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套装共11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目录

- [第1卷 文艺复兴：1493-1520年](#)
- [第2卷 宗教改革：1520-1559年](#)
- [第3卷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1559-1610年](#)
- [第5卷 法国的优势地位：1648-1688年](#)
- [第6卷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15/1725年](#)
- [第7卷 旧制度：1713-1763年](#)
- [第8卷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年](#)
- [第9卷 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年](#)
- [第10卷 欧洲势力的顶峰：1830-1870年](#)
- [第11卷 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
- [第12卷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年](#)

1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文艺复兴 1493—1520年

[英] G.R. 波特 (G.R. Potter)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1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文艺复兴 1493—1520年

[英] G. R. 波特 (G. R. Potter)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号：01-2018-79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卷, 文艺复兴：1493-1520年/（英）G. R. 波特（G. R. Potte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书名原文：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ISBN 978-7-5203-2597-4

I. ①新… II. ①G…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493-1520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3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42

字数 718千字

纸书定价 15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Vol.1 :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ISBN 978-052109974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平装版前言

本书是在20多年前规划和编写的。这篇前言所增补的导言则是1956年在多少有点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1]倘若这篇导言写于1975年，它将会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不消说，就连此书本身也会有所改变。波特教授的写作班子是当时他所能罗致的那一批人，此外，倘有可能，无疑还有一些他极愿延揽的作者。^[2]但是我认为本卷的编年上的局限性及其在其他有关丛书中的地位，对于可以延揽的人选造成了严重的限制。乔治·克拉克爵士在后面（见xxxiv页^[3]）写道，阿克顿勋爵提出了关于《剑桥近代史》的精心擘划，同一出版社又有《中世纪史》（1911—1936年）问世，然后不妨说是由于追本溯源，又出版了《古代史》（1923—1939年），此外，还有关于不列颠帝国及其他地区的著作。因此，就有必要对《剑桥近代史》重新加以剪裁，以配合已有的模式。这部著作的头两卷就势必要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题名了。

近年来，在震撼历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变革中，抛弃旧时的“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硬性划分的愿望可以被认为占有首要的地位。由于人们采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主要表示一个时期，而并不指贯穿某一时期的一次文化转折点，因此这种愿望时常能得到满足。在美国，“文艺复兴”确实很合宜地包括了从彼特拉克到维科的几个世纪；在本卷中，“文艺复兴”这一标题概括了如标题所精确表明的由1493年到1520年这一时期内对欧洲历史许多方面主要发展的评述。按这个意义使用这个名词来说明一个时期，姑且不论这个时期长短如何，则使这个名词失去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在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加上“文艺复兴”的标签，正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标签一样。只要这个名词的两种解释不致混淆，这倒是解决困难的一个十分合适的办法。正如下文所述（见第2页），稍后被尊为理科的那些科学的先驱者，就其旨趣来说也不是人文主义的。作为“文艺复兴”重大改革的学校新课程中（美术方面同时也有平行的发展），数学这门温文尔雅的学科自然只准占有一席卑微的地位。但是，课程表上占压倒优势的

却是拉丁文。拉丁文之所以必要，不再是因为人们要用它来诵习圣经和祈祷书，而是因为拉丁文是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语言，它本身就代表真和美。凭借拉丁文，人们可以获得最高级的能力——交往的能力。当然，这种交往也常常不用拉丁文，虽然使用拉丁文的场合毕竟多得惊人。即使人们说的和写的是意大利语、法语或其他国语，那些粗通文墨而地位显赫的人们却全都上过同一类的文法学校，全都熟悉基本的拉丁文典籍。甚至那些对学术毫无兴趣而只想在社会上找个适当位置的人们，也强迫自己把拉丁语法中的夺格独立句灌输到自己的头脑中去，并往往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即后来阿谢姆所谓的“睽违本性”的代价。

而且，使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示一个时期，将会促使我们超越历史学家们为方便起见而用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暂时界线，而现时的研究者们更不得不如此。正是由于抛弃了这种人为的界线，我们才能对托马斯·莫尔和路德这样的人物有了许多新的见解。从埃尔顿教授给《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平装本所写的前言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的宗教改革研究已经在什么程度上开始强调中世纪对16世纪主要宗教思想所提供的前例和所产生的影响。

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对古典学术和中世纪的研究更不待言）确有影响的一个变化，就是至少在英语国家的学校中，拉丁文教学量的急剧下降。不能否认这个过程由来已久，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准备日后在大学攻读文科各系的青少年，都得接受某种拉丁文训练。在过去25年的时间内，在英国和英联邦，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在北美国家中下降的情况并不那么显著，但那只是因为那里的中等学校没有普遍推行拉丁文教学的缘故。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后果之一是学生在阅读较古的典范著作时遇到了困难，这些著作虽用他们的本国语言写成，但有相当数量的引文和引喻采用了“晦涩费解的学究语言”。教科书甚至专门著作现在都必须提供译文，至少也要给这种材料作出详尽的诠释。这有所失，也必有所得。让一位学者断定他的引文究竟含义何在，有时也并非坏事。同时，现有的“文艺复兴”典籍的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相当显著的增加。例如莫尔和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就他们最流行的作品来说，在他们生前当然大体上都有了译文。但是“都铎时期译本”是出名的不可靠，处处涉及对古词古语或废词废语的理解问题。后来的译文，

尤其是19世纪出版的译文，往往粗制滥造，是早期误译本的低级“现代化”，既无文采，也不求具有学术价值。（典型的例子是普拉蒂纳《教皇列传》的英译本）但在近20年来，这方面却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有两项充满雄心和引人注目的事业必须作为例子提出^[4]。1963年，耶鲁大学编辑的《托马斯·莫尔全集》第二卷（系全集中最先出版的一本）《英王理查三世史》问世。莫尔曾出版过一个英文版本，这次则被耶鲁大学的编者R. S. 西尔威斯特印在该书的对照页上。接着出版的第二本是《乌托邦》（全集的第四卷，1965年），本文经过耶稣会的爱德华·苏尔茨的认真校订并附有他的译文，此外还有J. H. 赫克斯特的权威性的长篇序文。全集正在继续出版。同时在多伦多发起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计划：将伊拉斯谟的著作全部译成英文。出版的全集第一卷收集了他早年的书信（按P. S. 艾伦的编号是1—141号）：这一部分由R. A. B. 迈纳斯和D. F. S. 汤姆森翻译的《书信集》，由华莱士·K. 弗格森编辑，1974年出版。编辑部谨慎地避免说明，按这一规划最后还需要出版多少卷。

还有许多次要的实例，如以各种现代语言出版了与原文对照的译文，有的译本妥善贴切，可以使读者信赖，有的还附以渊博的评注，竭力想免除学者翻阅原文之劳。这当然绝不是说，不附译文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原著审定本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已停止。伊拉斯谟再一次成为一个例子。一支由各国学者组成的队伍已经着手出版他的1703—1706年莱顿版全集的新修订本。1969年第一分册已在阿姆斯特丹问世。

另一个新的发展是围绕某一题目组织出版不同作者的文集。这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虽不是独特的，却是最显著的现象。三种这类著作证明影响很大：E. F. 雅各布主编的《文艺复兴研究》（1960年）、N. 鲁宾斯坦主编的《佛罗伦萨研究》（1969年）和约翰·黑尔主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论文集）》（1973年）。从这些书名即可看出重视对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研究，这相当公正地反映出大多数关于意大利的研究的方向，至少就英、美学者来说，情况如此；其他大城市相对地受到漠视，尽管（举例说）特雷卡尼·德利·阿尔菲耶里所著的《米兰史》有关各卷描绘了令人兴奋的图景。文艺复兴早期的罗马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着笔，虽然在城市建设和美术方面现在已有一些优秀的著述；我们不妨举出T. 马格纳森的《罗马十五世纪建筑研究》（1958年）和L. D. 埃特林格的《米开朗琪罗以前的西斯廷小教

堂》（1965年）。上述研究集中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方面（尤其是英文著作），这反映了相沿成习的非学术性的研究倾向，也反映了它们的图书馆设备大大超过了意大利的一般水平。当然，这两个城市也都拥有十分可观的文献，目前时常被那些渴望填平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鸿沟的学者们所利用。电子计算机的影子正笼罩着文艺复兴时期。

直到作为本卷正式结尾时期的16世纪20年代为止，意大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积极地倡导新的人文学科和新的艺术。当时只有伊拉斯谟、比代和莫尔达到了比较伟大的意大利学者和文人的地位，所以他们近年来已经获得了应得的承认。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对于其他作家仅作出一些不完整的评价。15世纪时北方对意大利的文化影响至今还很少引人注目，而意大利对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前人文主义”的贡献也仍有很多问题尚未阐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我们的知识确实仍然如14世纪以前一样贫乏。但是，法国是一个进行研究较多的国家。弗朗哥·西蒙娜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法兰西文艺复兴》（1961年）；最近尤金·F. 赖斯又在他审订的重要版本《增加序文的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信函集及有关文选》中向我们提出：“在1490—1510年间勒费弗尔及其集团为改革文科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标志着使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文化纲领适应于巴黎大学教育传统的最重要的阶段。”勒费弗尔显然是旧事物即中世纪事物和新思想相交融的一个实例。德意志的修道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又是一个这种有趣的结合的实例。克劳斯·阿诺德为他写下了一本值得欢迎的专著（1971年）。研究这个时期的专家们即便在许多方面尚须探索，但是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年刊《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世界书目》，1966年在日内瓦发刊，内有一篇关于1965年出版的著作的评介。

本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以“文艺复兴”作为题名，并在前面几段叙述中约略地谈到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变化以及所做的新贡献。在这一方面，本来还有许多话可说。譬如，人们对于修辞学产生了新的和活跃的兴趣。如果我们要适当地理解当时人文主义者企图说些什么，就必须掌握从古代和中世纪修辞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种种假设。对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传记和成就的研究，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活跃气氛。就本卷所涉及的时期来说，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著作《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而以

前自兰克以来，凡是解释这一时期意大利和欧洲的背景，都以上述两位史学家的论述为依归。关于在法律与历史之间这时刚刚开始的一种丰富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例如可以参阅：唐纳德·K. 凯利的《近代历史学术研究的基础》（1970年），并和下面xx页富有洞察力的评论进行比较。

自从本书最初问世以来，与后面各章有关的一切学科都出现了许多对我们的知识大有裨益的著作，即使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几本，也就超过了本文作者的能力，同时亦非这篇增补性的简短前言的篇幅所能容纳。如要这样做，也只能开出一张甚至比上面举的几本文化史方面的书籍更具特色的书单。最后只能提一下我们在从原编问世到新编本问世之间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总的设想可能已经改变的一两个方面。

我们所有的人现在都面临的一种空前规模的严重的经验是通货膨胀。这一情况今天对于讨论过去被称为“16世纪物价革命”的问题来说，产生了显著的限制作用。经济学家如今坦然承认他们既不能解释，更不能控制我们的困境。同样，经济史学家对于16世纪中期比较温和的波动都比较缄默，本书下面将要谈到在国外探险和开发方面这种波动的开始出现。

1962年，已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时，另一个已告结束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也就是说，以前被认为不得翻案的背离罗马天主教学说和实践的一整套主张和行动又作为可行的方案重新出现。全基督教公会议的作用和权威问题便是一个例子。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康斯坦茨和巴塞会议上，公会议至上主义者所做的努力被特兰托会议所挫败，而最后则被把宣布教皇永无谬误当作信条的卑屈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破坏无遗。主教在教会行政中所处的位置可以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查，“首脑和肢体”又重新与实际情况符合。此外，教士结婚问题、罗马教会受赠财产和财务监督（甚至在“官定”的地区）问题、俗人信徒领“圣杯”问题（当胡斯被囚在康斯坦茨时早已在波希米亚成为一个争端）——这一切热烈争论的问题如今都可以听任研究罗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们自由辩论，而对其他人来说，则解除了忏悔的痛苦，他们赞同罗马教会圣餐礼的简化并在圣餐礼上采用本国语言

（这对于拉丁文则是进一步的打击）。从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看来，原来似乎作为结束语的话反而可以成为新章节的开场白了。

欧洲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宗教生活是本卷多少予以忽视的另一领域，因为除了研究德意志神秘主义和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者以外，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发表他们的著作。甚至教区的圣职人员，尽管在下面的论述中对他们较为严厉，但在当时的许多社团和行会中往往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本人在许多方面，从广义上来说才是进行“宗教活动的”。施舍和善行在各地平民百姓的生与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W.K. 乔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了英国当时的这种情况，而布赖恩·普兰则指出了威尼斯当时的情况。阿尔贝托·泰嫩蒂的杰出著作《文艺复兴时代生活中死与爱的面面观》（1957年）精心研究了这种心灵生活的图像。

许多政治问题不久前似乎早已有了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但如今看来也是同样地十分暧昧。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面目全非，这个事实现在很难加以漠视。旧的道理似乎减少了说服力：例如说15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由于联姻而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后来的联合王国；而更加著名的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姻最后产生了西班牙王国。（笔者不禁惭愧地指出，在本书第5页我曾写过“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终于出现了”）25年前，看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迟早会被消除，比方说德国仍将是一个德国，正如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始终没有变化一样。在我们的时代里，退化之说到处都有权威的鼓吹者，而且不论哪个大国或小国都不能肯定它的过去将决定它的未来。“任何事物在未发生前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公共事件的后果都是无法估量的。所有这些情况更加说明，尽管《剑桥史》各种著作有其权威性的面貌和悠久的生命力，但是“权威性的历史”已不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了（见后面xxiv—xxvi页）。

丹尼斯·海

[1] 当波特教授就任驻德文化参赞之际，本文作者即受托撰写导言并负责本卷出版事宜。

[2] 波特教授曾经写道：“本卷的计划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乔治·克拉克爵士明智的编辑‘方针’和两位著名作者不能撰写原来分给他们的章节。1950年初次约稿时，关于‘文艺复兴’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不寻常的转变状态。”

[3] 全书括号中的页码均指原书页码。——译者

[4] 公正地说，在中世纪史方面早就迈出了第一步的是《法国中世纪史文献》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史料》。《纳尔逊中世纪史料》始于1949年，现改名《牛津中世纪史料》继续出版。

总导言 史学与近代史学家

乔治·克拉克爵士

原来的《剑桥近代史》，即现在这套书的前身，在1896年由第一代阿克顿勋爵制订计划，而在1912年当地图卷问世时全部出齐了^[1]。从此以后，不论作为参考资料或是一般读物，《剑桥近代史》都成为一部人们所熟悉的标准著作。它是用英文出版的对当时学者们所认识到的前500年历史最有影响的评述。当时，在英国的大学里，历史作为一门考试科目，正吸引着相当多的、而且日益增加的选修者。这种兴趣向下扩展到一般学校，向外扩展到形形色色的男女知识分子，从而产生对历史书籍以及对历史书新品种的需求。教育内容的这种变化是由群众心理的许多变化造成的。有一批教育改革家提倡讲授历史，另一批教育改革家则提倡讲授自然科学，以代替旧有的课程，特别是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但是，教育界内部的宣传所反映的乃是教育界外部流行的意见。当英国政府在国内不断增加新的职能，在国外日益密切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时候，群众必然要讨论许多若不结合历史背景就难以阐明的问题。这样，当时产生一种渴望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的实用主义要求，也是非常合乎时宜的。同时人们也有一股把历史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热情，用以扩大思想境界，训练政治鉴别力，甚至进一步陶冶品德。两位担任主教的卓越的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和克赖顿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之列。最近刚刚逝世的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爵士是当时的帝国主义思潮的记述者。尤其重要的是，人们相信现已出现的一种比过去所实践的更为公正和更为精确的新历史学已经为理解过去和未来提供了线索。塞缪尔·罗森·加德纳正在显示用新方法研究英国历史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历史学家也训练自己运用这种难度很大的技术。尽管如此，现在仍缺乏用英文撰写的论述欧洲大陆历史的最新著作。除了克赖顿的《罗马教廷史》和西利的《施泰因传》以外，值得一提的巨著实在寥若晨星。为了一般的阅读目的，人们还必须利用老一代作家，如罗伯逊、考克斯、普雷斯科特、莫特利，甚至卡莱尔。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事们（其中有伟大的历史学家梅特兰）在1896年聘请阿克顿勋爵主持编纂一部《世界史》的时候，必然考虑到上述一些情况。阿克顿在前一年就任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除了讲课以外还没有决定从事什么工作。他对新历史科学的信念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他早年正是为捍卫这种科学而进行论战的。那时他主编杂志，试图表明如果他的教会对于“体现真理”的科学和“代表自由”的国家这二者的目标予以鼓励，则他们就会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没有迟疑多久，就接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们的邀请。他写道：“过去任何人都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使自己关于研究历史的见解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阿克顿最后接受邀请以前，编写计划曾经有过一些改动，其中之一必须在这里加以说明。出版社理事们压缩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因此现在的计划只包括“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史”。在这以前，就已经有一些著作家认为，这种以15世纪或15世纪前后为界，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的为人们所熟悉的、甚至所习惯的做法，并不十分切题，不如把分界定在较后时间，如17世纪的某个时期更为合宜。那些贬低早期变化的重要性而强调后期变化的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这种观点是颇感兴趣的。但是，由于两种原因，他们的看法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多加讨论。首先，它包含的意思，无非是认为，卷和章的划分应该依据事物的本质，而不仅是为了写作和授课的方便。其次，《剑桥中世纪史》已经问世，它与《近代史》正好首尾衔接。因此，在制订这套著作的计划时，近代史的年代上限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了。然而，有一个更广泛和更重要的问题不妨讨论一下：在近代史与其他较早的历史之间，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我们许多习惯的想法和说法中，都包含着这种远期和近期之间的区别。公元1世纪时，有好几位罗马著作家都讨论过古与今的界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方才合适。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为了把过去的历史分成便于研究的单元，必须给它划出一条或几条界线。但是，他们产生这样考虑的原因，表明彼此之间有无穷的分歧。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能够向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提供书面答案的任何最近时期的历史，都给以“近代”的名称。根据这种观点，古代或中世纪的历史乃是讲述人们的思想方法与我们现在不同的时代。例如，那时候的人不懂得把他们的经验归纳为统计资料或者甚至是确切的编年纪事。但

是，也有些人觉得人类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满足于将较远的时代与较近的时代划分开来，认为前者难以理解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太少，而对后者感到同样难以理解是由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又太多。当然，这后一类著作家喜欢较近时代胜过较远时代，因为，正如他们中间有一位所说：“历史科学……总是越来越有形成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对它的研究工作越做越好，而且，因为它变得一代比一代更适于研究。”^[2]然而，不幸的是，有些人认为近代史概念本身是荒谬的。有一种说法是：近代史这个专门名词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和近代相反的，凡是构成历史的东西都与我们对当今的认识不同，因此，除非历史学家假定过去已经完成和终止，否则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不论我们怎样给历史下定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历史所论述的是过去；不论我们把近代这个名词作什么解释，我们所指的必然是同当今密切关联的时间。任何事物越是属于历史的范畴，看来它就必然越不属于近代；反过来说，任何事物越是近代的，它也就越不可能是历史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听一听相反的论调。持相反论调的人同样似乎有理，同样自相矛盾，也许也同样浅薄得很。据他们说，“近代历史”一词是同义重复。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的，或者用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话来说，“一切真实历史就观念上讲都是当代史”^[3]。因为，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实或者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

现在有数目很多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的男男女女用他们的部分、甚至全部工作时间去钻研近代的历史，尽管我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他们为何从事这种工作，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他们中间有少数人是单独地工作，然而，由于他们所使用的书籍和手稿都是经过他人编写或整理的，因此甚至这些独立研究者的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活动。绝大多数人属于各种组织，如研究机构、大学、科学院、出版社、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历史学家协会，或者历史某一支研究者的协会。他们向评论杂志和研究刊物投稿。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和博物馆员（其中有许多高级专家）为他们搜集、整理和编纂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原始材料和半成品，以及早期研究的成品。上述各种组织以通信、会议和其他交流方式，在互相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科学和学术

机构之间发生联系。所有参加研究以及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都把近代历史的研究事业当作一个兴旺的企业，一个巨大的工作者组织。

在各大学里，系统讲授历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固定的课程，而且已经有了许多讲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教科书。有些教科书是一般性的，其他则是讲述被人扣上“辅助科学”这样一顶怪帽子的东西，如年代学、目录学、古字体学、古文书学以及对于印玺的研究（有时称印章学，有时甚至不太文雅地称图章学）。然而人们认为，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选用非历史著作家的普遍概念一样，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大多数实际工作，也要依靠一些通常不称为历史研究的其他研究。它们是把学术研究工作与非学术性工作加以区别的那种思想习惯的实际运用。其中有几种，早在历史学家认为有用之前，律师们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在6世纪，一个律师如果不审核一项法律的全文而只就其中的某一条文发表意见，他就没有当律师的资格[4]。现在，如果一位历史学家只是以史论史，也同样不够历史学家的资格。在15世纪，欧洲的法学家们一般地说，在判断古文件的真伪和确定其意义方面，都是很熟练的。基督教的教士们研究各种不同计时制之间的关系。古典学者们对残缺书本的校订工作正在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家们运用所有这些新的和旧的技巧，正如他们遵循总的思想潮流一样，在他们的论述中排除神异的奇迹和占星术的影响。在最近几个世纪，他们从自然科学中把想要拟定一般规律的雄心壮志接收过来，并用某种进化论原则去解释一些特定事件或一个比较广泛的历史历程。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借用了许多研究细节的方法。近来他们埋头研究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开始时在经济史中使用，现在则在书目史、教会史等不同领域中予以使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一种特殊的归纳论证，经过彻底考查所有可用的证据来找出真理。他们企图“完全占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尽管有一点令人惴惴不安：哪怕是一个狭窄的、特殊的历史研究课题，我们也不可能对有关资料网罗无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掌握了与他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所有资料，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而永远不会被新出现的资料弄得前功尽弃。无论研究课题的范围多么狭窄，无论对它加以论述的方面多么有限，有关资料的数量还是十分庞大，一个想要通晓全部资料的历史学家不能不放弃独立处理全部资料的企图。他可以毫不怀疑地采用其他学者关于某一边缘领域的论述。他可以满足于对某

个庞大组织的联合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由这个组织设法使他的发现和别人的发现互相配合起来。总之，我们向“完全占有”走得越近，我们离开原始的历史学家式的精确性就会越远。历史学家仿佛是兼容并蓄地采用了他人手头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表面现象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方法，或技术、或门径。历史学家依靠这种方法来对思想做出贡献。他们的所有研究课题都是探讨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生活，他们的专业就是整理他们的研究资料，使其前后连续，时序相接，成为有机联系的东西。任何一个要从一大堆混乱的资料中寻求确证的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有把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东西和无关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方法。他必须具备筛选证据的能力。这样一来，当他给一个结论找到充分的证据或者最有利的证据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其他的资料作为多余的东西统统丢弃。他要从每一项资料中提取而且仅仅是提取那些只是有助于理解他的研究课题的东西。律师们必须遵循关于何种证据可以采纳的规定。科学家们要为所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而准备进行实验。历史学家们必须从一切可能包含着有关情报的书籍、手稿和实物中找出他们的证据。在这些资料中，有些手写或印刷的文件或者实物，正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事件或时期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有一些当时和嗣后的著作、图画和其他物品对于过去的事件提供情报而不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某一事件本身没有留下任何可查的记录，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许多了解那一事件的方法。一种普遍的设想是：历史学家对于越是早期的证据越是相信，并据此做出初步筛选。许多历史学家把原始的或第一手的证据与第二手证据区别开来。如果第一类中除了确是各种事件中遗留下来的材料而外，还包括有任何其他东西，二者就失去明显的区别了。在报纸上发表的或在外交公文中传达的一次演讲，很可能是在发表演讲后立即写成的，但它也不能像录音那样完全是第一手材料，因为：不论方法是如何次要，但毕竟有另一个人加以干预，可能造成错误甚至以讹传讹。一份在演讲发表后写成的摘要，哪怕是由演讲者亲自执笔，也仍会离题很远，关于经历了漫长时期的许多事件，我们有回忆录和历史书籍提供最好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仅更加久远，而且含有编撰者个人的好恶在内。一切解释都取决于证据的选择，一旦把证据选择出来，不管是信手拈来还是去伪存真，这种选择都会支配任何可能的解释。既然我们的一切证据都经过有意或无意的选择，那

么，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证据一定都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与它们难以辨认的来龙去脉有关的一切进行过核对。

因此，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的区别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简单，而且也不那么有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回答问题，即使他们知道随着工作的进展，问题本身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他们愿意通过第二手证据来处理第一手证据。这样做，好处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位历史学家限于研究只是第一手证据或者最接近第一手的证据，他就会耗费几小时去译解已经刊印而仅用几分钟就能看完的手稿。如果在已经刊印的著作中他只阅读原始文件，那么，他就必须把前人所做的那些可以减少他的劳动的事情亲自重做一遍。严格地说，只凭第一手证据是不可能获得历史知识的。仅仅为了知道有这样的证据存在和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历史学家就必须从证据以外了解有关的一些情况。16世纪和17世纪关于在宗教问题上究竟应该依据圣经还是圣传的争论，与我们今天的争论十分相似。约翰·塞尔登完全驳倒了那种认为信仰和实践应该而且只能够以圣经为依据的论点。他说：“不管你怎样反对圣传，我们却只能根据圣传了解圣经文字的意义……就拿*In principio erat verbum*这句话来说吧，你怎么知道它的意思是‘言词在先’呢？不过是根据圣传，因为有人告诉过你。”

[\[5\]](#) 由于历史不能仅仅依靠对原始资料的理解，为了不被后世著作的谬误和增删引入歧途，最好是先研究一下这些后世的著作，然后再追本溯源。

实际上，时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位历史学家本来打算纠正一部权威著作的错误，但是他却未能摆脱其中的种种假说，而且举出新的证据却没有看到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另一些人则由于某种原因，不受他的假说的束缚，而更清楚地看到这一新证据的作用。人们当然会作出这样的推论：如果想要看清每件事情，就必须从思想中排除所有的假说。这就是某些历史学家重视第一手资料、而轻视第二手资料的一个理由，而且也只是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根据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就使人容易从现在向过去追本溯源地阅读历史。有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拿一个时代的成就作标准去责难另一个时代的缺陷，要不然，就根据事情的结果，或者以自己的时代作为尺度去断定是非。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也许会避免这些错误，但是他们仍有可能无意识地用自己的时代或者某一中间时代的眼光去观察较早的时期。例如，据说

约翰·赫伊津哈虽然学识渊博，而且感受性强，但是他对伊拉斯谟时代的观察却过多地采用18世纪的观点。实际上，一切重视思想明彻和表达清晰的学者都难以脱离18世纪的定论。如果向前看历史的话，那就要置身于川流不息事件的长河中，使自己同那个时代融为一体，只去了解和体会在那个时代能被人了解和体会的一切。这正是塞缪尔·劳森·加德纳想要做的。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翻阅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法规、公文和书信，而不是向前看，到下个时代的资料中去查考任何事件会产生什么后果。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会充满这样的感情：他已离开和忘掉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融化在眼前的古书和羊皮纸堆中。那些学问非常渊博而且保留诗人气质的历史学家最富于这种感情。还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感情本身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值得用生花的妙笔传达给每一个能够接受的读者。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情体验的问题，因为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会重视最佳史料的真实性。如果他能够使过去重新体现，并从自己的头脑中把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予以清除，那么，他就能使自己单纯的研究目标分离出来。因此，许多讲授历史研究法的教师指导他们的学生直接去找原始证据，并首先掌握它们。最严格遵循这种学说的信徒们在他们的论文的书注中绝对不提以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而且，除了接近于文摘性质的专题著作的编纂者以外，他们也绝对不提任何同时代的人。不错，他们使用字典、书目以及其他许多种参考工具书，但是这些治学工具看来也没有个人成分在内，就像《航海历书》一样，既无个人的偏见，也没有主观的解释。利用治学工具的技巧，即运用辅助科学，自有天真无邪的乐趣在其中。“纯粹历史”本身似乎就是最终目标，就是一种审美活动，既不受功利主义目标，也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

这不是编纂《剑桥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所持的态度。当然，在他们这一学派中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表述他们最显著的共同特点的适当名称。他们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但是，“自由主义”一词含有多种意义。在欧洲大陆上，它往往含有敌视教会、甚至敌视宗教的意思；但在英国，在这一学派的伟大著作家中就有斯塔布斯主教、克赖顿主教和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阿克顿勋爵。在某些方面，他们坚持18世纪的态度，特别把那些似乎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当作伪史加以摒弃；在其他方面，他们从自己最伟大的导师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早期著作中接受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

响，即强调种族、民族或时代之间的不同，认为这种差异是不能排除的东西。从他们对他们所用的资料的关系中，最容易看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19世纪期间，由于档案的开放而增加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各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经过批准的人们去阅读它们储藏的文件，甚至花费大量金钱去刊印有关较早时期的文件选辑。现在，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更加自由地开放他们的宝库。所有的政府依然把某些文件严密地锁藏起来，把公开提供研究的较旧文件与非常接近现代而必须保密的文件截然分开；但是，远在19世纪结束以前，一个文明的首都通常都有一些实际上公开的研究室，可以借阅官方的历史记录。利用这些记录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熟悉有关他们的研究课题的出版文献，而且大多是独自进行研究，至多也不过有几名抄写员协助而已。面对着在写成后不久即无人过问的浩如烟海的文件，他们并不渴望查阅与他们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每一个字。因为，那要等到不仅是官方档案馆而且还有一些大型图书馆的存书清单和目录有了很大的改进才能实现。他们只能撷英拔萃，挑选那些可以纠正通常说法或在矛盾说法中做出抉择的历史记录。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正如19世纪的科学家们一样，是以他们的发现而自豪的。阿克顿认为兰克是最初的和最重要的开拓者。看来，以准确的知识为尺度去发现错误，就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因此，十分重视校订原文以恢复被篡改或误读的文件真实词句。其次，他们研究了各种证据的分类。正如研究手稿来源的古典学者一样，历史学家创造了对历史记载溯本求源的一整套方法，从而能够去伪存真，从原始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不大赞赏可能性或推断性的证据。他们以严酷的事实进行对比来粉碎谎言或传奇，取得了许多成就，从而认为事实是不可摧毁的最小单元，这些最小单元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真正的历史。他们抱着这样一种信心，觉得将来总有一天能够写出“权威性的历史”。

晚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并不瞻望任何这样的前景。他们预料自己的工作会不断地新旧交替。他们认为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一个或更多人的思想传播下来的，是经过他们“加工”的东西，因此不可能由无法更改的那种基本的和毫无个性的最小单元所组成。他们甚至认为，就连在各个时代考古学用来作为证据的实物也不具有这些性质。一件燧石器不论多么耐久，一座金字塔不论多么巨大，如果我们不考察与之有关联的事物，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而不是与它们类似的其他东西留传下来，它们就不能产生充分的证明作用。剔精

抉微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有些急躁的学者就遁入怀疑主义，至少遁入这样一种学说：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涉及个人与观点，则一种判断与另一种判断同样有道理，因而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存在。

19世纪崇尚事实的目的之一，旨在防止这种相对主义。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寻根究底地问一下究竟什么是事实，看来只要不是虚构或理论就够了；他们对于事实往往用“确凿”二字来形容。不管其他方面有什么可疑之处，事实看来总是真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揭示真实的过去情况，而每个事实都是过去真实情况的组成部分。当我们着手修复残缺的铭文时，我们假定它原来是完整的，在残缺的地方有过文字，不管我们能否将那些文字复原，它们总是不能更改的。同样，当我们着手发现任何失传的事实或纠正任何历史记载的错误时，我们假定已知的过去和未知的过去都是存在的。在我们印欧语言的结构中就包含着这一类的假定：动词的各种时态表示时间和变化，有些时态则表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我们对过去有一些了解，我们还可能知道得更多。我们从历史的已知情况走向未知情况时，使用我们惯用的试验方法把真实知识和主观见解区别开来。一个试验方法是看是否前后连贯。如果据称是新的事实与我们的历史知识不能互相一致，那就必须修正或摒弃其中之一。已知的和未知的真实历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绝不仅仅是它的每个单独的组成部分都可能被新发现所推翻的那种整体。除了要前后连贯以外，它在某些方面是确定的，是永世不移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绝非老生常谈而已。古谚有云：

Hoc namque damtaxat negatum etiam Deo est Quae facta sunt, infecta posse reddere.

（只要存在事实，上帝难改历史。）[\[6\]](#)

有些研究工作者采取的方法表明他们认为存在着具有统一结构的真实历史，而且在了解更多的真实历史方面，不断地变得更有技巧，但却往往忘记这样一件事：在全部真实历史中，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历史的绝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永远也不可能用我们拥有的手段使之再现出来。在地球表面上生活过的亿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的某些情况留下了记载。如果我们把这几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小时内所意识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那就需要写成很多卷书册。即便有那样一部详细的记录，它也还够不

上一部失传的百科全书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逗点。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我们能够知道的一鳞半爪，而且意味着要掌握全部历史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另外，还意味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能不应与一个地图绘制者相提并论，地图绘制者只是缩小一块土地的比例和面貌。不错，地图绘制者也会显出他的知识的不足：凡是没有勘察过的沙漠，或者没有测量过的海洋，他就要留下个空白。另外，在他的地图中还有一种空白，表示没有特征的地区，亦即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使他希望加以表示的一部分地球表面。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还有第三种空白。这种空白是不可能用勘探或测量来填补的，然而，它却不是表示那里从来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只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他只要从已知的一系列事件，合理地推论出已经失传的事件必然是个什么样子，就可以解决。一些历史学家有时小规模地使用这个办法，正如统计学家增添几个数字一样。但是，当他们把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他们似乎就必须承认，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有许多种类的不同。他们所未知者乃是他们的知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们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的资料是经过无意或有意筛选的。他们继续做进一步的筛选。但是，他们不仅仅是从大量庞杂的资料中提取精华。他们所进行的一种筛选大大超出舍彼取此的范围。

如果编写史书仅仅把事实罗列在一起，那就不会有严整的布局，而只是杂乱的堆砌。许多写历史书的人都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的确，这可以被称为古典的观点。例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者爱德华·吉本，有时被认为是文学家而不是严肃的思想家，他把“公民的审慎”（civil prudence）作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品德。他所使用的“公民的审慎”一语有着很长的、奇特的历史[7]。即便吉本在落笔时并未考虑过去已经有不少人说过这句话，他也不过是在重复疏善的把关心公共事务当作优秀历史学家的天赋才能的见解而已[8]。“公民的审慎”，亦即对政治的判断力，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智能特性。它是正确判断具体情况的能力，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对一个人、一匹马或一幅画的正确判断一样。

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的这一古典观点，是同历史乃是“承续意识”（das Bewusstsein der Continuität）[9]的说法相一致的。事实的确可能是这样的：在历史知识十分缺乏而且只由少数知识分子

掌握的较早时代，不论对于过去所能知道的东西多么有限，但是过去还是贯穿、启迪和支配了现在，这种情况甚至比今天更为显著。历史从来不是代替另外一些古老的、基本的传统，而只是将其发扬光大而已。最低一级的承续是宇宙的物理延续。第二个主要的承续是生物的延续。家系学是一种原始的历史，但它并不是由于考虑已有的资料，即结婚和出生的事实而兴起的。对于这些事实的知识不但是在关于家系的知识中产生的，而且是随着关于家系的知识一同出现的，它是在本能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复杂经验中的一个结晶。不管在哪里，遗传仍然是社会延续的一个因素，即便在其性质和功用已经大大改变的社会里，家庭依旧是基本结构之一。可是家庭提供的延续一向是由有意识的知识，由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连续来确定和巩固下来的。继承的和交迭的世代把已经具有的特性遗传下去。然而，口头传述并不是有意识地承袭过去的唯一方法。语言的运用即使达到极其巧妙的程度，也永远不可能恢复任何经验的全部。因此，在口头传述之外，而且有时在与口头传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还有另一种使各种事件铭记在心以便重新忆起的方法。这就是礼仪。为了使社会有秩序，就必须让仅仅那些具有适当资格的人，那些应该继承过去的人享有国王的威严或夫人的地位，执行祭司的职务或运用教师的权利，行使地主要佃户服役的权利或佃户拥有土地上的产物的权利。因此，自古以来就以典礼的方法使这些权利地位深深印在参加仪式者的头脑里，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一些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每次正式结婚都用一枚戒指来表示，然而我们的报纸却报道当前的国王加冕典礼、教职授予式、圣职授予式、爵位授予式、学位授予式、神职任命式。举行这些仪式并不是因为宣布这类事件的《伦敦公报》或法律文件会有消灭或引起争论的任何危险，而是由于在每一项仪式之中都有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在较早时期，即使有体现法律行为的文件，也还要举行仪式，而且仪式比文件更起作用。当我们不相信语言能有效地记录下事件的实质时，我们就保留礼仪。

历史书籍确实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最可靠的知识。书面语言即使不像口头语言那样生动，却比它更加精确，而且更容易用于研究。可是，文字记载并没有使口头传说处于无用的地位。重音和语调是只能传授而不能记载的。文字历史依然深受物理的、生物的、仪式的和传统的延续的影响。这些延续并不十分清晰明确，但它们有独立的价值，而且有时能够解释文字记载中所保存的东西。所有这些延续

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使现代与过去协调一致的工具，因而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不错，历史所提供的延续也有与其他延续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其他任何延续一旦中断，就再也不能重新使它连贯起来。一个家族如果绝嗣，这个家族就算终结；当最后一位行吟诗人死去时，他的未用文字记下的歌谣便和他一同消亡。然而，历史能够被人忽略或忘记几个世纪，但它会重新出现。也许在所有的历史发现中，由能够解读失传文字的学者们所做出的发现最为突出。即便历史资料的语言是人所熟悉的，它们的原意仍可能被遗忘。一个文件可能显得它的含义与执笔者的原意大不相同。例如，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指责英国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仍然忠诚于其侄查理五世，因为她用西班牙语给侄儿写信时，在签名上面写了“吻您的手”几个字。如果这位历史学家翻阅一下初级西班牙语语法，就会发现现在仍然和当时一样，“吻您的手”不过是结束一封书信的通用格式而已。如果历史研究能够通过解读文件重新接上已经中断的延续，那么，它把各种有关的知识运用到历史的每个方面，就会使那些延续变得焕然一新。

历史学家的目标，和探求与过去相连续的知识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同样广泛。一个人由于众多原因中的某个原因，可能希望探索出某个乡村、城镇或民族，某种制度、习惯或信仰与过去的相连续的关系。在一个极端，像米什莱那样一位天才作家，可能是为了发表他对民族的光荣和苦难的历史的看法。在另一个极端，也有一些人是为了简单的实际原因。一个市镇官员为了弄清谁有确定通行税的权利，会从旧的契据中查明渡口的所有权。律师们经常寻找为他的当事人进行辩护的证据。各政党都设研究部门，以便为决定政策和进行宣传提供资料。艾伦比勋爵在计划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曾阅读《旧约》中所记载的战役和古罗马人的战役的情况。另外还有同样简单的感情因素或审美原因。一个古堡的主人或一座古城的居民，可能仅仅出于惊异和好奇而钻研有关古堡或古城的记录。一部记述拿破仑历次战役的书，尽管只作为一个冒险故事，却可能引起对于战略战术毫无兴趣的读者们注目。但是实际上，历史学家的兴趣很少是单纯的。在任何一位著作家的头脑里，往往都有几种不同的兴趣同时存在：许多军事史学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著述，而许多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却又不知不觉地去学习战术的技术细节。的确，现在历史学有数不清的分支，每个分

支都单独地研究一项特殊的问题。在规模较大的大学里，既有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专家，也有法律史、军事史、文学史、教会史和经济史的专家；有些大学还专门开设艺术史、科学与技术史和哲学史的课程。然而，这些特殊分支是与通史结合起来讲授和学习的。在通史中，对于某些分支注意的程度有大有小，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分支，即便没有提供最后的总结，毕竟会提供导言或基本论述。这就是历史研究与教学这种兴旺的事业的现行工作的组织情况；而这种组织的形式符合于历史学家们共同主张的要求。一般来说，正是这种共同主张决定了课题的选择。人们有时企图证明历史的这一分支或那一分支比所有其他分支都更真实地属于历史范畴，或者成为其他所有分支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在探索真实的过去，那么，我们会愿意相信，任何为发现真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都会揭示真实的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绝不会说历史的某一分支比另一个分支更加正统，或说一个分支的历史性质取决于它在广阔的历史领域中选择什么课题。

研究什么历史课题和为什么进行研究，取决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显然毫不相干的情况。那些在历史研究之前进行的并成为历史研究依据的其他活动也是如此。首先是记录活动。这种活动为要了解当时已成为过去的事情的那些人们做好了准备。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一个事务很简单的私人，除了一个银行存折、几封书信和几张收据以外，可能不保存什么记录；但是，一个富翁就会需要几间契据保管室和一大群秘书。各种企业，甚至小型企业，都苦于为它们在营业中累积的记录寻找存放的场所。政府部门和地方当局经常雇用受过训练的档案员，这些人按照精心制定的规章，决定在交给他们处理的文件中，哪些要保存，哪些要销毁。还有一些职业的或者属于志愿团体的专家给各公司当顾问，告诉他们怎样选择和保存记录以及如何处理那些虽然有保存价值却无处存放的档案。保管记录的人员必须了解登记和存档的困难的技术问题，也必须考虑安全和保密一类问题。但是，尽管有这样完备的组织和技术，记录数量的增加却已经超过了能期望其中的大部分会有人使用的程度。由于日益复杂的社会迫切需要，新的记录手段已经不断地得到采用。速记、打字、录音、摄影和电影，都在日常工作中留下大堆的资料。

在这个时期，大体上说，即在过去的60年间，当全世界的办公室里普遍出现这种过剩现象的时候，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增加了许多倍；要求他们进行研究的项目也同样迅速增多；他们研究更多的生活情况和更多的时期；特别是，他们已经开始考察最近的过去。对于研究这些课题，资料的大量增加似乎是很有利的。如果大量的资料难于处理，共同研究可以适用分工的原则。我们不可能断定任何一篇论文就不会为现在还无人能够预见到的某一问题提供答案，或者不会为至今还无人想要描绘的一幅图画填补一个空白。因此，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呼吁保存记录；但是，浩如烟海的大量记录迟早必须销毁，而且早销毁比晚销毁更为省钱省事。的确，记录工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经过很多困难，也只不过使它对于历史学家并不迫切的研究课题有用。记录工作甚至使大量文件阻碍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成千上万的委员每天坐在桌旁，面前堆满看不完的文件。尽管文件的内容摘要、索引和表格十分完善，但是，由于废话连篇，实在令人难以读到关键性的几句话。因此，行政人员就面临一个寻求限制公文数量的方法问题，换言之，就是寻求选择文件的方法，以便为当前事务的短期目的服务而不必考虑历史学家的长远需要。同一个人，在进行工作中有时会兼顾两种选择。一位想要撰写回忆录的政治家很可能保存许多在一个部门的档案海洋中容易被湮没的珍闻。不过，即使由一个人同时做两种选择（一般为两个前后连接的筛选阶段），这两种选择实质上也是不同的。

在做出任何选择时，历史学家当然要求保证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行政人员对此却不一定慨然应允。同样，当材料已经选定时，行政人员也不一定允许学者们随便接触。在过去几百年间，对于某些种类的记录，公众拥有为了一定目的而去查考的合法权利。死者的遗嘱予以公布，是为了使那些从遗嘱中受惠的人得知他们的权利。一般民众也有了解某些种类的议事记录（例如英国议会记录）的合法权利。这种特殊权利是经过长期的和激烈的斗争才取得的。现代各国政府拥有构成某些社会科学的主要资料的记录。但是，各国政府只是按照自己的规章才准人们进行查阅。许多国家还坚持它们对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官方文件的所有权，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那些文件中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防止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个人利用那些文件去反对它们。由于各国政府在较早时期只是部分地控制它们拥有合法权利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资料合法地或非法地掌

握在私人手里，因此，它们除了公开官方档案以外，为了使工作能圆满地完成，当然还要鼓励私人档案的开放，例如将私人档案编成目录，刊印部分内容，控制或资助收藏手稿的图书馆。这样一来，历史学家们开始对那些收藏的档案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们请求那些收藏物的所有者允许他们去进行研究，但并不是永远能达到目的。传送和照相技术的每一项改进都使得人们更易于查阅文件，因而在查阅文件时所遭到的任何失败似乎会令人感到更为可惜。同时，由于历史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的教育基础，成为研究和解释公共事务的良好手段，历史的编纂也就成为公共的事业，至少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事业。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作为公仆就有权查阅他们所要使用的资料。

历史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有时政府代替历史学家提出查阅资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历史学家向政府提出这一要求。根据历史编纂的性质，几乎必然产生这样的后果：一切拼命争夺权势或企图控制舆论的人，必然想要历史学家为他们服务。15世纪，勃艮第的公爵们设有编年史官和一般史官，其区别大概是：前者记录当时的事件，后者编纂过去的历史。从17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起，王公们就为了使历史学家能够编写历史而刊印他们自己的文档的大量摘录。随着19世纪公众教育的发展，随着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规模与经费的增加，各国政府都拨出资金来维持庞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所有的阶级都欣赏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因此，查阅历史资料的要求就成为公众想要欣赏一向被所有者拒绝或限制观赏的那些东西的普遍要求的一部分。当资料所有者自愿做出让步的时候，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政府也极力支持，并且乘机扩大它作为总的资料编目者和观赏组织者的职能。国家肖像陈列馆搜集有关英国所有历史肖像的情报；国家档案注册局登记一切公有或私有的古代文件。目录的存在是供人利用的。它们提高和促进人们观看目录上所记载的物品的愿望。政府部门可以编制供自己使用的目录，就像陆地测绘局编制古代地图目录那样。但是，一旦人们知道有这样的目录，就难以阻止为了更广泛的研究目的而利用它们了。

因此，政府机关调查、搜集和利用有关自己工作的历史资料的愿望就会激起一般公众为自己的目的去查阅那些资料的愿望。这又与公众想要了解政府的议事记录的要求之间只有一段很小的距离。在那些想要发掘埋藏着的信息宝库的新闻记者和民选代表与想要在工作中不

受干扰的政府工作人员之间，永远有一拉一推的扯皮现象。尽管当前欧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或者是政府的文官，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大多数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由政府资助并部分地受政府控制的大学中的教师，然而，这种对有组织的社会机器的从属关系并不一定妨碍他们的学术自由。社会可能对历史学家们施加无数的不同压力。一个基金会、理事会或一所私立大学的最高当局所施加的压力，与一位部长所施加的压力具有同样的破坏作用。幸运的是，历史学家拥有同样多的适应性强的防御手段来保卫他们寻求和传播真理的权利与义务。这些都是一种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除非与其他同样合法的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它们可能与其他权利和其他义务发生冲突。思想自由像任何其他自由一样，是含有责任的。对于一位政治家、一名官员、或者一个私人来说，保密有时是一种权利，有时则是一种义务。历史学家是用他们的论断来为社会服务的。尽人皆知，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像复印机那样工作，而让别人，让他们的读者根据他们复印出来的东西去作判断。

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能过去一向是、而且今后也永远是随着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况而发生变化的。历史学家的技能与读者的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不管他们是为了个别的赞助者，或是为了一个政府部门，或是为了他们能够吸引来阅读他们的著作的那些群众写作，他们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种要求。即便这仅仅是要求对某一课题进行真实报道或者对某些问题做出正确回答，他们也必须准备面对传教士那样的问题，那就是，即便不用听众所熟悉的旧思想方式，至少也必须用旧的语言去传达新的神启。他们与听众的信仰抵触越少，他们的传达工作就越容易完成。在制订最初的《剑桥近代史》的编写计划时，阿克顿似乎认为，在不触犯读者的信仰的条件下，这部书能够成为“未来世纪的航海图和指南针”。航海图和指南针都是科学的产物。它们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点偏见或者有意识的歪曲，都会损害它们。就这个范围来说，这个比喻极其确切地表明了近代史的性质。但是，航海者如果要用这些工具时，就必须了解一些它们的科学性质，而这些工具却不能为他决定航行的目的地。如果说历史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是一张航海图或一个指南针的话，这个比喻并没有指出航海者的专业训练和出航命令是用什么来表示的。50年以前，一位欧洲的思想家仍然往往会这样假定：文明世界的国家尽管情况各有不同，但都是由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按照或

多或少得到公认的施政方针进行治理的。和这种看法相适应的社会科学观念（特别是历史观念）是自由主义，即认为历史是事实的按比例缩图，加上必要的指南针似的明确解释。我们的世界已经今非昔比，这种观点再也站不住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他们如不讨论从事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就不可能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们绘制自己的航海图，但也要把一个航行目标同另一个目标进行比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作出判断，这个原则意味着他可能必须对目标做出选择。如果他接受宫廷历史学家、爱国历史学家、御用历史学家或卖身投靠的历史学家的条条框框，那么，他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判断职能，就是故意按照他和他的读者本可拒绝接受的一种假定进行写作，这种假定就是：他的雇主提出的目标是正确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断定遵守有关揭示公共记录内容的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也许会断定不遵守这种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但是，不论属于上述哪种情况，他们都作出了一种判断。不论他们掩盖了什么和揭示了什么，不论这是对待群众还是对待政府或一个雇主，不论他们遵循或不遵循什么研究路线，他都是在做出对社会有现实或潜在的利害关系的决定。如果能有一种完全不必加以判断的社会知识的话，那么，一方面就可能有一种与人无关的、纯机械性的社会科学，而另一方面就可能有任何树立这种科学的绝对权利。这样一来，社会政策就能够与社会科学分离。这种区分类似在某些政府制度中把政策与行政分开的情况。实际上，后一种区分即使不总是、也时常是因袭的、武断的和虚妄的，而在这一方面，前一种区分也完全相同。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

在制订《剑桥近代史》的这个新版本的计划时，不是把它作为撰写权威性的历史的阶梯，也不是把它作为我们有关这一时期的全部知识的摘要或者按比例绘制的缩图，而是把它作为符合事实的判断的完整体。新版本的目标与阿克顿勋爵为旧版所确定的目标绝大部分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必须放弃阿克顿的一个原则。阿克顿希望他所选定的执笔人排除或者隐藏他们个人的信念。我们根据他的学生古奇博士的权威说法，确切知道：“他从来没有以钦定讲座教授的身份写过一个字或讲过一句话，因为这一身份会暴露出他属于一个宗派而不属于另外一个宗派。”^[10]在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鼎盛时期，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似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即便就阿克顿来说，他运用这一

原则也是有限度的。在他的自由和进步的主要概念中，有一些主张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在我们这个自我批判的时代，历史学家虽然其追求真理的热诚并未削弱，但也认识到他们的结论，甚至他们认为不问自明的一些前提，都不会得到人们一致的同意。他们必须满足于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并尊重他们无法排除的分歧。

在阿克顿勋爵为《剑桥近代史》制订的计划中，对于通史的概念，有这样几句令人难忘和富有特色的话：

世界通史（他写道）并不是各种专史的总和，首先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本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君主专制政体、革命等来加以考虑。有些国家对于主流可能做出贡献，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贡献，内容的分配必须相应地予以处理。主流之外的各国历史虽不应受到损害，必须按照编年史的规格精确地予以记述。但是，不应该把葡萄牙、特兰西瓦尼亚、冰岛同法国和德国等量齐观，从而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希望当这些非主流国家处于重要地位的时候加以叙述，而不是不管它们是否重要，均按照年代的顺序予以叙述。

当一个国家第一次“进入主流”的时候，如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应该对它过去的历史作“充分而衔接的回顾”；当一个国家“脱离主流”的时候，如17世纪初期的威尼斯，应该对它“未来的情况加以概述”。他承认在实践中完全实现这些原则是困难的。当他不幸过早逝世，而由他人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情况也确是如此。不过，他的指导思想依然是这部新编《剑桥近代史》的准绳。我们确实不可能仅仅把旧的十四卷加以修订并使之符合最新要求。我们不但通过研究，对于几乎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时期的知识大大增加了，而且还运用了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关于近代史的每一部分，用英语写成的书籍都比50年以前大量增多，因此，《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不必去满足旧版所要适应的一切需要，而要作为一部能适应我们时代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的标准通史，来实现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要把已经肯定的研究成果表述在“文明”的历史之中，这种“文明”从15世纪起由它最初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外来的成分，直至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或多或少稳固地扎下了根。我们要阐述这个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情况。在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这些方面或其中几个方面综合叙述，这是编写计划的要求。但是，我们绝不勉强地综合或者人为地进行简化。如果不同的因素互相依

存，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分别叙述。如果一些国家或民族都经过一个共同的历史过程，我们就把它们安排在一章里。如果一些民族或民族集团的事务同其他民族或民族集团事务有显著的差异而不能一同叙述，我们就有必要用专章或专节来加以叙述。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并不按所有的国家分别进行连续的叙述。它既不是各民族历史的汇编，也不是在同一本书中包括这样一种汇编。它不打算成为每种民族语言的文学或每种地区性艺术流派的历史手册。如果是国际性事件，我们就从国际的观点予以论述，因此，每场战争都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比如滑铁卢战役，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法国、英国、普鲁士和尼德兰的历史中的事件，三四次地进行重复（除了稍加提及而外）。

我们在叙述事态发展的时候，势必要提到社会的结构。因此，我们在叙述历次战役的时候，要与战争艺术和它的应用以及社会和经济背景密切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谈到外交谈判的历史的时候，也要涉及谈判背后的社会力量。关于政治情况的叙述是与论述政治思想的章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民族性、容忍异教之类的问题，而是要使人们了解政府的实际基础发生的变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仿照旧版的先例，除非在看来特别需要的时候，否则在行文中不加脚注。在对非常广泛的领域进行简短的评述的著作中，一般都采取这种既定的做法。但是，旧版与新版之间还有一点和这种做法不无关系的区别，也许在这里应该提一下。旧版各卷的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参考书目，有时还列举未曾公布的手稿。这些书目并不是为了说明各章的执笔人是根据哪些权威资料撰写的，而是给研究有关课题的人们当作指南。书目中列举的项目过多，而附加的解释又过少，结果，它们只对高级研究人员有用，而对一般读者或初学者并无多大用处。我们不妨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如第四卷的书目占有161页的篇幅，其中包括阿克顿勋爵所收集的关于30年战争的小册子（现藏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全部目录。在《剑桥近代史》旧版问世的时候，英语的历史书目较少。当时仍然有理由认为编制这种书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必备的工具。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一般的和专门的书目有如汗牛充栋，如果不是书目的内容及其出现之处能够满足特殊需要的话，就没有理由再增加书目的数量。在

阅读或参考一部通史的人们当中，许多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旧版所提供的那种书目。编辑人员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虽要考虑出版哪类书目最适合于当前的需要，但这不意味着这套多卷本的著作应包括这类材料。

这套书的每一卷都将按年代的顺序叙述一个大致的时期。但是，时间的划分并不是硬性的，因为每一卷都要自成一个整体，每个主题都要有始有终。在所有各卷中，各章不是按年代而是按主题来划分的。在每一章里，由执笔人来决定是采用编年体还是综述，或者两者兼用。各章的撰稿人和各卷的编辑不是根据详细的编写计划，而是根据上面已经谈过的他们一致同意的指导原则来执笔的。他们代表着许多思想流派和许多研究专业。但是，他们的共同继承的遗产实在太大了，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兼容并蓄，编写出一部清晰明确的历史。

[1] 关于计划和编辑的情况，在《剑桥历史杂志》，VII1945年，第57页以下有比本文更详细的叙述。

[2] J. S. 穆勒：《历史科学补充阐释》，见《逻辑体系》（1843年）。

[3] 这是B. 克罗齐的说法，见《历史、纪年和伪史》（1912年），第2页，后又刊印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历史》（1917年），第4页。

[4] 《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编》I，3，24：《塞尔苏斯文库》VIII，《律例汇编》。不透彻了解整个法律而仅根据某一只言片语作判断或答复，是不公正的。

[5] S. H. 雷诺兹编：《席间漫话》（1892年），第127页。

[6]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各伦理学》中引用剧作家亚加松的一句话，见卡佐邦1590年刊印的拉丁文译本，1139b9。

[7] 在弥尔顿的《公民在教会事务中的力量》（1659年）的《书前献词的一封信》中有这句话。在拉丁文中，西塞罗用过这句话。在J. J. 贝歇尔的《心灵的智慧》（1678年）中也有过这句话。在格劳秀斯的《书信集》，莫鲁伊森编，第402号（1615年）中有“civilis sapientia”（公民的智慧）一语

[8] 《怎样编写历史》，第34页。

[9] J. G. 德罗伊森：《历史大纲》（1868年）。

[10] 《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第二版（1913年），第387页。

目录

[平装版前言](#)

[总导言 史学与近代史学家](#)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面貌](#)

[第三章 15世纪的文明与文艺复兴](#)

[第四章 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会](#)

[第五章 从1470年至1520年西欧的学术和教育](#)

[第六章 西欧的文艺](#)

[一 在意大利](#)

[二 在北欧](#)

[三 在西班牙](#)

[四 1493—1520年西欧的本民族语言文学](#)

[第七章 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下的帝国](#)

[第八章 勃艮第的尼德兰（1477—1521年）](#)

[第九章 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

[第十章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下的法国](#)

[第十一章 西班牙诸王国与天主教国王](#)

[第十二章 对意大利的侵略](#)

[第十三章 东欧](#)

[第十四章 奥斯曼帝国（1481—1520年）](#)

[第十五章 新世界](#)

[一 葡萄牙的扩张](#)

[二 西班牙人在新世界](#)

[第十六章 全欧洲关心扩张](#)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大约同一时期在意大利确认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有一个“中世纪”（medium aevum），其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后来采取文艺复兴作为西方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培根更进一步宣称：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已经改变了全世界整个事物的面貌和状态”。19世纪，以兰克为首的政治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出现了具有“近代”特征的现象，如民族国家、官僚政治、在公共事务中重视世俗的价值标准，以及保持势力均衡等。此外，整个欧洲都接受布尔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观点。布尔克哈特的这一名著是在1860年第一次出版，他的分析从美学方面和心理学方面令人深信同样的看法，即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文化成就形成此后几个世纪西方价值标准的典范。到了1900年，关于近代与中世纪划分的流行观点，在教学中已经僵化成为一种教条，西方每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们都曾找到一个方便的日期来运用普遍接受的范畴。法国，侵入意大利（1494年）；西班牙，二王并主（1479年）；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立（1485年）；德意志，查理五世即位（1519年）——这些都是似乎可以凭信的、容易为人接受的时代分界线。

这种强行简单化的缺点，是随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例如，在意大利，不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在15世纪末以前早已发生；实际上，是在1453年很久以前发生的。如果但丁可以归属于中世纪，彼特拉克则不能；而在科卢乔萨卢塔蒂（1406年卒）那一代的佛罗伦萨，意大利世界所独有的一切几乎已经全都略具规模了。甚至在北方的世界，近来也以更加怀疑的态度对旧的时代划分法进行仔细的考察了。在德意志，人们可以说马克西米连比他的孙子更加不负责任，但是，从他统治王朝的态度，或者对于日耳曼爱国主义和文学艺术的态度来看，你能说他更具有中世纪精神吗？法国的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在注意行政管理、控制教会、限制特权等方面，不是比查理八世或者弗朗西斯一世更近代一些吗？在英国，那些希望把托马斯·莫尔（1535年卒）看作普世基督教运动的最后代表的

人们，那些坚持说托马斯·克伦威尔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治国之道的人们，以及其他主张新的君主政体不是从都铎王室而是从约克王室开始的人们，对于历来所讲的博斯沃思战役的重要意义都是有争论的。

有人甚至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对旧的观念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如果说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世界，那么，我们就应当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近代世界那种最显著的特征——一心一意搞自然科学——的根源。然而，事实可以证明：人文主义是忽视科学的。15世纪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仅限于在巴黎有几个老式的唯名论者和在帕多瓦有几个阿威罗伊主义者而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建筑家并不是比他们的采用哥特式的前辈更高明的工程师，没有机械发明的浪潮来表明学术复兴的特征。所以说，既然这一时期在科学中没有新兴的东西，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复兴^[1]。至于说到“世界和人类的发现”，以及其现实主义和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其对“名声”的渴求及其对个人天才和德行的培养，我们应如何理解阿贝拉尔、让·德孟、科明这些人或那些从生活中取材塑造了莱茵河畔一些主教座堂的多愁善感的圣母或索思韦尔大教堂的植物图像的雕塑家呢？《小让·德·圣特列》不是一幅比《十日谈》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严肃的新社会的写真吗？凡·爱克兄弟的绘画不是比博提切利的虚无缥缈的学究式浪漫主义或者意大利的他的同时代人的堆砌典故的寓言更具体、更实际、更现实主义到无可比拟的程度吗？布尔克哈特除了认为意大利人有独特的发现以外，也认为他们有独特的缺点——彩色浓厚的反宗教、犬儒主义和不道德行为，他认为这些是他的光明世界的阴影。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欧洲北方的情况也可以作为评论的根据：勃艮第宫廷的暴虐程度足以与维斯孔蒂家族相比；在14世纪和15世纪，至少有四位英国国王（且不论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物），被成功的竞争者废黜和杀死，另一位在沙场上阵亡；博尔贾家族原本是西班牙人，并非意大利人。

至于说文艺复兴的地理发现，现在我们很难相信它们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是当时的新思想的产物。对托勒密原著产生新的兴趣，可能有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比马可·波罗著作的影响小得多。至少可以说，葡萄牙人探险（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动机是复杂的；科学的绘图法、一种寻求地理知识的单纯愿望肯定是有，但也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活动服从于一个由政治、宗教和日益增加的商业利益所决定的纲领。而且在那个时候，美洲的发现也不是重要的事

情。实际上，在本卷的另外一个地方（见第十六章）就论证说，直到16世纪的最后10年，新世界才对整个欧洲发生影响。欧洲的人口或许正在从14世纪的死亡灾难中复原，但处于当时的情况下却无法提供人力进行殖民活动；由于奥斯曼人的压力，很难抽出人力来补充西班牙的“征服者”；美洲探险的初期，效果是由输入金银产生的，它给所有的人们带来混乱，也只有商人阶级的几个幸运儿除外。

我们也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这样的看法，即人们对古典文物兴趣的扩大和古典拉丁文的复活，其本身就构成与过去的断然决裂。在下面（见第五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新的古典学术的广泛传播情况。如果说在那里所列举的许多学者的名字几乎已经完全湮没无闻，则他们中间却有足够多的人仍然是西方古典学术和文学的银河中的明星，从而使这个历史时代引人注目。同时，由于文艺复兴逐渐积累的影响，就产生了一种对待教育的态度，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承受它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慎重一些，不要把太多的功劳都记在人文主义者、特别是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账上。拉丁文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是新奇的东西，在西方，它是被教授了1000年的唯一的文法；教授法——实际上连教科书本身，长期以来没有变化。无可否认，新的文法的精确程度和资料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而且难度也比较大），在教学技术方面，日常会话逐渐排除了辩论法。拉丁著作家的文选更精了；选读的著作家的范围扩大了；西塞罗被看作一位实干家，而不是一个隐士了，维吉尔也不再是一位魔术师了；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安排了少量的希腊语课，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希伯来文。但是，正如把这些进步与静止的中世纪状态相对立，就会使之遭到曲解那样，如果你把新拉丁文的推广当作衡量对世界看法的变化的唯一标准，那么，你就会忽视在意大利以外的也许是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方面——它在地方语文学（见第六章第四节）中的反映。15世纪的意大利人实际上在文学中有两大歌颂的典范即两组“古典”的样板。在西塞罗和维吉尔旁边，我们必须并列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形象。到了16世纪初期，意大利语是最成熟的“近代”语言；欧洲北部需要通过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作家，从亚平宁半岛上所发展的精神食粮中，去获得一切能够最容易消化的东西。正是在各民族的语言中，这些东西才得到最真实的表现。卡斯蒂廖内的《侍臣论》出版后不久，就译成各种地方文字。布鲁尼或者瓦拉的严肃作品自然不是那么容易通俗化的。我

们是在拉伯雷的作品中而不是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找到我们认为在实质上是“文艺复兴”的大多数主张的最忠实的表现。

在15世纪下半叶，新的观点和旧的见解随着印刷的书籍而广泛传播^[2]，而这往往被人们看成西方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印刷机的重要性是与发现美洲相类似的：要对人们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需要经过许多世代。早期印刷业者所印的书籍，都是由抄写人手工制作的书籍，不仅有当代作家的作品，而且有已经成为教育、科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的旧文本。“我们分析一下印刷业者（必须假定他们对读者群众的需要有所了解）的出版物的数量，就会很清楚地显示出：中世纪遗留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不仅为人所知，而且一直被人普遍应用和继续流传到1600年左右，虽然在16世纪下半叶程度日益缩小。”^[3]我们也不能大胆地论断说，需要印刷术来进行扫盲。十分清楚，活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对书籍的需求增长的结果；同样明显的是，用活版印出的书籍的数量增大，进一步鼓励了人们读书识字。在15世纪，各地的学校数目成倍地增加，这个过程并没有被宗教改革运动严重打断，而且遭到打断的时期也很短。1500年德意志的大学在校学生总人数比1400年多3倍；到15世纪末，他们大多数是念文科，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获得，而且所学的只不过是现在中学里所教的课程。依照托马斯·莫尔的估计，在他那个时代，英国有3/5的人能够阅读——这是一个极高的比例，即便范围只限于阅读（与写作对比），地区只限于伦敦，而不是全国。但是，根据一鳞半爪的证据，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可能差不多相同^[4]。

然而，以上的论述并不是要否定“文艺复兴”。我们只从其他的时期去寻求一般认为是下一个时代所独有的行为或制度的例证，那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必须去确定在任何特定时期的特有状态发展的程度。用这种方法来观察，毫无疑问，例如阿贝拉尔，是12世纪舞台上的一位非凡人物；在文艺复兴以前，对于个性的培养不但十分稀少，而且时常中断。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整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这一运动在欧洲其他地区的表现，都不能不接受我们在下面论述建筑艺术时所称为的“人体测量学”的观点（见第129页）。这种以人体的形成为尺度来衡量美学和道德问题的方法，显然并不像许多人（例如布尔克哈特）所想象的那么“异端”；实际上，它是意大利最笃信基督教的阶段——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柏拉图思想

和新柏拉图思想的特点。他们认为，人的智能的比例和他的身体的比例，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结构的一部分。另外，意大利教育、经济、艺术和政治上的新鲜事物向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传播之快，正表明在意大利以外，认为应该把“文艺复兴”一词扩展到整个欧洲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亚平宁半岛，特别是其中部和北部的人民，是探索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将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占领的那些疆土的先驱。

然而，除了这些主观的范畴而外，本卷所叙述的时期对于当代的人们来说，有一种天然的连续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加以分析的责任。在公共生活的某些领域里，情况不断地有所进步，这不但在当时被认为是重要的，而在以后各个时期回顾起来，也会是很有意义的。欧洲从14世纪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中逐渐恢复，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关于恢复过程的年代，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我们就不可能简单扼要地讨论它对农业生活和商业生活的影响（见第二章、第十六章）。另一件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是“职业”探险家、士兵和水手对新世界的勘察和占领，这只要请读者注意阅读下面关于此事的讨论就可以了（见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不过，这一时期的四大特征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一方面由于问题本身十分重要，一方面也由于下面有好几章讨论它们。这些特征是：君主政府的加强和反君主势力的日趋衰亡；以王朝统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模式终于出现；教会内部的日益不稳和教会失去普遍的威信；崭新的精神状态（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的发展。我们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讨论上述各点。

中世纪论述政府的论文中曾讲述为了达到仁德，国王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科明在他的《回忆录》（1498年最后完成，1524年第一次出版）中和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1513年著，1532年出版）中，却试图讲述与之不同的东西，即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国王做些什么才最有利。关于有效的政府是像基督教统治的道德原则一样值得研究的想法，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因为这包含着要放弃1000年来在最有影响的书籍和说教中反复传播的观点，更何况是要放弃对中世纪早期的权力分散的封建社会表示完全赞同的观点。假如一位马基雅弗利或者一位科明所要阐明的命题不是在几个世代中，在欧洲许多地方，有实际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很难站得住脚。他们正在

领会的经验，当然有生动的当代事件作为证明，不过这些事件只是用以肯定而不是否定过去的。在法国、英国、特别是意大利，从13世纪晚期起，一再出现比较坚强的国王，如英国的爱德华一世、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法国的菲利普四世、查理五世、查理七世、路易十一世；在意大利，姑且不提1250年以前那不勒斯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早熟政府，也还有弗拉拉的埃斯特家族、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和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的超出地方性质的“暴政”。当然，就是在这些王权鼎盛的时期中，由于大贵族阶级的不满和阻挠，也并不是没有王业虚弱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王权上升便意味着自己的地位衰落。法国和英国的坚强的国王们难免要面临内部骚乱。在强有力的政府的时代之间，出现很长的衰退阶段，如在英国，爱德华二世和亨利六世的统治时期，或者如在法国，1392年以后的将近两个世代。甚至在一位国王的统治时期，王权的兴衰也有很大的变动；英国的理查二世和法国的查理七世既要扮演英明圣上，又要扮演一代庸君的角色。在意大利，甚至存在着一种更不稳定的情况：例如，维斯孔蒂家族不仅面临王朝内部制造分裂的力量，而且面临来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一种缓慢加强的抵抗。但是，随着15世纪的进程，君主政体的势头显著地增大。从15世纪60年代起，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政府的结构，可以说已经确定了：英国1483年至1485年的政变已属罕见之事，正如共同福利联盟战争（1465年）似乎令人厌烦地不合时宜一样。政府机器的发展是其部分原因。

西班牙对于这种变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伊比利亚半岛有一个长期的种族分裂、政府分裂和语言分裂的传统，之所以分裂是由于地面多山。尽管有这些因素，阿拉贡（它本身就是一个天下三分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和阿拉贡自己就往往分道扬镳）通过费迪南德与伊萨贝拉的联姻，与卡斯蒂利亚联合到一起了。仅仅是联姻还不可能造成国家的永久性联盟，西班牙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部分是偶然的巧合（见第十一章）。然而，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有意识的侵略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征服格拉纳达和后来占领纳瓦尔；坚决而巧妙地控制骑士团和整个教会；强调政府的中央机关以反对地方议会。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家会议都职业化了，而且有大批法学家参加工作；此外，还设立了宗教裁判会议、财政会议、骑士团会议、兄弟会会议。这样一种结构必要时可以扩大，就如同从卡斯蒂利亚的王家会议中分离出西印度群岛会议那样。

地方政府设有总督；1480年以后，对卡斯蒂利亚每个城市会议都派去一名地方长官，通过他认真地掌握市政；而在乡村，一个时期委托弟兄会行使王权。

在法国和英国，国王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扩大王权，因此在这两个国家里，这种情况的发展并不那么显著。不过，15世纪晚期在两个国家内都开始了一个国王自觉采取行动的时代，这具有关键意义。法国在这个时期（见第十章），全国三级会议最后将要消灭，不起作用；常备军实现了统一；国王和大臣们掌握教会的决心，甚至远远超出布尔日国事诏书（1438年）所宣布的法国教会的立场。大胆的采邑分封政策已经成功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依附王室，变成了以中央的朝廷体制为样板的、能够迅速转为从来没有如此依附于国王的地方行政系统的工作机构。租税主要由王室随意处理。在英国，行政改革的呼声也甚嚣尘上，豁免和特权的巨岛正被并入君主统治的大陆：北部边境已经不是珀西家族的天下；圣所和庇护权摇摇欲坠；由于避免同外国打仗，王室在财政方面得到独立，其意义的重大不次于法国君主的财政独立，而且对宪政的进一步发展危险性更小一些。英国的议会与法国的全国三级会议不同，它是作为国王政府的工具幸存下来并发展的。在法国和英国，也和在西班牙一样，地方议会的结构发展起来，国王政府的大臣们开始取代王室旧官员的地位。

德国和意大利政治发展中的事件，往往与上面所谈到的几个君主国家的事件形成对比。意大利只是在马基雅弗利的巨著里有它的“君主”。随着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见第十二章），最主要的是随着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以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大联合，亚平宁半岛进入一个外国干涉的时期；由于外国干涉，当地人的任何统一过程实际上都被停止，而在此后350年间，形成6个公国和日益衰微的威尼斯共和国共存的局面。至于德意志，马克西米连在位时期对于改革帝国结构所做的努力（见第七章），正如在他以前的几位皇帝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他以后查理五世将做的努力一样毫无效果。当时有一个德意志帝国；设立了很少几个虚弱无力的机关，例如最高法院；国会继续存在，通常作为反对意见与对抗的集中点。这些是德意志统一意识继续存在的因素。但是在实际上没有帝国的军队，没有帝国的租税，也没有帝国的教会。

但是，在全国性君主政体的下一级，公侯的出现却如同在濒临大西洋各国一样迅速。这一点在意大利可能不太明确；在那里，罗马教廷有一个精心安排的行政机构，然而每次选举教皇以后，其政策就遭受一场巨大的变革；在那里，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宫廷。可是在德意志，事情是一清二楚的。在那里，少数大家族和一些较小的家族不把皇帝、城镇和骑士放在眼里，不断加强自己的势力。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统治整个德意志可能是一筹莫展，但是，就连马克西米连这个人，就其奥地利及其他王朝领地而言（见第219页），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和富有进取心的公侯。在德意志特别显著，在其他地方稍微差一些，罗马法的命令书对于加强公侯的地位起过很大作用，这时为了明确公侯与皇帝的关系（见第198页），谨慎地保留着他们的封建权利和义务。神圣罗马皇帝这样接受罗马法，从中根本得不到一点利益。正如后期罗马法解释家所述的意大利城镇一样，德意志的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

通常总是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君主制度没有受到有力的抵抗，是15世纪对外作战和内战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真实性。法英两国的贵族丧失大批的财富和生命。在英国，玫瑰战争使贵族世家的自然消亡率增加了1倍。可是，除了这些异常的灾祸而外，还有一些压力使贵族比他们过去更加对国王俯首帖耳。虽然土地依然是所有各阶级梦寐以求的财产，但是到了16世纪初期，就不仅是大的领地所有权才会给人以政治和经济的保证或者社会威望了。一位廷臣比一位住在远方城堡里的大贵族更容易获得金钱和权力，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宫廷挤满了国内的大人物。恩俸、军权、官职，从国王那里源源流出；接近荣誉的源泉，便使一位显赫人物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他能够帮助依附于他的人实现他们的野心，以报答他们给予他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在法国和西班牙，对于贵族是免收赋税的，而且鼓吹这样一种学说：贵族由于服军役，就应该享有财政上的特权。而佩剑贵族被吸收到王家军队中，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国王的地位，从而间接地减少社会上其他阶级的束缚。

当时在西欧非常流行的君主专制的倾向，远远不是东欧的特征（见第十三章）。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内政治是与君主政体完全相反的。在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里，君主程度不同地处于屈从贵族的状态。在波兰和匈牙利，贵族都是人数众多的阶级，而且，

那些小贵族们认为依靠这个阶级可能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在“除了名义而外，完完全全是一个贵族共和国”（见第390页）的波希米亚，骑士阶级极力与已经形成一个世袭的和优越的特权阶级的少数大家族争夺权力。不论在波兰或匈牙利，大贵族尽管在法律上未与较小的贵族分开，但是他们形成占有统治地位的派系，拼命榨取王室的日益减少的财源。在所有上述几个国家里，城镇和农民的地位的下降是十分显著的，这与西方的发展又成为鲜明的对比。

在欧洲东部边陲的两个国家，以其各自十分不同的方式，在政治趋势方面，比刚刚提到的那些国家更与西欧相类似。俄罗斯正在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这个国家里，莫斯科大公们是决不容许有竞争对手的（见第368—370页）。同时，在拜占庭的废墟上，奥斯曼土耳其人（见第十四章）正在发展一种独裁政体，它像俄国的独裁政体一样，有很多地方借鉴于被推翻的东罗马帝国的范例。许多西方的公侯肯定会羡慕一个在法律上有权处决与他争夺王位的对手的统治者（见第396页）。

在西欧的两个地区——瑞士和低地国家，不存在或者说不大显著地存在强有力的政府的模式。这一时期，瑞士人正处在他们的昙花一现的军事霸权的顶峰。那些向瑞士人学习而不喜欢其战术的贵族，那些把瑞士人看作是集一切最坏的恶行——嗜血成性、贪得无厌和野蛮透顶——之大成的人文主义者，是以嫌恶的眼光投向瑞士人的，但瑞士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组织的独特性。至于在100年内将有一个第二共和国出现的低地国家（见第八章），勃艮第国家的幽灵以其地域分散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混杂的传统，以其日益抬头的寡头政治，以及经济重心从佛兰德向北移到荷兰等原因，也隐藏了对君主使用宪法加以约束的重要性，而这种约束在将来则是很重要的。在欧洲，只有意大利人稍稍了解共和政体之所以存在的政治理由，因此，事实上，共和政体的理论基础是十分薄弱的。甚至在意大利，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的和毫无用处的姿态（见第97页）是由文学作品鼓吹起来的，而不是出于对政治改革抱有积极的兴趣。只有威尼斯是作为一个独立共和国最后继续存在，而威尼斯的“贵族”寡头政治并没有给北方的城市自由民提供一个纲领。

国王变成了他们的王国的主人。结果，王朝统治决定国际关系的类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因为一个封建国王一

般要用联姻的方法谋取自己的利益：安茹“帝国”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偶然的产物；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的相互通婚的王侯家族，卢森堡的皇帝，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国王们，都可以提供许多中世纪的例证。但是在法国和英国，在一般情况下，王室联姻并不考虑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变化，无论如何，在1420年亨利五世与凯瑟琳结婚之前是这样。倒是那些豪绅巨富仿效这种做法，以此作为飞黄腾达的手段，如那不勒斯的安茹、米兰的奥尔良、西班牙的贡特和埃诺的格洛斯特。精心策划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计划任何事情但要以遗传的偶然因素为转移的话，那他就可以说查理五世的帝国是经过深思熟虑建立起来的，它是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特色的那些双重联姻之一（菲利普娶胡安娜，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嫁西班牙王子，1496—1497年）的结果（见第341页）。到本卷所讲述的时期结束的时候，马克西米连的孙子已是尼德兰、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新世界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不久以后，瓦卢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都在寻求进一步的联姻，以加强它们的竞争地位；16世纪的整个外交活动的脉络，都要以其结果为转移。当这些姻亲关系支配欧洲政治的时候，由于玛格丽特·都铎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联姻（1503年）而产生了另外一些规模不同但性质并无区别的姻亲关系。

这全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它使在16世纪的历史上成为十分显著的特征的那些国际政治往来的工具——日益扩大的外交机构、越来越职业化的军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使依然往往是一位亲王或高级圣职人员，特别派去磋商结盟或者缔结条约。但是，资格比较低的驻外国宫廷代表的人数越来越多，从15世纪就开始存在的外交急件的递送数量是十分巨大的（见第九章）。在外交技术的发展中，意大利的经验树立了样板。同时，在16世纪以前，我们只是在意大利见到职业将军。此后，各强国的军队越来越由步兵而不是由骑兵组成，而炮兵也变得更加重要；只要有可能，这些军队就交给专家去管理。

虽然政治的现实是君权的增大，但在欧洲的高耸的城墙后面，基督教世界的废墟仍历历在目。十字军虽然早已土崩瓦解，然而它的名字和它的若干魅力依然未衰。直到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的时候，十字军在西班牙还有一些意义；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防止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袭也同样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不过在西欧，发动一支“十字

军”仅仅是更直接的烧杀抢掠的序幕而已。自罗马教皇以下，基督教的国王们都准备同非基督教徒达成协议，至少是和平解决短期的争端。大多数政治家对于科明赞赏穆罕默德二世“聪明和勇敢”的话^[5]，一定在他们的内心里认为是十分公允的。尽管基督教徒们假装十分震动，但是，关于英诺森八世在1490年接收苏丹的一笔津贴（见第78页）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罗马教皇本来是基督教国家兴起的主要象征，现在成为它的衰落的一个象征了。亚历山大六世和朱理亚二世笨拙地披戴上了世界君主制度的全副盔甲。他们推行的政策纵然不能说帝威凛然，也霸气十足，并以意大利为核心。一位教皇持有这种态度，就引起欧洲北部的轻蔑和愤怒。伊拉斯谟的《从天庭驱逐出来的朱理亚》（1513年）是直接针对朱理亚二世写的，但指斥了当时所有的罗马教皇：“如今国家即系暴政”^[6]。对于这种情况，教皇本人的性格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使罗马教廷与基督教会离异和迫使教皇们变成小诸侯的历史过程。这些过程全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然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要点：教会的内部分裂、各国家教会的兴起和世俗人对赐予教士以地产的做法施加的压力。

教会的内部分裂是指15世纪所特有的听从命令的一致程度的低落。1378年的大分裂只能对此负一部分责任，尽管那次分裂所造成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互相敌对的教阶组织的存在，使已经显示出分裂倾向的国际宗教团体分崩离析。造成大分裂的那些红衣主教的名声已经永远扫地，因为他们在比萨和康斯坦茨非但没有改善自己的地位，却重新成立了一个教廷，这个教廷下定决心，不惜牺牲一切来阻止他们有朝一日再度掌权。最重要的是，由于大分裂及其不幸的后果，15世纪的教皇们对于教会公会议是胆战心惊的。康斯坦茨会议的教令表面上得到了教皇的批准，它一方面规定公会议的至高权力，也规定了每十年召开一次公会议的机构。极力阻止公会议按期举行和断然肯定公会议权力至上说是邪门歪道，却变成了犹金四世（他不得不接受巴塞尔会议的决定）和他的继任者的一贯政策。1512年的拉特兰公会议只是为了抵制法国人主持的比萨“非法会议”（*conciliabulum*）（见第四章）而举行的。

由于拒绝召开公会议，以便进行教会改革，因此就导致了异端邪说、类似的异端邪说以及冷漠态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认为，真正异端邪说的问题是最无关紧要的。自从12世纪以来，异端邪说在西欧的某些地区就非常流行，但是教会至少是容忍了它，并没有把它完全铲除。14世纪的异端邪说遭到类似的命运：罗拉德派（在1417年以后）只限于一小撮没有影响的英国人；胡斯派在波希米亚虽然举足轻重，但对整个基督教世界不构成威胁。15世纪使阿尔卑斯山外的思想界大受熏染的流行一时的神秘主义，对于宗教的一致性是一个十分隐蔽的危险。在德国西部和低地国家，神秘主义的同志会、兄弟会、姊妹会之类的团体特别多；它们有时受到当地教区主教的鼓励，有时受到迫害。在这样的团体里，世俗人越来越占领先的地位，他们大半是城市人，而且对教会人士怀有传统的敌意，关于这种情况，一些文学典籍——从《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小说百篇》和伊拉斯谟的《对话集》——是很好的证明。热尔松以后的比较严肃的批评家们把个人的信仰与对多数有组织的宗教的藐视结合起来，这就为那些极力给僧侣和修士制造麻烦的人们做出了榜样。对于这类的批评，只有一位清白而勤奋的教廷才能够做出回答。庇护二世以后的教皇们却激起人们种种怀疑，对这些怀疑，只有通过召开公会议的方法才能消除，而他们又不会赞成这样做。

各国家教会的出现，当然是教皇政治的软弱造成的。甚至在14世纪以前，君主们就已经不愿意容许教会有它所要求的自由。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国王拥有大权，高级圣职人员就由朝廷任命。在中世纪晚期，他们甚至把自己领地内的一些对教会的控制权下放到比较次要的统治者手里，而欧洲比较重要的君主对待教会的政策则讲求使他们能够成为属下僧侣的主人。在整个14世纪期间，英国国王对待僧侣的蛮横态度的史实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得到阿维尼翁教廷的宽容，但在1417年大分裂结束之后，甚至以更显著的方式继续下去。康斯坦茨公会议以后英国与教廷所达成的协议是一个正式文件，理查二世政府重新制定的关于圣职候补人员和关于王权侵害罪的条例成为国王权力的真实基础。在法国，教皇与国王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君主政府维护其对教会的控制权的真实反映。法国僧侣接受巴塞尔公会议的反教皇立法（《布尔日国事诏书》，1438年），只不过是第一次明确表示是国王而不是教皇拥有控制法国教会的权力。后来，国王们能够修改这个立法，特别是路易十二，还不得不推迟一个时期执行（见第302

页)；但是，不论一位国王会对教皇作出怎样的表面许诺，他对教会的实际控制权是确定无疑的。国王在教会领域中的权力的最显著的例证当然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1478年)，它不是把一种既能控制舆论，又能加强统一，而且有大利可图的有效工具(见第336页)，提供给教会使用而是让它给王室使用。

德意志具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类似的发展情况。那里的人们长期憎恨教皇，这种感情有时甚至能够把皇帝和诸侯结合在一起。德意志人，不论是世俗的帝王还是教会的首脑，都是公会议改革纲领的天然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因为这个纲领保证他们在处理教会事务中有最大可能的独立性。在这方面，也正如接受罗马法的情况一样，德意志人的公会议至上主义有利于诸侯，而不是有利于皇帝。由于德意志的许多高级教士兼为世俗的统治者(见第195页)，我们就很难把他们的态度和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世俗诸侯们的态度区别开来；实际上，主教们从削减教皇权力中所得的收获甚至比世俗领主要多。

在由诸侯就地控制教会的基础上，各个地方当然往往怀着充分行使教皇权力的雄心壮志来处理教会的政治。在本卷另外一个地方(见第302—303页)所述的昂布瓦兹红衣主教的生涯是意味深长的。他夺取圣职必然使他想成为教皇和得到教皇使节的美差，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在下一个世代的沃尔西的故事也是一模一样的。在朱理亚二世生病期间，马克西米连想要在1511年登上圣彼得宝座的天真计划(见第215页)，在后来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确实稀奇古怪，但是，如果我们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它只不过是亨利八世成为“地上最高主宰”时可采取的行动的前奏而已。

在教皇的政策中，最使阿尔卑斯山外的基督教会苦恼的是财政方面。英国几乎不向罗马教廷交纳一分钱，其他非意大利的主教辖区交纳的也不多，这些都不在话下。如果说比较正常的收入来源在下降(见第87页)，赎罪券所占的比重却不断增加；同时，任何的付款都使群情骚动，这种愤懑很深，而且见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于教会拥有大量财富，而世俗人又想要收回，或者至少是分享教会根据永久管业权而拥有的大量产业，因此教皇的“财政制度”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中世纪晚期，实际上到处都出现反对永久管业权的立法。另外，俗人分享圣职人员所取得的土地财富有着种种的名堂，财富的所有者要向俗人支付管理费、照料费、维持费以及各式各样的报酬。更

重要的是，某些地方把教会财产用益权广泛地授予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是属于教会的人物，而且提升大人物的子弟们让他们担任教会的高级职位。在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私生子们占据了大主教辖区、主教辖区和大修道院。教皇的慷慨批准有时甚至使提出要求的国王都深受感动，例如詹姆斯四世在1504年把他的11岁的私生子亚历山大提升为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得到认可时，连他自己都说：“此事不易，本难望有成也”^[7]。在詹姆斯四世的继承人的统治下，王族和达官贵人对苏格兰教会的夺取继续有增无减，当宗教改革运动到达苏格兰的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去正式解散修道院，因为实际上，留待解散的修道院连一个也不存在了。

在苏格兰，没收教会土地是国王与教皇勾结在一起进行的。在意大利，也是同样的彻底和同样的“合法”，尽管完成的方法有所不同。在意大利北部，土地从教士向俗人手中的惊人的过渡是一个很长的过程^[8]。在那里，教士被教皇、市镇和暴君课以重税；他们由于教皇授予产业用益权的做法而进一步贫困；他们很难利用改进自己的产业的机会；1300年以后货币迅速贬值使他们处于更加恶劣的地位。当这些压力开始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有很多土地已经租了出去，其中大部分租金很低，给债权人、有权势的人、修道院长的亲属使用，而这些人则能够以有利的条件转租出去。在15世纪中叶，“对教会财产的掠夺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时候，转租的利润高达700%，比商业的利润要大，而且可靠得多。这类出租（*fictalicia*）有一定期限。但是，教会必须向租用者补偿在租用期间所进行的土地改良的费用，否则就得按原来的不利条件继续租给人家（*eodemficto*）。由于教会实际上对租用者拿不出补偿费，只好采取第二种方法，这样一来，教会虽然在名义上依然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从它们的产业中得不到收益。当那些走运的租用者（*fictabilis*）得到许可，首先是以较高一些的租金永远租用，然后他如果用同样价值而不是同样大小的土地交换，就能得到享用产业的全部权利的时候，这就达到了最后阶段。因此，贫困的教会不能保持良好状态的大产业就落入俗人手中，而换来了小的产业。随着15世纪的前进而变成严格规定的建筑艺术和教会装饰的新风格，曾经留下许多具有永久价值的纪念物，但是这不能表示教会的富有，因为营造的经费往往是靠出卖田地和忽视所余财产的保养来筹措的^[9]。到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北部，教会只拥有

10%或15%的土地，而在南方却拥有65%或70%。因此，在意大利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一个改革教会的动机。

在本卷所述的时期，见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北方世界之间的最初的真正接触（见第三、第五、第六章）。从彼特拉克到列奥纳尔多·布鲁尼的意大利思想界的各种主张为何迟迟没有有效传播开来，是近年来真正受到很大注意的问题。在北方，许多方面都倾向于接受人文主义，如低地国家的城镇自由民的道德标准，许多北方艺术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发展，一些神秘主义者对经院派学者的迂腐态度的敌视。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奇怪的是：15世纪的英国竟谈不上有什么人文主义（见第55页），直到该世纪末，法国和德意志也几乎丝毫没有。北方在14世纪和15世纪长期见到的只是人文主义的皮毛，而不是它的精神；喜好拉丁化和古典的主题，而不是理解那些使亚平宁半岛的主要人文主义者受到启发的古代道德标准。不过，在了解意大利世界方面之所以如此迟缓，是有许多理由的。

在物质生活的水平上，意大利拥有比北方巨大而且主要是城镇的财富。要发展人们对艺术、文学和道德哲学的兴趣，就需要有丰富的资源，而在欧洲北部，这些资源比在意大利更紧密地与保守的教会联结在一起；神学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里占有统治地位，但在意大利的大学里，实际上就没有神学课程。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的社会里，始终有一种与封建的北方形成对照的同一性：达官贵人是城镇居民，虽然有教皇派和皇帝派的政治传统，王公与富人过着同样的生活；甚至14世纪的暴君们也是城镇出身，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臣民具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在兴趣和爱好方面，意大利的君主与北方的统治者大不相同；意大利的各共和国与佛兰德或德意志的城镇也是同样有很大的差别。

尽管如此，可不要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看作是反映一个统一社会的不变的类型。在掌握意大利的价值标准时，有一个困难就是它们绝对不是始终如一的，一位人文主义者可能用几种论调发言。彼特拉克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被佛罗伦萨放逐，而在北方暴君们的宫廷里度过岁月，他对文学采取超然的态度。只有在作为保护人的君主提供的一种最安适的闲暇生活中，文人才能完成指定的工作。这种态度可能有其政治上的复杂因素，因为彼特拉克在米兰的门徒们辩称：只有他们的维斯孔蒂主子进行干涉，意大利本身才能得救。在佛罗伦萨，逐渐

地出现了共和主义，据他们主张说，这多半是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的威胁的结果。^[10]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共和主义以外的问题上，布鲁尼的态度与彼特拉克的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布鲁尼否定彼特拉克对于积极生活的整个态度，承认西塞罗的政治活动是实现而不是否定他的道德学说，并把但丁——既是诗人和哲学家，也是一个家族的首领和政治家——当作一位理想的公民。不久，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派甚至采取更惊人的步骤，他们反对对财富的谴责，并且创立这样一种学说：在上帝眼中，贫穷并不是显示品德的唯一方法。我们可以选择这些发展情况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征，因为它们符合于我们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当时的意大利，对之进行批评者却始终不乏其人。例如，那时除共和主义的传统外，始终有一个君主的传统。当但丁把布鲁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时候，米开朗琪罗却把他捧上了天堂，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假定恺撒没有崇拜者。实际上，那些为祖国的政治困难局面而进行思考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处于一种为仿佛相互矛盾的政策进行辩护的尴尬地位。马基雅弗利是一位共和派，但同时又为强有力的君主制度辩护；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而对于意大利来说，却是一位激情满怀的君主捍卫者。

这样一来，我们在马基雅弗利的时代，就见到意大利政治思想中两个相反的传统有了某种汇合。在整个意大利思想界，是在15世纪末发生这样的大汇合的。正如我们在下面（见第69页）会读到的，在15世纪末开始了一个宗教的阶段，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崭露头角。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为了发扬在早些时候往往被湮没在“雄辩”之中的“智慧”，曾试图寻求一种比意大利初期人文主义所能达到的更为广阔得多的综合。皮科甚至不去设法适应当时良好的拉丁文体的需要，这一点表明这种兼容并蓄已经达到怎样深远的程度，并且使后来的人文主义进入像马基雅弗利那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境地（从意大利先前的学术观点来看）。我们应该附带说明：不仅仅是在佛罗伦萨集团里存在这样一种宗教的偏见。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艺术家全都不是异教徒。我们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见第135页）读到，米什莱、布尔克哈特提出的在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的命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所说的‘人’是指意识到他在伟大赎罪计划中的个人作用的人”。在其神学的寓意中，米开朗琪罗所绘制的西斯廷小教堂穹顶画是“无比深邃”的（见第139页）。

仅仅从保护文艺的观点来看，意大利又达到了一个相互对立的思潮趋于一致的阶段。早期的文学艺术保护人要求种种不同，甚至精神上互相抵牾的作品。维斯孔蒂的宫廷，佛罗伦萨的商人，阿西西的修道士，具有十分不同的趣味。到15世纪晚期，美第奇的影响在佛罗伦萨占有主要地位，不久以后，在罗马和天主教会中，这种影响也将占有主要地位。意大利各宫廷，小的如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宫廷，最大的如罗马教皇利奥的宫廷，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卓越的意大利语”；他们以极其相似的态度赞助相同的工匠和学者。建筑艺术中“意大利共同风格”（见第131页）和学术中的西塞罗主义，是新的同一性的标志。

与此同时，欧洲北部赢得了进行扩张和进行实验的时间。在15世纪初这个时期里，在英国、法国或西班牙，慷慨进行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格洛斯特公爵和贝里公爵作为保护人来说，要比他们的国王重要得多。但是，真正有时间和金钱去追求高雅生活的北方权贵，只有勃艮第的公爵们，只要他们能够在英法两国之间保持经济上的平衡。然而，到了15世纪末，英国和西班牙都处于渴望影响外部世界的集权制君主政体之下，而法国则从事侵略意大利的活动，这在文化领域中，将引起意大利的思想和观点对法兰西的占领。大量采取意大利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比过去容易了一些。由于意大利文明集中在君王和他们的宫廷的环境里，北方的君王和北方的宫廷就易于吸收那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人文主义者变成北方国王们的一种需要；为了与国外通信，必须有拉丁文秘书；为了派遣大使，需要有以拉丁语能言善辩的人；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要能够用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卡姆登仍然称为的“万国语言”向国际世界陈述他本国的立场。从乌尔比诺或罗马聘请来的意大利艺术家或作家，在英国或者法国，比两个世代以前更感到宾至如归了。访问亚平宁半岛的北方学者或画家所进入的环境，与他在国内所熟悉的气氛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到意大利留学正在变成他们训练的一个正常部分（见第155页）。

最初，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德意志那样迅速地对意大利的价值标准做出了反应（见第68页）。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因为在德意志，人们对罗马教会抱有强烈的敌意；德意志的绝大部分比起高卢、不列颠或西班牙来，与罗马都更缺少历史的联系。但是，也有一些有利的原因。德意志本国语言对于作家来说，要比法语或英语更加困难；因

此，人文主义者的拉丁文的一切魅力，意大利教育计划的一切美好希望，都更加吸引人。此外，德意志国王与意大利朝廷有着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是它依然具有一定的情感上的作用；意大利的第一流人文主义者，如埃内阿斯·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曾经一度在德意志任职。更重要的也许是：德意志人对罗马法很有兴趣，因而前去波洛尼亚；新的大学有接受新思想的风气；德意志南部与意大利城镇有商业往来——在奥格斯堡，城市公民是艺术新风格的最初的保护人（见第156页）。最重要的是，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运用新的意大利式手法发扬他们的旧文化，当然，他们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了许多东西，使他们对古典著作中曾经鼓舞意大利学生的某种爱国主义发生了兴趣。马克西米连积极鼓励这些发展。而这些发展的最好纪念碑是乌尔利希·冯·胡滕的简短对话《阿尔米纽斯》，在这篇对话里，作者论证德意志的英雄人物比亚历山大、西庇阿和汉尼拔胜过一筹。

然而，在北方的发展中，有一些方面无论从任何深远的意义来说，都不是意大利的或者人文主义的（见第64页）。从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产生了15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宗教”思想在某些地区所具有的那种吸引力。这种“宗教”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引起了科利特和勒费弗尔·戴塔普的兴趣。但这还不足以培养出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如果“人文主义者”一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学者或者虔诚信徒的同义词的话。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湮没了这些人物的特殊种类的福音主义，因而使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如入五里雾中。我们甚至缺少充足的传记，更不要说对他们在思想界的地位进行全面评价了。但是，千真万确的是：科利特是“一位让·斯坦敦克式的和共同生活弟兄会教友式的苦行改革家，他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是地道的基督教徒；然而，他不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致约多库斯·巴迪乌斯的传记式信件使许多世代的批评家们误入迷津。实际上，科利特完全反对当时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对学问的虔诚，他所崇敬的奥古斯丁式的智慧不仅不包括一些学派的不屑一顾的逻辑，而且不包括哲学家和诗人们^[11]。如果这是人文主义的话，那么，托马斯·阿·肯皮斯也必须列在人文主义者的队伍里。

就北方的神秘主义和福音主义以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来说，伊拉斯谟的地位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比其他任何的学者都

更加显示出两个阵营的特点：正如给他画了一些非常美好的肖像的霍尔拜因一样，他的作品既包含有哥特的因素，也包含有意大利的因素（见第155页）。他表现出南方传统的整个乐观主义，及其对文学是高贵心灵的最高贵的表现的信念，和对于雄辩术的爱好。而在同时，他非常注意宗教的现实和排除一切可能扰乱虔诚信仰的东西的必要性。对他来说，文学的复兴是基督教复兴的一个方面；文学界是基督教界的一个方面；学术的归宿是上帝。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伊拉斯谟在1505年出版洛伦佐·瓦拉的《新约全书集注》更能说明问题的了。瓦拉的确是一位令人莫名其妙的人物，但肯定不是积极的基督教徒。他专心搞的是语言学。在伊拉斯谟看来，瓦拉的著作是一部“圣经人文主义”的导言，在书中，语言学只是工具，而不是实质（见第115页）。这种既来自文学复兴也同样来自新信仰的研究途径，有时只有费很大气力才能辨别出来，因为伊拉斯谟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他的粗犷、多疑、爱争吵，往往毫无顾忌，而他对讽刺冲动也往往是放任纵容，几乎是为讽刺而讽刺。

在本卷所述时期的伊拉斯谟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讽刺和嘲笑。16世纪的最初20年是北方文艺复兴的太平时代。此后，路德和罗马教会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伊拉斯谟作出一个干脆的“是或否”的回答了。在路德引起教会分裂之后，他企图继续走他的中间道路，因而明显地显示出“基督哲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他的同代人所理解的哲学或神学，它不仅触怒宗教改革运动者，而且“既未能使托马斯的理性主义、奥康姆的信仰主义满意，也未能使神秘派的直觉主义满意，因而在特兰托公会议上，遭到理性主义者、信仰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驳斥”^[12]。1520年确实是关键的一年^[13]。当年6月教皇的通谕《斥马丁·路德》对于伊拉斯谟所认为的优美文学和他所主张的和解政策是一个可怕的打击。12月，路德烧掉教皇的通谕，任何理性占上风的机会都遭到破坏。从此，教条在两个阵营里都风行一时，伊拉斯谟的非教条的探索被打入冷宫。文艺复兴运动遂让位给宗教改革运动。

[1] 丹纳·B. 杜兰德：《15世纪意大利的传统与革新》，载《思想史杂志》，（1943年）第4期，第1—20页；里恩·桑代克：《文艺复兴或前文艺复兴》，载同上杂志同期，第65—74页。

[2] 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有关于印刷术兴起的简短论述。

- [3] E. P. 戈尔德施米特：《中世纪的著作原本和它们的第一次印刷出版》（伦敦图书学会，1943年版），第2页。
- [4] 西尔维亚·思鲁普：《中世纪伦敦的商人阶级》（芝加哥，1948年），第156—158页；一般叙述见J. W. 亚当森《没有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1946年），第三章。
- [5] 卡尔梅特编：《科明回忆录》第二卷，第337页。
- [6] 弗格森编：《伊拉斯谟短文集》，第83页。
- [7] R. K. 汉内、R. L. 麦凯、A. 斯皮尔曼合编：《詹姆斯四世书信集（1505—1513年）》（苏格兰历史学会，1953年），第36页。
- [8] C. M. 奇波拉：《在11世纪和16世纪间北意大利的教会财产是怎样丧失的》，《年鉴》第2卷（巴黎，1947年），第317—327页。
- [9] C. M. 奇波拉：《在11世纪和16世纪间北意大利的教会财产是怎样丧失的》，《年鉴》第二卷，第323页。
- [10] 汉斯·巴隆：《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两卷集（普林斯顿，1955年）。参见第二卷的参考书目，特别是巴隆博士在《历史》《镜报》和《约翰·赖兰兹图书馆刊》发表的其他一些论文（皆在1938年）。
- [11] 参见小尤金·F. 赖斯《约翰·科利特与自然物的毁灭》，载《哈佛神学评论》，第45卷（1952年），第141—163页。
- [12] A. 勒诺代：《伊拉斯谟：他的宗教思想和他的行动……1518—1521年》（历史评论丛书，巴黎，1926年），第11页。
- [13] A. 勒诺代：《伊拉斯谟：他的宗教思想和他的行动……1518—1521年》，第87—103页。

第二章 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面貌

麦考利勋爵说：“如果我们想从研究祖先的历史得到裨益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由书本上读到的国家与我们生活所在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对于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来说，他这句名言肯定是正确的。如果有可能把那个时代的山山水水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今日的景物大不一样。乡村虽然经过中世纪的开拓活动已经开垦，但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依然是野岭荒原，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即便大片的森林有所缩减，而沼泽与草莽却多半依然如故。中世纪的城市已经兴起，但由我们来看，大多数城镇的规模还很小，它们的工商业活动也是有限的。

现在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自然地理的主要特征却与过去大致相同。欧洲是由许多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半岛；在这个大半岛的两翼，过去是，现在还是两个滨海的世界：一个是地中海的世界，一个是北欧和西欧的世界，在历史、气候和物产等方面，它们有显著的不同。在半岛宽阔的底边附近，即与亚洲接壤的地方，欧洲逐渐失去自己的特性。广阔无垠的平原取代山峦与低地的相互交错，而在大半个冬天，这些平原的气温降到冰点以下。

但是，当研究15世纪欧洲的人文地理时，我们不仅要考察各处不同的自然背景，而且要考虑时间的范畴。中世纪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披荆斩棘，排水造田，使乡村改变蛮荒的面貌。然而，这个伟大的拓土运动并没有毫不间断地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开端。在某些地方，它放慢了脚步；在另一些地方，它停了下来；甚至有些地方，开垦的边疆又退缩了回来。的确，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迄至1300年，农业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到14世纪和15世纪，继扩大耕地的伟大时代而来的是一个停滞和倒退的时代。在1350年至1450年的100年间，衰退情况特别显著。农业如此，商业、采矿业和工业也是如此。至于城镇的发展，尽管个别有繁荣的情况，但就整个来说，也是一样。造成这种衰退的原因既复杂又不明显，人们用来解释的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大瘟疫、产品价格下跌、人口的大量减少，等等。15世纪末有一些复苏迹象，遂导致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新的繁荣。我们应

该以这样的空间和时间为背景，首先考察欧洲的乡村，然后考察欧洲的城市。

欧洲东部分成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三个地带，这在生活方式上也同样地反映出来。落叶林带是莫斯科国家的根据地。对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以及它们的支流两岸的土地进行开垦，为早期的莫斯科大公国提供了一个农业基地，使它比落叶林带的其他公国略胜一筹。黑麦是主要作物，但也种植大麦、燕麦和一些小麦。由伊凡大帝（1462—1505年）所统一起来的这个中心，向南北两方扩大领土，就开始产生近代的俄罗斯国家。

针叶林向北伸展，直达白海。这一地带人烟稀少，居民为芬兰族和拉普兰族；但盛产毛皮，有黑貂、貂、狐以及不太贵重的海狸、松鼠和水獭。毛皮吸引商人循几条大河向北方和东方前进，各大河之间则由陆路转运。在白海之滨以及其他地方，居民以制盐、捕鱼、捕海豹和鲸为主。农业是次要的，也许德维纳河上游算作例外。这一地区的贸易集中于汉萨同盟的一个中心、遐迩闻名的市场、靠近波罗的海的诺夫哥罗德。前来北部地区的不仅是商人，而且有传教士。在1340年至1440年间，修道生活大有发展，修士们寻求未开垦的荒原。别洛泽罗（1397年建立）和索洛维茨基（1436年建立）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莫斯科以北还有另外一些城镇，例如雅罗斯拉夫、沃罗格达、罗斯托夫和特罗伊察。1553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们开辟了白海通西欧的航路以后，所有这些城镇就具有新的重要意义。伊凡大帝于1478年征服诺夫哥罗德，到这时候，已经把诺夫哥罗德刚刚草创的贸易帝国纳入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势力范围，因而，16世纪的新的财货之利当然要由莫斯科来独占了。

由莫斯科往南，是一片片大草原。到15世纪，这些草原已不再为亚洲来客起走廊的作用。最后大批驰过草原的游牧民群是13世纪的鞑靼人，此后200多年间，钦察人的金帐汗国一直统辖北邻俄罗斯人。但是到了15世纪，这个汗国的国势因内讧而衰弱下来；1480年，伊凡竟拒绝纳贡。现在道路已经敞开，伊凡大帝的继承者治下的移民可以跨出森林，而向果戈理所描述的“一片黄绿色的海洋，布满千千万万春天的花朵”的那些草原地带前进了。

到15世纪末年，由于诺夫哥罗德已在1478年降服，金帐汗国已在1480年败退，旧的一页历史宣告结束，近代的俄罗斯由此开始。到了18世纪，彼得大帝就把俄罗斯的边界推向波罗的海，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又把它扩展到黑海。

越过波罗的海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11世纪，它的政治地理已形成它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保持下来的面貌。丹麦的领土横跨波罗的海的入口；它不仅包括日德兰半岛，而且包括更加肥沃的菲英岛和谢兰岛，以及现属瑞典的一长条地带。在斯科纳海岸外的洋面上，丹麦拥有欧洲几个产量最大的渔场。在所有的北方水域中，捕鱼（尤其是捕捞鲱鱼）都是重要的经济活动。远离斯科纳，在斯莫兰荒凉的高地以北，是瑞典王国的中心。这个中心处于从斯德哥尔摩向西南伸展的、维纳恩湖和维特恩湖周围的低地。这里，在清除林木以后的土地上，耕作和饲养家畜占有主要地位。由此往北伸展着诺尔兰的成片森林，很少有人居住。在12世纪和13世纪，瑞典曾经占据芬兰。直到今日，在芬兰的部分沿海地区仍然通用瑞典语，这正是那个殖民时代的纪念物。在西边，挪威濒临大西洋和北海。它的地面多山，大部分不适于农业或者永久定居。

我们很幸运，从1539年印制的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地图^[1]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的精彩描绘。这张地图附有许多小插图，使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主要地理情况。它标明大片的森林以及瑞典北部和芬兰的各种各样的毛皮兽；它标出波罗的海和内陆湖泊冬季结冰的界限；它画有科帕尔贝里以及瑞典广阔的多湖平原的其他地方的丰富矿藏，并且用不同的符号表示铁、铜、银和金。有些插图描绘陆上和海上日常生活的状况。这张地图往南包括德意志版图的波罗的海海岸。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个地域。

俄罗斯平原越过普里佩特沼泽地与德意志北部的平原相接，而普里佩特沼泽地的面积相当大，差不多有英国的一半。这片巨大的沼泽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无数沙丘隆起，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仍保持其水陆状态。通常认为这块地方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发祥地，他们从这里向东、向南和向西扩展，占据欧洲非常广阔的一个区域。他们在向西推移时跨过维斯杜拉河和奥得河，推进到已经进入罗马帝国的条顿民族所放弃的土地。到了公元600年，易北—萨勒河一线已成为日耳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的分界线，但是这个分界线并没有保持下去，因为

在900—1250年间，日耳曼人收复了这片失地的一大部分。日耳曼人的向东进展，是在经济和传教两种动机的推动下进行的，而在新的东方殖民德意志和旧的西方封建德意志之间又发生了显著的差异。有人把日耳曼人的东进比作美国人从大西洋海岸的西移，认为新的东方当年对于中世纪德意志所具有的意义，正如新的西部对于19世纪的年轻美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尽管历史事件的对比往往使人造成错误印象，但是上面的比较可以着重表明在中世纪时期和中世纪将近结束时德意志一大部分疆土的殖民性质。

德意志平原的地表几乎到处都覆盖着第四纪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扩展的巨大冰原所带来的沉积物。大部分黏土都形成波状，而在其难以排水的表面上有一些沼泽和奇形怪状的浅湖；许多河谷也是沼泽地。其他地方，由冰河沉积物造成的一片片不毛的沙砾形成一种叫作“沙岗”的地区。日耳曼族定居者所面对着的景物，就是森林、沼泽和灌木丛。森林，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被拓荒者的斧头砍倒了。以wald（树林）和holz（树木）为词尾的地名，可以说明当地过去的特征。而以rode（开荒）、schwend（披荆）和hagen（斩棘）为词尾的地名则是拓荒者的活动的见证。他们从德意志的故土前来，“牵马拉牛，携犁带车”，改变了今日称为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这些地方的面貌。荷兰、佛兰德和弗里斯兰的移民有的与他们同行，有的接踵而至，这些人筑起河堤，排干沼泽。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他们沿着勃兰登堡边界，把内地的沼泽转化为富饶的农村。他们挖掘一部分“沙岗”的硬土，开辟一些灌溉水渠。他们给马格德堡以东的地区取上自己的名字，叫作弗莱明格（Fläming）。城市也和乡村一样发生变化。德意志北部城市建立之日，正是拓荒者前进胜利之时。14世纪和15世纪汉萨同盟各城市的成就，正是移民们几百年来辛辛苦苦努力的结果。

到13世纪末，拓荒者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德意志的移民和文化渗入了波兰，但是范围有限。不过，在两个边远的东方地区，日耳曼人的传教热情和移民冲动找到了开花结果的地方。13世纪初，战友骑士团在里加湾周围地区建立了日耳曼的设防城镇，波罗的海日耳曼人主要起源于此。13世纪晚些时候，在这北方前哨和本国之间，又有一个骑士团即条顿骑士团，更加全面地占领了这块土地。这对欧洲的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日耳曼人移民的这个新领域（后来称为东

普鲁士)是被后来所谓的波兰走廊把它与日耳曼人的主要居住地区分开的。

这次向东扩张的总的结果就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已经划定了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疆界的主要轮廓。德意志北部平原的农村地区也改变了面貌。但是我们不要言过其实，说这个地区具有在15世纪它实际上不曾有过的那种繁荣。在某些地方，只是由于辛勤的劳动，才能使黑麦和燕麦在沙土上结实；至于大片“沙岗”的改造，那是要等待后世的农业科学来完成的。几百年间，有许多土地仍然处于沼泽的状态。甚至在近代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地区还有着大量的浅湖。

当向东进军仍在进行的时候，移民们也加强了对较老居住区的土地的利用。他们砍伐了森林，重新耕种荒废的田园。在德意志，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莱茵兰各大修道院的下属机构在把图林根和萨克森的乡野改变成良田和牧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他地方也完成了同样的工作。在已经耕作的田地旁边，又开辟了新的阡陌；在土壤和方位适宜的地方，新开垦的土地上栽培了葡萄。耕作的条件和效果因地制宜。在中央高地的北部边缘，条件极好，效果也最佳。这里有一条一漫坡的土地，覆盖着一层特有的“黄壤”或“软泥”，土质肥美，易于稼穡。不错，这条土地带的宽度并不一致，而且，有些地方被平原伸出的湾状隆起隔断。德意志的博尔德和黑尔韦格两地区从马格德堡伸展到威斯特伐利亚，它们的特征跨过莱茵河，延伸到黑斯巴耶、布拉邦特和埃诺的低低的山冈。在莱茵河谷的大块台地上，也覆盖着软泥。这些覆盖着黄壤或软泥的土地是欧洲最宜于稼穡的土地；经过中世纪的努力，在这些土地上人烟稠密，精耕细作。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改造占这一较老居民地区大部分面积的贫瘠沙土，但收效甚微。吕内堡荒原、汉诺威沙岗和肯普兰使中世纪移民努力开垦它们的心血付诸东流。在以后的几百年间，正如在中世纪的结束时期一样，它们始终是无人问津的荒凉地区；只有吕内堡周围的一些盐泉给当地带来若干财富。

在北海的海岸一带有失也有得，大概是失多而得少。1377—1421年间，大海吞没了低地国家的许多城镇，加大了须德海的面积；亚德湾也由于暴风雨而增大了。然而，领主、修士以及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筑坝和排水，在他们的堤坝的庇护下，从佛兰德到弗里西亚不断出现

肥沃的“填海田”。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施泰因的洪水泛滥的沼泽地带，也从大海的手中抢救回来。

北海的这种拦海造田活动并不能代表15世纪欧洲农业的一般趋向。农业的扩展早已达到了极限，大多数乡村都有倒退的迹象。不仅在南部和西部的“老地区”，而且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普鲁士，都可以找到被遗弃的土地和人口锐减的荒芜村庄。在南部和西部，这些荒地的面积高达过去耕作面积的约50%；按整个德意志的耕作面积计算，约为25%。上列数字可能有夸大耕地减少情况之嫌，因为有些被遗弃的土地只不过是人们一时撤离或者改变土地的用途而已。然而，即便打上所有的折扣，事实本身也是足够触目惊心的。昔日的繁荣已经逝去，而16世纪新的繁荣尚未来到，尽管在1500年以前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2]。

由此往西是法兰西王国。1050—1300年间，它也经历了可歌可泣的开垦时期。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了。由于世俗的领主、传教士以及农民的艰苦创业，有时出现一些新的村庄和半城市的居民点（新城市、城堡、村镇），有时是旧的村、镇得到了扩展。在法国北部的巴黎盆地，有一些欧洲最优良的农田；科区、皮卡迪、博斯以及其他地区的软泥覆盖的高地是以肥沃闻名的。圣奥梅尔附近的海滨沼泽，索姆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河口一带的沼泽，以及普瓦图沼泽，至少说是部分地被排干了。法国西海岸的这些泽国，有一些形成了天然的盐池；例如，卢瓦尔河以南的布尔日讷湾的盐池就特别重要，曾经吸引许多商贩从远方港口奔来。不错，这种征服自然的故事也还有一些例外。巴黎盆地东部的“湿地”香巴尼的森林和沼泽是大大减少了，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是一片泥泞，到处是死水坑，再有，巴黎盆地南部的索洛涅的湖泊和沼泽也很少发生任何变化。在西边的凯尔特布列塔尼，并不像法国北部其他地区那样到处是大块的、空旷的田地，而是密密麻麻的圈地；这里也跟其他地方一样进行了砍伐和排水，但是半岛上由古代岩石形成的土壤是很贫瘠的。即便如此，如果从总的方面来看，法国北部在中世纪的繁荣还是很突出的。它超越西欧的所有地方，无怪乎14世纪初期傅华萨^[3]就在他的著作中宣称：此处是“仅次于天堂的世界上最美好的王国”。

百年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法兰西，用彼特拉克^[4]的话来说，变成了“一片废墟”（1360年）。利雪主教托马·巴赞^[5]在记述1440年的情况时说，卢瓦尔河与索姆河之间“完全是一片沙漠。这里和那里可以看到几小块耕作的土地或者一个葡萄园，但是寥寥可数，而且只是在紧贴着城堡或有城墙的市镇的地方”。乡村成了群狼出没之处和人称“路劫”的散兵游勇横行不法的场所。当时人口比过去减少了一半，甚至有些地方只剩下了1/3。普瓦图沼泽地又恢复了它们的天然状态。在废耕的土地上又出现了树林，圣东日的老百姓长期以来这样说：“森林通过英国人之手又回到法国来了。”有些记载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当时的法律文件（有只是买卖荒地的契约）证明了田园荒芜的情况，这些文件在叙述事实时很少润饰，却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15世纪结束之前，已经有复苏的迹象。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克洛德·赛塞尔^[6]的话，那么，在1480—1510年间，法兰西王国有1/3的土地已经耕种；肯定有过一个热火朝天的活动场面，到了1565年，博丹^[7]就能够证明乡村地区的繁荣景象了。开采矿产也受到了鼓励。1471年，路易十一世设立一个矿务局，专门负责审批采矿特许权和勘探矿产的工作。某些企业招募日耳曼人矿工前来支援。许多地方——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博卡日地区与佩尔歇地区，在香巴尼农村，在尼维尔内以及其他地区，都有小规模的铁矿中心。1455—1456年，查理七世雇佣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矿工去开采博若莱和利翁内的银矿，不过，总的来说，法兰西土地是缺乏金属矿藏的。

法国南半部的命运在许多方面与北方相同。先是一个时期拓荒，然后是一个时期荒废。不过，南北两地的这些变化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发生的。大致在北纬46°以南，使用一种与北方的奥依方言不同的语言，即普罗旺斯语，又称奥克方言。另外，南方使用“成文法”，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加以修订的罗马法是一般通行的法规；比较法兰克化的北方则使用习惯法。在这南方地区，有中央高原的巨大台地，海拔超过1500英尺。它的情况也和现在一样千差万别。有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的肥沃河谷，也有一些由火山造成的膏腴之地，它们的丰收程度超出一般的水平。然而，也有大片大片的石灰石台地，比乱石滚滚的荒漠强不了多少；在东南方，中央高原向上升起，成为嵯峨嶙峋的塞文山脉，在那里的栗树林间可以见到一些孤零零的山村。中央高原的大

部分地区都有广大的牧场，饲养牛羊，输出干酪。根据中世纪的记载，每逢放牧季节，成群的牛羊就从周围的低地向这里移动。中央高原以西，是阿基坦农业平原，它主要包括两个显著不同的地区。一个是在纪龙德河口沼泽地带的、广泛栽培葡萄的梅多克和波尔德莱地区，由于出售葡萄酒而与英国有密切联系；这个地区也像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百年战争中遭受破坏的葡萄园正在恢复起来。另一个是茫茫沙海的朗德地区，它实际上是在一系列的海滨沙丘后面的、到处是沼泽和湖泊的荒原；这个热病流行的地区要到18世纪和19世纪，它的地表才会得到一些有效的改良。中央高原以东是罗讷河流域，在这里，越过朗格勒高原，欧罗巴平原向下倾斜，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里昂有了桑树，在维埃纳有了常青的橡树，再往南，在瓦朗斯附近则有了橄榄。当地有句俗话说：“南方是由瓦朗斯开始”，因为橄榄是地中海气候的良好标志。这些条件，在15世纪正如现在一样，是与巴黎盆地以及向后一直伸延到俄罗斯的整个欧罗巴平原的条件大不相同的。

地中海盆地与欧洲其他部分气候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夏季3个月（6月、7月和8月）的降雨量很少超过6英寸，在许多地区则不到2英寸。葡萄和橄榄都耐得住这样的干旱，葡萄的栽培可以北至英格兰，而橄榄只能到“夏季几乎无雨”地区的边缘为止。另一方面，冬季多雨，足够谷物生长之用。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被称为“地中海的三大出产”，它们一直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生活的基础。

地中海地区过去森林的面积究竟有多少，现在无法确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到了15世纪，原来的植被大部分都不见了。地中海地区典型的森林生长稀疏，而且多半是常青的，与欧洲中部和西部密集的落叶林大不相同。它很容易退化成为小树丛，而且由于人们为了开垦或者作燃料来进行砍伐，由于火灾以及牲畜的啃啃，就更加速了这个过程。人们给这样的小树丛的所有变种取了许多名字，如maquis, macchia, matorral, garrigue, monte bajo, phrygana^[8]；而在这样的小树丛中有一些芳香植物，如薰衣草、桃金娘、迷迭香和百里香等。从葡萄牙到达达尼尔海峡，都可以见到这种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与矮小的常青树交替出现的灌木丛；它们与相连的草地一起，成了放牧山羊和绵羊的牧场。砍伐树木的一个结果是加速了土壤冲蚀。土壤被暴雨冲走，送入波涛滚滚的洪流，形成一些三角洲平原，如埃

布罗河三角洲、波河三角洲和欧罗塔斯河三角洲等；因此在许多高地区域，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岩石。

四季常青的小树丛被人描述为“地中海区域各个海岸所共有的标准植物”。但是，从草原到落叶林带，随着地势的起伏和历史的演变，无论在土地利用或气候变化方面，各个局部地区都有很大的差异。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沿海地带、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在15世纪也正如今天一样，每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15世纪末，在伊比利亚半岛，正是基督教徒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失地的最后阶段。公元711年，穆斯林大举入侵西班牙，不到几年工夫，就席卷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直抵坎塔布连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基督教徒以这两个山脉为北方据点，几乎立即开始收复失地，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纳瓦尔和葡萄牙等基督教王国纷纷兴起。他们取得巨大的进展，到13世纪中叶，穆斯林的势力就只限于在东南部的格拉纳达王国了。不过，直到1492年他们才收复南方这一狭长地带，把穆斯林的统治从半岛上消灭干净。同一时期（1469年），通过联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室结合在一起；下个世纪初，又取得了纳瓦尔（1512年）。随着收复失地的完成和各王国的结合，在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就出现了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统治的局面。

穆斯林的长期占领对当地的生活和环境都留下很多的烙印。中世纪欧洲的巨大文化中心有几个就在西班牙，在那里，阿拉伯的学术被介绍到西方。另外，在西班牙的建筑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看到摩尔人的许多影响。在农业方面，摩尔人对于畜牧业的发展和种植业的扩大都曾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而对于改变乡村的面貌起过不少作用。

西班牙中部的巨大台地缺雨，因此大片的土地适于放牧而不适于耕作。长期以来，这些地方以养羊为主，而且有每半年移居一次羊群的习惯。但在摩尔人时期，养羊业大大地扩展了，而且加强了羊群的移居工作。西班牙的放牧用语大部分是阿拉伯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摩尔人有过怎样的影响。不仅如此，摩尔人在12世纪就引进了美利奴绵羊，尽管“美利奴”一词似乎直到15世纪中叶才有人使用。随着失地的不断收复，重新定居和经营农业的费用显然要比雇佣牧羊人和

利用天然牧场的费用大得多；因此，在新的基督教各王国中，畜牧业便得到非常显著的发展。

由于大规模游牧羊群的存在，就需要有一定的组织。于是，智者阿方索在1273年就把“卡斯蒂利亚的所有牧羊人”组成一个联合会，定名为“王国牧民荣誉会”，这个名称已经把牧羊人的会议和羊群所有人的会议联为一体。这个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到了15世纪，它的活动和影响已经是伊比利亚半岛经济生活中彰明较著的事实了。这个组织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它建立了羊群专用的大道网。这种大道有不同的名称，在阿拉贡叫作cabañeras，在卡泰罗尼亚叫作carreradas，在巴伦西亚叫作azadores reales，而最主要的是，在卡斯蒂利亚叫作cañadas^[9]。这些大道实际上扩大了羊群吃草的场所，把莱昂、索里亚、昆卡和塞戈维亚周围的北方夏季牧场与拉曼查、埃斯特雷马杜拉、阿尔坎塔拉和安达卢西亚低地的南方冬季牧场连接起来。大道有详尽的规章加以保护。羊群在大道上要走上350英里到450英里的距离。它们每年9月开始向南方移动，到10月末就在冬季牧场吃草了。来年4月中旬开始往回移动，在路上的停留站剪毛，5月末或6月初，它们回到北方。羊毛送到大的集市，特别是麦迪纳德坎波的集市去销售，或者送到北部海岸的港口，装船运往法国、英国和佛兰德。到15世纪晚期，南北移动的羊已达250万头以上。阿拉贡也有同样的制度，尽管没有集中化。在西班牙的大道上驱赶的并不仅仅是西班牙的羊群，因为我们从在埃布罗河以南的达罗卡城市联盟的公告中，就可以看到“法兰西、加斯科涅、巴斯克和外国”的牧羊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沿埃布罗河谷而下，在阿拉贡过冬。

这些游牧的羊群不可避免地引起放牧利益和农业利益之间的严重冲突。为了保存牧场，就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农耕，王国牧民荣誉会在国王政府的支持下所采取的政策乃是西班牙农业衰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再者，由于移动的羊群经常通过，卡斯蒂利亚的森林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在13世纪所采取的种种保护措施似乎有一定的效果，到15世纪还可以见到大片的森林。

摩尔人对于耕作的影响，可能比对于养羊的影响还要大。他们来自比较干旱的土地，十分了解水的价值；他们把水当作公共财产，用来为所有人谋利益。在罗马时代和西哥特时代，西班牙已经实行了灌溉。然而，在711年以后的年代里，灌溉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扩大。

摩尔人引进了水车，这是一种用牲口拉的吊桶加链条装置，从井里向外提水。他们还以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开凿运河，通过渠道把水输往低地；在那里，即南海岸和东海岸的河边低地与海岸平原，埃布罗河沿岸，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以及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他们建造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在这些丰饶的水浇地和肥沃的平原上，曾经出现密集农业和繁荣景象。新的橄榄树据说从非洲移来；橄榄的栽培在东南地区已很普遍；人们不顾先知的禁令，又大量栽培了葡萄。不仅培育半岛上旧有的作物，而且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甘蔗、棉花、番红花、水稻和桑树。水果的栽培也增添了许多种类——柑橘、杏、无花果、柠檬和石榴。有许多谈论农业的穆斯林作家，他们表明对耕作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是在摩尔人被赶走的地区，他们的成就也不是化为泡影，因为他们经营的事业保存了下来，基督教徒收获了他们的成果。到1492年完全收复失地的时候，两方面的进步——东南方平原和河谷的密集农业与台地上的大批养羊，使西班牙的农村生活具有非常优异的性质。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赶羊大道和水浇地上从事这些比较显著的活动的同时，西班牙农民也在许多其他地区与虽付出辛勤劳动，收获却极其菲薄的土壤上进行斗争，正如谚语所说，他们是用石头制作面包的。

矿产也有小规模的开发。例如，瓜达尔卡纳尔的银矿和阿尔马登的汞矿都很丰产。巴斯克族聚居各省的铁矿也是这样。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卡多纳和半岛的其他一些地方产盐。不过，这些采矿活动的总成绩是很小的。

摩尔人的海盗曾经侵袭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除了戛纳附近弗拉克西内土姆的一个临时哨所而外，从来没有占领任何地方。不过，这里也有一些特征与西班牙的状况相似，只是形式比较缓和，规模也比较小。这里有牲畜的迁徙，很大的羊群沿着叫作carraïres^[10]的羊路，在平原和山区之间行进。然而，这里没有与“王国牧民荣誉会”相当的组织，这里的羊主也从来没有西班牙羊主那样的特权。农业经营者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约束羊群的活动。这里也不仅只栽培葡萄和橄榄，而且栽培柑橘、柠檬和杏等水果。这里把西班牙的水浇地当作小灌溉区的样板，甚至试植甘蔗。这里引进了桑树，并在罗讷河流域推广，为17世纪和18世纪丝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盐是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海岸沼泽生产的。朗格多克进行了一些

排水工作。堤坝工联合会在罗讷河下游筑了堤坝。但是三角洲本身依然是一个任凭风吹雨打的、由沼泽和泻湖组成的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意大利了，因为它与西班牙更为相似。

在15世纪，正如在19世纪一样，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称。在南方，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曾经多次改朝换代，但是疆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更。穆斯林、诺曼人、安茹人和阿拉贡人曾相继而来，到15世纪末，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王国落入西班牙诸侯的手中。在北方，各城市分别占据自己周围的领土；米兰、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是主要的政治单位。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横跨亚平宁山脉，从罗马到拉文纳，沿着古老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是一些由罗马教皇管辖的国家。在中世纪末，意大利四分五裂，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尽管在政治上意大利与西班牙是如此地不同，但是，这两个区域的农村经济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自古以来，游牧的羊群就从沿海平原爬上亚平宁山区。在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年）统治时期，就制定了管理这类活动的法规，并且由中央政权直接统辖，限制把低地良田卖给他人经营农业，而将其保留作冬季牧场之用。15世纪，当那不勒斯王国转由阿拉贡的王室统治的时候，新的统治者带着满脑子的家乡观念，为了支持畜牧业并附带地增加游牧羊群通行税，而进一步作出一些改革，这已是理所当然的了。从西班牙进口了美利奴绵羊。普利亚台地^[11]，或者靠近东海岸的福贾周围的低地，一概不准种田。牧羊一定要走羊道。关于羊群移动的管理，又作出一些新的规定。牧场主所得到的特权与“王国牧民荣誉会”的特权一样。当时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制度，直到19世纪，大体上依然是意大利南部畜牧经济的基础。

在内陆的高地，粗放的牧场和灌木丛林逐渐地变成了栗树的小树林和枞树、山毛榉、橡树以及其他树木的森林。沿海平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平原，如罗马平原、蓬蒂内沼泽和托斯卡纳近海沼泽虽然提供了冬季牧场，但是疟疾横行，人烟稀少。从中世纪一直到最近，这些地方始终保持着荒凉景象。另外一些平原则比较肥沃。罗马平原的大部分土质良好，而它的一部分，即维苏威火山以北的耕作区，在15世纪是意大利精耕细作最有成绩的地区之一。另一个是阿尔诺河下游的平原。传统的主要作物是五谷、橄榄和葡萄。当时，阿普利亚和西西里尽管夏季干旱，也照样输出谷物。但是，也有一些新传

入的作物出现。阿拉伯文明带来了甘蔗、稻米、棉花和桑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生产水果（柑橘、杏、无花果等）方面也可与西班牙东南部媲美。

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的托尔法生产明矾，这是意大利半岛西部海岸地区经济中的一个不寻常的因素。1462年在这里发现了明矾矿，早在15世纪结束之前，明矾的开采量就已经十分可观，给罗马教皇管辖的国家增加了很多收入。在托斯卡纳也开采少量的铁；近海沼泽的岸边有一些盐场。

往北，在伦巴第平原，地中海的主要特征与欧洲大陆的主要特征融合到一起了。在中世纪期间，这里曾经花费很大力量去治理波河。12世纪修筑一些河堤，以防止洪水泛滥；开挖一些灌溉渠，为改良以前的贫瘠土地供水。1138年，米兰附近基亚拉瓦里的西多会修道院就有一个灌溉渠在使用。1239年，米兰的大灌溉渠“拉穆扎”竣工。到了14世纪，有名的“水草场”（即引水灌溉的草地）就已经十分肥美了。在12世纪和15世纪之间，另外还修筑了许多灌溉渠，以保证富饶的冲积平原农业的丰收。米兰本身与阿达河之间的马尔塔塞纳渠据说是由达·芬奇（1452—1519年）设计的。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些泻湖，特别是科马基奥的泻湖产盐。

山坡上满都是桑树，现在，这个平原是意大利主要的植桑地区。在意大利南方，种植稻米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到15世纪晚期，意大利北方才出现这种作物。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知道：比萨周围的平原是在1468年有了稻米的，伦巴第平原是在1475年有了这一作物的。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提倡种稻，他的模范农场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赞扬。伦巴第平原当时号称“欧洲的花园”。但是为时不久，这个花园便被投入炮火的硝烟中了。

往东，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1354年，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1361年，他们不仅占领了阿德里安堡，而且把他们的首都从小亚细亚的布鲁萨移至该城。土耳其人从色雷斯的这个基地出发，开始对东南欧的征服工作。北面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拼命抵抗，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被粉碎了。到下个世纪中叶，斯拉夫各国无论在名义上或事实上都变成了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保加利亚在1382年，塞尔维亚在1459年，波斯

尼亚在1463年。帝国的北部疆界沿着多瑙河和萨夫河东西伸展。在南面，自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占据希腊半岛的拉丁—法兰克人的国家，也都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到1461年，除了由威尼斯人掌握的几个分散的据点而外，土耳其人完全控制了整个地区。爱琴海诸岛比较难以夺取，又过100多年，土耳其人才得以进行有效的控制（1566年）。同时，土耳其人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本身的占领更使他们在欧洲的统治稳如泰山。

法兰克人中世纪占领希腊给乡村地区留下了许多痕迹，有巨大的城堡和塔楼，直到今日还可以看见它们的废墟。但是，这对希腊的人口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形形色色的意大利人与法兰西人，加泰隆尼亚人与纳瓦尔人，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批批驻扎在外国土地上的卫戍部队罢了。在土耳其人进军的面前，“新法兰西”便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不过是若干令人缅怀西方骑士耀武扬威场面的考古遗迹而已。土耳其人从15世纪开始的占领，同样对希腊半岛本身的人口组成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但是由此往北，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河谷与低地上，却有着大片大片的土耳其移民的集居地，直到1923年以后交换人口，才算结束这种情况。另外，保加利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由操土耳其语的人民居住。在依靠基督教徒的奴隶劳动而效率很低的“契利弗利克”（大庄园）中，土耳其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塞萨利的各平原，“契利弗利克”非常普遍。在整个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南部，远至大致从德林湾到多瑙河上的铁门一线，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大庄园。现在从另外一些情况也还可以看出土耳其人的影响，例如在阿尔巴尼亚本土、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南部，都有大量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还有波斯尼亚穆斯林所表现的奇特现象，他们在语言和种族方面是斯拉夫人，但在宗教方面却是伊斯兰教徒。这些鲍格米勒^[12]异端邪说的信仰者，“他们宁愿被苏丹征服，也不愿皈依罗马教皇”。^[13]土耳其人在14世纪向前进军的另外一些结果是：斯拉夫人大批向北方移居，这种移居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持续了500年左右。

关于15世纪巴尔干半岛在其新主人统治下的情况，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还弄不清楚；但是，关于它的经济的主要轮廓，已经无可置疑。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即紧贴内陆高地的达尔马提亚沿海边缘、希腊本土（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海中岛屿，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

候和物产。在这里，“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三种出产是生活的要素。无花果和柑橘类的水果也是特产。自从在公元6世纪把东方的蚕偷偷运进拜占庭帝国以后，人们普遍栽培桑树。伯罗奔尼撒半岛植桑极多，根据某种见解，它之所以后来通称“摩里亚”，是由于希腊人称桑树为“摩里亚”的缘故。底比斯周围的平原称为“桑园”，底比斯本身又以产丝闻名于世。但是，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土壤瘠薄。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和底比斯等由冲积土形成的地区虽然是有名的粮仓和家畜饲养基地，然而它们还有很大一部分地面排水不良、土软泥湿，有待于后世的改进。此外，当时还没有引进玉米和烟草来增加农业经济的品种。在15世纪，巴尔干半岛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不能匹敌。而且，随着土耳其人的入寇，它也没有更为美好的前途。

希腊大部分地区的典型风景永远是这样：先是田连阡陌的小平原，平原尽头升起丘陵，丘陵上覆盖着橄榄树或供牧羊用的灌木丛。从丘陵再往前，又升起高山，山上有一部分森林，也有灌木丛和优劣不等的夏季牧场。羊群的季节性转移在整个希腊随处可见，而在科林思湾以北的内陆山区，这种移动特别盛行。这里有游牧的牧羊者，叫作“弗拉赫”。“弗拉赫”或“瓦拉赫”是邻居称呼他们所用的名字，相当于英语的“威尔赫”或“威尔士”，即“外来人”之意，而弗拉赫却自称“阿罗马尼”，即罗马人。他们的来源不明，但是现在一般认为：他们是罗马殖民者和拉丁化的当地人的后裔，从他们的语言可以看出，他们与罗马尼亚人有血缘关系。他们的存在从早至6世纪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推知，然而直到976年，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他们。此后200年间，常常出现关于他们的资料，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1世纪和19世纪似乎大致相同。4月至9月他们带着羊群在山里生活，只有冬季从山上下到平原。在北方的这些内陆山区，夏季多雨，冬日酷寒；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特有植被让位于落叶林和塞尔维亚人称之为“西布里雅克”的落叶的密集小树丛。它类似中欧而不像南方。

在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平原之间横亘着一条山岳地带，绝大部分海拔都在1500英尺以上；有很多地方超过5000英尺，也有许多高达13000英尺以上的高峰。这个地带变化多端：从古老的已被磨平的山间高地到一连串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的奇峰，从窄窄的峡谷到辽阔的匈牙利平原。在西端，是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汇合的地方。所有这三种语

言在瑞士都通行，这个国家是在13世纪由卢塞恩湖畔的3个州联合成立的。其他一些州加入这个联邦国家，直到1513年它才固定下来，一直维持到法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国家形式。在瑞士东部和蒂罗尔南部的河谷地区，有一些从远古传下来的罗曼语系的方言，这些方言形成一个介于德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罗曼什语。

在阿尔卑斯山的东部，10世纪出现奥地利的村社（Mark），这是为抵御马扎尔人而建立的哨所；同时，一些操德语的民族向前移动，情况跟横越北方平原的移动一样。他们不仅顺多瑙河而下，而且往南方和东南方伸展，进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土地。远离德语地区的主要疆界之外，在斯拉夫人或匈牙利人的领土上，出现一些像孤岛似的德意志居民点。例如在1347年，巴伐利亚的移民就到达了卡尔尼奥拉的哥特切，根据当时的记述，那里是一片荒野。

这个中央山岳地带的经济是多种多样，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而有许多细节上的不同。但是，就整个地区来说，它所经历的农业史与北方平原大致相同。由于到处拓荒，乡村地区的面貌改变了。例如蒂罗尔，在中世纪早期只是因河和埃特什河谷地的肥沃斜坡上才有人居住；但是，到了15世纪，溪谷上方也都普遍有移民了。正如在北方一样，15世纪是农业衰落和人们弃田逃走的时期，特别是在高地的农场。在阿尔卑斯山区的许多地方，农民们有两个家——一个是永久性的冬季住所，周围是同一溪谷里的已经开垦的土地，一个是在高山牧场附近的夏季小屋，掩映在乔木、白雪与奇峰之间。由于这样安排，牲畜的季节移动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形式。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放牧制度的一些情况：在中世纪将近结束时，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出售黄油和干酪，而瑞士的牛向北输往德意志，向南输往意大利。

波希米亚高地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在中欧形成一个独立单位。12世纪末，日耳曼人开始向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土地大规模移民。波希米亚的统治者为了削弱当地贵族的势力，也鼓励他们前来。日耳曼人有的来经商、传教和采矿，有的来开荒种地。边界上的所有地区都有日耳曼人居住，直到近世，在波希米亚人种分布图上，这种日耳曼因素依然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异族流入，尽管日耳曼文化有它的重要性，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始终没有失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与北边的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的斯拉夫人不同。另外，斯拉夫人内部也进行移民，捷克人本身开垦荒地，建立新的村庄。在波

希米亚，有300多个地名带有“lhota”；在摩拉维亚，有80多个地名带有这个词素。“lhota”大致意味着“豁免”，在这里是用于指在荒地或空地上建立的居民点往往不必缴纳贡赋。由于“lhota”的散布之广，可以看出捷克人改造自然活动的一些情况。在更东边的斯洛伐克，这个词以“lehota”的形式出现过40次以上；不过，在那里似乎指的是日耳曼人的开荒活动，而与斯拉夫人的活动无关。在波希米亚这样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在胡斯战争（1419—1436年）中遭到极大破坏。据估计，1/6的人口消灭了。许多人离乡背井，到西边去寻求新的家园。人们往往把这些波希米亚流亡者与当时在中欧和西欧第一次出现的吉卜赛人混淆起来，法语称吉卜赛人为波希米亚人，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

除了波希米亚而外，还有一个需要考察的特殊单位。在喀尔巴阡山环抱中的匈牙利大平原，不论在种族上或是地理上，都与周围地区有显著的不同。马扎尔人在9世纪就已从顿河右岸地区向西迁移，他们大约在公元900年到达平原，大肆进行烧杀抢掠，甚至曾经入寇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公元955年，他们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费尔德吃了败仗。在此后的一些年里，一个以掠夺为目标的游牧民群转变成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欧洲国家，帐篷被丢掉了，换成了村庄、城堡和教堂。马扎尔人的来临和结合成国家，给欧洲的政治地理带来了长远的后果，因为他们形成一个把南北两方斯拉夫人分开的楔子，使多瑙河盆地的事情大大复杂化了。他们所定居的平原虽然平坦，但是远远不是一致的。很大一部分平原由肥沃的黄土层覆盖着，在农业上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多瑙河和蒂萨河两岸有很宽的沼泽地带，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两条大河之间和东北部，有大片的青草和沙石，所谓“普斯塔”（Pushta）在那里是极为典型的。“普斯塔”为斯拉夫语，意思是“人迹罕到之处”。

公元1000—1350年间，欧洲特有的移民活动也在这里出现了。本尼迪克教派的修士们不仅宣传基督教，而且鼓吹移民，推广西方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普斯塔”上开辟的大农场和大牧场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历代的马扎尔人国王都鼓励移民入境，无论乡村和城镇都出现了日耳曼人的住户。由于1241年蒙古人的侵袭而造成的破坏，在日耳曼人移民的协助下得到了恢复。例如，在多瑙河左岸、布达佩斯以北的瓦茨（瓦伊岑）的居民全部被屠，不得不由日耳曼人替代。

其他移民是为躲避土耳其人而逃来的斯拉夫人，特别是在1459年塞尔维亚完全失陷以后。1483年，马加什·科尔文写信给罗马教皇说：4年之间，就有20万塞尔维亚人定居在他的王国的南部；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说明当时在伏伊伏丁那已经有了大批的塞尔维亚人。

平原以东是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这个山脉的拉丁名称 Transylvania^[14]表明它森林密布，而它的马扎尔名称“埃迪利”（Edily）源出Erdő（森林）。这个山林地区大概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被马扎尔人据为己有，他们有许多人定居在西面的谷地，特别是索梅希河谷。在15世纪，特兰西瓦尼亚除了马扎尔人而外，还包括3个其他的族群。一个是来源不明的塞克勒人，他们可能与马扎尔人同宗，而且肯定操马扎尔人的语言；另一个是罗马尼亚人，关于他们来到这个地区的问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们曾有过热烈的争论；但是，第三族群的来源，即日耳曼人的来源，则是毫无争辩余地的。他们大多是在12世纪，应匈牙利最初几代国王的邀请，从莱茵兰前来砍伐边境的森林，变成农民和矿工；现在这个地区还说德语，正是他们的活动的一点纪念物。1224年，国王赐给他们一个不同寻常的特许状，允许他们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这样，到了1500年，匈牙利后来的人种问题的一些主要因素就已经很明确了。由于土耳其人的来袭和随后的撤退，又有进一步的移民和进一步的混杂。在15世纪期间，马扎尔人在阻止土耳其人前进方面起过巨大作用，但是在1526年，他们在多瑙河畔的莫哈奇败北；除了西部的一窄条领土之外，全部国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直至1699年。

整个山脉地带的特点之一是：到处都可以见到采矿活动。许多地方的矿床有铁、铜、铅、银、金、锌和锡，还有煤。矿藏有的离地面很近，有的就露在外面。其中有许多种矿藏，自古代起就已经开采。中世纪的采矿业几经变化，到15世纪末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采银。约·乌·内夫写道：“在1460年至1530年间，中欧的银产量增加了好几倍，大概在4倍以上。”^[15]银是如此，铜和铁也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增加；对煤矿的兴趣也是有增无减。如果说，在我们看来，这个数量还很少，而且技术也是原始的，但是我们必须不要脱离当时的情况来考虑问题。1523年，查理五世在他的帝国内的采矿和冶金业中雇佣的人员约达10万名。

在中世纪，采煤始终没有占重要地位。许多地方都挖煤，但是到了15世纪，只有在列日周围及其以西的蒙斯，采煤达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列日的煤在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与纽卡斯尔的“海运煤”互相竞争。铁工厂分散在附近的康德罗兹山和阿登山的森林中。在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高原，特别是在鲁尔和锡格之间的锡格兰与绍尔兰高地，铁的开采和冶炼也很普遍。离这里不远，在亚琛附近的莫雷斯内特，15世纪期间发现了异极矿，即含锌的矿砂，这就引起制造黄铜和对铜的需要。在这些高地和莱茵河盆地的另外一些高地——锡格兰、斯佩萨特、黑森林和孚日，都有一些银矿和铁矿。洛林的低品位铁矿也已开采；另外，在这里，在迪乌兹的丰富的盐水泉周围还有一些盐场。在弗朗什-孔泰的萨朗的大企业中也制盐。在法国中央高原的里昂地区和博若莱地区也有含银的铅矿和铜矿。跨过英吉利海峡，英格兰也在开采铁、铅、银和铜。康沃尔和德文产的锡打入了欧洲市场。

然而，中世纪采矿业最发达的地方是在东方。含铅或铜的银矿分布很广。1450年左右发现，借助铅可以有效地从含银铜矿中提取银，于是，含铅或含铜银矿的开采就大大兴盛起来。自从10世纪以后，哈尔茨山脉成为主要的采矿中心之一。人们积极开采戈斯拉尔附近的兰梅尔斯堡的巨大银、铜矿床，戈斯拉尔成为遐迩闻名的采矿中心。哈尔茨山区还有另外一些中心。离此往东不远，曼斯菲尔德有一些矿，马丁·路德的父亲就在那里当过矿工。在附近的萨勒河谷的哈雷有一些盐场。12世纪下半叶，在埃尔茨山脉发现了含银的矿藏。在这个山脉的萨克森斜坡上，矿工的宿营地发展成为市镇。弗赖贝格是在1171年建立的。在安娜贝格、马林贝格和施内贝格也有一些采矿中心。在阿尔滕贝格周围，以及在埃尔茨山脉的波希米亚一边的津瓦尔德周围开采了锡。再往东，在西里西亚，塔尔诺维茨、戈特斯贝格和瓦尔登堡都有银矿中心。赖兴施泰因生产金和银。

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以南是波希米亚，有人把它形容为“中世纪末欧洲的内华达”。在过去由捷克人居住的地区，德意志矿工的宿营地发展成为市镇。约阿契姆斯塔尔、库滕贝格、伊格劳、德意志布罗德以及其他一些矿区市镇，都起源于德意志人。波希米亚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多半是由于拥有这些矿物资源。胡斯战争（见前第36页）使一些矿山城镇化为废墟，但是它们在15世纪结束之前已经恢复旧观。往东，在斯洛伐克的诺伊索尔、克雷

姆尼兹和谢姆尼兹周围，有重要的铜矿和银矿，几百年间由德意志矿工帮助开采。在波兰的维耶利奇卡有盐矿。在南面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在蒂罗尔（特别是因斯布鲁克附近的施瓦兹），在萨尔茨堡以南，以及在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还有一些开采铜、银、铅的中心。在蒂罗尔等地的许多地点也都有盐场，施蒂里亚拥有几个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产铁中心，在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30年代之间，其产量翻了4番。15世纪期间在蒂罗尔和卡林西亚发现了异极矿，在卡尔尼奥拉的伊德里亚开采了水银。德意志的熟练矿工前来东欧，是中世纪期间日耳曼人总的向东移动的一个部分。例如，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srebro是银的意思）和塞尔维亚的新布尔多，都可以见到小帮孤立的萨克森矿工。拉古萨人也来帮助开采塞尔维亚的银矿和铜矿。更重要得多的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所谓“萨克森人”，他们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从莱茵兰前来做农夫和矿工。矿物有银、铅和铜，有一些金，也有盐。

奥格斯堡大商人福格家族的活动是中世纪末这种采矿活动的缩影。15世纪末，他们控制了西里西亚、斯洛伐克、波希米亚、蒂罗尔、卡林西亚以及西班牙的银矿、铜矿和铁矿。欧洲大多数采矿业的发展都是与从铜矿和铅矿中提取银分不开的。而在新大陆发现了含银量很高的银矿，特别是1546年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省发现的银矿，不仅对欧洲的采银业，而且对欧洲的整个采掘业，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如果说15世纪的农村主要是中世纪拓荒活动的产物，15世纪的城镇则是中世纪贸易活动的结果。大多数城镇地点的选择都有位置的关系和特殊的原因：有些是在要塞周围，有些是在大教堂周围，有些是在水陆交通要冲，有些是在港口附近发展起来的。就是那些人为地设置的城市，特别是在日耳曼人移民的地方，也没有一座不是利用当地的地形的。但是，如果说各个城镇的起源是与地理环境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对于11世纪和12世纪欧洲所特有的城市发展的总的趋势，就应该寻求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商业的复兴使距离遥远的国家互相接近，使气候不同和发展阶段各异的地区之间有了交换产品的可能。耕地的扩大，工业的发展，采矿的增产和人口的加多既相互依存，又与复兴的商业有密切关系。我们很难分清哪个是因，哪个是

果，可是我们无论如何能够看出一些征兆，大小城市的发展就是新经济秩序的最显著的征候之一。

然而，12世纪的所谓商业革命并不是毫不间断地走向16世纪扩展中的经济。正如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农田耕作的收缩一样，商业活动也有过收缩的情况。由于战争、瘟疫、东方贸易的中断，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现在弄不清楚的原因，生产下降了，运输的货物减少了，城镇萧条甚至衰落了。例如，据估计，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德意志北部城市的人口减少了20%左右。但是，总的来说，用统计数字来做证据是很不可靠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总的收缩之中，还有个别地方的繁荣。例如，当加泰罗尼亚的商人的黄金时代已经消失的时候，法国的海港正在日益兴隆，葡萄牙人正在沿着非洲西海岸开拓前进，为殖民地扩张展开新的远景。

概括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有两个商业世界，一个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商业世界，一个是地中海的商业世界。两个世界有陆路的和海路的联系。在陆地上，意大利商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找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口的道路；香巴尼地区的市集为南北商人提供了方便的集会场所。14世纪初，市集开始衰落、缩小为地方市场，但是在那以前很久，意大利人就与法国、英国、佛兰德，以及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的其他一些中心建立了联系。在海上，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长帆船在13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北海的各港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接触有相当大的增长。有很长一个时期，在这些北方的海岸上，布鲁日港是一个主要的交易场所。然而在15世纪，部分由于联结港口与海面的兹汶河的淤塞，部分由于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原因，布鲁日作为航路的端点就由安特卫普取而代之了。南北方之间由陆路和海路所进行的这些大量的接触虽然已经蔚为壮观，但它还不是中世纪商业最重要的特征。这是在波罗的海—北海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的各自内部所进行的单独的活动。我们幸运的是有两部英国人关于15世纪欧洲商业情况的论述。一部是《评英国的政策》，无名氏著，1436年出版^[16]；另一部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所著《英格兰的商品》^[17]。

北方贸易的典型商品与南方的不一样，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主要的一项，而且对天主教的欧洲很重要的一项，是鱼。冰岛周围的水域产鳕鱼，但是鱼的主要来源在大陆的近海。现在鲱鱼主要

在北海西部繁殖，但在当时，北海东部，特别是波罗的海南部却盛产鲱鱼。瑞典南方斯科纳的渔场，长期以来是欧洲最重要的渔场，干鱼和咸鱼的贸易是北方商业的一个主要分支。在15世纪期间，斯科纳的渔场作为主要的供应来源，已被北海的渔场压倒，取而代之了。我们不了解波罗的海鲱鱼的夏季鱼群是如何消失的^[18]，但是在斯科纳渔场最后停止大量生产之前，荷兰人就在北海建立起他们的鲱鱼贸易了。所捕获的鲱鱼的分配和买卖，使荷兰的船只可以满载而归。用当时一位荷兰人的话来说，“鲱鱼使荷兰人有生意可做，荷兰人的生意又使全世纪经济繁荣。”在北方海洋和南方海洋之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弗勒兴、鹿特丹以及尼德兰的另外一些港口，对于发展大规模的转口贸易来说，地点都很适中。不过，这种贸易的鼎盛时期还有待于未来。

腌制咸鱼所用的盐有很多来源，例如来自吕内堡，特别是来自法国西部海岸的海湾。北方各族人的运盐船经常开到那里的布尔日讷湾。食品的另一个主要项目是谷物。起初是由法国北部的肥沃地区，由英格兰和莱茵兰，后来是由德意志东部的新移民地区输出谷物。工业化的佛兰德的稠密人口就依靠这些来源。另一种商品是葡萄酒，到了15世纪，葡萄酒的商品生产集中于少数几个特别地区——普瓦图、加斯科涅、勃艮第和摩泽尔河沿岸；加斯科涅与英格兰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但是，商品所包括的并不限于食品。从14世纪起，波兰、利沃尼亚、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针叶树林开始在北方的海运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由于西方的森林地带因拓荒种田而大大缩小。重要的不仅是木材本身，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林产品”——松脂、焦油和碳酸钾。从这些北方土地上也运来一些奢侈品——装饰用的琥珀，制作蜡烛的蜡，还有并非不重要的既为保暖又为美观的毛皮。再有一种商品是羊毛。15世纪欧洲的一些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所依靠的都是进口的羊毛。主要的输出地区在很长时期是英国，主要的输入地区包括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到了13世纪，佛兰德及其邻近地区已经成为西北欧的主要纺织业中心。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涌向南方和东方。而在1400年以前，又增加了英国的布匹。在15世纪，英国成为毛织品而不是原毛的主要出口国。水上漂洗机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英国布匹生产的地理布局，而且使整个国家凌驾于佛兰德之上。英格兰西

部、东英吉利亚以及约克郡的布业中心的日益富庶，可以由它们的一些宏伟壮丽、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来证明。到15世纪末，英国布匹是欧洲国际贸易中的一宗极主要的货品，根据伊拉斯谟的记载，它的质量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布匹都要优良。

在这种贸易活动和这些工业的哺育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城镇繁荣起来。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根据一项估计，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一样多，也许比乡村人口还多一些。在欧洲大陆上，除了意大利北部，就没有一个地区有那么多、那么大和那么兴旺的城镇。佛兰德城镇的中世纪建筑物，特别是它们的布业大厅和它们的市政厅大厦，都是当年繁荣的明证。许多城镇都有它们的特产。阿拉斯（Arras）一名源出于叫作“阿拉斯”的挂毯；康布雷（Cambrai）一名源出“细亚麻布”（cambric）；里尔（Lille）一名源出“里尔线”（Lisle thread）；瓦朗西安（Valenciennes）生产帷幔（valence）；伊普雷则是菱形花纹布名称的来源。另外，有些城市以金属制品见长，特别是列日的铁工和迪南的铜工。还有一些城镇生产呢绒，包括布鲁塞尔、马林、卢万、杜埃和亚眠；如果全部开列，这个名单是很长的。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城镇的规模大小，而各种不同的估计数字又相差悬殊^[19]。可以肯定地说，居民人数超过20000的城镇为数不多；例如，阿拉斯的人口似乎刚刚超过20000。不过，这类数字大多只能使我们在比较城镇的大小时有一个粗略的概念。

英国完全没有像这样星罗棋布的城镇。15世纪末，伦敦本身的人口似乎超不过60000。其次就是诺里奇，大约只有12000人，布里斯托尔大概有10000人，都比伦敦差得多。由于与爱尔兰和欧洲大陆进行贸易，布里斯托尔人口在近世增长得很快。再其次是十几个人口在5000至10000的城镇。大多数为周围农村服务的市集的平均人口似乎远远低于2000的水平^[20]。另一方面，法国则拥有凌驾于所有西方城市之上的名城。巴黎的人口显然接近20万，它的规模大景物美，使得一批一批的游客赞叹不已。里昂位于索恩河的要冲，是四通八达的著名贸易中心。这里1506年开设的交易所在法国历史最为悠久。这里的丝织品和印刷业遐迩闻名。在法国西海岸，百年战争之后生活欣欣向荣。波尔多和贝荣纳用船装运葡萄酒；拉罗歇尔、南特、鲁昂和迪埃普同样由于贸易而富裕起来。

在法兰西以东，矗立着莱茵兰的一座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这是一个天然肥沃的地区，它的河流为贸易提供了运输要道。位于佛兰德与德意志南部之间的科隆，是一个通商要地，它的亚麻织物和金属工业是很重要的；即便如此，其人口也超不过35000。溯莱茵河而上，有一些著名的中心，如科布伦茨、美因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弗赖堡、巴塞尔。另外还有一大批城镇既是工业的所在地，又是当地生活的中心。关于这些城市居民人数的估计数字有多有少。斯特拉斯堡的人口大概有25000，而其他城镇的人口要比它少很多。一般城镇的人口似乎都在10000以下，有时候大大低于10000。

在德意志南部，有一批城市——纽伦堡、乌尔姆、雷根斯堡、帕绍、维也纳、苏黎世、奥格斯堡、慕尼黑、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部分地是靠穿越阿尔卑斯山隘的贸易来维持的。此外，波希米亚等地的矿山城镇也应该列在这批城镇之内。所有这些城镇，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一些城镇，在15世纪下半叶都曾经有过显著的繁荣，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居民人数是在20000以上的，许多都是10000人稍多一点。奥格斯堡的福格家族在德意志、匈牙利和西班牙经营矿业大发其财；他们在商业方面的投资更加广泛，在16世纪甚至渗入美洲和亚洲。福格家族被称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财阀，他们能够干预当时的国际政治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切影响都来自约翰内斯·福格的进取精神，他是14世纪奥格斯堡的一位织亚麻布的工人。福格一家并不是这些德意志南方城镇的唯一的商业王朝。纽伦堡的商人们在吕贝克有代理人，在东普鲁士和利沃尼亚有主顾；他们与莱茵兰的城市有联系，在意大利北部有投资。他们把波罗的海的鲱鱼运到萨尔茨堡，把波兰的牛运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们还在中欧的市场上出售东方的香料和西方的纺织品。

在北方的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另有一批城镇——多特蒙德、苏斯特、蒙斯特、戈斯拉尔、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和其他一些比较不著名的地方。这些城镇为当地的市场服务，靠当地的工业和远方的主顾来维持，它们发展的规模不大不小，大多数人口似乎在5000以下。汉堡和不来梅两个港口参与北方诸海的活动，主要输出谷物和盐。在易北河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城镇，这是1200—1400年间在荒地上或者是在几度遭到破坏的早先斯拉夫人村落的旧址上，经过精心设计而建立的。它们那些修得整整齐齐的横竖笔直的大街与西欧城市的弯弯曲曲

的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城镇有许多是周围新村庄的地方市场。有一些发展成为重要的行政中心，或者，比较特殊地，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更广阔的商业活动的桥梁。吕贝克是1143年日耳曼人建立的城镇，变成了北方贸易的市场和波罗的海周围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其人口大概刚刚超过20000。但是在这新的移民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中心。如罗斯托克、维斯马、莱比锡、德累斯顿、柏林和什切青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名字。再往外，是这样一些中心，如但泽、马林堡、埃尔平、托伦和柯尼斯堡。更往东一些，在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有里加（早在1201年建立）、多尔帕特、里瓦尔以及其他许多日耳曼人设防的中心。易北河以东新建城镇的数目在1000和2000之间。德意志商人从波罗的海沿岸向前推进，在大城市诺夫哥罗德设立一个“办事处”（Kontor）作为立足之地，又在普斯科夫、波洛茨克、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建立一些附属工厂。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推动力量。1200—1400年间，在瑞典出现了作为经济中心的城镇，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以西的梅拉达伦地区。斯德哥尔摩本身则发展成为穿越波罗的海与吕贝克进行贸易的起点站。哥得兰岛上的维斯比，对于德意志商人来说，是一个位置适中的城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另一边，卑尔根地位突出，它不仅与南方各地发生联系，而且取道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向西与冰岛发生联系。

所有这些城镇虽然大小不同，市容各异，各有各的成立历史和特殊活动，但是它们却像是一母所生的孩子一样。它们的居民，至少说是多数居民，从事贸易和工业。商业是一个城镇的命脉，因此，城镇居民总是遭受政治动乱和苛捐杂税之苦，更不要说劫路的贵族和河上的劫贼了。因此，在13世纪和14世纪，许多城市结成共同防护同盟，这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曾经有一个莱茵兰各城市的同盟，还有一个德意志南部各城市的同盟。在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之中，最大而又坚持最久的是汉萨同盟。这个同盟首先可以使我们了解欧洲北方经济王国的商业活动和城镇发展的情况。汉萨同盟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两种情况决定的。一是从英吉利海峡到芬兰湾，从伦敦到诺夫哥罗德，从科隆到卑尔根，已经发展了一个商业网。我们很难说出究竟有多少城镇属于汉萨同盟，因为这个数字经常发生变动，但是根据一般估计，在同盟鼎盛时期，共有80个。这些城镇不都是靠着海岸，也有靠着德意志北部平原的各条河流的。汉萨同盟下分四个“集团”，各以吕贝克、但泽、不伦瑞克和科隆为中心。汉堡和不来梅是主要的成员。

但是，到了15世纪，这个同盟的势力已经越过顶点了。既有利害冲突，也有政治困难。波罗的海鲱鱼捕捞业的衰落，对某些成员是一个打击。吕贝克所失，正是阿姆斯特丹所得。15世纪将要结束时，荷兰和英国的海上事业与汉萨同盟的海上事业进行竞争，因此，甚至在远洋发现之前，正如一位旅居德意志的英国观察家所说，“它的大多数牙齿已经掉了，其余的几个也在松动。”松德海峡税卡最早的申报表是1495年的。这些报表说明驶向波罗的海的船只绝大多数是荷兰的。可见，荷兰船只奔向远洋大展鸿图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地中海沿岸的活动不仅向北方的活动挑战，而且在实际上已凌驾于北方。欧洲南部的一些伸向地中海的半岛，不仅接触到新的大陆、新的气候和新的物产，而且接触到在远离地中海的地方传播的一种不同的文明。据说，“穆斯林商人可以从西班牙旅行到印度，丝毫不感觉不到他们是在前往他乡异域。”^[21]而且不仅是到印度，他们往往深入非洲和撒哈拉沙漠的绿洲。这些遥远地区的贸易给欧洲带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香料占有主要地位，其中有胡椒、生姜、丁香、肉桂、豆蔻和干豆蔻皮。其他的珍奇物品有莼澄茄、小豆蔻、樟脑和黄蓍胶之类的药物，以及香水、糖、宝石、染料（靛蓝、茜草、藏红花）、明矾和地毯。从西方往回运的是毛织品和亚麻布，另外还有一些原毛、金属和兽皮。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货物是经由红海或波斯湾，或者从黑海经中亚细亚进出地中海世界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判断出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之类的古代城市的重要性。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它发展成为世界大城市之一。图德拉的便雅悯在12世纪描述它是“一个巨大商业中心，这里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国”。^[22]它的工业（丝织业、金银工和兵器厂）给旅游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5世纪，它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业中心。在东方，还有其他一些巨大的贸易城市，如塔尔苏斯、以弗所、安条克、士麦拿、特拉布松和萨洛尼卡。土耳其人的来临，特别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打断了，但并没有永远封锁住自古以来的通商道路^[23]。

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城市从地中海贸易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把近东的商路与外阿尔卑斯山欧洲的商路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它们。这些城市的商人到埃及、地中海东部和黑海的各地去搜求东方的物品，然后，或是穿过阿尔卑斯的山隘，或是从海上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把这些货物销售出去。在这些意大利城市中，最了不起的是威尼斯。威

尼斯建立在亚得里亚海顶端，从沼泽和泻湖中冒出来的一群小岛屿上。威尼斯人在利用地形优势方面采取了明智的政策。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他们能够承担运输任务，从这一事实可以衡量出他们的海上力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是，拜占庭帝国被爱琴海周围的一群拉丁国家取而代之。威尼斯，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取得了“希腊帝国的1/4还多一点”。此后几百年间，威尼斯人用征服或收买的方法在爱琴海以及其他地方增加了不少殖民地。史书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像那样完全依靠海洋的国家。”从结构上来说，威尼斯帝国是由一系列的战略据点、停泊港口、岛屿和城市商业区组成，它们位于中世纪一条最大的贸易路线上。这个海上国家并不是没有它的弱点，在14世纪期间，它不得不采取向陆地上扩张的政策。其主导思想有二：一是需要生产粮食和肉类的地区，粮和肉是零碎拼凑起来的帝国所不能供应的；二是需要保证从阿尔卑斯山通往北方市场的道路畅通无阻。由于不断进军，威尼斯先后控制了帕多瓦、维罗纳、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在15世纪后半期，威尼斯的领土向西伸展几乎到达了科莫湖。当时，威尼斯城本身的人口将近10万；菲利普·德·科明描写得恰如其分，他说威尼斯是“我所见过的最得意扬扬的城市”。[\[24\]](#)

在东方海上与威尼斯相竞争的是只有它一半大小的城市热那亚。但是，到了15世纪，大的斗争早已过去，热那亚已经处于劣势。即便如此，热那亚人也没有退居守势，他们开辟了许多商埠，甚至扩展到克里米亚半岛。在那里，1475年失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卡法变成了一个与热那亚一样大、也许比热那亚还大一些的城市，一个有土耳其人、鞑靼人、俄罗斯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杂居的世界性商业中心。热那亚人还开采佛西亚的明矾矿，经营希俄斯的产量很大的乳香树种植园。他们对于莱斯博斯岛、萨索斯岛、萨摩斯岛、伊卡里亚岛以及爱琴海的其他一些岛屿都控制过不同的时期。自从土耳其人西侵、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沦陷以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对爱琴海诸岛的宗主权有过许多变动，但是威尼斯毕竟保住了克里特岛，而且在1489年攫取了塞浦路斯。

在东地中海的贸易大动脉上，1400年以前很久，就有从威尼斯和热那亚驶往佛兰德和英国各港口的定期护送船队。在许多西欧城市，都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代理人。这两个城市的商人也访问了北非的一些港口，1447年，一个叫作安东尼奥·马尔凡特的热那亚代理人进入

沙漠的中心地区。他从图亚特大绿洲写了一份报告，讲述商队与尼日尔河沿岸的富国进行贸易的情况，这些国家输出黄金和象牙以交换铜和其他商品。

在东方贸易中，还有过其他一些意大利的竞争者。阿马尔菲城的大部分在1343年被海水冲毁，失去了它的光荣。比萨由于热那亚的对立和托斯卡纳的内部纠纷而不能够任意发展。萨莱诺、加埃塔、里窝那和许多较小的港口从威尼斯的餐桌上分得一些残羹剩饭。那不勒斯约有10万人口，既是海港，又是一个大都市。另一个重要中心是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巴勒莫，希腊人、拉丁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那里各有自己的居住区。

但是，贸易并不是维持意大利各城市的唯一力量。工业也是重要的。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制玻璃业中心，也织绸缎和呢绒。在伦巴第的其他地方，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贝加莫、波洛尼亚、布雷西亚、科莫、克雷莫纳、曼图亚、帕多瓦、帕尔马、维罗纳和维琴察，虽然毛纺工业起步比北方晚，也变得很重要了。在这些城市中还有米兰，人口约有10万，是一个突出的冶金中心和纺织中心。托斯卡纳有另一群纺织城市。卢卡的丝织业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依然是重要的。比萨是另外一个纺织中心。然而，压倒一切城市的是拥有5万人口的佛罗伦萨；它的工业以外来羊毛为基础，过去由英国输入，这时更主要的是由西班牙进口。马基雅弗利于1469年在佛罗伦萨出生，他的《佛罗伦萨史》叙述到1492年，反映出商业竞争对于意大利各城市的政策形成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城市都由于当时经济环境而获得成功。有些城市，如锡耶纳、帕维亚、弗拉拉和拉文纳，都处于次要的地位。也有些城市还远远落后，比作为周围农村的市集强不了多少。

意大利各城市虽然占主要地位，但在地中海的商业中，它们并不是唯一活跃的动力。法国南部正在从100年的混乱状态中开始复原。例如，蒙彼利埃城在15世纪初已经大大缩小，自从雅克·科尔^[25]于1440年左右在这里开设企业以来，它又重新活跃起来。法国拼命与威尼斯的垄断贸易竞争，它和埃及、叙利亚，以及北非重新建立了联系。雅克·科尔的故事已经变成神话传说了，但是，那只不过是法国人的许许多多活动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占领鲁西荣之后，立即开始建设科利乌尔海港。在他的统治将结束时，他终于占有了马赛，并且宣布以马赛为商业中心，使东方的商品

在此卸货，然后分销西欧的所有国家。他计划建造一个地中海大舰队。尽管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即去世，他对于法国在地中海的活动毕竟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在地中海上的另一个竞争者是阿拉贡。它在地中海西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攫取了巴利阿里群岛和撒丁，它的势力一直伸展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但是，这些地方并不是加泰罗尼亚羊毛和毛织品的唯一市场。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们与拉古萨及亚得里亚海的其他港口，与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与柏柏里海岸^[26]，并且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与佛兰德和英国进行贸易。但是由于国内政局的不稳以及意大利的竞争，在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势力衰微。巴塞罗那是不是能有35000居民，实属疑问；而巴伦西亚就更小了。我们从加泰罗尼亚海员绘制的极其详尽的航海手册中，可以看出早期活动的情况。

伊比利亚半岛的内陆没有任何可以与意大利各城市相媲美的东西。但是，即便如此，在它的一片单调之中，也还点缀着一些生气勃勃的小城市。西班牙有一句老话常说：“托莱多富有，萨拉曼卡强大，莱昂妖娆，奥维多庄严，塞维利亚伟大。”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中心、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科尔多瓦产皮革，哈恩产丝和纸张，萨拉戈萨产布匹呢绒。除此而外，还有布尔戈斯、巴利阿多利德、塞哥维亚以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美丽的城市格拉纳达。马德里只不过是一个农业小镇，直到1560年才变成统一的西班牙的首都。在北方，比斯开湾的一些小港口与加斯科涅和诺曼底，与英国和佛兰德通商，特别是交易铁和羊毛。

西面是葡萄牙，它的海上贸易发展得很慢，但是很有潜力。载运葡萄酒、干果和橄榄油的船只从葡萄牙的港口，特别是从里斯本和波尔图，向北航行；1400年以前在布鲁日就有一个葡萄牙的代理店。然而，葡萄牙的好运交在南方。15世纪，在被人普遍称为“航海家”的亨利王子的鼓励下，人们连续乘船沿着西非海岸进行探险，并且由于偶然的机会，许多热那亚水手参加了这个工作。1445年到达佛得角，1461年，即亨利逝世一年以后，葡萄牙人驶进了几内亚湾。1487年，迪亚士绕好望角获得成功。同时，由柯维哈领导的一个葡萄牙探险队前往近东，由海路从埃及到达了印度。他的报告鼓舞了人们进一步的探险。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的一支探险队从塔古斯河启航。翌年5月23日，这支探险队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外面停泊。

当印度人问葡萄牙人需要什么东西时，葡萄牙人回答说：“基督教徒和香料。”返航的第一批船只装载着生姜、肉桂、胡椒、丁香之类，于1499年7月10日到达里斯本。

与此同时，热那亚水手哥伦布于1477年定居里斯本，但是，当发现他的计划很少有人响应的时候，他就于1484年前往卡斯蒂利亚，经过长期的斗争才得到认可。他于1492年8月3日开始他的著名的航行。我们对于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直向南航行的努力，还有许多弄不清楚的地方，而围绕着哥伦布的目的和信念，那就更是众说纷纭了。然而，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这些成就不仅出现在一个世纪的终结，而且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欧洲的近海贸易现在扩展到远方的大洋。欧洲的生活、欧洲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性质，以及欧洲的人文地理，都面貌一新。

[1] 爱德华·林纳姆：《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海上地图，1539年威尼斯版和1572年罗马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詹金镇，高树文库，1949年。

[2] 如愿研究这些现象，参见（1）W. 阿贝尔《中世纪的荒园》（耶拿，1943年）；（2）H. 波伦特《德意志中世纪荒园的扩大》（哥廷根，1950年）。

[3] 傅华萨（Jean Froissart, 1333?—1400），法国宫廷历史学家，著有《闻见录》四卷，对百年战争时期的西欧情况有生动的描述。——译者

[4]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意大利著名诗人，长期漫游欧洲，著有《抒情诗集》等。——译者

[5] 巴赞（Thomas Basin, 1412—1491），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为《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王朝史》，用拉丁文写成。——译者

[6] 赛塞尔（Claude Seyssel, 1450—1520），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朝出使英国、瑞士、奥地利、罗马。——译者

[7] 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法国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六卷本《共和国论》（1576年）。——译者

[8] 都是“灌木丛”的意思。maquis（法语）；macchia（意大利语）；matorral（西班牙语）；garrigue（法语），又译“加里哥字群落”；monte bajo（西班牙语），phrygana可译为“弗里吉亚群落”（弗里吉亚为地中海北岸古王国，故名）。——译者

[9] 四个地方语都是“赶羊大道”的意思。现代西班牙语作cañadas或cabañero。——译者

[10] 当地方言，与西班牙语cañadas（赶羊大道）同义。——译者

- [11] Tavoliere di Puglia. ——译者
- [12] 10世纪至15世纪期间，在巴尔干半岛兴起的一个宗教派别。——译者
- [13] 威·米勒：《拉丁东方论文集》（剑桥，1921年），第404页。
- [14] Trans是词头（外），nia是词尾（表示地名），中间主要部分sylva是拉丁文“森林”。——译者
- [15] M. 波斯坦和E. E. 里奇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剑桥，1952年），第470页。
- [16] G. 瓦纳（编）：《评英国的政策》（牛津，1926年）。著者可能是后来任奇切斯特主教的亚当·莫林斯。
- [17] 收在《约翰·福蒂斯丘爵士著作集》（两卷，伦敦，1869年）。
- [18] 奥托·皮特逊：《水文学现象与气象学现象之间的联系》，载《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第38卷（伦敦，1912年），第173—191页。
- [19] 为了便于对几个问题有概括的了解，请参阅《历史科学第九次国际代表大会报告集》（巴黎，1950年），第55—80页。
- [20] W. G. 霍斯金斯：《英国16世纪初期的地方城镇》，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5册（1956年），第1—19页。
- [21] M. 波斯坦和E. E. 里奇编：《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52年），第2卷，第283页。
- [22] 便雅悯，12世纪犹太人，生于西班牙。他是到达中国西部边境的第一个欧洲旅游者。引文见其所著《旅行记》。——译者
- [23] A. H. 里别尔：《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东方贸易的道路》，载《英国历史评论》，第30卷（伦敦，1915年），第577—588页。
- [24] 科明为佛兰德政治家和编年史家，法王查理八世曾派他出使威尼斯。引文见其所著《回忆录》第二卷。——译者
- [25] 雅克·科尔（约1395—1456年），中世纪法国最富有的商人，查理七世的财政总监。他经营各种赚钱的生意，曾在蒙彼利埃建立一个类似证券交易所式的组织，蒙彼利埃是他进行地中海贸易的第一个据点。——译者
- [26] 指北非沿海柏柏里海盗活动地区，包括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译者

第三章 15世纪的文明与文艺复兴

在1500年左右改变欧洲面貌的各种事件的历史中，我们必须看清两个互相交错的发展情况。除了用“文艺复兴”一词来表达其整个时期的文化变革而外，还出现了近代欧洲的国家制度。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期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经过长期的和复杂的准备以后，在坚强的君主政体之下达到了全国统一。此外，在法国和德国的富饶边境地区，有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勃艮第公国成长起来。由于法国拥有约1500万人口，它的潜力比任何对手都优越得多，并且在实际上代表一种在别的地方还不曾出现过的强大国家的类型（当时英国人口仅300万左右，西班牙人口仅600万，勃艮第公国人口，包括阿图瓦、佛兰德、布拉邦特等工业地区在内，也不过刚刚超过600万），法国贫穷的各邻邦于是就联合它们的各种力量。唯一与法国人口相等的德意志帝国不能做新欧洲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因为它是一个由区域性的邦和半独立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邦，统治它的哈布斯堡王室作为德意志皇帝没有多大实权。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其奥地利和阿尔卑斯领地中拥有最大和最强的区域性的邦。因此，他们就把反法平衡力量建筑在王室联姻的体系上，首先（1477年）是哈布斯堡与勃艮第两王室之间，随后（1496年）是哈布斯堡—勃艮第与西班牙王室之间。这样一来，在150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世纪世界所不曾有过的那种两大强国或者强国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当英国从16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竭力成为在法国与哈布斯堡—西班牙之间维持平衡的调解人的时候，在欧洲的舞台上便已建立了近代国家均势的格局。

就在大约1490年至1520年的这世代里，文艺复兴的艺术、人文主义和一种新的历史—政治科学占据了优势地位。（自然科学的发展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达到可与之相比的较成熟阶段）但是，在这一文化革命与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着一根本的差异。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艺术和文学中的新的美学价值标准，或者教育和人文主义学术中出现的新观点，很难说是在与政治发展的相互关系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这些新标准和新观点的根子并不在西欧国家的土壤里，而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政治统一的过程，但成为新的大国强权政治的可怜目标的欧洲

那一部分，即意大利半岛。这并不是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艺复兴文化仅仅是从南方输入的东西。毫无疑问，15世纪法国、佛兰德和德意志的艺术到处都飘荡着一种清新的现实主义；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北方的国家里，都有一种正在成长的个人主义竭力显现出来。此外，在每个欧洲国家里，经过与意大利接触而最后产生的艺术和文学，都随着当地的传统显示出一种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意大利以外的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们，从15世纪晚期起，一直相信：艺术、文学、教育和学术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最初的和典型的阶段是在意大利；他们自己代代相传的方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如果不认真努力去吸取阿尔卑斯山以南已经取得的最优良的成果，将来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有所进展。在中世纪末的文明中，特别是在15世纪期间，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对于中世纪人们所向往的事物来说，当康斯坦茨公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年）成功地结束大分裂的时候，算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大分裂粉碎了教会的统一，但未能满足人们对于改革宗教和节制教会的绝对独裁体系的长期不断的愿望。当时成为画饼的计划主要是由中世纪的大学煞费苦心制订出来的；改革派的首领们是一些大的经院学术中心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中心早些时候曾大量产生大胆的政治哲学，不断地探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帝王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义务等基本问题，并使其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当两次公会议的决议使在教会内实行机构改革的一切尝试化为泡影和使教皇的权力近于绝对化的时候，在这整个思想领域里，经院哲学知识分子的锐气全被消除了。教皇作为意大利中部教皇国家的统治者，不久就卷入意大利暴君国家的政治旋涡。14世纪经院哲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15世纪中叶之后也没有继续取得相应的成果。缺乏独创性和死板的传统主义变成了大学生活和教学的特点^[1]，后来的人文主义者经常不断地指责整个中世纪的学术都具有这种毛病。

到了15世纪，的确，中世纪骑士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诸侯的兵役几乎完全废除了。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依靠容易获得农业劳动力而维持的，这时由于黑死病毁掉了欧洲1/3甚至1/3以上的农业人口，由于14世纪席卷大多数国家的持续不断的经济衰退，它已经大大降低了。然而，如果以为自此以后城市自由民在欧洲的舞台上

占据了首要地位，那也是错误的。在建立欧洲新的伟大强国的过程中，君主政治的加强给贵族阶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与市民阶层一起，都是新军队和新政府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另外还能够给君主的周围增加光彩。在15世纪期间，市民与贵族之间和城市文化与骑士文化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些主要诸侯宫廷的存在和影响；在欧洲的每个国家里，所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从社会史和政制史方面来看，除了意大利而外，英格兰的君主政体从中世纪的封建条件下迈出的步子最大。英国的骑士们首先丧失武装军事等级集团的身份。在15世纪，他们被吸收到不再与市民阶层的商业世界相隔一道鸿沟的绅士集团中去。他们与伦敦的主要商人家族相互通婚并社交往来，而在下议院中，“郡选议员”与城镇选出的议员并肩坐在一起——这是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议会的会议中难以见到的社会平等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认为在这种联合中，势力的均衡是半斤八两，或者甚至于使骑士一方逐渐有消无长，那将是错误的。自从15世纪最初几十年起，越来越多的较小的有选举权的市邑并不是像在14世纪期间那样把商人或者市民阶层本身的成员选入下议院，而是把士绅选入下议院；英国议会的社会成分不是向有利于商人阶级的方面变化，而是向有利于上流人士的方面发展，以致到了伊丽莎白时代，士绅议员与市民议员的比例已经是4：1了。

在15世纪英国的文化生活中，我们见到士绅阶级的传统不但相应地残存下来，甚至于死灰复燃。这一情况，正如乔·麦·特里维廉博士所形容的那样：如果乔叟的幽灵回到15世纪晚期的英国环境中来的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他必然会感到完全舒适自如的。不曾出现崭新的思想或文风；人们依然阅读乔叟的作品，仿佛它们是当代的产物一样。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英国文学还没有完全吸取乔叟最好的成就。乔叟在风格和趣味方面是从他把《玫瑰传奇》译成英文和把法国骑士情诗的寓言体裁移植到英国的时代，发展到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清新的现实主义的时代。在15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的确包括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讽刺和教诲作品中；但是，代表1400—1500年之间的文化思潮的优秀文学作品却依旧运用乔叟初期的寓言的和骑士的恋爱诗的“华丽辞藻”。最得意的题材仍然是骑士的史诗，它把过去的历史转化成从特洛伊、罗马和亚瑟王的“圆桌”传承下来的英国骑士的一套传奇故事。

不错，这一世纪有重大的革新和发明。新的学校创办起来了，其中有伊顿公学和温切斯特公学。在这些学校里，士绅家庭甚至贵族家庭的子弟与下层最有才华的青少年一起受教育；正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高等教育变成培养社会栋梁的正常要素的时代已经即将来临了。在世俗社会的高级阶层，写信第一次成为日常的事情。但是，正如在从小地主上升到士绅阶层的帕斯顿家族的通信中那样，凡是这些信件中能使我们观察当时的文化潮流的部分，我们都会发现，除了特别喜欢和积极参加马上比武而外，中世纪的书架依然如旧，摆着描写骑士功勋的史诗，一些宗教作品，以及几册古代著作的译本（不是原文）。印刷书籍的出现并没有在趣味和观点方面立即造成重大的变化。当威廉·卡克斯顿在大半生充当伦敦商人和英国商业利益在低地国家的代理人之后，于15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兴办开创英国印刷时代的印刷所的时候，他出版书籍的重点，除了乔叟的作品而外，就是用英文印行讲述特洛伊、希腊、罗马、查理曼和亚瑟王的骑士的大量作品，这是中世纪晚期宫廷中的读物。在翻译和出版一部题为《骑士团》的法国作品时，伦敦商人贵族的思想感情的代言人卡克斯顿毫不踌躇地评论说：这是一部很合时宜的书，它会使健忘的英国想起在英国骑士以真正侠义精神闻名于世的过去的所有时期——特别是在亚瑟王、特里斯坦和珀西瓦尔的高贵的“气概、礼貌和仁义”的令人难忘的日子里的一般公认的准则。

15世纪英国的历史编纂学证明：经过美化的骑士光荣故事实际上就是卡克斯顿的同代人生活于其中的精神世界。不错，这时有钱的商人们已经代替用拉丁文写作的传教士，而用英文编纂自己城市的编年史，特别是在伦敦；其结果，市民生活中的许多日常琐事连每个小小的情节在内，都被如实地观察和记录下来。然而，如果说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伦敦编年史》的编纂使市民摆脱了他们对教会作家的依赖，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从骑士文化的优势地位强加于人的道德标准和偏见下面解放出来。在《伦敦编年史》记载的城市生活风景中，再没有比骑士马上比武和王族市内游行描写得更津津有味的了；那时还不曾试图观察表面现象和华丽装饰的实质，考虑原因和后果、资料的价值、选择资料 and 比例均衡的必要性等，这些都是在16世纪才出现的历史编纂学的特征。一般的历史著作，例如1480年定稿出版的《英格兰编年史》，依然以12世纪蒙默思的杰弗里所讲述的神话为背景，说埃涅阿斯的孙子布鲁图斯在打败土著巨人之后开创了不列颠王国；亚

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的英雄事迹依然被当作历史事实，并且用作衡量古今一切事物的尺度。15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幻想作品——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也是以这些英雄事迹为主题的。当卡克斯顿第一次出版这部书的时候，他奉劝读者们相信亚瑟的故事不仅仅是虚构；他说，马洛礼的生花妙笔谱写了英国历史的最伟大的时代。

这种既无力量又不情愿与中世纪的骑士世界决裂的情况，主要应该用社会现象来解释。从14世纪到15世纪末，英国也像欧洲的许多部分一样，经过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的时期。虽然在这时候已经出现经营纺织的人——在不受中世纪城市行会规章制约的乡村地区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的毛织厂主，但是，在都铎时代英国经济生活获得大飞跃之前，英国纺织工业的产量依然如旧，几乎没有变动。工业中产阶级的黄金日子还在遥远的未来。在15世纪，中产阶级中能够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唯一社会集团是伦敦的批发商人阶层，他们操纵英国唯一的大都会的政府，控制该城与欧洲大陆的贸易。然而，这些商人的排他性的和拥有特权的“同业公会”，在性质上并非近代社会的先驱，而是中世纪商业行会的历史的结尾。他们并不代表一个深深意识到自己与贵族的差异的集团，却形成一个通过联姻经常转化为土地士绅的社会阶层。商人们在乡间置下产业，就融合在半封建的环境中。甚至迟至伊丽莎白时代，具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的绅士们都在他们的乡邑过着被一群侍从前呼后拥的王公的生活，而他们自己转而又聚集到高级贵族中的一位庇护者的周围。如果说在那时候士绅和贵族的文化已经大大脱离中世纪骑士的传统，这在很多方面是由于首先在意大利各宫廷中发展起来的新贵族教育的影响。

不过，在15世纪末以前，英国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之间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接触。那时候，到意大利留学还没有形成士绅子弟或者伦敦商业贵族子弟的教育的一部分。1490年以前，英国到意大利旅行的人照例是传教士或者奉国王之命出差的官员。尽管这些人把少见的人文主义著作的手稿和对新学术的热情带回国内，从而偶然扮演先驱者的角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人文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新教育或者思想的一个新世界。他们回到英国，并没有发起新文化运动，或者建立反对经院哲学的团体。因此，尽管有这样一些先驱者的鼓吹，尽管英国高级贵族的个别成员延聘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到英国来当秘书或

教师，唯一明显的结果就是英国各图书馆增添相当数量的人文主义著作的手稿，以及旧的中学和大学增加一些希腊语的课程。

在人文主义对于中世纪晚期的英国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之前，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必须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古典学者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热情与更新的宗教思想以及糅合古典遗产与基督教传统的努力均衡地发展。在罗马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批判地校订《新约圣经》原文做出第一个榜样之后，在佛罗伦萨复兴的新柏拉图哲学派别中，意大利的学者们——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以古典时代的宗教文献为基础，开始在半古典和半经院的框架里建立起一种新神学；这在佛罗伦萨增加了对宗教的兴趣；1490年以后，萨沃纳罗拉的传道一度造成人们普遍脱离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世俗主义时，又提高了那里的宗教兴趣。正是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充满宗教意识的阶段，英国学者与意大利发生了接触。约翰·科利特在对意大利进行两年的访问之后，从1496年起在牛津作关于圣保罗书的公开讲演，这些讲演表明与经院哲学的方法作彻底的决裂。他沿着在那些年代里菲奇诺也曾遵循的途径，以异教徒和早期基督教时期为背景，从历史的观点来解释保罗的教导和传教工作。正如菲奇诺的情况一样，科利特对于洞察心灵深处具有一双新的慧眼，他从深深热爱作为圣经教师的保罗的人格而产生一种理解能力。科利特对于保罗学说的诠释是基于一种单纯的虔诚和一种信心，即认为信仰神的仁慈以及公正精神要比任何文字或仪式更能够说明问题。从这种信心出发，他对经院学者的大多数神学疑难问题显然漠不关心^[2]。

通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文化世界的这个第一座桥梁一旦搭起之后，人文主义在英国很快就变成能够跨出大学门墙蓬勃发展的一个运动。在大都会伦敦，由于科利特和托马斯·莫尔的功劳，有些人形成一个集团，他们的思想受到新宗教学的培育，很快就倾注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到了16世纪20年代以后，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后半期，文艺复兴在历史和政治、社会问题和人类行为方面的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当1500年以后不久，一位住在英国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多尔·维吉尔发现在人所公认的关于布鲁图斯和亚瑟王的记述中有中世纪传说的幻想成分，而以人文主义的模式改述英国历史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评论仍然感到激愤，认为荒诞不经。然而，怀疑的种子一旦播

下就会发芽，从16世纪30年代起，蒙默思的杰弗里的天下就逐渐地被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历史前景代替了。

跨过英吉利海峡，君主、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相同的。在法语国家中，君主政权在加强政治统一方面的活动比15世纪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在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最黑暗时期以及随后的重建时期中，国王是法国团结的中心和救世主；同样，勃艮第公国完全是法国王室年轻的一支努力尝试的一个创造物。在法国，王权已经变成绝对的了；全国三级会议在实际上已经失掉对税收事务的批准权，巴黎的最高法院（Parlement）只不过是偶然地控制一下国王的全知全能。即便中央集权的国王政府鞭长莫及，还不能直接统治广大王国的每一个省份，但在奥尔良和安茹、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则是由诸侯的宫廷以及王室支系或者高级贵族成员主持的地方政府来代行职权的。国王和王侯们在15世纪下半叶所进行的重建工作，不仅依靠贵族而且依靠中产阶级的合作。不过，尽管国王的政策对城镇的工商业极为有利，而法国的城市分子与其说是受到尊重的同盟者，不如说是在王家官员密切监督之下的俯首贴耳的宠臣。城市人的领导阶层并不代表一个全国性的商业或工业阶级；他们可说是形成只具有地方利益的富有的当地贵族。他们中间最成功的分子急不可耐地购买地产，参加地方贵族的队伍。因此，在法国的宫廷中，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文学艺术的精神几乎原封不动，未受城市的影响；中世纪骑士制度的遗风依然成为具有支配力量的因素。

的确，在诸侯宫廷的范围内，我们还遇到在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一种因素。在法国掌玺大臣公署的工作人员当中始终流行着对古典著作家的研究，在中世纪的晚期，这班人的思想是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拉丁古典主义脉脉相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使用的都是罗曼语，在中世纪的法国，对于残存的拉丁文学的兴趣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彼特拉克来临之前的意大利在内）都更加广泛地扩展。在14世纪，驻蹕罗讷河畔阿维尼翁的教廷使两个国家发生密切的文化接触，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的意法交融的环境中度过他成熟的年代，在他生平的最初阶段，可能在他的法国朋友当中比在他的故乡意大利得到更好的古典原著和参考资料。在彼特拉克以后的最初两个世代（大致为1360—1420年），我们从王家掌玺大臣公署的秘书当中见到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社会生活：他们热心传抄古典著作的手稿；互相交换模

仿古代样板的书信和诗歌。但到15世纪30年代以后，这些活动的势头衰退了，显然没有留下长久的效果^[3]。解释是不难找出来的。一种局限于掌玺大臣公署的狭隘世界的、对当时的法国学术或者对那些重要社会人物的价值标准没有多大意义的、偏重于修辞学的研究倾向，不可能产生任何可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有机发展相比拟的东西。

虽然成熟的人文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一个如此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古典研究对法国的长期影响，意大利又是法国的近邻，对某些最喜爱的古代著作家的兴趣就在法国宫廷的文化中扎下根来。从14世纪中叶起，国王的图书馆除了珍藏宗教文献和骑士文学作品而外，还增加了许多秉承御旨译成法文的希腊和罗马著作的手稿。这样一来，不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廷臣们不仅可涉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也可涉猎李维的《罗马史》，西塞罗的《论老年》和《论友谊》了。还有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特别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一些作品。但是，专为王公的图书馆译做的这些法文译本与一心要使所译作品的精确原文、文学形式和历史气氛重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的翻译大不相同，它们只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所做的意译和改编，即这些译本的内容能使那些急欲从罗马“骑士”的坚韧不拔、忠诚爱国和武人品德中寻求医治当前骑士精神堕落的妙药的读者和作家们，一看就懂，并可以拿过来做写作的题材。在15世纪后半叶法语国家的文化中心——勃艮第的宫廷里，古代特洛伊、希腊和罗马的传奇性的骑士历史成为有关行为、教育甚至政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公爵的秘书们搜集所有可以取得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资料，不论是古代史籍的译本还是中世纪故事的译本，编为带有美丽装饰的手抄书册。亚历山大在战时和平时神话般宏伟壮丽的宫廷生活成为一个样板，反映了勃艮第宫廷社会生活的形象。仍然通过蒙默思的杰弗里的眼睛来再现的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世界，以及关于特洛伊的每一点一滴可以获得的报道，不论是完全虚构的还是来自古代的资料，依旧是过去情况的公认的部分。好人菲利普公爵亲自参加编辑《特洛伊史》，它是这类汇集中最优秀的手抄书册，为后来由卡克斯顿译成英文和印刷出版的欧洲大陆关于骑士团的作品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的因素和意大利的影响对于改变传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显得无能为力。在骑士制度的初期发展阶段，骑士团、十字军，以及吟游诗人的恋爱诗的兴起，都是头等大事，这些是从中世

纪环境的需要自然产生的。现在在宫廷中，通过使其变成一种复杂的制度和仪式的方式，把这些昔日的回忆活生生地保存下来。中世纪的骑士团是志愿到东方去为基督教而战斗的骑士们的自由结合的团体。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骑士团，这是一些新君主国家创立的，它们在旧的骑士标志和社会形式的帮助下，竭力把许多辽远的行省的贵族联合于新的国家中并为野心勃勃的贵族们提供效忠王侯的新出路。第一个这类宫廷骑士团是英国的嘉德骑士团；随后出现的是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团，它是这类团体中最豪华奢侈的，在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合并之后，作为西班牙的一个组织继续保存下来。路易十一在法国创建的与此相似的圣米歇尔骑士团的兴起以及后来在像萨伏依、丹麦和匈牙利那样一些相互距离遥远的国家里类似的骑士团的创立，表明勃艮第的范例对于整个欧洲的宫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些新骑士团中，仪式的盛大和隆重是为了把旧的等级和荣誉的标准保持在至上的地位。至少是在勃艮第，甚至关于十字军的记忆还在起显著的作用。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欧洲许多地方都制订了组织一支新十字军的计划。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教皇庇护二世把他所有的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到无用的努力上。在勃艮第的环境里，组织十字军的计划变成了宫廷的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给古老的骑士史诗续上迷人的一章。在1454年举行的、据当时的历史记载以豪华著称的一次公爵宴会结束的时候，一个代表蒙受耻辱的基督教会的象征性人物出来祈祷，乞求把他从异教徒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于是，公爵在表现要重新鼓起骑士的英勇精神的场面中，宣誓他不但要亲身参加十字军，甚至还准备单枪匹马与苏丹战斗。在金羊毛骑士的誓言中，有许多比这还坚决。骑士的爱情和诗歌，在法国的宫廷里也变成了一种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制度。从14世纪末起，廷臣们设立了恋爱课程（cours d'amour），他们在正式集会上讨论骑士仪态和恋爱的微妙问题，朗诵他们依照骑士恋爱诗的传统风格写作的诗篇。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按照同一的模具铸造宫廷所有成员——上至王公下至他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秘书们的心灵。他们全都被结合到一个由王侯、大保守派、大臣、咨议、秘书以及其他许多截然不同等级的人组成的“多情的宫廷”（cour amoureuse）的神圣阶级组织中，不过相互之间还细密地区分开来。

这种背景就很容易阐明在15世纪法国和勃艮第文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流派修辞家们（Rhétoriciens）的精神——所表现的一些特征是：浮夸的美辞丽句，这些作家瞧不起贵族以下的平民社会；他们爱好古旧的体裁；他们迷恋中世纪诗歌的讽喻和象征；以及他们由于知道在宫廷的美妙习俗以外，骑士行动和骑士恋爱到处与现实生活碰壁，因而引起深深的悲观和忧郁情绪^[4]。不错，在15世纪也有少数伟大的作家，他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能够逃脱修辞派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心理分析得到更广阔的天地，并且产生了文学的瑰宝。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如此大力支持墨守骑士时代的观点和习俗，我们就找不到坚决反主流的文学派别；甚至那些描写现实细节的大师们也未能进一步自觉地起而反对传统的方法，或者变成文艺复兴潮流的先驱者。那个时期的一位法国大诗人弗朗索瓦·维永是以赤裸裸的自我暴露出名的，他之所以能够在许多方面摆脱时俗，只是因为他过着流浪汉的不规则的生活，在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上，他是中世纪初期漫游学者的后世弟子，而不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位先驱。另一位被称为近代小说拓荒者之一的著名作家安托万·德·拉·萨尔表明，那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和心理经验能够很好地产生对骑士制度的讽刺性的批判。但是，他的本意依然在于谴责社会的恶习和人类的缺点，而不在于提出新的方法。尽管拉·萨尔已经见到人文主义的意大利，但他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的书中主人公的教育，却依然是通过马上比武和宫廷恋爱对一个青年骑士进行训练。

在历史著作方面，现实主义和深入的心理分析，到15世纪末由路易十一的史官菲利普·德·科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明的笔下，把骑士制度作为一个古老的幽灵来谴责是很明确的；他的这种态度反映出路易十一在位时期（1461—1483年）的精神，在那一时期，对法国政治和经济复兴的热切关怀曾经一度使王室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处于次要地位。科明无情地挖掘人类的动机，他的“只有成功而非荣誉在政治上有用”的格言，以及他对于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就是在北方与他的比较年轻的同代人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的思想相呼应，但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科明的历史编纂中，并没有把15世纪现实主义的这些成果应用于解释历史和政治生活的新因果理论上去，而这一理论乃是马基雅弗利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成就。科明对详情细节明察秋毫的描述的基本出发点，依然是把战争和败北以及一切

历史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上帝进行惩罚或教育的意志。正是根据这样一些观察，路易十一时代才占有历史地位。路易十一在位时期的现实主义倾向，并没有使法国宫廷的生活和王室倡导的方针发生任何永久性的变化。除了因受意大利影响而逐渐有些改头换面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宫廷依然保持15世纪宫廷的骑士传统。甚至就在路易十一本人的朝代，你也会注意到：在那文质彬彬的沉着冷静的外交家的少数措施当中，就有一项是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创设新的宫廷骑士团。另外，路易的秘书们在写法国历史的时候，这些《法国大编年史》收容了中世纪的所有传奇故事，只有在16世纪期间，在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批判论已经发挥作用之后，它才让位于一种新型的历史编纂学。

在勃艮第地区，一种独特的文化任务落到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身上。在15世纪的艺术史册上，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没有一个地区像佛兰德和布拉邦特出现那么多杰出的人物。的确，在15世纪的绘画中，对大自然的感受性和对人类个性的理解力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凡·爱克兄弟为首的佛兰德派的历史。在讲述造型艺术中新精神的兴起的一章中，最伟大的先驱者克劳斯·斯吕特以及他的许多门生的名字又会把我们带到佛兰德—布拉邦特或者邻近的地区。但是，在决定这些艺术成就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记住另外几个事实。新的思潮并不是作为低地国家的城市的真正创造物而兴起的；甚至“佛兰德派”的绘画严格说来也不是佛兰德城镇画坊为了迎合商人贵族的趣味而在一种城市气氛中完成的产品。低地国家的艺术的社会背景与15世纪初期在佛罗伦萨和其他托斯卡纳城邦的市区之内兴起的意大利艺术的社会背景是不相同的。在佛兰芒—勃艮第艺术中，种子是在城市的环境中撒播的，但成长却是在勃艮第公爵们的上流社会中进行的。扬·凡·爱克以及其他大多数主要的画家和雕刻家是受雇于骑士制度的公爵宫廷，在这种宫廷的侯门气氛中生活和创作他们的许多主要作品的。他们在描绘人物和风景时对细微部分的反映能力，大部分不是从任何城市艺术，而是从专为14世纪的法国国王和诸侯们的图书馆制作珍贵手抄本的袖珍画家的作品中学来的。这些中世纪环境的性质在许多方面给佛兰芒派的现实主义打上了它的烙印。正如在科明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样，虽有重现真实细节的高度技巧，但缺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和法则进行组织的能力；对于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观点，依然是中世纪式的宗教的、精神的和

象征的观点。结果，佛兰德艺术家们对于人体和透视的依然不完备的知识，并没有像我们在意大利所见到的那样，发展成为对解剖学和光学的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而这种研究是艺术对于文艺复兴精神的不可缺少的一种贡献。

甚至在佛兰德各城市的城墙之内，都显示出勃艮第宫廷的强烈影响。根特、布鲁日、卢万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在当时修筑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正如最近一位勃艮第文化史家所说，看起来更多地像珠宝匠的细工，而很少像建筑艺术；它们类似供奉圣物的庄严庙堂，是用公爵宫廷的装饰风格建造的^[5]。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它们离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同代建筑所特有的朴素结构更远的了。至于文学和诗歌，阿图瓦、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城市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修辞院（chambres de rhétorique，在操德语的省份叫Rederijkerskamers），这是中世纪上演宗教神迹剧团体的已经世俗化了的化身。修辞院在15世纪具有两大宗旨：训练上演戏剧（这时的内容往往是道德说教和寓言性质的）的班底和使全体成员经常练习“修辞术”。为了受这种艺术的教育，曾经举行正式的会议，具有一种严格的社会仪式，与会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依照主席所指定的共同题目即席创作和朗诵诗歌体的作品。会议主席通常是一个勃艮第的高级贵族。由于修辞院这样注重仪式和文学表现方面可以教导的成分，它成为中产阶级的与贵族的恋爱课程相对应的东西。在两种组织中，保持社会上公认的形式和传统，远远超过个人独创的价值。几个世代以后，在16世纪期间，修辞院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一个社会论坛，最初传播的是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思想，随后，在尼德兰的北部省份，传播的是宗教改革思想。然而，为了找出从15世纪下半叶起首先逐渐传播新文化力量的渠道，我们的注意力必须离开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城市，而转向勃艮第领域以外的文化中心。

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和中部，有3个中心或地区没有接受法国宫廷和勃艮第宫廷的强烈影响。一个是巴黎大学，它是个古老的、国际性的欧洲学者聚合的地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与英国各大学的发展过程极其相似的情况。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做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

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那些在他们的精神教育中寻求更富于营养的食品的大学生，从阅读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在巴黎，正如在牛津一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开始运用古典学者对《圣经》的解释方法，以及把注意力转向古代遗产的神秘和宗教因素、为神学探索人文主义的途径之前，对待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冷漠态度是没有改变的。在巴黎，坚冰也是在1495年左右被打破的。正如科利特在牛津一样，在巴黎的勒费弗尔·戴塔普（法贝尔·斯塔普伦西斯）当时从意大利旅行中带回来对于一种新学术的热情，从此就立即开始了对古典学术方法的学习，产生了急切研究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趣，神学有了崭新的出发点，各种科目都贯穿着新的信仰的温暖。勒费弗尔只有一点与科利特不同，对于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他主要掌握的方面并不是对圣保罗书的兴趣，而是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古代关于神秘主义和玄妙科学、关于占星学和名字的象征意义的著作所给予的注意。从这一套古典晚期的著作中，人们可以一瞥基督教前的信仰情况。对于这一套文献的兴趣几乎变得像过去人文主义者对《圣经》的兴趣一样势不可当了。

至于法国人文主义运动与文艺复兴意大利之间的关系的后来的趋向，在法国如在英国一样，只是在宗教思想和神学方面已经有了这些接触之后，意大利人文主义才作为对现代生活和对过去传统的一种新态度而被接受下来。甚至到这时候，变化也不是骤然发生的。当受雇于法国国王的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保罗·埃米利奥，在1500年左右编写法国古代史而不采纳法国骑士源出特洛伊的传说的时候，他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未能给法国的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让·博丹的时代，即16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的历史批判主义才明确地开始消除法国骑士传说的虚幻世界。

在法国一勃艮第宫廷文化支配之外的第二个中心地区，是在布拉邦特—佛兰德和勃艮第东侧的星罗棋布的城镇，它们遍布莱茵河的广大河谷中，北自须德海周围该河河口，南至瑞士。与根特和伊普雷、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织布工业和国际贸易的显著集中相比，这个东

边的地区在14世纪是遥远而偏僻、财富有限，而且是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的家园；到了15世纪，这里开展一种叫作“现代虔信”（Devotio moderna）的敬神运动，它是前1世纪在莱茵河与须德海之间的平静的地区开始产生的。这个“现代虔信”的最有趣味的成果之一是“共同生活弟兄会”，由男子（偶而也由妇女）联合组成，他们虽然不做修道院式的绝无反悔的誓言，但是他们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在共同的房子里过一种朴素的和有严格规律的生活，在所有睡眠以外的时间，都依照规定的时间表进行祭祀、劳动、读书和布道，大家在一起就餐，就餐时选读《圣经》的片段。由这种生活的禁欲主义的纪律和意图来判断，很少有与修道院生活不同的特征；有时弟兄会会众也加入奉行改革过的奥古斯丁教规的温德谢姆修会，这是此种“现代虔信”的另一种反映。然而，即使弟兄会的生活与修道院十分相近，但一群自己制定宗教生活的准则，而不寻求任何已有教团的领导和监督的人们的联合团体的出现，也是一种新事物；而且，弟兄会对待教会、神学和教育的态度，在各方面产生了影响。由于他们相信没有誓言的约束也能够像修道士一样进行修道，再加上他们强调行为，这就产生了比严格遵守清规戒律更加重视品德和虔诚的趋向。弟兄会的这种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与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相同，但是不像神秘主义者那样，他们不再从神秘的狂欢中寻求灵魂的主要营养；在弟兄会住所的有规律的生活中，通过经常不断地和有条不紊地阅读《圣经》，以及具有实际教育性质的敬神活动，加强精神的力量。因此，《圣经》和公共图书是弟兄会住所生活的中心；甚至所规定的每天几小时的手工劳动也宁可用于制作细心和可靠的手稿抄本，出售这些抄本既能补充公共生活的经费，同时也有助于传播弟兄会士们从中找到精神指导的书籍。

不错，弟兄会这样阅读和流传的书籍与人文主义的知识兴趣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是，弟兄会士对玄妙的神学讨论的憎恶，与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的深奥莫测的哲理有些类似的地方；他们爱好作为精神和道德指导的书籍，因而成为通往人文主义者对于启迪读者心灵的古典诗人和伦理学家的爱好的一座桥梁。他们坚持以诚实可靠为抄写手稿的宗旨，这可能成为人文主义者在重新整理古代典籍时要求语言准确的一种榜样。这并不是说弟兄会士发展成了人文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独立地产生了一种新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学术的成长所需要的独立知识和生活经验，在这些弟兄会的住所里是难以找到的。

然而，和人文主义在某些主要方面相近，就足以使弟兄会士在人文主义教育学中看到合乎他们自己意图的一些东西，并且使他们自己欣然参加那些曾经在意大利求学或者在别处与人文主义发生接触的人们所兴办的学校。在这种场合，弟兄会士创立和管理与他们的住所相连接的学校学生宿舍；这样，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宗教热诚和严格纪律贯彻到学生们的生活中去。的确，他们从事这种支援教育的工作是如此地广泛，以致在尼德兰、布拉邦特和佛兰德甚至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终于到处都出现这样一些人文主义者的学校，它们的巨大规模和优良教学，大部分来自弟兄会会所的合作与利用弟兄会士管理的宿舍。

早在15世纪初，我们就见到库萨的尼古拉斯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首先是在须德海附近德文特的一座与弟兄会合作的学校的教育之下、后来是在海德堡和意大利的大学学习中形成的；由于在尼古拉斯的思想中南北两种因素的结合，就第一次出现了把神秘主义和“现代虔信派”的精神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交融在一起的哲学。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期间，在尼德兰的环境中教养出来的杰出人物是伊拉斯谟。他在思想形成期间，并没有访问过意大利；但是，他幼年时在德文特的学校上学时却是处于弟兄会士和受过意大利人文主义影响的教师们的双重影响之下。他在早期生活中，在牛津遇见了科利特。由于这一会见，低地国家的已经带有弟兄会士的精神素质和对《圣经》的兴趣的人文主义，与利科特在仅仅几年前从意大利带回英国并在英国继续宣扬的新神学和对圣保罗书的钻研，发生了接触。这样一来，在南北各种影响的交叉路口就出现了一种圣经人文主义，这个学派在巴黎也得到一个立足点，在那里，勒费弗尔晚年变成了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在1500年和1520年之间，在伊拉斯谟的领导下，圣经人文主义成为意大利以外的人文主义的最重要的潮流。

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即和圣经的人文主义传播到上莱茵河和南德意志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已经有几个世代与意大利发生密切接触的地区，这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法国宫廷与勃艮第宫廷势力范围之外的重要文化发展的第三个大区域。这个地区也具有有一种显著的城市性质。南德意志，甚至整个德意志，还没有产生一种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一些勃起的区域性国家的宫廷或者行政中心在观念上和结构上地方气息太重，不足以对德意志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15世纪，德

意志的下层贵族很少有机会去到王侯门下供职。直到16世纪下半叶，德意志贵族才在较大的邦国中开始发挥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作用；从那以后，西欧宫廷贵族的迷人生活才成为每个王侯所在地的模仿对象。

在1350年至1550年的两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有利于德意志城市和城市各阶级的因素。在工业和商业中，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绰绰有余地抵消了14世纪流行病的灾难性后果。从14世纪晚期起，长距离内陆运输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东欧国家联结到欧洲各国间的贸易中来。东方的大量食品和原料资源弥补了德意志由于黑死病减少人口而造成的农业损失。由于需要用以交换的工业品，结果在德意志各城市，新的手工业和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还开采了新的矿山，这必然导致建立具有高度技术的金属工艺。另外，德意志各城市依然没有停止作为英国北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南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网的中心[6]。

因此，在15世纪，德意志生活的特点是，无数小的社会体（其中有许多半独立的帝国城镇）生气勃勃而一切统一和联合力量则软弱无力，二者形成尖锐的对比，而这种统一力量本可能把这些充沛的活力融合成哪怕不是国家也是地区的联合。在政治方面的后果是：各城市和区域性国家的相互斗争，许多社会集团中的革命骚动，以及对帝国已经陈腐的中世纪结构的不满情绪。在雕刻和绘画中，没有出现在目的单纯和摆脱地方气息方面能够与佛兰德派相比拟的近代的流派。但是，在德意志许多省份和城镇的艺术中，出现一种对于事物实质的新的理解和对于现实主义地表现人类性格的日益增长的能力，从而独立地产生与佛兰德的佳作并驾齐驱的东西。在文学和知识文化方面，也由于缺少具有超越地方影响力的中心，妨碍了较广阔的流派的兴起，更不要说全国性的流派了。然而，在各省的许多地方，由于几乎不存在维护中世纪习惯和传统的宫廷生活，德意志的学者和作家思想比较开放，他们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文主义世界寻求新的发现，比西方学者和作家早得多。

在德意志南部地区，对于学习法学和医学的大学生，以及对于纽伦堡、奥格斯堡和乌尔姆的贵族青年来说，到波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求学很早就成为一种风气了，他们可以从那里把人文主义著述的最新作品带回国内。与此同时，这种著作通过意大利来访者源源不断地到达南德。在15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爾两次公会

议，有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15世纪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一度在帝国办公厅任秘书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米尼（后来为教皇庇护二世），这时候在传播新学术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15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群众不仅从他的笔下得到大量的拉丁文通信以及研究人文主义学术和人文主义人生哲学的详尽计划，而且得到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心理描写小说和可作为典范的关于德意志地理和历史的描述。一些把拉丁文学译成德文的翻译家们，受到这样的熏陶不久就对15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发生了兴趣，在这些著作中首先提出关于人的研究和开化、人类天性、妇女的作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思想。这些到15世纪70年代已经译成德文的先驱作品，法国、勃艮第和英国的读者们在15世纪却几乎得不到其中任何一种译本。德意志作家接受新历史编纂学的影响也是同样迅速的。早在1456年就有一部半人文主义的奥格斯堡城编年史，否定了该城市一般流行的关于早期居民为特洛伊逃亡者后裔的传说。30年后，对纽伦堡的历史应用了同样的批评方法；到1500年左右，对于日耳曼人的起源（根据恺撒和塔西佗著作中的资料）和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批判性研究，在德意志学者中间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探讨的领域了。

在这种环境中，适应人文主义式的大学教育要比在巴黎和牛津的古老的经院哲学的中心容易一些。新大学纷纷建立起来，其文艺院系明确显示出对人文主义的兴趣。第一所是1460年在巴塞尔建立的，那个地方既受到埃内亚·西尔维奥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出席会议的其他来访者的刺激。像这样一些人文主义的开端，与另外一种新的潮流交融起来。14世纪期间在奥康姆的经院哲学学派中已经开过花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在这个由意大利的影响和德意志工业城镇的工厂的实验交叉施肥的地区，又较早地萌动起来。正是在维也纳大学，在1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波伊尔巴赫和雷乔蒙塔努斯开始将人文主义研究与数学、天文学和力学结合起来，这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晚期（特别是在德意志）的一个主要特征。丢勒时代纽伦堡在文艺复兴科学的这些领域中所要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早在15世纪70年代，当雷乔蒙塔努斯由于贵族的赞助而得到他进行天文学和力学研究所需要的天文台和工厂的时候就做了准备工作的。在那时候，纽伦堡除了在其他许多艺术和手工艺方面执牛耳外，还在1450年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发明的活版印刷的新技术中树立了自己的伟大地位。

尽管通往文艺复兴的大道在德意志要比在西欧国家开通得早些，但是，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新路线上来往的旅客，在很长一个时期主要是在意大利度过一段成长期或者在南德意志与意大利人有所接触的学生；在15世纪，他们的势力还仅限于分散的地方和小的集团。在德意志，正如在西欧一样，一直到15世纪末，当它与宗教势力相结合的时候，人文主义才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而没有宗教势力，就不可能对中世纪晚期的世俗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认为新的研究可能带来一种文化和精神改革的期望，对于乐观主义的抬头起了决定性作用，人们以乐观精神面临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巨大知识变化和展望未来。在15世纪的德意志文学中，除与意大利有联系的一些小团体外，找不到这种乐观主义的痕迹。15世纪的德意志说教诗每行每句都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在我们找不到依然显示骑士作风的华丽宫廷的德意志，新的标准也还没有足够地成熟，因此尚不能与对由来已久的骑士美德的尊敬相竞争。由于这些美德在城市社会中消失殆尽，作为批评家的市民们便忧心忡忡地相信世界已经陈旧和解体，它在走向败坏和沦亡。在整个中世纪晚期的文学中响彻这样一个音调。同时，正如文艺复兴的乐观主义和对于新价值标准的信心还没有出现一样，在15世纪，德意志城市文化与文艺复兴所标榜的独出心裁和打破传统仍然毫无瓜葛。在工匠歌手（Meistersinger）的联合会——德意志手工艺者中与佛兰德和布拉邦特中产阶级的修辞院相应的组织里，中世纪晚期的同业公会的传统主义有一条戒律：凡是参加竞赛的会员，不得用不属于“十二大师”（传说中的歌唱权威）之一的腔调朗诵自己的诗篇；如果试图超出已经确定的形式，那就有点胆大包天了。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正是在纽伦堡的人文主义环境中，第一次承认了歌手个人创造的权利；过了不久，一个歌手只有在他至少创出一种自己的曲调之后，才能被尊称为名歌手。在16世纪初期，这个原则——足以证明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终于打破所有城市阶级的传统主义——变成了德意志各个城镇的德意志工匠歌手的法规。

同时，在15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每一个欧洲国家里都见到了一种类似的情况。在每个地方——由于篇幅所限，不容许我们在本章里叙述的西班牙可能是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例子，但也并非例外——人人对意大利心向往之。北方与南方的这种接触是在北方国家的公民和学者们开始摆脱经院哲学和骑士文化的传统而在寻求

一种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是宗教的教育类型的时机进行的。因此，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逐步占有关键的地位。在意大利这一发展阶段中，人文主义文化似乎比在其他任何阶段中都更能够提供一种出于宗教动机的对古代文物的研究和一种虔信上帝的人生哲学。欧洲人向意大利文明求救之日，正是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之时。从那以后，法兰西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互相交替地并吞亚平宁半岛北部。这样一来，从15世纪90年代起，意大利不仅成为客居的教士和学者们、而且也是欧洲所有国家的外交家和廷臣们经常注目的对象。而且，不久以后就认识到：像科利特和勒费弗尔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从意大利带回祖国的宗教哲学和《圣经》的批判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更复杂得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晚期的形态。

意大利的特殊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贵族阶层的历史。从中世纪初期起，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看不到市民阶级与垄断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导权的骑士阶级发生封建式的分离。至少是在皇帝和教皇为唯一的但是软弱的君主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多数城市很早就发展成为虽非合法但在实际上独立的城邦，这在17世纪以前，是除了瑞士的寥寥几个农村式的和城邦式的州而外，西方世界仅有的一些共和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不得不迁入附近的城市。在大多数中心城市中，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占有统治地位的商人阶级，到13世纪，一方面从事远距离的贸易，一方面生产呢绒——这是欧洲最早的主要出口工业。通过意大利贵族阶层的重要部分与商业和工业领导集团这种在同一城墙之内的会合，就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更早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骑士的因素和骑士的传统逐渐减少它的比重。

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爱情诗被这些意大利城市贵族移植和改作后，就开始失掉它的老套子，而采取一种比较简单的、比较有个性的和更加自然的格调。这是在1300年左右即但丁时代意大利文学的潮流。到14世纪中叶，我们在意大利见到对于经院哲学以及骑士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有意识的反动，这种趣味和判断力的变化，在彼特拉克所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中，给予古典主义以进攻的力量。从西塞罗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古罗马贵族的文化理想开始提供一种新的标准；西塞罗的“人性”（*humanitas*）变成一种教育的口号，这种教育要求把人从社会的习俗和职业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它努力使人的行动、语言

和著作真正表现他自己，表现他的精神和文化特征。当时人们把维吉尔的史诗看作是反映人类朴素的忠诚和热情，以及罗马人热爱祖国的诗歌的现成范本；这是一部民族史诗，它摆脱了在中世纪诗歌中占有支配地位的荒唐无稽的骑士法规。李维似乎对历史文献起了一种类似的作用，他为戏剧性地描绘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一个样板，并且通过对比说明，喜好外表的华丽和毫不相干的细节，是多么粗俗。

在中世纪，并不缺乏对古代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和道德哲学家的欣赏和一定的理解。在经院哲学兴起之前，特别是在12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教士曾经普遍地研究他们。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中的新因素是他一心一意用西塞罗的“人性”观念作为解释古代文物的指南。彼特拉克虽然大半生是在14世纪中叶取代北意大利许多城市的共和政府的专制君主们的宫廷中度过的，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城邦的独裁者“执政官”（signore）基本上是坚强而自立的人物，他能吸引一大群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亲近他们，并能与他们私人交往。他从来不是建立在宫廷习惯和等级差别上面的礼仪中心。的确，在最初的时候，专制君主国家的文化气氛几乎与城市共和国的文化气氛一样融洽，是一种只知道人与人之间高尚接触的形式和只知道实行自由教育的文化形态。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的胜利大大有助于把意大利专制君主所在地缓慢地、虽然最后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宫廷文化新中心的过程一直延迟到15世纪晚期。从1400年到1500年，即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15世纪初，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依据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打下的基础，忙于创造一种企图作为所有社会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们——教士以及俗人——的共同财产的文化和文学。像弗拉拉的瓜里诺·达·韦罗纳和曼图亚的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那样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所办的著名的寄宿学校，要求每个学生，甚至要求王侯的子弟，都学习古典研究和体育锻炼的同样课程。

由于意识到一种新的和更有价值的文化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模式，这就出现一种必然的结果，即在15世纪的著作中，改变了对过去历史和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看法。人们论断说，通过但丁和彼特拉克，正如真正的艺术仿佛又从一座坟墓里爬起来一样，真正的诗歌和古代的智慧已经在1000年的昏睡之后“复活”了。此后的“人性研究”的再兴，某些重要拉丁著作（包括塔西陀和西塞罗的书信）的复原，以及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协助下对希腊文学作品真本的接触，似

乎开辟了这样一个时代，它纵然不能与古典时代完全相等，却标志着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里的崭新成就的开端。应该指出，这种信心恰恰是在那些依然接受骑士法规的国家里弥漫着一种衰败的忧郁心情的时候，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增长起来的。

的确，如果城邦的自由在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每个地方都为独裁的执政官取而代之，整个意大利变成一个君主统治的地区的话，意大利文化中的强烈的城市的和公民的倾向，就很难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但是，在1390年到1450年的两个世代期间，尽管意大利各共和国具有最大工业实力并在欧洲贸易中占优越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们的中产阶级分子却由于在对暴政的严酷斗争中保卫了城邦的独立和公民的自由，得到了尊崇和威信。在14世纪末，最专横的暴政，即米兰的维斯孔蒂的暴政，通过继续不断的扩张，已经达到行将席卷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而形成专制君主国家的地步。如果这种威胁得逞的话，15世纪的意大利就不会成为一个天地虽小而万紫千红的地区，就不会呈现一种以城邦为基础的在某些方面类似古代希腊的样板的文明；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会根据它自己的经验，单独准备好去对古代世界做历史的重新发现。然而，由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坚决抵抗，到15世纪中叶，米兰被局限到伦巴第地区；而在同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两共和国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区域性国家，又由于势力均衡形成的结果，一些较小的自由城市和专制政权也得以苟存下来。在这些基础上，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在历史和制度方面彼此极不相同的5个主要国家的体系（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国家），一个以通过不断调整均势而保持平衡的思想为指导，相互交往的国家大家庭。这在近代史上是第一个实例^[7]。

15世纪初期的政治斗争和由此产生的共和自由与君主暴政并存的局面，给人文主义思想留下了经久不灭的痕迹。15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者们，通过从希腊的史料（这时已阅读原文本）研究古代城邦的宪政生活以及以此为依据评价近代意大利城邦的历史，为文艺复兴的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铺平了道路。他们在努力理解意大利的国家体系从神圣罗马帝国垂死的躯体中脱胎而出的自然原因时，对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假设（相信上帝安排一个继承罗马的全球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贵族世家把它们谱系追溯到特洛伊或者罗马、埃涅阿斯或者恺撒时所采取的任意而为的方法，表示怀疑。在意大利，这

些传说在15世纪初期就被一种对古代罗马共和国和君主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主义的重新评定取而代之了。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是在前罗马文明、罗马对意大利的殖民、罗马帝国后来的衰亡以及日耳曼移民的大浪潮等范畴内进行推想的。因此，15世纪意大利的区域性国家的历史就变成了新历史编纂学的早期典型，这种新历史编纂学，后来整整过了100年才在大多数场合排除了欧洲所有国家历史中的中世纪的神话。

15世纪初期给人文主义思想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由决定公民的人生观的价值标准产生的。彼特拉克和他的同时代人以中世纪晚期笃信上帝的俗人的眼光阅读了有关道德行为的古典著作。在他们看来，古代的智慧和基督教的信仰一致，使人爱好静修生活，教人弃绝物欲和必须使内心摆脱激情。正因为有这样的解释，彼特拉克的讲述道德问题的论文立即在整个欧洲大受欢迎。然而，1400年以后在意大利，公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骄傲与对古代事物的日益增多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便导致反对对禁欲主义观点做出这样的让步。他们争辩道，大自然对人的赋予是为了行动和对他的家属与同胞有用；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并不是要引导人离群索居。另外，对物质的占有也不应该仅仅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因为物质提供行善的手段，而且人类的历史就是他们变成大地及其资源的主人的进展过程。热情、雄心和争取荣誉是一个高贵的心灵行动的源泉；在人文主义的教育中必须鼓励这些东西。在15世纪初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没有一个分支不是某些这样的思想在里边起着作用；甚至在文艺复兴的晚期阶段，当哲学和文学中已经兴起不同精神的各种运动的时候，早期人文主义人生哲学依然是一种广泛的感化力量。在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的世代中见到的关于人类本性、历史和政治的观点，在实质上还是由这种力量形成的[8]。

不过，到马基雅弗利的时代，意大利逐渐恢复了文艺复兴文明在彼特拉克以后100年期间所背离的某些社会条件和文化趋向。然而，尽管从15世纪下半叶起一些中世纪的传统又卷土重来，它们是经过文艺复兴精神的熏染后而再现的。这类的倒退之一是意大利宫廷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450年以后有一个稳定下来的国家体系的时期，一种新的宫廷社会和贵族阶层在某些君主国家中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受到法国强烈影响的米兰，以及在埃斯特家族的弗拉拉和贡扎加家族

的曼图亚，这两个家族都是靠给神圣罗马帝国当诸侯起家的，甚至经过早期文艺复兴运动，他们还保存着一定的封建君主的气氛。特别是在这些宫廷圈子里，复活了中世纪史诗的骑士主题和骑士阶级的理想。迄至1450年左右，是意大利的巡游歌手利用查理曼大帝和亚瑟王的骑士们的传说作为娱乐群众的题材；在15世纪下半叶，人们允许这些传说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引人入胜的主题进入文学——甚至在佛罗伦萨，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圈子里。在法国侵略军出现在亚平宁半岛以前，马泰奥·博亚尔多在弗拉拉的宫廷里写出了为中世纪史诗传统的历史开辟一个新局面的作品《热恋的罗兰》。不过，长期被抛弃的主题的这种复旧只意味着在艺术想象力方面的再生；不论是中世纪把骑士光荣事迹信以为真，还是中世纪把传说与历史真实交糅在一起的做法，都没有真正恢复。在重新恢复的对于骑士的勇敢、忠诚和爱情的赞赏中充满一种讽刺的调子，显示出一种已脱离了中世纪的心理状态。我们应该用一种同样的眼光来考察晚期文艺复兴对于完美的廷臣的理想形象的重新塑造，这种理想形象在1528年出版的但早在151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写作的巴尔代萨尔·卡斯蒂廖内的《侍臣论》中得到了最成熟的表现。与早期人文主义教育的公民性质大大不同，“侍臣”的新概念显然是向贵族阶级的标准的倒退。然而，依照卡斯蒂廖内的设想，“侍臣”却是文艺复兴的“一般人”；在实质上，侍臣的这种概念并不是从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是脱胎于以锻炼身心并鼓励雄心和一切适合人类天性的高贵感情为基础的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教育纲领。

在15世纪晚期的哲学中，由于新柏拉图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对亚里士多德思想重新作宗教的解释，文艺复兴初期的现世主义被推到次要地位。那些从菲奇诺身上感到一种共同精神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这样想是正确的：意大利在长期集中注意世俗生活的问题之后，已经在许多方面恢复对宗教的兴趣和心灵的虔诚态度。菲奇诺从他作为哲学家的生涯的最初起，就拒绝接受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某些基本理论，如他们坚决主张灵魂和肉体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他们高度重视物质财产，他们把积极生活摆在第一位而忽视静修的价值。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形而上学推理的基本思想，他们的抽象逻辑论证，他们的著作的结构本身，的确表明返回中世纪的思想，甚至部分地返回经院哲学的思想。不过，在这个范畴内，当菲奇诺和皮科讲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尊严和创造力量时，都是采用文艺复兴的语言。菲奇诺

的新柏拉图主义，尽管包含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因素，却是比任何中世纪哲学都更加深刻地受到柏拉图对话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而形成的。即便说菲奇诺的人生观反映了15世纪初期的公民精神的衰退——归根结底是由菲奇诺时代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的一个乔装打扮的执政团所引起的衰退——然而，佛罗伦萨第一号公民洛伦佐对于艺术家和文人的关系依然与中世纪晚期公侯宫廷的庇护很少有相似之处。洛伦佐的圈子里的社会接触是自从彼特拉克以后指导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人类友谊理想的实现，他们有意识地企图恢复在西塞罗和柏拉图的对话和书信中所见到的文明交际的古代形式。在洛伦佐的晚年期间，有一些从北方来访问菲奇诺的客人还能够参加“柏拉图学园”的非正式的朋友集会。“学园”的成员效法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聚集到洛伦佐在卡雷吉的别墅中，进行哲学讨论和参与一种艺术与音乐占有主要地位的社会生活。正是在这些集会中，以及通过菲奇诺的著作，柏拉图的爱哲学在文艺复兴思想中获得中心地位，而在16世纪期间，它在欧洲文学、哲学和艺术中继续占有这种地位。

因此，北方学术在15世纪90年代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汇合，对于未来的欧洲文化来说，是充满发展潜力的。尽管在牛津、伦敦、巴黎、低地国家、莱茵兰和西班牙兴起的“新学术”的目的，在于指明宗教研究的方向，但其实际效果却好像打开一面窗子，展望意大利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出现的广阔的新世界。从那时以后，对意大利在教育、政治—历史思想方面、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在社会交往方面以及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成就的吸收和应用，就变成所有文化生活的一个基本任务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是在1490—1520年当文艺复兴运动的浪涛正在整个欧洲滚滚向前的时期，但是完成的过程一直延续到17世纪，在这一过程的漫长的年代里，宗教改革、海外发现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萌芽逐渐使意大利与欧洲其余部分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地位对比颠倒了过来。

[1] 经过许多讨论，情况依然如此。关于牛津大学的情况，见H. 拉什达尔《欧洲的大学》，波维克和埃姆登编（1936年），第3卷，第270页以下；关于巴黎大学的情况，见A. 勒诺代《巴黎在宗教改革以前和人文主义》（第2版，1953年），第98页以下，第158页以下；关于德国大学的情况，见G. 里特《十五世纪德国大学的古典道路和近代道路》，见《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告》哲学历史部分，1922年，第7辑，第95—99页，第113—115页。

[2] 关于科利特的研究是受菲奇诺的影响这一点，从他们研究途径的相似来看是很明显的，自从F. 西博姆的《牛津改革家传》（1867年）问世以来，大家都承认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对于科利特游历意大利的详细情况所知无几，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是缺乏证据的。由于发现两封菲奇诺致科利特的私人信件，现在已经证明他们有过直接的接触，见R. 马塞尔：《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文献丛编》，第14卷（1952年），第122页以下。关于科利特是否受菲奇诺影响的另一个疑难点是菲奇诺为保罗书做注释的日期较迟，据P. O. 克里斯特勒的《菲奇诺著作补遗》（1937年），第1卷，引言第82页，是在1496年和1499年之间。但是，既然注释写在讲演之后，那么，注释的日期就不妨碍做这样的假定：当科利特旅居佛罗伦萨的时候，菲奇诺已经从事他对《圣经》的研究，或者甚至已经在作他的讲演。

[3] 参见A. 柯维叶《贡蒂埃和皮埃尔·科尔与查理六世时代法国的人文主义》（1934年），特别是第229—234页，关于法国早期人文主义在1430年以后的衰退，F. 西蒙在《酒宴篇》（都灵，1951年）第189页和第193页以下提出了异议，据本章著者的意见，他所举的理由不足以推翻柯维叶讲述的情况。

[4] 关于在此以前和以后对勃艮第文化的表述，参阅J. 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第6版，1952年；英译本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24年），散见各处；以及他的《历史的魅力》（1943年），第326—336页；关于法国文化的同类表述，见R. L. 吉古尔《中世纪晚期法国文学所反映的骑士制度的衰落》，1937年。

[5] J. 赫伊津哈：《历史的魅力》，第332页。

[6] 关于德国15世纪的经济史，其中有许多情况依然难以归纳，参阅F. 吕特格《德国社会和经济史》（1952年），第142页以下，关于“城市的优越性”一章；同书，第149页以下，关于“德国贵族的作用”一章。

[7] 关于这种对于政治局势的估计，参见N. 瓦勒里《1343—1516年公国时代的意大利》（1950年），特别是189页以下，260页以下；H. 巴伦《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危机：古典主义和暴政时代的市民人文主义和共和国的自由》（1955年），特别是7页以下，315页以下，379页以下。L. 西梅奥尼的《执政官》（1950年）试图对维斯孔蒂家族和一般的专制君主国家提出强有力的论证。对于15世纪的解释，无数资料偏重社会经济因素而不注意社会政治因素，但是迄今为止，造成了观点的十分混乱。除了W. 佐姆巴特（《中产阶级》；英译本改称《资本主义的实质》）和A. V. 马丁（《文艺复兴社会学》）的较早的学说而外，参照F. 安塔尔的《佛罗伦萨的绘画及其社会背景》（1947年）以及T. E. 蒙森的评论（《历史思想杂志》，1950年第11期，369页以下）和M. 梅斯的评论（《艺术公报》，1949年第31期，143页以下。关于观点的分歧），又见C. M. 西波拉的文章（《经济历史评论》，1949年，181页以下）；A. 萨波里《1952年第三届文艺复兴国际大会记录》，107页以下；R. S. 洛佩斯和H. 巴伦的文章（《美国历史评论》，1956年第61期，1087页以下）。

[8] 关于15世纪人文主义文化和它与社会以及文艺复兴的政治—历史思想的关系的这些解释，见E. 加林《意大利的人文主义》（1947年；意大利文译本，《意大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哲学和公民生活》，1952年）；H. 巴伦《危机》，以及R. V. 阿尔贝蒂尼：《在从共和国向公国过渡时期的佛罗伦萨人的国家意识》

（1955年），还参见A. 勒诺代《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历史问题》，载《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丛书》，第9卷（1947年），第21页以下；R. 斯彭加诺《人文主义及其起源》，载《意大利文学史杂志》，第130期（1953年），第289页以下；以及W. K. 弗格森所著《文艺复兴的历史思想》（1948年）中《人文主义的早期传统》一章。P. O. 克利斯泰勒在其所著《文艺复兴的思想和学术研究》（1956年）中的一篇《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里，对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主要认为这种人文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人生和历史哲学，而是“中世纪修辞学家”在语法、诗歌和雄辩术方面的工作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的继续。

第四章 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会

在天主教大分裂^[1]带来的长期纷争之后，教会终于重新归于统一。教会如今似乎可以团结在尼古拉五世（1449年）的周围，在较少干扰的气氛中追求它不变的理想了。象征教会两大愿望的两个词再次响彻四方，即对内——改革，对外——十字军东征。两者都是刻不容缓的事，各国目光远大的人们都在鼓吹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希望（虽然并不十分明确）恢复其早期的纯洁。至于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日益迅速发展的事态已足以证明：即使对宗教和政治最漠不关心的人来说，这也是势在必行之事。从那时起，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对内改革和对外十字军东征在教皇的言论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当然只见于演说和通谕，而未见诸行动。

到了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意大利，其光辉所到之处，连罗马教廷也和各个国家一样，无不为之眼花缭乱。尼古拉五世是位第一流的学者（他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人），后来成为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他决定拆毁旧的君士坦丁大堂并在原址兴建一座与新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建筑物，这个决定就足以说明他的习性和爱好。在这里我们应该补充说明：他的这一决定曾经被人指摘为破坏文化的野蛮行径。文艺复兴的光辉是如此地眩目夺人，使教皇对其他理想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即便像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所占领（1453年）那样轰动的事件，既未能燃起基督教世界早已冷淡下去的热情，也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甚或更加卑鄙地一味追求扩大家族势力的情况。

卡立克斯特三世是个性格暴烈的西班牙人，一度似乎是基督教十字军的鼓吹者和坚强战士；组织教皇舰队是罗马教廷在这方面第一个令人惊异的冒险行动，虽然英勇可嘉，但仅如昙花一现。另一方面，从这位第一个博尔贾家族的教皇^[2]开始，重用亲属这种贻害他和此后一个世纪的祸患，毒化了罗马的气氛。庇护二世（埃内亚·西尔维奥）是人文主义教皇的完美典型。这位教皇是一位令人喜爱的人，有

大量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世。除了他就任圣职以前所写的小说《优利阿勒斯和萝克莱西娅》和喜剧《克里西斯》以外，应该一提的还有往往显示出他深思明辨能力的大量书信以及至今尚有极大历史研究价值的《评论集》，虽然这些评论并不都是十分客观的。这位教皇在外交方面审慎周密而能审时度势，似乎理应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尤其是应最后组织起他的前任教皇所念念不忘的十字军东征。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结果极端令人失望。他无疑是真诚地号召组织十字军，但是他真会相信这种行动能得到成功吗？他的著名通谕《罪恶的》明确肯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力，在此后许多年都得到响应。欧洲已无可挽回地四分五裂；昔日的共同理想已被一点一点地抛弃；这些都是令人沮丧的因素，这位教皇不久就明白了一切。因为他坚持基督教传统的普救众生的理想（纵然带有绝望的色彩），所以，如上所述，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皇。

在他以后，罗马教廷的衰落更加明显。保罗二世是个喜爱奢侈生活的威尼斯人，自然不是一个能挽救当时不稳定局面的人。而对“教会三恶魔”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应如何评论呢？提起西克斯特四世，他寡廉鲜耻地任用亲信，他极端暴虐和巧取豪夺的政策，均应受到谴责。他当然也可以被看作是文艺复兴舞台上的伟大人物，典型的文艺赞助者，但是他那个时代意大利的许多小君主，谁没有这样的特点？而他的领土野心和肆无忌惮的专制，不正也是和他们毫无二致吗？各个民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正待发泄他们的仇恨和积怨，当面向他倾吐他们的满腔苦情。基督教的大厦已出现裂缝，象征着分裂即将发生。不论人们在其他方面对托克马达这样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做什么样的评价，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和掠夺性残忍手段，似乎也无法提高罗马教廷的威信。英诺森八世任教皇的八年，更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不祥之兆，当时任用亲属和财政上横征暴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宫廷副大臣说：“上帝并不想要罪人死去，宁愿让他活着并拿出钱来。”这位教皇发布过臭名昭著的通谕《深情地希望》有力地促成了对巫术的审判（1484年）。不久以后，令人不寒而栗的《作恶者罪孽》通谕（1487年）便成为宗教裁判所审问官们的行动指南。这位教皇的劣迹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刚刚着手的对内改革停步不前，十字军东征则不再有人相信。如果说广大群众对罗马教廷仍然保持着深信不疑的顺从的话，达官显贵和统治者本身则或者心怀二志，或者公开造反，波希米亚国王乔治·波迪布拉德

的例子是令人难忘的。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以诉诸宗教大会相威胁，便成了对教皇的一个经常的要挟。

正当罗马教廷忘记了它一直应该起的伟大作用，日益卷入一些毫无意义的家族阴谋活动，并且做出种种不适当的妥协，因而削弱了它的威信的时候，土耳其官方的第一任大使于1490年11月底来到罗马。关于穆罕默德二世之子、巴耶济德之弟杰姆的令人吃惊的故事（见第398页），可以典型地说明教廷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一种只图钱财的鼠目寸光的政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惊人的事件，包括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与此同时，唐·罗德里戈·德·博尔贾利用因出卖圣职而臭名昭著的各种协议，登上了圣彼得大堂的宝座。世界的视野开阔了，而恰在此时一个最不配当教皇的人却继承了这一最高圣职，这真是奇妙的嘲讽。

1492年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唐·罗德里戈·德·博尔贾，天赋之高无以复加，而对这种卓越才华的滥用亦无人能出其右。结果，这位令人不安的教皇受到了最严厉的评判。这里绝不是替这样一个人辩解，更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徒劳地设法为他恢复名誉。固然，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人物的最高典型：他知识渊博，精力过人，雄心勃勃，但是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寡廉鲜耻的人。这位教皇以不可饶恕的软弱来对待他的家族，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这个家族所犯的那些往往被传说进一步夸大的暴行和罪恶。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尽管对当时意大利宫廷的一些经过添枝加叶的丑闻和惊人的奢侈靡费已经司空见惯，也都大声谴责这些行径之可耻。

萨沃纳罗拉事件这一悲剧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这位主张改革的修士和那位不配做教皇的教皇之间的激烈矛盾。来自弗拉拉的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在炽烈的热情和真挚的虔诚的激励下，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满怀改革教会的愿望，以恢复其旧日的纯洁，并把它从那些不可靠的教士手中夺回来。和当时许多传教士一样，萨沃纳罗拉喜欢以他那热情洋溢和含糊其词的预言性说教来打动他的听众。教皇长期置之不理，直到他本人受到异常猛烈的人身攻击后才被激怒。不仅如此，萨沃纳罗拉数年来对他所控制下的佛罗伦萨实行令人吃惊的专制，使人们对他的权威产生了憎恨，而这种权威起初是人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的。萨沃纳罗拉的信徒们肆无忌惮地纵情于各种越轨行为，常常有人加以描述；同样，这位专制者所规定的节日和宗教仪式享有

历久不衰的盛名，至今仍是一种奇迹。很难想象佛罗伦萨人竟会喜爱老年人的舞蹈和市民们戴着花环的舞蹈，喜爱那些不仅不尊重、反而是嘲笑宗教感情的假面舞会。固然，在这些儿戏中间，也可以辨别出比较严肃和比较新的思想，仅就他的相对说来具有民主性质的“民众政府”概念来说，即是如此；但即使在这方面，少数狂热分子的放肆行为也毁灭了一切。在一种神经极度紧张的气氛中——并有暧昧的政治阴谋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萨沃纳罗拉没有觉察到佛罗伦萨不久将脱离他的掌握，而事态的发展将会有利于教皇。历史学家一定会多少有些惋惜地记载：这位改革者的美好动机，显然由于缺乏稳重的情绪而受到影响，结果导致一种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的统治：类似宗教裁判所的那些折磨人的做法加上稀奇古怪的宗教仪式是绝不会重振道德的！萨沃纳罗拉被开除教籍后，很快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事件。开除教籍这种惩罚手段当时在公众心目中还没有失去威力。用火刑进行拷问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悲喜剧，它重现了中世纪后期神裁法的真实场面的气氛，这种做法也是这位改革家的致命错误，使我们很难把他看成是近代思想的先驱。不久以后他便被处死（1498年5月），在罕见的群情激愤和战争喧嚣声中，他很快就被世人遗忘了。很久以后，萨沃纳罗拉被认为是新教改革的先驱之一，持这种意见的人虽不少，但是缺乏根据。

这段插曲虽令人迷惑难解，根本无法与以后发生的其他事件相比，它对教皇威信的打击也没有预料的那么严重。教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就哥伦布及其后来人发现的广大领土所作的著名仲裁，便是一个明证^[3]。一般认为这只是几个岛屿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大陆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领土才在一系列通谕中作为教廷对“岛屿”拥有宗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来对待；这是一种很早就有人提出的理论。于是，从1493年到1501年陆续颁布了六道“亚历山大通谕”，其中最重要的是1493年6月28日颁布的，称作《划界通谕》（Inter Cetera）。对新发现的陆地作如此划分，也许纯粹是中世纪的概念；这在当时就已经肯定是一种时代错误，其愚蠢之处后来由海上强国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显示了出来。

这位教皇为培植他的家族中那些令人生畏的成员在意大利的牢固势力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也注定不会有多大成效。在意大利历次战争中，法国的两位国王虽曾获得辉煌胜利，但也同样遭到毁灭性的失

败，在战争的发展所引起的欧洲混乱局面中，像亚历山大六世这样一位教皇所施展的伎俩，不过只能引起一点微弱的反响而已。这位教皇因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过分曲意奉承而威信扫地（如在路易十二离婚问题上。这一无礼闹剧曾轰动了舆论）^[4]；他的私生活荒淫无耻，他的一家人声名狼藉，暴行累累；这样一个教皇还能领导基督教徒组成十字军东征土耳其吗？土耳其人确实仍是一个威胁，但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亚历山大六世却是最不足以唤起进行这种事业所需要的人。他倒是有可能同那些异教徒一起策划居心叵测的阴谋，因为这些阴谋，有人说他的政策是亲土政策^[5]。因此，1501—1502年基督教国家的舰队在爱琴海上显示武力的行动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字军东征的思想已经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几乎在每个国家，建立国教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而由于当时早期民族主义的迹象正在出现，就使这种分裂运动愈发严重。德意志的马克西米连和法国的路易十二，一个梦想建立德国的国教，一个梦想建立法国天主教，这些教会都严格地从属于各自的君主。在法国，国王们在优柔寡断的罗马教廷面前肆无忌惮地大颁其国事诏书（见后面第302页）。在西班牙，在英国，甚至在意大利，都可看到同样的趋势，不过略有不同而已。罗马教廷对此只是敷衍应付，满足于求得暂时解决办法和做出眼前的让步。

至于仍在争论不休的教会内部改革的问题，亦未看出取得了任何真正的进展：开明的舆论坚决要求改革，而罗马教廷却从未能拟定出一个具有明确内容的改革纲领。因此，教会改革问题仅仅是少数几次在方法上前后矛盾的互不相干的尝试而已。由于这个原因，佛兰芒人让·斯坦敦克（1443—1504年）便值得一提。他的苦行和禁欲属于中世纪的理想，并未经常受到人们的赞赏，他的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受到伊拉斯谟的讥笑。另一方面，让·蒙巴尔（1460—1501年）提倡的精神修炼，也根本不足以恢复对宗教的虔诚。总之，尽管这些改革者及其门徒们热情可嘉，但收效微乎其微；也许只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况除外，在那里，由于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的努力，16世纪大规模的神秘主义运动的种子开始发芽。

如果说在位仅三周的教皇庇护三世只须附带一提的话，我们对另一位教皇，即非常有力的人物朱理亚二世，则必须详加论述。西克斯特四世之侄朱理亚二世一生经历了许多大事，在光辉的生涯中显示了

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精明强干的行政才能。他容易感情冲动，富于尚武精神，适合于从事激烈的活动而不善于静思，所以这位教皇在拉斐尔那幅经常被复制并加以解释的名画中的形象是：双唇紧闭，两眼深陷，炯炯发光，当时的人都觉得“望而生畏”。

他的无可否认获得成功的国内政策，结果在各国的教会里牢固地恢复了迄至那时为止由于长期混乱而遭到践踏的教皇权力。过了不久，朱理亚二世就撤换了几年前权势显赫的劲敌切萨雷·博尔贾，劝服了封建贵族中最不安分的人，并敕平了匪乱。这位生性好斗尚武的教皇，贸然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止一次地断然亲自率师远征，使整个欧洲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当时的欧洲，对于在今天看来令人十分反感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他迅速征服了佩鲁贾，然后征服波洛尼亚，使他有机会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他的胜利（1507年），不禁令人想起罗马皇帝们凯游行生的生动情景。从这时起，朱理亚二世便成为每一次外交计谋的中心。是他组织了对威尼斯的斗争，由于他从法国取得援助，很快就将之击溃（1509年）；又是他背信弃义地改变自己的政策，恢复了蒙受奇耻大辱的威尼斯，并采取步骤建立反法的神圣同盟，因为他畏惧法国的野心，想把它赶出意大利。这几次战争中最有声有色的一段插曲是在隆冬季节围困并攻克米兰多拉城堡：这位教皇在刺骨的严寒中戴上头盔，亲自指挥作战。他的英勇自然博得了某些人的赞扬，马基雅弗利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也使某些开明人士感到愤慨，而这也是有道理的。他的政策无疑是一种大胆的政策，就其直接后果来说是有成效的，但对未来却充满巨大的危险。朱理亚二世认为必须挑拨各主要的君主一个个彼此争斗，结果使意大利长期沦为战场，并且把他称之为“野蛮人”而本想要消灭的那些人引入了他的国家。如果不是对教会，而是对文明而言，从这些事态发展中得到的唯一收获，便是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原则传遍了仍深深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欧洲。

对于那些仍能保持健全判断力的人来说，由一位教皇来放手从事暴力行动，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这里只须提一下伊拉斯谟针对这位使他厌恶的教皇而写的几段著名的话。这位人文主义者在他的《愚人颂》（1511年）中写的这些话，虽未明确指名，但不难看出指的是朱理亚二世：

虽然在《福音书》中，使徒彼得对主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6]；但是教皇们却把土地、城市、贡赋和封邑称为主的遗产；为了这些，他们心中燃烧着对基督的爱，用火与剑互相争斗，流了许多基督教徒的血，而当他们英勇地打败他们所谓的敌人之后，还夸耀说他们像使徒那样尽最大的力量保卫了教会，即基督的配偶^[7]。……你将会看到，这里年迈体弱的老人干着年轻人的事，既不在乎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也不为所花费的沉重劳动感到厌倦……一句话，他们成了人类灾难的根源。

这里指的是什么，一看便知，任何人都不会发生误解。在1517年写成的《和平的控诉》（*Querela Pacis*）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批评：

战盔与教冠有何共同之处？权杖与利剑，福音书与盾牌有何关联？继承众使徒的主教啊，你怎么敢向人们讲授与战争有关的事物？

最后，一本据认为是伊拉斯谟所作但迄无定论的题为《从天庭驱逐出来的朱理亚》（*Julius exciusus a coelis*）的小册子，以严厉的词句表达了基督教世界中开明分子对这种远远悖离基督教教义的行为的愤慨。

在朱理亚二世任教皇期间，还发生了公会议权力至上主义与教皇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之一。自从天主教大分裂以来，这一斗争经历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事件。早在15世纪中叶，庇护二世在他的《罪恶的》通谕中虽已最明确而庄严地宣布了教皇的主张，但是公会议权力至上派十分有力地拥护各君主的利益，因此不是一下子就会销声匿迹的。到15世纪末，历届教皇固然还在坚持他们的专制主义，但是也可以看到某些诸侯正在恢复公会议权力至上主义。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曾在他与西克斯特四世的交往中一再玩弄和滥用这种威胁手段，而且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人。后来，亚历山大六世曾经长期担心他会被公会议罢黜。朱理亚二世在位期间，斗争又格外激烈起来。1509年，这位教皇庄严地重申了庇护二世通谕的条文；而由于朱理亚二世的政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刚刚陷于孤立的法王路易十二，则为了使公会议权力至上的主张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便劝说少数热心为他效劳的红衣主教在比萨召开一次宗教大会，即比萨公会议（1511年5月16日）。朱理亚二世则针锋相对，于1512年4月19日在拉特兰宫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也是一次公会议。两派对立的理论互相交锋，其激烈程度难以想象，据当时人们的意见，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较量。

路易十二的打算，不论就哪方面说都是动摇不定的，一开始就预兆不佳。仅有很少几个红衣主教答应参加比萨公会议，而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么几个持异议的人就可以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人们不久就看清，这个公会议的成员不过是法国政策的并不热心的工具。这个公会议，或如它的对手们所称的“集市”（Conciliabulum）^[8]，知道它处在站不住脚的地位，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所以只能苟延残喘地存在下去。少数忠心为法王效劳的主教，枉费心机地想做出一番精彩表演，他们竟至要传讯教皇，颁布法令暂时停止他的教皇职务（1512年4月21日），但是几乎毫无作用。教皇随后策划进行反击，这证明格雷高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提出的那种权利要求还没有被人遗忘：宣布法国王位空缺，将王位转给英王亨利八世！然而，这位教皇当然也知道这样的决议已经过时，而且也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他准备的敕书始终不过是一个草稿，当时的大多数人也对此毫无所知，而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段奇事，虽然它能够说明许多问题。

比萨“公会议”时期，双方都产生了一种论争文学，这是近代在政治中使用宣传的最早实例之一。教皇和法王在这方面都不遗余力，而且攻击同样猛烈。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那些把教皇的性格刻画得既可笑又可憎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和戏剧表演，结果只起到混淆视听和蛊惑舆论的作用，而舆论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厌恶那种利用公会议反对教皇的想法。对于朱理亚二世的种种阴谋诡计，他的战争狂热，他不正当的政治权术，以及他忽视教会作为和平维持者的传统作用这些方面，法国国王和比萨公会议的拥护者要加之以罪名是太容易了。但是尽管用尽了各种方法，群众却几乎无动于衷。确实，不应忘记，人民从整体说来还是尊敬罗马教廷的，即使它由亚历山大六世或朱理亚二世这样的人做代表也还是如此。从许多方面来看，总的气氛和中世纪时差不多完全相同，至少在两代人的时间是不会起变化的。法国的舆论已经厌倦了那种看不出有解决办法的争论，厌倦了人们已经隐约地感到在政治方面枉费心机的意大利远征。当1512年军事上惨败的消息广泛传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到比萨公会议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另一方面，1512年5月3日由朱理亚二世庄严召开的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却越来越明显地赢得了大多数主教的支持。这次会议决定对法国国王及其支持者实行宗教制裁，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在此之前也是动摇不定的法国国王本人更受到很大的震动。从此，事实

很清楚，比萨公会议将要落得一个不光彩的下场，不久，其成员便作鸟兽散。

所以，这是教皇的一次胜利。1513年1月，“意大利的解放者”朱理亚二世举行了一次真正的“罗马帝国式的凯旋仪式”。这足以证明，这位教皇与其说是作为全世界天主教的首领行事，倒不如说是作为意大利的君主行事。人们可以想象到，这位教皇在被描绘成为执掌世俗大权的皇帝的时候，是何等的踌躇满志。但是好景不长。数星期后，这位卓越的教皇就一病不起。虽然为时不久，但他一度确曾是“全世界的主宰”。

对这位曾为马基雅弗利所钦佩的教皇，必须给予严格的评价。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对他厚颜无耻地使用那些与基督教世界领袖的地位不相称的方法深表痛惜，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曾经以相当客观的评断写道：

假如他是一位世俗君王，或者，假如他把在世俗事务和军事韬略方面为教会增光的心血和辛劳用于通过和平手段而在宗教方面为教会增光的话，他一定会是一位无愧于享有最高声誉的教皇。尽管如此，比起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教皇来，他还是值得尊敬和深切缅怀的。

这位非凡的人物，生来就爱好虚荣和战争，既是艺术保护者，又是军事指挥官，他有创建帝国的气魄，但不是一个志在普救天下的教会领袖那种类型的人。

以前，16世纪常被人们称为“利奥十世的时代”；现在至少可以说这位继承朱理亚二世皇位的人是不应被忽视的。佛罗伦萨的杰出人物“伟大的洛伦佐”的儿子乔瓦尼·德·美第奇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在1513年3月11日当选为教皇，他的当选颇受欢迎。基督教世界对已故教皇的杀气腾腾已经十分厌倦，新教皇的统治看来将会比较和缓。

新教皇利奥十世与他的前任迥然不同，而且，附带说一下，也不喜欢他的前任。他的思想极为高雅而富于修养，他是人文主义者、学者和艺术家的保护人，在他身上不再存在任何中世纪的残余，相反，他就是文艺复兴的化身。他的教皇任期预示着一个容忍和宽容的新纪元的到来，正如他丰满的圆脸，多少有点闲散的外表一样，与朱理亚二世的满脸凶相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期望，这样一个人是会采取外

交途径而不是宣战方法来解决争端的。在涉及对法关系的问题上，情况正是这样。

比萨公会议这个令人不安的事件一结束，新的灵活政策几乎马上开始出现。利奥十世没有按照某些人的要求严厉惩办那些迷途的羔羊，而是对那些确实通过公开认罪仪式而有悔改表现的人无条件赦免。在裹好这一内部创伤之后，他又不得不设法结束意大利战争。当时由于法国新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即位，这场战争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这件事情上，同样必须实行灵活的政策。

这次选择的时机很是适当。敌对双方都希望进行会晤，以便结束各自所处的困境。1515年12月11—15日，法国国王和教皇在波洛尼亚为签订他们早已感到需要的协议打下了基础。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教会一直没有任何权威，在两个同样倾向于专制主义的主子之间陷于分裂。国事诏书并没有给法国教会带来它打算给予的特权。相反，法国教会实际上经历了一段悲惨的时期，当时，主教管区和修道院实际上被当作掠夺物，各方以最恶毒的方式你争我夺。几乎没有一处按正式手续进行选举，因为国王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最残忍的手段，把他自己内定的候选人强加给选举人；某些关于主教选举的记载谈到了一些肮脏到极点的交易。即使没有发生过武力斗争，但有一桩提交高等法院或大枢密院的诉讼案，人们从中得到的只能是令人悲叹的景象，信徒们积压着怨愤，不知道该听从哪一个主教。这样的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双方都认为，国王和教皇之间签订一项真诚的协议已是当务之急。这样的协议终于通过签订波洛尼亚政教协议而达成了，但其间不是没有经过周折。

这项政教协议的功绩在于它结束了这一切灾祸和辱骂，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看起来也比较合理。以下所述是这些解决办法的概要。关于圣职，国王保留提名权，根据教规的任命权则归教皇。这样就合理地划分了特权，不过这样的划分将会使选举停止进行。这似乎是一种极端重要的革新，但只不过表面看来如此，其实如上所述，选举早已名存实亡。况且，国王在人选上也不能完全任意决定，他必须遵守有关候选人年龄和资格的规定。否则教皇有权拒绝他认为不符合要求的任何候选人。在司法权方面，教皇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巴黎高等法院经常抵制罗马教廷提出的要求。至于税收这一棘手的问题，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也有不明确的

地方，人们不久即认为国王做出很大的让步。关于是否可对圣职的薪俸征税以充实罗马财库的问题，则仍然是一个随时会发生意外的问题。国事诏书当然应予废止，这是教皇的巨大胜利，其条款竟使国王左右的人不敢予以公布。最后，政教协议还有几项关于教会改革的条款，但十分软弱无力，从来也没有人认真把它们当作是有效的。实际上，协议仍遗留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情况既然如此，该协议在法国的通过就不能不遇到强烈的反对，而国王的犹豫不决更助长了这一点。高等法院和大学对于接受教皇通谕的主张坚决予以抵制，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迫使国王和大法官迪普拉采取严厉措施。高等法院到1518年3月22日才同意将该协议登记备案，而两天后又强烈抗议强加给它的这个决议。在大学和高等法院的一些人中，骚乱持续达数月之久。但是尽管遭到这些反对，政教协议仍然付诸实行了。

关于教廷在财政方面的诛求无已，虽然政教协议中以十分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但仍是当时形势中棘手的问题之一。两个世纪以来，这些苛捐杂税引起过很多不满，每个政府都曾对日益严重的额外征收现象加以指责。尤其是到15世纪末，事实已经十分明显，教皇的财政要求——往往是为了最卑鄙的目的——决定着罗马教廷的整个政策。

虽然迄至那时为止，就连最激烈的抗议者也还没有想到要同罗马做最后的决裂，但到处都可听到少数人士的呼声，指责这种横征暴敛的弊端，要求教皇注意到这种政策的危险。感到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这种情绪是当时某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反罗马立场的主要根源。它虽然到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德意志尤为严重。改革教会的尝试措施不当，以致声名狼藉；15世纪末期的几任教皇可悲可叹，都为这种真正的“反教权主义”打下了基础。这种“反教权主义”，我们不但在当时的贵族或平民的某些阶层中可以看到，而且首先可以在大城市富有的纳税市民中看到。所以，控诉书之类的东西广泛流传，历数个世代之久。而且，这些思想倾向与当时仍然根深蒂固、在某些情况下中世纪色彩很浓的信仰并无不符合之处。实际上，正是在当时宗教观念最深的国家里，这种精神状态，加上痛苦的愤懑和民族主义的反抗情绪，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德意志和英国，情况尤其如此：在德意志，这种运动部分地说明了马丁·路德成功的原因；在英国，这种

运动后来导致了与罗马分立的国教的创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赎罪券”事件正是这样的星星之火。

由于过去往往被人误解，所以在这里不妨提一下什么是赎罪券。它是对仍须受惩罚的罪恶的全部赦免或部分赦免，否则要在现世或炼狱中受罚，即使罪人经过苦行赎罪圣礼，罪行已获赦免，亦在所难免。蒙受圣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此外，还规定要祈祷、斋戒和克己，以及从事各种善行，如捐赠和施舍，朝拜各个教堂，出钱朝圣，兴办慈善事业甚至公益事业，如建造教堂、桥梁、道路和堤坝。就这种意义上看，赎罪券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往往有利于公益。至于是否可以替死者赎罪的问题，很久以来即有争论，但当时却得到准许，并且有很多人赞成。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容易被人滥用。由于令人难解地缺少警惕，江湖骗术风行一时；很多带点官方性质的募捐收集人和大批的“赎罪传教士”到处任意答应赦免任何罪行，以换取金钱。因此，这类行为受到激烈而理所当然的批评。批评者往往是虔诚地相信这种做法，特别是相信为死者赎罪的做法的人。无知加上欺诈，结果使这种制度名誉扫地，而这种制度看起来明显地是教会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而采取的一种可耻的权宜之计。这种做法本应有助于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它成为教会横征暴敛的许多手段之一，的确在当时，即中世纪末，必须承认教皇们有一种最不幸的倾向，就是单纯为了财政上的目的而大量增加颁发赎罪券的数目。这样做在道德方面的影响是令人痛心的，受到一些思想开明的人士的谴责。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写的一段著名的话，不过表达了一大部分公众的想法：

对那些庆幸自己得到了虚假的宽恕的人，那些用沙漏来计算在炼狱的时间，能够像数学表一样丝毫不差地算出它的时代、年、月、日、时、分、秒的人，我该说些什么呢？现在假定有些商人、军人或法官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一小部分来，他立刻就认为他一生的污秽都已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么多的伪证，那么多的淫欲，那么多的放荡，那么多的争论，那么多的谋杀，那么多的欺骗，那么多的背信，那么多的变节，似乎都可根据契约而一笔勾销，而且勾销之后他们又可以着手重新再来。……

这时，利奥十世正好从接任教皇之日起就需要大宗金钱，特别是用于营建罗马的圣彼得大堂。为了筹集基金，这位教皇不幸心血来潮，颁发一次赎罪券（1513年10月），以继续这一历史性建筑工程，并错误地把宣讲这次赎罪的工作交给了一些毫不犹豫地施加各种压力

和惯于采用各种江湖骗术的人。这些说教者中有一个名叫特茨尔的，他在德意志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马丁·路德的愤懑。正是他，给马丁·路德造成了机会，使之在符腾堡就赎罪券的价值问题提出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所以，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这里无须对论纲进行论述，但是我们必须描述一下1515—1520年间罗马教廷和基督教世界，以及当时舆论界的状况。

迄至这时为止，文艺复兴的影响还没有为人们所普遍地感觉出来。意大利比欧洲其他部分进步得多，中世纪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到处抗拒新思想的进攻。如果说，在意大利，这一运动可以说是要恢复光荣的过去，在民族传统大不相同的其他国家就不能这么说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基督教基本上不同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教会，尤其是就外表形式和信仰方式而言。意大利人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习惯于“内心信奉异教和感情上表现神秘主义”，二者交织在一起，往往令人困惑，因此很容易接受正在兴起的各种新风气。在广大群众中，最可悲的宗教迷信仍旧流行；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群众，对某些上层阶级代表人物那种装腔作势地表现出对宗教的怀疑，也不以为奇。对于那些故意装出泥古不化的阴谋家，如保罗二世时代罗马科学院的成员，人们是否真的把他们当一回事，是值得怀疑的。洛伦佐·瓦拉或蓬波纳齐，甚至马基雅弗利这些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自然也就并不显著；同样，像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博蒂切利这样一些心灵上有创伤的人也是极少见的。总之，意大利的各民族难得意识到什么良心上的不安，对关系到全世界的天主教大分裂，或很快就将在他们的边界上出现的异端国教，就更加意识不到了。

几乎在所有其他各处，局势对罗马教廷具有更大的危险性。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民族主义十分高涨，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在马克西米连秉政时期就可以感觉到真正的民族觉醒。毫无疑问，这位君主不是能成为伟大政治家的人才；此外，他也异常缺乏进行任何大规模事业所需的物质资源。但是他富于骑士气质，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某种德意志爱国主义。马克西米连绝不会反对建立一个与罗马只保持极松散关系的德意志国教——即使他从未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认真地考虑过成为该教会的教皇！但是他能指望得到谁的支持呢？他不能指望那些高级教士，这些人整个说来都是些平庸之辈，关心的是增加他们在尘世的收

入或搜刮的财富，而不是提高全国的宗教或道德水平。至于就人民来说，则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他们笃信宗教，其热诚达到了导致建设许多新教堂的程度；他们慷慨大度，维持着不计其数的慈善基金会。然而他们也表现出敌视罗马的情绪，等到罗马教廷意识到这种情绪时，为时已经太晚。德意志的这位民族天才为国内有势力的各个阶级所制定的道路，与意大利的杰出人物所遵循的道路迥然不同。当然，德意志舆论界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感兴趣，但是也以急切的心情注视着罗马教廷的某些做法，而意大利人对这些做法如果不是漠不关心的话，也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这样的态度也可以从德意志人不相信罗马法这一点上看出来，因为罗马法也被认为是与他们的民族愿望和传统背道而驰的。罗马教廷错误的和令人气愤的财政措施，又使这种情绪更加严重。查理五世甚至说，罗马在德意志征收的金钱，比皇帝本人征收的还多。在这样的气氛下，路德的反抗就必然会得到充分的支持。这位德意志教士于1510年底到1511年初在罗马居住过的几个星期，使他对教皇及其亲信们所过的生活更加反感。在他看来，这种生活是最黑暗不过的。他对意大利人信仰方式的乖僻特点毫不了解，这种方式使他大为吃惊，因此带着痛苦和幻灭的心情回到德意志。毫无疑问，他经历了精神上的极大苦闷，但是他也未能理解一种与他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英国使节理查德·佩斯也是在1510年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罗马教廷腐败情形的极度嫌恶。

在英国，总的情况与上面所描绘的非常相似。在群众中，深厚而真挚的虔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是无法否认的。但同时教会的财政和司法组织也存在着不信任的情绪。尽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许许多多的看法，但人民就整个来说绝没有放弃传统的做法。相反，他们非常热诚，结果使教会建筑和宗教基金繁荣发展起来。有人正确地指出：从1468年到1530年间，英国出版的书籍有一半以上是宗教著作，其中有2/3是表达虔诚信仰的文章。应该补充说明，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宗教作品在书籍出版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与此相同。在英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宗教文学的爱好十分明显，读者对宣传宗教信仰的无数通俗小册子的兴趣永无满足之时。在一个不论是文学和艺术方面实际上都比大陆更具有中世纪色彩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足为奇。约翰·米尔克在1415年以前编纂的训诫和宗教传说集，即旧本的《节日便览》，在1483年和1532年之间重版不下19次之多，这个事实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至于各种传道用的、甚至关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

义的手册，16世纪初的30多年间更是汗牛充栋。和这种热情表现形成对照的是，英国的民族意识在同一时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反对教权的情绪，尤其是——和德意志一样——在富有的和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中间。虽然罗拉德派已不复为患，但是他们肯定并没有销声匿迹。

教徒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和他们比较起来，教士们的思想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想提出一个有可能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某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阶段的答案，的确是既危险而又无益的。但是，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谈一点总的看法还是可以的。

先看一看高级教士。如果指的是那些与其说是教士不如说是武士的高级教士们的无数事例，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尤其在德意志，有一种主教同时也是大封建领主，托马斯·穆尔纳和伊拉斯谟曾对这些人加以讥讽。在法国，无可否认也有少数惹人注目的捣乱人物。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给人以人文主义者或艺术赞助人的印象，但也丧失了对“他们的使命的神圣理解”。为了绝对客观起见，应当记住，不应根据少数可能是特殊情况的事例得出错误的一般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同意：人们对高级教士的总印象并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至于低级教士，要对之提出一种看法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缺乏对某一地区的情况作出仔细分析、而不仅仅是搜罗一些逸事传闻这样的研究著作。很明显，在许多地方低级的在俗修士很不称职，他们因为缺少教育，粗鲁庸俗，甚至暴虐不仁，长期受到指责。他们出身于他们仍然十分接近的人民群众中，往往保持他们那种粗俗而敦厚的习惯，与这些人共欢乐，甚至参加他们的游戏、舞会和争吵。有时候，这种态度也许与身份不合，但是却使他们名副其实地受人欢迎。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即将跨入神职门槛的大批教士，他们与修会毫无正式联系，有时无固定住址，而且时刻在伺机寻衅闹事。这些假教士是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人，引起当局的深切不安。我们也必须承认，低级教士的知识水平总地说来大成问题：“供神父使用的各种手册”当时对提高知识并无多大用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曾对这些毫无文采的著作一再加以嘲笑。不过这些著作长期以来对维持低级教士以及乡村教区一般信徒的热情，还是十分有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乡村教士中有些人的行为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例如，非法姘居的大有人在。我们之所以得知这些事实，不仅是通过传道时那些措辞激

烈的说教——这些说教往往令人怀疑是夸大其词——而且也通过宗教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不应掩饰这些确实存在的污点，但是也应注意到这些乡村神父的悲惨的贫困生活，《贫苦教士的书信》并不是一部纯文学的作品。

在正式的教士中间也普遍存在着同样的缺点，这些人显然也是每况愈下。各个修会之间的敌对，正式的和在俗的两种修士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他们都大大丧失了威信和影响。至于各修道院的物质财富，已出版的各种研究著述给人们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印象。不论是关于英国^[9]还是关于德意志的情况，必须先做彻底深入的研究，才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看法，而且很可能会表明，在各个地区之间亦有明显的差别。

考虑到所有这些，教会改革的情况如何呢？如上所述，这是罗马教廷的中心问题之一。必须承认，罗马教廷不可能给予这个改革运动以任何有力的推动，甚至不可能提出最起码的一贯主张。这就是为什么伯斯费尔德修会值得称赞的努力，也和荷兰修会的努力一样，只产生了无足轻重的，而且首先是昙花一现的效果。至于蒙太古修会或根据温德谢姆修会的教规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可能起多大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遇到了无法战胜的抵制。可能除了西班牙和英国外，情况几乎都没有改善，而且这时各地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诚地渴望改革。偶而有的君主装模作样地表示要亲手进行企望已久的改革：他也许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大会，拟订各种计划和纲领，但并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法国国王正是以这种方式于1493年11月在图尔召开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虽然不该无视该委员会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并没有使情况真正有所好转。

整个工作本应由罗马教廷发起，并且以不屈不挠的毅力贯彻执行。有一个时期，罗马似乎也理解这一点。事实上，1512年由朱理亚二世在极度动荡的时期召开的拉特兰公会议，在较为平静的气氛下举行会议的过程中，曾宣称该会议打算着手进行这一拯救教会的工作。在教阶组织的每一领域和每一级别，从罗马教廷直到最底层的乡村教士，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514年5月5日颁布的一个语气强硬的通谕，采取了某些实际可行的措施，特别是关于纠正经常受到指责的教会一大弊端——滥授教会

产业用益权——的措施。规定今后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授予，而且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在管理产业时必须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这些都是很好的规定，可惜几乎从未付诸实施。通谕的其余部分是试图约束红衣主教变本加厉地炫耀奢侈豪华的倾向，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要利奥十世这样一位挥霍无度的教皇来推行这样的规定是多么困难。此外还有几条关于整顿道德和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的礼拜仪式的合理条文，规定对当时到处盛行的亵渎神明、施行妖术和迷信的行为从严处罚。但是相信魔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作恶者罪孽》通谕正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大多数人相信巫术，这种态度以后还延续了多年。人们认识到：不但需要教育信徒，而且首先需要教育教士自己。直到此时为止，大部分教士，特别是下级教士，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尽管地方上所做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在英国，特别是在剑桥，15世纪末就设置了神学院和神学研究机构，以提高传教士的水平。印刷术从15世纪中叶以来就已使用，这时当然也被利用起来，但是它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因为它也可以被用来散布有问题的思想。这次公会议有鉴于此，就禁止印行任何未经正式指定的宗教当局所批准的书籍。总之，这些条文仅仅是零敲碎打地触及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大胆的措施。

这次会议还由于主教和正式教士之间，特别是主教和过去曾十分活跃的托钵修会之间旧日的斗争重新爆发而受到了干扰。对立的双方辩论起来从来不患无词，在唇枪舌剑中措辞往往也偏激过分；但最后正式教士还是同意减少某些完全超出本分的特权，其中有些是在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在位时授予的。倘非如此，整个主教统治制度一定会受到致命的削弱，因为有那么多的传教士任意作出预言，致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传教士无疑是很大胆的，而且对社会的需要又异常敏感。例如，法国直言不讳的奥利维埃·马亚尔从不向最专横的国王们低头，在每个国家都有努力仿效他的人。但是与这些强有力的人物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有害的人。传教士和假传教士大肆宣扬一些异端思想，预言骇人听闻的灾难即将降临，以便恫吓那些听他们讲道的人。危言随着他们不脛而走，往往造成恐慌和暴乱。对这些受群众欢迎的演说家必须严密注意，这次公会议认识到了这一点。[\[10\]](#)

1517年3月16日，这次历时达5年之久、值得纪念的公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对教会来说，它是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突然给教会敲响了警钟。罗马教廷是否注意到广大基督教徒的呼声，做出了为实行盼望已久的改革所需要做的事情呢？罗马教廷是否恢复了它的威信呢？罗马教廷是否已恢复，并在马丁·路德行将登上舞台的时候享有崇高的声望呢？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将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教皇的劣政似乎永无止境地一代接连一代：朱理亚二世的好战尚武，利奥十世的奢侈浪费——这些在当时的局势下，都不能算是有利的因素。即使群众对教廷仍有某种程度的尊敬，教廷的道德声誉也已经动摇。何况它已不受人尊重，它的声誉就更加动摇。即使考虑到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而放宽尺度，我们也要承认罗马教廷丑行累累。某些红衣主教由于其年龄和举止，已经不足以令人尊敬，他们享受的那种往往是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只能更加衬托出各个国家低级教士的穷困。政治上的钩心斗角，肆无忌惮的用人唯亲，在一切事情上不讲廉耻，往往是明目张胆地买卖圣职，这一切从遥远的现在看来，由于文艺复兴的灿烂光辉，相形之下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教廷中那些最显要的成员极力追求人间的欢乐享受，当然需要挥霍越来越多的钱财。因此，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财政措施和最危险的金融权宜手段；因此，始终是罗马政策幕后主宰的银行家，也就愈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除了在意意大利，地位卑下的各阶层人民是很少知道这些事情的，他们仅能通过传教士的暗示而进行含糊的猜测，但是社会上比较先进的阶层对这些事情并非一无所知。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阅读到处流行的人文主义者所撰写的小册子和讽刺作品。毫无疑问，这些作者很少有人不信神，也很少有人胆敢超越能够容许的限度，但是他们的批评击中要害，人人都能看出他们说得极为有理。统治者们则依靠最早出现的对罗马抱仇视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千方百计地利用广泛存在的宿怨和积愤。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教会团结在尼古拉五世周围时企图达到的两项目标——对外十字军东征和对内教会改革——不但没有能够达到，反而好像大大地后退了。

事实上，这时已不可能再当真地谈论什么十字军东征的问题了。诚然，利奥十世在1518—1519年仍然大谈其十字军东征，大肆吹嘘什

么“圣十字军兄弟会”，估量该会有多少人力物力，并制订种种计划，但很少有人相信他是出自真心。土耳其的威胁虽然尚未消除——而且远未消除——但是人们已不像过去那样认为与土耳其人誓不两立了。教皇们自己也已同土耳其人打交道了——有时还沆瀣一气，从事一些极其卑鄙的交易，例如在不幸的杰姆事件上——基督教各国的国王们也步他们的后尘。为十字军东征而征收的什一税十分经常地被挪作他用，而公众舆论对这些用项是毫不热心的。十字军实际上已寿终正寝。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会给人的印象是：它无力实行人人谈论和人心所向的教会改革。教皇虽然压服了那些支持公会议权力至上思想的人，但是他从那以后在国外大事宣扬的专制主义，却未能使他完全逃脱抨击。红衣主教团^[11]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利奥十世在位时对候选人的选择，整个说来差不多和在他之前的那些最坏的教皇同样糟糕。事实上，罗马一心一意经营的唯有修建圣彼得大堂。如前所述，鼓吹赎罪是为此搜刮必要的钱财，而许多更加迫切的任务却置之不理。在大力进行施工的时刻，在豪华讲究的生活方式中间，怎么还可能认真考虑对教士及其信徒们的道德进行整顿呢？在群众的宗教情感还十分强烈的时期，罗马教廷这种玩忽职守和无所事事的态度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懑。对宗教和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也许会为此耸耸他们的肩膀，但是，在16世纪初叶，这种漠不关心的人根本没有，或者只是寥寥无几。

[1] 指1378年至1417年间，意、法两国封建君主为争夺对教廷的控制权而造成的两个教皇对立的局面。——译者

[2] 博尔贾，西班牙—意大利著名家族。卡立克斯特三世系该家族成员，后其侄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译者

[3] L. 韦克曼：《1493年亚历山大通谕与中世纪罗马教廷的政治理论——教廷的岛屿宗主权之研究》（墨西哥，历史研究所，1949年）。

[4] 路易十二在1498年继查理八世为法国国王后，便解除与前妻的婚姻，而与查理八世的遗孀结婚。——译者

[5] H. 泼夫曼：《文艺复兴时代罗马教廷与土耳其的合作》（温特图尔，1946年）。

[6]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7节。——译者

[7] 《新约全书·以弗所书》第5章第23至25节曾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夫妻的关系。——译者

[8] 原文与“公会议”的原文Council谐音。——译者

[9] A. 汉密尔顿·汤普逊：《中世纪后期英国教士及其组织》（牛津，1947年），此书可能过于概括。

[10] 这些传教士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已为近来出版的关于某些传教士的专题论著所阐述。

[11] 即罗马教皇的枢密院。——译者

第五章 从1470年至1520年西欧的学术和教育

后来终于开出文艺复兴的灿烂花朵的文化运动，不管它最初的来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14世纪期间在意大利首先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的。不过，它在15世纪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到1450年，人文主义已经对意大利文化支配了一个时期，在15世纪下半叶，它开始渗入阿尔卑斯山以北。然而，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人文主义发展的路线与它的起源国所走的路线大不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是从中世纪的学术逐渐演变而来，而在西欧的其他国家，则是用它来向不同传统的结构突然冲击。在新思想的追随者和旧思想的维护者之间，有时就不免发生遭遇战。人文主义占了压倒性优势，到1520年，它已大大改变西欧文化生活的面貌。

意大利的政治结构使人文主义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在那不勒斯、乌尔比诺、曼图亚、弗拉拉和米兰，人文主义呈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氛。在罗马，人文主义当然是到古代的废墟中寻求灵感，利奥十世即位之前，它对希腊很少感兴趣，并且向罗马教廷靠拢，就像在佛罗伦萨一样，由于美第奇家族的保护，一些第一流的学者被吸引在该家族的周围。另一方面，在威尼斯，只有几名贵族、几名在学校教书的学者以及帮助阿尔杜斯搞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去努力钻研人文学，并且显示出研究希腊的强烈倾向。15世纪在意大利，由于书籍的广泛流通，人文主义的发展就比较容易多了。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切泽纳、乌尔比诺、威尼斯等地成立了许多新图书馆，而一些旧图书馆（梵蒂冈的藏书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经过彻底改造，都已经焕然一新。图书馆都有如此长足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也是由于改进了大量复制手稿的方法。正当这些方法达到最高效率的时候，印刷术的发明给书籍生产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一发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典作品的一再刊行；迄至1500年，在意大利，西塞罗的文集印过200多版，维吉尔的作品印过70版。由于有了印刷术，人文主义的先进分子不但专门向出版商提供古代作家的作品

的原文，现在还能够把已经经过他们修订和校勘的著作公之于众。15世纪末，威尼斯在这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那时，阿尔杜斯印书馆竭力运用人文主义的最佳技巧，编辑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开始陆续不断地出版。

人文主义者虽然提倡在教育中注重学习古典作品，但是中世纪的手册、指南并未能立即铲除。甚至到了16世纪初期，贝顿的埃韦拉尔和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所编的教科书依然流行，虽然在这时候，在大多数学校里，它们已为佩罗蒂、苏尔皮齐奥以及曼奇内利的新文法书取而代之。在中小学教学中显然可见的中世纪成分与新的成分同时并存的现象，各大学里也是存在的。16世纪初，意大利的大学机构依然是中世纪的体系。例如，在波洛尼亚大学，文艺学院的课程仍旧分为“低三艺”和“高四艺”；在波洛尼亚和帕多瓦两大学，亚里士多德是至高无上的，而对于学医的人来说，希腊和阿拉伯自然哲学家的著作丝毫也没有失去它们往日的威信，但在大量的传统学术存在的同时，也可以在大学中发现人文主义的新价值观念。佛罗伦萨大学的波利蒂安，波洛尼亚大学的贝罗阿尔多、科德罗·乌尔切奥和邦巴西奥，帕多瓦大学的莱奥尼科·托梅奥和罗莫洛·阿马西奥，都与那些几乎未受学术界新潮流影响的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们并肩教学。大学里实际出现一种工作的妥协，在这种妥协中，新旧传统能够长期和谐地在一起活动，没有发生太多的敌对状态。大学的组织方式使人文主义的理想很容易通过文艺学院而渗透到法学、医学和神学中去。至于向人文主义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与同辈学者和赞助人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那则是科学院的任务了。最早的人文主义学园是在阿方索五世（1458年卒）时代，由安东尼奥·帕诺米塔在那不勒斯非正式开办的，目的是讨论各种各样的题目，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古代典籍的问题。另一方面，由马尔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和他的赞助人美第奇家族所领导的佛罗伦萨（或称柏拉图）学园在崇拜柏拉图的精神鼓舞下，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为佛罗伦萨的文化生活谱写了许多独特的篇章。正如菲奇诺在佛罗伦萨一样，蓬波尼奥·莱托（1425—1498年）在罗马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在他的罗马学园里，对于考古学的爱好完全占有统治地位。莱托的学园宣传异教无害于人，但是保罗二世（1464—1471年）却认为是对基督教的威胁，1468年硬把它打入“地下”；直到西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时代，当罗马教廷的主要官员都成为学园的成员时，它才又重见光明。不

过，到了利奥十世（1513—1521年）时代，当它得到教皇的庇护时，才算达到鼎盛时期。威尼斯学园与意大利的其他学园有些不同，它由阿尔杜斯领导，表明对希腊文化具有特殊的兴趣，它很快在整个欧洲博得赫赫声名，并且与整个欧洲发生联系。

人文主义所起的一个作用是：人们依然可以像在中世纪时期一样，有时也把古代典籍当作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灵感的源泉。在马基雅弗利的论文中，往往从古代历史中汲取处理当代事务的准则，而他心目中的古代世界，却是通过李维和波利比奥斯的著作得到的。另外，在极少的一些场合，在鼓动反对暴君统治的情绪时，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回忆，看起来仍起着很大作用。所以，科拉·莫纳塔诺的人文主义学说在1476年直接引起对米兰大公加莱亚佐·马利亚·斯福尔扎的刺杀；而布鲁图的令人难忘的事迹，正是鼓舞皮耶尔·保罗·博斯科利及其同伙在1513年密谋推翻美第奇家族的因素之一。但是，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肯定是站在他们的统治者一边的，他们之中有些人，例如米兰的雅各布·安蒂夸里奥，那不勒斯的焦维亚诺·蓬塔诺和佛罗伦萨的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也的确做了地位甚高的国家官吏。这些情况肯定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当我们不仅回想起人文主义者往往被雇佣去做政治宣传，而且回想起他们在关于积极生活与静修生活何者有益的论争中所采取的立场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次论争是15世纪佛罗伦萨哲学界的主要论争之一，在约1475年完成的克里斯托福罗·兰迪诺的著作《在卡马尔多利会的论争》中有极充分的报道。在15世纪晚期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另一个引起同样兴趣的题目是关于人的地位的问题。因此，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就对人的知识自由和人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加以重新估价，蓬波纳齐和菲奇诺对这一学术讨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这种对于人类尊严的歌颂，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菲奇诺都是极为虔诚的人，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在各学园里聚会的学者们虔诚地参加俗人修士会的礼拜，肯定不是稀罕的事情；在整个人文主义时代，的确没有忽视对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研究。因此，萨沃纳罗拉的反对古典主义只不过是对于新学术及其所拥护的东西显然有利的气氛中，为建立狭隘的清教主义而奋斗的一场信仰复兴运动而已。萨沃纳罗拉的失败并不是基督教的失败；就连那些反对他的人文主义者，也肯定不是对教会怀有敌意

的。如果说有一件事确实使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心怀不满，这不是别的，就是本国语言，或者更正确地说，就是把本国语言用于文学。波利蒂安和他的保护人洛伦佐·德·美第奇（更熟知的名字是“庄严的洛伦佐”，1449—1492年）不在这些人之列。实际上，在他们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一些用意大利语在15世纪期间所写的最优秀的诗篇。而在16世纪初期，这种对本国语言的敌对势力已经大大缩小，只剩下一个虽然叫嚷很凶，但是人数很少的集团；正当彼得罗·本博（1470—1547年）让大家观看怎样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两种文字来表达人文主义的精神时，卡斯蒂廖内（1478—1529年）以罗马宫廷日常使用的语言描绘他那令人难忘的文艺复兴理想人物的图画，而阿廖斯托（1474—1533年）在他的《疯狂的罗兰》中用诗句生动地写出入文主义中最美好的东西。

拉丁文派和意大利语派之争，只是新旧两派的战斗的一个方面。另一场争执是把古典主义者本身分裂成西塞罗派和反西塞罗派，这在安杰洛·安布罗吉尼身上达到了顶点，他姓波利齐亚诺，或者如我们所称呼他的——波利蒂安（1454—1494年）。波利蒂安有极大的鉴别能力，有极高尚的趣味，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很高的写诗天赋，他轻而易举地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和古典学者。正是波利蒂安，真正开辟了一个途径，用比较现代化的方法研究古典的学识；而且，仿佛他不满足这样一个成就，还要大显身手，表现他对于希腊文的精通远远超过当时流亡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拜占庭人。他也是第一个表示欣赏维吉尔的《农事诗》和晚期拉丁古典文学的人（见他的《乡下人》，这是他讲授拉丁文诗的就职讲学中论赫西奥德和《农事诗》的讲稿），并且不仅从考古的观点，而且从美学的观点考察古代的作家。波利蒂安大声疾呼，西塞罗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使一个人的个性服从于模仿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否定文体风格。他绝对不肯到西塞罗的神殿去顶礼膜拜。坚持这一立场的也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埃莫拉奥·巴尔巴罗也采取与西塞罗敌对的立场，而菲利波·贝罗阿尔多则选择阿普列乌斯的浮华的散文作为自己写作的范本。当然，所有这一切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波利蒂安的立场受到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的公开谴责，而且成为保罗·科尔泰塞猛烈攻击的对象。尽管反西塞罗派中的一些人拥有很高的威信，但是一直到1520年，西塞罗主义依然占据上风。当时意大利的拥护西塞罗的最大代表人物彼得罗·本博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在1512年至1513年就模仿问题与詹弗兰切斯科·皮

科展开论战时，他表述了西塞罗主义的几条法则。但是，伊拉斯谟在《西塞罗派》（对拥护西塞罗的人们的辛辣讽刺，1528年出版）中，终于证明波利蒂安的观点的正确性。

在1470年至1520年间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最有深远意义的成就中，有3个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它在校勘、考据和希腊研究方面的贡献。在校勘古典著作方面，洛伦佐·瓦拉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取得一些显著的进展。但是，到了波利蒂安，才第一次用全面而系统的方法对手抄本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注意古字的考证、正字法和“手抄惯用体”。现代校勘学实际是由波利蒂安开始的，从他的《杂录》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他所用的方法。他的弟子皮耶罗·克里尼托使这些方法更加科学化了。在考古学方面，真正的先驱者是比翁多·弗拉维奥（1392—1463年），他在《重建的罗马》中试图从地形学重新呈现古代罗马的面貌。在比翁多的时代，由于奇里亚科·德·安科纳和乔瓦尼·马尔卡诺瓦的研究，古典碑铭学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这些早期碑铭学家的成就，在1470年至1520年间有了许多继承者，其中值得提出的是维罗纳的费利切·费利恰诺和乔孔多修士。比翁多的工作由蓬波尼奥·莱托以及他的学园中的另外几个人接替，多亏这几位，关于罗马遗迹的研究得到了新生力量。一些重要杰作的发现，如在教皇英诺森八世时期发现观景殿的阿波罗雕像和1505年发现拉奥孔雕像等，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的研究。弗朗切斯科·阿尔贝蒂尼的著作（例如他的成名之作《新罗马城奇观》，1510年版）和安德烈亚·富尔维奥的著作（例如他的《罗马古代艺术》，1513年罗马版；《卓越的形象》，1517年罗马版；《论罗马古代文物》，1527年罗马版），还有拉斐尔1519年给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发掘计划，都反映出16世纪初期罗马的考古情况。收藏古物，特别是艺术作品，在15世纪初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到16世纪头10年，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就几乎成为一种狂热了。一些稀世珍品当然落到教皇和王公们手里。但像彼得罗·本博和安杰洛·科洛奇一类没有官职的学者，也能搜集到一些令人赞叹不已的古物，引起他们同时代人的羡慕和忌妒。

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考古学占有优势。在15世纪上半叶，奇里亚科·德·安科纳曾经大力提倡研究希腊的遗迹，但是自从希腊世界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土耳其人

的征服还有一个结果，这就是难民成群结队地涌入意大利，他们之中许多是有才华的学者，渴望在学园里谋个职位。有人说这些流亡者把希腊文化带回西欧去了，这个观点当然不再被人接受。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对意大利等地的希腊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到1470年，对于希腊的探索在意大利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虽然在那时候，关于希腊的知识还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普遍流传，也不是每个大的中心都能提供进行希腊研究的便利条件。例如，彼得罗·本博为了很好地掌握希腊语，就不得不在1492年到墨西拿去进康斯坦丁·拉斯卡里斯的学校。尽管如此，希腊语很快就成为大学认可的课程，难民中的有用人才被聘请到大学和其他学校去教课。希腊流亡者，如约翰内斯·阿尔吉罗普洛斯、安德罗尼卡斯·卡里斯图斯、两位拉斯卡里斯和马尔库斯·穆苏鲁斯，在意大利的大学里，与波利蒂安和科德罗·乌尔切奥等意大利的希腊研究家并肩教学。15世纪下半叶在翻译方面最伟大的成就是拉丁文本的《柏拉图全集》，1484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但这个工作不是一个拜占庭人干的，而是出于意大利人佛罗伦萨的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之手。1470年以后不久，人们就感到学习希腊语的有效工具奇缺，并且终于得到了补救。就连波利蒂安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学习希腊语时都不得不使用两种语言对照的教科书，因为没有合适的语法书和辞典。因此，1497年出版乌尔巴诺·博尔扎尼奥用拉丁文所写的希腊语法和1478年左右出版乔瓦尼·克雷斯托内所编的希腊—拉丁辞典，都表明是文艺复兴希腊语的历史中的一桩划时代的大事。同时，希腊手抄本的比较稀少也不再那么令人烦恼，因为希腊文的印刷发展起来，使米兰、佛罗伦萨、特别是威尼斯的出版社能够刊印希腊的主要古典作品的版本。

意大利人研究希腊文化的一个结果是：哲学思想有了可喜的发展。在帕多瓦、波洛尼亚和佛罗伦萨风行一时的哲学理论新思潮，主要来自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的解释和对柏拉图的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帕多瓦和波洛尼亚具有无上的权威，这在那样出名的大学城市里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佛罗伦萨，由于有菲奇诺和他的同伴，柏拉图主义占有优势。约在1450—1460年以后，柏拉图主义者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红衣主教贝萨里翁1469年在罗马出版的坚决保卫柏拉图的论文，对当时争论的焦点有很清楚的记述。不过，参加这次论战的人主要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职业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们喜欢遵循经院哲学家所制定的原则。于是，直到

15世纪末，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在帕多瓦流行的是阿威罗伊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传统，与佛罗伦萨人那种从精神上进行探索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波利蒂安的朋友、威尼斯贵族埃莫拉奥·巴尔巴罗（1454—1493年）对这一传统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认为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一定要直接阅读希腊的原著，而不是通过古老的译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经院哲学所抱的敌对态度。巴尔巴罗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他对大普林尼的原著也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以致1497年莱奥尼科·托梅奥就已经在帕多瓦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原著了。但是，为清除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而最卖力气的并不是巴尔巴罗，而是柏拉图主义者的大本营佛罗伦萨。概括地说，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归根结底是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而对道德问题作出重新的估价，并且对基督教作出人文主义的解释。因此，这种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神学是不无影响的。奥古斯丁修会的大神学家埃吉迪奥·达·维泰尔博（1465—1532年）的著作显示出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对于神学的影响；甚至像红衣主教托马索·达·维奥（1468—1533年，更为熟知的名字是卡耶坦）那样一个保守的托马斯主义者，也认为在阐述阿奎那的思想时有必要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人文主义对经院哲学的冲击，大概在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这个奇怪而可怜的人物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皮科对事物的看法，他的趣味，甚至他的用语，都属于经院主义的传统；他对讽谕的爱好和对犹太神秘哲学的兴趣，也同样是中世纪的一套。尽管如此，他的广博的知识仍然具有一种真正人文主义的眼光，正如他为使一切宗教和哲学基本上和谐一致所做的极为大胆的尝试远远超出了经院哲学家们最狂热的梦想一样。

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在帕多瓦和波洛尼亚，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解释都在哲学理论中占有主要地位。巴尔巴罗、菲奇诺和皮科虽然用不同的方式，但全都是当时在上述两地所流行的理论思潮反叛者。不过，帕多瓦的学者们所探求的并不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而是中世纪注释家对它的歪曲。例如，1468年至1499年在帕多瓦大学讲学的尼科莱托·维尔尼亚（1420—1499年）的理论，并不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是以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作为基础的。维尔尼亚强调物理学必须脱离形而上学，正是他，第一次真正把科学提高到绝对独立的地位。然而，他缺乏亚历山德罗·阿基利尼（1463—1512年）的人文主义的感情；在阿基利尼的独树一

帜的阿威罗伊主义中，仍然给人类的个性留下一些余地。直到彼德罗·蓬波纳齐（1462—1525年），才通过亚弗罗迪西亚斯的亚历山大的注释，以文艺复兴的情调对亚里士多德作出新的解释。蓬波纳齐深深相信信仰和哲学两者的辩证的不可调和性，他甚至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法证明人类灵魂是不朽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是绝对不能永存，只是相对长期存在的。但在同时，他像菲奇诺一样对人的最终命运保持极大的兴趣，他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毫无疑问，蓬波纳齐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敏锐的哲学思想家；他虽然同情整个的人文主义思潮，但在实际上，他代表着一直到16世纪末统治帕多瓦哲学界的那种帕多瓦的自然主义、阿威罗伊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15世纪最后25年起在帕多瓦引起特殊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希伯来哲学，这主要归功于犹太学者埃利亚·德尔·梅迪戈，他对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皮科在鼓励人们研究希伯来语和东方语言的兴趣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在东方语言中，皮科的朋友吉罗拉莫·拉穆西奥（1450—1486年）特别研究了阿拉伯语；而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也引起了某些人文主义者（特别是在菲奇诺集团之内）的兴趣，并且促使安尼奥·达·维泰尔博去伪造一些文件（1498年在罗马出版），最后还导致皮耶罗·瓦莱里亚诺发表一篇关于象形文字的论文（1556年完成）。另一方面，尽管洛伦佐·瓦拉以及后来波利蒂安也已经注意研究《法学汇编》的原本，但是直到1520年以后，研究罗马法才不再墨守中世纪的成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其中的原因：一是法学家总是因循守旧，一是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向对研究法律抱着敌对态度，因而他们见了任何有关法律的东西都感到厌烦。

法国的人文主义发展得比较迟。不错，早在14世纪最后25年间，意大利的文化新风已经在法国找到少数的追慕者。但是，尼古拉·德·克莱芒日、让·德·蒙勒伊尔、贡蒂埃·科尔和皮埃尔·科尔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大有前途的努力成果，在百年战争最后阶段所造成的满目荒凉之中，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因此，直到15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风靡一时的新学术思潮未能再度吸引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的、烦琐主义的求知方法已经足以适应该国文化界的口味；法国人比较喜欢用他们的如簧之舌、维永的诗以及修辞家们的矫揉造作的作品来表现自己的天才。即便当一种人文主义的观点已经在法国发展起来

后，它最初也只是对极少数人（虽然他们显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群）产生了影响。在1470年至1520年的整个时期，学校教育一直固守旧日的传统，像《希腊成语》和《教义篇》之类的旧教科书仍然与过去一样流行。在各大学里，旧式观点还占有优势，尽管给新思想让出一些地方。例如，巴黎当时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学术中心，是欧洲主要的神学派别的所在地，其名师巨匠绝大多数对于文化界的新事物几乎没有任何的兴趣。在15世纪最后25年期间，使大学发生分裂的并不是是否应该接受新学术的问题，而是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之间的斗争。1474年，由于唯实论者对其对立面长期斗争的结果，唯名论的学说遭到官方的谴责和查禁。可是，失败的一方并没有停止斗争，结果在1481年终于把禁令撤销了。此后，唯名论在巴黎真正是称霸一时，一直到拉伯雷的时期把经院哲学作为笑料从大学中完全赶走为止。唯名论者如对唯实论一样，也拼命反对柏拉图主义，完全不比他们的敌手有任何更大的妥协的愿望。学术空气绝不是自由的。例如，1494年大学已经正式谴责占星术，但是路易十二在位期间，国王反对思想自由的政策在学术界里已经推行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蒙太古学院的重建者、正统派的让·德·斯坦敦克，1499年因口头不慎提了一些过火意见而被驱逐。到了这个时候，人文主义在大学中，特别是在艺术院系里，已经起了一个时期的作用。1456—1458年格雷戈里奥·蒂费纳特在巴黎的讲课已经向经院哲学家们介绍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一些情况，而当菲利波·贝罗阿尔多于1476—1478年在巴黎讲学时，更着重谈论了这个问题。罗贝尔·加圭安和他的一些朋友肯定没有丢掉这样的机会。从1470年索邦神学院[\[1\]](#)图书馆员纪尧姆·菲歇和他的同事让·埃伦在大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开设的印刷所所出版的图书的性质，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非常突出的是：他们的一系列出版物是从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的拉丁文通信集开始的。在这第一卷出版之后，接着刊印的是另外一些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原著，如巴尔齐扎的《正字法》、萨卢斯特和弗洛鲁斯的著作，以及菲歇本人的《修辞学》。简单一句话，在法国，印刷术的开始应归功于人文主义的热潮；而在整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文主义热潮比在罗贝尔·加圭安和他的朋友们中间浪头更高。罗贝尔·加圭安（1433—1501年）是格雷戈里奥·蒂费纳特旧日的学生，他热烈崇拜西塞罗，认为把知识和雄辩术结合起来，可以推动神学的进展。他不仅以自己的大量著作，而且通过个人的影响，来为达到这

个目的而奋斗。在他的著作中，他极力模仿意大利的样板；至于他个人的影响，也的确是非常有力的。所以，加圭安一群人成为法国人文主义的摇篮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人文主义不但不反对经院哲学，而且是在经院哲学的轨道之内，它对于语法和修辞显示出一种鉴别的能力。

如果考虑到加圭安在巴黎学术界的崇高地位，那么，许多逗留巴黎的外国学者（其中包括年轻的伊拉斯谟和许多意大利人）都极欲博得他的青睐，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努力巴结的另一个人是意大利出生的维也纳大主教安杰洛·卡托约（1440—1496年），他是加圭安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备受国王宠信。多梅尼科·曼奇尼正是在1483年12月1日从博让西写信有声有色地向卡托报告理查三世篡夺王位的经过；由于卡托身居高位，1487年才挑选他去解决纪尧姆·塔尔迪夫和杰罗拉莫·巴尔博之间的纠纷，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巴尔博约于1484年到达巴黎，他企图对意大利特色的人文主义的教授实行垄断。由于排挤塔尔迪夫，后来又排挤他的意大利同僚安德烈利尼和维泰利，弄得臭不可闻，他不得不在1491年匆匆离开巴黎，使同执教鞭的老教师们拍手称快。科尔内利奥·维泰利在1488—1489年讲了几个月人文主义之后，也自愿跑到英国去了。代替他们留在法国的是福斯托·安德烈利尼（约1462—1518年），他在法国作为人文主义讲师的声望仅仅次于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1480—1542年），后者自1508年起在巴黎讲授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另一位在法国有过一定影响并取得成功的意大利学者是维罗纳的保罗·埃米利奥（约1460—1529年），他为了学习神学于1483年到达巴黎，但是后来却研究起法国历史和古代文物，最后出任王家史官。他出版过一部法国历史（1517年），是按照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原则写成的。

像安德烈利尼、阿莱安德罗和保罗·埃米利奥等意大利学者的成功，很清楚地说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巴黎对人文主义价值原则的欣赏。从当时出版的图书的种类，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法国的出版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博学多闻、曾在意大利留学的约多库斯·巴迪乌斯）刊印了很多卷用法文写作的有关烦琐主义的学术、信仰和文学的著作，但是他们也出版了相当多的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原文作品。奇怪得很，查理八世所发动的意大利战争并没有立即促使两国之间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从帕维亚把斯福尔扎家的藏书

悉数运到法国，意大利战争使法国可用的书籍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另一个结果是希腊流亡学者约翰内斯·拉斯卡里斯和人文主义诗人雅各布·桑纳扎罗的来临：前者作为外交使节，表现出是路易十二的无价之宝；后者发现奥维德和涅梅西亚努斯的几篇长期被人遗忘的诗篇，总算使他的流亡得到一些酬报。恰恰是在意大利战争的前夕，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的研究在法国变得重要起来。格雷戈里奥·蒂费纳特在巴黎的教学包括一些希腊语的讲课，但是他的教学还为时过早，没有能够留下很深的痕迹。加圭安是格雷戈里奥的学生，他讲授希腊语肯定没有得到太大的效果。实际上，只是从1476年起，由于希腊流亡者乔治·赫尔蒙尼莫斯到达巴黎，巴黎才再度教授希腊语。赫尔蒙尼莫斯显然不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尽管如此，他还是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学生，例如比代、罗伊希林和伊拉斯谟等，都是由他引导（虽然教学无方）去学习希腊语的。1507—1509年弗朗索瓦·蒂萨尔在巴黎的讲课是法国的希腊语教学的第二个阶段，他也有一些由吉尔·德·古尔蒙在这几年专为学生印制的希腊语教本。但是，巴黎大学到1508年，即后来的红衣主教和教皇驻沃尔姆斯代表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开始在那里讲课的时候，才正式开设希腊语的课程。

在那些热心学习希腊语的法国人当中，我们肯定应该提到让·德·潘，他曾经在波洛尼亚受教于贝罗阿尔多（他写过这个人的传记）和科德罗·乌尔切奥等精通希腊语的大师的门下。另一位从希腊语学习中得到许多灵感的人是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约1450—1536年），尽管他对这种语言永远没有达到精通的地步。勒费弗尔与波利蒂安、埃莫拉奥·巴尔巴罗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交往，使他熟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精华。不过，他自始至终不是一个十足的古典学者，而更多地是一位人文主义神学家，他的读书兴趣并不摒弃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他的著作也包括对于库萨的尼古拉斯、圣维克托的理查德和中世纪佛兰德的神秘主义者的版本的研究。他也能够接受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新的解释（毫无疑问是在埃莫拉奥·巴尔巴罗的鼓舞之下），这种解释公开反对中世纪各学派的传统。他在这一方面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了解真正的、而不是被中世纪评注家歪曲的亚里士多德，早在1493年，他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八卷释义》中就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个目的。在他的生涯的较晚阶段，他企图像他过去评释亚里士多德那样去评释整个神学。这时他所构想的简直就是神学的彻底改革，并且把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传授给不懂希腊语的人们。正是为

了达到这些目的，他在1507年出版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著作的一个拉丁文译本，一年之后又刊印了一版旧约圣经的《诗篇》。勒费弗尔正是在他对保罗书信的评注（1512年出版）中，最深刻地、最独到地表达了他的神学思想以及他对圣经评注的热衷。在他的评注中，依然替伪造的塞内卡与圣保罗的通信的真实性进行辩护。

勒费弗尔·戴塔普毫无疑问是16世纪早期法国最有才华的思想家。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特别是在研究希腊方面，他比纪尧姆·比代（1468—1540年）肯定差得太远了。比代是被培养当律师的。曾在奥尔良研究民法，在1494年，他在赫尔蒙尼莫斯门下开始学习希腊语。不过，他的真正希腊语老师是约翰内斯·拉斯卡里斯和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这在当时的人文主义中是两个非常伟大的名字。1502—1505年，比代已经把普鲁塔克的一些文章译成了拉丁文。但是，直到1508年，当他的《〈法学汇编〉评注》问世的时候，才充分显示出他真正的才能。在这部著作中，他没有隐瞒他对中世纪解释罗马法的学者的轻蔑。1515年出版的《货币论》最高度地表现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对古典作品的领会程度。这部书使它的著者立即声名鹊起，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者之一。在这部第一次学术性地、可靠地讲述罗马货币制度的奇书中，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对于资料的剔择和鉴别的眼光，如果我们考虑到著者的出身背景和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的话。比代对于本国语言的轻视并不那么奇怪，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许许多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一样的。但是，在那时候，他全神贯注在古典著作上面。因此，他对学术研究怀有十分突出的热情，当在1517年听到弗朗西斯一世有意创立一个学者的社团时，他立即去打听清楚国王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并且在他的奔走下，国王的计划终于在1530年得到实现，成立了法兰西学院。

在15世纪晚期，英国也和法国一样，学术和教育依然遵循中世纪的模式。在整个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在文化方面起过主要作用。另一方面，15世纪最后25年间的英国的修道生活的总的情况也表明，过去由修道院完成的学术和教育的职能，这时已经有多少被中学和大学取而代之了。恰恰是在这个期间，有两所文法学校，即班伯里中学和牛津大学莫德琳学院附属中学，都在文法教学中开始采用新方法。在各大学里，这些革新的精神也显然可见。不过，在牛津和剑桥的学院生活中，神学教师依然占据主宰地位。但是，神学家们的无上权威并

未能阻止由意大利学者和曾经到意大利留学的牛津和剑桥毕业生倡导的对于人文主义学术的某些方面的爱好的兴起。印刷术的引进自然而然地导致书籍出版的革命。在英国印刷业的初期，显而易见的是：最初的印刷业者卡克斯顿、鲁德以及神秘的“圣奥尔本斯教师”，都对人文主义不无若干的同情。他们的出版物当然是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的。尽管如此，他们也出版少数与“新学”有联系的著作，牛津的鲁德甚至走得更远，在1483年出版列奥纳尔多·布鲁尼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拉丁文译本，在1485年出版弗朗切斯科·阿雷蒂诺翻译的法拉里斯伪书信的拉丁文译本。卡克斯顿和鲁德全都听从了旅居英国的意大利学者的劝告，他们提出：到了15世纪最后25年，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已经站稳了脚跟。在英国，这种新学术观点立即以许多方式表达出来。约翰·劳斯（约1411—1491年）和威廉·博托奈尔（伍斯特人，1415—1482年？）侧重于搜集和研究古物，对英国古代文化很有热情。另一方面，林肯教长罗伯特·弗莱明（1483年卒）则学习希腊语，并受当时意大利时尚的激励写一些平庸的拉丁文诗。韦尔斯教长约翰·贡索培（1498年卒）的学术活动也是如此，他的正式拉丁文演说是以他在弗拉拉所学到的传统的人文主义雄辩术为样板的。

拉丁文法是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最初的学术分支之一。意大利人所编的新文法手册到达英国后是如此受人欢迎，它们很快就使人感觉到：迄今在学校中作为教学使用的参考书已经不再适用了。牛津大学莫德琳学院院长约翰·安卫基尔（1487年卒）所著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显然具有改进拉丁文法研究的意图。约翰·斯坦布里奇和罗伯特·惠廷顿也仿效他，他们的论文颇为风行一时。安卫基尔、斯坦布里奇和惠廷顿的各种拉丁文法书，在英国明确地树立了文法教学的新方法。这样一来，就无怪乎当科利特在1510年创办圣保罗学院的时候，他也要采取措施，请利纳克尔专门为该院编写一部拉丁文法，而且任命著名文法学家威廉·利利为第一任院长。顺便提一下，利利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希腊学者。

人文主义学术在英国的传播，对于宫廷也产生了影响。宫廷人士对于高雅的拉丁文的喜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罗马教廷官员和学者们为了博得国王的青睐而带来的意大利文化的作用。这些学者所采取的邀宠的方法就是向国王或亲近国王的人们呈献拉丁文诗，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以及呈献用拉丁文写的文章。例如，彼得罗·卡尔梅利亚

诺（1450—1527年）开始向爱德华四世呈献拉丁文的颂诗，到了亨利八世时代，依然如此行事。罗马教廷的征税官，终于在1497年成为伍斯特主教的乔瓦尼·吉利，以及在伦敦的其他一些意大利人，如米歇尔·纳戈尼奥、菲利波·阿尔贝里科（曼图亚人，曾向亨利七世和理查德·福克斯各呈献一首拉丁文诗）和乔万尼·奥皮乔，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所有这些作品以及吉利和卡尔梅利亚诺的飞黄腾达，都表明在约克王室的国王治下，对于古雅的文字是颇有几分欣赏的。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更加认识到优美的拉丁文的政治价值。亨利七世不仅设立拉丁文秘书，而且任命卡尔梅利亚诺担任这个新的官职。在这位国王的统治下，一位法国学者、奥古斯丁教派的贝尔纳·安德烈充当桂冠诗人，尽管他的拉丁文受到伊拉斯谟应有的批评，但是，他的阿谀奉承的颂歌肯定讨得了主子的欢喜。因此，像这类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当罗贝尔·加圭安在1489年访英期间发表一篇侮辱亨利七世的拉丁文讽刺短诗的时候，依附宫廷的各式各样的人文主义者立即大写其谩骂性的拉丁文诗，对他群起而攻之。当然，这种宫廷式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讲究修辞的，只限于歌功颂德、正式演说以及写辞藻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另一方面，在牛津和剑桥，人文主义具有更大的学术性质，虽然甚至在这里，最初也是以专讲修辞术开始的。在剑桥大学首先用现代化的方式教授这门课程的是意大利方济各教派的洛伦佐·达·萨沃纳，他在1478年就已开始讲课了。洛伦佐的《新修辞学》于1479年由卡克斯顿出版，1480年由“圣奥尔本斯教师”出版。卡克斯顿在1480年也出版一个节本，这说明《新修辞学》一书颇受群众欢迎。在剑桥大学有另一个意大利人卡约·奥贝里诺仿效他，这个人除了讲授泰伦提乌斯的作品外，还被聘请用拉丁文写公文。另外一位剑桥的学者约翰·多格特，在意大利留过学，从1499年至1501年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他写了一大部关于柏拉图《斐多篇》的评注，其中肯定不会没有意大利的影响。在15世纪最后25年间，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牛津得到最大的发展，意大利人斯特凡诺·苏里戈内大约从1465年起至1470年就已经在该校教授修辞学。苏里戈内还可能教过一些希腊语；但是，不管他是否教过，埃克塞特学院从1490年起就有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科尔内利奥·维泰利任教，他肯定推动了牛津大学学术工作，特别是希腊研究的发展。在15世纪的英国，维泰利来以前，就已有人懂得希腊语了。罗伯特·弗莱明在弗拉拉掌握了一些希腊语的知识，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修道院副院

长威廉·塞林（1494年卒）不仅在1488年把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一个小册子译成拉丁文，而且大约在1472年就已经在他的修道院里教授他希腊语的初级课程了（他是在波洛尼亚学习希腊语的）。在约克大主教乔治·内维尔的家中，到1472年他流放到加来为止，也进行希腊的研究；内维尔的秘书，1484年成为达勒姆主教的约翰·舍伍德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研究希腊的学者，而一位拜占庭的流亡者——君士坦丁堡的伊曼纽尔实际上在1468年就给内维尔抄录了一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词（现藏莱顿），或者还有其他的原文课本。内维尔和舍伍德两个人都与另一位希腊人交往，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此人就是最后定居巴黎当教师的乔治·赫尔蒙尼莫斯。伊曼纽尔及其同国的抄写人约翰·塞尔博普洛斯（他在英国的活动时期为1484年至1500年）在英国抄写的现存的手稿，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牛津大学是需要这类原文课本的（特别是希腊文法书），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威廉·格罗辛和托马斯·利纳克尔在他们的赞助人之列。

威廉·格罗辛（约1446—1519年）的一生经历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虽然他写的文章很少，而且极端讨厌著书立说，但是，他对自己的同代人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利特、利纳克尔和莫尔都得到他的很多教导，甚至伊拉斯谟也只能对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之深肃然起敬。格罗辛在意大利掌握了古典著作，而又具有相应的批判能力。下列事实特别表明了这一点：1501年当他在圣保罗大教堂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他发现过去一直认为是丢尼修大法官所著的《教阶制度论》可能并非出自其人。这种以人文主义的学问为矢攻神学研究之的情况，在当时的英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约翰·科利特（1466？—1519年）在意大利留学时吸收菲奇诺和皮科的学说，增加了他对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热情，他回国后也把人文主义的学问应用到神学研究上。不仅从他的论文中，而且从他于1496—1497年在牛津所做的关于保罗书信的讲课中，都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他用意大利的把课文当作一个整体的方法来代替当时流行的解释文字和寓意的方法，给《圣经》注释工作带来一股新风气。科利特头脑里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念竟是如此的强烈，使他不仅摒弃经院学者而赞同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并且想要成立一个专门培养有学问的基督教徒的学校。他在1510年创办圣保罗学院，终于能够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与格罗辛和科利特相比，托马斯·利纳克尔（1460—1524年）成为鲜明的对照。尽管他与前两个人一样热衷于拉丁文法，但他的主要兴趣不在神学，而在医学。利纳克尔从牛津到意大利去研究医学和古典文学。在意大利的时候，凡是与他交往的人，对于他的希腊学识都有深刻的印象。利纳克尔用拉丁文翻译的普罗克洛斯的《天体论》，1497年由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出版社出版。但是，他的真正成就是对于希腊医师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他曾把加伦的几篇论文译成拉丁文。

格罗辛、科利特、利纳克尔以及他们的大部分人文主义朋友都是神职人员。而在当时的英国人文主义中成为最显著的人物的，却是一位世俗的人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在做学问方面，莫尔实际上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从来没有教过书，他的职业是律师，然而他具有超人的禀赋。他在红衣主教莫顿家的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很快从利纳克尔那里学会了希腊语。他用拉丁文翻译的琉善的作品和希腊文选，以及他对柏拉图的研究，都表明他研究希腊语言文化的深度。尽管如此，莫尔对于神学事物绝不是漠不关心的；例如，他坚决拥护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译本，并且当受到一些比较保守的经院学者的威胁时，他竭尽一切力量去支持牛津大学对希腊的研究。对于莫尔来说，正如对于科利特一样，总觉得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派最符合自己的心意。富有特征的是，他也是皮科的热烈拥护者，他曾把皮科的传记和一些书信译成铿锵有力的英国散文。这是他在当时无人与之匹敌的一个领域，正如他的拉丁文诗歌和散文是英国人文主义所产生的最上乘的作品一样。莫尔的《乌托邦》是一部迷人的并且往往被人误解的讲述世界上的生活道路的讽刺作品，正是在这部作品里，莫尔的人文主义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所写的这篇拉丁文散文妙趣横生，温文尔雅，文笔灵活，与所表达的真知灼见非常相称。

《乌托邦》一书表明：在莫尔的时代，一个英国人为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没有必要到意大利去留学了。其原因之一是：到了这个时候，由于英国宫廷中有几位有学问的意大利人，在伦敦就可以熏陶在意大利的文化气氛之中。对于这些学者来说，1509年亨利七世之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没有得到亨利八世的宠幸：桂冠诗人安德烈不得不销声匿迹；卡尔梅里亚诺的拉丁

文秘书职务则于1511年被另一个意大利人——安德烈亚·阿莫尼奥所代替，这个人除了正式工作而外，有时要写拉丁文的诗歌，并且频频与伊拉斯谟通信。在肯定由于统治者的更迭而受难的那些意大利人中，还包括波利多尔·维吉尔（约1470—1555年），他在亨利七世的鼓励下，约在1506年开始用拉丁文编写一部英国史，其目的是向欧洲说明都铎王朝的合法性。正是波利多尔把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广阔概念引入了英国，由于他刊印吉尔达斯的著作，也激起了研究英国古代文物的兴趣。不幸的是，他也招致了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仇恨，结果，他在1515年锒铛入狱，一直到1534年才得以出版他的《英国史》。

虽然在伦敦和各大学中都在进行着人文主义的活动，但是直到宗教改革运动为止，大学依然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营垒。牛津和剑桥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是在研究《圣经》时用推论法和探求寓意的方法呢，还是用新的批评方法并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但是在牛津又把这个争端缩小为在邓斯·司各脱及其所维护的一切与希腊语之间做出选择。旧派的神学家竟把希腊语看作是异端邪说的语言，1518年在牛津掀起了猛烈的反对行动；在剑桥，只是由于约翰·费希尔的巨大声望，才防止住一场类似的反动风潮。理查德·克罗克1518年在那里开始讲希腊语课。不过，在反动的经院哲学在大学里做最后挣扎的20年间，中学和大学教育也有一些重大的发展。科利特创办圣保罗学院，实际上是使文艺复兴的理想与基督教中世纪的理想做了成功的妥协。费希尔在剑桥的活动和理查德·福克斯在牛津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大学里的新的需要。费希尔所希望的是把剑桥提高到牛津的水平。由于得到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博福特，里士满和德比女伯爵，1443—1509年）的庇护，他能够劝说她在1505年创办基督学院，并使她在遗嘱中写明建立圣约翰学院。自从13世纪末就已经感到有必要成立三种语言的学校，在那里，为了促进神学的研究，应该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但是直到16世纪，这个工作丝毫也没有动手。费希尔通过设立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选修生奖学金的方式，极力促使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成为教授三种语言的学院。毫无疑问，这是费希尔的伟大成就之一。他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就是促使他的女庇护人在两个大学设立神学讲座。伊拉斯谟1511年至1514年来到剑桥讲学，很可能也是他的功劳。这件事对于该大学的人文主义的和《圣经》的学习，当然都是非常宝贵的。

几年以后，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1448？—1528年）在牛津仿效费希尔的榜样。他在1517年建立圣体学院，使牛津有了一个古典文学、特别是希腊语占据崇高地位的地方。给予神学以新的生命也是这里的最后目标。但有一点很重要：福克斯的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约翰·克莱蒙德是一位热心的古典学者。由他来领导这样一个学院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在这里，人们期待拉丁文讲师尽最大努力清除不规范的语言，神学讲师不是讲阿奎那或者邓斯·司各脱，而是讲述早期的基督教作家。

人文主义对于英格兰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扩展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威尔士和爱尔兰，1470—1520年，这两个地方的传统学术没有发生变化。在苏格兰，虽然15世纪在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和阿伯丁创办了3所大学，但学术和教育依然一成不变是中世纪的，直到宗教改革运动为止，大学里的各种课程也是如此。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从苏格兰到意大利的大学里留学的许多学生，还完全没有接受新的价值标准。唯一被人文主义迷住的苏格兰人是赫克脱·博伊斯（1465—1536年），他是伊拉斯谟在巴黎时的一位朋友，1527年出版了一部用拉丁文写作的、模仿李维著作的苏格兰史。不过，他在1505年当上了阿伯丁大学圣诞圣母学院（后改为国王学院）的院长，但是，尽管他有这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也没有能够对他的同胞产生任何直接影响。

在15世纪最后25年间，低地国家的文化出现一种颇为有趣的景象。有勃艮第大公和他们的哈布斯堡继承者的布鲁日宫廷的虚有其表、实际很肤浅的学术；有在“现代虔信派”的虔诚理想的鼓舞之下兴起的文化运动；最后，还有卢万的神学家们的传统的经院哲学。布鲁日宫廷的文化活动的最显著的表现，不在于模仿古典的样板，而在于显然从对神话的爱好出发，把古典作品一知半解地译成法文。有些古典著作的译本是很有名的，但是，那并不是把希腊作家的著作译成拉丁文，而是把拉丁文的本子译成法文。15世纪最后25年间在布鲁日出版的书籍，对当时流行的趣味提供了一幅可靠的画图，这种趣味在让·勒梅尔·德·贝尔热（约1473—1516年？）的胡诌八扯的和华而不实的文章中得到最典型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宫廷以外，文化空气的活跃是在教士中间，而不是在俗人中间；不过，这种活跃的空气不是来自经院哲学的研究，而是来自“现代虔信派”的严肃认真的虔

诚。“现代虔信”的两个分支（温德谢姆的奥古斯丁修会和共同生活弟兄会）的最终目标，就是他们要为宗教做出人文主义为学术所做出的事情。他们深受像圣伯尔纳和圣维克托派的作家之类神秘主义者的影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而提倡内心的反省，这在《效法基督》一书的字里行间得到最好的表现。

作为教育者来说，共同生活弟兄会会士是杰出的和成功的。到15世纪末，远至阿尔萨斯和德国南部都有他们的学校。实际上，他们的学校的功绩除了别的方面以外，还在于培养出北欧文化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库萨的尼古拉斯和伊拉斯谟等人。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校的伟大成就有着许多原因：他们有有效的组织和明智的教学大纲；他们开设宗教课；他们使学生一律住校；更重要的是，他们采用最新的教学方法。他们的学校最伟大的校长亚历山大·范·黑克，或称黑吉乌斯（1433—1498年）从1483年起在德文特教书，他十分相信希腊语的文化价值，相信人们希求在写作时以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作品为范本。共同生活弟兄会会士的文化活动并不止于教育，他们在写作宗教文字和传抄手稿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一旦有了印刷术，他们立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立即成立印刷所，但出版的不是关于经院派神学的论著，而是刊行适用于中小学教学的宗教课本、语法、古典的和人文的文章。如果看到低地国家与意大利之间的许多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那么，共同生活弟兄会对于人文主义著作的兴趣就肯定不足为奇了。在整个15世纪期间，佛兰德和尼德兰的学生们到意大利的主要大学去留学，其中包括鲁道夫·胡斯曼，别名阿格里科拉（1444—1485年），他的人文主义学问不但在本国、而且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都引起人们的惊叹。阿格里科拉的“雄辩”概念是从意大利人那里得来的，正是在意大利，他形成了自己优美的拉丁文风格，并且掌握了希腊语。在《辩证法的发现》中，阿格里科拉表现出运用修辞学的的能力，把新旧观点熔于一炉；而在《论学习热情的形成》中，他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常识的教育观念。阿格里科拉虽然倾向于人文主义，但他对于亚里士多德及其托马斯主义注释家们的尊敬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尽管如此，直到他去世时为止，他最主要的还是一位迷醉于人文主义的形式方面的、非常有才华的修辞学家。以阿格里科拉的出身来说，像他这样一个人所表现的对新价值观念的吸收，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例如，他的同胞甘斯福特的约翰·魏塞尔（约1420—1489年）在对唯名论者的“尊敬的元老”奥康姆的威廉效忠方

面，从来就没有畏缩不前过。虽然，他是从他的意大利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且还教授过这两种语言。但是，路德非常钦敬的这位清教徒却完全没有打上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佛罗伦萨和蓬波尼奥·莱托的罗马的烙印，他一直到死依然是一个受到神秘主义强烈感染的神学家，热衷于宗教改革和《圣经》知识的促进。

整个来说，“现代虔信派”的追随者对于传统的经院哲学是抱敌对态度的。在低地国家，卢万大学给经院哲学提供了一个根据地，这个大学为唯实论的神学家们所盘踞，最后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强大堡垒。约在1480年，人文主义修辞学家斯特凡诺·苏里戈内曾在卢万教学，他的讲课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弗洛伦茨（后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1523年卒）的活动却没有被人们忘记。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在学术方面的光辉经历，也说明在16世纪20年代，卢万还是怎样死死抱住旧的推论法不放。不过，即便在如此守旧的一个大学里，人文主义思想也并没有完全被忽视。大约在1515年，卢万开始有希腊语的印刷；并且，由于杰罗梅·布斯雷登的富有想象力的侠义行为，约于1517年在卢万创立了一个教授3种语言的学院，结果，从1518年起，这里就开始正式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了。正如所能预料到的一样，这种革新并不是没有遭人反对的。雅各布·拉脱姆斯（1475—1544年）和马丁·范·多普（又称多尔皮乌斯，1485—1525年）采取了坚决反对希腊语的立场，前者是既攻击路德又攻击伊拉斯谟的可怕的论战人物，后者主要以其对伊拉斯谟的敌对态度现在为人所知。另外，多尔皮乌斯的出名，还由于他曾在卢万的几次讲课中，对几个世代之前洛伦佐·瓦拉对经院哲学家的攻击做了回答；他认为福音书的希腊文本对于研究《圣经》是完全无用的，从他对《圣经》研究的新潮流抱有怀疑的态度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低地国家出生的古典学者当中，我们还应该提到克里斯托弗·德·隆格伊尔，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隆格里乌斯（1488—1522年）。他生于马林，在法国长大，但学术活动是在意大利展开的。在那里，他的才能和他对西塞罗的口才的坚决崇拜，使他很快成为一位最著名的西塞罗主义者。作为一个学者，隆格里乌斯既引起意大利人的嫉妒，也引起他们的羡慕；就连伊拉斯谟，尽管对西塞罗的雄辩抱着敌对态度，对隆格里乌斯的许多优秀品质也是称赞的。

伊拉斯谟（1466—1536年）应运而至，他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过，这位地地道道的国际学者永远没有完全摆脱掉他在成长期间的学习的一切烙印。他的以先进知识为上帝服务的愿望，他的使《圣经》去掉一切粗野内容而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热情，都表明他自始至终是“现代虔信派”的一个典型的追随者。不错，他不久就放弃了亚历山大·黑吉乌斯所坚持的许多观点，他对神秘主义也是漠不关心的，尽管如此，他强调回复《圣经》真面目的人文主义福音传道狂，以及他对路德派的宿命论所抱的敌对态度，肯定都会使他纳入“现代虔信派”的传统，正如他对经院哲学的厌烦也使他纳入这一传统一样。

伊拉斯谟学习希腊语以及接触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对他研究《圣经》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具有极大的好处。他对福音书原文的评注显然是以瓦拉在这方面的著作为基础的，而这一工作在他于1516年第一次刊印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瓦拉所著的《新约的全书集注》的第一版，是1505年由伊拉斯谟在巴黎刊印的）。伊拉斯谟对《圣经》文字的评注，是按照波利蒂安及其门徒所提出的刊印古典著作的方针进行的。伊拉斯谟也加入了波利蒂安所发动的反西塞罗主义的运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1528年在他的《西塞罗派》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这篇文章无情地揶揄那些崇拜西塞罗的人们。伊拉斯谟所写文字的总量大得惊人。他的大量著作中有对《圣经》的注释、从希腊文译出的作品、理论文章、论战文章，另外还刊印古典的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书籍。他的学问尽管十分渊博，但也有一定的限制。作为一个希腊文化研究者，他不曾注意荷马、索福克勒斯或者埃斯基罗斯，很可能是由于对于他来说，他们的著作太难懂了，而不是因为欧里庇得斯、利巴尼奥斯和琉善在实际上更合乎他的口味。在拉丁文方面，他对维吉尔并没有特殊印象，而他本人的诗也并不出色。从另一方面说，在伊拉斯谟的天赋中，不包括对于诗歌或文字的美的真实的感情。他对于古典作品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依然是中世纪的，特别是他认为古典作品归根结底就是伦理原则、醒世箴言以及美丽词句的汇集，并不把它们看作一个伟大文明的表现。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十分独到之处；他显然不喜欢抽象的思考，不过，他对重要的事物眼光极为敏锐，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他有写作说服性文章才能，这种文才使他的观点往往显得几乎难以批驳，因此，他能够克服上述的缺点。尽

管他的名字与任何伟大的运动或事件无关，但是，主要由于具有令人惊叹的丰富学识，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伊拉斯谟十分了解自己的力量，但他不像阿莱安德罗那样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也不像梅兰希顿那样成为宗教改革家，他宁愿保留私人学者的身份，主要从事刊印古代的著作。我们只要全盘考察一下伊拉斯谟的工作，就会十分清楚：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那些他对学术做出真正不朽贡献的作品。他的真正成就并不在于他的饶有趣味的拉丁文对话，也不在于《愚人颂》和他谈论教育和苦修的手册，而在于他作为一位原文书籍编辑人的工作。对于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批判研究，肯定是由他开始的；他把瓦拉对《新约圣经》的评论发展了一步，终于证明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绝不是没有错误。所有这种编辑和批评活动的一种有趣情况，就在于伊拉斯谟期望这种活动所得到的结果。他认为，一旦早期基督教作家，特别是《新约圣经》有了确切无误的定本，宗教的争论就必然会告结束，因为有了这种可靠的，不含有模糊字句和增添篡改之处的真本，就可能避免误解它们的真正意义。大概从《箴言集》中最能看出伊拉斯谟的天赋和学问，这是一部极好的古典佳句集，附有详细的注释，1500年第一次出版。特别是，这部书的每一页里都呈现出伊拉斯谟的真实面目，显露出他的勤勉刻苦，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博学多识，他的文化活动领域的异常广阔。

在15世纪后，意大利对于德意志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在本世纪文化史上的几位最杰出的人物，如库萨的尼古拉斯（约1401—1464年）、格雷戈尔·海姆贝格（1410—1472年）和阿尔布雷希特·冯·艾勃（1420—1475年），都曾在意大利留学，他们在那里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随着15世纪时间的前进，人文主义对于德意志学者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到15世纪末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有几个德意志学者已经采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他们的同行的方式方法了。印刷术是德意志人发明的，因此，毫不奇怪，这种技术最初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更快。从谷登堡时代到1520年期间，在德意志帝国各地区和瑞士出版的书籍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正如人们预料到的一样，这些书大部分的主题是有关传统学习、宗教礼仪或者专门业务的东西，但是，与这些书籍同时出现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古典文学和人文主义文献的出版物。实际上，到了16世纪初，已经有不止一家专门地，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地为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读者服务的出版社开业了。巴塞尔是一个主要例子，在那里，起初是阿莫巴

赫家族，随后是弗劳本出版社（伊拉斯谟自己的书在此出版），开创了与阿尔杜斯出版社在威尼斯所创立的传统极为相似的传统。也正是在15世纪最后25年期间，学校教育开始受到新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像鲁道夫·冯·朗根在蒙斯特所创办的学校，或者像路德维希·德林根贝格在施莱茨塔德所主管的学校等，虽然也是照旧注重共同生活弟兄会的教学中一贯采用的古代典籍，但是也显示出一种比过去更为自由的教育思想。在各大学里也可以见到这种有利于古典文学的态度。即便是德意志最古老的大学，也只是在14世纪下半叶才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它们的发展就极为迅速，以致到了15世纪初，维也纳、埃尔福特和海德尔堡都已经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了。人文主义在德意志大学里的抬头，起初没有遭到什么反对，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因为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斗争过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他们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致在某些大学，例如在海德尔堡和因戈尔施塔特，文艺学院竟然分裂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它自己的院长、教师和讲堂，一个部分遵循“古代道路”，亦即唯实论；另一部分则走“现代道路”，亦即唯名论。起初，神学家们并不反对人文主义者，确实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的研究对神学会有帮助。设置人文主义讲座所面临的真正困难是行政方面的，因为没有这笔经费，现存的课程表里已经没有地方再开设新的学科。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在不过分打乱课程表的情况下，适当地安排了人文主义题目的讲座，而为付给教师工资所需要的基金也已设法募集。因此，彼得·吕德尔能够在几家德意志大学里讲授拉丁诗人的作品，一直到他约在1474年逝世为止。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把人文主义的研究引进德意志大学的人当中，还有几个意大利的漫游学者，在15世纪期间，在整个欧洲经常可以遇到这一类人。其中之一，佛罗伦萨的修辞学家雅各布·普布里西奥在1467—1470年间，在埃尔福特、莱比锡、克拉科夫和巴塞尔的讲学很有些成绩。另一个是米兰人斯特凡诺·苏里戈内，他在斯特拉斯堡和科隆进行同样的活动。而钦齐奥·达·博尔戈·圣塞波尔克罗1487年在维也纳也曾活跃一时。但是，钦齐奥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与杰罗拉莫·巴尔博所扮演的角色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巴尔博毫无疑问是在德意志帝国各地区最有影响的意大利教师。甚至在最初的阶段里，德意志人本身就已经对学术的新概念做出极大的贡献，特别是那些在意大利留过学的人。除了其他方面而外，这些德意志学者有助于创造一种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著

作的兴趣，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菲奇诺、瓦拉和巴蒂斯塔·曼托瓦诺的著作显然是最受人欢迎的。另一位外国学者勒费弗尔·戴塔普的著作在德意志不但流行，而且很有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巴黎跟他念过书的比亚图斯·莱纳努斯，以及跟他有过交往的波廷戈尔、罗伊希林和阿莫巴赫家族。崇拜勒费弗尔的许多德意志人实际上采用了“复古派”的名称，因此，为了表示与奥康姆主义者对立而声称：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真正代表。

在像德意志学术界这样一个环境里，业余爱好者也能够发生巨大的影响。像彼得·朔特（1458—1490年）这样一个学者，他是斯特拉斯堡的教士，写过拉丁文的诗和一篇谈韵律的论文，就给自己的城镇树立了一个榜样。赫尔曼·舍德尔（1410—1485年）和哈特曼·舍德尔（1440—1514年）给纽伦堡的文化生活留下了一个标志。但是在这些业余爱好者中，出类拔萃、影响最大的要算历任斯彭海姆和维尔茨堡修道院长的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1462—1516年）。特里特米乌斯所写的东西，从神学到实际的虔行，从目录学到历史，范围极为广泛，篇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494年出版的《论传教士的著作》至今对于学者还是有用的。然而，他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对帝国各个角落的那些或是与他通信、或是与他结识的学者们所产生的强烈的影响。由于欧洲德语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结构，人文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地区的各个城镇同时繁荣起来。由于缺乏集中，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学者小集团，例如16世纪初期纽伦堡的以皮克海默为中心的小集团，或者斯特拉斯堡的以温普斐林为中心的小集团。另一个结果是成立了许多学会或学园，其中有几个是由于康拉德·采尔蒂斯（1459—1508年）的热情而存在的。采尔蒂斯所创立的学会之一是“莱茵文学会”。另一个是“多瑙学会”，这是1497年他应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请定居维也纳之后创办的，这个学社在采尔蒂斯的继承人约翰内斯·库斯皮尼亚努斯（1473—1529年）的领导下，继续欣欣向荣。库斯皮尼亚努斯是个考古学家，首创罗马编年史学的研究。当采尔蒂斯住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还劝请马克西米连一世建立了一个“诗学与数学学院”。皇帝于是派采尔蒂斯当院长，这个学院由于采尔蒂斯的热情而获得它的主要力量。所有这些学会主要是相互赞赏的团体，喜欢研究古代文物和用拉丁文赋诗。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当中，拉丁文诗作肯定是最普遍的活动。阿尔布雷希特·冯·艾勃和彼得·吕德尔最主要的是爱好诗学的修辞学家，温普斐林也是如

此，虽然他还有另外的爱好。采尔蒂斯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他的诗虽然平凡已极，却为他赢得了桂冠，1487年在纽伦堡，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赐给他“桂冠诗人”的称号。塞尔提斯和埃奥巴努斯·赫斯（1488—1540年）1517—1526年在埃尔福特讲授修辞学，他们的诗表明：德意志人文主义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哪怕是最上乘的作品，也还是多么平庸无奇。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拉丁文诗也是同样平庸，他最成功的作品《愚人船》是用德文写成的。

修辞和作诗可能是德意志人文主义最惹人瞩目的活动，但肯定不是它的最重要的活动。那些致力于编印古代典籍的学者们对于学术做出了更为坚实的贡献，即便说他们所做的许多订正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能够见到1472年出版的马尼利乌斯诗篇的初版，要感谢天文学家约翰·米勒（1436—1476年），他以雷乔蒙塔努斯的名字更为人所熟知。塞尔提斯在1489年编印了塞内卡的两部悲剧，在1500年编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库斯皮尼亚努斯编印了弗洛鲁斯和阿维亚努斯的著作；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则编印了维吉尔的诗篇。但是，德意志最重要的古典著作编印人是比亚图斯·莱纳努斯（1485—1547年），他的工作包括编印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的罗马史的初版，这部书是1515年他自己在穆尔巴赫发现的。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新的学术思想熏陶下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心：德意志历史有其自己的伟大之处，丝毫不次于古代的罗马。采尔蒂斯之刊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即中世纪的讲述德国光荣历史的书籍的编印，以及对德意志早期历史和古代文物的调查研究，均出自这种浪漫主义的想法。在中世纪的研究中，采尔蒂斯在1500年刊印了赫罗斯维塔的剧本，7年之后又刊印了西多会士君特的《利古里亚人》，因而表明他是这方面的先驱。在比昂多·弗拉维奥的插图本《意大利图册》的范例的鼓舞下，采尔蒂斯也计划出版《日耳曼尼亚图册》，以反映德意志的真实面貌。他只完成了一本《日耳曼尼亚概观》，系该书的一部分，于1500年出版。翌年，雅各布·温普斐林（1450—1528年）的《日耳曼尼亚》问世，其中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阿尔萨斯是德意志的领土，这个题目当然引起了很多的论战。温普斐林的《日耳曼史简编》于1505年出版，其中叙述德意志自远古以来的历史。此后，在1518年，弗兰西斯库斯·伊列尼库斯出版了德意志中世纪历史概要。但是，在同类书中，最好的是约翰·图尔迈尔（别名阿文提努斯，1477—1534年）所著的《巴伐利亚编年史》，这部书在德意志历

史编纂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明确的路标。引起人们对德意志历史发生兴趣的还有比亚图斯·莱纳努斯对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评论，1520年在巴塞尔出版。但是，在乌尔利希·冯·胡滕（1488—1523年）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拉丁文对话集《阿尔米纽斯》中，德意志历史才得到最充分的颂扬。《阿尔米纽斯》写于1520年，但到1528年才出版，这部作品把阿尔米纽斯写成一位民族英雄和日耳曼人在历代抵抗罗马的象征。

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有些德意志考古学家对碑铭学发生了兴趣，而且证明它是有点用处的。哈特曼·舍德尔搜集古典的和中世纪的铭文，他的大量收藏品现存慕尼黑；托马斯·沃尔夫（1457—1509年）也耽迷于同类的工作。康拉德·波廷戈尔（奥格斯堡人，1465—1547年）表明是当时德国最卓越的碑铭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收藏品包括钱币、徽章、雕刻、手稿，当然还有他从采尔蒂斯那里得来的著名的“波廷戈尔古地图”。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古物收藏家；除了编印一些古典的和中世纪初期的著作家们的作品外，他还在1505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在奥格斯堡主教管区发现的罗马铭文集。正如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波廷戈尔懂希腊文，对希伯来语很感兴趣，并且把他的研究扩大到中世纪的遗物。在15世纪期间，欧洲德语地区已经认识到希腊语的价值。不过，应该指出：在这些地区，研究希腊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圣经》和早期基督教作家取得较好的知识；显而易见，这是早期德国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发生密切联系的结果。在15世纪最后25年期间，阿格里科拉在海德堡，拜占庭的流亡学者安德罗尼库斯·坎托布拉卡斯在巴塞尔都曾教授一些希腊语，而罗伊希林即是后者的学生。稍后一个时期，约翰·库诺（1513年卒）也在巴塞尔教授过希腊语。在该城教授希腊语的另一位学者是约翰·奥科兰帕迪乌斯（1482—1531年），当伊拉斯谟编印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时候，他的帮助显然是极为宝贵的。同一时期，在科隆和莱比锡，由于一个英国人理查德·克罗克（约1489—1558年）的教授，希腊语的学习取得一些显著的进展；克罗克原是阿莱安德罗的学生，他一直讲课到1517年回国为止。但是在他走后，又在1518年找到一个继承他的人，即彼得·莫塞拉努斯，这个人使克罗克所开创的传统在莱比锡继续了下去。同一年里，梅兰希顿（1497—1560年）在维滕贝格进行第一次讲课时，就强调指出古典语言，特别是希腊语的重要性，并且出版了一部希腊语法手册。虽然到了1520年，希腊语被公认为大

学课程已经有了一个时期，但是，除了到国外留学，德意志人在16世纪以前想要掌握这种语言的知识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库萨的尼古拉斯、雷乔蒙塔努斯、彼得·朔特、约翰·库诺和比亚图斯·莱纳努斯都是在德意志以外学的希腊语，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是在巴黎乔治·赫尔蒙尼莫斯的门下开始学习希腊语的；而罗伊希林，除了受教于坎托布拉卡斯和赫尔蒙尼莫斯而外，还留学意大利，在阿尔吉罗普洛斯和查尔科孔迪拉斯的课堂里待过一个时期。罗伊希林在1488年所译的普罗克鲁斯的拉丁文的布道词，表明他早年已经精通希腊语；他在反对伊拉斯谟在希腊语音方面的观点、而捍卫希腊语的传统读音方法的小册子中，特别显示出他后来在这一领域里的渊博知识。比亚图斯·莱纳努斯在他所译的纳西昂的圣格雷高里的两篇布道词中，也表现了他充分地掌握了希腊语，除此而外，他还不时地用希腊语写信，他在信中所用的希腊语要比采尔蒂斯在那些可怜的讽刺诗中所用的希腊语高明得多，虽然后者在讽刺诗中，本来是扬扬得意地要夸耀他的希腊语学识水平的。

由于研究神学，对希伯来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采尔蒂斯、特里谢米乌斯和波廷戈尔肯定爱上了这种语言。但是，正是约翰·罗伊希林（1455—1522年）成为同时是了不起的希伯来语学家的第一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罗伊希林对于希伯来语具有极大的热情。他是在1493年左右，在雅各布·耶希尔·劳安斯的帮助下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的。罗伊希林之所以要学习希伯来语，是由于他想要通过原文研究《旧约圣经》，并且像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他之前做过的那样，去掌握犹太神秘主义的文学。1517年出版的《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就是此种研究的成果之一；另外一些成果是他在1506年和1518年所发表的关于希伯来语语法的著作。在那个时候，希伯来语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也得到另外一些非犹太籍的热心家，其中包括自修这种语言的康拉德·佩立坎（1478—1556年）和伊拉斯谟的朋友、在巴塞爾的合作者奥科兰帕迪乌斯。罗伊希林的名字跟关于希伯来语书籍的争论是一直联系在一起的，这场争论终于变成了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斗争。他对科隆多明我会士（他们在1509年弄到了禁止希伯来语书籍的教令）的战斗，导致德意志的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之间的永久分裂。这时，罗赫林的支持者不仅猛烈攻击科隆的反动的托马斯主义，而且狠狠批判其他的神学思想的表现。他们认为关于希伯来语书籍的禁令是对人文主义价值本身的一种威胁。《无名人物的书信》是人文

主义者的感情的最明显的表现，它无情地嘲讽了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这些虚构的书信把矛头指向他们的方法，最终目的则在于打击经院哲学的真正核心。对希伯来语书籍的查禁好像一个火花，它加速了一场无论如何也要发生的危机的来临。到了16世纪20年代，德国的世俗文化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再也不能够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家的学术妥协了。这时的倾向不再是把人文科学纳入神学的轨道，而是恰恰相反。这一点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站在宗教改革运动的一边。

在德意志，到了15世纪末，人文主义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甚至一直到1520年，还没有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这在挪威和冰岛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瑞典和丹麦，当我们考虑到它们与欧洲其他部分有许多贸易往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了。在1477年西克斯特四世下令批准在乌普萨拉建立一所大学之前，瑞典是不曾有过大学的。乌普萨拉大学创立后立即开始讲授文艺和神学，但是那里的教学严格遵循中世纪的体系。瑞典早期的印刷所在1478年开始印书，从1478年至1520年之间所刊印的书籍可以说明这个国家在学习方面的保守性质。丹麦的情况也是一样。1478年在哥本哈根建立的大学几乎并不比乌普萨拉的大学更为进步，而丹麦在1482年至1520年间所印刷的书籍的实际证据表明：该国对知识的兴趣，其范围也不比瑞典广阔。只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新学术才渗入斯堪的纳维亚。

在1470—1520年这半个世纪期间，西班牙的飞速发展也在知识领域中反映了出来。1470年以后不久，在西班牙就已经显然可见对于人文科学的新的兴趣了，这主要是来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影响的结果。西班牙所有的早期伟大人文主义者，其中包括内布里哈和埃尔南·努涅斯，都上过意大利的大学，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热心传播，新的价值标准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建立起来。在15世纪最后25年期间，到西班牙来进行教学的那些意大利学者所起的作用，与上述的学者们所做的努力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意大利学者中，第一个是蓬波尼奥·曼托瓦诺，他在1473年就已经在萨拉曼卡讲授拉丁诗人的作品了。蓬波尼奥·莱托以前的两个学生：1484年到达西班牙的卢乔·马里内奥·西库洛（约1446—约1533年）和大约3年以后到达那里的彼得罗·马尔蒂雷·丹吉拉（1459—1526年），对西班牙的学术做出了更重要的贡

献。马里内奥和马尔蒂雷两个作为人文科学的教师，都表明是无价之宝。不过，他们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在历史领域里，因为马里内奥在1495年所出版的《论受人称赞的西班牙》中就已经表现出他对于西班牙古代文物的兴趣，他还根据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写作了聘请他的国王的传记。而彼得罗·马尔蒂雷则以他的《新世界的几十年》变成了记述新世界和哥伦布的成就的历史学家。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宫廷里，以及在萨拉曼卡，人们对人文主义的兴趣十分浓厚，这必然对学校的教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宫廷附设的学校里特别明显，在那里，为了提高王室成员的文化水平，特别任命意大利的学者们去当教师。例如，安东尼奥·杰拉尔迪尼一直到他在1488年逝世为止，始终给一位公主做导师。马里内奥和马尔蒂雷也在这个宫廷学校的教师的队伍里。在亨利四世（1454—1474年在位）治下，由阿隆索·埃尔南德斯·德·帕伦西亚（约1423—1492年）任拉丁文秘书，这是一个在意大利培养起来的学者，他在那里吸收了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而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治下，这个职位由彼得罗·马尔蒂雷担当了一个时期。这是官方欣赏优美的拉丁文的又一个标志。在宫廷里大张旗鼓地进行的人文主义教学，也扩展到了当时在整个王国中最重要的萨拉曼卡大学。在1484年，也就是说在蓬波尼奥·曼托瓦诺已经在萨拉曼卡讲授拉丁诗人课程的11年之后，马里内奥·西库洛也在那里讲授同样的课程，而彼得罗·马尔蒂雷则是从1488年开始的。这种人文主义的课程绝不是意大利人包办的。当时西班牙第一流的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在该大学占有一个语法的讲席；而到15世纪即将结束时，波利蒂安过去在佛罗伦萨教过的一个学生、葡萄牙人阿里亚斯·巴尔沃萨在大学里讲授希腊语。在萨拉曼卡，托马斯的神学占有崇高的地位，那里不容许像司各脱主义和奥康姆主义之类的敌对学说存在。由于反对萨拉曼卡的旧式的保守主义而产生的一个行动，就是托莱多大主教和西班牙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1437—1517年）于1508年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创办了一所大学。他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要给“新学术”在西班牙找一个容身之地，而是要为基督教教义和邓斯·司各脱的哲学建立一个组织。但是，由于创办人的思想进步的结果，它不久就成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西班牙的大本营。在阿尔卡拉开办司各脱主义和唯名论的课程，毫无疑问是一个显著的革新。然而，除此而外，希门尼斯为了增进关于《圣经》的知识，还设置了希腊语

和东方语言的课程。另外，这位创办人还把16世纪初期西班牙一些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聘请到阿尔卡拉来教学。如果把上述事实加在一起，我们就几乎无法怀疑他的意图的根本性质了。

从迄至1520年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出版的一些书籍的性质来看，也能进一步证明这个王国是热衷于人文主义的。这些书籍包括几本拉丁文古典著作（最初一本是1475年出版的萨卢斯特的作品）的原本，以及从意大利传来的几篇人文主义的文章。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之间所刊印的语法书籍的数量也是同样重要的，这表明自从伊比利亚半岛引进印刷术以来，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在不断增长。语法教学的主要革新来自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他在意大利得到瓦拉的真传，自从1473年回国以后，就对粗劣庸俗的拉丁语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内布里哈的《拉丁语入门》很快就在中学和大学里代替了旧式的拉丁语法。像他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是绝无仅有，因为安德列亚斯·古铁雷斯在1485年出版了他的《语法》，胡安·德·帕斯特拉尼亚在1492年出版了他的风行一时的《语法纲要》。大约在同一年，内布里哈的以及阿隆索·埃尔南德斯·德·帕伦西亚的拉丁—卡斯蒂利亚文词典相继问世。随后，马埃塞·罗德里戈·德·圣埃利亚（1444—1509年）的《基督教义词汇》也在1499年出版了，这部语汇的目的在于向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解释基督教会的专门术语。

埃利奥·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1444—1522年）在西班牙人文主义的早期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意大利留学10年，不但精通各种人文科学，而且决心把意大利的文化财富介绍到本国来。他依靠教学、写作以及个人的影响，完成了自己的志愿。作为一位学者来说，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除了编纂语法和辞典而外，他还编印和评注一些拉丁文古典作品。他是确定希腊语读音准则的第一位文艺复兴学者。他对西班牙古代文物和古代地理学家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并且很喜欢希伯来语。他的历史著作《新世界的几十年》是用人文主义的传统所规定的方式叙述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时代（迄1485年）的各种事件，这部书表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任命他为王家史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最热心研究的是《圣经》。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即认为：只有以批评的眼光检查最古老的手稿，同时对拉丁文《圣经》的一些段落进行刨根问底的批评性的检查，才能确定真正的拉丁文《圣经》。对于萨拉曼卡的神学者来说，这种对待

圣书的态度显然是太革命了；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多年之后，内布里哈终于在1512年左右被迫离开了他的讲席。他马上得到希门尼斯的解救，希门尼斯聘请他到阿尔卡拉讲学，在那里，他除了讲授古典作品而外，还参加编撰《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的希腊语部分。

在15世纪最后几年，阿里亚斯·巴尔沃萨就已经在萨拉曼卡大学开始讲授希腊语研究的课程，他最优秀的学生埃尔南·努涅斯（1471—1522年）后来成为西班牙那一时代最杰出的希腊语学家。西班牙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希腊语学者有费尔南多·德·科尔多瓦（1425—1486年），他主要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柏拉图的学说调和一致；还有马埃塞·罗德里戈·德·圣埃利亚，他把圣瓦西里的一封信和罗马皇帝尤里安的一封信译成拉丁文和西班牙文。这两篇译文印在他的《基督教义词汇》第一版的最后，很可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西班牙人从希腊语翻译的最初的文件。在西班牙这些早期的希腊语研究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希腊语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古典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它是《新约圣经》和许多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的语言。这实际上也正是希门尼斯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希腊语的知识，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好的神学家。当然，他急切想使阿尔卡拉成为西班牙希腊语研究的主要中心，便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于是，克里特岛人德梅特里乌斯·杜卡斯从1512年到1518年在阿尔卡拉担任希腊语讲座，这个讲座于1519年由埃尔南·努涅斯接替。杜卡斯在阿尔卡拉的活动包括在1514年出版两部供学生使用的希腊语作品，一是拉斯卡里斯的语法，一是穆萨耶乌斯咏海洛和利安得的诗篇。这两部作品合成一卷，于1514年在阿尔卡拉出版。后来，埃尔南·努涅斯仿效这个榜样，他在任教的第一年就在阿尔卡拉刊印两篇希腊语的短文，在每行原文下面印上拉丁文的译文。大约在同一时期，希门尼斯的秘书胡安·德·贝尔加拉忙于把亚里士多德的3篇文章翻译成拉丁文。但是，阿尔卡拉的希腊语学家们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共同编印的希腊语版的《新约圣经》，这个版本在1514年就已经付印，也就是说，比伊拉斯谟在巴塞尔出版的那个原本要早两年左右。

在阿尔卡拉，由于热心研究《圣经》，也学习《圣经》的另外两种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阿方索·德·萨莫拉在1512年已经在那里教希伯来语了。他和另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同胞巴勃罗·德·科罗内尔也都参加了《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希

伯来文和阿拉米文部分的编纂工作。这种《圣经》之所以称为“康普鲁顿”本，是因为阿尔卡拉的拉丁文名称叫康普鲁顿。这是在希门尼斯的热情鼓舞之下，并且由他解囊出资所完成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1502年，希门尼斯就开始采取措施，不但要出版拉丁文的《圣经》，而且要出版使用原来各种文字的全本《圣经》。在阿尔卡拉创立大学以后不久，他就在大学里聚集一群著名的学者，委托他们担任这个冒险事业的编辑工作，甚至找来了一个排印现成各卷的工人。第一部分包括《新约》，在1514年就已经付排，虽然没有出版。一年之后，又发排一部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词典。此后，在1517年后又发排了四卷，包括《旧约》。可惜希门尼斯命中注定，永远也看不到这部堂皇巨著的问世，因为他在1517年溘然长逝，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直到1520年才终于批准它的出版。

毫无疑问，《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是西班牙早期人文主义的最伟大的成就。希门尼斯的另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既用原文，又用超过过去所有版本的新的拉丁文译文。当胡安·德·贝尔加拉还只把亚里士多德的3部著作译成拉丁文的时候，由于红衣主教的逝世，这个工作就被打断了。希门尼斯在逝世前不久邀请伊拉斯谟到西班牙来，这番努力也同样没有成功。当时，伊拉斯谟在那个国家的影响已经非常强烈。他不但没有前来，在1520年反倒成了迭戈·洛佩斯·苏尼加的一场攻击的目标。这个人虽然参加《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并没有阻止他怀着敌意疯狂地反对伊拉斯谟（在他所著《雅各比·洛皮迪斯·司徒尼卡耶反伊拉斯谟的注解》中，阿尔卡拉，1520年版）和勒费弗尔·戴塔普（在《雅各比·洛皮迪斯·司徒尼卡耶反雅各布·法布鲁·斯塔普伦斯的注解》中，阿尔卡拉，1519年版）两人。这种敌对行动主要是由害怕他们两人的观点引起的。

基督教人文主义虽然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引起如此巨大的兴趣和争论，但在阿拉贡的反映就少得多了。尽管阿拉贡与意大利南部以及年卡立克斯特三世（1455—1458年）和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两位原姓博尔贾的教皇治下的罗马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整个15世纪，这里的教育依然完全是中世纪的。不过，赫罗尼莫·阿米盖特在1502年出版《同义词》，1514年在巴塞罗那出版《语法入门》，他的行动表明：在卡斯蒂利亚已经风行一时的拉丁语法，到16世纪初，在

阿拉贡是怎样流行的。另一方面，这里所没有找到的是像内布里哈或埃尔南·努涅斯那样的学者。在阿拉贡，“新学术”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赫罗纳主教、红衣主教霍安·马加里特·伊·帕乌（1484年卒），他原来是个外交家，也写关于政治和伦理哲学的文章。不过，在他所著的《西班牙史补编》中无可否认地存在着人文主义的影响。从这部历史书中显然可以看出，它的著者在极力遵从15世纪初期列奥纳尔多·布鲁尼首先提出的人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概念。同时，这部书也在表明，著者对待西班牙古代文明的态度与内布里哈所持的态度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红衣主教的侄子杰罗尼·伊·帕乌，也像其叔一样对人文主义的学术心向往之，他除了精通希腊语和用拉丁文写一篇关于西班牙河山的论文（显然受到薄伽丘的《地理志》的启发）而外，还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出任罗马教廷的图书馆长。1500年在巴伦西亚创办大学的目的在于促进人文主义的研究，这从大学创办命令中所列的条件可以看得很清楚。命令中规定：既要设各种传统的学科，又要教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即便如此规定，也未能像在萨拉曼卡，特别是像在阿尔卡拉那样成功地掀起研究人文科学的普遍的热潮。

葡萄牙当时的文化动态与阿拉贡的文化情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那里，在15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已经与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建立了一些联系。佛罗伦萨的修辞学家雅各布·普布里西奥在1465年至1480年期间漫游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葡萄牙教过书。后来，波利蒂安曾经与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1481—1495年在位）通信，他的学生中有阿里亚斯·巴尔沃萨，这个人在萨拉曼卡大学成为第一位希腊语教师。过去在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的卡塔尔多·帕里济奥，一直到1495年国王约翰二世召他入宫的时候为止，曾经在科英布拉教学。1502年在科英布拉出版的卢多维科·特谢拉对约翰二世所作的拉丁文演说，其观点已经完全是人文主义的了。1505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埃斯特万·卡维列罗的《韵律学》也是如此。4年以后，在该城又出现了帕斯特拉尼亚所著的一部拉丁语法。尽管如此，如果说到了1520年，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葡萄牙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那将是夸大其词了。直到1520年为止，学术和教育离开旧标准的程度还是微乎其微；只有在下一个10年期间，葡萄牙才能够产生像达米亚奥·德·戈伊斯这样一位誉满欧洲的学者。

回顾一下从1470年到1520年之间的西欧文化，就可以看出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文主义是怎样逐渐成为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人文主义打进经院哲学的阵营，从而变成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它在文艺复兴的漂亮外衣里面，依然保持着中世纪各学派的许多传统的形态。如果说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基本上是世俗的，而在西欧的其他国家里，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我们就不能说情况也是如此。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所存在的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吸收和改造人文科学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则是增进神学的和《圣经》的知识。像法国的比代或者英国的利纳克尔一类的学者，肯定不是他们的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毋宁说，还是在科利特、勒费弗尔·戴塔普、比亚图斯·莱纳努斯和内布里哈的身上，更能看出他们各自的国家对待人文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如果说在实际上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意大利以外的人文主义各种思潮和理想的化身，那就是伊拉斯谟。在他身上，北方的人文主义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在被正确地称为伊拉斯谟时代期间，西欧的人文主义已经成功地使意大利人的过分偏重修辞与北方宗教信仰的狭隘视野调和到一起。宗教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既使人文主义达到鼎盛，又把人文主义破坏无遗。尽管在宗教改革运动过去以后，学者们和神学家们依然继续发展人文科学，但是，古典文物越来越不令人感到是一种活的东西和灵感的真正来源了。西欧宗教统一结束之日，亦即人文主义告终之时。

[1] 巴黎大学前身。——译者

第六章 西欧的文艺

一 在意大利

本章所讲意大利文艺的时期，通常叫作“盛期文艺复兴”。在15世纪的过程中，一系列“早期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主要是佛罗伦萨人），既专心从理论上、也注意从视觉上去征服大自然。他们的工作形成一种理想主义的伟大风格的基础，这种风格约从1490年起开始产生，而在1520年拉斐尔逝世时将近结束。它在1500年到1510年的10年期间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乔尔乔涅和提香的名字标志着它的顶峰。而在这些明星周围，还旋转着千千万万颗具有相当亮度的较小的繁星。现代的理论家们十分精辟地分析了这种风格的真正优美的性质，它像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希腊艺术一样，无论在精神上或形式上，都具有一种在古典时期以后的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庄严、和谐和匀称。对于这种现象，记述它要比解释它容易一些。同时，在这里也不能够作出一种解释。不过，老一代的著作家们主要地、而且过于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古代泛神教艺术的复活，而晚近的研究则是通过考察其创造者的意图，开始揭示风格的复杂性。我们在下文里遵循这样一种探索的方针，至于对风格的品评、人物传记的细节以及年表之类，就一概从略了。

文艺复兴的建筑艺术，一般被描述为古代建筑艺术的再生。这种说法从当时的建筑师本人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证实，他们全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在一个很长的衰落时期之后，正在返回“古代的建筑方式”。但是，如果你把一座古罗马的神庙跟最优秀的、正中式结构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堂（例如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所做的设计（1505年），大概也是由他设计的托迪的圣玛利亚·德拉·孔索拉齐奥内教堂（1508年动工），或者由安东尼奥·达·桑加洛设计的蒙特普尔齐亚诺的圣比亚焦圣母教堂（1518年动工））来加以比较，那么，要发现这两种建筑物之间的共同之处，就需要有牵强附会的真实本领了。不错，在15世纪期间，哥特结构体系已被一种源出古典建筑艺术形式

的“语言”所代替，我们仅仅举出5种古典的柱式、罗马式的拱形圆屋顶和带镶嵌的天花板，以及令人回想古代的花卉和动物图案的装饰，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必须使这些装饰部件适应于古典文化所不曾遇到的建筑任务；在设计教堂或者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的平面图和立面图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不作相当改变就能够使用的古典模型。另外，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们随心所欲地重新解释古典的法式。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用古典式的壁柱来加强表现曼图亚的圣安德列亚教堂（1470—1493年）的墙面的虚实交替的节奏，而这样的极端非罗马处理手法，后来布拉曼特在梵蒂冈建筑上采用了，就成为文艺复兴建筑进程中最重要表现方式。

而且，文艺复兴建筑的重要装饰是取自古代希腊、罗马后期、中世纪的和拜占庭的。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中第一次采用的柱拱，后来，在比亚焦·罗塞蒂设计的弗拉拉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1494—1516年）中，在阿莱西奥·特拉梅利奥设计的皮亚琴察的圣西斯托教堂（1499—1511年）中，以及其他许多教堂中，在庭院和柱廊中，也都可以见到；这种柱拱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早期基督教长方平面大教堂，而长方平面大教堂则是依照古典后期建筑物营造的。具有圆筒形外观的正中式结构的教堂，周边围有一圈柱廊。这是意大利北部很普遍的一种样式（最著名的是乔万尼·迪·多梅尼科·巴塔吉奥的十字架圣玛利亚教堂，在克雷马，1490—1500年），它继承着中世纪洗礼所（12世纪帕尔马洗礼所）的传统。遵循同一传统，伦巴第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同样地在穹顶外围圆筒体四周整齐地排列了一排柱子，使人联想起罗马式建筑风格。布拉曼特在米兰营造的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隐修院的穹顶（1492年动工）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典范。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佛罗伦萨殿堂立面处理无非是中古时期石砌墙面加以规格化的一种处理而已。固然这一开端可以追溯到阿尔贝蒂在佛罗伦萨的卢切莱府邸（1446年），新的和更古典式的殿堂风格在逐渐发展起来，但是，简朴的中古石砌墙面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消踪灭迹：本内代托·达·马亚诺的斯特罗吉宫（在佛罗伦萨，1489—1536年）、朱利亚诺·达·圣加洛的贡迪府邸（也在佛罗伦萨，1490—1494年）、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府邸（1469—1509年）、比亚焦·罗塞蒂的迪亚曼蒂府邸（在弗拉拉，1492—1493年）以及其他许多殿堂，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威尼斯，传统式的中古宫殿立面加上古典式表面装饰而现代化了，毛罗·孔杜奇的科诺一斯皮内利府

邸（1500年以前）和曼佐尼—安加兰府邸（1500年以后）就是很好的例子。

高高的穹顶连同圆筒体（也有不带圆筒体的）坐在穹隅上，从而使正方形的十字交叉过渡到上部的圆形穹顶，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重要的穹顶做法，它的起源是在拜占庭时期。它是经由威尼斯（圣马可教堂，11世纪）传入意大利的。因此，这一风格到了米开朗琪罗的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达到最高峰，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最漂亮的穹顶，追本溯源，是来自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来自罗马。有一种希腊十字形教堂平面，也是起源于拜占庭：在正中央是一个主穹顶，架在很高的柱墩上面，东西南北各伸出一个短臂，并各设一个卫星式穹顶以抵消主穹顶下向的推力。毛罗·孔杜奇在威尼斯的圣乔万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1497—1504年）使这种样式复活了，而在乔治·斯帕文托的杰作威尼斯圣萨尔瓦托雷教堂（1506—1534年）中，又把3个这样的希腊十字平面连接起来，使之变成一个纵长的平面设计。布拉曼特在他为圣彼得教堂的设计中，把拜占庭的希腊十字平面与源出米兰的6世纪的圣洛伦佐教堂的粗大柱墩结合起来。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家们所研究的罗马建筑的遗迹，它们的颜色都是单一的。布鲁内莱斯基遵循佛罗伦萨的哥特式建筑的习惯（新圣玛利亚教堂、圣十字教堂），在他的建筑物中把颜色分开：结构部分的石料采用深色，而墙面用浅色；在这方面，有无数的文艺复兴建筑家学习他。

如果说，从起源方面来讲，文艺复兴的建筑艺术结合了古代的、早期基督教的、中世纪的和拜占庭的因素，如果说，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建筑物与古罗马的建筑很少有相似之处，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家们依然能够正确地声称他们复活了古代的建筑式样。文艺复兴建筑艺术，正如古代建筑艺术一样，甚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模拟人形的，或者，更可以说是依据了人体测量学的。我们之所以说是模拟人形的，是由于这些建筑家们按照新的有机自然观点进行思考，他们主张说：一个建筑物的各部分必须像人体的各器官一样，既相互依赖，又联合成为整体。我们之所以说是依据了人体测量学的，是因为他们的兴趣集中于人的身体的长短大小的比例关系。《圣经》教导他们：人是根据神的意志，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新柏拉图主义又教导他们：人体中的完美的比例则反映出某种宇宙的和谐。因此，应该把人体的比例作为人工建筑物的标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隐喻。古

典的柱子很清楚地区分为柱基、柱身、柱顶和顶盘四个部分，它适合于用人体来说明：现在残存的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师的图样表明他们用测量人体的方法来画柱式已经深入到怎样的程度。大概这样讲是正确的：在文艺复兴的建筑艺术中，各种柱式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由于想用它们作为结构的要素，而是由于它们在建筑物的度量结构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筑家们用圆柱或方柱的直径作为测量一个建筑物长、宽、高各个方面的尺寸的标准（“度”），并按这个标准进行乘和除，以此来把一个建筑物的所有细部以及一个建筑群的所有建筑物都结合成在度量上互相关联的有机体。他们的主要成就就在这里。而且，他们是在古代建筑艺术中，而不是在任何古典以后的风格中，找到这种把所有的组成部分在度量上结合为一体（正如手指和脚趾、脚和手在人体中一样）的“人文主义”原则。

维特鲁威的著作，唯一现存的古代论建筑的论文，包含有他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他们在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个最普遍的原则，即美就在于把所有各个部分的大小和形体密切相互配合，使其达到不能增减一分、否则就会破坏整体的和谐。阿尔贝蒂首先复述了这个原则，后来又有其他人重复过上百遍。他们还见到这部著作在详细讨论柱式和它们的比例，建筑艺术的度和模拟人体的性质。另外，维特鲁威还论证说：一个体态匀称的人伸出臂和腿，会形成一个方形和圆形。建筑家们以此作为人的小天地与宇宙大天地在数学上一致的证据。他们遵循古老的传统，认为既没有开端又没有终点的圆形是上帝的象征；而且得出结论说：上面冠以圆顶的正中式结构的教堂保证了人与上帝最充分的结合。再者，在这些人看来，正中式建筑的教堂在度量上的完美就是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在地球上的最恰当的体现。在这种教堂中，达到了完全的谐调、匀称和一致。无怪乎自从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营造安杰利圣母教堂（1434年）以来，正中式建筑的教堂竟像雨后春笋一般建立了起来，以致在1500年的前后各10年间，就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这样匀称美观的大建筑物开始动工。无怪乎布拉曼特把基督教最宏伟的教堂——新建的圣彼得教堂设计成一座正中式建筑物，上面冠以雄伟的穹顶。当布拉曼特的圣彼得教堂的设计只实现一小部分，而达·芬奇热心研究正中式建筑的教堂还停留在纸上的时候，像朱里亚诺·达·圣加洛设计的普拉托的卡尔切里圣玛利亚教堂（1485—1491年）、布拉曼特设计的罗马的坦庇埃脱小礼拜堂（1502年）、托迪的玛利亚·德拉·孔索齐奥内教堂（1508年）、拉斐尔设计的罗

马的圣埃利焦·德利·奥雷菲奇教堂（1509年）和扎卡尼设计的帕尔马的斯特卡塔圣母教堂（1521—1539年）等十分完美的创造物，都实现了“盛期文艺复兴”的期望。

在15世纪中，维特鲁威的影响增长得很快，到了1500年，熟读和解释他的著作已经变成每一个建筑家不可违抗的义务了。如下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拉斐尔同安东尼奥·达·圣加洛一样，编印他的著作的意大利文版；在1515年逝世之前不久参加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乔孔多修士，曾于1511年出版了第一个拉丁文的插图本；10年以后，切萨里亚诺的富丽堂皇的版本问世了，这个版本反映出布拉曼特和达·芬奇是如何专心研究那位古代著作家的。在研究维特鲁威的同时，还按部就班地测量古代建筑的遗迹和复制它的原图。在16世纪初期，随着巴尔达萨雷·佩鲁齐的大部头图案集的出版和拉斐尔在1515年被任命为罗马古代文物保管主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这些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不单纯属于好古的性质：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家们从测量人体的经验方法中归纳出具有理想的比例的人体一样，测量和比较古代的建筑艺术已经成为人所公认的把最适当的比例与最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方法了。建筑家们还把古代的遗迹当作可以看到的罗马的“成就”的证据，这种成就曾经使罗马称霸全世界；在复制古代遗迹的原图的时候，他们完成了一种几乎像奇迹一般的识别的工作，希望通过这一工作重获一些昔日的伟大的东西。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年）是建筑艺术中的新风格的始祖。当他和比他年轻一些的同代人（最主要是米凯洛佐和阿尔贝蒂）开始把佛罗伦萨转变成一个文艺复兴的城市的时候，意大利的其余部分依然是哥特式的。佛罗伦萨的建筑家、画家和雕刻家们传播新的福音。但是，在佛罗伦萨以外，新风格被吸收得很慢，而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直到15世纪下半叶，它才取得完全的胜利。各地区依然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威尼斯喜欢色彩鲜艳的表面装饰，而伦巴第则喜欢深色砖和陶砖的细部。15世纪末，整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建筑艺术是多种多样的，这只要比较一下下列的不同建筑物，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如佛罗伦萨的朴实无华的斯特罗齐府邸（1489年）；罗马的精致高雅的高等法院（1486—1498年）和吉罗府邸（1496年），它们把粗犷的石砌墙面与柱式结合到一起；例如，孔杜奇在威尼斯营造的圣马可学院（1485年）的轻松而优美的立面以及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

隐修院的过分雕琢和过多装饰的立面（15世纪90年代）。尽管有如此的差异，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是以人体测量学为依据设计出来的。

当布拉曼特（1444—1514年）于1499年从米兰来到罗马定居的时候，这个既没有自己的艺术家，作为艺术中心又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竟一跃而起，上升到此后维持繁荣达200来年之久的显著地位。艺术和文化的领导权从佛罗伦萨永久地转移到了罗马。很难说明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罗马教廷权势的增大和朱理亚二世个性的刚强，另一方面也由于布拉曼特的卓越天才以及因重建圣彼得教堂而提出的独一无二和令人激动的任务。在布拉曼特的指引下，文艺复兴建筑艺术进入了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新阶段：“盛期文艺复兴”的“宏伟风格”获得了它自己应有的地位。由于不断加强研究维特鲁威的著作，又有古代遗迹赫然呈现在眼前，建筑家们就更坚决地吸收古典建筑的技法，并把它形成固定的程式。紧跟着布拉曼特，在罗马给予这种风格以永久性质的是乔孔多修士、佩鲁齐、拉斐尔、朱里亚诺和安东尼奥·达·圣加洛。

虽然地区的差异永远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在这时候，由于影响很大的罗马古典主义的确立，这些差异就被一种意大利共同风格所代替了。布拉曼特设计的卡普里尼宫和拉斐尔设计的维多尼—卡法雷利宫（1525年）首层立面都用粗犷的石砌墙面，而在主层使用紧密排列的双柱，这是把合理、简洁和宏伟3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处理方法。这种新的式样由圣索维诺、圣米凯利、帕拉迪奥以及其他一些人发扬光大和加以改进，它不仅在整个16世纪在意大利各城镇留下自己的标志，而且一直到进入19世纪还在欧洲的建筑物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非常关注府邸的内部结构，房间的布置、大小、比例和装饰。有些人企图按维特鲁威所叙述的古代住宅设想出一种绝对齐整的平面，但那只能是纸面上的理论性探讨。斯特洛齐府邸和拉斐尔未完成的在罗马近郊的马达马别墅的对称图形毋宁算作例外。一直到文艺复兴后期（1550年以后），对称的设计才成为常规（帕拉迪奥）。

文艺复兴时的别墅是中世纪期间所不知道的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在古典城郊别墅遗址的刺激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正如小普林尼在一天工作之余要到他的劳伦提努姆别墅去休息一样，15世纪佛罗伦萨的有钱人也到乡野中去寻求平静。美第奇家最初的一些别墅是简单而又

自然的建筑物；但是，朱里亚诺·达·圣加洛为庄严的洛伦佐于1480年至1485年间在佛罗伦萨近郊波焦阿卡亚诺营造的别墅却是一座带古典柱廊大门的富丽堂皇的宅第。从那以后，别墅就更加讲究式样而在外表上具有古典建筑的特征了。16世纪初期最富丽堂皇的郊外别墅——罗马的法尔内西纳别墅，是拉斐尔和佩鲁齐在1509年为有钱的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基吉设计的，它包含着“盛期文艺复兴”艺术的最美妙的精华。在拉斐尔晚期为未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开始营造的马达马别墅中，平面设计的扩大，讲究的装饰，以及把主体建筑与宽阔的阶梯式的整齐的花园结合起来，都达到了顶峰。此后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像朱利奥·罗马诺在曼图亚的泰府邸、吉罗拉莫·亘加在佩扎罗附近的帝国别墅等大规模的建筑，更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艺复兴时代的理论家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具有按照几何图形设计的笔直道路，而且每个建筑物都放在指定的地方。阿尔贝蒂把城市比作一座满足居民各种需要的大房子。弗朗切斯科·迪·乔治在1482年以后写文章说，城市的所有部分都必须按比例与整体配合，“正如人体的各个器官一样”。但是，意大利的大多数城镇，如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维罗纳、皮亚琴察和佩鲁贾，在12世纪至14世纪期间，当在政治上声势赫赫的城邦繁荣昌盛的时候，它们的公共生活中，它们的宽阔的广场、市政厅和公共建筑物，都已经建造起来了。文艺复兴几乎没有打乱这些中世纪城镇的有系统的格局。主要是在大小、式样和装饰方面各有不同的，建筑在已有的通衢大道上的文艺复兴的宫殿，改变了旧城市的风格。大规模的和密切结合的单元的创造，如比亚焦·罗塞蒂设计的弗拉拉新市区，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布局（1496年开始施工），布拉曼特设计的米兰附近维杰瓦诺的中心（1475—1485年），朱理亚二世时代他在罗马修筑的笔直的新大街（朱理亚大道），安东尼奥·达·圣加洛为佛罗伦萨圣安农齐亚塔广场设计的对称图形（1516年开始施工），在当时都还算是大海中的孤立的例子。市政规划的伟大时期始于16世纪后半期。

文艺复兴关于对称和整齐的理想，关于简单几何图形的理想，以及关于各个建筑群的统一而又清晰有别的理想，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在1520年以后，几乎就没有一座纯文艺复兴的建筑物了。在1520年和1530年之间，正是文艺复兴的伟大人物米开朗琪罗、佩鲁齐、安

东尼奥·达·圣加洛、朱利奥·罗马诺，亲自动手抛弃了旧的价值法则，开始破坏“盛期文艺复兴”的均匀而和谐的风格。

雕刻和绘画的发展过程，与建筑艺术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时几乎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专业化。没有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建筑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布拉曼特开始是一位画家，弗朗切斯科·迪·乔治（1439—1502年）和达·芬奇也是如此。他们对所有三种艺术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同样地精通。对于拉斐尔来说，建筑还是一种副业。米开朗琪罗是在41岁的时候才做他的第一个建筑图案——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的正面图（1516年），而且始终也没有按照这个图案施工。大约在15世纪末，在雕刻和绘画方面，也正如在建筑方面一样，对古典文化的解释发生了变化。15世纪艺术的精致和优雅被一种大尺度和大比例的英勇而崇高的理想取而代之了，这种理想的根子存在于古典艺术之中。1477年博提切利在他的《春》中所画的美惠三女神，就像用一种有节奏的美妙的线条联系在一起的绰约舞姬一样。大约在1500年，年轻的拉斐尔画了一小幅同样主题的画（现藏法国尚蒂伊博物馆），在这幅画里，他抓住了著名的古代大理石群像的神髓，即它的稳定和均衡。显然，使这种风格达到成熟的地方是罗马，而不是佛罗伦萨。在罗马，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在雕刻和绘画方面的成就，足以与布拉曼特在建筑方面的成就媲美。但是，不论确立新标准的是希腊美惠三女神或者是在1506年发现时受到艺术家们热烈欢呼的拉奥孔雕像，是观景殿的阿波罗雕像、梵蒂冈的人体躯干像或者尼禄的金黄屋的奇异风格图像（拉斐尔从这些图像得到启发，完成一种新式样的装饰：1515—1521年营造的梵蒂冈凉廊），这些古典式作品一般说来只不过是表达一种崭新内容的法式而已。

凡是研究文艺复兴时代坟墓的历史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在任何时代，墓葬艺术都是衡量生者的信仰的尺度。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坟墓，虽然披上古典的外衣，依然是继承中世纪的传统，把横卧的雕像放在拱形门槽内的石棺上面，而雕像上方刻有赎罪的宗教象征。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每个文艺复兴的坟墓都着重于灵魂得救的概念上。安东尼奥·波拉约洛设计的英诺森八世墓也是如此。这座坟墓是1492年至1498年间在圣彼得教堂内建造的，根据那不勒斯安茹王室各坟墓的传统，在坟墓上两次出现教皇的栩栩如生的宏伟雕像，一

个是横卧着，一个是坐着做祝福的姿势。米开朗琪罗设计的朱理亚二世墓也是一样，如果依照原来的图样完成，它会是“盛期文艺复兴”的最巨大的雕刻作品。米开朗琪罗的传记作者孔迪维在谈到这一作品时说：它使米开朗琪罗时断时续地耗费了整整40年时间（1505—1545年），简直是一出“坟墓的悲剧”。原来的设计是在圣彼得大教堂侧专门建造的小教堂中，在一个分3层叠起的独立结构的周围，放置40多个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但是结果大大缩小了计划，仅在温科利的圣彼得罗教堂内筑个“墙墓”，作为一个永久的家。第一个方案把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一种是古典的思想，要有一个墓室，要表现神圣和胜利（胜利女神和奴隶的雕像）；另一种是来自中世纪墓葬艺术的观念，即把下界凡尘与上界天堂分开，人们可以见到教皇被一些天使簇拥着。另外，为了净化那胜利升天得到永生的灵魂，他设计一个中间区域，放置代表积极和静修生活的摩西和圣保罗的雕像。他把复杂结构统一起来的思想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点已经成为定论^[1]，但是在许多细节上，学者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在1513年教皇逝世后做了很大改变的第二个方案中包括两个奴隶和摩西的雕像，奴隶的雕像现藏于卢浮宫，摩西的雕像既表现他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领导者，又表明他是一个沉思默想的思想家，它总算在坟墓的最后安排中得到了一席之地。在较后得多的阶段（1532年），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雕刻了胜利者，还有4个未完成的俘虏雕像，这是他最有力、最悲怆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小教堂中，更充分地实现了他作为一个雕刻家的梦想。只有内行的人才会知道这个作品也是一个非常巨大设想（1520—1534年）中的片段。他雕刻的是美第奇家族的两个比较不重要的成员——内穆尔公爵朱里亚诺和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他们坐在石棺上方的壁龛里，而在石棺顶盖上则躺着代表昼夜晨暮的4个巨大雕像。这两个公爵穿着罗马的盔甲，在整个设计中有许多古典的观念。但是，小教堂的神圣中心则是圣母玛利亚像所在的第三道墙，她的两边是美第奇家的守护神。没有另外的纪念物曾经引起如此众多和如此矛盾的解释^[2]。虽然我们不能怀疑这一作品所表现的是涂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义，但是各个雕像的真正意义依然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猜测而已。

在本章所探讨的时期，米开朗琪罗是唯一伟大的雕刻家。与他的万古长存的伟大天才相比，其他的任何事物都显得很渺小了。当他运

用古典文化来创造他那宏伟壮丽、富有个性、波澜起伏的风格的时候，威尼斯的雕刻家们发展了一种古典化的“盛期文艺复兴”的风格，这种风格既有些枯燥，又几乎完全是学院式的，其最好的例证是安东尼奥和图里奥·隆巴尔迪在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教堂中所做的以圣安东尼的奇迹为题材的大型浮雕。当米开朗琪罗正在为朱理亚二世墓进行超人的设计的时候，富有才华的安德烈亚·圣索维诺在罗马大众圣玛利亚教堂的巴索墓和斯福尔扎墓（1505—1507年）中，创造了“盛期文艺复兴”时代最成功的墙墓。他改变佛罗伦萨墙墓的旧有形式，把雕刻的人像放在凯旋门式的背景中。他以基督教的美德和救世的象征来表示人们所应理解的这些胜利场面的精神。从此以后，凯旋门的主题在坟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中世纪期间，在大教堂的正门上和门楣中心的弧形部分，可以见到连环的雕刻装饰。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这种传统几乎完全中断了。“盛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两个最伟大的作品——朱理亚墓和美第奇小教堂的雕刻，都不采取比较旧的包罗万象的情节，而专心刻画凡人，刻画他们的荣华富贵、生死无常和得救升天，这也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改变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布尔克哈特关于在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里所谓的“人”，是指意识到自己在赎罪的虔诚行动中的单独作用的人。具有与大教堂相类似的雕刻情节的唯一重要的文艺复兴纪念物，是帕维亚附近加尔都西会隐修院的正面。浮雕、圆雕人像、组雕和圆形浮雕构图，像五颜六色的壁毯一样，覆盖了整个正面。迄至1499年，主要的雕刻大师是乔瓦尼·安东尼奥·阿马代奥和安东尼奥·曼泰加扎（1493年卒），在此以后是贝内代托·布廖斯科，他在1506年完成了修道院正门的装饰。另外，还有大批的雕刻家协助他们。在伦巴第的文艺复兴雕刻中，古典主义的细部特别浸沉于晚期哥特式的感情主义之中。凡是想要研究这种雕刻的人，必须去考察帕维亚加尔都西会隐修院的立面，宁可不去看米兰大教堂。装饰的最下面的横带中雕刻着东方的君主、罗马的国王和皇帝，以及古代的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这些图像是从古典时期的钱币和宝物上搜集来的。在这一横带里，古典世界的人物是作为基督教的历史前驱，作为基督帝国以前的各帝国的代表出现的，而在上面各横带的全部装饰都是专门表现基督帝国的。

在文艺复兴期间，建筑和雕刻之间并没有断绝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与哥特式使雕刻从属于建筑的方法不同。在这时候，用壁龛代替雕像来作为建筑结构的一部分。把雕像从法国式大教堂移开，就造成一个结构的真空。早在13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就开始反对把雕刻与建筑合而为一。这种保持雕刻这一立体艺术的个性的朴素感情，是与千古不灭的罗马传统相一致的。壁龛中独立存在的雕像取得了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复兴时代雕刻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北方的国家里，艺术家们在被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迷住以前，一直反对古罗马式意大利独立存在雕像的。从这种雕像再稍微前进一步，在古典时代司空见惯的公共广场上的独立式纪念像就复活了。在中世纪里，只有在极少的场合出现这种文艺复兴的萌芽；当1504年米开朗琪罗把巨大的大卫雕像放在韦基奥宫的前面的时候，它才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这座雕像像古代英雄一样是裸体的，它是佛罗伦萨市区的一个庄严伟大的象征。韦罗基奥的科莱奥尼雕像（1479—1488年；1496年完成），是放在公共广场（威尼斯，圣乔瓦尼和圣保罗广场）上的第一座骑马的纪念像，恢复了在古典后期的罗马享有传奇式盛名的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的骑马雕像的传统。达·芬奇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雕刻的骑马纪念像，在1493年做了一个陶土模型；为特里武尔齐奥元帅雕刻的骑马纪念像，是在1506年以后设计的；两者都没有完成。正如他的许多习作表明：这两个雕像一定会赛过以前的一切骑马的雕像，不过，它们如果完成，也将形成坟墓的一部分，因此是在继续中世纪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家族坟墓的传统。

与宗教作品的浩如烟海相比，异教主题在文艺复兴的雕刻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米开朗琪罗的创作经历是典型的。他只有在创作《阶梯旁的圣母》的时期（1490—1492年）做过早期浮雕《半人半马怪之战》；在圣彼得教堂雕刻《圣母哀悼耶稣》时期（1497—1500年）在佛罗伦萨做过与人体一般大小的《醉中的酒神巴克斯》像；此后，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还采用过极少的其他的古典题材。大部分的古典题材见于小型雕刻、纪念章、小饰板、青铜浮雕和青铜小雕像。一方面，这些物件被认为适合于表现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顾客所好的用形象表现神秘的含义；在另一方面，它们成为起居室和书房的时髦装饰品。在古典时期，青铜小雕像是放在“家神龛”里，这是罗马人一家做祈祷的地方。意大利的青铜小品虽然采取古典的模型，而且往往是直接模仿，但是它已具有一种完全新的意义：它成为高尚趣味的

标志了。人们对这些物件的需求日益增长。吉贝尔蒂的佛罗伦萨铸工作坊是所有这类艺术品的发祥地。多那泰罗在帕多瓦的时候开始创造北意大利风格的雕刻。威尼斯人安德烈亚·里乔（1470—1552年），在一种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激发之下，从他的作坊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古典式青铜小物件；他的积极活动使这些作品遐迩闻名。

显而易见，如果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以为文艺复兴产生了一种以世俗性为主的艺术，以为奥林匹斯山诸神代替了耶稣和一大群圣徒，那将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文艺复兴艺术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种宗教艺术。

拉斐尔的艺术生涯是从一系列描绘圣母和圣婴的画开始的，他一生所画的最精彩的作品都是采取这个主题的。他的老师佩鲁吉诺（1445—1523年）是一位杰出的圣母像画家。达·芬奇的《岩间的圣母》（卢浮宫和伦敦藏），他的《圣母与圣安娜》（草图，皇家艺术学会藏），特别是他的《最后的晚餐》（米兰藏），巴托洛缪修士（1475—1517年）的巨幅宗教史画，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486—1531年）的富有感情的圣家族人物画，柯勒乔（1494—1534年）的圣母和圣徒大幅祭坛画，乔万尼·贝利尼（1430？—1515年）的许许多多以圣母为题材的各种美丽姿势的组画，提香的远远超过百幅的宗教题材画——所有这一切作品都表明，正如在中世纪时期一样，画家们的兴趣和活动依然主要集中于宗教的题材。但是，与中世纪那些往往令人望而生畏的祭祀神像不同，也与15世纪画家们的往往有些单调的写实主义不同，“盛期文艺复兴”的这些艺术家们给宗教的题材赋予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理想化的特质，一种把神变成人的崇高的想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拉斐尔在他的成熟时期的绘画里，如《阿尔巴圣母》（约1511年作，华盛顿藏）或者《座椅中的圣母》（1514—1515年作，佛罗伦萨藏），最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理想。

宗教画的范围是极为广阔的。为了在邸宅和宫殿里进行私人祈祷，人们绘制了无数幅独幅小画；富裕人家、高级教士和公共团体争相用祭坛画和成组的壁画装饰教堂。每一个这样的大画和组画都是在赞助人支持的情况下，甚至是在神学顾问的帮助下制作出来的。“盛期文艺复兴”时代尽管继承了基督教圣像画的古老传统，但是永远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包括个人爱好、地方特色或者宗教信仰的因素存在，如果不从历史上进行细致的考察，对它是不可理解的。例如，

提香的《佩萨罗圣母像》（在威尼斯托钵修会教堂，1519—1526年作）是雅各布·佩萨罗为了纪念他战胜异教徒而呈献的供品；画上迎风招展的教会旗帜和一个土耳其人俘虏暗示着这一场胜利，而圣彼得、圣弗朗西斯和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在向圣母玛利亚请求给聚集的佩萨罗一家降福。

在大型的故事画中，对于暗含的意义和复杂的主题就难以理解得多。我们可以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来讲。在佛罗伦萨的新圣玛利亚教堂的祭坛上，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把1486—1490年为有钱的银行家乔瓦尼·托尔纳博尼所画的圣母和圣约翰生活片段画成色彩丰富的当代佛罗伦萨生活的记事。在几年之后被萨沃纳罗拉斥责为不信上帝和亵渎宗教的，正是这一类典型的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的绘画。在同一教堂里，菲利皮诺·利比在1487年至1502年间为斯特罗齐家族画了一些取材于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和使徒腓力的生活的神奇的场景，从这些画面中，可以感到萨沃纳罗拉的革命的高度宗教气息。从卢卡·西诺列里在奥尔维耶托大教堂中所作的富有戏剧性的启示录的壁画（1499—1502年）中，可以见到类似的宗教冲动和狂热的神，但是不加精通此道的注释，对其中的奥妙就不可能理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索多马于1505年至1508年间在锡耶纳附近大橄榄山的本尼狄克会大修道院的走廊里所画的以圣本尼狄克的生活为题材的故事，则是极为朴素的平铺直叙，完全是描绘简单的寺院生活的清静和庄严。而真蒂莱·贝利尼（1429—1507年）和维托雷·卡尔帕乔（约1455—1526年）为威尼斯弟兄会的小礼拜堂所作的宗教组画，则反映出这个文艺复兴时代最富裕的国家的壮丽、豪华以及居民的平凡生活。1510年至1520年间佛罗伦萨绘画的倾向，从圣安农齐亚塔教堂的入口庭院的壁画中能够得到很好的研究。这里的壁画有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所绘的玛利亚仆人会创立者圣菲利波·贝尼齐生活的片段，有弗兰恰比焦、蓬托尔莫和焦万·巴蒂斯塔·罗索所绘的圣母生活的场景，另加上萨尔托所绘的《圣母玛利亚的诞生》（1513年作）。如果把这些画与吉兰达约在新圣母教堂里所作的同一题材的画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相距25年之间，佛罗伦萨绘画的发展趋势，即从细致、典雅以及丰富的故事和装饰细节，演变成为一种伟大而高贵的有节奏的风格，带有很少一些经过仔细安排的重点。另外，后一种绘画还显示出对于宗教题材的一种新的、富有幻想的探索：不画出天花板，而把屋顶画成

是露天的，有一个天使在云端捧着香炉，以此来表明圣母诞生的奇迹。

萨沃纳罗拉的宗教学说的禁欲和神秘的性质以及他的个人人品的力量，对于一小群艺术家产生一种为时不长、但是非常有力的影响。正如博提切利（1444—1510年）的晚期作品（如《基督诞生图》，1500年作，伦敦国家美术馆藏）的狂热和激情的风格所显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比这位多愁善感的画家更完全屈服于这种影响之下。新的宗教热情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而且不那么激烈。它是在1510年以后，从天主教的中心罗马教廷传播起来的，与拉特兰公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革热情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在梵蒂冈工作的拉斐尔，在他的作品中像地震仪一样记录了变化中的情绪。他的《华盖下的圣母玛利亚》（佛罗伦萨皮蒂府邸宫）是在1506年至1508年间以典型的古典风格绘制的，人物的表现和构图是完全均衡的，但是，他在仅仅3年之后所作的《福利尼奥的圣母玛利亚》（梵蒂冈，1511—1512年作）则是一个新的幻想风格的作品。圣母玛利亚不再坐在宝座上，周围有一群道貌岸然的圣徒（这是15世纪以来表现这种主题的通常方法），而是坐在云端，好像从天上下来显圣一般，受到怀着深情的捐助人和随从的圣徒们的崇敬。拉斐尔后来的《西斯廷圣母》（1513年作，德累斯顿藏）是用这种幻想风格来表现一个宗教题材的最伟大的一幅作品。

全意大利的最进步的艺术家用非常迅速地仿效拉斐尔。只要研究一下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圣母哀悼耶稣》，维特尔博，约1520年作）、洛伦佐·洛托、高登吉奥·费拉里等人的发展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柯勒乔（1494—1534年）从他早期的、具有古典风格的《圣母玛利亚与圣弗朗西斯》（1514年作，德累斯顿藏）转变到帕尔马的《持汤盘的圣母》和德累斯顿的《基督诞生图》（1522年开始画）的大刀阔斧的构图和大胆地使用光线，画中把天和地混为一体；他在帕尔马圣的福音传教士圣乔瓦尼教堂所作的圆屋顶装饰（1520—1524年作），是幻觉手法的第一个不朽的典范，它把神奇的事迹变成强烈的、富有现实感的经验。威尼斯尽管具有长期的、独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传统，也同样顺应整个的潮流。提香的《圣马可》（威尼斯藏，约1510年作）的画面上是一群和睦相处的圣徒，他们是按照多年来固定下来的“神圣交谈”的方式，井然有序地排列起来的。这幅画完成不久，他便画了一些生动活泼的和富于幻想的作

品，例如托钵修会教堂的《圣母升天》（1516—1518年作）和安科纳的祭台画（1520年作），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些得到灵感的圣徒，他们在虚幻的苍茫暮色中，为在云端的圣母玛利亚的蜃景深深感动。

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小礼拜堂所作的屋顶画是文艺复兴宗教肖像画的集中体现。这些画是在1508年至1512年间绘制的，它们从神学方面来说也是无比深邃的。在西克斯特四世教皇的时代1473年至1481年间所建造的小礼拜堂的墙上，有一些描绘摩西和耶稣的生活情景的壁画。为了保持《旧约》和《新约》之间早已确定的一致，前者的事实成为后者的事实的伏线。因此，这些壁画不仅具有画面的意义，而且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们的绘制者是当时的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博提切利、吉兰达约、佩鲁吉诺、西诺列里和稍逊一筹的科西莫·罗塞利。从历史上讲，先是从摩西的一生开始的法治的时代，随后就是从耶稣的一生开始的天恩时代。米开朗琪罗在屋顶上画了9幅表明律法时代以前时期的图景，用以补充墙上的历史组画。他所画的故事从创世到原罪，又从接着发生的大灾难——洪水到酩酊大醉的诺亚被他的儿子们嘲笑。中央的镶板则很悲观地以人类新种族的祖先的耻辱而告结束。在这些主要场景的下面，是先知和女预言家就位于宝座的图像；在他们的宝座的上方，是一些非常优美的裸体坐像，他们手里举着雕有列王纪中的片断故事的青铜色圆盘。这些片断故事，正如四角的拱肩上取材于犹太人历史的大幅解放的场景一样，代表着基督救世的不同的预兆。最后，在墙上8个拱肩和14个弧形窗中的耶稣的祖先，表明从诺亚直到耶稣的肉体的传承。这样一来，用先知和女预言家所表现的耶稣以前时代和耶稣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就与耶稣祖先们的肉体联系互相辉映了。

自从早期基督教时代起的《圣经》注释的历史表明：在从文字上阅读《圣经》时，必须以象征的解释来补充。在13世纪和14世纪期间，曾经制作出大量带插图的这类性质的东西，在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这类简要的说明经过印制成书，依然非常广泛地流传。因此，我们必须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正如西斯廷礼拜堂屋顶的角拱肩和圆形浮雕一样，中央的镶板也部分地启示着真理。事实上，一整套的宗教典故都是在证明：这些片断的图景是用象征的手法解释耶稣受难的深奥意义^[3]。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家们看来，希伯来的和古典时代的先知们的预言所包含的意义，完全就是如此。所以，从象征的意

义来说，整个屋顶形成一个密切结合的整体，而中央的镶板则是以“最后的晚餐”为结尾的旧时壁画所叙述的故事的继续。宗教象征的语言已经不再为人所理解，因而就需要用图例来表示它的意义。在屋顶的正中央，绘制了夏娃的产生。自从初期基督教著作家的时代起，就把这一事件当作教会的一个象征。圣奥古斯丁把耶稣的死与亚当的沉睡相比；正如把亚当的身体的一侧打开，取出他的一条肋骨造出夏娃一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从他的一侧流出鲜血，而教会就是在这圣体的血上建立起来的。把教会的创立与夏娃的产生相比，这是非常普遍地被人接受的一个明喻，在16世纪出版的大多数《圣经》中，都以这一情景作为卷头插图，不加任何的注释。

初看起来，西斯廷小礼拜堂屋顶画仿佛在风格上是一致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从原来的入口走向祭台，比例是在逐渐变化的。从诺亚被嘲弄开始，越接近创世的图景，人物的形象就越大，而且图景所放置的空间显得越不真实。在创造夏娃的图景中，圣父的形象超出了画面的框子。此后，这一形象就吸引了全部的兴趣，每一件事都集中到创世的生气蓬勃的行动上。正是这个横跃苍穹的圣父，大概比画上的任何一个形象都更加激发后世人们的想象力，因为无论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从来就没有以如此超自然的力量来表现太古创世的神迹的。从小礼拜堂的东端到西端，可以看出节奏的逐渐加强，而到这些创世的图景，则达到了它的顶峰。西斯廷屋顶画较早绘制的部分显示出1510年左右的形势所特有的平衡和稳静；而较晚时期壮烈的、生动的和虚幻的部分，则是与我们已经谈到的风格的总的变化相一致的。实际上，正是绘制西斯廷屋顶的米开朗琪罗为新的发展定下了步调，他甚至对拉斐尔产生了影响。

在文艺复兴期间，没有按现代意义来讲的那种正确描绘过去的事件的非宗教性历史画。尽管如此，历史画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中还是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题材的绘画的处理，其方式多种多样，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它们。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画家们认为必须强调一个事件的永久性的特征，而不是一时的和偶然的特征；第二，这一类作品的绝大多数注重描绘基督教的历史，或者与这种历史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事件。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于1503年和1504年应佛罗伦萨国君之请，为韦基奥宫大会议厅两面墙壁所作的战争画，可以算作例外。但是，即便是这些理

想化了的、纪念性的描绘佛罗伦萨战胜比萨人和米兰人的作品，如果政治局势容许完成全部计划的话，也要被放在一个巨大的救世主雕像的阴影之下，这个雕像是大厅的理想的中心。壁画也永远没有达到完工的阶段。尽管如此，文艺复兴的这两位巨人在这个不寻常的工作中你追我赶的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和持久的印象。达·芬奇的《夺旗之战》草图依然是后世战争画的最佳范本；而米开朗琪罗的《洗澡的人们》，则为研究和描绘裸体画确立了标准。

平图里乔在锡耶纳大教堂图书馆中的10幅大壁画（1503—1508年），用一种带有活泼天真的、倒退的风格描绘皮科洛米尼家族出身的教皇庇护二世的生平事迹，它比起其他任何历史组画来，可能更接近于直截了当地描绘历史事实。然而，他在描绘这些故事的时候，人物矫揉造作，布景虚无缥缈，而且充满古典主义的细节，这表明画家的意图在于给一些超人的事件赋予纯净的气氛。10年之前，就是这位平图里乔曾在梵蒂冈宫中，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作了许多房间的壁画，在一个房间里，他非常细腻地描绘了埃及的公牛神阿匹斯的故事。他画的公牛神披着博尔贾家族的纹章。根据作画的计划，是要表明亚历山大一族就是由阿匹斯直接传下来的。在这个故事里显然有一种魔法的因素。因为，尽管公牛神被画成在耶稣的继承者的面前俯首，但是他把自己的生气和力量给予博尔贾家族，从而成为亚历山大在基督教世界升上最高地位的主要推动力。这个有些野蛮的“图腾式”的故事，依然是打不破的神话即历史论的一个环节，根据这种论点，古代的神和英雄是经过神话化的大家族的祖先和城镇与社区的创立者。

拉斐尔的“厅室”壁画，即梵蒂冈宫中教皇的几个相通的厅室的墙上装饰，距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屋顶画只有几十米远，这是一套出类拔萃的最伟大的历史组画，就整个来说，也是“盛期文艺复兴”登峰造极的作品。拉斐尔几乎是单独一个人完成了第一个大厅（签字大厅），大致与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同时，共用3年的时间（1509—1512年）。大概这样讲是正确的：这个大厅四面墙壁的装饰简直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对中世纪百科全书最完全的再版；我们对于拉斐尔的画风特别适宜于表现的想象的丰富、思绪的复杂和感觉的灵敏，只能三言两语概括地说上几句。一群群生动活泼的历史人物变成了人类社会各个组成力量的化身：他在表现精神领域的时候，描绘关于圣体的奇迹的

神学争辩，即那幅有名的《教义的辩论》；在对面墙上的《雅典学派》这幅画里，他却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领导的哲学辩论来表现思想领域里的争论。理性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用托马斯主义者的语言来说，为“求得的和启示的学问”——是支撑认识真理的基柱。第三面墙上的《法律》画的是法律领域，它使人间的一切事物有可能保持道德的秩序。第四面墙上的《帕尔纳苏斯山》画的是想象和热情的领域，它是在解说柏拉图的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没有音乐家和诗人们在他们的诗歌里所表现的那种灵感激发的体验，就既不可能有个人，也不可能社会，甚至连宇宙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一个大厅里，拉斐尔光辉灿烂地把抽象的思想翻译成了视觉的语言。伟大而简单的形式，他那气象万千的明快风格，以及认真进行平衡对比的构图方法，三者合在一起，把教皇宫廷中饱学的顾问们所草拟的文字纲领提高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1512年夏天到1514年夏天这一期间，拉斐尔在学生们的协助下，在赫利奥多罗厅作壁画。作画的计划从一般性质的学术研究改变为直接反映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不过，这4幅画——《赫利奥多罗被逐出神庙》、《波尔申纳的弥撒》、教皇利奥会见阿提拉图和圣彼得出狱图，意义隐晦，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看得懂。与阿提拉会见的教皇利奥一世被画成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形象；正如他的伟大的先驱者奇迹一般地把罗马从匈奴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样，利奥十世由于他在诺瓦拉的胜利而把法国侵略者从意大利清除出去。另外的几幅壁画也是以历史上和传说中的古老故事为媒介，描绘一些当代的事件。他不仅是借古代的事情来歌颂当前的事情，而且比这更进一步：每幅画都通过以一个事件表现另外事件的方法，变成教会的永恒伟大的象征。因此，这些图画乃是一种高贵的神秘事物的视觉象征，它们只能用这种寓言历史画的特殊形式来表达。拉斐尔使他的风格适应这种新的工作。在所有这些壁画里，凡是信仰上帝而且受上帝保护的人，都用平直的竖线条描绘，而对于未开化之民的害怕、恐怖和惊骇，则用迅速的、斜角线的动作和扭歪的身体来表现。

在第三个大厅，即火警厅，是1514年至1517年间，在拉斐尔的指导下，主要由学生们绘制的壁画，他们对当代事件与自古以来的教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修改。所有四幅壁画都是以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图像扮演他的前人利奥三世和利奥四世的角色。但是，这些画

没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作鲜明的对比，它们暗指拉特兰公会议的进程，因此，必须理解为表明教会的基本信条的隐喻。《城镇火灾》画的是在849年，教皇用手画十字，消灭了一场大灾难，这是说明基督教会的神奇力量。《奥斯蒂亚之战》画的是利奥四世战胜萨拉森人，歌颂他无所不包的性格。《查理曼大帝加冕》表示罗马教廷的至高无上。《利奥三世的誓言》则说明神职人员仅对上帝负责。

君士坦丁大厅的4幅大壁画是1517年以后开始绘制的，但在拉斐尔逝世之后，于1523年至1524年间才完成。这几幅画说明基督教是怎样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它们的顺序是合乎逻辑的：第一幅是在君士坦丁大帝面前出现十字架，其次是他与马克森提乌斯作战，他的受洗，以及由君士坦丁赠献建立教皇的国家。尽管4个厅室的画题绝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设计出来的，但是，它依然表现出一种连贯的思想。签字大厅的壁画反映教会与人类生活其他各种基本力量的关系，赫利奥多罗厅讴歌教会的胜利，火警厅宣传教会的信条，君士坦丁厅则讲述教会起源的故事。

在前3个大厅室中的每个大厅，拉斐尔都树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风格的榜样。签字大厅的壁画今后千秋万代都将被当作“古典的”文艺复兴洪流的最高浪头。在赫利奥多罗厅的富有戏剧性的风格中，他发展了特别是在百年之后当绘画反映天主教复兴的宗教狂热时所拾起的一些原则。这个大厅的风格，有时不无道理地被贴上“原始巴洛克式”的标签。火警厅的风格是完全适应画教条的题材的，拉斐尔以这种风格开创了16世纪画风的两种主要趋向。《城镇火灾》，特别是《奥斯蒂亚之战》发展出一种不协调的风格，瓦萨里在16世纪中叶的复杂的构图，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查理曼大帝加冕》和《利奥三世的誓言》，在16世纪下半叶，由费代里戈·祖卡罗一类大师的有意识地简单化了的教条画风格继承了下来。

在历史画、寓言画和神话画之间，很不容易画出明确的界限。历史画似乎总是披上一件寓言的外衣，而寓言也可以罩上一层历史或神话的面纱来表现，神话也可能有一种寓言的意义。绘画的语言比文字更加含糊暧昧。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继承着一个传统，他们很少使画面和意义完全一致。例如，当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在1496年受委托在富有的贷款人行会——佩鲁贾的“交易所”的会议厅墙上画12个与活人一般大的古代英雄时，他对这些英雄的半寓言性质是交代得很清

楚的，因为在画面上，这些英雄每3个人为一组，把他们作为榜样所应有的主要美德人格化了。自从彼特拉克写出他的关于古代著名人物的作品以后，这些人物的英勇和公正，他们的尚武精神和公民品德，就被当作后世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古代的范例是完全适合于基督教伦理的世界的。

以古典的神话为题材作画，并非像老一代谈论文艺复兴的著作家们所以为的那样，是异教思想突然复活。晚近的研究揭示出古代的诸神是如何地坚韧不拔、千载犹生^[4]。中世纪给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而正如薄伽丘的《异教诸神谱系》依然是一部主要资料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文艺复兴支配了那笔遗产。《异教诸神谱系》于1472年印第一版之后，在15世纪期间又因必要再版4次，而在16世纪期间，再版的次数就数不清了。薄伽丘与传统的解经学是一致的，他主张说：一个神话有4重意义——文字的、道德的、寓言的和玄奥的。在研究文艺复兴时代以神话为题材的绘画时，不应该忽视这一点，虽然对于每一张画都要探求它的优点，而且只有充分研究突出的细节，才能揭示它的意义。

当文艺复兴时代艺术作品的最热心的搜集家和有鉴别力的保护者之一伊萨贝拉·德·埃斯特决定要以一些大师们有连贯性的组画来装饰她在曼图亚的宅邸中的私人书斋的时候，她选择一些神话的图景，但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想要在我们的书斋里有意大利最优秀的画家以寓言为题材的图画”。在那些图画中，有曼特尼亚的《帕尔纳苏斯山》（1497年作，现藏卢浮宫），这是表现寓言神话的最美好和最精湛的作品之一。这幅图画仿佛是在赞美诗歌和音乐所起的教化作用，而与此相对照的一幅画，也是同一大师所绘，于1502年完成，它以雅典娜和维纳斯为中心人物，所要给人的教训，翻译成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邪恶必须由美德来驱逐。这些神话和同一组画中的另外一些神话，都是用千变万化的、大有学问的暗喻来加以修饰的。这个组画特别有趣，因为伊萨贝拉的人文主义者顾问帕立德·达·切列萨拉为其中一幅画所写的、充满非凡的学问的提纲得以保存下来。他要求画中表现帕拉斯和狄安娜与维纳斯和丘比特作战，以象征“爱情与贞洁的斗争”。画家佩鲁吉诺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受到约束，并明确地禁止他加入任何自己的想象。这幅画是1505年到达曼图亚的。它没有

引起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很明显，这种艰难的工作已经超出那个专画可爱的圣母的温顺的画家的能力之外了。

伊萨贝拉的兄弟弗拉拉的阿方索公爵，在他姐妹的事业的鼓舞之下，决心将他城堡中的一个房间做同样的装饰。阿方索的宫廷拥有以阿廖斯托为首的许多文人学士，在这个宫廷的文雅高尚的气氛中，画的主题就跟伊萨贝拉的不一样了，它完全倾注于对爱情做出人文主义的表现。乔万尼·贝利尼老人在他辞世之前不久，开始画一幅奇异而有些讽刺意味，并且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诸神的宴会》，后来由提香完成（现藏华盛顿）；提香画了3幅《酒神节》（1516—1523年），现藏马德里和伦敦，其中有2幅精确地绘出了希腊作家菲洛斯特拉托斯所描写的情景。在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的绘画中，再没有一幅对古典的作品内容作出如此炉火纯青的表达。提香的画把文字的概念转化成自由奔放的、无限丰富和谐调一致的画家特有的构图。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不仅仅是纯粹的描绘。菲洛斯特拉托斯本人就曾指出《儿童酒神节》的寓意。他解释说，以丘比特们的游戏象征着的爱情，主宰着所有的芸芸众生。维纳斯所主管的爱情是一种性爱，而这些丘比特们则表现爱情的所有阶段，“从它的情窦初开，一直到地久天长”。我们会记得，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永恒的爱情叫作仁爱。很可能是：提香和他的顾问们是企图在这些画里把基督教的概念与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恋爱主义观糅合在一起。

我们举出提香的所谓《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1515年左右作，在罗马），可以作为上一说法的佐证。这幅画是他所创作的最轻松愉快的作品之一，充满和平和至福的气氛。我们认为，这种论断^[5]是正确的：裸体的维纳斯代表较高的原则；因为天堂的美，即永恒不变的美，是像真理一样赤裸裸的。而与她相对的另一个维纳斯，则具有人间的一切魅力，代表着可见、可触、而且转瞬即逝的地上的美的原则。但是，这两种柏拉图式的美的形象概括地代表基督教的爱的两条意旨——爱上帝和爱你的邻人，二者加在一起，就成为基督教的最高品德：“仁爱”。提香所画的一对维纳斯的特点与传统的描绘“仁爱”的特点极其相似。现在，我们很不容易完全掌握文艺复兴的神话和半神话绘画的讽喻和含义。不过，这一类绘画总是独有的，专门为接受当时的哲学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位主顾绘制的。至于像达·芬奇的《丽达》（现只存摹本）、乔尔乔涅在德累斯顿的《维纳斯》

或者提香晚期所绘的一些维纳斯像（藏佛罗伦萨、马德里）等名画，我们或多或少地是在五里雾中。不过，我们多半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品树立了“盛期文艺复兴”的女性美的理想：一种崇高、尊贵和无限优雅的美，而如果没有新柏拉图主义者几乎像信仰般的对美的灵魂寓于美的身体的渴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样的美。正是同样的精神，促使米开朗琪罗在圣彼得教堂中所绘的圣母哀悼耶稣一幅画中把圣母玛利亚表现为永久青春的状态，同时，把他在西斯廷屋顶上所绘的裸体青年的身体画得非常完美。

柯勒乔为帕尔马前圣保罗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所作的装饰（1518—1519年），可能是用神话和寓言为基督教的内容服务的最吸引人的作品。这里画的是狄安娜和她的侍从，农特神和灶神守护祭司，祭物和奠酒，美惠三女神和命运三女神，维纳斯和朱诺，同时还有表现单纯和贞洁、自然和永生的寓言。这是女修道院长焦万纳·皮亚琴察即女保护人的餐厅，她在大幅的狄安娜画像中得以传诸百代，永远作为贞操的十分警觉的监守人。在这幅画里，是用中世纪寓言的方法来表现贞操的胜利的，而那富有学术气氛的古色古香的细节以及古典的和充满美感的图画语言，则是“盛期文艺复兴”的典型代表。

拉斐尔约从1518年开始在法尔内西纳别墅所作的《丘比特和普赛克》组画，是与提香的《酒神节》相匹敌的罗马的不朽作品。这位大师从阿普列乌斯的迷人的故事中选择12个插曲，以装饰一度是开敞的凉廊的拱肩和顶棚。拉斐尔于1520年4月6日逝世，比请他作画的阿戈斯蒂诺·基吉早死5天，把那些壁画留给学生们去完成。这组画不仅在古人们那种把文字的和形式的传统和谐一致方面达到“盛期文艺复兴”的顶峰，而且，作为一首娓娓动听和宁静安详的爱的赞歌来说，也抓住了原来的神话故事的精神。拉斐尔如此地体会和揭示古代神话的诗情画意，就为探索古典文物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些壁画里，以及在一个毗邻房间中也许是在波利蒂安的《比武篇》中的几句诗的影响下所作的较早的壁画《伽拉忒亚的胜利》（1514年）里，拉斐尔的风格是古典的和雕刻式的，其中有几个人像是以古代雕刻的个别作品为模型的。只要与他当时所作的宗教画和后来所作的“厅室”画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位大师在他的创作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了适应主题素材而改变了自己的风格。

法尔内西纳别墅的装饰，就整个来说，能够使人清清楚楚地看出“盛期文艺复兴”的某些“异教的”情景。阿戈斯蒂诺·基吉的别墅第一层的卧室装饰得很适当，是索多马根据琉善（公元2世纪）的描述，用自由奔放的画笔所绘的亚历山大与罗克桑娜的婚礼；在另一些房间里，有佩鲁齐根据奥维德所叙述的神话故事所作的诸神的爱情的雕饰。但是，在画有《伽拉忒亚的胜利》的房间里也有佩鲁齐绘制的天花板，上面是用神话的表现方法很精确地画出1466年12月1日北方天空的天体图。这个日期是阿戈斯蒂诺·基吉的生日。所以，在天花板上描绘的是他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宿命星辰。这反映出占星术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行星和星座之所以自古以来就能够预示吉凶祸福，那是因为古典诸神身居河汉的力量。在这些壁画里所出现的对基督教的反抗，不是用异教与基督教相对照的俗套子来表达，而是用一种宿命决定论的信仰与神的意志的对抗来揭示的。

为了充分理解阿戈斯蒂诺扶植艺术创作的慷慨大方的精神，我们不应忘记从他的解囊相助中，基督教会得到了多么大的利益。举主要的来说，拉斐尔在罗马圣阿戈斯蒂诺教堂所作的描绘先知和女预言家的壁画（1514年），以及由拉斐尔设计、由他和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共同装饰的大众圣玛利亚教堂中的阿戈斯蒂诺家族墓地小礼拜堂，将会永远与他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自从但丁描写他的教会坐在“一辆凯旋车”上的幻想和彼特拉克写出他的寓言式史诗《胜利》以来，凯旋门和胜利大游行首先在文艺复兴的庆祝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地位。在庆祝结婚的时候，在欢迎贵宾或者凯旋的将领的时候，都要表演和描绘神话、寓言和历史中的胜利故事。而把古典的胜利应用到教会的礼拜仪式上，这也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特点。1491年，庄严的洛伦佐根据普卢塔克的记述，为庆祝圣约翰节演出了“艾米利乌斯·保罗的胜利”。1506年，朱理亚二世乘坐着凯旋车进入了波洛尼亚；在利奥十世进入佛罗伦萨时，表演了卡米卢斯的胜利。提香的木刻画《信仰的胜利》（1510年作）画着基督坐在一辆车上，拉车的是基督教神学家们，而主教与女预言者、殉教者与忏悔者则前呼后拥着。这个木刻画证明：古典的观念完全适合于歌颂基督教的胜利；同时还暗示出：基督教的胜利已经代替了古典时代的胜利。同样地，在文艺复兴的宗教画中司空见惯的异教徒的牺牲，其用意也是预示已经代替了它们的基督的牺牲。

正如安德烈亚·里乔在帕多瓦圣安东尼教堂的青铜烛台和他为德拉·托雷家族墓所作的浮雕（藏卢浮宫）中对祭祀显示出考古学的精确性一样，曼特尼亚在九张大幅草图《恺撒的胜利》（约1485—1494年作，现藏汉普顿宫）中，也把与古代文物相媲美当作名誉攸关的问题。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以如此大规模的方式或者以如此精湛的考古学知识来发展一个胜利的主题。这些画上有战利品和雕像，有祭器和俘虏，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认真研究，从古代的纪念物和阿庇安、苏埃托尼乌斯与约瑟夫斯的著作中关于古典胜利的记述中搜集来的。意大利北部对于古代文物的探索总是比意大利中部更侧重于考古的方面，从这一点来看，曼特尼亚的《恺撒的胜利》反映出北方的人文主义的特点。但是，这个作品中虽然显示出知识的渊博，却并不卖弄学问；它是具有极大个性的、富有想象力的、甚至是幻想的创造物，在这一创造物里，把古典的细节集中到一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东西——典型的文艺复兴的实体。曼特尼亚的《胜利》是为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画的，后来，侯爵的儿子费代里戈在曼图亚宫的一个房间里对此做了这样的安排：用原画的框架装上洛伦佐·科斯塔所作的一幅画（1522年），这张画是记录费代里戈本人参加帕维亚战役时获胜的情况。这样一来，费代里戈把自己的锦绣前程与罗马帝国的伟大传统结合在一起，就给自己的作战胜利增添了光彩。

与曼特尼亚的仿古主义相对照，佩鲁吉诺在佩鲁贾的交易所中所画的古代英雄，都穿着奇装异服，这种打扮归根结底来自在整个15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的勃艮第宫廷风格。虽然在这幅画中，也正如在其他许多幅画中一样，是用富丽和奇异的服装来表明时间相隔的久远，而不是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但是在16世纪初，即当所有3种艺术中都出现了浓厚的古典主义的时候，遵从以考古学为依据的事实已变成了一条准则。的确，任何其他做法在当时看起来，都会被认为是歪曲真理。从那以后，这种真实性就属于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确切性”的必要条件了（见第151页）。

自从艺术理论作为美学的一个独立部门诞生以来，也就是说，从15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肖像画在模仿艺术中的地位，比从历史、神话的《圣经》中选取题材的绘画低一等。因此，如果做出推论说，赞助人和艺术家一定同样地避免作肖像画，这似乎是很合乎逻辑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从15世纪上半叶起，新型的画架肖像画就在艺

术品的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肖像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16世纪头25年期间，最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洛托，都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肖像。只有米开朗琪罗是个令人不能忘记的例外。正是这些“盛期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解决了理论上否定肖像画和现实中应用肖像画之间的矛盾。达·芬奇的《蒙娜丽莎》（1502年作，藏卢浮宫）是肖像画中的一场真正革命的第一个伟大的范例。这幅肖像的形式要素——半身、3/4正身、眼睛直对看画的人，背后为远处风景——表示它们渊源于意大利15世纪的，还有佛兰芒的原型，但在这里，过去惯用的写实主义却被画中人的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肉体与精神的完美的神采所代替了。在这种神采面前，全世界的人都永远为之倾倒。拉斐尔定居佛罗伦萨以后不久，在1504年所作的早期肖像画《安杰洛·多尼》《马达莱娜·多尼》（藏佛罗伦萨），显示出达·芬奇的新的探求的影响。但是，他还没有像达·芬奇那样把所画的人精神化和理想化。对于拉斐尔从《马达莱娜·多尼》到《戴面纱的夫人》（藏佛罗伦萨皮蒂府邸）或者从《安杰洛·多尼》到《巴尔代萨尔·卡斯蒂廖内像》（藏卢浮宫）的转变，我们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一种风格上朝向更广阔、更完善和更有节奏的形式的发展，而更主要地，应该看作是朝向达·芬奇在他的《蒙娜丽莎》中所树立的崇高的人性的精神理想的发展。拉斐尔在1515年左右所作的一些肖像画表现了关于人的新的概念——温和、高尚、尊严，同样，他的朋友卡斯蒂廖内本人在其极有影响的《侍臣论》一书中树立了一座永世不朽的文学丰碑。

对于这种人道的理想，没有任何人比提香表达得更充分。在他所作的许多肖像中，他完全去掉了陪衬部分。头部体现出衣饰修整、谨言慎行和十分沉着的人物的理想。他往往画人体的3/4以代替传统的半身像，为的是表现人物的优雅举止，衣服的朴素精致——所有这一切，现在对于表现画中人的个性都是重要的了；而他那画家特有的粗犷的笔触所涂的温暖色调，更使画中人与看画人之间容易产生感情的交融。

画家试图实现和人们要求他们实现的理想化，并不是要损害写实的形似。没有比拉斐尔所作的朱理亚二世像和利奥十世像，或者比提香为他的朋友阿雷蒂诺和当时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所作的肖像在性格研究方面更出色的作品了。肖像画家的工作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将理想化

的神采与现实的容貌相结合。只有当他凌驾自然，赋予画中人以内在神采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一个理想化的升华过程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肖像画——根据来源于柏拉图的文艺复兴理论——从单纯的模仿提高到“高度”艺术的水平。

文艺复兴的新型人物，渴望回到一个快活的乌托邦里去。正如中世纪人爱好骑士的传奇和行吟诗人的恋爱诗一样，文艺复兴以后的人们喜欢“阿卡迪亚”了。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和维吉尔的牧歌在文艺复兴时期桑纳扎罗的《阿卡迪亚》（1502年）中达到了顶峰。当波利蒂安在佛罗伦萨、博亚尔多和以后塔索在弗拉拉，以及莫尔扎在罗马倾吐他们的哀歌的时候，当描写田园生活的戏剧和假面戏剧在1500年左右开始风行一时的时候，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他的菲耶索莱别墅中使“阿卡迪亚”复活了。为此，西格诺列里可能绘制了他的富有怀旧感的《牧神潘》（已毁，原藏柏林，约1490年作），乔尔乔涅创作了一幅阿卡迪亚式的天真无邪的图像。

乔尔乔涅大概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不可捉摸的天才。当他在1510年逝世的时候，大约是33岁。考虑到他在同代人中有极高的声誉，他应该留下了许多幅画，可是现在，关于哪些画属于他的问题，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我们可以这样说：既然专家们不能就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一个不能明确肯定的人物。可是，情况恰好相反。乔尔乔涅的名字引起十分明确的联想，沃尔特·佩特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中对此用美妙的词句做了论述。正是乔尔乔涅的艺术的独特的诗情画意把其他的艺术大师们吸引到这种程度，以致他们的作品就好像是他的作品的延伸。乔尔乔涅把他的人物放在广阔的风光中，使人物和风景表现同一的情调。风景本身，它那浓浓的树丛，它那轻缓的波动，以及它那奇妙的金光，都具有挽歌般忧郁的乐园阿卡迪亚那样感人的力量。把诗人们的阿卡迪亚这样变成视觉的语言，乃是一项头等重要的成就。乔尔乔涅的同时代人之所以把他的艺术当作一种迷人的启示，原因即在于此。乔尔乔涅使源出于威尼斯的画风达到完美的地步。威尼斯的艺术家们一向试图用颜色表示情调，这与佛罗伦萨的画风不同，在那里，颜色从属于线条和构图。在一些较早的艺术家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乔万尼·贝利尼和维托雷·卡尔帕乔的图画的风光背景中，我们可以追溯出乔尔乔涅的天才的基础是怎样形成的。另外，弗朗切斯科·科隆纳的《梦中爱情之战》（1499年

由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刊印，内有许多木刻插图）也有助于传播一种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但是，乔尔乔涅的艺术不应当被视为表现一种模糊的抒情的和哀伤的情绪。他的画总是依照当时的需要讲述很明确的故事。这位神秘的乔尔乔涅的未解之谜之一是：至今还无法解释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绘画，如《暴风雨》（藏威尼斯）《三个哲学家》（藏维也纳）和《音乐会》（藏卢浮宫）等的精确意义。

在本书里曾经再三提到，艺术理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从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把艺术的法则当作科学的时候起，自从阿尔贝蒂和达·芬奇提出实践必须以理论为基础的时候起，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与他的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自己的职业的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正是理论给予各个艺术家与现实做斗争的武器。

艺术理论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表现的正确性问题；二是美的问题。前者是通过透视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人体、解剖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广泛的自然现象的研究来达到的。因此，阿尔贝蒂要求：“首先画裸体人像，然后画穿衣服的。”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们都接受了这个忠告，我们从达·芬奇、拉斐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无数预备性的素描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因为如此，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孜孜不倦地、极端热心地研究解剖学和从事解剖人体。达·芬奇计划编定的《解剖学》，到16世纪末还存在着779页手稿。也正因为如此，达·芬奇付出大量的劳动，采取严格的实验方法，通过观察和试验，企图解开大自然的秘密。在另一方面，美是天工的回声和反映，只有用宇宙的和谐以其为基础的那些比例，才能够巧夺。“比例”，达·芬奇大声疾呼地说：“不仅在数目和量度中有，而且在声音、重量、时间和地点中，以及在每一种力量中都有……”为了保证一个艺术作品的美，必须把表现和适度的理论同比例的理论结合起来。达·芬奇特别是以阿尔贝蒂的发现为基础，要求艺术家必须令人信服地表现热情和情绪，而这些热情和情绪又必然准确地符合故事的戏剧性内容。他的《最后的晚餐》为应用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实物教材。由于这些艺术家们相信他们的作品的道德目的，表现的理论就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达·芬奇又应用阿尔贝蒂的定义，解释说：适度或者相称在于姿态、衣饰和位置的合宜。因此，适度也就等于历史的真实，而在古典主义的圈子里，从来就没有降低对这一点的要求。当拉斐尔为法尔内西纳别墅的天花板设计《古代群神的宴会》的时候，适

度要求参加宴会的诸神必须躺在长榻或睡椅上，这是古代用餐时的风尚。

在所有关于表现、相称和历史的真实的讨论中，拿画与诗来作比较是很方便的。假若能证明绘画与诗歌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方法，那么，绘画就会上升到诗歌的崇高地位了。贺拉斯在《诗艺》中有句名言：“诗如画”，这提供了古典的论断。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人们的确认为诗歌与绘画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主张说，绘画像诗歌一样，是模仿人类动作的东西；画家应该像诗人一样，从神圣的和凡俗的历史中，从过去的伟大榜样中，去选择他的主题。画家应该像诗人一样表现人类的感情，他不仅要取悦于观众，还要向他们传送知识——唤起他们的各种感情并使人类得到智慧聪明。最后，像诗人一样，艺术家通过知识上升到灵感，即“使他的意念变成神的意念的写照的那种神圣的力量”（达·芬奇语）。

虽然在理论上，阿尔贝蒂已经把艺术家的行业从手工艺提高到“高级艺术”，但在实际上，甚至在佛罗伦萨，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产生新的态度。在整个15世纪，艺术家们依然是从中下阶层补充新手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员或者贵族阶级的子弟志愿当艺术家者，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一个上等家庭的子弟坚持干艺术家的行当，那么，让他当一个画家的徒弟比当一个雕刻家的徒弟更为体面一些，因为画家隶属药剂师的行会，而雕刻家则作为石匠，与泥水匠并列在一起。在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中有一段已经确切证明的逸话，表明在他那个时代，至少是在佛罗伦萨的进步集团中，人们已经放弃了古老的观念。他的家庭属于佛罗伦萨的老自由民贵族，因此，父亲反对儿子立志去当一个艺术家。最后，他终于允许儿子到画家吉兰达约那里去当学徒（1488年）。当庄严的洛伦佐发现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雕刻家的天才的时候，父亲宣布说，他永远不会容许他的一个儿子去当石匠；只有在洛伦佐向他说明石匠与现代的雕刻家的概念之间的不同之后，他才应允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世纪受雇的手艺人发展成为当时的艺术家，而雇主发展成为艺术的赞助人。庄严的洛伦佐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赞助人和收藏家，同时也是当时的艺术赞助人最好的榜样。他首先在圣马可教堂的花园里开创了新式的艺术教育。在这里，青年艺术家们，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在老雕刻家贝托尔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个学

习班大约只存在3年，到1492年洛伦佐逝世就停止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它的真正性质，但是依然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学徒制度第一次被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教育取而代之，从这种教育中可以看到后世的艺术学院的最初的萌芽。

在15世纪期间，仍然司空见惯的是：艺术家们，甚至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们，都得接受任何应时应景的工作。他们不但为节日这样的短暂活动设计图样，而且为箱子和窗帘、骑兵的燕尾旗和骏马的装饰品绘图。16世纪初，这一切都改变了。瓦萨里在1550年问世的《艺术家传》中，反复谈到要求艺术家去干这类低级的工作，有辱于职业的尊严。由此可见，艺术家们有了新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才能是受到尊重的了。有了新的自由以后，艺术家这一类人本身也开始变化，自从15世纪末起，我们就开始看到至今艺术家们还往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性格。我们现在听说他们有超乎寻常的趣味和习惯。一度与达·芬奇合作的，似乎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搞艺术的第一个贵族的范例雕刻家詹弗朗切斯科·鲁斯蒂奇（1474—1554年），画家索多马（1477—1549年）、皮耶罗·迪·科西莫（1462—1521年）和蓬托尔莫（1494—1556年）等一类的艺术家，全都是著名的古怪人物。皮耶罗·迪·科西莫像一个隐士似的生活在污秽和肮脏之中；他那描绘太古生活的奇异而隐晦的图画（藏纽约和牛津）好像在抒发他心中的一团块垒。蓬托尔莫完全与世隔绝。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在1520年左右起来反对“盛期文艺复兴”的平衡状态的带头人，恰恰就是这位忧郁症患者。

艺术家们越来越坚持在孤独中创作，这是新时代的一个征兆。米开朗琪罗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正在作的作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开始时断时续地工作；紧张地创作一个时期，然后就休息一大阵。中世纪作坊连续工作的传统完全被打破了。为了容许新型艺术家的存在，就需要有认识和赞赏天才、从而准备忍受艺术家的怪僻和特性的新型赞助人。有一个传说说明这种新的关系：查理五世皇帝曾经弯下身体为提香拾起画笔，表示他对这位天才画家的尊敬。

教皇朱理亚二世对待米开朗琪罗的态度，也是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缩影。朱理亚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倡导者，他把布拉曼特、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决心使罗马成为世界的艺术中心。他对米开朗琪罗极为同情，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的巨大魅力，这种魅力与他自己的魅力极其相似。有一次，教皇拒绝为陵墓的事情接见这

位艺术大师。于是，米开朗琪罗写了一封信：“教皇大人：今天早晨，根据大人的命令，我被赶出您的宫廷；我现在奉告您，今后如果您想叫我效劳，您必须到罗马以外的地方找我。”写完信，他到佛罗伦萨去了。朱理亚耐心地试着劝说他回来。他给佛罗伦萨执政官写信说：“雕刻家米开朗琪罗毫无缘由地离开了我们，仅仅是由于任性。据我们得到的报告说，他害怕回来。其实在我们方面，我们理解这种有天才的人的心情，并不怪罪他。”这的确是一种新的语言。

没有另外一个艺术家对于整个艺术这个行业做出同样伟大的贡献。米开朗琪罗是艺术家们的雄心壮志和他们对独立自主的愿望的先驱。当他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他的家庭认为他在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他逝世以前很久，他就被敬为超人，被奉为神（divino）。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关于这种情况的变化写道：“在意大利，人们并不看重王公诸侯的声名；只有一位画家，他们敬若神明。”

二 在北欧

从1490年到1520年的时期，是北方艺术百花盛开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德意志有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和霍尔拜因这样的人物正在积极活动，尼德兰的艺术作坊仍然大量生产。正是在这时候，这些国家的艺术家们发觉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感到了宗教改革的春雷响动。

1494年春，当青年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正在往西走，到莱茵河上的几个大城镇去作《光棍旅行》的时候，被他的父亲从旅途上叫了回来。他遵从父命，回故乡纽伦堡结婚，并开设了自己的作坊。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又走了，不过这次是南下，到意大利去。这两次旅行是北方的艺术家们在世纪的转换时期不得不面临的危机的征兆。丢勒生于1471年，是一个金匠的儿子，在父亲的作坊里接受了最初的训练，后来到纽伦堡的主要画家米夏埃尔·沃尔格穆特（1434—1519年）那里去当学徒。这位大师，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德意志画家一样，受到罗杰·范·德尔·韦登（1464年卒）的强烈影响。在韦登的作品里，传统的哥特式构图与描绘世界外貌的新的兴趣完全融合在一起。丢勒在他的学习漫游期本打算去见画家和雕版师马丁·施恩告尔（1445—1491年），这个人几乎被认为是罗杰的弟子。但是，突然到意大利去旅行，这表明丢勒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当他在巴塞尔逗留的时期（约1491年），曾经与人文主义者和出版家密切来往，并为他们工作；在那里，他很可能见到了意大利的书籍和版画。回到纽伦堡以后，我们发现他十分仔细和精确地临摹意大利的版画。在他按照曼特尼亚和波拉约洛的原作所临摹的版画中，我们马上可以看出丢勒把全副精神贯注于人体的美和比例。正是这种兴趣驱使他两度访问意大利，第一次是在1494年，第二次是在1505年。他曾恳求可能是1500年来到纽伦堡的意大利画家雅各布·迪·巴尔巴里告诉他画人物结构的“秘诀”。当这位意大利画家表现出守口如瓶的时候，他开始研究维特鲁威。1504年，丢勒发表了一幅版画《亚当和夏娃》，这具体表现出他研究比例的初步成果。然后，他又根据规范图样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终于产生了采用同一主题的两幅大型版画（1508年作，藏马

德里)。稍后，他再一次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就是著名的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这时，丢勒还在准备写一篇内容丰富的关于艺术的论文，但是他只完成了关于透视和比例的书籍，这表明了他的特性。在晚年，他又在《四圣图》（1526年作，现藏慕尼黑）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一出自毕生的研究，表现为宏大而充满自信的作品。

丢勒一旦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他总要从意大利的艺术中寻求帮助。15世纪的北方艺术家们已经很知道他们周围的世界，但是，他们对视觉美的追求纯粹是经验主义的。意大利人研究大自然后，应用数学来作画。然而，这些意大利艺术家们只不过是返回他们本国的过去；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古代的纪念物、研究维特鲁威的法则以及研究大自然，只不过是同一问题的几个方面罢了。丢勒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或者佛罗伦萨；他只访问威尼斯就心满意足了，威尼斯是艺术家们正在从事他所要学习的东西的最近的中心。

大约到了1500年的时候，北方的艺术家们不能不注意在前70年间意大利所出现的发展情况了。丢勒的“学习”旅行可能是最初的这类旅行之一，但不久以后，这种旅行就较为常见了。30年前，青年艺术家们经常到佛兰芒现实主义的发祥地去作《光棍旅行》，现在他们到南方去了。奥格斯堡的画家汉斯·布格迈尔在1500年稍前一点访问了威尼斯，纽伦堡的雕刻家小彼得·菲舍尔于1508年去意大利，汉斯·霍尔拜因于1518年在米兰。甚至低地国家的艺术家们现在也到南方去；马比斯于1508年在罗马，扬·范·斯科勒尔应该是1520年左右在那里。

不过，这些旅行有多种多样的目的。与丢勒同代的德意志人当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理解了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问题：达·芬奇用数字和比例来构筑宇宙的缩影。丢勒写道：“因为艺术确实是埋藏在大自然之中；谁能把它挖掘出来，谁就能掌握它。如果你能得到艺术的精华，你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犯错误。通过几何学，你能够证明你的作品中的许多东西。”^[6]

他的同时代人对文艺复兴的课程在接受程度，总地说来，水平比较低。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1年）确实没有多少丢勒的深度或者敏锐头脑，不过，他的才华可能更多地在于对艺术的直接理解，这

种理解使他能够把去意大利旅行的经验完全与他的作品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在一个晚期哥特式的作坊——他父亲老霍尔拜因是在奥格斯堡的作坊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也必须跟意大利的新艺术打交道。在米兰，他一定看见过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岩间圣母》；他也许见过卢伊尼，他肯定看到过布拉曼特的某些早期作品。霍尔拜因给“舞厅”所作的正面装饰（1519年）和给巴塞尔市政厅所作的壁画（1522年），都充满了意大利的母题，尤其在它们布拉曼特式的建筑陪衬中更显得如此。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指出借用的主题来说明他的风格；他与意大利艺术相汇合的结果是深刻得多的。他从最初的作品起，就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现实感和严格地注重实际的做法，来补偿在想象和诗意方面的某些不足。与达·芬奇等一群艺术家相接触，只能够使他的眼睛变得更加敏锐。单纯的晚期哥特式的现实主义变成一种由更严格的形式原则所规范的连续不断的观察记录。大批的具有几乎100%真实性和简单构图的肖像画，就是德意志因素与意大利因素如此交融的产物。

在艺术的一个重要中心奥格斯堡，我们还能够研究南北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奥格斯堡像纽伦堡一样，是一个富庶的商埠，它主要从事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的贸易，与威尼斯的关系特别密切。实际上，德意志商人在威尼斯有他们自己的居住区，即“德意志商栈”。这个德意志居民区具有非常强烈的意大利式的趣味，在1508年聘请两位意大利的巨匠——乔尔乔涅和他的青年助手提香去装饰“商栈”的正面。丢勒为德意志人礼拜堂所作的祭坛画《玫瑰园中的圣母》（1506年作，藏布拉格），也许更多地受他极为敬佩的乔万尼·贝利尼的影响，而不是承袭北方的传统。因此，奥格斯堡的商人们希望他们的主要画家汉斯·布格迈尔（1473—1531年）为他们画出像他们在威尼斯的同事们所得到的那一种画，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事情。特别在布格迈尔的肖像画中，但也在他的祭坛画中，我们从构图的要素和浓艳的色彩，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自威尼斯的影响。正是委托作画者的趣味，使施恩告尔的弟子变成了威尼斯派的追随者。像这样的外部压力越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接受就越可能表面化。

我们从许多实例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但是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卢卡斯·克拉纳赫（1473—1553年）的作品中看得更为清楚。在某些方面，克拉纳赫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革新家之一。从1505年起直到他

逝世为止，他曾经受萨克森的几代选侯雇用。他在维滕贝格的作坊生意兴隆，有许多德意志的王公光顾。在他的大量产品中，有一些奇异的神话作品，它们的题材诸如：《泉边仙女》（藏莱比锡）、《维纳斯与小爱神》（藏罗马市民美术馆）和《海克力斯的选择》。所有这些题材文艺复兴的艺术赞助人必然要求用“古典的裸体”来表现。克拉纳赫对于这一类的要求是认真执行的；虽然他所画的人物还保留着许多哥特式的流动线条和优雅神态，但并非这种风格的特点使他所画的人物看起来那么缺乏古典的味道。他所画的人物不是裸体的，他们只不过是没穿衣服罢了。维纳斯仅仅戴个大帽子，美惠三女神炫耀闪闪发光的金项链，丘比特在腰上围一小块透明的轻纱。在这些画中，现在还有许多幅存在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们都是收藏家精选的作品。哥特式的遗风与古典式的重生的这种饶有兴味的结合，只不过是艺术而变得体面的放纵而已。

尼德兰的艺术家们经历了同样的两种传统的冲突。罗杰·范·德尔·韦登画派的势力正在衰退；他的最有影响和受人欢迎的徒弟之一汉斯·梅姆林于1494年去世。盖哈德·大卫（约1460—1523年）和海特亨（工作年代：约1490—1510年）把哥特式现实主义的传统继续了一个时期。一旦艺术倡导者和艺术家们都了解这种风格确实已经过时，丢勒的木刻和铜版画就开始产生相当的影响，这在卢卡斯·范·莱登（1494—1533年）的作品中表现得最清楚。当丢勒本人在1520年访问尼德兰的时候，他到处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人们推崇他是北方活着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在整个15世纪下半叶，北方与意大利的艺术始终发生直接的和重要的接触，但是，这主要是单方向的交往。尽管美第奇家族用佛兰芒的挂毯装饰他们的宫殿，托马索·波尔蒂纳里委托雨果·范·德尔·戈斯为一座佛罗伦萨的教堂作祭坛画，但是，荷兰和佛兰芒的艺术家们几乎没有由于他们所见到的意大利同代人的那些作品而动摇他们自己的传统。罗杰·范·德尔·韦登的绘画几乎没有显示出他在1450年左右到意大利去做过一次旅行。一个生活在50来年之后的艺术家的作品，通常立即会暴露出这位艺术家是否到过意大利，甚至不需要有什么文件作为佐证。马比斯可能是通过对意大利和古典艺术的经验形成自己风格的画家的最典型例证。在尼德兰，我们在克拉纳赫的绘画中所见到的那么奇怪地被歪曲了的古典传统，在马比斯的作品中却表现得纯正得多了。在马比斯的学习过程中，对丢勒的研究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他只有经过1508年根据他的

保护人、极有教养的勃艮第的菲利普的建议到罗马小住以后，才得到引起他的同代人尊敬的那种特有的风格。1484年，布鲁日的一个出版社刊印了奥维德《变形记》的一个中世纪讽古喻今的本子，叫作《奥维德醒世谭》。这本书有许多木刻插图，图中画的是古典时代的英雄们披挂着中世纪的重型盔甲，仙女和女神们都穿上了当时贵妇人的服装。大约20年以后，马比斯为他的保护人画了一幅《海神夫妇》（1516年作，藏柏林）。两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裸体像，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由于认真研究古典的雕像和浮雕才产生出来的；就连布景，一个巨大的神龛，也同样是纯古典的性质。瓦萨里告诉我们说：马比斯是把正确地处理的神话题材引进佛兰德的第一位艺术家^[7]。甚至在北方，这些传说也向从来没有被人完全忘记，而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又帮助艺术家和艺术倡导者们再一次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在这种“复兴”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一种社会学的强大动力，因为它是一种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物所需要的艺术。

对于丢勒来说，古典复兴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在青年时代，迷恋于奇怪的神话主题，例如《尤萝芭被劫》《海妖》《海克力斯》，或者《一个学者的梦》，他在这幅画里画进去一个古典式的裸体维纳斯。但是，随着他日益成熟和充满自信，丢勒明确地意识到，他能够通过宗教的、具有明显基督教性质的作品来最完美地表达他的美的理想。在心绪极为紧张的时期，例如在宗教改革的前几年，他偶而倒退回去，画一些对他说来是属于异教黑暗势力的东西（《独角兽背上的诱拐》，1516年作），但是，如果我们就丢勒的作品整体来说，在他1505—1506年的第二次意大利旅行之后，明显地不存在任何神话的题材，而且这并不是偶然的。丢勒本人在他的理论文章中讲得十分清楚：宗教艺术必须比其他一切艺术占有优先地位。寻求美的规律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是正确的。丢勒是同时采用传统宗教题材的画家兼铜版家，也是第一个抛弃掉晚期哥特艺术样式的德意志艺术家。

在1515年弗朗西斯一世登基以前，比较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法国还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穆兰画师”是具有传统哥特风格的一位典型艺术家。这位画家之所以被叫作“穆兰画师”，是因为他的最重要作品是穆兰大教堂中的一幅祭坛画。“清澄、明晰、庄重”是他的艺术的主要特点^[8]。让·佩雷阿尔（约1455—1530年）曾经陪同路易十二世去意大利，尽管如此，正如他的国王肖像（藏温泽）所表明

的那样，他依然忠实于传统。至多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发现米兰绘画的一点微薄的影子。布尔狄雄（约1457—1521年）好像受到了佩鲁吉诺的影响。但是，就整个来说，在15世纪末，法国绘画显然处于停滞的状态^[9]。

德意志的雕刻家们表明他们也意识到了画家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虽然在程度上轻一些。蒂尔曼·里门施奈德（1468—1531年）主要在莱茵和美因两河之间的地区工作，他成功地继承了哥特式雕刻的传统。他对人体的解剖，不论是穿衣服的或裸体的，从来就不够认真，站立的姿势不稳定，头像很少表现真正的感情。但是，人体的轮廓总是生动的，衣服和头发的安排足以使光 and 影的变化获得最大的效果。亚当和夏娃的迷人的雕像（藏维尔茨堡）是他那颇有几分柔细的艺术的很好的范例。

维特·施托斯1493年所作的巨幅祭坛画（克拉科夫大教堂），也完全没有超出哥特式的传统。在这幅画中，佛兰芒的现实主义，像德意志雕刻那样地处理衣饰，以及对于富有表情的姿势和头像的显著兴趣，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受任何文艺复兴的条条框框限制的、具有独特性格的、高度戏剧化的风格。施托斯的其他作品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这些作品大多数藏在纽伦堡及其周围，他曾在纽伦堡有自己的作坊。

我们又一次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找到为迎合意大利式的趣味而制作产品的作坊。老彼得·菲舍尔（约1455—1529年）的作坊曾经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强烈影响，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小彼得（1487—1528年）和汉斯（约1490—1549年）曾在意大利住过一个时期。他们的家庭作坊的最重要产品，罩在圣塞巴尔杜斯的遗骨上的神龛（1508—1517年作，在纽伦堡的塞巴尔杜斯教堂），总的设计依然是哥特式，形式遵循过去的传统。但是，它装饰了100多个小雕像，其中有许多很清楚地显示出是基于意大利的范本。在哥特式神龛根底下所出现的那些真正古典式的仙女们、小海神们和森林神们最清楚地表明了不同风格的这种奇异的混合。奥格斯堡的雕刻家阿道夫·道赫尔（约1465—1524年）为福格家族的一个成员装饰坟墓，雕刻悲伤的森林神和小天使骑在海豚身上，这可能来自威尼斯的范本。

当时，教堂建筑的活动很少，因而也就很少有人委托制作大型的艺术作品。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不久，连雕刻的祭坛神龛也日暮途穷了。但是，在死亡与灾祸的思想占据了人们心灵的时期，还经常有人委托制作富丽堂皇的陵墓，文艺复兴的装饰物在陵墓的美术加工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喷泉有时也按照新的风格制作。1532年，汉斯·菲舍尔在纽伦堡市政厅的院子中的喷泉顶端装置了一个阿波罗像。这尊雕像的设计，很可能受到罗马著名的观景殿的阿波罗雕像的影响。但是，雕刻家们把他们的精力用于创作小型装饰作品和收藏家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为既有钱又有教养、而且通常是亲身去过意大利的主顾制作的，因此必须适应当代的口味。在德意志，文艺复兴的雕刻主要是通过这种小型雕像为人所知。

用新风格处理的不仅仅是古典的神话。当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那里受雇多年的沃尔姆斯的康拉德·梅特（约1475—约1550年）用雪花石膏制作犹滴的小雕像（藏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的时候，他把她做成全裸体，就像古典的维纳斯雕像一样，充满强烈的性感。汉斯·道赫尔（约1485—1538年）把以纯哥特式的风格设计的圣母抱圣婴、另外有几个天使的雕像，放进了一个布拉曼特式的敞亮的大厅，这个大厅即便在最能吹毛求疵的意大利批评家的眼睛里，也会通得过的（浮雕，1518年作，藏维也纳）。

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雕刻中，也可以见到同样的过渡风格。米歇尔·科隆贝为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二世设计的陵墓（在南特大教堂，1502—1507年作）是最典型的例子。横卧着的逝者雕像和跪在他头部旁边的小天使们都是传统风格的，但是装饰的细部，特别是陵墓四角的海扇壳和寓言人物，则是别出心裁了。法国与德意志不同，在整个这一时期，有不少意大利雕刻家在那里积极工作。伦巴第雕刻家马佐尼所设计的查理八世的陵墓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朱斯蒂家族（在图尔落户后自称朱斯特）的一个成员所设计的路易十二世的陵墓（1516—1531年作，在圣德尼），可以说明在法国所流行的风格。个体装饰的样式是意大利的，但整个陵墓仍然是哥特式的类型。

在尼德兰，直到16世纪20年代晚期，几乎无法发现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雕刻的影响。在朗斯洛·布隆代尔为布鲁日的正义宫所雕刻的富丽堂皇的壁炉架之前，就没有真正重要的例证。

北欧的建筑艺术几乎没有受到15世纪期间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当建筑家想要吸收一种新风格的时候，他甚至比画家或者雕刻家更要依靠图样册和理论文章，可是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一类东西。阿尔贝蒂的《建筑十论》是在1485年出版的，但是，事情很明显：任何建筑师读了这部没有插图的书，也营造不出来与卢切莱府邸即使稍许相似的那样的建筑。另外，营造某些大教堂，例如乌尔姆、科隆和图尔的大教堂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具有严格传统的砖瓦石工的小屋依然是青年建筑师的温床。如果说砖瓦石工确实前往直意大利，他们不是去学习布鲁内莱斯基或者布拉曼特的艺术，而是去参加建造波洛尼亚的圣彼得罗尼奥教堂或者米兰大教堂等巨大的哥特式建筑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哥特式的传统在建筑艺术中存在的时期最长。1499年开始营造的安纳贝格（萨克森州）的安娜教堂和1518年开始营造的哈雷的圣玛利亚教堂都是哥特式边廊与中殿同高的教堂，但是穹顶下面的肋拱不再有任何功能的性质，而那八角形的凹面立柱十分奇妙，仿佛与穹顶无关似的。哥特式的形式依然为人所使用，但是，哥特式的宏伟大教堂的整个神韵，这时似乎已经荡然无存。法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过在程度上稍小一些而已。在那里，火焰式曲线风格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足以产生覆盖在14世纪鲁昂大教堂正面或者马丁·尚比瑞在1507年设计的特鲁瓦大教堂正面上的那种富丽堂皇的屏饰。实际上，查理八世1494年大动干戈远征意大利，在艺术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和在政治方面一样小。乔孔多修士和朱里亚诺·达·圣加洛1495年以后都在法国小住一个时期，但并没有留下可探索的作品，路易十二世在位期间所营造的布卢瓦城堡的侧翼，根本就看不出意大利的影响。直到弗朗西斯一世登基以后，才创造出一种非常意大利化的宫廷风格。他给布卢瓦城堡加上去的侧翼虽然是哥特式的建筑物，却展示出许多取自米兰建筑艺术、但并不显得不自然的文艺复兴的装饰。甚至1519年开始建造的尚博尔城堡也还是各种风格相杂的混合物。达·芬奇寄居法国时期（1516—1519年）所作的某些设计，后来对宫殿建筑艺术产生了影响。但是，大多数表现显著的意大利影响的建筑物，都不是建在本章所讨论的时期之内。

在16世纪最初20年间，建筑师们通常只满足于从南方借用一些装饰的母题，在哥特式的基本结构上薄薄加上一层文艺复兴的饰面。1507—1526年间在马林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建造的宫殿（现为正义

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门是文艺复兴式的装饰,窗户上冠以弧形拱,但是,陡斜的屋顶依然是哥特式的。

这种混合样式在德意志也很流行。早期的最好范例,又是在奥格斯堡。富有的福格家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们雇用意大利工人在圣安娜教堂内建造一个小礼拜堂(1509—1518年),并且要使他们在城内的府邸具有意大利府邸的外观(1512—1515年)。在北方,各种形式和风格混合的最典型的产物是在雷根斯堡仁慈的玛利亚教堂的造型(1519年)。它的中心式底层平面图几乎是正确的意大利型,但带一个中堂和一个晚期哥特式的立面。

当时对艺术的鼓励倡导,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个不协调的过渡阶段。我们对几位法国国王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讲得很多,足以阐明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两个典型的德意志的例子。马克西米连皇帝(1459—1519年)看起来既是中世纪精神又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化身。这位“最后的骑士”,本身就是一部旧式传奇小说《白色的国王》的作者,他喜好驰马比武,他把亚瑟王列为自己的祖先,同时他也渴望自己像真正的罗马皇帝一样,骑着马得意扬扬地从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的凯旋门下走过;他把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们聚集到自己的周围,并且与他们共同研究古代文物和文学;他喜欢亲自指导为他工作的艺术家们的设计图样。但是,所有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场纸上春梦而已。凯旋门始终没有真正造起来,它像胜利大游行一样,只留在一系列的木刻上,这些木刻是由许许多多德意志艺术家设计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丢勒。在这些木版画里,两个世界再一次相遇了。从1505年第一次出版的贺鲁斯·阿波罗的《象形文字》一书中摘录出来的古代人的奇巧图案,跟中世纪动物寓言中的母题混合在一起;意大利带翅膀的天使与德意志步兵并肩奔驰。《凯旋门》把意大利的装饰因素应用到一个非常不古典的哥特式建筑物上。但是,马克西米连的最古怪的一项事业,恐怕就是他在因斯布鲁克为他自己所设计的陵墓了(从1502年起建造)。这个陵墓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一直没有完成。他召唤来德意志最优秀的雕刻家,其中有维特·施托斯和老彼得·菲舍尔。陵墓的正中心预备放置一个石棺,石棺上是跪着的皇帝青铜铸像,在他的周围约有140个代表他的祖先、他的重臣、所属各行省等的大小雕像。这个陵墓使人想起米开朗琪罗为朱理亚二世所设计的坟墓,但是我们立即可以看出两种方案之间的巨大差异。米开朗琪罗千

方百计保持他的纪念物的形式的统一，而且，每个细部都服从于总的哲学观念（参见第134页）。马克西米连的陵墓最多只能成为上等雕像的集合体，因为雕像的整个安排缺乏统一性。骄傲、渴求不朽的荣耀、皇帝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这个陵墓中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世俗的虚荣心。正如当时的任何意大利人一样，马克西米连希望自己能够万古流芳；他希望有一个可以令人看见的、表明万世长存的标记，但是，他依然是一个披戴着中世纪盔甲的骑士，跟那些在他的雕像周围的他的祖先一样。

如果马克西米连是把他自己打扮成罗马皇帝的角色，那么，勃兰登堡红衣主教，美因茨、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则是企图与当代的意大利王公相比。他既是一位教会领袖，又是一位地区领袖，此外，还是选侯之一。他残酷无情、虚荣心强，不过，却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大规模地仿效意大利奖励艺术的行动，把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克拉纳赫和其他许多艺术家召唤来为他工作。实际上，格吕内瓦尔德曾在他的宫廷中任官多年。当他把红衣主教画为圣伊拉斯谟（约1518年作，藏慕尼黑）的时候，那种作寓言肖像画的流行的古典形式，肯定是根据主人的建议采取的，但是在构图和设计上，这幅画毫无疑问是北方风格的。

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有这样一种趋向：他们对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冲突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德意志艺术的一场灾难；他们叫嚷说，德意志艺术变成了外国侵略的牺牲品。本书不是批驳这类民族主义理论的场所。不过，有两个因素应该铭记于心。到了15世纪末，哥特式的艺术已经有山穷水尽的迹象了，这一点将会看得很清楚的。过去曾经是一种风格的东西，现在有变成陈规旧套的危险了。另外，“文艺复兴”是一种欧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意大利，即便它是在意大利开始的。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发现世界和发现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虽然我们现在倾向于修正这种提法，但是布尔克哈特的话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如果说在意大利，“发现世界”以达·芬奇的包罗万象的作品达到了顶峰，那么在德意志，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奥地利，它在纯风景画中得到艺术的表现。即便是完全注意到了自然美的希腊人，也从来没有凭风景本身的地位把它当作题材。在中世纪，风景的成分只不过是宗教故事的象征性的陪衬而已。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才进行精确的观察，例如，把植物正确地画在

草本书册里。15世纪的佛兰芒艺术家和他们的德意志追随者们给予风景很多的注意和很大的地盘，虽然始终不过是作为远距离的背景。卢卡斯·克拉纳赫在维也纳工作的时候，曾经画了一幅《耶稣受难》（1503年作，藏慕尼黑）。在这幅画中，他对大自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但是，他在构图中作了两点极为重要的革新：在画整个的景色时，尽最大的可能求得地质学的和植物学的正确性；同时，所取的视点极低，仿佛我们就在这些林间空地和萋萋芳草的跟前观看，因而直接被引入风景之中。另外，风景部分在整个画面中的比例也开始增大了。在《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1504年作，藏柏林）中，看起来布景与圣家族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菲尔（约1475—1538年）可能亲自见过克拉纳赫，他对于这些革新肯定是充分了解的，而且将它们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的《圣乔治和龙》（1510年作，藏慕尼黑）实际上是一幅带人物的风景画。另外，阿尔特多菲尔仿佛是第一个只画风景不加人物的欧洲艺术家（约1532年作，藏慕尼黑），在他的图画和铜版画中也有纯粹的风景。沃尔夫·胡贝尔（约1490—1553年）可能是在见过阿尔特多菲尔之后，继承了这种风格。

上面刚刚提到的3位艺术家，与几个二流的画家一起，有时被称为“多瑙画派”，尽管按照这个名称的正确意义来说，并没有这样一个派别，而这一群人的风景画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丢勒在他的两次意大利旅行中，就曾经制作他的几幅最美好、最精致的阿尔卑斯山风景水彩画，甚至在此之后，他还偶尔画这一类的作品。最初，好像只有艺术家和鉴赏家欣赏绘画的这个新的支派。丢勒只把他的水彩画当作素描；素描、铜版画和水彩画都被用作媒介物；现存的很少几幅绘画都是小尺寸的。因为是画在皮纸上的，很难管它们叫作架上画，但是保持着细密画的性质。不论是用的什么媒介物，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大自然的诗情画景的热烈感情，有时候，像在阿尔特多菲尔的一些晚期图画中那样，反映出对不可思议的广阔世界怀有一种敬畏的感情。

在同一大师的宗教画中，也充满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在他的圣弗洛里安教堂大祭坛画（1518年作）中，是用风景衬托圣塞巴斯蒂安的故事，这些风景增添了感情的成分，最动人的一个场面是描绘在阴森可怕的黄昏里，在河边找到圣塞巴斯蒂安的遗体。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宗教感情，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和运动期间，德意志艺术家们的许多作品的特点。在15世纪期间，德意志和佛兰芒的艺术家们为宗教的肖像画制成一种特殊的工具，这后来成为对宗教改革家的物质援助，这就是印刷版画。丢勒改进木刻和铜版画的技术，他用这些媒介物所制成的作品在欧洲是举世无双的，就连意大利的艺术家们也盗用他的印刷版画。丢勒的《圣母生平》，他的几组耶稣受难图，他的无数单张印制的版画，他在纽伦堡的画派的版画，彭茨、贝哈姆兄弟、汉斯·巴尔东·格里恩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版画，全都证明艺术的这一分支是多么多产和生气勃勃。丢勒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版画的评价似乎就比对他的油画要高一些；甚至在他去世以后，伊拉斯谟还用人文主义的优雅笔法，称他为“黑线条的阿佩列斯”^[10]。

汉斯·霍尔拜因的《死亡的舞蹈》（1523—1526年作，1538年出版）和丢勒的《启示录》（1498年作）使我们想起在本章所讨论的时期宗教反思的较忧郁的一面。萦绕于怀的对太平盛世的担忧，以及像病态性地专注于烦恼和苦难，这在本时期的两位最伟大的画家——布希和格吕内瓦尔德的作品中占有主要地位。希罗尼姆斯·布希（约1450—1516年）仍然属于15世纪他的故乡荷兰的传统，但是，他借助于晚期哥特式的表现形式，发展了一种至今还很少得到解释的画风。最近有人想把布希列为难解的亚当派的画家，但不能令人折服^[11]。布希喜欢再三再四地描绘威胁圣安东尼的可怕的妖怪（藏马德里），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的阴惨情景，这是当时的人们的心理状态的一部分。自从布希用他的生花妙笔，以最高度的写实手法来描绘这些恐怖情景以后，它们就显得更可怕得多了。

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约1480—1529年），真名为马西斯·尼萨特·戈特哈特，他对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的宗教热情做出了真实的反映。他根据德意志的传统，作雄劲有力的宗教图像，只吸收很少一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因素。他的最伟大的作品，为伊森海姆的安东尼隐修院所作的祭坛画（约1512年完成，现藏科尔马博物馆），是所有哥特式祭坛画中最佳的作品之一。它包括一个神龛（里面有尼古拉斯·哈格瑙尔所作的雕像）和两对可以移动的、带有绘画的侧翼。其中一幅《圣安东尼的诱惑》具有咄咄逼人的极端可怕性质，其精神类似布希的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作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再像15

世纪艺术家们经常描绘的那样是一出宗教剧中的引人场面了。他把耶稣和施洗礼者都放在十字架下，以此强调这次牺牲的象征意义。他在描绘耶稣受难时所表达的强烈的想象气氛，使看画的人对影响当时大多数宗教思想的《效法基督篇》一书发生兴趣。

在这幅画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与丢勒的作品所反映的和他在书信中所讨论的同样的宗教的烦恼^[12]。丢勒和格吕内瓦尔德两人对路德的著作的反映方式，比他们的个人经验要重要得多。格吕内瓦尔德好像深深地陷入了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宗教和社会的动荡之中，似乎积极参加了农民大起义。不管怎样，他在16世纪20年代初期肯定已经搁下了画笔，此后靠制造肥皂这样低贱的工作维持生活。他的神秘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已经没有了地盘。另一方面，丢勒通过研究意大利的艺术，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根据他自己所讲，路德的著作大大解除了他的烦恼。1520年以后不久，在他的木刻中就出现新教的形象。他放弃了以描绘圣母和圣婴为中心画板的大祭坛画，而竭尽全力去作他的做供奉用的《四圣图》（1526年作，藏慕尼黑），作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表示，他于1526年将此画送给他的故乡纽伦堡。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热切希望百世流芳的艺术家的行动，而更多地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新型艺术家的行动。丢勒运用自己曾经思索和研究过的一切，来描绘真正基督教的4个传道师，以警告世人要反对罗马教廷的弊病，但更要反对狂热的宗教改革分子的过火行为。在这幅画里，他的确是企图在艺术和宗教两方面，寻求一种新旧之间的新的有力平衡。德意志的许多艺术家为路德的战斗提供了有力的绘画武器，但是只有丢勒一个人找到了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完全融合在一起的途径。1520年左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笼罩北方艺术创作的两种巨大的力量。

三 在西班牙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期间，西班牙的国家活动的许多成果之一，是促进各种艺术得到新的和普遍的发展。如果说按欧洲的标准，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艺术只算作次要的话，那么，它在许多方面却有显著的特色，同时，它后来在西班牙所攫取的新大陆领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艺术产品依然以宗教的目的为主，但是这时王室的倡导在鼓励其发展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伊萨贝拉亲自兴修和资助修道院、教堂和公共机构；在她的建筑物上，正如在她的手稿的边缘上一样，作为装饰的母题，出现天主教君主的表记轭和矢，以及他们的饰有纹章的盾。另外，伊萨贝拉用大部分是从外国买来的挂毯和绘画装饰她的居室，这为西班牙王室收藏宝物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些主要的艺术倡导者是贵族和有钱有势的高级教士，如门多萨家族、丰塞卡和希门尼斯等，他们兴修府邸、礼拜堂、医院和大学，并且仿照王家的式样，为他们自己大造陵墓以流芳后世。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使这些人在摩尔人的榜样启发下，养成挥霍钱财进行装饰的趣味，在他们的装饰中，次要的艺术——细木工、金工、铁工等等占有重要的地位。

直到15世纪末，西班牙的艺术依然是在北方影响的支配之下。不仅如此，这种影响到了16世纪还是不减当年，为萨拉曼卡大教堂和塞戈维亚大教堂所选择的照旧是纯哥特式的风格。15世纪最后25年间，在绘画和雕刻中最初出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模仿品，但是，它们大多只限于在建筑物上和装饰细部，并且不是变革而是修改当时流行的西班牙—佛兰芒风格和哥特风格。由于长期爱好北方的艺术和一向喜欢穆德哈尔人的风味（在建筑艺术和次要艺术中依然存在的臣服西班牙的穆罕默德教徒的艺术），西班牙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事物接受得很慢。另外，异教的题材虽然在文学中已经司空见惯，但是，那些以他们的战功奉献于教会的基督教的英勇斗士们，作为艺术倡导者，对此并没有几分兴趣。绘画几乎完全限于祭坛画和以宗教为主题的架上画；壁画、甚至肖像画是很少见的。雕刻主要用于祭坛、陵墓

以及建筑物的装饰；对于半身像、城市纪念碑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独立雕像的需求是极少的。

尽管紧紧依靠外国的模型，而且有许多外国艺术家介入，但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即建筑雕刻的领域里，西班牙艺术却发展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性格。因此，在伊萨贝拉统治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火焰式哥特风格的西班牙建筑式样，就被人称为伊萨贝拉式；以接受意大利影响为标志的下一个阶段，也用一个特殊的术语来表示，叫作银匠式风格（Plateresque），这个术语源出Plateria（银饰品），到17世纪又被用来批评那些以“银匠式的狂想”^[13]破坏罗马（文艺复兴）建筑艺术法则的艺术家。伊萨贝拉式和银匠式的主要的和共同的特征是：以浅雕构成的许多装饰覆盖很大的表面，而且不大管下面的结构如何，利用这种装饰当作屏幕一样——这些特征与摩尔人的艺术极其相似。母题的重复和混合，从传统的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图形一直到徽章、纹章、铭文和蔓藤花纹，产生一种始终是放任自由的、往往是稀奇古怪和异国情调的效果。由于建筑和雕刻的密切关系（许多艺术家身兼两种行业），伊萨贝拉式和银匠式这两个术语既适用于祭坛作品和墓碑，也适用于建筑本身的装饰，如墙壁、门道、拱门、窗户，等等。巴利阿多利德的圣格雷戈里奥教堂和圣巴勃罗教堂的雕刻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放大的祭坛后面的石制装饰屏，而吉尔·德·西洛埃及其弟子们所作的巨大的彩色祭坛雕刻，几乎充满他们所装饰的教堂半圆形后殿。无论是独立的坟墓或者是墙墓，同样都有精心的结构和巨大的规模。

托莱多的圣胡安·德洛斯·雷耶斯修道院是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命令之下，为了纪念他们在托罗战胜葡萄牙人，于1476年开始建造的。尽管它的设计者、雕刻师兼建筑家胡安·瓜斯可能是法国血统，但是，这一修道院是伊萨贝拉风格的最早和最典型的范例之一。哥特式教堂内部，原来准备作为国王和王后的长眠之地，到处都是装饰性的雕刻品，有人像、饰品、刻有巨大哥特体文字铭文的雕带，而在所有这些雕刻物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王家盾牌的巨大图形，并附有轭和矢的图形，它们在耳堂的周围重复出现。

大门和门楣中心部的雕刻装饰，是沿袭中世纪的宗教建筑而来的，它变成了伊萨贝拉式和银匠式建筑正面的主要形态。这时，这种装饰扩展到了住宅建筑，在住宅中，第一次像装饰内部一样来毫不吝

畜地装饰它的外部。窗户、走廊、飞檐、栏杆，以及巴蒂奥（Patio，中世纪以来西班牙住宅所特有的内院）的连环拱廊，也都加上许多雕刻。房屋的正面往往点缀着雕琢成小平面的石材，而萨拉曼卡的孔查府邸的正面则镶满贝壳，以表现出宅主的“圣地亚哥骑士”的称号。胡安·瓜斯和他的助手们在瓜达拉哈拉所建造的王子宫（1480—1492年建，1936年大部被毁），其装饰丰富而复杂，使它成为贵族住宅的最豪华的榜样。正面的装饰有一个带连环柱的外廊，钟乳石状的飞檐，和由几个“野人”举着的门多萨家族盾形纹章。在内院里，一些托斯卡纳式柱支撑着三叶形拱，拱肩上满刻着有纹章的动物、盾牌和涡形花纹。顶棚属于穆德哈尔式的精致结构。

在15世纪末，虽然已经渗入意大利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妨碍伊斯兰教征服者和新世界发现者所表现的对浮夸气氛的追求；这种影响向艺术家又提供了一大套装饰的母题。他们也毫不迟疑地把称为“仿古式建筑”的新风格与“现代建筑”即哥特式混合到一起，而且并不遵循任何清晰的年代顺序。恩里克·德·埃加斯于格拉纳达陷落之后，在那里修筑了哥特式的王家礼拜堂（1506年），他也是早期银匠式风格最重要的倡导者。他为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修建的圣地亚哥的王家朝圣行宫（1501年开始营造），以及他为门多萨红衣主教所设计的托莱多的圣十字医院（1504年动工），都有以意大利装饰图案为主，也夹杂一点哥特形式的典型的银匠式正门。正如在西根萨大教堂的圣母领报礼拜堂入口处的彩画拉毛粉饰（1510年）一样，文艺复兴的装饰也往往与莫德哈尔式混合在一起。在萨拉曼卡大学的正门（1529年完成）上，皇帝查理五世的纹章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纹章并列在一起。这个正门的细部完全是意大利式的，有圆雕饰人像和仿制的古代雕像；但它仍然是建在哥特式的框架里边，仿佛用来作为建筑物正面的屏幕。在查理五世的整个统治时期，无论是哥特式的建筑物还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全都继续使用银匠式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有的是由意大利式和哥特式组成，有的是由意大利式和穆德哈尔式组成，也有的是由纯意大利的因素组成。而在巴洛克式建筑时期，它的许多特征都得到了反映。

促进银匠式装饰的意大利影响的第一道波浪，是由雕刻品的输入和意大利艺术家到达西班牙引起的。1498年旅居布尔戈斯的法国人菲利普·维加尼（德·博戈纳）对于传播新风格也做了很多贡献，特别

是由于他把文艺复兴的设计应用于传统的西班牙多彩祭坛作品。同时，他的活动还从布尔戈斯扩展到格拉纳达。但是，在16世纪的头25年间，意大利影响的主要来源是在意大利委托建造陵墓的新风尚。访问西班牙的最重要的意大利艺术家是佛罗伦萨人多梅尼科·范切利，他于1510年到塞维利亚，安装他在热那亚为门多萨大主教的陵墓雕刻的装饰。这引起了王室一系列的订货，其中包括阿维拉的圣托马斯教堂中的胡安王子墓（1513年造），以及在格拉纳达的王家礼拜堂中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本人的陵墓（1518年造）。所有这3个墓都受到波拉约洛在圣彼得教堂中为西克斯特四世所做的陵墓的启发，而且符合当时在西班牙依然流行的独立坟墓的传统。正如建筑方面的情况一样，纪念性雕刻所接受的意大利的影响，起初只限于装饰细部，直至范切利逝世（1519年）以后，它才开花结果。当文艺复兴的形式终于扫尽哥特式的残余时，这主要归功于新一代的艺术家，如奥多涅斯、马丘卡、阿隆索·贝鲁格特和迭戈·德·西洛耶——热爱意大利和古典风格的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在他的“群鹰”即著名当代艺术家名录（1548年）中所列举的4个西班牙人。他们都在意大利学的技艺，把“盛期文艺复兴”的成熟的风格带回西班牙。直到1526年，西班牙才开始营造第一座古典的建筑物，即马丘卡在格拉纳达所建的查理五世的宫殿（未完成）。同一年，西班牙出版了第一部论述古典艺术的著作，迭戈·德·萨格雷多根据维特鲁威的《建筑十论》所写的《古罗马建筑法式》在托莱多问世。

在绘画中，也像在建筑和雕刻中一样，对于北方艺术的爱好，直至16世纪依然不曾衰减；伊萨贝拉女王的庇护，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所收藏的200多幅画的目录和她遗赠给格拉纳达王家小教堂的作品，都表明她特别喜爱尼德兰的艺术家们：范·德尔·韦登、梅姆林、布希和大卫。她还聘请几位北方人——梅尔乔·阿莱曼、米歇尔·西多、胡安·德·弗兰德斯——当宫廷画家，虽然她的主要画家是托莱多的弗朗西斯科·查孔，这个人也充当检查官，其职责是：如有任何犹太人或摩尔人胆敢描绘基督、圣母或随便哪一个圣徒的形象，就立即予以取缔。不过，伊萨贝拉也藏有一些意大利的绘画，其中有一张是博提切利的，有一张是佩鲁吉诺（？）的；而且，她所喜爱的佛兰芒艺术家中有一些人曾经与意大利有过接触。这样，当西班牙——佛兰芒风格在宫廷中盛极一时，并且由卡斯蒂利亚的加雷戈斯和阿拉贡的贝尔梅霍那样的艺术家广为运用时，意大利的因素就开始出现

了，它们在绘画中出现的方式大体上与它们在造型艺术中出现的方式相同，也大体上与它们在当时的许多佛兰芒绘画中出现的方式相同。它们的产生既归功于这些画的影响，也归功于直接来自意大利的影响。

佩德罗·贝鲁格特是在15世纪访问意大利的寥寥无几的西班牙艺术家之一。1477年，他与梅洛佐·达·福尔利和根特的于斯特斯同在乌尔比诺。他回西班牙的时候，带来了对于叙事的、写实的细部和文艺复兴的装饰物的爱好，也带来了关于透视的知识。但是，由于他主要是为西班牙所流行的那种大祭坛画作小的镶板画，因此他的风格更接近于意大利化的佛兰芒画家的风格，而不是接近了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的风格。在安达卢西亚，阿莱霍·费尔南德斯（1543年卒）是把意大利影响和佛兰芒影响兼收并蓄的主要艺术家，他那理想化的样式比当时任何西班牙画家，都更能反映出意大利老前辈（例如平图里乔）的画风。但是给予哪怕是更意大利化的艺术家（如贝鲁格特和阿莱霍·费尔南德斯）的作品以特殊的西班牙性格的，则是模仿古式，运用金彩以及模式化的背景和服装。

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对于绘画的直接影响，首先来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出生地巴伦西亚，这个城市与意大利文化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早在1472年，这位未来的教皇就以红衣主教的身份，从意大利招聘3位艺术家到达巴伦西亚，其中之一是勒佐的保罗·达·圣莱奥卡迪奥，他为大教堂画了壁画。当地的艺术家中，例如罗德里戈·德·奥松纳父子，很快就开始把意大利的建筑艺术和装饰引进他们的佛兰芒式的构图了。1507—1510年，费尔南多·亚涅斯和曾经协助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大委员会会堂作画的费尔南多·利亚诺斯，通过他们为大教堂的祭坛后面的高架所作的组画，在巴伦西亚培植了达·芬奇的影响。几年之后，维森特·胡安·马西普创立了一个以16世纪意大利绘画为基础的画派，这一画派由他的儿子胡安·德·胡安内斯继承，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地方性的；因为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意大利的影响都没有形成一种特殊的画风，甚至没有达到较早的佛兰芒的影响的程度。尽管查理五世对于提香的赞助是宫廷肖像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一直到17世纪才有一个真正的民族画派出现。

四 1493—1520年西欧的本民族语言文学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的文化、政治和宗教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世纪的传统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还没有死亡。在许多年间，“现代”文学依然带有中世纪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在韵文故事、短篇小说或者闹剧中所体现的自由的、有时放纵的写实主义精神，这种写实主义以它的许多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使马基雅弗利、福伦果、拉伯雷和塞万提斯这样一些人的作品妙趣横生；还有骑士制度、繁文缛节和向女子大献殷勤的精神，尽管骑士团本身正在瓦解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种精神却在抒情诗歌和传奇小说中依然得到越来越矫揉造作的表现，直到柏拉图思想的输入赋予它新的生命为止；再有劝善惩恶的精神，寓言和象征是与它形影相随的东西。然而，在欧洲不同地区所出现的另外一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经院哲学下降到形式主义和诗歌下降到服从极为复杂的格律，两者之间不是没有联系的，最低限度也是互相平等的思想倾向。在某些国家里，干脆就把诗歌当作“第二修辞学”，因此要服从与修辞学相似的规律；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单词，把它们填入一个十分复杂的、由短语、格律、韵脚组成的结构，是当时最理想的作品；它几乎毁灭了诗歌。这种形式主义不仅见于意大利人数不多的彼特拉克派、法兰西的大韵律家和尼德兰的修辞家，而且从德意志抒情诗歌的衰落和工匠诗歌的发展，以及从15世纪下半叶威尔士的吟游诗歌的兴盛，都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这种不幸的发展倒有一个比较光彩的来源，那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磨炼个人技艺的精神成长起来；这种精神使以增添上帝的荣耀为目标的无名氏作品的数目减少，又使以增进作者的名誉为目标的署名作品的比例增加，从而促使一个艺术家愿意根据他的良知和时代风尚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因此，作家重技巧胜过重事实，胜过热烈的感情。与此同时，写作的对象以及事件可能也就范围狭窄了。中世纪作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他们喜欢重大的、普遍的题材：基督教和基督教世界、人的善与恶、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表现这些题材的作品，在手法上也许有些特殊，但仍然为群众所爱读，正如查理曼大帝和亚瑟王的事迹的广泛流传所表明的那样。不过，在这时候，由于写作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就需要寻求庇护和报酬，如果可能的

话，在国王或诸侯的宫廷中得到，如果不可能的话，则到地方贵族或者富商巨贾的府邸中谋求。如果水平极低，这会形成纯地方文学；如果水平较高，这会形成“国家”文学，不论这国家是城邦还是在不断开疆辟土的王国。文学运动的兴起在时间上是与政治历史本身的发展一致的，而政治历史的发展则迫使作家和保护人同样去注意作为一个独立的、容易辨别的单位的“国家”的性质和要求。这个国家具有自己的利益并且不再仅仅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可是，像达·芬奇或伊拉斯谟这样一些人，却经常越过这些国家的边界，而不论如何，伊拉斯谟能够看到这些边界在他的周围日益巩固起来。

伊拉斯谟的名字使我们考虑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即各种本民族语言文学与正在方兴未艾而且经过革新的拉丁文学这时候共同存在并相互促进。在拉丁文学方面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人们依然认为，在写严肃作品的时候，非用这种文字不可。除了几种最通俗的形式而外，本民族语言文学越来越受到新拉丁文学的影响，以致任何要把二者截然分开的企图，归根结底是很勉强的。伊拉斯谟的《箴言集》对于整个文学所发生的影响，新拉丁文戏剧对于使用通俗语言的新“正规”剧院的发展所起的冲击作用——这仅仅是古典文化通过人文主义者的著作，错综复杂地使本民族语言文学欣欣向荣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应该记住，许多作者既用拉丁文也用他们的本国语言写作。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学术性的著作中，就不能用本国语言代替拉丁文吗？在意大利，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这时候，它再一次尖锐化了。在其他国家里，到晚一些时候，也注定要对它认真研究和讨论。除了上述情况而外，还要加上：意大利人和一般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对于古代文字的新态度，在研究拉丁和希腊作者的时候，不仅要了解他们的著作内容（往往是误解的或者臆造的“道德”内容），而且要了解那些著作的美学价值以及怎样将它们的形式美应用于所表现的题材；古典的神话与基督教的事迹并列在一起，甚至以前者代替后者；不仅揭示一个“新的”古典时代，而且发现一个整个的新世界；以及印刷术的发展加速和加强了这些因素的传播。这些因素，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对欧洲所有重要的本民族语言文学发生了影响。

意大利的政治不统一，从文学和艺术活动的地方化上反映出来。这些活动围绕着一些中心：罗马教廷，以及佛罗伦萨、弗拉拉、威尼

斯、乌尔比诺和曼图亚等公国或者共和国。由于使用雇佣军，公民就有自由去争权夺利，或者去从事文学艺术；权贵人物本身沉湎于文学创作，而当他们的宫室的富丽堂皇和门下文人骚客的数目众多反映出赫赫威风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自己真正的光荣。但是，既然有众多的舞文弄墨的食客，其中也就有一些严肃的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有一件奇妙的事情是：尽管政治的混乱招来了一些贪婪的猛兽，法国的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进进退退进行过多少次拉锯战，但是意大利的各个国家仍然比较繁荣，它们的作家写出大量的作品。意大利的大多数中心都设有自己的学园，一般来说，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学习希腊拉丁语言文学，但是，这些学园却促进了一——纵然间接地——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性中心的范围内来记述这几十年间意大利的种种不同的文学，那就会破坏意大利文学在随后几个世代对其他地方所产生的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记述，又会混乱了各种不同风格所经历的发展情况。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在抒情诗中，在各种散文作品中以及在戏剧中的主要成就。

意大利的各宫廷里都拥满了优秀的和蹩脚的诗人，他们互相竞争着写作所有各种体裁的诗歌：这时已经大为流行的抒情小唱和十四行诗；传统的形式，如民谣和狂欢节颂歌；比较新的形式，如诗节和八行体。另一些人则忙于改写主要是来自法国的，依然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流传的传奇故事，不过，他们的精神主要是放在模仿彼特拉克上。洛伦佐·德·美第奇本人非常擅长于所有各种诗体。由于来回重复，好的题材已经陈腐不堪，于是只好在形式上做文章。因此，一种相反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彼得罗·本博是一位坚持固有传统和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针对这种堕落不堪的彼特拉克主义，提出一种更高尚的抒情诗的观念。正如一个世纪之后法国马莱伯的诗篇一样，他的《韵律诗集》（1530年第一次合为一集出版）形式极为完美，但是缺乏热情。他有一大群模仿者，他变成了一个“经典式的”样板。很有趣味的是：马莱伯后来斥之为过度放纵的法国七星诗社，竟会拿他的作品当作范本之一！彼特拉克派的夸张手法，也遭到弗朗切斯科·贝尔尼（1497—1535年）的嘲笑。贝尔尼像本博一样，很多时候居住在教皇的宫廷里。不过，他为了嘲笑而仿制的彼特拉克主义者的歪诗，仅仅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而已。他遵循浦尔契和布尔切洛的传统所写的幽

默和讽刺的作品，在揶揄社会上的蠢人蠢事时，文笔是那样地生动，措辞是那样地巧妙，对荒唐的事物是那样地尖刻，以致整个一类幽默讽刺文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前辈不仅有浦尔契和布尔切洛，而且还有伊尔·皮斯托亚（1436—1502年），这个人的讽刺诗里甚至有一篇是写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我们也不该忘记：米开朗琪罗的几首铿锵有力的十四行诗，也完全有可能写于我们所讲的时期，与一群二、三流诗人的彼特拉克化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教诲诗也不缺乏，鲁切莱根据维吉尔的《农事诗》所写的《蜜蜂》就是证明。但是，如果说抒情诗已经兴盛起来，但当时最重要的成就还要到传奇诗和史诗中去寻求。

在中世纪结束的很久以前，史诗和传奇诗之间的区别就已经没有了。或者毋宁说，把查理曼大帝和他的贵族们的丰功伟绩与惊险小说和亚瑟王故事的奇异经历和骑士风度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类型，有时用诗体，然后又越来越多地用散文体，不过总是不断地重新处理。15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桑纳扎罗用散文加诗体插曲写成的牧歌式的传奇《阿卡迪亚》强调温存体贴的因素，在勾画得很清楚的由一个虚构的阿卡迪亚和一个理想化的坎帕尼亚为背景，展开一些隐隐约约的、通常是凄惻或感伤的情节。其哀婉绮丽而往往虚浮的文辞，后来有很多人加以效法，而且不仅在意大利。不过，更接近于传统的传奇故事则是洛伦佐的亲密朋友路易吉·浦尔契（1432—1484年）的《巨人摩尔干提》。对于这篇以查理曼大帝为题材的诙谐史诗，有着种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是纯属打诨逗笑，也有的认为是嘲弄有教养的有产阶级；有的认为想象力非常丰富，也有的认为平凡得很，根本达不到幻想作品的水平；有的认为诗中含有邪恶的怀疑主义，也有的认为仅仅是投合群众的口味；有的认为作者通过恶魔阿斯塔罗蒂很有力地表现了当代人和他们的问题，也有的认为他连当代人究竟有些什么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这部疾风骤雨式的作品注定要影响许多人，包括拉伯雷在内。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刚刚开始不久，在弗拉拉宫廷的影响下，出版了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与浦尔契的作品截然不同的诗篇，即博亚尔多（约1440—1494年）的《热恋的罗兰》。它的题目表明史诗与传奇的融合，故事的处理具有想象力，表达了彬彬有礼的骑士精神的尊严。诗中人物所讲述的各种奇遇和佳话使全篇结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这些小故事有时是正常传奇式的，有时与新小说相似，叙述极为巧妙，内容多有创新。不过，文体失于粗糙和

不雅。16世纪初，尼科洛·德利·阿戈斯蒂尼把这部诗续完，但是，这个续篇，甚至博亚尔多的原诗，在贝尔尼用优美的托斯卡纳语重新写作的《热恋的罗兰》面前都黯然失色了。在讲述阿廖斯托之前，我们可以提一下弗朗切斯科·贝洛（伊尔·切科）的《曼布里亚诺》，这是一部具有同样精神的诗篇，1509年作为遗著出版；它结构混乱，一向没有受到多少欢迎。

洛多维科·阿廖斯托（1474—1533年）毫无疑问是所有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人物。像博亚尔多一样，他属于埃斯特集团，尽管他与这个家族的几个成员的关系不很融洽。我们不必多费笔墨去谈他的早期抒情诗了，不过，在他的《讽刺集》中，可以看出一种信笔所至的、谑而不虐的幽默性质。其中有几首是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写作的。这是一些极度涉及私人的诗篇，作者可能并未打算发表。它们与贺拉斯的讽刺诗和书信如出一辙。关于他的喜剧，我们到后边再讲。阿廖斯托主要以《疯狂的罗兰》成名，这部作品是作为博亚尔多的诗的续篇来构思的。他在16世纪第一个10年内开始执笔，但是一直到1516年，才由他的庇护人伊波里托·德·埃斯特红衣主教出资，第一次出版其中的40篇。1521年出了第2版，随后于1532年出版了定本，包括46篇。在这部作品里，史诗的成分与传奇的成分再一次糅合到一起，故事的主要情节的背景是基督教徒与萨拉森人之间史诗般的斗争。罗兰的疯狂，病情的进展和治愈，中间夹杂着一系列千变万化的悲壮的、哀感的、甚至滑稽的插曲，包括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有一个次要的情节是罗杰与布拉达曼特的爱情，这是影射埃斯特家的开祖的，在现代读者看来，描写他们的爱情的某些段落，由于含有阿谀奉承而受到损害。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偶尔的瑕疵，如用词不当、比喻夸大或者矫揉造作，等等。但是，文笔的挥洒自如和清明流畅，风格的至善至美，以及语言的纯洁高尚，使所有的小小缺点都成为无关宏旨的东西。阿廖斯托不仅是比博亚尔多更为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的态度和笔调也有所不同。他在描绘骑士和骑士精神的时候，并不像博亚尔多那样一本正经，的确有很多处，其笔锋似乎带嘲笑的意味。他并不避免运用讽刺语句，甚至像在形容英国骑士阿斯陀佛和叙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还采取漫画式的和戏谑的手法。他既掇拾博亚尔多文笔洗练之长，又混入一点浦尔契的风格。通过他生动如绘的流畅诗句，我们见其诗如见其人：他行止有度，又富于幽默感，温文尔雅，又多嬉笑文章，洞察世事。虽然他的诗篇没有，也不能期待它们有很大的深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还可以说有些肤浅，但是，它们毕竟帮助建立了意大利的文学语言，对后世产生了伟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概正是泰奥菲洛·福伦果（1496—1544年）其人，在闹剧式的诗篇《巴尔杜斯》中，也获得了成功。早在1490年，帕多瓦的蒂菲·奥达西就在他的《马卡罗尼亚》中，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混合语言写的滑稽诗，嘲笑史诗与传奇融合的体裁。福伦果是个被开除的修士，后来又回到修道院去了。他也选用这种工具，作为打击同一对象的嬉笑怒骂的武器。他的其他作品也属于同一风格：《苍蝇战役》讲述苍蝇与蚂蚁之间的一场战争，是模仿《青蛙和老鼠之战》的；《萨尼托涅拉》是摹拟彼特拉克和《阿卡迪亚》，仍以田园为背景的爱情诗；《奥兰迪诺》直到1526年才出版，是以意大利的文学语言模仿滑稽的风格。《巴尔杜斯》，或者，如人们更为熟知的那样，有一个拼音不同的题名《马卡罗尼亚》，共25卷，于1519年出版，著者署的是假名：梅林·乔采。这部令人惊异的滑稽史诗捉住了群众的心灵，4年间就出了6版。开头部分与《奥兰迪诺》非常相似，但是人物的名字改变了，不久，这些人物就去投入一系列荒唐的冒险，最后是进入地狱，在那里，作者发现他自己跟所有的欺名盗世之徒，其中包括占星家和诗人，都很气味相投，他在收场时对他所写的主人公、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艺术大杂烩开了个玩笑，就向我们告辞了。他用强有力的滑稽史诗的风格表达最通俗的题材，但是，有一些描绘是很迷人的，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讽刺性质，仿佛他已经下定决心，迫切地，虽然有时猥琐地，要用他的粗俗的笑话来摧毁空洞的艺术、社会的体统和习惯、对已经消亡的骑士精神的表扬和崇拜、经院哲学以及他那个时代打着宗教招牌进行的欺骗。他看到自己周围尽是卑微琐事，但他基本上是个正人君子。在他的纯粹写实主义中，并没有把坏人坏事写得引人入胜。这种生动活泼的讽刺诗文，对拉伯雷以及萨缪尔·勃特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戏剧已经出现一些古典影响的迹象，但是，尽管塞内卡、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已经在学者们和某些贵族宫廷当中为人所知，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改变戏剧的性质。旧式的闹剧依然十分流行，它们还会存在一个时期。在严肃的风格中，圣剧占有主要的地位。这种戏剧有时不仅有文艺的价值，而且是形成伟大场面的原因，因为每当上演时便引起一种狂热的气氛。上演地点主要在宫

廷，也有时由市当局出资。人文主义者波利齐亚诺1471年在曼图亚所写的《俄耳甫斯》利用了圣剧的形式，但是注入了非宗教的主题和史诗的情调。庄严的洛伦佐本人写了一部《圣乔瓦尼和圣保罗的表演》，1489年上演。这部作品像他的短诗一样，显示出优美的抒情情调。这一流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文艺的目的，终于被日益流行的塞内卡的风格阻挡住了。在15世纪末以前，塞内卡的悲剧已经刊印，其中有几篇已有译本。在少数几部本民族语言剧本中可以看出塞内卡的特点，但是直到1540年以后；随着钦蒂奥的剧作的问世，塞内卡式悲剧的统治地位才完全建立起来。同时，皮斯托亚的《潘菲拉》（1499年）取材于《十日谈》中的一篇故事，但是改变了人名，并且以塞内卡本人作为道开场白的角色。在卡雷托的枯燥无味的《索福尼斯巴》（1502年）问世之后，又出现了特里西诺的《索福尼斯巴》（1515年），这部作品是企图写成一个分幕的“古典”悲剧，带有抒情韵律的合唱。但是，它直到1524年才刊行，1562年才重新搬上舞台。鲁切莱的《卢斯蒙达》（1515年）虽然不无一些塞内卡的影响，但是由于它根据伦巴第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写成，情节令人胆战心惊，就没有落入无动作的抒情剧的窠臼。

喜剧（正如50年后在法国一样）是比较有生气的，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杰出作品，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喜剧有生气勃勃的闹剧作为后盾，部分是由于它可以从一些小说集中取材，但主要则是由于：归根结底，它更接近于生活，特别是接近于当时意大利的虚伪的、堕落的和奢侈的生活。1508年左右，红衣主教比宾纳的《卡兰德里亚》先后在乌尔比诺和罗马上演，场面很大，有在乐池里的乐师，有类似芭蕾舞的古典主题幕间剧。喜剧中的人物是借用一篇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一个愚蠢的丈夫，一个机智灵敏和玩世不恭的、耍笑和愚弄这个男子的媒人，一对长得十分相似、由于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而给舞台增加许多疑云的兄妹，从表面形式来看，所有这一切都是模仿拉丁的喜剧，可是，它显然是活生生的意大利的东西。既没有心理的深度，也没有伏线的牵引，说明问题的只是事实本身，只是各个情节的交叉错综。马基雅弗利的《曼陀罗花》是在1504年至1513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写成的，但是直到1524年才刊印出来。这并不是他的唯一戏剧作品。他翻译过泰伦提乌斯的《安德罗斯女子》。他的《克丽齐娅》是采取拉丁喜剧的形式来描绘一个佛罗伦萨家庭的生活。《曼陀罗花》看起来可能像是比《克丽齐娅》距离公民的日常活动更远一些，但

是，它具有深刻得多的性质。如果单单从情节上看（卡利马科在一个寄生虫的协助下哄骗愚蠢的尼齐亚并且玩弄尼齐亚的老婆），可以把这部喜剧与比宾纳的作品并列，然而，如果进一步认真考察，就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使它不但作为喜剧远远超过《卡兰德里亚》，而且超过16世纪的最优秀的喜剧。第一，它结构特别紧凑，每个动作都经过认真的计算和巧妙的安排；第二，这种计算是以对于人性的即使抱怀疑态度但是十分深入的观察为基础的。所有的人物都很生动，而其中有两个人物特别令人不能忘怀：一个是愚蠢而傲慢的丈夫尼齐亚，他顽固地相信自己头脑聪明，但是作者把他从一个场景带到另一个场景，每个场景都表明他原来是一个大笨蛋；另一个是贪财图利和玩世不恭的修士提莫列奥，他很痛苦地注意到自己行为的可耻（像泰伦提乌斯的《阉奴》中的帕尔梅诺一样），但是用自我剖白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良心，结果成为使卡利马科爬上路克列茜亚的绣榻上的罪魁祸首。马基雅弗利嘲笑人们的愚痴和腐化，但是他没有显示出愤世嫉俗的样子。他冷静地、不动感情地解剖和分析他们。他偶尔也揭示出教皇和君主对于他所描绘的邪恶似乎会采取的态度。同时，他把情节的喜剧和性格的喜剧融合成为一部即便离经叛道也是伟大的作品。这部喜剧的对白写得十分生动，它使情节像流水一般发展下去，而且总是非常适合每个出场人物的身份，因此，虚构的剧情却显得像确有其事一样。

阿廖斯托也对意大利的舞台做出了贡献。他曾被任命为弗拉拉公爵剧院院长。自从1486年以后，那里就演出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拉丁文剧本。阿廖斯托以这些剧本为样板来写他自己的喜剧，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一共写了5部喜剧，最后一部《学究》没有完成。第一部《卡萨里亚》是纯粹的模仿物，其中的人物是从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中取来的，只是改用了意大利的名字，同时照方抓药，使这些人物进入了错综复杂的情节。这个剧本的上演是成功的，因为它用本民族语言重复了观众通过拉丁文所已经熟悉的东西。《顶替》（1509年）是一部较好的喜剧，主题有所变换，但风格一如样板。这部喜剧像《巫术师》（1520年）一样，成为16世纪后半叶法国喜剧的一个范本。《巫术师》的情节和对白都比较生动，但是缺乏马基雅弗利的喜剧的现实感。剧中主角占星术士不是一个真正的占星术士，因而他的方术便成为笑料。他是一个毫无知识、骄傲自大的江湖骗子，不断暴露出他的愚蠢，并且被他自己的仆人当场揭穿。情节是俗套

子，头绪也烦琐，然而，当阿廖斯托把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一些妙言趣语加到泰伦提乌斯的样板里的时候，还是有他独到之处的。不过，这部喜剧以及《列娜》（1529年）依然逊色于《曼陀罗花》和阿雷蒂诺的《宫廷女侍》。精力充沛和放荡不羁的阿雷蒂诺（1492—1556年）在他的喜剧（严格说来，其中大多数不属于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中，搬出来他自己的酒色世界中的一些人物：妓女、老鸨、伪君子 and 流氓无赖。当他来了兴头的时候，他就不顾这一剧种的“规律”，而且由于忽视“常规”，反倒常常下笔有神。如果说他的作品缺乏《曼陀罗花》的紧密结构，那么，它们也具有自己的优点，即生气勃勃、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一个不知廉耻的、玩世不恭的、道德败坏的，但是十分滑稽的社会。有趣的是：阿廖斯托的早期喜剧是用散文写成的，但是后来又用三音节音步诗体改写，他认为这更接近于他的典型，足以表达日常会话的自由。

在这个时代，散文是很繁荣的。我们可以选择几部重要作品来谈。首先来看看本博，他是两部颇有趣味的散文作品的著者。《阿索拉尼》（约1500—1502年作，1505年出版，是献给卢克雷齐亚·博尔贾的）是一部从好的意义来讲的通俗化作品，他用柏拉图的对话形式来解释柏拉图式爱情的原则，对于大约在这一时期为阿尔杜斯出版社编印彼特拉克诗集的本博来说，这个任务是非常适合的。对话纵然有些冗长和呆板，但还是十分动人的。《通俗语言探讨》也采取同样的形式，它是在16世纪初开始执笔，大概在1506年至1512年间完成，先以手稿流传，1525年才出版。在对话中讨论了并且大部分解决了人们争论不休的文学语言问题；本博站在本民族语言一边反对拉丁文，而在可以使用的通俗语言之处，他主张用托斯卡纳语。他的优雅，他的明智的论断，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的威信，对于托斯卡纳语的完全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另外一个领域内，巴尔代萨尔·卡斯蒂廖内（1478—1529年）的《侍臣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位作家也写过优美的书信，雅致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诗篇和一篇戏剧式的牧歌《蒂尔西》。《侍臣论》是1507年左右在乌尔比诺开始写作的，1528年出版。它是以对话的形式考察王公侍从的性质，而在这幅可能美化了乌尔比诺宫廷及其趣味的图景里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在法国和英国，也和在意大利一样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公认的那种绅士的典型，堪与此相媲美。

在这个外交、阴谋和战争的年代里，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可谓汗牛充栋。“严肃的”编年史等依然用拉丁文编写，但是用本民族语言写的也出现了。比斯蒂齐（1421—1498年）留下了他的《十五世纪名人传》和同样一部关于贵夫人的著作。不过，在正式的本民族语言历史中，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和圭恰迪尼（1483—1540年）的名字是最主要的，尽管他们的主要著作的出版日期有时是属于本卷以后的时代。关于前者，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他是一位戏剧家，但是，作为一位诗人，他写过十四行诗，单节诗、戏谑和讽刺的三行体诗，狂欢节歌，用三行诗节押韵法写的编年史（《十年》，1506—1509年作）；作为讲故事的人，他写过《大恶魔巴力法格》（1515年作），这是一篇用他的彩笔丰富起来的传统故事；作为论述语言的著者，他写过对话《论语言》（1514年作）；他对1499年以后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写过各种各样的观察敏锐而冷静客观的报告；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大名鼎鼎的。他借以名扬千古的几部著作：《君主论》（1513年作）、《论李维》（1512年及以后）和《论战争艺术》（1519—1520年作），是他在圣卡夏诺暂时退隐的时候写成或者开始写作的。他的名著《佛罗伦萨史》是1520年受委托执笔，而到1525年才问世的。

《君主论》是与他关于李维的论文无关的另一个主题。它简明扼要、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君主之道的性质，以及如何来加以维护和发展。这篇文章引起猛烈的批判，特别是从道德的立场上。但是，它首先不是一部愤世嫉俗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作品。它是对现存的和可能出现的局势的评价。它是超越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去寻求一个强盛的、统一的意大利的理想以及能达到这个理想的手段。马基雅弗利认为，达到这一理想比现存的道德或传统的法律具有更加刻不容缓的重要性。通过这部著作，正如通过《论李维》和《卡斯特鲁乔传》（1520年作，马基雅弗利的理想人物的肖像），以及通过《佛罗伦萨史》一样，著者不仅开创了一种对公共事务的纯理性的和超道德的态度，而且提供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散文风格的范例：清晰、简明、恬静甚至是深思熟虑、有条理而且十分现代化的。圭恰迪尼实际上属于下一个世代，他既受意大利的日益混乱腐败的政治的影响，也受到马基雅弗利思想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提一下他的早期著作《佛罗伦萨史》（1508年），这是对萨沃纳罗拉统治佛罗伦萨的异常时期的生动记录，笔下富有创见，对事件的内在联系有精辟的分析。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另一种重要的散文是小说，它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内，除了作为资料而外，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马苏乔·萨莱尼塔诺和乔瓦尼·萨巴迪诺的集子都是在15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而班代洛的作品可能早已编成集子，但是在很久以后才出版，菲伦佐拉、彼得罗·阿雷蒂诺、本韦努托·切利尼等人的重要作品也是如此。

在西班牙半岛和在西属意大利，本卷所包括的30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大有成就的时期。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合，这个联合王国作为大国在欧洲和海外势力的增大，葡萄牙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帝国，这一切都使当地居民产生一种力量和天命的感觉。由于长期与摩尔人进行斗争，就推迟了中世纪的结束；但是，新的光荣时期既激发了征服的野心，也鼓舞了艺术与文学的活动。尽管地中海的两大半岛之间有密切的接触，但是到这时还没有感觉到古典的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的猛烈冲击，因而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文学长期带有极为明显的独特风格。甚至在我们所讲述时期的最进步的作品中，虽然追求和模仿新的样板，但是仍具有强烈的中世纪的味道。避免把这种文学截然分成卡斯蒂利亚文学、葡萄牙文学和加泰罗尼亚文学，这不仅为了方便，而且是很重要的。不单单是卡斯蒂利亚文学稳步前进，以取得“西班牙文学”的身份，并逐渐地消灭方言文学，而且有许多作家是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写作，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往往被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1492年，人文主义者内布里哈写成第一部卡斯蒂利亚语法，3年以后，这位学者又刊印了他的《拉丁—西班牙，西班牙—拉丁辞典》。同时，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创办了新的大学，成立了图书馆，翻译了古典的和意大利的文学。然而，乍看起来，总的背景对于文学或艺术的创作并不是有益的。不过，宗教裁判所的活动，驱逐犹太人（1492年）和驱逐摩尔人（1502年），可能大大有助于防止在意大利极为流行的玩世不恭、穷奢极欲和大摆排场的风气的发展，正如宗教改革运动的来临在法国、德意志和英国遏制了这些过火行为一样。大众文学有民谣，有传奇故事新编，如《贤者梅尔林的呼声》（1498年）或者《圣杯的要求》（1515年），有宗教的演唱和短剧，有牧歌和闹剧。一般来说，重要作品本身与老的作品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时间上向前追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有些相当重要的作品，虽然如今才初次出版，但是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成书，并且为人阅读和遐迩闻名了。

在抒情诗领域里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在1511年出版埃尔南多·德尔·卡斯蒂略的《诗歌全集》，一是在1515年出版加西亚·德·雷森迪的《诗歌总集》。前者包括将近1000首诗，主要是过去时代的作品，但也包括一些当代的诗歌。这部诗选在16世纪内出了许多版。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诙谐诗”，1529年扩大为戏谑的和往往是淫秽的诗歌专集出版。雷森迪所编的《总集》主要包括用葡萄牙文写的诗，但是值得注目的是也包括一些用卡斯蒂利亚语写的作品。在两部诗选里，大多数作者都是遵循文雅的传统吟诗能手，矫揉造作，缺乏灵感，但是文辞优美，刻意润色。实际上，这两部诗选都结束了此类歌集的传统。不久以后，新的形式就代替了它们，因为在它们的内容中已经有了彼特拉克的影响和古典文艺作品的痕迹。在1520年以前写作的诗人，能够列入很高位置的寥寥无几。不过，在1513年用卡斯蒂利亚语出版诗集的佩德罗·曼努埃尔·希门尼斯·德·乌雷亚写给他妻子和他母亲的私人诗歌，一般被公认为佳作；而他在一首田园诗中改写《塞莱斯蒂娜》的末尾一段和在他的散文《爱情的惩罚》（1514年）中改写《塞莱斯蒂娜》的全部内容，证明他对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这部著名作品是很有兴趣的。讽刺诗也并不乏人写作，不过，正如汗牛充栋的宗教诗和祈祷诗一样，它是用不着我们多费笔墨的。

当时最重要的作品是用散文写成的。阿方索·马丁内斯·德·托莱多是塔拉韦拉的大司祭，他写了一部作品叫作《对世俗爱情的责难》，但是以《科尔巴乔》（从薄伽丘的《科尔巴乔》而来）的题名更为人所熟知。这部作品是1438年写成，然而直到1498年才出版。这是一篇谈论男女风化问题的讽刺性和教诲性的文章，从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的资料中取材，也包含作者自己的经验；文体生动，想象丰富，讽刺有力，语言通俗。对于这种半说教、半小说式的文学，迭戈·德·圣·佩德罗提供了他的《论阿纳尔特和卢森达的爱情》（1491年），其中包括关于爱情的书信和感想；第二年，他又出版了《爱情的监牢》，这是一部较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它以一种有些混乱但是激动人心的方式，把个人的回忆、心理的分析、奇异的遭遇和巧妙的比喻结合到一起。它继承和发展《菲娅梅塔的挽歌》的传统，出版后立即炙手可热，以后经常复印，并且译成其他许多文字。模仿它的有1508年至1512年间在那不勒斯就地取材写成的《爱情问题》，这部书据传为巴斯克斯所作，他写过同类的作品《爱情的典范》（约1510年）。《论格里马尔特和格拉迪萨》是继承《小小的火光》的另一部

作品，著于15世纪最后的几年，而在16世纪20年代当它改换一个新书名的时候，依然为人们所爱读。不过，在我们所讲述的时代里，叙事体散文的杰作毫无疑问是《高卢的阿马迪斯》，它在欧洲小说史上注定要起很大的作用。这部作品的题材在半岛上已经流传几百年，最早取自法国的亚瑟王式传奇故事的传统。加尔西·罗德里格斯·德·蒙塔尔沃声称他仅仅是旧的材料编辑人，但是第四和第五两卷几乎可以肯定是他自己的创作。前4卷是在1508年刊印的，虽然这几卷似乎在15年左右以前已经定稿。它大受群众欢迎，经常再版，几乎译成了欧洲的所有语言。书中详细说明当时最优美的骑士理想，举出忠君爱国和骑士行为的范例，从而体现了典型西班牙的（尽管故事的背景不在西班牙）浪漫式骑士精神。文体轻松而华丽，虽然偶有冗赘之处。这部作品对西班牙国内外的散文传奇故事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尽管它的类型往往蜕化为愚蠢和造作的形式，受到塞万提斯的严厉谴责。不过，《堂吉珂德》的作者在早期加泰罗尼亚的讽刺性传奇故事、约翰诺特·马托雷利的《暴君布兰奇》中却找到了一些可以赞许的东西，这部作品是在1511年翻译成卡斯蒂利亚文的。此后一些年出现许多模仿和继承阿马迪斯题材的作品，并且形成类似的一套帕尔梅林传奇故事，其中之一《英国的帕尔梅林》最初是以葡萄牙文出版的。

从重要性来说，唯一能够与《高卢的阿马迪斯》相比的作品是《卡里斯托与梅丽贝娅的悲喜剧》，又名《塞莱斯蒂娜》，这部作品很难把它列入哪一类。虽然它的题目是“悲喜剧”，但是把它说成是用戏剧形式写成的散文故事，也许更合适一些。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版本（布尔戈斯，1499年）包括有16“幕”，但是后来的版本又插入一些新的幕，总幕数达到22个。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曾经有过很多的争论，但是现在大体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除第一幕而外，其他所有各幕的作者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费尔南多·德·罗哈斯。他在安排这篇讲述两个青年人不幸的恋爱故事时，不断阐明自己的道德观念，并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展示罪恶和腐化的背景，与那种田园诗式的、带有感伤情调的恋爱故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副标题之所以为群众所熟知，是因为他勾画了淫媒塞莱斯蒂娜的令人惊异的可怕嘴脸，这个家伙假装行善，以对上帝的虔诚来掩盖玩世不恭的阴谋。文学方面的来源很多，从泰伦提乌斯和奥维德一直到中世纪故事，皆有摄取；但是这部作品依然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其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远远凌驾于《高卢的阿马迪斯》之上。在150多年间，《塞莱斯蒂娜》对西班牙

牙的小说和戏剧，并通过许多译本，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小说和戏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前一时期编纂的本民族语言编年史中，有一些是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第一次刊印的。其中必须提到的是费尔南·佩雷斯·德·古斯曼的《世代和人物志》，这是一组很有参考价值的当代人物传记，1450年左右编入《史海》。《史海》于1512年刊印，模仿它的有阿隆索·德·托莱多的《史鉴》。其他的历史著作有：迭戈·德·巴莱拉的《编年史》（1482年）和《英雄事迹记录》，后者是阿隆索·德·帕伦西亚早些时候的《几十年》的重编；恩里克斯·德·卡斯蒂略的《恩里克四世编年史》，这部书过分夸张和有所偏袒，但显示出敏锐的观察力；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的《名人传》（1500年）和他那歌功颂德的《信奉天主教国王编年史》，后者直到1565年才刊印，但是由内富里哈译成了拉丁文。这类著作的主要兴趣是传记，但并没有忽视历史的其他方面。当然，历史和哲学的鸿篇巨著依然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可是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也有一部值得注意的有影响的本民族语言作品，即阿方索·德·拉·托雷的《哲学与科学的喜人景象》，虽然它是在这个时期以前写成的。这部著作是中世纪最后的百科全书之一。正如题名所表明，它的结构是一个寓言，在这个寓言里，“理性”“智慧”“自然”以及类似的拟人手法，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知识。

在戏剧方面，如果把《塞莱斯蒂娜》算作剧本的话，则除它之外，只有很少几个出名的作品。胡安·德尔·恩西纳（约1468—约1529年）在西班牙和西属意大利的剧院发展中都有所贡献，他使过去一直是宗教的形式丰富化和世俗化了。他注入了一种抒情的风格（他那以内布里哈的教导为基础的关于诗歌的概念，在其1496年出版的《诗艺》中有详细说明）。由于他是一位技艺纯熟的音乐家，就能够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他把令人喜欢的和勤劳多产的农民典型搬上了舞台。巴托洛梅·德·托雷斯·纳阿罗的《普罗帕利亚迪亚》（1517年）中包括在意大利写作的一些作品，从其情节的错综复杂以及分成序幕和5个“进程”（这是一种由神秘剧的“日”向贺拉斯规定的5幕的过渡），可以看出意大利和拉丁的影响。不过，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戏剧家是葡萄牙人吉尔·维森特（约1465—约1536年），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和银匠，在他的44篇剧作中，有16篇是用葡萄牙文写

的，11篇是用卡斯蒂利亚文写的，17篇是用混合语言写的。他的早期戏剧作品主要是与伟大节日有关的宗教性的东西，但是，从1508年起，他转向世俗的和幽默的类型。在他的晚年中，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包括一些闹剧以及他的3个讽喻死后和来生的短剧：《地狱》《炼狱》和《天堂》。他的抒情的灵感，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能力，以及他的幽默的广阔范围，都使他成为在两种语言的这一过渡时期的最有趣的人物。

在法国，这一世代的作家也可以、而且也许更清楚地证明中世纪传统的衰落（但不是死亡）和意大利与人文主义影响所产生的最初效果。《玫瑰传奇》以它用讽喻、色情和说教的方式所遗留下来的一切，依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维永的作品在出版和为人们所阅读；在1489年至1533年间，他的诗篇有20个或多或少有瑕疵的版本问世。但丁在前两个世纪内就为法国人所知，15世纪末，《地狱篇》翻译成了法国的三行押韵诗节。当查理八世于1494年侵入意大利的时候，法国人与意大利发生了直接的和令人激动的接触。侵略变成了对一个令人鼓舞的国家的发现。交往频繁起来。法国人如比代和拉扎尔·德·巴富在意大利漫游或者留学。勒费弗尔·戴塔普会见了菲奇诺、皮科·德·米兰多拉和波利齐亚诺。意大利的军人、外交家、学者、艺术家们前来法国。具有各种工业、印刷所、作为故都的赫赫威名以及优越的战略位置的大都市里昂，不仅成为意大利流亡者的避难所，而且树立了人文主义和意大利文化这两个一脉相通的传统。意大利文学的译本在法国出现：《十日谈》在1485年，彼特拉克的《胜利》在1514年；《天堂篇》在1515年至1524年间；浦尔契的《巨人摩尔干提》在1519年；等等。与此同时，还刊印了古代作家的原本、译本和注释。约在1500年韦拉尔出版了一部泰伦提乌斯的散文和诗歌集；奥克托文·德·圣热莱在1509年翻译了《埃涅阿斯纪》；马罗在1512年翻译了维吉尔的第一首牧歌；另外还有许多。查理八世把希腊学者拉斯卡里斯带回法国。伊拉斯谟在蒙太古学院求学，1500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箴言集》。比代是伊拉斯谟的大敌手，他工作得十分勤恳。但是，这种活动的果实要到后来才能收获。这一世代的3个伟大名字是让·勒梅尔·德·贝尔热、科明和格兰戈尔。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中世纪的桎梏，但是全都指出各自不同的前进方向。

这是大修辞家的时代，他们是诗人并且常常是历史编纂家，也是200年来城镇自由民的抒情传统的文字冗长但是软弱无力的后代。他们最初是在勃艮第和佛兰德的宫廷中，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个人周围得宠，只有当路易十一世的死亡给他们敞开大门的时候，他们才在法国宫廷中得到显著的地位。他们的诗歌的主题，正如他们的散文的主题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爱情和骑士精神，政略和历史，宗教和道德，科学和艺术，但是他们的处理手法是呆板的和说教的，很少有一种真正个人的笔调使其生动活泼起来。他们把这些题材填塞到寓言、神话和拟人法里。他们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充满臆造的词句和没有消化好的拉丁语法，而他们的诗体则被诗歌是“第二修辞学”的观念破坏无遗。他们长于用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采用费尽心思的押韵方法和过多地讲究抑扬顿挫而变得非常复杂。不过，还是有几位作家留下了声誉：梅希诺（约1420—1491年）用散文和诗歌写成的寓言式《王子们的眼镜》在1493—1539年间印了20版以上；莫利内（1435—1507年）是为勃艮第王室服务的编年史家，用散文改写了《玫瑰传奇》，附有伦理性评注；科基利亚特（1490年卒）以几篇辛辣的讽刺作品而为人所记忆；夏特兰是勃艮第人的教长；克列坦（约1525年卒）是巴黎人，名望极高，连克莱芒·马罗都会称之为“至尊的诗人”；让·马罗（约1465—1526年）曾教导他那更有名气的儿子如何作诗，他后来对于韵文的技巧运用自如。尽管他们有许多缺点，但这些能工巧匠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他们试图把诗歌与学术结合起来；他们根据自己的良知，援引古代的拉丁文学；他们坚持技巧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过于迷恋表面的形式，而且他们除了近期对原作进行价值不高的改编外，对自己的民族遗产则一无所知。克莱芒·马罗后来使他自己从修辞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过在创作新的、生动的个人风格诗歌时，还是运用修辞派的一些技巧。但是，这时候他依然以他的老师们的风格进行写作，正如他的早期作品《丘比特的神庙》（1515年）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在1519年，他进入阿朗松的（后为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宫廷服务，直到他转而为弗朗西斯一世服务和得到解放之前，他在那里接受了他的真正诗学教育的初步课程。

除了小马罗以外，让·勒梅尔·德·贝尔热（约1473—约1515年）是最伟大的修辞家，因为他解放得最彻底。他在波旁公爵和卢森堡的路易那里服务之后，先后成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布列塔尼的安妮的侍从，并作为诗人、历史编纂家、外交家和旅行家而扬名。他是

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的人物。他那些登大雅之堂的诗篇是精雕细琢的，但是，他的3部主要作品都具有另外的性质。《绿色情人的书信》（1511年刊印）假托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宠爱的鹦鹉所写，他以优美的诗句和生动的辞藻描绘小鸟由于女主人不在而悲恸自尽后奔赴动物的黄泉和乐土的故事，当然，也不是没有显示出相当的博学。《两种语言的合谐》（1511年作，1513年刊印，此后经常再版）采取三重寓言的形式：诗人访问维纳斯的神庙，但是没有找到和平，这一部分是用三行一节、每行十音节的诗体写成的；中间是一个用散文写的插曲，他去弥涅耳瓦的神庙，在那里可以找到荣誉和一切的美德，这一部分是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的；他将法语和意大利语相对比，但并不像题名所示在语言方面，而是在文字和学术方面，在这方面，它们是平等的，而且应该在有益的和高尚的竞争中相得益彰。

《高卢的光荣和特洛伊的神奇》（共三卷，1510—1513年写作和出版）发展了关于赫克托耳的儿子法兰库斯创立法兰西的中世纪传说，以一种通史的形式，从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一直讲到法兰库斯在高卢安家立业。他任意搬用古典的东西，而一些章节描写得很动人，并且富有想象力，这立即表明在欣赏古代文学方面有了进步，以及对于一词一语的含蓄价值的感受性；这也表明为什么龙沙后来采取这个传说作为他的失败的史诗《法兰西亚德》的框架。勒梅尔依然是一位修辞家，有时好引经据典而且玉石杂陈，特别是在早期的充满寓言的作品中，但是随着他的进步，他运用经典更加灵活了，他的感觉能力更加敏锐了，他的诗的韵味和他的遣词造句都更富于和谐和明晰性了。

法国的散文是旧式的，代表作品有：修辞派所写的大批编年史、论文和讲稿；翻译作品；米歇尔·梅诺（1450—1518年）或者奥利维埃·马亚尔（约1450—1502年）等人的铿锵有力的、主要是通俗的讲道词；用散文改写的传奇故事和传奇化的史诗；故事或故事集，如《十五桩结婚喜事》、安托万·德·拉·萨尔的《小让·德·圣特列》，或者《新故事百篇》，最后这部书虽然自己宣称承袭《十日谈》的传统，但是除了表面的“故事”形式而外，并没有汲取到任何东西。以上的所有作品都是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老早以前写成的。

只有一个接近第一流伟大作家的名字，这就是菲利普·德·科明（约1447—1511年）。他是佛兰德人的后裔，非常聪明又讲求实际。他是一位头脑明敏的心理学家，一位手腕灵活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

原来给勃艮第大公服务，后来转到路易十一世的宫廷，他发现路易十一世不仅能够赏识他，而且与他气味相投。他晚年的命运并不那么美好。他的《回忆录》有上、下两卷，上卷是1490年前后所写，记载从1464年到1483年之间的事情，1524年第一次刊印；下卷是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所写，叙述查理八世的意大利远征，于1528年出版。《回忆录》是作为维也纳大主教编写拉丁文的路易十一世传记的原始资料而写的，并不要求文章优美，但是，它不缺乏笔致的秀逸。科明注重事实，他不屑于卖弄修辞派的文章技巧，他的风格朴实无华，有时显得沉闷，但是往往具有令人钦佩的精确性和贴切性。他的洞察能力，他的分析技巧，他对各种事件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认识，他对国王和国家的利益的忠诚拥护，他的冷静客观和表面上不关心道德的因素，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观念：科明是马基雅弗利的先驱。他肯定相信外交和权术，但是，当他有可能的时候，他宁愿道义和舆论在他的一边，而且当他考虑事件的进展情况时，他看到一种能够左右和导致预料不到的结局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是上帝的意志，而不仅仅是偶然的演化，因为，不管表面看起来如何，科明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对于各种事件以及因果关系的理性的探索，他的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都使他成为第一位真正近代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如果更注意于美词丽句，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损失。

法国这一时期的演剧历史几乎没有划时代的重要标志。没有几部作品可以很精确地确定年代，而它们只不过是1450年到1550年以后的一个总的运动的一部分。大型神秘剧主要是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依然上演。它们极少脱离宗教的范围，并且可以大规模地表现圣经历史的主要事件或者个别圣者的生平和事迹。它们可能在一个整个的村庄或城镇上演，时间经过几个星期，也许仅在一个小单位上演，时间只是一天；它们可能为了一个大的节日上演，或者为了瘟疫的熄灭，或者为了祈求丰收而演出。它们基本上是大众化的，因此它们一般缺少文学价值，虽然可以见到一些成功的段落，而且因为它们把严肃的场面与滑稽的场面混合起来，而后一种场面则蜕化为大开玩笑的恶作剧，使官方感到不悦。在巴黎，耶稣受难会主要上演这些东西，直至1548年下来一道禁令为止。其他一些团体既在巴黎又在各省进行演出。例如，巴黎最高法院的书记们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团体“巴索歇”，上演神秘剧、道德剧和闹剧；旧城堡法院的书记们有他们自己的“巴索歇”，审计法院的书记们有他们的“加利利

帝国”；而在第戎、鲁昂、里昂和其他的重要城镇都存在着类似的团体。巴黎的另一个团体是“欢乐儿童会”或称“愚人”，有他们的“傻王子”和“傻妈妈”，这些人组织傻剧、闹剧和道德剧，通常是在圣会星期三的前一天上演。我们很难给这几种不同类的戏剧画清界限，但是可以指出一些大体上的不同点。总的来说，道德剧是戏剧化了的寓言，用拟人的方法达到教诲的目的，但是，滑稽的道德剧也是常见的，例如安德烈·德·拉·维涅的道德剧《圣马丁的神迹》加上一个令人发笑的场面：人们违反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的意愿把他们的残疾治好了，于是他们以不难想象得到的不同方式对此做出了反应；或者像尼古拉·德·拉·谢奈所作的《宴会的惩罚》（约1507年），用喜剧的方式来谴责暴饮暴食。指出这样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1548年，塞比耶在讨论悲剧和喜剧的时候，发现在道德剧中两者是异曲同工的。到17世纪，闹剧依然盛行不衰。闹剧往往是把描写女人的水性杨花、男人的皮包或钱袋的容易损失，以及人类任何共同的弱点的情节加以痛快淋漓地戏剧化。正如在风格上与之相似的以前的韵文故事一样，闹剧有种种的不同：有的是巧妙的（纵使很简单的）心理描写，有的则淫秽不堪。闹剧的八音节诗是紧凑而有力的。著名的《帕泰兰律师的闹剧》（1470年）在它的篇幅长度、它的结构，以及它始终保持细心观察和文学技巧的高度水平方面，都是一个例外。傻剧往往与闹剧和道德剧一道演出，它有时取材于时事问题。《新大陆》的作者大概是安德烈·德·拉·维涅，1508年由“愚人”演出，以“国事诏书”为题材；格兰戈尔的《傻王子》（1512年作）攻击罗马教皇朱理亚二世，另外还以一个道德剧《法国人民、意大利人、顽固的人》加强火力。这篇道德剧刻画这位教皇与路易十二世之间的分歧，“顽固的人”当然指的是教皇。傻剧《世界、恶习、傻瓜们》（约1514年作）更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观众说：尽管有些人想把世界重新建立在愚蠢和腐败之上，但是世界依然会跟它过去一样。不难看出，寓言在这些傻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皮埃尔·格兰戈尔是很突出的。他在1511—1512年扮演“傻妈妈”；他那大胆的《傻王子》在写作的时候，即便不是由国王或者他的大臣们授意，也一定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格兰戈尔在当时必然是个颇出风头的人物；他肯定是多才多艺，虽然他的许多作品都落入修辞学派的窠臼。他的《圣卢瓦阁下传》（约1514年作）看来似乎表明了真正的宗教感情。但是我们怀疑，是否值得像19世纪浪漫派作家那样把他敬若神明。

普罗旺斯文学在这时候处于衰落的状态。法国南方的作家几乎完全用法语写作，虽然用普罗旺斯语写的宗教剧留下了一点点痕迹，但是这些作品来源于法文的剧本。意味深长的是：像图卢兹百花诗赛那样的一个文学竞赛，在1513年已经允许用法语写的作品应征；15世纪末获得这种“学院”奖的最后一些作品，表明形式主义正在代替灵感。

从德意志诗歌的整个历史来看，德意志抒情诗中的同样动态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中世纪的抒情诗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兴旺的工匠诗歌。早期诗人的缠绵悱恻的情歌，在14世纪给“工匠”诗人们（例如弗劳恩洛布）的格律严谨和意义高深的作品让了路；而“工匠”诗人们的作品，又给德意志南方城市行会所组织的诗匠——技艺分成等级并定有死板规矩的工匠歌手的诗歌让出一条大道。能脱离一般流行的机械的作诗观念的诗人寥寥无几。杰出的工匠歌手汉斯·萨克斯（1494—1576年）的很多作品不属于工匠诗歌的风格，事实上，这些诗歌的绝大部分是在我们所讲述的时期之外的。他的重要性大概在于他发展了戒斋节剧或称忏悔节剧，这一剧种是在德意志大量拥有的为圣诞节和复活节上演的宗教剧的滑稽场面的影响之下，由原始的化装狂欢剧发展而来。汉斯·罗森普律特的剧本和迪特里希·舍尔恩贝格的《尤塔夫人的表演》（1480年作）已经指出用一些滑稽故事作戏剧题材的道路，这在汉斯·福尔兹的作品中得到了实践；1510年左右，福尔兹在纽伦堡曾经红极一时。潘菲鲁斯·格恩巴赫在1515年至1518年间写这一类的道德剧，后来，伯尔尼的尼科拉斯·曼努埃尔用同一形式攻击天主教的教义与实践。与此同时，民歌似乎繁荣起来，以《玫瑰传奇》的传统为基础的旧式寓言诗依然流行，但是它越来越矫揉造作，骑士传奇成了滑稽模仿的对象，或者越来越出现下流的改编，如菲特雷尔的《奇遇记》。因此，当我们看到马克西米连皇帝亲自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候，是很有趣味的，他指导写作《图尔丹克骑士历险记》（1517年作），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记述他向勃艮第的玛丽求婚的事迹，附有优美的木刻插图。

除了滑稽故事的发展而外，用旧题材重新编写的作品主要属于讽刺的一类，这一类在当时产生了一些杰作。按出版的日期排列，第一部是塞巴斯蒂安·布兰特（1457—1521年）的《愚人船》（1494年作），布兰特是斯特拉斯堡的一位法学家和权贵，他也写过拉丁文的

诗，法学著作，编过传统的笑话集和13世纪流行的一部教诲性的作品——弗赖丹克的《谦逊》。《愚人船》用辛辣的讽刺笔调和令人难忘的生动的双行诗体讲述人类的愚蠢行为；形式是寓言式，主要情节是由愚人做船员和驾驶的一只船，乘客也是一些愚人，他们驶向愚人的天堂。这部作品附有动人而有趣的木刻插图，曾经印了许多版，并译成许多语言（包括拉丁文），到处发生直接的影响。在1509年以前，它已经有两种英文译本。在德意志，它导致出现了如盖勒·冯·凯泽斯贝格的作品那样的说教作品（1500年作，1511年以拉丁文出版），也导致模仿它的讽刺作品，如托马斯·穆尔纳的《愚人的咒语》（1512年作）。它既为人文主义者欣赏，也被不学无术的人喜爱。低地德语的《列那狐传》（吕贝克，1498年）是把在尼德兰、德意志、法国以及其他地方已经有长期历史的资料刊印出来；看起来，它所根据的是一个佛兰芒语的本子，而卡克斯顿的《列那狐》（1481年出版）也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的。经过各种不同的重新整理，这部带有讽刺性的动物史诗从来没有失掉群众的普遍欢迎，曾出版了无数版本和改编本。《梯尔·欧伦施皮格尔》（1515年）与滑稽故事一脉相承；这是一部戏谑和诙谐的作品集，据说是14世纪初期一位农民所撰，写的是心地质朴的乡下人对头脑比较复杂的城里人的复仇。以前就有人将这些故事编成集子，但是没有保留下来。1515年在斯特拉斯堡刊印的这个本子翻译成许多语言，尽管它很粗糙，但是由于充满奔放的热情，它曾长期成为讽刺作家的资料来源和写作范本。在德意志的讽刺作家中，托马斯·穆尔纳（1475—约1527年）是一位重要人物。1515年出版的《梯尔·欧伦施皮格尔》，虽然证据不足，但确实有人认为是他所撰。他过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活，有一个时期是马克西米连的桂冠诗人，但是他不能定居下来。在几部继承《愚人船》的传统的作品中，他痛骂社会的愚蠢和罪恶；其中最著名的是嘲笑情人们的愚蠢的《笨拙的一对》（1515年作，1519年出版）和题目本身就说明内容的《论路德派的愚人》（1522年出版）。工匠歌手格恩巴赫（1470—1524年）在1518年也写了一篇《笨拙的一对》。与此同时，也在进行着古代文学的翻译工作：寓言是受群众欢迎的，有一些寓言集出版了，包括拉丁文和德语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一本（1508年），是约翰·阿德福斯所编；另一本由马丁努斯·多尔皮乌斯编的寓言集，重版了好几次。1499年出版德文的泰伦提乌斯全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我们所讲述的整个时期乃是新

拉丁语演剧十分活跃的时期，虽然严格说来，这不属于我们的论题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它对德意志内外的本民族语言戏剧（特别是喜剧）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我们必须提上一提。在这一方面，罗伊希林的名字是重要的；他的喜剧于1496年出版。

不过，罗伊希林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他作为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对创造路德后来取得成功的那种气氛所做的贡献。当然，其他的一些影响也在起作用。1498年出版了14世纪神秘派作家约翰内斯·陶勒的说教作品。而从16世纪开始之前起，有“德国萨沃纳罗拉”之称的盖勒·冯·凯泽斯贝格（1445—1510年）的大胆的训诫作品就被他的朋友传抄并出版了，看起来很像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利用手头所有的东西，如前所述，也包括《愚人船》。在1520年以前，路德就已经开始行动，他的95条论纲是1517年所写；1520年，他的3篇著名的“宗教改革论文”——《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论教会的巴比伦囚虏时代》和《论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问世了，它们分别谈论德意志民族抗拒罗马巧取豪夺的责任、圣礼制度和因信称义的教义。1520年12月10日，路德邀请维滕堡大学和城内的人们前来观看他烧毁开除他教籍的教皇通谕以及其他“罗马的”东西。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过去了，路德的其他作品，包括他翻译的《圣经》（1534年完成，《新约》是1522年出版的）在内，都属于一个新的时期。而他的《圣经》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对于标准德语散文风格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的译本并不是第一个德文译本。现在只提一下主要情况：1466年版是在斯特拉斯堡由门特林刊印的，这个版本所根据的是一个较早的版本。迄至1518年至少有13个另外的高地德语版本，迄至1522年有4个低地德语版本，都是从1466年的版本而来。这些版本毫不生动，枯燥无味，错误满篇，影响较小。

低地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奇故事以及宗教和敬神作品之类而外，有盛极一时的修辞院（Rederijkerskamers）的作品，修辞院各具有稀奇古怪的名称，是一种行会式的合作组织，专门致力于诗歌和学术。当15世纪颇为盛行的宗教剧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圣礼剧》据传为斯米肯所作，但也有人主张是布鲁日修辞院成员安东尼斯·德·鲁维勒所作，1500年在布雷达上演，这大概是最后的宗教剧之一），修辞院的成员们发展了道德剧。最出名的道德剧是《每个死尸》，著者一般认为是彼得·多兰

都斯，约在1470年写成，1485年左右在安特卫普上演，1495年出版。这部作品可能是英国的《普通人》的底本。这些道德剧（abele spelen），主要以高尚的英武事迹为主题。修辞院在偶尔上演神迹剧（例如《内伊梅根的玛利亚》，大概是一位安特卫普的修辞院成员在1500年左右所作）以外，大抵献演这类道德剧和大开玩笑的闹剧。这些戏剧作品和一些美词丽句的抒情诗似乎是这一时期尼德兰人对于文学的主要贡献，但是它们与一些中世纪的作品（如《列那狐传》）不同，能达到可以称之为欧洲水平的真是凤毛麟角。

英国学者与伊拉斯谟和其他一些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者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在当时的一些英国本族语言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的若干情趣。然而，主要的传统依然是中世纪的；在诗歌中，还没有摆脱乔叟的以及寓言的魔力。我们很难相信对枯燥的说教寓言家斯蒂芬·霍斯（1475—1530年）来说，他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骑士世界会是完全真实的；他的《道德范例》（约1503年作，1512年出版）和他的《快活的消遣》（约1505年作）都是枯燥无味的讲仁义道德的冒险故事，由于用拉丁化的语法和杂乱无章的风格而搞得一塌糊涂。亚历山大·巴克利（1474—1552年）是一个虔诚的方济各会士，他在1509年改编了布兰特的《愚人船》。早些时候，他为了教育的目的，曾经颇为生硬地模仿曼图安的田园诗。约翰·斯克尔顿（约1460—1529年）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曾经受到伊拉斯谟的称赞；但是作为一个教区牧师，却并不令人满意。他给未来的亨利八世当过辅导教师。他以辛辣无比的讽刺和信口开河的诙谐而博得文名。在他的讽刺性寓言里，他放弃传统的英雄诗体，而采取一种不整齐的、不规则的，带有重韵的节奏，这种节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别有蹊径在其中”。他在《宫廷饮食》（1499年作）中，用乔叟的节律讽刺宫廷的生活。他的《科林·克劳特》（1519年作）攻击神职人员、甚至沃尔西本身。在《你为何不进宫？》（1522年作）中，他以极刻薄的字眼，再度发起一次进攻。他的早一些时候的《麻雀菲利普》是对珍妮·斯克鲁培的宠爱的动物之死所作的挽歌，这首挽歌以卡图卢斯的作品为基础，但是塞满了回忆和枝叶，拉得很长。他还写了一篇道德剧。这位奇特的人物令人想起拉伯雷，他有很丰富的骂人词汇，很活泼的文体，很多的斗争精神以及一点点人文主义的味道，但就整个说来，他仍然属于中世纪的而不是文艺复兴的传统。苏格兰的诗人们也保留着一种强烈的中世纪的气味。罗伯特·亨利森（约1425—1500年）活动

在一个乔叟式的世界中。他在《克莱西德的遗嘱》中，给予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的故事以（在他看来）更圆满的结局。他的《寓言集》，故事讲得很好。他的《欧尔福斯与尤丽迪思》哀婉动人，有抒情的节奏。他的《罗本与马金》具有质朴无华的写实主义色彩。在整个苏格兰作家中，理所当然最为出名的是威廉·邓巴（约1460—约1520年）。尽管他的作品不多，他的诗通常都很短，但是，他的寓言诗，如为欢迎玛格丽特·都铎到苏格兰来而写的《蓟与玫瑰》，或者他的《七个死罪罪人的舞蹈》，以及他的讽刺诗，如以其写实主义而值得注目的《两个已婚女人和一个寡妇》，和《通兰德的芬尼耶特·弗赖尔》，都具有极精湛的技巧。他出众的地方在于语言和音韵的精巧，而不在于任何思想感情的创新，甚至在他的一首吟咏死亡的忧郁的抒情诗《哀悼造物主》中，也是如此；这首诗是悼念苏格兰过去的诗人的。加文·道格拉斯（约1475—约1522年）乍看起来，仿佛朝向较少中世纪色彩移动了一步，虽然他的早期寓言，以简洁著称的《荣耀之宫》（1501年作）和《国王哈特》，依然遵循古老的传统。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埃涅阿斯纪》的第一个英译本（过去只有若干片段）。这个译本用的是十音节的押韵诗行，努力做到准确；但是，维吉尔的诗意几乎没有表达出来，倒是道格拉斯在每卷前面的引言写得有声有色，受到人们极大的称赞。戴维·林赛爵士的作品完全采取中世纪的形式和传统的结构，所以不在我们的讲述范围之内。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形式的大众诗歌都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确定它们的年代。要想准确地指明在全国各地搬上舞台的许多宗教剧和世俗剧的写作日期或者演出日期，也是同样地困难。城镇的成套故事不仅依然流行，以后也继续受群众欢迎。一些道德剧为15世纪的作品，它们遵循标准的模式。《普通人》的优点是人所共知的。《四个元素》约在1519年出版，但现存只有残本，这部作品谈的是科学和新的发现。

如果严格按我们的时期来讲，要提到的散文是很少的。严肃的文章依然主要是用拉丁文写作。旧传奇小说印成廉价的小册子流传。伯纳斯勋爵（1467—1533年）翻译得很活的傅华萨的《见闻录》以及同一译者所译的《波尔多的于昂》虽然内容是追溯中世纪的事情，但英译本的出版属于下一个十年。我们必须记得，卡克斯顿1485年出版的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卡克斯顿的另外一些出

出版物，例如温金·德·沃德的一些作品，使当时出现的许多最有价值的作品以及古典著作的译本得以保存下来。

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正如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大众文学的背景：有在晚些时候搜集起来的民歌和民谣；有英雄的、神话的或趣味性主题的叙事诗，或者像冰岛的《特里斯丹叙事歌谣》那样，利用过去广泛流传的“布列塔尼的”题材；在冰岛，还有取材于“萨迦”的诗体故事（rímur）。用丹麦文出版的第一部书据说是由修道士索洛的尼尔斯所著的《韵文编年史》（1495年）。约在同一时期产生的瑞典的编年史有《查理朝编年史》和《斯图勒家族编年史》（约1500年）。在冰岛，对传统的叙事诗也用散文体进行了重新改编。宗教诗并不缺乏，而且产生了新的作品，如欧登塞的米克尔的3首圣诗《圣母玛利亚的玫瑰花环》《创世》和《人生活》，均在1514年发表；而在冰岛，霍拉的最后一位天主教主教约翰·阿尔逊创办了第一家印刷所，在1550年他被斩首之前，曾经写过一些关于虔信上帝、爱国主义和政论的诗篇。1506年，曾经出版据说由彼得·拉拉所编的丹麦谚语集。在瑞典，瓦斯特纳的一位修女英格丽·珀斯多特写给一位青年贵族的《情书》（1498年），是脱离当时流行的类型的感人的作品。虽然很少有准确的证据，但是我们很难相信在这些国家里会找不到在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那一类神秘剧和道德剧。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盖尔语文学依然忠实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在爱尔兰，人们继续搜集原本，同时继续写阿尔斯特和芬尼亚的连续故事，有时用民谣的形式；编年史、宗教和敬神的文学继续存在，还从中世纪的古典文献中取材，翻译和改编小说。苏格兰的正式文学语言依然是爱尔兰语，正如写诗的主要技巧依然是爱尔兰的一样。在那里，杰出的文献是詹姆斯·麦格雷戈爵士弟兄在16世纪初期所编纂的《利斯莫尔教长的书》，其中有包括格莱诺基的坎贝尔（1513年卒）在内的一些新老诗人的诗篇以及几篇对女人的讽刺诗。莪相民谣也编成了集子。但是，苏格兰盖尔语文学的伟大时期是从1745年开始的。

布列塔尼凯尔特语文学有较大的进展。布列塔尼处在法国的影响之下，翻译和改编了许多法国作品。1499年出版了第一部布列塔尼文的作品，即让·拉加德克的《万灵全书》，他是在30来年以前编纂这部布列塔尼—拉丁—法语辞典的。1519年写成《死神之镜》，这是一首以死神和末世的事件为题材的长达3000行以上的长诗，直到1575年

才得到出版。16世纪早期出现了两部诗体神秘剧，一部是《圣诺恩传》，这是根据一部拉丁文传记改编的，以布列塔尼为背景；另一部是《耶稣的伟大奇迹》，它属于法国神秘剧的传统。敬神文学取材于《黄金传奇》。在康沃尔，宗教剧继续流行。《我主的受难》是一部枯燥无味的戏剧，以见诸正典的和托古伪作的福音为基础。它像《奥尔丁纳利亚》一样，是15世纪的作品。《奥尔丁纳利亚》是三部宗教剧，一为创世，二为受难，三为复活，所用的格律各有不同。虽然有一些滑稽的场面，但总的效果很差，对白毫不生动。属于同一大类的是《圣梅里亚塞克传》，它将近5000行，格律和音调多有变化，但年代错误俯拾皆是，结构十分松散。这部戏剧源出布列塔尼，但是夹杂着英语的单词，如果不是“多米努斯·哈德顿”所编，也是他在1504年抄录下来的。在威尔士，正如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一样，吟唱诗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威尔士的正牌吟唱诗人非常受人尊敬，他们以自己的技艺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自豪。但是，还存在着一大群自封的吟唱诗人，他们比流浪的乞丐强不了多少，并且构成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艺术的威胁。1451年的卡马森诗歌演唱大赛企图整顿这种情况，但只是通过作诗规则的严格化而取得一般的效果。虽然杜斐德·阿普·格威里姆的比较自由的风格依然有追随者，然而在15世纪末，由于有杜斐德·阿普·爱德蒙（约1480年卒）和他的弟子们，特别是以其警句式的诗歌而长期为人们所记忆的屠杜尔·阿莱德，更加形式化的诗歌流行一时。有一些诗人甚至在亨利·都铎赢得英国王位之前就为他大唱赞歌，而这种生动活泼的威尔士诗歌在评论时事方面的创作则可以以刘易斯·格林·柯蒂（1490年卒）对切斯特家族的辛辣讽刺为其代表。除了继续存在箴言式的三行诗而外，散文显得停滞不前。用威尔士语写作的第一本书直到16世纪中叶方才出版。

在欧洲本土西部以外的地区，据我们所知，文艺复兴发生的作用不大，虽然波兰的贵族青年有时是在意大利求学的。斯拉夫世界的总的传统依然是拜占庭式，采取地方题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就是西塞尔维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人，他们形成（特别是在拉古萨）一个以威尼斯和意大利为榜样的社会，而在早些时候，希腊学者从君士坦丁堡向这里逃来。西斯科·门切蒂奇（1457—1527年）和迪奥尔杰·德尔吉奇（1461—1501年）在情诗和哀歌方面，是上承奥维德和彼特拉克的。这些诗人无论如何应该包括在我们的论述里边。

对于本章的复杂的叙述，要想作一个总结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希望和成就、落后与保守的滚滚浪涛中，意大利光辉灿烂，占有独特的地位。的确，意大利在许多年间都成为一个样板和指南。尽管在其他地方有一位罗哈斯或者一位布兰特、一位邓巴或者一位勒梅尔·德·贝尔热、一位科明或者一位蒙塔尔沃的成就，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像意大利那样远远地跑在前面，把中世纪丢到大后边。古代学术的复兴（甚至在意大利内部）以及意大利的榜样的巨大威力，尚有待于扩展到欧洲的其余部分，以后，一般是被改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宗教改革的结果的制约。

[1] 在E. 潘诺夫斯基的《圣像学研究》（1939年）中作了极好的评述。

[2] 查理·德·托尔奈：《美第奇小教堂》（1948年）；潘诺夫斯基：《圣像学研究》；F. 哈特：《米开朗琪罗的美第奇小教堂的意义》，载《纪念乔治·斯瓦仁斯基论文集》（1951年）。

[3] 关于西斯廷小礼拜堂屋顶的象征性的各种不同意见，参见：查理·德·托尔奈《米开朗琪罗》，第2卷，1945年；E. 温德《圣帕戈尼尼和米开朗琪罗》，《美术杂志》第86期，1944年；温德《诺亚的方舟》，《准绳》1950年第1期，第411页；温德在《艺术学报》第33期（1951年）的文章，第41页；F. 哈特《天堂中的生命之树》，《艺术学报》（1950年）第32期，第115页以下，第181页以下和第239页；哈特在《艺术学报》第33期（1951年）的文章，第262页。

[4] 特别请参看A. 沃伯格、F. 萨克斯尔和E. 潘诺夫斯基的文章，这些文章在J. 塞兹涅克的《古代诸神的继续存在》，1940年，英译本（1953年）中，都有引用。

[5] 潘诺夫斯基：《圣像学研究集》。

[6] E. 潘诺夫斯基：《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943年，第242页以下，特别是第279页。

[7] G. 米拉内西编：《瓦萨里文集》，第7卷，第584页。

[8] G. 林格：《法国绘画一百年，1400—1500年》，1949年。

[9] A. F. 布伦特：《法国的艺术和建筑，1500—1700年》，1953年，第18页。

[10] E. 潘诺夫斯基：《沃伯格和考陶尔德学院学报》，1951年，第14期，第34页以下。

[11] W. 弗拉恩格尔：《希罗尼姆斯·布希理想中的太平盛世》，1952年。

[12] H. 鲁波里什：《丢勒遗书集》，第1卷，1956年，第85页以下。

[13] 参见奥尔蒂斯·德·苏尼加《基督教编年史》，马德里，1677年，第546页。

第七章 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下的帝国

1493年8月19日，老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在他自1440年即位以来漫长的统治期间，德意志民族意识开始上升。这种民族意识经过立宪主义对专制主义论争时期大辩论的哺育，受到了印刷术的发明在宫廷和城镇中日益富裕起来的德意志语读者之间影响的激励，体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个流行的口号。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四面八方的国土却是频频丢失。霍尔施泰因的领地已经接受了丹麦国王的统治（1460年）。条顿骑士团也处于波兰的控制之下（1466年）。奥地利各公国频频遭到土耳其人的蹂躏。瑞士人已不再认为自己对神圣罗马帝国负有义务。随着勃艮第势力的衰落（1477年），法兰西王国又重新开始向东扩张；法国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从尼德兰到阿尔卑斯山的离心运动。弗里德里希的儿子马克西米连接管的帝国却是国土缩小，四面受到威胁。

帝国的无能为力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但是办法何在呢？马基雅弗利写得很对：“对于德意志的力量无人能表示怀疑，因为它富庶，而且人口众多，武器充足……但却不能加以使用。”^[1]最高的权力是国王，国王要根据国会的意见并取得其同意才能行事，而国会则是国王的领地或直接佃户的代表会议。国会全部人数最多时包括6名选侯，约120名高级主教，约30名世俗王公，140名伯爵和领主，还有85个城镇。但是这个名单颇为杂乱，很不可靠；而且每届国会都有许多领地不包括在内。有的虽派遣了代表参加，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一定具有约束他们委托人的全权。许多城镇、贵族和他们属下的农村人口都没有代表参加。国会建立了某些程序。国王提出了他的建议后就离开国会。选侯、王公贵族和城镇分别进行讨论。美因茨选侯随后主持联席会议，并将取得一致的意见呈报国王。国王与各领地取得的一致意见即成为法律。但是，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将新的义务强加于人这一中世纪的原则仍未失去其作用。再者，那些对于某些提案在国会中本已表示附议的人，往往一再拖延迟迟拒不执行，直到时过境迁这些提案已

不符合需要。弗里德里希在位期间，国会频频举行会议，提出了许多在有限的期间内解决争端和维护和平的计划，并大肆宣扬。但是，这些计划除了促使人们的思考并要求维持秩序以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德意志仍然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势力集团。德意志的百姓都把当地的统治者看作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只是在较大的公国领地或较大的城镇中，百姓才相信他们的统治者在正常情况下具有足够维持治安和进行防卫的能力。

在英、法两国中，教会谆谆教诲人们在世俗事务方面要服从王室的权威，并且往往充当王室政策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工具。但是，德意志的100多名高级主教，上自美因茨、科隆、特里尔这3位兼任选侯的莱茵区大主教；下至各修道院院长和教堂执事，尤其在南部或西部，他们自己就是世俗的统治者；他们大多数是王公贵族世家的成员，具有王公贵族的政治观点。这些高级主教身兼各种有俸的神职，并且相沿成风。例如，巴拉丁的乔治伯爵在成为施佩耶尔的主教之后，又在1513年取得罗马教廷的许可仍兼任美因茨教长、科隆和特里尔大教堂公祷团的成员、布鲁日的圣多纳西安大教堂教长、霍克海姆和莱茵河畔洛尔希的教区神父。勃兰登堡选侯的兄弟阿尔贝特·冯·霍亨索伦，1514年当选为美因茨大主教时，经准许仍保留原来马格德堡大主教的职务，以及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区。这些高级主教们充斥着财产和权力的思想，而对辖区广大教徒们精神生活的福祉毫不关心。他们有些人很少履行教士的职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鲁佩特·冯·西默恩，他在1440年到1478年任斯特拉斯堡主教期间，从来没有主持过一次弥撒，并和世俗人一样每年接受一次圣餐。

尽管如此，教会在履行开明教化这一伟大的任务，在德意志人中间传播责任、友好和谦让的美德。教会的永恒性令人仰之弥高。教会的法庭执行教会的法律，其判决是有效的。教育几乎仍然全部掌握在教会手中。各种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中洋溢着德意志人慷慨无私的虔诚情谊。艺术家和名工巧匠精心装点着教会的大礼拜堂、教堂和宗教会所。朝圣吸引着成千上万热心于瞻仰古迹和花钱赎罪的人，卖赎罪券的某些收入支持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服务事业。

但是，在人们普遍接受传统的同时，许多正统派改革者对于教士们缺乏纪律和教育的情况日益感到不满；资产阶级的一些舆论对于教会的权力之大也不能容忍。同时，教士中的“无产者”中间也存在着

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以千计的世俗教士是收入微薄的教区神父，他们的上司却有薪俸可拿而且另住他处；有的不能担任拯救灵魂的职务，依靠在某些特定的祭坛上主持弥撒为生；有的为了收取一点费用而从事其他宗教活动。在15世纪末，有236名教士附属于布雷斯劳的两个教区教堂^[2]。尽管再三实行改革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国内还有许多宗教会所管理不善并且不从事宗教活动；还有一大群到处流浪的托钵僧，其中有些是属于不见经传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兄弟会的骗子手。全国各地拥有大批资产的修道院和教士团组织到处林立。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大都不是教士，而清一色地来自贵族世家（他们被称为上帝的贵族），他们除了没有结婚这一点以外，和他们的那些专事武斗和沉湎狩猎的兄长们毫无二致。教士中间有如此众多的没有基督教信念的人物混迹其中，要能够有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基督教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成立什么神学院。只有追求教士薪俸和修士身份的小执事才去上大学。教士中很少有人有神学、布道或礼拜方面受过训练。没有一个主教着手解决教士教育这个根本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通俗的宗教读物的大量需求，路德以前德文版《圣经》再版次数之多，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无数出版物都为人的自由意志进行辩护，正好说明基督教关于人的教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出了问题。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大传道师盖勒·冯·凯泽斯贝格说过：让普通人来任意解释《圣经》，就像把切肉刀交给一个小孩让他去切面包一样地危险。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禁止未经批准即刊印并出售用本地语言写作的宗教著作，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如果说在波希米亚以外地区反对教会教义的规模仍然很小，它还没有张扬开去，或者仅限于少数几个异教徒的人文主义者，那么这种反对毕竟是在酝酿之中。

官方强制实行的改革，并不是来自那些漠不关心的高级教士，却是出自世俗的统治人物。教士中间极力主张改革的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宗教界和遥远的罗马都已失去信心，而且又害怕反教权的情绪不住地高涨，于是便转向王公贵族请求支持。王公贵族对教会事务发号施令，对教会的各种教士团组织或改组或取缔，都不是罕见的事情。城镇也愈来愈多地接管在此以前一直由教士们经办的各项活动，如医院、学校、管理伦理道德的问题，甚至管理教会和修道院。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在宗教改革前有20所大学，其中18所或是由世俗的

王公贵族或是由市政议会创办的，只有最无足轻重的2所，即美因茨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才是由教会当局兴办的。

但是，这种由世俗愈来愈多地控制教会的过程只能是靠强有力的人物实现。这个过程有助于少数的诸侯大家族巩固他们日益庞大的权力和财富。而这些大家族在1495年至1504年的10年中间，一心想要参加管理帝国，即管理那些无数的诸侯。而这些诸侯以及少数的大城镇在16世纪中都将成为实际上独立的国家。

经济上的变化打断了中世纪德意志生活的节奏。德意志的商人学会了意大利人的大规模资本主义经营的方法。在马丁·路德以前的那个世代中，大资本家这个新的势力已兴起；他们组织了贵金属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控制了价格的涨跌。统治者们通过收买或贿赂其他国家的大臣，或者通过战争的方法，奉行着种种有力的扩张政策。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的职业兵，如果不按期发饷，他们就要开小差。这就需要有大量的现金，而资本家可以提供这些现金以换取生产上的垄断权，从而他们又可从垄断权中取得好处。关于这种垄断权，在马克西米连统治的末期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当时控制匈牙利铜矿的福格商行和主要经营蒂罗尔铜矿的霍赫施泰特尔商行之间的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铜业市场完全要由蒂罗尔供货，而尼德兰的铜则由匈牙利供应。经济普遍动荡的结果，小规模生产者的旧式联营百业萧条，由于新发明的问世，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工业无产阶级在成长，而在较为成功的资产阶级中间财富和文化则迅速增长。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促使农村中的小贵族加重了他们不自由的佃农的负担并且剥夺了他们的普通权利，除了巧取豪夺以外，又施加暴力，因为这是唯一能使这些小贵族向富裕的市民生活方式看齐的手段。每隔10年，德意志南部的某地总要发生一场严重的农民起义；随之而来的镇压往往提高了邻近地区的王公贵族的威信，因为这时证明他是唯一能够对付这次起义的强有力的人物。

促使变化的另一种影响是罗马法的传播，这是知识分子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德意志的法律是地方法，而且名目繁多。德意志法的根源莫衷一是。罗马法披荆斩棘在丛林中开辟了一条明确的、始终一贯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于权威和财富是有利的。在罗马的古迹受到人文主义者几乎是顶礼膜拜的时代里，罗马法的威信是崇高的。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大学培养出来的平民法学家越来越多地

被诸侯用来充当行政官吏、法官和公断人。在1495年成立的帝国最高法院中，有半数的法官是由平民法学家担任的。从此以后，这种外来的、权力主义的并且把君主视为一切权利的源泉的法律，就更加迅速地引进了各地的司法和行政管理中去，以便进行正规的和系统的治理。但是中央政权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尽管这些诸侯在其自己的领地内一心想要成为罗马法所说的君权的源泉，但是对于神圣罗马皇帝却仍然一直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封建关系。

到15世纪末，较大的诸侯所取得的胜利还没有获得任何保障。较大的城镇乃是财富的主要中心，它们的力量还很强大足以自卫；如果说，它们必须作出抉择的话，它们宁愿接受帝国有效的治理，而不愿接受诸侯的统治。在西南地区，由诸侯、主教、伯爵、骑士和城镇组成的“施瓦本联盟”有正规的会议、法庭和一支起码的共同拥有的军队，计有步兵12000人和骑兵1200人；这个联盟在一个帝国观念最强而实际力量最分散的地区内，在维护和平和保卫现有秩序方面确实大有作为。这个联盟是由于斯瓦本的各阶层慑于瑞士的“革命”势力日益增长和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各公爵采取了侵略政策而于1488年成立的。这个联盟是一个要求各加盟成员对其本身的自治权利作出一定牺牲而结成同盟的实例。马克西米连和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都依附于这个联盟，而且俩人都想设法争取联盟支持自己的关于“帝国”的观念。联盟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确曾支持过贝特霍尔德所做的改革努力。但是，在1499年与瑞士议和、1504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失败后，联盟已达到了它原来的要维持西南地区现状的目的。改革运动此时也就偃旗息鼓了。在符腾堡的埃贝哈德去世（1496年）后，联盟再也没有一个有作为的和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联盟在1519年时，力量还相当强大，足以推翻符腾堡的野心勃勃的乌尔里希，并把他的领地卖给了查理五世。但是，联盟的成员往往只想分享联盟的好处，不愿尽力地去完成联盟的义务。宗教改革又使联盟进一步分裂，逐渐趋于解体。

从教会、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方面来看，德意志处于混乱之中，经历着一场急剧的变革。人们渴望着秩序、和平和安全；渴望着有一位领袖能够实现这种愿望；渴望着有一位皇帝出世，他能够按照《启示录》流传极广的传说出来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对于广大的德意志舆论界来说，马克西米连这位自1486年起就是德意志王，而

在他的父亲去世后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及哈布斯堡各领地唯一的统治者，看来就是天赐的领袖。马克西米连具有为其各阶层人民所爱戴的品德，年方34岁，相貌堂堂。他为人敦厚，平易近人，对诸侯、教士、骑士、贵妇人、商人、农民一切人等一视同仁。他爱好运动，喜爱登山，在竞技和狩猎方面也是佼佼者。他又是一位学者和诗人，是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的保护人。他在战争中则是一位胸有韬略的统帅，他是德意志步兵即雇佣兵的缔造者，炮兵技术的专家。他曾于1479年把法国人从尼德兰赶出去；近如1493年1月，他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在萨朗一战告捷，使西德意志免遭法国的侵略，继而在5月订立了森里斯和约。3年前，他取得了蒂罗尔并把匈牙利人逐出下奥地利，从而将哈布斯堡家族所有的土地重新又置于他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管辖下。在他登上这独一无二的统治宝座的时刻，极尽荣耀之能事，而且深受人民大众的爱戴。

但是，马克西米连对于一个德意志王所要遇到的棘手困难深有体会。这些困难再加上他自己又无法对自己所面对着的种种可能性作出切合实际的估计，因而他的统治受到挫折，令人失望，最后归于失败。在法国、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穷兵黩武的专制国家日益强大的时代中，马克西米连不免看出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在你们的国王领导下团结起来，保卫德意志使之免遭法国和土耳其人的侵犯，否则就是灭亡”，这就是他雄辩地向国会，向首要的诸侯们，向城镇议会不断提出的问题。他没有能够说服各个阶层的人物，德意志以后的三个世纪的历史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警告。

马克西米连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可以不受约束地征税并拥有一支常备军。这些努力遭到美因茨的大主教、帝国大法官兼选侯团的主席亨内贝格的贝特霍尔德的反对。后者组织人们起来支持另一种主张改革国会。他显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以他能使选侯团中的他的同僚们，甚至马克西米连的好友萨克森—迈森的阿尔贝特和符腾堡的埃贝哈德等人改变主意而同意他的主张。因此，他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达10年之久。贝特霍尔德代表中世纪后期的贵族立宪主义。他和他的同僚们要求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作为整治德意志当时无政府状态的根本补救办法。但是，最高的中央权力机关必须由一批较大的诸侯组成，其中各选帝侯以其传统和辅佐的经验应作为国王的参议而名列前茅。这些改革家们

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帝国，其中大诸侯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但对于共同的事务则应和国王一道作为一个政府进行管理。不管帝国将来拥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必须用以维持国内的秩序。必须避免对外战争，以便使新建立的机构有可能在和平的时期为人所接受并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不同意马克西米连自以为有权可以自行控制军队和财权，可以自行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们看到马克西米连在帝国边缘各地进行冒险，其所追求的目标也许可以扩大哈布斯堡家族的力量，但看来和德意志的中心利益却相去甚远。马克西米连曾替他的儿子菲利普担任尼德兰的摄政，他的对法战争激怒了佛兰德的各城镇，因此帝国不得不派遣一支军队去解救马克西米连，使他从布鲁日市民的监禁中脱身（1488年）。两年后他通过代表与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妮秘密结婚。这是一个疯狂的策划，目的是要使他能够从背后进攻法国。这时，虽然理由并不充足，他却又断然声称他的家族享有对匈牙利王位的继承权。无论他的父亲或是帝国议会都不支持这两个计划中的任何一个。

1493年夏天，马克西米连的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东方。土耳其人此时已在克罗地亚和南施蒂里亚出现，马克西米连便前往格拉茨组织防御。在森里斯条约之后，西部平静无事。马克西米连任命的尼德兰执政萨克森-迈森的阿尔贝特已经使佛兰芒人各城镇降服（做得很成功，300多年来这些城镇一直忠于哈布斯堡家族）。1494年8月，他把权力交给了年轻的菲利普公爵。看来，法国从下莱茵兰进入德意志的门户已经被堵死了。其实，法国的查理八世和马克西米连两人都梦想着组织一支对付伊斯兰的欧洲十字军联军。

1494年9月，法国侵犯意大利。马克西米连对此未加反对。相反，他和查理八世在谈判中似乎确定：为了报答他对法国征服那不勒斯的默许，查理八世将支持他反对威尼斯。威尼斯是马克西米连一直忌恨的目标，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窃取了不少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这次会谈是1509年康布雷同盟的一次早期的预演，两位国王在会谈中划分了对意大利的控制权^[3]。为了推进这项在意大利恢复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计划，马克西米连又与米兰的摄政卢多维科（绰号摩尔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把米兰公国授予卢多维科，而且还娶了他的侄女比安卡·玛丽亚·斯福尔扎为妻，以换取44万他求之不得的杜卡特金币。有了法国和米兰的支持，他就可以把威尼斯共和国赶出大陆，而

大陆则将回到帝国的怀抱。然后再从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大事征伐，使东方得到解救。1494年11月24日，他号召议会于1495年2月2日在沃尔姆斯开会，与会者要各带一部分军队；此时，他仍然一直怀抱着这些希望。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在德意志大军陪同下前往罗马举行皇帝加冕典礼。到夏季，便可进行对土耳其的十字军东征。

但是，法国在意大利取得的意想不到的完全胜利，使各国普遍感到震惊。西班牙、威尼斯、教皇和米兰不久便一致起来进行抵抗。尽管马克西米连对于查理八世无视帝国在中意大利的权利以及谣传查理提出要改革罗马教廷，甚至想要攫取帝国的皇位等甚感不满，然而，只是在西班牙的费迪南德一再告诫说法国有独霸意大利的危险，并且提出马克西米连的儿子菲利普和女儿玛格丽特与西班牙的胡安娜和胡安双双联姻，马克西米连才于1495年2月参加了威尼斯同盟，要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

由于德意志的军队没有参加，威尼斯同盟1495年7月在福尔诺沃进行的对付法军的敷衍了事的战役也受到了削弱。马克西米连为什么没有在那里指挥同盟的军队作战呢？由于议会不同意他提出的供应要求，因此他滞留在沃尔姆斯。他原来指望议会只开一两个星期的会议，但却开了26个星期，因为马克西米连要求派出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和改革派便乘机坚持要求马克西米连实现他在1489年和1491年曾答应过的体制改革（成立最高法院，永远禁止械斗），并采取进一步措施。马克西米连滔滔不绝地向各等级人士说明除了土耳其侵略这一经常性的威胁外，还有法国控制意大利以及法国从南方和西方进攻的危险。他要求立即拨付进行意大利战役的经费以及将来在10年至12年中为了保持一支军队所要花费的金钱。争论的双方都承认对方言之有理。但问题在于轻重缓急。改革派认为德意志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贯彻始终而又切实可行的法律和秩序的体制。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中除包括上述的要求外，还包括一个由17人组成的常设最高执政委员会（*Reichsrat*），负责国防事务和国内的和平，执行朝廷做出的决定，并管理王室的收入；不经该委员会同意，国王的法令将无效。委员会主席应代表国王，6个选帝侯可各提1名委员，宗教界贵族提4名，世俗贵族提4名，城镇提2名。重大问题包括对外关系和征收新的税收等问题则要提交国王（如国王视事）和选帝侯。

福尔诺沃战役，法国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帝国议会在这—消息的推动下，批准了征收公共税（公共芬尼）以供应一支国防军的计划，各城镇立即贷款15万盾，以后再向准备预付公共税者收取15万盾。但是关于其他措施的辩论—直进行到8月。甚至有人提议建立一个不受罗马约束的德意志教会。最大的分歧是关于执政委员会的问题。国王不同意把他的地位降为选帝侯们控制下的一个委员会的一名行政官员。各等级赞成执政府的也寥寥无几。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那样的一些人物则公开表示反对。于是委员会的问题遂作罢。但是，贝特霍尔德坚持认为必须成立某种代议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最后决定还是应当授权帝国议会，每年召集一次会议或召开非常会议，颁布维持和平的措施，负责公共税的支付，执行对外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样一来，一个长期证明不能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构变成了最高的行政权力机构。

同时还宣布永久的国内和平。这是一项成就。其实，和平与否，要看各诸侯是否支持集体安全而定。仍然有人违反和约，有些诸侯就不听约束，而强盗骑士们不可能要他们在一代之内就放弃他们的劫盗生涯，但已不如以前为烈了。同时还宣布了械斗为犯罪这一原则。帝国最高法院在法兰克福（在远离哈布斯堡势力范围的莱茵河畔的德意志选侯地区）开庭，将实行法治。国王将任命法院院长，院长将由议会批准的8名贵族和8名法学家襄助。马克西米连于10月31日正式为法院举行了成立典礼，这是沃尔姆斯议会决议成立的一个常设机构。但是，这个最高法院开始工作时就很不得力。它无法制约权势者。法官们领不到应由公共税中支付的薪金。诉讼者抱怨说，不行贿案件就无人受理。1497年5月，最高法院便迁往生活费用比较低的沃尔姆斯。

财政供给是一场失败。公共税经议决仅仅征收4年，是要用来支付帝国军队和帝国最高法院以及其他政府开支的。税款是要向7名由国王和各等级提名并常驻法兰克福的司库缴纳的。这7名司库每年将账目呈交议会，由议会分配各项开支。这项强调帝国统一的一大革新，即征收收入的2.5%或本金的0.1%的税收，是直接向所有年满15岁并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的，并由教区神父收集，因为这项税收原先主要是打算用于对土耳其的十字军东征。这是迈向真正联邦税制的第一步，虽然各个等级负有责任督促税收的收集工作。这不只是联邦向各地统治者提出的要求，这些统治者是可以任意征税的。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到

手。许多诸侯、伯爵和城镇认为这项税收是横征暴敛。许多人拒绝接受一个他们既未出席、也没有派代表参加的议会所发布的命令。法兰克骑士的一次集会竟宣称，他们的职责是为帝国而战斗，不是向帝国纳税。两年之后，只有美因茨（理所当然）和其他两地的主教、勃兰登堡侯和两个较小的诸侯以及西南部的一些城镇缴清了税款。没有钱，没有强制性的权威，在沃尔姆斯议会上提出的种种改革都是行不通的。

此后4年，马克西米连的种种活动都贯穿着一条线，这就是他继续不断地与法国争雄。1496年初一些法国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这件事似乎证实了查理八世不久即将回师意大利的传说。可能首当其冲的米兰的卢多维科劝说威尼斯人和他一道按月给马克西米连一笔津贴，让马克西米连充当他们的佣兵首领，带一支德意志军队进入意大利。此时马克西米连的宏图大略是让帝国的旗帜飘扬在意大利，把法国人赶走，然后和西班牙一道从南面侵入法国，同时英国人则从北面进兵法国。但是，他提出的帝国大军于7月和他会师的号召，却没有什么人响应。帝国没有一个诸侯率兵前来或赞同这次征伐。因此，他必须用钱来雇佣军队。福格家族同意拿出121600盾，以换取蒂罗尔银矿的专利开采权。但是这笔钱几乎全部用于偿还旧债和支付蒂罗尔官员们的开支。他不顾沃尔姆斯敕令的规定，把公共税中蒂罗尔缴纳的部分尽量搜刮过来，带领着一支由4000名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兵力不多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妄想用意大利人提供的津贴雇佣一支由瑞士人组成的声势浩大的雇佣军。但是，此时情况已经判明：法国不会侵入意大利，威尼斯人因而劝告马克西米连不必再前进。然而他不听劝阻；他是作为救苦救难的天使来到意大利的，可是现在却谁也不需要他。卢多维科替他想出了一个任务：解救佛罗伦萨进攻下的比萨。马克西米连遂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包围了佛罗伦萨的港口里窝那。马克西米连在里窝那敌不过秋季的气候，而且威尼斯的津贴又拿不到手，于是便赶忙放弃他的意大利计划，匆匆返回德意志，在整个意大利徒留下一片嘲笑声。

然而，就在马克西米连在意大利出尽洋相的时候，1496年10月21日却在安特卫普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在将来几乎肯定要使哈布斯堡家族成为他梦寐以求的欧洲的君主国。这便是他的儿子勃艮第的菲利普和西班牙的胡安娜联姻。

从1496年夏天到1498年夏天，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几乎使议会在林道、沃尔姆斯和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等地不停地举行会议，极力劝说参加会议的邦议会为共同的利益而放弃各邦自立的主张。马克西米连不闻不问，在他自己的蒂罗尔整顿行政机构。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节约和禁酒的条例。最后于1498年6月，马克西米连到弗赖堡出席会议。查理八世暴卒，奥尔良的路易继任法国国王。在路易尚未坐稳王位以前，马克西米连已在组织一场防患于未然的战争。公国领地勃艮第应予收复，法国在莱茵河一带的附庸小国应予制止不得与帝国对抗。他对着一群诸侯慷慨陈词说：“伦巴第人叛我而去。德意志人弃我而去。但是，我决不能再像在沃尔姆斯那样被捆住手脚……我必须要进行战争……我必须这样做，即便是把皇冠掷于脚下加以践踏，也在所不惜。”^[4]

议会认为进行战争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国王和各地诸侯达成了协议。公共税缴纳的情况有所好转，其中一小部分拨作战费。马克西米连批准了沃尔姆斯敕令。但是马克西米连的战争却烟消云散了。路易这时正在为征服米兰进行准备，因此对勃艮第问题却愿采取守势。同时，他又巧妙地使意大利同盟解体，与威尼斯和西班牙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布鲁塞尔和马克西米连的儿子菲利普订立了友好条约，与瑞士进行谈判，并怂恿已被废黜但仍不甘心的盖尔德斯公爵埃格蒙特的查理进行活动。1499年2月马克西米连忙于对付盖尔德斯的时候，听说在施瓦本—瑞士边界全线战争已经爆发。

当时的瑞士联邦包括原有的森林各州即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其他两个农业州即楚格和格拉鲁斯；城镇占优势的伯尔尼、卢塞恩和苏黎世各州；还有1477年后兼并的弗里堡和索洛图恩。此外还有几个由两三个州共管的地区以及附属的阿尔卑斯山区和联盟城镇。由10个农民和市民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或几次会议。它是实行某些管理和决定共同政策的中央机构。

圭恰迪尼描写瑞士人“剽悍；由于土地贫瘠，多从事游牧而不务农……这些强悍而原始的民族以团结和武功著称，由于他们生性勇猛而严于军事纪律，因此在保卫国土时一贯英勇，在为外国雇佣作战时赢得声誉”。^[5]在从封建军队转向职业军队以骑马的武士为主体，转向以新式火器为主的过渡时期中，瑞士人由于纪律严格和英勇善战，因而战争便成为这个民族的事业。瑞士人除了从畜牧业中取得微薄的

收入外，由于他们处于中心地带，还可从货物过境中牟利，也可从苏黎世和伯尔尼的工业中获取一部分利润。他们除了这些财源外，还有从在外国当雇佣兵获得的金钱和抢掠来的财物。而在外国当雇佣兵则是年轻人最喜爱不过的。出于其他方面的动机也会派出由这些剽悍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前去作战，例如本国的独立受到了威胁，出于捍卫教会，或者由于某些领袖们（他们对欧洲只略知一二，因而被人收买）的言论。在外国的强国中，法国的国王一直是出价最好的雇主，所以在15世纪末，瑞士军队差不多一直是法国政策的一种工具，德意志的舆论为此表示愤慨不已。有时，瑞士方面的反应竟会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查理八世在1495年8月派人从都灵前往瑞士招募12000名雇佣兵，应召而来的却在一倍以上，因此不得不派人把守各处关隘以制止妇女和儿童也来赚取法国的金币。

瑞士的弱点在于分裂，乡村各州和城镇各州互不信任，伯尔尼、苏黎世和卢塞恩彼此竞争，家族和个人之间的积怨颇深。各次勃艮第战争及其后果助长了伯尔尼的霸权，使大批说法语的人口沦于瑞士的统治之下，并且造成了为利润而纷争。只是经过了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瑞士在1481年才幸免于内战。接着而来的是一段和平时期，这时苏黎世的州长（1483—1489年）汉斯·瓦尔德曼在手工艺工人行的帮助下，成了苏黎世州实际上的独裁者。他的目的是要使瑞士在抵抗他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哈布斯堡危险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后来被反对他的人逮捕并处决，瑞士从而陷于没有统一领导的局面。

瑞士之所以能够和它以东的各个附属地区永远联系在一起，是由于对哈布斯堡的仇恨。这种仇恨的起因是由于对过去历次的斗争记忆犹新，而哈布斯堡家族占领蒂罗尔和施瓦本、阿尔萨斯和勃艮第的许多土地，更使这种仇恨死灰复燃。自从1438年以来，帝国的元首就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帝国的权威事实上已被认为消失。这种权威一旦恢复，瑞士人便立刻表示不满，因为在这种权威的背后却是哈布斯堡的利益以及瑞士人已经胜利地摆脱了的封建观念。瑞士人对于施瓦本联盟的建立并无好感，他们认为这是哈布斯堡设置的阻止瑞士扩张的一种障碍。莱茵河两岸交相谴责习以为常，边界上的形势一触即发。

如果倡议改革的寡头执政者们在他们的各级议会中给予组织良好的各个瑞士共和国以应得的席位，那么，1495年在沃尔姆斯通过的帝

国改革方案是会受到瑞士的欢迎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瑞士将得不到一席之地。对于一个没有农民发言权的议会，瑞士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他们的仲裁法庭的工作进行得相当令人满意，帝国最高法院对于他们毫无用处。至于缴纳公共税以供哈布斯堡的国王和选侯们挥霍，则更非所愿。帝国的改革派想把早已不起作用的宗主权改变为行之有效的主权。对此，瑞士不但加以拒绝，而且像一块磁铁那样，把企图摆脱帝国义务的邻邦一个一个地吸引到自己的体系中来。

1496年10月，瑞士人愤怒地拒绝了帝国最高法院的一项敌视瑞士圣高尔镇的判决。1497年期间，施瓦本联盟和瑞士双方各自磨剑砺矛。1498年，路易十二派人在瑞士人中间进行活动，广施金钱并散布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言论，以防止米兰的卢多维科得到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援助。点燃积怨这桶火药的星星之火是蒂罗尔和格劳尔之间一点微不足道的纠纷，格劳尔是阿尔卑斯山高原恩加丁谷地附近的一个部族。格劳尔人请求瑞士支援，蒂罗尔则向施瓦本联盟求助。1499年2月，沿莱茵河从巴塞尔到费尔德基尔希一带爆发了战争。这是一场野蛮而又不成体统的战争，只有一些小规模英勇战斗，更多的却是抢掠和破坏。瑞士人为了捍卫自由，作战时表现出团结一致和忠诚不渝，这正是施瓦本方面所缺少的。施瓦本方面的某些骑士还拒绝和“低贱的乡下佬”作战。

瑞士的这场大发作非常不合马克西米连的口味。这不是他要打的战争。瑞士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人，他经常需要他们为他服役。只要他能够获得他们的军事支持，他们事实上的独立大可以置之不理。这场内战带来的好处不多，却造成了德意志人力的大量伤亡。但是，马克西米连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元首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任命自己的姻兄弟巴伐利亚的阿尔贝特为临时总司令，许多施瓦本骑士对此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在一名巴伐利亚人的统率下服役。他本人也慢慢地南下到康斯坦茨湖畔，拟订了一个包围瑞士军队的计划。计划尚未实行就出了一件大乱子。德意志人右翼的一支约16000人的部队，于7月22日在巴塞尔附近的多纳赫遭到突袭全军覆没。瑞士方面胜利已成定局。这场战争估计死亡20000人，200个城堡和村庄被毁，经过谈判于1499年9月22日订立巴塞尔和约，战争才告结束。

巴塞尔和约没有改变领土的现状，至于神圣罗马帝国要求对瑞士行使管辖权这个主要问题则避而不谈，不了了之。但是，帝国法庭上

对瑞士的起诉则需撤销。马克西米连就这样接受了瑞士独立这一事实。1508年，当他和瑞士商谈雇佣瑞士军队的时候，就正式使瑞士联邦及其成员摆脱了帝国法庭司法管辖权的束缚。

战后，瑞士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501年，莱茵河上的两个要冲巴塞尔和沙夫豪森被接纳为瑞士联邦的正式成员。可能是为了抵销城市因素的增加，1513年阿彭策尔农村地区作为一个主权州又被接纳加入了联邦。在安全取得保障后，瑞士接着就向南扩张。1500年，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在8000名仓促之间征募到的瑞士人的支援下，从法国人手中夺回了米兰。但是另一支法国军队却出现在伦巴第，同来的还有一支人数更多的瑞士军队，这支军队是经过瑞士国会准许而应募来的。两支瑞士军队在诺瓦拉对阵。卢多维科手下的瑞士人，早已因为不能立即拿到钱和进行掳掠而失望，便拒绝和自己的同胞打仗，开回本国去了。于是米兰再度落入路易的手中。但是，法国国王和他的瑞士盟友之间又在与米兰的通商自由问题以及早已答应交给森林各州的贝林佐纳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争端。1503年初，瑞士的一支军队越过了圣哥特哈德山口，路易十二此时正忙于那不勒斯事务，便把瑞士垂涎已久的这个地区交给森林各州。因此，瑞士森林各州便取得了对一个说意大利语地区的永久控制权。

与此同时，瑞士联邦的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领袖们却深深感觉到派军队为外国服役有害于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1503年7月21日，有12个州参加的国会在巴登开会，一致同意放弃派军队为外国服役的做法，拒绝接受恤金以及其他募兵的引诱手段。但是国会并不能完全控制各州，而各州又不能完全控制本州的公民。所谓放弃的行为不过是侈谈而已。

直到1510年，瑞士或多或少还坚持着和法国的联盟。但是教皇朱理亚二世却决心要利用瑞士人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他的代理人马蒂亚斯·希内尔因为是瓦莱的德意志反法集团中的著名人物因而升任锡昂的主教。替教皇服役看来是件非常高尚的事业，因此，1510年3月14日瑞士的所有各州在卢塞恩举行的国会批准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瑞士在5年内应按要求提供6000人为罗马教廷服役，而每个州每年可以得到1000盾。条约不久便超额地被履行了。路易十二由于拒绝增加定期付给瑞士人的金钱，招募了德意志的雇佣兵，并在比萨召开了分裂的教会公会议，这就引起了瑞士人的愤懑。1512年夏天，12000多名

瑞士人直下阿迪杰河，把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这是瑞士人在强权政治中的极盛时刻。阿尔卑斯山从圣贝尔纳到斯蒂尔夫塞约赫的全部要隘，如今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卢加诺和洛迦诺由森林各州镇守，基亚文纳和瓦尔泰利纳则由格劳尔部族扼守。斯福尔扎家族在瑞士人的保证下在米兰复国，这就是说，这个大伦巴第公国正在沦为瑞士的保护国。

1513年捷报又传。路易十二想要夺回米兰的努力，于6月间在诺瓦拉被瑞士人决定性地粉碎了。在英国侵犯法国北部的同时，瑞士的一支大军开进了勃艮第公国。第戎投降的条件中包括法国人最终要从伦巴第撤退，并向瑞士赔款40万克朗。这些瑞士山民不等条约批准，便凯旋回国去了。路易则拒绝接受这个条约。

弗朗西斯一世认为他在1515年要做的头等大事是克复米兰。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向他的保证人求救。瑞士的大臣们意见分歧。亲法派和中立派重申他们的主张。西部各州虽然出兵，但却被弗朗西斯所收买。东部各州的军队在马里尼亚诺处于战术上不利的地位，结果全被打败（9月13日）。瑞士作为军事强国的历史结束了。1516年，有一些州仍然派出军队去为马克西米连和斯福尔扎服役。但不久他们的薪饷被扣留不发。法国军队也收留了一部分瑞士人。弗朗西斯准备让瑞士人保留他们在阿尔卑斯以南占领的地区。因此，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当雇佣兵滋长贪婪，引起争端并养成暴力习惯，人员的伤亡对于一个小国代价太大；比较妥当的政策还是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保持中立。1516年11月29日，瑞士联邦和法国缔结了一个“永久和约”。瑞士的军队将永远不被用来反对法国。法国国王有权招募16000名瑞士人，但仅用于防御。瑞士联邦还可以得到经济上宝贵的特惠权。于是，法国成了瑞士联邦的“头号朋友”和顾问。从此以后，瑞士内部极少发生内战，对外战争也绝迹，这都证明了法国的外交手腕的高明。神圣罗马帝国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瑞士，瑞士人则建立了他们永久中立的传统。

在1499年瑞士战争期间，路易十二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吞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封邑米兰。帝国议会难道能够忍受这种耻辱吗？议会于1500年4月10日，即卢多维科最后被法军俘虏的那一天在奥格斯堡举行会议。受尽磨难的马克西米连出席了会议。自1495年以来，他一再置沃尔姆斯敕令于不顾，一心只想使帝国打仗。他打过佛罗伦萨、法兰

西、盖尔德斯和瑞士，均未取胜。他可以争辩说，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得不到各个等级的支持，而那种行之有效的君主立宪的试验又使严重的后果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其结果，正如他在1495年所预言的那样，在德意志的南面和西面法兰西虎视眈眈。在法国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对神圣罗马帝国步步进逼的时候，德意志王却不得不应付混乱、不服从命令和背叛的局面。但是改革派仍然势力强大而且寸步不让。为了解除反对派的武装，马克西米连自己又提出了他曾在沃尔姆斯否决过的提案，即成立一个代议制的最高执行委员会，即帝国执政府。贝特霍尔德和他的同僚们便着手制订出一个适用于此后6年的方案。这个帝国执政府将由21名成员组成，国王或国王的代表任主席；成员中有2名代表奥地利和勃艮第；每个选侯可指派1名；其余12名由各等级按自己的阶层选出，代表除哈布斯堡及选侯领地以外的6个地区。方案还规定执政府将包括自由市公民、骑士和法学家在内。执政府每届会期3个月，1名选侯必须亲自参加会议。他要首先投票表决，并对决议案副署。这个政府机构设在纽伦堡。其官员的薪金将从经议会批准征收的税款中支付。但是，如果国王或国王的代表都没有到会，这个执政府照常处理事务。而且，它几乎接管了帝国的全部职能。行政、财政、司法改革、维持秩序、执行对外政策、征集军队乃至指挥军队等一切权限皆归其所有。它的命令将以国王的名义发布，并加盖国王的印玺。执政府每年向议会提出报告，6年届满时最高权力归还议会。

为了应付国防需要，遂采取了一项新的权宜办法。人人都得出力。贵族提供骑兵，各诸侯则向所属非贵族的平民征税以供养一支民兵。帝国执政府和帝国最高法院的开支靠教士和各城镇的捐献，人们相信他们可能懂得这两个机构的需要。这种办法由联邦制向邦联制倒退了一步，征税和组织军队的全部责任完全落到各个等级的身上。

这样，马克西米连建立帝国军队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多么重大！他已经不再是他所能承认的任何意义上的那种国王了。他已经沦为一个在贝特霍尔德和他的选侯同僚们左右下的执政府虚设的主席。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他既没有否决权，也没有行动的自由权。甚至连军事指挥权都从他那里移交给巴伐利亚的阿尔贝特公爵。马克西米连不得不屈从于需要。但是他向帝国议会提出警告

说，如果现在还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他将不会等着被人废黜，他要拿起皇冠把它摔得粉碎。议会闭幕前，他就到蒂罗尔打小羚羊去了。

改革派管理中央政府并不比马克西米连高明，他这时没有给他们以任何帮助。他们不会用把米兰交给路易的办法来和法国讲和。但是，他们既然不愿从事战争，也就没有给路易十二留下什么印象。民兵没有组织起来。贝特霍尔德的健康状况开始欠佳。各个等级很少支持他。执政府出席的人数寥寥无几。收到的税款为数如此之少，以致执政府的成员入不敷出，1501年当罗马教皇使节红衣主教佩劳迪刚到来收取大赦年赎罪券的收入时，他们就曾劝说佩劳迪把一部分款项拨给他们，但未成功。执政府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累赘。

马克西米连很快就从屈辱中恢复过来，重新取得了行动的自由权。他作为未来十字军东征的统帅，不遗余力地争取将大赦年赎罪券的收入尽可能多地向他缴纳。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命令截留下赎罪券的款项，听候他进一步的指示。他不经帝国执政府，便召集德意志诸侯率领军队和他一道于1502年6月1日进行十字军东征。贝特霍尔德的政策是召集各选侯开会，考虑国王违反沃尔姆斯敕令和奥格斯堡敕令的问题。1502年3月，马克西米连要求帝国大法官贝特霍尔德交出帝国国玺。其实这就是帝国执政府的末日。帝国最高法院亦已停止开庭，因为官员们拿不到薪金，而且马克西米连又恢复了他的皇家法庭，并亲自任命了法官。6月30日各选侯在格尔恩豪森开会，决定每年开会4次，并且撇开国王径自行使帝国政府的职权。马克西米连和贝特霍尔德书信往还，彼此激烈攻击。马克西米连并向乌尔姆市议会公开控告贝特霍尔德为法国国王所收买。这时，德意志陷入了比以前更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

马克西米连此时所进行的，不是耗费国帑的战争行动，而是事关哈布斯堡王朝今后伟大基业的曲折的外交活动。他的儿子菲利普已经通过妻子胡安娜的途径成为西班牙未来的统治者。1503年西班牙在南意大利彻底战胜了法国，这就加强了西班牙盟友马克西米连的地位。另一方面，菲利普和他的佛兰芒的臣僚们却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劝使马克西米连作为一方与路易十二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都一再载明菲利普的男婴查理要与路易的女婴克洛德联姻。虽然法王和德意志王根本互不信任，但查理大公似乎有朝一日不仅可能成为西班牙的统治者，而且至少要兼为路易十二某

些领地的主人。根据1504年9月的布卢瓦第约，路易将以20万杜卡特金币的代价取得米兰，并保证不再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如果路易死后无子，查理和克洛德将承袭米兰、布卢瓦和布列塔尼。次年4月，红衣主教昂布瓦兹以路易十二名义，代表米兰前往哈格诺觐见马克西米连，举行了隆重的授权仪式。尽管德意志境内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马克西米连关于将来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家的美梦却得到了鼓励。

马克西米连同时还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从事发展君主制的行政管理。他常说，他宁愿当有所作为的奥地利公爵，而不愿当一名无用的德意志王。虽然改革派正在把他在帝国的权力削减到几乎等于零，但是他却设法在哈布斯堡的土壤中寻求权力的根基（参见第219页）。

他还耐心地、孜孜不倦地积极争取诸侯们对他的支持。他的国王的地位和尊严使他能够对各修士会、豪门家族和城镇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成功地在许多主教区内安插了支持他的人。在世俗贵族中，除了那些一贯以拥护皇帝为己任的人以外，他还用分封采邑、授以征税权和其他权利的办法，培植了一批党羽。

马克西米连最可贵的是他的品格。那些好斗的、爱好打猎的年轻贵族们所有喜爱的东西，他都擅长。作家、艺术家和传教士为他歌功颂德。他在各城镇中也是备受欢迎的客人。他平易近人，长于口才，兴趣广泛，市民社会为之倾倒。

最后，他的主要反对者贝特霍尔德的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504年12月21日去世。若不是因为贝特霍尔德不懈的努力和对原则的忠诚，宪政改革运动根本就不能有任何成就。

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使形势突然改观，马克西米连在帝国内获得了短时期的胜利。1503年12月1日，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富人”乔治去世，死后没有男嗣。他曾和他的两个堂兄弟巴伐利亚—慕尼黑的阿尔贝特公爵和沃尔夫冈公爵在继承问题上有过协议。但是，他在遗嘱中却把他所有的领地都传给他的女儿、巴拉丁选侯之子鲁佩特的妻子伊丽莎白。这个遗嘱不但违背以前的协议，而且也违反帝国收回无人继承的采邑的权力。巴拉丁选侯一贯是法国的附庸，是他本人的敌人，因此马克西米连绝不会甘心让巴拉丁选侯取得如此之多的实力。于是马克西米连在奥格斯堡主持他自己的皇家法庭，对于双方提

出的继承权的理由找出法律上的不足之处，并建议分治。但年轻的鲁佩特占领了兰茨胡特城镇，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马克西米连必须予以制止并惩治这种藐视皇权的行径；并且在此过程中为哈布斯堡家族捞到点好处。所以，他于1504年4月23日宣布了帝国对鲁佩特的禁令。施瓦本联盟以及巴拉丁的许多敌人都拿起武器支持国王，因此南德意志便陷入了战祸之中。法国并没有给予巴拉丁以支援，因为马克西米连此时施展外交手段，设法使法国保持中立。决定性的战役是9月12日马克西米连在雷根斯堡附近大败巴拉丁的波希米亚雇佣军。然后他转而保护自己在蒂罗尔的利益，包围了鲁佩特方面坚守的库夫施泰因要塞。3个星期后要塞投降。指挥官和17名守军被绞死，以示对叛逆者的警诫。于是马克西米连在蒂罗尔北部门户之处有了一个可贵的据点。

马克西米连乘巴伐利亚战争胜利之威，召集议会于1505年6月在科隆开会，这是他一生中光荣的时刻。选侯们的反对已经消逝。美因茨和特里尔如今都是他的拥护者。科隆方面从未对马克西米连本人表示不友好，对改革也从不积极。勃兰登堡年轻的选侯约阿希姆自愿在马克西米连的军中服役一年。打败了的巴拉丁的菲利普已无力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了。3年前提出要行使帝国政府权力的选侯中，只有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还在小心翼翼地对建立君主权力的任何企图进行抵抗。另一方面，马克西米连享有极其隆盛的声誉和景仰。1505年4月，威尼斯的使节们向国内报告说：“皇帝陛下现在是帝国真正的皇帝和德意志的统治者。”^[6]

兰茨胡特继承权的问题再次提交马克西米连裁决。他把多瑙河以北比较小的部分分给鲁佩特的三个儿子，他们的父亲鲁佩特已在战争中阵亡。多瑙河以南的比较大的部分则分给了慕尼黑家族。预料这种安排将会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两支后裔之间留下永远不和的根源。这位胜利者兼审判者的马克西米连取得了极其丰厚的酬劳。他兼并了库夫施泰因及其以南的山谷，在他的蒂罗尔周围筑起子屏障，同时巴拉丁选侯不得不把许多城镇和地区拱手让给哈布斯堡家族。

马克西米连在科隆着手建立帝国中央政府的各个机构。德意志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家，不能陷于寡头执政者们侈谈治理的清谈之中而不能自拔。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与他1495年在沃尔姆斯提出来反对贝特霍尔德的执政府的建议非常相似。此后6年之中，应在纽伦堡成立一个常设的帝国执政府。执政府应由12名成员组成，从6

个区选出，并且被授与议会的全部权力。但是，国王在任何时刻均有权召见执政府，在重要政策问题上必须执行国王的命令。有些条文规定执政府不应只是国王意志的工具（原来目的显然正是要这样的），马克西米连保证在他本人和执政府产生任何意见分歧时，他将召集选侯和其他诸侯共同做出决定。马克西米连还提议执政府拥有一支它前所未有的常备军队以备强制实行法律之用。德意志的4个行政区将分设4名司令官，每名司令官指挥一队25名骑士，作为某种形式的帝国警察。这种用小贼捉大贼的计划，实属别出心裁。骑士们也许会欣然从事这项差使，可以有机会对某些诸侯绳之以法。然而，这样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士队伍是否能够收效，是值得怀疑的。这项计划遭到由诸侯把持的议会的拒绝，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说各个等级对于国王无限崇敬，他们实际上已不愿重新再来讨论改革问题了。他们对为立宪而做的种种努力已感到厌倦。他们很有礼貌地向马克西米连保证说，他的统治豁达大度，公正贤明，治国有方；而且他知道如何继续这样做。因此，他们并不希望限制或规定他的权力。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的计划是不实际的。不管这个国家如何立宪，诸侯们是不会接受作为一个臣民的地位的。国王也不会降低到联邦共和国总统的水平。除了目前混乱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别无其他良策。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年来议会的立法中究竟还有几条仍属有效，因此情形每况愈下。

马克西米连通常提出的要求是为战争要钱。这一次他提出的要求是，倘若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死后没有子嗣，哈布斯堡家族便可以承袭匈牙利的王位，因此要钱同马扎尔贵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仗（然后进军罗马举行皇帝加冕典礼）。这一次他的要求不算过高，因此便顺利地接受了。他只向帝国要求4000人，另从自己的领地提供1万人。因此不存在以任何形式恢复公共芬尼的问题。于是根据传统的但已废止的每个等级应向帝国输纳兵员和金钱的花名册加以申报。

由于马克西米连的几乎清一色由奥地利人组成的军队在匈牙利的出现，但更重要的是由于1506年7月瓦迪斯瓦夫生下了一个儿子路易，遂导致双方签订了一个没有取得什么结果的和约（7月19日）。持有敌意的匈牙利贵族并未收回他们不让任何非匈牙利人继承王位的誓言（参见第222页）。但和约中却载明，一旦亚盖沃家系没有男嗣，哈布斯堡家族即可享有继承权。

出征匈牙利之后，马克西米连便在罗马加冕，于是神圣罗马帝国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但是，就在马克西米连的命运在帝国内部有所改善的时候，在国外的处境却每况愈下。路易十二宣告废除布卢瓦条约，同时还解除条约中规定的查理和克洛德的婚约，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情。路易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现在已是盟友，各自统治着其所据有的意大利的一部分土地。1506年9月，继承伊萨贝拉而为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菲利普大公去世。费迪南德曾娶一个法国女子即路易十二的外甥女为妻；他再度成为整个西班牙的统治者，而且可能生下一个儿子，从而排斥菲利普之子查理使之不能继承西班牙的王位。马克西米连既没有盟友，进入意大利的道路又为法国和威尼斯所阻。他必须向议会要求给予充分的支持。

在1507年5月的康斯坦茨议会上，马克西米连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继承法国和西班牙王朝世系的希望显然失败后，各个等级对于建立一个国际间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家的恐惧心理便消失了，从而使他的声望更高了。他娓娓动听地请求各个等级支持帝国。他要求提供3万人，并许诺伦巴第和威尼斯一旦为帝国收复，就将成为帝国领土，成为帝国的财库，从而大大解除德意志的财政困难。但是各个等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动容。他们不愿真的和法国及威尼斯进行战争。对于马克西米连的罗马之行，他们同意拨给3000骑兵，为期6个月，并以申报清册为基础拨款12万盾供应9000多步兵——对于一项必须遭到激烈抵抗的行动来说，这点供应完全是不够的。各个等级方面则要求正式恢复1495年成立的帝国最高法院。这件事得到了同意。国王将任命院长以及代表奥地利和勃艮第的2名陪审法官；每名选侯推举1名陪审法官；6个行政区的各个等级将提出其余的8名。2名诸侯作为视察员，每年检查法院工作，并向议会提出报告。这种法院的最大弱点仍然是没有制裁权。法院的判决一旦受到违抗，法院和视察员则将商讨采取适当的措施强制执行，并向国王报告。如此而已。因此，帝国的两项极不能令人满意的设施即花名册制度和帝国最高法院便在康斯坦茨议会上明确无疑地建立起来，并在今后持续了3个世纪。

马克西米连的关于意大利的宏伟计划又一次落了空。1508年初他在特伦托。但是答应拨给他的军队却不见踪影，金钱也只拿到了1/4。他不得不放弃他的罗马之行，却于1508年2月6日在特伦托大教堂宣布，经教皇朱理亚二世同意，他将采用“当选皇帝”这一称号^[7]。但

是，如果说罗马是不可及的，那么也要迫使目空一切的威尼斯资产阶级共和国交出一些它从帝国窃去的土地。因此，马克西米连便和威尼斯打仗，这场战斗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年，议会表决不给这场战争以必要的供应。德意志的各城镇也抱怨干涉它们和威尼斯的商业关系。马克西米连只得靠他从外国盟邦那里以及从他自己的长期以来多灾多难的领地中所能筹措到的津贴去作战，并将他的全部资产抵押出去，最后沦于一贫如洗的地步。

1508年春，威尼斯军队不但打败了马克西米连的人数不多的军队，而且长驱直入，吞并了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等哈布斯堡领地。马克西米连不得不休战议和，接受既成局势。但是等候着威尼斯的却是一场惩罚。路易十二对于威尼斯共和国停止对马克西米连的敌对行动不满，因此皇帝的聪明而有手腕的女儿、尼德兰的摄政玛格丽特在1508年12月经过谈判缔结了一个康布雷同盟，由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对威尼斯采取联合行动。参加康布雷同盟的还有西班牙和教皇。4个列强一致对威尼斯发起进攻，每个国家不达到自己对威尼斯的要求决不媾和。皇帝应得的地盘是维罗纳和帕多瓦以东的全部陆地。马克西米连不得不再赴议会求告，议会慢慢吞吞地于1509年4月才在沃尔姆斯开会。他又一次滔滔不绝地要求他所需要的军队。可是，这一次他遇到的却是断然的拒绝。各个等级对于他们不感兴趣的战争，不愿出一兵一卒，不愿拿出一文钱；而且这次战争却是和他们常常听说乃是帝国头号敌人的法国结成同盟而进行的。所以，康布雷同盟对威尼斯发动总攻击时，未曾得到德意志盟友的协助，不过的里雅斯特周围的哈布斯堡领地却被收复。马克西米连的唯一军事努力是和蒂罗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军队一起包围帕多瓦（1509年8月10日），结果大败，他含羞忍辱地返回了德意志。4个盟邦之中，唯独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1510年3月奥格斯堡议会上，马克西米连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国防和国内治安的方案。各等级应在10年内供养5万名常备军，由一个总司令统率，并由4名指挥官负责帝国的4个区。4个区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由皇帝派人主持，以决定在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这支军队来维护法律。这种制裁手段确系帝国之所必需。但是，各等级对于中央政府已不感兴趣，并且怀疑这支军队一旦成立，将被用于对威尼斯

的战争。他们把整个问题拖到下届议会再行解决，于是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两年，马克西米连一直仰承法国的鼻息。在教皇朱理亚二世与西班牙、威尼斯和英国组织神圣同盟要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的时候，马克西米连和路易十二一样，却在玩弄风行一时的宗教改革的主张。他极力劝告路易十二宗教改革大会不应在比萨召开，而应在特伦托或维罗纳召开。这样就可以像法国人一样，成立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德意志教会，实际上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一名德意志出生的罗马教皇常驻使节就可以排除罗马教廷的管辖权。行政费和司法费以后将不再向罗马缴纳，而要捐献用来支持帝国政府。1511年8月朱理亚二世病重时，马克西米连又一次成为鳏夫，他甚至异想天开，打算提名自己竞选教皇。尽管女大公玛格丽特非常了解她父亲的为人，但当她读到他的来信获悉他有这一念头的时候，也不禁为之失色^[8]。这位头脑清醒的贵夫人回信说，她宁肯看到她的父亲和玛丽·都铎结婚，也不愿意在已经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问题之外，再加上教皇位置这些问题。无所不能的福格家族也不愿资助他的这个计划。不管怎样，教皇朱理亚二世却霍然痊愈，康复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马克西米连也忘却了他对教会和其他主张。教皇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向他叙说参加神圣同盟的种种好处。他在法国和神圣同盟之间举棋不定达数月之久。最后，他于1512年允许教皇的瑞士雇佣兵经过蒂罗尔开入伦巴第，又撤回作为法军步兵骨干的德意志雇佣兵，从而为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512年11月他庄严地宣布坚决支持朱理亚的拉特兰公会议，教皇答应对他进行的使人厌倦的与威尼斯的战争给予支持。

但是马克西米连未能利用由于瑞士人回国后在意大利北部形成的力量真空。他没有资源。1512年夏天，他向特里尔—特隆议会又一次提出了进行有效治理的计划。他要求恢复公共芬尼，并按1500年在奥格斯堡的规定成立一支德意志民兵。各等级原则上表示同意，但由于各贵族阶级已在其他方面为帝国效力，则免于纳税，其他人等应纳的税额则降到相当于本金的0.2%。他们说，超过此数，他们的百姓即不能负担。他的其他提议通过得比较顺利。议会应每年开会。在为了选举帝国最高法院而划分的现有各行政区内，邦议会均有义务参加对违法分子的“缉捕”，接受皇帝任命的司令指挥，从而确保集体安全。

议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由8人至12人组成，常驻帝国朝廷，监督方案的执行，处理紧急事务和对外关系，并在当事者不愿向帝国最高法院呈诉的案件中充当调解人。这个方案等于恢复早已不存在的帝国执政府，不过处于皇帝的监督之下罢了。邦议会对此建议做了重要修改。他们要把6个行政区的体制扩大到整个帝国（波希米亚、瑞士和意大利边缘地带除外），把哈布斯堡家族和各选侯的领地也包括在内。萨克森和勃兰登堡，莱茵河地区四大选侯，上、下奥地利，勃艮第和尼德兰各自和其邻近土地结成一个区，于是全国总共形成10个行政区。但是他们坚持要由各行政区的邦议会自行推选指挥官，拒绝由中央来控制。他们赞同成立上述执行委员会，但它只能成为一个调解机构。

这一方案毫无结果。1513年6月在沃尔姆斯召集过一次议会，与会者寥寥无几，结果失败，此后直到1517年再没有召开过议会。又过了很多年，在马克西米连死后，各行政区的成立才见端倪。德意志诸侯们的幻想破灭了。提高政府实效的运动已宣告死亡。唯一幸存的革新是帝国最高法院，它面对着丛林般众多的过去的权利要求和惯例，诸侯们管理政治的新力量竭力在其中披荆斩棘；结果帝国最高法院成了那些大诸侯的眼中钉，对于弱者很少能给予保护。德意志将要经历一场社会和宗教彻底改革的摧枯拉朽的大动荡，然后再在那些建立了地区性有效政府的诸侯的统治之下和在少数几个保持了共和独立现状的城镇的管理之下安定下来。

即使在1512年科隆的帝国议会之后，马克西米连仍然精神抖擞地投身到神圣同盟的计划之中。1513年，西班牙、教皇、瑞士、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将多方汇合，进攻法国。马克西米连将得到英国的一笔津贴，用来给瑞士人装备骑兵和大炮。他的1496年旧梦即将实现。在西方的敌人将被打倒。之后，各基督教强国将团结一致，在他的统率之下献身于对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教皇利奥十世，对这场战争都不肯卖力。瑞士的确侵入勃艮第公国，但中途却被收买过去（见第207页）。马克西米连从帝国得不到支持。1513年8月他亲赴驻在塞洛昂前面的英国军营。他是作为军事专门顾问来的，随身不带军队。他来后发现亨利八世不愿单独和法军作战，已择定在10月间启碇归国。

神圣同盟解散。马克西米连又一次孤军奋斗，以他那民怨沸腾的奥地利各地资源对威尼斯作战。但是弗朗西斯一世的继位和1515年9月

法国重新并吞米兰却使神圣同盟再度成立。马克西米连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以便在意大利大显身手。他用英国的金钱雇佣一些瑞士和德意志军队。他横渡阿达河，1516年3月25日甚至攻入米兰，但只占领一天。但是他手下的瑞士人在和法军中的瑞士人作战时是不可靠的。他的财源已经枯竭，领不到饷银的部队纷纷哗变瓦解，把马克西米连叫作“稻草国王”。这位皇帝赶紧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国，正如1496年和1509年一样。他如今不名一文，也不知何处可以弄到钱。他不得不挖空心思办法，骗取英国使节在银行汇票上签字。他的孙子尼德兰的查理大公从1516年1月起继位为西班牙国王，在1516年8月13日于努瓦荣与法国缔盟，马克西米连随即也参加了这一联盟。他在意大利的一切活动就此告终。伦巴第复入法国之手。对威尼斯的长期战争扰乱了德意志的贸易，破坏了奥地利的财政，结果他在这次战争中的全部所得，仅仅是里瓦、罗韦雷托和稀稀落落的几个村庄以及山谷而已。

1517年7月，帝国议会在美因茨开会。有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令人痛心的报告。骑士阶级中的败类的恶行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为非作歹的骑士把抢劫和绑票搞成了一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业，往往还得到贵族官吏的默许。弗朗茨·冯·济金根是最著名的强盗，他私自组织了一支部分由法国资助的军队，竟然对沃尔姆斯市进行破坏性战争达3年之久（1514—1517年），使莱茵河上游的贸易陷于混乱，而没有受到任何干涉。1518年他进攻梅斯城，然后再进攻黑森的兰德格拉夫所领的地区。帝国议会请求皇帝采取应付这一局面的措施，但未作出任何决议便散会了。

到了第二年，又有一个新的因素把德意志人投入了一场大骚动之中。德意志人对他们所熟知的天主教社会制度的不满如聚集的洪水，突然被一所小小的维滕贝格大学中一位不出名的教授路德打开了闸门。如今这一位声如洪钟、笔锋犀利的修道士已经出现，看来他正是人们盼望已久的革命领袖，于是各种不满的因素：民族主义的、反教会的、社会的、经济的都要求有所行动。议会于1518年8月在奥格斯堡开会，听取教皇使节发言，并准备为拉特兰公会议所宣告的十字军东征筹集军饷。在教皇的紧急要求之下，马克西米连有可能在他的老年（当时59岁就算老年）实现他的十字军东征。红衣主教卡耶坦向帝国议会恳求德意志为了切身的利益，组织对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和施蒂里亚人的军事支援，这些民族正起着他们不能胜任的基督教世界防

护堤的作用。教士应捐献收入的1/10，世俗人士则由5%至2%不等。这位发言人颇为谨慎地说，这笔款项的管理纯属德意志自己的事情，任何款项都不必汇至罗马。但是教廷对德意志的呼吁来的最不是时候。各等级回答说他们将和本国人民商量，并附上一张“德意志民族对教廷的不满”的清单。

马克西米连年迈力衰，他在奥格斯堡的当务之急是使他的孙子查理（现为尼德兰、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当选为德意志王即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件事需要大量金钱。两位霍亨索伦选侯即勃兰登堡的约阿希姆和美因茨的阿尔贝特都已许诺如果帝国元首出现空缺将投票选举弗朗西斯一世，他们为此得到大批现金，以后还有年金。亲法的巴拉丁的路易得到弗朗西斯一世的允诺，将把他父亲在1505年的失地归还原主。特里尔选侯积极拥护弗朗西斯，并从弗朗西斯那里领取年金。还有一些显赫的德意志诸侯也被拉到了法国方面。皇帝和他的谋臣通知国王查理说，为了胜过法国的许诺，他所花的钱必须大大超出原来的预料，而且只有现金，不是诺言，才能办通事情，他必须授权给他们放手从各处借钱。马克西米连在奥格斯堡以比法国更高的代价争取了那两个霍亨索伦选侯，还有巴拉丁选侯，给予他以迟迟尚未到手的授职。马克西米连还答应科隆选侯一笔钱，为数不多但已满足他的要求。马克西米连本人和他的朋友波兰的西吉斯孟作为年轻国王路易的保护人，他们的波希米亚选票这时又可以使用，保证投给查理。这样，查理便可在7票之中获得5票。1518年8月27日，皇帝和4名选侯订立一项条约，内容一如上述。只有特里尔选侯坚定不移地站在弗朗西斯方面。而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则对拍卖帝国的整个买卖表示抗议，他根据1356年的黄金诏书，拒绝参加任何交易。在现任的德意志王尚未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之前，不得选举德意志王；为了避免有人据此提出反对，马克西米连便要求教皇给他举行皇帝加冕典礼。实际上，他提出了他是否参加十字军东征要看是否举行加冕而定。但是利奥十世不愿加强任何一个外国征服者在意大利的地位，不论是统治着米兰的法国国王，还是统治着教皇采邑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国王，而对后者则更为不愿意。他保持罗马教廷反对将德意志和那不勒斯统一在一人之手的一贯态度，并表示他宁可让德高望重但实力不足的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当选。

马克西米连的逝世结束了他的加冕问题。由于帝国的元首出现空缺，局势起了变化。各个选侯认为他们对马克西米连许下的诺言已解除，于是重新开始了在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进行拍卖。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之后，马克西米连朝东向他童年时代的故乡维也纳诺伊施塔特进发。他此时身无分文，因为前账未清，就连他的因斯布鲁克的乡亲们也拒绝收留他的随从。到了韦尔斯他就再也不能前进了。他在那里卧病6个星期，于1519年1月12日去世。他给人留下的记忆是品格出众，为后人所倾倒。然而他离世之际，帝国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而德意志舆论界正为那些贪图贿赂的选侯们就要把这个君主国家出卖给法国国王的谣传所激怒。

马克西米连作为德意志王其政绩一再受挫，秩序越来越混乱。可是他却被称为奥地利国家的奠基者。他的目标是统一，是创立纪律整饬的行政系统，是各司其职。当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于1490年在蒂罗尔开始实现这一目标，当时那里已有一个“上奥地利”执政府，“上奥地利”包括蒂罗尔和莱茵河上游的哈布斯堡领地。在当地各等级的善意协助之下，他让他们选举执政府的成员，而不由他本人任命，并把财权交给一个单独的4人财务委员会掌管。但是在“下奥地利”即奥地利恩斯河上下游、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等地，有些省份的邦议会桀骜不驯，他不得不把统一的、集权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1493年，他设立了一个“下奥地利”摄政委员会，后又设立一个财务委员会，该会在1496年附属于因斯布鲁克的财务委员会。

1498年，当马克西米连为反对在沃尔姆斯强加给他的限制而进行斗争时，他曾为整个帝国（包括他自己的领地在内）建立了两个政府机构：作为最高法院和行政委员会的皇家政务会，和总管他的全部财务的皇家财务署。但是在1499—1502年马克西米连最困难的几年里，任何使帝国得到整顿的希望都归于破灭。他便转而在“下奥地利”改组政府。全体摄政在林茨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所有的人不问地位高低均可前去告状。在维也纳诺伊施塔特设立了一个皇家法院，作为中央法庭，有12名法官，大部分都是遵奉罗马法的法学家。财务委员会则设在维也纳。

这些措施遭到反对。各等级看到，一个由不关心地方传统的人们组成的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机构，势必渐渐夺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施蒂里亚人提出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林茨是外国的土地。马克西米连力排众议，宣称他代表的是一个新时代，是世界潮流之所趋。他们只要对他的革新抱有耐心，就将会看到其价值。他慈父般的训示并没有平息反对派，威尼斯战争所需的巨费使他最后不得不出让步。马克西米连同意在各省恢复传统的地方长官的法庭，并将各省的习惯法编纂成文。除了财务审计局和林茨的委员会，他的各个共同行政机构暂时停止工作；林茨的委员会迁至维也纳，仍旧监督所有5个省的政府。各等级开始接受某种中央政府的存在，同时要求在其中分享一席之地，这样的改革很可能引起各方利益互相冲突的混乱局面。

马克西米连一生中最后一年，财源枯竭，于是他召集哈布斯堡所有邦议会到因斯布鲁克开会。他需要金钱来赎回他抵押出去的收入来源。邦议会为了进行威尼斯战争而被搜刮一空，他们曾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帝国的事业，现在他们要求在哈布斯堡和帝国政府中都有他们一份。马克西米连建立成立一个常设的帝国委员会（皇家政务会）来治理哈布斯堡领地和整个帝国，因为1498年建立的两个机构早已停止工作。邦议会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加以修正。皇家政务会将包括18个成员：4名帝国官员、9名哈布斯堡领地的代表、5名帝国其他各地的代表。讨论哈布斯堡政务时5名其他各地代表将不列席。哈布斯堡邦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将管理“奥地利”的全部财政。倘无邦议会的同意，不得进行战争，不得出让哈布斯堡的财产，不得增设新的负担。

“下奥地利”的全部官员均归当地的邦议会管理。接受这些条件，这次会议将承担赎回上述抵押所需的费用。

马克西米连虽然年老有病，但也不肯接受对他的权力作如此的限制。他拒绝把皇家政务会一分为二，因为这就意味着哈布斯堡是独立于帝国的一个君主国家。他并以不懈的毅力驳斥了其他的要求。不管是由于他的外交手腕，还是由于邦议会之间意见不一，或者是由于当时流行的专制作风，会议结果给了他40万盾以赎回他的财产；他却什么也没有给，仅仅同意他的蒂罗尔财务主管当局将由“下奥地利”的本地官吏协助。

马克西米连在威尼斯战争中弄得民穷财尽，他的大部分行政管理试验均如昙花一现。但是他的“下奥地利”委员会经受住了他死后对

中央集权制的反动，而为斐迪南一世所保留下来。他在因斯布鲁克的中央财务机构继续办事，并分设收入、支出、审计等部门。他千方百计想要执行的原则，即常设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及职能分工制，均为他的继任人和其他德意志诸侯所采用，并加速了德意志近代国家的创立。[\[9\]](#)

马克西米连统治时期中欧生活背景的一个经常因素是土耳其的危险。匈牙利王室的领地长期以来几乎孤立无援地抵御着穆斯林的侵袭。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有一个各方力量的大联合。1500年前后，人们还看不清楚要在谁的领导下才能形成这样的大联合。马克西米连通过外交，有时也通过武力，经常不断地致力于为建立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大联合铺平道路。哈布斯堡王室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拥有言之成理的主权要求。如果说这两个王国的各等级也和波兰一样，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自己选举国王的权利，那么，他们在投票时却也经常考虑到继承权、继承条约和需要支持等问题。143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阿尔伯特二世曾一度在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统一过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他当时有希望得到帝国的支持，而且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在捷克族和马扎尔族的两个王国的城镇和农村矿区中均有日耳曼族的人口。那次的统一后来瓦解了。但是1463年的条约规定弗里德里希三世是匈牙利的名义国王，如果当政的国王匈牙利的马加什·科尔文身后无男嗣，将由哈布斯堡王室继承。弗里德里希三世处事谨慎，他把马加什收为养子，以表明这项条约是父亲对儿子的让步。

当马加什席卷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后又征服奥地利之际，这个大联合的领导权看起来可能落入匈牙利的手中。马加什的疆域由勃兰登堡直到塞尔维亚。但是他在1490年死后并无男嗣，他的帝国四分五裂，恢复到传统的单位。奥地利回到了哈布斯堡的怀抱。匈牙利的贵族们对德意志的统治者与对土耳其统治者几乎同样地不信任，他们把波兰国王的长子瓦迪斯瓦夫·亚盖沃推上王位，而他从1471年起就是波希米亚国王。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大有可能成为波兰领导下的一个大联合中的两个成员。这种大联合没有成立。波兰的贵族们接连推举了瓦迪斯瓦夫的三个兄弟。而且，这些东欧国家的君主们甚至还不如马克西米连，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军队、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动来有效地治理他们的王国。

1491年，马克西米连出兵匈牙利的结果是瓦迪斯瓦夫同意签订一项协定：如果他的世系今后没有直接的男裔，继承权将归哈布斯堡王室所有。这项协定为1492年2月在布达召开的匈牙利议会所接受。

自此以后，马克西米连和瓦迪斯瓦夫一直是盟友。但是，有一伙匈牙利贵族却设法使他们的议会在1505年10月宣称：如果国王身后并无男嗣，他们也绝不要一个外国人做他的继承人。马克西米连和瓦迪斯瓦夫的答复是在1506年3月签订了一项协定：瓦迪斯瓦夫的女儿安妮将和马克西米连的一个孙子结婚，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如系男孩则将和马克西米连的一个孙女结婚。为了把这个协定强加给那些犯上作乱的匈牙利贵族，马克西米连再度侵入匈牙利（参见213页）。在1506年的战役时，瓦迪斯瓦夫的儿子路易出生，随即签订了一项条约（1507年11月12日），条约确认以前各项关于继承的协定，并规定安妮应嫁给马克西米连那个将成为奥地利领地统治者的孙子。

匈牙利贵族中比较顽固的一派拒绝了这个条约，并共推扬·扎波利亚伊为他们的领袖，扎波利亚伊的妹妹巴尔巴拉在1512年嫁给波兰国王西吉斯孟，为了不让波兰—匈牙利同盟得以成立，马克西米连挑动莫斯科大公伊凡对波兰进行威胁，并唆使条顿骑士团再显身手。但是瓦迪斯瓦夫警告他必须在对波兰友好和毁弃继承权协定二者之中作一抉择。马克西米连放弃了他的反波兰盟友，于是两位亚盖沃世系的国王，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来自波希米亚—匈牙利，同于1515年在维也纳和皇帝会晤，并批准了各项继承权协定。年轻的路易和马克西米连的孙女玛丽订了婚。由于孙子们不在场，年已56岁的马克西米连本人有条件地与12岁的安妮订了婚。翌年他解除了第三次的婚约，而斐迪南大公正式通过代理人和安妮结了婚。最后，马克西米连把路易收作养子。

这一切人为的手段，包括继承权条约，联姻和过继，都未能使哈布斯堡王室取得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继承权。1526年，土耳其在莫哈奇的惊人胜利和路易死于该地，终于使波希米亚各地的议会及匈牙利议会的一部分人面对现实，依附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哈布斯堡大帝国。它们把两顶王冠都奉赠给斐迪南，他是奥地利的统治者，而且也是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国王、帕维亚的胜利者的兄弟。

马克西米连生前没有看到有力量保卫帝国并最后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出中欧的那种统一局面。但是他为了实现哈布斯堡统治下多瑙河地区大统一而做的不懈的努力，证明了他的确不愧为由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组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人。

[1] “论伟大的事业”，见《马基雅弗利文集》，G. 马佐尼和M. 卡塞拉编，1929年，第740、742页；或邦尼蒂尼编，1954年，第487、491页。

[2] J. 洛茨：《德国的宗教改革》，第1卷，第86页。

[3] 这种见解见乌尔曼《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卷1，第271页和卡泽尔《德意志史，1486—1519年》，第55页。

[4] 卡泽尔：《德意志史（1486—1519年）》，第77页，参阅乌尔曼：《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卷1，第592页。

[5] 圭恰迪尼：《意大利史》，第10卷。

[6] 《奥地利档案》，第66卷，1885年，第77页。

[7] 此后提及马克西米连时不再称国王而称皇帝。

[8] 从1511年9月18日马克西米连致玛格丽特的信中幽默的语调来看，马克西米连的这个计划是否真有此想，很值得怀疑。但是从另一封他9月16日致蒂罗尔的地方长官保·冯·利希滕施泰因的信（我们只有一个副本）来看，则并无开玩笑的意思，信中讨论了如何为马克西米连竞选教皇筹款的方法问题。此信载于帕斯特：《教皇史》，第6卷，附录90。另见许尔特《教皇竞选人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1906年；纳格尔《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在1507年是否想当教皇？》，见《哥勒斯社历史年鉴》，1907年；乌尔曼（前引书卷2，第440页）认为，马克西米连就像在1507年时一样，只是在考虑如何取得信仰罗马天主教各国的世俗统治权，恰恰和这位皇帝所说的话的表面含义相反。

[9] 关于马克西米连曾否把勃艮第的行政管理方法引进德意志和引进的范围的争论，参见F. 哈登《德意志政制史》，第21节。

第八章 勃艮第的尼德兰（1477—1521年）

勃艮第的查理公爵死于南希战役（1477年1月5日）的消息尚未证实，但在由于他的战争而引起骚动的尼德兰却已经造成了混乱。1477年1月11日，查理遗孀约克的玛格丽特和他的独女玛丽召集联省议会到根特开会。当时必须招募一支新军，以防法国的入侵；尽管也有相反的谣传，但如果公爵确已身亡，玛丽作为查理的继承人，则应该得到构成勃艮第的尼德兰各地区的省议会的承认。

朝廷对即将召开的联省议会心怀疑虑，它们曾在1476年猛烈抨击公爵的政策，因此在召集这次会议的同时，许诺免交拖欠的税款。然而，联省议会和各地地区的省议会不同，它们不是按照地方传统而是根据“好人菲利普”公爵的建制而设立的，所以直到查理公爵去世，它们一向把公爵的特权放在百姓的自由之上并为之效力。

2月3日，玛丽在根特向联省议会发表演说，它们通过承认玛丽是其父的全部领地的继承人，保持了尼德兰的精诚团结，但也要求玛丽发布“若干总则”。大特权敕令便是1477年联省议会的一座纪念碑。为了防止当权的公爵执行一项不能使他的各个领地感到满意的内外政策，上述条例授权联省议会和各省议会可以不经召集自行集会。宣战在1477年是头等大事，非经联省议会认可不得执行。大特权敕令对公爵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加以区别。百姓获准和敌方通商，而佛兰德至少在14世纪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大特权敕令的宗旨在于保护每块领地的区域自由，而不是要制定一项通用的宪法。敕令把地方管辖权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不传讯原则，除地方法院以外，任何人不受其他方面的传讯。但是，倘不改革中央政权，大特权敕令就不能保护各地的独立自主主义，而各省议会都主张对中央政权适当予以改组，但不得加以摧毁。大特权敕令自然赞成统一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它虽废止了马林最高法院，

却并没有使勃艮第各地取消高等法院，因为它新成立了一个大枢密院。

大胆的查理的最高法院全部由法学家组成，他们大多数来自勃艮第公国或勃艮第伯爵领地；大枢密院将由女公爵全部领地的法学家和贵族组成，按比例选派代表。较大的单位如布拉邦特、勃艮第、佛兰德、荷兰和泽兰各派两名法学家和两名贵族，较小地区各派1名或2名代表。诉讼均用案件发生地区的语言进行。而且，血统贵族（即与女公爵有亲戚关系的贵族）可以进入大枢密院，大枢密院还须随侍女公爵；这些事实说明它的用途既是法院，又是政治枢密会议。

尽管有一项条文准许联省议会可以拒不听命，并以此作为对女公爵进行要挟的最后手段，但大特权敕令既是一个封建制的宪章，也是一个联邦制的宪章。大枢密院将包括荷兰、泽兰、卢森堡和勃艮第等地成员，这些地区在1477年2月11日玛丽赐颁大特权敕令的时候都还没有代表。虽然大特权敕令重申了传统的改革思想，禁止招人承揽司法职务，禁止用推荐办法任命重要神职人员，但其用意始终是要限制当权的公爵。

即便法国路易十一此时未曾发动侵略，在查理公爵垮台的时候趁火打劫，大特权敕令也仍然不切合实际情况。它试图使勃艮第领地的统治者处于被托管的地位，就像布拉邦特省议会1422年对其公爵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在布拉邦特已告失败的实验被应用到已经成为欧洲列强之一的勃艮第，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埃诺存有收藏在蒙斯的敕令佛兰芒原本的法译本。勃艮第尼德兰的其他地方也各自取得了它们自己的大特权敕令，有的在它们承认玛丽是该地女伯爵或女公爵之时（例如佛兰德是1477年2月11日，与大特权敕令宣布同一日；布拉邦特的大特权敕令则在1477年5月29日），有的通过代理人（例如荷兰，1477年3月14日，其宪章亦称大特权敕令）。总地说来，大特权敕令是革命性的。这些特权符合立宪程序，而新的统治者则依靠这种程序与各个领地订立契约关系。

对查理公爵的反作用必然使各地方的特权将中央和地方的王权都削弱到最低限度。各地都宣布在司法和任免官吏方面可以自行裁夺。这些特权不能被说成是纯粹反动的而不予考虑，因为它们接近现实；而荷兰的敕令中关于捞救溺水者和开掘堤内泥炭的规定是很开明的。

玛丽制定的各项特权和大特权敕令不同，它们提出了其子于1495年及其孙于1515年必须进行谈判的实质问题。玛丽的各项特权基本上是相似的。[\[1\]](#)

从15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勃艮第阵营中有一些名流和明智人士都被法国方面吸引了过去。1477年，路易十一曾有机会获得低地国家，当地的贵族和官吏都憎恶已故公爵的恐法病，他们认为玛丽和法国联姻是恢复和平的办法。如果路易十一坚持使用贿赂和外交手腕，自然万无一失，但是他偏偏要采取两种策略。策略之一是让玛丽和法国皇太子结婚，其二是用武力夺取玛丽的继承权。结果是他虽然小有收获，但所争取的主要目标即与玛丽联姻，却被哈布斯堡皇族达到。

要征服大胆的查理以前统治的领地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轻而易举。尽管遇到了一些零散的抵抗，路易十一在南方侵占了勃艮第公国和帝国采邑勃艮第伯爵领地，在北方占领了索姆地区、阿图瓦的大部分和布洛涅全部地区。

1477年1月，玛丽个人试图与法国开始谈判，结果未成，但是联省议会并不甘心被排斥在外交活动之外。2月初组成了一个赴法使团，由已故公爵的大法官纪尧姆·于戈内特为团长，但也包括联省议会的代表。女公爵玛丽、约克的玛格丽特和低地国家军事长官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阿道夫共同签署了一封致法国国王的信，并把该信交给大法官于戈内特和查理公爵另一位旧臣安贝尔库勋爵。这封信的原本现已不存，据科明称该信要求路易与于戈内特和安贝尔库两人谈判。使节和使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区别是划得很清楚的，这封信大概是两位使节的证书，而不是用来排除联省议会代表的一种手段。不管怎样，这件事是秘密外交和公开外交两者的拙劣配合。

这个使团对于路易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继续加紧这次侵略。约在1477年2月中旬，联省议会决定要在尼德兰全境招募一支联合军队，并向路易十一再派一个新的使团，其中有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但是没有朝廷官吏。

路易十一非以女公爵和皇太子的婚姻为条件不可，否则拒订和约。但是他对市民们却十分彬彬有礼，他把以前那封证明于戈内特和安贝尔库两人身份的信件交给他们，目的在于利用联省议会对已故公爵两位大臣的猜忌。这件事他做得非常成功。使团一回到根特，关于

招募一支联合军队的提案就被放弃了，而于戈内特和安贝尔库则双双被捕。玛丽大胆地为他们说情，但两人终于在1477年4月3日被处决。关于他们的审判记录早已亡佚，但是含糊的叛国罪名至今未曾昭雪；他们倘非前朝之臣，恐也不致罹此苦难。在两人被处决后不久，根特获得了赦免书，原谅该城参与这一事件。蒙斯也仿效根特的先例，逮捕了公爵领地的收税官，并不顾女公爵的干预，依地方法院的判决将他处死。过去每隔一段时间就席卷尼德兰全境的暴动，在此后数月中，也在城镇中蜂拥而起。在布鲁塞尔，手工业工人来势更是凶猛，但总的情况到处如出一辙。各种较小的行业带头攻击城镇官吏和那些与政府沆瀣一气的富人。

在叛逃到法国的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安东尼，即“好人菲利普”的年龄最大的幸存私生子，外号“大杂种”；还有一位是埃斯凯德勋爵菲利普·德克雷夫科尔，他后来在皮卡迪成为法国国王的副官，此后他的事业便是向北扩展法国的疆土。然而，埃诺等处地方上的反抗日益加剧，路易十一穷凶极恶地进行战争，因此再也无人敢提玛丽和法国联姻的事。

向玛丽求婚者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和瓦卢瓦家族联姻一旦不能实现，则转而和哈布斯堡王朝结亲的方案便占上风。不管怎样，玛丽此时已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之子、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订婚；虽然玛丽还在根特地方的监护之下，但居孀的公爵夫人约克的玛格丽特却力主和哈布斯堡联姻。1477年3月以前，勃艮第的使臣来到奥地利，他们在1477年4月21日把哈布斯堡的使节带到布鲁日，以马克西米连的名义向玛丽求婚。

联省议会非常畏惧法国入侵，所以他们欢迎和哈布斯堡王朝联盟。他们在根特的会议散场后，布拉邦特便使用大特权敕令赋予各省议会可以自行集会的权利，召集佛兰德、埃诺、荷兰—泽兰和那慕尔的代表于1477年5月到卢万开会。布拉邦特的大法官让·德·拉·布维里埃告诉代表们玛丽答应不获得联省议会的同意，她不能结婚，联省议会则认为马克西米连如能批准玛丽赋予他们的自由，他们现在就同意他俩的婚事。皇帝派来的一位使节详细地解释了议婚的条约，并为联省议会的方便将条约译成了法文和荷兰文。联省议会这次履行了大特权敕令事先为他们规定的任务。

约克的玛格丽特敦促皇帝使节火速行事，因为正当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连由于手头拮据而款款西行的时候，根特正准备找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人便是盖尔德斯的世袭后裔埃格蒙特的阿道夫，在1472年他父亲阿诺德公爵把盖尔德斯出售给大胆的查理之前，他就一直身陷囹圄。通过根特从中转圜，阿道夫被释后成为根特的名誉公民，根特的计划是使他成为玛丽的丈夫。根特在各行各业招募一支军队，在阿道夫的指挥下进攻图尔内周围的法军阵地，但一战即溃，阿道夫在掩护撤退时阵亡（1477年6月27日）。玛丽听到阿道夫的噩耗后并不遗憾；但是图尔内这个主教管区城市却始终是法国插在尼德兰身上的一根刺，直到1513年英国征服该城和1521年查理五世最后加以并吞时为止。布鲁日的城市民兵不久亦被法军打败；所以在评价马克西米连早期盛名的时候，人们必须记住他是在低地国家自卫力量已经招架不住的时候来到这里的。

奥地利公爵时年18，玛丽时年20，1477年8月19日在根特城内的普林森霍甫举行结婚典礼。没有多少理由使人认为这个婚姻今后就必然决定了独立的尼德兰的命运。瓦卢瓦的公爵们在法国的重要性不亚于哈布斯堡皇族之在德国，他们在智力上和体力上都要比哈布斯堡皇族高出一头，但尼德兰却已经归化了他们。婚约所制定的是一些总则，两方都遵循成文法而不顾习惯法。倘父母有一方死亡，只有其子女有继承权，而排除尚未死亡一方的权利。然而，这个婚约被玛丽的一个特许状（1477年9月17日）所推翻：如果她死后没有子女，将由奥地利公爵获得她的继承权。联省议会在玛丽死后拒不接受对婚约的任何补充；但暂时搁置了宪法上的防范措施。马克西米连当然不得不批准各地的特权，但是他始终没有在大特权敕令上盖印。

马克西米连作为防御法国的卫士受到了欢迎；他一直是个骁勇的骑士，但从未成为一员大将。何况路易十一的财力要胜于他在尼德兰所能聚敛的一切。他受到尼德兰厌恶战争的居民们的阻碍，使他不得不以骇人听闻的代价招募雇佣兵，主要是日耳曼人。这些雇佣兵很少关饷，他们的掳掠使爱好和平的尼德兰人对他一直怀恨在心。马克西米连没有能和法国谈判订立一项和约，或以武力强制法国接受一项和约，这就妨碍他在困难经常引起骚乱的低地国家中重建王室的威信。路易十一采用经济战为这种骚乱推波助澜。他的军队在斯凯尔特河上游地区毁坏农作物，使根特粮食匮乏，他的舰队袭击佛兰德捕鲱鱼的

渔场，截获由波罗的海向荷兰运粮的船只，他对佛罗伦萨的钱庄施加影响，不准他们贷款给勃艮第朝廷。

两国的战争行动所采取的方式是中世纪式的袭击和奇袭，仅在1478年7月到1479年7月和在1480年8月到1481年3月有过两次稍长时间的停战。唯一一次双方对阵的激战是在根盖特（1479年8月7日），勃艮第取得了胜利，如果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本可望收复阿拉斯。如果说这次战争推迟了尼德兰从1477年的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但是它却证明，尽管阿图瓦和皮卡迪未被收复，然而由英吉利海峡的格拉夫林到卢森堡的一要战线是可以成功地用来防范法国人的。

原先勃艮第的外交联系均已恢复。其中最主要的是和英国的联盟（1478年，1480年）以及和布列塔尼的联盟（1480年）；后者使奥地利公爵恢复到了相当于以前大胆的查理作为法国诸侯之首时的地位。

北部和东部各地有的是查理新近征服的，如盖尔德斯公国和列日主教管区；有的是间接控制的，如乌得勒支主教管区，其主教大卫是“好人菲利普”的一个私生子。在这些地区中，1477年危机触发了压制已久的家族世仇，路易十一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马克西米连正忙于法国边界的战事，在1481年前对于荷兰、乌得勒支和盖尔德斯没有加以重视；但是他的不予过问反而有利于保全勃艮第政权，因为保卫勃艮第的责任落到了当地志士仁人的肩上，不管市民和士绅中的地方独立主义分子怎样阻挠，勃艮第国家却有愿意与它共存亡的有势力的战士。于是，在荷兰，虽然由于胡克党和卡贝利奥党之间的世仇重又点燃而陷于四分五裂，但卡贝利奥党显然成为执政党。在乌得勒支，1477年大卫主教被迫作出的让步类似一个地方性的“大特权”，到了1481年5月，他重又暂时取得了权力。1477年盖尔德斯人一心想要恢复他们本地的朝廷，但是在盖尔德斯公爵阿道夫死在图尔内郊外后，公爵之子查理留在玛丽的宫廷长大成人；扬·范·埃格蒙特是盖尔德斯公爵家族幼系艾瑟尔斯坦家族的一员，他却在荷兰、乌得勒支和盖尔德斯为勃艮第的事业战斗，立下了大小功勋。

乌得勒支和列日这两个主教领地造成了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因为它邻近法国。1477年3月，玛丽不得不宣布放弃她父亲在1468年征服列日时所取得的权利。列日这个城市曾在查理手中大遭劫掠，还没有充分恢复元气；列日主教路易·德·波旁是玛丽的叔父和咨

议，他希望使勃艮第和法国交战双方都承认列日中立，以便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这个解决方案，因为他在世俗权力方面受到拉马克封建家族的挑战，拉马克家族是阿登大部分土地的领主，曾被路易十一用作法国干涉默兹河流域的代理人。后来主教势力的削弱至少使马克西米连恢复了勃艮第对列日的某些传统影响。

玛丽所生子女活下来的有两个：1478年生的菲利普和1480年生的玛格丽特。由于她生下了子女，结果重新唤醒了人们对朝廷的忠诚，对玛丽和马克西米连在困难情况下顺利地恢复瓦卢瓦公爵的各种建制很有贡献。1478年4月，马克西米连恢复了作为瓦卢瓦公爵世系在欧洲地位象征的金羊毛骑士团。路易十一自从1477年征服勃艮第公国以来就一直议论要实现金羊毛骑士团的主权，可是在这方面他却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行政机构也经过重建。虽然于戈内特的被处决打断了勃艮第大法官即大公爵手下最高官吏的连续，但是在1480年3月任用让·卡朗多莱以后又恢复常规。值得注意的是让·卡朗多莱是勃艮第伯爵领地弗朗歇-孔泰的人，而勃艮第伯爵领地和勃艮第公国不同，从来没有被路易十一彻底征服过。弗朗歇-孔泰继续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司法官，这件事使低地国家很不满。

按大特权敕令而设立的大枢密院，实际上起着以前的马林最高法院的作用，并从该法院接收过来许多卓越的法学家，菲利普·威朗亦在其中。虽然枢密院没有紧跟女公爵的行踪，而习惯于在原地工作，但是它还是跟着她各地迁徙，以便和她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近。其实枢密院也并非无所事事，仅在1479年一年就作出107件判决。它受理从地方法院移交的案件，显然违背了大特权敕令；在1482年，反对中央集权的人物都要求把法学家从枢密院中清洗出去。

战争费用浩繁，再加上马克西米连早年挥金如土，积习始终未改，结果只好典当玛丽的许多祖传家产；不过国家的财政机器照旧不变。大胆的查理在马林建立的中央财政法庭一直未曾恢复，所以在里尔的审计署以及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审计院重新得到了独立。但是即便财政在地理上是分散了，然而行政上的统一却恢复了。因为查理赞赏法国的模式，引进了将普通收入与特殊收入加以区别的法国制度。查理的财政改革遭到破坏以后，“好人菲利普”的稳妥的勃艮第方法就

得到了恢复，这个方法就是，领地收入和税务收入统由称作领地和财政事务官的同一官吏管理。

即使奥地利公爵做得更策略一些，在朝廷中少用一些德国人，重建整个中央行政机构之举也要和大特权敕令的精神以及各省特权的文字相冲突。在布拉邦特，马克西米连在恢复总检察官一职时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总检察官所保护的是1477年大特权敕令所废除的特权；在荷兰，也有人反对他任命非本地人担任官职。

马克西米连在与法国订立休战协定（1478年）并与英国缔结同盟（1480年）时，并未通知各省议会；因此特别是在根特，人们批评他以专制君主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1481年2月在增加税收的时候，就有人要求削减公爵家属的开支，并要求从公国和伯爵领地驱逐勃艮第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心甘情愿实行专制主义的代理人。

反对派又以1477年的姿态变得强硬起来，玛丽和马克西米连如果同心协力，也许能够把他们压下去，但在1482年3月27日，玛丽却由于在布鲁日郊外骑马出事而去世。

大胆的查理的去逝引起了反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应，而玛丽的去世则不但继续了这一反应，而且引起了一场影响到国家首脑的长期性的政体危机。

联省议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了玛丽的幼婴菲利普是名正言顺的世子，但是他们拒绝马克西米连要在菲利普未成年以前自动成为摄政的要求。他们有布拉邦特的先例可援：在安东尼公爵在阿让库尔阵亡后，他们曾任命一个摄政团以辅佐其子。联省议会强迫马克西米连和路易十一签订了一项条约，以法国国王作为他们所取得的优势地位的担保人，在这方面他们是更加革命的。佛兰德的各个成员（根特、布鲁日和伊普雷）在根特率领下发难，根特的元老威廉·里姆在1482年4月通告其他各省应由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大政。佛兰德取得了布拉邦特的支持，因为布鲁塞尔和卢万都持有相似的观点，而安特卫普更是早已如此。1482年10月，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结成同盟，表面上是为了防务，实际上是排斥奥地利公爵，并以联邦制取代他的权力。菲利普日后将轮流在他的每个领地居住；但目前他和他的妹妹玛格丽特都被根特扣留，根特是知道这两人的价值的。荷兰和埃诺拒绝参加这个同

盟；但是只要布拉邦特和佛兰德同心协力，它们就是强者，确实比奥地利公爵强大。

阿拉斯和约于1482年12月23日签订；但是其中的条款几个月前就由联省议会的代表越过马克西米连大体上和路易十一谈妥了。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即玛丽的女儿将嫁给法国的王太子，玛格丽特本人和她的嫁妆包括阿图瓦和勃艮第伯爵领地均将立即交给法国。和约中毫不妥协地重申佛兰德伯爵领地在法律上是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菲利普一旦成年，就必须代表佛兰德前去觐见法国国王。在此以前，巴黎高等法院在佛兰德的司法权将予以恢复。路易十一履行宗主国的权利，批准自大胆的查理逝世以来颁给佛兰德的各项特权。条约中还有一项条款保障了其他各地区省议会的地位，该条款宣称倘若在菲利普身后继承权落入玛格丽特和法国王太子之手，则“各地政府将自行其是”。

路易十一排除了人们对于没收财产所抱的恐惧心理，自从查理七世统治时期采取剥夺财产措施以来，没收财产的事一直使富人谈虎色变。在阿图瓦和勃艮第，采邑和教会神职都不受扰乱，1477年以后授予贵族的特许均予承认。在转让给法国的地区内，前查理公爵以公爵领地作抵押出让的“租地”，均保证照付利息。查理公爵曾经想为了卡昂的利益而搞垮安特卫普集市，如今路易十一均予以专利，他还负责保证捕捉鲱鱼的船队的安全。

1482年的和约完全改变了1435年的阿拉斯条约。路易十一挽回了他自己在大胆的查理死后所犯的错误，并破坏了马克西米连重建的各种勃艮第同盟，因为英国和布列塔尼都被排斥在这个和约之外。条约文本在法国和尼德兰两地印行，试图使双方关系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只有把它与森里斯条约（1493年）和巴黎条约（1515年）联系起来，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个条约的价值。

奥地利公爵只得袖手旁观，眼看着他的女儿玛格丽特远嫁法国，他的儿子菲利普在1483年1月被承认为佛兰德伯爵，而成为联省议会另行成立的政府的挂名首脑。一个枢密会议以菲利普的名义行使实权，其成员有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阿道夫、“大杂种”安东尼之子贝韦伦勋爵菲利普、格鲁特豪斯的路易和拉森海姆勋爵阿德里昂·维兰。重要的是前面两人都是与勃艮第王朝有关系的血统贵族，而后面两人则是各自代表布鲁日和根特的城市化贵族。此后几年，相当大的一部

分贵族，不仅是居住在城镇的贵族，一方面反对马克西米连，另一方面则假托菲利普的名义和联省议会一起设法和法国取得谅解。在背后推动菲利普政府的力量是根特；而1483年和1488年两次似乎是“佛兰芒分裂主义”的行动，只有被看成是根特最后一次企图在比佛兰芒更广泛的范围内以自己的权力取代君主的权力，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自从阿拉斯和约以来，马克西米连至少可以更放手地来对付列日和乌得勒支这两个主教教区；路易十一在这两个教区中抛弃了他的两个小盟友：在列日是拉马克家族，在乌得勒支是胡克党别。

纪尧姆·德·拉马克自任总管（mambour，大体相当于主教的军事和世俗事务助手），曾领导一次叛乱，在战斗中杀死主教路易·德·波旁（1482年8月20日）。纪尧姆只是没有能够强制圣朗贝尔大教堂的教士会议同意他的儿子担任列日主教。然而，布拉邦特却给马克西米连配备了一支干涉军，因为这个公爵领地一向认为列日地方在它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内。1483年1月8日，拉马克家族被马克西米连部将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菲利普（阿道夫之子）打败；霍恩的约翰是与勃艮第宫廷有联系的世族，保持了列日的主教管区。拉马克家族的势力虽未被摧毁，但已受到了抑制，而哈布斯堡王朝在列日的势力亦得免于衰亡。

奥地利公爵亲自参加激战，终于在1483年8月使勃艮第的大卫主教回到了他在乌得勒支的主教管区。马克西米连被承认为这个教区的世俗“赞助者”，他的勃艮第前辈们曾经占有和利用这个地位来间接控制乌得勒支的广大地盘。

在此以前，他曾对布拉邦特省议会的一派人进行了一次打击；1483年5月，遵照他的命令，在布拉邦特逮捕了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卢万的代表。其中4人以叛国罪名被处决，内有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参加签订阿拉斯和约的全权代表。布拉邦特对于佛兰德正日益疑虑，并对菲利普被扣在根特感到厌烦，因此对奥地利公爵的高压行动并无反响。安特卫普对中央政权始终不渝的忠诚其实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

路易十一去世（1483年8月30日），把法国王位传给年已13并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订婚的查理八世。奥地利公爵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只要路易在世，则利用菲利普反对其父马克西米连的那一伙人肯定可以依靠法国实力的庇护。并不是说此后法国不再进行干涉，但是

查理八世的摄政博热的安妮在国内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对国外的每个方面都提供援助。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军事和外交干涉就越来越多地被委托给前勃艮第人埃斯凯德，他已升迁为法军元帅（1485年1月21日）。

在奥地利公爵看来，推翻他儿子周围那个另行成立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483年9月，他在安特卫普集市的大庭广众之前郑重宣布撤销菲利普的咨议人员的职务。接着双方互相论战，每方都重提过去财政方面的丑事来攻讦对方。马克西米连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484年4月金羊毛骑士团首次在他和持异议的尼德兰之间进行调停，以后又调停了好多次。金羊毛骑士团在两方阵营内部都各有自己的代表，他们通过承认马克西米连为摄政而避免了一次分裂，但并不掩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菲利普的继承权。由于根特不让步，对佛兰德的调停半途而废，扬·柯本荷尔在根特利用他反对马克西米连的斗争使自己成为当地的暴君，直到1492年他逝世时止。

佛兰德对于内战并没有退缩，反而做好准备要对尼德兰的其余部分进行经济制裁：根特禁止粮食出口，布鲁日在斯凯尔特河上建立一个关卡，阻塞安特卫普的贸易。佛兰德的自我扩张促使其他地方的民意倾向奥地利公爵，他获得荷兰的支持。由于他的经济拮据，他的雇佣军只能试图达到有限的目的；结果发生了到斯凯尔特河对岸进行抢掠的袭击行动并将待赎的俘虏和缴获的牲口在安特卫普由官方予以拍卖。查理八世和佛兰德订立了一项军事同盟（1484年10月25日），并向奥地利公爵提出了一个实质上的最后通牒（1484年12月27日），要求他撤出佛兰德；但是法国的联盟并没有使佛兰德人免于被困，1485年6月28日法院和商业界的支持者让奥地利公爵进入布鲁日。

这种反应在根特也开始了，街道上有人高喊“奥地利人来了”，扬·柯本荷尔逃往法国。佛兰德成员和马克西米连订立了一项温和的条约，把菲利普交还给马克西米连，并为他敞开了根特的大门，但是德国雇佣军风纪败坏，几天就已在根特惹出轩然大波，武装的各行各业工人在自己的旗帜指挥下占领了旧市场。马克西米连正寻思是否应该破坏根特，就像他的岳父曾经毁灭列日那样，但是约克的玛格丽特和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劝阻了他。根特不得不接受比上述与佛兰德订立的条约更加苛刻的屈辱条件。1485年7月22日，代表公爵接见的大臣公开撕毁了该城自1477年以来接受的特权。1453年加夫勒战役以后的局

面实际上得到了恢复，因为手工业工人被排斥在外，公爵保留了更新法律之权（定期重新任命行政官吏），而民兵组织则已废除。年幼的菲利普迁往约克的玛格丽特的陪嫁城镇马林去居住，并由她监督他的教育。

奥地利公爵获得了胜利，但是他并不强大，因为尽管有佛兰德和根特的赔偿，他在财政方面仍然捉襟见肘。某些显要权贵因军功而获得职位、土地和金钱等报酬；他们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好处。1485年至1488年是大胆的查理的朝臣转变为“美男子菲利普”及其以后各朝寡头政治集团的过渡时期。这些寡头政治集团仍然要比奥地利公爵更明了国家的需要；从1485年11月到1486年5月马克西米连在德国的期间（他在1486年2月16日当选为德意志王），他留下来的一个枢密会议主要因为保持对法国的和平而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其成员有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拿骚的恩格尔贝特和专门处理法律事务的大法官让·卡朗多莱。

马克西米连和其父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回来，当匈牙利人占领维也纳时，弗里德里希三世就来靠尼德兰赡养他。德意志王非但没有殚精竭虑使低地国家休养生息，首先让它们的财政得以复苏，却反而立即重启对法国的战端。他本想在大胆的查理遭受失败的方面获得成功，但最后却不得不在1489年不光彩地离开尼德兰。和查理一样，他想领导一个由法国的封建领主组成的反国王同盟，而后大举地入侵法国。倘若马克西米连果真在1486年和1487年的两次侵略中获得更大的成功，那么，他也许可以得到法国封建领主的充分合作，从而恢复查理的全部遗产，因为这些封建领主们正迫不及待地想在查理八世尚未成年时期利用法国王室的虚弱。但正是在这些年中，马克西米连暴露出他没有作战才能，而埃斯凯德则胜利地保卫了法国的北部边疆，因此为法国做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马克西米连的失败使他这位德意志王在低地国家中完全威信扫地，这些国家为了发放他的雇佣军的薪饷而专设捐税，如荷兰的河运税，但这些雇佣军却反而对地方各省进行劫掠。贵族们像参加竞技比武那样进行战争；有一群贵族原来计划在1487年8月对贝顿发动奇袭，不料中了埋伏，盖尔德斯的继承人埃格蒙特的查理和拿骚的恩格尔贝特两人被法军生俘。

到1487年秋，战争使中央政权陷于1482年玛丽逝世后发生的那种混乱状态。拉森海姆勋爵从1485年起一直被囚禁在维尔沃德的国家监

狱中，这时同情者把他救了出来。扬·柯本荷尔也从法国回到根特，根特的地方官署在1487年11月改组，一心一意和马克西米连作对，结果马克西米连的拥护者不得不逃到布鲁日。根特以佛兰德的名义行事，援引大特权敕令赋予各省议会有自行集会的权利，邀请布拉邦特和埃诺共同商议。为了先发制人，阻挠在根特的支持下召集一次对抗性的会议，马克西米连急忙把各省议会召集到布鲁日。

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提议各省议会应在斯卢思要塞内集会，但是这位德意志王却没有汲取根特暴动的教训（1485年），也忘却了他的父皇到达布鲁塞尔时的一场丑剧（1486年），偏要居住在布鲁日的府邸而不用武装保护。等到他准备调进德国雇佣军的最后一刻，当地居民害怕将来由德国雇佣兵充任卫戍部队，便关闭了布鲁日的大门（1488年2月1日），把马克西米连和他的朝廷都幽困在内。这次行动并不是事先预谋的，但是产生的后果却比破坏马克西米连召开联省议会的计划还要严重得多。由较小的行会控制的布鲁日各行业工人全副武装，驻在市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位德意志王，却把自己的一腔怒火都发泄在他在当地的拥护者和官吏身上。官吏中的皮埃尔·朗夏尔是财务大臣，立即被处决。根特的政客们抓住布鲁日各行业工人给他们造成的机会，控制了局面，把幸存的马克西米连的廷臣一个个撤职，让他们在今后的谈判中充当根特的人质，其中就有大法官让·卡朗多莱。

布鲁日因为根特的莽撞而感到惶恐，这些行动激起了德意志的爱国主义，科隆的选侯发表了道义上的谴责，威胁要使佛兰德遭到严重的经济后果；1488年4月，弗里德里希三世亲率皇家军队前来救援他的儿子。在尼德兰内部，遭到非难的是拘留马克西米连的方法，而不是原则。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以制定一部与大特权敕令方针相同的宪法作为交换，德意志王才可以释放；这说明了根特为什么能够轻易地把召来谈判马克西米连自由问题的联省议会，转变成起草一个限制其权力的法案的会议。按照这种发展的情况，联省议会在1488年2月底到现已擢升为大公爵的菲利普的住地马林开会，最后又迁往根特闭会，并在5月12日通过了《联合、联盟和邦联》文件。这个文件在布鲁塞尔的拉文斯坦宾馆被提交给一个贵族委员会，其成员有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阿道夫及其子菲利普、贝韦伦的菲利普、埃诺的大法官安托万·罗兰和布拉邦特新任的大法官让·布维里埃。

《联合、联盟和邦联》这个文件取消了马克西米连在佛兰德的摄政权，仅仅准许它在其他地区在血统贵族的治理下继续下去。在菲利普尚未成年期间，联省议会每年集会一次，第一年在布鲁塞尔，第二年在根特，第三年在蒙斯；因为这种一年一度的会议，除非已在其他两地至少已各开一次，否则不得在同一地区连开两次。联省议会的职权范围规定为改正各个地区的不利的一切新规定；由于文件对各省的自由显然比对全体的自由更为关心，所以《联合、联盟和邦联》不如大特权敕令有利。但是，这一文件的目的是为宪法打下永久的基础，因为它的绪言宣称，凡是文件中提到当然世子爵位的地方，仅仅适用于菲利普成年以前，而并不永久适用于所有与他有关的时间。文件不但提出在和德国君主谈判时要运用各省的共同力量，而且按照联邦制的精神向列日和乌得勒支两主教区以及其他不指名的“邻邦”发出了参加《联合、联盟和邦联》的邀请。

德意志王在1488年5月16日获释，释放前他在一项条约中宣誓不对佛兰德进行报复；这项条约包括了《联合、联盟和邦联》的内容，称作布鲁日和约。虽然克莱弗斯的菲利普被留在布鲁日做人质，而且必须宣誓，如果马克西米连背弃誓言，他将为《联合、联盟和邦联》作战，讨伐马克西米连；但是这位国王一回到卢万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和帝国军队那里，他就否定了这项和约。马克西米连声称自己必须恪守以前所宣布的效忠于皇帝的誓约；然而他的行动纯粹是政治性的，就道义上来说，是不可辩解的。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后来拿起武器反对他，是因为这位菲利普比较懂得政治，所以他不相信马克西米连竟会信守誓言；同时也因为他很精明，所以他不让自己俯首听命地充当人质，除非他想找寻一个公开的事件来对这位国王挑战。

除了武装冲突以外，布鲁日和约曾大量印行流传，它引起了一次文字上的冲突。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提出了辩护书，但是最犀利的一份宣言却是根特在法国的合作之下以“菲拉利特斯”的笔名发表的，它是对1488年7月马克西米连向埃诺省议会发出的备忘录所做的一个答复。

7月，帝国军队从根特城下撤退，根特建筑了一个设防的水闸以志纪念；1488年9月，克莱弗斯的菲利普进入布鲁塞尔，到处公布布鲁日和约。马克西米连的反对派大有胜利之势，亨利七世8月间接见了他们的使节。人们日益相信德意志王将接受一笔赔款，离开尼德兰。1488

年的《联合、联盟和邦联》重建了1482—1483年的反马克西米连联盟。除了安特卫普是个明显的例外，布拉邦特的大小城镇几乎都倒向根特一边；和1482—1483年间的情况一样，根特是依靠一批形形色色的贵族和法学家支持的。

尽管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既有军人气概而且和外国王朝如葡萄牙又有关系，但是要领导反对马克西米连的运动，他在政治上却不如根特的扬·柯本荷尔那么重要。1488年秋，扬·柯本荷尔前来强迫布鲁塞尔接受根特的权力，就像他在若干较小的城镇中已经做过的那样。

1489年2月，马克西米连撤回德意志，把萨克森公爵阿尔贝特作为他的副手留了下来，这个能干的雇佣军头目在整个内战期间十分巧妙地举行了各次谈判。即使在面临像萨克森公爵阿尔贝特这样一个难以制驭的对手以前，《联合、联盟和邦联》方面便已节节失利，因为布拉邦特各城镇挤满了乡村逃来的难民，如要获胜，只能速战速决。再者，尽管《联合、联盟和邦联》方面自称以菲利普大公爵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为了马克西米连的原因，这个当然世子仍被安全地保留在马林。他留在当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就使人们不再对《联合、联盟和邦联》效忠。在荷兰，胡克党的首领们和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携手合作，到海上共同进行海盗活动，但是荷兰发生的纷乱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影响事态的发展。

布鲁日和约恢复了阿拉斯和约，《联合、联盟和邦联》被置于查理八世的个人担保之下；但由于法国对布列塔尼的图谋和对根特的怀疑，法国对马克西米连的干涉也是审慎的。布列塔尼公爵卒于1488年9月，在他去世前很久，法国的摄政安妮·德·博热和她的谋士们就决心为王室取得布列塔尼的继承权；因此，有鉴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在佛兰德和布列塔尼两地同时进行战争，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力量用于布列塔尼。在布鲁日和约后，尼德兰已不能被马克西米连用作发动侵略的基地，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它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地方。然而，当时已可见到，马克西米连的失败有利于根特、而不是法国在低地国家中称雄。148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埃斯凯德和柯本荷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法国将继续援助根特，但同时也要要求根特表面上以偿还债务的形式把一大笔款项拨交埃斯凯德，并且把马克西米连被拘在布鲁日时作为人质被俘的两名贵族转交给他。法国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此时马克西米连和亨利七世结成联盟（1489年2月），萨克

森公爵阿尔伯特在布拉邦特不断取得军事胜利，遂使法国不愿再让自己更深地陷于尼德兰的事务之中。拿骚的恩格尔贝特仍被扣押在法国，由他作为马克西米连的外交使节，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查理八世和德意志王在法兰克福签订了一项条约（1489年7月22日）。

法国国王的宗旨是实现布列塔尼的中立化，并使这个公国为逐步渗透做好准备。作为交换，查理八世打算通过他的仲裁来促使根特及其盟友重新服从哈布斯堡王室。来自法兰克福的消息促使布拉邦特决定对萨克森的阿尔伯特公爵投诚并偿付赔款。根特虽未战败，但是就连它也向瓦卢瓦王朝俯首听命；按照法兰克福条约的条款，佛兰德派遣格鲁特豪斯、拉森海姆和扬·柯本荷尔前往图尔进行谈判。马克西米连也派去了一个人员众多的使节团，其中最重要的使节有拿骚的恩格尔贝特，他曾官至宫廷大臣，自从被俘囚禁在法国后，已为他本人及其家族在法国—勃艮第外交中赢得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一个是弗朗斯·范·比斯莱登，他曾任行政法院审查官，是大公爵的导师，这时承担了他的第一个重大任务。

10月30日签订的蒙蒂尔斯—列兹—图尔条约废除了布鲁日和约。佛兰德成员将在三年内交付一项大宗赔款，并按低地国家政府今后可能采用的货币重新估价折算。在法兰克福仍予维持的阿拉斯条约，如今已由新条约代替；尽管佛兰德的代表团提出抗议，但从大胆的查理逝世后所给予的各项自由，将在查理八世和马克西米连两人亲自晤谈时加以考虑。

法国方面心中有数，这个和约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和约，因为根特未被征服，柯本荷尔及其一派尚未和解，而克莱弗斯的菲利普虽自己请求加入和约，但是任何权威，只要是它没有使他恢复全部土地、官职和恩俸，尤其是没有使他恢复在他退居的斯卢思地方所担任的首领的职务，他是不会予以承认的。1489年12月14日关于币值重新调整的法令，极其严重地破坏了佛兰德和荷兰政权的恢复。自从大胆的查理去世以来，钱币贬值，使原已随着战争形势动荡的物价更加浮动，各省议会特别是在1488年就已关心改革方案。从技术上说，1489年的法令产生了一种稳定的货币，但这种货币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税收的价值，并如条约中所提到的那样使佛兰德的赔款增值。流通中已贬值的钱币丧失其价值约66%；此时正值圣诞节前各种租约、各省和各城镇租金均需付现之时，因该法令而引起的麻烦和诉讼延续了10年之久。在

一年多的时间内，货币问题引起了对根特的反控，而有利于柯本荷尔保持他的地位，并静待国际形势的转变以便重新展开斗争。

事与愿违，由于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和马克西米连之间的私怨，尽管这位菲利普再三敦促，他亦未被重新起用。由于镇守斯卢思，菲利普如今对于当局来说，是一个比柯本荷尔还要危险的对手。菲利普从斯卢思出发扩大海盗活动，扼杀了布鲁日的商业，并严重地干扰了荷兰的贸易，他在荷兰利用因此而造成的困境，成功地煽动了叛乱。布鲁日叛乱的死灰复燃从政治上说并不重要。富有的阶级自知在这场较量中必败无疑，纷纷逃出布鲁日。布鲁日在1490年11月29日投降。根特的富户遂与中央政府和解，其中就有拉森海姆勋爵阿德里昂·维兰；但是克莱弗斯给拉森海姆送去了一份决斗通知书，以致拉森海姆在1490年6月被杀。

马克西米连想要执行他早在1486年就已拟订的和布列塔尼女继承人结婚的计划，又和法国冲突起来，否则，根特在柯本荷尔率领之下的最后一次叛乱是不可能发生的。1490年12月19日德意志王通过代理人 and 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妮结了婚。法国不可避免地重新对尼德兰进行干预，而一贯乐于利用法国的根特也在1491年5月公开反叛。

1491年12月，查理八世和马克西米连的新婚妻子布列塔尼女公爵结了婚，却把马克西米连的女儿即根据1482年和约与查理订婚的玛格丽特退了婚；瓦卢瓦家族对哈布斯堡家族取得了一次卑鄙的胜利。1492年2月联省议会不得不在马林开会，和根特谈判和平。从1489年以来，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接连拒绝多次和谈请求，希望越过大公爵的咨议们直接和各省议会接洽，但是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在1492年已经不合潮流了。金羊毛骑士团和大公爵枢密会议中博学多识之士拒不接受他那种和君主平起平坐的旧式态度；与枢密会议关系密切的联省议会，把他的辩护书当作了请愿书，把若干份呈交大法官。和1488年不同，联省议会想保存中央政权。大公爵是当然的世子，几年之后就要成年，这个事实很重要。

联省议会要求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和柯本荷尔两人在战争与和平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他们两人并没有给予政治上的答复，然而，仍然指望政府由于其他地方性叛乱而进退维谷。1492年是从1477年以来最困

难的年份之一，在荷兰发生了一次叛乱，而埃格蒙特的查理返回盖尔德斯更说明了勃艮第的继承权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荷兰和西弗里斯兰的运动并不是农民起义。运动采用的旗帜不是犁或木鞋，那是起义农民的象征；它的旗帜是奶酪和面包，宣告国家不能被包税人吃光。这次起义是农村群众以及阿尔克马尔、哈勒姆这类城镇对现存制度的强烈抗议，当时各财团预先付款给政府，而政府则把税务包给这些财团。以面包和啤酒为旗帜的德国雇佣军荡平了这些“奶酪和面包叛乱分子”，叛乱到1492年6月便告平息。这次叛乱的重要后果是胡克党作为一个战斗派别已走向衰落，因为实现平定以后荷兰的政府控制更加严密，所以剩下的胡克党人都被吸收到了盖尔德斯的同盟者一边。

盖尔德斯直到1543年才肯定地被重新征服，而盖尔德斯的丧失乃是法国外交利用当地的地方自主主义的结果。1492年2月，按照法国在低地国家中为勃艮第人或哈布斯堡家族树敌的一贯计划，埃格蒙特的查理被派回盖尔德斯。这位查理对马克西米连的怨仇事出有因：自从1487年他被俘以来，马克西米连从未设法予以营救，而其家族幼系的艾瑟尔斯坦的埃格蒙特却从1484年至1517年担任荷兰执政。地方自主主义是个常被误用的词语，但却适用于盖尔德斯，因为它在1492年重又接受了关于在世袭领主之下保持自给自足的中世纪理想。盖尔德斯的省议会从一开始就和查理联合在一起共同奋斗，使盖尔德斯这个地方摆脱它从1473年以后所属的大尼德兰的范围，而回到它原先的采邑地位。

查理八世和布列塔尼的安妮成婚以后，不但紧紧控制住阿图瓦和弗朗歇—孔泰这两处作为已被退婚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陪嫁的领地，而且还扣留玛格丽特作为人质，向她的家属勒索更多的权益。另一方面，欧洲的形势正变得对哈布斯堡王室有利。法国君主在布列塔尼所获的胜利局面是亨利七世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力图加以改变的，法国不得不对英国（1492年11月3日埃塔普勒条约）和西班牙（1493年1月19日巴塞罗那条约）让步，才免于它们的攻击。马克西米连遂与亨利七世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联盟；他和西班牙的联盟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这个联盟是菲利普大公和一位西班牙公主结婚的前奏，虽然按巴塞罗那条约这件婚事已予以废除，但终于酿成了1496年的王朝联姻。

由于休弃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法国国王就通过这一撕毁阿拉斯和约的行动而在勃艮第各地人民的心目中毁掉了自己的地位。在作为玛格丽特陪嫁地的城镇阿图瓦和弗朗歇—孔泰，经久不衰的对勃艮第的忠诚之情正在如火如荼地迸发出来；1492年11月，阿拉斯居民起来反抗法国卫戍部队，在“勃艮第万岁！”的呼声中重新加入了尼德兰。马克西米连在隆冬时节侵犯弗朗歇—孔泰而获得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他在杜农对法国人小战告捷（1493年1月19日），不如说是由于各城镇给予他的合作。

对于这个勃艮第国家的生存力抱有信心，同时除了在盖尔德斯以外，任何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都在没落，这种状况对于和平的恢复起了决定性作用。根特在军事上虽然未被征服，却接受了相当于它在1453年和1485年失败后强加给它的条件。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怨仇终于导致柯本荷尔被绰号为“耕田人”的农民首领所暗杀的事件（1492年6月16日）。尽管有这些内部纷争，根特还能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进行激烈的反击，但是认识到一个城镇不能无限期地公然对抗一个国家，于是开始了谈判。结果订立的卡赞特和约（1492年7月29日）把根特由一个自治城镇降为一个普通城镇。它的司法权从属于佛兰德法院的上诉权力，它安置外来市民的权力被缩小到最低限度。作为佛兰德伯爵，君主对于每年一度重新任用政府人选具有永久性的影响，这些官吏只能从贵族而不能从低等行会中吸收。正如皮雷纳所说：“君主控制城镇，而城镇控制各行各业。”虽然大胆的查理兴修城堡以威慑根特的计划直到1539年的下次暴动以后才始执行，但是这个城镇在此后整整一个世代中一直没有起来造反。

从列日主教教区发生的事件来看，法国的干涉显然日趋衰落。在1485年一次短促的胜利之后，马克西米连纵容主教霍恩的约翰把总管纪尧姆·拉马克处死。这种草菅人命的裁判只能重新点燃霍恩和拉马克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1488年在《联合、联盟和邦联》声势最盛的时候，查理八世把列日置于法国保护之下，列日主教和拉马克派之间的局部内战，大致可以同马克西米连和《联合、联盟和邦联》之间的主要斗争相匹敌。中立的好处慢慢地被人们理解；直到敦奇利和约（1492年5月5日）以后，交战各方和省议会才同意列日保持中立并实行自由贸易。1492年7月查理八世承认了关于这个主教区地位的各项原则，一个月后菲利普大公爵也予以承认，不论列日的中立对于国际法

的发展多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当时却表示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靠削弱法国外交而使列日地方和勃艮第各地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1492年10月12日，在斯卢思长期被围攻之后，克莱弗斯的菲利普投降了。政府的海上力量薄弱；海军提督贝韦伦的菲利普默许他自己的港口维尔的船只向斯卢思的私掠船购买通行证。但是亨利七世对于私掠船对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难以忍受，在他和马克西米连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派出一支由爱德华·波伊宁斯爵士率领的舰队，帮助萨克森的阿尔贝特进行围攻。此后，克莱弗斯的菲利普不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然而他的出降实际上还是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引起的，他不得不进行谈判以保存他的祖传财产。由于和他同事的权贵们的团结，他官复原职；但是菲利普是个聪明人，从此不再攻击实行君主制的社会，虽然直到1528年去世时一直主张和法国维持和平关系，但他采用的却是更微妙的办法。

与法国重建正常关系一事受到了在法国宫廷的勃艮第流亡者的阻挠；然而森里斯条约（1493年5月23日）却保存了阿拉斯条约的主要内容。法国送回了玛格丽特和她的陪嫁城镇阿图瓦和弗朗歇-孔泰，这两个城镇如果不和勃艮第公国结合起来，对于法国的安全只有很小的危险。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绝对否认战争是收复勃艮第公国的合法手段；因为虽然双方都保留着阿拉斯和约所规定的权利，但他们都同意“通过友好方式”，“公正”地使彼此都得到圆满的解决，在大公爵统治下的所有法国采邑中，法国国王享有的永久宗主权和司法权得到了承认；在大公爵年满20岁时向法国国王行觐见礼以前，对于埃尔、贝顿和埃斯丹等战略要地实行一种共管制度，由埃斯凯德代表查理八世管理当地军政，而民政事务则归大公爵处理。因此，根据中世纪的分别管辖原则，直到1498年，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以保卫其北部边界。

1482年和约中有利于富豪（包括有俸的神职人员）的条款得到了扩充。双方的财产所有人均可恢复其财产，但没有权利收回1470年后为任何一方国家所处理的收入。16世纪初法国和尼德兰双方关系的这种稳定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493年和约中的经济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在边界的任何一方地区内均可持有财产，并废除来往商人的安全通行证。森里斯和约和在它以前的阿拉斯和约一样，被刊印出

来。鉴于这些条约对于个人利益牵涉极广，所以予以刊印也就不足为奇了。

森里斯和约预告了马克西米连摄政时期行将结束。他儿子的朝廷中的两名最显赫的大臣弗朗斯·范·比斯莱登和托马·德·普兰内襄助谈判事宜。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从法国归来，在瓦朗西安受到了欢迎，当时上演了一出牧歌式的戏剧，以表示这个国家正从一场浩劫中恢复过来。

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在1493年8月逝世。各省议会派希埃弗莱勋爵纪尧姆·德·克罗伊为代表，他们发现马克西米连愿意接受他们开出的款数作为菲利普解除摄政的代价。1493年10月的法令规定以拿骚的恩格尔贝特代替萨克森的阿尔贝特主持大公爵的枢密会议，这标志着菲利普亲政的开端。司法和财政大权遵循勃艮第的惯例，仍被保留在大公爵家族的势力范围之内，而马克西米连关于菲利普在尼德兰的枢密会议和他自己的奥地利枢密会议保持联系的指示则并未执行。

菲利普的亲政不仅仅结束了1482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政体危机，因为标志着他的统治开始的就任特许权在每个重要地区都收回了玛丽在1477年赐予它们的特权。1494年9月10日的大特权敕令是他接任布拉邦特公爵时颁布的，它只承认1477年以前通行的惯例，虽然他已同意增加一些该公国议会一致要求而他的枢密会议亦认为可行的补充条款。荷兰省议会被迫于1494年12月在交通不便的格尔特鲁登堡城镇和他见面。他几乎全部废除了从1477年开始实行的荷兰大特权敕令，但他愿意对该省的建议加以考虑，1495年增添了一些补充条款。佛兰德在1483年就已承认菲利普为该地的伯爵，但菲利普断然加以拒绝，并派了监管官员前去接管；在埃诺，他宣誓要做个好的统治者，要做当地的真正继承人和所有人，并撤回了蒙思从1477年以来所取得的特权。

托马·德·普兰内是大枢密院的主席（之所以称“大”，是指它的法律方面），他忙于在布拉邦特、荷兰和埃诺进行谈判，以致很可能负责制定了关于修改1477年各种特权的原则。君主不受他的前任所作的让步的约束，自由不是臣民生来就有的不可改变的权利；菲利普所作的各项补充条款，其目的在于提高效能而不是实行专制，因为不能永远强迫某一地区的各个成员承担共同责任。1494年12月菲利普同意荷兰重估税收，菲利普的特派员做了一次调查，把荷兰北部当时的

人口和财产与1477年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多德雷赫特和荷兰其他城镇之间因税收问题而引起了一场诉讼：多德雷赫特根据它的特权要求降低税率；荷兰其他城镇则主张“在公共事务方面，小的城镇必须仿效大的城镇”，竭力强使多德雷赫特也按它们的税率付税。1497年，菲利普的大枢密院作出的一项终审判决中多德雷赫特占了有利地位，而由国库承担了损失。

菲利普统治时期的外交政策以1500年为界分作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菲利普处于一连串有利的国际形势之下。1461年以来一直未断的法国压力已经转向意大利；埃斯凯德勋爵死于查理八世向意大利进军途中，临终时嘱咐把他的遗体埋葬在布洛涅，表示他对法国扩张主义新方向的抗议。

如何把与法国的政治和平和与英国的经济和平结合起来？这是尼德兰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被马克西米连所忽视（在这方面他不像瓦卢瓦家族的公爵们），而现在却有了解决的可能。在菲利普的枢密会议上，法国的观点和英国的观点都有其代表，因为，如果说希埃弗莱勋爵和弗朗斯·范·比斯莱登倾向法国，那么，贝尔根家族由于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城镇贝尔根奥佐姆的贸易而赞助英国的事业。

菲利普秉政伊始，就承认了森里斯条约，并通过巴黎条约（1498年8月2日）承担了这一条约的后果。1499年在阿拉斯，他以佛兰德和阿图瓦的名义向代表路易十二的法国大法官行了觐见礼。

马克西米连支持约克的玛格丽特所豢养的觊觎王位者珀金·沃贝克来反对亨利七世，这种支持在外交上是无效的，而在商业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沃贝克的冒险事业正在进行的时候，菲利普政府在1495年便开始劝说亨利七世取消他对低地国家施加的经济制裁，1496年2月24日双方订立了一项贸易条约，一般称为“大通商协议”（*Intercursus Magnus*）。条约恢复了50年前对英国商人征收的税率，并授予菲利普以外交事务的绝对控制权，但禁止在约克的玛格丽特陪嫁城镇马林这类特区内发生反对亨利七世的不友好行动。

在1500年后开始实行的外交政策的第二个阶段中，尼德兰的利益服从于实现大公爵的西班牙继承权。菲利普同西班牙两位天主教国王的公主胡安娜结婚（1496年10月20日）以及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西班

牙王子在1497年结婚，本来都是马克西米连在外交上的胜利，也可以说是1477年以前的勃艮第和伊比利亚半岛关系的重建；但是当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唐·米格尔在1500年去世后，菲利普大公爵就凭借他妻子的权利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而在伊萨贝拉本人逝世（1504年11月26日）后，他承袭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称号。

发展对法、英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再是为了低地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使这些强国默认菲利普对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继承权。大公爵对法国的态度变得唯唯诺诺，但这种态度至少在1505年夏天以前使得路易十二不至于严重地妨碍他的西班牙计划。

菲利普两次访问西班牙。第一次他在1501年11月离开尼德兰，直到1503年11月返国；第二次他在1506年1月乘船去西班牙，1506年9月25日死于该地。第一次访问是由安排菲利普和路易十二签订的里昂条约（1501年8月10日）的希埃弗莱和比斯莱登两人准备的。菲利普决定取道法国前往西班牙，这成为他的枢密会议中亲法派的一个胜利。他的到达巴黎令人回忆起他的曾祖父于1461年来到巴黎的情景，曾是一本刊印的故事和歌谣集的主题。作为法国贵族元老，他出席了巴黎最高法院，不但表明了他对这个王国的封建依附关系，而且表明了他个人在这个王国中的地位。

第二次对西班牙的访问是因为马克西米连、菲利普和路易十二签订的哈格诺条约（1505年4月8日）而作出的；但是法国国王醒悟过来，认识到一位哈布斯堡王室成员来到他的索姆和比利牛斯边界的用意。菲利普只得从海道前往西班牙；法国对低地国家进行干预的恶性反复并不始于菲利普死后马克西米连实行第二次摄政时期，而是始于1505年下半年。在司法方面，路易十二把巴黎最高法院的权力强加到对佛兰德的管辖上；在外交方面，他支持列日的拉马克家族；在军事方面，他援助法国从未完全打倒的盖尔德斯的查理公爵。西班牙继承权是勃艮第朝廷的一场赌博，所下的赌注比在意大利角逐的列强所下的赌注还多，但尼德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并且承受了在法国引起的反应的冲击。

和在法国或英国一样，在低地国家中，政府的治理工作在16世纪初要比以前的几个世代容易，比16世纪后半叶更加容易得多，所以菲利普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获得了可与路易十二媲美的声誉。他在幼年

时代就力求和谐，1492年在攻打斯卢思以前，曾先给克莱弗斯的菲利普送去一个口信：“转告菲利普君，我不会做出任何日后会使我后悔的事。”仰慕独裁专制人物的后世人们认为他的外号“听信咨议者”具有贬义，但这在当时正好说明他是个明智的统治者，他不同于大胆的查理而善于采纳众议。

贵族们当然也扩大了他们在公众中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尽管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这时却逐渐使自己 and 各个省份打成一片。贝尔根、克罗伊、拉拉印、拉努瓦和拿骚等家族簇拥在菲利普的周围，使他的政治枢密会议酷似一个金羊毛骑士团的会议。这个国家和威尼斯那样一个寡头共和国有许多共同点。

大公爵不仅恢复了他的勃艮第先辈们的气派，而且也回到了他们居住的旧址。他相信自己百姓的忠诚，1498年这一年他是在布鲁塞尔的库丹贝格度过的；他和佛兰芒人和解，亲自前往根特的普林森霍甫，他的儿子查理1500年2月生于该地。除了安特卫普等少数城镇以外，各城镇正在内战的劫灰中竭力挣扎，对于国家在处理他们债务方面给予的援助表示感激，因为从1494年到1500年间荷兰的多数城镇已告破产。

由于菲利普的观点和大胆的查理的不同，而是和平的，由于中央权力整个说来是要通过各省的机构而不是要钳制这些机构来予以执行，所以尽管有些措施就其专制精神来说，可以和查理时代的相比，但执行起来困难不大。一项关于收回产权的法令（1495年5月6日敕令），要求恢复荷兰和泽兰自1477年后停止的一切王室收入和权利，其中不但包括过去让与的土地和官职，还有包出去的全部税收；它们不但在财政上有重大价值（例如，在斯凯尔特河入口处的税收），而且对省与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列强（如英国）的关系均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菲利普政府在中央集权方面并不墨守教条。1496年，里尔的审计署以及布鲁塞尔和海牙的相同机构都被强制并入设在马林的总署，情形和1477年前一样；菲利普对布拉邦特的省议会说，他们的所谓审计院事实上都是他的。但到了1498年年底的时候，这些会计部门又回到了它们各省原来的地方，因为一旦君主的权力得到了承认，他很乐意

照顾地方上的感情。菲利普的两位心腹大臣希埃弗莱和弗朗斯·范·比斯莱登（1502年8月卒）既擅长外交，也善于处理经济事务。

在马林设立大枢密院（1504年1月22日），表面看来最多不过是给菲利普的大枢密院（即他的枢密会议专司法律的部门）找个固定的地点；但是从他逐字地重复大胆的查理1473年设置马林最高法院的法案，却可以看出菲利普在马林设置高等法院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根据他的治国之道。由于菲利普早死，遂使他在法制方面恢复中央集权的实验也中途夭折，而和马林抗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构布拉邦特法院，也就摆脱了大枢密院对上诉权限的约束。

菲利普和联省议会的正式关系是令人满意的。由于菲利普与他祖父和父亲的做法不同，常常亲自和联省议会交往，所以它们对宫廷的疑虑消释了。1501年9月，他向联省议会告别，指定拿骚的恩格尔贝特在他即将访问西班牙期间作为他的代理人。联省议会是由各省派来的代表团组成的，尽管后来对间接税问题一拖再拖，并且讨价还价，政府还是对这些代表团给予时间回省请示。结果，在菲利普执政和查理尚未成年的时期以内，不管多么勉强，税收还是得到各省的同意而予以增加。联省议会已不再像菲利普未成年时期那样参加制定大政方针。即使在政策适合他们利益的时候（例如1498年巴黎条约），也是由菲利普的枢密会议先作决议，然后再提交给他们。1501年后，他们越来越不愿为菲利普的外交政策花钱；但是只要事情有关反对马克西米连的干预，则随时可以指望他们对菲利普给予支援。

无论在内政或对外事务方面，菲利普都完全摆脱了他父亲的控制。1496年，马克西米连把菲利普召到德国去的时候，比斯莱登一时失宠，但不久便恢复原职。翌年即1497年，菲利普将马克西米连原来的大法官让·卡朗多莱免职，而代之以托马·德·普兰内，后者也是亲法派，但完全效忠于菲利普的利益。在1498—1499年间和1503年初，德意志王企图征服盖尔德斯的时候，菲利普和联省议会对埃格蒙特的查理坚持中立立场，这是他们亲法联盟的必然结果，他们甚至允许法国援军过境前去盖尔德斯。

1505年夏天，菲利普已经取代他的父亲在哈布斯堡王室中的领导地位，只是在这时，他才进行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战役，与马克西米连一起入侵盖尔德斯，逼使埃格蒙特的查理投降（1505年7月），并

使他降到在1487年前作为勃艮第宫廷人质的地位。如果对查理加以适当的看管，则这次宽大处理也就无可非议；但是查理没有跟随菲利普前往西班牙，却设法逃回了盖尔德斯，在那里他可以指望路易十二的全力支援。

当时路易十二控制着默兹河的全程，国内情况看起来比1493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危急，然而菲利普还是急于到达西班牙，在1506年1月10日从弗勒兴乘船启程。除了埃格蒙特的查理逃回盖尔德斯以外，法国势力还趁主教霍恩的约翰去世的机会在列日取得了胜利。1505年12月30日，埃拉尔·德·拉马克，即一度曾任总管的纪尧姆·拉马克之侄，路易十二内定的主教候选人，被圣朗贝尔教堂全体修士会议选为主教，而使哈布斯堡王室提名的雅克·德·克罗伊落选。菲利普在动身前的几个月中募集金钱来偿付这次航行费用，抵押了他的部分领地，并且把1495年5月恢复的斯凯尔特河上的税收，除了保留名义以外，全部卖给了安特卫普、米德尔堡和贝尔根奥佐姆。

在紧要关头，领地和税收被认为像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可以抵押；1499年，菲利普以荷兰伯爵的名义把他对弗里斯兰的权利割让给萨克森的阿尔伯特，以清偿他欠阿尔伯特过去担任军事指挥官的酬劳。虽然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查理五世没有费多大周折就收回了菲利普所典质的一切，但是他处理王室资产作为西班牙之行的经费，对于1494年以来他所执行的关于建立王室特权的政策来说，却是一种倒退。菲利普和亨利七世签订的两个条约中断了他的西班牙之行。第一个条约（1506年3月20日）纯属王朝世系问题，菲利普在卡斯蒂利亚的权利得到了英国的支持。第二个条约（4月30日）是在他离开英国以后签订的，从未得到他的批准。这个条约得到“不幸的协之议”（Intereursus Malus）之名，因为它对英国的贸易给予优惠。两项条约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菲利普和他的咨议们为了在外交上和财政上取得对他的西班牙政策的支持，不惜代价到了何等地步。1506年9月25日菲利普在西班牙突然去世，此时他的西班牙政策已取得了意外的成功。

把1506—1515年这一时期称为查理未成年时期，要比称作马克西米连第二次摄政时期更切合实际。1507年后马克西米连自称皇帝，曾在1508—1509年和1513年两次访问低地国家，按月支取津贴，并保留任免官职之权以取得更多的好处。在菲利普未成年时期，马克西米连

曾将各省卷入战祸；而在查理未成年时期，这个角色却由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来担任了。国内反对发动国外战争的抵抗力量过去来自各个城镇和各省议会，如今却出现在枢密院内部。社会更加趋于统一；而国内一个强大的亲法派别的存在，意味着从外界施加的法国影响会减少。无论如何，路易十二为把各城镇拉到法国方面所做的努力，在1507年和1513年两度失败；而贵族和法学家们也已不像马克西米连第一次摄政时期那样，大批离国，逃往法国。

在枢密院和金羊毛骑士团中有一批人曾经反对玛格丽特的再征服战争，曾经使皇帝在1508年想把弗朗歇-孔泰立为一个王国以及1511年想要恢复已经消失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等企图遭到挫败，但如果把这批人称作一个民族性的派别，那就未免太简单了。相反地，这些人认为对法国保持和平是解决国内困难的办法，并要求对英国的关系应限于贸易方面，而不承担王室的（更不必说军事的）联盟，同时把查理的姐姐伊萨贝拉嫁给埃格蒙特的查理，以求解决盖尔德斯问题。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希埃弗莱，他已经由一个封建的贵族和朝臣发展为一个欧洲的政治家。在枢密院和金羊毛骑士团中还有一个与它对抗的派别，由扬·范·贝尔根和艾瑟尔斯坦的弗洛里斯·范·埃格蒙特领导，他们主张用战争方法来解决盖尔德斯和法国问题；这一派也可以自称同样地爱国，因为他们主张的对英联盟在过去曾带来不少好处。亲法派以其家族利益主要在埃诺的希埃弗莱为首；亲英派则以在布拉邦特北部和荷兰的贝尔根和艾瑟尔斯坦为领导，两派似乎象征着北方和南方的抗衡。但是当时的贵族政治不是按这些路线发展的；拿骚家族在尼德兰的中心是布雷达，但在巴黎和约（1515年）以前和以后一贯亲法。希埃弗莱及其追随者们有一点可能符合爱国这个名称，那就是他们对当然世子非常重视。他们是维持现状派，旨在保持菲利普逝世时的状况，等待查理成年后接受他的继承权；他们也因此而得到联省议会的同情。

1506年没有可以同1477年相比的反对势力，这要归功于菲利普在恢复君主统治时所施用的方法。联省议会不再像以前那样企图另行颁布一项宪法，由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远见，后来的冲突得以避免，虽然情况往往不妙。1508年，各省宣誓，声称仍旧团结一致，互相支援，气势汹汹有如1488年，但是玛格丽特提出了康布雷和约，作为一剂镇静药。联省议会不仅反对战争政策，而且十分保守，被各省之间

的猜忌所分裂。玛格丽特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调解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之间关于名次问题的纠纷，1508年贝尔根对她提出建议，劝她不要在联省大会上而是分别地对付各省。

以后的政治史要用玛格丽特的品格和希埃弗莱的个性来加以解释。玛格丽特学识渊博，对艺术的赞助范围十分广泛，无法扼要重述；但是她对政治最感兴趣；在她最后一个丈夫萨伏依公爵1504年去世后，她就急于回到尼德兰来代替菲利普或马克西米连治理国政。她对法国国王的敌意不仅仅是由于她曾被查理八世遗弃而造成的个人怨恨，而是来源于她的勃艮第家族世系，因为虽然她知道尼德兰使她的家族兴旺发达，但她把第戎看作它的首都。她起初对于低地国家的政治传统不大同情。她的办法是异乎寻常的，她所依靠的人如梅尔库里诺·迪·加蒂纳拉，是她从萨瓦带来的一个曾在意大利内阁经过培养的人物。

菲利普之子卢森堡伯爵查理，时年6岁，通称大公爵。被菲利普留下作为他的代表的希埃弗莱所领导的枢密院，很快就对查理的继承权的宪法问题作出了答复。1506年10月6日、7日两日，枢密院各咨议上书马克西米连，请求他接受摄政权，并明确指出这一解决办法将立即提交联省议会。他们仿照菲利普统治时的惯例来决定政策，然后再取得各省议会的信任。1506年10月27日马克西米连决定留用菲利普的咨议们，而他们也就可能暂时留用审计署和佛兰德法院的公务人员，从而使行政机构照常工作。

在1506年10月的联省议会上，枢密院只争取到部分省份接受马克西米连的摄政。布拉邦特和荷兰表示同意；佛兰德代表团要求给予时间以便向上峰请示，而埃诺和那慕尔则由于畏惧法国而踌躇不决。路易十二希望，也许期待，成为查理的保护人。直到1507年4月的联省议会上马克西米连才被承认为摄政，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同时（1507年3月18日）授命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代他宣誓担任摄政之职的缘故。当时他仅仅赋予她以最低限度的独立权，直到1509年3月18日她才从他那里获得了摄政权。她所处的地位之所以更为微妙是因为她必须通过枢密院才能施政，当时枢密院仍保留着它在菲利普统治时期所取得的权力，从理论上说虽然是个咨询机构，实际上却和国家元首共享政权。在查理未成年期间，玛格丽特始终没有取得控制枢密院人事的权力。当年老的大法官托马·德·普兰内于1507年去世时，玛格丽特未能阻

止让·勒·索瓦热成为枢密院首席咨议兼主席——这个职位在国王未成年期间相当于总理大臣。勒·索瓦热不是亲法派，而是一个佛兰芒法学家，从1494年起以办理对法外交而出名。

当路易十二还有希望成为查理的摄政时，他强令盖尔德斯公爵和列日主教埃拉尔·德·拉马克签订休战协定；但是一旦马克西米连担任摄政变成无法避免的事，他就重又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军队。玛格丽特转向英国求助，1507年12月，枢密院主要的亲英派贝尔根代表她在加来和英国商谈联盟。但是亨利七世不是一个提供军事援助的国王，所以玛格丽特向法国挑战并想征服盖尔德斯的初次尝试归于失败，结果促使了布拉邦特省议会在1508年起要求和平。她通过康布雷和约（1508年12月10日）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联盟。尼德兰取得了一个喘息机会，因为盖尔德斯公爵不得不接受和约的条件，两国联盟转入了对威尼斯的战争。虽然玛格丽特在康布雷和约之外还和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中包括了查理和玛丽·都铎的婚约（1508年12月7日），然而亲法派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于这些动向十分敏感的神圣罗马皇帝便任命希埃弗莱担任查理的宫廷大臣。玛格丽特曾多方设法为贝尔根谋取这一要职，结果白费心计，希埃弗莱终于大权在握，负责把这位当然世子培养成人。

对于维持现状派来说，康布雷和约和森里斯和约一样，是永久性的；但是对于担任摄政的玛格丽特来说，它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所以，当亨利八世的继承王位可能使她获得一个同盟者的时候，她便借口埃格蒙特的查理违反和约而破坏了和盖尔德斯的谈判，并于1511年和英国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盖尔德斯，结果把局部性的冲突酿成了国际冲突。英国军队前来援助玛格丽特的军队围攻文洛，但埃格蒙特的查理却去进攻荷兰，1511年11月，文洛之围被迫解除了。

引进英国军队是对维持现状派的一个挑战。1511年7月，摄政对于长袍和短袍贵族咨议官引退很是不满；同年年底，她的陆军长官拿骚的亨利和海军提督勃艮第的菲利普（“好人菲利普”最小的私生子）都诈称有病，等候解除军权。虽然她劝谏皇帝撤销勒·索瓦热的职务，任命已故大法官之子热拉尔·德·普兰内为枢密院主席（1511年11月），但是维持现状派也显示他们有力量来阻挠官方的政策。

这位摄政的脱身之计是对贵族和一切拥护查理为国家元首的人作出让步。1512年4月她为大公爵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宫廷。皇帝的愿望是要让他的孙子周围有一批永久任职的官吏，但她对此予以蔑视，另一方面却根据所谓半年制来安排查理的扩大了宫廷人员，这一办法只让地位最高的官吏持续不断地留在宫廷，其他官吏任职半年之后，再由另一批官吏接任半年。玛格丽特认识到要笼络贵族，就必须把在宫廷任职的好处，广泛分配。她在给侄儿选择导师时宁可要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而不要伊拉斯谟，认为阿德里安不仅可以在将来当查理的大臣，同时也可对查理宗教和智力的发展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位摄政之所以比较积极地作出这些让步，是因为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可以推翻康布雷和约，而把神圣罗马皇帝、英国国王和阿拉贡国王联合成一个军事同盟来反对法国了。

在1512年7月，她对她的父亲说：各省是靠贸易与和平而生存的；有鉴于各省将拒绝正面参加对法战争，她宁可宣布各省中立，而以外国的军队和金钱进行战争。中立在原则上已不新鲜，但是把中立扩大到把尼德兰和弗朗歇-孔泰（后者是玛格丽特的陪嫁城镇，已在1512年8月宣告中立）排除在重大战争之外，则和列日主教教区的那种中立有很大不同。1513年4月，神圣罗马皇帝在劝诱下参加了教皇、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尼德兰的中立是由于一句妙语双关的遁辞而得以保全，因为马克西米连只是作为皇帝而不是作为他孙子的保护人而参加联盟的，所以他孙子的世袭领地应排除在同盟之外。路易十二对此评论说：倘若查理已经成年，他就应当作为藩属而应召保卫法国。

摄政玛格丽特进行侵略战争的不寻常的策略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瑞士向第戎挺进，迫使路易十二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亨利八世也向皇帝提供军队和金钱。虽有许多亲英贵族为亨利八世服役，但尼德兰的主要任务还是供应军队给养；玛格丽特1515年声称尼德兰在战时牟取暴利达100万金币，这种说法也许接近事实。法国在斯凯尔特河上的设防城镇图尔内落入亨利八世之手（1513年9月21日），玛格丽特高兴地看到亨利八世扼守该地；因为图尔内使亨利八世与低地国家利害攸关，而英国则成为玛格丽特政策的基石。

1513年10月，在里尔宣布了一项关于大公爵查理的新的王室法令，由马克西米连、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共同保护查理，结

果使这位当然的世子国际化。对查理实行这种王朝国际共管，显而易见地掩盖着一个亲英联盟，其目的在于延长玛格丽特的摄政期限，并削弱查理身边的希埃弗莱及其亲法派。双方在里尔互相保证，决定在1514年5月举行查理和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的婚礼；但是在枢密院和金羊毛骑士团内处于牢固地位的亲法派和亲卡斯蒂利亚派却把婚期拖延到预定日期以后。所以，当1514年8月亨利八世宣布玛丽和路易十二结婚的时候，整个形势改变了；玛格丽特显然已不能再长期维持她的摄政地位。希埃弗莱使大公爵离开马林这个以贵妇人和法学家著称的故乡，前往布鲁塞尔和一些新人相处。

布拉邦特省议会怨声载道，反对在宣布查理成年以前再支付任何间接税；但是到了1514年末，当联省议会向皇帝提出一大笔款项，要求对查理解除束缚的时候，马克西米连又和他在1493年类似的情况之下那样地顺从。按照他1514年12月23日的指示，查理1515年1月6日在布鲁塞尔的联省议会面前宣告成年。查理的成年是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也是各省愿意为接受本国世子的统治而不惜付出代价的结果。

查理的即位开创了勃艮第的复兴。让·勒·索瓦热立即被任命为勃艮第大法官，事实证明他是担任这一官职的最后一人，因为1518年6月他去世后，接替他的加蒂纳拉仅是查理的私人事务大臣，而由审讯官接管了以前由大法官负责的尼德兰法律事务。但是勒·索瓦热在其任期内，对政府各个部门都进行监督，和15世纪时的尼古拉·罗兰如出一辙。而且，再一次按照勃艮第的传统，政府与大公爵变成两位一体。这种安排对于希埃弗莱和勒·索瓦热都是合适的，因为希埃弗莱作为宫廷大臣，是宫廷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和查理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勒·索瓦热作为大法官，则控制了各部门的秘书官员。枢密院由来自低地国家和弗朗歇-孔泰的贵族和法学家们组成，只有马克西米连的代言人伯爵和玛格丽特的代言人加蒂纳拉是例外。虽然个别的咨议如拿骚的亨利由于他们的财产而握有很大的势力，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则决定于他们在宫廷内的地位。最高一级的决定权操在希埃弗莱、勒·索瓦热和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三人手中，而在最后一人于1515年底被派往西班牙执行其不可告人的使命以后，则操在前两人手中。

查理接受他的领地时的条件大体上和他父亲即位时相仿；但是其间许多年来的政局稳定却使查理的亲政成了庆祝典礼，而没有就地方

自由问题进行反复磋商。1515年4月，查理对他在布拉邦特的“大特权”作了增补，它虽然排斥吉卜赛人，却扩大了该公国内其他臣民的个人自由。但是即便他风闻要强迫他作出让步，他也不能容忍；他在根特被接待后，听说有人谣传他已废除了卡赞特和约，他便责备该城镇不该对造谣生事者宽大处理，并在1515年4月重新公布了和约。这一事件表明各城镇动乱不安，而随着查理的统治不断进展，这种动乱变得更加显著；虽然早在1514年在齐里克泽就已发生过反对市镇官吏的暴动。穷人的怨怒不断增长，在布鲁塞尔（1532年）和根特（1539年）最后酿成暴动，矛头直指支持城镇统治阶级的中央政府。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对法政策遭到如此彻底的颠倒，以致人们对于希埃弗莱和她之间的裂痕产生了夸大的印象。路易十二于1515年1月1日去世，他的继承人弗朗西斯一世恰好和查理在同一个月内开始进行统治，这种巧合要求双方当局改弦易辙。这时谴责希埃弗莱在1515年向法国投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列日、盖尔德斯和弗里斯兰当时的局面都要求法国出面干涉，这种干涉已经在尼德兰推迟了国家在道义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并且威胁要把尼德兰的统一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由拿骚的亨利率领前往巴黎的使节团以查理的名义代表佛兰德和阿图瓦觐见，使节团也想代表勃艮第觐见，但未获成功。1515年3月24日缔结了巴黎条约。查理将和路易十二之女勒内结婚，她的嫁妆则是路途不便的贝里采邑；拿骚的亨利将和奥朗日—夏隆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这个家族一个世纪以来周旋于法国和勃艮第之间。和条约的大多数条款不同，这个封建婚姻却得以实现。弗朗西斯和查理之间建立了友好联盟，但是查理在反对盖尔德斯和列日主教的斗争中却没有获得丝毫保护，仅仅由缔约双方承担义务，绝不援助对方的敌人而已。

这项条约和一切对法条约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而向英国谋求谅解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同1496年和1508年的情况相似，在同法国订约以后很快就和英国订约。以后数年，在外交方面，这3个强国设法保持同一步调。1516年1月和英国签订了政治和贸易协定；努瓦荣条约（1516年8月13日）维持了对法友好关系，其代价是让弗朗西斯以他自己不到1岁的女儿代替勒内和查理订婚，但是在同1个月内又开始谈判另一项对英条约。1516年终，马克西米连对尼德兰进行了他生平最后一次访问；他没有像他答应亨利八世那样撤换希埃弗莱和勒·索瓦热，相反，这位皇帝却批准了努瓦荣条约。这些年的外交活动必须对

照查理即将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背景才能理解。1516年1月23日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去世，他把阿拉贡遗赠查理，并任命查理为其他西班牙王国的摄政。1516年3月查理在布鲁塞尔宣布继位。

富有者认为西班牙是勃艮第进行扩张的一个场所；西班牙人在低地国家的人数越来越多，和马克西米连的同胞相比，他们是很受欢迎的。金羊毛骑士团挫败了皇帝想把它变为奥地利—哈布斯堡骑士团的图谋，而1516年的米迦勒节教堂全体修士会赞同把金羊毛骑士团扩展到西班牙，并且为西班牙人保留了10个职位，等到他们的君主查理访问他的新领地的时候予以任命。

尽管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况迫切要求他亲自前去，但查理仍把他的西班牙之行推迟到1517年9月。也许是因为希埃弗莱想要尽可能长久地让他保持纯粹勃艮第君主的地位；1517年亨利八世的使节们也曾抱怨说查理的咨议们把他当作布拉邦特公爵而不把他当作国王。另一方面，查理的政府除了把注意力全部贯注在盖尔德斯、乌得勒支和弗里斯兰上面以外，在1515年初还开始进行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改革。1506年菲利普甚至不顾安危匆匆前往西班牙的急躁情绪再未出现。

1514年所做的比1494年更为详细的调查，表明荷兰比20年前更加富裕，人口也更多；但是1515年重新确定税额却惹出了激烈的反对，结果在1518年又有更改。在佛兰德，税制一有改革，就要和过时一个多世纪的税额发生冲突，这种税额大有可能成为永不改变的数额。重新对神职人员财产实行永久管业权本身就是一个足以测试中央政权力量的措施。

佛兰德的“运输税”是个额外收入的来源，从中可以看出每次整个伯爵领地缴纳间接税的时候，佛兰德各部分，较小城镇和乡村付出多大代价。但是“运输税”从1408年以来一直没有修订，财富方面的变化使它的更新成为迫切的任务，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君主国家的一种税收工具的话。1515年5月就任命了一个“运输税”改革委员会，但到1517年10月，委员会才完成了它的报告。

1515年的“运输税”收入比1408年的超出很多；过去城镇上交税款占总额的50%以上，但1515年所占的百分比却下降到44%。小城镇和乡村所占比重的增加过于一般，除了工业重点的转移以外无法解释。布鲁日在1408年曾提供税额的15.7%，到1515年仅占总数的14.4%；但

格拉蒙和阿洛斯特则从1408年的7.4%增加到8.6%。对于伊普雷、弗纳斯和库尔特莱等设有乡间呢绒和亚麻纺织业的农村地区摊派的税额比例的上升甚至更加显著。

对神职人员的财产实行永久管业权，是查理统治时期把教会的神职任命权、财产和管辖权置于国家监督之下的政策的一个步骤。从理论上说，勃艮第公爵规定从间接税中抽取相当于神职人员年收入3倍的资财，作为分期偿还神职人员财产的费用；但直到1474年，各地区各不相同的永久管业权法令都未严格执行，1477年后，守法的神职人员数目更少。1515年4月，“大特权”增补了一条，禁止布拉邦特境外的神职人员未经许可可在公国境内购置财产；1515年5月，又下令登记在过去40年内，即大胆的查理的永久管业权法令（1474年7月10日）颁布以来，佛兰德各教会所添置的一切财产。这道命令加上1515年12月发给在各省推行永久管业权的公爵代表的公函，不仅引起神职人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掌握行善基金的市民们的反对。反对者向罗马上诉的行为被政府视为与叛国罪无异；而查理和利奥十世的交情也使反对者们不能从罗马得到支持，1520年10月19日的法令禁止在布拉邦特境内未经许可将财产转让给神职人员，因而在这方面又推进了一步。

查理在罗马的信誉也使他得以恢复对乌得勒支的控制，按照勃艮第的传统，地方主教教区常被当作赠给王室世系中私生子的采邑。巴登的弗里德里希主教对盖尔德斯公爵持中立态度，因而一直是布鲁塞尔关注的问题；1516年，弗里德里希经过劝导提出辞职，让位给任海军提督的私生子勃艮第的菲利普，使他在1517年3月担任乌得勒支主教。在罗马，事情在最高一级进行，地方上的派别诸如乌得勒支的省议会，甚至盖尔德斯公爵均无法企求达到这一等级。一直到1524年，菲利普去世后乌得勒支教会财产转归世俗所有为止，在尼德兰东北部的危急形势之下，人们都可以依赖菲利普来照顾王室的利益。

1515年5月，萨克森的乔治把他在弗里斯兰的权益出售给查理，所得只占“美男子菲利普”当初向他父亲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抵押权利时所得的一小部分。阿尔贝特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对手东弗里斯兰伯爵爱德华·西克森纳都没有能建立对弗里斯兰的区域统治权，原因在于不论哪一方都不能和格罗宁根谈妥条件。格罗宁根这个城镇据说是整个弗里斯兰的依靠，即使它还没有足以支配全省的强大力量，它却可以防止任何其他人采取这种做法，除非条件对它合适。埃格蒙特的查理

乐于接受格罗宁根的条件，1514年10月格罗宁根接受了他，不久以后这个城镇便置身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哈布斯堡的查理和埃格蒙特的查理又为另一片土地卷入了一次直接冲突。

利用盖尔德斯家族的幼系艾瑟尔斯坦来反对它的长系是勃艮第的传统手法。1515年，弗洛里斯·范·埃格蒙特继他的伯父担任荷兰执政后，又被任命为弗里斯兰执政以代表哈布斯堡的查理。从1516年至1517年，弗里斯兰在战争中的命运变幻不定；但是1517年夏，一支弗里斯兰舰队把荷兰船舶赶出了须德海，大批为盖尔德斯作战的雇佣兵在麦丹布立克登陆，在荷兰到处劫掠，向南直抵阿斯佩棱。1516年秋，议会曾同意出资装备4个符合建制的武装集团；但由于财政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不足，他们不能立即服役。然而，恢复大胆的查理的军事改革对于主要由马克西米连提倡的依赖雇佣兵的办法是一次彻底的决裂；在查理访问西班牙期间，新恢复的武装集团把在莱茵河下游掳掠的雇佣兵团伙全部肃清；因而使查理1521年归国后能够征服亨利八世于1519年2月已归还给弗朗西斯一世的图尔内。当时盖尔德斯公爵手头拮据，因此便受到了1517年6月在根特签订的一项条约的更加有效的约束，条约规定了东弗里斯兰伯爵爱德华·西克森纳为哈布斯堡王室所保护的人。

1517年6月至7月在根特召开的联省议会，表明了1517年9月8日查理从弗勒兴乘船前去西班牙以前已取得了多么强大的地位。根特市长祖祖辈辈都是反君主制舆论的代言人，如今这位市长却带头宣誓效忠，临别前声泪俱下，联省议会强要查理收下一份献金。作为交换条件，查理不在国内期间，政府的政治计划均向联省议会汇报。1517年7月23日成立的枢密会议还为皇帝保留着名誉首脑的地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在礼节上得到卓越地位，但对于枢密会议，不享有特殊权力。其实她如今比1507年，甚至比1509年还要自由得多，因为查理拒不指定副职，让她放手行动，而且查理签署公文的印玺也交给玛格丽特保管。直到1519年7月1日和16日，即查理执掌帝国大权之后不久，他才赋予她以摄政的权力。

在查理离国期间，玛格丽特在对待列日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一个可行的（但不是永久性的）解决办法。当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列日地方在尼德兰内部的地位问题，另一个是埃拉特·德·拉马克主教及其家族在哈布斯堡势力和瓦卢瓦势力之间的地位问题。从

1506年起，埃拉尔就显示他自己既是个灵活的外交家，又是个干练的统治者，如果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列日则很难作为一个公侯主管教区而幸存下来。查理在罗马的良好声望有助于他削弱这位主教在布拉邦特的教会管辖权（1515年7月），但是，这位主教在罗马教廷的交往中，有一位极其能干的中间人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因此，在查理1520年由西班牙回国时，阿莱安德罗，后来还有埃拉尔，就收回了在低地国家镇压异教的广泛的管辖权。列日地区的省议会对于任何与尼德兰其他地方加强联系的行动都产生猜疑，他们坚持中立作为自己区域独立的保证。早在1517年1月，查理就设法离间列日人和他们主教之间的关系，把列日人召来要他们在对待弗朗西斯一世和他自己之间表明立场；但当时哈布斯堡王室和拉马克家族达成协议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大家族和小家族之间的交易。

1518年4月27日在圣特隆德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是公开的，还有一个是秘密的。前一个条约将由列日的省议会批准，后一个条约是关于哈布斯堡和拉马克两家族之间关系的。以年金为代价，并以在查理保护下的优先地位为钓饵，埃拉尔经过这种诱劝后，答应决不将他的教区传给他侄儿以外的任何继承人，并发誓拉马克家族将不顾一切为查理效劳。列日省议会只是在1518年11月14日才不得不接受了公开的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或多或少澄清了管辖权问题上的混淆，促进了布拉邦特和列日之间的贸易，但由于它规定向布鲁塞尔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从而违反了他们关于中立的思想。1521年，查理对弗朗西斯一世进行第一次战役时，拉马克家族便不再考虑这项秘密条约；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把列日并入尼德兰一事一直拖延到19世纪。

马克西米连的逝世（1519年1月12日）促成了一次皇帝选举，尼德兰成了1519年6月28日福格家族从选帝侯手中为查理购买帝国的抵押品。各省对1486年马克西米连的选举无动于衷，但是对1519年他孙子的登基大业却情绪激动，布拉邦特省议会还预先筹集了一笔献金，准备作为加冕典礼的费用。

查理从西班牙归来，1520年6月1日在弗勒兴上岸，他在前往亚琛加冕的途中对联省议会说“他的心永远是在这里的”。他在1522年立下的遗嘱是一个勃艮第人的遗嘱：指示如果他临终时第戎尚未收复，那么就把他葬在布鲁日他祖母墓的旁边；1524年，他支付124枚法国银币给乔治·夏特兰的儿子，购买其父所撰瓦卢瓦公爵世系纪年的全部

手稿。各省还把查理看作是他们团结的纽带；当把哈布斯堡家族分开，以便为查理的兄弟斐迪南提供土地的问题发生时，以布拉邦特省议会为代表的舆论竭力抵制任何分割低地国家的图谋，结果促使斐迪南放弃了对低地国家的领土要求，而取得了奥地利的土地。

[\[1\]](#) P. 范·乌瑟尔：《玛丽统治勃艮第的朝代》，卢万，1943年，第49—65页。

第九章 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

15世纪末年，人们原设想基督教徒之间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和平，和衷共济，随时准备击退异教徒。实际上，在基督教徒之间更可能发生的却是战争，而且为了让自己腾出手来进行战争，主动向土耳其人乞求和平。

骑士文学的作家们仍在教导人们说战争是光荣的，意大利理论家们的科学观点则因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而看不见战争的恐怖。这两种观点都赞美取得成功的名将——一种观点是赞扬他们的勇敢，即他们的功勋；另一种则赞颂他们的天才和精力对于事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即他们的德行。前者认为战争是合法的，因为它是高尚的；后者则认为武力乃是谈判的一个天然合法的组成部分。

教会也通过支持各骑士组织和集团，来称赞人们使用并非经常用来反抗压迫者或异教徒的武器；并准许人们发动正义的战争，实际上就是认可一切战争。一般认为，正义战争的标准是：它必须是经上级权威当局批准而发动的，为了正义事业并具有正当意图而进行的战争，而除了对那些最固执的讲良心的人之外，这样的标准是不难满足的。同时，教会也要用战争来维护它的权威，惩办那些竟敢亵渎它的人。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在伟大的事业中，战争是一种神圣的裁判，是裁决性决斗的延长，即由两军对垒代替两士厮杀来决定孰是孰非。此外，妨碍人们对战争加以谴责的，是很难把战争和夙怨区别开来，而夙怨被默认为是两派人或两个国家之间取得公正解决的合法手段。把战争和报复同等看待的法学家们又从宗教方面为战争辩护，说战争是上帝化干戈为玉帛的手段。约翰内斯·德·莱尼亚诺1360年在第一篇专门讨论战争的法律问题的论文《论战争、报复和决斗》中，强调战争是自然发生的，是医治人类脓肿的不可缺少的手术刀。耶稣赞许为正义事业而使用武器的说法，一直贯彻于16世纪初叶越来越科学化的战争中，结果大炮以使徒的名字命名，剑戟上刻有耶稣受难的情景，将军们先吻土地，然后以他们的守护神的名

义发起进攻。在最正义的事业，即反抗异教徒侵略的战争中，当时直接受到土耳其威胁的威尼斯、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国的海、陆军，都经常处在战斗状态，即使在不稳定的短暂和平时期也处于半动员状态；而直到1492年西班牙军队才最后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看到如此之多的合法战争，人们对整个战争的恐怖也就麻木不仁了。

此外，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战争才在地理上形成它的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进行战争才形成它的社会；战争的势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失的。贵族受教育就是为了战争，在和平时期他们莫知所从。经营土地已不如过去那样有利可图，马上比武也抵不上实际的战斗。骑士们出于财产和感情方面的原因，渴望进行战争和国外的冒险事业，意大利战争在贵族的鼓动下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因为这些贵族在宫廷的职位被职业的行政官吏所取代，他们的地产往往不足以供养庞大的家族。对于非商业阶级来说，战争是他们靠掠夺和勒索赎金迅速发财的良机。战争一旦爆发，上述这些动机就会使战争继续下去。

“我们该怎么办？”法国元帅蒙吕克曾设想有一位军官问他：“要是我们不积攒几个钱，要是我们不克扣士兵的薪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得进收养院，因为不论是国王还是别人都不再理睬我们，我们自然也就穷了。”^[1]

在西班牙，由于连年对摩尔人作战，由于全国大部分土地贫瘠，由于贸易和工业大部分掌握在非基督教徒手里，就产生了一个比法国人更依赖军事冒险的贵族阶级；西班牙人也被当时人看成是好战的民族，认为荣誉主要建立在武功上。同样，在德意志，特别是南部和西部，工业和贸易的收入不敷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进口粮食。无数仅有少量世袭产业、由于只受军事教育而在意大利受人讥笑的贵族，就非常热衷于战争。瑞士拥有当时最精锐的军队，那里的公共集会主要是操练和检阅，它依靠战争为它唯一的出口商品——步兵提供市场。

15世纪下半叶，呼吁保持现状的声音根本无人理睬，在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王国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这些国家的疆域因某一战役的胜负、某一采邑的被围或陷落而变迁很大；东方各国的国界也因土耳其进兵的压力大小而经常移动。在这半个世纪里，勃艮第的查理所统治的由北海直达莱芒湖地区的半独立帝国土崩瓦解，鲁西荣和塞

尔当落入西班牙之手，法国的实际势力伸入地中海。在欧洲，各种错综复杂的封建义务和数百年来各王室之间联姻而产生的各种反要求交织在一起，经常由于幸运的王位嬗递，或由于某些古已有之而现在认为时机成熟应予实现的领土要求，而使现状发生变化。民族的情况仍然含混不清，土地的价值依占有土地而得的享受和利益而定，而不是根据该地使用的语言而定。各个国家甚至连自然边界都得不到满足，因为这样的概念当时还不存在。

土地由君主和其他地主享有，但君主对土地的欲望并不取决于国家是否同意给予满足。14世纪末，奥诺雷·博内写道：“人人皆知，在决定、宣布和进行战争的事情上，穷人是毫不相干的。”^[2]100年后，各王室通过把经常税用来应付紧急开支，从而使其权力进一步加强，情况就更加如此。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决定于议会，在拥有真正强大的行政机构的国家，例如法国，即使在税收方面，议会也不起什么作用；意大利战争的进程就没有受到交战国家议会活动的重大影响。同样，军队只占人口中极少的一部分，构成军队的大部分人，不是与统治者利益一致，就是由统治者出钱雇用的人。根本没有向全体国民提出要求他们武装对敌的情况，而且，随着战争越来越依靠职业军人，也就不去注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了。战争是依照国王的意旨来进行的。

推动一些强国参加意大利战争的并不是经济压力。意大利战争的发起国法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法国有葡萄酒和粮食，不依靠进口食品，也不依赖进口的原料，仅仅购买一些制造大炮用的金属。它出口的葡萄酒、盐和粮食都有现成的市场，无须依靠强制手段。法国农民生活富裕，不希望离开他们的土地去当兵。对于法国来说，战争是一种奢侈品。同样，西班牙的干涉不过是偶然为了保卫西西里，和保卫运送粮食给天主教各国国王的船只。马克西米连之所以加入1495年的神圣同盟，并不是因为法国的胜利威胁了他的收入。亨利八世并不是因为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不得不参加1511年的神圣同盟并侵入吉昂^[3]地区的。他和查理一样，为的是乘机攫取某些奢侈品。莫尔^[4]曾想象他自己介入法国国王的御前会议，敦促在场的人“改弦更张，吸取新的教训，说道：我的忠告是不要干涉意大利的闲事，而是安安静静地留在本国；法兰西王国本身比一人所能统治的任何国家更加辽

阔，国王不必一再筹划如何得到更多的土地。”然而这不过是《乌托邦》中的一段话。

西欧强国志在扩张。英、法两国已在百年战争之后恢复了元气，不过英国接着发生内战，不像法国那样立即打算奉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法国国王则因取得吉昂（1453年）、勃艮第（1477年）、普罗旺斯（1481年）和布列塔尼（1491年）而巩固了地位。到了1492年，西班牙已无内顾之忧。这种扩张的趋势并未由于任何认为必须举国一致行动这样的观念而妨碍其发展，也不受任何自然边界观念的指导。只要具备支持战争经济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国内秩序，各国就把眼光转向国外。究竟应征服哪里，并不决定于要求使经济的国界和民族的国界相一致，也不决定于要求达到某条山脉或河流的自然边界，更不决定于要求使边界与语言或风俗习惯相符合。法国扩张的途径，显然应是向东北越过平原到尼德兰，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这些地方不仅从巴黎容易到达，而且又十分富庶。相反，查理八世却麾师南下，越过阿尔卑斯山，顺狭长的意大利半岛而到达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只盛产粮食，而法国并不需要；到达该地的交通只有靠海上力量才能保证，而法国又无此力量。尽管阿拉贡在地中海进行了扩张，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却是在其西方的葡萄牙和新世界，而不在地中海；然而甚至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建立王室的联系以前，西班牙就已使自己卷入意大利事务达3个世纪之久。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当时被公认并被称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却是靠外国雇佣兵的帮助进行战争。法国的一位王后竟在1501年提议将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两大公国交出，作为哈布斯堡的查理和她女儿订婚的交换物。民族感情和民族外交政策是王室战争时代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同时，条约并非进行侵略时不可逾越的障碍。诚然，条约既以最严肃的态度保持其庄严性，并不是轻易就可撕毁的；对条约文字的违背，在宗教上是犯下了伪誓的重罪，从而名誉扫地，并受到更无情的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的惩罚。因此，必须在条约的措辞或用意上找出某些法律上的破绽，必须利用布道坛、大学、街道化装表演、大幅招贴物、奖章和歌曲等大事宣传，才能使人们对背弃条约在思想上有所准备。由于原签约人的继任者是否应遵守该条约很难断定，背弃条约也就更加容易。莫尔对此也说得明白：

订立同盟时礼仪愈繁多，愈神圣，就愈会由于在道义上任意找到借口而迅速遭到破坏；这些借口往往在事先就已巧妙安排，而不论条约的约束

力多么牢固，也会找到漏洞……此种狡猾手法，……如果他们知道普通百姓在买卖和契约中玩弄的也是这套手法，他们却会忍无可忍，而疾言厉色地大声高呼此系最卑鄙的犯罪，应该处以可耻的死刑。

然而，也不应当完全相信对这种弄虚作假的指责。撕毁条约可以通过法律上的重新解释和教皇的批准来进行，而不让人感到个人的需要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取得的。

除了在国内保持最低限度的稳定以外，战争的前提是金钱（除神圣罗马帝国外，各强国都有足够的金钱）和军队。困难就在于军队。瑞士人在格朗松和莫拉两次战役（1476年）中战胜勃艮第重骑兵，确定了重步兵乃是战争中决定性的战术要素。但是这种情况仅适用于按瑞士方式训练出来的士兵。直到16世纪初德意志和西班牙重步兵袭用瑞士的战术之前，瑞士的独占地位一直没有受到挑战。这种独占地位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雇佣兵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他们是十分宝贵的出口物，国家不能不加以控制。瑞士不仅仅是军队的储备库，而是具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抱负的国家。路易十二不听从瑞士提出的在米兰取得贸易自由的要求，结果在1503年把贝林佐纳丢给了瑞士。他对瑞士的要求继续充耳不闻，最后导致瑞士在1509年放弃了与他的联盟，从而使瑞士的军队为它的敌人服务。实际上，瑞士联邦尽管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各州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但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盟国看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契约国。这并不是说瑞士议会的拒绝是最终的决定。议会自己所订的契约，所包括的是它挑选的最优秀的军队，但是挑剩下来而可以受雇的，更确切地说，可以单独收买的，也还大有人在。因此，当1499年洛多维科·斯福尔扎通过官方得到1万名军队对法作战时，路易十二也通过非官方途径得到2万人来与洛多维科作战。总之，任何强国都不会由于某一个议会调整瑞士联邦军事政策而放弃它的战争计划。

在热衷于战争而且有能力进行战争的各强国面前，有一个长期诱惑人的目标——意大利。它富庶，四分五裂，作为当时宗教世界和古代世俗世界的首都，仍然具有魅力，它已经与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通过封建和宗族的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要应付这种紧张局势，这种促成战争的潜在力量，旧时的国际仲裁机构已无能为力。固然，神圣罗马帝国还没有失去它的鼓吹者们为它赢得的威望。它是最高世俗权威，只有皇帝能册封国王，只有他

一人被尊称陛下。查理八世渴望取得皇帝的尊号，并进入那不勒斯夺取象征东欧各国帝王权力的宝球，而且传说他也觊觎着西欧各国帝王的宝球。但是，如今已不再有人祈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充当国与国之间的仲裁人了。他的各项决定看来越来越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

罗马教廷的情况也是一样。守旧的人们仍然指望它阻止各世俗统治者互相残杀。伊拉斯谟在1514年写道：“罗马教皇、红衣主教、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正当职责就是平息各基督教君主之间的争端。”然而，虽然教廷的普遍权威还未完全受到非议，虽然在各地仍普遍交纳彼得便士，^[5]虽然教皇使节在百年战争末期还常常居间调停，但是教廷作为国际仲裁者的作用已每况愈下。签订条约时可能还要宣誓，要求天谴神罚，而且唯有教皇一人可以豁免受这些条款的惩罚；但条约中逐渐加入一些条款，规定缔约双方不得请求豁免，并强调教皇不是根据职权，而是以私人身份行事。罗马教廷对战争的控制权更是确切无疑地已宣告结束。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公会议禁止把基督徒战俘作为奴隶，批准实行教会休战^[6]，并禁止与异教徒进行作战物资的交易——所有这些措施均已名存实亡。在意大利境外，罗马教廷的训斥虽能使许多人的良心感到不安，但已经被置之不理。教会权力的特殊性质，对战争的准备或进行战争的方式都不再发生重大的影响。

当教皇以基督教首领的名义呼吁基督徒团结起来抵御土耳其的时候，他对各好战国家的影响受到了决定性的考验。各强国再三申明他们愿意实行团结。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之间签订的伦敦条约（1518年）声称：“基督教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传播基督教的信念，消灭基督教的敌人。”弗朗西斯在1535年因缺少海军力量不得不与土耳其联盟，但曾因自己的这一行动而向教皇谢罪。而且，危险也十分明显。土耳其军队在1456年围困了贝尔格莱德，1480年占领奥特朗托，1521年侵入匈牙利，并猛烈攻下贝尔格莱德。大祸即将临头的一些国家高声呼救。1499年和1517年罗马教廷两度号召十字军东征。捐税征收了，人们的良知也被激发了起来。费迪南德与路易十二1507年在萨沃纳会晤时，人们都认为这次会晤将讨论来自土耳其方面的危险，而他们实际上讨论的却是瓜分意大利。伦敦条约签订前两年，阿勒颇失守的时候，亨利八世对向他求援的威尼斯使节谈到他的想法时说：

雄辩家先生！您是贤哲，以您的深思熟虑当可理解：只要这种背信弃义在基督教强国中间占上风，对土耳其人的共同讨伐就不会奏效，他们唯

一所想的是互相残杀。[\[7\]](#)

一方面高喊团结起来反对土耳其，另一方面惧怕土耳其的各国则继续积极与之进行政治交易，或希望土耳其成为盟友帮助他们反对其他基督教国家——这就是摩里亚半岛[\[8\]](#)的一些当权者已经做出的榜样。从1490年到1494年，罗马教廷每年收到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的一笔款项，作为监禁他的兄弟，也是他潜在的政敌杰姆的费用。教皇的这种行为使得土耳其在对付巴尔干基督徒和对付威尼斯时采取较强硬的政策。苏丹对西方商人的容忍（到1507年时，君士坦丁堡一地就有60多家佛罗伦萨商行的代理人），也使意大利各国对他很难存有恐惧之心，反而把他当作盟友。这些国家——米兰、弗拉拉、曼图亚和佛罗伦萨曾在1497年联合起来收买土耳其人，帮助它们进攻威尼斯。尽管当时仍存在着一种基督徒团结一致反对土耳其的情绪，但是罗马教廷无法利用这种情绪来扭转各国继续为私利而进行战争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各国共同关心的，首先不是土耳其，而是意大利，结果是加深了政治上的角逐，而不是团结。然而，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上虽然有助于确立民族间的敌对情绪，但同时也迫使各国更加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扩张的倾向使外交来往日渐频繁，对意大利共同关注，结果加深了彼此间的提防。现代历史学家的长处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而他们的缺点也在于过分强调这种连续性。在这个时期，外交史上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军队能够动员得愈迅速，受威胁国家的情报机关也就必须组织得愈好；由于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包罗万象，更易起突然变化，每个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需要随时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向。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其他国家的宫廷中保持常设代表。常驻使馆之所以不断增加，还因为各国宁可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愿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这样做，各国更易于自行其是。此外，派驻使节往往是弱国畏惧强国的表现，意味着奉承对方。随着国际关系发展速度的加快，花费在谈判上的时间也增加了。新的结盟关系要求高度紧张的外交活动。尽管有少数几个主题是长期不变的：如英国利用它和佛兰德的联盟来对抗法国利用苏格兰；西班牙策划反对法国时依赖英国；英国受法国威胁时依靠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连觊觎威尼托地区等——但是从整个来说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联盟并不意味着安全，也不意味着与其他国家进行的谈判可

以轻易地中断，正如亨利八世在1514年和1517年当他的盟国在暗中准备改变立场时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情势所迫切要求的是经常的讨价还价，收集情报和保持警惕。

旧式的临时性的外交实际上已不能满足需要。过去是在册封骑士爵位，赠予金玫瑰^[9]或圣诞节剑，递交婚约，宣战或休战时才派遣使团，都是随时任命，使命完成后即归国解散。在外交关系上，很少有连续性。各国君主设法通过贿赂，在外国宫廷中“聘请”某些重要官员照管他们在国外的利益。路易十一曾支付这样的费用给英国的大法官，以及案卷法官和宫廷大臣，据说他在德意志比马克西米连本人还要有势力。但是这些接受贿金的人只有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才忠实办事。君主自己充当外交代表的情形也不多见。虽然君主之间常常计划举行会晤，但真正举行的却为数甚少。1419年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在蒙特罗桥遇刺，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先例。1475年路易十一和爱德华四世会晤时，在索姆河上搭成一座舟桥，桥上横立着像狮笼铁栅栏一般密的木格栅栏，两位国王就隔着栅栏互相拥抱。这些会晤所表现出来的疑虑和警惕，使亲切和坦率丧失净尽；所安排的会谈，如1507年费迪南德与路易十二在萨沃纳的会谈，1520年亨利八世与弗朗西斯一世的会谈，也只不过是作为常驻代表工作的补充，而不能代替他们的工作。

弱小国家向国外派遣常驻代表，是它们保持联盟的条件，而它们在这些联盟中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伙伴。威尼斯之所以能加入某些没有它参加也行的条约，是由于它的驻外使节百折不挠地保护本国利益的结果。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也多亏他的常驻法国使节贝尔焦伊奥索伯爵的熟练手腕，把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时的几名随从拉到了自己一边。许多国家都极其迫切地想在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宫廷派驻代表，以致路易十二被这些争先恐后的代表们纠缠不休；他们全都希望每天至少见他一次。他们伴他打猎，陪他饮宴，当他不在的时候就觐见他的王后和大臣；他们甚至收买他的侍者，报告他饮食起居之间说过些什么。两国互派使节也可以在两个强有力但互相猜忌的统治者之间加强联盟并加深了解，特别是当他们之间订有秘密协定时，例如1520年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协定。

常驻外交的目的之一是提供消息，以作为各国政府决定外交政策时的依据。在非常驻外交的初期就已为此做了准备。威尼斯1288年的

一项法令，要求它的使节在归国后的15天以内就国家感兴趣的一切情况提出报告。从13世纪中叶起，在它派驻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商务代理人中，就有事例说明定期报告产生了效果。驻君士坦丁堡的领事，驻亚历山大的领事，驻希俄斯、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副领事，都不知不觉地像关心威尼斯人在国外的贸易和法律地位一样关心起政治来；他们必须定期送发政治情报，而不管它是否直接和市场情况有关。

直到15世纪下半叶，形势的紧张才使纯粹的外交常驻代表大量增加，但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孤立的事例，说明人们对在两国之间不断保持个人接触所起的作用仍是欣赏的。1341年前，曼图亚的路易吉·贡扎加就曾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的宫廷派有驻节代表。1375年，米兰与曼图亚交换使节，以加强合作，共同反对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家族。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有7年多时间在德意志王的宫廷中保持一位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吉斯孟派有驻米兰的代表，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联盟并使之保持警惕。

为了同样的目的，米兰公国爵位追求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1446年派他的秘书尼科代莫·达·蓬特雷莫利，常驻在佛罗伦萨他的盟友科西莫·德·美第奇处。他参加了米兰、佛罗伦萨和法国三国联盟的谈判，该联盟经过多次战斗，通过1454年洛迪和约，从威尼斯手中挽救了斯福尔扎。洛迪和约之后，大约有40年之久的时期，意大利5个主要国家即那不勒斯、罗马教廷、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的结盟非常恰当地得到了调整，对任何扩张的迹象反应极其迅速，而且总是由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来遏制威尼斯。因此，这一条约被看成是外交政策均势原则的范例——外交政策均势一词在该世纪结束前就已使用了。保持外交政策均势所要求的互相戒备和合作，使得常驻外交迅速发展起来。到1458年时，这4个国家都在对方宫廷中派有自己的代表。罗马的地位使这种发展进一步确立起来。派代理人常驻教廷，早已有之，因为教廷作为盟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罗马作为交换消息的场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使节。自从米兰于1445年派遣马尔科利诺·巴尔巴瓦拉以来，使节人数增加得很快，以致庇护二世扬言，凡居留超过6个月以上者降级为一般代理人，从而将丧失其特权。他希望以此减少其人数，但亦无成效。随着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势力的强大，随着这些国家愈来愈引起意大利各国的注意，这种常驻外交的做法也扩展到了北方。当法国的战争准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侵略的

阴影开始笼罩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各国便派遣使节常驻法国，设法防止这种威胁或将其引向别处。从1463年到1475年，米兰有大使常驻法国。威尼斯自1471年起在勃艮第派有代表，勃艮第失败后，自1485年起在法国派有代表。在双方敌对行动已迫在眉睫，或实际上已经开始后，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发展。甚至罗马教廷也变得软弱，在1495年派遣两名代理人常驻在马克西米连的宫廷。威尼斯在1495年派代表到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1496年又派代表到英国。米兰自1490年起在西班牙派有常驻代表，大约在同时派人常驻英国，自1494年起派人驻马克西米连宫廷，从1493年起派贝尔焦伊奥索驻查理八世宫廷。那不勒斯在1490年派使节去英国，1494年派使节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随着北方诸国由于它们共同专注于意大利事态而不得不保持密切而持续的接触，它们在彼此的宫廷中也保持常驻使节，于是这种做法就更进一步得到发展。自1495年起，西班牙在伦敦一直驻有代表。路易十二不但在罗马和威尼斯，而且在奥地利太子和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处，以及在西班牙均派有代表。例如1504年时，罗马教廷的态度由非议转为接受，朱理亚二世的典礼官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告天主教的各国王、公爵和他们的代表享有优先权。

这并不是说，到了1504年左右，甚至30年以后，常驻外交已成为常规。只有对意大利感兴趣的國家才经常采用常驻外交。苏格兰、葡萄牙、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匈牙利和德意志各王侯都依靠旧式的临时外交；即使在其他国家，派遣常驻使节并不等于这个职位没有什么用处时还继续维持下去。以往依靠间谍的办法毕竟是相当有效的，亨利七世以他的大陆情报准确而闻名，这些情报几乎全部来自非官方的暗探。像托马斯·斯皮内利（一个从1509年起领取英国国王津贴的佛罗伦萨人）这样的人，不但因其能从安特卫普、布鲁日和里昂等重要商业新闻中心获得情报而成为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而且可以被用来处理要求保守机密的事务。让这些暗探公开身份，给他们加上使节的头衔，未必能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暗探们却热衷于得到官阶所带来的威望。而且，随着外交关系的紧迫性的增加，除了暗探以外，还有必要增加一些更负责任的、可用来进行公开谈判的人。甚至以前满足于在罗马保持代表的法国，也从1517年起在威尼斯，1522年起在瑞士和葡萄牙，1525年起在英国，1526年起在神圣罗马帝国派遣了其他人员。配合常驻外交，仍然采用派特使的办法。常驻使节主要从事调查和报告；一般来说，他们的级别和他们的国书都使他们没有

资格就特别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要处理这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必须另派地位更高的使节，在这位使节离任以前，常驻使节处于下级的地位。

这类特使出行时，往往还很讲究排场，精选大批随员，包括教士、仪仗队和由法学家和文书等组成的庞大秘书处。常驻使节虽在呈递国书时有一定的正式礼仪，但生活简陋，有时有一位级别相同的或担任秘书职务的同事，但往往只是他一个人。一些重要人物也执行外交使命，他们不如上述两种使节那样具有官方性质。例如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妻子贝亚特里切·德·埃斯特在1493年曾前往威尼斯表示米兰的友好。信使在这种新外交中也有一份地位。他们和纹章官一样，在互相猜疑或互相敌对的各宫廷是一种特殊的受欢迎的人，这些宫廷因他们享有骑士的声望和在职务上一向享有豁免权而予以接待。信使不仅用来作为战场上两军之间的谈判者（如在福尔诺沃战役中），或者是传递挑战书和宣战书的人（如1509年蒙儒瓦向威尼斯传递的），而且用来作为使节。蒙儒瓦作为法国的纹章官，确曾被派往欧洲许多国家的宫廷，并在1500年在阿德里安堡会见巴耶济德，不过他每次出使都是提出要求或通知某项决定，而不是去进行威胁利诱。

在这些官方谈判之外，还进行着一种由暗探、间谍和告密者从事的阴暗外交。意大利人特别喜欢利用商人和银行家；美第奇家族则利用他们在里昂的支系同宫廷的交往，这些人消息很灵通，比从他们的使节那里得到的还多。威尼斯则借重医生，因为医生可以在最无戒备的时刻接近君主。查理五世利用教派成员充任间谍，弗朗西斯一世则建立了一支暗探队伍，包括男女贵族以及无名的神职人员和冒险家。各国使节千方百计在驻在国的宫廷中罗致告密者。塞巴斯蒂安·朱斯蒂安尼从教皇驻英国使节弗朗切斯科·基耶雷加托那里获得了大量情报。他在呈文中提到这个人时总是用“朋友”代替。他为此恳求城主给予他某些优遇，并且提醒他们要用密语，否则阴谋便会败露。

大量的外交文件说明各国政府通过他们的常驻代表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外的事态。除去护照、国书等正式文件外，这些文件可以分为三类：指示、呈文和报告。指示概括地规定出使的目的，使节应如何到达目的地，到后与哪些人接触，以何种口气提出本国政府的问题。由于这些指示往往是在使节到任时为表示亲善而拿出来的，所以大都是一些官样文章。但是使节往往同时带有秘密指示，这些秘密指示必

须严加保管，只能给某些可靠的人看；它们往往措辞有力而强烈，指出在谈判时应运用的确切论点。

使节自到任之日起，便应定期把他的活动向国内汇报；既然情报是使馆最有用的业务之一，因此要求他尽可能经常地提供报告。马基雅弗利第一次出使罗马期间，50天之内就发回了49封报告，虽然这是特殊情况，但一般要求每周至少写一封，即使是长期驻在某国的使节亦如此。和重要人物的谈话必须逐字逐句汇报，还得加上可能与之有关的每件事或每个谣传。使节所得的印象也是宝贵的，各国政府唯有通过他的书面描写才能想象出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官方对这些人的描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马基雅弗利在写给他的年轻朋友、初次出任西班牙大使的拉法埃洛·吉罗拉米的一封信中，曾指出过所需情报的范围。他首先应报道自己到任的消息，并叙述他和国王会晤的经过。然后他应观察并报告与国王和他的国家有关的一切：查理（这封信写于1522年）是坚决果断的呢，还是他人的工具？是吝啬的呢，还是慷慨大度？是好战的呢，还是爱好和平？他最热衷的事业是追求荣誉，还是其他？他是否深得民心？他是否亲西班牙而疏尼德兰？能左右他的是哪些人？这些人怀抱什么目的？他们是否可以买通？全国上下对查理抱什么样的感情？——凡此种种，以及其他许多项目，如果言之有据并写成报告，就可以给使节带来荣誉。此外，各国政府还依靠它们的常驻使节提供那些未派驻代表的邻国的消息。当威尼斯和英国之间关系破裂时，威尼斯常驻法国的使节就必须同时报告英国的消息。当威尼斯在都灵没有派驻代表的时候，它通过米兰收集有关萨伏依的情报。

常驻使节归国后应作出报告，报告有时是书面的，尤其在意大利。在威尼斯，归国使节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宣读报告是一件大事，这已成为毫无例外的规矩。由于使节的任期一般是两年至三年，所以这种办法意味着元老院对于和它交往的每个国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都能得到定期的报告。这种报告必须是全面的，作报告的仪式也从不草率从事，报告的好坏对使节的名望有很大的影响。

从1425年左右开始，政府及其代表之间的文书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到15世纪末，就连教皇使节的报告也是如此。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愈来愈多地学习外国语。英国和意大利在法国的使节平时都说法语，瑞士的使节也是一样。王公们接见外国使节时使用该国的语言，

以表示对他们的友好，虽然所说的不过是临时学会的几句话。由于路易十一和他的继任者们的外交活动，由于法语是马克西米连统治时期德意志宫廷所用的语言，法语开始逐渐成为第二外交语言，虽然拉丁文同时也正在恢复。拉丁文使用于条约和护照等国际文件，在没有更合适的语言的情况下，也用于国际交易，还被用来表示祝贺或致谢——但本国语言是用来迁就弱者，而拉丁文则是用来奉承强者；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先用拉丁文发表正式讲话，然后再用本国语言继续交谈。拉丁文许多世纪以来受地方语言和地方口音的影响而失去其纯正，它虽然在人文主义的激励下仍然是真正的国际语言，但实际用途早已远不及它的名望。

拉丁文在用于会话的时候所具有的各种优点，在书信中自然都成了缺点，因为书信中需要的是隐秘，而不是人人都理解；由于驿邮和外交豁免权不一定靠得住，便往往采用密码作为本国语言的辅助。在这方面写有很多书籍。修道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所著《密码六论》是献给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通常只有最关键的段落才用密码，但是有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使馆的办公厅喜欢全部用密码写呈文。有些密码极其复杂，很难破译；编制密码也十分枯燥乏味（例如 *enviando*（送去）一词，有一种西班牙密码写成 *DCCCCLXVIII le No r malus 3'*），根本不能译出。1504年，西班牙使馆办公厅认识到必须简化它的密码。

不管文件写得多么频繁、完满和秘密，实际作用如何还取决于驿站，而驿站当时仍然是不可靠的。也有私人办的邮务，著名的如塔西斯家族在北欧和中欧经营的邮路；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官办的邮政，虽是最廉价的通信工具，却最不安全。专门信使所费十分昂贵，因此往往积压信件，等凑够一个包裹后方始传递，从而使较早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价值。如果能找到邮局、信使、行商或友好的外交官员的话，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通信也不见得过分缓慢。标准的速度是：罗马和巴黎之间12天；罗马和威尼斯之间2—3天；都灵和威尼斯之间6—7天。凡需要渡海传递的文件，时间更不确定。从威尼斯到伦敦一般要用20—30天；虽然在1499年一名信使由塞维利亚渡海到威尼斯用了15天，但1504年伊萨贝拉逝世的消息经30天才传到罗马。

尽管有上述这些活动，许许多多的信使和数以百计的文件，但常驻使节在欧洲外交中还远远没有被认为是正规的和经常的因素。有关

使馆工作的著作的作者们，往往忽视或缩小使节的作用。使节往往出身低微——后来用了相当的时间才通过上等的教育培养出足够数量能担任常驻使节的人——这一点对他们不利。虽然外交豁免权是民法和教会法规中一条由来已久的原则，特派使节受到干扰的事例也鲜有发生，但常驻使节并不十分安全。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使他们得到上述保护，而且由于他们不断搜集情报，很容易被看成是间谍，他们的证书是值得怀疑的。沃尔西曾私拆过法国和威尼斯的文件，并截获过教皇使节基耶雷加托的文件和密码；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往往受到公开的敌对待遇；他们的住所受到监视，他们的人身受到污辱，有时甚至被监禁和被拷问。

这种差别从普通常驻代表经常处于贫困境况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在由行政官员、骑士或主教充当的特使身上大量滥用金钱，好让他们引起被访国家王公贵族的注意。但是，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国王，也不觉得他们的常驻使节过着悲惨不堪的贫困生活（如像费迪南德驻伦敦大使德·普埃夫拉那样）会有损于他的名声。马基雅弗利从法国发来的呈文中对生活的拮据诉苦不已，说他不得不伴随到处巡游的国王而没钱备马，经常出入宫廷而无力添置洁净服装，频频发送文件而付不起信使的费用。

政府长时期不做任何指示，也是对国外常驻使节漠不关心的一种表现。由本国政府向驻在国朝廷写信致意并报告消息，对一个外交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是他取得朝廷好感和各种消息的手段。除了对驻外使节的呈文置之不理外，更令人难忍的是对常驻使节的呈文经常不予信任。例如，威尼斯由于怀疑他们的外交官受到国外生活的腐蚀，就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一切好处。

经过很长时间，常驻使节和特使之间的地位差别才渐渐缩小。在这段时间内，常驻使节不但在国外旅途危险，出入宫廷十分劳顿，而且还要在国内受到轻视和猜疑，因此境遇格外困难。经常有人请求离任，而且不得不对拒不赴任的新任使节严加处分。1500年威尼斯选派的驻匈牙利使节扎卡里奥·孔塔里尼曾请求免职，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由于意大利战争已经改变了的外交，却仍然在沿袭旧做法的条件下进行。他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批准，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和10个子女；他曾经出使10次，其中3次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德意

志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让他住在一所一个死于瘟疫的人住过的房子里；他的父亲和另外两个亲属都曾因担任使节，死于生活的困苦。

各强国向外扩张的趋向使它们必须联合，但是既没有传统的友谊，也没有传统的轴心，也就不会有信任 and 保证。特别是它们全都想攫取同一个战利品——意大利，结果形成了一种对国际协定反复无常的诡诈外交和一种变化莫测、互相恐惧和互不信任的气氛。在最高一级，很难断定说这一时期的政治道德比以前或以后更坏。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毁约，借口便可信手拈来。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并非有意地违背了他在普瓦蒂埃战役被俘后获释时所作的誓言，后来又谨慎地重返英国为囚，这样的例子毕竟不能代表他那个时代的特点^[10]。在较低的一级，即在外交官中间，尤其是在新任的常驻使节之间，则互相猜忌，不受明文规定的豁免惯例的保护，也不因为属于某一可靠的特权阶级而得到支持，种种原因促使人们行动诡秘，采用一些狡诈而不正当的手段。

常设外交在当时尚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一事实使变化莫测和互相猜忌的气氛更加浓厚。有些君主乐意得到他们邻邦的情报，却痛恨别人来发现他们自己的隐私。此外，外交家的目的是斗智，是骗人而不受人骗——这是科明根据路易十一的所作所为而总结出来的目的。路易十一不但吹嘘他自己撒的谎很有用处，而且宁可任用临时使节，其理由是前一个使节许下的诺言可以由第二个使节加以否认。诡诈手段花样翻新，采用伪装、密告，君主们把某一使节隐藏起来，以便他能够窃听另一使节的谎言，几乎成为闹剧。外交官们往往也并不是单纯为一个国家效劳。法国国王的亲信顾问科明接受了希望改变法国政策的佛罗伦萨的金钱；而抱着这一目的派驻法国的佛罗伦萨使馆本身，也有敌视本国政府而拥护查理八世的分子。普遍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国际制裁的解体，结果产生了一种对待政治事务的态度，这种态度以一个亲身经受过这种不安全感，从中学习并将之编撰成书的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就是马基雅弗利。

从1499年起，马基雅弗利屡次被派出使外国和其他意大利国家。《君主论》所表现的那种大胆反抗的非道德观，直接来源于他所接触的当代外交的无情和猜忌的特点。作为一个弱小国家的代表，他备受奚落和冷遇，因此他认识到国家唯有强大才会受人尊敬，而国家要强大全在于武装。由于主子的犹豫不决的政策，使他一再受到掣肘，所

以他体会到折中办法无济于事，中立是自杀的一种形式。法国人讥笑佛罗伦萨是“无用先生”，他由此认识到，当今之世唯有金钱与武力才能算数，在生死搏斗中，弱小者有时必须使用不正当手段。他在1500年第一次出使法国时所得到的这些教训，于1502年会见强有力的切萨雷·博尔贾后更加深信不疑。翌年他把这些教训传给了他的同胞。佛罗伦萨当时受到切萨雷、比萨人和正向那不勒斯南进的法军的三方威胁，并正在辩论究竟是进行武装呢，还是和以往一样进行谈判。马基雅弗利提出了他的主要论点：没有武力，城市就会灭亡。不要相信朋友，当今敌对乃是常态。不要相信条约，对当今的君主只有靠战争威胁才能加以约束。“因为，我告诉你们，命运将不会帮助不愿自助的人，上天也不会——也不能——维持决定要自我毁灭的东西。”^[11]他后来几次出使，包括又3次出使法国在内，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佛罗伦萨必须强大起来，并且就像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度在轻浮善变的法国人中缔造了一个战斗的强国一样，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袖，最后，在这个领袖实行的政策中，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这是马基雅弗利一生事业所得到的教训。他在1512年被免职后，决心通过《君主论》告诉意大利怎样才能强大起来，怎样才能在一个充满战争、权术和危机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一再重述这些教训。虽然他希望意大利成为文化统一体的观点是理想主义的，他希望意大利成为一个可以治理和可以防御的整体的观点则是现实主义的。他希望看到的统一的意大利，以托斯卡纳和罗马涅为基地，抵抗力量将集中在这里以防止进一步的分裂。在这里，如果有一个君主能以大功垂成的切萨雷为榜样，坚决准备战争，并牢记当今那些寡廉鲜耻的政府所提供的教训，他就可以挽救意大利的崩溃。他后来忠告年轻的外交家拉法埃洛·吉罗拉米说：要光明正大，直言不讳，如果你做不到，也要掩饰你的谎言，至少也要准备好进行花言巧语的辩解。同样，君主不可因为保持自己的荣誉感而牺牲自己的国家，也不可因为遵守一项无人遵守的规约而接受“无用先生”这样的蔑称。

不仅仅是小国由于弱小而被迫进行谈判。在14世纪时即已捉襟见肘的战争耗费，如今又随着军队的装备和结构的变化而陡然上升，以致任何强国都不能经常拥有诸如足够数量的大炮和支付雇佣兵薪饷的现金。一再利用讹诈和智谋来弥补将威胁或诺言付诸实现的能力之不足。结果就夸大在谈判中人的作用，即一方对对方施加影响或引对方上圈套的能力。圭恰迪尼在他的《札记》中说：

在派遣使节与外国宫廷进行交涉时，有些君主会坦率地向使节们说出内心的想法和他们的谈判将要达到的目的。而另一些君主则认为较稳妥的办法是只告诉他们企图说服外国君主做什么事，他们认为，使臣是与外国君主办交涉的工具和代理人，若不能先骗过使臣，也就很难骗过那位君主。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各有其好处。

但是应该注意，不要受意大利著作家们这种很有说服力的文笔的影响，而将文艺复兴时期外交的这种微妙做法或现实主义加以夸大。

相信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或召开宗教大会的作用，这些可用来象征保守的观点还继续存在，同时在方法上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仍然相信，能够带来戏剧性变化的个人干预可以有效地代替专家们旷日持久的谈判，雄辩可以代替常识，贿赂可以收买敌方的代理人，而敌人的金钱却不起作用。从许多方面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是迟钝的和不合理的。不要忘记，在圭恰迪尼和天主教徒费迪南德^[12]的时代，天真的行为还起着作用。

圭恰迪尼认为意大利战争的最初30年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他在另一条《札记》中写道：

在1494年以前，战争是旷日持久的，战斗是不流血的，围攻城镇所遵循的方法，行动缓慢而变化不定；尽管大炮已经在使用，但操作者缺乏技术，杀伤力很小。因此要推翻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颇为不易。但是法国人在侵犯意大利的时候给我们的战争注入了许多新生的东西，结果迄至1521年为止，旷野一旦丧失，国家也随之陷落。

1521年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指挥米兰保卫战，象征着防御重新对进攻占据了优势的一个转折点。这种重新恢复的优势的确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役的整个性质，使战役的进度减慢；强调战略和政治行动，而降低了战术、单纯的技术和勇敢这些因素的地位；要求在一次战役中获胜，而不要求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并且提出了补充兵员和给养等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法国军队在米兰没有取得突出的战绩的话，同年，土耳其人则连连攻克了防守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道路的许多堡垒。总之，这是一个旧式的东西和先进的东西并存的时期，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

有些城市已经学会了利用棱堡和低而厚实的围墙；但其他城市则仍然保留着城市引以为荣的塔楼和高而薄的幕墙。弩和火绳枪同时并用；火炮虽被用于战斗，但很少得到恰当的利用；面对着火器和野战

工事的使用，战术正在改变，但有时仍由于盲目自信而忘却了经验；手执新式武器的沉着而老练的职业军队，与神经紧张的、由国家以廉价的、往往是陈旧武器装备起来的外行并肩作战；冷静而科学的作战准备仍有可能由于骑士式的冒险行为而遭到破坏。

变化的步子很迅速，因为战争差不多连续不断；变化的影响也广泛传播，因为牵连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虽然出版了许多军事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变化完全不应归功于空谈理论的作家们，而是时势逼迫一些聪明的指挥官如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和佩斯卡拉侯爵等促成的。大部分书籍只不过重复了古典军事理论家如韦格提乌斯和弗朗蒂努斯^[13]等人的教程。内容包括详细的技术见解的著作，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或弗朗切斯科·迪·乔治关于防御工事的著作，仍然还是手稿。固然，从1472年罗伯托斯·瓦尔托里厄斯的《论军事》在维罗纳出版之时起，这类书籍附有新武器的插图，但这些插图所根据的往往是对古典围城器械的错误描绘，与战场上的实际战事没有多少联系。此外，直到1528年问世的巴蒂斯塔·德拉·瓦莱的《统帅简明手册》，才在根据古典著作所描绘的军队队形图中加上了大炮。

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来论述战争的卓越范例是昂特拉格城主罗贝尔·德·巴尔萨克的《论君主与战争》。该书出版于1502年，反映了在路易十一进行的阿尔马尼亚克战役和布列塔尼战役以及查理八世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中，作者亲身的军事经验。该书的第一部分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因此不值一读；但第二部分则直率地提出一个君主怎样才能战争中取得胜利。它充分地论述了炮兵的作用，详细描述了攻城作业，着重说明了轻型炮和手枪的用途。他建议君主在必要时毫不留情地实行焦土政策，并提出在战前和战时都应利用间谍。他强调军队灵活性的重要意义：对敌人不能同样对待，必须研究他们各自的特点，君主必须有针对性地部署自己的力量。他详细论述了纪律涣散和放纵军队劫掠的危险性，提出要故意散布鼓舞人心的谣言以振奋士气。他一面提出要恪守条约，但又警告说君主绝不可指望他人诚实，尤其在休战期间。最后他提出一个在古典军事著作中未曾提出的论点：“最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提供战争所需要的一切。”

此后大约30年间，由于谨慎比勇敢更受到赞赏，由于大规模使用了发射武器，骑兵也变得同古代的骑兵相似，罗马战争和当代战争的真正相似之处才更充分地显示了出来。但是在一个问题上，罗马人的主张和当代人已经是一致的，那就是纪律。由于缺乏纪律，一次又一次地使胜利化为泡影。科明在回顾查理八世向那不勒斯进军时出乎意料的胜利，以及这支军队曾多次濒于瓦解的情况时，得出结论说：

“必须承认，是万能的上帝左右了局势”。困难是双重的。雇佣军队不可靠：他们只为金钱而战，没有钱他们就拒绝服从命令，或者散伙。因紧急状态而应召入伍的本国军队比较容易控制，但他们缺乏职业军队的训练和耐力，在战斗中动辄惊慌失措。不单为了金钱而且也为了自己祖国而战的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为数甚少。君主有贴身警卫，主要的堡垒有驻军防守，军需和炮兵一类的兵种的人员也经常保持着；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依靠的还是本国的应征士兵、志愿兵和雇佣兵。骑兵的补充不是严重问题，贵族们都受过作战教育。但是，在战术上起决定作用的已不再是骑兵，主要问题是要有精良的步兵。

障碍一方面是行政管理上造成的，一方面是人的气质造成的。在不用兵的时候要拨出一大笔钱财来养活大批军队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没有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来充当新部队的骨干，以便把这些部队很好地编制、训练和装备起来；以军事生涯的优点来打动人们也着实不易。不论是城市的资产者或富裕的农民都不愿放弃他们小康但有保障的生活，而去选择死亡或掠夺来的财富，就像法国和德意志几次试图召募国家军队时所一再遇到的情形一样。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曾哀叹贸易和奢侈有使人衰弱的作用，这种哀叹最终表现为马基雅弗利对使政治生活分成两个方面——平民和军事——的生活方式的谴责，而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曾经保证了罗马的自由，并导致了罗马的伟大。

马基雅弗利在《论战争艺术》（1521年）中描述了理想的情况：战争不应由雇佣的外国职业兵，而应由公民自己来进行，“以便每个人均可为了争取和平而欣然赴战，任何人都不会为了挑动战争而破坏和平。”但是离开了军人的职业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训练和纪律；他既主张他的模范军队必须彻底忠诚，那么，他也就使他的军队不可能彻底有效能。1506年的佛罗伦萨民兵就体现了他的许多思想，例如，军官们频频从一个司令部调往另一个司令部，以免对个人的忠诚损害对国家的忠诚：设置政治委员会来防止军国主义统治的弊端。一个忠

诚的佛罗伦萨人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为佛罗伦萨安排得最好的事情”，但是1512年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时民兵在普拉托的溃败，说明没有经过很好训练的军队是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的。比最高水准低得很多的步兵毫无用处，而最好的步兵——德意志和瑞士的长枪手、西班牙的和职业的意大利的火绳枪手——之所以具有效能，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战争。西班牙和瑞士是当时仅有的产生既为本国效劳又是职业性的步兵的西欧国家。马克西米连起先是招募一支民兵，而在此举失败之后，又设法把海盗式的德意志雇佣兵的力量引上正轨，通过树立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来提高他们的士气。就像宗教对胡斯运动派成员、爱国主义对瑞士人所曾起过的作用那样，皇帝的理想将会对这些雇佣兵起作用。但是，无论是普通士兵也能得到擢升的新军阶的魅力也好，还是对之进行鼓吹的人们的努力也好，都不能动摇军队的信念：他们效忠的是自己选定的军官，而不是任何比按时关饷更重要的高尚情操的抽象概念。在战术方面，德意志雇佣兵改进到能够与瑞士雇佣兵相匹敌，但是他们在和平时期仍是令自己的国家害怕的一支力量，在战争时期准备替帝国的敌人打仗；而有时，如像1527年的“罗马大洗劫”那样，则表明马克西米连想以某种更高尚的东西代替他们那种狭隘的集团精神的种种尝试完全是徒劳无功。

在西欧强国中，法国拥有最大的常备军，但是除了炮兵以外，全部都由骑兵组成，包括国王的近卫队和精骑兵团：近卫队经常在役，精骑兵团则轮流担任卫戍任务，然后长期休假。在战时，可发布动员令和征召诏书，征集应对采邑服军役的佃农，组成素质参差不齐的骑兵，但名目繁多的免役规定，加之志愿从军的人又宁愿在精骑兵团中正式服役，就使这种征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法国没有正规的步兵。虽然还可能存在着弓箭手，但是他们在根盖特战役（1479年）中的拙劣表现证明他们并不可靠，国王于是依赖由一些持国王委任书的军官在有合适的人自愿参军的地方，特别是加斯科涅和皮卡迪招募的团帮。路易十二遇到了1509年瑞士人的背信弃义，设法组织一支本国的步兵，并在1513年恢复自由弓箭手，但也和在德意志一样，只有那些最无希望成才的人才肯去当兵，管理问题困难重重。在这个时期的其余时间，法国依靠外国雇佣兵，在可能利用瑞士人时利用瑞士人，在不可能利用瑞士人时利用德意志的雇佣兵。

在炮兵方面，法国没有一个须认真对待的对手。法国国王不惜耗费巨资进口金属和技术人员，1495年部队退却时冒着重大危险把他们的野战炮和攻城炮安全地撤过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法国国王对这一兵种的特别重视。

在西班牙，虽然军队中唯一的常备部分是一个由2500名重骑兵组成的支队，即老禁卫军，但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正规兵种。适于骑乘的马匹远不及骡子的数目，面对摩尔人的攻城战和小规模战斗中发展起来的不是重骑兵，而是轻骑兵；不是野战炮，而是攻城炮。有一支后备步兵，城镇民兵是其中最有用的部分，虽然事实证明这些民兵不适于长时期在国外作战，但是意大利战争很快却吸引了一批自愿兵，而且有现成的人员；不出一个世代，人们就发现卡斯蒂利亚能吃苦耐劳的贫穷的高原居民甚至比瑞士人还优越。事实上，由于伟大的将领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善于适应各种形势的天才，他使一部分军队仿效瑞士的长枪手，另一部分仿效意大利的火绳枪手，并借鉴意大利利用野战工事消耗敌人攻势然后组织还击，击敌要害的办法，所以到1503年他在切里尼奥拉战胜法军时，西班牙军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瑞士各州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尽管出租雇佣兵有利可图，但瑞士本身既无常备兵亦无民兵。公民自备武器，由当地军官指挥并打着当地的旗帜自愿进行训练，但随时可以开拔的也只有这些人。当议会决定招募军队时，有关各州确定前去的人数——该国的农业经济可以放心地留给老年人和妇女——并招募志愿参军的人。队伍一经组成，兵士就选出自己的指挥官。这种制度有两个严重缺点。自愿训练的规定虽属健全，但不久即成为陈规旧套；瑞士的战术原封未动，而其他国家早已学会了战而胜之的办法。指挥官的权威受到严格限制，结果他们优柔寡断，有时还引起兵变。但是士兵们健壮的体魄，他们的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却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在战争开始时所拥有的战术上的优势。

马基雅弗利赞赏并畏惧瑞士人，认为他们是理想的公民兼士兵；他因此而贬低意大利军队，这就妨碍他对意大利军队作出正确的估价。事实上，15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并不是一次不流血的战争，意大利也并非毁于继承上述传统，在战斗中纯粹为了私利而背信弃义，拥兵不前的那些不负责任的雇佣兵首领。固然，已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的一些主要的雇佣兵帮伙，早已解甲归田，以致在这些地方严

重短缺有经验的士兵。但米兰和威尼斯这两个国家，由于有定居于它们境内的前雇佣兵首领的帮伙，这时已成为常备军的中心。除此以外，米兰还有从国家封给采邑或与公爵有亲属关系的军官们那里招雇的军队。威尼斯在纯粹做买卖的基础上雇佣了一批骑兵和重步兵，因为它不想再培植起新的军人世家，但它还拥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农村民兵。从以上两种情况看，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还不是靠现钱来维系的。在几乎完全依靠雇佣兵的国家，如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指挥官们也往往与统治家族有关系，或受过统治家族的分封；例如，那不勒斯国王曾和威尼斯一样，因害怕武装自己的贵族，而把采邑分封给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意大利的弱点并不在于它依赖雇佣兵，也不在于它进行的战争更像是在棋盘上对弈，而不像是在屠场上砍杀；意大利军队1487年在克雷沃拉角战役中就已经证明他们能打败瑞士人，他们的大炮的质量也不像一些刻薄的意大利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大大劣于法国的大炮（意大利人曾是法国炮兵的教官）；意大利的弱点在于不团结，在于指挥分散，在于过分依赖政治行动——正如在福尔诺沃战役中的遭遇所表明的那样。

马基雅弗利认为利用雇佣兵是道义上软弱和政治上愚蠢的表现，这种见解毕竟很容易将人引入歧途。自从百年战争末期的一些战役、胡斯战争，以及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冲突以来，事实显然表明：军队必须各兵种协同作战，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培植所有兵种。例如，英国是最统一的国家，统治者也并非不明智，但亦不得不依靠外国人替它打仗。英国的马匹太矮太弱，支持不了人和马的铠甲，因此雇佣勃艮第的骑兵来代替。英国各郡征集的步兵只习惯于使用弓箭和钩戟，必然依靠德意志的长枪手作为步兵的骨干。缺点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实与士气没有多大关系；错误的指挥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一支国家军队对一支由各国的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所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说一个士兵，除了在打防御战之外，是为他的国家而不是为了金钱而战斗，那也不一定正确。然而，虽然西欧国家在设法减少它们对雇佣兵的依赖并发展常备军，但在东方却恰恰相反。在摩尔多瓦，征兵是以土地所有权为根据的，武装反对土耳其人的号召，使地主和佃农在战场上结成一体，保持高度的纪律和昂扬的斗志，人人骑马行军，步行作战，在作战中不分什么阶级，从而更促进了他们的团结。但是在罗马尼亚，自由农民只有把财产权卖给地主才交得起土耳其人强征的赋税，因此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了裂痕。农民们再也无力

购买新式武器，他们不肯替剥削阶级打仗，贵族们也不想武装他们。结果，政府越来越转而依靠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西欧的雇佣兵。

与基督教国家不同，土耳其不仅有一支庞大的、力量均衡的常备军，而且整个国家机器可以立即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军队是从年轻的基督徒俘虏中间征集，他们经过长期的教育训练，誓愿效忠于苏丹和他的信仰。禁卫军（步兵）约1.2万人；西帕希（骑兵）1万至1.2万人，但每人尚须另带马夫2人至6人，总数约达4万至5万人。除西帕希外，在战时还从各采邑征调骑兵，至少在欧洲另征5万人，在亚洲另征3万人，因为册封土地的条件就是该地领主必须在平时维护秩序，在战时应召提供军队。此外还有大批非正规军队，其成员认为他们为信仰而死可以立刻得到幸福，因此可以把他们用来充当炮灰。在人数、训练和忠诚方面，土耳其军队都是无可匹敌的。对基督教世界来说，幸运的是这支军队也有弱点。骑兵的人数之多，这样庞大的一支常备军，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是不会安宁的；每一个苏丹都是靠他们的支持才登上宝座的，他虽然一方面受到他们的崇拜，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因他们要求打仗而深受其害；军队统一由苏丹领导，结果是不能分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东方发动进攻时，必须在西方媾和。例如，1503年波斯人在国王易斯马仪率领下兴兵犯境，土耳其人就不得不和威尼斯讲和。

所有这些军队都有大群的随营人员，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筹办粮秣、做饭、看护伤员、帮助修筑工事，等等；德意志人还专设一种随军车辆押运官来管理他们的事。其他许多平民的生活也和战争息息相关；伙食一般不是由军事当局提供，官兵都要从中间人手里自行购买，这些中间人则随着军队的移动在农村采购农产品。此外还有一种随军商人，他们把缴获的物品换成现钱，希望从中谋利。这些平民可以严重妨碍行军的速度，其数目之多，根据法国军队的随营人数可见其大概：法军进入意大利时随行的约有4万人，在1495年经过长途跋涉的退却后，仍有大约1万名非战斗人员。

这个时期在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筑城术的变化。战场上主要使用长枪，结果便改变了军队的结构；越来越多地使用火器，结果影响了军队的装备，并且渐渐地影响了战术；但是，正如圭恰迪尼阐明的那样：防御再一次显得比进攻重要，这一事实改变了战役的全部性质，从而也改变了战役的财政和外交背景。

15世纪初法国炮兵的成功，暴露出薄而高的城墙的缺点：这种城墙可以抵挡木制攻城武器的俯射，但敌不住大炮的平射火力，尤其是在使用金属炮弹的时候。在1494年突然遇到挑战以前，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有几座法国城堡重新修筑了较厚的城墙，为防御一方的大炮修了炮眼，但其中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圆洞，只有少数几个（例如在布拉耶的哨塔）呈现出朝外作八字形展开的样子。这种式样要到16世纪中叶才习以为常。但是最重大的革新——棱堡，此时还没有使用的迹象。一旦突破缺口的方法（这种方法破坏了幕墙防护工事、堞眼和防卫廊的作用）比云梯攻城的方法更加普遍采用后，城墙太厚会使守城者看不到紧靠脚下的地面动静，这时有效的侧翼火力就成为必要。棱堡是突出在幕墙之外的坚固建筑，高度大致和幕墙相同，有时呈曲线形，一般对战场的一边是一个棱角，内有支援作战的大炮，能从侧翼瞄准任何对幕墙的攻击，火力可达到邻近的棱堡的死角。在此以前曾采用过一些折中办法，把塔楼降低，用土加固，弗朗切斯科·迪·乔治也曾作过各种设计图，但是第一个真正的棱堡似乎是1496年在罗得岛的奥弗涅大道上建成的，该岛曾是土耳其侵略威胁首当其冲的地方。1494年前，意大利的建筑家们没有把角形棱堡的设想当成一回事，当看到防御阵地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在法军手中之后才大吃一惊，迅速地发展了这种设计。但是此后30年中间，重点还是整修旧防御工事，并没有不惜工本地去修筑新的工事。市民们宁可用专门修筑的内部工事来防卫突破口，即挖掘壕沟，而在挖出后扔在内侧的土石上安装大炮防守。这种技术曾在法国证明可用，并于1509年在帕多瓦打败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精锐炮兵。大规模的工程只是到1520年重修维罗纳防御工事之时才开始进行，此后30年内这类工程只有在重要的战略重地才有所见。爆破性地雷在意大利战争的最初10年中得到改进，但到1520年时也已大都有了对付的办法，例如把铃子之类的报警物安放在沿城墙的鼓上；挖掘通气口以排除爆炸的冲击波；或者加深护城壕沟；等等。

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30年，炮兵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到意大利战争结束时，大炮发展到一种定型，此后300年没有重大的变更。到1494年，浪费金钱的实验时期已经过去，在这段时间内试验过一天只能发射几次的带有拧进去的炮尾的巨型炮。埃尔科莱·德·埃斯特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等君主都是热心于炮术的人，马克西米连曾大力宣扬他的著作《白色的国王》和《图尔丹克骑士历险

记》，而亨利八世的兴趣也不亚于他。制造大口径的长炮身大炮公认有许多结构上的困难，人们就不再考虑炮身的大小，而注意搬运的方便和准确性；炮架的改进和炮耳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炮的性能。其实，能在行军中便于跟上部队，在战斗中又可以自由移动的轻型炮，最早是在勃艮第首创并为法国人所利用的。大炮对付砖石建筑十分有效，但对付人时，就不一定有效：在许多次交战中，和发射的炮弹相比，杀伤的比例小得可笑，虽然在拉文纳战役中大炮决定了战争的命运，把西班牙骑兵从他们筑有工事的阵地中轰出来，强行发动进攻，据说是每发炮弹击倒33人之多。由于石弹容易碰碎，所以逐渐普遍使用铁弹来代替。由于大炮这时还没有统一的型号，加农炮和重炮等名词含混不清，君主们或铸工们一时兴之所至，想造什么样的炮就造什么样的炮。弗朗西斯一世继承了17种不同口径的炮，查理五世则继承了50种。这样，军火的供应和运输便成了一项复杂和浪费的任务。

可以随身携带的火器已不再是令人惊讶的珍宝，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发射武器已占主要地位。大弓的有效射程约为250码，每分钟可射出6支箭；弩的杀伤射程是220—250码，如使用方头穿甲箭则是150—200码，每分钟能射出一箭。钢制的军用弓要用辘轳或吊车才能拉开。但是除英国以外，应用得最广的还是弩，因为在对付马匹和甲冑时，重量和命中率比射程和速度更加重要。这种情况有利于火绳枪的使用。它的有效射程，即使在意大利战争结束时还不到400码，但是它的子弹很重，结果使弩在16世纪20年代仅仅在海战和攻城时才使用。由于火绳枪的使用，已不需要一手握枪（枪必须小，但必须很重，因为要用它的重量来抵消后坐力），另一手以火柴轻扣火门；如今射手在开射时可以双手稳住火绳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目标上面，不必分一半神在火柴上。到这个时期末又出现了轮式枪机，这就使火绳枪成为效率还算不错的骑兵武器，而为手枪的发展开阔了路子。枪托用以顶在胸膛或髋部，有时也可顶在肩部，其中最重的几种则用一个支架插在地上，这样便可以发射得相当准确。枪支起初主要用于守护防御工事，但到1512年已使用于野战，在长枪兵的保护下，越过他们头顶射击，不久甚至连这种保护也不要，而成为一种独立武器，提供掩护或杀伤火力。枪支火力对队形的影响比对铠甲的影响要大。为了对付火力，队形必须疏散；铠甲则已经为了对付方镞弩箭而大大加固，至少已能挡住乏弹或流弹。军械工人所遇到的第一个美好时代，也正是铠甲制造者最美好的时代。

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后的30年间，铠甲的式样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革，这是由于把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国的风格融为一体，结果产生了（至少是为有钱的人）精雕细刻的马克西米连式甲冑。有趣的是，在此火药最迅速发展的时期，甲冑的改进不是着眼于保护作用，却是去增加美观和舒适。有些君主，如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不但赞赏甲冑，还收集甲冑。此时比武愈来愈趋复杂，各种不同方式的格斗需要特别坚固或用来替换的甲冑，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有力地给甲冑制造者以推动力。

甲冑和武器制造者的武器，如长矛、长枪、戟、剑等，继续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在切里尼奥拉战役（1503年）中可以看到，进攻一个由火绳枪兵防守的设防阵地是多么的危险。在拉文纳战役（1512年）中，炮兵决定了部分战斗的打法，但并没有决定战斗怎样才能赢得胜利。在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中，炮兵打乱了被骑兵的冲锋截住的步兵纵队，使局势大大改观。在比科卡战役（1522年）和帕维亚战役（1525年）中，胜利是由于使用了大炮尤其是火绳枪而决定的；前一战役用于防御阵地，后一战役用于旷野。然而在这两次战役之前，火药虽已促使战术改变得面目全非，但人们仍未认识到必须认真改进设备使之赶上需要。最危险的威胁依然来自长枪纵队的密集进攻。

瑞士人于1476年在格朗松和莫拉两次战役中击败勃艮第骑兵，曾引起军界人士的普遍瞩目。他们的战法是由大约6000人组成密集方阵，横排85人，正面有100码长，纵列约70排。这种阵法要取得胜利，全靠严明的军纪和严格的操练。不能容许任何力量阻挡方阵的压力或抵抗，直到它或者被杀伤殆尽或者获得胜利为止，不可能有任何人被俘，伤员亦置之不理。骑兵冲向这种方阵，首先遇到的是前四排长枪兵枪尖的钢铁屏障，然后持戟的士兵趁着敌军队形已乱，与之短兵相接，或从侧面把骑兵钩下马来，然后在方阵的中央，挥着大砍刀的士兵可以砍杀仍骑在马上的人，或把已落马的人戳死。如系步兵冲向方阵，首先遇到的是戟兵把长枪枪尖打落在地，然后在正面是一排排长枪，侧翼是刀剑手，方阵的中心和后方则是弩和火绳枪。瑞士人同另一支曾战败过重骑兵的步兵即英国弓箭兵不同，他们是能够进攻的；他们士气很高，所以只穿很少的铠甲，能够迅速进攻，而且秩序井然。他们进攻时前有弓箭和大炮开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然后停止射击，让方阵通过。方阵枪矛如林，除非遭到强大火力大量杀伤，或

因地形凹凸不平而受阻，否则势不可当。在人数允许的情况下，瑞士人用三个方阵组成梯队，以阻挡侧面包抄并保持后备兵力，这种方法在诺瓦拉战役（1513年）获得巨大成功，但那是最后一次。

这些战术不久就被仿效，起初是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和法国人，后来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德意志的雇佣兵最忠实地仿效这种战术，但是训练和领导却逊色，原因之一是充当军官的是那些出最高价买得军阶的人，而不是最干练的军人；直到16世纪20年代，前几排都由惯经沙场的老兵组成，才达到最强的时期。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比较审慎地以瑞士为榜样，他们没有丢掉自己以灵活机动见长的特点，因为瑞士的方法有严重的缺点。方阵是发射武器容易击中的目标，而且甚至在火力武器已经具有实效的时候，还保持着自己密集的队形。方阵不适合恶劣的地形，也不宜于攻坚战。方阵在布阵时行动麻烦，缺乏灵活性，只有在敌人以两军对垒的旧方式作战，以相同的武器攻打相同的武器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意大利的军队比较灵活，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不会因为地势崎岖而受到影响，而且能认真利用野战工事。在长枪与火绳枪系统地结合在一起以前，胜利总是属于比较善于变化的一方。他们可以先进行骚扰和迂回，然后再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意大利人之所以直接被瑞士人的战术和直接被法国人的战略所击败，其过错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们的军队，而在于他们的指挥官和他们的政府。

为对付瑞士式的士兵，使得重步兵和轻步兵日益明显地分开。例如，贡萨洛·德·科尔多瓦一方面加强他的长枪兵的甲冑，一方面越来越多地用枪炮武装他的其他步兵，随着这些步兵更加收到成效，他们愈来愈独立行动。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总的趋向是一方面发展重型突击部队，另一方面发展快速的轻型发射武器部队。

步兵的身价愈来愈高——贡萨洛的长枪兵中包括贵族，而法国的步兵则在1515年马里尼亚诺战役中由法国国王亲自率领——但并不意味着重骑兵已不再是战争中的尊贵者。1509年围攻帕多瓦时，马克西米连曾提议让法国重骑兵放弃坐骑而同步兵一起冲锋，打开缺口。骑士贝亚尔^[14]回答说：“皇帝陛下认为让这么多的贵族和他的步兵一起去冒险是正当而合理的事情吗？这些步兵中，这个是鞋匠，那个是掌蹄的铁匠，那个又是面包匠，以及诸如此类的工匠，他们不像我们这些绅士一样要保持自己的荣誉啊！”另外建议德、法两国重骑兵同

时下马作战，遇到的也是同样的观点。德意志人拒绝的理由是：“他们不是那种步行的人，不是去打开缺口的人，他们真正的地位是作为高贵的人在马背上打仗。”^[15]

这种重骑兵骑着披甲的壮马，手执矛、斧或钉头锤，他们一成不变的战术是四五百骑一起猛打猛冲。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长矛骑兵，包括一名重骑兵和他的扈从，扈从的人数各国不等。在法国，一名重骑兵配备一名随从、侍从和仆人；还有两名弩手，全部骑马，有时一起冲杀。和步兵一样，基本单位中的重装部分，即重骑兵和他的扈从，也有与轻装的骑马弓手相分开的趋势。

轻骑兵在搜索和突袭时的明显作用，更加促成了这种分开的趋势；1509年，阿尼亚德洛战役失败后，威尼斯所雇用的西班牙轻骑兵和巴尔干轻骑兵，以其机动灵活和奋不顾身而担当了防御该共和国的主要任务，他们以其效能完成了这个分离的过程。当时受到重视的是乘快马，戴头盔，披轻甲，手执剑、轻矛或弩的骑兵，此时火绳枪还难以使用。然而，这种轻骑兵虽然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兵种，但和重骑兵比较起来仍是次要的，因为只有重骑兵能够阻挡长枪兵纵队的进攻。这两种骑兵的人数和步兵相比都已相对地减少，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战术上用处越来越小，而是因为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因，他们的补充都有一定的数字，而步兵则可以不断地增加其征集和装备的人数。

就交通、运输和供应来说，船只是军队的必要补充，交战各国的命运都受到它们所能得到的船只数目的影响。当时皇家的船只很少，也没有为创立皇家海军做过多少努力。正如瑞士人和德意志人被用来建立陆军一样，意大利各海上国家被用来建立舰队。因为当时战船和商船的差别甚小，两者都可以用于作战。人们也不认为平底战船和圆头战船的功能根本不同，以致不能同时在北方和南方的海域使用。当时大西洋国家和地中海国家都使用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帆桨船。

查理八世只有21艘皇家船只，有两个因素使得利用商船颇为棘手：一是布列塔尼、吉昂和普罗旺斯各地的海军将领们由于猜忌而自行其是；二是在地中海没有法国本国的航运业，几乎全部贸易都掌握在外国人手。所以，为了侵略意大利，查理八世不得不从热那亚租用船只，虽然他已在土伦着手建造平底战船；路易十二在布雷斯特建

造皇家战舰，弗朗西斯一世开辟了勒尔港口，但法国从来没有离开过雇用的船只及由此引起的政治纠纷。

虽然西班牙同样缺少皇家船舰，而且海盗的危险日益增加，直到17世纪中叶才恢复大规模建造平底战船，但是它在商船方面的境况却好得多。国王根据商船的吨位给予补助，并严禁把可能在战时使用的船只售往国外；同时西班牙对西西里的粮食和对与北非的贸易十分关心，因此它拥有大批可供征用的船只。不过，这些船只一旦被征用之后，组织工作非常草率。船队没有统一指挥，士气低落。船长不配备足够的人员，为的是可以中饱他们所申报的“死魂灵”的薪饷，同时因为他们把搭载货物作为一宗合法的私人买卖，他们宁可多加小心，也不肯冒险丧失货物。

热那亚的舰队也存在同样的弊端。国家与私人签订提供船只由政府服务的合同。船只损坏或沉没均不予赔偿，付费甚低，所以人们千方百计避免同海军舰队作战，而是虏获商船以博得赏金。这些船队也允许军官保留货位；托斯卡纳和罗马教廷的舰队也是一样。在威尼斯，只有那些补充国家船队不足的船只才有这种情形，因为在意大利诸强国中唯独威尼斯才有一支常备舰队。土耳其在1495年拥有约250艘战船，所以来自土耳其的经常威胁使威尼斯必须保持舰队；在1499年的战争中因为战舰太少而吃了大亏之后，威尼斯经常备有一支由70艘到100艘专为作战使用的平底战船组成的舰队。此外威尼斯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它的大多数贵族都有航海经验，它的商船已经武装起来，在军火方面，它拥有欧洲最大的和管理最佳的工场。

亨利七世对和平的贸易比对战争更感兴趣。他在朴茨茅斯建立了船舶修造厂，该厂拥有英国第一个干船坞。除了他从理查三世手中继承下来的3艘战船外，又增添了8艘，但他主要依靠的是商船，对高吨位船只给予补助。他的继承人对航海的个人兴趣，他的推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意愿，来自西班牙和苏格兰的威胁（前者不久便和尼德兰联合；后者在玫瑰战争期间建造了庞大舰队），这种种原因终于使亨利八世的海军的船只增加到85艘：46艘是新造的，26艘是购买的，13艘是缴获的。为了这些船只的需要，在伍尔威奇和德特福新建了船坞，行政管理也集中统一，不像先前那样杂乱无章。例如，海军舰长不再负责管理他们舰上的伙食和装备。但是直到1533年前，除了确系战时而外，这支舰队的船只仍然出租给私商，分散在各地。

从15世纪初起，船上就安装了大炮，而且如同在陆上一样，16世纪初的发展趋势是缩小炮体，以便于搬运，并能较迅速地发射；同时实行口径标准化，以便于供应弹药。旧式的后膛炮仍然保留，因为它重新装炮弹的速度较快；但结构较佳的前装炮愈来愈多地被采用，这种炮装在双轮炮架上，炮架在甲板上的垫木之间来回反弹，可转入舷内重行装弹。法国、苏格兰、威尼斯和土耳其均拥有1000吨以上的战船，土耳其有两艘达1800吨。这些大战船各装有100多门大炮，从船前船后的舷窗以及甲板和船的上层都能开火，但这些大炮的效率不高。低效火药虽然在船上使用安全，但至多只能把一枚中型炮弹射出一英里多，有效命中距离不超过300码；不过它几乎完全用来对付帆缆和人，仅仅作为强行登船部队的一种辅助武器。虽然当时最好的大炮效率和纳尔逊时代的大炮也相差无几，但大炮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时海战的战术目的仍然是登上敌船，而不是用炮火将其击沉。

在16世纪中叶舷侧火力占支配地位以前，战术是简单的，不需要复杂的布阵。圆顶战船进攻时齐头并进，设法占据上风位置，在近距离以重炮开火，然后登船。如果不能占据上风，就开炮制造烟幕，以便重行取得上风之利。两船一旦靠在一起，战斗就纯属陆战性质，虽然还可以放下小艇，以作一般接应，或沿敌船吃水线钻孔。平底战船也是排成一线齐头并进（进攻的方法更刻板，因它们的结构比较单薄，只能沿中心线开火），同时冲向敌船侧翼，以使用自己的撞角破坏对方支桨用的托架。战术并不是海军的专门战术。差不多全部指挥官都是陆军军人，船上士兵对水兵的比例是2：1。信号也和战术同样的简单。舰队司令可在发现敌情、登船举行会商、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时发出信号，但战斗一经打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从此刻起，舰队司令对这场混战就再也无法控制了。

虽然战争的特点在改变，变得更加需要精密策划，更加专业化，但是骑士作风仍起一定作用。在百年战争之后，一些著作家如让·德·比埃尔在《青春》中力图表明：真正的骑士作风已不再是在骑马比武和在自己的事业中与个人有关；而是在军事服役中与个人有关的事。鲁莽行为必须让位给纪律，但个人仍能显示他的勇气和忠诚。虽然骑士作风的“条律”从来不适用于贵族阶级以外的人，但正如贝亚尔的传记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步兵的使用日益增多，仍然使英雄人物，即对强暴者嫉恶如仇，对卑微者豪侠仗义，对贫困者慷慨仁慈的

人大有用武之地。在实际战斗中冲锋陷阵之时，根本没有考虑讲求公平比赛的理想的余地；战场上的骑士作风很少能反映出书本上的骑士作风。即使如此，骑士的习俗仍然常常打乱科学的作战计划，胜过战术和战略上的考虑。准备两军对阵的复杂部署仍然会因为要求进行两人的决斗而被放弃，例如加斯东·德·弗瓦在拉文纳战役前向西班牙总督提出的挑战。重要的战俘可以因为一时出现的高尚念头而释放，例如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不索取赎金就释放了贝亚尔。海陆军指挥官理应身先士卒，结果是进攻一开始他们就不能控制局面。由于个人争夺头功的荣誉，一次稳操胜券的进攻，结果反而很可能受到破坏。草率的建议仍有可能妨害审慎从事，大胆蛮干会胜过足智多谋，例如1494年拉巴洛的守卫者因不屑于固守自己的工事而遭到了惨败。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仍有可能胜过政策考虑，例如在福尔诺沃战役中，法国军队越过亚平宁山脉后得到休整的机会；又如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弗朗西斯一世竟让瑞士败军逃走而不去追击。玩弄诡计和策略也不能说明骑士作风已寿终正寝。至少从14世纪起，什么是正当的计策，什么是不正当的计策已经有所区别。例如，一支军队可以伪装、伏击，让太阳光炫惑敌人的眼睛，但不应破坏停战协议和条约。但是，如何决定什么是可以容许的计谋呢？16世纪初，人们强调迅速结束战争是好人的目的，这种观点不久导致一位法国指挥官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主张任何有利于对付敌人的办法都是好的，就我来说（请上帝饶恕我），如果我能够召唤地狱里所有的魔鬼把敌人打得脑浆迸流，我也会心甘情愿去做，要不然敌人就会把我打得脑浆迸流。”^[16]

火药的使用是欧洲对战争的态度的一個考驗。只是到这个时期，大炮的杀伤力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到，在此以前，大炮比中世纪攻城器械中的投石机和弩炮的效能强不了多少。那时大炮也主要是用于攻打防御工事，只是到了这时，加农炮在野战战场上的致命效果才为人们所认识。文艺复兴的欧洲实际上遇到的是一种新武器，一种空前残忍和具有空前破坏性的武器。人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它提出了指责，攻击它不合基督教的教义，谩骂它使卑鄙者和懦怯者得以从远处击倒高贵者和无畏者。火药的使用违背了教会的教义，违背了大多数有势力的人所赞同的社会规约。尽管如此，大炮依然存在，实际上在抗议之声最强烈的时期，成为更加毁灭性的武器；而即使在抗议声中，也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为之开脱、辩护和赞美的声音。这种新武器也和其他新武器一样被人们接受了下来，因为它迎合了人类的发明创

造力量，人类对军事效能的赞赏以及人类的民族自尊心。是否拥有大型的、新式的和强有力的大炮，成为国家的威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空想出发而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敌不过这个正中要害的论点：大炮帮助统治者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唯一的一个宁愿拒绝最高限度地利用火器，从而使本国军事效率受到损害的国家，是一个非基督教国家。麦木鲁克人把骑兵奉为最优等的人，这种理想使它规定枪支仅限于专门招募来的黑奴部队使用（至少是直到枪支便于在马背上使用之前一直是这样），这种限制使麦木鲁克王国在同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

在南方，教皇和世俗君主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似乎都对战争使道德败坏的影响表示认可，但北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则坚决表示反对。莫尔的乌托邦主义者对征服精神、战争的光荣均嗤之以鼻。伊拉斯谟一再写到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写到战争的浪费和残酷。他的《箴言集》每条大都只占印张上一栏的一部分，他对“未经历过的甜蜜战争”这个痛苦的题目的诠释，却在1520年时铺叙而为一篇长文。他和莫尔都谴责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常规外交，谴责每个联盟、每次联姻和每次互派使臣都加深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分歧，每个条约的本身都可以作为宣战的新理由。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约塞·克利克托夫也持这种观点，他在1523年的《论战争与和平》中宣称自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我只承认基督教徒这个名字”。

但是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战争并不能够靠诉诸基督徒的责任而受到节制。控制战争（就战争能够受到控制这一点而论）是由法学家们努力把战争的惯例编成法典，接受国家主权观念，不是诉诸神的法律而是诉诸国际法才逐步地做到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越轨行为本身引出了矫正的办法。战争的某些方面迫切需要加以节制：报复行为、私掠行为、中立国的权利和战俘的地位。

对战俘仍然是任意地加以对待，取决于抓获俘虏的人本人或他们的指挥官一时兴之所至。俘虏不是君主的财产，而是俘获他的那个人的财产（虽然英国的陆军法规规定必须把从战俘身上获得的利益的1/3上缴作为战争经费）；如果俘虏是一个军阶很高的人，那么俘获他的人可以把他卖给一个中间人，中间人可以处于较有利的地位来勒索一笔相当的赎金。瑞士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向不收留战俘；意大利战争

突如其来地改变了该半岛仁慈的习惯，战俘受到监禁，被强制劳动，有时还被严刑拷打和被弄瞎眼睛。一般对正式投降的城市不予加害，对明显被打败的敌人予以宽恕，但这种命令往往得不到遵行，而当时在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中处罚违抗这种命令的人，不但从政治上讲不切合实际，而且从法律上讲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洗劫掠夺，在平民中间造成了严重破坏，而除非是军饷得到提高、给养得到改善、纪律得到整饬，否则无法制止。从14世纪晚期开始，偶尔也有人试图禁止抢劫，以便安抚平民百姓，并防止军队取得一次未必就是最后的胜利之后瓦解，但生效的只有关于禁止抢劫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战争物资，主要是枪炮弹药的命令。

西班牙在新世界进行征服活动的残酷进程，最尖锐地提出了“正义战争”这个有关道义的问题。这时人们根据上述这些实际问题对此进行了讨论，其结果是，中世纪国际关系中日益过时的各种法令，即根据在战时何事可做何事不可做的骑士准则，根据对民法的研究，以及根据教会法规中规定的基督教道德不断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融汇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套东西——渐渐地被一套国际法取而代之。

[1] 《布莱兹·蒙吕克将军评论集》，查尔斯·科顿英译，伦敦，1674年，第4页。

[2] 《战争的轴心》，G. W. 库普兰编，利物浦联合出版社，1949年，问题48。

[3] 法国西南部相当于今纪龙德、多尔涅、洛特、洛特—加龙、阿韦龙各省的地区。——译者

[4] 即《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译者

[5] 旧时北欧和英国等国，每年圣彼得日每户教徒向罗马教皇交纳一便士献金，称彼得便士。——译者

[6] 中世纪的教会在某些时期内规定的休战。——译者

[7] 《出使亨利八世宫廷的四年——威尼斯使节塞巴斯蒂安·朱斯蒂尼亚安呈文辑录》，布朗编，伦敦，1854年，第2卷，第57页。

[8] 奥斯曼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称呼。——译者

[9] 教皇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赠给信奉天主教的君主或都市的袂邪物。——译者

[10] 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于1356年普瓦蒂埃战役中被英国俘虏，1360年根据布雷蒂尼和约，用赎金和人质作为交换获释。后人质之一逃跑，约翰为挽回荣誉，重返英国为囚。——译者

[11] 关于金钱问题的谈话。

[12] 曾任阿拉贡国王、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的费迪南德二世的绰号。——译者

[13] 二人均为古罗马军事著作家。——译者

[14] 法国著名骑士，被称为“无畏无瑕的骑士”，在意大利战争中战功卓著。——译者

[15] 《忠实的仆从编辑的贝亚尔传》，L. 拉切译，伦敦，1883年，第196—197页。

[16] 前引《蒙克将军评论集》，第33页。

第十章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下的法国

15世纪末年，法国在一个风云迭变的世界里，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法国政府采取调整政策的必要措施，还将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百年战争的结局保证了法国的民族独立，这次战争也使它摆脱了由于佛兰德—勃艮第国家的存在而产生的威胁。战后，在路易十一统治时期部分重建起来的法兰西王国，必须在纷纷新建的国家中间确定它的政策方针，在国家的职能尚未十分明确之际使国家步入正轨，对由于天主教大分裂的冲击而仍在动荡不安的教会授予一定的地位，并使社会各阶级命运所系的经济恢复繁荣。

路易十一的政治错误由于偶而表现出的活动能力和几乎是奇迹一般的机遇而得到补救。继承路易十一的是一些智力平庸的国王，他们的事业心为愚蠢的野心所驱使，他们必然要被他们最精明的敌手所制服。除了极少的例外，法国的朝廷中，竟没有一个政治家能把政府的大权掌握在手中。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由于路易十一所犯的错误而陷于险境的法国政策，将进入一个今后许多年内影响欧洲未来的新方向。

在查理八世即位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国王在法律上说已经成年，其实政府仍掌握在他姐姐和姐夫皮埃尔·德·博热手里。安妮的性格在有些方面很像她父亲。她处理国家大事既认真又勤奋，她父亲曾说她是“世界上最不愚笨的女人”。这些年头正是贵族和百姓都骚动不安的时期，她的有力的和有远见的指导对法国政府起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些美德被她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之心所抵消，她的无止境的贪欲和经常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后来使她的波旁—博热家族和她任军事长官的女婿同和法兰西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查理八世在耐心忍受7年保护之后，现在就要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如果我们依据他同时代人几乎一致的评价来对查理八世作出判断，那么他仅有庸碌之才，不堪担负他的使命。孔塔里尼说：“无论

在身体或思想方面，他都不具备巨大的价值”；科明证实了这种意见，把他描写为“非常年轻、软弱、任性，很少与聪明人为伍”，又说：“他既无金钱，又无理智”。他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根本不懂拉丁文。他唯一欣赏的是“道德的和历史的”著作，尤其喜好能刺激他想象力的骑士侠义传奇。他能勉强在信件上签字，不能亲自写信。他对政府事务不感兴趣，把国事交给没有多大能力的顾问们去办，这些人甚至不去劝阻他从事那些最轻率的冒险。然而他的意图还是善良的，他迫切地想要“遵照上帝的十诫过善良的生活，把教会和司法办得井然有序”。他当真在出征意大利回来后想要着手这项任务，可是这时候死亡却结束了某些人曾预见其光辉结局的他的统治时期。

查理八世几个不成才的孩子都命中注定早夭，继位的是他的堂弟奥尔良公爵路易，他在国王敌人的营垒里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青年时期，随着年龄渐长继位的可能日益增大，人也随之变得聪明起来。他也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他的头部很小，“没有地方装下很多的脑髓”；但是他以某种尚武的英俊气派吸引住了当时的人，他也能说出一些显示他仁义和聪明的言论来为他的歌颂者提供材料。他安定人心的办法是表示自己关心经济，同情普通百姓，执法公正不阿，和“先知摩西一般”圣明。这一切都能骗过那些对他非常钦佩的朝臣，1506年议会中尊称他为“人民之父”的显要人物，以及那些替他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不到事实真相：路易十二是一个傲慢专横的国王，他从事耗资巨大的冒险事业，在发动时又毫无远见，其结果导致灾难。此外，他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为他效忠卖命。他的王后们也没有帮助他赢得声誉。他第一次结婚是和路易十一之女法兰西的让娜，王后很不得宠，终于离婚；由于一个道德败坏又声名狼藉的教皇参与了这件事，由此而引起的丑闻更是不脛而走。他第二次娶的是布列塔尼的安妮，结果使这位查理八世的遗孀重新恢复了王位。她在执政初期避免出头露面，但后来渐渐胆大，干预政事，竭力扩充她在布列塔尼的利益，从而损害了王国的利益。除了才能平庸的少数几名宠臣以外，掌握朝政的是鲁昂大主教乔治·昂布瓦兹，他是红衣主教兼教皇使节。一连10年他拥有几乎相当于君主的权力，左右对意大利的政策，向法国教会发号施令，并希望将其改组，纳入国教的范畴。“他乃是真正的法国国王”，当时有一个人这样说；但是他也是一个首先要实现自己野心的国王。

尽管这两个国王的统治时期都缺乏天才人物，也没有垂之后世的功勋业绩，却都留下了一些好的印象，因为贵族们完成了一些光荣的使命，人民得以在前一个世纪的天灾人祸之后休养生息。没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饥荒，没有广为蔓延的致命的时疫；农业和贸易繁荣昌盛。在两个贫穷时期的中间，这些情况足以造成良好的舆论。和意大利的交往以及法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使学者们的热情昂扬到了顶点，自此以后他们对这个时期的观点便压倒了一切。

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和罗马教廷已不再是无所不至的势力，因此法国的国家首脑必须在形势改变了的欧洲决定他们的政策。路易十一曾长期受到属下的王公们的威胁，尤其是其中最强大的勃艮第公爵；他在1477年对他们占了上风，1482年阿拉斯条约使他取得了勃艮第世袭领地的大部分。但是角逐者还不乏其人，由于哈布斯堡王室的马克西米连和大胆的查理的继承人、勃艮第的玛丽结婚，法国的政治问题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便搅到一起了。如今一旦没有了亟欲把自己的“君主国”强加于基督教世界的皇帝，邻近各国的首脑就可能来干涉法国的封建领地，从而威胁法兰西王国的领土完整。有两个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关于勃艮第各省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布列塔尼的问题。在这个紧要关头，马克西米连和英国国王可能出面对两个问题都进行干预。

阿拉斯条约暂时解决了勃艮第继承权问题和那些不可靠的省份的命运，这些省份打算既不投靠德意志帝国也不依附法国而设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的经济活动不断发展，遂使它们成为邻近各国垂涎的对象。法国取得了阿图瓦、弗朗歇-孔泰、查罗莱和奥塞尔州，这些地方都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陪嫁地，她当时只有两岁，以后将嫁给查理八世。这种媾和的条件极不稳定，所根据的是一件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事实，它并不能终止各方面对这些省份的领土要求。

查理八世执政之初，布列塔尼曾是最主要的问题。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艰苦年代过后，贵族反对政府的危险便日益暴露，他们在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二世周围纠合为一个集团。弗朗西斯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因为各个阶级都同样遭到恶遇，心怀不满。王公们还依靠他们自己与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以及英国国王理查三世结盟，这两位国王都决心和法国国王较量一番。这个威胁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弗朗西斯二世年迈无子，他的省份的命运将取决于他的长女安妮的婚事。

法国国王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以免敌对的强国在这个公国中占据地位；因为布列塔尼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对于目前正注视着斯凯尔特河和默兹河地区的法国部队的后方是一种威胁。第一个联合行动——“疯狂的战争”——失败之后，1487—1488年又发生新的叛乱，马克西米连和英国国王均派部队支援。法国国王的军队在圣奥班迪科米埃一战得胜（1488年），结束了这次叛乱。萨布勒条约的解决办法使法兰西王国深感满意，外国军队一律自布列塔尼撤退，非经法王同意，安妮不得结婚。由于公爵弗朗西斯二世去世，12岁的安妮继承了爵位，她结婚的可能性这时更大了一些。媾和条件看来似乎具有永久性，但是由于布列塔尼贵族的阻挠，以及那些想要和这位女公爵结婚的王公们的干扰，只得再度推迟进行。求婚的胜利者是马克西米连，虽然只是由代理人参加婚礼，他们却成婚了。结果引起一场非常严重的国际纠纷，几乎危及法兰西王国的独立（1490年）。正是这个问题又导致一场新的冲突。这一次是查理八世本人想要娶得布列塔尼的安妮，他决心以武力来夺取。法国胜利的结果是订立了拉瓦尔条约：安妮同意嫁给这位新的求婚者，但他必须保证尊重布列塔尼的自治。

法国在克服了勃艮第方面来的危险之后，又摆脱了布列塔尼的威胁，同时，封建贵族们群龙无首，已经不足为惧。在国外，尽管马克西米连皇帝还口口声声要求勃艮第的继承权，但已经无力再启争端；英国国王亨利七世虽还在要求法国的王位，似乎也不能重新开始中断已达40年之久的敌对行动。法国已无任何近忧，法国的政策正经历着罕见的均衡时期，它既不需要被迫表态，也不需要应付任何敌人。但是这也为各种异想天开的事业扫清了道路，而国王和他的顾问们的想象力正诱使他们投身于这些事业。

正在这个时候，查理八世陶醉在他的骑士气概的狂热之中，进行了那不勒斯远征。他企图恢复安茹大公对两西西里王国的权力。这些权力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根据的是一次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占领，而这次占领从来是不稳定的。但是他是应意大利方面即米兰大公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别号摩尔人）的恳求才做此行的。这位国王的视界超越了那不勒斯，幻想征服耶路撒冷，实现十字军东征和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基督教的帝国；罗马皇帝的头衔已不复存在，它不再是角逐的目标了。这些不着边际的冒险计划，或如科明所说的“意大利的荣耀和虚荣”，将在半个多世纪之内使法国的政策脱离实际，耗尽法国的力量

和财富，结果除了使它沦为意大利各国政府的马前卒之外，一无所得。但是，我们不能光是谴责这项政策，而不考虑到把法国引向这个新方向的一些实际的利益。在新世界的吸引力被人们感觉到以前，对东方的贸易、在地中海沿岸占领的战略据点、法兰西王国兼并普罗旺斯后使用该地区的港口，这一切都值得引起政治家的注意，鼓励他们想方设法在地中海盆地建立强大的地位。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至今一直没有获得这种有利地位的那些国家，竟会发现还有别的贸易路线可以畅通无阻，还有其他的富源可以唾手而得。

那不勒斯远征从一开始就使法国蒙受牺牲，耗尽了它近年来得到的一切收获。查理八世亲自创议，付出巨额赔偿，向英国买得了一项永久和平的诺言（埃塔普勒条约）；更妙的是，他把鲁西荣和塞尔当归还给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巴塞罗那条约），把弗朗歇—孔泰、阿图瓦和查罗莱归还给马克西米连，同时因为拟议中的婚事不能实现，把马克西米连的女儿也交还给他（森里斯条约）。法国无偿地让出了它从勃艮第继承权中所得的大部利益，结果它的东北边界在两个世纪之内濒于危险境地。做出这些安排之后，查理八世便能够麾师远征那不勒斯了。但这次出征十分短促，因为他不久便被意大利各国联合起来赶走，幸而福尔诺沃一战未分胜负，才得以逃回。

但是，这次征伐的后果却不是短暂的：对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命运密切关心的列强结成了一个反法联盟；对查理八世出征的回答是菲利普大公与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西班牙的胡安娜结婚（1495年）。这样一来，作为对查理八世的回敬，哈布斯堡王室和西班牙王室之间的结合正在酝酿，同时形成日后查理五世所拥有的广大无比的权力，这将成为对法国生存的一种威胁。查理八世并不因为这些挫折和前景而感到气馁，他正在策划再度出征以确保意大利，但是却死于1498年。

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二也并不比他更有远见，路易十二也投身于类似的甚至野心更大的冒险，因为他作为维斯孔蒂家族的后裔提出了对米兰领土的要求。半个世纪以来，米兰公国始终是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激烈抗衡的原因，在一连串毫无结果的战争和谈判之间先后易手。法国的野心还超越米兰，指向西班牙也想染指的那不勒斯；但是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他的继承人如今是地中海西半部的主人，相形之下法国在地理上的遥远和海上军事力量的薄弱，使它在那

不勒斯比在其他地方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法国并不理解大大提高海军实力是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实行扩张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法国的野心甚至引起了罗马教廷政府的不安。虽然路易十二曾通过把他的部队交给切萨雷·博尔贾调遣，得以和亚历山大六世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这时他所要对付的是一个更难驾驭得多的对手朱理亚二世，朱理亚二世对任何限制他独立的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路易十二为了表示他的顺从，曾参加了旨在反对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现在他看到一个新的反对他的同盟正在形成，这个同盟此次的目的是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1512年）。由于宗教争论，由于教会自立主义和改革教会的计划，形势更趋复杂。加斯东·德·弗瓦的军事才能和拉文纳大捷都没有产生预期的决定性效果。到1512年末，法国统治的痕迹便已完全消失了，米兰又一次回到了斯福尔扎家族手中。1513年，法国又一次试图征服意大利，结果在诺瓦拉败北，而此时王国本身却遇到了来自各方的侵犯。英国的亨利七世攻打北部边境，从而表明英国的野心死灰复燃；就这一点来说，百年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瑞士人长驱直入，进抵第戎，他们的撤退使法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教皇以褫夺教权令威胁法国，法国不得不对敌人的要求作出让步。路易十二去世后，新政府应该采取的明智的政策就是竭力缩小以前轻率发动的各场战争所引起的后果。

在这一时期，西欧每个国家都扩大了政治活动的范围，并改组了国家机构，这个过程在法国的特点就是它的机构改革，这种改革为近代君主国家政府的建立做好了准备。从这种观点来看，15世纪后半叶成绩卓著。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封建君主国家里，权力建立在个人关系和履行封建义务上面，国王权力的大小在各省有所不同，而在大封建贵族的领地上就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由于百年战争这场浩劫的后果，由于在一段无政府状态之后恢复正常的需要，就要以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业来代替上述的安排。军队、财政和司法都必须在枢密院的最高权威领导下，并在一群对君主忠心耿耿的法律专家的手中，进行初步的组织工作。当然，这些机构都不是按照非常明确的原则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成立起来的。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都没有很大的治国才能，在他们的朝廷中巧取豪夺的权贵很多，政治家却很少。

纵然如此，在他们的统治时期显然实施了一些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综合起来，预示了一个新制度的出现。

此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看作是君主制度本身的变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全国三级会议经常开会，成为王国必不可少的机构：三级会议被认为有权批准税收，提名枢密院的成员，而且在国王未成年时，还有权提名摄政的人选。政府有的时候看来正向着以英国为榜样的议会制度演进。1484年召开的为查理八世组织政府的全国三级会议，看起来也是承袭这个传统的。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却完全变了样。国王的权力一旦巩固下来，他立刻摆脱了各种方式的监督，再也没有召集全国三级会议。此后三级会议只成为临时的会议，它的权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在极其难以做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征询其意见。

政府最稳定的常设机构和国王的行政管理中心现在是枢密院，国王的大臣们都参加枢密院，并领导各主要行政部门。当时正是旧制度君主国家形成其行政结构的最关键的年代。从这时候开始，大法官和财政总监以及下设办事官员即财务官和国库官等职务均有一定的永久性，由惯例，有时还由文件（例如1499年的重大改革法令）加以保障。同时，还吸收出身较寒微的新行政人员来补充这些官员，这些人不像高级官吏那样因为朝廷帮派体系的浮沉而容易变迁。尤其是，这些新的行政人员都是些财务签押秘书，他们按本人的业务能力担任专门工作，以后可以升任国务秘书。高级法院也渐渐脱离国王的朝廷，体制与枢密院平行，通过各种法令确定了更明确的职责。1498年的一项法令承认了大枢密院的存在。最高法院仍是最高的司法机关，从15世纪中叶起一些条例明确规定了它的权限和程序。与此并行，审计院和税务法院监督整个财务系统。

这样一来，在继英法战争一场动乱之后的和平时期内，法国中央政府的组织逐步定型。这个体系看来是正向明显的中央集权方向发展，但并未排除若干离心的倾向。王国的地域广袤，新并入的封建领地又各自为政，因此这种中央集权不可能是完整的或永久的。全国三级会议已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各省的三级会议，除了在巴黎市政大厅办公的最高法院外，各省也成立了拥有最高权力的高级法院，这些法院使向巴黎最高法院上诉成为不必要。在以前的各个朝代里，这种动向已在图卢兹、波尔多、格勒诺布尔的高等法院开始，在路易十

二统治期间又批准了鲁昂、第戎和埃克斯等地大法院的存在，而布列塔尼公国在雷恩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与国王有某种直接的联系。同时，整个王国划分为4个大财政区：即朗格多尔、朗格多克、诺曼底和外塞纳—荣纳，不久又加上了新并入的省份皮卡迪、勃艮第、多菲内、普罗旺斯、布列塔尼和吉延内。这种措施是应历史的需要而采取的，必须加以改组，才能使之更加整齐划一，更易于为中央政府所监督。但是这种临时措施预示了今后还要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各省组织的详细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变化也能说明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数世纪以来各城镇均设有城镇公所和由特许状保证真正宪政体制，这时农村也自行组织起居民村社。为了便于分摊和收集人头税，越来越多的村庄召集会议，成立了某种雏形的自治机构。此外，还赋予少数几种公民权利，特别是在司法方面。地方政权得到这些初期的发展，在后来将变得更加活跃。

在立法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向。国王想要整理并统一王国现行的法典，首先用文字把各地方大部分靠口头和惯例沿袭下来的习惯法记载下来。1454年全国三级会议命令王国所有实施习惯法的省份都必须进行这项工作，记载和修订习惯法是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时期法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显然，这些法律体制需要在日后加以统一调整，从而创立一部全国通用的统一法典，但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完成。结果这方面的差异依然存在，同时习惯法的各种惯例更加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产生了旧制度结束以前法国政府所特有的政体：仍容许区域自治的中央集权制。

在这两朝稳固地建立起来的两个新工具：财政和军队，现在都掌握在国王手中。在这两个方面，查理七世的法令早已规定了大致的原则。从这些试验性的办法开始，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把这两件必不可少的工具置于国王手中。

从王室领地上取得的普通税收，已不足以应付国家日益增长的开支。在此之外，探索了其他开源办法。起初，这些还仅被认为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的办法，但后来它们为王室的财政提供了最稳定和最易取得的进项。在这些办法之中，人头税的收入最大，也最便于为国王所使用。人头税是一种直接税，每年征收一次，原先要由全国三

级会议授命，并决定征收的总额。1484年的会议又重申了这项原则，但是由查理七世统治时期的末年起，就再也不需要全国三级会议从中参与，税额总数每年由枢密院根据预计的开支加以确定。路易十一曾把人头税提高到骇人听闻的数字，340万里弗尔；路易十一去世后法国政府不得不约束这方面的要求，以免引起1484年全国三级会议的反。因此，税率降低了一半以上，尽管意大利战争引起支出增加，这个新的数字上下波动不大。然而这种克制之所以可能实行，是因为用一系列的借款，抵押王室领地以及其他经济上的权宜办法来弥补不足；因此到了路易十二统治时期末年，尽管他有节约开支的美名，也不得不增加直接税的税率，最后超过了路易十一所课的税率。这种财政组织在15世纪末已臻完善，使国王手中有一个极度灵活的财政制度和各种财源，后来的国王们在困难情况之下大量利用了它们。这些财源首先用于维持国王的军队，如今领饷的士兵永远代替了以兵役作为部分封建义务的部队。查理七世招募的正规部队，是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装备的骑兵部队几乎全部都由贵族组成。路易十二又给他们配备了一支炮兵，这支炮兵既强大有力而又机动灵活，可以越过阿尔卑斯山运送到意大利。这一代价昂贵的措施大大有助于国王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在历次出征意大利中都是常胜的，直到后来由于携带式火器的使用、防御手段的变化和新战术的引进，使得整个军事体系必须重新改组为止。

同时，国王的行政机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部门。这就是外交部门，路易十一首先模仿意大利各国政府加以试行。从1484年起，有一位红衣主教代表法国国王常驻罗马，并已成为惯例；与外国政府进行谈判的特派使节人数陡增。从16世纪初起，对意大利的战争和与瑞士的关系使外交活动范围更形扩大，到后来的朝代便以有组织的方式来进行。

法国数世纪宗教史的一个特点是教会在行政和教义方面的变革，我们只有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统治时期中才能找到这些变革的渊源。教会当时正在设法重新保持自己的稳定，但是它仍能感到天主教大分裂所引起的动荡的余波，到处可以看到改革者为恢复教义和教规所做的种种努力。

宗教危机在法国是以教会自立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这次宗教危机把基督教世界投入了一个多世纪的混乱之中，并使公会议的权力和教

皇的权力发生争执。教会自立的运动忠于公会议主义，而对教皇仅给以礼节性的优先地位。在法兰西王国境内，教会将被作为一个本国的单位来对待，在法国主教的领导下按法国特有的习俗和法国的公会议的决议进行管理。教皇被褫夺了一切司法权力，并被禁止征收什一税、神职人员捐献的第一年度年俸以及教皇在发放神职人员薪俸时回扣的其他费用。教会自立运动是15世纪某些著名的神学家提出来的，并不是一种一经规定以后不再变更的教条。在运动的支持者中间，因各集团的利害关系不同而有显著的意见分歧。在神职人员中，教会自立运动是比较纯正的，因此不同于国王的教会自立运动，国王的首要目的是捍卫君主的权益；也不同于最高法院的即法学家们的教会自立运动，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尊重法律原则。

1438年的布尔日国事诏书未经教皇同意，便规定了法国教会的地位。这一诏书规定带薪的神职应由自由选举或由指定捐赠薪俸的施主确定；教皇所课的捐税一律废除，同时在宗教诉讼中向罗马法庭的上诉也予以废除。教皇们从天主教大分裂结束之日起便一直致力于恢复他们的专制主义，因此对这个诏书大加谴责。与此同时，国王们被互相对立的政治动机拉过来又推过去，一直在执行诏书和撤销诏书之间摇摆不定。路易十一尤其反复无常，在他想利用教皇的时候废除了这个诏书，而当他与罗马发生齟齬的时候又以发布限制教皇职权命令的形式予以恢复。查理八世的政府也同样善于变化。1484年的全国三级会议曾要求恢复这个国事诏书，但过了不久，与教皇进行谈判以订立政教协定的呼声却喧嚣起来。

若不是意大利战争对于这场争执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那么推托拖延的政策还可以悄悄地进行很长一段时间。查理八世以教会改革家的面貌在意大利出现，他相信这样做就会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地位。当时罗马教廷已因亚历山大六世的宫廷丑闻而信誉扫地，查理八世便故意散布他有意罢黜教皇，并以亲自召开宗教大会作为威胁。1493年他在图尔召集了一批人，准备改革的纲领；他的意大利远征更具有同时对土耳其和罗马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性质。但是这些昙花一现的计划正在他处在可以付诸实施的地位时收场了：他对亚历山大六世呈上了效忠誓言，而不久亚历山大六世便愚弄了他，拒绝把那不勒斯王国授予他。

路易十二利用了教会自立运动，作为打击罗马教廷的手段。他是有鉴于意大利政治的混乱才这样做的，其中教皇朱理亚二世每回都充当了反法联盟的带头人。除了教会教规而外，还应该考虑到经常起着和国王平行作用的红衣主教昂布瓦兹的个人野心。这位红衣主教经常从教士们的薪俸中饱私囊，并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大家族替他推波助澜。他的野心转而指向意大利，他是路易十二意大利冒险的主要策划人。他所瞩望的是在这些冒险胜利之后为自己加上教皇的冠冕。当他的野心受挫之后，他企图至少要加强他对法国教会的控制，成立一个国教，而他将以教皇一般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教会。任命教皇使节的敕令使这个计划如愿以偿，敕令任命乔治·昂布瓦兹为教皇代表，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以实现法国教会的改革（1501年）。这种安排将令人不安地蔓延开去，妨碍教会的统一，并预示英国教会也必将终于建立。此外，这也使真正的教会自立派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传统自由的恢复，而是以服从国王取代服从教皇的危险。

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路易十二与红衣主教布里松内和德·普里合作，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间毫无顾忌地煽起这场冲突。作为对朱理亚二世的威胁的回答，路易十二于1510年在里昂召集了一次法学家大会：他们将草拟一项以限制教皇职权的原则为基础的法令，局部地恢复国事诏书。不久，在图尔召集的神职人员会议又宣称国王有权在任何情况下保卫国家，可以向公会议请示，不必将问题提交教皇审议。后来冲突愈演愈烈，路易十二便在一小撮红衣主教的拥护之下想碰一碰他的运气，于1511年通过分裂派的红衣主教们所下的一道命令，召开一次全基督教的公会议。大会在比萨举行，参加人数极少，大部分都是法国人。这就使这次公会议失去了普遍性。会议刚开始，就不得不为安全起见逃到米兰，后又移至里昂，在装腔作势地宣读了一些公会议的传统教条之后散会。会议的失败是由于在意大利的军事失利而引起的，同时也由于朱理亚二世的反戈一击：在比萨公会议召开的同时，教皇也召开了一次公会议，大多数基督教国家立刻承认了这次会议的权威性（1512年）。

这次公会议所采取的政策旨在改革教会的法规和戒律，不免有被广大人民误解的危险。所以政府希望通过法律和文学的宣传，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以影响舆论。作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读者为对象。让·勒梅尔·贝尔热出版了一篇题为《天主教分裂和公会议之区别》的历史

论文，在其中发表了关于教皇历史的有倾向性的观点。让·布歇写了一篇《哀悼战斗的教会》。皮埃尔·格兰戈尔为普通百姓写了一个题作《鹿与鹿的追逐》的粗俗的闹剧，并且在《傻子的王侯》中描写了教会和教皇被一群邪恶的化身包围的情景。法学家和教规研究家则设法影响受过教育的公众，他们重印了国事诏书，并附有科斯梅·基密尔的法学注释，提出了法国教会自立派的全部论证。图卢兹的M. 贝特朗出版了一本《论高级主教间的斗争》，索邦神学院一位神学家雅克·阿尔曼写了无数关于教义的论文，如《教会权力论》《自然的主人》《宗教专制论》等。这些文字都是对维护教皇绝对专制制度的那些人的一个回答，也是对那位把论文交给神学院听候审查的托马索·达·维奥（天主教多明我会会长卡耶坦）的一个回答。这场论战使争论双方都掀起了一场波澜。

虽然争论往往以最激烈的言辞进行，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这场论战的宗教感情色彩很浓，争辩双方不得不谨慎从事。国王明白他的臣民希望和平，在他的主张教会自立的公会议失败后，他看到由于新的军事败绩，他必须和敌方达成谅解。在罗马拉特兰宫召开的公会议谴责了比萨的“公会议”。教廷敕令将法兰西王国逐出教会，使法国有被开除教籍的可能。路易十二再三碰壁，走投无路，只好屈服，此时朱理亚二世去世，也有助于谈判和平。倡议召开分裂大会的那些红衣主教们已和新任教皇和解，国王也就投靠了罗马拉特兰宫的公会议，派一个郑重其事的使节团前往。这都是为了使教会自立主义的一场纠纷宣告结束，但是拉特兰宫大会提出了对国事诏书的控诉，法国政府被召出席以辨明其无罪。1515年，弗朗西斯一世不得不商谈一项折中协议，除非军事上的胜利能使他重新提出争论并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教会自立这场长期的剧烈运动使法国教会遭受了痛苦的考验。法国教会非但没有受到国事诏书的保护，反而遭到了教皇和国王们的任意干涉。国事诏书所规定的授予有俸圣职的条款从未得到执行。对教会枢机职务（主教辖区和修道院）的人选要经过选举，而选拔高级教士的责任则交给适当级别的教士或修士全体大会执行。但国王强迫教会接受自己的候选人，或是向选举者推荐他们，或是用恐吓威胁的手段强使他们当选。在各个封建主的领地上亦复如此，贵族们竭力设法替他们的心腹之人谋得职务。选举人只得唯命是从地接受君主所指定

的人选，如果违抗，按照教规选出的候选人和他的竞选者之间便有打不完的官司。这种官司打到后来，双方候选人都弄得名誉扫地，使得教区内混乱不堪。因此，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统治时期，仅巴黎高等法院直辖区便有55个主教辖区的人选发生了争端。国事诏书也为较低的神职人员作了同样严格的规定，包括副神父、神父和教士。这些人的通常的保护人都都被剥夺了权力，在国王企图和教皇言归于好的时候是教皇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而在国王滥用自己王权的时候则是国王本人。

这样一来，在法国教会生活中根本就谈不到任何纪律秩序。反对法国教会的人错误地认为国事诏书是这种堕落的原因，其实这一切不正当的现象正是由于践踏国事诏书的规定而引起的。主教教区和修道院都虚席以待，专供那些豪门和权贵，他们既不必放弃自己的世俗活动，同时又可大发横财。某些家族对教会特别矢忠，他们垄断了各省的神职，仿佛这些职务是专为他们而设的。他们是布里松内家族、萨拉查家族、蓬歇家族；还有昂布瓦兹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一度同时占有5个主教辖区和好几个修道院。更有甚者，即便最有利可图的神职还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他们便不顾一切地大事兼职，违反了有关不可兼职的一切教规。有钱的神职占有者彼此交换买卖职位，安排收益办法，套取向教廷上交的款项和其他各种财务收入，这一切全都是买卖圣职的行为。而且这些权贵们并不一概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在宫廷、府邸、军队或使馆中安度一生，只有在接收教区时才去教区视事，有的要到死后埋在大教堂内时才去教区。他们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主教辖区司教总代理人，或交给受托征集收益的代办人。在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中间，做法有所不同但结果完全一样，因为谁也不能设想这些显贵们甘心恪守修道院的清规：他们掌管这些修道院的教会财产用益权，把管理工作交由代理人去进行。这些凡俗事的神职人员虽没有放弃信仰，但他们充满了世俗精神，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人文主义和艺术，而不是虔诚。即使这些神职人员还没有以道德败坏的行为以及主教和应听命于他们的教士、修道士之间的激烈冲突而耸人视听，他们也以自己违背传统的行径而使信徒们大失所望。

下级神职人员，即不计其数的神父、副神父、教士、教区神父等，都同样地毫无秩序，而且不顾国事诏书的要求，始终如此。这类有薪神职中有许多已为显赫的权贵所占，以补充他们的收入。余下来

的名额还要分配给出身较低微的传教士、大学毕业生和法官，这些人对履行职责也并不比自己的上司热心。最后，还是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大批教士来执行这些职务。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神父的训练，不知经义和礼拜，有时候甚至不懂拉丁文，只会照搬仪式而不明白是什么含义。他们由于生活贫苦而不知荣辱，因为他们教会收入的大部分要被挂名的有薪神职人员夺去，往往只能靠一点额外补贴生活，而募集这些补贴又不免和教区居民发生冲突。像这样没有俸职，只靠布施和偶然不可靠的收入朝不保夕地过活的教士，又何其多呢？

修道院患的也是同样的病症。修道院的收入都留给荐引修士的院长，而修士则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以致有些修士无可忍耐，只得控告他们的院长。院址建筑失修毁坏，院内生活已不再按照规矩进行。其中最最有能耐的人放弃静修生活，在修道院中过着有如诗人的自在生活，而另有一些人则耽于尘世间最快乐的享受，例如跳舞和打猎，也不回避一些更严重的放荡生活。于是，修士团体纷纷解体，到处游荡的修士成为当时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人物。

下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过着和平民一样的生活，和他们同时代人一样地落魄潦倒。但是像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和广大的信徒没有区别，他们已经看不到宗教生活的意义。

对实现改革表示关心的人们，都认为这种衰落的原因出于国事诏书，后来，大法官迪普拉为了要使政教协议能够被接受下来，声称有必要改革立法制度。但是事实上这些反常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国事诏书被人轻视，国王和高级神职人员非法干预教会事务。一切均已积重难返，即便政教协议正在执行的期间，道德风气也并未发生变化，反常现象更变本加厉。

然而，随着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代举足轻重的某些人物的出现，又出现了可能好转的迹象。所谓严守教规者竭尽全力，设法恢复秩序，恪守教规，重申修道院清规，学习神学科目，并在神职人员中间提倡15世纪时在佛兰德和莱茵兰从未间断过的神秘主义传统。在此以前的几个朝代也做过某些改革的尝试：某些修道院院长曾致力于重新控制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和托钵修会。但这些改革引起了争论，在争论中每个组织都力求独树一帜。这种改革精神也影响了1484年的三级会议，其结果是召开了桑斯会议（1485年），并且在图尔的神职

人员大会（1493年）上发布了改革法令，这批法令规定恢复教规，实际上不过是重申国事诏书所规定的各种要求而已。

查理八世和继承他的路易十二，以及控制了全国所有神职人员的昂布瓦兹红衣主教都抱着良好的动机。但是利用教会和教会的财富来为世俗的目的服务却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只有少数个别的改革者才能担负起这种恢复教规的工作。这些改革者中间最著名的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奥利维埃·马亚尔、帕奥拉的修士圣·弗朗西斯（他创立了米尼姆教派）和昂热的主教让·德·莱利。同时，来自低地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让·斯坦敦克充满着苦行主义的愿望，热心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规，重新创办了蒙太古派，不遗余力地推行清规戒律。同样来自低地国家的让·蒙巴尔改革了兰登堡和圣维克托的修道院。这些人得到司法当局支持，因为他们的改革有时需要实行强制。这就使他们承担的工作具有危险性，而且很难和推动神职人员的宗教精神相一致。

当时各个大学的学术研究正陷于经院哲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拘泥于训诂注释而不见古代和中世纪伟大作家的思想；由于大学学术研究的中落，振兴基督教的思想就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了。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样本，一个既注意古代哲学又重视经文研究的运动正在形成，目的是恢复这些著作的本来面目，并深入探索其作者的思想。

这一运动的缔造者是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他活动的时期是法国宗教改革出现前的半个世纪。他活动的中心是红衣主教勒穆瓦纳的神学院，他在该院讲学，吸引了那些和他一样潜心研究经文的人。勒费弗尔受过意大利人文主义方法的训练，并把这个方法和莱茵兰的神秘主义思想相结合。他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开始自己的生涯，编辑出版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他不信古代人的哲学，不久便把它只作为通向基督教思想的台阶。于是他转而研究《圣经》，认为应该用古典学派的方法加以编订。经过大量辛勤劳动，他在1509年出版了《诗篇》，该书附有一篇释文，诠释词义并对经文作出神秘主义的解释。1512年他出版了圣保罗的《使徒书》，这本书是关于基督教某些基本教义的：它们经过改革者的解释，引申出因信仰耶稣而获释罪的学说。勒费弗尔只对圣保罗的思想作了极其简单的评述，并没有提出要讨论救世、谢恩和天命等恼人的问题。勒费弗尔的一生颇负盛名，他的著作为神学对传统教义的解释开阔了新的视野。他的著作仍饱含着

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并且尊重既定的惯例，但同时也为以后将由改革者来实行的变革鸣锣开道。

勒费弗尔是对人文主义表示了应有的敬仰的第一个人，人文主义渐而渐之在社会文化各界、修道院和巴黎各神学院中得到尊敬。一些心胸开阔的人也致力于研究古代、研究希腊和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述。罗贝尔·加圭安和后来的纪尧姆·比代都是复兴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但是伊拉斯谟是这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他在巴黎数次居留，和学术界人士互相通信，成为巴黎人文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导师。伊拉斯谟的影响也许可以和勒费弗尔相比，但他们对道德和传统宗教的态度各不相同。勒费弗尔的神秘主义和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圣理名言和尊崇宗教理想恰成鲜明的对比，而伊拉斯谟的尊崇宗教理想把形式服从和严守清规视为不足为训。

在他们两人的双重影响下，古典原作一版再版，诠释文字表现了对古代人思想的越来越确切的认识。索邦神学院和纳瓦尔学院的教学已经革命化，“前文艺复兴运动”就此开始，在路易十二统治年间，巴黎也如牛津、巴塞尔和莱茵河流域其他城市一样，成为这一运动最活跃的中心之一。这是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席卷了最知名的学者，但这时还仅仅涉及人数有限的佼佼者。大多数人的宗教观点和知识眼界仍属于中世纪。那些宣扬对信仰虔诚、对偶像和圣物崇拜、朝圣以及传播剧烈的受难感和死亡感的书本使人们头脑中保留着一种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便以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安放在墓中和死神的舞蹈等主题表现在宗教艺术上面。

普通百姓置身于学术复兴的潮流之外，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肉体生活的物质需要和他们每天的面包，就这方面来说，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统治时代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有许多新的建树。百年战争带来了类似中世纪初最悲惨年代的天灾人祸。农村中人口下降、土地荒芜，以及因时疫而加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影响了各个城镇。自从15世纪中叶起，复苏步履艰难，军队的烧杀劫掠和路易十一时期的战争扑灭了任何复兴运动抬头的可能。

查理八世登基的时候，人口的下降还是十分显著。在影响最严重的省份里，乡村荒无人烟，居民或已绝迹，或已背井离乡，逃往危险较小的地方。许多文献都指出有些村庄被遗弃后再也无人居住。许多

土地再度变成一片荒原；林莽草泽侵蚀耕地，农村有些地段荒芜之后直到19世纪才又有人耕种。领地的边界自行消失，财产权混淆不清。由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封建赋税和收入，也随着划分征收权利的边界的消失而消失。人们不知哪片田产属于哪个贵族，此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因而过去曾经详细加以规定的封建制度，根基已经动摇。这种情况还不限于少数偏僻的地区。相反地，过去最繁华的地方，如法兰西岛、诺曼底、加斯科涅等地，受到士兵的掠夺也最严重，它们的命运是重新成为不毛之地。即使是城镇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浩劫。到处庐舍为墟，不见重建。农民们虽避难其间，但到处可见城镇人口稀少，劳力昂贵。

法国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为复苏而做出不懈的努力。在这段时间内，意大利战争结束后国内的和平没有受到干扰，财政的需索也不如以前苛重。同时，一连串的好运使国家免除了致命的时疫和引起普遍饥荒的恶劣气候。在这段相对繁荣的时期内，人口增加，乡村也慢慢重建起来。到15世纪末，人们又出现在过去离弃过的地方，重新耕种土地。时常有新的居民来自远方，城市中有许多新来的人，农村地区也有不少，同时还有许多移民从一省迁至他省。

依靠耕种领地取得收入的贵族，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佃户。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把土地重新耕种起来，即使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最突出的措施是解放农奴，并对自由农民做出种种让步。由于劳力缺乏，他们完全由自己经营田产要冒风险，所以他们宁可把田产永久租给别人，每年收固定租金，每旧法亩不超过4个苏。就以当时的通货计算，这点钱也是微不足道的，后来货币贬值，就更微乎其微了。过去规定期限并可予以伸缩的那种租佃制度也被放弃，那些原来可以把全部没有佃户的土地都归为已有的贵族们也和别人一样把土地分开，希望重建自己的庄园并招揽大批人口。农民还得了其他一些好处，例如暂时免去封建义务，并可借得工具和种子。结果是在一个特别艰苦的时期结束之后，农民们重又经历了一段表面繁荣。有些得到恩惠较多的农民果然致富发家，买进空地，建立占地甚广的家业，既有牧场又经营农业。这些新发家的农民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后来与某些居住城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一起，置身于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之间。过去的佃农现在对他们所使用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有继承之权，但仍要听凭货币价值涨落及其所产生的长期后果的摆布。

在15世纪末年，货币的含金量显著下降（过去几个世纪几乎接连不断地都是如此），但货币的购买力却明显地上升。从封建领地按规定收取固定租金的贵族当然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因为规定以货币计算的租金不变，他收入的现金就相应减少了。但是他收到的钱可以买进数量越来越多的货物，结果收支仍然相抵，他可以保持相当的富足，而且今后还将如此。佃农从这种情况下也能得到利益，因为他得到保证不致有人任意抬高租金，尤其是不必向他的领主交付过多的人头税。当时真正的农业经济繁荣为佃农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料。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中农村人口的幸福生活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水平。但是在16世纪的最初30多年里，这一切就都要接受再度侵略的挑战，并且经历一个货币价值波动比任何时候都更猛烈的阶段。

各个城镇也相似地在重建中做出了成绩。随着安全重新有了保障，工商业再度活跃起来，并且由于和其他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而发生了变化。和意大利的交往带来了以前未曾使用过的贸易方式和贸易方法。由于把普罗旺斯并入法国王家领地，地中海各国正在逐一开放；不久之后，随着新世界的发现，大西洋沿岸的海上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在城镇中人口的增长特别明显。路易十一曾号召外国人来各工业中心居住，路易十一以后，特别是随着意大利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到来，这种活动更加广泛。外国人长期定居下来之后，就加入到16世纪的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来。因此，里昂成了一个国际中心，不断地居住着来自各国的居民，其中有佛兰芒人、瑞士各州和莱茵兰来的日耳曼人，而居于首位的是意大利人。在传统的行业公会中可以非常显著地看到这种重整旗鼓的活动，但同时也给行业公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

当中世纪生活的某些方面正在渐渐逝去的时候，行业公会生命却似乎正在苏醒。过去行业公会仅仅存在于某些地区，在西部各省，甚至像里昂这样的工业大城市也很少有人知道公会，这些城市仍然遵循着各行各业中的自由原则。但是如今行业公会到处纷纷成立，这一点既由于手工业者自己的努力，也多亏想要趁机利用这些组织的国王的权威。一连几代国王发布给行业公会规定的各种条例，并批准管理已成立公会的各个行业的规则，结果大量地增加了行业公会的数目。行业公会成了公共团体，它们参加市政生活，并提供值更的巡逻人员；也可以依靠它们来交纳额外的税收，或支付强制性的借款。由于

市政当局尤其在财政方面的深谋远虑，行业公会制度的发展得到鼓励，并得到国王的积极支持。同时，行业公会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个转变；它们现在已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业务活动上面，不像早年各朝代时那样沉溺在政治煽动之中。行业公会内部的争吵减少，东家和伙计之间的纠纷也不那么严重。无疑这是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结果，它暂时地缓和了利害关系的冲突。

但是在这表面和平底下，仍可以察觉到动乱的迹象。主人变得富有了，他们就愈来愈想要强调工人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主人们取得社会名誉、物质报酬以及他们在市政机关中的优越地位，而工人们则以兄弟会和手工业行会（散工的行会）的形式结成了越来越多的集社。这一切撒下了敌对的种子，在经济情况恶化的时候就会引起剧烈冲突和镇压手段。在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应运而生的行业中，这种趋向更是显而易见。从意大利引进的丝织业在图尔扎下根，南方各省养育的蚕茧供应该地。虽然谈不上什么大规模工业，但是已有一批批使用贵重原料的手工工人，如纺丝工、拈丝工、织绸工和染工。他们使用复杂的设备，因此必须投入相当多的资本，给工人准备工具和原料，并设办事人员在商人的经常指挥下监督各个工人的工作。

印刷业显然要依靠造纸业，它吸收了更多的劳力和资本。印刷业在路易十一时代引进以后即迅速发展。巴黎在1470年，里昂在1473年成立第一家印刷所以后，两个城市中印刷所的数目大大增加。这两个城市在16世纪成为主要的出版业中心。在里昂，15世纪末有55家印刷所，在1515年已有百家以上。如果把不可缺少的辅助性行业也算在内（包括造纸、铸字、装帧、镌版、装订），雇佣工人的数目非常众多。起先，和使用的原料一样，这种工人都来自德意志，但后来就招收本地工人。印刷业飞速发展，遍及全国各省；到15世纪末年，在30多个城镇中均有印刷所，在当时出版了非常之多的书籍。

印刷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需要付与大批资金，设备本身（包括活字和印刷机在内）价值昂贵。专门工人（排字和校对）工资很高，出一本书所要垫支的款项超过其他任何行业所花的费用，特别是因推销书籍而必须做出各样安排。印刷商同时是书商和出版家，因此必须参加集市，并找寻出口市场。当时最大的印刷商如约多库斯·巴迪乌斯、马尔内夫家族及艾蒂安家族，都必须一身兼为学者和实业巨子。此外，这一门新的行业给劳工界带来了其他的变化。印刷商招请的工

人，尤其是校对工人，往往慕大出版业中心重要印刷所之名来自遥远的他乡。他们成群结伙，往往发生事端，为新思想的传播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同样，贸易也在较为安定的条件下向着以前还未探索过的路线发展。当战争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的时候，大宗贸易的路线都绕开法国，但从此时起法国又恢复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里昂是最大的贸易中心。1420年，查理七世就在该地设立集市，但是直到1489年后集市才定期举行，开始真正活跃起来。从那时起，集市获得很大的成功，参加集市的商人被赐以特权，有的还永久定居该地。由于接近外国的大商业城镇（日内瓦和莱茵河流域各城镇），由于意大利的贸易在战后不断增加并继续扩大直到1567年，该地成交的贸易额极大。每年举行集市4次，每次长达两个星期，集市前后各有一段时间予以特惠，并延长期限以清理账目。因为里昂有许多畅通无阻的航路，是联结北方诸国与地中海的通道上的码头，所以这些集市在里昂保持了几乎经常性的活动。

其他城镇也经营类似的活动，但不及里昂。一年举行数次集市的办法传至各地，单是查理八世时期就颁发了400份特许状。与王国其他重镇（鲁昂、图尔、特鲁瓦、第戎和蒙彼利埃）一样，巴黎在圣但尼和圣日耳曼德普雷均设置集市。这些集市是工业需要的某些产品的真正国际市场——如盐（实际上由少数海洋国家垄断），明矾（织布业不能缺少）、丝、香料、金属（法国的自然资源很缺），尤其是铜；铜用于铸造大炮，但要从波希米亚和上德意志的铜矿进口。

随着不断增加的贸易，货币也大量流动，贵重金属和各种钱币大批转移，然而由于途中可能发生危险，运输颇为不便。货币的稀缺不适应于日益增长的商业要求。到15世纪末，法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痛感贵重金属的短缺，因此不得不使用信贷，并借重银行的干预。自13世纪以来，法国即有银行存在，假如不是更早的话。但是政治危机中断了它们的活动，直到此时还只主要经营兑换货币和短期借款。百年战争后，银行再露头角，但为意大利人所控制，美第奇家族便在里昂设有分行。其他银行亦随之而起，到即将进入16世纪时，便已为数很多了。这些银行总行大抵设在里昂，在王国各主要城镇，尤其在巴黎添设分行支行，但巴黎无疑是从属于里昂的。

这些银行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有来自佛罗伦萨或卢卡的意大利人，如卡波尼家族、加达尼家族和邦维奇家族；也有德国人，他们的活动要受奥格斯堡或纽伦堡的银行控制。法国银行为数甚少并且相距很远，偶或进行银钱交易，但这也是和它们的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很难在银行本身业务和一般性大规模贸易之间划分界限。它们几乎把“罗马宫廷”的银行业务全部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罗马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借钱给教士俸禄的接受人，或借给与教廷打官司的人。

这类经营牵涉到作为集市贸易和国际商业基础的较为复杂的业务：汇兑、划款、信贷结算、存款和借款。这样才可能结清账目，否则由于货币流通不畅将会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甚至政府的事业需要预先付出大批款项时，也得寻求银行家的帮助。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就是靠里昂的意大利银行家提供的贷款来开支的。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此后每一件政治行动都在暗中伴随着一桩财政方面的交易，例如1519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便说明了这一点。

如此，某些家族积聚了大量财富，形成了他们权力的基础。这些家族和旧时的土地世家显著不同。商业中产阶级与行政当局关系密切，在查理八世及其后继者的时代突飞猛进。这种情况固然不乏先例，其中最著名的莫如雅克·科尔；但是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在15世纪末以前很少被人察觉，博纳家族、布希尔家族、于罗家族和布里松内家族都直到此时才遐迩闻名。他们同时身兼商人、金融家和王室财产的经管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国家就不能生存。他们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历任政府和教会要职，他们还希望把自己提高到大地主的地位，甚至进入贵族的行列。

重视金钱，在某些工业和大规模贸易中不能缺少金钱，这个事实标志了法国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到来，在丝织业中，资本家购买和进口原料，让一批工人加工，工人所用的设备系资本家所有；而制造完成以后，资本家出售绸缎。拥有资本、担当风险并享受利润的资本家和他付给工资的工人之间，差别变得更加显著。在印刷业中也可以见到同样的差别。拥有资本的同一个商人，往往还出借金钱谋取利息，这可能违背教会的规定，但是他采取了掩盖他交易本质的各式各样形式上的提防措施。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债

主，直到后来拿他们的土地抵债。这就是土地所有制大规模变动的开端。

资本家甚至还借款给国王，国王支出巨费，负债日多。但是国王的信用异常低落，他借钱还要由朝廷的大人物替他担保，利息也比普通商人之间借贷高出许多。政府开始把行政官职作为一种收入来源，暴发户的中产阶级收买官职之事也时有所闻。因此公职，甚至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就转入平民之手，仿佛这是他们的继承权的一部分。国王首先出售的是财务官职，后来是司法官职；起初还有点扭扭捏捏，做得小心翼翼，出售时装作借款，但国王有借无还。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尤其是路易十二在朝的时候和他身后，国库需要增加，而行政官职又数量增多，情况就更其如此。这些都是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对国家的社会结构有严重影响。随着对英战争结束后贸易活动的恢复，这些情况引起的种种变化都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

第十一章 西班牙诸王国与天主教国王

1492年是西班牙出现奇迹的一年。西班牙取得了格拉纳达，结束了8个世纪的对穆斯林战争；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新世界已经发现。中世纪时一向在半岛中央闭关自守的卡斯蒂利亚，突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卡斯蒂利亚的崛起，可以说是命运和偶然，而不是精心谋划的结果。卡斯蒂利亚人一见机会来到，立即紧紧抓住不放，只有经济因素才是主要的限制。命运把大宗财富放到一个民族的手中，这个民族虽有雄心壮志，却缺少经济头脑。这个伟大的帝国一出现就遇到重重经济问题，原是意料中事。真正奇怪的是这个帝国竟延续了那么多年。

卡斯蒂利亚王国统治下的半岛人口不多。1482年为军事目的做过一次统计，总数达750万。这次统计十分粗略，数字似乎太高。1530年为征税目的而做的另一次统计，就只有343300。但这次统计不包括加利西亚（约有60万人），也不包括人口也很密集的格拉纳达王国和穆尔西亚王国。1541年为征税而做的第三次统计，人口约为6272000人。1530—1570年可能是人口的最高峰时期，因此1482年的数字应大大低于1541年，但可能超过4500000人。至于阿拉贡王国治下的各个小国，其大概数字是：阿拉贡270000人（1495年），巴伦西亚270000人（1510年），加泰罗尼亚307000人（1512年）。

卡斯蒂利亚人民主要经营农业，也有的过着游牧生活。大部分可耕地为贵族、军人、教会、修士和王室所有，或者是城镇和乡村的公地。税赋由农民负担，贵族一概豁免。谷物是最主要的作物，但往往不敷供应，必须进口小麦。费迪南德认为他可以用西西里的粮食供应卡斯蒂利亚，因而大力发展养羊业和羊毛业，输往佛兰德市场。查理五世需要征召农民入伍，便从尼德兰、丹麦和德国运来小麦供应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王国在半岛上的各个小国从地中海其他小国如西西里和撒丁进口粮食；巴伦西亚有时还从罗马尼亚或土耳其进口。卡斯蒂利亚人认为阿拉贡可以成为他们的粮食市场，宣布对阿拉贡的出口一

律免税（1480年）。穆尔西亚新开发的土地原先用来为阿拉贡种植小麦，但是牧民需要土地放牧，群起反对。伊萨贝拉死后卡斯蒂利亚和费迪南德发生摩擦，卡斯蒂利亚国会便千方百计停止对阿拉贡出口粮食。尽管连年丰收，该国会在1518年重申禁令，在1525年完全禁止出口。这个禁令最后为查理所解除（1537年）。阿拉贡依靠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粮食进口，加泰罗尼亚有时也是如此。巴斯克诸省则由南特供应从布列塔尼和法国西部来的小麦。对西印度群岛的小麦供应又是一笔负担。这批小麦要由德意志、佛兰德、法国和北非国家运去。

1509—1520年间的收成虽比1503—1507年时为佳，但是卡斯蒂利亚的小麦产量始终不足。自1502年起，国王不得不控制价格，但官价一直没有得到遵循。如以1511年小麦价格指数为100，到1530年便达273；虽然美洲白银的流入当时对此还未发生影响。农民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据官方记载，此时农民负债累累，不得不在晒场上就卖掉新粮，而中间商却利用他们的贫困大发横财。直到1535年左右情况才起了变化，这场变化历时约30年。由于美洲的白银，又有人收购土地，但那时土地用于种植葡萄，不种小麦；到16世纪中期，葡萄酒的价格不断上涨。

在卡斯蒂利亚的经济中，养羊业最为重要。逐水草而居的牧羊主和他们的活动均由王国牧民荣誉会管理，这个全国性的牧羊主行会组织在13世纪时即已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从1512年到1521年，每年平均羊只数目约为284万头。牧羊主租用南部的牧场供羊群过冬，这种牧场大部分属于军人，但这些军人的产业均已为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王室所兼并。王国牧民荣誉会财源极其兴旺，查理一有困难便前往求助。1518年、1519年、1525年、1526年、1528年和以后多年，王国牧民荣誉会都曾贷款给王室。查理相应地通过了许多法律，这些法律照顾养羊业而不利于农业，强逼荒废耕地而供羊群放牧。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王室的大部分收入都靠羊群维持。牧羊主们除了有几次借款给国王以外，每年还交纳牧场租金；这些牧场名义上为军人所有，事实上直接控制在王室手中。查理五世往往把牧场包给外国银行收取租金，作为对借款的抵押。例如在1525年，牧场就被发放给福格家族经营，因为他们曾经为查理的皇帝选票预支了款项。

国王保护羊毛贸易的政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治下，实行的还是1462年的命令，即为卡斯蒂利亚的毛织业留下

1/3的羊毛。查理后来试图把这个比额提到1/2，但这种旨在发展本国工业的措施却受到出口商和王国牧民荣誉会反对，只得加以收回。热那亚的商人控制了约40%的羊毛贸易，结果他们在西班牙的贸易界和金融界中起着极活跃的作用。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在马拉加和卡塔赫纳装船运往意大利；阿拉贡、马埃斯特拉特和巴伦西亚的卡斯蒂利亚腹地出产的羊毛，则从托尔托萨和巴伦西亚启运。对佛兰德的出口是其中最重要的，在布尔戈斯和麦迪纳德坎波均有极大的羊毛市场。1494年，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授权布尔戈斯的商人组织他们的行会，这是一个以加泰罗尼亚各海运事务处（1283年在巴伦西亚，1343年在马略尔卡，1347年在巴塞罗那）为样板的同业组织，经办国内和对外的一切贸易。布尔戈斯行会有权核定运费和海上保险费。它管理比斯开湾内的船只运输，并和实际上经营大部分船运的港口毕尔巴鄂达成协议（1495年），每年有7000或8000骡马来往于布尔戈斯和毕尔巴鄂之间，驮运羊毛12000捆至15000捆（约900吨）。根据需要，每年有一个或两个船队由毕尔巴鄂开往安特卫普。

这时候，塞维利亚成为对美洲贸易的巨大中心。经管对西印度群岛全部贸易的贸易署，1503年设在塞维利亚，稍后（1543年）又成立了一个与布尔戈斯行会类似的机构。同时，塞维利亚垄断对美洲的全部进出口贸易，吸引着所有的外商，在16世纪迅猛地发展起来，成为西班牙最大的都市（1517年居民2.5万人，1594年居民达9万人）。

在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巴伦西亚光辉灿烂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正处在衰落之中，巴塞罗那更是这样。它们在政治上的扩张已经超出它们在地中海的贸易扩张：巴利阿里群岛、西西里、马耳他、希腊、撒丁和那不勒斯等地一个接一个落到了加泰罗尼亚的统治或势力之下（在北非沿岸、黑海和埃塞俄比亚均有贸易点）。加泰罗尼亚这个早期帝国中心的形成，连同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之间的友好传统，以及欧洲外交棋盘上的敌对关系，都是费迪南德对后来成立帝国所留下的贡献。然而，在另一方面，后来成立的帝国却没有借鉴加泰罗尼亚人建立帝国和治理海外属地的经验（只是借用了他们成立海运事务处和设总督的经验），也没有使用他们所擅长的理财能力。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卡斯蒂利亚人把帝国看作仅属他们所有，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并得到王室的支持；另一个原因则是加泰罗尼亚的衰落。

加泰罗尼亚衰落的生物学方面的原因要追溯到14世纪，这个小民族在地中海扩张和黑死病之后，又在14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远征撒丁时贵族伤亡极重，已经元气大伤。14世纪末欧洲经济危机波及加泰罗尼亚，贸易、财政和金融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条件，加泰罗尼亚人一向采用十分死板的传统办法，因此往往不能对这种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1381—1383年巴塞罗那金融危机后，阿拉贡王国的财政中心迁至巴伦西亚，巴伦西亚的繁荣是建立在农业（以大米和糖为主）、阿拉贡羊毛出口的吸引力及其对热那亚资本和商人提供的便利之上的。

1430年后，巴塞罗那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一方与富有市民和地产所有人为另一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农村中则在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阿方索五世此时离开他半岛上的领土，前往新开拓的那不勒斯王国定居（1432—1458年）；由于他不闻不问，这些问题愈演愈烈。官府和商人多方设法试图挽回这一局面，如果他们能像巴塞罗那王室过去历届君主时那样得到王室政策的一贯同情支持，他们的种种努力是稳可以如愿以偿的。

1458年的钱币贬值，对商人是一桩鼓励贸易的措施，因而受到欢迎，但为地产所有者和食利者所不满。这些人破坏这项措施，在社会各阶级间制造敌对和骚乱，由此为一场大戏提供了舞台。这就是主要由巴塞罗那商人领导的反对费迪南德之父约翰二世的加泰罗尼亚革命（1462—1472年）。就加泰罗尼亚人所争取的民族和民主自由来说，国王和全国人民之间的最后和议还算较为满意，然而这场革命之后加泰罗尼亚疲惫不堪，社会动荡不已，结果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地主。许多商人在战时纷纷离开巴塞罗那，移居巴伦西亚，但后来针对加泰罗尼亚的反抗（1484—1487年）而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最后的打击便到来了。此后，大部分商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便携带他们的资本和货物离开这个国家，所以巴塞罗那官方曾很恰当地说该城“已经完全毁弃”。

16世纪初，即1505—1510年对凯比尔港、奥兰、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进行远征后，加泰罗尼亚与北非的贸易稍稍复苏；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对组织这几次远征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武装部队和船只。当被占领的城市被并入希门尼斯的托莱多大主教区时，加泰罗尼亚人取得了和新领地通商的

权利（1512年），以及向这些地区出口纺织品的优惠条件。16世纪前半半个世纪，加泰罗尼亚继续与西西里、那不勒斯、北非、埃及进行贸易，但已经大非昔比。地中海是土耳其和柏柏尔海盗出没之地，如今欧洲经济生活中心移往西方和北方，其重要性便丧失殆半。加泰罗尼亚人被排斥在美洲贸易之外，这就使他们失掉了重振旗鼓的最后机会。自此以往到16世纪中叶，巴塞罗那也就湮没无闻了。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举行婚礼（1469年10月19日）的那个时期，加泰罗尼亚统治权不属于新郎的父王约翰二世；直到1472年约翰二世才重新得到承认。直到1492年，格拉纳达这一阿拉伯王国才被征服。在伊萨贝拉死后，费迪南德独自一人不以国王身份而仅以总督身份治理卡斯蒂利亚，他在1512年征服了纳瓦尔王国。因此，整个半岛除葡萄牙以外，后来全部归入查理五世一人的统治之下。

因此，以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为首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王室的结合，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其政制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阿拉贡善于机巧权术的约翰二世围绕着亨利四世继承人的问题，密切注意卡斯蒂利亚事态的发展，精心策划了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事。当时宫廷传出流言，据说王后之女胡安娜公主不是国王亨利（称为“无生育能力者”）之女，而为葡萄牙的一个贵族贝尔特朗·德·拉·奎瓦所生，胡安娜便被蔑称为“贝尔特朗氏”。贵族和主教中反亨利的一派利用这种流言作为资本进行阴谋活动。国王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有时承认胡安娜非由己出，但临终之际却申明她确系自己的女儿（在我们今天，马拉尼翁医生搜集了所有医学方面的证据，得出结论说她大概是国王的女儿）。然而反对派最后设法宣布她为不合法，而把阿方索王子捧上太子的宝座。阿方索王子和亨利都是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二世（1406—1454年）的儿子，但阿方索王子和未来的天主教徒伊萨贝拉都是约翰的第二个妻子葡萄牙的伊萨贝拉所生。这位葡萄牙籍的王后神经错乱，就像伊萨贝拉之女、查理五世之母“疯女”胡安娜一样。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中一脉相承的那种病态遗传，可能是渊源于她。阿方索王子早逝（1464年）。阿拉贡的约翰二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心腹前往卡斯蒂利亚，在伊萨贝拉跟前假献殷勤，劝诱她嫁给他的儿子。第一步，尽管托罗斯德基桑多协定（1468年）如今看来纯系伪造，但亨利承认了伊萨贝拉是他的继承人。接着其他的求婚者均遭谢绝，其中有路易十一的兄弟法国的吉昂

公爵，和葡萄牙的阿方索五世。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的婚姻是约翰二世暗中许多活动的最终结果，包括他串通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和他收买卡斯蒂利亚贵族，尤其是那些负责监护那位年轻公主（时年约18岁）的贵族，让他们劝导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结婚。在这一切往返磋商之中，约翰二世受到两地犹太籍最大的名门望族的支援（在卡斯蒂利亚是本维尼斯特家族和亚伯拉罕·塞尼奥；在阿拉贡是拉卡瓦列里亚），这些人彼此间有共同商业利益的联系，他们相信两位年轻的君主将保护他们的种族，而抑制1391年以来在卡斯蒂利亚日渐加剧的反犹主义。

约翰二世出自卡斯蒂利亚非婚生世系的特拉斯塔马拉家族，虽是阿拉贡王室的君主，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卡斯蒂利亚的王子，并不亚于他的第二个妻子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恩里克斯。他年年岁岁忧虑的是他在卡斯蒂利亚和埃什特雷马杜拉的大宗田产，这些田产曾使和他竞争的贵族垂涎不止。除此以外，半岛上王位的宝座已全部由他和他的姊妹们占据。他的兄长阿方索五世是阿拉贡王国的君主，并已把一个新王国那不勒斯并入版图，而约翰二世则是其继承人。他的姐姐玛丽亚曾是卡斯蒂利亚约翰二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现今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他的另一个姊妹埃莉诺是葡萄牙爱德华一世的妻子。他第一次和纳瓦尔王国的布兰卡女王结婚，成为该国女王的丈夫，在女王去世后仍为该国国王。这一切使得约翰二世那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欲壑难填，想把所有这一切王国全都一统到他本人或他幼子的治下。他正考虑如何掌握权力并施展外交。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和法国路易十一两雄争霸，他需要在半岛上建立一支能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相匹敌的兵力。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结合留下一件使人惊异的事实：费迪南德当时18岁，伊萨贝拉19岁，但除这一对青年夫妇的婚约之外，双方国王或双方国会之间对此事却没有签订一项协定。婚约是伊萨贝拉的代表和费迪南德1469年1月7日在塞尔维拉签订的，此时约翰二世正率兵和加泰罗尼亚作战，他军队的大本营正在塞尔维拉。婚约达到了两个目的：卡斯蒂利亚要求费迪南德和阿拉贡人保证不干涉卡斯蒂利亚政府；约翰二世则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使伊萨贝拉和他的儿子结婚。婚约规定费迪南德必须和伊萨贝拉居住在卡斯蒂利亚，非经伊萨贝拉同意不得离境或遣送他们的子女出境。一切信件和契约必须在一方的

王国内由王后和国王共同签发。倘非卡斯蒂利亚国籍，并未经王后许可，国王不得任命任何人参加枢密会议，或担任其他官职。卡斯蒂利亚所有城市和设防地点都必须对王后一人宣誓表示忠诚。非经王后许可，国王不得和其他国王或贵族交战、议和或联盟。为了表示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结盟”，并增添王后的妆奁，费迪南德在阿拉贡、巴伦西亚和西西里三王国中各将两个城市（在婚约中指名）交给王后，此后还将由王后在此三王国中各选择一个城市（婚约中未提及加泰罗尼亚，那个国家这时正以武力反对约翰二世）。立约后4个月内，费迪南德将付给伊萨贝拉10万金弗罗林；在卡斯蒂利亚发生紧急情况时，费迪南德将亲领4000名长枪兵实行镇压。

费迪南德和他那诡计多端的父亲竟然唯命是从地接受这些条件，这要到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逝世（1474年）时才真相大白，当时费迪南德进行突然袭击，声言他是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唯一男性后裔，因此合法的继承人是他，而不是伊萨贝拉。这件事纯属卡斯蒂利亚的内部事务，因此被提交红衣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和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两人审议。两人裁定的要点如下：在一切法律、钱币和印章上费迪南德的名字应在伊萨贝拉之前；但卡斯蒂利亚的纹章应在阿拉贡之前。卡斯蒂利亚的收入应用于支付其全部行政费用，余下之数由国王和王后按他们自行商定的份额公分。费迪南德一方的收入也按同样的条件处理。主教空缺的候补人姓名应由国王和王后共同呈交教皇审批，但仅由王后一方提名。国王和王后同在一地时，宫廷大小决议均由两人共同签署。国王和王后如不在同一个省内，则各自在所在的省内执掌司法大权；国王或王后的一方和枢密会议同在一地时，则应审理由各省上交的一切案件。但是，这一切裁定当时只能适用于卡斯蒂利亚，因为约翰二世尚在人世，费迪南德直到1479年才成为阿拉贡的国王。

撇开这些技术性的细节不谈，西班牙各王国的统一体，即后来的哈布斯堡帝国或称君主国的基本体制，不过是个结构松散的邦联。这个体系的基本要点是：各王国都保留着各自的国会、政体、法律、法院、军队、税制和货币，不受其他国家支配。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同时又是其他国家的国民。直到很久以后，才设置引渡罪犯的制度；卡斯蒂利亚和纳瓦尔之间、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之间当时还互征关税。后来有位政治学者索洛萨诺·佩雷拉曾简要地说明当时国王的权力：

“维系所有这些国家的那位君主，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君，但不是所有国家的国王”。尽管有些作家偶而也在笔下提及“西班牙国王”，但从国家体制来说这一称号并不存在。这位君主按他属下各小国的情况而使用不同的称号。尼德兰的17个省都承认这位君主，但每个省各自赋予他以不同的称号和不同的权力。

国君在每一个小国里均由一名总督代行君主的权力。哈布斯堡君主国家的总督制发源于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两国的这次联合是联邦性质的，所以国君在他所不在的那个国家里要派驻一名副手作为他的代表；这名副手不是他的子嗣，便是王室中一名显要的成员。14世纪时，在雅典曾有过一个司教总代理，后来在撒丁有过总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接受西印度总督称号的第一个人。费迪南德去世后，他的遗孀热尔梅娜·德·弗瓦仍领巴伦西亚女总督之衔，他的私生子萨拉戈萨大主教阿方索·德·阿拉贡则是阿拉贡的总督。查理五世即位之初，在阿拉贡王国所属各小国内任总督的必须是王室成员；菲利普二世兼并葡萄牙时也做过同样内容的许诺。但是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总督先从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高级贵族中选拔，后来也起用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从查理的朝代以后，王国的每个属国：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西西里、那不勒斯、撒丁、纳瓦尔以及美洲的秘鲁和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均设有总督。尼德兰也有一名总督。

国君的周围，犹如群星拱卫，有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暨意大利领地）和西印度群岛等各国政府的顾问班子。这些顾问班子不是地区性的，而是个人性质的——即他们不在他们所管理的国家坐镇，而是经常陪伴在国君左右。因此，自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联合（1137年）之时起牢固建立的阿拉贡王国联邦制传统，胜过了卡斯蒂利亚的合并和集中的体制，在1230年莱昂和卡斯蒂利亚两王国最终联合后两国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在卡斯蒂利亚对西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和美洲的扩张中，这种传统都发挥了作用。勃艮第的传统也是联邦制，也许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查理五世一直推崇联邦制。

西印度群岛被视作卡斯蒂利亚自己的属地，管理方式一直按照卡斯蒂利亚的传统，而不是联邦制。该地的君主是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总督所代表的是国王本人。该地从未试图设置自治或代议制机构，殖民地概由卡斯蒂利亚通过西印度事务委员会治理。伊萨贝拉在遗嘱中

曾明确声明：这些国家的发现和征服“是由我的各个王国出钱，并由这些王国的国民居住，因此那里的贸易和交往就应归属于我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诸王国，并由它们经办。由西印度取得的一切，应归于它们并为它们谋利益”。只有卡斯蒂利亚各王国本国的国民才能在美洲居住或从事贸易，一切贸易和船运均通过塞维利亚港口。这条原则一直沿用下来，尽管费迪南德在伊萨贝拉死后对阿拉贡各属国臣民作过临时的让步（1505年）；查理对德国银行家韦尔瑟家族和福格家族也作过同样的让步。巴塞罗那城曾请求和美洲通商（1522年），但未获批准。

扩充卡斯蒂利亚统治范围的另一个实例是征服格拉纳达这个阿拉伯王国。投降条约（1491年11月25日）的条款是宽大的。该王国将由一名卡斯蒂利亚总督主管，但居民可以保留他们的穆斯林宗教信仰、法律和法官、古代习俗、语言和服装，享有他们原来的财产，并向他们保证税收绝不超过他们向摩尔人君王缴纳的数额。这些条款在格拉纳达大主教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企图劝导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的期间（1493—1507年）曾经得到遵守，但不久即被废止。伊萨贝拉嫌进度太慢，便派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去和大主教一齐加速推行，并在压力之下实行集体改宗。这种压力，加上公开焚毁伊斯兰教经书，最后逼使摩尔人造反。接着年满14岁而不接受洗礼的穆斯林一律被逐出格拉纳达王国（1502年2月12日）。他们一概不得前往北非或阿拉贡王国属下各国（虽然费迪南德许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巴伦西亚避难）；只准去埃及或经过卡斯蒂利亚和比斯开的边界离境。这些新改宗者称摩里斯科人后来就自动处于宗教裁判所的认真管理之下。据查理五世后来颁布的一条法令（1525年），他们不得使用阿拉伯姓名，不得佩戴阿拉伯式样的首饰，只许悬挂十字架和基督像。他们不得按自己旧时的法律书写婚约，1556年明文强制推行卡斯蒂利亚语，禁止使用阿拉伯语，违者重罚。这些和后来增加的严厉措施引起了1571年的新暴动，在卡斯蒂利亚各国将摩尔人疏散出境，最后在1610年把他们全部驱逐出西班牙。

上面所说的这个联邦制君主国的大概轮廓，需要再从两方面加以补充，才能看得清楚它的实际情况。虽然在原则上一个国家绝不从属于另一个国家，但是美洲的财宝，以及军队主要在卡斯蒂利亚征募，和国王和他身边的朝臣顾问均在卡斯蒂利亚居住这些因素，便使卡斯

蒂利亚处在盟主的地位。再加上卡斯蒂利亚人怀有民族主义的野心，他们不断地在其他国家中谋求文职和神职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所以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不久便被排斥在他们意大利属地的行政机关之外。尽管王室的政策助长这种趋向，尽管圭恰迪尼曾记载过伊萨贝拉说“阿拉贡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去征服它”，但无论是费迪南德或查理在位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践踏其他小国家自由的行动；以后的政策可就大不一样了。即使在1512年被征服和1515年被并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纳瓦尔，也保持着它的独立和它的政治组织机构；当时费迪南德遵循的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的联邦体制。推动帝国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重大的势力是一个机构，一个对帝国内大部分国家来说是公共的、极其强大有力的机构——宗教裁判所，它由宫廷通过“神圣至上的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而加以控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见后面第334—338页）。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联姻所形成的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统一，遇到了一连串的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去世之时（1474年），当时葡萄牙的阿方索五世提出了由胡安娜公主即“贝特朗氏”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要求，并侵犯该国。此时也和过去几年的情况一样，卡斯蒂利亚朝廷的亲葡萄牙派很得势，因此统一的西班牙是否能够形成就成了问题。卡斯蒂利亚是走向大西洋，还是走向地中海呢？从地理上和文化上来讲，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较卡斯蒂利亚和加泰罗尼亚语系国家更为接近。当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统一大有成功的希望，西班牙也就有可能免去后来因卡斯蒂利亚和加泰罗尼亚诸国的统一而产生的许多内讧；然而这种统一到了菲利普手里即葡萄牙及其殖民帝国更为强盛之时也必然解体。不过，葡萄牙曾在阿尔儒巴罗塔打败过卡斯蒂利亚军队（1385年），而保卫了自己的独立；所以当时卡斯蒂利亚在托罗的胜利（1476年）也就保持了两国间的分裂状态。

伊萨贝拉去世（1504年）之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王国的统一遭到了又一次危机。伊萨贝拉在遗嘱中指定她那精神错乱的女儿胡安娜公主为卡斯蒂利亚女王（各王国当然的女主人）。纵有过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协议，费迪南德还是因此被剥夺了王位，伊萨贝拉在身后又一次使卡斯蒂利亚从阿拉贡怀抱中分离出来。当时如果胡安娜离国出洋，不愿或不能问政（实际情况如此），费迪南德就可以被召回担

任“总督和行政长官”；当时如果费迪南德肯于宣誓必使王国励精图治，绝不分裂割据，形势也会改观。胡安娜的丈夫即奥地利的菲利普被承认为王夫。这些不明智的手段不久便产生了可想而知的结果。以菲利普为首的反费迪南德派得到了王公贵族的支持。尽管在胡安娜偕其丈夫自尼德兰渡海登陆之时，费迪南德曾建议卡斯蒂利亚由胡安娜、菲利普和他本人共同治理（1505年11月24日），但菲利普不久便得到卡斯蒂利亚的大军的支援，于是翁婿双方商定费迪南德撤回到他自己的各个王国（1506年6月27日）。如此，为统一西班牙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又重归于泡影。

阿拉贡国会（1502年）和加泰罗尼亚国会（1503年）曾宣誓对胡安娜效忠，但有一个条件：国王一有合法的男性后嗣，这个宣誓即归于无效。当时伊萨贝拉虽尚在世，但已染病（她可能死于子宫癌），不可能再有子嗣，所以这一条件的意义就更为明显。善于随机应变的费迪南德，既对菲利普没有好感，又不想看到外国王朝统治西班牙，便决心再婚，作为他政治和外交新方略的一步棋子。为了对抗菲利普及乃父马克西米连皇帝（菲利普以卡斯蒂利亚军队曾参与征服那不勒斯为口实，已经提出了对那不勒斯王国领土的要求），费迪南德灵敏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和他以前的死敌法国的路易十二签订盟约（1505年10月12日布卢瓦条约），并答应迎娶这位法国国王的甥女热尔梅娜·德·弗瓦。由于莱里达大主教加泰罗尼亚人霍安·恩格拉的从中斡旋，当菲利普由尼德兰来到西班牙登陆之时，婚礼已经举行（1506年3月18日）。费迪南德和他的新王后移居那不勒斯。为了保证这个王国确是他的属地，他开革了当地的卡斯蒂利亚官员，代之以亲信的加泰罗尼亚人。他的亲侄儿阿拉贡的约翰，代替了卡斯蒂利亚总督、伟大的将领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职务。

菲利普猝然死亡（1506年9月25日），整个局势又忽然大变。以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为首的摄政委员会成立。不安分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再度蠢蠢思动，过去支持过菲利普的人如今请求菲利普的父亲马克西米连皇帝出面干涉。然而希门尼斯和摄政者们力主费迪南德回国，相信费迪南德会采取坚决手段对付这些难以控制的贵族们。但是费迪南德从容不迫，先去巩固他的意大利属地，并与他的新交路易十二会晤（1507年6月）。直到夏末，费迪南德才去卡斯蒂利亚，着手对付叛逆分子，恢复人民对他的信任。最后，这位前任国王

在马德里国会（1510年10月）宣誓以他疯女儿的名义就任王国的行政长官。

热尔梅娜·德·弗瓦生下的一个男孩仅活了几个小时，因此由她得子的希望遂又烟消云散。年老的国王在晚年期间把他的慈爱都转而寄托在他的小外孙费迪南德身上。费迪南德后来是奥地利的统治者，在他外祖父的心胸和谋划中，他都比他哥哥、未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处于优先的位置。外祖父死后，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密切注意小费迪南德的朋友们，及其反对查理的密谋，小费迪南德父亲的继母热尔梅娜也从中推波助澜。查理前往萨拉戈萨接受阿拉贡国会承认为国王时（1518年），他所遇到的是一个分裂主义运动，其宗旨是要查理承认费迪南德是他的阿拉贡王位的继承人（而不传给他以后的子女）。

最后加入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国家是纳瓦尔。阿拉贡的约翰二世通过他第一次和纳瓦尔女王布兰卡的婚姻，一直领有这个王国，直到他逝世为止。他们两人所生之女埃莉诺嫁与弗瓦家族的加斯东第四，王权便经由埃莉诺传给她的儿子加斯东及其后代。加斯东之子弗朗西斯·菲布斯早卒无嗣，王位便传给女儿凯瑟琳，即让·阿尔夫雷特的妻子。但弗瓦家族方面却认为阿尔夫雷特家族是外族，声称王权已经由埃莉诺之子加斯东传给了他的弟弟约翰。这位约翰又娶法国路易十二之妹玛丽为妻，他是费迪南德后妻热尔梅娜·德·弗瓦的父亲。换句话说，费迪南德通过他妻子的关系，有理由对纳瓦尔王国提出严正的要求。其他还有一些情况，也使这场宗室纷争更加错综复杂。首先，纳瓦尔内部四分五裂，各派争雄。其次，当费迪南德和路易十二互争短长的时候，法国曾替弗瓦家族撑腰以反对阿尔夫雷特家族；但费迪南德一旦和弗瓦家族成婚，就再无此种必要，路易也就更换了他所保护的人。纳瓦尔问题也反映在外交动态方面。当费迪南德用布卢瓦条约来博取法国国王青睐的时候，纳瓦尔暂且被搁到了一边。但是到了费迪南德又一次在卡斯蒂利亚稳定了大局的时候（1510年），和法国的联盟对他就不再有任何用处。费迪南德此时已踏上了他最后的也是最光辉夺目的外交活动阶段，正在西欧霸权的问题上和法国一决雌雄。纳瓦尔介于双方领土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的位置，对两国都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意义。

热尔梅娜·弗瓦的兄弟加斯东·弗瓦在拉文纳之战（1512年4月11日）中阵亡，立刻引起了局势的变化。费迪南德发现他的妻子出乎意

料地得到了纳瓦尔的继承权利，便决心迅速而充分地利用这一事实。他还像以前一样，十分细心谨慎地策划这次政变。他一面秘密调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军队，一面佯作诱兵之计，继续和纳瓦尔的让·阿尔夫雷特谈判；然而心中却明白在他（费迪南德）和弗瓦家族通婚之后法国国王已被拉到了阿尔夫雷特那边。同时，他劝说亨利八世兴兵前往吉昂，表面上是要收复古代的英国领地，实际上是胁迫法国不敢去救援纳瓦尔，从而使自己避免卷入一场重大的战争。费迪南德扬言纳瓦尔国王组织分裂教会的小派别，因为他奉行路易十二在比萨召集的反对教皇的公会议路线；费迪南德从他反法的神圣同盟的帮手朱理亚二世那里弄到一张开革教籍的敕令（1512年7月21日），褫夺阿尔夫雷特家族的一切权利，除纳瓦尔人对阿尔夫雷特家族的忠诚誓言。同时费迪南德的间谍获得路易十二与让·阿尔夫雷特谈判的情报。费迪南德巧妙地将他得到的情报东拼西凑，草拟了一份他的两个政敌誓言进攻卡斯蒂利亚的假条约。他利用这个条约（1512年7月17日）作为借口，扬言自卫，亲自进攻纳瓦尔。第二天法国和纳瓦尔在布卢瓦签订了真的条约，根据条约让·阿尔夫雷特将支持法国国王抵抗费迪南德和亨利八世的进攻。

7月21日，阿尔瓦公爵率领卡斯蒂利亚军队从西面侵犯纳瓦尔，数日后阿拉贡军队又自南面入境。武力和诈术齐施，9月初纳瓦尔便被征服。费迪南德对他新王国的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他先把纳瓦尔并入阿拉贡王国，但（据苏里塔的说法）为了不使纳瓦尔人和阿拉贡人团结起来要求更多的自由和豁免权，他最后把纳瓦尔归入卡斯蒂利亚（1515年布尔戈斯国会）。然而在此种情况下，遵照的是阿拉贡的而不是卡斯蒂利亚的传统。新王朝的国王在潘普洛纳派有一名总督，作为他的代表；但在休会期间代表国会的常务会议、国内行政管理、法律以及审计局职权内的币制、税制和财政等一律不变；唯一的变化是在国王跟前设立了一个以阿拉贡的顾问班子为样板的纳瓦尔顾问班子，就治理这个新合并王国的问题向国王提供咨询。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们使自己创立的卡斯蒂利亚由乱入治，并建立了半岛各国政府赖以建立的新体制。通过长期的、稳步前进的过程，中世纪的行政组织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组织，并且经过扩充和整顿，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君主国家的统治工

具。据称有一次菲利普二世曾站在费迪南德的画像前喃喃自语：“我们的一切均他所赐。”

一切改革所环绕的中心原则是王室的中央集权。由于国家政治传统各异，居民和地方当局态度不同，卡斯蒂利亚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阿拉贡；虽然在大多数场合王家权力占优势，阻挠抵抗无济于事，例如费迪南德尽管遇到3年抵抗，还是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宗教裁判所。王室首先打击的是那些只谋私利，不肯安分守己的贵族，这些人随时准备叛乱，并从日益亏空的王室财产捞取恩赐（封地和赏钱）。如何使王室财产重新充盈起来，乃是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最首要的任务。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还以王室的名义兼任3个军功骑士团的大首领，兼并了其广大的田产。

对人数众多的具有爵位的人，只要他们默认王室的权力，同意提高王室的经济地位，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是不反对的。在他们即位之时，卡斯蒂利亚共有7个公爵，到他们统治的末年达到15个，而在查理五世即位初期共有25名大公。但他们并没有削减贵族的权力，这种政策是在查理五世时才执行的。16世纪初，贵族的收入估计是140万杜卡特。至于等而下之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即缙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据我们手头看到的最早统计，1541年分配补助金时，有缙绅（免于纳税的）108358户，平民（纳税的）784578户。这些数字仅是户数，每个阶层的总人数约为缙绅54万人，平民3923000人。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针对着高级贵族采取了行动。他们非常老练周到地把问题提交1480年的托莱多国会，但是让各个城市的代表提出建议。他们呼吁王室的收入应恢复到原来法定的比例，为了不致增加税收，以前没有适当的理由赠给贵族的产业应予复查和撤回。女王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受命执行这项复查工作，结果每年值3000万马拉维迪的收入从贵族那里流进了王室财库。从伊萨贝拉遗嘱中一项特殊条款，可以看出她对此心犹未已，她认为自己身为女王，应对王室财产负责，命令贵族们将并非他们本分应得而赐给他们或由他们保留的一切全部交回王室。许多王公贵族，如阿尔瓦公爵、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比列纳侯爵等人在女王死后遇到了一纸不受欢迎的命令，要他们把她生前赐予或批准的赏赐交回王室财库。叛变贵族所筑的大批堡垒和要塞一律分批拆毁，1480年，国会禁止新修城堡，同时禁绝私斗。在采取这些强制办法的同时，这两位天主教国王

还实行了一种吸收贵族望门参与朝政的政策。在贵族们被逐渐调离地方上的行政职务后，他们的职位便为出身低微的律师所代替；贵族们被允许保留特权（如不受肉刑、不因债务监禁）和他们的爵位，甚至还颁给新的爵位。同时，他们鼓励贵族们让自己的子女受到精心的培育，往往延聘意大利的教师，这些教师便前来卡斯蒂利亚传播文艺复兴的思潮。国王的全家率先提倡：伊萨贝拉学习过拉丁文，她的女儿如葡萄牙的伊萨贝拉和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也都学习过拉丁文。

强化王权和充实国库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兼并富有的军功骑士团的田产。1476年，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大首领去世，从罗马得到敕令，将此职位授给费迪南德国王，因为问题既涉及宗教又涉及军界，所以此事必须征得教皇同意。但是费迪南德十分谨慎从事，先让骑士团推选一名骑士担任此职，直到1499年那人死后这才执行教皇敕令，替他自己办事。在此期间，他兼任卡拉特拉瓦骑士团（1487年）和阿尔坎塔拉骑士团（1494年）的大首领。大首领的竞选一向引起各大贵族之间的角逐。国王亲自出马担任三地骑士团的大首领既免除了争吵，并把骑士团田产的大宗收入归王室所有。其实教皇敕令已把骑士团的收入赐给女王伊萨贝拉，她又在遗嘱中转赠给费迪南德。直到1523年，教皇才另下一道敕令，由查理五世终身担任大首领之职，经营骑士团人员的田产。不幸的是查理五世一直都是财政负担沉重，在1529年左右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趋向，就是抵押、出售和分割骑士团的田产及其收益。1519年，骑士团田产收益的稽征就以133000杜卡特之数包给了王室财政总管马德里的古铁雷斯。

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秩序，同时钳制那些蠢蠢思动的贵族，两位天主教国王利用了一个古已有之的组织“兄弟会”。中世纪时兄弟会是一种城市联盟，有定期召集的理事会议，有公印和民兵，并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会员义务、该会的职能和职司、对犯罪的刑罚以及对违犯者的检察起诉。一句话，它是个“国中之国”。如我们在1480年国会会议上见到的情况，这两位国王依靠各城市的支持，早在马德里加尔国会（1476年）上便通过了在国王督导下改组“兄弟会”。卡斯蒂利亚王国各城镇代表大会为新的“兄弟会”制定了章程，成立了一个各省代表参加的委员会（Junta），由国王委派一人担任主席。“兄弟会”有全权揭发和处罚抢劫、纵火和反抗王室的叛乱等当时不属于普通法院管辖范围的罪行。“兄弟会”的旧式武装部队得以恢复，成

为一种乡村警察队。所有城镇均需捐款维持“兄弟会”及其武装，而在每个城镇之内，无论平民、神职人员和贵族，人人都得出钱。弓箭队在道路上和乡村里来往巡逻，对犯罪者铁面无情。断肢或死刑都是寻常的处罚。贵族们恨之入骨，但他们的申诉没人理睬。“兄弟会”的工作大奏成效，它镇压犯罪和破坏治安分子，保护商旅安全。贵族们过去使卡斯蒂利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如今他们却不敢作恶。最重要的是，王室的权力愈益巩固，威信普及四方。20年间，“兄弟会”实现了自己的宗旨。1498年下达的法令停止了理事会和筹措“兄弟会”经费的摊派。量刑减轻，对其判决不服者许可向普通法院上诉。

两位国王在利用城市对抗贵族之后，又着手把城市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到了15世纪，中世纪的市政自治原则已经过时。市政府中贪污横行，卖官鬻爵的人物大权在握，他们不但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城市中而且可以在他们活动所及的边远城市中买卖和出赁官职。这就是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所遇到的和他们想要挽救的局面。局面的澄清要靠镇压这种不正之风，可惜的是市政的自由也受到了镇压。市政机关的职位现在不经选举，而用抽签的方式补充缺额，候补人的名字从一个口袋拈出，口袋里装的全是经过国王认可的人的名字。市政机关派有国王任命的官员，其中最主要的是市长，他们自1480年起由国王派往卡斯蒂利亚每个城市的市政府。梅里曼称这些市长是“专制君王的万能臣仆”。他们监督城市财政、城市公地并研究增加收益的妥善办法。摩尔人和基督徒的关系、赌博、地方苛捐杂税、司法机关等，也统归市长管理。通过这些市长，国内每一个人都置身在中央政权直接监督之下。

国会作为代议制国民大会的性质这时已经丧失殆尽，更不用说卡斯蒂利亚国会根本不同于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它一向就没有多大的财政权或立法权。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从不定期召开卡斯蒂利亚国会；1483年前开过4次，1497年后开过12次。前面4次也是为了国王需要国会作为反贵族的同盟军才召开的，由上面提到过的1476年和1480年国会即可见一斑。但王室的权力一经成为绝对专制，这个同盟军就再也用不着了。14年无国会（1483—1497年）的事实，就可说明当时国会已无多大用处。1497年后虽重行召开，但国会仅被用来承认王位的继承人和对意大利战争拨款。卡斯蒂利亚国会的议员没有一个是**有名有实的代表。国王可以召集他喜欢的任何人，想什么时候

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虽然按照惯例某些人士应在被邀之列。贵族和神职人员渐渐不去参加会议，原因是国会开会仅是为了筹款，而他们又不缴税纳赋。结果只剩下了36名城市代表，18个城市每城2名——有人说这一数字作为委员会来说人数太大，作为国民大会则又嫌太少。

决定天主教国王和罗马教廷关系的是两项原则：互相支持对方的政治利益；在西班牙和西印度的教会事务归入国王权力范围。在亚历山大六世即巴伦西亚人罗德里戈·博尔贾担任教皇期间（1492—1503年），双方关系特别友好，是西班牙在罗马有很大影响的时期。国王和教皇相知甚深，奉行相仿的政策，结果王室和教皇的权力同时增强。亚历山大六世的“主要事项”通谕（1493年5月3日），把海外将来发现而尚未属于其他基督教君主的大陆和岛屿一概永久赐给卡斯蒂利亚国王。次日，他又下了一道“至高的虔诚”通谕，在佛得角和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处画一条分界线，以划分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新发现的土地。当法国的查理八世派兵到意大利征服那不勒斯，并威胁教皇国家的时候，亚历山大六世在1494年底授予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二人“天主教国王”的称号，以表彰他们对宗教的功绩。其实这件事掩盖着一个外交上的动向，即鼓励费迪南德出面结成一个反对法国国王的同盟。这个同盟最后于1495年3月31日签订，称为威尼斯同盟，包括威尼斯共和国、马克西米连皇帝、米兰公爵、费迪南德和教皇，其目的是“保障意大利的和平安定、全体基督教国家的福祉，保卫罗马教廷的荣誉威信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利……”从此之后爆发了一连串事件，结果把那不勒斯王国又一次置于阿拉贡的国王的统治之下。

亚历山大六世和朱理亚二世所下的几道通谕，几乎把西印度的全部教会事务都交给两位君主。国王承担义务派遣传教士和建筑教堂，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征取全部什一税（1501年），并享有提名权，即对西班牙美洲全部教区和教会办事机构人选有向教皇提名的权利。经国王内定的主教往往在得到教皇批准以前即前往辖区视事。由于国王处于保护者的地位，他直接主管美洲的教会事务。只有一件事罗马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请求授权他们提名一位西印度最高主教，该主教有权不通过罗马处理多种事务。由于危险性十分明显，罗马教廷拒绝让步。到1524年即查理五世年代，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了一个西印度大主教，但这个头衔不过是一种荣誉，没有任何实权。

在西班牙各王国内，国王一贯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目的是在除教义以外的各个方面成立一种本国的教会体制。对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实行两条基本路线，即服从和改革。原来和大贵族一样不肯俯首听命的高级主教，结果也遇到了曾使大贵族们循规蹈矩的各样措施。由于提名权的运用，久而久之仅有忠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高级主教才能到教区补缺。提名权是在略经讨论之后由西克斯特四世在1482年授予的，这位教皇还承认了新的宗教裁判所和兼并骑士团的产业。

各个教派，尤其是寺院外的教士，在宗教改革前一段时期内的处境，在西班牙也并不比其他国家强。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两位天主教国王以改革本国一切修女和修士团体的全权。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奉命执行这项工作。希门尼斯是这个时期最卓越的人才之一。他有炽烈的热情和无穷的精力，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兼有圣芳济会修士的谦逊和政治家刚强的意志。他是许多教派和院外修士中的改革者。他创办阿尔卡拉大学（1498年），使他们接受教育和进修；他两度担任摄政，治理卡斯蒂利亚国政：一次是费迪南德不在卡斯蒂利亚国内（1506—1507年）期间，另一次是费迪南德死后，查理因菲利普去世而在尼德兰尚未到来之时（1516—1517年）。从1492年起他是伊萨贝拉的忏悔神父，尽管他对女王影响甚大，他并不是唯一替天主教国王出谋划策的人物。当时大多数教派分为两支：“严守教规派”严格遵守旧有的戒律，“圣芳济会修士”则纪律趋于松弛。希门尼斯则不懈不怠地强制所有教士严格遵守各种规定。希门尼斯自己的教派圣芳济会率先改革，至1506年完成，多明我会、本尼狄克会和哲罗姆派也随之改革。这些教派，尤其是圣芳济会，会众多至无数。前往西印度群岛的传教士，大都是他们派去的。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中出现了一群优秀分子，他们既有文化修养，又笃信宗教，同情伊拉斯谟的思想；在以后的年代里，伊拉斯谟的思想就影响到了反宗教改革的某些方面。

西班牙的国王从本土各王国的教会取得大宗财政援助。教皇西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认为对格拉纳达的征讨是对不信教者的一次十字军行动，所以对做出财政贡献的信徒颁发赎罪券（1482年）。这种办法时断时续，一直保持到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结束之后。查理五世对土耳其作战时重予采用，到后来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教士、十字军传教士遍访每个教区，到处游说教廷颁发赎罪券的谕示，并准

许在四旬斋期间食肉，其代价为每人施舍约68个马拉维迪。卡斯蒂利亚国会（1518年、1520年、1525年和1548年）曾多次指控此种陋规：有时人们不得不连续两天前往教堂，听取无休无止的说教，耽误日常工作，直到他们答应购买赎罪券时才算罢休。这种制度还传布到半岛和意大利的各个王国，1523年初次在美洲应用，但到1538年才正式推行。

费迪南德摄政（1510—1515年）期间，成立了一个十字军委员会，专司规定和征收每个主教区应纳的贡赋。正如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兼并军功骑士团田产的情况一样，人们看到，无处不在的德国银行家福格和韦尔瑟（1530年），热那亚的萨尔瓦焦和洛梅利诺（1538年）控制了十字军的收入，作为他们预支给国王款项的押金。在每人所交的68个马拉维迪中，1/4留给教会，余下51个马拉维迪扣除征收时的费用后全部上交王室财库，再由王室财库支付除实际上不存在的十字军以外的一切开支。希望每个人都应有一张赎罪券。在卡斯蒂利亚国王统治下应有赎罪券的人数，按教区分配（1523年？）总数在142万以上，但这个数字可能指的是户数。据估计1523—1525年的收入金额约为45万杜卡特。

经教皇利奥十世同意，神职人员都上缴一笔特别款项，称补助费。凡凭教会产业收取租金的神职人员、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1532年卡斯蒂利亚有470个修道院）均须完纳。一如前例，这笔费用的征收也往往包给热那亚银行家琴图廖内和格里马尔多。1536年，为装备22艘抗击土耳其人的兵船而征收的补助费，估计在193000杜卡特左右。

宗教裁判所是在天主教国王手中政教权力合一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机构。为了恰当地评价它在国王改组国家计划中的地位，应该提一提1478年成立该机构以对付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的教皇通谕，这个通谕发布于1476年将骑士团田产兼并为王室财产的教皇通谕之后，和在1480年国会通过的把以前赏给贵族的恩赐归还王室财库的法令之前。我们已知当时国王们头脑里所考虑的是什么问题，所以可想而知宗教裁判所的使命不纯粹是精神方面的使命。倘若它只有宗教上的目的，那么像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样，教会应该是最合格的负责当局；也就很难说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硬要把控制它的权柄从教皇手中夺过来是什么原因了。

自1391年可怕的对犹太人大屠杀以来，犹太人问题在卡斯蒂利亚一直是个严重问题。使犹太人问题在15世纪更加尖锐化的是那些改教的犹太人或新人教的基督徒，他们虽在国家中占着显要的地位，但是既得不到自己的教友也得不到基督徒的信任，他们被控在新信仰的外衣下保留旧的信仰，犹太教徒为保持其信仰的纯洁性，在犹太会堂中采取严酷手段对待叛教者。另一方面，许多改教的教徒为了在基督徒面前表白和捍卫他们自己，又激烈地反对犹太人。出身于犹太人和改教者的有一批著名的作家和医生，还有大部分商人。许多贵族世家委托犹太人经营他们的田产，相当多的主教也照样仿效，雇用犹太人替他们征收教区进项。国王也把税收、铸币、租金、营业执照、盐的专卖等包给卡斯蒂利亚最出名的犹太家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犹太人在很多地方不孚众望，但是在国王们考虑改组政府机构的时候，却往往要想到他们。这并不是说天主教国王就一点不受宗教的影响（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宗教人士的包围之中，不可能不受影响），也并不是说他们不想统一人民，解决改教者的社会问题及日益高涨的反犹浪潮。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贾（未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干练地往返磋商，结果从西克斯特四世那里得到了一道通谕，按照国王的意图设立宗教裁判所（1478年11月）。中世纪时期法国和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裁判官服从主教的权威，而在新的宗教裁判所却服从国王，事实上它就是卡斯蒂利亚国王的皇家宗教裁判所。渐渐地，国王过问裁判官的任命，由他们对管理和调整薪俸问题颁发指令，并监督将没收的财产全部交入王室财库。宗教裁判所实际上直到1480年才成立，这说明它当时受到过阻力。

宗教裁判所自1480年秋起在塞维利亚初施暴虐，结果改教的犹太人纷纷狼狈逃窜。罗马接到了报告，西克斯特四世见到这种危险，便收回他以前所作的各种让步（1482年1—4月），他设法把宗教裁判所拉回到中世纪的样板上来，亲自任命裁判官，并拒绝了费迪南德把皇家宗教裁判所引进阿拉贡王国的请求。同时，这位教皇对于因贪得无厌而造成的各种倒行逆施不胜感慨，于是对改教的犹太人实行大赦，以后又规定了宗教裁判所的诉讼程序：必须公开举行审判，并有向罗马教廷上诉之权。费迪南德报以一封怒不可遏的回信（1482年5月13日）：有人向他报告了教皇的决定，但他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教

皇陛下的责任是以适当的方法实行宗教裁判；即使教皇对皈依基督教的人作出此种让步，他也不打算接受。所以，他认为“应按我的意旨在本王国土地上”建立宗教裁判所。

与西克斯特四世进行的这些谈判，应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其他谈判联系起来看。1480年，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费迪南德是次年驱逐土耳其人的那个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但是在1482年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威尼斯正和弗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为敌，但埃尔科莱·德·埃斯特又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女婿，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的表兄。威尼斯在5月2日进攻弗拉拉，在是夏侵入；西克斯特四世不但支持威尼斯，并向路易十一乞援，允诺以支持他夺取阿拉贡家族的那不勒斯作为酬劳。费兰特遂向费迪南德告急，费迪南德虽无意在海外进行军事上的远征，也以贸易战恐吓威尼斯，并以武装干涉教皇国家威胁教廷，教皇慑于威力，立刻转向那不勒斯和弗拉拉一方。同年年底，威尼斯众叛亲离，只剩下热那亚一个盟国，但仍设法寻求法国干涉。在费迪南德的威胁下，西克斯特四世对意大利事务的态度完全改变，这种转变也许可以解释他在宗教裁判所问题上的变化。1482年10月10日，教皇终于向国王彻底投降。1483年2月23日他写信给伊萨贝拉，说由几位红衣主教组成的代表团正在研究她的请求。她的请求是让她和她的丈夫有权自行任命宗教裁判官和一名上诉法官，他则向她保证，他从来不认为这件事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然而，应该指出在西班牙，特别在阿拉贡，为宗教裁判所审理的案件做证的人都一再述说他们认为裁判所的目的是在剥夺被告的财产，他们对伊萨贝拉的责难多于对费迪南德。

费迪南德企图把宗教裁判所引进阿拉贡，却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在阿拉贡本国，反对的高潮是宗教裁判官佩德罗·德·阿韦斯在萨拉戈萨大教堂遇刺（1485年），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对一些首要的犹太家族进行迫害，但是那些和国王接近的人物几乎没有遇到丝毫伤害。在加泰罗尼亚，宗教界和非宗教界的所有权威人士，包括旧时宗教裁判所的成员，对费迪南德和他的新宗教裁判所对抗了3年（1484—1487年）。对加泰罗尼亚的民主传统来说，宗教裁判所着实有些令人憎恶的地方。同时犹太籍的和改教的商人携带货物和资本逃往法国，使加泰罗尼亚的贸易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面对罗马的敌对态度和费迪南德不可改变的决心，加泰罗尼亚只好屈服。宗教裁判所还被引进到了

西西里，撒丁和美洲殖民地。由国王身边的一个委员会控制的宗教裁判所是唯一能使国王在王国的全部土地行使其权力的机构。

1483年8月2日教皇敕令任命托马斯·德·托克马达神父为卡斯蒂利亚的总裁判官，10月17日又任命他为阿拉贡王国总裁判官。他的继任者迭戈·德·德萨是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被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任命为卡斯蒂利亚的总裁判官（1498年），后为教皇批准。9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阿拉贡王国的总裁判官。伊萨贝拉去世，两王国分立，各自分设宗教裁判所和裁判官。乌得勒支的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即未来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再度成为两地的裁判官（1518年），当西克斯特四世最后承认国王的宗教裁判所的时候（1483年），国王的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更确切地说是卡斯蒂利亚的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早就已经成立。后来以同样形式成立了卡斯蒂利亚的另一个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稍后又成立阿拉贡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不过两者往往同由一人主持。后来两会均并入“神圣至上的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

犹太人问题的结局是最后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1492年）。这不是个突如其来的步骤。早在1480年，伊萨贝拉就打算把犹太人赶出安达卢西亚。宗教裁判所开始活动后，各地就下令驱逐：在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两教区犹太人被逐（1483年1月1日）、在昆卡犹太人不得居留3天以上（1483年12月12日）、在布尔戈斯所有年轻的犹太人均被赶走（1486年3月）、在毕尔巴鄂犹太人不得过夜（1490年8月12日），等等。这些都还是在同格拉纳达作战时期采取的措施，当时有名的犹太人如阿布勒凡纳和亚伯拉罕·塞尼奥均签有供应基督教徒军队的合同。但攻下格拉纳达后，犹太人就再也用不着了。3个月以后（1492年3月30日）发布了驱逐令，显然是宗教性的狂热在这里起了极大的作用：穆斯林已经被赶走，现在该轮到犹太人了。若干年后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为表示他在帕维亚反法战争的胜利（1525年）而向上帝感恩，查理五世逐走了所有留在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约35000个家庭离开了卡斯蒂利亚各王国，也有少数人离开加泰罗尼亚，因为那里留下的本来不多。问题还不在他们的数字，而在于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辛酸。从另一方面看，通过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和后来驱逐穆斯林，西班牙的宗教统一是保持下来了。西班牙扮演了罗马天主教会急先锋的角色，但是在别的方面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犹太人是唯一有经济才能的公民，驱走了他们就使卡斯蒂利亚帝国在诞生以前就

注定了自己的厄运。这是一个文艺复兴正在传扬自由讨论的原则以促进科学和思想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宗教裁判所，不仅要从它在人身迫害方面做了些什么，而且要从它防止做了些什么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人们认为，建立一系列的委员会是哈布斯堡君主政府的特色，而费迪南德则是这种制度的创始人。中世纪时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枢密院，先是由马德里加尔国会（1476年）加以改组，后又在托莱多国会（1480年）最后加以改组。其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法学家代替了贵族（1名高级教士、3名贵族和八九名法学家），变成了宫廷的常设机构。或者说，原来贵族向国王提供咨询的会议，成了执行国王政策的文职人员的衙门。

费迪南德还领导着一个旧式的阿拉贡王国枢密院，该机构在阿拉贡的彼得四世时代即已组织完备，设有大法官法庭、财务部和王室总管办公厅，在略经暂时调整后，1494年重行改组。由1名副大法官领导，5名摄政或称枢密官（一般为法学博士），1名庭长主管大法官法庭，他的副手是1名财政方面的律师，代表政府和王室的利益，1名总财务官（无权对司法问题进行表决）和4名秘书分别主管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事务的办公室。副大法官和5名摄政必须是本国人，由阿拉贡在半岛上的3个省各出2名。总财务官不一定是本国人，后来国王的政策是任命卡斯蒂利亚人担任此职。还有一些委员会上面已经提到：“兄弟会”的委员会成立于1476年，到1498年便已废除；财务委员会（1480年仅初具规模，很久以后方完备），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1483年）和军功骑士团事务委员会（1489年）。

这些委员会中，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枢密院，以及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均系最高机构，也就是说除国王外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委员会或任何权力机构。西印度和意大利两个事务委员会，后来也属于这类最高机构。先后次序的复杂问题均在详加讨论以后加以规定：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枢密院地位相等，分列国王的右边和左边；宗教裁判事务委员会紧跟在国王身后，其他各会相随。各委员会按它们职司所属国家和职权范围就政策问题向国王提出意见和建议，提出请求任命的王家官员，分别就王国政府与该国当地政府的事务作出决议请求国王批准，同时还起上诉法庭的作用。

由大审计官和会计官管理的财政，被当作国王财产的一部分，而并非国家的财源。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失败、查理回到西班牙为止。后来查理任命尼德兰财政总监的拿骚的亨利，作为6人委员会的主席（1523年），监督卡斯蒂利亚的审计局。虽然查理皇帝把这个单位看作一个“财务委员会”，但1568年前的卡斯蒂利亚立法中没有正式使用过这个名称。在费迪南德摄政期间，审议局内有一部分人负责征集十字军的收入，由此产生了十字军委员会。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期间，卡斯蒂利亚枢密院兼管西印度事务。查理即位之初，卡斯蒂利亚枢密院中似曾附设一个委员会专管西印度事务；至少在拉科鲁尼亚国会（1520年）时期的一个文件中曾含糊地提到过“西印度事务”，然而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到1524年方始正式成立。

我们姑且离开西班牙各国的内政，把范围扩大一些，对费迪南德的外交活动稍稍做一考察。直到他的晚年，即女王死后，他虽然仍是阿拉贡国王但仅仅是卡斯蒂利亚摄政的时候，他多年来处心积虑的密谋策划才达到顶峰，他在各方面播下的种子得到了收成。

费迪南德的大部分外交活动是以前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外交活动的发展。他联合北非对抗土耳其人的地中海政策是沿袭以往的路线。对意大利进行干涉以及在意大利同法国发生利害冲突，始于1281年加泰罗尼亚人在西西里登陆，但此时仍是费迪南德国际关系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法国比意大利各国更难于应付，费迪南德大部分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要包围法国：他同英王及神圣罗马皇帝之子联盟，并以自己的女儿和他们联姻，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卡斯蒂利亚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向比较闭关自守，它在外交方面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是它和葡萄牙的关系。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在位期间以及他在（1476年及1479年）战败之后，西、葡两王国的关系是友好的，这种友好主要建筑在两国联姻上面。费迪南德的长女伊萨贝拉先嫁给被打败的国王的孙子阿方索（1490年），阿方索死后再嫁给贝哈尔公爵曼努埃尔（1497年），后来他成为国王。这一位伊萨贝拉死于产褥，她的婴儿本来可以统一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3个王国，却亦在两年后死去（1500年7月20日）。同一期间，两位天主教国王的独子王子约翰也病故（1497

年），他死后不久，他的妻子马克西米连皇帝之女玛格丽特生下一个死胎。承袭王位的唯一希望，现在放到了公主疯女胡安娜和皇帝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大公爵的婚姻上面。看来，西班牙各王国及其属地将落到一个外国王子的手里，这种前景并不使两位天主教国王乐观，但是却注定要出现。所以当仍旧志在统一整个半岛的曼努埃尔晋见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向他们第4个女儿玛丽亚求婚的时候，他的请求得到允许（1500年10月）。玛丽亚死后（1517年），他又一次和西班牙王室通婚，这一次娶的是埃莉诺，她是胡安娜和菲利普的长女，查理五世之姐。玛丽亚的儿子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从未实现他父亲素来的宏愿，但是这些婚姻关系，加上后来几次通婚，终于使菲利普二世在要求继承葡萄牙王位时处于有利的地位。

这些西、葡友好关系中，还包括对阿尔卡索瓦斯协定（1479年9月4日）的恪守。这一协定规定阿方索五世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的领土要求，并规定了两王国划分北非和大西洋的领地。加那利群岛被认为是卡斯蒂利亚属地，而葡萄牙则被承认领有佛得角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以及非洲的非斯和几内亚地区。1494年，即征服格拉纳达两年之后，教皇将非斯王国以东的全部北非穆斯林地区赐予天主教国王。在费迪南德担任卡斯蒂利亚行政长官（1506—1511年）的早期，曾对北非进行过数次远征，先攻下戈梅拉岛的皮农（1508年），后征服奥兰、布吉亚、的黎波里、特内斯和阿尔及尔（1509—1510年）。这些地方都拨给了阿拉贡王国，并由加泰罗尼亚进行贸易。后来在两国联合的总国会上（1510年蒙松）讨论过派一支十字军讨伐埃及和耶路撒冷的问题，为此阿拉贡王国所属小国家议决拨款50万镑。

地中海的关系使费迪南德和土耳其对立，而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的领土只相隔一个奥特朗托海峡。法国和土耳其同费迪南德的敌对，最后使两国结成联盟，成为基督教界的一件丑闻。

整个来说，中世纪的卡斯蒂利亚传统是对法国友好，但是在费迪南德手中，加泰罗尼亚传统却成了他所有王国的政策。法国并吞过鲁西荣和塞尔当的几个加泰罗尼亚的城镇，他先要和法国算这笔账。费迪南德的父亲约翰二世在加泰罗尼亚革命时的财政困难期间，曾拿这些城镇向路易十一抵押过30万克朗，后约翰二世无力付款，法国国王尚未到期就以抵押品抵销了债款。当法王查理八世进行布列塔尼战争（1485—1491年）的时候，费迪南德便使他陷入自己的罗网，拉拢

马克西米连皇帝、英国亨利七世一起反对他。1488年春，英王建议两国密切联盟，他的长子阿瑟和这两位天主教国王的女儿凯瑟琳结婚，费迪南德接受婚约的条件之一就是反对法国。

布列塔尼战争期间并没有对联盟国家提出很高的军事上的需求。但是，查理八世意识到他这次是怎样被围的，所以在筹划征讨那不勒斯的时候，他首先设法打破被围的局面，归还鲁西荣和塞尔当各城镇（巴塞罗那条约，1493年），而与费迪南德和解，同时要求费迪南德认为自己是法国一切交战国的敌人。查理果真要夺取那不勒斯，费迪南德自然不会赞同这个条件。于是费迪南德拼凑了一个反对法王的同盟——威尼斯同盟，参加的有威尼斯共和国、他本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德·博尔贾）、马克西米连皇帝、米兰公爵还有他的表兄，前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1495年）。费迪南德的计划如愿以偿，他的军队保卫并占领了那不勒斯，查理八世撤兵。此时费兰特去世，由他年老体弱的叔叔费代里戈接替（1496年）。费迪南德的伯父阿方索五世让位给约翰二世的遗嘱中，包括了西西里和阿拉贡王国，但是没有包括那不勒斯王国，于是费迪南德看到了恢复那不勒斯的机会。他的第一步棋是争取当时已陷入英、德两国围困中的法国国王。1496年到1497年的那个冬天，举行了王室和帝室之间的两个婚礼：胡安娜公主嫁与菲利普大公爵（1496年10月），女公爵玛格丽特嫁与胡安亲王（1497年4月）。同时威尔士亲王即太子阿瑟和公主凯瑟琳的婚事也重开谈判。

于是查理八世对停止在意大利的敌对行动表示欢迎，他通过秘密洽商被费迪南德拉进了两国分割那不勒斯的计划（1497年），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批准了这一计划（1498年）。威尼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使费迪南德有了派兵直至那不勒斯附近地区的口实（1500年）。国王费代里戈向费迪南德求援，费迪南德不理；现在费代里戈明白了危险来自何方，仓卒与土耳其联盟。这正是费迪南德早就等待着的借口。他和法王同时进兵那不勒斯王国（1501—1502年），瓜分了这个国家。最后一幕戏是可以预期的：胜利者之间发生了争吵。费迪南德再度施展外交策略，至少使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和罗马教皇保持中立，其余问题一概武力解决。法国失败了，不得不在一个条约（1504年3月）中承认费迪南德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

费迪南德的外交手腕相当圆滑，所以他能在愚弄和打败法国之后又取得法国的欢心，同时保持和英国的联系。伊萨贝拉死后，面临菲利普的野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可能威胁，他不能不保护自己，因此他更加靠拢法国。一场风云过去，他下一步关心的是恢复那不勒斯王国仍留在威尼斯手中的亚得里亚海各港口。趁列强均与威尼斯对垒的时机，他加入了一个新的同盟——康布雷同盟（1508年），加盟的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教皇朱理亚二世，佛罗伦萨、神圣罗马皇帝和路易十二。亚得里亚各海港唾手可得。这时法国在北意大利的地位变得相当强大，以致使旧时的盟友担心。同时，费迪南德作为卡斯蒂利亚摄政的位置也已十分稳定，不再需要法国。结果威尼斯、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和他的女婿亨利八世结成了反法的神圣同盟（1511—1513年）。费迪南德的一贯做法是设法参加胜利者方面。他在意大利没有得到更多的利益，可是他得心应手地调动了法国，使它处在有利于他征服纳瓦尔的地位。在他临终之前，费迪南德尚能支援英国反对法国弗朗西斯一世同盟（1515年10月）。他的这一政策在布列塔尼战争，尤其在征服纳瓦尔的活动中开花结果。查理五世继续维持这个同盟，结果菲利普与玛丽·都铎结婚。此后两国又各自分道扬镳。

与神圣罗马帝国友好原本是费迪南德用来反对法国的一步棋，结果却给西班牙带来他没有料到的发展。他的继承人查理在东西两半球均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中世纪闭关自守的卡斯蒂利亚如今跃身而为世界强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光荣。然而同时它的周围也积累了许多不可解决的难题，耗尽它的人力、物力，逼着它做出无尽无休的牺牲。费迪南德播下了种子，却由查理来收获果实。这位年迈的国王虽然奠定了一个帝国的根基，但是他很难预料这个帝国日后发展的规模。在查理即位和当选神圣罗马皇帝之初，人们幸运地见到了的仅是未来的光明一面。

第十二章 对意大利的侵略

查理八世入侵以来，不到20年的时光，意大利人就已不胜感慨地谈论法国人到来以前那些快乐的日子了。他们缅怀1494年前那些和平与繁荣的年代，那时才能出众的人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宫廷和城市的生活充满新奇和高尚的娱乐。虽然他们留恋过去，然而15世纪后半叶确实可视为意大利文明的鼎盛时期。由洛迪和约（1454年）到法国的入侵，40年来意大利统治者致力于建设国内的和平与秩序，并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与把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相比，它们之间的争执仅居次要地位。小规模的战事不足以对他们追求富裕和扶植艺术造成严重的障碍。虽然当时对意大利的商业优势的挑战已十分激烈，商人们仍有钱财用于绘画、图书和建筑，而王公贵族更以他们充任雇佣兵首领的收入，把他们的都城装扮成文艺复兴的艺术和学术中心。各个国家在它们还享有独立与和平的时候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在16世纪初结出了光辉灿烂的硕果。从反面看，国外列强对意大利事务愈来愈感兴趣。意大利统治者们在发生内争时总是寻求法国支持；正是由于这种恶习，才使安茹家族和奥尔良家族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领土要求常常成为突出的问题。西班牙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对于意大利的独立是个还未充分表现出来的隐患。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宗主权这个政治因素，由于威尼斯和奥地利王室之间因意大利东部边界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而更显示出了实际的重要性。正在此时，川流不息的知识探求者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其中不仅有穷苦的学者，而且有在本国位居要津有权有势的人物。此外还有前来各主要宫廷的外交人士和为商务而来的客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制造了一种印象：意大利是个艺术的宝库，它富庶然而四分五裂，军事力量薄弱——是个可以战而胜之并且不难到手的战利品。

在意大利，15世纪前半叶是一个战争、扩张和巩固的时期，出现了5个旗鼓相当的国家。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教廷和那不勒斯尽管规模和性质都相当不同，但大致上保持着政治势力上的均势。米兰的几代维斯孔蒂公爵使一大批各有强烈的分裂主义传统的城市结

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由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所产生的各种实际效益维系着它。最后一代维斯孔蒂公爵死后（1447年），试行了一段共和政体，但归于失败，于是当时最主要的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成为米兰公爵。他上台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他和维斯孔蒂公爵的私生女的婚姻，而是在于拥他为公爵的公民的民意，还在于意大利各国认为维斯孔蒂家系的延续合乎它们的共同利益。控制法意之间几条主要通道的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公国，是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同时也是对威尼斯领土扩张的一种钳制。随着洛迪和约使威尼斯垂涎已久的克雷莫纳落入米兰之手，斯福尔扎东征西战的日子便告结束。但是他保留着优越于意大利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也许只有那不勒斯除外。公爵家族的骑兵，加上一支步兵和若干炮兵，是常备军的核心；而雇佣兵则大部分是戚族和仆从，他们在本地招兵买马，把米兰看作自己的祖国。米兰在历代斯福尔扎公爵统治之下繁荣昌盛起来。公国由于大兴水利灌溉，使农业资源得到开发，种植桑树，使丝绸业迅速发展。在维斯孔蒂时代建立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米兰的多莫大教堂和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隐修院，此外还有斯福尔扎城堡，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修建的大医院，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教堂和公共建筑。斯福尔扎家族由于未能得到神圣罗马皇帝的正式授权，便千方百计取宠于民，使他们能进行统治。虽然那些自称教皇党的人在反对派中形成一股不满的暗流，但直到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成为他侄子吉安·加莱亚佐的监护人时为止，米兰公国大部分时间是统一而安定的。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当权（1480年）以后，米兰进入了它最伟大的光荣时期，而它的困难也由此开始。

15世纪前半叶，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不断取得土地，打破了它历来的孤立。它的疆域由阿尔卑斯山直至波河，由阿达河直至伊松佐河，成了意大利政治中的重要因素。马基雅弗利认为威尼斯衰落的原因在于它在意大利半岛上拥有了领地，从而不得不招募雇佣兵扩充军队，而它以前的军队只是由本国公民组成的海军。事实上，威尼斯在对付雇佣兵首领和管理所属城市方面都是内行，很是成功。对于严厉但公正，并按时关饷的雇主，雇佣兵是敬重的，并且大多数能忠诚地为他效力。威尼斯用从所属城市征得的税款来供养的步兵，曾在对康布雷同盟军队的作战中声名卓著。威尼斯以盟友的态度对待境内城市，不把它们当作下属，并且以此自豪。下等阶级尤其受益于威尼斯高水平的司法和低税收，即按从东方进口货物的购买价格征收间接

税。即便贵族们对在他们自认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城市中派驻威尼斯的总督表示不满，他们还是承认威尼斯统治的优点，对此并无异言。在威尼斯国内，贵族独揽政权，因而获得非常方便的进身之阶。然而统治阶级中财富分配相当均匀，因为政府控制不让任何一个家族单独积累大量钱财。非贵族出身的人可以通过经营自己的行业公会和参加文职工作来表现自己的行政能力。政府的政策是保障每个阶级的利益：由工商业者起直到国营兵工厂工人和划船的桨手。市民方面受到的是一种传统教育的熏陶，这种传统认为圣马可的共和国^[1]是有史以来除了罗马以外最伟大的国家，并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威尼斯的弱点主要是它引起了邻国的忌妒和猜忌。作为意大利半岛的新兴国家，它的利益是靠占其他国家的便宜得来的。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米兰、曼图亚和弗拉拉都因它的兴起而日益穷蹙，全都因它贪得无厌的领土欲望而感到惶惶不安。它的海外利益以及它与土耳其的斗争，使它迟迟不与意大利各国结盟，还以自私自利而闻名。正由于它讲究效率，因此它在那些不善于经营管理的国家中更不受欢迎。正在此时，它与土耳其的对峙削弱了它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危及它的商船的安全通航；而随着绕道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的发现，出现了它的香料独占贸易可能遭到致命打击的前景。尽管如此，当菲利普·德·科明^[2]在1494年前去访问的时候，威尼斯从外表上看来正在繁荣的顶峰，是一个建筑富丽堂皇，娱乐不惜靡费，政治清明，公民团结的城市。

在早年美第奇家族上升的时候（1434—1494年），佛罗伦萨政府老练地迎合了市民的性格和理想。全民一致献身于共和国的事业，但是阶级与阶级、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倾轧，使顺应民意的政府不能有效地施政。组成城市统治阶级的是那些大行业公会的成员，即与纺织业有关的商人，他们在全欧各地都有商业利益。在9个主要的市政官中他们占7个，因此他们能够左右佛罗伦萨的政策。他们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的内部纠纷使政府软弱而分裂，并使那些处境不如他们的阶级得到发泄不满情绪的机会。美第奇家族在法律上虽然仍系普通公民，他们却给政府注入了它先前所缺少的力量和连续性。宪法上某些条款的修改使他们更易于对国家进行控制。在每两月一次的市政官员选举中取消了抽签的选举办法，改由专门小组遴选，这就大大地保证了主要市政官员一律由他们的亲友充任。1480年成立了一个70

人委员会，其职责包括从它的70人中遴选主管财政和外交的各委员会的成员，表明权力更进一步集中到美第奇家族的一小撮人手里。这些变化虽然重要，但效果如何取决于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他们自愿地先后接受了柯西莫、皮耶罗和洛伦佐等美第奇家族成员的领导。美第奇家族这种凌驾一切的地位，其实是大多数市民所欢迎的。事实证明，与大银行合作，会对商人有利。城市内食品供应充足，为慈善事业开支大量金钱，娱乐享受人人有份，这一切都使下层阶级感到满足。学者和艺术家受到慷慨的赞助，美第奇家族的府邸成了各地游客前来欣赏的宝库。由于他们与银行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天才，美第奇家族把佛罗伦萨提高到很有影响的地位，与它军事力量的软弱形成鲜明的对比。洛伦佐在晚年成了意大利和平的保护人，其他国家都要请求他帮助和提供意见。他和王公贵族结为朋友，平起平坐，但由于他从小在佛罗伦萨学习，言谈、举止和写作都显出他是个共和国公民和公仆。美第奇家族登上统治地位的资本，就是他们提高了佛罗伦萨的名声，至少在名义上保持了佛罗伦萨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地位自始至终是不稳定的。

自从天主教大分裂结束，马丁五世回到罗马之时起，罗马教廷即致力于将在教皇宗主权控制的整个意大利领土置于教廷直接统治之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教廷遇到了很多方面的反对。罗马城在内心里还是共和主义的，即使在它由于作为教廷所在地而获得威信的时候也是这样。罗马的名门望族在红衣主教团有自己的代表，在城市中有房屋，在城外有大批田产，他们有许多机会来阻挠教廷的政策，而他们也没有放过这些机会。佩鲁贾和波洛尼亚之类城市、罗马涅^[3]那些作为教廷代理人而进行统治的专制者，几乎都是各自为政。教廷对那不勒斯的宗主权，只不过是一些怀有二心的那不勒斯贵族和争夺王位的人们手中一件可资利用的工具。教皇主要依靠自己的亲戚来扩大自己的权威，这些人有的是他们提升为红衣主教的神父，有的是他们授予土地和官职的世俗人士。西克斯特四世尤其把族阀关系变成了一门高明的艺术。里亚里奥和德拉·罗韦雷两个家族的子侄不是当上红衣主教，就是被封为城市贵族。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一度几乎主宰了整个罗马涅，甚至想征服弗拉拉。意大利主要强国都想充当罗马涅当地统治者的保护人以维护它们自己在罗马涅的势力，由于这些国家的一贯反对，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这些计划受到了挫折。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阻碍，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仍然有利于世俗权威的发

展。意大利的统治者是半心半意的基督徒，而且有很强的反教权情绪，但是他们仍然认识到褫夺教权和开除教籍对于他们对人民不太牢靠的统治会起恶劣的影响。属于教会国家的专制君主和共和国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教皇的宗主权，他们的目的一向是与罗马教廷和解，这样，教廷就会尽一切可能来保障他们的安定和行动自由。因此，罗马教廷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要求，等待时机将其实现。

那不勒斯在15世纪还是一个封建王国，还保留着诺曼征服者强迫它接受的那种国家组织的烙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生的贵族都在那里拥有广大的田产，这些贵族向往的是在自己的领地上过小国王的日子而不受王国的干预。15世纪两个卓越的君主——阿拉贡的阿方索和费兰特尽其所能来扩充王室的权力。约安纳二世去世（1435年）后，阿方索提出应由他继位，但是过了7年他的权威才建立起来。他和他的继任者改革了财政，靠佛罗伦萨资本的帮助扩大了贸易，并课征重税。反对他们苛政的人受到无情镇压，谋反的贵族或被处死，或被监禁、流放。阿方索（1458年卒）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王公，是个建筑者和学术爱好者，他的宫廷中聚集了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来的人才。费兰特（1494年卒）仿效他的父亲，倒不是因为他个人对艺术的爱好，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保护艺术具有政治价值。由于他是私生子，他不能要求继承西西里的王位，西西里便和阿拉贡王位一起在他父亲去世后传给了他的叔父约翰。法国安茹的雷内也自称为那不勒斯的继承人，经过与雷内的长期斗争，费兰特才取得了那不勒斯。他的王国只限于意大利半岛本身，他的王储和斯福尔扎家族联姻，他的女儿嫁给弗拉拉公爵，他也就加入了意大利王公贵族的圈子。阿拉贡国王治下的那不勒斯往往成为意大利政治中一个骚扰不安的因素。在宗主权问题上与罗马教廷经常发生摩擦。费兰特每年按例向教皇赠送白色坐骑一匹，以示他的藩属关系，但他拒绝此外再附加任何贡品。他一向是罗马贵族的盟友，而教皇则支持受压制的那不勒斯贵族。费兰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是个野心很大的好战分子，他抓紧一切机会在意大利扩充势力，他也没有忘记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曾指定他的祖父为米兰的继承人。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是亚得里亚海上竞争的对手，威尼斯竭力想取得阿普利亚的几个港口。这些局部性质的冲突对于阿拉贡王朝的外敌倒是一种鼓励。威尼斯和罗马教廷都鼓励安茹王朝的王公们重申他们对那不勒斯的要求，而那不勒斯国内和流亡在外的安茹派也一直不断请求法国出兵。阿拉贡的国王们此时正十

分忙于西班牙事务，但是他们希望旧西西里王国的海岛部分和半岛部分归于统一，所以他们乘人之危，立即利用他们的表兄弟们在那不勒斯的困境。1480年8月，土耳其军队占领奥特朗托，费兰特呼吁意大利各国帮助驱逐敌人，但未得响应。第二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危险才算过去，然而这提醒人们，意大利是有隙可乘的。

小国之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弗拉拉，统治者是埃斯特家族，该家族同时领有神圣罗马帝国的采邑摩德纳。弗拉拉属于教会统治范围的国家，虽然博尔索·埃斯特在1471年被封为公爵，但历任教皇并未放弃他们直接统治这个城市的目的。威尼斯也想侵犯弗拉拉以扩大它的领土。在这双重威胁之下，埃斯特家族请求米兰保护，在米兰公国沦于法国人之手后仍然如此。弗拉拉的长期独立，不仅要归功于它的盟国，也归功于埃斯特家族长时间深得民心的统治。埃斯特侯爵在12世纪末成为弗拉拉领主，他的继承人在弗拉拉统治了400年。与这个古老的统治世族相比，斯福尔扎和美第奇家族都是些暴发户。正是埃斯特家族奠定了意大利的社会风尚，骑士精神传统和自由城市传统融为一体，社交礼仪具有古典文化的色彩。弗拉拉的宫廷为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阿廖斯托的作品提供了相匹配的背景。曼图亚是个又穷又小的国家，是它的强邻米兰和威尼斯两国野心的牺牲品。由于它位于明乔河畔沼泽和湖泊间，地形宜于固守，也由于统治它的贡萨加家族的领主们英勇善战的素质，它才得以保全自己。140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文策尔封其在位领主为曼图亚侯爵，侯爵的两个继承人又和德意志王公贵族通婚，更加强了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贡萨加家族的政策取决于他们充当雇佣兵首领这种职业。他们在各个时期曾为各主要的意大利国家征战，用他们挣来的钱把曼图亚的城堡变成了一座宏伟的文艺复兴宫殿，以后各代人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点缀。贡萨加家族和瓦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公爵关系密切，两家的情谊在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到曼图亚的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的学校上学时开始，后来又通过联姻使之更加巩固。这位费代里戈是他那个时代军人兼学者的突出典型。他在瓦尔比诺创办了一所很大的图书馆，并兴建了一所府邸，在外国入侵的时候成了许多逃难的家族的避难所，卡斯蒂廖内的《侍臣论》一书中关于礼节理论的议论就是以此作为背景的。由于西克斯特四世安排的婚姻，瓦尔比诺公国在费代里戈之子去世之后传给了罗韦雷家族。波洛尼亚在15世纪下半叶仍然是一个共和国，在理论上，政府由教皇使节和市政官员共管。实际上，真正的

权柄操在乔瓦尼·本蒂沃利奥手里，这位第一公民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共和国，并使教皇使节的权力名存实亡。本蒂沃利奥当过米兰的雇佣兵首领，他在米兰的支持下努力使罗马涅诸城市保持自由，受地方贵族治理，而无视教廷的要求。他兴建的府邸与曼图亚和乌尔比诺等地的府邸一样富丽堂皇，但在朱理亚二世占领波洛尼亚后被他的敌人夷为平地。佩鲁贾和锡耶纳也顺应时尚，把共和国政府交给一个居首要地位的公民家族掌握，作为对它们的和平与独立的最可靠的保证。所有这些较小的国家各有自己当地的绘画流派，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爱好，都对丰富多彩的意大利文明做过贡献，实际上也都是意大利统一的障碍。

在这些年代里，1455年意大利同盟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一直是维持和平的因素。为了建立一个抵抗无论来自意大利或外部强国的侵略的防御体系，意大利同盟曾制定过一套复杂的机构，但从未得到实现，对其成员提出了强制条件，也在提出来后旋即遭到破坏。同盟虽未能防止战争，但是表达了一种信念：共同的利益和各国的利益都要求意大利境内实现和平团结。它一直是政治家们呼吁实现的理想，较小的国家则认为这是他们继续生存的保证。同盟于1480年正式续订25年之后，和平的保持主要依靠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密切谅解，和洛伦佐·德·美第奇排解争端的不懈努力。当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对弗拉拉发动进攻的时候，3个强国的干涉为埃斯特家族保全了这个城市。主要是由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调停，罗马教廷和那不勒斯间的局部战争没有扩大，不久即告结束。正当米兰和那不勒斯关系恶化，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也经不起出兵意大利的诱惑的时候，洛伦佐于1492年4月去世，这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法国的政权由精明练达的博热的安妮^[4]之手转入查理八世之手后，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见向这位年轻的君主提出。一些人极力促使他进军意大利，以维护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的领土要求，其中有萨莱诺亲王安东内利·迪·圣塞韦里诺。作为1486年叛乱中叛变贵族的首领，他害怕费兰特的报复而逃到了法国宫廷，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安茹派在那不勒斯的悲惨遭遇和他们愿为查理效命的热情。虽然查理八世继承那不勒斯王位的要求毫无根据，但按照安茹的雷内的遗嘱，他是安茹家族的事业的公认代理人。查理八世少年时多病，深受骑士浪漫传奇的熏陶，梦想自己成为英勇的征服者，在取得那不勒斯后，可以

用它作为基地，向土耳其进行十字军东征。他拥有久欲一试锋芒的法国精锐陆军，认为这次征伐将对国家的荣耀和统一做出贡献。查理八世的谋臣之中，财政官员纪尧姆·布里松内和博凯尔司法总管艾蒂安·德·维斯克热心表示支持。另一方面，由路易十一的传统培养出来的老臣如菲利普·德·科明则认为远征意大利是一场仅是为了荣誉的战争，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据一位佛罗伦萨的使节记述，查理八世一向是按照最后一个和他一起的人的意见改变主意。这一回在两种意见之间久久地举棋不定。要不是意大利方面又有人怂恿，入侵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自从阿拉贡的伊萨贝拉嫁给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之时起，她就一再向她在那不勒斯的父亲和祖父抱怨说，她和她的丈夫凡事都得听从摄政洛多维科，她本人则被洛多维科的妻子贝亚特里切·埃斯特剥夺了宫廷第一夫人的合法地位。卡拉布里亚的阿方索找到了一个机会重申自己对米兰的权利，从那不勒斯方面来的进攻似乎即在旦夕。洛多维科更加恐惧，于是决定利用法国入侵的威胁作为自卫手段。1493年4月，在调解失败之后，他公开宣布自己是法国的盟友和支持者。根据过去的先例，他可能以为这种威胁未必会成为现实，他也可以像其他意大利国家一样，利用这种威胁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不幸的是这次法国人真的来了。米兰的合作给查理打开了进入意大利的门户，现在的形势对主张入侵的一派有利。红衣主教圭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来到法国宫廷后，更是火上加油。在英诺森八世死后的选举中，他为罗德里戈·博尔贾即现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所击败。他想查理八世的到来一定会使他又怕又恨的敌手陷入困境，便以他特有的那种热情促成这次侵略。查理八世原想说服亚历山大六世把那不勒斯封给他，但是有了罗韦雷在他身边，他的十字军精神一有机会就可能重新昂扬起来，使他幻想召开一次宗教大会，在会上罢黜这位教皇。在进攻意大利之前，查理八世又通过巴塞罗那和森里斯两个条约取得阿拉贡王费迪南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的默许。巴塞罗那条约把鲁西荣和塞尔当归还西班牙；森里斯条约则将弗朗歇-孔泰和阿图瓦交还给勃艮第。于是，路易十一旨在加强法国在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的边界而取得的一切成就，均因为征服意大利这个幻影而前功尽弃。

由于法国对意大利的侵略迫在眉睫，意大利各个强国不得不决定何去何从。米兰主意已定，但罗马教廷和佛罗伦萨却彷徨歧途。亚历山大认识到反对法国将会危及他作为基督教世界首脑的地位，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无能力保卫教廷领地反抗那不勒斯的。他认为最近的危险是最可怕的危险。于是承认费兰特死后王位由阿方索继承，同时告诫查理八世不要扰乱意大利的和平。在佛罗伦萨，与法国结盟是以长期的传统为基础，并且通过贸易往来而巩固的，但是1480年以来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政策基调是与那不勒斯友好并阻挠法国干涉。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再也无法统一，做出抉择的任务落在了美第奇家族愚笨的孩子皮耶罗·德·美第奇的身上。有勇无谋的皮耶罗决定站在那不勒斯朋友一边。威尼斯如果坚持抵抗法国，很可能会改变事态的发展，但是这个共和国按照习惯采取了严守中立的立场。波洛尼亚的乔瓦尼·本蒂沃利奥曾向米兰的使节示意，要他的主人好好考虑一下法国人进入意大利的问题。他说，他本人的意见是意大利人应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对敌人进行报复，而不能让野蛮人插足他们之间。波洛尼亚扼艾米利亚大道要冲，本可以成为法军南下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嘴上说得很巧妙，但乔瓦尼·本蒂沃利奥既怕得罪米兰又想从教皇那里弄一个红衣主教头衔给他儿子，所以摇摆不定，直到事情发展到他已无力对其施加影响的时候。这些小国的典型立场，就是像这样只顾地方和个人的利益，这是意大利人的根本弱点，也是法国人胜利的原因。

阿拉贡的阿方索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防御计划，并拥有足够的军队执行这一计划。国王的兄弟费代里戈将率领那不勒斯舰队封锁热那亚，陆军主力则在罗马涅固守阵地，这样，再由皮耶罗·德·美第奇在托斯卡纳配合作战，即可阻止法军跨越亚平宁山脉。实际上无论哪一个环节都遭到惨败。由于延误了动员，所以在阿拉贡舰队开到热那亚之前，奥尔良公爵就进入热那亚。拉巴洛本来是由阿拉贡支持下的一个热那亚流亡者所占据，但当法国舰队在拉巴洛海岸出现的时候，费代里戈宁可撤退也不愿和法国海军接火，让拉巴洛去听天由命。在佛罗伦萨，由于皮耶罗·德·美第奇支持那不勒斯，结果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尤其是布匹业中的工人，他们因法国对佛罗伦萨货物的禁运而没有工作可做。当查理八世通过米兰领土进抵皮亚琴察的时候，欢迎他的是美第奇家族旁系的代表，他们向查理八世保证佛罗伦萨完全支持法国。当他到达托斯卡纳时，皮耶罗·

德·美第奇秘密前往法国军营，请求查理八世予以保护。萨尔察纳、皮埃特拉桑塔、里窝那、比萨等地的要塞都拱手交给了法国人，通往佛罗伦萨的道路于是畅通无阻。这就意味着皮耶罗的大权宣告结束。在皮耶罗弃城逃亡国外之后一个星期，查理八世于1494年11月17日入城，备受尊崇，宛如萨沃纳罗拉在讲道中所预言的上帝派来复兴意大利的使者。他在离开佛罗伦萨前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该城承认查理是佛罗伦萨自由的保护人，同意对他进军那不勒斯提供财政上的捐献。从此以后，直到1512年法军被逐出意大利，佛罗伦萨除名义而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的藩属。与此同时，法军沿艾米利亚大道长驱直入，由阿方索的王储费兰蒂诺指挥的在罗马涅的那不勒斯军队望风而退。据守在罗马以北各要塞的奥尔西尼家族，丝毫也没有阻挡侵略军的胜利前进。查理八世进入罗马，也和他进入佛罗伦萨时一样未遇到反抗。他离开罗马前和亚历山大签订一个条约，取得了通过教廷领土进兵的权利。阿方索见弃于盟国，遂让位给他年轻而又深孚众望的儿子费兰蒂诺，然而费兰蒂诺也抵挡不住法国的进军。1495年2月22日，查理攻进那不勒斯。不久，椭圆堡和新堡两个要塞投降，费兰蒂诺逃往伊斯基亚岛，整个王国几乎都陷于法军手中。查理八世未经一战就取得了那不勒斯。法国炮兵证明自己对于轰击外围的堡垒有它的优越性，而攻占堡垒之后洗劫抢掠之凶吓得人们不敢抵抗。盟国的军队四处溃逃，各大城市见救援无望，纷纷向敌人敞开了门户。

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失掉他所得土地，正和他取得这些土地时同样神速，这里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法国人在那不勒斯的所作所为。土地和官职都归法国人占有，支持他们的安茹派并没有比阿拉贡的追随者得到更好的处境，因此愤愤不平。供应久缺，行政腐败，占领军以他们的残暴、放纵和肮脏而恶名远扬。查理离开那不勒斯前各地即已发生起义，不久费兰蒂诺和阿拉贡的费代里戈便成为他们的首领。他们由西西里偷渡入境，而以西西里作为重新收复意大利半岛本土的根据地。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决心阻止法国在那不勒斯建立统治。他的军队由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指挥，在西西里集结，待命前往那不勒斯，重立费兰蒂诺为国王。他通过外交将互相敌对的各派结合为威尼斯同盟。该同盟于1495年3月31日订立，缔约各方有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威尼斯和米兰，其目的是共同防御它们的国家，反对侵略。从形式上看，威尼斯同盟一如过去40年内意大利各国间为了维护和平而签订的各种协定。威尼斯同盟受到了欢迎，因为它

标志着导致法军入侵的那种意见分歧已经结束；但是这个包括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同盟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说明意大利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1495年7月6日，在查理八世返回本国的途中，弗兰切斯科·贡扎加统率的威尼斯同盟军在塔罗河谷与法军交战。福尔诺沃战役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方面获胜；不过意大利人损失远为沉重，而查理则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伦巴第，这些事实说明法国方面占了上风。然而意大利人作战英勇，贡扎加的包围行动几乎得到成功。同盟军纪律松弛，各方面的力量不能通力合作，以及法国精骑兵团无与伦比的效率，这些因素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米兰驻波洛尼亚的使节写道：“我们最满意的，是法国人在意大利遇到了敢于与他们较量的军队，知道了意大利的武器和他们的一样锐利。”^[5]这一点，再加上意大利人截获了整个法国辎重车队，促使贡扎加向曼特尼亚定制了一幅维多利亚圣母像，以纪念他在塔罗河的功勋。由于米兰参加了威尼斯同盟，奥尔良的路易便得到一个要求拥有米兰公国的机会，因为他是瓦伦蒂娜·维斯孔蒂的孙子。自从查理第一次来到意大利以来，路易一直待在他祖母的陪嫁城镇阿斯蒂，他从阿斯蒂占领了诺瓦拉，被同盟方面的军队紧紧围困。但是，查理八世无意帮助路易的事业，他急于回国，而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同样急于让他快走。两人终于签订了维切利和约（1495年10月10日），而引起双方阵营中要求把战事继续进行下去的那些人的愤懑。和约规定把诺瓦拉归还给米兰，洛多维科还允诺在法国再进行远征时支持查理。这时，法国的总督蒙庞西埃在那不勒斯作战节节败退。到1496年春，费兰蒂诺已完全收复了他的都城。蒙庞西埃本人和他部下许多人都死于法国人称为那不勒斯症的时疫。剩下来的少数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回国。查理八世后来继续计划新的远征，直到1498年4月7日逝世，才结束了他的征服美梦。

在意大利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像佛罗伦萨那样由于法国人的到来而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若不是法国人的到来，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声名也许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传道者、基督教信仰的阐述者和罪行的斥责者。作为亲法联盟和佛罗伦萨新宪法的拥护者，他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从查理八世的到来和皮耶罗·德·美第奇的垮台开始。在危急关头，各阶层的人们都颂扬他是自由、和平和繁荣新时代的先驱；通过他的影响，革命才得以不流血地进行。以威尼斯为样板的大

议院，也主要是由于他的鼓吹才成立的。这个大议院拥有3000名议员，使数目更多的佛罗伦萨人能够有效地行使公民权利。大议院得到政治评论家的好评，在开始时亦能深得民心。比萨在法军占领其城堡的时候叛离佛罗伦萨，收回它的最大希望在于同法国友好。幻想旋即破灭。比萨战争使佛罗伦萨财源异常枯竭，而同情比萨人的法国司令官又把该城堡交还给他们，使情况更为恶化。当佛罗伦萨拒绝参加威尼斯同盟的时候，同盟即通过派军援助比萨，而对佛罗伦萨施加压力；教皇也禁止萨沃纳罗拉传教，最后将他开除教籍。在佛罗伦萨宗派为患，使大议院无地发挥作用。萨沃纳罗拉一贯宣称他的政治纲领代表上帝的意志，不服从是一种罪恶，而且他的追随者生活奢靡，因此招致了各方面的反对，加剧了他本来想调解的公民之间的敌对情绪。查理八世之死使得到法国援助的希望渺茫，消息传来之时正是佛罗伦萨人们起来反对教会复兴主义和发生尖锐财政危机之际。于是，作为教廷许可对神职人员征收什一税的交换条件，佛罗伦萨把萨沃纳罗拉交给教廷特派人员，将他处死（1498年5月23日）。他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政策有任何变化。共和国的体制和亲法联盟依然存在，对比萨的战争仍在进行，直到1509年比萨城沦于佛罗伦萨手中。在最后一个共和国（1527—1530年）期间，这位修道士的精神又重新得到发扬，宗教热忱和爱国热情相结合，鼓舞佛罗伦萨人为争取自由而做最后的斗争。

随着法军的撤退，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似乎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吉安·加莱亚佐死于1494年10月。他究竟死于他叔父所下的毒药，还是死于他身体虚弱而又荒淫无度，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后一原因更为可信。洛多维科从而被一个由主要公民组成的会议宣布为公爵，次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使节们庄严地授予他公爵职位。他是斯福尔扎家族中受到皇帝册封的第一个人。马克西米连随时需要钱花，因此他甘心出卖弗里德里希三世坚决不肯出卖的特权。洛多维科与查理八世订立和约之后，那不勒斯已不足为惧，于是他可以随个人的兴趣花费时间和金钱了。在米兰宫廷，文艺复兴时代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表现。宫廷人物之中，有画家、建筑家、雕塑家、音乐家、学者和军人，他们都是自己专业领域中的能手，又各以自己的工作使宫廷生活大放光彩。在盛时佳节的假面舞会、竞技比武和宴乐聚会上，在宫廷闲暇时刻的各种简易文娱节目中，他们全都各显其能。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讨论，即席引吭高歌并以七弦琴伴

奏，各类游戏和恶作剧，各种消遣不一而足。陶醉在这种快乐和高度文明的生活之中，洛多维科已将他的军队和要塞置诸脑后，对未来危险的警告也无动于衷。尽管他真心实意地关心造福民众的计划，但赋税繁重和专制独裁在公国内部引起了日益高涨的不满；他在法国占领期间执行的政策已使他在意大利无一友邦。奥尔良的路易登上法国王位后打击随之而来，这时洛多维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抵抗的办法。

路易十二一方面念念不忘征服意大利，另一方面从他的国内政策又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意识到法国和法国人民的需要，这两者极为不一致。他没有更多的爱好，着意于家庭生活、爱好和平、注意节俭，但对他自己的权利却总是紧紧抓住不放。他相信自己对米兰的领土要求是正当的，他认为在查理八世远征期间自己未能征服米兰，是一个必须洗雪的耻辱。他进攻意大利的计划受到他的首席顾问、鲁昂大主教乔治·德·昂布瓦兹的热烈支持，此人野心勃勃，其志不在红衣主教，而在罗马教皇，所以路易刚刚即位，他就着手进行准备。从意大利各国对发生第二次法国入侵的前景的反应，可以看出查理八世的远征使人心涣散到何等的程度。1494年以前，各国满以为法国人不会前来；在查理撤兵后他们又自相庆幸法国人没有留下；它们心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路易的干涉来更好地为它们自己谋利益。亚历山大六世立刻和法国的新国王谈判，他认为这位新国王是一个可贵的同盟者，可以协助实现他扩大教廷世俗权力和使他自己的家族发迹的计划。他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这时正竭力设法从教会职务改任世俗职务。切萨雷正在物色妻子和寻求取得封邑，路易答应为他办这两件事，只要亚历山大六世提供方便，让他和法兰西的让娜离婚，并和孀居的王后布列塔尼的安娜结婚。1498年，切萨雷已不再是巴伦西亚红衣主教，而成为瓦朗斯公爵，他带领一队威风凛凛的随从，乘法国船只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随身携带着路易十二第二次结婚的特许证，并给德·昂布瓦兹带去一顶红衣主教的法帽。他求婚的对象是那不勒斯国王费代里戈的女儿夏洛塔，她是在法国宫廷长大的，但是她坚决不肯嫁给这位前红衣主教，费代里戈支持他的女儿，这保持了她的荣誉，也导致了她的灭亡。于是，切萨雷另娶了纳瓦尔国王之妹查洛特·德·阿尔弗雷特，引着法国侵略军回到了意大利。他从米兰出发，趾高气扬地使用法国名字，率领一队法国骑兵和若干瑞士步兵，对罗马涅进行第一次征服战役。佛罗伦萨欢迎路易十二的到来，因为这结束了它在意大利的孤立地位，并重新燃起收复比萨的希望；而威尼斯

则是经过一再拖延的谈判，才与法国订立了联盟。由于痛恨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瞒着它在维切利签订了合约，由于路易允诺在胜利后把威尼斯的西部边界扩展到包括克雷莫纳和吉亚拉达达，威尼斯终于改变了传统的中立政策，转而积极支持侵略者。站在米兰一方面的，而今只有那不勒斯的费代里戈和罗马涅的几个小统治者，前者是因为路易要求得到他的王位，后者则是因为害怕切萨雷·博尔贾。

大军压境，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处境极为不利。贝亚特里切·德·埃斯特已不在他的身边以她的聪明才智替他排解疑难；他似乎已不知所措，他所做的一切准备为时过晚。他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他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友谊上面，但马克西米连所能给予的帮助却和以往一样力不从心。由于马克西米连与瑞士联邦发生争执，而洛多维科也卷入其中，从而促使瑞士否定了它的几个州与米兰的联盟，并与路易订立一个10年条约，允许路易在瑞士境内招募步兵。在国内，洛多维科也尝到了他的错误造成的恶果。由于恣意挥霍，他所承袭的健全的财政体制已经陷入混乱。由于他对杰出的比武猛士、但并非将才的加莱亚佐·圣塞韦里诺恩宠有加，从而疏远了两位久经沙场的司令官。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是教皇党贵族的成员，对这样的人本应用心安抚，但是洛多维科没有这样做。当特里武尔齐奥发现自己在军队中的位置已为圣塞韦里诺取而代之时，他开始支持伊萨贝拉女公爵，替她到那不勒斯去向她父亲告状。他在那不勒斯参加了法军，这时带领路易的侵略军返回米兰。曾在福尔诺沃战役中率领米兰部队的卡亚佐伯爵，也因为他的弟弟反被优先提拔而心怀不满，一见机会来到，就立即投靠法国。圣塞韦里诺未能守住米兰防御线上的重镇亚历山大里亚，接着各城市接二连三向法国投降，抵抗已属无望，洛多维科于1499年9月退到蒂罗尔，他和两个小儿子在蒂罗尔受到马克西米连的热情接待。他把迅速回国的希望寄托在米兰城堡上面，因为该城堡深沟高垒，贮有足供一年的粮草，并且由一个他完全信赖的城堡主驻守。但最大的不幸降临：在公爵离国后12天，这个“新犹太”就把米兰城堡拱手让给法国。

然而，洛多维科的前途也并非全无希望。瑞士的那几个州不满法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同意向他提供1万人，他带着这些人马在第二年春天出发前往米兰。在米兰，贵族中一个派别的首脑特里武尔齐奥的独裁统治受到他政敌的激烈反对。赋税比以前更加苛重，割让克雷莫纳

给威尼斯一事引起了公愤，洛多维科的不孚众望已被忘却，人们对这个统治世家的忠诚重新恢复。米兰人听到他将到来的消息，便起而占领了各个城门。连每一个刚会说话的孩子都上街高喊“摩尔人”^[6]，在欢呼声中，特里武尔齐奥弃城而走，洛多维科在欣喜若狂的人们拥戴之中进城。但是，洛多维科的事业就此中落。法国人顽强地坚守米兰城堡和公国中其他据点。法军得到援兵，洛多维科的人力物力都已枯竭。1500年4月8日，他在诺瓦拉不战而溃，从而决定了斯福尔扎家族的命运。瑞士人放下武器，拒绝和自己的同胞作战，洛多维科企图逃走未遂，被法军俘获。他作为阶下囚在法国度过了晚年，“身陷四壁围立的寸室之中，而他过去的雄心壮志却是连整个意大利几乎都容纳不下。”^[7]

路易十二既得米兰，下一个目标就指向那不勒斯。费代里戈提出把他的王国作为法国的采邑；路易十二本应明智地采纳这个建议，但是他却宁愿采取1500年11月格拉纳达条约所规定的冒险方针，即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商定征服并瓜分各自所觊觎的土地。可怜的费代里戈直到入侵开始前尚不知道这宗买卖，以为贡萨洛是来援助自己的，便准备与法军交战。当他发现费迪南德也反对他的时候，知道大势已去，在法军占领并洗劫卡普亚后，便向路易无条件投降，宁可相信公开的敌人，也不相信出卖了他的亲戚了。他受到宽大对待，被送往法国，授以安茹公国，以补偿他失去的王国。这时，路易拥有那不勒斯的北半部，包括首府在内，费迪南德则占据了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费迪南德比路易更能干，更不择手段，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获得更大的利益。不久，两个盟国之间的争执引起了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把法国人逐出了他们所占的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土。问题出在两国分割土地的条约中未提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法国的阿布鲁齐和西班牙的阿普利亚之间的卡皮塔纳塔，双方都认为它属于自己一方。该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土地肥沃，并有税收之利，牛群来往于冬、夏牧场，均须缴纳通行税。法国人凭借武力强制实现他们的要求，在开始时取得了一些成功。贡萨洛退到巴列塔，在1502年底到1503年初的那个冬季一直被围困在该地，依靠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由海上运来的供应来支持。次年春，援兵源源而至，贡萨洛重新开始作战，在切里尼奥拉获胜，为他打开了通向首府的道路。法军退至加埃塔，待到有足够的力量后才向那不勒斯南进；但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时间，到隆冬时

分两军才在加里利亚诺河两岸对阵。贡萨洛用舟桥偷渡过河，对法军进行突然袭击。经激战后，法军向加埃塔溃退，1504年1月1日，加埃塔这个法军在那不勒斯领土上最后的据点，落到了西班牙人手里。整个王国重新统一，受阿拉贡国王的统治。就意大利来说，阿拉贡在那不勒斯的统治并非新鲜事。法国国王是外来的侵略者，而阿拉贡国王则是已适应了意大利情况的公认的君主。所以，王位由非正统的世系传到正统的世系，也就没有引起什么忧虑。那不勒斯王国的居民当时还不了解围绕在那不勒斯第一位阿拉贡国王左右的加泰罗尼亚人和巴伦西亚人与卡斯蒂利亚官员之间的区别：前者很随和，而后者则是前来把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在西班牙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扩展到新近取得的土地。本地的当权者之中，很少有人了解，为什么一个早已在西西里和撒丁站稳了脚跟的地中海强国竟会对控制意大利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具备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不了解阿拉贡人过去在意大利打下的基础竟会使他们成为比法国人远为难以对付的扼杀意大利独立的敌人。

在路易十二的盟友之中，从他征服意大利获益最大的莫过于罗马教廷；在路易统治米兰期间，罗马教廷几乎把所有的教会国家都纳入它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由切萨雷·博尔贾完成的。经过3次毫无喘息机会的战役，他成为罗马涅的主人，把当地的贵族逐出他们所在的城市，在这一区域内建立了秩序和统一。他组织了一支只效忠于他的军队，成立了中央法院，不遗余力地为他统治下的各个阶级谋利益。由于路易十二与佛罗伦萨联盟，使他在托斯卡纳扩充势力的计划受挫，当他正在考虑离弃法国倒向西班牙的时候，亚历山大六世去世（1503年8月），于是他的政治生涯也告结束。他的突出特点是极端残忍，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某些善于治理的才能。因此，马基雅弗利认为他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救世主，但是他反复无常，残酷无情，自私自利，因而为邻国所厌恶，难以充当这样的角色。[\[8\]](#)

切萨雷·博尔贾的成就，结束了罗马涅小国分治的局面。他下台后，很少有哪个城市愿意重新接受原来的统治家族，在庇护三世短期担任教皇之后，圭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继任教皇，称朱理亚二世，享受了切萨雷所创事业的果实。朱理亚二世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他首先的目的是收复教会的全部领土，然后企图担任一个旨在驱逐外国统治的意大利联盟的领袖。路易十二勉强答应对教皇当前的目标给予

援助，经过两年准备，朱理亚二世从罗马出发，率兵征伐，强迫红衣主教中除身体极弱者外，都要随军出征。兵至佩鲁贾，该地的当权者巴廖尼出门迎降，把城市交到他的手上。接着乔瓦尼·本蒂沃利奥弃波洛尼亚逃走，教皇军队凯旋入城。波洛尼亚这个大城始终未被切萨雷·博尔贾所征服，如今成为朱理亚二世最大的战利品。朱理亚二世在波洛尼亚设立教廷，度过了1506年底至1507年初的冬季，对自己的功绩十分得意。此时热那亚起义反抗法国，路易十二亲自进行镇压，得到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回到了罗马。因法国显示实力而提心吊胆的不仅是朱理亚二世一人。马克西米连抱怨说，路易本人垂涎于神圣罗马帝国，并想为昂布瓦兹谋取罗马教皇职位，于是宣布他本人将前往意大利加冕，并坚持他对热那亚和米兰的宗主权。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前往萨沃纳与路易会晤，两国君主在礼节性访问的掩盖下就两国未来的意大利政策取得了谅解。1508年，马克西米连要求让他的军队通过威尼斯领土，在遭到拒绝后照样进兵。他的军队在弗留利战败，他只得同意休战，把迄至那时为止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阜姆、的里雅斯特等城市割给威尼斯。此时，马克西米连和路易决定停止争吵，合力对付威尼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德·昂布瓦兹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康布雷，草拟和约条件，并筹建同盟，该同盟将全部剥夺威尼斯在过去100年内并吞的意大利各国土地。马克西米连所得部分将向西扩张到明乔河，包括重要城市维罗纳。明乔河与阿达河之间的各城市将归还给米兰。那不勒斯将收回布林迪西和威尼斯在帮助它把查理八世赶出意大利时所占据的其他阿普利亚港口。曾遭受损失的曼图亚和弗拉拉都参加了康布雷同盟，并得到允诺；它们过去的领土均将归还它们。

朱理亚二世与威尼斯之间的争端，既是宗教的，又是领土的。威尼斯曾趁切萨雷·博尔贾下台的机会增加了它在罗马涅占有的城市的数目，对教皇断然要求归还这些城市不予理睬。它拒绝将教区财产收入交给由教皇提名的非威尼斯籍主教。有一个故事记述威尼斯使节和朱理亚二世的一场舌战。教皇说：“我若不使你们成为你们原来那样的卑贱渔民，决不罢休。”那位使节回答道：“神父，如果你不自检点，我们能更容易地使你成为一个小小的教士。”^[9]朱理亚二世最初的用意只是以康布雷同盟作为威胁，诱使威尼斯接受他的要求，他本人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夕才加入该同盟。1509年5月10日路易十二的军队强渡阿达河，几天之后，在法国10年前割让给威尼斯的阿尼亚德洛进

行了唯一的一次重要战役。由于两位主将缺乏配合，只有一部分威尼斯军队和法国的密集大军相遇。威尼斯步兵作战虽然十分勇猛，但是兵力相差过分悬殊，寡不敌众，结果威尼斯大败，随之他们丧失了全部领地。各城市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的新主人媾和，威尼斯元老院内还有人主张最后放弃他们在大陆上的领土，回到海上去。但是威尼斯也有两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是它的敌人内部互相忌妒和猜疑；二是它从属的城市都知道在它的统治下可得到好处。维琴察的贵族路易吉·达·波尔托此时扮演的角色典型地说明了局势的转变，他以书信方式撰成的战争回忆录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他率领全家欢迎马克西米连占领维琴察，声称他们愿意依附胜利者一方，但后来机会一来到，他们就出力为威尼斯收复了他们的城市；此后路易吉在威尼斯旗帜下作战，直到负伤致残。1510年，朱理亚二世改变了立场。在把威尼斯人赶出罗马涅各城市后，他只需赢取弗拉拉，就可以把教皇国家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弗拉拉的历代公爵均依靠法国维持自己的独立，所以，朱理亚二世对弗拉拉的进攻就成为他对法战争的一段插曲。此后两年发生的事情有：教皇强加给威尼斯一项条约，而威尼斯不承认该条约对它有约束力；教廷对弗拉拉作战失利；本蒂沃利奥凭借法国的武力一度在波洛尼亚复辟。在法国支持下，在比萨召开了一个分裂主义的天主教公会议，后来会址迁往米兰，从而使斗争扩大到宗教领域；此时朱理亚二世费尽心机，终于把法国所有的敌人都拉进了神圣同盟。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未经一战，便从威尼斯手中收复了他在阿普利亚的各港口，他欣然参加神圣同盟，并派那不勒斯总督围攻波洛尼亚。加斯东·德·弗瓦从米兰前来防守该城。他解了波洛尼亚之围，但这时传来布雷西亚由于当地某些市民首领采取行动又回到威尼斯手中的消息，他又赶回伦巴第。布雷西亚再次被法军征服，遭到无情洗劫。加斯东又回师，在拉文纳迎战神圣同盟的军队。拉文纳战役（1512年4月11日）是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的一场殊死苦战，双方死伤极为惨重。西班牙和教廷的军队一度几占上风，但法国骑兵在弗拉拉炮兵的有力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加斯东·德·弗瓦这位具有杰出军事天才的青年将领，也于此次战役中阵亡。法军失去首领，使胜利者由欢乐陷入悲哀。次月，瑞士袭击米兰，发生了新的危机，法国便没有力量来应付了。

瑞士在意大利战争中的作用，是瑞士和米兰公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所造成的结果，也是瑞士以充当雇佣兵为其国家的事业而造成的结

果。如果说，通向米兰的交通便利对于瑞士城市地区各州的贸易很重要的话，那么，对于林区各州就更是生死攸关，因为粮食和葡萄酒主要依靠米兰公国供应。当瑞士步兵的最大雇主法国国王成为米兰公爵后，瑞士联邦就希望从贸易和提供兵源两方面同时获利。实际上，路易十二和瑞士的关系是争吵迭起。双方就贸易问题、瑞士林区各州居民移居贝林佐纳问题、瑞士步兵薪饷问题，以及未经许可即雇用瑞士步兵攻击热那亚问题等都互有争执，彼此产生恶感。由于这种紧张关系，法瑞联盟在1509年未再续订。在锡昂红衣主教马蒂亚斯·希内尔的领导下，瑞士准备以独立国家的资格在意大利行动。这位爱国勇士正合朱理亚二世的心意，在二人通力合作之下，瑞士作为神圣同盟的成员，成为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的主要工具。经马克西米连许可，希内尔的军队通过布伦内罗山口进入意大利，随行的有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长子马西米利亚诺。法军突遭袭击，不战而退。一直在策划另选对立教皇的公会议也随法军退却，在里昂无声无息了。1513年法国企图卷土重来，在诺瓦拉被瑞士人击溃。神圣同盟承认马西米利亚诺为米兰公爵，但瑞士人继续控制这个公国。在法国，对失去米兰很少有人抱憾，因为法国人认为这样反而卸掉了一个无利可图的负担。马基雅弗利认为路易在意大利所犯的错误是他失败的原因，但是比所有这些错误更大的一个错误乃是他出兵意大利的决定。

驱逐了法国人，结果使斯福尔扎家族重新登上米兰公爵的宝座，同时也使美第奇家族回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共和国与路易十二联盟，并没有带给它什么好处。法国在比萨战争中所给的军事援助，不值佛罗伦萨为它付出的大批款项，而且与法国的敌人给予比萨的援助两相抵销。1509年，比萨最后不得不投降的时候，所有其他军队正在参加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之间的战争，胜利是由佛罗伦萨的军队独自取得的。选举皮耶罗·索代里尼为终身职的大法官（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虽使共和国有了一个长期的元首，但未平息派别之间的纷争，或使佛罗伦萨的财政摆脱已陷入的混乱。索代里尼拒绝参加神圣同盟，使佛罗伦萨遭到朱理亚二世的攻击，引起各界市民的不满，这等于帮了美第奇家族的忙。1512年8月，末日终于来到。西班牙军队进攻普拉托，防守该地的佛罗伦萨民兵逃跑，普拉托被占领并遭洗劫。数日后，索代里尼被罢黜，美第奇家族被请了回来。当时该家族的首要成员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两个幼子和他的孙子，即皮耶罗的儿子，名字也叫洛伦佐。1513年，已经成为这些人中间最活跃人物

的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成为教皇利奥十世。美第奇家族作为佛罗伦萨的真正统治者，继承了在托斯卡纳的支配地位，而这曾是切萨雷·博尔贾在下台前想要谋取而未得到手的；这样一来，从海岸到海岸横亘意大利中部的大片领土都落到了一个家族的控制之下。如若这个家族的成员中有一人具有切萨雷的才能，他一定会有绝好的机会将全意大利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并把外国人赶出去。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马基雅弗利写下了《君主论》，先把它献给圭利亚诺，后又把它献给皮耶罗·德·美第奇之子洛伦佐。但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和抱负担当这个任务。和蔼可亲而颇得人心的圭利亚诺宁可在佛罗伦萨做一个平民，他应利奥十世的请求，不久就把国家元首的位置让给了他的侄子。洛伦佐有魄力也有雄心，但是他不是个合格的军人。他一味追求贵族的仪表气派，因此不宜于治理一个共和国。利奥十世主要关心的是给他的家族加官晋爵，其次是如何扩大教皇权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既可以把外国统治者赶走，也随时可以与他们媾和。他把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赶出乌尔比诺，而立洛伦佐·德·美第奇取代其公爵爵位。他甚至扬言要让圭利亚诺接替那不勒斯王位，然而他本人生来却是个艺术爱好者，罗马生活中的种种乐事耗尽了他的精力，在他的保护下文艺复兴在罗马发展到了顶点。在意大利全境，法国人的离去标志着旧日生活方式的恢复，在宫廷内欢乐而又有文化教养的生活中，听任外国侵略过后的暂息时机度过而对未来丝毫不加考虑。法国的第三次进军所进入的是一个既无防备又四分五裂的意大利。

1515年8月弗朗西斯一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这支军队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华组成的。波旁公爵和阿朗松公爵等大贵族都在第一线，有3000余名所向无敌的骑兵，虽然步兵大部分是德意志雇佣兵，但有加斯科涅人作为后援。弗朗西斯也和查理八世一样，以君士坦丁堡作为他的最终目标，但是他出征的动机既不是推动查理远征的骑士式浪漫主义，也不是路易十二那种赢得自己合法权利的決心，而是为他本人和法国争取光荣。他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他需要广阔的天地来施展他身心方面的多种才能。威尼斯再度成为法国的盟邦，曾在阿尼亚德洛战役中被俘的巴尔托洛梅奥·德·阿尔维亚诺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在这次征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一个从前是敌人而如今为法军效劳的是著名的工程专家和地雷专家佩德罗·纳瓦拉，他曾经在那不勒斯战争中帮助阿拉贡人夺取过许多城堡，如今

主管法国炮兵。和法军对垒的是神圣同盟的联军。利奥十世曾为双方斡旋，但最后决定支持他的盟友，他派洛伦佐·德·美第奇率领一支队伍前往皮亚琴察，并借调军队给米兰。那不勒斯的一支军队匆匆北上，在仍由马克西米连占据的维罗纳建立阵地。在米兰保卫战中首当其冲的是瑞士人，但是瑞士人还没有十分牢靠地把这个公国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瑞士人把目光放远大一点，不是首先竭泽而渔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财政要求，而是给予时间让这个公国恢复繁荣的话，马西米利亚诺和瑞士联邦之间签订的条约本来是会给瑞士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一个大好机会的。但是，一个雇佣兵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立即对他们的服役给予报酬，希内尔虽千方百计约束他们的贪得无厌，却未见多大成效。马西米利亚诺的挥霍无度，又给已被搜刮殆尽的人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人们最后甚至公开谈论他们宁要法国的统治，也不要目前的政府。瑞士的各州中还出现了一个亲法派，他们宁愿恢复旧时的制度，由法国赏给一些诱饵和津贴，也不主张瑞士联邦独立行动。就这样，米兰人的不满和瑞士人内部的分歧导致了在战场上的失败。

原估计弗朗西斯一世很可能从塞尼山口或热内夫尔山口进入意大利，所以瑞士军队驻守苏萨，等他进入平原后进行堵截。但他取道不常为人通行的阿尔让蒂埃尔山口，从而包抄了瑞士人的阵地，迫使他们向米兰后退。法军在比利亚弗兰卡击溃瑞士军队之后，在米兰东南数英里处的马里尼亚诺扎营，9月14—15两日两军在马里尼亚诺交战。瑞士步兵一再以重兵冲击法军，法军付出重大的代价才将其击退。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身经18次战役，这是其中最后一次，他觉得这场战役不是人和人的交锋，而是巨人和巨人的搏斗。正当法军开始不支的时候，特里武尔齐奥放水淹没瑞士人作战的草原，使之阵营混乱，这时阿尔维尼亚诺率所部威尼斯军队来到，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威尼斯军队又把西班牙军队牵制在维罗纳，对法军的胜利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罗马教廷的军队一直在皮亚琴察按兵不动。

马里尼亚诺战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其直接后果是瑞士已不再成为意大利政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即使在瑞士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以前，对于体制松散的瑞士联邦来说，占据米兰公国这样的任务，对它说来也未免太重了。马里尼亚诺战役证明马基雅弗利所说法国不是瑞士的对手这句名言是不正确的。1516年春进攻米兰失利之后，希

内尔和法国订立了弗里堡永久和约。瑞士不得不割让控制辛普朗山口的多莫多索拉，但保有贝林佐纳和提契诺河谷，还有卢加诺湖大部以及马乔列湖的洛迦诺一端。这样一来，瑞士和米兰之间的边界就基本上确定下来，至今保持原状。条约恢复了瑞士人替法国服役的津贴制度。自此以后，瑞士人在欧洲纠纷中只充当雇佣兵的角色；他们的国策是，而且现在还是，严守中立。这次战役对意大利各国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弗朗西斯一世成为米兰公爵，马西米利亚诺引退，靠年金在法国闲居。米兰再也没有保持其独立的希望了。尽管后来还有一位斯福尔扎公爵，但他的爵位得之于查理五世皇帝，他的统治是西班牙直接统治的前奏。利奥十世与弗朗西斯一世媾和，把米兰和教廷之间长期争执未决的城市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交给法国，而弗朗西斯一世则保证美第奇家族继续统治佛罗伦萨。圭利亚诺和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佛罗伦萨事务主要由罗马指挥，因而佛罗伦萨保持自由共和国的幻想更属渺茫。1515年12月，利奥十世和弗朗西斯一世在波洛尼亚会晤。双方会谈的结果，解决了80年来一直不和的法国教会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教皇得到的是废止1438年的布尔日国事诏书^[10]，但是他承认法国国王有提名法国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权，并同意对他的圣职任命权加以限制。波洛尼亚政教协议具有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签订的协议的特征，高卢派教会的权力和教皇的特权都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前做出了牺牲。对威尼斯来说，马里尼亚诺战役为康布雷同盟引起的各种纠纷的彻底解决铺平了道路。1509年，马克西米连曾因迟迟不占领维罗纳而得罪了该城居民，但他一经占领该城，就没有人能说服他予以放弃了。现在他不得不同弗朗西斯一世达成协议，将该城交给弗朗西斯一世，但达成谅解，必须将该城交还威尼斯。威尼斯在收复维罗纳后，就重新拥有其大陆领土的大部。它不久前取得的领土，如克雷莫纳和从马克西米连手中夺得的伊松佐河彼岸的各城镇均已丧失，它过去在罗马涅和阿普利亚所占的城市也已丢失，但是伦巴第平原的绝大部分仍在它的手中。伦巴第平原在拿破仑到来之前一直是威尼斯所有，在威尼斯共和国存在期间，这里也一直是意大利最自由、最繁华的地方。说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是从法国的胜利获益最多的国家是西班牙。只要瑞士人留在米兰，他们就从反对法国的每一行动中获得实利。如今西班牙成为法国在意大利的唯一劲敌。在连续三次入侵的过程中，意大利的独立已经遭到破坏。下一阶段的斗争

便是欧洲两大强国的争霸，在这场斗争中，意大利各国设法在两强之间挑拨离间，坐收渔利，从而为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

意大利未能抵御入侵的原因，首先不在于它在军事上没有能力。比它的武装力量的薄弱更为严重得多的原因是造成各国四分五裂的那种狂妄的地方爱国主义。分离主义的祸患由于破坏各国政府稳定的内部分裂而更形加剧，并增添了各国对其邻国的畏惧和怀疑。首先受到查理八世打击的是一些装备不及法国精良的军队，而炮兵尤其如此；而且这些军队也不习惯于敌方久经征战的军队如此神速和无情地廓清他们路上的障碍。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意大利人使自己适应新的作战方法，表现了很大的主动精神。切萨雷·博尔贾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帮助下^[11]，装备起一支精良的炮兵，战争接近尾声时阿方索·德·埃斯特曾使弗拉拉的大炮超越了其他国家。在几次入侵之前，都大批增招步兵，并加紧步兵的发展。在卡斯泰洛城，著名的雇佣兵首领维泰利史弟按瑞士的模式训练步兵。几次战争中，个别的意大利人在作战技能和英勇冲杀方面有众多范例。著名的有1503年在巴列塔由13名意大利人对13名法国人进行的战斗，自诩高人一等的法国人结果大败。这个英勇事迹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意大利复兴运动初期，一位意大利爱国者曾以此作为一部小说的题材。虽然意大利没有产生过可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和加斯东·德·弗瓦相伯仲的军事天才，但它还是拥有卓越的将领。罗马的奥尔西尼和科隆纳等大家族的子弟从幼年就受军事训练，转战意大利各地。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在加里利亚诺河沿岸曾为击败法军做出过贡献，后又在查理五世军中服役，证明自己不愧为贡萨洛的门生。巴尔托洛梅奥·德·阿尔维亚诺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养子，善于运用法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方法。他在阿尼亚德洛战役中的失败，是因为他的同僚没有支援他，而且威尼斯人没有做到统一指挥。被俘后居留法国期间，他一直忠心耿耿为威尼斯出力，使威尼斯和法国继续结盟，回来后又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获得了荣誉。佩德罗·纳瓦拉虽不是出生在意大利，但一生有为之年都在意大利度过；他作为地雷专家在佛罗伦萨军队中服役，1488年在萨尔察纳包围战中崭露头角。据说雇佣兵首领们指挥无能，不讲信义，贪得无厌，逃避战斗；这种传说即使仍然存在，也显然是荒谬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战争也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被那些学习这一专业的，热衷于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人作为一门艺术。固然，雇佣兵首领中有背叛者，但牺牲个人利益而忠于雇主的也大有人在。雇佣兵

首领由一方转向他方，大都不是出于贪图金钱，而是出于希望得到更重要的用武之地，或者由于气愤而去。在这个时期的历次主要战役中，意大利人英勇善战，但他们各据一方，利害不一，不能作为一支统一的军队共同战斗。福尔诺沃战役中，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友好，以致人们怀疑卡亚佐奉雇主命令，故意阻止米兰军队前进。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但当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自然就不能不妨害盟国的事业。当各国吁请佛罗伦萨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参加为赶走法国人而结成的联盟时，这个共和国奉行的路线却是并不关心意大利的利益而只关心收复比萨。各国之间四分五裂，同时，各国统治者又都得对付大门之内的敌人。那不勒斯国内贵族分为许多对立的派别，只有在共同削弱王权这一点上才意见一致，政局之不稳显而易见。意大利其他地方都是些城邦，各自都认为本城邦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缩影，要求它的市民享有主权。各君主的统治权，首先是由民众授予他们的，虽然有些人在民众选举之外还加上从罗马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授权他们统治某城市的授权令，但他们是否能继续统治下去，还要以民意转移。即使在米兰这样一个根基稳固的君主国家里，也有一个共和派一向与斯福尔扎公爵们对立，他们在对政府不满的时候就欢迎法国人的到来。没有合法称号的统治者，只不过是公民中的头面人物，地位就更加不稳。在佛罗伦萨还有一些富有的家族，他们认为自己也与美第奇家族一样，在该城占有领导地位，等待着时机反对美第奇家族。在反对威尼斯的战争中，各从属城市 and 这个共和国保持关系仅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忠诚。市民的爱国主义局限在城垣之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本城的福利。那些热切希望完成维护本国独立和统一这一艰巨任务的意大利人，莫不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向外邦寻求援助，或者转而排外。1510年，当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作为教会军事首领对法国人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伊萨贝拉·德·埃斯特在曼图亚为他担任摄政。她命令曼图亚境内各城堡主，让法国军队过境前往弗拉拉保卫她的兄弟，并让他们以敌不过优势兵力作为借口。在她的眼里，法国是朋友，朱理亚二世是敌人；她是一个还无力采取统一政治行动的国家的一位典型代表人物。

[1] 即威尼斯。圣马可可是威尼斯的守护神。——译者

[2] 菲利普·德·科明，法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威尼斯大使。——译者

[3] 罗马涅（Romagna），历史上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名称，拜占庭帝国时期统治意大利的中心。——译者

[4] 博热的安妮为查理八世之姊和摄政。——译者

[5] 1495年7月的信，米兰，国家档案馆《外来的强国》，第187页。

[6] 洛多维科被人们广泛称为“摩尔人”。他采用桑木和摩尔人的头作为他的标志。

[7] 圭恰迪尼：《意大利史》，第4卷。

[8] 佩佩的《博尔贾家族的政策》（1946年）一书否认切萨雷在罗马涅的统治有任何好处，但他实施的各种改革，以及他同时代人如圭恰迪尼等人的评述也不容忽视。

[9] 达·波尔托：《历史文献》，布雷桑编，1857年，第30页。

[10] 1438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颁布，严格限制罗马教皇在法国教会的权力。——译者

[11] 1502年，达·芬奇曾在切萨雷·博尔贾军中任军事工程师。——译者

第十三章 东欧

东欧在受到莫哈奇战役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以前的35年间，这块位于神圣罗马帝国边界以东和当时土耳其军队达到的界线以北的土地，在政治方面，甚至在心理方面，都十分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俄罗斯的土地，莫斯科的历代大公使这片土地变成了一个严密的、有纪律的和重视自身利益的天下；另一部分包括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波希米亚3个王国在内的辽阔而复杂的地区。因为在这个时期内，波希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不过纯粹是从法律上而言，它却和匈牙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波兰的关系也密切。这3个王国是以王室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虽然这种结合是松散的，而且未来的事实也将证明这种结合是短暂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室是两位一体的，而波兰的王位则为匈牙利国王的兄弟或叔伯所拥有，所有这些统治者都属于波兰—立陶宛的亚盖沃家族。摩尔多瓦小公国则处于半独立或藩属的地位，时而从属于土耳其，时而从属于匈牙利或波兰。

我们不妨仅用三言两语来叙述这两大地区最东一端的情况，因为莫斯科的兴起和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俄罗斯国家的成长（这个地区的全部历史即在于此）是一个在1490年很久以前就已开始，但一直到1526年以后很久才告完成的过程。本书所论述的时期不过只是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这的确是一个灿烂辉煌的阶段。伊凡大帝是1462年至1505年的莫斯科大公，他是他的那个世系之中成果最著的一个。他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俄罗斯国家的真正的缔造者。他在1465年至1488年间逐步完成了兼并诺夫哥罗德及其广大领土的任务，不但使他的实力大增，而且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基辅最终应由莫斯科或立陶宛继承的问题。1472年被征服的彼尔姆，虽然战略地位不算重要，却使莫斯科的领土面积进一步增大。维亚特卡、特维尔和梁赞在1485年前后也相继被并入版图。与此同时，伊凡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人的最后羁绊；此后，鞑靼人的部落有时虽然不免依然为敌，但大多的时间则是他的附庸和盟友，至少已不再是他的主子了。

伊凡在位时期新的特点，不在于他登基以来领土的扩张和独立的加强（这方面他不过继续了几个前任者的工作而已），而是他在为自己的侵略做辩护时有意识地、并且非常自信地提出了他的权力要求。

随着领土的扩大和地位的巩固，伊凡多半由于妻子佐约·巴利奥洛格（索菲娅）的影响，开始提出更大的要求，不仅要作为基辅的继承人，而且要充当拜占庭、甚至罗马的继承人。他采用双头鹰的纹章以及“独裁者”和“全俄罗斯君主”的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提出赐给他以国王的称号，他傲慢地拒不接受，说：“我们过去不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这一称号，现在也不想。”“承上帝保佑，我们从一开始，从我们的第一代祖先起，就君临自己的土地，我们是受命于天的”。1501年，波兰的卡吉米日抱怨说，伊凡掠夺了他的祖先遗产，当时他就回答说：“他们所说的祖先遗产是什么？从我们古代的祖先起，俄罗斯的土地就是我们的祖先遗产”。1503年，他又一次描写自己的“祖先遗产”是“在立陶宛手中的俄罗斯土地——基辅，斯摩棱斯克和其他城镇……我们的祖先遗产并不仅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城镇和地区，而且还有所有亘古以来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土地”。而且，这种从王朝世系提出来的要求是与从宗教方面提出的要求相辅相成的。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莫斯科便一直是“第三个罗马”，甚至是“第二个耶路撒冷”。莫斯科的大主教当时还不是一个教长；但是，无疑地他会得到君士坦丁堡的任命，而且只能由一个俄国人出任。发动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原因之一是要收复“圣弗拉基米尔的世袭遗产”，而立陶宛的亚历山大竭力在他的东正教徒臣民中间散布“佛罗伦萨联盟”的思想又足以成为伊凡开战的借口。

在上述种种的情况下，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之间是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的。伊凡曾亲自对他的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王说过：和平是不可能有的，只能有“喘息的间隙”。这几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伊凡和他的西方邻国之间的一部关系史。其中主要的事件，我们将在下面从另一个方面加以叙述。虽然时运起伏不定，但从长远权衡，发展的趋势是对伊凡有利的。这里应该提到，这种优势并不是完全凭借武力的。在立陶宛主权管辖下的俄罗斯人的城镇，对于莫斯科和东正教的召唤，也不是无动于衷的；其中有几个城镇——佩列米斯尔、谢列斯克和科泽尔斯科就自愿地改变了效忠的方向。诺夫哥罗德虽然特

别反对被人称为“世袭遗产”，但是这个城镇中仍有一大批人认为，与莫斯科联合要比与立陶宛联合更加顺理成章。

1503年伊凡去世，莫斯科扩张的步伐自然要放慢下来。他的儿子瓦西里继位后（1505—1533年）在西方的唯一重大成就，是夺取了斯摩棱斯克要塞。此外，他又兼并了梁赞的其他地区，取消普斯科夫的特权，从而完成了平定莫斯科附近土地的任务。但是，他的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如其父，而他的儿子伊凡雷帝的政策目的亦复如此。他的对内政策也如出一辙。伊凡取走了象征诺夫哥罗德自治的诺夫哥罗德大钟；瓦西里也取走了普斯科夫的大钟。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央集权和服从个人意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种尚属原始但此时开始定型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的。

至于莫斯科以西各个国家的兴衰，则需要而且也应该做更详细的叙述，不仅因为这些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也因为这些国家和莫斯科不同，它们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构成了本国历史中独特的一页。1290年在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三国之间建立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必然要继续下去，并且最终将在这个具有这么多共同特点和共同利益的地区出现一种真正的统一。但是历史表明，这却是一场彻底解体大变动的前兆，这场变动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纳入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西方体系；而匈牙利的其余部分则被纳入由奥斯曼帝国左右的东方世界；只剩下波兰作为早先的集团中尚保持独立的唯一代表。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解体并不完全与这个时期为将来所准备的各种条件背道而驰；就哈布斯堡的势力向东扩张来说，却正是实现了这些条件。然而，离心的倾向胜过了向心的倾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比较强大的自然力的必然胜利，或者说，这一胜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既可轻易地起着正面作用、也可轻而易举地起着反面作用的那些琐细的个人动机所促成的，这些问题不免要引起人们的揣测。历史为此种揣测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因此，人们对此特别感兴趣而且煞费苦心。

1490年，亚盖沃家族拥有所有的三个王位；而哈布斯堡家族却是其中两个王位的重要角逐者，他们在这场角逐中虽然暂时落后，但在实力上远为雄厚。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形势的造成，完全可以说主要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即6个家族的成员的出生和死亡。一直到14世纪

初，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发展路线是类似的，而且是自然的（如果可以这样称为的话）：都是在本地血统的王朝统治下，王室成员所奉行的政策，始终是以本民族为基础，通常是与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相一致的。波兰的皮亚斯特王室虽然延绵不绝（如果说他们的繁殖率也下降到无传宗接代的地步，这完全对波兰有利；因为自从波列斯瓦夫三世生下17个子女以来，皮亚斯特王室的成员为数过多），但是，阿尔帕德和普热美斯尔两王室却几乎同时绝灭，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便成了欧洲各个竞争的王朝争夺的对象。原来夺得魁首的两家王族的男系末了也先后绝嗣，匈牙利的安茹家族两世而绝，波希米亚的卢森堡王室三传而绝。只是由于王室的父辈们为他们的女儿们着想，才促成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三世于1437年接替了两国的王位，^[1]这一点在两个王室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哈布斯堡邻邦所订立的一系列约定中均有所反映。

哈布斯堡王室的好景不长，阿尔伯特接位不到3年，便于1439年去世，死时没有子嗣，不过他的妻子此时已经怀孕。与此同时，波兰人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皮亚斯特王室近支的嫡系男嗣在伟大的卡吉米日之后中断（虽有远房堂兄弟，但要继承王位却得不到支持），遂由匈牙利的路易来波兰接位。但是，这位来自国外的国王的统治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据回忆，捷克国王文策尔二世当年也是不受欢迎的），他死后只留下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将接替波兰王位的女儿已和另一位哈布斯堡的王子订婚；因此，当路易去世时，全国发生叛乱，婚约被废除，并将这位小公主嫁给了一位严峻的立陶宛人亚盖沃。亚盖沃也是一个外国人，但却没有那些比较上流的王室之间所有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纠葛。亚盖沃作为雅德维格女王的丈夫来说是很良好的，但是她没有为他生下子女；他的第二个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但却夭折了；他的第三个妻子亦无儿女。他晚年娶的妻子是一个立陶宛女子，但与欧洲各王室毫无瓜葛。她为他生了3个儿子，他死后余下二子，从而又重新建立了一个以民族为世系的王朝，这个王朝不但排除了任何方面对波兰王位提出的权利要求，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国王。

亚盖沃王子中第一个接受去他国为王请求的是亚盖沃的幼子卡吉米日王子。1437年，一群捷克贵族提出了这项请求，这是由于选择什么样的国王比较合适而引起的，因为主张迎立卡吉米日的捷克人反对

迎请阿尔伯特为国王，因为他出生于德意志人家庭，而且他的姻亲多信奉天主教。但是，即使如此，所以要拥立卡吉米日的原因是因为他身上没有这些缺点，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良好的品德；主张拥立他为王的那些捷克人中，也无人想要建立一个波兰—捷克联盟。因此，1439年阿尔伯特逝世时，匈牙利人便立即选立亚盖沃的长子瓦迪斯瓦夫（称乌拉斯洛一世），这完全是因为拥立他比较不用费事，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多少可以说将届成年（他当时16岁）；再加上此时土耳其人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们再也不能等待阿尔伯特的孩子出世了，而且那孩子也未必一定是男嗣。诚然，瓦迪斯瓦夫向他的拥立者许诺要用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的军队保卫匈牙利；但是，哈布斯堡王室大概也能召集一支同样有力的军队。后来，瓦迪斯瓦夫率领军队出征，于1444年在瓦尔纳阵亡时，军队中实际上几乎没有波兰人参加。结果，阿尔伯特之子拉迪斯拉斯·波斯图穆斯居然一人兼领两国王位。但是，他在1457年去世时尚未结婚，这两个国家便分别建立了由马加什·科尔文和乔治·波迪布拉德为国王的民族王国，这无疑是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对两国来说最得人心的办法。

这种解决办法一度似乎是长治久安之计。哈布斯堡王室和亚盖沃王室（且不提其他次要的王室）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这两个王位，他们的理由因为下列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继承兄长王位的卡吉米日·亚盖沃娶的是哈布斯堡的伊丽莎白（阿尔伯特的女儿和拉迪斯拉斯·波斯图穆斯的妹妹），因此他提出伊丽莎白所生的亚盖沃家族的子女有权作为她哈布斯堡兄长的继承人而取得王位；而弗里德里希皇帝却根据1362—1364年间他的家族和波希米亚的查理四世之间的契约提出了对这些王位的要求。但是，由于弗里德里希懒散成性，波希米亚王国的王位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最后，他自己以皇帝的身份将王权授予了乔治。如果说他曾经极力要求拥有匈牙利的王位，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匈牙利的一帮反对马加什的权贵的怂恿；1463年他放弃了直接拥有王位的要求，作为回报的是他得到应诺（还有其他的事项），马加什一旦死后没有男嗣，他或他的继承人便可继承王位。而卡吉米日的孩子们此时尚在孩提时代，他本人正忙于普鲁士和立陶宛的事务，无暇顾及南方。他和乔治保持极为良好的关系，甚至拒绝了教皇邀请他参加对乔治的十字军东征，理由是“他不明白怎么能把一个行过涂油礼和加冕礼的国王推翻”。如果说他和马加什之间关系不是那么亲密，但无论如何，他通常总是谨慎从事，不去触动那

个有才能的人物的财产，尽管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在西里西亚进行了干涉。

这两个民族王国之所以在其缔造者去世前即不存在，这是咎由自取，马加什的过错更大，简直无法比较：即使乔治对某些相当可疑的阴谋并非毫无干系，但这些阴谋从来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因此不足为患。然而马加什的秉性却是，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意义重大就干；尽管他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但他并没有能够给多瑙河带来和平或团结。他开始时贿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培植和乔治的友谊（他娶了乔治的女儿为妻），积极从事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但他不久即沉湎于征服西方的梦想之中，而他本国的历史学家们却要把这种赤裸裸的野心欲盖弥彰地说成是一种长期战略行动，其目的是积蓄力量以便更为有力地进行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在位期间，匈牙利的居民和他所征服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省居民之间的感情一直不融洽；而波兰的卡吉米日的长子瓦迪斯瓦夫·亚盖沃1479年继承了波希米亚的王位，便是马加什进攻波迪布拉德的直接结果。因为乔治原来想要他自己的长子继承王位，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为了取得波兰的卡吉米日的支持以反对马加什和教皇，他在1469年提出由卡吉米日的长子继承波希米亚的王位。两年后乔治去世，除了瓦迪斯瓦夫和马加什以外没有一人能够出来继承王位。马加什坚持认为他的人选应仍属有效，但一伙以国家为重的人却推选了15岁的瓦迪斯瓦夫。正如以前议会推选他的父亲时一样，瓦迪斯瓦夫的当选是由于他消极方面的因素。因为人们指望他对波希米亚的独立或其宗教不致为患；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可以得到保障，即要求瓦迪斯瓦夫恪守契约，保证波希米亚的宗教和平，并且不得把国家的任何官职授予外国人。

与此同时，在马加什方面，无论卡特琳·波迪布拉德或在卡特琳死后于1476年所娶的美貌而薄命的阿拉贡的贝阿特丽克斯都没有给他留下继承匈牙利王位的后裔。他唯一的子嗣约翰·科尔文是个私生子，系布雷斯劳的一个市民的女儿所生。他在晚年期间曾费了不少时间，力图保证约翰成为他的继承人。他曾向马克西米连（现已和勃艮第的玛丽结婚）提出，如果马克西米连放弃1463年条约，并接受约翰为匈牙利国王，那么他将归还他在1477年至1485年间占领的奥地利各省；然后，约翰将娶马克西米连的女儿为妻。1489年秋，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虽然尚未正式签订），于是马加什便强迫王室各自由城镇

及匈牙利的世俗和教会各界的权贵宣誓接受约翰为匈牙利国王；他还设法通过了“巴拉丁选侯法”（这一措施虽然当时没有达到它的直接目的，但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却一直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法令赋予巴拉丁选侯在“一旦王室无人承祧”时对王位继承问题有决定之权，并在王位空位期间由巴拉丁选侯担任幼主的保护人兼任总督；这样马加什便扶植自己的亲信伊姆雷·扎波利亚伊为巴拉丁选侯。

但是，1490年4月6日，当马加什前去参加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指望和马克西米连达成肯定的协议）的时候，突然在途中过早地去世了。这时，伊姆雷·扎波利亚伊已经在他之前去世，其继承人也尚未指定。过去曾经拥立马加什为国王的那些小贵族们，此时都拥戴他的儿子，但是那些显要人物，撇开别的想法不谈（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约翰是私生子这一点确实是个障碍），都认为马加什的强力统治不合他们的心愿，不如那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可以在自己的统治地区内称王称霸。

除了约翰以外，还有三个可能的人选：马克西米连，以及波兰的卡吉米日的两个儿子，当时已是波希米亚国王的瓦迪斯瓦夫和活下来的年龄比他稍小的兄弟扬·奥尔布拉赫特。马克西米连和奥尔布拉赫特都是坚强和有才干的人物，而且两人都有自己的党羽。但是，大贵族中大多数都赞成瓦迪斯瓦夫，这恰恰是因为他是以既不坚强又无才干而著称。瓦迪斯瓦夫是位与世无争、息事宁人的好好先生，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也不理解，他在波希米亚的绰号是“多布热”国王（“多布热”系捷克语，意即“好吧”——译注），因为向他提出任何建议，他都习惯地说“好吧”，表示同意。匈牙利有一个权贵就讥笑他是“一个可以把他的辫子攥在他们手掌中的国王”，这正符合他们的心意。各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进行了贿赂以及一些战斗，但是瓦迪斯瓦夫的党羽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筹措金钱，收买了附近的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即当时驻扎在西里西亚的马加什的“黑军”，暂时为他们服务。纳杰瓦拉德主教约翰·菲利佩斯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摩拉维亚，因而竭力为瓦迪斯瓦夫的事业奔走。他匆匆赶到西里西亚，用他在仓促之间筹集的金钱把这支军队拉了过来。约翰·科尔文的党羽不久便被击败。约翰既没有他父亲的精力，又缺少他父亲的雄才大略，便放弃了他的要求，以换取斯洛文尼亚公爵的头衔和波斯尼亚国王的前途（在可能的时候）。扬·奥尔布拉赫特因为自己的兄长于1491年

成为另一个候选人，便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要求。马克西米连在收复了失去的奥地利各省之后，便带领一支雇佣军侵入匈牙利，但是他付不起军饷，这支军队便解散了。此时他便根据普雷斯堡条约（1491年11月7日）同意承认瓦迪斯瓦夫为国王，以换取对方承认奥地利各省归他所有，并许诺瓦迪斯瓦夫死后若无子嗣时，王位由他或他的子孙继承。

然而，这项协定在匈牙利实际上从来没有获得批准。与哈布斯堡建立关系在匈牙利是十分不得人心的，在同意瓦迪斯瓦夫继承王位时他曾被迫做出的许多许诺中，有一项就是不经匈牙利国会的同意不得和弗里德里希或马克西米连订立任何协定。当瓦迪斯瓦夫于1492年向国会提出普雷斯堡条约的时候，小贵族们拒不接受；但是瓦迪斯瓦夫本人则认为该条约对他具有约束力，而且有67位显赫的贵族还签署了一项庄严的宣言，宣称如果瓦迪斯瓦夫死后无子嗣，他们将投票赞成由马克西米连或他的后裔继位。马克西米连对此表示满意，瓦迪斯瓦夫的王位如今也不怕任何外来人的觊觎了。

1492年，波兰的卡吉米日去世。这一次瓦迪斯瓦夫退出竞争而支持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显然是波兰选侯们中意的人选。于是扬·奥尔布拉赫特便成为波兰的国王，但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不兼任立陶宛大公。在卡吉米日统治期间，往往由于所谓的他同情波兰人的利益而忽视立陶宛的利益（特别是他在诺夫哥罗德反对伊凡时没有给以切实的支援）因而在立陶宛引起相当大的不满，因此卡吉米日不得不答应另由他人担任立陶宛大公驻节维尔纽斯进行统治。此时这一肥缺便落到了他们的第3个兄弟亚历山大头上。他们的第5个兄弟弗里德里希是位红衣主教；而第4个兄弟西吉斯孟此时尚无任何特殊的职衔。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如今至少在对外政策方面实际上是处在一人控制之下，虽然两国的国会各以不同的决议（以后将要详述）来捍卫自己，但这些决议并不能够影响作为当时真正外交政策主要部分的各种王室协定。瓦迪斯瓦夫和扬·奥尔布拉赫特在1494年5月5日的一次会晤中商定，如果两国中的任何一国的臣民反叛，或擅自动用王室收入，则两国均将倾全力相互进行干涉。这个协定并没有责成协定双方执行一项共同的对外政策，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和以后的场合中，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都协调一致。所以，把此后25年间的波兰和匈牙利—波希米亚的外交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来叙述，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这

种叙述不仅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一致，同时也暴露出它们的分歧，而且，有许多事态仅和其中的一方有关。在开始叙说这些事实之前，我们不妨在这里先提及这些情况作为前提：在这整整25年期间，瓦迪斯瓦夫一直统治着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扬·奥尔布拉赫特死于1501年6月17日；而亚历山大已经继承了他的波兰王位，同时仍兼领立陶宛大公，他也于1506年8月19日去世。于是，西吉斯孟便开始长期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直至1548年。

瓦迪斯瓦夫和奥尔布拉赫特即位后，除了只是对波兰有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外，全部历史过程一时相对来说是简单而平静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在这一时期相安无事。诚然，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当地土耳其人的首领们曾在瓦迪斯瓦夫即位初期对匈牙利的边境进行几度骚扰，但当时边防工事仍然相当完整，而边防将领如约翰·科尔文、克罗地亚的弗朗盖巴家族和久经沙场的名将帕尔·金尼茨等人都能击退来犯的敌人，没有失去一寸土地。幸而巴耶济德苏丹秉性和平，不愿大事冒险，这乃是匈牙利的幸事；他对欧洲唯一重大的战争（即在16世纪初他与威尼斯的一次作战），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进攻，不如说是出于防御。匈牙利方面也不可能考虑采取攻势（1500年威尼斯曾请求匈牙利采取攻势，但匈牙利予以拒绝），因此威尼斯战争结束时，匈牙利即与这位苏丹订立了7年休战条约，后又于1510年和1513年两次续订。这时，好战的谢里姆苏丹已经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但是在他继位后的最初几年里他却全神贯注于南方和东方，无暇顾及匈牙利。

1483年至1484年间，土耳其攻占了基利亚和阿克曼，并且确立了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有时也对摩尔多瓦）的宗主权。波兰统治者认为局势永远对自己不利，因而一心想要扭转这种局势。卡吉米日在1483年至1489年间曾3次派遣远征部队越过南部边境，但是这些部队都没有成功。1489年他签订了一项以保有占领地原则为基础的休战协定，扬·奥尔布拉赫特在1494年又将此协定延长3年。他并不把这一协定看作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而是要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准备在休战协定期满时大举进攻，以便收复两个要塞，切断土耳其人和他们的鞑靼卫星国家之间的通路。这一企图也未得逞。奥尔布拉赫特便和瓦迪斯瓦夫举行会谈，想要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他在谈判过程中轻率地提出要撤去他认为不可靠的摩尔多瓦大公斯特凡的职务，由亚盖沃王室的第四个兄弟西吉斯孟担任。瓦迪斯瓦夫认为摩尔多瓦是匈牙利

的藩属，拒绝对斯特凡采取行动。因此，奥尔布拉赫特不得不撤回他的建议，但这一建议已被透露给斯特凡。后来，休战协定期满，1497年远征开始时，波兰人和立陶宛人进行合作，但匈牙利却袖手旁观。斯特凡相信这一行动是针对他的，便宣布自己是苏丹的藩属，并向波兰军队进攻，波兰军队被迫退却；立陶宛人也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也大肆袭扰波兰，作为报复行动。奥尔布拉赫特只得和斯特凡重修旧好，承认他的独立，并和苏丹另行谈判休战协定；该项协定终于在1501年签订，苏丹更是欣然同意这个协定，因为这样就避免了波兰和此时正在与土耳其作战的威尼斯联合起来的危险。威尼斯的代表们在双方开始敌对行动的时候，实际上曾极力要求波兰参加教皇所宣布的十字军东征。从这个休战协定开始以后，波兰也和匈牙利一样，按期和苏丹续订休战协定，直到1521年卡吉米日拒绝续订时为止。

波兰几乎不断地和莫斯科处于交战状态，这是前面曾提到的莫斯科扩张政策的结果。卡吉米日死后波兰和立陶宛分裂。分裂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瓦西里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联合进犯立陶宛。亚历山大不得不提出议和，并提出要娶伊凡的女儿叶琳娜为妻以巩固和议。伊凡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即亚历山大必须承认他最近征服的全部土地和他的“全俄罗斯君主”这一称号。这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或稳定，因为有更多的边境地区纷纷向伊凡表示效忠，伊凡一一接受，因此在1500年又以亚历山大支持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的统一运动为借口再度宣战。这次战争延续到1503年（直到亚历山大即波兰王位后），伊凡又再次同意议和，条件仍是承认他的既得利益。随后形势便由于伊凡和亚历山大两人去世而起变化。鞑靼人此时也彻底被击败，实际上他们已经改变立场，变成了波兰的盟友。这种局势便促使西吉斯孟趁伊凡死后莫斯科公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要求归还被伊凡征服的土地。两国都调动军队（其实俄罗斯军队首先离开基地），波兰方面在战斗中最初占上风，但波兰军中一个名叫格林斯基的信奉基督教的鞑靼人叛变，打乱了波兰军队的行动。因此，1508年10月8日西吉斯孟便和莫斯科缔结“永久的和约”，承认伊凡所征服的土地。他从中取得的好处主要是他现在可以转而对付进犯加利西亚的摩尔多瓦的斯特凡；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匈牙利对摩尔多瓦的宗主权。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或其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之间，不论是友好的或不友好的，都很少有交往。而在匈牙利，却由于本国的内讧造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局势，其规模足以危及王位的稳定，从而影响国际上的形势。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小贵族们曾经希望约翰·科尔文能继承父位而为国王。甚至在1492年以后，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事实证明约翰也没有能力和瓦迪斯瓦夫竞争，他显然相当满意地接受了对他所做的安排，并且忠诚地为瓦迪斯瓦夫效劳（只有一次当他被无耻地骗去了一些产业时，他似乎有过反叛的念头）。但是反对瓦迪斯瓦夫的情绪仍存在着，这时已经拥有极大权力的扎波利亚伊家族攫取了这一伙人的领导权。伊姆雷·扎波利亚伊的兄弟斯特凡在1490年被选为巴拉丁选侯，担任此职达10年，使他原已巨富的家财更为增多。他后来也于1500年去世。但是，他那活动能力很强而又具有野心的遗孀，即切申女公爵，毫不隐讳地声称她要使自己的一个儿子登上王位。

与此同时，匈牙利王位的继承问题，主要由于瓦迪斯瓦夫秉性软弱，陷入了一种荒谬的僵局。1475年他20岁时曾由人代理与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阿奇勒斯的女儿巴尔巴拉结婚，但却一直没有迎娶新娘。1478年，他在征服奥尔米茨时遇见了马加什的年轻的第二个妻子阿拉贡的贝阿特丽克斯，据说两人均为对方非常的美貌所吸引，马加什一死，贝阿特丽克斯提出瓦迪斯瓦夫应该和她结婚，这样她既可得到一个漂亮的丈夫，又可得到一顶王后的冠冕。红衣大主教鲍科茨在贝阿特丽克斯的住处为两人秘密举行了婚礼，但是瓦迪斯瓦夫当时即提出异议说，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因为他已经结过婚。他这时已经牢牢地被束住手脚，不可能指望日后有任何合法的子女了。

在这种情势下，对马克西米连最有利的就是使瓦迪斯瓦夫保住王位，而瓦迪斯瓦夫本人也转向这位至少愿意等待他终其天年的人物寻求支持和鼓励，以对付他的那些野心太大的臣僚。正如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所写的，到1510年，马克西米连“早已不是这位国王的敌人，却已成了他的朋友和顾问”。神圣罗马皇帝的使节接连不断地来到布达，给这位国王带来忠告和帮助，同时也在匈牙利的权贵中间搜集了一批亲哈布斯堡的人物；他们在这一任务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

1499年，波兰、匈牙利两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结果。到此时为止，条顿骑士团已有多

年未曾对波兰进行骚扰，也未受到神圣罗马帝国方面的怂恿。卡吉米日晚年时期，条顿骑士团的首领梯也芬一直是波兰国王任劳任怨的藩属和忠心耿耿的合作者，在卡吉米日去世后仍向扬·奥尔布拉赫特效忠。但并非整个骑士团的成员都对这种关系表示满意，因此在梯也芬1498年去世后，他们就决定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从神圣罗马帝国方面取得支持，并提出由神圣罗马帝国主要的诸侯之一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继承梯也芬的位置。弗里德里希拒绝向扬·奥尔布拉赫特效忠。

1499年12月在普雷斯堡举行了亚盖沃家族会议。瓦迪斯瓦夫、西吉斯孟（他住在布达他的兄弟处）和红衣主教弗里德里希参加了会议。会议计划寻求和法国结成联盟；为了巩固这一联盟，由瓦迪斯瓦夫和布列塔尼的安妮之侄女坎戴勒的安妮结婚，奥尔布拉赫特则和这位安妮的妹妹热尔梅娜结婚。路易十二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1500年7月18日法国的使节便在布达和波兰、匈牙利两国订立了一个泛泛的永久性联盟，反对土耳其人以及目前和将来的一切敌人，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和德意志王则除外。

这样安排妥当后，扬·奥尔布拉赫特便转向条顿骑士团，要求骑士团效忠，并且准备动员兵力。在此情况下，无论神圣罗马皇帝或帝国议会都不愿帮助骑士团；再者，皇帝与议会之间由于相互争吵而严重分裂。于是骑士团首领做了让步，同意宣誓效忠。但是，在他宣誓之前，也在奥尔布拉赫特举行婚礼之前，奥尔布拉赫特却溘然而逝。骑士团首领此时便迟迟不去向亚历山大宣誓效忠。所以，事态发展的唯一直接后果仅仅是瓦迪斯瓦夫得到一位法国妻子，因为教皇最后终于为他解决了难题，宣布他以前的两次婚姻均无效，于是他便派人迎娶这位新娘，及时和她完婚。

这并没有影响瓦迪斯瓦夫和马克西米连的关系。但是，波兰此时却与神圣罗马帝国发生齟齬，因为弗里德里希坚决拒绝效忠；而且，马克西米连由于对奥尔布拉赫特的行动极为不满，也对弗里德里希进行煽动；在亚历山大向教皇求助并从教皇那里获得一封责令骑士团服从的信件之后，马克西米连却使教皇收回了这封信。与此同时，匈牙利的王后生了一个女儿，也和她的生母一样取名安妮。1504年，约翰·科尔文去世，留下两个孩子，儿子叫克里斯托弗，女儿叫伊丽莎白。切申女公爵眼见机会来到，便立即让她的幼子乔治和伊丽莎白·科尔文订婚，同时又向瓦迪斯瓦夫发动攻势，要求将小公主许聘给她。

的当时正担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这一要职的长子约翰。西吉斯孟促成了这些婚事，这时他正全力倾注在从事反德意志的政策上面。

整个事情就像是瓦迪斯瓦夫的那些比较有力的兄弟们强加于他似的，但是他至少可以下定决心不让扎波利亚伊家族得逞。他便一面对他们敷衍拖延，一面向马克西米连求助。1505年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约翰·扎波利亚伊这时把他的事业和小贵族们的事业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哈布斯堡的民族独立事业。2月，议会以废除王位对瓦迪斯瓦夫相威胁，但也仅止于威胁而已。在7月召开的第二届议会上问题可望有所分晓。在此次会议之前，瓦迪斯瓦夫向马克西米连要求军事援助，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投票赞成。但是，德意志的军队姗姗来迟，而率领2000名士兵的扎波利亚伊却准时到达，于是议会通过决议，虽没有触动瓦迪斯瓦夫本人（如扎波利亚伊事先和王后所商定的），却把匈牙利所遭受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匈牙利的国王是外来的，因此发誓以后决不再要外来的国王了。

第二年，王后生下一个男孩，名叫路易，因而直接危机总算过去，而马克西米连则以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为满足：这两个孩子都要和马克西米连自己的两个后裔结婚。因此，匈牙利一波希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间的关系仍像过去一样亲密。但是，由西吉斯孟于1507年1月24日加冕为王的波兰，却不在这个集团之内，而且仍和条顿骑士团时相摩擦。弗里德里希仍然拒绝效忠，条顿骑士团在马林堡会议（1506年8月）上制订了一项计划：废止东普鲁士对波兰国王的宣誓效忠，东普鲁士与王室所辖的普鲁士合并，合并后的行省将作为波兰国王的一个采邑，由骑士团首领进行治理。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匈牙利企图从中斡旋，而西吉斯孟此时正要把全部兵力用于反对瓦西里的行动，因而不愿急于得出结果。在整个波兰与莫斯科的战争期间和签订永久的和约后的最初两年，谈判一直拖延下去。这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去世（1510年12月14日），条顿骑士团选举了霍亨索伦—安施帕赫侯爵阿尔布莱希特为自己的新首领。此人一向默默无闻，而且贫困潦倒，但却富有进取心，而且野心勃勃。他不仅立即和马克西米连而且也同瓦西里开始谈判。西吉斯孟闻悉此讯，便转向匈牙利这个对立面，他娶扎波利亚伊的姐妹巴尔巴拉为妻，并和扎波利亚伊家族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要互相援助以反击一切敌人（意指哈布斯堡王室）。这是在1512年，这年较晚的时候，瓦西里进攻立陶宛。

整个1513年，战争一直在进行。与此同时，马克西米连获悉西吉斯孟和扎波利亚伊家族订有密约。鉴于这一密约对于他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整个王朝计划有危险，于是亲自派遣1名使节前往莫斯科（1513年12月）。这位使节（超越了他所奉的指示）缔结了一个有深远意义的进攻性的联盟，可是事实证明这件事在德意志并不受人欢迎。德意志有好几个诸侯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室扩张势力而进攻波兰。后来，在1514年9月8日，波兰—立陶宛军队在奥尔萨彻底打败了俄罗斯人。因此，马克西米连便决定与西吉斯孟讲和，而西吉斯孟由于不愿意面对着俄罗斯、神圣罗马帝国和条顿骑士团联合起来对付他的这一前景，因此他也愿意和解。经过一番磋商后，于1515年5月20日在普雷斯堡就条顿骑士团问题签订了一项初步协议，7月22日在维也纳签订了正式条约。根据初步协议，神圣罗马皇帝承认托伦条约；而西吉斯孟则同意不得吸收波兰人加入骑士团，而且今后5年内波兰人与骑士团之间发生的一切冲突均须提请神圣罗马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进行仲裁。整个会议最终解决了匈牙利—波希米亚的继承权问题。年幼的国王路易（已于1508年加冕为国王）和马克西米连的孙女玛丽结婚，而安妮·亚盖沃则和马克西米连的一个孙子斐迪南订婚，神圣罗马皇帝亲自作为代理人，并许诺倘若斐迪南执意不从，他本人将娶那个女孩子为妻（这个婚姻实际上于1521年结成）。

这次交易的重要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正如事实所证实的，仅仅过了11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两国王位都归于哈布斯堡王室了。某些匈牙利的史学家说：这是上述协定的一个直接后果，如果路易十二不认为匈牙利是哈布斯堡的一个卫星国，他就不会挑动苏丹进攻匈牙利了；而1515年以后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种情形在未来的一段很长时间内，也改变了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西吉斯孟这时放弃了他的反德意志的政策，而凑巧巴尔巴拉·扎波利亚伊逝世，这种改变实行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1518年4月12日，西吉斯孟娶博纳·斯福尔扎为妻（这次联姻是由德意志人安排的），所以，在建筑、艺术和文学中意大利影响的扩大，人们公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博纳王后的个人影响，这在未来的岁月中是波兰生活的一种显著的特色，这也可以算作维也纳会议的一种结果。西吉斯孟拒绝兼并西波美拉尼亚（他本来不久后即可这样做）和他拒绝瑞典民族派要他兼任瑞典国王的请求，无疑也是这一会议的结果。

吃了亏的是匈牙利的扎波利亚伊派、条顿骑士团和莫斯科公国。约翰·扎波利亚伊这时却通情达理，自甘失败；而且公平而论，他在以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制造事端。骑士团和波兰之间又重新开始令人生厌的谈判。骑士团首领似乎受到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某种暗中怂恿，因为他说话时的口气非常无礼，要求不但归还王室所辖的普鲁士领地，并且提出波兰应为占领50年而付给赔偿，以此作为签订协定的代价。1517年3月10日，他和莫斯科订立一项攻守同盟，并于次年要求神圣罗马皇帝在波兰拒绝接受他的条件时给予军事援助。他还接近丹麦，收到比较大的效果。1519年12月，西吉斯孟宣战，战斗激烈。但是，1521年4月5日，通过神圣罗马皇帝和匈牙利国王从中调停，签订了一个4年休战协定；在休战期满之前由他们决定骑士团首领是否应宣誓。但在期满以前，整个形势改观，因为阿尔布莱希特接受马丁·路德关于他应改奉新教，结了婚，并把他的教士身份改变为世俗人身份的建议。既然神圣罗马皇帝对宗教改革持敌对态度，这件事除了联合波兰否则就做不到，而西吉斯孟既由于国内的原因，又鉴于土耳其方面的威胁会再起，便接受了阿尔布莱希特的建议。1525年4月8日，在克拉科夫签订了一项条约。阿尔布莱希特在效忠于波兰国王的条件下接受了东普鲁士。对这个新建的公国的继承权则归于他本人和他的3个弟兄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倘若他们世系中断，该公国则仍归于波兰。3日后，阿尔布莱希特在克拉科夫的市集上公开举行效忠礼。

在此期间，与莫斯科的战斗时断时续。瓦西里终于恢复了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联盟。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在1520年9月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继而在1522年9月14日又签订了5年的休战条约。条约是以占领地保有原则为基础，因而莫斯科便拥有斯摩棱斯克要塞，该地虽小但战略意义却非常重要。1526年休战条约又续订。

瓦迪斯瓦夫和扬·奥尔布拉赫特之间的家族协约在内政方面仅仅涉及防止实际上的叛乱和防止（国王所属臣民）挥霍王室岁入。可以说，前一种情况并未发生过，或者至少并未公开发生可以称为条款中所指的那种情况；而后一种情况却经常发生，但是也从未被用来作为兄弟之邦进行干涉的口实。没有任何史料说明他们兄弟两人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协调国内政策方面曾超越这些做法。其他政治因素相互结合起来或协调一致起来的情况，则更加稀少。我们甚至也没有发现过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国议会曾经联合起来反对过它们共同的统治

者。然而，在这个时期内，制度和形势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的发展路线却极其相似，这一事实只能部分地用这样一个观点来加以解释，即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但不可避免主要是由于两国互相影响和互相模仿的缘故。具体地进行比较研究是可以从这一最有趣味的角度来处理这3个国家的内政史的，但是令人遗憾，这样的研究工作仍然有待进行，而本章只能分别扼要地指出各个国家中的主要发展情况。

波兰在体制结构方面更加原始，而其发展也比较晚。实际上它主要是在追赶匈牙利。此时波兰正在匆匆经历匈牙利已经经历过的某些演变阶段。我们在这里提出匈牙利，因为不管波兰的“兹拉启塔”（szlachta）来源于何种实际情况，毫无疑问至少到13世纪时，这一人数众多的小贵族阶级，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都更类似匈牙利当时的“柯兹内梅什克”（köznemesség），^[2]而不像波希米亚的贵族阶级。如果对匈牙利的族系做更加周密而细致的研究，这种相似的地方就更加清楚了。1374年，由于匈牙利国王路易向波兰贵族颁布了“科希策特典”，“兹拉启塔”的地位就进一步明显地和“柯兹内梅什克”的地位相同；它基本上是匈牙利1223年“黄金诏书”的翻版。此后不久，随着“沃迪克”（wlodykes）这一较低阶层的最后消失和波兰各省的相互同化作用，“兹拉启塔”便成了一个由性质类似的人构成的阶级，其成员的各种个人自由和豁免权都一再得到认可。由于这些权利的存在，国王的权力显然受到了限制，即国王在国内或国外都不得采取与这些权利相抵触的行动；但除此之外，“兹拉启塔”对于政策的决定是没有发言权的。唯一供国王咨询的机构是国王的枢密院，这是一个由少数几个高级官吏组成的小型机构；但是国王甚至并不一定要听取它的意见，更不必说采纳它的意见了。

但是在14世纪，“兹拉启塔”的阶级意识不断增长，因此它便开始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许多因素加在一起，就使人们感到他们有这种愿望。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旧有的义务兵（insurrectio）变得几乎毫无用处；国王要打仗，就需要有比较训练有素的军队，不管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是要给钱的。但是，如果“兹拉启塔”不同意，国王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科希策特权条例”所规定的每户不得减免的二格罗申以外的金钱。这就使“兹拉启塔”讨价还价的地位大为增强，因为国王确实需要征得它的同意而解囊，才能办事。由于波兰王位继承问题无法决

定，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地位。亚盖沃以后的每任波兰国王要想保住自己的以及后代的王位，就必须和他的臣民进行讨价还价。

因此，“兹拉启塔”的地位在15世纪上升很快，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达到和国王平分秋色的地步。早在1404年就已开始实行某种类似普遍代议制的制度，当国王需要征收非常税收时，就要派遣枢密院的成员前去和各地的“兹拉启塔”机构磋商。这里只举出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阶段：1454年国王在“策雷克维策特权条例”中，重申大波兰的“兹拉启塔”的各项原则，并且许诺不改变这些原则；国王未经与各地的地方议会（Seymniki），即地方上的“兹拉启塔”会议协商，不得征召义务兵。^[3]这些诺言后来也适用于波兰其他各地，并在“涅沙瓦特权条例”中加以保证。至迟到了1493年，在法律上的安排终于成形，波兰拥有三级代议制：地方议会；由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的省议会；和全国议会（包括三个“阶层”，即国王、枢密院和众议院，众议院由各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

从理论上说，这丝毫不会影响国王的特权，因为只是在涉及议会显然有权可以否决的事项时才不得不征询其意见^[4]。著名的1505年的“毫无新内容”（nihil novi）的法规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国王只不过在这里再次重申先前的保证而已。甚至在此以后，国王未经与议会磋商即进行了许多重大的事务，如和条顿骑士团取得协议，规定城市和犹太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有议会的存在，国王想要通过采取片面行动而践踏“兹拉启塔”的权利，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再者，随着情况日趋复杂，国王不需要支持即可自行决定的问题的范围也日益缩小。议会因而就每次进一步视国王方面所做的让步而做出自己的让步，结果国王可以自行其是的范围就更小了。

新的发展形势使小贵族的力量增加了，结果不但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也削弱了权贵们的势力。这些权贵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单独阶级。但是一小撮大家族事实上形成了朝廷中的一批扈从，他们之间分享高官厚禄，这些窃据高位者便组成了过去的枢密院，这时称为参政院。众议院纯粹由小贵族组成，自然就成为与参政院相抗衡的砝码，而且由于议会通过任何决议都需要全体一致，因此众议院甚至掌握“最后的手段”；不过，实际上并没有由于有某个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否决因而使重大的决议不得通过的情况。

在这段时间内，“兹拉启塔”的力量也靠牺牲城市，特别是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大为增加。15世纪初期，波兰农民的处境并不坏。许多村镇起源于移民。它们对于自己的事务拥有一定程度的有保障的自治权。它们缴纳固定的赋税，但随着货币贬值，这种赋税已变得和贵族向国库缴纳的贡俸一样少得可怜。地主在转向商品化耕作之前，无意强迫农民生产比所能消费的更多的农产品。首先，农民有自由迁移权，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劳动力求过于供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地主敢于过分地进行盘剥；否则，他的农民可以干脆离他而去，到其他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劳作。在15世纪的晚些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情况有所改变。原因之一是此时逐渐可以通过但泽输出谷物，虽然这也许并不是某些人有时所说的决定性的原因。但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包括国防兵役的改变，由他们亲自参加转变为他们花钱雇人参加），地主们正在转变为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农场主，他们最关心的是为他们的土地取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他们这时开始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直接经营这些土地。1493年的议会重申过去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农民只可在一定的日期离开农场，除了引荐新的佃户外，否则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出土地和财产。但是，这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1496年、1501年、1503年、1510年、1511年），禁止农民或他的儿子们（起初这种禁律仅适用于有一个以上儿子的情况）未经主人同意擅自离去，并且简化手续，规定擅自离去者可以追回。同时，农民的法律地位被贬低。原有的自治权利已被取消，地主的管家代替了从前的村长。农民们长期以来在许多方面都要服从地主的传统家法，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可能向国王法庭上诉。1496年和1501年的法律对此大加限制，1518年西吉斯孟最后终于放弃了裁决农民对其主人（如系普通平民）上诉的权利（在王室和教会的土地上则仍可上诉）。田赋和劳役都有增加，地主如今为了自己农场的利益可以大量侵占过去农民的土地，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是无权这样做的。

城镇仍然保持其自治和权利，国王和各城镇分别谈判供应的问题。因此，城镇不受议会发展的直接影响，只有克拉科夫一地按惯例有代表参加议会。但议会的发展自然也增加了“兹拉启塔”的政治力量，从而削弱了城镇的政治力量；“兹拉启塔”还取得某些其他特权，尤其是免去关税的特权（1406年实行，1504年、1541年和以后几次重订），也对城镇不利。地方上的制造业无法和不纳关税的德意志

进口货相竞争。土耳其人在黑海北岸立定脚跟，旧时来自东方的转口贸易中断了，这也使城镇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在波兰，许多事态发展日后所产生的恶果在当时并不很明显。亚盖沃时代的各任波兰国王都是恪尽其职的，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团结得相当牢固。我们从研究波兰的对外关系中可以看出，波兰实际上损失甚微（假定和条顿骑士团的和解仍有可能产生良好结果的话）。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西吉斯孟于1526年在一直统治马佐夫舍的皮亚斯特王朝的最后一批王公去世后，把马佐夫舍并入了波兰。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有起有落，在扬·奥尔布拉赫特去世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重又落入一人之手时，波兰人即打算实行一种新的联合（即梅尔尼克联合），规定联合选举国王兼大公。由于波兰并没有必须选举亚盖沃家族成员的规定，这就等于说，该家族对大公国的世袭权利消失了。但是，立陶宛人拒不同意这种联合，虽然他们后来接受西吉斯孟为他们的大公（尽管他同时又是波兰国王）。这个问题只是到以后才又提出。

匈牙利事态的发展比波兰更动荡。波兰15世纪90年代事态的发展是70年代事态发展的自然结果，而70年代事态发展又是前数十年事态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在匈牙利却插进了一个马加什·科尔文生机勃勃的朝代。而马加什·科尔文无论在政策目的和施政方法上都更接近于与他同时代的中欧和西欧新一代的王公们，而不是他的各个斯拉夫邻国。尽管他尊重匈牙利宪法的形式，但实际上却非常不重视它，所以他的统治和开明的专制相接近，匈牙利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往往模仿西方的形式。

匈牙利在他去世后立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反动潮流。这种反动潮流也许并不像后来的匈牙利学者往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道理的。匈牙利的主要过错出在马加什为了豢养他的“黑军”而向匈牙利人征收税金。如果这支军队能够保存下来，匈牙利有可能避免莫哈奇的惨败，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马加什组织他的常备军主要不是用来防备土耳其人，而且也没有用于这个目的。他在南部边界只用少数雇佣军补充民团；而且他在该地（在他即位最初几年之后）只是采取防御行动，使用这支小部队即可应付。他把自己的雇佣军扩充为一支庞大的部队并课征重税来养活这支军队，其目的则是为了他的西方战役，而这些战役不能为他的匈牙利臣民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他们在法

律上也不是必须要承担捐献义务的。至于他的其他措施，虽然有很多是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但也有很多措施就其直接效果来说，无疑是压制性的。

然而，他的统治却得到人民的拥戴。拥戴他的不仅有长期悼念他的农民，还有那些他（和波兰的卡吉米日一样）曾向之讨好的小贵族。他讨好的做法不是给予他们以实际的让步，而是沉重地打击那些显贵们。这些显贵是一群人数不多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富人。他们就是借助这支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常备军把瓦迪斯瓦夫扶上了王位的。这些人对新王朝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王朝应该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在找到了一个其一般性格符合这一要求的人物之后，便着手大大限制国王的权力。瓦迪斯瓦夫不得不在加冕宣誓以外又颁发一个书面的“即位特许状”，其中除重申关于尊重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等一般惯常的保证外，又不得不就外交、内政各个方面做出特殊的保证。外交方面，尤其是如上面所说，倘无高级主教和王侯们“明确、自由和自愿的同意”不得与弗里德里希三世或马克西米连订立协定。内政方面，在发行新钱币和实行其他各种措施之前，必须征得大主教和王侯的同意。他还不得不同意取消马加什的“新政”，特别是要取消用以维持“黑军”的弗罗林税。国会要定期开会，国王必须在开会前1个月发出通知，并事先通知他要在国会上提出讨论的问题。1507年终于确立了一项原则：国王颁布的法令未经国务会议批准，不具有法律效力。1504年又宣布，任何地区违背王国古代规定的自由权利，不经整个国会同意而向国王提交任何补助金或献金是非法的。这就堵塞了一个最重要的漏洞。

国王的权力即使在法律上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又由于瓦迪斯瓦夫的软弱而降为零。国王仍然可以通过节俭而又明智地使用从王室的土地、矿产和其他王室财产所取得的重大收入而操纵大权。但是瓦迪斯瓦夫却让控制这些收入的大权旁落到了一帮朝臣的手中，他们便无情地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结果收益上达国库时，只有马加什时代的一半，有时仅及1/4。有些收入则包给了匈牙利和外国的投机商们，以便预先换取现金。当这些现金也花完了的时候，这位穷困潦倒的国王只得出售马加什收藏的书籍和绘画。有时候，他简直是靠乞求施舍才能使他的朝廷酒食两足。

国王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因素，于是小贵族和大贵族之间便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小贵族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大贵族开始时便把国务会议成员限定为4名高级官吏、4名主教和4名贵族。但国会却通过一项措施，在这个数字之外增加了16名小贵族的代表。小贵族在国会中当然占有绝大多数，因为一切贵族都有权参加国会，而实际上也必须出席国会。1495年经批准大贵族的地产也必须置于县当局的管辖之下。按规定，“福司班”（föispan，即地方长官）由县议会选举并对县议会负责（县的所有贵族在选举中各有一票），全县任何人均不得在该地方长官的管辖之外。1514年，小贵族的地位在理论上又得到了一次显著的肯定。1498年的国会决定统一编纂匈牙利的法规。这项工作几年之中一直进展不大，但后来由法学家维尔伯齐接手。维尔伯齐本人出身于小贵族家庭，而且他个人的致富之术也不亚于任何人。维尔伯齐的著作称为《三章法》，这是在匈牙利农民起义（我们在下文中将谈到这次起义）之后不久问世的，记载了起义后农民状况恶化的情况。这部著作着重地阐述了匈牙利人所享有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全部为贵族——即相对于“苦难的庶民”而言的“匈牙利平民”——所独享。这部著作接着又着重地指出“平民”中所有的成员之间的地位则完全平等。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全部法律和惯例对于他们都是平等的，只是在“领主”犯法时课以较高的补偿金而已。但是，这并不是“根据自由，而是按照官职和级别而来的”。这一著作还发展了著名的君权神圣说，即君权是以王冠本身为象征的神秘实体；但从政治意义来说，它是由两种人所组成：一种是戴王冠的国王，另一种是全体平民，而每一个贵族则是整个平民中的一员。这两种人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离的，因为贵族选举国王，而国王又是贵族的渊源；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任何一方的决定都是无效的。维尔伯齐的著作（该书声称系根据匈牙利的习惯法编纂而成，而且可能比公认的在更大程度上依据真正的古代传统）从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是数百年来一直被作为匈牙利宪法的权威性阐述而加以引证；该书的问世大大加强了小贵族的地位，不但在他们对农民和市民的关系上是这样，而且在他们对大贵族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值得着重说明的是，根据宪法大贵族不但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如在波兰那样），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不能自成一体。他们中间有很多是新人：红衣大主教鲍科茨的父亲论社会地位是个农奴，论职业是个蜡烛匠人；后来的财务大臣在历史上用三种语言分别名为福钦纳图斯、塞

莱切什或格鲁克，他是一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这些年月中，一些人所掌握的大权，不过是由于在混乱的局面下那些有本领的人物乘机浑水摸鱼而捞到的。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就使权贵们掌握了实权，这种实权的分量超过了小贵族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力。所以，这些年中匈牙利的事务是由权贵们所控制，而事态的发展方向则要视权贵中各派之间层出不穷的钩心斗角的进程而定。小贵族们所享有的权利本身并不是他们力量的真正源泉，因为参加国会这一义务把他们弄得民穷财尽，他们不能够长时期地离开自己的田庄，而权贵们却可以利用使争论的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下去的办法使他们挨饿，从而迫使他们就范。

匈牙利农民的状况也和波兰农民的状况一样每况愈下，尽管开始时要比波兰缓慢得多。1492年的国会仍然批准了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但却以减少农民迁移的诱因这种间接办法来加以限制。国会使用的办法是把各地入境者的所有生活水平都降低到所能容许的最低程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地主都必须征收各种允许征收的税款，并在以前不收此种费用的免税地区 and 市集城镇一律征收。到1498年，国王所属的免税城镇也开始征收。1504年又禁止农民猎取禽兽。1514年爆发了多萨起义这一个可怕的非常事件。红衣大主教鲍科茨·托马什对于教皇的职位梦寐以求，因此想要有所建树。他在教皇利奥十世的要求下，鼓吹组织十字军东征，大约有10万名农民和其他贫苦阶级的成员志愿参加了这支十字军。由于没有一位高级将领愿意指挥这批乌合之众，鲍科茨遂任命一名塞克勒人的职业军人乔治·多萨担任指挥官，但后来心有悸恐，又想解散十字军。多萨便趁机率领他手下的人掉过头来反对“贵族老爷们”。经过一场浴血战斗之后，他战败被擒。在这次战斗中，他的手下人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他本人身受难以描述的折磨之后被处死。因此国会对国王所属免税城镇以外的全体匈牙利农民一律判处“实际的长期苦役”，并进一步把比以前远为沉重得多的赋税和劳役强加到他们头上。

尽管匈牙利的反农民立法比较耸人听闻而且不是逐步实施的，但是这种立法并不比其他国家的更为苛刻，身受其苦的农民的状况也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差。但是，匈牙利四面楚歌的形势使它更经不起这种折磨，就国家的防务问题而论，更是如此。“黑军”取消后，国家又恢复了原先的民团制度，除非有外国侵略时才能实行大规模的征兵。

后来在“弗洛林税”终于不得不再次恢复的时候，负责提供民团的贵族宣布他们应免此税。因此，尽管通过种种办法，税收征入仍然甚少，养育民团不多。匈牙利全境唯一没有完全忽略防务体系的地方是南部边境地区，国王在这个地区派驻有卫戍部队，这些部队实际上通常是由教皇或威尼斯给予津贴而支付的。

1490年以后，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实际上已与波希米亚重新合并（匈牙利国会坚持保留其权利并保留其要求补偿的权利，但这种补偿从未兑现）。波希米亚的主要特殊问题是宗教问题。天主教派和酒饼同领派之间根据库特纳霍拉条约建立的和平措施，并不是十分完善的。酒饼同领派一直拒绝放弃规约（Compactata），也拒绝放弃把他们与天主教派分裂开来的任何教义方面或组织方面的论点。同时，虽经多方努力进行调停，教皇也同样坚持拒绝继续执行规约。这是一次休战，甚至本来就不是要它成为一个长期的休战，因为路德的教义一经传播，敌对行动又要重新点燃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弟兄联盟”的教派却不断迅速地发展起来。不知什么原因，瓦迪斯瓦夫对这个教派却有一定的好感，而该教派在贵族和酒饼同领派的高级教士中间也有几个很有势力的保护人。1496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激进的派别分裂出来，称为“阿莫西特派”。这一教派中的大部分人在卢卡斯长老的领导下，逐渐转而信奉禁欲主义成分较少的教义，他们的信徒如今可以参与世俗事务，担任各种官职。有相当多的捷克贵族此时参加了这个教派，它在两个主要的敌对派别之间居于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波希米亚贵族自然和匈牙利贵族一样，也利用了“多布热”国王的软弱无能。他们在1500年通过了一部完整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国会有权投票决定征收赋税，有权控制赋税收入的用途，并决定国防所必需的现役人数。国王只能在外国进攻的情况下才有权调动军队。各省的官员则由贵族选举，并对宪法宣誓。国王甚至失去了赦免之权，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得撤换，他们的判决不得取消。1508年国会接管国王的债务，但条件是由他们管理王室的收入。

这样一来，波希米亚除了名义上而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贵族共和国。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国内情况一样，贵族认为自己才是个人权利或政治权力的唯一代表。宪法阐明的原则是，唯独他们才有自由，而居民中的其他各阶级都命中注定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所享受的

任何利益都是出于恩典，而不是他们的权利。波希米亚农民的地位和邻国一样每况愈下。一直到胡斯战争时还继续存在的为数相当众多的自由农民和半自由农民阶级，在胡斯战争之后由于采取了“凡没有领主者，必须有一个领主”这一原则而被消灭。在瓦迪斯瓦夫即位后的最初几年里，议会通过法令规定，农民不经自己领主同意不得离开住地；领主们又彼此相约不得收容由其他庄园迁移来的农民。1497年，农民被奴役的地位已经法律确认，在1500年的宪法中又重新作了规定。和其他地方一样，领主们愈来愈多地转向直接经营农场和从事农业工业，推到农民头上的赋税和劳役也随之大量增加。

贵族也对城镇展开了攻势，在这方面的冲突往往因为宗教和民族的对立而尖锐起来。城镇被置于贵族的监督之下，其特许权或被削弱，或被取消。城镇居民被禁止在乡间地区进行交易，商人甚至在路途中遭到扣留。1500年的宪法取消了城镇居民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然而，城镇居民所代表的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他们为自由而英勇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简直和一场内战相同。他们在1508年恢复了在议会中的代表权，1517年又签订了一项休战协定（即所谓圣文策斯拉斯条约），其中规定城镇放弃他们根据乔治·波迪布拉德的法令取得的酿造和出售啤酒的专利权，而贵族则承认他们自治，并准许他们在议会中有代表权。

与波兰和匈牙利相比较，波希米亚社会结构很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没有一个相当于波兰“兹拉启塔”或匈牙利“柯兹内梅什克”的庞大而有力的阶级。在这3个国家中，波希米亚受到的西方影响最深，在这种影响之下少数大家族（1480年在摩拉维亚只有15个）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世袭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不但在自己的庄园上几乎是绝对专制的君主，而且独霸了国家所有的要职。小贵族则笼统地被称为骑士团，处于大贵族和非自由人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

在瓦迪斯瓦夫执政期间，波希米亚的骑士也和其他国家的骑士一样，不但侵犯非自由居民，而且也冒犯大贵族。1487年（波希米亚）和1492年（摩拉维亚）他们都有一定数目的代表进入了高等法院。1497年国王瓦迪斯瓦夫规定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比例名额，由大贵族和骑士团二者分担国家的要职。这是骑士方面的胜利，因为他们如今也有份担任这些职务，但是大贵族仍占多数，并把持了其中比较重要的职务。因此，波希米亚的寡头（因为国王懦弱无能，他们的实权当然

就更大了）合法地享有，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享有匈牙利寡头们只是在事实上享有的无上权力。

波希米亚人在见机行事方面并不比匈牙利人高明。在这里，这个时期的内政史也是一部各斗争集团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肮脏历史。如果说这种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的状态之所以还没有给国家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是因为它幸而远离土耳其军队。波希米亚的大贵族和骑士团已经从瓦迪斯瓦夫那里取得了一项保证，即他们不必派遣士兵在自己的边境以外的地方服役，因此他们便能够超然地甚至心安理得地坐视一场席卷匈牙利的风暴即将来临。

国王瓦迪斯瓦夫于1516年3月13日死于布达。10岁的路易已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国加冕，两国朝廷中各个权贵集团对于他的继位问题均无异议，只是反对这样的意见，即被指定为路易的共同保护人的神圣罗马皇帝和西吉斯孟无论如何都无权干涉两国的事务，因为两国的事务已经完全掌握在这些权贵们的手中。波希米亚局势的发展造成了两派的争权夺利。两派首领是瓦迪斯瓦夫曾指定为自己儿子导师的两个人：罗兹米达的日丹涅克·列夫（布拉格的第一任城主，代表酒饼同领派）和罗森贝格的布莱梯斯拉夫·斯维霍夫斯基（天主教派领袖）。罗兹米达在开始时势力较大，但是他鱼肉人民，引起人民深为不满，因此当年轻的国王于152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即以符腾堡的约翰取代了罗兹米达，并任命乔治·波迪布拉德之孙明斯特尔贝格公爵查理担任摄政，一时人心大快。但是，罗兹米达仍有足够的力量，终于使国王收回成命，于是波希米亚此后独立存在的不多几年的历史便成了天主教派和酒饼同领派两派领袖和信徒之间自相残杀的历史。

匈牙利的情况至少也是同样的不妙，朝廷中的权贵们（其中最有力的是路易的堂兄弟勃兰登堡的乔治侯爵）肆意掠夺国家的收入，同时置办奢华靡费的庄园，结果国家所需要的金钱更加短缺了。路易实际上解散了他的民团，几个权贵也仿效他的做法。反对朝廷的只是那些争权夺利企图分得一杯羹的敌对的权贵们，因为小贵族们这时又是群龙无首。约翰·扎波利亚伊已和这些小贵族脱离关系，退至特兰西瓦尼亚，切实地巩固自己的独立的准公国。小贵族的代表甚至也被排斥在枢密会议之外。此时巴尔干各地的形势再一次险恶起来。1520年苏里曼大帝接替了父亲谢里姆的王位后，立刻转向北方。1520年他

派遣使节去见路易要求朝贡。在遭到拒绝后，他准备向布达进军，但是这必须首先攻下萨夫河和多瑙河畔的要塞。沙巴茨和贝尔格莱德的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英勇自卫，最后终于陷落；因为国王命令率军驰援的巴拉丁选侯和扎波利亚伊行动迟缓，战斗在他们尚未到达之前即已结束。

如今全国上下觉悟到国防的重要，缅怀马加什的伟大时代，1521年12月的国会因而通过一条法律，接受了为建立一支常备雇佣军而普遍征税的原则；不过这是取代了过去的兵役制，而不是它的补充。同时，领主们解除了维持民团的义务，而小贵族们也摆脱了服劳役的义务。然而征收的金额毕竟很少，就连这么一点税金，其中大部分也落入了巴拉丁选侯和其他官员的腰包，或者落入了经管和操纵国王的许多财政事务的塞莱切什的腰包。

苏里曼决定先攻取罗得岛然后继续北进，这就给予匈牙利一个意外的喘息时间。但是，匈牙利并没有就此加强自己的防务，而是乘机侵犯瓦拉几亚，并在那里建立了它的宗主权。

匈牙利派遣使者前往国外乞援。神圣罗马帝国在纽伦堡的议会深为贝尔格莱德的陷落所动，便派出使团前往维也纳和斐迪南大公（此时已娶安妮·亚盖沃为妻）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代表进行会谈。但是，哈布斯堡和法国之间的重大冲突刚刚爆发。德意志人兵力不足，只向斐迪南提供3000人，斐迪南便把他们派往克罗地亚。1523年、1524年和1525年虽经一再求援，也未产生更好的结果。至于路易自己方面的波希米亚人，罗森贝格的天主教派愿意提供少量的援助，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一向维护自己宪法权利的国会却对路易的求援回答说：“即使他送来一车这种信件，用金字大书特书，他们也不会听命的”。唯一的真正的援助（也是微乎其微的）是来自教皇的；教皇派遣一位使节前往匈牙利（安东尼奥·布尔焦男爵），这位使节亲自出资成立了一支人数不多的从摩拉维亚招募的雇佣军。波兰的西吉斯孟也想提供援助，他拒绝与苏丹继续订立休战条约，并派遣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前往匈牙利；但是，土耳其人在鞑靼人帮助下残酷地洗劫罗塞尼亚、沃利尼亚和波多利尼亚，他需要以所有的兵力来防护自己。正是由于这些洗劫，遂开始形成哥萨克的组织，成为波兰和立陶宛南部和东南边疆的一支特别的防御力量；哥萨克第一批应召入伍的花名册始于1524年。

1525年和1526两年，匈牙利的权贵中各敌对集团之间以及大贵族和小贵族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各方都指责说国家的现状是由对方造成的。1525年，小贵族们极力使维尔伯齐被任命为巴拉丁选侯，但次年他又被推翻。平心而论，他也并不比他的对手更有建树。同年又发生了弗朗西斯一世向苏丹靠拢这一著名的事件，这件事就决定了匈牙利的命运。

1526年初，布达方面十分可靠地获悉，苏丹正在准备出动，4月他便率领10万大军和300门大炮徐徐北上。4月间匈牙利国会结束时，议员纷纷叫嚷如果国王再不筹措并动用据说国家所能拿出的一切资源，他们将不负任何责任；而国王则答复说，由于国家资源不足，因此一旦灾难临头他不能负责。苏丹本人则缓缓前进，却派首相易卜拉欣率先前去攻打扼守多瑙河上渡口的彼得沃拉丁要塞。要塞顽强地进行防守，但在7月底终于陷落。在此几天以前宣布了一次全体早朝之后，路易本人即带领3000人的军队由布达出发，这是当时在首都可以调集的全部兵力。他沿着多瑙河右岸缓缓进军，以便各县来的民团和小部队能有时间赶来和他会合。但是，由于他发出的一些命令含混不清和前后矛盾，结果事情弄得更糟。扎波利亚伊率领他的特兰西瓦尼亚队伍来得太迟，不及参加决战；后来人们纷纷指责他故意拖延，其实他一连接到了四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他侵犯瓦拉几亚，而后来的几道要他和国王的军队会合的命令却又到得太迟了。指挥由德意志军队增援的克罗地亚军队的克里斯托弗·弗朗盖巴，也遇到同样的情形。但他和扎波利亚伊都曾请求国王在他们到达之前不要接战。和国王在一起的匈牙利军队拒绝离开国王单独行动，苏丹因而在埃塞克便毫无阻拦地渡过了德拉瓦河。当国王听说土耳其军队在莫哈奇前面停下来时，他为了防范有人临阵脱逃，便决定不等待援兵到达即行开仗，虽然他的全部兵力仅有约16000名匈牙利人和仅及其半数的波兰、德意志和捷克的雇佣兵。8月29日，这一支兵力不多的军队便在莫哈奇以南布阵，等候土耳其人前来。这位年轻的国王为了鼓舞部下，便和全体政府官员在战线的中央亲自指挥。被迫担任指挥的考洛乔大主教保罗·托莫里认为迅速攻打苏丹的罗迈连人前卫部队就可以在其主力到达之前将其击溃。但是，主力非常靠近，出乎他的预料，因此当匈牙利人把鲁梅利亚人赶回去而自己的队伍在战斗中也发生混乱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苏丹的炮火之下。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约有15000人丧命，其中有许多是部队的指挥官。路易本人也受伤。他的两名副官把

他从战场上抢救出来。但是，当他们渡过一条沼泽般的小河时，国王和一名副官溺毙，另一名副官回到了布达向国人报告全军覆没和国王死亡的噩耗。

[1] 原文如此，疑为阿尔伯特二世之误。——译者

[2] “兹拉启塔”和“柯兹内梅什克”均系指权贵以外的普通贵族。——译者

[3] 这个条例中的词句只是说“除非召开地区代表全体会议并经批准，否则将不制定任何新的条例，也不命令本国人参战”。本文作者认为问题很清楚，“战争”一词必须理解为波兰边境以外的战争，因为“兹拉启塔”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义务是从来不成问题的。

[4] 1501年的“梅尔尼克特权法”曾规定国王必须接受参政院的决议，但后来认为该法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四章 奥斯曼帝国（1481—1520年）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期（1451—1481年），一直努力实现一个主要目标：巩固奥斯曼国家。他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在希腊人统治的最后年代里，该城被弄得贫困不堪，人口也大大减少，但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再次成为一个帝国的值得夸耀的首都。苏丹修整古代的城墙，并从他治下的所有地区迁移成批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使其居住城中的空闲地点。一些公共建筑兴建起来，例如他所建立的大清真寺还设有沐浴室、医院、客舍以及向学生们教授伊斯兰法律的学院。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帝都本身就反映出奥斯曼国家的富裕而复杂的性质，它把安纳托利亚的各行省和巴尔干的土地都联结在一起，而这是帝国的旧都阿德里安堡所做不到的。

巩固国家也是苏丹连年不断征战的目的所在。145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的最后残余部分变成了奥斯曼的边境省份塞门德里亚，不过穆罕默德在1456年围攻强固的桥头堡贝尔格莱德未克，该地仍留在匈牙利人手中。1463—1464年占领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的贵族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在保卫边疆以及对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进攻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希腊，1458—1460年征服了由佛罗伦萨的阿奇亚约里家族所据有的雅典公国和帕莱奥洛格家族统治的希腊摩里亚君主国^[1]；而在爱琴海上，1455—1456年占领了萨索斯岛和萨莫色雷斯岛，伊姆罗兹岛和利姆诺斯岛，1462年占领了莱斯博斯岛。在与威尼斯的长期战争期间（1463—1479年），尼格罗庞特^[2]于1470年落入苏丹之手；不过，一直到威尼斯的盟友阿尔巴尼亚人在他们的领袖斯坎德培于1468年逝世之后减弱了抵抗，奥斯曼人才通过1478—1479年攻占克鲁亚和斯库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得到一个牢固的据点。

黑海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热那亚人集聚的加拉塔（君士坦丁堡市郊的一个区）于1453年被迫向穆罕默德降服，这样一来，热那亚就与它在这一带水域的海上帝国切断了联系。1461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对黑海南岸的控制权，在那里，热那亚人的利益中心阿马斯特

里斯，连同土耳其人的卡斯塔莫努酋长国（包括它的锡诺普港在内）以及希腊人的特拉布松“帝国”，都归属了苏丹。1475年，奥斯曼舰队占领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古老商业中心卡法^[3]，从而取得黑海的北岸。甚至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国，这时都变成了奥斯曼人的一个臣藩。在安纳托利亚，长期以来成为奥斯曼国家背后的一个危险敌人的土耳其人的卡拉曼公国，在其统治者易卜拉欣贝伊于1464年逝世后的年代里，大部分被占领了。旧的统治家族的王公们继续在领地的山区负隅抵抗，从而迫使奥斯曼人进行更多的战役，例如1470年和1474年的战役；但是，在这些事件之后，尽管独立的传统还维持了一个世代以上，卡拉曼终于成为苏丹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取得这样一些成就，但当穆罕默德在1481年逝世时，还没有完成巩固江山的大业。在欧洲，奥斯曼人对瓦拉几亚^[4]和摩尔多瓦两个基督教公国的控制尚未巩固。1462年遭奥斯曼人蹂躏的瓦拉几亚造成的麻烦比摩尔多瓦还少一些，而摩尔多瓦在其精明强干的统治者斯特凡大公（1457—1504年在位）的领导下，1475年在拉科瓦河畔打败了奥斯曼多瑙河各行省的边防战士。尽管1476年穆罕默德在瓦列亚阿尔巴击溃了摩尔多瓦人，报了这次失败之仇，但是奥斯曼人为了建立通往克里米亚的安全的陆路交通线，后来还不得不控制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的入海口。在帝国的西北边疆，匈牙利人仍占有贝尔格莱德以及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而威尼斯的舰队则仍然支配着亚得里亚海和摩里亚半岛的一些强固的基地。

在东方，在穆罕默德统治的晚期，与两个相邻的穆斯林强国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一个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埃及，争执的原因是由祖尔—卡德尔王室统治，而被麦木鲁克人看作他们的保护国的缓冲国家阿尔比斯坦；另一个是波斯，因为乌宗·哈桑最近在那里建立的国家对于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乌宗·哈桑（1423？—1478年）原是据有迪亚尔巴克尔周围地区的通称为阿克科雍鲁（白牧羊人）的土库曼部落的酋长，他开始征战生涯，在1453年之后的一些年成为波斯西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的主人。当威尼斯与穆罕默德进行战争期间，他作为威尼斯的盟友曾经侵入安纳托利亚，只是1473年在特尔詹战役中才被击退。尽管如此，奥斯曼与阿克科雍鲁国家之间的边界在1481年还没有明确划定，与麦木鲁克王朝的叙利亚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

穆罕默德把奥斯曼的旧风俗提高到法律的地位，即一位苏丹在即王位后，必须将他的弟兄以及弟兄的男孩子处死，以消灭一切可能争夺王位的手；但是，他并没有解决王位继承本身的问题。当他在1481年5月3日死去的时候，遗有两个儿子——巴耶济德和杰姆，他们每一个都遵循王子从早年就必须学习治国之道的奥斯曼传统做法，各自管理安纳托利亚的一个省。长子巴耶济德在阿马西亚，杰姆则在卡拉曼的故都科尼亚。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究竟鹿死谁手，要看哪个王子有足够的幸运赢得禁卫军和国家重臣们的效忠。高官显宦之间是有分歧的，但其中有几个人，包括安纳托利亚总督，以及据某些史料称统率禁卫军的阿加（将军），均与巴耶济德的姊妹或女儿结婚，因而坚决支持他对王位的要求。固然，杰姆一党为首的是首相穆罕默德帕夏这样的大人物，但此人极其不得人心。

苏丹穆罕默德是在一次新战役开始的时候，在距离伊斯坦布尔对岸的于斯屈达尔不远的马尔泰培死去的。首相秘而不发苏丹的死讯，向阿马西亚和科尼亚派出使者，希望杰姆能够在巴耶济德之前到来。为了防止依然在马尔泰培驻扎的禁卫军渡过海峡开赴首都，他回到伊斯坦布尔，下令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码头并扣留一切可用的船只。但他枉费心机，因为秘密泄露了出去，禁卫军起来造反，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夺得船只，从于斯屈达尔渡过海峡，把他杀死了。与此同时，派往科尼亚的使者被安纳托利亚总督下令抓获。为了保证巴耶济德即位，拥护他的一党把他的一个儿子考尔库德扶上王座，作为巴耶济德本人从阿马西亚回来之前的临时国君。于是，巴耶济德在1481年5月20日到达伊斯坦布尔后，立即被宣布成为苏丹。

杰姆被迫进行武装抵抗。他在卡拉曼，从托罗斯山区的土库曼部族——瓦萨克族和托古德族中聚集一支强大的兵力，使他能够夺取他的先祖的故都布鲁萨，在那里自加苏丹的称号。不过，他的军队并不能与禁卫军匹敌。他在邻近布鲁萨的耶尼谢希尔战败（1481年6月20日）之后逃往埃及，到麦木鲁克王朝的苏丹卡耶特贝伊（1468—1495年在位）那里去避难。正在这一时期，以前在大不里士的乌宗·哈桑之子亚库布贝伊（1478—1490年在位）的宫廷中过流亡生活的、已被废黜的卡拉曼王室的卡西姆贝伊入侵他祖先的土地，但被赶到吉里吉亚去了。1482年春，他和杰姆合兵一起，6月，猛袭科尼亚，但以失败

告终。杰姆成功无望，逃往罗得岛，去寻求圣约翰骑士团的庇护（1482年7月26日）。

骑士们了解巴耶济德多么急切地要捕获那么危险的一个奥斯曼帝位要求者，就于1482年9月把杰姆送到法国。当巴耶济德应允不对罗得岛采取一切敌对行动，并且在1482年12月进一步商谈之后，又答应每年付给骑士们45000威尼斯杜卡特的报酬后，他们保证把王子万无一失地幽囚起来。为了取得对杰姆的控制，基督教强国，甚至还有麦木鲁克王朝的苏丹，开始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密谋，在这一过程中，骑士们于1486年同意把杰姆交由教皇英诺森八世看管。英诺森八世在这位王子由他监护（1489年）后，便在1490年11月与巴耶济德达成谅解，从此以后接受了过去付给罗得岛的骑士们的年金。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遣密使向巴耶济德告警说，当时即将入侵意大利（见第十二章）的法王查理八世很可能利用杰姆发动一次反奥斯曼人的十字军。但是，苏丹的担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尽管教皇的确在1495年1月被迫把杰姆引渡给了查理八世，但这位王子在同年2月便死去。

巴耶济德在位近14年，几乎经常处于基督教强国可能利用杰姆作为他们的工具而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危险之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苏丹都不能将他的军队投入某一条明确的战线。固然曾经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些行动不是边境省份的总督们发动的袭击，就是范围极其有限的战役。杰姆在世期间，奥斯曼的军事机器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有进无退的大规模战争。

在欧洲，沿着以萨瓦河和多瑙河为标志的边界线，从波斯尼亚到黑海，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边境上的领主们相互之间进行了无休止的游击战争，双方的中央政权都无力加以制止。波斯尼亚和塞门德里亚的奥斯曼贝伊们一定是把苏丹穆罕默德之死看作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机会，因为在1481年，他们对匈牙利的入侵是如此的凶恶，以致匈牙利在特梅斯瓦尔的总督帕尔·金尼茨于同年11月把塞门德里亚省夷为废墟以示报复。1483年春，苏丹修复并加固了摩拉瓦河一线的边防工事。同一时期，他使黑塞哥维那完全处于奥斯曼的控制之下。在波斯尼亚的全部领土中，只有北部在匈牙利人据有的亚伊采要塞保护之下的一小块地方依然没有纳入奥斯曼的版图。巴耶济德和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尔文（1458—1490年在位）都不希望发生严重的冲突，战争

状态于1483年以5年停战协定宣告结束，后来又把这一协定延长到1491年。

马加什的逝世以及随后匈牙利人在选择新王问题上的纠纷（见第十三章），导致奥斯曼人在停战协定期满后再度开始进攻。战斗采取大规模袭击的形式，不仅指向匈牙利，而且还指向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土地——施蒂里亚、卡尔尼奥拉和卡林西亚。1492年的大举入侵，迅即使基督教徒遭到可怕的毁灭。尽管如此，当一个袭击纵队携带掠夺品和俘虏满载而归的时候，在菲拉赫附近遭到卡林西亚士兵们的伏击。双方在这里展开一场鏖战，据说有1万名穆斯林战士和7000名基督教徒战死。而另外几次对匈牙利的入侵也在索赖尼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红塔山隘被击退。1493年更加凶猛地重新开始侵略，克罗地亚和下施蒂里亚再一次遭受蹂躏，9月9日，克罗地亚的贵族在阿德宾纳几乎被斩尽杀绝。1494年又对施蒂里亚和特梅斯瓦尔发动进攻，匈牙利人作为报复，于11月洗劫了塞门德里亚周围的地区。1495年，苏丹担心意大利最近的事态发展，遂与匈牙利缔结为期3年的停战协定，恢复了和平。

当杰姆在基督教徒手中做俘虏的时候，巴耶济德本人对摩尔多瓦的斯特凡大公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战役（见第396页）。1484年7月15日，他占领了多瑙河入海口的基利亚要塞；8月9日，当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可汗蒙里·吉莱率领大队骑兵前来支援之后，他夺取了德涅斯特河口的阿克曼。这时，斯特凡转向波兰求援，1485年9月15日承认卡吉米日四世是他在科洛梅亚的宗主；不过，尽管同年11月在比萨拉比亚南部的卡特拉布格附近，他在一支波兰军队的帮助下打退了由马尔科奇-奥卢·巴里贝伊统率的奥斯曼多瑙河边防军，但未能收复基利亚和阿克曼。波兰因受伏尔加河一带鞑靼人的骚扰，无法给予他有效的援助。所以，在1487年，他再次向苏丹进贡。波兰自己也于1489年与巴耶济德以签订停战协定而媾和，1492年延长期限，1494年又延长3年。

在东方，由于沿托罗斯山脉的边境一直处于动乱状态，曾引起与埃及的一场战争，埃及要求对吉里吉亚和邻近的阿尔比斯坦公国实行一种没有明确规定权限的保护制度。由于统治这个“无主地带”的地方王朝时而与埃及，时而又与奥斯曼人策划阴谋并结盟，致使奥斯曼人与麦木鲁克王朝之间的潜在的敌意尖锐起来。在吉里吉亚西面的阿达纳和塔尔苏斯周围地区，拉马赞奥卢是麦木鲁克苏丹的臣藩。麦木

鲁克王朝甚至对托罗斯山脉以南的领土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在1464年，即奥斯曼征服（见第396页）的前夕，原来统治卡拉曼的王室的一位王子伊沙克曾经在很晚的时候将自己置于埃及的保护之下。在吉里吉亚东面，缓冲国阿尔比斯坦控制了通往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水路。因为这个公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麦木鲁克王朝为牢牢掌握对它的统治权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没有取得持久的成功。在整个吉里吉亚和阿尔比斯坦，始终追求战争和掠夺的强大的土库曼部落瓦萨克人和托古德人使托罗斯边境地区更加动荡不宁。

1465年，阿尔比斯坦的君主阿尔斯兰贝伊死后，他的两个兄弟布达克和沙苏瓦尔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战斗，这时麦木鲁克王朝和奥斯曼人之间发生了摩擦。起初，布达克在麦木鲁克苏丹胡什盖德木（1461—1467年在位）的帮助下得到了成功。胡什盖德木还在卡拉曼诸王公对奥斯曼人的冲突中给他们以鼓励。但是在1467年，沙苏瓦尔向与阿尔比斯坦的一位公主结婚的穆罕默德二世求援，他由穆罕默德二世封为领地的统治者，赶走了布达克贝伊。沙苏瓦尔对于埃及苏丹卡耶特贝伊企图把他赶跑的努力抗拒了几年，但在最后他终于就擒，后于1472年在开罗被处死。于是，布达克贝伊又重返公国的首府马拉什，在那里作为麦木鲁克王朝的臣藩进行统治。为了能够放手对付阿尔比斯坦，卡耶特贝伊不再支持卡拉曼奥卢抵抗奥斯曼人，并向穆罕默德保证，他决不是想完全控制阿尔比斯坦，他所采取的行动只是由于个人对沙苏瓦尔的不满。不过很清楚，他意欲排除奥斯曼人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影响，直到1480年穆罕默德再次悍然进行干涉，立布达克贝伊的弟弟阿拉杜拉为阿尔比斯坦国君为止，这一政策是很成功的。

苏丹穆罕默德死后，奥斯曼与埃及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如前所述，卡耶特贝伊在1481—1482年曾支持杰姆反对巴耶济德。奥斯曼人还抱怨说，麦木鲁克人煽动土库曼诸部族入侵卡拉曼，前往麦加朝圣的旅队在吉里吉亚的山隘受到骚扰。

直到1485年奥斯曼的卡拉曼总督卡拉格兹帕夏进军吉里吉亚，占领了阿达纳和塔尔苏斯，才开启严重的战端。为了进行报复，卡耶特贝伊以土库曼人袭击卡拉曼，并且派遣麦木鲁克人的一支军队前往吉里吉亚，对奥斯曼军队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猛攻。这时被任命为这次战役总指挥的安纳托利亚总督赫尔塞克奥卢·艾哈迈德帕夏率军前来援救。卡拉格兹没有与总督配合作战，而是袖手旁观，因此，由于他的

按兵不动，造成艾哈迈德帕夏的败北和被俘。在听到受挫的消息后，巴耶济德就认真地准备一场新的战役。1487年，首相达乌德帕夏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吉里吉亚，麦木鲁克人在他的优势兵力面前撤走了。首相听从了站在奥斯曼一边的阿拉杜拉的劝告，开始膺惩土库曼的瓦萨克人和托克德人。第二年，阿里帕夏在吉里吉亚指挥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中包括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即封建骑兵）以及禁卫军的一支大分遣队。为了排除这种威胁，一支麦木鲁克的军队在由来自大马士革、阿勒颇和特里波利的军队以及由拉马赞奥卢和托古德族酋长们指挥的土库曼战士的增援下，向阿达纳进军。1488年8月17日在该城附近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阿里帕夏被迫撤出吉里吉亚。由于奥斯曼这次进一步的败北，阿拉杜拉逃亡到麦木鲁克人那里；自从1480年起便亡命大马士革的他的兄长布达克贝伊也因此逃往伊斯坦布尔。巴耶济德命令阿马西亚、开塞利和卡拉曼的军队支持他在阿尔比斯坦复位；但由于布达克贝伊在1489年被俘押往埃及，这一企图未能实现。1490年，阿拉杜拉在一支强大的麦木鲁克军队的支持下侵入奥斯曼领土，包围了开塞利。麦木鲁克人未能攻克这个城防牢固的城镇，就蹂躏周围的地区，直至他们由于缺乏给养和奥斯曼的一支大军的到来而被迫撤退。

这时，双方都希望媾和。巴耶济德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匈牙利，那里的马加什·科尔文已于1490年4月死去；而卡耶特贝伊则急于结束一场仅仅依靠在埃及引起群众不满的横征暴敛来维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在1491年达成协议。经过6年毫无结果的战争以后，承认埃及据有吉里吉亚，但阿达纳和塔尔苏斯的岁入则要献给麦加和麦地那的各个寺院。

从表面上看，苏丹巴耶济德未能夺取吉里吉亚，遭到巨大的挫折。不过，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他都未曾全部投入他的军事力量——因为杰姆依然活在人间。他派往吉里吉亚的军队大部分是安纳托利亚各省的西帕希，由禁卫军的分遣队以及巴尔干地区的西帕希在必要时加以支援。与这样有限地动用奥斯曼的武力相比，麦木鲁克人在他们的战争努力中却是大动干戈了。在1488—1489年的几次战役中，动用了他们的资源的一大部分。尽管如此，1491年托罗斯边境的形势，对于麦木鲁克人来说绝不比它在战前更为有利，虽然他们在吉里吉亚打了胜仗。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奥斯曼人认真谋求解决这个边境问

题的日子已经迫近了。一旦最后关头到来，麦木鲁克人将不得不面对奥斯曼战争机器的全部可怕的力量。

1495年，杰姆死去，使巴耶济德终于可以放手采取比较大胆的政策；但是，在他还没有利用这个新的自由之前，他又不得不应付来自波兰的威胁。波兰国王扬·奥尔布拉赫特（1492—1501年在位）不愿接受奥斯曼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起从克里米亚到多瑙河封锁波兰通往黑海的道路这样一个事实，希望在摩尔多瓦的协助下打破这道樊篱。摩尔多瓦的斯特凡大公在1485年丧失基利亚和阿克曼之后曾宣誓效忠于波兰，但波兰未能满足他的希望，后来就再次向苏丹纳贡，因而不愿在名义上或者在事实上成为波兰的臣藩。另外，匈牙利人也要对摩尔多瓦行使保护权，因此很可能也对波兰的干涉不满。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对于1497年波兰发动的战役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这次战役的目的在于征服基利亚和阿克曼，但是在实际上，当斯特凡怀疑扬·奥尔布拉赫特的真正意图而向苏丹求援后，就变成对摩尔多瓦的入侵。波兰进攻摩尔多瓦的苏恰瓦要塞未克，之后由于缺乏给养和严冬的来临而被迫撤退。1497年10月26日摩尔多瓦人在布科维纳地区的科兹敏击溃他们，使之狼狈逃窜。

巴耶济德被波兰人这次对他的臣藩的进攻惹恼，遂命令多瑙河地区的锡利斯特拉省的总督、著名的边防勇士马尔科奇奥卢·巴里贝伊入侵波兰。1498年春夏，巴里贝伊在摩尔多瓦和鞑靼的骑兵增援之下，先后蹂躏波多利亚和加利西亚，直抵伦贝格；但是同年晚秋对加利西亚发动的第二次侵犯却在喀尔巴阡山的狂风暴雪中惨遭败北。在罗马尼亚的民歌中对巴里贝伊凄惨溃退景象的描述流传至今。1499年4月扬·奥尔布拉赫特与摩尔多瓦大公媾和，才算终止了进一步攻击。不过，巴耶济德这时正在与威尼斯处在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愿再拖长敌对状态，因而答应续订以前与波兰的停战协定。

杰姆死后，巴耶济德的一些顾问极力主张，重新开始对基督教徒发动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不能忽视这些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结果，尽管自从1482年巴耶济德由于在与杰姆发生冲突期间急欲在西方保持和平，而以比过去更为有利的条件确认威尼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特权以来，苏丹与城主之间的关系一直风平浪静，然而不得不面临奥斯曼大举进攻的恰恰正是威尼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与其说

它起因于某种明确的争端，不如说起因于两个强国之间在一般结盟中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只要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占据着诸如塞本尼科和斯帕拉托，扎拉、布杜瓦和安蒂瓦里，杜尔奇诺和都拉斯等重要的地区，奥斯曼对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统治权就不会是完全的。摩里亚的情况也是一样，在那里，威尼斯是莱潘托、莫敦和科伦、纳瓦里诺、罗马涅的那波利和莫南瓦西亚的霸主。

为了保卫这些领地，威尼斯使用了希腊、克里特岛，特别是阿尔巴尼亚的雇佣军，这些人的掠夺成性，绝不亚于他们的对手奥斯曼边防战士。因此，“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另外，海上也有摩擦。在海上，利用威尼斯各港口的基督教徒海盗以及来自奥斯曼的海岸和岛屿的穆斯林海盗人数都很多，而且十分活跃。威尼斯对奥斯曼舰队的壮大感到惊恐，因为在1496年之后的年代里，在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各港口，苏丹建造了许多战船，并且招募海盗充当船员。

1498—1499年，在从达尔马提亚到摩里亚的边界线上，战云密布，日甚一日，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威尼斯抱怨奥斯曼人袭击塞本尼科和斯帕拉托；而巴耶济德得悉威尼斯的雇佣军在罗马涅的那波利伏击500名奥斯曼士兵后，也勃然大怒。1498年11月，威尼斯决定派遣安德烈亚·赞卡尼前往伊斯坦布尔，送上它为赞特岛支付的贡金，并保证说它并不愿意打仗。然而，赞卡尼1499年3月的出使未能防止日益临近的冲突。苏丹为威尼斯刚刚与法王路易十二世结成反对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联盟（见第十二章）感到不安。斯福尔扎派密使去伊斯坦布尔通报说，如果入侵米兰得逞，法国打算组织征讨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意大利其他与威尼斯敌对的国家也向苏丹提出这样的论断。巴耶济德认为威尼斯人必然会由于他们在意大利承担的义务而受到严重阻碍，于是在1499年夏天发动了战争。

8月12日，威尼斯舰队企图阻止奥斯曼舰队驶向科林思湾的莱潘托的时候，在距莫敦不远的萨皮恩扎岛外的海面上被击败。虽然有法国的一个分舰队来增援，威尼斯人此后在贝尔威德尔和基亚伦扎的海面上的几次较小的战斗中（8月23—25日）战况亦不佳，于是弃守科林思港口，撤退到赞特岛的炮火掩护之下。莱潘托被苏丹从陆地上包围，这时又失去了海上来的一切救援，于8月29日降服。与此同时，米卡尔奥卢·伊斯坎德尔帕夏为了分散威尼斯的兵力，率领波斯尼亚的边防战士大举进攻弗留利。6月，他把的里雅斯特和莱巴赫之间的地区夷为

废墟，然后，在莱潘托陷落以后得到增援，在9月最末几天跨过伊松佐河和塔利亚门托河，蹂躏威尼斯的土地，一直达到维琴察。

1500年，由于城主的财政困难因而人员不足和装备不良的威尼斯舰队，又一次未能击败在摩里亚海岸外作战的奥斯曼海军，在那里，巨大的莫敦要塞受陆海两方的围攻，于8月9日落入苏丹之手。6天以后，科伦和纳瓦里诺向奥斯曼人投降。在整个战役期间，边防战士们袭击了威尼斯在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领土。威尼斯不顾一切争取盟友，通过提供大量的补助金极力寻求匈牙利人的支援，最后终于把匈牙利人拖入战争，虽然直到1501年5月才正式结盟，这次结盟还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内。在同一时期，威尼斯舰队在由名将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指挥的、由身经百战的老兵组成的西班牙分舰队的帮助下，于1500年12月攻占了克法利尼亚岛。威尼斯和匈牙利之间的同盟未能阻止住奥斯曼人沿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动的进攻，在那里，1501年夏天，爱尔巴桑总督穆罕默德贝伊占领了都拉斯。同年10月，威尼斯和法国的军舰驶往爱琴海，进攻莱斯博斯岛但未攻克。不过，这几乎是这次战争的最后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因为威尼斯发现这场冲突耗资过大，遂急欲求和，而苏丹由于安纳托利亚的事态已经开始需要他密切注意，对威尼斯的愿望更加欢迎。尽管如此，零星战斗还继续了1502年的大半年。威尼斯于8月30日夺取圣毛拉岛，得到最后的一次胜利；而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进行无效袭击的匈牙利人，这时侵入了奥斯曼的维丁和尼科波利斯两个行省。

这时，和平已经在望。主要条款在1502年12月14日得到双方同意，虽然直到1503年8月才完成正式批准手续。威尼斯完全放弃对莱潘托、莫敦、科伦、纳瓦里诺和都拉斯的主权要求；同意继续为赞特岛纳贡；并且允诺从圣毛拉岛撤兵。作为交换条件，它保有克法利尼亚，并且恢复了它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特权。至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的边界划分，则留待日后讨论，后来讨论的结果是：威尼斯于1504年把卡塔罗附近的若干有争议的领土、1506年又把阿尔巴尼亚的阿列西奥要塞割让给了苏丹。这次战争，即使并非轰轰烈烈，对于巴耶济德也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以及摩里亚，他已经大大接近于完成穆罕默德二世所开始的统一大业。威尼斯这时在摩里亚只保有罗马涅的那波利和莫南瓦西亚两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

个事实：奥斯曼人在穆斯林海盗的帮助下，正在变成令人生畏的海上强国，因为预示着他们后来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和平不仅限于对威尼斯。在1503年8月20日，匈牙利人从苏丹那里得到一项为期7年的停战协定，这个协定也包括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巴耶济德急欲摆脱在欧洲的一切纠纷，因为他必须去处理东方的一些咄咄逼人的事件。

在奥斯曼与威尼斯进行战争的年代里，在波斯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后裔的舍赫·萨菲艾丁（1252—1334年）在阿塞拜疆的阿达比勒创立了一个教派，根据他的名字，通称为“萨法威亚”。这个山区长期以来成为什叶派信徒的避难地，他们又分有不同的宗派，分别拥立阿里的这个或那个子孙为哈里发。

“萨法威亚”在它的创立者的家族领导之下，自从舍赫·火者阿里（1392—1429年在位）的时代起，展开一场广泛的宗教宣传，结果阿达比勒变成了朝圣者络绎不绝的朝圣中心。野心勃勃的舍赫·朱奈德（1447—1460年在位）除宗教权威外还想取得政治权力，就把“萨法威亚”锻造成一个军事工具，这引起邻近地区的王公们对他的仇视，因此，他不得不逃往安纳托利亚。1449年至1456年这几年，他在卡拉曼，在安塔利亚周围的泰克省，在叙利亚北部阿尔苏斯山脉的吉里吉亚和托罗斯山区的土库曼人瓦萨克族和托古德族中间，在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山区贾尼克和卡斯塔莫努等地进行教导和传道取得很大的成功。1456年至1459年，他由迪亚尔巴克爾大力展开自己的宣传活动；在那里，他得到阿克科雍鲁王朝的统治者乌宗·哈桑（见第396页）的庇护，1458年与哈桑的妹妹结婚。这次联姻所生的儿子舍赫·哈伊达尔后来与乌宗·哈桑的女儿阿勒姆沙·贝吉姆成亲，贝吉姆成为后来的波斯国王易司马仪（即沙易司马仪）的母后。事态的发展继续有利于“萨法威亚”的日益抬头的权势，因为在乌宗·哈桑的儿子和继任人亚库布贝伊（1478—1490年）死后，王朝的争吵导致阿克科雍鲁政权的迅速崩溃。这时，在波斯西部和阿塞拜疆出现了一个只有“萨法威亚”有足够的力量来填补的政治真空。1499年，当时已是这个教派的首领的沙易司马仪发动一场征服战争，通过他在舒鲁尔（1501年）和哈马丹（1503年）对阿克科雍鲁王朝各据一方的王公们的胜利，使他成了波斯的主人。

舍赫·朱奈德死后，萨法威人以始终不懈的精力在安纳托利亚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土库曼人中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构成波斯新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正是这些安纳托利亚的“萨法威亚”追随者们。为沙易司马仪服役的一些最强大的土库曼部落所取的名称，诸如鲁木吕（即来自阿马西亚—瑟瓦斯地区的人们，这个地区称为鲁木）、卡拉曼吕和泰克吕，即可说明这一点。

奥斯曼人是严格的正统派穆斯林，他们非常讨厌“萨法威亚”的教义，把它当作异端邪说。不过，他们很正确地认为这一派人远远超过一种宗教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它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即使在正常时期，安纳托利亚各省当局也很难控制各土库曼部落，这些部落像游牧民惯有的情况一样，总是喜欢给村庄和城镇定居的人口制造麻烦。由萨法威人的宣传争取过来的部落已经变成被他们奉若神明的一位外国主子的盲目的和狂热的奴仆。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是：如果容许“萨法威亚”放开手脚去组织土库曼人的话，就可能逐渐摧毁奥斯曼对安纳托利亚所有省份的统治。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麦木鲁克和奥斯曼的主权要求发生冲突的那些地区，什叶派的信仰是很强烈的。那么，如果奥斯曼人企图粉碎托罗斯山区的萨法威运动，麦木鲁克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这一类的干涉将意味着边界线上的力量均衡发生急剧的变化，并且可能驱使麦木鲁克人去与什叶派的波斯国家结盟，尽管他们坚持正教的信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奥斯曼人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甚至在与威尼斯媾和之前，巴耶济德就已经对“萨法威亚”的进展感到惊慌了。1502年，他下令把大批什叶派信徒从泰克省驱赶到他在摩里亚半岛新占领的莫敦和科伦；沙易司马仪抱怨说他在奥斯曼领土内的拥护者要去波斯受到了阻碍，这一抗议也遭到巴耶济德的拒绝。

沙易司马仪在波斯西部树立了自己的权势以后，就开始在托罗斯边境上动起干戈来了。1503年，沙易司马仪在哈马丹附近击溃阿克科雍鲁王朝的法尔斯和波斯伊拉克领主穆拉德，而阿尔比斯坦的君主阿拉杜拉却收容穆拉德避难。不仅如此，阿拉杜拉还试图去夺取沙易司马仪作为阿克科雍鲁王朝的继承者而提出主权要求的迪亚尔巴克尔地区，并且拒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沙易司马仪。1507年至1508年，萨法威的军队打败阿拉杜拉，征服了哈尔普特和迪亚尔巴克尔，并且占领

了库尔德斯坦。沙易司马仪小心翼翼地 向麦木鲁克人和奥斯曼人保证说，他对他们并没有敌对的意图。尽管如此，巴耶济德和麦木鲁克苏丹甘萨伍赫·高里（1501—1516年在位）都以大批的兵力镇守自己的边疆，一方面阻止沙易司马仪，一方面使边境的土库曼人就范。

1510年，与波斯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已经过去，因为河间地带的乌兹别克汗已经占领波斯的呼罗珊省，沙易司马仪不得不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一转变并未带来什么宽慰，因为第二年在泰克省的“萨法威亚”的拥护者中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长期活跃在泰克的叫作沙库利的人，他大肆鼓吹结束奥斯曼的统治，声称沙易司马仪是真主的化身，而他本人则是将恢复真正信徒的统治的“马赫迪”即“得道者”。1511年春，叛乱者们在阿菲翁卡拉希萨尔附近打败安纳托利亚总督，劫掠了屈塔希亚，然后向布鲁萨进军。首相阿里帕夏率领包括4000名禁卫军的一支军队，与巴耶济德的儿子艾哈迈德所指挥的阿马西亚军队会合，把沙库利向开塞利的方向赶去。1511年6月在这个城镇附近打了一仗，阿里帕夏和沙库利均阵亡。叛乱者溃不成军，无人统率，逃奔沙易司马仪，其中某些人由于在逃往大不里士途中犯有暴行而被沙易司马仪处死。沙易司马仪企图以这种方式推卸他对叛乱的责任，因为乌兹别克战争依然在进行中，他不能激起奥斯曼人的愤怒。而巴耶济德即便想进攻波斯，亦无暇进行，因为他的儿子们正在为继承帝位相互争吵，奥斯曼帝国正濒临内战的边缘。

在1511年，巴耶济德有3个儿子在世，根据奥斯曼的习惯，分派他们每人掌管安纳托利亚的一个省。长子考尔库德被任命为泰克省总督。他担心两个弟弟的势力日益增长，又在关于泰克省某些领土的争执中败给首相阿里帕夏。1509年，他乘船前往埃及，在那里为自己对王位的要求寻求支持。他在开罗虽受到礼遇，但未达到目的，因为麦木鲁克苏丹甘萨伍赫·高里当时正在红海和印度洋上与葡萄牙人作战，不愿意得罪巴耶济德。因此，考尔库德别无他法，只好与他的父亲谋求和解，1510年，他的父亲再一次恢复他在泰克省的地位。每个王子都希望得到一个离伊斯坦布尔尽可能近的省份，因为，一旦为争夺帝位发生冲突，能否首先到达伊斯坦布尔将是成败的关键。考尔库德以泰克做交换，从巴耶济德那里得到了离伊斯坦布尔近得多的、以马尼萨为中心的萨鲁罕省，于是，他在这方面比两个弟弟处于优越的

地位。然而，尽管他曾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当过几天苏丹（见第397页），但他继承巴耶济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国家的高官和禁卫军中间，他博得的是学者和诗人的声誉，不适合即奥斯曼王位。在平定沙库利的叛乱中，他亦无出色表现，丝毫未能冲淡这样一种印象。在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考尔库德只起到无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上，争端后来发生在阿马西亚总督艾哈迈德与3个王子中年纪最轻、掌管遥远的特拉布松省的谢里姆之间。显然，艾哈迈德到时将成为苏丹。巴耶济德似乎更属意于他而不是谢里姆，一部分有权势的高级官员也倾向于他。然而，谢里姆比艾哈迈德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由于他的好战和果断的性格，他受到禁卫军的爱戴。结果，正是禁卫军的拥护，甚至比他自己的胆略更有力地把他送上了王位。

谢里姆远见卓识，对关键时刻的到来早有准备。他在特拉布松建立了一支军队，他曾率领这支军队袭击萨法威人的领土，结果使沙易司马仪于1505年和1508年两次向巴耶济德提出抗议。谢里姆不顾这些抗议，进一步入侵埃尔津詹地区。为此，沙易司马仪在1510年威胁说要进行报复；但巴耶济德派遣使臣携带礼品到达，他才平息下来。谢里姆不但拥有在战争中久经锻炼并忠于他个人的军队，而且还巧妙地利用他在宫廷中的影响，设法任命据说是他的女婿的伊斯坎德尔贝伊为奥斯曼舰队司令；如果事情的发展对谢里姆有利的话，伊斯坎德尔贝伊就能够阻止艾哈迈德跨过海峡到达伊斯坦布尔。为了给艾哈迈德进一步设置障碍，谢里姆给他自己的儿子苏莱曼谋求到波利总督的位置。波利是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个省份，它控制着阿马西亚与首都之间的交通线。但是这个计谋失败了，因为艾哈迈德看出这对他自身的危险，就劝谏苏丹收回成命。这时谢里姆作出大胆的决定，要把他的活动从特拉布松转移到巴尔干半岛。为了给这一计划做准备，他请求让他的儿子苏莱曼掌管克里米亚的卡法省，并且得到了批准。这里是渡过多瑙河作战的一个良好的出发基地。与此同时，他又争取到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可汗蒙里·吉莱结成联盟，这位可汗答应向他提供骑兵，情况就更加对他有利。

行动的时间已经到来。谢里姆未征得巴耶济德的同意，就率领他的军队乘船从特拉布松前往卡法，在那里他又招募了更多的兵员和扩充了他的舰队。他不理睬他父亲叫他返回特拉布松的命令，宣称他之所以离开那里是由于他想对基督教徒作战，并且为此目的，希望授予

他一个欧洲的省份。他请求的是哪个地区不太清楚。他似乎要求的是塞门德里亚，但是某些历史资料也提到波斯尼亚和锡利斯特拉。当巴耶济德拒绝这一要求后，谢里姆派他的舰艇开往多瑙河口，并且率领一支大部分由鞑靼骑兵组成的军队，于1511年3月渡过多瑙河。

在当时宫廷驻地阿德里安堡，艾哈迈德的一党极力使苏丹感到谢里姆的过失的严重性；但是，巴耶济德不愿对他的儿子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对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爆发的沙库利的叛乱忧心忡忡，结果决定授予谢里姆要求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正式的协定中，他把塞门德里亚省授予谢里姆，并且还保证他不把王位让给艾哈迈德。这样把多瑙河中游的一个巨大省份交给一位以武士自居并且公开主张对基督教徒作战的王子，是完全符合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境酋长们的愿望的，例如马尔科奇奥卢，他对巴耶济德自从1503年以来对基督教国家所持的和平态度显然是不满意的。

一时之间，谢里姆对于他的成功是扬扬自得的。但是，当他向塞门德里亚进军的时候，消息传来：沙库利打败了安纳托利亚总督，艾哈迈德的忠实朋友阿里帕夏首相已经受命率领由禁卫军及其他部队组成的一支强大的兵力去镇压叛乱分子。谢里姆猜想（而且这种猜想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阿里帕夏能够粉碎叛乱的话，他会利用在他指挥之下的强大军队为艾哈迈德夺得王位。甚至在进攻沙库利之前，首相就试图争取他本人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军队从事这样的计划。不过，由于他的禁卫军坚决不肯放弃他们对谢里姆的支持，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谢里姆为了预先防止艾哈迈德与阿里帕夏把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可能产生的危险，再次向阿德里安堡进军。该城市未经抵抗即向他投降，因为巴耶济德认为他的儿子是要将他废黜，于是匆匆撤往伊斯坦布尔。当谢里姆乘胜追击的时候，苏丹在他的顾问们的紧急要求下，在乔尔鲁进行了抵抗。1511年8月3日，巴耶济德的禁卫军尽管强烈地倾向于谢里姆一方，但他们在这里还是忠诚地为他们的合法主人进行了战斗，而且由于他们训练有素，表明比蜂拥在他们周围的鞑靼骑兵胜过一筹。谢里姆一败涂地，没有别的出路，只好逃到停在黑海岸边的他的舰艇上，驶还卡法。有些历史资料记载说：他并无意向他的父亲挑战，只是，由于谣传巴耶济德已死，他才为了夺取王位而匆忙向伊斯坦布尔进军。究竟他是受骗，听信了这个谣言，还是出于政治动机而自己制造的这个谣言，这一点我们不清楚；

但是不容怀疑的是：艾哈迈德的追随者们是在竭尽一切力量来促使他垮台的。当时有一位威尼斯观察家写道：“统治国土和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是一些高官显宦，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想要谢里姆做他们的主子，因为他是一个自行其是而不会任凭他们摆布的人^[5]。

与此同时，沙库利和阿里帕夏1511年6月都在开塞利附近的战斗中阵亡。艾哈迈德虽然丧失了他的最可靠的拥护者，但仍可指望宫廷中许许多多有权势的朋友们的帮助。另外，首相的阵亡使他得以指挥曾经平定安纳托利亚叛乱的强大军队。因此，他率军向首都进发，希望能够渡过海峡，尽管由伊斯坎德尔帕夏指挥的奥斯曼舰队可能进行抵抗。然而，当1511年9月他在宫廷中的盟友们设法帮助他渡过海峡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由于他在对沙库利作战时表现无能而对他比以往更加离心离德的禁卫军举行叛变，洗劫了他的这些盟友的住宅。这明白无误地警告：禁卫军不会拥立艾哈迈德为苏丹。

这个事件是决定性的。这时，他的同党已被镇压下去，艾哈迈德别无他途，只有加强和扩充他在安纳托利亚的力量，准备进行武装抵抗。他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大部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进一步接管了卡拉曼，这一行动并未请求他父亲的许可。苏丹令他立即从卡拉曼退回到他自己的阿马西亚省，他拒绝接受这一命令，实际上已经表明这是一场公开的叛乱。

巴耶济德为艾哈迈德的行为所震怒，于是同意恢复谢里姆对塞门德利亚的管辖权。谢里姆自从在乔尔鲁败北后后，一直在卡法聚集新的兵力。由于艾哈迈德在可汗的宫廷中策划阴谋，谢里姆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同盟似乎曾一度处在危险之中，但最后表明蒙里·吉莱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当1512年1月底谢里姆渡过多瑙河的时候，鞑靼骑兵再次随他征战。他的事业已经取得了胜利。据传，艾哈迈德企图与沙易司马仪结盟。由于这引起了人们对萨法威可能进行干涉的恐惧心，仅这件事就足以使谢里姆登上王位了。显然，必须立即对艾哈迈德展开一场武力战斗。1512年3月，禁卫军要求召回谢里姆领导他们。如果默认这一要求，那就等于让位，但是老苏丹被迫同意了。在这时候，萨鲁罕总督考尔库德王子也企图得到王位。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前往禁卫军的营房，希望以他曾经做过他们的苏丹为由取得他们的支持。禁卫军拒绝帮助他。与此同时，谢里姆急如星火地兼程赶来，4月19日在首都城外设立营地。一星期后，他成为苏丹。巴耶济德被允许退居

他出生的城镇德莫提卡，但尚未到达目的地，即于1512年5月26日死去。关于他，马基雅弗利写道：他受惠于穆罕默德二世的伟大成就，得以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来维护帝国；但是，如果谢里姆是一位像巴耶济德那样的苏丹的话，奥斯曼国家就会为人所灭^[6]。

只要谢里姆的弟兄以及侄儿们活在上，他就不可能感到高枕无忧。因此，他第一件关心的事情就是除掉他们。危险迫在眉睫，因为消息传来，艾哈迈德的儿子阿拉丁已经占领了布鲁萨。1512年夏，一方面，舰队为防止任何一个王子像杰姆那样逃到国外避难而监视着安纳托利亚的海岸；一方面，谢里姆把艾哈迈德的军队从布鲁萨驱回阿马西亚，然后又赶往波斯和叙利亚的边境。当他班师布鲁萨的时候，下令处死住在那里的5个侄子（1512年11月）。不久以后，企图越海逃亡而从萨鲁罕跑到泰克的考尔库德被擒，也落得同样下场。与此同时，艾哈迈德收复了阿马西亚，在那里过冬，准备对谢里姆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不过，他的事业是希望渺茫的，因为沙易司马仪依然忙于从事他对乌兹别克人的战争（见第406页），不能给予他有效的援助。1513年春，艾哈迈德开始他夺取王位的最后一次努力。虽然他在埃尔梅尼德尔本特挫败了谢里姆军的前锋，但在4月24日当他在距布鲁萨不远的耶尼谢希尔孤注一掷进行决战的时候，末日终于来临。他的军队在禁卫军的强大威力和谢里姆的鞑靼骑兵的勇猛攻击面前溃逃。艾哈迈德在途中被擒，根据谢里姆的命令立即被处死。

艾哈迈德的死并没有缓和奥斯曼人与萨法威人之间的紧张局势。1512年，沙易司马仪命令埃尔津詹总督率领几千名安纳托利亚的“萨法威亚”信徒进入波斯。这一行动挑起了边界上的战争，在战争的过程中，埃尔津詹军队占领了托卡特镇。就在这时，即1513年，沙易司马仪在大不里士盛情接待了艾哈迈德的一个儿子、从耶尼谢希尔战役中逃出的穆拉德王子。这些事件使谢里姆确信：对沙易司马仪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预防在他亲征波斯时后方发生叛乱，他下令对安纳托利亚全境进行一次讨伐，在这次讨伐中，据说有4万名什叶派信徒遭到屠杀或者监禁。

1514年4月24日，谢里姆开始远征波斯，通过耶尼谢希尔和阿克谢希尔先向科尼亚、然后向开塞利进军。在这里，他请求阿尔比斯坦君主阿拉杜拉供应粮食和补充人员，而这位君主百般推诿，而且丝毫不阻止他的土库曼人骚扰奥斯曼的部队。苏丹从开塞利进至瑟瓦斯，

在此检阅了他的全部军队，留下一支强大的兵力镇守边境地区。当他通过埃尔津詹和埃尔祖鲁姆进军时，发现所经之处饲料和粮食都被波斯的司令官们劫掠一空，因此，他的士兵备尝艰难困苦，只能靠从海上运到特拉布松，然后再由陆路用骆驼千辛万苦运来的一些军需品来部分地解燃眉之急。谢里姆不顾禁卫军怨声四起，强行向前推进，直到沙易司马仪终于被迫进行保卫大不里士的战斗。1514年8月23日，两军在查尔德兰相遇。奥斯曼军的右翼是由安纳托利亚总督息南帕夏指挥的安纳托利亚骑兵；左翼是鲁梅利总督哈桑帕夏指挥的鲁梅利骑兵；而在每一翼的末端则是用铁链联结在一起的大炮。禁卫军在辎重和骆驼的掩护之下居中锋，苏丹本人带领他的大臣们和他的近卫骑兵在他们后边督阵。经过艰苦的行军已经精疲力尽的奥斯曼人，不得不面对着大概是最大限度地集结的萨法威军队。从骑兵的人数来讲，沙易司马仪大概不少于谢里姆；但是，他没有炮兵，也没有能与禁卫军相匹敌的步兵。沙易司马仪企图摧毁奥斯曼的大炮和从背后袭击禁卫军，向战场左右两翼的末端展开了进攻。他的骑兵突破了鲁梅利骑兵（西帕希）的防线，但被禁卫军的火枪杀伤大半。对安纳托利亚骑兵的冲袭也被粉碎，因为息南帕夏命令他的部队退到大炮的后边，从而使大炮得到毫无障碍的射界。

这次压倒性的胜利给谢里姆打开了通往大不里士的道路，他在9月5日进入该城。他打算在邻近的卡拉巴赫地区^[7]过冬，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饲料和供应品；但是禁卫军以兵变相威胁，迫使他经由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撤退到阿马西亚和安卡拉周围的冬季营区，1514年11月，在那里把军队疏散。查尔德兰战役的结果虽未征服波斯，但它仍然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沙易司马仪从此再也不敢攻击奥斯曼人，即使在谢里姆卷入他与埃及的冒险战争的时候也未敢造次。

查尔德兰战役使谢里姆成为埃尔津詹和巴伊布尔特的主人。这时，他把这两个地区与贾尼克、特拉布松和卡拉希萨尔合并，形成帝国东北部的一个强固的边境省份，由比伊克利·穆罕默德帕夏统治。为了巩固他在这个地区的势力，谢里姆还在阿马西亚冬季营地时，就命令穆罕默德帕夏围攻距离埃尔津詹不远的卡马赫大要塞。不过，一直到1515年5月，在苏丹亲临督促围攻之后，这个要塞才陷落。对卡马赫的征服意味着阿拉杜拉的最后审判日已经到来，谢里姆对他在查尔德兰战役期间的敌对行为是不会宽恕的。在1514年11月，谢里姆就已

经任命阿拉杜拉的一个侄子沙苏瓦尔奥卢·阿里为开塞利总督，并且派他去袭击他叔父的领土。1515年6月，息南帕夏统率1万名禁卫军打败并且杀死阿拉杜拉以及他的4个儿子。阿尔比斯坦公国如今被赐给了沙苏瓦尔奥卢·阿里，他作为奥斯曼的臣藩来统治这个地区。

与此同时，谢里姆也在扩大奥斯曼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那里的土著封建领主生怕丧失他们的独立，对沙易司马仪1508年以后通过从自己的土库曼酋长中选拔总督来统治他们的企图感到不满（见第406页）。在查尔德兰战役以后，迪亚尔巴克尔地方自发地发生了反对沙易司马仪的叛乱。而且，有25名库尔德族贝伊请求谢里姆给予援助，他随即派遣一位著名的库尔德贵族、后来以奥斯曼史学家闻名于世的易德里斯前去接受他们称臣的宣誓，并组织对萨法威人的抵抗。易德里斯和库尔德人虽然在战场上并未失败，但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支援，未能解救被萨法威人在库尔德斯坦的主力部队紧紧包围的迪亚尔巴克尔。对阿拉杜拉的作战一结束，当时驻在巴伊布尔特的比伊克利·穆罕默德帕夏便立即被派遣率几千人去与易德里斯合力解围，他在1515年10月完成了这个任务。虽然如此，萨法威人在库尔德斯坦的司令官卡拉汗继续顽抗，一直到卡拉曼总督胡斯列甫帕夏前来增援穆罕默德帕夏和易德里斯，终于也于1516年在科奇希萨尔把他打败为止。这时，乌尔法、马尔丁和摩苏尔已被奥斯曼人攻占，因而几乎整个库尔德斯坦都落入他们的手中。谢里姆授给易德里斯确定新征服地区未来地位的全权，他很明智地避免试图把奥斯曼的直接统治强加于每个地区的任何做法，而是将这一地区划分为24个行政单位，其中5个实行由库尔德族酋长领导的完全自治，另外8个同样由土著家族治理，但奥斯曼官员保有监督权；其他11个地区则变成奥斯曼正式行省。这一眼光远大的政策，为苏丹取得了库尔德人的继续效忠。

1514—1515年的各种事件，深刻地改变了托罗斯边界线上的力量对比，这对埃及不利。麦木鲁克苏丹甘萨伍赫·高里在1514年希望奥斯曼人败北，这样就能够使他以很少的代价改善他在托罗斯山脉的地位。即使说他没有煽动阿拉杜拉对奥斯曼人采取敌对行为，他对此显然是表示赞许的；因为当谢里姆进军波斯时曾派一位大使火速前往开罗，迫切要求埃及制止阿拉杜拉的行动，而甘萨伍赫所给予的却是一个客气但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后来暴露出来，他曾经秘密地对这位阿尔比斯坦国君表示祝贺，赐给他一件光荣长袍，并且力劝他对奥斯

曼人坚持不友好的态度。甘萨伍赫·高里对查尔德兰战役后威胁着阿拉杜拉的危险感到不安，抱怨谢里姆任命沙苏瓦尔奥卢·阿里为开塞利的总督，硬说这个省是阿尔比斯坦的一部分，因而属于麦木鲁克的势力范围。这个抗议是1515年4月当谢里姆正在进军围攻卡马赫的时候提出的，没有收到效果。如前所述，卡马赫一陷落，阿拉杜拉就在同年6月被击败和杀死。这时，甘萨伍赫·高里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当沙易司马仪的密使到达开罗请求麦木鲁克王朝协助抵御奥斯曼人可能重新开始的对波斯的进攻时，他答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倾自己的全部兵力亲临叙利亚边境。

他相信只要一显示武力，就能够阻止住奥斯曼人的前进，真正的战事不会发生。但这只不过是痴心梦想而已。麦木鲁克人肯定会知道他们自己与奥斯曼人相比之下的弱点。各个大埃米尔相互之间和他們与苏丹之间的宿怨，属于各方的麦木鲁克人都已卷了进去，一旦发生危机，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作为兵士，麦木鲁克人现在也不如过去训练良好，已经失掉他们以前的许多优点。另外，他们轻视火器的使用，而对曾在查尔德兰大显威力的炮兵的价值茫然不知，这就暴露了他们是一支在军事技术方面已经相当落后的力量。同样严重的事实是：埃及和叙利亚的人民对麦木鲁克政权完全离心离德，甚至实际上抱着敌对态度——而这又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历史学家伊本·伊雅斯曾一再着重叙述麦木鲁克人巧取豪夺的情景。横征暴敛和军人的恣行无忌，长期以来是他们的统治的痼疾。甘萨伍赫·高里由于葡萄牙人封锁红海而失去对印度贸易的大量收入，不得不采取严厉的财政措施，其结果，正如伊本·伊雅斯所写的，在他的统治下，老百姓真是度一日犹如千年。^[8]麦木鲁克人一旦有事，是不可能指望他们的臣民提供援助的。

谢里姆虽然知道甘萨伍赫·高里支持沙易司马仪的意图，仍然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对波斯的进攻，他认为波斯是更危险的敌人。因此，他派遣这时任首相的息南帕夏前往库尔德斯坦。息南于1516年4月28日出发，6月13日在开塞利与鲁梅利总督和禁卫军的阿加（将军）会师。但是在7月4日，侦探报告他说，甘萨伍赫正在向阿勒颇挺进，马拉提亚的麦木鲁克总督已奉令不准奥斯曼人通过他的省境，因此，他不得不在阿尔比斯坦停止前进。

早在4月21日，甘萨伍赫就已经发出在托罗斯边境作战的命令。从5月9日起，麦木鲁克的分遣队每天都开入叙利亚，苏丹亲率主力部队于5月24日由他在开罗附近的里达尼亚的营地开拔。他携带着在国库中所能得到的几乎全部的钱款和他的先王新聚集的大部分宝贵战争物资。他在6月5日抵加沙，两周后抵大马士革，7月10日到达阿勒颇。谢里姆依然希望麦木鲁克的干涉可能避免，或者至少是推迟。他于6月4日从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密使在这里等候着甘萨伍赫，保证说他们的主人并不愿意与埃及发生冲突。甘萨伍赫猛烈斥责他们占领阿尔比斯坦，并把他们投入了牢狱。

与此同时，谢里姆于6月5日从伊斯坦布尔渡过海峡到达于斯屈达尔。他经由屈塔希亚（6月20日），然后经由阿菲翁卡拉希萨尔和阿克谢希尔进军到科尼亚（7月1日）和开塞利，于7月23日率领强大援军与息南帕夏会合。在这时候，甘萨伍赫·高里从阿勒颇派出的一位大使到来，警告谢里姆不要继续反对波斯，并且如奥斯曼的一部历史资料所述，要求把阿尔比斯坦归还埃及。谢里姆简短回答道：如果坚持这些要求，那么他除了侵入叙利亚外别无他途。

这个意想不到的挑衅一定使甘萨伍赫·高里突然大失所望。为了最后避免战争，他下令释放关押在阿勒颇的奥斯曼密使，并且派遣他的一位埃米尔穆古耳贝伊去见谢里姆。但为时已经太晚。7月28日，谢里姆进入马拉提亚平原，他在这里取很好的地利，必要时既可向阿勒颇，也可向迪亚尔贝克尔进军。在这里，由比伊克利·穆罕默德帕夏率领的库尔德斯坦军队与他会合。8月3日，当了解到甘萨伍赫·高里向沙易司马仪求援后，谢里姆不得不立即做出决定。8月4日，他与他的的大臣们商量，决定放弃进攻波斯，立即挥师攻击叙利亚。几天以后，他想必是接见了麦木鲁克的使臣穆古耳贝伊。谢里姆对甘萨伍赫选派一个军人来做大使十分恼怒，将这位埃米尔的随员杀掉，而将穆古耳贝伊本人加以羞辱送回阿勒颇。奥斯曼人向西南方进军，于8月20日，即麦木鲁克人开出来迎战他们的次日，到达艾因塔布；麦木鲁克人把他们的大部分辎重和财宝留在阿勒颇的城堡，因为情势很明显，决战将在该城附近的某处进行。1516年8月24日，两军在达比克草原会战。

奥斯曼军队全部投入多少兵力，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但是，他们的战斗序列有很清楚的记载：在正中央，是谢里姆率领首

相和禁卫军；在他的右翼是安纳托利亚骑兵，紧接着骑兵是由沙苏瓦尔奥卢·阿里和拉马赞奥卢的一位王子马哈穆德贝伊指挥的来自阿尔比斯坦和吉里吉亚的土库曼人；在他的左翼是鲁梅利骑兵，再左是比伊克利·穆罕默德统率的库尔德人。与奥斯曼人相对阵，甘萨伍赫·高里大概有60000名，其中12000名至15000名是麦木鲁克人。其余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分遣队，一部分由贝杜因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的骑兵组成。麦木鲁克的战斗序列的详细情况不明，但是我们知道苏丹本人在中央，阿勒颇的部队在他的右翼，大马士革的部队在他的左翼。

即使在这时候，甘萨伍赫·高里仍未能摆脱使他的军队四分五裂的长期倾轧而造成的派系偏见。他为了保存嫡系麦木鲁克军队的实力，命令他的前任的部下进行第一次冲锋。这些老战士约2000人，他们由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骑兵殿后，把奥斯曼人阵列在左右两端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赶了回去，只是敌方的大炮和禁卫军的火力才给他们以很大的杀伤。这时如果坚决前进还有可能取得胜利，但在此关键时刻，甘萨伍赫·高里和他的嫡系麦木鲁克人依然按兵不动。当奥斯曼人向麦木鲁克中央阵地开始猛烈攻击时，长期以来怀有二心并与谢里姆密通情报的阿勒颇总督哈伊尔贝伊散布甘萨伍赫已经被杀死的谣言。麦木鲁克人发生动摇，经短暂的抵抗后即溃逃。甘萨伍赫·高里在混乱中死去。在战斗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们在阿勒颇恣意妄行而引得怨声载道。现在这些逃跑的麦木鲁克人发现城门大关，拒不接纳他们。这场祸患意味着他们失掉了国家金库和存放在城堡里的一切战争物资。叙利亚再也无法保卫。他们除了继续逃往大马士革，然后再逃回埃及外，已经别无他途。

叙利亚未做进一步抵抗，就向奥斯曼人投降。谢里姆于8月28日进入阿勒颇。一个月以后，他到达大马士革，决定让他的疲劳的军队在那里休息一下。这时向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如阿勒颇、特里波利、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指派了奥斯曼的总督；并派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驻守加沙，监视穿过西奈沙漠进入埃及的道路。即使到这时，谢里姆还不能确定继续进行战争是否得策。他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无须再担心埃及与波斯结成联盟，因为叙利亚已经牢牢掌握在奥斯曼人手中，使这两个国家远远隔离开来。固然，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入侵埃及，因为沙易司马仪不会在安纳托利亚的严冬之际发动进攻，至少要等到1517年春天。尽管如此，进攻埃及还会是一桩危险的

事业。首先是要穿过沙漠，那里必然缺水，阿拉伯人的部落将会千方百计骚扰奥斯曼人；其次，毫无疑问，麦木鲁克人为了保卫他们最后的阵地会拼命进行抵抗。经过百般考虑，尽管哈伊尔贝伊请求继续进行战争，谢里姆还是派遣一位大使前去开罗提议媾和，如果麦木鲁克的新苏丹，已经于10月16日登基的突曼贝伊能够同意作为奥斯曼的一个臣属治理埃及的话。

这次出使的结果尚未得知，就听到消息说，突曼贝伊虽然处在麦木鲁克人的不满以及缺乏资金和装备的沉重压力之下，但已经派遣约1万人，由占勃第·加扎里埃米尔指挥去收复加沙。为了对付这一威胁，首相息南帕夏于12月1日率领5000人（包括禁卫军的一个分遣队）从大马士革进军，正当麦木鲁克人从西奈沙漠露头的时候与加沙卫戍部队会合。他佯作撤退，在夜间北移，旋又急转向南，迫使占勃第停止前进，于12月21日交战。禁卫军的火力把麦木鲁克人从他们在一个险峻的干河床边缘上的坚固阵地中赶了出去。息南帕夏跨过河床，重整队伍，发动一次猛烈的冲锋，结果以麦木鲁克人的溃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谢里姆除了留守叙利亚的卫戍部队外，率领他的全部兵力于12月14日从大马士革向南进发。由于麦木鲁克人企图收复加沙，而且在12月末又传来他派往开罗的大使被杀的噩耗，终于使他打定主意必须征服埃及。他于1517年1月3日在加沙与息南帕夏会师，6天后开始穿越沙漠的进军。虽然在突曼贝伊的煽动下，阿拉伯部落一再进行骚扰，奥斯曼人于1月17日踏上埃及的土地，又行军两天后，到达开罗东北约30英里的贝勒贝斯。通过麦木鲁克埃米尔占勃第·加扎里的背叛，发现突曼贝伊在里达尼亚构筑了一个设防的炮台，周围挖有壕沟，配备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大炮。1月23日，谢里姆从背后攻击这些防御工事，用炮火予以摧毁。虽然如此，直到击退麦木鲁克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冲锋后，战斗才获得胜利，在这次冲锋中，首相息南帕夏阵亡。接着在开罗进行了4天（1月27—30日）顽强的巷战，才粉碎了麦木鲁克人的抵抗。27日夜，突曼贝伊率领约7000人进行突然袭击，战胜了自从里达尼亚战役以后驻在开罗的奥斯曼分遣队，但在第二天夜里，当谢里姆为了摧毁麦木鲁克的路障而把炮兵调进城内后，突曼贝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他在城堡附近做最后的坚持之后，带着很少一部分残部逃走。他得到一些阿拉伯部落的支援，继续骚扰奥斯曼

人，直到最后于1517年3月在尼罗河畔再一次被打败为止。不久以后，他落到奥斯曼人手中，于4月13日在开罗被处决。

已经在对基督教徒的战争中以伊斯兰的头等战士闻名于世的奥斯曼人，由于征服叙利亚和埃及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威望。这时，一位奥斯曼的苏丹第一次获得了“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的荣誉，这个称号使他在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中间处于超越他人的地位。在埃及，谢里姆只留下一位奥斯曼帕夏和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为最高领导，而容许麦木鲁克的旧秩序继续存在，实施他们自己的法律，保持他们自己的军事采邑和行政体系。而在叙利亚，他建立了按照帝国其他部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省，虽然在这里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允许麦木鲁克的法律和地方的风俗习惯继续保存。同时，他还承认了阿拉伯酋长们、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和基督教派领主以及托罗斯边境的土库曼王朝（例如拉马赞奥卢）的特权。尽管做了这些安排，在过去的麦木鲁克领地中，有几年时间是很不安定的；一直到谢里姆的儿子苏莱曼在位时期奥斯曼的政治体制以一种更稳定 and 更永久的方式加以改组为止。

1517年9月10日，谢里姆任命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前麦木鲁克埃米尔哈伊尔贝伊为埃及帕夏后，开始长途跋涉，从开罗返回安纳托利亚。到10月7日，他已抵达大马士革城外，在那里用了一个冬季进一步安排叙利亚的行政机构和处理一个叫作伊本·哈努什的阿拉伯酋长的叛乱。当谢里姆还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接见了一位波斯大使，这个大使是前来对他征服麦木鲁克王国表示祝贺的。在奥斯曼人整个作战时期，沙易司马仪一直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害怕再冒失败的危险，另外也因为波斯东部发生骚乱要求他予以注意。他派遣一位大使去叙利亚，意味着他无意再与奥斯曼人兵戎相见。尽管如此，在安纳托利亚的托卡特周围，由一个叫作沙韦利的人领导的什叶派信徒发动了一场新的叛乱。1518年，这场叛乱被臣附奥斯曼的阿尔比斯坦君主沙苏瓦尔奥卢所粉碎。与此同时，谢里姆把大马士革委托给前麦木鲁克埃米尔占勃第·加扎里，于1518年3月到达阿勒颇。在这里，他得到消息说，大马士革的新帕夏已经打败并且杀死了阿拉伯酋长伊本·哈努什。在阿勒颇停留两个月后，这位苏丹继续向伊斯坦布尔进发，7月25日抵达，距他1516年离开这里，时间正好过了两年。

自从1503年以来，一直与基督教徒保持和平。威尼斯于1513年重新恢复了它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特权。在叙利亚和埃及被征服以后，它请求谢里姆承认它在麦木鲁克苏丹统治时期在那两个国家所取得的权利。这在1517年9月17日的协定中得以实现。威尼斯答应按它过去为占有塞浦路斯向麦木鲁克人交纳的贡赋数额，每年向奥斯曼人纳贡8000杜卡特。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也能够与苏丹相安无事，尽管在边界线上不断发生骚乱。1519年，谢里姆与它们续订了自从1503年以来几度延长的停战协定。由这种在西方保持和平的局面，并不能认为意味着谢里姆没有在将来进行侵略的意图。1515年，他就已开始从伊斯坦布尔建立一座大兵工厂。这时，在1518年至1520年，他大力建造一支新的和更加强大的舰队。他似乎是想进攻穆罕默德二世在1480年没有能够夺得的罗得岛；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这番事业，便于1520年9月20日，在从伊斯坦布尔前往阿德里安堡的旅途中，死于乔尔鲁附近。

甚至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性格即已使人们产生种种不同的评断。对于从表面上看问题的观察家来说，由于他的严厉，他不过是一位暴君。但是，尽管由于他狂热地好战和脾气暴躁，使他赢得了包含敬畏之意的“亚武兹苏丹谢里姆”，即“残酷的苏丹”的称号，但他还是一位学术和文艺的保护人，他本人也用波斯文写诗。当他的名誉和光荣达到顶峰的时候，在开罗见到他那战胜者姿态的威尼斯人路易吉·莫切尼戈，对他的伟大保留着一种长久不变的印象。^[9]在5年残酷无情的战争中，谢里姆解决了他的父亲遗留给他的严重问题，现在，他把一个幅员大大增加，由新的资源加以充实，而且能够以空前未有的庞大规模向基督教徒重新发动进攻的帝国传给他自己的儿子苏莱曼。曾随谢里姆出征埃及的奥斯曼诗人和历史学家凯末尔帕夏扎德，在哀悼这位伟大的苏丹的逝世的一篇挽歌中并非夸张地写道：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建树甚多，正如夕阳一样，在地球的表面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10]

^[1] 摩里亚是奥斯曼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称呼。——译者

^[2] 即今希腊埃夫维娅（尤比亚）岛。——译者

^[3] 即苏联费奥多西亚。——译者

^[4] 今罗马尼亚境内南喀尔巴阡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译者

[5] 马里诺·萨努托：《日记》（威尼斯，1879—1903年），第14卷，第293页（安德烈亚·福斯科洛致皮耶罗·福斯科洛信，1512年3月28日，佩拉）和第12卷，第515—516页（安德烈亚·福斯科洛致皮耶罗·福斯科洛信，1511年7月21日，佩拉）。

[6] 马基雅弗利：《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第1卷，第19章。

[7] 前苏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译者

[8] 伊本·伊雅斯：《奥斯曼对埃及的征服》，W. H. 萨蒙翻译（东方翻译基金会新编丛书，第25卷），伦敦，1921年，第58页。

[9] 保罗·焦维奥：《土耳其问题评论》，威尼斯，1541年，第25—26页：“当时驻开罗大使尊敬的路易吉·莫切尼戈先生曾对我说：他曾见到过谢里姆苏丹，认为没有一个人比他经验更丰富，更具有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精神，与北非人的特点完全不同。……”

[10] 见E. J. W. 吉布《奥斯曼诗歌史》，第3卷，E. G. 布劳恩编，伦敦，1904年，第19页。

第十五章 新世界

一 葡萄牙的扩张

历史学家选择美洲的发现作为划分中世纪和近代的一个方便的时间，对于古往今来的不同编辑和各种学派来说，这也是一个沿袭的观点。但是科学史或思想史，尤其是欧洲的扩张史却都告诉我们这种划分是武断的。托勒密^[1]的地球不是突然间就变成了默尔卡托^[2]的地球的。相反，传统的宇宙志是根据日益扩大的经历而逐步校准的，甚至哥伦布的伟大发现也是深深扎根于中世纪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组成部分。在他横渡大西洋的壮举背后，是葡萄牙在15世纪的一系列发现，最后找到了直达印度的航线。首先是1415年葡萄牙人征服休达，在该地建立他们的第一批海外领地，从此开始了欧洲的向外扩张运动。这种扩张的方向恰和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相反。因此，半岛中世纪史的各个主要阶段便为这些发现提供了时代背景，这些主要阶段是：1002年后伍麦叶哈里发国灭亡，结果立刻让基督徒进入半岛中央，并最后进入南部；1147年征服里斯本，里斯本是联结哥特人的北方和穆扎赖卜人的南方的第一个大西洋口岸；夺取塞维利亚，开放直布罗陀海峡供北欧和南欧贸易；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对穆斯林北非事务的干涉；意大利的商务从地中海扩大到大西洋；意大利同北欧的企业和资本在葡萄牙汇合。

关于葡萄牙的中世纪经济史，我们还不了解全貌，但是对于亨利王子擘划的宏图，我们的看法却十分明显地不能和他全力赢得的那种商业和航海方面的卓著经验分割开来。从1415年占领休达到1460年王子去世为止，葡萄牙人在航海学、造船以及探险与殖民方法等方面均已取得一定的领先地位。他们已经移居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耕种从前很少有欧洲人涉足的土地。他们驾驶新发明的轻帆船沿西非海岸南下，到达赤道八度以内的地方，甚至更远一些，并陆续和该地的土人通商，如柏柏尔人、阿塞内克人、贾洛夫人和曼丁加人。在这些

活动中，塞维利亚以西安达卢西亚各渔港的水手接踵而至，他们占领了加那利群岛。

12世纪政治家们可能考虑过把非洲的再征服变成对非洲的扩张运动。甚至在占领塞维利亚前，费迪南德三世就曾对摩洛哥进行干预，到1280年时突尼斯成为加泰罗尼亚的保护地。不久，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所以，欧洲对非洲的有限扩张至少在13世纪就开始了。但究竟在什么时候，葡萄牙的这位王子和他的同伙把视线转向更广阔和更重要的扩张的呢？那就很难说了。15世纪前半叶对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占领明显地超出了再征服的有限扩张的范围（虽然其殖民方法仍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移民时学到的方法）；亨利王子找寻神秘的基督教国王祭司王约翰的计划也超出了这个范围，起初认为这位国王在亚洲，后来却发现他原来就是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当亨利在位时期，关于祭司王约翰的古老神话和马可·波罗的奇妙见闻都被视为未来的远景，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海路的想法，后来这就成为葡萄牙国家政策的目标。亨利的动机是复杂的，忽略这一点当然是错误的。他有可能领导一次反对伊斯兰国家的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希望在非洲找到一个基督教盟国；他探索地理知识；他企图攫取香料贸易；他渴望传播基督教福音——所有这些目的全都兼备，而在不同时期占有不同的比例。有时关于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愿望超过了一切其他设想，同时对摩洛哥发动一场宗教战争的计划被置于开展探险活动之上。由于葡萄牙历代国王的人力物力有限，因此，在摩洛哥进行任何一次旷日持久的战争都至少必须暂时中断航海活动。由于这种情况和那些宁愿在摩洛哥实行扩张的国王们（即阿方索五世以及由于摩洛哥政策的破产而和阿维斯王朝一同垮台的那位不幸的塞巴斯蒂昂）的软弱无能，人们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非洲西北部存在一个强大的海上国家，则会使整个探险计划受到挫折，所以征服摩洛哥各港口对这一计划的实现非常重要。15世纪最后25年，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便明显地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直到塞巴斯蒂昂毁灭性的游侠骑士行为改变了葡萄牙整个历史进程时止。

对东方的这种关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点很难断定。我们知道亨利的弟弟即未来的摄政佩德罗于1425年至1429年曾在海外旅行4年，并曾参加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在威尼斯时该共和国总督赠给他一

部马可·波罗的著作和一本不知何人所作的世界地图。这些礼品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志留念。欧洲市场对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埃及对于转口的东方货物征税很高，这种情况自然使发现一条直接通往东方的航路具有新的价值。但是我们对于这些经济力量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了葡萄牙的地理发现运动，却从没有得到确切的资料。

关于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此时已经失去以前的重要性。14世纪时，欧洲旅行家就已经到达阿比西尼亚，15世纪时，有几个阿比西尼亚使节团来到欧洲，其中之一于1452年到达里斯本。10年前，亨利王子曾命令他的一名侍从出航非洲，探听关于祭司王约翰的土地以及关于印度的消息。后来陆续有几位船长直下几内亚海岸，徒劳地寻找尼罗河支流，甚至寻找半个世纪后哥伦布认为在奥里诺科河源头的“人间天堂”。卡达莫斯多在西非土人中间孜孜不倦地探询他们的宗教和邻居，由此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希望他们会提供关于基督教国王的消息，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时，他的探险队向南只到达塞拉利昂。他的侄儿费尔南王子多完成了对佛得角群岛的探险，但死于1470年。国王阿方索五世偏爱骑士武功，他镇压摩洛哥异教徒，而对旷日持久的航行不感兴趣，这些航行看来只能导致和非洲土人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但是地理发现也没有完全遭到漠视。这时实行了一个颇有成效的临时变通办法，西非的贸易被国王包给里斯本一名富商费尔南·戈麦斯去经营，而他作为交换条件，则连续5年以塞拉利昂为起点每年沿海岸探险100里格。当时人们自然希望就在这范围以内找到印度，而这些希望则以地理学家托勒密和弗拉·毛罗的论述作为依据。按照这一合同进行的航行，史书上并无记载，但费尔南·戈麦斯手下的船长们曾驶进几内亚湾，航经尼日利亚，到达喀麦隆。但是1474年合同期满，却未予续订，关于地理发现的活动便由阿方索的那个精力充沛而又有能力的儿子，即未来的约翰二世接替。约翰二世在1481年继承王位。国王对航海事业继续予以控制，从新颁布的保护国王利益的严峻法律便可见一斑。对于插手非洲贸易的外来者采取了严厉的手段；阿尔古因要塞的工事得到了加强，并在米纳兴建了一座新城堡。这个基地建立后，接着就由迪奥戈·卡奥进行两次航行。航行从1482年开始，这年他到达刚果，对现为安哥拉的部分海岸进行了探险，于1486年或1487年结束，当时他已到达西南非洲的克罗斯角。这些航行把葡萄牙人带到了更南的地方，超过了他们猜想在转向东北去寻找祭司王约翰的土地和印度群岛以前需要经历的航程。鉴于路途遥

远，约翰二世便考虑前往印度的其他途径，同时派遣探险队从陆路去查证阿比西尼亚和印度的具体位置。他可能就向西航行，从海路到达印度的问题，与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商议。当然，唯一的证据是托斯卡内利后来答复哥伦布询问的一封信，但是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作为反证。大多数人认为，约翰二世当时拒绝了托斯卡内利的忠告。看来更加可能的情况是约翰二世确曾派出或批准探险队向西航行，但是船只或是丧失，或是未到达陆地即行返航。无论如何，大约在1484年哥伦布向约翰二世提出他的计划的时候，葡萄牙御前会议拒不接受，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哥伦布本人，或者当时已有证据，认为真正通向印度的航路是取道非洲。

1486年葡萄牙人从一名贝宁土人那里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据称有一个名叫奥格涅的伟大国王在位。这位国王核准贝宁各酋长的权力，并赐予十字架给他们每人佩戴。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却从帷幕后面伸出脚来，让晋见者亲吻。他住在贝宁以东20“蒙”远的地方。奥格涅无疑就是祭司王约翰，而20“蒙”就是弗拉·毛罗所说的300里格。看来，这个消息促使约翰二世决心派遣个别的探险家前往阿比西尼亚和印度，以检验所说是否确实。探险家之一是佩洛·达·柯维哈，他是约翰二世的身边警卫，曾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充当过间谍。他顺利地到达了坎纳诺尔、卡利卡特和果阿，4年后回到开罗，遇见了约翰二世派遣的其他使臣，并向他们汇报。他的同伴阿丰索·派瓦被派往阿比西尼亚，结果死于途中，因此柯维哈奉命再由开罗前往该地。他沿途一切顺利，后来定居在阿比西尼亚，度过了他的余年。大约在30年后，他遇见了董·罗德里戈·德·利马的探险队成员。约翰二世在瓦斯科·达·伽马启程前是否已经得到柯维哈关于印度的消息，虽然各方意见不一，但很可能是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同时，巴托洛缪·迪亚士奉命由海上进行大规模的探险。他的3艘船于1487年8月启航离开里斯本，随船携带一批黑人，他们将带着香料和稀有金属的标本深入陆地，探询寻找祭司王约翰和印度的道路。在沿海岸航行到小安格拉以后，他的船最后被风暴卷入海洋，只是在风暴平息后才掉头东驶，但未能找到陆地，便往北航行，发现了他称之为瓦奎洛斯湾的地方。这是欧洲船只第一次驶进了东方水域。虽然迪亚士又向前航行了一段路程，而他本人仍想继续前进，但是他手下的船员不肯从命，由于供应短缺，坚决要求返航，途中经过他们以前未

曾发现的好望角。1488年底，迪亚士回到了里斯本。他围绕非洲大陆顺利航行和打开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消息，促使约翰二世下令准备一次适当规模的探险，以便这一伟大事业得到圆满结束。

由于一些至今尚未弄清的原因，船队经过了长期的拖延才终于出发。情况可能如下：在迪亚士企图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同一时期，另一个弗朗西斯科·杜尔莫率领的葡萄牙探险队试图横渡大西洋去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但是没有成功。大约与此同时，哥伦布劝说约翰二世提供他所需要的设备，但是约翰使他失望，于是他便退至卡斯蒂利亚，以他的理论向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进行游说。虽然供建造前往印度的船队使用的木材已经采伐，并任命一名船队队长专管其事，但是到1493年3月初，哥伦布完成了他的伟大业绩后突然出现在里斯本附近海面的时候，探险队却还没有准备就绪。虽然约翰二世殷勤地接待了哥伦布，但是看来不能隐藏心中的不悦，据说这是因为他没有首先到达印度。虽然他给这位发现家提供了清理和整修“尼尼亚号”的条件，但是他已决定抵制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提出的领土要求，引用阿尔卡索瓦斯条约和1481年的“永恒的王”通谕，二者都规定在加那利群岛以南和非洲以西发现的土地均属于葡萄牙。

因此，在哥伦布的航行结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谈判。起初，西班牙通过1493年5月3日的“主要事项”通谕，取得教皇对他们的支持；而葡萄牙则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的指挥下横渡大西洋。直到1494年6月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才告结束。这个条约确定了著名的分界线，即由北往南，在佛得角以西的370里格处。这种安排为葡萄牙保留了对巴西的发现权（据说约翰二世对巴西是否存在，此时仍表示怀疑），同时也允许卡斯蒂利亚的船只横渡大西洋而不受更强大的葡萄牙舰队的干扰。谈判是在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以前进行的，当时这位发现家正准备一支庞大的舰队，希望舰队的声势足以震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君主们。约翰二世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许多他当时并不了解的好处。他在1495年10月去世，距此仅有一年多时间。如果哥伦布在他的第二次航行中成功地到达了印度，葡萄牙就不得不放弃它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地理发现的目标，因为卡斯蒂利亚人将它从东方排挤出去，就和它曾经把卡斯蒂利亚人排挤出非洲一样。但是，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没有能确切证明他到达了或正在驶近印度，1496年仲夏他

返回时，他的事业正陷于深沉的失望之中。他本人继续确认他所发现的土地距离亚洲不远，但是当时持有同样想法的人却为数寥寥。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葡萄牙的新君主曼努埃尔在即位第一年即1496年的12月，在御前会议上提出了继续探险的问题。有些大臣鉴于摩洛哥战争的耗费，同时考虑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合后卡斯蒂利亚的实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形势，必须保存某些力量，并且也由于听说卡斯蒂利亚已发现亚洲的外围岛屿而无疑地深感不安，所以愿意放弃这一伟大的壮举；但是也有一些大臣却主张继续把这一活动进行下去，而曼努埃尔则表示赞同他们。一个新的探险队将沿着传统的路线尽快前往印度。约翰二世委派的船队长这时已死去，他的儿子瓦斯科·达·伽马接任指挥，他的领导才能、坚决意志和勇敢都是毋庸置疑的。瓦斯科·达·伽马的4艘船于1497年7月由里斯本启航，在海上航行3个月未见陆地，终于在好望角附近的海岸登陆，1498年初在莫桑比克接触到穆斯林文化在东非的前哨，并找到1名领港做向导。他们在蒙巴萨靠岸，后又到达马林迪，达·伽马在马林迪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并且遇到了印度的航海者，起初他还以为他们是基督徒。4月24日船队从马林迪启航，5月15日瞥见印度，两日后驶入卡利卡特附近的海港。

在达·伽马声明他的来临后，卡利卡特土王随即派人表示欢迎，达·伽马率领着13名同伴上岸，递交国王曼努埃尔的信件。他被带到一座他认为是教堂的建筑，在他猜想是圣母玛利亚的女神前祈祷，在街上，广大的人群击鼓、吹喇叭和放炮，对他表示欢迎。达·伽马穿过熙攘的群众来到王宫，被带到土王面前，向土王叙述了葡萄牙长期寻找该地的经过，并代表曼努埃尔表示友好。可惜，他手中所能奉献的礼物如织物、珊瑚、糖和蜂蜜，均被认为不宜馈赠土王。达·伽马丢了面子，但被允许通商。

当时马拉巴尔海岸各土邦由几名印度王公统治，其中首脑是卡利卡特土王。对外贸易系由阿拉伯人或本地的穆斯林经营。这些商人眼见葡萄牙人是印度贸易中的高强对手，便开始制造麻烦，予以刁难。他们给葡萄牙人送去一张征收巨额关税的税单，并扣留货物以及几名船员。后来，被扣者被及时释放，但达·伽马收到了土王最后一封表示愿意进一步通商的信件后决定离去。1499年7月10日，经过了两年多的别离后，达·伽马的第一艘船返抵里斯本。达·伽马本人受到了凯旋式的接待。他使100年来的努力圆满结束。他带回的大部分印度货物样

品成为大规模扩张运动的推动力。他和哥伦布不同：哥伦布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去证实他的理论，但是未能满足他的雇主们的更加实际的利益；而达·迦马却证明了王子和约翰二世的估计正确无误，并且也证明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对卡斯蒂利亚人所做的让步没有被违反，但这种让步是微不足道的。难怪曼努埃尔迫不及待地自己采用了“对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进行征服、通航和通商之王”的称号。

达·迦马刚刚归国，曼努埃尔国王便派一支新船队去印度。船队由13艘船组成，指挥者是一名年轻的朝廷大臣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而久经考验的探险家巴托洛缪·迪亚士和杜阿尔特·帕切科等随行。有1艘船在佛得角群岛附近海面分道而行；其余船只折向西南，直到发现陆地迹象为止；结果在1500年4月22日发现了巴西海岸现称圣埃斯皮里图州的地方，把它命名为“真正十字架国土”。巴西的发现究竟是事出偶然还是按照计划，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卡布拉尔曾经遇到恶劣气候或逆风，以致他非出于自愿而远远向西驶去；巴托洛缪·迪亚士和瓦斯科·达·迦马可能都向他提出过要和非洲海岸保持相当距离，他的航线就在人们建议那些寻找好望角的船只采取的路线以西，距离并不太远。有人强调，曼努埃尔当时已知南大西洋对岸有陆地存在，因此卡布拉尔奉命寻找该地。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曼努埃尔或任何人不应当对这片陆地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关于卡布拉尔这次航行的记载在这个问题上向无定论，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当时有一艘船奉命回国报告消息，其余船只继续开往印度。其中4艘连同全体船员在途中失踪，不知去向，但其余的船只安然抵达卡利卡特。卡布拉尔为人精明，给土王带来了合适的礼品，但是穆斯林商人采取有效的手段，不让葡萄牙人获得他们寻求的商品；当卡布拉尔扣留了穆斯林的1艘载有香料的船，他的贸易站遭到了袭击，代理商及其助手们被杀。于是，卡布拉尔强行夺走了10艘穆斯林船，驶往科钦和坎纳诺尔，在当地载满货物。他的13艘船中仅有6艘在1501年7月到达里斯本，不过所载货物足以补偿整个探险活动的全部费用。

以前早已做出决定，要开展经常的贸易活动，每年3月均有一支船队自里斯本启程。关于卡布拉尔遭遇困难的消息，引起了新的讨论，考虑对印度继续进行探险活动是否明智。但是这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

同，于是决定派出武装部队，在必要时可与穆斯林决一雌雄。如果穆斯林一旦被消灭，则印度人的王公们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和葡萄牙进行贸易。于是，1502年达·迦马率领15艘船出发，随后将有由5艘船组成的第二支船队开来。这些船中有一部分将截住来往于红海和印度之间的穆斯林船只，并为科钦和坎纳诺尔的商行代理处提供海上保护；其余船只则作为通常的贸易船队，达·迦马在赴印度途中曾在基尔瓦停留，向当地酋长勒索大量黄金作为纳贡，而他到达印度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卡利卡特开炮轰击，作为对杀害卡布拉尔代理商的行为的一种惩罚。到了这时，葡萄牙人势必要对印度事务进行干预：他们已成为科钦酋长的朋友，同时却是卡利卡特土王的敌人，在此后几年内他们一面进行贸易活动，一面又穿插着建筑碉堡和替他们的盟友打仗等活动。1505年，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出征，结果在东非以及科钦、安杰迪瓦和坎纳诺尔等地修筑了要塞，葡萄牙人在这些地方以石头碉堡进行自卫，同时发现了大量胡椒和其他货物。

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出现后，埃及便立刻建立一支舰队，企图打开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结果使自己惨遭大祸，因为该舰队于1509年2月在第乌岛被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打得惨败。同年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在此后的6年中葡萄牙奠定了它在东方的贸易基础。东方的全部交通运输将由少数用作军事基地和贸易中心的设防港口来实行控制。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港口是果阿，它是阿尔布克尔克在1510年从比贾普尔苏丹手中夺取来的，如今代替卡利卡特，作为葡萄牙在东方一切活动的总部。两年后马六甲被占，成为葡萄牙与爪哇、暹罗和勃固贸易的前哨站；马六甲俯临马来海峡，使葡萄牙人得以控制近东和远东之间的大部分贸易。由于侵占亚丁的计划失败，葡萄牙仍没有对印度洋海路取得全部控制。但1515年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占领，使它控制了波斯湾的门户。对来往于印度东西两面的外洋轮船实行了严格的和相当有效的执照制度，葡萄牙的强大昌盛主要归功于它对运输业的这种控制。在这些年中，葡萄牙人成了欧洲善于经商的民族之一：里斯本奇迹似的暴富起来，曼努埃尔成了专制君主，冒险家们成群结队地前去里斯本，靠占有富饶的东方而使自己致富。

葡萄牙对印度的“发现”引起十分巨大的反响，支持这一“发现”又耗费如此巨大力量，以致对巴西的占领起初反而没有得到多少重视。从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直到墨西哥的被征服，一片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大西洋彼岸的这块土地。亚洲大陆尚未找到，从加勒比群岛取得的黄金数量很少。在哥伦布对航海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卡斯蒂利亚的水手们继续寻找难以捉摸的印度航路，逐步探索南北海洋线，并确定哥伦布在1498年报告他所发现的那个大陆实际上是一片接连不断的陆地，和亚洲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在卡布拉尔探险前的一两年，哥伦布的后继者曾经从委内瑞拉到达过现为巴西北部的海岸。尽管证明材料混乱，而且不是当时的记载，但维森特·亚涅斯·平松所发现的杜尔塞海（与卡布拉尔到达维拉克鲁斯同时）很可能就是亚马孙河河口。在头一年的6月，大概由奥赫达指挥的另一个卡斯蒂利亚探险队，曾在被认为是阿苏三角洲（北里奥格兰德）的地方登岸，这次探险很可能就是韦斯普奇的第一次航行。看来十分可能，1499年的卡斯蒂利亚探险队首先看到的土地就是今天的巴西，而平松则是第一个沿着巴西很长一段海岸线航行的航海者，但卡布拉尔却首先把巴西定为一次单独的发现，并且首先在巴西登陆。

坎蒂诺和卡内里奥所绘的地图表明巴西沿岸的大片土地都是在1500年和1504年之间发现的，虽然个别探险队的记载混淆不清。卡布拉尔派回报信的船只到达后，国王曼努埃尔派出了3艘帆船前去巴西探险，它们在佛得角和从印度归来的卡布拉尔的剩余舰队相遇。这支舰队可能沿巴西海岸由南纬8°航行到32°，据安东尼奥·加尔旺（约1550年）的记述，因寒冷和风暴被迫返回，而这次航行却被韦斯普奇称为他的第二次航行。关于从南纬8°到32°的这次漫长的航行韦斯普奇仅仅说他“除了望不到边的颜料树、肉桂树、制造黑色颜料的树以及无法形容的其他稀奇古怪之物”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叙述很简略，这正说明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向南航行，以便发现一条通往印度的西海道。由于这条海道根本没有找到，而卡布拉尔的“维拉克鲁斯岛”又被证明是一块连续的大陆，这就使韦斯普奇有理由提出以他的名字给美洲命名的主要要求。他确实没有发现美洲，但他可能是第一个证明美洲是一个新大陆的人。

1503年曾被达米亚奥·德·戈伊斯提到并为韦斯普奇描述过的那次航行，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一条西南海道，结果在巴西的南部

筑成一个城堡，并装载了一批染料木运往里斯本。这个探险队回来后，葡萄牙国王似乎认为西南海路虽不失为可取，但不是近期的目标。道理很清楚：沿这条海岸一带居住的是一些稀稀落落的原始的印第安人部落，有些还是食人生番，因此，对于一个贸易国家来说，这个海岸除了提供大量的染料木（巴西这时因此得名）和猴子、鹦鹉等玩赏动物外，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曼努埃尔采取了阿方索五世在几内亚采取的那种做法：把染料木贸易租给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商人费尔南·德·洛隆哈（又名诺隆哈），条件是他每年应派船沿海岸探险300里格，期限3年。

早在1503年，一艘法国船在两名葡萄牙人的协助下，由哈尔弗勒到达巴西中部海岸。虽然当时曾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禁止输出地图和航海图，不准葡萄牙海员搭乘外国船，并使教皇重申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所规定的葡萄牙权利，但是此时法国人已了解到他们所要了解的一切，而且不顾对方再三抗议仍旧砍伐染料木，并和巴西土人贸易。侵扰、冲突和抗议持续了好些年，最后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葡萄牙必须占领巴西，否则必将永远和外来者分享巴西。1526年约翰三世开始派遣武装舰队驱逐法国人，不久又移民防卫各个贸易据点。

在与法国发生冲突的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发生了意见分歧。虽然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处理的土地尚未划分界线，但在订约后的25年内，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于地区的分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纠纷。此时西班牙人主要忙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设立行政机构，并对附近岛屿进行勘探和征服，这些地方距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很远。误入加勒比海的葡萄牙船员可能被拘禁，而寻找西南航路的西班牙人倘在巴西上岸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但是，只是由于麦哲伦叛逃到卡斯蒂利亚和他顺利到达菲律宾，才又重新提出了通往真正印度的航路归属的问题。按照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规定，西班牙有权占有向西航行所发现的地方，而葡萄牙则有权占有向东航行所发现的地方。但现在却需要在东方也划定一条和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界线相应的界线。争执的焦点在于香料群岛，这是某些最贵重的东方产品来源地，不少国家渴望予以占领。经过多年的讨价还价，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规定：香料群岛归葡萄牙所有，但必须向西班牙交付赔款35万杜卡特。这样，新近发现但尚未被勘探完毕的世界，便在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之间被瓜分了。

二 西班牙人在新世界

对西属美洲进行移民是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开始的。第一次航行是一次成功的勘察，计划周密而且执行得很出色。哥伦布十分幸运，他充分利用了北大西洋的风系；他在东北贸易风开始前从加那利群岛航行到巴哈马群岛，而回到亚速尔群岛时又进入了冬季的西风带。他发现了安的列斯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他声称他所发现的岛屿位于亚洲东部沿海，可能还发现了亚洲大陆的一部分，而且直到逝世前仍抱着这种信念。我们无从肯定哥伦布的这些声明是否符合他的初衷和诺言，也不知道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是否全盘地予以接受——当时某些有识之士是没有全盘接受的。但是毫无疑问，哥伦布发现了一个由一些未知的岛屿所组成的面积广袤的群岛，这个群岛出产一些黄金，并居住着和平温驯而又极端原始的人民。这些岛屿是否和亚洲人烟稠密的部分仅有一衣带水之遥，当时尚未见分晓，但毫无疑问，对它们值得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的。

第一次航行虽然成功，但耗资颇巨。哥伦布损失了旗舰，被迫将一半人员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让他们听命运摆布。他所掠夺的财宝和这次航行的费用相比，少得可怜。这时必须在发现之后再跟紧一步，使投资能产生收益。刚收到哥伦布的第一个报告，甚至在哥伦布回国朝见以前，两位君主便命令他开始准备第二次航行。此后不久，他们就同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开始谈判，以便对哥伦布所发现的海洋和土地取得独占的航行与移民权利。

和罗马教廷进行谈判，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亚历山大六世本人就是西班牙人。他对两位天主教君主感恩戴德，当时他正设法为儿子在意大利成立一个侯国，所以寻求这两君主的支持。在他以前的历任教皇已授权葡萄牙，让它在西非独占探险和传教活动，因此，亚历山大巴不得也给西班牙同样的待遇。他按照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根据哥伦布意见所提出的一连串要求，陆续发表了4个通谕，每一通谕逐次加强和扩充前一通谕的规定。前两个通谕指明凡哥伦布探险所至的区域内一切已发现和未发现的土地均赐给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第三个通谕即有名的“主要事项”通谕，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之

处由北到南划定一道假想的界线，并规定在这条界线以外的土地和海洋均属西班牙的探险范围。第四个通谕即“早先的”通谕，扩充了过去赐赠的范围，使之包括“向西或向南航海或旅行中所发现的和未发现的一切岛屿和陆地，而且不论它们所在地区是在西方，或子午线上、东方或印度”；此外，在上面提到的地区内，以前所做的赐赠一律作废，即使赐赠以后，继之以实际占领也是如此。不论这些规定在国际上的效力如何（天主教界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分歧），这4个通谕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便是西班牙国王取得新世界土地的基本法律根据。

但是，葡萄牙方面提出的反要求也是不容轻视的。约翰二世对于意大利人的言过其实表示怀疑，从来没有接受哥伦布对这些发现所做的解释。对他来说，“印度群岛”是大西洋中的另一组岛屿，最初他根据1479年阿尔卡索瓦斯条约的条款提出了对这些岛屿的领土要求。显然，葡萄牙不管当地是否产有黄金，也不愿为了占据几个仅有裸体的野蛮人居住的远方岛屿而进行战争；但“早先的”通谕却引起了严重的惊恐。通谕条件甚宽，又特别提到印度，这对于葡萄牙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计划造成了一种威胁。因此，一切外交手腕和地理学的论据都被用来限制这一通谕的效力。约翰二世未能打动教皇，便直接同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进行谈判。他接受关于分界线的“主要事项”通谕，作为双方讨论的基础，但要求把分界线再向西移动270里格。两位西班牙君主仍被哥伦布提出的关于通往印度的西航路的谬论所迷惑，便表示同意；双方无论如何想必都认识到，这种含糊的边界线是无法确切地加以划定的，因此各方都认为对方受骗了。此外，双方都竭力避免公开的冲突。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于1494年正式签字。这是葡萄牙外交上的一次辉煌胜利。条约确认葡萄牙不仅拥有真正的印度航线，而且拥有整个南大西洋，包括想象中的土地安蒂利亚和真实的土地巴西在内，虽然这种情形当时即使在里斯本也是无人知道的。

在条约签订以前很久，哥伦布就已回到西印度群岛。他在1493年9月率领一支大舰队离开加的斯，舰队有三桅船、轻帆船和双桅船，总共17艘。舰队的结构和舰队长身负的命令，全都指明了它被派遣的目的。舰队中没有全副武装的战舰，也没有装载贸易货物，只有少量通常运往西非和土著交换的实物。船只装载的主要是人（总共1200名，有教士、军人、工匠、农夫）和农业用品（农具、种子、牲畜），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次航行的直接目的不是开辟新的贸易市

场，也不是征服东方的王国，而是去伊斯帕尼奥拉岛定居，建立一个既开采矿藏又从事农业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将使该地的食物自给自足，把黄金解往西班牙以支付这次航行的费用，同时成为进一步朝着印度或中国方向探险的基地。自愿参加的不乏其人。关于黄金的议论本身就足以吸引他们。对于那些由于私人战斗衰落和格拉纳达陷落而无所事事的士兵们来说，西印度群岛提供了冒险的事业，掠夺的机会，以及可能享有舒适的地主生活。对于地位卑微的百姓来说，他们可以有希望脱离被牧民荣誉会的特权羊群蹂躏得一片荒凉のカ斯蒂利亚高地，而逃往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当地劳动力既多而又便宜的地方。舰队是在塞维利亚副主教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的命令下装备起来的，此人同西印度群岛将保持长期的和影响极大的关系。哥伦布对丰塞卡有很多怨言，认为后者既碍手碍脚又办事拖拉。主持出海的航海家对码头行政机关的文牍主义往往不耐烦，他们两人之间好像互相厌恶。其实，这次为航行所做的装备工作效率很高而且速度极快：在15世纪的西班牙，就准备如此巨大规模的一支舰队来说，5个月是很短的时间。丰塞卡的唯一严重错误是他没有为在殖民地度过第一年准备充足的食物。对于欧洲人在热带国家中能够依靠当地出产维持生活的程度过分乐观，是这些早期探险具有的普遍特点，也是造成哥伦布后来遇到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舰队经过顺利的航行，在多米尼加岛安然靠岸，然后沿着形成一个美丽的弧形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续航，穿过维尔京群岛，行经波多黎各，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北海岸。哥伦布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第一次航行时期建立的圣诞节移民地已经荡然无存；他选择了一块没有隐蔽、不宜居住的海滩作为移民地，命名为伊萨贝拉，在这一点上，哥伦布铸成了第一个严重错误。伊萨贝拉殖民地始终没有兴旺起来。这时要有一个具备指挥天才的领导人，才能在这批早期的西班牙移民（这些人一向脾气暴躁、爱好冒险和贪婪成性）中间维持秩序，强迫他们开发森林、建造房屋并种植作物，而不在岛上到处漫游，寻找黄金或奴隶。哥伦布是位伟大的探险家和航海指挥者，尽管有卓越的航海才能，却不具备作为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总督所必须具备的经验和气质。再者，他是外国人，并且是一个手艺人的儿子，只有一个空头衔和一副新纹章。他和他的下属是否能控制这些人直到换防的舰队到来，不久就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寻找印度的航行是不容延缓的，哥伦布把一些最调皮捣蛋的水手打发到内陆去探险后，便率领3艘轻帆船启航，前往古巴南海岸探险，并发现了牙买加。他回到伊萨贝拉的时候，发现他的水手们病弱不堪，并和土人处于公开敌对状态。泰诺人是以采集树根和贝类为生的和平居民，几乎连最根本的农业也没有，他们只有很不耐用的木制或石制工具和武器，但由于不断地被勒索食物和妇女，已被惹怒到了不惜一战的地步。哥伦布袭击这些印第安人，派武装人员携带凶猛的猎狗穿越丛林追赶他们，迫使他们以金砂交付人头税，但他们都付不起。在这种可怜战争中，俘虏都被变作奴隶。哥伦布把数百名奴隶用船运到西班牙，其中大多数在西班牙死去。其余的奴隶奉女王命令释放，遣返原地，所以甚至奴隶贸易也未能获利。同时，在伊萨贝拉殖民地，惨遭浩劫后的印第安人弃地不种，留在热病流行的破旧营房中的西班牙人受到了饥饿的威胁。

当1496年春哥伦布乘船回到西班牙，亲自去处理在伊萨贝拉对他不满时人们提出的申诉时，情况就是这样。当他出差的时候，在他的同意下，他的兄弟巴托罗梅代他负责，组织了移民地的迁移工作，从伊萨贝拉搬到南海岸一个较好的地点，1496年或1497年，殖民者在该地开始兴建圣多明各城镇，圣多明各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是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首府，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兴旺不衰的城市。

两位天主教国王仍旧信任哥伦布，在他们的支持和资助下，他在1498年回到了西印度群岛。但是，这一次自愿参加者不多，跟随这位舰长出海的水手，有的是被强迫的，有的则是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哥伦布航行到他以前航程以南的海洋，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奥里诺科河的出海口。这是当时欧洲人所知的最长的一条河，河中的大量淡水证明新发现的海岸线是一个庞大的大陆的一部分。哥伦布运气不佳，没有见到委内瑞拉沿海盛产珍珠的牡蛎场，但是他以高超的航海技术，从玛格丽塔岛直接北上，航往伊斯帕尼奥拉岛，抵达他兄弟新建的城市。

哥伦布在圣多明各发现他的移民中有半数在镇长弗朗西斯科·罗尔丹的带领下，公开反抗巴托洛梅的权威。哥伦布既不能而且也没有用武力镇压这次反叛，但是用让步的方式（赦免、恢复官职、赠送土地）收买了罗尔丹和他手下的人。除了同意这些屈辱的条件以外，这位舰长此时又一次对反叛者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分

给西班牙移民充当奴仆和庄园劳工。这种分派劳役制后来稍加修改，便成为西属西印度群岛的普遍制度。强迫劳动再加上天花和麻疹加速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土人人数的下降，但在当时这种安排却起了安抚叛乱首领的作用，而哥伦布就有可能去镇压后来发生的规模较小的西班牙人叛乱，但严厉的程度可能有些过分。然而，这样一来，就把事情搞坏了。在哥伦布实行的政策比较软弱的地方，心怀不满者回到西班牙后则把他的政策说成是暴政。1499年春，两位国王委派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去替代哥伦布，并调查对他的控诉。博瓦迪利亚对这位舰队长施加镣铐，遣返国内。虽然两位国王恢复了他的爵位，发还了他的财产，并始终对他表示礼遇，但是再也不准他担任舰队长或总督的职务，也不准他对他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所实行的统治进行干预。

从博瓦迪利亚的继任者弗雷·尼古拉斯·德·奥万多到来起，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政府真正开始实行统治了。奥万多是阿尔坎塔拉的骑士指挥官，他对伊斯帕尼奥拉统治6年，采取的严厉措施绝不是哥伦布所敢实行的。其实，纪律尤其是殖民者所需要的东西。倒于印第安人，奥万多在1503年取得国王的敕令，遂使哥伦布所开始实行的分派劳役制具备合法的形式。外来的殖民者向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强征贡物和强制劳动，然后让他们改信基督教并给予保护。对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则进行无情的战争。泰诺人也许此时已濒于危亡，而奥万多的苛政则更加快了他们的灭绝。然而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土地所有者达到了小康水平，在露天的牧场上放牧大批的猪和牛群，种植山芋和木薯，甚至少量甘蔗。他们用马拉磨或用水力磨把甘蔗辗碎制糖。奥万多说当时有24个这种磨坊，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基本投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溪流的产金量也逐步上升，在16世纪20年代时所达到的数量已足以引起费迪南德及其朝臣的兴趣和垂涎。

伊斯帕尼奥拉岛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是劳力不足。殖民者采取在巴哈马群岛劫掠奴隶的办法来代替即将绝种的泰诺人，稍后，又从西非的葡萄牙代理处进口少数黑奴，但劳力始终缺乏。对于那些气质和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相同的人们来说，如果没有劳力，土地就毫无用处；即使开掘金矿，也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工作，它需要非熟练劳工。由于缺乏劳力，同样也由于淘金热、传教热忱，或单纯地是由于不得安宁，于是驱使许多西班牙人从伊斯帕尼奥拉岛移往其他岛屿或陆地定

居，而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可能人数更多也更能吃苦。像它的创始人所计划的那样，伊斯帕尼奥拉岛变成了进一步探险的基地，也是向探险队供应咸肉、干牛肉和木薯粉面包的产地；在奥万多的继任人、老舰队长哥伦布之子迭戈·科隆在任期间，这种远航的探险队数目日益增多。

1509年，胡安·德·埃斯基维尔开始向牙买加移民，或至少是向新塞利维亚周围地区，即现在的圣安娜湾的附近移民。5年前，哥伦布曾使他那几艘虫蛀的轻帆船停靠在岸滩。牙买加不出产贵重金属。它供养少量的西班牙人口，这些人靠放牧牲畜为生，但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他们无足轻重。1511年迭戈·贝拉斯克斯移民古巴，是一件规模较大的事业。贝拉斯克斯是奥万多手下伊斯帕尼奥拉岛副总督，他和奥万多一样，是一个实施纪律者和能力很强的行政官吏。他率领一小支亲信队伍，在3年内镇压了土著的抵抗并占领了全岛。在选择最佳地点建立西班牙移民地方面，他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和远见；在他担任总督的最初5年中，共建立了7个城镇，尽管有些城镇的名称和确实地点改变了不止一次，但它们都在建立的地区内被保存了下来。古巴盛产黄金，比伊斯帕尼奥拉岛土地肥沃而山岳较少，提供了放牧、种植烟草和甘蔗的良好条件。和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一样，矿山和农业所需的劳力是通过早年对土著居民的再分配取得的。古巴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吸引来许多移民，贝拉斯克斯至少曾经一度使他自己事实上对旧殖民地的总督保持独立。

第四个重要的海岛移民地是波多黎各，这一活动始于1512年，但不很成功。从小安的列斯群岛流窜到此的加勒比人已在波多黎各定居，他们对西班牙人的抵抗比伊斯帕尼奥拉岛土人更加凶猛。而且，第一任总督胡安·庞塞·德·莱昂又必须兼管该岛与佛罗里达半岛，因而分散了注意力。他在1514年试图向佛罗里达移民，但未成功。结果，和其他岛屿相较，波多黎各的移民活动更加迟缓，流血更多，也更不完整。这个殖民地在16世纪从未吸引过很多的西班牙人。

正当以此种方式对大安的列斯群岛进行征服和移民的时候，其他时间更长、危险更大和获利更多的探险活动则由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沿加勒比海陆地的海岸探险。即使在哥伦布生前，他对“海岛和大陆”探险的垄断，也在国王的默许下，数次遭到了破坏。1499年，维森特·亚涅斯·平松，原轻帆船“尼尼亚号”船长和哥伦布的伙

伴，在一次著名的勇敢的航行中，沿巴西的北海岸上溯，发现了亚马孙河三角洲。同年，阿隆索·德·奥赫达（他也是哥伦布的老伙伴并经常给哥伦布带来烦恼），也继哥伦布的第三次航行而到达了帕里亚湾，在委内瑞拉沿岸进行勘探，发现了玛格丽塔岛宝贵的珍珠采集场。和他同船航行的是阿梅里戈·韦斯普奇；他的精彩文笔和正确的地理判断给他带来的声誉，曾一度使哥伦布的名字黯然失色。库巴瓜这一小岛成为西班牙的新加的斯移民地，它的建立就是为了开发这个珍珠采集场。大概有25年时间，新加的斯一直是加勒比海最繁荣的地点之一，也是以奴隶充当潜水者这项兴旺而又十分残酷的贸易的中心，直到竭泽而渔的采珠方法使资源归于毁灭时止。

更具有长期性而对未来更有意义的是对中美洲的几次移民，地点是哥伦布第4次航行中所发现的地峡，也就是哥伦布家族后来仍保持的唯一大陆领地，即很小的贝拉瓜公爵领地。1500年，罗德里戈·德·巴斯蒂塔斯曾访问达里安湾的海滩，陪同前往的是哥伦布的前向导和地图测绘师胡安·德·拉·科萨。1504年，德·拉·科萨做了一次更彻底的勘探，阿梅里戈·韦斯普奇也参加了。他们的报告使国王决心鼓励大陆移民，而且不顾迭戈·科隆再三抗议，发出了两张许可证书，一张准许迭戈·德·尼奎萨向贝拉瓜移民，另一张则批准阿隆索·德·奥赫达向现为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地方移民。这两支移民队伍于1509年年底启航，共有1000余人，但饥饿、疾病和射来的毒箭不久就使这支队伍只剩下几十人了。这是直到此时西班牙人在美洲遭到最严重的损失，最早的死者之一是胡安·德·拉·科萨，而西班牙所器重的正是他这样的人。后援队伍终于到达，率领者是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位法官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但是经过众人同意，实际的领导权落到了人所共知的一名无赖巴斯克·努涅斯·巴尔沃亚的手中。巴尔沃亚曾于1500年和巴斯蒂塔斯一起航海，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很果断、胆大妄为、不通人情。他用船把恩西索送回伊斯帕尼奥拉岛（奥赫达已离去），把尼奎萨投入大海，听其漂流以至淹死。他独自掌握了全部探险活动的大权。巴尔沃亚是美洲大陆的伟大的征服者中的最早的一位。奥维多对他十分了解，并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的勇敢、他的才能以及按当时当地的野蛮人的标准来说，他的人道行为。巴尔沃亚建立了达里安城，并使用武力、恐怖、安抚和外交等手段，压服了地峡的印第安人；他从这些印第安人那里搜集了大量的食物和黄金，同时又强迫自己的人建筑房屋，种植庄稼，以供未来需

用。最重要的是在1513年，他接到印第安人报告后，即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湿漉漉的丛林，经过地峡，来到了太平洋岸边。

巴尔沃亚的发现不但向欧洲人证明了“南太平洋”的存在，也证明了两洋之间相隔的一条陆地是多么狭窄，因此，对于那些希望在中美洲发现一个海峡由西通往东方的海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鼓舞。正是这种希望，驱使人们在地峡的加勒比海沿岸进行勘探，而且只要船只造好，也就立即在地峡的太平洋沿岸探险。因此，对中美洲的征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葡两国在到达东方的竞赛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在巴尔沃亚穿越地峡的当年（1513年），葡萄牙的首批船只到达了摩鹿加，在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的同年（1519年），麦哲伦所做的航行将揭示出由西面到达东方的真正航线以及太平洋浩瀚无际的洋面，麦哲伦的航行也表明了西班牙人在这场竞赛中已告失败；但是他们在中美洲却得到了另一种报酬。西班牙人未能发现海峡，但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巴尔沃亚既是发现家又是帝国缔造者，因此，对于他的同伙和他的国王都是有功的；但是他也和哥伦布一样，因为他的仇人返回西班牙后搬弄是非而吃了苦头。人们不难理解国王对尼奎萨和胡安·德·拉·科萨的死亡的关切，但他不能容忍代表他的权威的恩西索受到冒犯。巴尔沃亚关于发现太平洋的报告，并附有珠宝黄金等实物做证，但它到达太晚，来不及改变国王的决定。1513年，国王任命的达里安总督不是巴尔沃亚，而是佩德罗·阿里亚斯·德·阿维拉，一个可怕的老家伙，当时的人们把他叫作“残暴的统治者”。佩德拉里亚斯（即阿维拉）以极大的精力开展探险和移民工作，但是他完全背弃了巴尔沃亚安抚印第安人的政策，使巴尔沃亚的大部建设性工作前功尽弃。他和他手下的船长们统治、剥削和蹂躏这个地峡长达16年之久。巴尔沃亚因为佩德拉里亚斯的嫉妒而受害，1519年因被控叛国罪而受审并被斩首。

佩德拉里亚斯受任为达里安总督，此事本身虽然带来严重后果，但却标志着国王对于控制其在西印度群岛的臣民的活动，有了新的决心。费迪南德早已撤销哥伦布家属对大陆的土地要求；他现在更明确地宣布这些移民地的权力掌握在国王所任命的官员手中，而不在自封的头目手中。在各海岛上已经出现了执行国王意旨的公认机构。1511年，在圣多明各设立了一个上诉法院，它是后来对殖民地的治理影响

至深，由经过学校训练的法学家组成的检审法院的前身；尽管迭戈·科隆的权力对大陆鞭长莫及，但检审法院的上诉权却可以直达大陆。在1511年同一年，西班牙任命了卡斯蒂利亚议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就西印度群岛的治理问题向国王提出咨询。该机构的主席是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他的官僚作风曾使哥伦布非常恼火。在财政方面，早在1503年就在塞维利亚设立了贸易署，以调节对美洲的贸易。每当一个新的移民地成立，便任命王室官员以保护国王的财政利益。奥维多便是以这种官员身份随佩德拉里亚斯去巴拿马的。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调整西班牙征服者和被征服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对海岛上土人遭受残酷剥削提出抗议，以1511年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神父在圣多明各所做的圣诞节传道作为开端。这次传道大大触犯了岛上的一些西班牙人，并在西班牙引起轩然大波。蒙特西诺斯被他在圣多明各的同伙派回国去，在朝廷为印第安人提出申诉。国王的咨议大臣们详加研究后，制定了1512年的布尔戈斯法；这是欧洲第一部殖民地法典，其中除有许多详细规章外，并阐明了三项明确的原则：印第安人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必须采取和平方法使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而不得使用武力；印第安人必须参加劳动。由哥伦布首倡并为奥万多使之合法化的分派劳役制或监护征赋制将继续施行，但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勒索的劳役和贡赋则予以限制；监护人方面也必须完成他们的职责（给予保护和传教），并遵守一切旨在防止施加虐待的规则。对于多米尼加的鼓动者们说来，关于土人权利的规定是不充分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至少国王已通过正式的立法，承认印第安人享有权利，以后不准国王泯灭良知。据我们所知，蒙特西诺斯在提出抗议后，便默默无闻了；但是其他宗教界人士继续了他的工作，要求对印第安人给予较好的待遇和更多的自由，并对西班牙人加强监督。蒙特西诺斯信徒中最有名望的是多米尼加的伟大的传教士和政论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的著作和讲道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影响西班牙的殖民政策。

因此，当巴尔沃亚被佩德拉里亚斯处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殖民地行政机构的初步体系，对当地土人的政策也有了初步规定。但是这个体系和这种政策不久便要以意想不到的规模运用到比西班牙人在美洲所曾遇到的民族人数更多、组织更加完善的一些民族身上。当时有一些优秀的民族，他们散居在美洲热带地区，主要是在高山地带，虽

然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驮载的牲畜，并使用木器或石器，但是他们却在某些艺术（雕塑和建筑）和手工艺方面具有异常卓越的技巧，包括对某些软金属的加工在内。他们的主要作物是玉米，这种粮食作物比海岛上的木薯产量更高，营养更足；他们通过组织周密共同劳动制度，使锄种玉米的产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的主要居留地，规模宏大，堪称城市，其中有石头筑的和砖坯筑的庙宇和公用房屋。至少在两个中心地点（墨西哥的峡谷和安第斯中部高原），一些好战的部落称雄称霸，向广大地区内被征服的人民勒取贡物和强迫劳役，并且建立了与旧世界的帝国或王国表面上相仿的政治组织。这些民族的财富和权力对于西班牙人是美不胜收，他们的宗教对虔敬的基督徒来说，具有一种恐怖的魅力，在某些情况下美丽动听的救世普济的传说往往是和活祭殉葬及同类相食等令人发指的仪式交织在一起的。

新世界的这些古代的城市建设者之中，没有一个以航海为生的民族。他们的主要中心都在内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人好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就连玛雅人在尤卡坦的几个大城，也不容易从海上直达。被发现、遭到进攻并被征服的第一个古代“帝国”是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中部建立的“帝国”。阿兹特克人是一个敢于入侵别人的好战的民族，他们的首府城市特诺奇提特兰建筑在特斯科科湖内的几个岛上。由于这些岛上人口过多，阿兹特克人不得不向外扩张，在西班牙人到来的前1世纪里，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结盟，把势力向西南扩充到海湾沿岸附近一带。而在海湾探险的西班牙人发现了他们的活动，并听到了关于他们权力的传说。

卡斯蒂利亚德奥罗地峡的移民来自伊斯帕尼奥拉岛。到墨西哥探险并进行侵略的人们来自古巴，而做准备工作的领袖人物则是一个能干的、野心勃勃的总督，名叫迭戈·贝拉斯克斯。贝拉斯克斯的部属曾一度在洪都拉斯海岸附近的海湾群岛抢劫奴隶，很可能他们这一带找到了与大陆上更加发达的文化进行交流的证据。1517年和1518年，从古巴派出了几个小型探险队，对尤卡坦沿岸和墨西哥海湾进行勘察。1519年，根据这些探险队的报告，贝拉斯克斯装备了一支更加庞大的舰队，其任务是进行贸易和探险，并任命他以前的私人秘书埃尔南·科尔特斯为舰队司令，而在财政方面科尔特斯又是这一事业的合伙人。科尔特斯本人颇负声望，这个计划吸引了600名左右的自愿参加者，对于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是个很大的数目。贝拉斯克斯和科尔

特斯两人互相猜忌，也许科尔特斯一开始就设想此去将征服一个独立的王国。他秘密地匆匆离开古巴，一上岸就迫不及待地否认贝拉斯克斯的权力。从此时起，这次探险就成为科尔特斯本人的事业了。

西班牙对新世界的历次征战，以对墨西哥的征服最出名，而且也有最充分的文件做证。有4部当时的目击者记载留传下来，其中至少两部具有独特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科尔特斯本人的书信生动翔实，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意图和把一切决定都说成是科尔特斯本人的决定这种自然倾向的影响。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的《新西班牙征服信史》，可矫正上述缺点。卡斯蒂略的叙述是从一个忠诚而又聪明的军士的观点出发，而他恰巧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征服墨西哥的史话，除了有名和叙述得体以外，还完美地和典型地说明了征服者心理状态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对黄金、土地和奴隶的饿狼般的贪欲；他们狂热地想要打倒异教徒并使人们皈依基督；此外，还有为了自己利益而要做一番伟大事业的激情，这一点虽然更加微妙，但有同样的推动力。正是最后的这种激情，即开创巨大事业的自豪感，使普通士兵对他们的首领们的明显的鲁莽行动表示赞赏，使他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刻紧密团结，使他们不假思索地去尝试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古代英雄人物的仿效者，而是和这些英雄人物分庭抗礼，进行抗衡。在古代神话或中世纪传奇中，当然没有比一小撮落魄江湖的剑客征服一个庞大的半野蛮帝国更加能使听者动容的故事了。

科尔特斯在今天的维拉克鲁斯的附近登陆，用两个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征讨的开端。第一个行动是摧毁了他乘来的船只。这样，科尔特斯便防止了不满分子潜回古巴，使水手和军队一起行军，并且以一个古典的比喻满足了征服者对戏剧性姿态的偏爱。第二个行动是以隆重的仪式在当地成立了一个自治政府。科尔特斯把他在古巴接受的委任状交给了维拉克鲁斯“镇”的地方官，这些地方官作为西班牙国王在墨西哥的代表，又把一项新的委任状给他，他又立刻上书国王请求予以批准。在尽一切可能使他的独立指挥权变为合法以后，他便率领军队从维拉克鲁斯雾气弥漫的丛林出发，攀登崎岖的漫长山路，到达墨西哥中部的高原地带。

对于现代的旅行家来说，科尔特斯的路程几乎是极端困难的；其中行经两个极高的山隘：维拉克鲁斯州内的奥里萨巴和科弗尔德彼罗

特之间的山口，以及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西塔西瓦特尔这两座对峙的被雪覆盖的山峰之间的科尔特斯山口。上述两个山口至今还没有可以通行的道路。科尔特斯的路线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在友好的地区内尽可能地向前推进。从维拉克鲁斯到特诺奇提特兰，其间有很多印第安人的村庄，它们并非出于自愿地向阿兹特克酋长们纳贡；有一个城镇及其附近农村此时仍和阿兹特克人对抗。科尔特斯同时并用武力与外交手腕，因而能够促使森波拉和附近村庄的不满情绪迅速发展为叛乱；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后，他和特拉斯卡拉这个顽强的城镇订立了进攻同盟。这些友好的城镇以食物和民夫支援西班牙人，还提供作战所需的辅助人员，而最重要的是提供情报。科尔特斯在森波拉首次听到魁扎尔科亚特尔，即托尔特克人神话中的英雄之神，据墨西哥的占卜者说魁扎尔科亚特尔回到人间的日子预期大约在西班牙人登陆之时。从特拉斯卡拉的无畏的战士们那里，科尔特斯一定了解到许多关于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力量及其弱点的情况。使节团来到兵营，带来的礼品以其珍贵价值和精巧工艺而显示了墨西哥的富有，使正在等待的贪婪的西班牙人垂涎三尺。他们此来还进行威胁，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当地的贫困，徒劳地企图劝说科尔特斯不要向首府进发。科尔特斯十分精明，把这批金光闪闪的财宝中最好的一些，派人带回国去呈献国王（虽然途中有些财宝被法国私掠船劫去，从未到达西班牙）。科尔特斯从他们的威胁中，猜出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既妄自尊大又盲目恐惧的复杂心理，看到他能利用蒙提祖马的恐惧心理。科尔特斯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他在这种情势之下能够衡量心理因素，同时也因为他善于在盟友和敌人这两方面同样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这个阶段的主要困难在于遏制他的盟友，因为他们对战争的观念并不精细，而是更为直接。他对这个棘手的任务顺利地予以完成；军队向前推进时纪律严明而且迅速，西班牙人在适当时候由他们的阿兹特克主人护送，沿着堤道开往特诺奇提特兰，以和平的方式显示了军队的英勇气概。西班牙人被安置在城内一幢宏伟的公共建筑或如他们所说的宫殿里居住，而辅助部队则在外面湖边宿营。在一切运输全靠肩挑背扛的一个国家里，在临时通知的情况下竟能养活这么多额外的人口，这充分证明阿兹特克人的组织力量。

和平不久就消逝了。首先使这个和平局面中断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潘菲洛·德·纳瓦埃斯的率领下开到了维拉克鲁斯，纳瓦埃斯是原先的古巴征服者之一，是古巴总督派来捉拿科尔特斯的。科尔

特斯急忙赶到了海边，机智地挫败了纳瓦埃斯，用威胁、贿赂和许愿等方法把从古巴到来的士兵收容到自己的手下。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副手们由于自己的狂热，捣毁了异教庙宇，不断地要求供应食物，把阿兹特克人逼得走投无路，快要不惜一战了。蒙提祖马由于沦为西班牙人的俘虏，已成为一个威信扫地的傀儡，对于约束他自己的族人已无能为力。阿兹特克人另选了一个新的军事首领，科尔特斯率援军到来，便导致战争的爆发。整个战役中他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和蒙提祖马的权力，重新进入特诺奇提特兰。蒙提祖马被他自己的人用乱石击死，科尔特斯不得不在夜间沿被切断的堤道突围出城，一夜之间损失人员的1/3和大部辎重。但是辅助作战的部落仍旧信守他们的盟约。军队得以退往特拉斯卡拉，重新改编，以便进行一次更完善的但不大引人注目的进军。科尔特斯派人营造船只，准备在湖上作战，并包围城市，切断城市的淡水和食物供应，有计划地进行劫掠，逐家逐户地摧毁建筑物，当他向湖的中心进军时把瓦砾铲入湖中；结果在1521年，阿兹特克人的残部投降了。科尔特斯在原地开始兴建一座美丽的西班牙城市，其中已不见印第安人建筑的痕迹，这个地方已和欧洲的罗马城市一样全部经过重建，而大湖现在已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瘠原野了。

墨西哥战役的速度，其实也就是西班牙征服者占领美洲文明一切重要中心的速度，和葡萄牙在东方商业扩张的速度不相上下；但是，西班牙的征服产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其成功也更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将领的英才是个重要的原因，但印第安人也有他们能干的首领，在使他们的战术适应新形势的时候显得很有才干，例如他们学会了利用高低不平的地形来打伏击战，而不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在空旷地带以密集队形进行战斗。拥有火器是个重要的因素，但也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舰只可以载着武器装备驶往任何地点，但在陆地上却要用人力把火炮拉过山冈或越过沼泽。科尔特斯用以入侵墨西哥的军队只有几尊小炮和13支滑膛枪。马匹可能比火炮更为重要，但印第安人很快就不再怕马，甚至学会了骑马。科尔特斯在上岸时共有16匹马。他的士兵大部分使用刀、矛和弩，步行作战。他们拥有的钢铁胜过石头，这是优势，但他们却不是一支武器精良的欧洲军队在和一群手无寸铁的野蛮人打仗。

西班牙人具有无限的勇气和必要的纪律。他们是一个以小麦为主食的种族，具有比一个以玉米为主食的种族更大的坚韧和耐力。他们人数甚少，生活资料仰给于当地，但敌人方面要在战场上供养大队人马，至多只能维持几天。他们能够利用敌方的某些传奇和迷信，至少能够暂时地瓦解抵抗力量。他们的作战对象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战争部落，这个部落以武力或威胁手段征收贡物，却不大替臣民办事。所以，他们拥有大批的印第安人同盟者，这些同盟者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无实的和专制的国王，幸灾乐祸地攻打他们从前的霸主或对手。如果没有特拉斯卡拉人，科尔蒂斯未必能够拆毁特诺奇提特兰的建筑物。最后，西班牙人的优势还在于他们好战的宗教信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绝对信心。印第安人认为他们的宗教需要他们战斗，并在必要的时候英勇牺牲；西班牙人则相信他们的宗教会使他们得到胜利。

科尔蒂斯的天才不但表现在他笼络自己部下这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至少取得了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对他消极服从上面。他的做法非常明智，所以后来高原地区的土人从未制造任何严重麻烦。实际上，科尔蒂斯自己的部下却比印第安人给他带来更多困难。这次征讨所得的掠夺物令人失望，但也无法不是如此，因为士兵们原来期望过高。科尔蒂斯因此受到责备，甚至被控隐匿财宝占为己有。幸而科尔蒂斯在此地时，印第安人社会已有了向宗主纳贡和服役的经济条件。科尔蒂斯通过监护征赋制中把印第安人居住区分配给他部下的手段，使西班牙的新贵族取代了阿兹特克及其盟友过去所占的地位，并以一个新的僧侣集团取代了古代庙宇的主持。他审慎地把相当一部分朝贡村庄划归国王所有，自己保留了一块监护征赋地，拥有大约23000名朝贡的户主，是一个堪与王公媲美的采邑。同时，他给自己军官中有雄心壮志者找到一个任务：即向南方探险并征服玛雅人的土地，同时力图降服西面那些更野蛮的部落。阿尔瓦拉多、奥立特、桑多瓦尔等人仿效科尔蒂斯，给新西班牙王国增添了一批半独立的大省。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勇敢可与科尔蒂斯相比，但残酷却有过之，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将才与智慧能和他匹敌。到了1524年，由墨西哥南下的部队同由达里安北上的队伍相遇，双方头目开始作战。科尔蒂斯不得不亲自上阵。他的最后一次战役是征讨洪都拉斯的一场可怕的消耗战；这次战役攻打西班牙人，是野蛮的内战之一，而这样的内战似乎是每一次伟大的征服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西班牙征服者的统治是短暂的，而且有很多的争论。他们自己出资来到美洲，遍尝千辛万苦，牺牲生命和财产；尽管如此，他们却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援助。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盼望退休后得到养老金。如果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就会在自由的群居地定居下来，采用在西班牙早已过时的封建方式，按当时的需要对印第安人进行剥削，除口头上对国王表示臣服外别无奉献。西班牙的统治者任何时候都不想让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国王便以大量的流血和耗费为代价，斩断了大封建世家、骑士团和地方特权集团的魔爪。正在发展中的专制王权决不容许在海外再出现一个新的封建贵族阶级。平民出身的司令如科尔特斯、皮萨罗、贝拉卡萨尔和努尼奥·德·古斯曼都是依靠自己的部下取得权势的。如果说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不久也都被国王任命的新人所取代。法学家和神职人员接管了对帝国的治理；牧场主、矿业资本家和塞维利亚的出口商正在开发帝国的财富。在墨西哥，事实上在西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当主要的移民区已被认为安定下来的时候，西班牙征服者的伟大时代便宣告结束。他们已经无事可做了。森林和空旷的草原不是他们的志趣所在。有的人定居下来成为牧场主或监护征赋人；有的死于非命；有的如贝尔纳尔·迪亚斯，终生窘困。没有一个人获得国王的信任，被委以行政实权。科尔特斯晚年退休后生活愁闷而又忙于诉讼。他生来就不是充当官吏的材料。

[1] 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2世纪时最负盛名。——译者

[2] 真名为格哈特·克雷默（Gerhard Kremer，1512—1594年），中世纪佛兰德的地理学家。——译者

第十六章 全欧洲关心扩张

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历次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除了其他特点外，是因为地理方面的学术成就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时代打破民族主义枷锁的那种方式。探险家几乎与那个时期的雇佣兵、画师、雕刻师或者金饰匠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他对专业问题的探讨和他的专业技能是由他的民族背景熏陶而成；但是，这一切都听从任何一个愿意给予报酬的王公或者国家使用。卡伯特父子是为英王服务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哥伦布如果不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王服务，也会甘心情愿地为英国的、或者法国的、或者葡萄牙的国王效劳；佛罗伦萨人维雷扎诺携带法国国旗去美洲大陆；葡萄牙人麦哲伦是由西班牙雇佣去航行的。在一个稍后的时期，伦敦人亨利·赫德森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于1608年从阿姆斯特丹起程去做他的航行；再稍后，英国赫德森湾公司的成立归功于两个法裔加拿大人——“醋栗先生”梅达尔·舒阿尔和皮埃尔·埃斯普里·拉迪松的坚持和经验。

这些人所凭借的是一个共同的测绘知识和地理推想的宝库。在“发现时期”，有许多东西即使说不是国际性的，也还是世界性的。但是，尽管科学技术和航海技术算作世界性的，而他们所服从的领导和他们的成功所仰赖的财力显然是民族性的。葡萄牙阿维斯王室为探险家所做的有目的的组织工作以及为阻止顽固的愚昧无知而给予他们的保护，是使这个小国站在运动前列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葡萄牙虽然拥有一个对航海家以及他们口讲笔述的神话般的新世界发生兴趣的王室，但在这方面它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西方君主国家为权力和税收而内讧不已的背景中，国王们乐于去组织世界性的天才人物进行那个时期的探险，这一事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种意义上，那只不过是期望当时的王公给予艺术和科学的总的保护的一个方面。不过，这种保护有其本身的重要性。因为它适合在那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重商思想和实践。

在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学说中，几乎从作为国家关心的事物的贸易刚一出现起（在13世纪末左右），就可以看到对一个单独目的的

日益重视。这就是每个国家都想要使自己在经济方面对潜在的敌人和不可靠的朋友保持独立性。为达到这一单独目的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既因国家而不同，也因时期而相异。政策的表现可见于特许和特惠、垄断和保护、对进出口的控制、鼓励货主以及禁运奢侈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一个压倒一切的考虑是以规定贸易差额的方法积累金银。表现千姿百态，目的恒常不易。结果，“重商主义是一个如此广泛和如此松散的术语，似乎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尽可能相近的定义说，它是这样的“一个专门术语，人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活动时，为增加其本身的权力、财富和繁荣而采取的那些由当时的各种条件所产生的理论、政策和实践”。

像地理发现这种具有如此革命的性质和如此丰富的经济可能性的事件会使重商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转入新的类型，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根本目标，即完成一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和独立的王国，必须依靠在一个新的和更广阔的世界中的重新安排来达到，而这一个世界也已经显示出它拥有如此大量现实的和潜在的财富，足以改变一切旧的均衡。

结果，组织地理发现和控制那些发现的成果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性质的领导就理所当然地变成威力最大的国际因素。至于早期的发现把它所包含的财富和权力归属罗马天主教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到1580年，又把享有西葡两国的发现成果的正式权利转让给哈布斯堡王室，这种稍微意外的情况也是造成上述后果的部分原因。因为西欧所有其他国家在急于从宗教上、政策上、财政上摆脱菲利普二世的权势的过程中，它们的民族的和重商的理想已经成熟，这些目的实际上就变成了摆脱海外领地所提供的权力和财富的愿望。

但是，不管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否是决定形势的一个因素，欧洲在重新确定贸易和外交的概念时也必然要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发展贸易、船舶和从事航海的人口，控制初级商品以供生产、消费和战争需要，以及充实国库金银储备，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实际如此），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的新资源的出现必然刺激新的野心和新的竞争。对于新出现的资源的开发必然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范畴，新的财富和权力的平衡，即便没有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会如此。不过，不

仅是古老的政治格局，还有许多古老的贸易方式，依然基本上没有受到新贸易路线、新的财富和宝物的资源的影响。

既然是由于地中海贸易体系在15世纪的缩小而大大地推动了地理发现，如果坚持说地中海及其海运贸易在整个16世纪西欧的积极商业和海事活动中依然是最重要的单一因素，那就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论调了。但是，尽管意大利的大木船队从北方各港口消失了踪影，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意大利其他港口的航运业和一般权势都有所低落，总的来讲，北方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在16世纪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地中海东部诸国与印度和远东的陆路联系传来的香料和其他产品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打断了，但它们却在地理发现所开辟的新商路的终点重新出现。然而，地中海贸易的其他产品，如棉花、酒类、葡萄干和椰枣；佛罗伦萨的纯丝以及威尼斯的丝织品和玻璃；西西里和北非的糖、棉、丝；伊比利亚的油类、橄榄、葡萄酒、杏仁和橘子；图卢兹的大青和葡萄酒以及西班牙北部所产的铁，所有这些东西正以更大的数量和速度源源不断地流通。它们为工业生产提供某些不可缺少的原料；它们适应中产阶级更舒适的生活水平；它们与土耳其人所打断的东方贸易的物品相比，较少显著的异国情调和豪华特色。

随后有一个时期连这些贸易也停止了，一直到莱潘托战役使海盗活动的威胁减少为止。不过，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地中海的贸易的确比外部世界——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具有更大的商业意义。

然而，即使这些贸易也改变了地域的重点，这部分地是由于地理发现所引起的重新确定方向。葡萄牙组织和支持的到印度洋和印度大陆的航行是令人惊叹的，它组织和支持到香料群岛以及出于偶然地到巴西的航行也是同样值得敬佩，然而那个小小的王国既没有人员、经验，也没有聪明智慧去管理伴随地理发现而来的移民和贸易。只要条件还维持在使无照营业者无利可图的水平上，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巨大财富就为它所有。不过，在15世纪和16世纪两个世纪，控制和垄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地中海的运输在1512年被土耳其人完全断绝，欧洲发生了一场香料荒，但这只不过使威胁葡萄牙东印度贸易的竞争更为加剧而已。到16世纪中叶，限制和控制加深了这种财源的脆弱性质。

1514年，事情已经很明确：对于葡萄牙来说，殖民地贸易是由王家垄断的，它是由王家代理商代表王室组织起来的；1516年设立的商品管理局准备外运的货物，分发和销售运回的香料和丝织品，并补充军队和行政人员。当在西班牙的影响下，“管理局”由一个“商品委员会”来代替的时候，原来造成的混乱和繁重工作还没有纠正过来。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不得不通过少数几个货物集散港口来进行——群岛和印度大陆的主要香料贸易要通过果阿；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要通过澳门；巽他群岛和摩鹿加群岛要通过马六甲；然后从这些港口按仔细规定装载的物品被运往欧洲，船只数目有严格的限制，而且只能送到唯一的一个商业城镇。对于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和各殖民地区之间的贸易大部分掌握在领有执照的个体商人手中（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官员），个人缴纳重税（均为货物价值的30%），也可以从事由果阿到里斯本的主要贸易。但是，葡萄牙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内所进行的贸易的发展中的明显特征就是层层管制，既专横独断，而又混乱不堪。

这些限制招来了无照营业者，特别是由于贸易在外交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葡萄牙人在他们所假想的领域外围没有雄厚的实力。在这方面，手段与野心之间的矛盾是很清楚的。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威望和与地方统治者签订条约所取得的种种权利，他们的薄弱力量无法对抗欧洲的挑战。

把贸易的物品投放欧洲市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如果说这个词用得确当的话），它加重了私人和国家竞相夺取如此丰富的财源的不可避免的趋向。尽管没有能够在它的属地建立有效的统治和实施阿尔梅达与阿尔布克尔克的计划，葡萄牙在16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极度繁荣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商业兴隆，里斯本在殖民地贸易中占有完全的统治地位。起初，从1494年起，东方的产品是通过葡萄牙人在安特卫普的代理店“发货”的。但是从1549年起，把贸易集中到里斯本，然后从那里通过普通的商业渠道到达安特卫普，要经过官府干扰的重重枷锁。那个时期的大银行家们，特别是福格家族，运用他们支配葡萄牙王室收入的权力来控制贸易。其结果是，虽然香料依然是经由安特卫普来销售，但是官府的干扰、商品管理局的干涉，在东方的贸易货栈制度和在西方的里斯本的垄断，在商人—银行家开始享有贸易实惠之前，这一切都要增加他们必须付出的成本。

归根到底，他们的销售价格就与在一种竞争比较开放的制度下，或者由非葡萄牙人无照营业者所能确定的价格大不一样了。

制度本身的弱点及其所掌握的财富，都引起他人的挑战。但是，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葡萄牙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宝库。对于葡萄牙的国库岁入来说，在1569年的财政危机中，当塞巴斯蒂安不能支付他的账单而被迫在安特卫普暂停兑款的时候，危机就达到了高潮。16世纪末，约翰·惠勒在他的《商业论》中，对于开发财源的失败有更为概括的叙述：“首先，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我们知道，他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善良人一样，每年完全饿着肚皮（上帝晓得），几乎就是为了香料而航行地球的三部分区域，而当他把香料运回来的时候，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安特卫普的大富豪们就把这种货物完全弄到他们自己的手中，而且往往是预付货款，因而形成一种纯粹的垄断。”惠勒作为英国冒险商公司的秘书，在谈到安特卫普的时候虽不无偏见，但是，他对于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如何使安特卫普发财致富以及如何使那个城市在欧洲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叙述并非夸大其词。

西班牙在新世界的领地与葡萄牙所属的领地的不同点在于：西班牙人要在那里通过殖民而不是通过贸易来生产财富。至少说，这是西班牙人得出的第一个结论，而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时宣布了殖民的条件。然而，西班牙殖民的最初的果实——农产品，对于一个其本身仍以农业为主的欧洲来说是价值不大的。一直到征服者的迅速渗入发现西班牙掌握了巨大矿物资源，西班牙的领地在欧洲经济中才与葡萄牙的领地差不多一样重要了。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吸收各大骑士团的首脑，限制贵族的特权和收入，拉拢兄弟会的城市成员，向神职人员征税，通过卡斯蒂利亚的议会及市镇政府收税，以此来复兴他们的民生凋敝的领土，进行他们的战争和重振王室的威信。两位天主教国王共同执政的时代是一个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但是，尽管卡斯蒂利亚的财政制度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先进一些，在这个时代里，国王的国库还没有显得充裕起来，伊萨贝拉大大地撙节了开支。这位女王为了在1489年与摩尔人作战，不得不用自己的珠宝做抵押去举债；虽然在她的最后遗嘱中，她命令必须用她的王国的还未分配的收入偿还债务，但这一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西班牙在进入16世纪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王国，它的资源大

部分都抵押了出去，它的收入难以应付进行有效的统治（不要说在欧洲起领导作用）的任何尝试所必需的耗费。

岁入大部分出自卡斯蒂利亚王国。在阿拉贡及其属国，议会是如此容易招惹麻烦，结果它们很少召开，而且在征税方面所做的贡献很小。无论是对于在西班牙重振王室的威信，或是在欧洲增加西班牙的国威来说，从新世界获得的岁入还都没有起显著的作用。直到16世纪20年代，从新世界进口贵重金属的数量才达到并继续保持足以使其在西班牙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中成为重要因素的程度。16世纪初，大量的黄金开始运来。1511—1515年时期的总额比1503—1505年时期的总额几乎增加1倍。但是，一直到16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划时代的生长。这时，白银的增加额比黄金的增加额大得多，虽然黄金的输入也有十分可观的上升。到1516年，查理五世从海外领地所得的收入每年约为35000杜卡特。由于短期波动的幅度太大（1518年为122000杜卡特，而1521年则下降到仅有6000杜卡特），我们不妨着重考察长期的趋向，这要比考察任何特定年度、甚至一个5年时期的数字适宜得多。在1538—1548年和1548—1558年的两个10年期间，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65000杜卡特，比查理五世登基那一年的35000杜卡特有大幅度的增长。随着一些大银矿的投产，甚至这个数字也很快被超过了。王国的这笔收入迅速增加到每年100万杜卡特以上，而在菲利普二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它逐渐增加到每年在200万和300万杜卡特之间。

这些收入超过了哈布斯堡王朝从他们在低地国家的领地所取得的收入。但是，这只是来自新世界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王国的五抽一税，即抽征金属生产的20%，往往减轻，有时免除。这些钱被用于支付西属美洲的越来越完备的行政体系所需的费用，也用于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行政开支。甚至在其他的收入来源（关税，卖官职收入，盐、烟草及其他专卖，什一税和其他半教会税，各殖民地征收的市镇政府税收，强迫的献金直至公然的没收）使五抽一税大量增多的时候，岁入依然是经常被行政费用占去大部分。据估计，在15世纪，岁入的半数是这样用掉的；到17世纪末，约80%是如此消耗的；有若干年，就连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也不向国库交纳钱款，因为它已被总督和其他官员的薪俸完全占用了。

当西班牙的岁入由于一切的苛捐杂税，由于重商主义的行政官吏雷厉风行地从殖民地搜括金银并竭力运回西班牙储存而大大增加的时

候，或者当它由于这种贸易必然遭受的走私、海盗掠夺和贪污而有所减少的时候，事情依然很明显：在16世纪，西班牙正获得足以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的大量金银。这是那个时期的外交阴谋中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在16世纪下半叶已经变得逐渐重要，而在17世纪则有时占支配地位。当查理在1519年当选为德意志王的时候，正是福格家族的支持使他能够进行贿选。雅各布·福格曾经指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我的帮助，陛下就不可能当上德意志王。”这话确实很有道理。福格家族当时的借款是以蒂罗尔的和西班牙的岁入做保证的。福格家族100余年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主要生意就是以西班牙的几个大的基督教骑士团的收入为基础的。对比之下，随着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财政危机在1551—1552年迫在眉睫，福格家族已经深受这一危机的连累而不能从西班牙和尼德兰提取岁入了，他们就开始转向指望以“印度”运来的金银作为勉强贷款的唯一可以接受的保证。当安东·福格出面，于1552年向驻跸菲拉赫的皇帝贷款的时候，也就是福格家族把皇帝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最后一次，使查理免于接受在帕绍对他提出的苛刻条件的40万杜卡特的贷款是完全拿西班牙做保证的。安东·福格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忠诚；但是一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时候，新世界的金银向西班牙的输送有如潮涌，并刚刚表明可能把美洲的白银从西班牙大量装载到安特卫普。把这种金银从西班牙转移到安特卫普的金融中心是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而菲利普二世对这一贸易的阻止则给银行家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哈布斯堡王朝的作战能力究竟有多大程度依赖于大银行家们以王室的欧洲收入为担保所提供的信贷，或者依赖于从海外地区运到欧洲的金银硬货，这是不可能进行估计的，由于会计制度的混乱，就更增加了困难。当然，在重大问题上是可以举例说明，如果没有新世界的金块银条做诱饵，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时财政的信贷基础的灵活性就会达到无限小的程度。

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甚至在它扰乱普通商人的贸易的时候，一般来说，也只触及对新世界的整个贸易的一小部分。除了作为王家岁入所取得部分以外，通过普通商业渠道流动的金银就足以产生在那样一个时期势难避免的纯经济效果。在这里，事实与理论错综地混在一起了。新的金银的绝对数量本身必然会使社会发生巨大的和持久的变化。另一方面，欧洲的各王室全都倾注于靠操纵铸币（如果有可能的

话)赚钱,这是一个普遍地但是不平衡地降低货币质量的时期。这种做法引起商业界的猜疑和易变,使对价格和价格趋势的任何估定都加倍地困难,而广泛使用商业票据则把货币或伪币的流通量提高到使金银增加的后果被夸大的程度。

金银的第一个冲击对象是西班牙本身。西班牙的金银进口额列表如下(据J.哈密尔顿伯爵:《美洲的财宝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34页),以5年为一期,单位皮索等于纯银42.29克:

1503—1505年	371055.3
1506—1510年	816236.5
1511—1515年	1195553.5
1516—1520年	993196.5
1521—1525年	134170.0
1526—1530年	1038437.0
1531—1535年	1650231.0
1536—1540年	3937892.0
1541—1545年	4954005.0
1546—1550年	5508711.0
1551—1555年	9865531.0
1556—1560年	7998998.5
1561—1565年	11207535.5
1566—1570年 ^[1]	14141215.5
1571—1575年	11906609.0
1576—1580年	17251941.0
1581—1585年	29374612.0
1586—1590年	23832630.5
1591—1595年	35184862.5

1596—1600年

34428500.5

一直到18世纪中期，1590—1600年的十年^[2]是最高峰。虽然在17世纪期间，新世界的白银实际产量有所增长，但是它的增长额未能超过行政费用的增加量，向西班牙的输入显示出稳步下降的趋势。像上述数字所示的一个世纪间的金银的大量增加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在西班牙本土，以及通过普通的商业和金融渠道从西班牙扩展到欧洲的其余部分，它影响到金银和通货对其他货物的关系，因而造成物价上涨。在西班牙以外，它引起一种妒忌性的竞争的政策，使占有这些金银的一定数额变成任何急欲独立于西班牙或者想同西班牙竞争的强国的政策中的必要部分。

金银的流动所产生的正常经济影响由于如下的事实而复杂化了：从1519年起，白银开始起更重要的作用，在16世纪下半叶期间，它的进口额完全超过了黄金。结果，两种金属的比较稳定的关系被打乱了，使复本位制的通货适应于两种金属的更迅速得多和更大量得多的流动这一问题给当时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增加了困难。

由于政治家们，整个说来，不能很快地了解到麻烦大部分是由流通的金银总额的绝对增加引起的，由于他们全都在不同的时候企图用调整金位的方式解决他们当地（往往是在省的而不是在国家的基础上）的问题，那一时期的物价上涨夹杂着一些次要的原因，夹杂着加重它的影响的权宜之计，也夹杂着大量普遍的但是混乱的理论。这样一些因素使人难以估计新世界的财宝的绝对影响。不过，十分清楚的是：西班牙在16世纪上半叶开始了金银进口的过程，当时进口数量不很显著，而到了1550年左右至1600年左右的时期，西班牙就不得不尽可能地调整经济，以适应金银大量进口的新的流动。在西班牙，物价在1519—1520年左右开始上涨，在16世纪的其余时间继续稳步提高，最后在16世纪结束时达到世纪开始时的5倍。

这一动态从西班牙向外扩展，到16世纪末，在西欧达到它的顶峰，但是从来没有对物价发生像在西班牙那样灾难性的影响。在法国，到16世纪末，最高数字只不过是世纪初的2倍半左右。在英国，这一动态大概比在法国开始得稍微晚一点（约在1550年），一直到17世纪中叶才达到顶峰，那时候物价保持在比16世纪初高3倍多的水平。荷兰也感觉到这一影响，不得不开始对新世界的财宝所带来的后果采取

一种补救办法。查理五世发布命令说，所有与他的海外领地的贸易必须由塞维利亚转口，这样一来，尽管尼德兰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它只是作为正常商业往来的结果共享财宝的利益，其条件与法国或英国大多相同，但是，由于在葡萄牙人的地理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香料贸易日益增长，安特卫普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它成为16世纪金融世界的无可争议的中心。大银行家们在那里开设他们的总行；支配当时的外交的贷款条件在那里确定下来。哈布斯堡王朝是靠从西班牙运输香料来维持它在安特卫普的信用；而那个城市的频繁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运到那里的金银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安特卫普在商业上的优势约在16世纪中期最为鼎盛，在那时候，那里的整个物价水平高于法国或者英国。根据圭恰迪尼当时的记述，安特卫普的住宿费用，除里斯本以外，比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高；而英国的驻外使节则发现那里的生活费比法国贵1倍。

西班牙虽然患有（根据近代的诊断）贵金属积攒过多症，它却拼命地不让它们外流。尽管有人否认下列这一点，但却没有多大的怀疑余地，即西班牙的政策是最广义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它利用商业作为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西班牙的政策从狭义方面，也就是从金银方面来说，也是重商主义的，因为它采取严格的措施来达到在本国内储存尽可能多的金银。与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正常贸易一概由西班牙包办，禁止金银向外国出口。实践证明，这种措施不仅无用而且十分有害；它加重了西班牙物资比金银的相对短缺，这是运载金银造成的主要结果。于是，到了16世纪中叶，人们把西班牙物价的上涨部分地归因于向殖民地输出货物；补救方法是：既然殖民地有足够的原料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那就禁止输出西班牙的货物。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商业和工业便失去了市场，它的经济很快变得甚至不能符合它自己的需要，西班牙越来越要从属于这样一个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它从欧洲的其他部分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而以新世界的财富支付购买货价的大部分。适用于西班牙本土的实际做法甚至更适用于新世界的领地，在那里，不许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禁令是用许多方法来躲避的，往往由一个西班牙人插手，他把那些货物“装扮”成仿佛是他自己的东西。汉萨同盟各城市的船舶把波罗的海沿岸和英国来的纺织品以及其他货物运到塞维利亚，并且，随着17世纪贸易模式的发展，法国的船舶终于占领塞维利亚一新世界市场，接踵而来的则是热那亚和荷兰的船舶。到1691年，据估计，法国人运往塞维

利亚的货物贸易额每年约为2000万里弗尔，其中约有1200万里弗尔的货物运往新世界。回程的货物，法国人所运约值1400万里弗尔，荷兰的份额约值1000万，英国的份额约值600万或700万。

这样，尽管采取以上的政策，西班牙政府并不能在国内控制财富的新的流动所带来的好的或者坏的结果。无论是财富的绝对数量，或者是金银的相对供应量的变化，在西班牙境外都有它们的反映。从西班牙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现在重新出现了葡萄牙垄断香料的结果的情景。葡萄牙人过去为了把香料运回国以便使安特卫普人充实装有大量财帛的钱包，曾经“完全饿着肚皮”辛勤跑遍世界的3个部分，而西班牙人现在则感到“西班牙人从西印度群岛经过长距离的、长时期的和危险的航行之后带回的它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用鲜血和劳动收获的一切，都被外国人毫不费力地和舒舒服服地运到他们本国去了”。

财富的作用如此扩展的结果绝不完全是坏的。但是，这些结果是分裂性的。在欧洲的经济史中，“利润膨胀”论的一个最强烈的论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如下的情况正是“利润膨胀”的特征：物价脱离生产成本的控制，从而进行组织工作和靠销售货物生活的阶级（企业主）收取利润，而且根据膨胀运动的长度和深度，社会的均衡发生一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一方面使土地所有者受损失，另一方面使靠工资为生者和生产者受损害，而企业主们变得更有钱有势。西班牙的情况引起的后果是：新的购买力首先是由贵族和统治阶级捷足先登，以致他们哄抬工资，在那个国家里创造一种“收入膨胀”而不是一种“利润膨胀”。然而，新的金银是通过贸易和金融的途径到达西欧的其他国家，在那里，向财宝供应过剩的西班牙市场出售货物的商人们得到巨额利润，这种利润是那一时期的经济史的质量标志。在那里，那一时期的经济进展的巨大果实落到投机商人而不是靠工资为生者或者土地所有者手里。人们认为“利润膨胀”在英国从1550年一直持续到1650年，在法国从1530年一直持续到1700年，随着这个时期的消逝，英法两国工资的购买力逐渐下降了。

新世界金银扩散的这种结果不仅在社会均衡中产生一种显著的变化，它还引起资本的迅速的和有刺激作用的增长，在西方国家的商业界和工业界出现一种相应的事业精神。在这种精神的表现中，新的工业技术和对技术进行投资的新方法的普遍增加是同样值得注目的。这

是所谓的“16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新的金银在鼓励和资助这个时代的技术改进、扩大生产单位和市场扩展方面起了它的作用。有一种导致危机和困难的“轻松、兴奋、摆脱经济忧虑的气氛”，但是，这也是16世纪的经济和文化的活跃所需要的一个因素。

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占有新金银资源的民族主义势力是完全适应这种精神的，那一时期的大多数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主义除了与西班牙人争夺新世界的财富的主题外，并没有其他的主题。1580年，菲利普除了西班牙的王位以外，又登上了葡萄牙的王位，使这个主题变得更加迫切。这样一来，新世界的两个部分（像1493年教皇通谕《主要事项》或者后来的更有效力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的那样），全部落入同一的气势汹汹的主要强国的手中了。正如小哈克卢特所述，西欧感到的威胁是“一旦西班牙国王享有葡萄牙和东印度群岛，欧洲各国君主即将面临的危险不是很快就能消除的”。

西班牙的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它为满足西班牙本身及其殖民地的需要，无论如何也不得不依赖欧洲其他部分的工业产品，从而不得不允许把它的财宝投放到欧洲的各市场。它的困窘由于两个严重的缺点而增大了，这些缺点是自然的和地理的，并不是它自己的重商主义的结果。一个缺点是，它缺乏海军的补给品，另一个缺点是它缺乏西非的领地。伯利在无敌舰队覆没的那一年^[3]就确信西班牙如果没有“东方土地”（波罗的海沿岸）运来的桅杆、甲板、锚索、缆绳、沥青、焦油和铜，连最小的一支侵略军也不能够运输。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弱点，这个弱点使西班牙必须在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安特卫普存放大量的钱款，也使西班牙容易受到袭击，例如当汉萨同盟的60只船在塔古斯河口被俘获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战斗能力。在重商主义时代，像这样缺乏海军战备品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英国在这方面遭受的困难也不亚于西班牙。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波罗的海诸国和控制其贸易的商人们在那一时期的外交中便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更奇怪的是，西班牙帝国依赖着西班牙境外的奴隶劳动的贸易。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作为第一个殖民者，在他第三次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带去一个奇怪的所谓移民混合体。尽管在塞维利亚经过贸易署的严密审查，仍有许多不良分子随他前去，而且后来还有更多的人跟踪而至。根据16世纪的政治家们所提出的问题，移民作为解

决欧洲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既不必要，也不受人欢迎。例如，在16世纪末，西班牙的人口只有800万左右，法国大概1600万，英国约500万，葡萄牙只有100万左右，尼德兰不到300万。人口数字在16世纪的过程中确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中心，即作为稀少的统计资料的大多数来源地的那些城市。我们很难从实际证据确定16世纪究竟是西欧人口的一个增加时期还是一个减少时期。就整体来说，它大概是一个增加的时期，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足以使欧洲人充填世界上新发现的空旷地区成为合乎需要或者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这类趋向于大规模移民的运动都必然与那一时期的政治家们的重要宗旨完全对立，因为除了金银以外，坚强有力的步兵是保卫国家的主要力量，除非这个国家是一个海岛，而在这一场合，海员又是受到重视的目标。

因此，无论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不可能由旧世界来完成对新世界的殖民。要求派出的只是适当的移民与接受的自愿移民者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目的上的矛盾。实际上，人数是很少的，妇女移民极少，而且一般来说品行不佳；男子则渴望发财致富，然后回国花用，用所得到的财富大享清福并不打算在那里建立家园。从一开始，西班牙人就借重于当地的劳力。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非常廉价地出卖劳力，以致旧西班牙来的穷苦青年无法获得工作，“因为印第安人用比一个4便士银币还少一点的钱，就可以过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活，而西班牙人，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全都做不到这一点”。即便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劳动者，他们在工资基础上与印第安人的劳工的竞争，尤其是在强迫劳动或者奴隶制的基础上与后者的竞争，使得移居外国除了对于那些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外是没有吸引力的。

加勒比人劳工和印第安人劳工的来源枯竭，对黑奴劳工的依赖，从一开始就成为西班牙当局经常盘算的事情。第一次用船运载黑奴是在1503年进行的，此后经常有这样的运输。迄1515年止，黑奴在里斯本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此后他们是从几内亚海岸直接装船，自从1517年起，这种贸易是在一种许可制，即“合同”制下进行，允许外国商人供应此项在西班牙帝国经济中不足的商品。但是，“合同”制仅仅使拥有特权者垄断这种重要的贸易，它没有供应在数量上和价格上满足殖民者要求的劳力。因此，一种不顾当局限制的奴隶贸易发展

了起来，这无疑是一种走私的贸易，而且始终与海盗行为没有多大区别。

在这种贸易的最初年代里，最著名的事件是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的3次航行。他的第一次即1562年的航行使他成为普利茅斯最大的富翁，他的第二次即1564年的航行使他成为英格兰最有钱的人，他的第三次即1567年的航行引起在圣胡安德乌略亚的战斗和私掠船对西班牙贸易的袭击的加剧，最后发展成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公开的海战。

霍金斯的冒险事业是出类拔萃的，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基本的因素是：西班牙未能向它的殖民者供应货物或者劳力；它也未能建立足够的海上力量和行政效能，以此作为壁垒，把其他强国从它自称拥有主权的领地排除出去。在塞维利亚和西班牙的其他一些港口有声誉卓著的英国商人集团，他们的生意是向西班牙运进殖民地需要的货物，以备每年的西班牙船队向海外输送；法国和英国的商人们都多次航往几内亚海岸；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领地和船舶是法国私掠船员（他们之中有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经常的掠夺品。法国人由迪埃普的大船东让·安戈组织和装备起来，到处劫夺西班牙的财宝。特别是伟大的让·弗勒里很早就展开一项计划，即埋伏在圣文森特角或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面上，等待回航的西班牙船队；1522—1523年，他在那里截获了科尔特斯在征服墨西哥以后输送的第一批财宝。法国人由此得到一套航海图，他们用这些航海图越来越多地劫夺西班牙对新世界的贸易。霍金斯在一个阶段曾希望从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而到这时依然经常进行的这些掠夺中取得利益，他要以对西班牙人给予保护的方式换取贸易的特权。双方谈判毫无结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只不过给16世纪期间欧洲列强相互不和的多种原因又添上一项罢了。

这时掀起了关于国际法的各种问题的激烈争论。因为法国人，以及后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当他们相继主张自己有跨海经商的权利和探查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还没有渗入的地区的权利时，都不得不提出一个学说，这个学说不论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表达，都是向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利和教皇的政治权限进行挑战。不论哪个国家所提出的否定，结果全是大同小异的贸易和航海自由的思想。对于英国人来说，根据古典的解释（提出的许多解释之一），应抗议英国人被不公道地排除在对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之外。他们不承认教皇对领地的所有权；他们宣

称天空和海洋应由全人类共同使用；他们告诉西班牙人说“没有占领则法令无效”——只能承认西班牙人对那些已经用有效的占领来加强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法国人用类似的口吻提出抗议：“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土地上，法国人不应受到扰乱，在法国人的海上航行中也是一样，他们决不允许被人剥夺海洋或者天空。”

这些都是以法律学说为基础的深刻的挑战。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动力是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以及由于西班牙人的排他性主权要求和行政无能而向商人、探险家、各国政府与爱国志士提出来的挑战。但是，对于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无能也很容易做出过分的估计，因为尽管与本国联系困难、问题层出不穷、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敌对者不断侵袭，他们还是对殖民统治的艺术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并且在帝国的利润中保持一个突出的份额。引起挑战的不是殖民帝国的行政部门，而是西班牙的本国政府，因为它企图把进口的金银保存在西班牙一国之内，而它本身却不能向殖民地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拥有资源去满足需要和运用海上威力去反对禁令的其他国家的竞争之下，上述那样一种政策是维持不住的。有两个值得考虑的事实引起了这种对立。到16世纪下半叶，由于在西班牙出现的高物价、高工资和一般的吸引力，经常有法国人成群结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前去西班牙，想从西印度群岛的财宝中赚取几个资本。这些“在西班牙身上生活的跳蚤”不仅仅是法国人，虽然据估计，在1548年，仅在巴伦西亚王国就有1万名法国工人；移民入境的还有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尽管他们本国的政府由于害怕人口减少而制造一些困难。根据当时的记载，如果不允许外国人入境，西班牙就很难找到手工艺者。史料缺乏统计上的准确性，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楚的印象：西班牙本身提供了吸引外国人并允许他们吸取它的财宝的雇佣条件。新的财富在西班牙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市场，而对这个市场，无论西班牙本身的或者它的竞争对手的立法，都不能将它限制在西班牙境内。

在考察西班牙作为新财富的垄断者的地位时，第二个应该记在心里的因素是：在1565年霍金斯做第二次航行的时候，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绝不是坚决反对西班牙的。当时对她的地位的严重威胁更确切地说是来自法国和在法国支持下的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而不是来自西班牙，以致菲利普在卡托—康布雷奇强加给法国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它承认伊丽莎白对英国王位的权利。不过，伊丽莎白同意分担霍金斯的

船舶装备费用并分享冒险事业的暴利；直到在随后的年代里西班牙的态度变得强硬为止，始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即可以把霍金斯看作不过是展示了一条令人鼓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英国的航运和贸易本领可以有助于西班牙的帝国概念并在其中占有一个位置。在霍金斯的冒险事业的背后有相当大量的外交往来，而由这些往来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即西班牙会给与英国人进行贸易的“合同”，交换条件是可以利用英国的船舶去保卫西班牙的领地和贸易以防法国和摩尔人的私掠船员的劫夺。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西班牙的概念中一般缺乏平衡与可能性这一情况的两个突出的方面。野心和成就的矛盾是西班牙帝国主义与葡萄牙帝国主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它本身，通过它的经济作用，就足以勾起世界其他地区的欲望。但是，当这种矛盾与重商主义观念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应用、与西班牙不仅要保持财宝作为权势的源泉而且要运用它的更广阔的贸易政策的企图、与西班牙以财宝为这一政策的中心以便控制它的邻国的经济生活和一般政策的做法联结到一起以后，阻截财宝流动的诱惑力就加大了势头。至于西班牙把贸易政策看作对其邻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方法很多，例子不胜枚举。他们认为排他性的占有新发现的外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例如菲利普，本来与他本人并无直接关系，但他还是表示意见说：在1555年，不应当允许英国对几内亚海岸的贸易；既然几内亚海岸人所共知是由葡萄牙国王占领的一个地区，“那么，就应当使英国的航行不能不遇到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严重困难”。西班牙的政策从排他性占有、给予不便和尽可能制造麻烦的情绪出发，一直发展到明确的和有目的的干涉，例如，当1555年英国歉收而为了政治上的原因禁止对英输出谷物的时候，或者当1562年西班牙新任驻伦敦大使接到训令的时候，情况都是如此。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加剧伊丽莎白的贫穷状态。这样，由于只能从英国—佛兰德贸易的兴盛中获得关税收入，她就不得不对这种贸易做出让步；这样，由于她的大部分收入依靠西班牙的友善，她就可能被迫去改变自己的国教。

新的金银向外扩散，新的价格幅度带来的影响，再加上金银比率的重新调整，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使一切与西班牙和尼德兰进行贸易的国家（这意味着整个西欧的国家）财政甚至比过去还要困难得多，因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更容易接受西班牙所要施加的那种经济压

力。尼德兰是金融世界的中心；德意志王、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和女王以及大批的德意志王公，全都在那里，在安特卫普举债，他们依靠这些贷款去维持他们的政权的内部稳定和对外的独立地位。他们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忽略支配尼德兰货币市场的金融情况和观念，他们几乎不能不炮制出某种理论，这种理论足以使他们理解他们与这种贸易的联系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调整那些联系。由于西班牙的主权要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西班牙的实际行动，他们不能直接到产地去取得新的金银，于是便转而大张旗鼓地反对西班牙的主张，回避西班牙的规定，并且调整他们自己的贸易，以便把西班牙人劫掠得一千二净。

在这一个时期里，法国和英国都在集中精力搞调整货币制度、控制外汇比率，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理论和条例。它们极力鼓吹采用航运、海上保险和银行事务等方式的“无形的出口”，这些对于经济理论也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情况的主要结果是：深入研究货币制度的各种问题，以及反复强调人们早已承认的关于把贸易平衡作为将所需的金银从一个国家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手段的概念。这些运动的最为人们所知的、但绝不是孤立的特征，是让·博丹所提出的关于新的金银的结果的“数量论”。1568年，博丹在他的《答马勒特鲁瓦先生的矛盾理论》（这一矛盾理论提出货币贬值是物价上升的原因）中写道：“我认为现在的特殊情况是由三个原因产生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唯一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人谈到这一点）是金银数量的充足，如今，在这个王国里，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因而400年以来并无争讼。”几乎同样人所共知但并非那么容易理解的（因为一些外交秘密，经济理论制造的许多混乱，以及严重的个人虚荣把事件真相隐蔽起来了），是托马斯·格雷欣为使伊丽莎白女王得到她所需要的一份财宝而做出的努力。

格雷欣作为“英国财政界耆宿”的一生，很可作为一个实例，用来说明16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通过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依靠新世界金银流入的情况。他一生事业中最可显示这一情况的几个突出事件中，最主要的一桩是他在1554年为了寻求金银前往塞维利亚的航行。1552年，他曾被派往安特卫普和福格家族洽谈大宗贷款。他此行颇为得手，借款在一年后随即归还，但此后德意志王的需要吸收了福格银行的全部财力。1554年，格雷欣乐于从福格家

族和一些热那亚人那里接受了一笔贷款，该款将在西班牙收取。从这里可以看出，就连英国也通过安特卫普交易所提供的贷款而参与金银流通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西班牙所强加的限制和西班牙经济极不稳定的平衡。因为格雷欣在西班牙极力利用兑换比率并破坏西班牙银行家的信用，以致塞维利亚的银行不得不暂停兑现，并使他一度担心他已造成了一次普遍的金融危机。

格雷欣一生事业中最有代表性的第二桩大事发生在1565年，当时他致力于运用货币兑换率、英国币制的比较稳固以及他在商业方面因为正直无欺而获得的当之无愧的信用，来为伊丽莎白取得比其他君主所能获得的条件更为优惠的贷款。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是动用英国商人在国外的结余来付清尚未支付的贷款，而不使货币兑换率有损于本国一方，他在动用这些结余的时候对这些英国商人给予优惠作为补偿。此时汉萨同盟商人在英国的由来已久的特权已被冒险商公司所压倒。所有这些都确切无误地强调了英国国家的经济统一，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以及英国国家对尼德兰市场、信贷和金银的勉强的依赖。

英国正如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认为它很有必要分享新世界的财富，并且发现安特卫普市场是它采取这种措施的方便之门。补充办法还有通往西班牙本土的非法航行，对西班牙的直接贸易以及与各参加国的间接联系。这些国家全都竭力想保留尽可能多的金银，而有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允许汇兑，从而使金银由一国转至另一国。实际上，西班牙和它的对手互相容忍，结果双方都认为尼德兰是“英国的东印度群岛”，而把西班牙货币当作法国最佳的流通手段。由于这些密切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都符合这一目的，即把西班牙的金银输往西欧其他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各自订立的力图取得和保存部分硬币的各种条例便具有新的和迫切的重要性。

这种制度特别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结果西班牙对尼德兰政策的压倒一切的宗教目的，最后便使这一制度解体，因为它结束了作为这一制度的基础的宗教宽容。在这方面，阿尔瓦公爵来到尼德兰的作用可能被估计过高。因为，红衣主教格朗维尔自从1561年任职以来，即挑动宗教纠纷，并且不遗余力地设法建立一个不宽容的宗教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将把异教徒排斥在贸易和市场之外，从而使信奉异教的公侯贵族皈依天主教。他以伦敦的大瘟疫做借口，设法把英国的呢绒

排斥在贸易之外，这方面的成功完全归于“西班牙人和教士们”，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这位“人人憎恨”的红衣主教。然而，阿尔瓦固然对格朗维尔的政策毫无改变，但是他有时候的表现却不像这位红衣主教那样一意孤行，也比他更有经济头脑。由于阿尔瓦的就任，格雷沙姆才决定英国的商人和金融家必须离开尼德兰，因为在这块地方人们动辄“就要为宗教问题而自相残杀”。他本人在1568年离开安特卫普。中心市场商行的贸易中心试图找到一个替代布鲁日的地方，但经过一系列不能令人满意的临时措施后，迁移到英格兰。冒险商公司的呢绒市场当时也由安特卫普迁到汉堡，从而使尼德兰失去了一个16世纪欧洲的贸易中心地位，同时也使汉堡这个蒸蒸日上的大城市离开了汉萨同盟的怀抱。这些变化在欧洲的贸易体系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更不用说这些变化在英国经济史上的重要意义了；而英国的羊毛出口业自从和尼德兰的加工厂商分开后一直没有恢复，而这些变化则使原来就已兴旺发达的呢绒出口业确立其独占鳌头的地位。可能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政治和外交上的调整要比它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得多。

经过这样一段中断时期，结果就在英国经济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体制，英吉利海峡内的海盗行径在这一体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使英国得到了它从低地国家进行贷款和贸易所不能获得的一份财富。过去与贸易有关的那类海盗行径，即早期由英格兰到西印度航运中“海上掳掠固然可爱，却不如搞走私买卖”的活动，已经让位给无休止的英国劫盗事件，以致在格朗维尔离开尼德兰以后，顾问官维格利厄斯做出了发自内心的长叹：“啊，上帝！我们生活在平时时期，但是我们遭受的损失却超过我们公开战争时的损失……惩罚还在继续。正义并未伸张。”1568年，伊丽莎白下令把从西班牙途经英国，前往支援阿尔瓦军队的几艘热那亚金银扣留，因此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事件。这些船在普利茅斯请求避难，伊丽莎白就对这批金银实行“保护性的监管”，以后在海上实际上爆发了公开战争，只有全副武装的大舰队才能使用由西班牙到尼德兰的运输财宝的航路，例如1572年的梅迪纳·塞利舰队和次年庞大但效率不佳的舰队。英国的海盗正在西班牙新世界的财宝运往尼德兰各转运口的航道上称霸。

英国对尼德兰“吞吐”新世界金银的航线的干涉，对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都有生死攸关的影响。结果将引起伊丽莎白时期所特有的投

机狂，这种投机狂正是当时社会和教育变化的背景。同时它也将使许多企业力量脱离更加正常也可能更有效益的商业和农业经营，并且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向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提出直接的挑战，这个挑战一经解决，将在欧洲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英国之所以自行其是，原因全在于它的地理位置。法国和葡萄牙也是西班牙和西欧各贸易中心之间可供采用的运输财宝的航线。许多往来是可以用汇票和其他方式进行的，而且应该承认对英吉利海峡航路的骚扰绝不能阻止经由这条航线运输金银，但必然要使这种运输更加危险，更增加花费，也更不可靠。

也许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上述情况不出几年也正好就是西班牙对葡萄牙实行控制以及菲利普二世对香料贸易实行垄断的时候。在此以前，前往东方香料产地的新的航海线曾经在世界香料贸易中引起过危机，有时并使葡萄牙和安特卫普在财政上占有优势，然而安特卫普趁机利用了这种优势，而葡萄牙则滥用了这种优势。但是新情况也一直没有使通往香料产地的旧的地中海航线就此中断。现在，从1580年起，虽然西班牙国王加以控制，但此时对葡萄牙贸易的垄断略见松弛，同时又因为阿拉伯重又参加竞争，结果使葡萄牙重新获得了它经过16世纪最初25年的暂时兴旺后所失去的优势。菲利普有意地把这一重占优势的贸易引导到地中海，以便脱离英吉利海峡、英国海盗和尼德兰商人。例如，1585年他把葡萄牙胡椒贸易的合同给了威尼斯，后来又给了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这些城市决定不接受合同的条件，这就足以证明它们相信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就他们所知还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菲利普的政策在这次是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哈布斯堡王朝存有戒心。但是他的政策却体现出经济实力消长方面的一个长期的变化。如今终于见到了新的贸易路线在最初开创时期未曾带来的实力平衡方面的变化。在16世纪这最后的10年里，而不是在更早的年月，终于可以看到地中海由于大西洋地位的提高而走向衰落，尽管无敌舰队被击败后英国及其卫星国家后来在英吉利海峡拥有优势，使地中海东部地区出产的胡椒在随后的几年里比葡萄牙出产的胡椒便宜。

所以，在16世纪最后的一个世代里，新世界对欧洲的影响开始具备相当重要的规模，并在欧洲实力的消长方面引起持久的和根本的变化。在和哈布斯堡王朝独占优势这个不变因素对照之下，这些日益增

强的力量使敌对国家内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重商主义学说改变了措辞。最初的结果是希望葡萄牙属地脱离菲利普的影响。英国人的想法仍然还是老一套，即想在葡萄牙策动叛乱。叛乱一旦成功，西班牙将失去西方的财富，它的贸易和商品，以及海员和食物。这样，通过打破西班牙的霸权和要求分得一份葡萄牙的贸易（最后由于查理二世与布拉干萨的凯瑟琳联姻而得到确认）等办法，“我们才能保持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宗财富”，小哈克卢特在1580年这样写道。他不过说出了他同时代的人们的一般思想感情。

“贸易平衡”的概念此时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引起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而是采用什么具体的办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即通过贸易顺差而增加金银储备。1575年，英国有一份详尽的政府公报说明了这个概念，捍卫了这个概念，甚至还制定了当年的平衡。“输出商品超过输入商品的价值总额”是255214英镑13先令。

“贸易平衡”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不仅是在英国），主张持久地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殖民地”贸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海外商品不应通过直接贸易或通过尼德兰向西班牙去买，而是应当直接向宣誓效忠的殖民地去买。人们津津乐道海外领地的利益及其可能带来丰硕成果的前途。特别是北美洲的温带部分，似乎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甚至拥有以前只以波罗的海地区为唯一供应地的木材和其他松脂产品。据论者称，英国向北美移民，就可以摆脱在油类、“麻袋”、葡萄干、橘子、柠檬、兽皮方面对西班牙的依赖，在大青、食盐和酒类方面对法国的依赖以及在亚麻、沥青、桅杆和焦油方面对波罗的海诸国的依赖；因此“我们就不必像现在这样使自己的财富如此枯竭，不必使不可靠的朋友如此大发横财，而只需用我们现在所花费的一半钱财就可买到我们所需的商品”。这就是16世纪最后25年中发展起来的英国论点的核心内容。哈克卢特兄弟在很大程度上宣扬了这种观点。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仅代表他们自己而并不代表别人，那就错了。他们后面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航海家、金融家和经济学家；这种介乎海盗和移民之间的海外运动吸取了本书所述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动资金，结果必然推迟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变化，并可能变更这些变化的方向。就连纽芬兰无人居住的土地也被包括在讨论的课题中，尤其强调渔业是培养海员的场所，盐是可以制造而不必购买

的货物，桅杆和帆桁可以取自森林，以及使英国需要出口的货物成本低廉等问题。

法国人或荷兰人所抱的目的也同样明确；同时要办成任何事情，就必须公然反抗或者回避西班牙政府，这也同样明确。法国的企图主要是根据布列塔尼沿海渔民的利益和事业，比英国人更加向往美洲大陆的北部地区。他们被纽芬兰的大海岸所吸引，因此不如说他们是渔民而不是开拓者和移民。早在1510年，捕捞鳕鱼的渔业就已组织井然，中心市场设在鲁昂。1505年，诺曼底人贡内维尔在巴西上岸住了6个月，在他以后法国的船长们相继而来，在巴西沿海既进行贸易又从事海盗活动。

佛罗伦萨人维雷扎诺1524年沿北美洲海岸航行，从北卡罗来纳出发到达纽芬兰，结果坚定地确立了法国人对待新世界问题的独特做法。他最后一次航行的目的，是要在他所讴歌的这块大陆周围发现一条海路。他没有得到成功，但是他为雅克·卡蒂埃和弗朗西斯一世指挥下的法国扩张活动铺平了道路。当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对亚历山大六世的著名通谕作出解释，认为该通谕仅适用于已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发现的领地，从而法国就可以放手进行发现活动，而不致冒犯弗朗西斯难以担当的教皇禁令。所以，卡蒂埃在1534年和1535年的两次航行都是国王钦定的航行，是奉法国国王的命令并以其名义进行的。他奉命寻找一些谣传有大量黄金的岛屿和土地，并要发现直达中国国土的海峡。他的首次航行勘探了纽芬兰，接着前往拉布拉多，后在加斯佩盆地登岸，为法国占据了该地。他在1535年第二次探险时证明圣劳伦斯是一条河流，而不是海峡，他溯圣劳伦斯河而上，到达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并在该地困苦地过了一个冬天。在他结束两次航行的壮举后，接着就提出了明确的移民计划。卡蒂埃的两次航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没有引起注意，但他的计划描述了圣劳伦斯河的下游流域土地肥沃，从而形成了一种国际法概念，这种概念保护法国移民区不被西班牙侵占。弗朗西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学说：构成对海外领地的所有权的条件不是发现，而是占领和移民。实行这个准则带来的结果，是已有移民居住的土地被确认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财产，同时1545年的克莱斯宾—莱诺瓦条约禁止法国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或巴西。但法国仍在加拿大和南美继续努力；1555年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建立了科利尼

堡，1562年让·里博又开始一系列的努力，试图在佛罗里达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

法国重视殖民而不是探险和贸易，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甚至比在南美更加显著。但是，加拿大盛产毛皮，不久事实表明，毛皮可以通过贸易向印第安人购得，因此法国重视的殖民事业被打乱了。在卡蒂埃的航行以后，接着发出关于殖民的特许状，以罗贝伐尔担任总督和军事长官，其使命是使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并探寻通往西印度群岛的航线；卡蒂埃旋又奉命做1541—1542年的一次航行；建立了查理堡王家殖民地，有数百名男女移民前往，最后显然归于失败。但是卡蒂埃的《航行纪略》却使加拿大的美景永远吸引着法国人，当法国克服了国内的纷乱以后有力量再度向海外领地进行建设性的开拓的时候，加拿大是它心目中最重要目标。

到了此时（亨利四世和絮利手中权力的巩固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外交惯例已进一步扩大，从而允许法国和其他大国自由行动。因为，早在卡托—康布雷奇条约中就已商定“在本初子午线以西和北回归线以南……一方对另一方所施加的暴力将不被认为触犯本条约”。“界线之外不存在和平”的这种概念，在1598年重被载入弗尔汶条约，这种概念允许冒险家们在不扰乱欧洲和平的情况下任意进行掠夺、攻击或移民。因此，西班牙承认亨利四世对法国王位享有权利，也就附带地默认了他有权向海外进行移民或贸易。此外，这时法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受到一套连贯的经济理论的支配，在这套经济理论中，这个富有的大国的自给自足成为中心主题，而有必要保持这种自然富源所赋予的经济独立则成为其主要目的。

尽管纽芬兰和加拿大吸引了它的极大的注意力，但法国由于自己的独特情况，仍以东印度贸易和通过地中海东部诸国前往东印度的航线为重点，因为东印度贸易是它所向往的奢侈品的来源，而通过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航线则与法国贸易和外交的历史及实践相符合。1602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04年，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续订的条约答应重新活跃马赛的商业，当时也有人谈论开凿某种运河以便连接红海与地中海。但是通过这几条路线的东印度贸易并没有繁荣起来。由于阿尔及利亚海盗重新猖獗和法国人缺乏经验，结果这条航线无法和好望角航线相竞争，因为后一条航线是在荷兰和英国与葡萄牙竞争下发

展起来的。直到科尔贝尔在17世纪后半叶借鉴荷兰的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以后，法国繁荣东印度贸易的希望才如愿以偿。

在对待东印度贸易的问题上，絮利代表了法国人十分普遍的态度。当时更注重理论的经济学家，以巴泰勒米·德·拉费马，商业委员会中的讨论和蒙克莱田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作为代表，都不十分热衷于由地中海东部诸国至东印度的贸易。他们认为加拿大和北美保证能够维持发展航运业和渔业（鳕鱼和鲱鱼）；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新法兰西；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可以皈依基督教；在那里法国的制成品可以销售而法国所需要的原料也可以坐地生产；在那里刚毅不屈的法兰西民族可以安家落户。在这幅图画中，还要提到地理学权威萨米埃尔·德·尚普兰，他在1603年上溯圣劳伦斯河的航行以及在1604年的第二次航行；此外还有：开始在阿卡迪亚建立法国移民区，1608年给德蒙和加拿大公司颁发特许状，同年尚普兰建立了魁北克。从此以后，法国对圣劳伦斯河下游的占领虽然不稳，但却是长期性的了。

同一时期，荷兰却坐收对新世界贸易中的利益，而并不需要积极参加东方或西方的航行和贸易。荷兰人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宗教纠纷和他们对西班牙的长期斗争。凭借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他们在经商方面的聪明才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和他们的重要城市安特卫普变成东方香料的转运港，同时又是美洲财富的交易所。北海的鲱鱼贸易又使他们在和葡萄牙及地中海的商业来往中利市百倍，而他们和波罗的海诸国在木材、亚麻、焦油和毛皮方面的贸易则使他们成为西欧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

荷兰的天然出海口是在北方而不在西方或东方。荷兰最初试图在欧洲和海外领地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所采取的方式是设法从东北方向打开一条前往印度的通道，而不是到大西洋和印度洋去争夺地盘。即便如此，人们通常都认为直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把葡萄牙并入西班牙王国，并把伊比利亚半岛的港口对新教徒和反叛者实行封锁以后，才有必要做出这种努力。在此以前，荷兰可以自由地取得东方的香料并获得利润，而安特卫普的大部分财富和荷兰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大部分贸易都要依靠它和里斯本的香料贸易。荷兰人的探险活动把他们引向北方和西方，而不是南方和东方。1584年，荷兰人初次访问新地岛。1594年，派遣由4艘船舰组成的探险队前往北极。我们需要做出很多特殊辩解才能使人相信荷兰的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知道由印

度洋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的详细情况，并且在菲利普实施禁运令以前曾在葡萄牙人的领航下走过这条航线（正如他们曾经横渡大西洋到达巴西和西印度群岛那样）；但是他们在禁运令发布后为什么要改变策略并且敢于反抗西班牙当局，进行明目张胆的断断的航行，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其原因是印度洋上的航行不但十分困难而且非常危险。[\[4\]](#)

不管怎样，1594年装备好由4艘航船组成的船队扬帆出海驶往爪哇，1597年归来，这件大事被普遍认为是标志着荷兰对海外贸易方针的一大转变。这次航行实际上是荷兰人长期细心地搜集资料的结果。它特别依靠扬·胡根·范·林索登所积累的丰富知识。林索登在果阿曾为葡萄牙大主教工作好几年，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他的《客中记事》和《旅途见闻》，对世界的地理状况做了概述，并且记录了他前往印度和美洲的航程中所得到的知识，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出自水手和商人的道听途说。1594年，科内利斯·德·胡特曼在里斯本居住多年后回到阿姆斯特丹。他在里斯本获得了关于葡萄牙的东印度贸易，它的发展前景以及葡萄牙人正遇到的困难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在阿姆斯特丹当时已经具备相当重要的知识，关于葡萄牙严守秘密的航线图已在荷兰印行和出售（人们颇有兴味地看到这一事实：海外贸易和航行必须广开门路这一必要的特点似乎一开始就集中在荷兰；迟至17世纪中叶还有法国的领航员使用荷兰出版的航路图在圣劳伦斯河上航行）。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财团1594年资助胡特曼做了一次航行。这次航行的安全和比较成功的结局推动了一系列类似的航行，来自荷兰的14个船队在此后5年内不断地往返。

这些航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荷兰民间集资兴办的公司的事业心和热情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私人资本举办的。这些航行在欧洲市场掀起了新的价格危机和新的投机狂热，带来了新的、有竞争力的、削价抛售的香料产地，也引起了一种新的要求组织、控制和垄断的愿望。结果各地方商行联合为“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独家经营荷兰的香料贸易，联合资金共6424588弗罗林，联省议会又给增加了25000弗罗林。

荷兰东印度公司给印度尼西亚人带来一种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荷兰人下定决心要取得一种宗主权，作为把其他的欧洲竞争者排挤出产地的一种手段；并决心利用这种宗主权来强制香料的生产，这

是他们对欧洲市场的组织严密的控制所要求的。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荷兰以这种方式介入东印度的贸易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随着它的介入产生了对海外贸易的新的有目的的交易方法，同时也因为它的介入与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恰好同时，因此在欧洲信奉新教的海运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进行新世界的贸易和航行的角逐。

[1] 原文70作50，显然印误。——译者

[2] 依原表，1590年似应为1591年。——译者

[3] 1588年，西班牙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结果全军覆没。——译者

[4] 这一观点是B. H. M. 弗列克在《努桑塔拉——东印度群岛的历史》中提出的（第90—104页）。J. S. 弗尼瓦尔在《荷属印度》中概述了一种更加正统的观点（第20—21页）。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achen, 亚琛, 258

Abelard, Peter, 阿贝拉尔, 彼得, 2, 4

Aberdeen, University of, 阿伯丁大学, 它的创办, 111

Abrevanel, 阿布勒凡纳, 在西班牙供应军需品的犹太人承包商,
337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加泰罗尼亚在阿比西尼亚的贸易据点, 318

欧洲人到阿比西尼亚旅行, 422, 423

发现祭司王约翰就是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 421

Aeciaiuoli family, 阿奇亚约里家族, 雅典公国统治者, 395

Achillini, Alessandro, 阿基利尼, 亚历山德罗, 人文主义哲学家,
101

Acton, Lord, 阿克顿勋爵, xiii, xiv, xix, xx, xxx

Adana (Cilicia), 阿达纳 (吉里吉亚), 在麦木鲁克与奥斯曼
土耳其人的战争中, 400, 401

Adda, 阿达河, 32, 217, 360

Adelphus, Johann, 阿德福斯, 约翰, 德国人文主义者, 188

Aden, 亚丁, 葡萄牙人侵占计划失败, 427

Adrian Florents, of Utrecht (later Pope Adrian VI) 乌得勒
支的阿德里安·弗洛伦茨 (后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

在卢万大学, 113

给查理大公当导师，251

出使西班牙（1515年），253

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地的宗教裁判官，337

Adrianople, 阿德里安堡，408

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1361年），32

1453年以前的奥斯曼首都，395

Adriatic coast, 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奥斯曼人占据该地，395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威尼斯与那不勒斯的竞争，348

Aegean Islands, 爱琴海岛屿，奥斯曼人的占领，395

Aemilius Paulus, 埃米利·保罗，庄严的洛伦佐重新演出了“埃米利·保罗的胜利”，147

Aeschylus, 埃斯基罗斯，114

Afiun Karahisar (Anatolia), 阿菲翁卡拉希萨尔（安纳托利亚），414

萨法威人叛乱（1511年），406

Afonso V (the African), 阿方索五世（非洲人），葡萄牙国王，339, 421

侵略卡斯蒂利亚（1474年），325

划分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领地，340

征讨摩洛哥，422, 423

Afonso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阿方索，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女儿伊萨贝拉结婚，339

Africa, 非洲

与欧洲的商队贸易，47

葡萄牙人的航行和殖民，49, 420—5, 427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分割西北部，421

对西印度群岛进行奴隶贸易，434，457

Africa, North, 北非

加泰罗尼亚的贸易据点，318

希门尼斯与贸易的复兴，319—320

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分割北非（1494年），340

天主教徒费迪南德的远征和卡斯蒂利亚的行政管理，340

Agnadello, battle of, 阿尼亚德洛战役（1509年），360，363，366

Agricola, 阿格里科拉，见Husmann, Rudolf

Agriculture, 农业，20—37各处

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的扩大和收缩，20—21，25，35

西属美洲的土著农业，439

海外企业对英国农业的影响，465

Ahmed, 艾哈迈德，苏丹巴耶济德之子率兵讨伐萨法威叛乱分子（1511年），406

与谢里姆争权和内战，406—411；死亡（1512年），411

Ahmed Pasha, 艾哈迈德帕夏，安纳托利亚总督，与麦木鲁克人作战，400

Aintab (Syria), 艾因塔布（叙利亚），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415

Aire, 埃尔，实行法兰西—勃艮第共管（1493年），242

Akkerman (Moldavia), 阿克曼（摩尔多瓦），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1484年），375，376，399

Ak Koyunlii, 阿克科雍鲁（白牧羊人），土库曼部族，396，405，406

Akshehir (Anatolia), 阿克谢希尔 (安纳托利亚), 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 411, 414

Ala ad-Daula, 阿拉杜拉, 阿尔比斯坦国君, 413

穆罕默德二世在阿尔比斯坦拥立他, 400

他背弃与麦木鲁克的联盟, 401

被萨法威人打败, 406

在奥斯曼—波斯战争中, 411败北和阵亡 (1515年), 412, 413

Ala ad-Din, 阿拉丁, 奥斯曼王子艾哈迈德之子, 被谢里姆处死, 410

Alba, Fadrique de Toledo, 2nd duke of, 阿尔瓦第二代公爵, 托莱多的法德里克, 329

侵略纳瓦尔 (1512年), 328

Alba,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3rd duke of, 阿尔瓦第三代公爵, 托莱多的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 他在尼德兰的统治, 462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人占领的结果, 33

屈服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 395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2, 403

Alberico, Filippo, 阿尔贝里科, 菲利波, 在英国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07

Albert II, 阿尔伯特二世, 皇帝,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221, 371

Alberti, Leon Battista, 阿尔贝蒂, 莱翁·巴蒂斯塔, 意大利建筑家, 131

他重新解释古典建筑法式, 128

对艺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50—151

他的《建筑十论》，160

Albertini, Francesco, 阿尔贝蒂尼，弗朗切斯科，他研究古代文物的作品，99

Albistan, 阿尔比斯坦，麦木鲁克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间的争议，396, 399, 400, 413, 414

参见 ‘Ala ad-Daula, Shahsu waro-ghlu ‘Ali

Albret, Charlotted’，阿尔夫雷特，查洛特·德，与切萨雷·博尔贾结婚，356

Albret, Jean de, 阿尔夫雷特，让·德，见Jean (d’ Albret)

Albuquerque, Afonso de, 阿尔布克尔克，阿丰索·德，葡萄牙驻印度总督，427, 448

Alcala de Henares, University of,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122, 123, 125

对《圣经》的研究，124

Alcacovas, Treaty of, 阿尔卡索瓦斯条约（1489年），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对新发现领土的瓜分，340, 424, 431

Aldus, 阿尔杜斯，见Manutius, Aldus

Aleandro, Girolamo, 阿莱安德罗，吉罗拉莫，红衣主教，104, 106, 119, 257

Aled, Tudur, 阿莱德，屠杜尔，他的警句诗，192

Aleman, Melchior, 阿莱曼，梅尔乔，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的宫廷画家，168

Alemshah Begum, 阿勒姆沙·贝吉姆，舍赫·哈伊达尔的妻子，波斯国王沙易司马仪的母亲，405

Alenssn, Marguerite de Valois, 阿朗松，瓦卢瓦的玛格丽特，女公爵；与克莱芒·马罗，183

Aleppo, 阿勒颇，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415, 416

Ales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路易十二入侵时沦陷于法军手中,
357

Alessio, 阿列西奥, 威尼斯割让给奥斯曼土耳其人 (1506年),
404

Alexander VI, pope (Rodrigo Borgia), 亚历山大六世, 教皇
(罗德里戈·博尔贾), 125, 297

个性, 77, 78, 83

与萨沃纳罗拉, 78—79, 354

划分新世界 (“亚历山大通谕”), 79, 332, 430—431

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关系, 80; 监禁杰姆, 265, 398

与路易十一的关系, 80

与公会议运动, 82, 302, 350

令人画出一些神话即历史论的壁画, 141—142

延聘意大利美术家到西班牙, 169; 与法国侵犯意大利, 200;
威尼斯同盟 (1495年), 332, 341, 353; 支持那不勒斯反对查理八世
(1494年), 350—351; 允许法军过境, 352; 鼓励路易十二的侵略
(1499年), 355—356; 从路易十二侵略得到的利益, 358—359

对西班牙的好感, 332, 340

改革西班牙的修士制度, 333

在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 335

逝世 (1503年), 359

与把条顿骑士团首领职位转让给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的问题,
379

与匈牙利和威尼斯结盟反对奥斯曼土耳其, 403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立陶宛大公, 波兰国王, 222

企图把他和罗马的结盟强加给他的东正教臣民, 对俄罗斯的战
争, 369, 376—377

与条顿骑士团，378—379

Alexander, 亚历山大，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私生子，13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亚弗罗迪西亚斯的亚历山大，101

Alexander of Villedieu, 维尔德的亚历山大，所编的教科书使用到16世纪，96

Alexandria, 亚历山大，46，267

Alfonso II, 阿方索二世，那不勒斯国王，他的领土野心，348

对米兰的威胁引起法国干涉，350

亚历山大六世承认他为国王，351

王位让给费兰蒂诺，352

参见Italy（法国入侵各条）

Alfonso V（the Magnanimous），阿方索五世（宽宏的），阿拉贡和西西里国王，319，321

在遗嘱中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分开，341

在那不勒斯的统治，347

Alfonso X（the Learned），阿方索十世（智者），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国王，建立“王国牧民荣誉会”，29

Alfonso, 阿方索，卡斯蒂利亚的王子，约翰二世的儿子，320

Algiers, 阿尔及尔，319

归卡斯蒂利亚所有，340

阿尔及尔的海盗，467

Ali, 阿里，先知的女婿，404

Ali Pasha, 阿里帕夏，奥斯曼军队司令（后为首相），400—401

死于镇压萨法威叛乱的战事，406，408，409

与艾哈迈德及谢里姆两人之间的争权，407，409

Aljubarrota, battle of, 阿尔儒巴罗塔战役（1385年），325

Alkmaar, 阿尔克马尔（荷兰），1492年起义，240

Allegri, Antonio, 阿莱格里，安东尼奥；见Correggio

Allenby, Lord, 艾伦比勋爵，xxiv—xxv

Almain, Jacques, 阿尔曼，雅克，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宣传家，303—304

Almeida, Francisco, de, 阿尔梅达，弗朗西斯科·德，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427，448

大西洋航行计划，424

Alost (Flanders), 阿洛斯特（佛兰德）；对1515年“运输税”的估计，255

Alpine Passes, 阿尔卑斯山山口，瑞士对山口的控制，207

Alsace, 阿尔萨斯，205

Altdorfer, Albrecht, 阿尔特多菲尔，阿尔布雷希特，德国画家，他的《圣乔治和龙》，和纯粹的风景画，163

Alvarado, Pedro de, 阿尔瓦拉多，佩德罗·德，443

Alviano, Bartolomeo d' , 阿尔维亚诺，巴尔托洛梅奥·德，对神圣同盟作战中的威尼斯军官，363，366

Amadeo, Giovanni Antonio, 阿马代奥，乔瓦尼·安东尼奥，135

Amalfi, 阿马尔菲，该地的衰落，47

Amaseo, Romolo, 阿马西奥，罗莫洛，在帕多瓦的人文主义教学，96

Amasia (Anatolia), 阿马西亚（安纳托利亚），396，410，412

Amastris (Anatolia), 阿马斯特里斯（安纳托利亚），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1461年），395

Amazon, river, 亚马孙河，可能为平松所发现，428，435

Amboise family, 昂布瓦兹家族, 305

Amboise, Georges d' , 昂布瓦兹, 乔治·德, 红衣主教, 鲁昂大主教, 13, 210

操纵法国政策, 293—294

个人野心和法国教会改革, 302—303

与教会改革, 307

当教皇的野心, 355, 359

支持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野心, 355—356

与康布雷同盟, 360

Amerbach family, 阿莫巴赫家族, 出版家, 115, 117

America, 美洲亚历山大六世划分新世界, 79, 332, 424, 429—430, 430—431, 455

葡萄牙人去巴西的航行, 424—429; 又见Brazil

America (North), 北美洲

法国和英国的移民地, 465—467

寻找西北方的通道, 466

法国向加拿大殖民, 466; 加拿大成为“新法兰西”, 467

America (Spanish), 西属美洲

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 3, 420, 424, 430—434

西班牙人的行政管理, 323—324, 338; 国王对教会的控制, 332—333; 建立宗教裁判所, 337; 维护国王的控制, 437—438, 443—444; 支付费用, 450—451

动力是殖民而不是贸易, 431—432, 449

第一批移民的困难和印第安人劳力的使用, 432, 434, 456—457

对印第安人的待遇，433—434，435；布尔戈斯法（1512年），

指控和召回哥伦布，433—434

伊斯帕尼奥拉移民政府的开始，434—435

向牙买加和古巴移民，435

委内瑞拉沿海和达里安湾的探险，436；巴尔沃亚和征服中美洲，436—437

大陆土著居民的文化和经济，438—439；宗教和政治组织，439

地峡地区的移民点（卡斯蒂利亚德奥罗），439

科尔特斯与征服墨西哥，439—443；作为见证人的叙述，440；征服者胜利的心理和原因，440，442—443；科尔特斯对墨西哥的统治，443

金银的输出，450—452

以岁收为抵押向福格家族借款，451

奴隶贸易，457—458

加勒比海上的法国私掠船，457—458

对西班牙权益的挑战，457—458

又见Expansion (Overseas)，对欧洲的影响

Amiguet, Jeronimo, 阿米盖特，赫洛尼莫，人文主义和阿拉贡的新学术，125

Ammonio, Andrea, 阿莫尼奥，安德烈亚，亨利八世的拉丁文秘书，110

Amour Courtois, 《多情的宫廷》，59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45，445

与渔业贸易，41

与荷属东印度贸易，469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穆罕默德二世治下奥斯曼的进展, 396

萨法威的进展, 405

艾哈迈德和巴耶济德之间的内战, 409

谢里姆屠杀十叶派信徒, 411

Ancona, Ciriaco d' , 丹科纳, 奇里亚科·德, 在碑铭学方面的工作, 99

Andre, Bernard, 安德烈, 贝尔纳, 亨利七世的宫廷诗人, 107

Andrelini, Fausto, 安德烈利尼, 福斯托, 在巴黎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04

Anghiera, Pietro Martire d' , 丹吉拉, 彼得罗·马尔蒂雷

《新世界几十年》, 121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拉丁文秘书, 122

Ango, Jean, 安戈, 让, 装备法国私掠船, 458

Angola, 安哥拉, 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探险, 423

Angra Pequena (W.Africa), 小安格拉(西非), 423

Anjediva (Goa), 安杰迪瓦(果阿), 葡萄牙在该地的要塞, 427

Anjou, house of, 安茹, 公国, 路易十二赐给阿拉贡的费德里戈, 358

Anjou, 安茹王室, 9, 10, 343

对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土要求, 295—296, 347, 348

在匈牙利, 371

Anjou, Renè, 安茹公爵, 雷内, 与安茹对那不勒斯的要求, 347, 350

Ankara, 安卡拉, 412

Anne de Beaujeu, 博热的安妮, 波旁女公爵, 350

查理八世的摄政, 233

与布列塔尼的继承权, 238, 262

性格, 292

Anne (de Candalle), 安妮(坎戴勒的),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后, 瓦迪斯瓦夫二世之妻, 378

Anne (of Hungary and Bohemia), 安妮(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 皇后, 斐迪南一世之妻, 222, 378, 379, 392

Anne, 安妮, 法国王后, 布列塔尼女公爵, 对勒梅尔·德·贝尔热的保护, 189

与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通过代表), 200, 238, 295; 与查理八世结婚, 299, 295; 与路易十二结婚, 356

Anthony, 安东尼, 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的私生子(大杂种), 232

投靠路易十一, 227

‘Antilla’, “安蒂利亚”, 想象中的南大西洋上的地方, 431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西班牙移民地, 434—435

哥伦布的发现, 430

Antioch, 安条克, 46 Antiquario, Jacopo, 安蒂夸里奥, 雅各布,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97

Antiquity, study of, 古代研究对政治思想和历史学的影响, 71—72; 对政治行动的影响, 97

作为文艺复兴时代仪式的规范, 147—148; 又见Archaeology, Epigraphy, Humanism

Antivari (Albania); 安蒂瓦里(阿尔巴尼亚), 为威尼斯占据, 402

Antwerp, 安特卫普, 203, 246, 247, 318

代替布鲁日成为贸易中心, 40

与阿拉斯和约（1482年）, 232; 马克西米连处决签约全权代表, 233

在内战中支持马克西米连, 234

出面反对1488年“同盟”, 237

与葡萄牙殖民贸易, 448—449, 453, 464

作为财政中心, 451, 453, 460, 461

与波罗的海贸易, 456

“英国中心市场商行”迁离, 462

在荷兰海外扩张中的地位, 468

Anwykyl, John, 安卫基尔, 约翰, 牛津大学莫德琳学院院长,
107

Apollo, Horus, 阿波罗, 贺鲁斯, 《象形文字》, 161

Appenzell, 阿彭策尔, 瑞士的州（1513年）, 206

Appian, 阿庇安, 148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 拉斐尔在法尔内西纳别墅的组画, 146

Arabia, 阿拉伯, 葡萄牙与该地的贸易, 448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语

在人文主义的意大利对阿拉伯语的研究, 102

在西班牙禁止使用（1660年）, 324

Arabs, 阿拉伯人

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 416, 417

在奥斯曼治理下, 417

对东方贸易的干涉, 447

Aragon, 阿拉贡, 6

王室世系, 9

与地中海贸易, 48

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较晚, 125

人口, 319

羊毛贸易, 318, 319

农产品, 319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约中, 322

历任总督, 323

抵制成立宗教裁判所, 336

与卡斯蒂利亚划分西北非, 421

又见Catalonia; Valencia; Spain

Aragon, house of, 阿拉贡王室, 9

与意大利的牧业经济, 31

与15世纪的那不勒斯王国, 348

Aragon, Alfonso de, 阿拉贡, 阿方索·德, 萨拉戈萨大主教, 阿拉贡总督, 323

Aragonese, 阿拉贡人, 被排斥在意大利行政部门之外, 325

Aramaic, 阿拉米语, 在阿尔卡拉对阿拉米语的研究, 124

Arbues, Pedro de, 阿韦斯, 佩德罗·德, 宗教裁判官, 在萨拉戈萨被害, 336

Archaeology, 考古学, 在人文主义的意大利, 99

罗马科学院, 96

对建筑的影响, 130—131

在艺术中的反映, 147—148

Arctic Ocean, 北冰洋, 1594年荷兰的探险, 468

Ardabil (Azerbaijan), 阿达比勒(阿塞拜疆)

萨法威亚的发祥地, 404

Ardennes forest of, 阿登森林, 中世纪的铁工厂, 38

Aretino, Francesco, 阿雷蒂诺, 弗朗切斯科, 106

提香所作肖像, 149

Aretino, Pietro, 阿雷蒂诺, 彼得罗, 178

他的喜剧, 176—177

Arguim (North-west Africa), 阿尔古因, 葡萄牙在该地的要塞, 422

Argyropoulos, Johannes, 阿尔吉罗普洛斯, 约翰内斯, 在意大利的希腊流亡学者, 145, 119

Ariosto, Iodovico, 阿廖斯托, 洛多维科, 意大利诗人, 145, 348

《讽刺集》和《疯狂的罗兰》, 98, 173—174

戏剧作品, 176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58, 96, 113, 123, 124, 307

15世纪后期对宗教的解释, 74

在帕多瓦和波洛尼亚对他的研究, 100

勒费弗尔·戴塔普对他的解释, 105

贝尔加拉的译文, 124

Armies, 军队

常备军, 在法国的发展, 7

职业化的军队占优势, 10, 261

使用雇佣军队和在战争中缺乏民族团结, 262; 为使用雇佣军队辩解, 280

重步兵的优越性，283

国家管理瑞士雇佣兵的服役，263，279

在意大利组织军队的困难，275—278，279—280

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组织军队，278—281

马基雅弗利论意大利军队，279—280

辅助人员和伙食，280

轻骑兵的发展，286

法国入侵对意大利军队的领导，365—366；意大利雇佣兵首领的性质，366

鞑靼人的袭击和哥萨克的组织，393

Armour，甲冑，283—284

Arpad，house of，阿尔帕德王室，匈牙利的，370 Arras，阿拉斯，244

作为制造业中心，42

在法国入侵中（1477年），229

反法起义（1492年），241

Arras，Peace of，阿拉斯和约（1482年），231，241，243，294

布鲁日和约（1488年）恢复了阿拉斯和约，237

蒙蒂尔斯—列兹—图尔条约（1489年）取而代之，238

为查理八世所破坏（1491年），241

为森里斯条约（1493年）所重申，242

Arras，treaty of，阿拉斯条约（1435年），232

Arslan Beg，阿尔斯兰贝伊，阿尔比斯坦君主，399

Arsson，Jone，阿尔逊，约翰，霍拉的主教，在冰岛引进印刷术，191

Arthur, 阿瑟, 威尔士亲王, 亨利七世之子, 和阿拉贡公主凯瑟琳结婚, 341

Arthurian legend, 亚瑟王的传说

在历史编纂学中依然作为史实, 54, 56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中, 172, 180

Artillery, 炮兵

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282—283, 284

船载的, 287—288

人道主义的和宗教方面的异议, 289—290

在侵犯意大利中的重要性, 365—366

奥斯曼对炮兵的使用, 417; 在查尔迪兰战役(1514年)中, 411, 413

Artois, 阿图瓦

1477年遭受路易十一蹂躏, 226, 229

为查理八世所扣押的奥地利玛格丽特陪嫁领地, 231, 240, 241, 294; 根据森里斯和约(1493年)归还, 242, 296, 351

在阿拉斯和约(1482年)中, 232

对勃艮第的忠诚和1492年叛乱, 241

菲利普大公爵承认法国宗主权, 244; 查理大公爵承认法国宗主权, 253

Arts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 又见Literature (vernacular), 及各艺术家和作家姓名条

文艺的保护人, 16—17, 70—71, 77, 146—147, 152, 153; 事无巨细都由保护人掌握, 144—145; 艺术家和保护人关系的变化, 152—153; 朱理亚二世和米开朗琪罗, 153

文艺理论, 148, 150—151; 人作为人造建筑物的规范(人体测量学), 5, 129, 131; 诗歌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151

艺术和文学中的阿卡迪亚式乌托邦，149，150

浪漫主义，150

艺术家的社会地位，151—152；学徒，152；由工匠发展为艺术家，152

意大利的建筑，2；对古代建筑再生论的批判，127—129；非古典主义的古代表现方式，128；拜占庭式穹顶的采用，128—129；人体测量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129，134；维特鲁威和遵循古传统，129—131，132；正中式建筑的教堂体现宇宙的秩序，130；对古代研究的利用，130—131；布鲁内莱斯基与佛罗伦萨学派，131；各地区的差异，131；文化优势转移到罗马，131；布拉曼特的影响，131；民族特色的出现，131—132；别墅的古典主义渊源，132；对中世纪城市模式的重视，132—133；和谐风格不久便解体，133

建筑物，在意大利：洗礼所（帕尔马），128；布拉曼特在维杰瓦诺和罗马的工作，132；交易所（佩鲁贾），148；高等法院（罗马），131；斯福尔扎城堡（米兰），344；隐修院（帕维亚），131，135，344；多莫教堂（米兰），344；圣比亚焦圣母教堂（蒙特普尔齐亚诺）127；斯特卡塔圣母教堂（帕尔马），1，30；美第奇小教堂（佛罗伦萨），134；米兰大教堂，160；卡普里尼宫（拉斐尔府邸，罗马），131；科诺—斯皮内利府邸（威尼斯），128；迪亚曼蒂府邸（佛罗伦萨），128；吉罗府邸（罗马），131；贡迪府邸（佛罗伦萨），128；曼佐尼—安加兰府邸（威尼斯），128；皮科洛米尼府邸（锡耶纳），128；卢切莱府邸（佛罗伦萨），128，160；斯特罗府邸（佛罗伦萨），128，131，132；泰府邸（曼图亚），132；韦基奥宫（佛罗伦萨），136，141；维多尼—卡法雷里宫（马罗），131；圣安农齐亚塔广场（佛罗伦萨），133，138；波焦阿卡亚诺别墅（佛罗伦萨），132；圣安东尼教堂（帕多瓦），135，147；圣阿戈斯蒂诺教堂（罗马），147；圣安德列亚教堂（曼图亚），128；圣十字教堂（米兰），129；圣埃利焦·德利·奥雷菲奇教堂（罗马），130；圣弗朗切斯科教堂（弗拉拉），128；圣乔万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威尼斯），128；圣洛伦佐教堂（佛罗伦萨），128，133；安杰利圣玛利亚教堂（佛罗伦萨），130；卡尔切里圣玛利亚教堂（普拉托），130；孔索拉齐奥内圣玛利亚教堂（托迪），127，130；十字架圣玛利亚教

堂（克雷马），128；托钵修会教堂（威尼斯），139；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隐修院（米兰），128；新圣玛利亚教堂（佛罗伦萨），129，137；大众圣玛利亚教堂（罗马），135，147；圣马可教堂（威尼斯），128；圣马可广场（威尼斯），138；圣保罗女修道院（帕尔马），146；圣彼得教堂（罗马），127，128，129，130，134，136；圣彼得罗尼奥教堂（波洛尼亚），160；圣西斯托教堂（皮亚琴察），128；圣萨尔瓦托雷教堂（威尼斯），129；圣马可学院（威尼斯），131；斯福尔扎医院（米兰），344；西斯廷教堂（罗马），139—141；梵蒂冈，128，133，139—141，142—144；法尔内西纳别墅（罗马），132，146—147；帝国别墅（佩扎罗附近），132；马达马别墅（罗马附近），132；美第奇别墅（菲耶索莱），149

意大利的雕刻：古典的形式、基督教的内容，133—134；墓葬艺术作为信仰的尺度，133—134；米开朗琪罗设计的朱理亚二世墓，134；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134；米开朗琪罗，134—135；威尼斯的雕刻家，136；雕刻作为支持布尔卡特对文艺复兴论点的证据，135；与建筑的关系（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对比），135—136；公共场所的纪念雕像，136；以宗教主题为重点，136—137；青铜小雕像的出现及其意义，136；雕刻家的社会地位，152

意大利的绘画：“盛期文艺复兴”在风格上的复杂性，127；受古典主义的启发，133；以宗教主题作重点，137；主题的复杂性，137—138；宗教的象征主义，139—141；历史画，141—144；古典神话传统的继续性，144；寓言和神话，144—148；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145—146；以古代为范本，147—148；“异教”色彩，147—148；提香和肖像画，143—149；忠实于考古事实，148；在15世纪勃艮第宫廷风格中的反映，148；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对比，150；解剖学与裸体画，150—151

Arts of the Renaissance (in Northern Europe)，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北欧的），又见Literature (vernacular) 及艺术家和作家姓名的各条对艺术的保护，在勃艮第宫廷，61，62；福格家族，161

艺术理论，丢勒和意大利的理论，154，155；丢勒论宗教艺术，158

公元1500年前的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对比，159—160

哥特式传统山穷水尽，162

印刷术和宗教神像，163

马丁·路德的著作对艺术的影响，164—165

西吉斯孟与意大利联姻在波兰造成的影响，380—381

北欧的建筑，6；勃艮第宫廷风格在佛兰德的反映，62；哥特式传统在德国和法国继续存在，160—161；弗朗西斯一世引进的意大利影响，160；哥特式风格和意大利风格的结合，160—161；达·芬奇的影响，160

北欧的建筑物：安纳教堂（安纳贝格），160；布卢瓦城堡，160；尚博尔城堡，160；科隆大教堂，160；福格家族的府邸（奥格斯堡），161；“舞厅”（巴塞尔），155；圣玛利亚教堂（哈雷），160；正义宫（马林），160—161；鲁昂大教堂，160；圣安娜教堂（奥格斯堡），161；塞巴尔杜斯教堂（纽伦堡），158—159；图尔大教堂，160；市政厅（巴塞尔），155；特鲁瓦大教堂，160；乌尔姆大教堂，160；玫瑰园中的圣母礼拜堂（布拉格），156；美丽的玛利亚教堂（雷根斯堡），161

北欧的雕刻：在莱茵河地区的大教堂内，2；在15世纪德意志，67；德意志继续保持哥特式传统，158；菲舍尔家族和意大利式情趣，158—159；哥特式传统和意大利传统的混合，158—159；纪念性雕刻中的文艺复兴式装饰，159；在法国哥特式风格和意大利风格的混合，159；尼德兰的雕刻，159—160；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陵墓设计，161—162；格吕内瓦尔德在伊森海姆所作祭坛画上的雕刻，164

北欧的绘画：佛兰芒画派，61—62；德意志15世纪的，67；意大利的影响，153—158；人文主义传统和哥特式传统的冲突，155—158；保护人的意大利化的情趣，156，158—159；1500年左右法国的绘画，158；“多瑙画派”和风景画，162—163

Arts of the Renaissance (in Spain)，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西班牙的）；又见Literature (Vernacular) 及艺术家和作家姓名各条

王室和其他方面的保护，165，168—169

摩尔人对工艺品装饰的影响, 165, 166

哥特式风格的持续, 166

伊萨贝拉式和银匠式建筑雕刻的发展, 166—167

意大利的影响, 167—169

文艺复兴式和穆德哈尔式的混合, 167—168

意大利艺术家的到来, 168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时期对艺术家的检查, 168

奥兰达的“群鹰”, 168

宫廷中的西班牙—佛兰德风格, 168—169

建筑物: 孔查府邸(萨拉曼卡), 167; 圣十字医院(托莱多), 167; 王子宫(瓜达拉哈拉), 167; 查理五世宫(格拉纳达), 168; 王家小教堂(格拉纳达), 167, 168; 王家朝圣行宫(圣地亚哥), 167; 萨拉曼卡大学, 167; 圣格雷戈里奥教堂(巴利阿多利德), 166; 圣胡安·德洛斯·雷伊斯修道院(托莱多), 166; 圣巴勃罗教堂(巴利阿多利德), 166; 圣托马斯教堂(阿维拉), 168; 西根萨大教堂, 167

Arts, native, in Spanish America, 西班牙美洲的本土艺术, 438—439

Asia, 亚洲

未能发现通往亚洲的西海路, 428—429, 430

麦哲伦的航行, 429—430

Asperen (Holland), 阿斯佩棱(荷兰), 256

Assisi, 阿西西, 16 Asti, 阿斯蒂, 356

Astrology, 占星术, 63, 147

在巴黎受到谴责, 103

Astronomy, 天文学

在意大利和德国再次兴起，68

雷乔蒙塔努斯编印马尼立乌斯的著作，118

Athens, 雅典，323

雅典公国为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服（1458—1460年），395

Auberino, Caio, 奥贝里诺，卡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剑桥，108

Augsburg, 奥格斯堡

文化和商业地位，17，155，156，158，161；银行业（又见Fugger），313；编年史，67

Augsburg, Reichstags of, 奥格斯堡议会（1500年），208—210；（1510年），215；（1518年），218

Austria, 奥地利

地理和经济，35

在帝国执政府中的代表权，208

马克西米连取得蒂罗尔，（1490年），199，203

马克西米连强化君主制行政机构，210；皇家政务会，皇家财务署和皇家法院，219—221；恢复地方长官的法院，220

Auxerre, 奥塞尔，包括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陪嫁领地内，294

Aventinus, 阿芬蒂努斯，见Turmair, Johann

Averroes, Aerroism, 阿威罗伊，阿威罗伊主义，111

与自然科学，2

在15世纪的帕多瓦和波洛尼亚，100，101

Avignon, 阿维尼翁，12

Avila, 阿维拉，168

Avila, Pedro Arias de, 阿维拉，佩德罗·阿里亚斯·德，他对达里安的治理以及他对巴尔沃亚的嫉妒，437，438

Avis, dynasty of, 阿维斯王朝, 葡萄牙的, 421, 445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被乌宗·哈桑所征服, 396

与“萨法威亚”的发展, 405

Azores, 亚速尔群岛, 430, 458

葡萄牙所有权得到承认(1470年) 340

葡萄牙殖民, 420, 421

Aztec empire, 阿兹特克帝国, 为西班牙人所推翻, 439

Badius, Jodocus, 巴迪乌斯, 约多库斯, 出版家, 18, 104

Baglioni, Giampaolo, 巴廖尼, 詹保罗, 把佩鲁贾交给朱理亚二世, 359

Bahamas, 巴哈马群岛, 430

西班牙人抢掠奴隶, 434

Bahia dos Vaqueros, 瓦奎洛斯湾, 为迪亚士所发现(1487年), 423

Baiburd (Anatolia), 巴伊布尔特(安纳托利亚), 包括在奥斯曼行省中, 412

Baif, Lazare de, 巴富, 拉扎尔·德, 法国人文主义者, 在意大利留学, 182

Bakocz, Thomas, 鲍科茨, 托马什, 匈牙利红衣大主教

与匈牙利农民起义(1514年), 388—389

与瓦迪斯瓦夫二世和阿拉贡的贝阿特丽克斯的婚姻, 377

Balbo, Girolamo, 巴尔博, 杰罗拉莫,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16

Balboa, Vasco Nunez de, 巴尔沃亚, 巴斯科·努涅斯, 德

与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移民地, 436—437

他的被陷害和被处决, 437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318

又见Mallorca

Balkan peninsula, 巴尔干半岛, 1500年前的地理和经济, 33—34

Balsac, Robert de, 巴尔萨克, 罗贝尔·德·昂特拉格城主, 他的《论君主与战争》, 276

Banbury, 班伯里中学, 106

Bandello, Matteo, 班代洛, 马泰奥, 意大利作家, 178

Banks, 银行, 银行业与罗马教廷, 93

路易十一影响佛罗伦萨银行家反对勃艮第宫廷, 228

银行的发展, 313—314

银行业家族: 邦维奇、卡波尼和加达尼, 313; 美第奇, 313, 346; 琴图廖内、格里马尔多洛梅利诺、萨尔瓦焦、韦尔瑟, 334; 又见Fugger

意大利银行资助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 314

1831—1833年危机和巴塞罗那的衰落, 319

美洲在贸易上的让步, 324

与十字军东征的经费, 334

马克西米连以蒂罗尔的岁收作抵押, 451

从新世界来的王室收入和金银作为信贷的基础, 451

安特卫普作为金融中心, 451, 453

格雷沙姆在西班牙的财政使命, 461

又见Expansion (overseas); Fugger

Baptist of Mantua, 曼图亚的浸礼教徒, 见Mantuan

Barbara, 巴尔巴拉, 波兰王后, 西吉斯孟一世之妻, 222

Barbara, 巴尔巴拉, 勃兰登堡侯爵阿尔伯特·阿奇勒斯之女, 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结婚(由人代理), 377

Barbarelli, Giorgio, 巴尔巴雷利, 乔治, 见Giorgione

Barbari, Jacopo di, 巴尔巴里, 雅各布·迪, 与丢勒, 154

Barbaro, Ermolao, 巴尔巴罗, 埃莫拉奥,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05

他的反西塞罗主义, 98

攻击经院哲学, 100—101

Barbavara, Marcolino, 巴尔巴瓦拉, 马尔科利诺, 米兰驻教廷使节, 267

Barbosa Arias, 巴尔沃萨, 阿里亚斯,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 与萨拉曼卡大学的希腊语研究, 123, 125

Barcdona, 巴塞罗那, 48, 318, 319

财政和商业的衰落, 319—320

被排挤在美洲贸易圈之外, 324

Barcelona, Treaty of, 巴塞罗那条约(1493年), 241, 296, 341, 351

Barclay, Alexander, 巴克利, 亚历山大, 改编和模仿布兰特和曼图安的作品, 189

Badetta, 巴列塔, 法国围困该地(1502—1503年), 358, 366

Bartolomea, Fra, 巴托洛米奥修士, 意大利画家, 137

Barzizza, Gasparino, 巴尔齐扎, 加斯帕里诺,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03

Basil IV, 瓦西里四世, 俄国沙皇, 369—370

侵犯立陶宛, 376

波兰战争, 379—380, 381

Basle, 巴塞尔, 124, 154, 155, 205

印刷业, 115

加入瑞士联邦, 206

Basle, Peace of, 巴塞尔和约（1499年）, 与对瑞士独立的默
认, 206

Basle, University of, 巴塞尔大学, 68, 119

Bastidas, Rodrigo de, 巴斯蒂塔斯, 罗德里戈·德, 对达里安
湾的探险, 436

Battagio, Giovanni di Domenico, 巴塔吉奥, 乔万尼·迪·多
梅尼科, 意大利建筑家, 128

Bavaria, Albert IV, 巴伐利亚公爵, 阿尔贝特四世, 206, 209

在1499年瑞士战争中, 206

Bavaria-Landshut, George ‘the Rich’,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
公爵, “富人”乔治, 与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 211

Bavaria-Landshut, Elizabeth of,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伊丽
莎白, 巴拉丁选侯鲁佩特之妻, 211

Bavaria-Munich, Albert and Wolfgang, 巴伐利亚—慕尼黑公
爵, 阿尔贝特和沃尔夫冈, 与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 211

Bay Islands (Garibbean Sea), 海湾群岛（加勒比海）, 西班
牙的奴隶掠夺, 439

Bayard, Pierre di Terrail, 贝亚尔骑士, 皮埃尔·迪·泰拉
伊, 表示对步兵轻视的引文, 285

骑士作风的典型, 288, 289

Bayezid I, 巴耶济德一世, 奥斯曼苏丹, 78, 269, 375, 407

付款给罗马教廷以监禁杰姆, 265

容忍西方商人, 265

与杰姆争继承权, 396—398

向东欧进攻，398—399，402

对埃及的几次战争，400—401

对威尼斯的战争，402—404

与萨法威亚的进展，406

内战与谢里姆的继位，408—410

逊位和去世（1512年），410

Bayonne，贝荣纳，43

Bazzi, Giovanni Antonio, 巴齐，乔万尼·安东尼奥，见Sodoma

Beatrice of Aragon, 阿拉贡的贝阿特丽克斯，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王后，马加什·科尔文的次妻，373

与瓦迪斯瓦夫二世结婚，377

Beauce，博斯，25

Beaufort, Lady Margaret, 博福特夫人，玛格丽特，里士满和德比女伯爵，110

Beaujeu family, 博热家族，292

安妮·德·博热，见Anne de Beaujeu

皮埃尔·德·波旁爵士，见Bourbon, Pierre, duke of

Beaune family, 博纳家族，314

Beham, Bartholomew and Hans, 贝哈姆弟兄，巴托罗缪和汉斯，版画家，163

Belalcazar, Sebastian de, 贝拉卡萨尔，塞瓦斯蒂安·德，444

Belbeis (Egypt), 贝勒贝斯（埃及），416

Belgioioso, Carlo di, 贝尔焦伊奥索伯爵，卡罗，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派往查理八世处的使节，266，268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396

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占领（1521年），392

包围战（1456年），395

Bellini, Gentile, 贝利尼，真蒂莱，他的绘画中反映了威尼斯居民生活，138

Bellini Giovanni, 贝利尼·乔万尼，意大利画家，150

所作圣母像，137

对丢勒的影响，156

Bellinzona, 贝林佐纳

路易十二割让给瑞士（1503年），206，263，361

1516年后为瑞士所保留，364

Bello, Francesco (il Cieco), 贝洛，弗朗切斯科（伊尔·切科），《曼布里亚诺》，173

Belvedere, 贝尔威德尔，威尼斯为奥斯曼土耳其所败（1499年），403

Bembo, Pietro, 本博，彼得罗，红衣主教，他的西塞罗主义，98

希腊文知识，99

对彼特拉克主义的反动，172

他的散文作品和本国语文学，177

Benin, 贝宁，与关于祭司王约翰的传说，423

Benjamin of Tudela, 本雅明，图德拉的，论君士坦丁堡，46

Bentivoglio family, 本蒂沃利奥家族，凭借法国在波洛尼亚复辟，361

Bentivoglio, Giovanni, 本蒂沃利奥，乔万尼

与波洛尼亚的治理，349

未能抗御法国入侵（1494年），351

被朱理亚二世赶走，359

Benveniste family, 本维尼斯特家族, 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
婚姻, 321

Bergamo, 贝加莫, 47

威尼斯的控制, 46

Bergen family, 贝尔根家族, 245

Bergen, Jan van, 贝尔根, 扬·范, 支持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好
战政策, 248—249; 与英国结盟, 250

Bergen-op-Zoom (Holland), 贝尔根奥佐姆 (荷兰), 244, 247

Berlin, 柏林, 44

Bermejo, 贝尔梅霍, 西班牙画家, 169

Bernard, St. 圣伯尔纳, 112

Berne, 伯尔尼, 187

瑞士的州, 204, 205

Berners, John Bouchier, lord, 伯纳斯, 约翰·鲍彻, 勋爵,
191

Berni, Francesco, 贝尔尼, 弗朗切斯科, 讽刺诗, 172

他改写《热恋的罗兰》, 173

Beroaldo, Filippo, 贝罗阿尔多, 菲利波,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96, 103

Berri, 贝里, 253

Berri, John, duke of, 贝里公爵, 约翰, 他对艺术的保护, 17

Berruguete, Alonso, 贝鲁格特, 阿隆索, 西班牙艺术家, 与文
艺复兴在西班牙的影响, 168

Berruguete, Pedro, 贝鲁格特, 佩德罗, 西班牙艺术家, 他对意
大利的访问, 169

Berthold of Mainz，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见 Mainz，archbishop of

Bertoldo，贝托尔多，意大利雕刻家，152

Bertrand，M (of Toulouse)，贝特朗（图卢兹的），法国教会自立派的宣传，303

Bessarion，Johannes (or Basilius)，贝萨里翁，约翰内斯（或巴西里乌斯），红衣主教，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论战，100

Bethune，贝顿，235

法国一勃艮第共管（1493年），242

贝顿的埃韦拉尔，96

Betti，Bernardo，贝蒂，贝尔纳多，见 Pinturicchio

Betto Bardi，Donato di，贝托·巴尔迪，多纳托·迪，见 Donatello

Beveren，Philip of，贝韦伦勋爵，菲利普

与为菲利普大公爵摄政，232

与1488年的“联盟”，236

与斯卢思私掠船，242

Bibbiena，Bernardo Dovizi，比宾纳，贝尔纳多·多维齐，红衣主教，他所作的《卡兰德里亚》，175

Bible，biblical studies，圣经，圣经的研究

伊拉斯谟和瓦拉的著作，18，114

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123，124

在德国对本地语言的版本表示担心，196

路德的译本和他以前的译本，188—189，196

勒费弗尔·戴塔普的著作，307—308

Bicocca, battle of, 比科卡战役（1522年），用炮兵决定胜负，284

Biçapur, 比贾伊普尔，苏丹，为阿尔布克尔克所废（1510年），427

Bilbao, 毕尔巴鄂

羊毛贸易，48，318

驱逐犹太人，337

Bisticci, Vespashano da, 比斯蒂齐，韦斯帕夏诺·达，他的传记著作，177

Biyikli Mehmed Pasha, 比伊克利·穆罕默德帕夏，奥斯曼总督，412，415

Black Death, 黑死病，52，66，319

Black sea, 黑海

卡泰罗尼亚人的贸易据点，318

奥斯曼的控制，395—396

Blanca, 布兰卡，纳瓦尔女王，阿拉贡王后，阿拉贡约翰二世之妻，321，327

Blaye, 布拉耶，哨塔和城防工事的发展，281—282

Blois, Treaties of, 布卢瓦条约（1504—1505年），210，213，326

Blondel, Lancelot, 布隆代尔，朗斯洛，佛兰德雕刻家，他在布鲁日的作品受意大利的影响，160

Bobadilla, Francisco de, 博瓦迪利亚，弗朗西斯科·德，取代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的职权，434

Boccaccio, Giovanni, 薄伽丘，乔万尼，意大利作家，2，3，58，71，125

《十日谭》，12；法文译本，182

在《异教诸神谱系》中对神话的处理，144
与皮斯托亚的《潘菲拉》，175
《科尔巴西奥》，179—180
Bodin, Jean, 博丹，让，法国政论作家，26，63
 他的铸币“质量论”，461
Boece, Hektor, 博伊斯，赫克脱，苏格兰诗人和人文主义者，111
Bohemia, 波希米亚，11，196
 君主政权的软弱性，8—9
 日尔曼人和捷克人的殖民，35—36
 胡斯战争的恶果，36
 矿业，39；矿工宿营地发展为德意志人的城镇，39
 哈布斯堡的利益，221—222
 乔治·波迪布拉德的继承问题，370—372
 瓦迪斯瓦夫二世的波希米亚，372
 宗教纷争，389，391
 贵族权势的增大，389—390
 社会结构，390—391
 对路易二世继承权的争议，392
 又见Hungary
Bohier family, 布希尔家族，314
Boiardo, Matteo, 博亚尔多，马泰奥，意大利诗人，149，174
 《热恋的罗兰》，74，173
Boleslav III, 鲍列斯瓦夫三世，波兰国王，370
Boli (Anatolia), 波利（安纳托利亚），奥斯曼省份，407

Bolivia, 玻利维亚, 发现银矿的影响, 39

Bologna, 波洛尼亚, 47

与罗马教廷的控制, 346; 被朱理亚二世所征服, 81, 147, 349, 359

15世纪后期的共和政府, 349

未能抵御法国的入侵(1494年), 351

法国复辟本蒂沃利奥的统治, 361

与神圣同盟, 361

Bologna, University of, 波洛尼亚大学, 17, 67, 96, 105, 108

Bombasio, Urbano, 邦巴西奥, 乌尔巴诺,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96

他的希腊文语法, 100

Bona (Sforza), 博纳(斯福尔扎), 波兰王后, 西吉斯孟一世的第二个妻子, 380

Bonet, Honore, 博内, 奥诺雷, 法国著作家, 论统治者唯一的战争发动者, 261

Bonvisi family, 邦维奇家族, 意大利银行家, 313

Borde (Germany), 博尔德(德意志), 24

Bordeaux, 波尔多, 43

Borgia family, 博尔贾家族, 2

亚历山大六世委托绘制的画, 141—142

Borgia, Cesare, 博尔贾, 切萨雷, 81, 273, 297

路易十二入侵意大利时与之合作, 355—356

与查洛特·德·阿尔夫雷特结婚, 356

武功和性格, 359; 使用炮兵, 366

Borgia, Rodrigo, 博尔贾, 罗德里戈, 见Alexander VI, pope

Bosch, Hieronymus, 布希, 希罗尼姆斯, 尼德兰画家, 168
所画形象不可思议, 164

Boscoli, Pier Paolo, 博斯科利, 皮耶尔·保罗, 97

Bosnia, 波斯尼亚, 并入奥斯曼帝国, 33, 395, 396, 398

Bosworth, battle of, 博斯沃思战役 (1485年), 1

Botoner, William, of Worcester, 博托奈尔, 威廉, 伍斯特的, 106

Botticelli, Sandro, 博提切利, 山德罗, 88, 139, 168
《春》与拉斐尔的手法的对比, 133
萨沃纳罗拉的影响, 138

Bouchet, Jean, 布歇, 让, 法国教会自立派宣传家, 303

Boulonnais, 布洛涅, 1477年为路易十一所蹂躏, 226

Bourbon, Anne, duchess of, 波旁女公爵安妮, 见Beaujeu

Bourbon, Louis de, 波旁, 路易·德, 见Liège, bishops of

Bourbon, Piece de Beaujeu, 波旁公爵, 皮埃尔·德·博热, 292
勒梅尔·德·贝尔热的保护人, 183

Bourdichon, Jean, 布尔狄雄, 法国画家和微型画画家, 可能曾受佩鲁吉诺的影响, 158

Bourgneuf, 布尔日讷湾, 25
与运盐船, 41

Brabant, 布拉邦特
1477年的“大特权敕令”, 225; 菲利普大公爵予以修改 (1494年), 243
在大枢密院中派有代表, 225

召集联省议会以批准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的婚姻，227

和佛兰德一起反对马克西米连任菲利普大公爵的摄政，231；逮捕并处决马克西米连的反对派，233；与1488年的“联合”，237；萨克森的阿尔伯特在军事上的胜利，238

在列日的传统利益，231

接受菲利普大公爵为公爵，243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对布拉邦特和佛兰德的纠纷进行仲裁，249

接受马克西米连为查理大公爵的摄政，250

与查理大公爵的成年，252

驱逐吉卜赛人，253

Brabant, Anthony, duke of, 布拉邦特公爵，安东尼，231

Bramante (Donato d' Angelo Lazzari), 布拉曼特（多纳托·德·安杰洛·拉扎里），意大利建筑家，127, 128, 130, 132, 133, 160

为圣彼得大教堂所作的设计，130

与罗马的文化优势，131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23, 25

Brandenburg, Albert Achilles, elector of, 勃兰登堡，阿尔伯特·阿奇勒斯选侯，377

Brandenburg, Albrecht of, 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见 Mainz, Albrecht, archbishop of

Brandenburg, Barbara of, 勃兰登堡的巴尔巴拉，377

Brandenburg, Joachim, elector of, 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与查理大公爵的当选为德意志王，218—219

Brandenburg, John Cicero, elector of, 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塞罗，202

Brandenburg-Ansbach, George, margrave of,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 乔治, 耶根多尔夫, 392

Brant, Sebastian, 布兰特, 赛巴斯蒂安, 德意志学者和讽刺作家, 193

《愚人船》, 118, 187, 188; 巴克利改编该剧本, 189

编辑维吉尔作品, 118

Brazil, 巴西, 447

葡萄牙发现巴西, 424; 卡布拉尔远征印度时发现巴西而产生的问题, 426; 平松的航行, 435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 428—429

染料木贸易, 429

法国的远征, 429, 465, 466

划分新世界时确认为葡萄牙领地, 431

Bremen, 不来梅, 45

Brenner Pass, 布伦内罗山口, 362

Brescia, 布雷西亚, 47

威尼斯的控制, 46

Breslau, 布雷斯劳, 195

Brest, 布雷斯特, 286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弟兄会, 18

与“现代虔信派”, 64—65

与人文主义的学术和教育, 112, 116

Briçonnet family, 布里松内家族, 305, 314

Briçonnet, Guillaume, 布里松内, 纪尧姆, 红衣主教, 与法国教会自立主义, 303; 鼓动查理八世侵略意大利的野心, 350

Briosco, Benedetto, 布廖斯科, 贝内代托, 135

Bristol, 布里斯托尔, 人口和贸易, 43

Brittany, 布列塔尼, 25

布卢瓦条约 (1504年) 中的, 210

布列塔尼文学, 191—192

勃艮第联盟 (1480年), 229; 为阿拉斯条约所废除 (1482年), 232

路易十一死后与法国王室的关系, 238, 294—295; 为法国所取得 (1491年), 262

Brittany, Anne, duchess of, 布列塔尼女公爵, 安妮, 见 Anne, queen of France

Brittany, Francis II, duke of, 布列塔尼第二代公爵, 弗朗西斯

科龙贝在南特为该公爵设计陵墓, 159

逝世 (1488年), 237—238, 295

与法国君主的关系, 294—295

Brotherhood of the Holy Crusade, 圣十字军兄弟会, 94

Bruges, 布鲁日, 112, 189, 195, 227

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 40

1477年法国入侵时民兵败北, 228

反对马克西米连, 232, 233—234; 马克西米连被扣, 200, 235—236; 屈服 (1485, 1490年), 234, 239

克莱弗的菲利普海上私掠对贸易的影响, 239

1515年“运输税”的评估, 255

企图为英国中心市场商行试图开辟市场, 462

Bruges, Peace of, 布鲁日和约 (148年), 236—237; 被蒙蒂尔斯—列兹—图尔条约废除 (1489年), 238

Brunelleschi Filippo, 布鲁内莱斯基·菲利波, 意大利建筑家, 128, 160

为圣彼得教堂所作的设计, 129

新建筑风格的创始人, 131

Bruni, Leonardo, 布鲁尼, 列奥纳尔多, 3, 14

他的人文主义与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相对比, 15—16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本, 106

Brunswick, 布伦瑞克, 44, 45

Brusa (Anatolia), 布鲁萨 (安纳托利亚), 32, 397

在谢里姆和艾哈迈德的战争中, 410

Brussels, 布鲁塞尔, 231, 235, 252, 253

在派使节觐见路易十一失败后1477年的骚动, 227

审计院恢复独立, 230; 为菲利普大公爵所核准, 246

马克西米连处决阿拉斯和约 (1482年) 的全权代表, 233

与1488年“联合”, 236

柯本荷尔强迫布鲁塞尔接受根特的权力, 237

Brutus, 布鲁图, 作为人文主义者弑杀暴君的榜样, 97

Buda, 布达, 222

Budak, Prince of Albistan, 布达克, 阿尔比斯坦王子, 在奥斯曼土耳其和埃及的战争中, 400, 401

Bude, Guillaume, 比代, 纪尧姆, 法国人文主义者, 104, 308

在意大利的学术研究, 165—166, 182

与世俗人文主义, 126

Budua, 布杜瓦, 为威尼斯所占据, 402

Bueil, Jean de, 比埃尔, 让·德, 法国作家, 论骑士作风在战争中的地位, 288

Bugia (North Africa), 布吉亚 (北非); 加泰罗尼亚属地, 340

Bulgaria, 保加利亚, 并入奥斯曼帝国, 33

Burchiello, Domenico, 布尔切洛, 多梅尼科, 意大利滑稽诗人, 172

Burckhardt, J., 布尔克哈特, J., 瑞士历史学家, 论意大利文艺复兴, 1, 2, 5, 16, 162

雕刻是支持他的论点的证据, 135

Burghley, William Cecil, Lord, 伯利勋爵, 威廉·塞西尔, 论西班牙缺乏海军物资, 456

Burgio, Antonio, baron, 布尔焦男爵, 安东尼奥, 援助匈牙利抵抗苏里曼的进攻, 393

Burgmair Hans, 布格迈尔·汉斯, 德国画家, 155

他的保护人的意大利化趣味, 156

Burgos, 布尔戈斯, 163

行会和羊毛贸易, 318

驱逐犹太人, 337

Burgundy, county of, 勃艮第伯爵领地, 见Franche Comte

Burgundy, duchy of, 勃艮第公爵领地

发展成为国家, 50; 通过公爵的权力实现政治统一, 56

古典传说在宫廷中的影响, 58

1513年瑞士的进攻, 207, 217, 252, 297

向大枢密院选派代表, 225

1477年遭到路易十一的蹂躏, 226, 262

在阿拉斯和约中（1482年），232

查理大公的觐见礼为弗朗西斯一世所拒绝，253

大胆的查理帝国的崩溃，260—261，261

Burgundy, Charles the Bold, duke of, 勃艮第公爵，勇者查理，184，226，231，256

他的去世（1477年）与尼德兰的反应，224—225，231

对列日的劫掠（1468年），229

废止其财政改革，230

1474年永久管业权法令，255

他的帝国的崩溃，260—261

Burgundy, John the Fearless, duke of, 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他的被害（1419年），294

Burgundy, Mary, duchess of, 勃艮第女公爵，玛丽，187

被承认为勇者查理的继承人（1477年），224—225

其大特权敕令及地方特权，224—226

与路易十一的侵犯（1477年），226

路易十一关于她和法国皇太子（查理）结婚的计划，226，227

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226，227

放弃对列日的权利，229

她的孩子的出生，230

逝世（1482年），231

Burgundy,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58，224，227，229

Bursfeld Congregation, 伯斯费尔德修会，91

Busleiden, Jerome, 布斯雷登，杰罗梅，与卢万的教授三种语言的学院，113

Busleyden, Frans van, 比斯莱登, 弗朗斯·范, 224, 246, 247
 菲利普大公的导师, 对法谈判, 238
 与森里斯和约(1493年), 243
 与里昂条约(1501年), 245

Butler, Samuel, 勃特勒, 萨缪尔, 英国作家, 与福伦戈的《马卡罗尼亚》, 174

Byelozero (Russia), 别洛泽罗(俄国), 21

Byzantium, 拜占庭, 拜占庭建筑术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影响, 128—129
 又见Empire, the Eastern

Cabbala, 犹太神秘主义
 皮科·科拉·米兰多拉对犹太神秘主义的兴趣, 101
 罗伊希林的《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 120

Cabot, John and Sebastian, 卡博特, 约翰和赛巴斯蒂安, 445

Cabral, Pedro Alvares, 卡夫拉尔,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 他的印度远征和巴西的发现, 426, 428

Cadamosto, Alvise da, 卡达莫斯多, 阿尔维斯·达, 422

Cadzand, Peace of, 卡赞特和约(1492年), 241
 查理大公重新颁布该条约(1515年), 253

Caen, 卡昂, 232

Caesar, Julius, 恺撒, 尤里乌斯, 67

Caiazzo, Francesco de San Severino, count of, 卡亚佐伯爵, 弗朗切斯科·德·圣塞韦里诺,
 背离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投奔法国, 357
 在福尔诺沃战役中的作用(1495年), 366

Cairo, 开罗, 424

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占领, 417

Caietan, Cardinal (Tommaso da Vio), 卡耶坦, 红衣主教,
(托马索·达·维奥), 101

1518年呼吁十字军东征, 218

反教会自立运动的论战, 304

Calais, 加来, 108

Chalcocondylas, Demetrius, 查尔科孔迪拉斯, 德米特留斯, 希腊流亡学者, 在意大利讲学, 119

Calicut, 卡利卡特, 49

柯维哈的旅行, 424; 达·迦马的旅行, 425; 卡布拉尔的旅行, 426

果阿取代其作为葡萄牙总部的地位, 427

Calixtus III, pope (Alfonso Borgia), 卡立克斯特三世, 教皇
(阿方索·博尔贾), 125

Callistus, Andronicus, 卡里斯图斯, 安德罗尼卡斯, 希腊流亡学者, 在意大利讲学, 100

Cambrai, Peace of, 康布雷和约(1508年), 249, 250, 251

康布雷同盟, 见League of Cambrai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剑桥大学, 该大学内的人文主义,
106, 108, 110—111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威廉, 古物收藏家, 17

Cameroons, 喀麦隆, 葡萄牙人的航行, 422

Camillus, 卡米卢斯, 利奥十世重新演出他的胜利, 147

Campbell of Glenorchy, 格莱诺基的坎贝尔, 他在《里斯莫尔教长的书》中的诗, 191

Canada, 加拿大, 见America, North

Canada Company of France, 法国的加拿大公司（1608年），467

Cananor, 坎纳诺尔

柯维哈的航行，423

葡萄牙的工厂和要塞，427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430

卡斯蒂利亚的所有权得到承认，340；占领，421

Candalle, Germaine de, 坎戴勒，热尔梅娜·德，让她与波兰国王扬·奥尔布拉赫特结婚的计划，378

Canerio, 卡内里奥，他绘制的地图，428

Cantino, 坎蒂诺，他绘制的地图，428

Cantoblacas, Antonio, 坎托布拉卡斯，安东尼奥，希腊流亡学者，在巴塞尔讲学，119

Cape Cross, 克罗斯角，卡奥的航行，423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49

迪亚士绕行，424；达·迦马绕行，425

Cape St Vincent, 圣文森特角，458

Cape Verde, 佛得角，49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葡萄牙的所有权得到承认，340

葡萄牙的探险，422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割新世界中，424

Capitalism, 资本主义在

毛织业中，54

在宗教改革前德意志的兴起，197；在法国的兴起，314—315

新世界来的金银的刺激作用，455

Capitanata, 卡皮塔纳塔, 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争议, 358

Capponi family, 卡波尼家族, 意大利银行家, 358

Capua, 卡普亚, 为法军占领和洗劫, 313

Carandolet, Jean, 卡朗多莱, 让, 勃艮第大法官, 230, 234, 247

 被根特当作人质, 236

 为托马·德·普兰内所替代, 247

Caretto, 卡雷托, 意大利作家, 他的《索福尼斯巴》, 175

Caribbean Islands, 加勒比群岛, 428

 又见America (Spanish)

Caribbean Sea, 加勒比海, 法国的私掠行为, 475

Caribs, 加勒比人, 对西班牙人的抵抗和为西班牙人所雇用, 435, 437

Carinthia, 卡林西亚, 219

 奥斯曼的进攻, 398

Carlotta, 卡洛塔, 那不勒斯国王费代里戈的女儿, 拒绝嫁给切萨雷·博尔贾, 356

Carmarthen, the Eisteddfod of 1451, 卡马森, 1451年的诗歌演唱大赛, 192

Carmeliano, Pietro, 卡尔梅利亚诺, 彼得罗, 亨利七世的拉丁文秘书, 107, 110

Carniola, 卡尔尼奥拉, 219

 奥斯曼的进攻, 398

Carpaccio, Vittore, 卡尔帕乔, 维托雷, 他绘画中反映的威尼斯生活, 133

Carrilloz, Alfonso, 卡里略, 阿方索, 托莱多大主教, 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两人的婚姻, 321, 322

Cartagena, 卡塔赫纳, 318

Cartier, Jacques, 卡蒂埃, 雅克, 与法国在北美的扩张, 466

Cartography, 地图学, 见Maps and Charts

Carucci, Jacopa da, 卡鲁奇, 亚各帕·达, 见Pontormo

Casa de Confratación, 贸易署, 见Seville

Casimir III (the Great), 卡吉米日三世 (伟大的), 波兰国王, 371

Casimir IV, 卡吉米日四世, 波兰国王, 221, 369, 371, 386

和哈布斯堡的伊丽莎白结婚, 372

逝世 (1492年), 374

与奥斯曼的进攻, 399

Castiglione, Baldesar, 卡斯蒂廖内, 巴尔代萨尔, 意大利作家, 98

所著《侍臣论》, 3, 74, 149, 177, 349

拉斐尔的肖像画, 149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王室世系, 9—10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 121—124

作为世界强国而出现, 316

农业与游牧经济, 316—317; 王国牧民荣誉会的财富, 317,
432

羊毛贸易, 318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约, 320—321

在新世界的特权, 323—324

在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优势地位, 324—325

阿尔卡索瓦斯条约（1479年），与葡萄牙分享新的发现，340，
424

与阿拉贡瓜分西北非洲，421

见Spain（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一），（在费迪南德和伊萨
贝拉统治下），（伊萨贝拉死后的外交关系）

Castilian language, 卡斯蒂利亚语，见Spanish language

Castilla del Oro, 卡斯蒂利亚德奥罗，西班牙移民地，439

Castillo, Bernal Diaz de, 卡斯蒂略，贝尔纳尔·迪亚斯·
德，他的关于科尔特斯探险的（信史），440

Castillo, Enriquez de, 卡斯蒂略，恩里克斯·德，西班牙著作
家，他的《恩里克四世编年史》，181

Castillo, Hemando del, 卡斯蒂略，埃尔南多·德尔，他的《诗
歌全集》，179

Castriotes, George, 卡斯特里奥特斯，格奥尔格，见
Skanderbeg

Catalan language, 加泰罗尼亚语，179 Catalonia, 加泰罗尼
亚，7

人口，316

海运事务处，318

14世纪后衰落，318—319

1462—1472年革命，319，321

宗教裁判所的建立，319；抵制，336—337

希门尼斯和北非贸易的复兴，319—320

总督，323

加泰罗尼亚人被排斥在意大利属地的行政部门之外，325

Cateau Cambrésis, Treaty of, 卡托—康布雷奇条约（1559
年），459，467

Catherine of Aragon, 阿拉贡的凯瑟琳, 英国王后, xxviii, 330, 341

Catherine of Braganza, 布拉干萨的凯瑟琳, 英国王后, 464

Catherine of Valois, 瓦卢瓦的凯瑟琳, 英国王后, 10

Catherine Podzebrad, 卡特琳·波迪布拉德, 匈牙利王后, 马加什·科尔文的第一个妻子, 372, 373

Catherine, queen of Navarre, 凯瑟琳, 纳瓦尔女王, 和让·德·阿尔夫雷特结婚, 327

Catherine 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 俄国女沙皇, 22

Cato, Angelo, 卡托, 安杰洛, 维也纳大主教, 184

与塔尔迪夫和巴尔博之间的纠纷, 103—104

Catullus, 卡图卢斯, 是斯克卢顿作品的模本, 190

Caux, 科区, 25

Cavaillero, Estevan, 卡维列罗, 埃斯特万, 所著《韵律学》中的人文主义影响, 125

Caxton, William, 卡克斯顿, 威廉, 58, 106, 108, 191

他的文学上的保守主义, 53, 54

所著《列那狐传》, 187

Cellini, Benvenuto, 切利尼, 本韦努托, 意大利艺术家, 178

Celtis, Conrad, 采尔蒂斯, 康拉德,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 120

与德意志的文学研究院, 117—118

他的中世纪研究, 118

Cempoala, 森波拉, 墨西哥城镇, 援助科尔特斯, 441

Cents Nouvelles Nouvelles Les, 《新故事百篇》, 12, 184

Cephalonia (Aegean island) 克法利尼亚 (爱琴海岛屿), 在奥斯曼—威尼斯战争中, 403, 404

Cerdagne, 塞尔当伯爵领地, 由阿拉贡割让给法国, 又据巴塞罗那条约归还 (1493年), 296, 340—341, 351

Ceresara, Paride da, 切列萨拉, 帕立德·达, 埃斯特的伊萨贝拉的顾问, 145

Cerignola, battle of, 切里尼奥拉战役 (1503年), 279, 358

火器的有效使用, 284

Cervantes, Miguel de, 塞万提斯, 米格尔·德, 西班牙作家, 170, 180

Cervera, 塞尔维拉, 321

Cesariano, Cesare, 切萨里亚诺, 切萨雷, 编辑维特鲁威的著作, 130

Cesena, 切泽纳, 95 Ceuta, 休达, 葡萄牙攻占 (1415年), 420

Chacon, Francisco, 查孔, 弗朗西斯科, 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的宫廷画家, 兼检查官, 168

Champagne, 香巴尼, 25

集市, 40

Champlain, Samuel de, 尚普兰, 萨米埃尔·德, 与法国在加拿大的移民地, 467

Charlebourg Royale, 查理堡王家殖民地, 法国殖民地 (1541—1542年), 466

Charles V, 查理五世, 皇帝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38, 167, 223

通过王室联姻创建帝国, 1, 10, 296; 他的帝国是引起意大利战争的根源, 7

论罗马教廷财政, 89

对提香的赞助，153，169

获得符腾堡的乌尔里希的领地，198

马克西米连计划查理和法国的克洛德结婚，210，213

关于被选为德意志王的会谈（1518年），218—219

与勃艮第的玛丽所赐的特权，225—226

收复图尔内（1521年），228

他在尼德兰的未成年时期（1506年），248—252

与玛丽·都铎结婚的计划，250，252

他在尼德兰亲政，252—258

从布拉邦特驱逐吉卜赛人，253

继承阿拉贡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的王位（1516年），254；离国
前往西班牙，256

恢复正规部队，256

当选为皇帝（1519年），257—258

从福格家族贷款，257，451

受民众拥护的尼德兰统一的象征，258

他在1522年的遗嘱中表示对勃艮第的热爱，258

使用宗教界人士作间谍，269

马基雅弗利在致驻西班牙使节的信中提出对他的质询，270

与西班牙进口粮食，316，317

与王国牧民荣誉会的财富，317

与西班牙羊毛贸易，318

在美洲贸易方面给予银行家的优惠，324

有关西班牙摩尔人的法令，324

和他兄弟费迪南德的竞争，326—327

与西班牙各骑士团，330

从那不勒斯驱逐犹太人，337

与西班牙的“财务委员会”，339

与西班牙在米兰的统治，365

海外领地的收益，450—452

与塞维利亚对西班牙海外贸易的垄断，453

Charles II，查理二世，英国国王，464

Charles IV，查理四世，波希米亚国王，372

Charles V，查理五世，法国国王，6

Charles VII，查理七世，法国国王，1，6，26

与王室对财政和军队的控制，300，301

Charles VIII，查理八世，法国国王，1

与教会改革，92，302，307，350

入侵意大利（1494年），160，182，244；马克西米连的干涉（1496年），202—203；从瑞士募兵，204；法国的对外扩张不以自然边界为定，261—262；他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以外地区的野心，295—296；受米兰的请求抗御那不勒斯，296，350；受意大利银行家的资助，314；威尼斯同盟的形成（1495年），332，341；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合谋瓜分计划，341；在国内和意大利对侵略的鼓励，350—351；初步胜利，控制佛罗伦萨，占领那不勒斯，352；他的失败（威尼斯同盟和福尔诺沃战役，1495年），353—354；维切利和约（1495年），353—354；入侵佛罗伦萨的后果，355

与法国人文主义，182

在科明的回忆录中，184，196

逝世（1498年），203，296，354

博热的安妮摄政时期，223

与勃艮第的玛丽结婚的计划，226，227；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结婚的计划，231—232，294；扣留她的陪嫁领地，240

与佛兰德对马克西米连的抵抗，234；法兰克福条约（1489年），佛兰德的屈服，238

是1488年的（《联合、联盟和邦联》）文件的担保人，237

和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239，295

与列日的中立，241—242

对甲冑制造者的保护，284

与海战，286

他的性格和才能，292—293

与布列塔尼公爵领地的继承权，294—295，341

与三级会议的权力下降，298

塞尔当与鲁西荣归还阿拉贡，341，351

Charolais，查罗莱，包括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陪嫁地之内，294

Chastellain，Georges，夏特兰，乔治，勃艮第历史学家，183，258

Chateau-Landon，monastery of，兰登堡修道院，307

Chatelet（Paris），沙特莱堡法院（巴黎），书记们演出的神秘剧，185

Chaucer，Geoffrey，乔叟，杰弗里，12，53，189

Chiaravalle，Cistercian monastery of，基亚拉瓦里的西多会修道院，32

Chiarenza，基亚伦扎，威尼斯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败（1499年），403

Chiavenna，基亚文纳，207

Chieregato, Francesco, 基耶雷加托, 弗朗切斯科, 教皇驻英国使节, 269

Chievres, sieur de, 希埃弗莱勋爵, 见Croy, Guillaume de

Chigi, Agostino, 基吉, 阿戈斯蒂诺, 与艺术的保持人, 132, 146, 147

China, 中国

与哥伦布的大西洋航行, 424

与葡萄牙的贸易, 448

Chios, 希俄斯, 267

Chivalry, 骑士作风

在法国和勃艮第宫廷, 58—61

对法国文学的影响, 59—60, 63—64

在战争中继续保持, 288—289

Chouart, Medard, 舒阿尔, 梅达尔, “醋栗先生”, 在赫德森湾公司供职, 445

Christian I, 克里斯蒂安一世, 丹麦国王, 194

Christ' s couese College, Cambridge, 基督学院, 剑桥大学, 创办, 110

Chronicles of England, 《英格兰编年史》, 54

Chronology, Roman, 编年史, 罗马, 库斯皮尼亚努斯的著作, 117

Church, Catholic, 天主教会15世纪听从命令的一致程度的低落, 11

与国王的控制, 在中世纪, 12; 在法国和英国, 195; 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 332—333

非教会人士享有教会地产, 13—14

去俄国传道，21

改革：尝试的失败，51，91—92；在天主教大分裂结束后对改革的要求，76；马克西米连和改革，215；德意志神职人员的窘困状况和改革派的愤怒，195—196；德意志世俗人对教会的改革，196—197；在法国的状况和改革的措施，304—307

16世纪的反教权主义，86—87

16世纪红衣主教团的没落，94

作为德意志的世俗统治者，195；上帝的贵族，196

对战争的态度，259—260

与波希米亚酒饼同领派的纠纷，389，391

又见 Clergy; Councils of the Church; Gallicanism; Inquisition; Papacy

Church, Eastern (Orthodox)，教会，东（正教）

莫斯科大主教的地位，369

拒绝佛罗伦萨同盟，369

Church of England，英国教会，以法国教会自立运动为榜样，303

Churches, national，教会，各个国家的

由于罗马教廷的软弱而受到鼓舞，12

在16世纪出现，80；德国趋向于国家教会，201，215

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民族主义倾向，333

俄国教会，369

又见Gallicanism

Cicero，西塞罗，3，58，70，95

布鲁尼称赞他的政治活动，15

“人性”在意大利是个性的基础，70

Ciceronianism, 西塞罗主义, 人文主义者的争论, 17, 98, 114

Cieco, il, 切科, 伊尔, 见Bello, Fran-cesc

Cilicia, 吉里吉亚, 麦木鲁克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争执, 399, 400—401

Cinthio (Giraldi Giambattista), 钦蒂奥 (吉拉尔迪·詹巴蒂斯塔), 意大利作家, 受塞涅卡的影响, 175

Cirksena, Edward, 西克森纳, 爱德华, 见East Friesland, Edward Cirksena, count of

Cisneros, 西斯内罗斯, 见Jiménez de Cisneros, cardinal

Citta di Castello, 卡斯泰洛城, 366

Classics, 古典作品

兴趣的扩大, 3

在法国宫廷, 58

15世纪的德文译本, 67

中世纪时期对古典作品的鉴赏, 70

15世纪在意大利作为典范, 70

又见Education, Humanism

Claude of France (later queen), 法国的克洛德 (后为王后), 路易十二之女, 布卢瓦条约 (1504年) 对她的婚姻的安排, 210, 213

Claymond, John, 克莱蒙德, 约翰, 牛津圣体学院第一任院长, 111

Clemanges, Nicholas de, 克莱芒日, 尼古拉斯·德, 法国作家, 102

Clement VII, pope (Guilio de, Medici), 克莱门特七世, 教皇 (圭利奥·德·美第奇)

对拉斐尔的保护, 132

任命“西印度大主教”，33

解释亚历山大关于分界的通谕，466

Clergy, 教士

在意大利北部的贫困，14

在16世纪的状况，90—91，92；在德意志，195—196；在路易十二和查理八世统治时期的法国，305—307

又见Commendams: Orders (reli-gious)

Cleves-Ravenstein, Adolf of, 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阿道夫，226

在佛兰德反对马克西米连，232

Cleves-Ravenstein, Philip of, 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菲利普，234，235

打败纪尧姆·德·拉马克，233

与1488年的“联合”，236

在布鲁日和约的争议（1488年）中，237

与马克西米连不和，238—240，245；他的投降，242

与杀害阿德里昂·维兰（1490年），239

Clicthove, Josse, 克利克托夫，约塞，论基督教徒对战争的态度，290

Climate, 气候，地中海流域和欧洲其他部分的；27—28

‘Cocai, Merlin’， “乔采，梅林”，见Folengo, Teofilo

Cochin, 科钦，葡萄牙在该地的商行代理处和要塞，427

Coeur, Jacques, 科尔，雅克，法国商人，48

与蒙彼利埃的贸易，314

Cofre de Perote (Vera Cruz)，科弗尔德彼罗特（维拉克鲁斯），440

Coimbra, 科英布拉, 该地的人文主义, 125

Coinage, regulation of, 货币制度的调整, 受新世界金银输入的影响, 460—461

Col, Gontier and Pierre, 科尔, 贡蒂埃和皮埃尔, 102

Colbert, Jean-Baptiste, 科尔贝尔, 让-巴蒂斯特, 法国政治家, 与法属东印度的贸易, 467

Col d' Argentiere, 阿尔让蒂埃尔山口, 阿尔卑斯山山口, 364

Colet, John, 科利特, 约翰, 圣保罗教堂主教, 63

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相比较, 18

他关于圣保罗书的演讲中反映的对意大利的访问, 55—56

他对伊拉斯谟的影响, 65

圣保罗学院的创立, 107, 109, 110

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126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比代与该学院的起源, 106

College of the Holy Virgin in the Nativity (later King' s College), 圣诞圣母学院 (后改为国王学院), 阿伯丁, 111

College de Montaigu, 蒙太古学院, 102, 182

Collegium Poetarum seu Mathematicorum, 诗学与数学学院, 117

Collioure, 科利乌尔, 48

Cologne, 科隆, 45

工业和人口, 43

科隆大学, 116, 119

大教堂, 160

各大主教是世俗的统治者, 195

科隆国会 (1505年), 211—212; (1512年), 216

Cologne, Hermann of Hesse, 科隆选侯，黑森的赫尔曼，支持马克西米连反对佛兰芒人，236

Colombe, Michel, 科隆贝，米歇尔，为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二世设计陵墓，在南特，159

Colon, Diego, 科隆，迭戈，436，437

治理伊斯帕尼奥拉岛，435

Colonna family, 科隆纳家族，280，366

Colonna, Francesco, 科隆纳，弗朗切斯科，他的《梦中爱情之战》，150

Colonna, Prospero, 科隆纳，普罗斯佩罗，从他的米兰保卫战得来的教训（1521年），275；他的军事技术，366

Columbus, Bartolomé, 哥伦布，巴托洛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兄弟，与圣多明各的建立，433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49，78，420

西印度群岛第一任总督，323

与人间天堂，422

他向西方航海的计划遭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拒绝，423—424；遭亨利七世拒绝，445

他的美洲航行，424—425，430—434

他寻找印度，433

缺乏行政管理能力，432

对他的控告和被召回，433—434

他发现地峡，436

他垄断探险的权利被否定，436，437

Commendams, 教会产业用益权，造成教士的贫困，13，14，305，306

1514年通谕， 92

Comynes, Philippe de, 科明， 菲利普·德， 法国历史学家，
2, 193

他的《回忆录》中的政治理论， 5—6

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赞扬， 10

论威尼斯， 46, 345

否定骑士作风， 60—61

他的现实主义， 60—61, 62

与法国的人文主义， 182

他的《回忆录》， 184—185； 其中流露出的基督教信仰， 185

论路易十一的外交， 273

享受佛罗伦萨津贴， 273

论查理八世向那不勒斯进军， 276—277； 不赞成查理的野心，
296, 350

Como, 科莫， 47

Conciliar movement, 公会议运动， 11, 51, 78, 82

又见Councils of the Church

Concordat of Bologna, 波洛尼亚政教协议（1516年）， 85—
88, 306, 365

Condivi, Ascanio, 孔迪维， 阿斯卡尼奥， 意大利作家， 论米开
朗琪罗设计的朱理亚二世墓， 134

Condroz, forest of, 康德罗兹森林， 中世纪的制铁业， 38

Conducci, Mauro, 孔杜奇， 毛罗， 意大利建筑家， 128, 131

Confrerie de la Passion (Paris), 激情剧团（巴黎）， 与神
秘剧， 185

Congregation of Montaigne, 蒙太古修会， 91

Constance, *Reichstag* of, 康斯坦茨议会（1507年），213—214

Constance, lake, 康斯坦茨湖，206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267

陷落（1453年），1, 46, 71, 192

15世纪的工业和商业，46

奥斯曼占领后的修复和建设，395

成为奥斯曼的首都，见Istanbul

Contarini, Zachario, 孔塔里尼，扎卡里奥，威尼斯使节，论常驻使节的困苦，272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哥本哈根大学，121

Coppenhof, Jan, 柯本荷尔，扬

控制根特，233

在法国避难（1485年），234

回到根特（1487年），235

他在1488年“同盟”中的作用，237

与法国谈判（1489年），238

与币制调整（1489年），239

与根特最后一次叛乱（1491年），239

他的被害（1492年），241

Cordoba, 科尔多瓦，48

教区，驱逐犹太人，337

Cordoba, Fernando de, 科尔多瓦，费尔南多·德，西班牙人文主义者，123

Cordoba, Gonzalo de, 科尔多瓦，贡萨洛·德，276, 366

改组西班牙军队，279；发展步兵战术，285

与查理八世侵犯意大利，353；与路易十二侵犯意大利，357，
358

指挥威尼斯军队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403

Cornwall，康沃尔，该地的地方语文学，192

Coron（Morea），科伦（摩里亚），406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402；陷落（1500年）和被威尼斯割据，403，404

Correggio（Antonio Allegri），柯勒乔（安东尼奥·阿莱格里），意大利画家，137

他的风格中的古典的和幻觉的成分，139

神话和隐喻，146

Cortés，Hernán，科尔特斯，埃尔南与征服墨西哥，439—443

他的信件，440

登陆（1519年）和向特诺奇提特兰进军，440—441

战斗的爆发和占领特诺奇提特兰，441—442

他对墨西哥的治理，443

Cortese，Paolo，科尔泰塞，保罗，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的反西塞罗主义，98

Corvinus，Elizabeth，科尔文，伊丽莎白，约翰的女儿，379

Corvinus，George，科尔文，乔治，约翰之子，379

Corvinus，John，科尔文，约翰，斯洛文尼亚公爵，马加什的私生子，377

与瓦迪斯瓦夫二世的继承波希米亚王位，373

抵抗奥斯曼土耳其，375

逝世（1504年），379

Corvinus，Matthias，科尔文，马加什，见Matthias Corvinus

Cosimo, Piero di, 科西莫, 皮耶罗·迪, 意大利艺术家, 152

Cossacks, 哥萨克人, 其起源, 393

Costa, Lorenzo, 科斯塔, 洛伦佐, 意大利艺术家, 148

Cotti, Lewis Glyn, 柯蒂, 刘易斯·格林, 对切斯特家族的讽刺, 192

Councils of the Church, 公会议, 15世纪罗马教廷对公会议的恐惧, 11

 巴塞尔(1431年), 11, 12, 51, 67

 康斯坦茨(1414年), 11, 12, 51, 67

 佛罗伦萨(1439年), 369

 拉特兰, 第二次(1139年), 264

 拉特兰, 第五次(1512年), 11, 82, 83—84, 92—93, 216, 303—304

 比萨(1409年), 11

 比萨(1512年的“集市”), 11, 82—83, 85, 207, 215, 303, 304, 361

 特兰托(1545年), 19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113, 333

Cour des Comptes, Paris, 审计法院, 巴黎, 书记们的神秘剧和道德剧, 185

Courtrai, 库特拉, 1515年的“运输税”的估计, 255

Covilha, Pero de, 柯维哈, 佩罗·德, 49

 他的阿比西尼亚和印度之行, 423

Cracow, 克拉科夫

 大学, 116

 大教堂, 施托斯的祭坛画, 158

Cranach, Lucas, 克拉纳赫, 卢卡斯, 德意志画家

他的保护人强加于他的奇异的意大利风格, 156, 157

风景画的新手法, 162—163

Creighton, Mandell, 克赖顿, 曼德尔, 主教, 历史学家,
xiii, xix

Cremona, 克雷莫纳, 47

洛迪和约(1454年)将该地授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344

威尼斯的图谋, 与路易十二的入侵, 356

马里尼亚诺战役(1516年)后威尼斯让出该地, 365

Crespy-en-Lannois, Treaty of, 克莱斯宾—莱诺瓦条约(1545年), 466

Crestone, Giovanni, 克雷斯托内, 乔万尼, 他编的希腊文—拉丁文辞典, 100

Crétin (Crestin), Guillaume, 克列坦(克列斯坦), 纪尧姆, 法国诗人, 183

Crévecaeur, Philippe de, lord of Esquerdes, 克雷夫科尔, 菲利普·德, 埃斯凯德勋爵

叛逃投奔路易十一, 227, 233, 235

与柯本荷尔谈判(1489年), 238

在勃艮第的法国—勃艮第共管区任查理八世的军事总督, 242

他的逝世以及对查理八世入侵野心的最后抗议, 244

Crinito, Piero, 克里尼托, 皮耶罗,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以及他对手抄本的科学校勘, 99

Cristofano, Francesco di 克里斯托法诺, 弗朗切斯科·迪, 见 Franciabigio

Croatia, 克罗地亚, 奥斯曼的进攻, 398

Croia, 克鲁亚, 为奥斯曼土耳其所占领 (1478—1479年), 395

Croke, Richard, 克罗克, 理查德, 英国学者, 110

在德意志教学, 119

Cromwell, Thomas, 克伦威尔, 托马斯, 2

Croy family, 克罗伊家族, 245

Croy, Guillaume de, 克罗伊, 纪尧姆·德, 希埃弗莱勋爵, 244, 246, 249, 252, 254

与勃艮第的菲利普的亲政, 243

与里昂条约 (1501年), 245

反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对法政策, 248, 253

任查理大公的导师, 250 Croy, Jacques de, 克罗伊, 雅克·德, 247

Crusades, 十字军

15、16世纪十字军精神的残余, 10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33, 46

号召和计划, 59, 76—77, 218, 264, 340, 376; 1514年在匈牙利的号召与农民起义, 388—389

罗马教廷的舰队与海军作战行动, 76, 80

十字军理想的消失, 80, 94

圣十字军兄弟会, 94

为十字军征税, 94, 264

根据捐献颁发赎罪券, 333—334

西班牙的费迪南德远征埃及和耶路撒冷的计划, 340

葡萄牙在摩洛哥的战役与在非洲的扩张, 421

Cuba, 古巴, 439

哥伦布的发现和探险, 430, 432

西班牙移民地, 435, 436

Cuenca, 昆卡, 驱逐犹太人, 337

Cusanus, 库萨努斯, 见Nicholas of Cusa

Cuspinianus (Johannes Spiesshaim), 库斯皮尼亚努斯 (约翰内斯·施皮谢伊姆),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 117, 118

Cyprus, 塞浦路斯, 威尼斯人为该地交纳贡赋, 418

Czechs, 捷克人, 波希米亚的殖民化, 36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3, 420

Damascus, 大马士革, 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 416; 奥斯曼的占领, 416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吉耶里, 1, 3, 71, 147

布鲁尼钦佩的理想公民, 16

在法国的影响, 182; 《地狱篇》的法文译本, 182

Danube, river, 多瑙河, 36, 396, 399

Danzig, 但泽, 44, 45

谷物出口, 384

Darien, 达里安, 巴尔沃亚建立该城, 436

达里安湾的探险, 436

Daucher, Adolf, 道赫尔, 阿道夫, 德国雕刻家, 可能受威尼斯影响, 159

Daucher Hans, 道赫尔, 汉斯, 德国雕刻家哥特式和意大利式风格的结合, 159

David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大卫, 见Utrecht, David, bishop of

David, Gerhard, 大卫, 盖哈德, 佛兰芒画家, 156, 168

Degli Agostini, Nicolo, 德利·阿格斯蒂尼, 尼科洛, 意大利诗人, 173

De la Bouverie, Jean, 德·拉·布维里埃, 让, 布拉邦特的大法官

与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的婚事, 227

与1488年“联合”, 236

De las Casas, Bartolomé, 德·拉斯·卡萨斯, 巴托洛梅, 多米尼加传教士和作家, 他与新世界印第安人的权利, 438

De la Chesnayé, 德·拉·谢奈, 法国作家, 他的《宴会的惩罚》, 186

De la Cosa, Juan, 德·拉·科萨, 胡安, 哥伦布的向导, 达里安湾的探险和死亡, 436, 437

De la Marck, family of, 德·拉马克家族,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关系中的列日, 232—233, 245, 247

De la Marck, Erard, 德·拉马克, 埃拉尔, 见Liège, Érard de La Marck, bishop of

De la Marck, Guillaume, 德·拉马克, 纪尧姆

对列日主教波旁的路易的反叛, 232

被列日主教霍恩的约翰处死, 241

De La Sale, Antoine, 德·拉·萨尔, 安托万, 60

《小让·德·圣特列》, 2, 184

Della Torre family, 德拉·托雷家族, 其墓收藏在卢浮宫, 147

De la Torre, Alfonso, 德·拉·托雷, 阿方索, 他的《百科全书》, 181

De la Vigne, 德·拉·维涅, 法国作家, 他的《圣马丁的神迹》, 185

Della Rovere Family, 德拉·罗韦雷家族, 347, 349

Della Rovere, Francesco, 德拉·罗韦雷, 弗朗切斯科, 被利奥十世赶出乌尔比诺, 363

Della Rovere, Giuliano, 德拉·罗韦雷, 圭利亚诺, 见Julius II, Pope

Della Scala family, 德拉·斯卡拉家族, 6

Della Valle, Battista, 德拉·瓦莱, 巴蒂斯塔, 他的《统帅简明手册》, 276

Del Medigo, Elia, 德尔·梅迪戈, 埃利亚, 与意大利的希伯来哲学研究, 102

Del Piombo, Sebastiano, 德尔·皮翁博, 塞巴斯蒂亚诺, 139

Del Pulgar, Hernando, 德尔·普尔加, 埃尔南多, 西班牙历史学家, 181

Del Sarto, Andrea, 德尔·萨尔托, 安德烈亚, 137

他的佛罗伦萨圣安努恩吉亚塔教堂的人口庭院的壁画, 138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108

Demotika, 德莫提卡, 巴耶济德的出生地, 410

Deptford, 德特福, 亨利八世的船坞所在地, 287

Deutschbrod, 德意志布罗德, 39

Deventer, 德文特, 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 65, 112

Deza, Diego de, 德萨, 迭戈·德·塞维利亚大主教兼宗教裁判所总裁判官, 337

Dias, Bartolomeu, 迪亚士, 巴托洛缪, 1487—1488年非洲的航行, 49, 423—424

参加卡布拉尔的印度远征, 426

Dieppe, 迪埃普, 供应法国私掠船员, 458

Dijon, 第戎, 252

被瑞士占领（1513年）207, 217, 252, 297

成为勃艮第的首府, 249, 258

神秘剧和道德剧, 185

集市, 313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丢尼修大法官, 所著《教阶制度论》格罗辛否认其为真作, 109

Diplomacy, 外交, 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overy, voyages of, 地理大发现的航行, 探险家成为工匠一样的雇佣人员, 445; 又见America, Brazil, Mexico, Portugal, Spain

Diyarbakir, 迪亚尔巴克尔, 396, 405

被波斯的沙易司马仪所占（1507—1508年）, 406; 反叛, 412

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 415

Dneister, 德涅斯特河, 396

Doget, John, 多格特, 约翰, 国王学院院长, 他对柏拉图《斐多篇》的评注, 108

Dominica, 多米尼加, 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的, 432

Domodossola, 多莫多索拉, 瑞士割让（1516年）, 364

Donatello (Betto Bardi, Donato di), 多那太洛（贝托·巴尔迪, 多纳托·迪）, 与青铜像的铸造, 136

Donchéry, Peace of, 敦奇利和约（1492年）, 与列日的中立, 241—242

Doni, Angelo and Maddalena, 多尼, 安杰洛和马达莱娜, 拉斐尔的肖像画, 149

Dordrecht, 多德雷赫特, 与1494年税收估计, 244

Dorlandus, Petrus, 多兰都斯, 彼得, 他的《每个死尸》可能是《每个人》的底本, 189

Dornach, battle of, 多纳赫战役（1499年），206

Dorp, Martin van, 多尔皮乌斯，马丁·范，德意志人文主义者，188

他的反对希腊语，113

Dortmund, 多特蒙德，44

Dósza, George, 多萨，乔治，与匈牙利起义（1514年），388—389

Douglas, Gawin, 道格拉斯，加文，苏格兰诗人，向脱离中世纪传统转变，190

Doukas, Demetrius, 杜卡斯，德梅特里乌斯，希腊流亡学者，与阿尔卡拉的希腊研究，123—124

Dournon, battle of, 杜农战役（1493年），241

Drave, 德拉瓦河，在莫哈赤战役中（1526年），393

Dresden, 德累斯顿，44

Dringenberg, Ludwig, 德林根贝格，路德维希，与自由的教育思想，116

Druzes, 德鲁兹派，奥斯曼土耳其承认他们的权利，417

Drzić, Djordje, 德尔吉奇，迪奥尔杰，他诗歌中的人文主义影响，192

Dui, 第乌，埃及舰队在此为阿尔梅达所败（1509年），427

Dulcigno, 杜尔奇诺，为威尼斯所据有，402

Dulmo, Francisco, 杜尔莫，弗朗西斯科，与大西洋通往印度的航路，424

Dunbar, William, 邓巴，威廉，他在苏格兰诗人中间的威望，190，193

Duns Scotus, John, 邓斯·司各脱，约翰，烦琐派哲学家，110

阿尔卡拉的司各脱派哲学，122

Duprat, 迪普拉, 安托万, 红衣主教, 弗朗西斯一世的大法官, 与波洛尼亚政教协议 (1516年), 86, 306

Durazzo, 都拉斯,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2

陷落 (1501年) 和为威尼斯所割让, 402

Durer, Albrecht, 丢勒, 阿尔布雷希特, 德国画家和雕刻家, 68, 153, 162

他在国外留学, 154—155

受贝利尼的影响, 156

访问尼德兰, 156

木刻与雕刻, 156—157, 161, 163

与古典作品的复活, 157—158

论宗教艺术的优势, 158

他的风景画, 163

他的《启示录》, 164

受路德的影响, 164—165

Dutch Congregation, 荷兰修会, 91

Du Terrail, Pierre, 迪·泰拉伊, 皮埃尔, 见Bayard

Dvina, 德维纳河, 21

Dynasticism, 王室联姻, 决定国际关系, 9—10, 50

East Friesland, Edward Cirkse, count of, 东弗里斯兰伯爵, 爱德华·西克森, 与查理大公爵的弗里斯兰战争, 1516—1517年, 256

East India Companies, 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 英国的, 法国的, 469

East Indies, 东印度, 见France, Netherlands, Portugal

East Prussia, duchy of, 东普鲁士, 公国, 24; 建立在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上面, 381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 新世界金银的扩散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460—461

Edmwnd, Dufydd ap, 爱德蒙, 杜斐德·阿普, 与诗歌中的形式主义风格, 192

Education, 教育

人文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3; 在意大利, 95—102; 法国, 102—106; 英格兰, 106—111; 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111; 尼德兰, 111—115; 德意志, 115—120; 斯堪的纳维亚, 120—121; 西班牙和葡萄牙, 121—126

15世纪的发展, 4

在英国, 4, 53; 神学院的成立, 92

在15世纪的意大利, 71

中世纪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同时并存, 96

又见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Universities

Edward I, 爱德华一世, 英国国王, 6

Edward II, 爱德华二世, 英国国王, 6

Edward III, 爱德华三世, 英国国王, 6

Edward IV, 爱德华四世, 英国国王, 107

与路易十一会见(1475年), 266

Edward I, 爱德华一世, 葡萄牙国王, 321

Egas, Enrique de, 埃加斯, 恩里克·德, 西班牙建筑家, 与西班牙早期银匠式风格, 167

Egmond, Adolf, Arnold, Charles of, 埃格蒙特的查理, 阿道夫, 阿诺德, 见Guelders, Adolf, Arnold, Charles, dukes of

Egmond, Floris van, 埃格蒙特, 弗洛里斯·范, 248; 为查理大公爵效力反对埃格蒙特的查理, 256

Egmond, Jan van, 埃格蒙特, 扬·范, 229

Egypt, 埃及, 奥斯曼的治理, 417; 威尼斯的权利得到承认, 418

Egypt, 埃及, 麦木鲁克帝国

在甘萨伍赫·高里统治下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396, 399—401, 413—416; 达比克草原战役(1516年), 甘萨伍赫·高里的失败和死亡, 415—416; 奥斯曼的征服, 416—418

麦木鲁克人轻视火器并丧失军事优势, 290, 413

从萨法威亚方面来的威胁, 406

麦木鲁克统治的不孚人心, 413—414

麦木鲁克苏丹的贪得无厌, 414, 442

Elbe, 易北河, 23, 24

Elbing, 埃尔平, 44

Eleanor (of Aragon), 埃莉诺(阿拉贡的), 葡萄牙王后, 爱德华一世之妻, 321

Eleanor (of Austria), 埃莉诺(奥地利的), 葡萄牙王后, 曼努埃尔国王之妻, 340

Eleanor, 埃莉诺, 阿拉贡的约翰二世之女, 加斯东(第四)·德·弗瓦之妻, 327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女王, 与西班牙的关系, 459

Elizabeth (of Habsburg), 伊丽莎白(哈布斯堡的), 波兰王后, 卡吉米日四世之妻, 372

Emmanuel of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的伊曼纽尔, 流亡学者, 他的德摩斯梯尼演说词的抄本, 108

Emilio, Paolo, 埃米利奥, 保罗,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63, 104

Empire, the Eastern, 东方帝国, 9, 46, 296; 又见 Trebizond, Greck empire of

Empire,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演变, 7—8

王公贵族权力的发展, 8, 又见下: 帝国的改革

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下民族的觉醒, 88—89, 198—199

弗里德里希三世统治时期领土的丧失, 194

帝国的改革: 帝国议会的组成和作用, 194; 沃尔姆斯议会 (1495年) 与马克西米连和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之间的冲突, 199—200; 以马克西米连同意改革为条件同意他的意大利计划, 201; 帝国执政府, 201; 公共芬尼, 201—202; 议会职能的扩大, 201—202; 帝国最高法院, 202; 改革的失败, 202; 节省消费和戒酒的条例 (1496—1498年), 203; 1495年的改革为瑞士所拒绝, 205; 奥格斯堡议会 (1500年), 变更方案, 帝国执政府, 208—209; 军事组织和税收, 209; 失败, 209—210; 马克西米连的地位加强, 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去世 (1504年), 210—211; 科隆的议会 (1505年), 马克西米连关于帝国执政府和强制实行法律的建议遭到拒绝, 211—212; 康斯坦茨议会 (1507年), 恢复帝国最高法院和花名册, 213—214; 奥格斯堡议会 (1510年), 马克西米连未能实现其防务和国内秩序的计划, 215; 他在科隆议会 (1512年) 上关于改革的建议, 216; 美因茨议会 (1513年) 与试图禁止私斗, 217

高级教士作为世俗的统治者, 195

教会和神职人员的状况, 195—196

罗马法和国王与王公的权力的扩散, 197—198, 220

城市和王公贵族之间的权力冲突, 198

斯瓦本联盟, 198; 对瑞士的战争, 204—206

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马克西米连一世治下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统一, 199

马克西米连认识到分裂的危险, 199

军事组织, 199, 202, 208—209, 210, 212, 215

私斗，试图禁止，201，202；强盗骑士，202，217

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210—211，212

沃尔姆斯议会（1509年）与拒绝支持马克西米连对威尼斯的战争，214—215

奥格斯堡议会（1518年）与呼吁进行十字军东征，219

皇帝失去国与国之间仲裁者的地位，263—264

Encina, Juan del, 恩西纳，胡安·德尔，他的戏剧与诗歌，181

Enciso, Martín Fernández de, 恩西索，马丁·费尔南德斯，与委内瑞拉沿海的移民地，436，437

Enfans Sans Souci (Sots)，欢乐儿童会（愚人），他们的道德剧，185，186

England, 英国

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立（1485年）是公认的转折点，1

国王权力的增长，6，7，8，52

玫瑰战争对贵族的影响，8

与罗马教廷，12

对艺术的保护，17

羊毛贸易，41，462—463

纺织工业，42，54

15、16世纪的人口（城市），42—43；16世纪的人口，456

与16世纪的力量均衡，50

文化与教育：15世纪的保守主义，52—53；教育，53；历史编纂学，54；人文主义的传播，55—56；对学术和教育的影响，106—111，地方语文学，189—191

15世纪的宗教虔诚，89—90

与勃艮第的联盟（1478年，1480年），229，232

与尼德兰的贸易关系，“大通商协议”（1496年），244；“不幸的通商协议”（1506年），248

雇用雇佣军有其道理，280

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治下的海军组织，287

新世界的金银流入后物价上涨，453

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454，458

对罗马教廷分割新世界提出挑战，458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对西班牙的关系，459

对西班牙的权力的挑战，460，463—464

格雷欣的仕途说明了新世界金银流入的影响，461—463

16世纪愈来愈强调经济统一，461—462

从尼德兰迁走商人和金融家们，462—463

争取分享葡萄牙的东方贸易，支持对西班牙的反叛，464

殖民地贸易体系的建立，465

Enguera, Joan de, 恩格拉，霍安·德，莱里达主教，326

Enns, 恩斯河，219

Ephesus, 以弗所斯，46

Epigraphy, 碑铭学

在人文主义的意大利，99

波廷格尔和德意志古文物收藏家，119

Epistola de miseria Curatorum, 《贫苦教士的书信》，91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德西德里乌斯，4，80，103，107，111，113，119，120，124，251，290，308

赫伊津哈对他的赏识，xxiii

他对朱理亚二世的攻击，11，82

他的《对话集》，12

他对希腊文的态度与瓦拉的态度相比，18

与北方神秘主义及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关系，18—19，126

与中间道路，19

论英国纺织品，42

他介绍意大利人文主义，65

论售卖赎罪券，87

他的《西塞罗派》，98，114

关于文学、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著述，114—115

受苏尼加的攻击，124

论丢勒的版画，163

与拉丁文对地方语文学的影响，170

在巴黎求学，182

他对斯克尔顿的称赞，189

论教皇作为诸侯之间的仲裁者，264

他对战争的态度，290

Erfurt, 埃尔富特，大学，116，118

Ermeni Derbend, 埃尔梅尼德尔本特战役（1513年），艾哈迈德和谢里姆战争中，410

Erzerum (Anatolia), 埃尔祖鲁姆（安纳托利亚），411，412

Erzinjan (Anatolia), 埃尔津詹（安纳托利亚），411

受到谢里姆的袭击，407

并入奥斯曼行省，412

Esquerdes lord of, 埃斯凯德勋爵，见Crèveœur, Philippe de

Esquivel, Juan de, 埃斯基维尔, 胡安·德, 与牙买加的移民地, 435

Este family, 埃斯特家族, 6, 173

在弗拉拉的统治, 348

Este, Alfonso d' , 埃斯特, 阿方索·德, 弗拉拉公爵

对艺术的保护, 145

炮术的发展, 366

Este, Beatrice d' , 埃斯特, 贝亚特里切·德, 米兰公爵夫人,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之妻, 350, 356

她赴威尼斯的使命(1493年), 269

Este, Borso d' , 埃斯特, 博尔索·德, 弗拉拉公爵, 348

Este, Ercoled' , 埃斯特, 埃尔科莱·德, 弗拉拉公爵, 282, 336

Este, Ippolito d' , 埃斯特, 伊波里托·德, 红衣主教, 他对阿廖斯托的保护, 173

Este Isabellad' , 埃斯特, 伊萨贝拉·德, 曼图亚侯爵夫人,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之妻

她对寓言画的兴趣, 144—145

1510年入侵意大利时她对法国的帮助, 367

Estienne family, 艾蒂安家族, 印刷商, 312

Etaples, Treaty of, 埃塔普勒条约(1492年), 241, 296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见Abyssinia

Eton College, 伊顿公学, 53

Eugenius IV, 犹金四世, 教皇, 11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114

Everard of Bethune, 贝顿的埃韦拉尔, 他的文法教科书到16世纪仍在使用, 96

Everyman, 《每个人》, 189, 190

Exeter College, Oxford, 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 维泰利在该院任教, 108

Expansion (overseas), 扩张(海外), 对欧洲的影响

各国对地理扩张的利用: 重商主义, 445—446

从新世界输入金银, 1503—1600年的估计数量和表格, 450—452; 在欧洲的影响, 451; 白银占优势的影响, 452; 价格上涨, 453—454

西班牙控制金银出口与殖民地贸易, 454

财富流动影响的扩展和“利润膨胀”, 454—455; 对资本和商业企业的刺激作用, 455; 对政府财政的影响, 460—462

对西班牙海外控制权的民族主义反响, 455—456

欧洲人口和新世界的殖民问题, 456—457

对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权利的挑战, 457—460

对“贸易平衡”这一概念的影响, 460—461, 464—465

格雷欣的仕途说明海外扩张对欧洲的影响, 461—462

英国商人和贸易从尼德兰转移, 462—463

英国对西班牙运输财宝通道的攻击, 463—464

长期的后果, 464—469; 英国殖民贸易体制, 465; 法国在北美的移民地, 465—467; 西班牙承认法国的海外贸易和移民地, 466—467; 法国和东印度贸易, 467; 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扩张, 468—469

Eyb, Albrecht von, 艾勃, 阿尔布雷希特·冯, 与德意志的人文主义, 115, 117

Eyck, Hubert and Jan van, 爱克兄弟, 胡伯特和扬·凡, 佛兰芒画家, 2, 61

Faber Stapulensis, 法贝·斯塔普朗西斯, 见 Lefèvre d'Éaples

Fancelli, Domenico, 范切利, 多梅尼科, 西班牙的陵墓艺术, 168

Faroes, 法罗群岛, 44

Federigo III, of Aragon, 费代里戈三世, 阿拉贡的, 那不勒斯国王

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反对西班牙的费迪南德, 341

与查理八世对意大利的入侵, 341, 351—352, 353

拒绝他的女儿夏洛塔与切萨雷·博尔贾结婚, 356

与路易十二入侵意大利, 356, 357—358

Feldkirch, 费尔德基尔希, 206

Feliciano, Felice, 弗利恰诺, 费利切, 他在碑铭学方面的工作, 99

Feltre, Vittorino da, 费尔特雷, 维托里诺·达, 与人文主义教育, 71, 348

Ferdinand I, emperor, king of Hungary and Bohemia, 斐迪南一世, 皇帝,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当选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222—223

与安妮·亚盖沃结婚, 222, 380, 392

接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 258

与奥斯曼对匈牙利的进攻, 392

Ferdinand II, 费迪南德二世, 天主教徒, 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国王, 6, 213

对艺术的保护, 165, 166, 167

与威尼斯同盟(1495年), 200—201, 332, 341, 351, 353

在意大利南部战败法国, 214

参加康布雷同盟（1508年），214

与神圣同盟（1511年），215，251，342，361

反对法国在布列塔尼的计划，240—241 逝世（1516年），254

与路易十二在萨沃纳会见（1507年），264，266，359

与卡斯蒂利亚的羊毛贸易，316，317，318

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结婚（1469年），320—322

征服纳瓦尔（1512年，1515年），320，325，327—328

他对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要求，322

即阿拉贡王位，322

与卡斯蒂利亚垄断美洲贸易，324

伊萨贝拉死后被取消卡斯蒂利亚王位（1504年），325—326

布卢瓦条约（1505年）以及他和热尔梅娜·德·弗瓦结婚，326

菲利普一世去世后返回卡斯蒂利亚，326

巩固他在那不勒斯的地位，326

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335—337

把奥斯曼土耳其人赶出奥特朗托（1481年），336

和法国瓜分那不勒斯，357—358，入侵那不勒斯和赶走法国人，341—342，358

与哥伦布，424，430—431，433

国王控制在新世界的西班牙臣民，437，438，又见Spain

Ferdinand III, St, 费迪南德三世，圣（?），卡斯蒂利亚国王，421

Fernández, Alejo, 费尔南德斯，阿莱霍，他作品中意大利和佛兰芒的影响，169

Fernando, 费尔南多，葡萄牙王子，与佛得角群岛的探险，422

Ferrante (Ferdinand I), 费兰特(费迪南德一世), 那不勒斯国王, 336

与威尼斯同盟(1495年), 341

逝世(1496年), 341

取得和治理本王国, 347—348

Ferrantino (Ferdinand II), 费兰蒂诺(费迪南德二世), 那不勒斯国王, 继阿方索二世王位, 352

与查理八世的入侵, 352, 353, 354

Ferrara, 弗拉拉, 6, 48, 132, 171

人文主义的文化, 71, 95, 103, 149, 171, 176, 348

对威尼斯的惧怕, 345; 与奥斯曼土耳其联盟反对威尼斯, 265; 威尼斯的进攻, 336, 348, 349; 参加康布雷同盟(1508年), 360

与罗马教皇的控制, 347, 348, 349; 受朱理亚二世攻击, 361

Ferrari, Gaudenzio, 费拉里, 高登吉奥, 意大利画家, 139

Feudalism, 封建制度, 在15世纪衰落, 52 Fez, 非斯, 葡萄牙的所有权为卡斯蒂利亚所承认(1495年), 340

Ficheh Guillaume, 菲歇, 纪尧姆, 与巴黎的印刷业, 103

Ficino, Marsilio, 菲奇诺, 马尔西利奥

与宗教人文主义, 16, 55, 97

他的柏拉图主义, 16, 55, 74, 100, 101; 与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 96; 《柏拉图全集》, 100

在国外的影响: 论科利特, 55—56及注; 在德意志, 117; 在法国, 182

对神秘主义和神秘术的兴趣, 63

Filipec, John, 菲利普斯, 约翰, 纳杰瓦拉德大主教, 支持瓦迪斯瓦夫在匈牙利的继承权, 374

Filippo Benizzi, St, 菲利波·贝尼齐, 圣, 生活的片断(安·德尔, 萨尔托所绘), 138

Finland, 芬兰, 15世纪时的, 21

Firenzuola, Angelo, 菲伦佐拉, 安杰洛, 意大利诗人, 178

Fisher John, 费希尔·约翰, 罗彻斯特主教, 与剑桥的教育, 110—111

Fiume, 阜姆, 马克西米连确认归属威尼斯, 360

Fläming, 弗莱明戈, 23

Flanders, 佛兰德被萨克森—迈森的阿尔伯特所降服的城镇, 200

在大枢密院派有代表, 225

承认勃艮第的玛丽, 225

与勃艮第的玛丽的婚事, 227

法国的宗主权为阿拉斯和约所承认(1482年), 231; 为菲利普大公爵所承认, 244; 为查理大公爵所承认, 253

反对马克西米连对菲利普大公爵的摄政, 231, 232; 内战, 233—234; 屈服(1485年), 234; 1488年的起义, 236; 与法国的谈判和屈服(1489年), 238; 通货贬值降低马克西米连的权威, 239

勃艮第的菲利普取得领地, 243, 246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仲裁与布拉邦特的纠纷, 249

与马克西米连对查理大公爵的摄政, 250

1515年的“运输税”和税赋的增加, 254—255

与西班牙的羊毛贸易, 318

又见Netherlands Flandes, Juan de, 弗兰德斯, 胡安·德, 受聘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 168

Flavio, Biondo, 弗拉维奥, 比翁多, 他的考古工作, 99, 118

Flemmyng, Robert, 弗莱明, 罗伯特, 林肯学院院长, 与古典研究, 108

Fleury, Jean, 弗勒里, 让, 截获西班牙的运送财宝的船队, 458

Florence, 佛罗伦萨, 1, 6, 95, 132, 136, 153, 155, 169, 171, 464

新柏拉图主义在该地, 5, 55, 63, 96, 100, 101

美第奇对艺术的保护, 16, 346

抵抗米兰的扩张, 72, 267

萨沃纳罗拉的势力, 78—79; 政治改革, 354; 反对萨沃纳罗拉, 他的死亡(1498年), 354

与新的建筑式样, 131; 优势地位丧失给罗马, 131 绘画, 138, 149

路易十一对佛罗伦萨银行业者施加影响, 使之反对勃艮第, 228

与奥斯曼土耳其联盟反对威尼斯, 265

与洛迪和约, 267

外交代表, 267

马基雅弗利和法国对佛罗伦萨的轻视, 273—274

采用马基雅弗利的军事原则, 277—278; 依靠雇佣军队, 279

参加康布雷同盟(1508年), 342

美第奇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 345—346

与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1494年): 皮耶罗·德·美第奇对查理的支持, 351—352; 法国对佛罗伦萨的控制, 352; 拒绝参加威尼斯同盟(1495年), 354, 367; 入侵的后果, 354

比萨战争(1495—1509年), 354, 362, 367

支持路易十二的入侵(1499年), 356, 359, 362

拒绝参加神圣同盟（1511年），362；美第奇家族在赶走法国人后重新掌权，362—363

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胜利后罗马教廷对该地的控制，365

16世纪时的衰落，447

Florence, University of, 佛罗伦萨大学，人文主义和中世纪传统的残余，96, 100

Florents, Adrian, 弗洛伦茨，阿德里安，见Adrian Florents of Utrecht

Florida, 佛罗里达，试图移民，西班牙，435；法国，460

Florus, 弗洛鲁斯，著作的早期版本，103, 118

Flushing, 弗勒兴，256, 258

与鱼的贸易，41

Foix, Francis Phoebus de, 弗瓦，弗朗西斯·菲布斯·德，327

Foix, Gaston (IV) de, 弗瓦，加斯东（第四）·德，327

Foix, Gaston (V) de, 弗瓦，加斯东（第五）·德，297, 327, 366

在拉文纳战役（1512年）中，289；在拉文纳去世，327, 361

Fiox, Germaine de, 弗瓦，热尔梅娜·德，见Germaine, queen of Spain

Foix, Jean de, 弗瓦，让·德，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对纳瓦尔的要求，327

Folengo, Teofilo (‘Merlin Cocai’), 福伦戈，泰奥菲洛（梅林·乔采），意大利诗人，他的谐仿韵体诗和拉丁文与口语掺杂的诗，170, 174

Folz, Hans, 福尔兹，汉斯，德国作家，与喜剧，187

Fonseca, Juan Rodriguez, 丰塞卡，胡安·罗德里格斯，塞维利亚副主教

与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432

与国王对西属美洲的控制，438

Forlì, Melozzo da, 福尔利，梅洛佐·达，意大利画家，169

Fomovo, 福尔诺沃战役（1495年），201, 269, 289, 296, 353, 366

Fort Coligny (Brazil), 柯立尼堡（巴西），法国人所建（1555年），466

Fortescue, Sir John, 福蒂斯丘爵士，约翰，他的《英格兰的商品》，41

Fortification, 城防工事，1494年后的发展，281—282；探雷仪，282

Fortunatus (Szerences, Gluck), 福钦纳图斯（塞莱切什，格鲁克），匈牙利财务大臣，388

Fox, Richard, 福克斯，理查德，温切斯特主教，107

牛津圣体学院的成立，111 France, 法国

入侵意大利（1494年）是公认的转折点，1

13世纪起王权的增长，6, 7, 8；15世纪末三级会议的衰落，7, 57, 299；君主国和政治一体化，56—57；国王控制财政和税收，300

对艺术的保护，17

农业的开垦，1050—1300年，25—26；罗讷河流域的排水和堤坝，31

地理，26—27, 31—32

罗讷河流域丝绸业的起源，31

南方盐的生产，31

人口，城市，15和16世纪，43；16世纪，456

与15世纪的地中海贸易，48

在15世纪时的潜在优势，50

文化的发展：诸侯宫廷的影响，57—58；坚持中世纪的传统，58—59；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63—64，102—106；希腊文的研究，104—105；古文物的研究，308；勒费弗尔·戴塔普与巴黎的基督教思想，307—308；方言文学，182—186；又见 Arts of the Renaissance (Northern Europe)

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与朱理亚二世，81—82；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时，82—86，365

法国人的好战传统，260—261；常备军和雇佣兵，278，301；海军的组织，286—287，288

入侵意大利，295—297，363—365；不存在经济上的压力，261；百年战争之后准备发动侵略，262；又见 Italy (入侵) 外交：意大利驻法国使节，267—268；利用常驻使节，268，301；外交工作的扩大，301

15世纪结束时的新问题，292—294

从百年战争的影响下复苏，294

阿拉斯条约（1482年）和勃艮第问题的解决，294

布列塔尼问题，294—295

15世纪下半叶体制上的变化，297—300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代的教会，301—305；低级教士，305—306；改革的企图，306—307；又见 Gallicanism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308—313；行会和工人联合会，311

资本主义的出现，313—315

新世界金银的流入引起物价高涨，453

16世纪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454，457

对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权利挑战，457—458

在北美洲的移民地，465—467

与东印度贸易，467

Franche Comté, 弗朗歇—孔泰，230, 231

受到路易十一的蹂躏（1477年），226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陪嫁领地，为查理八世所扣留，240, 241, 244；根据森里斯条约（1493年）归还，242, 296, 351

对勃艮第的效忠和对马克西米连的援助（1493年），241

宣告中立（1512年），251

Franciabigio (Francesco di Cristofano), 弗兰恰比焦（弗朗切斯科·迪·克里斯托法诺），意大利画家，138

Francis, I, 弗朗西斯一世，法国国王，1, 207, 253, 257, 286, 342

与波洛尼亚政教协议（1515年），85, 304, 365

与法国的人文主义，106, 158

与建筑中意大利文化的影响，160

即位（1515年），217

关于选举他为德意志王的谈判，218—219

与伦敦条约（1518年），264

与亨利八世会晤（1520年），266

入侵意大利（1515年），363—365

与土耳其结盟（1525年），393

Francis of Paola, St, 帕奥拉的圣弗朗西斯，与教士的改革，307

Frangepán, Kristof, 弗朗盖巴，克里斯托弗，在奥斯曼进攻匈牙利时，393

Frangepáni family, 弗朗盖巴家族，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抵抗，375

Frankfurt, 法兰克福, 202

法兰克福条约 (1489年), 238

Frauenlob, Heinrich von Meissen, 弗劳恩洛布, 海因里希·冯·迈森, 与德国诗歌中的形式主义, 186

Fraxinetum (near Cannes), 弗拉克西内土姆 (戛纳附近), 摩尔人的占领, 30

Frederick II, emperor, 弗里德里希二世, 皇帝, 6, 315

在意大利的农业立法, 31

Frederick III, 弗里德里希三世, 皇帝, 117

逝世 (1493年), 194, 243

与匈牙利王位, 221, 372

在尼德兰, 234, 235; 对马克西米连的军事援助, 236—237

Frederick of Baden, 巴登的弗里德里希, 见 Utrecht, Frederick of Baden, bishop of

Freidank, 弗赖丹克, 德国作家, 他的《谦逊》, 187

French language, 法语

分别使用奥克方言和奥依方言, 26—27

在外交界的应用, 270—271

Fribourg, 弗里堡, 瑞士州, 204

Fribourg, Eternal Peace of, 弗里堡永久和约 (1516年), 364

Friesland, 弗里斯兰把该地的权利作为报酬授给萨克森的阿尔贝特, 248; 为萨克森的乔治所出售, 256

1516—1517年战争, 256

Friuli, 弗留利

威尼斯人打败马克西米连 (1508年), 359

奥斯曼的袭击 (1499年), 403

Froben, John, 弗罗本, 约翰, 出版家, 115

Froissart, Jean, 傅华萨, 让, 法国历史学家和诗人, 26

Fiietrer, Ulrich, 菲特雷尔, 乌尔里希, 德意志作家, 他的《奇遇记》, 187

Fugger, house of, 福格家族

 对矿产的控制, 39, 43, 197, 203

 对艺术的保护, 161

 拒绝支持马克西米连为教皇候选人, 215

 与查理五世被选为皇帝, 257, 317; 与查理五世被选为德意志王, 451

 获得对美洲贸易的让步, 324

 控制十字军的收入, 334

 贷款给查理五世, 451, 461; 贷款给托马斯·格雷欣, 461

Fulvio, Andrea, 富尔维奥, 安德烈亚, 古文物工作, 99

Funen island, 菲英岛, 22

Fumes, 弗内斯, 1515年的“运输税”, 255

Gadagne family, 加达尼家族, 意大利银行家, 313

Gaeta, 加埃塔, 47

 为西班牙人从法国手中夺得(1504年), 358

Gaguin Robert, 加圭安, 罗贝尔, 与法国人文主义, 103, 104, 107, 308

Galata, 加拉塔, 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1453年), 395

Galicia (Spain), 加利西亚(西班牙), 人口, 317

Gallegos, Femando, 加雷戈斯, 费尔南多, 西班牙画家, 169

Gallicanism, 教会自立主义, 7, 80, 297, 301—303

文字宣传，303—304

与波洛尼亚政教协议（1516年），365

Galvão, Antonio, 加尔旺，安东尼奥，428

Gama, Vasco da, 迦马，瓦斯科·达，49

前往印度的航行（1497—1499年），425—426；（1502年），
426

Gardiner, S. R., 加德纳，历史学家，xiii, xix

Garigliano, battle of, 加里利亚诺战役（1503年），358, 386

Gascony, 加斯科涅，与葡萄酒贸易，41

Gaspe Basin (Canada), 加斯佩盆地（加拿大），1534年卡蒂埃
的航行，466

Gattinara, Mercurino di, 加蒂纳拉，梅尔库里诺·迪，为奥地利
的玛格丽特效忠，249, 252, 253

Gavere, 加大勒战役（1453年），234

Gaza, 加沙，在奥斯曼—麦木鲁克战争中，414；被奥斯曼占领，
416

Geertmidenberg (Holland), 格尔特鲁登堡（荷兰），243

Gelnhausen, 格恩豪森，1502年选侯会议，210

Genga, Girolamo, 亘加，吉罗拉莫，建筑家，132

Gengenbaeh, Pamphilus, 格恩巴赫，潘菲鲁斯，他的戏剧和讽刺
作品，187, 188

Genoa, 热那亚，336, 469

与北海贸易，40

15世纪和16世纪地中海贸易，46—47

租船给查理八世，286

海军的组织，287

与西班牙羊毛贸易，318

1494年那不勒斯舰队的失败，351—352

起义被路易十二镇压，359

失地给奥斯曼土耳其，395—396

16世纪时的衰落，447

在香料贸易中的地位，448

银行业，461

Genoese，热那亚人，在葡萄牙人地理发现航行中，49

Geoffrey of Monmouth，蒙默思的杰弗里，历史学家，54，58

George ‘the Rich’，duke of Bavaria-Landshut，“富人”乔治，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见Bavaria-Landshut

George of the Palatinate，巴拉丁侯乔治，见Speyer，George，bishop of

George Podiebrad，乔治·波迪布拉德，波希米亚国王，78，372—373，390

Geraldini，Antonio，杰拉尔迪尼，安东尼奥，与西班牙的人文主义，121

Germaine de Foix，热尔梅娜·德·弗瓦，西班牙王后，费迪南德二世的第二个妻子，213，326

巴伦西亚女总督，323

与费迪南德对纳瓦尔的要求，327

German language，德语，作为德意志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移民的证据，37

Germans，日耳曼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起源，23

向南方和东南方移民，35—36，37

Germany，德意志

查理五世继位是传统的转折点，1大学：1400—1500年间学生人数的增加，4；人文主义，67—68，116—117；世俗的大学超过教会的大学，196

政治的进展，7—8；诸侯势力的发展，8；又见Empire, Holy Roman

流行神秘主义，12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17—18，66—69，115—120；文学团体，117；人文主义研究和民族主义，118

文化发展：方言文学，17，186—189；文学中的悲观主义，68；工匠歌手，69；又见Aris of the Renai ssance（北欧）

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对立态度，17，77，89；世俗的和教会的神职人员，195—196；建议成立国家教会，201，215

地理和经济，22—24，25；向东方扩张，23—24；矿工居住区发展为城市，38—39；莱茵兰城镇和南德意志，43—44；北德意志和东德意志，44；汉萨同盟和其他城镇同盟，44—45；城市的发展和贸易与工业的扩大，66；资本主义的兴起，197

民族主义的兴起，88—89，194

军事传统，260；以瑞士为典范的重步兵，263；马克西米连试图改革雇佣兵，278

Geroni i Pau，杰罗尼·伊·帕乌，亚历山大六世的图书馆长，125

Gerson, Jean, 热尔松，让，巴黎大学校长，12

Ghent, 根特，256

1477年的联省议会，224

1477年向路易十一派出使节，226，227

反对马克西米连和勃艮第的玛丽结婚，227—228

进攻图尔内（1477年），228

反对马克西米连，230—231，232，233—234

扬·柯本荷尔的统治, 233, 235, 237, 239

向马克西米连屈服(1485年), 234

废止民兵组织(1485年), 234

反对马克西米连的起义(1488年), 235—236

与1488年的“同盟”, 与布鲁日和约, 236—237

1489年法国的要求, 238

向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屈服, 238

关于币值重新调整的辩论(1489年), 239

1491年的起义, 239

与马克西米连和解, 241; 丧失自治权(卡赞特和约, 1492年), 241, 253

查理五世诞生于此, 246

效忠于查理, 256

Ghiberti, Lorenzo di Cino, 吉贝尔蒂, 洛伦佐·迪·奇诺, 在佛罗伦萨雕刻青铜像, 136

Ghirlandaio, Domenico, 吉尔兰达伊约, 多梅尼科, 他在佛罗伦萨新圣母教堂中的绘画, 137, 138

Gibbon, Edward, 吉本, 爱德华, 论历史学家的主要品德, xxii—xxiii

Gibraltar, Straits of, 直布罗陀海峡, 420

Gigli, Giovanni, 吉利, 乔瓦尼, 伍斯特主教, 与英国的人文主义, 107

Gildas, 吉尔达斯, 波利多尔·维吉尔刊印他的著作, 110

Gioeondo, Fra, 乔孔多, 修士, 160

他在碑铭学方面的工作, 99

与对维特鲁威的研究, 130, 131

Giorgio, Francesco di, 乔治, 弗朗切斯科·迪, 133

论城防工事, 276, 282

Giorgione (Giorgio Barbarelli), 乔尔乔涅 (乔治·巴尔巴雷利), 意大利画家, 127, 145, 149

他作品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 146

他的天才的性质, 149—150

为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工作, 156

Gipsies, 吉卜赛人

与波希米亚人相混淆, 36

被查理大公赶出布拉邦特 (1515年), 253

Giraldi, Giambattista, 吉拉尔迪, 詹巴蒂斯塔, 见Cinthio

Girolami, Raffaello, 吉罗拉米, 拉法埃洛, 佛罗伦萨驻西班牙的使节, 270

Giusti (Juste), 朱斯蒂 (朱斯特), 圣德尼的路易十二墓, 159

Giustiani, Sebastiano, 朱斯蒂安尼, 塞巴斯蒂安, 威尼斯驻英国的使节, 269

Glares, 格拉鲁斯, 瑞士州, 204

Glasgow, University of, 格拉斯哥大学, 成立, 111

Glinski, 格林斯基, 信奉基督教的鞑靼人, 反叛波兰的西吉斯孟一世, 377

Gloucester, Humphrey, duke of, 格洛斯特公爵, 汉弗莱, 10, 17

Glock, 格鲁克, 见Fortunatus Goa, 果阿柯维哈的果阿旅行, 424

葡萄牙的要塞和贸易中心, 427

Gois, Damio de, 戈伊斯, 达米亚奥·德, 葡萄牙作家, 126, 428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21, 又见Tatars

Comes, Fernão, 戈麦斯, 费尔南, 向国王承包西非贸易, 422

Gonneville, 贡内维尔, 法国船长, 他在巴西停留 (1505年), 465

Gonzaga, family of, 贡扎加家族, 在曼图亚的统治和充任雇佣兵首领, 348

Gonzaga, Federigo, 贡扎加, 费代里戈, 曼图亚侯爵, 他参加帕维亚战役 (1525年) 的情况记载在科斯塔的画中, 148

Gonzaga, Francesco, marquis of Ferrara, 贡扎加, 弗朗切斯科, 弗拉拉侯爵, 367

曼特尼亚的保护人, 148

福尔诺沃战役 (1495年) 为威尼斯同盟指挥作战, 353

Gossaert, Jan, 戈萨尔特, 扬, 见Mabuse

Gotland, 哥得兰, 44

Gotthart, Mathis Nithart, 戈特哈特, 马西斯·尼萨特, 见Grünewald, Matthias

Gottsche, 哥特歇, 巴伐利亚人的移民地, 35

Grammont, 格拉蒙特, 1515年“运输税”, 255

Granada (city), 格拉纳达 (城), 48

Granada (kingdom of), 格拉纳达 (王国)

为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所征服, 6, 10, 28, 316, 320; 投降的条件, 324

卡斯蒂利亚人的行政管理, 324

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 (1492年), 337

Granada, Treaty of, 格拉纳达条约（1500年）

与路易十二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双方瓜分意大利, 357

Grand Bâtard le, “大杂种”, 见Anthony, bastard of Philip le Bon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法国大编年史》, 61

Grand privilege, 大特权敕令, 见Netherlands (Burgundian)

Grandson, battle of, 格朗松战役（1476年）, 263, 284

Grands Rhétoriciens, 大修辞家, 见*Rhétoriciens*

Granvelle, Antoine Perronet de, 格朗维尔, 安托万·佩罗内·德, 红衣主教, 马利内大主教, 他在尼德兰的不宽容制度, 462

Grauer Bund, 格劳尔部族, 207

与蒂罗尔的纠纷（1499年）, 205—206

Gravelines, 格拉夫林, 229

Great Schism, 天主教大分裂, 11, 12, 51, 76, 82, 292, 301, 302, 346

Greece, 希腊, 318

法兰克人的各小国, 33

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 33, 395

15世纪前的地理和经济, 34

Greek language, 希腊语与

流亡学者, 99—100, 104, 108

在大学中使用, 98—111各处, 119—120, 122, 123—124; 遭到反对, 113; 关于发音的争论, 120

博尔扎尼奥的语法和克雷斯托内的辞典, 100

与意大利的哲学研究, 100

Gregory VII, 格雷高里七世, 教皇, 83

Gregory of Nazianzus, St. 纳西昂的圣格雷高里，莱纳努斯翻译他的著作，120

Gresham, Thomas, 格雷欣，托马斯，他的仕途说明新世界金银流入欧洲的影响，461—463

与英国商人和金融家撤离尼德兰，462—463

Grien, Hans Baldung, 格里恩，汉斯·巴尔东，他印制的版画，163

Grimaldo, house of, 格里马尔多家族，热那亚银行家，334

Gringore, Pierre, 格兰戈尔，皮埃尔

与法国人文主义，182

与傻剧，186

教会自立主义的宣传，303

Grocin, William, 格罗辛，威廉，他的学识和批判工作，108—109

Groningen, 格罗宁根，在弗里斯兰的势力，256

Grünewald, Matthias (Mathis Nithart Gotthart), 格吕内瓦尔德，马蒂斯（马西斯·尼萨特·戈特哈特），德国画家，153

他为勃兰登堡的阿尔布莱希特工作，162

他的宗教图像画中的德意志传统，164

他对路德的反应，164

Gruuthush Louis of, 格鲁特豪斯的路易，与佛兰德反对马克西米连，232；与法国谈判（1489年），238

Guas, Juan, 瓜斯，胡安，与建筑中的伊萨贝拉风格，166，167

Guelders, 盖尔德斯，208，241

售给勇者查理（1472年），227

与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之间的较量，204，227—228，229，240，
247

Guelders, Adolf of Egmond, duke of, 盖尔德斯公爵，埃格蒙特的阿道夫，计划与勃艮第的玛丽结婚，227—228

在进攻图尔内时阵亡（1477年），228

Guelders, Arnold of Egmond, duke of, 盖尔德斯公爵，埃格蒙特的阿诺德，把盖尔德斯售给勇者查理（1472年），227

Guelders, Chades of Egmond, duke of, 盖尔德斯公爵，埃格蒙特的查理，204，229，254，255

被法军俘虏（1487年），235

回到盖尔德斯（1492年），240

得到路易十二的军事援助，245，247，250

向菲利普和马克西米连投降（1505年），247

与奥地利的伊萨贝拉结婚的计划，248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寻求英国联盟共同反对他，（1511年），251

在弗里斯兰问题上与查理大公爵发生冲突（1516—1517年），
256

Guerre Folle, “疯狂的战争”（1485年），295

Guicciardini, Piero, 圭恰迪尼，皮耶罗，意大利历史学家，73

对朱理安二世的批评，83

与地方语言历史著作，177

论瑞士，204

论外交技术，274

论战争方法的改革，275

论安特卫普的生活费用，453

Guienne, 吉昂亨利八世的进攻（1512年），261，327

为法国所取得（1453年），262

Guienne, Chades de France, 吉昂公爵，法兰西的查理，向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求婚遭拒绝，320

Guinea coast, 几内亚海岸葡萄牙的探险，422

葡萄牙所有权得到承认（1494年），340

向西属美洲输出奴隶，457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湾，49, 422

Guinegate, 根盖特战役（1479年），278

Gunther the Cistercian, 西多会士君特，采尔蒂斯刊印他的《利古里亚人》，118

Gunthorpe, John, 贡索培，约翰，威尔士学院院长，他的拉丁文演说中的意大利影响，107

Guymer, Cosme, 基密尔，科斯梅，对国事诏书的注释，303

Guzmán, Femán Pérez, 古斯曼，费尔南，佩雷斯，西班牙作家，所著《世代和人物志》，181

Guzmán, Nuño de, 古斯曼，努尼奥·德，444

Gwilym, Dufydd ap, 格威里姆，杜斐德·阿普，与诗歌写作的比较自由的风格，192

Haarlem, 哈勒姆，在1492年革命中，240

Habsburg, house of, 哈布斯堡王室，10, 50, 343

在瑞士遭到痛恨，205

在东欧的权利要求，221—222, 380, 370—380

各处西班牙支系，320

继承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领地，449

又见Charles V; Maximilian I; Philip I

Hagenau, Treaty of, 哈格诺条约（1505年），210, 245

Hagenaueh Nicolas, 哈格瑙尔, 尼古拉斯, 德国雕刻家, 164

Haidar, Shaikh, 哈伊达尔, 舍赫, 与萨法威亚运动的进展, 405

Hainault, 埃诺, 231与“大特权”敕令, 225

 与勃艮第的玛丽的婚事, 227

 1477年法国入侵时的, 227

 与布鲁日和约(1488年), 227

 接受马克西米连为查理大公的摄政, 250

Hakluyt, Richard, 哈克卢特, 理查德论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统一的危险, 455—456

 与英国在北美的移民地, 464

Halberstadt, 哈尔伯施塔特, 195

Hamadan, battle of, 哈马丹战役(1503年), 405, 406

Hamburg, 汉堡, 45

 冒险商公司呢绒市集的建立, 462

Hampton Court, 汉普顿科特宫, 147—148

Hanover, 汉诺威, 24

Hanseatic League, 汉萨同盟, 21, 23, 45

 16世纪与塞维利亚的贸易, 454

 塔古斯河口汉萨船只的损失, 456

 商人在英国的特权丧失给冒险商公司, 461

Harfleur, 哈尔弗勒, 429

Hasan Pasha, 哈桑帕夏, 鲁梅利总督, 在查尔德兰战役(1514年)中, 411

Havre, Le, 勒阿弗尔, 286

Hawes, Stephen, 霍斯, 斯蒂芬, 他的枯燥的寓言, 189

Hawkins, John, 霍金斯, 约翰, 与几内亚奴隶贸易, 457

与英国对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权利的挑战, 457, 459

Hebrew, 希伯来语, 人文主义的研究, 3; 费希尔与在剑桥大学讲授希伯来语, 111; 罗伊希林对希伯来语的研究, 120; 经院派反对希伯来语, 120; 在阿尔卡拉, 124

Hegius (Alexander van Heek), 黑吉乌斯 (亚历山大·范·黑克), 他的教育工作, 112, 114

Heidelberg, 海德堡, 65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海德堡大学, 116, 119

Heimburg, Gregor, 海姆贝格, 格雷戈尔, 与德国的人文主义, 115

Helena, 叶琳娜, 波兰王后, 伊凡大帝之女, 亚历山大一世之妻, 376

Hellweg, 黑尔韦格, 24

Henneberg, Berthold of, 亨内贝格的贝特霍尔德, 见Mainz, Berthold of Henneberg

Henry IV, 亨利四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 121, 320, 321

逝世 (1474年), 325

Henry V, 亨利五世, 英国国王, 与瓦卢瓦的凯瑟琳结婚, 10

Henry VI, 亨利六世, 英国国王, 6

Henry VII, 亨利七世, 英国国王对拉丁文学者的保护, 107, 110

在威尔士诗歌中, 192

反对法国在布列塔尼的计划, 240—241

与斯卢思的私掠船, 242

与尼德兰的贸易条约 (“大通商协议”, 1496年), 244

大陆上的情报机关, 268

与海军组织， 287

保留对法国王位的要求， 295， 297

与西班牙的费迪南德结成反对查理八世的联盟， 341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英国国王， 13， 110， 189， 217， 264，
265， 282

朱理亚二世把法国王位封给他， 83

占领图尔内（1513年）， 与归还法国（1519年）， 228， 252，
256

与神圣同盟（1511—1513年）， 251—252， 261， 342

论基督教列强在土耳其威胁之下背信弃义， 264

与弗朗西斯一世会晤（1520年）， 266

海军的发展， 287

在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对纳瓦拉的战争中给予援助（1512年），
261， 327

Henry IV， 亨利四世， 法国国王， 466—467

Henry the Navigator， 航海家亨利， 葡萄牙王子， 49

与非洲的探险， 420， 421， 422

逝世（1460年）， 423

Henryson， Robert， 亨利森， 罗伯特， 与乔叟的传统， 190

Heresy， heretics， 异端， 异端分子

公会议运动的失败鼓励了异端的发展， 11

波希米亚的阿莫西特派， 389

鲍格米勒派， 33

胡斯派， 11

罗拉德派， 11， 90

又见Bohemia（宗教纷争）

Hermonymos, George, 赫尔蒙尼莫斯, 乔治, 希腊流亡学者, 与巴黎的希腊语教学, 104, 105, 108, 119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并入奥斯曼帝国, 398

Hess, Eobanus, 赫斯, 埃奥巴努斯, 他用拉丁文写的诗, 118

Hesse, Philip, Landgraf of, 黑森的兰德格拉夫, 菲利普, 冯·济金根攻打他的领地（1518年）, 217

Heynlen, Jean, 埃伦, 让, 与巴黎的出版业, 103

Hieroglyphics, 象形文字, 在人文主义的意大利进行研究, 102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 429, 439

为哥伦布新发现和移民, 430, 432

早期移民的困难, 434, 435

Historiography, 历史编纂学

坚持古典的和亚瑟王的传说, 54—56

科明, 60—61, 184—185

15世纪德意志的唯实论, 67

古代文物研究所起的影响, 71—72

保罗的法国史, 104

波利多尔, 维吉尔的英国史, 110

博伊斯模仿李维, 111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 118

在西班牙, 马里内奥和马尔蒂雷, 121; 内布里哈, 123; 方言写作的历史, 181

在意大利, 177—178

勃艮第的编年史家, 183

Hochheim, 霍奇海姆, 195

Hochstetter, family of, 霍赫施泰特尔家族, 控制铜的市场,
197

Hoek-Kabeljauw feud in Holland, 荷兰的霍克家族和卡贝利奥
家族之间的世仇, 229

Hohenzollern, Albert of, 霍亨索伦, 阿尔贝特的, 见Mainz,
Albert of Hohenzollern

Hohenzollem-Anspach, Albrecht, 霍亨索伦-安施帕赫侯爵, 阿
尔布莱希特, 条顿骑士团首领, 379—380, 381

Hojeda, Alonso de, 奥赫达, 阿隆索·德

可能是卡斯蒂利亚派往巴西的探险队队长, 428

加勒比海沿岸的探险和移民, 436

Holanda, Francisco de, 奥兰达, 弗朗西斯科·德, 论西班牙艺
术家, 168

Holbein, Hans, the elder, 霍尔拜因, 汉斯(大), 155

Holbein, Hans, the younger, 霍尔拜因, 汉斯, (小), 18,
153

他作品中的意大利成分, 155

他的《死神的舞蹈》, 164

Holland, 荷兰承认勃艮第的玛丽, 225

1477年的“大特权”, 225; 被菲利普大公修改(1494—1495
年), 243

在大枢密院派有代表, 225

与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婚事, 227

在1477年法国入侵中, 229

税收: 河运税, 235; 1494年的估计, 243—244; 1514年的估
计, 254

胡克派与克莱弗斯的菲利普一起进行海上私掠活动, 237; 对马克西米连的权威的影响, 239; 胡克派的衰落, 240

重新估定币值损害马克西米连的威信, 239

内战后城镇的破产, 246

菲利普大公恢复荷兰的王权和收入(1495年), 246

接受马克西米连为查理大公的摄政, 250

在查理大公和埃格蒙特的查理之间的战斗中, 256, 257

Holstein, 霍尔施泰因, 接受丹麦国王的统治(1460年), 194

Holy League, 神圣同盟(1511—1513年), 81, 215, 216—217, 251, 261, 342, 361—362, 363—365, 又见Italy

Homer, 荷马, 114

Honduras, 洪都拉斯, 科尔特斯的远征, 443

Horace, 贺拉斯, 182

Hoskins, W.G., 霍斯金斯, 论英国16世纪初地方城镇的人口, 43

Houtman, Cornelis de, 胡特曼, 科内利斯·德, 与荷属东印度的贸易, 469

Hrotswitha, 赫罗斯维塔, 采尔蒂斯刊印她的剧本, 118

Huber, Wolf, 胡贝尔, 沃尔夫, 与风景画, 163

Hudson, Henry, 赫德森, 亨利, 为荷兰服务, 445

Hudson's Bay Company, 赫德森湾公司, 445

Hugonet, Guillaume, 于格内特, 纪尧姆, 勃艮第大法官, 派往路易十一的使团(1477年), 审判和处死, 226—227, 230

Huguenots, 胡格诺派教徒, 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私掠活动, 457

Huizinga, John, 赫尔津哈, 约翰, 批判他对伊拉斯谟的观点, xxiii

Humanism,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和中世纪对古代文物的态度，3

文艺复兴对个性的培养，4—5

在意大利以外发展迟缓，14—15

意大利矛盾的各方面，15—16，95

佛罗伦萨对财富的态度，16

宗教偏见，16

意大利的态度和北方态度的对比，18—19

与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调和，55—56

人文主义文化从意大利传入英国，55—56

在法国和勃艮第，56—61，63—64

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61—62

在尼德兰，64—66

在德意志，66—69

同时作为精神和文化的改革，68

意大利中世纪文化向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69—75

对学术和教育的影响：意大利，95—102；法国，102—106；英国，106—111；在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有限的影响，111；在尼德兰，111—115；在德意志，115—120；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影响较晚，120—121；在西班牙，121—125；在葡萄牙，125—126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派，96—97

古典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运用，97

与虔诚，97

与地方语言文学，97—98

西塞罗的辩论，98

著作评述，98—99

意大利人厌恶法学研究，102

对英国宫廷的影响，107—108

意大利内外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126

Humbercourt, lord of, 安贝尔库，勋爵，派往路易十一的使团（1477年），审判和处死，226—227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20, 56, 102, 262, 264, 280, 292, 297, 298, 308

Hungary, 匈牙利

君主政体的弱点，8—9

地理面貌，36

马扎尔人定居，36—37

修士会对殖民和农业的帮助，36—37

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关系，213, 221—222, 378—380

马加什·科尔文以前王位的继承，370—372

马加什·科尔文未能巩固王国，372

波希米亚的瓦迪斯瓦夫二世继承王位，373—374

与波兰的密切关系，374—375

与奥斯曼土耳其：瓦迪斯瓦夫二世领导防御；苏里曼率领奥斯曼进攻与莫哈奇战役（1526年），392—394；奥斯曼的进攻（1490—1495年），398—399；与威尼斯联盟反对奥斯曼土耳其（1501年），403—404；在1503年和约后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418

继承瓦迪斯瓦夫二世，377—378

瓦迪斯瓦夫二世与安妮·德·坎戴勒的婚姻以及与法国结盟，378—379

扬·扎波利亚伊与民族独立事业，379—380

维也纳条约（1515年）的后果，380

宪政体制，385—389；巴拉丁选侯法，373；宪法和习惯法汇编，387—388

马加什·科尔文和瓦迪斯瓦夫二世治下的税收，386；在奥斯曼进攻时为招募雇佣兵而征收的税赋，392

瓦迪斯瓦夫治下王权的衰落，386—387

小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斗争，387，393

农民的状况，388—389

与1514年的起义路易二世即位的争执，392

又见Bohemia

Hurault family, 于罗家族，314

Husmann, Rudolf (Agricola), 胡斯曼，鲁道夫（阿格里科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112—113

Hussite wars, 胡斯战争，280

在波希米亚的影响，36，39

Hutten Ulrich Yon, 乌尔利希·冯·胡滕，德国人文主义者，《阿尔米纽斯》与德意志民族主义，18，118

Ibn Hamish, 伊本·哈努什，阿拉伯酋长，反谢里姆的叛乱，417

Ibn Iyās, 伊本·伊雅斯，论麦木鲁克统治者的暴虐，414

Ibrāhim, 易卜拉欣，奥斯曼帝国首相，在莫哈奇战役（1526年）中，393

Ibrāhīm Beg, 易卜拉欣贝伊，卡拉曼统治者，396

Iceland, 冰岛，44

渔业，41

印刷术的引进，191

本国语言文学，191

Idrīs, 易德里斯, 奥斯曼历史学家帮助库尔德人起义反对波斯, 412

为谢里姆组成政府, 413

Iglau, 伊格劳, 39

IJsselstein, house of, 艾瑟尔斯坦王室, 在盖尔德斯公爵领地, 229, 240, 249, 256

Imbros, 伊姆罗兹岛, 并入奥斯曼帝国 (1455—1456年), 395

India, 印度

葡萄牙与航路, 49, 421—428, 425—426

葡萄牙约翰二世与向西航行的路线, 423, 424; 哥伦布寻找印度, 433

从陆地上前往印度, 423

当地人对葡萄牙贸易者的抵抗, 425—426

葡萄牙势力的建立, 426—427

Indians, 印第安人

在西属美洲, 433—434, 435, 438, 439, 456—457

美洲的印第安人, 与皮毛贸易, 466

Indulgences, 赎罪券, 209

作为教皇收入的来源, 13, 87—88

定义与弊端, 87—88

为十字军提供财政捐献而颁发, 333—334

Industries, 产业

在欧洲: 军备、装甲, 46, 283—284; 渔业, 21, 22, 41, 45, 468; 玻璃, 47; 制革, 48; 香料种植场, 49; 金属业, 32, 38, 42, 46, 47; 采矿, 22, 26, 30, 32, 37—39, 43, 46, 203; 造纸, 48; 印刷, 312 (作为文化影响的印刷业参见Printing); 制盐, 21,

25, 30, 31, 32, 39, 41; 丝绸, 31, 32, 46, 47, 48, 311—312, 344; 纺织, 42, 47, 48, 54, 462; 木材、林产、树脂, 41—42, 456, 468; 葡萄种植, 24, 27, 41

在新世界: 捕鱼, 465; 采矿和黄金生产, 434—435, 449 (另见452); 珍珠采集, 436; 木材和树脂, 465

Industry, 工业

在西班牙, 30, 48; 在君士坦丁堡, 46; 在意大利, 32, 47—48, 344; 在德意志, 66; 在法国, 310—312

法国的行业公会, 311

新世界金银流入的刺激作用, 455

西班牙在尼德兰实行不宽容政策造成的影响, 462

Ingolstadt, University of, 因戈尔施塔特大学, 116

Innocent III, 英诺森三世, 教皇 (洛塔里奥·德·孔蒂), 83

Innocent VIII, 英诺森八世, 教皇 (詹巴蒂斯塔·奇博)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 10, 78, 365, 398

与教皇威信的低落, 77—78

他的陵墓在圣彼得大教堂, 134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220, 221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作为王权的工具, 12, 334—336, 338

与巫术, 《深情地希望》(1484年) 和《作恶者罪孽》(1487年) 通谕, 77, 92

在哈布斯堡帝国, 325

在西班牙: 成立, 335—337; 对文学的影响, 179; 在加泰罗尼亚, 319; 在加泰罗尼亚遭到抵制, 336—337; 对加泰罗尼亚贸易的影响, 337; 赋予控制西班牙摩尔人的权力, 325; 与中世纪意大利的对

比，335—336；在阿拉贡的阻力，336；灾难性的经济和文化后果，338

在西属美洲，33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皇帝和教皇作为国与国之间仲裁的作用下降，263—264

外交：16世纪外交技术的演变，10；使用常驻使节，265—267，301，272；情报、间谍和密探，266—267，268，269—270；对君主之间的私人会晤抱猜疑态度，266；特殊的外交使命，268—269，272，301（参阅226）；信使，269；语言、拉丁语和本国语，270—271；驿站和信使传递，271；使用密写和代号，269，271；外交豁免权，272；普遍存在怀疑和不信任，272—273

收买外国官员，260，273，275

洛迪和约（1454年）后意大利各国奉行均势原则的例子，267

马基雅弗利主义，273—274

又见Armies; Treaties; War

Ireland, 爱尔兰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外来影响，111

盖尔语文学，191

Irenicus, Franciscus, 伊列尼库斯，弗兰西斯库斯，与德国中世纪史，118

Isabella (Hispaniola), 伊萨贝拉（伊斯帕尼奥拉），哥伦布移民的失败，433

Isabella, 伊萨贝拉，卡斯蒂利亚王后，约翰二世之妻，320

Isabella, the Catholic, 伊萨贝拉，天主教徒，卡斯蒂利亚女王，213，325

对艺术的保护，165，166，167

她的逝世（1504年）和遗嘱，245，325；恢复王室财产的命令，329；骑士团的收入留给费迪南德，330

与西班牙的羊毛贸易，318

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结婚，320—322

她被承认为卡斯蒂利亚的继位人，320

鼓励拉丁文的学习，330

被控利用宗教裁判所来取得财政利益，336

与驱逐犹太人，337

与哥伦布，424，430—431，433

贷款进行反对摩尔人的战争，449—450

又见Spain

Isabella，伊萨贝拉，葡萄牙王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女儿，她的婚姻，339—340

Isabella of Aragon，阿拉贡的伊萨贝拉，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350，356

Isenheim，伊森海姆，格吕内瓦尔德为安东尼教堂所作的祭坛画，164

Ishak，伊沙克，卡拉曼王子，399

Iskender Beg，伊斯坎德尔贝伊，奥斯曼海军司令，支持谢里姆反对艾哈迈德，407，409

Islam，伊斯兰教

格拉纳达投降后在西班牙受到镇压，324

为波斯尼亚贵族所接受，395

征服埃及后奥斯曼苏丹的地位，417

又见Safawiyya，Shiā

Ismā‘il，沙易司马仪，波斯国王

征服波斯，405—406

与河间地带的乌兹别克人的战争，406，410

与艾哈迈德和谢里姆之间的内战，410

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战争，411—412；在查尔德兰战败（1514年），412

与奥斯曼-麦木鲁克战争，413，415，416，417—418

Isonzo，伊松佐河，403

Istanbul，伊斯坦布尔，397，407，418

作为奥斯曼国家的首都，395

又见（1453年前）Byzantium；Constantinople

Istria，伊斯特拉，威尼斯得而复失（1508—1509年），214

Italian language，意大利语，3，177

Italian League，意大利同盟（1455年），与维持意大利和平的企图，204，349，351

Italy，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中的中心地位，5，193

13世纪以来诸侯权力的增大，6

外国干涉妨害统一，7

16世纪的共和主义，9

与职业军队的发展，10

16世纪外交机构的发展，10；又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教会土地转入非教会人之手，14

文艺复兴初期的财富和文化，与北方国家相对照，15

对艺术的保护，16—17

15世纪以前王朝的更迭，31

地理和经济，31—32

工业，32，47—48，344

海上贸易代替陆路贸易，40；东方贸易，46

法国和哈布斯堡控制北方，69

贵族和城邦，69—70

作为艺术发展的模式，192—193

成为外来侵略的诱惑物，263，265

15世纪末叶的繁荣，343

主要意大利国家的出现，343—349

又见 Arts in the Renaissance（意大利）；Literature（vernacular）（意大利）

Italy，意大利：入侵

外国对意大利的兴趣日增，344

入侵前夕的意大利各国，343—349；米兰，344；威尼斯，344—345；佛罗伦萨，345—346；教廷，346—347；那不勒斯，347—348；小国，348—349

查理八世的入侵（1494年）：有限的文化影响，104，106，171，182；马克西米连的干涉（1496年），202—203；瑞士的援助，204；查理的野心，295—296；米兰寻求法国保护以对付那不勒斯，296，350；查理初期的胜利，控制佛罗伦萨，占领那不勒斯，276，351—352；威尼斯同盟的形成（1495年），332，341；查理得到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的鼓励，350；意大利各国对入侵威胁的反应，351；威尼斯同盟和查理的失败（福尔诺沃战役，1495年），352—353；奥尔良的路易（路易十二）要求取得米兰，353；维切利和约（1495年），354—355；入侵在佛罗伦萨的影响，355

路易十二的入侵：路易十二对米兰公国的领土要求，353，355；他占领米兰（1499年），356—357；瑞士人在诺瓦拉（1500年）拒绝为米兰作战，357；路易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瓜分那不勒斯，

358；法国被赶出那不勒斯，358；教廷支持入侵并获利，355—356，358—359；热那亚起义，359；马克西米连干涉为威尼斯所败（1507年），359—360；马克西米连和路易结盟反对威尼斯（康布雷同盟，1508年），360；反法神圣联盟（1511年）的形成，361；瑞士进行干涉并赶出法国人（诺瓦拉战役，1513年），361—362；美第奇家族回到佛罗伦萨，362

弗朗西斯一世的入侵（1515年）：威尼斯支持法国，363；瑞士援助神圣同盟，363—364；瑞士人在马里尼亚诺战败（1515年），363；弗朗西斯一世战胜米兰，364—365；威尼斯的得失，365

意大利失败的原因，365—367

IvanIII, the Great, 伊凡三世，大帝，俄国沙皇

与俄罗斯国家的扩张，368—370；从鞑靼人压迫下解放，368

从王室和宗教方面提出的主权要求，369

Jade, Bay of, 亚德湾，25

Jadwiga, 雅维加，波兰女王，路易一世之女，与立陶宛的瓦迪斯瓦夫·亚盖沃结婚，371

Jagiello, house of, 亚盖沃王室，波兰和匈牙利的，213，368，371，372

Jagiello, Frederick, 亚盖沃，弗里德里希，红衣主教，375，378

Jamaica, 牙买加

为哥伦布所发现的，433，434

西班牙移民地，435

JamesIV, 詹姆斯四世，苏格兰国王，10，282

Jānberdi al-Ghāzālī, 占勃第·加扎里，麦木鲁克司令

在进攻加沙（1516年）中战败，416

逃跑后任奥斯曼的大马士革总督，416—417，418

Janik (Anatolia), 贾尼克 (安纳托利亚), 405, 412

Janissaries, 禁卫军

支持巴耶济德反对杰姆, 397

支持谢里姆反对艾哈迈德, 407, 408—409, 410

支持巴耶济德反对谢里姆, 409

在查尔迪兰战役中 (1514年), 411

在谢里姆对波斯作战时以兵变作威胁, 412

在达比克战役 (1516年) 中, 415

Japan, 日本, 与哥伦布的大西洋航行, 424

Java, 爪哇

葡萄牙与之贸易, 427

荷兰的远征 (1594年), 468

Jean (d' Albret), 让 (阿尔夫雷特), 纳瓦尔国王, 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对纳瓦尔的领土要求, 327—328

Jeanne, 让娜, 法国王后, 路易十二的第一个妻子, 293

Jebel Arsūs (Syria), 阿尔苏斯山 (叙利亚), 405

Jem, 杰姆, 奥斯曼王子, 因继承权与巴耶济德争吵, 被监禁并死去, 78, 94, 265, 396—398

Jews, 犹太人

在西班牙被禁止以宗教主题绘画, 168

被逐出西班牙 (1492年), 316, 319, 337—338; 对文学的影响, 179; 严重至极的经济后果, 338

卡斯蒂利亚的反犹太主义, 321

改变宗教的犹太人的问题, 335

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335—336

被逐出那不勒斯（1525年），337

Jiménez de Cisneros, Francisco, 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 弗朗西斯科, 红衣主教, 托莱多大主教, 80, 123

与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学术, 122, 124, 333

对艺术的保护, 165

与北非贸易的复苏, 319—320

在格拉纳达镇压伊斯兰教, 324

与费迪南德对自己兄弟查理五世的阴谋, 326—327

任卡斯蒂利亚摄政, 326, 333

与教士的改革, 333

Joachimstad, 约阿契姆斯塔尔, 39

Joanna (‘the Mad’), 胡安娜(“疯女”), 卡斯蒂利亚女王, 与菲利普大公爵结婚, 10, 201, 203, 210, 296, 320, 340, 341

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 325

Joanna, 胡安娜, 葡萄牙王后, 约翰二世的第二个妻子, 321

Joanna, 胡安娜, 外号“贝尔特朗氏”, 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之女, 她对继承权的要求, 325

Joanna II, 胡安娜二世, 那不勒斯女王, 347

John II, 约翰二世, 阿拉贡国王, 319, 320, 327

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事, 320—321

加泰罗尼亚战争, 320, 321

他的扩张王朝的计划, 321

把塞尔当和鲁西荣割让给法国, 340—341

John II, 约翰二世, 法国国王, 273

John II, 约翰二世, 葡萄牙国王

与葡萄牙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125

与通往印度的航道，421—425

与哥伦布发现美洲，424

死亡（1495年），424

与新世界的瓜分，431

John III，约翰三世，葡萄牙国王，340

John Albert，扬·奥尔布拉赫特，波兰国王，222，373—376各处，378.

对摩尔多瓦—奥斯曼联盟的战争，401—402

John Chrysostom，St，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圣，威廉·塞林译过他的一本小册子，108

John Fisher，St，约翰·费希尔，圣，见Fisher，John，bishop of Rochester

John of Gaunt，duke of Lancaster，贡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10

John of Hoome，霍恩的约翰，见Liège，John of Hoorne，bishop of

Josephus，约瑟夫斯，与人文主义者模拟古文物的开端，148

Juan，胡安，西班牙王子，费迪南德与伊萨贝拉之子，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结婚，10，201，340，341

Juanes Juan de，胡安内斯，胡安·德，与西班牙的意大利绘画风格，169

Julius II，pope（Giuliano della Rovere），朱理亚二世，教皇（圭利亚诺·德拉·罗韦雷）

性格和政策，81—84，93；受到伊拉斯谟的攻击，11，82；在法国道德剧中，186

与反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1508年），81，214，297，359，
360—361

组织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1511年），81，215，251，297，
342，361；雇用瑞士军队，207，215

在各国的教会中扩充教皇的权力，81—82，349，359，360—
361

拉特兰公会议（1512年），82，83—84，92，303，304

与罗马在文化上的优势，131

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坟墓，134，161—162

拉斐尔所绘的肖像，149

关于外交优先权的规定，268

协助阿拉贡的费迪南德进攻纳瓦尔，328

与国王在西属美洲对教会的控制，332—333

鼓励查理八世对意大利的野心，350

进攻佛罗伦萨，362

Junaid, Shaikh, 朱奈德，舍赫，与萨法威亚的军事发展，404—
405

Justus of Ghent (Joos van Wassenhove)，根特的于斯特斯
（裘斯·范·华森豪甫），佛兰德画家，169

Jutland, 日德兰，22

the Kabeljauws, 卡贝利奥派，与荷兰的霍克派的世仇，229

Kaffa, 卡法，47

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1475年），396

奥斯曼行省，408

Kaisersberg, Geiler von, 凯泽斯贝格，盖勒·冯，188

他曾受布兰特的《愚人船》的影响，187

论本国语言圣经的危险，196

Kā ‘it Bay, 卡耶特贝伊，麦木鲁克苏丹

与杰姆和巴耶济德之间的倾轧，397，398，400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399—401

Kamakh, 卡马赫，被谢里姆占领（1515年），412

Kānsūh al-Ghaurī, 甘萨伍赫·高里，麦木鲁克苏丹

与来自萨法威亚的威胁，406

与葡萄牙的战争，407

鼓励阿拉杜拉反对奥斯曼土耳其，413

他统治时的税收，414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413—415

在达比克草原战役（1516年）中丧生，415

Karabagh, 卡拉巴赫，412

Karagoz Pasha, 卡拉格兹帕夏，奥斯曼的卡拉曼总督，在反对麦木鲁克人的战役中，400

Karahisar, 卡拉希萨尔，并入奥斯曼行省，412

Karakhan, 卡拉汗，萨法威人在库尔德斯坦的司令官，412

Karaman, 卡拉曼，405

在奥斯曼帝国中（1464年），396

受麦木鲁克人的攻击，400

艾哈迈德从巴耶济德手中占领该地，409

Karaman-oghlū, 卡拉曼奥卢，土库曼部落，400，405

kars, 卡尔斯，412

Kāsim Beg, 卡西姆贝伊，卡拉曼统治者，支持杰姆反对巴耶济德，397

Kastamuni, 卡斯塔莫努, 405

向奥斯曼土耳其屈服, (1465年), 395

Kaysari, 开塞利, 412

被阿拉杜拉包围, 401

萨法威人叛乱中的战斗 (1511年), 406, 409

在奥斯曼战争中, 411, 414

Kemalpāshazāde, 凯末尔帕夏扎德, 奥斯曼诗人和历史学家, 论谢里姆苏丹, 419

Kempenland, 肯彭兰, 24

Kempis, Thomas a, 肯皮斯, 托马斯·阿, 18, 112

Khā ‘ir Beg, 哈伊尔贝伊, 麦木鲁克的阿勒颇总督

在达比克草原战役 (1516年) 中叛变, 415

为奥斯曼土耳其服务, 416, 417

Khoja Alī, Shaik, 火者阿里, 舍赫, 萨法威亚领袖, 404

Khorasan, 呼罗珊, 受到乌兹别克人的攻击 (1510年), 406

Khushkadam, 胡什盖德木, 麦木鲁克苏丹, 400

Khusred Pasha, 胡斯列甫帕夏, 奥斯曼的卡拉曼总督, 412

Kilià, 基利亚, 被奥斯曼土耳其所, 占领 (1484年), 375, 376, 394

Kinizsi, Pál, 金尼茨, 帕尔, 抵御奥斯曼土耳其, 375, 398

Kipchak, 钦察人, 21; 另见Tatars

Konia (Anatolia), 科尼亚 (安纳托利亚), 396

在奥斯曼战争中, 411, 414

Konigsberg, 柯尼斯堡, 44

Kopparbeg, 科帕尔贝里, 在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地图上, 22

Korkūd, 考尔库德, 奥斯曼王子, 巴耶济德之子, 397, 407

被谢里姆处死, 410

Kossovo, battle of, 科索沃战役 (1389年), 33

Kozelsk, 科泽尔斯克, 并入俄罗斯国家中, 369

Kufstein, 库夫施泰因, 被马克西米连所兼并 (1504年), 211,
212

Kuno, John, 库诺, 约翰,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 与希腊语教学,
119

Kurdistan, 库尔德斯坦, 414

为乌宗·哈桑所征服, 396

为沙易司马仪所占据, 406

奥斯曼的控制, 412—413

Kutahia, 屈塔希亚在萨法威亚叛乱中 (1511年), 406

在奥斯曼-麦木鲁克战争中, 414 Kutna Hora, Treaty of, 库
特纳霍拉条约 (1485年), 389

Kuttenberg, 库滕贝格, 39

Labrador, 拉布拉多, 被卡蒂埃并入法国 (1534年), 466

La Cavalleria family, 拉卡瓦列里亚家族, 与费迪南德和伊萨
贝拉的婚姻, 321

Laffemas, Barthélemy, 拉费马, 巴泰勒米, 与“新法兰西”,
467

Lagadeuc, Jean, 拉加德克, 让, 他的《布列塔尼—拉丁—法语
辞典》, 191

Lalaing family, 拉拉印家族, 245

Lanchals, Pierre, 朗夏尔, 皮埃尔, 马克西米连的财务大臣,
被布鲁日各行业的工人所处决 (1488年), 235

Landino, Cristoforo, 兰迪诺, 克里斯托福罗, 他的《卡马尔多利会论争》, 97

Landshut succession, war of, 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 211, 212

Landsknechte, 德意志雇佣兵马

克西米连试图组织, 278

以瑞士为样板的战术, 285

Langen, Rudolf von, 朗根, 鲁道夫·冯, 与人文主义教育, 116

Lannoy family, 拉努瓦家族, 245

Lapland, 拉普兰, 21

Lascaris, Constantine, 拉斯卡里斯, 康斯坦丁, 希腊流亡学者, 与希腊语教学, 99, 100

Lascaris, John, 拉斯卡里斯, 约翰, 希腊流亡学者

与希腊语教学, 100

受雇于路易十二, 104, 182

Latin language, 拉丁语

对传播人文主义的影响, 17, 107, 122—123

在历史编纂学中仍然存在, 177

伊拉斯谟和对地方语言文学的影响, 171

在外交上, 271

Latomus, Jaeobus, 拉脱姆斯, 雅各布, 尼德兰人文主义者, 反对讲授希腊语, 113

Laurentinum, 劳伦提努姆, 132

Law, Roman, 罗马法, 102

比代的《法学汇编评注》, 105

在德意志: 不信任罗马法, 89; 传播, 约1500年, 197—198

Lazzari, Donato d' Angelo, 拉扎里, 多纳托·德·安杰洛, 见 Bramante

League of Cambrai, 康布雷同盟 (1508年), 81, 214, 297, 342, 345, 359—360, 362

League of Venice, 威尼斯同盟 (1495年), 201, 261, 332, 341, 353, 354

Lebanon, 黎巴嫩, 奥斯曼承认其基督教特权, 417

Lechfeld, battle of, 莱希费尔德战役 (955年), 36

Lefèvre d' Étaples, Jacques, 勒费弗尔·戴塔普, 雅克, 18, 65—66, 105, 117

与巴黎的人文主义, 63, 307—308

受到苏尼加的攻击, 124

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126

在意大利, 182

Leghorn, 里窝那, 47

马克西米连包围该城 (1496年), 203

投降法国 (1494年), 352

Legnano, Johannes de, 莱尼亚诺, 约翰内斯·德, 论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 259

Leiden, 莱顿, 108 Leipzig, 莱比锡, 44

Leipzig, University of, 莱比锡大学, 116, 119

Lemaire de Beiges, Jean, 勒梅尔·德·贝尔热, 让, 112, 193

与法国的人文主义, 182

比韵律家的形式主义进步, 183—184

教会自立主义的宣传, 303

Lemnos, 利姆诺斯岛, 奥斯曼占领该岛, (1455—1456年), 395

Lemoine, college of Cardinal, 勒穆瓦纳红衣主教神学院, 巴黎, 307

Leo X, pope (Giovanni de' Medici), 利奥十世, 教皇 (乔瓦尼·德·美第奇), 92, 93, 95, 124, 255, 362

《斥马丁·路德》通谕, 19

与波洛尼亚政教协议 (1518年), 84—86, 365

与朱理亚二世对比, 84

与售卖赎罪券, 88

与十字军东征, 94, 218, 388, 392—393

与红衣主教团, 94

与罗马学院, 96

拉斐尔的壁画中对他的描绘, 142, 143; 拉斐尔所画的肖像, 149
佛罗伦萨凯旋式, 147

与神圣同盟 (1511—1513年), 217, 363

支持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做德意志王候选人, 219

同意西班牙神职人员缴纳补助费, 334

重用亲属和关心世俗权力, 363

与弗朗西斯一世的媾和 (1516年), 365

Leon, 莱昂, 48

Leopardi, Alessandro, 莱奥帕尔迪, 亚历山德罗, 意大利雕刻家, 136

Lepanto, 莱潘托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2; 被奥斯曼所占领 (1494年), 403, 404

莱潘托战役 (1571年), 447

Le Sauvage, Jean, 勒索瓦热, 让, 与尼德兰枢密院, 250, 251, 252—253

Lesbos, 莱斯博斯岛并入奥斯曼帝国 (1462年), 395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4

Leto, Pomponio, 莱托, 蓬波尼奥, 121

与考古学研究, 96, 99

Lev, Zdeněk, of Rožmítal, 列夫, 日丹涅克, 罗兹米达的, 波希米亚酒饼同领派领袖, 391

Lewis I, the Great, 路易一世, 伟大的, 匈牙利和波兰国王, 371, 382

Lewis II, 路易二世,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213, 222, 391

与哈布斯堡的安妮结婚, 380

与奥斯曼对匈牙利的进攻, 392—394; 在莫哈赤溺死 (1526年), 394

Lewis IV, 路易四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267

Leyden, Lucas van, 莱登, 卢卡斯·范, 德意志艺术家, 他受丢勒的影响, 156

Libanius, 利巴尼奥斯, 114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评英国的政策》 (1436年), 41

Libraries, 图书馆, 95

法国国王的, 58

梵蒂冈的, 76, 95

斯福尔扎的图书馆迁往法国, 104

Lichtenstein, Paul von, 利希滕斯坦因, 保罗·冯, 蒂罗尔地方长官, 215注

Liège, 列日, 中世纪煤矿业, 38

Liège, Érard de la Marek, bishop of, 列日主教, 埃拉尔·德·拉马克, 247, 250, 254

Liège, John of Hoorne, bishop of, 列日主教, 霍恩的约翰, 233, 241, 247

Liège, Louis de Bourbon, bishop of, 列日主教, 路易·德·波旁, 229, 232

Liège, bishopric of, 列日主教区

勃艮第的玛丽被迫放弃其在列日主教区的权利（1477年）, 229

法国入侵时路易·德·波旁企图得到对其中立的承认（1477年）, 229

霍恩·德·拉马克的世仇与哈布斯堡—瓦卢瓦的角逐, 229, 232—233, 241, 247, 250, 253; 圣特隆德条约（1518年）, 257

被邀参加1488年的“同盟”, 236

Liège, Pays de, 列日地区, 256

与布拉邦特公爵领地, 232—233

在尼德兰的地位, 242; 与圣特隆德条约（1518年）, 257

Lille, 里尔, 252

审计院的独立, 230, 246

Lilly, William, 利利, 威廉, 圣保罗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07

Lima, Rodrigo de, 利马, 罗德里戈·德, 他对阿比西尼亚的探险, 423

Linacre, Thomas, 利纳克尔, 托马斯

他的拉丁语语法, 107

与医药研究, 109

与世俗的人文主义, 126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林索登, 扬·胡根·范, 与荷兰对东印度群岛的探险, 468

Lippi, Filippino, 利比, 菲利皮诺, 意大利画家, 他为斯特罗齐家族绘画, 137—138

Lisbon, 里斯本, 49, 423, 424, 425, 427

葡萄牙的占领(1147年), 420

殖民地贸易的霸权, 448, 468

对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 457

Literature, vernacular, 文学, 本民族语言文学: 又见作家姓名各条

从中世纪传统到人文主义传统的转变, 169—171

在意大利: 对行吟诗的改作, 70; 政治不统一和文学地方化, 171—172; 反对彼特拉克主义, 172; 叙事体和传奇体的结合, 172—174; 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 173—174; 奥达西和福伦果, 174; 古典主义对戏剧的影响, 174, 175; 圣剧, 175; 喜剧, 175—177; 阿廖斯托的戏剧作品, 176; 历史编纂学, 177—178; 小说, 178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中世纪传统根深蒂固, 178;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时期, 178—179; 卡斯蒂利亚文学占优势, 178—179; 抒情诗, 179; 散文, 179—180; 《高卢的阿马迪斯》, 180, 181; 帕尔梅林传奇故事, 180; 《塞莱斯蒂娜》, 180—181; 地方语编年史, 181; 内布里哈和恩西纳的诗论, 181; 戏剧, 181—182

在法国: 中世纪的传统和意大利的影响, 182; 大修辞家, 182—183; 勃艮第编年史家, 183; 马罗和勒梅尔·德·贝尔热, 183—184; 散文, 184—185; 戏剧, 185—186; 普罗旺斯的文学, 186

在德意志: 抒情诗歌和工匠歌手, 186; 道德说教剧, 187; 讽刺作品, 187—188; 拉丁文学的翻译, 188; 罗伊希林是路德的前驱, 188; 路德和德语散文, 188—189

在尼德兰: 修辞院和道德剧, 189(又见62, 69, 170)

在英国：人文主义的痕迹，189；规诫作品，189；中世纪传统根深蒂固，189—190；通俗诗歌和道德剧，190；散文，伯纳斯和马洛里，190—191

在斯堪的纳维亚，191

盖尔语文学：本地传统根深蒂固，191

在布列塔尼、康沃尔和威尔士的布列塔尼凯尔特文学，191—
192

西欧以外地区，192

Lithuania, 立陶宛

向往与莫斯科统一，369

大公国脱离波兰王国，374—375，385

伊凡大帝的入侵，369，376—377

Livery companies of merchants, 商人同业公会，54

Livy, 李维，58，70

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影响，97，111，173

Llanoh Femando, 利亚诺斯，费尔南多，西班牙画家，169

Locarno, 洛迦诺，207

Lodi, Peace of, 洛迪和约（1454年），267，343，344

Loire, 卢瓦尔河，25

Lombardi, Antonio and Tullio, 隆巴尔迪，安东尼奥和图利奥，雕塑家，135

Lomellino, house of, 洛梅利诺家族，热那亚银行家，334

London, 伦敦，人口，42

London Chronicle, 《伦敦编年史》，54

London, Treaty of, 伦敦条约（1518年），264

Longueil, Christopher de (Longolius), 隆格伊尔, 克里斯托弗·德 (隆格里乌斯), 人文主义学者, 113—114

Lorch am Rhein, 莱茵河畔洛尔奇, 195

Loronha, Fernão de, 洛隆哈, 费尔南·德, 429

Lotto, Lorenzo, 洛托, 洛伦佐, 画家, 139, 148

Louis XI, 路易十一, 法国国王, 1, 6, 183, 292, 321, 351

鼓励开矿, 26

与法国的地中海贸易, 48

与罗马教廷的专制主义, 82

起用科明, 184

入侵尼德兰 (1477年), 224—231各处

计划让太子查理与勃艮第的玛丽结婚, 226, 227

与金羊毛骑士团, 230

与阿拉斯和约 (1482年), 231—232, 294

逝世 (1483年), 233

贿赂外国官员, 266

与爱德华四世会晤 (1475年), 266

性格和能力, 293

税收, 300

设立外交机构, 301

对国事诏书的态度, 302

鼓励外国商人和手工艺者, 310—311

他对那不勒斯继承权的要求, 336

Louis XII, 路易十二, 法国国王, 12, 104, 158, 186, 245, 266, 286, 298

与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与亚历山大六世的关系，80；比萨的“集市”（1511年），82—83，207，215，303，304，361；利用法国教会自立主义对抗罗马教廷，202—203，304；教会改革，307

与思想自由，103

佩雷阿尔所画的肖像，158

把贝林佐纳割让给瑞士（1503年），206，263，361

布卢瓦条约（1504年），210，213

与尼德兰，229，244，245，248，250

与玛丽·都铎结婚，252；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356

逝世（1515年），253

使用常驻使节，268

试图组织本国的步兵，278；炮术的发展，301

对甲冑制造者的保护，284

税收，300

与纳瓦尔的阿尔弗雷特和弗瓦两大家族之间的纠纷，327—328

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1494年），守卫热那亚，352；占领诺瓦拉，353

他的入侵意大利（1499年）：对那不勒斯的权利要求，336；对米兰的权利要求，353，355；在意大利受到的支持，355—356；招募瑞士人，356；占领米兰和俘获洛多维科·斯福尔扎，356—357；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瓜分那不勒斯，357—358；被赶出那不勒斯（加里利亚诺战役，1503年），358；在罗马涅协助朱理亚二世，359；与费迪南德在萨沃纳会晤，359；与马克西米连联合反对威尼斯（康布雷同盟，1508年），360；在阿尼亚德洛打败威尼斯（1509年），360；组成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1511年），拉文纳战役（1512年），361；瑞士的干涉与法军的被逐（诺瓦拉战役，1513年），361—362

与波兰和匈牙利结盟的计划（1500年），378

Louvain，卢万，237

省议会（1477年），与批准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结婚，

与阿拉斯和约（1482年），231，233

Louvain University of, 卢万大学，113

Lubeek, 吕贝克，成为贸易中心，44；在汉萨同盟中，45

Lucca, 卢卡，47

Lucerne, 卢塞恩，瑞士州，204，205

Lucerne, Treaty of, 卢塞恩条约（1510年），与瑞士在军事上为罗马教廷效力，207

Lucian, 琉善，xxiii, 114

索多马在法尔内斯别墅的绘画，147

Luder, Peter, 吕德尔，彼得，与德国的人文主义，116，117

Lugano, 卢加诺，207

Lugano, Lake, 卢加诺湖，364

Lukas, Brother, 卢卡斯长老，波希米亚“弟兄联盟”领袖，389

Lü burg, 吕内堡，24

Lu satl, 卢萨蒂亚，与波希米亚合并，389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19，38，113，218

关于赎罪券的论纲，88

与德意志的反罗马情绪，89

访问罗马（1510—1511年），89

对丢勒和格吕内瓦尔德的影响，164—165

他的圣经，188—189

与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381

Luxemburg, 卢森堡，229

在大枢密院派有代表，225

Luxemburg, house of, 卢森堡家族，9，371

Luxemburg, Louis de, 卢森堡，路易·德，183

Lyndsay, Sir David, 林赛爵士，戴维，190

Lyons, 里昂，303

工业，43，312

16世纪的文化地位，182

神秘剧和道德剧，185

成为工业和贸易中心，311，312，313

Lyons, Treaty of, 里昂条约（1501年），245

Mabuse (Jan Gossaert), 马比斯（扬·戈萨尔特），佛兰芒画家，155

受意大利和古典作品的影响，157

Macgregor, Sir James, 麦格雷戈爵士，詹姆斯，《利斯莫尔教长的书》，191

Macao, 澳门，与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448

Macauley, Thomas Babington, baron, 麦考利男爵，托马斯·巴宾顿，20

Machiavelli, 马基雅弗利，73，81，84，88，170，185

他的《君主论》，7，177—178，273，274，362—363；与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对比，5—6

他把两种相反的政治理论合而为一，16

《佛罗伦萨史》，47—48，178

与科明对比，60—61

古典历史学家的影响，97

他的戏剧作品和诗歌，175，176，177

论德意志帝国的无能，194

论使节的职责和苦衷，269—270，272

“马基雅弗利主义”，273—274

他的《论战争艺术》，277

论瑞士军队的素质，279，364

论意大利军队，279—280

论威尼斯的衰落，344

论切萨雷·博尔贾，359

论路易十二的侵略，362

论奥斯曼苏丹，410

Machuca，马丘卡，与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影响，168

Madeira，马德拉群岛

葡萄牙的殖民，420，421

所有权被承认（1479年），340

Madrid，马德里，48

Madrid，Gutiérrez de，马德里，古铁雷斯·德，与各骑士团的收入，330

Magdalen College，莫德琳学院，牛津，106，107

Magdeburg，马格德堡，23，24，44，195

Magellan（Fernão de Magelhaes），麦哲伦（费尔南·德·马加良斯），445

环绕地球的航行，429—430，437

Maggiore，Lake，马乔列湖，364

Magyars，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定居和归化，36

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37

Mahmud Beg, 马哈茂德贝伊, 土库曼王子, 在达比克草原战役中 (1516年), 415

Maiano, Benedetto da, 马亚诺, 本内代托·达, 意大利建筑家, 128

Maillard, Olivier, 马亚尔, 奥利维埃, 93

他的通俗的传道词, 184

与教会改革, 307

Mainz, archbishop of, 美因茨大主教, 作为世俗的统治者, 195

选侯, 他在国会中的作用, 194

Mainz, Albert of Hohenzollern, 美因茨大主教, 霍亨索伦的阿尔贝特, 红衣主教, 马格德堡大主教

仿效意大利王公, 162

兼职过多的例子, 195

与查理大公的当选为德意志王, 218—219

Mainz, Berthold of Henneberg, archbishop of, 美因茨大主教, 亨内贝格的贝特霍尔德, 202, 209

对地方语文学的检查, 196

与施瓦本同盟, 198

与帝国的改革, 199—200, 200—202, 203, 208—209, 210

逝世 (1504年), 211

与佛兰德起义 (1488年), 236

Mainz, *Reichstag of*, 美因茨议会, (1517年), 217

Mainz, University of, 美因茨大学, 196

Maître de Moulins', “穆兰画师”, 法国画家, 传统哥特风格的典型, 158

Malabar Coast, 马拉巴尔海岸, 与葡萄牙的贸易, 425—426

Malacca, 马六甲
被葡萄牙占领（1572年），427
在葡萄牙的贸易中，448

Mfilaga, 马拉加，318

Malay Straits, 马来海峡，葡萄牙的控制，427

Malfante Antonio, 马尔凡特，安东尼奥，论非洲的商队贸易，
47

Malherbe, François de, 马雷伯，弗朗索瓦·德，法国诗人，
172

Malindi, 马林迪，达·迦马访问该地（1498年），425

Malines, 马林，113, 234, 239, 244, 246, 252
最高法院，224, 230
与1488年“同盟”，236

Malkoch-oghlü tribe, 马尔科奇-奥卢部落，408

Mallorca, 马略尔卡，318

Malory, Sir Thomas, 马洛礼爵士，托马斯，54, 191

Malta, 马耳他，318

Maltepe, 马尔泰培，穆罕默德二世在该地，397

Mancinelli, Antonio, 曼奇内利，安东尼奥，他的文法书代替中
世纪课本，96

Mancini, Domenico, 曼奇尼，多梅尼科，103

Manilius, 马尼利乌斯，雷乔蒙塔努斯的版本（1472年），118

Manisa, 马尼萨，407

Mantegazza, Antonio, 曼泰加扎，安东尼奥，135

Mantegna, Andrea, 曼特尼亚，安德烈亚，意大利画家

他所绘《帕尔纳苏斯》中的寓言，144—145

他所绘《恺撒的胜利》，147—148

对丢勒的影响，154

《维多利亚圣母像》，353

Mantovano, Battista, 曼托瓦诺，巴蒂斯塔，见Mantuan

Mantovano, Pomponio, 曼托瓦诺，蓬波尼奥，在西班牙讲学，121, 122

Mantua, 曼图亚，47, 95, 145, 148, 171, 267, 345

达·费尔特雷的学校，71

与巴耶济德联盟反对威尼斯，265

15世纪时的地位，348—349

与康布雷同盟（1508年），360

Mantuan (Battista Spagnoli, Battista Mantovano, Baptist of Mantua), 曼图安（巴蒂斯塔·斯帕尼奥利，巴蒂斯塔·曼托瓦诺，曼图亚的浸礼教徒），圣衣会宗教作家，人文主义者，117, 189, 193

Manuel I, the Great, 曼努埃尔一世，伟大的，葡萄牙国王

他的婚姻与菲利普二世对葡萄牙王位的要求，340

与葡萄牙对印度的探险，425—427

与巴西沿海的探险，428

Manuel Niklas, 马努蒂乌尔，尼科拉斯，他的戏剧中对天主教的攻击，187

Manutius, Aldus, 马努蒂乌斯，阿尔杜斯，出版商和人文主义者，95—96, 97, 116, 150, 177

Maps and charts, 地图和航海图

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地图（1539年），22

加泰罗尼亚海员的航海手册， 48

威尼斯总督赠给葡萄牙佩德罗的《世界舆地图》， 422

坎蒂诺和卡内里奥， 428

葡萄牙禁止出口， 429

法国私掠船员使用西班牙航海图， 458

荷兰在航海图测绘方面领先， 469

Marañon, Dr.， 马拉尼翁， 医生， 考证“贝尔特朗氏”胡安娜的合法性， 320

Marásh, Albistan, 马拉什， 阿尔比斯坦， 400

Marcanova, Giovanni, 马尔卡诺瓦， 乔瓦尼， 他在碑铭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99

‘Mar Dulce’， “杜尔塞海”， 平松发现该地， 可能是亚马孙河出口， 428

Margaret of Austria, duchess of Savoy,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萨瓦女公爵， 10, 183, 201, 215, 244, 340, 341

对艺术和文学的保护， 159, 160—161, 182—183

与康布雷同盟（1508年）， 214, 360

出生（1480年）， 230

计划和法国太子查理结婚， 231—232, 233, 294

查理解除与她的婚约， 239

被扣押为人质， 240

森里斯和约归还她的陪嫁领地（1493年）， 242

从法国归来（1493年）， 242

与查理大公的未成年时期， 248—252

反对她的再征服战争， 248—249

她的性格和爱好， 249

与各省议会的关系和康布雷和约（1508年），249，250

与英国的同盟和对盖尔德斯的进攻，250—251，252

与各省的中立，251

与神圣同盟，251—252

在查理大公统治时期改变她的刘法政策，253—254

在查理离国前往西班牙时期，257与列日问题，257

Margaret of Navarre，纳瓦尔的玛格丽特，见 Alençon，
Marguerite d

Margaret Tudor，玛格丽特·都铎，苏格兰王后，詹姆斯四世之
妻，10，190

Margaret of York，约克的玛格丽特，勃艮第公爵勇者查理的遗
孀，224，226，234

支持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结婚，227

支持珀金·沃贝克，244

Margarita island，玛格丽塔岛，在哥伦布对加勒比的探险中，
433

Margarit i Pau，Joan，马加里特·伊·帕乌，霍安，红衣主
教，赫罗纳主教，与阿拉贡的新学术，125

Marienburg，马林堡，44

条顿骑士团会议（1506年）和东普鲁士公爵领地，379—380

Marignano，battle of，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285，
289，364，366

炮术的有效应用，284

Mari Dabik，battle of，达比克草原战役（1516年），麦木鲁克
—奥斯曼战争中的，415

Mameffe family，马尔内夫家族，印刷商，312

Marot, Clément, 马罗, 克莱芒, 法国诗人, 182, 183

Marot, Jean, 马罗, 让, 法国诗人, 183

Marseilles, 马赛, 与东印度贸易, 467

Martin V, pope (Oddo Colonna), 马丁五世, 教皇 (奥多·科隆纳), 346

Martinez de Toledo, Alfonso, 马丁内斯·德·托莱多, 阿方索, 他的《科尔巴乔》, 179—180

Martorell, Johanot, 马托雷尔, 约翰诺特, 加泰罗尼亚作家, 他的《暴君布兰奇》, 180

Mary, 玛丽,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后, 路易二世之妻, 380

Mary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玛丽, 见Burgundy, Mary, duchess of

Mary, 玛丽, 卡斯蒂利亚王后, 约翰二世的第一个妻子, 321

Mary Tudor, 玛丽·都铎, 法国王后, 路易十二之妻, 215, 250, 252

Masip, Vicente Juan, 马西普, 维森特·胡安, 与意大利化的画派, 169

Masovia, 马佐夫舍, 为波兰的西吉斯孟一世所并吞, 385

Mathematics, 数学, 意大利和德国重新研究, 68

Matthias Corvinus, 马加什·科尔文, 匈牙利国王, 37, 221, 372—373

逝世 (1490年), 373, 401

他的几次婚姻, 373

与马克西米连谈判, 373

与匈牙利的宪政发展, 385

他的“黑军”, 386与奥斯曼土耳其, 398

Mauro, Fra, 毛罗, 弗拉, 地理学家, 422, 423

Maya cities, Yucatán, 玛雅城市, 尤卡坦, 439

Maximilian I, 马克西米连一世, 德意志王, 神圣罗马帝国当选皇帝, 1, 7, 8, 248, 265, 268, 295, 326

他想当教皇的野心, 13, 215

与人文主义, 17—18, 117

他的《白色的国王》, 161, 282

对艺术的保护, 161—162, 187

继承弗里德里希三世(1493年), 194

性格和外貌, 198—199, 210

在奥地利: 获得蒂罗尔(1490年), 199; 组织和统一, 203, 219—221

与瑞士对施瓦本同盟的战争(1499年), 198, 206, 356

与帝国议会的改革, 199—216 各处; 又见 Empire, Holy Roman: 帝国的改革

在尼德兰: 入侵弗朗歇—孔蒂和森里斯和约(1498年), 198—199, 241, 242—243, 351; 在布鲁日遭到监禁(1488年), 200, 235—236, 238; 和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通过代表), 200, 239, 295; 入侵勃艮第的计划(1498年), 203—204; 与盖尔德斯公爵领地, 204, 227—228, 229, 240, 247; 与根特, 227—228, 230—231, 232, 233—234, 235—236, 239, 241; 法国战争(1477—1482年), 228—231; 与英国和布列塔尼结盟(1478年, 1480年), 229, 232; 与乌得列支主教区, 232, 233; 与列日主教区, 229, 232, 241—242, 247, 250; 行政改革, 230—231; 阿拉斯和约(1482年), 231—232, 241; 任菲利普大公的摄政, 231以下(又见 Netherlands: 菲利普大公的未成年时期); 征讨法国的失败(1486年, 1487年), 236—237; 撤回德意志(1489年), 237; 与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菲利普争吵, 238—240, 245; 与英国和西班牙结盟, 240—241, 341; 与菲利普大公的亲政, 243; 与约克的玛格丽特对珀金·沃贝克的支持,

244；与查理大公的未成年时期，248，249—250，252；与查理的成年，252；批准努瓦荣条约，254

与意大利：把米兰公国授与洛多维科·斯福尔扎，200，355；与比安卡·玛丽亚·斯福尔扎结婚，200；与威尼斯同盟（1495年），200—201，261，332，341，353；根据对沃尔姆斯敕令（1495年）尊重的情况支持他的意大利计划，201；他1496年的远征失败，202—203；布卢瓦条约和哈格诺条约（1515年，1516年）与承认路易十二为米兰公爵，210，245；与康布雷同盟（1508年），214—215，342，359—360；与神圣同盟（1511年），215—217，251，342，363，364；最后一次出征意大利（1516年），217；在帕多瓦包围战中遭到贝亚尔的责任（1509年），285；在米兰失陷后收留洛多维科·斯福尔扎（1499年），357；1508年出面干涉并为威尼斯所败，359—360

与十字军东征，200，209，218，219；致力于多瑙河联盟，221—223

王室的安排，210，296

在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中获利，210—211

干涉匈牙利，213，222，373，374，378—380

采用当选皇帝的称号（1508年），214

与教会改革，215

与选举查理大公为德意志王，218—219

加冕为皇帝的计划，219

逝世（1519年），219，257

总结他的一生，219—223

恢复金羊毛骑士团，230

当选为德意志王（1486年），234

企图改善雇佣兵，278

Mazzoni, Guido, 马佐尼，圭多，意大利雕塑家，159

Mecca, 麦加，400，401，407

Mechanics, 力学, 15世纪时在德意志取得进步, 68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23, 24, 25

Medemblik, 麦丹布立克, 256

Medici family, 美第奇家族, 16, 96, 97, 157, 345, 346, 348
情报机关, 269

银行业活动, 313, 346

在驱逐法国人出境后重新在佛罗伦萨掌权, 362—363

Medici, Cosimo de' , 美第奇, 科西莫, 德, 267

Medici, Giovanni de' , 美第奇, 乔瓦尼·德, 见Leo X, pope

Medici, Giuliano de' , 美第奇, 朱利亚诺·德, 内穆尔公爵,
134, 362—363

Medici, Lorenzo de' , the Magnificent, 美第奇, 洛伦佐·
德; 庄严的, 84, 132, 147, 149, 172, 173

他的“柏拉图学园”, 75

与雕塑家的艺术地位, 152

他的文学创作, 172, 175

为共和国服务, 346

他的在意大利实现和平的政策, 349, 351

逝世(1492年), 349

Medici, Lorenzo de' , 美第奇, 洛伦佐·德, 皮耶罗之子,
134, 362, 363

在神圣同盟的战争中, 363

被利奥十世安插在乌尔比诺, 363

Medici, Piero de' , 美第奇, 皮耶罗·德, 354

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反对查理八世, 351, 352

把佛罗伦萨让给查理，352

Medicine, 医药

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的研究，96；利纳克尔，109 “那不勒斯症”，354

Medina, 麦地那，401

Medina del Campo, 麦迪纳德坎波，与羊毛贸易，29，318

Medina Sidonia, duke of, 梅迪纳公爵，西多尼亚，329

Medium aevum, significance of, “中世纪”的意义，1

Mehemmed II,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苏丹，10，78，348

帝国的巩固，395—396，400

逝世（1481年），396，397，398

Mehemmed Beg, 穆罕默德贝伊，奥斯曼的爱尔巴桑总督，404

Meistergesang, 工匠诗歌，186

Meit, Conrad, 梅特，康拉德，德意志雕塑家，他作品中的古典影响，159

Melanchthon, Philip, 梅兰希顿，菲利普，德意志神学家，119

Memling, Hans, 梅姆林，汉斯，佛兰德画家，156，158

Menćetić, Sisko, 门切蒂奇，西斯科，他诗歌中的人文主义影响，192

Mendoza, Pero Gonzales de, 门多萨，佩罗·冈萨雷斯·德，托莱多大主教

对艺术的保护，165，167

范切利为他的陵墓安装雕饰，168

Menglī Ghiraī, 蒙里·吉莱，克里米亚鞑靼人可汗，支持谢里姆反对艾哈迈德，408，410

Menot, Michel, 梅诺，米歇尔，他的通俗的讲道词，184

Mentelin, John, 门特林, 约翰, 出版家, 189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定义, 446, 又见 Expansion (overseas)

Mercator, Gerard, 默尔卡托, 吉拉尔德, 佛兰德地理学家, 420

Merchant Adventurers, company of, “冒险商公司”, 460, 462

Meriask, St, 梅里亚塞克, 圣, 康沃尔宗教剧的《圣梅里亚塞克的一生》, 192

Mers-el-Kebir (North Africa), 凯比尔港 (北非), 与加泰罗尼亚的贸易, 319

Meschinot, Jean, 梅希诺, 让, 法国诗人, 183

Messina, 墨西拿, 99

Metz, 梅斯, 受到冯·济金根的攻击 (1518年), 217

Meung, Jean de, 孟, 让·德, 法国诗人, 2

Meuse, 默兹河, 247

Mexico, 墨西哥, 西班牙的探险和占领, 323, 437, 439—443; 又见 America (Spanish)

Mexico, Gulf of, 墨西哥湾, 西班牙的探险, 439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米开朗琪罗, 博纳罗蒂, 127, 142, 151

他的第一个建筑设计, 133

他的雕塑, 134—135; 朱理亚二世墓, 134, 161

以宗教主题为主, 136

西斯廷小教堂穹顶画, 139—141

他在佛罗伦萨画的战争场面, 141

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146

学艺，152

与艺术家对保护人关系的变化，153

他的十四行诗，172

Michelet, Jules, 米什莱，朱尔，法国历史学家，xxviii, 16

Michelozzo, 米凯洛佐，雕塑家和建筑家，131

Middleburg, 米德尔堡，247

Miguel, Dom, 米格尔，堂，曼努埃尔和葡萄牙的伊萨贝拉的幼子，244, 340

Mikhal-Oghlū Iskender Pasha, 米卡尔奥卢·伊斯坎德尔帕夏，奥斯曼攻打威尼斯的指挥官，403

Mikkel of Odense, 欧登塞的米克尔，他的宗教诗，191

Milan, 米兰，6, 15, 31, 95, 100, 131, 155, 269, 303, 464

灌溉渠道，32

人口和工业，47

维斯孔蒂的统治，71, 267；斯福尔扎统治的开始，344

与法国的入侵，217, 275；和威尼斯一起寻求马克西米连的干涉，202—203；寻求查理八世的保护以对抗那不勒斯，296, 350；参加威尼斯同盟（1495年），332, 341, 353；维切里和约（1495年），354—355；路易十二对公国的要求，353, 355；法国占领（1499年），356—357；瑞士人拒绝在诺瓦拉作战（1500年），357；康布雷同盟（1508年），360；神圣同盟（1511年），361；逐出法国人（1513年），361—362；弗朗西斯一世的入侵（1515年），363；弗朗西斯取得米兰，364—365

使用常驻使节，267, 268

军事组织，279, 344

在保卫意大利中的重要性，344

- 265 惧怕威尼斯的扩张, 345; 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反对威尼斯,
- 保护弗拉拉, 348
- 反对罗马教廷控制罗马涅, 349
-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宫廷, 353
- Milan, dukes of, 历代米兰公爵, 见Sfor-za; Visconti
- Mina, 米纳, 葡萄牙在该地的城堡, 422
- Mincio, 明乔河, 348, 360
- Minnesang* and *Meistergesang*, 抒情诗歌和工匠诗歌, 170, 186
- Mirandola, 米兰多拉, 被朱理亚二世攻占, 81
- Mirandola, Giovanni Pico della, 米兰多拉, 乔瓦尼·皮科·德拉, 见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ri
- Mirk, John, 米尔克, 约翰, 他的《节日便览》, 90
- Modon, 莫敦, 406
-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2; 陷落(1500年)并为威尼斯所割据, 403, 404
- Mohács, battle of, 莫哈奇战役(1526年), 37, 222, 368, 386, 394
- Moldavia, principality of, 摩尔多瓦公国, 368
- 与奥斯曼的宗主权, 375—376, 396, 399
- 与波兰的宗主权, 376, 377, 399, 401—402
- Molinet, Jean, 莫利内, 让, 勃艮第诗人和编年史家, 183
- Moluccas, 摩鹿加, 葡萄牙人到该地的航行, 与贸易, 437, 448
- Mombaer, Jean, 蒙巴尔, 让, 宗教作家, 80; 与修道院的改革, 307
- Mombasa, 蒙巴萨, 达·迦马曾访问过该地(1498年), 425

Monarchy, 君主政体, 在西欧的势力增加, 6—9, 50, 52

Monasteries, 修道院, 其财产难以估计, 91

Monasticism, 修道生活

14世纪和15世纪时俄国的, 21

与农业和殖民, 24, 36—37

与教育, 106

在德国的流弊, 196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在法国的没落, 306; 改革, 307

Monemvasia, 莫南瓦西亚, 为威尼斯所占据, 402, 404

Money, 货币

尼德兰的币值重新调整, 239

15世纪法国货币含金量的下降和

购买力的上升, 310

又见: Bodin, Jean; Expansion (overseas)

Mons, 蒙斯, 225

煤矿业, 38

与1477年向路易十一派驻使节, 227

与1488年“同盟”, 236

勃艮第的菲利普撤销它的特权, 243

Montalvo, Garci Rodríguez de, 蒙塔尔沃, 加尔西·罗德里格斯·德, 西班牙作家, 他的《高卢的阿马迪斯》, 180

Montana, Cola, 蒙塔纳, 科拉, 与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被刺, 97

Mont Cenis Pass, 塞尼山口, 364

Montchrétien, Antoine de, 蒙克莱田, 安托万·德, 与“新法兰西”, 467

Montefeltro, family of, 蒙泰费尔特罗家族, 在乌尔比诺, 16, 348—349

Montefeltro, Federigo da, 蒙泰费尔特罗, 费代里戈·达, 与曼图亚—乌尔比诺的友好关系, 349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 土耳其占领的后果, 33

Monte Olivete Maggiore (near Siena), monastery of, 大橄榄山(锡耶纳附近)修道院, 138

Montereau, 蒙特雷奥, 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遇刺(1419年), 260

Montesimo, Fray Antonio de, 蒙特西诺斯神父, 安东尼奥·德, 与西属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 438

Montezuma, 蒙提祖马, 墨西哥军事首领, 441, 442

Mont Genève pass, 热内夫尔山山口, 364

Montluc, Blaize de, 蒙吕克, 布莱兹·德, 论职业军人对战争的态度, 260, 289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48

集市, 313

Montpensier, Gibert de, 蒙庞西埃, 吉贝尔·德, 查理八世的驻那不勒斯总督, 354

Montreuil, Jean de, 蒙勒伊尔, 让·德, 法国人文主义者, 102

Monzon, 蒙松, 总国会(1510年)与十字军东征计划, 340

Moors, 摩尔人在西班牙受管制, 168, 331

被赶出格拉纳达(1502年), 324; 反叛(1571年)和最后被逐出(1610年), 324; 对文学的影响, 179

又见Islam; Moriscos

Morat, battle of, 莫拉战役（1476年），284

Morava, 摩拉瓦河，398 Moravia, 摩拉维亚，并入波希米亚，389

More Sir Thomas, 莫尔爵士，托马斯，1—2，56

 论英国人识字的情况，4

 与英国的人文主义，109—110

 《乌托邦》，110

 论法国王室的贪婪，261—262

 论不恪守条约，262—263

 他对战争的态度，290

Morea, 摩里亚，威尼斯在摩里亚的据点，402

Morea, Despotate of, 摩里亚君主国，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征服，395，458—460

Moriscos (converts from Islam), 摩里斯科人（改变伊斯兰教信仰的西班牙摩尔人），对他们的管理，324

Morocco, 摩洛哥，葡萄牙在摩洛哥的战役，421

Mortmain, 永久管业权，反对永久管业权的王法，13，255

Morton, John, 莫尔顿，约翰，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109

Moscow, 莫斯科，见Russia

Mosellanus, Peter, 莫塞拉努斯，彼得，与希腊语教学，119

Moselle, valley of, 摩泽尔河流域，与葡萄酒贸易，41

Moulins, cathedral of, 穆兰大教堂，158

Mozambique, 莫桑比克，达·迦马曾访问该地（1498年），425

Moller, John, 米勒，约翰，见Regiomontanus

Münster, 明斯特，44，116

Münsterberg, Charles, duke of, 明斯特贝格公爵, 查理,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路易二世的摄政, 391

Mughul Bāy, 穆古耳贝伊, 麦木鲁克派往谢里姆处的密使, 414—415

Muhammad, the Prophet, 先知穆罕默德, 404

Munich, house of, 慕尼黑家族, 212

Murād, 穆拉德, 法尔斯领主, 被波斯的沙易司马仪打败, 405, 406

Murād, 穆拉德, 奥斯曼王子, 艾哈迈德之子, 411

Murbaeh, 穆尔巴赫, 118

Mumer, Thomas, 穆尔纳, 托马斯, 他的讽刺诗, 187—188

Musurus, Marcus, 穆苏鲁斯, 马尔库斯, 希腊流亡学者, 100

Mysticism, 神秘主义, 63, 306

通俗的神秘主义, 对宗教统一的危险, 11—12

“现代虔信派”, 64, 111, 112, 113, 114

圣维克多派, 112

Nagonio, Michele, 纳戈尼奥, 米歇尔, 与英国的人文主义, 107

Naharro, Bartolomé de Torres, 纳阿罗, 巴托洛梅·德·托雷斯, 他戏剧作品中的意大利影响, 181—182

Namur, 那慕尔, 与接受马克西米连担任查理大公的摄政, 250

Nancy, battle of, 南希战役(1477年), 224

Nantes, cathedral, 南特教堂, 159

Naples, 那不勒斯, 95, 352

人口, 47

“那不勒斯症”, 354

Naples, kingdom of, 那不勒斯王国, 6, 267, 319

使用常驻使节，268

依赖雇佣军队，279

安茹对它的权利要求，295—296，347，348

在哈布斯堡帝国中，323

菲利普大公对它的权利要求，326

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对它的占领，326，332，357—358

路易十二对它的权利要求，336；与阿拉贡共同瓜分，341—342，357；向法国人屈服，357—358；赶走法国人（1504年），358

在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的遗嘱中与西西里分离，341，347

在阿拉贡国王治下的政府，347—348

与罗马教廷的控制，347，349

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争雄，348，360

查理八世的入侵（1494年），351—352；查理进入那不勒斯，352；赶走法国人（1496年），352—353，354

与康布雷同盟（1508年），360

Napoli di Romagna (Morea)，罗马涅·那波利（摩里亚），被威尼斯占据，402，403，404

Narváez, Panfilo de, 纳瓦埃斯，潘菲洛·德，在墨西哥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441

Nassau, family of, 拿骚家族，246，249

Nassau, Englebert, count of, 拿骚伯爵，恩格尔贝特，234，235，238，243，246

Nassau, Henry, count of, 拿骚伯爵，亨利，251，253，339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对罗马教廷的威胁，88

在德意志，88—89，194

Navarino, 纳瓦里诺,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2; 陷落 (1500年) 并被威尼斯割让, 403, 404

Navarra, Pedro, 纳瓦拉, 佩德罗, 雇佣兵首领和工程专家, 363, 366

Navarre, 纳瓦尔, 6, 323

被阿拉贡的费迪南德所征服, 320, 325, 327—328, 342

布兰卡女王死后阿拉贡的约翰二世成为国王, 321

Navarre, Collège de, 纳瓦尔学院, 308

Navidad, 纳维达德移民地, 哥伦布移民的失败, 432

Nebrija, Elio Antonio de, 内布里哈, 埃利奥·安东尼奥·德, 与西班牙的人文主义, 121, 122, 123, 126, 179, 181

Nef, J.U., 内夫, 约·乌, 论1460—1530年间的银矿开采, 37

Negroponte, 尼格罗庞特, 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 (1470年), 395

Niels of Soro, 索勒的尼尔斯, 丹麦修道士, 他的《诗体纪年》, 191

Nemesianus, 涅梅西亚努斯, 104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克服早期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 74—75

作为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一种影响, 129, 134

又见Florence; Plato, Platonism

Netherlands, 尼德兰

神秘主义的流行, 12

地理和经济, 24—25; 鲱鱼渔场, 41; 纺织工业, 42

人口, 42, 456

文化的发展，61—62；地方语文学，62，69，189；人文主义的影响，111—115；又见 Arts of the Renaissance (Northern Europe)

勇者查理去世后的反应（1477年），224—225；承认勃艮第的玛丽，224，225

法国的入侵（1477—1482年），224—232；法国的成功，226；向路易十一派遣使节，226—227；叛逃到法国的人，226，227，248；与英国（1478年，1480年）和与布列塔尼（1480年）结盟，229；波旁的路易试图取得列日的中立，229；地方上对法国的抗御，229；阿拉斯和约（1482年），231—232；承认路易十一为各省议会优越地位的保证人，231；法国对佛兰德的宗主权得到承认，231；与英国和布列塔尼联盟的终结，232

宪政和行政的变革：勃艮第的玛丽的大特权敕令和地方特权，224—226，230，235，236；大枢密院，224—225，230；废止马林高等法院，224—225，230；审计署和审计院的独立，230；恢复总检察官，230；反对中央集权，230—231；菲利普大公收回特权，244；菲利普在马林设立大枢密院，246；查理大公未成年时期的枢密院的地位，250

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227，228

菲利普大公的未成年时期：勃艮第的玛丽逝世（1482年）和承认菲利普为当然的世子，231；各省议会反对马克西米连一世摄政，231以下；各省议会成立替代政府，232；马克西米连恢复对列日和乌得勒支主教区的控制，232—233；他在布拉邦特的成功（1483年），233；内战，233—234；巨门豪富从马克西米连的成功中获利，234；与法国重启衅端，235；马克西米连的失败和中央政权的垮台，235；反对马克西米连的新事件，235—236；马克西米连被囚在布鲁日（1488年），236；1488年的“同盟”和布鲁日和约，236；萨克森的阿尔贝特的战役和胜利，237，238；得不到法国的援助来反对马克西米连，237—238；蒙蒂尔斯—列兹—图尔条约（1489年）与布鲁日和约的废除，238；克莱弗斯的菲利普和马克西米连的争执，238—239，242；重定币值损害马克西米连在佛兰德和荷兰的威信，239；布鲁日屈服（1490年），239；根特叛乱（1491年），239；法国再次干涉

（1491年），239；荷兰和西弗里斯兰的叛乱（奶酪和面包），240；失去盖尔德斯，240；马克西米连入侵弗朗歇—孔泰（1493年），241，351（参见198—199）；法国干涉的结束，森里斯条约（1493年），242—243

菲利普大公亲政（1493年），243—248；司法和财政的中央集权，243；废除勃艮第的玛丽所赐特权，243—244；在荷兰确定税收金额（1494年），243—244；与法国的友好关系，巴黎条约（1498年），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大通商协议”），244；菲利普和西班牙的胡安娜结婚对外交关系的影响，244—245；法国重新进行干涉（1505年），245；贵族势力的增加，他们与各省打成一片，245—246；调整过的中央集权，246；与各省议会的关系，246—247；各省同意征税，247；独立于马克西米连的控制之外，247；入侵盖尔德斯与埃格蒙特的查理的归顺，247；清理王室资产以便向西班牙提供现金，248；菲利普逝世，248

查理大公的未成年时期（1506年），248—252；亲法派和亲英派，248—249；菲利普恢复君主制的结果，249；承认马克西米连为摄政，249—250；由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代行权力，250；玛格丽特对查理大公的王室事务的管理，251，玛格丽特与各省在神圣同盟各次战争中的中立，251—252

查理大公统治时期（1515年），252—258；勃艮第的恢复，252—253；城市的骚动，253；改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对法政策（巴黎条约，1515年；努瓦荣条约，1516年），253—254；与英国的政治和贸易协定，254；西班牙势力的增长，254；税收，与神职人员财产的永久管业权，254—255；对乌得勒支主教区的控制，255；与埃格蒙特的查理交战，256；查理赴西班牙期间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任摄政，257；列日主教区的临时解决办法，257；查理成为尼德兰统一的纽带，256—257

与哈布斯堡帝国：各省对君主的关系，323；新世界金银的输入引起价格上涨，453；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454；荷兰对罗马教廷划分新世界提出异议，458；西班牙的不宽容政策和呢绒贸易上的损失，462—463；荷兰的探险航行，在东印度群岛的扩张，468—469

Neville, George, 内维尔, 乔治, 约克大主教, 他的希腊语知识, 108

New Cadiz, 新加的斯, 西班牙移民地, 436

Newcastle upon Tyne, 泰因河畔纽卡斯尔, 中世纪煤的贸易, 38

Newfoundland, 纽芬兰

渔业、盐业和航海供应, 465

卡蒂埃曾在此探险, (1534年) 466

New Seville, 新塞维利亚, 西班牙移民地, 435

New Spain, 新西班牙, 见Mexico

Nicholas V, Pope (Thomas of Sarzana), 尼古拉斯五世, 教皇(萨尔扎纳的托马斯), 76

Nicholas of Cusa (Nicholas Krebs Cusanus), 库萨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克莱布斯·库萨努斯), 红衣主教, 65, 105, 115, 119

Nicopolis, 尼科波利斯, 奥斯曼行省, 404

Nicuesa, Diego de, 尼奎萨, 迭戈·德, 贝拉瓜移民地, 436, 437

Niger, 尼日尔河, 47

Nigeria, 尼日利亚, 葡萄牙人的航行, 422

Nile, 尼罗河, 与几内亚沿岸的探险, 422

Nominalism, 唯名论与自然科学, 2

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113, 116

Non, St, 诺恩, 圣, 布列塔尼的《圣诺恩传》, 192

Norrland (Sweden), 诺尔兰(瑞典), 22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法国殖民地, 466

North Sea, 北海, 24—25

渔场，41

Norway，挪威，15世纪时的疆界，22

Norwich，诺里奇，人口，43

Novara诺瓦拉，归还给米兰（1495年），353

Novara，诺瓦拉，瑞士人拒绝在该地作战（1500年），206，357；诺瓦拉战役（1513年），142，207，297，362

Nova Zembla，新地岛，荷兰人来到此地（1584年），468

Novgorod，诺夫哥罗德，22，44

被伊凡大帝吞并，368，369，370

Novo Brdo（Serbia），新布尔多（塞尔维亚），39

Noyon，Treaty of，努瓦荣条约（1516年），217，254

Nuñez，Hernan，努涅斯，埃尔南，西班牙人文主义者，121，123

Nürnberg，纽伦堡，208，313

该地的文化和人文主义，67，68，69，117，158—159，165

Occam，William of，奥康姆的威廉，奥康姆主义，19，113，122

Odasi，Tifi，奥达西，蒂菲，意大利诗人，他的《马卡罗尼亚》，174

Oder，奥得河，22，23

Oecolampadius，John，奥科兰帕迪乌斯，约翰，与希腊文《新约》的研究，119

Ogané，奥格涅，贝宁酋长的宗主，被认为即祭司王约翰，423

Oka，奥卡河，21

Olaus Magnus，map of，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的地图，22

Olid，Cristobal de，奥利德，克里斯托瓦尔·德，444

Opicio，Giovanni，奥皮乔，乔瓦尼，与英国的人文主义，107

Oran, 奥兰, 319

卡斯蒂利亚征服（1509—1510年），340

Orange Chalon, Claude of, 奥朗日—夏隆的克洛德，与拿骚的亨利结婚，253

Orders knightly and military, 骑士团和军功团，69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西班牙，6；大首领职位和地产被国王兼并，329，330，334，449；罗马教皇将其赐给查理五世，330

阿尔坎塔拉骑士团，330，434

战友骑士团，23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330

《骑士团》，53

嘉德骑士团，59

金羊毛骑士团，59，240，246，248，252；为马克西米连所恢复，330；与承认马克西米连为查理大公的摄政，233；扩大到西班牙，254

圣约翰骑士团，与杰姆的被囚禁，397—398；又见Rhodes

圣米歇尔骑士团，59

条顿骑士团，24，194；与波兰王室的关系，378—381；世俗化，381

Orders, religious, 教派

15世纪的分裂倾向，11

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的立法，92—93

在西班牙的改革，333

奥古斯丁教规，64，91，112

蒙太古派，307

本尼狄克派，333

多明我会，333；与禁止研究希伯来文，120；与新世界印第安人的权利，438

圣芳济会，其改革和在西印度群岛的工作，333

哲罗姆派（圣哲罗姆修士），333

米尼姆派修士（帕奥拉的圣弗朗西斯），307

玛利亚仆人会（仆人会），138

圣维克托派，112

Ordoñez, 奥多涅斯，西班牙艺术家，与文艺复兴的影响，168

Orinoco, 奥里诺科河与寻求人间天堂，422

被哥伦布发现，433

Orizaba (Vera Cruz), 奥里萨巴（维拉克鲁斯州），440

Orleans, house of, 奥尔良王室，10, 343

Orleans, Louis, duke of, 奥尔良公爵，路易，见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Orrnuz, 霍尔木兹葡萄牙的占领（1515年），427

在葡萄牙与阿拉伯的贸易中，448

Orsini family, 奥尔西尼家族，280, 352, 366

Orsza, battle of, 奥尔萨战役（1514年），380

Orvieto, 奥尔维耶托大教堂，该教堂中西诺列里的作品，138

Osona, Rodrigo de, 奥松纳，罗德里戈·德，西班牙画家（父与子），他们作品中的意大利影响，169 ‘Ossianic’ ballads, “莪相”民谣，191

Otranto, 奥特朗托，奥斯曼土耳其占而复失（1480年，1481年），264, 336, 348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3, 10, 221, 264

独裁政体的发展，9

征服东南欧，32—33

与东方贸易路线，46

与罗马教廷的关系，78，80，265

进入克罗地亚和施蒂里亚，200

苏里曼对匈牙利的进攻，392—394；在莫哈赤的胜利（1526年），222

奥特朗托占而复失（1480年，1481年），264，336，348

基督教国家与之合作，264—265

军事组织，280—281（又见Janissaries）；海上力量，287，288，402，404，418

与西班牙的费迪南德的冲突，与法国联盟，340

15世纪后期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关系，375—376

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下得到巩固，395—396

威尼斯战争（1463—1479年），395，396；（1498—1502年），281，402—404

与波斯的战争，281，396，411—413；受到“萨法威亚”成长的威胁，404—406

与麦木鲁克的埃及在吉里吉亚的战争（1485—1490年），396，399—401；（1515—1517年）与征服叙利亚和埃及，413—418

杀害男性争夺王位的对手合法化，396

巴耶济德和杰姆之间的继承权之争，396—398

谢里姆和艾哈迈德之间的内战，406—411

在巴耶济德统治下对东欧的进攻，398—399，402

控制和治理库尔德斯坦，412—413

在威尼斯战争后与基督教徒的关系，418

Ovando, Fray Nicolas de, 奥万多, 弗雷·尼古拉斯·德, 他对伊斯帕尼奥拉的治理, 434

Ovid, 奥维德, 104, 180

佩鲁奇在法尔内斯别墅的壁画, 147

《奥维德醒世谭》(1484年), 157

与天主教斯拉夫文学, 192

Oviedo, 奥维多, 48

Oviedo y Valdes, G.F.de, 奥维多—巴尔德斯, 德

论伊斯帕尼奥拉的工业, 434

论巴尔沃亚的性格, 436

他出使巴拿马, 438

Oxford University of, 牛津大学人文主义在该校的发展, 63, 68, 106, 108, 110—111

15世纪下半叶传统主义根深蒂固, 51及注

Pace, Richard, 佩斯, 理查德, 英国驻罗马使节, 论罗马教廷的腐败, 89

Pacheco, Duarte, 帕切科, 杜阿尔特, 在卡布拉尔的印度探险中, 426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巴尔沃亚的探险队曾经到达(1513年), 437

Padua, 帕多瓦, 2, 47, 214

威尼斯的控制, 46

被包围(1509年), 214, 282, 285

Padua University of, 帕多瓦大学, 67, 96, 100, 101, 102

Paiva, Afonso de, 派瓦, 阿丰索·德, 葡萄牙探险家, 423

Palaeologus family, 帕莱奥洛格家族, 在摩里亚, 395

Palatinate, the, 巴拉丁领地, 在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中, 211

Palatine, Lewis, elector, 巴拉丁选侯, 路易, 218—219

Palatine, Philip, elector, 巴拉丁选侯, 菲利普, 21

Palatine, Rupert, count, 巴拉丁伯爵, 鲁佩特, 在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1504年)中战败被杀, 211, 212

Palencia, Alfonso Hernandez de, 帕伦西亚, 阿隆索·埃尔南德斯·德, 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四世的拉丁文秘书, 121—122, 181

Palermo, 巴勒莫, 47

Palladio, Andrea, 帕拉迪奥, 安德烈亚, 建筑家, 131, 132

Pamplona, 潘普洛纳, 328

Papacy, 罗马教廷

状况, 及其衰落, 8, 12, 77, 80, 89, 93—94, 264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往, 10, 78, 94, 265, 398

与公会议运动, 11, 12, 51, 82—84, 94

与法国君主的关系, 12, 80, 81—86; 波洛尼亚政教协议(1516年), 85—86, 365

与英国君主, 12

在阿维尼翁, 12, 57

德意志的反对, 13

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影响, 16

用人唯亲的现象, 76—77, 79—80, 355—356, 363; 与权力的扩大, 346—347

教廷舰队, 76, 287

绝对专制主义(《罪恶的》通谕), 77, 82, 94

恢复世俗的权力, 81, 359, 361

16世纪时为大众所崇敬, 83

税收, 13, 85—86, 89, 264, 301, 302
就提供雇佣兵和瑞士达成的协定 (1510年), 206
与十字军东征, 264—265, 又见Crusades
外交, 267—268
与法国在意大利的野心, 297; 从路易十二入侵中得见的好处,
358; 又见Alexander VI; Italy (the invasions); Julius II
受到教会自立主义的攻击, 301—304
与西班牙的关系, 332—333
害怕威尼斯的扩张, 345
支持昂儒对那不勒斯的权利要求, 348
与弗拉拉和波洛尼亚的关系, 348, 349
在意大利扩大世俗权力, 346—347, 348, 349, 358—359, 360
—361
与那不勒斯的宗主权, 347, 349
Papal States, 教皇国, 31, 51, 72
明矾制造业, 32
切萨雷·博尔贾与朱理亚二世恢复领土, 81, 358—359, 361
依靠雇佣军队, 279
教皇权威难以维持, 346—347
Paradise, the earthly, 人间天堂, 与地理大发现的历次航行,
422
Paris, 巴黎
人口, 43
神秘剧和道德剧, 185
印刷业, 63, 103, 312

集市, 313

意大利银行业, 313

Paris, Treaty of, 巴黎条约 (1498年), 244, 247; (1515年), 232, 253—254

Paris, University of, 巴黎大学

人文主义与该校中世纪传统的残余, 63—64, 68, 103—106, 308

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102—103

印刷术, 63, 103

Parisio, Cataldo, 帕里济奥, 卡塔尔多, 在科英布拉教学, 125

Parlement of Paris, 巴黎高等法院

与教皇的司法权, 85—86

书记们上演神秘剧, 185

Parliament in England, 英国议会作为国王政府的工具, 7

15世纪时下院的组成, 52

Parma, 帕尔马, 47, 139

利奥十世让与弗朗西斯一世, 365

Paso de Cortés, 科尔特斯山口, 440

Passau, 帕绍, 451 Paston family, 帕斯顿家族, 53

Pastoralism, 游牧生活, 31, 316—317, 434

Pastraña, 帕斯特拉尼亚, 他的拉丁语语法, 125

Pater, Walter, 佩特, 沃尔特, 论乔尔乔涅, 150

Patervoradin, 彼得沃拉丁, 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占领 (1526年), 393

Paul, St, 保罗, 圣, 伪造的与塞内卡的通信, 105

Paul II, pope (Pietro Barbo), 保罗二世, 教皇 (彼得罗·巴尔博), 77, 88

Pavia, 帕维亚, 48

Pavia, battle of, 帕维亚战役 (1525年), 148, 337; 炮兵决定胜负, 284

Pavia, University of, 帕维亚大学, 125

Pedrarias, 佩德拉里亚斯, 见Ávila, Pedro Arias de

Pedro, Dom, 佩德罗, 堂, 葡萄牙摄政, 他的国外旅行, 422

Pegu, 勃固, 葡萄牙与该地的贸易, 427

Penez, 彭茨, 163

Peñon de la Gomera (North Africa), 戈梅拉岛的皮农 (北非), 卡斯蒂利亚征服该地 (1508年), 340

Peraudi, 佩劳迪, 红衣主教, 罗马教廷驻德意志使节, 209

Percy family, 珀西家族, 7

Pereira, Solorzano de, 佩雷拉, 索洛萨诺·德, 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 322

Peremysl, 佩列米斯尔, 并入俄罗斯, 369

Perm, 彼尔姆, 被伊凡大帝所征服, 368

Perotti, Niccolò, 佩罗蒂, 尼科洛, 他所写的文法书代替了中世纪的教科书, 96

Perreal, Jean, 佩雷阿尔, 让, 法国画家, 158

Persdotter, Ingrid, 珀斯多特, 英格丽, 她的《情书》, 191

Persia, 波斯

在乌宗·哈桑统治下的发展, 396

与奥斯曼土耳其: 与威尼斯的联盟, 与入侵安纳托利亚 (1473年), 396;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411—413

萨法威亚力量的发展，404—406

与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413—416，417

Persian Gulf，波斯湾，葡萄牙的控制，427

Peru，秘鲁，西班牙的统治，323

Perugia，佩鲁贾，132，148，346

被朱理亚二世所征服，81，359

15世纪的共和政府，349

Perugino (Pietro Vanucci)，佩鲁吉诺（彼得罗·瓦努齐），意大利画家，137，138，158，168

他所绘圣母像，137

他作品中的寓言，144

他为伊萨贝拉·德·埃斯特作画，145

反映勃艮第宫廷的风格，148

Peruzzi, Baldassare，佩鲁齐，巴尔达萨雷，意大利建筑家，131，132，133

他的古代建筑图样，147

他在法尔内西纳别墅的作品，147

Peseara, Ferdinando Francescod' Avalos, marquis of，佩斯卡拉侯爵，弗尔迪南多·弗朗切斯科·德·阿瓦洛斯，276

Peter I, the Great，彼得大帝，俄国沙皇，22

Peter IV，彼得四世，阿拉贡国王，338

Petit Jehan de Saintr , Le，《小让·德·圣特列》，见de la Sale, Antoine

Petrarch, Francesco，彼特拉克，弗朗切斯科，1，3，14，15，58，71，147

他的人文主义与布鲁尼的人文主义的对比，15—16

在阿维尼翁， 57

与西塞罗的“人性”， 70

他的禁欲主义， 73

对彼特拉克主义的反动， 172

本博的版本， 177

他的《胜利》的法译本， 182

对天主教斯拉夫文学的影响， 192

Peuerbach, George, 波伊尔巴赫， 乔治， 德意志天文学家， 68

Peutinger, Konrad, 波廷格尔， 康拉德， 与德意志人文主义，
117, 119, 120

Pfalzgraf, 伯爵， 见Palatine, Rupert, count

‘Philalites’， “菲拉利特斯”， 为布鲁日和约（1488年）辩护， 237

Philip I, 菲利普一世，“美男子”， 卡斯蒂利亚国王， 勃艮第大公爵， 199, 204, 233, 234, 256

与西班牙的胡安娜结婚， 10, 201, 203, 210, 241, 296, 341

对艺术的保护， 157

在尼德兰继承马克西米连， 200

他的逝世（1506年）， 213, 248, 326

与勃艮第的玛丽所赐的特权， 225

出生（1478年）， 230

在玛丽去世后为各省议会所承认， 231

各省议会利用他作为反对马克西米连的挂名首脑， 232

在马林受教育期间， 234, 237

1488年“联合”对他未成年期的规定， 236

在尼德兰亲政，243—248

即卡斯蒂利亚王位，244—245，325—326

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244—245，248

在西班牙（1501年，1506年），245，325—326

他的个性和声望，245—246

Philip II，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国王，446

统一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323，328，455，468；他对葡萄牙主权要求的根据，340

与玛丽·都铎结婚，342

停止与安特卫普的金银贸易，451

承认伊丽莎白为英国女王，459

在海外贸易中排斥英国，460，464

Philip IV, the Fair, 菲利普四世，“美男子”，法国国王，6

Philip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菲利普，好人菲利普的私生子，见Utrecht, Philip, bishop of

Philippine Islands, 菲律宾群岛，在麦哲伦的航行中，429
Philosophy, 哲学

希腊学术的影响，100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争，100

希伯来文的研究，102

在人文主义的意大利，100—102

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113—116

又见：Averroes; Aristotle; Duns Scotus; Florence; Neoplatonism; Occam; Plato; Scholasticism; Thomas Aquina

Philostratus, 菲洛斯特拉托斯，为阿方索·德·埃斯特画的绘画中表现了他作品中的情景，145

Piacenza, 皮亚琴察, 132, 352, 364

与神圣同盟（1511—1513年），363

Piacenza Giovanna, 皮亚琴察, 焦万纳, 帕尔马圣保罗女修道院院长, 被作为狄安娜绘入画中, 146

Piast, house of, 皮亚斯特王室, 在波兰, 370, 385

Picardy, 皮卡迪, 25, 229

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ni,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乔瓦尼,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 88, 100, 105, 116—117, 182

与宗教人文主义, 16, 55

与神秘主义, 63

他思想中的中世纪成分, 75, 101

他的虔诚, 97

他的百科全书主义, 101

Pietrasanta, 彼得拉桑塔, 向法国投降（1494年）, 352

Pins, Jean de, 潘, 让·德, 与希腊文研究, 105

Pinturicchio (Bemardino Betti), 平图里乔（贝尔纳迪诺·贝蒂）, 169

他在锡耶纳的壁画, 141

他在梵蒂冈的绘画, 141—142

Pinzon, Vicente Yañez, 平松, 维森特·亚涅斯, 与发现亚马孙河三角洲, 428, 435

Piracy, Pirates, 私掠活动, 私掠船员斯卢思的, 239, 242

攻击西班牙船只, 457—458, 463

阿尔及利亚的, 467

Pirckheimer, Wilibald, 皮克海默, 维利巴尔德,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 117

Pirenne, Henri, 皮雷纳, 亨利, 论贵族控制根特, 241

Pisa, 比萨, 47, 203

投降法国 (1494年), 352

和佛罗伦萨的战争, 354, 362

Pistoia, Antonio da, 皮斯托亚, 安东尼奥·达, 172, 175

Pius II, pope (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 庇护二世, 教皇 (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米尼), 17, 68

致力于十字军东征, 59

与德国的人文主义, 67

文学作品, 76—77

与教皇专制主义, 77, 82

性格和政策, 81—82

与派驻罗马教廷的使节, 267

Pius III, pope (Alessandro Farnese), 庇护三世, 教皇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 80

Pizarro, Francisco, 皮萨罗, 弗朗西斯科, 444

Place-names, 地名

从地名上得到的证据, 23, 36, 37, 39

与纺织业的名称, 42

Plaine, Gérard de, 普兰内, 热拉尔·德, 251

Plaine, Thomas de, 普兰内, 托马斯·德, 247

与森里斯和约 (1493年), 243

与菲利普大公修改特权, 243

逝世 (1507年), 250

Plato, 柏拉图, 柏拉图主义, 5, 16, 75, 100, 108, 123, 142, 177

Plautus, 普劳图斯, 174, 176

Pléiade, poets of the, 七星社诗人, 172

Pliny the elder, 大普林尼, 100

Pliny the younger, 小普林尼, 132

‘Ploughman’, “耕田人”, 暗杀柯本荷尔的农民, 241

Pluralism, 兼职现象, 在德国, 195

Plutarch, 普卢塔克, 147

Plymouth, 普利茅斯, 扣留西班牙运金银的船只 (1568年), 463

Po, 波河, 中世纪的河堤和灌溉渠, 32

Poitiers, battle of, 普瓦蒂埃战役 (1356年), 273

Poitou, 普瓦图, 25, 26, 41

Poland, 波兰

君主对贵族奴颜卑膝, 8—9

德意志的殖民, 23—24

“波兰走廊”, 24

文艺复兴的有限影响, 191

哈布斯堡在波兰的利益, 221, 378—380

对莫斯科的战争, 369, 376—377, 379—380, 381

亚盖沃王朝, 370—371

扬·奥尔布拉赫特与匈牙利—波希米亚的密切关系, 374—375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 375—376, 399, 418

对立陶宛的关系, 374—375, 385

与法国路易十二联盟的计划, 378

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条顿骑士团的关系，378—380

政体结构，382—385

15世纪的农民，384—385

鞑靼人的袭击和组织哥萨克人，393

Politian (Angelo Ambrogio da Poliziano)，波利蒂安（安杰洛·安布罗焦·达·波利齐亚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96，97，100，102，105，114，125，146，149，182

与反西塞罗主义，98

版本诠释，99

他的《奥尔甫斯》，175

Political institutions，政治机构奥地利，210，219—221

波希米亚，8—9，389—391

神圣罗马帝国，7—8；又见Empire, Holy Roman：帝国的改革

英国，6，7，8，52

法国，6，7，8，56—57，297—300

匈牙利，8—9，385—389

意大利，6，9，31，69—70，343—349

尼德兰，9；又见Netherlands, Burgundian：宪政和行政的变革

波兰，8—9，382—385

西班牙，6，322—325，328—332；西属美洲，323—324，437—438，443—444

瑞士联邦，9，34—35，204—205

Political theory，政治理论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对比，5—6

诸侯的权力和法律，9，13

马基雅弗利对共和制和君主制的综合，16；他的政治著作，178；又见Machiavelli

人文主义和对希腊城邦的研究，72

古典历史学家的影响，97

Pollaiuolo, 波拉约洛，意大利艺术家

他对丢勒的影响，154

他为西克斯特四世所作陵墓，168

Polo, Marco, 马可·波罗，2，421，422

Polotsk, 波洛茨克，44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23，24，25，381

Pomponazzi, Pietro, 蓬波纳齐，彼得罗，意大利学者，88，97

与对亚里士多德的新见解，101

Ponce de Leon, Juan, 庞塞·德·莱昂，胡安，对波多黎各的治理和试图

在佛罗里达移民，435

Poncher family, 蓬歇家族，305

Pontano, Gioviano, 蓬塔诺，焦维亚诺，97

Ponte di Crevola, battle of, 克雷沃拉角战役（1487年），280

Pontormo (Jacopo da Carucci), 蓬托尔莫（亚各布·达·卡鲁奇），138，152

Pontremoli, Nicodemo da, 蓬特雷莫利，尼科代莫·达，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秘书，267

Popocatépetl, Mt., 波波卡特佩特尔山，440

Population, 人口，50，456

15世纪和16世纪城市的人口，42—44，46，47

在法国的人口减少和恢复，26，308—309，310—311

16世纪西班牙的人口，316，318

与新世界的殖民，456—457

Portinari, Tommaso, 波尔蒂纳里，托马索，157

Porto, Luigi da, 波尔托，路易吉·达，论朱理亚二世和威尼斯使节的争论，360

在威尼斯战争中与马克西米连的关系，360—361

Portsmouth, 朴茨茅斯，亨利七世的船坞，287

Portugal, 葡萄牙

王朝统治，9

地理，28

人文主义，125—126

托罗战役（1476年），失去与卡斯蒂利亚统一的可能性，325

曼努埃尔一世的婚姻，西班牙的菲利普对葡萄牙的主权要求，339—340

与菲利普统治下的西班牙结盟，455，468

人口，456

海外扩张：探险航行的动机，2—3，421；15世纪和16世纪海上贸易，49；与西班牙瓜分新世界，79，332，340，424，429—430，430—431，455，458，466；封锁红海，反对埃及，414；扩张的中世纪背景，420—421；国王将殖民地贸易租让给商人，422，429；去印度的海路，421—422；西非洲的探险，430；用海军和陆军保护在印度的据点，427；巴西的航行，428—430；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434，457；在东方实行的皇家专卖特许制度，448；东方贸易组织的弱点，447—448；欧洲市场，448—449；香料贸易，463—464；英国为参加殖民地贸易而斗争及其对西班牙叛乱的支持，464；又见Africa；Brazil；Magellan

Portuguese language, 葡萄牙语, 179, 182; 又见Literature, vernacular: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Posts, 驿站, 271

Poynings, Sir Edward, 波伊宁斯爵士, 爱德华, 斯卢思包围战(1492年)时的海上援助, 242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布尔日国事诏书(1438年), 7, 12, 85, 186

废除(1516年), 86, 365

法国后来所持的态度, 302—303

在教会自立主义宣传中加以利用, 303—304

受到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的谴责, 304

其失败的后果, 304—305, 306

Prato, 普拉托, 被西班牙占领(1512年), 277, 362

Preaching, 传教活动, 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和对传教活动的控制, 93

Pressburg, Treaty of, 普雷斯堡条约(1491年), 374

Prester John, legend of, 祭司王约翰的传说, 421, 422, 423

Prie, René de, 普里, 勒内·德, 红衣主教, 与教会自立主义, 303

Printing, 印刷

对这一发明直接效果的夸大看法, 4, 53

作为公众笃信宗教的标志, 89—90

教会的控制, 92

与古典作品的广泛流传, 95—96, 100, 115—116

在索邦神学院, 103

在法国, 104, 312

人文主义在英国影响的早期痕迹, 106
作为文学趣味的证明, 112
共同生活弟兄会, 112
在卢万, 113
在德意志, 115—116
在斯堪的纳维亚, 121
作为人文主义在西班牙的证据, 122
丹麦的第一个印刷品, 191
介绍到冰岛, 191
布列塔尼的第一个印刷品, 191
威尔士的第一个印刷品, 192
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刺激, 194
Pripet marshes, 普里佩特沼泽地, 22
Proclus, 普罗克洛斯, 利纳克尔翻译的《天体论》, 109
Provence, 普罗旺斯, 为法国所取得(1481年), 262
Prussia, 普鲁士, 25
Przemyslide dynasty, 普热美斯尔王朝, 波希米亚的, 370
“Pseudo-Phalaris”, 《法拉里斯伪书信》, 阿雷蒂诺的译本,
106
Pskov, 普斯科夫, 44
为沙皇瓦西里四世所征服, 369, 370
Ptolemy, 托勒密, 地理学家, 2, 420, 422
Publicio, Jacopo, 普布里西奥, 雅各布, 与德意志和葡萄牙的
人文主义, 116, 125

Puebla, Roderigo de, 普埃夫拉, 罗德里戈·德, 西班牙驻英国使节, 272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西班牙发现该地并移民, 432, 435

Pulei, Luigi, 浦尔契, 路易吉, 意大利作家, 172, 174

他的《巨人摩尔干提》, 173; 法文译本, 182

Quebec, 魁北克, 尚普兰创建(1608年), 467

Quetzalcoatl, 魁扎尔科亚特尔, 托尔特克人神话中的英雄之神, 441

Quinze Joyes de Mariage, 《十五桩结婚喜事》, 184

Rabelais, Francois, 拉伯雷, 弗朗索瓦, 3—4, 103, 170

与奥达西的《马卡罗尼亚》, 174

Racova, 拉科瓦河, 396

Radisson, Pierre Esprit, 拉迪松, 皮埃尔·埃斯普里, 在赫德森湾公司服务, 445

Raffaele, 拉斐尔, 见Raphael Ragusa, 拉古萨, 48

1500年前后的文化地位, 192

Ramazan-oghlu, 拉马赞奥卢, 土库曼部落, 399, 400, 415

奥斯曼承认其特权, 417

Ramusio, Girolamo, 拉穆西奥, 吉罗拉莫, 他的阿拉伯文研究, 102

Ranke, L. von, 兰克, 利·冯, 德国历史学家, xx, 1

Rapallo拉巴洛战役(1494年), 289, 352

Raphael (Raffaele Sanzio da Urbino), 拉斐尔(拉斐尔·圣齐奥·达·乌尔比诺), 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 127, 130, 131, 133, 141, 148; 151

与罗马古代文物, 99, 130

建筑方面的工作，132
处理古典题材的方法与波提切利的相比较，133
他的圣母像，137
他的风格中所反映的神态的变化，138—139
梵蒂冈厅室的壁画，142—144
法尔内斯别墅的《丘比特和普赛克》组画，146
他的逝世（1520年），146
在圣阿戈斯蒂诺教堂和大众圣玛利亚教堂中的壁画（罗马），
147
他的肖像画，148—149，朱理亚二世的肖像画，81
Rassenghem, lord of, 拉森海姆勋爵，见Vilain, Adrian
Ravenna, 拉文纳，48
Ravenna battle of, 拉文纳战役（1512年），289，297，327，
361；炮术决定了胜负，283，284
Rederijers, Rederijerskamers, 修辞家，修辞院
与尼德兰文学中的形式主义，170
与道德剧和奇迹剧，189
Red Sea, 红海，葡萄牙对埃及的封锁，414，427
拟议中连接地中海的运河，467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路德和伊拉斯谟的“中间道路”，19
教育暂时被打断，4
与人文主义的关系，126
与加强反对哈布斯堡的优势，444，469
又见Luther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161

Regensburg, battle of, 雷根斯堡战役（1504年）, 211

Reggio, 勒佐, 169

Regiomontanus, 雷乔蒙塔努斯, 德意志学者（约翰·米勒）, 68, 119

他编辑的马尼利乌斯著作, 118

Religion, 宗教

在人文主义中的地位, 16, 18—19, 55—56, 64—65, 68, 97—98, 112—113, 126

在英国表现出的虔诚, 89—90

在艺术中, 137—142, 145—146, 163—165

在波希米亚的分歧, 389—391

新世界的土人的, 439

西班牙的不容忍政策和对英国的经济压力, 460; 在尼德兰的影响, 462

又见Church; Heresy; Inquisition; Islam, J-ews; Luther; Mysticism; Philosophy; Reformation

Rély, Jean de, 莱利, 让·德, 昂热主教, 与教会改革, 307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作为历史的转折点: 对这种观点的批评, 1—4

意大利的“异端”, 5, 147

意大利精神的延迟扩散, 13—14

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对比, 61

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75

“盛期文艺复兴”与“早期文艺复兴”相对比, 127

又见Arts in the Renaissance; Humanism

Renée of France, 法国的勒内, 路易十二之女, 计划将她嫁给查理五世, 253, 254

Resende, Garcia de, 雷森迪, 加西亚·德, 他的《诗歌总集》, 179

Reuchlin, John, 罗伊希林, 约翰, 德国人文主义者, 109, 117

他的希腊文学识, 119—120

他对希伯来语的热情, 120

作为路德的先驱, 188

Rhenanus, Beatus, 莱纳努斯, 比亚图斯, 与德国人文主义, 117, 118, 126

Rhetoric, 修辞学, 剑桥的新教学法, 108

Rhétoriciens, 修辞诗派, 在法国文学中, 59—60, 170, 182—183

Rhine, 莱茵河, 24

Rhodes, 罗得岛

城防工事的发展, 282

奥斯曼的占领(1521年), 392

受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攻击, 418

对杰姆的监禁, 397

Riario family, 里亚里奥家族, 与罗马教皇重用亲属, 347

Ribault, Jean, 里博, 让, 与法国在佛罗里达的移民地, 466

Riccio, Andrea, 里乔, 安德烈亚, 他的青铜作品和塑像, 136, 147

Richard II, 理查二世, 英国国王, 6, 12

Richard III, 理查三世, 英国国王, 6, 103, 287, 295

Richard of St Victor, 圣维克托的理查德, 神秘主义作家, 105

Ridaniyya, 里达尼亚, 在奥斯曼向开罗进攻中的战役 (1517年), 417

Riemenschneider, Tilman, 里门施奈德, 蒂尔曼, 雕刻家, 158

Riga, 里加, 44

Riga, Gulf of, 里加湾, 23

Rio Grande de Norte, 北里奥格兰德, 可能是在韦斯普奇第一次航行中发现的, 428

Riva, 里瓦, 217

Roberval, Jean de la Rocque, 罗贝伐尔, 让·德·拉·罗克, 法国驻加拿大总督, 466

Roias, Fernando de, 罗哈斯, 费尔南多·德, 西班牙作家, 193

他的《塞莱斯蒂娜》, 180—181

Roldán, Francisco, 罗尔丹, 弗朗西斯科, 与在圣多明各反对巴托洛梅, 哥伦布的叛乱, 433

Rolin, Nicholas, 罗兰, 尼古拉斯, 勃艮第大法官, 252

Roman de la Rose, 《玫瑰传奇》, 2, 53

其影响在法国经久不衰, 182, 187

Romano, Giulio, 罗马诺, 朱理奥, 建筑家, 132—133

Romansch language 罗曼什语, 35

Rome, 罗马, 155, 175, 200

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 16, 139—141

君士坦丁大堂, 76

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 76, 88, 94

作为文化中心, 131

拉斐尔在梵蒂冈厅室的壁画, 142—144

洗劫 (1527年), 278

Rome, Academy of, 罗马科学院, 96

Rood, Theodore, 鲁德, 西奥多, 牛津的出版家, 106

Roovere, Anthonis de 鲁维勒, 安东尼斯·德, 佛兰德作家, 189

Roselli, Cosimo, 罗塞利, 科西莫, 意大利画家, 139

Rosenberg, 罗森贝格, 见Svihovsky, Bretislav

Rosenplüt, Hans, 罗森普律特, 汉斯, 德意志作家, 187

Rossetti, Biagio, 罗塞蒂, 比亚焦, 意大利建筑家, 128, 132

Rosso, Giovan Battista, 罗索, 焦万·巴蒂斯塔, 意大利画家, 138

Rostock, 罗斯托克, 44

Rostov, 罗斯托夫, 21

Rotterdam, 鹿特丹, 与水产贸易, 41

Rouen, 鲁昂

- 大教堂, 160
- 神秘剧和道德剧, 185
- 市集, 313
- 与水产贸易, 465

Roumanians, 罗马尼亚人, 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移民引起的争执, 38

Rous, John, 劳斯, 约翰, 英国古文物家, 106

Roussillon, 鲁西荣

- 由阿拉贡割让给法国, 340—341
- 归还阿拉贡(1493年), 296, 351

Rovereto, 罗韦雷托, 217

Rožmítal, 罗兹米达, 见Lev, Zdeněk

Rucellai, 鲁切莱, 意大利诗人和剧作家, 172, 175

Rumdi, 鲁梅利, 奥斯曼行省, 411

Rum-Rü, 鲁木吕, 土库曼部落, 405

Russia, 俄国

莫斯科大公得势掌权, 9

地理和经济, 21

从鞑靼人手中解放, 21—22, 368

修道生活, 21

15世纪下半叶的扩张, 22

伊凡大帝和瓦西里一世时的成长和发展, 368—370; 伊凡对波兰—立陶宛的战争, 369, 376—377

俄罗斯“遗产”: 莫斯科作为“第三个罗马”, 369

国家教会的独立, 369

瓦西里和伊凡雷蒂继续执行伊凡大帝的政策, 370

Rustici, Gianfrancesco, 鲁斯蒂奇, 詹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雕刻家, 152

Ruthenia, 罗塞尼亚, 为鞑靼人所洗劫, 393

Ryazan, 梁赞, 并入俄罗斯国家, 368, 369

Rym, William, 里姆, 威廉, 根特的元老, 与尼德兰反对马克西米连, 231

Saale, 萨勒河, 23

Sabac, 沙巴茨, 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1521年), 392

Sabadinno, Giovanni, 萨巴迪诺, 乔瓦尼, 他的小说, 178

Sablé, Treaty of, 萨布勒条约(1488年), 295

Sachs, Hans, 萨克斯, 汉斯, 与戒斋节剧, 187

Safawiyya, 萨沙威亚, 成长过程, 与对奥斯曼统治的威胁, 404—406, 411; 在泰克的叛乱 (1511年), 406, 408; 又见 *Persia*

Sagredo, Diego de, 萨格雷多, 迭戈·德, 他的《古罗马建筑法式》, 168

‘St Albans schoolmaster’, “圣奥尔本斯教师”, 印刷业者, 106, 108

St Andrews, University of, 圣安德鲁斯大学, 创立, 111

St Ann’s Bay, 圣安娜湾, 牙买加, 435

Saint-Aubin-du-Cormier, 圣奥班迪科米埃战役 (1488年), 295

St Bernard pass, 圣伯纳德山口, 207

Saint-Denis, 圣但尼, 该地的集市, 313

Saint-Gelais, Octovien de, 圣热莱, 奥克托文·德, 他的《埃涅阿斯纪》译本, 182

Saint Germain-des-Prés, 圣日耳曼德普雷, 该地的集市, 313

St Gotthard pass, 圣哥特哈德山口, 206

St John’s College, 圣约翰学院, 剑桥, 创立, 111

St Juan d’Ulloa, 圣胡安德乌略亚, 霍金斯的海上战斗 (1567年), 457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 法国人的探险, 466, 467

Saint-Omer, 圣奥梅尔, 25

St Paul’s School, 圣保罗学院, 106, 107, 109

Saint-Trond, Treaties of, 圣特隆德条约 (1518年), 257

Saint-Victor, 圣维克托修道院, 307

“St Wenceslas, Treaty of”, “圣文策斯拉斯条约”, 390

Salamanca, 萨拉曼卡, 48

Salamanca, University of, 萨拉曼卡大学, 121, 122, 123,
125

Salazar family, 萨拉查家族, 305

Salemitano, Masuccio, 萨莱尼塔诺, 马苏乔, 意大利作家, 他的小说, 178

Salerno, 萨莱诺, 47

Salins, battle of, 萨朗战役 (1493年), 198—199

Sallust, 萨卢斯特, 103, 122

Salutati, Coluccio, 萨卢塔蒂, 科卢乔, 1

Salvaggio, house of, 萨尔瓦焦家族, 热那亚银行家, 334

Salzburg, 萨尔茨堡, 43

Samothrace, 萨莫色雷斯岛, 并入奥斯曼帝国 (1455—1456年), 395

San Casciano, 圣卡西亚诺, 178

Sandoval, Tello de, 桑多瓦尔, 特略·德, 444

Sangallo, Antonio da, 圣加洛, 安东尼奥·达, 意大利建筑家, 131, 133

Sangallo, Giuliano da, 圣加洛, 朱利亚诺·达, 意大利建筑家, 128, 130, 131, 132, 160

San Leocadio, Paolo da, 圣莱奥卡迪奥, 保罗·达, 意大利画家, 169

Sanmicheli, Micheli, 圣米凯利, 米凯利, 意大利建筑家, 131

Sannazzaro, Jacopo, 桑纳扎罗, 雅各布, 意大利诗人, 104

他的《阿卡迪亚》, 149, 172

San Pedro, Diego de, 圣·佩德罗, 迭戈·德, 西班牙作家,
180

Sansepolcro, Cinzio da Borgo, 圣塞波尔克罗, 钦齐奥·达·博尔戈,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16

San Severino, Antonelli di, 圣塞韦里诺, 安东内利·迪, 萨莱诺亲王, 劝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 350

San Severino, Galeazzo di, 圣塞韦里诺, 加莱亚佐·迪, 在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入侵中, 356, 357

Sansovino, Andrea, 圣索维诺, 安德烈亚, 意大利建筑家, 131, 135

Santaella, Maese Rodrigo de, 圣埃利亚, 马埃塞·罗德里戈·德,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 他的《基督教义词汇》, 123

Santa Maura, 圣毛拉岛,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4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437

巴托洛梅·哥伦布建立移民地, 433; 移民的反叛, 433

Sapienza, 萨皮恩扎岛, 奥斯曼土耳其在此击败威尼斯 (1499年), 403 Saragossa, 萨拉戈萨, 48, 336; 萨拉戈萨条约 (1529年), 429

Sardinia, 撒丁, 318, 319, 323, 337

Sarukhan, 萨鲁罕, 奥斯曼行省, 407, 410

Sarzana, 萨尔察纳投降法国 (1494年), 352

包围战 (1488年) 366

Savona, 萨沃纳, 路易十二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会晤 (1508年), 157, 264, 266, 359

Savona, Lorenzo da, 萨沃纳, 洛伦佐·达,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他的《新修辞学》, 108

Savonarola, Girolamo, 萨沃纳罗拉·吉罗拉莫, 55, 78—79, 97

他在佛罗伦萨的独裁, 78—79; 被交给教廷特派人员将他处死 (1498年), 354

他对15世纪绘画的攻击, 137

他对艺术家的影响, 138—139

与法国的入侵(1494年), 352, 354

Savoy, Margaret, duchess of, 萨伏依女公爵玛格丽特, 见 Margaret of Austria

Savoy, Philibert the Fair, duke of, 萨伏依公爵美男子菲利贝尔, 249

Saxony, 萨克森, 24

Saxony, Albert of Meissen, duek of, 萨克森公爵, 迈森的阿尔贝特, 199, 256

受雇于马克西米连担任尼德兰的军事指挥官, 200, 237, 238, 241, 242; 菲利普把弗里斯兰的权利割让给他作为报酬, 248

Saxony, Frederick III, the Wise,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 弗里德里希三世, 智者, 48, 211, 219

与条顿骑士团, 378, 379

Saxony, George, duke of, 萨克森公爵, 乔治, 256

Scala, Bartolomeo, 斯卡拉, 巴尔托洛梅奥,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97

他的反西塞罗主义, 98

Scaligeri family, 斯卡利杰尔家族, 136, 267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9

政治地理, 22

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较迟, 121

地方语文学, 191

Schaffhausen, 沙夫豪森, 加入瑞士联邦(1501年), 206

Schedel, Hermann and Hartmann, 舍德尔, 赫尔曼和哈特曼, 与德国的人文主义, 117

Scheldt, 斯凯尔特河, 233, 234, 246

勃艮第的菲利普靠其税收筹款, 247—248

Schernberg, Dietrich, 舍尔恩贝格, 迪特里希, 他的《尤塔夫人的表演》, 187

Schinner, Matthias, 希内尔, 马蒂亚斯, 红衣主教, 锡昂主教, 207

与瑞士干涉意大利, 361—362, 364

与弗里堡永久和约, 364

Schlettstad, 施莱茨塔德, 116

Schmalkaldic War,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451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68, 69, 100

衰落, 51, 102—103, 307

在15世纪的巴黎, 63

在美国的大学中继续存在, 110

与人文主义, 119, 120

在15世纪的萨拉曼卡, 122

与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相平行, 170

Schongauer, Martin, 施恩告尔, 马丁, 画家和雕版师, 154

Schott, Peter, 朔特, 彼得, 与德国人文主义, 117, 119

Schwyz, 施维茨, 瑞士的州, 204

Science, 科学, 自然科学, 为人文主义者所忽视, 2, 50

15世纪德意志取得的进展, 68

维尔尼亚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分开, 101

Scorel, Jan van, 斯科勒尔, 扬·范, 访问意大利, 155

Scotland, 苏格兰

- 没收教会财产, 13—14
- 意大利人文主义有限的影响, 111
- 苏格兰文学, 190
- 盖尔语文学, 191
- 海上力量, 287, 288

Scotus, 司各脱, 见Duns Scotus

Scutari, 于斯屈达尔, 414

- 为奥斯曼土耳其所占领(1478—1479年), 395

Sebaldus, St, 塞巴尔杜斯, 圣, 纽伦堡的神龛, 158—159

Sebastian, 塞巴斯蒂昂, 葡萄牙国王, 421, 449

Sebenico, 塞本尼科, 为威尼斯所占, 402, 403

Seeley, Sir John, 西利爵士, 约翰, xiii, xiv

Selden, John, 塞尔登, 约翰, 论传统, xviii

Selím, 谢里姆, 奥斯曼苏丹, 375

- 继承巴耶济德和内战, 406—411
- 进攻萨法威亚领土(1505—1508年), 407
- 屠杀安纳托利亚什叶派教徒, 411
- 对波斯的战争, 411—412
- 扩大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 412—413
- 征服叙利亚和埃及, 413—418
- 与基督教大国的关系, 418
- 逝世(1520年), 性格和业绩, 418—419

Sellyng, William, 塞林, 威廉, 坎特伯雷基督教堂副修道院长, 他的希腊文造诣, 101

Semendria, 塞门德里亚, 奥斯曼行省, 395, 398, 408, 409

Seneca, 塞内卡, 118

与意大利戏剧, 174—175

Seneor, Abraham, 塞尼奥, 亚伯拉罕与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婚姻, 321

军队供应的合同, 337

Senlis, Treaty of, 森里斯条约 (1493年), 199, 200, 232, 242—243, 296, 351

Sens, 桑, 宗教会议, 与改革, 306

Serbia, 塞尔维亚, 并入奥斯曼帝国 (1459年), 33, 395

Serbopoulos, Johannes, 塞尔博普洛斯, 约翰内斯, 希腊流亡学者, 与抄写希腊原文的手稿, 108

Serejsk, 谢列斯克, 并入俄罗斯国家, 369

Serfs, 农奴, 解放, 309—310

Seville, 塞维利亚, 48

红衣主教门多萨之墓, 168

人口, 318

贸易署和对外贸易, 318, 324, 438, 453, 456

成立宗教裁判所, 335

被西班牙占领 (1248年), 420

英国商人殖民地, 457

格雷欣在1554年的使命, 461

Seville, bishopric of, 塞维利亚主教区, 驱逐犹太人, 337

Seyssel, Claude, 赛塞尔, 克洛德, 论法国农业的恢复, 26

Sforza family, 斯福尔扎家族, 348

Sforza, Bianca Maria, 斯福尔扎, 比安卡·玛丽亚, 与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 200

Sforza, Bona, 斯福尔扎, 博纳, 见Bona

Sforza, francesco, 斯福尔扎, 弗朗切斯科, 米兰公爵, 136

与洛迪和约(1454年), 267, 344

继承维斯孔蒂, 344

Sforza, Galeazzo Maria, 斯福尔扎, 加莱亚佐·马里亚, 米兰公爵, 97

Sforza, Gian Galeazzo, 斯福尔扎, 吉安·加莱亚佐, 米兰公爵, 344, 350, 354—355

Sforza, Lodovico (“il Moro”), 斯福尔扎, 洛多维科 (“摩尔人”), 米兰公爵, 205

与入侵意大利: 寻求马克西米连的援助以反对查理八世(1496年), 202—203; 米兰得而复失, 为法国所占(1500年), 206, 208, 263, 356—357; 寻求法国援助以反对那不勒斯, 266, 296, 350; 参加威尼斯同盟(1495年), 332, 341, 351; 与查理八世媾和(1495年), 353—354

在米兰掌权, 344, 350, 354—355; 马克西米连授与公爵领地(1495年), 200

他在米兰的宫廷, 355

绰号“摩尔人”, 357注

Sforza, Massimiliano, 斯福尔扎, 马西米利亚诺, 米兰公爵, 207

瑞士人安置在米兰, 362

为法国人所驱逐(1515年), 363—364

Shah Kuli, 沙库利, 萨法威亚的拥护者在泰克省叛乱的领袖(1511年), 406, 408, 409

- Shahsuwār, 沙苏瓦尔, 阿尔比斯坦王子, 400
- Shahsuwār-oghlū ‘Alī, 沙苏瓦尔奥卢·阿里, 奥斯曼驻开塞利的总督, 412, 413, 415, 418
- Shah Welī, 沙韦利, 领导什叶派叛乱反对谢里姆, 418
- Shetland Islands, 设得兰群岛, 44
- Shī’ a, 什叶派, 伊斯兰教派, 404
- 在安纳托利亚信徒遭屠杀 (1513年), 411
- 起义反对谢里姆 (1518年), 418
- Ships, Shipping, 船只, 船运型号, 在战争中的使用, 286—288, 420
- 波罗的海航海供应的重要性, 456
- Shirwood, John, 舍伍德, 约翰, 达勒姆主教, 他的希腊研究的造诣, 108
- Shurur, 舒鲁尔战役 (1501年), 与沙易司马仪征服波斯, 405
- Siam, 暹罗, 葡萄牙与之贸易, 427
- Sicily, 西西里, 318, 320, 323
- 在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约中, 322
- 建立宗教裁判所, 337
- 在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遗嘱中规定脱离那不勒斯, 341
- Sickingen, Franz von, 济金根, 弗朗茨·冯, 他的强盗骑士活动, 217
- Siculo, Lucio Marineo, 西库洛, 卢乔·马里内奥, 与人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121
-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葡萄牙人航海到达, 422 Siena, 锡耶纳, 48, 132
- 15世纪的政府, 349

Sigismund of Luxemburg, 卢森堡的西吉斯孟, 皇帝, 267

Sigismund I, 西吉斯孟一世, 波兰国王, 222, 375, 376, 377, 378, 379

与选举查理大公为德意志王 (1518年), 218—219

与巴尔巴拉·扎波利亚伊结婚, 与博纳·斯福尔扎结婚, 380—381

拒绝接受瑞典王位, 381

马佐夫舍并入波兰 (1526年), 385

与奥斯曼对匈牙利的进攻, 393

Signorelli, Luca, 西诺列里, 卢卡, 意大利画家, 138, 149

Silesia, 西里西亚, 23

与波希米亚合并, 389

Siloe, Diego de, 西洛埃, 迭戈·德, 与西班牙艺术中的意大利影响, 168

Siloe, Gil de, 西洛埃, 吉尔·德, 与西班牙建筑雕刻的发展, 166

Simmern, Rupert von, 西默恩, 鲁佩特·冯, 斯特拉斯堡主教, 195

Simplon Pass, 辛普朗山口, 364

Sinān Pasha, 息南帕夏, 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总督 (后为首相), 411, 412, 414, 415, 416, 417

Sinope, 锡诺普, 为奥斯曼土耳其所占 (1461年), 395

Sint, Jans, Geertgen tot, 圣詹斯, 吉尔特根·托特, 佛兰芒画家, 156

Sistine Chapel, 西斯廷教堂, 罗马, 16, 139—141

Sittow, Michel, 西多, 米歇尔, 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的宫廷画家, 168

Sivas, 瑟瓦斯（安纳托利亚），411

Sixtus, IV, pope (Francesco della Rovere), 西克斯特四世, 罗马教皇（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77, 81, 138, 349

与罗马科学院, 96

与乌普萨拉大学的建立, 121

波拉约洛所作的陵墓, 168

与西班牙的教会, 333, 335—336

为筹募十字军经费而颁发赎罪券, 333—334

支持威尼斯反对弗拉拉（1482年），336

与路易十二对那不勒斯的要求, 336

重用亲属, 347

Skanderbeg (George Castriotes), 斯坎德培（格奥尔格·卡斯特里奥特斯），395

Skania (Sweden), 斯科纳（瑞典），22, 41

Skelton, John, 斯科尔顿, 约翰, 189—190

Slavery, 奴隶制禁止以被俘的基督教徒充任, 264

在西属美洲, 433—434, 435, 436, 438, 456—458

Slavs, 斯拉夫人向西扩张, 22—23

在奥斯曼帝国, 32—33

在波希米亚, 36

Slovakia, 斯洛伐克, 矿业, 39

Sluis, 斯卢思为克莱弗斯—拉文斯坦的菲利普所控制, 239

包围和攻占（1492年），242, 245

Småaland, 斯莫兰, 22

Smeeken, Jan, 斯米肯, 扬, 189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44
 并入俄罗斯国家, 369, 381
Smyrna, 士麦拿, 46
Sodalitas Danubiana, 多瑙学会, 117
Sodalitas Literaria Rhenana, 莱茵文学会, 117
Soderini, Piero, 索代里尼, 皮耶罗, 他在佛罗伦萨的统治,
362
Sodoma, il (Giovanni Antonio Bazzi), 索多马, 伊尔(乔瓦尼·安东尼奥·巴齐), 意大利画家, 138, 147
Soest, 苏斯特, 44
Sologne, 索洛涅, 25
Solothurn, 索洛图恩, 瑞士的州, 204
Solovetsky, 索洛维茨基, 21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114
Sorbonne, College of, 索邦神学院, 308; 印刷所, 103
*Sots*黑人, 见*Enfans sani scuci*
Southwell Minster, 索思韦尔大教堂, 2
Spagnoli, Battista, 斯帕尼奥利, 巴蒂斯塔, 见Mantuan
Spain,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一, 6—7, 28, 320—321; 一般作为转折点, 1; 与国王权力的增长, 6—7; 统一的结构, 322—325
 十字军精神的残余, 10
 对艺术的保护, 17, 165, 168—169
 再征服的完成, 28
 地理和经济, 28—30, 29, 316—317
 摩尔人占领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 28, 29—30

城市的发展和工业，48

人文主义，121—125，又见Arts of the Renaissance（在西班牙）；Literature, vernacular（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人的好战传统，260

15世纪末已做好侵略的准备，262

对意大利的干涉并不限于扩张到一定的自然边界，262

军事组织，263，278—279

使用使节，268

海军组织，287

人口，316，318，456

税收，316

羊毛贸易，317—318

加泰罗尼亚的衰落，318—320

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结婚，320—321；婚约，321—322

哈布斯堡帝国的结构，322—325

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统一，323

镇压伊斯兰，324

葡萄牙的入侵和托罗战役（1476年），325

伊萨贝拉去世与菲利普和胡安娜在卡斯蒂利亚继位，325—326

菲利普去世和费迪南德返回，326

费迪南德兼并纳瓦尔，327—328

在菲利普二世治下与葡萄牙统一，455，468

Spain，西班牙，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时期，6—7

王权的集中，328—329

税收，329，334，449

对高级贵族采取的行动，329—330

兼并骑士团财产，329，330，334，449

秩序的恢复，330—331，449

王室对城镇的控制，331

国会的衰落，331—332

与罗马教廷的关系，332—333

“天主教国王”的称号，332

对教会各派的改革，333

赎罪券和神职人员给予的财政援助，333—334

委员会体制的开始，338—339

又见Inquisition: Jews

Spain, 西班牙，伊萨贝拉死后的对外关系

改变卡斯蒂利亚与法国的传统友谊，339，340—341；威尼斯同盟（1495年），341；收复那不勒斯，341—342；康布雷同盟（1508年）和神圣同盟（1511—1513年），342；从法国在意大利的胜利中获益，365

在北非的战役，339，340

与葡萄牙友好，339—340

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冲突，340

与英国的关系，459，464

Spain, 西班牙，海外扩张及其后果与葡萄牙瓜分新世界，79，332，340，424，429—430，430—431，455，458，466

收入，450—452；作为对福格家族的抵押，451；金银进口一览表（1503—1600年），452

金银进口引起的价格上涨，453

重商主义和为防止金银输出而做的努力，454；失败，459—460

在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经济上的不利条件，456

吸收异国工人，459

对英国施加经济压力背后的宗教动机，460

英国对金银运输路线的袭击，463—464

反对哈布斯堡王室垄断海外贸易，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
464—469

关于探险航行和西班牙殖民地见America; America (Spanish)

Spanish language, 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占优势，178—179

Spavento, Giorgio, 斯帕文托，乔治，129

Speyer, George, 施佩耶尔主教，乔治，巴拉丁伯爵，作为兼职
过多的例子，195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447, 468

批准属葡萄牙（1529年），429

Spieshaym, Johannes 施皮谢伊姆，约翰内斯，见Cuspinian

Spinelly, Thomas, 斯皮内利，托马斯，英国间谍，268

Sponheim, abbey of, 斯彭海姆修道院，117

Srebenica (Bosnia), 斯雷布雷尼察（波斯尼亚），39

Stanbridge, John, 斯坦布里奇，约翰，与拉丁语法教学，107

Standonck, Jean, 斯坦敦克，让，18, 80, 103

与蒙太古派的改革，307

Stephen 斯特凡，摩尔多瓦大公

与承认波兰的宗主权，376, 377, 399, 401—402

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抵抗，396, 399

Stettin, 什切青，44

Stewart house of, 斯图亚特王室，13

Stilfselioch pass, 斯蒂尔夫塞约赫山口, 207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22, 44

Stoss, Veit, 施托斯, 维特, 雕刻家, 158, 161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 117, 189

 人口, 43

Strassburg, University of, 斯特拉斯堡大学, 116

Strozzi family, 斯特罗齐家族, 138

Stubbs, William, bishop, 斯塔布斯, 威廉, 主教, 历史学家, xiii, xix

Styria, 施蒂里亚, 219, 220, 398

Suceava (Moldavia), 苏恰瓦 (摩尔多瓦), 402

Suetonius, 苏埃托尼乌斯, 148

Sulaimān the Magnificent, 苏里曼大帝, 奥斯曼苏丹, 418

 对匈牙利的进攻与莫哈奇战役 (1526年), 392—394

 治理埃及, 417

Sully, 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c de, 絮利公爵, 马克西米连·德·贝图恩, 与法国海外贸易的权利, 466—467

Sulpizio, Giovanni, 苏尔皮齐奥, 乔瓦尼, 他所著语法代替了中世纪的教材, 96

Sundas, 巽他群岛, 葡萄牙与该地贸易, 448

Surigone, Stefano, 苏里戈内, 斯特凡诺, 人文主义学者, 108, 113, 116

Svihovsky, Bretislav, 斯维霍夫斯基, 布莱梯斯拉夫, 罗森贝格的, 波希米亚的天主教派领袖, 391, 392

Swabia, 斯瓦本, 205

Swabian League, 施瓦本联盟

与帝国的改革，198

对瑞士的战争（1499年），198，205—206

与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1504年），198，211

Sweden, 瑞典

15世纪的边界，22

德意志人和城镇的发展，44

本国语文学，191

波兰的西吉斯孟一世拒绝接受瑞典王位，381

Switzerland, Swiss Confederation, 瑞士，瑞士联邦

雇佣兵和军事传统，9，260，263，278—279；与罗马教廷的协定（1510年），207；与法国的协定（1516年），207—208；步兵战术，284

地理、经济和政治组织，34—35，204—205；各州的竞争是不团结的原因，204—205

从神圣罗马帝国得到解放，194；对施瓦本联盟的战争（1499年），198，205—206；汉斯·瓦尔德曼与对抗哈布斯堡王室，205；瑞士对哈布斯堡的仇视，205；拒绝1495年的帝国改革，205；巴塞尔和约（1499年）和独立，206；巩固和扩张，206—207

与入侵意大利，203，204；为查理八世效力（1494年），204；为路易十二和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双方效力，在诺瓦拉拒绝战斗（1500年），206，356—357；与路易十二发生分歧，驱逐法国人（1513年诺瓦拉战役），206，207，216—217，361，362；保卫米兰，在马里尼亚诺战败（1515年），363—364

从法国手中夺取贝林佐纳，206，263，361

入侵勃艮第（1513年），207，217，252，297

与法国媾和（1516年）和瑞士的中立，207—208，364

Syria, 叙利亚

在奥斯曼—麦木鲁克战争中，396，414；奥斯曼的征服和治理，415—416，417

麦木鲁克政府不得人心，414

威尼斯的权利为奥斯曼土耳其所承认，418

Szeklers，塞克勒人，移居特兰西瓦尼亚，38

Szerenees，塞莱切什，见Fortunatus Tabriz，大不里士，397

在波斯—奥斯曼战争中，411，412

Tacitus，塔西陀，67，118

《日耳曼尼亚志》与德意志爱国主义，18，118

Tagliamento，塔利亚门托河，403

Tagus，塔古斯河，俘获汉萨同盟船只，456

Talavera，塔拉韦拉，179

Talavera，Hemando de，塔拉韦拉，埃尔南多·德，托莱多大主教

他容忍穆斯林的风俗和宗教，324

在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治下改革税政，329

Tainos，泰诺人（伊斯帕尼奥拉的印第安人），433

Tardif，Guillaume，塔尔迪夫，纪尧姆，法国人文主义者，他和杰罗拉莫·巴尔博的纠纷，104

Taro，valley of，塔罗河谷，福诺沃战役的战场（1495年），353

Tarsus，塔尔苏斯，46

在奥斯曼—麦木鲁克战争中，400，401

Tatars，鞑靼人

俄罗斯的解放，21—22，368

1241年的入侵，37

帮助波兰反对俄国，377

与土耳其人联盟进攻波兰，393，399，401

屈服于奥斯曼土耳其，375，376，396

与莫斯科结盟反对波兰，381

在内战中支持谢里姆，408，410，411

Tassis family, 塔西斯家族，他们经营的邮路，271

Tasso, Torquato, 塔索，托尔夸托，意大利诗人，149

Tauter, Johannes, 陶勒，约翰内斯，神秘主义作家，188

Tchaldiran, battle of, 查尔德兰战役（1514年），411—412

Tehorlu, 乔尔鲁，苏丹谢里姆死在该地（1520年），418

Tchorlu, battle of, 乔尔鲁战役（1511年），409

Tekke, 泰克，奥斯曼行省，405，407

逐出什叶派教徒（1502年），406

萨法威亚反奥斯曼土耳其的起义（1511年），406

Tekke—lü, 泰克吕，土库曼部落，405

Temesvár, 特梅斯瓦尔，匈牙利行省，398

Tenes, North Africa, 特内斯，北非，卡斯蒂利亚所有，340

Tenochtitlán, 特诺奇提特兰，阿兹特克首府，439，441

被科尔特斯所占领并摧毁（1521年），442

Terence, 泰伦提乌斯，108，174，180

马基雅弗利译的《安德罗斯女子》，175

法文译本，约1500年，182

德文译本（1499年），188

Terjan, 特尔詹，奥斯曼—波斯战争（1473年），396

Teschen, duchess of, 切申女公爵, 斯特凡·扎波利亚伊的遗孀, 377, 379

Tetzel, John, 特茨尔, 约翰, 与出售赎罪券, 88

Teutonic Order, 条顿骑士团, 378—379

Texcoco lake of, 特斯科科湖(墨西哥), 439

Thasos, 萨索斯岛, 并入奥斯曼帝国(1455—1456年), 395

The Hague, 海牙, 审计院的独立, 230, 246

Theocritus, 忒奥克里托斯, 149

Thérrouanne, 塞洛昂, 217

Thessalonica, 塞萨洛尼卡, 46

Thomas Aquinas, St, 托马斯·阿奎那, 圣, 19, 122

Thomas More, St, 托马斯·莫尔, 圣, 见More, Sir Thomas

Thom, 托伦, 44

Thom, Treaty of, 托伦条约(1466年), 380

Thuringia, 图林根, 24

Tieffen, 梯也芬, 条顿骑士团首领, 378

Tifemate, Gregorio, 蒂费纳特, 格雷戈里奥, 与巴黎的人文主义研究, 103, 104

Till Eulenspiegel, 《梯尔·欧伦施皮格尔》, 187—188

Tirol, 蒂罗尔

为马克西米连一世所得(1490年), 199, 203

与格劳尔部族的纠纷(1498年), 与瑞士对施瓦本联盟的战争, 205—206

在兰茨胡特继承权之战中(1504年), 211, 212

马克西米连加强对行政的管理, 219

岁入，作为向福格家族借款的抵押，451

Tissard, Francois, 蒂萨尔，弗朗索瓦，与巴黎的希腊语研究，104—105

Titian (Tiziano Vecellio)，提香（蒂齐亚诺·韦切里奥），意大利画家，127

他的宗教画，137

他的风格中古典的和幻想的成分，139

他的《酒神节》，145—146

他《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中的新柏拉图主义，145—146

他的《信仰的胜利》，147

他的肖像画，149，169

受查理五世的保护，153，169；受威尼斯德国商人的保护，156

Tlaxcala (Mexico)，特拉斯卡拉（墨西哥），帮助科尔特斯，441，442，443

Tokat (Anatolia)，托卡特（安纳托利亚），什叶派反对谢里姆苏丹的起义（1518年），418

Toledo，托莱多，48，168

圣胡安·德洛斯·雷耶斯修道院，166

Toledo, archdiocese of，托莱多大主教区，扩大到西非，319

Toledo, Alonso de，托莱多，阿隆索·德，他的《史鉴》，181

Tolfa，托尔法，该地的明矾制造业，32

Tomco, Leonico，托梅奥，莱奥尼科，与帕多瓦的人文主义，96，100

Tomori, Paul，托莫里，保罗，考洛乔大主教，在莫哈奇战役中指挥匈牙利军队（1526年），394

Tordesillas, Treaty of,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1494年），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新世界，424，425，429，431，455

由萨拉戈萨条约（1529年）加以补充，429—430

Torghud, 托古德族，土库曼部族，397，399，400，404

Tornabuoni, Giovanni, 托尔纳博尼，乔瓦尼，意大利银行家，吉兰达约的保护人，137

Toro, battle of, 托罗战役，（1476年），166

与未能使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统一，325

Toros de Guisando, agreement of, 托罗斯德基桑多协定（1468年），与天主教徒伊萨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320

Torquemada, Thomas de, 托克马达，托马斯·德，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总宗教裁判官，77，337

Toscanelli Paolo, 托斯卡内利，保罗，意大利地理学家，约翰二世曾就向西到达印度的路线与他商量，423

Toulouse, 图卢兹，百花诗赛，186

Toumai, 图尔内

遭到根特各行各业所招军队的进攻（1477年），228

为亨利八世所占（1513年），228，252，256；归还法国（1519年），256

为查理五世重新占领（1521年），256

Tours, 图尔，302

大教堂，160

神职人员大会（1493年）和教会改革，306

丝绸工业，311

集市，313

Towns, 城镇

从波希米亚的矿工居住地发展而为城镇， 39

中世纪时的发展， 39—40

与欧洲西北部的纺织工业， 42

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家所尊重的中世纪式样， 132—133

15世纪法国的城市重建， 310—311

Trade and commerce, 贸易与商业毛皮贸易， 21（参见22）； 加拿大的， 466

英国对俄贸易， 21

瑞士在中世纪时出口畜牧产品， 35

中世纪的煤炭贸易， 38

分为波罗的海和北海商业与地中海商业， 40—41

香巴尼集市的衰落， 40

14世纪和15世纪时贸易与商业的收缩， 40

与中世纪的城市发展， 40； 在波罗的海， 44—45

干鱼和咸鱼， 41

粮食出口， 41； 从但泽出口， 384

葡萄酒贸易， 41； 法国与英国的， 27

木材和木材产品， 41—42， 456

羊毛， 29， 42， 317—318， 319

奢侈品， 42

15世纪的地中海贸易， 45—48； 16世纪的地中海贸易， 447，
464

意大利向西北的海上贸易， 47

与非洲的商队贸易， 47

15世纪和16世纪时葡萄牙的贸易与商业，49；东方贸易的建立，422—423，447—449；组织欧洲市场，448—449；菲利普二世将香料贸易从英吉利海峡转移，464

德国的扩张（1350—1550年），66

福格家族和霍赫施泰特尔家族对铜的控制，197

15世纪时法国的扩张，310—311；里昂和对外贸易，312

卡斯蒂利亚垄断美洲贸易，324

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黑海贸易的停顿，335

基督教徒重新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后果，420—421

巴西的染料木贸易，429

奴隶贸易，434，436，457—458

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军军用物资，458

尼德兰的鲱鱼贸易，463

荷兰的东印度贸易，468—469

又见Expansion（海外），扩张在欧洲的影响

Tramellio, Alessio, 特拉梅利奥，阿莱西奥，意大利建筑家，
128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15世纪时人种分布，37

Trastamara family, 特拉斯塔马拉家族，其在西班牙各统治家族中的位置，321，322

Treaties, 条约，尊重与违反的借口，262—263

又见各条约名称

Trebizond, 特拉布松，46，411

希腊人的特拉布松帝国，并入奥斯曼帝国（1461年），395

奥斯曼行省，407，412

Trevelyan G.M.，特里维摩，乔·麦，论15世纪英国的文化保守主义，52—53

Trier archbishop of，特里尔大主教，作为世俗的统治者，195

Trieste，的里雅斯特，为威尼斯所占（1508—1509年），214；马克西米连批准归威尼斯所有，360

Trinidad，特立尼达岛，为哥伦布所发现（1498年），433

Tripoli，的黎波里（北非），319

卡斯蒂利亚所有，340

Tripoli，特里波利（叙利亚），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400；奥斯曼占领，416

Trissino, Giovanni Giorgio，特里西诺，乔万尼·乔治，意大利作家，175

Trithemius, Johannes，特里特米乌斯，约翰内斯，斯彭海姆和维尔茨堡修道院院长

与人文主义学术，117，120

论密码（《密码六论》），271

Triumphal processions，凯旋式游行，模拟古代，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47

Trivulzio, Gian Giaeomo，特里武尔齐奥，吉安·贾科莫，136

让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替路易十二效劳，356—357

他在马里尼亚诺的胜利（1515年），364

Troitsa，特罗伊察，21

Troubadours，行吟诗人，意大利对他们诗歌的移植和修改，70

Troyes，特鲁

瓦主教座堂，160

集市，313

Tuat, 图亚特绿洲, 47

Tūmān Bāy, 突曼贝伊, 麦木鲁克苏丹, 在麦木鲁克—奥斯曼战争中战败而死, 416, 417

Tunis, 突尼斯, 267, 421

Turcoman tribes, 土库曼部族, 奥斯曼承认他们的特权, 417

又见Ak Koyunlū; Karaman-oghlū; Ramazan-oghlū; Rum-lū; Tekke-lū; Torgħud; Varsak

Turks, 土耳其人, 见Egypt, Mamluk empire of; Ottoman Turks

Turmair, Johann (Aventinus), 图尔迈尔, 约翰 (阿文提努斯), 与德国历史编纂学, 118

Tver, 特维尔, 为伊凡大帝所降服, 368

Ulm, 乌尔姆, 主教座堂, 160

‘Ummaiyad caliphate in Spain, 西班牙的伍麦叶哈里发国, 其覆亡和欧洲对非洲扩张, 420

Union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统一运动 (1438—1439年), 以及伊凡大帝和立陶宛的亚历山大之间的战争, 369, 376—377

Unity of the Brotherhood, “弟兄联盟”, 波希米亚教派, 389

Universities, 大学

德国: 学生人数的增加, 4; 人文主义, 67—68, 116—117; 世俗大学的成立占优势, 196

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的大学与北方的大学相对比, 15

中世纪教会改革纲领的失败, 51

15世纪中叶后大学的衰落, 51—52

人文主义与中世纪传统, 96—97

引进希腊文, 100, 104—105

在斯堪的纳维亚成立大学, 121

与罗马法的传播, 197

在西班牙, 122—124

又见大学城镇名称各条目

Unterwalden, 下沃尔登, 瑞士的州, 204

Uppsala, University of, 乌普萨拉大学, 121

Urbino, 乌尔比诺, 16, 17, 95, 169, 171, 175, 177

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和对曼图亚的友好, 349

传给罗韦雷家族, 349

利奥十世为了洛伦佐·美第奇而排挤弗朗切斯科·罗韦雷, 363

Urceo, Codro, 乌尔切奥, 科德罗, 与波洛尼亚的人文主义教学, 96

Uri, 乌里, 瑞士的州, 204

Urrea, Pedro Manuel Jiménez de, 乌雷亚, 佩德罗, 曼努埃尔·希门尼斯·德, 他的散文和诗歌, 179

Utraquists, 酒饼同领派, 与波希米亚的宗教纠纷, 389, 391

Utrecht, David of Burgundy, bishop of, 乌得勒支主教, 勃艮第的大卫, 229

马克西米连恢复其主教职务(1483年), 233

Utrecht, Frederick of Baden, bishop of, 乌得勒支主教, 巴登的弗里德里希, 辞职(1516年), 255

Utrecht, Philip of Burgundy, bishop of, 乌得勒支主教, 勃艮第的菲利普, 好人菲利普的私生子, 任命(1516年), 255—256

Utrecht, 乌得勒支, 主教区, 229, 232

马克西米连加强其控制(1483年), 233

应邀参加1488年的“同盟”, 236

查理五世取得控制权, 255—256

Uzbek, 乌兹别克, 河间地带的可汗, 攻打呼罗珊 (1510年), 406, 410

Uzun Hasan, 乌宗·哈桑, 波斯国王, 397

他建立波斯国家, 396

与威尼斯联盟反对奥斯曼土耳其, 396

庇护舍赫·朱奈德 (萨法威亚领袖), 405

Vács (Waitzen), 瓦茨 (瓦伊岑), 匈牙利, 德意志人居住地, 37

Valea Albă, 瓦列亚阿尔巴, 奥斯曼打败摩尔多瓦人 (1476年), 396

Valencia, 巴伦西亚, 6, 48, 318

与意大利的文化联系, 169

大教堂, 169

代替巴塞罗那成为财政中心, 319

Valencia, Kingdom of, 巴伦西亚王国

人口, 316

王后热尔曼 (德·福埃) 作为女总督, 323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的婚约中, 322

法国工人在巴伦西亚, 16世纪时, 459

Valencia, University of, 巴伦西亚大学, 创办 (1500年), 125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 243

Valera, Diego de, 巴莱拉, 迭戈·德, 西班牙历史学家, 181

Valeriano, Piero, 瓦莱里亚诺, 皮耶罗,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他关于象形文字的著作, 102

Valla, Lorenzo, 瓦拉, 洛伦佐,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3, 88, 117

《新约》研究与章句诠释, 55, 98, 113, 117; 他的兴趣和伊拉斯谟的兴趣不同, 18

研究罗马法, 102

Valladolid, 巴利阿多利德, 该地的圣格雷戈里奥和圣巴勃罗教堂, 166

Valois, house of, 瓦卢瓦王室, 8, 10

Valtelline, 瓦尔泰利纳, 207

Valturius, Robertus, 瓦尔托里厄斯, 罗伯托斯, 他的《论军事》, 276

Vanucci, Pietro, 瓦努齐, 彼得罗, 见Perugino

Varna, battle of, 瓦尔纳战役(1444年), 371

Varsak, 瓦萨克族, 土库曼部族, 397, 399, 404

Vasari, Giorgio, 瓦萨里, 乔治, 意大利作家, 他的《艺术家长传》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 152

Vásquez, Francisco, 巴斯克斯, 弗朗西斯科, 西班牙作家, 180

Vecellio, Tiziano, 韦切里奥, 蒂齐亚诺, 见Titian

Veere, port of, 维尔港, 与斯卢思的私掠活动, 242

Velasquez, Diego, 贝拉斯克斯, 迭戈

古巴移民地, 435

卡斯蒂利亚德奥罗移民地, 439

对科尔特斯不信任, 439, 441

Velleius Paterculus, 韦利奥斯, 帕特库洛斯, 莱纳努斯编印的版本, 118

Venezuela, 委内瑞拉

在哥伦布的加勒比探险中，433

在奥赫达和韦斯普奇的探险中，436

Venice, 威尼斯, 6, 7, 131, 139, 150, 155, 171

与奥斯曼土耳其：在希腊和爱琴海的抵抗和损失，33, 395；奥斯曼与威尼斯在意大利的敌人结盟，265, 403；战争（1498—1502年），281, 402—404；亚得里亚海，395, 396；与波斯联盟，396；战争（1463—1479年），395, 396

贸易和商业，40, 46, 47, 48, 156, 447, 464；探险航行的威胁，345

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46

15世纪时的海外帝国，46

工业，47, 287

大陆领地，72, 344—345

与康布雷问题（1508年），81, 297, 345；马克西米连的失败（1509年）与同盟的形成，214, 359—360；丧失亚得里亚海港，342, 361；在阿尼亚德洛战败（1509年），360, 363, 366；从罗马涅被逐，360—361

与神圣同盟：同盟的形成（1511年），81, 215, 342；失去布雷西亚，361；对弗朗西斯一世的援助，363—364；法国在马里尼亚诺胜利后（1515年）收复领土，365

印刷业，95—96, 100, 116

人文主义学院，97

丢勒的访问，154—155

德意志商人的居留地，156

在达尔马提亚的文化影响，192

与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入侵；和米兰一起敦请马克西米连干涉（1496年），202—203；威尼斯同盟（1495年），332, 341, 353；1494年的中立，351；对路易十二的支持，356

与马克西米连的最后一次意大利远征（1516年），217

外交：使用常驻使节，266，267，272；情报机关，266，279

军事组织，279，286，297，344—345，402；海军组织，287，288；军火库，287

与弗拉拉的战争（1482年），336，348

入侵意大利前夕威尼斯的地位，344—345

社会和政治组织，345

16世纪时的衰落，447

Vera Cruz，维拉克鲁斯，440，441

在卡布拉尔对印度探险中，428

Veragua, duchy of，贝拉瓜公爵领地为哥伦布的家族所拥有，436

Vérard, Antoine，韦拉尔，安托万，法国出版家，182

Verböczi，维尔伯齐

和匈牙利的法典编纂，387—388

小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斗争，393

Vercelli, Peace of，维切利和约（1495年），353

Verezzano, Giovanni，维雷扎诺，乔万尼，与法国在北美洲的移民，445，466

Vergil, Polydore，维吉尔，波利多尔，与英国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56，110

Verais, Nicoletto，维尔尼亚，尼科莱托，他对亚里士多德作阿威罗伊式的解释，101

Verona，维罗纳，6，47，132，136，214

威尼斯的控制，46；在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之后回归威尼斯，365

城防工事，282

在法国入侵意大利（1515年）时，363，364

Verona, Guarino da, 韦罗纳，瓜里诺·达，与人文主义的教育，71

Verrochio, Andrea, 韦罗基奥，安德烈亚，意大利雕刻家，136

Vervins, Treaty of, 弗尔汶条约（1598年），467

Vese, Etienne de, 维斯克，艾蒂安·德，博凯尔司法总管，鼓励查理八世对意大利的野心，350

Vespucci, Amerigo, 韦斯普奇，阿梅里戈

与美洲大陆的发现，428

加勒比海沿岸探险，436

Via Emilia, 艾米利亚大道，在保卫意大利中的重要性，351，352

Vicente, Gil, 维森特，吉尔，葡萄牙戏剧家，182

Vicenza, 维琴察，47

与神圣同盟，360—361

奥斯曼的袭扰（1499年），403

Vidin, 维丁，奥斯曼行省，404

Vienna, 维也纳，150，220，234

Vienna, Congress and Treaty of, 维也纳会议和条约（1515年），380，381

Vienna, University of, 维也纳大学，68，116

Vigarny (de Borgona), Felipe, 维加尼（德·博戈纳），菲利普，与意大利对西班牙艺术的影响，168

Vilain, Adrian, lord of Rassenghem, 维兰，阿德里昂，拉森海姆勋爵，235

与佛兰德反对马克西米连一世， 232

与法国谈判（1489年）， 238

被害（1490年）， 239

Villach, 菲拉赫， 451

Villach, battle of, 菲拉赫战役（1492年）， 398—399

Villafranca, battle of, 比利亚弗兰卡战役（1515年）， 364

Villena, marquis of, 比列纳侯爵， 329

Villon, François, 维永， 弗朗索瓦， 法国诗人， 60, 102, 182

Vilna, 维尔纽斯， 立陶宛大公居住地， 375

Vilvorde, 维尔沃德， 阿德里昂， 维兰被囚禁之地， 235

Vinci, Leonardo da, 芬奇， 列奥纳多·达， 意大利艺术家，
127, 162, 169

与马尔塔塞纳渠， 32

对建筑的兴趣， 130, 133； 在法国的影响， 160

设计骑士像， 136

他的绘画， 137, 155； 在佛罗伦萨的战争画， 141； 肖像画， 蒙
娜丽莎， 148

与艺术理论， 150—151； 为他的《最后的晚餐》所阐明， 151

研究解剖学， 151

在西班牙的影响， 169

与炮术的发展， 366

Vio, Tommaso da, 维奥， 托马索·达， 见Cajetan

Virgil, 维吉尔， 3, 70, 95, 114, 149

与波利蒂安的《乡下人》， 98

与鲁切莱的《蜜蜂》， 172

16世纪的法文译本，182

加文·道格拉斯译的《伊尼特》，190

Virgin Islands, 维尔京群岛，在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中，432

Visch eh, Peter, the elder, 菲舍尔，彼得，老，德国雕刻家，与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墓，161

Viseher family, 菲舍尔家族，德国雕刻家们（汉斯，老彼得，小彼得），他们的作品受意大利的影响，155，158—159

Visconti family, 维斯孔蒂家族，2，6，16，71

Visconti, Bianca, 维斯孔蒂，比安卡，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之妻，344

Visconti, Filippo Maria, 维斯孔蒂，菲利波·马里亚，米兰公爵，267，348

他的去世（1477年）和维斯孔蒂家族在米兰的统治的结束，344

Visconti, Valentina, 维斯孔蒂，瓦伦蒂娜，与路易十二对米兰的权利要求，353

Vistula, 维斯杜拉河，22

Vitelli brothers, 维泰利兄弟，他们按瑞士的模式训练步兵，366

Vitelli, Comelio, 维泰利，科尔内利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巴尔博在巴黎的争论，104；在牛津，108

Viterbo, 维泰尔博，139

Viterbo, Annio de, 维泰尔博，安尼奥·达，他的伪作，102

Viterbo, Egidio de, 维泰尔博，埃吉迪奥·达，意大利神学家，101

Vitruvius, 维特鲁威

与文艺复兴的建筑，129—131；丢勒的研究，154；萨格雷多《古罗马建筑法式》一书的基础，168

各版本, 130

Vlachs, 弗拉赫人, 34

Volga, 伏尔加河, 21

Vologda, 沃罗格达, 21

Voragine, Jacques de, 沃拉琴, 雅克·德, 《黄金传奇》是布列塔尼敬神文学的源流, 192

Voyages of discovery, 探险航行, 见 America; America (North); America (Spanish); Expansion; Spain; Portugal; Venice

Vyatka, 维亚特卡, 为伊凡大帝所征服, 368

Waldmann, Hans, 瓦尔德曼, 汉斯, 苏黎世州长, 他的去世是对瑞士团结的一个打击, 205

Wales, 威尔士,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之外, 111; 15世纪晚期诗歌的形式主义, 170

Wallachia; 瓦拉几亚为匈牙利所夺取(1522年), 392

为奥斯曼土耳其所洗劫(1462年), 396

War, 战争

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 259—260, 289—291

15世纪时有利于发动战争的条件, 260—262

15世纪和16世纪时缺少经济上的推动力, 261—262

统治者是唯一的发动者, 262

教廷控制权的告终, 264

意大利战争中战事的过渡性, 275—276

军事文献, 276—277

战术, 284—286; 海上的, 288

骑士传统的残余, 288—289

合法的诈术与非法的诈术之区别，289

战争惯例的法典编纂，290

又见Armies; Artillery; Fortification; Ships; Weapons

War of the Common Weal, 共同福利联盟战争（1465年），6

War of the Landshut Succession, 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1504年），211—212

Warbeck, Perkin, 沃贝克，珀金，马克西米连赞同约克的玛格丽特对他加以支持，244

Wars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1450—1485年），对英国贵族的影响，8

Wassenhove, Joos van, 华森豪甫，裘斯·范，见Justus of Ghent

Weapons, 武器，283—284；火器，283；又见Artillery

Weis, 韦尔斯，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之地（1519年），219

Weiser family, 韦尔瑟家族

与在美洲的贸易租让，324

与控制十字军经费的收入，334

Wener, 维纳恩湖，22

Wenzel II, 文策尔二世，波希米亚和波兰国王，371

Wenzel III, 文策尔三世，皇帝，波希米亚国王，348

Wessel, John, 魏塞尔，约翰，神秘主义神学家，113

West Friesland, 西弗里斯兰，奶酪和面包起义，240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见America; America (Spanish)

Wetter, 维特恩湖，22

Weydem Roger van der, 韦登，罗杰·范·德尔，佛兰德画家，154, 156, 157, 168

Wheeler, John, 惠勒, 约翰, 冒险商公司秘书, 论安特卫普通过殖民地贸易致富, 449

White Sea, 白海, 21

Whittinton, Robert, 惠廷顿, 罗伯特, 与拉丁文语法教学, 107

Wielant, Philip, 威朗, 菲利普, 与尼德兰大枢密院, 230

Wiener, Neustadt, 维也纳新城, 219, 220

Wimpfeling Jacob, 温普斐林, 雅各布, 德国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17, 118

Winchester School, 温切斯特公学, 53

Windesheim, 温德谢姆修会, 奥古斯丁教规, 64, 91, 112

Winds, 风, 北大西洋风系和哥伦布的航行, 430

Wisby, 维斯比, 44

Wismar, 维斯马, 44

Witchcraft, 巫术, 《深情地希望》通谕(1484年)和《作恶者罪孽》通谕(1487年), 77, 92

Wittelsbach, house of,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与施瓦本联盟, 198

与兰茨胡特继承权战争(1504年), 211—212

Wittenberg, University of, 维滕贝格大学, 218

Wladislaw II 瓦迪斯瓦夫二世,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在匈牙利王位继承问题上与马克西米连的协议, 213, 221—222

即波希米亚王位, 372—373; 被承认为匈牙利国王, 373

绰号“好吧”, 374

与波兰的约翰·奥尔布拉赫特的密切关系, 375, 377, 381—

和勃兰登堡的巴巴拉结婚（通过代表），377；和阿拉贡的贝阿特丽克斯结婚，377；和安妮·德坎戴勒结婚，378

与扎波利亚伊反对派，379

与王室权力的衰落，387

逝世（1516年），391

Wladislaw II (Jagiello)，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沃），波兰国王，与亚盖沃王朝在波兰的建立，371

Wladislaw V (Postumus)，瓦迪斯瓦夫五世（波斯图穆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371

Wolsey, Thomas, 沃尔西，托马斯，红衣主教，约克大主教，13, 110, 272

Worcester, William, 伍斯特，威廉，见Botoner, William

Worde, Wynkyn de, 沃尔德，温金·德，英国印刷业者，191

Worms, 沃尔姆斯，159, 202

遭到冯·济金根的攻击（1514—1517年），217

Worms, 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和敕令（1495年），199—202, 203, 204, 214—215, 又见Empire, Holy Roman（帝国的改革，1521年），105

Württemberg, Eberhard (Barbatus) duke of, 符腾堡公爵，埃贝哈德（巴巴杜斯），与施瓦本联盟，198

Württemberg, Ulrich, duke of, 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为施瓦本联盟所推翻，198

Würzburg, abbey of, 维尔茨堡修道院，117

Ya' kūb Beg, 亚库布贝伊，波斯国王，397, 405

Yañez, Fernando, 亚涅斯，费尔南多，西班牙画家，169

Yaroslav, 雅罗斯拉夫，21

Yenishehir (Anatolia)，耶尼谢希尔（安纳托利亚），411

杰姆的战败（1481年），397

艾哈迈德为谢里姆所败（1513年），410—411

Ypres, 伊普雷, 与反对马克西米连做菲利普大公的摄政, 231

Yucatān, 尤卡坦玛雅人的城市, 439

西班牙沿海岸探险, 439

Zaccagni, Bernardino, 扎卡尼, 贝尔纳迪诺, 意大利建筑家, 130

Zanchari, Andrea, 赞卡尼, 安德烈亚, 威尼斯派往奥斯曼土耳其的使节, 403

Zante, 赞特, 在威尼斯—奥斯曼战争中, 403; 威尼斯为它支付贡金, 404

Zápolyai, 扎波利亚伊王室, 在东欧反对哈布斯堡家族, 377, 379, 381

Zápolyai, Barbara, 扎波利亚伊正室, 巴巴拉, 见Barbara, 波兰王后

Zápolyai, Imre, 扎波利亚伊, 伊姆雷, 匈牙利的巴拉丁选侯, 373

Zápolyai, Jan, 扎波利亚伊, 扬,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后为匈牙利国王）与反对哈布斯堡王室, 222, 379, 392

在奥斯曼对匈牙利的进攻中, 392, 393

Zápolyai, Stephen, 扎波利亚伊, 斯特凡, 匈牙利的巴拉丁选侯, 377

Zara, 扎拉, 为威尼斯所占据, 402

Zealand, island, 谢兰岛, 22

Zeeland, 泽兰

在大枢密院有代表, 225

与勃艮第的玛丽和马克西米连成婚, 227

菲利普大公恢复圣室的收入和权利，246

Zierikerzee (Zeeland)，齐里克泽（泽兰），253

Zoë (Sophia) palaeologue, 佐约（索菲亚）·巴利奥洛格，俄国沙皇伊凡大帝的王后，369

Zuccaro, Federigo, 祖卡罗，费代里戈，意大利画家，144

Zug, 楚格，瑞士的州，204

Zuider Zee, 须德海，256

Zu' l-Kadr, 祖尔-普德尔，阿尔比斯坦的统治家族，396

Zuñiga, Diego Lopez, 苏尼加，迭戈·洛佩斯，西班牙学者，他对伊拉斯谟和勒费弗尔·戴塔普的攻击，124

Zürich, 苏黎世，瑞士的州，204，205

Zurita, Jeronimo de, 苏里塔，吉罗尼莫·德，328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宗教改革 1520—1559年

[英] G.R.埃尔顿 (G.R.Elto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2: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宗教改革 1520—1559年

[英] G. R. 埃尔顿 (G. R. Elto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 宗教改革：1520—1559年/（英）G. R. 埃尔顿（G. R. Elton）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书名原文：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2,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ISBN 978-7-5203-2590-5

I. ①新… II. ①G…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520-1559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1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张湉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52.5

字数 832千字

纸书定价 18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2: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ISBN 978-052134765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致谢

编者谨向彼得·默里博士、J. 林奇博士、J. 罗伯茨博士和M. S. 安德森博士致谢，承蒙他们在编辑本卷的重要阶段一俟接到邀请即同意鼎力合作。他们均欣然接受并完成了时间十分紧迫的任务。编者深知未能给予他们以在通常情况下本应有权要求得到的充裕时间来撰写或最后修订他们的文稿。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引论：宗教改革时代](#)

[第二章 经济变革](#)

[一 农业](#)

[二 安特卫普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 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迄至1529年）](#)

[第四章 瑞士的宗教改革及其教派](#)

[一 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的宗教改革](#)

[二 再洗礼派](#)

[第五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宗教改革](#)

[一 丹麦](#)

[二 挪威](#)

[三 冰岛](#)

[四 瑞典](#)

[五 芬兰](#)

[六 波罗的海国家](#)

[第六章 宗教改革陷入困境](#)

[一 1555年前的德国宗教改革](#)

[二 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

[三 1519—1559年的法国](#)

[第七章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第八章 意大利与教皇统治](#)

[第九章 新修会](#)

[第十章 查理五世在欧洲的帝国](#)

[第十一章 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室的斗争](#)

[第十二章 知识发展潮流](#)

[一 著述：印刷的书籍](#)

[二 科学](#)

[第十三章 学校和大学](#)

[第十四章 西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

[第十五章 东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

[第十六章 陆军、海军与战争艺术](#)

[第十七章 1520—1566年的奥斯曼帝国](#)

[第十八章 1462—1583年的俄罗斯](#)

[第十九章 1521—1580年的新世界](#)

[第二十章 欧洲与东方](#)

[索引](#)

第一章 引论：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丰满的时期，具有自身的特点及其中心事件，甚至也许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就历史时期的划分而论，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就是那些对16世纪初期的传统解释持异议的人，通常都集中攻击把16世纪看作是近代的开端的见解。有些思想史学者直接通过研究16世纪来探索中世纪，从中发现了新奇的东西，研究中世纪教会内部的别的争论则不会有这些新发现；他们愿意以某一点——世俗（科学）的思想态度突出地取代宗教思想的时候——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对宗教改革的性质进行重新评估的学者，并不否认1520—1560年间本身所呈现的特殊性质；但是另有一些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的热心支持者——甚至都情愿对此予以否认。如果有人要把宗教改革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偏差（即使是过了400年以后仍要结束的一个阶段），或者仅仅看作是回归正路——这些分析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却合乎宗派的需要——这样做人们就会因怀疑宗教改革的精神内容与思想内容而过多地抹杀这个时期所具有的凝聚力。论证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反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实质上都属于同一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可能的。但是那些为了方便起见，而把他们研究的主题分为若干时期，又动辄对这些时期进行修改的历史学家，一般还是容许“宗教改革”这一提法继续存在下去的。本章的宗旨是要探索，人们默许这一已确立的传统提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40年具有其凝结性和意义？

首先，这一时代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这一点虽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必须予以强调，因为有人对一度认为的宗教改革具有毫无疑问的独特性持合理的怀疑态度。非常明显，远在路德的攻击显示所谓拉丁教会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以前，这个所谓的大家庭早已经不起严格的考查。多样化，有时甚至走向异端的极端，在中世纪教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卜尼法斯八世（卒于1303年）晚期以来，教皇政权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一统的统治。本套史书的前一卷已经叙述过，15世纪晚期出现了向成立本国教会发展，削弱教皇统治，将教会土地改为世俗拥有，世俗统治者得势的各种趋势。^[1]上述这些特点和与路

德、茨温利及加尔文相联系的宗教与灵性的剧变，都构成宗教改革的特点；再者也要注意，像威克里夫和胡斯发起的运动，都可算作是对宗教改革所缺少的因素的补充；而15世纪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实践和信仰，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抗拒普遍权威的先声。因此，有时人们也认为宗教改革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没有什么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它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看来这些论点中不无真理，有时人们会看到另一种观点，即认为直到16世纪初期，一直存在着罗马领导的统一教会所体现的真正的基督教大家庭。和这种观点相比，上述看法值得特别注意。但是如果这种修正的观点以为，发现各种导致宗教改革的趋势，会使宗教改革这个重大事件丧失其无比的重要性，这就太过分了。后来发生的宗教论战——这种论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改变了种种古老的问题的整个性质。世俗化，诸侯凌驾于教会之上及宗教上的多样化，在1517年以前可能都曾出现过；但是自宗教改革以后它们才成为有影响力的、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现象。这场反对教皇专制权力与神职人员特权的运动的大爆发，转变了欧洲的政治、思想、社会和宗教的性质；不应因这场突发运动所针对的是一些已被削弱的敌人，并且产生了这次宗教革命的领袖既未预料到又不欢迎的结果，而认为它的革命性有所减损。自此本卷所论都将证明宗教改革产生的冲击力是势不可挡的。此一时代的特有标志就是它的独特性，这正是由于它与教会内较早时期出现的问题具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特点，但却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果。尽管较早的一些运动具有相似的目标和灵感，但只有新教宗教改革在依附罗马的教会里导致了永久性的分裂。

应该把“宗教改革时代”定义为新生教会采取攻势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应该（按照一般传统）始于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的年代（1517年），一般要延续到16世纪50年代晚期。1559年开始的特兰托公会议第三次会议以教皇的退却而告结束；此后罗马教会开始采取攻势。这并不是说反宗教改革一直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正如为恢复罗马教会的统一企图召开一次公会议的历史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对罗马教会发动攻击的人们自始就激起了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渐渐地发展得更有信心，更加强烈（见本书边码第170页以下）。欧洲的第一君主查理五世皇帝对旧教的继续效忠，助长了反抗势力。反对新生教会的运动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初步镇压新生力量的过程中取得一

些经验和胜利；后者不仅担当了世俗领导，而且还发挥了宗教影响，该国教会拥有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异端裁判所法官，它成为迫害人的经验丰富的教会范例。新修会的兴起证明旧教远未死亡（第九章）。在玛丽都铎统治下的英国预演了一出反击宗教改革的戏剧。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一些事情，尽管1547年德意志新教诸侯战败，这个时代的真正活力还是在宗教改革这一边。德意志的改革运动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和约》作为结束，英国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以1559年伊丽莎白恢复新教而告终。建立路德宗教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君王，于1559年（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和1560年（瑞典的古斯塔夫一世）相继去世。法国亨利二世之死（1559年）也成为一时期结束的标志，但它的影响却离奇地与一般的经验相反：对新教的镇压很早就开始了，到1560年后，政治混乱给勇敢的组织军事化的胡格诺力量带来了机会。但是如果反宗教改革在法国遇到大的困难的话，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吉斯家族而不是亨利二世的自觉与积极行动。老一代的历史学家说得对：本卷涉及的这四十多年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定义为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改革在这四十多年中取得异常的进展，既迅速又广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地区都受到它的影响，不过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受影响较小并设法与宗教改革保持一定距离。在别的地方，某种形式的新教由少数布道家的热情一夜之间发展成为广泛的人民的运动。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宗教改革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是人们一直难以确定的问题，今天没有人愿意把宗教改革的“诸种原因”一一列举出来。这个现象如此复杂，其起因如此众多，所以只有对数百年的历史进行全面分析，才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出近似的答案。但普遍存在的对神职人员的反感在其间发挥了作用，宗教改革往往伴随着对罗马的敌意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运动中夹杂着贪婪与嫉妒，其中还有权谋。但是不可否认，那些改革家所传讲的讯息满足了人们强烈的灵性饥渴，这正是官方教会未能做到的（在历史上也并不是第一次）；宗教改革达到某些阶段时，也并不总是能使所有指望从中获得灵性滋养的人们感到满意，结果除了那些较受欢迎的改革者外，很快涌现出一些由极端分子组成的团体，这一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无论走到哪里，宗教改革的传播者们并不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去吸引追随者，尽管政治力量的支持在先知式的传道开始造成强大推进力以后对巩固改革证明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可忘记，宗教改革在起初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富有宗教使命的灵性运动。

另一方面——这方面应予以强调，宗教改革不是争取自由的运动，除非赋予自由非常专门的意义。所有不同形式的新教义在抵制一个特定的权威——教会与教皇的权威。但是几乎所有形式的新教都以某种其他形式的权威取而代之，并禁止时而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圣经》成为最高的权威，解释《圣经》只需注重《圣经》经文，而不需要作为中介的教会的干涉。其结果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从基督教真谛的恢复到与僵化而不注重理解的基要主义有关的种种谬说并存。在政治上，那些主要的宗教改革家都倾向于支持世俗权力；虽然路德不是诸侯的驯服工具，但也不像人们有时（从他反对农民的著述中引用的话）推断的那样是人民的敌人。他和大多数新教徒一样，只要执政者是虔诚的信徒，就给予他们合乎情理的尊重。思想自由也许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最不提倡的。这些具有传教热情的运动不允许宽容精神和怀疑主义的存在，也不会在他们所攻击的对象中间产生这种回应；在这场新时代的宗教论战中，首先被牺牲的就是自由探索精神和对不从国教者应有的耐心。路德可能因损害伊拉斯谟式的知识分子而成为极端的蒙昧主义者；意大利天主教的所谓改革者们的命运（第八章）表明，在大异端罪名的压力下对合理的不同观点的宽容是如何转变为强烈的敌意的。托马斯·莫尔著有《乌托邦》，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文主义者，但到1530年已经发展成为迫害他人的大法官。

宗教改革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宗派性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狭隘的时代。在斗争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之际，冲突时代的激情还常常蒙蔽人们的认识，这无益于公允地估价这个时代的成就。有时，人们主张，熟知意识形态斗争和迫害的20世纪，由于有丰富的认识应该也的确能够理解16世纪。但是，忽视世俗意识形态与超自然的宗教之间存在的不同点而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会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其结果（实为屡见不鲜）是用20世纪的观点解释16世纪的历史。与宗教改革前的一百年左右相比，在某些方面宗教改革时代距离现在更远，宗教改革的基本思想态度包括两点：其一是认为人们从过去的理想堕落了，其二是专门热衷于专研神学与教会论，而置其他研究于不顾；这都不是1700年以后西方思想特有的要素。必须承认的是，要切记在直接发源于宗教改革的溪流之外，还有一条专门论述世俗事物著作的相当大的河流，这些著作采用的是越来越“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解释。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当时存在两种迹象：一种是已定型的思想

方式；另一种是不太明确的可能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暗示。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宗教改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向后看的，它既然公开承认旨在恢复失去的特性，因此它只能如此。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强烈渴望灵性的抚育，而且从各方面对上帝的初步探索给予理智解释的一些思想运动，均有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首先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在这里扎根，而在那里消失，为什么事实上这一套反教皇的“异端思想”在以罗马为首的教会里会导致永久性的分裂。政治和世俗野心在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简言之，凡是在世俗政权（诸侯或执政者）赞成宗教改革的地方，宗教改革就能在那里维持下去，在那些世俗当局决心镇压宗教改革的地方，它便无法存在下去。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各公国、日内瓦及具有特殊形式的英国，属于第一种情况；西班牙、意大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东部国家及法兰西（虽然当时尚未确定下来）属于第二种情况。1553年协议背后的这句名言——“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远在人们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前，这种情况实际上已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一个要求同一的时代，它认为，在任何地方，一个政治集体中不能包容两种信仰或崇拜形式。

上述信条的产生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只要一个世俗国家的成员自然成为某个教会组织的成员，那么加入不同的宗教组织即表示政治上的不满，甚至背叛。因此各个政府都强制推行同一种信仰，因此统治者信仰的宗教便成为他的国家的宗教。英格兰成为实行这一信条的一个极端例子，它的官方信仰经过一系列剧变：从亨利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经过爱德华的瑞士式新教和玛丽承认教皇的天主教，到比较富有英格兰特色的伊丽莎白的新教。不过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这种转变并未给人们带来压抑感或者是使人们放弃宗教信仰。王公贵族、政府和被统治者一样，行动的动机都是复杂的，所以忽视某些王公皈依的灵性因素，与只看到一般群众单纯的宗教愿望而忽视其他因素一样，都是错误的。宗教改革所以超过以往与之相似的历次运动的梦想而获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一般所说的时机成熟，而是由于它得到世俗力量的赞许。宗教改革获得成功，固然是由于那些世俗掌权者想要得到教会的地产而抗拒王室或教皇的要求，想要缔造独立自主国家的雄心等因素发挥了作用，但是他们对宗教改革者的说教心悦诚服的拥护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宗教改革有一个方面不是君王或宗教改革者所能促成的，这就是一种广泛普及的真正的群众运动，通常称之为再洗礼派运动（第四章第二节）。再洗礼派是一个便于使用的名词，包括形形色色的不同信仰和表现，从狂热的千禧年主义到虔敬主义，从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到和平主义，从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到谦卑的虔敬与热诚。这些所谓的再洗礼派信徒在许多地方以多种形式出现。这些男男女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与任何国家的宗教都不相符，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触犯政教同一的原则。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再洗礼派运动是在下层群众中传播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如此频繁地遭到迫害。这个运动具有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因素和（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革命的危险。明斯特恐怖事件（本书边码第128页以下）仍然使一些政府保持长期的警惕，1524—1525年发生的德国农民协会起义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宗教狂热和经济上的不满在那次起义中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从再洗礼派多种形式的传播和相似的教义中看出，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而且是经常比较隐晦的对现存政权的群众性反抗的征兆，这种看法不会有大的错误。宗教改革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掀起动荡的同时，也给予这种社会对抗公开化的机会。再洗礼派运动的追随者来源于社会的底层，这个事实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当局者对再洗礼派的反应。这是一个通货膨胀与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各处暴乱和起义不断，16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1536—1558年的英国尤其如此。即使是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人通常也不愿意提倡社会革命；那些从事改革的领袖们并没有什么民主的东西，如果真有的话，那就不识时务了。再洗礼派遭到可怕的迫害，但如果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意义甚至在温和派看来也是革命性的，那就会误解了这一运动。由这个运动所激起的镇压行动绝对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再洗礼派团体及其后继者不仅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下来，而且他们造成的社会动荡后来又以其他形式发生。这个运动使人们透过成文历史的表层窥见一些瞬息之间出现的真相；如果其具体表现比较稀少比较分散的话，那么那种潜伏的仇恨和不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相当大的。那些镇压他们的政府深知其镇压对象的厉害。

我们称之为宗教改革的诸种运动的复合体，在所论及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一种统一的因素；另一种因素也同样显著地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出现。这位皇帝在路德第一次以威胁教皇对教会的统治的姿态公开

露出头角的前一年登上西班牙王位；《奥格斯堡和约》后不久，他让出所拥有的多处领地。他的帝国（第十章）多少有点像是按照中世纪方式建立的最后一个普世的世俗统治大国；因为尽管他的大部分领地在组织与姿态上表现为“现代的”，但查理本人却是用类似于查理曼大帝的精神来看待自己的地位的——他是一个成就并不那么具有明显的英雄气概但世袭制的成见却异常突出的一个查理曼。但是这种比较倒也不是全然荒唐可笑，因为这位哈布斯堡王朝最伟大的人物的才能与德性正日渐显示出来；这种比较也不是反历史的，因为它反映了查理本人的思想本质。即使他没有得到德意志及其帝号，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使非常不合时代的庞大帝国维持其表面上的存在，也是令人值得注意的。尽管他不合时宜地自视为教会的护卫者，但还必须承认他所起的护卫作用（乐于以傲慢态度与教皇取得谅解）阻止了中欧地区完全落入新教之手，并在西班牙和其他地区为罗马公教的复兴做好准备。查理的统治绝不是全然失败。他未能实现其主要的抱负，是因为那些抱负过于宏大：他想取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但是与之相应的权威和意向都是一些虚幻的影子，无望成为现实。但他还是使其广博分散的国土和多种民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团结；他促进了勃艮第本土保持经济的繁荣；挽救了教皇的统治；如果说他是最后一位中世纪皇帝的话，那么他也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第一位君主。

众所周知，查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大计划是由于世俗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逐渐增长的力量以及德国诸侯领地中同样存在的民族主义而遭到破坏的。前一卷^[2]所描述的西欧诸地区性国家的巩固过程在这一时期又生气勃勃地继续发展（第十四章）。的确，乍看起来，这种现象在欧洲似乎是普遍的。这种现象普及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改革在那里为丹麦和瑞典提供了建立强有力的统治的媒介（第五章）；甚至俄国的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看来大致会重演英国亨利七世、八世，法国路易十一世与弗朗西斯一世的所作所为（第十八章）。但是这些趋势的真正意义却不是那么容易估计的。君权在西部一些国家可能看起来是至上的，但又不是绝对的。甚至在专制政治几乎建立的法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保持着内部旧时代差异繁多的显著遗迹，并且通过维持其“习惯”权利对君主加以限制；那种始终危害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自由权利”的破坏作用几乎尚未开始。在下一个时代兴起的加尔文主义促成基本上带有本地色彩的一些分裂势力抬头。但是至少法国君主可以随意征收赋税，制定法律；西班牙和英国的君主

却没有这种权利。西班牙依然是拥有不同组织形式的诸王国的联盟，虽然继续受到较严格的君主统治的卡斯蒂利亚已越来越取得支配地位，但是真正按专制原则进行改组的时代只是在腓力二世时期才开始。由于英国从古以来就有巩固的君主制度和亨利八世与罗马争吵的意外事件，所以它成为一个既近代化而又巩固的君主制的最好实例；但是英国确也审慎地对专制进行抵制，通过使君主制依赖君主在议会中行使其统治权，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英国保持并采纳了承传下来的立宪精神。苏格兰却不得不等到诺克斯的到来才开始对中世纪政治加以限制。实际上，这些西方君主国家并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专制和具有革新的自觉意识。土耳其作为东方专制国家之一所树立的榜样有时使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以羡慕的眼光大加赞赏；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君主权力则不够强大，远远未能达到17世纪的专制主义。过去时代的分离主义和宪法给予的诸种权利的残余处处存在，并时时要求得到承认；然而只是在英国原则上摒弃了专制主义并为正式限制君主权力铺平道路，君主与议会的代议制度在此建立了互利联盟。

如果地区性的君主国甚至在西方都不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完全巩固，那么在东方一些较远的地区它的地位就更不稳定了。在德国东部边境的一些外围王国——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16世纪初就已陷于一个王朝——波兰的亚盖沃王朝之手。从组织方式来看，这些王国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君主制度软弱，掌握议会的贵族当权，不存在任何强有力的城市或中产阶级。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形势有所改变（第十五章）。到1560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不属于土耳其的地区均已落入哈布斯堡王朝手中，不管这个王朝其他方面的真相如何，它知道如何照看好属于自己的东西。宗教改革与土耳其人造成的双重冲击有助于国王斐迪南一世精明而坚定不移地巩固自己的政策，即使这种行动是慎重的。它与天主教会建立了联盟，这在那些国家中绝少先例，而战争的需要使这种联盟有助于君主获得军事力量。斐迪南希望把他的领地建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他认识到议会组织对于集权的君主政体来说是极为有用的，注意到这一点也是饶有兴趣的。但是，他想使两个王国共有一个议会的计划却化为乌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组织下院的人才，一部分原因是贵族中间要求独立的传统过于强大：波希米亚贵族也有离心离德的倾向。尽管由于上述原因他取得君主权力的过程缓慢，获得的权力有限，但他使波希米亚和匈

牙利开始有了强有力的政府，这也是实情，而波兰在以后200年的悲惨历史中缺少这种强有力的政府也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在东部诸王国中，虽然可以看出君权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达到强盛的地步。西方不仅在经济发展、官僚机构、稳定的政府和文化成就各方面比较先进，而且当西方在这些方面日益进步的时候，东方在诸方面却每况愈下。正当西方的农奴制和领地分封制消亡之际，在东方的几个大平原——包括德国在易北河以东的部分，自由农逐渐消灭，拥有半独立司法权和政权的大庄园正在形成（本书边码第35页以下）。地主家族这一著名制度的发展在平衡君主权力突出增长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就是在君主地位强于波兰和立陶宛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也是如此。普鲁士专制制度通过消灭地主贵族的政治权力最后得以确立，但特别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统治的地方，16世纪的这种巨大的社会激变的迹象直至1918年仍然存在。这种发展与西方的情况恰好相反，部分原因是经济的：东方谷物生产地的开辟给地主阶级带来巨大的利润，他们得到大庄园和廉价充足的劳动力。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地区再一次成为抵抗外敌的边陲地带。来自土耳其人的压力，后来又加上来自俄国的压力，在东部边缘地区形成一个边疆地带，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世纪之久。这个地带产生一种必然现象：边疆地区领主的出现。远离中央、防御的需要、农奴制的强制推行以及因血缘而产生的自豪感，很快使这些富翁确立了半独立地位。令人惊奇的是君主统治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地区，也多少能维持其自身的存在。这是通过在波希米亚进行军事征服（1618—1620年）和与匈牙利贵族联盟而实现的。这些事实使君权统治具有一种特殊性，但它在性质上仍然是自觉的和官僚政治的君权统治。

至少在理论上，德国本该是另一个向适当的统一与有效的国家地位发展的区域性实体（参见本书边码第477页以下），但是德国君主统治长期以来极其软弱，以至它不得不从头做起，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这种软弱性主要是由于德国君主本身素有的王者尊严造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国王的选举特性，部分地是由于过去的掌权者的失误造成的，但大半是由于德国王公贵族的离心作用的野心和政策造成的。查理五世竭力要克服所有这些困难，但事实上他只不过仅能保住自己的帝号和自封的权利。他一退位，德意志王国就不复存在了，就是国王和皇帝的称号也名存实亡了。德国

的历史从查理五世到拿破仑甚至到俾斯麦的时代，乃是一些独立州郡的历史，这些州郡只是空泛地由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但很少是由共同的政纲联系在一起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只是确认查理五世治下早已决定的事项。德国各诸侯国本身非常适合那个时代的一般模式，在君主统治与增强的官僚政治基础上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意大利是经受住中世纪帝国一切后果的另一个国家，现在德国正在走意大利两百多年以前走过的路。用一句著名的话来形容，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成了表达地理的名词。由于组成意大利的各地区曾产生过强有力的统治者做经过改革的政治机构的首脑，所以德国诸侯加紧了对他们的领地的控制。在意大利本部，这个时期那些有独立权的统治者们的独立地位宣告结束，法国的势力走向衰落；这个半岛事实上成为西班牙总督治下的一些省份的集合体。威尼斯继续抗拒，但是它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热那亚倒还繁荣，但是它接受西班牙的统治。教皇逐渐地承认博尔吉亚、德拉鲁维尔和梅迪奇想把圣彼得的疆土^[3]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的雄心壮志失败了，只好回到其教会内部的事务上来。但是至少在当时，教皇最终不能摆脱西班牙的控制。

如果德国诸侯的独立性成为一种阻力，使查理五世的帝国梦想变成荒谬念头的話，那么哈布斯堡与瓦卢瓦之间的长期斗争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又成为另一种阻力（第十一章）。这种王朝之间与民族之间的斗争有席卷大部分欧洲的倾向。其战场首先在意大利后来转向莱茵河下游地区——它们曾是中世纪晚期的两个文化中心——结果这两个地方的强盛地位让位于更具有有利条件的地区。英国扮演了平庸的角色，它在16世纪20年代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沃尔西的花招造成在交战者之间可以作出独立选择的假象。实际上英国的政策从来也没有摆脱伦敦与安特卫普之间强大的贸易联系，加上与法国以往的敌对关系，使英国基本上同情君主制（毋宁说是同情西班牙），甚至在与罗马分离和决裂使查理五世成为敌人以后还是这样。法国在1528年还是卑躬屈膝，后来不但通过与德国的新教徒而且与土耳其人联盟恢复其均势。对这位最合乎基督精神的国王所结成的友谊加以嘲笑固然容易，但想明白他如何还能用其他方法来抗拒查理的势力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这些不择手段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些做法不仅实质上有助于德国新教的存在和土耳其人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这就必然使意大利彻底衰落），而且也引出了有关国际关系和法律原则的重要问题。

如在上一卷中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个人之间与王朝之间的关系。^[4]婚姻与血缘关系决定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查理五世的帝国本身就是通过上述原则取得了最大胜利。虽然战争起于家族之争所铸成的深仇大恨，但有时也是由于家族纽带——这个纽带指分散且不稳定的家族依然笼统地注意到其共同的遗产——的背景而引起的。这个共同遗产就是那种过时的观念，即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为维护其双重领袖教皇与皇帝而向异教徒作斗争。这种观念从来就没有成为过现实，而且即使是作为一种好听的理论它也早已成为几乎被人遗忘的废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当一位皇帝再一次显示出要认真对待这种被人遗忘的废物的同时，它却消失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讽刺。查理五世真的相信他作为皇帝所负有的使命。在他看来，与新教所作的斗争不只是为反对分裂维护王朝统治而作的斗争，而且也是为了维护信奉天主教的欧洲的统一而作的斗争。这种统一早已不复存在——如果它确曾存在过，而作为查理实力中心地的西班牙是最不愿意对教皇有任何贡献的天主教国家；但是这位皇帝依然用一种冠冕堂皇令人敬佩但不可能实现的观念来看待他的使命。不少政治家都高谈阔论土耳其人的危险，并且空泛地向基督教世界作出团结一致对付土耳其人的呼吁，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位皇帝愿意把言论付诸行动。当然，可以说他也是唯一可能靠这种联合行动获利的人。但这种议论并非全然正确——把土耳其人赶回亚洲去对整个欧洲都有利，也不会减少查理所持的态度中所包含的真正的理想主义成分。

但是在查理五世掌权的时期，他的梦想宣告结束。他的帝号与权威远远不是实现他更为现实的雄图的资本，反而成为阻力。他没有把欧洲统一在他的周围，而是亲眼见到并且亲自部分地导致了德国的最终解体，使各个大国之间几乎是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最糟的是弗兰西斯一世请求苏丹的帮助，这就证实了所有关于十字军和基督教世界的言论都是彻头彻尾的空谈。国际政治的核心长期以来（也许总是如此）就是一个权力和野心的问题；人们一眼就会看透其实质。但是神话具有支配力，基督教统一体的神话曾起过约束作用，现在却永远消逝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决心与国家军队的兴起，结束了基督教世界与骑士精神的神话。中世纪的冲突虽然经常是那么野蛮可怕，但它们是在以共同公认的惯例为背景发生的。信使与使节都受到保护，战时通行证得到尊重，在夺取城市与赎回战俘时骑士制度的准则（有时是一些古怪的准则）得到遵守。当然也会有例外，例如瑞士军队的暴行就

使传统观点受到出自内心的震动；这些军队置战俘伤员于不顾，并且对骑士精神的惯例也缺乏尊重。在16世纪中叶那些遵从骑士准则的人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或轻蔑：100年以前堂·吉诃德还不是令人可笑的人物。关键不是这些准则和惯例是否经常或严谨地或处于确信地为人所遵守；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存在着一套人们共同接受的处理各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其中一部分意义比较含混，但这些观念在16世纪时对欧洲政治最终失去了约束力。

这些观念的消失留下了一个必须填补的空白。派遣使者送交挑战书这种完全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做法仍然继续。这个事实表明需要有新的常规来制定进行这些事项应遵循的方式方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终于产生了一套公认的国际法，就是决定国与国（或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5]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法律要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间得到实施：它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制裁力。颇为重要的是，中世纪时有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把争端交给某个公认的第三方面——一种较高的或不偏不倚的权威进行仲裁；但因为现在办交涉的双方不承认有较高的权威，或不相信有人会不偏不倚，所以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主权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谈判或最后诉诸战争。谈判也好，诉诸战争也好，这两种方式在实践和法律方面都需要注意和详细论到。

在外交史上，这一时期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这个小规模的外交舞台上所使用的一些外交手段，至少已扩展到欧洲的西部和南部。^[6]所有较大的国家开始互派常驻使节，虽然有特使继续派往国外，外交政策逐渐越来越依赖于常驻使节与其派驻国政治家的经常接触和经常发生的公文。除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演说家”这些人们熟悉的人物外，现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的大使们也为人们所熟悉。在这一时期尚未结束之前，这些人中间有的人作出重大贡献，并且给这个在开始时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不被重视的职务增添了光彩。虽然国家元首的地位很高，但特别使节的重要性日益具有实质性意义。近代外交组织的主要原则是显而易见的。常驻使节的存在提出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特别是外交豁免权问题。16世纪初，这一方面没有大的进展。大使人身的神圣不可侵犯在理论上得到承认。虽然有一种感觉认为这个原则只是在大使驻在国中才有效。但是关于保护外交文件的原则还未受到尊重：1529年沃尔西在允许他的同胞坎培基奥枢机主教离

开英国之前甚至检查了他的文件。驻外使节的居所享有不受干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这是出于审慎与共同利益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接受治外法权的原则。大使随行人员的权利引起了许多纠纷，因为其仆从与一些本地人发生摩擦司空见惯；这些常驻人员的存在往往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讨论和考虑：这种新做法内含的问题开始得到承认。所以外交豁免权是先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意识而建立起某种程度的既定惯例，后来才体现为国际法的正式规定。

战争是一个更为古老的问题，它总是有一种能逃避加之于它的任何规章或惯例的窍门。这一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它变得更加“需要认真对待”，它越来越不是那些谙于战争规章的职业人员个人考虑的问题，它更多地成为大国要考虑的政治问题。或许可以认为1520—1529年的哈布斯堡—瓦卢瓦王室的斗争仅仅是把1494年和1516年在意大利进行的法国—西班牙战争的规模扩大了；但是这种扩大却深深影响了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第十七章）。日益增长的开支——钱财是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当时人们喜欢引用的话，迫使一些实力较弱的参战者退出战争；亨利八世这位不折不扣的富国元首，甚至也因16世纪40年代的战争而几乎破产。至于那位掌大权的查理五世皇帝则经常处于财政困难之中，靠着永远还不清的借款过日子；他在1552年陷于绝境的时候不得不苦苦求告安东·富格尔给予援助。在军事科学方面，在装备、围城术与工事或海战方面这一时期都有很大进步；但这一时期关于战争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却是一些君主往往轻易地就卷入战争，直率地讲，他们却又无力支付战争的费用。最难对付的军队还是土耳其皇帝的军队，但是甚至伟大的苏里曼都感到那个时代的技术力量严格地限制了征服性战争的规模（本书边码第514页以下）。

这一时期，从法律角度对战争的考虑多限于关于正义战争的问题。似乎没有人对诸如战俘权利（如果有的话）和司令官对他所经过的乡村地区应负的责任等这类问题给予多大的注意。没有人提到使战争符合人道精神。部分的原因无疑是因为关于宽待投降者或城市投降的老条例至少还受到口头上的尊重，而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战争暴行也不太突出。与下个世纪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甚至一般居民都很少遭受战争之苦。像1527年罗马遭到战火那种最严重的暴行经常是乱军所为，军队中的叛乱都是因缺乏粮饷所致。粮饷充足的军队——这是少

有的情况——往往是满意的军队，因此显而易见自愿无限度地服从命令。

如果中世纪惯例的主体还残留下来，这说明缺乏为战时行为制定条例的兴趣——但在军队内部却有大量条规，这当然是另一回事——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问题给予的大量关注也是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东西。十分奇怪的是，最重要的论文不是从欧洲的战争中产生的。16世纪30年代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在萨拉曼卡大学所作后来又出版的演讲，是由于西班牙征服西印度群岛和对异教徒进行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问题而引出的。维多利亚用同样的正义标准来对待所有的战争，明确地谴责西班牙在美洲的大量暴行，并且主张对于非正义战争——它实质上是纯粹为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进行的战争，犯有战争罪行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加以抵制，基督教世界（如人们所认为的）应采取一致行动予以惩罚。当然，一方面这是一个事实上做不到的主张，另一方面这也证明，在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反对某一大国或某几个大国的许许多多伪善的联盟有其道理。维多利亚不但显示出对美洲情况的了解，也显示出惊人的高尚理想和不受民族偏见的影响，这在当时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更为重要的是这显示出用道德观点探讨国际法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做法有传统的支持，也值得敬佩，但无实际的效用。国与国彼此打交道所遵循的这些条例的真正内容更可以在海洋和商务法庭的判决中，在这一时期的条约中以及在王朝之间往往类似于解决纯粹私产的协议中出现，此种协议却真正决定了邦国的命运。但是人们尚未对这些技术性很高的文件中所收录的法律进行解释。

因此1520—1560年构成一个独特的界定分明的时期。在宗教内部与教会中所进行的这场大革命，企图实现他的帝号所包含的全部权力要求的那一位最后皇帝的统治——所有这些连同它们在思想与学术方面，在政治机构的变革与法律的修改方面以及在国内与国际事务方面的副产品，都赋予这个时期明确的统一性。不过，可以说，至此所采用的标准明显是过于陈腐了。今日的一些主导看法不再认为教会与国家中的政治是历史学者所关切的主要问题。现代历史学流行的研究热点是社会史——就其定义来说是社会中人的历史——实际上这种研究集中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方面。政治与组织结构上的变革被认为不如人们的谋生方式、习惯的思维方式或使自己适应社会分层的方式

那么重要。这些的确都是深刻的问题；即使是人们不甚确知这些问题在对过去历史的研究中是否真的值得摆在首要位置上，但不会对它们的现实意义有所怀疑。无论如何，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在这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什么东西可以明确地归之于“宗教改革时代”呢？再者，我们拥有的关于这个时代思想和态度的知识，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对那个难以捉摸的观念^[7]，或其思想趋势恢复其本来面貌或如实加以叙述呢？

经济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革，但是要不是这些变革发展得如此迅速是难得的，那么任何半个世纪都难以依据社会经济的不同情况而取得其特定的地位。被认为是某个时代特有的发展，在更早的时期已经非常明显，这是屡屡出现的；最有效的分析方法是研究社会的实况，这种方法最能摧毁传统的思想范畴。由此看来，以上所说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宗教改革时期。如果看得更长一点，比如说，15世纪中叶以后的200年农业实践与社会方面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是很明显的，在西方，从以生存农业为主已转变为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主，而东方则从自由农社会转变为大庄园与农奴制的时代（第二章第一节）。社会变革包括充分承认英国绅士阶级的地位，损害了比它高和比它低的社会阶层的权益；我们姑且作以上概述，因为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在讨论中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欲知其全面情况，仍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这些社会变革包括法国有官职的贵族的权力日益增长，德国与意大利独立的资产阶级的衰落，还有这一成分（指资产阶级。——译者）的力量在北勃艮第、荷兰和泽兰的逐渐增长。这些变革也包括中欧与东欧大贵族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和小贵族的衰落。即使这些现象具有高度重要性，但是不可能期望他们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会完全适合其历史环境。事实上，宗教改革时期在上述一些趋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改革引起了土地市场的巨大运动，最突出的是在英国，由于修道院的解体而使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国家土地收入转移到一些新兴分子的手中，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在这些地方宗教改革则意味着土地的世俗化。土耳其人的威胁和皇权的衰落对东欧的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君主政治的巩固加强，在其势力所及的地方都造成了社会影响。^[8]

宗教改革时期的贸易与工业史只不过是起始与终结都没有清楚的界限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从一些陆地主要贸易路线转移到海上贸易

航线，并以一些新商业中心逐渐取代中世纪欧洲传统商业中心的阶段。^[9]虽然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处处都可以见到工业企业（制糖业、烟草加工业、佛兰德与英国新兴的布匹绸缎业，以及由于一部分出于战争需要而促成的金属工业的进展）的扩展，这种扩展值得重视但尚未发展完备。作为欧洲首要商业中心的安特卫普（其竞争对手为位于其南部的里昂，它是地中海地区的金融中心）的兴起与衰落这一特殊现象，不早不晚恰好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第二章第二节）。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9世纪到来以前最后一个独立于区域性政府之外的国际金融巨头的阴谋诡计在许多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富格尔家族的时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代颇有共同之处，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却与之绝少共同之处。^[10]这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两个现象摧毁了那些巨大的德国家族与意大利家族所处的世界，一个是王侯金融的不可靠性，它导致所有的大家族的破败或极度衰落及地方金融势力特别是法国、英国和荷兰金融力量的逐渐增长。另一个现象是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它加大了政府的财政需要，使之只有靠增加税收才能弥补日益加剧的匮乏。关于本世纪物价上涨问题前已论及^[11]，这里只需要指明，只是在1560年以后美洲硬币大量流入才使人们实际上感到物价上涨，因而使物价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和普遍化。英国的情况是个例外：1546—1551年5年间物价上涨了一倍，因而造成最严重的困难，其直接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靠毁灭性的货币贬值来支付高昂的战争费用。大体来看，显而易见这些经济发展尽管对于了解宗教改革时期至关重要，却并未给这一时期带来什么特性。确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土地的变革、贸易发展和通货膨胀并不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也不是在这一时期结束的；从这些经济上的重大现象可以认识到宗教改革时期的特殊意义，但是根据这些现象来确定本时期的特点就不容易做到了。

至于人们的思想问题——即有关“思想倾向”的问题——有一点最为突出：就是关于神学问题的讨论再度盛行。宗教改革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论战的时期，又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印刷术，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量写作小册子的时期。如果仅仅是有了新的规模，在差别如此显著的时候，那么规模就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印刷机没有向路德提供争取广泛同情的机会，那么路德也只不过是另一个威克里夫而已——当然由于多种理由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假定；如果亨利八世未能

很成功地运用官方宣传方式，那么他的教会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会遇到巨大困难；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双方都大大借助于书籍的普及。过度集中探讨神学问题并没有扼杀关于其他问题的著述（第十二章第一节），在一些未曾预料的地方，早期比较世俗化的人文主义迹象继续存在。新学为反教皇和反教权的著述家们的军械库提供了多种武器！从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修订本，德国（后来又有其他国家）各大学为训练改革者所起的作用，到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宣传家们所作的历史辩论（这要比一般听说的更为合理）。虽然科学由于人们专注于人文主义——此种人文主义有专在古典世界中进行探索的偏向（第十二章第二节）——而有所损失，但科学还是取得了一些大的进步。这个时期的世俗作品，常常是用民族语言撰写的，比那些论述教会的著作更使人感兴趣（少数几个伟人的著作总是例外）：世俗著作时常具有永久价值，而那些短暂的论战只会使人感到厌倦甚至引起反感。专注于非神学的作品，即使在文学讨论方面是正当合法的，也会成为冒险之举，那就是忘记宗教改革时代本身最关注的东西。

初步看来，这40年左右的时间里似乎没有才华出众的人、优秀作家以及第一流艺术家所赋予的魅力。的确，这一时期有用许多欧洲语言写成的不少重要的和一些令人满意的作品，尽管莫尔、加尔文、布塞尔或罗耀拉等人的其他优秀品质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他们不能被认为具有超凡的文学艺术才能。在政治理论史上，尽管法国的居雅斯和比代与英国的斯塔基和庞尼特等人的笔下产生了一些有趣的二流作品，但是介于马基亚弗利和博丹之间的时代却是一段空白。在诗歌史上，甚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其对法国和英国产生影响的时期之间（我们必须把龙萨和莎士比亚留到下一卷）有过类似中断的现象，在艺术史上，从米开朗基罗到贝拉斯克斯时期之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有才能的思想界领先人物专注于宗教问题这一事实，使他们应该划归为其他类型的著作家，而且这样才算合适；不过应该提一下，路德在塑造德国语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克兰默的崇拜礼仪显示出高级的诗歌天赋，英国的小册子作者们使英语变得灵活，并具有磅礴的气势[12]，在宗教改革家的笔下，北方的一些民族语言成熟起来，而且完全专注于神学与宗教丝毫没有必要和对文学的关注脱节。但是一个最突出的收获乃是新教圣诗的时期，不会是艺术上杰出的时期；因为在文化领域中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发生，所以有理由略去艺术和诗

歌的篇章。艺术和诗歌可以在宗教改革前后的历史时期中更好地进行论述。

经过对各方面的考虑，我们依旧可以合理地认为在这个时代中，由于那些博学者主动投入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各种斗争之中，所以在这些斗争中很难使生活与知识的魅力存在下去。人们的宗教热情的复兴不仅与宗教宽容而且与知识进步都是背道而驰的；路德对上帝恩典的极度领悟，几乎没有给伊拉斯谟对人类理性的信仰留下余地。有一种理论认为我们应该把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6世纪上半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与上面所举出的具体情况正好相反。探索事件的根源并认为一切都是循直线发展的做法，常常会把先后的次序和位置搞错，人们对此一定会表示赞同；但是恰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太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后来却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对历史的研究。法国民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处理办法，可以被公正地看作是采用历史方法最早的一个例子。^[13]因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方法的发展对近代思想来说和科学本身同样重要，可以认为尽管这一时期的科学还带有中世纪精神，但这一时期无疑和晚代的思想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人们可以再次认为，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孕育新思想的时代，这种发展在17世纪占有重要地位。坦白来说，这些思考像所有关于思想溯源的思考一样，是智力游戏而不是历史研究。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这些思考往往抛开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东西，倾向于从这个时代中抽出那些在晚代或更远的时代才变得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能否找出一个习惯说法来说明这个时代里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用一个特定的标题来概括这个时代的做法是否妥当？那些“信仰时代”或“理性时代”的说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应该使我们受到这样的警戒：宗教改革这个提法甚至也可能不够简明，也不足以适合于我们乐于加给它的这些（经常是带有偏见的）界定。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因为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特别是宗教和道德大幅度动荡的时代。所以它给这一时代的思想打上一个印记。但是这个印记是什么，一个印记是否就够了，这是另一个问题，它完全属于另一个领域。我们要回答这一领域内的问题，从最好的方面来说，答案都会流于空洞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从最坏的方面来说，这些答案也会非常不充分而且会引起误解。是否可以从当时的著作判断这个时代的思想呢？这些著作可能是尽我们所有，但是肯定地说它们遗漏的东西很多

——尤其会遗漏当时活着的大多数人。是否可以用社会习尚的概念来说明呢？虽然这些社会习尚在过去国与国之间不像现在那样变化很大，但它们在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用这个单一的概念来概括就会十分不妥当。其实使这种概念具有现实性的任何足够的工作都丝毫未曾做过。

单就欧洲统治阶级来说^[14]，根据相当的理由可以说指导他们行动的有两组特别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对无论哪一组关系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充分加以研究，因而不可能证明关于思想趋势的概括论断都是正确的。一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因而形成一个王朝中的各级联姻关系。另一组关系源于一种相互的义务和利益制度，它看来比效忠、单纯的义务或单纯的自利更能决定人是否采取行动。那些真正举足轻重的人的大部分权力与职责、从属与独立、偏见与特权，绝不可能从计算庄园领地的多少或分析法律权益中发现。贵族和绅士以一种半封建态度适应于远非封建时代的实际情况，以合理的期望从王室恩赏取得适当报酬的服务制度代替了服务的义务与受保护的权利。一本尚未完成的重要著作，探讨的是主仆关系、礼品与报酬的赐予和拥有与求得庇护权在巩固西欧的社会和行政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15]与此同时，特别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官僚机构当中已偶尔发现一些迹象，就是文职人员对官职的态度已不再认为官职是买来的或者是靠恩惠给予的一份财产，而是需要对一个不具人格的国家尽义务并且为恪尽职责的人提供生计的一个工作职位。

当然，上面所说的一切都不适用于国家中的低层人士——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商人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习尚。在此之前，专注于商人特有的概念曾使历史学家发现这个时代具有近代特有的某种东西，即一种称为“资本主义兴起”的现象。也许不需要再一次以那个古老的题目作为出发点：所谓“资本主义”态度，不管定义得多么明确，早在16世纪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即使是在16世纪较为显著的资本家中，也完全找不出明确的资本主义态度。然而，在程度不同的变化中，在很少作出分类的情况下，谁能说出“人们”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想的，他们的主要态度是什么？有些猜想是不无道理的，而且有的猜想听起来比其他猜想更为可信：每一个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心里都有一个捉摸不定的判定，对于本时代来说什么是对的是什么错的衡量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能说明本时代的“思想趋势”。也许本章作者最好还是承认他对“思想趋势”整个概念是有怀疑的，并且不作详细的论述。

不管囊括一切并富有启发性的概论所具有的吸引力多么危险，它也是正当合法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搜集者的区别就在于历史学家能作出概论，最好是成功的概论。宗教改革时代在其所处的较大历史范围内发挥了它的作用，有时它对一些当时存在的思想潮流起着刺激作用，有时使它们改变方向，有时——有可能——对它们产生了永久的或暂时的抑制作用。宗教复兴与社会的世俗化同时进行而且力量越来越大。特别是中欧的政治史转变了方向，纵然在德国已经出现衰败的早期征兆，但这个转变却是新生事物。曾经出现的人文主义与宗教宽容的迹象转向隐蔽状态。上述表述可能是笼统的，但是立论精确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因为旧的传统信念正处于崩溃的过程中，所以笼统就更不能避免。人们确定这个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什么地位毕竟依然是一个个人判断问题。本章作者觉得，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思想领袖坚决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就把这个时代当作近代（它本身就是非常不明确的名词）的开始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人们肯定会发现这个时代是另一种东西的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欧洲取得支配地位的开始——这种未来会很好地作出决断的支配地位，这一地位到1914年才结束。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经常告诫我们要对关于欧洲史的褊狭思想加以限制，叫我们切记和那些东方帝国比起来，欧洲的一些大国甚至也是微不足道的，叫我们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历史。这些看法都有说服力，而且无疑与现代都有紧密关系，但是如果这些看法使我们忽视欧洲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所起的支配作用，就只能是歪曲现实。在上面所说的这个时期之内，集中着眼于欧洲并不是褊狭——这样做标志着对历史真正的均衡具有适当的认识。欧洲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欧洲的风俗习惯、欧洲的法律、科学和文化，从最早的发现开始便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去，直到世界在各个方面都欧洲化了。这一种征服实质上以西方古典时代遗产来取代像印度和中国那种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本地传统，在一切征服中它是最为深入的。在宗教改革时代，当西班牙征服南北美洲并向那里殖民的时候（第十九章），当葡萄牙打开远东的时候（第二十章），这种征服就已经开始了。欧洲——由于新的信仰、激烈的战争和个人的野心而造成内部分裂，由于来自亚洲蒙古族发起的最后强大的进攻而受到重挫——竟然还有力量开始进行这种迅猛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惊讶的。那么，在

欧洲本部大量地挥霍浪费兵力，同时在海外却又以小的兵力取得非凡的成就，在欧洲扩张史上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异的了。欧洲在技术设备上的优势在最早的阶段便显示出来，确实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一部分原因。

欧洲——或者还不如说是西欧一些地区的一些个人——的扩张活动，奇特地与欧洲本身所发生的事形成对比。在这里人们注意到的是收缩现象、领土丧失、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调整，它们把欧洲一切有生力量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但所幸的是向海洋方面却是开放的。16世纪的欧洲比14世纪的欧洲要小。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俄国人征服乌克兰，这就使中世纪欧洲的国境线永久地向后退移。土耳其和俄国都可以借口宣称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进行建设，但是双方都不比他们所谓的先辈在本质上那么具有欧洲的特性。而且，在欧洲陆地边界一带存在的这些侵略军队为了防卫集聚了巨大的力量，并且沿着从波兰到克罗地亚这一广阔地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适应能力，这就使中欧失去了一些欧洲特质。这些扩张活动对土地占有的安排和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前已论及。这种“边界局势”的直接后果是两个新兴国家奥地利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崛起，这两个国家的肇始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当查理五世把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东部赐予他的兄弟斐迪南时，他实质上是建立了奥地利帝国，而宗教改革不但使勃兰登堡侯爵获得相当可观的晋升，而且使介于吕贝克与里加之间这一地区的均势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在大选帝侯^[16]以前一个世纪就可以预见到普鲁士的崛起。在靠海的一边沿大西洋一带各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欧洲事实上是向外开拓的，它的中部地区衰落而边缘地区兴起。中世纪全盛时期的主线通过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连接起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中心位于其他地方——在莱茵河下游地区，在通过法国直达英国的轴线上——这条轴线在12世纪的安茹帝国时清楚可见——在立陶宛的广大地带几乎一直伸展到伏尔加河下游。但是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很早就已衰落，欧洲的重心一直还是在中部；甚至法国虽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有高度成就，还是转向它的东部，转向勃艮第。此时意大利与德国都让位于后起之国。几个世纪以来本质上的欧洲——扩张与征服的欧洲——不是在中部、南部或中东部，而是在西部。许多过去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发展，但是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而

排斥其他地区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当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与查理五世帝王野心的破产注定了中欧的衰落并促进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时，这种发展就已经开始了。

（魏书名 译）

[1] 第1卷边码第10页以下。

[2] 欲知其概况，参见原书第1卷边码第5页以后。

[3] 指教皇拥有的疆土。——译者

[4] 原书第1卷边码第9页以后。

[5] 哈佛大学的S. E. 桑恩教授本来要写一章专论国际法，但不幸身体不好经医嘱不得不作罢。如果他能写这么一章，那就会很有启发。编者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得不以拙笔勉强写出，恐怕对这个问题会有交代不清的地方。

[6] G. 马廷利所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1955年）一书中论及此问题，并做了很好的概述。

[7] 指宗教改革时期。——译者

[8] 本书系一般历史著作，因此不可能有足够篇幅详细讨论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可以在《剑桥经济史》的有关章节中充分予以介绍。

[9] 特别参见第一卷第十六章，并见第一卷第五章和本卷第十九、二十章。

[10] R. 埃伦贝格著《富格尔家族的时代》一书中对此叙述颇为全面（德文原书1896年出版，英译本1928年出版）。

[11] 原书第一卷边码第450页以下诸页。

[12] 可以把休·拉蒂默的讲道篇章与托马斯·莫尔的灵修或辩论作品进行比较。

[13] 参见J. G. A. 波柯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1957年），第一章。

[14] 一个受到一些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基督教上流人士的问题——旧式基督教骑士精神的理想与文艺复兴美德结合起来——这在卡斯蒂利奥内所著《朝臣》（原书第一卷第74页），托马斯·埃利奥特所著《统治者之书》（1531年）等书中随处可见，关于这个问题也可参见F. 卡斯帕利《都铎王朝治下英国的人文主义与社会秩序》（1954年）。

[15] 当荷兰各等级人士向他们的总督胡格斯特雷滕抱怨，说他在朝廷没有为他们的利益尽到足够的努力时，他回答说：“如果有人对我有这么多的好处”（他指指自己的手腕），“我就对他有这么多的好处”（他指指自己的肘部），“但是”，他又说：“如果有人对我这么不利，我也要那样对待他。”我是从H. 柯尼格斯博士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它对公认的观念作了非常巧妙的说明。他在写第十章时因篇幅所限不得不略去这个故事，不过他希望我在别的地方加以叙述。他

还希望向海牙的P. A. 梅林克博士致以谢意，感谢他为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档案馆中阅读E. 范比安那写的一份材料提供的方便。

[\[16\]](#) 有选举神圣罗马皇帝权的诸侯。——译者

第二章 经济变革

一 农业^[1]

按原则说来，不能孤立地理解经济问题而只能参考一个较大的基准体系去理解。如果经济史的任何一个分科都不可忽视这一点的话，农业史尤其如此。农业经济与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是互相联系的：人们或许可以把经济学家的“价格相互依存法则”扩大为支配所有经济现象，从而也支配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法则”。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在农业经济领域——只打算谈一些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特点是，土地（或土地处置权）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土地毕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媒体，一种生产要素，它还是人类的生活场所。因此，对土地的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涉及对居住于该土地上的人的统治权。我们处处都可见到由于这种控制土地而产生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例如，在军事征服中，或者在社会分层的发展中，我们都可见到这种现象。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以军事征服凌驾于土著人之上（最近以来有些社会学家几乎把这一点过分强调为国家起源的一个要素），在通常叫作“封建时代”的数个世纪中，这种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特别显著。在这段时期中，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尤其是农业的体制。马克斯·韦伯将这种体制叫作“贵族领主土地占有制”，即通过土地所有权间接取得的对居住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的人（更确切地说对农民）的统治权。与真正的人身农奴制截然不同的是，这种所有制不是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而是通过插入一个中间环节获得这种权利。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可能还有经济的领导权有关的那些集团——在地产上追求自己的物质基础，地主们直接利用土地的程度倒是次要的。使用土地的雇农以实物或现金交纳的地租和提供的劳务构成统治阶级的收入，这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农业结构。

就我们这里所述而言，封建社会（地主以及农民）对经济问题的态度有两个特征。首先，人们在一种道德上的相互依存状态中生存。农民交纳某些款项或提供劳务的责任必须看作是他效忠地主的产物。作为对他尽忠的回报，地主有保护和帮助农民、提供安定的环境和给予关照的道德义务——能以具体的经济上的反向服务（供给食物、分享收成、贫困时给予帮助等）体现他们自己的道德义务。换句话说，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由这样的一些道德因素决定的。因此，提供和交换经济上的服务与等值回报主要依靠这样的个人关系而不是依靠财产法或债务法的要求。其次，典型的经济行为最初不是由市场和价格决定的而是由自给经济的要求决定的。农民的劳动不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地主的需要，地主期望以农民的劳动成果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一原则的纯理论的实现过程中，不是物价水平的变化而是农民与地主的需求变化引起生产的变化。

然而，如果在历史事实上，经济上相互关系的加强产生了实际上的市场和价格（无论是多么不成熟），结果便产生一种矛盾的局面。考虑到这些事实，于是产生了传统运作情况是否会变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变革的问题。各种过渡形态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完全无视这样一些有重要经济成果的经济资料，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化完全没有引起生产变化，而且没有通过“市场机制”达到供需平衡；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价格这个经济上的事实决定生产，并且一种合理的经济组织取代了过渡组织。

货币的出现以及价格机制随之进入农业经济部门特别促进了这样一种合理组织的形成。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当广泛的相互作用，因为理性的经济学思想的兴起接着引来理性的货币媒介；它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农业问题。由经济学思想对货币价格和市场的这种重新定向引起的问题是双重的。首先，人们必须发现它在农业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变化。其次，人们必须问一问，经济学领域的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社会领域——在农业社会中是否有相应的变化。在别的方面，社会变革可能已经领先并在相应的经济变革中显现出来。这些是有待调查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涉及从被称之为中世纪到被称之为近代的这段过渡时期（即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这段时期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中都发生了许多根本变革。这些变革在欧洲的不同国家中

具有很不相同的形式，结果自那时以来，整个欧洲的差别已变得特别巨大。历史条件是产生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这就使得有必要仔细注意前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情况。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到16世纪，欧洲已产生了许多迥然不同的民族经济，加之有了国际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就使得有可能谈论世界经济。这就意味着任一特定国家的农业经济，通常还有其社会结构，时常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与之有着明确的进出口关系的国家的经济情况的影响。

如果15世纪和16世纪的这些变化必须从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理解的话，这段时期对其后几个世纪的影响也应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这就迫使人们还得注意后来的这几个时期，因为在没有其他办法时，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只能从它们对后一个时期的影响来判断。因此，最好是先概述一下在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总趋势，然后简述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各自的发展情况。

普遍存在于所有这些国家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于15世纪达到顶点的决定性发展路线之一是原来没有人身自由的那些农民也赢得了人身自由。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那个时代认为的自由与奴隶状态的意义。

原来自由的含义是自由人是亲属中或人民中的正式成员，因而能在民众集会中以一名东道主和在法院中以一名陪审员的身份发挥其作用。与之相对的是非自由人，他们不属于民众范畴，没有亲属支持。这种无人身自由的现象早在卡洛林王朝时代就开始消失。基督教引入一种全新的精神特质，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次要作用的是日耳曼民族一般来说不把非自由人用作奴隶而是给他们一块土地，附加的条件是必须提供特定的劳务和支付一些款项。另一方面，原来的自由人渐渐以各种方式不知不觉地进入雇佣关系。这样，在8世纪与12世纪之间出现了一种单一农民，“单一”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曾经决定其地位的个人身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已丧失全部意义。由于这一发展尚不完全，采取一些措施来废除古老的人身依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德国东北部，在12世纪，那里的地主开始解散大庄园。从14世纪和15世纪开始，这一变革涉及解放农民，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早期的农奴为有人身自由的农民所代替，只是必须交纳租金。同时，在德国西部的农民中，农奴身份不复存在，不过“无地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农家——经过依附地位暂时更加恶化的时期之后，直到15世纪才获得自由。这时仍然保留

下来的是某些交纳租金的义务。在德国西南部，早在中世纪的全盛期，大庄园就分裂为小庄园了。在更小的新庄园体系中，农民的义务就是安下心来只交纳租金。同时，旧的人际关系在德国中部消失了。意大利的发展情况更为激进。在那里，原来的奴隶成为佃农，只有在像弗留利和撒丁岛这样的边远地区，人身依附状况才继续存在到15世纪。在法国，这一进程始于13世纪，除了少数例外，到15世纪就已完成。在英国，即使起因不同，至少从13世纪起，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要抓住这一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14世纪人口锐减在各地都起了作用，以及随后封建阶层变成可以叫作资本家的阶层，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口减少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已在起作用的这些趋势——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更进一步把农业经济和那些靠土地为生的人一起引入了货币经济的复杂关系之中并产生了市场与价格效应。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由于加大了市场条件所产生的复杂情况而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一点无须进一步强调。早在卡洛林王朝时代，在全欧洲我们发现，农业负担是以货币来确定的，这不一定意味着以现金支付；这些负担通常是以实物支付，现金数额仅表示负担量的大小。货币经济始于意大利和佛兰德，但从12世纪起日益扩大，到15世纪，至迟到16世纪已普遍占优势地位。随着地主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他们需要钱来获得所需的进口商品和那些很少能用天然产品来交换的商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再从农民那里得到以货币支付的款项，看来这是很有好处的。

对地主们来说，这一巨大的好处也有——或至少是可能曾经有——一大不利之处，而农民却从中受益。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影响到所收租金的实际价值。由于贯穿几个世纪的这一变化总的来说接近尾声，即使地主们的正常需要没有改变，他们也发现自己的实际收入在下降，地位在削弱。支付款项、所有权和耕作方法的变化常常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只有当这些变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对地主们有利时，才能扭转这一趋势。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反复证明这一点通常是不可能的——地主在经济上衰落了，因此，一般来说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相应下降。农民或者因负担普遍减轻而使他们得到意外的

好处，或者有时甚至有可能只出钱就能全部或部分免除这些负担，农民因而获益。因此，货币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物价水平的变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有时是因前面已提到过的货币价值的改变（贬值）而产生这些影响。但是，有时物价变化相互关联。也就是说，或是在每一组产品中或是在每一个单独的民族经济中的特定物价水平方面有变化。各组商品的价格比率变化可能导致各个农业产品的变化：因此，羊毛价格的相对上升和粮食价格的相对回落对英格兰和佛兰德的经济有重大的影响。西南欧的葡萄酒，或是低地国家、德国图林根州以及别的地方的农业商品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体现农场主生产成本的工资是一种特殊的物价：经历黑死病之后工资上涨对依靠雇佣劳动的农业的生产成本影响非常大，以至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结构变动。

这样，在农业危机中达到令人沮丧的顶点的农业周期问题在这段时期中开始具有重要影响。假如忽略特定种类的异常情况，从8世纪到14世纪经济一直上升之后接着在14世纪中叶出现了第一次大衰退，大约1500年，又开始出现新的上升势头，持续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因此，也在这方面，16世纪具有特殊的意义。17世纪初突然出现经济大崩溃。按照达旺纳尔（d' Avenel）的说法，务农热（the fievre agricultural）导致垦殖更多的土地，从而加强了农业；生产过剩——几个特大丰收之后的标志——使农产品和土地的价格都下降了。在德国，三十年战争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由外部经济领域引起经济崩溃——而西欧则经历了新一轮增长，到1660年左右才转入新的衰退。所有这些起伏曲折都对农业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整体上还受到极其重要的另一点的影响——开垦荒地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即使偶尔有倒退，这一过程一直在扩大欧洲各国的耕地面积。耕地面积的增加可能还伴随着在所有相关的生产因素之间维持现存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产量往往不会增加。如果农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条件下上升，一方面可能使更多的不太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各地都发生了这种情况）；然而，另一方面，良田沃土就将不断提高地租。这就提出了是农民还是地主获益的问题。总的来说，直至14世纪中期的发展能使农民增加收入；只是由于其后情况

迅速变化，这个问题才成了争吵的主题，其结果根据实力的相对分配而有所不同。

农民的情况改善意味着地主的情况恶化。同时，如果农民陷入困境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生产能力，地主的处境也可能恶化。因此，地主处在双重危险之中。偶尔可能造成彻底崩溃，像在法国发生的情况就非常值得注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地主是否能以及以什么方式能阻止他们境况的这种衰退：像通过增加直接剥削一样，以增加权利和地租的方式还是以将商业财富引导到农业领域的方式。这些应急的办法时常能使渡过危机的老贵族成员们甚至显示出一种改良倾向。特别重要的是君主们对贵族的关心程度。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如英格兰的国王，不需要听从贵族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在政治上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此，贵族身份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如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影响大。在其他国家，如在德国西部的许多地方，16世纪出现了地区王侯与贵族之间的紧密结盟，结果，与贵族阶层相比，城镇的市民阶层失去了权力；封建主义又经历了一次复兴。只有当具有商业主义思想的王公和贵族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因素更有力量，从而接受“中产阶级的理想”时，拥有土地的贵族到这时才会变成地主，这一发展进程的最终结果是农民在1800年左右获得自由解放。

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涉及提供资金的人，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那些倡导人。在英国，在发展高潮中占据这一位置的是租地的佃户而不是地主。后者起着间接作用，因为长嗣继承制保证了经济实力的集中。强有力的君主决不让经济实力发展为政治权力，更不用说领土独立了。这样，地主经常能向农业提供资金。在法国，以及在意大利，农业资金大部分是由富裕的城里人提供的。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不允许市民获得乡村的大片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城镇居民的女儿通婚才能获得城里的资金——如果不愿借贷的话。其他的资金来源有：军官和文职官员之类的人积累的地租或工资、战利品、嫁妆，等等。当然，这些人通常也是拥有地产的贵族。在王侯领地上，王侯们本身在农业中起着先锋作用。尤其是在普鲁士，王侯领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一系列总趋势，它们都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或多或少达到明显的高潮，并且按照历史、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5世纪中叶以后，德国^[2]继续遭受黑死病引起的人口损失和随之产生的农业危机的事后影响。该国人口剧减，破坏严重，地租和贵族地位下降，城镇兴起和市民地位上升，商品价格上涨和随后对农业不利的物价形势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经过前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形势剧变。

15世纪最后25年开始发生变化并在整个16世纪都在继续。这一变化源于早在15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人口剧增；作为同时代人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有时还是令人吃惊的）建议。乌尔里希·冯·胡滕建议与土耳其重新开战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而其他著述家则公开说，要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必须有鼠疫和类似的疾病。到1500年，大瘟疫造成的损失得到恢复。除了尼德兰，该帝国的人口据估计已达到1200万即大约为11世纪人数的两倍，在整个16世纪人口都在继续增长，该世纪末，合理的估计数字是2000万人。

整体增长意味着利用了同样影响经济生活的种种强大力量。由于城镇的兴起，在前一个时期中，货币经济已经增强，这就增强了这些力量对农业的影响。农产品价格陡然持续上涨——粮价甚至超过了肉价和奶制品价格——并且对农业起着刺激作用。的确，从大约1500年起，又重新开始垦殖土地。这一过程体现在德国恢复向东扩张，在整个16世纪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都在继续进行。这一复兴活动不仅使自14世纪中期以来已经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耕种，而且还翻耕沼泽地和荒地，砍伐森林，耕种牧草地，沿北海海岸筑堤排水而获得了新的土地。1565年与1615年之间，在尼德兰通过排水而获得大约11万公顷的土地。在德国的北海海岸，通过努力也获得类似的成果。

此外，耕作方法也得到改进。慢慢增多的农业资料逐渐把有关新发现的知识传播到更大的范围里。13世纪在意大利开始的农业科技著作浪潮向外扩展，于16世纪到达德国和法国。这些大体上讨论的都是旧的耕作方法的改进，而低地国家在16世纪却在试验种植像苜蓿和芜菁这样的新作物以及其他饲料或有商业性用途的产品。结果出现了新的栽培方法。英格兰采用了尼德兰的这些栽培方法。从16世纪起，这些方法又以“英国农业”的名义传到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

因此，也可以这样来谈德国：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是农业史上的分水岭，正如这段时期在英格兰、低地国家和法国，以及后来在丹麦

和瑞典——实际上是在全欧洲发生的情况那样。在德国，这些变革与几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各地可以觉察到的各自发展情况联系在一起。下面将简要地谈到这些情况，特别是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主义国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不同的倾向。

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发生了一个事件。尽管这一事件本身超出了经济因素的范围，但它却对未来，特别是对农业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相对来说未受这场战争波及的地区人口也不再增长，因此，战争结束时的人口数量仍然停留在战争开始时的水平上。然而，在那些饱受战争风暴袭击的地区，战争毁灭了60%或70%（有时还更多）的人口。总之，德意志民族人口总损失估计为50%左右。此外还有钱财和各种财产的巨大损失。因此，尽管由于减产而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农业却崩溃了，必须经过许多年的重建才能克服这场灾难产生的后果。只有通过缓慢的方式才能填补人口的缺口并使荒芜的农田重新得到耕种。直到缔结和约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以后，人口才达到大约2000万的原有水平。只是由于路易十四推行的那套政策使法国从17世纪中期起人口开始明显减少（据弗朗索瓦·魁奈带有夸大的计算，从2400万减少到1600万），从而使法国未能在人口数量上长期超过德国。

这里所描述的灾难对于大约1500年以后的农业社会史当然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大体上来说它们加快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一些倾向，如像德国各地的货币经济的增长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庄园的形成。东方大庄园的发展是一种单独的现象，它具有特殊的意义。

德国的农业，特别是从14世纪中期起，也引入了货币经济，因而物价水平日益重要。始于意大利的这一发展趋势在德国各地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莱茵兰（包括低地国家）和较大城镇的附近地区发展速度最快、影响最强烈，而在较遥远的地区，发展速度较慢、影响的程度也较低。但这一倾向是明白无误的。一方面，这些发展结果对供应市场的农业影响程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经常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也使靠收地租的各类地主的收入减少。在德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西南部和西北部，这种情况造成大庄园的瓦解。

14世纪中期发生的黑死病这一大灾难明显推动了这些倾向。正如业已指出的那样，许多土地上空无人烟，大片田地重新成为不毛之地，农民停止交纳应交的租金。幸存者凭借人口稀缺，他们不仅扩大了权利，而且还减少了租金。贵族阶层迅速衰落：骑士制度的封建时代结束了。贵族们负债累累，以至文西斯劳斯国王发现，必须颁布一项全面免除所欠犹太人债务（*Judenschuldenerlass*）的敕令。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项措施来得太迟了，对其他人来说，这仅是暂时的宽慰。拥有最多地产的贵族条顿骑士团（举一个突出的例子）也陷入困境，以致完全破产，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起初，它以抵押土地来偿还沉重的债务，但由于最终无法赎回这些土地，所以，骑士团的理事会和高级首领在15世纪的整个前半期竭力以出售财产来挽救骑士团，结果枉费心机。王侯、绅士以及各城镇都不愿与他们接触。各地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商人的钱财难得进入这些地产中或进入农业的任何一部分。这是由于在城镇自己的经济范围内赢利的前景要好一些，并且还因为似乎有机会制止衰退，就不能仿效意大利的习惯做法，特别是城镇居民购买土地的愿望。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梅斯市，市政会提出给该市的公民提供土地，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会把它当作一份礼物来接受，因为耕种成本特别是雇工的工资太高——也就是说，由于地产没有收益。

只有几个城市，例如莱比锡，早在这时就开始系统地购买地产和整个村庄。只是由于地价上升和人口恢复（从15世纪最后25年和整个16世纪），各地有钱的城镇居民才开始购买土地，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各布·富格尔于1507年购得基尔希贝格和魏森霍恩两座庄园。在德国，城镇居民大规模获取土地所有权不成问题，这就像在法国，在英格兰，以及（较早）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那样。地区王侯们强有力地日益崛起，从15世纪中期起，贵族阶层开始复兴，当时它与王侯们结成同盟，之后有时设法从公职薪水中增加自己的地产总收入；而城镇居民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收入来源上。这些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第二个大灾难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使所有这些问题又死灰复燃。地主们再一次失去了大部分收入；还可以支付的实物地租数量太小，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因而也换不回钱来。由于比以前更困难，小贵族无法靠地租生活，于是便寻找并且在军官的薪金或在

宫廷以及国家官员的薪俸中找到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期的农业的不景气状态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助长了这一倾向。

地主们能否通过以其他方式增加收入来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这个问题必然会提出来。要么通过提高地租（如有必要，通过改变土地法），要么通过增加对土地的直接利用，基本上能做到这一点。力求实现这两种可能性毕竟是英格兰农业变革的特点。地主要么亲自耕种土地，要么通过替换租约来更改甚至取消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那些短期租约，提供了调节收益以适应市场条件的机会。除了非常偶然的情况，在德国没有出现后一种可能性。纯粹是一种合同关系的租约在那里几乎不能立足；农民的终身租佃权是一个自然人法（*personalrecht*）的问题，所以农民一直拥有这种权利。这些权利通常是明确规定的，所以不能单方面加以改变。农民相当小心，不同意有任何改动。只有像人身农奴制（*Leibrecht*）这样的合法习俗才使得有可能在承租人死后修改租金，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州和邻近地区有这种习俗。类似的原则适用于一种叫作“自由制”（*Freistift*）的租赁方式，这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地主可加以取消的租赁方式。但是，由于习惯法不允许这样做，所以，除了几种有限的情况，利用这一原则来取消租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因此，总的来说，德国地主不能通过提高地租来增加收入，即使提高地租仅是为了弥补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也不行。在如德国西北部的一些地方，曾试图进行类似的根本改革，但王侯们很快通过颁布对农民有利的农业法令来加以干预，从而禁止实行改革政策。如前所述，总的趋势使农民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稀缺价值来减少负担，经过鼠疫和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一点最为明显，但是在其他较小的战争和疾病之后自然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德国的各种农民起义直至1524—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都不是由农民负担加重引起的。除了向权力日益增大的王侯们作斗争之外，农民宁愿只是合法地在实质上抵制地主提出的一些小小的要求。后者在尽力阻止自己的衰落，他们比上一个时代更彻底、更强烈地迫使农民满足他们的要求。经济实力强而又信心十足的农民完全拒绝地主提出的要求。即使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地主们也没有试图增加地租和扩大其他权利，因为他们完全明白，这样的一些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在王侯们支持这样的做法或许还带头这样做的那些地方才有例外。例如，在巴伐利亚，16世纪增加了展

期租费（fines for renewal）。当时物价上涨，人们可能争辩说，增加地主的权利是一种补偿。因此，总的来看，只剩下一一种可能性——亲自进行精耕细作。

在这方面，在德国各地和靠近德国东部的一些地区，情况也很不相同。首先，如果当时的法律状况为这种利用土地的方式提供了不同的机会，那么法律地位当然就很不相同。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如果农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因而地主不能合法地剥夺他的权利，那么，只要法官依法办事，而王侯又没有把法律地位改得对农民不利，这条路便被堵住了。因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在法律上对变革能起作用的力量，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理所当然必须看作是其中之一。

从14世纪中期起，贵族在物质上和政治上衰落了，因而想要避免彻底破产，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在许多情况下大瘟疫使地主占有的土地几乎是自动扩大，因为许多农民的土地已经荒芜而无人占用。但是，这只能有暂时的意义；实际上，这必定不会有更多的意义，特别是在那些由于耕种成本和工资太高而直接利用土地无利可图的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因此，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为闲置的土地寻找新的佃户，纵然常常还得主动向农民提出减少租税负担。在16世纪，由于人口的缺口渐渐弥合，粮价上升，本质问题仍然是一个经济收益问题。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贵族能不能通过前面已谈过的方式获得官职从而获得其他种类的收入（薪金），以便减少地租的相对重要性；或者他们会不会发现自己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官员（法官）从官场中挤走因而又不得不依靠农业收入呢？15世纪普遍显现出这样的倾向，但在16世纪，德国的某些地区遏制了这些倾向，不过在其他地方（如萨克森），这样的倾向继续存在。影响贵族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是地区统治者因财政困难而出售政治特权，就像德国东部发生的情况那样；后来，正如这些地区统治者在普鲁士所做的那样，他们可能先后将这些重新安置的贵族用作军官。牵涉大庄园的任何更多的直接开发的基础在于要有一种合适的经济利益综合，以及克服劳动力供给问题的程度。

这样，在大约1500年及以后，德国几个地区的地主逐渐增加直接耕种。在有些地区，如在巴伐利亚，这些尝试结果失败了。那里的运输费用使得不可能把产品运到德国西部、佛兰德和英格兰的市场去，

因此，刚刚开始便夭折了。在德国西北部，尤其是下萨克森州，在哈尔茨山北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别的地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开发土地的现象，不过大多数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才出现。在萨克森选侯领地也可以见到类似的尝试。然而，在那里，从16世纪起，强大而有经济实力的政府奉行一项保护农民的一贯政策。这就阻止了领主消灭农民，因此，只有少部分农民的土地丧失而增加到领主的领地上。

在图林根州也可能出现过某些扩大领地的现象。

然而，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出现了规模大得多的增加地产的现象。这种情况不限于德国，而是一直延伸到波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罗的海各国、白俄罗斯等地。起初——至少在包括波希米亚在内的德国各地——这一过程并未牵涉有意破坏农民地产的问题；荒地和无人占用的土地只是增加了领主地产，而不是转租给农民。东部的情况有利于这一发展，殖民骑士一般都已获得包括几个庄园的地产。他们靠家仆和强迫农民劳动来耕种这些土地。从殖民化初期起，全国各地都散布着这样的中等大小的庄园，能以所述的方式加以开发。三十年战争（在德国东部地区，特别是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以及波希米亚，战火肆虐，破坏极大）常常违背贵族的意愿，进一步增加了闲置土地，继而增加了领主的领地。由于贫困的王侯们常常授予领主司法权和其他权利，还由于新的佃农常常是按叫作限期使用土地权（*Lassrecht*）的不利条件占用土地，因此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遭领主强行征用，结果有可能增加当时经营大庄园所需的劳动力。通过对选择做家务的农民孩子行使预先雇用权——偶尔被扩大为要求作为期数年的奴役劳动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了需要的劳动力。

这样，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只有得到领主的许可才能离开庄园；农民的儿子可能被迫接管给予的闲置土地；等等。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奴役关系通常被说成是世袭的或“实际的”奴役——之所以说是“实际的”是因为农民人身是自由的，所受的奴役在于暂时承租的土地和承租人的身份。

所有这一切的经济基础在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能在西欧和德国西部市场上畅销，以及德国东部的河湖水系与波罗的海和北海一起提供了便宜的运输条件。由此出现了一种不是为羊毛市场（如像在英格兰）而是为谷物市场所确定的生产。

到17世纪末，事态发展分为两种结果。在霍亨索伦地区（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制定强有力的立法来保护农民。领主一开始以赶走佃户并将土地并入自己的地产来剥夺农民的土地时统治者就这样做了。这一点因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而受到抵制。由于有力地实行保护措施，这些地区的农民大体上生存下来。只有发生于19世纪的解放运动在这里造成农民土地的巨大损失；这次运动的止息并非与严重的政策失误无关。在别的地方，如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占领地区、波希米亚，等等，以及东方的斯拉夫诸国，由于农民没有受到保护，所以丧失了大部分土地。

这两个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拥有土地的贵族转变为一种叫作领主家族（*Gutsherrschaft*）的特殊形式。在这种体制中，领主在他的整个领地或庄园中拥有统治权。因此，庄园在一国之内有点像是个政治单位：庄园内的居民只是地区王侯的间接臣民。同时，领主统治下的庄园是整个国家结构中的基本行政单位，具有与直接向该国统治者负责的对等官方机构相同的地位。因此，领主家族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综合体，而庄园农业（*Gutswirtschaft*）代表一个纯粹的经济综合体。从16世纪起，它的发展从根本上把易北河以东的地区与欧洲和德国两者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分开来。

因此，16世纪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德国农业史上深刻突变的痕迹。这不仅适用于社会——领主和农民的权利和义务，占有权以及司法权力与领地所有权之间的联系等——而且也适用于农业。王侯领地和贵族庄园采用合理的耕种和养牛的新方法，而农民的耕作和养殖方法仍然很落后。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的几个世纪的经济特点是稳步发展，中间有几次挫折。12世纪是相对停滞的时期；14世纪中期随着黑死病流行而出现最大的停顿。不过学者们对这场危机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程度还有不同看法。社会结构史的发展要平稳得多，由诺曼人征服过程中建立的封建秩序逐渐被具有更多资产阶级特征的社会秩序所代替。这对特有的英国式封建主义具有显著的重要性——譬如说，与德国和法国所采用的形式相对比——英国的封建法律禁止通过国王或其他某些大领主所赠予的土地而产生附庸佃户。由于大多数佃户是王室的佃户，所以，英格兰国王能对其臣属实行比（尤其是）在德国更严密的控制。^[3]11世纪建立起来的封建领主集团起初很卖力地承担给他们规定

的任务。经王室许可，他们有条不紊地在无人居住的地区进行垦荒和定居。这样，他们尽一切努力，成功地为日益增长的人口（在11世纪和15世纪之间人口增加了一倍）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在这方面，他们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拥有土地的贵族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大。在封建领主进行垦荒的同时，农民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最近对有些地区（例如，德文郡和林肯郡）所作的详细调查结果就是这样。农业发展是由需求的稳定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决定的。这些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在某种程度上由农民自己获得；封建领主只有亲自经营农业或收实物地租才能得到这些好处。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诺森伯兰郡是个明显的例外——封建领主亲自经营大片领地，因此分享了市场的好处。将土地出租供短时期耕种的地方情况也同样如此。例如，按照黑死病流行之前常见的那样出租的土地供一个人一生使用：这样的租约使得有可能定期地使租金与总的经济形势保持一致。在以现金支付租金的地方，由于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导致领主的收入下降。不管是以精耕细作还是以其他措施如做生意来弥补损失，其中任何一种情况的结果都是货币经济日益增长。

这些变化与这种中世纪的封建农业社会的瓦解同时进行。举个例子来说，从12世纪起，实物租金渐渐为货币租金所代替，领主用所收的货币租金来雇用劳工耕种自己的土地，雇工花钱较少而且活干得更好。由隶农耕种土地转变为自由租赁（为领主所服的劳役也在改变）然后转变为实际租借，这就补充了这一办法；这样，庄园主与隶农之间的古老关系就被纯粹的契约关系所代替。花了大约400年才实现的这些措施属于那段时期真正重大的事件之列。

与刚才谈到的这些要点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圈地。这个词指的是几种不同的做法，事实上，它们常常同时并存：合理地划分田地，将耕地改为牧场，取得邻近的土地（大量收购），有时甚至纯粹是垦荒和移民。真正对未来有影响的那种做法是把耕地转变为牧场。与此同时并进的是，既通过扩大又通过合并来充实庄园的地产，尤其是在那些耕种狭长条块田地的地方。圈地现象始于13世纪初，但在以后的200年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3世纪政府颁布了第一批反圈地法令，特别是默顿法令（1235年）和威斯敏斯特法令（1285年）。在圈地的初期，领主开始圈占部分荒地（assarts）。虽然在当时荒地顶多用来作牧场，但是它开始吸引在日益增长的人口中

渴望得到土地的人。由于农民享有在荒地上放牧的权利，因此，这样的圈地行为逐渐破坏了农民经济的基础之一。这些法令规定，在圈地时，必须注意给农民留出足够的牧场。这是王室方面为保护农民利益反对领主而做的努力，这清楚表明，领主不愿主动注意这个问题。这样，国家在推行一项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并没有禁止圈地而只是尽量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圈地过程中，领主竭力增加自己的收入，提防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下降。他们要么通过耕种圈占的土地，要么更通常是通过将其出租收取货币租金来达到这一点——较大块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农场主），较小块的土地出租给佃农、村里的工匠，等等。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所有这些都因此而获得人身自由：农民（这时成了农场主），还有佃农以及其余的人都摆脱了农奴身份而成为新的意义上的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与领主的关系不再有人身约束而只受法律契约的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英格兰农民解放的开端，因为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过程中，没有使用法律强迫而是通过自愿协议就废除了旧的终身关系。

将新土地分配给雇农、工匠等，帮助了地位低于农民的一个阶级人数的增长，这就在强迫劳动制度以外为农业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这就引起劳动方法的变革。随着终身约束的消失，领主再也不能依靠这样的劳务。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因为，由于隶农有自己的特别权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农奴甚至确立了一种有利的权利来做这种劳动并享受与此有关的好处。因此，在“自由”这个意义上，领主也成了自由人。他们用自己的自由要么以自由劳动力来耕种领地的土地，要么采用一种纯粹建立在租金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租金来自实际租赁出去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中，他们起着地主的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中，他们成了大庄园主。劳动方法上的这一变革还进一步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其全部作用只有在后来才能看到。与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紧密相连的是工业劳动力稳步增加。佃农和其他一些人一旦有了土地，很快就不再完全依靠农业为生——当农业劳工——而是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工业中，特别是织布业。这又扩大和加强了该国不再被束缚到地主庄园的那部分人并且更加理性地面对经济问题。

正如在整个欧洲一样，在英国，黑死病的影响也同样对进一步深远的发展起着刺激作用。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1348

—1349年期间，英格兰死去将近一半的人。结果，地主、农民和工人中业已存在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农民可能利用他们人口短缺来强行要求改善条件，而工人也可能用类似的方式来增加工资。索罗德·罗杰斯，还有支持他的W. J. 阿什利，曾谈到工资增加了50%。W. 艾贝尔计算了从1300年至1380—1390年收割工的工资与小麦价格之比，得出结论：工资上涨两倍；其他劳工集团的工资看来也增加了将近一倍。

像劳工法令这样的一些应急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是失败了：它们未能提供持久的解决办法；固定工资的尝试虽然暂时见效，但由于地主与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之间竞争劳工而失败。有关各方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这就不足为奇了。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各个地主面临这样一种形势：劳动力稀缺、宝贵，而土地却很多。地主常常发现自己拥有荒芜的土地而没有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利用的佃户。于是，他要么亲自耕种，要么重新租出去。试图按传统的封建时代的条件来重新出租土地既无实际可能又无特别用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很难按那些条件找到佃户，或者是佃户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之所以说没有用处是因为只有大大减少收益才能以旧的方式将土地出租。这样，早先采用的租赁的做法迅速扩展。在初期，地主曾是合理的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他们的地位实质上被农场主所取代。小型农场的承租人使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因此，获得的更多而又不需要管家和监工。如果耕种的规模大， he 可以从地主那里获得转让的土地，雇用隶农劳工进行耕种。他能更周全、更合理地使用劳工而无须插入一套管理班子。如果地主决定亲自经营——管理更多的土地而使用更少的劳工——他就必须改变耕作方法，实行粗放经营。这就使人想到采用放牧，养羊是明显可行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特雷维廉说，“牧场增加纯粹是大灾难的产物”——因为羊毛在国内外市场有极好的销路。这只能从更广大的经济角度来理解：即使价格上涨，由于国内外市场对布匹需求逐渐增加，在羊毛价格合适时也会产生对这种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从13世纪起，羊毛出口越来越重要；从15世纪初期起，在出口羊毛的同时也出口布匹。

因此，如果不考虑到羊毛贸易和布匹工业，就不可能理解英格兰农业的这些变革。没有哪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受到城市经济利益如此大的影响。

织布业在英格兰（以及其他国家）已发展了若干个世纪。其中心起初是在广大的乡村。在那里，羊毛在家里由农民及家仆、寡妇、穷人及其他人纺织。商人（经纪人）购、销布料。有证据表明，早在8世纪就向法兰克帝国出口布匹。然而，由于英国布的质量比其他国家，特别是比尼德兰的质量差，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13世纪，主要产自斯坦福的英国布出口开始显著增加。在王室的鼓励下，城市的织布业逐渐发展起来。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伦敦，布匹商（绸布商和布商）获得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布匹贸易能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始终存在扩大织布业的刺激因素。由于羊毛关税，特别是由加来贸易中心收取的关税，构成了王室岁入的重要来源，所以，王室对于羊毛贸易也极为感兴趣。织布业在14世纪经历了意义重大的、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扩展，其特点是既有农村织布业的扩展又允许外国（主要是佛兰芒）的织布工进入。随后现行经济结构的变革既是绝对地又是相对地吸引了很大份额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主要是从农业抽走了这部分劳动力，所以被迫以更少的劳力搞农业。然而，当织布工人不一定要成为城市居民。相反，由于发明了用水力作动力的漂洗厂，这些漂洗厂都建在山谷里，所以，尽管受到城市行会的抵制，还是引起了从城市向农村迁移。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城里的织布工也将他们的布送到农村去漂洗，而且更是因为织布商开始在其工厂附近使用农村劳动力。早自14世纪起，城市工业的这种相对衰落就成为发展的特征。可是，确实出现了某种普遍的工业扩展。虽然在15世纪晚期和整个16世纪就业和工资下降，但并没有产生相应的人员回流到农业的现象。这就封堵了农民重新加强粮食生产的一切可能性（如果曾经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话），虽然在15世纪后半期小麦价格上涨而在16世纪更加急剧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讲，16世纪——尤其是前半期——的特点是羊毛和小麦的价格同时都很高，其结果反映在农业生产上。

羊毛的高价加强了早先扩大养羊业的倾向。圈地的结果建起了牧羊场，大部分是中等大小的，不过也有大牧场和更多农民的小规模养羊。理性的经济思维起了作用。增大养羊业依靠增加牧场。但是接着小麦价格也上涨了，于是这些“现代的”农场主们力图利用这一仍有潜力的赚钱行业，因而在养羊的同时又从事种植谷物。这在16世纪前半期引起耕作方法上的进步。G. 汉森把它说成是“精耕细作的耕地加

草场的经济”，坎宁安则称之为“可转化的农业”——一种牧场与耕地相互结合进行长期轮作的方法。

这些耕作方法的变革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当然，封建制度也是合理的经济制度的一种障碍。无疑人们必须避免古代文学中常见的概括和夸张，因为英格兰只有部分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而其他地区（北部和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南部）未受触动。这些变革还具有高度的时代特征，而人们值得重视这些变革。它们对农业结构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封建秩序，随之也破坏了农奴制。未经正式废除，这些旧有的关系就消失了，因为地主对劳役失去了兴趣：在实行亲自经营农业的地方，他们发现，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低，不合算，而在将庄园的土地全部或部分租出去的地方，他们在庄园内能得到代表承租土地的人提供的劳务。旧的所有权的法律基础不复存在，大部分为记录在庄园案卷（*per copiam rotuli curiae*）中的习惯保有权所代替：副本土地保有者（自由农民）的由来就在于此。副本土地保有权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特别是可能为期数年，一代人或几代人，或者是可以继承——以及其他像实际租赁权这样的合法形式也出现了。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如农民的地位改变重要。从15世纪起，尤其是从16世纪，农民的土地开始落入牧场主的手中，到16世纪末，农民不再是英格兰农业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地位低于农民的那部分人的人数也下降了，因为大牧场只需要少数牧羊人而且根本不需要农民。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或许太简练精辟但本质上是正确的：“农民摆脱了土地而土地也摆脱了农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英格兰各地发生变化的程度很不相同，而且在各个阶段发生时的剧烈程度也各不相同。日益衰落的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跨越1800年前后，更确切地说从1760年持续到1830年。这段时期的后期圈地的广度使人们不会过高估计16世纪的动乱。不过，从那时起，英格兰不再是一个农民国家。尽管不是每个地方的程度都相同，然而，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不是能提供重农主义者所说的地主，也不是农民；那是农场主即以赚取承包利润为目的经营农业的土地承租人，他们不但利用农业技术，而且还利用市场。这种思想方法从他们向外辐射到其他群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是古老的封建传统秩序和方法的终结并由承包赢利活动支配的思想方法所取代。总之，农业适应了一种由市场调节决定的体制和生产方法。

对英国农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这一决定性变革不是在英国各地或在地主中同时发生的。阿什利已指出——而霍斯金斯、哈勒姆、贝雷斯福德、罗森、查普曼和其他一些人新近所作的一些研究更有力地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这一变革在不同的郡发生的剧烈程度也不相同：在肯特郡、埃塞克斯郡、萨福克郡、伍斯特郡以及什罗普郡、莱斯特郡、北安普敦郡、怀特岛等地很显著，而像约克郡、林肯郡、格洛斯特郡、牛津郡这样的一些地区就几乎未受影响。英格兰中部地区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占首要地位。这里的圈地导致了最大的动乱，因为人口集中而土地缺乏，因此，圈地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生活。世俗地主与教会地主也有差别。特别是后者——但也有一些世俗地主——直到16世纪还抵制这一发展趋势，甚至偶尔还收取实物地租。另一方面，正如埃尔顿已指出的，改革不可能对农业经济和农业结构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地主已经将他们的许多土地出租，而农场主通常是在旧的封建传统秩序瓦解之后才买下租赁权。法律关系可能变了，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没有变。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教会土地占了英格兰耕地的大约四分之一。仅仅在16世纪这段时期里，通过解放奴隶和其他手段，奴隶身份也就不复存在。16世纪和其后的两个世纪在英格兰都没有出现有利于恢复甚至强化旧的封建秩序的局势或力量——就像在德国东部特别是在波希米亚，在波兰、白俄罗斯和其他东方国家成功地尝试过的那样。

其原因不只是在这一事实中找到：新的农业非常有利可图，它能长期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上的自我意识和农场主对利润的越来越大的追求。更重要的还是农业的发展和其他经济部门，如贸易、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完全协调一致。这里还同时采纳体现新经济自由原则的新形式——以自由合同（劳动合同、销售合同，等等）代替旧的承诺方式，以及以理性的思维方式代替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些经济部门需要劳工、海员、职员、军人等，以便在国内发展新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要将这种新体制引入新获得的殖民地。它们从农业获得劳动力，不是因为新制度减少了靠土地谋生的手段从而迫使移民离开土地，而更多的是因为农业正在按照经济上的合理考虑进行改组，从而分流出剩余劳动力。这在我看来是布罗德尼茨（G. Brodnitz）自相矛盾的说法中的正确成分：比起工业来，资本主义思想以英国发展中的奇特方式更早而且更迅速地深入到农业中。

热衷于将资本投资于土地的商人、船主和工厂主以新的财富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发展。由于拥有土地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即使经营农场赚钱较少、经营体制又不太合理，无疑他们也会这样做。然而，既然旧贵族家庭成员把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这种现代的合理农业视为无上光荣的事，那么，富有的城里人就没有理由不照着做。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新经济观点能维持并且通过取得格外显著的成就可能有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英格兰，从成功的商人和实业家中不断产生新贵族，而且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惯常的经济做法上以一种对以后几个世纪意义重大的方式开始产生密切的联系——密切程度超过许多大陆国家。即使在诺曼人征服时期，这种封建制度在英格兰也得到非常明确的限定，因此，在英格兰发生的封建制度的瓦解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方式，其程度或许只有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可以与之相匹敌。所有其他国家都只是在以后、部分地区直至19世纪才经历这些变革。英格兰长期以来处于发展的领先地位——要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一点既对英格兰本身自然也对其他那些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且，英格兰发展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对大地产广泛使用限嗣继承法，这可以追溯到1285年的法令。财产固定的结果意味着尽管全部资本都来自财产的所有者，但是，实际得益者却是有权占用土地的人，即那些真正体现与金融界的联系从而也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农场主。

与英格兰相比较，法国发生的情况明显要更保守一些。在该国发生的这样一些变革就更谈不上深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大约1450年至1560年的110年构成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人们还可以找到新发展的起因。在那些年代，法国终于有了长久的和平时期并随之日趋繁荣。从1339年以来的前一个时代受所谓的百年战争所左右。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有时因鼠疫（法国于1438年也发生鼠疫）而影响更加深远，结果，人们几乎无法区分引起大灾难的这两个根源。1562年开始的宗教战争再一次严重破坏了法国的繁荣，使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实际上以进行大规模战争著称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也有类似的影响。

百年战争和鼠疫的可怕状况导致的结果是除了反复叙述这场大灾难及破坏的程度，抢劫和谋杀外，几乎没有留下可供人们判断发展或

是停滞的文献材料。因此只能通过回溯已得到相对充分研究的早先一个时期来判断16世纪及以后的发展趋势。

在9世纪和10世纪，君主制衰落而封建制度和地主庄园制发展起来。即使在那时，法国的几个地区也存在差别，直到18世纪这些差别还仍然有影响。因此，封建制度在勃艮第和香槟地区发展得最为彻底，但在布列塔尼、诺曼底、普罗旺斯以及南方的其他地区，发展程度就要差一些。正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领地农业与农民农业同时并存。农民的法律地位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从农奴经过隶农（占大多数）到新旧自由民。然而，法国很快又经历了一个简化过程：人身依附状况和个人负担转为依附于土地，而使用收益权实质上合并为财产权。

正如在英格兰发生的情况一样，德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在13世纪推行了一种日益增强的货币经济。实物租金大部分被货币租金所代替，不过布列塔尼是个明显的例外，在那里，实物租金一直维持到18世纪。同时，领主的领地农业衰落了，直到11世纪，领主的领地还占法国耕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这些土地常常以明显优惠的条件出租给农民。13世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或一部分农民以劳务换取现金报酬。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解放。领主们需要现金并急需同城镇的吸引力作斗争，因此，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农奴制存在的原有条件在这时开始消失，但并没有像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那样完全消失。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农奴制瓦解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到那时农奴制就完全瓦解了。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垦殖过程在13世纪终于结束。这一垦殖过程并不是像在德国那样要砍伐原始森林，而是清除掉生长在曾经耕种过的土地上的灌木丛。只是在这一个世纪，那些曾在罗马时代使用过的所有土地才重新得到耕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获得了对树林和牧场的共同所有权，或至少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公共土地上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开始的一个发展阶段在百年战争期间只能有零零星星的发展，其后才变得完全明显起来。鼠疫流行使战乱雪上加霜，必然造成大灾难和新的破坏，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旧的关系正在进一步瓦解。由于租金的购买力下降，贵族变得非常贫困，因而他们无法阻止传统的农奴制的进一步消亡。在像洛林、勃艮第和弗朗什孔泰这样的地区，由于未受战争的影响，农奴制就非常容易保存下来，这是其

特色。在别的地方，这时领主已丧失大部分甚至完全没有了奴隶劳工，而又无法支付临时工的已增长的工资，因而被迫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租约（多半是部分租赁和短期租赁）越来越多地代替了过去的农民承租权。富有的市民（主要是商人）开始有了地产，特别是城镇附近地区的地产，这有可能促进这种由契约确定的经济关系。15世纪后半叶已恢复和平，同样的发展趋势——庄园制特别是领地农业的衰落，日益增多的出租土地的做法——继续进行而未受妨碍。

法国的工商阶层没有以羊毛出口、布匹生产和布匹贸易这种影响英格兰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路线的情不自禁的欲望，这与英格兰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国工业在这段时期很不发达；它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当地市场，商品质量低。的确，城镇居民、商人、金融家、投机商、法官，偶尔还有富裕的农民挤入地方贵族阶层，而原来拥有土地的家族变穷了，只好到宫廷和军队中去谋职。但是，新贵族采用了旧贵族的时尚和习俗。实际上，新贵族通常是法院（*Parlement*）成员，控制着司法过程。虽然他们曾经为反对庄园制而斗争，但现在，庄园使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和租金收入，所以，他们运用他们的全部权势来巩固庄园制。诚然，普瓦图 and 皮卡迪的大布商组建起广大的国内工业和出口贸易，但他们与英国同行不一样，没有考虑过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羊毛生产，从而改造农业以适应养羊业。他们对振兴和发展实质上已不复存在的直接开发也不感兴趣——这种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在英格兰而更多见于东欧。17世纪和18世纪竭力限制农民的林权和放牧权，或者以一种彻底的解决方式完全废除公共土地，其目的仅是想要增加租金收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抵消租金价值的持续降低。这些尝试不涉及农业方法或基本农具的改革，他们也不打算这样做。另一方面，农民（即使他们认识到经济上的这些可能性）无法采用革新措施，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需的资金。在19世纪之前，一直无法消除农业上资金的匮乏。发展如此受阻不是由于租金的压力（普遍说来租金相当低），而是由于小片的土地限制了生产效率，以及像税收这样的公共负担造成的。大多数法国农民拥有的农场非常小，以致仅够维持他及家人的生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连生计也无法维持下去，所以农民家里的人被迫去寻找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上资本积累呢？在法国，能获得的这种资金来自农业以外的其他来源，而且不是进入农业领域，而是进入贸易、投机事业、工业，甚至采矿业。国内交通

运输系统不健全——道路很差，更重要的是种类繁多的国内通行费等——均由这种受抑制的发展状况所致，反过来又使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法国在农业方面几乎没有出现过那种明显合理的经济思想和行动。13世纪的这些变革及其在16世纪的延续确实引起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和劳役，从而结束了人身农奴制，巩固了所有权，更多地采用出租方式，但事情到此止步。法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靠收租为生的地主阶级使农民负担过重。法国仍靠传统的经济方法，是一个贫穷而不发达的国家。在宗教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就有了发展趋势，但未发展成熟。而在英国，他们经历的是一直向前发展。只有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等人）的思想和政策，当然还有法国大革命，才使新经济力量产生出巨大的爆发力。

在南欧国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占有特殊的地位。两国都经历了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经济改革，然后，在征服民族的统治下，接触到与他们先前发展情况格格不入的新奇的社会与农业组织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中，起初的征服者都是日耳曼人，随同他们带来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使之与当时的罗马晚期文化相融合。公元415年，西哥特人建立了一个以托莱多为首都的帝国。起初，帝国版图包括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但后来，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使其仅限于西班牙。在意大利，在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队伍取得短暂胜利之后，狄奥多里克大帝率领的东哥特人于493年建立了一个王国，只维持到533年。早在568年，北部就被伦巴族王国取代。在这两种情况下，日耳曼人的“服从”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制度通过领主与仆从之间的个人关系决定了农业结构。711年，除北部以外整个西班牙都落入阿拉伯征服者手中。在意大利，由于查理曼帝国（774年）中的伦巴族王国与经常派仆从到那儿定居的历代德国皇帝后来建立的统治地合并，从而加强了日耳曼人的力量。在西班牙，经过阿拉伯人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又开始收复失地。在阿拉伯人统治期间，政治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独立形式的农村组织在10世纪开始发展起来；在11世纪，它们在与日耳曼封建制度作斗争的过程中农村组织的发展势头更加猛烈。最后，都市的精神力量终于战胜了封建统治。正如阿尔弗雷德·多伦指出：“在意大利的几乎每一个地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组织体制战胜了北方日耳曼

人的封建制度。” 自由自治公社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在政治上也使周围农村屈服的都市国家。

这样，意大利及其农业结构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从11世纪持续到13世纪。以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这段发展时期的特点是：法律上曾经严格分开的一些阶级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何契约或承诺的约束。昔日的仆人（*servus*）成为隶农（*colonus*），而 *livellarius*（有人身自由但受劳役的约束）和 *arimannus*（有人身自由的日耳曼人）与隶农结合为统一的佃耕农阶层。这时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出身时的身份而仅是应该承担的义务。然而，在撒丁区和弗留利这样的边缘地区，无人身自由的状况晚至15世纪继续存在。一步紧接一步：即使这种事实上的终身依附状况也减少了，并为以租金（通常以现金支付）体现的劳役所代替。结果，终身占有权改变为合法的自由租赁制。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领地农业制被逐步废弃了。意大利的领地农业制的作用从来就无法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庄园相比。但是，已有一些庄园使用劳工并付给工资，这些庄园依据不同于农民法的法律行事。领地大部分被分开出租；剩下的部分——主要用作花园、公园、果园，以及葡萄园——不再有单独的法律地位。换句话说，这时只有一部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土地法，不再有封建采邑的土地法。

纯粹从物质方面来看，这些变革一般来说没有改善农民的命运；各地的租赁金或应该承担的义务超过了原来的终身租用金。但农民在耕种方式方面有完全自由。因此，各种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被迫进入一种由城镇控制的经济。同样地，贵族越来越多地从农村特权阶层转变为城市特权阶层，将其大部分财富投资于动产而不是不动产中，分享由贸易中所赚得的利润。城镇自身的一些因素也促进了这一都市化过程。当时，富有的城镇居民购置田产，种植果树或喂养家禽，以满足自身的部分需要。但是，他们也将其用作避暑住所和农村休养地。在评价城镇与农村的这种相互结合和消除法律观念上原有的差别时，人们必须看到这些“别墅”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托斯卡纳——这一过程到13世纪就完成了。16世纪在几乎整个欧洲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发展，而对意大利却没有重要意义。虽然在这几个世纪中甚至直至现在，大宗地产确实一直掌握在大贵族家族和教会手中，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农业，

只有小农场经营。教会也发觉必须将其巨大的财产中较大部分予以出租或出售，因为罗马教廷进行的十字军东征需要的大量捐款已造成无法承受的债务重负。因此，世俗人士或宗教界人士的手中都没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自给自足的理想而不参与到总体经济中。

西班牙的发展截然不同。这不仅是由于该半岛上几个地区的气候差别很大，而且还由于政治时运的不同。尽管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摩尔人的统治之下，但加泰罗尼亚归卡洛林王朝管辖并建立起严格的封建制度，成为从事与摩尔人作斗争的军人阶级的基础。西北部的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很相似，不过，在巴斯克地区很快就开始显现出特点。这个地区受贸易和运输业的影响，即城镇的影响，反对这些地区从族长统治而不是从解放奴隶发展而来的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巴斯克地区的农业经过自动调节适应了邻近城镇的市场经济，明显出现非常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发展。在那些逐渐从摩尔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在阿拉贡地区，上层贵族取代了摩尔人领主的位置，他们与城镇结成联盟，对王室权力进行强有力的限制，以致农民一直处于极端的从属地位，直到18世纪才获自由。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中心地区保留着由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建立的定居点——由一圈不设防村庄围起来的设防城镇。在继续收复失地的过程中，这些城镇成为贵族领主的宅邸所在地，他们控制着周围的平原，这是在意大利也可以见到的特征。南方还不懂得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定居方式——这里要么由地方贵族要么由军人集团统治，养羊业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地中海沿岸地区受占有土地的大贵族控制，他们拥有必需的灌溉系统。另一方面，小庄园是塞维利亚内地的特征。在15世纪和16世纪，塞维利亚的商人大量买下这些小庄园，企图以此攀升为贵族。

上层贵族和下层贵族都没有经济上的进取心。他们把庄园的管理工作交给管家。大部分贵族的生活条件都相当低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土地交给承租人，这些承租人有时又分为第一承租人和第二承租人。正如间或在安达卢西亚见到的情况一样，他们从居住中心直接将土地包租出去。从中世纪的全盛时期起，农民一直享有人身自由。而对土地要么拥有继承使用权要么拥有租用权。此外，还有一些临时工。农民的负担普遍很重，尤其是在那些可以提高租税的地方；但在

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这一点行不通，那里的农民一直承担固定不变的租税。

总的来说，只有在西班牙的大港口和大的贸易城镇能发挥作用的那些地区才呈现出与欧洲的发展总趋势相一致的特别景象。

二 安特卫普的重要作用

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被公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史上最著名的篇章之一。正如英国外交家桑普森指出，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安特卫普是“世界的一朵鲜花”。当时的这些人，包括亲王、外交官、艺术家、诗人、旅游者和商人，已在历史记录上留下了他们对这座商业都城之王的惊讶赞美之词。到16世纪中叶，赞美之声的音量加大，调子升高，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在1565年的描述使这一赞美的高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外国人所写的有关该城的最华丽的墓志铭之一，因为当圭恰迪尼撰文赞美之时，安特卫普已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如果同时代人把该城看作是无与伦比的，那么，这位历史学家赞同他们的看法则是分量更重的评述。因为他与他们不一样，能对照继该城之后的名都大邑所达到的水平来估量出该城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得出结论：“从来没有一个市场曾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商业国的贸易集中到这种程度。”可以对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作出类似的尽管不太全面的结论：该城同时所起的两种作用肯定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借用安温对安特卫普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进行的类比，安特卫普不仅仅是16世纪的伦敦，它还是曼彻斯特。如果加上博尔顿或奥德姆我们也几乎没错，因为安特卫普以工业活动感到自豪，其重要性被该城早期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因此，这一点遗留给近代的著述家来论证。

在有关这段繁荣时期的种种直接起因之中，与1499年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葡萄牙的香料贸易中心相比，没有哪一个事件显得更加突出或有更充足的理由标志这一时期的开始。从大约1460年起，葡萄牙人就在布鲁日开始销售他们航海事业的产品。但是，直到葡萄牙王室代理商在安特卫普立足之后，香料贸易才突显重要。在1488—1493年的佛兰芒叛乱期间，这位王室代理商就临时转移到那儿，但这次旅居是应马克西米连皇帝的邀请，而在1499年重返那里却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行动，而且，这次他是来居留的。在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深入到东印度香料产地的同时，他的决定确保了未来半个世纪中安特卫普将是葡萄牙香料进入欧洲的主要渠道，因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贸易受王室

垄断，出售贸易品是王室代理商的主要职责。从里斯本发送来的第一批胡椒和其他商品于1501年到达安特卫普。两年后，王室代理商与安特卫普的一位商人签订了第一份合同，结果，在1504年8月，1000吨香料沿斯海尔德河逆流而上运抵该城。

代理商将出售的1504年运来货物所得利润的一部分用于购买葡萄牙当时所急需的粮食。但是，通常他想要换取的是金属（特别是铜）、金属制品、布和银。这些东西可以运到非洲和远东去换来更多的香料。一直在那里做生意的其他两个“民族”商业集团将数量越来越多的这些东西运到安特卫普：南方即高地德国人运来金属，英格兰人运来布匹（还有一些铅和锡）。正因为如此，在50年中，葡萄牙代理商一直驻扎在那儿。1549年葡萄牙王室代理商的撤离立即产生后果，这是情况变得对安特卫普不利的象征。但是香料是一块磁铁，除了金属和布匹之外，它还吸引着其他东西。其他商品运输路程短，沿线很安全。而运来与它们作交换的香料则不同，从遥远而无安全保障的地区经海路长途运来，结果，供应量大起大落。因此，从一开始就无法阻止香料交易成为一种赌博。然而商人并不想阻止这种赌博；相反，他们却急于要利用这种交易中的投机性。风险很大，但回报也很大。用铜和水银交换香料的德国南方人同样也出了一些那个时代最大的金融家，这绝不是偶然的。

同样也绝不是偶然的因素使葡萄牙人、英格兰人或德国南方人来到安特卫普，无论好歹，随同他们一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与金融强国的信心；他们的到来是前一个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1世纪到17世纪，尼德兰是包括由莱茵河、马斯河与斯海尔德河冲积而成的巨大三角洲在内的低洼地区，当时是欧洲贸易的集散地之一；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毫不新鲜，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详述。但是，正如这个地区总的来说构成一个经济重心一样，在任何特定时间它在自身范围内也有一个最大商业强度：在这一地区众多的城镇中，有一个拥有大都市的地位和权力。从12世纪到15世纪，那个城镇是佛兰德的布鲁日。然后，在15世纪期间，布鲁日被安特卫普超过。在五十多年中，安特卫普在其最兴盛时期拥有比布鲁日更大的霸权。在经济变化与政治动乱的双重夹击之下，安特卫普接着也衰落了。而这一次，领导权又转移到三角洲北缘的阿姆斯特丹，它对此早已翘首以待。阿姆斯特丹的绝对霸权是安特卫普从来就没有过的，所以持续的

时间相当长，直到这一整个地区暂时丧失了长期拥有的龙头地位时才结束。

因此，安特卫普的兴起恰好同时是布鲁日的衰落。安特卫普发起第一次挑战正是在14世纪早期：例如，1338年该城成为与英格兰进行贸易的中心，第一次预示它有极好的前景。但是，1357年，安特卫普成为佛兰德的属地，在半个世纪中，它的经济利益为该国的利益作出牺牲。只是随着勃艮第家族的到来这种约束才得以消除，而有利于安特卫普的实质因素又再一次充分发挥作用。皮雷纳在其《比利时史》[\[4\]](#)中描述了16世纪的安特卫普，其中著名的一段的主题就是关于起作用的那些实质因素：通向海路的水道逐渐变深，港口设施的改进，英格兰的布匹贸易的增加和高地德国人的到来，而最重要的是成为城镇解决商业问题的方法的特点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皮雷纳来说，这些是安特卫普领先于其近邻的主要原因。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些要点将便于简略地谈一谈自他那个时代以来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结果。

进出方便是大海港头等重要的必要条件。由于安特卫普进出大海的水道最终得到自然改善时正是它取得优势的时候，所以，在对该城起着有利作用的种种变化中，高度评价这一点是必然的。斯海尔德河西段水路的改善肯定促使了海船沿河航行而不是在河口处，在“瓦尔赫伦之路”上停泊，在那里将船货转运。在16世纪20年代，由直达运输而付停泊费的船只数目每年介于6艘至36艘；在16世纪30年代，相应的数字为88艘至319艘，而此后，船只数目稳定在200艘至300艘。这些年代是安特卫普的繁荣鼎盛时期，因而也是斯海尔德河西段海运最兴旺的时期。但是中转运输体制直至16世纪中期都还远远没有被取代，其原因不难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行“巨轮”的河道仍然有些危险，而且由于安特卫普的港口设施很有限，使得沿河逆流而上的船只只在到达时可能受到严重耽误。从海上进入的便利条件已经产生而不是解决了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它的好处很多，但并不是有时声称的那样重要。很清楚，这些好处只不过是该城在与东南部广大内地的交往中已享有的好处的增补而已。向南辐射的水路网是从早期起使安特卫普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两个自然特征之一；另一个自然特征是该城位于从莱茵河向西通往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一条陆路的终点。从科隆到布鲁日的中世纪大道穿过根特和梅奇林，但在跨越马斯河之后从主干道分出一条支路，向西北延伸，跨过

坎彭河通往斯海尔德河河口。这是德国南方人去安特卫普的路线，正如斯海尔德河西段是英格兰人去那里的路线一样。走这条路线费用较低，穿过贫穷的农村地区，在那里能得到便宜的供应品，重要的是免收通行费和不征收其他税费。在坎彭的乡村地区，至今还可以见到像“科隆大篷车”之类的客栈名称，这些名称使人们保持了对这条已消失的交通干线的记忆。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德国南方人是到安特卫普来做生意的两个主要“民族”之一，这是人们对这两个商业集团的称呼。在该城历史的这一页上，“汉萨同盟”这一名称曾一度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现在很清楚，曾经认为汉萨同盟具有的重要性更多的是由于该同盟的高度组织性因而在那个时期的文献上的突出地位而不是经济上的真实情况。对比之下，除了少数几个主要商行，德国南方人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松散的团体在档案中几乎没留下痕迹。他们以纽伦堡、奥斯格堡和法兰克福为基地，与像柏林、布雷斯劳和莱比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联系，经营中欧矿山产的金属和南德高地的农村工业织造的棉麻混纺粗布，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对这两种商品都有旺盛的需求。他们的大商行，如富格尔、霍赫斯泰特尔、韦尔瑟和图克尔开始时全都是既做金属生意又做布匹生意，但是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往往放弃布匹生意而专做金属生意，尤其是铜和银。在安特卫普的地中海“民族”中，意大利人位居前列。他们之所以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经营的是贵重商品，包括细布和从来未被葡萄牙的廉价商品排挤出该市场的黎凡特高级香料，而且因为他们的商业和金融专业知识：安特卫普的第一代银行家全是意大利人，他们是直到那时聚集在布鲁日的商行的继承人。后来他们中出了许多商界领袖和官员，以及在卢多维科·圭恰迪尼著作中提到的该城最伟大的国际法学者。

但是，毫无疑问，当时在安特卫普的“各民族”中占第一位的是英格兰人，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英格兰布匹的“贸易城镇”是仅次于把它建成香料交易中心而吸引全欧洲的商人到那里去的第二个原因。尽管遭到许多令人灰心的挫折，英格兰布匹业在15世纪经过努力奋争终于在尼德兰获得一个货物集散地。它所显示的毅力，以及由此而得到的丰厚回报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正是他们在欧洲沿海别的地区未能站住脚才驱使这么多的英格兰商人到尼德兰来碰碰运气。

英格兰对安特卫普的布匹贸易的增长，就像开始控制这一贸易的冒险商公司的兴起一样，总的来说是英格兰海外贸易的收缩而不是扩大。对于这一看法还有很多话要说。可以假定，当谈判准入条件时，当时的形势就会使英格兰人无能为力。如果尼德兰当时已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由勃艮第公爵将这些地区进行联合是人为的联合，在勇敢者查理死后，中央政权瓦解了，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又着手重建国家。因此，当充分深入到回顾中的那个时期——而且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的某些方面时，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区以及这些地区中强大的城市社团继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完全是中世纪产物的排他主义。从英格兰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可取之处，因为它使他们的弱点转变为长处。冒险商公司在尼德兰开始享有特权地位的秘密之一就是有意避免承诺单独利用三个相关城镇的其中一个。这三个相关城镇是安特卫普、米德尔堡和贝亨奥普佐姆，都是可供他们利用的。为了捍卫这一策略原则，他们不但必须抵制这些城镇本身的诱惑，而且还须抵制勃艮第公爵们施加的压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宁愿看到由一个强制性的贸易中心来安排布匹贸易。例如，在1497年，当美男子菲利普请求亨利七世同意在安特卫普和贝亨奥普佐姆建立这样一个贸易中心时，冒险商公司坚决抵制并坚持选择自由，这使他们能“迫使这些城镇由于担心他们撤走而改正错误”。单是威胁要撤走还不够，英格兰人还时时转移到互相竞争的城镇去办一段时期的商品交易会。

但是，只有安特卫普才会成为英格兰最佳的贸易中心，只有在那儿他们才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做生意的“各民族”。这是不是由于这些商人发现在那儿受到更好更多的文明待遇、较少的限制和较大的宽容——换句话说，是不是由于安特卫普比邻近地区更自由、更“现代”？四个要素支配着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本身的交易方法；允许“各民族”商人进入的条件；在该城的两个交易会期间得到公认的特别管理制度以及尼德兰政府奉行的政策。其中，第一个最不重要。一般说来，交易方法是全欧洲共有的，就像很快就传到安特卫普的复式记账簿一样，预付款的方式也通常是最先在南方采用，然后由创始者带到北方。但是，在15世纪，商品的买卖，送货和付款是根据各贸易城镇大致相同的规则进行的。确实，在1500年后，安特卫普的商品贸易量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与此同时商业交易方法也有了提高。只要

这些方法有助于使该城能成为一个更自由更现代的商业中心，荣誉就应更多地属于设想出并完善了这些交易方法的商人而较少属于该城。

“各民族”到安特卫普来的准入条件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期待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城市开明公正的特别证据，那就只有在此地了。而且由于在各国的所有商人中，只有英格兰人获得最好的条件，他们是最有可能证明这个论点的例子。不可否认，在1446年（那年第一个“法规”明确规定了英格兰商人的地位）以后的半个世纪由安特卫普授予他们的特权当中，有几个是“自由的”和“现代的”特权，从而代替了旧的外国人旅居管理条例（*gastenrecht*），安特卫普的英格兰人在这方面开始享有几乎完全的自由，而且他们在同其他外国人做生意时如果需要雇用当地的经纪人，这些中间人的合法与不合法活动的范围越来越有限。但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不仅仅是安特卫普在这样逐步放宽苛严的外国人管理条例，甚至通常被看作是非常落后的布鲁日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且，由于这些特权决非这些城市自动给予的，所以看来肯定是在受到要撤走的威胁的情况下强行取得的，我们已听说冒险商公司曾夸耀过这一点。这些城市本身对于挑拨它们相互反对的手段不抱任何幻想，有时这些城市还能同心协力进行自卫，就像安特卫普和贝亨奥普佐姆在1488年所做的那样；是年它们联合“反对英格兰王国的商人，因为他们所做的有损它们利益的不公正的事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

当谈到布拉班特商品交易会时，我们了解的事实更加确凿。该交易会是三角洲地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四个集市”。当约翰二世公爵于14世纪初建立，或许只是使其规范化时，每次集市交易期只有两周，但是这些集市的交易期很快就延长到6周（从理论上来说，其中前两周是去交易会路途的时间，最后两周是离开交易会的时间），因此，在15世纪，这4个交易会（其中有两周重叠）至少要花22周，将近半年的时间。它们间隔的时间不是均衡的，而是分为两组。贝亨奥普佐姆的复活节交易会（*The Paasmarkt*）于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开市，紧接着是安特卫普的五旬节交易会（*The Pinxten*或*Sinxtenmarkt*）。与此相类似，8月底开市的安特卫普交易会（*Bamismarkt*）即圣巴沃（St Bavo）交易会之后，几乎紧接着就是于10月份最后两周开始的贝亨交易会（*Koudmarkt*）即冬季交易会。两座城市相隔很近（相距只有30英里）使得商人们很容易在春秋轮回经商过程中光顾两地，这就有助于

说明在两届贝亨商品交易会已丧失其商业意义（像它们在1540年以前所起的重大作用那样）之后，它们仍然能实现更小但更有用的目标：提供财务年度中的两个结算期。关于这些商品交易会在15世纪中对布拉班特的这两个城市的价值几乎没有疑问。诚然，它们相互之间的管理制度或与其他城镇的管理制度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刑事原因之外，人员和商品免办法律手续，并受特别保护以防暴力、抢劫和类似的违法行为——这些是最基本的特征。但是，这些城市为保护自己的交易会举办权而表现出的妒忌行为和想要延长交易期的急切心情足以证明它们受重视的程度。

然而，进入到16世纪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两个城市的商品交易会表面上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它们的实际意义开始有了区别。贝亨奥普佐姆继续作为商品交易会举办城市，它的外贸集中在几个星期的两次商品交易会之内，此外就几乎没有外贸。而且，它的商品交易会本身很快就完全衰落了，来参加交易会的客商人数从16世纪20年代的大约400人逐渐下降到16世纪40年代初期的100人或更少。只是由于英格兰的布商决定把贝亨商品交易会用作安特卫普交易会的陪衬，它才能够继续存在，这一点几乎没有太多可说的。相反，在安特卫普，不仅商品交易会本身繁荣兴旺，而且越来越兴旺以至成为多少有些连续不断的商业年度的高峰。英格兰人的影响也很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冒险商公司的控制有利于周期性贸易而不是连续性贸易，运送布匹的船队定于商品交易会（尤其是五旬节交易会）期间按时到达。因此，一方面，尽管看来安特卫普的贸易正在冲破中世纪商品交易会的限制，另一方面，一直确凿无疑的是，即使在达到最大贸易量的时候，这些商品交易会仍然是商业年度的主体，以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成了金融业的基础。

尼德兰的勃艮第统治者对斯海尔德河两岸的新兴大城市的态度依然如故。这些地区的中世纪体制、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王室的重大使命所要压制和取代的众多棘手的特权和风俗习惯，长期以来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和阻碍了推行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连贯一致的政策。因此，只有在像通行费和货币体系的管理或商业条约的谈判这样一些中央政府能较为得心应手地加以控制的经济政策领域中，我们才能找到至少在初期偏袒安特卫普的痕迹。正是佛兰德给了勃艮第王室在尼德兰的第一个立足点，这种情况继续反映在它的法令中。直到在勇敢者查理

的统治时期和更加明显的是在马克西米连统治时期，佛兰芒的工业和贸易持续衰退，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才中断了原来的那种关系。佛兰德所失去的正是布拉班特尤其是安特卫普所得到的。在马克西米连与佛兰芒诸城市进行的。十年斗争中，正是安特卫普对他的支持才缔结了该城与该王朝之间的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菲利普二世于70年以后到来之前都未受削弱。该联盟关系以马克西米连1488年颁布的特种权利法令开始，该法令要求住在布鲁日的“各民族”转移到安特卫普。其中也使葡萄牙王室代理商第一次来到该城。

因此，如果安特卫普把15世纪末结束的成长期间的某些东西归结于政治上的好运，那么，在16世纪的半个世纪的成熟期和鼎盛期它继续享受着那些年留下的遗产。在哈布斯堡统治者的直接控制下，在他们开始逐步带来的不论好歹的状况中，安特卫普能够以拥有一定程度的即使在本国也很了不起的政治、宗教和财政自治而感到自豪。但是它做到这一点是依靠两个条件。第一是它“在亲王需要时给予支持”的能力和意愿，第二是它以提供财力的方式来赞同亲王奉行的政策。该世纪的头50年几乎完全与查理五世的统治期相吻合，这段时期中这些条件基本上得到履行。地方行政官始终乐于花费金钱以便保住旧的或获得新的征收通行费或承包税收的特权，而官场外最富有的人经办帝国外交政策日益需要贷款。除了偶尔抱怨一下之外，该城也同样接受了它要么赞成要么能使之变得对它自身利益无害的政策。这在宗教上更是如此。在一个越来越不宽容的时代，地方行政官使用该城的特权来保护其商业社团。他们对小人物不感兴趣，安特卫普的殉教者中大多数是这些人，其中许多人被通称为“再洗礼派教徒”。但是，商业界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从葡萄牙蜂拥到安特卫普的“新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各民族”云游教徒都会受到自治市法律和习惯法的多方面的保护。正是这种态度和政府的政策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缝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使他们之间疏远了，尤其是在1555年以后。如果不是政府在财政上这么依赖该城及其金融市场，它可能早就打击这个享有特权的障碍物了。实际上，格兰维尔可能劝告菲利普二世鼓励根特的贸易以作为对安特卫普的一种平衡力。自从根特在1540年被制服以来，它就没有添过麻烦，而且它比斯海尔德河岸边的“过分强大的臣民”更容易管理。这是与1488年的打算相距甚远的一种想法。

直到一代人以前，有关安特卫普达到或接近顶峰时的交易量的仅有的数字是圭恰迪尼在1560年左右写的著作中提供的那些数字。当时下降趋势或许已经开始，圭恰迪尼在著作中给出了每年输入到该城的一系列金额巨大的各类商品。在将近1600万金克朗的总值中，英格兰布匹占了500万，或者说将近三分之一；其次是意大利商品，特别是细布，达到300万；波罗的海小麦将近175万，德国葡萄酒150万，法国葡萄酒和葡萄牙香料各占100万。西班牙葡萄酒和羊毛、德国布匹、法国菰蓝染料、英国羊毛和法国盐，金额渐次减少，构成总值的一部分。幸亏有比利时历史学家们的著作，现在才可能将这些传统的数字与安特卫普某些年份的出口总额相比较。安特卫普的这些出口总额是通过将尼德兰政府为帮助支付法兰西战争的费用而对该国的出口贸易征收的税收收益相乘而获得的。在这些税收中，主要的税收是1543—1545年对所有出口商品征收的百分之一的出口税和1552—1554年对出口到南欧的商品征收的百分之二的出口税。这样所得的总额包括从1543年2月到1544年2月的12个月中从安特卫普由陆路和水路出口的全部大约100万佛兰芒镑^[5]的贸易额和其后12个月超过120万佛兰芒镑的贸易额，而1551年11月至1552年1月的0.5%的税收收益代表的是225万佛兰芒镑的年总额。由于政府在财政意义上对进口贸易的兴趣不如对出口贸易的兴趣大，所以我们对进口情况知之甚少，但有一个相当于1551—1552年出口额的大约160万佛兰芒镑的进口额。

虽然这些数字的误差可能很大，但这些及类似的数字证实了从非统计数据中所能作出的推论，安特卫普的过境贸易额在该城的“黄金时代”的不同时期差别很大。1939年发表的耶斯克鲁德（Iersekerood）的通行费，或泽兰的通行费收益的金额提供了这种商业活动模式的清楚明白的迹象。这是对使用斯海尔德河三角洲水道的交通征收的主要的通行费。这些水道包括安特卫普与大海之间的斯海尔德河西段，这条路线可能占了该城贸易量的一半。由于通行费通常是承包的，所以这些金额大多数是承包人每年所付的租金，但是，间或有记录下的实际收益。总的来说，这些数字说明这样一个结论，1500年与156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是由三个非常明确的时期组成：该世纪头20年快速扩张的初始期；接着，经过10年的衰退之后是大约12—15年的稳定期，这时大致达到顶点；然后，从16世纪40年代末起，经历了12年的剧烈波动期，在这段时期中，新的高纪录与经济大萧条的低谷迅速交替。

16世纪40年代和16世纪50年代的贸易总额可以成为某些有启发性的比较的基础。当用来衡量安特卫普与尼德兰其他港口对比的贸易额时，它们表明该城处理着70%到80%的该国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证明了皮雷纳的这种说法：整个地区都成了这个大都市的郊区。另一方面，相当于大约90万英镑的1543—1545年的出口总额是伦敦对应的出口总额的将近3倍，比所有英格兰港口的出口额总和还多50%。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安特卫普看来已有贸易“顺差”。由于外国人在安特卫普筹集了大笔贷款，所以我们本来可以预计到由这些贷款服务所体现的入超。情况似乎相反，这是对该城在把进口原料和半成品转变为价值更大的制成品来努力发展工业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奖励。

普遍认为，16世纪安特卫普的贸易性质主要是“转口贸易”，该城只不过是尼德兰别处生产的商品的一大转口港，通过它转运到或远或近的目的地。事实上，安特卫普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在别处启动的一股贸易流的渠道。因为不仅该城本身是许多商品重要的最终市场，而且它与周围地区共有的工业活动是其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用一个简明的现代术语来说，由此产生或加快的“专门贸易”就进口方面而言有食品、原料和半成品，就出口方面而言有在该城或周围地区生产或加工的商品。安特卫普是欧洲北部人口最稠密地区的最大城市。16世纪中期对尼德兰人口的估计数字是300万，这很可能有些夸大——现代的学术权威可能会把这个数字减少到200万以下——但是人口密度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肯定是最大的，后者有50多万人。安特卫普自身的居民人口从起初的不到5万人增加到该世纪中叶的大约10万人，就大小而言，当时该城紧接在欧洲的6个最大城市之后；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客商、托运人和旅游者。这个人口集中的都市的粮食供应需要连续不断的贸易流量。当地的农产品和渔产品连同大量作燃料用的泥炭每周源源不断运到，为该城送来了食物和温暖；而该城拥有的三个粮食、鱼类和燕麦交易中心意味着它也处理许多为整个布拉班特地区从国外进口的食品。许多进口商品在安特卫普进入工业活动范围经过加工处理：那里的鱼加工、制糖和肥皂制造早已闻名。

最重要的专门进口贸易项目是与纺织品有关的项目。在16世纪前，安特卫普几乎没有纺纱和织布业，但是布的精加工已发展成为一个较重要的行业：1564年，单是服装同业公会就有1600名工匠和学徒。在安特卫普进行上浆处理的大批布匹来自英格兰，因为买英格兰

布的商人通常在该城将布进行精加工然后才运到目的地。1565年，安特卫普的地方行政官估计，每年进口的英格兰布匹价值达70万佛兰芒镑以上，其中价值40多万的布匹用于再出口。由于精加工的成本平均为批发价的三分之一，因此，该城从这个贸易项目所得的收入可能达到10万佛兰芒镑。除了布匹本身之外，精加工工业还需要各种其他的进口商品。首先是明矾，它是用于固色的必不可少的媒染剂（也用于炼铜）。在教皇国的托尔法发现明矾矿之后，勇敢者查理禁止从任何其他地方进口明矾，而在1491年，美男子菲利普和马克西米连通过使安特卫普成为明矾交易中心来加强垄断。这项贸易本身掌握在承包商（通常是意大利人）手中，但是该城负责收取每拉斯特^[6]25先令的关税：随着贸易额的增长，所涉及的税收金额变得非常之大，直到1555年，才以支付24万佛兰芒镑将其赎回。其次的进口品是用明矾来加以固色的染料。安特卫普的染料业有3种常用色：黑、蓝和棕黄色。直到该世纪中叶以后，安特卫普人才找到一种菰蓝的代用品来作蓝色染料来源，而这种菰蓝（法国菰蓝）是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的主要商品，其中一些又再出口到邻近的一些国家。世界的开发带来了作染料用的新材料。1550年以后不久，在安特卫普人们就知道靛青，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用于染色工业。虽然红木（巴西的名字来源于红木）属于葡萄牙最早的贸易项目之列，但只是慢慢代替传统的西洋茜草。胭脂红从1550年左右进入该地。

在安特卫普及其附近地区发展起来的其他新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越来越多地耗用金属。军火工业在法兰西战争的刺激下增长并繁荣起来；而在安特卫普出售的部分武器装备以成品形式从德国或马斯河流域运来，有些则是在安特卫普或附近的梅奇林用进口金属制造的。1549年9月举行菲利普亲王的入城式时，大约1000门炮排列在他入城的城门外，此事给人的印象是大炮非常多。另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是铸钟业，平原上无数高耸的教堂尖塔对铸钟保持着旺盛的需求。

显然，在安特卫普的进口总量中，不少商品不仅仅是通过而是运进该城，要么是在那里消费要么经过当地工匠的手加工制作之后再运走。对应的出口贸易除了已提到过的那些主要项目之外还包括一大批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促进了物质享受水平的提高和文化进步，这些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各种各样的家具、地面和墙面上的覆盖物、花毯、绘画和小雕像、珠宝首饰、玻璃器皿、书籍、纸张和地图，以及尼德

兰以此而闻名的乐器。在尼德兰别处生产然后运到安特卫普来销售的众多商品延长并丰富了这张商品目录单，如由佛兰德的农村织布业或北部省份产布的城镇所生产的“新布匹”，其中大量的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安特卫普运走。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安特卫普的贸易几乎完全被外国人控制，本地人在贸易中所起的仅是一种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作用。这是圭恰迪尼的观点，像他的大多数权威看法一样，这一观点长期以来毫无疑问地被接受。就主要的海外贸易项目来说，这确实是非常正确的：从一开始，将货物运到安特卫普来并相互买走货物的是英格兰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不是去寻找这些东西的安特卫普人。在这方面，16世纪的安特卫普所占据的位置与很快由阿姆斯特丹占据的位置迥然不同。阿姆斯特丹的海外贸易大部分是由荷兰人自己开创的。那种认为，要么安特卫普人从一开始就温顺地默许这种事态的发展，要么是这种事态使他们除了“站着等待”以外毫无作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至少在该城占优势的初期，安特卫普商人的船队不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在欧洲水域，我们听说过安特卫普人积极与邻近的国家做生意甚至深入到波罗的海，偶尔还竭力仿效远洋航行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在1510—1520年，敢于进取的德克·范·佩施恩为朝圣者和商人组织了去意大利和黎凡特的豪华旅行。1521年，3艘安特卫普的船只航行到远东，只有一艘船从那里返回。但是，部分由于该城贸易增长，其自身的作用变得更消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早期取得的成就引起敌视行动的结果。在波罗的海，安特卫普人与汉萨同盟发生冲突；在英格兰，他们同越来越多的排斥行为作斗争。最主要的是，他们为打破香料垄断的尝试激怒了葡萄牙人，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损害这一繁荣的贸易。当然，在所有这一切中毫无例外，各地的商人都要面临心怀妒忌的竞争者以及自然灾害。如果安特卫普人显示的毅力，比如说，不如荷兰人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的这么多好处会在贸易战中丧失，要是接受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得到的要多得多。他们要做的事还很多。贸易引出了一整套的“商业服务”。尽管其中有一些，特别是金融服务，逐渐被外国控制，但其他一些仍然保留着较多的民族特征。因此，为商业文件作公证的业务繁忙的公证人通常是本地人，就像那些人数更多但社会地位较低的中间人、经纪人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中各个不同国家的人都有了。发展非常迅速然而大部分仍控制在当地人手中的一个行业是佣金代理

行。其中一个叫范·德·莫伦兄弟公司的代理行创下一个独一无二的交易纪录，1538—1544年间，它受理了一千多份委托书。

简单地把安特卫普贸易界划分为外国人和本地人的做法忽视了那些已在该城定居并适应了该城生活的外国人中间群体。在这些外国人聚居区中，最大的是西班牙人聚居区。政治上的联系使西班牙人与其他外国人的立场不同，非商业人员（主要是官员和军人）使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加。在16世纪40年代，大约有50个西班牙商人常住该城，到1560年，总人数上升到100，或许还有同等人数的公务员和代理人。葡萄牙人的人数看来大约为一半。同时，到该世纪中叶，英格兰人聚居区很可能达到50或60人（或家），而意大利“各民族”（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和卢卡人占多数）的总和达到大约同样的数目。法国人的人数很多，但没有具体的数字。德国人的人数也难以确定。总体说来，到1550年左右，可能有400个至500个外国商人常住安特卫普，还有相等数目的外国人家属。

并非所有的这些外国人都在那里终生定居，他们包括每一个同化阶段的人。在该城住上几年然后又回国的外国商行代理人仍然可以算作外国人。但是，如果一个在那里站住脚的商人与当地人结婚生子，那里就成了他的家，他就向“归化”的方向迈进。但是，很少外国人最终成为公民。在1533年与1582年之间，只有179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出生的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被接纳为该城的市民，在这些年份中，只有两年接纳的人数超过10名；在同一时期内，成为公民的英格兰人不超过23名。显然，只有少部分外国出生的居民无论因什么原因决定与该城市共命运。然而正是在“被接纳”的这一小部分安特卫普人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商界的主要人物。伊拉斯谟·谢茨继承了铜材生意，通过婚姻关系又进入香料行业，并将两者变成为安特卫普最大的个人财产之一。就像糖业大王希利斯·霍夫特曼一样，他也属于这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对决定该城命运与任何纯粹的外国人有同样大的影响。

安特卫普很少有现金批发买卖。现金购买者很难遇到，而且往往索要达30%的折扣。在使用的各种形式的信用付款中，最常用的一种是将所涉及的金额分为若干部分，并确定各部分金额不同的付款日期：通常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可在即将到来的那次商品交易会上支付，其余部分在继后的两次商品交易会上支付。长久以来为欧洲所有贸易

国确认，在安特卫普几乎人所共知的一个有助于作这种付款安排的条件是各次商品交易会的间隔时间很合适。到16世纪，原本属于商品交易会期间的“结算期”开始紧接在交易会后：通常定为10天，但可以延长，稍作调整后这4个“结算期”就可成为按季付款的基础。根据1521年的法令，这4个结算期的时间定在2月、5月、8月和11月的月初。头两个月份是贝亨奥普佐姆商品交易会的结算期，后两个月份是安特卫普商品交易会的结算期。

安特卫普的贸易正是建立在赊购和票据付款这个双重基础之上。对当代的商人来说，要是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他们习惯了的那种大规模贸易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理查德·格雷欣爵士在1538年断言：“商人没有交易同海上的船没有水一样都无法继续存在。”提供必要的信贷是16世纪的银行家的主要职责。商人之间的相互交易在中世纪晚期已成为交换业务的特征。虽然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16世纪，但是，到那时，特别是在大的贸易中心，购买票据以及其他形式的预付款项的业务越来越为银行家所接替。不加区别地使用“商人”这个词既指商人又指银行家，这表明至此还没有明确的区分。一旦拥有一些资本，商人就弃商从事银行业务的普遍倾向在各地引起关注并令人感到痛惜。克莱门特·阿姆斯特朗对于“通过汇兑占有金钱”的“富有的老商人”的斥责在一代人以后得到圭恰迪尼的响应，他谈到，绅士和商人都利用“他们能弄到手的所有资本来做银钱生意，其大笔可靠的利润是巨大的诱饵”。但是，只要这些由商人转变过来的银行家接管并改善了巨大的商业票据业务，他们就代表了专业化的一个必然阶段，有助于消除旧的做法中的一些弊端。他们使商人不必要去找交易对手，并且提供了非常需要的信心要素。有许多票据未能按期付款：付款人老是拒绝承兑这些票据，声称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出票人。一个与一家在各主要中心都有代理行的有名商行打交道的商人不大可能遇到这种困难，结果发现比较容易说服债权人接受支付款项的票据。

16世纪没有正规的票据贴现：它们在当场银货两讫地进行买卖并在到期日变现。每届商品交易会的利息通常为3%，即年息为12%，并付给经纪人0.5%的佣金。因此，如果一位伦敦的银行家以26先令8便士佛兰芒币兑换1英镑的汇率买进一张习惯期限即1个月期的汇票，其中的大约4便士是利息收益和佣金，剩下的“净”兑换率是26先令4便士。

如果同时有一位安特卫普的银行家买进一张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他定于在那里收款的每英镑交付的这个“净”数字是26先令4便士减去应支付利息和佣金的4便士，即26先令。因此，同一汇率在安特卫普的证券交易所和伦敦的伦巴第街金融中心以相差8便士的两个数字来表示，并且安特卫普的汇率总是较低的那个数字。对于较长期的汇票，或在银根“很紧”时，利率就高一些，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就按比例增大。这样，买进汇票准备在国外收款的银行家从该笔交易中获得一笔可以事先计算出来的收益。但是，如果他想要将钱再汇回国内，他必须反过来重复这一过程：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说，他必须“再兑换”。正是这种“兑换和再兑换”（拉丁语 *cambium et recambium*，意大利语 *ricorsa*）构成了最简单最普遍的兑换投机形式。由于银行家无法预先知道他能再兑换的汇率，这就产生了不确定因素。然而，他可以用各种名为“汇率贴水”的方法为资金投保不利流动险。这些方法可以用来赚取利润也可以用来避免损失。汇率波动和利率变动密切相关，它们为16世纪的金融家提供了两个主要的投机领域之一（另一个是商品价格的变动，特别是像香料这样无稳定供应而可以“囤积”的商品价格的变动）。当时与现在一样，成功的条件是有足够的资金和将其迅速调动以寻求边际利润的能力。有关的主要市场是安特卫普本身，德国南部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奥格斯堡这个德国高级筹资的摇篮，里昂、热那亚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安特卫普—奥格斯堡轴线为德国大商行所垄断，安特卫普—里昂—意大利三角区为意大利人所垄断。

在安特卫普的其他投机性行业中，最安全、利润最丰厚的一个行业是房地产。由于对该城各种住处的需求总是领先于供给，所以，购买土地或房屋等待“涨价”是外国人积极参与的一项有吸引力的事业（然而，创办最大的一项房地产事业的是一位名叫吉伯特·范·朔恩贝克的当地人。他于1548年在旧城以北开发安特卫普新城）。接着有了各种类型的保险。从事长途而危险的航行的商人在其离开期间有保人寿险的险种，可是，由于被大肆滥用而受非难——理由之一是它导致杀人事件的增加——因此在1571年被禁止。海上运输保险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考虑到它对商业界的重要性，它那杂乱无序的特性令人感到有点惊讶；由于大部分业务都委托给公证人和经纪人，16世纪前半期它在受到最少控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因而弊端百出，欺诈成风。1550年颁布了革除这些弊端的第一个法令，1559年，皮埃蒙特人

J.B. 费吕菲尼被任命为第一个监管员；10年以后，阿尔瓦发布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法令。由于有这么多类似于赌博的东西成了安特卫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只能预料那儿名副其实的赌博成风。很快就风行于全欧洲的抽彩给奖起源于安特卫普，但另一种直到1544年才被禁止的很流行的赌博形式——对孩子的性别下赌注，似乎是从西班牙传到那里的。

如果安特卫普在16世纪仍然仅是它15世纪期间就已成为的那副模样：勃艮第人统治下的尼德兰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那么它在欧洲的金融业中所起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是有限。使这座城市在这方面的作用发生转变的是把尼德兰首先与帝国然后与西班牙联系在一起的王朝纽带。低地国家就这样被卷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网中，被迫向哈布斯堡政权缴纳税款；战士、作战武器、船舶，所有这些都是帝国利益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于安特卫普的财力在重要性方面开始超过所有别的一部分。由于里昂在法国的政府财政中起着类似的作用，所以，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两个王室之间的长期斗争是这两个金融市场之间一场持久力的较量。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受到激励去取得重要的技术进步。正是1511年的法兰西战争第一次促使尼德兰政府利用安特卫普开展贷款业务，从那时起直至1542年，公众借款尽管仍然是时断时续的，但更为常见了。1542年是金融市场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之间的分界线。尼德兰政府需要时通过谋求贷款来满足特别的需要。其他的借款者也一样，只是由于葡萄牙人的业务与香料贸易联系在一起，它们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系统化的尝试，借贷期限也短。埃伦贝格的借款始于1516年，那一年，该政府借了总额为5万佛兰芒镑的当时堪称大笔的贷款，采用交易会会历（the faircalendar）来确定贷款时间。当时所借款项的借期从1届交易会到4届交易会不等，即从3个月到1年，如有必要，还可在同样的基础上延期。查理五世关于确定“结算期”日期的法令未必与他在这些日期的利益无关。

在谈判这些贷款时，有关政府只依靠一小批主要的金融家。富格尔、霍赫斯泰特尔、韦尔塞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南部家族与查理五世皇帝的主要业务往来始于别处，但是人们发现他们这时在安特卫普做的政府业务数量日益增加。除了他们之外，主要的金融家在开始时有在尼德兰的最后两个佛罗伦萨大家族弗雷斯科巴尔第和瓜尔泰罗蒂，后来有西班牙人德·瓦伊莱和莫希卡以及拉萨鲁斯·图克尔，他们是第

一批安特卫普的“金钱大王”。该市场的有限性加上需求无规律，使得利率很高而又不稳定，例如，在1516年这一年中，尼德兰政府筹集的贷款年利率在11%与31%之间，而在1520—1521年这两年中，年利率在15.5%与27.5%之间。16世纪30年代期间，利率逐渐降至12%与15%之间。虽然部分由于政府对金融体制不恰当的干预使得利率在1539年和1542年之间又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到这段时期末，利率下降和波动减少表明金融业务的管理已取得很大的进步。

1542年与1557年之间的15年中，安特卫普的金融业务规模空前巨大。随着新法兰西战争的爆发，尼德兰政府本身大大增加了借款的规模和次数，单是在1543年它就筹借了25万多佛兰芒镑，这一数额比先前任何一年的借款数额大几倍。此外，查理五世这时也开始通过西班牙王室代理人为西班牙大量借款。即使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总需求起初还是不如查理五世皇帝的盟国英格兰的需求量大。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4年中，他在安特卫普的借款接近100万英镑，即大约150万佛兰芒镑，以便为他在战争中承担的份额筹措资金。在此期间，第三位王室借款人葡萄牙国王以交付香料作抵押继续大规模筹款，据说1543年他已在那里欠债50万佛兰芒镑。尽管这些总金额巨大，但在这些年中很少有货币真正紧缺的时候，而且短缺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利率也没有上升，一般介于12%与15%之间，这是它们在16世纪30年代期间降至的水平。而且，这时的利率比从前要稳定得多。显然，货币的供给足以满足需求。由于资本积累使安特卫普能够承担这些新的重担，金融市场应该归功于自1499年以来40年中商业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但是，对于将这种资本调入这些巨大的贷方所使用的方法来说，有关政府应感谢那些他们越来越信赖的金融专家。

16世纪40年代在安特卫普的这些专家中，最伟大的是意大利人加斯帕尔·杜奇。他的一生是同时代大部分金融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他开始时当商品经纪人和佣金代理商，以这两种身份在安特卫普的几个贸易中心作了大笔交易，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金融业中。他主要在安特卫普和里昂之间从事业务活动，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外汇投机家。杜奇并不满足于以正常的利率差和汇率差来赚取利润。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在他的营业线的每一端交替营造货币丰歉的局面，让利率或汇率上涨致使自己能获利而使他的竞争者尤其是佛罗伦萨人破产的水平。他采用的方法的政治含义所引起的怀疑加剧了他的方法在那里

的商界中引起的强烈的敌对态度。因为安特卫普和里昂是互相敌对而且常常交战的政府的两个金融堡垒，而杜奇的活动超越了这一界限。然而，哈布斯堡君主政权很感谢这个只为自己无止境的贪婪和野心所动的金融丛林之王，主要原因是在整个16世纪40年代和16世纪50年代初期他维持了安特卫普的财力调动。杜奇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以尼德兰税务总局的名义发行而用其控制的税收作担保的公债。它们属于“无记名债券”，任何持有这些债券的人都可以将其兑现，因此很容易流通。在这方面，它们等于是商业债务证明书，153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使其广泛用作流通票据得到法律认可。杜奇所控制的是这样一些债券的定期发行，它们既可通过吸引小额资本来直接为政府服务，也可以通过把政府借款与商业借贷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间接为政府服务。在里昂，法国政府发行的“王室债务证”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受到16世纪60年代前后第一次大灾难的沉重打击的正是安特卫普的高级金融界。1557年，西班牙和法国宣布自己破产，3年后葡萄牙也这样做。对于已经借了巨款给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政府的银行家来说，这些打击非常沉重：他们眼见贷款被迫转为利息为5%的年金，这不仅意味着利息的大量减少，而且大量的资金只能分期偿还。但是他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政府破产之后紧接着是尼德兰的公共行政管理机构的破产，其中有税务总局和一些城镇，然后又是一大批私有机构：最近靠金融市场和投资景气而筹措的小额资本现在又把破产的影响扩散到各地。

金融危机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不会迅速或轻易就能恢复的冲击，然而它的前奏和伴随现象是金融界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但预兆更不吉祥的动乱。就时间而言，或许在重要性方面，第一个预兆就是作为永久机构的葡萄牙王室代理商行于1549年关闭。对采取这一步骤或产生的直接后果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香料贸易模式在保持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之后紧接着是20年的混乱和短缺。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欧洲可以直接从里斯本或从正在复兴的黎凡特贸易路线购进香料，而安特卫普就从操纵这一贸易的首要地位下降到与其他城镇，特别是地中海沿岸港口城镇同等的地位。有可能减弱葡萄牙对安特卫普的依赖的其中一个变化是东印度地区所需的白银可以轻易地从当时

由新大陆流入西班牙的主渠道中弄到手，而从前葡萄牙是在安特卫普购买产自德国南部的白银，这样，欧洲白银的供应量就更容易预知。或许另一个变化是同样的那些供应商乐意将其他金属运到除斯海尔德河沿岸以外别的地方。富格尔家族与葡萄牙王室代理商之间签订的为期3年的合同上包括大批铜制品的交货地点就定在里斯本。

对于英格兰布匹贸易来说，这些年也是重负的年代。自该世纪初以来，这一贸易稳定扩大，伦敦出口的布匹从1500年一年大约50000匹上升到16世纪40年代初的两倍于那个数目。从1544年起的货币贬值加快了这一贸易，于1555年达到顶峰，该年伦敦的出口总量超过130000匹。但是，那时市场的暂时饱和，英格兰物价的日益上涨，以及1551年本想降低物价采取的货币贬值，这三者同时造成的后果必然会严重打击这一贸易并使其在十多年中都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人为寻求新市场并想马上达到旧市场的水平所作的努力，以及针对外国（包括安特卫普本身）的竞争采取的措施的尖锐化，导致关系恶化，这在十来年内造成完全停止交易并且第一次将这一“集市交易”移至尼德兰以外。

正是安特卫普的贸易支柱遭到削弱，而不仅仅是对金融上层建筑的损害，才使这个“黄金时代”于1560年左右结束。摧毁这些支柱的大动荡还在后头——在1566年、1576年和1584—1585年，甚至在这些大灾难之后，该城还远未精疲力竭。的确，随着那些曾在黄金岁月大量涌现并获取了丰厚利润的外国人逐渐减少和离去，本地人得以重新显示自己的能力：于是，在1562—1565年间，建立了许多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做生意的安特卫普公司。但是，在超过这一意义上，安特卫普的作用自此以后注定仅是一种“本国的”作用。欧洲的政治和贸易大潮流曾使这个城市成为经济界的中心，而这种“本国的”作用则是回归到此前的地位。

（曾佑昌 译）

[1] 由于第一卷中没有论述过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章最好概括介绍一下农业结构的变化。

[2] 这里讲述的德国情况还包括瑞士和低地国家的发展情况，它们在这时刚开始脱离旧帝国。

[3] 分封地的做法受到大宪章的这条规定的限制：封地的剩余部分必须大到足以使授予封地的承租人能够履行他对君王的义务。法令*Quia emptores*以出售地块来代替领地分封，并规定：购买者不是向卖主而是卖主的主人——通常指国王尽该块土地附带的劳役义务并缴纳税款。

[4]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比利时史》，1923年版，第三章第三节，第271页。

[5] 同本节中别处一样，这里的“佛兰芒镑”这一术语的含意是合240格罗申的币值，不是指合40格罗申的币值，即查理金币，这就是造成疑问的原因。因此这里所给出的总数等于该记述本身所引总数的六分之一，再加德·斯梅特（De Smedt）在*De Engelse Natie te Antwerpen*一书第2卷第437、441页中已指出的未包括在内的对冒险商公司出口额的一个补充的估计数字。

[6] 拉斯特（last）：重量单位，约合4000磅。——译者

第三章 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迄至1529年）

乌得勒支的亚德里安在一封致查理五世皇帝的信中随便地称呼马丁·路德为无名之辈，这一称呼令人想起马丁·路德制造的事件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地平线上一片只有握紧的拳头般大小的乌云的时候，那时不可能相信他可能成为欧洲历史主要记事的旁注以外的内容。这一事件中有不折不扣的遥远因素。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出生在萨克森的埃勒斯本城，1546年2月18日死于同一城市。他一生大多数时候住在边陲小城维滕贝格。路德和伊拉斯谟不同，伊氏流动于牛津、卢万、巴黎、巴塞尔、威尼斯和罗马间，总是靠近拥挤地，靠近公路大干线，路德却只有三次出门，去过罗马、奥格斯堡和沃尔姆斯，而且只有数日，但他感受到了事物跳动的脉搏。

因此，路德与大多数人不同，他把握住了他所经历到的历史。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看看上帝想要做什么”，这句话是了解他的生活的一条线索。可是，遥远、孤立、被动等印象却使人产生误解。在思想和观念的领域存在着充满活力的、强烈的、猛烈的运动。当马丁·布塞尔责备维滕贝格的神学家们没有对“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一条诫命给予足够注意时，路德的回答触及了全部的真情：“我们是用笔杆子在履行这条诫命。”从这个小小的地方，路德发出的是巨大的思想武器，其速度超过对手，迅速传到基督教世界的各个角落，引起了下至村夫上到帝王的注意。人们聆听他的教导，接受了道的感染。在1520年至1560年间有16000名学生在维滕贝格听课，他们代表了传道的感化力，这种感化力有助于说明路德在德国进行的改革为何根基深厚，经久不衰，为何传播到了北欧和新世界。

新教的图案改变迅速，日益复杂，但作为其始因的路德的图案却是简单而原始的。他灵魂里发生的事影响了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给运动以猛烈的推动，给运动指明了方向，使研究中世纪后期的学者们不知所措，这些学者们十分熟悉反教权主义、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对

出现一个胡滕、卡尔斯塔特、闵采尔，甚至茨温利和再洗礼派并非没有准备。于是，在无法探索的心灵的王国，作为一名不落后于一个卫斯理或利文斯通的探索者和先锋，路德是使徒。我们在此关注的是路德早期的伟大著作，在通常未被认识到的更加深刻的意义上这些著作是“新教”出现的先导。

关于路德的家庭和学业，没有多少引人注目之处。在家庭和学校，他的父母和老师给他灌输了许多健全的认识，清除了许多糊涂的认识。汉斯·路德和玛格丽特·路德以一种毫不掩饰的骄傲来看待自己的儿子，而路德回报他们的不仅只是惯常的孝道。路德出身农民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他有农民的直爽、精明和固执。他爱好谚语表达的智慧，他的著作中这种智慧随处可见。他的家庭也许迷信而严肃，但他的幽默感却也是在那儿培养起来的。汉斯·路德历尽艰辛终于在曼斯费尔德的采矿业者中成了中富，有了一定的影响。他这个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的人以这种对学问的过分尊重，心甘情愿为自己天赋甚高的儿子受教育作出牺牲。路德在曼斯费尔德、马格德堡和爱森纳赫受的学校教育使他掌握做学问的工具，并打下了修辞学的基础，修辞学教育是中世纪从古典时期继承来的。1501年当曼斯费尔德的马丁·路德被艾尔福特大学录取时，他至少熟练而合格地掌握了两样他终生热衷的爱好——优秀的音乐和辩论的技巧。

艾尔福特是一座秀丽而繁荣的城市，塔楼和花园令人赏心悦目，艾尔福特大学，特别是法学院相当著名。艾尔福特是“新神学”——唯名论者对抗托马斯主义——的一座堡垒，大学的两位教师，特鲁特维特和阿诺尔迪，在通过比尔·加布里埃尔反映出来的奥卡姆主义的视角之内给了他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即使路德后来批驳了他们的教导，他仍对这两位老师心怀深切的感激之情，说实在的他在演绎推理和哲学方面得到的复杂精细的思维训练超过了他所认识到的，这应该归功于这二位老师。1505年，22岁的路德在17名获文科硕士学位者中名列第二，他转而攻读法学，准备实现父母的愿望。后来，他的父亲突然获悉他决定从事宗教活动并已被接纳入奥斯定会艾尔福特修院，因此大为震怒。如果路德在作决定前经历过思想的冲突，那么他的家人并未得到任何暗示，而对混乱的证据的评价最好不超出他自己说过的一些话：“我并非自由地或渴望地成为修士的……而是因为受到突然死亡的恐惧和痛苦的包围，我才迫不得已发了愿。”路德要是

当了律师，很可能是非同寻常地拙劣的律师，但他却有完美的天赋担任神职。

路德在加入圣奥古斯丁隐修会改革会时，他加入的是一个托钵修会，该修会在艾尔福特和大学有重要联系。新的世界富有吸引力且引人入胜，这位见习修士顺利而迅速地学会了隐修生活的规矩和纪律，学会了在单人小室祈祷和集体祈祷的方法。1509年9月，路德发了终生愿，然后准备接受圣职授任。他于1507年4月担任神职，一个月后主持的第一次弥撒对他是一次严肃而巨大的考验。

路德由于具备条件而被选拔继续深造，他在一所由奥卡姆派管理的大学重新开始学习。1508年，他被送往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准备将来在文学院任教，但他发现强制以亚里士多德为前提不合他的口味，因而渴望回到神学的研习。他成功了，在获得圣经学学士学位后回到艾尔福特大学，任讲授《神学全书》的讲师，讲授彼得·郎巴德的《神学意见汇编》。有人建议把奥古斯丁会在德国的住院派和严规派修院联合起来，这一建议引发了一场辩论，艾尔福特大学被卷入其中，路德被派遣到罗马呈交一份七所持不同意见的修院的请愿书。这是一次有趣的度假和虔诚的朝圣，他在罗马发现的是一派空谈，这预兆了因信称义教义的产生。对他看到的意大利神职人员的职业作风，他产生了条顿人的那种认真的反感，罗马这座城市有许许多多东西令不谙世故的人感到震惊，他便是带着这种反感和关于后者的混杂记忆返回艾尔福特的。1512年10月12日，他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而且几乎立即继承了其友人、庇护人、教区主教代理人约翰·冯·斯陶皮兹担任的维滕贝格大学圣经神学教授职位。

当时维滕贝格城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修建房屋和修道院的计划，因此路德是在一间极其简陋的临时性棚屋里开始其影响重大的布道生涯的，1514年他高兴地转移到教区教堂的讲坛布道。他获得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事务性的教会职务，其中最高者是1515年获任命的区牧，管理11座修院。但他主要的工作是授课。近年来编辑并出版了路德的授课材料，这是现代学术的一项伟大成就。这些讲义有：彼得·郎巴德的《名言集》（1509年）、《诗篇》（1513—1515年）、《罗马书》（1515—1516年）、《加拉太书》（1516—1517年）、《希伯来书》（1517—1518年）。这些文献中有的是路德的原稿，宽阔的页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细小而整洁的注释，对这些文献的研究表

明，路德神学的许多要点形成于赎罪券之争以前，不可以再被认为是教会斗争的理性化或为教会斗争而临时拼凑出来的东西。

对路德关于自己的修道院生活的记述的真实性，有名望的史家们再也不怀疑了。他遵守规章，以特有的全心全意踏上了通向《新约·圣经》所要求的完善的道路。有一段时间一切都顺利，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精神潮流之中，把他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教会有许多预防这类苦恼的措施：可以缓和修道院的纪律；可以研读道德神学；随时随地可举行圣事，可得到老练的忏悔神父的忠告，有圣典可消除疑虑。路德从这一切找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但得不到永久的解脱。他教授的全部内容从最好的方面估量也不能支撑一个战栗的心灵。关于补赎的教导已经开始不适当地强调外在的苦行赎罪的行为，以至当斯陶皮兹向路德指出“基督的伤痕”是内在的悔罪的真正方向时，他指出的是一种有益的平衡力。奥卡姆派在自由意志和善功的教义范围内关心保护上帝和人类的选择自由，这种关心是对意志的大力强调。一个人可以出于自己的道德力量而有爱上帝之行为；对那些行了自己内在的善的人，上帝是不会不赐给恩典的——这是一种路德由于对反驳（*Anfechtung*）^[1]的体验（一个在上帝之愤怒下陷入困境、受到谴责、孤独的人感到的绝望的有罪的孤立）而被永久清除了的强烈的乐观主义。奥卡姆派承认没有[得救的]把握，这一令人困惑之点是区别真爱上帝还是假爱上帝的试金石。然而，路德感到不安，他的信念、他的令他痛苦的认识的根子正在这儿——他的信念是爱上帝必须是自由的、喜乐的、不受限制的，他痛苦地认识到，就他自己的情况而论：“我的隐修生活不管怎样无可责备，我仍感到在上帝面前（*coram Deo*）自己是个罪人，良心极度不安，我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苦行赎罪感到满意。对这个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我不爱，毋宁说我恨。”

这里，他对《圣经》的研究增加了他的苦恼。《圣经·新约》中的《罗马书》开宗明义地宣布上帝之义（*justitia Dei*）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宣布似乎是最后一根稻草。从奥古斯丁时代起便有人根据赐予罪人的救恩对这种上帝之公义加以阐释，这一事实路德实际上不知道。后期经院哲学家们发展出一套关于上帝之属性的逻辑论证，以至加布里埃尔·比尔总是用“怜悯心”（*misericordia*）代替上帝之仁慈，用根据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圣经来想象的“正义”

（*justitia*）代替上帝之积极的惩罚的正义。根据圣保罗，这不仅是由律法而且由福音本身显示出来。这就把路德推向了最后的绝望以至他希望自己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把他推向了公开亵渎这个可怕的罪的边缘。

然后，奇迹发生了：当他在解经学研究中思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经文并了解到上帝之正义必须“消极地……”解释为“仁慈的上帝借以因信而称我们为义人的那个东西……此时我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通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天堂本身”时，他找到了安慰。我们不必讨论深深地埋藏在摆在他面前的《圣经》材料中的东西是否新颖。正如罗尔茨所说：“对他来说这是新的。”假如证据没有留存下来，我们就应该发掘像这样的证据来解释因信称义的教义对路德何等重要，解释此教义在后来的新教的议程上的重要地位。

近来的研究试图确定这一思想在路德早期的讲稿中出现在何处。有学者提出路德继承的涉及多方面的圣经解经学也许帮助了他。因为通过首先根据“字面上的先知的”意义（即根据基督论），然后比喻地根据上帝在灵魂里的工作来解释“正义的上帝”，一种通过由信所领会的基督的工作来解释“正义的上帝”的混合解释方法便近在手边了。我们可以提议路德在讲解《罗马书》（1515—1516年）前已经解决了他个人的冲突似乎是可能的，从而缩短一场未结束的讨论。^[2]无可否认，1508年至1518年间路德的讲义显示他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如果在关于彼得·郎巴德的讲义中所作的教义评述主要是传统的，那么显然有一种对哲学，特别是对“那个腐臭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侵入神学的强烈的仇视。还有使教父们的基本教义摆脱维格诺兹（Vignaux）称之为后期经院哲学的“外壳”的东西的积极尝试。16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声音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或反宗教改革家的声音，而是圣奥古斯丁的声音，而路德对他的热情在这些早期讲义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虽然对他从不是不加批判的。目前关于奥卡姆主义的研究日新月异，因此对路德和奥卡姆主义，路德熟知的一种经院哲学的关系只能试探性地论及。这里可以提出三点。第一，就像加布里尔·比尔，路德并不受惠于奥卡姆的反教皇著作。第二，路德的因信称义教义，他对“归因”和“不归因”概念之使用是在基督中心论的框架内，和中世纪后期在上帝之“无限的”和“规定的”权柄的辩证关系内来讨论这些概念大相径庭。第三，路德受的唯名论教育，尽管他激

烈反抗，一定对他的思维方式的潜在倾向产生了影响，引发问题并暗示他的许多思想的方向。

路德关于《诗篇》的第一批讲义是材料的大量堆砌，经院哲学的成分和经改造的奥古斯丁主义并存其中。但更为重要的是显示出他以《圣经》为中心的倾向在发展，因为任何对路德的阐释，如果未能考虑到整部《圣经》材料而不是一些精选的教义或心爱的书信在形成路德神学的规范性要素中所达到的程度，都不可能是公正的。后来的关于《罗马书》的讲义更加紧凑，更加感人得多。这里保罗的主题引发了对人类困境的描述，罪是在人类身上的一种影响及于整个人的内在的不安定的酵素，是一种伪装成壮观的偶像崇拜的自我中心，但当活生生的上帝在审判人的反叛和骄傲中面对人时，罪便暴露“在上帝面前”。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没有人类的、固有的义能够保持不变，但上帝准备了另外一种义，即通过他的儿子作出的拯救，通过信来领会的慈悲和宽恕。而信并不仅仅是理智、感情，或意志的气性所进行的活动，而是整个的人对亲身为活生生的上帝所遇见作出的反应。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在上帝那一方面，它是出于纯粹的、不受约束的、自由的慈悲——人找到了其新生活、爱上帝和邻人以及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由的源泉和动机。这种称义并不在某个开始阶段或在某一次独特的经验中结束与完成，而是基督徒从罪到完善的运动永远不变的参照标准；路德把这运动总结为下面这句伟大的名言：永远有罪，永远悔罪，永远称义。

1516年路德阅读了陶勒的著作，还读了《日耳曼神学》。这些书加深了他对罪的自我中心性质以及基督徒和基督的谦卑和苦难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强调。这“十字架神学”，连同它和经院哲学的思辨“荣耀神学”，是他以后讲授《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的讲课的一个着重点。在这些年里，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了律法和福音的辩证关系，在此种关系中罪人通过“基督的非常的工作”，通过对律法进行谴责，被带领入“上帝自己的工作”的领域，从而由于上帝之慈悲而得救。到1517年中期时，路德已经把维滕贝格变成了重新确定了方向的神学研究的中心，而且他可以谈论“我们的神学”了。他甚至能够打算把运动扩大到其他大学，送一份反对后期经院哲学家的《九十七条论纲》到艾尔福特和纽伦堡，这是一次当时还没有考虑到的冒险挑战。麻烦迅速从一个没有料到的地方发生了。

基督徒的悔罪涉及一个古老而艰难的问题。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行动间、理论和实践间、进行教育的教会和对俗人的教育间的恰当平衡。到16世纪开始之时，在涉及特赦制度方面这些脆弱的调节机制已经被打乱。特赦原先是属于补赎圣事的苦行赎罪行为的代偿。在中世纪早期，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中接受补赎圣事者引进了一种世俗观念，该观念夸大了通过付钱代偿道德过错的可能性。在十字军时期特赦范围为财政困难极严重的教皇所扩大。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300年实行的大赦大获成功，后世的教皇对此不可能予以忽视。该制度在圣徒相通，在功库的思想中找到了解释。黑尔斯的亚历山大对此加以了阐述，克雷芒六世1343年发布的诏书（*Unigenitus*）断言“基督为教会的战斗者获得了一座功库”。147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把特赦的范围扩大到炼狱里的灵魂，这一教义要求敏锐的神学判断力，开辟了歪曲和滥用的不祥的可能性。关于许多尚未界定之点，难以预料之处甚多，许多天主教道德主义者对赎罪券表示怀疑，而一些天主教统治者对这整个事情持不信任态度。到16世纪开始之时，赎罪券已成为教皇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银行家族富格尔家族的监管之下，涉及各级教会的中间人如此之多以致发生令人作呕的丑闻决不是遥远的事。

1513年，勃兰登堡亲王阿尔贝特当上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兼哈尔伯斯塔特主教教区行政长官，时年23岁，在以后的年月他又当上了美因茨大主教和日耳曼首主教。由于这[权力的]积聚欠下的巨额费用包括一笔欠富格尔家族的债务和一场财政危机，阿尔贝特同意在他的土地上颁布发行用以重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新的赎罪券才解决了危机。诚然，美因茨的阿尔贝特和教廷之间的这一秘密安排直到教会斗争已完全开始才广为人知。赎罪券之争的直接原因是一件简单的事：多明我会代理主教约翰·泰泽尔在维滕贝格附近布道。这件触及人的良心和涉及得救希望的事，这件现在成了财政上获取利益的工具的事，竟然引发了使欧洲的统一解体的连锁反应并非偶然。与其说萨克森的智者腓特烈禁止在他的领地上出卖这东西不可归因于他对此感到义愤，毋宁说相反。在过去几年他在维滕贝格的建设上花费了巨资，该城的城堡和教堂由包括丢勒和克拉纳赫在内的德国最杰出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设计，是富丽堂皇的哥特风格的火焰式建筑。城堡的教堂是大学的机构，一边和大学紧相连，另一边则是周围的教区。但决定其外观的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腓特烈收集的大量圣物，1518年时达17433件，陈列在

沿巨大中殿修建的12个陈列室里。这远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博物馆，因为在这儿向接受补赎的观光者颁发赎罪券，其时效超过10万年。腓特烈不准泰泽尔到他的领地，其动机是他耿直地决定不让萨克森的钱外流，禁止和当地他自己的神殿竞争。

给代理主教们的指示和赦罪证书似乎总是措辞审慎。但毫无疑问，泰泽尔的布道造谣中伤，对虔诚的人来说不堪入耳。关于这些事情的最有力证据是他的朋友后来和他断绝往来。路德本人长期以来便对赎罪券感到不安，而现在当他的堂区信徒从数英里外的采尔布斯特和于特博格带着赎罪券归来并在他面前挥动时，他被激怒了，因为这些信徒完全误解了赎罪券的真正意义。泰泽尔的阐述会使当时许多道德主义者感到震惊，但对路德的冒犯却深入骨髓，因为它们触及他高度敏感的一些信念——赎罪大得惊人的代价和真心悔罪具有引起巨变的内在性质。他选择了万节前夜提出抗议，这时的维滕贝格挤满了朝圣者；这说明他不怕直捅这个道德的中心地。意义重大的是，他写《九十五条论纲》进行争论，其“愿望和目的是阐明真理”。《论纲》用拉丁文写成，显然不比他驳斥经院神学家的论文引人注目。但因为《论纲》触及教会政治，所以他写了一封附信和一份《论纲》一道呈送给美因茨大主教阿尔伯特；他俯伏在地祈祷，请求上帝在这场冒险中支持他。1517年10月31日大约正午，他步行穿越维滕贝格城区，把巨幅《论纲》招贴张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大体而论，《九十五条论纲》并不是革命性的，有些条是以争论的方式表达了仅仅是试探性意见的东西。然而其中有对路德所谓的“我们的神学”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中有“我们的主希望信徒的整个生活都是悔罪的生活”，第六十二条中有“教会的真正宝库是上帝之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这样的文句。

这时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路德的《论纲》被译成德文刊印，迅速到处流传。他对此感到惊恐，于是着手认认真真撰写一篇长文为之辩护，呈送一份给他的教区长勃兰登堡主教，并附有一封极其恭顺的信。但美因茨大主教阿尔伯特已经把《论纲》寄往罗马并要求对路德加以约束；1518年2月，代理行政长官、奥古斯丁会修士加布里埃尔·德拉·沃尔塔给斯陶皮兹下达了大意如此的指示。威胁着路德的更加公开的危险来自多明我会。该修会气势汹汹的恐吓暂时使奥古斯丁会紧密团结起来，1518年在海德堡召开了修士大会，这是

路德本人的胜利。然而，在以后的数月间路德的处境开始充满危险。他也许把自己得以幸存归功于斯伯拉丁的坚定友谊，斯伯拉丁（1484—1548年）是选帝侯腓特烈的图书馆馆长、秘书兼附属教堂牧师。腓特烈的信仰、忠诚以及利益肯定为路德的抗议所冒犯，他竟然没有采取抛弃一个自己从未谋面的教授这一极其简单的步骤实在是历史上不可预测的事件之一。

1518年10月，路德被召往奥格斯堡，和宗座代表、多明我会总会长卡叶坦红衣主教进行了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谈。卡叶坦是杰出的托马斯主义者，他坚定的正统思想当时并未显露出他的主张在晚年会发生伊拉斯谟式的崩溃的任何预兆。按得到的指示，他要求路德立即撤回自己的主张，将来不得再提。当这两位神学家，一位守旧，另一位具有现代思想，为“宝库”一词在诏书（*Unigenitus*）中的含义开始激烈争论时，立即解决这一事件的努力便宣告失败。路德找到了一个漏洞由下述事实可以看出：会谈一结束卡叶坦便向罗马寻求并获得了一份关于赎罪券的措辞较为含混的声明，即教皇在1518年11月9日的教令（*Cum Postquam*）。但路德已不是对辩论点加以补救所能挽回的了，也许第一次某个掌握权力的人认识到这位眼窝深陷、滔滔善辩的修士不只是一个固执的道德主义者。会谈不欢而散，然后是一段预兆不祥的暂时的平静，路德的朋友们催促他逃离奥格斯堡城；他回到家乡，接着卡叶坦便发来一道愤怒而轻蔑的命令，要求把这个小人交出来。

路德的忠诚感情到现在已经有些勉强，并受到公开侮辱；虽然他主张公会议理论时间非常短暂，但他在奥格斯堡时就已强调了公会议具有更高的权威，并于1518年11月28日起草了一份正式的呼吁，要求将来召开一次公会议。现在，他等待被捕或流放。危机在12月1日降临，当他在参加告别宴会时便来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催促这位学者赶快上路，第二道却要他暂缓离开。事实上他后来又留在维滕贝格28年是高层政治人物干预的结果。12月8日，腓特烈给卡叶坦发去一份态度坚决的回信：他无意把路德送往罗马受审，或听任他未经至少某种形式的审讯就被关押。这时正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取腓特烈的好意的时候。因为腓特烈是帝国七个选侯之一，他本人也是皇帝候选人之一。皇帝想确保其孙子查理继承帝位，而欧洲其他列强对出现一个其统治权自查理大帝以来无与伦比的皇帝的前景大感惊恐。马克西米连皇帝于1519年1月22日驾崩，查理五世6月末在法兰克福当选为皇

帝，其间教皇极其需要腓特烈支持，以至让他的特使查理·冯·米尔蒂茨采用新的安抚战术。但这种战术，从教皇的观点看，除浪费时间导致灾难之外一无所获。因为随着宝贵的时间这样一周周地悄悄逝去，路德事件可望平息下来的最后历史时机错过了，革命即将爆发。现在，各种力量已处于躁动之中，以至教皇和皇帝准备采取一致行动之时，他们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股全民对罗马发泄怨愤的日益高涨的骇人浪潮。

当奥古斯丁会修士们，包括斯陶皮兹在内，开始变得冷漠超然时，大学坚定地支持路德。随着菲利普·梅兰希顿（1497—1560年）的上任，神圣语言的学习大大加强，梅兰希顿是青年平信徒，罗伊希林的侄孙，可算得上一个天生的奇才。

安德烈·博登斯泰因·冯·卡尔斯塔特（1477—1541年）是路德上大学时的高班同学，“传统神学”教授，正在努力沿着城堡教堂的教阶等级往上攀登的在俗神职人员。他开初持怀疑态度，后来屈尊俯就突然成为比路德还要赤诚的奥古斯丁会修士，这正是此人的特点。因此，当难对付的因戈尔施塔特的神学家约翰·冯·埃克（1489—1543年）散发他谴责路德的小册子《方尖塔》时，卡尔斯塔特热情地投入了捍卫自己不在的同事的活动，为此他写了《三百八十条论纲》，后来又补充了二十六条。结果，这两位神学家陷入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著名的1529年6月在莱比锡举行的辩论。主要的辩论仍然在埃克和卡尔斯塔特之间围绕恩典和自由意志这个主题进行。但路德一直是真正的目标，并终于获准参加辩论。预备性的小争论再次提出了教皇的权力问题，而路德近来开始深入细致地阅读教会法规和教会史，通过这些阅读他不久便越过了公会议权威更高的立场。莱比锡辩论是埃克个人的胜利；埃克年纪较轻，他虽然单枪匹马对付路德和卡尔斯塔特，但却使后者显得滑稽可笑，诱使路德陷入危险：路德看来是在攻击伟大的德国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并被怀疑同情胡斯派。这次辩论引起了对比赎罪券更广泛的问题的注意，并加速了小册子之战的发生。同时也迫使路德检查自己过去所言所行的含义。然而，即使到现在教廷的行动仍然犹豫拖延。路德的案子仍然杂乱无章。科隆大学和卢万大学审查了路德的一卷本著作，佛罗本纽斯在巴塞尔出了该书的一种版本，从其中的神学论文和早先的文章中整理出对路德不利的四十一条，这四十一条后来收入1520年6月15日发布的教

皇诏书中。不过该诏书断章取义的引文因为路德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的言论而很快过时。

路德现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写作活动。一项新的事实进入了局面：这位遭受谴责的神学家也是写作天才，他使用本国语之流畅前无古人；他的写作天才表现在潮水般涌现出来的短文和小册子中，这些作品时而以论战的辛辣令人震惊，时而又充满喜剧性，令人捧腹，但他的教诲性作品也表现了其写作天才，这类作品把深刻的直觉真理、温柔的美和畅达的简朴熔为一炉。就这样，在基督教世界一个难以到达的角落，在一位势力强大的王侯的保护下，有他的大学的热情支持，有德国学术界的同情，有为他说话的王侯、骑士、商人和农民作为强大的同盟，路德再也不孤立，他迅速成为国民对罗马的反教权主义的愤恨象征。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开初对路德是热情友好的。随着莱比锡大辩论引起的激动逐渐平静下来，随着对路德的指控继续进行，他们变得较为缄默，1520年教皇发布的诏书和路德的激烈反击分裂了他们的队伍，许多人从支持路德的立场退缩。热度的变化可从伊拉斯谟的著作中看出。然而在此时他仍存充当调解人的希望，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路德谈论过许多紧迫而有益的事情。在1520年11月与智者腓特烈在科隆进行的一次著名会见中，他用一句措辞精辟的话把要他明白裁定的要求搪塞过去，但意义重大的是他没有用他的巨大威望来反对这位改革家，而且选侯认为路德应该有申辩的机会的决心加强了。

对于正式的谴责，路德的回答是公开蔑视。1520年夏季，他写作了三篇革命宣言。第一篇宣言是《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就对舆论的影响而论数这篇文章最大，同时也很能迎合国民的骚动情绪。就形式而论，该文是有缺陷的，因为文章逐渐演变为列举已经广泛表达了牢骚和补救办法，但单纯的激情和直爽的大胆足以弥补这些缺陷而有余。三条主张像三道护墙般保护着教皇的专制：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典；只有教皇有权召开公会议。针对过分自信和傲慢的教权主义，路德求助于所有基督徒都是其成员的基督教的根本等级。他正是凭借一切信徒皆为祭司这一教义向德国的基督教行政长官们发出了呼吁。因为在这场危机中，宗教权力如此长久而固执地拒绝自我改正，行政长官们便可凭上帝给予的职权，代表全体信徒进行正当的干预。

第二篇宣言是《教会的巴比伦之囚》，用拉丁文写成，是写给神职人员和知识界的。文章直接抨击了神职人员的权威和威望起源于礼仪和圣事的教义。路德把圣事从七种减少到三种，即补赎、洗礼和圣餐。他对不让平信徒领杯、变体论、弥撒的献祭作用加以痛斥。这些都是大胆的举动，对胆怯或保守的人的震撼比路德过去所写的任何东西都大。第三篇宣言《论基督徒的自由》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篇劝诫性的文章。从某些方面看，该文是对他的优秀布道文《论善功》的补充，它探索了因信称义的宗教含义和道德含义。但正如其标题所表明，主要强调基督徒之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喜乐的和创造的性质，这种自由通过对上帝之出于爱的顺从以及服务邻人表现出来。善功不是教会施行的技术性活动，而是信仰的果实，善功源于信仰。《论基督徒的自由》属于最初两篇宣言，不仅从其写作日期来看如此，而且从它说明了路德的方案的完整性——说明该方案不只是出于义愤的道德主义或反教权主义这一事实——来看也是如此。路德在讲堂上、修道院的单人小室里、布道坛上制定的教义，他以切利尼式的激情在他自己在受试探的烈火中锻造出来的这些教义，并不是脱离我们可以称之为1518年至1520年间即兴创作的实用文章的某种东西，而是构成所有这些文章的基础低音的东西。这些是1520年的大事件。12月，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埃爾斯特門莊嚴地焚燒了教會法，後來他又把教皇詔書投入火中，這是象征已經更有力地表現在寫作中的蔑視的姿態。1521年1月3日，教皇發布了最後一道詔書（*Decet*）將路德革除教籍。

在查理五世統治期間召開的第一次帝國議會上，這位新登基的皇帝面臨着錯綜複雜的體制問題和經濟問題。他必須小心對付，這就是教廷大使吉羅拉莫·阿萊安德未能阻止路德出席沃尔姆斯帝國議會的原因。阿萊安德（1480—1542年）是人文主義者，後轉任外交官，從前是伊拉斯謨在威尼斯的朋友。至少他對形勢的嚴重性不抱任何幻想，他發往羅馬的急報試圖震動教廷，使之認識到這兒發生的危機不僅是德國的而且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危機。讓路德出席帝國議會可能成為一則災難性的廣告，無論如何意味着教皇對他的譴責不夠。然而，阿萊安德又是收買，又是懇求，再加上慷慨陳詞都無濟於事，儘管下述情況確系事實：隨着時間的臨近，皇帝的謀士們變得忧心忡忡，做了點努力想把路德吓跑。路德的朋友們也試圖阻止他出席會議，不過就像往常一樣，他們想使他鎮靜下來的意圖適得其反，以至當他們越來越愁苦時，路德反而越來越高興，並對他們的恐懼報之以

安详宁静的信心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当1521年4月16日上午他步入沃尔姆斯的街道时，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长列队伍，他们不是从屋顶上窥视他的无数魔鬼，而是一群对路德大声疾呼同情的德国人，对此种情况阿莱安德愤愤不平，抱怨不已。

第二天下午，路德出现在拥挤的与会者面前。情况很可能是他对将发生什么事情一无所知，而发生了的事情却使他感到很窘。几乎就在他弄清自己的处境前，帝国骑士团首领乌尔里希·冯·帕彭海姆用严厉的声音命令他在得到说话的命令前不许说话。他面前的一张方桌上堆放着一大堆书：收集到的马丁·路德博士的著作。向他提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他是否承认这些著作是他写的？他是否愿意收回它们？阿莱安德是否设法使路德的“听审”降低到这一令人苦恼的最后通牒不得而知，但路德感觉到了自己处境危险。片刻间一切都可能结束，他可能被撵出议会，有声有色地履行他对选侯的诺言，这样后来所有的戏剧性事件都可以避免了。当他要求给他时间考虑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微弱无力，局促不安；议会为他而休会，这引发了灾难。

第二天发生的事件超出了阿莱安德最严重的担忧，将留存在欧洲人的记忆中。在一间更大却更拥挤的大厅里，观众因几个小时待在污浊的空气里而躁动不安，在闪烁的火把照耀下，路德站在帝国最高权威面前，面对青年皇帝查理五世那苍白、严厉、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而他最近才面对面向日耳曼帝国的基督徒贵族发出强烈呼吁。在路德和帝国官员约翰·冯·埃克之间似乎有过口头交锋。然后路德回答问题，他说对他的著作他必须区别对待。劝诫性的作品他不应该，也不必收回。针对教皇专制的著作，他不能收回。他针对个人的争论性文章中有情绪上和表达上不合适的东西，为此他愿意道歉。然而，即使在这些文章中也有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也是他不能撤回的。可是——在这里他巧妙地把问题扔给了对手，要让他们用令人信服的理由或以《圣经》为依据说服他认识错误，那时他愿意高高兴兴收回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他干得太漂亮了：被迫回答问题，他却成功地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许多人来说他借助于主动提出收回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其讽刺意味他们也许没有领会到。那位帝国官员尖锐地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许有棱角”，但路德迅即报之以无情的蔑视。他不愿意撤回，“因为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愿上帝助我。阿门”^[3]。在一定的混乱中，皇帝让他离开，

于是他穿过一群气势汹汹的西班牙人，到了他的德国朋友一边，感到了安全。

路德出了庭，但几乎不能说他得到了听审。当一队队武装骑士带有威胁性地在附近出现，当一夜之间便听见了农民的喊杀声时，“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便不能由当局根据严格的法律上的功过来加以讨论了。路德被给予他长期徒劳追求的东西：和友好的讯问者们进行真正的讨论，现在这批人中有特里尔大主教。也许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随随便便地考虑过路德可能在政治上有用处，可以用作一场争取召开一次日耳曼公会议的民族运动的喉舌，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使他回到公会议的立场上来的尝试也许不仅只有叫人高兴的合理性。无论如何，讨论在这一点上，在公会议是否可能有谬误上，当路德拒绝在这时妥协从而撤回其态度坚决的蔑视时，讨论破裂了。

皇帝将尊重安全的处理方法；无疑他不会食言。无论如何，处决胡斯后发生的全国性起义是德国的诸侯们这些月来牢记在心的事件，这一事件劝他们小心为妙。路德被告知在20天的期限未到之前离开此地回家去。他按要求和他的伙伴们一道撤离，穿过他的故土静悄悄地向家乡行进。突然他消失了，最荒诞的谣言开始流传。直到后来许久人们才知道路德在他的诸侯的默许下被绑架了，朋友们把他从那人数不多的护送队中拉了出来，穿越森林把他送进了一处安全的堡垒。

路德现在被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在路德被打发走以后由残余议会通过的帝国敕令的激烈措辞是阿莱安德的杰作。沃尔姆斯敕令后来成为天主教诸侯的一种号召力，尽管其直接影响被迫使查理在以后的10年中离开德国的政治事件所削弱。它的阴影终生笼罩着路德。然而，路德公然违抗了教皇和皇帝，他在有生之年写了80卷对开本的书讲述这不平常的经历。路德说：“是道做成了这一切；假如我有意挑起事端，我本来是能够给德国带来大流血的。对了，在沃尔姆斯我本来能耍一点小小的花招，以至皇帝也不得安全。那会是什么呢？是恶棍的游戏。我把一切都交托给道了。”虽说如此，绑架路德这一事件本身是政治势力的干预活动。在以后的数月中，路德说服了美因茨的阿尔贝特通过更大的宗教讹诈撤销了在哈雷出售赎罪券的计划。运用权力、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权力，仅仅才开始。

路德在瓦特堡的城堡中得到了他极其需要的休息。但是突然的松弛，不常有的丰富膳食，加上孤独给他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疾病，一系列的被试探。不过他不久又开始写作——评注《诗篇》第六十八首，写“圣经评注”，写他擅长的《圣经》中的礼仪部分的评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从《新约》开始迈出了翻译《圣经》的最初步伐（和梅兰希顿合作修订的《新约》[德文译本]第一版于1522年9月出版）。在以后的有生之年，他不断加以修改，争取到许许多多合作者，因为他从来就认为翻译不是一个人能胜任的工作。但他的天才在翻译上显露无遗：他对大众语言有直觉的认识，他本有根基深厚的简朴文体，他有在《圣经》世界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个译本由于其质量卓越而大受欢迎。虽然他远离自己的藏书，但就在此时他仍写出了他最出色的辩论文《驳拉托姆》（*Contra Latomum*），该文是他阐释使人称义的信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章。

除了描述路德在流亡中取得的这些积极的成果外，还必须谈谈维滕贝格的形势，虽然路德不在该城，但改革的势头依旧。在路德的追随者看来，有一些实际问题要解决：对教会里的滥用职权怎么办？宗教职业又如何？许愿弥撒、圣坛、圣像怎么办？守斋、两种方式的圣餐礼、神职人员独身又该如何处理？1521年，卡尔斯塔特应邀去丹麦帮助规划那儿的改革，但该国的运动流了产，他感到灰心丧气，带着一套改革方案回国。现在，他在维滕贝格采取主动。为了阐述自己的激进方案，他写了无数篇论文，大量小册子（“印刷于基督教之城维滕贝格”），经常布道，起初在他任领班神父的城堡教堂，后来在他无权在那儿讲道的堂区教堂路德的讲坛上。

温和的方案和激进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重叠，区别仅在方法上和选定时间上。1521年秋，路德开始用拉丁文写作《论隐修誓言》和一篇短文，用德文写作《弥撒之滥用》，当斯伯拉丁阻碍它们的出版时他甚感愤怒。10月，大学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对改革加以研究，但菲利普·梅兰希顿和城堡教堂的主持神父尤斯图斯·约纳斯缺乏领导才干。梅兰希顿最近撰写了《神学精义》，这是一本论述之清晰预示着灾难的纯教义便览，路德欣喜若狂地加以赞扬，但梅兰希顿的才干在于学术，他对处理事务没有多大热情，而且在危急关头常常惊慌失措。卡尔斯塔特控制着市议会。12月初发生了反对圣像崇拜的骚乱，学生使全城处于大混乱之中达36小时。朝廷为之惊恐，部分原因是他

们给乔治公爵以催促在萨克森各国强制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的借口。12月19日，卡尔斯塔特宣布他打算在元旦举行圣餐礼，用两种方式让信徒领圣餐，但他认为提前实施这一创新是合宜的，所以在圣诞节那天，他让平信徒领了酒；主礼仪式时他没有穿法衣，采用拉丁仪式，但省略了其大部分。这时他宣布和一位16岁的女士安娜·冯·莫豪订婚。然后从波希米亚边境来了一批茨维考的先知，他们年高德劭，留着胡须，外表简朴。他们动人地谈到惠赐给他们的上帝之谈话和天堂的异象，梅兰希顿和约纳斯大为感动，同时着了迷的卡尔斯塔特开始讲授《玛拉基书》和《泽迦利亚书》，不久他便夸口说关于梦境和显圣他所讲述的，维滕贝格大学的任何教师都不能与之相比。

现在出台的《王侯之城维滕贝格应有的宗教仪式》是市民和大学师生联合行动的结果。它试图推行一项温和的撤销圣像的计划。更重要而且也是有价值的先例是开始实施济贫法，采取对付身强力壮的乞丐的措施，建立一个工匠们可以由之获得低息贷款的公共金库。1月6日，在与路德取得联系后奥古斯丁会修士大会在维滕贝格召开，会议决定凡感到被迫这么做的修士可以离开修道院。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卡尔斯塔特制定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神学和伦理学，是《圣经》、极端奥古斯丁和神秘主义的混合物。在路德用《圣经》里的“信仰”概念之处，卡尔斯塔特用最高的德行“平和”——灵魂在完全的自我克制中的奉献。在路德使用律法与福音的辩证关系的地方，卡尔斯塔特则保留奥古斯丁的字面形式和精神实质的二分法。在路德为一般性的事物，为基督徒的自由，留出大量空间的地方，卡尔斯塔特则仰赖清教主义的和《旧约》的律法主义，这种律法主义坚持圣餐礼有两种方式，用本族语举行仪式，谴责一切圣像，甚至谴责唱诗班和教堂音乐。他不久便代表单纯的福音宣布放弃所有纯理论区别，为可以称之为“一切祭司皆为平信徒”的教义，他把自己描述为“新平信徒”，赤足在室外行走，戴农夫的阔边帽，称自己为“安德烈兄弟”。

由于两件事他在维滕贝格的运动宣告结束。首先是大学当局敌视他。然后是1522年3月路德回到维滕贝格，他的回归影响重大。路德中止了躲藏，他在其书信中最著名的一封里向选侯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他安全抵达维滕贝格，老天爷也因为乔治公爵的大败而没有威逼他。在过去数月间他穿着俗人的服装伪装成“容克贵族格奥尔格”，现在

他脱下了这套服装，故意穿扮成奥古斯丁会修士（他的改革的整个方法受到检验）在堂区教堂讲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道。他把市民从平信徒的清教主义争取回来，回到了保守的改革上来，而他是靠讲道取得这一成绩的，因为他之所以战胜卡尔斯塔特仅仅是因为选侯支持他的党派路线这一看法并不正确。再一次他把真正宗教的内在性，把道战无不胜的大能——一道通过获得内心的赞同而赢得整个的人，把尊重软弱的兄弟的良心、以爱来对待他们的必要性摆在了听众面前。

路德拒绝卷入德国骑士们的反教权主义的战争计划，并回绝了其领袖乌尔利希·冯·胡滕和弗朗茨·冯·济金根提供的帮助。他认为向神职人员发动战争就是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但骑士们发现特里尔大主教身上毫无女子气和儿童气，在兰施图尔的灾难后骑士们的政治权力，在较美满的情况下本可能成为德国体制上的混乱中一股起稳定作用的力量的东西，才宣告寿终正寝，在那次灾难中济金根丢了性命，胡滕遭流放。1532年，皇帝开始在他继承的领土上积极迫害改革派，第一批殉教者是两名荷兰奥古斯丁会修士亨利·弗斯和约翰·冯·埃斯。

在维滕贝格，布根哈根（波梅拉努斯）的到来不只弥补了卡尔斯塔特的变节造成的损失，他的伟大才干先运用于维滕贝格，后来用于在整个北欧组织教会。因为到1523—1524年时，通过路德的朋友和门徒宗教改革已经扩散到德国许多城市：朗在爱尔福特，林克在阿尔滕堡，布伦兹在施瓦本哈尔，米科尼乌斯在哥达，阿姆斯特多尔夫在马格德堡，奥西安德尔在纽伦堡推动改革。其他人较少受维滕贝格的约束：布塞尔和卡皮托在斯特拉斯堡，布劳雷尔在康斯坦茨，奥科兰帕迪乌斯在巴塞尔，茨温利在苏黎世活动。激进派也不乏门徒，卡尔斯塔特的学生赖因哈特和韦斯特贝格活跃于科隆和耶拿。路德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和著作主要涉及正在出现的福音派教会的实际问题。他的短文《论教会圣礼》（1523年）对公共崇拜仪式提出了建议，按这些建议固定的读经和惯常的讲道恢复了宣道的应有地位。他的《弥撒经与领圣体》（1523年）是一种拉丁仪式，除了删除了主要部分这一点外，是保守的。直到1525年才在维滕贝格举行了德语弥撒，路德的《德语弥撒》于1526年出版。到此时，在许多城市，值得注意的是闵采尔在阿尔斯泰德和茨温利在苏黎世，都举行本地语仪式，而在施瓦茨·特奥巴尔德的仪式1524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现以后，在马丁·布塞

尔的指导下在该城迸发出一连串礼仪试验。路德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赞美诗，向1523年殉教的两位荷兰人表示敬意。路德证明是杰出的赞美诗作者，在众多优秀作品中，他的“*Eyn' feste Burg*”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社会的动荡在萨克森加剧了改革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德国找不到可和英格兰诸郡的骑士、缙绅和自由民、治安法官相比的人群，这些人可以承受在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中间部分的应力。在诸侯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和令人痛苦的冤屈，而纠正的机器，笨重且常常随心所欲，不能够跟上经济革命的步伐。宗教改革本身对普通人产生了无可否认的影响，改革强调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根本的平等，断言普通信徒皆为祭司。织布工施托尔希竟然属于先知的行列使选侯智者腓特烈感到的窘迫可能和其同行工匠布里·鲍托姆的翻译使雅典公爵感到的一样。但这是时代的标记。路德的德语《圣经》很重要，因为他的译本与只有受过教育者才有能力享用早先的本国语译本不同，成为教育无产者的媒介，迄今为止没有发表意见和陷于贫困的社会阶层借以在宗教方面有了发表意见的能力，有了谈论神学问题的能力。

但是，这部德语《圣经》又引出了新问题。它起源于一所大学：它是一种学术成就；是进行教导的教会的产品，只不过以新的伪装出现。但激进派诉诸的是简单的福音，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智慧隐藏着的福音，却启示给虔诚的平信徒。在闵采尔的著作中关系紧张最为明显。

托马斯·闵采尔（1491—1525年）像路德一样也是萨克森人，他是在俗神职人员，相当有学问，受神秘主义和启示文学作品影响甚深，其中错误地认为卡拉布里亚先知菲奥雷·达·若阿基姆的评注。他原来是路德的崇拜者，后来成为其死敌。1524年无意中受到路德重大影响的奥科兰帕迪乌斯通过来访者尖刻地贬低路德而认出了他是谁。他指控路德和教皇至上主义者宣教一种错误的信仰教义（*Von dem gedichteten Glauben*）（1524年），抨击路德耽于感官之乐（“追求舒适生活的兄弟”），抨击路德虚伪，是“撒谎博士”。路德在其《论世俗权力》（1523年）中深信不疑地说政府在上帝之秩序中有其适当的地位，这对基督教地方行政官的良心是安慰。闵采尔对当权者持大得多的怀疑态度，对他们甚为尖刻，而对“贫穷的普通人”和

“上帝拣选的朋友”则大力迎合他们的趣味。在茨维考进行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传道活动后，他在布拉格发布了一篇宣言，但捷克人没有响应他的召唤，他随后去到小城阿尔斯德特，控制了该城，在那儿进行的礼仪试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其中有中世纪圣诗的优秀本地语言译文，用本地语言的晨祷和晚祷，一种完全集体朗诵的弥撒仪式，这种仪式唯一古怪之处是规定祝圣词由全体会众重复。后来路德派来到该城，他们抹去了“宗教改革时代”第一阶段的最有趣的礼仪改革试验之一的所有痕迹，这是1525年发生的事件令人遗憾的后果之一。

闵采尔的共产主义的证据仰赖于在折磨下让人“忏悔”这一可疑的证据是否成立。但确凿无疑的是，他每到一处便在矿工和织布工人中征募追随者，按秘密盟约要求他们发誓在末日的斗争中拿起武器。特别使路德愤怒的是，这些行为只能在他自己的宗教改革运动起保护作用的自由下才可能发生，却不敢渗透到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路德在谈到闵采尔时说：“他在我们的荫底下，分享我们的胜利却不承担我们的斗争，他坐在我们的土堆上，冲着我们大喊大叫，这不是勇敢。”

1524年7月，阿尔斯德特出现了危机，当时约翰公爵，公爵之子约翰·腓特烈以及萨克森的一些高级官员来到该城出席一次试验布道以检验闵采尔是否适合担任阿尔斯德特的传道人。闵采尔当着他们的面布道，他布道的内容是阐释《但以理书》第二章，这次布道有权被认为是该世纪最杰出的讲演。《罗马书》第十三章，民众服从的教义之经典章节（*locus classicus*）被大胆放肆地转化为革命的工具，因为他煽动萨克森的统治者用剑来消灭不信上帝的人，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这次布道给朝廷留下的印象坏到极点。闵采尔立即奉命受接见，在接见中他很快便因恐惧而无言以对，面色泛黄，后来只得逃之夭夭。他一路迢迢来到纽伦堡和巴塞尔，历时数月，和一些激进派传道人通了信，之后便停留在米尔豪森，但他在该地从未获得他原先在阿尔斯德特的支配地位。

在萨克森，现在有两个“宗教狂热”的中心。在奥拉明德，卡尔斯塔特自命为牧师，他在自己原有的教义上又增添了否认婴儿受洗和圣餐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义。路德在《反对神圣的先知》（1524年）中已深刻地判断出他自己和极端分子之间的神学分歧，他嘲笑了这些宗

教上的邦托尔内斯（*Bunthornes*）的晦涩难懂的胡言乱语，并激怒了卡尔斯塔特，因为他把他的寂静主义和闵采尔的反教权主义的叛乱计划混为一谈。他在萨勒河谷作布道旅行时，在耶拿的一家小旅店里碰见卡尔斯塔特，他们越过桌子相互怒目而视，其中一人从钱包里拿出一枚金币扔给对方，这是古代表示公开的敌意的一种方式。到此时，选侯已认定卡尔斯塔特无可救药，于是将他放逐。如何对付这种人的问题使任何时代任何掌权者感到不安（关于卡尔斯塔特，10年以后布林格和米科尼乌斯所说的不友好的话和路德与梅兰希顿现在说的一样）。但也许萨克森当局如果稍为考虑稗子的比喻的话，也不会放逐他了，因为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流浪，引起人们的怜悯，毫不隐藏他的不幸（“未经审讯和定罪，安德烈·卡尔斯塔特便被马丁·路德博士驱逐”），一路散发了成千册恶毒的小册子，对他们的名声和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1524年6月，在黑林山的施蒂林根爆发了农民战争，叛乱迅速扩散到莱茵兰、施瓦本、弗兰科尼亚和图林根。大体上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中世纪的计划，特定的自由和革除特定的弊病：废除奴隶制，减轻封建税收、教会的勒索，什一税。叛乱者中有文化修养的人起草了宣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梅明根人的《十二条》。运动很快便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叛乱者的队伍中有许多受胁迫参加的人，由于缺乏充足的给养，他们不得不就地为食，并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向防卫相对薄弱的宗教会所。极端分子的行为，如魏恩斯贝格大屠杀，损害了整个运动的声誉。当叛乱者围攻陶伯河上游罗滕堡时，卡尔斯塔特在行军中被俘，但他并不同情这类暴力行动，据当地人传说，他采用使徒的方式坐在一只筐子里被从城墙上放下来得以逃生，尽管他带着家眷一道却不是使徒的方式。但由于他原先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在以后的几天他处于极大的危险中，以至他只有可怜巴巴地向路德求助并卑躬屈膝放弃信仰才得以脱险。闵采尔则毫无疑惧，在一种特有的精神陶醉状态下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签发了“上主和基甸之剑”。5月初，叛军控制了弗兰科尼亚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势不可挡。突然间分裂和瓦解的迹象大增。5月15日，闵采尔和他的同志们被围困于弗兰肯豪森，当时福音派的黑森的菲利普成功地阻挡住叛军的前进，直到天主教的约翰公爵率领炮兵到达。在随后发生的屠杀中，闵采尔带头率溃败的叛军从田野逃走，在城里躲藏时被抓获，饱受折磨后被处决。但是，正如黑森的菲利普所证实的那样，他死得体面。尽管他十分狂

热，但我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对正义的呼唤，在随后发生的可怕报复中这呼唤横遭践踏。

温和的反叛者们热切地转向了改革派领袖。路德的态度是坚定而一贯的。有三年的时间，在一系列比德国任何人都阐述得更清楚的著作中，路德预言过宗教上的煽动性行为必定以社会动乱和政治上的毁灭告终。他还对基督徒服从的义务作了阐释，并断言叛乱是邪恶的，叛乱总是引起比它能够矫正的更多的弊病。他认识到（如1522年发生在维滕贝格那样的）民众骚乱将归咎于他：“因为我清楚地看到魔鬼，他未能通过教皇毁灭我，现在试图借助于嗜血成性的谋杀的先知和骚乱的精灵来铲除我，吞食我。”不过，他的《和平的告诫》（1525年）只对《十二条》作了十分温和的评论，该文对双方都加以指责，并赞同农民的要求中有许多是正当的。他断然谴责的是叛乱这个罪和狂热，因为它们可能把暴力和谋杀当作“基督教革命”加以炫耀。他通过责怪双方结束文章：“你们都错了，你们的战斗是错误的。”

到这本小册子出现时农民的势力正如日中天，为谣言所夸大的放火、抢劫和暴力比比皆是。路德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图林根有不满情绪的地区布道，现在写出了小册子《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他是在农民看来可能取胜时写作该小册子的（“即使农民碰巧占了上风——因为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我们不知道通过魔鬼来破坏一切秩序和规则是否是他的旨意”），他求助于想要服从上帝旨意的基督徒诸侯，肯定地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行使地方行政官的职权，动用司法权来惩罚干坏事的人。这本小册子措词激烈，有时候人们使它看起来很糟糕，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如此糟糕。但事态的发展再一次比路德的笔来得快：当这本小册子作为他早些时候写的《和平的告诫》的附件而印刷出来之时，在叛乱者正处于节节胜利之时，他说的这些话在他们冷静下来时却有了不同的理解。

在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为他的言论所触犯，因为他的言论似乎同意无节制地残暴的报复。他证明了自己的一贯性，但他得到一点神性是以牺牲其人性为代价。现在，他以那种无疑是他身上一大缺点的固执写出了《关于〈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的公开信》，或许是这封公开信而不是那本小册子才包含有野蛮、残忍和无可辩解的东西。虽然如此，即使是这封信也以针对年轻的诸侯的强烈言词断

定：“有两件事我感到忧虑：假如农民成了领主，魔鬼将当上修道院长；但假如暴虐的诸侯成为领主，那么当修道院长的将是魔鬼的母亲。”

就在此时，当路德认为世界的时光正在耗尽，他自己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为了对魔鬼表示蔑视，他和卡特丽内·冯·博拉结了婚，她是逃离隐修院的一批修女中的最后一名。这一婚姻开始时缺少浪漫，但结果极其美满。可以肯定，路德的床铺多年来无人整理，他需要人照料。在家庭生活中，他找到了欢乐，感到心旷神怡，当一个个孩子出世后（有的死去），他的家成了比任何文章都更有效地为神职人员结婚辩护的工具，成了大大丰富了欧洲历史的基督教牧师家庭的样本的原型。

1525年他写了《论意志之束缚》，在文中他回答了伊拉斯谟的抨击。1521年后，伊拉斯谟不得不对付自己的困难。在卢万、意大利和西班牙有一批人数日增的天主教神学家决心击败他，为首者是他的宿敌阿莱安德。他的朋友和庇护人，其中有国王亨利八世和教皇阿德里安六世，长期以来就催促他加入对路德辩论者的行列。现在他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他对改革派的暴力越来越反感，作为一种类型——路德是那种他最讨厌的死守教条的托钵修会的神学家。但伊拉斯谟的《论自由意志》（1524年）并未获得伟大的成功，既没有激励他的天主教朋友，也没有满足他的天主教敌人。对批评敏感的他被路德的回答激怒到无以复加，路德对挖苦的小小刺激报之以响亮的耳光。而且路德的神学素养达到的论证说理的高度是那位更伟大的学者不可企及的，结果路德的文章虽然片面、判断有误而且偏激，但其中难忘的警句比比皆是，至今仍是有成效的神学研究主义的对象。作为回答伊拉斯谟写了两篇冗长的专题论文*Hyperaspistes*，而路德所做的仅限于写了一封极不公平的公开信和在晚餐桌上作尖刻的评论。

1524年在改革派中爆发了关于圣餐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宗教改革第一时期最复杂的神学辩论，其重要性不可小看。全体改革派一致抨击关于弥撒的教义，一致拒斥阐述真正临在之正统教义的实体转化论和经院哲学。但改革派并不能就此了事。一场辩论，根据圣典（用语文这一新工具）、根据教父著作研究得出的证据（用新近印刷的文本）对该教义进行考察，用《圣经》而不是用经院哲学的范畴来阐释基督教真理将不可避免。但真实情况是热度高声音大而有启发性内容

的光亮少。圣餐礼成了基督教意见分歧的焦点，1524年卡尔斯塔特曾提出象征论教义（其中有这样狂热的诠释：在“这是我的身体”中的“touto”指基督的物质的身体，并不指饼酒）。但辩论的真正开始是当茨温利收到荷兰学者科内利斯·赫恩的一封信后，该信促使他相信[基督]制定圣餐礼的句子中的是这个词应该解释为一种比喻：似乎 *est*[是]是 *significat*[象征]。奥科兰帕迪乌斯汇集了引自教父们的文句，他的《论主的真言》（1525年）成了象征论观点的手册，他在其中强调德尔图良使用的语词身体之形。他的士瓦本同乡、路德派的布伦兹及其同事们撰写了 *Syngramma* 一文回答奥科兰帕迪乌斯，该文大伤感情并使情绪越来越激动。

在其早期著作中，路德时常想着其天主教对手们，因此他强调对信仰之需要，强调[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是在“使用圣餐礼之时”这一事实。同时，他在1520年摈弃了经院哲学的范畴，并对实体的概念作了如此大的修改，以至把他本人的观点描述为“圣体同质”，或用奥科兰帕迪乌斯杜撰的词“圣体圣餐合一说”加以描述，都是使人产生误解的。路德在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主晚餐的大表白》（1528年）中对他的教义作了最清楚的阐述。该文显示他对真正临在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依赖于这样的观点，即和上帝之交通必须通过一种为信仰所领会的可感知的媒介起中介作用为有罪的人促成：基督作为神一人是救世的中介，因为其位格的不可分解的统一性，他不仅以其神性而且也以其人性临在于圣餐中，即使他的真正临在的方式不可能用空间概念来加以解释。

布塞尔开初为茨温利和奥科兰帕迪乌斯所争取过去，但1529年路德的《关于主晚餐的大表白》说服了他：他认为自己误解了路德，他认为路德的意思并不指局部临在。他本人赞同使用教父的切合实际语言来表达对真正临在的灵性解释的套语，他相信这里有福音派团结的真正基础。路德继续认为凡是和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卡尔斯塔特和闵采尔的同伙，所以对这整个事情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现在他也全然不愿意做1521年在沃尔姆斯他拒绝做的事——为了教会的团结而放弃自己的信仰。1529年举行的马尔堡会谈是由黑森的菲利普促成的，他坚信福音派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会谈一开始便取得了积极的成绩：德国和瑞士最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在9月的最后几天会聚一堂。辩论坦率而认真，只是偶尔有人发火，比如在以下场合：当茨温利说

（关于《约翰福音》第六章）“这将折断你们的脖子”时，路德反驳说“没这么快！在这儿脖子没这么容易就折断。你是在黑森，不是在瑞士”。大范围的误解得到澄清，尖刻而偏激地相互指责伤害对方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路德对布塞尔说的那句名言“你的心灵与我们不同”暴露了维滕贝格、苏黎世和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模式的深刻差异。虽然如此，在签署的《马尔堡十五条》中仍达成重要的一致，写进其中的根本分歧仅仅是关于圣餐的。但这一点失败是严重的。作为基督教神学家，路德派拒绝为了民众阵线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无疑是正确的做法。但最终还是政治事件阻止了《马尔堡十五条》成为一项重要的协定。茨温利离开马尔堡时深感失望，没有达成他希望的同盟，他将要面对危险的政治形势。梅兰希顿甚至比路德更为对皇帝和帝国的忠诚所感动，这是瑞士人无法理解的，但却使他们产生了在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改革派之间进行某种调和的希望。1524—1529年，德国明确地分裂为两派：天主教诸侯和福音派诸侯。沃尔姆斯敕令一直是天主教派施压的号召力量，但随着1525年德绍同盟的形成，改革派诸侯在托尔高同盟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托尔高同盟以萨克森的约翰公爵（智者腓特烈在农民战争期间去世）和黑森的菲利普为首。他们与不伦瑞克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安哈尔特亲王和曼斯费尔尔德伯爵一道组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1526年在施佩耶尔召开帝国议会时通过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关于沃尔姆斯敕令各路诸侯“生活、治理国家、为人处世均可各行其是，只要他认为自己所作所为能向上帝和皇帝陛下交代得过即可”。

在萨克森，制订了意义重大的教会视察计划，并于1527—1528年付诸实施，梅兰希顿撰写了《训导》，路德为之写了序言。由神学家、朝廷派来的平信徒代表和传道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视察了5个地区。这次视察成了德国其他地区改革的榜样。其直接效果是揭示出神职人员和民众令人震惊的无知，实施基督教教育乃头等重要的需要。路德因此于1529年撰写了两份值得注意的文献。第一份是《大教理问答》，这是一本供牧师和教师使用的手册。第二份是《小教理问答》，这也许是路德最优秀的著作，其朴素美在新教文献中无与伦比，儿童可以用作祈祷的工具，路德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据以作祈祷，这是颇有特色的。

黑森的菲利普面临军事和政治危险而心神不宁，因而上了冒险家帕克的当，此人于1528年用一些伪造的文件说服他相信天主教列强的进攻迫在眉睫，他因此谋取在帝国境外和法国和匈牙利结盟。骗局暴露出来后福音派的事业大受伤害。在1529年召开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上，意见不统一的福音派不得不面对占多数且态度坚定而凶狠的天主教会。1526年的法令被宣布作废，福音派被禁止搞任何新的改革和世俗化更多的教会财产。这引发了福音派诸侯提交《抗议书》，签署《抗议书》的有萨克森选侯约翰、勃兰登堡侯爵乔治、黑森的伯爵领主菲利普、不伦瑞克-吕纳堡公爵恩斯特（Ernest）、弗兰西斯安哈尔特亲王沃尔夫冈和帝国的14座城市。《抗议书》的结尾颇为著名：“关于上帝之荣誉和我们灵魂之得救与永生问题，人人都必须亲自面对上帝并向他交代。”这样抗罗宗^[4]在当地找到了一个聚集点，得到一个名称，以及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开始了其存在。事情再也不会交托给道去处理了，现在路德曾经谴责为“恶棍的游戏”的东西玩起来了，人们不祥地预感到血腥手段的使用。

第二年，即1530年，问题尖锐化。自1521年起，皇帝之目的从未改变：他坚持沃尔姆斯敕令，坚持其对新教义的谴责。但他的政策，虽说取决于他的处境，却并不那么明确。1529年末，他在缔结康布雷夫人和约因而牢固掌握了意大利以后^[5]，他第一次获得了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德国的问题的自由，他下令第二年夏季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议会。1526年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将路德派问题推延到一次大公会议召开之时解决；现在查理终于得到教皇的允许：只要能使路德派就范，便可召开一次公会议。查理将破例一次亲自出席，他希望土耳其人的威胁加上呼吁在帝国境内效忠皇帝（在路德派诸侯中有强烈的效忠思想）将导致和解。皇帝的命令要求持异议者准备信仰声明作为讨论的基础，而且这么提出时并非以不容变更的态度。几乎各方都怀着看见和平得以恢复的最良好意愿出席了奥格斯堡帝国议会。

但事态已发展得太远。到这时，不仅新教已牢固地确立起来；不仅皇帝本人太正统以至不能对固执的教皇产生影响；而且还因为世俗化教会土地问题（1529年提《抗议书》的主要原因）路德派诸侯的表现不可能尽如人意。比维滕贝格的教义更为偏激的教义到这时已在瑞士和德国南部广为流行，康士坦茨和斯特拉斯堡准备的信纲便是明证。在奥格斯堡发生的争斗是三角的，天主教会、路德派和“德国南

部讲高地德语的”一派各自往不同方向拉扯。结果，《奥格斯堡信纲》是作为路德派的信仰声明而产生出来的，信纲是温和的，在此之前与会者等待数周之后查理五世才到达。信纲的作者们——梅兰希顿特别得到人文主义者、最近任智者腓特烈的秘书的乔治·斯伯拉丁的帮助——在批评声中准备信纲，批评不仅来自茨温利而且来自路德本人。这位改革家仍然不受帝国法律保护，他待在科堡的城堡中，不能再靠近奥格斯堡；他从那儿焦虑地注视着会议的进展，唯恐他的观点被歪曲。其实他不必担心：信纲体现了新信仰的基本点。信纲的语言是和解的；它把路德派和再洗礼派以及煽动性的教义区别开来，可谓用心良苦；关于圣餐的条款如此温和，以至天主教派应皇帝之要求作驳斥陈述时竟几乎挑不出错误。然而，会议显示和解仍是幻影。一方面，梅兰希顿的温和态度确认了和瑞士人在圣餐上的冲突，瑞士人没有受到忠诚于帝国的感情的影响，而路德派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怀着对德国和平与对土耳其人采取联合行动的真诚希望来参加帝国议会的；另一方面，甚至更加严重的是教皇政策表里不一，执行此政策的坎培基奥枢机主教受命宣布这次公会议无效并坚持沃尔姆斯敕令有效。他和梅兰希顿进行的长时间的谈判显示罗马寻求的并非相互让步，而仅仅是投降。

因此，《奥格斯堡信纲》——今天被正确地认为是特殊环境的产物，尽管温和冗长，其调子是解释说明，甚至几乎是辩护，成了分裂的路德派教会坚定而长久的基础。它远没有弥合分裂，反而巩固了分裂。而且，继其后突然出现了一连串的信纲和教会，现在这些教会已扩散到整个欧洲。在以后的30年，基督教世界将大谈和解、大公会议和恢复团结。然而，惹人瞩目的事实却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教廷在分歧的基本点上不会让步，这由克雷芒七世在他势力最弱的时候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证明了。从沃尔姆斯到特伦托，罗马在教皇至高无上、弥撒是献祭、关于圣事的正统教义、善功和向圣徒祈祷方面态度坚决。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有时候的确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也不可能在不放弃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的条件下接受这一切。当布塞尔提出《四城信纲》——南部德国对梅兰希顿的圣餐教义的反应时^[6]，和《奥格斯堡信纲》的圣餐教义一比较，事实就清楚明白了。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使伊拉斯谟的梦想终成泡影：从内部以理性与和平的精神进行了改革的教会再将不会回归统一了。它同样使查理五世的希望落空。从现在起他不得不也在德国战斗。

[1] P. 比勒：《马丁·路德的反驳》（1942年），第4页。

[2] 欲了解另一种观点，见E. 比策尔《得自聆听的信仰》（诺伊基兴，1958年）。

[3] “我的立场就是这样；我只能如此行事”，这句著名的话未见于原始文献中。

[4] 在我国通常译作“新教”。——译者

[5] 见本书边码第345页。

[6] 见本书边码第111页。

第四章 瑞士的宗教改革及其教派

一 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的宗教改革

莱茵兰和瑞士各城市的宗教改革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里整个地理、政治、文化环境赋予改革的冲动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向，改革的结果不同于德意志各拥有土地的公国，也不同于统一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

到中世纪末，许多欧洲城市里的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都已取得独立。对教会事务已开始行使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扩大和加速产生的干预权。在瑞士教区机构和极重要的郡县结构无关系，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内部势力的平衡，各城市均不相同。在伯尔尼坚持的是贵族政治；在斯特拉斯堡，有一个主教座堂教士会和几所大学校园教会；在巴塞尔，有一位常驻主教，同时该地手工业行会也成了施加改革压力的工具，该地一所大学的存在为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苏黎世和斯特拉斯堡则移交给了教区神职人员。在瑞士，军队的勇武、兴旺、独立性激发了警觉性和自信心。在苏黎世，“市议会的大人们”习惯于采取与萨克森的小城镇政客们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重要事务和对事件加以控制。瓦克纳格尔在宗教改革发起之时绘制了一幅巴塞尔城的精致图画，画上有宏伟的建筑、著名的出版家、艺术家和学者，这幅作品给予商人，即能干的富人，以适当的地位，他们对重要的问题有聪明而虔诚的认识，蜂拥去听取奥科兰帕迪乌斯的演讲。

在这些城市里，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瑞士和莱茵兰的一些大会社使这一过渡成为可能，不仅是从“优雅文学”向“神圣学术”——采用新的工具和文本对宗教语言和教父们进行研究——过渡，而且超出于此而过渡到我们称之为福音文学的东西，过渡到圣经人文主义，16世纪20年代的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为此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这些仍然小到所有重要人物彼此能叫出

姓名的城市自然为一种基督教共同体的概念所吸引。路德已经为教会确立了两个大的方面：道和圣事，并且强有力地恢复了教会存在的核心：基督当前的统治。如今第三个方面出现了，这第三个方面就是“基督的戒律”。随之而出现的是一整套与基督教周围环境有关的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虔信上帝之治安法官纠正谬误的权力和教会的教牧戒律之间的关系。在宗教改革最初几年，所有老的教会机器都受到妨碍、堵塞，并被既得利益者所把持。无裁判权的福音派牧师们发现那些虔信上帝之治安法官是使事情办成的名副其实的天赐之物，是有效的、称职的工具。只是后来进一步的考虑才使人想到利用来源于古代的道德和政治势力将给新教带来危险。但到此时，这些治安法官们已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任何权力了，当他们对一种新教权主义敏感和怀疑时，他们就更不情愿。在城市里再洗礼派的反叛就是尖锐地针对治安法官之行使基督教的职责而发动的，虽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更加具有启示意义的背景下常常高举的也是一种基督教共同体的教义。

可是，[只论事]而不考虑人并不能解释宗教改革。要考虑到是人发起了宗教改革，而当我们对宗教改革进行思索时，只有数量少得惊人的人联系到他们取得的创造性成就来进行思考。这些学者、传道师和牧师的才干给人印象之深令人吃惊。他们绝大多数是好人，许多是伟人。因为有茨温利、布塞尔、加尔文这些巨人，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在宗教改革史上地位突出。

1. 苏黎世

在所有宗教改革家中，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年）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是最安适自在的了。他的一个敌人在他的遗体旁边低语时说过以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一个腐朽的异端分子，但却是一个好同盟者。”茨温利1484年元月1日出生于威尔德豪斯村，该村位于杜根堡河谷的高处，他在他的演说和写作中用比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河谷山坡的景色和声音。

他从他的叔叔、韦森的首席牧师巴托罗缪学习过拉丁文，后来到巴塞尔和伯尔尼上学，149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在该大学他遇见了一批瑞士学者，其中有学识渊博的瓦狄亚努斯和豪放不羁的格拉雷亚努

斯；他们把对古希腊和拉丁语文钻研和对地理、数学和医学这些新学科的热情结合起来。茨温利曾被勒令退学；我们倒不必和那些虔诚的传记作者一道去寻找[他被勒令退学]的高度灵性的和可信的原因，因为这些瑞士青年自以为了不起，本科生行为轻率，几乎达到了可耻的程度。但他后来获准复学，完成了学业，之后他到巴塞尔大学继续求学，于1506年在该大学获得文硕士学位。在巴塞尔大学期间他和讲授传统神学的教师托马斯·威藤巴赫交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对这位教师一再加以赞扬。1506年他到格拉鲁斯当牧师，此后的数年间他尽其所能一边做教牧工作一边学习。他至少两次和瑞士军队一道去意大利。他还加入了一个人文主义小组。在正统的研究中对这个相互钦佩的社团有所提及，这些珍贵的材料虽不可全信，但由此可以知道他在其中是出类拔萃的，并于1516年引起了心目中的英雄伊拉斯谟对他的注意和好感，伊拉斯谟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1516年他接受了艾恩西德伦的圣职，并在该地成功地抵制了兜售赎罪券的贝尔纳迪诺·萨姆松，但并没有招致教皇的责难，反而成了教皇年俸的领取人直到1520年。1518年，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米科尼乌斯提名他为大教堂的“人民牧师”。他购置的演奏乐器的设备让比较稳重的教友们感到吃惊，更为严重的是他1516年和一位理发师的女儿发生了不名誉的恋爱事件，尽管如此，他仍然被任命担任了一项本身虽不重要但事实上却成为苏黎世宗教改革的关键的圣职。

老一些的历史学家们强调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并认为他是一位在宗教和神学的表浅的层面上关心实际上滥用职权的知识分子。然而，现代瑞士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已经摧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虽尚未结束，但已经明确地重新提出了一些问题。茨温利似乎受到传统神学方面的训练，阅读了司各脱的许多著作。（虽然，假如有证据说明他是唯名论者的话，那么对他的圣餐论的解释会简单得多！）他显然和佛罗伦萨学园的柏拉图主义有过接触，虽然有关他这方面的材料的不足再次阻止我们对这一太诱人的资料——他的圣事论里的“唯灵论”——的采用。他得益于伊拉斯谟是无可置疑的。这激发了他热情学习希腊文，使他像伊拉斯谟一样在教父们中偏爱哲罗姆和奥利金，因为他是在后来才逐渐得益于奥古斯丁的。然而，他又与伊拉斯谟不同，他高度重视《旧约·圣经》，并准备为此孜孜不倦地学习希伯来文。

有人（克里斯蒂安尼）指出，1516年在他的成长中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圣经》出版，这一年教皇和法国国王签订的宗教协定坚定了他反对教皇制度的决心，这一年他感到的道德危机迫使他去寻求圣典的帮助和安慰。另一个重要年代是1519年，这一年他染上瘟疫，几乎丧命。康复后他写作的那首优美的赞美诗显示，由于这次他得到人难免一死的暗示，他的宗教意识加深了，虽然对下面这一诗句我们不应加以过分的解释：

无论沉没或远航，

我都是你的一叶小舟。

茨温利的宗教越来越以《圣经》为中心，了解《圣经》的关键不单单是语文学，而是信仰，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说：

我终于得出了如下结论：“你必须离开其余的一切，从他的简单的道中了解上帝之意图。”然后我向上帝要求光明，于是光明就来临了。

毕竟这就是那个把福音传道的号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并把它置于自己的礼仪的中心的人。韦恩勒说：“上帝之旨意在茨温利的思想中取代了路德思想中恩典的地位。”这句话值得讨论，但它也许并没有正确对待以基督为核心的要素（甚至在他于1529年作那次重要讲道时对所作的著名解释中），也没有公正评价按照《圣经》思索关于上帝之旨意的教义所达到的程度。当然，在茨温利的著作中有一种持久不变的人文主义基础，而且直到最后都有许许多多对古典的提及，这点他自己是有意识到了的。虽然他有理由强调自己与路德无关，但他在1518年却和人文主义者一道对这位“德国的赫尔克里斯”满怀热情，这是很可能的事实。

这位传道人1519年1月1日开始任职并宣布他要违反先例，直接通过圣马可的福音讲道，这时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啊，那些王侯、城市、民族有福了，主在他们中间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自由地讲话。”（1529年）茨温利颂扬基督教社团、先知的团体、在道之下的城市的概念。他的宗教改革的开始、继续和结束都是通过先知式的讲道来进行的。茨温利眼睛近视，声音微弱，他缺少向公众讲演的才干，然而他能够控制这座伟大的城市的秘密却正是他的讲道，而他在小议会或大议会中的全部活动就重要性而论都不能与此相

提并论。在这方面很少有人（加尔文、诺克斯、拉蒂默）比得上茨温利——在一个小到人人都相互认识的社会中，在一个一切有效的领导都在道之下的城市中，适应于不断变迁的每一天的实际需要都继续不断地对《圣经》加以解释。1520年议会颁布一项批准福音传道的命令，此事的真实性虽然一直受到置疑，但这福音传道的事实却是无可怀疑的；在瑞士所有城市中，这种以《圣经》为依据的讲道率先在这里继续进行。

其第一批成果之一和雇佣兵的输送有关。谈论茨温利的和平主义是与他所处的时代不合的，因为他完全缺乏有节制的温顺，他不只具有现代反战者空谈的好战性。他思想上的真正存在的紧张关系大体反映了瑞士人感情上的分化。一方面他们对瑞士的军备感到骄傲，瑞士的军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赫赫有名，求者甚众，这部分地引起了也部分地反映了对军事艺术的兴趣。在自己那本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上写满了条分缕析的评论的茨温利被朋友们认为绝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瓦狄亚努斯有一句评论是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就像茨温利一样爱使用武器，其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为了维护和捍卫真理。”他关于一次战役的速写（1524年）是一份出色的文献，论述了战略、战术和给养问题，还为随军牧师和号手制定了规章，尽管是速写，但用意是严肃认真的，人们也这样看。另一方面，大多数瑞士人对当雇佣兵参加战争感到良心不安。随着武器交易的发展，丑恶的见利忘义行为进入了瑞士政治，由于贿赂和津贴而愈演愈烈。而且瑞士人并非总是获胜。茨温利目睹了当马里尼亚诺的血腥战斗和比科卡的惨败（1512年）的消息传到失去亲人的村民和寡妇孤儿那里时，当伤兵一瘸一拐地回家时，舆论如何为之大变的。对战争，茨温利有从战场到村庄里举行的追思弥撒的第一手感受。他的《上帝的告诫》（1512年）是伊拉斯谟主义的，且文辞华丽，但却是一次真正的心理突变。他早年就对他的祖国之卷入强权政治的大游戏持反对态度（这在他1516年写的政治诗《迷宫》中有鲜明的反映，在这首诗中他呼喊：“难道这就是基督教导我们的吗？”），现在这态度成了一种强烈的信念。他在讲道时极力鼓吹之，终于结出果实：首先，在瑞士各州中只有苏黎世拒绝和法国国王订约，后来又反对令人畏惧的红衣主教希内尔和教皇本人，最后议会于1522年决议禁止参加雇佣战争。

奥斯卡·法尔内尔说明了1525年当最初的危机过去之后茨温利的日常讲道开始越来越注重实际，在道的轨道之内考察紧迫的事务。茨温利的圣经主义比路德的更加激进，给无关紧要的事情留的地盘狭窄得多。他以梅兰希顿式的谨慎提出了一份卡尔斯塔特式的纲领。他令人吃惊地承认《圣经》里很少有对付一税和婴儿受洗的支持。他在圣典中找到了根据，要求撤除圣像和图画，取消唱诗和教堂音乐。但在1522年他却谨慎行事，总是小心翼翼不超越事态发展的步伐。在大斋首日，一群改革者在印刷商家里故意不守大斋，但茨温利特地不去碰那两节作为反叛象征的熏香肠，尽管他在《食品选择和自由食用》这篇大胆的讲道中为改革者们的原则作了辩护。7月，茨温利和他的朋友们向康斯坦茨的主教请愿，要求准许神职人员结婚，但被驳回。（茨温利本人于当年晚些时候结婚，但他直到1524年才公开宣布此事。）同月，方济各会修士阿维尼翁的弗朗索瓦·朗贝尔到达茨温利所在的地方，此人身材修长瘦削，弯腰骑在驴背上，像个堂·吉珂德，他仿效格列柯^[1]在整个宗教改革期间骑着一头驴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和茨温利就圣徒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辩论，结果丢人现眼地惨败。几天以后，市长发布一道命令允许福音传道，“以圣典为依据，将司各脱、托马斯之流排除在外”。年底，茨温利在其作品中驳斥了康斯坦茨的主教的抗议，使他无言以对，预示了一整套改革纲领的出台。

现在，他把该纲领具体化为67条（1523年1月19日），开首第一条对福音作了总结，继而抨击了教皇的权威、变体论、圣徒的中介、守斋和朝圣。接下来按市议会的命令，于1523年1月29日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约翰·法贝尔——康斯坦茨主教的能干的教区代理主教，大败于对手的计谋。他原先以为这是一场通常的辩论，可以请远处的神学教授仲裁，结果他发现这是一场公开的大示威，要在其中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他发现听众达600人，市议员们也在其中，福音传道师们组成一个小组，三种神圣语言的大开本《圣经》翻开放在他们面前，准备用全部听众都能听懂的德语进行辩论。他试图用沉默来对付这一场面，后来当他决定辩论时已经太迟，这是他犯的致命错误。当他大喊“必须要有一位仲裁者”时，茨温利反驳道：“来自圣典的上帝之灵就是仲裁者”——他这么说时虽然是在回避论点，但却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支

持。事实上，那天的辩论已经由于市长宣布因为没有找到答案、茨温利应该继续布道而决定了胜负。在秋季发生的反圣像动乱之后，在10月举行了第二次辩论，在辩论中茨温利的同事利奥·尤德抨击了圣像的使用，茨温利则对弥撒进行了抨击。年底，和主教权威的决裂完成，次年夏季，风琴、圣物和圣像均被从教堂正式移出，城里的修道院被解散。1525年，茨温利重新对弥撒加以抨击，以至弥撒于4月12日被取消。接着是茨温利制定的圣餐仪式的出台，他在一张摆有大酒杯和木质容器的桌子边主持仪式，坐着的信徒们首先领受圣餐，然后牧师们领受，这种表示纪念的仪式很简单。还出台了一种新的洗礼仪式。茨温利1525年的礼仪改革完成了他于1523年实施了一半的改革措施。他制定了一种使用祈祷的布道仪式，有人认为这起源于一种中世纪时期在讲道前作简短的宗教训导的一种仪式（而且与斯特拉斯堡的起源于圣餐的仪式大不相同）。更加有创新意义的是“先知讲道”仪式，该仪式取代了原有的早晨唱诗仪式。茨温利在1525年当再洗礼派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开始举行这种仪式的，这一名称并不表示对自发性和主观性的偏爱，而是——正如对《科林多前书》第14章的一项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对在一种阐释《圣经》的仪式中对监督 and 控制的偏爱，在这种仪式中布道者依次对前面已讲过的内容添加自己的评述。在先知讲道仪式中阐释的是《旧约》；下午则对《新约》加以阐释。伟大的苏黎世《圣经》便是这些仪式的结果，它是一批支持茨温利、利奥·尤德、佩利卡鲁斯和比布利安德的学者合作的成果。苏黎世《圣经》中的《诗篇》译本深入到尼德兰和英格兰，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发现和研究。1525年5月，组建了一所法庭来整顿和监督婚姻，1525年颁布了全面监督公共道德的法规，并于1530年加以扩充。

茨温利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虔信上帝之地方行政官的纠正谬误的权力。他对基督教纪律的关心在他的67条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正如莱伊指出的那样——他的构想更多的是预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受《旧约》的影响太大。然而，议会虽然于1526年“以全教会的名义”接管了革除教籍的权力，但议会仍与牧师们合作开展工作，而且直到1531年都主要受茨温利的影响。1528年，茨温利在致安布罗斯·布劳雷尔的一封信件中强调了上帝之国必须和外在的事物相关并号召议员们尽改革的责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对基督教信仰的阐释中有这么一句名言：“没有地方行政官参与的教会是残缺的、不完全的。”他是在再洗礼派的反对下被迫作出的对于虔信上帝之地方行政

官的不断增强的强调的，再洗礼派在苏黎世的杰出领袖康拉德·格雷贝尔和费利克斯·曼茨是他自己的学生和门徒。不管在别处其起源如何，苏黎世的再洗礼派运动竟然貌似有理地表现出首尾一贯的、彻底的茨温利主义。茨温利本人对婴儿受洗所持的犹豫态度，他的原罪教义（认为原罪是一种病——即使这种病像瘟疫，这种看法也不如奥古斯丁或路德关于罪的教义激烈），他对礼仪的简化，他对圣餐的看法，再洗礼派都可以声言把它们推到了合乎逻辑的极限。但在茨温利的教义的核心问题上，在基督教社团和地方行政官的职责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在一次气氛激烈的会见中，当茨温利告诉反叛者们什么时候取消弥撒礼应该由议会决定时，曼茨喊叫道：“不，应该由上帝之灵决定。”茨温利完全支持现在瑞士各城市对再洗礼派的野蛮惩罚，这些惩罚使一场本来正迅猛发展的运动急剧衰落下去。茨温利本人越来越卷入了关于圣餐礼的神学论战，由于像他的优秀著作《真伪宗教记》（1525年）之类的较积极的著作，我们本可能对其中一些论战小册子持宽容态度的。他本人的神学是深刻唯灵论的，浸透了字面意义和精神间的二分法。对他而言，一段伟大的经文是“对什么也无益的肉体”。他厌恶感性的东西能够传送属灵的恩典这一观点。因此，他认为圣礼并非是不可见的上帝借以会见堕落了的人类的手段，毋宁说是誓约和象征，是上帝和选民之间所立之约的标记。他一旦确信圣餐礼中基督所设立的话具有象征意义后，越来越强调基督的身体在天国里，他仅仅在上帝之统一性里临在于圣餐中。他关于圣餐的小册子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圣经〉善解》（1527年）。

茨温利强烈地感觉到苏黎世在与天主教各州的对立中政治上的虚弱，感觉到奥地利的强大。他梦想看到他的城市在一个福音大邦联中居于领袖地位，他终于在1528年建立了基督教城市同盟，到1529年时该同盟包括了伯尔尼和巴塞尔、康斯坦茨、比尔、米尔豪森、沙夫豪森、圣加尔，1530年斯特拉斯堡加入同盟。他认为同盟也许可以向外扩张和托尔高同盟的日耳曼各诸侯联手，如果需要，甚至准备和法国或威尼斯结盟。他越来越想发动一场破坏性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到1529年时他已创建了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但也许由于他的领导者们对他在早先的年代的优良讲道太过于注意了，因为当部队与敌国人民亲善之时，政治家们举行了谈判，结果缔结了第一次卡佩尔和约。他认为这是姑息，他厌恶地喊叫道：“你们要和平意味着战争；而我要的战争却意味着和平。”确然，在以后的数月间他的同盟的力量逐

渐消融，以至在马尔堡会谈上当计划中的福音派联合政府失败之时，眼里噙着泪水的是茨温利。1531年，他孤注一掷地策划了对天主教各州的制裁（制裁是奇怪地在圣灵降临节时在讲道坛上宣布的），结果于10月引发了一场致命的军事反击。在战斗的前夜茨温利遇见了年轻的布林格，含着眼泪道了再见——“亲爱的亨利，上帝保佑你。坚持信我主基督和他的教会”——随即消失在黑暗中。那天的战斗十分混乱，充满灾难，而且很可能有人背叛。在苏黎世的部队里有13位传道师，卡佩尔的隐修院院长也在其中。茨温利的尸体在战场上被发现，对尸体先加以侮辱，然后焚毁。他是怎么死的将永远是个秘密，但如克勒所言，他没有戴钢盔，手持一把巨剑和一把斧头纯粹是为了装样子。

第二次卡佩尔和约虽然结束了苏黎世的冒险对外政策，但并不像它本来可能的那样带来诸多灾难；亨利·布林格继续执行茨温利留下的政策，只是对其虔诚地略加修改而已。茨温利怀抱《圣经》、手持宝剑的塑像，如果路德看见似乎认为是两个王国的邪恶混合，它招致并应该得到它实际上得到的下场。但是，我们对茨温利的政治的评价太容易受它们所遭到的军事灾难的影响了，而我们应该低估他对一个以他为首脑的福音派的瑞士邦联的希望的大胆和远见卓识。因为茨温利的希望并非是不光彩的梦想，他梦想的是这样一个共同体：上帝可以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在其中就基督教社团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各方面自由地讲话。

在茨温利死后几周之内又出现了第二次打击：巴塞尔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奥科兰帕迪乌斯（1484—1531年）去世。奥科兰帕迪乌斯是学者，性格内向，属于宗教改革家中最富有吸引力者。他下巴上留着胡子，长着一只悬垂鼻子，面色灰黄，透过眼镜凝视着《圣经》抄本，这副容貌可以作伦勃朗的“哲学家”的模特儿。路德在谈到他背叛圣礼时叹息道：“这样一个人”，并认为他是陶醉于茨温利的代达罗斯式的迷宫里的伊卡罗斯。奥科兰帕迪乌斯生于士瓦本的魏恩斯贝格，他在求学时就接触到了“莱茵学派”的学者们，其中有罗伊希林、温普斐林等老一代的伟人，在年青一代的伟人中则有布伦兹、布塞尔和梅兰希顿。他在海德堡、博洛尼亚和蒂宾根受的教育，获神学博士学位，令人惊异地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当他的朋友沃尔夫冈·卡皮托1515年以教授和大教堂传道师的身份来到

巴塞尔时，奥科兰帕迪乌斯在弗洛比尼的大出版社里担任了修改校样这一较为朴实无华的工作，他写了许多条语文学注释，对伊拉斯谟翻译的伟大的《新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受雇编辑伊拉斯谟版的哲罗姆著作，从而进入了第4和第5世纪的教父们的世界，他们的学问、禁欲主义和虔诚使他着迷，以至对教父的研究成了他全神贯注的工作。因此，在奥科兰帕迪乌斯身上我们接触到了宗教改革中的一种真正的重要因素，即在“老教父们”那儿为后来的时代发现了新的天地，这要素与牛津运动的共同之处较多，与福音复兴运动的共同之处较少。

他从克里索斯开始，一部接一部地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希腊教父的著作。他同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皮克海默和阿德尔曼·维利巴尔德兄弟有了友好交往，他们为他谋到了奥格斯堡主教座堂传道师的职位。他发现教会工作的压力颇像“踩踏板一样单调”，突然加入了布里基泰因修会（该修会由男女修道者组成，专门从事学术和晚近问题的研究），住进了该修会在旧明斯特的巴伐利亚隐修院，这难免不引起朋友们的反感。阿德尔曼厌恶地写道：“可鄙透顶，你知道，[这座隐修院]是由妇女管理的！”但他不久便感到失望并于1522年离开隐修院，留下了珍贵的图书，和布塞尔一道藏身于埃伯恩贝格城堡。11月，他和胡滕一道到达巴塞尔，在那儿他目睹了他的最新译作出版，并行使了他作为博士的权利在学校讲学。不久，他被聘任为教授，并在那儿以惊人的全神贯注开始了一项工作，因为除了西门·格里纳埃乌斯外，他没有一批支持他的出色的福音派同事，像在苏黎世支持茨温利那样，或者像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形成一支令人敬畏的队伍。不多时，他就用三种语言再加上德语一卷卷讲授《旧约》各书，听众是数百名市民。他先在圣马丁教堂，后来在大教堂讲道。1522年，他和茨温利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开始通信，他的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这位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家。1524年，关于圣餐的辩论开始，奥科兰帕迪乌斯用自己关于教父的知识帮助了他的朋友。他的《论主的真言》（1525年）成了圣餐象征论者的手册和武库，像费希尔和科克拉乌斯这样的天主教徒，还有像布伦兹这样的路德派都把它当作抨击的目标。

1526年5月，在巴登城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天主教徒由于吸取了苏黎世辩论的教训而得益，他们在会议中安插了自己的人，并邀请了

大名鼎鼎的约翰·埃克担任主角，他表现得很顽强。茨温利以其特有的慎重不愿意去参加辩论，他恳请议会即使在有安全通行证的情况下也不批准这次出访，他几乎没有给奥科兰帕迪乌斯任何意见，而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挑起了福音派事业的重担，他对此感到满意，而奥科兰帕迪乌斯发现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投票时居于少数。奥科兰帕迪乌斯表现出色，当埃克以他最动人的方式咆哮暴跳之时，他以平静的尊严和力量坚守住了阵地，显示了他过去数月间已从对学问的浅薄涉猎有了多么巨大的长进。下一次辩论于1528年在伯尔尼举行，那天正值福音派的户外集会日。茨温利、布塞尔、卡皮托等人在城市各处讲道，奥科兰帕迪乌斯有特色地挑选的题目是《论基督对他的教会的爱》。随后在伯尔尼改革迅速开展，而在巴塞尔，天主教在议会中势力强大而且有一批有凝聚力的布道人。1528年末，危机出现了。那年的圣诞节期间，一队队武装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晚间在街上走动。但在元月4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人们看到福音派的人数以千计，而天主教徒仅有数百人。并不很疯狂的破坏圣像活动持续了数小时，震动了这座城市。之后，议会于2月8日宣布弥撒礼将被取消，在巴塞尔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圣像将被撤除（伊拉斯谟、格拉雷亚努斯及其朋友们收拾行李去了较为平静的牧区）。1529年4月1日颁布了伟大的改革法令，该法令对教区组织、教育和公共崇拜提出了新的框架。在以后的数月中，奥科兰帕迪乌斯对教会行使了真正的主教监督权，教会按苏黎世的模式开始组织宗教会议体系。从他年轻时在巴塞尔担任听忏悔的神父之时起他就关心基督徒的纪律问题，这是他对道德主义的希腊教父们的研究所促成的。他越来越关注捍卫教会的宗教纪律并把它和信基督教的地方行政官采取的维护治安的行动区别开来。他在1530年发表的一篇伟大讲演《论限定处罚》中对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作了阐释。这篇讲演，施特林正确地认为，在基督教会史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科兰帕迪乌斯认为教会在牧养方面的纪律是补救性的，旨在使忏悔者得以复员，因此和地方行政官的惩罚是有区别的。他提出了一项设立平信徒长老的计划，这些长老执行这一纪律，并代表传道师、教徒和宗教会议。他希望瑞士其他城市也采纳他的计划，但他发现它们不大愿意放弃已由地方行政官行使的权力并怀疑会出现新的福音派教权主义。布塞尔尖锐地指出，奥科兰帕迪乌斯的计划更多地带有“教父的严厉”的味道，较少“保罗的宽容”，虽然宗教自治的主张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通过他这两种危险地被混淆了

权力的区别重新被引进了斯特拉斯堡体系的福音派纪律中，加尔文后来对之加以巩固和整理，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永恒重要意义的方法。

卡佩尔战役的消息传来后，奥科兰帕迪乌斯陷入深切的悲伤之中，由此引发了身体上的疾病：他长了一个痈，其毒液置人于死命。11月22日，他对其家人和牧师们道了再见。其间，当他被问及强烈的光线是否使他感到厌烦时，他拍拍胸部有气无力地笑了，用自己的姓名说了一句双关语：“这里已经有足够的光亮”。

在巴塞尔，奥科兰帕迪乌斯的追随者是奥斯瓦尔德·米科尼乌斯，此人的职务是首席传道师也就是“首席牧师”之意。他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但在学术上没有名气，他把这方面的事务多委托给西门·格吕奈乌斯。1534年，安德鲁·卡尔斯塔特到达巴塞尔，被任命为该地大学教授，数月之内便变戏法般地引发了一场有特色的、极其丑陋的吵闹。米科尼乌斯对自己之没有学术地位一直有点敏感。卡尔斯塔特现在对神职人员（在米科尼乌斯领导下的教区神职人员）和实施教育的教会（大学）的权威逐一开始挑剔和反对。卡尔斯塔特本人几年前还对一切学术称号加以嘲笑，现在却认为学位低于博士者不得在该城任教，必须先获得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讲授大学学术课程，尽管米科尼乌斯和格吕奈乌斯二人可以免于考试！但这种恩赐式的让步并未使局势得到缓和。格吕奈乌斯为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感到伤心，而米科尼乌斯则非常愤怒。1541年，卡尔斯塔特患瘟疫病逝，此事终于得以了结。卡尔斯塔特死后留下大量恶作剧式的争吵；他的可怜的寡妻四十余岁，处境悲惨，她跟随丈夫无休止地各处游荡，由于这些没完没了的长途跋涉的辛劳而致残。

亨利·布林格成了苏黎世人的天才领袖。亨利由于缺乏茨温利那样的天分和政治冒险（无论如何，第二次卡佩尔和约的签订使这座城市最终摆脱了政治冒险）能力，他满足于做一名模范牧师和教师，他和欧洲所有的宗教改革领袖们大量通信，从而成为宗教和解方面的重要人物，其重要性仅次于精力更加扩散的布塞尔。是布林格的苏黎世而不是茨温利的苏黎世使瑞士对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作出了贡献。

1534年，米科尼乌斯在巴塞尔提出了一份信纲。1536年，苏黎世和巴塞尔合作提出了第二份巴塞尔信纲，又称第一瑞士信纲，这是一

项享有权威的杰作。1549年，布林格和加尔文之间订立的意义重大的《共同纲领》（*Consensus Tigurinus*）打开了瑞士所有归正宗教会和解的道路。1566年，布林格的第二份瑞士信纲出台，该信纲为大多数瑞士宗教改革家所采用。布林格的讲道和辩论记录虽然缺乏深度和创新，但却使改革了的基督教从茨温利的事业向约翰·加尔文的成就过渡成为可能。

2. 斯特拉斯堡

帝国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在宗教改革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斯特拉斯堡位于莱茵兰平原上，比瑞士联邦的其他城市更易受到攻击，处于帝国权力的范围之内，这对它来说是灾难性的。由于地处欧洲交通要道，斯特拉斯堡享有生机勃勃强劲有力的繁荣，因此，是一位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家（在布塞尔的《论基督之国》中）给予新教所谓的“艰苦工作的福音”第一次原则性阐述。从1482年《誓约》之时开始，该城的宪法便包括了寡头政治和民主之间的平衡的复杂结合，运作得相当良好，同时，频繁的选举保证了手工业同业公会多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与大多数城市相比，斯特拉斯堡的地方行政官有更多的监督权，同时，一项重要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该城出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约翰·斯图尔姆。

斯特拉斯堡的图书业很是繁荣，很早就参与了路德和梅兰希顿的著作的发行。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的先驱是马修·泽尔（1477年生），他于1521年以神父和听取忏悔的神职人员的身份开始在大教堂的侧室小教堂讲道。他的口才和他对积弊的抨击使教众群情激愤。当局禁止他使用教堂中殿的石头讲道坛（这个讲道坛是为凯塞尔斯堡的盖勒修建的），木工同业公会便为他制作了一个木质讲道坛，他在该讲道坛布道时听众超过3000人。1523年5月，沃尔夫冈·卡皮托到达斯特拉斯堡。卡皮托（1478—1541年）拥有法学、医学、神学三个专业的博士学位。他曾在巴塞尔任教授，还担任过大教堂传道师。他是杰出的希伯来语文学家，曾与伊拉斯谟合作，得到后者的敬重。他曾为美因茨大主教阿尔贝特主管秘书室，当过他的助理教士。也许一种更加坚忍不拔的性格本可能使这一职位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中起重大作用。但他一方面受不了天主教徒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不了来自维滕

贝格的谴责，便离职去了斯特拉斯堡，任圣托马斯大圣堂的教士长，过他希望的较为平静的生活。然而，他和泽尔一见之后便毅然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艰苦的宗教改革战争。不知何故，卡皮托属于那种“即将出现但却始终未出现的伟人”，因为他的才干逐渐降低，历史的裁决虽然给他以崇高的地位，但在宗教改革家中却属于二流人物。

卡皮托到达斯特拉斯堡时已是在学术上和教会里公认的杰出人物。布塞尔的情况则不同：他于同月到达斯特拉斯堡，贫穷，失业，默默无闻，但他在一年之内便成了“斯特拉斯堡教会的灵魂”。马丁·布塞尔（1491—1551年）曾在施莱斯塔特的优秀拉丁文学校学习，他早年便加入了多明我会，由于入会时太年轻，以至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解除了誓言。他的朋友比亚图斯·雷纳努斯把他引进了伊拉斯谟的著作，后来他成了伊拉斯谟的忠实门徒。此后，他于1518年在奥古斯丁会在海德堡的集会上听过路德的讲演，那天他被争取到改革事业方面，他对路德的热情之高以至遇到任何挫折也不稍减。1521年，他成为冯·济金根的助理牧师，在骑士暴动之后他到达维桑堡，再由那儿到斯特拉斯堡。泽尔对他印象很深，不久便请这位新来者讲解《圣经》，直到园丁同业公会请他在圣奥列利亚（St. Aurelia）教堂担任他们的神父。10月，美因茨的神学博士、多才多艺的学者卡斯巴·赫迪欧来到斯特拉斯堡。阿维尼翁的兰伯特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其结果是在《圣经》神学方面的感人合作，这是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的至高无上的需要。卡皮托讲解《旧约》，布塞尔讲解《新约》。赫迪欧先讲授希腊文，后转而讲授教会史和拉丁教父，并开始把奥古斯丁的著作译成德文。对《圣经》的评注一部接一部完成，其中准确的语文学解释成为神学阐释的基础。1525年，兰伯特评注了《何西阿书》，次年卡皮托评注了《哈巴谷书》。布塞尔则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书写几乎不可辨认的著作，其中有对《福音书》和《以弗所书》的评注，1529年，他出版了《诗篇》评注，后来共出了五版，加尔文赞之为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

1523年末，市议会（以苏黎世为典范）发布了一条命令，准许福音传道。布道师们紧接着便要求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但并非只有宗教改革家们才记得往事，斯特拉斯堡主教在大圣堂教士会的支持下避免了一场公开冲突。1523年末，马修·泽尔结婚，而且公开在大教堂举行婚礼。次月，七位著名的已婚神职人员被革除教籍，这一处罚的结

果只是表现了在该城主教权威的脆弱。1523年，传道师们发表了一项理由充分的申明，说明为何圣像应该废除；在斯特拉斯堡圣像之废除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别处那么多的暴力行为。1524年，对福音传道师管理下的教区作了重大改组，颁布了新的纪律，开始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高潮是建立了在约翰·施图尔姆领导下的著名学园。

按布塞尔的观点，政府的措施必与解释和对公众良心的教育配合进行，这是宗教改革中绝对必要的。对于只凭公法进行宗教改革的无价值，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因此，他于1523年出版了引人注目的小册子《人不应该只为自己生活，人应该为邻人生活》。他在1524年所作的清楚明白的理论阐述（*Grund und Ursach*）预示着礼仪改革的开始。1538年当新的城市秩序建立起来时，出现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献《论牧养》。布塞尔同意了地方行政官的改革法。但从1530年起，他对奥科兰帕迪乌斯教会应该有自主的纪律的主张深有所感。1530年，当局任命了一批教区委员，此事在当局和布塞尔对这一职分的解释上引起了一定的紧张。这些平信徒委员们认为批评传道师不违背他们的职责，他们欣然向议会报告，马修·泽尔[布道]唠唠叨叨，布塞尔的讲道太高深，大多数教众理解不了。但1534年布塞尔确实成功地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下述观点：这些平信徒委员代表了圣典里的一种职分，事实上他们是教会的长老。他对教会纪律的关心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也许他从路德的《德语弥撒》（*Deutssche Messe*）（1526年）得到了提示，也许提示来自宗派成员的秘密集会，他提出成立小型的基督教基层组织 *Gemeinschaften*，平信徒小组在这种组织中相互监护灵魂。尽管地方行政官员们不以为然，这些小组仍旧聚会，直到1550年。1529年4月20日，议会表决正式取消弥撒礼，184票赞成，1票反对，94票主张推迟取消，21人缺席。1534年在举行了一次由地方行政官主持的宗教会议之后，以传道师们提出的十六条信条为基础作出了最后决定，随后于1535年发布了一道有关纪律的条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789年。

部分地由于其位置，但更多地因为其统治者促进和解的倾向，斯特拉斯堡成为接纳宗教改革中的流亡者的主要城市。该城在减轻苦难方面有着崇高的记录。当农民军于1525年跨过阿尔萨斯之时，泽尔、卡皮托和布塞尔在阿尔特多夫会见了其领袖们。他们严厉的训斥得到反叛者们的尊重。但在后来发生的可怕后果中，斯特拉斯堡的市民们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特别在发动所有牧师妻子参加救助行动的泽尔夫人的带领下，给大量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在1529年的大饥荒期间，这一善举又得以重复，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救助。布塞尔在新教教会的三个方面（道、圣餐礼、纪律）加上了“爱”并非没有效果。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流亡者都来到斯特拉斯堡。在这份辉煌的流亡者名单上有：勒费弗尔、法雷尔、兰伯特、加尔文、卡尔斯塔特、茨维考的先知们、登克、赫策尔、萨特勒、考茨、罗特曼、胡布迈尔、霍夫曼、约里斯、塞尔维特、斯斐克费尔德、弗兰克。此外还有一批批不那么显要的流亡者来此避难。他们中许多人特别给泽尔和卡皮托留下深刻的印象，了解到他们并非都是狂热分子。泽尔和卡皮托在真正的宗教的内在性，在虔诚的生活的重要性方面和这些外来者看法一致。不过，也有足够多的顽固而凶残的狂热分子居然迫使当局采取行动，于1527年6月27日下令驱逐各教派成员，并威胁到给这些人以庇护的市民，但在以后数年，一再重申这一法令，表明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卡皮托似乎不止一次被他们的教义所陶醉，最值得注意的是为斯斐克费尔德的教义所陶醉。1529年，卡皮托重病，后来爱妻的亡故耗尽了他的精力。在为朋友找对象方面大有办法的布塞尔在一封致玛格丽特·布劳雷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开信”中，代人求婚，遭到那位令人畏惧的女学究的拒绝，迫使布塞尔另谋人选，终于为朋友赢得了性格较不开朗的寡妇韦布兰迪丝·奥科兰帕迪乌斯的心，她后来成为卡皮托的第二任妻子。但卡皮托一直陷于忧伤而不能自拔，1541年染上瘟疫病故。

1524年2月16日，提奥巴尔德在大教堂引进了一种德国弥撒礼。这是创造性试验的开端，在以后的10年里产生了24种有趣的礼仪。布塞尔起了主要作用。布莱特曼对布塞尔的礼仪中说教成分过多进行了批判，但我们必须记住，对他来说这仅是总体改革的一个方面，其中的每一点变革都必须伴以解释和教育。恢复道在布道和解经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首要的问题。传说布塞尔把大教堂里的祈祷书上的对神的名（*the divine Name*）——晚期经院哲学家们用微妙的辩证法就此相互攻击——的赞美之词涂掉，在原来的地方写上“我们的父”（Our Father）。像奥科兰帕迪乌斯一样，他在其圣餐仪式中为默祷作了规定。他给予教众唱赞美诗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人们声言对布塞尔而

言“教会是围绕赞美诗而建立起来的”，在那些年出版的赞美诗集的收藏品中最漂亮的是1541年的版本。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们和在阿尔斯泰特的闵采尔一道率先在早课和晚课仪式中使用地方话。鲁塞尔于1526年描述了这座城市里的崇拜仪式：

早上5时，在每一座教堂举行讲道和公祷，7时再次举行。8时，人们被召集到一起，但这次只在大教堂里，对他们再讲一次道。在宣读上帝之道以前和以后，都要唱诗，所唱之诗已从希伯来语的诗篇翻译成当地人的语言……在早餐后4小时人们又在同一教堂集会并用同样的方式上演基督的事工。

布塞尔的洗礼仪式试图避免罗马的和茨温利的仪式的极端做法，而他对基督教教育的关心使他比其他任何宗教改革家都更强调坚信礼的重要性。

他的两个有特色的话题是牧养和关于教会的教义。他追随路德和奥科兰帕迪乌斯，把教会的概念解释为圣徒的团体。他从预定、从在基督里被拣选的选民开始。但布塞尔认为，凭慈善行为使基督徒可以认为那些过着虔信上帝的生活并参加教会的崇拜和圣礼的人事实上属于选民之列，因此，执行包括排除不良分子领食圣餐在内的基督教纪律是可能的，这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性。他对《以弗所书》的阐释，特别是对第4章的阐释，强调了《圣经》里的神职的重要性，他认为神职分为四重：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在所有宗教改革家中，布塞尔最热心传教，玛格丽特·布劳雷尔开玩笑地称之为“[教会]合一的狂热分子”。布塞尔和卡皮托相信，在主要问题上的合一是紧要的，而存在的别的问题基督徒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或允许有分歧，这是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布塞尔能够写道：“避开信仰表白书，对弱者要有耐心。当全部信心都放在基督身上时，事情就稳妥了。并没有规定所有人在同一时刻要看见同样的东西。”

在关于圣餐礼的大论战中，他犯了两点不可原谅的过错，从而严重破坏了他作为调解人获得成功的机会：他未经公告便把自己的观点塞进了原先打算作为布根哈根和路德的著作的正式译本中，以至当他们在马尔堡会见时，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路德对他摇晃着指头说：“你这个无赖！”但当他读了路德1528年关于圣餐的信仰表白时，他认识到自己误解了路德，认为路德意指局部的、范围有限的临在，他于是确信有可能取得意见的一致，在马尔堡会谈失败以后仍坚持之。

在他看来，他可以用教父们的唯实论语言来表达一种真正临在的灵性的教义，他愿意说基督的身体和血真正分发给信者，未悔改者按自己的判断得到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不信上帝者得到的只是面包和酒。他虽然不愿意接受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有关圣餐的条文，并以巴克斯特式的欣然态度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林道）《四城信纲》，但他仍于1532年在斯韦福特，1535年在卡塞尔，奋力进行调解，终于和梅兰希顿一道实现了1536年维滕贝格协议的缔结，之后他仍继续在巴塞尔（1536年）和苏黎世（1539年）寻求和瑞士人达成一致。他和加尔文、梅兰希顿一道在沃尔姆斯、哈格诺和雷根斯堡与天主教徒会谈（1539年至1541年，1546年再次会谈），这些会谈尽管都破裂了，但他们和进行斡旋的神学家格罗珀、皮吉乌斯、孔塔里尼之间在称义和圣灵的工作这两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真正的谅解。

1546年，发生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军事灾难，雅各布·斯图尔姆只得跪在胜利的查理五世脚下为他的骄傲的城市乞求宽恕。这位皇帝不愿意和布塞尔提出的新信纲发生任何联系，并坚持要斯特拉斯堡签署他的临时协议。这位马丁·布塞尔断然予以拒绝。在他步入老境身体很虚弱的情况下，他在众多的邀请中挑选了最艰辛者——和家人一道冒险渡海到了那个遥远的、不文明的、落后的国家。在英格兰，他居住在剑桥，任神学钦定讲座教授直到去世。英王爱德华六世赐给他一个火炉，这火炉冒出的股股硫磺火焰让他想起欧洲大陆，抵消了剑桥附近的低地散发出的潮湿的雾气。为表示感谢，他献出一件高贵的礼物作为回报——论文《论基督之国》（*De Regno Christi*），这一高贵的文献总结了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25年的梦想与计划（其中大多数现已破灭）。该论文部分地是一篇实际的回顾，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读起来更像是17世纪的清教运动的绝妙预兆。最重要的是论文试图使基督的统治适应人类的历史，用的是政治家式的、先知式的有足够预见性的语言，令人敬佩。

临时协议结出了果实。当斯特拉斯堡的新教徒迎来了较为美好的日子时，在马尔巴赫和帕普斯的领导下不妥协的路德宗占了上风，布塞尔的工作为之黯然失色。所以，布塞尔的斯特拉斯堡从来都不能和路德的维滕贝格、茨温利的苏黎世和加尔文的日内瓦相提并论。在名声方面，他未能进入前三名。他太认真，缺乏幽默感，难以纠正地冗

长，这些都限制了他的著作的范围和影响。他用心良好，却惹怒了如此多的人，以致我们怀疑他气质上有某种缺陷。但他得到极大的称赞和真诚的爱，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是一个“人物”，在他流亡的英格兰也是如此。M. 斯特罗尔说，他具有一种“同化人的超凡能力”，他思想开通，明白真理具有多面性，这是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争斗的时代的所有猛烈的声音中，只有他向那些今日像他自己那样为了耶路撒冷的和平辛苦操劳的人欢呼致敬。

3. 日内瓦

在加尔文身上，法兰西给过深地浸染着条顿精神的新教增添了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品质。似乎怜悯之神预见到了冷酷的复仇之神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对法国的归正宗教会做些什么，因此从一开始便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主动权，使归正宗各教会的这个决定性的、超级的、持久的伟大礼物成为可能。

日内瓦的宗教改革之兴起和伯尔尼市的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繁荣、野心勃勃、富于进攻性，沃州地区的伯尔尼是强大到足以抵御萨伏依公爵和日内瓦的天主教主教的唯一城市，伯尔尼鼓动日内瓦寻求摆脱世俗宗主权和宗教的宗主权的统治，到1536年时几乎大功告成。在伯尔尼市，一般强大的贵族势力对变革起到了制动作用。但贝特霍尔德·哈勒（1492—1536年）和塞巴斯蒂昂·梅耶的活动导致了1528年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瑞士所有主要宗教改革家都参加了，卡皮托和布塞尔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大辩论的结果是弥撒礼于1525年2月7日正式取消，并正式通过进行宗教改革，因此改革迅速扩大到附近的骑士管辖区。在这一工作中担任领袖的人物有威廉·法雷尔、安托万·弗罗芒和彼得·维雷特；威廉·法雷尔（1489—1565年）是勒费弗尔的学生，学识平平，不切实际，但滔滔善辩，言词激烈大胆，他和安托万·弗罗芒（1510—1584年）是法国人，彼得·维雷特（1511—1571年）是瑞士法语区人，不久便成为洛桑的宗教改革家。法雷尔在对艾格勒和纳沙特尔宣讲福音后于1532年10月4日来到日内瓦，但不得不立即离开。弗罗芒留下来了，以开办一所现代语言学校为掩护，宣传改革。日内瓦的冲突就双方面来说都是暴烈而厉害的。天主教方面

行为之轻率令人难以置信，煽起了本来已经强大的反教权主义火焰，同时多明我会修士富尔贝蒂的鼓动招致了伯尔尼市议会站在改革派一边进行干预。1533年12月20日，法雷尔两次来到该城。1534年1月的一次辩论击溃了反对派，3月法雷尔获准使用方济各会的小教堂。主教试图使用武力制伏该城，结果迫使改革派表示他们和市民争取城市自由的事业休戚相关。[天主教方面]企图毒害改革派，反而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1535年3月和5月举行了公开辩论，天主教徒的表现令人惋惜。8月，该市各义会下令暂停弥撒。次年2月，通过了整顿公共道德和教堂纪念的命令。1536年5月21日，大议会在大教堂集会举手庄严宣誓按照上帝之道生活。改革派的胜利一直是迅速的，但领导人十分清楚胜利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正如加尔文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布过道。他们烧过圣像。但并没有真正的改革。一切都还在熔化锅中（*tout etait en tumulte*）。”两个月后当约翰·加尔文经过这座城市并被法雷尔拦截住（这是值得纪念的）时，这座城市的形势就是这样。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1509年7月10日生于努瓦永城，他的父亲是主教秘书，有足够的权势在自己的儿子12岁时便为他谋取到大教堂的圣俸作为他的教育经费。1523年，加尔文到巴黎大学求学，进入马尔舍学院。在那儿，他从伟大的马蒂兰·科尔迪埃学习拉丁文，养成了西塞罗式的精美的风格。后来，也许是在约翰·马若尔的指导下学习神学，马若尔是“现代方式”的著名倡导者。1525年，他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前往奥尔良，在杰出的皮埃尔·德·勒图瓦尔门下学习法律。也许就在此时，他开始在路德宗信徒梅尔希奥·沃尔马尔的指导下学习德语。但不久他便移居布尔日，那里有一个人文主义小组，加尔文于是全心全意投入优秀文学的学习中。1531年5月他的父亲去世，从此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走自己的路，于是回到巴黎，恢复了古典语言的学习，他在奥尔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写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书，出版于1532年4月4日。该书是塞涅卡《论仁》（*De Clementia*）的翻版，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人的作品，书中充塞的学识略嫌太多，引自古典和教父作品的典故虽使该书熠熠生辉，但有卖弄学问之嫌。这本书当然没有销路，但却是他的彻底的人文主义的明证，正如M. 文德尔所说：“加尔文一直或多或少保持了他1532年时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在以后数月间的某个时候他经历了一种心灵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是从优雅文学到神圣文学的理智上的过渡。他后

来在《诗篇》前言的谜一般的著名证言中如此写道：上帝“凭借一次突然的转化降服了我的心，使之驯服”。这时他交往了一批危险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此人于1533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正式演讲，引发了一起骚动。这篇演讲稿主要是引自路德和伊拉斯谟的文字的并不起眼的拼凑，主要由于其中对迫害的抗议而具有煽动性，现在看来加尔文似乎不可能参与起草。但结果却是包括加尔文在内的许多改革家东躲西藏。他逃到普瓦捷和昂古莱姆，然后到奥尔良，在那儿写作了他第一本神学小册子*Psychopannychia*。^[2]这本小册子是一篇讨论死者的状况的专题论文，该文暗示他认为古典思想和《圣经》里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合。1534年10月，张贴“标语”引发的愤怒致使加尔文离开这个国家，逃到学者之城、书籍和伊拉斯谟之城巴塞尔。在那儿他出版了一本小书。他没有让该城的大出版商出版这本书，而交给托马斯·普拉特尔的颇带业余性质的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一封致法国国王的大胆而优雅的书信，八开本，532页，书名简单地题为“基督教原理”，看起来像是又一篇篇幅相当长的初级读本。出版社和作者本人当时都不可能梦想到，他们给世人的是一部规范的宗教文献。他继而到了意大利，进入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宫廷，和流亡在此地的诗人同胞们交往。他似乎因紧急的家庭事务到过巴黎，返回时为绕过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布好阵式准备交战的军队，他作了一次大迂回，在迂回中偶然经过日内瓦。他的希望和计划全部在文学世界，现在却被粗暴地召唤到狂暴汹涌的实际改革的世界。只有法雷尔用他那最先知式的召唤苦苦哀求才使得他没有像伊拉斯谟那样拒绝。但是，他一旦接受召唤便永不动摇。

在日内瓦，加尔文在教堂里任读经师，悄悄地开始了他在该地的生涯。1536年10月初，他出席了在洛桑举行的辩论会。在令人疲乏的辩论快结束、听众都感到疲倦时，这时一位身材瘦削过分讲究的陌生人站了起来，凭记忆连珠炮似的说出了一长串引自教父的话以及其他种种引证，从容不迫，令人惊异，听众为之振奋，全神贯注，他们知道那天一位奇才出现了。

日内瓦市议会和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的一样决不愿意承认一种新的新教的教权主义。但加尔文和奥科兰帕迪乌斯及布塞尔都认为，教会监督自己的宗教纪律是至关重要的。1537年1月，他提出了重新组织教会的条款，还有一份信仰表白，其中明确提到纪律。于是法

雷尔和加尔文便卷入了一场和学者皮埃尔·卡罗利的长期而猛烈的争吵，卡罗利指控他们贩卖阿里乌主义，有不承认亚大纳西信条之嫌。争吵被带到了伯尔尼和洛桑的议会，最后以卡罗利大败而告终。虽然如此，在伯尔尼却引起了怀疑，当法雷尔和加尔文拒绝接受伯尔尼的礼仪时，怀疑达到了顶点；日内瓦市议会接受了伯尔尼的礼仪，传道师们大惑不解。同时，议会否认神职人员有权革除教籍。加尔文和法雷尔被驱逐出该城。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的停留期间（1538—1541年）硕果累累。有人说他到达那儿时是一位青年神学家，他回到日内瓦时已经是教会政治家了。他担任法国人的教会的牧师，在一个密集的社团中医治灵魂的疾病。他和阿尔萨斯的宗教改革家，尤其是布塞尔，进行实际合作，讨论神学问题，从中所学甚多。布塞尔对有关教会的教义和牧养的强调在他自己心灵中引起了共鸣。布塞尔此前就强调过有关预定的教义，早在1536年便以基督中心论为背景论述过这一问题。是布塞尔坚持了圣经里规定的神职，认为神职有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四种。斯特拉斯堡的礼仪是加尔文的较简单的礼仪的样板，同时两人对会众唱诗的价值和重要性意见一致。正如M. 斯特罗尔说的那样，我们一定不要把影响和模仿混为一谈，而加尔文把他学到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语言，极其清晰的语言。

他写作了一些重要的短论。《致萨多莱托书》是一篇优秀的辩护文章。1539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的修订版，增补了两章。1541年，他出版了该书的法语译本，译本被认为是法语文学杰作，法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圣餐礼小议》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说明文，具有和解性质，论点处于路德派和茨温利派两种极端之间。1540年8月，他和伊德蕾特·德比尔结婚。几周前，日内瓦市议会已决定请他回来。他对法雷尔抱怨说：“我甘愿受死一千次也不愿在那个十字架上每日受死亡的折磨一千次。”但他毕竟还是回去了，而且他和日内瓦的那种奇特关系——德·拉·图尔（De La Tour）把它比作有某种谋利目的之婚姻——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之时。地方行政官员们急于讨好他。他们给他分配了一座房子，著名的尚努安内街11号，还给他丰厚的薪俸。他一到达便立即带着一份改革计划去议会并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该计划，这样办事是他的特色。

《教会宪章》（*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1541年11月20日）说明加尔文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不同，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政治家，愿意接受让步和限制。圣典中有关教会和神职的教义是用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四重结构来说明的。争端仍然是纪律和革除教籍权。平信徒长老们由地方行政官提名。他们的集会就是教会法庭，但传道师和长老的集会由该城的四位地方行政官之一做主席。长老们可以行使一般的道德监督，但无地方行政官的同意与合作便无权实施制裁或革除教籍。直到1555年加尔文才得以随心所欲，自主行事。在这以前，在瑞士各教会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两派神学竞相争夺在沃州地区的控制权：加尔文的神学和茨温利的神学，前者在非宗教的纪律和教会的纪律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后者关于信奉上帝之地方行政官的教义在伯尔尼由埃拉斯都的前任沃尔夫冈·穆斯库鲁斯加以阐述。

加尔文不得不接受一些其他的修改：圣餐礼每季度而不是每月举行一次，举行授神职礼时不再按手，传道师为进行“兄弟般的忠告”而举行的集会每季度一次（加尔文的意图是每周一次）。议会仍牢固控制着任命教师、婚姻管理和审理公民犯罪的权力。加尔文出版了《教会祈祷和颂歌的规范》（*Forme des prieres et chants ecclesiastiques*），这是他早先在斯特拉斯堡的礼仪的修订。1542年，他发表了法文和拉丁文教义问答的修订本。他善于讲道，改革者在日内瓦定期举行的《圣经》讲道成了当地以及其他地方改革的主要媒介。但加尔文很关心教育，邀请了他能够邀请到的最优秀的教师，先是马蒂兰·科尔迪埃，后来是塞巴斯蒂昂·卡斯特里奥。约翰·斯图尔姆领导下的斯特拉斯堡的学院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加紧筹建，日内瓦终于在1559年建立了自己的优秀学院，狄奥多安·贝托任校长。在一个接一个的布告中，加尔文试图借助于一系列的措施把堕落的大众争取过来，让他们养成正确的道德习惯，这些措施触及生活的每一方面，执行时无论地位高低皆不得幸免。自然，加尔文树敌众多，而原先的压力集团则利用宗教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和卡罗利的事情使他对不正统的指控很敏感。1544年在一场尖锐的神学争执后，卡斯特里奥被驱逐，争执的问题是《雅歌》的作者是谁，但这只不过是借口，而不是原因。更严重的是塞尔维特被处火刑。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年）是西班牙人，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爱标新立异，由于这一癖好他至少作出了一项重大医学发现，但他危险地把

它用于对三位一体教义作批判研究，他写作的《论三位一体之谬误》（1531年）使同时代人不寒而栗，同时他自己陷入受异端裁判所审判的危险。否认神的名不仅是异端，而且是公开亵渎，一千年来的基督教帝国的法律上明文规定如此。他还写作了刻薄的文章来抨击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而加尔文公开地警告他，他如果在日内瓦露面将被处死。1553年他居然愚蠢大胆到在日内瓦的一个教堂露面，这一警告事实上得到了兑现。他被逮捕并判罪。加尔文试图改火刑为非火刑，这一让步只有吉尔伯特^[3]式的诡辩才能使之感动人；塞尔维特之死刑虽然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赞成，但对后世而言，似乎是加尔文的日内瓦历史上的最严重的污点。

加尔文在生命的最后数年统治了这座城市，是该城光荣而受尊重的领袖，他的羞怯的天性掩蔽了他颇有吸引力的友善，以至群众从未看见这点。日内瓦成为难民的伟大城市，成为福音教育和宣传的中心。如果在有些人看来，比如在约翰·诺克斯看来，它似乎是“基督的最完善的学校”，那么该城的慕道友，如像奥利金的慕道友，则不会忘记殉道的范围有多大。从日内瓦派出的神职人员训练有素，遵守纪律，忠诚事业，他们是新教中最接近耶稣会的一批人。数年之内，便有161名牧师被派往已经是“十字架之下的教会”的法兰西归正教会。

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一直被称作新教的“神学大全”。但它对于学者而言，远不止是一本神学概要。对救赎机制的这一解说也是在人世间的教会好战分子的纲要，基督教武士的手册。1543年，新拉丁文版已增补至21章。1550年，该书被分为节和段，此时全书共33章。1559年终于出了定版，共80章，增补多达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些部分是短命的，而和奥西安德、威斯特伐尔、塞尔维特的论战有损该书的形象。但在这儿，最终展现出的是加尔文全部的崇高的智力资源，是他的圣经知识和教父知识的完整范围（书中引述奥古斯丁达341处）。

加尔文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研究教父的学者之一，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圣经神学家之一。《圣经》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尽量利用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在证据中抓住每一点宝贵的闪光，以便接近这些400年前的男男女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他们做的正是这点：了解圣洁的先知和使徒，聆听主的道，而且他们这么做时怀着更加强烈的

感情，把更多的东西押在了赌注上。加尔文每周两次讲解《圣经》多年，出版了除《启示录》外的对《新约》各书的评注，对《旧约》许多书卷，也出版了评注。他对以前的宗教改革家们那里凡是有益的东西，他一概吸取进自己的著作中。他之吸取路德的思想颇像圣托马斯之浸透奥古斯丁的观点，尽管他在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上，在圣餐的教义上与路德有分歧。他还从布塞尔和梅兰希顿学到许多东西。

以往有一个观点认为加尔文的主导思想是上帝之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当这一观点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恩典来加以解释之时也是如此，但这一观点已经为神学研究的成果所修改，近年来的神学研究已使其基督中心论处于突出位置。他把新教二十余年的争论已开始拆分开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关于道和圣灵的教义：他的伟大的口号是，“唯有信仰唯有神恩”；“唯有《圣经》”；“唯有上帝之荣耀”。关于预定的教义必须放在中世纪后期对这一问题的阐述的环境中去看待，而我们几乎不能把后来的新教徒对它的解释归咎于加尔文。此外，如果我们认为他的教义有悖常情而且谬误，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在加尔文看来上帝之旨意中费解的东西只不过是过分强烈的光造成的黑暗。加尔文在一些段落中以对不可言喻的善的令人难忘的敬意来论述上帝之无限的恩赐，这些段落达到了庄严而动人的美，即使他有几分缺乏路德的温柔和喜乐。他的严谨虽然是真实的，但却有几分缺乏茨温利的那种快乐的坚实。

在关于圣事的论战中，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加入之时论战最初的仇恨已经过去，而布塞尔已经使调解的希望随时有实现的可能。他坚持（圣餐中）真正的、精神的临在，在其中凭信仰升入天国的信者接受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力量和品德。1539年至1541年，他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一道举行会议，他和他们一道分享而他本人从未停止抱这样一个大胆的希望：建立一个也许能把所有分裂的教会联合起来的自由的、基督教徒的议会。他和许多国家的宗教改革家们的通信显示出异乎寻常地不褊狭，对于和他自己的大不相同的情况和性格，他具有少见的天赋去设身处地加以理解。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加尔文是第二代宗教改革家，是后继者中的巨人。新教运动已经减速，最初的动力已经消耗，已经出现了分裂、疲惫、泄气。加尔文之后新教再次运动起来，高歌猛进，准备为

自由发起新的打击。他恢复了基督徒情谊的活跃。他复活了勇往直前去征服并一定要征服的大胆想象。

二 再洗礼派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及其主要支持者，如梅兰希顿、布林格、布塞尔等辈，发现自己不仅卷入和罗马的论战，而且还要和观点比自己更激进者论战。他们不得不同时在两翼作战。当他们仍然在和罗马当局进行斗争时，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左翼出现了一系列独立的思想家。浮现在我们脑际的有卡尔斯塔特、登克、弗兰克和斯文克斐尔德。还有一些相当大的团体，正如麦金农所说，“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群教派”。这些分布颇广的群体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否定婴儿受洗。他们认为这一仪式只应在表白信仰以后施行。他们对《新约》的理解导致他们认为给幼儿行洒水礼不是真正的洗礼，所以对接受这一圣事他们毫不迟疑，并对他人施行，作为个人悔改和信仰的一种表征，不管幼小时可能有什么别的经历。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这是荒谬绝伦的。洗礼此前一向被认为是不能重复施行的。再洗礼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当这种做法再加上别的错误和危险的见解和倾向时，[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主要宗教团体都认为自己有正当理由施加最严重的惩罚。再洗礼派这一名称——是茨温利最初使之流行起来的——成了普遍辱骂的词语，该词充塞着一种恐惧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情感方面的内容。

在16世纪，甚至在100年以后，这一名词用得如此宽泛，以至今天仍不容易确定哪些人和人群应该包括在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对象之内。宗教改革是如此深刻的剧变，在人们的观点和习惯方面的变革如此之大，以至无论如何在一些地方都会出现过激行为和反律法主义倾向。

“再洗礼派”受到的野蛮对待，特别是1529年以后受到的野蛮对待，助长了受迫害者中的狂热和反常的倾向。只有现在才渐渐有可能尝试对运动的过程和运动的最优秀代表人物为之奋斗的原则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评价。

我们应该从何处开始叙述？从1521年维滕贝格的茨维考的“先知”们和托马斯·闵采尔开始，还是从1523年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巴尔瑟萨·胡布迈尔和瑞士兄弟会开始？认为在维滕贝格抨击婴儿受洗是再洗礼派运动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开始，如此主张的人有下

述理由：茨维考的先知们似乎鼓吹过建立接近于政教分离型的教会，尽管他们很可能从未对信徒施过洗礼。闵采尔以宗教革命家的身份开始，他和路德就圣典、信仰和洗礼问题展开论战。如果不是更早，也是在1524年，他肯定已经和瑞士的激进派有了一定的接触，虽然他们拒绝接受他的暴烈的方法。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后来有许许多多人同情再洗礼派的地方煽起了广泛的不安定和怀疑情绪。^[4]闵采尔的中尉之一汉斯·胡特后来成为再洗礼派的著名宣传家；农民军在弗兰肯豪森战败后他躲过了大屠杀。但这一切只是对再洗礼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的细流，而不是最重要的主流。那些把注意力集中于苏黎世发生的事件的史学家们发现该地是再洗礼派运动的源头，运动实际上是从那儿扩散开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肯定是正确的。

茨温利于1523年元月在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进行公开辩论后确立了自己苏黎世的地位。^[5]在数月之内，他和自己的一部分支持者就在什一税和利息、教堂的圣像和弥撒礼的改革诸方面，他们究竟应该走多远展开了争论。胡布迈尔断言，在那年5月茨温利承认过还未接受过信仰教育的儿童是否应该受洗是值得怀疑的。但在10月举行“第二次辩论”时，那些主张更激进的改革和教会秩序（努力更加严格地恢复《新约》中的秩序）的人未能获胜，虽然他们由康拉德·格雷贝尔和西门·斯通普夫领头；茨温利称格雷贝尔为“高尚而有学识的青年”，斯通普夫原先是方济各会修士。然而，在1524年洗礼问题越来越使这些人及其朋友们不安，他们的关切也许由于和卡尔斯塔特（当时他已被逐出萨克森）、马丁·塞拉利乌斯（Martin Sellarius）、闵采尔的接触加深了，接触方式要么是会见，要么是通过写作。在苏黎世城和周围地区一些人无视市议会的命令，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受洗。1525年1月，格雷贝尔、菲力克斯·曼茨（曾任神父，自1519年便一直支持茨温利）、威廉·罗依布林（也曾任神父）和茨温利与布林格当着议会的面讨论了该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但未得到满意的结果。有未受洗礼孩子的家庭得到命令在一周内让孩子接受洗礼，不从命者将受驱逐出境的惩罚。

数日以后，也许是1525年1月21日，一小群朋友在举行例行的《圣经》学习会时采取了两个决定性的步骤。乔治·布劳洛克，另一位前神父，在表白自己的信仰后由康拉德·格雷贝尔以注水方式给他施了洗礼。然后，他给学习小组的其他人施了洗礼，约有15人。此后不

久，他们一道举行了简单的圣餐礼，认为这是纪念基督所受苦难和受死，这是一次团契餐，只有信徒才应分享。此时在苏黎世，弥撒礼仍在举行。这批人决定他们不能再受茨温利和议会的支配了。

数日之内，在沿湖东岸5英里的一座村庄措利孔也举行了洗礼。议会试图通过逮捕和监禁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一场群众性的信仰复兴运动已经被触发起来了。其详情难以理清，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这个小组的领袖们在附近的乡村到处走动。到复活节时，在圣加尔和瓦尔茨胡特，数十人，也许数百人，受了洗，格雷贝尔和布劳洛克显然是在河流和溪水里用浸入水中的方式给男男女女施洗礼。教堂没有人去了，仪式在私人住宅里和田野里举行。在同道们的布道中，偶尔可以听到《启示录》的调子，不过这并非整个运动的特点。群众的激动不可能和德国的农民起义全然无关。1525年5月，路德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反对农民的小册子，茨温利也发表了一本小书《论洗礼再洗礼和幼儿洗礼》。1525年下半年，格雷贝尔、布劳洛克和曼茨都受过监禁。当过隐修士的青年米夏·萨特勒被驱逐出该州。胡布迈尔被逐出瓦尔茨胡特，后在苏黎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的洗礼观点是错误的，后来又撤回认错，再后又一次认错，最后终于获准离开该市。但运动并未被阻挡住。1526年5月，议会决定有必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下达了“毫不留情地”淹死再洗礼派的命令，大约同时，教区出生登记员得到指令要尽力保证所有婴儿受洗。1526年11月，再次颁布淹死再洗礼派的法令，而且听[再洗礼派]布道的人也受到处死的威胁。热心的格雷贝尔已于数月前去世，要么死于狱中，要么死于瘟疫。11月，曼茨和布劳洛克再次被捕。1527年1月，在茨温利知道并同意的情况下，曼茨被捆在一个囚笼上投入利马特河淹死，至死英勇无畏。性急如火的布劳洛克虽然也许要对再洗礼派运动在措利孔及附近的传播负主要责任，但因为他是该州的公民，所以未将他处死。但被沿街鞭打后驱逐出境。再洗礼派运动在邻近的一些谷地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但幸存下来的领袖们逃往别处。再洗礼派运动在瑞士分散地、秘密地继续到17世纪，但已不再对当局构成严重的问题。

格雷贝尔及其同道们很少有机会详细拟定完整的教会制度。然而，他们说明了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后来出现在别的地方。他们主张克勒所谓的“内在的、使徒式的圣经主义”，断言他们只不过在把茨温利本人的以圣典为依据的原则推进到其符合逻辑的结果而已。瑞士

再洗礼派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信徒受洗，“自愿的”教会，强调登山宝训的戒律，拒绝宣誓，反对战争和诉讼，坚持影响深远的物质上的相互帮助。再洗礼派的兄弟们是否实行了财产公有似乎不能肯定，但无疑他们朝此方向有所进展。

尽管起源于茨温利和布林格的对再洗礼派的猛烈谴责广为流传，但苏黎世地方行政官们的行动助长了再洗礼派运动在别处的传播。再洗礼派传教士被逐出苏黎世，他们穿过格里松领地，进入意大利北部，在那儿他们的教义为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反叛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些人最终加入了索齐尼派。^[6]劳洛克一路来到蒂罗尔，证明自己福音传道很成功，给数以百计的人施洗礼，1529年被捕并烧死。蒂罗尔直到该世纪末都是再洗礼派模范的传教地，力量的蓄积库，这些蓄积的力量从雅各布·胡特（布劳洛克的继承人）时起便被引向摩拉维亚。

胡布迈尔于1524年给他原先的朋友约翰·埃克发了一封题为“关于异端分子和烧死异端分子者”的值得注意的呼吁宽容的请求；胡布迈尔作为信徒由威廉·洛依布林施了洗礼。他在被逐出苏黎世后一路来到斯特拉斯堡。1526年6月，他出席了一次该城再洗礼派同情者的重要集会并给汉斯·登克施了洗，此人在圣加尔目睹过一些人的洗礼并被托马斯·闵采尔的著作所感动。登克被他的一位同时代人描述为“再洗礼派的阿波罗”，但他和运动的主流联系很可能是短暂的，不过却是密切而明确到为汉斯·胡特施洗的程度。登克是一个品格高尚的青年，超凡脱俗，相当有学问而且大有个人魅力，他逐渐对宗教形成了一种更加独特的神秘的看法，在他于32岁英年早逝前不久对自己由于洗礼而放弃了自己的精神使命表示后悔。就在同一时候胡布迈尔又再跋涉300英里，到达了摩拉维亚的尼科尔斯堡。

摩拉维亚证明是再洗礼派取得成功的主要地区之一。该地南部的居民大多数有德国血统。胡斯和布拉格的哲罗姆的著作仍然被人们珍藏。路德派的宗教改革的一般原则和实践已经在那儿确立。胡布迈尔迅速成为一场激进的民众运动的领袖，把该城主要福音传道师、利希滕施泰因的两位伯爵莱奥纳尔德和约翰以及当地其他一些贵族争取到自己的观点方面来。一年内便至少有6000人成为运动的支持者，虽然很可能在他们受洗前几乎没有接受教导。印刷业人士弗洛绍尔从苏黎世到来给再洗礼派小册子的传播以机会。可是，不间断的成功延续的

时间是短暂的。已经养成了强有力的个性的汉斯·胡特动身到尼科尔斯堡。他并未抛弃从托马斯·闵采尔接受来的观点。邻近地区已有一些人试图实行财产公有，拒不相信地方行政官，拒绝为战争纳税，尽管土耳其人的威胁就在附近。胡特和他们的领袖雅各布·维德曼——“独眼龙雅各布”——通力合作，不久便出现了一场启示主义的千禧年运动，使再洗礼派运动的力量发生分裂。胡布迈尔坚决反对一切狂热，但许多原先追随他的人被胡特的疯狂热情席卷而去。当利希滕施泰因的领主把胡特监禁起来时，胡布迈尔赞成他们的行动，他在一本小书《论剑》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该书以圣典为依据清楚而有节制地为支持地方行政官进行了辩解。但帝国当局正在追捕胡布迈尔，不出数周他及其妻子就作为囚犯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旅程。胡布迈尔有学识而善辩，曾担任要职，包括有雷根斯堡主教座堂的传道师，被约翰·法贝尔认为是“再洗礼派的守护神和第一位创始人”。他是再洗礼派的最知名的领袖。1528年3月10日，他作为异端分子被处火刑，三天后他的妻子被投入多瑙河，脖子上绑着一块大石头。胡布迈尔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上加上“真理不死”这句名言，通过这些著作他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汉斯·胡特越狱逃走，回到奥格斯堡，但不久又被抓获，在神秘的情况下死去。在摩拉维亚，持剑的人（*Schwertler*）和持长枪的人（*Stabler*）之间的争论继续进行，前者准备接受胡布迈尔对地方行政官的态度，后者则追随维德曼。莱奥纳尔德·利希滕施泰因鼓励后一派离开他的领地。他们迁居到奥斯特利茨，不久雅各布·胡特尔和来自蒂罗尔的相当大数量的再洗礼派加入到他们之中。胡特尔是一位明智的领袖，颇有组织才干，不迟于1523年，在一次新的迫害浪潮中他们被押往因施布鲁克烧死。他们的居留点的数量不少于86个，大多数居留点有数百人，有一个人数多达2000人。这些再洗礼派证明自己是具有节制而勤劳的殖民者和手工业匠人，实行财产公有和严格的宗教纪律。1536年对他们的攻击（主要起因于明斯特发生的事件）逐渐平息，但10年后重新开始。1547年到1564年这一时期在胡特尔派编年史上被书之为“受大迫害时期”。布鲁德霍菲（*Bruderhufe*）的居住者被驱赶于摩拉维亚和匈牙利之间达一个世代或更久。

这些摩拉维亚的再洗礼派社团的故事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悲惨的，但也充满着浪漫和光荣，这浪漫和光荣产生于其男女成员为自己的信

仰甘愿吃大苦受大难的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16世纪中叶，胡特尔派和波兰以及欧洲东南部的再洗礼派团体有了接触。从意大利北部来的难民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常有像莱利乌斯·索齐尼乌斯和彼得·戈内西乌斯（Peter Gonesius）这样的具有自由神学观点的人拜访他们。1540—1560年间在萨洛尼卡定居下的那个小小的再洗礼派难民团体也知道他们。1567年，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便是在胡特尔派中去世的。他们与中欧和西欧的再洗礼派也有相当经常的接触。

16世纪20年代后期，当布劳洛克进入蒂罗尔和胡布迈尔沿多瑙河谷旅行时，瑞士兄弟会的其他成员则顺莱茵河而下。斯特拉斯堡对许多难民而言成了他们的“希望之城”，“公义的庇护所”^[7]。尤其是卡皮托最初对激进派的观点抱同情态度，他听见费利克斯·曼茨被淹死的消息时深为震惊。布塞尔本人一度曾表现出对成人受洗礼是否更不好持怀疑态度。有6年或7年时间，斯特拉斯堡是就宗教改革家们提出的神学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轰轰烈烈的辩论的场所。在这期间，可以在那儿发现威廉·洛依布林、迈克尔·萨特勒、路德维希·赫策尔、汉斯·登克、皮尔格兰姆·马尔贝克和梅尔基奥尔·霍夫曼，还可以发现和再洗礼派运动主流联系较不密切的人士，例如卡尔斯塔特、弗兰克·斯文克斐尔德和塞尔维特。大家都明白瑞士的运动提出的挑战。1530年弗兰克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存在三种不同的有大批信徒的信仰，即路德派、茨温利派和再洗礼派。”到1533年时，布塞尔和卡皮托在反对瑞士兄弟会的分裂主义倾向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次年以奥格斯堡信纲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斯特拉斯堡新教教会，奥格斯堡信纲责成给婴儿施洗礼，在其条款中有5条特别谴责再洗礼派。但在当时的斯特拉斯堡人口仅2万多点，再洗礼派就约有2000人。

萨特勒、马尔贝克和霍夫曼须进一步谈及。1525年被逐出苏黎世的迈克尔·萨特勒是少数考虑过把许多地方涌现出的小教会团契按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人之一。他作为卡皮托的客人在斯特拉斯堡短暂逗留后，定居于内卡河谷，他把一种个人的清教主义和热烈的福音传道热情以及一贯的和平主义结合起来。“假如土耳其人果真来了，不应该抵抗；因为[《圣经》上]写着，你们不得杀戮。”1527年初，再洗礼派于沙夫豪森附近的施拉特集会，通过了一份他们称之为《上帝之儿女关于七条信纲之兄弟联合声明》，现在更常称《施莱特海姆信

纲》。无论萨特勒是否是起草人，该信纲都代表了他的观点似乎无大怀疑。在施拉特通过的信纲如下：

1. 洗礼只施予“已经知道忏悔并在生活中改正……和生活在耶稣基督之复活里的人”。

2. 革除教籍（即逐出教门）施予“有时失足而陷入错误和罪里”的人，但只应在两次私下劝诫加上一次公开劝诫，即第三次劝诫之后施行。革除教籍应该在进圣餐之前施行，俾使教会一起坐下开会时是纯粹而合一的。

3. 圣餐只应由已经受洗者领食，圣餐主要具有纪念性质。

4. 远离世俗，其含义是“远离一切天主教的和反天主教的著作和教会仪式、会议和教堂集会，远离酒吧、市民事务，不作言不由衷的承诺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所以，毫无疑问，一切非基督教的、魔鬼的暴力武器，诸如剑、盔甲之类及其使用，都应离开我们”。

5. 上帝之教会的牧师必须是为“信仰以外的人”公认的正直的人；牧师的职责是“在教会里读[经]、劝诫和教导、警告、执行纪律、逐出教门、领导祈祷……进圣餐时将饼拿起，并在一切事务里关照基督的身体；牧师应得到教会的支持”。牧师如果被放逐或殉难，“应同时按立另一位牧师，以便上帝之羊群和人民不至被毁灭”。

6. 剑，按规定应由世俗地方行政官用于惩罚恶人，基督徒即使为自卫也不可使用。基督徒也不应诉讼，不应承担地方行政官的职务。

7. 根据《马太福音》第5章第34节和《雅各书》第5章第12节，严禁起誓。

《施莱特海姆信纲》在16世纪时广为流传。该信纲通过后数月内，手抄本便到达茨温利手中，他把这些条文收入他的作品 *In Catabaptistarum Strophas Elenchus*（1527年7月）中。加尔文在1544年发表其著作《简短训导》时似乎案头已有一本印刷的法文译本。德文、拉丁文和荷兰文译本也相继问世。这7条代表了很可能是欧洲各地大多数再洗礼派的观点。在施莱特海姆集会后不久，萨特勒及其同道便被捕并残酷处死。

皮尔格兰姆·马尔贝克受过良好教育，出生于蒂罗尔，职业是采矿工程师。他的精神历程把他从天主教带到路德宗，又从路德宗到再洗礼派。他在斯特拉斯堡3年，在此期间成为该城的一位主要人物，他因其专业技能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1532年他因为发表反对婴儿受洗的言论和著作而遭放逐，在其余生之年他是内卡河与乌尔姆城之间的再洗礼派诸社团的领袖。他和斯文克斐尔德进行文字论战若干年，后者对教会的外在的仪式失去了信仰，鼓吹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督—神秘论。马尔贝克的著作 *Vermanung* 为准备受洗和领圣餐的人提供教导。该书可和彼得·里德曼大约同一时期写作的作品《我们的宗教、教导和信仰的解释》相比较，里德曼从1542年至1556年在摩拉维亚任“首席牧师”。这两本书都表现出对使徒信经的忠诚，强调出自个人虔诚的严格遵守纪律的生活，对洗礼和圣餐的态度在本质上和瑞士兄弟会和《施莱特海姆信纲》的态度相似。

梅尔希奥·霍夫曼被描述为“再洗礼派的怪才”。最初听说此人的姓名时，他是瓦尔茨胡特附近地区的毛皮加工匠，很早就被卷入宗教改革运动，但一直有独立倾向，不久便和茨温利发生冲突。1523年，茨温利在给瓦狄亚努斯的信中写道：“那个加工毛皮的饭桶在这儿开始扮演福音传道师的角色了，他对我提出了异议。”霍夫曼只有在宣传自己的观点时才感到快活。他一路来到维滕贝格，路德鼓励他继续往前到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8]到1529年时他已在丹麦和布根哈根争论，他说路德只不过是“开早期阶段的使徒”，是将迎来教会的最后阶段的更加激烈的变革的先驱。从丹麦，他到达斯特拉斯堡，在那儿加入再洗礼派。议会命令他放弃布道，不要管闲事，但他仍在德国西北部和低地国家从事广泛而且成功的传教工作。从一座城市被驱逐，他又在另一座城市出现，他先知式地宣告主的日子即将来临，组织并牧养不断增多的再洗礼派教会，宣讲一种非正统的基督论，这种基督论他似乎直接取自或出于误解取自斯文克斐尔德。霍夫曼说，基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的，而不是“由”她所生。“正如天上的露珠落入蚌的壳，在那儿变成珍珠，但没有从蚌壳获取任何东西，圣灵，上帝之道落入玛利亚的子宫并在那儿自发成长为灵性的珍珠，耶稣基督。”佛兰德地区的世俗当局和宗教当局当时仍忠于罗马。它们烧死一些再洗礼派以示警告。随着迫害的增强，霍夫曼对自己的传教及其高潮即将来临的信心反而日增。“梅尔希奥派”的数量日益增大，他们的领袖宣布斯特拉斯堡已被挑选为新耶路

撒冷，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洗礼将由144000名义人从这儿传遍整个地球。这一伟大的应验将于1533年开始。霍夫曼怀着不同于闵采尔和汉斯·胡特的确信，自动重演了以利亚的角色，回到斯特拉斯堡，他到达时正当布塞尔和卡皮托终于促成了对再洗礼派的谴责。他立即被投入监狱。斯文克斐尔德勇敢地友好对待他，但斯特拉斯堡当局态度坚决。霍夫曼被严密监禁，10年后死于狱中。

霍夫曼假如仍有自由，悲剧后果是否可能避免？结局是否更加悲惨？谁能说得准？他之被监禁并未阻止住他鼓动起来的兴奋的期盼。迫害反而煽起了狂热的火焰。詹·马蒂斯，哈勒姆的面包师，成为尼德兰的领袖。在阿姆斯特丹周围，在坎彭、兹沃勒和代芬特尔，人们成百地皈依再洗礼派。当局施加的惩罚加重时，那些饱受折磨的牺牲者——其中许多是单纯而虔诚的信徒——决定前往比较友好的地区寻求安身之处。闵斯特市看来有希望提供自由。他们租了30只船，希望沿海岸航行到埃姆斯河口。这些船要么遭拦劫，要么沉没，要么被迫退回。一些人阖家带着全部财产从陆路出发，被军队追杀。仍滞留在代芬特尔的再洗礼派被逼入绝境，于1534年12月试图夺取这座城市的控制权，但未成功。在莱登和阿姆斯特丹也作了类似的尝试，均未获成功。1535年初发生了一件事，后来常被传说，整个再洗礼派运动的名誉都为之蒙受损失。7名男子和5名女子脱光衣服，他们说，这是一种象征，表示他们说的是赤裸裸的真理；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街上边跑边喊叫：“哀哉！哀哉！哀哉！上帝发怒了！”他们遭到围攻并被打死，迫害随之上升到一个新的强度。皇帝颁布敕令：给他人再施洗礼者处以火刑，再受洗礼者或窝藏此等人者处以死刑，妇女犯有以上情节者活活烧死。数以千计的再洗礼派遭受了这些惩罚。

这些悲惨事件不能和同一些月份在闵斯特发生的事件分割开来。市议会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的支持下任命了一位福音传道师伯恩哈德·罗特曼，此人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富有的布匹商人贝恩哈德·克尼珀多林当霍夫曼在瑞典时便和他交往。当罗特曼开始对婴儿受洗表示怀疑并赞成基督徒间某种形式的财产公有时，一般的平民百姓支持他，反对当地地方行政官员。大约同时，杨·博克尔松，杨·马蒂的好友，设法从荷兰到达闵斯特，数月以后詹·马蒂本人也到达该市。再洗礼派控制了市议会，克尼珀尔多林格成为市长之一。马蒂不久便成为控制该市的人物。他下令一切不信教者，即是说未受洗的

成年人，不得在该市居留。离开意味着冒落入罗马主教派来夺取该城的军队手中的危险。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大批的人受洗的场面。随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强制实行财产公有。林赛谨慎地说过：“开初只不过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大量的基督教慈善行为，后来，能用于支持一座被围困的城市的全部人口的所有东西，一概加以征用。”这句话应予以注意。

但是，1533年4月，马蒂和他的20位伙伴冲出城去攻击围城的部队，但战败被杀死。领导权转入年轻的杨·博克尔松（莱登的约翰）手中。他解散了议会，任命了12位长老统治这座城市，并宣布自己为国王。他被描述成能干而有辩才的人。他是裁缝，到处流动打短工，闵采尔的小册子对他影响颇大。城内的情况越来越艰难，但仍然成功地坚持防守。1534年7月，博克尔松采取了措施，不仅他自己的名誉加上闵斯特的再洗礼派的名誉因此永久扫地，而且给各地激进派的反对者们提供了辱骂的新武器和镇压的新借口。当时在闵斯特仅有1700名男子，妇女的人数为此数的4倍，儿童有几千。博克尔松建议允许男子娶数位妻子，他从《旧约》引经据典证明此举是正当的。传道师和长老们迟疑不决达8天之久，但最终同意了。博克尔松本人娶妻16名，其中有他的朋友马蒂的遗孀。城内有人抗议。围城的军队更加强大。1535年夏季，一位叛变者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守城者在克尼佩尔多林格和罗特曼的带领下齐集市场作殊死的抵抗，但被打垮。城市遭到抢劫，市民遭到屠杀。博克尔松、克尼佩尔多林格和马蒂的遗孀，还有少数其他人，被留下活口，经折磨后被公开处决，他们的人头被挂在教区教堂的塔楼上示众。

关于闵斯特发生的事情，许多世代流传的描述多有夸大和歪曲。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只能在全欧洲引起一阵恐怖的浪潮。布林格尔说：“通过闵斯特的反叛，上帝打开了政府的眼睛，所以没有人会相信甚至那些声称自己无辜的再洗礼派了。”在瑞士各州，在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在德国和低地国家，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消灭再洗礼派的努力变本加厉。路德派从再洗礼派的竞争中有效地解脱出来，虽然路德派因此比从前更加是王侯和中产阶级同情的宗派。估计在闵斯特陷落后10年间单在荷兰和弗里斯兰被处死的再洗礼派就不下30000人。“在教会史上，没有别的争取精神自由的运动有这样多的人殉难。”^[9]

1534年，当闵斯特仍被围困之时，当时亡命于奥尔良的青年约翰·加尔文写作了他的第一篇神学论文的前言，该文驳斥了灵魂在[人]死后要到末日审判时才有意识这一古代异端，这种观点，他说，为“一些再洗礼派的渣滓”所复活。该观点肯定当时在许多激进派中流行，一个世纪之后在英国也有人倡导。加尔文在其《基督教原理》中对再洗礼派毫不宽容。按他的说法，他们是“疯狂的”，“为上帝所摈弃的妖精”，“魔鬼”，他不仅抨击了他们对洗礼的看法，而且还抨击了他们对誓言和地方行政官的态度。那些依靠“内在之光”的人同样使他厌恶。1544年，在胡布迈尔的一篇短论（有法文译本流传）的启发下，加尔文发表了《短训》。塞尔维特之被捕、受审和处火刑于1553年发生在日内瓦。他和再洗礼派的任何主要团体都无联系，可是他在其著作《基督教的恢复》中说过：“我称婴儿受洗是极令人厌恶的事情，是对圣灵的压制，对上帝之教会的蹂躏，使整个基督教信仰混乱，宣告基督造成的新生无效，将他的整个王国放在足下践踏。”在1559年出版的《基督教原理》的定版中涉及再洗礼派的文句属于最激烈的，也许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在1548—1551年间，在英国至少出版了4种反再洗礼派的小册子。其中3种是约翰·韦龙的作品，韦龙是法国人，1536年定居于剑桥，1551年在英国教会受按立。这3种小册子以利奥·于德对布林格尔谴责激进运动的著作的增补版为依据写成。第4种小册子是加尔文5年前发表的《简短训导》的英语译本；该译本也可能是韦龙的作品。此外，约翰·胡珀在他的《基督之道成肉身的教训》中批评了霍夫曼的基督论。[当时]爱德华六世在位，英国的宗教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10]在这几年间，彼得·马尔蒂尔和约翰·厄·拉斯科（John à Lasco）在这些年间访问过英国，1551年布塞尔死于剑桥。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也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国家，家庭派的领袖亨德里克·尼古拉斯很可能也在英国。关于与欧洲大陆出现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这儿也有许多辩论。克兰麦的《宗教四十二条》（初稿写于1549年）至少有3条——关于世俗地方行政官；关于基督徒的财产，这些财产不是公有的；关于基督徒的誓言——是直接针对再洗礼派中某些宗派的观点的，而且有不少于17条可能作类似的解释。

在何种程度上再洗礼派在英国已有了立脚点？这一问题难以回答。在东部和东南部各郡肯定有许多持激进观点的团体。1550年，提

议授予年轻的约翰·诺克斯罗切斯特主教职，正如诺森伯兰致塞西尔的信中所言，其目的是希望他“不仅激励坎特伯雷主教，使他活跃而锋利——这是他需要的，而且要大挫最近在肯特郡出现的再洗礼派的锐气”。约翰·胡珀已经就再洗礼派在肯特和埃塞克斯两郡制造的麻烦，以及他在伦敦开“讲座”时出现捣乱分子致函布林格尔。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库奇的人看来是第一个冒险印刷材料为再洗礼派辩护的英国人，他遭到威廉·特纳和诺克斯的回击。1550年5月，琼·鲍彻，一位出众的妇女，曾在肯特和埃塞克斯工作达10年或更久，在经克兰麦、里德利和其他宗教改革家审讯以后被烧死。数月后，乔治·范·帕克，伦敦异乡人教会的成员，遭到类似的命运。这两人都和大陆有联系。

再洗礼派最初出现在荷兰难民团体中。他们的观点在英国人中传播有多广不能肯定。20年前，沃哈姆大主教提醒过他的同胞警惕这类激进观点，亨利八世发布的公告有直接提到再洗礼派者。1535年或1536年，与闵斯特陷落同时，有14名荷兰人被烧死，其中2人在史密斯菲尔德，其他人在伦敦周围各郡的城镇。他们被指控持有与霍夫曼类似的观点。1538年又有更多再洗礼派被火焚。玛丽继承爱德华的王位后，继续搜捕和烧死再洗礼派。随着伊丽莎白的登位，出现了一股从低地国家的新移民浪潮。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新的篇章，关于教会和洗礼的激进观点后来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假如在闵斯特的反叛后数十年的黑暗时代，大陆上的再洗礼派运动完全销声匿迹，这几乎不足为奇。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胡特尔派的社团的数量锐减到可怜的程度，但仍熬过了剧烈迫害的时期。在低地国家，情况仍旧极端混乱。在那儿，再洗礼派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唯一严重挑战；加尔文宗是后来才出现的。在该世纪中叶，被处死的荷兰再洗礼派数以万计，但就是从这血洗中慢慢出现了现在称作门诺派的社团，他们主要从荷兰兄弟会获得灵感。路德认为再洗礼派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是魔鬼附身的证据。但目睹过这种英雄气概的人并不都有同感。1536年元月，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格在闵斯特被处决一周或10天之内，门诺·西蒙斯，荷兰弗里斯兰省西部海岸边的村庄威特马森的教区牧师，断绝了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残余联系，并在表白自己的信仰后由奥贝·菲利普施了洗礼。菲利普是和平主义再洗礼派的一个团体的领袖。当时西门已40岁。采取

这一行动后，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他提供住处的人有可能遭监禁或处死。然而，在以后25年间，他到处走动，看管备受折磨的信徒的小小教会。到1539年时，他已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救赎教义基本读物》的第一版，该书仍是了解一般的再洗礼派和特别了解再洗礼派中的门诺派的基本书籍。

数年之内，奥贝·菲利普退居罗斯托克，把领导权交给了门诺·西蒙斯。门诺活动的痕迹不仅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和低地国家，而且可以在科隆、埃姆登（1544年他在此地和约翰·厄·拉斯科举行过一场公开辩论）、吕贝克，甚至往东远至普鲁士找到。门诺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尽管提倡严格的教会纪律，但他性情温和；他于1561年去世，在此以前他挽救了欧洲西北部残留的再洗礼派社团并使之有所增加。他直言不讳地反对“闵斯特派”，虽然他的基督论与霍夫曼和斯文克斐尔德的基督论有些相似之处。通过他的社团，许多再洗礼派的教义流传到17世纪。但并非所有荷兰再洗礼派都接受他的领导。例如，大卫·约里斯的追随者“约里斯派”便是如此；约里斯是玻璃绘画工，到过英国。他认为圣灵的时代已经开始，他经验过显圣，在其影响下他开始认为自己是“第三个大卫”。他以大致和门诺·西蒙斯相同的方式到处走动，谆谆劝导他各地的教众严守纪律。在低地国家他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1544年，他和一些追随者一道离开低地国家来到巴塞尔，在那儿他确立了其虔诚堪称楷模的高尚的外国绅士的形象，等待他似乎相信即将来临的天国，他自己是天国的先知，他和他留下的教众仍然保持联系。他成为卡斯特里奥的朋友，勇敢地抗议烧死塞尔维特。他的身份直到1558年，即他去世后两年，才发现。当局大为震惊，立即掘出他的遗体，加以焚毁，凡当局能收集到的他的著作也一道被焚毁。

亚当·帕斯特，原先是天主教神职人员，1533年加入再洗礼派，曾和门诺·西蒙斯合作，但到1547年时他表白了反三位一体的观点，成为下莱因地区一个小小的团体的领袖，该团体人数虽不多，但继续存在了几个世代，对后来荷兰的门诺派并非没有影响。还有一位领袖亨德里克·尼古拉斯也把原有的再洗礼派社团分散在各地之残余聚集在一起；他是成功的商人，受大卫·约里斯的影响。尼古拉斯认为自己是宗教史上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期的先知，1540年至1560年间，他以埃姆登为基地开展工作，建立了“爱社”（*Familia*

Caritatis)，这是一个至善主义的兄弟团契，在英国有代表，也许是尼古拉斯亲自到英国的结果。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门诺·西蒙斯的追随者。他们继承了整个再洗礼派运动的最优良的传统，并且珍视这些传统。1562年在荷兰出现了一部自传和证言集*Het Offer des Heeren*，也许是以早先的一本书为基础写成的。书中增加了一些赞美诗。两个世代以后，阿姆斯特丹门诺派教會的牧师汉斯·德·赖斯在其著作《殉道史》中使用了该资料，赖斯的书后经T. J. 范·布拉特扩充，扩充后的书现在通称《殉道者宝鉴》。该书现在仍旧是了解16世纪再洗礼派的观点和精神的最感人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书中可以读到曼茨、萨特勒和其他许多瑞士与荷兰的再洗礼派信徒是如何提供他们最后的证言的。范·布拉特不仅是一位编年史家，他还努力解释基督教的历史，追溯殉道者的事迹从使徒时代直到当时，并提出结论：真正的教會一直是“十字架下”的教會。这就是支持那些组成再洗礼派會众的单纯的信徒们的信念。这在胡特尔派的手抄本史书中，在他们的诗集《化身》中都可以找到；该书是再洗礼派最早的赞美诗集，其核心是大约50首据说是一批被囚禁于巴伐利亚的瑞士兄弟會的信徒于1535年创作的。

再洗礼派有时被描述为在灵性上主要属于中世纪，直接与早先的分裂教派，特别与韦尔多派，有联系。他们被描述为“宗教改革的继子女”。不过，现在已放弃了[把他们]与韦尔多派直接建立联系的努力。再洗礼派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肯定有某种联系。再洗礼派有几位领袖了解并珍视约翰·陶勒尔和托马斯·厄·肯培的著作。他们受《日耳曼神学》的影响。但路德也是如此。他们中许多人也像路德，受的是天主教的培养和训练。说“第四宗教改革”，或借用彼得·泰勒·福赛斯的用语“共生的宗教改革”，也许更为准确。^[11]重要的是注意那些赋予其多样性以一定的统一性并在后来对现代世界的自由教會产生影响的那些主要特点。如果瑞士兄弟會、胡特尔派和门诺派被认为是这一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那么H. S. 本德尔(Bender)就说得对：“再洗礼派的看法包括了3个主要着重点：第一，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做耶稣的）门徒的新观念；第二点，教會就是兄弟团契的新观念；第三，爱和不抵抗的新伦理。”^[12]在他们看来，追随基督包括沿着十字架之路跋涉，而他们从未由此退缩过。他们决心“让世界和他们的看法一致，容不得半点降低，容不得丝毫调和”^[13]。他们是

狂热者（Schwarmer）。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狂热者，或者说被推入狂热。他们中大多数人对道德表现得极其认真。像大多数宗教改革家，他们诉诸的是《圣经》。其中有些人成为极其拘泥于字面意义的圣经主义者，但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一些最有灵性和最深刻的以《圣经》为根据的见解是在再洗礼派中出现的。大家一致同意婴儿洗礼并不是《新约》中的洗礼，教会按其本性就是和国家分开的，就是有别于国家的。在对地方行政官的态度上，他们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完全加以拒斥，有的则承认其在自己的范围内的权利。除了在导致闵斯特事件的相当例外的情况下，个人使用暴力遭到几乎全体再洗礼派的反对。从长远看，再洗礼派对现代世界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对宗教自由的请求。胡布迈尔的文章《关于异端分子和烧死异端分子者》先于弗兰克和卡斯特里奥提出宽容和信仰自由的请求。但比他们的请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面对逆境时所提供的证据。菲利普斯·雅各布·斯彭内尔说过：“从再洗礼派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这句话仍然是正确的。

（林成西 译）

[1] 格列柯（1541—1614年），西班牙画家。——译者

[2] 这本小册子部分地是对再洗礼派的抨击，见本书边码第129页。

[3] 英国喜歌剧作家。——中译者

[4] 见本书边码第89页。

[5] 见本书边码第101页。

[6] 见本书边码第269页。

[7] 另见本书边码第109页。

[8] 另见本书边码第157页。

[9] 卢弗斯·琼斯：《神秘宗教研究》，第392页。

[10] 见本书边码第243页。

[11] 《教会与圣礼》，第213页。

[12] 《门诺派季评》（*Mennonite Quart. Rev.*）（1944年第18期），第78页。

[13] 琼斯：前引书，第31页。

第五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宗教改革

一 丹麦

15世纪20年代初，宗教改革开始在丹麦安营扎寨，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和德国一样，改革的基础早已准备就绪。诸多迹象表明，在中世纪后期，民间的宗教热情有增无减，但对教会的堕落和滥用权力却颇为不满。这个时代，不称职的主教比比皆是，贵族地主对宗教也不是真心地向往。主教的头衔乃至更高的职位都给贵族留着，这无疑更加模糊了高级神职人员与贵族之间的界限，从而加深了他们与教区神父之间的隔阂。人文主义在教士中间广为流传，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曾留学国外。

保卢斯·赫利是加尔默多会的修士，圣经派人文主义和天主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于1520年成为这个修会在哥本哈根新创会院的主持，同时也在大学讲授《圣经》。他的思想基础源于他根据教父著作来解释的《圣经》。他强烈反对教士的世俗化，反对由教会滋长出来的礼俗和迷信，起初他为路德而欢呼，并把他看作自己的盟友，但当他意识到路德派运动的发展将导致与社会的决裂时，便彻底地割断了与路德的联系，因为对教会的“谴责不是要取消教会的存在”。赫利的观点虽不矛盾，但却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保卢斯·赫利的圣经人文主义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在中世纪后期的宗教生活向福音派基督教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缓冲作用，宗教改革在1536年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味着断然的决裂；实际上所有神职人员都留任原职。

除了赫利，另一位必须提及的圣经派人文主义的头面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彼泽森。他是隆德的一位教士，曾在巴黎学习数年，并在那里发表了许多关于祈祷、礼仪以及历史方面的著作。后来他转而支持宗教改革，并在安特卫普发表了丹麦文的《新约》译本（1529年）、

《大卫诗篇》和许多路德派的小册子。之后他作为出版商在马尔默生活了许多年。天主教的改革思想得到了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1513—1523年在位）的支持，这从他的法律和他对教会的改革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克里斯蒂安二世想通过牺牲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利益来提高王室、自由民和农民的收入。他按自己的需要任意指派和撤换主教，敏锐的教会察觉到了此番用意的后果，国王的妄举终于酿成了1523年的反叛，自己也被迫流亡国外。之后到1531年，他一直客居尼德兰，密谋策划，以图光复他的王国。1524年他访问了维滕贝格之后便皈依了路德教，并遣人把《新约》译成丹麦文，第一部丹麦文本的《新约》送往丹麦后对宗教改革的迅速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克里斯蒂安二世逃离丹麦后，议会推举他的叔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继承王位。腓特烈一世在其加冕状中许诺要维持教会的权利和特权，镇压路德派宣教士。但他很快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一方面尽可能地保留教会的现有权利，另一方面在举行一次公会议作出最后裁决之前，任何教义只要与《圣经》不相抵触，皆可宣讲。

与此同时，民间福音派运动正在兴起。石勒苏益格的商城胡苏姆成了福音派最初的活动中心，赫尔曼·塔斯特可能早在1522年就在此地宣讲路德宗教义了。石勒苏益格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据点。腓特烈在这里不受丹麦宪章的约束，贵族中的一些人组成了路德派，并且成了国王处理王国宗教事务方面的首席顾问。在伦茨堡会议（1525年）和基尔会议（1526年）上，神职人员没能说服腓特烈一世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国王的长子北石勒苏益格公爵很想支持宗教改革：他曾出席过沃尔姆斯议会，路德在会上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528年，哈泽斯莱乌和托宁两者按照与一种路德派教会规条如出一辙的哈泽斯莱乌规条进行改革，其影响波及60个教区。禁欲主义被废除，规定不打算结婚的神父得向公爵提出理由。从仪式上看，该规条仍是保守的。不但要求神父们要兢兢业业地向会众传授《圣经》和教义问答手册，向他们反复灌输对权力的服从（诸如纳税之类的事情），还要求神父们对公爵领地中正在扩大影响的再洗礼派进行迫害。

1526年，日德兰半岛上的维堡成了福音派公开活动的场所。丹麦最重要的改革家汉斯·陶森就活跃在这里。他是西兰岛安特沃尔斯科夫修道院圣·约翰修会的会士，几年的大学生活曾使他饱受人文主义

教育的熏陶。1519年他在罗斯托克获硕士学位，之后到哥本哈根从师保卢斯·赫利，他非常精通希伯来语，很可能是在勒芬学到的，1523年5月之后的18个月里，他一直住在维滕贝格。1525年他返回丹麦后便进了维堡修道院，院长允许他向公众授业和传教。在市民们的喝彩声中度过了数月的布道生涯之后，他因为拥护宗教改革而名声大噪，终于在1526年春被逐出修会。同年10月，维堡市民获得了一封国王的保护信，信中任命他为国王的牧师，这才使他不受主教的管辖。福音派运动发展迅猛，还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大量发行拥护改革的小册子。没过多久，陶森在容根找到了一位名叫耶尔根·延森·萨多林的助手，他也是（在1526年）获国王恩准到本城创建教会学院的。陶森委任萨多林为牧师，并娶他的妹妹为妻，明确地表述了与天主教的决裂。很快宗教改革就在维堡拉开了帷幕。除了陶森和萨多林在两个托钵修道院担任牧师所在的教堂外，另外12个多余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撤毁。同时还向日德兰半岛东部派去了几位福音派传教士，路德宗也在广大的乡村地区迅速传播。在菲英听说路德宗的影响已波及阿森地区，赫利以前的追随者彼泽·劳伦森正在这里满腔热忱地从事宗教改革。

丹麦东部的贸易重镇马尔默成了福音派运动的中心。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与德国北方广大城镇的联系，船只在向丹麦运货的同时也送去了福音派传教士和小册子。这次运动在克劳斯·莫腾森·通德宾德牧师和汉斯·奥卢夫森·斯潘德马格修士的领导下开始于1527年。1529年福音派神学院创立了。牧师中有像彼泽·劳伦森和加尔默多会会士、人文主义学者弗兰斯·沃尔莫德森这样的人。马尔默的改革者们也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大量宗教论辩、祈祷及礼仪方面的著作。1528年出版了第一部丹麦文的赞美诗集，其中包括了路德创作的赞美诗译文，随后又不断地再版和增版。同年还出版了一部新编丹麦文仪式集即《马尔默弥撒》，以多贝尔的《纽伦堡弥撒》和路德的《德语弥撒》为蓝本。1529年议会决定推行福音派的改革。哥本哈根遂于同年爆发了福音派运动，陶森被派驻圣·尼柯拉斯教堂，第二年本市的路德派宣教士已达4位。

1526年和1527年的欧登塞议会以及1530年的哥本哈根议会制定了明确的教会法。

1526年的欧登塞议会规定，以后主教应向大主教而不是教皇申请授职礼，所收费用应纳入国库。这些主教作为王室议会的成员，对丹麦教会与罗马教皇分道扬镳的决定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们仍然成功地说服国王采取措施，以对付福音派运动。他们答应与天主教的改革步调一致，但要求国王收回侵犯其管辖权的保护信，以后没有主教的许可任何人不准布道。国王只是回答说，他的信只维护公正，他本人只允许传播圣经的人布道。欧登塞议会上对未来的教会改革作出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国内外政治发展的影响。自由民和农民对克里斯蒂安二世都有好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人们期望他那位刚才打败法国的妻兄查理五世皇帝会以武力相助，帮他收复丹麦。与此同时，在日德兰和斯堪尼亚发生了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由于教会无人问津、上帝之道也无人传讲而拒绝缴纳什一税和其他应付税。

在1527年的议会上，主教们要求惩罚农民领袖，保留教会传统的特权，废止国王写保护信，禁止教士结婚和修士离开修道院。国王就教会的特权问题向高级神职人员们作了肯定的答复，同时也肯定了普通老百姓有缴纳什一税的责任，但不赞成主教拥有法律的权威。他的答复堪称名言：

基督教的信仰是自由的。你们中没有人愿意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你们也必须明白，那些笃信圣经或被称作路德派的人同样不愿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双方都相信自己是对的，但却无人可以作出裁决。朕作为国王和法官，主宰的是王国的生命和财产，而不是灵魂……每个人当如此行为，以便在世界末日面对全能的上帝对全体基督徒作出审判之时而无可指责。

国王允许不再写保护信，但却把所有传教与《圣经》相吻合的人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于是，腓特烈一世与当时的几次德意志帝国议会，最近的一次是1526年的斯佩耶尔议会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召开一次公会议对信仰之争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实行宽容政策。《圣经》中的上帝之道是教会的唯一基础，使用天主教的阐释还是福音派的阐释只是个人的选择。按照这个决定，国王感到有必要拒绝镇压福音派宣教士和社团的请求，重申教士可以结婚，修士可以离开修道院，只要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可。

建立一个社会宽容机构的法律根据就这样确定了。丹麦教会此时已分裂为官方的天主教会和独立的福音派教会。但这个法律机构在现

实中并未持续多久。许多教会都接纳了由国王和亲路德宗贵族团体资助的路德派牧师。1529年，约阿希姆·伦诺为竞选付了3000荷兰盾后，国王才承认他为罗斯基勒的主教，他只得同意对任何宣讲福音的人都不加干涉。天主教会和福音派教会双方都在期待着最后的裁决，都在指责对方是异教徒，是离经叛道，所以是非法的。此外，高级神职人员们还提到国王在加冕状中所作的镇压路德教徒的允诺。

1530年，议会在哥本哈根召开。本届议会一项新的内容是，共有21名福音派宣教士声明为他们的布道负责。在会上高级神职人员得到了丹麦最著名的神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保卢斯·赫利和一些来自德国的神学家。通过一次辩论以德国的方式来解决宗教纠纷，这很可能是国王的主意，但与路德派的愿望相反，他并不希望宗教改革取得最后的胜利。出于眼下政治局势的需要，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必须确保得到主教们和教会的支持。克里斯蒂安二世又倒向了天主教，他此时的威胁已迫在眉睫。整个丹麦都认为，克里斯蒂安在皇帝的帮助下正在组建一支干涉舰队。鉴于这种情况，丹麦的主教们只得妥协让步，满足国王的财政要求，但要求国王本人反对路德宗运动，以此作为回报。会谈开始后，福音派为其所盼望的辩论准备了一份信仰声明，即《哥本哈根信纲》作为辩论的基础，并向广大对那些高级神职人员及其追随者极端反感的民众逐条宣讲。然而辩论并未发生，双方交换了大量的论文，但对由谁来裁定却无法达成共识。天主教派希望由一位博学的神学家来充当法官，而路德派则认为，他们的信条并不复杂，本议会的成员完全能够确定它是否有悖于《圣经》。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端：改革派坚持要用丹麦语，天主教神职人员则主张用拉丁语，以防大众介入。会谈最终破裂，这个结局大概对国王是最有利的。从宗教上看，本次议会形成的决议只不过是维持现状而已，双方都失望而归。

《哥本哈根信纲》可能是出自彼泽·劳伦森之手，它在当时并未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但作为丹麦宗教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却别具一格，非常有趣。《哥本哈根信纲》与《奥格斯堡信纲》完全没有关系，前者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论战性、非神学性和大众化的倾向。丹麦的改革者是从圣经派人文主义中孕育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修道院墙内的路德式的斗争。他们对人文主义和圣经真理的执着与早些时候出现的人文主义的路德思潮不无关系，后者普遍流行于16世纪20年代早

期德国南部和北部的一些为丹麦改革运动提供了火种的大城市。丹麦的改革者与维滕贝格的神学家不同，为路德的教义辩护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特别注重改革要求的、简明而无分歧的基督教，它以《圣经》为准则，但并不是完全以路德派阐释的《圣经》为依据：它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把圣典看作律法书即：“上帝的律法”。《哥本哈根信纲》是对马尔默的改革著作的复述，其内容总的来说比陶森和萨多林的思想更为激进。

天主教会在腓特烈一世去世的前几年已是风烛残年。受苦最甚的要算那些托钵修士，他们被赶出城镇，大多时候是在暴力之下完成的。很快教会领地的世俗化运动便起劲地推行开来。1530年，西兰岛上所有拥有土地的修道院都奉命撤出，搬进了贵族的采邑。此时改革还未触及菲英，那儿的于尔登谢恩主教拥护改革，他把萨多林纳为自己的助手。1532年，为反对克里斯蒂安二世，于尔登谢恩被派往前者最终于此登陆的挪威，萨多林便在主教管区内安排了一次巡视，为此按照由他译成丹麦文的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和《奥格斯堡信纲》在牧师中间推行改革。1537年，萨多林成了菲英第一位福音派主教。

腓特烈一世死后，高级神职人员力图讨回失落的权力。在1533年的哥本哈根议会上，他们反对推举克利斯蒂安公爵为王，力选他尚未成年的弟弟来取而代之，可望用天主教的信仰来加以培养和塑造。这期间由于王位空缺而干戈四起，国家因此而遭受极大的不幸。1534年，马尔默因大主教把斯堪尼亚的神父逐出教会而发生了一场暴动，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结成联盟，并向西兰岛派去了一支由奥尔登堡的克里斯托弗伯爵率领的军队。日德兰半岛北部也爆发了农民起义，之后在1534年夏季，半岛上的贵族推举克利斯蒂安三世为王，由于雇佣军装备精良，克利斯蒂安三世很快又收复了王国，于1536年进入陷入饥荒的哥本哈根。国王胜利了，却因此而负债累累，他向教会求助却一无所获。在德国顾问的鼓动下，他决定发动政变，以武力解除主教的职务，令教会财产还俗。以后王国就完全掌握在世俗政权的手中，主教的职位就纯粹是精神性的了，战争酿成的不幸要由那些主教负责，是他们推迟了国王的选举。国王攫取了教会的土地和什一税，这笔财富是王室收入的三倍。但他得给新上任的福音派主教（起初叫主管）支付薪水，资助学校和医院。1536年10月，议会接到了新的指令。主

教们除了伦诺夫之外很快就随波逐流，继续享受他们的贵族和地主生活去了。

国王立刻倡导起草一种新的福音派教会法规。甚至议会还未召开之前，国王就在力图说服布根哈根以及后来的梅兰希顿到丹麦来，尽管没有成功。1537年1月为了制定一部新教会章程而成立了一个由路德派牧师及大教堂的全体教士组成的委员会。4月份完成了最后一稿，准备送往维滕贝格交路德批准。1537年夏，布根哈根来到哥本哈根，与国王的一些谋臣一道对草案作了最后修改，于是克里斯蒂安三世在1537年9月2日颁布了新的（拉丁文）教会法规，布根哈根也于当天在哥本哈根大教堂委任了7名福音派主教。新法规实施起来很困难，遂要求国王和议会以普通法的形式予以公布。1539年在欧登塞举行的议会通过经专门修改和增补过的丹麦文译本为“真正的”教会法规。该法规（1542年印刷）在克里斯蒂安五世的《丹麦法》（1683年）和《教会礼则》（1685年）颁布之前一直为丹麦教会的宪法，并且在后两个法案中得到了部分体现。虽然它的实际有效范围应是整个王国，包括丹麦、挪威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最终只是在丹麦（和挪威）推行，公爵的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情况不同，它需要一部特殊的低地德语法规，这是在1542年的伦茨堡议会上表决通过的。

这部法规是以基督教国家这个概念作为基础的。国王作为基督教的领袖乃是处理教会问题的最高权威，但教会事务则掌握在教会自己的代表手中。即耶稣基督的法规与国王的法令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讲上帝之道、圣礼的施行、用基督教教义培养儿童、对教会职员和学校的支持、对穷苦人的关怀）是不可更改的；后者是服务于前者的，所以必要时可以改变。在这部法规中，各种圣事以及布道和仪式、学校、主教和牧师的地位等分门别类，都有极为明细的规定。主教由教区城镇的牧师选举产生，经王室批准。城镇的牧师由市长和议会挑选，乡村牧师则由教区内德高望重的绅士和副主教一起共同推举。保留了贵族作为庇护人的权利。从这部法规的内容可以看出，它所定义的基督教类型是梅兰希顿式的路德教。宗教改革一旦兴起，来自维滕贝格的直接影响就会变本加厉、更加强烈。神职人员们对《圣经》所怀有的质朴的信仰逐渐被路德的《教理问答》中所陈述的基督教教义所取代。1536年前那段时间由于福音派的觉醒而导致的

冲突和纷争已偃旗息鼓，教徒们变得消极起来，他们的目光也逐渐转移到了教会的体制和牧师的尊严上。

1537年9月2日由布根哈根——没有使徒传统，因为布根哈根仅是一位牧师——委任的7位新主教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西兰岛主教彼泽·帕拉第乌斯。他没有参加丹麦宗教改革的斗争，但在维滕贝格研习6年，并于1537年6月成为神学博士。由于布根哈根、路德和梅兰希顿的力荐，克里斯蒂安三世任命了年仅34岁的帕拉第乌斯为该岛的大主教，而他并没有辜负国王的信任。帕拉第乌斯的名著《巡访书札》（*Visitation Book*）堪称丹麦文体的典范，寓严肃性和温馨的幽默为一体，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其中显示了他在教会管理和大众演讲方面的非凡才能。截至1543年，帕拉第乌斯视察了本辖区内的390个教区，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是国王处理所有教会事务的顾问，他负责规劝自己的同僚，并主持主教会议，还处理挪威和冰岛的教会问题。大学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后又开始复兴，帕拉第乌斯作为大学教授，以其频繁的演讲来影响他的学生。他的神学著作在新教国家中广泛传阅，他的《导引》（*Isagoge*）最负盛名，该书是对《圣经》著作的介绍，其拉丁文本再版了16次之多，并被译成德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此外，他还用丹麦语发表了大量的专题论文。从神学上看，帕拉第乌斯是梅兰希顿的门徒，但他没有尾随梅兰希顿偏离路德的教义。

汉斯·陶森有“丹麦的路德”之称，不在1537年委任的新主教之列。他是大学的希伯来语讲师，1538年开始讲授神学，并担任罗斯基勒大教堂的牧师，此地的天主教势力仍然很强大。他在1541年才成为里伯的主教。为此他不辞辛劳，创办学校和医院，千方百计地改善教士的培训和财政状况，他要克服重重困难：世俗大众、再洗礼派和桀骜不驯的贵族分子所表现出的无知以及在他们中间广泛流传的迷信，等等。陶森的重要著作中需要提到的有基督教《摩西五经》的译本（1533年）和《布道集》（*Book of Sermons*）（1539年），后者是一本重要的牧师指南，还有一部赞美诗集曾再版过多次。

首批福音派主教为推动宗教改革而耗尽了精力，在1560年左右相继去世，这标志着第一代宗教改革的结束。克里斯蒂安三世作为君王通过自己的表率领导了这场改革之后，也于1559年离开了人间。这个时代充满了困难、贫穷、无知和天主教习俗的残余，以及人民对道德

沦丧的怨声载道，通常在每一次伟大的精神震荡之后皆是如此。当然这代人也有乐观主义的一面，他们知道自己冲破了教皇制度的黑暗，迎来了“《福音书》的光明”（帕拉第乌斯）。简洁明了的丹麦仪式和用来培养后人的、单纯的基督教教义问答乃是改革留给子孙后代最为重要和持久的遗产。1550年，伟大的《克里斯蒂安三世〈圣经〉》出版，这是第一部丹麦文本的全译《圣经》，是这场改革所留下的最伟大的丰碑。

二 挪威

乘着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丹麦取得胜利的东风，宗教改革和《教会法规》也被引入挪威。这里正值政治、文化和宗教的萧条时期。些许零零星星地也出现过一些天主教改革和圣经派人文主义的迹象，但总的来说，挪威的改革缺乏准备，全然不能像丹麦那样上演一场群众性的运动。

挪威第一位路德宗宣教士是个德国修士，名叫安东尼乌斯，他是1526年卑尔根地区德国人中的活跃分子。他在卑尔根城的宣教活动引起了巨大的不安，使德国人对教会和当地人的态度显得颇为放肆。1529年，腓特烈一世对卑尔根的两名福音派传教士颁发了保护信，其中一位叫延斯·维博格，此人后来成了当地教区神父。在斯塔万格和芬马克隐隐约约也能感受到一点路德派的影响。这时有些贵族正开始破斋，转而施行福音派的习俗，但他们最渴望的还是占有教会的财产。1528年夺取了几座修道院，教会财产的世俗化运动随即迅速铺开。

奥拉夫·恩格尔布雷克特松大主教是天主教会和挪威独立最有力的捍卫者。他有能力，有学问，政治上却摇摆不定。1523年在罗马逗留期间，获教皇批准任命的诏书，也发誓效忠流亡的克里斯蒂安二世，但1524年回国后却加入王室议会对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声讨，并选举腓特烈一世为挪威国王。然而腓特烈迫不得已签署了一份苛刻的宪章，和丹麦宪章一样，里面载有迫害路德派教徒的条款。不过他很快就因其他一些问题明显疏远了与国王的关系，因为腓特烈支持卑尔根的宣教士。1531年，克里斯蒂安二世在奥斯陆附近登陆，力图取道挪威夺回失去的王国时，得到了大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的支持。克里斯蒂安被监禁后，一支丹麦舰队开到特隆赫姆，奥拉夫迫不得已屈尊俯就，与腓特烈一世重归于好。1533年国王死后，奥拉夫在皇帝的支持下，力举克里斯蒂安二世的侄儿，一位德国伯爵为王，但随着1536年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丹麦的胜利，挪威的独立以及罗马教会在挪威的统治很快结束。1537年，在丹麦舰队到达特隆赫姆之前，奥拉夫·恩格尔布雷克特松逃往尼德兰，次年便死于该地。

挪威此时归附了丹麦，其议会已不复存在，独立性也受到极大的削弱。在克里斯蒂安三世的诏令下，挪威和丹麦一样开始了宗教改革。1539年，在奥斯陆和卑尔根会议上通过了《丹麦教会法规》。国王攫取了主教的财产，大部分教会的金银珠宝都运到丹麦去熔化。另一方面，丹麦人对仪式和教义的改革只得小心翼翼地推行，以免招来不必要的反抗。在任命新主教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如此。斯塔万格、哈马尔和奥斯陆的主教都被监禁。奥斯陆主教于1541年复职，哈马尔主教区和奥斯陆主教区合并。特隆赫姆在1546年前主教职位一直空缺。只有卑尔根很快就有了新主教。1536年，卑尔根的神职人员大会选择盖布莱·佩代尔森副主教为主教。他是天主教徒，也是人文主义者，在卢万获硕士学位，但他很快就站到了克里斯蒂安三世一边，非但避免了其他主教的下场，甚而被国王封为福音派主教，与其他丹麦主教一道于1537年接受了布根哈根的委任。以前主教辖区内的一部分收入给他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被用作教会的重点工作。盖布莱·佩代尔森是帕拉第乌斯主教的朋友，后者的拉丁文著作《为挪威教区神父所撰教义问答阐释》（1541年）多次再版。

然而在丹麦传播改革的确遇到了很多麻烦。这里的牧师基本上未接触过路德宗，有一个时期，许多教区都没有牧师。人们墨守成规，遵守天主教的习俗为时已久。对于普遍的贫穷和道德堕落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是满腹牢骚。最大的难处是语言问题，因为官方语言是丹麦语，而《圣经》《教义问答手册》以及赞美诗集都还未译成挪威文。改革是以一种半生不熟的语言、以过去在挪威推行丹麦文化的种种方式来传播的。它从未形成群众运动，教育人民信仰路德宗花费了几代人的工夫。在推行改革的主教中，最著名的要数斯塔万格的约根·埃里克松（Jorgen Eriksson, 1571—1604年），这位充满改革精神的铁腕人物恢复了教会的秩序，他发表的布道集被当作神职人员指南，同时也被公认为挪威宗教改革时期在文学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挪威教会法规》在1607年颁布。

三 冰岛

冰岛对宗教改革也是毫无准备的。冰岛天主教的最后两位主教斯考尔荷特的奥格蒙杜尔和候拉尔的约恩·阿拉松都是著名的铁腕人物，都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教区。他们的神学素养可能都不高，但约恩·阿拉松则是一位颇有几分名气的诗人。他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这在当时的神职人员中是司空见惯的。有一个时期，两位主教的不和几乎酿成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在1526年他们又各自统领一支庞大的武装卫队来到阿尔辛讲和，之后双方慑于共同的敌人路德宗的日渐壮大，又紧密地携起手来。

路德宗何时传入冰岛已无法知晓。那些宣传宗教改革的小册子肯定是在与德国尤其是汉堡的贸易往来中传入的。1533年在阿尔辛通过了一项决定：“所有人都必须继续坚持神圣信仰，遵守上帝之律法，这是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也是经历任教皇认证的。”同一时期，在国外待了几年并接受了福音派教义的奥都尔·戈特沙尔克森返回冰岛，做了斯考尔霍特主教的秘书。他在这里把《新约》译成了冰岛文，但却不是一名公开的路德派斗士。他未受按立，而是作为农民生活在自己的田庄里。

吉苏·埃纳尔松才是冰岛第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他在德国留学期间熟悉了路德的思想，1536年任斯考尔霍特主教的助手，他并没有立刻表示出对路德派的同情。

丹麦的宗教改革成功之后，克里斯蒂安三世力图把改革引向冰岛。1538年他在阿尔辛实施《教会法规》，但立刻就遭到两位主教的拒绝。丹麦人用高压手段强制推行，其中包括解散修道院。奥格蒙杜尔主教年事已高，老眼昏花，视若盲者，遂决定卸任，并荐举吉苏·埃纳尔松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后者被派往哥本哈根接受神学家的考核，于1540年3月被国王任命为斯考尔霍特的主教。

然而事实上，这位25岁的主教很难维持自己的权力，老主教和神职人员都反对他。1541年国王派了一位密使到冰岛促进《教会法规》的实施，奥格蒙杜尔主教因态度顽固而被逮捕，并死在押往丹麦的艰

难路途中。这位使者虽然成功地说服了斯考尔霍特接受了《教会法规》，但在候拉尔仍然遭到拒绝，主要是因为约恩·阿拉松的影响。由帕拉第乌斯按立的吉苏主教尽管环境于己不利，仍然竭尽全力要在他那庞大的教区内，按照路德宗的原则组织教会。每次出访期间他都反对使用天主教的仪式和迷信，他规劝神职人员结婚，并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他动员奥都尔·戈特沙尔克森翻译德文的福音派布道集，并下令神职人员人手一册，外加一本1540年版的《新约》译本。他自己也翻译了《旧约》的部分章节和《教会法规》。

1548年初吉苏·埃纳尔松去世，尽管神职人员们都反对，约恩·阿拉松还是占领了斯考尔霍特主教区，并把吉苏的接班人投进了监狱，为此他被国王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抓获，并交送丹麦人处理。丹麦人不敢留他们在冰岛过冬，又无法将他们押送丹麦，遂于1550年11月将他们处死。1552年，候拉尔主教区也屈服于克里斯蒂安三世，承认了《教会法规》，对改革的公开反抗被粉碎，随着教会财产被世俗化，对教堂和修道院进行有组织的剥夺便开始了。

此时对于新上任的主教而言，要敦促人们遵守路德宗的信条和社团生活，可谓任务艰巨，所以进展不大，两个教区都出版过教会手册和袖珍赞美诗集，里面还有丹麦文的赞美诗，但译得很糟。拥有教堂的城镇办起了学校，培训神职人员。帕拉第乌斯对冰岛的情况，表示了特殊的兴趣，亲自担任冰岛教会的总监。几代人之后，宗教改革才获得牢固的基础，人们才逐步地习惯了新的宗教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571—1627年间荷拉的居布兰迪尔·索尔劳克松主教，此人颇有才干且精力充沛，在为基督教的社团教育和神职人员培训的改进中，他可算是呕尽心血，并且还发表了大约90本小册子。1584年，第一部全译本的冰岛文《圣经》出版。然而，作为冰岛最伟大的主教之一的居布兰迪尔，严格地说，属于紧接着宗教改革以后的那个时期。

四 瑞典

在古斯塔夫·瓦萨（1523—1560年在位）的引导下，瑞典的改革经历了一条与丹麦截然不同的道路。这里主教制的传统和教会的独立性都要牢固得多，改革不可能突如其来，其过渡期近似于有机体的发育，持续了许多年。斯德哥尔摩以外地区的改革根本不是靠民众的觉醒，完全是取决于国王的態度。

古斯塔夫·瓦萨因领导了1521年反对丹麦统治者克里斯蒂安二世的民族起义，于1523年被推选为国王。他的目标是要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强大的王权，所以教会在这里丧失了国中之国的地位，其多余的财产均被国王没收。国王处理教会事务的首席顾问、身为大法官和斯特兰泰斯副主教的劳伦蒂乌斯·安德烈埃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才能的人，因为曾在国外留过学，对中世纪后期教会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所以赞成对天主教进行改革。他提出一个建立民族教会的方案，并在其中声称道，既然教会是信仰者即基督教人民的社团，那么教会的财产就应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的国王来掌管。只有《圣经》而不是教皇颁布的法令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在阅读路德的著作时，也必须以上帝之道为标准来加以审视。

效忠克里斯蒂安的古斯塔夫·特罗勒逃往丹麦后，最初的那些年月时局动荡不定，天主教的职位一直空着。在教皇仍然支持特罗勒的情况下，暂时不可能推举他人。但国王逐个地把拥护天主教改革的亲信安插进教会，填补了主教职位空缺所造成的权力真空。1524年，国王在其保留首年圣俸的努力归于徒劳的情况下终止了与教皇的直接联系。林库平的老汉斯·布拉斯克是瑞典主教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是路德宗最强劲的对手，早在1522年，他就威胁要把那些携带和阅读路德著作的人逐出教会，如果不是因为斯德哥尔摩住着许多德国商人，路德宗是不可能在这里落地生根的。

瑞典伟大的改革家奥拉夫·佩特利于1493年生于厄勒布鲁，是一位铁匠的儿子。1516—1518年间，他在人文主义的中心维滕贝格学习，并获硕士学位。他在那里受到了广泛的人文主义教育，学会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此期间，他还可能目睹了路德成长为改革家的历

程。1518年秋，奥拉夫做了斯特兰奈斯的主教秘书，1520年受按立为副主祭，并在大教堂里的学校教书。他投身改革的转变过程与他逐渐理解路德思想的程度是一致的。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路德的信徒，但他心中的权威仍然是圣经。不管怎么说，从1523年起，他的训示完全是路德式的。就在这年的斯特兰奈斯议会上，古斯塔夫·瓦萨开始注意到了奥拉夫，可能是通过劳伦蒂乌斯·安德烈埃，此人和国王一样，很快就意识到了新的宗教观念对于制定宗教政策的重要性。

1524年，奥拉夫·佩特利做了市府秘书，并开始在斯德哥尔摩传教，影响颇大。这个城市的居民半数是德国人，教区神父是一位德国的路德教徒，名叫尼古拉斯·施特克。1525年奥拉夫完婚时，布拉斯克主教对他和他所传的路德宗教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主教在致国王的信中把他的婚姻说成是瑞典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古斯塔夫·瓦萨回答说，如果不是学识浅薄的话，他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一个牧师若按上帝所认可的那样娶妻完婚就会被逐出教门，而不顾上帝的反对与女人私通则安然无事。这类婚姻在国外已蔚然成风了，所以他建议举行一次公会议来作决定。

也有人在处心积虑地捍卫古老的信仰。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印刷所出版过许多有关信仰的著作。然而在国王的怂恿下，这个印刷所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奥拉夫·佩特利发表了一部代表福音派观点的有关信仰的书《实用教诲》（1526年）以示对传统信仰捍卫者的反击。这是瑞典首次出版的宗教改革著作。该著作的理论基础是路德的著作《贝特手册》，但它所受到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德国南部的福音派而不是维滕贝格，同时也标志着奥拉夫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著述的开始。改革的小册子从纽伦堡和弗兰科尼亚经哥尼斯堡传到瑞典，奥拉夫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研究。1526年出现的首部瑞典文本的《新约》可能就是他与劳伦蒂乌斯·安德烈埃联袂的译作。这部书基本上是译自路德的德文译本，但母本是1526年的斯特拉斯堡版本，这也是奥拉夫与德国西南部有过联系的最早的文字证明。他还参照过伊拉斯谟的希腊版本和拉丁译本。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瑞典文本的《新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525—1527年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和丹麦改革的成功加速了瑞典改革的进程。其中与普鲁士公爵阿尔雷希特的联系至为关键，是他在1526年与古斯塔夫·瓦萨缔结了一项条约，才使改革的小册子能够顺

利地送到瑞典。国王瓦萨和普鲁士的使节一道筹备1527年在韦斯特罗斯召开的议会，他还设法安排了一次博学的托马斯主义者乌普萨拉的佩德·加勒和奥拉夫·佩特利之间的宗教辩论。在瑞士、德国南部和德国北部都曾采用过辩论的方式来解决神学的争端。然而，佩德·加勒对国王提出的问题只作了书面回答。奥拉夫也在1527年撰写了《对十二个问题的回答》对此进行详细的答复，与加勒的文章一道刊出。这本小册子以《圣经》作为依据，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福音派的学说，强调传达上帝的声音乃是教会的唯一职责，它对基督教会政治作用的陈述至关重要，可以说为韦斯特罗斯议会作了直接的准备。

1527年夏，国王召集了这次重要的议会。在会上，国王重述了王国政治和经济所面临的悲惨处境，如达莱卡尼亚暴动、吕贝克要求偿还战争债务等。他说自己在目前的状况下无法维持统治，但他没有自作主张，只是要求议会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并谴责了那些富有的高级神职人员。他否认了他要引入新宗教的传闻，并提出当着议会的面举行一次辩论。议会很快就通过决定，支持国王反对达莱卡尼亚农民暴动的战争，因为暴动可能得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响应。为了使神学争端有个结论，改革派力主安排一次论战。然而，布拉斯克从主教的利益出发，认为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安排，因为教会对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已有定论，他不想和异教徒争论。他保证给国王提供财政援助，条件是必须维持教会的特权，所有神职人员的变动都应得到教皇的批准，为此他得到了贵族的支持。国王一气之下宣布退位，当即离席。在这生死关头，改革派分别与各阶层的人士会谈，在随后几天那剑拔弩张的氛围中成功地说服了大家坐下来倾听国王的要求。有位倾向于天主教改革的主教提出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坚定地坚持天主教教义和礼仪。这就动摇了主教之间的团结。国王的退位的确是一项聪明的政治举措。议会此时投票通过了大幅度削减教会财产的决议，主教的殿宅连同其“多余”的财产以及大教堂神职会和修道院的财产都被王室没收。贵族们也收回了自1454年以来所有送给教会的财产。甚至连论战也举行了，各方人士都注意到，改革派的辩护非常有力，他们只传讲上帝之道。议会决定在整个王国宣讲纯粹的上帝之道——流行于丹麦和德国的容忍原则。韦斯特罗斯议会打破了教会在政治和立法事务中的特权地位，但保留了教会的组织机构和主教处理教会内部事务的权力。瑞典和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议会结束后，布拉斯克主教便逃离了瑞典。

从形式上看，韦斯特罗斯议会只是规定，争论的双方中要能用福音书为自己辩护，就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为福音书即纯粹的上帝之道，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予以认可的最高权威。事实上，议会的决定不仅是一次教会政治上的转变，也是一场宗教上的变革，因为它肯定了路德宗的布道是合法的。这就为改革派传播信仰铺平了道路。

其后的岁月可谓艰难时世。国王毫不留情地削减教会的财富，甚至把教堂的钟和固定装置都没收了。人民对路德宗运动的反感导致了一连串的暴动，但都遭到了古斯塔夫·瓦萨的无情镇压。宗教改革在国内的风云变幻左右着他对瑞典改革的态度。然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立后，大大加强了德国新教的安全，他便旗帜鲜明地采取了反天主教的立场。

1528年，在古斯塔夫的加冕仪式上，奥拉夫在其重要讲道中表述了改革派对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用大众的教会这个观点作为立论的基础，陈述了主教和牧师的地位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宣讲上帝之道并用上帝之道来主宰人们的良心。世俗的权威是上帝赋予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但是国王也要和全体人民一道，共同遵守法律。当权者对教会的义务就是保障它能够自由地宣讲福音。1528年，奥拉夫翻译了路德的《布道集》，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辩性的著作，反对天主教的礼仪、习俗、圣事、告解、独身和修道生活，等等。他的著述垄断了整个图书市场。随后的几年里，他还撰写了大量作品，旨在最终改变瑞典人的礼仪，并在仪式中使用本国语。1531年，他发表了《瑞典语弥撒》。

同年，他的32岁的兄弟劳伦蒂乌斯被任命为大主教。突如其来的任命乃是因为国王忙着举行结婚典礼，想使王后的加冕尽可能地符合时尚，富丽堂皇。由于教皇仍然支持流亡的古斯塔夫·特罗勒，天主教的主教中不可能有人接受大主教的职位，古斯塔夫·瓦萨只得在福音派主教中进行挑选，并且认为奥拉夫的弟弟是合适的人选。授圣职礼是按天主教习俗进行的，即是说保持了使徒传统，虽然主持仪式的人私下宣称，他们这样做是被迫的。

劳伦蒂乌斯在维滕贝格念过书，深受梅兰希顿的影响。他受过广泛的神学和人文主义训练，兼有组织者和牧师的良好素质，并且精通

圣事和礼仪的语言。他既能顺应环境，又不丧失立场，所以虽历尽沧桑，却始终保持着对一位烦躁不安的专制国王的忠诚。他任大主教四十多年，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后的瑞典教会。

1536年，大主教在乌普萨拉召集宗教会议，会上规定：不管什么地方的牧师都应宣讲纯粹的上帝之道；奥拉夫的《瑞典语弥撒》和手册要在全国普及和推广。神职人员独身被废除了。国王对会议的决定表示默认就意味着与天主教的彻底决裂，瑞典教会此时已正式成为福音派的瑞典国教。奥拉夫·佩特利的布道书、赞美诗和弥撒又出新版发行。路德的《小教理问答》也在瑞典首次出现，此举的功劳似乎要归于奥拉夫。此刻教会的主要任务是用福音派的信仰去教育人民，所以改革派特别强调《教理问答》的讲授和家庭祷文，因为这些才刚刚入俗。

如要描述这些年来奥拉夫勤于著述的非凡能力，所要提及的就不只是他的《瑞典语拉丁语词典》，还有他那至今仍是瑞典法律典籍入门的《审判规则》，以及他的《瑞典编年史》。后两本书使他对瑞典人的文化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宗教会议过后的几年，宗教改革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国王针对教会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动摇不定，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大约在1538年前后，他改变了对教会的看法，因此与改革派发生了分歧。国王的傲慢和疑心日益加重。鉴于德国路德宗的状况，他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观念上来，即地方长官是上帝委派的，因此，所有臣民都有服从他的义务。他希望扩大路德宗的战果，让教会完全听命于国王，这就和改革派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仍然信守瑞典的传统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理想是在瑞典建立一个由主教领导的大众教会，它有权处理教会内部的一切事务。三位改革家就此达成了共识。人民臣属于上帝而不是现世的统治者，所以他们是自由的公民。奥拉夫作为传讲上帝之道者，大胆地强调了当权者的责任，猛烈地抨击了他们的不良行为。

很明显，奥拉夫·佩特利的一次布道是铸成他与国王关系破裂的原因。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瑞典的宗教冲突也造成了严重的道德腐败。天主教的原则已被打倒，新的福音派信条又还未深入国民的生活。奥拉夫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布道中对日趋明显的胡乱发誓和诅咒

的现象进行了强烈地抨击，并公开批评国王未能给国人作出表率。大约在奥拉夫进行布道的同时——布道文于1539年春印发——劳伦蒂乌斯·佩特利因抱怨国王未给学校提供足够的资金而惹恼了国王。历来就对主教们怀有戒心的古斯塔夫·瓦萨谴责大主教妄图恢复昔日主教的权力。劳伦蒂乌斯·佩特利虽保住了职位，但却被迫退居幕后，一位德国的路德教徒乔治·诺曼作为国王的代表，实际上成了教会的领袖。奥拉夫·佩特利和劳伦蒂乌斯·安德烈埃被起诉，在一次有失公正的审判后被判处死刑，死刑定于1540年元月2日执行。然而两人都在交付重金之后获得宽恕。营造这种紧张的气氛不过是要迫使他们妥协，不与国王的教会政策唱对台戏，所以他们很快又恢复了对国王的忠诚。1542年奥拉夫成了斯德哥尔摩的教区牧师，劳伦蒂乌斯·安德烈埃则退隐于斯特兰奈斯，1552年在该地逝世。

乔治·诺曼此时成了瑞典教会的“总管”。他是典型的梅兰希顿的信徒，是他为梅兰希顿的神学和教会观念在瑞典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要按德国的模式进行，不管是教义还是仪式都必须德国化。教会丧失了独立性，具有独立意识的主教已不复存在，新的教区头领还未找到。相对说来，从1539—1544年这段所谓的“德国化”时期并不算长。这期间诺曼到处视察，在教区内强制推行改革，掠夺教堂的银器和值钱的东西。1542年，瑞典南部爆发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反古斯塔夫·瓦萨的起义，主要是人们对社会和经济现状不满，起义的矛头直指国王的贸易条例，这个条例破坏了斯莫兰和布莱金尼地区边民与丹麦人的交易。但天主教神父则在一旁火上浇油，旨在恢复天主教的信仰。皇帝和其他外国统治者也对起义表示关注，1543年当起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被古斯塔夫·瓦萨扑灭。但在获取胜利之前，他不得不废除所谓“德国式”的教会敕令，恢复以前瑞典的教会体制。诺曼并没有失去国王的信任，只是他扮演的角色换成了国王的政治顾问而已。

这次暴动使国王觉悟到，必须与天主教彻底决裂，必须牢固建立民族的世袭君主国。所以1544年在韦斯特罗斯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上，瑞典被正式宣布为福音派王国，与会全体成员保证“决不放弃刚才确立的信仰”。圣徒崇拜、安魂弥撒、朝圣以及其他天主教习俗统统禁止。由瓦萨的家族世袭国王。

在随后的几年里，民众对宗教的态度改变了。从反面看，这是镇压天主教习俗和过去的异教迷信所取得的成果：路旁的十字架搬走了，兄弟会解散了。从正面看，这是福音派布道和讲授《教理问答》的成果。1541年，佩特利兄弟二人发表了著名的《瓦萨圣经》，这是第一部瑞典文本的《圣经》全译本，对瑞典的基督教、语言和文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544年后，劳伦蒂乌斯、奥拉夫·佩特利及众主教再次取得领导地位。然而古斯塔夫·瓦萨对主教和教会的独立始终存有疑心，因为他不愿看到“神职人员的统治”。根据德国的做法，新的主教称为主管，不再授予主教头衔，其地位与王室派到教会去的监察员相当。为了削减主教的权力，国王对几个主教区进行了分解，新的主教区不设神职人员会，领头的是国王派去的“主管”。以前的神职人员会基本上没有了。教堂乃至神父的宅邸都属于要没收的财产和家具之列，主教区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值得慰藉的是，新的教育体制已开始走上正轨，它在培养人们的基督教信仰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奥拉夫到死都是国王所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方面的顾问。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沉溺于个人的伤悲而显得黯然无光。1552年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诺曼也在来年去世，劳伦蒂乌斯·佩特利才在教会中成了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和他的哥哥从前一样，他几乎主宰了整个书市。除了关于《圣经》翻译的著作和主持仪式所必读的书外，他的学术创作中还包括大量论战性的文献以及宗教实践方面的著述。尤其是在1560年古斯塔夫·瓦萨死后，大主教才迎来了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他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在教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独创性都是卓越的。在当时的神学纷争中，他采取旧式的瑞典路德宗的中间立场。

大主教毕生都在致力于为瑞典教会起草一份代表福音派观点的法规。1547年他把定稿后的草案呈交国王审阅，但未被采纳，因为他仍然抱着改革派的理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受到国家保护的教会，它能够独立地处理教会内部的一切事务。其后的几年，大主教设法通过各个独立的区域内颁布暂行条例来管理教会事务。这些法令都被纳入于1571年发布的教会法规草案，并在1572年的乌普萨拉宗教会议上获得通过。教会法规正式采取了1527年韦斯特罗斯议会的立场。重申上帝之道即《圣经》是瑞典教会的信纲，是教会法律的准绳。禁止任

何人以德国路德宗的信纲作为依据。路德和梅兰希顿处于同等地位。同样，为了显示与德国式的诸侯统治教会的区别，有意识地强调了以主教为代表的瑞典教会的相对独立性。主教由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选举，由国王最后定夺。牧师一般由会众指定。对宗教仪式的程序以及礼仪的常规也在会上详加讨论。一种复杂的崇拜仪式的制定表示了对中世纪传统的尊重。学校由教会管理：有关学校的法规都带有梅兰希顿的教育学和人文主义的印记。为了配合教会对人民的教育，法规中采纳了路德宗教会的纪律和独自忏悔的方式。1571年的这些法令构成了后来发展的基础，其对瑞典的影响和1539年的《教会法规》对丹麦的影响一样重大。

1560年，古斯塔夫·瓦萨在遗嘱中表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信徒对路德宗所怀有的质朴的信仰，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大主教临终前也是如此。同时，瑞典急风暴雨式的宗教改革中的主要人物相继去世，于是瑞典的路德宗历史的第一章宣告结束。

五 芬兰

宗教改革兴起的时候，芬兰正值瑞典人的统治时期，所以芬兰的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步瑞典教会事务发展的后尘。然而，芬兰改革的实际运行是由一帮留学德国耳濡目染了这场新运动的年轻人操作的。芬兰的改革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别的国家在这个时期的情况相反，芬兰从中世纪传统向宗教改革的过渡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中世纪末，天主教教会在芬兰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都曾留学国外，受过非常好的神学训练，皆属能人之辈。其下层神职人员当然要略逊一筹，但教会内部通常发生的抱怨和争端对当时整个芬兰教会尚不构成威胁，所以也就不足挂齿。改革的进程缓慢，改革的要求也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强烈。改革在这里还只是主教和牧师的事。芬兰人思想保守，因循守旧，故不能出现像丹麦和德国那样的群众运动。在宗教仪式的举行还是由拉丁语唱主角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教会就无法向人民灌输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但是当构成罗马上层建筑的圣事的魔力、因善功称义和使徒崇拜等，被打倒之后，改革者就能在中世纪后期着手建立真正的基督教生活，使人们在迈向新时期的时候，怀着基督受难的秘密和对基督的敬畏，按福音派的方式进行赔罪。这些都在阿格里科拉的著作中写得清清楚楚。改革派的目的是树立个人的信仰，并努力在芬兰用本国语主持仪式和进行宗教著述。改革家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因此成了用书面芬兰语的鼻祖。

根据教会的看法，芬兰教会只有一个以阿博为中心的主教区。1528年由一位年已七旬的虔诚的多明我会会士马丁·斯屈特出任主教。他是圣经派人文主义者，也是天主教改革家。他曾经留学国外，在罗斯托克等地求学，对宗教改革的思想并不完全反对。他对在维滕贝格念书的年轻人表示支持，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芬兰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利用在大教堂学校教书之便积极活动，使学校实际上成了芬兰的神职人员研讨班。斯屈特主教上任时只得向古斯塔夫·瓦萨保证，他的神职人员将按照1527年韦斯特罗斯议会的决定宣讲上帝之道。由于他自己的神职人员会成员的反对，他显得小心翼翼，缩手缩脚，结果国王于1528年来信命令他推行福音派教义而不必在意他手下

的神职人员。韦斯特罗斯议会关于削减教会财产的法令在他任主教期间同样有效：主教的库斯托宫被拆除，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什一税被王室占为己有，教堂和修道院的财宝也被抢走。

16世纪20年代，路德的影响开始进入芬兰。第一个“路德派教徒”叫佩德·萨尔基拉克斯。他生于贵族家庭，是阿博一位市长的儿子，在罗斯托克、卢万或许还有维滕贝格等地求学多年后回到阿博，成了一名法政牧师，后来升为副主教。萨尔基拉克斯在布道中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圣徒崇拜和偶像崇拜，反对独身和修道生活。他的言辞遭到一些神职人员会成员的反对，但作为大教堂学校的教师，他那清新和自由的思想对那些年轻而富有热情的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529年他过早地去世了。

在东部，维堡和当地的学校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它与雷瓦尔和地中海国家的城市毗邻，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通过当地的德国居民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529年，或许更早在1526年，维堡就有一位叫佩德·索罗伊的教区神父倾向路德宗。芬兰真正的改革家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也是从维堡起步的。他生于芬兰南部的佩诺教区，时间大约是1510年。他在维堡完成学业后，于1528年来到阿博，开始是做主教的书记员，后来升为秘书。在阿博期间，萨尔基拉克斯的布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大教堂，当主教外出视察期间也在乡村教区传讲福音派教义。阿格里科拉是主教决定送到国外深造的年轻人之一，1536年他来到维滕贝格，1539年回国后便开始进行文字工作，很快就为芬兰教会翻译了《新约》及《圣经》的其他部分，还用本国语发表了一些教会手册。9年后，他以阿博大教堂学校校长的身份升为斯屈特主教的助手，以此身份在全国各地巡游视察。1550年主教死后，阿格里科拉继任主教职，由于当时正值国王在考虑重新组织主教区，所以对他的追认一直拖到1554年。此时主教区的划分已经完成，维堡成了一个新的主教区，可能是为了削减主教权力的缘故。阿格里科拉满腔热忱，为了属下的牧师和教徒而不辞辛苦，但他任职的时间并不长。1557年他被派到莫斯科，和其他使者一道，为俄国和瑞典双方的和平进行谈判。回国途中他不幸患病，于1557年在卡列林地峡逝世。

阿格里科拉的影响在于他的文学作品，为此他获得了“书面芬兰语之父”的美名。他的《新约》翻译完成于1543年，但直到1548年才

出版，本书以希腊文本《圣经》为基础，参照了路德的德文译本、伊拉斯谟的拉丁文本和奥拉夫的译本。他还吸纳了大部分路德的导言和旁注，包括《致罗马人书》中的重要导言。阿格里科拉最有趣的著作要算《圣经祈祷》（*A Biblical Prayer Book*）（1544年），这是一本时髦的供牧师用的手册，版面虽小，但内容纷繁复杂，足有875页。他不但翻译宗教改革作家（路德、梅兰希顿）的书，也翻译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神秘主义者（施文克菲尔德）的著作。许多礼仪的祈祷文都是出自他的《阿博弥撒》。1536年的乌晋萨拉宗教会议之后，出版芬兰文本的礼仪书籍成了当务之急，芬兰的宗教生活只是在1549年阿格里科拉的礼仪书和《弥撒仪式》（以奥拉夫的有关著作作为基础）发表之后才有了固定的形态。阿格里科拉还出版了一本关于耶稣受难的故事和一些关于先知以及《大卫诗篇》（1551年）的故事。在《新约》和《诗篇》译本的导言中他还叙述了芬兰人对基督教的皈依，瑞典人对芬兰的殖民，芬兰的地形、家庭、方言和芬兰异教徒之神等，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对人文主义的兴趣。

阿格里科拉改革活动的特点是对传统的尊重。他接受了福音派信仰的基本要素——因信称义、在上帝里的新生、极度敬畏上帝之道，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执著于一些模糊不清的传统观念，如关于炼狱的教义和圣母玛利亚的教义。关于耶稣受难的神秘主义和中世纪后期一般的虔诚在他的宗教思想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祈祷书是一部耶稣受难日的祷文集。同样，他保留了基督圣体节，这是中世纪晚期最为流行的节日，也是中世纪神秘主义在圣礼中的主要表现形式。阿格里科拉的保守态度也体现在他的改革行动中。他希望改革的推行务必要谨慎从事。和路德一样，他认为改革之前要先搞启蒙，但他总是避免攻击天主教的体制，这一点又和路德不同。他的作品侧重于人的敬畏感和基督教的实践，并不以神学理论见长。他特别强调祈祷的作用。从他的几部作品的导言中可以看出，他具有牧养信众的非凡能力。他给牧师们写信，对无知和粗枝大叶进行谴责，并鼓励他们在这变幻莫测的乱世之秋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阿格里科拉是芬兰的改革家，没有他就不可能在芬兰实现由中世纪的虔诚向一种路德宗的基督教形式的过渡。由于他对于各式各样的宗教生活和教义所采取的宽容态度以及他对实际的基督教生活的推崇，他才成了芬兰人笃信宗教的典型代表。

路德派的宗教改革在北欧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取得了更为彻底的胜利。改革根据不同的政治和民族状况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类是丹麦—挪威—冰岛式的改革；另一类则是瑞典—芬兰式的改革。北欧教会实际上仍然是统摄全体人民的路德宗民族教会。

六 波罗的海国家

福音派运动大约在1520年传到波罗的海国家，进展很快，尤其有德国人居住的城市更是如此。由于地区主教、三个最主要的城市议会（里加、雷瓦尔和多尔帕特）以及在本地区拥有大部分土地的条顿骑士团之间权力之争，使宗教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起初，条顿骑士团大统领瓦尔特·冯·普勒滕贝格设法维持这三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以免外来势力的插手。但本地的自由民和骑士皆有路德宗的倾向，很快城市议会就和条顿骑士团联合起来对付主教们，后者转而寻求外援，甚至是俄罗斯的帮助，从而导致国家的解体，各部分依附于各自的邻国，大统领的策略也就落空了。

在1522年的沃尔马议会上，城镇代表和骑士代表联手反对主教，抗议公布沃尔姆斯敕令和把路德革除教籍的教皇诏书，声称用刀剑征服的土地不能由手握革除教籍权的主教来统治。实际上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双方势均力敌，只得留待将来召开一次公会议作出最后的裁决。在1524年的雷瓦尔议会上各方表示要誓死捍卫“神圣的上帝之道和他的福音，而不是人的教义或者是人对上帝之道和福音所作的增补”。至此，改革得以迅速发展。虽然强劲的福音派运动已经为各大城市所接受，但是1524年在里加和雷瓦尔及1525年在多尔帕特由德国狂热分子梅尔希奥·霍夫曼挑起的暴乱中发生的数起洗劫和捣毁教堂和塑像事件说明，波罗的海国家的宗教改革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史上最精彩的一章是在里加谱写的。改革者是一位名人，叫安德烈亚斯·诺伯肯。他是土生土长的波美拉尼亚人，1517年担任里加的副牧师。诺伯肯曾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和伊拉斯谟通过信。在里加待了几年后，他来到波美拉尼亚由布根哈根任校长的特伦普托学校念书。他以前曾在此求过学，如今在布根哈根的指导下继续其人文主义的学业，尤其是潜心研究《圣经》和教父。1520年后，布根哈根和他的弟子们通过阅读路德的力作而了解到宗教改革的思想。于是一场导致主教进行干预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便开始了。就在布根哈根在维滕贝格加入路德的阵营，并在那里从事改革活动的同时，诺伯肯和一大群学生一道于1521年从立窝尼亚回到里加。此时他作为

一名福音派信徒在圣·彼得教堂重新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并通过他的传教很快就召集了一大帮追随者。诺伯肯在其富于论战性的反对现存秩序的著作中保持了温和的态度。除了布道之外，他还对市民们讲授《罗马书》。他写的评论还未刊印就被广泛传抄，后由布根哈根作序于1524年出版，并多次再版。作者以现场布道的方式，把论辩的矛头直接指向被罗马教会歪曲的教义和教会的弊端，并扼要地总结了福音派的学说，尤其是路德和梅兰希顿在16世纪20年代推导出的关于称义的教义。

福音派运动很快就在里加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市长康拉德·杜尔科普和市府秘书约翰·勒米勒。于是大主教林德便要求大统领进行干涉，但是普勒腾贝格主张参照别国的做法，组织公开辩论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愿采取强制措施。1522年6月12日在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席上，诺伯肯与他的一些天主教对手就其《罗马书》评论中的15条基本论点展开了辩论。诺伯肯驳斥了对方的抨击，证明自己的教义与《圣经》并不相悖。听取论战的有市议会的成员（包括杜尔科普）和大批会众，最后议会决定在里加进行宗教改革。由于大主教反对改革，拒绝委任福音宣教士，市议会便与本城的两个兄弟会的长老一道指派诺伯肯为圣·彼得教堂的副主教。

诺伯肯属于思想保守的路德派神学家，对改革的要求并不过分，而圣·雅各教堂的牧师西尔维斯特·特格特迈尔则是一位感情冲动的人，他对改革所持的激进态度很快就酿成了一场攻打教堂和修道院以反对偶像崇拜的破坏性运动。1524年3月，里加的两个教区教堂即圣·彼得教堂和圣·雅各教堂遭到打劫。神坛被捣毁，圣物被搬走，使徒的雕塑和画像被拖到城外用大火烧掉。当时的圣·彼得教堂有32个以上的祈祷室和神坛，后来特格特迈尔带人冲进教堂，大肆进行玷污和破坏。一天清晨，市议会用暴力相威胁，使可恶的方济各会修士弃城而走，到了5月，天主教神父都被赶走。与此同时，议会收缴了教堂的财宝，8月，教堂再次遭到亵渎，甚至把庄严的圣母塑像从高高的神坛上拖到德里纳河上去接受神裁，用水冲打，然后用火焚烧。

此时，市民们与大主教的关系日趋紧张。1524年，大主教死后，多尔帕特一雷瓦尔的主教布兰肯贝尔吉被选为他的继承人，市议会宣布，从今以后不承认任何主教为世俗的领主。勒米勒在一本重要的小册子《教皇、主教和教士不应占有土地和统治人民》中表述了市民的

看法。与此同时，市民们要求得到普勒腾贝格的保护，普勒腾贝格一阵犹豫之后接管了该市的世俗政权，并在1525年9月21日的声明中保证给予路德宗教会以更大的自由。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市民、贵族和大统领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在1526年的沃尔马议会上，各阶层代表建议普勒腾贝格像阿尔布雷弗特公爵在普鲁士所做的那样，以福音派诸侯的名义统治整个立窝尼亚，但被他拒绝。不过他迫于压力，迅速制定了反对大主教的措施，后者在寻求皇帝、教皇乃至俄国人的援助时被宣布为叛国者给抓了起来，后来显然是因为对普勒腾贝格表示屈服而获释。但在1526年8月为了向皇帝和教皇控告大统领他离开了立窝尼亚，次年便亡命他乡。他的后继者托马斯·舍宁只关心如何恢复主教的特权和财富，为此他承认了路德宗信徒的权利和自由。

16世纪20年代末教会的组织和礼仪规则有了固定的形式。1527年，约翰内斯·布里斯曼博士这位在哥尼斯堡和东普鲁士的宗教改革中举足轻重的保守的路德派神学家被召请与诺伯肯一道为里加制定一套礼仪规则，于1530年在罗斯托克发表，并于同年在里加传播。按照法令，教会事务由市议会派两名议员负责处理。当这两位“监管人”和市长忙于应付教会外的事务时，教会内部的管理便留给了后来称为教士监理的“首席牧师”。1532年的牧师议会决定，由诺伯肯和特格特迈尔轮流担任议会的主席，任期6个月。广大教会众则通过他们中的长老参加教会的管理，诸如挑选牧师、赈济贫民以及执行教会纪律等。

改革之初，教会在波罗的海其他城市的地位和里加的地位大致相同。雷瓦尔是毗邻里加的最重要的城市，1525年5月19日在这里颁布的教会法规是最早的路德宗教会法规之一。约翰内斯·朗格、赫尔曼·马尔索（Herman Marsow）和扎哈里亚斯·哈塞（Zacharias Hasse）都在这里传讲新教义。正如里加一样，改革很快就得到了行会的支持，并导致了最遭痛恨的多明我会与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宣教士们向修士们提出就何谓真正的信仰进行辩论，但未获响应，所以市议会决定有组织地进行改革，并且下令福音派神职人员要连续3个礼拜日在修道院的教堂布道，对广大修士进行启蒙。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伙愤怒的暴民在1524年9月14日闯入修道院的教堂，捣毁了“偶像”、神坛及其他贵重物品。紧接着供奉圣灵的教堂和圣·奥拉夫教堂被夷为平地，圣·尼古拉教堂由于已经关门上闩才幸免于难。然而市议会很快就控制了局势，并于暴乱后的第二天作出决定，凡劫

得教堂贵重物品的人必须将其送交市政厅，否则将按偷窃罪处理。但同时也决定，圣·尼古拉教堂内的神坛、圣徒塑像及类似物品必须搬走，否则将被没收。1525年元月，修士们被逐出城外。

教堂风波过后几天，三位福音派宣教士提议要制定一部教会法规，如上所述，这部法规在来年5月为议会所接受。和里加的教会法规一样，这部法规的特点在于教会的心灵使命与其世俗管理之间泾渭分明，后者全部交给议会和会众。另外，首席牧师在履行职责时不受议会的左右，只对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负责。约翰内斯·朗格被挑选出来，担此重任，他尽心尽力，努力工作，为改革的成功而奋斗，于1531年英年早逝。

可以说当1554年的沃尔马议会宣布普遍推行宗教宽容，个人有宣讲福音的自由时，宗教改革已经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大统领与主教之间的持续斗争使后者为了保住权力而与邻国结盟，致使国家迅速解体。1558年伊凡雷帝侵入立窝尼亚，大肆掳掠，导致了国家的彻底分裂。^[1]分裂的各部设法得到邻国的庇护，并且很快就被邻国兼并。整个分裂过程完成于1559—1561年间。爱沙尼亚的大部领土并入瑞典。奥塞尔主教区落入丹麦君主马格努斯之手，但他未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立窝尼亚与里加和多尔帕特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立窝尼亚大统领把库兰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公爵领地。尽管发生了政治上的分裂，路德派基督教仍在蓬勃发展，教会法规仍在广泛实施。

（赵亚麟 译）

^[1] 见本书边码第559页。

第六章 宗教改革陷入困境

一 1555年前的德国宗教改革

在16世纪，改革教会等于是在改革世界，因为教会就是世界，所以只有赢得这个世界的当权者的支持，改革事业才可能获得成功。罗马教皇从一开始就拒绝改革。1530年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皇帝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此次议会签订的法案即恢复沃尔姆斯敕令，无异于向改革派公开宣战。改革派怎么办？视改革为生命的粮食的人不可能停止传讲福音。他们只能依靠其正义的事业所蕴含的力量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建立新秩序。如果作为最高上诉法庭的公会议不站在他们一边，宗教改革的领导权将落入主张特殊神宠论掌握大权者手中。

本次议会扬言要使用武力，而武力只有用武力才能对付，所以新教王侯提出再次结盟的构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个方案被一些重大的神学问题复杂化了。用武力能够捍卫福音的事业吗？可以用武力来反抗皇帝吗？谁是福音的真正的支持者？围绕圣餐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导致了新教内部的分裂，以至于相互之间已经无法达成共识。人们在捍卫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捍卫的可能正是福音中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在建立联盟时所面临的风险。因此，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乃是当务之急。

神学家首先出面。奥格斯堡议会还未结束，马丁·布塞尔这位刚才草拟过《四城信纲》与《奥格斯堡信纲》^[1]针锋相对的改革家便与路德在科堡会晤，以求在圣餐问题上达成协议。路德起初抱有敌意，尽管他清楚布塞尔并无意把圣餐解释为一种纯粹的“象征”，而认为在圣餐里人体验到个人与基督在精神上相遇，而路德所期望的远不于此。他认为和基督的相遇也必须是外在的，必须发生在饼酒里，与领餐者的信仰无关，但强化信仰——即所谓“以口领取”（*manducatio oralis*）和“无信仰者领取”（*manducatio impiorum*）。然而两人都看到了新希望，虽然思想的统一还有待努力，但统一的端倪已经出现，这是迅速促成联盟的一个政治因素。

是否可以用武力来捍卫新教会，乃至武装反抗皇帝的合法权利，这也是让人头痛的问题。这不是完全背离了路德本人及其信徒至此在著述中所表述的甘为信仰而受苦的观点吗？此时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联盟，而且要有健全的良心来支撑这个联盟，这就要求从神学上为反抗的权利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路德不允许反抗，他满足于向王侯们及某些个别人士提出警告，要他们不要参与对福音派的镇压。路德寄希望于祈祷的力量：

我不可能也不会惧怕那些上帝的可怜的敌人，他们的愤怒正是我的骄傲，他们的狂暴正是我的欢笑。他们从我这儿能够拿走的只是一堆罪恶的肉体，但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我能够从他们那儿拿走的是什么。

他仅仅是同意自卫，并不想看到反叛的出现。但律师们却找到了根据。帝国法律本身就有这一条：若是皇帝明显不义，可以起而反抗。在福音并不排挤世俗法律的前提下，路德作了让步，承认律师们提出的法律依据，但他决无任何反抗之意，而这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只有纽伦堡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路德本不主张联盟，也不赞成抵抗，但他很难对他们解释清楚。路德的主要宗旨在于：信仰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如此行为才会有好的结果，“即使这个结果是一个错误，甚而是一个罪恶”。另一方面，黑森的伯爵则不仅保留了反抗的权利，并把这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政治家们正如梅兰希顿所说的那样，对路德的书面意见任意解释——如梅兰希顿所说进行肢解——以满足其建立联盟的愿望，而无视他为此所做的保留。

与此同时，布塞尔在其谈判中提出用一本关于主晚餐的小册子来综合各种不同的观点，虽然未能如任何一方的意，但统一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于是1530年12月，各路王侯与各城市签订了实行联盟的初步协议，1531年本协议相继在各城市获准通过。^[2]这将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只是为了坚持基督教的真理，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的和平”，反对非正义的武力。他们已无须征求路德的意见。从此，新教徒组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从此福音是否有效成为一个由权力来决定的问题。瑞士人则置身于联盟之外。布塞尔发现，要和茨温利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后者的信徒在信仰表述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后便收回了原先所作的承诺。他们提出要求，要么就承认他们的信纲，要么就建立一个信纲在其中不起作用的联盟。两者都遭到萨克森代表的拒绝，尽管以黑森为首的诸侯已准备接受。所有这些都令德国南部城市感到深深的失

望。因为它们与瑞士在政治和神学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强烈希望瑞士人而不是遥远且行动缓慢的萨克森人的军事援助。然而，诸如此类的考虑很快就因苏黎世的失败和茨温利的去世而告吹了。

之所以要提到这段失败的历史，不仅是因为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而且还因为它显示了苏黎世改革的“另一种精神”。茨温利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家兼教会改革家，而路德总是害怕触及政治。在茨温利看来，律法和福音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特别强调破除大斋节守斋，这在路德看来却一点也不重要。茨温利实际上是在推行苏黎世政策，并且公开地、毫无宗教或信仰顾忌地把它作为沿北海和亚得里亚海国家联盟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总方针。1531年初，他向法兰西国王呈送了描述自己的信仰的著述《论信仰》，该著述的用意是表示苏黎世决不会责难当局和宗教。这本小册子（直到1536年才发表）之所以特别有趣，在于它非常明显地揭示了茨温利和路德之间的区别。对于路德来说，上帝之道等于是上帝的恩典，而对于茨温利，道也只是一种象征，否则，“猿”这个词就等于一只猿本身了。道和圣礼并不是上帝的安慰，也不是个人与上帝相遇的奇迹，而是对基督的指向和纪念。路德认为茨温利的死是命运，是该得的，因为它结束了苏黎世的基督教政府，虽然在亨利·布林格的宗教指导下，苏黎世依然保持了福音派的信仰。

然而，德国的新教徒此时已结成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施马尔卡尔登是位于萨克森和黑森边界上的小镇，同盟常在此集会，故因此而得名。虽然不管从内部还是外部看，同盟都远称不上稳固，但在当时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重大成功。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皇帝因萨克森人的强硬态度而不愿对各城市提供支援，但成员们则听说，美因茨和巴拉丁的选侯已答应充当皇帝和新教徒之间的调解人。皇帝对维持内部和平是感兴趣的，他要集中力量对付外部敌人，尤其是土耳其。紧接着开普尔大灾难后在施魏因富特召开的同盟会议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谈判。这次会议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茨温利派的城市要和路德派的城市分离，出于防备，斯特拉斯堡的神学家们奉命就是否能接受《奥格斯堡信纲》进行调查，回答是他们对《奥格斯堡信纲》不管在意义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毫无异义，于是市议会宣布，斯特拉斯堡将与另外四个城市一道承认《奥格斯堡信纲》。

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施魏因富特议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同盟自身的组织问题。复杂而庞大的机构面临着物质供应和人员安排的困难。在关于宗教和约的谈判中，新教徒起初的期望过高。既然和约好歹只能维持到议会的召开，那么新教徒就有理由要对这个只得在德国召开的、自由的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概念进行严格的限定。他们希望和约的有效范围能够扩大到所有的福音派，茨温利的信徒在各加盟城市不会遭到排斥，新入伙的同宗信徒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帝国最高法院的帝国议院无权过问宗教问题。很自然，皇帝并未打算作这样的让步。谈判中断了一个月后，又在纽伦堡重新开始。神学家们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斯特拉斯堡和黑森的代表认为，把将来拥护《奥格斯堡信纲》的人都纳入和约的范围是良心问题，因为他们也有权接受福音。路德竭力反驳道：接受福音就要自担风险，这是每个人的责任，皇帝提议和解是一次施恩的行为，不可能强迫他再施予别人。谈判以黑森方面的观点为基础重新开始，数星期后，同盟消除了分歧，通过了路德在1532年6月29日曾强烈敦促各方予以接受的这份“外在的和约”。“上帝向我们致意，该是我们感恩的时候了。”

最后，皇帝重申了帝国和约宣布“在召开公会议之前”，宗教事务的处理以帝国和约为根据，并下令帝国议院停止受理宗教方面的诉讼。同时答应为公会议的召开再作努力，争取在6个月内宣布，年内举行。和约通过一项帝国敕令而生效。但此时在雷根斯堡举行的议会并未同意。查理有关帝国议院的协议没有写进帝国敕令，只是对作为调解人的选侯进行了传达。必须考虑到皇帝的困难处境：作为一国之君，却不让他对国家如此生死攸关的问题进行裁决。事实上，他宁愿一次又一次地作出承诺，进行赦免，也不愿全面暂停法庭的审判。新教徒这边答应帮助他反对土耳其人。但黑森和萨克森之间在最后一轮讨论中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黑森的特使表示同意，但以黑森领主以后批准为条件，后来领主的确批准。

然而，在公会议召开之前新教徒的存在的合法性，已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诉讼的审理和裁判仍然令人头痛，因为，宗教的事务并不完全看似宗教的，往往与政治和财产这样一些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给法官和皇帝的恣意妄为留出了很大的余地。就帝国本身而言，这份和约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它能使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土耳其人。查理五世亲自出访维也纳（在此他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之后

再到意大利和他的西班牙领地。其间，他一直在琢磨何时召开公会议这个在德意志人看来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公会议能否召开则取决于意大利能否保持和平、教皇能否使罗马教廷的利益服从整个教会的利益以及法兰西能否恪守条约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还悬而未决，需要皇帝一方施展其非凡的政治技巧，也需要作为另一方的各派确有诚意。

和平意味着改革将进一步扩展，这正是改革的敌人所惧怕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建立使得许多城市的改革得以正式推行，不时还有一些城市加入到通常是民主与改革并举的进程中来，其中有东北部的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以及东部西里西亚地区的公国列格尼茨和布列格。

改革的最大收获要数符腾堡公国的归附。自从乌尔里希公爵被施瓦本同盟赶走之后，这片领地就归奥地利当局管治。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被查理五世正式赐给自己的弟弟斐迪南从而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财产。此举再次激怒了流亡公爵的所有朋友以及王朝的敌人。此时，公爵正住在蒙佩加德（Mopelgard）自己的小郡里，他在这里与瑞士人取得联系后便开始进行改革。后来，因为和黑森伯爵是亲戚，他去了黑森宫廷。尽管他感情冲动，脾气不好，叫人讨厌，但是，他的出走毕竟不是自愿的，剥夺他的领地也没有法律根据，就连巴伐利亚那些严奉天主教但反对哈布斯堡的公爵们也赞成为他恢复领地。他的儿子也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外甥克里斯托弗公爵虽曾受教于维也纳宫廷，但却在巴伐利亚人的帮助下逃走了。

这一事件刚好使两个正为反对斐迪南大公当选罗马王而忙乎的公国黑森和巴伐利亚携起手来。法国人也被说服，对它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此刻的形势对它们似乎很有利，因为施瓦本同盟包括乌尔里希的宿敌已在宗教纷争的压力下开始解体，当然，要是没有黑森的参与，情况就完全不同。1534年元月，黑森伯爵菲利普在巴勒迪克与弗兰西斯一世会晤，并且赢得了他的支持，此事教皇是否知道至今尚不清楚。弗兰西斯想和哈布斯堡大干一场，菲利普的兴趣却只限于为乌尔里希收复失地。达成此举并不困难，一场短战突击就了结了，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幸而萨克森选侯从中斡旋，不顾乌尔里希的强烈反对，在波希米亚签订卡丹和约，才使事件得以平息。条约规定：符腾堡是奥地利皇室赐给乌尔里希的封地，但是乌尔里希有权在此实

行改革（条件是不能推行茨温利的改革）。后来的情况表明，乌尔里希的改革大势所趋，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教会很大一部分财产都落入他的手中，为他解决了债务上的燃眉之急。但是，公爵也面临着由于神学冲突而带来的难题：在施瓦本，他需与之保持友好的那些城市都倒向了茨温利，他本人的改革思想也是在瑞士受到启蒙的。然而，他必须恪守和约规定，与茨温利的改革划清界限，否则，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和黑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公爵只好妥协，把领地的宗教改革一分为二，北部地区的改革由路德教徒艾哈德·施内普夫执掌，南部地区连同杜宾根大学一道改革则由布塞尔的一位来自康斯坦茨的朋友安布罗斯·布劳雷尔领导。两位神学家在斯图加特就关于圣餐的信条达成了共识，决定采用路德派在马尔堡会谈中向瑞士人提出但立刻就被驳回的说法。原以为这是双方握手言和的一大进步却很快成为新的麻烦：瑞士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路德化；同样，路德派对安布罗斯·布劳雷尔也不信任，对他指定的宣教士表示怀疑。牧师们根据斯特拉斯堡人雅各布·施图尔姆的提议，起暂时采用《奥格斯堡信纲》中的规定用语，而非上述协定中所达成的条文。签订协定所碰到的问题又重新抬头，人们不得不尝试再次召开会议来加以解决。1534年底，梅兰希顿和布塞尔在卡塞尔黑森伯爵菲利普的宫廷举行会谈，双方在这次会上通过的信条暂时获得了路德的承认。由于这次会谈的成功，符腾堡的改革与路德曾经提出的所有原则和要求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它纯粹是一项政府行为，由诸侯发布命令，从上到下地推行。这种方式尽管不尽如人意，但还是产生了效果：规模庞大的新教区在南部建立起来了，它成了联结黑森和瑞士的纽带，周边城镇所向往的中心，就像一块楔子，插在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之间。在来自施瓦本哈尔的约翰内斯·布伦兹的领导下，它很快就成了那些路德教意识极强的新教国家的典范。起初顽固不化的杜宾根大学此时也成了福音派学子的圣地。

几乎与此同时，明斯特城的情况同样表明了，改革也可能会释放出危险的力量，改革所带来激情需要加以引导和疏通。和其他由主教管辖的城市一样，明斯特也在为争取城市自由与主教作斗争。下层老百姓及行会也在反对富有和保守的市镇贵族，并致力于从市镇自治向市镇民主的过渡。就在这样一种还不明确的背景下，伯恩哈特·罗德曼在市外一个由主教管辖的教堂里开始了福音传道。当主教按照帝国敕令将他驱除时，他没有抗命，而是转入本城，在一家商业行会中继

续布道。两个月后，他的信徒为他争取到了一座教堂，5个月后即1532年8月，福音派宣教士充斥了市内所有的教堂。短短几个月时间，罗德曼就把明斯特人变成了新教徒。当然，其中不可能没有过激行为，但它一开始就纳入了福音派事业的轨道。并且，早在1532年12月，路德和梅兰希顿就来信警告，要避免神秘主义的狂热所带来的危险：“魔鬼是狡诈的，它甚至能把优秀、虔诚和博学的宣教士引入歧途。”危险在于狂热分子的存在。神秘主义在莱茵河下游一带根深蒂固，这里是共同生活兄弟会实践其《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中的思想的一个中心，并且在韦塞尔甘斯福特（Wessel Gansfort）还产生过一位神秘主义的前期改革家，路德自己早年曾编辑过他的文章。这里也是再洗礼派频繁活动、吸纳会员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幸存者惯于保密，所以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明斯特的成败前面已有叙述。^[3]它同样表明了，仅仅仰赖激情是危险的，这样会把所有良好的秩序统统破坏。这些事情本身仿佛都在提醒采用非常手段的必要性：只有黑森伯爵菲利普的行动要温和一些，他设法利用布塞尔把再洗礼派拉回了教会。天主教当然要把明斯特革命竭力说成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但是，路德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再洗礼派及其思想的最强劲的对手，路德派甚至认为，在那些福音派没有自由而思想又放任自流的地方，再洗礼派的势力是最强大的。事实上，精神禁锢最严重的地方当属尼德兰，此地皇帝的统治下，宗教改革屡屡遭到镇压。

如前所说，符腾堡事件促使人们再次努力就圣坛之圣事达成协议。路德并不反对布塞尔在卡塞尔提出的信条，但他并不打算以这个仅由两个人认可的信条为基础，不管它的名声有多大。一个协定是否有效要由全体教会来决定。况且，维滕贝格人的怀疑也不是毫无根据，布塞尔能否真的为他表面上代表的所有人说话还远未确定。另一方面，布塞尔已经在向路德的观点和立场靠近。在奥格斯堡这个被称为“日耳曼的科林斯”的地方局势尤其艰难，布塞尔在讲坛上承认他对该问题有误解，于是，奥格斯堡的牧师们便拟了一份新的信纲交给路德，并要求他派一位路德宗宣教士。无可否认，他们之所以如此，显然是迫不得已，而并不完全是出于神学的激情，因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必须作好准备，把那些表明态度、旗帜鲜明的城市吸收进来。瑞士的情况也一样，领袖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布林格也看出，圣餐不只是基督的临在的一种“象征”，但是，他不可能像茨温利那样

一味地附和布塞尔。1536年初，瑞士人遵照地方行政官的命令，也拟订了一份信纲——赫尔维希亚第一信纲，该信纲起源于在巴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作者们并未考虑要和路德派保持一致，只是觉得有必要向公会议阐明自己的信仰。圣餐在他们看来不只是一种象征，也包含着“实质”，在圣餐里上帝应许某事并“立即实现之”；但就他们提出的阐释而言，仍然是在坚持这种观点，即象征所传达的东西，只有在该圣礼之外才能获得。卡皮托和布塞尔以肯定的口吻向路德报告，好像全瑞士此刻都已改信了路德宗似的。瑞士人自己认为，兴许路德对这个信纲会表示满意；唯独康斯坦茨因为吸取了符腾堡的安布罗斯·布劳雷尔的教训，才明了其间的差异。按照他们的观点，说“通过圣餐，罪人的拯救得以展示”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圣餐就不是拯救的记忆，而是拯救的工作了。但是，这恰好是路德思想的核心。瑞士人反复撰文，力图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茨温利的《解说》发表了，这本书突出地表现了茨温利主义不愿妥协的精神。

要消除争议，订立协定，就必须召开神学会议。于是，布塞尔向德国南部人发出了邀请，不过，那些著名的路德教徒却不在其中。瑞士人没有更多的动作，只是向布塞尔提交了他们的信纲，要求在会上进行传达。梅兰希顿对会议的前景忧心忡忡，生怕弄巧成拙，到头来不但没有达成团结，反而使分裂不可弥合。会议的首选地址是爱森纳赫。但因为路德有病在身，行动不便，这些南方人只得北上，于1536年到达距离更远的维滕贝格。

谈判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由于路德拿出瑞士人最近出版的著述，指责瑞士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布塞尔不得已而为此进行自辩，同时也为他的朋友辩护，处境十分尴尬。于是，路德要他承认，基督的临在不仅是因信或不信，而且是凭基督的代人祈祷与领餐者本人的主观品质无关。信或不信并不影响基督的代人祈祷。用专门的神学术语来说，路德要他承认“无信仰者领取”。为此，布塞尔感到很棘手，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在圣餐是应该领受到一种精神的、灵性的实体，这种实体只有那些拥有必须的器官即精神（the spirit）的人才能领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维滕贝格的牧师布根哈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不配的人只能领受基督的身体。言下之意是在“不信上帝者”和“不配者”间作出区分，前者什么也领受不

到；后者是基督徒，因此拥有作为领受器官的精神，但由于不能恰当地使用，领受到的只是没有果实的恩赐。毫无疑问，这样的区分完全是人为的，所以遭到强烈的非议。令人惊讶的是，路德居然对此表示满意。梅兰希顿根据这一信条为所谓《维滕贝格协定》起草了条款，这份协定并不是谈判双方妥协让步的产物，而是一份由维滕贝格与会者认可的南方人制定的信纲。他们就这样接受了维滕贝格会议的立场，而路德本人也不认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重大的分歧仍然存在，这些分歧路德是知道的。布塞尔并没有放弃他历来主张的象征说观点，他只是作了某些修改，以至于不会被路德完全否定而已。他承认，产生恩典的并不是思索信仰，而是在圣餐里基督因其允诺而临到领餐者；同时，他也不否认，基督的行为与牧师的所作所为是有联系的。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只有精神才能领受到灵性的实体。奇怪的是，路德对此并不表示反对。很清楚，路德之所以如此，乃是这种说法符合他的宗教利益。因为，在他主张那些不信上帝者有权领圣餐时，他并不在乎这些人中是否包括土耳其人或犹太人（因为圣餐礼不是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设的），他只是觉得有必要向所有领圣餐的人讲清楚，他们确实是在领受基督的全部恩典；如果说路德反对灵性圣餐的话，那也不是说他想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释基督肉身的实在性，而是因为他不想把恩典的确实性建立在领餐者主观信仰的确实性上。恩典不靠信仰，而信仰要靠恩典。基督徒的信心不在其自身，而在于他在圣餐里所领受的那个东西。既然这些观点在他看来都已被接受了，他也就不再反对与那些南方人签订协议了。当然，仍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布塞尔的态度中就有表现：对于瑞士人，他不但不打算进行遏制，而且反观他的言行，好像瑞士人的观点已无须改变似的。他为了满足政治家的希望而不惜牺牲神学家所追求的明晰。然而，只要有人哪怕稍微强调一下那些适用于不配者的条件，那么，布塞尔的看法就会大不一样了。加尔文关于圣餐的教义同样含糊不清，他作为斯特拉斯堡的一位牧师，也同意了这个协定。总之，就路德而言，这项协议也只是临时性的，还得在以后得到所有教会的认可。所以，布塞尔得设法争得瑞士人的同意，但是，茨温利对文中不管是明白的部分还是含混的部分都予以否决。分裂还在继续。当南方人用布塞尔作为桥梁通向路德主义时，当维滕贝格协议在德国南部城镇中长期具有信纲的效力时，瑞士人却保留了对圣餐所作的特殊解释，后来加尔文和这种解释建立了关系。

在那些年月里，新教的向外传播和内部发展只有在推迟召开公会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德国的王侯们，包括天主教王侯们都认为召开公会议势在必行。自奥格斯堡议会以来，皇帝一直在为此努力。新教徒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在《奥格斯堡信纲》的前言中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但被教皇取消，其中有神学上和教会政策上的原因，也不乏一般政治的原因。的确，召开公会议的要求涉及一大堆尚未解决的问题。早在1519年的莱比锡论战中，路德就坚持认为，即使公会议也会出错。新教徒会屈从于一次公会议吗？他们能够得到准许[参加]吗？他们会被宣布为异教徒吗？教皇和公会议是什么关系？谁在谁之上？另一方面，是否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来推行势在必行的改革，并恢复教会的统一呢？起初，教皇认为，召开公会议等于是在给已病入膏肓的教会送上一服“致命的药剂”。然而，皇帝也看不出，如果要避免暴力的话，还有别的途径可走。至于法兰西的立场，它的国王则把整个事件看成是一种政治，他随时都可以选择英格兰国王的道路。

在1532年的雷根斯堡议会上，天主教徒建议由皇帝亲自召集议会。查理并不打算这样做：他是尊重罗马教廷的。但在博洛尼亚，他却竭力敦促教皇采取行动。克雷芒七世最初想与其他大国商量，但法国出于政治原因，破坏了这个计划，教皇也未生气。尽管如此，罗马教廷还是向德国派去了一位使节，以便事先转达教皇的意向。这位使节在德国受到了天主教徒的盛情接待，但是，新教联盟的反应则是：一次宣称承袭“教会习惯做法”的公会议不是他们所期盼的，也不是帝国议会所应允的，因为它不是“基督教”的，不是由《圣经》决定的；并且它也不是“自由”的，而是由教皇主宰的。路德向使节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力陈了以上缺点；然而，他还是主张参加会议，如果会议的召开能够成为现实的话。紧接着，新教联盟就宣布，不能接受罗马教皇的条件，但是，只要会议对福音的传播有利就要保留出席会议的权利。他们不想阻止召开宗教会议；但要皇帝保证，这是一次真正的基督教会议。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提出了召开公会议的要求，但双方所强调的内容则大相径庭。然而，会议还是搁浅了，但不是新教徒从中作梗，而是由于法国的反对，弗兰西斯一世在一次与教皇在马赛会晤（1533年10—11月）中表明了以上态度。就是在这次会晤期间，邦纳博士当面向教皇请求，针对教廷谴责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的裁决在将来召开一次公

会议。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前，亨利八世甚至未回答教皇的询问。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会议的延期实在“令人烦恼”；甚至整个天主教会都认为是教皇不再认真对待，尽力不够。

然而，新教皇保罗三世（法尔内塞）对此则十分认真。1535年初，罗马教廷的使节被再度派往各国，向王侯们传达教皇已下定决心，并向他们征求意见。派到德国去的使节叫彼得罗·保罗·韦尔杰里奥：人们把他当作传福音消息者来接待。然而，他的出访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他在维滕贝格会见了路德：后者并不相信教皇是真诚的，但仍然答应，“即使我知道你会把我烧死”，也定来赴会。这位使臣以为，路德的话表明选侯们也同意了，但却被告知要与各加盟者进行磋商。1535年，在施马尔卡尔登召开的同盟会议上，与会者既不表示赞成，也未表示拒绝，只是反复陈述，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样的公会议。就在此时，英国使节赫里福德大主教爱德华·福克斯奉其国王之命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教皇的言词激烈的讲话，指责教皇一心只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并宣称，英国所希望的是召开一次自由的、基督教公会议。接下来便开始谈到新教同盟与英格兰结盟的问题，但是，新教徒们得事先弄清英格兰教会的教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后来在维滕贝格会议上加以讨论，结果便产生了《维滕贝格信条》，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召开公会议的计划再次化为泡影之后，该信条很快就被遗忘。法国又一次充当了绊脚石。这次弗兰西斯一世想通过自己与梅兰希顿的谈判来恢复教会的统一，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因为梅兰希顿遭到萨克森选侯的禁闭，来不了法国。最后，经过不懈的努力，法兰西国王终于同意召开一次公会议。查理五世在访问罗马期间把会址定在了曼图亚。教皇于1536年6月4日颁布诏令，宣布会议的日期是1537年5月23日，并规定了会议的任务：纠正错误，排除异端，改革道德，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并着手准备对异教徒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教皇又一次派去使节，不过，这次他们的任务只是以适当形式传达教皇的邀请而已。

现在是新教徒们下决心的时候了。萨克森选侯立刻命令他的神学家们仔细商讨，他是否可能接受邀请而又不“使自己默默承担”出席会议的义务，“承担”不管会议采取什么形式都予以承认的“义务”。由于梅兰希顿南下出访，讨论拖了很久。大家都认为，这次公会议肯定是教皇说了算，不可能符合新教徒的要求。尽管如此，神学

家们还是觉得，为了给信仰作证，出席会议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而选侯本人及他的法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他要是接受邀请，就等于承认公会议及其决定，这样一来就否定了自己的信仰。从选侯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召开一次新教徒的公会议来和这次公会议对抗。在商议过程中，他要路德重新撰写一份福音派信纲，作为在公会议上甚至在新教的对抗性公会议上谈判的基础。这份文献是后来路德的《施马尔卡尔登信条》。不知不觉地，抵制又出现了：普遍认为，新教徒在此次会议上肯定会遭到谴责，皇帝肯定会履行职责，对新教徒采取行动。此刻，甚至连路德也宣称，防卫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他甚至说，他要“尽自己的责任祈祷，（如果情况如此）甚而挥舞拳头”。黑森的神学家们也提出要求，应该通过新的信纲来对罗马教皇的行动予以公开回击。

此时，新教同盟把神学家召集起来，在施马尔卡尔登集会。他们要在这里就公会议问题拟出详细的声明。在所有新教的活动中心，讨论的内容都写成备忘录。对于教皇通谕以及即将召开的公会议，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则各说各的一套。黑森人主张立即行动，全力备战；其他人仍旧对皇帝陛下抱有幻想，希望在他的帮助下，公会议满足新教的要求；梅兰希顿希望重新审定一套教义公式，清楚、明白，不会产生歧义；维滕贝格的神学家们则坚持要对会议发难，但仍然认为出席会议是明智的，这样做可以为其信仰作证。很明显，这与他们选侯的意图是截然对立的。

路德在去施马尔卡尔登之前，曾郑重其事地号召他的维滕贝格会众进行祈祷；钟“就要铸成，它将响彻世界，福及子孙”。但在施马尔卡尔登，则是由王侯们说了算。出席会议就意味着要服从会议的决定，基于这种想法，他们立刻就达成共识，拒绝邀请，并告知帝国使臣黑尔德副宰相；市民们以及梅兰希顿本人就此作了让步。帝国使臣认为，新教徒可以力争改变会议本身的形式和程序，但新教徒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刚好在这个时候，教皇的使节来到了施马尔卡尔登，向选侯和伯爵面呈邀请函。选侯虽然接见了，但却让梅兰希顿答复说，教皇使节应当在同盟会上发表演说，并把他的那些信带上。教皇使节拒绝了这项要求，理由是，选侯本人保持缄默，表明他已接受了邀请。选侯并不打算羞辱这位使节。他拒绝邀请是因为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参加会议并接受会议的决定：递交传票是一种法律行为，它对

接到传票的人是有约束力的，因此，传票一般都是在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交代的。黑森的菲利普对教皇使节甚至连面都不见。皇帝借此提出，要新教徒为反对土耳其给予特别援助，新教同盟的条件是，必须获得稳固的和平的保证；于是乎，拒绝出席会议这一行动立刻就在政治上结出了硕果。

在这种情形下，神学家们在施马尔卡尔登也就无事可做了；由于新教徒拒绝参加会议，提交路德的条款也就显得多余。总之，市民们也害怕，讨论教义只会带来新的分裂；梅兰希顿似乎完全没有弄懂路德手稿的深层含义，所以竭力阻挠对手稿的考虑。大家所做的只是审议了《奥格斯堡信纲》，并增加了一段由梅兰希顿撰写的《论教皇之权力》。早先就圣餐引发的争议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当路德的条款送交神学家们讨论时，至少他们愿意在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布塞尔和路德在哥达会晤，商讨协定；路德提醒布塞尔，协定不能含糊其词，他虽然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但仍然心平气和，对协议最终达成完全一致充满希望。

新教同盟会议的正式结果就是，新教徒拒绝参加会议。为此，梅兰希顿只得草拟一份正式的道歉，以同盟的名义发表。尽管他个人另有看法，并且害怕引起战争，但还是扼要地归纳了几条拒绝的理由。可以说，新教徒如果不把基督教的最高法庭放在眼里，那么对任何法庭都可以不予承认。但是，同意参加会议就等于承认教皇是信仰问题的法官，也就意味着不是由上帝之道，而是由现存的教会法规来进行裁决，那就会导致对信仰的否定。

会议在解散之前，收到一封法王的来信，告知他也不同意召开公会议。新教徒的拒绝加上法国所表明态度，使召开公会议的计划再次流产。实际上，法国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和新教徒同样的理由。弗兰西斯只是强调，在他与皇帝开战期间，他是不可能到曼图亚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会允许法国主教接受邀请。此外，曼图亚公爵因为会议要在此召开而提出了叫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公会议就这样两次被迫搁置，不再有人相信它果真会召开。路德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教皇的小册子，随后又在1539年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论公会议和教会》（*Of Councils and Churches*），就天主教关于这些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他的主要论点是，公会议不可能与教父们谋求一致，因为教父们本来就不是统一的：想要真理，就到《圣经》中去找，

《圣经》之外没有确实的真理。公会议不可能再发现新的真理，只能捍卫古老的真理，就像学校和教会每天都在做的那样。只有凭《圣经》来进行裁决的公会议才是庄严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圣经》里才有教会的“法律”。的确，因为滥用教义，生活腐败，有必要召开这样的公会议——皇帝和王侯们甚至应迫使教皇召集会议；但是，如果不能召开一次令人满意的公会议，那还不如保持沉默，不召开更好。路德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里，就教会这个概念作了清晰的说明。教皇看重的是外在的形式、法律和秩序；而教会则只是由上帝之神圣的道——由传道——和传道所必须的教职——祈祷和信仰构成的。由于罗马教会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所以它便成了魔鬼在教会旁边为自己建造的一座小教堂。所有这些便是新教徒拒绝出席会议的基本理由；它说明了，新教徒与旧秩序已相去甚远，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要求召开一次公会议。

1538年4月25日，教皇无限期地推迟召开公会议。紧接着，教皇与皇帝以及法国国王在尼斯会晤，遂有其后10年的休战，虽然其间也不乏风风雨雨的时候。按道理，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正是举行公会议的好时机，但在1539年的教令中，教皇无缘无故地将会议延期。现在，整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教皇不愿意召集公会议。以至连皇帝都在抱怨教皇的热情在冷下去。的确，教皇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改革时期最让人琢磨不透的现象之一。人们可以举出很多政治上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是：教皇害怕召开一次公会议将使势力过分强大的皇帝处于支配地位。但是，这些难道不是谴责教皇对教会的需要置之不理的根据吗？[\[4\]](#)

如果不召开公会议将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如果不召开公会议，德国的公会议就会导致公开的分裂，皇帝对此束手无策。即使他想过使用武力，他也不能使用武力，这是因为，他虽然有极其巨大的储备力量，但由于为外交政策的需要所搁死，无法动用。皇帝该如何办呢？

甚至在最后一次作出推迟公会议的决定之前，似乎已经露出了解决问题的端倪：尼斯会议不久，勃兰登堡新选侯（约阿希姆二世）就答应从中斡旋，通过和谈来弥合分裂。斐迪南对此表示支持，他希望这样能获得新教徒的支持，反对土耳其；甚至连教皇也看不出有拒绝的表示，因为这样一来，他兴许就能摆脱公会议问题的纠缠。之所以

能够提出这个建议，并不仅仅是出于新选侯的一番好意，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意见。不管是维滕贝格还是罗马，都不可能完全主宰它的追随者的思想，比如使他们往后看。许多人看不见，或不愿承认冲突的尖锐，许多人已认识到改革教会的必要性，同时又认为，天主教会是可以保留的。伟大的伊拉斯谟在他的《论教会协和之恢复》（*De sarcienda ecclesiae concordia*）（1533年）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虽然他能用教条来谈论路德主义的实质，但他所说的信仰是指形成的信仰，他坚持这种解释；教会属于更高的品级。至于称义，他谈到两种义——信的义和爱的义；难道两者之间就不能互相补充吗？对许多人来说，这很简单，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这样做既满足了新教徒的利益，又避免了因忽视善功而招致的危险。难道这不能使人同时既是福音派信徒又是天主教徒吗？伊拉斯谟有很多弟子，其中一些人还身居高位。天主教的头面人物像尤利乌斯·普夫卢格、格奥尔格·维策尔、约翰内斯·格罗珀都对他言听计从。康拉德·冯·黑雷斯巴哈本是克利夫斯公爵的大臣，1532年他推行了一种几乎是改革过的教会制度，但并未因此而成为新教徒。萨克森公爵的顾问卡尔罗维茨（Carlowitz）接受了这些思想，并在与布塞尔举行宗教对话的过程中（似乎）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甚至于意大利都有与伊拉斯谟遥相呼应的改革团体，连最著名的红衣主教也在其中。

但是，在道路铺平之前，需得再次奠定政治基础。新教徒拒绝了公会议之后，转而寄希望于战争。黑尔德副宰相在施马尔卡尔登栽了跟斗，便在纽伦堡组建天主教联盟，给迫在眉睫的战争火上浇油。新教徒则担心，那些纽伦堡和约签署之后刚入盟的成员是否具有合法地位，否则，它们在休战期间将不受和约的保护。一系列针对它们的诉讼悬而未决；帝国城市明登尚处在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禁令之中。这些都是得首先排除的疑虑。

皇帝从容备战。1539年2月，新教徒召开议会，大会关注的似乎也将是如何备战，而不是和平。然而，流亡的隆德大主教韦扎的约翰以帝国全权大使身份出现，这表明皇帝同意在没有罗马教皇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谈判。这次谈判的过程跟7年前的施韦福特和纽伦堡谈判大致相同。新教徒的要求太高，遭到了隆德的拒绝，全权大使认为，如答应这些要求，就会扰乱教会的秩序，破坏帝国议会的法令，影响正常的司法管理。他主张暂时休战以促进和平，组织一次辩论来廓清宗

教是非。双方在协议签订之前得保持充分的耐心；新教徒再次提出，和平的范围应该包括未来加入同盟的成员，这是谈判中最令人棘手的问题。双方努力的最终结果是1539年4月19日签署的协定《法兰克福临时敕令》，其中规定，新教徒从5月1日开始在未来的15个月中将不会受到攻击。对于现存的《奥格斯堡信纲》的履约者，协定仍然有效，甚至将延续到规定期限之后，直至下次公会议召开为止。那些悬而未决的诉讼案将推到这段和平时期之后去裁定。另一方面，新教同盟在15个月之内将不再吸纳新成员，不再推行世俗化运动。辩论将在纽伦堡举行，日期暂定为8月1日；新教徒拒绝罗马教廷参加。他们宣布准备参加支持反对土耳其的谈判，并服从关于这个问题召开的大会的决定。将和平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新教徒以及纽伦堡同盟在和平期内不得吸收新成员的要求现已摆在皇帝面前，他要是拒绝，目前的条约就只能维持6个月，之后将再次被纽伦堡和约所取代。

这只是一系列条约之一，这些条约全部都应该签署，这是更重要的事，至于条约中的具体条款的争议，那倒无关大局。新教徒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次成功，本来他们拒绝参加公会议之后，皇帝是准备调转矛头来收拾他们的。此刻，战争的危险已消除。在这样的气氛下，大家又才坐下来关注宗教谈判。双方唇枪舌剑，相互攻击。布塞尔认为，新教同盟同意暂停扩大是对福音的背叛。天主教徒同样也感到愤怒。教廷派驻斐迪南处的特使阿莱安德尔谴责隆德接受了新教徒的贿赂，认为即将组织的论战不让教皇出席乃是德国全国性公会议的恐吓。罗马方面企图加以阻挠，很快便提出要皇帝终止履行和约。尽管查理实际上并没有批准条约，但他还是坚持了条约所规定的原则；甚至原本忠实于天主教的萨克森当1539年4月17日公爵去世后却改信了新教这件事也未能对他产生影响。所以，尽管有人竭力反对，有人动摇不定，皇帝还是在1540年4月18日对定于6月6日在斯佩耶尔举行的论战发出了邀请。

为了阻止全部按原方案运行，罗马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做到了，不让教皇像新教徒反要求的那样被排斥在事件之外。要教皇同意在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来解决宗教问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天主教徒也绝对不会答应。另一方面，新教徒虽然乐于参加讨论，但要他们牺牲自己的整个教义来服从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比如，维滕贝格的神学家们就说：

“就他们而言，如此分裂会使上帝高兴。”他们害怕寻找所谓“中间道路”，因为基督所真传的教义是不可更改的，即令那些“世间的圣贤”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看见的只能是存在于异教徒心中的那种“尘世差强人意的和平”的希望。教会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新教徒不会承认教皇的精神权利，而作为另一方的天主教徒也不会放弃这种承认。至少维滕贝格从一开始就很清醒，所谓新道路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瘟疫流行，论战地点从斯佩耶尔转到哈根诺。教皇派出的代表叫莫罗内，他不参加论战，但却充当天主教辩方的顾问。论战之前开了个预备会，商定了像会议日程这样一些细节问题，论战本身则推到沃尔姆斯会议上进行。新教徒现已同意让教皇的代表参加，但不能将此看成是承认教皇的领导。情况就这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这些争论已经不再像是一次全国性公会议讨论的问题了。

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教廷特使真的露面了。他的使命是捍卫教会的权威，保证教皇对所有解决议案的审批权。新教徒的任务则是拒不退让，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教皇的权力。这次的预备会议也一样拖了很久：天主教徒千方百计不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投票方法的影响，并希望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他们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整个事情不感兴趣。代表皇帝赴会参加谈判的格兰维尔已不抱任何希望，遂要求查理再次推迟会议。真正辩论的时间很短，只有3天，双方仅就原罪的信条达成了共识。然而，真正的成果是私下获得的，与会者并不知道。科隆的约翰内斯·格罗珀和帝国秘书费尔特维克与布塞尔和卡皮托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就上面提到的教义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见。当然，布塞尔并不想牺牲福音派的教义，他之所以表示同意，只是想给统一保留一线希望，以避免宗教战争。会谈的结果形成了文字，这样就为1541年在雷根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上重开谈判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格兰维尔正在为沃尔姆斯协定大作宣传。路德收到了勃兰登堡选侯寄来的文件副本，他断言，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提出的建议则是教皇和新教徒都无法接受的。萨克森选侯认为，对方会首先要求承认教皇的权威，为此，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细节上作出让步。不过，人们充其量只能希望一种表面稳定的和平。

皇帝亲自出席了雷根斯堡议会。根据他的提议，议会委托一个由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就统一[教义]问题进行谈判：新教一方有梅兰希顿、布塞尔和黑森人皮斯托里乌斯，天主教一方有普夫卢格、埃克和格罗珀，教皇派去的代表是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天主教与会者每天在会前和会后向他汇报，因为他的谨慎，埃克才不至于显得鲁莽和出格。会议所讨论的蓝本并不是新教徒希望的《奥格斯堡信纲》，而是《沃尔姆斯协定》，会议向与会各方逐章宣读协定的内容，几乎未作任何改动。起初，会议相对来说开得比较顺利；到了5月2日，眼看已经胜利在望，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双方从各自的证明中找到了共同的准则，以至连埃克和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加尔文也无可挑剔，只好赞成；皇帝则认为，这是上帝在相助。但是，当谈判涉及弥撒时，双方的分歧立刻暴露出来。双方在告解、赦罪和补赎、教会和教会政府之类的问题上各执一端。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在协议签署一系列条款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长串无法解决的问题。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路德较有可能看到其意义，所以勃兰登堡选侯就派了一位使臣去探路德的口信，看看路德对天主教徒提出的这些条款持什么态度，是不愿承认呢？或者至少暂时宽容呢？路德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支持梅兰希顿的条款，只要能够保证福音派教义的“纯洁”，他可以接受其他的观点。黑森的菲利普，本是新教徒中最担心协定会遭到夭折的，可连他都站了出来，反对作进一步的妥协。作为另一方的天主教徒对皇帝诏书则颇有微词，并坚持认为，宗教的统一是不可能达到的。议会对此也束手无策，只能提出再进一步讨论，如果还没有结果，那就只得再开一次公会议。皇帝决定将这个问题移交给教皇的使者孔塔里尼，与他一道协商处理。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孔塔里尼要皇帝听从罗马教廷的决定，不管是以公会议的形式，还是以其他别的形式，总之，罗马教廷的决定对于教会、对于日耳曼国家都是最有利的。同时，他迫不及待地给日耳曼的主教们去信，号召他们行动起来，以天主教的精神进行道德改革。

这样做无疑把所有路都给堵死了；就连皇帝此时也别无他法，只得召开一次公会议来解决。如果后者再被推迟，那就只能留待帝国大议会来处理了。新教徒立刻提醒皇帝，他们早先就反对召开公会议，并且已经表示拒绝参加。而本次帝国议会的最后决议中的确再次提请要召开公会议，据说，孔塔里尼曾答应不久就会实现，为此，皇帝还得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愿望落空了，那就只能召开一次全国性公

会议或留待下一次帝国议会。同时，高级神职人员们要“奉命改革”，促成“良好和健康的管理，以及最后达到一致”。不出所料，教皇的使者立即抗议，反对召开全国性公会议，尽管如此，召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纽伦堡和约直到公会议接近尾声时才获得通过，虽然天主教徒一再抗议，那些诉讼案还是被搁置。在正式公布的法令中又补充了两条帝国声明。要形成统一的决议已经不可能了。帝国政府在其全盛时代是如此庞大的一部机器，却由于宗教分裂而陷入停顿，它对帝国的统治还能继续下去吗？

双方在关于称义的教义上达成了共识，这是本次帝国议会引以为豪的成果，但是，其中的水分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萨克森选侯敏感地察觉到，其中没有提议因为信仰（sola fide），所以说是背信弃义的。路德和布根哈根把雷根斯堡条款称为“异想天开的拼凑”。孔塔里尼甚至无法征得其意大利朋友的同意。卡拉法只允许这项宣言按照天主教的意思来理解。5月27日的罗马教会议会作出决定，日耳曼人要坚持其错误，那是他们的事，罗马不能向他们让步，这样做会损害宗教的尊严。罗马在给红衣主教孔塔里尼的正式答复中只是说，既然谈判不能取得积极的成果，那正说明，谈判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没过多久，孔塔里尼就因异端倾向而受到指控，他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后来的特伦托会议断然否决了同一个教义两种解释都正确的做法，从而把最后一点统一的基础也推倒了。

毫无疑问，皇帝是真心诚意地想从中进行斡旋，他在雷根斯堡为此花了不少力气，调解不成肯定使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可以说，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怀疑德国能否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尽管对此他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是，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从他与黑森的菲利普（后面还要提到）和勃兰登堡的约阿希姆二世签订的条约可以断定，他正着手准备动用武力，而巴伐利亚公爵、不伦瑞克公爵以及罗马教廷早就认为，只有动武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此时，虽然此时从维滕贝格传来的著述反复鼓吹要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要相互宽容，但是，像查理五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再起来响应了。

皇帝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与黑森签署了上面提到的那项条约，这笔交易是那个混乱的时代留下来的最令人不愉快的记载之一。菲利普伯爵是新教徒最积极的领导者，但他本人在性方面却是激情满怀，异常亢奋。由于过度纵欲而身患重病，到了1539年，他的健康完全崩

溃。由于对自己能否保持婚姻的忠诚缺乏自信，于是便渴望与别的女人长期结合。为此他选中侍奉他姐姐的一位宫女，而这位宫女的母亲作为监护人很难对付，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仅仅作为选侯的情妇，但是，如果势在必行，只要有权威的理论根据，她对重婚的做法也还是满意的。布塞尔一直是菲利普的忠实顾问，所以被派去搜集权威的论据。此举使路德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选侯正在为自己良心上的不安寻找出路；此外，菲利普经常引用《旧约》，有时也引用路德的语录，似乎这样做便打开了特殊通道。他很想让路德公开出面来处理这件事，但无论如何要有个书面的字据。对于那些以政治相威胁的种种暗示，路德并不在乎，相反，倒是菲利普良心上的不安使他大为感动。所以路德在处理此事时开了绿灯，类似于主教的特许，但要求保密，以免使人反感。路德并不想模仿再洗礼派那种时髦的做法，增补什么新的规定或条例；他只想把这个案子作为例外情况特殊处理，赦免其罪。菲利普征得原配夫人的同意后，随即举行了婚礼，梅兰希顿是婚礼上的客人之一。当然这样的事是无法保密的。所以，菲利普害怕引起皇帝的愤怒，因为查理五世的刑法法典菲利普本人也是赞同的，其中对重婚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他希望路德能够公开站出来为他说话。路德拒绝了，并不是因为路德言而无信，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坦白地告诉这位选侯每个忏悔神父都清楚，有些案子靠求助于一般的规则是毫无用处的一一而是因为把事情张扬出去对菲利普并无好处。忏悔神父的特免并不等于世俗的法律，忏悔神父只能说什么在上帝看来是对的，但是，世俗的法律毕竟是法律，这是无法更改的，要听从神父的劝告，就得准备承受因其与尘世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此外，路德还听说，选侯的那帮政治伙伴不相信选侯的良心会有不安，如果把事件的原因归咎于选侯良心上的顾忌，那只会遭到众人的奚落和嘲笑。我不能同意说路德因此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或者说作为一个神学家他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伯爵此时已经得到皇帝的庇护，他们之间的谈判早在沃尔姆斯会议期间就已经开始，并且在雷根斯堡达成了协议，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条约。实际上，伯爵已经成了皇帝的盟友，他摒弃了与所有非日耳曼势力的联系，并阻止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接纳皇帝的敌人克利夫斯公爵，为此，皇帝原谅了他迄今为止为反对帝国及其宪法所做的一切，“如果由于宗教的缘故而引发一场针对所有新教徒的全面的战争，那又另当别论”。伯爵没有食

言，继续发挥其干扰新教同盟行动能力的作用。然而，他还远未走到这一步，即放弃新教信仰，停止黑森的宗教改革。

另一方面，在另一个选侯的领地科隆，由于雷根斯堡议会的影响，又重新燃起了改革的希望。鉴于明斯特事件的教训，身为大主教和选侯的赫尔曼·冯·维德得出结论，今后的改革必须是严肃认真的，否则就难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他的第一次改革尝试尽管有格罗珀从神学上给予支持，结果还是失败了。这一次，有议会通过的法令作为依据，他得以放开手脚，把布塞尔叫到他的首府波恩来布道：科隆是帝国的城市，从来就有反对主教统治的传统。为了帮助重组教会，梅兰希顿也赶来了。然而，这位主教此时发现自己遭到他的顾问科隆的神职人员格罗珀的强烈反对。他们通过交换信件这种新的方式来攻击和驳斥对方。科隆的这位神职人员并不想卷入布塞尔所提出的论战，但是他决不允许对天主教会关于教皇和主教团的基本教义存丝毫的怀疑。布塞尔是主教团的敌人，他违反了他们的规则，因而被视为异端，对付他的办法不是论战，而是驱除。虽然选侯有自己的领地支持他，但他的对手也达到了自身的目的。皇帝是他们的后盾，当教皇下令把大主教赫尔曼逐出教会时，由于得不到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积极支持，赫尔曼只得离开他的侯国，几年后，默默无闻地死在他那小小的维德封邑里。这是福音派事业在帝国境内首次遭遇的巨大失败；紧接着，诉诸暴力成了解决许多问题的迫切手段。

然而，在此次宗教改革时期，最难解决的莫过于最终把查理五世拖入战争的问题。雷根斯堡议会之后，皇帝出访意大利，在卢卡会见了教皇。会谈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教皇同意召开公会议，但和以往一样，对会议能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当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发动的战争和在阿尔及尔对异教徒的远征惨遭失败之后，皇帝奔命于西班牙，为处理伊比利亚诸王国事务，整整耽搁了两年才得以返回德国。1542年春在施佩耶尔召开的议会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昭示时局的艰难而已：此次议会的结果与上次大同小异，通过一部总的法令，外加两条声明。同年，皇帝与法国重新开战，并取道盖尔德斯进攻尼德兰，盖尔德斯自最后一位公爵死后，一直被克利夫斯所占据。但是，当查理于1543年春回师德国的时候，仅仅通过一次小规模战役便击败了克利夫斯的威廉公爵。此次胜利结束了所有想在克利夫斯进行改革的尝试；五花大绑的公爵交给天主教方面处理，盖尔德斯成为尼德

兰领土的一部分。皇帝似乎对以武力作为政治武器会如此奏效而感到惊奇。紧接着，他又得回过身来对付法国。与法国的战斗因为在斯佩耶尔召开的第二次帝国议会而暂时中断，在此次议会上，他甚至赢得了新教徒的支持以反对法国和土耳其。由于教皇支持法国，皇帝与教皇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致使他同意在下次议会召开之前进行“一次基督教改革”，即是说：德国全国性公会议即将成为现实。皇帝完全放弃了他早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为此，路德和加尔文都站出来为皇帝辩护，反驳教皇的攻击。在随后的战斗中，皇帝长驱直入，向法国的纵深挺进，克雷斯皮和约的签订表明，他是胜利者，他不仅使法国答应出席公会议，而且还使法国秘密作出保证，支持他反对德国的新教徒。

公会议终于能够召开了；教皇把会议的地点定在特伦托，时间是1545年3月15日。然而在此之前，德意志帝国议会不得以再度碰头，按照斯佩耶尔议会上皇帝许下的诺言，打算把它开成一次德国全国性会议。但是，公会议此刻已经召集，皇帝似乎不受承诺的约束，敦促新教徒承认由教皇召开的公会议。他们不仅对此毫无准备，甚至在帝国议会上决定他们的所有让步将取决于在不召开公会议的条件下保证和平。由于新教徒坚决抗命，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只得召见教皇的来使，双方在会谈中决定用武力来扭转目前的局势。教皇的使节一口答应给予支持，为了获得[教廷]明确的承诺，他立刻就返回罗马。在意大利，立即召集了军队。

然而，查理再一次犹豫：他并不想在这一年发动战争。因为他的脑子里并没有摆脱沃尔姆斯议会留给人们的希望，即可以再举行一次宗教论战，最后在下一次帝国议会上形成决议。为此，他和教皇的谈判花了很多时间，如果迟迟不作最后的决定，特伦托会议就不可能召开（聚集在特伦托的神职人员们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在雷根斯堡举行的另一次议会上，争论仍然没有结果。自此以后，皇帝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做做样子以掩盖事件的真相而已。教皇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巴伐利亚人出于宗教的同情，消除了对于王朝的仇恨。最后，皇帝通过与之签订条约来对一些信奉新教的王侯如黑森伯爵菲利普的女婿萨克森公爵莫里以及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阿尔西维亚德斯等进行制约，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年轻的王侯不再把廓清宗教观点看得那么重要。尽管皇帝竭力从纯粹政治的角度来阐述即将

爆发的战争，但谁都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渴望信仰。虽然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因为内讧而陷于困境，然而同盟证明了它在关键时刻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同盟的领袖们很快就召集起了自己的军队，时间之短简直不可思议。这样一来，决议就只能通过战争来形成了。

路德于战争爆发前的1546年2月17—18日晚在艾斯勒本逝世。此时他正在为当地那些吵闹不休的权势者即曼斯菲尔德的伯爵们进行仲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未停止对特伦托会议的思索，在他看来，特伦托会议对信仰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史在别处已有撰述。^[5]它和历史上大多数战争史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都是由于双方难以置信的错误造成的。这场战争使皇帝成了无可争辩的胜利者：同盟的两位领袖萨克森选侯及黑森伯爵都成了他的阶下囚。选侯被帝国法庭判处死刑，但是他至死也不承认特伦托会议。最后，选侯允诺将来遵守帝国法令，皇帝以此聊以自慰。^[6]

但是，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特伦托会议也不是一次和平的会议。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当战争进程过半的时候，教皇曾疏远过皇帝。与查理的愿望相反，会议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宗教教条，而不是教会改革，这样从一开始就破灭了所有企图重新统一的希望。很快，皇帝方面的人便认为，会议由专制的教皇使者把持比由路德来把持还要糟糕：很难相信这些精神卑下的人会接受圣灵的指引。1547年春，不顾皇帝的一再抗议，会议改到博洛尼亚举行，之后又暂时休会。于是，要在奥格斯堡议会上（1547年9月至1548年6月）说服新教徒参加公会议已不可能；为了信仰的统一，皇帝终究还是尽了一份努力，颁布了所谓“临时敕令”，一方面在某些枝节问题上满足新教徒的要求，又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就某些引起争议的教条给出天主教的定义，但是，因为它仅是作为使迷途的羔羊返回羊栏的桥梁，所以，它所看重解决的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非本质问题。麻烦马上就出现了。天主教徒不予承认，新教徒莫里斯公爵也不予认可，而此时的维滕贝格已纳入了他的领地；在梅兰希顿的帮助下，他对原敕令进行修改后发布了《莱比锡临时协定》，梅兰希顿认为该协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并未涉及教义，只是要求恢复被认为是不置可否（*adiaphora*）的天主教仪式。在整个德国北部，由于皇帝的军队鞭长莫及，抵抗仍然非常剧烈。那些神学反对派们在“主的住所”马格德

堡集会，莫里斯奉帝国之命对该城进行封锁，他的军队就这样在城外田野上安营扎寨。南部也一样，临时协定颁布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宣教士们迫不得已，只好作罢。布塞尔远走英格兰，布伦茨藏了起来，其他人都被抓走了。但是，会众们并不欢迎天主教神职人员；自然，精英们现在都不肯继续卖力，况且，地方当局也未向他们提供帮助。协定的推行处处受阻。这场危机清楚地表明，甚至在那些从上到下，强制推行改革的地方，福音也已被接受了，且深入人心。决不是靠一声命令或者是动用武力就可以根除的。

另外，路德的弟子们由于神学的争论而导致了严重的分裂。梅兰希顿成了猛烈抨击的目标，开始是因为他同意了《莱比锡临时协定》，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麻烦起于他关于信仰与善功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意志的教义。不久，围绕着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尔这位来自纽伦堡的人以及他的神学产生了激烈冲突，他在普鲁士公爵领地避难，他的布道与那些得道于梅兰希顿的同行们的布道大相径庭；冲突的焦点在于，基督究竟是临在于信仰者里还是临在于信仰者之间。比路德与瑞士人之间的冲突更严重的是梅兰希顿学派与由饱学之士弗拉希乌斯领导的“极端的路德派”之间的新一轮的争斗。毫无疑问，他们很快会在圣餐问题上进行交锋。然而，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神学家们争论的范围。的确，梅兰希顿这位曾经与路德并肩战斗并且为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人已经踏上了一条难以觉察但却日益明显地偏离路德教义的道路。他一边尝试着尽可能客观地把上帝之恩典建立在上帝之行为中，一边又为人们从主观上获得客观的恩典恢复了余地。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和他早在1535年在维滕贝格就曾经捍卫过的伊拉斯谟学说达成谅解，而且也可以和瑞士人达成谅解；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却背离了路德的初衷。路德在世时，他的声望和权威成了梅兰希顿的保护神，尽管后者——正如他在马堡事件之后写给卡洛威尔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因为受到这位更伟大的人的压力而深感痛苦。值得注意的是，极端路德派既是梅兰希顿的学生，也是他的对手；他们感觉到梅兰希顿的主张有问题，但是他们水平有限，缺乏洞察力，抓不住问题的根本，只是抓住一些细节问题不放。正因为如此，人们从其长年累月的争吵中所获得的只是一种“拉比神学”的印象：即使正确的路线就在眼前，他们也没有弄清分歧的能力，所以分歧的原因永远没有被认识。

1551年5月1日，在皇帝的敦促下，宗教大会又召开了。这一次新教徒再没有理由不出席会议了。萨克森的梅兰希顿和符腾堡的约翰内斯·布伦兹都为此起草信纲，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参加了。但是，新教徒的使者出现在特伦托会议上本身就表明了，皇帝关于教会会议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即大会不能接受长期受到谴责的异端分子作为谈判代表，大会也不能中止以往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帝国代表作了长时间的努力才获得允许让他们交出信纲。没有安排神学家们进行讨论，尽管布伦兹作为公爵的外交大臣此时就在特伦托。萨克森的神学家们却被滞留在纽伦堡，无法前来。这次会议不但没有平息分歧，反而成了天主教会加以利用的工具。这次会议标志着皇帝所奉行的依靠宗教会议的政策失败，实际上也标志着所有试图统一的努力终结。

结果倒是出来了，但与初衷大相径庭，是一份以暴力作为特征而形成的决议，内容是狡猾而肆无忌惮的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密谋策划，鼓动信仰新教的诸侯们举行叛乱。他们的动机主要还不是宗教的；叛乱的宗旨在于维护德国的自由——诸侯反对皇帝的自由——而与宗教无关。他们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完全出于政治的考虑，根本不像路德派那样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为了换取法国的支持，他们不惜把帝国的领土梅斯、图勒、凡尔登等主教辖区出让给法国。所以，他那身为荷兰摄政王的姐姐以及好心的路德教徒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弗提醒他要当心事态发展的动向时，人们一点也不感觉惊奇。但是，叛乱者旗开得胜，经过艰苦的谈判，他们成功地于1552年8月2日与皇帝签署了帕绍条约。^[7]既然特伦托会议和施佩耶尔议会都无法解决宗教纠纷，莫里斯便提出至少在表面上要建立持久的和平，皇帝以良心上不安为理由，推说到下一次帝国议会上再作批准。危险过去了，但皇帝没能光复被法国占领的梅斯。虽然他本人并不主张和平，但是失败的沮丧、时局的无望促使他倾向于和平。于是，他把帝国的大权交给了斐迪南，后者在第二次奥格斯堡议会上同意了所谓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次帝国议会于1555年9月25日公布的法令以帝国法律的形式暂时承认《奥格斯堡信纲》以及天主教信仰；然而，其中也有条款明确规定，要为恢复统一作进一步的努力。既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这项和约实际上也就成了开辟新时代的基石。不是特伦托宗教大会，也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帝国议会结束了争斗；议会所形成的决议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神学的，而是政治的。就在德国开启和平年代的同时，宗

教战争却在法国、尼德兰和英国达到了高潮；这是一个政治主宰宗教的时代，一个屈从而非信仰的时代。

二 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

16世纪的新教改革在拉丁教会的东部前沿地带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三个王国并未留下任何值得一书的成功范例。改革在这个地区的命运之所以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因为它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与西欧有所不同，所以它的改革和法国东部地区一样，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不论是在德国和尼德兰，还是在法国和不列颠，我们都可以看到改革的理想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强大的君主们因此而获益匪浅，贵族们的分离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商业和市镇日益兴旺，社会不再以契约劳役制的农业为基础了。相反，在易北河、柏梅沃尔德河和莱塔河以东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国王的势力弱小，贵族的权力很大，中世纪的议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对说来，城市很少，规模小，力量弱，农奴制已经合法化，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剧地向前发展。西部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自从被纳入基督教世界之后，不断地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这样一些率先发展起来的社会中输入技术和艺术形式，引进制度、思想和人才，以推动自身的变革，并且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即所谓波兰式的、捷克式的或马扎尔式的。16世纪所出现的这一引进和变革的过程与维滕贝格和日内瓦宗教改革家的原则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16世纪初，波兰教会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教会一样，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从11世纪到14世纪，波兰与罗马教皇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由于罗马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波兰的敌人条顿骑士团，这种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直到1505年，尤里乌斯二世敦促大主教发誓效忠波兰国王亚历山大时，这种紧张的气氛才得以缓和。为了从波兰教会获得更多的捐助，波兰国王也一直在和罗马教皇争吵，其结果是，格涅兹诺大主教由罗马教廷指派，主教和修道院长则根据皇室的推荐进行选举，这种做法常常败坏了教会的虔诚和德行的美誉。

在宗教会议期间，波兰教会人士一直是宗教会议权威至高无上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阐释者：在康斯坦茨会议上，他们几乎成了胡斯的唯一支持者；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巴塞尔会议的忠诚；他们学会并养成

了批评政府、批评罗马教廷的做法的习惯。整个15世纪，尤其是在克拉科夫大学神学院，人们一直怀着改革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保持到16世纪为伊拉斯谟思想提供了温床。由马丁五世明令，并由巴塞尔会议形成决议，定期召开省宗教会议和教区宗教会议，这项举措在波兰结出了硕果：波兰教会法规和神父会法规已编纂成典，对教士们滥用职权、酗酒、非法同居、跳舞、赌博、逛酒店、无故缺席、迫使收入微薄的教区代理通过开旅店之类不务正业的工作来捞取外快等恶习进行披露和谴责，尽管没有根除。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16世纪初波兰的高级神职人员都是一些愤世嫉俗的圣徒和学者。这些神职人员，不管是修会的还是非修会的，都是贵族出身：1515年，利奥十世接受了波兰议会提出的要求，即父母不是贵族的人不能成为教堂的教士或有俸神父。1538年，这项要求经议会批准成了一条法律，其中涉及的人除了上面提到的教士或有俸神父外，还增加了修道院长和副院长。15世纪，世俗化趋势像传染病一样到处流行，人们蒙昧无知，丧失了宗教热情，只关心财产，只贪图享受，受此影响，教会的房产和财富急剧地增加。人文主义的影响没有波及波兰的修道院。教区神父大多是由当地领主或市镇议会提名当选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贫穷、无知、玩忽职守，对牧养人的灵魂根本不感兴趣。自1406年起，主教管辖的法庭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它们对神职人员的不法行为和冒犯神职人员的行为，只需起誓证实的如婚姻、嫁妆、遗嘱的认证、合同等大小事情，以及异端罪拥有独占的司法权。这种广泛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由教会来进行裁判使贵族和绅士们极为愤怒，尽管进行裁判的这些神职人员是他们的亲兄弟或堂兄弟，他们仍然认为，教会法庭是他们谋取教会财产的障碍，是对他们的行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干涉，是对贵族独立的侮辱。

宗教改革运动前夕，教会在波兰的地位与其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各国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新教到来之前，波兰境内教会分裂的状况是受到保护的。不只是加利西亚的罗塞尼亚人多数仍然是正教徒，立陶宛公国的俄罗斯居民更是顽固地坚持其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族特殊的礼拜仪式。亚盖沃王朝支持1439年从佛罗伦萨联盟产生出来的希腊公教会，但是王朝的统治者们企图在波兰和立陶宛建立希腊公教会的尝试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所以，在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白热化期间，多数立陶宛人只认基辅的东正教大主教为他们的头；同

样，多数罗塞尼亚人只拥戴加利西亚的东正教大主教。利沃夫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权力只限于少数移民过来的乞丐、地主和自由民。

16世纪初，匈牙利的宗教状况和教会与波兰不分伯仲，日渐虚弱的亚盖沃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乌拉斯洛）和他的继承者路易二世以及后来权倾一时的豪门显贵和高级神职人员把匈牙利教会搞得比波兰教会更为世俗化和政治化。安杰文国王查尔斯·罗伯特和路易一世以及紧接其后的本地统治者约翰·亨亚迪和他的儿子马加什·科尔文尽管在削弱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但却成功地把匈牙利教会降格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这种状况甚至到1490年“杰出”的弗拉迪斯拉夫接替科尔文为王以及他的小儿子路易二世于1516年继任王位时还在延续。圣·斯特凡戴上王冠后，宣称他是使徒的继承人，拥有教皇使节的权力，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权力是公元1000年西尔维斯特二世授予匈牙利国王的。强有力的国王自作主张而软弱无能的国王则在那些权高位重的豪门显贵的训谕下指定皇家土地上的大主教、主教、神父会人员及修道院院长和副院长，教皇也只好同意，但却常常拖延批准皇室的任命。在16世纪初匈牙利君主制度非常虚弱的情况下，拥有皇室对圣职的授予权意味着匈牙利的主教管辖区不过是少数几个控制王权和垄断教会的大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已。由于土耳其人和新教徒的袭击，匈牙利富庶的教区很少由像沃尔西或克拉默这样出身贫寒的大主教来掌管。那几个自己出人担任大主教的家族伙同其他的贵族绅士一道指定在俗神职人员作为资助人。只有在城市，圣职授予权才掌握在市镇议会的手中，贵族没有权力任命各级神职人员。在这样的状况下，匈牙利教会缺乏生气、虔诚、美德和学问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些东西恰恰又是它在土耳其人侵略、新教运动渗透以及内战影响的情况下能够保全自身的法宝。

就像波兰的西吉斯孟一样，国王路易二世有许多笃信东正教的臣民：在特兰西瓦尼亚，弗拉其的神职人员使用罗曼语，从而保住了自己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组织和斯拉夫仪式；在巴纳特和巴克斯卡，操塞尔维亚语的南斯拉夫人越来越多，但都信仰东正教，采用东正教的教规或仪式。

波希米亚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情况却很特别。它的大部分国民已经接受了被教会谴责为异端的信仰和仪式；他们都是胡斯派民族教会的成员，带有明显的分裂主义色彩。在胡斯派教会确立其存在的这

个世纪，胡斯主义成了大多数农民、牧场主、乡绅和市民所信奉的宗教；居少数的天主教徒主要包括那些豪门显贵和他们的仆从，以及边境地区讲德语的市民和村民。胡斯派在其教义或实践上与天主教会的主张并无多大区别。事实上，它们之间只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阻碍着二者的统一：胡斯派认为，在举行圣餐礼时，应该让平信徒领杯。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认为它不是一个教义问题，而只是一个应用问题；他们只是想要教会放弃一个引入时间相对较短的习俗，回到一个早就为教皇和宗教大会认可了的由基督和他的门徒以及早期教会所采用的实践。但是，康斯坦茨会议和巴塞尔会议（后者是长时期争论的结果）以及1462年教皇庇护二世的声明都把平信徒领圣餐时既食饼又饮酒的做法斥责为异端的做法，因为教会和那些更为实际的饼酒同领派都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采用何种仪式的问题了。胡斯派坚持认为，把酒杯交给平信徒不只是合情合理、有利无害，而且是符合神意，所以对于人的拯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他们给自己的小孩施洗礼后立刻就举行这种仪式的缘故。从1415年到1620年致使饼酒同领派从天主教会中分裂出来的根源在于，饼酒同领派拒不承认罗马教皇和议会法令的权威可以超越《圣经》的权威。所以，捷克人早在路德因教会贩卖赎罪券而向教会的权力挑战以前就已经提出了权威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胡斯派教会的仪式相当简单；祭服很朴素，由于早些时候那场狂热的偶像破坏运动，圣画和圣像已经所剩无几了；不管是在布道坛上还是在祭坛上都使用本国语；胡斯和他的同伴殉道者布拉格的哲罗姆被当作圣徒来缅怀；到处都在传阅《圣经》译本，人们用本国语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在公共场合和私下崇拜时唱颂。宗教改革之前，胡斯派教会的确已经显示出了“新教”的特征，但从教义上说，它的确又是保守的。在早先的塔波尔派时期，和激进的离经叛道行为相反，饼酒同领派相继接受了天主教会的变体论教义以及所有七项圣事。尽管他们捣毁了许多十字架耶稣像及圣母画像，但是他们并不拒绝以圣母或圣徒为荣，也不否认善功的效用；他们的基督论和基督救世说完全是正统的；他们坚持神父要过禁欲生活。胡斯派内部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保守的右翼势力为了尽快与天主教会重归于好而作出让步，即平信徒可用两种方式领圣餐；但是大多数人，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急风暴雨的16世纪皆为他们过去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并相信他们已被上帝选中，要带领人类返回到以《圣

经》为准、清明廉洁、崇尚道德的基督教大同世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放弃作为民族教会事实上已经获得的教会的和政治的独立。

胡斯派教会因为国王接受了两种圣餐方式而吸纳了几乎所有波希米亚王国的臣民；胡斯派的神职人员都是照此主持仪式的。教区的教堂大部分由饼酒同领派掌管，他们有一定的薪俸，但没有封地。乡村的教区神父通常是由当地领主任命的；在布拉格和其他的皇家城市，教区神父由教区信众推选或由地方行政长官任命。神职的授予仍然是一个难题；胡斯派希望保留由主教授职的教规；他们想要一个恪守教规并甘愿奉献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大主教，但是天主教会拒绝委派。因此，胡斯派只得把自己的候选人交由有授予权的地方来加封，为此他们求助于威尼斯大主教或其他在此事上并不过分要求与罗马教皇的原则保持一致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布拉格大主教空缺期间（1431—1561年），胡斯派教会的管理靠的是两位行政长官和一个宗教法庭，两者都是由议会指定的结果，饼酒同领派教会的统治权属于平信徒，而不唯独是饼酒同领派的上层人士，尽管像信仰和道德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通常要由神职人员和大学教师开会来讨论和决定。

自1471年起，这个分裂派教会的世俗首领是一位天主教国王，他在当选时曾发誓，要坚持1436年的“协定”，该协定把胡斯社团的自由奉为神圣。身为天主教徒的亚盖沃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以及路易并不热衷于强迫胡斯教徒归顺天主教，而是通过允许恢复原先的天主教教会来达到目的；特别是许多在1471年至1526年间在这个国家实际掌权的豪门显贵都是天主教徒或者说都皈依了天主教。另一股天主教的主要势力是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那些日耳曼人占压倒多数的城镇。第一代胡斯派教徒几乎把天主教会的地产洗劫一空；主教管区和修道院的财产不仅遭到胡斯派领主和乡绅以及胡斯派城市的掠夺，同样也遭到国王西吉斯孟的争抢，他用这些抢来的财富去换取那些仍然效忠于他和天主教会的贵族和城市的支持。从1419年到1434年这段时间，所有修道院内的财产都被抢走，修道院的大多数房屋被拆毁或被夷为平地；修士和修女们全遭驱逐，他们中许多人被杀害。但是，不论是1436年到1439年天主教国王西吉斯孟和阿尔贝特的短期执政，还是亚盖沃王朝的长期统治，这个国家都做了一些恢复天主教教会的工作。国王和教皇承认圣·维特斯大主教领地上的修士大会及其行政首脑为本地天主教的最高权威，尽管这位天主教的行政首脑经常不在

天主教控制的比尔森，在国王在布达的另一处宫殿里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从前教会的财产，虽然是少得可怜的部分，还是还给了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大会，10所修道院获得重建，只是其中的修士和修女所剩无几，他们和神父会成员一样，因为不愿成为教会地产的新主人而过着贫穷的日子，此间，天主教徒交出的掠夺物几乎和胡斯教徒交出的一样多。

众所周知，分裂导致的还是分裂。胡斯派运动本身在早期就已分裂成众多的派别，如塔波尔派、霍尔比派、“孤幼派”、裸体派和“皮克哈蒂派”，等等。其中大部分宗派团体要么被那个更为保守的中产阶级派别“布拉格人”或称“加里斯丁人”所挫败，要么被它所吞并，只有“兄弟联盟”得以幸免，它从天主教和胡斯派统治者的迫害中死里逃生，虽然在16世纪初“兄弟联盟”的人数还很少，但它却是国家宗教生活中一个充满生气的重要因子。胡斯主义早期的兄弟会就包含着激进和民主的成分：它的圣经神学、它的清教主义和福音派实践，还有它的民主管理，经常召集具有自主权的会众召开全体社团大会，明确信仰，制定方针，推选“主教”或“高级神职人员”、神父、执事和女执事、行政人员或“小议会”成员。其活动范围开始只限于手工艺人和下层农民，后来其社会基础逐步扩大，以至许多富裕且有影响的领主也参加进来。这一发展过程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在15世纪末的最后10年中，兄弟会大多数成员完全放弃了和平主义，以及对战争、死刑、参加陪审团和担任地方行政官员的谴责，而这些东西正是兄弟会在初创时期从彼得·海尔奇茨基那儿学来的。在他们的“老前辈”卢卡斯兄弟那颇具政治家风范的领导下，兄弟会已经整装待发，要在波希米亚乃至波兰的宗教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任何一个研究中欧宗教改革的起因的学者都会问：胡斯派的出现以及胡斯思想对波希米亚邻邦的宗教改革究竟作了多少准备？今天，尤其是捷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把渲染胡斯主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胡斯主义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所起的作用，当作一种时髦。的确，胡斯主义对德国和匈牙利北部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对波兰和摩尔多瓦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将所有零星证据汇集起来似乎也不足以说明，胡斯主义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倘若没有胡斯派的分裂运动，它们就不那么容易接纳新教

思想。有关胡斯派在宗教改革运动来临之前的50年间，在国外产生影响的证据确实一点也没有。

吸引波兰和匈牙利接受宗教改革的原因不是胡斯主义的传播，而是比胡斯主义影响更大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同样也在波希米亚流传，不过仅限于少数文人之间，并且他们大都是贵族出身，因为布拉格的查理大学不像克拉科夫大学那样是倡导新学术的中心；布拉格王宫也是如此，因为自1490年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合并以来，国王经常起居的是布达王宫。弗拉迪斯拉夫和路易二世的匈牙利宫廷里不仅保留着马加什·科尔文时代引进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典籍，更为显著的是，在路易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联姻之后，宫廷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德国人文主义的探索精神被来访或旅居的德国贵族、骑士和文人带了进来。匈牙利人自身也已和伊拉斯谟取得了联系。波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克拉科夫大学、西吉斯孟一世的宫廷以及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大会都对新学术表示欢迎和支持。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如博纳科尔西）都访问过克拉科夫。波兰自己有任神职的人文主义者如利沃夫大主教萨诺克的格热戈日，波兰贵族人文主义者像扬·奥斯特罗罗格等。博纳王后的神父意大利人利斯马尼尼在扬·切切斯基的邸宅组织学术圈子，从事探索研究；后来成为格涅兹诺大主教的雅各布·乌哈斯基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许多波兰贵族和居住在波兰城市中的德国商人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学中去接受教育。

来访的德国人及回乡的本地人早早地就把路德的所作所为传到了波兰和匈牙利。于是，靠近德国的奥地利边境地区的商人、学生、外交官、朝臣及旅游书商开始传播来自维滕贝格和沃尔姆斯那振奋人心的消息，而此时路德正安全地在瓦特堡避居。从但泽到克拉科夫，从肖普朗（奥登堡）到布达，从斯洛伐克的矿业城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市镇，到处都在复述路德派的论点和实践。四面八方，尤其是在城市，教区神父们开始用本国语宣讲带有改革意味的教义。任何一个持批评态度或要求改革的人都被那些令人反感和惧怕的神职人员和诸侯们叫作“路德派分子”，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改革者在最初的10年间就已确信自己或者说被他们的听众认为是路德的公然的门徒了。许多布道者和会众当他们的情感和态度开始倾向于改革的思想 and 实践时，他们正在不知不觉地从天主教会中游离出来，无意识地站到了维滕贝格

异端一边。正是由于政府和教会对每一个批评者的辱骂才使得路德主义的发展更为迅速，规模更加浩大，如此反而使那些本来只满足于教会内部改革的人走上最初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厌恶的分裂教会的道路。的确，匈牙利和波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大批像封建领主托马什·纳达斯迪和波兰王室秘书弗里茨·莫杰夫斯基之类的平信徒以及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区神父，他们不脱离教会，而是伊拉斯谟式的改革斗士；还有许多教区，特别是在匈牙利北部，虽然公开采用路德的信仰和实践，但却长期缴纳什一税，并且承认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的权威。两国都没有出现过灾难性的、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脱离教会的情况。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某某教区神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布道坛来宣讲当时流行的概念，诸如必须悔罪和补赎，须崇敬而不是崇拜圣母及圣母像，为活着的人尽职比为死去的圣徒献身更重要，斋戒本身并不是目的，等等。在这些未经安排和协调的鼓吹改革的布道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方面的革新，如祭服的简化，采用本国语赞美诗，有意不过大斋节。大塞本（赫曼斯塔特）的情况典型地反映了这早期的特征，这一点从大塞本城神父会于1526年写给埃斯泰尔戈姆的拉斯洛·绍尔考伊的信中可知道：

在塞本城……有位校长创办了一所学校，里面用德语唱《尼西亚信经》，与弥撒和日课有关的曲调也用德语来唱……教会的司法权几乎完全被摧毁，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不把教会法庭放在眼里，他们说，他们有世俗的法官而无需接受神父的审判……他们侮辱那至圣的圣母玛丽亚，不为死者出殡，并宣称一天七次的日课为愚蠢之举；还想规劝修女及其他笃信宗教的妇女放弃对上帝的侍奉。

匈牙利北部和东部那些日耳曼人居住的城镇自然要受到新日耳曼病毒的影响；他们和德国的关系密切；他们十分珍惜德意志文化，只有在以德意志文化为背景的宗教生活中，他们才能够心情愉快，表达自如。他们的市民出访德国归来，总要带回一些路德宗的印刷品，由于宗教书刊小贩的叫卖，宗教改革的作品像潮水一般涌流进来，为此，其中一名小贩于1524年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这位匈牙利新教的第一个殉道者乃是改革家康拉德·科达图斯一位兄弟的仆人。而康拉德本人正是布达王宫中最受路易国王和玛丽王后欢迎的布道者。正因为人们最初极少把改革的热情和路德宗异端联系起来，科达图斯乃至其他一些德国改革家如约翰·亨科尔等才会在这里如此风靡。克拉

科夫的人文主义者、物理学家、科西策的约翰·安托尼在1526年是这样描述亨科尔的：

在匈牙利的时候，我还未见到有谁像他那样受到王后、国王以及其他王国大臣如此热烈的欢迎；我也未见到有谁像他那样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及在任何场合布道时对伟大的伊拉斯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崇拜。

不过，国王还年轻，一经别人蛊惑，便以他的名义，要着手根除路德派这株杂草。教皇的使节博尔焦劝说他下令于1524年焚毁路德的著作，这仿佛是在推波助澜，致使匈牙利国会在1523年要国王“以天主教诸侯的名义，对所有路德派及其支持者进行起诉，处以极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因为他们是最神圣的圣母玛丽亚的公开敌人和异端”。但是，正如斯洛伐克矿区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只有在改革者试图煽动社会暴乱时，国家才会采取有效的措施。1525年，玛丽王后最喜欢的布道者康拉德·科达图斯和另一位布达的教区神父约翰·克雷布林因对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伯茨特切班尼亚）和克雷姆尼察（科尔莫克巴尼亚）的矿工们宣传路德思想而遭逮捕，次年，博尔焦向教皇报告：“在富格尔铜矿干活的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们中有4000人去攻打市镇教堂，并对附近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工人进行煽动。”一个由著名法理学家维尔伯齐领导的委员会前往调查起义的原因，结果起义领袖以反叛者和路德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在波兰，也需要这类宗教与社会政治暴动恰好凑到一块的条件来促使国王和国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同样，在王国最日耳曼化的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按照1466年的托伦条约，西普鲁士被条顿骑士团割让给了波兰。其城市但泽、托伦和埃尔宾（埃尔布隆格）完全是德国式的。自1518年起，由学生和商人带回来的路德著作影响了但泽的一些德国神父，使他们在教区的布道坛上公开拥护改革。其中为首的便是男修道院的三位修士：多明我会的雅各布·克纳德、方济各会的亚历山大·斯费肯尼和加尔默罗会的马蒂亚斯·比内瓦尔德。起初他们并不引人注目，直到1523年，他们的信徒急剧增多，其中一位神父被当地主教马切伊·杰维茨基抓起来后，他们才开始名声大震。经不住其门徒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主教被迫在半年之后将他释放。这次胜利使但泽人冲昏了头脑，1524年底，他们对所谓反对改革的中心据点但泽教堂和修道院发起攻击，并将其摧毁。但泽市贵族议会采取强硬措施，逮捕了暴动的头目。此时的宗教冲突与手工业者、雇佣工人

及城市无产者仅对商人和金融家的显贵统治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情绪激昂的人们要求取消税收，公布市镇议会财政项目。1525年元月22日，起义者冲进议会大厅，迫使议会颁布了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还未来得及实施，起义者就把议会解散了，并重新组织议会，新议会根据路德宗精神立即着手立法：天主教的习俗予以废止；教会财产收归城市所有；修会会院除两座外，都被捣毁；把主张改革的牧师派到各个教区。被迫出走的地方官员向国王西吉斯孟发出了请求。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显然被这次起义所惊动，害怕但泽及整个西普鲁士会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为此，波兰国会敦促国王亲自出马，恢复原来的政治和宗教秩序；马林堡（马尔堡）的西普鲁士议会达成一致意见。1526年4月，西吉斯孟在波兰贵族军队的支持下进入但泽，立刻就成立了特别法庭，处理异端分子的叛乱。革命的市镇议会被取缔；路德派领导人遭到逮捕，其中15人被处死；前地方官员又恢复原职。同年7月，西吉斯孟颁布法令，规定对教会的变节者处以死刑。

宗教改革运动自进入中欧起到1526年，乃是一个逐步发展、有限推进的过程；它最初基本上是在日耳曼人的社团中发生影响，很难对本地的捷克人、波兰人、马扎尔人或这些国家中后来成为改革最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助者的贵族们产生重大影响。随后中欧新教的迅速扩展则是一系列政治事件推波助澜的结果，首先是此时的两个宿敌普鲁士和波兰之间的冲突。由于14世纪末立陶宛人的改宗，条顿骑士团没有了合法的职能，逐渐在波兰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只好在1466年把西（皇家的）普鲁士交给了卡齐米日四世。条顿骑士团最后一任大统领、霍亨索伦-安斯巴赫家族的阿尔布莱希特已于1512年着手准备把东普鲁士变为一个世俗领地。1525年4月，他宣布效忠西吉斯孟一世，遂被封为公爵；阿尔布莱希特就这样成了参议院即波兰国会上院的议员。三个月后也就是1525年7月，阿尔布莱希特承认自己是路德宗信徒，并放弃了自己的半牧师身份，以便能够结婚，并使他的公爵领地成为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领地（100年后，他的领地由大勃兰登堡支系承袭）；阿尔布莱希特在后改革时期首先采用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这条原则，是他把路德主义变成了普鲁士公爵领地上的国教。这些事件对于波兰的新教非常重要，因为阿尔布莱希特自此（直到他1568年逝世）便开始注意保护波兰新教徒的利益，培育波兰新教徒的势力，有了他对波兰宗教流亡者的友情款待，有了他在其首府哥尼斯堡鼓励出版商用德文和波兰文出版福音的著述，并首先向他的马苏里

亚领地讲波兰语的臣民发行，路德教才得以在波兰流传开来。波兰文的路德的《小教理问答》于1530年在哥尼斯堡出版；紧接着又出版了波兰文的赞美诗集和忏悔文集；1544年，他又在哥尼斯堡创建了一所新教大学。

莫哈奇之战这一政治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历史，1526年8月19日土耳其苏丹苏里曼的军队消灭了企图阻止他们由贝尔格莱德向布达胜利挺进的基督教武装。^[8]莫哈奇之战导致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路易国王属下两个王国的历史。路易本人从战场逃跑时被杀。他的表兄哈布斯堡的斐迪南遂成了胡斯派波希米亚的国王；同时又被少数匈牙利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推选为匈牙利国王，但是，在此之前，多数贵族和神职人员已经选举了本地行政官员中的首富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约翰·扎波利亚为王。于是，长达20年的内战的蹂躏使匈牙利苦不堪言，斐迪南从他的北方基地发难，约翰王及他的后继者则从他们的特兰西瓦尼亚要塞出击，整个国家被搞得支离破碎。在此期间，匈牙利又在土耳其的入侵面前屡遭失败：1529年对维也纳的包围只不过是这次破坏性侵略获得成功的标记而已。几乎所有匈牙利的重要城镇包括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的领地先后都遭到土耳其人的围攻和占领。从1541年起，土耳其人便永久驻扎下来，在布达建立帕夏，他们所占的领土呈一个大三角形，其大本营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之间，其顶端伸向南斯洛伐克。自这时起，匈牙利便名副其实地分成了三个国家：西北部的哈布斯堡的匈牙利、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以及布达的帕夏；直至1606年，内战和与土耳其人的战争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隙外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匈牙利宗教史上，内战及土耳其战争所造成的主要后果就在于，它们给匈牙利的神职人员集团带来了空前的劫难。王国的16位高级神职人员中，有7位死于莫哈奇之战：2位大主教，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拉斯洛·绍尔考伊和考洛乔大主教帕尔·托莫里；5位主教，杰尔（拉包）、佩奇（芬夫基兴）、乔纳德、瑙吉瓦劳德（大瓦代恩）和波斯尼亚的挂名主教。整个16世纪匈牙利教会都没有恢复元气。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主教职位都是空着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教皇对两位敌对的国王都不想疏远，所以对对方的主教提名都未予批准。从1573年到1596年，埃斯泰尔戈姆根本就没有大主教，甚至在此之前，本地的大主教就经常只得住在西斯洛伐克的特尔纳瓦（瑙吉松博特），因为

相当长的时间，埃斯泰尔戈姆都控制在土耳其人的手里。另一个大主教管辖区考洛乔差不多成了土耳其人永久性的占领区，1528年至1572年之间从未向那里派过主教。乔纳德、杰尔拉斐厄瓦尔（卡尔斯堡）和塞赖姆（希尔米乌姆）等主教区在异教徒的控制下长期处于没有牧师的状态。布达的帕夏没有天主教指派的主教，倒是有一些新教传教士在那里活动，他们没有遭到天主教的反对，土耳其人也因为他们在反对圣像崇拜上是同路人而对他们采取了宽容态度。如果主教的职位不是空着的话，那么，由两个敌对国王之间任命的任何一方的主教都会给本管辖区带来不幸和灾难，因为任何一方都会在对方不在的情况下趁机增税。有些主教背弃了天主教而改信路德宗，如尼特拉主教费伦茨·图尔佐，他于1534年皈依路德宗，并两次结婚；还有佩乔主教翁德拉什·斯鲍尔代洛蒂因1568年娶妻而被削职；大主教的侄儿维斯普富姆的马丁·凯切特以及萨格勒布名誉主教埃尔多蒙的西蒙也都成了新教徒。还有一些主教区，有时因为其税收被用来支付圣战的费用而显得软弱无能，或者甚至完全世俗化。1528年，斐迪南一世把杰尔主教区的15000弗罗林抵押给他的司库约翰·霍夫曼，又从他的手中转到世俗贵族帕尔·巴基奇的名下，这个人是大宗有争议的教会领地和财产的暂行保管人，尽管他对宗教事务丝毫不感兴趣。1534年，国王约翰·扎波利亚为了赢得大富豪佩泰尔·派伦伊的支持，把埃格（埃劳）主教区的税收给了他，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于5年后投奔斐迪南。

莫哈奇之战不但削弱了匈牙利的罗马天主教，而且也重创了匈牙利的君主政体。斐迪南就像他在波希米亚王国所表现的那样，富于忍耐，精明狡猾，是力主基督教世界统一于天主教会的现实捍卫者。但是，在匈牙利他却无力做到这一点，他的地位巩固与否要看他是否能够赢得或者说买到马扎尔贵族们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城堡是解决军事冲突的关键。所以，他和国王约翰一样，都不可能对任何潜在的拥护者的宗教倾向过于友好。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都不敢一如既往地与他们的支持者保持一致。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都得仰仗主教区和修道院的收入。他们都是教会财产世俗化过程的总代理，同时也是教会走向衰落新教得以生存的确切保证。对于新教在匈牙利的传播，斐迪南和约翰都未进行过认真的阻挠。的确，1535年斐迪南曾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波若尼）召集会议，立法规定归还所有在1526年被非法占有的教会财产和世俗财产，1538年在瑙吉瓦劳德签订的临时和

平条约中也有一项条款，明令赔偿教会的全部财产，但剥夺者对这两条法令根本不予理睬。

从1526年到1541年土耳其人在匈牙利中部建立永久性统治期间，新教的发展非常迅速，不管是在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人居住区，还是在本地人更多的马扎尔地区，情形都是如此，因为马扎尔的达官贵人此时已经认识到新教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吸引力，并开始成为宣传新教的积极分子。很多基础工作都是由那些从未脱离天主教会的贵族们准备的，是他们在资助那些研究伊拉斯谟的学者、赞美诗作者和《圣经》翻译者，这些人发表的作品又成了新教发展的推进器，这是作者或翻译者们始料不及的。亚纳斯·亚尔维斯特翻译出版的《新约》是匈牙利新教的理论根据，而他是天主教徒托马什·纳达斯迪的被保护人，后者本人显然未曾和教会脱离关系。但此时很多或者说多数豪门显贵都公开接受了新教。由于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提供神学资助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他们能够用路德宗的牧师来充斥乡村教会，信徒们无权选择，只能屈从于新教的教义和实践。新教的显贵们就这样使一个又一个的郡皈依了新教。越来越多的牧师公开声明信仰路德宗，这样更加速了新教在整个王国的发展，他们中有些人是本地的日耳曼人、西里西亚人或来自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大多数则是匈牙利的日耳曼人，这些人通常有一部分教育是在维滕贝格获得的；在最活跃的路德宗传道人中，有一部分是叛教的修士或托钵修会修士；有些是斯洛伐克人。内战时期，斯洛伐克和西尔本布根日耳曼城镇的路德宗化从未停止过。科西策（卡萨；卡绍尔）、班斯卡·斯塔弗尼卡（谢姆尼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诺伊索尔）、克雷姆尼察、普雷绍夫（埃佩列斯赫；埃佩耶斯）及莱沃恰（洛策；洛伊查赫）的市镇议会都任命了日耳曼的路德宗“传道士”和学校教师；同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斯洛伐克市民伙伴，在斯洛塔弗尼卡和比斯特里察都有“文德人”被任命为传道人，这些人都是来自西里西亚的波兰新教徒。

约翰·扎波利亚统治时期，特兰西瓦尼亚尤其是“萨克森”城镇的路德宗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一个享有特权和特许权的社团，正是他们的首席地方长官，即那位颇有影响的马克·佩姆弗林格从一开始就对路德宗的传教表示鼓励。大塞本、布拉斯湖（克罗龙斯塔特）及瑙吉瓦尔德（大瓦代恩）都是最早的路德

派中心；1533年，约翰·洪特尔来到特兰西瓦尼亚，后来成了特兰西瓦尼亚路德宗的领袖。

在那些清一色是马扎尔人居住的地区，路德宗是由传道人来传播的，他们大多是马扎尔人，有富豪显贵的支持，生活在宫廷和城堡中。他们中最有名气的是马贾什·德沃伊·比罗。比罗原是天主教的神父。但据史料记载，他曾于1529年至1530年在维滕贝格学习过，并因此成了路德和梅兰希顿的朋友。回国后先是得到托马什·纳达斯迪和费伦茨·包贾尼、后来是佩泰尔·派伦伊的资助，他在三位贵族的全部领地上都创立了路德宗。1533年，有人试图对他的活动进行检查，之后他被逮捕并押送维也纳，接受维也纳主教的审查，但他逃了出来，仍然继续活动，此后再未受到盘查。比罗在维也纳回答对他的指控时，对当时路德宗在匈牙利的传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描述：他承认他相信平信徒可用两种方式领圣餐；相信祝圣之后圣体中仍有饼和酒的实质；相信仅凭信仰即可得救；相信所有信徒皆为祭司。他不承认涤罪的教义，不承认意志的绝对自由以及临终涂油礼。比罗在蒂萨河地区马扎尔人中间所开展的工作得到了塞盖德的伊什特万·毛焦里·基斯这样一些同伴的有力帮助，他们一直在此地及匈牙利中部活动，甚至在土耳其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仍未停止。基斯的工作异常出色，他似乎是在没有贵族资助的情况下独立开展工作，并且直接深入到农民家里。到1547年，马扎尔路德宗的中心是蒂萨河上游的主要城市德布勒森。

莫哈奇之战所带来的灾难同样对波希米亚王国宗教史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波希米亚国会在受到威胁和贿赂的情况下，只得选举路易的表兄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继任他的王位。虽然推选条件之一是，他得保证给予天主教和胡斯派以相同的尊重，但是捷克人还是有了一位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国王。斐迪南采用了与他同时代的君主们以及他在西欧国家王位上的亲属们的策略。他对宗教统一高度重视，他的宗旨是调和他的饼酒同领派臣民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防止在王国内部出现新的宗教派别。斐迪南确实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刻意敦促教皇及后来的特伦托会议承认那些无关信仰本质的枝节问题如：平信徒领杯、神职人员的婚娶以及波希米亚大主教的任命，等等。因为他知道，此时的饼酒同领派非常强大，单靠自己有限的实力不可能将其剪除；况且，斐迪南过于依赖捷克贵族的支持，其中大多数是饼

酒同领派，又都是教会地产的拥有者，他不可能立刻向分裂的波希米亚教会公开宣战。但是他对其他非天主教宗派所制定的政策就不同了，因为他相信在这里有饼酒同领派作为依靠。他试图争取波希米亚国会和摩拉维亚国会的支持，开展一场反对波希米亚兄弟会的运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组织完好的宗派一天天发展壮大。但是，此时兄弟会在贵族中间的影响日趋强烈，国王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非常有限，国会的势力又很弱小，要想在1547年之前限制兄弟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样，斐迪南要想阻止路德宗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新教在这里受到的威胁并不像在匈牙利和波兰那样严重，斐迪南的捷克臣民自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宗教改革，这主要是路德的思想与实践在讲德语的波希米亚人中间传播的结果。早在1520年初，路德的思想就开始在波希米亚边境的条顿人居住区以及那些仍然拥有大量德语居民的城镇中流行了。在斐迪南统治的头20年，我们发现波希米亚西部和北部的城市中如比尔森、阿什、约阿契姆斯塔尔（亚基莫夫）、卡丹、奥西希（拉贝河畔的乌斯季）、埃尔博根（洛凯）以及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奥洛穆茨），都有经本地市镇议会介绍到各个教区去的德国路德宗传道人。虽然捷克的饼酒同领派并不同意路德关于仅因信仰便可得救以及牧师可以婚娶的观点，但是胡斯派和路德派之间的良好关系却更加牢固，因为路德欠约翰·胡斯的情，是胡斯运动为路德宗的传播铺了路搭了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作为回报，路德鼓励在德国出版胡斯的著作、胡斯的赞美诗集及本国语《圣经》。波希米亚兄弟会和路德的友好关系还要亲密一些；1528年卢卡斯兄弟死后，兄弟会中接替他的“前辈”们尤其是那位果敢而专横的奥古斯塔兄弟期望在两个教派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统一。德国再洗礼派进入捷克乃是维系德国改革和捷克改革的另一条纽带。截至1526年，到摩拉维亚南部定居的再洗礼派信徒已经超过千人。尽管斐迪南一再规劝摩拉维亚国会将他们驱逐出境，但是这些因为当地议会立法反对而从德国南部、瑞士和蒂罗尔流亡出来的再洗礼派难民对于摩拉维亚的领主贵族们实在是太宝贵了，他们当中不仅有手艺高超的磨坊工、织布工、锁匠、陶工，甚至还有外科医生。对再洗礼派的迫害是野蛮的，而且时断时续，没有真正停止过。1528年再洗礼派的第一位领袖巴尔塔扎尔·胡布迈耶被处死后，再洗礼派在摩拉维亚南部的居民点随着1529年激进的雅各布·许特尔从蒂罗尔的到来而获得新生。从那时起，虽然斐迪南一再敦促议会采取强制措施镇压再洗

礼派，并且有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地方贵族的保护下，再洗礼派社团绝处逢生，躲过了厄运，尽管人数减少，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9\]](#)

在波兰王国，宗教改革的进程从未受到任何像莫哈奇之战这样剧烈危机的干扰，也从未被像波希米亚的分裂派教会之类现象搞得如此复杂。在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强有力的庇护下，皇家普鲁士的日耳曼城镇但泽、埃尔宾、托伦及布劳恩斯贝格（布拉涅沃）的路德宗得以在1526年的运动中幸存下来。公爵是在波兹南（波森）传播新教的前多米尼克教徒安杰伊·塞缪尔和扬·塞克卢恰的保护人；1542年此二人受到刑事起诉时，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首府哥尼斯堡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塞克卢恰在这里发表了他用波兰文撰写的《路德宗信纲》和四福音书的波兰文译本。大波兰的这个省，与勃兰登堡毗邻，最先受到路德宗的冲击。这儿传播异端的传道人有大贵族作为靠山，出钱资助。小波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在立陶宛已经有人开始传播这种新的教义。早在1528年，克拉科夫的市民和贵族们就开始在聆听伊萨的雅各布关于宗教改革的布道，并且发出阵阵喝彩。但是，在克拉科夫发生的这些活动中有许多仍是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不过路德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国王的秘书阿尔萨斯人约斯特·迪茨（德西乌斯）和克拉科夫要塞司令塞韦伦·博内尔都与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

国王西吉斯孟一世和斐迪南一世一样，渴望自己的王国能够保持统一，忠于罗马。尽管他憎恶变节叛教的行为，害怕他的臣民会改变信仰，但是他对教会自身的污点以及教会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并没有熟视无睹。他直率地拒绝了约翰·埃克的建议，即所谓像亨利八世在英格兰所做的那样，对路德派采取强硬态度。西吉斯孟的第二个妻子斯福尔扎的博纳年轻幼稚，骄横跋扈，因为对那位传道人弗兰奇斯·利斯马尼尼推崇备至，便放任自流，随便地去搞那些激进而危险的活动。但是，西吉斯孟不可能全然不顾教会的压力，因此，他通过地方会议和教区会议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法规来强化打击路德派的措施。1523年，他宣布对引进异端书刊的人处以火刑；1534年，他下令所有在异端大学里念书的臣民回国；1540年颁布法令对拒不服从者处以死刑，在1543年又废除了这项法令；很显然，所有这些法令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只有高级神职人员对反对新教显示了

极大的热情，但是，即使在他们中间意见也并不完全统一：至少卡米尼克主教莱昂纳德·斯洛切维斯基和库亚伊瓦主教扬·德罗霍约夫斯基是同情路德宗的。另一方面，彼得库夫省教会法院却在1542年下令对异端采取最强硬的追查措施。教会法庭三天两头开庭，分期分批地对那些无视斋戒，散发异端宣传材料，宣称反对涤罪、圣餐变体以及秘密忏悔等教义的人进行惩罚。但是，但泽起义遭到镇压之后，教会的训谕和判决中已经没有了火刑，只有1539年六十高龄的凯瑟琳娜·魏格尔被烧死除外，但她为何被烧死，是作为路德宗信徒、阿里乌教徒抑或是犹太教徒至今尚不清楚。这样直至1548年西吉斯孟一世去世，波兰以路德宗形式出场的宗教改革虽然称不上轰轰烈烈，却一直在稳步发展；改革只受到一小部分人的青睐：豪门显贵中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改革，改革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流行，并在城市站稳了脚跟。然而，作为国家中最有力量的下层贵族和乡绅并未受到这种日耳曼和埃拉斯都（Erastus）式的新宗教的深刻影响。但在1548年之前，另一套对他们吸引力更大的宗教思想体系——约翰·加尔文的教义已在中欧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1536年开始，加尔文在波希米亚声名鹊起，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但他的神学以及他关于教会政府体制的构思却从未在这个国家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因为大部分捷克人对胡斯主义已经相当满意了，同样，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则满足于路德主义。然而，波希米亚的改革在世纪中期却出现了一场危机。当1546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在德国爆发时，波希米亚国会不顾国王的反对，着手帮助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1547年4月24日腓特烈在米尔贝格之战的失败使捷克的反叛者们再度受制于斐迪南，他特意利用自己的牢固地位来削弱议会和城市的宪法地位，但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那些他还得依靠的领主贵族。他采取一些试探性的措施，力图通过控制神职管理人员和世俗“保护人”的任命来降低饼酒同领派教会的地位，使它隶属于自己；但没过多久，他又慎重地回到了原来的政策轨道，想通过罗马教会与胡斯派的合作恢复宗教的统一。他还试图利用1547年叛乱夭折的那次机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兄弟联盟。在国会和保守的饼酒同领派领导人的支持下，1508年颁布的反“皮克哈蒂”法延期至1547年，次年颁布的皇家敕令勒令所有的兄弟会成员要么遵守教令，要么流放境外。许多人被赶出了家园，到普鲁士和摩拉维亚寻求避难的人成千上万。许多人在一位“老前辈”伊日·伊兹拉埃尔的率领下，在波兰的西部

找到了避难所，得到安杰伊·吉爾斯基、雅各布·奧斯特羅羅格以及其他波蘭領主的保護。到了1551年，波希米亞兄弟會便成功地建立起來了；它以托倫、波茲南和萊什諾為中心，從波蘭的地主貴族和市民中吸納了大量的信徒。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兄弟會成員都逃離了斐迪南的領地，因為像領主佩恩斯切恩這樣一些波希米亞顯貴們並不想失去那些有價值的農奴和工匠，於是便保護自己領地上的兄弟會成員免遭迫害。皇家敕令在摩拉維亞並未得到真正的貫徹，許多流亡者都逃到這裡，兄弟聯盟在這裡照常興旺發達。為了進一步削弱聯盟的勢力，斐迪南下令逮捕了它的大主教揚·奧古斯塔；從1547年到1564年，他一直被關在監獄裡，剛進監獄時，大主教慘遭凌辱，受盡折磨，但儘管他人不在，聯盟還是熬過了那些血雨腥風的歲月，並於斐迪南死後，在揚·布拉霍斯拉夫的領導下重新又繁榮起來。布拉霍斯拉夫不僅是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同時也是原文《聖經》的翻譯家，他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他是科美紐斯出現之前兄弟聯盟最偉大的領袖。

斐迪南非常巧妙地利用這次反宗教改革的浪潮來解決波希米亞的宗教問題。1556年，他從維也納帶回彼得·卡尼修斯，讓他在布拉格創立耶穌會；他還出資在那兒的克雷芒提那（Clementinum）修建耶穌會大學，在布拉格和奧洛穆茨設立學校。在斐迪南的規勸下，羅馬教廷終於在1561年恢復了布拉格的天主教大主教區，任命安東尼·普魯斯為大主教。為了實現與胡斯派的和解，普魯斯費盡心機，他甚至把一批胡斯派教徒任命為天主教的神職人員。1564年4月16日當他和斐迪南無視特倫托會議法令，說服教皇庇護四世發布一封宗座簡函，允許斐迪南領土上的平信徒可以用兩種方式領聖餐時，他們的大計差一點就成功了。但是為時已晚。除了少數極端保守分子，幾乎所有胡斯派成員都拒絕利用這次機會來結束教會分裂；事實上，他們在1567年成功地促使斐迪南的後繼者馬克西米連二世及波希米亞國會同意正式廢除（1436年的）協定，並承認餅酒同領派為獨立教會，“根據聖經”實行自治。斐迪南的計劃失敗了。儘管他盡了一切努力，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天主教仍在繼續滑坡，走向衰落；耶穌會的努力成效甚微；修會會院日漸衰敗，只有普雷蒙特雷修會例外。反之，到處都是餅酒同領派以及路德派在摧關拔寨，一個城市一個城市、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將傳統信仰的份額奪走。到馬克西米連統治末期，新教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已經根深蒂固了，只有像1620年發生的那場巨大災難才能將其铲除。

虽然加尔文宗在波希米亚没有什么市场，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则有一个人多势大的阶层即当地的中下级贵族对此怀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对罗马教会的财富感到嫉妒，对宗教法庭管辖权过宽表示不满；此外，波兰和马扎尔绅士不喜欢路德宗的日耳曼风格，认为它的教义过于保守，并且看不惯它对世俗权力的阿谀奉承。然而，在这些地主看来，加尔文宗似乎没有这些缺点。它不是德国的，甚至从根本上说也不是法国的。它热情激进，毫不妥协，逻辑严明，民主共和。它拒绝任何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不论是教皇还是君主。因此，它对那些正在为土地而战而且正在取得胜利的地主们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尔文宗教会的长老管理制赢得了波兰、立陶宛和马扎尔贵族及绅士的拥护。加尔文教会中从地方教务评议会到国家宗教会议各个管理层面上的牧师都是由平信徒推选和委任的，并且平信徒长老在其中起主导性的作用，这简直就是地主们在其县议会、省议会及国家议会的世俗政府中正在争取的东西在教会的精确翻版。[\[10\]](#)

许多波兰领主贵族和绅士接受加尔文宗长老制主要是其内在因素必然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功劳。加尔文、贝扎和布林格的著述在西吉斯孟1548年加冕为王的那个时期开始产生影响。波兰的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中，有些只是人云亦云的伊拉斯谟信徒，另一些已经信了路德宗，此时纷纷改信这位日内瓦人的神学和宗教实践。其间有三个人的影响特别显著：首先是人称“黑人”的巨富米科莱·拉齐维尔，他把所有的地产及无数财物都送给了加尔文宗。其次是扬·拉斯基（约翰内斯·拉斯科），他兴许是波兰宗教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最崇高的人物。他出身贵族，是以前一位大主教的侄儿。起初，他到普鲁士公爵领地组织新教教会；但因怀疑路德神学的正确性而被迫出走。拉斯基到伦敦待了三年，正值爱德华四世统治的后期。他在这里负责组织和领导外国新教徒的集会。玛丽女王当政后，他再次被迫出走，但因拒绝接受《奥格斯堡信纲》关于圣餐的教义，使他在哥本哈根、罗斯托克、维斯马、吕贝克和汉堡遭到驱逐。在法兰克福与加尔文的会面似乎解决了他的宗教皈依问题。1557年，他回到波兰，在其生命的最后3年里，他在利斯马厄尼和拉齐维尔的支持下，为建立波兰全国性的福音派教会而努力奋斗；但是，不论是波兰的路德宗信徒还是波希米亚的兄弟会信徒都不承认他的神学和组织。第三位波兰加尔文社团的创始人叫费利克斯·克日扎克或称克鲁齐格。最先他是塞采明的一位路德宗牧师，1544年小波兰地区的路德派推选他来管理本

省的路德宗教会。但是，领主贵族们对该教会管理机构由神职人员把持很不满意，于是在同年的平丘夫宗教会议上决定，要选出一些德才兼备的贵族作为首要的教会成员来支持和维护这些有神职的“老前辈”，告诫他们在做决定之前要采纳贵族的建议。到了1577年，小波兰的这个福音派教会便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长老制。尽管从理论上说，自由民和农民皆有资格选入教务评议会，但事实上却是什拉赫塔（Szlachta）作为长老和赞助人在掌管教会。在小波兰的这个波兰人省份和立陶宛，加尔文宗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大波兰和普鲁士则是路德宗和波希米亚兄弟会保持了优势。

直到16世纪中叶，路德宗才在匈牙利拥有了一块比较清晰的地盘。我们的确听说过，1530年在大塞本、1540年后在德布勒森都出现过茨温利派或称“圣礼派”。但很有可能他们实际上是从茨温利的苏黎世被驱逐出来的再洗礼派。1533年，13个施皮斯（齐普斯）城镇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法官接到命令，对那里的一些再洗礼派采取行动；1535年，他们被禁止在萨罗斯帕塔克的佩泰尔·派伦伊的城市居住。但他们并不是匈牙利新教徒中的主流部分。另一方面，加尔文宗如同在波兰一样，取得了迅速和引人注目的成功。与波兰的情况相似，它受到了当地领主贵族的欢迎，他们对日耳曼市民及其日耳曼宗教并无多少好感，只是对长老制提供的平信徒掌权的可能性感兴趣。同样在匈牙利，加尔文宗不是由传教士而是由本地的改宗者来传播的。马贾什·比罗这位优秀的马扎尔人从路德宗转信加尔文教，并带领整个德布勒森城的马扎尔人一起改了宗；1560年后，德布勒森成了“匈牙利的日内瓦”。比罗在马扎尔贵族中以及在蒂萨河谷岸边和上匈牙利地区推行加尔文宗时得到了莱纳尔·黑克尔牧师和他的资助人佩泰尔·派特罗维奇的帮助。匈牙利东北部加尔文宗社团的使徒和组织者叫彼得·米柳斯·朱哈茨，他在德布勒森当了25年的主教。他能言善辩，1561年的信纲，即马扎尔加尔文宗的普遍信纲，关于圣餐以及命定论等教义严格比照日内瓦模式，这主要归功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在那位颇有权势且臭名昭著的瑙吉瓦尔德主教弗拉泰·捷尔吉任国王约翰·扎波利亚的遗孀伊萨贝拉和幼子约翰·西吉斯孟的老师期间，改革的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由于弗拉泰·捷尔吉于1551年遭到谋杀，防洪的闸门又打开了，加尔文宗又开始在马扎尔领主贵族中迅速传播。1563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加尔文宗信徒在科洛斯堡（克劳森堡，克卢日）发表信纲。至1551年到1571年期间，特兰西瓦尼亚的改

革绝对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干涉。约翰·扎波利亚的遗孀伊萨贝拉靠已被还俗了的瑙吉瓦尔德和于拉弗赫堡主教领地上的收入为生；教会财产的世俗化是1557年特兰西瓦尼亚会议召开后实现的；修道院及修道院的修士都消失了。的确，要不是斯特凡·巴托里这位天主教徒在1571年被推选为诸侯，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天主教会恐怕也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他的前任约翰·西吉斯孟当政期间（1559—1571年），新教徒拥有自决的权力；1564年议会决议在其第15款中写道：

科洛斯堡的马扎尔信众（加尔文宗信徒）塞本的萨克森人（路德宗信徒）正在争论不休，为了王国的和平，拟同意双方各自实践自己的宗教，传道人不管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都不能强迫其居民信奉他的宗教；无论传道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只要不受欢迎，任何城镇和村庄都有自由将他赶走。

这种地方宗教自治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地方领主贵族的意志可以支配一切。

著名的“特兰西瓦尼亚式宽容”实际上并不是与16世纪的精神全然不同的某条原则的胜利，而只是君主力弱以及路德宗的日耳曼城市与马扎尔的加尔文贵族势均力敌的表现。但是，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特有的这种宽容为那种形式的新教提供了避难的场所与活动的空间，而该形式的新教不管从神学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是新教的合乎逻辑的终极形式，即索齐尼主义。

16世纪40—50年代，波希米亚的神学思想混乱不堪，偶尔也有人起来指责反三位一体说的错误，但在大批移居国外的意大利神学家到来之前，任何地方都未发现坚持此种异端的团体，这些意大利人认为甚至加尔文的日内瓦对他们也过于激烈，所以把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当作最终的避难所。宗教改革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乃是：不论是从神学的意义上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宗教改革的最极端的神学表现和社会表现竟然源于这两个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而在其他方面改革在这两国是最不成功的。但这实际上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洛伦佐·瓦拉和萨伏那洛拉的母国曾经诞生过二十几位行为极古怪的人，后来又把他们给驱逐了，他们在对信仰的基础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便开始对赎罪说和三位一体说提出批评。这些人包括奇瓦尼·真蒂莱、莱利奥·索齐尼和他的侄儿福斯特·索齐尼、弗朗西斯库·斯坦卡罗、乔瓦尼·阿尔拾蒂、贝尔迪诺·奥基诺以及乔尔吉奥

• 布兰德拉塔等，他们所有人在虔诚和学识的有力推动下，自然而然地便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伊拉斯谟对《新约》的令人不安的评注、加尔文的神学激进主义、新柏拉图哲学的复兴以及早期教父们关于基督教论的争论，等等。像阿里乌和聂斯脱利，他们已经确信亚大纳西已使教会误入歧途，去建构一个毫无必要、非理性及错误的三位一体的谜。伊拉斯谟在其头两版发行的《新约》中故意省略了“约翰的逗号”，导致他们对《圣经》作为正统教义的权威提出了质疑。

波兰反三位一体说的运动可以说是始于1549年斯坦卡罗在克拉科夫被任命为希伯来文教授。其后的25年间，他的老乡大索齐尼、真蒂莱、阿瓦拾蒂、保利、奥基诺、布兰德拉塔最后还有福斯特或长或短都把波兰当作避难所。他们在小波兰和立陶宛受到了那些在神学上更富有冒险精神的加尔文宗社团的平信徒领袖和神职首领的欢迎。但是，1559年斯坦卡罗的论聂斯脱利的专题论文《论三位一体和基督的介在》以及稍后奥基诺的《对话》（*Dialogus*）和真蒂莱的《反驳》（*Antidota*）发表后，使大多数较为保守的波兰加尔文宗信徒非常警觉，分裂已在所难免。1562年，反三位一体说的那批人与小波兰的加尔文宗教会决裂，并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小社团”。本地支持它的波兰人越来越多：加尔文宗的神职人员，他们中许多人原本是织布工、纺纱工和其他行业的工匠，像戈尼翁兹的彼得、布热茨尼的格热戈日·帕维莱、瓦伦蒂·克拉维奇和马尔青·加霍维兹等。什拉赫塔把持着归正宗教会，这大概就是牧师们时常退出该派教会转向阿里乌派的原因。这个新宗派吸引了许多人，也有一些大贵族和乡绅对它表示忠诚，但它的基础就像再洗礼派一样，仍然是那些手工艺人和小店主，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从社会压迫中挣脱出来的希望和梦想，而这一点正是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其他类似的教派所做不到的。波兰的反三位一体派向摩拉维亚的再洗礼派派遣了一个寻访使团，有意识地去吸收再洗礼派的许多关于社会和道德的观念；从1562年起，他们就在宗教会议上反复讨论携带武器、杀生以及充当地方行政官员和陪审员的合法性。他们中有个别牧师经常不断地谴责人压迫人的贵族制度和财产世袭的占有制度，宣扬所有人不论是贵族、牧师还是农民和工匠都应该靠自己的双手谋生。

西吉斯孟·奥古斯都连同以新教徒为主的议会及天主教统治集团并未竭尽全力，使波兰摆脱眼下各种异端的影响。1564年一些创立异

端的意大利人被迫暂时离开波兰。唯一可去且相对自由的国家是特兰西瓦尼亚，这里国家权力的影响要小得多。斯坦卡罗和布兰德拉塔曾经访问过此地，并且在东匈牙利的加尔文宗信徒中播下了反三位一体说的种子。1563年，布兰德拉塔成了特兰西瓦尼亚诸侯扎波利亚的儿子约翰·西吉斯孟的御医和私人顾问。他与其他来自波兰的人一道，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中间开展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许多人都皈依了他们的异端信仰，其中包括约翰·西吉斯孟本人以及他手下的廷臣和牧师。但是，最重要的皈依者当属“科洛斯特堡”，即加尔文宗特兰西瓦尼亚社团的“主教”费伦斯·戴维。戴维1567年发表的《关于真假唯一上帝及圣父圣子圣灵的思考》是他彻底加入反三位一体说行列的标志。同年在托尔达召开的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允许所有教派都可以自由布道。1568年，当王子公开自己的信仰时，科洛斯特堡大教堂成了身为特兰西瓦尼亚阿里乌教会“主教”戴维的活动中心。和波兰的情况一样，特兰西瓦尼亚反三位一体说派成员中也存在着非常剧烈的争论；1579年，布兰德拉达和福斯特·索齐尼都因戴维宣扬极端上帝一位论而判他有罪，随后戴维在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不管怎么说，特兰西瓦尼亚反三位一体说躲过了这场风暴，并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团一直延续至今。

自路德发表那些改革论文后的半个世纪里，新教在中欧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之后又出现了回潮现象。宽容的统治者死后，权力又交给了天主教的支持者：1571年，天主教徒斯特凡·巴托里继阿里乌派信徒约翰·西吉斯孟之后成了特兰西瓦尼亚诸侯，4年之后被选为波兰国王；1576年，就学于西班牙的鲁道夫二世继开明的马克西米连二世成了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新一代的统治者发现，他们的王国被两种信仰一分为二。在波兰，绝大多数人仍然笃信天主教；但也还有4个有组织的持不同意见的教会：以承认1551年修正的《奥格斯堡信纲》为基础的路德宗，统一在1568年《赫尔维希亚信纲》基础上的加尔文宗，大波兰的波希米亚兄弟会以及其神学理论尚未统一、其组织尚未定型的上帝一位论派的社团。在哈布斯堡国王统治下的那一部分匈牙利，到1576年天主教会仍然处于下风，尽管大主教欧拉（1553—1568年）和韦龙奇奇（1567—1573年）费尽心机，想通过引进特伦托会议改革计划及创建耶稣会来复活天主教，但都没有成功。在那些矿业城市中，路德派信徒既有日耳曼人也有斯洛伐克人根据1549年的《五城信纲》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在以土耳其为宗主国

由扎波利亚和巴托里家族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以及邻近的县郡，路德宗、加尔文宗和上帝一位论派三种新教都组织起了自己的教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天主教在特兰西瓦尼亚仿佛已经无人过问，直到巴托里出面干涉，才保住了残余势力，不至于销声匿迹。在土耳其控制的匈牙利，加尔文宗和上帝一位论派各自都有自己的组织，16世纪的方济各会和17世纪的耶稣会曾在那里竭尽全力，公开维护天主教的权力。在马克西米连二世统治期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各个宗派都已经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是人数众多的饼酒同领派和日益发展壮大之路德宗，甚至是在摩拉维亚仍然困难重重的兄弟联盟的规模和影响也在扩大。

1576年以前，中欧反改革的势力并未取得多大成果。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欧拉和韦龙奇奇、布拉格大主教安东尼·普鲁斯和他的同行奥洛穆茨主教威廉·普鲁西诺夫斯基、波兰大主教乌哈斯基及他那才能超群、成绩卓著的同僚红衣主教兼沃米亚（埃姆兰）主教霍修斯都在从事恢复天主教的神圣使命；此外，在斯洛伐克、布拉格和奥洛穆茨、波兰和立陶宛都建立了耶稣会社区、神学院和学校。虽然至此除波兰之外，收效都不大，但却成功地提醒了新教徒要着力解决宗派间的纷争。1575年，饼酒同领派、路德宗和兄弟会在波希米亚共同签署了一个信纲即著名的《波希米亚信纲》，虽然它并未造就出一个统一的波希米亚新教教会，但却成功地向鲁道夫二世及反改革势力展示了新教联合阵线的力量。1555年波兰的加尔文宗和波希米亚兄弟会在科日米内克达成了相互承认的协议，到了1570年，由于无子嗣的西吉斯孟二世突然死亡，波兰的新教徒不得已又得提防某个较穷兵黷武的天主教国王会继位。加尔文宗、路德宗和波兰的波希米亚兄弟会在桑多米耶兹订立了一份协议，极其艰难地就圣餐的形式达成一致，只因其词义含混、晦涩难懂才被各方接受。桑多米耶兹协定使有三方参加的大宗教会议间或召开，但它还远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联盟。1573年1月当安茹的亨利确信无疑要成为波兰的国王时，波兰的新教徒和一些天主教徒纠合在一起，在华沙起草了一份“联盟宣言”，这是一份宣传宗教自由的宪章。据说，安德雷奇·菲尔莱伊把这份宣言呈交给了巴黎的安茹王室成员，其中有这句话“如果你不就此宣誓，你将不再统治”。这一次，不论是桑多米耶兹“协议”还是华沙“联盟宣言”都未能拯救波兰的新教徒免于天主教徒的全面反攻。新教在波兰绝没有像在波希米亚那样具有如此深厚的民族基础，以至于要通过大规模的

军事打击去进行围剿，波兰的新教也不像匈牙利的新教那样受益于君权的长期分裂和弱小。尽管带有讽刺意味，但它毕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教仅在中欧的这一部分，即破碎不堪的匈牙利王国躲过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劫难。

三 1519—1559年的法国

要了解宗教改革在法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兴衰变迁，我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这出戏降下帷幕的那一瞬间、在幻想破灭的那一时刻才能体会到。事实上，到16世纪末，法国仍然保持着天主教信仰。亨利四世被迫承认这样一个根本事实，要继承全部遗产，就必须放弃新教信仰。新教在法国即使是在其最辉煌和最具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也只是少数人的信仰。新教精神只适合少数人。新教打入法国社会多彩生活的结构或者说内部结构的方式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幕伟大的戏剧。如果通盘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导致法国开始宗教改革的这一系列良心上的危机（我们在考虑新教改革运动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引发了一个毫无疑问在16世纪上半叶对于法国历史来说乃是关键性的问题。

其次，这一点必须记住，在法国只占少数的新教群体能够使南特敕令（1598年）得以颁布，从而通过政治权力的保障，甚至通过增强地位来保护其精神生活。就这样新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结构。

此外，这时已经开始走向对立的宗教时常又表现出一种互补性的特征。不了解宗教之间的冲突就无法了解（和解释）宗教，这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似性，可以相互依赖。于是，法国的宗教改革虽然表现为加尔文宗这种极端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只有将它置于反宗教改革运动（另一种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过激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根据反宗教改革运动，我们才能够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现实、这两方面运动的加深了我们对这两种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力量比较和认识，而两者都是在16世纪上半期建立起来的。

还有一种支持这种观点的看法：必须把宗教重新植入到它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于是，在那时的法国这样一个奉行天主教的社会，经过改革的信仰之自由，只有和其他的自由一道，不管两者之间是友好的或敌对的、互补的乃至相互依存的，才能够或者说才有可能试图表达自身；于是后者根据前者而存在。在缺少一种有机的、专制的制度，一种既普遍又有效的制度的情况下——在16世纪的法国一切或几

乎一切东西都表现出自身的社会差异，大量的独立的权威的存在要么防止，要么导致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君主政体的权威总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1]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化，自由才是相对的。这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各阶层丧失了宗教的问题，因为它们全都被包容进一种单一宗教的结构和强制性的统一中去了。

整个初期阶段直到1530年左右，人们发现，宗教生活与理性生活关系密切，处于相对和平之中。结果在最初的时候，各种情况纷繁复杂，充满微妙的差别，很难界定；它们表现为下列几个独立的分支内容：天主教会和君主政体、路德宗影响的扩散、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最后是传统势力的反应。

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法国的天主教会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源于1438年的布尔日国事诏书，产生于宗教会议时期。法国教会因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免于罗马所遭受的或者罗马发生的重大打击。年轻的弗兰西斯一世在1515年马里尼亚诺之战取得胜利的第二天便与教皇利奥十世谈判，于1516年8月18日签署协定。按照协定的第一条，国王获得了在其王国内的全部620个神职中任命大主教、主教、神父的实权。这样一来，法国教会早先主张的高卢主义（起源于它所主张的宗教会议高于教皇这一特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独立，便让位给王权高卢主义了。王室采取强硬措施，使国家与教会关系问题一下子便得到了解决。但同时弗兰西斯一世及他的后继者们立刻就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看到教皇极权主义的日益增强的压力成为对他们的权力的一种实际威胁。

大力加强王权，对法国天主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进行控制，这一点不难理解。上述协定通过条款拒绝自由选举、降低会议的作用、废除处理教会事务时的一致同意原则，更是加强了君主的绝对权力。王室的权力范围又增加了从废除这些古老的惯例争取到的地盘。国王对教会的征服拓宽了通向君权神授理论的道路。于是便在1538年出现了由沙尔·德·格拉塞撰写的《法国王室》，支持国王有权增税和任命高级神职，以及1539年由杜莫林撰写的《巴黎习惯法刍议》，主张国王对神职人员有司法权。布尔日国事诏书的颁布才过了一个世纪。与此同时，罗马法研究的勃兴也促进了国王的事业。法律和律师学校率先对地方权力以及处理政府事务中必须遵循的一致同意原则进行了

攻击，布尔日就是有名的例证。在布尔日以及其他地方已经露出了专制主义思想的可怕端倪。

弗兰西斯一世在统治初期的斗争中，小心谨慎、自然而然地扩大他的权力，并不轻信那些对王权的每一步发展都表示反对的议员们献出的阴谋诡计。协定提交巴黎高等法院之后，拖了差不多两年才于1518年3月22日获得通过。最后法院也只得让步了。

这一问题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点值得注意，法国的宗教改革在初期事实上在法王努力推行和玩弄其外交政策时有意无意地给了它以巨大的推动。法王在意大利的冒险活动，杀气腾腾，旷日持久，吸引了许多法国人，用科明内斯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前来参军打仗纯粹是为了耀祖光宗”，法王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率领一支军队穿过阿尔卑斯山，向那片美丽而富庶城市星罗棋布的平原进军，此举的目的并不是真心要帮助教皇和教皇极权主义。事实恰恰相反。然而，法国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2月）被打败后，欧洲的均势曾一度被打破，为此，教皇克雷芒七世被迫与法国结成科尼亚克同盟，以此缩小查理五世的巨大战果。几乎与此同时，查理五世立刻作出了反应：1527年罗马遭到了洗劫。从那时起，直到1559年，教皇的政策一直受到西班牙的和帝国的政策的左右和摆布。查理五世这位意大利的主人控制了教皇。法国失去意大利后，罗马就不再是它的支持者了。

此外，法国因为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去打仗，便忽略了其东北边境上法德交界处的那条大道。法国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采取一条最终有利于新教徒的迂回政策。法国在帕维亚战役战败伊始就昧着良心向苏里曼苏丹疯狂地发出解围的呼吁，结果引爆了莫哈其（1526年）之战，随之而来的是土耳其人大肆掠夺，横扫匈牙利，甚至打到维也纳的城下，使德国受到了一次又一次间接的打击。这位真正的基督教国王搞垮帝国的策略要求，与那些信仰新教的、作为路德及其后继者保护人的诸侯们重修旧好或达成谅解，这些活动通常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就像1534年把符腾堡还给乌尔里希公爵；在1552年又重新夺回了这个主教区一样）。

1520年左右，法王对思想自由采取的宽容和鼓励政策使整个国家受到了德国宗教改革之暴风骤雨的袭击。实际上，法德之间的广泛交流在活跃商业的生活的掩盖下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

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里昂这个商贾云集、商品荟萃的著名集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宗教改革的传播中心。路德对法国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12\]](#)德国这位伟大的改革推广者那直率、真切、热烈并富有人情味的风格和文体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像法雷尔以及德·迈格雷的法文著作乃至纳瓦尔女王玛格丽特的《罪人灵魂之鉴》中都带有这种风格的痕迹。大量翻译作品的印刷和流传也扩大了路德的影响。这些急急忙忙从德国的出版社拿出来然后又急急忙忙运往法国的出版社去印刷的书籍是德国宗教改革思想有力的传播媒介，甚至可以说是一股革命的力量。于是，在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可以看到这些书的法文版上市；在巴塞尔书市上装帧精美的弗罗本印刷的书籍得到了伊拉斯谟、勒费弗尔和法雷尔的认可；斯特拉斯堡皈依了新教并成了法国流亡者（有时是勒费弗尔和鲁塞尔）的避难所；在纳莎特尔和日内瓦，还可以举出更多的源头，这些书从所有那些一直与里昂这座巨大的国际交流中心保持联系的城市中运出来，然后穿过边境到法国流通。在法国，尤其是在里昂、莫城、阿朗松和巴黎也有秘密出版社，其出版物很快就可以沿着大道流向四面八方。1519年，弗罗本写信给路德，通报已经有600本书正在通往法国和西班牙的路上：“它们要拿到巴黎去出售，甚至在索邦神学院也可以读到这些书。”1520年，有1400本在法兰克福市场上出售。法国就这样遭到了大规模的思想入侵。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时期，路德的著作成了抢手货，“深受所有新教前卫分子的欢迎”，1524年4月勒费弗尔（后来在莫城）写信给法雷尔“从你和德国来的一切都令我十分高兴”，这些书用木桶装着，混在商品中，或放在小贩的背包中，或藏在大包里。比如，在秘密偷运时以法律书和历史书作掩护，成百上千类似的箱子就这样进入法国，甚至运往很难到达的西班牙。

这种迅捷的地下宣传，其作用是无法用精确的数字来测算的。有一个例子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类书籍不仅限于在新教徒中流传。这个例证取自一个罗曼家族米芳家一位成员的遗嘱。他是一位绅士，从他列入目录的那些小圣母像和圣徒像可以判定，他还是一位天主教徒，他留下了一个更令人感兴趣的图书馆。从里面的149卷书中，我们发现了卡斯蒂利奥内的《朝臣》、龙萨的《颂诗》和《乱伦》、马基雅弗利、普林尼和柏拉图的书以及一套多卷本的伊拉斯谟著作，还有1522年被索都神学院定为禁书的梅兰希顿的《论灵魂》。

此外，千万不能忘记，所有这些出自路德以及其他德国和瑞士改革家的思想译成法文后影响力更为巨大。法国的宗教改革得益于像弗朗索瓦·朗贝尔这样的翻译家，他本是一个绳索腰带修士^[13]，1522年后到德国避难，1526年成为黑森伯爵的宾客；以及纪尧姆·迪莫兰，1525年住在维滕贝格，后来去了斯特拉斯堡；其他像路易斯·伯尔坎、帕皮永、朗佩勒和迪布瓦就更不用提了。1535年前有十几本德国著作被译成法文出版。它们是：《圣经精义——基督徒常规经》（巴塞尔，1523年，1544年出第二版）；《福音解读》（安特卫普，1528年）；《耶稣预言》（1527年）；《最佳祈祷书》（巴黎，1529年）；《现世痛苦与良心不安之基督教告慰》（巴黎，1528年）；《纳瓦尔女王编译之天主经要义对话》（年代不详，原作年代1519年）；《祈祷法训导以及如何组织仪式队列和举行丰收祷告》（年代不详）。还有一个人的活动值得一提，他叫罗伯特·埃蒂安娜，他参加出版了1522年、1541年、1542年、1543年和1545年的《圣经》节选，以及1528年、1535年、1540年、1545年和1546年的《圣经》全文。正是翻译家、出版商和书贩子的这些活动给法国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的观念和传统。

法国的早期宗教改革情况不明确，一方面，观念含糊不清，信仰摇摆不定；另一方面，其中有人文主义在推波助澜。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人文主义是法国的民族传统，因为与来自国外的人文主义学者一直保持联系而不断地得到滋养和鼓舞，并且根植于（这一点不可忘记）自发的也几乎是传统的反教权主义的土壤中。路德之前，让·布谢已经在1512年发表的《战斗教会悲叹》中写道：

得了，不要再对我花言巧语

也请收起你的圣餐杯、十字架和奇装异服……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埃塔普的雅克·勒费弗尔，他早路德几年在《评圣保罗的书信》（*Commentaire sur les Epîtres de St Paul*）中就主张因信称义。1534年奥当主教就宣称，“我们已处在这样的时代，只有，或者几乎只有最怯懦和最卑劣的人才渴望从事如此应受尊敬的职业……”而且马修·马兰格雷1533年在他的诗中是这样唱的：

无论什么都与我无益，

即使是方济各和他那或黑或白或灰的宽衣：

我也摒弃了多明我和他的篷船，

全心力投向你——我的上帝，因为你已将全部的善包括无遗。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发生在莫城，开展活动的是一个以纪尧姆·布里松内主教为核心的团体。布里松内（1470—1534年）出生于一个律师、商人和金融家的家庭。他的父亲纪尧姆·布卫松内是查理八世的全权大臣，差不多等于首相。他本人早年曾受命参加比萨会议，并参与谈判签订了协定，遂被提升为洛德夫主教，之后在1515年12月31日当上了莫城主教。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帮生性活跃、勇于思考并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朋友和学者。他的主教宅邸成了学者聚会的场所。戴塔普的雅克·勒费弗尔（1455—1536年）离开巴黎圣日耳曼后，大约在1520年末来到这里，奉命管理本城的医院（1521年8月11日），1527年5月1日升为教区主教代理；能言善辩的热拉尔德·鲁塞尔（1480—1550年）很快当上了神职人员会司库；学者瓦塔布莱和德·金塞伊、神学家马夏尔和马聚里丽（被指派担任莫城圣·马丁大教堂的有俸神职）、多才多艺的卡罗利、躁动不安的纪尧姆·法雷尔，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1523年，勒费弗尔出版了他翻译的《四福音书》；之后在1527年出版了他的《旧约》译本。在倾向于保罗教义的莫城到处可以看到传道人在向会众们大声呼吁，其市中心成了复制德国思想、模仿德国样板的最佳场所。作为传播改革的中心，莫城在法国是最有影响的，它的命运更是不同凡响。当然，在这些领袖们的行为背后，我们也必然记住那许许多多散布在各行各业的小人物——漂洗工、羊毛梳理工、织布工以及各类工匠——这些人自1553年后就像两年之后德国农民一样骚动不安。这就是莫城的小“羊群”。除此之外，布里松内肯定还在构想更广泛的改革，并且在考虑如何拯救纳瓦尔女王玛格丽特那颗杰出的灵魂，他是她的朋友，是她可信赖的人，是有权听取她告解的神父，而她也只信仰基督的善功。

布里松内努力工作，力图在自己的主教管区内，按照罗马奥利托拉会的方式重新整顿纲纪。1519年10月15日他颁布法令，规定神职人员应当住在自己的教区内，但是这命令不得不在1520年元月7日和10月27日重复颁布两次，由此可见抵触情绪的顽固。改革的这一尝试尽管很温和，仍然激起了那些不想受新规定和新思想约束的反启蒙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愤怒。然而，他的朋友乔西·范·克利希托夫在1520年宣

布自己反对这种危险的革新，紧接着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轻而易举地就把布里松内拉回到了传统。1522年他应召返回巴黎，答应要采取措施防范路德的著作。次年他回到莫城，下令（10月15日）不准销售和藏匿此类书籍；12月13日他下令禁止教区神父接纳有激进思想嫌疑的传道人。1524年3月和4月他公开抨击那些怀疑基本教条如弥撒、圣徒、涤罪等的教义，同时设法复兴宗教仪式并恢复其自发性的特征。在宗教改革早期的这塘浑水中潜藏着一股逆流，克利希托夫就是最好的例证，的确水太浑了，以致当时的人总是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后来倒向改革的纪尧姆·法雷尔（1489—1565年）在1524年4月2日写给科尔马内·舍费尔的信中说道：“我的法兰西已极其喜悦地获悉上帝的声音。”事实上，这一断言大成问题。那么，对于布里松内、勒费弗尔、鲁塞尔、法雷尔以及克利希托夫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如此隐蔽的信仰以及相互之间如此之大的内心差异我们怎样进行分类呢？

大约在1530年，尤其是在此之后，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影响了法国的知识潮流和情感氛围。这些变化只会使本来就不简单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教会已敏锐地意识到，它的统一和它的权威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竭力想通过强化传统来反对那些它认为会导致教会分裂的思想和观念。在巴黎有两股势力在帮助教会阻碍新教义的教播：巴黎高等法院和巴黎大学神学院。前者反对加强王权，更不用说宗教中出现的新思想了；后者知道自己在巴黎乃至在整个欧洲在理性判断方面享有崇高的声誉。1530年，亨利八世曾向其神学家征求过关于离婚问题的建议。1532年，安特卫普的商人向他们陈述过在高利贷问题上所存在的顾虑。正是巴黎被伊纳爵·罗耀拉认为是继罗马之后值得在此培养弟子的地方。正因为其声名显赫，所以，一般人要想恭维某人时总是说他辩论起来“像索邦神学院的博士”。

就在教皇谴责了路德的著作后，神学院也在1521年4月15日发布一篇相似的声明，对路德进行谴责。同年8月，巴黎高等法院大张旗鼓地下令，要求在一周内交出路德的著作，然后组织搜查。1523年6月路易丝·伯尔坎在巴黎被捕，这期间被盘询的小人物中他是唯一有身份的人。由于国王直接插手以及国王的妹妹纳瓦尔女王玛格丽特的私下请求，他才获释。8月，让·瓦利耶被定罪，在巴黎被烧死，成了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罹难者，尽管他不是因为信奉路德宗而被定罪的。全国各

地都发现了异端书籍：1523年，索邦神学院的人在巴黎仍在发现这类书籍。波尔多和格勒诺布尔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1524年在布尔热、1525年在诺曼底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处境变得严峻是与弗兰西斯一世第一次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那场戏剧性的战争分不开的。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宽恕了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学院挑起事端的行为。1523年法雷尔已经逃往巴塞尔。大约在1524年，刚好在勒费弗尔出版他的法文版《新约》之际，莫城的那个团体受到了严重警告。卡罗利和马聚里丽相继在元月和2月重申拥护天主教；12月迈格雷遭到监禁。1525年2月，弗兰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败被俘，并从意大利押到马德里。可以说，1525年大概就是莫城那个团体终结的日子了。布里松内接受了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开始搜查禁书。稍后他受到曾在莫城被他禁止宣道的那些绳索腰带修士的揭发。10月到12月，他被召回巴黎，向高等法院回答对他的指控。他被指控在其教区散布“谬误连篇、充满邪说的法文书”。10月，勒费弗尔和鲁塞尔逃到斯特拉斯堡。

1525年5月，在摄政王的请求下，教皇把对异端的审判权交给了高等法院中的4位法官，其中两名是神职人员，两名是平信徒。这个特别法庭仅维持到1527年就关闭了。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弗兰西斯一世从马德里的狱中写信给高等法院，要求它暂停审判。1526年2月国王获释。4月，由于玛格丽特的再次干预，勒费弗尔和鲁塞尔又回到法国。但是高等法院不听劝告，坚持奉行强硬政策。1526年3月12日它再次谴责路易斯·伯尔坎的著作，只是由于国王的坚持，他才幸免于难。10月8日国王不得不又一次给高等法院写信：“朕命令你们……宽恕伯尔坎。”国王再次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所以起而支持思想自由的事业。然而他自己还有足够的影响来主宰这敌对的形势吗？在意大利，他的权威由于帕维亚的失败、马德里条约（1526年）及康布雷和约（1529年）而遭到严重削弱。根据最后一项条约，国王被迫用200万埃居的赎金为扣在西班牙作人质的两个儿子赎身，其中的120万要用金币一次性付清。这对于由于战争过度超支而感到吃紧的王室财政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1527年的应召显贵会议上，波旁枢机大主教对王国目前的宗教状况以及国王在宗教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一些重要的外省宗教会议，尤其是桑斯和布尔日的宗教会议。

桑斯会议是在法国大法官、枢机主教、阿尔比主教及桑斯大主教安托万·迪普拉的主持下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从1528年2月3日到10月9日。乔西·范·克利希托夫应召出席了会议。会议的议题包括筹集国王要求的款项、宗教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问题。会议颁布的关于教义的法令旨在恢复教会的权威，法令规定：只有教会才有权甄别书本中的思想是异端还是正统：凡涉及弥撒、圣礼、圣像、恩宠论等事宜也只能由教会进行裁决和定义。此外，桑斯会议还强调了教区的纪律，并强调要由修会对布道进行控制。布尔日会议在土伦红衣主教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控制异端布道和异端书籍的措施。米歇尔·弗朗索瓦写道：“书籍和言词‘是’宣传新教义最好的工具。”法国教会就是这样来拼命进行自卫，重组自己的宗教力量的。然而即使这样，是否可以说，法国教会在恢复自身的纪律和权威的时候，只能求助于省宗教会议而非国家宗教会议呢？如果不坚持这一点，法国在16世纪的基本特点就必须重新认识。就君主国家来说，法国无疑是统一的，但它的幅员广大，外省——最广义的外省——的干预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这些外省宗教会议召开正值大追捕路德宗信徒之时，随后于1527年10月、1528年12月在巴黎；1528年6月在鲁昂处决路德宗信徒，皮埃尔·巴尔实际上并不是路德派成员，也在鲁昂以拒绝承认基督的神性而被定罪。伯尔坎又一次遭到攻击：1528年，他第三次被监禁，结局很悲惨，1529年4月17日经审判后被处死。必须提到的是，大批的人因受到怀疑而被捕，有一些人被处死：1529年在朗格勒；1531年、1534年、1536年、1538年、1539年在第戎；1534年在博讷；1532年、1533年、1535年、1536年在蒙彼利埃（1527年有报道说“这个城市有一大半人是路德宗信徒”）；1530年、1532年、1538年在图卢兹；1526年、1530年在图尔；1530年、1534年、1535年在波尔多；在整个南方如卡奥尔、卡斯特尔、芒德、罗德兹、蒙托邦、卡尔卡松；在诺曼底的好几个城市；里昂也不甘人后。所有这些都明示了未来的血雨腥风。宗教改革的初期阶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画上了句号。

从这时起，色彩不同后果各异的种种倾向开始形成。这样，正如前面提到的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开始分道扬镳。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物质生活上的安乐似乎已败坏，因为直到此时它只靠易于获得的东西和某种愉悦的情绪来支撑。一个从肉体到精神焕然一新的法国出

现了。只不过在那些至为关键的年代里，它的容貌终无常形，变换得太快了一点。

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离异分手是一桩意义深远的大事。虽说他们之间的分裂并不十分明显，但实际上，他们在对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相当复杂的变化。知识分子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保护之下。克莱芒·马罗虽是一个囚犯，但因为有沙特尔主教的关照，他的待遇很好，行动也十分自由；艾蒂安·多莱特在利莫热主教处供职；鲁塞尔不断得到纳瓦尔女王玛格丽特的同情和关照；麦格雷是杜贝莱家的常客。因此他们有文学艺术事业资助者，有知识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的荫蔽。事实上，知识分子所获得的这类资助和保护正在逐渐地有时甚至是大幅度地减少。一方面是那时的米西勒斯（文学事业的资助者）们对于此道已感厌倦，这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对他们祖先的公开背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上层，在于王室又改变了政策。这本是一场主题和结局不断重复的伟大戏剧。那些头脑清醒、明了正反两方论点的温和派人士已经不再有市场了。时局已不再需要像纪尧姆·杜贝莱这样的人了，他曾千方百计想通过发动一场类似梅兰希顿在德国导演的运动来修补教会的裂痕，恢复教会的统一，但是失败了。在这些变故的背后，是不是也有老一代相继去世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布里松内死于1534年，勒费弗尔死于1536年，伊拉斯谟也是在这一年离开人世的。现在，年青一代开始发言了。新一代正在新的形势下脱颖而出。

文艺生产和宗教热情之间的剥离很快就完成了。除了日益加剧的宗教迫害之外，这是不是和对先前那些改革精英的一定程度的贬低也有关系呢？迫害是坚持真理和表现大丈夫的决心的时刻——在这一切之中确立起了采取行动和民众暴力的整个现实。关于当时的形势流行着一首歌谣，其中对索邦神学院的做法极端憎恶：

光明所至，
阴影顿生。
福音传来，
罗马反讽。
索邦虔信，
索邦缄声。

但是，索邦并没有保持沉默，它对新事物毫不留情，对新思想一追到底。大约在1530年，由于王室读经会开始实施，法兰西学院的骨架搭起来了。索邦神学院立刻通过纳尔·伯达的言辞以示抗议：

《圣经》的希腊语或希伯来语文本大部分出自德国人之手，其中不少可能还是修改过的。而那些希伯来文《圣经》更可疑，因为许多印行希伯来文《圣经》的犹太人都是路德教徒。

言辞的攻击不断升格，迫害和追捕异端分子日益猖獗。剑已出鞘，屠杀已在所难免。伯尔坎于1528年，让·达·卡蒂尔瑟1532年在图卢兹先后被处死一定是例外情况。然而，他们的死也掩盖不了许许多多地位低下的人受害这一事实。实际上，在文艺复兴这场理性的运动的核心，反民众的传统显示了自己的威力。5年前即1525年，路德在面临德国农民起义时不也同样是如此吗？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分裂从许多方面显示了宗教改革的大众化特征，这种情况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布道取得的伟大的发人深省的成功，布道在后来加尔文宗的传教浪潮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成功便是明证；胡格诺派的歌谣和《新教》诗篇的普及和流行也是明证。1524年出版了德文版的诗篇，1539年出版了法文版；但最有影响的是后来的克雷芒·马罗（1496—1542年）版本。着手于1532年、完成于日内瓦的这部《诗篇》（译成法文的50首诗篇）直到1543年才由艾蒂安·多莱特出版，从1543年到1560年再版了28次；1562年狄奥多尔·贝扎完成的译本《诗篇》一年之内就印刷了25版。法文版的《诗篇》与《基督教原理》一道在法国的民众的宗教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没有比《鲁昂编年史》（*Chronique de Rouen*）更有启迪作用的文献了，它记录了这个城市1560年3月，“下层民众中许多人咿咿呀呀地哼唱着大卫的诗篇和圣歌，那歌词译得极粗俗，颇像克雷芒·马罗的格调”。

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很容易把1533—1534年看成是关键性的两年。1533年复活节，鲁塞尔在罗浮宫给纳瓦尔女王玛格丽特讲道。对此，索邦人极为敏感，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刚刚才对《罪人灵魂之鉴》的再版（1531年第一版）进行了谴责，这个版本增加了克雷芒·马罗用法文翻译的《诗篇》第6首。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因为国王站在他的妹妹一边。由迪普拉和巴黎主教率领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1533年5月18日作出决定：鲁塞尔留下来，伯达被逐出巴黎。这对索邦是一个沉重但却是间接的打击。11月8日，索邦神学院撤回了它早些时候所

作的谴责。至此，一切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和谐状态。表面上看，国王成功了，温和派胜利了，应当注意的是，改革也因此得到促进。然而，刚刚才宁静下来，又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海报”事件，有如一声惊雷，令人们大为吃惊。1534年10月17日至18日，一夜之间到处都贴满了各种海报，标题是：“实话实说：揭露教皇弥撒的各种可恶的、重大的和影响恶劣的流弊，这种弥撒纯属杜撰，旨在对抗我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中介者和唯一的救世主——的圣餐礼。”这些海报同时出现在巴黎、奥尔良、鲁昂、布卢瓦、图尔和昂布瓦斯。国王此时正在昂布瓦斯，一张海报恰好钉在他卧室的门上。国王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极其愤怒。紧接着便开始了镇压。11月26日，大约有200人被逮捕，其中24人后来被处以火刑。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中有些人是从德国带回禁书的饰带制造商。此后没过多久，国王又恢复了温和主义政策：通过库奇宣言（1535年7月16日），国王宣布对在半年之内发誓悔过的逃亡者实行大赦。然而，宗教改革已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

与此同时，最后一位斯福尔扎去世，在由谁来继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夺，因为谁都想拥有富庶的米兰。为此，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从1536年打到1538年，尼斯停战协定（7月18日）签署后才算平息。事实上，敌对双方之所以要握手言和，目的是要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异端，就像8月份所安排的那样，国王和皇帝在艾格莫尔特就此进行了谈判。之后，国王又在法国开始对新教徒进行镇压，此种政策许多年来激起的感情给反君主主义者E. 德·博利厄以灵感，他于1546年创作了下面这首歌：

一旦失去他的城市的支持，
一旦被起义的人民推翻，
我不信这样一位君王不会感到悲哀，
也不信上帝还会让这位无道暴君继续统治。

王室的这一政策方向一直推行到弗兰西斯一世在世的最后一刻。弗兰西斯的统治的悲剧在于此，但其原因很难说清，尽管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十分清楚，一目了然。1538年12月16日发布的敕令授权最高法院“采取一切手段来监控有异端思想者”，1539年6月24日发布的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1540年6月1日）授权给世俗法官即高等法院来

镇压异端。类似的行动还可以在里昂和巴黎的印刷商罢工时发布的维莱科特雷敕令（1539年8月31日）中看到：

依照我的亲爱的巴黎书籍印刷师傅们谦恭的请求[国王宣布]，我们应为上帝的荣耀来获取知识，应大力支持并扩张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让神圣的基督教传遍全球，为我们的王国争光……

或许，要讲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会显得冗长乏味。只要举出1542年索邦神学院开出的禁书单就够了；1543年，它提出了为弗兰西斯一世所能接受的天主教24信条；1544年又公布了一个新的禁书索引。

弗兰西斯一世在签署克雷斯皮和约（1544年9月18日）时重新保证要对异端进行围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对新教徒的打击。他的统治的最后几年因为以下的事件而蒙上了阴影：“莫城14君子”被处死（1546年），按照1540年11月18日颁布的梅里多尔法令，沃州在1545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弗兰西斯一世于1547年3月去世，他的儿子亨利二世继承了王位。亨利二世上台时期，法国新教团体正处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但是他并未改变他父亲在世时的最后几年所制定的路线。从父亲到儿子，只是使这出戏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而已。如果从因果关系上看，加尔文宗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按照传统的说法，加尔文宗的蓬勃兴起是从1541年法国出现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时算起的。这个说法是相当准确的。接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宗在法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亨利二世统治末期的发展，从1577年算起。也正是这出戏向纵深发展并走向灾难的时期。

亨利二世的统治，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作影响法国乃至法国以外地区16世纪后半叶长期走势的分水岭或出发点。法国经济在这个交接时期似乎停滞萧条，倒退不前。与此同时，在1540年后甚至更远一些的1550年后，法国各个省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大道沿线城镇的前途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这里所讲的城镇是指那些信奉异端的城镇。在早期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法国广大内陆中心地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莫城、图尔、布尔热、特鲁瓦、蒙彼利埃及里昂等。确切地说，16世纪下半叶，这些城市为了支撑自身的物质生活而与新思潮脱钩了。里昂经济遭受了长时期的停滞和衰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例。1557年里昂因经济崩溃而受到了

沉重的打击，大伤元气，物质生活已远不如过去。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1540年至1560年之间，法国的宗教改革转向了沿海一带，这里因为商业的欣欣向荣而变成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地方。相对照的是，内陆省份则显得顽固不化，死气沉沉：香槟和勃艮第曾经一度向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开放过，但它们并不热情，对加尔文的思想，它们甚至怀有敌意。在吉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影响下，这儿的人唯命是从，没有独立的思想，于是，香槟、勃艮第便与邻近的洛林一道，成了经意大利穿越西班牙低地国家这个反改革大走廊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提出这些基本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十分慎重的。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向大西洋沿岸倾斜只能在法国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宗教战争爆发的前夕使法国的宗教改革趋于复杂化。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尽量从金融史和经济史的角度来展示这场拉锯式的运动。^[14]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场深刻的运动是从亨利二世的统治开始的。与通常讨论宗教改革方法不同，这种观点着重强调法国的经济 and 物质生活的重大改革对宗教改革的影响。

这个国家又一次卷入了欧洲历史的漩涡，这道门大开着，进去很容易，但要想从里面逃出来就困难了。的确，亨利二世统治下最后几年出现的危机如果不参照欧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无法认识清楚。1555年这一年，随着《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不管是表面上还是事实上都看得出来，德国重大的宗教争端已经停止和平息了。德国这一边出现了幸福和宁静；法国这一边却没有如此幸运，它笼罩在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中，时刻准备采取果断行动。对外战争对法国的承受能力是一次检验。从这场使人精疲力尽的战争中可以看出，法国整个国家机器和组织结构都有问题。这场战争已经完全失控，沃塞勒停战协定（1555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的结果是，敌对双方亨利二世的法国与菲利普二世庞大的西班牙两败俱伤。双方在国力枯竭的情况下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4月）。帝国的西班牙重新获得了喘息之机。法国却没有如此好运，它敞开国门，把自己变成了邻邦入侵的战场。然而，这场冲突同时也是精神的冲突，是由两支军队、两位意志坚强的领袖、两个伟大的战士来规定的，他们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和无休无止的争论最终传给了他们的后继者：让·加尔文（1509—1554年）和董·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或称圣·依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年）。

把他们两人稍作一下比较是值得的。本质上说，他们对当时的法国都非常了解。甚而可以说，他们在巴黎读书期间很有可能在蒙泰居学院会过面。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奇遇！本质上说，他们都反对那些囿于地域或民族的传统，而这些传统正是高卢天主教会或者说《奥格斯堡和约》的谈判者们最珍惜的。加尔文宗信徒以及耶稣会的“战士们”都不知什么叫国界。另一个奇怪的特点是，首批耶稣会会士自称为使徒，拒绝修士的着装和行为方式。他们组成支部和行动小组，甚至组成积极行动、争强好斗的军团。这种比较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耶稣会在法国的命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540年9月27日教皇下诏书，批准了耶稣会。罗耀拉想集中力量创建两所学院，一所建在罗马，一所建在巴黎。耶稣会在法国得到了洛林红衣主教强有力的支持。在他们的撺掇下，亨利二世于1551年元月发出特许状，允许耶稣会“在巴黎城用其所得的捐款盖一座学院”。王室的同情就够了吗？1551年8月，法国天主教又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这是因为国王改变了对德国新教诸侯的政策而达成谅解造成的，这种形势对耶稣会是不利的。耶稣会遭到巴黎高等法院的无情反对和索邦神学院的拒绝承认使维护古老的教会的坚定不移的努力达到了紧要关头。但是，耶稣会不属于古老的教会。1553年元月10日，新的特许状和敕令书显示了实力，使高等法院下定了决心；1554年12月1日，索邦神学院通过了一个反对耶稣会的法令。面对这些压力，耶稣会被迫等待，直到1561年9月15日才注册登记和得到官方的承认——这是一个重要日期，它正处在宗教战争爆发的前夕。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会已开始在奥弗涅传道讲学，迪普拉于1555年在这里创立了比洛姆学院。

加尔文宗信徒们所起的作用更为引人注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加尔文宗最后取得的效果更好。日内瓦是新教的首都，地理位置优越，它从高处俯瞰着法国的边界；另一个所幸之处在于，加尔文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具有法国人的思维。没有人会怀疑，他在思想上对自己的母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1541年发表的《基督教原理》和1551年发表的《圣经》译本轻而易举地就从日内瓦出版商的手中进入了法国。并且，他还给法国的加尔文宗团体及斗士们去过很多信，对他们循循善诱，为他们指点迷津，给他们下达命令。于是，这个来自

边境之外的力量给予了法国加尔文宗团体一种超越民族的特征，一种“国中之国”的地位。这些话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耶稣会。

亨利二世很有一套办法进行迫害和镇压。他采取的惩戒措施和他的前任不相上下。1546年7月20日，罗伯特·埃蒂安娜的受谴责的《圣经》被列入禁书目录的索引。1547年12月11日，依照枫丹白露法令，所有书籍尤其是那些来自德国和日内瓦的书籍未经索邦神学院的正式批准一律不准在市场上发行。1547年12月3日，亨利二世下令由高等法院执行“审判权，主要是路德教派案的审判权”。“路德教派”这个名称已经过时。实际上，现在是加以狠狠打击的时候了。1548年5月2日，高等法院内设立了特别法庭，即有名的火焰法庭（又译火刑法庭）。它在香槟、布里、法兰西岛、皮卡迪、曼恩、安茹、图赖纳、普瓦图、欧尼斯、昂克穆瓦、博斯、奥尔良地区、索洛涅、贝里、尼维尔地区、里昂地区、福雷、奥弗涅、波旁、莫尔旺以及马扎地区拥有管辖权。最后，沙托布里扬敕令（1555年6月27日）委托新的初级法院法官来惩罚异端分子。

有条不紊的暴力镇压与加尔文宗在法国的迅速传播比肩而行，传播多半是得人心的（从火焰法庭的案例清单上便可看出），由此集中反映了宗教战争前夕宗教改革史的实质。在这一点上，1553年后在日内瓦受过培训的传道人的到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33年，菲利贝尔·哈梅林到达圣通；1555年，德·洛内和弗朗索瓦·德·莫雷尔来到巴黎，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教会。到处都在组织加尔文宗团体：1553年在普瓦蒂埃和昂热；1556年在布尔热；1557年在布卢瓦、鲁昂、康城、拉罗歇尔、里昂、艾克斯、波尔多、伊苏丹、昂迪兹；1558年在迪耶普、勒阿费尔、图尔、桑特、蒙塔尔吉、圣让-当热利、马赛、贝尔热拉克、圣福瓦、蒙图瓦尔；1559年在南特、塔拉斯孔、加普、瓦朗斯、吉昂、维勒弗朗什、沙托鲁、图阿尔、内拉克。1558年估计至少建立了34个拥有牧师的教会：1561年法国舰队司令科利尼宣称，按照卡特琳·德·梅迪西斯王后的说法，全国有2150个教会组织。1559年3月25日在巴黎召开首届全国宗教会议。一个新教教会就这样成立了，它既是一个国家教会，又是一个超国家的教会。如此迅速的传播速度就连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加尔文自己都感到吃惊。1560年，他在写给蒙特利马尔的加尔文宗信徒的信中说道：

我们要求你们节制……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何要走得这样快。你们应该稳步地发展自己的团体，不必操之过急。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明智的忠告，但对于日内瓦的这位倔犟的老人来说则很平常。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得益于人们或各国的深谋远虑。

战争又一次爆发了，从1552年军队向莱茵河挺进的那一刻起便昭示这是一场费力而广泛的战争。战火绵延，硝烟四起。在日内瓦的新教徒中，人们认为，不打开内战的闸门，外战就不可能结束。马卡尔1558年8月17日写信给加尔文说，“倘若国王取得了和平，他就将像他断言过的那样，倾其全力打一场围剿路德派的战争，直至把他们斩尽杀绝”。1559年4月3日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条约。天主教两强国所签署的和约开辟了内部动乱的机会。1559年6月2日天主教根据埃库昂敕令向新教宣战，该敕令宣告：“该死的异端分子们活动猖獗，要败坏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

之后在1559年7月10日，亨利死于持矛比武事故中。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中断，战火就要在王国燃起。这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争斗揭开了法国历史的新篇章。如果把战场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就可以看出，新教徒并未在整个法国扎下根来。经过1569年的第三次战争，我们发现，新教的势力已向大西洋沿岸转移，拉罗歇尔成了它的大本营。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利二世戏剧性的统治期间，事态的发展早就为新教在法国划定了地域，早就预示了新教在法国的命运，同时也早就规定了它发展壮大和走向衰弱的线路。这里存在着一种共时发生现象，可以肯定这是拙劣的共时发生，但这是经济活动和战争之间的共时发生，是新教的渗透和旧宗教的抵抗与复兴之间的共时发生；旧宗教的复兴是通过可以称作天主教改革的运动而实现的，天主教复兴在别的地方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如此牢固地站住了脚，以致新教丧失了控制力和独立存在，此时的新教尽管不乏英勇的壮举，却并未占上风。

（赵亚麟 译）

[1] 见本书边码第111页。

[2] 参见本书边码第350页。

[3] 见本书边码第127页以下。

[4] 欲了解教廷和公会议，另见本书边码第270页以下。

[5] 见本书边码第355页以下。

[6] 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并未被执行死刑，他以放弃选侯职位及割让领地等为条件保住了性命。——译者

[7] 见本书边码第357页。

[8] 见本书边码第512页。

[9] 见本书边码第122页。

[10] 见本书边码第466页。

[11] 见本书边码第440页。

[12] 欲了解这一问题，见W. G. 莫尔纳《德国的宗教改革与法国文学》（斯特拉斯堡，1930年）。

[13] 指方济务会修士，因他们腰束打结的绳索而得此名。——译者

[14] 《1493—1680年的世界经济与法国的货币铸造》（巴黎，1956年）。

第七章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众所周知，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与其他地方的宗教改革有所不同。在别处，宗教动乱之后紧接着出现政治和体制的重建，而英格兰之脱离罗马是由政府领导的，其原因与宗教或信仰关系微乎其微。然而，有些因素，如环境、感情和激情、冷漠，是可以解释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的。在整个西欧出现的对神职人员和教会的权利以及权利要求的反感并非对英格兰无所触动。民间大量流传着关于神职人员劣迹的故事，证明公众中存在着一一种意见，其准确性虽成问题，但其意义十分重大。教会之滥用职权、买卖圣职、任人唯亲、兼领圣俸、卖弄财富、贪污腐化、追名逐利使得像托马斯·沃尔西这样的优秀的正统基督教徒也踌躇不前，当对教会的谴责已被认为与异端有联系时，他们刚开始否认和这些事情有关。托马斯·沃尔西^[1]这位伟大的枢机主教自1515年起便管理着教会和国家，他全面具体地体现了教会的一切弊端。同他的主子一样，他今生之志已酬，对来生只给予形式上的关注。尽管后世认为，他对建筑、他对艺术和学术的保护以及他的宽容可以减轻其罪恶，但对他自己那个时代而言，这一切似乎更加重了他那厚颜无耻地追名逐利的作风。在英格兰的神职人员中，有比沃尔西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身居高位者和任低级神职的人中，在主教和教区牧师中，灵性生活差者大大超过其他人。两个世纪以来，晋升主教职位是通过为王室效劳、担任律师、外交官和公务员等而实现的；这样的主教的确可能（事实上也如此）效率高、勤奋，甚至是正直的楷模；但却不可能提供许多灵性指导，或对无可怀疑的滥用职权进行真正的改革。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教会的统治者必然要终生使这种制度永久存在下去。

在对神职人员的这种普遍反感——拒绝再受他们统治——之上，平信徒们又增添了别的更加明显的愿望。教会拥有的财产和追求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愤恨。英格兰三分之一的财富为教会所掌握。像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或温切斯特主教那样的大领主（沃尔西将他们的封地纳入他的约克大主教管区）控制的税收比世俗贵族还多。那些租用修道院土地的绅士现在希望将使用权转变为真正的所有权，而让渡土

地所有权的计划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当时教会收取的苛捐杂税，尤其是什一税，经常引发怨恨。神职人员对举行宗教仪式收取的费用，尤其是葬礼费（送葬费）和由教会法庭收取的税收几世纪以来就经常受到人们的抨击。曾经如此有用的教会法庭此时遭到人们的仇恨。其腐败人所共知，办事拖拉，难以捉摸，不仅如此，它们对私人生活的干涉程度是世俗法庭难以望其项背的。此外，它们代表的是那个致命的事实：教会是独立的组织，是国中之国。

所有这些情绪，虽然古已有之，但现在依然活跃，事实上与日俱增，通常用一个标题来加以概括：反教权主义。毫无疑问，英格兰是反教权主义的；对教会的种种制度尊重少，反感多，甚至常常怀有刻骨仇恨。这种感情在人口众多的南部尤为显著，在伦敦更是如此。1514—1515年发生的一次著名事件显示了其力量。一个伦敦商人理查德·胡恩因被怀疑为异端而遭逮捕，后被发现吊死于主教的监狱内。虽然那位主教发誓说该商人系自杀，但验尸陪审团指控狱卒和主教的司法官犯有谋杀罪。接着在伦敦市和国会里发生了暴动和骚乱。虽然该司法官交了一笔罚金而得以了事，但教会却因此一蹶不振。胡恩的真正罪行在于他曾向世俗法庭控诉，要求取消过高的送葬费；教会试图通过把他当作异端焚毁其尸体的办法来伪造成绩，这一令人厌恶的企图应该归罪于神职人员的思想状态，这是令人悲哀的。当国会终于找到机会攻击教会时，胡恩事件又旧事重提。

反教权主义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异端在英格兰盛行，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总体而言，这个民族坚持正统，但其虔诚在任何情况下与其说是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形式上的。150年前威克利夫对正统之学究气的抨击最后残留下来的罗拉德派的教义在宗教改革中没有起作用。更加可怕的是正开始在各大学传播的路德宗新异端。1524年，威廉·廷代尔逃离这个国家，在国外出版了《圣经》英语译本，并领导了英格兰新教运动。（1536年他被帝国当局逮捕并烧死。）在剑桥，一个名为“小德意志”的讨论小组开始对路德的教义作出学术上的响应；当沃尔西从剑桥调动一些神学家充实在牛津新建的学院时，他无意中影响了另外一所大学。英格兰国教会的殉教史开始于这些年托马斯·比尔崙和约翰·弗里斯的殉教。沃尔西的世俗倾向使迫害受到了抑制；在他1529年倒台后，平信徒托马斯·莫尔继任内阁大臣，他鼓励主教们采取行动。但总的来说，一方面英格兰国教会可以公正地回

顾廷代尔，另一方若不是因为国王，他的呼声本来会消失在旷野里；国王仇恨他，国王在一本自己写的书《七圣事辩护》（*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1521年）中表白了反路德的信仰，对这本虔诚但在学术上平平之著，教皇甚为感谢，授予他信仰维护者的称号。英格兰的反教权主义是出于世俗的原因，不是由于对福音的信仰。我们也不应指望把理性运动作为宗教改革的一种原因。对“新学问”，对学校里的人文主义革命，英格兰像其他国家一样已有所闻；英格兰不是庇护过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及其朋友们不是把年轻的亨利八世指望为自己的伟大保护者吗？但英格兰的人文主义者仍然忠于罗马教会；他们中为教皇的事业而殉难的烈士很少，莫尔和费希尔是其中两个。虽说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开始时既不是灵性的运动也不是理性的运动，但并不因此就不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持续性，并不因此就不值得重视。

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真正的主因是政治。可以发现人民的反教权主义虽然得到那些反对教皇的外来干涉的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但本来不会导致和罗马的决裂的，假如国王认为没有必要对付教皇对教会的控制的话。因为教会代表了一种中世纪意义上的特权，一种豁免权，有独立的法律、法庭，在控制英格兰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也是独立自主的。英格兰的国王们总是找得到方法来干涉教会事务：他们向神职人员征税并通过协议分享神职任命权。但正如亨利八世后来以难以置信的吃惊神态发现的那样，神职人员效忠于两个主子。英格兰教会并不严格准确地存在：只有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教省，是普世的拉丁教会的部分，受罗马的专制统治。借助于上诉和撤销罗马法庭每年从英格兰抽取很大数量的案件；英格兰的教会法就是罗马的教会法；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向罗马缴纳相当多的岁入。在14世纪时英格兰的国王和领主们发现自己的圣职授予权受到威胁：教皇越来越习惯于在全欧洲“提供”教区牧师领取圣俸，此时他们通过了保护国王的“王权”的法令——委任有俸圣职法和蔑视王权法，关于这两项法令的不公开的意图不得确知，以至于16世纪时能够以一种新的势不可挡的方式来利用它们。但是在整个15世纪及以后，英格兰王室和罗马保持了最友好的关系，英格兰是最拥护教皇至上论的国家。亨利八世努力反对路德，教皇授予他那个著名的头衔，这两件事只不过是根深蒂固的合作传统的继续，当时体现在托马斯·沃尔西的地位上：亨利的大法官，

教皇的特别代表。如果说有人因这种平淡的和睦关系而吃苦头的话，那就是英格兰教会——受到两主子的勒索和折磨。

当然，在这和睦关系中偶尔也会出现麻烦，尤其是涉及教会的豁免权时，因为教会豁免权是与王室积极巩固统治权的政策相抵触的。教会享有的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庭审判和庇护犯人的特权危及秩序的恢复，按第一种特权任何罪犯只要坚称自己哪怕只有次级神品头条罪状便可得到赦免，按第二种特权教会可给一般逃犯以避难权。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和亨利八世统治初期都通过了限制这些特权的恶劣影响的立法，151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引发了一场暴露了潜在麻烦的冲突，因为该法律剥夺了拥有次级神品的神职人员的神职。1515年，基德明斯特修道院长罗伯特·温奇库姆，发表了一篇讲道反对该法，结果遭到亨利·斯坦迪什的反击，亨利当时是一托钵修会修士，后来任圣阿瑟夫主教。主教会议试图起诉斯坦迪什，他则寻求国王的保护，在后来的辩论中亨利有机会预示英格兰国王在人世间从来没有过上司。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怀疑，也不惊诧：他从未想到过英格兰以外的任何权力可能阻挠他。

当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错了时，[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就开始启动了，如此说并不过分。贵族们可能对神职人员的财富感到愤慨，人民可能看不起神职人员，对什一税仇恨，对传唤人恐惧，因为他传唤他们到会使总的法庭卷入深不可测的令人烦恼的官司，但只要国王站在教皇一边，教会便是安全的——既不会搞一般的改革也不会进行宗教改革。亨利想要离弃阿拉贡的凯瑟琳的重要性在于：国王因此从教皇的保护者成为教皇的头号敌人。这样，它就把英格兰人反教皇和教会的感情释放出来，而这种感情到当时为止尚不能突破这位“外国统治者”躲藏在其后的防御工事。没有这次离婚[英格兰]便没有宗教改革，但这并不等同于说除离婚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引发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洪水来势之凶猛、泛滥之迅速说明引发宗教改革的真实的自发的情绪有多么大。再者，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一旦英格兰和罗马决裂，由纯政治因素引发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很快便获得了一种真正宗教的，甚至是真正灵性的伴随力量。

关于[英格兰]教会本身的态度有必要交代一句。教会的崩溃，虽然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突然，那样无可争辩，但仍然颇为迅速。1529年以前在英格兰（除少数异端分子外）没有神职人员怀疑教皇认为自

已是基督之下教会的最高元首的主张，甚至当1534年以后坚持这一主张必然冒生命危险时仍旧如此。英格兰教会在宗教改革以前和以后可能都是天主教的，但肯定是在宗教改革后才成为安立甘宗的。开初教会没有理由保卫自己，因为它受到的攻击并未大到足以使它记住国王有自己的权利，教会应在一定程度上效忠国王。在教皇开始受到攻击以前这场战斗就已经输掉。此外，沃尔西并非故意地准备好了教会的末日。他通过作为教皇使节的独断专行的行政管理，首次在两个领域间建立了某种持久的统一；他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变主教为他的伟大权力的纯粹代理人，这样便削弱了教会的独立生存能力；他把除自己外的所有神职人员从国王的决策班子中赶走，从而降低了教会的影响^[2]；由于他本人极不得人心，他因此让教会确信教皇的权力中有内在的危险；最后，在他倒台时他为敌人提供了一种制伏教会的战术武器。在沃尔西的邪恶的影响被适当研究后，[人们发现]真正令人吃惊的并非是教会屈服于亨利八世，而是在这位枢机主教15年的强有力的、自私且颇具灾难性的统治之后，教会居然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其实际上的抵抗。

1527年某个时候亨利八世得出了下述结论：娶其寡嫂为妻是违反上帝的律法的。他认为上帝的愤怒明显地表现在其子女的命运上。由于死胎、流产、婴儿夭折，他现在只有一个合法的子嗣，当年11岁的玛丽。对于亨利是否真正关心王位继承问题，或只不过把它用来掩盖他对安妮·博林的不成体统的爱及其对衰老中的凯瑟琳的可耻的反感，从来就无定论。王位继承悬而未决和没有把握无疑使他烦恼。他和他的国家都还没有忘记上一个世纪的麻烦；如果要保障王朝和王朝的和平，国王似乎有必要增加自己的后嗣的数量。同时，他无疑爱恋着安妮。但是他的头脑并不这样理性地分析问题，因为这位国王尽管意志坚强，头脑敏锐，有学者的兴趣，却缺少明智。他也有一个自负者具有的最高天赋——对自己一贯正确深信无疑。在此事上并不存在虚伪：他的良心总是而且颇诚心诚意地把理性所要求的东西和愿望混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正确的保证。他想要换妻，或确保王位的继承，最好是找一个高尚的幌子来掩盖这些愿望，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和凯瑟琳一道生活是罪过，最好彻底解决此事。因此，所有这些策略和个性的问题现在都成了教会法问题。

解除不合适的王朝婚姻的步骤是十分清楚明白的：教皇可根据教会法提供的众多理由中的一项宣布其无效，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教皇很愿意迫使国王们支持亨利八世，因为他已证明自己是忠于圣座的。但在此事件中出现了两个障碍。其一产生于该婚姻的情况：凯瑟琳和亨利的兄长早先的婚约当然是实现了的，后经教皇特别恩准解除。因此，克雷芒七世被要求否认自己摒弃圣典律法的权力。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亨利就此问题首先开始协商后不久，罗马便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军队所洗劫，教皇也成了阶下囚，陷入那个要迫使他拒绝亨利的请求的人的控制。查理五世是凯瑟琳的外甥，他的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对王朝威望的看法都促使他无可改变地反对解除其姨妈的婚姻。^[3]西班牙的影响和克雷芒的胆怯是沃尔西不能忍受的。反复派遣使节和两年的协商取得的结果仅只是授权沃尔西和坎佩基奥枢机主教在英格兰审理此案件，但教皇暗中授权与坎佩基奥让审理无结果。然而，这令人讨厌的诉讼除了显示凯瑟琳天生的尊严和善良外毫无进展。由于巧妙的拖延，诉讼一再耽搁，克雷芒将屈服于西班牙的压力，沃尔西被取消授权并撤回案件交罗马审理的危险不断增大，他被迫得走投无路。这位枢机主教深知自己的国王，以至他预言如此的诉讼将导致他的倒台，随着他的倒台教会在英格兰也将丧失独立。1529年6月，沃尔西的世界在他周围崩溃了。在查理五世的逼迫下，克雷芒撤回该离婚案；坎佩基奥宣布教皇使节法庭休庭至10月，或者不如说休庭至末日；而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康布雷和约，沃尔西再次扭转意大利局势的最后希望也化为泡影。

和罗马和平合作解决离婚问题的尝试便这样收场了。其暴露于前台的主角——教皇使节很快便被处决：到10月时沃尔西充分体验到了诸侯们准备抛弃他这个失败的大臣。众叛亲离，大法官职位被革，被指控犯有蔑视王权罪，受到终身监禁的威胁，这位枢机主教请求亨利宽恕。这至少使他免受私人仇敌的报复，并保留住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但其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统治英格兰和操纵欧洲达15年之久，现在无法相信这一切。他虽然去到北方致力于教会的职责，但从未到达约克，并保持对伦敦发生的事件的关注。不出一年，他的敌人们便掌握了他幕后暗中破坏的证据。他因此被捕押往议会受审，但这位老人于1530年11月在下途途中死于莱斯特修道院。他的倒台和死亡标志着事物的一种秩序的终结。同时也生动地描述了在他掌权的年代实质上并无成果，目的没有达到。

劝说和要求都不能获得罗马的合作，亨利现在急忙另寻良策。托马斯·莫尔爵士接任大法官职，但他接任此职是被迫的，并以答应不必卷入离婚案为交换条件。他即使这样不与那些年代唯一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联系，仍将使自己处于靠不住的地位，后来只有殉难才把他解脱出来。其他大臣们也没有激发起什么信心。其中以自1528年任秘书长的斯蒂芬·加德纳最能干，他真心实意地忠于都铎王朝，也同样真心实意地忠于一个从政的神职人员的抱负，但在以后整整25年的生涯中他从未做到将二者调和在一起。亨利花了几乎3年的时间实际想出了他后来实行的策略。他的目的仍旧固定不变：另娶妻子和王位安全、合法继承；他也不能摆脱必须得到教皇批准才能实现这两点的信念。但既然教皇不自觉自愿地满足他的要求，现在就有必要采取威胁、恳求、表示敌意等手段来强迫他顺从。他自然想到了召开国会。亨利八世就像西方各王国所有国王一样，当他认为召开国会可能对自己有用时就召开，对亨利的据说的政治天才通常给予的带敬畏的钦佩是不对的。假如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都不召开国会，那才令人吃惊。但这并不是说亨利在利用国会方面没有表现出相当高的技巧。他要求国会爽快合作，因此不可能要求国会给予特别津贴，而且关于1523年的记忆劝告他要小心，那年沃尔西在金钱上的要求导致会议陷入大混乱，令人不满意。不过，国会勾销了国王的欠债，从而缓解了他的困难（这是沃尔西的另一份遗产），但却助长英格兰教会产生了一种更为顺从的心态。众议院至少不仅记起了理查德·胡恩，而且还回忆起教会使平信徒感到烦恼的许多榨取钱财的劣迹。国王给了他们自由发泄不满的机会，神职人员们不久便感到极为惊恐——一位法国使节已为他们预言过。几个律师委员会起草了限制遗产布施和遗嘱验证费的议案，还起草了抨击诸如不居住在任职处、兼有俸圣职、神职人员从事世俗职业以谋取利益的议案。整个教会法庭制度都受到了抨击，尽管当时只引起了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的激烈抗议。

然而，民众愤恨的自动爆发并未给予国王直接的帮助：离婚仍无进展。现在离婚取决于克雷芒七世是否准许在英格兰解决这一问题，或坚持在罗马审理这一案件（亨利坚决拒绝考虑）；几乎又是3年时间在毫无结果的会谈和相互指责中度过。亨利隐晦地谈到利用国会解决问题，但当他的法律顾问们宣称这类灵性的问题在国会的权限以外（1530年12月）时，亨利放弃了这唯一有希望的攻击路线。剩下的办法只有恐吓，而恐吓的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尝试利用法国

从中斡旋，以及1530年进行典型的和典型地无用的活动：通过一些优秀大学的意见——亨利的理由是正当的——来说服教皇。最后一条办法是剑桥大学一位默默无闻的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默提出的，作为报偿他因此得到了副主教的职务。

1531年元月，在一场自1529年12月以来持续进行的宣传运动之后国会和神职人员代表与主教会议再次召开，此时采取了一个效果更为重大的步骤：全体神职人员在教牧人员代表与主教会议上向蔑视王权罪的起诉——因为他们行使其宗教司法权时无视国王的权利！——屈服，并花费118000英镑购买了一张赦免状。同时，他们承认亨利为“他们唯一的最高主人，而且只要基督的律法允许，甚至是最高首脑”。在这次屈服中埋藏着革命的胚芽，但当时亨利并未表现出对此事的含义心领神会的迹象。按他本人对此的解释，这一称号给他的仅仅是首脑的世俗权利，并未给他宗教权利。费希尔和大主教沃哈姆插入的保留条件清楚地说明英格兰国王并未取代教皇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首脑，这是因为基督的律法无论如何定义，都是否定此事的。尽管亨利可能大声威胁，尽管神职人员和凯瑟琳的支持者们可能惧怕，但罗马是不会向这种打空拳屈服的，而亨利甚至对自己的神职人员的控制尚未达到弗兰西斯一世——比如说按1516年的宗教协定——享有的控制程度。1531年末，亨利显然无计可施，以至谣言四起，说 he 已决定放弃离婚的要求。

然而，在此关键时刻，他找到了能解决他的困难的人：托马斯·克伦威尔。此人不久前还是沃尔西的仆人，于1529年进入国会，此后在国王的顾问班子中扶摇直上。他出身卑微，才智甚高，游历颇广，博览群书；他曾经商，做过初级律师，当过沃尔西的总代理，从各方面看他对国内外政治都有透彻的了解；他生性对宗教持怀疑态度，非同寻常地不受先入之见的影响，因此他能够作出最激进的决定并出色地加以执行；此外，由于他明白传统的价值并忠诚于国会和普通法，所以他总是有坚实的基础依靠。他只是提出使多年来漂浮不定的所有模模糊糊的威胁和要求成为现实的方法而已。亨利一旦被说服律师们（还有他自己）错了——离婚无须教皇批准，国会可能在此问题上采取行动，办法就明摆在面前了。克伦威尔的意图是建立一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王国，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他采用存在于其统治者不承认世间有权力凌驾于其上的任何政体中的平民的帝权（*imperium*）概念，

称该主权民族国家为英格兰帝国。他对这个帝国的结构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认为在英格兰这个“帝国”可以表现在体现于法令之中的国王在议会中至高无上的立法活动。他解除了过去对法令的限制，这种限制希望参照一定的外部规律——自然规律、基督教世界的规律——来检验法令（托马斯·莫尔的检验），因此他认为法令是有全权的，必须服从。

这项工作国会举行了4次会议才完成。1532年，克伦威尔利用1529年众议院议员们的一些不满迫使神职人员把对教会法规的权力交给国王（神职人员让权法），并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剥夺教皇从英格兰获取首年圣俸或第一批果实的权利的法案，不过亨利不愿意走极端，以至在该法案中加入了一项随国王之便推迟法案生效的条款。这样，随着逐渐削弱罗马教廷对英格兰教会的立法权和财政权对教廷的真正攻击终于开始了。1533年通过的一项重要法案，禁止向罗马上诉法，摧毁了教皇干预英格兰事务的最重要的武器，因为该法案禁止王国境内的法庭向境外法庭上诉。该法案的著名导言通过对英格兰帝国的描述概括了克伦威尔的国家理论。1534年召开的两次会议把教廷在[英格兰]教会里的其他权力全部转移给国王，其中有特许状授予权、主教任命权、自由征税权。1534年的至尊法案只不过宣布了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而且必须如此看待他而已。同年通过的一项叛逆罪法附加了对[至尊法案]的要求的惩罚条款。在此期间，已不再真正成为问题的离婚已自行解决。克伦威尔的政策一旦得到国王的注意，娶安妮·博林的阻力便迅速被克服。到1533年元月时，她已怀孕并举行了秘密婚礼。同月，托马斯·克兰默被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此次提升使他感到眼花缭乱；准备殉教并拒不让步的沃哈姆已于1532年去世，而谋取该教职的加德纳已在就神职人员让权法进行的谈判期间失宠。5月，克兰默使用禁止向罗马上诉法赋予的权力宣布亨利的第一次婚姻无效，6月亨利公开与安妮结婚并立她为王后。罗马的反应不出所料——宣布这些行动无效并要求亨利回到凯瑟琳身边，国王于10月要求召开一次大会，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禁止向罗马上诉法已向罗马宣了战，而在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言及谈判并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团结并未遭到破坏，但分裂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国王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他的至尊地位来自上帝：由于他的国王身份，他在其世俗领土所及范围之内也是上帝在人世间的牧师。这

一观念可以说起源于君士坦丁。他的至尊地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来自国会，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虽然有人如是说）。没有人认为这样的职务可能取决于国会的法令：所有法规都认为这至尊地位之事实是理所当然的。而此时此刻至尊权力也不在国会里或通过国会行使：正如教皇的至尊地位——国王至尊地位起源于此——一样，国王之至尊地位是个人的、君主的甚至是专制君主的。这一点在1536年最明白地表现出来，是年亨利按授权把他掌握的教会事务的全部权力——国王的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转移给了托马斯·克伦威尔，任命他担任教会事务副督察；这次权力转移仅凭最高首脑自己的权威。不过，国会在这场革命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实际的原因，还因为可用于宗教事务的法规不能确保一场革命，至尊权力必须通过王国的普通法庭来行使。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现行的法典中增添刑法的立法，确定新的叛国罪，而这种增添只有法规——只有国会有资格作出。这一基本的必要性加上克伦威尔对法规的确切与清晰的热心足以说明国会里惊人的革命气氛。当到适当的时候英格兰教会需要对教义加以说明时，真正的信仰便由至高无上的首脑以类似的方式规定，只不过有时由国会予以实施罢了。

然而，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首次行使却与宗教真理之确立无关。有时候解散修道院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中被赋予了首要地位，虽然此事不如国王至尊地位之确立重要，但仍然是一次惹人瞩目的事件。在一种意义上，对修道院的攻击宣布了和教会之过去的绝对必要的决裂，和摆脱罗马的束缚同样必要，而且有可能克伦威尔认为修道院是危险地亲教皇的，尽管事实上它们对英格兰的忠诚并不比在俗神职人员逊色。但是，这次攻击大体上必须认为是对教会财富的憎恨的一种结果：国王需要钱，贵族需要土地。现在，对于克伦威尔的代理人1535年末对所有修道院进行大视察期间收集到的对[修道院]腐败的指控，已没有人认真对待了；同时大家都密切注意《教会财产评估》（*Valor Ecclesiasticus*），这是数月以前以一次财务普查为依据编纂的一份资料，以惊天动地的准确性记录了教会的全部财富。该资料不仅提供了评估第一批果实（全体新上任的有俸神职的人员一年的收入）和什一税（每年对全体神职人员的收入课税十分之一）的依据，而且成为解散修道院的必要的促进因素。1535年宣布解散年收入在200镑以下的修道院；1536—1539年，规模较大的修道院要么自愿解散，

要么被迫解散；1540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全部修道院财产划归国王所有，从而圆满完成了整个没收计划。

所有一般修会和托钵修会就这样在4年期间从英格兰消失了。修道院的解散是有序而高效地进行的，对被逐出修道院的修士们考虑之周到令人吃惊，条件是他们不抵制。规定并付给他们足够的年金——付给修道院长们的年金可以说是丰厚的；肉体上的折磨极少。国王增加了大大超过10万英镑的年收入，这笔收入大致使普通岁入翻了一番。然而，从一开始部分土地便被转移。免费赠送的土地不多，获得此项利益的是主要的大臣和侍臣；其他人则付出相当多的钱才能得到土地，否则只得满足于租赁。1542年以后，管理效率的下降和耗费巨大的战争的再爆发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让渡，以至到爱德华六世统治末期国王保留的新获得的土地已为数极少。金钱大量流入王室的金库，但这些金钱被挥霍掉了。如果说解散修道院是为了确保国王的财政独立，那么并未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拥有土地的新老贵族、根基深厚的郡县家族以及后辈青年、新兴自由民和商人，都在购买土地，这一现象把保存修道院房产的兴趣扩大到这个国家政治影响所及的整个地区。

这些广泛的剧变并非没有遇到抵抗，尽管抵抗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规模小而且没有实际的目标。从一开始，社会各阶层的许许多多人都持观望态度，对广泛认为会导致灾难的种种事情感到惊讶，但后来的成功取得了回报：消除了这样的担忧。较为严重的是支持教皇地位至高无上者的反对。当时，一位贫穷的精神不正常的女仆伊丽莎白·巴顿狂热地布道反对[国王]离婚，并在幕后人支持下公开为教皇说话，她因此获得了肯特修女的称号，1534年她和支持她的神职人员一道被处决。同年早些时候，第一继承法要求对新事态宣誓认可，但遭到少数正式被要求宣誓的人拒绝；可是托马斯·莫尔、约翰·费希尔以及伦敦加尔都西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其中。这些人中有的为旧信仰而殉道：经过大成问题的审判后被处决，就修士们而论，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惨遭折磨，但只有这些人自己的良心而拒不顺从。（当然，也有人为了良心而支持亨利。）莫尔的案件最为费力。莫尔受的教育是忠诚于王室，作为政治家，他经过长期的自我斗争之后才决定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但他在受监禁期间私下拯救个人的良心极其小心翼翼，以至只有亨利急切的报复心和审判时作伪证才导致了他被处决。

当第二年安妮王后增加到被处决者的名单上时（她被处决是因通奸，但真正的原因是失宠于亨利），亨利残忍嗜杀的恶魔的名声便确立起来了。人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亨利国王有才智有政治技巧，另一方面又实在无法否认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这一评判。

不管欧洲如何恐怖，但直到修道院的解散使事态在王国最不安定的地区——北方达到了紧要关头之前，英格兰是很平静地对待这场革命的。在北方，不满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自从亨利表现出与罗马决裂的迹象以来，不满日渐增强。北方人对来自中央的控制感到愤恨，不喜欢从爱德华四世以来便奉行的摧毁边境地区自古就有的但具破坏性的各种各样的忠诚的政策，对养羊业的扩大和圈地感到愤怒，对1535年通过的用益权法（*the Statute of Uses*）及其对贵族非法的但根深蒂固的遗赠土地之做法的打击感到恼怒，所有这些情绪再加上对宗教变革的满腔怒火终于引发了一场起义运动，起义者的组成和起义的动机同样地混杂。骚乱首先在林肯郡爆发（1536年10月），迅速蔓延到约克郡。在约克郡起义运动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罗伯特·阿斯克，此人是约克的律师，他用基督的5处伤口的图案作旗帜从而大得人心，他认为起义是一次朝圣，称作求恩巡礼。反叛者的要求以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为核心：他们要求惩办异端主教和政客，要求恢复修道院。但是除此而外，他们还表现出北方特有的独立自主精神以及贵族和平民的自私性。起义一度看起来很危险，特别因为政府无力镇压起义；但亨利和克伦威尔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决不犹豫。谈判和起义者内部分歧把起义限制在特伦特河以北，王国的其余部分仍旧绝对忠诚于国王；国王的陆军中尉诺福克公爵召集了一支所谓的军队；在国王允诺赦免后，阿斯克于1536年12月解散了他的追随者。在以后的数月中发生的骚乱较小，亨利因此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却进行了可怕的报复，阿斯克被处绞刑。起义运动作为中世纪英格兰的最后一次表现和老百姓对宗教改革的抵制吸引了众多的同情；但事实上——假如我们把阿斯克和几个真诚的人排除在外，这次起义证明的只不过是这些闻名的动荡不安的地区的落后和任性。起义的主要结果是诱使克伦威尔改组北方的议会，[改组后的]议会积极执行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摧毁特伦特河线，这条线自罗马征服以来一直把英格兰一分为二。真正打动一位不带偏见的观察者的并非是北方针对都铎王朝的统治和与罗马决裂的反叛，而是地域更广大更得人心的南方对二者都感到满意。

镇压求恩巡礼和继续消灭剩下的修道院结束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第一阶段：以政治国家的重新组构和民族国家的胜利为特征的政治阶段。1535年至1539年间逐渐解决了由这次革命性的变革造成的问题：国王的至尊地位的性质和英格兰教会的信仰。这些内部的政治和教义争执，由于欧洲舞台上的变化和英格兰外交政策的需要而进一步复杂化，至于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引起的麻烦，那就更不用说了。假如说克伦威尔在关键的第一阶段起主要作用，那么说克兰默在第二阶段处于事件的中心并不为过。克兰默是一位慢性子的诚实学者，一旦有了信念便坚定不移，在这些年间经历了内心的变化。这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现的形象和教会事务副督察大不一样，后者冷酷无情、有政治家才干、直截了当地世俗化。克伦威尔无疑个性较强，目的更明确，但克兰默性情温和，较有宽容精神，这些品质更具吸引力。他们是好朋友。

亨利八世似乎原先以为可以不改变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崇拜便和罗马决裂。他，如果说不是别人，显然坚持自认为没有发生革命，只不过是恢复真正的古代的组织。可是在别处带政治性的宗教改革正在开始激起宗教骚乱。有些神学家已经接受了路德和廷德尔的教义，这批人数量不多但直言不讳，他们认为时机到了，而克兰默——他继续进行在剑桥时就已经使他脱离了正统的研究——感到倾向于支持他们。克伦威尔也有此倾向：他急于找到消除法国—西班牙同盟的潜在危险的盟友，他在德国路德派诸侯中寻找，他们至少在遏制教皇和使皇帝忙于应付方面[和英格兰]有类似的利害关系。征兆是清楚的但绝不是光明的：脱离现有的惯例和信仰，尤其是改革派特别厌恶的以炼狱教义为基础的惯例和信仰，将小心翼翼地进行了。1536年由教会事务副督察对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下达的禁令而开始实施的《十信条》体现了这一妥协：他们“丢失了”除路德宗也承认的三种圣礼（洗礼、圣餐和补赎）外的所有圣礼，并且审慎地隐约表现出对向圣徒祈祷和为死者祈祷的反感日益增强。这一禁令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禁令要求每一教区拥有一册本族语《圣经》并陈列出来。1539年一种官方译本（以廷德尔和迈尔斯·科弗达尔的翻译为基础的“马太《圣经》”）出版使各教堂有可能服从这一命令。英格兰新教的这种具有特色的工具就这样在这场战斗的早期便出现了。

然而，1536年也是阿拉贡的凯瑟琳去世和安妮·博林被处决的一年，是法国和西班牙重开局部战争的一年。亨利因此认为不再需要这些朝路德宗方向的[改革]动作了；每当外来压力不复存在，他便无例外地对克伦威尔在北欧建立反教皇集团的尝试加以阻止。所以，在1537年当国王（又娶简·西摩为妻）得到一个儿子却失去一个妻子时^[4]，他批准出版了一本识字祈祷书《基督徒的基本原则》，该书甚至从《十信条》取得的审慎的进步后退了。但在1538年夏季，欧洲大陆的列强缔结了尼斯和约；有一段时间情况看似它们终于将转而对付英格兰了，将利用它们在那儿能找到的不满了。克伦威尔因此暂时得到了放手大干的权力。他现在忙着加强这个国家被忽视了的防务；约克王室的波尔家族和科特尼家族的残余代表旧信仰和教皇，把家族的野心和叛逆活动结合起来，为了满足他对安全的希望和消除亨利的[都铎]王朝的恐惧，他消灭了这批人；他在1538年9月发布的禁令中以新的气势推行其改革政策，该禁令抨击了“迷信习惯”、圣物匣和朝圣。他还重新作出努力建立一个路德宗同盟。但是，他已开始在国内引起猜疑；他筹划防范的危险看来永远不会发生。雷弗维尔·波尔枢机主教1539年初出使英格兰清楚说明各大国只愿谩骂亨利，不愿进一步采取行动，而在国内改革派的号角和对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圣物匣这样的古老的崇拜中心的攻击正在引发骚乱。即使在北方许多人抵制了对他们熟悉的修道院的攻击，英格兰人民已经以显著的平和心情接受了亨利之取任教皇。只是当习惯于形式上的虔诚和赎罪手段——这时对很多人来说基督教的全部意义就是这些——的缺少宗教热情的一代听说他们的神职人员中有一部分人把这些安慰说成是可疑的、否认向圣徒祈祷和为死者做弥撒的效力并指责向圣像和圣物匣祈求产生奇迹是迷信时，真正的不安定出现了。宗教方面的改革肯定是出现在16世纪30年代，是政治剧变的直接后果，这些剧变清除了年代久远的对意见分歧的障碍；接着它便立即开始培育那种宗教热情，那种神学狂热（*furor theologicus*），这种热情是以后150年的特征，既和被推翻的制度的形式主义有别，又和克伦威尔的世俗头脑之冷静的清晰不同。

到1539年时，这个国家在日渐增强的抱怨声中活跃起来，在这些抱怨声中可以察觉出动乱的迹象：这个国家被新宗教的狂妄的傲慢和旧宗教的粗野的固执分裂为二。然而，从上面来的一句话将解决一切问题，平息争论。因此，下令于1539年4月召开国会与神职人员代表和

主教会议，两会召开的时间是非同寻常的——接近夏季和疾病多发季节，这说明问题之紧迫性。在教会的会议和贵族院中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产生了一份教义解释，即著名的《六信条》，它裁定天主教为正统信仰。《六信条》标志着以加德纳为首的保守派主教们对克兰默和克伦威尔的胜利；当国王看到《六信条》得到大多数人意见的支持时，便接受了它们。然而，《六信条》尽管一直标志着官方的正统标准，但实际上被暂时搁置：在亨利在世的日子未对新教徒进行大规模迫害，虽然有少数人将吃苦头。

然而，《六信条》法结束了克伦威尔逐步走向新教的政策。这位大臣仍大权在握时成功地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但他很烦恼以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迫使亨利接受了一次令他讨厌的婚姻。计划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建立同盟关系于1539年5月被放弃了；作为替代，克伦威尔为其主子找到了一位新妻子安妮，这位安妮是克莱沃公爵之女，公爵的领地控制着神圣罗马帝国从意大利通往勃艮第之通道。从第一次见面起亨利就讨厌克莱沃的安妮。这次婚姻并非是克伦威尔失势的起因，但国王却因此产生了听他这位大臣的敌人的意见的倾向。1540年初约有5个月之久秘密进行着这场激烈的战斗。个人仇恨加上国际关系的考虑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表面上，而且在一定程度的实际上，斗争是在宗教上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进行的。亨利继续信任，或者说继续支持克伦威尔直到最后，但终于听信了似是而非的谎言：他的宗教事务副督察是异端分子，6月10日亨利下令逮捕了克伦威尔，未经审判便被褫夺公权后于7月23日被处决。同时，克兰默和国会顺从地解除了国王和克莱沃的安妮的婚约。

克伦威尔的垮台对英格兰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尽管亨利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有政治家的品质，但现在留下来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以克伦威尔那样的熟练、敏锐和勤奋来指导国家事务。对新教的事业来说，此事则证明远不那么具有灾难性。克兰默仍旧得到国王的信任：这是截然不同却又被相互钦佩和甚至挚爱维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一种奇怪的关系。再者，尽管国王势力强大，但他不可能单枪匹马地阻挡几乎由他一人释放出来的潮流；他关于分裂所发的吹毛求疵的牢骚以及就宗教问题发生的争吵于他毫无助益。在教会的前头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因为直到亨利去世之时，事务仍在一位仅只在机会主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掌管之下。如果说此人的品质制止了国王给予这场风暴

以方向，那么这些品质也救了他，使他在下一任国王统治时没有采取鲁莽和脱离实际的措施。事实上，他在各方之间维持了一种摇摆不定的平衡有6年之久。

克伦威尔垮台以后，当保守派为国王找的王后因不贞于1542年被处决时，他们的迅速崛起便宣告结束。一年以后，和西班牙的结盟与改革派狂热分子的过激行为使天平略向另一方向倾斜。立法规定英语《圣经》保留给富人使用；新出版一本识字祈祷书《基督教基本教义与知识基础》除去了1537年出版的祈祷书中的全部路德派痕迹；天主教主教们数次试图像除掉克伦威尔一样除掉克兰默。可是，不久以后事态的发展推进了新教的事业。在宫廷中，由爱德华王子的舅舅哈特福德伯爵和莱尔子爵约翰·达德利为首的年青一代正转向新思想，而亨利在把自己的继承人交托给像约翰·切克爵士这样优秀的新教徒教育时，他便认识到未来是何样子了。1546年末，自从克伦威尔掌权以来天主教在俗界的中流砥柱霍华德家族终于走错了一步。此事不应责怪老诺福克公爵：他有两个侄女嫁给国王并且得罪了国王，他幸存下来，这证明了他的能耐。可是，他的儿子萨里伯爵亨利却不负责地、不成熟地表现出倾向于改革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大谈他有爱德华一世的血统。霍华德父子树敌甚多，因此亨利驾崩后，萨里伯爵于1547年元月27日被斩首，他的父亲被判处死刑关进伦敦塔（不过判决从未执行）。

无可否认，亨利统治的最后几年在宗教改革方向上并未有正式的进展。《六信条》继续保护着正统信仰，偶尔烧死几个新教徒使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克兰默忙于翻译连祷文，但他没有发表其成果。同时，亨利当然没有从他是教会最高首脑这一立场后退一步，而且以卖国罪处死了几个教皇至上主义者，以表示他在此问题上的决心。在这些年代，从表面看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亨利派教会：在教义上和罗马一样是天主教的，但作为基督徒的团体则是和罗马决裂了的。可是从一开始大陆上反教皇的新教的存在便使这种带有个人特异性的妥协处于危险之中。改革派迟早会壮大；“亨利派”迟早会认识到，假如他们放弃国王至上的立场，他们便只能保持天主教的信仰。正因为亨利看到了这点，所以他从不信任加德纳和其他正统派主教们，而且他在去世之时把国家交给一个信奉新教的孩子手中，辅佐这个孩子的人中新教徒占优势。作为最后一招，国王不可能毁掉自己和克伦威尔已经建

立起来的东西。亨利的改革的本质在于主权民族国家对在英格兰的教会的胜利；宗教方面的变革——信仰和教义的变革——只是在亨利去世以后才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然而，一旦王权落入懦弱无能的爱德华六世手中，这些变革无须多久便发生了。在他统治的6年间（1547—1553年）发生了一场宗教革命，其意义和30年代管辖权方面的革命同样重大。亨利八世刚一安葬，新教胜利的征兆便开始频频出现。先王努力避免一位大臣的权势压倒其他大臣而处于支配地位，他的这一努力立即付诸东流：哈特福德伯爵在威廉·佩吉特的帮助下使自己被封为护国公和萨默塞特公爵，开始以他的外甥的名义进行统治。无可否认，萨默塞特公爵担当这一角色的资格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是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和国王的舅舅，而且中改革派的意，改革派在议会中的势力使他占有优势。不幸的是就他的性格和能力而论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他虽然宽宏大量，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愿意消除穷人的疾苦，但他也证明自己傲慢、贪婪，在和他的对手打交道时不圆通。最严重的是他没有表现出那种使都铎王朝维持至今的敏锐的政治判断力——那种在正确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的嗅觉力。他从废除先王时期制定的使政府成功地压制了宗教上的不顺从的残酷法律开始改革。《六信条》仍有效，叛逆法也有效；准许在两种情况下举行圣餐礼；克兰默发表了一本《讲道集》（*Homilies*），对该书的攻击导致加德纳被送进弗利特监狱。政府已经表示打算走什么路了。

创建了英格兰新教教会的爱德华朝的宗教改革分两个明显的阶段进行。首先，在1549年发布《公祷书》，继而于同年通过准许神职人员结婚的法令，又于1550年颁布《授圣职礼书》，从而建立了温和的新教。《授圣职礼书》消除了英格兰神职的一切祭司职分的痕迹：神职人员只是按新教方式传道的牧师。就其对圣礼（书中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的态度而论，《公祷书》本身显然是新教的；书中包括一套简化了的以《诗篇》、读经和指定的短祷文为中心的仪式，颇像诸如雷弗维尔·波尔和方济各会修士、枢机主教基尼奥内斯这样的天主教改革派提出的仪式。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表明了问题的关键：爱德华朝的宗教争论的核心圣祭坛之圣礼——弥撒和圣餐礼之间的争吵，以及圣礼变体问题。克兰默的头脑策划出他的笔写出了几乎所有仪式书和礼拜书，而他本人迟至1546年还相信真在论，至少他在亨利

统治时期没有加以否认。但从1547年起他开始受到来自大陆的人的影响。由于压制性的立法的撤销，一些主要的[大陆上的]改革家被吸引到英格兰，他们完全是故意请来帮助大主教解决他的问题的：发现真正的宗教并强加之于英格兰教会。从德国、意大利、波兰来了一些最负盛名的新神学家，马丁·布塞尔在剑桥任教，彼得·马蒂尔·韦尔米格里在牛津任教，还有约翰·阿·拉斯科（John à Lasco）和弗朗西斯·德赖安德。对克兰默影响最强烈的是体现在苏黎世的教皇亨利·布林格尔身上的茨温利派的教义，在布林格尔看来英格兰新教将在未来大约30年间寻求帮助和意见。不过在圣餐礼问题上，克兰默拒绝完全接受茨温利的主张，他得出了一种具有英格兰特色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弥撒是献祭和瑞士教派的圣餐仅仅是纪念的主张的折中。

如此，[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足够的新教改革，但有所保留。萨默塞特公爵忠诚于自己的自由性格，他只通过一项宽容放任的法案来推行《公祷书》，不愿意再进一步，克兰默对完全割断和天主教的历史联系的理由也感到没有十足的把握。可是，到头来《公祷书》只使少数人高兴。大陆上来的人以不情愿的态度接受了《公祷书》，但一当加德纳（他因公开反对新教的布道从1548年7月被关进伦敦塔）发现《公祷书》可能具有天主教的解释，他们便决定加以反对。要克兰默进一步改革的压力在增强；特别是当1550年第一批清教徒（英格兰新教后来产生大量清教徒）崭露头角时更是如此。约翰·胡珀诚实、热情、不妥协，常常口出恶言、令人难以对付，他不仅对从政的神学家们，而且对像伦敦主教尼古拉·里德利这样的激进派都证明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克兰默和里德利都感到无意尊重胡珀对法衣和礼拜用品的吹毛求疵式的顾虑，而最感无意如此的是议会，但优秀的新教主教难以得到，因此他们需要他的服务。结果，胡珀作了大让步，接受了格洛斯特主教职位（后来又增加了伍斯特主教职位），但他在宗教上对极端主义的抵制有助于推动教会进一步改革。

不过，真正的压力来自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毕竟从不是宗教和神学家们独占的领域；政治和世俗的力量总是更为重要。1550年世俗力量正处于转变之中。在议会里，萨默塞特公爵的敌人比朋友多；这是由于他有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造成的。在危机四起的1549年，当两次同时发生的起义震撼了这个国家时，强大的贵族（议会代表他们）吓了一跳。在这两次起义中，康沃尔郡的起义似乎主要是

针对宗教革新而发的：康沃尔郡人抱怨《公祷书》和圣经是外国的，用的是像拉丁语这样不寻常但较不熟悉的语言。更为严重的是诺福克农民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因其领袖是凯特而称为凯特起义，一度在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建立了一个几乎是独立的政治组织。在这儿起义的主要缘由是农民的不满，特别是对圈占公地和不合情理的地租不满，而在宗教方面凯特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同情新教。对萨默塞特公爵的敌人而言，这些分歧显得无关紧要；动乱说明的问题是他未能履行都铎王朝政府的首要职责。他在宗教方面的革新激发康沃尔的起义；他的社会政策——调查非法圈地和试图强行实施针对贵族本身的法律（1548年）——鼓励了凯特及其同伙。这些指控有一部分是公平的，但并不重要。议会的愤怒，还由于这位护国公的个人野心和在法国进行的战争之失败而越发高涨，终于迸发出来；在约翰·达德利（此人现在已是沃里克伯爵，不久将受封为诺森伯兰公爵）的带领下，他们向萨默塞特公爵发动了攻击，逮捕了他，最后在1551年以伪造的叛逆罪处以死刑。人民对“好公爵”之死感到悲伤，这既说明他在权势堪与相匹的对手们中不得人心，也说明民众的这类感情根本不起作用。

诺森伯兰公爵的胜利开初有意作成像是天主教的反攻倒算，但不久便成为进行一场更积极的宗教改革的前奏。诺森伯兰公爵行政管理能力强，精力充沛，他本可成为一位典型的都铎王朝君主的优秀仆人的，但他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的无可争辩的指控：他太肆无忌惮和谋求私利，以至他做的事对这个王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有其他人，代表了那些靠国王的慷慨和没收的土地而发迹的人，因此他只能支持最严厉的反教权主义的政策。解散修道院遗留下的尚未满足的贪欲，萨默塞特公爵于1547年满足了，是年他实现了亨利的意图解散了小教堂并没收了其基金。设立这些小笔基金的主要用意是支持牧师为创立者的灵魂唱弥撒，对否认炼狱和代祷的改革派而言，无疑令他们讨厌；基金也是地产。有一种看法认为解散修道院毁掉了欣欣向荣的语法学校体系，但最近证明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16世纪对教育的贡献比以前的世纪都大，事实上国有化了的土地中有一部分用于办教育。^[5]不过，绝大部分还是用来扶持拥有土地的贵族了。现在剩下来可供掠夺的只有在俗神职人员的，特别是主教们的土地了，没收这些土地的最佳办法是把现任高级神职人员免职和向继任者强索捐赠。谋取私利就这样规定了诺森伯兰公爵的一种新教政策，假如他像

克兰默和萨默塞特公爵一样在这一问题上有更多的真诚感情的话，那么这些感情从来就没有被观察到。

因此，无论英格兰的还是外来的改革派事实上都发现新上任的公爵比老公爵更合他们的意，尽管有一段时期他们为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担惊受怕。克兰默不久便发表了经修订的《公祷书》（1552年），该书抛弃了原书中残留的天主教教义，从而完全站到了新教一边，虽然他继续相信基督的灵临在于圣餐之中，这一信仰把该圣礼提升得比茨温利派的绝对简单的圣餐礼高。这本《公祷书》还去除了遭到拉斯科和其他人反对的罗马天主教的所有痕迹；至于教义和礼仪，英格兰教会现在以大陆上的归正宗教会为榜样。严厉的划一法不仅使其他所有崇拜形式可能遭到重罚，而且强制人们参加国教的崇拜仪式。1553年，克兰默发布《四十二信条》，从而为改革的大厦加上了压顶石，《四十二信条》是一部信仰汇编，要求全体神职人员订购；该汇编从头到尾全部是新教的信仰，不过有些往后看的折中的痕迹，暴露了这位大主教从根本上对革新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现在至少就立法和法令的作用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论，英格兰已成为一个新教国家了。事实上，上层的变革产生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地方的确可看到热烈的新教。国王本人以一个少年人的超人的热情赞同新教，国王从童年就受到新教信仰的灌输，自萨默塞特公爵垮台后他在事务方面能起一些作用；高级神职人员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包括越来越多的有利于新思维方式的人（不过当时最杰出的布道家修·拉蒂默和托马斯·利弗由于致力于批判现存权力而未被授予高级神职）；在一些人，至少是一些贵族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那里，对改革过的宗教的真诚信仰甚至比土地占有阶层的利益更为重要。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克兰默更明白，如他现在所见到的那种真理必须通过长期的宣传和强制实施在国民——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反复灌输，他制定的教会法典（《教会改革法》[*Reformatio Legum Ecclesiasticarum*]于1553年完成，但从未颁布）就是为这场战斗提供武器。最乐观地看，这个国家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关心；在许多神职人员和地方行政官员不喜欢革新的地方，仍继续使用旧的崇拜形式。有人说爱德华朝的宗教改革只触及皮肤。关于其影响程度，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下肯定的结论；但这一点是清楚的：像后来伊丽莎白朝的解决一样，改革是否能

持久有赖于一段时期的应用和强制实施，而由于政治上的不测事件的发生，改革的倡导者们没有必需的时间。

关于爱德华朝的宗教改革，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它结束了亨利八世型的，即个人的和实际上暴君型的国王在教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是至高无上的首脑的地位由于一个孩子占据了王位而削弱，真正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法规的措辞方面。在亨利八世利用国会来强制实施最高首脑亲自作出并说明其正确性的决定的地方，爱德华朝的国会，当由立法确定的崇拜形式成为国会一项立法的附件时，则参与了最高权力的行使。伊丽莎白在教会里最终继承的地位是其弟弟的而不是其父亲的，由于她的性别，这一地位就更加虚弱，由于她是女性，她不适合当握有全权的首脑；尽管她为阻止国会干预宗教事务进行了顽强斗争，但她未能否定其参与的权利，而且不得不退守第二道次要防线，为提出涉及教会的法规的权利而争吵。

随着1553年的临近，人们清楚地看到爱德华六世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除非做点手脚，继位者非其姐玛丽莫属，玛丽为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拥护罗马天主教的决心不可动摇。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样的王位继承意味着宗教政策的完全逆转：16世纪时各地政府都在这样的问题上发号施令，如果人们记得，英格兰人民认为不问其宗教观点如何便忠于世俗政权是上帝之律法所禁止的，那么英格兰发生的剧变就不难理解。诺森伯兰公爵已走得太远，在他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希望车轮会倒转。由他的恐惧产生出一个世纪最无耻最无望的阴谋，其中不乏许多漂亮的典型。诺森伯兰公爵决心维护其权力，试图破坏王位继承，排除玛丽，立简·格雷郡主为国王。简是萨福克家族提出的王位继承人，他安排自己的一个儿子娶简为妻。他以超凡的精力和冷酷的魄力在议会里占了上风，但爱德华于7月驾崩，他的阴谋遂成幻影。国民决心要一位正宗都铎家族的成员当国王，因此拥立玛丽为王；诺森伯兰公爵为反对玛丽而退入东英吉利亚，在伦敦的议会抛弃了他；最后玛丽郡主顺利继承了王位。诺森伯兰公爵被斩首，但玛丽一时发慈悲赦免了其他参与阴谋者的死罪，其中有那个年仅16岁的无辜的工具——简。

就这样开始了为期不长的天主教复辟，在这一时期英格兰最后一次构成了指靠罗马的教会的一部分。对玛丽、对其政策以及对关于她的记忆不幸的是，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构成哈布斯堡王室的领土综合

体的一部分。玛丽压倒一切的抱负是让王国回归正宗信仰，得到教皇赦免分裂之罪并根除异端。另一方面，查理五世在他这位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表妹登上王位时看到了把英格兰引入他的家族而通过多宗精心选择的幸运婚姻而建立起的势力圈的机会。自始至终，这两项政策就从未足够平行地加以执行。查理五世皇帝欢迎英格兰回到教皇的羊栏中，但他又希望阻止对新教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和真心实意恢复玛丽的纯朴信仰，因为他担心这些步骤将导致分裂，从而降低英格兰在他的欧洲政策中的价值。因为他打算让他的儿子勃艮第大公菲利普娶玛丽，所以他更加强烈地感到这点；实际上，在挫败了议会中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后于1554年初举行了婚礼。国民对这一婚姻的反对和敌意从未缓和过：菲利普得到的充其量是容忍，同时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都发现了一个古已有之的事实：性情和传统大不相同的民族间的交往更可能产生的是敌意，而不是友好。和西班牙的联姻使女王大为高兴，但这个国家却因此卷入他人的战争，结果导致加来的丢失，破坏了英格兰政府的团结并摧毁了其目的，而且并未能阻止对新教的迫害，而查理五世不管在原则上如何赞成迫害，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玛丽朝的全部成绩常常被描述为不结果实，这一结论只有最认真的支持者才会发现容易对之持异议。英格兰被归还给罗马。被挑选来实现玛丽的虔诚愿望的工具是波尔，此人是英格兰枢机主教，不幸的结果是他是那种诚实而才华横溢的神学家，而这种人往往是满不在乎的政治家。大约30年前，克伦威尔就曾提醒过他不可认为哲学家的教导可应用于这个世界的事务，但这一教导波尔从未领会（有人认为这是对他的赞扬）。他于1536年和他的同胞亨利八世决裂，此后有一段时期忙于发动欧洲君主们反对英格兰国王，但未有结果；后来他退隐过一种对他更为相宜的从事学术研究和虔信宗教的生活。然而现在他的时机到了。他被从退隐生活中请了出来，前往自己的故土，口袋里装着教皇的赦罪诏书，期望恢复这个王国古老的[对教皇的]顺从。他遇到的障碍有两个。其一是英格兰所有统治阶级的担心——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担心：回归罗马意味着势必交出自1533年以来从教会夺取的土地。其二是查理五世希望在他的儿子在那儿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前，引发不安的因素不应进入英格兰。因此，从1553年末至1554年11月，教皇的使节一直在尼德兰等待许可，以便横渡狭窄的海峡去执行和解的使命。

在此期间，玛丽努力要从国会获得对其反宗教改革的一定的支持。她认为反教皇的立法虽然本身就是无效的，但她不得不屈服于包括加德纳（现在任大法官和首席大臣）在内的一些人，他们宣布只有国会才有资格取消国会所作的决定。于1553年10月召开的玛丽朝的第一届国会废除了爱德华朝的[反教皇]立法，但拒绝重新向政府提供萨默塞特公爵丢弃了的镇压异端的世俗武器。第二届国会于1554年3月召开，这届国会除剥夺了托马斯·怀亚特爵士最近发动的叛乱之参与者的财产和公民权利外（其后果之一是被囚禁于伦敦塔的简·格雷郡主及其亲属被处死），不愿另有作为。同年11月，在菲利普已巩固了作为英格兰国王的地位并一再绝对保证不再提及没收教会的土地后终于让波尔枢机主教进入英格兰，同时召开第三届国会废除了亨利朝的立法并谦卑地请求教皇使节赐给教皇的宽恕。20年的成绩就这样废于一旦；分裂已弥合，剩下的工作仅仅是惩罚其尚活着的责任人并扑灭异端的残余。

事实上，在玛丽统治余下的时间里集中进行了大迫害，关于她，公众只记得这点。第三届国会重新颁布过去的惩治异端的各项法令，但甚至在此以前便出现了将采取行动的迹象。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还有林肯主教和受新教影响最深的教区诺里奇的主教，在惩治异端的各项法令重新生效以前便试图镇压异端，他们的行为使政治家们感到愤怒。加德纳也表示自己在亨利统治期间虽然离弃了教皇的事业，但这并不削弱他处理别人身上这种懦弱造成的后果的决心。玛丽和波尔确信有必要根除异端，这两个人必须承担大部分罪责；虽然就其个人而论他们温和慈悲，但他们也有宗教狂热者的致命禀赋：有在个人和事业之间作出区分的能力，对个人慈悲为怀，为事业大开杀戒。

议会发现对迫害表示认可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总的来说涉及的仅是下层人士。相当数量的新教领袖已逃往国外；在玛丽统治的整个时期，在法兰克福、日内瓦和斯特拉斯堡的英格兰社团虽然不无内部争吵，但保持了新教的传统并为回归祖国作准备。但有4名领袖受到迫害：胡珀、拉蒂默、里德利和克兰默以重犯异端罪为名被处以火刑。已知在史密斯菲尔德和别处的烈火中被焚死的牺牲者有273名，除以上4人外大多数是小人物——工匠、店主、劳工，而妇女所占比例大得惊人。被处死的人中有许多是宗教狂热者，而其中有些人可能持有新教

政府也会因之对他们加以迫害的见解——再洗礼派及诸如此类的见解。可是，而且不无理由，这种集中迫害和为警告民众而故意扩大火刑（无可否认因为约翰·福克斯的宣传性著作《伟绩与丰碑》[*Acts and Monuments*]大获成功而加剧，该书于1563年首次出版）使英格兰人民在以后数世纪都仇恨天主教，认为它是残酷的迫害人的宗教。16世纪时生命总是不值钱，在那个时代随时都有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滥杀。然而，已变得冷漠的一代人对于为宗教而烧死人的反应是惊恐。不管人们对这次迫害有何别的看法，它都是一次头等严重的政治错误。

玛丽朝回归罗马最坏的一个特点是满足于迫害而不努力，比如在灵性复兴方面，有所作为。没有引导人们走正道的宗教热情和渴望：波尔老朽，甚至于最后被怀疑为异端，而其他主教们早已失掉了正直。一切都是政治。在玛丽的统治结束前，波尔被一位疯狂的教皇以纯政治理由革除教籍，而玛丽则看到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精神之父不和。事实是在英格兰，无论迄至当时新教的传播多么微弱，只有新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这个国家也许依恋弥撒和旧的崇拜方式，但旧的方式的显著特点是缺少真实的信念和真正的信仰。诚然，信念和信仰将产生冲突和迫害，但玛丽朝的历史本身说明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宗教狂热者可以造成，而且不关心宗教的俗人也可以造成。如果英格兰要从由于谋私利和贪婪而滋长的腐败——自从1547年政府遏制腐败失败以来腐败蔓延越广——中得到拯救，那么她不仅需要回归良好的治理，而且需要注入一种积极的信仰。在16世纪50年代罗马是不能够提供这种信仰的；而日内瓦能，这也许是不幸的，对伊丽莎白来说肯定使她大感恼怒。

玛丽和波尔在1558年11月的同一天去世时，他们知道他们的政策失败了。他们驱逐了信不过的神职人员，看到异端分子被烧死。从表面看，就如同亨利八世怀疑自己的婚姻以前一样，英格兰是十足的天主教国家。可是事实上玛丽的统治摧毁了罗马再次统治英格兰教会的机会。战争，加来的丢失，西班牙的崛起，这些事件和对迫害的反抗结合起来使这个国家终于脱离了自己的过去。反教权主义，对罗马教廷的厌恶，还有对教会土地之渴望较之30年前有增无减；现在，对西班牙和教皇的影响的经验已进一步为接受新教做好了准备，而在爱德华朝[宗教改革]猛烈进展期间却鲜有这样的迹象。对天主教在英格兰

的未来最糟糕的是，作为妇女和女王玛丽没有生育她渴望的孩子。王位将由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继承，伊丽莎白是安妮·博林所生，在玛丽统治期间始终被认为是对天主教的反攻倒算和西班牙的支配地位的威胁。

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些担心是正确的。不管伊丽莎白个人信仰如何（这一点从未弄清），她发现自己事实上是新教提出的王位继承人。流亡国外的人蜂拥回国，在新天堂的旅居使他们精神振奋。1559年元月召开的国会有一个由优秀新教徒组成的热心的核心，他们把女王推向改革，其程度之深和速度之快都是女王原先所不愿意的，到1559年夏季时《至尊法案》和《划一法》再次切断了英格兰和罗马的联系，恢复了国王的至尊地位（在理论和基础上比亨利八世的地位弱，但在其女儿手中是同样令人畏惧），新教的《圣公会公祷书》重新启用。

（孙善玲 译）

[1] 托马斯·沃尔西（约1475—1530年），伊普斯威奇一位牧场主之子，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特别研究生，1509年任国王的施赈吏，1514年被任命为林肯主教和约克大主教，1515年被任命为大法官，1516年被任命为教皇特别代表。他从国王和教皇二者授予他的种种职位而达到其显赫地位，他的外交政策的目的虽然是为支持教皇，但他的权力实际上依赖于国王。

[2] 宗教改革的一个奇怪的直接后果是在国王的顾问班子中神职人员成分得到加强，斯蒂芬·加德纳1528年被任命为秘书长，1530年被任命为主教，他是自沃尔西1515年任大法官以来第一个任官职的主教，在16世纪30年代有4位主教任国王的顾问。

[3] 有时候有人争辩说查理五世对一位中年姑妈不可能那么关心，但这么说是忘记了对他而言家族感情是政策问题（参见本书边码第303页）。

[4] 简·西摩于1537年产下一子，她于产后12日去世。——译者

[5] 琼·西蒙的论文《A. F. 李奇和宗教改革》（载《英国教育研究》，1955年）打破了这种公认的看法。

第八章 意大利与教皇统治

路德的活动和教导的消息、接着茨温利的活动和教导的消息，以及后来再洗礼派、反三位一体论者和加尔文等活动教导的消息，在意大利半岛各国，像在中欧和西欧其余诸国一样，有如种子落在肥沃土壤里，深受人们的欢迎。萨伏那罗拉讲道的声誉，在许多教士中也并非总是受人青睐。例如，以路德路线为依据，最知名的意大利《圣经》翻译家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布鲁乔利就对萨伏那罗拉抱非常敌对的态度。^[1]但第五届拉特兰教务会议（1512—1517年），特别是佛罗伦萨人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并接近威尼斯元老和卡马尔多利修道院修士，被宣称为有福者^[2]的保罗·朱斯蒂尼亚尼（1476—1528年）^[3]在人们中间却燃起了希望。人们希望平信徒、僧侣统治集团和教廷都有更崇高的德行和更严肃的生活；他们充分意识到所谓“弊端”，本来都是为了应付教会在财务管理和中央集权主义政策方面对金钱和干部的需要而制定的，并非仅因教廷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意大利国家之一员。人们对天主教宗教生活应具备更高尚的观念也抱有强烈的愿望：因为像朱斯蒂尼亚尼这样的人（其朋友包括威尼斯贵族后来成为著名枢机主教的加斯帕罗·扎塔里尼在内），这种高尚精神注入的结果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如此类的倾向决不意味着要对教条、礼拜仪式、戒律、传统等天主教会基本结构施加任何影响，而是希望由于提供了充分活力能使教会首脑及其成员（‘in capite et in membris’）获得净化。平信徒中也常有这种类似教士们的激动情绪，但更像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那样，对于教士们的罪恶进行严正批评的人也屡见不鲜。^[4]

不应把这类表现理解为对路德的活动、保护他的王侯们或他的追随者们的支持。他们是平信徒中反对教士滥用职权的表示，也是许多教士中没有任何实际教务会议基础的反对教廷主宰一切的思想的表现。^[5]因信称义教义的最初迅速传播，人文主义者、神学家、传道者和一般人民之对此教义普遍深感兴趣，也并不意味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宗教改革的努力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尽管早在15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于这项教义就进行了讨论，德国和瑞士宗教改革家们还利用它

作为改组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结构及改善其对平信徒和世俗当局关系的教条主义基础，而对大多数对其感兴趣的意大利教士来说，则仅因其所引起的希望足以鼓励人们对教务会议和讨论感兴趣，且其在个人中间的宣传常能产生半隐蔽活动和在政治上的一种模棱两可态度。这正标志着意大利新教运动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因此，当彼得罗·卡尔内塞基^[6]取得某些受俸神职职位时，虽然有些人因教廷把这种俸禄赐予不愿执行有关职务的人是滥用权力而痛加指责，但他和他的朋友们则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俸禄来帮助穷苦和受迫害的新教徒。

法国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以后，意大利诸国领土即沦为战场，其宫廷则沦为强国外交争夺的对象。萨切雷·博尔吉亚的雄心，由于给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提供了机会，曾被马基雅弗利加以理想化，其实，那不过是对（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儿子死后短短15年间之回忆而已。^[7]尤里乌斯二世（1503—1513年在位）继续了切萨雷·博尔吉亚的工作，彻底改组了天主教各国的民族和军事管理。其恢复教皇古代管辖领域的企图，使他同威尼斯发生了冲突。但他的旨在挫败当时正在谋划争夺意大利领土的法兰西、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阴谋，增进意大利自由（*Liberta d' Italia*），在国际领域所从事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只在击退法兰西权力方面取得了成功，而教廷政策则仍在其他列强的控制之中。尽管如此，在1559年以前，使意大利诸国摆脱法兰西、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暗含以教皇为盟主的“意大利自由”这一口号，仍旧为教廷政策的指导原则。再次巩固了拥护教皇权力的各国之后，尤里乌斯二世召开了以着手天主教改革为目标的拉特兰教务会议（1511年）。虽然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一直生活在路德宗教改革初期和列强参加查理五世和弗兰西斯一世抗衡斗争时期，仍然继续执行了尤利乌斯二世的政策。为了报答给教皇国家增添领土的好意和提高梅迪奇家族的利益，他协助了神圣罗马帝国一方。阿德里安六世^[8]在其短暂的教皇任期内（1522—1523年），在政治方面为天主教宗教改革可能做的事很少。另一方面，克雷芒七世（1525—1534年在位）所最关心的只是扩张和巩固梅迪奇家族的利益，趁着时局混乱，浑水摸鱼，试图为他的亲属谋取封地和采邑。不过，克雷芒改变政策，使教廷反对西班牙而亲近法兰西，并非仅因查理五世的权力终于获得巩固，终止了他的这些尝试，而是因为

作为教皇他认为：帝国权力无上强大，对于天主教非常危险，特别因为查理五世从未停止过干涉教会事务，偏袒天主教改革派，并且主张召开天主教教务大会。正是由于克雷芒的这些弱点，他的联结法兰西政策和为梅迪奇家族谋利益政策，把从尤里乌斯二世以来的“意大利自由”纲领解释成了“天主教自由”的同义语。查理纵容其部队抢劫罗马以后，意大利各国军队就不再对教廷提供坚定的支持。佛罗伦萨反抗梅迪奇家族的统治，威尼斯试图侵占教廷领土，而作为同盟国的法兰西则显示其无能为力、无所适从和不守信用。1528年，为了酬谢把佛罗伦萨重新归还梅迪奇家族的许诺，克雷芒七世（像在他以前的安德烈亚·多里亚^[9]所做的那样）抛弃了意大利事业，把意大利自由理想完全置诸脑后。然而，只是在1530年梅迪奇家族才回到佛罗伦萨做公爵。从那以后，他们就受西班牙的支配，并和教廷紧密地结合起来。

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的教廷政策，把住内部全力增强教廷国家势力改变成在国际方面保持中立，这不仅是一深思熟虑的纲领，而且也已证明颇有成效。自从查理五世的权力在意大利登峰造极无人敢与之抗衡以来，教皇作为不惜牺牲教廷领土以自肥的法尔内塞家族的一个成员，在国际方面继续保持中立，对教皇制度来说，不失为有利之举，同时对天主教本身也是有利之举；为了给会议做好准备和贯彻执行天主教改革计划也需要和平。教皇的儿子，倾向于对法国友好的皮尔·路易吉·法尔内塞在一次由西班牙人策划的阴谋中遇害（1547年）；另一方面，热亚那的菲耶斯基策划的反西班牙阴谋失败了（1547年），像矛头指向梅迪奇家族，也就是指向西班牙的卢卡的布拉马基的阴谋失败一样。撇开教皇的任人唯亲和教廷辖地内部问题不谈，保罗三世领导下的教廷政策，开始更多关心意大利问题与更多关心宗教和普世教会问题，也就是说，开始更多关心教务会议问题。克雷芒七世总是拖延召开教务会议，而保罗三世则自1536年起就开始提出召开教务会议的命令。但由于战争，法国人的蓄意破坏和对会议组织问题同查理五世发生争论所招致的困难，直到1545年^[10]12月才得以召开。会议地点选择在靠近哈布斯堡家族领地边界，但在君主—主教（prince-bishop）领导下为意大利独立城市的特伦特。由于时疫和害怕来自比罗马更近得多的因斯布鲁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1547—1549年的教务会议改在博洛尼亚举行，接着教皇又宣布休

会。保罗三世于1549年11月逝世时，雷金纳德·波尔有相当大的继任机会这一事实显示：这时纯粹教会利益已占了意大利政治利益的上风。除了做过无效的绥靖尝试外，尤里乌斯三世（1550—1555年在位）对于意大利政治问题（1551年的帕尔马战役和1553—1554年的锡耶纳战役）没有积极参与过，因为教廷自身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他所奉行的中立，并不反映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是由形势需要所迫不得已。尤里乌斯三世1551年重新召开了特伦特教务会议，但当德国的宗教战争危及该市安全时，他就被迫再度休会。他没有参与耶稣会会士在欧洲及更远地区的挺进，或天主教会在英国的复兴。教皇马塞勒斯二世（Marcellus II）的任期太短，不可能有任何建树，那不勒斯人教皇保罗四世（1553—1559年在位）时期的教廷中立政策暂时停止了，该教皇重新开始了引起战争的反西班牙活动。尽管有法兰西亨利二世的参战，菲利普二世麾下的西班牙部队不仅重新确立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最高地位（1556年），而且1557年在圣康坦终于战胜了法军。威尼斯虽然在短时间内曾与教皇联盟，但托斯卡纳的科西莫一世（Cosimo I）则以略取锡耶纳为西班牙封地为限。1556年以后，教皇卡拉法^[11]则专心致力于其家族和天主教改革和反改革问题。

不难看出，意大利宗教情况首先（1518—1534年）是由罗马教廷所支配，而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则受皇帝与教皇对于教务会议的矛盾斗争所左右。贯穿整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写反路德论文的意大利作者——1536年以前至少有63人——他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严格的意大利问题，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由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所进行、构成教务会议一般辩论的一部分的问题，首先是占优势的传统论题，即教皇权力（*De Potestate Papae*）这一问题。连许多对路德所阐释的保罗教训感兴趣并怀着极大的新奇感（受到人民和王侯赞许），把它们逐个城市逐个国家地应用到基督教改革上的教士们，他们所关怀的，与其说是意大利形势和意大利教会，不如说是一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命运。意大利半岛被划成不同的国家，由于丧失了“意大利自由”或独立所产生的混乱以及外国民政和政治当局（法国的、西班牙的和神圣罗马）的存在，其结果是特定意义的“意大利教会”已不复存在。吉贝蒂及其少数伙伴们已孤掌难鸣。在最初时期曾有个别的皈依日耳曼和瑞士新教信仰的事例发生。

必须注意的是，一般来说，1519年至1563年间，对整个意大利宗教运动的历史研究，仅以新教在意大利的传播为限。没有任何近代研究把各个不同国家之间和各个不同城市及不同地方之间的不同情况加以考虑；没有任何研究试图说明某种运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处寺院、教士、学校、法庭、机关和商店所产生的影响，确定其特征和真实意义。这不仅涉及教条和教义的不同，一般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个人行为，而且也影响到民众信仰、较低地位教士的生活、教会和国家行政和经济结构。^[12]但从一般意大利观点可以这样说：贯穿社会各个阶层，从农民到君主，从工匠到法律教授，对于阿尔卑斯山那边已经确立的观念和宗教改革实践模式，莫不寄以同情和关怀。就连在教会镇压已经开始以后，这种改革运动仍然受到许多教长和一些王侯的支持以及其他人士的善意宽容。

关于宗教改革的早年情况（1519—1530年），我们占有的资料极少。个别人的姓名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逃到新教国家或受到骇人听闻的刑罚；不管对天主教意义的教会改革赞成或不赞成的当局，只是在公开和明目张胆的情况下，例如改革派为了论战的缘故，宣读并公开利用保罗书信和改革派著作的时候，才对这种新异端进行斗争。在战争和被占领的痛苦中，这些宣传悔改的宣教师们所构成的危险除了对教会当局外似乎并不很大，就连对教会当局也并非都有危险，因为连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教条也是半信半疑。在意大利首先散发路德和梅兰希顿著作的人是帕维亚书商弗朗切斯科·卡尔维，他是伊拉斯谟的一个朋友。这是早在1519年的事，而且纯粹是商业性质，并没有宗教宣传的意图。1519年左右，以假名出版的梅兰希顿著作，在被揭发以前，曾在罗马和教廷宣读。帕维亚、威尼斯、波洛尼亚和米兰的商业中心以及帕多瓦大学是这些书的主要销售处。被谈论得最多的人是路德，在很长一段时期，意大利持异端论的教徒一般都称为路德派：在费拉拉有次检察官称他们为圣餐形式论的路德派，这是一个会令路德派信徒和茨温利信徒惊恐万状的名称。无论如何，除了和茨温利派后来又和加尔文派密切结合，自1532年以后，重新募集改宗者活动的韦尔多派以外，这只是个别人物的历史而不是集团的历史。甚至在费拉拉著名女公爵法兰西的勒内的宫廷里也没有任何募集改宗者的活动：她的宫廷简直就是新教徒的避难所。她于1528年来到费拉拉，是一个有诚挚宗教信仰的妇女，怀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兴趣，后来又扩展为把新教及其教义也包括在内。

不过，个人或孤立集团事例甚至在更早时期（1521年、1523年、1524年、1530年）就已经发生。1531年在帕多瓦大学学生中，路德教义似乎已经很时髦。威尼斯市政当局迫切希望不致因对宗教讨论施加严格查禁而影响对日耳曼的贸易关系。元老派惯常采取的慎重态度，他们对印刷厂商和帕多瓦大学许多外国人利益的关怀，帮助了早在1520年就在寺院里开始的革新派所进行的宣传和他们的著作的传播。1530年开始了对革新派的审讯、判刑与处决。但有案可查的资料则主要表现了教会当局对世俗当局的漠不关心和过分宽容的抱怨。例如，对阿尔卑斯山那边异端书刊控制不严和在当时已经明显很时髦的以保罗著作经文为讲道题目的广泛流行等问题。威尼斯政府和教廷间的政治关系随着国际政局变化起伏不定也对形势产生了影响。

在那不勒斯王国，除了在卡拉布里亚殖民地的韦尔多派行动和他们在皮埃蒙特殖民地同一宗派人相似以外，这一运动主要以首都为限，只是在下一个十年中才具有重要性。在其他城市和国家，这一运动的存在开始产生影响也是在这样的早期（在波洛尼亚，1533年）或以后十年的末期，不过它并非一直以地区为限。几乎所有来自方济各会、加尔默多会、奥古斯丁会和本笃会的宣教士，由于镇压行为一直只在主教一级进行——每一主教在他们自己的教区里进行——而且进行的方式也随地区和个人情况而各不相同这一事实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宣教士们得以从这一城市迁移到另一城市。监督管理的热情变化无常，对异端派的镇压甚至还伴随着对臭名昭著和骇人听闻的滥用权力的毫不妥协的谴责。这样一来，通过随地迁移，宣教士们就有可能避免一切危险，把新教教义带到另一些地方。由于他们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还吸引了那些不受特定地区限制的人们：主要是修会成员、贵族妇女和教士出身的各式各样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彼此间的互相交往，突破了政治和行政界限。他们之出现在那些直接或间接依靠皇帝的国家特别引人注目。在早年时期，由于希望促进教务会议的召开，由于皇帝对同法兰西友好的克雷芒七世进行的政治斗争，由于伊拉斯谟思想对皇帝大臣们的影响（这种思想很适合作为西方基督教思想代表的查理五世的帝国政策），此外，它也是一种对教皇们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因而凡赞同新教教义并倾向于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对教皇滥用职权行为进行批评的人们在实践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都享有相当多的活动自由。

主教们的行动受到教廷的奖励和配合本是意料中的事，不久教廷就发出训令（bulls）、敕书（briefs）和公函（missives），（根据所收到的情报）恢复了反对路德、路德派和其他宗教中追随他们之人的各种通谕（encyclicals）的主题。不过，事实上，除了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撰写反对路德小册子的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外，在教廷里特别是在克雷芒七世任职期间，也还有一些非常赞成天主教改革的其他人士，经常以旁观者态度看待那些为天主教会在宗教、道德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而奋斗，在意大利各不同主教辖区，各女修道院、各贵族社会奋起的战士们，而没有任何迫害他们的意图，有的甚至还对他们表示同情。

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主教改革派领袖而在早期不妨称之为福音派领袖的人们。这是一种通过强调伦理和宗教，强调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以达到革新天主教传统宗教生活为目的的运动。这种强调丝毫不包含摒弃教条仪式和等级制度的意义，更没有抛弃教会的统一性，而只是纯洁所有这一切，恢复其原始福音性质的一种手段。它同欧洲和意大利的两种改革运动在改革标准以及不仅包括教会管理而且包括所有等级在道德、训诲和教育上的教士行为诸如救济穷人、慈善事业、看护贫苦者、开办医院等都有联系。15世纪在对修道会的改革和改组等工作上已经有很多成就。现在这些运动又带着某种恢复宗教活动和在俗教士良知的倾向重新开始其工作。这种倾向还伴随着对修道会特别是对托钵僧的谴责。一般来说，领导人物主要是诞生于前一世纪并在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时期参加教廷或教会生活的人们。他们戴着教会头衔而所干的却常是政治任务。他们中最著名、最典型的是被他们同时代人认为是模范主教和模范教区改革家的马泰奥·贝吉蒂（1495—1543年）。他在早年是克雷芒七世的秘书和政治顾问，曾鼓励和引导克雷芒的反皇帝和反西班牙政策，坚信这种政策会导致意大利自由和作为意大利主要列强之一的教皇国的自由。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据说吉贝蒂还是一批过严肃生活的教士中最早的一员。他致力于祈祷和慈善事业，他们决心革新天主教会以达到革新整个基督教的目的。这使奥拉托利神爱会（*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修士中包含加埃塔诺·迪·蒂内、路易吉·利波马诺、吉安·彼得罗·卡拉法即后来的保罗四世和贾科莫·萨多莱托，很快他们又和诸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雷金纳德·波尔等人取得联系，只是在1528年吉贝蒂在教廷所实行的反西班牙政策失败以后，辞职回到自己主教辖区，完全

献身于其事业时，才在他的同代人中享有盛誉。他创办了一所印刷厂，出版了宗教书刊特别是教父们的著作，把一些宗教界、文学界和政治界的重要著名人物聚集在自己身边，亲自对包括低级教士和一般人民信众，在信仰和道德上进行教诲。不幸的是，近代研究家们还没有对这样一个人物进行过什么调查研究工作。

当克雷芒七世教皇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吉贝蒂等人正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管理教会的工作。他们经常做这样一些主教的保护人，这些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试图促进人民道德标准的改革，使教士们重新过严格纪律和有教养的生活，要求他们讲道要简单明白，易于理解具有启迪意义。像吉贝蒂这类的人物受到敌人的非难是很自然的，保罗三世任期内，在教皇亲自明确的指令下，他们从教会内部指导教会的改革运动。在新枢机主教名单中，上述诸人的名字也赫然在内。像《关于纠正教会弊端的建议书》（*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 1536年）等文件，就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表现。这一运动表明，教皇自己愿意直接行动，而且在皇帝所传的伊拉斯谟意义的天主教改革和教务会议以外，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这时教廷作为精神权威，在执行其作为意大利国家政策的同时，已不可能坚持一般意义的中立声明，而必须是真正的中立才行。然而，无论是这一点或者是对追求的信众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对路德派和茨温利派指控的明确答复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对于新教教义及其传播的关切，在比较严肃认真的教士们心中产生了不安情绪，发生于修道院及研究室的论争正在通过宫廷和低级修道会广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虽不必对传统作任何背离，却不得不对哲学—神学（philosophico-theological）方法和兴趣有所取舍。由于这种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对神学和基本教条问题试图采取中立立场，甚至还由于他们有些人后来作为异端同情者受到了迫害，于是关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历史传说，认为他们是真正革新教会和改造教会的人，他们向教会提供了使教会适应新社会和在欧洲出现的新政治形势的新工具。由于他们的和解精神，人们在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把他们当作“自由派”；难道他们不是承认有进行改革的必要，因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改革活动有很多正义和合理的地方，他们（在私下里）难道不是对那些研究和讨论新教教义的人采取了容忍态度吗？

实际上他们对任何同教会改革有关的问题都倾向于采取一种向后看的态度。他们希望以往的好日子能够再度出现，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使舆论认为新教徒的行动有道理的滥用职权、堕落和腐化得以消除。有名的《建议书》的提出就是为了消除和纠正已经成为教会祸害的教廷滥用职权；镇压危险的哲学学说：把伊拉斯谟的《会谈》（*Colloquia*）从学校里清除出去，并制定检查书刊的条例。甚至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他们传统的见解，例如在主教和非常驻教士的关系问题或者在主教和修道会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和传教与倾听信众认罪的关系问题上，《建议书》所主张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重新肯定主教的权力。在神学上采取中立立场，一般来说，起源于教父们所主张的非教条精神，或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或保罗所主张的福音虔信型的教义。所有这一切立场都起源于前一世纪或者说路德以前的时代。路德、茨温利和稍晚时期的加尔文，由于创立了教会组织的新体制，使新教义的实践成果得以集中体现，其在神学家中所产生的新形势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所认为特别重要的似乎是找出一种妥协性教条以维持并恢复他们所认为是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即教会的统一。此外，路德派的许多福音主义信条，就其本身而言，也并没有被认为最异端，特别是梅兰希顿所掌握和《奥格斯堡信纲》（1530年）发表后路德和新教君主及城市所达到的改革成就，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没有极端而令人震惊的茨温利或宗教改革那么危险具有煽动性。因此而出现了假定路德宗教改革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的兆头，以为这种革命正在取得一种公共制度的特征：尽管有论战性的教条和组织上的改变，它仍然在回复到传统上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普通的方面。尽管希望并试图在雷根斯堡会谈（1541年）时达成协议，但连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代表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路德不承认梅兰希顿，教皇不承认孔塔里尼。[\[13\]](#)

有利于新教或路德教的运动迅速发展，1535年至1549年间越来越强烈。在皮埃蒙特由于在法国领导下的占领军甚至在其高级将领中包含有归正宗教会成员，还由于世俗当局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韦尔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尽管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有禁令，在米兰公国，由于地方世俗当局的支持，这一运动仍然日益发展壮大。1539年，奥士定（奥士定会）托钵修道士曾向一群平信徒追随者和少数方济各会宣教士宣讲异端；其后数年中，此类人员中不仅有教士，而且有一次还有一个商人。1541年对帕维亚路德派和茨温利派大学生

活动进行的一次调查，发展成为对在米兰、托尔托纳和帕维亚传播新教传教士的袭击，而在这些大学生被捕以前却没有任何人谴责过这些传教士。后来在帕兰扎（1543年或1544年），克雷莫纳（1547年）特别是在卡萨尔马焦雷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一个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方济各会宣教士，在自己身边聚拢了十来个门徒和宣传人员，几乎赢得了整个城市的拥护，还在克雷莫纳接收了改宗者。1547年和1548年间约有30名被认为最坚定最活跃的领头人被逮捕，其中有些是地主绅士，有些是中产阶级成员，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一些工匠和一个农民，贫富都有。在这整个时期中，这类事件一再发生，托钵修道士占主导地位，但在1550年和1552年间，在克雷莫纳有一批坚强的平信徒被捕受审，这些人也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一个医生、一个皮匠、一个书商、一个金匠、一个商人、一个仆人、一个律师，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名门望族的绅士。当局哀叹这类不幸事件正在从普通百姓（工匠和农民）蔓延到上层人士，这次是些适当组织起来的社区成员，他们和其他类似社区人员有接触，是加尔文主义模式的会众，即使在这次离散以后，直到1576年关于他们的记录依然保留着。他们从地方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法官们干涉的不断抗争中获得间接的和不自觉的援助。

约在1541年，曼图亚的档案里记载了关于宗教的论争，但没有比这更早的资料。1543年有过一次对于不懂《圣经》和语法，以做工匠为职业，妄自尊大有权讨论宗教问题的平信徒的谴责。1539年有一处原始资料暗示由枢机主教莫罗内的代理人庇护异端派，在摩德纳比在别处更危险更活跃。这里有一个叫保罗·里奇的西西里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又名利西阿·菲莱诺，很可能和卡米洛·雷纳托是同一个人，后来在他们被流放到格里松斯时成了再洗礼派和反三位一体派的名家和代言人）。他们集合了显然经常聚会在私人房屋里的一个小集体。这批人不仅由学者和富裕的人们所组成，而且也有来受教育和目不识丁的人们，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不仅在私人房屋进行关于信仰和基督的律法的论争，而且也在市场、商店和礼拜堂里。摩德纳的名声传遍了阿尔卑斯山以北，布塞尔写了一封祝贺和勉励的信给该城的弟兄们。里奇被逮捕，带到费拉拉，发誓放弃信仰，但有些被派往摩德纳的天主教宣教士因公众意见认为该城已净是路德派，太危险，拒绝前往。官方对学者的态度仍旧是劝导和善意的。1542年枢机主教费科莫·萨多莱托曾写信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兼语言学家卢多维科·

卡斯特尔韦特罗，1555年因在一场争论中诗人安尼巴尔·卡罗指控他为路德派并警告他说，在天主教宗教法庭（Consistory）里已经有人提出了对他的正统性的怀疑；但他自己却以卡斯特尔韦特罗给予他自己和他们整个团体的保证为满足。从那时起，公开运动就停止了，私下运动的情况不明，不过，1539年的人名中有4个人在1555年曾重新出现。

在这几年中也出现了以法国的勒内为中心的最重大的加尔文主义活动。1537年，加尔文的费拉拉之行，在女公爵宫廷讲道，博得了女公爵的青睐和祝福，接纳了改宗者，曾轰动一时。但由于埃尔科莱二世（Ercole II）公爵的干预，这位法国宣教士在费拉拉逗留的时间很短（他的名字是后来才发现的）。加尔文给勒内的信充满了鼓励和劝勉，同时也指责了她犹豫不决的弱点，显示了10年前在茨温利身上所看到的把对皈依新教的君主政治利益的考虑同对所宣传的上帝纯正之道具有神异能力的信心混杂在一起了。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们由于深信自己是上苍所挑选执行上帝旨意的工具而具有一方面积极策划一方面苦修心灵的同样复杂的心情。他们希望通过使少数重要教士和王侯接纳新教，就可以再次实现路德的成就。

即使在她离开意大利以后，女公爵仍旧继续了她和加尔文、布林格和切·塞·库廖内的通信，较早时候她曾参加保护像法恩扎（Faenza）的法尼诺·法尼尼那样著名的受迫害新教徒的活动。这次公爵支持了她，设法延缓了法尼尼在信仰问题上认错之后又重新宣传新教所遭受的死刑判决。对埃尔科莱二世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同教皇国和托斯卡纳有共同边界的罗马涅人民的好感。在勒内宫廷里还有个人文主义者富尔维奥·佩莱格里尼·莫拉托和他的博学女儿奥林匹亚·莫拉托。由于她的人本主义教导和1551年离开费拉拉之后曾漫游各处在新教徒中很有名气。无论如何，据她自己说，她是从蓬波纳齐式带有唯理主义偏向的人文主义皈依加尔文主义基督教的典型代表。其实，所有这一切并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名噪一时，公爵不仅不得不对女公爵加以密切注意（这是从一开始就如此的行动），他还必须让她蛰居在城外一座大别墅里，直到公爵逝世，这时她的虔信天主教的儿子阿方索出于敌意迫使她回法国（1559年）。教皇一直对费拉拉公国享有封建特权，而且总是试图把它并入教皇国之内。约在世纪

末，这一野心终于实现，埃斯特家族再也不能让勒内政策前进一步了。

在威尼斯本土，维琴察是新教的坚强中心。1546年保罗三世直接对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potesta*）和人民领袖（*captain*）讲话时还提到了即将召开的特伦特教务会议，为的是使他们摆脱其“不冷不热”的心情。甚至在1546年以后，人们已不再提路德派时，强有力的再洗礼派仍继续在那里存在。1531年左右，当路德派的第一次浪潮过去以后，除了关于反三位一体派的谈论以外，这段期间，已没有多少关于帕多瓦的消息了；大学生们获得了平安学习的机会，只是在1550年的十人会议上才提出了帕多瓦路德派大学生的问题。在威尼斯本土，元老院和十人会议对镇压大学生并不热心，但在保罗三世任职期间，教皇大使在谴责和逮捕以方济各会修道士为主体的路德派宣教士方面很活跃。该大使的继任者继续了这项工作，但他恳求教皇授予他以赦免悔改者的特权并在阅读新书方面适当放宽限制。所涉及的人士中有被革的托钵修道士和受过教育的平信徒，但也有工匠，这是令人不安的事情。所涉及的神父人数较少。威尼斯运动的名声很大，以致在1539年竟有人认为他可以用梅兰希顿的名义致书元老院，就教士滥用职权的改革问题提出建议，不过他同时也指明，在德国，比较极端的运动正在受镇压，还警戒他们，米格尔·塞尔维特的反三位一体教义正在广为传播。1540年《关于运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恩典的专题论文》第一版在威尼斯发行，这是一篇在意大利出版被广泛阅读的新教小册子，曾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14]

自1541年起，镇压行动愈演愈烈。然而，从巴萨诺的弗朗切斯科·内格里所写的另一本书《自由意志的悲剧》受到普遍欢迎，同样被广泛阅读还被翻译成别国文字，就知道这项运动仍在威尼斯继续进行着。1546年、1547年和1550年迅速连续印了三版。不过在威尼斯最令人感兴趣的事莫过于阿布鲁奇人巴尔达萨雷·阿尔铁里，他是英国驻威尼斯大使西吉斯孟·哈维尔的秘书；利用其外交豁免权从事宣传活动，特别是在路德派各团体间建立接触点。1542年他受威尼斯、维琴察和特雷维索公众的委托，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路德，尤其因为当时的新形势引起了一阵逃亡、囚禁和恐惧，阿尔铁里就利用机会向这方面求援；他恳求这位能引起奇迹的德国宗教改革家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新教王侯一道进行调处，向元老院施加压力，在会议闭幕以

前，为新教徒取得在礼拜和信仰方面的宽容。阿尔铁里和其他方面一致同意，认为单此一举就足以重新燃起革新运动之火，使其向前推进一大步。但一时间他并未取得任何结果，因而不得不再度要求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的保护。不过从1546年起，他又能够以黑森伯爵领主和萨克森选侯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尽管不是以强有力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名义。1548年英国驻威尼斯大使逝世，阿尔铁里职务被解除，他又求助于瑞士。1549年他向布林格表示希望被任命为伯尔尼和苏黎世驻威尼斯代表，但所得到的还是几封推荐信而已。无论如何，施马尔卡尔登会议之瓦解，标志着威尼斯对教皇和皇帝两者政策的转变。1552年阿尔铁里逝世，使意大利新教团体的命运和政治及外交关系有所改变的另一尝试亦随之而失败。改革运动在伊斯特里亚和弗留利的历史也遭到了同样命运：改革派宣教士和主教们受到相当大一部分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他们继续被孤立起来，在随后的镇压时期则遭受逮捕或被迫逃亡。

卢卡的情况亦复如斯，几乎同一时期，几位著名人物聚在一起：彼得·马蒂尔·韦尔米格里、库廖内、马丁南戈伯爵和吉罗拉莫·赞基全都是闻名海外的意大利改革运动的未来领袖，还有韦罗利的人文主义者奥尼奥·帕莱亚里奥，他是教皇国的本土人士，后来因被审判、定罪（1567—1570年）以及从泛神主义的人文主义进而接受巴尔德斯学说而闻名于世，这是从他的作品里明显看得出来的。由于科西莫一世（Cosimo I）争夺扎斯卡纳盟主地位，当宗教法庭通过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时候，卢卡的这群人就首先被袭击并发现自己处于防守地位。布拉马基阴谋（1544年被发现，经过长期费力的辩论后，弗朗切斯科·布拉马基于1548年在米兰被砍头），其矛头指向梅迪奇和西班牙，而且很可能含有一些萨沃纳罗拉主义（Savonarolism）意味。不管怎样，1545年卢卡元老院迫使公民们参加弥撒和所有他们应尽的各项义务。1549年这项命令又重复了一次。在这一时期里，不满情绪迫使很多家庭不得不从卢卡迁居日内瓦，在那里马丁南戈伯爵做他们的牧师，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意大利殖民中心。不过，更大一部分人的迁居则发生在1559—1560年间。

关于佛罗伦萨情况所知不多。1525年有少量宗教论争，但当代人和历史学家所特别关注的仍然是佛罗伦萨丧失自由的问题和萨沃纳罗拉问题的余波。1544年，科西莫一世的代理人彼得罗·杰利多对路德

教书刊很感兴趣，但不久即逃离意大利。1548年，翻译过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誊写员兼翻译家卢多维科·多梅尼基由于翻译了加尔文的《尼哥底姆论》（*Nicodemiana*）被判刑监禁十年，但旋即获得赦免。1551年宗教法庭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一次真正西班牙式的“死刑宣判”（*auto-da-fe*），有22人公开认罪，一些异端书刊被焚毁。卡特琳娜·基伯公主（1557年逝世）在佛罗伦萨过隐居生活，她同巴尔德斯圈子里的人有过接触，但显然没有接触过当地任何团体，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有关比萨的消息。在另一托斯卡纳城市锡耶纳，该城于1552年转向梅迪奇家族。在该处再生学园（*Accademia degli Intronati*）举行过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会。1541年市政当局不得不颁布命令，禁止讨论教会批判过的教义问题。1545年还认为有必要重新颁布这项禁令。还有关于褻渎的谈论。1548年最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是有关异端书刊流行的问题，在涉嫌者的名单中有各式各样行业的从业人员。德国路德派大学生的存在也是人们担心的原因之一。

1543年罗马教廷不得不发布严禁异端书刊的命令，所提到的出版和销售这类书刊的中心城市包括罗马、费拉拉和波洛尼亚。来自波洛尼亚和摩德纳的团体同在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尔有书信往来，他们寻求澄清所辩论的关于圣餐的问题。1549年许多来自波洛尼亚的人被遣送到罗马的宗教法庭，但在保罗三世逝世以后都获得了自由；在尤里乌斯三世任教皇期间，由于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接受审讯后，被重新释放。但在1550年认为有必要在波洛尼亚建立一所宗教法庭，这里的新教运动同摩德纳及费拉拉的大学生团体有联系。

1535—1550年间，再洗礼运动和反三位一体倾向出现、获得巩固并广为传播；同时，以巴尔德斯为中心的团体也开始发展。^[15]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是，尽管他们散布在意大利各个不同部分但却没有地方化。参加他们的人们之间彼此有接触，从西西里向米兰迁移，却并不属于任何地方主教辖区、寺院或宫廷，而仅是作为某一大地区的个体成员，不属于任何正式组织，尽管威尼斯可能称为再洗礼派中心而且提供了有关再洗礼派的极大部分证明材料，而那不勒斯则是巴尔德斯追随者的中心。最后这个团体的立场介于以天主教、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为一方与以再洗礼派和三位一体派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这种运动有贵族气派，包含着贵族、主要教士、人文主义者和名门贵妇。它通过著名家族的大厦、寺院、宫廷、官邸以及谈话、通信而广为传

播。不可能说它有什么组织哪怕是再洗礼派那样最简单的组织；像反三位一体派情况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一条理智之流而已。然而，几乎所有胡安·巴尔德斯的追随者，在胡安·巴尔德斯逝世之前，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有过接触。他们彼此之间过去有过接触，此刻仍有接触。他们中的一员，贝尔纳迪诺·奥基诺的讲道，吸引、感动了大量的人们。还得加以说明的就是此项运动具有独特的意大利式，它不仅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岛，而且那个有意大利风采的西班牙人的追随者几乎都是意大利人。此外，所有赞同在意大利进行宗教和教会改革的绝大多数是宗教和知识分子领袖，他们的改革热情，甚至超出或违反了罗马方面的愿望；不管他们同巴尔德斯本人及其朋友是否接触过，他们最初都是附从于巴尔德斯圈子的人们。

胡安·巴尔德斯是曾任查理五世大臣的阿方索的弟弟，像他哥哥一样也是一个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1529年来到罗马，充当皇帝侍从中的一员，后来成了驻克雷芒七世教廷的皇帝代理人。克雷芒逝世时，巴尔德斯来到那不勒斯，于1534年获得永远定居权，在那里他把一群朋友聚拢在自己身边，他们讨论和思考宗教问题，完全以《圣经》和教父权威为依据，宁愿详细研究有关苦行和神秘的问题。明白地或暗含地认为，相信基督及其牺牲而得救，和个人与上帝直接发生关系为基本信条的总原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使他们能避免明确规定神学立场或不承认天主教的一切告诫、礼仪和圣餐有任何重要性，遵守或不遵守这些都无关紧要（*adiaphora*）。巴尔德斯劝勉他的追随者，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忽视它们，但要用神秘意义予以解释。就这样，巴尔德斯这群人，不像法兰西的勒内和她的追随者那样，必须照路德派和加尔文主义者所要求的，参加圣餐仪式，也不必避免参加弥撒。其实，巴尔德斯本人，就是以最虔敬的态度，在天主教怀抱中逝世的（1540年）。

在他的追随者和宾客中，我们发现像维科的加利佐·卡拉齐洛侯爵那样未来的严格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嘉布遣会总会长贝尔纳迪诺·奥基诺（稍后在移居摩拉维亚的意大利再洗礼派中逝世）、（在巴塞尔茨温利派中逝世的）贵妇人伊莎贝拉·布里塞尼奥以及卡特琳娜·基伯公主和著名的朱莉娅·贡扎加，她们隐居在天主教女修道院，虽被认为涉嫌分子，宗教法庭却未加任何伤害，毫无疑问，这和她们的地位有关系。以上两人都平平安安地在天主教怀抱中死去。维

多利亚·科隆纳也是如此，尽管同巴尔德斯没有直接接触，却是贝尔纳迪诺·奥基诺和巴尔德斯的许多其他追随者的女保护人。一项文件在列举巴尔德斯的朋友和追随者名单时，说其中有11位主教和大主教，例如，吉罗拉莫·塞里潘多，未来的枢机主教和奥斯定会总会长，自始至终一直是特伦特教务会议的重要人物。塞里潘多从青年时起就是巴尔德斯的朋友，坚决主张波尔枢机主教所阐释的柏拉图主义是引述保罗教义的前奏。稍后，他成了许多被指控为异端者的保护人，使他们获得了较轻的判决和缓刑，更后（1549年），正是这同一个人，禁止了两方的任何一方讨论天主教和异端之间有争论的教义问题。他竭力敦促人们只讨论教会初期学者们所处理过的问题而不是近代问题。1550年他甚至绝对禁止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万一不得不讨论时，也应该对问题加以明确澄清，防止任何偏袒异端之嫌。

与此大不相同，其命运在巴尔德斯的追随者中更为典型且更为始终一致的是巴尔德斯在那不勒斯的另一位客人彼得罗·卡尔内塞基。他出身贵族，有敏锐的智力，具有良好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法律训练基础，是克雷芒七世教廷中最为才气焕发的人员之一，克雷芒曾任命他为教廷首席书记（apostolic protonotary）和自己的秘书。他留在罗马一直到克雷芒逝世，和吉贝蒂及罗马的奥拉托利神爱会人士有接触。1540年他常去那不勒斯巴尔德斯家里，1543年常和维泰博（Viterbo）的英国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小圈子的人们交往。同年，他先到威尼斯，接着又到法兰西卡特琳·德·梅迪奇的宫廷。1543年他面临第一次审讯。部分地由卡特琳和科西莫·德·梅迪奇的干预，在所有控诉理由方面他都被宣告无罪。在法兰西继续旅行一段时期后，他前往帕多瓦和威尼斯，同这些地方的高级教士和新教保护人有接触。保罗四世任教皇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1559年卡尔内塞基被传至宗教法庭，因未遵传出庭，他被宣判为异端者，财产被没收，因危险很大，逃至日内瓦。1561年，再度由于科西莫·梅迪奇的干预，宣判被撤销，财产发还。从那时往后，他隐居佛罗伦萨。但科西莫终于因政治原因，被迫向重新恢复保罗四世镇压异端活动的庇护五世让步。卡尔内塞基致宗教法庭法官们的信，尽管由于长期令人精疲力竭的审讯，他苦心孤诣，委曲求全，陈述不尽准确，供词显得过分低声下气，但就义时则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穿着时髦白色衬衫，戴着一副崭新手套，手执白色手帕，像赴喜筵似的，正如科西莫代理人1567年在罗马描述的那样。

像卡拉法（教皇保罗四世）那样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人们，以怀疑眼光看待巴尔德斯、波尔、吉贝蒂和同他们一样的他们圈子的成员的“福音主义”以及维多利亚·科隆纳的朋友们并没有弄错，因为这些圈子虽然的确包含着主要忠于天主教会和教皇权威的高级教士，其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异端分子和罗马的敌人。另一方面，还有迹象表示（试从狂热者中举一例）迫使诸如贝尔纳迪诺·奥基诺和韦尔杰里奥对教廷敬而远之的，通常正是德亚底安会成员那样毫不妥协的狂热态度。

加尔文劝勉其国人要公开承认信仰并为之奋斗的话似乎正是为正气凛然就义前的卡尔内塞基说的。在这句话里加尔文仿佛是向那些仅以纯正信仰为满足而不愿为之冒任何风险的教皇的脆弱书记们嗤之以鼻。加尔文就这个问题的论述（其矛头部分地是指向法兰西的勒内）似乎对意大利情况也很合适，因而有好几次被不同人士译成意大利文。有人曾着手印行意大利文版本，但1553年在日内瓦以小册子形式发行以前，并未能公开发行，更未能流传。这本小册子对于面临迫害讨论逃跑问题的读者作出了忠告，劝勉意大利人除非他们有明确当牧师传道的呼召，或者是绝对的统治者，否则就应以选择流亡为上策。序言的作者决不是什么乐观人物，他说：“众所周知，在意大利有些教会和信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不足取、没趣味、没有多大价值……”抛弃这一切决不是重大的不幸，“因为很明显，在它们里面没有任何好东西”。凡已经离开他们或即将离开他们的人不可能被指摘为使教会变得空荡无物（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空空如也），也不可能指控他们帮助了敌人或放弃斗争，因为他们可以从国外用宣传或写作的方式更好地进行斗争。无论如何，这位作者把加尔文主义者所特别爱用的“尼哥底姆主义者”这个词应用在他们写作的对象身上，尽管他也指明在其他问题上，加尔文所谈的是法国情况而不是意大利情况。^[16]尼哥底姆主义者实质上意味着那些愿意度天主教徒生活而把天主教所认为基本教条和圣餐礼仪看为对得救无足轻重的人们，因为如果不能确信因信称义的道理，弥撒和炼狱就更不足凭信了，他们甚至还谴责天主教有些实践和教条是非基督教的。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他们援引尼哥底姆为例，尼哥底姆获得称义，是在于他夜间来见耶稣，也就是说，隐秘地相信耶稣（《约翰福音》第19章第39节）。

的确，尼哥底姆主义在意大利很流行，主要由于巴尔德斯教导的影响，但并不以巴尔德斯及其弟子或再传的追随者为限。这种立场的自觉的和明确的表述，1544年已在日内瓦被确认，而在瓦登西流域，则约于1555年，由一个佛罗伦萨人带到那里，也被确认。不过，对于这一问题并未作过详细精确的研究。这种立场同民众对教务会议的希望有密切关系：由于上苍的干预有可能使和解成为可能，而如果放任宫廷和教廷的影响与阴谋充分发展，也可能鼓励人们期待依靠政治与外交发生相互作用的希望。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意大利逃亡者，尽管严格说来并不是再洗礼派或反三位一体派成员，而在加尔文看来，却都是些老于世故、模棱两可的不信者，同时这也说明了这些人所以离开意大利，其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向往按教条规定的真理，而是因为向往思想和宗教讨论的自由，因此，他们因在流亡中并未发现他们所向往的自由而感到震惊。这一点从卡米洛·雷纳托和许多别的意大利人在米格尔·塞尔维特被焚后所提的抗议中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这些抗议后来逐步发展为在法律和神学方面应当有宗教宽容的学说“索齐尼主义”。

再洗礼派和反三位一体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即使在意大利，也并不是所有再洗礼派都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然而，意大利最早的反三位一体者却都是在再洗礼派中发现的。莱利奥·索齐尼死在一个再洗礼派家里。这些事例表明，意大利的两个激进宗教运动虽然互不相同，它们彼此之间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通过不同阶层的人民隐秘地传播的，他们中有工匠、农民和低级教士，还有律师、教师和人文主义者。1539年，反三位一体的危害曾在威尼斯元老院受到申斥。塞尔维特本人在1554年曾想到威尼斯去，在那里波斯泰尔曾为他出版了他的《辩解书》（*Apoloogia*）。1555年教皇的训令中曾提到过反三位一体派，而从一个反三位一体者在其受审期间所暴露和揭发出来的最早资料则起源于1550年。同一年，再洗礼派在威尼斯召开了一次坦率的会议，讨论在他们的一些成员中开始出现的反三位一体苗头，这些人显然主要来自维琴察。代表们来自意大利各不同地区和移民中心。在运动内部有比萨、那不勒斯、托斯卡纳、教皇国和西西里的意大利人，但这次威尼斯会议或会众中最大多数人则来自威尼斯本土城市格里松斯、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索的再洗礼派社区。一种声称早在1546年在维琴察组织的会议中就产生了反三位一体运动的传说正是这次威尼斯聚会中出现的。但在那些年间甚至更早就有再洗礼派宣

传家们在那一带活动。由以上提到的再洗礼派的冗长供词中就已得到了证明：它还表明再洗礼派已经采用了门诺派的巡回传教制度。在暴露了这些情况之后，再洗礼派就很容易受到突然袭击、被逮捕并驱散。他们中有些人设法逃到摩拉维亚，不久（1559年），他们试图从那里差派两位密使，劝说留在意大利的弟兄们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但密使被宗教法庭抓获。值得注意的是，在路德教运动被镇压以后，维琴察的再洗礼派迅速得到发展，这大概是因为对付由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形势，需要有更大的警惕，他们已经明确宣称自己是尼哥底姆主义者。

根据1550年一个涉嫌异端而受审者的证词，在那不勒斯，巴尔德斯圈子中有人主张耶稣只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先知，他们不承认童贞女生子；揭发者指控巴尔德斯也抱这种观点，也许他只是容忍了他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巴尔德斯的朋友和门徒中，有人公开宣称自己是反三位一体主义者。上帝一位论历史学家E. M. 威尔伯（Wilbur）称巴尔德斯是一位自由派天主教徒，他还认为，如果巴尔德斯不是一位先驱者至少也是我们的运动的通报人（herald）。[\[17\]](#)

面临征兆和疑点两方面都有充分资料的这种意大利宗教形势，教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制度化的措施。这并不是说旧法律的运用还不够严厉，而是说，由于异端运动的新奇和规模，大量追随者团体的行动隐秘，人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各团体在法庭、主教及枢机主教和教廷所受到的保护，最后，由于犹豫不决和推迟召开教务会议所引起的在教条和教义方面的不确定，使得有必要采用新的武器和新的镇压措施。从1524年1月15日，即教皇驻威尼斯大使奉命实施第五届拉特兰会议有关传教及审查书刊条例那天起到1543年，记录在案的教皇致意大利主教和高级教士的敕书约80起，要他们采取行动反对路德教异端。最后10年间，由于运动的开展和强化，使原来交由主教在其各自辖区和领地所执行的传统宗教法庭体制已经很不够。由于1530年天主教宗教改革家之一（枢机主教卡拉法）的推动，保罗三世在1542年7月21日颁发的训令（*Licet ab initio*）[\[18\]](#)里创立了有名的中央组织“Holy Office”[\[19\]](#)这个罗马最高宗教法庭。主教设置的法庭和地区性宗教法庭都应服从最高法庭；它们都应遵守最高法庭所制定的统一程序，把审判记录抄本送到罗马，听候罗马对每一案件应如何判决的指示；他们通常甚至还把罪犯送到罗马最高法庭受审或由罗马最

高法庭派专员至地区会审。就这样，在意大利的宗教改革还未取得大势所趋的统一性质和还未在民众中扎根以前，最高法院就作为镇压和管制的单一工具而存在了。在卡拉法强有力的引导下，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著名的贝纳尔迪诺·奥基诺和韦尔杰里奥案件，就是典型的事例。奥基诺作为一个传教者，曾被选为新建的嘉布遣会总会长，享有盛名。他同巴尔德斯发生了接触，自此以后，在他的讲道里就明显地看出有巴尔德斯的影响。他的名声传遍了意大利，听他讲道的群众的热情保护了他，使他免受主教和地区宗教法庭的干扰。但当他被罗马新宗教法庭传讯的时候，他就宁愿移居国外（1542年）。[\[20\]](#)

移居国外的现象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最初是零星的，所涉及的人只是些狂热的极端分子，而且通常仅发生在意大利北部边境的国家。正式移民出境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自从奥基诺逃亡后，形势日益严峻。但最知名的涉嫌分子虽多逃往瑞士、斯特拉斯堡和英格兰，多数人则仍留在意大利境内，寄希望于教务会议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保护。这种保护由于来自主教、枢机主教和王侯，通常是很有效的。

经过长时期的讨论之后，1545年教务会议终于召开。主张天主教改革的人和巴尔德斯的追随者们希望它首先将会颁布有关教会改革的法令，然后再进一步对“因信称义”教义作出建议，容许人文主义者和福音派对圣保罗的信息所作的解释；他们对1546年参加教务会议者，如英国的枢机主教吉罗拉莫·塞里潘多和许多别的人，抱有极大希望。尽管后来有些高级教士和贵族感到希望破灭，但正如卡尔内基的审讯所显示，甚至在著名的韦尔杰里奥受审后，这些希望仍然残存着。韦尔杰里奥曾充当教皇克雷芒七世驻日耳曼大使，在他的卡波迪斯特里亚主教辖区里是一位主张改革的主教。1542年他移居出境，成了意大利流亡者中少数真诚路德派的领袖和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弗的顾问，他同1542年逃亡的圣餐形式论者切·塞·库廖内争当大主教未能成功。在公开露面的有利时机来到以前人们用耐心和镇静保住了对教务会议所抱的希望。他们希望当对改革持友好态度的人们成功地通过容许对教条作某些宽大解释和行动的决议时这一时机即将来到。这主要是通过含混不清的措词同枢机主教莫罗内的立场妥协达成的，1557年5月到1560年6月莫罗内曾被囚禁、审讯，但宗教法庭没有定他的罪。有些事情并不是单凭保罗四世的热情和严格正统性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除了这些情况复杂的希望以外，还有些比较简单和更为确定的因素。许多人并不愿逃亡，鼓舞他们的这种精神纯属宗教性质，因为他们所召集的这些信众，不管人数多寡，都是他们不惜以殉道为代价得来的，不能抛弃他们，尽管实际上他们最终并未能作出最高的牺牲，在韦尔米格里逃亡以后，曾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后也一直考虑过。因此，在意大利人圈子里，认为弗朗切斯科·斯皮耶拉案件很重要。斯皮耶拉是靠近帕多瓦的奇塔德拉的一位富裕律师，有11个孩子。显然是由于他的法律实践而产生的对于道德问题的顾虑和阅读了有关书籍，他皈依了新教，先利用福音书刊带领家人和朋友改变宗教立场，后来就公开传教。看来追随他的人们主要是“贫苦和微贱的人们”。从各方面资料都非常强调、连在宗教事务上也非常忽视城乡贫苦人民这一事实来看，这是很可能的。斯皮耶拉被谴责并受到审讯。他害怕如果被定罪可能影响其子女继承遗产的资格。1546年他公开认错，但立刻又因好像听到了他所出卖的基督谴责他的声音而陷于失望和深沉的沮丧。医生们诊断他的病况认为是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并给他开了各种不同的处方。消息传到了帕多瓦，好些人从那里来看望他，有的是像韦尔杰里奥和马泰奥·格里巴尔迪那样杰出的人物，他们从1547年至1548年先后两年来安慰斯皮耶拉，但他本人却说他知道自己现在是该死的人了。1548年他因失望而死。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还出版了一些不同的记述。韦尔杰里奥在1549年离开了他的主教辖区和意大利，但另外一些人则把斯皮耶拉的事例理解为是对他们的一种温和的警告，要他们继续传教，对抗罗马的宗教法庭。

这时已经到了教皇保罗三世任期的末尾，经过马尔切卢斯二世的短暂插曲后，到达尤里乌斯三世和保罗四世任职时期。^[21]其趋势是从强调教会在道德、管理、纪律和组织上的改革应居首位逐渐向镇压异端运动让步。这种镇压是以最严格的教条正统性和对凡不能卑躬屈膝服从教士者或对有关教皇权力的最极端理论稍持怀疑态度者的蓄意猜疑为基础的。这些理论既然是在教条上还没有作出定义的问题，公开讨论就应该是合法的。从保罗四世往后，西班牙式严厉认真的教权体制在罗马占了上风。人文主义者被严厉而一丝不苟的神学家所取代，他们对平信徒和异端派都抱着粗暴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事实上，在大主教中存在着一种单一的运动，但它有两个方面，天主教的改革和反改革，两者交替出现。当教会政策以反改革形态表现出来的时

候，并不意味着另一方面已经消失，每一方面的要点往往可以从另一方面的文件中辨认出来。

尤里乌斯三世和保罗四世任职期间（1550—1559年），尽管政治形势很不相同而且充满矛盾，但其主要特征实为天主教改革者的缓慢退却。有些人是依照塞里潘多的模式，另一些人（如莫罗内）则蒙受严重猜疑。应当大书一笔的是，卡尔内塞基虽然没有出庭受审，但在莫罗内之后几个月，其判刑即被免除。还可举乔瓦尼·格里马尼为例，他本是阿吉亚尔宗主教，1549年被指控偏袒路德派异端，1550年被迫辞去主教职务，1552年受审并被宣判无罪，从此一直隐居至1561年，为谋复职而重新开始活动并终于被教务会议批准。他的名字曾列于提升候补主教名单中，威尼斯议会虽曾坚持以外交方式为其说情，终未获得成功。主要活动家的情况大抵一如既往，但他们现在的地位在怀有更为严格和更不妥协倾向的代表中越来越软弱了。新一代的人正在开始出现。卡洛·博罗梅奥和米凯莱·吉斯利埃里（Michele Ghislieri）正在发迹。在这段历史前20年占显要地位的许多人物已逐渐衰老，另一些人则移居境外。本来为天主教改革派的莫罗内、波尔和塞里潘多，越来越被认为有异端嫌疑。最初以作为受迫害的异端分子保护者为满足的这些人，最终竟以最严格的正统支持者姿态出现，尽管这种姿态同他们原先的倾向和理想大相径庭。早在卡托—康布雷齐条约以前就已经出现的意大利政治形势是不能改变的。其主要情况是西班牙的无上统治，教廷和西班牙结盟以及认识到同新教徒（路德教和其他）达成协定之不可能。西班牙的无上统治意味着反宗教改革的镇压愈来愈强烈。尽管在枢机主教成员中，强有力的一派希望波尔继续任教皇而不愿任何别人当选，但当保罗三世逝世时波尔并未当选。尤里乌斯三世任职末期，波尔成了主张恢复英国玛丽女王职位的领导人之一，令他的新教朋友们大为失望并丢脸。然而，这并未能使新教皇保罗四世对于莫罗内和吉贝蒂的这位朋友的怀疑得以消除。1558年，波尔也从舞台上消失了。其遗嘱中绝对拥护教皇的表示曾受到朱莉亚·贡扎加和卡尔内塞基的批评，后者所写表示不赞成此举的信成了其被判死刑的原因。

庇护四世（1559—1565年）任职时意大利形势趋于稳定。经历了使所有意大利国家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税收方面严重损失的战争蹂躏之后（威尼斯的损失比其余国家较轻）经济重建工作已经开始。战

争的结果是到处都遭受了相当严重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社会痛苦。形势所要求的不是建设而是重建。政治形势已经改变，但尽管事件性质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所作的调整则无足轻重。从1545年起，法尔内塞家族就掌握了帕尔马和皮亚琴扎公国的政权，1547年虽然有导致皮尔·路易吉·法尔内塞被杀的阴谋，他们仍然牢牢掌握着政权。锡耶纳和其周围农村对西班牙政府所怀的敌意，从不同形式的起义不断表现出来。1552年有法国军队协助的一次起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了又有佛罗伦萨流亡者参加的锡耶纳战争。战事以1555年锡耶纳有条件投降告终。以后，随着1559年法国军队撤走，蒙塔尔奇诺陷落，共和政体的最后残余宣告绝迹，蒙塔尔奇诺不仅在宪法上是共和体制，其人民也实实在在参与了政府管理。经过同菲利普二世（1555年查理五世曾将该城授予他管理）短暂辩论之后，除了“行政长官”（Stato dei Presidi）的国家以外，1557年锡耶纳连同其领土和资产，全都落入了科西莫·德·梅迪奇手中。1554年，别号布朗达诺（Brandano）的巴托洛梅奥·达·佩特罗伊奥逝世，在整个锡耶纳地区，他曾被认为是一个以宗教形式表达了人民永不休止的不满情绪的先知。

1556年，卢卡终于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酷的寡头政治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由新公民们和中产阶级构成的1531—1532年的所谓的乞丐叛乱危机，他们大都是得到贫苦和普通人民支持的富有人士。1557年罗马的犹太人被关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Ghetto）。尽管像托斯卡纳大公国或萨伏依公国那样的意大利国家专制主义改组历史属于另一时期，但通常伴有同教会当局争辩的立法倾向则已于此时略露端倪。主要是西班牙无上统治的巩固，来自威尼斯的消极抵抗，在这种无上权力的阴影下教廷作为意大利主要国家之崛起，以及教皇权力在天主教国家之重振，赋予它们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多的灵活性。卡拉法家族受审的悲惨丑闻和其在1560—1561年的覆灭并没有削弱教廷的威望，尽管此项审讯明显地构成了保罗四世大部分任期中的丑闻之一，其实也是教皇无上权力时期的丑闻之一；从反面来说，所表现的能力反倒增加了教皇的威望。1562—1563年莫罗内和塞里潘多曾协助1560年召开的教务会议达成一项决定，不过其所处理的问题已不仅是或主要不是意大利的问题，尽管根据历史学家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的说法，决定中曾提到过意大利主教的优势问题，这种优势通常都是教皇利用压力或协商办法从有关方面或意大利王侯方面取得的。庇护四世

和科西莫·德·梅迪奇之间的协商进展得特别顺利。虽然教皇庇护四世同托斯卡纳教士之间有管辖权和财政问题的激烈争论，他并没有对托斯卡纳主教施加压力，要他们参加教务会议并按照教皇旨意选举，科西莫还从教皇那里获得了政治上的照顾；阿方索·德斯特（Alfonso d' Este）也是如此。

像教廷的所有意大利政策一样，这一时期的政策从那时直到目前，曾被天主教史学家解释为一种意大利政策，这就是说，是一种有利于意大利诸国的“自由”，半岛的和平并有利于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政策。总之，是一种意大利民族团结的政策。最近一位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蓬蒂耶里（Pontieri）教授，在一本涉及同一时期和这里所讨论的同样问题的重要著作中曾持同样意见。^[22]他还断言，教廷对于天主教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认真而有力的探索，证明了教皇所自称在一个对教会和意大利造成极大灾难的时代来到以前，“教廷具有挽救意大利民族宗教统一无可争辩的功绩”之言为不虚。他还说：在这种统一里，尽管意大利臣服于外国，但它发现了它自己，到时机充分成熟的时候，就为它无上光荣的政治统一创造了基础。实际上事物发展与此很不相同，而且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关于这一点，从事复兴运动的人们从马志尼到加富尔都清楚知道，尽管对于政治家们历史著作的歪曲和简单化不能不有所原谅。正如克罗齐明确而且有时还雄辩地说过的那样，所谓“无上光荣”，归根结蒂，还是指由于教廷同西班牙势力结盟，通过天主教宗教改革和反改革活动，成功地镇压了那些运动而言。

（吴永泉 译）

[1] G. 斯皮尼（G. Spini）：《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修士A. 布鲁乔利》（佛罗伦萨，1940年）。

[2] “被宣称为有福者”，指天主教的一种宣福礼，即教皇在这种仪式上宣称：死者已升入天堂。——译者

[3] H. 耶丁：《扎塔里尼和卡马尔多利——关于玛利亚痛惜耶稣之死故事的意大利档案》卷三（1953年）。朱斯蒂尼亚尼及其友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只是在最近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和出版他们著作和书信的工作正方兴未艾。参看本书边码第278页。

[4] 关于这整个时期，请参看H. 耶丁《吉罗莫·塞里潘多》（维尔茨堡，1937年：两卷本，附文件；英译本，不附文件，伦敦，1956年）。

[5] 天主教关于教皇管理教会权力的理论：一种认为教皇有权主宰一切；另一种则认为教皇一个人不能说了算，必须经过有关教务会议决议才行。——译者

[6] 参看本书边码第266页。

[7] 亚历山大六世和其儿子萨切雷·博尔吉亚并非死于同一年，亚历山大六世死于1503年，其儿子萨切雷死于1507年，原文含糊不清。——译者

[8] 阿德里安六世原名Adrian Florens Baeyens（1459—1523年），是唯一荷兰籍教皇。——译者

[9] 安德烈亚·多里亚（1466—1560年）热亚那海军将领，先同弗兰西斯一世结盟，后投查理五世麾下。——译者

[10] 参看本书边码第171页以下。

[11] 教皇卡拉法即保罗四世。——译者

[12] M. 贝伦戈和A. 里斯托里在研究卢卡；E. 波米耶在研究再洗礼派，并请参看S. 卡波内托《西西里宗教改革的起源和特征》，《文艺复兴》，第7卷（1956年），第219—342页，F. 卡贝德：《米兰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宗教史》（波洛尼亚），1940年。

[13] 参看本书边码第179页。

[14] 作者为本笃会僧侣贝内代托·卢奇诺（Benedetto Lucino）即贝内代托·达·曼托瓦（Benedetto da Mantova），不是3个世纪之前人们所认为的奥尼奥·帕莱亚里奥（Aonio Paleario），参看B. 克罗切（B. Croce）《基督的恩典》，载《批判》（*La Critica*）第38期（1940年）第115—125页，及B. 卢奇诺（B. Luchino）《基督的恩典》（*Beneficio di Cristo*），绪言和注释由马里亚诺·莫雷斯基尼（Mariano Moreschini）撰写，罗马，1942年。

[15] *Valdesiani*指胡安·巴尔德斯的门徒和追随者而言，不可与*Valdesi*即韦尔多派（Waldensians）混为一谈。

[16] D. 坎蒂莫里：《16世纪意大利的尼哥底姆主义和对教务会议的希望》，载《贝尔法戈尔手册》《特伦特教务会议和反宗教改革历史文献》（佛罗伦萨，1948年），第12—23页。参看《消除迷信与厌恶承认真理及坦率公开承认信仰》。

[17] 《上帝一位论、索齐尼主义及其先行者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33页。

[18] 教皇所颁发的训令，一般都由该训令开始的前几个拉丁词语命名，这种做法，同我国《论语》一开始说：“学而时习之”，一般即称该章为“学而”章，或孟子“见梁惠王”，即称该章的“梁惠王”章的做法很类似，但因其并非完整的句子而无法翻译。——译者

[19] Holy Office一般也译为“宗教法庭”，但同地区性法庭有所区别，故特加“最高”二字。——译者

[20] 参看本书边码第284页。

[21] 此处原作者叙事混乱不清，易滋疑难。因教皇保罗三世任职是从1534—1549年，尤里乌斯三世是从1550—1555年，马尔切卢斯是1555年4、5两月，保罗四世是1555—1559年。正确的说法似应为：从保罗三世任职（1534—1549年）末尾，经过尤里乌斯三世（1550—1555年），马尔切卢斯的短暂插曲（1555年4—5月）到达保罗四世的任职时期（1555—1559年）。——译者

[22] E. 蓬蒂耶里：《意大利独立的最后希望》，载《暗淡时期的意大利历史》，那不勒斯，1949年。

第九章 新修会

众多形式各异的宗教生活深深地交织入天主教的结构中。修会的状况通常可靠地指示整个天主教会健康状况，而从早期开始天主教的各大形成时期就有不仅改革现存修会而且创建新修会的特点，创建新修会首先是对一个新时期的需要或思想倾向作出反应，虽然总的说来这掩盖了[修会]令人惊奇的生存力和适应力。16世纪和17世纪时天主教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复兴也不是这一规律的例外。这是一个在欧洲社会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的时期，而这些变化确实把至关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摆在了一次天主教复兴的面前，但实际上天主教再也不能享有宗教垄断地位，而且在欧洲面临着疆界的缩减，在许多地方简直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这一时期修会的历史显示了努力摆脱恢复和新建之习惯程式，但其环境远较从前经院哲学所面对的复杂得多，不利得多。

要对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时修会的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过去150年间的改革潮流把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和法兰西所有托钵修会分成了两派，即严规派和住院派，并且产生了各式各样严守会规的本笃会，但这些潮流早就一直在减弱，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完全止息下来。由于没有更一般的改革运动的支持，其成功仍旧是不协调的，局部的，常常是短暂的，而且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似乎都对进一步的前进持反对态度。极其多样的物质因素和对整个修道理想所持批评态度对共同生活的解体和热情的减退及其产生的全部道德后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富人和穷人似乎对其结果都不满意。主要对修道院的财产问题感兴趣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干预却不加限制的世俗力量，总的来说是不如此害处很可能更大，并且利用了住院派和严规派院长们之间经常发生的管辖权之争。除了在英格兰，灾难性的有俸神职的暂时代理制度就像植物枯萎病一样难以对付。用无耻的办法而且常常在申请者自己的院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便可从罗马教廷获准免除修道义务。见习修道者和修道者，无论男女，所受之培训和教育普遍不足。人文主义者的敌对批评，加上诋毁苦修与形式上遵守的价值的宗教态度的成长，最终发展成为新教的激烈谴责——然后

是毁灭性的实际上的胜利。不过这并不是否认仍然存在着值得尊敬的，甚至热诚的宗教团体，这类团体经常和其他团体中最严重的弊端劣迹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修会]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就像整个教会一样，纠缠在世俗世界的复杂的社会和物质罗网中以一种特殊方式为生存而进行着斗争。他们号称是“从不堕落，所以从来不需要改革”，但是他们与平信徒的交往也很多，特别是在那些长期有重要影响的会院，如在伦敦和科隆的会院，这种交往颇多。缺乏的是一种具有独立精神活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最高水平上得到经过革新的、专心致志的、能够判断并面对真正困难的教会领导的支持。直到这样的条件显示出产生的迹象时，是不可能指望出现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永久性变革的。

就托钵修士而论，其处境尤其严重，因为教会的牧养工作大部分是他们做的，而且有趣的是第一批新教领袖——像路德本人——中有许多竟然来自经过悔改的严守会规的托钵修士。但他们在西克斯特四世1474年和1479年发布的诏书中达到了顶峰的广泛的特权和免受主教控制的种种豁免权引起了和主教团关系的高度紧张；而教会改革的中心目标——重建教会使徒式的效率便永久性地受到修士及其豁免权这个问题的妨碍，1512年至1517年的拉特兰会议对此有所考虑但未能加以解决。结果，是作为新灵性（这是意大利和别处由严肃认真的人组成的一些小组的特征）之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的牧养和慈善方面的动机创造了一种宗教社团的新形式，即神职班修会，以耶稣会为最重要的例子，不过耶稣会并不起源于意大利。这些团体为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和教皇提供了组织精良、受过良好教育、习惯于服从但与修道院无关的牧养工作者，他们不受当地关系之干扰，不受修士和托钵修士的礼仪制度和团体规章的束缚，同时同样地不受世俗生活的种种诱惑；它们在使天主教内部有一定的秩序，稳定天主教和改革派之间的边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时代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样，是在嘉布遣运动复兴方济各会努力中在牧养方面的动机从一开始便使之得到世俗保护者的欢迎，并最终为之获得了罗马的支持。

然而，有一段时间在罗马对整个宗教修会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怀疑。在保罗三世的改革委员会于16世纪30年代发起的辩论中，谈论的中心更多的是镇压修会而不是鼓励建立新的修会。诸如镇压所有住院派并把其他宗教组织合并为三四个完全废除修会免受主教控制，以及

全面禁止新建修会之类的建议显示出在一些地方恼怒和失败主义所达到的程度之高。但是，这些激进的方案无论在纸上吸引力有多大却几乎不会成为教会的实际政策，只有一个极端主义派别支持这些方案。前面已经指出，在著名的《教会改革纲要》和其他当时类似的文献中找不到许多属于积极建议改革的内容，比如给予青年修士修女更好的灵性和知识方面的培训，或者其他实际措施，如类似于最终将逐渐提高较古老的修会的修道生活水平的措施。在本章所覆盖的整个时期，嘉布遣会、德亚底安会、耶稣会和其他新修会早期所取得的使徒式的成功，当代人似乎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的热情所结出的果实，在全面的努力肯定在不断扩大但对于改革是否可行，甚至对一些较古老的修会将来是否继续存在从根本上缺乏确信的背景下，显得颇为突出。直到1563年特伦托会议举行的最后几次会议期间制定出一份修道院改革的一般准则时才为一项被大家所接受的一般性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政策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快到世纪末时有了较大的自信心和集中指导从而获得进展，逐渐——如果说仅仅是断断续续地——提高了绝大多数过去的修道机构的总体水平。

各式各样的神职班修会是天主教在16世纪在宗教修会方面的杰出创造。但这里为方便起见先论述正在回顾的这段时期更为重要的沿着传统路线发生的修道生活的复兴。卡马尔多利会的修士们在意大利新建的修道院虽然看来仅仅是那种15世纪地区性的修道制度改革的继续，但由于其创建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当时其他重要的虔诚团体的密切联系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保罗·朱斯蒂尼亚尼和文森佐·奎里尼是出身贵族并受过先进教育的威尼斯人。1510年和1512年，他们及其虔诚的人文主义圈子内的其他人遁世入教，在卡马尔多利加入了独居修士的行列，他们从那儿尽了最大的努力劝说其友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可是，他们尽管卓有成效地帮助这位未来的红衣主教关注自己的良心，但最终未能说服他相信仅仅在修道院里自己才能得救。^[1]卡马尔多利会起源于11世纪圣罗穆埃尔德创建的修会，既有独居修士也有住院修士。到16世纪初，卡马尔多利会已在住院派和严规派中有了分机构。但朝向完全而严格地恢复原来对规章的遵守的新冲动正受到会长德尔芬诺的阻挡。奎里尼英年早逝，但朱斯蒂尼亚尼不久便成了改革派的领袖。1519年他当选为独居修士的院长，1520年他带着一批追随者离开卡马尔多利，在别处如马萨其奥、帕塞鲁波和科罗纳山，建立了新的经过

改革的卡马尔多利会的定居点。在这些地点，他对圣罗穆埃尔德的理想的新观点被付诸实施，而且最终出现了一个准自治的由一些卡马尔多利会修道院组成的修会，该修会称科罗纳山修会。

朱斯蒂尼亚尼于1528年逝世。在意大利通过悔罪、施舍、遁世隐退寻找上帝时许多热心者的团体中，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和卡拉法、圣卡耶坦以及未来的教皇保罗三世法尔内塞交往甚深。像他那样的人竟然成为当时存在的最严格的隐修制度之一的独居修士，这件事在那时的虔诚者和爱嘲笑者中都留下了显著的印象。但此事也表明了时代潮流：甚至对这个最注重默祷的修会朱斯蒂尼亚尼也认为某种使徒式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有这样的看法，他认真考虑过在美洲建立经改革的新修会的可能性。然而，他最终确信善举应该从家里开始。他的运动具有的特点和嘉布遣会有共同之处，但先于后者；是在马萨其奥两位最早的嘉布遣会修士卢多维克·达·胡松布罗内和拉斐尔·达·胡松布罗内在1526年大斋节期间找到了一个临时避难所，以逃避追捕；他们还提出长期居留的请求，但遭到卡马尔多利会修士的拒绝。

嘉布遣运动是作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灵性总复兴的一部分而发生的，在众多回归方济各会会规（从最早期开始这便标志着小兄弟会的历史特征）的字面意义的尝试中该运动显然是最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嘉布遣运动创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小兄弟会修会，如果在一些地方它逐渐被认为是一些预言的真正实现，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些预言说创始人所教导的生活方式最终将得以恢复。1517年，利奥十世设法简化复杂的方济各会，他的办法是将现存的方济各会的所有机构合并为两个，而且是两个独立的组织。住院派接受了官方对会规的全部“解释”和放宽。人数较多的严规派起源于14世纪和15世纪回归立会初期之简朴的运动，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偏离了简朴的修持生活方式；现在打算在严规派各教省拨出房舍供希望过更加严格的生活的修士用。但关于此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实际进展，而说明方济各的理想在意大利具有广泛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嘉布遣运动在严规派中兴起，而严规派是借助于严格解释会规的新的热情的大浪潮而产生的，在现存的严规派框架内这种热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得到满足。

嘉布遣运动并不在翁布里亚这块“着了魔的土地”上而是在安科纳的边界地区兴起的，这是一片乡村，在从翁布里亚和阿西西延伸出去的群山的另一面，是14世纪时属灵派的避难地，严规派的摇篮。出身农民家庭的马泰奥·达·巴斯其奥是一位单纯的青年牧师，属于严规派在蒙特法尔科纳的修道院。他感到自己受上帝之召唤严格按照圣方济各立下的会规生活，并遵守这位圣徒在其最后的信仰表白中提出的告诫，但这些告诫的强制性已遭到罗马的否认。他给自己制作了一件粗布袍子，戴一顶缝在袍子上的尖顶风帽（用以代替当时穿着的用较柔软布料做的袍子和分开的圆形风帽）。他认为这代表圣方济各实际穿着的样式，而这种样式的风帽后来成为嘉布遣会修士复兴早期方济各主义的外在标志，他们为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胡须是嘉布遣会修士的第二种极其重要的外在标志，也许是从卡马尔多利会输入的，该会的习俗对嘉布遣会会规的制定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正如圣方济各遇见麻风病人是其生活的转折点一样，对马泰奥而言在他的经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在1513年和1527年两次瘟疫流行期间全心全意为病人和瘟疫患者服务；到那时他已有了三位同道：卢多维克和拉斐尔·达·胡松布罗内兄弟、保罗·达·基奥贾（Paolo da Chioggia），这三人都和他一样是要求更严格遵守会规的严规派。嘉布遣运动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而是以全心全意的慈善工作为牢固基础。这就把嘉布遣会和当时意大利天主教所有其他改革派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克雷芒七世的侄女卡梅里诺女公爵支持嘉布遣会会士的原因，假如没有她保护他们免受严规派院长们的敌意的伤害，那么关于马泰奥、卢多维克以及尖顶风帽也许不会有更多的情况为大家所知晓了。

然而，马泰奥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修会的创始人。当他在朝圣年1525年去罗马时，他想望的，还有他从克雷芒七世口头得到的一切——也许有教皇侄女的暗中帮助——仅仅是私下准许他过游方福音传道的生活，一年向他的院长们汇报一次，可以戴尖顶风帽和蓄须，努力忠实遵守圣方济各立下的会规。他的榜样产生的精神推动力在一个新组织中找到了表现的渠道，是因为其早期追随者卢多维克·达·胡松布罗内的品格和精力。卢多维克是个老兵，他身上的战斗精神不减当年。他逃脱了院长们数次逮捕，于1528年，即罗马被洗劫的次年7月，获得《宗教热忱》（*Religionis Zelus*）诏书，标志着一个小兄弟会的新团体合法开始，这个新团体是由那些聚集在最初四位领

袖周围的人形成的。诏书准许他们按圣方济各的会规独居隐修，接纳其他人入会，享受卡马尔多利会的所有特权。1529年在阿尔巴基那召开的第一届大会制定了章程，选举马泰奥为会长。不久马泰奥便将会长职交给卢多维克担任。这次权力的不合法转移显然得到其他会士的默认。

在1529年最早的章程中这个新团体自称为独居隐修小兄弟会。但应该说明的是，设想的“独居隐修”生活并不像当时卡马尔多利会修士，以及意大利正规宗教修会外的许许多多入过的独居隐修生活，这些人间或从自己独居隐修的山里下山布道叫人悔改，宣告灾难即将来临。可是，显然是因为人们喊叫着 Scapuccini！（这是对独居修士的通俗称呼）把他们当作独居修士来欢迎他们，嘉布遣会修士才获得了“嘉布遣小兄弟”（Fratres Minores Capuccini）这一称呼。该称呼最终流传下来并于1535年首次出现在一份教廷的文件中。但集体生活、使徒式的布道工作、关心穷人病人等才是嘉布遣会之理想的实质，正如它们是圣方济各之理想的实质一样。独居隐修生活对他们的意义正如其对圣方济各的意义一样。他们的社团中心设在安静的山区或乡村地区，以避开喧闹的城市生活的直接压力，一般不在通常的旅行路线旁边，却又离人口集中的地点足够近，以便兄弟们能履行在大众中传福音的天职，也可不远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施舍来源。他们坚决放弃遍布欧洲各地之众多圣方济各会社团的巨大而精美的城市教堂和修道院。兄弟们宁愿生活在小型社团中，因为大批人生活在一起会带来危险，住在用泥和树枝搭的最简陋的隐居室里，居室很小，礼拜堂也极小。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实践绝对的贫困、极端的肉体苦行和一心一意祈祷，祈祷是他们不外出时的活动。自1528年起便开始修建这样的隐修处，1529年就已存在的最早四个隐修处在卡梅里诺附近的科门佐内和波伦扎、阿尔巴基那和福松布罗内（卢多维科及其弟弟之家乡）。

在这些以及后来修建的隐修处圣方济各及其最初的伙伴们的精神开始复兴。嘉布遣会最早期的资料和传说再现了菲奥雷蒂派（the Fioretti）^[2]的氛围。就像大约同时的最初一批德亚底安修士一样，他们努力要以最极端的、几乎是超人的形式来证明与当时流行的邪恶和陋习相对立的美德——贫穷、纯洁、悔改、祈祷和受大众欢迎的使徒职责。他们明确声明放弃对会规，特别是关于贫穷和拥有财产方面

的放宽和解释，这些放宽和解释是住院派，甚至部分地是严规派，已从教皇那里接受了。他们在吃食、睡觉、场地、享受方面追求的是最低标准。他们不折不扣地做到了不为明天着想，甚至于除非极度需要绝不去乞讨。在他们的小小的教堂里，他们举行极简单的仪式和诵经。每天拨出两小时为个人祈祷时间。因此有一种纯粹的敛心默祷的强烈成分，这后来在该修会的其他地点变得更加强烈。但方济各会的使徒式的活动的原有的精神得到充分的维护，并且无论在开初还是在后来都压倒了偏离敛心默祷的所有倾向。在悔罪和祈祷的生活方面树立榜样的确是他们的使徒职责的一个方面，尽管并不是其全部。他们放弃了大量给予托钵修会的特权和豁免权，开初试图使自己在布道和施行圣礼方面直接受主教管辖。可是后来改变了这一政策。作为宣教士，他们自觉地避免复杂精巧、华丽夸张、专业神学的语言和内容，从而培养出了一种福音传道和道德方面的直接感染力。由于这一原因，还以方济各会崇尚简朴的名义，他们不鼓励研究神学，因为最早期的会士要么已经是神职人员，要么就像拉斐尔·达·福松布罗内一样已经是平信徒修士。开初盛行的是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修士完全平等的原始制度，甚至达到安排平信徒修士当权的程度。然而，快到世纪中叶时只得放弃这种制度。另一方面，似乎并非所有神职人员都是宣教士，而在整个16世纪非宣教士占多数。而且，正如当时正统改革派的情况一样，更经常求助于补赎和圣餐这两种圣事是他们在进行劝诫性的布道时的一个中心题目，但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并不听取忏悔。这是他们不侵犯堂区牧师的职责这一政策的一部分，还是他们对研究不信任的自然结果，并不很清楚。但是这一做法虽然遭到种种非议，却肯定保持到1619年嘉布遣会完全确立了管辖权的独立之时。

1529年，即举行第一次大会的那年，在经历了开初的一些困难之后，在马泰奥和卢多维科建立的组织和一些由雷焦的贝尔纳迪诺领导的卡拉布里亚严规派之间实现了联合，这批严规派希望以改革为名摆脱其院长的控制。这表明起源于边界地区的嘉布遣运动在地域上的扩大，而且此后开始传播到意大利其他许多地区。这也把来自一个对弗洛拉的约阿希姆及其对属灵派之影响的记忆也许尚未完全泯灭的地区的人们带进了这个新修会。但整个看来，嘉布遣运动显而易见没有约阿希姆的著作在属灵派和弗拉蒂塞里派（the Fraticelli）^[3]中帮助激发起来的过度的观点和虚幻的启示论。卢多维科早就采取了在罗马

建立一个定居点这一重要的实际措施。他的面向未来的方针还包括在那不勒斯（1530年）和意大利其他地方建立组织。到1535年召开第二次大会时，这个新修会已有大约700名修士，其中大多数是从严规派吸收来的。然而，卢多维科统治的这些年中，尽管修会建立起来并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也遇到巨大的困难，既有内部的困难，也有外部影响造成的困难。事实上，这段时期经历的不只是成长期通常有的剧痛。

卢多维科本人的地位是名不正的。他从未被选举为院长，他只不过在马泰奥把权力交托给他时从后者手中接管了权力。他实行专制君主式的统治，从不召开大会，违背了方济各会所有正常的规章和惯例。不管他对嘉布遣运动作出了多么突出的贡献，他越来越严厉无情的独裁引起了一帮人的反对。反对派迫使他于1535年召开大会，在会上他的院长职为贝尔纳迪诺·德·阿斯蒂所取代，这使他感到惊讶。在心理完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年的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阴谋活动，导致了另一次大会于1536年召开，修会的枢机主教—保护人（cardinal-protector）亲临大会。但与他的期望相反，大会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重新推选贝尔纳迪诺为院长，同时采纳了贝尔纳迪诺准备的修订章程。生性骄傲的卢多维科在这次对他的最后抵制中未能以适当的谦卑默默服从。他一怒之下退隐到一处隐修地，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余生。大约同时，显然由于教皇克雷芒七世1552年的口头准许，马泰奥再度成为他一向渴望的游方宣教士。很可能这是因为他名义上依附了严规派的当权者，甚至放弃了嘉布遣会的风帽。关于他后来的生活，所知不多。1546年，他作为嘉布遣会修士目睹了米尔贝格之战（博瓦迪利亚，首批耶稣会修士之一，也亲临战场），1552年死于威尼斯。这两位嘉布遣会创始人皆退出了修会，命运之离奇竟至于此。马泰奥个人的冒险事业点燃了嘉布遣运动的火星并立下了该运动的基本原则：遵守会规比修会的利益更重要；而卢多维科则以其精力和管理才干把星星之火扇大成为经久不灭的火焰。在他们销声匿迹之时，这火焰由贝尔纳迪诺·德·阿斯蒂及其继任人熟巧地重新照料保全下来；贝尔纳迪诺似乎是第三代创始人，继其后者是弗朗切斯科·达·杰西、贝尔纳迪诺·奥基诺和犹西比乌斯·丹科纳（Eusebius d' Ancona）。这四个开创并使嘉布遣改革运动长期进行下去的人都是从严规派过来的。而这显示了改革的最大困难是严规派院长们的敌视。

严规派院长们的敌视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严规派院长们中肯定有同情嘉布遣改革的人。但分离主义的嘉布遣组织通过从严规派拉走最为热心的成员严重损害了严规派计划的改革。1525年马泰奥个人向教皇提出的请求实际上是有代表性的：罗马不负责任地给单独的修士发放了无数的特许状，从而削弱了隐修生活的共同约束和院长们的权威。由背叛严规派的修士们组成的分离主义组织的表现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捣乱的。嘉布遣组织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地之严规派教省长（minister-provincial）乔万尼·达·法诺（首先，此人曾竭力压制马泰奥和卢多维科）脱离本派加入嘉布遣会，事态因此更加严重。1530年，严规派总会长西班牙人基尼奥内斯的会长职由意大利人皮索蒂继任。这是不幸的选择。皮索蒂没有作任何有助于严规派内部改革的事，却努力要以暴力镇压嘉布遣“分裂活动”。再者，他是一个爱虚荣、爱出风头的人，视察时的排场太过分。他的行为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他想要结束的严规派修士流向嘉布遣会的现象。但当时的教廷，以及优柔寡断的克雷芒七世就是有这样的特点。嘉布遣会的对手们现在发现获得削弱嘉布遣会的地位的官方文件就像当初嘉布遣运动的倡导者们获得建会所必需的批文一样容易。这些文件和相反的文件——有时从大不相同的官员手中获得——的消长过于复杂，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但皮索蒂于1533年被免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继任者也敌视嘉布遣会，而克雷芒的去世则是对嘉布遣会的打击。他的侄女、嘉布遣会的主要支持者卡梅里诺女公爵不仅立即被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剥夺了权势，而且领地也被剥夺。然而，是克雷芒本人在1534年初向嘉布遣会的对手屈服，下令解散嘉布遣会并将他们逐出在罗马的居留点。所有这些打击都被卢多维科以某种方式加以对付和挡开。到1536年他退隐之时气氛已较为平静。嘉布遣会找到了一位更加强大的新保护人维多利亚·科隆纳。1536年和1537年保罗三世批准他们合法存在。不过，为了平息严规派的愤怒，他禁止改革派再从严规派吸收新成员和在意大利境外建立修道院。他还要求嘉布遣会会长在选举时寻求住院派教长的正式批准。最后这一项非正式协议一直延续到1619年，是年协议的废除终于使嘉布遣会成为方济各会家族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支派。禁止改革派再从严规派吸收新成员也许完全对嘉布遣会有利，因为这使嘉布遣会从一开始便培训自己的人才。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新入会者并不缺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嘉布遣会虽然主要

在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中开展工作，但吸引的贵族和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数量也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1536年嘉布遣会仍然面临着对他们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最为可怕的考验——他们的院长、最卓越的宣教士贝尔纳迪诺·奥基诺背叛并逃往罗马。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差不多整垮嘉布遣会的灾难性事件也有助于他们获得对新教思想之盛行和力量的较为敏锐的意识，这意识后来对他们的整个团体产生了影响。贝尔纳迪诺作为宣教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1541年，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他的院长任期延长三年，他被认为是模范修士和杰出的领袖。但是，他专注于称义问题，他读路德著作，也许还有他在那不勒斯和胡安·巴尔德斯交往，这一切终于把他引向了只能有一个结果的立场，对此他在某个难以准确确定的时间一定已有认识。当然事后诸葛亮有的是，但人们说要不是奥基诺后来背叛，他直到1539年的讲道和著作仍旧可以被认为是当时天主教苦行主义文献的一部分。然而，1524年时意大利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人们感受到路德的思想在产生影响。罗马的异端裁判所正在重建。教会认识到潜藏着的危险，因此心肠变得硬起来。卡拉法是铁腕人物。奥基诺因公开批评一位奥古斯丁会会士被监禁一事已经受到教廷驻威尼斯大使的处罚。在他留在嘉布遣会里的最后几个月，他在罗马已受到怀疑。保罗三世邀请他访问，这封邀请书决定了他的逃亡。

教皇的本能反应是全面镇压嘉布遣会。他们受一位暗藏的新教徒控制达四年之久。现在谁能信任他们？他们最大的支柱——民众的巨大支持——垮掉了。仅仅圣基维利诺红衣主教的干预，再加上弗朗切斯科·达·杰西（他接管了贝尔纳迪诺放弃了的领导权）的熟巧和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影响，才阻止了镇压的执行。对该修会所有宣教士的教义观点进行了一次调查，要求他们递交书面说明。调查结果令人满意，宣教士重新得到许可，嘉布遣会幸存下来。不久他们便恢复了过去的声望，在奥基诺逃亡后的那几年，嘉布遣会及其工作在弗朗切斯科·达·杰西、阿斯蒂的贝尔纳迪诺、安科纳的犹西比乌斯的领导下稳步发展。就在奥基诺背叛后大有影响的平信徒修士坎塔利切的圣菲利克斯加入了嘉布遣会，而且尽管有接纳严规派入会的禁令，会士人数仍稳步增长。早在1535年，已经建立了多达8个，也许12个独立的教省。到1550年时教省的数目上升到约15个，托钵修士达2500人。嘉

布遣会遵循方济各会的正规路线，但显然一定程度上偏爱严规派而不是住院派的术语。院长（superior）或总代牧（vicar-general）有时，也许在1619年以前不准确地称作教长（minister-general），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1512年对章程进行了重新编辑。当时认为有必要对原先规定的极端的苦行加以一定程度的放宽。随着该修会的发展，较大的较永久性的修道院被认为是可取的。城镇里的居留点得到默认。有一处地方被指定作学习用。最初对主教之完全管辖的承认未予重申。后来特伦托会议于1563年有关修道院的立法使嘉布遣会进一步改变其活动——主要在学习的组织方面——成为必要。1572年，不许在意大利境外建立机构的禁令取消。此后，嘉布遣会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从禁令取消之时到16世纪末修院和会士的数量都不止增加一倍，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贡献方面仅次于耶稣会。

嘉布遣会不是，也不声称是革新派。他们对之作出回应的是一种已经令人崇敬的理想的感召——积极的生活与敛心默祷的生活相结合，这是托钵修士的理想；这个新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修会的经过改革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些神职班修士新团体是在对当时的特殊问题作出特别反应的过程中出现的。在16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在许多意大利城市中越来越多的虔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团体中——其中以罗马奥拉托利神爱会（该会是以热那亚一个类似的组织为榜样建立的）为最著名^[4]，对个人的圣洁、神职的尊严和效率的恢复以及针对受苦受难者和赤贫者的慈善工作的关注共同导致了各种神职班修会的建立，神职班修会修士是按规章和发三绝誓愿共同生活的神职人员。1534年建立的德亚底安会是罗马奥拉托利神爱会的四名会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四人中有两位杰出人物：加埃塔诺·达·蒂埃内（圣卡耶坦）和尼亚波利坦（Neapolitan）主教吉安·彼得罗·卡拉法，前者是维琴察人，后者后来成为教皇，称保罗四世。主意似乎最初是卡耶坦出的，但组织上的推动力更多是卡拉法的。这位温文尔雅、喜独处的圣者和暴躁好动但博学的主教相辅相成，这很像嘉布遣会首批会士中马泰奥和卢多维克的关系。这个组织的名称德亚底安（Theatine）来自卡拉法的主教管区之一基耶蒂（Chieti）之拉丁文形式，当时他已放弃了该管区。修会采用这一名称说明卡拉法处于主导地位。虽然他和卡耶坦，后来还有其他人，轮流担任任期为三年的院长，但部分是因为其主教品级，他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地位显赫。在1530年

至1533年间，会规详细制定出来，1533年该修会得到克雷芒七世的批准，1536年保罗三世再次加以批准。

德亚底安会会士既不是修士，也不是托钵修士或律修会修士。他们是发绝财、绝色、绝意誓愿的共同生活的牧师，以便尽可能完善地过使徒式的神职人员的生活。他们集体背诵日课，不像当时所有神职人员的社团中流行的那样唱日课。虽然卡耶坦本人似乎重视集体背诵日课，但该修会在早期便为部分会士寻求并接受了对甚至私下背诵日课的免除，以便节省时间从事其他工作。第一批会士在入会前都分散了自己的财产，放弃了圣俸，接受绝对贫困的生活方式，就像嘉布遣会那样不接受固定的收益，也不定期乞讨。在神职人员的行为和穿着方面，他们为自己定下了最高的标准，通过榜样来纠正当时神职人员生活中的失职和弊端，达到了英雄的境界。新吸收的会士在入会时有时采用新名。一方面他们不接受教区和慈善组织的正式管辖，另一方面却忙于布道、听忏悔、规劝人们更经常地领圣餐，忙于为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的慈善工作，忙于学习，特别忙于为礼仪改革作准备。他们过着退隐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不像嘉布遣会和早期耶稣会那样在露天布道。但卡拉法保持住了在克雷芒七世那里的地位，后者继续以各种方式利用他的服务。德亚底安会在罗马的修道院很快便成了热烈的灵性生活与有影响的中心。

德亚底安会对神职人员界的影响虽然重要，他们通过自己的榜样和作为培养未来意大利主教的苗床注定将对天主教作出的贡献虽然价值甚高，但其影响在创会的最初几十年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第一个因素是会士的数量有限。自愿过艰苦的退隐生活——这种生活夺去了一切外在的吸引力，甚至修士的服饰——人的数量必然很小，但不仅仅因为这一原因，还因为修会的创始者们从一开始便敏锐地认识到让不能坚持过如此艰苦的生活的人宣誓入会所带来的危险。因此，德亚底安会人数较少——而且主要由贵族组成。虽然这并未使该修会完全不发生变节，但是却减少了修院的数量。第二个因素是1527年罗马遭洗劫，在洗劫中德亚底安会在罗马的社团——主要是圣卡耶坦本人——在西班牙士兵手中遭到骇人听闻的野蛮对待，此后他们被迫到威尼斯避难。他们在威尼斯留下来，直到1557年才回到罗马，那时卡拉法当了教皇，卡耶坦已进了坟墓。作为一个修会，他们的利益结果受到了损害，这样认为是合理的。1528年至1529年在维罗纳进行了一次

不成功的冒险，甚至1533年在尼亚波利坦建立的机构在早年也遇到严重的困难。直到1557年，他们仅有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两座修道院。但有一点是他们给人们留下印象的证明：“基耶蒂诺”（Chietino）被普遍用来指天主教中的“清教徒”——无论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在一些地方一度曾用来指第一批耶稣会会士。然而，在圣伊纳爵看来，整个德亚底安会的观念显然太局限，他1536年至1537年在威尼斯认识了该修会的成员，不过在此期间他和卡拉法之间关于这个问题交换了些什么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无法确知的。[\[5\]](#)

另外有两个习惯上和德亚底安会一道考虑的神职班修会：巴拿巴会和索马斯基会。它们的建立是否受德亚底安会的直接指使，现在尚不清楚。积极从事慈善工作这一动机是建立两会的强劲原因，该动机是由战争及战后的贫困、疾病和罪恶在意大利北部造成的苦难景象所激发起来的。巴拿巴会原名圣保罗神职班修会，后来改名是因为该会拥有米兰的圣巴拿巴教堂；在三名创建人中担任领导的是圣安东尼奥·马利亚·扎加利，他是克雷莫纳人，在任牧师前行过医；第二位叫巴尔托洛梅奥·费拉里，曾当过律师；第三位是贾科莫·安东尼奥·莫里吉亚，此人是数学教授。德亚底安会是1533年在米兰创建的，准许首批入会者庄严宣誓。尽管他们献身于牧养工作，特别是关心和教育青年人，但他们采取了如此苦修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有人向保罗三世报告他们过着奇特的生活，保罗不得不于1535年进行了调查。然而，调查结果是他批准了该修会，准许他们不受主教控制并授予某些特权。1537年，它在威尼斯、维琴察、帕多瓦、维罗纳以及别处建立了修道院。会规于1542年制定，但直到1579年才最后定型。在17世纪时，巴拿巴会发展到了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作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们保持集体背诵日课，并为此着专门的服装，罩在牧师的普通长袍上。

圣吉罗拉莫·阿埃米利亚尼于1532年在贝加莫附近的索马斯卡（Somasca）建立了一个神职人员的团体，后来称为索马斯基会，此人曾是军人。他和一批在1527年、1528年和1529年在维罗纳、布雷西亚和贝加莫瘟疫流行期间一道工作的朋友们建立了该团体，反映了他对战争及其社会后果的厌恶。他主要的慈善工作是建立孤儿院。第一批会士没有宣誓。在阿埃米利亚尼于1537年去世时，要不是他的主要追随者安吉洛·马尔科·甘巴拉的努力，这个团体本将作鸟兽散；由于

安吉洛，它存在下来并于1540年得到教皇的批准。1547年，该团体试图并入耶稣会，但未获成功。从1547年至1555年，它和德亚底安会联合，但这两个团体的精神不同，当卡拉法当上教皇后，联合被解除。保罗四世仍然鼓励恢复后的索马斯基会保持独立。1563年得到庇护四世再次批准，1568年通过引进起誓被圣庇护五世提升为真正的宗教修会，并被授予免受主教控制的特权。就像巴拿巴会一样，索马斯基会深得圣查理·博洛梅奥的青睐。索马斯基会一直是个小修会，但在17世纪后半叶通过在大学和神学院开展教育工作经历了一次相当大的发展。

卡马尔多利会、嘉布遣会、德亚底安会、巴拿巴会和索马斯基会的故事说明当时意大利北部在起作用的相互关联的灵性影响和动机之复杂性。前面提到的创建人无一不和别的创建人有接触，无一不和改革派的主教们，如像利波马诺和有影响的吉贝蒂有接触，后者是维罗纳主教，他已辞去了罗马教廷审查教廷官员候选人资格的职务；而卡拉法——实际上他是他们中唯一的南方人——插手是无处不在的。卡拉法无疑做了许多工作使克雷芒七世和保罗三世对所有这些运动始终保持真正的兴趣；他和早期嘉布遣会士有密切的接触，对他们抱同情态度；他是阿埃米利亚尼的灵性导师。为了全面了解意大利天主教灵性更新的这一不断扩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不可忘记两个并不总是得到足够强调的因素：第一是来自过去的修会的修士和修女的灵性影响，第二是16世纪最初几十年间意大利人民在肉体上受到的苦难。例如，圣卡耶坦便受到奥古斯丁会修女布雷西亚的劳拉·米尼亚尼的强烈影响，而劳拉仅仅是当时几个潜在影响大但知名度不如维多利亚·科隆纳之类高的虔信宗教的妇女之一。卡拉法总是和他的姐姐、那不勒斯的多明我会士保持密切联系，他本人为妇女创建了一座经改革的修道院。多明我会托钵修士克雷马·达·巴蒂斯塔是一位有影响的灵性导师，圣卡耶坦向他请教，他很可能推动了巴拿巴会的建立，虽然他在晚年脱离自己的修会招来卡拉法的责备。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在哀叹文艺复兴后期折磨着意大利的战争、瘟疫、饥馑和贫困方面是一致的。每一个“奥拉托利会”，每一个虔诚的团体，每一个托钵修士或神职人员的新团体都关心救济病人、饥饿者、赤贫者、孤儿，关心改邪归正的妓女，关心为梅毒患者建立特别医院。梅毒据说是由入侵的法国军人带来的新的天谴。纯粹的灵性动机当然是占主导地位

的，是基本的，但它自然地、有机地外溢入社会救济的善举中，而此种善举是意大利天主教改革的基本要素。

称作奥拉托利会的神职人员的组织的建立是较后一个时期的事。但这里应该提到的是，1533年未来的罗马使徒、年轻的圣菲利普·内里从佛罗伦萨带着自己奇异的灵性体验来到不朽城罗马，他在该城过着奇特隐士生活达18年，然后才决定受按立担任神职。在佛罗伦萨，他还是孩童时便从圣马可教堂的多明我会士和圣凯瑟琳·里奇接受了对萨沃那洛拉的崇拜，他也从未忘记原先多明我会对他的恩德。但在罗马，他接触到了许多别的，特别是耶稣会的、强大的宗教思想潮流和影响；他的成熟的和发展了的灵性，虽然主要来源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独创性，但也是他多年和所有这些活跃于16世纪中叶的罗马各种各样的灵性力量密切联系所造就的，这些灵性力量是产生上面描述过的各新修会的一种因素。

1535年在布雷西亚发生了一件在妇女宗教团体史上意义颇为重大的事件。一批未婚妇女——来自社会各阶层，大多数是青年，不过也有少数寡妇——组织了一个献身于圣乌尔苏拉的连队。其成员继续过在俗生活，和自己的家庭住在一起，除每月共同举行一次全体参加的团结契合外在自己的教区教堂参加礼拜，而且不着统一服装。但她们应遵守一种会规并服从院长，过退隐的苦修生活，做慈善工作，特别是在自己家里对青年女子进行基督教虔诚精神的教育。1536年，布雷西亚主教批准了该组织，将其置于主教管辖之下并有神职人员给予帮助和指导。鼓动并创立该组织者是圣安吉拉·梅里奇，当时她已经61岁，多年来她的高度的圣洁和苦修及其对善功的追求已广为人知。她吸入的灵性空气是方济各会第三会的，她曾到耶路撒冷朝圣。据说1525年克雷芒七世试图劝说她到罗马工作。她的组织在意大利北部，特别是在米兰，发展迅速，后来传入法国。该组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妇女对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需要的反应，而且在于它是在俗信徒的一次冒险行动，在其中她们拒绝了要起誓的和关在修道重地里的隐修生活。世俗意义上的教育——也许教读写除外，起初并未加以考虑，要到1595年才着手进行。是年世俗意义上的教育在帕尔马的一个社区里开始进行，该社区已实现了修道化的生活，已重新承认了过去的社会差别。这个在俗信徒为开展社会工作和“主日学校”教育而建立的阶级差别已消失的组织在一个世纪内便被转变为一个宗教修会，入会必

须庄严宣誓，申请神职要交纳钱财，有严格的修道重地规定，开办女子学校——这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但并非原先的计划。

圣安吉拉于1540年去世，她似乎曾希望她的连队发展和改编，而1544年教皇的批准诏书为未来的改编作了规定。但实际的发展否定了她的许多基本思想。在意大利或法国，社会或教会关于反宗教改革的舆论都没有为在俗妇女的自由宗教组织这种想法做好准备，这些妇女私下发愿独身，过不脱离社会的退隐生活，但为了开展慈善工作而按一套规则组织起来。首先于1546年规定了制服或修道服；然后于1566年在米兰的一处公共住宅里住院修持；最后由要求发简单誓愿最终到发大愿，以及制定了修道重地之规定，这一切把这个连队改变成了一个修会。在这一过程中，圣查理·博罗梅奥和特伦托会议的教令——所有虔诚修行的妇女必须在修道重地修行的严格规定起了主要作用。按圣安吉拉的思路组织在俗信徒的团体，或甚至没有严格修道重地规定的积极活动的修女组织的时代还没有到来。17世纪时圣简·弗朗西斯·钱特尔和玛丽·沃德建立的组织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随着圣保罗的味增爵创立仁爱女修会潮流开始转变。可是，从圣安吉拉·梅里奇及其少女们中涌现出许多派别的乌尔苏拉女修会，它们在女子教育方面成绩突出。为完全起见，这里应该提一提巴斯蒂塔·达·克雷马和圣安东尼奥·马利亚·扎加利支持过一个成立于1533年的不大的妇女团体，该团体是由原先的女庇护人路易莎·托雷利女伯爵创立的，目的是为帮助巴拿巴会在妇女中开展传道工作。1557年，她们也被迫接受了修道重地之规定。嘉布遣女修会1538年由隆加·玛丽亚创建于那不勒斯，该组织从一开始便执行严格的修道重地规定，隆加是西班牙人，是一位意大利官员的遗孀。

然而，所有这些新修会在重要性上很快便为耶稣会所超过，耶稣会正式批准于1540年建会。在这个团体中，神职班修会的基本思想被推到了极端并为新的成分所丰富。耶稣会是由一名巴斯克人和他的九位同伴建立的，这9人中还有1名巴斯克人，3名卡斯蒂利亚人，1名葡萄牙人，2名法国人和2名萨瓦人，但没有意大利人；这个组织从其构成看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性，并有广泛的目的。耶稣会虽然建立于教会的中心罗马——因为它是建立来奉献给教皇的，而且在意大利这10名“外国的”或“朝圣的”神职人员（最初的耶稣会会士在意大利被如

此称呼）居住了四年之久才实际建会，但在能查明的事件中应归功于意大利的环境者却微乎其微。

伊尼戈·洛佩斯·德·罗耀拉（后更名为伊纳爵）1491年出生于阿斯佩蒂亚一个巴斯克骑士家庭，该家族在罗耀拉及别处拥有财产。他在30岁以前当过军人和侍臣，勇敢、鲁莽过人、乐于——或者说他晚年如此记述——决斗、赌博、谈恋爱。1521年在潘普罗纳抗击法国人的战斗中他腿部受了重伤，痛苦不堪，长期卧床，无所事事。他在此期间没有浪漫事件可参与，阅读了圣徒传奇故事和加尔都西会士鲁道夫的《基督生平》的西班牙文译本，此时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把他的效劳和冒险的理想导入了全新的渠道。伊纳爵努力要在侍奉上帝和他的圣母方面效法圣徒们，因此他康复后便告别了家人，到蒙塞拉特山加泰兰（Catalan）修道院朝拜著名的圣母殿。在这里他向一位法国修士作了一次总忏悔，也许他接受了有益的灵性指导。然后他整夜在圣母像前祈祷，恳求过悔罪和侍奉上帝之新生活。他用自己的骑士服和一名大惑不解的乞丐换得一套乞丐服，然后他退隐到附近的曼雷萨城八个月，在那儿他作了最严厉的悔罪，实行了最严酷的苦行，经历了最不同寻常的宗教体验和启示，这些体验和启示形成了他未来生涯的基础，也为他写作《灵修》打下了基础。在这儿他还发现了《效法基督》，那个北方“新虔敬派”的伟大杰作。这部书和他在第一次病中所读之书是对他的灵性的唯一的直接而无可争辩的文学影响。他离开曼雷萨时罪得到了涤净并得到上帝之启示，他单独赤足穿越意大利到耶路撒冷朝圣（1523年）。在耶路撒冷，他试图加入方济各会并在圣地作托钵修士终其一生。由于未能如愿，他回到巴塞罗那，考虑加入加尔都西会。但是他侍奉上帝之理想逐渐宽阔。他不再仅仅希望隐姓埋名于默默无闻的修道院生活中，他感到一种冲动，要将上帝在曼雷萨教给自己的关于通向上帝之路的知识带给别人。他认识到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学习，这对他的未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此后是他的早期学习阶段，他先后求学于巴塞罗那（1525年）、阿尔卡拉（1526年至1527年）和撒拉曼卡（1527年）。但无论他到什么地方，都有男男女女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宗教，他也已经试图按《灵修》中的计划对他们加以指导。此时《灵修》的雏形似乎已写出。

一个平信徒的这种未经授权的活动几乎肯定会使教会当局不悦。在西班牙有人声言直接得到上帝启示，教会当局早已对此极其敏感。在阿尔卡拉和撒拉曼卡，伊纳爵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统性，不过并未能避免遭一时监禁。但异端裁判所试图对他作为灵性导师的活动加以限制，这促使他在西班牙境外寻找一块比较自由的地方进行学习和使徒式的传道努力。因此，他在巴黎度过了几年（1528年至1535年），这是他生活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在此期间他的眼界从多种意义上看都扩大了。在巴黎，他也在自己周围聚集并组织了一批门徒，他们注定要和他一道建立组织；1534年8月15日，他和其中六人——勒费弗尔、莱内斯、萨尔梅龙、博瓦迪利亚、罗德里格兹和方济各·沙勿略——在蒙马特尔发了那著名的誓愿，决心终生以安贫贞洁守神，在圣地——如不能如愿——就通过效忠教皇，侍奉上帝。在完成学业后，伙伴们于1537年再次会聚并乘船前往威尼斯，此时又有勒热、布勒特和科杜尔加入他们的行列，扩大了队伍。伊纳爵也在威尼斯，他已完成学业，正在熟悉意大利的情况。正是在这时他与卡拉法和德亚底安会有了接触。包括伊纳爵在内的还没有神职者在那儿接受了按立，然后伙伴们分散到意大利各城市开展工作，直到能乘船前往圣地之时。

但由于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他们未能于1537年成行。经过不长时间的等待后，他们决定执行蒙马特尔誓愿的替代计划，主动提出为教皇效力。作为准备，伊纳爵和勒费弗尔、莱内斯一道去罗马察看情况。在罗马郊外拉斯托尔塔（La Storta）的一座小教堂，伊纳爵经历了一次神秘的体验，增强了他的信念，他声称上帝“将他安放在他的儿子身边”；在罗马，他的努力不久便为他本人及其伙伴们赢得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好感。有人从他过去在西班牙和巴黎的生活中收集了材料据以指控他为异端，指控他不负责任，对此他成功地为自己作了辩护，并终于在教会最高层掌权人物们的支持下于1539年初把伙伴们召集到自己身边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对于为使自已成为教皇手中更为有效的工具是否有必要组织一个宗教团体问题，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辩论。到6月24日时他们一致同意组织起来，并在安贫和贞洁之上再加一条誓愿：服从会长。他们起草了一份由五章组成的文件，在该文件中耶稣会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第一次书之成文。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伊纳爵在这一切活动中是主导力量，现在概述的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并非是新的。这份文件交到教皇的谋臣们手中，然而

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其中有些论点似乎新奇；而且当时的基调是反对建立新修会。几乎可以肯定，是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确保了他们获得有利的结果，经过修订他们的建议被接受。1540年9月27日教皇发布《教会军事化管理》诏书，耶稣会由此诞生；耶稣会这个长期以来有人认为有问题的名称应回溯到伊纳爵在拉斯托尔塔的经历。1541年，伊纳爵在伦特（Lent）当选为总会长，当时在罗马的6名成员于1541年4月22日在圣保罗教堂（墙外）庄严发愿。

罗耀拉的伊纳爵从军人到创始圣徒的长期演化过程现在大功告成，从此时起到1556年7月31日去世他一直住在罗马，周密指导他的组织各方面的生活与活动。批准成立耶稣会的诏书审慎地对发愿成员的数量限制为60名。1544年，保罗五世取消了这一限制，尤里乌斯三世在1550年当选后不久便发布了重要的诏书（*Exposcit debitum*）确认耶稣会，该诏书是在前任教皇的领导下起草的，对耶稣会的目的和组织有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两任教皇都热情支持耶稣会，他们对耶稣会的价值甚为赏识，授予了该修会大量的特权。但在保罗五世统治期间气氛变得较为冷淡。教廷撤回了对耶稣会的一些机构的支持，在伊纳爵死后对总会长终身任职制进行了抨击，在罗马的耶稣会神职人员们被迫像德亚底安会士一样集体背诵日课。然而，庇护五世再次允许耶稣会奉行自己的章程。这些，再加上一些补充公告，组成了一份有10部分的周详冗长的文件。这是对1539年起草的短短的五章文件的详尽充实，是伊纳爵本人的成绩，在他的秘书、帕多瓦大学毕业生波朗科的帮助下完成于1547年至1551年间，波朗科起草了大部分内容。1551年，该文件为发愿神职人员大会所采纳，大会期间伊纳爵试图辞去总会长职，但为大会所否决。以后的数年耶稣会迅速发展。伊纳爵在1540年至1549年间写的书信尚存约920封，1549年至1556年间写的书信尚存者不少于6740封。

耶稣会公开宣布的目标有一个特点：都少不了有益的活动。除了培养自己的会士虔诚圣洁外，还有“宣传”——1550年的教皇诏书中加上了“保卫”——信仰，通过布道、教育、组织静修、举行圣事、开展灵性方面的和物质上的慈善工作，包括用基督教真理教育男孩，促进人的善。一切安排都考虑到这牧养的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取消了集体背诵日课和不参加唱大弥撒。斋戒和严厉的肉体苦行不再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耶稣会会士的祈祷要以保持其意志和心思

专注于积极的任务和避免沉思默想的诱惑为条件。在摒弃隐修生活方式和精神方面，耶稣会比当时其他神职班修会都走得更远，这成了对保守的批评者的一块绊脚石，这些批评者有意在一个特殊的修会的特殊政策中看中一条大体上带有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或甚至新教味道的谴责理由。然而，耶稣会实际取得的成功基本上是由于这些多方面的革命性的特点以及对会士的长期培养。

未来的见习修士首先要经过“第一次见习修道期”，在此期间根据章程第一章规定的标准对品格和动机进行彻底审查。这次见习修道不是惯常的一年，而是两年，不进行不间断地隐修，而是在可能的地方，如一家医院服务一段时间和赤足乞食朝圣一次。然后是更为激进的革新：要求在见习期和发愿入会之间进行一段不定期的学习，称为初学院学习。这实际上是一段视情况而定的在人文学科、哲学和神学方面接受教育的时期，也可能包括布道和慈善工作。初学院学生须发安贫、贞洁、服从之简单誓愿，并保证在其院长认为适当的时候正式入会，定为哪一级也由院长决定。如果他到一定的时候被吸收入会，他将受按立并进行为期一年的第二次灵修见习，称为“第三次见习修道期”。此后，在三种可能的方式中，他以其中一种被吸收入会。在知识或文化方面尚未达到最高等级但可用于纯灵性工作者成为“熟练灵修助手”。其他人则发大愿——通常有三大愿——成为正式的发愿会士，此后照例不得被开除。在这批人中，有一部分获准发第四愿，这是耶稣会创始者们原先的意图的反映。第四愿是如蒙教皇差遣到国外传教，个人须直接服从教皇。“发第四愿的会士”构成耶稣会的最内层的核心，是其统治机构。1556年，在大约1000名会士中只有43名发过第四愿；另有17名发过大愿，灵修助手5名。会士等级的划分——还包括熟练在俗灵修助手——是伊纳爵的天才发明之一。从这些等级来看反映了他自己的生涯的几个阶段。还有人提出，他可能受到威尼斯宪法或他在该城时正在威尼斯知识界讨论的“理想社会之宪法”的影响。^[6]

耶稣会的最高权力和对章程的解释权掌握在已发第四愿的神职人员的或他们推选的代表的大会手中。然而，该机构并不定期开会，只是在选举新总会长或在现任总会长召集时才开会。在很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开会处理愚蠢的或严重不称职的总会长。为了便于事务的管理和对选举负责，过去150年的修道制度改革都在限制院长任职期

——甚至本笃会也如此，在按托钵修会的方式召集的神职人员大会中寻求安全感，可是耶稣会的总会长却终身任职，该修会也不知道神职人员大会。总会长任命整个修会的所有重要职务，总会长在终身任职期间只受其选举产生的助手的制约。按规定应有四名助手。实际上，总会长的权力看来至高无上，这就像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廷，可以不无道理地被认为是在教会组织体制方面作为16世纪初叶特征的中央集权新精神的反映。从反面看，服从的美德受到特别的尊重，伊纳爵详尽地反复灌输，他希望完美的服从成为其追随者的特殊标志。耶稣会被构想成教皇手中用来侍奉基督及其教会的工具。同样，一个个耶稣会会士在其院长的掌握之中。然而，死尸和手中的杖的比喻并不是新的，而是取自方济各会的以及其他中世纪的会规。但耶稣会的服从没有严格的修道规章和外部活动受限制这两方面的制约因素，因而可以说是耶稣会的工作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拓宽了其应用的潜在范围。还有一种服从要求思想和精神在许多灵性问题和神学问题上和该修会的特殊见解保持一致，这是比“想教会之所想”这个一般性的责任更紧迫的要求。不过，耶稣会的服从本质上是军事性的概念还不是整个真情。大力关心[会士的]个人性格是章程特别要求院长们的，伊纳爵本人和他的臣民打交道的技巧堪称典范，许多早期耶稣会会士在该修会的谨慎而有弹性的框架内表现出一种真正文艺复兴时代的多样性和性格的独立性。对耶稣会会士的灵性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灵修》，这部书提供了调理和集中意志与感情的系统而有目的之祈祷和默念的卓越方法，从记载清楚显示这方法在无数人身上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效果，永久地重新燃起了新下决心的热情，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伊纳爵本人的转变历程，他的《灵修》起源于这些转变的体验。《灵修》不仅是耶稣会的个人灵修的依据，也是其履行一般的使徒职责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之一。这部书是伊纳爵为培养指导灵修的会士而精心写作的课本。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的拉丁文本于1548年获得教皇的批准，并于同年首次出版。

耶稣会会士发誓除非教皇明令不得接受主教或教会的职务。他们还审慎地拒绝对妇女社团进行灵性指导，伊莎贝拉·罗瑟尔，伊纳爵在巴塞罗那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试图在罗马建立一个受耶稣会管辖的妇女社团，这一考虑欠周令人为难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他们也拒绝直接管理堂区，但迅速在罗马及别处建立了一整套宗教和慈善组织。在这些方面，他们步德亚底安会的后尘。耶稣会进行的特殊的更加广泛

的活动到1556年时已经使这两个修会有所区别了，它们显示了这两个修会在见识和眼力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活动首先是教育和学术，其次是到不信教和异教国家传教，还有和意大利境外的新教作斗争。

耶稣会和初期的乌尔苏拉会一样不是作为严格的或独特意义上的“教育修会”而建立的，如像后来圣约瑟·卡拉桑奇奥和圣让·巴莱斯·德·拉萨勒创立的修会。但圣伊纳爵很了解神职人员的无知带来的耻辱和灾难，虽然他本人并未成为大学者，但他决定他自己的“经过改革的神职人员”应该具有与其神职相称的最高文化和教育水平，能够既对天主教徒也对不信教者切合目前情况深透讲述所传信仰。他自己准备学习，在巴黎时从同学中挑选人共建修会，规定初学院制度，只让最有学问的人成为最高级的会士等并非事出无因。事实上，在有关教會的学问方面，也在人文学科方面，最初的耶稣会会士皆是杰出人物，他们不仅因牧养工作的效率，还因为对教义和圣典的阐述而得到保罗四世的好感。耶稣会会士作为教义和道德神学家以及辩论家在未来的重要地位从创会之时便隐埋其中，并尤其得到1546年莱内斯和萨尔梅龙出席特伦托会议大获成功的预示，他们的成功如此之大以至1552年当他们重返特伦托参加会议时，其身份是经正式认可的圣座神学家，他们在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使耶稣会更加著名。开办章程规定的大学——与发愿神职人员的会院不同，允许享有固定收入是为了在人文学科、哲学和神学方面对会士实施教育。课程可以在社会承认的大学修习，也可由耶稣会的神职人员讲授。第一所大学于1542年在帕多瓦创办，伊纳爵为这所大学起草了后来成为范例的章程。其他大学相继创办，最负盛名者是1551年开办的罗马学院。1556年，保罗四世授权耶稣会向该学院学生颁发学位。

耶稣会精心设计的培训自己的会士的教育制度取得极大的成功，不久其他修会便开始热情仿效。执行现在应该称作男子中学的学校（当时与大学教育重叠）的任务并不包括在耶稣会对男孩进行宗教教育的最初计划中。伊纳爵开始并不急于发展这种学校。但外来的压力推动了办学的步伐。1545年在果阿首次让一批平信徒男孩进入一所耶稣会办的学院学习人文学科，此事由于在印度传教的特殊情况而被认为是正当的。然后在1546年在甘迪亚公爵——后来的圣方济各·博尔贾，耶稣会总会长，当时已秘密发愿入会——的要求下，准许耶稣会会士在甘迪亚大学修一门为平信徒开设的文科课程。最后，应西西里

总督的坚决要求，伊纳爵作了原则性让步，于1548年在墨西拿开办了第一所男子学院，该学院的成功引发了其他无法回绝的办学要求。在伊纳爵去世时，耶稣会有三十余所为青年平信徒开办的学院，已开始了其不可逆转的对欧洲天主教地区的上层阶级实施教育的生涯。与他人相比，伊纳爵最不配被称作“文艺复兴的产儿”，因为他早年坚决拒斥伊拉斯谟的观点；但正是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耶稣会会士将大量经典文艺复兴的学术和人文主义精神引入了正统天主教教育。为了道德和基督教教义而清除古典原著无疑会引起全心全意的人文主义者的反对，但从耶稣会有关基督教教育之目的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经过无数次试验之后直到1599年耶稣会的教育方案《求学要义》才最后定版。

在耶稣会的早期办学中法国有强大的影响。伊纳爵力主坚持巴黎的教学制度，尽管意大利人不了解且常常很不喜欢这种教学制度。罗马学院——其课程不久便对平信徒开放——的首任院长以及早期耶稣会在罗马、甘迪亚和墨西拿的许多教师都是法国人。十分不合常理的是在法国本土耶稣会开初[在办学方面]进展不大。在巴黎，主教和大学由于其法国天主教观点对耶稣会不信任，因为该团体得到教廷赐予的如此多的特权，其活动领域又往往和大学的重叠。1556年时在法国仅有2个耶稣会社团，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在比永，而且后者的法律地位尚有些不确定。另一方面，在葡萄牙已经有4个耶稣会社团，在西班牙有二十余个，在意大利甚至更多。在意大利，耶稣会在克服地位稳固的当地教师和学院的反对方面比在其他地方成功更快，他们不愿意把直接控制的地盘拱手让给用巴黎的方法办学的外国神职人员——他们还把不收费定为一项原则。

认为耶稣会的建立特别是为了和新教作斗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为西班牙人，与注意德国的新教相比伊纳爵更容易注意穆斯林世界和东方。伊纳爵去世时，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和远东的不平凡生涯已经有四年，他的事业代表了早期耶稣会后来也从未衰退的理想。葡萄牙国王及时和热情的支持促进了[耶稣会]在印度（以果阿为基地）、巴西、埃塞俄比亚的早期传教活动，在伊纳爵去世之时，赴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团正在路上，其中有两名受按立为主教的耶稣会会士。还有一个传教团到刚果。伊纳爵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时考虑过在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开办大学。然而在西班牙控制下的

新世界，耶稣会却姗姗来迟，在奥古斯丁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后来到该地区。但伊纳爵在巴黎、威尼斯，还有在罗马期间无疑开始重视新教运动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第一批耶稣会会士赴德国考察情况却不是伊纳爵本人主动倡议的，而是保罗四世明确指示的。在16世纪40年代，勒费弗尔、勒热和博瓦迪利亚作为莫罗内红衣主教和其他教廷代表的助手分别去德国。平信徒和教会的有权有势者都想求教于他们，因此他们被传唤到许多地方，他们与这些人交往，收集了许多自己不了解的关于德国的印象和资料，做了一些和新教领袖建立关系的尝试。但从所有这一切都分别得到了同一结论：只有用新的、更为积极的、自信的天主教精神培养出的新一代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才能拯救德国天主教。不久便出现了请耶稣会办大学的要求。1554年在科隆的关键地点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在德国的]永久居住点。杰出的人物有卡尼修斯和凯塞尔，两人都是低地国家人。就像在巴黎的居住点一样，由于市政当局支持大学和其他敌视新来教师的人的反对态度，该居住点最初举步维艰。但科隆对德国天主教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和低地国家联系密切，而许多早期耶稣会会士来自低地国家。后来建立的居住点，比如在因戈尔斯塔特和维也纳的居住点，开始较为容易。在伊纳爵去世时，耶稣会已在德国扎了根，并得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哈布斯堡王室的青睐，尽管博瓦迪利亚直言不讳地谴责奥格斯堡临时协议。耶稣会还管理着罗马的德意志学院，该学院是在莫罗内红衣主教的鼓动下于1522年建立来培养适合于将来任神职的德国青少年的，是耶稣会办的第一所寄宿学院。后来，耶稣会办了一些神学院，在培养各国在俗神职人员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波尔红衣主教和伊纳爵意气相投，和他本人及其年轻的修会保持联系。他关心布勒特和萨尔梅隆1541年流产了的到爱尔兰传教的活动，尽管在玛丽女王执政时天主教复辟期间派遣一个耶稣会传教团到英格兰的建议未能实现——因为伊纳爵有别的似乎更为重要的事务，但波尔更系统地培养神职人员的计划显然是受到耶稣会的实践和经验的影响，波尔的计划出现在1555年至1556年召开的伦敦会议的教令中，1563年特伦特会议的教令中关于神学院的部分是仿此计划制订的。^[7]

1554年，伊纳爵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因而给他配备了3名助手。纳达尔被任命为代总会长，到德国以及别处进行了重要访问。然而，在伊纳爵去世后当上代总会长的却是十位创始人之一莱内斯，因为大会由于保罗四世制造的种种困难而推迟，1558年他才正式当选为第二

任总会长。在伊纳爵去世时大约有1000名耶稣会会士，其中大多数仍是见习修士和初学院学生。他们分布在100个各种各样的机构——发愿会士的会院、学院、居留处中，组成大约12个教省，覆盖了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此外还有印度、巴西和刚果。也许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会所不在欧洲，但住在罗马的会士不少于170名。建立学院和机构的要求源源而来，远非耶稣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所能满足。但这个修会在某些方面仍处于试验阶段。耶稣会里的意大利成分仍不强。也许直到第一位意大利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1581—1615年）任职期间耶稣会章程的详细条款才得以完全和顺利实施，这个修会才以其全部成熟了的特性站立在世人前。然而，耶稣会的独一无二的性格和巨大的潜在在1556年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耶稣会是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的先锋，在牧养方面具有积极的活力，有国际性、自信、坚定、不屈不挠，同时灵活、变通、讨人喜欢、现代化。其创始人教导耶稣会要和教会和政府两方面的最高当局建立良好关系并把他们的权力和支持善加利用。但是，按其创始人的传统耶稣会也决意不让任何事情妨碍其按章程的目标和精神服务教会的目的。在教会中，耶稣会处于重要而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注定不仅在推动反宗教改革运动方面，而且在近代天主教的生活与精神的每一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成西 译）

[1] H. 杰丁：《青年孔塔里尼教堂生活的经历》，1951年。

[2] 意大利语，意为“小花”。——译者

[3] 意大利语，意为“小兄弟”。——译者

[4] 见本书边码第258页。

[5] 请比较P. 帕斯基尼的《S. 加埃塔诺·蒂耶内、吉安·彼得罗·卡拉法和德底安会固定神职人员的起源》（1926年，第137—139页）和耶稣会P. 塔基·文图里的《意大利耶稣会史》（第2卷，第一部分，1950年第2版，第79—80页）。

[6] J. 克里恩、S. J.：《圣伊纳爵和波尔红衣主教》，*Arch. Hist. Soc. Jesu*, xxv（1956年），第11—12页。

[7] J. 克里恩、S. J.：前引文；V. P. 布拉塞尔、S. J.：《特伦特会议神学院改革方案的前奏》（曼雷萨，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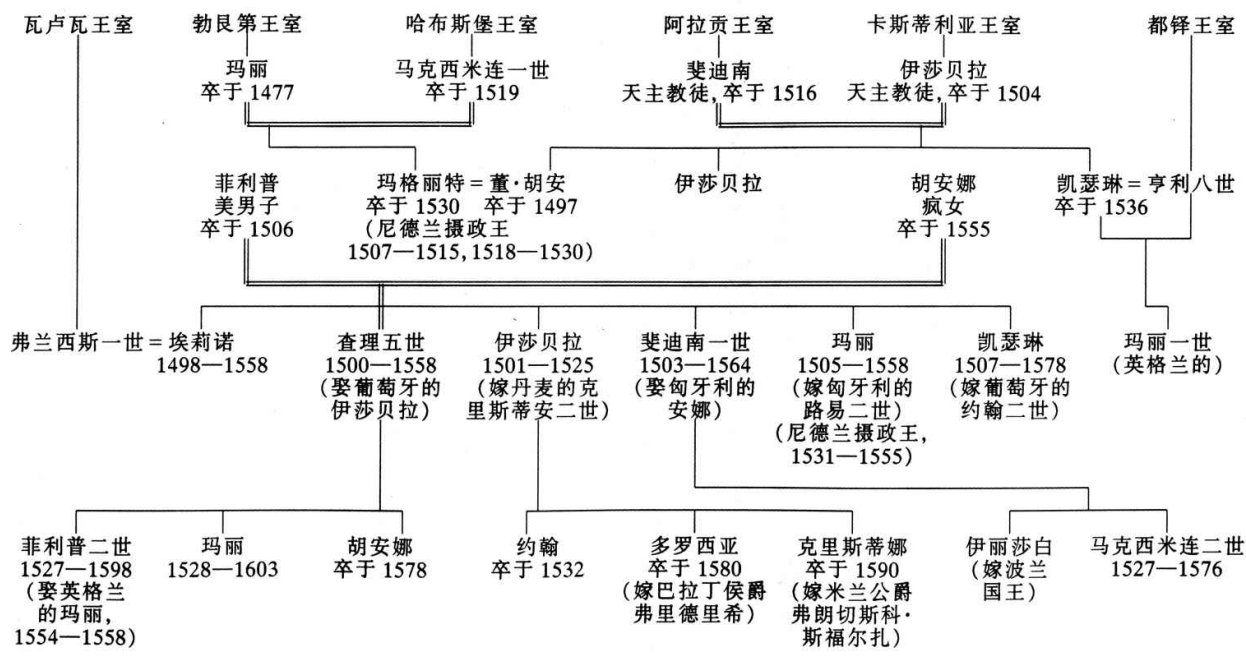
第十章 查理五世在欧洲的帝国

16世纪是先知辈出的时代。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解释了上帝之道，对罗马天主教认为只有自己的解释才是唯一有效的主张提出了挑战。这些先知们在诺克斯、科利尼、奥兰治的威廉那儿找到了自己的武装保护者。天主教会则用自己的军队、用罗耀拉、用菲利普二世、用异端裁判所来反击他们。但是，在宗教冲突爆发为公开的战争以前有一个多世代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生活是由一位大不一样的为上帝而战的斗士所主宰：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此人是中世纪最后一位皇帝，对他而言，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团结既是他生活的理想目的，又是政策的一个实际目标。伊拉斯谟在献给查理的著作《圣马太释义》的题词中写道：“恺撒不是福音书博士，而是福音书的保护人。”查理皇帝本人则于1535年7月在巴塞罗那自称为“上帝之旗手”，当时他在该地起锚出征，要把突尼斯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来。

查理满有理由抱这样的信念。总理大臣加蒂纳拉1519年[对查理]说过：“上帝把你送上了建立一个世界君主国的道路。”联姻和继承给予查理这独一无二的机会。在15世纪时，奥地利和勃艮第之王室已在北欧联合，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王室在南欧联合；但16世纪初勃艮第的腓力和卡斯蒂利亚的乔安娜的婚姻仅仅由于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死亡才产生了北欧王室和南欧王室之间类似的联合。结果，查理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的财产，奥地利、蒂罗尔和德国南部一些地区、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继承了西班牙及其新获得的美洲殖民地和西班牙在意大利、西西里、萨丁尼亚、那不勒斯。对查理来说，这些继承是上帝对自己的信赖，是上帝之意图的证明，也是实现这一意图的物质手段。其他人，虽无正当的资格，却已经妒忌地对属于他的一些地方提出了要求。但在上帝帮助下，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他总是能为其继承人保持他继承的财产不致减少。查理在给儿子的秘密教训和遗嘱中如此写道：在查理统治期间的此时或彼时，他本人或其家族的某一成员要么作为统治者，要么作为统治者的配偶，端坐于欧洲差不多每一个王室的王座上。王室的联合已经作为实现上帝之旨意的有效工具而出现了，而且王室的联合是这位皇帝毕生喜爱的

政策，是他为增强在欧洲的力量而自由选择的唯一的一项政策。查理在1548年告诫儿子说：“因为上帝最着力向[王侯们]推荐的是和平。”他对基督教王侯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迫不得已。

查理五世的家族



只有在反对异教徒时才有正当理由发动进攻性战争。查理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团结的基督教世界反对外部敌人穆斯林土耳其人，后来还要反对内部敌人路德派异端分子，他认为这任务是上帝指派给自己的。[\[1\]](#)为此目的，勃艮第、奥地利和西班牙各王室在他那里奋发起来，团结起来。为此目的，查理支持其[家族]成员的合法权利，甚至不顾国家利益的需要：他拒绝在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案中给予前者照顾性考虑，并坚持推进其侄女多罗西亚对丹麦王位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达数十年之久。为此目的，他还坚持要其家族成员像他自己一样为他的帝国政策牺牲自己。他在给其妹妹匈牙利的玛丽的信中就是如此写的，因为1535年玛丽对拟议中的把他们年仅12岁的侄女丹麦的克里斯蒂娜嫁给米兰公爵提出抗议。

在大多数查理的同时代人看来，他的帝国的地位并不具有这种超凡的意义；那些负责让这位年幼的王子顺利继承如此众多土地的人也不作如是观。查理于1506年丧父，当时年仅6岁；他从其父那里继承了勃艮第王室的财产：弗朗什孔泰连同获得勃艮第公国（自1477年起便

在法国人手中）和当时称作帕德卡诸邦后来从16世纪30年代才叫做尼德兰的地方的权利。这些地方是卢森堡公国和布拉班特公国，佛兰德、荷兰、泽兰、埃诺和阿图瓦的郡县，连同一些较小的郡县和贵族领地。查理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虽然活到1555年，但她患精神病不能执掌政务。结果，由这个孩子的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通过其女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萨伏依公爵未亡人摄政。1515年1月议会贿赂马克西米连宣布王子成年，玛格丽特的摄政随之结束。

此事发生之后不出一年，阿拉贡的斐迪南去世（1516年1月23日）。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全部遗产现在落入勃艮第的查理手中。对谢夫尔的领主纪尧姆·德·克罗依、查理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而言，这问题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出乎意料的。10年多一点以前，勃艮第的贵族陪同查理之父菲利普到西班牙，帮助他实现了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要求。自从那时起，西班牙各大公便出入于勃艮第朝廷，并被允许获得金羊毛勋位。西班牙商人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成了熟悉的人物。对谢夫尔和在其谋臣班子中的贵族而言，是否接受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的问题从未出现过；这只是一个如何实现继承的问题。谢夫尔是古老的瓦龙贵族的领袖。从文化、家庭的联系以及在法国边境附近甚至那边占有地产而论，他们有亲法国的传统。现在，谢夫尔必须使“英格兰”派顺从，玛格丽特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统治的。他必须争取马克西米连和亨利八世的充分合作，并诱劝弗兰西斯一世保持善意的中立（1516年12月3日签订了努瓦永条约）。

谢夫尔没有加蒂纳拉和查理的帝国使命意识，所以他能听任法国控制意大利北部，只要这意味着和他的强大的邻邦保持和平与友好。当他终于在1517年9月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宿敌盖尔德斯的查理（Charles of Guelders）签订了停战协定时，勃艮第的外交就已经达到了主要目标——欧洲和平与排除对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一切干涉。

西班牙本身的形势则问题多得多。西班牙各国王的联合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各王国的联合，而且在每一个王国都仍然有强大的势力乐意看到分割而治的局面的回归。在卡斯蒂利亚，虽然伊莎贝拉作了努力，但国王的权力仍旧远未牢固确立。在每一位国王去世之时，大公间和城市间的旧有的对立都爆发成为公开的冲突。自从伊莎贝拉去世以来，卡斯蒂利亚的摄政大权便掌握在她年迈的大臣枢机主教、托莱多大主教西门内斯·德·塞斯内罗斯手中。在斐迪南死后，西门内斯

很清楚，查理只有早日到达西班牙才可能保证顺利继承王位。努力要在空位期捞取利益的贵族们试图重新获得他们过去对城镇的控制权。托莱多和巴利亚多利德都发生了反叛，拒不服从国王在城市政府中的代表——镇长。枢机主教试图招募3万民兵，但遭到来自为自己的权力感到担心的各城镇和大公们两方面的破坏。西门内斯害怕引起更严重的麻烦只得让步。最困难，也最激怒人的是王室任命官职。西班牙人指控尼德兰人贪婪和钻营官职。但事实上，除了在少数实例中，在布鲁塞尔的宫廷谨慎地做到了手下留情；不过在西班牙，西门内斯的秘书写到，不赐给封地和奖赏（mercedes）便不可能进行统治。

谢夫尔用了18个月为查理出发[到西班牙]作准备，对西班牙来说这一段空位期太长。当查理于1517年9月到达西班牙时，支持他的人已经失望，而贵族和各城镇则情绪消沉，对这位外国人已无可免除的统治感到畏惧。枢机主教兼摄政王奄奄待毙，正如查理宫廷的弄臣恶意地说的那样，是因为国王的到来高兴得要命。查理本人则年轻、丑陋且缺少经验，不会说西班牙语，为勃艮第的谋臣和朝臣所包围，一开始就没有给西班牙人一个好印象。西班牙人把勃艮第宫廷的豪华、比赛和舞会的奢侈和天主教国王们的朴素节俭的习惯作了对照。虽然只有三个主教管区给了外国人，但其中包括托莱多，该管区给了谢夫尔的亲戚，此事很容易被认为是为勃艮第人而劫掠[西班牙人]。还有，曾经在尼德兰的西班牙人看来比在西班牙为国王的事业服务的西班牙人更受优待。1518年2月，巴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向查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要求和很直截了当的意见，作为该地效忠和分三年付清的一笔60万达卡的款项的条件。朝廷爽快地答应了，纵使关系不热情友好，查理现在毕竟是得到承认的卡斯蒂利亚国王了。

阿拉贡王国的议会比卡斯蒂利亚的议会保留了甚至更大的自由。与在卡斯蒂利亚相比，[谢夫尔]费时长得多才和萨拉戈萨的议会和巴塞罗那的议会达成妥协并从这两地分别获得20万达卡和10万达卡的款项。谢夫尔不愿在巴伦西亚重演这样的拖延。查理戴上了阿拉贡的王冕，他现在继承了古阿拉贡帝国、巴利阿里群岛、萨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这是一个诸王国的联合，而每一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义务和仇恨。必须保卫意大利南部不受土耳其人侵犯，这就必然使查理五世的帝国和奥托曼帝国发生冲突，更不用说查理自认为是基督教世界的卫士了。阿拉贡人和安茹人都对那不勒斯提出针锋相对的要求，这就迫使查理和法国冲突，而这一冲突是谢夫尔的纯从

勃艮第着眼政策至少可以暂时避免的。对土耳其人的防御必然转化为控制地中海中部的斗争。对法国人的防御必然转化为控制意大利的斗争，并转化为一——正如查理皇帝的谋臣加蒂纳拉和格兰维尔后来所说的那样——争取在整个欧洲的霸主地位的斗争。即使查理不被选为查理皇帝，卡斯蒂利亚和法国的传统友谊（尽管卡斯蒂利亚人恐法，但友谊仍然维持至今）现在不可避免地破裂了，与此类似的是瓦龙贵族的法国和勃艮第亲善的政策也破裂了。

查理五世的继承还有最后一步：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领地和被选为德意志国王，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由于教皇支持弗兰西斯一世，而且选侯们仍未拿定主意，所以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提议，与接受尼德兰、西班牙和半个意大利的强大统治者相比，更容易劝诱教皇和选侯们接受查理之弟斐迪南。查理从巴塞罗那作出的尖锐的回答读起来就像他的统治纲领。他写到，经验说明，即使像马克西米连这样德高望重而又成功的查理皇帝在保护他的世袭财产和帝国权利方面也经常遇到麻烦。但是他，查理，掌握着他全部伟大的王国和领地赋予他的权力，将令王侯们感到敬畏，将获得帝国臣民的真正顺从，将打败信仰的敌人。与获得对基督徒的控制权相比，对斐迪南和他本人而言，这都是更大的荣耀。但查理允诺要为斐迪南当选为罗马人国王，也就是说作为皇帝称号之假定继承人而努力。最后，查理被德意志选侯们一致选举为国王（1519年6月28日）。

说来奇怪，这一胜利是新上任的总理大臣皮埃蒙特人梅尔库里诺·阿尔波里奥·迪·加蒂纳拉的胜利，他于1518年受任命担任现职。加蒂纳拉是才华出众的律师，极善于行政管理，热衷于人文主义，崇拜伊拉斯谟，在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服务期间受到器重。在以后的12年间，在形成他的主子的政治理想方面他的功劳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当时查理还处于年轻气盛的成长阶段，按勃艮第宫廷的传统骑士般地追求个人荣誉。加蒂纳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在对西班牙议会和尼德兰议会的演说中，在给查理皇帝及其谋臣班子的备忘录中，一再重申他的信念：皇帝之称号赋予查理统治全世界的权力，因为这是“上帝亲自规定的……是我们的救赎者基督之降生、生平和受死所证明了的”。这是但丁的帝国观念的复活。加蒂纳拉就像他那学识渊博且有历史意识的本国同胞但丁，认为帝国权力的中心在意大利。不是个人拥有米兰或其他领地，而是意大利各国和全体基督教王侯的支持（无

疑这是由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力量所保证的）将确保皇帝作为全世界的道德和政治领袖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查理把这些见解变成了自己的见解，但很少有这位意大利人的人文主义学识，而是更加强调他的地位的宗教和王朝统治的方面。1530年加蒂纳拉去世时，查理已在智力和道德上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了。此后他再也不需要总理大臣了。由于长期掌权，他的责任感提高了，他那迟钝而少创见的头脑变得自信且对政治驾轻就熟，他在理想的专一和策略上的灵活与精明方面都胜过他的同时代人。他34岁时给他的妹妹玛丽（匈牙利皇太后，不久前被封为尼德兰的摄政王）写了一封信，就她在摄政时遇到的麻烦进行宽慰，他写道：当她的经验和他一样多时，她就不会再为困难而感到绝望了。若干年后，玛丽向他（她）们的弟弟斐迪南抱怨说：“查理皇帝难以相处，事情要是不出自他，他并非总是认为是好事。”所以在提香的著名人物画中，这位查理皇帝显得自信而专横，而在晚年有点多疑。

查理的同时代人，甚至他自己领地上的人，并非都能接受他和加蒂纳拉的观点：帝国为基督徒间的和平，为保卫基督教不受穆斯林和异端分子的侵犯而奋斗。加蒂纳拉对意大利的政策被归之于他在米兰公国拥有地产。在帕维亚战役后，他极力主张兼并多菲内和朗格多克，此后他的皇帝是[帝国]道德领袖的政策便大可怀疑了。查理皇帝有一个外甥女嫁给米兰公爵，查理的部队控制了米兰的要塞，因此他声称的他是在保卫米兰的独立，在威尼斯人和法国人听来便是缺乏诚意了。欧洲主要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查理的帝国，因为这种看法，欧洲唯一的另一个力量堪与帝国抗衡的大国法国便永久敌视帝国，较少独立的英国、丹麦以及意大利诸国断断续续地与帝国为敌，充其量只维持冷淡的友好关系。还有，查理坚持其宗教目标，坚持宗教目标与政治目的之融合，这就有助于使两个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解决的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德意志各王侯的关系与和教皇的关系。在德意志王侯看来，查理的政策代表了帝国的压力和宗教的压力的双重威胁；由于天主教王侯对查理的政治权力感到同等的恐慌，所以他们从未给他以政治上的支持，而只有政治支持才能使他解决宗教问题。

教皇似乎是“上帝之旗手”的天然同盟，查理也从未放弃教皇将证明自己果真是如此的希望。但是，克雷芒七世和保罗三世作为意大利王侯，看到那不勒斯和米兰在一个人手里联合起来，就和他们12世纪和13世纪的前任们一样感到恐慌。所以，他们从未停止过和法国密

谋反对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查理完全明白这一事实。他永远不明白的是教皇作为基督教会的精神领袖从未考虑过他的下述主张：他是折磨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冲突的最高仲裁人。在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查理的神学家们竟然努力和新教徒达成一项对所有基督教徒都有约束力的妥协，这是不能接受的^[3]；一个世俗王侯居然在改革教会方面采取主动并扬言要召开一次公会议，这是不能容忍的。在土耳其人和新教的威胁下，查理皇帝和教皇结成了不稳固的同盟，只有一次，即在1527年，潜在的敌意爆发为公开的灾难性的战争；但查理皇帝不能诱导教皇在他的政策上全心全意合作却是其地位的一个主要脆弱点。

查理五世的帝国的存在——把一些国家联合在一个人的统治下——就这样产生了一些单个的国家要么从来不会面对的，要么即使面对也容易处理得多（正如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的问题。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有治理这个各式各样的国家的大杂烩这一史无前例的问题。归根结底，查理五世的帝国只存在于查理皇帝其人里。它甚至不被称为帝国。帝国这称呼是保留给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Empire）的，这里用一个大写字母把它和查理五世的帝国（empire）区别开来，而查理五世的帝国应该明确地被理解为一个纯现代的称呼；查理五世的同时代人万一要用一个集体的名词来指他的全部领地，那么他们用的是君主国（*monarchia*）。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对那个令人崇敬的组织含义是混淆不清的，这是因为它突然有了这样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但至少对加蒂纳拉而言，有一点是清楚明白的：帝国的各个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联合必须有一种功能上的联合与之相称。就教育和经验而论，加蒂纳拉属于罗马律师的派别，该派大多数人是弗朗什孔泰人，借助于建立议会和法庭并通过它们来管理各省，他们帮助勃艮第公爵们把尼德兰融接成为一个功能上的同盟。^[4]他作为勃艮第总理大臣，其权力现在扩大到查理的全部领地。在各议会中，上院（the Council of State）是大贵族能成为其成员的唯一的议会，上院就一切重大问题向查理皇帝提出建议，现在加以扩大，不仅接纳勃艮第议员，也接纳西班牙和意大利议员。颇有特色的是，德国人视自己的查理皇帝为全世界的立法者，“沿着好皇帝查士丁尼的道路”，改革法律，简化司法程序，以便全世界都想要采用，并有“可能说只有一个查理皇帝，只有一种普世的法律”。

这一幻想并无成果。加蒂纳拉设大司库的计划也无成果可言，按他的计划皇帝所有领地上的金库都应向大司库结账。在加蒂纳拉去世和他的总理大臣的职务撤销以后，另一些全帝国的机构甚至从原来已达到的不大的规模退缩到更小。帝国之中央控制越来越成了查理和他挑选来就某特定问题征求其意见者的个人的控制。大量的文书工作（迄今为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出版了）由两个独特的机构处理：西班牙国务秘书处和法兰西秘书处。前者继续按天主教国王们开创的传统办事，负责西班牙、意大利和地中海的事务；后者以勃艮第传统为基础，负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全部事务。原来的德意志帝国总理府继续在纯技术性事务方面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治上从属于法兰西一勃艮第秘书处。这些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两个秘书处权力大增。西班牙秘书长弗兰切斯科·德·洛斯·科波斯（Francesco de los Cobos）和法兰西一勃艮第秘书长、格朗维尔领主尼古拉·佩雷诺（Nicolas Perrenot）都是大有能力的人，但在1530年以前，他们的职责和个性都不能使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堪与加蒂纳拉相比。

查理，而且只有查理，越发代表帝国。他就像16世纪大商人家族的族长般统治这个帝国，在这样的大商人家族中晚辈们在公司的驻外分部任主管。让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在他的领地上任行政长官、摄政王甚至国王好处很大。他们在当地比甚至最大的非皇族血统贵族更容易被接受，卷入当地世仇的可能性也小得多；他们受雇用担任他的个人代表是与查理本人的王朝起核心作用的观点相一致的。1529年以后，尼德兰、帝国和西班牙，至少在名义上总是托付给哈布斯堡皇族成员或其配偶统治。只有在意大利领地上任命的总督不是皇族成员。结果，除了在一次灾难性的事例中^[5]，皇帝的政策都是成功的，他的家族忠实地为他服务，他任命的两位尼德兰行政长官，他的姑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518—1530年任尼德兰摄政王）和妹妹匈牙利的玛丽（1531—1555年任尼德兰摄政王），都是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人。

如果查理五世信任自己的行政长官和总督们，如果他不像他那多疑到病态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准备让他们任职数十年并支持他们压制当地的反抗，那么他依然把对政策的最终控制权和行政权完全留给了自己。他及其秘书们每周和总督们通信一次。信使传递信件必须长途跋涉，众所周知，查理皇帝作决定磨磨蹭蹭，总督们和将军们疯狂地要求更充分的权力处理紧急情况；查理不顾这些困难，坚持一切重大决定亲自作出，只依靠他从一个领地到另一个领地作经常性的视察时

随行的谋臣们。这一制度实现了他所期望的控制，但其代价是丧失了许多机会和效率很低。至少有一次，在科穆内罗斯人叛乱期间几乎毁灭了他在西班牙的权力。[\[6\]](#)

除了这些定期政治通信，行政长官和总督们还受任职时得到的指令的约束。他们必须听从查理为他们任命的枢密谋臣团的意见。他把一切重要的任命都留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领地之施政都从不是总督的施政，而总是查理皇帝之施政。他在1548年写下的政治遗嘱中告诫儿子不可让行政长官们窃取大于他授予的权力；菲利普一方面不可全信对他们的种种抱怨，另一方面又不可不听，这样总督们才不至于独断专行，王侯们才不至于对正义感到绝望。这不失为正确的意见，查理本人适当而合理地遵循之，但后来被菲利普二世推到极端，成为怀疑和口是心非。

查理皇帝决心不仅控制公职的任命权，而且控制一切其他形式的恩惠的施予权。他对有功者迟迟不给奖赏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位大臣或仆人总是能指望最终得到奖赏（merced）：有俸圣职、称号、津贴、城堡或较小的官职或闲职，查理可用这些使一个人成为富人而对他本人不造成什么损失。因为希望得到这些奖赏，大领主和大臣们都愿意为查理皇帝效力，而地位较低者则依附于大领主和大臣。总督和行政长官们，有时甚至一些行省和城市，都在查理皇帝宫廷中安插有代理人，通过在谋臣和书记中分送礼品（此举有远见卓识）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这些人中有些成了富人。查理本人认为，科波斯没有接受礼品却得到许多而且要求得到更多。小格朗维尔（他继承其父成为查理皇帝之主要谋臣之一）并不拒收礼品，虽然他喜欢假装拒收。据说格朗维尔父子聚集的财产多达100万达卡。

查理处于一切恩惠的分配者的地位，大可说明他的臣民们为何热烈渴望他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如任命施予权在查理首次到西班牙时是西门内斯最重要的问题，它仍旧是他所有的行政长官和总督们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尼德兰的玛格丽特和玛丽得到了一份名单，俸饷和官职出缺时只能授予名单上有名者，而且必须严格按名单所列顺序授予。玛格丽特提过抗议，但无结果。假如她不能奖赏那些支持她并为她效力的人，她便得不到为查理皇帝办事时她所需要的支持。她说，她自己作出的任命和赏赐被查理皇帝撤销，她的信誉因此受到严

重损失。最后，她提出至少获准处置1/3的俸饷，但即使这一要求也被查理驳回。

毫无疑问，查理皇帝的政策在把对其领地之政治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但却引起其臣民经常的不满，总督们的工作也因此异常艰难。皇妹玛丽对此有24年的经验，她在摄政结束时写到，臣民们更愿意服从查理皇帝本人而不愿意服从他的总督，因为无论总督有多么健全的见识，总督对他们用处不如查理皇帝大，所以反对总督的人总比支持他的人多。

然而，查理皇帝未能为帝国建立一种非个人的组织制度，并非仅仅是他对自己的职责所持个人见解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他统治下的不同领地所持态度造成的结果。他不是亚历山大，也不是拿破仑，他们的帝国是自己征服的；他是自己的每一块领地之世袭的合法的统治者，他已发誓要维持其法律和风俗。西西里人以其自愿效忠阿拉贡王室而感到自豪，他们暗示假如他们的特权得不到维护，他们就要再举行一次西西里晚祷事件，这使西班牙人吃惊。西班牙人坚持认为西班牙国王的称号胜于德意志查理皇帝之称号，希望查理在西班牙时不用后一称号。德国人对外国军队特别疑惧，而且他们担心查理皇帝正在安排儿子的“西班牙王位继承”，这一担心是查理在其统治末期在德国丧失权威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帝国之最初缔造者尼德兰人甚至抵制把尼德兰各省联合为一个较紧密的联邦的尝试。1534年，总督向议会建议组建一个防御性联盟，由各省定期捐资维持一支常备军。这一建议遭到拒绝，议会说：“因为假如我们接受这一方案，那么我们无疑将更为统一，但是将受到法国那样的待遇。”即是说丧失自由。查理皇帝各领地之自主独立不仅是对中央集权而且是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当查理抓住出现的每一次机会来增强自己在每一块领地上的权力时，他从未试图向任何领地上的臣民的自由发动全面的攻击。任何一种建立一个帝国政府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这样的攻击。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查理未能为他的帝国提出一种经济政策，甚至未以同时代的单一国家的统治者同样的方式构想他统治下的各领地之经济统一，这不足为奇；而这些统治者已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王国的经济统一了。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只有加蒂纳拉才理解帝国之全部含义。他曾提出发行一种通用的帝国通货，但毫无结果。

查理皇帝在经济事务上一贯采取最小阻力路线，这是由既得利益、地方传统和帝国政府之压倒一切的财政上的需要决定的。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固然坚决维护，但颇具特色地留给了卡斯蒂利亚人。然而，卡斯蒂利亚却不能提供西班牙在海外的殖民者所要求的产品。卡斯蒂利亚人远不能利用为进口产品支付黄金和白银的第一流的殖民地市场，他们对出口感到惊慌，把自己的王国内的高价格归因于出口。1548年的议会甚至请求禁止向西印度群岛出口，因为现在殖民者应该已经有充分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这正好与重商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态度背道而驰。皇帝没有接受该请求。早些时候（1542年）的一项禁止从西班牙出口一切原料的请求他也没有接受，这项请求如果被接受，将会切断把他的最重要的两块领地联结起来的经济联系：西班牙对尼德兰的羊毛贸易。让查理的所有臣民都可参加西班牙殖民地贸易本来会使帝国的各部分都得益。卡斯蒂利亚人垄断贸易的结果是法国、英国、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和制造商在平等条件下同加泰罗尼亚人和尼德兰人在向卡斯蒂利亚提供出口西印度群岛的商品方面竞争。也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维持往日的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帝国的经济联系的残余，该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曾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业帝国的竞争对手。巴塞罗那已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该地商人仍在奥特朗托和巴勒莫购买谷物，在特拉帕尼购买盐，在那不勒斯和墨西拿购买丝绸。但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的船只更多资本更大，他们已摧毁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卓越地位，而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宁愿把原料卖给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因为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工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制成品。[\[7\]](#)

1492年天主教国王们驱逐了犹太人；西班牙军人和行政官员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驱逐犹太人使西班牙失去了其公民中本来可能在帝国经济生活中起同样作用的唯一重要的人群。填补犹太人在西班牙的消失留下的真空者，首先是德国南部的银行家们。1524年，已经拥有蒂罗尔和匈牙利大多数矿业资源的福格尔家族租得了西班牙国王从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和阿尔坎塔拉三个骑士团的岁入。到[查理的]统治结束时，福格尔家族还控制了瓜达尔卡纳尔的银矿和阿尔马登的汞矿。德国第二大的银行业家族韦塞尔家族偶尔也对这些租借感兴趣并努力要在委内瑞拉按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s）的经典方式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8\]](#)甚至于比德国人更重要的是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于1528年从为法国效力

转而为查理皇帝效力，这就给热那亚人以机会。在以后的数十年间，琴图里奥尼家族、帕拉维西诺家族、斯皮诺拉家族、格里马尔迪家族以及其他许多家族不仅被公认为查理皇帝的银行家，而且是西班牙控制的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贸易商。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每一个重要港口都有热那亚商人定居。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效力对查理皇帝来说，犹如多里亚的战舰在海战方面的效力一样不可缺少。这是他们对其宿敌加泰罗尼亚人的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北方，尼德兰无疑从和西班牙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帝国的财政左右了安特卫普的货币市场。但帝国的政策证明对尼德兰人的经济利益的帮助并不如他们希望的那样有效。1523年，查理的妹夫克里斯蒂安二世被逐出丹麦。此事件以后，在帝国境内没有别的地方利益的分歧之明显胜于荷兰与波罗的海沿岸列强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关系了。^[9]对荷兰而言，其船只自由通过松得海峡意味着繁荣；关闭该海峡则带来沉重的损失、失业和饥饿，因为尼德兰人依靠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看来，丹麦不落入敌国，特别是其死敌吕贝克人手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商人们看来，荷兰的困难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机会，因为吕贝克人自己在与荷兰交战时狡诈地给予他们影响深远的让步。在查理皇帝看来，丹麦问题首先是他的家族的权利问题。他先支持克里斯蒂安二世，后来又支持克里斯蒂安的女儿多萝西娅及其丈夫巴拉丁领地之弗里德里希重新获得王位的努力。他希望通过他们在北欧扩大帝国的影响，即使把荷兰卷入并不需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也在所不惜。只有在布鲁塞尔的匈牙利的玛丽的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使各方和解，有时甚至威胁说查理皇帝之全部军力将参战，这种虚张声势地吓唬倒也奏效。然而查理皇帝并不愿意全力参战。在他看来，与法国和土耳其问题相比，丹麦只不过是次要问题；他颇想让尼德兰自己去和丹麦与吕贝克打交道，他自己只保留支持其甥女[对王位的]要求的权利就行了。所以，二十多年以后尼德兰和丹麦之间的关系问题才在斯派尔和约（1544年）中得到最终解决，而坚持要查理皇帝为他的所有领地签字的是丹麦人。这是政治和经济观念对帝国的王朝观念的胜利，不过查理皇帝是极不情愿地接受该条约的。

在帝国的不同地区都有强大的势力愿意支持查理和他的帝国政策。勃艮第高级贵族们在为自己的王侯谋取成功地继承他的诸王国的王位方面效力甚大，即使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加蒂纳拉和查理的基

基督教理想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意味着他们的骑士教养在勃艮第宫廷中时髦地成为寻常事物，他们也始终不渝地忠于查理皇帝。为基督教最强大的王侯效力，有机会被任命为行省的长官或者甚至被任命为总督，或者率领他的军队和法国人、土耳其人异端作战，这就足矣。西班牙贵族们也这样想。他们早期对查理的敌视很快便转变为热情支持。他们对查理发动十字军式的圣战的理想和他的帝国理想之同情胜过尼德兰人。卡斯蒂利亚人难道不是在自己人的土地上和摩尔人作战吗？阿拉贡人难道不是通过征服意大利诸国而获得权力名声，通过轻易得到西西里人和那不勒斯人的财产或教会圣俸而成为富豪吗？骑士游侠生活与掠夺的双重诱惑使西班牙人在欧洲成为帝国主义分子，正如在美洲使他们成为征服者（conquistadores）一样。而对意大利贵族来说，晋升和高官的吸引力并不更小。查理皇帝作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国王，是他们自己的王侯，这正如他是西班牙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一样。贡扎加家族、佩斯卡拉家族、德尔·瓦斯托家族宁愿当帝国总督或殖民地总督而不愿当雇佣军司令。

律师是仅次于高级贵族的查理皇帝之最热情的支持者。他们受的是以帝国和专制为传统的罗马法教育，其中不少人是人文主义者和伊拉斯谟派，他们发现把对查理五世关于帝国的主张的同情和在帝国各级议会中的灿烂生涯的前景联系起来并不困难。对查理统治下的各领地上的人口之其他部分而言，属于一个世界帝国的好处看来较可怀疑。有些人，特别在商人阶层中是能够利用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之间的政治联系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帝国各部分间的经济联系极少依赖于帝国的政治结构或查理的政策。在查理皇帝旗帜下在西班牙步兵团中服役的数以百计的西班牙下级贵族（hidalgos），代表的是一种西班牙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普世帝国主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帝国似乎是基督教世界内部和平的最后机会，若干世纪以来，这一热切的渴望就把自己和罗马帝国的名字联结在一起。而今，它在查理五世身上实现了。或者说，对那些欢呼查理皇帝或皇子巡视各国时进入自己的城市的人群而言，似乎在他身上实现了；对那些向他致敬的凯旋门来说显得如此，在这些凯旋门上，当地的拉丁文学者们展示了自己的学识和对“罗马帝国之光复者”和“全球未来的统治者”的热情。但是，查理未能给予他的臣民的正是这渴望已久的和平。当朝廷走上正轨后，税收就一直用以支付各行省常常似乎并不关心的战争的费用。如果说对查理的忠诚少有动摇，他的总

督们，无论是外来人还是本地人，常常遭到仇恨，而查理皇帝为帝国的事务经常离开则引起深深的愤恨。结果，在每一事例中地方利益和忠诚一直是突出的问题，帝国团结的感情从未充分发展以至于形成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

战争和不断增加的赋税似乎是查理的臣民的命运。它们压在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身上，而帝国的利益似乎只为几百人所获得。查理皇帝和他的行政长官之间的每一封信件，大臣们提交给他的每一份备忘录，都直接或间接与财政问题有关，因为只有现钱才会保持查理皇帝之军队驰骋于战场上，战船航行于海上，而军队和战船是他的全部政策和帝国的存在最终依赖的工具。查理的财政需要越来越成为他和各领地之间的关系围绕其旋转的支点。

这在尼德兰表现最为清楚。尼德兰的大城市，正如它们从不厌倦地坚持的那样，靠贸易和工业生存，因此它们要和平。尼德兰的贵族，虽然就个人而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一样渴望在战场上立功扬名，对和平时期的追求兴趣索然，但他们参与本国的经济生活如此之深以至于支持对和平的渴望。1536年，尼德兰总督匈牙利的玛丽亲自向其兄长请求让尼德兰在即将发生的同法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此请求，查理予以拒绝。他在信中写到，如此显然的虚弱只会鼓励法国人和盖尔德人进攻各行省。

如果说和法国的战争更花钱，潜在的危险更大，那么和盖尔德斯的战争破坏性更大，看似更无意义。盖尔德斯公爵埃格蒙特的查理也许是查理五世面对过的最坚决的敌人。他主张小王侯独立，反对布鲁塞尔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他得到法国的支持，用法国的金钱装备了自己到处劫掠的军队。他的司令马尔滕·范·罗塞姆，人称“黑马丁”，是荷兰人用来吓唬孩子的妖怪，在整个荷兰和布拉班特北部纵火破坏。1528年，他劫掠了海牙；1542年，几乎夺取安特卫普和卢万。荷兰和布拉班特人数次请求一位积极于此事的总督和盖尔德人和谈，但埃格蒙特在法国的怂恿下破坏了每一次停战条约。最后，他的政策不战自败。终于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德伦特、上艾塞尔和乌得列支开始仇恨这位自命的自由的捍卫者胜于仇恨查理皇帝。它们一个接一个让自己为荷兰和布拉班特所征服。1538年，埃格蒙特去世，在他的公国，他仍旧未被打败。其继承人克莱沃的威廉努力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但其政策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1543年，查理皇帝首次有

了自由倾其全力对付盖尔德人，终于兼并了该公国，从而结束了这次长期的反常的战争。尼德兰的东北边疆现在安全了，但这次战争拖得太长，它告诉尼德兰人他们从其王侯的伟大力量中获得的利益是多么少。^[10]

查理五世追随勃艮第诸公爵的传统政策：使各行省更加密切联合并给它们提供效率更高更强有力的统治。各行省的议会和各国议会则用它们的传统特权和自治反对这些中央集权的政策。最后，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实力关系，以至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只得用公开的战争来加以解决。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没有一方愿意把自己的要求推向极端，甚至不愿坚持推行一种攻击对方的权力的政策。议会并未认真怀疑这位“天生的王侯”进行统治的权利，也不怀疑他要求得到金钱以保卫国家的权利。尼德兰人比法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且自己的王侯不随意对他们课税，政府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至少是一点效果不错的宣传内容。尽管如此，每一次新的财政要求都遭到各省议会的顽固抵制和削减。每一项政府的建议都必须向各省和各市镇回报。在布拉班特，以及1540年以前在佛兰德，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和同业公会在市镇议会中有代表，不得不同意所有提议。因为，一般而论，要求全体一致同意，比如卢万的手工业者完全能阻碍整个国家议会作出决定。查理皇帝由于未能诱使市镇议会给予其代表完全的权力，他便采取了针对市镇的坚定不移的反民主政策。无论在什么地方有机会出现，他便把同业公会排除于市政府之外。继市镇反叛他的总督后，1522年，他在图尔奈不顾自己的许诺做到了这一点；1528年，他在布鲁塞尔再次成功；1540年，在根特又一次成功。总体而言，被留下来的贵族对他的财政方面的要求是较迁就的。但是，他和他的总督们要各省议会不再坚持在讨论新征税前纠正抱怨的弊端的努力却彻底失败了。他甚至没有做出努力去阻止各省议会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来控制它们已表决通过的税收的征集和使用。

各省议会都阻止建立像法国那样的绝对的皇权。但是，城市贵族的利益，也是国会的利益，是地方性的和局部的；他们维护的特权同是地方性的，常常和其他行省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即使在尼德兰其他地方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荷兰仍坚持其自由出口谷物的特权。结果，查理五世的摄政王们从未面临过普遍的反叛。国会一直是一股保守的力量，能够阻挠政府重要政策，诸如1534—1535年提出的联合，但是不能也不愿意挑战国王对政府的控制。虽然如此，帝国政府在尼

德兰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并且倾向于恶化，特别在大约1530年以后。不断增加财政要求这一帝国政策要对地位恶化负主要责任。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试图详细研究查理五世统治期间尼德兰的财政史，下面的情况也并不令人惊讶：16世纪的会计是极其随意的，计算准确是罕见的，连帝国的财政官员们也坦率地承认会计普遍混乱。但有许多证据说明，赋税沉重且不断增加，由此引起的不满虽然断断续续但却稳定地增强。1522年和1525年，摄政王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两次担心即将爆发叛乱。1525年，布瓦—勒—杜克（Bois-le-Duc）发生骚乱；1532年，布鲁塞尔发生骚乱。荷兰各省议会和总督霍赫斯特拉滕伯爵间的关系更趋紧张。1534年，通常坚定支持政府的布拉班特各大修道院院长组织了一个秘密联盟来抵制进一步征税。最为严重的事件是根特拒绝缴纳1537年国会投票通过的它应缴的那一份税款。到1539年时，该城公开反叛政府，尽管口头声称忠于查理皇帝。正如在该城风波迭起的历史上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建立了一种民主的专制并开始对贵族和政府的支持者实行恐怖统治。查理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到达才使之驯服（1540年2月）。

在查理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和法国的战争要求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款项。查理留给儿子的债务高达450万里弗尔。即使如此，尼德兰人声称他们在5年之中额外给查理皇帝的钱就达800万达卡。他们抱怨说，他们正被迫为查理皇帝征服意大利；他们认为——不管对还是不对——查理皇帝在尼德兰驻军是为镇压人民。物价上涨，比如根特和莱登这样的纺织工业古老中心的衰败，在瓦隆佛兰德的乡村和小城镇纺织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变化正在打破尼德兰社会的平衡，创造一种革命形势，这种局势又被战争和高赋税大大激化。大约从1530年以后，路德派和再洗礼派宣教士们在古老工业城镇的手工业匠人和劳工中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大量追随者。在查理皇帝退位后不久，加尔文派的宣教士们在安特卫普和瓦隆佛兰德获得的成功甚至更大。乡村贵族，至少在尼德兰的部分地区，发现由于物价上涨他们的地租收入在减少。他们中鲜有人能像高级贵族那样通过在政府任职来增补收入。他们在当地之传统势力遭到中央政府及其法庭的侵犯。到那时为止，他们仍然完全忠于查理皇帝，但他们在下一任统治者掌权期间进行的对抗的基础已经打好。查理五世的勃艮第出身和个人的名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形势的严重性。但是，1555年10月25日，当查理皇帝在布鲁塞尔皇宫的大厅里，在深切感动的国会和流着泪水的金羊毛骑士团

的骑士们面前宣布退位时，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政治体系已经接近于解体了。十几个个月以后（1557年），政府不得不宣布财政上破产，而国会变得几乎无法控制。几年后宗教和社会麻烦达到白热化，尼德兰终于开始了持续80年之久的内战、宗教战争和民族战争，这次战争不仅摧毁了他们以如此愉快的心情帮助建立起的帝国，也摧毁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查理五世的帝国中，西班牙的历史和尼德兰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它也同样受帝国财政的左右。

卡斯蒂利亚比其他领地更早面对这些要求，而它立即作出的反应敌意之大几乎不可能更有甚者。为了给查理返回尼德兰和竞选查理皇帝筹措资金，谢夫尔把卡斯蒂利亚议会召集到边远的圣地亚哥的加利西亚城召开（1520年3月），要求议会通过新增拨款税，而此时1518年的拨款还未缴清。从一开始就有种种困难。宫廷坚持代表们应该享有充分的权力。各城镇则努力用限定性的指示来约束代表，因为他们不无理由担心代表们会为要求他们投票通过的税收中抽出的钱所收买。托莱多人根本未出席议会。其他城镇则要求在提供经费前对抱怨的弊端先进行讨论。加蒂纳拉于是将议会迁移到科鲁尼亚港，朝廷已经在该地开始工作（1520年）。借助于贿赂加让步，在议会中有代表的18座城市中有8座现在被劝诱投票赞成征税；5座城市坚持反对；其余城市意见不统一，没有投票。当船队1520年5月20日起锚开航时，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西班牙没有一个人，甚至查理自己的谋臣班子也不认为新税合法或能够征收到手。暴民们袭击投票赞成征税的代表的房屋，在塞哥维亚甚至谋杀代表。查理皇帝之权威在大多数卡斯蒂利亚城镇垮掉了。议会镇压未果，特别是查理皇帝的军队纵火焚烧里奥塞科城，只能是火上浇油，使反抗更加激烈。1520年整个夏天和初秋，贵族们没有动一根指头来帮助他们的国王，他们还没有忘记他的勃艮第谋臣们及其被指控的抢掠，尤其激怒他们的是任命一位外国人，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为摄政王。以托莱多为首各反叛城镇组织了一个同盟并建立了一个执政团（*junta*），实质上就是一个革命政府。阿德里安被逐出巴利亚多利德，不得不在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法德里克·恩里克斯的庄园里避难。反叛者的首领帕迪利亚夺取了巴利亚多利德，抓获患精神病的太后。看来查理在西班牙的权力将要彻底崩溃。阿德里安在

越来越绝望的信中写到，只有赦罪和与科穆内罗斯运动进行谈判的全权才能挽回局势。他的要求得到海军上将法德里克·恩里克斯和卡斯蒂利亚王室总管伊戈尼·德·贝拉斯科的响应，这两个人于1520年秋和阿德里安一道被任命为摄政王。

帝国对遥远的领地行使有效控制的问题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但查理和谢夫尔只做出不触及皇帝权威的让步这一政策最终证明是成功的：暂停征收税，任命法德里克·恩里克斯和伊戈尼·德·贝拉斯科并允诺今后不再任命外国人，查理迅速赶回西班牙。但有若干月，这一问题吉凶未卜，而为查理挽回了局势的并非是他的直接努力。

在各城镇，得人心的激进分子们越来越占了上风。当反叛扩散到大公们的庄园上时，他们开始感到惊恐。城镇和贵族间由来已久的敌意再次突然爆发。在安达卢西亚，拥有大庄园和大量摩里斯科佃户的贵族们比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更早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们从一开始便阻止科穆内罗斯运动向南方发展。在科穆内罗斯运动阵营内部，敌对的派别各施策略谋取对运动的控制权。1520—1521年冬天，从城市贵族中来的温和派领袖一个接一个叛逃到皇党方面。1521年4月23日，卡斯蒂利亚贵族及其扈从在维拉拉尔（Villalar）击溃了科穆内罗斯叛军。巴利亚多利德和卡斯蒂利亚北部其他城镇立即和国王议和；只有发动反叛的托莱多坚持抵抗到1521年10月。

王国的权力就这样在卡斯蒂利亚得以恢复，以后在哈布斯堡家族历任国王统治期间再也没有遭到严重动摇。各城镇保留了大多数自治权，但查理皇帝之控制通过重新确立镇长的权力而得到维护。议会代表们现在不得不用全部权力来支持查理，他们的薪水是用他们投票通过的税收支付的。恢复在提供经费前先纠正抱怨的弊端的原则的所有尝试都遭到坚决拒绝：在1521年战败后各城镇便再也无力坚持自己的主张。查理已无必要对议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它们愿意投票通过税收，它们的请求常常在一届届议会上反复提出，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得看查理皇帝是否高兴。

贵族虽然在内战中获胜，但正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不可能摆脱和王国的联盟。王国现在能够驾驭议会并有费用维持一支常备军，所以是实力较强的一方。查理有步骤地将各公国排除于西班牙政府之外，这使阿尔瓦公爵大为懊丧。但他仍然有许多奖励和头衔赐给贵族们，作

为他们失去政治权力的补偿。甚至更有直接重要性的是贵族免缴赋税。这一特权皇帝并不乐意准许。1538年10月，贵族和神职人员加上18个城镇的代表被召集到托莱多举行会议，在会上政府提出对食品征收消费税，不允许任何豁免。贝拉斯科隐晦地暗示，在卡斯蒂利亚每当引进任何“新奇事物”时总是要发生骚动，贵族们几乎全体一致投了反对票。为避免公开分裂，查理作了让步，但他以后再也没有召集贵族参加议会的会议。王国在卡斯蒂利亚获得的政治胜利是以让贵族订约免除其对政府和帝国的财政义务为代价而取得的。

对卡斯蒂利亚来说，后果是惊人的。是卡斯蒂利亚和尼德兰一道满足了查理五世进行的战争的大部分财政需要。在查理皇帝统治期间，政府从税收得到的岁入大约上升了50%。^[11]在同一时期，价格大约上涨了一倍。由于人口的增长，显然赋税的总体负担减轻，而不是增加，但赋税在社会不同阶级中的分配变化颇为迅速。普通岁入的绝大部分原先来自商业税，一种包括贵族在内的社会各阶级都必须缴纳的销售税。在各城镇的要求下，商业税被改变为分摊税额，是一种每一城镇或村庄按配额缴纳的款项。定额保持不变，而其实际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趋向于减少。另一方面，税的收益的上升远比价格快。控制城镇议会并在议会中代表城镇的下级贵族们愿意投票通过征收他们自己可像大贵族一样免缴的税收。国会通过的赋税的重荷就完全落在了平民（*pecheros*）身上。正如注释中的指数显示的那样，这些税收的现金收益近乎增至4倍，而价格只翻了一番，在这个表格上它们在赋税总负担中所占比例从8%增加到19%。国王和贵族的联盟把帝国的负担转移到了最无力负担者的肩上。

皇帝在西班牙的政府完全明白这一情况。“普通百姓不得不缴纳税”，菲利普亲王1545年在给父皇的信里写道，“他们被逼迫到如此贫困悲惨的境地以至许多人赤身裸体”。他继续写道，贫困如此普遍以至不仅扩展到皇帝之直接封臣，而且还扩展到那些普通百姓无力继续向他们缴纳地租的贵族。然而，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似乎并未蒙受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够提高地租，其速度至少和物价一样快。^[12]这一见解也得到卡兰德的支持，他在1956年元月30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表达了这一见解。他们和外国商人和银行家们是年金，即以政府岁入为基金建立的终身年金的主要购买者。1558—1559年政府出售属于在皇家地产上的城镇的土地和村庄时，购买者也是贵族。

随着来自美洲的贵金属的流入，16世纪物价在西班牙的上涨比欧洲别处更加急剧。本来可以指望这些金钱的注入和殖民地市场的扩大产生的刺激将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西班牙的农业落后，势力强大的养羊业主同业公会梅斯塔（*Mesta*）的武装牧羊人赶着羊群跨越数百英里，从高地牧场到低地牧场，又从低地牧场到高地牧场，穿过整个卡斯蒂利亚，践踏玉米地，毁坏栅栏和许多耕地，而这个国家的干旱土地和英国或法国的土地相比无论如何是极端贫瘠的。政府不顾土地所有者的强烈敌视态度坚持维护梅斯达的特权，因为梅斯达为这些特权慷慨付款。羊吃人现象在西班牙远比在英国真实，西班牙对佛兰德繁荣的羊毛出口的阴暗面使赤贫的西班牙农民买不起自己的城市工业的制成品。由于农产品短缺，那些从贵金属的流入获利的人又不愿意投资贸易，所以城镇未能繁荣起来。与意大利或尼德兰相比，卡斯蒂利亚的城镇仍旧很小。工业不发达，不能和外国工业不断扩大的贸易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竞争。1546年菲利普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帝国的赋税越来越沉重地落在平民身上，其沉重已达到这个王国的土著人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程度。

如果说沉重的赋税倾向于阻碍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进行投资和经营商业，那么贵族则没有因这种不利条件而蒙受损失。但下级贵族和大公们，由于在反抗摩尔人的长达若干世纪的斗争中形成的倾向和传统，比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对经济活动更加反感。教会工作和从军，以及下级贵族在萨拉曼卡和埃纳雷斯堡学习法律然后为国王效力，这些事业提供的机会比以不光彩的商业为职业更有吸引力。议会经常抱怨外国商人的活动，但1525年当菲利普提出逐步赎买当时最大保险金额已达620万达卡的年金时，引发了年金持有人猛烈的反对；除了投资土地，他们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可以投资，同时担心不动产的价格会过度上涨。

因此，令外国人惊异的是，从秘鲁流入的大量白银不能使西班牙为富国。美洲来的财富帮助皇帝支付战争费用，使热那亚银行家们发了大财，但这些财富中投资于生产的部分太少，不足以克服该国的经济落后状况。随着查理五世的帝国越来越成为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在经济上的虚弱就日益成为它在和西欧各敌国的斗争中的不利条件。

最成功地抵制了中央集权政府的侵袭和帝国财政的压力的，是皇帝在西班牙的领地中较小和较贫穷者。如果说阿拉贡人和加泰罗尼亚

人在承认查理为国王的过程中比卡斯蒂利亚人制造了更大的麻烦，那么他们至少没有起而反叛查理。只有在巴伦西亚，查理第一次到西班牙期间唯一没有去的王国，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最初并不是针对皇权，而是针对贵族。巴伦西亚的贵族不愿意向一位不在当地的国王表示效忠，而巴伦西亚城的手工业工人和劳工却匆匆表示了他们的忠心。巴伦西亚的百姓，为了抵御摩尔人入侵的危险早已武装起来并受过训练，现在则在针对贵族和摩尔人的兄弟会（*Germania*，一种民间基督教兄弟团契）中组织起来（1519年）。查理不可能仍旧和这样一种运动结盟，但是，他就像在卡斯蒂利亚一样仅仅任命了一位卡斯蒂利亚人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任行政长官，此外几乎别无动作。这个兄弟会控制王国的大部分18个月以上，但他们未和科穆内罗斯运动合作，也未能引起邻邦加泰罗尼亚的下层阶级的同情。他们屠杀，强迫贵族庄园上的摩尔人佃户改变宗教信仰，这些都影响了其反叛的阶级感染力，同时未能为他们赢得乡村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同情。兄弟会首领贝森特·佩里斯的部队于1521年10月被贵族的军队打败，之后巴伦西亚立即在其城市选举中投票通过回归合法当局，但直到1523年在首府以外的所有抵抗才最终被镇压下去。

然而，这个兄弟会的战败并未影响阿拉贡王室各王国原有的权利和特权。阿拉贡贵族们像国王般统治着自己的臣属，对社会各阶层都拥有司法权。在加泰罗尼亚他们有权发动私斗。在议会中，他们成功地维护了在提供款项前纠正抱怨的弊端的原则，“所以一位皮匠、铁匠或这类人有权坚持任何要求直到满意为止”，大为震惊的威尼斯人大使孔塔里尼如此写道。

如果在阿拉贡，一个人因皇帝下令而被逮捕，他可以要求由大法官审理自己的案件，大法官是王国最高法官，终身任职，因此执法不受皇帝喜怒的影响。孔塔里尼声称查理请求过教皇免除他维护这一特权的誓言。但没有证据说明这一步取得了成效，也无证据说明查理在任何时候试图向阿拉贡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特权或自由发起全面攻击。如果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威尼斯议会的拨款比较少并且受附有义务的条件限制，那么是否能迫使这些小王国多拨款达到值得和它们发生正面冲突的程度是可怀疑的。再者，查理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臣民已经长期习惯于承担帝国的义务，而且，至少对他的地中海政策，他发现他们的传统比卡斯蒂利亚的传统更有助益。

这些传统是和热那亚竞争西地中海的贸易，和法国人竞争对南部意大利的控制权。16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两个新问题：北非和北非穆斯林海盗，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兴起。这些问题本来是不相关联的，但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变得如此紧密交织，以至终于演化为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间一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

北非问题基本上是西班牙征服格拉纳达（1492年）和强迫卡斯蒂利亚的摩尔人改宗基督教（1502年）产生的后果。地中海西部海峡两岸历史上几乎第一次由个别的敌对政治势力所控制，它们的商业和文化联系被中断。然而，尽管基督教徒对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新征服现在已完成，西班牙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是西欧和中欧唯一的这样的社会。在其边境内，被强迫改宗的摩尔人经常构成威胁，因为非洲的摩尔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一心想报复的难民——袭击西班牙海岸并常常得到西班牙摩尔人的帮助。西班牙的基督教徒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内部同化和外部征服。1525年，皇帝把卡斯蒂利亚强迫改宗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巴伦西亚，异端裁判所帮助他用该敕令来对付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改宗的“新基督教徒”。在外部，西班牙的反应是试图征服北非。这是伊莎贝拉女王和西门内斯枢机主教的政策。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这一试图因西班牙人的精力被阿拉贡人在意大利南部的政策所转移而中断。

直到16世纪30年代早期，西班牙在地中海西部的诸问题仍基本上是各不相干的。最古老的问题——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竞争，已经因为西班牙和热那亚的海上联盟而得到解决，这一联盟使安德烈亚·多里亚成为皇帝在地中海上的船只的司令，并确认了热那亚对加泰罗尼亚的霸权。然而，在此期间西班牙未能完成对北非的征服带来的是一场厉害的报复。1516年，阿尔及尔的摩尔统治者们请求海盗兄弟巴尔巴罗萨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佩农（the Penon），位于海湾进口处的一块设防的岩石。巴尔巴罗萨费时13年才达到这一目的，但在此以前许久他就使自己成为阿尔及尔的主人并自认为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的分封王。基督教徒在数世纪中第一次在地中海西部面对一支真正强大的敌对海军力量，这支海军力量的袭击令西班牙和意大利沿海的村庄和城镇经常感到恐惧。更坏的事情还在后头。作为对多里亚夺取摩里亚半岛上的科伦（Coron）的反击，苏丹任命巴尔巴罗萨为帕夏兼任整个土耳其舰队的总司令。1534年，他带领土耳其100余艘战船劫

掠了意大利南部海岸，然后挥师突尼斯，把它的摩尔人国王西班牙的盟友赶出该国。[\[13\]](#)

皇帝领有的意大利诸省现在受到严重威胁，威胁者不仅有海盗，而且有土耳其人与帝国为敌的实力极其强大的全部海军力量。实际上，这成了一场争夺地中海中部控制权的斗争；如果在西班牙控制下，它将保护西西里并切断巴尔巴罗萨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如果在土耳其控制下，它将使各穆斯林势力联结在一起并打开进攻意大利和地中海西部的道路。查理第一次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亲自率领军队，于1535年征服了拉戈莱塔和突尼斯。这也许是他最伟大的个人胜利，是他作为基督教骑士和十字军战士的证明。但是，巴尔巴罗萨并未被打垮。数周内他便进行了报复，袭击了梅诺卡的马翁港。更为严重的是多里亚1538年9月在普雷维扎战败，这次失败主要是由于结盟的帝国舰队和威尼斯舰队之间缺乏信任。普雷维扎战役是皇帝之拥护者把战争推进到地中海东部的一次重大的尝试。毫无疑问，这是查理的最终目标，征服君士坦丁堡则是最后的战利品。1538年8月，玛丽大感担心，从尼德兰写信劝说其兄长放弃他的宏伟计划。她争辩说，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作战困难极大；与法国最近才达成和解，是相当靠不住的；教皇和威尼斯人给予的帮助将很少；他们冒的危险很小，只有皇帝一人冒险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各领地首先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进一步的冒险。在普雷维扎战败后，玛丽的见解占了上风，查理进攻性军事行动有了严格限制的目标。甚至这些目标也经常达不到，1541年皇帝亲自率领大军远征阿尔及尔遭到惨败就是证明。

土耳其人方面，在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期间也只认真进行了一次以武力进入地中海西部的尝试。这次远征始发于1543年。[\[14\]](#)法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早在1525年就进行过讨论，16世纪30年代公开确认；法土联盟是皇帝在地中海必须面对的最致命的潜在危险。但土耳其人在1543—1544年的远征后并未再有行动。即使他们有法国基地可使用，但距离过于遥远；远离国内基地1000多海里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对苏丹就和对皇帝一样大。西班牙征服一个北非帝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和西印度群岛，甚至和意大利相比，北非对掠夺成性的西班牙士兵没有吸引力。从经济上看，西班牙的要塞是一种不利条件。到北非海岸的威尼斯人和其他贸易者宁愿去摩尔人的港口。纯粹由于战略原因，西班牙人才保持在北非驻军。但是，他们实际上维持的是地中海西部盆

地的海上霸权。土耳其人的基地离基督教控制的地中海的心脏地区太远，不能对此霸权提出挑战。

西班牙在意大利成功地对付了法国从而保卫了阿拉贡帝国，这与西班牙在北非地位之恶化形成鲜明对照。^[15]阿拉贡国王在意大利最古老的领地西西里的确从未受到过严重威胁。正如在阿拉贡本土，皇帝在这里继承的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小国，其上层社会等级享有影响极其深远的特权。在西西里议会中，神职人员、贵族和城镇成功地抵制了西班牙总督的侵犯，保住了这些特权。1516年，即皇帝刚开始统治[西班牙]的那年，他们就起来反对众人仇恨的总督戈·德·蒙卡达，迫使他逃离巴勒莫。领导这次起义的贵族表示忠于查理，他们派往布鲁塞尔的使节至少获得一项成功：蒙卡达被撤职，由那不勒斯人蒙特莱昂内公爵继任总督。但是，当查理和蒙特莱昂内都未有表示取消蒙卡达不得人心的种种命令的迹象时，1517年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由巴勒莫的资产阶级的成员领导，起义扩大到西西里岛大部分地区。义军烧杀抢掠，起义不久即演变成反对贵族的社会性叛乱。贵族作出的反应是在巴勒莫暗杀了起义运动的领袖，6个月后当西班牙军队到来时，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与科穆内罗斯人的叛乱不同，西西里人1516年和1517年的叛乱（以及1523年贵族策划的一次流产了的阴谋）对政治力量的平衡影响极微。西西里贵族和城镇根本上是忠于阿拉贡国王的。他们怀念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那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意志的一次最重要的维护。但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由于刻骨的党派仇恨和巴勒莫与墨西拿的对抗已荡然无存，因此西西里人几乎完全失去了采取联合行动的能力。在尼德兰，地方自由和特权的维护最终导致一场反对西班牙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中央集权政策的革命，而在西西里，类似的贵族和城镇的利益却导致更多的内部争吵和仇恨。这是因为，正如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一样，王国并未作出认真的努力去干涉该国的特权。西西里官员腐败是众所周知的，法院贪赃枉法，贵族间有刻骨的血仇，土匪无处不在并像现代黑手党一样得到当地贵族的保护；由于历任总督采取任何一项行动时都受到这些特权的牵制，又得不到来自西班牙的足够支持，所以他们在反对这一切的斗争中节节失利。不像在14世纪时，贵族的派系斗争再也不能把整个国家推进内战的火坑，但他们及其武装家臣仍然相互攻击城堡和城市，他们的争斗必须通过签订由总督担保的正规和约来解决。

正如在查理的整个帝国一样，财政是政府政策的关键。经历了数世纪的外部和平，西西里现在受到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查理五世的最后两任总督，费兰特·贡扎加（1535—1546年任职）和胡安·德·维加（1547—1557年任职）不得不修筑全新的海岸防御设施，维持一支由10艘船只组成的西西里舰队和一支步兵团的西班牙骑兵，训练一支当地民兵，以击退摩尔人的袭击。由于摩尔人的这些袭击，西西里人甚为看重西班牙统治提供的海上保护，因为这保护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但是，在查理统治期间议会把“捐赠”从每年平均10万斯库只增加到大约17.5万斯库，在同一时期一般价格至少上升了同样的比例。除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西西里王国一直是皇帝统治下的各王国中赋税最轻者。皇帝退位时，在意大利流行着一句新谚语：“西班牙人在西西里小口小口地吃，在那不勒斯大口大口地吃，在米兰狼吞虎咽地吃。”

查理五世的政府在那不勒斯的财政问题与在他的大多数其他领地上相比，确实比较容易解决。这个王国的议会很软弱，不能与西西里的议会相比。那不勒斯城本身在给予捐赠方面没有投票权——虽然该城派代表参加议会的会议，但它为此目的设有自己的代表机构。神职人员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贵族尖锐地分裂为阿拉贡派和安茹派，以致没有严肃考虑过使议会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工具问题。在这里，要求在提供拨款前消除抱怨的弊端问题根本不存在；皇帝及其总督完全随自己的意处理请愿。因此，查理可以从该王国抽取大笔款项并把它们送往国外：在1525年至1529年间给帝国驻意大利北部的军队送去175万达卡；1530年为他的加冕礼拿走30万达卡；1543年抽取的金额为15万达卡，下一年增加到17.5万达卡，1552年又抽取50万达卡——全部送往米兰和德国。但即使是皇帝的最铁腕的总督能从这个国家榨取到的财富也是有限度的。彼得罗·托莱多总督一再拒绝查理皇帝对钱的要求，或拒绝接受在他的政府兑现的汇票。随着土耳其人的威胁越来越紧迫，防务开支陡增。从大约1530年起，皇帝不得不用西班牙的钱来给予补贴。但是，只要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不时遭到海尔·阿德-丁的袭击，那不勒斯人便和西西里人一样意识到多里亚的舰队提供的保护。

然而，有充分的政治理由不过分激怒那不勒斯人。阿拉贡人和安茹省人的确使所有贵族合作反对政府成为不可能。阿拉贡派已接受了许多没收支持过洛特雷克1528年入侵的人的土地。更多的地产赐给了

支持皇帝的已在这个王国定居并和那不勒斯贵族通婚的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效忠皇帝的，可是他们和那不勒斯诸城镇就像西西里人一样为自己的自愿的效忠感到骄傲。他们也同样高度看重自己的特权；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上行使的权力也许甚至更大。领主们随意向自己的下属征税，禁止他们向皇家法庭上诉。皇家法庭的法官假如来自贵族的领地，则受贵族的压力的支配。贵族中即令有一人反叛也可能造成危险，1552年萨莱托（Salerno）亲王在查理的统治最关键的时刻试图引法国人和土耳其人进入这个王国便是明证。

因此，国王采取反对贵族这些过分的权力的立场既是策略的又是正当的。保护穷人和弱者不受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欺凌是查理五世1536年给彼得罗·德·托莱多的指示的基调。1532年，他委派这位卡斯蒂利亚的大公去重建一个饱受法国和帝国军队蹂躏的国家，并清理一个软弱政府的长期统治留下的遗产：压迫和不义。几任总督——其中有些，比如尼德兰人拉努瓦，甚至不想了解那不勒斯的情况——都短命，他们一个接一个走马上任，根本不能对付腐败的皇家官员、暴虐的贵族和受大领主保护的土匪。托莱多颁布法令并处决人犯，和这些罪恶现象作斗争21年，但他的成绩却很有限。1550年他告诉佛罗伦萨大使在他任总督期间被判处死刑者达18000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1559年他对继任者所作的指示描绘的该王国状况的图景就和1536年的一样黑暗。

但是，托莱多的政策在分裂贵族和平民方面却是成功的。贵族和平民只有一次联合起来，帝国在那不勒斯的统治立即陷入极其严重的危险之中。1547年，查理五世想要把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引进那不勒斯。在西西里，异端裁判所已经为天主教徒斐迪南所引进，最初很不得人心。1516年，巴勒莫人把异端裁判所审判官连同总督一道逐出该城。只是在查理的统治临近结束时异端裁判所才通过给予数以千计的平信徒家庭免受王室司法权管辖的权利而较为得人心。那不勒斯人对[异端裁判所]的反应比西西里人更加激烈。那不勒斯城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市民成立了一个同盟；他们的代表大会，接管了市政府；和西班牙军队发生了冲突，总督的战船向城市开了炮。不久，谣言四起，说“同盟”正在和法国人谈判。最后，托莱多提出撤销异端裁判所，作为对中产阶级市民，而不是对整个城市的特殊恩惠：他断定市民和贵族之间的仇恨与异端裁判所相比是西班牙统治较为坚实的基础。在那

不勒斯，贵族的特权及他们在当地政府中的势力被用于促进总督的利益，因为民众对外国统治的愤恨许多被转移到当地贵族身上。结果，那不勒斯的暴民虽然爱聚众闹事，总的来看，该城是查理五世的帝国中一个感到满足的部分。

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查理五世是承袭的国王，他在米兰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当最后一任斯福尔扎公爵弗朗切斯科二世于1535年去世之时，德尔瓦斯托侯爵率领的帝国军队已经控制了该公国，但皇帝对如何解决继承问题多年拿不定主意。在与法国谈判期间，在拥护皇帝的阵营中讨论过把米兰或尼德兰转让给弗兰西斯一世的一个年纪较小的儿子。查理本人及其勃艮第谋臣们，值得注意的是格兰维尔，想要保留尼德兰，放弃米兰。诸如托莱多的大主教塔韦拉之类的卡斯蒂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支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既不喜欢西班牙卷入意大利的事务，也不喜欢为有利于一块被征服的领地而放弃一块承袭的领地。可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比如阿尔瓦公爵，还有西班牙裔意大利人，则坚持保留米兰作为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权力的关键。^[16]最后，尼德兰没有被放弃，米兰也成功地保卫住了。但是，实际上，西班牙派是胜利者。菲利普王子被授予该公国（1546年）；在皇帝之谋臣班子中其事务的处理被委托给科波斯（Cobos）；其要塞的指挥权被授予西班牙人或尼德兰人。米兰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军事前哨基地。

西班牙人并未实质上改变这个国家由其传统当局实施行政管理的状况，这与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做法并无二致。米兰贵族相对而言较贫穷，在政治上则由于分裂为归尔甫派（the Guelph）和吉伯林派（the Ghibelline）而力量虚弱。因此，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总督的权力为往昔的种种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所限制和抵消的地方，在米兰则受到一个较为现代的、半自治的文职部门的类似的限制和抵消，这个文职部门由受其监管的参议院和专业化的城市管理机关组成。总督和参议院争吵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1554年费兰特·贡扎加就有此经历，是年参议院诱劝皇帝派一个调查团到米兰并召回他的总督。

参议院和市行政官员可以限制总督的行政权力，但与西西里的议会不同，他们无权限制总督征税的权力。必须付钱给驻扎在伦巴第的庞大的帝国军队，而军队有权保证这笔钱的筹措。各城镇的抗议，甚至文职总督卡拉乔利枢机主教的抗议，在德尔瓦斯托侯爵的雇佣步兵的长戟面前是毫无效果的。在卡拉乔利于1538年去世后，德尔瓦斯托

侯爵便身兼总督和总司令两职（1538—1546年），继他以后的费兰特·贡扎加也如法炮制身兼两职（1546—1554年）。现在，西班牙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征税，仅只因为担心公国发生叛乱而法国可能立即重新进行干涉时才有所收敛。

然而，如果说西班牙人在米兰“狼吞虎咽地吃”，那么米兰也狼吞虎咽地吃西班牙。1535年，格兰维尔就曾希望公国不仅支付自己的防务开支，而且对帝国的开支要有所贡献。失望迅速来临。1537年，西班牙驻热那亚大使写道，7个秘鲁都不足以满足皇帝在伦巴第的需要。40年的战争留下的遗产是贫穷和破败。在1536年至1538年的战争期间，西班牙不得不拨款一百余万达卡供驻扎在伦巴第的军队开支，在米兰的花费约为60万达卡。在皇帝统治的最后5年，西班牙给了米兰人大约200万达卡，作为对他们缴纳的防务税的补偿。西班牙驻军的费用使米兰政府[的财政]出现几乎永久性的赤字。不过，公国本身在西班牙的统治终于提供了的和平环境中得到恢复。在16世纪下半叶，公国的人口增加，城市和工业的强劲有力的重建使伦巴第在17世纪的灾难来临以前又保持了50年的繁荣。

查理五世之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赋予他获得皇帝称号的权利，而有了皇帝称号他就有了道义上的理由来推行他的帝国政策。但最终是在德国他的帝国政策遇到了最彻底最不可弥补的灾难。查理履行了对其弟弟斐迪南的诺言。他把自己对在德国继承的领地的一切权利（1521—1522年）都让予了斐迪南，而且任命他为*Reichsregiment*，即德意志帝国政府的首脑。1531年，查理在教皇为自己加冕后劝诱诸选侯选举斐迪南为罗马人的国王。查理一定知道这一步对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他任皇帝之前景是严重不利的，甚至对哈布斯堡王室的联合权力的未来存在都是不利的。但菲利普当时年仅4岁。假如查理本人过早地去世——他的许多遗嘱和表白显示他头脑里总是想到这不测的事件，那么至关紧要的是要有一位继承人，他将保护哈布斯堡王室在帝国的权利要求和幼儿菲利普在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权利。最为重要的是查理在德国需要有一位尽可能强硬的代理人。查理在1531年给斐迪南的指示中授予他的权力比他的其他任何总督或行政长官都广泛得多。不过，他要求在赐予高级贵族头衔上要与他商议，他还要求他自己作出的任命应予维持，他的所有命令都得遵守。所以，查理实际上继续控制帝国在德国的政策。

德国问题的症结是路德的改革运动和一些德意志王侯的联盟。长达二十余年之久，查理致力于将这联盟的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一个对教会进行总体改革的框架之内解决宗教问题。仅只在这些努力肯定已失败和新教集团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开始和法国勾结之时，他才改变了政策。^[17]在仍旧努力要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保持分离的设想下，他对新教王侯们进行了打击，表面上称他们反对帝国的权威，实际上为使改革运动丧失其政治后盾。他在米尔贝格的胜利本可能提供同时解决德国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础，但事实上任何一个问题都未获解决。特兰托和波洛尼亚公会议是教皇的会议，而且对新教徒来说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德意志诸王侯，无论信奉新教还是信奉天主教，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通过彻底修改帝国宪法来增大皇帝按宪法享有的权力。查理尽管获胜并享有巨大的威望，但并未强有力到能强制所有的王侯。他试图用下述建议来避开这个问题：成立一个以皇帝为首脑的王侯同盟，在该同盟中每一成员都缴纳固定数量的特别税以维持一支同盟军。这一想法并不新奇。1519年，士瓦本同盟把亲法国的符腾堡公爵驱逐出了他的公国，查理因为其在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领地而担任该同盟的首脑。在竞选皇帝的运动中，士瓦本同盟的军队是查理的一项极有用的资产，1520年又帮助他获得了符腾堡。他竭尽全力保持士瓦本同盟的存在：可是在德国各上层社会等级眼中他的权力已经大到危险的程度了，他们不愿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前，皇帝又有了建立同盟的想法，但充其量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1547年秋天他提出的更为全面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帝国“将陷入受奴役状态”，勃兰登堡选侯这样说，因此王侯们拒绝这一计划。

这一计划的失败促成了皇位继承的危机。菲利普现在已经成人。对新教徒的战争说明，只有在来自西班牙和尼德兰的钱和军队的帮助下，皇帝才能维持在帝国境内的权力。查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1519年的分析的正确性。^[18]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他在1546—1547年冬天想到过要他的弟弟放弃罗马人的国王的称号以利于菲利普，但斐迪南对有这样的意图的谣言的极其激烈的反应却令人几乎不会怀疑这就是查理正在考虑的理想解决办法。斐迪南的态度，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的态度，还有德国人对“西班牙人继承[帝位]”的极度的敌视态度都促使查理放弃这一想法。1551年，哈布斯堡家族的老资格成员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斐迪南仍保留罗马人的国

王的称号并继承查理皇帝称号，他本人的称号则由菲利普继承，当轮到马克西米连时则由他继承菲利普的称号。

双方都不满意，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的团结首次受到严重的损害。1552年，萨克森的莫里斯和其他德国王侯联合亨利二世（他们许诺把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给他）向查理发动进攻，迫使查理从因斯布鲁克逃命。他们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斐迪南态度暧昧。查理从因斯布鲁克逃命以及和反叛的王侯们订立帕绍条约使在米尔贝格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他在德国的权力实际上已崩溃，他未能从法国人手中重新夺取梅斯（1552—1553年冬季），这两件事说服他相信他的帝国纲领，如像他在1519年构想的那样的纲领，已经失败了。教会改革的路线并没有做到把新教徒领回到原先的信仰上来；新教徒也没有为武力所制伏。意大利是安全的，但法国仍和以前一样有威胁性，法国不但远不会参加[讨伐新教的]十字军，而且还是异教徒的同盟。帝国仍旧是难以驾驭的，下一任皇帝虽然仍享有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勃艮第分支的同盟，但已不再能掌握帝国的全部权力。他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比查理虚弱；他的利益将纯粹以欧洲为中心。查理于1555—1556年间退位，这标志着他本人承认了自己的帝国概念的失败，这失败是试图重建在皇帝和教皇领导下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这个中世纪的观念的失败。

查理退隐于一座紧邻着埃什特雷马杜拉的圣热罗尼莫·德·尤斯特修道院修建的乡村宫殿。在那儿，他临朝听政，在祈祷之间愉快而且经常是积极地继续关注他的帝国的命运，直到1558年去世。帝国本身并未因为他的退位而土崩瓦解，但帝国的性质已经开始变化。帝国正从一个有着勃艮第的核心和灵感的普世的、基督教的帝国变成一个有着卡斯蒂利亚的核心和灵感的西班牙的、天主教的帝国。全帝国的行政机构机能不全是查理五世的帝国的弱点之一。但古老的阿拉贡帝国至少具有一个帝国政府的雏形，即阿拉贡议会，阿拉贡国王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地的最高法庭。西印度群岛议会，为卡斯蒂利亚的海外帝国而设立，以类似方式运作，但在行政和政治事务方面有广泛得多的权限。1558年，菲利普以这两个议会为模式建立了意大利议会。这为西班牙及其在意大利的领地提供了比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任何其他国家集团有过的紧密得多的行政上的统一。[\[19\]](#)

在皇帝之领地中，尼德兰是经济上最先进和最富有的国家。“这些是西班牙国王的财富，这些是他的矿山，这些是他的西印度群岛，支撑了皇帝之全部事业”，威尼斯人索里亚诺在1559年写道。但是，即使他这样写，情况已不复如此。与尼德兰更多的财富相比，西班牙给自己的统治者提供金钱更为乐意。大约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白银增加之迅速超过原先的一切预料。在意大利和德国进行的战争越来越清楚显示西班牙骑兵比其他军队优越。在加蒂纳拉于1530年逝世前，查理五世的大臣班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机构，尽管勃艮第人占优势。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是皇帝在西班牙的摄政王；两位勃艮第人，沙尔·德·拉努瓦和菲利贝特·德·沙隆是他驻那不勒斯的总督。在勃艮第受教育的皮德蒙特人加蒂纳拉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谋臣。可是，在他统治的后半期，西班牙人和西班牙裔意大利人垄断了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的全部高级职位，接着，他们又出现在德国和尼德兰。像费兰特·贡扎加这样的人从这一趋势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鼓吹把查理五世的帝国谨慎地变成一个地中海君主国。他提出西班牙应该撤离德国和尼德兰，因为这两国是不可能长期保留住的。在西班牙本土，光照主义和伊拉斯谟主义正在消亡，而这两种主义是皇帝早期关于教会的改革和与新教徒和解的看法的理智的和精神上的伟大动力；其最后一批倡导者在异端裁判所的权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或者被监禁或者逃亡。西班牙有圣特雷莎和圣伊纳爵，有耶稣会士和异端裁判所，尤其是有其新国王菲利普二世，现在这个国家不仅成为宗教战争年代反宗教改革运动财政和军事上的主力，而且成为这一运动的精神前锋。

（孙善玲 译）

[1] 这事实上是P. 拉索夫的见解，见其著作《皇帝查理五世的观念》（1932年）。50年前，E. 阿姆斯特朗在《查理五世皇帝》（第2版，1910年）中争辩说这位查理皇帝之政策纯粹是防御性的，他的一切战事都是别人强加于他的。K. 布兰迪在其《独裁者查理》（*Kaiser Karl V*，第1卷，1937年；C. V. 韦其伍德的英译本出版于1939年）则坚持认为查理的政策更为积极，以增进哈布斯堡王室之伟大为最终目的。该书收入现代传记大全和精选书目大全。

[2] 参见本书边码第338页以下。

[3] 见本书边码第179页。

[4] 见本书边码第441、445页。

[5] 见本书边码第332页。

[6] 见本书边码第319页。

[7] F. 布罗代尔：《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1949年），第88页以下。这是关于16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史最全面的现代著作。

[8] R. B. 梅里曼：《西班牙帝国之兴起》，第3卷（1925年）。此书虽然陈旧，但仍是这一时期西班牙通史的最佳著作，其中的书目颇有用。

[9] 参见本书边码第135页。

[10] A. Jacopsz, *Prothocolle van alle de reysen*, 手稿，存阿姆斯特丹 Stadsarchief, E. van Bienna打字本。蒙海牙的P. A. 迈林克博士的准许，我才有机会研究该打字稿。

[11] 最近由拉蒙·卡兰德（Ramon Carande）完成的开拓性研究《查理五世和他的银行家》（*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1949年）第2卷给我们描绘了查理五世在卡斯蒂利亚的财政状况，使我们对此比对他的其他任何领地的了解都更清楚。撇开政府从由墨西哥和秘鲁进口的贵金属得到的岁入，从神职人员和出卖教会的赎罪券得到的税收，还有其收益或者不稳定或者在查理统治期间未有可观增长的其他国内税收，我们有可能制作出下面这张查理的岁入表：

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岁入

（单位：百万马拉维迪，11—12 世纪在西班牙的摩尔人使用的一种金币。——译者）

	约 1516 年		约 1553 年	
	数额	指数	数额	指数
普通岁入（主要是分摊税额）	380	100	500	132.3
租赁骑士团财产岁入的收入（Maestrazgos）	51	100	89	173.7
议会拨款（Servicio）	37	100	136	370.0
总额	468	100	725	155

[12] 布罗代尔：《地中海》，第631页。

[13] 参见本书边码第517页以下。

[14] 参见本书边码第531页以下。

[15] 参见本书边码第342页以下。

[16] 沙博：《米兰国》，第39页以下。

[17] 参见本书边码第181页以下。

[18] 参见本书边码第306页。

[19] 欲了解皇帝之诸议会，另见本书边码第445页以下。

第十一章 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室的斗争

在西方史学著作中，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室在16世纪上半叶的斗争已成为一场经典的悲剧。在许多情况下，史家已经把这场悲剧演得淋漓尽致——事件的进程，显著的特征，行动的动机；的确，他们全力投入了弄清事实和精简归纳的工作。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是这方面的行家，是这场大争吵的导演；他把斗争的第一阶段缩短到10年，即从1519年查理当选为皇帝到1529年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为止。在这10年一切都尝试过。从骰子一掷下开始，这场争吵就是复杂的、就是冲突和冗长枯燥的变化的重复。

从1519年至1529年，这两个王朝为了控制欧洲半岛和地中海西部这个角斗场进行了10年的斗争。1529年以后，甚至在1525年2月帕维亚大战役以后，瓦卢瓦王朝的失败对其未来的事业就成了一个障碍，虽然这并不是说其对手就更为成功。历史仍然把人和政府一劳永逸地分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吗？

的确，把注意力转向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就会为研究的进展所吸引，甚至更为历史之范围和解释的变化所吸引，从而创造出一种大有别于传统的写照。虽然把聚光灯留给了主要人物，但越过主角和背景演员直接到那些可以肯定地说虽未形成整个历史但却在决定历史的命运中起了重大作用的集体力量是值得的。对制度的进化、对16世纪皇帝之“天职”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思考，将必然发现一些和米涅——即使以伟大的技巧——勾绘出的观点不相同的观点。这确实将有创新并减轻对个人责任的强调，减轻对沉默寡言的、睿智而精明的皇帝之功过的强调，或减轻对弗兰西斯一世——那个在其统治早期在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带来的令人陶醉的日子里备受赞扬，但在对伟大的统治的快乐追求中失败之时，在这令人沮丧的时刻遭受严厉批评的赌徒——的错误和愚蠢的强调。威尼斯的大使们把他描述为着迷于“恺撒”的行动、言论和计划的人。对他而言，这场斗争是他生活中的大事。其实，这些人的行动不像我们想要相信的那样自由，他们因

为一些——即使不总是——也常常把不可回避的竞争强加于他们的更伟大力量，而一再地采取行动，发生碰撞。

还有，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的新历史不可能限于1519年至1529年的序幕，尽管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这场戏的收场，即在1529年缔结“夫人和约”（Paix des Dames）之后，也需要懂得历史的观众的注意。30年的冲突、诡计、行动、前进、后退，从1529年到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的签订毫不蹒跚地过去的30年，当一切都说过做过时，毕竟构成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也并非没有重大的变革。弗兰西斯一世于1547年先消失；1555年查理退隐，1558年逝世。这场戏的最后一幕是几近于轰动效应的终止——一个由强渐弱的音符——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的签订。

因此，在把这场戏延长到早期以后的年代时必须谨慎从事。首先，不应把它限于欧洲这个狭窄的舞台。整个世界，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都被牵涉进去。西班牙假如未控制大西洋和更远处的美洲及其金银财宝，它能够如此长时间地起这样伟大的作用，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人并占据领导地位吗？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潜心研究说明不可能。造就查理五世的与其说是他的德国金王冠，不如说是西班牙——西班牙及其在美洲的矿山。这一切都不应该忘记：既不应该忘记金银，也不应该忘记远比欧洲大、并有形形色色引人入胜的问题的世界的各个部分。

人们经常谈论16世纪“皇帝之天职”，假如“皇帝之天职”指的是对不久将被称作普世君主专制的全面控制的追求，全面控制的必要性以及全面控制的光荣，那么这是再正确不过了。然而，这天职需要从两方面加以限定。第一，必须将它置于原本的环境之中。因为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是在超级大国——即根基深厚幅员广阔的国家——间进行的，而在16世纪，未来是操在根基深厚、有引人注目的领土、人员和资源的国家手中。小国消失了：未被吞并的是例外情况。这一趋势减少了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间斗争的个人戏剧成分。第二，查理五世，用他的对手的话来说，并非是第一个想要“到处发号施令的人”。控制世界的梦想，即使未能实现，也一直伴随着欧洲的历史而存在，这个欧洲总是不忘记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疆界之内。再者，查理五世的政策是从更古老的梦想以及从创新集聚起来的遗产。查理既为过去的阴影所困扰，也同样为诸如追求光荣、荣誉问题、经常热

切寻求摆脱困境的方法、屈服于他的命运之星的变幻无常的恩赐等“文艺复兴”的思想所困扰。

然而，当人们谈论无疑在那个时代最值得重视的政治英雄查理五世时，这就不仅是一个遗产问题。无可否认，他是至少两笔遗产的继承人——或者说受害人。直接（而近在手边）的遗产让他有可能用他的国家及其意图的沉重枷锁来围住瓦卢瓦王室统治下的法国。这一点不久将有说明。另一笔遗产较为复杂，虽然并非更不重要——它更为深奥，更难以确定、估量、判断。在16世纪时，欧洲本是并且仍旧是基督教的世界。而且，不管是否喜欢，这个基督教世界和为土耳其人的成功所复兴了的伊斯兰教世界面对面。在君士坦丁堡被夺取以前，伊斯兰教的压力便危险地增大了，在该城于1453年被夺取以后其压力就更大了。[伊斯兰教的]威胁从格拉纳达（1492年才对基督教徒开放）一直延伸到希腊；沿地中海南岸，沿小亚细亚海岸激烈增强，一直渗透到巴尔干的广大地区。在这个格斗场之外，伊斯兰教传播到广阔的地区，直达黑人种族居住的地区、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印度，甚至穿越中亚腹地到达中国。欧洲要继续存在取决于是否能抵御这个敌对集团。[\[1\]](#)

正如在过去一样，有别于在罗马的精神领袖的基督教世界的世俗首脑接管了十字军式的讨伐的领导权，因而不可避免要和伊斯兰教发生冲突。所以在15世纪，由于单纯的勃艮第公爵们在进行这场光荣的斗争中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上升到首位，虽然他们并没有王冕或皇冠。还有，1494年查理八世在进入那不勒斯前所作的看似虚张声势的讨伐计划，其用意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严肃，这些计划表现出法国方面的“皇帝的”尝试。后来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以后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协议，法国的“对应行动”，标志着这样一种梦想的终结。这同一种梦想在查理五世的思想上和其人身上得到复活与体现。在各地，在他的君权的影响所及之处，他都充当了十字军式的讨伐的先锋：在那不勒斯（在那儿土耳其人于1480年到1481年这两个生死攸关的年头围困了奥特朗托）；在维也纳（1529年土耳其人进攻该城，但未获成功）；在西班牙他更是先锋，这是天主教诸国王的西班牙，靠近并面对非洲海岸，这个西班牙就是一支活生生的十字军。他在十字军之海地中海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突尼斯他于1535年大获全胜，在阿尔及尔他于1535年在看得见那个古老的海

的地方失败了，在圣路易之后几乎3个世纪，他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十字军战士。要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奥地利的唐·约翰于1571年10月7日在勒班托打败土耳其人的舰队从而摘取了这一传奇式的荣誉的所有桂冠，那么他本来将是一长列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十字军战士了。

这一切都赋予查理五世作为皇帝在身体和思想方面的经验以一种特殊表现，对这种表现后世持怀疑和几乎不赞成的态度。正如往常一向的那样，欧洲先要求然后又拒绝了可能把欧洲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的权威。在面对强力时，欧洲较弱的成员倒团结一致。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国在总是重新爆发的地方性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欧洲同时既支持又反对欧洲。在16世纪，甚至更早，各民族国家已把一个基督教世界闹得四分五裂，而这个基督教世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更要经历别的甚至更加严厉的考验。

这是一份包裹在过去中的遗产，这也是一份近在手边的遗产。这份遗产，出生于1500年的查理在其生命的头20年不间断地加以继承。一步一步地，靠他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的结合体中他让自己的存在为人们所感觉到。他是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的主人，在非洲有立脚点，这些立脚点是西班牙人在1506—1511年间经过一场斗争获得的。这样，第一个西班牙“地中海”帝国建立起来了。他也是一个广阔的美洲和大西洋帝国的主人，这个帝国的分量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因此，他是基督教世界的伟大王侯之一——要是没有从1515年初路易十二世死后便坐在法兰西王位上的弗兰西斯一世与他抗衡，他便是天字第一号王侯。就在那一年，弗兰西斯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征服了米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意大利北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意大利北部是当时基督教世界第一国的意大利的物质生活与权力的中心。所以，在这两大王侯之间机会是均等的，一个占有意大利南部，另一个占有北部，而事实上北部是这个众城之国的较好的部分；前者统治西班牙，后者统治法国。然而，查理还拥有低地国家，这可算是另一个意大利和另一个主要的经济区：安特卫普是世界的中心之一。诚然，法国的威望和财富在力量对比上是大有分量的。还有的事实是意大利从未被野蛮人入侵者征服过；法国人在北部获得的成功并不比西班牙人在南方获得的成功大。正如未来将要显示的那样，甚至西班牙也没有做好归顺一个佛兰芒人——在1516年还是根特的查理——的准备。最后，美洲当时还不是一个喷涌着贵金属的宝库，尽管后来这个宝库

震惊甚至支撑了整个世界。查理早期对帝国的希望是寄予尼德兰的，还没有寄希望于美洲。但下述情况是会突然跳出来的：在历史学家看来，当时的人甚至更这样看，天平似乎在这两个将要在冲突中对面的之间摇摆。不过，在幕布升起以前最后说一句话：不可认为机会在造就查理五世上起了太大的作用，因为毕竟查理五世是一些精心策划的婚姻的产物，这些婚姻都是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的借口下通过谈判达成的。通过这些婚姻，天主教国王们和哈布斯堡王室联手提前许久便包围了法国，这是他们压倒一切的雄心壮志。查理五世的地位是在这引人入胜的有远见的对弈中创造的。

现在按时间顺序来组织本章就比较容易了。这场戏明确地分为三幕：

从查理1519年当选为皇帝到1530年在博洛尼亚加冕；从1530年至1550年的非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的结束可定于米尔贝格战役（1547年），查理在该战役大获全胜，但这次胜利却是昙花一现的，或定于奥格斯堡临时协议的签订（1548年），甚至定于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1555年），在这20来年期间是德国而不是法国是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的核心；最后10年，这10年在各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一贯性，直到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1559年4月1—3日）前帝国彻底失败国力枯竭为止，此时法国恢复了其作用。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在德国未加冕），查理的另一位祖父，于1519年元月12日去世。竞争帝位的新选举不多耽搁便开场了。在这场较量中似乎没有不许用的手段。选侯们毫无廉耻地拍卖自己——经常拍卖两次而不是一次。教皇在谈到查理时说过“金钱将使他成为罗马人的王”，而我们不妨加上“或者说什么也将不会[使他成为罗马人的王]”。法国国王也有供自己支配的财富，也有意要获取这一头衔和威望及其提供的成功的希望。此外，在只关心自己的德国王侯中存在着分裂和敌意。于是，找钱便成了排在其他事情前面的第一件心事。查理在西班牙迫使议会允诺给予一笔特别津贴。然后他转向已是那个世纪新的大领主的金融家们求助。雅各布·富格尔答应给他30万弗罗林，不久查理又得到其他德国银行家——韦尔塞家族和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金融家——的支持。结果，所有这些商人都脱离了法国人的事业。

起初，查理和弗兰西斯似乎都得到由7名选侯组成的选举团中4票的支持。然而，在3月过去以后，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明白了竞争已经失败，即使他有利奥十世的支持，利奥“准备做任何[弗兰西斯]希望他做的事以阻止天主教国王当选”，弗兰西斯这么认为是大有理由的：

“你知道从这儿到他的国土的边界有多少英里吗？40英里！”但这害怕和默许是不够的。虽然处于劣势，但这位法国候选人仍然把[竞选的]花费提升到大大超出预料的数额。竞选最终花费了获胜者85万弗罗林，其中54.3万弗罗林是雅各布·富格尔提供的，14.3万是韦尔塞家族提供的。法国国王用金币支付，而天主教国王用在奥格斯堡兑现的汇票支付。汇票是一种许诺；它和现金支付价值是一样的吗？不过，美因茨选侯得到了大约10万弗罗林，并得到每年津贴1万弗罗林的许诺。拥有一支由弗朗茨·冯·济金根指挥的军队的士瓦本同盟事先已宣布支持查理，其帮助在心理上是巨大的，共花费171360弗罗林。

当然，如此之慷慨与挥霍无度，法国的资财便早已不足；里昂和热那亚的金融市场的能力显得不足。弗兰西斯一世于1519年6月和7月暗中降低了他的金币的成色，这是法国的资财不足的明证。对弗兰西斯不利的还有本身就很重要的这样的考虑：在德国舆论认为他是外国人。他是德国的邻居，本来会成为比在远方的天主教国王更起作用的主宰的。更有甚者，他难道不是对其人民实行“暴虐的”统治吗？最后，疏远哈布斯堡家族就是忽视边境上的麻烦，忽视土耳其人的威胁。所有这些考虑无一不是有分量的。

无论如何，1519年6月28日，查理在法兰克福当选——而且是全票当选：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7月6日，这一消息传到在巴塞罗那的查理耳中，但法国大使不在向他致贺的人们中。无论代价多大，这一成功是巨大的。不过，允诺是一回事，付款是另一回事。欠富格尔家族的债长期未清。不得不对他们在蒂罗尔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矿业方面的让步），然后是在西班牙，1525年把几乎是一个国中之国的三个骑士租借地、首领领地转让给他们。这是他们辉煌历史的阴暗面。

再说，这次选举皇帝解决了任何问题吗？为了公正地加以评判，我们必须估计并理解帝国的含义，至少尽可能估计并理解能被理解的含义。这决非易事，因为有上千个障碍横亘在路上：布下了政治纠纷的罗网和陷阱的路德宗的反叛；打击到西班牙中心地区的卡斯蒂利亚

科穆内罗斯起义（1521年）；在德国，帝国骑士暴动（1522年至1523年）和激动人心的农民战争（1525年）；在国外，发生了和法国的大战中的第一次战争，这次战争本身把一切都吸引进去；还有其猛烈程度倍增的土耳其军队的攻击。在这一切事件中，有两个年份将加以比较：1521年和1522年，和法国的冲突开始于前一年份，在后一年份罗德岛为[土耳其人]夺取，地中海从而危险地对土耳其人的猛攻和前进敞开了大门。整个基督教世界现在处于危险之中，为自相残杀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过，让我们回来看德国的场景。在那儿重要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于1521年元月8日召开。首先，棘手的路德的反叛问题被提出来，而查理也已发现了自己毕生的大敌。^[2]按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通缉路德令，新的教义被禁止；但禁止并不是制胜。其实，在欧洲正逐渐被烈火所吞噬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有时间致力于帝国的种种问题吗？查理把在奥地利继承的土地转让给其弟斐迪南，这不失为明智之举。该转让于1522年2月7日为布鲁塞尔会议所批准。斐迪南于是接管了5个奥地利的公国，即奥地利、卡林西亚、卡尼奥拉、施蒂里亚和蒂罗尔，后来（1530年）成为罗马人的国王。查理通过他，通过尼德兰总督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还有自己家族的帮助，对他这个命中注定不连成一片的过于庞大的帝国进行治理。这个帝国包围了法国。然而，法国打破了帝国的整体性并从一开始就使帝国不能正常运转。

因此，他只得对德国内部的争斗听之任之；只得尽可能不去捅这个危险的马蜂窝，让宗教斗争的火保持在火盆里燃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本来会对准备支持和保护路德的萨克森和黑森的诸侯加以打击的；或者对欢迎新宗教的富裕城市——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斯特拉斯堡以及后来的马格德堡——加以打击；或者制服条顿骑士团的大统领，此人在娶波兰国王的女儿后没收了骑士团的财产，自称为普鲁士第一公爵，采纳了路德宗的教义。然而，皇帝考虑到其他分心的事他应该做什么呢？等待并伺机行事——这就是这位青年皇帝采取的路线。他在执行这条路线方面，在1525年12月召开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并未获得多大成功，但1526年6月在斯佩耶尔由于德国各王侯的共同谋划收到了较大的效果。无论如何，即使他想要并能够击败新教异端，他那时也没有教皇实质上的支持。一切情况都有利于达成

妥协，而在1526年8月27日的条约中果然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宣布：

我们，帝国之选侯、王侯、议会……在召开一次全国大会以前[协议]在生活、治理国家、为人处世方面人人皆可各行其是，只要认为自己所做所为能向上帝和皇帝陛下交代得过去即可。

召开一次公会议的呼吁只能有利于而且实际上有利于新的教义，承认每位王侯的良心的权威甚至更是如此。然而，这必然是表面的平静。反对派正在形成：托尔高同盟（1526年），由黑森、萨克森、普鲁士、吕讷堡各王侯和一些改革派城市组成，另一派是科尼亚克同盟。^[3]这时一点火星就可能在德国燃起熊熊大火，不过这种情况后来才发生。

是弗兰西斯一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王和皇帝之间的斗争——救了德国。在查理当选为皇帝后，战争再也不可能推延了。这只是集中财力、订征兵协议、收买和拉同盟的问题。弗兰西斯一世的确并非没有办法。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树立了他在意大利北部心脏地区的权威。通过1516年的[弗里堡]永久和约，他得到了瑞士各州的实际支持，通过1521年的协议得到了欧洲最优秀的骑兵的支持，该协议允许他在瑞士各州征集一支16000人的军队。然而，[弗兰西斯一世]有一个小小的障碍：苏黎世，该城在茨温利的领导下不参加协议。^[4]但是，大问题是英格兰是否支持法国国王反对皇帝。因此就有了加来附近的[军队]调动，亨利和弗兰西斯在金缕地壮观得过分的会见（1520年7月7日）。然而喜庆结束了，如果说不是没有代价，那么至少是没有结果。小小的英格兰为其所能表现自己，时而站在一边，时而站在另一边，时而使天平向基督教国王倾斜，时而向皇帝倾斜。然而，也许除了在1528年，选择并非是很自由的。沃尔西支持教皇，英格兰准备屈服于查理五世的巨大权力。投向皇帝一边是否明智有待观察。的确，英国难道对帕维亚不分担责任？亨利八世及其谋臣们对查理五世的力量抱有幻想。他们把赌注押在查理这边，也许他们玩得很不高明。

然而，查理五世抓紧时间孤立法国国王，而国王则轻率地去鼓动反叛的科穆内罗斯人，科穆内罗斯义军于1521年4月23日在维拉拉（Villalar）被击溃，这对查理来说是一件幸事。在不久后的1521年5月29日，皇帝和利奥十世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于是，教皇和皇帝的

联军在11月19日袭击了米兰；该城无力抵抗，为联军所夺取，弗兰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在米兰的地位立即被恢复。这一打击是直接而沉重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亲自举行的会谈。按1521年8月25日签订的布鲁日条约，联盟得到了认可。查理将娶亨利的女儿玛丽为妻；查理和亨利两人都将于1523年3月[对法国]公开宣战。这些协议为查理访问英格兰时于1522年6月19日签订的温莎条约所确认。这两个盟国决定于1524年5月一道入侵法国领土。所有这些协议加强了查理五世本来已经强有力的地位。武装远征法国，特别以勃艮第为目标，早已于1521年秋开始。弗兰西斯一世入侵纳瓦拉未达目的并以彻底失败告终并无助益。战争决胜负的地方并不在法国或西班牙边境，而在意大利这个有富有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的国度，在那儿抢劫和征服可以激励王侯和支持军队。这个由相互敌视的国家和相互争吵和仇恨的军队拼成的意大利是一个理想的战场。道道大门都是敞开的。对法国而言，有两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米兰和热那亚；正如已指出的那样，热那亚是拥有一支能进行远距离战争的舰队的女霸主。

这样，教皇和皇帝之军队于1521年在科隆纳·普罗斯佩罗和莱斯卡雷（Lcscaire）的指挥下把洛特雷克子爵奥代德·富瓦和法军逐出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而且几乎兵不血刃便夺取了米兰。第二年，洛特雷克在北部平原和一支瑞士军队会合。然而，由于急躁他在比科卡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1522年4月27日），遭到惨败，但这次失败阻抑了法国人的攻势的影响，而锐气受挫的瑞士雇佣军被迫龟缩回瑞士。由于失败不是孤立的事件，帝国军队向热那亚发动了攻击，倾全力夺取了该城，然后大肆抢劫（1522年5月30日）。

数月以前利奥十世去世（1521年2月1日）。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六世当选为教皇，此人曾是查理五世的老师。他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中间奉行中立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土耳其人在东方的进攻，但未能成功。他逐渐被拉进了帝国的齿轮系统中，在他于1523年9月去世前仅一个月更是公开站在了皇帝一边。他死后继其位者是帝位候选人朱利奥·德·梅迪奇，当选教皇后称克雷芒七世。这是皇帝的一次新胜利。教皇似乎对皇帝言听计从。

在法国，弗兰西斯也发现事情一团糟，需要成功地加以对付。1523年，法国元帅波旁的查理背叛。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的混乱和斗争的高潮。1521年春，波旁的查理丧妻，其妻苏珊娜（Suzanne）是博热

的皮埃尔和安娜之女。她没有在世的子女。她在遗嘱中把自己的丈夫立为全权继承人。国王和昂古莱姆的女公爵都声称有继承权。元帅在和国王的敌人会谈后于1523年秋逃之夭夭，最终到达勃艮第并为查理五世效力。次年7月，他和一些西班牙将军以及佩斯卡拉侯爵一道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法国，穿越普罗旺斯，围困马赛。在这些不幸事件中，发生了一起小小的幸事：同情法国的安德烈亚·格里蒂于1523年被选为执政官。加倍努力筹措经费的弗兰西斯一世把王后和自己的银器押出典当。1524年8月13日，他在里昂要求得到所有能得到的金银餐具，“因为现在我所从事的事业如果没有大量的金钱便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面临这些准备措施，皇帝的军队放弃了对马赛的围困。1524年12月12日，因皇帝的成功而感到惊恐的克雷芒七世、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秘密和法国结盟。这引起查理五世对教皇的愤怒，教皇原是受他保护的人。同时，法军再次进入意大利，一支分遣队向那不勒斯进发，主力仍留在北方。米兰再次易手。

2月，驻守在北方的这支部队在帕维亚附近的米拉贝洛的公园筑壕固守，地位稳固；如果坚持不动，则只有好处。可是，不听种种明智的劝告，该部队向查理的军队发动挑战。在随后发生于1525年2月24日的战斗中，法军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弗兰西斯一世被俘。从意大利他被押送到马德里。帕维亚的丢失是由于法国国王的优柔寡断、轻率莽撞以及其他种种过错，还是西班牙军队的勇气和堪称瑞士雇佣兵的对手的德国长矛兵的高素质？无论原因如何，这次战斗立刻便产生了影响。查理的胜利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自马里尼亚诺战役以来的第一军事强国法国被打败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报复威胁到那些坚持顽抗的人，而克雷芒七世并非是最不坚持顽抗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按新条件重新加以了构想，这条件就是：欧洲有了一个新主人。

弗兰西斯一世在关押他的西班牙监狱中勉强地接受了马德里条约的条款（1526年元月14日）。他把路易十一世夺取的勃艮第遗产、弗兰德、阿图瓦和图尔奈三属国并因此也就把勃艮第公国归还给了其征服者。此外，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和阿斯蒂的主权要求。最后的耻辱是宽恕波旁的查理并恢复其财产和土地。弗兰西斯将娶查理五世之妹埃莉诺。尽管我们承认查理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愿意公平对待被他征服的人，但我们能说他是温和稳健的

吗？他的政策努力要做到放眼世界，矛头指向土耳其人。马德里条约第26条说：

皇帝和虔诚的基督徒国王陛下下的主要意图，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依据该特别和约获得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并由此实现对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切非基督徒和异教徒的精神控制……

一个月后，重获自由的弗兰西斯一世留下两个儿子作为人质，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中的边界。实际上，法国的地位并不像人们从当时的记述可能认为的那样绝望。法国由于在帕维亚的失败而失去了其显赫地位，但这失败也立即招来了盟友。人人都想到了要对付皇帝以保全自己。在任摄政王的萨伏依的路易丝的儿子被囚期间的任务颇为容易。她求助的呼吁并非没人理睬。在帕维亚战役的次日便向土耳其人发出了呼吁，后者的回答是有利的：此事以后讨论。同时，教皇的使者吉安·贾科莫·帕萨诺在英国和沃尔西枢机主教开始了会谈。这一切努力的成果是科尼亚克神圣同盟的建立（1526年5月24日），在该同盟中罗马和威尼斯支持法国以摧毁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势力为目的之事业。该同盟得到佛罗伦萨的承认，后又得到1526年7月24日被西班牙人逐出米兰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承认。亨利八世虽未公开宣布加入同盟，但抱同情态度。

科尼亚克同盟帮助法国缓过气来。土耳其人1526年8月在莫哈奇的胜利几乎使整个匈牙利落入异教徒之手，这是对法国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帮助。这打击到斐迪南和查理五世本人。后者在这些新的挫折中的感情，特别是他对克雷芒七世的感情，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宣扬他的事业，他于1527年9月17日给枢机主教团发出一封公开信。数月后的1527年5月6日，查理的军队开进并洗劫了罗马，克雷芒七世只得逃往圣安吉洛城堡避难。这是该世纪最可怕、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11月，教皇全盘接受了皇帝提出的协议，但却于1527年12月16日逃往奥尔维埃托（Orvieto）以逃避立即执行协议。毫无疑问，查理否认对洗劫罗马负有责任。此事并不妨碍“上帝之正义”追随其事业。后来许多年，尽管偶尔有独立的姿态和行动，教皇都唯皇帝马首是瞻。

然而，一些事件本身继续有利于法国。1527年5月17日，佛罗伦萨驱逐了梅迪奇家族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由尼科洛·卡波尼任领导。通过威斯特敏斯特条约，弗兰西斯一世使亨利公开加入了他的事业。7

月，洛特雷克再次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意大利，虽然未能夺取米兰城，但却穿越了米兰公国，和安德烈亚·多里亚与热那亚舰队协力成功地，把皇帝的拥护者逐出了热那亚，宣布该地由法国管辖，由泰奥杜诺·特里武尔齐任首脑。最后，显贵会议（1527年12月16日）向弗兰西斯保证他可以征收需要的税款以赎回两个王子。

不过，形势仍旧是脆弱的。双方都被如此长久的斗争拖得精疲力竭。一次事件就可能改变一切，使之朝这一方向或另一方向发展。引人注目的打击是在热那亚发生的。1528年的战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一支由洛特雷克率领的法军穿插到半岛的南端，围困了那不勒斯，致使该城几乎投降。多里亚的热那亚舰队切断了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控制下的西西里之间的联系，使封锁得以生效。在此关键时刻，热那亚，或者确切说安德烈亚·多里亚投向查理。热那亚对法国的事业的忠诚早已令人怀疑。1527年，热那亚人就已派遣一位使者温琴佐·帕拉维奇尼到洛特雷克处要求归还萨伏内，法国人威胁说要发展该城，这将不利于热那亚。法国代表雅克·科兰在1527年10月和1528年元月间几度劝国王保留这座珍贵的城市。1528年6月，安·多里亚的不满已是众所周知，结果查理努力离间他脱离法国的事业。1528年6月7日，让·德·塞尔维（Jean de Selve）致函当时在巴黎的蒙莫朗西说“皇帝正在做多里亚的工作，要把他争取过去，并通过多里亚许诺给热那亚城以自由”。事实上，多里亚待价而沽，先要求查理承认热那亚的独立，然后要求在意大利分两年连续付给他12万斯多库。他拒绝了克雷芒七世的开价。7月4日，他向其侄子下达了从那不勒斯前面的水域撤离舰队的命令。不久他便包围了热那亚（9月9日），终于恢复了按贵族宪法实行统治的共和国。弗兰西斯一世努力要对这一打击作出反应。8月，他计划在布列塔尼召集一支舰队，开往意大利以重新打开局面。10月，克雷芒七世建议他把萨伏内给予热那亚。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热那亚背叛产生的后果继续增大。在那不勒斯城前的法军大量死于疾病并由于洛特雷克的死而失去了指挥官，终于不得不于8月28日撤退。

热那亚投向皇帝，或者确切地说投向西班牙（热那亚的金融家们在西班牙已经有强大的势力）一边——这次重修旧好也是16世纪的伟大事件之一。它确认了一个不仅是政治性的同盟。它比从前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地位，因为意大利的生存既靠陆地也靠海

洋。这样，意大利西部的重要海军阵地被这位热那亚雇佣军舰队司令拱手送给了西班牙。

在这样的形势下，达成一种总体解决还会遥遥无期？通过1529年6月29日的巴塞罗那条约，皇帝和克雷芒七世达成一项协议。后者保证承认斐迪南为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和法国缔结了和约。按康布雷和约（1529年8月3日缔结，亦称夫人和约，因为是王太后路易丝和查理五世的姑母玛格丽特谈判达成的），弗兰西斯一世放弃对意大利的主权要求，也放弃他作为佛兰德和阿图瓦的大君主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查理五世同意不再坚持对勃艮第提出要求。波旁的查理和奥兰治亲王的领地转移给法国，而法国的同盟者罗伯特·德·拉·马尔克（Robert de la Marck）和盖尔德斯公爵则被抛弃。米兰公国被给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弗兰西斯一世将娶奥地利的埃莉诺。两位王子的赎金订为200万埃居，其中120万必须用黄金一次付清。

这一显然是广泛的解决办法在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的关系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我在这次的和平中看到两件好事”，克雷芒七世宣布，“第一件是法国国王将领回他的两个儿子，从此不再受皇帝的约束。……另一件好事是为了土耳其人的事，也由于路德派的原因，皇帝除去德国之外，别无选择”。

从1529年夫人和约的签订到1547年的米尔贝格战役形成了一个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政治对话的明确时期。弗兰西斯一世（死于米尔贝格战役前）统治的最后阶段冲突不那么剧烈和较少暴力。战争肯定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打运动战却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意大利，火炮的设置，隐藏的防御墙的修筑，更重要的是石墙——过去极易被突破——的修筑，所有这些工程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使防御工事更加牢靠。^[5]现在已不可能像在洛特雷克在世时那样可以轻松愉快地进入意大利了。

还有第二点原因，这原因本身就是充足的：除了1536—1537年和1542—1544年有两次战争外，查理五世和弗兰西斯一世没有冲突。毫无疑问，经济条件不能支持这些吞食了诸侯和国王们岁入的长期战争。在弗兰西斯一世的明智判断中有这一原因吗？这说明许多问题。开初，他也许认为这是他和独裁者之间的个人问题。然而，还有别的

势力——亨利八世和不安的教廷包围着他们，在他们之间，准备既反对他们又调和他们。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正确评价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1540—1541年以前发动的强大进攻，以及德国缓慢而稳步地为突然发动米尔贝格战役作准备。弗兰西斯一世的政策——不管是否是事先的智慧——反映在并非是他引起的、他也未为之付出代价的事件的影响中。

在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斗争中，还有第三支巨大的力量——土耳其帝国。土耳其人在1529—1530年以前许久，即在1519年查理五世正在接受全欧洲对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祝贺时，便进入了这场斗争。甚至在此以前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巴尔干半岛诸国，在中欧，尤其在西方世界的财富仍然依靠于它的地中海——就已经是一个政治现实了。土耳其人无论向什么方向推进，碰见的都是弱国，这些弱国要么由于内部原因而腐败，要么太小以至不能对基督教世界给予任何实在的保护。就意大利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在地中海是再正确不过了；意大利既面对西方又面对东方，但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虚弱不堪，这是危险而不祥的。在中欧也是如此，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是脆弱的堡垒。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是南欧重要的前哨阵地。它们是否会投降？1520年时匈牙利就已经表现出对自己的任务和责任未做好准备。这个王国从内部受到宗教改革思想的滋扰，并受其君主政治甚为虚弱之害。路易二世及其一帮朝臣（大封建主）倾向于接受德国的影响；他们遭到主要由马扎尔贵族组成的由特兰斯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领导的民族派的反对。哈布斯堡王室企图利用这些不和，其政策助长了匈牙利的身心两方面的长期虚弱。而且，在政治的阴影中潜藏着大工商业的影响。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广有企业的福格尔家族——主要是（比如说）诺伊索尔和克雷姆尼茨（Kremnitz）的铜矿和银矿——在德国的渗透掩盖下推进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出口和赢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约翰·扎波利亚的批评。

在地中海，形势也是同样令人惊惶。在恐怖者谢里姆苏丹（1512—1520年在位）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压力急剧增大。在查尔德兰战胜波斯人（1514年）后，土耳其陆军夺取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1516年），然后夺取了埃及（1517年），再后接受了麦加的行政长官的归顺。所有这些胜利必然是对西方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不难想象

的危险，建起了一条由威尼斯帝国和热那亚帝国组成的脆弱的防线，特别是扎营于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实在是非常脆弱。在这相互争夺的地区那边，有巴巴里海盗造成的危险，16世纪初在海尔·阿德丁当头目时其势力之崛起令人触目惊心。^[6]必须指出，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在各个方面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甚至马上直接和间接的威胁。在匈牙利和地中海，冲突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假如考虑到和法国的斗争，事实上是在三条战线上。查理五世像这样在各个方面保卫自己，耗尽了他庞大的力量。

1520年9月22日，苏里曼大帝继承谢里姆的苏丹位。在他统治期间，对基督教世界施加了力度大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打击。那时是[基督教世界]生死存亡的时候。1521年，即他统治的第一年，苏里曼离开君士坦丁堡（5月10日）。7月8日，他顺路夺取了沙巴茨，月底前便完成了对贝尔格莱德的包围。威胁是很严重的。教皇已经使大家注意到了这危机，事实上匈牙利国王的使者希罗尼穆斯·巴尔布斯已出现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4月3日）。然而，查理五世忙于对付德国的问题和路德的反叛，对他的要求未予重视。贝尔格莱德的命运只能靠自己了。面对土耳其人的炮火与爆破坑道的打击，该城终于在8月3日屈服。威尼斯知道自己虚弱，赶紧和苏丹讲和，苏丹确认其商业特权和在君士坦丁堡设领事的权利，允许其保有塞浦路斯，作为这一切的交换条件，威尼斯向苏丹缴纳1万达卡的贡金。

苏里曼1522年如何把力量转而对付罗得岛下面将有叙述。^[7]土耳其人的胜利是慢慢得来的，但围困一天天过去，没有帮助，没有增援。那年发生了比科卡战役，教皇的和平呼吁没有得到响应。阿德里安六世致函查理说，假如罗得岛或匈牙利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他恐怕基督教世界的王侯们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夺回来。1524年，匈牙利的刘易士再次求援。1525年2月发生了帕维亚的灾难。法国开始与高门^[8]建立联系。这位摄政王先派了一位代表，后于12月又派了一位大使，1526年2月苏丹对此作了满意的答复。这样土耳其便加入了欧洲的“音乐会”。匈牙利仍旧处于孤立状态；波兰于1525年续订了休战协定；威尼斯受其签订的条约的约束。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间的斗争也是对东方问题的这种普遍不关注的一部分，这是史家必须指明并加以详述的。

自1516年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的路易二世（当时年仅10岁）统治的是，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一个政治上、社会上和宗教上分裂的国家。民族主义派由于国家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而势力日增，1521年的货币大贬值便是经济困难的明证。该派领袖约翰·扎波利亚就是在反对德国的影响和保王派中声望大增的。1524年，路易对这恐外症作了让步，1525年再次让步。福格尔家族在宫廷中的同盟者被撤换，其矿山被没收。后来，安东·福格尔（1525年雅各布去世后他接管了控制权）估计损失达206714弗罗林。然后，1526年8月匈牙利在莫哈奇遭到毁灭性的失败。^[9]路易被杀，匈牙利如果说不是被征服了，也是对入侵敞开了大门。10天后，胜利者进入布达。

莫哈奇战役的后果之巨大有如帕维亚战役，甚至胜过帕维亚战役。从这时起哈布斯堡王室发现自己首当其冲，独当难局。斐迪南，查理五世之弟，帝国总督，已故国王路易之姻兄，为自己既继承了亲德的保王派的计划，而且也继承了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的要求。现在他发现自己有责任保卫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徒的侵犯。一部分地是出于野心，另一部分是由于深谋远虑，因为——正如一位观察家在德国评述的那样——斐迪南的国土被置于极大的危险中。自卫也是保卫他人。10月23日，斐迪南在布拉格被宣告立为国王，12月17日在波若尼匈牙利贵族承认他为匈牙利国王。他立即发现遭到扎波利亚的反对，因为后者也被选为国王，这次是被民族主义派于11月10日在施图尔韦森堡选为国王的。一场夺取后方的帝国的反哈布斯堡王室的运动的前景吸引了科尼亚克同盟的注意。但扎波利亚被调解的提议分散了注意力，于1527年9月26日在托考伊被斐迪南打败，后者于11月5日举行了加冕仪式。

莫哈奇战役的惨败使匈牙利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国土。^[10]土耳其人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哈布斯堡王室控制下的那部分匈牙利，斐迪南确立了自己的权力。由于他，福格尔家族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矿山和工业企业，一直开发经营到1540年。在此期间，扎波利亚隐蔽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山区并投向苏丹，苏丹承认他为国王和臣属。然而，1538年他和斐迪南和解。不过，在经过几次大战后匈牙利的国王、诸侯、领主们变得几乎无足轻重。大斗争是在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进行的，而后者至少在1540年以前没有减轻过其压力。事实上，土耳其人沿多瑙河继续进攻，1529年9月土耳其国旗已插在了维也纳的

城墙前。这时，德国才注意到这致命的危险。3月在因斯布鲁克召开的帝国议会表决通过拨款12万莱茵盾供抵御土耳其人用；5月，斯佩耶尔帝国议会答应组建一支16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组成的陆军。关于维也纳围困的失败在别处叙述。^[11]在维也纳，土耳其人入侵欧洲的浪潮达到了最高点。这一事件很重要，事实上既显示了苏丹的力量之巨大，也暴露了其限度。1529年在维也纳城前的挫折，1532年在小城金斯前的厄运，同年在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下的舰队在袭击阿尔及尔附近非洲海岸边的小港市舍尔沙勒时只获得小小的胜利，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说明土耳其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阻止其攻势并非不可能。不过，在1540—1541年以前，苏丹仍旧能发动一些可怕的打击。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可怕的严重形势有历史为证。

现在是完成对德国的描述的时候了，德国在皇帝的事务和优先关注的事情中越来越处于最显著的位置。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运动在德国发展，从事情来看它们各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方面。一方面，稍稍地、几乎察觉不出地开始了积极的天主教的复兴，强劲有力并富于进攻性，德国的史家们指出这就是势不可挡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新教运动并未停止前进和巩固其对德国的尚不牢固的控制。天主教的复兴和新教的扩张——这两个运动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说明的。一个运动的胜利对另一个意味着忧愁，恐惧和成功经常互换位置。德国的世界尽管在16世纪上半叶显著地繁荣，但不可能无限期地繁荣下去。这两个运动发生冲突，从早期便为该世纪中期的爆发作了准备。

必须指出，大约在1530年路德派就显然获得了成功，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稳步走向巩固。那些签署施佩耶尔《抗议书》（*Protestation*）的团体开始有了较明确的形式。在施马尔卡尔登，从1530年12月22日至31日，各路王侯讨论了这一问题，在1531年2月2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著名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其成员有黑森伯爵领主菲利普、萨克森选侯、不伦瑞克公爵和吕讷堡公爵（即菲利普、奥托、恩思特和弗兰西斯）、安哈尔特的沃尔夫冈亲王、曼斯菲尔德伯爵（格布哈德七世和阿尔伯特七世）、斯特拉斯堡市、乌尔姆市、康斯坦茨市、罗伊特林根市、梅明根市、林道、比伯拉赫、伊斯尼、吕贝克、马格德堡和不来梅。“在任何场合”，协议说，“我们中任何一员为上帝之道和福音的教导或为其他任何与此有关的事遭受攻击，其他全体成员将立即尽其所能前往援助，帮助他脱

离危难。……”然而，该同盟并未消除建立更加严密的新教联合体的障碍。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这一形势。1531年10月11日，茨温利这个令人烦恼的因素在卡佩尔战场上消失了。他的失败促使新教徒解决分歧，紧密团结。同盟不久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其军事组织在1531年11月和12月完成。萨克森选侯和黑森伯爵领主将分担领导责任。有新成员加入同盟：格丁根、戈斯拉尔、艾恩贝克、汉堡和罗斯托克，后来在1537年，又有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汉诺威加盟。新教就这样在德国北部牢固确立起来。但他们组织起来保卫自己从性质上说是对一场气势汹汹的坚定的天主教运动所作的反应，该天主教运动即使在政治层面也已成为历史上的一股伟大力量。在德国，这些年代就像万花筒里的图案般一闪而过。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许多原因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桥梁并非一朝一夕便全部遭到破坏。有一大批温和稳健的人指望能重新编织教会的结构。德国的史家，例如卡尔·布兰迪（Karl Brandi）和彼得·拉索（Peter Rassow，他甚至更持以下观点），已正确地认为在1530年举行戏剧性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期间所做的求和解的尝试具有头等重要性。尽管皇帝和梅兰希顿作了努力，这些尝试终于失败。^[12]尽管如此，但它们揭示的不仅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且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形势。在多种多样和深奥莫测的灵性生活以外，我们不应忘记在帝国境内外复杂的政治情况。在西方有敌对的法国，在东方正和土耳其人交战。因此，朝宗教战争发展的诸阶段需要追溯。在1532年的纽伦堡帝国议会上，匈牙利的诸问题和在匈牙利进行的战争的必要耗费首先浮现在与会者心头。国外的斗争和国内问题的解决导致了1532年7月23日在纽伦堡正式缔结和约，该和约宣告了德国境内一切宗教战争的结束，并因此暂时停止了对萨克森选侯的迫害和其他针对新教徒的诉讼案件：“我们认为应该维护帝国和王公领土内的和平与公共和谐，如此我们才能更好更有力地抵抗所有基督徒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制止他们杀戮基督徒。”

所有这些因素——所有或几乎所有——使从德国所处的中心地位来理解贯穿于这场王朝之间的斗争的第二幕的事件的进程变得较为容易。像往常一样，困难在于安排场次和指出能说明问题的起索引作用的事件，一系列因果关系。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一条基本法则：德国境内的和平，在德国天主教和路德派交替占优势，时有内战的虚

惊，时有冲突发生却没有引发内战的烈火——这和平有赖于在东方和西方进行的国外战争。现在，西方的战争于1536—1537年和1542—1544年爆发；而东方的战事相当频繁。经常的情况是处于戒备状态而不爆发公开战争；在陆地上和海上都往往如此，表现为抢劫和袭击。必须指出，哈布斯堡王朝从各方面尽了一切努力来限制破坏和财力与精力的消耗。他们的确很懂得如何在苏丹的朝廷进行谈判——也许不是皇帝本人懂得，因为他不想在讨价还价中丢失面子，而是皇弟懂得，皇弟被安放在维也纳，其领地使他成为土耳其人的邻居。1532年，在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后，苏丹和斐迪南达成了一项永久停火协议（事实上停火只是短暂的）。在罗马人的国王看来，协议在形式上是屈辱的，但实际上是有利的。毕竟，苏丹有别的事要操心（1534年，1548年，1553年在波斯进行的战争）^[13]，也有别的野心。在法国国王和巴尔巴罗萨（他已被任命为苏丹的舰队的总司令）的要求下，他投入了一场地中海的大战，这场战争如此猛烈以至连威尼斯也未能幸免，1538年他看到了皇帝的舰队在普雷韦扎附近的撤退和失败。地中海即将成为土耳其的一个内湖。^[14]1542年，战事在匈牙利边境重开，于1547年结束，然后有5年的和平，但1551年战争又重新爆发。以上所有这些例子说明，伊斯兰教和哈布斯堡王朝间的战争永无休止，但应该补充说明，这并非是一场无意义的斗争。然而，土耳其人不是唯一的异教徒。即使是半皈依，在西班牙也有穆斯林；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对面有巴巴里的海盗。1535年，查理五世亲自率军夺取了突尼斯，但1541年引人注目地试图夺取阿尔及尔时遭到失败。^[15]

和法国的战争也是断断续续。在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后，需要一次惊人的事件才能促使查理五世和弗兰西斯一世重新开战。1535年，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亡故无嗣。他的死再次激活了在意大利引发战争的地方性刺激因素。整个意大利靠上千种欲望和仇恨生活。意大利甚至不是自由的，因为西班牙的控制自1529年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撤退的代价，查理是承担不起的。作为皇帝，他是米兰的宗主。他安排了爵位继承并在米兰驻扎了自己的军队。对此，已为自己过去的热情所耗尽的弗兰西斯一世重新提出了过去的要求，这一要求在此激动的时刻看似合法。米兰是弗兰西斯一世所关爱的地方。他加倍努力筹划战争，吁求帮助，首先是向土耳其人求助。没有土耳其人，就没有舰队。没有舰队在东方钳制，他如何能战胜这样强大的对

手？亨利八世和路德派都决定中立观望。苏里曼在匈牙利施加了压力并派遣其舰队西进。这一次，与前面讲过的情况相反，既没有“协议”，也没有正式的同盟，毋宁说只有一——用史家约尔加（Jorga）古老而总是贴切的描述——两个大国的“对应行动”。

战争需要额外的开支。查理五世立即向金融家们求助。1536年4月14日，福格尔家族以14分的利息贷给他10万达卡，用从新大陆来的金银偿还。1537年2月26日，又借得10万达卡。此外，一支满载财富的舰队到达塞维利亚。同年铸造了著名的埃斯库多，一种较轻的金币。铸造金币本身说明，庞大而散乱的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并非一切都好。

然而，这场战争的范围并不广。弗兰西斯一世侵入萨伏依和皮埃蒙特，4月夺取都灵。查理五世采取了反对行动，派遣军队第二次进入普罗旺斯，但远征再次未获成功。在北方，埃格蒙特的查理（1538年去世）将其领地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但在海利赫来战败后放弃了格罗宁根。事实上，这是一场规模小时间短的战争。战争由于保罗三世的干预而结束，1538年6月18日签订了尼斯停战协定。协定维持10年；肯定了康布雷和约，交战双方保留各自占领的土地：弗兰西斯一世保有萨伏依和皮埃蒙特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仍旧在皇帝手中。这样，按法国史家的看法，法国夺取了保护王国的土地。协定签署之后的7月，查理五世和弗兰西斯一世在艾格莫尔特亲自举行会谈。他们很快便达成反对三位一体的异教徒——土耳其人、路德派、英国人——的协议。

从这一切——在这两个对手之间一场短暂的斗争后，皇帝穿越法国到达尼德兰，该地的根特正处于叛乱之中——我们必须说明，法国获得了垂涎已久的通往意大利的通道。然而，甚至此时真正的基督教国王也并未在搅乱场面方面有所克制。这时，查理五世感到自己足够强大和安全，可以让儿子就任米兰公爵了。几乎不可想象弗兰西斯一世会对此既成事实听之任之。1542年7月3日两名法国密探兰科尼（Rinconi）和弗勒戈西（Fregos）在帕维亚附近被暗杀，弗兰西斯一世以此事为借口于1542年第四次向查理五世宣战。他立即向土耳其人求助。法国和巴尔巴罗萨的联合舰队夺取了尼斯，但未能占领该城的要塞。在法国于1544年在切雷索莱获胜——其重要性不可夸大后，皇帝从尼德兰进攻并在法国北部夺得一些土地：8月17日夺取尚皮涅的圣迪济耶，9月夺取蒂耶里堡和苏瓦松。亨利八世在布洛涅城前安营扎

寨。瑞士军队正在抛弃法军。弗兰西斯一世被孤立，只得求和。不久，即1544年9月18日，在克雷斯皮缔结了和约。查理放弃了对勃艮第的主权要求；弗兰西斯则放弃对那不勒斯以及佛兰德和阿图瓦的主权要求。他的次子奥尔良公爵将娶皇帝家的一位公主为妻（1545年3月），但他于1545年9月9日去世，由于他的死，米兰重新回到查理五世手中。

由于这些在东方和西方，甚至在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上进行的战争，德国没有出现其国内问题本来会必然导致的那些后果。然而，这些颇大的益处是短暂的。当新教徒从天主教方面获得一些援助时，它们就更加短暂。的确，在转而讲述导致米尔贝格战役的那些事件以前，值得说明大致在对法战争期间新教的很具特色的发展。

有一次小规模战争的结果于1534年夏恢复了符腾堡公爵对自己的公国的统治。15年前他为士瓦本同盟所驱逐，现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恢复了其地位（随着他的复位，宣布该公国改奉新教）。黑森的菲利普是此事的组织者。在弗兰西斯一世的公开支持下，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于1534年4月入侵，弗兰西斯进行干预得到蒙贝利亚尔作为回报，他喜出望外。6月末，一切问题皆在卡丹和约（1534年6月29日）中得到解决——或者说至少看似得到了解决。^[16]最重要的问题，德国境内的和平，仍旧未获解决。其他事件对路德派有利，特别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1535年，天主教徒、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去世，由约阿希姆二世继位，他起初归属于天主教的黑勒（Helle）同盟，但后来在1538年却拒绝加入天主教的纽伦堡同盟。到1540年时他已经改奉路德宗。1539年在萨克森公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是年虔诚的天主教徒乔治公爵亡故。爵位由亨利继承，亨利为新教徒，1541年再为莫里斯继承，此人也是新教徒。这些变化虽小，但其本身意义重大。德国新教正在扩散到全境。另有一件小事此时发生了，其细节无关紧要。1538年至1539年出现了复杂的于利希-克莱沃-贝格继承问题。

其中一个继承对另一个都意味着恐惧。天主教方面的恐惧随着纽伦堡同盟的建立（1538年6月）而结束，哈布斯堡王室将按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模式来组织该同盟。其成员有皇帝、斐迪南、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不伦瑞克的两位公爵、美因茨和萨尔茨堡的两位主教。好处和挫折都有，交替出现。1540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丢人现眼的事件，击中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要害，当年黑森的菲利普脱离同

盟，后来与查理五世结盟（1541年6月13日）。[17]他抛弃了和英国、法国和克利夫斯原有的联系，答应帮助查理，并承认斐迪南为查理的继承人。这一事件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队伍中打开了一个颇大的缺口。它为查理提供了征服很重要的盖尔德斯公国的机会。1543年8月24日，查理成功地进行了对迪伦的进攻，9月6日在芬洛接受了威廉公爵的投降，1546年威廉回归天主教。

到此时，形势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事实上，德国境内的冲突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1542年7月，处于孤立的天主教诸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亨利目睹了他的公国被萨克森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和黑森的领主伯爵所蹂躏。他的公国在他逃离之后立即被改奉路德宗。当时查理的处境几乎不容许他干预此事，因为他很可能激起法国、瑞典、丹麦和苏格兰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甚至教皇也不可信赖。此时此刻他有亨利八世作为盟友，因为亨利在英格兰不断加强天主教改革，曾使他疏远了德国新教的事业。1543年2月11日，这两个大国秘密结盟对付法国；皇帝和亨利八世分别于5月和8月公开宣布这次结盟。尽管如此，对新教控制下的德国施加打击的时候尚未到来。它仍然倾向于弗兰西斯一世。1541年4月，正如孔塔里尼评述的那样，弗兰西斯一世热情地鼓励德国新教徒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的控制，甚至宣布对他们的教义他并非不同情。前面已经提到，1542年基督教国王向查理皇帝宣战。从此时起，在德国采取坚决的行动是轻率的。查理五世是小心谨慎的人，懂得如何等待时机。1544年9月在克雷斯皮缔结和约后，他从这克制状态解脱出来。和约有一条：

使他得以放手对我们神圣的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同盟加以整顿，防止基督教当前所面临的危险恶化到不可收拾，以使该同盟得到普遍的安抚，使大家能够同仇敌忾地去跟土耳其人及一切非基督徒作斗争。

然而，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提前许久为查理五世在德国的进攻性政策做好了一切准备。[18]他已花钱买到了支持。萨克森的莫里斯于1542年退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在对法战争期间他参加了查理的军事行动。1546年6月9日，他和查理签订了中立条约。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在花钱收买支持方面，在软化人的良心方面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无须补充说明的。为了使这位青年公爵脱离新教的事业，皇帝利用了他的个人野心。毕竟，他难道不愿意把萨克森选侯的领地添加到自己的公国的领土上吗？1546年10月27日，莫里斯

得到许诺将获得他垂涎的这一荣誉。此外，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虔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通过1546年6月7日签订的条约站到了皇帝一边。6月9日，查理五世落实了和教皇的一项协议，教皇在特兰托公会议上允诺给他一支军队和一大笔津贴。1546年5月，一心想打仗的皇帝开始动员其部队。可是，在战斗的前夜，并非一切都如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在缔结克雷斯皮和约后，黑森的菲利普重新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而新教方面已经为这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好了准备。1545年至1546年冬季（12月到2月），该同盟在法兰克福进行了商讨。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1546年6月后）上，新教对特兰托公会议表示反对，并要求召开一次全国大会，但未获通过。战争已经在进行了。

起初，新教方面有相当大的军事优势：50000步兵、7000骑兵和110门火炮。其指挥官塞巴斯蒂安·沙尔特林·冯·布滕巴赫有卓越的才能，他的战略目标是封锁蒂罗尔诸山口，不让皇帝的军队通过，切断他和意大利的联系，并阻隔帝国境内的交通。然而，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控制和坚强的领导，这些计划被放弃，以至新教徒逐渐失去主动权。1546—1547年，命运出现了离奇的转变。在数月之内，伟人们一个个从舞台上消失——路德（1546年），巴尔巴罗萨（1546年），亨利八世（1547年元月），弗兰西斯一世（1547年3月）。现在只剩下皇帝一个伟人，他的威望增高，间或还有好运的帮助——不过可以肯定，命运宠爱的是年轻人。他只需耐心等待，计算时日。他一步步成功地对付了下列城市：1546年底夺取梅明根、比伯拉赫、海尔布隆、埃斯林根、罗伊特林根、法兰克福，次年元月夺取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2月，仍在抵抗的只有康斯坦茨，在此期间天主教再次在科隆复辟。接着，他转而对付约翰·弗里德里希，约翰已侵入莫里斯的领土。4月13日，他进入萨克森；同月24日，他在易北河的薄雾中赢得了决定性的米尔贝格战役。约翰·弗里德里希落入他的手中；6月20日，黑森的菲利普投降。就像在帕维亚一样，这次皇帝似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萨克森的莫里斯得到了允诺给他的选侯领地，并随之获得了维滕贝格和萨克森的富矿。

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从来没有如此之大，如此傲慢，但同时也从未如此脆弱。在米尔贝格战役后10年间这令人敬畏的地位的崩溃是这场戏剧性的王朝斗争的最后阶段。

随着世纪中叶的到来，欧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仅仅在数年内，在查理五世发动的混乱战争中西班牙的支配地位便被感受到了，而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将进入历史的阴影之中。皇帝失掉了其威望，他的德意志帝国则失掉了其经济威力。的确，另一个欧洲出现了，人们几乎可以说一个西班牙的欧洲出现了，它比查理五世的欧洲对大西洋、对全世界的问题更加开放。地中海丧失了部分重要性，而土耳其，那只大胡蜂，则受到了遏制。不过，我们不在此论述这一段广泛的历史，而应该讲一讲查理五世的最终命运。在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年代里，步伐加快了，在这快步前进中他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力。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耗资巨大。1547年2月，福格尔家族就说过，由于不能按时偿还，他们“对皇帝借债感到厌烦”。就在皇帝的政策本应向前推进从而招致新的开支时，其政策变得精于计算，成为资金不足的吝啬的管家。人们秘密地或公开地指责查理，说他的政策对大家，无论是敌是友，都是昂贵的节俭。就他个人来说，教皇保罗三世不希望特兰托公会议成为皇帝的工具。1546年元月，他从查理五世的军队中撤回了自的部队。为了摆脱皇帝的直接影响，他于3月将会议迁往博洛尼亚。他对费兰特·贡扎加之被提名任米兰总督感到惊恐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保罗三世于1549年元月去世。

对新教控制的德国之突然征服本身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对这一胜利加以整理，并将新教重新统一进基督教世界中。其结果只能是专制的，因此是困难的。1547年9月1日召开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于1548年6月30日接受了一份倾向于天主教的临时协议。路德派和天主教两方面对妥协均不满意。^[19]皇帝则较不费力地宣布（1548年7月）尼德兰的17个省获得自由，不再受帝国法律的管辖：促成这些权威的决定的与其说是宗教，还不如说是政治。德国境内的叛乱在蔓延。1550年2月，在柯尼西斯贝格成立了一个防御性的同盟来对付哈布斯堡王室，加盟者还有屈斯特林的汉斯，梅克伦堡的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和普鲁士公爵阿尔伯特。6月以后，法国的使者与萨克森的莫里斯开始重要的谈判，结果于1551年10月5日达成洛豪协议，之后又于1552年元月15日议定了尚博德条约，该条约最后由黑森的威廉和梅克伦堡的约翰·阿尔布雷希特于2月19日完成。性格忧郁的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允诺给其盟友一支军队并给予补贴。其盟友则将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辖

区割让予他作为回报。这些协议得到苏里曼的支持，也得益于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关于提前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意见分歧。^[20]

帝国的外交十分奇怪地落后于德国和欧洲的阴谋，自认为可以不依靠战争就获得成功。帝国外交随波逐流，终于遭到欺骗。尼德兰摄政王匈牙利的玛丽建议应该采用任何可用的手段抓获萨克森的莫里斯，但未被采纳。因此，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1552年3月13日，法国在德国境内发动了战役，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不在意大利境内。一支35000人的军队穿过洛林，占领了三个主教辖区。同时，萨克森的莫里斯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侵入德国南部并突然袭击了查理五世。查理只得逃往因斯布鲁克，然后翻越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到菲拉赫避难。不过，他的士气尚存。1552年4月4日，他写信给斐迪南说：“假如我必须在受奇耻大辱和冒大险之间作出选择，我将选择冒险。……”他向安东·福格尔求助。这位奥格斯堡的商人不愿看到自己的企业陷入危险，借给皇帝40万福洛林。同时，多亏了斐迪南，部分地也由于那位出色的统帅萨克森的莫里斯的骑墙和算计，一切都迅速发生变化。查理五世的诸王国，尤其是西班牙，救了年老的皇帝。查理回到奥格斯堡，和阿尔瓦公爵联手，在德国天主教势力的支持下，围困了法国人从皇帝手中夺取的梅斯。该城在吉斯的弗兰西斯的指挥下固守，查理不得不于1553年元旦撤军。然而，1553年7月9日，在西弗斯豪森（Sievershausen），就在战胜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的时刻，萨克森的莫里斯被杀。这位侯爵在施泰特堡（1553年9月12日）和施瓦察赫（1554年6月3日）再三战败，后逃往法国。

在经历了这次挫折后，未老先衰并受身体上的疾病折磨的查理五世认识到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问题已经不再是使用武力解决德国的事情。通过《奥格斯堡和约》——皇帝并不愿意缔结该和约，宗教和平在路德派（但并不是新教各派，因为加尔文宗被排除在外）和天主教之间得以确立。后来，这一解决方案被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随后，查理退位，退隐，去世。^[21]帝国的皇冠落在他的弟弟斐迪南头上。查理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得到西班牙、新世界诸国、那不勒斯、米兰、弗朗什-孔泰和尼德兰。和解已为期不远。承认在德国的失败、政区的分割、西班牙利益的优势，尤其是1557年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性的破产致使损伤了战争的力量，这些都是导致结束这场争端的要素。所以，1559年4月1—3日在卡托—康布

雷齐签订了和约。法国放弃萨伏依和皮埃蒙特，并随之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不过，法国保留了五座要塞，包括都灵、萨卢佐和皮涅罗尔；在北部保留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著名的主教管辖区。在意大利，梅迪奇家族得到了锡耶纳作为封地；伦巴第被分裂——西部归萨伏依，南部和东部归法尔内塞家族和贡扎加王室。由于这一大解决，欧洲的外交活动出现了一次间歇。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以欧洲近代史上伟大的和约之一著称于世。和约的许多决定后来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和约持续有效，这对历史来说是一件大有好处的事。那么，和约为何持续有效？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点与该时期的经济形势有关。和约缔结后，欧洲，也许全世界的所有活动都受到了刺激。一种更有活力的血液在循环。第二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该世纪中叶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折点。与其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未来的开始。16世纪的后半叶将揭示和展现西班牙统治的长期的、充实的路线。欧洲的重心，实际上是世界的重心，偏离了欧洲中部诸国。查理五世本能地意识到其统治地位的不确定性；他认识到自己的帝国的中心在西班牙。他的退位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清楚地说明菲利普的支配地位，让德国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听任法国内部纷争不已。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不知不觉地获得了成功，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欧洲的宪章，这个新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了西部，那儿大西洋带来了珍贵的新的生命。土耳其人仍旧可能在匈牙利逞凶斗狠，但匈牙利已被征服被野蛮化了。欧洲中部瘫痪了，很快意大利，有着繁荣兴盛的城市的意大利，衰落了。未来的路甚至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大西洋彼岸，在世界七大洋的彼岸。

（孙善玲 译）

[1] 另见本书边码第324页以下及本书第十七章。

[2] 参见本书边码第81页以下。

[3] 见本书边码第343页。

[4] 见本书边码第100页。

[5] 参见本书边码第491页以下。

[6] 参见本书边码第324页以下，及边码第518页以下。

[7] 参见本书第510页以下。

- [8] The Pome, 奥斯曼帝国政府。——译者
- [9] 参见本书边码第512页。
- [10] 参见本书边码第552页以下。
- [11] 参见本书边码第514页以下。
- [12] 见本书边码第93页以下。
- [13] 参见本书边码第516页以下，边码第524页以下，边码第528页。
- [14] 参见本书边码第519页。
- [15] 参见本书边码第518页，边码第531页。
- [16] 参见本书边码第165页以下。
- [17] 参见本书边码第179页以下。
- [18] 欲了解关于查理五世的政策的一种有些不同的见解，参见本书边码第181页以下。
- [19] 参见本书边码第183页。
- [20] 见本书边码第332页。
- [21] 参见本书边码第332页。

第十二章 知识发展潮流

一 著述：印刷的书籍

到了1520年，印刷术已在出版业中正式使用。印刷术已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是这项发明使人们开始了对凸版印刷文物的收集。

尽管16世纪的文物收集家对此项发明颇感兴趣，尽管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关于这项发明的学术研究几乎从未中断过，但是我们对印刷术早期发展史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项新技术最初是作为商业秘密严加保护的，尤其是当印刷的书籍在一段时间内，即令不能完全冒充手写本而和手写本展开了竞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其次，最早的书籍清一色都是十分流行的著作，很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和经常使用而破损，没有流传下来，或者说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篇断简。还有一种情况，印刷的书籍由于其性质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善本收藏家的注意，所以没能有系统地出现在同时代的图书馆里。最后，研究早期印刷的书籍的学者们多数只有自己本行的专业知识，他们对手写本书籍的制作和发行所知甚少，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孤立进行的，只有当把手写本书籍的证据和印刷的书籍的证据放在一起时，对15世纪图书贸易的探究才会取得长足的进展。

所幸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15世纪毫无疑问经历了一次图书需求的高涨，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在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这个队伍中，能阅读会写作的人在迅速增加。同时财产管理和商务管理都得靠书面的账目，过去那种需要学问的专业队伍——神职人员、律师及官僚——的人数已经不少了。如果说15世纪大学的教育质量下降的话，那么受教育的数量倒是大大上升了，并且中等教育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之而来对于图书的需求也就决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职业阶层，虽然光是这些人就已经够多的了。印刷术的发明同样也影响到供灵修的著述和供消遣的著述。除了神职人员们需要拉丁文版《圣经》和礼拜仪式书外，修士和平信徒都极其需要本国语版的经典和神秘主

义著作，编年史家、诗人和小说家在城堡和市镇中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到底残留下来的拉丁文《圣经》、每日祈祷书以及其他礼拜仪式的手写本有多少已无法计算：各个大型图书馆都拥有许多这类套本。但是，英文版《圣经》的誊本只剩下了200本；曼德维尔的法文版《旅行记》不超过60本；傅华萨的《编年史》剩下100本左右；英文版的英国《布鲁特编年史》（Brut）据查证有120本。这些大部头书籍非常昂贵，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永久性保存的要求来制作和设计的。这些书籍照例都是大部头，这有助于说明中世纪后期图书业生产的那些保存期较短和更适合个人的书籍的篇幅，比如学校用书像《多那特教程》、虔修著作如《效法基督》等。

到了14世纪末期，图书的交易已经世俗化了。除了修道院里的缮写员及个别神职人员出于热情偶尔还在缮写经文外，一般场合下，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要购书都去找专职的抄写员，毫无疑问，这些抄写员预先考虑到并满足了大众对书籍的要求。流行的书籍不断地被赶制出来，虽然仍然是供不应求，但是许多书已不再需要每个客户专门委托制作了。就在手写图书交易高度组织化的同时，尤其是在大学集中的地方，对图书的需求是和对原文精确复制的需求同步增长的，鉴于顾客数量不断增加，其制作是相当困难的。只要有大学的资助及校方的批准，书商和图书制作者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能够得到垄断行会的保护也是如此。但是，抄写员通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尽管超负荷工作，还是不能从供不应求的产品中获得好处。因为任何一个职员也都可以经营此道，合理合法地赚钱。出于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出于虔诚心的驱使，这些抄写员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在代芬特尔以及荷兰别的地方成立了自己的协会，这些协会构成了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核心。同样，技术的进步也会带来图书产量的增长。其中主要是纸张的生产。纸最先是从东方引进的，12世纪在西班牙、13世纪在意大利开始生产。15世纪头1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建立了造纸厂，原本打算寻求新材料的企图很快就消失了，尽管在16世纪有些出版商偶尔还在使用羊皮纸来制作少量豪华型图书以作礼赠。图书生产有大量相对便宜的原材料作为保证，其他的发明与革新也就接踵而至了。图书的页数大大地增加了，样本可以化整为零交给抄写员，就和后来的“拼版”过程相似，抄写员把缩小的本文写在未装订的纸上，就像迄今保存下来的几本毛边手稿所显示的那样。遇到特别流行的短篇著作，就把它刻在木头上大量复制，在亚麻布上进行印刷设计的方法在它被用

来制作“大部头”图书之前，最先是用来制作卡片和神圣（Heiligen）印刷品（圣徒像和简短铭文）的。所有这些发明都出现在15世纪初期，并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还在使用。

根据一项长期的传说，也有文字材料的支持（尽管并不那么明确），活字印刷术是由美因茨人约翰·古滕贝格（约翰·根斯弗里希）发明的。虽然在此之前，活字印刷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但古滕贝格的发明的独创性并不因此而降低。因为使用汉字给这种新技术的自由发展设置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也没有任何一项证据清楚地表明，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得益于中国印刷术的知识。倒是有清楚的记载显示，在欧洲中心地带的另一个地方（哈勒姆和阿维尼翁）与古滕贝格同时，有人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验，但这仅仅是证明了，探索加快图书生产的途径乃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资本家富斯特以及他的女婿抄写员舍费尔与古滕贝格牵扯在一起的话，这也只是表明，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商人还是抄写员，对于图书采用新方法制作所带来的利益都是极端敏感的。

1456年印刷的篇幅仅为42行的《圣经》，尽管不是古滕贝格亲手完成的，一样表明了他发展的这套制作程序首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它是在古滕贝格和他的合伙人发明印刷术至少10年过后才成就的。早期印刷品仅存的一些残篇断简揭示，有相当多的人大胆使用这种新方法，旨在印制：一首德文启示诗，多纳图斯的一个句子，一页天文历法；1454年印制的一份教皇特赦状（留有受纳人亲笔签名的空白）表明，印刷术很快就要在一个新的领地里大派用场了。最后，1457年富斯特和舍费尔出版的宏伟巨作《诗篇》印上了出版者的商标，并且第一次在上面标注了出版商的姓名和出版日期。后来出版的许多图书都没有如此精确的日期，但从那以后，印刷术发展的年代顺序更为确定了，并且使我们有可能相当准确地探索这种新工序在欧洲的传播。

当欧洲大陆到处都奇怪地处在踌躇不前、停滞拖沓的时候，唯独印刷术的传播是如此之快，令历史学家颇感兴趣。印刷术从美因茨传到班贝格和斯特拉斯堡（1458年前），就在意大利本土由斯韦因海姆和潘纳茨在苏比亚科修道院（1464—1467年），之后在罗马（1467年以前）印刷第一批书籍之前，德国印刷商已经印制了一本意大利文祈祷书。意大利早期最值得纪念的印刷之乡威尼斯于1469年成立了一个

出版社。在法国，有三位德国人于1470年在索邦神学院开始从事印刷活动，同年，乌得勒支也开始出现印刷业。1474年有位佛兰芒人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从事印刷业，与此同时，威廉·卡克斯顿为英国的图书市场设计和印制了第一本书，从1476年起，他一直在威斯敏斯特搞印刷。实际上到了16世纪初，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印刷所和本地的印刷商。大城市是印刷商云集的地方。到了1500年，就是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小地方，也会发现一两个印刷所，时断时续地传来机器的运转声：法国开展印刷业的地方总共有45个，德国有64个，意大利近80个。图书需求量小的地方印刷商和印刷业中心都比较少；英格兰的圣·奥尔邦斯有一个印刷所，但时间不长，并且除伦敦之外，英国15世纪长期有印刷业的地方只有牛津。像巴黎这样的较大的中心地区，印刷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外国人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苏格兰在1508年创办了一个印刷所，但只维持到1510年就关闭了，并且在此后的30年间，印刷业在那里没有绵延不断的历史。

所以，印刷业在整个欧洲的确立实际上大约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不管怎么说，印刷业的推进速度主要依赖于当时的图书贸易。印刷的图书的生产和发行显然提出了新问题：资金和市场。书籍本身就是一种主要的商品，长期以来就作为商业中的一个项目而起重要作用，尽管在国际贸易中，它还是一种需求不高的奢侈品。此时图书进出口成了长途交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图书交易会——主要设在法兰克福、莱比锡和里昂——有利于图书批发和大宗交易，有些城镇甚而把图书生产当作主要产业：这方面首推威尼斯和巴塞尔，其次是巴黎。就生产的经济规模而论，我们对同一版的印刷数量（在印刷业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一般不低于200本，也很少突破1000本，学校用书除外）和生产成本知之甚少，所以不敢冒昧猜测早期印刷出版业的利润。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刷商只在那些具有固定销售渠道的图书上进行风险投资，比如学校用书、流行的宗教著作以及那些已经声誉卓著的书籍，至于把握性不大的图书，尤其是那些无名小卒的新书则按正规程序，谋求与作者或第三者共担风险（和利润）。印刷和出版的大规模经营——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巴塞尔的弗罗本以及巴黎的埃蒂安纳——显然需要巨额资本来购置和维修机器，购置各种类型的全套活字、纸张、油墨及其他天然原料，还要准备贮存成品图书的地方，有些图书部头非常大，足够卖上好几年。进行这方面投资的人虽然发不了大财，但也相当富足，得到的尊重则更大。此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

的商号，有好几十家，通常为大书商做批发生意。还有大量巡回的流动印刷所，其库存和原料就装在马车上。到了16世纪中叶，出版业和印刷业之间出现了分工，印刷所都集中在欧洲的大城市中，这样做的效果更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新技术的采用，对书籍的作者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起初并不存在什么版权的问题，后来版权是通过市政或王室特许，以一种不稳定的专利形式获得的。即使如此，受保护的也只是出版商，而非作者本人。除非他是印刷商的合伙人，其支付常常是用实物兑现的，即一定数量的图书。这点微薄的报酬一般来说是由保管图书的出版商支付的。印刷商可以任意复制由他人最初印刷的图书，尤其是当原书的出版商不在本地时更是如此，一部畅销书（伊拉斯谟的许多著作皆属此列）可以在欧洲各地到处印刷而无须征得作者的认可或同意，作者也就谈不上从中获取多少利润了。因此，印刷业兴起后，作者仍然和从前一样，依靠他们的赞助人，依靠从教会或国家领取奖金。只有很少一部分作者，比如伊拉斯谟，可以说是靠笔为生的，并且即便是伊拉斯谟，也主要是因为他同时为弗罗本做编辑。另一方面，印刷术扩大了书籍传播的范围，加快了书籍传播的速度，同时也加快了赞助人和作者成名的速度。彼得拉克和傅华萨的著作要是在生前能够得到印刷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穷困潦倒，靠领取私人津贴为生了，他们的名声可能会传得更快更远。

如果赞助人的作用几百年都不受影响，不被削弱，剽窃和盗版的机会剧增，那么，就审查制度而论，印刷术的采用对著述就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按照正统的道德观、神学观或政治观来对书籍进行监督管理，这在手抄本时代就已经够难的了，然而，那时只要某位主教或异端裁判所官员态度坚决，他就能挖空心思剔除其中的异端思想，因为抄本的数量非常有限。但是，采用印刷术后情况就不同了，上述那种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16世纪印刷术的成长是与宗教分裂和政治独裁的发展同步而行的，许多既得利益者对印刷术的使用表示怀疑，甚至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书籍可以自由发行，通常不是作者而是书成了禁止的对象，收藏受谴责的书成了犯罪行为。教会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早期留下来的证据表明，教皇曾经对此深表不安，并两次作出禁书的重大决定：1520年，利奥十世禁止传播和阅读染上路德宗思想的作品；1559年，保罗四世公布了第一份教廷禁书目录。在这两次

大的行动期间，还零零星星地发布过一些禁令和进行迫害，禁书和迫害在公布卢万大学和索邦神学院神学家们系统的禁书目录时达到了顶点。教皇谴责的书籍一点不比那两所学院少，要使谴责产生效果，还有赖于各国政府的支持。对于正统派的这些要求，各路诸侯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反应总是显得迟缓且反复无常，至于禁书的作者反而因此而感到欣慰，因为天主教权力机关的审查等于是为他在新教徒中作宣传，伊拉斯谟之所以在新教国家中享有崇高声誉，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就在于1559年公布的禁书目录对他的所有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谴责。至于新教的图书审查，自然不那么雄心勃勃且远不那么奏效，因为改革后的教会分为20个辖区，它们之间也还达不到天主教那样的内部连贯和统一。但在改革派控制的小国城邦中如1542年的日内瓦，也能看到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的审查。有必要强调的是，教会对思想的禁锢到头来都被印刷出版的书籍所打破。当然，不定期进行迫害的恐怖打乱了许多有良知的作者和印刷商平静的生活，这也是事实。罗伯特·埃蒂安纳因为神学博士们爱找岔子而遭到迫害被逐出巴黎，1550年移居日内瓦，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接受甚至连加尔文也得在口头上打帮腔的特许制度。最后不要忘记还有几次运动以及几个新教和天主教都不喜欢并且要加以迫害的人。协同的不宽容政策可能发展到窒息舆论：当时印刷的1000册塞尔维特的《恢复基督教教义的本来面貌》（维也纳，1553年）仅有三本有幸躲过劫难，其中一本已残缺不全。

据估计，从印刷业的所谓摇篮期到1500年，欧洲至少生产了3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1]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题材上，拿它们去和15世纪头50年的手抄本相比会把历史学家搞得晕头转向。虽然在印刷业摇篮期出现的书籍已差不多全部列入目录，但对于其中哪些属于中世纪后期的手抄本我们并未作鉴定分析。虽然更多的新书出现在印刷业建立之后（当代著述家约占摇篮期著述的六分之一），这一点似无疑问，但也有可能出版的著作的种类与大家熟悉和公认的种类非常接近。印刷业的生存发展有赖于知书识字的人数量不断增长，反过来它对文化的进一步普及推动很大。但参与读书的那些群体虽然人数更多，却仍是早期光顾手抄本书贩子的那些人群。英国的图书交易反映了北方人兴趣的保守。宗教作品的比重很大（如果包括从欧洲大陆进口的有关礼拜仪式的作品，比重会更大），其次是法律书及学校图书。这些书种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专业人员的需要，中世纪晚期大量的手抄本都属此类书籍。卡克斯顿出版的图书中大约有一半从广义上说都是宗教作

品。看看大印刷商温金·德·沃德的图书产量：大约40%与文法学校的课程有关，大约27%与这样和那样的宗教著作有关，还不算他在1535年临终前发行的40种风格不同的礼仪书。^[2]

在意大利，虽然流行的灵修书、法律著作、《圣经》、弥撒书以及其他礼仪书的发行量很大，但早期的出版业对人文主义在学术、教育和道德方面的关注也有所反映。^[3]的确，意大利曾于1472年在罗马和威尼斯经历了两次生产过剩的危机，都是因为印刷商对这类书籍需求的预测失误造成的。类似的危机在阿尔卑斯山北部似乎没有发生过，因为这里更注重按照实际需求来规定产量。1500年前，欧洲图书总量中大约有一半是宗教书籍，德国、法国和英国为维持这一比例花了不小的力气。在印刷业摇篮期出版的130种左右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版本中，只有27种出自意大利；有11种版本的马莱尔米翻译的意大利文《圣经》，而德国方言的《圣经》版本则达到了15种。到1500年，托马斯·阿·肯皮斯的《效法基督》再版不下于70次。

在采用印刷术的最初几十年所出版的书籍还带有老一代人的趣味：书籍本身保留了手抄本的物理特征。活字的字体制得和出版地职业抄写员的手写体几乎一模一样，印刷时使用黑墨，用手书的红字做标题，有时还要用精制牛皮纸取代一般的纸张，其用意是让读者产生新书和过去的书一模一样的错觉。像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戈这样颇具鉴赏力的藏书家是不会允许印刷的书籍进入他的藏书的，如果一般人并不持这种态度的话，毫无疑问，许多早期印刷的书籍质量是相当糟糕的。所以，15世纪末，一种新的图书设计方式的涌现成了文化和文学领域中的一件大事。首先采用这种方式的是威尼斯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尤其是法国人詹森（卒于1480年）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卒于1515年）。意大利的印刷模仿当地手写体，但这种字体主要为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由于“罗马体”和“意大利体”^[4]两种字体的采用，更为清晰的油墨以及印刷得不那么密密麻麻的书页，在16世纪初期生产的书籍也许不再被错当作手写本，但自身就很美观。总而言之，16世纪意大利先进的凸版印刷术传到欧洲北部乃是对意大利人文主义某些要素的传播的最佳说明。在德国以外的地区，“黑体字”正在逐渐废弃不用，它之所以保留下来，主要是为了照顾一些守旧的顾主，尤其是那些律师。从15世纪20年代起，采用先进印刷术和出版学术著作

的中心由威尼斯移到了巴黎，这和一种更大的文化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

这里且不说图书印刷在绘画艺术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扼要地谈一下印刷术对学术进步的意义却是恰当的。印刷术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早期出版商使科学和文学著作能大量地为读者所获得，这是普遍承认的事实。由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开始，其他出版商紧随其后，印刷出版了一系列价格适中、文体简洁的经典作品。很难评价印刷术在推动学问技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手抄本后面附上索引，这纯粹是藏书者个人的癖好；在印刷本后面附上的索引则不得不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撰写索引乃是一种做摘要的练习，并导致对正文作出更具批判性的评价。到了1480年，印刷本也和手抄本一样，在每一段法律或宗教章节的周围有很多注释，但明显没有脚注的效果好。同一部著作存在着大量基本相同复本，参照起来很容易。随着印刷业的兴起，我们相应地也就进入了书与书之间大量相互参照的时代。如果没有印刷业提供的便利，词典的编纂活动是不可思议的。1545年首次出版的书目提要总表即康拉德·格斯纳的《目录大全》标志着把印刷的书籍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开始。

现在我们必须转到1520—1559年的著述上面来，这个时期的著述几乎全部是通过印刷来传播的。新的图书生产方法的一般影响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所以必须记住。然而，对16世纪的印刷的图书进行概括远比对印刷业初期要难得多，原因很简单，1500年以前印刷的书籍差不多全部让目录学家列出来了，但是我们对之后出版的书籍的了解绝对不能说是全面的。在《1475—1640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出版书籍简要书名目录》^[5]这部书中有一份关于英国整个16世纪出版情况的系统和名单，其中也收录了外国印刷的英文书，但是（拉丁文的宗教仪式书除外）没有纳入在国外印刷用外语写作然而针对英国市场或者由英国作者完成的书籍，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这本无价之宝的目录作为根据，我们对英国16世纪书籍的数量和质量的把握就要比了解同时期欧洲大陆上的书籍要可靠得多。除了巴黎国家图书馆有一本不完整的作者目录外，大陆上没有一个大型图书馆拥有类似的图书印刷目录，想知道16世纪著述全貌的学者还只得到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这本目录书。但是有一点也必须引起注意，据测算，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的1600年前的法文书籍“最多不超过已知在巴黎印刷书籍的五分

之一以及在法国各地印刷版数的六分之一”^[6]。也就是说，要像对15世纪下半叶的印刷书籍那样来对16世纪的书籍出版量或题目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已有一大批作者成了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有许多重要的出版商和印刷商已被研究过了。

和1500年相比，到1520年时图书出版的总量已大大增加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图书生产量连年递增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就英国的情况来看，据测1550年的印刷量是1500年的4倍，即是说，1500年出版一本书，1550年就要出版4本。没有理由相信，欧洲大陆的图书生产量的增长会小于这个数目；或许比这更高，特别是法国，它有相当一部分书籍要拿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市场上去交易，并且，在基督教世界分裂之前，它要印刷许多宗教仪式方面的书籍运往英国和德国去销售。甚至在德国的路德的改革和英国的亨利的改革之后，巴黎、巴塞尔和其他印刷中心仍在继续出版国际上流行的学术著作。尽管从1520年到1559年这段时间英国只出版了3部拉丁文版的西塞罗的书（《反腓力辩》1521年，《论老年》1535年，《论职责》1558年），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学者缺少新版的西塞罗原文书籍，只不过是出自威尼斯、巴黎和巴塞尔而已。较为古老的英国图书馆都有堆满了16世纪大陆出版商的经典教育课本的记录。

如果复活了的拉丁语，即人文主义者的拉丁语曾有过演变成一种能够容纳西欧人的想象和思考的语言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眼下正在考虑的这40年最终消失了。意大利仍然存在着大量用拉丁语谈话和写作的人；但大批用本国语写作的人则表示，几乎所有的题目都可以用意大利语来完成，尽管他们对意大利语的构成仍然争论不休（就像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法国和西班牙本国语著述家的才能和志向都不像意大利人的那么明显，但还是有所表现。同样的趋势也清楚地出现在不列颠和德国，虽然在后者的某些地区以及整个北欧和东欧，实际生活仍然离不开拉丁语，因为操本国语的人连那种昙花一现的作品也写不出几本，更不用说严肃的作品了。然而，除了浪漫作品这块园地，要在语言运用的其他方面使用拉丁语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如果拉丁语在它曾深深扎根的地方都不能继续发展，它又怎么能在条顿语域和斯拉夫语域繁荣昌盛呢？于是乎，用本国语写作就成了这一时期欧洲人著述的特征。虽然如此，大部头的作品仍然是用拉丁语创作的。

拉丁语的威望很高，功效卓著。正是这两点保证了使用拉丁文从事创作的人生活安定。那些诸侯和贵族们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信题词的抬头，而那些教授、市长、主教、议员和军人们也概莫能外。这些教会和政府中的大员都是有权提供赞助的人。意大利诸共和国及其君主、阿尔卑斯山北部欧洲的城市和国王都需要通晓拉丁语的职员来应付国际的书信往来。16世纪，欧洲各地知识分子的地位要高于商人，他们中大部分也常出现在该世纪拉丁文著作的题献中。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这种圈子的存在营造出大量需要拉丁文学作为著述一种小圈子的色彩：学者为学者写作。这话有理，但也不全都在理。每一个国家的学校、大学和政府机关里都有学者，这些人在他们所在的社会中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如果把他们都凑在一块就会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性质而论是国际性的，他们不会去听某个法国人讲法语，或者某个德国人讲德语，但都渴望并能够共享一部不知有国界的著作。有这样一群公众的存在说明，16世纪中叶拉丁文作品的数量是巨大的，但是现存的这个时代的拉丁文作品之少则使我们的研究大为扫兴。我们的图书馆里仍然保存着大量这种被遗忘了的拉丁语的对开本，人们当前对欧洲文明史缺少了解的部分不是手稿文献，而是印刷出版的著作；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著述的历史学家。^[7]然而这个时代拉丁语写作的资助者和大众读者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知识界的名士和许多政界要人。所有这些都在警告我们，不能小看拉丁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按照传统的划分（当然也有例外），所有严肃的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写作的，所有通俗和昙花一现的作品都是用本国语写作的。这种两分法尽管在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中间颇有影响，但却不断受到拉丁文人的挑战。到了16世纪，大量以前被本国语所垄断的各类作品都是在古典范例的刺激下创作的。各种诗歌（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和史诗）都尝试过；拉丁文在戏剧领域里则拥有自己的传人；讽刺剧、幽默剧、流行的道德剧以及故事性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希腊文本和东方语言文本常常翻译成本国语，也被翻译成拉丁文；人们对于模仿西塞罗和普林尼优秀散文的书信集甚为欣赏。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著述较为轻松的一面，除了作为同一种工具的本国语用于怡情以及表现崇高和记录学术成就提供了范例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永久纪念的作品。[用拉丁文]大量创作了各类诗歌，其中大多数描写的是爱情和尘世间的事情，虽然到处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的德国都可以

看到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这些诗歌有许多创作很成功，甚至有些还很感人。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则在于对后来的本国语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荷兰诗人约翰内斯·塞肯达斯（卒于1535年）的《巴西亚》以及意大利诗人维达（卒于1566年）的基督教史诗《基督》（1535年）和《诗人》（1527年）都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其他国家创作的挽歌、牧歌、讽喻诗和机智短诗而扬名的杰出诗人更是数不胜数。以教化为目的的剧本创作很快就成了宣传和攻击的工具。1530年到1560年间，拉丁文宗教剧在德国和低地国家非常流行，诺乔治（托马斯·基希迈耶，卒于1563年）乃是这类剧本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在北欧，有据可查的宗教剧少一些，乔治·布坎南（卒于1582年）的 *Jephthes* 受到广泛阅读，并被大量翻译，便恰好印证了这一点。16世纪后期，这一传统被耶稣会剧作家用来为天主教的宣传服务。

在讽刺作品和流行的道德作品创作方面伊拉斯谟（卒于1536年）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尽管我们后面谈到他时，是把他作为学者来讨论的。他的《格言集》反复再版，不断扩充，已不只是一部格言集，常常扩展成为论文，讨论当时争论的问题。他的《对话》（1518年）很快就背离了作为拉丁语对话手册的初衷，成了辛辣讽刺和嬉笑怒骂的生动对话。伊拉斯谟这些类型的著述模仿者甚多，但却没有与之媲美者。在书信领域里，伊拉斯谟也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趣味。他的书信最初发表于1516年，后来扩大为书信集。这些仅是他通信的一小部分，发表前曾作过筛选和修改。其他拉丁文作者的书信带有更明显的雕琢色彩，以萨多莱托（卒于1547年）或本博（卒于1547年）为例，可以公正地说，他们写的书信是一种文学练习，“写出来不是为作为书信寄出去”，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说的。

虽然我们谈到的各类型的新拉丁文学上都笼罩着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时期拉丁文学成就的欣赏。对于写作严肃作品的作者来说，拉丁语不仅是唯一的跨语言边界进行交流的工具，而且仍然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唯一精确的语言。此外，那时有一种传统，即把懂得拉丁语和学识渊博联系在一起，在几乎每一种学科，专门术语和方法都表明拉丁语是写作工具。所以，神学家、科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都用拉丁语写作。本书其他地方对大量神学著述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8\]](#)我们在这里只是就

宗教改革对学术的这一方面所带来的某些后果进行考察。第一个后果是神学价值观在一切思辨领域的影响。

要区分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哲学就和区分中世纪的一样困难，但在路德向罗马挑战后的那令人焦急不安的几十年，这位思辨的思想家发现自己的著作被人们用了13世纪特有的苛严仔细地检查以寻找其中的神学含义。各派神学家都不惜把最宝贵的精力用来诋毁和攻击他们的对手。在这场论战中，路德圈内的人认为，罗马的意大利辩护士们装腔作势，缺乏修养，令人无法忍受。路德自己则满足于“操着蹩脚的拉丁语大吼大叫”，并且，这种情形在梅兰希顿为路德派的论战树立起良好的风格之前，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贝扎，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加尔文却不是等闲的拉丁语学者。这个时候，伊拉斯谟站在中间，一边是意大利天主教徒、卢万大学和索邦神学院，另一边是他们的敌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形影相吊，眼看着粗暴的教条把优美的文学连同“基督教哲学”一道摧毁。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世纪初还显得无害的新柏拉图主义或泛神论学说此时遭到全体宗教的一致谴责。卢克莱修主义，就像意大利人帕林吉乌斯（卒于1543年）的学说一样，以及像给荷兰剧作家尼亚法埃乌斯（卒于1568年）的著作打上印记的那种再洗礼主义同样都遭到了谴责。蓬波纳齐（卒于1525年）在帕多瓦大学提出的阿威罗依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杂烩，人们也几乎同样地不予赞同。在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声望在各领域都扶摇直上，圣托马斯在天主教徒中威信与日俱增，这些新情况虽然对未来甚为重要，但在当时却湮没在一片急迫而辛辣的神学争论和谴责声中了。

用拉丁语写作的历史学家很多，后来的批评家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弗拉维乌斯·布隆杜斯（比翁迪，卒于1463年）的追随者，主张研究古代要准确精细，另一派则是第一位伟大的工于修辞的作家阿雷蒂乌斯（莱昂纳多·布鲁尼，卒于1444年）的信徒。但是到了16世纪，两个学派很大程度上也在相互吸收或同化，新的历史编纂学——和新的外交联系紧密——吸取了两派的特点。人文主义作家倾向于使用优美的语言；引语丰富，既有直接引语式，也有间接引语式；人名和机构名称的拉丁化有时叫人不知所云。虽然许多这类历史学著作辞藻华丽，修饰精湛，但却渗透着一种新的批判精神，这些作品避免采用神秘主义的内容和真伪难辨的传说，把基础建立在可靠的史料来源

上，并且经常采用（尽管不情愿）基督教历法和基督教编年史中那些朴实无华并且会使整个文章风格受到损害的术语。新的历史书以意大利的公国和共和国作为开篇，这种写法最早主要是由移居国外的意大利人兴起的，他们是：在法国的保洛斯·埃米利乌斯（卒于1529年）、在英国的维吉尔·波利多尔（卒于1555年）、在西班牙的马里努斯·西库卢斯（卒于1533年）和彼得·马尔蒂尔（安吉埃雷的，卒于1526年）。就像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德·莱布里哈（内布里森西斯，卒于1522年）、塞普尔韦达（卒于1573年）和保洛斯·埃米利乌斯的法国继承人阿鲁尔·勒弗隆（卒于1563年）所做的那样，本地作者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新方法。德国人（在历史编纂学和其他领域一样）抵制运用意大利人的方法，继续把兴趣放在大编年史上，在其他地方这种写法已不流行；德国因为探索用坦白的态度对待过去的理由引发的争论而分裂。在新教地区，此类著作中也有一些写得非常成功，比如约翰内斯·卡里翁（卒于1537年）的《编年史》，后来梅兰希顿还对这本书进行了扩编（1558—1560年）。在持帝国立场的这一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斯莱达（约翰·菲利普森，卒于1556年）的《诠释》。而按人文主义传统写的概述性著作只有一部，即贝亚图斯·雷纳努斯（卒于1547年）的《德国史》；还有一大批成绩斐然的区域性历史学家。然而，德国的宗教论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它促使被称为马格德堡“世纪记年历史学家”的一批合著者在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卒于1575年）的领导下撰写了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教会史，1559年出版了第一卷；巴罗尼乌斯（卒于1607年）的《教会通史》是天主教会批驳新教的著作，后来经他人修改和续写，今天仍然是历史学家们的案头书。此时意大利有相当一批声誉很高的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学家，但是意大利人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真正创新之作（保卢斯·焦维乌斯[卒于1552年]的那些华丽而肤浅的传记和当代史除外）却是用本国语写成的。这些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学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对本国语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我们或许可以举出两位兴趣主要在法律方面并在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纪尧姆·比代（卒于1540年）和安德烈·阿尔恰蒂（卒于1550年）。比代的名声在于他是一个希腊语学者，而不在于他是一位古代法律的著述家；阿尔恰蒂之所以著名也不在于他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写民法，而在于他那本道德象征画集《寓意画》（1531年），这

本集子通常以插图版的形式发行，对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比代和阿尔恰蒂在其专门性著述中所用的方法本质上是语文学的，而语文学从广义上说明了16世纪的拉丁语是一种学术的语言，也说明了为什么拉丁语会有那么大的价值和影响。不说远的，就说1520年以后伊拉斯谟的工作：在世俗著述方面我们发现了校订的西塞罗、塞涅卡、库尔提乌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著作，他翻译的加伦和色诺芬的著作，他校订的早期教父们的著作有哲罗姆、西普里安、阿诺比乌斯、希拉里、依里奈乌、安布罗斯、奥古斯丁、拉克坦修斯、奥利金的作品以及他翻译的克里索斯托姆和巴西尔的译本。这份令人生畏的清单必须加上其他许多学者的作品，他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多产，但把他们出版了的著作加起来实际上就等于是希腊、拉丁和基督教古代遗产中的所有重要（和许多不重要的）文本。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版本我们提到过好几次了，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流行的文本被再版的次数。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法国和德国都在仿效阿尔杜斯，出版价格适中，具有权威性和文体简洁的古典作品；原本在印刷希腊古典著作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威尼斯现已让位给巴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伯特·埃蒂安娜（卒于1559年）是一位学者型的印刷商。

虽然反动的神职人员对人文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不时地对希腊研究和希伯来研究表示公开的敌视，但总的来说，宗教的仇恨并未严重阻止古典学术的研究；对古典文坛的尊重或许是感情脆弱的一种表现，但这决不是个别的现象。然而，教派之间的仇恨造成了《圣经》研究的浩劫。路德宗运动的兴起与伊拉斯谟发表其《新约全书》（1516年，希腊文版和拉丁文版，1519年拉丁文新版）是同时发生的，最后伊拉斯谟在红衣主教希梅内斯（阿尔卡拉，1520年）的鼓励下发表了《多语种圣经合参》。伊拉斯谟的评注方法在他校订的瓦拉的《手记》（1505年）中已经有所暗示；希梅内斯门下的学者的方法要谨慎得多。但是，神学家们对新近出现的将学问用于《圣经》研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的愤怒无以复加；他们的怀疑是由许多从事此道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伊拉斯谟本人的福音传道者的癖性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伊拉斯谟被迫修改其文本（对《约翰一书》第5章第7节的篡改就是有名的例子），尽管他明知这样做是错的；罗伯特·埃

蒂安纳遭到索邦神学院的谴责，最后只得离开巴黎，前往日内瓦（1550年），他的校订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1538—1540年）数世纪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使用的主要版本；特伦托会议通过的有效决定之一便是使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天主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本。新教徒也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一种对待它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那些苦心致力于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圣经》研究的学者们所运用的语文学工具则显得残缺不全。因为古文书科学还未诞生，所以伊拉斯谟把11世纪的手抄本《圣经》当成了古本。许多相关手抄本藏书的目录根本没有，所以导致人们校勘甚至像埃蒂安纳这样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使用的文本也是冒险一试或者抱着也许能接近原文的心理。

虽然16世纪还没有古文书学，但已经有了系统的词典编纂。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兴趣浓厚，却很不稳定：他们只对个别的作者进行了研究，但是作为供学生使用的一般性词典，最好的还是卡莱皮努斯（安布罗焦·卡莱皮诺，卒于1511年）的词典，尽管它的质量也许不如以它为指导而编纂的大多数词典。1531年，罗伯特·埃蒂安纳出版了他的第一版《词典》，经过1536年和1543年两次再版，这部著作的容量更大了，可信度也更高了，不愧为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词典编纂者的楷模。也正是这个亨利·埃蒂安纳为希腊语（1572年）做了同样的工作。

罗伯特·埃蒂安纳的《词典》通过剔除“非古典”派作者对早期的词典作了改进。这使我们想起16世纪早期新拉丁文学的那个最让人头疼也最使人兴奋的问题：西塞罗式文风以及西塞罗式文风的提倡者和反对者。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由于各种非文体的原因，西塞罗研究在人文主义的当务之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对西塞罗的文风顶礼膜拜之时，那些朝气蓬勃的拉丁语学家们实际上长期以来并不是始终一贯地沿袭西塞罗的词汇的句法；严格的语法规则为作者的情感所削弱。还有瓦拉这位15世纪初期最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对当时的西塞罗风格崇拜者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然而，瓦拉的严谨却昭示了新批评时代的来临。紧接着便是波利欣和保罗·科尔泰西、詹弗朗切斯科·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本博之间断断续续的争论，在争论中慢慢地西塞罗式文风的崇拜者数量增多影响扩大。最后一次冲突远比早期那些小规模争论要剧烈得多。总而言之，伊拉斯谟自1516年起一直在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1528年他发表了《西塞罗式文

风》：这个问题立即便和民族威信和宗教正统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法国军队和德国军队的蹂躏之下，意大利只得在蒸蒸日上的文化中寻求安慰，作为政治上软弱无能的补偿。利奥十世以及他的继承者们推行的“帝国主义”鼓励这种情绪。罗马成了严格的西塞罗式文风的中心，而西塞罗式文风则成了一个失败的民族和一个仍然坚持其世界使命的教会的象征。伊拉斯谟的攻击不只伤害了数量不多的学者们，也伤害了罗马的爱国热情和宗教地位方面至高无上的自尊心。伊拉斯谟完全不懂得古典罗马与基督教罗马的这种认同的本质：他的对手们——缺乏他那种独创精神，虽然为他的讽喻所刺，仍然确信其语言的纯洁性——全然忘记了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在北欧已引起了异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的怀疑。伊拉斯谟列举罗马学派在语词方面的创新（用“朱庇特”[Jupiter]指“神”[Deus]，用“阿波罗”指“儿子”[filius]，用“派别”指“异端”，用“基督教信条”指“信仰”，用“使节”指“使徒”，用“元老”指“枢机团成员”，等等）并且得出结论，“我们口头上表白信仰基督，而我们心里装着的却是朱庇特和罗穆卢斯”。意大利的文人圈子对伊拉斯谟发起攻击，不仅说他是一个蛮子，而且还说他是信奉路德的异端分子，通过鼓吹既丑陋又褻渎的折中主义公开挖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墙脚。这场风暴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文学方面的内容，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伊拉斯谟最活跃的对手生活在法国：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尔（卒于1588年）和艾蒂安·多莱特（卒于1546年）。即使是在拉丁文学方面，意大利处于领导地位的时代正在消失。同样，只有拉丁语才能作为创作文学作品之工具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拉丁语的推崇者们过于迂腐，过于讲究语言的纯洁（西塞罗式文风和维吉尔风格将再主宰一个世纪的文坛，即便是在它们曾经遭到抵制的新教国家也是如此），以至于摧毁了这种语言对富有创造性的著述家的想象力的把握。拉丁语后来只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教教而已；本国语提出了生存的权利。

在讨论本国语文学时要切记，这个时候的作家通常是用拉丁语和本国语两种语言写作，即使是那些正式用俗语创作的作家也在读书时接受过拉丁语的训练和熏陶。这种情况的例外者尽管不容忽视，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作用重大，但毕竟人数不多。到16世纪中期，意大利和法国的作家不论是在文体和词汇方面，还是在文学的兴趣方面，都受到了古典作品和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著作的深刻影响。既然意大利是人文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中心，那么，此时意大利的文学远比阿尔卑斯

山脉以北地区的作品要成熟也就不足为怪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旨在成为表达各种体验感受的媒体；它提供了固定的正字法和语法的一种范例，并传送了一套丰富但严格的形式。贯穿16世纪，在整个欧洲，如此的实例到处都可以看到：而意大利语本身就能向那些较不发达的语言的文学显示，一种同复活了的拉丁语的亲密关系塑造成形的本国语进一步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样子。因为，除了古代和当代的拉丁语作品范例外，16世纪的意大利人还有14世纪的作家如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乡土语创作方面为他们作出的表率。这些人受到崇拜的程度几乎和维吉尔和西塞罗不相上下。总之，意大利人既有古代的“经典”，也不乏现代的“经典”，尽管意大利文学的标准到16世纪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

意大利优秀文学作品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有力地说明了，意大利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处在领先地位，关于这些作品，下面还要提到。但是，意大利半岛上还有另外三个展开讨论的问题也表明，此时意大利文学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是北欧文学不能自夸的。所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意大利本国语本身的性质和价值。“语言问题”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问题：本国语适宜用来创作严肃的作品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众多意大利方言中应该采用哪一种呢？或者说，是否应当发展一种能够超越地区方言的统一的意大利语呢？尽管头一个问题在16世纪仍然争论不休，但实践已经对此作了回答，本博的《意大利语言探讨》（1525年）还从理论上为本国语进行了辩护，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拉丁语学家之一，这使辩护更有分量。争论并没有停止，保守派一方痛惜拉丁学术的衰落，进而指出，14世纪意大利文学艺术大师们是用拉丁语创作严肃作品的，但是，本国语创作结出的丰盛硕果足以对此进行反驳，詹巴蒂斯塔·杰利（卒于1563年）甚而说道，学习古代语言简直是浪费时间。随之而来的另一个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更不容易得到明确的解决。本博（尽管是威尼斯人）赞成采用托斯卡纳方言，但这个问题却引来了地方政治势力的干预和竞争，因为意大利没有都城，罗马、那不勒斯、伦巴第和威尼斯都有可能向佛罗伦萨的文化中心地位发起挑战。的确，正是由于小小的乌尔比诺宫廷的影响，伦巴第人巴尔代萨·卡斯蒂利奥内才力言要建立一种高贵的意大利语，一种兼容并蓄、典雅的绅士语言，同样的倡议早在200年前但丁就提出来了，他在《为乡土语辩护》一文中曾呼吁创立一种“卓越的、主流的和高贵的”语言。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活

跃。但实际上，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N. 利布尔尼奥的语法研究的三大渊源，1526年）在14世纪留下的杰作已成了16世纪大部分作家所公认的标准或典范，许多理论家都孜孜不倦地鼓吹对它们进行“模仿”。这样一来，佛罗伦萨语和“卓越的方言”，实际上就不是相互排斥的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所要解决的重点就成了方言的成熟性这个正在进行分析的问题。

其次，从泰奥菲洛·福伦戈（卒于1544年）的那些不同凡响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意大利语过早成熟的一面。1577年，当福伦戈发表他的《巴尔杜斯》（*Baldus*）时，写作中意大利方言和拉丁语双语并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日常生活中，拉丁语和本国语混杂使用已经司空见惯了，并且，在中世纪的诗歌中已经发现了这种双语并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几乎总是包含着讽刺的意味。但是，福伦戈的六韵步诗把这种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的诗采用流行的意大利史诗结构，具有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特点，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双语并用方面展示了惊人的灵活性，和他那冷嘲热讽的精神完全合拍，很有吸引力。同样，他的诗和其他此类风格的作品一样，受到意大利民众的欢迎，到1552年已再版了4次，他们喜欢福伦戈思想中的反修辞的癖好。这种独出心裁的风格与精神并不是只有意大利人才能领略的：拉伯莱就读过福伦戈，并且承认他在词汇的运用和讽刺史诗的兴趣方面都曾受惠于福伦戈。但《巴尔杜斯》这样的诗篇只有在拉丁语和本国语的读写能力均已得到广泛普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明显已被接受、高度严肃性已不再是对作家的要求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

再次，意大利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彼得罗·阿雷蒂诺（卒于1556年）所享有的声望。阿雷蒂诺的名气使他能够向大人物邀宠，得到教皇和皇帝的亲近，在威尼斯过着奢华阔绰的生活，这一切全靠他那支残酷无情的笔。他写作的收入十分丰厚，他以犀利的笔锋相威胁而获得资助，他拥有使人名扬天下或使人名声扫地的能力。他的作品像新闻一样人们争相传阅，不管写的是关于占卜预测以及像《论辩》（1534年）之类粗俗的讽刺作品，还是像《基督的人性》（1534年）这类描述奢华习俗的著作。他那支笔有驾驭一切的本领，其犀利而婉转、刚柔并济的文风使本国语的运用别开生面，不管是口头语、私下用语还是非正式用语在他的笔下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表达。这一点在他于1537—1557年间发表的6卷书信里表现得尤为充

分，正是这些信件引发了竞相出版本国语书信的时髦。阿雷蒂诺的成功全在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人们崇尚务实，左右文学的是都市人的价值观，公众所需要的是取乐和猎奇，而不是道德和灵魂的升华。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本国语作家渴望拥有的读者数量较少，而且更显保守。意大利的城市主导着意大利半岛的文化。而在别处，资产阶级的作用虽然重大，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其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要么透视出旧式贵族和教会的价值取向，要么就还带有未与高雅文学认同的通俗色彩。巴黎和伦敦都是正在崛起的文化中心，但在法国和英国，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仍然要看是否能够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吸引到国王的周围；伊比利亚诸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德国，就是那些生意兴隆、欣欣向荣的大城市还是用老式的、多半是宗教的词汇来传达其文化追求的，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袭和包容这个国家贵族阶级的态度。15和16世纪，由于意大利诸侯对文学的鼎力资助，才改变了意大利文学的格调，使之为北欧的读者所接受：但是，意大利文学由此而染上了矫揉造作的宫廷文风却在文坛上持续了很久才被革除。意大利文化风景吸引北欧作家的魅力在于意大利人的博识饱学，而不在于他们的大众现实主义能力。对于意大利文学，非意大利人顶礼膜拜的是本博，而非福伦戈或阿雷蒂诺；是那些工于修辞的文人，而非那些反对学究的作家。意大利文学的胜利使意大利语几乎被看成是与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样高雅和完美的文学载体，受此鼓舞，若阿基姆·杜贝莱（卒于1560年）毫不怀疑，法语也能做到与之媲美，他在其《法语辩说》（1549年）中所列举的论据几乎全部出自意大利，尤其是出自斯佩罗内·斯佩罗尼（卒于1588年）的《关于语言的对话》一文，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只要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重要文体的发展，就能管窥到上述过程的某些方面。

诗歌方面，在我们的考察的这些年代中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诗人。意大利在阿里奥斯托到塔索这一段时间，尽管诗人多如牛毛，但相对说来都很平庸乏味。主宰诗坛的是彼特拉克式诗体，即使是那些反对循规蹈矩的人也只能模仿彼特拉克的作品。彼特拉克和本博式的诗句虽然精美和华丽，但并不是主流艺术，在所有意大利城镇中，这类创作仅限于少数文人圈子内，像弗朗切斯科·马里亚·莫尔扎（卒于1544年）、加莱亚佐·迪·塔尔西亚（卒于1533年）和路易吉·坦西洛（卒于1553年）等人的诗作只存在于诗集里，并不为人们所

知；韦罗尼卡·甘巴拉（卒于1550年）、维多利亚·科隆纳（卒于1547年）和加斯帕拉·斯坦帕（卒于1554年）三位女诗人中只有最后一位才超越了因仿照彼特拉克而必然导致的痼疾：过分追求形式的完美而缺乏感情。弗朗切斯科·贝尔尼（卒于1535年）的模仿虽然也属彼特拉克风格，则要归到另一类，因为他的诗作体现了意大利文化背景中通俗而有趣的格调，即上面已经提到的那种讽刺精神：他对博亚尔多的修订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唯有一位诗人真正令人信服，就是米开朗基罗（卒于1564年）。在那个时代诗坛上的一片软声细语中，他的诗别具一格，粗糙刺耳，让人难受，只有他一个人冲破了流行的规则，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然而，与其说彼特拉克式诗体在意大利俨然已成为桎梏，不如说它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学发展却起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从克莱芒·马罗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意大利对法国诗歌的影响，尽管马罗的迷人之处更多地在于运用传统的形式和题材时所表现出的机智和真诚，而不是对新风格的推崇；马罗对《圣经》诗篇的翻译更是一次重大的创新，为此，他的名字和法国的改革派人士、瑞士的加尔文宗信徒以及他于1544年逝世的地方意大利连到了一起。那个时代的诗人，大部分都满足于运用修辞学中的古老方法，但是，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卒于1549年）这位在文学资助方面甚至超过她的哥哥、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诗人，就像受她保护的马罗一样，其诗文显示出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并展现了改革感情的潮流；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她的诗具有自己的特色，反映她自身的精神困惑。然而，就在玛格丽特死后的10年间，普遍认同的新诗传统建立起来了：1558年，若阿基姆·杜贝莱发表了《罗马古迹》和《遗憾》；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卒于158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杜贝莱和龙萨无疑是七星社的泰斗^[9]，而七星社的思想和感伤情调的渊源可追溯到以龙萨为核心在巴黎成立“社团”以及1549年这个社团的第一部宣言杜贝莱的《辩护》发表之前：与他们最初准备承认的相比，他们更多地把这归到罗马学派、梅兰·德·圣热拉（卒于1558年）和莫里斯·塞夫（卒于1564年）的名下，莫里斯·塞夫是里昂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他在意大利及意大利之发现古典文化和法国之间调和折中。杜贝莱在其《辩护》一文中，对中世纪的诗歌风格痛加责难，并提出苛刻的要求，要法国文学赶上古典文学的水平，甚而和它分庭抗礼，文章的观点前后不一，缺乏连贯性，并未提出富有见地的新方法。风格的形成

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杜贝莱本人对彼特拉克风格的练习以及对罗马和“甜蜜的昂热”所怀抱的那份乡愁；更重要的是通过龙萨，通过他因不满足于自己在感伤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在颂诗、赞美诗和英雄史诗方面所作的尝试。

西班牙和英格兰也受到了意大利的影响。胡安·博斯坎（卒于1542年）有意识地尝试采用意大利的形式，他的朋友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卒于1536年）用这种新的风格来表达柏拉图式恋爱的细致入微，显得更为成功。西班牙作家在15世纪已经受到了意大利的影响。英格兰和意大利之间在文学方面的联系直到16世纪中叶仍然不甚明显，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卒于1542年）的彼特拉克式诗体的尝试进展缓慢；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卒于1547年）对十四行诗心醉神怡，他把无韵诗用作《埃涅伊特》的部分翻译可能是受意大利人的启发。但是，不列颠文学在“中世纪晚期”比在随后的“无生气时代”显示出更多的活力，取得更大的成就^[10]；最好的证明就是16世纪上半叶苏格兰诗歌的繁荣。和南方的邻居相比，苏格兰更加远离外国的影响，但它此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诗人，像道格拉斯、邓巴^[11]和来自高地的戴维·杜赛爵士（卒于1552年5月）等。这些人处理传统的韵律和形式靠的是技巧和自身的敏感；那位性情古怪的英国诗人约翰·斯凯尔顿（卒于1529年）也是如此。在西班牙、苏格兰和英格兰，尤其显著的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诗歌是在民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歌准确地说就是通俗的诗，而且大多都不是为发表而写作的。然而，再没有一个地方比德国接受意大利影响更少的了，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德国人对意大利人文主义所代表的许多东西都怀有敌意。也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那样，中世纪的传统会延续如此之久。汉斯·萨克斯（卒于1576年）是德国最多产的诗人。教会改革之后所写的那些赞美诗，值得注意的是路德本人的诗作，虽然有独创性，但在许多方面都属于较古老的抒情传统。

对欧洲诗歌的这番短暂的回顾表明了，主宰意大利诗坛的这种主要为都市人所创作的典雅的彼特拉克式诗体到了1560年很大程度上已为法国所接受，一定程度上也为西班牙所接受，但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却明显微小。戏剧领域的发展状况大体上也是如此。16世纪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中世纪的戏剧仍然很盛行：总而言之，神秘剧在宗教纯粹主义者对其表示不满之前，以大众的宗教理解为基础，一直拥有大

量的观众。从流传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出，16世纪早期的确上演过一些精心创作的戏剧，比如1547年在瓦朗西安上演的戏剧。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神秘剧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都已名声扫地。另一个传统剧种道德剧或者说被改编为戏剧的寓言在16世纪后期只是被与之竞争的娱乐形式湮没而已，尽管它因为蕴含有进行政治讽刺的潜力而常常成为诸侯们和地方官批评的靶子。道德剧在法国的发展最快。在首都巴黎有得到官方承认的剧团，比如“欢乐儿童会”，皮埃尔·格雷古瓦（卒于1538年）便是该会的成员之一。还有专门的娱乐剧种：趣剧和闹剧，两者都是道德剧本身的分支；闹剧的生命力尤其顽强，新派诗人的傲慢的轻蔑并未使它屈服。在这方面，苏格兰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说明，因为林赛的道德剧《讽刺三个等级》尽管创作的时间晚，1540年才在林尼斯哥出版，但其结构和语言的风趣堪称此类作品中的经典。16世纪中叶，法国和英格兰出现了历史剧；英格兰历史剧在后来的戏剧发展中影响极大。西班牙也是如此，它有一种源于宗教的流行剧种圣礼剧，该剧种注定要在17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

到16世纪中叶时，只有在意大利有一种新潮剧用的是本国语。到现在仍可发现圣剧，但这个剧种已被贬谪到边远地区和未开化地区。在意大利也和在别的地方一样，神秘剧留下了一份更为恒久的遗产：幕间喜剧表演（幕间剧）。然而，这一点被人文主义者忽略了，因为他们正在寻求一种建立在古典戏剧复兴基础上的更具学术性的戏剧形式。翻译过来的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以及类似的当代拉丁戏剧在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舞台上演，供贵族们消遣，并且很快就在罗马及别的地方流行开来。这些局限于小范围内的演出尝试本身只是一时间心血来潮的表现而已：但它们毫无疑问促发了阿里奥斯托和马基雅弗利（后者的剧本《曼陀罗花》尤其引人注目）^[12]更为重要的喜剧创作。然而，意大利的本国语喜剧自1520年后实际进展并不大，悲剧亦然。^[13]另一方面，古典的喜剧形式与古老的幕间表演传统相结合产生了即兴喜剧。剧团根据剧目中的固定情节和角色进行即兴表演，这一惊人的发展很自然在起步阶段是不可能留下什么惊人之作的（这方面最早的文学证据是1545年的帕多瓦的一份合同），它也就没有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况且，这些作家们脱离舞台实际，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创作出具有戏剧上的价值而不是文学上的价值的剧本了。这样一来，意大利流行的戏剧实际上和文学已经分了家。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4]，许多剧本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伊拉斯谟的许多对话生动活泼，颇富戏剧色彩。这些作品中多数都具有教育意义，总的来说，对戏剧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学术和流行戏剧的联姻最终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获得了辉煌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这些国家中央集权政府和京都名城的存在。

另一方面，想象丰富的意大利散文形式多样，活力强大，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广泛传播。就像在诗歌领域里一样，14世纪意大利的散文界也产生了一位天才的典范作家薄伽丘。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16世纪中叶的小说家们，尽管文学创作的源泉此时已显出干枯的迹象：艺术才能的发挥正在降格为仅仅是为了取悦于读者而已；或者说艺术风格（通过不计其数的作者对柏拉图式恋爱的对话和评说）正在趋于矫揉造作。所谓阿卡迪亚小说或牧歌小说都是源出于此，而现实主义创作仅仅因为有难度便被尘封起来。虽然现实主义在许多散文和对话体作品中不见踪影，比如乔凡尼·德拉卡萨（卒于1556年）的《礼范》，或阿尼奥格·菲伦佐拉（卒于1543年）的《论爱》，但是，很难否认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确真实地再现了那个让人纸醉神迷和富丽堂皇的乌尔比诺宫廷。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倒是更贴近老百姓，甚至在尝试制造惊恐效果时，他们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人文主义者更进一步地运用流行的传统手法。于是，优秀的小说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他们的作品便在欧洲流行起来。吉安·弗朗西斯库·斯特拉帕罗拉（卒于1557年）、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格拉齐尼（卒于1584年）和马泰奥·班戴洛（卒于1561年）的小说很快就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被翻译和改编。

然而，北方人的小说爱好是有其自身的根基的，即韵文故事、短篇小说以及正在衰落但仍在流行的散文体的骑士史诗。后者的确在16世纪上半叶有过一次复兴。篇幅宏大而散漫的骑士小说特别具有西班牙的特征：《阿马迪斯·德·高尔》比之流浪汉冒险故事《拉扎里洛·德·托尔梅斯》（1554年）中的现实主义更能表现西班牙人的趣味。《阿玛迪斯》在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朗塞罗、特里斯特朗及其他人所继承和发扬，它在英国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一点从伯纳斯勋爵（约翰·鲍彻爵士，卒于1533年）的译作——傅华萨的著作《小不列颠的阿瑟》《波尔多的于翁》——中便可看到。骑士

爱情也是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作品《七日谈》中的内容之一；虽然这部故事集的框架出自薄伽丘，但其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感则基本上属于北方特色。

欧洲北部这一时期最伟大、最有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作家是弗朗索瓦·拉伯莱，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文学倾向的方方面面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史诗、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等。他原是一位外省的布尔乔亚，在宗教上他先后做过托钵修士、修士和任过在俗神职，但他基本上是个大学的学子，他的最后学历是医学博士。他以这个身份成了让·杜贝莱的随员，之后曾数次访问意大利，而他的首次出访便是随让·杜贝莱而成行的。毫无疑问，和意大利的这些接触坚定了他的人文主义倾向，正是在里昂，他第一次受到了人文主义的鼓舞，也正是在里昂，他发表了自己的医学著作和考古学著作，以及1533年发表《庞大固埃》。1534年，他发表了《高康大》，但本书的第三部直到1546年才与读者见面；1548年发表了第四部。1553年，拉伯莱在巴黎逝世，之后在1562年发表了第五部的一部分，1564年全书出完。^[15]《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展示了拉伯莱的文学天才，后人为这两本书写的续集真是五花八门；拉伯莱被称为无神论者、新教徒、天主教徒；同时也被叫作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诚实人中的第一人、中世纪人中最后一位、近代人中第一位，等等。由于他对自己所深爱的这个世界所做的讽刺性的观察，由于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和无所不包的学识，以及对自然尤其是对人性所具有的乐观主义态度，他在文学上的地位至今不可动摇。当时，对读者有吸引力的是幻想，是中世纪式的或文艺复兴式的讽喻，是仿英雄体诗和滑稽讽刺作品，是在作品中穿插道德说教（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说教的篇幅拉得更长），尤其是遣词造句的风味。这种对言词如痴如醉般的玩味可能会使20世纪的读者感到乏味。而在当时，这是把交汇于一个充满喜乐、丰富多产、广知博学的头脑中的哥特语的世界和拉丁语的世界，巨人的哥特语世界和特勒米修道院的拉丁语世界，大众化的北方传统和异国情调的南方传统加以令人兴奋的混合的适当的工具。

用本国语进行创作并不稀罕：这是本国语在中世纪就已经为人们所承认的作用。本国语是通过戏剧舞台才打进严肃创作领域的，因此，观察戏剧舞台的情况是我们了解方言创作逐步走向独立的最佳途

径。这一步的确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因为在其他国家，本国语创作的进展要慢得多，进入16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拉丁语一直是学术的重要媒介。无论怎么说，16世纪中期，本国语的使用获得了惊人的发展，部分是通过翻译，部分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直接创作。

这期间翻译的数量之大，着实让人吃惊。虽然，有许多作品是一种“现代”语言译成另一种现代语言（比如说，把当时的法语骑士小说译成德语），但是大量翻译的还是拉丁语、新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作品；当然，正是这后一种翻译使本国语在词汇、句法和文体上受益匪浅。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在翻译方面先声夺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把希腊语作品译成意大利语，在这方面法国人紧随其后。这股翻译浪潮中产生的许多作品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都有错误；希腊原著通常是从有缺陷的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诗句被翻译成诗句，但损害了文字的忠实；译者总是想方设法迫使原作符合16世纪约定俗成的模式。因此，只有当译者的风格和他要翻译的文本巧合的时候，这样的翻译才能成为艺术（且不论思想的传播，不管多么不确切）。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这是很罕见的，但是，正是由于雅·阿米欧把他为之写作的公众的世俗道德倾向和自己的学术成就带到他的翻译中，才使他的译作《普鲁塔克的一生》（1559年）成了名著。人文主义者的拉丁语著述的翻译却不存在用现在语言来容纳古代思想的困难。所以，几乎是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1511年）同步进行的翻译文本就获得了普遍的共鸣，后来的译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1520年的法文译本和德文译本，1539年的意大利文译本和1549年的英文译本，等等）；莫尔的《乌托邦》在最初的本国语译本中所遇到的情形大体上也是如此（如1524年的德文译本，1548年的意大利文译本，1550年的法文译本和1551年的英文译本，等等）。

《圣经》的翻译归入一个单独的范畴。《圣经》的性质决定了对《圣经》的翻译必须严格，不能像对待世俗著述那样轻率，长期以来，不管是《圣经》全译或是节译都已形成了固定的传统，许多章节都已经译成了本国语，这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限制；这一切很快就成了改革者和反改革者之间争论的一个主要话题。至于最后这个问题，只得留待宗教改革通史去解决。而对于《圣经》在文学中的重要性来说，有两点必须指出。首先，《圣经》的某些章节对于16世纪的作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与作者虔诚与否无关：法国的马罗和英国

的怀亚特都把对《圣经·诗篇》的翻译看成是一种挑战。我们很难知道早期的著述家们是怎样抵御纯文学的诱惑的；这可能是需要一种圣经学术研究氛围，这种氛围要能释放出成为后来的文学所永久全神贯注的东西：“释义”《圣经》。其次，那就是《圣经》被译成本国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阅读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值得一提的也是最为惊人和最容易被人们引以为证的例子就是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从1522年起，这部书到他1546年去世为止，出了377版。在这个语言和政治上都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一部叫人非信不可的《圣经》译本所起到的统一作用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天主教的译本（1537年的埃克译本）没有得到认可，正统派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对路德译本稍作修改而已，这个译本是对形成一种统一的德意志语言的最伟大的一项贡献。在别的任何地方，圣经的翻译都没有获得如此戏剧性的结果，尽管从1520年到1560年这段时间，到处都有人在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勒费弗尔·戴塔普尔和奥利维坦为法国和法语瑞士、廷德尔和科弗达尔为英国、彼得森为丹麦等等。

不论16世纪的《圣经》翻译看起来如何新颖，但翻译《圣经》的实践是很古老的。另一方面，神学是中世纪大学的高年级课程，拉丁语自然就是它的表达工具。这种状况在16世纪固然难以改变，但这一时期用乡土语进行宗教论战的势头却在攀升。路德和加尔文的许多论战性作品分别是用德文和法文写成的。加尔文为自己的《基督教原理》（1541年）一书所作的法文版翻译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一位神学家用一种现代语言来撰写学术论文，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此外，虽然天主教在回答新教徒的诘难时，不得不用新教徒的术语，因此不得不用本国语，但是，本国语神学（和《圣经》翻译）与宗教改革的关联却坚定了正统派当权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从16世纪20年代索邦神学院满腹牢骚的敌对态度到特伦托神父们谨小慎微的怀疑心情都是如此。其他由社团掌握的科学—法律（教会法和民法）、自然科学、哲学和医学不要求进行宣传，也不要求改宗，所以从拉丁语迈向本国语的步子要慢得多，尽管在医学方面，不够高级医生的档次的开业医生的数量日益增多，这就导致了医学书籍和论文的乡土语化。

把本国语用于严肃写作只是在史学领域才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方面也有许多先例。从13世纪起，到处都有人在用本国语编写历史，科明内斯的事例表明，北欧甚至在还未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情况下，

就已经开始在用批评或分析的眼光看待过去了。低估16世纪旧式编史传统的价值是完全错误的。16世纪法国的普通百姓正是通过《大编年史》译本而不是历史学家保洛斯·埃米利乌斯才了解其过去的；在约翰·利兰（卒于1552年）和那位于1560年发表《法国研究》第一部的作者艾蒂安·帕基耶（卒于1615年）渊博的历史和文物研究学识背后，是否明显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也确实让人怀疑；爱德华·霍尔在很大程度上被喻为英国土生土长的城镇编年史学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年代学上的一次意外事件使他把意大利人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观点传给了这一传统的其他代表人物。在16世纪的西班牙、德国以及其他地方，编年史学还处在发育阶段。然而，当这一点被认可之后，它对史学编纂以及对人文主义的政治思考的重要性便值得注意了。对君主形象的拔高使政治这门关于君主的科学成了引人入胜的趣事；只有从历史当中，才有可能分辨出政治的结构；也正是根据希腊和拉丁的模式，才有可能撰写出政治在其中被给予光荣地位的历史。于是，人文主义者全神贯注于当代或近当代史的撰写，其意义比那些以现代手法去影响（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方法）民族故事改编的方式更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尼比比翁多更加切合实际，也更符合时尚[16]，所谓“佛罗伦萨第二历史学派”作品的兴趣超出了他们的题目所涉及的狭窄范围。

“佛罗伦萨第二历史学派”是意大利的，使用的是意大利人的语言，显示的是意大利人的兴趣，表达的是意大利人的老练风格和情感。但是，使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卒于1527年）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卒于1540年）成为重要人物的是：他们的思考对整个欧洲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早在1532年全书首版发行之前的手稿阶段就已经名声大振了，他的《论文集》和《佛罗伦萨史》（分别出版于1531年和1532年）同样也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必修文献[17]，圭恰迪尼的两本历史著作《意大利史》（1561—1567年首版）和《佛罗伦萨史》（直到1859年才出版）也是如此。仅把它们当作历史看，这些著作便是相当重要的。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在敢于不顾编年史传统和充满自信的总结和分析，以及强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而非个人的作用等方面，都远比人文主义的拉丁历史更具有现代色彩。圭恰迪尼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独创性从他的

《意大利史》而非其《佛罗伦萨史》中便可看出：一种比支配着意大利和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地方主义要宽泛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史观。

这样一来，佛罗伦萨的历史只有放到整个意大利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去看才容易被理解，因为外交和战争就像一根无情的纽带把各诸侯国绑到了一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由曾试图插手实际事务的人所撰写的著作都是他们在作为政治家遭到失败后而留下的作品，并且都是在流亡期间或孤独之时完成的。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人文主义者如此羡慕的悠闲甚至对这位为公文搞得心力交瘁的马基雅弗利和那位被个人和家庭的志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圭恰迪尼来说也是令人愉快的，对他们两人来说，摆弄文笔乃是一种解脱。他们转向写作，部分原因只是想改变他人的看法，更多的原因则是为了澄清他们自己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死后才发表的。尤其是阅读圭恰迪尼的作品，你会感到一种以极度悲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有意加以引导和控制的反省精神。本是为圭恰迪尼自己的家庭而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杂感》

(*Recordi civili e politici*) ^[18]有可能是我们正在回顾的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最不同凡响的著作。在马基雅弗利看来，历史能够给人以教训；对于圭恰迪尼来说，除了人自身的处境之外，一切都是相对的。圭恰迪尼在回顾他为罗马教廷当差的生涯时，承认他对在教会任职的抱负感到厌恶，他承认神职人员们的贪婪和奢侈本来会促使他成为路德宗信徒的，要不是首先考虑谋生之道的話（《杂感》，第28节）。他的理想有三：一是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政府；二是建立一个清除了所有野蛮人的意大利；三是建立一个废除了罪恶的神职人员专治的世界（《杂感》，第236节）。但是，他对自己的理想能否实现表示绝望。明白事理的人常把事情办糟；计划不能达成就像是没有制订；未来总是捉摸不定。“但是，人不能像动物一样任凭命运摆布，因为人有理智。明智人做事，只要动机纯正，就应当心满意足了，即使这样做的后果糟糕透顶也无所谓，而不应当采用卑劣的计划或手段去达到某个善良的目的。”（《杂感》，第382节）德·桑克蒂斯（想到阿雷蒂诺）曾经写道：16世纪的意大利被笑声给窒息了，圭恰迪尼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到了16世纪中叶，本国语已经战胜了拉丁语，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尽管在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运用本国语的实际状况并不理想。

除此之外，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吗？很明显，拉丁语的影响无处不在，意大利语的影响也在到处蔓延。欧洲的作者接受的是拉丁语教育，他们翻译并模仿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作者。这样做明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要看到，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负面的影响。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模式和意大利模式既促进了本地诗歌传统的形成，也抑制了本地诗歌传统的发展；经常会出现一些“学究气”的用语，虽然显得博学，但却晦涩难懂，这样的文风就是再好的作家也在所难免，以至于连拉伯莱也不得不在其《巨人传》第四部中把“晦涩用语”列入一张表里。这样做不仅导致了故作风雅和绮丽夸饰的文体，并且还滋长了本国语作家的文人圈子意识，与使从事拉丁文学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遭到损毁的拉丁文人圈子相似。然而，和16世纪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丰富本国语言的词汇，和那些被证明是令人愉快且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情感和形式得以传播比较起来，这点代价算不了什么。否则，萨纳扎罗的田园牧歌风格怎么能传给西班牙的蒙特马约尔和英国的锡德尼呢？若非如此，十四行诗又怎么能够在所有欧洲的主流文学宝库中开掘出只有严谨而具有贵族气派的体裁才能释放出来的财富呢？

然而，正是通过对16世纪散文的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更有把握地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作出判断，这个时期散文体的丰收是以牺牲文学内容中的诗意换来的，这样说似乎更公正一些。之所以这样说不只是这一时期伟大的诗人凤毛麟角，也不只是由于价值取向的逐渐演变，使诗歌落到与剧作或论文等同的地位。16世纪作家日渐看重的价值观是讲究实际：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受实际上通过观察和经验得出的准则的约束，尽管人们在口头上是多么赞成古代的道德哲学。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评价蓬波纳齐派或卡耶坦派的哲学成就时必须有所保留；学院派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托马斯主义，和从前相比更与现实不相干了。在一个资产阶级情调日趋浓厚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说它，那种史诗般的联系使它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法国的拉伯莱一直到蒙田一脉相承。这位当过波尔多市长后来成为领主的他在《随笔集》中消化吸收了本章讨论过的书籍，所以通过阅读他的著述，我们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16世纪的著述在本世纪中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二 科学

科学史上，16世纪是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缓慢形成的变革时期，但这些变革要到下一个世纪才最终完成并为世人所接受。此时的科学中世纪的成分多于现代的成分。尽管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尽管有从两个印度传过来的惊人发现；尽管确实出现了哥白尼和维萨里的技术革新；有学问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一样，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所具有的情景自14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这情景所得到的意象对于莎士比亚和对于乔叟都同样适合。

因为，科学一方面要对自然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还要对自然现象作出解释。所谓解释就是把那些看似复杂和令人迷惑的现象归结为简单明了的本质性特征；中世纪科学解释的一些核心观点在16世纪仍未受到挑战。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还是盖伦的四体液说；在物质概念及其变化形式方面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在天文学方面，还在坚持天体必然作完美的圆周运动；在物理学方面，仍将运动分为两类：暴力引起的运动和自然的运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科学原理似乎还跟早先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就像现代的科学家在解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时必须借助于惯性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哥白尼和维萨里对于描述的修改并未超越这些解释的基本法则，科学在物理学方面的活动或科学的理性的活动的新发展也并未真正把它们推到危险的境地。直到下一个世纪，在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以及仅仅引证古人的权威的做法提出异议的同时，才没有反复断言观察、实验和数学证明是科学理论是否有效的最高标准。

16世纪初，或者说在整个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知识的来源首先是古代的经典著作，其次是中世纪从13世纪到14世纪这一伟大和富有创造性的时期所涌现出来的成果。科学入门和科学鸟瞰如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及盖伊·德·肖利亚克的《外科学》之类的通俗作品几乎都是中世纪的产物。至于物理学和宇宙论之类高深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则已经为其提供了整体的结构和大部分的内容；盖伦之于解剖学和生理学、迪奥斯科里斯之于药理学、托勒密之于天文学情况也如此。虽然，把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在中

世纪希腊语学者压倒阿拉伯语学者之前，仍然存在着对伊斯兰的科学经典尤其是医学著作的需求。比较起来，1500年以前出版的科学书籍中，近期作者的手笔几乎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对传统经典的提炼而已。就是16世纪称得上第一流或者说编得最成功的教材格雷戈·赖斯的《哲学的明珠》也是如此。其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这个世纪以前就讲授过的；它并没有体现出新时代的精神，对自然界的看法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16世纪的科学很少像中世纪哲学家那样一味追求逻辑的精密，也不在意蜚声于1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机械论的批评，展示了中世纪人类理智经验中既活跃又有几分迟钝的情形。

很难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从中世纪自然哲学家和医学著述家那里得到的恩惠给予过高的评价。虽然中世纪的拉丁语有失典雅叫人瞧不起，虽然掺杂了阿拉伯语的古希腊科学传统是否纯正让人怀疑，但不能因此就说，拒绝这份思想是正确的。因为中世纪晚期希腊科学在西欧各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伊斯兰教作为中介而达到的。中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彻底崩溃的地方取得了胜利。并且还在大学里设立机构，使古典学术得到永久性的保存，这样一来，巴黎、帕多瓦和牛津自然而然就成了雅典和亚历山大的后继者。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翻译、教学和评述以及对古代著述的分析、批评和比较恢复了由于社会灾难和蛮族入侵而被打破的文明结构。

此外，中世纪的科学探究对经典例证或作修改，或作增补，其方法如果进一步加以发展，定会对16世纪的科学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也是能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作出贡献。在方法上，中世纪哲学家非常强调对特殊现象进行直接观察和实验是支持其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必然条件。这一合理构想的运用尽管有限，但却引人注目。人体解剖在古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在大的医学院校已是屡见不鲜了，虽然只是用视觉给盖伦的著述作评注而已。这时，磁力现象的基本特征通过实验已经得到验证，罗盘也已经用于航海。在光学方面，折射现象受到了认真的研究，并且，通过直接实验对彩虹形成作出的解释明显优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世纪在技术工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技术革新产生了诸如机械钟和玻璃镜头等，而这些东西在近代科学的早期对于制造观察和实验的工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通常认为的近代史的开端都不是和科学革命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概念之产生同步的，它们的起源得从近代史之前的

任意一个时期中去寻找。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创见既离不开中世纪对托勒密天体几何学的探索，也离不开中世纪对地球运动可能性的讨论。关于物质和物质变化的化学理论起源于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炼金术，在18世纪后期的拉瓦锡时代之前，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但却停滞不前。这当中最有趣得要数动量概念的演变^[19]，从古代动量概念的产生到14世纪广义机械论的状况都是和亚里士多德的动力理论直接对立的。同样一个理论，几乎未作任何进一步的修正，便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的评注者一直讲授到17世纪初；正是从动量机械学这块知识跳板而非直接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他对自己的发现的阐释显然带有中世纪的痕迹，他之得益于14世纪的让·布里当和尼科勒·奥雷姆比这两位科学家之得益于亚里士多德或文艺复兴更多。

在15世纪，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科学和哲学曾一度丧失了由翻译别人的著述转向发表独创性见解的推动力。对科学史上这段时期的一种解释集中在两点：一是16世纪早期放松了中世纪十分看重的科学阐释的逻辑性；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古典权威的不折不扣的忠诚。针对这种解释，也有人指出，列奥纳多·达·芬奇广博的兴趣和全新的视角，指出这一时期对希腊思想的真正精神的更真诚的赞同，指出安德烈亚斯·维萨里（1514—1564年）和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的创造性工作，都说明了文艺复兴对科学之再生的影响。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看法聚讼纷纭，并且由于人们认为对广义的文艺复兴显示出来的特性或导入思想史上的特性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显得模糊不清。

科学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交叉联系，这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些联系之中，发明印刷术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20]由于抄写书籍要花费大量的劳动，所以被选中的少数书籍便被赋予了人为的突出地位，从而限制了新书的传播。到16世纪中叶，即使是学术上的无名之辈也能拥有相对来说数目庞大的某一题目的专著。一位死于1551年的剑桥物理学家拥有超过200卷的藏书，其中包括四十多册医学专著，一本是盖伦的希腊文著作，其他都是古典时期、中世纪以及当代著述家最著名的著述。在引进印刷术之前，只有修道院的图书馆才能收集如此众多的权威著作。有了印刷术，就可以对各种观察和见解进行比较，这是中世纪望尘莫及的。同样，如果没有印刷的书籍

的作用，葡萄牙新的航海科学要想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维萨里和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年）的著作要想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也是不可思议的。更早一些时候即15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叫梅毒，一时间引发了大量的文章，这充分地说明了，印刷术对科学争鸣著作的传播作用。

首批出版的书籍中，科学著作和医学著作相对居多。据克莱布的书目（1938年）统计，1500年前出版的书籍有1044种，三千多版，大约650位作者。当然，意大利出版社的发行量占了很高的比例。虽然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大部分科学和医学著作是用拉丁文撰写的，但在最有名的中世纪文本中（如英国人巴塞洛缪的《论物性》、曼德维尔的《旅行记》以及卡克斯顿的《养生之道》之类书籍），也有一部分采用了本国语。16世纪出版的书籍，种类更多，范围更广，包括医学和外科学，航海以及应用数学的其他分科等方面的论文。然而，伽利略是近代天才的科学家中第一位用本国语从事大量写作的。

在科学中，运用视觉形象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运用印刷文字的交流，就像凸版印刷刺激了人们力图以最完好和最纯正的形式来再现古代的知识、改正抄写员和译员世世代代造成的笔误（印刷术提供了可以重复印刷而不会出错的方法）的渴望一样，从木刻印版到后来铜凹版的运用，既可增加图例的数量，又不至于出现错误，从而使人们产生了通过适当的形象来图解文本的想法。把中世纪动物标本和植物标本中的图片和难得一见的解剖图拿来与16世纪类似的木版画相对照可以看出，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精确地复制一张图画要比复制一篇拉丁散文困难得多，所以，技艺高超的画师远比抄写员的数量少得多。由于采用新技术，15世纪末最后一个年代第一次出现了印有插图的解剖学书籍和植物标本集。以后的50年在这方面又有了重大的改进。

木板画极大地促进了医学外科教学、植物学和解剖学的发展。但是，要想获得最佳的效果，还需搞科学与搞艺术的人进行协作，文艺复兴时期素描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繁荣对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抛开明显的美中不足之处不说，中世纪的艺术是象征的和理想主义的；文艺复兴的艺术是描述的和现实主义的。文艺复兴的画家已经掌握了透视原理，即在平面上描绘三维结构的技术。艺术家能为读者几乎像目睹一般描绘出一部机器各部分之间或人体器官之间的空间关

系，相反，中世纪显然没有攻克描绘科学和技术物品的制图方法。自波提切利以后，艺术家们都乐于对花、叶、紧张的肌肉、光线的反射和折射进行精确的描绘。为了深入了解动物和人体的组织结构，使作品更富于现实感，像米开朗基罗和列奥纳多这样的画家都作过解剖，他们的素描远远超过了专业解剖学图解的标准。所以，有人把维萨里《人体结构》（1543年）中第一流的图形当成了提高画派的作品，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也许在生物图解这一小块领域内，科学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之间的交流是最紧密的。

然而，文艺复兴时代的纯学术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影响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下的三大任务上：一是再现曾经失传和被人忽略的文本和知识；二是寻找希腊文原稿以取代中世纪的阿拉伯—拉丁文译本；三是对最有用的原稿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核对，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样的学术研究大量投向古典科学著作。因此，许多在中世纪鲜为人知的著述到了16世纪便不再陌生了。1417年由波吉奥·布拉乔利尼发现的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被多次再版。这是古希腊原子论思想最为精致，也是最晚时期的陈述，中世纪的人们对它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充满敌意的引述中得知的，我们从17世纪机械唯物论的粒子观中可以看到卢克莱修这部诗作的影响。赛尔苏斯《医学》这部罗马人对希腊医疗科学的汇编1426年前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此书引人入胜，甚至在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著作还未印刷之前就已经出版了。在数学和机械学方面，发现希腊人阿基米德（1544年）[\[21\]](#)产生了革命性的撞击；近代数学史实际上应当从阿基米德算起。然而，新的文本并未全部取代已为人们熟悉的权威版本，以伊斯兰传统为基础的医学论文虽然受到希腊语学者的怀疑，但大多数人并不拒绝。代数的发展和几何学一样在16世纪欣欣向荣，这并不是希腊根源推动的结果，因为数学的这个分支本来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创造。如果说，解剖学中的阿拉伯术语已被涤除，代之以相应的希腊用语，但化学则依然保留了“alcohol”（酒）和“alkali”（碱）以及其他大量由伊斯兰语派生出来的词汇。正因为欧洲中世纪科学几乎清一色起源于古希腊科学，也正因为16世纪并没有完全拒绝阿拉伯文化的中介作用，所以在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影响下取代阿拉伯文化的范围并不是非常巨大。要求对“阿拉伯”天文学家引入的托勒密数学常数进行修改的争论以及用“阿拉伯”人的静脉切开放血术与希腊人的这项技术相对立而引发的争论都是一些枝节问题，而不是带根本性的概念和方法。文

文艺复兴时代在这方面的专家未必就更高明，或者说就一定比中世纪的前辈们知道得更多。

很明显，16世纪早期的学者——科学家在医学和自然史方面是最活跃的。没有哪位著述家的著作像加伦的那样受到如此细心或者说反复不断的编辑。英国学者参加了阿尔定版（1525年）的编纂工作，并且，维萨里（之前他再版了约翰·金特的《根据加伦的解剖学原理》）也参与了1541—1542年季翁塔版的工作。植物学的发展是由瓦莱里乌斯·科杜斯（1515—1544年）以及彼得罗·马蒂奥洛（1500—1577年）这样的博物学家去推动的，以迪奥斯科里斯的《药物学》的希腊文本作为坚实基础，并按照要求，为适应西欧截然不同的植物区系对这部书作了补充。在初版译本中依然色彩浓厚的中世纪植物学传统（一直到1526年的英文本都是如此）被彻底抛弃了。虽然，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1516—1565年）和乌利西·阿尔德罗万迪（1522—1605年）实际上是引经据典，以古人的话作为界限，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优点。

文艺复兴提倡古希腊学术本身就很难激发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如果这样说意指愿意批判公认的科学阐释原则，愿意寻找未曾尝试过的探究方法，愿意真正地去观察事实。对亚里士多德、加伦和托勒密的普遍正确性提出质疑，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仍然要冒被斥为傻瓜的风险，或者受到更恶劣的对待。中世纪哲学家凡采纳和传授希腊自然观的就不会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谴责，反之就要遭到批评。后者的错误就在于，在还没有吃透古典的情况下就胆大妄为，以至迂腐到要尝试改进古典文化中的智慧结晶。是经院哲学本身，而不是它以之为基础的哲学成了伊拉斯谟和蓬波纳齐之类思想家攻击的靶子。如果说，中世纪通过把“阿拉伯人”和希腊人都尊为科学和医学的权威，既发展又批判传统思想、促进技术和实用科学的进步，显示了其承认文明进步的一定倾向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更着重于对古典文化的模仿。所以，某些背离中世纪传统的文艺复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这并不会使人感到吃惊；所以，像帕拉切尔苏斯之类真正反传统的人，公开承认既反中世纪，也反希腊，这不只是在16世纪，就是在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会遭到强烈的不信任。

那么，从什么意义说“科学的文艺复兴”才是无可非议的呢？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科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中，没有出现

过突然中断，也未出现过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的断然拒绝过去。然而，对于科学遗产，更明智的做法是力图理解它，而不仅仅是把它们列举出来。解剖学家和植物学家可能会将书本和肉眼耐心观察的结果加以比较；或者（像哥白尼所说的）可以像古人所做的那样，自由地去提出和检验新的假设。这里，更大范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知识发挥了作用。古代遗产不是单一的，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派和阿基米德在16世纪比以往更为频繁地为人们所提及和认同。在人文主义的剧烈推动下，人们在力图从字面上理解古代科学的真正含义的同时，对实实在在而非想象的自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这样，中世纪自然滋长起来的修辞训练、宗教象征主义和朴素寓言大多也就烟消云散了。

从哲学家的书房走向田野和作坊的实践活动可以从16世纪科学的方方面面清楚地看到：博物学家宣称自然中蕴含着美和道德教训，他们云游四处，渴望找到新的物种。帕拉切尔苏斯详述了那些理发师、浴室管理员和巫婆们所掌握的实用医疗技巧。阿格里科拉（1490—1555年）和比林古奇奥（约1540年）描述了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品制造和早期化学工业的经历，并收集了大量新的事实数据和观察结果。几何学被用于制图、航海、射击和测量后，在教学运用上出现了新的难题，但都依次被解决了。人们在测量和观察的方法上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也基本上都是实用型的，比如，维萨里通过解剖标本和图例来改造解剖学；哥白尼把一个奇怪的假设置入精确的数学形式中；尽管科学阐释采用的基本术语没有什么改动，但确定的事实的陈述还是有了根本性的改进。到1600年，世界比过去有了更好的地图；天上的星体比过去有了更准确的定位；人体结构比过去有了更精确的描述；化学作用比过去有了更明晰的陈述。科学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虽谈不上辉煌，却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在科学上获取全面丰收的年代被推迟了，但它却为提出与所有享誉于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本身的科学思想完全不同的全新概念铺平了道路。

数学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在几何学方面发展较为复杂的希腊人的方法，这些方法是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在其著作中所研究过的；二是更好地掌握代数方程；三是强调应用，推动通俗教学的发展。因为数学向更深奥的分支方向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并

不大，所以没有必要详加考虑。代数向符号化发展，以及用代数方法解决科学上的问题，两者都是17世纪而非16世纪的创新。在笛卡儿的《几何学》发表以前，乃至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天文学家和应用数学家几乎沿袭希腊人的做法，纯粹用几何学来解决问题。问题的展开方式要求计算长度、面积和体积，由此得出解答。由于希腊人对圆锥曲线的分析的重新发现和三角函数的广泛运用，更由于阿基米德面积算法向“无穷小法”的发展，这样的演算就容易得多了。由于在技巧的运用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机械科学中用几何推理解题的前景就被打开了，事实证明，后来由伽利略、笛卡儿、卡瓦列里以及许多其他17世纪早期科学家加以发展的这套几何推理方法，乃是一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

要使数学更加通俗化，就要剥去数学技巧的神秘性，剥去它与一般人无法进入的艺术之间残留的联系，在这较为低级的层面的努力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银行、金融和交易所的管理，另一方面是船舶的航行、工程项目的指导和战争的指挥，都在趋于复杂化，这就为开发一般人能够精通或运用的计算规则提供了许多机会。这种情况对像英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英国，第一部算术书卡思伯特·滕斯托尔的《算术论》（*De arte supputandi*）直到1522年才出版。紧接着便出版了罗伯特·雷科德的4部本国语著作，其中包括名气很大的《艺术的基础》（1540—1542年）^[22]和《知识堡垒》（1551年）——这是第一部用英文写的、其中提到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以及引进代数的《智力的磨刀石》（*The Whetstone of Witte*）。至于迪格斯关于测量和测绘的英语论文如《论度量》（*Pantometria*）（1571年）中所讲授的应用几何，其基础是欧几里德定理，这在许多数学手册中都有方便的归纳。欧几里德的《原本》的英文译本（由约翰·迪作序）于1570年出版；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日期更早一些。本书作为测量高度和长度的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教学。英国人撰写的同类著作也以多数大陆语种出版。

几何学的两种特殊用途都与天文学密切相关，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制造日晷的技艺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改良，在使用轻便型仪器后于15世纪得到简化，办法是在它里面安装了一个小型磁罗盘，这样盘面上的指针轻而易举地对准南北方向。理论上，一天的时辰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确定，一是测量太阳在子午线方

位角上的位移；一是测量太阳距离地平线的高度，再就是结合两种方式的测量。在后两种情况下，仪器必须提供某种方法以测定太阳偏斜时引起的季节性变差。使用超过一个纬度时，要求日晷的标度盘可以被调整。当把这些原理付诸实践，以及当建造固定日晷用于不同的场合，适应不同的用途时，几何学上的问题便出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著作有一大堆，其中最圆满的或许要算克里斯托弗·克拉维尼斯的《日晷测时学》（1581年）。

航海乃是更为重大的商业活动。综观整个古代，一直到15世纪，船只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导航全凭海员对风向、海底情况以及界标的熟悉程度。此外，太阳和星体的位置也可为航行大致指出一个方向。13世纪采用了磁罗盘后，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测定航向，但船体自身所处的位置还是无法确定。16世纪的近海航行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许多关于领航术的教科书出版了，比如教人怎样确定某个码头的潮汐状况以及“北斗星群”。但是，船长们的技术和记忆并不足以完成在大西洋上向南和向西的航行以及横穿印度洋的任务。在远洋航行中，船员有数月时间看不到陆地；航海员得用新的方法来测定自己的位置，并且把自己的位置标在航海图上。其中的问题，部分已在15世纪通过天文学和几何学解决了。纬度通过测量正午太阳的高度（适当考虑太阳的偏斜变化）或极点的高度来确定。经度只得根据航线进行粗略计算，并估计每一个方位的航行距离。然后，在海图上找到船只所到达的地点。比如环非航行，可以先向西，再适当向南，直到好望角的纬度，然后“顺着纬度”一直到达海角。

远洋航行靠的是测程仪和海图、磁罗盘与天体观察的综合并用，这是这个时期唯一重要的完全出自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技术，是葡萄牙人的创新。它要求除了懂得基本的科学原理之外，还要掌握操作仪器和使用图表的技术。渐渐地，这项技术传到了西班牙，而后又传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因为，对于那些想要进入东印度或从事美洲贸易的人来说，掌握这门技术是必需的。揭示航海这门新科学的书中最有影响的要数马丁·科尔特斯的《航海术》（1556年），1561年由理查德·艾登译成英文。虽然，就航海这门科学来说，主要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对仪器和图表的改进却一直没有中断。从理论上说，测量经度变化的方法也在进步，但是，没有一种方法的使用能够超过两个世纪。威廉·吉伯在那篇伟大的论文《论磁石》（1600年）中开始部分

地对地球作为一个磁体的活动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其中的奥妙比人们最初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虽然地极的磁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考虑，但是，磁针从根据地极确定的北向发生偏移在整个地表遵守一种简单常规这个原先为人们所期望的结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到了16世纪末，人们普遍认识到，可以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来改进航海技术，与此同时，许多人主动提出教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海员改进他们的驾驶方法。

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地理学和制图学从15世纪最后10年开始的努力探索中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另一个与此并不完全相关的重大事件乃是，托勒密的《宇宙结构学》于1475年首次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试图根据他的理论重新绘制世界地图，中世纪在这方面所做的理论补充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当人们认识到，哥伦布发现的地方并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时；当太平洋水域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当人们对探险家的报告进行分析后并得出结论时，托勒密的地理学终于显得过时了。在奥尔泰利乌斯和默尔卡托的努力下，地球上被探险过的地区在16世纪下半叶有了精确绘制的地图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欧洲有限地区的认真细致的地图测绘始于15世纪后期，到了1600年，人们都已充分地认识到，在制作地图时，要用三角测量术进行勘查。然而，却没有人尝试精确地测出一个地理度的长度（并由此而确定地球的大小）。人们考察了对海图制作尤为重要的设计方法；这方面由于引进了默尔卡托的设计（1569年）而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它能够制作出特别适宜于航海的地图。其数学基础首次由爱德华·赖特（1599年）作了全面的解释。

几何学最引人注目、最广泛的用途是计算和预测天体的运动。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科学兴趣问题，也不只是仅与航海家有关联的问题，因为明断占星术以及类似的迷信依然盘踞在人们的心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当哥白尼的天文体系引起争议时，最初的反对者们就曾迫不及待地指出，这个体系对传统占星学的计算没有丝毫妨碍。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没有对占星术或任何现存的迷信加以过约束。毋宁说由于以下三种原因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人是神秘力量的玩物：一是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是人类探究的适合对象这种意见的提出；二是对古人的秘传知识兴趣日益浓厚；三是关于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纯基督教的观点走向衰落。对危险的神秘力量，人们更多的是采取鼓

励而不是回避的态度。哲学家和诗人都毫不讳言地把人生的不测事件归因于星体的排列；物理学家和炼金术士也是按这些神秘力量来调节他们的工作。所以，人们把各种奇迹怪事如：彗星、怪胎、新发现的星体等看作是不幸和神秘的征兆也就不足为奇了。行星之间的相互靠近和离去以及月食、日食等现象不仅是少数天文学家，也是许多阅读历书的人们所关心的事。

公元2世纪时，托勒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规则的几何运动模型来描述从地球上固定一点所观察到的天体运动。如果像托勒密所说的那样，地球稳定不动，位于宇宙的中心，那么，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就要围着地球由东向西绕行一周。但是，人们以星体作为背景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太阳、月亮和行星由西向东朝着相反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运动。此外，托勒密坚信，开卜勒以前的所有人也和他一样持同样的观点，即：所有天体运动都呈完美的圆周运动，但是人们从观察中清楚地看到：只有太阳和恒星以地球，即宇宙的中心，为中心作圆周运动。托勒密只能用假设来说明为什么对行星和月球的观察结果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即：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心（本轮）旋转，而这个中心又围绕着地球作另一种完美的圆周（均轮）运动。通过观察后的计算，托勒密从各种不同运动的周期和许多圆周半径中找出恰当的值，然后通过补充各种假设来建构一幅宇宙的几何图像，从中可以计算出天文图表，并对未来将发生的事件作出预测。然而，他的几何学并未完全遵行统一的模式，他也不打算建立一个能够简化为几条简单原理的严格体系。

托勒密没有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天体现象，实际上要用物理学来对他的几何图像作精确的阐释是不可能的。相反，倒是亚里士多德这样做了，他在其著作中讲述道：有一组同心的球面，天体在其上旋转；地球物质与天体物质不同以及各种现象有其原因和目的等等。所以，自然哲学家以亚里士多德为研究对象，而数学家则以托勒密为研究对象，因为数学家虽不总是，但却经常坚持不懈地继续实际观察的传统。

尼古拉·哥白尼是中世纪数学天文学传统最后一位伟大的捍卫者，尽管他用这种方法证明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假设：地球本身是运动着的，它是一颗绕太阳旋转的行星。整个天空由东向西旋转实际上是由于地球绕着地轴自转而造成的错觉，这种观点在中世纪已广为人

知，但并未使人信服。对于托勒密体系，五大行星以太阳而不是地球为其运行轨道中心的观点自然是另外一种选择。但是，自从亚里士达克宣称：太阳和恒星是固定不动的，地球围绕着轴心自转同时又按照某种运行轨道环绕太阳旋转以来，再没有人提到这一思想了。日心说体系真正伟大的价值在于，除了免去宇宙必须每天旋转一周的麻烦之外，还可以从每个行星运动的几何描述省去现在可以归因于地球每年实际公转的成分。这样一来，哥白尼就可以比较公正地宣称，从数学上说，他的体系比托勒密的更为简洁，更为和谐。

正是在考虑这一让人感到亲切的、严格说来已超越了科学的评价之时，哥白尼迫不得已声明，日心说的假设不仅在数学上是站得住脚的，在事实上也是确凿无疑的。哥白尼的天体几何只不过是托勒密的天体几何的倒转，派上略有差别的用途而已。他保留了完美的圆周曲线、本轮和均轮等学说，甚至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天体概念。他借用托勒密的劳动成果以及托氏引用的观察结果来计算天体的旋转周期和轨道运行的圆周半径，并采用了一大批伊斯兰教天文学家的数据以及一小部分他本人的劳动来加以补充。结果，尽管他和托勒密的基本假设南辕北辙，但各自使用的几何方法则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不管是用哪一个体系来运算，从地球上看到的天体的相对位置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不可能用天文观察来对二者进行检验，日心说体系也不可能比地心说体系作出更为准确的预测。哥白尼的首要任务是证明，日心说的假设在数学上并不是荒谬的，它的准确性不会比地心说差。再往前走就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了。然而，他并没有停下来，他要证明现存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要解决的就只是可能性的问题而非现实性的问题了。是所有天体都在旋转，还是只有地球在旋转，哪种可能性更大？在天球层上，谁是宇宙的中心？是小小的地球呢？还是那巨大而炽热的太阳？是相信恒星的距离相对来说要近一些呢（比土星的距离远不了多少）？还是相信它们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从它们那里得到地球公转一年的暗示呢？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天体呢？还是和其他行星一样，能作相似的运动呢？

哥白尼在对付这些问题时，便进入了一个与数学天文学不同的思维领域。随着他努力证明日心说体系是对客观现象的真实描述，而不只是一个运算工具，哥白尼从托勒密的领地进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地

盘。因为，如果地球环绕太阳作圆周运动，那么，亚里士多德对物理现象的解释就不再有意义了。如果宇宙的中心不等于地球的中心，或者轻物体离开地心向气和火的区域上升，那么，重物体朝着它在宇宙中心上的自然位置下落就不再是真的了。如果地球既公转又自转，那么，重的要素，即土和水，自然而然地呈直线向下运动就不再是真的了。并且（很久以前就有人这样极力主张），如果地球是运动的，那么，物体怎么会具有稳定性呢？地面上的建筑物怎么会不倒呢？所有物理学和机械学的解释都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它是不动的，并且所有的解释都说明，是哥白尼而不是托勒密错了。但哥白尼是数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这种意愿也没有这份才能去完成如此深刻的观点的转变，赋予他的日心说假设以物理学的意义。当然，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还是作了一些修正，比如他认为：圆周运动是符合自然的，适合于所有像地球和月球之类的球体，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亚氏理论中的主要难点。因此，在同时代大多数人看来，他称自己是一个为了数学的高贵和典雅可以牺牲一切健全的科学思考的人是自我谴责。

我们不能把他们的态度斥之为蒙昧主义或偏见。因为，如果说中世纪在宇宙的数学天文观和自然哲学观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差异，那么，哥白尼是拉大而不是缩小了这个差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他的日心说假设是相互矛盾的，尽管哥白尼对二者都保持着忠诚；几乎没有人步他的后尘，多数人宁愿稳妥一点，坚持传统的看法。他们正确地看到，如果哥白尼是对的，亚里士多德便是错的；如果拒绝承认《物理学》，取而代之的便是思想的虚无。直到1632年，伽利略勾画一种全新的自然哲学观，并与地球运动的思想相吻合时，这种二元对立的状况才被打破，从这时起，日心说体系的拥护者才一下子多了起来。

在《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发表之前以及之后的40年里，关于天文学上“哥白尼改革”，的确有过同样多的讨论。哥白尼是一位受尊敬的天文学家，他曾意大利工作多年，传说他的伟大著作在国外尘封了20年之久才出版。他的新天文学的第一部著作《纲要》（*Commentariolus*）好像曾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过一段时间，有记载表明，哥白尼曾于1533年向克莱门特七世解释过他的思想。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心说理论此时由于神职人员的敌视而遭到挫折，或者说学

术界（也有例外）除不感兴趣外对此有什么看法。直到16世纪末，情况对哥白尼的信徒们才开始变得不妙起来。试想，要是每一个星球都被一群星体环绕着，宇宙的大小尽管是有限的，但和地球比较起来就会显无限之大。然而，如果地球是运动的，太阳和恒星是固定不动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宇宙无边无际，布满星体的宇宙空间从太阳向四周无限地延伸，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星体，其距离的遥远也必定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观点受到了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迪格斯（卒于1595年）的拥护。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说明宇宙是无限的。尼科勒·奥雷姆在14世纪就已经讨论过（并打消了）这种看法，即：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宇宙之外有可能存在着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宇宙。可能存在着众多的世界，可能在别的世界上也存在着生灵，早在16世纪末焦尔达诺·布鲁诺进行这样的思考之前，这种观点就遭到了驳斥，认为它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神学上是危险的。1600年布鲁诺受到谴责并被处以火刑，在新教徒看来，这乃是一起恶名昭著的丑闻，结果使天主教反对哥白尼主义的态度更为坚决，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天文学的讨论因为和神学问题搅在一起而变得剧烈起来。然而，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哥白尼革新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要使天文学更为精确，就要改进观察手段，这项工作最初是在15世纪下半叶由波伊尔巴赫和雷齐蒙塔努斯开始的。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厄（1546—1601年）之前，不管是日心说的假设，还是16世纪对仪器制造技术的改进，都没有带来多大的实际成果。第谷是反对哥白尼的，主要还不是数学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地球的运动把所有解释物理现象的路都给堵死了。他的天文学体系就像哥白尼的一样，主张每一个天体都在作同样的相对运动，但却假定，地球的位置是固定的，是太阳和星星绕着地球旋转。这是对日心说几何学的合乎逻辑的回应，并且使有利于哥白尼信徒的数学论据和观察论据归于无效。然而，从科学上看，这个体系是第谷的研究工作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天文观察家，他的观察记录对于其后的两代人都没有过时。由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资助，在松德海峡的文岛建立天文台（天文堡），把第谷等人召集到那里进行研究，这个有组织的研究中心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第谷自己设计仪器，并雇用德国最好的工匠进行生产，许多仪器都尽可能精确地加以校准，以适用于一种目的。他用带缺口表尺的仪器对在角度测量中心出现的种种错误

进行仔细的研究，并且发明了尽量减少误差的方法，也懂得了对观察结果进行适当更正的必要性。

就像他的所有前辈一样，行星运动中的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然而，自从行星位置的观察可参考相邻恒星的位置轻而易举便能找到之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准备一份新的恒星位置一览表。为此目的，他设计了一种确定天球经度的新方法。不管是实施这项任务，还是对行星进行观察，他都要用不下于两位的系数来改进以前规定的精确度。他的误差范围大约是4分，事实证明，这个限度对后来的理论天文学乃至整个物理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开卜勒才能创立行星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定律”。于是，就像维萨里之于解剖学一样，第谷通过辛勤的劳动，达到了对天体观察的精确描述，为就连他自己也无法预测的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基础。然而，他自身的影响并不全都是消极保守的。除了坚持地球不动的信念外，他既不恪守亚里士多德，也不迷信托勒密，特别是他1572年对新星的讨论打破了天体本质不变的教条，并且证明了，彗星不是一种大气现象（大气层之上层的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天体。

16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除了在阿基米德的影响下，机械学作为数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更加突显出来，除此以外，中世纪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把物体的物理特性和四要素（土、水、气、火）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对物理世界进行解释的：物体是通过四要素的组合，并通过四特质（干、湿、冷、热）的作用而形成的。这种解释仍为人们所接受。中世纪那种“形式幅度”（即是说：估计某物体所拥有的特质的度）的讨论仍在继续。中世纪时修正过的亚里士多德源于动量概念^[23]的运动理论仍然在讲授，并没有作重大改动。14世纪关于动量效果（被认为是落体加速度的原因）的几何分析为一些人所重做并加以坚持，以证明如下重要结论：落体有一个“匀速的非匀速”运动，该运动被认为等同于一个匀速运动，即物体下落到中点时的运动。但是，要想把中世纪和16世纪提出的那些含糊不清的新概念弄明白，要想找到一种数学分析方法，能够把时间、速度和距离联系起来，纳入到一个单一的公式中，对作匀加速运动的物体进行描述，还得等到天才的伽利略。为了驳倒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即：重物比轻物下落的速度快，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进行验证。今天普

遍认为，这是一个神话，但类似的实验肯定在大约1590年由其他人做过。

在层次较低的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上，科学倒取得了更为实在的进步。中世纪对希腊人关于杠杆和平衡的一般原理所作的研究并非无足轻重；16世纪初还在使用中世纪的论述。然而到了1586年，西蒙·斯蒂文（1548—1620年）这个有名的十进制拥护者和讲求实际的工程师的虚拟速度原理用于非平行力的作用，解决了许多另外的难题。他在这方面的观点非常接近矢量的概念。他也是第一个讨论“帕斯卡悖论”的人，即：液体对表面的压力随表面面积和液体柱之高度而变化，与它的横截面无关。另一个阿基米德的学生、敏锐的伽利略也完成了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纳入了他论述物质强度的著作中。伽利略也正是在比萨生活期间，首次意识到了钟摆的等时性。

在液压工程方面，这是一个重要时期。斯蒂文和伽利略在这方面都做了踏踏实实的工作，他们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液压工程联系起来。把科学用于机械工程就不那么容易了，尽管16世纪产生过许许多多的小发明。在光学方面，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做。阿尔贝蒂（1404—1472年）之后，丢勒和其他一些人撰文论述过透视几何学，然而，就光线和色彩理论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关于镜头和镜子的观察实验有一些详细的报告，一种类似望远镜的装置在大约1609年“伽利略”式望远镜真正出现之前，影响了整整一代或不止一代的人。这里或许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正是在实用技术的发展方面，才最清楚地看到脱离中世纪世界的变化。

化学的知识和技艺经两个不同性质渠道——工业和炼金术——传入16世纪。在古代和中世纪，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情况可能是这样，有些工业技术是从炼金术士的实验室里借来的，比如蒸馏技术以及用无机酸溶解和提取金属的技术等。炼金术以其神秘的哲学、晦涩难懂的行话而著名，圣功的制备就是用这种语言描述的。工业程序诸如金属的冶炼和纯化，肥皂、玻璃和明矾的制造，染料和药品的提取等，都是用作者尽可能掌握的明晰的语言来描述的，几乎看不到通过某种理论对这些程序进行解释的尝试。把化学传统中这两个方面的历史叠在一起，等于是以下两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用化学工艺制备日益增长和适销对路的商品，不仅如此，还制备出大量在当时还是奇物珍品的物质。

16世纪的发展因为新观念和实践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复杂。炼金术当然还在继续；人们对工业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出现了由帕拉切尔苏斯发源的化学医学派的双重发展，一半显得深奥和神秘，具有强烈的炼金术倾向，一半趋于理性和经验，具有在未来形成一门真科学的潜能。

到16世纪初，炼金术已不能再为化学工艺和化学观念的发展出力了，然而，直到17世纪，炼金术的那套理论的遗风仍在发挥作用，要在化学理论的阐述中作比较现实的解释是很难办到的。在帕拉切尔苏斯影响的刺激下，利用炼金术去寻求一些虚幻的东西仍然很有市场，就连罗伯特·波意尔（1627—1691年）和伊萨克·牛顿（1642—1727年）也不能简单地加以排除。许多论文被错误地归在阿尔伯特斯·马格努斯、维兰诺瓦的阿尔诺德以及雷蒙德·勒尔这样一些中世纪巨匠的名下到处流传，在这些数量庞大的集子中，有一本名为《被称为化学的炼金术》，于1572年在巴塞尔出版。还有许多关于炼金术的小册子问世。一方面“喷着烟的人”在熔炉旁没完没了地干，常弄得一身污秽却毫无成果（例如勃鲁盖尔在1558年就做过这样的描绘），另一方面，“行家”却翱翔于语言和图解的象征之中。比如，从《哲学家的玫瑰园》和图尔内塞的《第五要素》（157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炼金术士的想象力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接下去的下个世纪上半叶，炼金术更为盛行。

炼金术方面的著述转向了过去，作者们声称是在阐述古人的智慧。还有一类书籍在表述旧传统的同时，也预示了未来化学工业的发展。有一本无疑是继承了关于化验的手写本的传统著作，早在1520年就在德国印刷出版了。尤其是瓦努奇·比林古奇奥的《论烟火制造术》（1540年）和阿格里科拉的《金属学》（1556年），对所有与金属制造有关的东西都作了非常全面的叙述，从矿石的化验分析、矿物开采的焙烧和熔炼、金属的分离和精炼到合金生产和铸造技术，等等。为了在欧洲降低生产贵金属的成本（拉萨努斯·埃克尔在1576年发表的论文丰富了这方面的论述），起码要具备矿石品位的可靠知识，掌握在金银离析过程中进行精心控制以及在精炼过程中对金属纯度作精确化验的技术。因此，由于化验员被委以确保货币合金的精确性的重任，所以他们率先将精确测量质量的方法引入了化学的所有分科，质量的精确测量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至关重要的。

比林古奇奥和阿格里科拉讨论的化学题目绝不仅仅限于冶金学的范围。他们还谈到了玻璃和火药的制造，明矾、硫酸、硫黄及其他矿物的制备和几种试剂的配制。在地质学和矿物学方面，阿格里科拉更富于传统风格的写作也很重要，他关于采矿技术的说明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作者的视野较窄，只是紧随其后而已。埃克尔关于化验的论文已经提到过了；这篇论文晚至1683年才被译成英文。从布伦什维格的《提炼术》（1500年）开始，涉及当时化学制作中最重要的程序、蒸馏的论文一直绵延不断，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对酒精的嗜好的不断增长（医生对此表示鼓励而不是责难），蒸馏者变成了酒精生产商；蒸馏术也进入了医用和工业用的许多非酒精类提纯物的制作。在奇普里亚诺·皮科帕索（1524—1579年）那篇谈及意大利伟大的陶瓷工业以及它在釉料和颜料化学方面一流的凭经验进行控制的技术的手稿论文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在这方面作全面论述的文章了，不过，这个缺陷由于法国伟大陶工贝尔纳·帕利西（1524—1589年）的著作而多少得到了一些补偿。关于威尼斯的玻璃工业，安东尼奥·勒利在1612年发表的文章中作了精彩的描述。其他许多著述者，包括世纪初的科内利乌斯·阿格里帕和世纪末的巴普蒂斯塔·皮尔塔都饶有趣味地展示了化工技术各个方面的知识，如金属处理、染印、上色及珠宝工艺，等等。

于是，炼金术由于在神秘主义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它在实用性方面获取成功的断言日益遭到经验丰富的冶金家的怀疑，倒是化工技术给人以更大的信心去做成功的探索。这些技术的工序和制作方法（至少是大体上）已不再是某个作坊或行会需要保守的秘密。它们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在由工匠们所利用的复杂的化学变化现象与由哲学家或炼金术士所作的空泛的总结性解释之间进行比较和对照。但是，这些技术问题的著述者实际上都是师傅；他们的知识显得零碎，缺乏组织；他们的观察带有随意性，并且有时会产生误导的作用。化学作为一门系统的、描述的科学不可能只有这一个源头。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年）那暴烈和非理性的个性向化学发展的二元传统发起了有力的冲击。就像路德一样，他全然不是现代人，然而他却助长了现代世界的创生。他不拥有也不渴望拥有他那个时代渊博的哲学家和医生们所拥有的经典学问，他只是通过对古人声情并茂的谴责，通过使他的惊人见解为人所采纳的过分要求，通过宣

称自己掌握了非凡的医疗方法，直接向下层文人和那些卑微的医术拥护者们呼吁。他的主张很简单。即是说：那些正统的医护人员全然不了解生命、疾病和死亡的奥秘，只有他帕拉切尔苏斯才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的大部分观点都是中世纪的，比较粗糙，甚至连他的同时代人都认为他很迷信。他认为所有东西包括动物、蔬菜和矿物质对人都有效力，通过它们的药效形象就可得知。^[24]医生的医术在于了解疾病，并知道怎样获取治疗所需的“效力”。药物学家的技术在于从药物中提取这种效力，并加倍地发挥其作用。这里，帕拉切尔苏斯进入了一个他自己所无法预知的新领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化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相信，效力可以通过烟火制造的工序，通过炼金术士们所采用的水煮和溶解、沉淀和蒸馏来提取。按照他的规定，所有人造的化工产品都应当在药典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和原先就在里面的一些自然矿物质排列在一起。甚至许多化学生产出来的毒药也潜藏着效力。

这一学说并非全然没有先兆。酒精、含铋药剂和汞化合物以及无机酸已被一些医生认为是益药，尽管遭到另外一些医生的反对。然而，帕拉切尔苏斯提倡全部用化学治疗取代复杂的植物制剂，即后来所谓的“加伦制剂”。他本人实际上对化学知识的增加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的化学医学学派的弟子们在实验室里以及在行医实践中（通常是非法的）大胆地进行了试验。到17世纪初，“化学”这个词已被习惯性地用以指一种独特的职业，即：用化学程序配制药剂。化学家们用“三种主要元素”（盐、酸、汞）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的名声变得更响了。帕拉切尔苏斯的那些名副其实的继承者们通常也是炼金术士，他们对帕拉切尔苏斯的那些狂野的主张为庸医们所利用并不姑息，而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斥责，是他们第一次发现了许多新的化学反应和物质并作了描述，也是他们第一次迈出了向真正的化学理论挺进的脚步。安德烈亚斯·利巴维乌斯的《炼丹术》（1597年）抛开它的书名不说，乃是第一本化学教程，从中可以看出，16世纪在化学实验方面作出了榜样，它使化学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不断发展，硕果累累。

16世纪初还未有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也非常罕见。另一方面，却有很多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这些科目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据说都含有某种东西，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就像医学本身一样，生命本质的研究也受到了希腊学说和思想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16世纪上半叶。在亚里士多德和加伦的学说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方面在继承古代经典上明显要胜于物理学和数学。与后者相反，观察和描述占据着主导地位；理论的发展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传统科学只限于地中海区域，而16世纪的人所面对的则是一个从北极的冻土带到南非的好望角，从东印度到西印度的世界。他们怀着值得一试的心情去响应这个世界的挑战，对丰富多彩的现存的物种进行分类和了解，尽管他们并不乐意承认这在古代是没有臆测到的。

亚里士多德写过三篇关于动物学的论文（《动物史》《动物的起源》《动物结构》），这些著述显示亚氏研究面之大，知识面之广，确实让人吃惊，17世纪后期之前还未见有人超越过。中世纪在这方面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直接继承显得特别乏力。动物寓言集以传说为主体，再罩上一层厚重的象征，这就是中世纪动物学的主流，像皇帝腓特烈二世的《猎鹰驭术》（约1248年）那样采用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则是例外。文艺复兴的研究趋向发生了改变，重心从一般转向了特殊，从象征转入了现实，同时强调有关动物及其行为的资料的重要性，这些资料尽管为亚里士多德、普林尼及许多古典作者所采用，但迄今为止，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效果在16世纪中期以前并不明显。甚至连画家似乎也觉得植物比动物更能给人以灵感：列奥纳多对鸟类飞翔的研究实属罕见，但他的灵感似乎更多是出自机械学而非生物学。

就在文艺复兴越过意大利边界，对法国、德国以及欧洲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的艺术和学术进行改造时，生物学复兴了。苏黎世的康拉德·格斯纳（1516—1565年）是当时动物学方面最伟大的人物，只有博洛尼亚的乌利西·阿尔德罗万迪（1522—1605年）能够与之匹敌；法国人纪尧姆·隆德莱（1507—1566年）、皮埃尔·贝隆（1517—1564年）和英国人约翰·凯尼斯（1510—1573年）和威廉·珀尼（1530—1588年）对动物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如果要对他们从事这种研究的动机作出解释，那么必须这样说，部分是出于宗教的虔诚，部分是出于美学的鉴赏，部分则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而且都伴随着十分浓厚的书卷气。因为这些人不只是观察家和收藏家，他们更是学者。这段时期，人们到处收集能够让人吃惊的东西，完全是出于盲目的冲动，但

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像在阿尔德罗万迪自己的博物馆里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从几乎所有著名著述家的作品中去收集材料，但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形态和产地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探索，所以其探索的范围扩大到了语文学、传说、寓言和饮食学。他们对中世纪的虚构并没有全部采纳，像鳄鱼的眼泪、白额黑雁之类便属拒用之列。动物物种的声音信息的最初一些资料便是他们收集的，这些工作以及为了真实地显示他们所描述的生物所作的努力乃是这些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们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然而，就图示方面说，动物学著述家所取得的成功还是赶不上植物学著述家。对众多不同的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的记录总算开始了，但在更严格的科学学科分类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16世纪的博物学家们并没有作出什么新的贡献。当然，他们要取代亚里士多德还为时过早。

植物学的状况是更有作为，也成熟得更快一些。对于医术来说，拥有草本植物的知识是最基本的，中世纪的一些草药医生既了解权威的典籍，又有野外采集的经验，他们保存了一种科学传统。早期印刷出版的草药书并未显出什么新趋向；这方面的新阶段也是在后来才开始的，而且是在北方，不是在意大利。普遍认为，奥托·布隆费尔斯著作的出版（1530年）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因为，尽管布隆费尔斯不是一个知名的著述者，但是，是他想到了这么一个好主意：雇用艺术家按实际标本制作图例。伦哈特·富克斯的《植物志》（1542年）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书简直就是一本艺术名作，从书中可以看出，富克斯学问精深，经验丰富。然而，他的著作和他的许多后继者的著作一样，显示出来的是功利思想，而不是科学精神。至于生物学本身所固有的难题，他以及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的视野仅局限于识别和医学上的用处。其他许多植物志，不管是拉丁文的，还是本国语的，有图解的，还是没图解的，都是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出版的，英国在这方面最先作出贡献的是约翰·杰勒德（1597年）。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一切都是在模仿迪奥斯科里斯；这一时期，抄袭和剽窃成风，印刷工之间相互购买或偷盗木刻印版。

16世纪初后期，标本采集在西欧更加深入细致，范围更大，甚至扩大到了新大陆和东方。富克斯介绍了玉米；杰勒德介绍了马铃薯和红薯；马蒂亚斯·德尔洛贝尔介绍了烟草；博物学家们渴望在自己的园子里种上由加西亚·德尔韦尔托和尼古拉斯·莫纳德斯这样一些具

有植物学头脑的旅行家所描述的那种非本地的物种。在这样的压力下，用古人所描述的物种来对至少每一群植物进行识别的习惯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人们认识到，西北部乃至海对面的那个大陆的植物群与地中海区域的植物群不同。古人连愈创树这样的药物和巧克力这样精美的食物都给忽略了，可见，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同样清楚的是，自然界的生物是丰富多彩的，大陆与大陆之间，各有不同。这些发现向人们提出了，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确认成千上万种植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按规则对它们一一进行分类，而这些规则又不像字母顺序或其他分组形式那样武断。这种方法只能通过挑选某种形态特征来作为关联和分类的标准。于是，种类的选择标准的运用就成了在其后200年的植物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系统分类学所面临的难题。在这个方向上，尤其是通过安德烈亚斯·皮萨切诺（1519—1603年）和德尔洛贝尔（1538—1619年）的思想，16世纪的植物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总的来说，是在采集、整理和描述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此外，植物学自身的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得益于药物学研究的独立，其独立的标志就是官方药典的首次出版（佛罗伦萨版，1498年；纽伦堡版，1551年；奥格斯堡版，1564年）。但是，16世纪的博物学家们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物种的植物，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机物的功能。就像动物学的研究一样，植物学的研究仍然有许多由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对植物的生存级别的知识就算稍多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也谈不上大的进展。生物学已在着手其伟大任务之一：列数物种。但向另一个难题，即考察生命状态的条件和过程发起冲锋的任务则拖了很久才到来。

在这方面，唯有对人本身的研究鲜有所见；这时关于人体整体结构的知识得到了修正和澄清；人体健康时才运转并受制于疾病的旧观念受到了批评；甚至对人的心理的认识也不像从前那样教条了。虽然思维重心的转变和理论细节的修改导致了富有成果的争论，但是，希腊和中世纪关于这些课题的理论支柱并没有被取代。这些都依次在医学实践中得到了反映，为医疗提供了新的提示，使从中世纪承袭下来的书卷气十足且顽固不化的医学传统多少软化了一些。那些愿意从事观察和实验的医生那里，医学的可信度更高了。

解剖学是医学研究的基础，它被认为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医学素质。16世纪解剖学家的成就是通过他们以在大学任教为己任讲解加伦

的著作而体现出来的，他们的成就也在人的身体上证明了其真实性。这是已确立的传统做法，文艺复兴借助于精练解剖技术，修正但不抛弃加伦的思想，把文字描述和视觉经验融合在一起，将这种做法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了。因为，想一下子取代加伦解剖学论文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维萨里的著作《人体结构》也办不到，威廉·哈维虽然成功地对解剖学的新发现作了新的综合，但他在1628年还是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加伦思想的基础上，在上世纪真正伟大的解剖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去证明加伦错了。他们宁愿等到加伦的错误不断暴露出来时，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吃惊。和其他科学门类中的情况一样，批评不会如此张扬，直接对准真正的典籍，因为用来对中世纪的阐释进行批驳的那些更新的标准也是从这些典籍中产生出来的。促使人们去解剖，偶尔也做做实验的真正动机看来不过是想对加伦的文字叙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解剖便成了对研究文本的学者的工作的补充），并且，对材料的搜寻可以使他们对加伦的叙述作忠实的评述，并为之作图解。既然加伦的解剖学论文是尚存的最有用的论文，那就必须在它们被取代之前先把它搞懂和吃透。

当贝伦加里奥·达·卡皮（1470—1550年）、维萨里及巴尔托洛梅奥·欧斯塔基奥（1520—1574年）这样一些人转向解剖后便立刻把它作为研究和教学的一门工具时，他们仍然滞留在加伦的框架内。但是，解剖学家们并不情愿把他们的知识局限于教室里的听众，他们利用印刷机之际，采用图示来对文字进行补充。的确，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像维萨里的《图说梗概》一样，文字在某些场合反而成了图解的附属物。这种手法并不新鲜；16世纪开始以前，除了一幅珍稀的中世纪解剖图外，还出版了一些制作粗糙的木版画，但是，严肃的解剖图示史则是从贝伦加里奥和查尔斯·埃蒂安纳（1520—1530年）时代开始的。虽然他们绘制的图像相当粗糙，但其中透露出一种向维萨里（1543年）富丽堂皇的木版画和欧斯塔基奥（1552年）那技术高超的铜版画迅速过渡的迹象。后两人的作品不断地被人复制。^[25]配有图解的解剖学书籍的制作更进一步促进了图解之用于解剖学，因为，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杰出，是否有用，乃是和操作员的技术和经验成正比的。此外，艺术家的见解也加快速了解剖学的学术探讨和科学研究。列奥纳多的解剖学素描闻名于世，是他那个时代或者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无与伦比的，并且，他在这方面的爱好也是独一无二的。图示的现实主义特征为解剖学的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维萨里的《人体结

构》的名气和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制图人，不管是谁制的图。

在第谷的天文学著作发表之前，维萨里的《人体结构》是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最高成就，其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达到了科学的精确。维萨里不是理论家，然而他揭示了实际上阻碍加伦对心脏活动作出解释的主要原因，但他并未努力去寻找替代的解释，并且更多地以事实和方法为理由（例如，他提到加伦讲的人体结构只能在动物中找到）而不是因为加伦的解释，对加伦的权威大加挞伐。尽管作了如此批评，维萨里在人体解剖的处理上还是尽量地模仿加伦；但对当时的人而言，经过解释、修改和图解的加伦比加伦本人的著作更有用，也更易懂。虽然没有经过全面而仔细的考察，但这条路是明摆着的，就是要使解剖学回到对人体的实际观察，维萨里在帕多瓦创立了一所学校，该学校在这方面的做法比维萨里本人还要走得远。在比较解剖学、特殊器官的解剖以及胚胎学的研究方面，等等，维萨里的意大利接班人为现代人建立了许多分支科学。实验室解剖被规定为动物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人成了主要的解剖对象，解剖学家的技术被用来为与当初的目的——证明——相去甚远的探究服务。

然而，16世纪在解剖学上获得的知识成果只是到了17世纪才为人们所理解。在人体生理学方面也是如此：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1628年）在这方面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这和帕多瓦解剖学家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和具体的解剖学上的发现相比，关于人体是怎样运转的观念的变化与世界观和医学经验的巨大转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法国医生让·费内尔在其思想的成熟期对人们之相信天体影响人体和魔法治疗同样持反对态度。他的怀疑主义出自他自己对这些迷信说法有害无益的经验，出自他对理性、对加伦的学说所抱有的信心，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新的科学事实或观念的基础上的。在费内尔看来，人体及折磨人体的疾病都属于理性的因果关系的范围，不受神秘力量的支配，但是他讲的因是加伦的因，他讲的生理学是加伦的生理学，是对加伦生理学逻辑地、连贯地表述。费内尔不知道，生理学能够通过实验来研究，他相信，生理学不能靠解剖尸体来获得启迪，因为主宰人体的灵魂和“功能”已经离开了尸体；人体的功能只有依靠对医生的经验“沉思冥想”才能理解。唯一对此正统理论发起挑战的是帕拉切尔苏斯及其追随者，他拒绝承认由热促成消化的理论。相反，他认为居

于胃中的“原尺度”或者说体内化学师把食物中有害的牙石从有益的成分分离出来，并将这些有益的成分转化为“汞”，然后被吸收。这种凭空幻想虽然在当时并未赢得多少支持，但在鼓励17世纪的“化学”理论朝着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上还是起到了一些间接的作用。

因此，医学实践方面的变化应该归功于较为显著的医学科学方面的进步者也甚微。维萨里参加了关于放血的争论，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解剖学经验对他的论辩产生了影响。塞尔维特是“小循环”理论，即血液从心脏流出，经过肺部再返回心脏的最早的倡导者，但他关于糖浆剂的演说就像老生常谈，非常沉闷。医疗实践对发病率的变异、对由于帕拉切尔苏斯对药典的影响而引起的变化、对允许生僻药的使用以及在最优秀的医生中对积累的观察材料不可避免地比在解剖桌旁的工作更为敏感。然而，外科医学的进步与令人满意的解剖教学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点在当时便得到普遍的承认，而且还有一种相应的倾向：外科医生只要刻苦努力，学识越多，技术越好，社会地位也就越高。看起来，医学在操作和实践方面确实比医学的理论本身取得了更切实的进步。

毫无疑问，科学的世界到17世纪开始的时候比早先哥白尼和列奥纳多·达·芬奇所处的那些年代要广阔得多了，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穿越也更加自由了。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唯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尽管到此时为止对古典著述家公认的权威提出的重大挑战还很少，尽管这些挑战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挑战毕竟开始了，而且后来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就是在古代资料的范围内，人们的认识也更加广泛和深入了；希腊科学的遗产不像中世纪时看起来那样，有那么多狭隘的限制，有那么多僵化的教条，有那么多严格的门户观念。

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种发展，都在强化而不是偏离中世纪科学的趋向。在16世纪科学史上所发生的几乎一切在中世纪就已经露出了端倪，虽然令人不悦，但却能够以一种牛顿时代的科学所办不到的方式

为早些时候的几代人所理解。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对科学的目的和方法（由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笛卡儿以及所有重要人物）重新进行陈述的尝试是在17世纪而非16世纪。在后来的一个时期，理性和逻辑在与它们对路的领域里受到了尊重；数学作为一种分析技术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尽管人们利用所有这些要素来建构自然界的图景，但是，决不会想到它们构成自然界的总体。那些在17世纪被当作宗教、形而上学和迷信的命题在16世纪的科学传播中则畅通无阻，没有受到怀疑。阻碍科学态度获得全面发展的痼疾像轻信权威、迷信、祈求上帝和神意、忽视观察和实证等还未克服，的确在某些方面，它们造成的麻烦较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能够以非常奇特的方式运作，并产生出奇怪的造物，然而没有人敢于对奇怪的自然设置界限。“自然律”的概念、机械论的科学的基础本身还没有得到系统地阐述。涂在武器上的药膏“或许”能治好一个伤员；“或许”有美人鱼、人头兽、鸡身蛇尾的妖物、火怪；金属“或许能”在它们被挖出来的矿脉里像苔藓一样生长。很难把未证实的东西和不可能东西区别开来，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缺乏充足的理由而怀疑某个设定的后果。正是古典学术影响力下降，才使人们对自然产生了如此不可思议和混乱的看法，直到一种新的、更富有活力的科学方法将古典学术取而代之后，这种局面才告终止。

16世纪经历了技术的进步，欧洲人获得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第一手知识。16世纪带给他们许多新的事实和新的传说。但是，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原理来帮助他们区别事实和虚构，便于他们对事实进行有组织的积累，除了对少许实例作系统观察之外，培根认为这种积累是科学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16世纪也没有提供新的理论，对人们所熟知的事实进行说明，并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重物的下落、磁石的引力、光和色的变化以及化学上的“嬗变”，等等，尽管从事所有这些科目研究的一些人确实意识到了自己所提供的理论的脆弱，他们还是无能为力。这是一个神秘主义与早期机械主义相对立、对古典学术的崇拜与批评相对立、沉闷的保守主义与大胆创新提出假设相对立的世纪。解决这些对立、建构新的自然哲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理论、铸造科学探索的新工具乃是17世纪的伟大成就，但16世纪为此在提出设想和进行探索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1] 公告及类似的印刷品除外。

[2] H. S. 贝内特：《英国图书和读者，1475—1557年》（剑桥，1952年），第188、242—276页。

[3] 维克托·斯科德勒：《15世纪意大利的出版商与读者》，《不列颠研究院公报》第35卷，1949年。

[4] 即“正体”和“斜体”。——译者

[5] A. W. 波拉德和G. R. 雷德格雷夫，伦敦，书目协会，1926年；1946年和1949年两次再版；目前正在修改之中。

[6] 《不列颠博物馆藏1470—1600年法国出版图书简要书名目录》（伦敦，1924年），第iii页。有类似的目录，涵盖西班牙（1921年）和葡萄牙（1940年）的图书。

[7] 正如保罗·冯·蒂格姆在他那篇重要的长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藏书》第四卷（1944年），第177—418页。本文是讨论这个题目的一般性论文中唯一有价值的。由于缺少一部详尽的著作，查阅哈勒姆的《15、16和17世纪欧洲著述介绍》仍将获益，1837—1839年版以及后来的再版。

[8] 见本书第3—9章。本章的第二部分和第13章讨论了其他拉丁文学学术著作。

[9] 按传统的说法，七星社的其他成员是：J. A. 德·巴伊夫、E. 若代勒、蓬蒂斯·德·蒂亚尔、R. 贝洛和J. 多拉。

[10] 这些术语是如像C. S. 刘易斯在《16世纪的英国文学》（牛津，1954年）中使用的。

[11] 见本书第一章，边码第190页。

[12] 见第1卷，边码第75页。

[13] 给维特鲁威的威望以及戏剧设计师的影响所带来的效果被认为是令人沮丧的。

[14] 见本书边码第369页。

[15] 现在普遍认为，第四部并不完全是拉伯莱独自完成的。

[16] 见本书边码第371页。

[17] 见本书边码第460页。

[18] 部分未经授权的版本，巴黎，1576年。

[19] 见本书边码第401页。

[20] 参见本书边码第361页以下。

[21] 阿基米德的一些著作已在13世纪下半叶由穆尔贝克的威廉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的译文于1543年印刷成书。希腊文本的新拉丁文译本于1558年出版。

[22] 这部书第一版已失传。

[23] 实质上，由于某种动原（比如，肌肉力量或重物自然下落的趋势）引起的运动使重物获得了某种“传送功能”或持续运动的“动量”。这种动量正是这种动原运动停止以后物体还在继续运动的原因，也是自由落体产生加速度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对这些运动的解释非常含混，难以让人满意。

[24] 药效形象说利用某种疾病的症状或人体的某一部分与某种物质或物种的相似性，多多少少带有随意性。于是壳内的核桃肉与头骨里的大脑相像，所以可以用来治疗头部的疾病。

[25] 维萨里的印版相当流行；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又重新流行（稍作改动）。欧斯塔基奥的铜印版被发现并首次印刷后，于18世纪也被大量使用。

第十三章 学校和大学

这个时期，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迅速发展非常值得注意。人们对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倾注的思考大量增加，并且建立起了一大批积极推行新原则的学校。然而，对这个问题考虑远不是简单的。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先给教育改革方案的本质下一个定义，以便对学校 and 大学采用新方法后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必须将教育改革运动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清理出来，因为后者在这个领域里的深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存在着公开的偏见，不仅混淆了当时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使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变得复杂化了。教育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宗教改革是损害和挫伤了文艺复兴呢，还是相反？就连不知不觉中已实施了3个多世纪，并被视为理想的教学方法以及此时还在坚决予以推行的古典教育，其价值在后来也受到了质疑。所幸的是，有一点是大家都没有疑义的。打入16世纪的新思想并没有立刻取得胜利。它们只是对现存的机制逐步地加以修改，因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时间里，16世纪中期的教学条件与几个世纪之前相比并无二致，所以，有必要先全面考察学校和大学的传统结构。

更为重要的是，有一点必须牢记，纯粹出于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的正规教育与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关系。构成欧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便是如此，这一点无须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季节、天空以及祖先传下来的农业智慧就是他们的老师。的确，担任神职是处在最底层的孩子改善自己及其家庭地位的可靠途径；托马斯·布拉特尔不辞辛劳寻找老师说明了，在一个没有文化的阿尔卑斯山谷教师所拥有的威望。但是有他那样的毅力的孩子寥寥无几，而且教会用来新招人员的职位总是有限。在城市，虽然找老师较容易，但是系统的拉丁语教学不如学徒的实际知识的学习来得重要，学徒，和大学里文科的学习时间一样长，一样要受到细心的管理。甚至对绅士和贵族，尤其在意大利以外，真正重要的科目都是按古老的方式传授的：骑术和武器运用、狩猎（练就一双好眼睛，能够分辨出富有的女继承人、丰厚的财产和强健的动物）。的确，中世纪后期的绅士不只

是讲究风度，他们也重视阅读和写作。为了了解复杂的财产账目，一个人不仅需要识字，而且有可能的话，需要涉猎法律知识，还要有数学头脑。但是，这些实际知识的获得，并不是由学校或学院的训练提供的。所以，各色各类的家庭教师就成了大户人家的重要成员，贵族子弟通常都有家庭神父或者本地神职人员教他们识字读书；核对账目的程序通过计算赢利和亏损的艰难途径获得，法律知识则依靠丰富的诉讼经验以及日益普遍的习惯：把家庭中至少一名成员培养成为律师。

现代教育对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划分并不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但实际上那时的教学类别和现在是一样的。教小孩读写的基础教育到处都可获得，因为资金经常不足，所以总是断断续续。就像其他所有的教师一样，从事基础教育的男女教师须得到主教的认可，尽管人们不禁会怀疑，这些纯粹只是临时性地靠教几个孩子读书、写字和计算来挣点外快的男女们是否真能获得主教的特许。然而，正规学校更多一些。由于唱诗班歌手缺乏，所以中世纪晚期的小教堂和教堂都设立了正式的歌咏学校，在这里，阅读和基础教育乃是音乐训练的主要内容。培养写作的学校属于另一种类型，所有西方国家都有，尽管这类学校以及它的下线学校即：识字学校或称阅读学校通常都是由一些资历浅的人来管理的：在朗斯顿，1540年的识字学校就是由“一位市长挑选的老年人”来掌管的，也是在康沃尔的格拉斯尼，识字学校则是由一位敲钟人在看管。最常见的情况是，本地神父出任本地学校的校长：莎士比亚把他们称为“掌管教会学校的书呆子”；1526年，在沙特尔的一次主教会议上规定，每个教区必须有一所学校，“可以由神父或执事来教识字和教义”；1529年的坎特伯雷会议要求“所有的学校由堂区神父……教男孩学识字和阅读”。这些基础学校课程的基本内容都是与主祷文、信经以及其他祷文和感恩祷文的拉丁文本和本国语译本有关联的基础知识。这些在英国发展成为“识字初级读本”的教程既介绍了宗教的基本信条，也介绍了阅读的基本技能，并与紧随基础教育之后的培养神职人员的进一步教育衔接在一起。但是，许多不想担任神职的孩子只读基础学校；重要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大一点的城镇的学校都开设有实用算术课程，因为商人或管家需要懂得“计算”。完全有理由设想，上述这类基础教育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日益普及：在英国，这场运动尤其是和小教堂的增多分不开的；在大陆上的莱茵兰地区仿佛有大量的学校，比如：在克桑顿，

我们发现在1491年有个小学校长抱怨他和他的助手工作量过重；几年之后就有5位教师被韦瑟尔学校录用；甚至在莱茵河流域一些很小的村庄里也发现有学校。此外，无论它们尽量想保证的入学条件，实际上，许多语法学校还是设有初级班，即“小班”，由年轻教师或大男孩来教。

中学或称语法学校和教堂的联系更为密切。通常和小学一样，其发展也是和小教堂和大学预科的增多分不开的。教区长对语法学校校长的管理（在一些大学城，由大学当局管理）比他的小学同行更为严格；因此，中学校长对授予自己并能够独立支配的特权更为珍视。他的职能是为男孩能够进入大学接受更高的神职教育打基础，尽管他的学校可能会承担年纪很小的学生的教育任务，但一般说来，孩子接受语法教育的年龄是7岁。语法学的是拉丁语法，虽然对低年级的学生用本国语教学，但基本课文选自拉丁文仪式书和部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同时采用像多纳图斯、亚历山大·维莱·迪约（多伦西斯）这些人所编写的教材。之后的教材是《格言集》和从西塞罗·奥维德及维吉尔的作品中选出来的文章。在大学集中的地区，语法学校名副其实；而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很少有学校开设的课程覆盖了大学文科的大部分课程。“说拉丁语，过虔敬生活”：假如没有宗教教育这门课，那么所有的科目教学都渗透了这方面的教育，其目的是为进教会的那种机构即大学，作准备，孩子们在青春期进大学。有证据说明，就像小学一样，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这个世纪，拉丁文学校或称语法学校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毫无疑问，许多不打算上大学的孩子也进了语法学校。在德国大一点的城市中，都有设备齐全的学校，它们附属于主要的教堂；在英国，即使是那些文化相对来说不甚发达的城镇虽然也办有这类学校，它们附属于教堂、小教堂和行会，也有一两所“私立”语法学校。私立学校中，温切斯特公学和伊顿公学是最有名的。另一方面，约翰·布茨巴赫和托马斯·普拉特尔的痛苦经历也警告我们，不要把16世纪早期教育普及的图画描绘得太美妙了。因为这个时期，学校的数量或许是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教学的质量通常很低。

然而，扩大教育最有影响的证据是由大学提供的。14世纪末，大学（studia generalia）的总数达45所，（人们可以设想）足以满足基督教世界的需要了。但在15世纪超过33所大学又建立起来了^[1]，到1550年又增加了一半。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创办大学最显著的特点就

在于，它们大部分都建立在13和14世纪没有大的学园（studia）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苏格兰，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1400年时才有5所大学，到了1520年就增至18所。从理论上说，在大学里，学生在接受法律、医学和神学这些更为高级的专业训练之前还得接受文科方面的训练，但16世纪早期乃至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这样，在所有的大学都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读文科，但他们并无意于成为文学士，只是想体验一两年称心如意的大学生活。对他们而言，听文法、修辞和逻辑等规定课程是无关紧要的。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起用严厉的体罚便可推断：大学里的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校长的荆条转到了学监的手中，因为学监逐步接管了本是属于校长的工作。

以上所概述的这种教育结构一直延续着，尽管变化缓慢。在中等教育领域里，像代芬特尔的那所伟大的学校一样的与共同生活兄弟会有联系的学校正在开辟新的事业：在这里，在八个大班级中，要把男孩逐步引向学习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课文，即大量维吉尔、西塞罗、贺拉斯及巴蒂斯塔·曼图安纳斯的作品，由黑吉乌斯（卒于1498年）这样既是学者又是语法学家的教师来讲授。兄弟会的许多学生在新的地区开始了类似的传统；德林根伯格在谢勒茨塔德推行这种教学体制，温普斐林就是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后来约翰·施图尔姆也成了这里的一名学生。1509年，科利特已经建立了圣·保罗学校，它在精神实质上或许与早期由城市商号掌管的学校并无区别，只是规模更大，接受的资助更多而已，它明确地提出要致力于“拉丁文和希腊文优秀的文学作品、拥有罗马人那充满智慧和雄辩的优秀作家，尤其是古典作家”的教学；规定不仅要教传统的、为大家熟悉的课文，而且要教伊拉斯谟的《基督徒的教育》和《德库比阿》。在巴黎和牛津，由大学负担的学院正在迅速增加；各地所接纳的自费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专业化使“硕士或博士变成了教授”。至于大学的教学，文科课程的性质、特许访问教师的传统为革新，比如大陆上几所大学诗歌教授职位和由像巴黎的阿莱安德这样一些访问专家开设的讲座，提供了可能性。中学和大学的教学都在逐渐受到印刷业的影响。课文的辩论和听写以及讲评乃是基本的教学方式，但是，书本的售价便宜了，这就使得讲评更为细致，听写的作用也就慢慢地降低了。比如到1520年，维莱一迪约的亚历山大的《教义》出版了250多版。

无论如何，这些变革都不能与15世纪意大利迅速发展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相提并论，这些理论和实践是欧洲其他地方在16世纪推行

的大量教育法的基础。意大利有数不清的城镇，有繁荣兴旺的大学，有富足和闲适的资产阶级，这些条件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的原因。这反过来又成了一项最主要的教育方案。“优秀”的人文主义者都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家。当然，如果说满足欧洲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教育需要的专业学校在那里不存在或者说根本不同，那就错了，博洛尼亚大学或多或少对所有北方的大学施加了深刻的影响，巴黎大学作为典范同样影响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学园”。但是，当致力于拉丁古代遗产和古代道德观念的兴趣开始被培育起来的时候，真正独立于教会控制但缺乏主要的神学系科的意大利大学便积极地起来响应。古老一点的大学像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图瓦大学对新学术绝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而是给予极大的鼓励，尽管是断断续续的；佛罗伦萨大学（之后是比萨大学）、帕维亚大学和费拉拉大学则更是讲授人文主义的基地。同样意义重大的是意大利人思考教育原理的方式和他们得出的结论。这一点从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给安布罗焦·特拉弗沙里的信中强调西塞罗的格言“美德贵在行动”便可看出。与其说这是15世纪最知名的一位校长在袒露他的感伤，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向那位虔诚的修士和未来的圣徒诉说他自己的观察，因为在早些时候，虔诚和圣洁与积极行动的生命是矛盾的，就像中世纪的神职教育忽视了市民和平信徒一样。在维多里诺以及此时其他的意大利教育家们看来，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学术，不只是为了技术，也不只是对教条的反复灌输。现实的“学校”，不管是得到官方鼓励的修道院和大学的专业教育，还是由城镇商人的儿子或由贵族的孩子接受的系统性略有欠缺的专业教育，实用性都不足。在这一领域的意大利的理论家们最终与人文主义的普遍精神走到了一处，他们坚信，古代的道德说教即“诚实感恩的道德”是对基督教价值观的补充，文科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获得只能建立在对古典文化进行研习的基础之上。所以，学术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为社会生活作准备：它们反复灌输伦理的原则，修饰行为的方式，深化人的理解。当一个人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具备了应付公共事务所必要的各项素质时，这便极有可能使人们在闲暇中的社会交往变得高洁文雅和丰富多彩。

韦尔杰里奥、布鲁尼、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以及其他人所详述的教育方案之间惊人的一致。孩子的早期教育由母亲照管，之后由家庭教师或教师接管对孩子进行较为正规的教育，而后当学童，到10岁时，就应该去上大一点的学校，是他们著述中的老生常谈。叙述学习

的科目时也是如此。当获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还只是一种理想时，强调拉丁语的掌握，首先是对最优秀的文章进行理解，其次是语法的学习，这是一个较为有限的目标，并且是一个为自豪而光荣的爱国主义情操所强化并激发了许许多多人文主义行动的目标。在课程中，特伦斯因其在说明拉丁语会话方面的价值而受到称许，西塞罗作为无拘无束、善于论辩的散文大师，奥维德和维吉尔作为诗人而得到肯定。史学家的地位几乎被看得与这些作家一般高，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道德范例，并且，这些被选中的作者的文章的伦理内涵与他们在文学上的价值同样重要。在尽可能当作活的语言来教的拉丁语之外，又增加了希腊语，不过一般而论学习希腊语的时间短一些，而且甚至教希腊语的老师当中，几乎也没有人把用希腊语进行会话当作目标。教希腊语的主要理由在于，只有它才能对拉丁语进行全面的阐释，同样也只有它，才能对古代的地理学和自然史研究进行全面的阐释。当对物理学或数学尤其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显然必定会通过希腊和拉丁作者的适当学习来加深他对这些科目的知识的时候，这并未构成理想的课程的一部分；几何学作为学校的一个科目有其特定的价值，但算术与店主的计算太相似了，所以没有多大帮助。

这些原则能在16世纪如此有条不紊地传播到欧洲北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主要是在各国诸侯的宫廷氛围中而不是在意大利共和国的氛围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的。虽然新派的或者说人文主义的学校是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创办的，但是，新教育理念的两位伟大的拥护者则是曼图亚贡扎加宫廷的维多里诺和费拉拉东宫的瓜里诺·韦罗内。即使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在贵族家里养着一位有声望的学者作为家教的习惯在意大利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后，这成了一种固定的时尚，并且成了教育家们总体的构想中的一个部分，即：教师乃是推进学习方案的基本手段。大人物的随员中包括一群孩子，其中有他自己的子女，也有他的仆从、受庇护人和朋友的孩子，这在欧洲是一种颇具中世纪色彩的、司空见惯的时尚；意大利诸国的宫廷也流行这种做法，供养着一位训练有素的男教师，由于他们的宫廷位于城市，这位男教师就可能像费拉拉的瓜里诺所做的那样，形成一个该社团的文化贵族的中心。在北方，当诸侯和贵族们对某个家庭教师或神父的思想观念习惯了之后，他们就可能以学术水平为标准，考虑重新换人。当然，作这样的调整肯定是有困难的。总的来说，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学校规模较大；而北方在有闲阶级中流行的是，一个家庭教师带几个孩子。

意大利的维多里诺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教育不应该放弃体育和军事训练活动，意大利在这方面的经验明显和传统的贵族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为北方一些教育学家所接受；但是，伊拉斯谟和比维斯对此并不完全赞同，他们把体能训练仅仅看成是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把它看成渴望实现的目的本身。但是，出现这点分歧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北欧人从来都是把早期意大利人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的观点当作法宝来进行宣传和实践的。

在北方的理论家当中，伊拉斯谟^[2]和路易斯·比维斯不论是在影响力还是在独创性方面都是卓越的。伊拉斯谟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但是他从事过大量的教育实践，其中一些后面还要提到。他提出的教育学原理主要包含在1529年出版的《论孩童教育》中；其他与此直接有关的著作是《论学》（1511年）和《论孩童举止》（1530年）；但他还有其他许多文章都谈到过教育问题。^[3]在伊拉斯谟看来，人文主义所规划的教育本身就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为它提供了直接研究圣典和活生生的基督教的根源的方法，因为它具有教化的力量，因为它使健全的古典学术能为人们所用。它和传统教学只提供技艺性和专业性的知识不一样，它将宗教信念的培养、文科各学科、社会职责和纯洁的行为方式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反复灌输，因为这些是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孩子从母亲那儿学习虔诚，学习书写，有可能的话，还要学习拉丁语的入门知识，到了7岁，就应该交给他的父亲、某位学校教师或家庭教师去管理：很少有父亲能够担当此任，也很少有学校的教师是信得过的。所以，由家庭教师来教一小群男孩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家庭教师的任务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运用交谈、对话、简易课文加上大量的口头和作文练习来教孩子们学习拉丁语，旨在使他们从中吸取道德的教训，并获得流利的自我表达能力。修辞技巧，按昆体良的教导，应从西塞罗的文章中学习。希腊语的教学在精神实质上略有不同，得采用另外一种教学方式：不必要求掌握口语，学习希腊语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对《圣经》的理解，有助于对罗马文学的阐释以及希腊语本身在各门科学的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1492—1540年）和伊拉斯谟一样，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他生于西班牙，早年生活却是在法国、英国和低地国家度过的。和伊拉斯谟一样，他也是教科书的作者，也写过

关于教育的论文。他的这些论文中，最重要的是1531年发表的《论传道》。比维斯比伊拉斯谟更加重视家庭和母亲的作用，然而他也承认，尽管学校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寻一个好的家庭教师比找一所好的学校更容易。就像15世纪末意大利的教育学家们所推崇的那样，比维斯认为，熟练地掌握一门本国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值得向往的；他还准备把本国语历史学家作为道德范例的源头纳入古典历史学家的行列。但讲到语言学习，他指的是拉丁语言的学习，文法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辩证中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看到，比维斯同样看重直接教学法的运用，同样最终还是把西塞罗作为其阅读方案的内容，把学习希腊语看成是学习拉丁语的补充。因为对逻辑和旧式的辩证法表示反感，所以他愿意采纳数学和物理学，尽管好的教材很缺乏。比维斯和伊拉斯谟一样认为，深层的宗教驱动力对所有的教育产生影响。学术本身虽然值得尊重，但必须从属于基督教生活的实践。于是，教师尽管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学生面前也要保持谦虚，要设法向学生逐渐灌输与“虔诚”相协调的“博学”。

第三位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说进行阐述的人是伟大的红衣主教贾科莫·萨多莱托（1477—1547年），从他的《儿童正确教育法》（1533年）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对缺乏好学校的哀叹及求助于家庭教师的劝导。但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他更注重希腊语的学习，因为当时意大利人所倾心的柏拉图理论和所爱好的“哲学”都出自同一个源头。此外，萨多莱托还设想过一种教育，旨在用普遍的方式获取所有方面的知识，尽管他争辩说，每个学生也应该培养某种特殊的兴趣和能力。

伊拉斯谟、比维斯和萨多莱托提出的教育方案基本上都是学术性质的；虽然他们赞美文学的教化作用，但还是把它放到了从属的地位。然而，如果把那些写作的宗旨并不完全是为了教育以及那些把主要兴趣用于描写社会风尚的作家都排斥在外，那就错了。因为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1528年）和乔凡尼·德拉卡萨的《礼范》（1558年）都曾对欧洲北部关于绅士素质的一般看法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这两部书都曾被大量翻译，并且自然而然地便引起了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注意。在他们看来，贵族绅士构成了最有影响的一个社会组成部分，这种关于举止、谈话和道德行为的新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与古老的骑士理论嫁接在一起：“风俗时尚造就人”，这是中世纪的看法，然而不断变化着的是时尚，而不是对时尚的尊重。伊

拉斯谟和比维斯主张的文学教化论以及卡斯蒂利奥内提倡的礼貌行为在托马斯·埃利奥特（卒于1546年）的《治人者》（1531年）里都有明晰的表述。伊拉斯谟和比维斯都是这个他们所批评并试图纠正的教育体制的产物，埃利奥特并不是大学毕业生，然而他的长篇故事著作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活跃和聪明的青年在伦敦和不在大学所能够获得的知识成就。他未受过专门教育，所以比大多数北方人更符合意大利教育学家的所谓显示天才的目的。他的《治人者》一书旨在要求放宽对世俗社会中的中心人物的限制；所谓“治人者”指的是所有担负行政职责的人，从国王的近臣到像治安官那样恪守尽职的谦恭的绅士。为教育这些人的孩子，他吩咐要像伊拉斯谟的方案那样，把拉丁语作为一门活的语言来学习，并承认家庭教师的必要性。但是，他同意（伊拉斯谟却不是这样）不只是一要学习语言这门艰难的课程，还要学习音乐、绘画和体能训练。总的目的在于通过古代典籍的教学使孩子获得一种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功利的发展的智慧。

理论家的这些思考对实际的教育产生了什么效果呢？毫无疑问，它们传播了15世纪的意大利理论家们的基本学说；也给那些大人物树立了新的理论权威，使他们养成送孩子上学或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的习惯，不过，此时被规定的或者说通常更多被指定作家教的是语法学家，而不像过去那样是神职人员。结果，连地主最终也接受了正规教育的必要性。它们到底对学校教育方面的影响有多大，较难估计，因为理论家们首先是从家庭的角度来思考的。学校和大学好歹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随时都有可能产生新的方法，所以不必依赖他们。在教科书方面，正如后面要指出的那样，人文主义者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意大利之外，有3个在中等教育方面有名的类型可以作为人文主义的原则实际运作的典例：波尔多的吉耶纳学院、斯特拉斯堡的施图尔姆学校和第一耶稣会神学院的课程。很明显，这些学校虽然各不相同，第一所是法国学校，深受改革的影响；第二所是德国学校，公开主张新教；第三所是有名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工具”，但它们的办学方式则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它们采用的方法也不全都是新的。吉耶纳学院有一批“著名的讲师”，他们是安德烈·古维亚1534年接受波尔多行政长官的邀请离开巴黎后带来的。这所学校在古维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并且它所开设的课程在中世纪是很有名气的。十年级，即最低的一个年级，课程包括字母或拼写，通过本国语以礼拜仪式材料和包含曲折变化的《拉丁语法小手册》学习拉丁语基础。能够

掌握这些材料、能够指出拉丁语的动词变位以及名词变格并且能够字迹清晰地进行书写的男孩将升入这所学校中最大的一个年级九年级。本年级的目标是流利地运用法语，尤其是要流利地运用拉丁语；要一方面阅读更高级的语法，一方面阅读加图的道德《格言》。到了八年级，要学习西塞罗书信选和特伦斯剧作选，以此作为掌握“措词”的途径，并且每周学习一篇散文以补充每天逐字逐句地解释。能力强的男孩在11或12岁时进入七年级，开始对同样的课文进行更为详细的学习。六年级和五年级学习的课文篇幅更长一些，包括特伦斯戏剧全集中的某一个剧本，并开始学习诗体学。四年级的课程变动更大：要学习西塞罗的演说辞和一本修辞手册，写作的篇幅更长了，包括诗歌的写作，并且开始了希腊语的学习。以后三个年级的课程全是这个模式，尽管三年级要教一点数学，往下的年级所学的主要课文有：西塞罗的散文；维吉尔、奥维德和卢堪的诗歌；昆体良的著作；历史学家的作品，此时的作文包括演讲稿的准备。辩论是高年级教师常用的教学方式，虽然在翻译和评论作者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运用法语，但是，学习的目的还是要达到用流利的拉丁语进行演讲和写作。1538年，约翰·施图尔姆（卒于1589年）被指定为在斯特拉斯堡的文科中学（Gymnasium）的校长，尽管他安排希腊语的学习要早一些，使用的《圣经》选文要多一些，但是他开设的课程实际上与波尔多的古维亚和维勒所开的课程并没有什么两样。耶稣会的学校从1546年起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大致也差不多；最后的课程安排直到16世纪后期才草拟出来，但耶稣会方案的概要在1551年的章程中就已经明确了。七年级开设语法课（先拉丁语法后希腊语法），方法与新教学校一样，只是体罚要少得多，大力坚持奖励制度，用竞争来刺激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毫不留情地从选自古典作品的课文中删掉那些被认为是对年轻人具有煽动作用的内容。耶稣会士注重教学心理学，他们在这方面比耶稣会以外的大多数从事实际教学的老师要技高一筹；但他们的宗旨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是一样的：通过修辞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训练来规范人的道德和行为举止。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在宣扬文法的优点时，古典课程对中学的主宰如此全面和长久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类古典学校的推广并没有那么惊人，假如人们记得它的编制本身实际上谈不上新颖。中世纪文法学校的课程安排不太清楚，但在大一点的学校，其编制一般都在6个年级以上。代芬特尔的黑吉乌斯学校有8个年级；16世纪早期的布雷斯劳学校有9个年级。沃尔西计划在伊

普斯威奇创办但中途夭折了的学校准备设8个年级；伊顿公学在1528年有7个年级，但在16世纪中期降为6个，这在后来成了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因为可以按季度或按半个学年从一个年级升入另一个年级，所以在年级的数量上，学校之间的差别并不大。那些规模大的学校即使已经定型，但用新文法取代旧文法的速度却快得惊人。让我们来追踪一下马蒂兰·科尔迪耶这个人的工作足迹，他先后在内韦尔、波尔多、日内瓦和洛桑任过教，每到一处，他都有新的教学方法留下来；还有谢勒斯塔德那所名校的学生约翰·施图尔姆，他母校的荣誉因为他在斯特拉斯堡中学的杰出领导而显得暗淡无光。施图尔姆学校的崇高声誉使它成了其他许多教师模仿的对象；加尔文在考虑日内瓦的学校发展计划时曾经访问过它；托马斯·普拉特尔1541年被派往巴塞尔市立学校时也曾征求过施图尔姆的意见。在新教德国，梅兰希顿在关键时刻给予新课程的支持使得当局只好对教育进行改革：他在教育事务方面的倡议得到了56个城市的响应；在艾斯莱本的拉丁语学校（1525年）和纽伦堡的中学（1526年），他的影响显得更为直接；并且，他自己在维滕贝格管理一所私立学校长达10年之久。从约翰·布根哈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梅兰希顿的影响，而布根哈根为不伦瑞克学校（1528年）颁布的条例也成了其他7个德国北方城镇制定规章的基础。这位“德国教师”使他的对手耶稣会士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有意识地制定制度是卓有成效地办学之本。有强大的修会作为后盾，有优秀的、训练有素的教师为之服务，耶稣会的学校数量增多乃是理所当然的：1556年当耶稣会的创始人去世的时候，耶稣会除了为本修会的见习修士办学校外，还为其他人办有三十余所学校，并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天主教控制的那部分德国所取得的成功是非常了不起的。

新课程的标志和象征更多的是它的教科书，而不是教材中的课文。多纳图斯的语法、维莱·迪约的亚历山大的《学理》、贝蒂纳的埃伯哈德的《语法》以及其他中世纪的语法著作仍为人文主义的语法学校大量采用：梅兰希顿和耶稣会士都规定使用多纳图斯的语法；让·德斯波特勒（范·波特朗，卒于1520年）的语法著作只是对《学理》作了一点改进，同样也获得了资助。但是它们都只提供给低年级学生使用，它们被当作纯粹的语法来对待，所以不能作为逻辑论证的题目，并且逐渐地让位于新潮的语法手册。许多老师编写新教科书，使那些惯用旧教科书的教师感到不满。在这种压力之下，所有大城市

都在不断地发行由当地语法学家和教学法家撰写的著作。英国远未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列，然而我们发现，马格达伦高级中学校长约翰·安威凯尔在1483年发表了他的《文法纲要》。他的接班人约翰·斯坦布里奇1501年迁居班伯里；1505年到1550年，他的*Accidentia*印刷了17次；1508年到1529年，除了别的为人所知的版本之外，他的英语拉丁语词典*Vulgaria*印刷了7次。到1533年，罗伯特·惠廷顿的《名词变格》已经印刷了16次，并且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其他语法著作发行了128版。科利特和他创建的圣·保罗的学校的校长威廉·利利在这方面的努力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著作质量更好，并且由于伊拉斯谟的认可而增色不少。利利的《文法11讲》和利利与科利特合著的《文法短论》是由亨利八世在1540年正式钦定的语法基础教程。大陆上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梅兰希顿的《拉丁语法》在新教学校的教师中享有同样的声誉，后来葡萄牙人耶稣会士伊曼纽尔·阿尔瓦雷斯的《文法教程》在天主教徒中的地位也是如此。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些著作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本地区的范围，如迈森的里维乌斯的著作以及到大学教书之前曾是纽伦堡学校教师的卡梅拉里乌斯的著作。

人文主义教师为他们的学生编写的拉丁语会话书籍使新教学法更具特色。就像人文主义的技术从中世纪那里受益匪浅一样，这种对话形式也是从中世纪承袭下来的，它和主要与宗教教育有关的教义问答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旧形式具有新含义，里面装的全是流行的会话内容。在这方面，伊拉斯谟或许不是第一位但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对话体作家，他的《对话录》长盛不衰，也许由于该书前几章部分内容源于伊拉斯谟亲自作出的不多的有关实践的教诲。本书于1497年抄写完毕，1518年，贝亚图斯·雷纳努斯在伊拉斯谟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其出版。伊拉斯谟本人首次出版该书是在1522年；此后，本书的修订、扩充和重印一直没有中断，到1536年伊拉斯谟去世时，这部著作已发行了100版。最初的《对话录》只是在列举问候用的词组或短语。然后是两位初次见面者的会话方式，再后是家庭会话。然而，紧接在这些会话后面的是伊拉斯谟斥责当时人们的愚蠢行为的著名谈话，它们不仅属于教育史的范围，而且也属宗教史和文学史的范围。尽管《会话》遭到索邦神学院的猛烈攻击，并因为里面有些轻薄语和不好的内容而受到路德和罗耀拉的谴责，但却为全欧洲的国家所采用，不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概莫能外。然而，在这

个领域内，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类型的书籍还有很多，只是缺少伊拉斯谟的讽刺精神而已。P. 莫塞拉努斯的《幼儿学》、C. 黑根多夫的《儿童会话》以及巴兰德的《会话》都是伊拉斯谟同时代人的作品。类似的许多著作中，有两本获得了超常的成功，那就是比维斯的《拉丁语言练习》（1538年）和科尔迪耶的《学生会话四讲》（1564年）。这些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地提醒人们新语法学校开设课程的宗旨，即：使学生迅速掌握拉丁口语，并且做到流利、典雅和正确。这个宗旨，也导致了对特伦斯的剧作和卢奇安的会话的拉丁文译本的重视（前面已提及），这些作品是许多学校规定的教材。同样，通过对拉丁剧本的实际演出反过来刺激了尤其是在德国和耶稣会中的新拉丁语剧本的创作，这是斯特拉斯堡的斯图尔姆方法的首要特色，使用这个方法也是为了实现上述宗旨。[\[4\]](#)

如上所述，对人文学科的重新关注深刻地影响了中等学校的教学。对大学的冲击则不是那么显著。16世纪的教育学家更多关心的是中学的教学，不太重视高级课程的质量。16世纪的大学基本上还是培养专业人员的机构，文科各系自然要受到来自文学和语法的新观念的影响，而医学、法学和神学这些专业所受的影响要少一些。总之，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老牌大学对新式教育并不总是敌视的，尽管索邦神学院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牛津的“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一度就接受新的学习方法问题挑起争论。欧洲的大学里出现了许多新派学者；这场中学改革运动对缩小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的距离产生了作用；出版古典作者的作品时，同时兼顾中学高年级同学和大学生的需求。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博大精深的学问所带来的伟大而不朽的成就往往与学术的摇篮是分离的。伊拉斯谟决不是大学里的人。罗伯特·埃蒂安娜的《拉丁语词典》（全版，1543年）不是在大学里产生的作品；他的儿子亨利（1572年）的《希腊语词典》也不是。值得注意的是，威尼斯和里昂出版了那么多文献和著作，却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人会把巴塞尔的学术出版社与它那规模又小又没有什么名气的大学联系在一起。公平地说，为了文学而牺牲逻辑这种新风尚出在德国的大学。不管是何处，学习加伦和希波克拉底总是要用更好的版本，总是对正文而不是注释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然而，巴塞尔大学医学系一开始就怀着像对待维萨里那样的崇敬心情对帕拉切尔苏斯表示欢迎，可以说，大学里那种主要是通过书本来学习医学的方法对医学的长足进步不可能有什么帮助：那种为大家公认了的教科书，即使作过

很多改动，^[5]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民法教学使用的教材也更好，但是，教会法的教学减少了，在新教的大学里尤其是在德国自然而然地就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神学系和巴黎索邦神学院一样，显得很重要，尽管在维滕贝格以及其他地方，神学教学的内容已经相当狭窄，仅限对《圣经》的阐释和教义学。

如果把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好坏作为衡量新学问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当时的人经常臆断应该如此），那么必须指出：相对而言，大学未能给予普通学科充分的地位。16世纪中期，许多大学都有希腊语教授，其中很多人学识极为渊博，著作也非常丰厚。但是，他们的活动领域仅限于教材编辑，尤其是翻译。希腊语的资料少得可怜，那些资深的教育学家甚至认为，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中学就应该具备的，对于大学里面的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来说，用这点资料是不能为严肃的学习打下足够坚实的基础的。甚至在中学，直到16世纪末，也并不是全都开设有希腊语课程的。1561年，麦钱特·泰勒学校（伦敦）的章程重复了16世纪以前圣·保罗学校的科利特章程使用过的言词：校长应该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如果可能的话”。虽然在大学里面希腊语成为文科课程，但不是必修课，只有少数升到高等专业的学生才把希腊语作为必修课。理所当然，希伯来语的处境就更不利了，完全局限于神学教学，有如在维滕贝格，按照1546年的条例，希伯来语教授的教学内容实际上只是对《旧约》进行解释。

人们深信语言，即：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非常重要，但却没有引起大学的足够重视，这才有了三语学院的发展。在16世纪20年代以前，在大学设置古代语言学的教授职位，几乎不是先例。利奥十世在罗马和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在阿尔卡拉推行的教育革新更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没有人对在卢万创办三语学院的独创性表示异议。它的创办人哲罗姆·布斯列登于1517年去世，他死后留下一笔钱，用来在卢万大学创办一个学院，这笔钱除了用作学生的奖学金外，还要提供三位教师的薪水，由他们提供免费教学，他们“将用三种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向所有来者公开阅读和阐释基督教的、其他道德学说的以及备受人们称颂的作者的作品”。尽管有来自那些谨小慎微的神学家方面的阻力，因为这三位教师的做法有异端之嫌；尽管有来自其他教师方面的阻力，因为他们自己的听众在减少；新学院还是办得欣欣向荣。三语学院体现了伊拉斯谟的理想，所以直接得到了伊拉斯谟的庇护和劝告。自从它与正规大学的课

程脱钩后，不仅吸引了卢万大学的学生，而且还迷住了许多绅士和访问学者，使他们能够从学习语言和文学的现代方法中大受裨益，无须为了一个学位而伤心劳神，拼命苦读了。卢万的三语学院反映了社会在这方面的广泛需求，这一点从别的地方也在追求同样的发展便可推断出来。理查德·福克斯在牛津（1517年）创办的基督圣体学院和沃尔西的学院（1525年）都是这同一种思潮的反映，尽管它们办得没有卢万那么成功。在法国，类似的发展在1530年任命王家教授时达到了顶点。1531年有5位：两位教希腊语，两位教希伯来语，一位教数学；1534年增加了一位钦任拉丁语教授；就这样，一个新的三语学院成立了，没有多久就演变成了法兰西学院。与此有关的方案比纯粹是文学改革的方案要多；在卢万和那个尚处在萌芽阶段的法兰西学院出现了一种针对高级学习的新观念。拉姆斯（皮埃尔·德·拉·拉梅，卒于1572年）——一位大学人，如果有过大学人的话——一生的事业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他使传统的教学恢复青春的徒劳尝试在巴黎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对他来说，他从1551年至1562年一直在此任教的这座新近成立的皇家学院并没有提供实行根本变革的机会，倒是提供了一个自由讲学的场所，这种自由精神在大学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以上提到的所有教育方面的变革都是在教义纷争日趋严酷的时期进行的。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一种改革过的教会和另一种改革过的教会之间的宗教分歧在几个主要的方面影响了中学和大学。因为老学校基本上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新学校的目标则是要把学术和虔敬在一种*pietas litterata*中结合起来，所以，关于宗教本质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育特点本身的争论。此外，改革派重视对圣经的直接研习，这也有教学法上的含义。旧的教育捐赠制度的毁灭导致新的教育捐赠方式的建立，伴随改革而来的混乱从物质层面上捣毁了一些中学和大学，并遗传下来毒害教学氛围和教室的神学家之间的反感的传统。最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展开进一步强化了市镇官员对教育的控制：王侯们成了决定中学和大学命运的主宰。

如何排除人们投身于教会工作的刺激乃是摆在新教国家面前的一道特殊的难题。如上所述，宗教改革之前，提升晋级的希望对各个阶级的人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这条生路断绝之后，（似乎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个严肃学者的愿望也就随之消失了。贵族绅士的子弟仍然上中学，上大学，但是，即使是像接受捐资相对充裕的英国教会里的那几个可以得到的职位，他们也无心去争取了，更何况到大陆改革

过的教会中去做传道人。拉蒂默在一次布道时曾抱怨说：“学院里只剩下大人物的孩子们在念书，而且他们的父亲不希望他们成为神职人员。”类似的报道在德国也可以听到。路德本人就曾在1524年和1530年先后两次把古老的神职出现空缺与少有人愿意求学联系在一起，他甚至主张由国家颁布法令，推行义务教育。除了生计不多外，改革者对劳动价值的争论以及对神职人员的劣迹所进行的抨击，也起到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效果。安斯巴赫侯爵曾在1531年将这种现状归咎于“那些如此强烈地抨击读书，并且还扬言要培养孩子们长大后去做体力劳动的传道人”。然而，如果本国语《圣经》是通向拯救的唯一可靠的途径，孩子们干吗还要费心去和拉丁语和希腊语打交道呢？

只是在教育资金的供应问题上，改革的发展起到了干扰作用。当然，那些没收教会土地的人是打算把所收土地的一部分用作教育目的的。例如，1543年，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在和议会达成的一个协议中把普福尔塔、迈森和格里马3个修道院的捐款分给了3所学校，每个地区一所；然而，财产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问题，事实上对财产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由市镇议会创办的学校其情形大体如此，比如1531年，在奥格斯堡用加尔默多会的财产创办的那所中学，市镇当局不得不追加捐款。宗教改革之前，大量教师职位要靠教会的收入来维持：现在教会财产没有了，教师的生计总的说来，一是靠赏金；二是靠时有时无的赈济以及从王侯或市镇当局发放的不定期的薪水。其结果，大多数前景不错的学校发现，很难保证优秀教师的正常教学，教师本来应该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却耗费在替当局撰写编年史上，或者耗费在小本生意或四处奔波另谋职业上。让学生沿街乞讨乃是德国教师惯用的招数。在明斯特从1537年到1541年之间，这种老师就出现过6位。此外，给教育提供资助或便利这种刺激主要是用来鼓励人们创办拉丁语学校。老式的“写作”或“德语”学校则留给那些失去了任何赚钱方式的人去管理。1531年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就有一位鞋匠请求议会批准他兴办一所德语学校，理由是他的处境不妙；1551年在奥格斯堡，也有一位装订工提出过类似的要求。看起来，总的来说，宗教改革在英国严重地干扰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严重的程度则过于夸大了，特别是1547年成立附属小教堂捐赠委员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6]总之，英国的发展和大陆上的情况一样，并没有长时期地阻碍教育经费的增加，而是还进一步助长和鼓励上述那种由世俗来管理学校的趋势。

虽然牛津和剑桥的那些焦虑不安和奉承讨好的教师们害怕亨利和他的儿子采取措施，实行更大规模的裁员，但是，只有修道院在牛津和剑桥兴办的学院由于宗教改革而不复存在，学院大部分教师的收入并未受到影响。在德国，宗教改革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收入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更严重。捐赠给学院和教职的款项被王侯或市镇当局所没收，教会学院里附属于教职的俸禄也被取消了。特别是3所新成立的大学，马堡大学（1527年）、哥尼斯堡大学（1544年）和耶拿大学（1558年），和其王室创办人的其他所有政治机构争夺资金。依靠地方上私人的慷慨赞助是不稳定的，大学的报酬低，而且不定时。至于中学，和大学的情况差不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反复不断地因贫困而抗议，无休无止地发出要求救助的呼声：海德堡大学杰出的希腊语教授米西鲁斯（马尔什姆）1537年向校方请愿，理由是每年60个弗罗林的收入连单身汉的生计都维持不了，况且他还要养家糊口；校方的反应是给他的薪水多加20弗罗林；那位享有王权选侯此时正好来到大学，他建议米西鲁斯应当被开除。就在中学教师靠乞讨和叫卖来维持生计时，大学的教授们也被迫在教学之外通过其他途径来增加收入，海德堡大学1558年的条例规定，允许教授们每年零售一定数量的酒。在天主教德国，雇人的报酬和条件还不是那么混乱，王侯和市镇当局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经常采取措施来恢复由于管理不当和通货膨胀造成的破坏。

宗教的变革所造成的是因神学论战而出现的分裂以及不时发生的政权的转手和交替，这对于财政和行政方面产生的混乱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在这方面，英国的经历与德国相比，也要温和一些。亨利八世的政策变动对大学的影响是轻微的：教义之争也是如此，暂时还构不成一个问题，剑桥与牛津铲除异端的行动也没有给大家造成什么影响。但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统治期间（正如他们的统治所反映的那样，他们代表当代宗教对立的两极），大学的情况与大陆上动荡不定的学校现状也有几分相像。比如在牛津，在爱德华当政的时候，新教神学被一个名叫彼得·马尔蒂尔的人塞了进来，大学被关于圣礼本质的论战搞得四分五裂；大批老师离开了学校，直到玛丽掌权、他们的敌人逃走后，由两位西班牙修道士入主牛津，对新教徒的破坏进行清算时才回来。在德国，神学的瓦解力更强，诸侯的行动也更为严厉。比如1535年在蒂宾根大学，坚持旧信仰的教师被强行驱逐；1539年在莱比锡大学，根据维滕贝格神学家的建议，所有不接受路德主义的教

授都被萨克森公爵剥夺了教职。神学家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以及所有学科的教学明白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同样令人泄气。新教徒和新教徒辩论：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剧烈的学术争论；特别是路德死后，路德阵营一分为二，分别为梅兰希顿的门徒和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的门徒。^[7]维滕贝格坚守梅兰希顿的观点，耶拿则成了弗拉希乌斯派的大本营，每一个新教的大学都为这些争论所滋扰。之后，加尔文主义火上加油，加入了新教的纷争。在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地方，这类麻烦自然要少得多，尽管耶稣会的到来不断挑起愤懑和仇恨，有时在古老的大学中导致公开的敌视，就像1556年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1559年在维也纳大学所发生的那样。在法国，直到强硬的保守派逼迫大学圈子里温和的改革派人士必须在敌对的两派中进行选择时，才出现了怀疑和分裂。索邦神学院是保守路线的顽强斗士，它对待耶稣会士就和从前对待“皇家讲师”一样凶狠好斗。只有在大学教学这一时期普遍低落的意大利以及多数大学仍然维持中世纪一成不变的课程的西班牙，才很少发生教义争端：在这两个国家，宗教法庭对大学的异端实施了有效的监督；同样在这两个国家，教育阵地后来都被耶稣会牢牢地控制着。

上述这些因素的后果是，大学的入学率普遍下降，此时的德国可能比别的地方更严重（表见下页）。以下列举的大学入学人数在16世纪初期一直在上升，这个趋势在16世纪一直在延续，几乎没有中断。只是在16世纪20年代一度停止过：为了进行数字比较，有必要再回到16世纪早期去看看：1515年前5年创下的最高点直到1556—1560年才又重新达到。其结论必然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是暂时地，但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的入学人数。据说，牛津大学入学人数的下滑虽然没有如此严重，但也好不了多少。实际数字已无法作精确计算，因为这个时期的入学注册记录已经不能用了。然而，确有材料显示，回落现象是存在的。那份学位授予花名册^[8]显然残缺不全，但它首次记录了1505年至1509年间，每年授予的学位平均超过150人；之后每5年的平均数似乎在下降：1520—1524年是116人；1540—1544年是70人；1555—1559年是67人。然而在1552年，牛津大学的在册人数大约是1000人，就是和现在一所完全由学院组成的大学相比，这个数目似乎也是可观的了。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入学人数又开始上升，16世纪中期宗教和政治上的干扰似乎使这里的入学人数也受到了影响，然而明显的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

总的说来，教育在这个时期意义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教育逐渐陷入受世俗权力、市镇议会或王侯控制的方式。不可否认，严格说来，这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不管怎么说，从14世纪开始，最大限度地使社会“世俗化”开始趋于明朗，大学，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中学，明显地都成了雄心勃勃的世俗统治者猎取的目标。由于大学直接领受教皇的诏书，所以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并且满足期盼从罗马教廷获取特权和晋升的学生和博士，它是教会最有可能引起一心想控制自己地盘上的教会的君主们兴趣的一个方面。此外，任何一个有地位的国家都应当有自己的大学，这种感情到处都感觉得到，正像在都市社会中，市镇议会常常发出类似的感情一样。正因为如此，在14和15世纪，我们发现大量证据表明，各国王侯和地方行政官员一直在考虑，怎样操纵旧的大学，如何创办新的大学。在意大利，教会从一开始对大学就没有多少影响力，这一点非常突出。但在北方，大学是公爵和国王们作为其王权至上的象征而创立的；如此建立起来的大学通常是靠其统治者禁止人们在其他任何的学校学习来支撑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尽管是北方伟大的学术中心，其地位却是非常卑微的。巴黎大学虽然仍具有世界性，但却由于大学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德国、苏格兰以及法国本土的其他地方而受到了冲击；因拥护高卢主义，它发现自己只能与君主结盟。由于分裂事件和威克利夫的插曲，牛津大学也被迫屈从于王室的意志。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校长实际上是由王室任命的，遗憾的是，王室的慷慨取代了真正的独立。

1501—1560年德国大学年度入学人数估计[9]

(5年平均数)																
年 度	海德堡	科隆	爱尔福特	莱比锡	罗斯托克	格赖夫斯瓦尔德	弗莱堡	因戈尔斯塔特	蒂宾根	维滕贝格	法兰克福	马堡	哥尼斯堡	迪林根	耶拿	总人数
1501—1505	201	586	461	740	322	81	207	172	155	527	—	—	—	—	—	3346
1506—1510	266	556	473	789	333	63	208	291	219	308	—	—	—	—	—	3687
1511—1515	299	581	502	819	359	77	203	371	212	364	257	—	—	—	—	4041
1516—1520	247	469	541	705	284	72	170	422	161	600	273	—	—	—	—	3850
1521—1525	156	322	95	331	140	44	147	184	123	379	93	—	—	—	—	1994
1526—1530	84	152	44	175	37	—	77	149	95	250	49	47	—	—	—	1135
1531—1535	140	121	108	256	44	—	131	154	105	371	75	140	—	—	—	1645
1536—1540	170	173	124	301	100	—	177	229	156	586	112	182	—	—	—	2307
1541—1545	178	129	136	486	122	?	203	406	194	879	201	205	—	—	—	3121
1546—1550	181	228	302	489	182	?	282	360	224	640	288	154	125	—	—	3455
1551—1555	153	243	158	378	224	?	257	392	312	866	286	206	63	132	—	3670
1556—1560	187	261	156	490	177	?	341	402	341	960	349	203	80	118	269	4334

如此发展将把王权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终于在16世纪变成了现实。在英国，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案成了国王首次显示其潜在权力的机会；随后出现的变化并未引起什么麻烦就被人们接受了，因为国王迅速派出使者去巴结和说服了大学中对法庭影响重大的人物。大学和修道院一样，被视察搞得苦不堪言，在爱德华和玛丽统治时期，成立了两个皇家委员会负责对大学实行全面检查。委员们无所不能的权力迫使人们记住，国王已经成了英国的教皇。虽然王国政府对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并无兴趣，但它的权力仍然是很大的：在牛津大学，王室的态度和倾向足以消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敌对；能够准确地规定谁应当参加选举学监的投票。从亨利及其继位者对大学福利漠不关心的背后，那些神经紧张的教师看出了国王和议会已经掌握了令人生畏的绝对权力。修道院被解散了；附属小教堂也被解散了；这难道不是说，很快就要轮到牛津和剑桥了吗？然而，王室在英国的权势也有重要的补偿作用。它保护了希腊语不受保守派的侵害；并在设置了一些文科学科的讲师职位；1549年，牛津委员们对课程设置作了轻微的改动，这和要求是一致的，这些改动如果没有王室的支持，肯定会拖上好多年。

在法国，国王的地位与此非常相似。巴黎的神学家们正是凭着自己的鼎鼎大名才能够坚持抵制弗兰西斯一世对新学和伊拉斯谟的改革采取宽容态度。但是，他们的抵制最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是由于1534年的公告发布后，弗兰西斯的态度发生转变而造成的；即使是那时刚刚成立的法兰西学院也是在王室的保护下才得以幸存。在德国，王侯们对其学府的主宰就更为突出了。正如前面提到的，有3所新教大学即马堡、哥尼斯堡和耶拿，都是由王侯们创办的。这些大学一成立就面临着地位问题，因为，一所真正的大学经教皇授权后可以颁授具有普遍效力的学位，其毕业生可以在任何地方授课。马堡大学可以从查理五世那里获得此项特权，耶拿大学则可以从查理五世的继承人那里获得此项特权，但是，教皇和皇帝都不承认哥尼斯堡大学。这类新成立的学校自然要维护其创办人的利益。创办马堡大学的王侯可以开除马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裁定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合乎正统的法官。在哥尼斯堡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们发誓效忠的对象更多的是信仰和普鲁士公爵而不是学校本身：“我不以任何理由，不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恶意和充满敌意地策划、进行和煽动对公爵不利之事。”在那些接受了新信仰的老牌大学里，情况也是一样，在路德主义的发源地

维滕贝格，大学同样按照国家法令，由教会的地产资助，到1550年，它便具备国家教会的职能。当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539年重新开始招生的时候，同样要仰仗波美拉尼亚公爵的慷慨赞助。在那些其创办人不是王侯的大学，或者像爱尔福特大学那样，其王侯不在当地，市议会就会承担起管理的职责。爱尔福特市议会在爱尔福特大学强行推行新教，并不顾及它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所具有的独立性；在巴塞尔，市议会和大学都是见风使舵，谁在宗教斗争中处在上风就服从谁。但是，明确由地方行政官控制的市立大学是日内瓦大学，1559年，加尔文在这里又建了一所日内瓦学院，完全由当地的神权政府管理。国王获得在其土地上掌管大学的权力这种现象不只局限于欧洲的新教国家。在维也纳，从1533年起，斐迪南大公就把大学置于他的监督下，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行改革的法令，使学校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派人对日常教学进行监督，就连具体的教学内容也要接受当地政府的审查。在因戈尔斯塔特，巴伐利亚公爵也公布了一项具有同样效果的“改革法令”。这个时期天主教德国新成立的唯一一所大学便是迪林根大学，由奥格斯堡主教创办，并于1551年得到了教皇的承认。中学对于王侯们没有明显的直接利益，虽然在德国，地方统治者偶尔也进行干预，要在教师中保持宗教信仰的一致，而在英国，到亨利八世统治末期，连小学的识字课本和拉丁语法书都要由政府来校准。

学术界的“地区化”进程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开始了，在本书所描述的这个时期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王侯们对大学群起而攻之的阶段，因为这些大学建立在他们的领地上，却属于一个普世教会——这个教会包括修院、教会法和大学——结果，对学者的管制更为严厉了。这和学术界的理想是冲突的，似乎只有伊拉斯谟这样的人文主义者才可以达到这个理想。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把科学和国家的尊严、威信联系在一起，使政府有权把学术院校基本上看作是为政治家所定义的公共目的而存在的，并且一度曾使大学的高等教育呈现明显的停滞。这在德国最为突出，明显的理由是，由于上述的“地区化”运动造成了高等学府发育不良和缺乏朝气，德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生命力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就开始衰落了。然而，德国只是这一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大学总的说来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虽然大学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稳步上升，上层阶级家庭的青年应当到大学里去学习一段时间已经成为惯例；但是，从

狭义上说，大学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正趋于降低。17世纪所取得的巨大的知识进步与那些在死气沉沉、行将就木的学院中执教的博士和教师的关系甚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大学在很久之后开始复苏的时候，复兴正是在德国开始的。

可以这样问，我们所讨论的教育变革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学术界和王侯们对改革者所带来的新型的语法学校和改变了的大学到底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问题的提出要比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容易一些，尽管有些资料是现成的。

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而言，他们对人文主义教育家的主张没有多大兴趣。有材料显示，由其社会地位决定只能做卑微的工作的人们中也有人渴望上学，渴望掌握文字这种工具。对此，罗伯特·威廉斯1546年在刚买到的一本书上用潦草的字迹写道：“辛巴里山上的克平治羔羊”，对于只允许贵族和富商而不准所有平信徒阅读《圣经》的做法提出了诚恳的谴责。不过，罗伯特·威廉斯这样说是出于宗教而非教育的动机，而且在农村地区，学校的老师们普遍抱怨，孩子们只在他们方便的时候才去上课：在德国，据说农民只在冬天才送孩子去念书，夏天则利用他们去干农活。

然而，语法学校是直接为贵族和市民们开办的。虽然传统的观点从来就认为，在学校里待上一段时间对成长中的男孩是必要的，但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孩子们上学往往是敷衍了事，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都未给上学以高度的重视。拉丁语法与绅士的儿子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对于埃利奥特来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就必须学习拉丁语。不过，在世俗的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生机的时期，主要的“统治者”中又有几位是埃利奥特意义上的学究先生呢？尤其是不是大学出身的克伦威尔取代了从大学出身的沃尔西：父母不能因为从中获得了暗示而遭到责备，埃利奥特要男孩子在未满14周岁以前不应离开学校的要求也太过分了。14和15世纪，上层阶级送孩子读书、上大学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并且获得了明显的进展。^[10]历史上间或出现的那些诗人的和政治家的心智肯定从学校吸取了养分，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学只是一种习俗：普通的乡绅能从拉丁语法的学习中得到什么帮助呢？至于商人，实际算账的训练和现代语言的掌握都用不着去进语法学校。“因此，富裕的市民当男孩念完一年级或二年级后，便继续把他们送到瑞士、英国、威尼斯和

布鲁日去学习流行的商业语言。”科尔迪耶在他的一次对话中解释说，父母“显然对长时期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拉丁语教学感到焦虑不安”。他的托词是，拉丁语虽然在商场上不怎么行得通，但适宜用于国际的交往。事实上，16世纪兴办学校的成功看起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其人文主义的内容成反比的。保守的英国语法学校逐渐采用了新的课程，但它们的做法太温和，在教育上也没有明显的乐观态度。在大陆上，尤其是在德国，学校倒闭的记录不少。斯特拉斯堡的施图尔姆学校、伊尔费尔德的尼安德学校，还有巴塞尔的普拉特尔学校，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行为所致；蒙田称这些个人有着“精明而非平庸的头脑”，并且，他们的成就为那些知识造诣更高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失败记录给抵消了。就像蒙田早期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一个例外一样，波尔多（他在此地上的中学）的吉耶纳学院也是一个例外。因为蒙田对理论家倡导的这种教育方式感到满意。他还在摇篮里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开始了拉丁语学习，他的父亲把这个家庭管理得适合于培养出模范儿童。他的母亲和仆人尽量用拉丁语和他交谈，他就这样学会了拉丁语，“既无技巧也无图书，既无语法也无训诫，既无鞭责也无眼泪”。后来在古维亚领导的学校：“法国最了不起的、无可媲美的中学校长”，这孩子的教师是尼古拉·格劳齐这样著名的希腊语专家和乔治·布坎南这样杰出的拉丁语专家。然而，他觉得自己的学校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收获；他的拉丁语能力下降了；并且，他作为人文主义教育最完美的产品只是用他的拉丁语来强调某种道德或装饰某种见解。

各种各样学会的出现使我们能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校和大学作进一步评论。无可否认，这不是教育史范畴内的题目。不过，它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在中世纪很难看到这样的成人团体和文人圈子，他们不仅由于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由于共同的学术追求而走到了一起。这类团体产生于15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便是其中的典例。16世纪，这样的学会在意大利多如牛毛，其中的一些已开始表现出正式的立宪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了学会传统的特点之一；其中的另一些则以某个专业的研究而著名，如佛罗伦萨的克鲁斯卡学园（1552年）专门致力于意大利语言的研究。北方的人文主义圈子中也有类似的非正式团体，被称为“阿德沃特学园”的协会便是早期的一个例子；广义上说，伦敦的“民法博士协会”也属此类，它看起来基本上是学者尤其是民法学家的俱乐部，律师学院也对普通的

律师提供类似的服务。意大利树立的榜样对法国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其学会运动显得非常强劲。在这场运动中，专业学术社团和业余学术社团，从零零星星开始发展壮大，在以后的数世纪为推动和控制学问和科学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学问和科学从前为大学和学校所垄断。

（赵亚麟 译）

[1] 要查这些数字，可见拉什多尔（编辑，波威克和埃姆登），第1卷，第24页；多勒大学和贝桑松大学被算作一所，同前，第2卷，第192页。

[2] 欲知他的文学活动，参见本书边码第369页和第372页。

[3] 参见伊拉斯谟涉及文学、教育的著作目录，该目录收入《书信集》（编辑，阿朗），第1卷，第38—39页；第8卷，第373—374页。

[4] 见本书边码第369页。

[5] 见本书边码第391、409页。

[6] 见本书边码第244页。

[7] 见本书边码第184页。

[8] 牛津历史学会，编辑C. W. 博尼斯，1885年。

[9] 弗朗茨·奥伊伦贝格，“Die Frequenz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von ihrer Gründung bis zur Gegenwart”，*Abhandlungen der phil.-hist. Klasse der königl.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见第24卷（莱比锡，1904年），第55页，第102—103页。这张图表略去了特里尔和美因茨以及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539年恢复后留下来的那些不确切的数据。至于奥伊伦贝格对上述数据的计算方法，见第7—45页，出处同上。维也纳的数据表明，大学的招生人数在1530年降到了最低点；F. 奥伊伦贝格，“Ueber die Frequenz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in früherer Zeit”，*Jahrbu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III • Folge, Bd. 13*（耶拿，1897年），第543页。

[10] J. H. 赫克斯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教育》，《现代史杂志》第22期（1950年），第1—20页。

第十四章 西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

16世纪上半叶是沿欧洲西海岸的各民族国家要求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小一点的国家没有什么影响。苏格兰民族国家的形式是60年代宗教改革到来之后的事，不属于本章考察之列；勃艮第虽然正处在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中，但却没有抵挡住以后100年间王国的支离破碎和重新瓜分；葡萄牙在1580年西班牙人的占领之前已经拥有了所有它应具备的体制。因此，本章叙述的内容只能集中在3个主要的地方：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各王国。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中世纪的王权在15世纪初开始走向衰落。百年战争以及随之和随后发生的内战摧毁了法国和英格兰的君主专制。在地方和阶级要求独立面前，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王的地位突然被削弱。所以，16世纪下半叶这些国家同时出现了恢复强大的君主专制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努力。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们、法国的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英格兰的约克郡王和亨利七世都在用大致相似的手段来达到大致相似的目的。但是，如果这些和平与善政的恢复者们只能以“中世纪”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由此开始，下一代人应当坚持不懈地做出更多的创造和革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英格兰，王室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引起了一场体制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独立的民族国家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了，行政实行了改革，君主立法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发展起来了。在西班牙，查理五世的统治使迄今为止仅靠婚姻来维系的诸王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统一，这再加上勃艮第的统治方法的引进使中央集权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法国，弗兰西斯一世的统治在传统主义的掩盖下，加快了向君主专制主义和统一迈进的步伐。所有这些国家碰到的问题大致相似，尽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极不相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任何关于立宪问题的讨论都必须从君主制度开始谈起。君权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臣民的尊敬，有时近乎盲目崇拜。中世纪早些时候王权的衰落为下一个时代对君主制的过度忠诚奠定了基础。因为，正是通过君主政体才有了一种世俗的拯救，人们不必为

屈从于新的救世主而大惊小怪。君主的力量是强大的，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他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是正义的源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头领，现在他作为国家的拯救者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化身站出来了。说得更实际一点，他是一切荣耀和成就的源泉。人们在上司的手下，通过为他们效劳来寻求恩宠和升迁；而国王在远处掌握着数量最大的恩惠。一套逐渐发展起来的仪式（在法国最为华丽，在英格兰最正式）把君主和下面的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旧贵族的败落和由王室恩宠创造出来的新贵族的成长常常使这两种形势造就的新贵族成为国家最高的等级；君主专制充分繁荣的时代看来成熟了。

然而，不管其臣民的感情是多么的虔诚，也不管其暴君的行为是多么的专横，都不能说明专制主义和完美的君主统治真正建立起来了。阻挠查理五世的国王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虽然他成功地削弱了卡斯蒂利亚的特权，但却不能完全摆脱阿拉贡国王和勃艮第国王的牵制。在英格兰，就像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从亨利八世大吵大闹、恣意妄为的背后，不难看出立宪主义和限制国王意志所达到的惊人程度。即使是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统治下的法国，虽然在摆脱中世纪王权不稳的影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宗教战争期间却显示出这些成绩的基础是多么的脆弱。尽管如此，法国的君主政体依然是最接近理想的制度。其成功的努力始于百年战争末期查理开创的君主政体，它超越了对手的妒忌、能自由课税并获得了随心所欲制定法律的权力。路易十一、路易十二以及弗兰西斯一世的努力则导致了一个表面上看似中世纪、实质上则更像17世纪开明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到1546年时，有一位威尼斯使臣认为，法国人把一切自由都交给了他们的国王。尽管法王的权力，诸如立法、任命官员、决定和平与战争、行使最终裁判和铸币等，在法学家经过反复推敲后写成的特权条文中有规定，但是，法国君主的行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或者说是受规定权利的限制的。虽然法王的立法权要受不可变更的基本法概念的限制，但事实证明，这些基本法是毫无意义的；省大理院，尤其是巴黎大理院可以拒绝登记某项敕令从而使之无效，但他们从未这样做过。在其理论、权力和无限制的行动自由方面，法国的君主政体为所有君主主义者树立了榜样，早在16世纪30年代就有人给法王安上了暴君的绰号。

查理五世所处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原因是他从未统治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使是法国，某种程度上也仍是一个采邑和封地的集合体。虽然法王通过政策，再加一些侥幸的事件吸纳了许多大采邑，比如，1492—1532年间收回布列塔尼，1523年收回波旁，1525年收回阿朗松，最后在亨利四世时收回了纳瓦尔的波旁领地；虽然一个财政机构权力基于整个王国（各税收区），但王国仍然是一个由各种各样地方性和社会性的组织构成的整体，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习俗和权利要求，国家的统一是靠一系列单独的契约来维持的。^[1]然而，这种差异和混乱与查理五世的帝国比较起来就单纯多了。从尼德兰到西西里，从卡斯蒂利亚到（一段时间）波希米亚，除了体现在帝国统治者（他在其每一块领土上都保留了不同的身份）身上，帝国从未有过统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帝国君主政府机构：只有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卡斯蒂利亚诸位国王、阿拉贡国王和两位西西里王到米兰公爵、勃艮第公爵再到阿图瓦伯爵、弗兰德斯和荷兰伯爵等等，所有这些统治者恰好就是同一个人。^[2]相对帝国的每一部分来说，查理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在他的权力中心西班牙，他是相当专制的，但对阿拉贡实行寡头政治统治的残余分子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恢复中世纪的君主政权、压制贵族的过分影响以及改编Hermidad（城市同盟，主要由市镇支持的一种警察组织）这样的流行的组织来为自己的君主政体服务感到满意，这是必然的。这样的统一因为没有统治者之间的婚姻关系作为纽带，只得部分依靠阿拉贡这样的小国对卡斯蒂利亚这样的大国的屈从，部分依靠那所建于1481年的宗教法庭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这所法庭一开始就是为控制这两个王国而兴建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当我们发现下述情况时，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查理五世并不着力主张新的君主政体学说，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扮演的角色，他必须保持他的各领地凝聚在一起，这又使得他在坚持个人的专制统治上手段异常强硬。他在低地国家这样做的可能性或许是最小的。虽然他在得到图尔奈（1521年）、弗里斯兰（1523年）、上艾塞尔和乌得勒支（1528年）、格罗宁根（1536年）和盖尔德斯（1543年），并且使阿图瓦和弗兰德斯脱离宗主国法国的控制后，完成了17省的统一；虽然他把那个聚集体式的公爵领地这种高级组织作为模式在他那个总体上是由各种不同民族构成的帝国内进行推广，但是，他

在其统治早期以后几乎没有出访过尼德兰，而是由他的女性亲戚对尼德兰实行卓有成效的治理。15世纪，查理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机构（官员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弗朗什孔泰的法律学家）和一个各地议会代表组成的总议会来维持摇摇晃晃的统一。但是，到了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地方议会的重要性超过了总议会，各地的习俗和特权也未受到触动，并且个别的地方根本就不把他看成皇帝、看成西班牙国王，甚至看成是勃艮第大公，只是把他当作和他们自己领地的公爵或伯爵一样的人物来服从。在这些面积虽小但差异甚大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国所遭受的失败足以解释在下一代腓力二世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说明了查理五世企图以类似的方法去统治其他更大但差异同样大的领土为什么会失败。

然而，这位统治者位居各机构之上，有那些其利益超越了国界且只依附于他的人辅佐。如果在查理的实践活动中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君主政体学说在作指导，如果他穿梭来往于一个又一个的王国时不得不扮演成变色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位后来成为颇具影响和聪明的统治者查理提供了一个君主专制统治的实际榜样，对这个统治他的大多数领地是臣服的，这也是事实。由于如此巨大的一个帝国的财政和治理情况复杂，致使官僚机构日益膨胀，但帝国的统一和生存——因为查理的癖好，还有一切行动^[3]——继续要靠这位君主。查理五世以这种初始的、非理论的方式从他在尼德兰和阿拉贡继承的遗产中世纪立宪主义迈入了一种官僚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勃艮第的技巧和卡斯蒂利亚的权力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些巨人的比较可以看到，英格兰君主制的任务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众所周知，英格兰是最后从中世纪的衰落中恢复元气的：在路易十一（1461—1483年）的统治下，法国的复兴进展顺利，致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能够在1498年放弃他们自己的版本的城市同盟，但是，英格兰的王朝之战一直持续到1485年，其影响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对可能提出权利要求者的打击中仍可看到。然而，英格兰国王不必像大陆上的国王们那样，他只需通过在自己的家庭内重新发挥国王的个人作用来恢复中世纪君主制的权力和方法就行了。中世纪的英格兰从集中的领土获取了非同寻常的利益，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它是一个异常强大和效力显著的君主国。当然，早期的都铎王朝还有待加强：1536年，威尔士与英格兰合并，同时颁布了反特权大法案，终于使所

有曾经获得部分豁免权的地区归附于民族国家，听命于国王的诏书。爱尔兰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亨利七世放弃了虽然大有希望但却代价高昂的使爱尔兰英格兰化的努力，转而支持依靠当地贵族的政策，尽管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令人不安；亨利八世（1540年）放弃了克伦威尔提出的征服和渗透政策，尽管一年后他实现了一项有名无实的要求：给自己安上了爱尔兰国王这个新头衔。尽管存在上述情况，都铎王朝统治的是一个在中世纪的环境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长期以来非同一般地统一的国家。关键在于它没有违背一项法律即：英格兰普通法，这项古老的法律起源于12世纪，到那时已经处于僵化的危险中了。与此相反，法国对各个地方不同的风俗和法律采取了包容政策。在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曾多次尝试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大法典，与其说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专制主义的实施，不如说因为所有能担此重任的专家都是民法学家；但最后只完成了个别习惯法的部分编纂。查理五世的帝国拥有的法典和拥有的国家一样多，并且帝国应拥有一套共同的法律的观念简直荒谬到不值一提。^[4]可以认为英格兰普通法也有不足，需要改革（的确如此），有些人认为含有一些野蛮的内容，应当废除（并不如此）；但它在维护地方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保持了王国的统一，而在别的地方，在有君主制特点的罗马法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统一却导致了专制主义。

如果臣民们有了自己的权利，拥有特权的英格兰国王们也就有了他们的权利，所谓特权指一组已知的特权以及一些残留的旨在使统治者能够实施统治的未界定的权力。在英格兰和法国，皇室领地、关税以及依附于封建统治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皇家财政的基础；按照特权，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国王的。但是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庞大，因为对内对外的管理需要大量的职员，战争也变得更加复杂，并且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国王们的固定收入因此减少。在这方面，弗兰西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情况都要好于亨利八世：在英格兰，严格说来，额外的税收通常要征得议会的同意。当然也有逃避议会的办法，比如宣称是自愿送礼（捐款在1483年被宣布为非法）或强行借贷，永不归还。但是，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没有一种可以过多地运用，或用得太出格，因为沃尔西在1524年发现，弥补议会拨款不足的一系列努力结果在广大地区差一点引发暴乱，因此不得不放弃。英格兰国王不能立法，而这正是法国君主的特权之一。1539年制定的一项臭名昭著的法案宣称，皇家的公告和议会的法案具有同等效力；但是，皇家的公告

不能用于重大的问题，因为它们不能裁定叛国罪或重罪。皇家公告只能涉及一些不重要的和临时性的政令，而法案的目的主要在于为这些政令的实施提供工具，英格兰君主政府不能征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立法，缺乏能够建立真正的专制主义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英格兰曾经有过建立专制政权的企图。

这种情况必须和下述事实加以比较：在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国王崇拜乃是普遍现象——允许用大量谄媚和奉承的语言来遮盖现实，以及出现勾起人们对英国君主制加以大量思考的政治事件，即亨利与教皇的争吵。通常的情况是，国家主权这个特殊问题在这场冲突中将具体化，因为教廷不仅要求拉丁基督教世界精神上的忠诚，而且要求对所有神职人员进行直接统治，不管他在何处。西班牙王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信罗马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控制本国教会：由国王任命所有的主教以及类似的神职人员，并强迫他们服从，但他并不设置障碍，阻止西班牙教会与罗马教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联系。当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教皇成了皇帝的私人神父后，这类问题事实上已不成问题了。法国好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1511年，路易十二在和尤里乌斯的战争中甚至自行负责地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但在1516年的政教协定中双方达成了谅解，形成了与西班牙极为相似的情况，法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5]这个协定也使英格兰成为教皇最有价值的金钱来源和保护者，这是为什么克雷芒七世要固执己见，拒绝对亨利八世作任何让步的部分缘由。

然而，即便如此，这场争端到最后本来是可以类似法国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亨利的初衷也是如此），但是，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克雷芒拒不退让，于是，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影响下，英王决定利用此次机会与罗马彻底决裂。这样一来，君主国家中的大多数教皇至上主义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行动基于一种构思清晰的政治理论。英格兰是一个帝国，一个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享有主权不受一切外来控制的国家，由一位在国家教会中同样行使最高权力的国王统治。于是这个君主国获得了自其发端以来最大的一次权力的增长，尽管这样的权力要求的先例可以追溯到在教会中出现教皇专制制度以前（即是说，约公元1000年前），但这并不重要。至少在理论上，亨利八世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代表了王权地位的上升，这在西欧的任何地方

都是无与伦比的，即便王位后来传给他那虚弱无力的儿子以及再后来传给他那桀骜不驯的大女儿的时候也还是如此。虽然他的君主地位实际上是否能与弗兰西斯一世相比仍有待观察：但他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权力则是大到不能再大了，并且他的个性足以给人们造成一种宽松的专制主义的错觉。

如此，在整个西方国家中，君主政体成为国家地位的必然体现，君主政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获得了更为惊人的荣耀，也获得了广泛而实际的权力。这个发展的阶段——不管其前景如何好，也不管多么不完善——几近于一种新生事物，这可以从这些君主国着手建造一个更加复杂、更有能力的统治机器的方式中看出。相似之处是明摆着的，但要究其根源和影响看起来是不可能有的。中世纪的行政理念遭到了普遍的拒斥，包括国王、国王的朋友和随员，或者用英语说，就是国王的household（王室）的拒斥，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人们可以称之为职业化官僚机构的东西逐步建立起来了。16世纪的勃艮第在民法学家的影响下已经指出了这条路，查理五世在西班牙采用的制度许多带有他的尼德兰谋臣们的主意的痕迹。法英两国在重建的那些年代曾满足于沿袭传统的方法，但在16世纪进行了值得注意的革新。在英格兰，最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革命，托马斯·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突然推出了一套连贯的改革措施。沃尔西满足于作为一个有无上权力的首脑来进行统治，他仍然沿用亨利七世的体制，由他亲自负责并且只关心结果，尽管和亨利七世相比他给予该体制略多一点条理性。行政改革这个题目太宽泛，这里只能作最粗略的考察。三条典型的路线共同促成了“国家”官僚之取代“王室”：一是利用皇家议会；二是新官员或新近发迹的官员的崛起；三是广泛的财政机构改革。

皇家议会是16世纪君主政体的特有工具。议会在中世纪就有了一段长久而复杂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期间王权之基本上占优势（挑选议员，操纵议会的活动），和利用议会来抑制君主专制的雄心相互交织。15世纪后期旧贵族的衰落和王权的巩固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议会成员一般都是由国王钦定并受国王控制，所以对国王绝对忠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官僚机构化，不仅引进了组织（职员、档案、程序），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把议会的各种职能在不同的机构中加以专业化的趋势。1497年和1498年颁布的特别法令把法兰西议会的

司法职能移交给了一个名为“大法院”的分支机构，而它的政治和行政职能仍由一个名称不一的机构（*conseil du roi*, *conseil prive*或*conseil d'etat*）来掌管。1534—1540年间，虽然没有发布特别的命令，英格兰还是从过去在整个大议会中模模糊糊地看得出来的由主要议员形成的核心集团创立了枢密院；1540年枢密院的最终确立标志着枢密院和作为法庭的议会即星法庭之间在组织上分开了。与此同时，法国和英格兰都一样，同一个人可以而且确实在议会的这两个部门之任何一部门任职，这一事实说明，16世纪官僚机构的分工仍然很不明确，但不可用该事实来否认十分明晰的机构划分。弗兰西斯一世越发依赖国家行政法院中的一个核心集团（正如英王只靠枢密院的几个顾问处理大部分事务一样），后来，亨利三世（就像都铎王朝的玛丽对她的机构所做的那样）对这个机构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但是，这些进一步的变动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才具有公共机构的形式，那时它们再次达到和英格兰的机构齐头并进的程度。在我们谈论的这个时期，枢密院在法、英两国的作用不是很大，它由几个可靠的贵族，有时是作为国家重要官员的主教，以及一些职业政治家或行政管理人员组成（英格兰倾向于任用前者，而法国则倾向于任用后者）；国王控制着枢密院，尽管两国的国王都很少出席枢密院的会议。

然而，真正对议会加以利用的君主政体是查理五世的。在帝国的这些组成部分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尼德兰中，情况的发展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前两者中，天主教国王们对旧式的皇家议会进行了重组，限制其成员的人数，规定他们做些官样文章和文书工作，纯粹把他们当作王室的工具。在哈布斯堡王朝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好人”菲利普（1419—1467年）则通过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统治，用枢密院处理日常事务，用大议会负责司法。查理五世对议会的早期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布鲁塞尔帮助完成了专业划分，于是那里的摄政王有了3个议会：国家议会主管政治事务（调解贵族之间的矛盾）；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枢密院负责行政管理；还有一个议会管理财政。在西班牙半岛也存在3个议会。对于一般性的、庄严的问题要召开隆重和比较正式的会议来处理：国家议会成立于1526年，表面上，它的任务是就国家事务提出建议，但在西班牙大公们的眼里，它不过是一堆废物，毫无意义；另一个是负责战争事务的议会，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召集；还有一个宗教法庭议会，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负责两个王国的审判任务，但总是只有一个议长。其

次，王国的每一个部分都有适当的治理议会：阿拉贡议会在1522年具备了和卡斯蒂利亚议会同样完全的机构组织，1555年在意大利成立了另一个议会，以帮助菲利普亲王接管他父亲在这里的统治。根据新大陆的需要，（1524年）成立了西印度事务院。所有这些议会都是集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后者占主导地位。议会的多种职能之间保持协调，当然部分靠的是君主本人，但也部分地靠对卡斯蒂利亚议会拥有支配权的默认，因为在查理外出期间，整个西班牙半岛由卡斯蒂利亚议长主政。最后提一提在每一个王国内有级别低的议会便足够了：军事修会的议会，城市同盟的议会和金融议会，等等，还不要忘记那个由奇怪而强有力的牧羊主协会麦斯达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议会，所有这些议会都效忠国王，并帮助国王在整个王国树立王室的权威。

这些议会和整个行政机构职员配备的确引出了一些难度很大的新问题。法国和查理的帝国可以依靠大批在罗马法方面训练有素且有志于仕途，致力于外交和内政管理的职员，但英格兰，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结束了对教会的传统依赖之后^[6]，只得到别处去寻找为其服务的公务员（尽管也雇用了一些法学家）。这一正在演进的制度直接源于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使得每个人都与他为之服务的主人或领主联系在一起。新的公务员趋向于在那些其家庭和职务提供了训练的王室仆从和大臣的仆从中招募。然而，我们对下级官吏所知太少；对他们的上司知道得多一些。那些老派的高官们，在管理技巧上保持着优势。英国大法官和法国大法官仍然不失其尊严，比如，仍在枢密院主持工作，但是已失去了对行政的控制，除非他们还是主要的议员，所以才和行政事务保持接触。沃尔西是一位属于中世纪的大法官，作为大法官他是首席大臣，几乎是唯一的大臣；在他之后，大法官首先是王国中地位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法国的宫廷主管和宫廷法官这两个古老的官职却派上了新的用途，他们成了一个普通警察系统的核心人物。大法官加蒂纳拉从1518年到1530年实际上一一直是查理五世的首席大臣，致使他的管理和沃尔西的管理一样，都是“中世纪”的。由于所有旧的形式和官职都还保留着，因此，这个世纪希望找到新的形式和官职来做实际的工作。

原因很简单：16世纪面临着新的任务，至少在重要程度上说是非常新的任务。对内来说，中央集权和统一意味着，中央政权现在要处理一大堆本来是由下级单位处理的事务。对外来说，新的外交（一套

等级分明的新班子，包括外交大使和外交特使以及他们的随行职员，有永久性的，也有短期的）和新的战争，需要一个发达的组织机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处理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掌握在国王的秘书手里。那些和君主本人特别亲近的官员，以前常为国王撰写书信，在英国，这些人也被委以重任，为国王保管私印，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训练，精通数种语言，例行的公事也不太多，显然适宜于为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效力。甚至在天主教国王们统治的国家西班牙，政府的真正的大权掌握在两位秘书手中，那就是米格尔·佩雷斯·德·阿尔马萨和他的侄儿佩德罗·金塔纳。查理五世对勃艮第的类似情况了如指掌——让·德·马尼克斯是萨伏依的玛格丽特的得力助手，尽管他在议会里要了一个空有其名的席位，但他的重要性实际上应归功于那个级别不高的秘书职位——自然也就在帝国全境保留了这种做法。1530年，加蒂纳拉死后，大法官的职位空了出来，由两位秘书科布斯和格兰维尔来接替他的权力，这两人可以称得上是国务秘书了。^[7]他们两人的手下又有不同级别的秘书，处理不同部门的事务，并负责在各议会之间进行联系和沟通，他们的职责是筹划议会的工作。说查理五世的帝国是由显赫程度各异、一般都有秘书头衔的职业管理者在统治，一点也不为过。

英格兰顺应这一趋势的时间相对要早一些，主要是因为克伦威尔利用秘书这个职位使他成了全权在握的大臣（1534年）。在他那个时代之前，这个职位因能够贴近国王而显得相当重要，但是，这个职位的拥有者几乎没有一个是议会的议员，而且他们的级别从来都不是最高的。虽然，克伦威尔后来升到了更为显赫的职位，但是，由他开始的举足轻重的秘书职位，后来从未真正消失过，甚至没有倒退过，即便是出于管理上的原因把这个职位一分为二，由两个人（1540年）来负责的时候也是如此。法国在国王的秘书向国家重臣的过渡上稍微慢了一点：直到1547年这个职位的正式确立，他们的真正权力才得到承认，而国务秘书这个头衔是从1559年才开始使用的。在法国这样一个比英格兰更多地依靠法令来规定和组织的君主国里，上述的日期表明，法国[的秘书]迟一些时候才获得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就已获得的地位，虽然克氏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头衔。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君主政体已经在小额债权法院的官员中找到了另一个官职来为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化的君主制效力。任命这些官员原本是用他们来代表国王实施公正司法的，1493年首次确定这个官职时，规定人数为8人，后来证

明，这些人的作用非常之大，以至于到16世纪中期，他们已被用作国王的总监察人数超过了60。他们的权限不明，权力极大，要对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行政、财政、军队和异端问题进行监察——“王权的全权代表”（杜塞）。不管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西班牙，与此哪怕是略微相似的官职也不存在，不过，英格兰把这个官衔授给了4位好心肠的法官，由他们来解决穷人的诉讼问题。

所有这些改革和发展都要花钱；总之，就像前面解释过的，政府开支正在变得空前地大。现在不是调查三个王国的实际财政状况的时候：三国的财政从来就不是很有保障——几个世纪以来，亨利七世在聪明人的眼里一直很突出，是一个奇迹，因为他实际上聚敛了大量的储备——因为战争的重负总是把财政拖到崩溃的边缘。法国和英格兰的解决办法是增加税收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又往往是落在那些较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的头上；前者也靠出卖官职以及向神职人员征收什一税；后者有从西印度用不名誉的手段弄来的财富。查理五世实际上大量增加了从他的西班牙领地征收的赋税。但是，物价涨得更快。^[8] 英格兰国王不可能过多地征税，不管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只能靠征拨教会的收入来避开灾难：1534年，王室获得征收神职人员首年圣俸和每年征收神职人员圣俸十分之一的权利，1536—1540年解散修道院期间，政府一时富得流油。但是，更使人感兴趣的是征收问题，也就是说，是财政体制的问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这个世纪切实面临的财政问题。政府从来未曾有把握获得应得的收入。三个王国中没有一个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缺乏有效而具体的控制手段。有一段时间，英格兰看似有可能提出一套真正改革过的制度。亨利七世采取他的王室惯用的手法，把皇家办公室变成一个巨大的征集处，使古老而庞大的税务署相形见绌。沃尔西对税务体制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但效率下降，克伦威尔则进行了根本的改革：把财政机构从王室的手中分离出来。他的方案是建立两个平行的征收机构（税收庭），每一个机构征收税收的一个特定部分，并将盈余上缴中央金库。这项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克伦威尔就死了，他的后继者们被16世纪40年代的一大堆问题（战争、萧条、通胀）搞得焦头烂额，只好放弃了这个方案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方面。到1554年，英格兰的财政机构已经确立了一个多世纪：权力部分地还给了改革后的税务署，几乎所有王室的收入都由它来征收，但是，它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落实政府的权力，还达不到克伦威尔计划的税务

庭的要求。克伦威尔所期盼的中央集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亨利七世和克伦威尔引进的许多现代方法却保留下来了。不过，这个臃肿庞大、循规蹈矩的税务署连同它的那些腐朽、头脑僵化的官员以及他们那褊狭的猜疑不可能确保这台管理机器像克伦威尔所向往的那样顺利运行。直到17世纪后期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之后，它才恢复到了原有的功能。

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两国，国王卖掉广泛的征税权）在许多方面税收机器要简单得多。直到1523年，法国的岁入还是由两套官员管理：皇家领地由4名法兰西司库在财务总管督导下管理；数额大得多的“非常的”税收（盐税、间接税、人头税、集市税）则由4位财政税官负责。就在这一年，对分支机构实施了合并，成立了中央金库，由一位国库财务官主管，还设一名（临时收入）财务官，负责管理近期和临时的收入。进一步的改革试图逐步将税收集中由一个机构负责，但这一改革没有全部完成。1547年任命了两位审计官，后来在1554年改成任命一位审计大臣，这样便解决了审计问题，但在英格兰，审计改革直到19世纪才进行。在西班牙，查理五世从谨慎的斐迪南那里接过了一个由两总司库集中管理的审慎的机构，一个财政委员会（contraduria）每天的例会则由三位秘书（porteros）协助办理。收税、司库和审计的这种周详组织在西班牙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英格兰和法国在不同时期着手解决过这一问题，仅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查理五世感到有必要增加的只是一个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于1523年，由勃艮第的一位专家纳索伯爵领导；到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时候，它发展成一个高度官僚化的机构，成为效率的严重障碍。西班牙财政所遇到的麻烦不那么像英国的那样仅仅是管理引起的，英国的财力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而得不到合理的调度；西班牙的财政困难起因于皇帝的政治任务太多以及对美洲黄金的依赖。

尚需讨论的中央政府的一个方面是司法的管理和法律的实施，16世纪所有的中央政府都会承认这是它们首要关心的事情。实际上，这是对普通管理和司法管理进行落伍过时的严格区分。遵循若干世纪以来的习惯，16世纪时人们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实施法律和为争议各方进行裁决；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上面提到过的组织机构都有一个综合性的特点，那就是议会和法院合二为一。因此，1536年为处理没收修院的土地而成立的增收法院（Courn of Augmentation），由一个高

官重臣组成的议会掌管，他们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处置被驱逐的修士、土地的出卖和出租，以及岁入的征收和支出等等，同时也要履行法官的职责，处理他们管辖的土地上出现的简单的诉讼。巴黎高等法院，在法国的高级法院中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从不会轻易忘记，它实际上起源于国王的普通近侍，也从未停止过要行使“政务会”（包括政治和行政）职能的努力，尽管国王试图把他们的职能限制在司法范围。然而，真实的情况决不都是模糊不清的。到处都有古老的法庭存在，它们是真正的法庭而不是别的，正像法、英两国枢密院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真正的功能划分肯定不会超出这个世纪理解力的范围。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讨论的对象只能是更为重要的中央法庭，但是，必须记住，除了教会法庭这个系列之外，也还存在着古代盛行的法庭、几乎同样古老的封建（庄园）法庭以及中央皇家法院的地方分支机构。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运用王室的权威逐渐废除所有级别低下的司法机构。

面临这项特殊的任务，英格兰再一次显示出其不寻常的优越的地位。它不仅有普通法，而且有一套实施普通法的法院体系，以威斯敏斯特为中心，并且还拥有一套在全国各地实行司法的手段，其中最为荣耀的是王座法院，处理刑事案件和涉及王室的案件；民事诉讼法院（最忙碌），处理当事方的民事案；财务大臣法院处理税收案。不幸的是，这些法院事实上在程序上显得太拘泥于形式，其法律在应付不断变化的情况时又显得太刻板：15世纪时它们在维护正义或实施法律和维护秩序方面失败的例子太多了。前一种失败导致了大法官法庭的成长，该法庭执行一套尚在发展中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用来改变法律，使之能够适应司法的需要，因此被称为衡平法；在沃尔西、托马斯·莫尔以及他们的后继者这样一些积极进取的大法官的领导下，这个法庭才成为常设机构，才具有制定规则的地位，才有了大量的业务。为了弥补普通法法院的另一种缺陷，为了给一个越来越喜好打官司的时代提供足够的正义，早期的都铎王朝（沃尔西在这里再一次成了推动力）发展了皇家议会对剩余财产拥有的司法权，首先把案子吸引到议会的正式会议上审理，然后又成立了政务会法院。1530年出现了上诉法院，处理穷人的民事诉讼和任何可以获得听讯的人的案子，在以后的20年里，它确立了不很庞大的组织规模；星法庭的成立最初是用来处理聚众闹事罪和其他尚未达到重罪的刑事案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议会发展出来的一个司法部门，不论如何，最

迟从1540年起，它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法庭，专门办理法律事务。星法庭本来的任务是对扰乱治安的人进行镇压，并惩罚那些有权有势、影响巨大以至普通法院处理不了的人，但很快就掺杂处理了一些私人争端的案子，甚至到后来审理的多数案子是这一类的，在这类案件的控告状里用虚构的扰乱治安罪来进行伪装以获取星法庭的受理。其他的政务会法院在动荡不定的边境地区实施法律（北方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或处理特殊问题，如像税收法院（增收法院是这类法院的原型）和存在时间最长的王室财产事务法院（1540—1643年）。虽然，这些法院的某些程序源于罗马法，但是，它们所实施的仍然是英格兰的法律，即普通法和成文法，而就星法庭的情况看，是文告。

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按照大小和多少来进行比较的话，不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都不能夸口说它们已建立起了具有如此广度和深度的法院体系。但是，皇家中央司法结构简单并不意味着法制较少或者说诉讼较少，而是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国家后来在一种司法结构的指导下而达到了统一，它们没有必要再去复制早先的法院。法国有许多处于中心地位的高等法院，其中大部分是财政性质的，但只有两个需在这里提一下。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大法院，它虽然组建于1497年，但是它的作用直到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期间才完全发挥出来。这位国王利用议会的这一分支机构来协调审判，而不顾及法国是以法律和司法的多样性著称于世的。的确，不管是在民事还是刑事方面，它的权力都是无限的，但是它在运转过程中真正一贯坚持的是王室的利益。它是王室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完全受国王的支配，它的多样而又单一的目的在亨利二世的统一法令中得到确认（1552年），所以，它比王室法庭的地位要重要得多。所幸的是，在1484年至1560年间没有召开过议会，而在1484年和1560年的议会上曾两次出现过针对它的抗议呼声。但是，它对王室的用处太大了，还可以说，它对法国当时的法律和法律管理来说太有必要了，所以它的权力是不能削弱的。对另一个大法院巴黎高等法院就不能这样说了。虽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只是几个地方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中的一个，但是，它凭借其古老的历史，凭借其法学家的名气，凭借其在16世纪上半叶又大量增加的精细的组织而具有较大的影响。它是从国王的大议会中发展出来的，所谓*litde justice*即御临法院这一名称便可说明这一事实。然而，直到16世纪君主政体开始施加压力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其是，未受国王控制的。亨利二世的火刑法庭从暂时的意义上说是一

次成功的举措，它剥夺了最高法院的刑事裁判权^[9]；这个法院可以通过拒绝登记来阻止立法，但这一权力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已。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初审和上诉法院，倘若对王权表示顺从的话，其权限也可以是无限制的，也可以对王国实施普遍的监督。对于像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这样能够使它唯命是从的国王来说，它的存在不过是使那个中央集权和专制君主政体的武库中又多了一件兵器而已。

无须多说，查理五世没有在其帝国境内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司法机构，至于人们期望绕过普通法院或者说期望更正普通法院的判决而恳请他亲自出面干涉的情况则属于例外。在尼德兰，枢密院竭力想使各式各样的地方法典和法院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直到查理退位的时候，这项工作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半岛上，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从而各王国都有了真正而充分的司法公正。这些从中世纪承袭下来的中央法院一般称为大法官法院（*chancellarias*）或检审法院（*audiencias*），它们通常行使的是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并掺入了大量罗马法内容的法典。天主教国王们把这套系统推广到了格拉纳达、巴伦西亚以及其他边远地区；他们还为一个的大法官法院增加更多的法官和开庭次数来确保审判更公正更快捷。查理五世统治期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总的来说，由于没有一个长住的君主进行监管，这些法院的效率似乎降低，因此西班牙开始尝到了现代欧洲早期摆脱不掉的麻烦的苦头，即大量拖延的悬而未决的诉讼。在阿拉贡，查理五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图打破古代人为防止专制主义而设置的保护措施。最高司法官职（集摄政王、司法官和特权保护者为一体）受到斐迪南约束，他在此之上设立了一个由5位皇家法学家组成的控制议会，第一次（1518年）扩充时，人数增至7人，之后又废除了（1528年），因为，希望尊重阿拉贡特权形式的皇帝想要确保君主政体的支持者被选为最高司法官。

以上对西欧诸王国君主政府的概述一定是很不完整的，但它阐述了这些统治者建立、扩展和深化其中央集权所达到的程度以及所采取的方式。由于有像战争、宗教以及外交这样一些更为重大的利益的不断干扰，这一工作很少有连续坚持哪怕是一段时期。查理五世是不会把这种西班牙得自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勃艮第得自好人菲利普的对组织结构的关心用于他的领土的。在英国，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这两位热衷于改良政府机构的人所实施的管理就像普遍充斥着考虑欠周的政治

抱负的大海上的孤岛。法国在这方面可谓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更多地要归功于大批训练有素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法学家和公务员，而不是国王。这项工作是一点一点打补丁似的完成的，而且在整个弃旧迎新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希望，也没有心存哪怕是一丁点打算要摧毁所有特权并消除过去承袭下来的差异：人们一定不可忘记当时普遍未能做到把政府坚定的决定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并使各地区欣然服从。

直到相当近代的时候，中央集权政府才老是发现，执行政府的命令不知比制定这些政策和命令要困难多少倍。16世纪的政府的效率差异颇大。它们通常都能够镇压实际的叛乱，并且一般都有一套可用的手段，来强制偶然出现的反抗顺从其权威。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神秘仪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如果反抗的情绪只是广泛的存在，还未酿成暴力，那么这种办法通常都是成功的，这在现代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比如，任何人如果认为，正是由于亨利八世的暴政，英国才很不情愿地被迫割断了与罗马的关系，那么他最好研究一下，当那些举足轻重的人们——尤其是贵族，也包括商人和工匠、自由民，甚至农民——的确不喜欢政府采取的措施时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想纳税，那么亨利八世在他的人民面前的退路总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不愿遵守禁止特定商品的进出口规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充其量仍是发一封有气无力的公函而已。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失败都不是由于不想尽力为之。虽然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拥有更有效的控制手段，但是，他们也不能明确地宣称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日常统治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的确，英格兰仍然是16世纪西欧治理得最好最有效的国家。只要消息、命令和报告的来回传递还要花上数天或数个星期；只要国家还处于半无人居住状态，还有大片的荒野来藏匿坏人；只要地方的成见和偏见继续左右陪审团和司法；中央集权的政府要达到绝对的或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永远不可能的。

如果要对地方行政所展示出来的图景作出恰当的评判，以上各点务必要记住。在所有这些正在讨论的国家中，这个时期增加的东西很少有可以称为新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为执行中央政府命令而设计得相当好的机构。其中的一些到此时只是过去的残存，像英格兰的郡长和法国的省长（1542年禁止使用，3年之后又恢复使用，以此讨好大贵族）——这些曾经是国王忠实仆从的官员都在即时屈从于破坏性的封建制度，现在不过是一种个人的荣誉而已。财政

区的组织（1542年对财政区进行了改组，从而给18个税区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制度）使法国政府能够对所有难题中这个最难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类似的做法在英格兰和西班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地方政府机关所采取的主要职能形式是司法。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问题出在城镇上：控制了城镇，就控制了个国家。所以，天主教国王们通过地方长官（corregidores）来建立他们的控制，他们把这些皇家官员充实到城市政府中去，很快就控制了这些城市。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治安法官，他们是被任命来执法的地方绅士；在整个世纪，他们的职责和权限都在不断地扩大，最后，他们不仅成了有即决裁判管辖权的治安法官，而且也成了社会行政官员。法国的司法系统依靠的是一个古老的职位，即执行官（bailli）或司法总管（senechal），他想成为他的管区上的大人物，在这种意义上他与英格兰的治安法官并无二致，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和治安法官很不一样，因为他在其地盘上的影响、他的统治权力要大得多，个人地位也高得多。执行官代表国王处理所有的事务（财政的、司法的和军事的），并且在16世纪依然如此，尽管已经说过，他的表现常常更像他的执行官辖区在国王宫廷里的代表。部分地为了削减这些大人物在当地的支配地位，增设了一些下属官职，从而使执行官不能像原先那样独断专行：从1523年起，每一个执行官辖区都增设了刑事副执行官和民事副执行官，同时还进一步增设了助理官员、王室公诉人、王室律师等等，不断地扩充人数，直到官僚机构化的法院形成为止，英格兰的地方司法机构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发展历程。1554年颁布的一项敕令强化了这一系统，并且在王国建立了警察总署。为下个世纪这个古老的制度实行全面官僚化的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不过，有一点必须记住，在此发生之前，半封建的执行官不得不为省长让路。

总之，在这个时候，就是法国国王也不敢夸口，说他对自己领地上的所有部分都确立了名副其实的统治。这倒不是因为机构无能，而是通讯困难的地方豪强在挡道，再加上边远地区的态度冷漠，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首府城市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现实的情况是，当地人得管理当地事务。像英格兰那样依靠当地无俸的知名绅士进行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有例外的情况：法国的行政官员是任命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王室支付报酬的，当然，用的是地方的人才，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法国实行官职买卖，结果对当地人和当地的独立有利；它在外省开创了一种由世袭的资产阶级官僚取代旧的世袭贵族的

管理。英国的体制可能受王室的支配要少一些，但实际上，都铎王朝的议会对治安法官们采取了小心审慎和还算有效的监视，对这些法官来说，丧失所委职责是在郡一级社会组织中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就像免职会给每一个领取薪俸的官员造成严重影响一样。政府至少对其执法官员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只有出现重大叛乱造成非常情况才可能对此构成威胁，就像英格兰北部的贵族加入求恩巡礼时那样。我们提醒，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个时期的政府权力，但也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君主国都实现了更为牢固的控制，都操纵着比从罗马陷落以来在欧洲所能见到的更加令人生畏的权力武器。

至此，我们已经对王国政府作了详细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欧王国统治者们用来扩张权力，巩固地盘和在这个地盘上进行统治的机器，以及通过这个机器，就表面现象看，发展了君主政体通常所固有的专制主义趋向。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又都存在着与此相对的另一类组织：代表大会，不仅在国家层面上有英格兰国会、法国和勃艮第的三级会议以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议会，而且在地方层面上如法国和尼德兰各省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也有同样的组织。实际上，从13世纪开始，这样的大会就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迅速发展；它们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匈牙利等国所特有的，也是整个西欧所特有的。并且，它们是中世纪晚期政治的特点，也是君主政体本身的特点。当然，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这一点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的确是存在的，并且一位德国学者发现，所有这些国家在统治者和代表大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结构的二元化，这在他以及其他人士看来是从14世纪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宪政问题。

[\[10\]](#)

然而，决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说，这种二元性就是中世纪晚期议会的显著特征。它们毕竟是王室制造出来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王室的召唤。国王经常召集议会，因为它们能够为王室的某些目的服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王室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钱，所有这些议会都拥有并行使批准征税的权力。在法国，当国王在1440年宣布有权直接征税后，议会也就失去了这项权力；卡斯蒂利亚的议会实际上在1538年后就放弃了这项权力。议会在两个国家最终失去作用几乎扼杀议会本身。此外，除了在英格兰——因为在那里每一个人包括贵族、神职人员以及普通百姓都要纳税，这一作用对于那些政治上最有权势的等级

总是最提不起兴趣的问题，必然会减弱他们对参加那些费用高昂和没完没了的会议的热情。至于立法，法国议会从未有多少机会以英格兰国会的方式利用法定办法来发泄不平。在西班牙的议会中，对立法权的要求各不相同，阿拉贡议会紧抓住立法权不放，而卡斯蒂利亚议会只是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但在16世纪，这个半岛上所有的君主制政府都确立了制定和颁布法律的特权。不管怎么说，议会还是经常召开会议以发挥它们的有益的作用，除了法国，从1484年那争吵不休的议会团体到1560年陷入危机的等级议会这段时期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查理五世一直设法在财政方面得到合作，只是在其意图一次次遭到失败而感到失望时，才召集了大约15次卡斯蒂利亚议会，尽管他感到满意的还是那6次开得更为艰难的阿拉贡议会会议。

国王利用议会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这些议会有助于领土的统一，并且是统一的象征。14世纪，英格兰国会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亨利八世为了同样的目的，直到1536—1540年才动用议会，当时他召见来自威尔士、柴郡和加来的当选代表。勃艮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充分：召集议会是为了压制地方的排他主义，为君主政体打下坚实的基础。议会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直到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议会一直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团体，实质性的工作，甚至征税，一直掌握在各地地方议会的手中。法王路易十一承袭前朝的方针和实践，所以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法国议会经常召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会议，但是，当法王有了独立的收入来源，王国的官僚机构羽毛渐丰之后，法国君主政府便撇开议会，自行其是，即使遭受批评也不在乎。在西班牙各王国，议会作为王室反对地方独立或贵族独立的武器在早期也是受到鼓励的，并且在恢复活力后的君主政体之下，仍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宪政发展的层次差别非常之大，并且两个王国之间的分离由来已久，所以，在1709年以前，全西班牙议会一次也未开过。顺便说一句，葡萄牙议会在16世纪迅速走向衰落，终止参与立法。

一方面，此时这些议会只有迎合国王的意愿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国王的需要和议会已确立的凌驾其上的权利又给一些人提供了反对国王及限制其自由的机会。这种情况也见于阿拉贡，尤其是英格兰。英格兰国会有过一段抑制王室专制主义以争取特权和发展权力的历史，即使是在15世纪，国会陷入宗派之争时，国会仍在立宪方

面有所收获。然而，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所发生的事件最初表明，国会也只是王室权力的附属而已。亨利七世召集国会是要国会通过他的政策，批准给他的拨款；如果他两样都不需要，他就不召集国会。亨利八世当政的开头几年，召集过4次国会，目的是为战争筹款；之后沃尔西主政，直到他倒台这14年间，只开过一次国会，并且，从国王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1523年的国会坚决反对政府要求提供经费的议案，1538年出现的类似情况使查理五世深信，他再也无法利用卡斯蒂利亚的议会了。英格兰国会史上也出现过危机式的情况：在沃尔西当权的时期，人们毫无把握，当所有的议会都处在风雨飘摇之时，唯独英格兰国会能于16世纪幸存下来，不但生气勃勃，而且还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和其他各国议会相比，英格兰国会享有特殊的优势。它控制着国王无法通过其他合法手段征收的非常税。虽然，立法可能由政府来策划（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国会两院的通过也不能生效；王室除了发布公告外，没有独立的立法权，而公告的局限性上面已经讲过了。国会制定的法律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国会才能对王国的普通法进行增补或修正：当然，也只有国会才能规定新的叛国罪或重罪。至于国会的组织成分，前面已有说明，按照传统的说法，由骑士和自由民组成的众议院要优于法国仅由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这是由于对后者的误解造成的，但是，众议院与欧洲所有其他的下院相比，是一个更具有自我意识的组织。它的人数（从300人起还在增加，和卡斯蒂利亚议会的38位城市代表或“第三等级”的150个左右的成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及它的社会成分的单一性（城市从未像欧洲大陆那样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至少从1400年起，它就越来越倾向于从贵族中寻求代表）足以把它与别的地方的类似团体区别开来。英格兰国会产生于中世纪，与任何其他的等级议会或议会比较起来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但是，它在猛然间所达到的重要地位却是政治环境和政治家式的洞察力促成的。

1529年，当亨利八世意识到，不进行斗争就离不了婚时，危机出现了。就像西方的君主们在此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他召集了国会；这一行动本身表明只不过是亨利按习惯程序办事，并非政治上的天才举措，但人们一直对此予以过分的称赞。差不多3年时间，国会几乎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对于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人来说太重大了，并且也没有先例可循。直到1532年，亨利也想不

出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叫国会去威胁神职人员，去矫正他们的弊端劣迹；国会对他的意向给予了含糊的支持，这虽然也有帮助，但他被告知，国会不能同意他所希望的自由以便再婚。要不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开始掌权，从而事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么国会本来仍将无所作为，很可能会像大陆上的国会一样被废除掉。但是，克伦威尔解开这个结的方案包含两条重要的思路。一是他鼓励国王把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主张变成现实；把国王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神学信念以及自君士坦丁以来的历史都被征用来证明罗马教皇权力至高无上乃是一种篡权的行为。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言辞而已：这第二种进攻才是天才的一击。为了使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得以实施，有必要规定新的叛国罪——将由法庭施加惩罚的新罪行，而国会正是适合这类立法的机构。然而，可以说，1533年之前的确是这样说的，国会不能涉及由上帝的律法掌管这个领域，而教会法规才是上帝律法的恰当的反映。这种观点不管是实际上还是理论上都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反对，在一个国家中，唯有由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明确制定的法律才有约束力，并且，这位立法者事实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当然，这其中反映了君主专制的实质，如果有人想这样认为的话。然而，在16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很明显的是，至高无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国会中的国王手里，而不是某个单独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手里。英格兰的立法史显示出了这种走向；克伦威尔是一个训练有素并抱有偏好的议会拥护者；然而，君权问题被如此明确地提出又得到了如此明确的解答是非同寻常的，就像在那个国王崇拜时代，对国家的最高权力将逐渐属于立宪和有限君主政体抱有信心那样非同寻常。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精力和断然无疑的傲慢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尽管他们天性是独裁者，但他们决不是专制暴君，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立法。克伦威尔用和罗马断绝关系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作为宪政必不可少之一部分的国会。

所有我们涉及的国家都在明确无误地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更有凝聚力和更加巩固的国家，更强大和更多管事的政府，权力更集中的君主制。英格兰以及其余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过，幸亏英格兰历史的影响，英格兰才不至于在这个一致的方向上走那么远，所以不那么需要与过去决裂。这个时期，任何一个王国的君主专制都未获得成功；现实的困难、历史的羁绊、封建思想的残余都是拦路虎。然而，在瓦卢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的王国中，向专制主义发展的走势是明

确和一贯的；尽管有失败和退却，专制主义最终还是到来了。议会作为王室政府唯一能够调转枪口对准国王的武器停止了活动，或者说其作用降到了零。唯独在英格兰，国会远不是削弱了，反而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历程，因为国会（国会包括国王）成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往昔的二元对立被这一尽管实际上鲜有人看到的政治创举（即包容二者的最高权力机构）解决了。国会的成果是引人注目的：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政府管理的结构、程序、思想和方法已经打上了可以辨认的“现代”的印记。16世纪30年代的国会第一次向我们提供了政府大规模立法的计划、贵族院和平民院的委员会、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议会对政府的管理以及政府对选举的影响等的迹象，这是不可轻视的。19世纪才须加以改革的国会制度在16世纪已经定型了，而此时，所有其他的代议制体制都在衰退。^[11]表面上看，英格兰王室的权力也明显加大了。但是，明眼人肯定能够从中看出都铎王朝君主政体的立宪主义实质。

这些倾向和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当时人们关于国家的思想中呢？一般说来，重要的政治思想只有在重大的政治动荡中才会出现。西班牙因其国内政局异常平静，故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著作。16世纪初期，法国和英格兰关于国家的学说都曾产生过向后看的传统主义观点。克洛德·德·赛塞尔于1519年发表《伟大的法兰西君主》，他在书中认为国王在适当的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权力，但是，国王要受神圣律法、自然法和习惯法的制约。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运用法人团体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看法：国家是一个有机的、共同的单位，首脑确实可以在其中进行统治，但其他各部分成员也有其不可取消的权利。^[12]他承认，国王有权修改不好的或过时了的习俗，并且不得不同意，法国国王可以通过税收的权力来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但是，他很钦佩法国的宪政中的制衡，并坚决主张对国王使用超人类法、劝告和同意这样一些传统的制约的手段。克里斯托弗·圣杰曼是一位普通的法学家，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数《博士和学生》（1528年）最有学术价值，他同样强调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人类的法；虽然他对英格兰国王的特权范围和国会的立法权同样予以承认，但他还是保留了中世纪自然法中的保护条例，或者说，就像他（以英格兰法学家的方式）所称呼的理性法。这些人是传统的法学家，属于

老的一代；圣杰曼在八十多岁时，突然遇上了宗教改革，他赞同改革但没有理解宗教改革对其国家观的重要性。

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的著述中有一种怪诞的思想必须要提一下。1516年，年轻的托马斯·莫尔发表了他的《乌托邦》。描写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岛上王国，它除了不信基督教之外，各方面都很理想。《乌托邦》部分地是一个梦，部分地是对当时英格兰状况富于激情的尖锐批评。然而，谈到立宪问题时则显得很苍白；乌托邦既不是作者对其所熟知的英格兰进行观察的结果，也没有对英格兰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认真思索就会发现，就像所有道德主义者的建构一样，乌托邦是一个令人惊恐的社团。这本书给人以高尚、诚实，也不乏幽默（莫尔的思想鲜能如此），同时，它也使人们感到压抑、狭隘、清教徒式的古板拘谨和缺乏宽容。莫尔不同意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基督教的一条信条，不是一直牵强附会地推断出的原始共产主义，但是，他也像所有这些空想理论的鼻祖柏拉图一样，把那些陈腐的、行将就木的功利标准运用到所有人的行为中去。乌托邦人的许多社会习俗都是理性的、宽厚和明智的；然而，其政治体制所产生的总体效果可能会使一个有思想的人掉头而去。这部著作之所以享有盛誉，部分原因是由于它那激进的社会思想（尽管是建立在对英国经济问题理解不够的基础上）得到了后来的激进派的青睐；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非道德的治国之术所作的堂堂正正的抨击，但主要原因还是它那引人入胜的风格以及作者迷人的个性。撰写《乌托邦》的莫尔是人文主义者、道德主义者，而不是时事评论员；但他对周围的世界并不是漠不关心。有位16世纪早期思想家中的佼佼者对现实有深刻得多的研究。此人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13]他死于1527年，他本人的经历仅限于意大利，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在政治上犹如死水一潭，尚不能证实1560年以前，他对任何人，不管是著述家还是政治家产生了影响。^[14]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既普遍适用又狭隘，是他死后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所以，有必要在这里为他费一番笔墨。

马基雅弗利1469年生于佛罗伦萨，以出任外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以1498年到1512年任执政委员会的秘书，梅迪奇家族复辟后，他无可奈何，只得在家隐居。他的目光锐利，尽管我们必须记住，他的经历其实只限于外交，尤其是博尔吉亚和梅迪奇的意大利外交；他对

古典作品有过广泛的涉猎，并对罗马共和国情有独钟，把它看作现代意大利效法的对象；毫无疑问，他生性喜欢显得心怀恶意、愤世嫉俗和惊世骇俗，尽管他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他的有重大关系的著作是《君王论》和《李维论》。普遍认为，后者更多地反映了马基雅弗利的本色，而前者更加愤世嫉俗，较缺乏思想深度，前者写得更好，因此，一般倾向于用此书来对他进行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马基雅弗利的思想中，重要的是他的目的和方法，而不是他的结论。他想把本来就是如此也应当如此的权术传授给人们，他的经验和研究告诉他，要从道德戒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这些道德的戒律他在书本外还未能见到。他没有看到，他所描述的那些方法和技巧经过宣传后并没有什么改进。马基雅弗利真正的创见在于他的分析方法。著述家按自己对政治的解释去看现实，这一观念并不像有时候人们所说的那样新颖，但他用严格而专一的逻辑将其贯彻始终。他竭力想把他的所有理论都只建立在可查明的事实的基础上：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发生了，这就是这些事所发生的方式，这些就是它们留下的教训。这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命，因为第一，它剔除了那种关于在生活中根本不现实的看不见的法则和类似的准则的哗众取宠的空话；第二，它用目前是否有利作为标准来检验一切。马基雅弗利的问题总是：“这对眼前的目的有帮助吗？”而绝对不会是：“这是对的吗？”当然，他为此而背上了骂名，但是，当你想到正是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学家提出的问题在支配着大多数人，特别是政客们的处事行为时，他毕竟是正确的，所以，真正的政治哲学家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马基雅弗利非常清楚他的方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革命性的影响，为此他感到很自豪。尽管如此，这套方法并不像他本人和他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诱人；其中的缺陷是不能归因于这位先驱所遇到的困难的。特别是在《李维论》中，他更关心的是历史的事实而不是经验的事实，他不加批判地有选择地使用这些事实来支持某种预设的理论。对因果关系的功效和历史上的类似事件，他常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的整个方法要求有一些这样的教条，但是，例如圭恰迪尼就不一样，他在对待那些历史的先例以及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典例时抱较为明智的怀疑主义态度。马基雅弗利本人的经验并不多种多样到足以把他从他那革命性理论的狭隘运用中解救出来；他似乎从未越过军事和外交行为来探讨过经济问题或国家的结构。实际上，他对国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他考虑的只是怎样用权力来对国家进行保护。必

须明白的是，马基雅弗利对权力问题的专注是政治学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乃是一次解放。此外，马基雅弗利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分析家和观察者，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激情的人，这在他对古罗马的消亡感到幻灭和失望中表露无遗。最后，他犯了“现实主义者们”的通病：对人性太过于理性化了，结果使他过于不尊重人性，并认为只有人才有能力对他们的利益进行预卜，然后再根据这个从纯粹形式上说他们并不拥有的利益去行动。

既然对他的思想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异议，因此没有必要对他的结论长篇大论地进行评述了，总的来说，他的结论为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些相当理性但常常是短见的格言。^[15]他宁要共和而不要君主，他甚至希望这个目的能够在意大利实现，这是他理解不了自己的那个世界并且对李维保持着依恋的又一个例证。如果说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那么，他最终的地位必定是高的。不论他在实践自己的学说方面有时候多么的不足，他依然是伟大的，因为他理解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的重要性。他对人的某些行为的惊人洞见、他对权力问题和怎样保护权力的清醒认识、他拒绝建立一种体系或硬推行一种道德，这一切使他比那些让人惬意的作者高明，因为他们总是虚情假意地重复着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总是表白他们知道和传授的都是对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那些虽不那么重要但在当时更具影响的著作。法国君主政体向专制政体的发展并非没有引起国际法学家的注意，并且王权的捍卫者主要是从罗马法的学生中产生的。由于有像格拉赛这样的法学家和像比代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进行联手，才使得君主政体从过去的封建理论和宗教理论所设置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们极力主张扩大王室的特权，直到他们看见“绝对的权威”，即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君主政体的统治中出现为止。虽然像基本法这种旧时代的遗产以及[国王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进行商议的做法保留下来了，但是它们不起作用，因为王室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根本不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家开始就国王的双重权力进行区分：一是普通权力，国王在法律之下或按照法律用这项权力来执政；一是绝对权力，这项权力使他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甚至可以无视实在法。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传统的繁琐程序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而从这些

程序演绎出的结论导致的君主制和赛塞尔的君主制大相径庭。或许应当指出，这些理论反映了法国君主政体的进步；而不是它们促成了这种君主政体。不那么专制的政体的论述也幸存下来了：纪尧姆·德·拉·佩里埃尔晚至1555年才发表了他的《政治》，他在书中坚持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对此，赛塞尔肯定会从心底里为他喝彩。1560年之后，随着宗教战争的爆发，法国才出现了真正的政治危机；其主要的政治学著作当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的。

另一方面，英国的政治危机爆发于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尽管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但却产生了耐人寻味的著述。对英格兰政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和帕多瓦的马尔西里奥；许多著述家实际上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的。以下是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捍卫王权至上方面的理论著作：像爱德华·福克斯对政府驾于教会之上所作的枯燥论述《论王权与教权真正的差异》（1534年）或斯蒂芬·加德纳的《论真正的服从》（1535年）。克伦威尔的宣传班子用本国语写作使我们更感兴趣。这些人都受过人文主义的训练，且受雇于政府，他们进行著述是出于坚定的信仰，新的事态，满怀热情，这使我们想起，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确是一次伟大的对自由的呼吸。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托马斯·斯塔基，他于1535年发表了《基督教统一的劝诫》，但留下了部头更大、更有独到见解的手稿《拉普塞特与普尔的对话》；外交家和政治家理查德·莫里森，他的著作包括《整治煽动言行》（1536年）和《所有英格兰人起来保卫国家》（1539年）。他们的著作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著作，不仅是捍卫了王权至上，更重要的是坚持了立宪主义和法律至上；他们不走极端而崇拜中庸之道，并且看到了，倘若政治变革要持续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十分重要。尽管亨利八世有那样的个性，但我们找不到这些英格兰著述家中有谁鼓吹法国模式的专制政体。但是，在这样一个实际上已接受了立法权高于一切这一观念的国家，在使之理论化方面却连试探性的步子也未迈出。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的法令这一实践性理论（如果可以这样用词的话）——其前言部分含有许多最早出自克伦威尔本人的重要的政治思想——则显示出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具有连贯性的观念：这些法令不仅对国家主权的总概念作了精确的界定（《上诉法案》，1533年），而且对议会里的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的表述作了勾勒（《特许法案》，1534年）。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著述家中缺乏敏锐和强有力的思想，

才使英格兰不至于失去轻松自如和便利实效的直觉，以把握那通常是难以捉摸的“限制因素”，唯有这种直觉才能使严格的受立法约束的君权成为可以承受的，这样说也许不错。

（赵亚麟 译）

[1] “这个王权在16世纪具有某种契约性质，正在从封建王权向绝对王权过渡，到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完成了这一过渡。”参见R. 杜塞《十六世纪的法国制度》（1948年），第1卷，第36页。

[2] 见本书边码第308页。

[3] 参见本书边码第309页以下。

[4] 加蒂纳拉制定的除外；见本书边码第308页。

[5] 见本书边码第211页。

[6] 以出任圣职作为其仕途生涯之开端的这种风气是逐渐消失的，但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代便寿终正寝了。所有国家，尤其是英国，招募未受专门训练的人乃是司空见惯的。通常，西班牙和法国聘用的是军人，英国聘用的则是有教养、有抱负的绅士。

[7] 参见本书边码第309页。

[8] 见本书边码第321页。

[9] 这个法庭有数年（1547—1550年）垄断了异端案的审判权；见本书边码第224页。

[10] O. 欣策，载《历史杂志》，缩写，《历史年刊》第141卷（1929年）。

[11] 尼德兰议会的前程远大，但其历史则是一部共和主义的叛乱史，与英国“皇家”议会形式的发展截然不同。

[12] 埃德蒙·达德利是这个时期唯一一位对这种比喻持不同说法的人，他的目的大体上一样，就是要人们了解有机统一的国家概念，见他的著作《共和国之树》（1509年）。

[13] 见第1卷，边码第177页。

[14] 把托马斯·克伦威尔看成一位马基雅弗利主义者，这种陈旧的观点经不起检验（G. R. 埃尔顿：《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政治信条》，翻译，历史协会1956年）。

[15] 参见第1卷，边码第273页。

第十五章 东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

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都属于16世纪欧洲最大的王国。它们与德国、波罗的海、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接壤，用自然地理的术语，属于奥德河、维斯图拉河和多瑙河中游流域。在政治发展中它们也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它们虽然落后于西欧国家，却领先于俄国和土耳其。正是这种中心地位构成了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领主们与君主之间势力贯穿整个世纪是如此平衡，以至赋予它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一种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在欧洲远离中欧的地区正在发生的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冲突可由之得到说明。

亚盖沃王朝的“老人”西吉斯孟一世1506年入主波兰，1526年，皇帝查理五世的弟弟、已经成为其世袭领地奥地利诸国统治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登基，此二人的继位标志着冲突的开始，因为他们的前任都是懦弱无能的国王，领主们实际上是各行其是。他们继位的王国政治结构松散，仍然属于中世纪。西吉斯孟所继承的是一个甚至连名称都不叫王国的“共和国”（*rzeczpospolita*或*respublica*）；波兰王国12世纪衰落后分裂成为的6个公国，此时尚未全部直接纳入国王的治下，因为马索维亚公国直到1526年最后一位公爵死后没有继承人才并入波兰。直到1525年，东普鲁士才完全向波兰国王俯首称臣，即便是在此时，霍亨索伦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作为波兰的封臣也几乎享有他当条顿骑士团大统领时同样大的权力。此外，和一般的主权国家不一样，西吉斯孟的领土有一半以上即立陶宛大公国直到1569年建立卢布林联盟后才与波兰王国进行组织上的合并。

斐迪南1526年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后所继承的领地是一片更松散的版图。严格来说，它们是“圣·瓦茨拉夫王室的领地”，包括波希米亚王国的捷克领地和摩拉维亚的侯爵领地、一打左右的波兰—日耳曼西里西亚公爵领地、分属上、下卢萨蒂亚的两个独立的文登—日耳曼公爵领地以及各式各样像海布（埃格尔）、克拉克茨科（格拉

茨）、洛凯（埃尔博根）和奥帕瓦（特罗保）这样一些孤立的和未归化的公爵领地和贵族封地。斐迪南的匈牙利王国是三者之中最松散的，因为“圣·斯蒂芬的王室领地”显然还可分成两个王国即：匈牙利王国和克罗地亚王国。匈牙利境内还有一个难归化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这个公国本身又是由三个实行部分自治的马扎尔人、日耳曼人和塞克勒人的“国家”组成的。克罗地亚包括3个独立的部分：达尔马提亚、中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欧洲这个地区在16世纪的共同特征就是地主们在经济上享有并加以利用的巨大的优势。这些地主不管其地产是多还是少，都是贵族。这个阶级在波兰称为*szlachta*，在波希米亚叫作*šlechta*，在匈牙利则名曰*köznemesseg*，它不受制于任何统治者，也不受长嗣继承制习俗的约束，它清楚自己拥有的权力，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能为自己谋利的特权，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大权的独揽，在中欧占据着统治地位。地主和王室、教会以及市镇拥有所有的土地，随着该世纪时光的流逝，世俗地主的份额也在稳步增加，其来源有王室土地的抵押、教会土地的充公以及对市镇土地的强取和没收。所以，封建法理学家，如维尔伯齐才能断言，“国家”，不容争辩也无须证明，等同于王室和地主。^[1]贵族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地方议会或郡议会体现出来的。在波兰它们被称为“小议会”（*sejmiki*），通常每一个伯爵领地都有一个小议会，全波兰有37个，立陶宛有12个。议员清一色地都是地主。色姆米基并不是地方行政和司法的常设机构，波兰的行政和司法乃由王室委任的地方官员行使。它们的功能基本上是议会性质的。王室直接向它们下达推选省议会或国家议会的命令；于是，“前议会”（*przed-sejmowe*）色姆米基便着手向下议院推选领薪代表，然后根据国王召开议会的令状下达的议事日程的一般方法加以批准。之后，色姆米基代表共6人便召开省议会，共同制定为本地区所奉行的政策，以便在国会中加以捍卫。国会解散后，代表们便向本地的“听取汇报的”（*relayine*）色姆米基汇报，然后由色姆米基采取措施来实施已颁布的法律，批准税率比事先由“前议会”色姆米基所同意的更高的税收，并任命官员到伯爵领地上去收税。

波希米亚的地方议会（*sjezdy krajské*）与波兰的差不多，只是权力没有那么大。在1439—1458年这段空位期，波希米亚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议会（*lamdfridy*）的权力极大，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

财政，自从波德布拉迪的国王乔治推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之后以及亚盖沃王朝实行寡头政治时期，地方议会的这些权力被剥夺了，到斐迪南当政的时候，它们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选举议会成员和地方官员以及规定如何执行法令了。斐迪南还规定，禁止地方议会在没有王室诏书的情况下召集会议，违者处以死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议会的权力。在匈牙利，郡（*megyek*）的地位和权力截然不同，因为斐迪南急需得到贵族们的支持，以战胜他在内战中的敌手约翰·扎波利亚和他的继任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及其宗主国土耳其，因此，他不敢贸然侵犯贵族们在地方自治中享有的特权。的确，一直到1867年缔结奥匈协约时，匈牙利郡的存在或许正是哈布斯堡匈牙利维持其相对自治地位的最好保证。匈牙利郡法院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集会，而是由各郡的贵族议会（*megyegyűlés*）推选出来的永久性委员会，具有司法、行政、经济和财政的功能；郡议会不仅像波兰的色姆米基一样具有选举的职能，而且也是有效的地方立法机构。

16世纪中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会或议会，在国会里，各王国的3个等级（*Stany, Stavy, Rendek*）不时参与——通常和国王一道——行使最高职能。3个中欧王国的这类议会中有很大部分同时既是握有重权的象征，又是软弱无力的标志。波兰有王国的大议会（*sejm walny*）和大波兰、小波兰、库亚维亚、皇家（西）普鲁士、1525年合并后的公爵（东）普鲁士以及马索维亚等省议会，马索维亚直到1526年公爵的后裔中无继承人之前，一直是一块独立自治的封地。立陶宛在1569年卢布林联合前一直有自己的议会，但在联合中并入了波兰的议会（*sejm*）。在“圣·瓦茨拉夫王室领地”，波希米亚王国议会（*snem*）拥有一些统治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有大部分权力留给了摩拉维亚、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上卢萨蒂亚和下卢萨蒂亚的议会。还有海布、洛凯、奥帕瓦和克拉茨科的自治议会。有时，为了举行加冕典礼，处理公共秩序中出现的危机（1511年、1518年），多数场合下是为了补贴土耳其战争的费用（1530年至1595年之间共爆发了11次战争）才召集大议会，其代表来自波希米亚王国的所有议会。但是，各地的等级议会不无怀疑地都把如此大规模的议会看成是王室进行勒索的工具，没有人试图把它发展成一个捍卫全波希米亚国家复合体主权的永久性机构。在“圣·斯蒂芬王室领地”，也存在着许多议会。匈牙利王国等级议会在内战中一分为二，斐迪南的支持者通常在波若尼（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开会，扎波利亚的拥护者

则在布达佩斯集中；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有自己的议会，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独立于匈牙利国王和议会的；克罗地亚王国在它那部分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国土上存在着3个议会：萨格勒布议会、达尔马提亚议会和斯拉沃尼亚议会。有趣的是，人们习惯于把斐迪南看成是议会政府的敌人，然而正是他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全部领地上创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议会。1528年，他下令要各地的议会在布尔诺召开一次共同的或联合的议会，竭力使奥地利货币在他的所有领地上流通；类似的等级议会于1530年和1541年还在林茨召集过，目的是为土耳其战争提供经费。由于波希米亚人拒绝参加在其国界以外召开的任何会议，斐迪南力图于1534年和1541年在库特纳霍拉（库滕贝格）或布拉格利用大会的形式来召集议会，但是，匈牙利人要么不到场，要么拒绝提供津贴。由于各民族议会之间的相互排挤，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上建立大议会的机会失去了。

16世纪中欧议会的组织成分说明，地主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实质上都是等级会议，但是，不论会议在何处召开，只有一个等级是必须在场的，并且议会通常也是由这个等级构成的，这个等级就是贵族。国王不管他是本人亲自到会，还是由别人代理出席，都算是议会中的一个等级。但是，如果国王死后无男性直接继承人或继承人年幼，那么议会无须王室召集令便可召集会议，实施国王选举法案。贵族在任何一个议会中都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势力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很难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因为权贵与绅士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反映在议会中就是两个议院（*curiae*）并存。波兰议会包括一个上议院，即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izba poselska*）。参议院的成员有天主教的大主教和主教、省总督（*wojowodowie*）、城堡主、王室最高军务官和宫廷法官、国王的秘书、副秘书长和司库。在1529年以前，参议院有87名议员；从1529年到1569年，由于马索维亚封地不复存在，议员数增至94人，与立陶宛合并后达到了140人。严格地说来，波兰参议院是由王室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由王室任命的高级神职人员组成的一个团体，但是，因为这些官员和高级神职人员中，除了少数几个新贵（*novi homines*）和王室的宠臣外，全部都是来自大贵族家庭，所以它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利益并执行其寡头政策的议院。参议院表决由议员逐个进行，很可能执行多数票通过原则。波兰议会下院除了克拉科夫市以及1569年后威尔诺的代表外，乃是清一色由什拉赫塔（*szlachta*）组成的议会。每一个贵族出身的成年男性都有权进入下

院并参加投票，只不过因为耗时又耗资，多数人才敬而远之。在16世纪早期，下院半数的成员要由参议院指定，但从1520年起，中层贵族对此举发起挑战，1540年后，这种做法显然终止。1520年公布的一项条例规定，下院的议员由色姆米基推选，国王同意支付每个选区6名代表的费用。尽管西吉斯孟二世竭力控制议员的人数，但议院的规模还是在不断地扩大，1504年为45人，1553年为93人，1569年为110人，1570年扩大到158人。被选上的成员一定要出席会议。有证据说明，重要的宪法如1548年、1553年、1563年和1565年的宪法都是由多数票决定的。但在处理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则出现了一种不幸的趋向，寻求全票通过，或者至少无反对票。但那时还没有否决的自由，尽管单独的sejmik（“色米克”，议会）可能有，有时的确拒绝承认某项法规适用于本地区。

波希米亚议会（*sněm*）是三院制议会。显然上院就是贵族院；每一个“潘”（*pán*）只要被上院承认为贵族，只要祖上至少四代为贵族，就是上院的成员；所以，它和波兰的参议院不同，其成员不是王室的大臣或地方行政长官，它属于最富有的地主，是可以增补成员的议院。它的成员中没有神职人员，因为在胡斯战争的暴风骤雨中，波希米亚的主教团已经消失，直到1620年后才恢复其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斯内姆中的二级院（*curia*）是绅士院（*vladykové*），或者像后来所称的骑士院（*rytíři*）。每一个有盾形纹章的绅士只要拥有一份地产，且名字被列入土地册中便有权在议院享有席位和投票权。这样的贵族家庭大约有1500个。但是，议员得自己维持生计，因此就和波兰的情形一样，只有较富有和较显要者才去出席会议。家境较贫寒的贵族在本地区的议会中选出2至6位代表，他们在议会期间靠领取国王的薪俸为生，但是，每一位贵族都有权参加议会。1526年后，斐迪南设法阻止推选贵族进入议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二级院实际上已为中层贵族中较富有者所垄断。议员人数通常在100人至200人之间，从未超过300人。波希米亚议会中的第三院由自由民组成。这种例外现象乃是波希米亚王室领地上城市力量较强大和富庶的标志。他们在胡斯战争期间获得和巩固了自身在斯内姆中的地位，虽然贵族曾经在1485年至1508年间成功地将他们排挤出去，但后来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议会。斐迪南一世因为他们在1547年的起义中所充当的角色而把他们的代表降到仅仅为王室议会充当顾问的地位，以此进行惩罚，但他们的力量已足够强大，因而能从这一惩罚性措施中坚持下来。所

以，到1564年国王死时，市民等级又成了议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恢复了它从前的地位。30个国王城市和6个“女王”城市派出代表加入波希米亚议会，6个国王城市派代表进入摩拉维亚议会。^[2]市民议员由市镇议会委派并付给薪水；小城镇有时会同意由毗邻的大城市代表。波希米亚议会中的三院自1440年起便开始独立进行商议，事务的决定都以多数票为准。法院的最终通过要由三院全体会议决定，每级议院有一票，三票必须完全一致，法案方才有效。

匈牙利议会（*Országgyűlés*）是16世纪中欧最纯的贵族议会。它由两院（*tabulae*）组成，其中上院是一个小型议会，其成员包括显赫家族的头面人物，按照惯例，单独地召集他们举行会议；还有两名大主教、若干主教以及大宗教议院的几位主持。由于大多数国家重要职位由高级神职人员或权贵们充任，匈牙利的上院和波兰的参议院一样，也有许多类似寡头政治的特点和偏好。下院（*tabula inferior*）则是一个成分不明的议院。16世纪早期，下院都是逐个召集贵族们开会，但由每个郡推选代表的做法逐渐流行起来。1552年，国王宣布，他不想因为出席议会而给绅士们带来开销上的负担和麻烦，遂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但有些人迟到1572年还单独接到邀请，尽管是最后的一次。匈牙利的城市在议会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上匈牙利有8个“自由”城和两个“矿业城”（*bányavárosok*）派了代表，但是这些代表就算全部到齐也构不成独立的议院，只能夹在下院的绅士之中。

虽然，波兰王国、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等级议会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机构，但在许多方面，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匈牙利，斐迪南一世和匈牙利人民一样受到土耳其人永久性威胁的影响；他需要从领主的农奴和市镇那里获取税收，就像领主们需要哈布斯堡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免遭苏里曼及其帕夏们的攻击一样。斐迪南也不敢冒犯匈牙利贵族和自由，以免把他们逼到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对手的阵营中去。出于这个原因，16世纪匈牙利的宪政史与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宪政史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都处在一个国王和议会相互利用、相互合作，又不断发生摩擦、搞得双方都不愉快的时期，但两国之间又有两点大不相同。在匈牙利，地方政府掌握在由贵族组成的郡议会手中，而不在国王委任的向枢密院负责的官员手中，并且国王还是选举产生的。这两点正体现了匈牙利王权的脆弱，斐迪南对此是清楚的。毫无疑问，他很想削弱议会的权力及贵族的议事

权，但他至多只能使国家中央行政机构服从于他在维也纳的君主权力工具的权威而已，因为他太需要他们的支持了。在这一有限的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匈牙利的国王会议无事可做，所谓国王顾问的头衔只是一个荣誉的称号而已。1528年斐迪南按照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模式改造过的国王财政部由于1528—1531年的土耳其人造成的危机而休会，之后又重新恢复，名为财政管理署，仅负责维也纳宫廷会议厅（Hofkammer）所下达的预算，根据1548年和1561年的法令，除了关税和贸易管理方面某些特定的事务，它所做的一切都要听令于宫廷会议厅。为了把匈牙利政府置于维也纳的控制之下采取了一项更为有效的措施：1532年到1554年间中止了匈牙利巴拉丁（*nádor*）职位。1554年，斐迪南对议会推举才能卓著、忠心不贰的托马什·纳达斯迪为巴拉丁一事的确未加干涉，但在他于1562年去世之后，斐迪南便不愿再委任继任者。巴拉丁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和首席长官”，乃是大法官、议长以及“贵族和皇帝之间的官方调解人”，确实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为斐迪南的个人目的所左右。所以，斐迪南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委任的是无权指挥匈牙利军队的副大臣（*helytartó*），而不是巴拉丁，他任命的两位副大臣埃莱克·图尔佐和帕尔·瓦尔道伊大主教下设一个政务会，这个政务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斐迪南统治期间维护匈牙利的国家地位和司法独立。

斐迪南一登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便着手对维也纳国家中央机构实施改革，使它们成为为其所有领地制定政策和进行审议的机构。这些中央部门无一例外都是由斐迪南的日耳曼大臣和官员们把持着，尽管有些部门设有负责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事务的秘书或委员会。它们分别是宫廷大臣官署（*Hofkanzlei*）、就财政问题给地方下达指令的宫廷会议厅（*Hofkammer*）、宫廷议会（*Hofrat*）以及至关重要的枢密院，枢密院有4名至5名成员，都是日耳曼人，负责就对外政策、国王的个人和家庭事务向国王提供建议，并为匈牙利议会、波希米亚议会以及其他议会制定议事日程。

斐迪南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君主制国家具有的选举[国王的]资格。1526年，摩拉维亚议会承认他的妻子、国王路易的妹妹安娜为合法的继承人，但她把权力让给了斐迪南；西里西亚议会接受他为“世袭的和推选国王”。但波希米亚议会只是从一批候选人中把他推举出来，并坚持要他发表一份声明（*revers*），宣称他是议会自由

选举出来的，他的继承人在他加冕以前不能成为国王，并且任何外国继承者必须在边境上起过誓后，才能进入王国。在加冕典礼的誓词中，斐迪南不得不起誓保护波希米亚议会的“规程、权利和特权”，不得让渡王国土地上的一切。1526年，斐迪南在匈牙利的最初阶段的地位甚至更微妙。扎波利亚已被大多数领主推举出来，为了站稳脚跟，斐迪南不得已在普雷斯堡选举会议上同意，维护王国的法律和习俗，不让外国人进入匈牙利议会，不把地产赐给外国人。就像在波希米亚已经做过的那样，斐迪南一当选便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自己的王位是真正的自愿的选举的结果。斐迪南居然能把自己统治期间这不称心的一页涂抹掉，是他对哈布斯堡王室之能够凌驾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之上的贡献。1539年，他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要匈牙利议会承认，他是凭世袭权获得的王位；这项要求未获通过，但在1547年制定的法案中，匈牙利议会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们“让自己不仅接受国王陛下本人，而且永远接受其继承人的统治和权力”。斐迪南在其生命临近结束时要求，马克西米连应当为王，不用选举；议会虽然表示反对，但并没有坚持。1563年，议会同意马克西米连在父亲的生前加冕。对此，议会只提了一个条件，即推选一位巴拉丁，国王连这点要求也未满足。

斐迪南为使波希米亚王位世袭化所作的努力更为清楚地显示了他那富于忍耐的机会主义精神。在他当选国王的那一年，那些腐败和愚蠢的波希米亚权贵们就曾诱使斯内姆宣称，只要斐迪南起誓保护“这片土地的自由”，他的成年子嗣就可以在其父的有生之年加冕。1541年发生了一起很快就为斐迪南加以利用的意外事件，载有国家所有庄严法案的波希米亚土地册被大火烧了；编纂新册时，斐迪南设法让他在1526年承认自己只是一位当选国王的那份声明漏编。于是在1545年，斐迪南便尝试性地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他草拟了一份声明，声称“波希米亚议会承认和接受安娜女王作为其兄路易的继承人，并出于自由意志和善意，推选和接受斐迪南”。议会敏锐地察觉到其间所蕴含着的威胁，不同意把这份声明收进新的土地册。1547年的叛乱是1618年以前波希米亚宪政史上出现过的最致命的危机，叛乱的失败却给斐迪南创造了更好的机遇。1546年，德国酝酿已久的冲突导致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爆发。斐迪南力图说服波希米亚议会同意出人出钱，帮助他去向德国的新教王侯宣战。但是波希米亚的领主们却一反常态，不合时宜地轻率作出决定，支持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还

未等他们为此叛逆的目的把队伍拉起来，腓特烈在米尔贝格战败和被俘使整个波希米亚行政区任凭斐迪南摆布了。斐迪南利用这次机遇的手腕，最充分地展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机敏和狡猾。因为这位国王很清楚，只要他对那些领主们出于宗派和经济的缘故加以嫉妒的团体进行镇压，就会得到领主们的支持，于是就把波希米亚兄弟会和城市当作冒犯了他的领主们的替罪羊。为此，他颁布了驱逐兄弟会的法令；剥夺了城市的自治权，用王室委任的hejtmans和行政长官（rychтары）取代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并没收了他们的不动产。通过对有罪的领主实行赦免，并声明“国王陛下无意于采取对议会的自由和特权造成影响的行动”，斐迪南赢得了领主贵族的支持。概括地说，他利用1547年的胜利迫使愚蠢的领主们把1545年的那份声明塞进了1549年的“土地法令”，并宣称他对“波希米亚领地拥有的特权包含以下原则：任何一位国王的长子在其父去世后都将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同年，波希米亚议会顺从地接受马克西米连二世在其父尚在人世时为世袭而非选举的国王，就像后来在马克西米连死前两年同意并宣布他的儿子鲁道夫二世为王一样。

16世纪波兰的宪政发展并未使王权得到任何强化，有如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者在波希米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匈牙利强化王权那样。的确，1572年亚盖沃王室的消亡以及随后安茹的亨利和斯特凡·巴托里试图在波兰王位之上建立瓦卢瓦王朝或特兰西瓦尼亚王朝的失败使波兰处于贵族当道的无政府状态，波兰也因此而成为政治无能的代名词。这并不是说西吉斯孟一世（1506—1548年）和西吉斯孟二世（1548—1572年）无能，也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16世纪赋予欧洲统治者们的重任。实际上，西吉斯孟一世本人就有独裁者的气质，他在其第二任妻子即那位把米兰暴君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带到克拉科夫的博纳·斯福尔扎的唆使下，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争斗。他的儿子西吉斯孟·奥古斯都至少在1562年以前也是如此，之后他似乎不得不与什拉赫塔分享他的权力。

在世纪之初，波兰君主的宪法地位就已经是不牢固的卡齐米日四世（1446—1492年）当政期间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开疆扩土方面，而不是在国内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了实施他的西里西亚和普鲁士计划，他向什拉赫塔做了许多让步才换来议员们的支持。他的两个儿子约翰·阿尔伯特（1492—1501年）和亚历山大（1501—1506年）不是

按长嗣继承制（他们还有一位哥哥叫弗瓦迪斯瓦夫，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而是靠不得已的妥协被推选为国王的，因为统治的时间太短，加上战争灾难不断，所以他们不可能阻止为寡头所把持的上院的权力的扩张。被称作新宪法的著名的亚历山大1505年宪法通过了下列准则：“从现在起，在没有获得议会和领主贵族代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继承者都不会推出任何有损于共和国，或者给私人带来伤害，或者导致基本法和公众自由发生改变的新措施。”

老人西吉斯孟是卡齐米日5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位，是他们中第三个登上波兰王位的人，所幸的是，与前两位国王相比，他的性格坚强，政治领悟力敏锐，并且在位的时间长；他还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这也是两位前任所缺乏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1530年，当小西吉斯孟还只有10岁时，博纳王后和她的丈夫便诱使色姆推选他为波兰国王，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轻而易举地接过父亲的王权。但是贵族们很快便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愚蠢。他们不停地纠缠西吉斯孟一世，大吵大闹，要求他们的所谓的“法律的完成”。贵族们提出的这项著名的方案最初是在1520年的比得哥什（布罗姆贝格）议会上宣布的，方案要求召开全国性司法会议（conventus justitiae），收集所有的法律，把它们统一起来进行修改，编纂成典，然后付诸执行；正是这一方案的内容使所有贵族的特权获得了永久的法律效力，而这些特权都是他们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从君主手中争取过来的。这项方案还要求王室重新购买它所让渡的土地。为了解除教会法庭对什拉赫塔所拥有的裁判权，议会也不断地施加压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首次重大的成功是1538年和1539年在彼得库夫和克拉科夫召开的国会上获得的，西吉斯孟一世在会上被迫答应，他将永不违法，也不主动地颁布新的宪法，同时还被迫宣布，1530年对他儿子的王位选举是不合法的，等小西吉斯孟死后，新的国王将由全体贵族参与选举。为此，西吉斯孟唯一所保住的就是，他儿子定于1548年继任王位一事无须再作决定。

西吉斯孟二世·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正值现已大多皈依了新教的贵族争取发展和要求权利以及为立窝尼亚和白俄罗斯与伊凡雷帝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和劳民伤财的时期，所以他没有闲暇也没有机会去成功地解决宪政冲突的问题。1562年，他承认自1504年以来非法让渡的王室土地之“完成”。1569年，当波兰的王室与议会和立陶宛大公国按照

卢布林联盟协议达成统一时，他未能阻止波兰什拉赫塔将其自身在法律和经济上拥有的特权向整个广大的立陶宛公国扩散。西吉斯孟·奥古斯都死于1572年，没有儿子继承王位，王位只得由那些现已权力至高无上的贵族们来进行拍卖。他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取得了成功，却带来了灾难，迫使由他们挑出来的候选人安茹的亨利态度坚决地许下诺言，尊重所有他们已获得的所有特权，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方面的权利，极其明确而详尽地规定在以下三个文件中：《聚会协议》、被称为《华沙联盟》的宗教宪章以及《亨利条例》。最后一个文件在关于不服从的条目中对什拉赫塔所取得的胜利作了总结：“如果国王的行为触犯了这些法律、特权、条款和条件，或者不落实它们，那么他就解除了贵族对他的服从和效忠。”紧接着王朝遭受的灾难又进一步巩固了波兰贵族的胜利。安茹的亨利在波兰只待了几个月，为了抓住机会继承其兄查理九世成为法国国王，1574年他离弃了令他感觉不自在的波兰王位。他的继任者是被选为国王的特兰西瓦尼亚王子斯特凡·巴托里，因为忙于和俄国打仗，新国王对波兰新教社团的打击只是开了一个头；1586年他去世时也无子嗣。什拉赫塔遂推选西吉斯孟三世继承王位，是为瓦萨王朝三位国王中的第一位。但是为时已经太晚。波兰已为少数土地所有者所牢固控制，丧失了按它的版图、财富及民族资质本来可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机会——倘若16世纪的这场阶级和民族的冲突是由不同的因素所确定的话。

在本章所讨论的三个国家当中，只有波兰人从学术上进行了尝试，试图对贵族的习惯做法进行合理的解释。与捷克人或马扎尔人相比，波兰的显贵和国家官员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学者的联系较为密切，捷克人的异端运动长期以来割断了他们与西方学者的联系，而马扎尔人则由于文化上较落后且全神贯注于对付土耳其人造成的危险，也少有和西方学者交往。马扎尔人和捷克人的政治理论几乎只有从像弗谢赫德的维克托林·克内尔和伊斯特万·维尔伯齐这样一些16世纪的布雷克顿^[3]所撰写的“法律书”中才能找到。克内尔的著作《关于波希米亚国家的法律》是在1508年最后成书的。里面有大量关于土地法庭（zemsky soud）的司法方式及土地登记（zemské desky）的法律程序的描述；克内尔在这两个地主的核心机构里都发现了弊端，并提议对它们进行改革；他是土地登记部门代理书记员，他怀着一份律师和一位官员提高效率的愿望着手探索过这些问题，并且希望废除领主的那些较为恶劣较为专断的特权。至此，此类论文中最著名也是最重

要的法律论文要数伊斯特万·维尔伯齐的《匈牙利王国习惯法三编》，它是应匈牙利国王乌拉斯洛（弗瓦迪斯瓦夫）的要求编纂的，并于1513年得到了国王的认可。虽然它从未被议会通过，不具备法律的有效性，但逐渐对法庭的判决却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并在其后三百多年中一直是匈牙利宪法和私法的基础。该文基本上涉及的是不动产法，拥有大量篇幅的第一部分全部用于论述继承法、没收法、契约法、遗孀法和监护法，这些显然都属于习惯法的范围。维尔伯齐不加论证便承认了不动产所有权的来源与合法性以及因这种所有权而拥有的贵族地位是君主的奖赏，同时他们之间借以建立了一种相互关系：“因为君主只能由贵族选举，而且贵族从君主那里获得贵族的尊严。”《匈牙利王国习惯法三编》的第二部分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在开头还讨论了立法的权威性，对此维尔伯齐认为，基本法（宪法）只能由君主和人民共同制定，并且这样的法律“首先用来约束按照人民的要求向人民公布法律的君主本人，根据这条原则：‘[君主]须恪守你自己所定的法律’”。《匈牙利王国习惯法三编》的第三部分论述下属的立法机构：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各郡、王室和议会的市镇以及行会。全书的结尾部分陈述了农奴（jobbagiones）的法定地位和司法地位，书中认为，虽然农民过去曾有改变居所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因为最近的叛乱已被剥夺，如此叛逆行为致使他们成为从属于他们的地主的完全和永久的农奴。

波兰的贵族老是抱怨没有人像维尔伯齐对匈牙利人所做的那样为他们的自由和特权作出权威的阐述。在议会要求“法律的完成”的鼓动下，波兰的政论家和文职官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演讲，贯穿一致的中心思想就是议会至上。其中最具才华的大概是那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该著作是斯坦尼斯拉斯·奥热霍夫斯基以《忠实仆人》为标题献给1549年新登基的国王西吉斯孟·奥古斯都的。在点明其主题“骑士制度是王国的根基”之后，他继续说道：

国王是为王国而挑选出来的；但王国并不为国王而存在。这是因为法律——王国的灵魂和精神——的权力毫无疑问大于王国，自然也就大于国王……因此，如果有人像古罗马公务员特里波尼安和乌尔皮安那样阿谀奉承，说你在你的王国里是至高无上的，你可不能听信，并且要告诉他，是法律在统治你的国家。

奥热霍夫斯基用相当肯定的口吻说波兰是唯一的自由的发祥地。他在1553年出版的《致波兰骑士》一书中问道：

你能告诉我，除了波兰，你还看到过或者听到过哪个国家是自由的吗？……你的血肉同胞波希米亚人在他们的法律中还剩下多少自由呢？……我看英格兰也没有自由，因为它把自己的两道伟大的光芒上议院议员罗彻斯特的约翰主教和托马斯·莫尔送上了刽子手的行刑台。

波兰在16世纪宪政实验的激励下在政治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当数安杰伊·弗里茨·莫杰夫斯基的《共和国的改革》，此书写于1551年，1558年出版。它一开篇就列出了西塞罗关于国家的定义以及一部理想的混合型宪法的定义。国王应当通过选举产生，而当选的条件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对统治艺术的精通：

因此，既然波兰的国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按各阶层人民的意志选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无权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制定法律或者随心所欲地强迫别人缴纳贡金。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征得各阶层的同意，都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除非得到骑士等级和参议院的批准，否则就不能制定法律。因为议会的职责是使国家免于王室暴政的威胁，所以阻止寡头特权的非法横行就成了国王的责任。莫杰夫斯基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抽象的理论；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来阐述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所具有的实际功能：提供教育，控制贸易和关心穷人。其中关于国家有职责修建济贫院的那一章（第18章）好像是埃德蒙·查德威克本人的手笔。使莫杰夫斯基良心不安的是，波兰与德国相反，仍然允许农奴制的存在。他不止一次地重申，法律不只是贵族的特权，它对任何人都必须是平等的：

“如果我们取消农奴向他们的领主讨个说法的权利，我们就剥夺了他们的所有自由。如果我们给予领主们以其自己的理由对他们的农奴进行审判的权力，我们就破坏了公正判决的原则。”在《共和国的改革》的结尾，作者慷慨激昂地对财政制度发起了攻击，领主们自己不纳税，都把整个国防费用强行摊到那些可怜的农民身上。莫杰夫斯基深信，波兰共和国的这部和谐的宪法如果能够消除其不公正的部分，波兰就能成为最完美的国家；这一信念可以说是中世纪欧洲的送葬辞，但它本身也包含着这样一个国家理念，即公正是高于一切的，公众的利益是政府和法律追求的最高目的。

德国宪政发展纪要^[4]

1519年，查理五世花费了大笔钱财并作了大量允诺^[5]之后被选为皇帝，登上了哈布斯堡王朝独占的皇位，而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

国在此之前早已不成其为一个政治实体了。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消亡，德国16世纪狂热的民族主义重新点燃了帝国复兴的希望。路德及其追随者就从未停止过呼吁德国的统一。即使是那些王侯对皇帝以及帝国这个概念的忠诚也还是相当真诚的，虽然不得不承认，一到紧要关头，这种感情被领土独立和宗教纷争所压倒。如果查理的抱负只限于“日耳曼”而不是“全世界”，那么也许另有一番景象。他既不可能把德国看作自己的国家，也不可能看作其领土的中心；虽然他本人对帝国这个概念怀有深度的信念，但在他的脑海里，帝国不是一个明确的日耳曼人的帝国。有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作为一个讲法语的勃艮第人，统治着如此广大和众多的领土，仰仗西班牙而不是中欧获得他的基本权力，他有什么理由要把自己视为日耳曼人呢？当人们对那些至今为查理未能做一个十足的日耳曼人仍然耿耿于怀的人不予理睬的时候，也必须认识到，查理在利用帝国的威严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日耳曼国家方面尤其不够格。

当然，这个错误远不是他一人酿成的。在他祖父的时代，通过体制改革来使帝国成为现实的各种各样的尝试达到了高潮。^[6]但无论是通过建立一些共同机构，还是通过把议会变成实现统一之工具的尝试，以及通过在王侯领地和帝国（“各行政区”）之间建立一些中间部门的权宜之计都没有收到任何成效。1521年，当查理离开德国赴西班牙时，建立帝国的统治的思想复活了；他的弟弟斐迪南奋斗了将近10年才把摄政王掌握的进行民事控制和军事控制的脆弱工具建成实实在在的机构。议会的反对加上施瓦本联盟对其指令不屑一顾使这项计划遭到破坏，1530年左右便任其销声匿迹。1559年，斐迪南继承帝国皇位，他终于成功地设立了一些多少还算有效的帝国机构：一个帝国大臣官署，由一位在以后的历史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首脑（副总理）负责；两个法庭即：皇家枢密院和帝国枢密法院，由于采用罗马法而对后来的德国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到这个时候采用这样一些乏力的权宜之计尽管能满足奥地利王室的利益，却再也无助于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

帝国议会的失败是不那么可原谅的。它不仅是改革派1500年左右选中的工具，而且由于它实际上把德国所有强大的利益集团聚集一堂，从而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合作与结合所作的重大努力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舞台。实际上，帝国议会（Reichstag）主要是用作王侯们对抗皇

帝争取独立的武器。从1497年起，议会作出的决议几乎都是以法令（Abschied）的形式下达的，这是皇帝与议会之间达成的协议；查理五世试图把议会当作皇权的工具，用它来签发皇帝的决定，这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行不通的。议会的章程同样是有利于王侯独立的。实际上是选帝侯这一等级在决定一切；就连王侯等级也几乎没有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至于下层贵族帝国骑士（Reichsritter）——自弗朗茨·冯·济金根骑士战争（1522年）失败之后就已经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或帝国城市，在这些封地统治者把持的会议上，他们的呼声从未有人认真听。虽然只是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之后，帝国议会的会议才成了由各公国派外交使者参加的代表大会而不是各等级的会议，但这种倾向老早就露出苗头了。因此，帝国议会由那些赞成独立自主而非倾向联合的人把持着。在西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代议制机构总是对强有力的国王的中央集权政策有利的；而在德国，皇室的衰弱和议会的非代议制特点结合在一块，摧毁了这一时期在巩固王权方面最有力的工具。

地方同盟与级别较低的同盟是带来较好结果的希望之所在。1500年的行政区组织，尽管维持下来而且后来在行政管理上有一点重要性，但在剥夺独立封地的主权方面从来都不是必不可少的。而像15世纪后期在皇帝的鼓励下建立起来的重要的施瓦本同盟这样的组织虽然志向不大，但看起来似乎更有作为。为了在德国重要的西南地区保持帝国的和平（Landfrieden），同盟在此部署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马克西米连和查理有时对这支军队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它不仅吸引了城市以及一些下层封建领主的支持，甚至获得了一些王侯的拥护。最后连巴伐利亚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但是，像乌尔姆和奥格斯堡这样一些使公爵大伤脑筋的城市却进入了同盟的领导层。同盟最辉煌的岁月在这一时期之初就来到了。1518年至1519年，同盟轻而易举地就战胜了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1519年，在法兰克福城外安营扎寨的同盟军队被认为对查理五世的当选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从1523年起，同盟对帝国的统治的命令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向多瑙河上游和莱茵河上游迂回。但是，济金根的背叛使同盟丧失了一位重要的指挥员，也丧失了帝国骑士的支持，1530年之后，同盟就解散了。

虽然如此，施瓦本同盟仍树立了一个榜样。1530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成立^[7]后，同盟的数量便开始成倍增长，各种同盟如此之多，以

至当黑森的菲利普被要求加入重建的施瓦本同盟时竟然回答说，他归属过的类似的同盟实在太多。然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证明，部分结盟的原则很容易造成帝国的分裂而不是促进帝国的统一。在以后的岁月里，查理五世总是忘不了1519年施瓦本同盟拥有权力时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他把实现统一的计划依然奠定在同盟的建立上，于是，1547年他打败新教徒之后，便把谈判的注意力引向他建立大日耳曼联盟的倡议上来。这一切并没有结果：就像施瓦本同盟已经证明了那样，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希望在于其基本成员势力的不断强大，而不在于拥有封地的王侯，但是到1547年的时候，这些基本成员，不管是帝国的城镇还是下层贵族，都已经衰败了。一个个统治者的分裂野心战胜了所有旨在统一的尝试。在王侯们，尤其是各选帝侯看来，查理的目标受改革思想和外来思想的制约。当他们宣称要维护由来已久的特权，反对皇帝实行中央集权时，他们并不完全是虚伪的，但他们的确给古老的帝国敲响了丧钟。1550年以后萨克森的莫里斯领导的反查理联盟，皇帝之战败和蒙受耻辱，帕绍条约的签订（1552年），最后，1555年的谈判——就像是在各独立的君主之间进行的——结束了德国史上的这一时期，本来它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由于查理五世的努力才又回光返照，苟延残喘了一阵。

查理五世的努力曾经从那最终将肯定导致德国分裂的事件中获得过惊人的支持。乍一看，宗教改革运动一定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它将使统一的一切残留的希望破灭。然而通过关于宗教以及宗教统一性的冲突，宗教改革增添了一种新的不和的成分；宗教改革更加坚定了一些王侯维护其自由的决心，因为他们认为，新信仰的持续存在有赖于此；虽然路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宗教改革最终却湮没了这种激情。当1529年的新教徒拒绝接受帝国议会大多数成员做出的决定时^[8]，他们在法律上虽然拥有充分的理由，但否定了帝国古老的传统并永远地摧毁了对议会仍然抱有的一切希望。这样一来，由于宗教改革成功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并在其过程中强化了德国的独立自主精神，所以宗教改革在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明确的。但一度它也可能导致出人意料的效果。正是因为宗教纷争的爆发，才使查理五世行动起来并一直在战场上为其德国领土的近乎统一的东西而战斗；否则，他很可能会满足于让斐迪南按照与王侯们和其他等级达成的半心半意的协议管理国家事务——这是马克西米连统治后期的特点。同时还应当看到，查理本人精明、果断而有毅

力，他的这些性格对德国历史在这段时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足以证明这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当施佩耶尔会议（1526年）的决定，即每个王侯都可采用他认为合心的宗教（只要他向上帝和皇帝陛下交代得过），但只是因为查理的强硬固执，第二个保留条件才具有意义，最终纳入1555年的奥格斯堡条约之时，皇帝已经通过自己要在德国建立一种君主制度以恢复宗教统一的决心使这场斗争进行30年了。

此外，宗教改革造成了他的敌对阵营发生分裂，王侯中的一派归到了他的帐下，使他的大业有了一半的成功机会：宗教改革迫使天主教教徒们不由自主地结成了紧密的同盟。然而，他在1547年的胜利的规模使情况发生了改变。王侯们恢复了往常的态度，世俗的利益压倒了宗教的关注，查理未能乘胜出击扩大战果，全都因为王侯们恢复了他们的阵营。然而其中的复杂情况通常未被完全认识。如果萨克森的莫里斯是死于1548年而非1553年；如果马格雷夫·阿尔伯特·阿尔西比亚德斯1552年至1553年在库尔姆巴赫的劫掠没有转移查理的一些支持；如果皇帝在那个紧要关头没有疲惫和昏聩，当然，这些“如果”通常都只是一些无用的假设，但却能使我们明白，查理之所以差一点就毁灭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为在德国建立君主政府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宗教分裂给他提供了实现这伟业的同盟者。

然而独立自由原则最终战胜了皇帝那些不再有活力的希望。主宰德国未来命运的是领地，即由选帝侯、王侯、伯爵等统治的一个个的国家。在这些事实上的主权国家里，宪政发展路线与西方的普遍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显示了君权扩大和巩固的趋势，这也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特点，但是正如这些国家一样，它们太受制于历史留下来的限制因素和习惯权利，以至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们实现了专制主义。王侯们重新整顿财政，从议会的办公部门中辟出新的财政机构（办公室），并且享有大量不受议会同意征税的限制的收入。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由训练有素的文职官员——通常情况下是民事律师，组成的顾问班子；市镇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6世纪的德国，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那些在市镇机构担任大小公职的市民们通常所拥有的高等学术资格那样令人惊奇的。这一时期流行的是家长式统治伴以集权化管理；一些王侯用自己关于贸易、劳动、贫困救济等方面的法律取代了行会和帝国颁布的法令。同时，领地议会

(Landstage) 似乎经历了一个其作用日益重要的时期。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所知甚少，但是正在进行的研究迟早会向我们揭示更多的东西。领地议会在财政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区，它们接管和担保统治者的债务，结果在控制财政方面，它们一般都取代了统治者本人。随着市镇力量走向衰落和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经济实力的增长，议会的构成跟着也发生了改变；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其他地方在王侯与议会之间似乎还未出现严重的对立。王侯仍然是握有实权的统治者，虽然他们的行动自由因为一个机构的存在而多少受到限制，不过这个实体的主要特征是时刻准备与其合作并分担政府的工作。这里和西方其他地方一样，权力向真正的专制政治方向转化是以后的事情。然而，我们不能一句告诫的话也不说便丢下这个话题。几乎可以肯定，说所有日耳曼国家都是按一个样式剪裁的是错误的。以上所说反映了眼下人们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尽管还有许多工作留待我们去做，有一点却已经明朗化了：从根本上说，各诸侯国之间的差别点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9]

(赵亚麟 译)

[1] 至于地主的经济政策，见本书边码第35页以下。它的基础是“地产”所有者的土地之完全保有权（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这项权利的不断扩大是以牺牲王室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2] 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的议会中也有市镇的代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摩拉维亚有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议院，西里西亚和上卢萨蒂亚也有，但下卢萨蒂亚无。

[3] Henry de Bracton (? —1268年)，中世纪时期英国法学家，《论英国法律和习惯》的作者。——译者

[4] 这个纪要需要说明。原定关于德国宪政的发展和思想这一章由弗赖堡大学的E. 哈辛格教授撰写，使他大感悲伤的是他不幸突然患病，以致不能着手这项任务，病情又一直不见好转，这样由他撰写的这一章便无法完成。当最终作出决定取消这一章时，想到别处去找人来填补空白为时已晚，但这一空白又几乎不能完全不予以填补。编辑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当然，指望用这样一篇纪要来代替一个章节是不切实际的，但它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并未被遗忘。

[5] 查理被迫同意了第一份选举宪章(Wahlkapitulationen)，其中要求皇帝答应遵守以前的法律，尊重王侯们的特权，自他开始，这便成了大家奉行的习惯做法。

[6] 本书第1卷，第7章。

[\[7\]](#) 见本书边码第350页。

[\[8\]](#) 参见本书边码第93页。

[\[9\]](#) 我在这方面的资料得益于伦敦大学的F. L. 卡斯滕博士，目前他正在从事16和17世纪德国宪政史的研究。

第十六章 陆军、海军与战争艺术

1519年查理五世登基与1559年签订卡托—康布雷齐条约之间的40年对于战争艺术的演变比其后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为决定性的意义。此前的二三十年是真正的过渡期：各种不同的武器、各种不同的作战方法，新旧同时并用，它们各自的长处尚未确定。帕多瓦保卫战的胜利似乎证明了内部防御工事能有效地增强旧式城墙作用；诺瓦拉之战彻底证明了瑞士的传统战术是正确的；手枪仍然不如弓弩使用得普遍。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后期，出现了某些与过去彻底的决裂，而且未来两个世纪的各种作战方式也在此时形成。在棱堡图形的基础上使野战防御工事系统化，而且颠倒过来暂时强调内部防御而不是外部防御；不再使用弓弩；独立作战的密集的长矛纵队消失了；从此以后，没有骑兵、步兵、炮兵这三个兵种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协调行动，就没有哪支军队敢于开始作战；每支军队都寻求并找出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一百多人的编队与庞大而不实用的“兵团”之间的一种组织单位；火绳枪与长矛开始习惯性地一起使用，而前者开始让位于滑膛枪；手枪出现在战场上，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中型骑兵：手枪兵。新武器需要有新的战术。到1559年，武器大体上稳定下来，这一事实意味着，到那时战术已达到比较明确的阶段。战略主要取决于新兵的征募、财力、运输、设防措施与围攻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军队的人员构成。在这一时期，以上各方面都呈现出长期稳定的态势。军队依靠外国雇佣兵，如果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他们就要回国；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难以按时拿出足够的钱来支持长期战争；除最重型的攻城炮以外，所有军用物资的运输在道路允许的情况下变得尽可能快速；围攻花的时间太长，使军队长时间不能调动，以至财力和供应都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所需的守备部队数量很大，因此，行军途中的军队不得不分出很大一部分实际作战部队用于守卫新征服的土地和保护军队的基地。构成成分相类似的军队在出现非常明显的进攻机会之前避免发生冲突并小心防守。这样，战争的节奏放慢了。帕维亚战役（1525年）之后，对阵战变得罕见。军饷出纳与军需官对将军的重要地位提出挑战。正如一直是斗智的战役日益成为神经战一样，宣传和控制士气变得更为关键。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在一固定成形的时期没有过渡期的特征。将军们仍然能够在格拉夫林战役中莽撞行事而给德·泰梅斯带来灾难。民兵的功绩与职业军人的功绩相比仍然显得很突出，正如1552年至1553年在锡耶纳发生的情况那样。1522年对罗得岛的系统防御工事发起强攻的土耳其人，7年后在维也纳的旧式城墙前被击退。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年间传统的战争之树的老枝迅速枯萎，新枝茂盛生长，显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景象。

当然，由于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欧洲某处总有战事发生，这就有助于新的军事思想得到传播和巩固。人们迅速吸取教训，对得出的结论也能及时加以检验。军队成分的国际性也有助于取得进步。将军们不仅从敌人那里学得知识，而且也向自己的外国雇佣兵学习。人们不仅打仗，也写有关打仗的事，因而军事知识开始更加快速地积累起来。

诚然，两种原因使军事著作的出版发行受阻。人们历来担心这些危险知识可能被异教徒随意利用。出版有关建造要塞的著作是很安全的，因为基督教徒不是侵略者，但是，人们认为刊印关于如何炸毁城镇或在野外击败对方士兵的方法是危险的。至少这是一种论点。但是，如果没有人如此过分以至做出像瓦尔托里厄斯在1463年向苏丹赠送手稿《论军事》（*De re militari*）那样的事来，那么大量的技术著作的确会出现的，与其说是崇高的思想不如说是垄断能更好地解释对出版这类著作的节制：比如，只要对意大利人的枪炮制作技术和构筑要塞的技术保守秘密，其他国家就被迫雇用意大利的铸造师和工程师。在出版军事文献最多的3个国家中，法国以其军事分析家和战史作者最为著名——如果没有富尔克沃、蒙吕克和拉努的著作，我们对当时的战争的知识就会贫乏；意大利以理论与技术著作闻名——比林古奇奥和塔尔塔利亚的著作成为以后200年间几乎一切论述炮术的著作的基础；而德国人则以对军队及其组织所作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著称——弗朗斯佩格和佐尔姆的《军事文库》（*the Kriegsbucher*）是一部带插图的书，对兵法作了包罗万象的指导，从军队的组成、战术及武器装备到管理上的最小细节应有尽有。

我们不应期望军事题材的著述家们没有引用古典先例的热情；罗马帝国的真正伟大之处首先是其军队，其次才是在军队保护下得以繁荣的艺术。正如上一代人一样，人们继续到处寻找特别是维吉蒂乌斯

和弗朗蒂乌斯的著作，而艾利安、波利比奥斯及恺撒、莫代斯特与维特普威的著作也仍然对乐意读的人有吸引力。人们对他们的思想不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最讲实际的技术题材的著述家则喜欢加上自己的看法作为对古代权威思想的附和。没有人能轻易使马基雅弗利的眼睛从现代战争转移到古人对战争的闲言碎语上，即使如此，他也（在1521年出版的《论战争的艺术》中）谈到古典的先例：“我不会在各方面都完全仿效它，而仅以最适合现代情况的方式加以仿效。”例如，在比较了古今步兵各自的优点之后，他认定，理想的步兵单位的组成应是一半士兵以古罗马的方式武装起来，手持短剑和盾牌，另一半的人按现代的瑞士方式手持长矛和火绳枪。乔瓦尼·巴蒂斯塔·赞基于1554年撰文论述设防时谈到，尽管有了火药，但是，处理他的高度专业化的题目的最佳方式是不仅从现代的实践也要从古代的实践演绎出作战的法则。

的确，古代的实践经验并非总是无意义。当维吉蒂乌斯说：“以饥荒、突然袭击或恐吓来战胜敌人比采用常规行动要好得多，因为在采用常规行动中，运气要比勇气占更大的分量”，他这是说给16世纪中期的军事指挥官听的。另外，由于古罗马人没有马镫，所以，他们把骑兵用于投射而不是突击战术中。他们把重点放在大量的稳重的步兵和敏捷但又令人担心的马匹上。由于这种先用长矛然后用火绳枪的古罗马式的组合对于使中世纪式的重型骑兵的冲锋失去效力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又再一次受到青睐。新的设防技术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亚德里亚海的另一边，位于斯帕拉托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皇宫的门楼呈六角形，按对角线方向在各个角落建有方塔，这种古典时期末期的防御工事显示了如何引开箭矢和投石以及用突出的防御工事形成屏障即上首不会遭到来自其他防御工事的火力攻击的一块空间，这样就不会有较古老的圆塔的缺陷。

如果说古代人预先考虑到了16世纪大部分战略上的及部分战术上和技术上的需要的话，那么有一种新的要素他们未能预见到：火药。当弗朗蒂乌斯谈道“武器的发明早已达到其极限，对其在应用技艺上的改进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他只是代表旧世界说话。在现代世界，由于有了新武器，作战方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这一点无知的人所提供的意见倘若非常注意，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古代著述家们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与现在相比，他们的战争似乎计划非常巧妙，他们的军队训练十分合理，他们的战斗井然有序。这一印

象主要是由于像李维那样的历史学家们造成的。他们按应该发生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形来描写战斗。维吉蒂乌斯也是按照应该的情况来描述兵法的，热衷于宣传理想化的过去和比任何实际存在的更完美更有效率的组织。这种完美性征服了甚至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这样讲求实际的人。在论述设防的著作中，他把一整节的篇幅用于详细描述一个设防地的城市规划。描述根据的是维吉蒂乌斯对设防营地的分析，而古罗马人本身已摒弃了这种营地。在16世纪没有哪位将军试图按这些方法来安营扎寨。在几种情况中，实际的组织要点承袭了古罗马人的习惯。例如，弗兰西斯一世的“军团”有6000名士兵，每100人为一个单位，由一名百夫长率领。但是，尽管这些著述家描述的有关古罗马的军备和战术的大部分内容因不适用于火药时代而遭到拒绝，但人们对他们所谈的有关古罗马军队的道德规范和军事纪律却听得如痴如醉；虽然武器已变，但士兵仍然相同。

把军事问题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认真对待的每一位著述家都关心军队的素质：士兵及士气。本来应该打赢的战争由于无纪律行为或缺乏勇气一次又一次输掉。懒散而无经验的军官会影响他们的士兵。浪费和盗用钱财增加了战争的费用。士兵开小差，野蛮掠夺造成一个地区的敌对态度，由于只对战利品感兴趣的部队很涣散，难于继续取得胜利，这一切都使战役受到制约。最好的装备，最精明的战术，最有灵感的统帅，如果没有稳定而可靠的部队，它们全都是无用的。这个问题与本国军队关系最大。草率而不加选择地招募新兵，然后又尽快地遣散，会造成这一问题。但是，外国雇佣兵的表现也会造成这一问题，他们通常都任性凶残，不愿在所得报酬之外多打一天仗，而不管雇主处境何等危急。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惩戒机构：督军和他手下的军官加绞刑架。但是，忙碌的军事法庭和一排排歪扭着的脖子不一定能使士兵们在炮火中行为更稳定。即使由土耳其人和瑞士人对怯懦者强制执行的死刑也无法使懒散胆小的士兵成为好士兵。

士气和训练造就优秀士兵。而士气本身受训练和纪律的影响。“秩序使人勇敢，混乱使人怯懦。”“在战争中，纪律胜过实力。”“服役期或军龄本身决不会造就一名军人，因为服役许多年之后，一名不遵守纪律的士兵在职业上仍然是新手。”第一句话是马基雅弗利说的，其余的来自维吉蒂乌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古人对纪律和士气问题的意见。甚至技术问题的著述家也反映了在战争中人的因素这一普遍关心的问题。丢勒写道，

为了保卫一个要塞，“首先需要的是虔信宗教的、充满活力的人，他们才真正能保卫自己”。在军纪方面，富尔克沃于1548年尖刻地写道：

古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们做得好。与我们相比，他们的士兵更守纪律、更吃苦耐劳、道德更高尚，是更优秀的战士。

古罗马士兵按固定规则进行艰苦训练，他们遵守严格的纪律，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非常自豪，生性勇敢俭朴。

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著述家随时将他们自己的部队与那些看来表现出古代军队长处国家的部队作比较，找出不利之处。西班牙人受到广泛称赞。他们性情稳重而不爱激动，习惯于过艰苦生活并乐于吃苦。对西班牙有身份的人来说，从军是最高尚的职业。在被派遣到战场去之前，士兵们先在国内驻地经过良好训练。瑞士人也能吃苦耐劳。他们经过刻苦训练——长矛兵的性命取决于同伴们的坚定可靠。直到在比柯卡战役（1522年）他们的信心受到动摇之前，他们一直确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他们宁愿杀死而不愿俘获战俘，不肯为劫掠财物而违反命令，对动摇者给予无情惩罚，这些严酷的特征突显出了一个以武装确立了自由主权、而且仍然在以武装扩大其疆界的民族。德国的职业军人雇佣步兵也具有瑞士人的坚定稳重和团结精神，但没有他们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对他们来说，士气与他们作战的原因是完全脱离的，士气只是职业上信赖自己能力的产物。但是，最广为传颂和最受人羡慕的是土耳其人。当与异教徒相比，西方士兵的名声受到贬损时，他们的耻辱就更加严重。“土耳其人的军纪非常公正严明，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焦维奥这样写道：

土耳其人有三个理由胜过我们自己的士兵：他们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很敏捷利索；他们在战场上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没有面包和酒他们照样能长期生存下去，只要有大麦和水即可。[\[1\]](#)

访问者对土耳其士兵在列队行进中和在营地上所表现出的秩序井然印象很深。他们把勇武好斗的精神积蓄起来用在战争上，他们在和平时期不会趾高气扬、喧闹作乐和打架斗殴，这与西方士兵不一样。事实上，道德主义者将土耳其人的品德理想化，是为了斥责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堕落倒退，但是，他们和军事改革者发现土耳其人有一种性格同样很重要：他们尊重“那些快乐的幸运者，那些不是在妻子儿

女的哀痛声中死于家里，而是在敌人的呐喊、在盔甲与长矛的铿锵声中死于国外的人”[\[2\]](#)。

对土耳其人的这种赞扬有许多都是恰当的。正规军队的军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经过严格训练。他们对苏丹怀有绝对的忠诚。他们的宗教信仰促使他们坚决地参加对不信教者的战争。没有不愿当步兵的势利现象。不是按出身而是按功绩进行定期提升，这与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的托马斯·奥德利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抱怨说，许多人“没有当过兵就被任命为上尉军官”[\[3\]](#)。老兵退役时生活有保障。部署战役不受军方与其政治雇主之间的任何冲突的干扰，因为土耳其人不知道西方的那种军事部门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区别。由于宗教和社会学上的原因，西方人不可能仿效其中一些优点，西方国家的组织也不可能是基本上为战争服务的。但是，西方的改革者们因此不仅异想天开：他们正在称颂的是一颗已在暗淡的明星的完美，而且他们对土耳其军队的动人的描述忽视了其缺点。土耳其禁卫军在平时和战时都是危险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打仗，此外一无所长。随着16世纪时间的推移，他们日益暴露出禁卫军士兵的不利之处：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仆人。由于允许他们结婚，并且到苏莱曼统治末期，允许禁卫军的儿子进入部队，他们的战斗力也就下降了。他们对苏丹的绝对忠诚大打折扣。此外，土耳其人取胜的原因除了军事效率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如像1522年在塞浦路斯那样，或是由于敌人在政治上不团结，如像在匈牙利屡次出现的情况那样。在16世纪，当他们的战术和武器装备趋于停滞不前、纪律稍微有些松懈的时候，欧洲军队却更愿意进行革新，并且逐渐能训练出为正确掌握现代武器所必需的坚定沉着的品质。然而，即使是对于那些最了解土耳其人因而最不害怕他们的人来说，显然，与欧洲大国截然不同，他们拥有一支常备大军使他们有着巨大的优势。

意大利战争已非常清楚地显露出雇佣兵的种种不利之处。如果未付军饷，他们要么开回老家，要么像在比柯卡战役中那样，在作战时机还不成熟时要坚持开战。即使付了军饷，他们的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帕维亚战役前夕，6000名瑞士军人虽然领了全饷，当听说基亚文纳陷落时，却开拔前往保护他们自己的边界去了。即使有过极其良好的表现之后，他们也很容易使他们的雇主大吃一惊，这是不受欢迎的。例如，在帮助拯救维也纳之后，德国的雇佣步兵要求得到3倍的

报酬，并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就要洗劫该城。忠于特定的首领，如像弗伦茨贝格或乔瓦尼·德·梅迪奇，有时可能比个人目的更重要。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金钱是能使雇佣军留在战场上的唯一原因，而在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之中，现金是最难搞到的。

富尔克沃在他那受人广为传阅的《战争学》（1548年）一书中写道：雇佣兵与该国有利害关系，不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或财产而战。他们得到优厚的报酬，退役时满载赠品而归。然而，正如像帕维亚战役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并不总能克敌制胜。他们在战斗中不愿首当其冲，而是把真正危险的阵地留给当地部队，因此，当地部队承担了大部分战斗风险却没有得到胜利的荣誉。当然，这些论点连同马基雅弗利对雇佣兵的批评要点一起都是片面的。雇用雇佣兵确实能带来一定的好处，这些瑞士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随时可供雇用。他们训练有素，他们携带的武器比由本国勉强装备起来的国民军的武器更好、更新式。只要付酬，他们就能长期留在战场上而无须担心由于无人照管导致庄稼受损或生意衰败。瑞士人的民族感情很强，不愿打自己人或危及自己国家的命运；除他们之外，其他雇佣兵叫他们进攻谁他们就进攻谁，而不问其民族或宗教信仰。德国雇佣步兵千百次地对神圣罗马帝国作战。意大利军队在他们的半岛上进行的战争中帮法国人打仗。信天主教的意大利人帮助镇压德文郡的天主教徒，而信新教的德国人在1549年帮助镇压造反的诺福克新教徒；在法国内战中，瑞士人帮助天主教徒进攻自己的教友。此外，雇佣兵愿意帮助雇主捍卫其领土，也乐于进攻别人的领土，而国民军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保卫他们紧紧相邻的地区（这时他们可能战斗得非常英勇，如像1529年佛罗伦萨人所做的那样）但不想为外国打仗，虽然从诸如西班牙那样的贫穷国家中和像法国小贵族那样的贫穷阶级中随时可以征召到士兵。

另一方面，对常备军也有确凿的反对理由。当然，第一条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平时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费用问题。为维持各个要塞、炮场及王室禁卫军已使社会各等级不堪重负，他们还不得不支付上司们的军事计划的费用。军队的不法行为是人们要尽可能少见到他们的另一个原因。当《论公共福利》（约1549年）一书中的骑士谈到法国军团时，英国农民回答说：

但愿上帝不让任何这样的一些暴徒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正如人们所说，这些人会像在法国所干的那样，拿走穷人的鸡、猪和其他物品而不付

任何钱；此外还干诸如强奸穷人妻女这样的坏事。

正如许多敕令表明的那样，英吉利海峡对面也在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在火器使职业军人比带钩镰枪和弓箭的农民占优势的时代，常备军可能成为政治上的一种威胁，有可能产生傲慢情绪和寻衅闹事。如果士兵在服役时对温顺的平民构成威胁，那么在其休假或退伍时老百姓就更加畏惧了。使用雇佣兵就是把这种社会混乱的包袱转移到提供雇佣兵的国家身上。然而，并非所有的政府都认为武装自己的臣民是安全的。马基雅弗利不得不竭力为他的民兵辩护。“罗马帝国保持独立达400年，斯巴达维持了800年，尽管在这整个期间他们的公民都是武装起来的；而许多其他国家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丧失了独立。”可是，即使在1512年和1524年这些危机四伏的年代，佛罗伦萨人也不让臣属的城镇招募军队来保卫自己从而也是保卫佛罗伦萨自身。

虽然对本国常备军的许多反对意见涉及他们在和平时期的存在问题，他们在平时充其量不过是引起混乱，但所有对雇佣兵的反对意见都涉及他们实际上可能使战役失败的问题。因此，尽管本国的常备军有种种不利之处，但还是努力招募和训练他们，并用他们来至少取代一部分雇佣兵。一个不利之处是，现代军队需要各专门兵种配合行动：炮兵、轻重骑兵、长矛兵和火绳枪兵。使用其中一些兵器的特长最终不仅取决于训练，而且取决于民族特性。尽管瑞士和德国的长矛兵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但他们依然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法国作出许多努力来训练自己的长矛兵，但从来没有获得成功。在其他国家培训出自己的火绳枪兵之后很长时间，仍然需要意大利的火绳枪兵。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高质量的所有兵种，所以必须通过使用雇佣兵来进行适当的补充。第二个不利之处在于某些武器的特性：长矛、火绳枪，该世纪中叶之后还有滑膛枪，都需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但是，各国能够承受而老百姓的偏见又能容忍的是本国后备军制度，间隔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召集起来进行训练，其核心部队长期驻守要塞。

英格兰遇到的这种问题没有如此尖锐。英格兰不常在大陆上打仗，时间也不长，而英吉利海峡是防范入侵的有效屏障，通过亨利八世的海岸设防又得以加强。北方所征的军队两次证明足以打败苏格兰人，一次是佛洛顿战役（1513年），另一次是索尔韦莫斯战役（1542

年）。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足以使伦敦人放心。仅有的常备军是皇家义勇骑兵和加来及贝里克的守备部队。由于国内没有紧迫危险的鞭策，除了在海军领域外，英格兰一直是军事保守主义的堡垒。亨利八世经过反复考虑，曾对火绳枪产生了短暂的兴趣，但弓箭仍然是重要得多的投射武器。虽然采用了长矛，但过程非常缓慢，所以在1543年至1545年他打的最后一次战役中还得租用外国的长矛。同样，到这一时期末，英格兰还得使用勃艮第的骑兵和西班牙与意大利的火绳枪兵。因为像西班牙一样，英格兰也很少饲养承载能力大的马匹，承载全身披挂盔甲的骑士和战马铠甲。

神圣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尽管西班牙、德国和低地国家能提供各种兵种，但是在东方、南方和西方前线的需要量非常巨大，而且尽管德国拥有众多的重型步兵和中型骑兵（Reiter），但也不是轻易就能给帝国使用。总体繁荣程度相当高，所以当职业军人对大多数人没有吸引力，而马克西米连向德国雇佣步兵灌输对哈布斯堡王室忠诚和敬重的感情的企图失败了。甚至当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作战时，他们也是首先忠诚于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作为帝国仆从，他们固执而难于两者兼顾。和平环境将他们从军人转变成土匪。在16世纪中叶，曾企图重新实行早已中止的封建服役制度。例如，帝国军需官拉扎勒斯·冯·施多迪希望，土耳其人的威胁能改变（满不在乎的）找人代服兵役或以现金代替服兵役的长期传统做法。他想建立一支领全饷的未被德国雇佣步兵的工联主义所败坏的常备军，这一冒险行动失败了，但至少通过1548年、1551年和1555年的法令，使雇佣步兵与国家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并剥夺了他们一贯滥用的一些特权。

然而，正是欧洲最具侵略性的法国感到最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常备军。召集令（*Ban*）和因拥有封地而应该服兵役的土地占有人带马匹应召入伍（*arriere-ban*）继续在使用，不过，随着步兵，特别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火绳枪兵越来越重要，其效用一直在下降。最精明的新兵更喜欢在正规的重骑兵团（*gendarmerie*）中服役，1534年以后，喜欢在正规的步兵，即军团中服役。曾试图改造这些征兵制度。间或减少免服兵役义务的类别；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修改错误的兵役档案。为了减轻服役负担，到国外服兵役的义务暂时从40天减少到将敌人从法国国境线赶走所需的时间。为召集令和封臣应召入伍的制度制订了培养步兵和中型骑兵的计划，以代替旧的持重型武器的重骑兵及其骑马的助手。尽管作了这些尝试，所征兵员从来没有好的表现，而且，尽管

他们得到民族主义者的偏爱，但却受到那些主张创建一支全新的队伍来取代他们的军事专家的鄙视。

法兰克弓箭手（*franc-archers*）仍然残留下来，但是，尽管短期内将他们召集起来，由于装备的是各种混杂的武器，又缺乏纪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因而于1535年被解散。仍然残留下来的另一支15世纪部队是重骑兵团，由有身份的志愿兵组成，他们仍是法国骑兵团部队的坚实基础。他们的服役是正规的，因为他们每年必须集结3次以领军饷并接受检阅。平时他们大约一半的人休假而另一半人留下来执行驻防任务。随着意大利战争继续进行，重骑兵团在决定战役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少，他们的作用也就下降了。尽管这种部队仍然存在，但是，到16世纪中叶，它的威望已经大部分丧失。他们思想极端保守，态度傲慢，不容纪律约束，把服兵役看作是一种要是觉得不方便就可以放弃的等级特权。当然，更有职业感的是法国王室部队、苏格兰和瑞士卫队与弓箭手队，但他们人数少，而且，苏格兰卫队和弓箭手队还是骑马作战。

本国步兵是由持有国王委任状的军官临时一批批招募的。这些士兵是志愿兵，在战场上表现良好，但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实现和平他们即被解散，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在敌对行动期间劫掠尽可能多的财物。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没有和平时期的安身之处可回归，他们保持武装状态，靠农村供应给养，直至再次爆发战争。这是一些雇佣兵，他们是鼓吹建立定期付酬的步兵团（*legion*）的活生生的理由。这样的步兵团于1531年组建起来。当时在香巴尼、皮卡迪、诺曼底和朗格多克地区招募这些兵团，每个兵团6000人。招兵时费尽苦心以便挑选到优秀兵员。他们的制服和武器——长矛和火绳枪的比例因兵团而异——是由国王提供的。召集令及应召入伍可以免按征召令服兵役吸引了贵族，而可以免税和有晋升为贵族的机会吸引了平民。在和平时期，大多数人一年要集合两次，而每个兵团的骨干则长期保持武装状态。创建这些兵团时进行了大量宣传，得到热情的参与。富尔克沃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指导。但是，他们要在10年内取代雇佣兵的希望结果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臃肿的管理机构漏洞很多；这些士兵通常很穷，在1543年的战斗中表现很差。1558年，改组他们的尝试失败，于是，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更持久的试验的进展上，即创建不那么庞大臃肿的团队。在16世纪中期，法国仍然依赖步兵队（*bandes*），特别是像皮卡迪队和皮埃蒙特队这样一些步兵队。它们

常常被定期反复征用，以致可以视同常备军。1543年和1549年，对步兵队的失败作了可悲的让步——对瑞士雇佣兵的旧有的依赖关系以新条约加以确认。16世纪的战争不是可以通过匆匆忙忙给老百姓穿上军服然后给他们取个罗马名字而取胜的。

这些战争的特性主要是由技术发展来决定。新武器要求有新战术，新战术决定了军队构成的变化。通过迫使人们改变对待战斗的态度，新武器又影响了战略及战役的时间长短；在国内，从财政和物资供应的角度来看，在外部，从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角度来看，他们以这种方式影响着整个政府。因此，谈谈武器及其演变是非常必要的。看看设防的发展特别重要，因为由这门科学所引起的作战速度的变化是影响16世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军队在战场上靠经仔细设计的临时防御工事就能使自己几乎不遭到攻击，如果城墙的牢固程度足以抵挡围攻者的枪炮，那么，急于求战和乐意应战、城市迅速落入胜利者之手的那种战争，像查理八世的入侵带给意大利的那种战争，便不再可能了。

问题是要保护城墙免受枪炮毁坏，在次要程度上，不让其被挖坑道所破坏。在前一时期人们已预先给出了这个答案的要点：人们已明白，必须降低城墙的高度以缩小目标，加厚城墙以增加抵抗射击和承受报复性火力打击的能力。随着城墙高度的下降，防卫者的视野也降低了，而在城墙之外，就更需要有宽阔的壕沟和外围工事，以便将攻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使主要防御工事不受攻击。随着城墙的加厚，要立即看到贴近城墙下面发生的情况就更困难了；这就需要侧翼观察和侧翼火力，并加强使用棱堡。与战场成突出锐角的棱堡取代了圆堡。系统规划的一排棱堡——由固定间距的棱堡组成的屏障——仍有待于未来才出现。即使是在安特卫普（1540年）和埃丹（1554年），防御工事的样子也有点特别，棱堡的间距不规则。枪眼继续扩大外部尺寸，而内部尺寸却缩小了，呈喇叭状展开。停止使用大而低的法国式枪眼，因为它们在猛烈攻击下难于防守。作了各种努力来弥补在受攻击时防卫者的射击速度慢的问题。要么是照弗朗切斯科·迪·乔治建议的那样，防卫者在棱堡的凸角里增加火力的层数，但这样就会使结构薄弱，要么修建外围工事暗炮台，或者以骑兵增补来自幕墙和棱堡的火力。在这段时期，无论哪种方法都未得到系统地利用，靠的是轻武器的密集射击和城墙内的辅助防御，以防御土墙掩护的壕沟。一般来说，城市是在遭到攻击之后才以现代方式大规模加固防御工事。因

此，防卫者被迫从内部对现存的防御工事进行增补，并全力以赴地保卫经常出现的缺口，在维也纳（1529年）、布洛涅（1544年）和梅斯（1552年）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在他写的《旅行记》（*Voyages*）一书中描绘了那里发生的情况：

每个人都日夜忙着运土去修补土墙。王子、贵族、上尉、中尉和少尉军官——全都在挑篮运土，以鼓励士兵和市民效法他们。甚至连贵妇淑女也参加进来，那些没有篮子的人就用水壶、挂包、袋子、被单以及一切可以用来运土的东西帮着运土。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参加修补土墙，所以，一旦城墙被攻破，敌人发现城墙后面还有更牢固的土墙。

到这段时期末，设防理论已大大超越了实践。例如，教科书上理想的设防城市是圆形的，而实际上的城市不是这样的。地形上的差异意味着专家们的想法不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对进步的最重大的阻碍是当时存在的防御工事。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防御工事，再改变这些防御工事费用太大。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唯一理论家丢勒提出，把防务作为一种济贫方式。市民和统治者都以高耸的城墙而感到自豪，不愿意降低它们的高度。只有1526年在处境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佛罗伦萨人才降低了一些塔楼。降低一点城墙通常是为了利用防御大炮，而再降低一点是为了保护特别危险的地点，仅此而已。几乎没有像安特卫普（1540年）那样新的大规模的防御工事，甚至连新的要塞也不多：米凯莱·桑米凯利在威尼斯的利多修建的S. 安德烈城堡和亨利八世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防御工事是改建总规律的例外情况。像丢勒（1527年）和瓦拉（1528年）这样的16世纪20年代的理论著述家将很大的篇幅用来阐述保卫现存的城墙的新方法。维罗纳的防御工事是从1520年逐渐改造的，但维罗纳处于从布伦内罗来的干道上的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通过1509年和1516年的战争已显示出它的防御工事的缺陷。迟至1552年，梅斯仍然在改造它的旧防御工事，用泥土填满塔楼以便把它们变成临时代用的堡垒。

通过把这段时期的初期出版的马基雅弗利的《论战争艺术》与1546年出版的尼科洛·塔尔塔利亚的著作作比较，就可以看出这段时期获得理论上广泛赞同的设防技术的变化。马基雅弗利利用亲自参加围攻比萨的经验以及他所听到的围攻帕多瓦的情况，集中精力改造现存的城墙和准备修筑内部防御工事。虽然塔尔塔利亚承认必须要有某种对付已攻破城墙的敌人的方法，但他却集中精力于如何以极精确的火力将敌人阻挡在一定距离外，以保护重新规划过的城墙。敌人强攻

马基雅弗利的防御工事，爬上或攻破城墙之后，会发现自己处于一条既深又宽的壕沟的边沿，受到从土墙顶部射来的炮火的控制，还受到沿土墙底部的暗炮台发射的炮火的侧面攻击。土墙是用挖壕沟时堆在靠城这一面的废土筑成的。巴列塔的最高执政官曾问过塔尔塔利亚，他是否认为都灵的新设防方式——每堵城墙都建有一座棱堡，每堵城墙的中段建有一个炮台——是可能有的最好的设防方式；在这次对话中，塔氏的思想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就蛮力（*materia*）来说这些防御工事不错，但就设计（*forma*）而言则很差。城墙不应是直线的，而应是曲线形的。敌人最多抵达棱堡而决不能让敌人接近幕墙。任何时候敌人都应暴露在至少从4个侧面发射的炮火之中。最高执政官对这些意见的反应是：“要是果真如此，大炮就已失去它在攻城中的大部分声望了。”

塔尔塔利亚的理论在英格兰已付诸实践。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和解意味着亨利八世面临着针对整个东部和南部海岸的任一地点进行联合入侵的可能性。因此，他加紧完成了精心计划的海岸防御体系，从赫尔到米尔福德·黑汶相隔一定距离构筑要塞和堡垒，重点放在泰晤士河、唐斯、南安普敦、怀特岛和法尔茅思。其中许多防御工事都相当完好地保存下来：唐斯的迪尔和沃尔默，索伦特的赫斯特堡，法尔茅思·黑汶的彭登尼斯（Pendennis）和圣莫斯。它们与早先的英格兰防御工事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要塞而不是别的：设计的功效决不因住宅的需要而受损害。它们是直接由国家而不是按习惯由得到王室特许的个人或团体建造的。在英格兰新近建造的要塞中没有对设计的独立性起抑制作用的例子。由于本国没有培养工程师的学校，因此，这些要塞是由从外国引进的专家，如像斯蒂芬·冯·哈希恩珀格，按最现代的方式建造的。虽然并不是按统一标准规划的，但所有要塞都很隐蔽，周围有壕沟，有曲线形的墙体和圆拱形的胸墙，以及有带炮眼的几道土堤，其中一些炮眼（如桑当和沃尔默的）几乎完全向外展开呈喇叭状。由于政治上的危险逐渐消失，这些要塞从未试用过。如果当时试用过的话，很可能它们不会被强攻所夺取。罗得岛的防御已表明，如果有现代装置的帮助，即使是旧城墙也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它的棱堡有助于击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即使当外墙已被攻破时^[4]也是如此。富尔克沃写道：在最近的30年中，在城防方面已发生了一场革命。当人人都在忙于改造防御工事时，“从现在起要征服一个国家确实是很困难的”。

在君主们的积极关照下，火炮的研制在继续发展。他们珍视枪炮，因为拥有枪炮就有威望，还因为枪炮确实能起作用。由于每个国家都自己生产枪炮和火药，所以，枪炮和火药的制造更加普遍。还有一个武器种类增多而造成浪费的问题，其中包括供应问题难以克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完全无效率可言，因为石弹（尽管不如铁弹好）仍在继续使用，石弹可以在现场按一定大小来制造，以弥补弹药供应上的缺口。在围攻布洛涅（1544年）时，英格兰人仍然在使用11种不同口径的火炮，每一种都需要自己的炮架和炮弹。或许值得对其中使用时间较长的4种炮的详细情况给予介绍，这些中型炮的特征在其后的100年间或多或少是保持不变的。

	重量 (磅)	口径 (英寸)	射程 (码)		每天整发 炮弹的 发射率
			近距平射	以 10 度仰角	
重 炮	4000	5. 5	460	2650	60
次重炮	3000	4. 5	400	2400	70
隼式炮	1500	3. 5	360	2170	80
小 炮	800	2. 5	320	1920	120

虽然早先的大炮已经被其他较灵巧较精确的枪炮取代，但是亨利八世用那些用带子背在背上的庞大的仿制木炮（有小型的真炮）来对着布洛涅的要塞，他以这种方式来深深怀念这些令人生畏但难于操作的炮管。

正如枪炮的口径没有统一，材料也是这样。铁制的和黄铜制的枪炮在同时生产。黄铜在铸模中的流动性要好一些，因此，更适合作大炮。另一方面，发射造成的高温使其变软并容易爆炸。铁制枪炮的优点是它们可以由当地铁匠制造，但它们较重，而且不如浇铸的枪炮精确，因此在这段时期不受欢迎。枪炮制造业成为专门的集中的行业，后来一直如此。精确度大大提高，枪炮的膛孔钻得更好，支架更好调节，炮手的象限仪使得不必作费时费力的试射，对发射学的研究也给予了适当注意。随着铸铁在迫击炮的制造中取代了锻铁，迫击炮在围攻战中越来越有用，到16世纪中叶，发射出的是能有效爆炸的炮弹。如果说巨型炮在围攻战中的使用逐渐减少，那么，很轻型的炮也开始从战场上消失。德国的枪炮匠早已研制出一种能放在四轮炮架上拖着

高速前进的轻型炮，1554年开始在伦蒂（Renty）使用，但它已是一种过时的东西。滑膛枪在开始使用，口径差不多，效果几乎一样，但更容易运送。

除了长弓在英国顽强地保留下来之外，火器作为投射武器在这段时期取得了最后胜利。石弓从16世纪20年代的战斗中消失了，持保守观点的人无不感到痛惜。火绳枪容易遭到非难，因为它在潮湿的气候中不可靠，而且射击速率比弓弩慢。但是，意大利造的最好的火绳枪的最大杀伤射程是400码，比长弓强而与石弓相等。火绳枪在震扰和弹着方面因而也在杀伤力方面确实无疑占优势。非常有趣的是，火器从手枪到滑膛枪最快速发展的那些年代正是弓箭的射程在东方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时期。所用的弓是复合短弓。甚至为了取得加入由穆罕默德二世所建立、由苏里曼大帝鼓励支持的弓箭手同业公会资格，射程必须要至少达到630码。最高等级是专门留给那些射程超过770码的人的。然而，达到这些射程用的是轻箭，借助于风力，而且没有指出从在战斗中的精确度和命中率的角度看究竟用途有多大。欧洲人并非不了解短弓，但有几个因素不利于采用它：西方使用的盔甲较厚；极难制造而且从异教徒国家获取行业秘密也极端困难；最重要的一点是火器迅速扩展开来。当然，几乎从一开始，土耳其人自己就已使用了火器。

火绳枪的有效性已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的证明，他们首先大规模使用火绳枪。于是，德国和瑞士步兵（后者特别是在比柯卡战役之后）按一定比例同时使用火绳枪与长矛。在西班牙，这两种武器各自的价值无一例外地反映在给第一流的火绳枪手的报酬要比给最优秀的长矛兵的高。富尔克沃是痛惜石弓突然衰落的人之一。他这样谈到火绳枪：“只要由技术熟练的人使用，这东西很好。但问题是，目前人人都想成为火绳枪手；我不知道干这一行是应拿更高的报酬，还是应少装备火绳枪，抑或是应进一步摆脱它。”他还给予有益的提示：把火绳枪交给不熟练的士兵会造成浪费。“由于这一玩忽行为，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就发射10000发枪弹，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打死，因为这些火绳枪手只想打得热闹，漫无目标地乱射一阵。”滑膛枪不久将取代火绳枪，但在这段时期，它仍处于发展初期：沉重的一英寸口径的火绳枪在攻城时使用。枪管很长，安在座架上，因此，它类似于一门小炮。在16世纪20年代的战场上，人们已见到一种装有轻便支架的

滑膛枪，但它是一种很难操纵的武器，改进工作进展缓慢，其广泛使用有待于未来。

火绳枪由骑兵部队使用，但它用作骑兵武器不尽如人意。它需要用两只手发射，在发明转轮打火机（在扣动扳机时，由一只弹簧启动，将一块硫铁矿石抵住一个快速旋转的钢轮）之前，保持导火绳不熄灭格外麻烦。很可能需要先放下缰绳，甚至要下马，然后才能进行有效发射。但是，当转轮打火机在16世纪20年代普及时，骑兵用的短筒马枪和重型手枪问世了。两者都是为即刻使用而配备的，携带时放在马鞍上的皮套里。这些武器，特别是重型手枪，是16世纪40年代问世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对骑兵战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整体上说，对于火器，正如炮一样，不必寻求千篇一律。正在进行大量的试验，由最好的工匠造出的样品几乎与下个世纪最好的武器不相上下，只是少量生产来供富有的人使用。但是，普通士兵——特别是非雇佣兵——所使用的武器较落后，简单而价廉。

尽管火器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盔甲制造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兴旺。火药使得盔甲需要加固。从这时起，更重、更坚固，而且，只是为了满足个别人异想天开的念头，在外形上做得更圆。由于惧怕枪伤以及随之而发生的血液中毒，能搞到盔甲的士兵都坚持穿上盔甲以抵御射击——即是说，抵御大于近距离平射射程的轻型武器的射击。这些盔甲在头前部和胸前部作了特别加固，腿甲和肩甲的金属片也加厚了，尽管这些部位的保护更多地来自按常规相互搭接的金属片。这种较重的盔甲使用起来不方便，但是由于火器的缘故，甚至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天气炎热的国家也必须穿盔甲，在此之前，在那些地区穿全副盔甲较北欧国家滞后。额外增加的重量使步兵感到特别恼怒，他们常常宁愿灵活点、少穿点防护不足，也不愿受穿在身上的防护装的束缚。有人埋怨士兵们把盔甲当作军用行李而不是个人装备，因此，在遭到突然袭击时来不及穿上。他们受到非议还因为平时穿盔甲的时候太少以致在战斗中几乎无法承受其重量。

举行马上比武的理由之一就是它能养成士兵穿盔甲的习惯。马上比武本身又迫使盔甲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在这段时期到了决定性阶段。战斗中的实际应用与马上比武的应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同一副盔甲难于两者兼顾；专门为比武而设计的盔甲本身在战场上是没有用处的。每一种战斗各有特点，采用的是不同的打击方

式，或骑马或步行，使用长矛、短剑或狼牙棒，而为适应每一种情况，盔甲必须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给予最有效的保护。这一问题的解决部分是通过用一块甲片替换另一块甲片，部分是通过额外加固某些甲片。1547年为奥地利斐迪南大公制作的那套野战铠甲和步战盔甲有34个替换甲片和加固甲片。这并非不同寻常，已知的实例达100个。像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这样的君主们的明智赞助维持了工匠们的制作水平，他们的样式为朝臣所仿效。盔甲的重量对战术有某些影响。盔甲越重，马负载穿戴盔甲的人快速行走的能力越低。在15世纪发展起来用以代替按纵队密集骑马缓行的按横列冲锋的作战方式，当以缓步或即使以快步发动进攻时，就失去了效力。16世纪又恢复到按纵队作战，以冲击的分量代替了冲击的速度。但是，影响战术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当然是火药。

尽管已提高了炮架的机动性，但大炮在战斗中起的作用仍然不如枪支的作用重要。像马基雅弗利和富尔克沃这样的著述家在描述假想的战斗时，在受先头部队阻碍或被敌人的骑兵部队压制之前，只让炮兵部队发射一两发炮弹。这是夸张，但事实上至此时还很少有在公开战斗之前进行长时间的第一轮炮轰的例子。炮兵的主要功用，像在比柯卡战役的情形，是为了加强壕沟防御阵地，在拉文纳战役中是为了用炮把敌人从阵地中轰出来，或者是为了打乱敌人的队形，如像在海基战役中海军炮火打散了苏格兰人的左翼、在格拉夫林之战中打散了法国人的右翼。土耳其人将炮兵作为后备力量，置于两列骑兵之间，向突破防线的敌人开火，这一作战技法在1514年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已获得成功，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也同样获得成功。但是，西方国家没有仿效这种作战技法，部分原因无疑是基督教军队对于大炮从后面开炮感到不那么乐意。

比柯卡战役（1522年）和帕维亚战役（1525年）彻底表明，面对火绳枪，必须修改战术。比柯卡战役说明它在设防阵地上的能力，帕维亚战役说明它在旷野中的能力。比柯卡战役的主要受害者是瑞士步兵，在帕维亚战役中是法国骑兵，两者都是该兵种的最佳代表。瑞士人不顾总司令洛特雷克的劝告执意发动进攻，冒着火绳枪兵从低洼的道路后面的一堵土墙射出的枪弹稳步前进。他们的损失极大，而且，虽然他们抵达并开始猛攻帝国军队的阵地，但是，由于他们的力量消耗太大，从火绳枪兵中穿越上来的长矛兵轻易就把他们打退了。在帕维亚战役中，佩斯卡拉侯爵对抗重骑兵猛攻的方式是：把他的火绳枪

兵向前调动，不断扰乱先头部队，利用他们能利用的一切掩蔽物——战斗是在稀树草原上进行的，那里有许多树篱和灌木丛——后又撤退到能得到长矛队保护的地方。布朗托姆引述一份西班牙的资料，它强调这些战术的新奇性，他本人将这些战术称之为“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新奇作战形式，它易于想象而难以描述”^[5]。提示一下这一点或许有助益：随着用火绳枪兵进行散兵战和用较小股军队作战的战术变得更公开，对战役的描述人为的内容往往越来越多。虽然法国人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些战术标新立异，但内心却在吸取教训：从1529年起，在骑兵部队中增加了骑马的火绳枪兵，一当发现德国人的骑兵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就马上雇用了骑马的手枪兵。而且，在帕维亚战役之后，骑兵不再用来对抗火绳枪兵，而是用来对付其他的步兵，或是在有枪弹支持的长矛兵与其他部队正面交战时用来攻击他们。由于步兵与骑兵都开始避免直接针对火绳枪兵的军事行动，所以枪弹不再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火药在拉文纳战役、比柯卡战役和帕维亚战役中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人们才制定出合理的对策。从16世纪20年代中期起，枪弹虽然仍很重要，但已成了一种次要的武器。

虽然骑兵与步兵的比例在这段时期下降到大约1：7或1：8，但骑兵仍然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侦察、突袭或骚扰已与之交战的敌军部队仍然需要轻骑兵。重骑兵以反复的突然冲击，对于遏制大批步兵仍然起着非常宝贵的作用，因而能给炮兵和投射部队提供固定目标，如像平基战役中那样。长矛步兵因枪弹射击而紧张越来越成为规律，所以直接向纵深冲击逐渐失宠，虽然对这种运动方式的优点还在进行热烈的辩论，但已倾向于为半旋转式轮番进击所取代，以这种方式进攻时，配备有手枪的一个中型骑兵纵队稳步前进至近距离，一排骑兵开枪之后立即转开，另一排骑兵接着上来接替。这种战术的好处就在于能连续不断地开火打击敌人。不利之处在于它需要镇定自若的勇气去接近有火绳枪兵在内的步兵并要仔细瞄准。由于大部分骑手是以右肩托枪，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向左边让开，这就削减了他们一半的效用。但是，某种中重型或重型骑兵仍然非常重要；缺乏骑兵的军队必然是那些配备有更优秀的这个兵种的军队打败的对象。

到这段时期中期，社会加在步兵身上的大部分污名已经消除。这有多种原因。在某些国家，如像西班牙，骡子是主要的乘骑，而在英格兰，那儿的马体格瘦小，由于骑马的机会较少，所以骑兵要少一些。君主们偶尔以戏剧性姿态来宣传步兵在战术上日益重要的作用：

查理五世与长矛兵一起作了短途行军，就像在他之前马克西米连已做过的那样。徒步比武在贵族中越来越流行，因此他们看惯了身披盔甲站立的人。火器使得步兵更受欢迎，不过征募长矛兵因此变得非常困难，以致瑞士人和德国人不必为市场对他们的需求感到担心。这两个兵种都需要。单有长矛兵容易受枪炮的攻击，单有火绳枪兵则容易受到突然冲进来的骑兵的袭击，而没有充裕的时间或宽阔的空间来瞄准目标。如果有长矛兵阻止敌军的冲击而给火绳枪兵重新装填弹药的时间，或者在敌军猛攻长矛兵时由火绳枪兵来减弱敌人的攻击力，那么，骑兵取胜的机会就很小。在这段实验期，问题是要找到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最佳方式。在切雷索莱战役（1544年）中，两种实验互相抵消。法国军队和帝国军队都把射击安排在第一排长矛兵的后面，并命令要等到双方军队实际相遇后才开枪：法国军队的手枪和帝国军队的火绳枪同时开火，击倒了最前面的长矛兵，但并未造成力量平衡的改变。

托马斯·奥德利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论兵法的论文是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撰写的。他的理想的战斗队形是以庞大的步兵方阵为基础，要么是完完全全的正方形（这使人联想起瑞士人的纵深队形），要么横排是纵列的两倍。队形应由5个分队组成。前5排或6排是长矛兵，在第一排之后是射击队但也可不安排；第二个分队由戟兵或钩镰枪兵组成，两端有长矛兵小队保护，以防这些武器装备较差的士兵受到骑兵的侧面攻击。中部是另一个长矛兵分队；之后是像前面一样由长矛兵掩护的戟兵和钩镰枪兵组成的混合分队，最后是由长矛兵单独组成的分队。这一密集队形两侧的每一边由一支“袖套状”的射击队（弓箭手以及火绳枪兵，这是一种英格兰的队形）作掩护；在射击队之外，在每一侧还有炮兵，在炮兵之外，还有骑兵。在整个编队的前面是一排细长的投射部队，由弓箭手和火绳枪兵混合组成。在战斗中，这一散兵战斗队列所造成的麻烦同它撤退前可能造成的麻烦一样多，于是，部队的主力一行接一行地靠拢来，目的是要有足够的骑兵来阻挡敌人并足以派出兵员去骚扰其侧翼。

这并没有什么先进之处。而且，从整体来看，直到16世纪第3个25年间，战斗队形仍然是极其保守的。其部分原因是，一旦吃了火药的苦头，就很少有大规模的激战，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国际性军队中很难把新征兵员和职业雇佣兵联合起来。国际性军队的忠诚常常为总司令和分队指挥官所分享。大规模密集队形与大规模密集队形对阵

（中世纪时的战斗）的传统继续存留下来，并由于人们没有忘记罗马人的纵深战斗队形而得到加强，罗马人的队形由相互支持的三个分队组成，分别叫第一列、第二列和第三列。难于联合肯定促进了这种密集队形的采用，却失去了具有更灵活的先头部队的更小、更自由的分队。由6000士兵组成的军团和3000士兵组成的步兵团是试图保证将部队单位的规模控制在易于管理的范围内。已有几个小“队”被纳入统一指挥。但是，还没有出现既有相当的总体规模又能独立作战的分队的部队，如像纪律严明、拥有自己连队的团级单位。军队的战斗力比它们各部分应有的战斗力的总和低下。

军费短缺影响了战略，因为它影响了军队的规模和运输能力，有时还影响战术，由于缺乏现金——哪里有银子，哪里就有瑞士人——可能引起某个部队单位叛变。但是，这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是否开战的决定。对于受到进攻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反而要容易解决一些：由于免税、过时的财产评估以及收税效率低，16世纪的税收很少像本来计划的那样深地去掏人们的腰包，而且在战争威胁之下，明显被过重征税的人通常能再多交一些。法国这个经常进行侵略的国家可以辩护但并不能证明有强制性的需要，却一次又一次为其新的冒险成功地筹集到款项：时而向全国普遍征税，时而向个人或公司贷款，时而又向社会上特定的某一部分人，如像神职人员，征收特别税。而且，到国外打仗的军队总是能指望以战利品和释放俘虏的赎金来补偿少而又不定期发放的军饷。

随着技术上的每一进展，投入军队的资金数量就会增加。枪炮、炮架以及弹药车都象征着日益增加的经费。虽然其中的许多经费在和平时期也要开支，但是，运输炮场上的炮和其他东西需要租用数以千计的牲畜。一门中型炮需要10匹马，一门大型炮所需的牛则达20对。随着国家投资金额的增长，政府就越来越不愿让战利品流散在个人手中。理想的办法是，以战养战，就像古代人那样，他们将大部分掠夺物上交国家，其余的由部队均分，其中少量的留作军团的救济基金。士兵们进行掠夺的合法权利——至少是在一场从法律意义来讲的“正义”战争中——并未受到置疑。但是，曾作出努力以防止国家完全得不到补偿，同时为了维护军纪而试图控制抢劫行为。1527年颁布的斐迪南一世的战争条款是那个时代最持久最具代表性的法规之一。未经允许禁止劫掠；在发信号准许行动之前必须严格遵守命令。任何大炮、弹药、火药和粮食储备必须留给皇帝。不准劫掠投降的城市。在

劫掠罗马那一年发布这些条款，这一事实表明这样的规定是多么必要，实施起来又是多么困难。人们想发战争财。有许多人，如像参加了抢劫罗马的塞巴斯蒂安·谢特林·冯·伯顿巴赫，带回国的劫掠物足以购置房地产和买贵族头衔。军队经过的城镇和村庄被洗劫一空，除了更值钱的东西之外，连衣物、器皿、畜禽也统统抢走，以致行李多得妨碍了军队的前进，不得不对行李的数量加以限制。但是，在各方都得益的情况下，这样的限制必然是无效的。而且，国家通过有效控制抢劫或通过拨给自己更多的战利品是否已从中获益，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劫掠战利品一直是征兵中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此外，在对军费开支及其预期的回报作了冷静的审查之后，不再发动战争了。荣誉、威望、冒险——这些仍然是最强大的刺激因素并影响着那些决定参加战争的人，正如战利品和释放战俘的赎金对参战的人的刺激作用一样。在1525年和1558年之间，法国在既无海上霸权又没有对伦巴第和意大利地区实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竟然4次发动夺取那不勒斯的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那些在激发查理八世统治集团中贵族们（与审慎的政治家相对而言）的冒险热情方面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骑士传奇故事，人们仍在阅读，而事实上这段时期再次兴起崇尚军旅生活和军人美德的热潮。其原因不仅仅是激发堂·吉珂德的狂热的那种过分夸张的骑士传奇故事，对这些传奇故事的适度赞扬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战争艺术比所有其他艺术要高级得多”，维吉蒂乌斯在他的第3本书中写道，“有了它，我们的自由得到维护，我们的尊严得以永恒，各行省及整个帝国本身则将长存”。纪尧姆·迪舒尔在他的《论古罗马人的设营术和军事训练》（1556年）中的《致国王》一文精确地阐释了这种感情。为了激发佛罗伦萨民兵对其陌生的新职业的热情，在1528年对他们所作的演讲中又再次提到同样的论题。皮尔·菲利波·潘多尔菲尼赞扬军事训练“胜过所有其他的科学和美德”。路易吉·阿拉曼尼激励他们以参加礼拜时同样多的“崇敬和纯洁”来看待服兵役。巴托罗米奥·卡瓦尔坎蒂用来描述“好军人”的话一位道德主义者可以一字不改用来描述“好人”。在这些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要强调基督教徒的勇于战斗的美德，因为仍然有一种坚强的萨沃那洛拉派的信念，认为佛罗伦萨是基督选定的城市，它的敌人就是基督的敌人。但是，人们在习惯上对军人美德的赞扬调子太高，以致在《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第3卷的序言中拉伯雷有充分的理由用自己的说法对此进行了讽刺：

我确实相信，在拉丁语中战争被称为Bellum（好事），不是像古拉丁语警句的某些拙劣修补者从对立面所猜想的那样，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看到战争的美妙之处，而是要按照字面意思从肯定角度来理解，因为在战争中，每一种美与善都显露出来，每一种丑与恶都被彻底消灭。睿智与和平之王所罗门除了将神的智慧那不可言喻的完美比作是一支旌旗缤纷的军队之外，不知道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尽管少数人按伊拉斯谟的传统表达了基督教徒出于和平主义的不安情绪，但在欧洲战争上几乎没有得到支持，不过，他们最终却证明是用以抨击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残忍的侵略行为的一根有用的棍棒。富尔克沃对他们感到不耐烦，根本不予考虑他们的意见，这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战争只要不是仅出于野心或为报复而发动，就是合法的。

在我看来，如果依照圣经提出相反的看法，宣称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耐心地忍受伤害和冤屈，不要抵抗那些打他或夺走他的财产的人，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认为，那只是说给使徒及使徒式的人听的，如果他们宣讲的教义要想产生良好的结果，他们就不得不表现出谦卑和耐心。

军事著述家们知道有两类读者大众：由对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我的目的不是帮助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互相对抗”，丢勒在他论设防的著作里写道，“我的目的首先是要援助那些与土耳其相邻的国家对抗异教徒的政权和军事行动”。这种十字军式的思想仍然有生命力，但是十字军式的战争并不需要谴责这样的战争，而仅需要将它引导到这一方向上来。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必须更有力地向人们逐渐灌输基督教的原则，以便消除人们的好斗本性；另一种是，应该为基督教削弱了人们的尚武精神而感到痛惜（马基雅弗利的观点）；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是大多数人承认战争是社会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至于战争是好是坏，则仅视战争对个人的生活或国家的名声产生何种影响而定。这反映在贵族平时的娱乐活动上，而平民的通常很野蛮的决斗是仿效贵族的马上比武。这种观点还充塞于骑士故事之中并且是许多在罗马更为传阅的文学的主题。这样的读物不仅描写了战争的最高尚的方面——无私的牺牲，拒绝接受政治奴役，它还强调找碴儿的重要性，以及（源于诸如弗朗蒂努斯的《战略三书》之类的书）为了取胜无论采用多么残忍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的重要性。

马基雅弗利抱怨说，战争已变得太仁慈，对于战败已感到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人们不再愿意进行为取得军事胜利所必需的严格训

练。这种草率的推论几乎没有事实作依据。土耳其人很少活捉战俘，除非已及早将投降条件给守军。即使那样，投降条件并不总是能得到履行：1529年布达守军根据协议投降之后，当他们撤离出城时，还是遭到大屠杀。除了通常将贵族留下活口以获取赎金外，土耳其人也不分贵族与普通士兵。在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战败者方面，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瑞士人几乎也如出一辙，令人生畏，因为，他们自夸说从不收容战俘，落入他们手中的俘虏统统被杀死。其他国家有时也同样冷酷无情，1522年，埃丹附近的科普特堡陷落时，法国人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下令立即把所有俘虏杀死而不扣押起来索取赎金。然而，更通常的做法是，当敌人被打得显然不可能恢复元气时，指挥官就命令士兵给予宽恕。然后把那些有能力付赎金的人扣留下来，而那些付不起赎金的人，如果运气好的话，被夺去财物之后便允许自由离去。对待无利可图的战俘的问题太复杂了，16世纪的军事管理部门无法解决。但是，给予宽恕是出于仁慈而不是出于任何道德的或法律的义务感。当梅斯城解围时，法国人出城去给那些被战友撤退时遗弃的西班牙伤兵包扎伤口。外科医生帕雷说：“我们愿意这样做”，但又闷闷不乐地补充了一句“我想他们对其他人可从来不会这样做”。

当人们想起对一支军队自己的伤员的关心太少时，对敌军伤兵的关心难以确知似乎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对伤员的治疗护理很马虎。大贵族随身带有自己的外科医生，有时，这些人也能关照普通士兵，但他们首先关心的是雇主及其朋友，这是很自然的。300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为每1000人配一个医生；参加1544年战争的大约有32500名士兵的英格兰军队没有军队直接雇用的外科医生，法国军队也没作正式的规定。玛丽·都铎捐赠了一所医院供贫穷、年老或伤残士兵就医，而1551年科利尼的条令建议部队自己征税来为医院的经费和设备提供资金。的确，在法国，伤残军人不是完全没得到照管。有些伤残士兵被安置在国王有委任其有俸神职权的修道院中（愤愤不平的修道士为了得到津贴通常花钱贿赂得到这些伤残军人入住自己的修道院）；其他伤残军人被安置在安全的城镇，安排他们在那里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以换取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占很少一部分。提供正规的医疗队，建立专门的军队医院和一套补偿伤残士兵的体制，还有待于建立大规模的正规军。然而，在这段时期，能得到的医疗服务虽少，但医疗质量开始提高，特别是在治疗枪伤方面。在1545年昂布鲁瓦兹·帕雷发表《火绳枪及其他火器伤口的治疗方法》之前，枪伤一直是用

烧灼剂来处理的。他采用较温和并且烈性较小的药物治疗，结果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在10年之内，又有4位作者出版了有关治疗伤口的书，其中3位作者专门谈治枪伤。

虽然在1519年至1559年间很少有海上激战，没有一次决战，但这段时期的造船业却非常活跃，用于海军及其各项装备的费用急剧增加。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各兵种联合作战所需的运输及护卫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1535年，查理五世用大约25000人进攻突尼斯；10年之后，法国人从海上进攻英格兰南部海岸用了将近60000人。政治上的敌对状态导致边境很容易遭到海上进攻的大国之间展开军备竞赛。在这方面，威尼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建立一支拥有100艘战舰的后备军，以便在紧急时候增援其巡逻舰队。这就意味着要建立的舰队比任何一个大西洋强国的更大。但是，即使如此，威尼斯也只能与其他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才有希望在战舰的数量上与土耳其及其北非支持者相匹敌。在北方，主要的挑战来自法国，而亨利八世热心于发展海军意味着，除了要在数量上与之相匹敌以外，英格兰还力图在设计与管理上胜过敌手。如果说政治上的对抗需要的是数量上的优势，那么统治者的威望则一定有赖于船只的庞大。每一个统治者都希望至少有一艘外表令人望而生畏的船只。继1511年苏格兰的皇家船只“大米歇尔”号和1514年英格兰的皇家船只“亨利谢主”号之后，法国于1527年建造了“大弗朗索瓦”号王室船，瑞典于1532年建造了“大象”号皇家船，以及1534年葡萄牙人建造的笨重的“桑若昂”号皇家船。甚至马耳他的骑士们也被这些庞大而带有华丽装饰和令人敬畏的装备的船只所吸引，他们自己的“奇物圣安娜”号船于1525年下水，企图以此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载重量1000吨及1000吨以上的商船并非罕见，它们的载货能力证明它们的规模应该很大，但是，这些庞大的军舰就像火药使用初期难于控制而又“显赫”的射石炮一样；如果不是为了荣耀，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建造几艘较小型的船只。

在设计、对现有型式的修改和采用新型式方面所做的试验也刺激了造船活动。地中海海军建筑师主要关心的是提高大型桨帆船的速度和机动性。直到16世纪30年代，这种船一直被尤其是威尼斯人用作强力武装货船。有了重型装备和众多的船员，他们就能抗击袭击者，而且，只要他们载有贵重的船货，则货运费足以弥补船员与载货空间比例过大造成的损失。由于香料贸易衰退，这些船赚不到钱，而且，由于海军装备同时在改进，需要一种比轻型船能给桨手提供更多保护的

船，于是，重型武装商船就成了军舰。它们主要是用帆航行载货而建造的，因此，牺牲了划行和作战性能。问题是要使它们像轻型桨帆船一样快，如果可能，驾驶起来一样灵便。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也是最不实用的一种是修建一个以上的桨手甲板。皮凯罗尼·德拉·米兰多拉向参议院呈送的船舶设计方案，分别有2层和4层甲板，但是，由于两层桨帆船的上层划桨有大约60英尺长，而4层桨帆船的上层划桨长达180英尺，这个设计方案遭到否决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威尼斯没有建造过多层甲板船。第二个建议是，一人一支桨，这样一个坐板上的桨的数量便超过通常的3支。人们见到过一个坐板上有4支桨、一人一支桨的船，但是，当威尼斯希腊雄辩术公共演说家韦托雷·福斯托向参议院提出建造古代战无不胜的5排桨大帆船的建议时，引起许多争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命令兵工厂造一个样品。在1530年的一次公开的速度试验中，尽管它很复杂，却在群情激奋中超过了一艘标准的一个坐板3支桨的桨帆船，但在福斯托的船之后，再也没有建造过这样的船了。未来的船只在于要有第三种设计原理：一种由几个人，通常是5个人操作的一个坐板一支桨的船。

当南方强调把桨帆战舰和弧形船作为独立类型的船只加以改进时，北方却在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建成一种既有战舰的机动灵活又有弧形船的海上适航性和坚固性的船。经过对帆船索具、炮位和桨位安排方面做了大量试验之后，到16世纪中叶，在西班牙大帆船中出现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船舶，在轮廓上比武装商船更接近于同一平面，比大型桨帆战舰更高更庞大，几乎只靠船帆航行，但在紧急情况下也能用桨推进并在船头和船尾配备有桨帆战舰的重型火力装备以增加弧形船的舷侧炮火的威力。所有这些对设计的试验（在南方，似乎甚至已在进行装甲船壳的试验）意味着，每艘船的造价都随着它与常规建造标准的差别程度而提高。在发展战舰的过程中，这段时期是关键时期，但是，在账簿中找到的证据比在战斗中找到的要更清楚些。

就商业运输而言，上一代人已解决了桨与帆之间的基本区别，在狭长快速帆船还是弧形船的问题上，选择了弧形帆船。有些特征表明，当时可能为战舰作了同样的选择。对弧形帆船的帆和滑车索具进行了修改，从而它们在海上的普遍适航性方面明确超越了桨帆船。而且，由于四周都有炮，它们成了浮动要塞，甚至能击退数量很大的桨帆船队，正如在地中海本身不时表明的那样，如在普雷韦扎（1538年），当时一艘停泊着的威尼斯大帆船击退了敌军桨帆船的一系列进

攻。另一方面，桨帆船也有一些严重的弱点。与弧形船不一样，它们容易受到侧面撞击，即使受到偶尔的一击，损坏了桨或危及划桨甲板，就可能使其动力装置丧失工作能力。由于船身很长，它们转向很不灵便，而且，由于发射强大的炮火时，只有让船身的长度吸收后缩力船才安全，所以只能通过船自身的运动来转动这些大炮（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升高）。此外，1541年将查理五世的舰队刮到阿尔及利亚海滩上毁坏（从而阻止了土耳其战舰对其拦截）的大风表明，桨帆船只是在冬天才有不太大的可靠性。尽管如此，桨帆船仍是地中海的主要军舰；桨帆船不仅影响了北方帆船的设计，而且制造了名副其实的桨帆船供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使用。军舰设计不能只靠造船木工的意见来决定。传统很有价值，尽管人们应当注意：北方民族憎恶强迫劳动被看作是桨帆船未能在其水域安家落户的一个原因。基督教徒的桨帆船上的桨手几乎都是自由人，自愿应征入队，允许拥有自己一定体积的货舱，在大部分航程中能利用船帆航行时就不划桨。很难使这些自由人在港口时行为规矩，也难于使他们按时回到船上，这就是有人建议，就像1556年一位威尼斯的营造总督所做的那样，应该使用更多的罪犯来做船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妨碍造船木工的理想全部付诸实践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在任何特定的水域占优势的舰队是由桨帆船组成的，就不得不用桨帆船来对付。在平静无风的天气，当敌舰在数量上足以超过自己、16世纪中叶开始在巨型桨帆船上装备的远程重炮也能相匹敌时，弧形船组成的舰队就无能为力了。单靠弧形船也不能迫使桨帆船参加它们不准备接受的交战。仅有一种类型的桨帆船的能力也不够——例如，造价比较低廉的轻型桨帆船，即使与重型弧形船一起使用也不行。由桨帆船组成的舰队只能用同等的军力、由重型桨帆船支持的轻型桨帆船（同时后者也支持前者）来对付。由于风向变幻莫测，联合使用帆和桨并不总是可靠。在普雷韦扎，安德烈亚·多里亚正要与土耳其人开战时风就停了。由于不想与其弧形船分隔太远，于是他停止了进攻。土耳其人也停下来，希望把那些性能比它们差的桨帆船队吸引过来。多里亚不愿靠近，结果没有发生全面交战。安东尼奥·多里亚在其未出版的《论土耳其事务》一书中强调，由于帆和桨的作用随风向和海面的变化而差别很大，所以决不要允许弧形船到战斗前线；而只应用来作运输、补给和预备队。同样，由于法国人使用了桨帆船，英格兰人被迫用自己的划艇来对付，就像1545

年英格兰人用桨划动的驳船保护自己的弧形船免遭丹尼包尔特的意大利战舰攻击一样。

还有一个因素妨碍了人们单独考虑这种理想的作战性能。商船与战舰之间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哪一支海军大到可以不依靠商船的援助；没有哪一个国家富裕到足以单独使用其战舰来作战。例如，在英格兰，王室给达到一定规模的商业船队以补贴，其着眼点就在补充海军，而在和平时期又把海军的船只租给商人。军舰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受到对商业最有用处的船舶类型的影响。大西洋强国的海上利益驱使他们主要考虑使用弧形船，而威尼斯人由于其海洋运输业的萎缩，他们做到了用自己的桨帆船来反击土耳其人的桨帆船，而不致为军事需要牺牲太多的商业上的便利——不过，到16世纪中叶，地中海的商业船舶与海军船舶之间的差异大于北方；土耳其人对威尼斯的不断威胁，以及桨帆船作为货运船的用处日益减小，这意味着威尼斯在大西洋强国被迫同样做之前一个世纪就不得不把资金搁置在一种专门的战舰上。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北方把军舰作为巡逻舰的这一特殊用途对威尼斯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因为自从土耳其人海上力量增强以来，威尼斯人就一直甘心于不仅仅按照令人敬畏的临时舰队集结或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观点，而且也要根据非赢利的警戒任务来看待海军。

当海军舰队互相遭遇时，其行为在战术上类似于两支陆军部队的行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仍然没有看到海军的战术有其独特之处的任何明显迹象。古代人的看法是保守而不明确的。古罗马人依靠其船只的重量优势来逼近敌舰并尽快集中力量咬住敌舰。消灭敌人的实际任务是由登上敌舰的一队队军团士兵完成的。因此，在作者们的论军事的著作中，海军问题所占的篇幅不大。当维吉蒂乌斯进行著述的时候，罗马几乎不关心海军事务，而他对海上知识比对海战更感兴趣，将大部分篇幅用来给指挥官谈什么时候能安全上船以及如何设法找到敌舰；由于接受了海陆类比的观点，如果找到了敌军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就不必细谈。结果，理论家们很少写海上战争的情况，而舰队指挥员中许多是陆军军人，在航行方面依靠部下，根据他们自己在陆地上的经验来确定战术。就桨帆船的作战而言，这是完全合乎常情的；复杂而又受到严密控制的调动可以不考虑风的影响来进行部署。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原则却支配着对大型帆船作战队形的部署。

因此，阿方索·德·沙维叶在1530年左右写到关于西班牙的弧形船时强调：

一支海军舰队同另一支海军舰队交战时需要有整齐的队形，就如同一支陆军部队同另一支陆军部队交战时需要有整齐的队形一样。因此，在陆军中，重骑兵单独列队发起攻击或迎击敌人，而轻骑兵在另一个地方支援重骑兵，追击和骚扰敌人；海军舰队也是如此，舰队司令应该调令最强大的舰只到一个区域列队进攻，较弱的舰只在相隔一定距离的另一区域，如果敌人逃跑则用大炮骚扰和追击敌人，并到最需要的地方进行救援。[\[6\]](#)

目的就是在广阔的战线上发动进攻（结果只用能向前发射的炮），以便较大的军舰能咬住并尽快强行登上敌舰，在需要时由停在一旁应急的轻型舰只进行支援。和纯粹桨帆船的战术唯一的差别是，虽然对桨帆船进行侧翼攻击是有效的，但对弧形船的舷侧进行侧翼攻击则有危险，而且弧形船受到撞击不容易沉没。1545年在写给英格兰舰队的两份起航命令中，出现了这些西班牙战术的另外一种版本。英格兰舰队主体分为3列，在有桨手的两个侧翼舰队和一个后备舰队的支援下向法军发动攻击。当第一列舰队与敌军的第一排战舰遭遇时，应从敌舰之间穿过去，然后转身从敌后攻击敌舰，与此同时，由舰队司令指挥的英格兰第二列舰队开上前从正面与敌舰交战。当然，这不是一种能照搬到陆地上的调动部队的方法，但是这种战斗队形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队形，就像一排排急于开始投入战斗的士兵排成长长的行列向敌人发起正面攻击一样，每一种依靠正面进攻的队形都是如此。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战术要等到对阵战受到连续炮击的作战方法影响之后才会有。连续炮击战就是充分利用舷侧火力并依靠大炮而不是强行登船的作战方法。事实上，当时人们认识到远距离作战方式是帆船之间最有效的交战形式。这种发展（对装备桨帆船的海军来说不重要）要到16世纪70年代才出现。它不是在对阵战中所获经验的结果，而是以前由军人们控制的军事会议感受到参加小规模连续炮击战的老海军们的看法时产生的。但是，这些新战术也只得待到研制出更好的火药之后才出现，因为有了性能更好的火药，短筒炮在舷侧发射时才更容易操作从而增大射程和攻击力。到16世纪50年代，尽管桨帆船战舰的作战情况在地中海上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海上战争的性质在北方却经历了一场革命，因为舰艇的设计和武器装备的技术改进，加之军事上的类比逐渐减少，使得远距离作战方法取得绝对优势。自此以后，解决问题靠的是技术而不是数量。一旦参加老式的正面交战就再

也不能穿越队形，在接着发生的大混战中，重量是主要的优势。在远距离作战时，在整个交战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当时信号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能控制舰队。虽然间或仍有登船作战的情况，而有大批船员的大舰只仍有某些优势，但胜利的可能性往往在较灵便的舰只一边。在16世纪中叶以后，陆上和海上的战争艺术不但在内容而且在方式上开始分道扬镳。

（曾佑昌 译）

[1] *Turciarum Rerum Commentarius*（巴黎，1539年），第83页。

[2] 约翰尼斯·博穆斯：*De Omnium Gentium Ritibus*（奥格斯堡，1528年）lib. 3, c. 2。

[3] 《关于论兵法的论文》，载《陆军史研究学会期刊》（1927年），第113页。

[4] 参见本书边码第511页。

[5] 拉兰纳编：第1卷，边码第337页。

[6] 《作战指南，1513—1816年》，J. S. 科贝特编，海军档案学会，1905年，第7页。

第十七章 1520—1566年的奥斯曼帝国^[1]

谢里姆一世在其统治末期，一直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但没有人能肯定攻击将朝向何方。这位伟大的苏丹却于1520年9月去世。当消息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传开的时候，人们以为阴霾已散，化险为夷了。据说谢里姆的独生子苏莱曼不谙世事，性情温和，因此，是一位不好战的皇太子。很少有比这更草率的预言或更快速破灭的幻想。1521年，苏里曼向匈牙利进军了。

这次战役经过精心组织：鲁梅利省省长（*beglerbeg*）^[2]率军向沙巴茨进发，苏丹与他的大部分王室警卫团随后而行；宰相皮里帕夏（*grand vizier piri pasha*）^[3]则率领强大的近卫兵分遣部队携带大量的攻城炮向主要目标贝尔格莱德挺进。穆罕默德二世曾于1456年试图攻占该城，但失败了。同时，阿金吉斯（*Akinjis*）^[4]骑兵队分两支纵队向前挺进。一支纵队去牵制特兰西瓦尼亚，另一支纵队劫掠了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土地。沙巴茨和塞姆林的陷落切断了通向贝尔格莱德北面 and 东面的道路，因此，苏莱曼这时就能放手袭击这个大要塞。从多瑙河的一个岛上用大炮袭击城墙，一次强攻便把守城部队赶入城堡；奥斯曼帝国的舰队逆流而上，切断了由水路而来的所有援军。由于匈牙利人与其塞尔维亚雇佣军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该城的末日便到来了。匈牙利人想要坚持战斗，而塞尔维亚雇佣军却主张放弃防守。1521年8月29日，贝尔格莱德投降。

这时苏莱曼又转向去征服罗得岛。圣约翰骑士团长期以来骚扰穆斯林的商业贸易，抢劫载有去麦加朝觐者的船只，杀死或奴役奥斯曼苏丹的臣民。他们的劫掠活动过于猖獗，以致穆罕默德二世于1480年试图夺占该岛，但未获成功。1517年谢里姆一世征服麦木鲁克（*Mamluk*）^[5]苏丹国，实际上已决定了罗得岛的命运；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无法容忍这个梗阻于从伊斯坦布尔到叙利亚和埃及各新省海路上的海盗大本营继续存在下去。然而这个要塞几乎坚不可摧，苏莱曼

很清楚地知道，骑士团作了精心准备来防守它。1522年的苦战说明了这位苏丹在这场战役中应该多么感谢他的父亲谢里姆。在谢里姆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已加强和提高了他的海军力量，似乎其意图是要征服该岛。

攻击舰队于1522年6月24日到达罗得岛。一个多月之后，部队登陆，军需品运上该岛，开挖战壕，修筑攻城炮台。苏莱曼率领强大的增援部队，穿过小亚细亚半岛，于7月下旬跨海到达罗得岛。数次猛攻要塞的尝试清楚表明，只有在城墙下挖坑道并轰击城墙才有成功的希望。结果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断断续续的强攻中人员和物质损失惨重。随着冬季的到来，雨水和寒冷使围攻行动难于进行，苏丹只好提出宽大的投降条件。但直到12月21日，骑士团精疲力竭到极点，在得到自由而不受骚扰地撤回欧洲的保证后投降。

在新的统治时期的头几年，在叙利亚和埃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在那些已被谢里姆一世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麦木鲁克人中，仍然残留着对他们从前光辉业绩的怀念。而这时，随着苏莱曼登基，更多的不满分子认为重获独立的时候已经到来。曾为麦木鲁克人埃米尔的大马士革帕夏占勃第·加扎里于1520—1521年起来造反，围攻阿勒颇未果而遭失败，在抵抗伊斯坦布尔派来征讨他的军队时阵亡。在埃及，动乱与阴谋比比皆是，海尔·贝伊帕夏死后，在1522年发生骚乱。在其后的年月里，在1523—1524年的冬季，掀起一场更严重的反叛。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派来的新帕夏艾哈迈德联合一些麦木鲁克人的贝格（*begs*）^[6]和阿拉伯酋长，企图消灭驻开罗的土耳其近卫军，以便使他成为该地的真正首领。他的野心注定不能得逞，因为麦木鲁克成员中以及各个部落联盟之间相互倾轧，就不可能统一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尽管这次造反没费多大周折就镇压下去了，但它使苏莱曼深信，需要修改在征服时临时决定的解决办法。他把这一任务交给首相易卜拉欣，于1524—1525年在埃及实行广泛的司法、财政和行政改革，重新确立的政府基本体制一直沿用到几乎三个世纪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兴起之时。易卜拉欣实现了在帕夏、近卫军、麦木鲁克贝格和阿拉伯人酋长之间权力与特权的平衡。自此以后，他们的联合和关系紧张对于埃及内部的事态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时确立的微妙平衡总有一天会打破，从而有利于麦木鲁克而

不利于帕夏；但这种变化要到很久的将来才出现。在此期间，这些改革使埃及有了很长一段稳固而有利的统治时期。

苏莱曼已有多多年没打仗了。闲着无事使土耳其近卫军产生了不满情绪，结果，1525年3月突然爆发一场骚乱，警告苏丹不得将准备新战争的时间拖延太久。宰相被从开罗召回，于9月到达伊斯坦布尔，决定沿多瑙河发动大攻势。1526年4月，苏莱曼向匈牙利挺进。由于天气恶劣，行进困难，进展缓慢。直到8月下旬他才跨过埃斯泽克（*Esze'k*）附近的德拉瓦河，继续前进，穿过一片沼泽与河流涨水交织的地区，阴雨绵绵，偶有薄雾，最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抵达莫哈奇平原。

匈牙利人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互相倾轧毁灭了精诚团结、抵御外敌的一切希望。^[7]匈牙利的达官贵人既不努力守住德拉瓦河防线，也不同意在布达抵挡围攻以期将防卫战拖延到冬天来临，迫使苏丹撤退。8月中旬关键的一两周时间在激烈的辩论中浪费了，剩下的是极其危险的最后选择：冒险同一支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打一场阵地战，而这时扎波利亚的士兵，所有从克罗地亚招募的兵员以及从波希米亚召集的部队都还未到达。

多瑙河流经莫哈奇平原的东部，平原的南部和西部是有树林的低矮山丘，挡住了视线，使人看不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纵队在向前挺进：在先头部队中有塞门德里亚（*Semendria*）的边防武士；接着是鲁梅利省的瑟帕希斯（*sipahis*）^[8]部队，然后是安纳托利亚的瑟帕希斯部队；在他们后面是苏莱曼率领的土耳其近卫军和王室骑兵团；由波斯尼亚的战士殿后。1526年8月29日，匈牙利人还没有打算在大篷车和二轮车后进行防卫战。他们的重型骑兵队在首次猛冲中，将鲁梅利部队向后猛推，撞上安纳托利亚部队。但匈牙利骑兵队自己也停下来，当时波斯尼亚和塞门德里亚的贝格穿过山丘已行进到左面，他们从西面下来进入基督教徒的先遣部队的右侧翼。这时，国王路易率领其余的骑兵发起第二次强攻，绕过安纳托利亚的瑟帕希斯部队，向前猛冲进入土耳其近卫军中，枪炮射击到苏丹周围。猛烈的炮火粉碎了匈牙利人的进攻，大规模的侧翼攻击将他们击溃，朝多瑙河方向逃去。国王及其大部分达官贵人，要么阵亡，要么掉入河流沼泽中溺死，只有少部分残兵败将在大雨和夜幕的掩护下逃走。苏莱曼于9月10日抵达布达。一星期后奥斯曼土耳其人跨过多瑙河到达佩斯。阿金吉

斯骑兵队朝拉包（杰尔）和科莫恩方向到处劫掠，被召回后，将掠夺得来的贵重物品和在布达找到的所有枪炮顺流运走。在所有胜利中最赫赫有名的一次战役结束之后，苏丹迅速撤退，先撤到塞盖丁，然后撤到派泰尔沃尔代和贝尔格莱德。

在回国行军途中，传来西里西亚的土库曼人起义的消息。他们对于派来为财政和行政管理目的登记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的奥斯曼土耳其官员的行为感到愤怒。在卡拉曼也有麻烦，在那里，有一个叫卡连德·奥卢的人及追随他的托钵僧激励土库曼部落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阿纳多卢^[9]、卡拉曼、阿马西亚和迪亚贝克尔的部队在来自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增援部队的援助下，进行了一场此起彼伏的战争。形势非常危急，以至终于需要宰相易卜拉欣帕夏亲自过问。他以圆滑老练的外交手腕和赠予封地的许诺诱使土库曼贝格放弃与卡连德·奥鲁的联盟。之后，这次造反很快失败而平息了。但即使如此，在托鲁斯山区还发生过一起暴动。直到1528年夏季，这次起义的最后一点余火才熄灭。

在此期间，在北部边界外发生了严重冲突。匈牙利兼波希米亚国王路易（二世）娶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大公爵斐迪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亚，而斐迪南本人又娶了路易的妹妹安娜为妻，然后，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儿接管了奥地利及其属国。路易在莫哈奇去世时，未遗下后嗣继承他，斐迪南要求得到这份丰厚的遗产。如果他的雄心能够实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就可以和奥地利融合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侵略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样，苏丹所面临的就不止是一个像路易那样独立而弱小的匈牙利国王，而是一个属于当时欧洲最伟大王朝、属于牢牢掌握大权的王室的亲王。在紧急情况下，这个王室有能力在多瑙河边召集起远远超过苏丹在莫哈奇地区战胜过的兵力。虽然斐迪南很快就获得了波希米亚的王权，但在布达他却未能轻易得手。他首先得击败一个可能与之竞争的对手、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1526年11月，当地贵族已将扎波利亚扶上王位。一年以后，斐迪南在施图尔韦森堡被拥立为国王，他的军队把特兰西瓦尼亚的扎波利亚驱赶至与波兰接壤的地区去躲避。这时，扎波利亚只好转向伊斯坦布尔求援。^[10]

虽然苏丹把匈牙利王国看作是他靠征服夺得的领土，但他明白，与他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所使用的统治方式相比较，间接控制比

长期直接占领更容易取胜也更容易维持下去。如果在布达扶植起一个附属于自己的王公，那么，由附庸国组成的一道屏障就可以保护他的帝国从黑海几乎延伸到亚德里亚海的北方边界。因此，他欣然接受扎波利亚的请求，将死去的路易的王国赠予他，并保证要保护他不受奥地利敌人的侵犯。不久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要求奥斯曼土耳其人放弃在贝尔格莱德战役和莫哈奇战役期间和以后所占领的沿萨瓦河和克罗地亚边界的所有要塞。宰相易卜拉欣以令人难堪的轻蔑口吻说，他不明白，当苏丹最后一次接见的时候，曾给使者们传达不祥的口信，他本人要亲自来维也纳重新兑现大公爵的要求：“吩咐他做好欢迎我的一切准备”，斐迪南为什么没有提出要求得到伊斯坦布尔。

多瑙河畔的一次大攻势是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事能力的严峻考验。苏莱曼在匈牙利战争中，战期从8月中旬延长到10月底，但是，单是到贝尔格莱德的距离就非常遥远，苏丹的部队几乎不可能在7月1日以前大规模跨过萨瓦河。行军常常缓慢而吃力，因为即使在夏季，天气似乎也一直很恶劣，苏莱曼的官方战争日记不断提到暴风、冷风和绵绵不断的雨水。^[11] 补给品与运输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必须架桥才能渡河，这是需要高技能的壮举。在困难地段还得修路，因为匈牙利国土上河流纵横，沼泽遍布。多瑙河小舰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分担运送枪炮等军需品的任务，因此，大部分现场急需使用的军需品必须用马车和手推车、骆驼和其他牲畜运送。然而，由于天气和地形条件不利，牲畜常常遭受严重损失。储备大量的粮食非常必要，因为撤退时经过的地区可能已被阿金吉斯部队在前进过程中将粮食扫荡一空，或者是在前几年的袭击中，遭受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类的蹂躏，结果成为不毛之地。而且，在长时间战役的最后阶段，总是会出现新的危险——冬天过早地突然开始。从来没有比1529年的那些困难更明显、更难于克服。苏里曼于5月10日离开伊斯坦布尔，直到7月中旬才到达贝尔格莱德，9月27日才终于来到维也纳城前。由于雨水连绵不断，河水上涨，他失去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斐迪南能够调集作战力强的老兵部队驻守该城。时间短促，粮食渐渐匮乏，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离他们最近的基地也很远。如果他们要夺取维也纳，就得速战速决，否则就完全不可能。但是，基督教徒的防御抵抗住了每一次强攻。10月14日，苏丹发出撤军命令。“雪从傍晚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在沼泽中损失了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许多人死于饥饿”——向贝尔格莱德行军的艰难历程就这样进行着。但是，这次战

役还没有完全失败，因为它取得一个重要的结果：扎波利亚重新统治布达。

大公爵斐迪南没有发动有力反攻的手段。他的部队待遇很差：牢骚满腹，他急需要钱。尽管德国的王侯们准备在危急时刻援助他，但决不会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在多瑙河上打一场长期而费钱的战争。他也不能指望从查理五世皇帝那里得到迅速的援助，当时查理五世的心思全部放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上。因此，斐迪南尽力与苏丹讲和，提出以贡金来交换对全部匈牙利领土的占有，但努力未获成功。他本人一点也不愿放松对整个匈牙利王国的要求，而苏莱曼也坚决拒绝抛弃扎波利亚。

苏丹在1532年4月离开伊斯坦布尔，他的公开目的是要找到并打垮斐迪南和查理五世的联军。他于6月末跨过萨瓦河，沿多瑙河远达埃斯泽克，然后折向西南穿过巴布克萨（Babocsa），跨过拉布河，直到抵达小镇贡斯（Guns）。在这里，一小支守军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抵抗奥斯曼军队全力以赴的强攻，支撑了几乎三个星期，最后才在8月28日投降。这时，夏季的大部分已过去，雨水连绵不断，而在此期间，正如苏丹也一定知道的那样，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已与维也纳的斐迪南部队会师。由于苏莱曼不想重复他三年前遭受过的痛苦经历，所以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从此时起，这场战役始呈大规模袭击性质。阿金吉斯骑兵团远奔进入奥地利，而主力部队穿过斯蒂里亚山谷朝格拉茨行进，在那儿让克里木汗鞑靼人沿穆尔河离开。这次行军“简直像最后审判一样令人乏味”。这时苏丹撤退到德拉瓦河另一边，然后一路烧杀从整个斯拉沃尼亚扫掠而过，来到萨瓦河的支流博苏特河。袭击到此为止，因为这条河流的那一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的希尔米乌姆地区。10月12日，苏莱曼再次来到贝尔格莱德。

对奥地利发动了使人精疲力竭而又未能决胜负的两次战役之后，苏丹意识到，时间和距离至少是与哈布斯堡政权一样难对付的敌人，除非能在遥远的萨瓦河北方获得一块永久性的基地，否则他就几乎不可能给斐迪南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于1533年同意给大公爵以和平。“维也纳国王”可以保留他当时占有的那部分匈牙利王国的国土。他还可以在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与扎波利亚签订单独的协议。事实上，苏莱曼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

停战协定。一位仰仗于他恩惠的王公继续主宰布达。他的话仍然能确定多瑙河畔大事的进程。在此期间，他还得到一个直接好处：放心处理东方的紧急事务。

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在小亚细亚半岛北部，苏丹的直接统治只延伸到厄尔津詹和巴伊布尔特。在这些要塞以外的国土仍然在土库曼贝格的控制之下，他们按照自身的需要，时而效忠于伊斯坦布尔，时而效忠于大不里士。在南方，奥斯曼帝国占有库尔德斯坦的西部和大部分中部地区，但未能控制凡湖周围地区，在那一带，沙王的势力仍很活跃。1514—1516年的战争平息下来，演变成边境地区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紧张局势。苏丹与沙王之间没有正式言和。长期不和与袭击事件继续困扰边境地区。将东正教或伊斯兰教逊尼派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波斯人分隔开的仇恨情绪并未见比从前有所缓和。^[12]

当苏莱曼正在朝贡斯进军的时候，卡拉曼、阿马西亚和迪亚贝克尔的部队与叙利亚派来的分遣队一起正在库尔德斯坦对已倒向沙王的比特利斯可汗作战。这个边境酋长的背叛使苏丹深深感到需要巩固和加强小亚细亚的不稳固的边界。还有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因为波斯驻巴格达总督曾自愿归顺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不料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援军到来之前他就被杀害了。苏莱曼不想放弃征服伊拉克的这么合适的一个借口。

与奥地利一签订和约，首相易卜拉欣就匆忙赶赴库尔德斯坦。但是，一接到比特利斯再一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的消息时，他便隐居到阿勒颇的冬季住所。次年春天他出发去对付波斯，到7月中旬，已攻占大不里士。沙王塔赫马斯普不忘他父亲易司马仪在查尔德兰与苏丹谢里姆交战（1514年）中遭受惨败的教训，他宁可放弃该城而不愿面对奥斯曼土耳其近卫军及其野战大炮的袭击。苏莱曼在1534年6月才离开伊斯坦布尔。在他前进途中，横越了几乎整个前线地区，通过厄尔津詹到厄尔祖鲁姆，然后南向到凡湖，再向东到达大不里士，在那里他与易卜拉欣帕夏于9月28日会师。接着是翻越波斯西部山脉的非常艰难的行军。“雪像隆冬一样”困扰着大地，食物匮乏，运输用的牲畜损失严重。但是，苏丹终于在11月30日进入巴格达。他在那儿一直停留到1535年4月。在作好了伊拉克的防卫准备和管理方面的安排之后，通过库尔德斯坦向北撤回到大不里士。沙王仍然决心避免一切打

大仗的危险。对于这种回避战术，苏丹无法找到有效的对付办法。大不里士位于阿塞拜疆的心脏地区，是一个离最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基地也很远的山区。试图占据这个地区将是一种后果很难确定的冒险。只要沙王的军队仍然不采取行动的话，要迅速地一举消灭那支军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8月下旬，苏里曼发出撤退命令。这次战役取得了两个显著的结果：在东方边境地区的厄尔祖鲁姆建立了一个新省和征服了伊拉克。

1536年，在从波斯战争归来不久，苏丹给予法国类似于威尼斯早就在奥斯曼帝国内拥有的那些商业特权。这项协议是使法国国王和苏丹团结起来的日益增进的友谊的明显象征。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失败被俘以后的几年中，弗兰西斯一世力求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持续进攻奥地利，希望这样能减轻哈布斯堡王朝对他自己的王国施加的压力。^[13]苏莱曼意识到与一个敌视查理五世皇帝和大公爵斐迪南的基督教国家达成协议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非常贴近于他要有效控制匈牙利王国这一愿望的请求。然而，正如维也纳和贡斯战役所证明的，多瑙河畔的那场战争不但未能保证使弗兰西斯一世获得确实的收益，反而使他处于不利地位，以致使德国的新教徒更不愿意和他一起公开反抗查理五世皇帝，迫使他们为自身的利益与奥地利团结一致反对苏丹。

然而，另一条战线上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合作前景。查理五世在地中海加强了海军力量。热那亚人对其法国盟友感到不满，于是在1528年投靠查理五世。这是头等重大的事件，因为热那亚共和国拥有一支本来可以使法国获得有效制海权的独一无二的舰队。而且，在同年经查理五世同意，圣约翰骑士团在非洲海岸的的黎波里建立要塞，并在1530年接受查理五世交给的保卫马耳他的任务。西班牙早就渴望征服北非的穆斯林各公侯国，现在看来似乎处于接近实现其愿望的边缘。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作为穆斯林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又是阿尔及尔的太上皇的苏莱曼绝不可能无视这个问题：北非应该保留还是丧失穆斯林统治？只有在海上大胆进攻才能防止受基督教统治的危险。同时，如果派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去对抗查理五世，就法国而言，这将起着代替热那亚战舰的极好作用。对苏莱曼来说，其作用与对弗兰西斯一世的作用一样大，地中海的战争比起在多瑙河上再与查理五世打仗看来似乎具有直接的好处。^[14]

苏丹在伊斯坦布尔和加利波利有巨大的兵工厂，沿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海岸有优良的港湾，在小亚细亚有丰富的木材并能为造船厂提供充裕的劳力。他的海军组织的主要缺陷是缺乏胜任的舰长和能与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司令相匹敌的富有作战能力的高级指挥部。尤其是有一件事提醒苏莱曼要注意急需消除这一弱点。查理五世的大臣们建议加强意大利海岸、特别是阿普利亚的防务，同时，作为使苏丹从多瑙河转向的最佳手段，开始在地中海东部发动强有力的海上攻势。1532年9月，热那亚海军司令官安德烈亚·多里亚在属于教皇、马耳他及西西里的三支海军中队的支援下，率领舰队去征服摩里亚的科龙。奥斯曼军队于1534年4月重新夺回这个要塞，但是，由于多里亚成功地给留在那儿的西班牙驻军以救援，所以，只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围攻之后才夺回的。苏莱曼准备向波斯进军，但他不能在他离开时听任地中海没有防卫。多里亚向马耳他以东发动新袭击的危险并不亚于对北非日益严重的威胁和与法国合作的问题，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以保证重新组织苏丹的海军，然后发挥最大的能力和作用。阿尔及尔的海盗集团（taife）是可供利用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极好工具，这些人在对基督教徒进行不停的袭击中正锻炼成为富有经验的海员。他们的著名首领海尔·阿德·丁应苏丹邀请来到伊斯坦布尔。^[15]他带来了舰长和海军技术人员，建造了新船只。在到达奥斯曼土耳其首府8个月之后，他于1534年8月率领奥斯曼舰队出航，占领突尼斯，这样就抵消了查理五世对地中海中部狭窄水域的制约。这仅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因为次年7月查理五世攻克该城，恢复了穆斯林统治者的附庸王公的地位，受驻扎在拉戈莱塔要塞的西班牙军队支持和控制。然而，海尔·阿德·丁逃到阿尔及尔，在秋季袭击了巴利阿里群岛和巴伦西亚海岸。

弗兰西斯一世希望重新获得米兰和热那亚，于是在1536年再一次发动了对查理五世的战争。苏丹愿意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要在完成了海军准备工作之后才行动。1537年夏季，他进军到亚德里亚海岸的发罗那。同时，海尔·阿德·丁率领一支大大扩大了奥斯曼帝国舰队航行到奥特朗托并蹂躏了毗邻的地区。法国国王发现这场战争费用昂贵而又无利可图，非但没有进攻米兰，这时反而同查理五世进行意大利前线停战谈判。因此，苏里曼拒绝冒险强行跨过亚德里亚海。多里亚在爱奥尼亚海上巡航，他不用担心法国袭击热那亚，因而可以集中他的军舰试图从海尔·阿德·丁手中夺取对奥特朗托海峡的

控制权。8月，苏丹放弃了对阿普利亚的袭击，转而攻击威尼斯的科孚岛。

苏里曼无须费心就能找到指控威尼斯的理由。基督教徒海盗在地中海东部掠夺穆斯林的船舶，长期以来一直在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威尼斯人的港口出售掠夺物并获得补给品。在达尔马提亚和摩里亚，执政团的由克里特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雇佣军经常卷入当地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贝格的冲突。在海尔·阿德·丁开始重新组建和改进苏丹的海军以来的年月里，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了。每当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从伊斯坦布尔驶出，威尼斯就比以前更加感到需要加强在科孚岛附近水域的海军中队。于是，威尼斯共和国就只好谨慎从事，但真正的危险在于，尽管警告过船长们要最大限度地忍耐，但经常处于戒备和克制的紧张状态下，难免会失去自我控制。一次严重的“事件”很可能给威尼斯带来灾难，因为它已失去了从前在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中的大部分影响力。在易卜拉欣帕夏一生中，他一直是执政团的忠诚朋友，但他已于1536年被处死。而这时，在那些深得苏莱曼欢心的官员和大臣中，没有谁比海尔·阿德·丁享有更多的特权——而他却是发动海上无情进攻的鼓吹者。如果有了麻烦，威尼斯发现很难平息苏丹的怒火。在袭击阿普利亚时，威尼斯巡逻队确实夺取了奥斯曼帝国的许多船只，然后，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攻击了一支海军小船队，船上的一位大使带有苏莱曼给执政团的抗议书。为了报复，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蹂躏了科孚岛。但是，当发现除了以长期围攻为代价外无法攻取主要堡垒时，于1537年9月撤退。威尼斯意识到所有的和平希望都已破灭，于是便指望同教皇和奥地利皇帝结盟。1538年春签订了协议条款，但是，直到那年秋天才终于调集联盟的海军对奥斯曼帝国进行联合作战。9月28日，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了，当时，海尔·阿德·丁在阿尔塔湾普雷韦扎外的海面上击败了基督教徒。这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里亚的表现取得的，因为他决心要使他的舰队保持完好无损，从而把最激烈的战斗留给威尼斯和教皇的指挥官。[\[16\]](#)这次战斗本身只是一件小事，盟军只损失了少许船只。可是，它标志着海上霸权冲突的一个更为不吉祥的阶段：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迎战并击退了仅有的能挫败他们获得地中海控制权野心的两支舰队的联合兵力，从这时起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海上主动权大部分操在苏丹手中。

威尼斯没有从与奥地利皇帝的联盟中得到实际的好处。的确，联合舰队取得的唯一成就是在1538年10月占领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卡斯泰尔诺沃，但是即使这么一个不太大的收获也很快丧失了，因为海尔·阿德·丁于次年8月重新占领了这个要塞。威尼斯共和国把该联盟看作是保护它在亚德里亚海和黎凡特地区的领地的一种手段，而查理五世最关心的是保卫地中海西部免受阿尔及利亚海盗的袭击，将其视为最多不过是一项有限的承诺而不愿为执政团的利益去冒毁灭他的海军的危险。威尼斯对来自奥地利皇帝的有效援助感到绝望，于是寻求结束这场灾难性的冲突。它更急需和平，因为它要从奥斯曼的国土上获得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战争使粮食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以致在1539年威尼斯严重缺乏谷物而很难养活其居民。同年达成一项休战协定，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导致1540年10月的和解。为继续得到苏丹的优惠，威尼斯付出了高昂代价：割让它在摩里亚的最后几个据点（那波利·迪·罗马尼亚和莫南瓦西亚）及其在爱琴海所控制的一些岛屿。

同时，苏莱曼已开始对另一个敌人葡萄牙人发动海上进攻。在遥远的印度洋水域，葡萄牙人正在试图切断东方香料的贸易路线，这一条贸易路线经叙利亚和埃及再到地中海北岸各大商业中心。葡萄牙人于1509年征服果阿，这样就在印度西部获得一个极好的基地，他们的舰队依靠这个基地可以控制通向阿拉伯的海上航线。扼守曼德海峡入口处的索科特拉岛已于1507年被占领。此后，尽管夺取亚丁的努力从来未获成功，但是葡萄牙人能够深入红海——1541年，埃斯特瓦奥·达·伽马甚至还进行了远袭苏伊士的大胆之举。葡萄牙人还谋求同长期以来与苏丹国的穆斯林埃米尔有冲突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结盟。在波斯湾，葡萄牙人也非常活跃，霍尔木兹（1515年占领）、马斯喀特和巴林是他们控制的主要港口。

麦木鲁克苏丹甘萨伍赫·高里急于要保住他从过境贸易中获得的大笔税收，于是向印度西部派去一支小舰队，1508年在焦尔外的海面上击败葡萄牙人的一个海军中队，但在第二年，它自己又败于第乌。尽管有这次挫折，但高里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获得木材、枪炮和其他军需品的援助，在苏伊士建造了新船只，并于1515—1516年试图在也门获得对海岸城镇的有效控制。谢里姆一世征服叙利亚和埃及（1516—1517年）使得这次战役夭折，不过从舰上登陆的麦木鲁克军队与当地阿拉伯酋长之间的陆上战争还在继续进行。

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保卫红海中有了直接利益，可是由于长期全神贯注地投入巴尔干事务中，以致几乎没注意到来自葡萄牙人的危险。宰相易卜拉欣帕夏在巡察开罗期间，在苏伊士改组海军机构，结果，麦木鲁克的旧舰队于1525年起航，想要使也门不只是名义上归顺奥斯曼苏丹。这次冒险行动并未获得大的成功。直到征服伊拉克之后，一次事件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葡萄牙人除了在红海的冲突外，很快又会在波斯湾爆发一场战争，苏丹才终于决定开始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反攻。

埃及总督苏莱曼帕夏受命在苏伊士建立一支新舰队，他于1537年开始执行这一任务，急征他在亚历山德里亚港找到的威尼斯海员，于第二年春天完成任务。1538年8月，他占领亚丁，9月，在跨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之后，与古吉拉特邦的军队一起，试图夺取由努尼奥·达·库尼亚于1535—1536年在第乌建立的要塞。这时帕夏远离基地，又无进行长期围攻的手段，而在第乌的基督教徒顽强坚守抵抗。11月6日，苏莱曼帕夏放弃了这一冒险计划，撤回到也门，在那儿组建了奥斯曼帝国一个新政权，其主要中心是亚丁和宰比德，然后回到埃及。

1538年末，葡萄牙人仍然控制着通往阿拉伯及邻近国家的贸易路线。他们的封锁最初产生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因为威尼斯商人常常发现在黎凡特市场上几乎没有香料出售。实际上，执政团有时被迫从里斯本获得大宗的胡椒和其他东方商品。然而，虽然原来的贸易遭到破坏，贸易量大幅减少，但仍然逆势而继续进行。葡萄牙人可以限制但无法消灭穆斯林长久以来在马拉巴尔和古吉拉特海岸建立起来的商业权益。他们的海军中队可以进入但未能控制住红海，而且很快面临对他们在波斯湾的统治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如果苏丹愿意锲而不舍地更加积极抵抗葡萄牙，那么，通往巴士拉和苏伊士的贸易无疑会重获昔日许多光彩。^[17]与奥地利媾和并未结束多瑙河边境地区当地的敌对活动。波斯尼亚、塞门德里亚及毗邻地区的边境战士是加兹（ghazis），即献身于伊斯兰圣战的士兵。对他们来说，加扎（ghaza），即进入非穆斯林国土——战争场所进行劫掠和虏人出售为奴的远征——是宗教信仰的一种义务，也是他们抢劫和虏人出售为奴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为奥地利效劳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边境贵族的行为准则与加兹的行为准则并无二致，他们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战的意识与为捍卫他们直接管辖的领地而战的愿望同等重要。伊

斯坦布尔颁布的法令也好，维也纳发布的敕令也好，都无法阻止边境地区无休止的冲突。在那些地区，劫掠性远征可以说已构成有其自己特殊的行为和信仰模式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奥斯曼土耳其人沿德拉瓦河进行的袭击使人感到十分头痛，因此，1537年，一支大约24000人的军队——德国和波希米亚从卡尼奥拉、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征集的部队——向南进击埃斯泽克的要塞。边境地区的贝格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卫士们围困在瓦尔波附近他们的临时营地中，切断了他们所有的粮草补给，杀死或偷去他们用来拉车和大炮的大部分牲口。这时已是11月下旬。基督教徒开始撤退，夹在成行的四轮马车和用链条拴在一起的轻型野战炮之间向前移动。暴风雪阻碍了队伍的行进，最后，在猛烈追击的压力下，长长的纵队终于断开了。在12月2日进行的一场拼死战斗中，卡林西亚的士兵们连同德国与波希米亚的几个团几乎遭歼灭。

在多瑙河下游也发生了冲突。即使在这时，摩尔达维亚在有关奥斯曼土耳其政府问题上，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因为苏丹在1529年向贵族们确认了他们选举自己的王公时有提名权，只要奥斯曼土耳其人批准他们所选出的候选人即可。当时的摩尔达维亚王公彼得·拉雷斯涉嫌与威尼斯勾结。因此，伊斯坦布尔的人认为必须将他赶下台，而且必须马上着手。1538年9月，苏里曼占领摩尔达维亚当时的首都沙恰瓦，把一个新的王公扶上王位，并且兼并了南部的比萨拉比亚，从此以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其税收用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阿克尔曼和基利亚两个要塞所需费用。苏丹有理由对这一成就感到满意。摩尔达维亚将会受到更有效的控制，从克里米亚到多瑙河的陆上路线比从前要安全得多。当年克里木汗的鞑靼骑兵响应号召来参加匈牙利战争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到这时，苏丹与大公爵斐迪南议和已有5年。在此期间，尽管经常有使团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但未能找到调解扎波利亚和大公爵同时对匈牙利王权的要求的办法。1534年，苏莱曼在同奥地利大使谢佩尔谈话时，他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他自己的态度。他说：

……这个王国属于我，我已在那里安排了我的仆人，我将这个王国给了他，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可以从他那里将它收回，因为我有权处理它及其所有的居民，他们都是我的臣民。因此，叫斐迪南别想违背这一点……
贾诺斯·克拉尔^[18]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皆是以我的名义行事。……

1538年，扎波利亚与大公爵签订了一个协议：每一方都将拥有国王的称号，每一方都将保留其当时拥有的那部分匈牙利王国的国土。但是，在扎波利亚去世时（当时还未结婚而无后嗣）他的国土将转给斐迪南，而条件是，如果他娶了妻，应给其王后及后嗣以适当的赔偿。为了使该和解协议生效，需经苏莱曼批准——当时还未征得他的同意。此外，在匈牙利贵族中，以大瓦代恩教区主教马丁努齐为首的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不赞成将来受奥地利统治。1539年，扎波利亚娶了波兰的伊萨贝拉。次年7月，在王后刚生下一个儿子之后，他去世了，这立刻引起一场头等大的危机。

马丁努齐知道，斐迪南会谋求实施1538年的协议，而斐迪南本人在国内也遇到危险的竞争对手，因此，马丁努齐要求苏丹立即给予援助。苏里曼明白，对于匈牙利问题，除了间接控制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世代的刻骨仇恨使这个王国四分五裂，所以，不可能让伊萨贝拉及其婴儿杨·西吉斯孟德名义上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找一个人来替代小王子，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使“当地”派聚集在其周围来对抗斐迪南的要求获得王位继承权的人。需要有一个能足以制止大公爵的阴谋的新办法。苏丹一定在头脑中掂量过在维也纳和贡斯城前所吸取的深刻教训：在遥远的多瑙河畔打一场持久战会有重重困难。他的最后选择仍然是进行永久性的征服。事实上，战争已变得不可避免，因为在此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正在向布达进军。苏莱曼命令鲁梅利省省长去增援布达的守军。他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责骂从维也纳来的大使：“你已……告诉过你的主子……匈牙利王国是我的吗？为什么他派军队进入我的王国？你们此举的目的是什么？信誉何在？你们的国王只想骗我……现在是冬天，但夏天会再来嘛。”

1541年8月，苏丹在布达扎营，波斯尼亚和多瑙河地区的贝格与伊莎贝拉的支持者一起将反对他们的基督教徒部队击溃。对于此时由斐迪南派到他这里来的使者们，苏莱曼要求他们的主子归还自扎波利亚去世以来夺占的所有要塞。大公爵还应向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就那次事件前控制的匈牙利国土交付贡金。杨·西吉斯孟德及其母亲被护送到利帕，在那儿作为苏丹的附庸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布达本身将是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一个新省的中心。

下一次战役的组织工作做得极为精细。1543年夏季，苏莱曼率领一支无比强大而极为壮观的军队从贝尔格莱德向北进军。长长的骆驼

队驮运食物和军火，河流小舰队载运攻城炮以及大量粮食和其他补给品。近卫军和王室警卫团、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都已全体总动员。瓦尔波、锡克洛斯和佩奇被鲁梅利的贝勒贝攻陷，从而扫清了通往布达的道路。苏丹的主要进攻目标格兰于8月10日投降。施图尔韦森堡于9月4日遭到猛攻。既然已在多瑙河畔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苏莱曼便回到伊斯坦布尔。1544年的战役委托给边境地区的贝格。布达的司令官穆罕默德帕夏占领诺格拉德、豪特万，还有维舍格勒，这是一个阻碍河上舰队来往于格兰的坚固堡垒。与此同时，波斯尼亚人占领了斯拉沃尼亚的韦利卡，深入到瓦拉日丁进行劫掠，在朗斯卡，大败斯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克罗地亚的军队。大公爵斐迪南见既无希望从德国王公那里，也无希望从他兄弟那里得到有效援助，于是在1545年寻求并实现了停战。苏莱曼并非不愿意结束战争，他的注意力现正集中于波斯边境。经过长时间的争辩，1547年6月签订了有效期为5年的和平条款。斐迪南同意为仍在他控制下的匈牙利王国西北部地区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支付30000匈牙利杜卡特的年金。

自1536年以来与波斯一直没有重大冲突。在边境地区，地方性的敌对活动仍然时有发生。苏丹和沙王竞相争取得到亚美尼亚和高加索的穆斯林及基督教徒酋长们那不可靠的忠诚。沙王塔赫马斯普的一个兄弟埃尔卡斯·密尔萨（Elkass Mirza）逃到伊斯坦布尔，这可能有利于苏莱曼巩固东部边界。1548年夏季，他向大不里士进军，但发现沙王宁愿再次放弃该城，而不愿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时，苏丹向西撤退去围攻凡城这个大要塞，他曾于1534年拿下该城，然后在第二年又丢失给波斯人。经过短暂抵抗之后，凡城于8月25日投降，连同毗邻地区，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边疆省的中心。在阿勒颇过冬之后，苏莱曼来到埃尔祖鲁姆，1549年派维齐尔艾哈迈德帕夏去攻打阿哈尔齐赫的格鲁吉亚人。这些格鲁吉亚人曾伙同波斯萨非王朝的贝格一起劫掠过卡尔斯、奥尔图和阿尔特温之间的边境地区。维齐尔在这次持续6个星期的远征期间，将托尔图姆周围地区置于奥斯曼帝国更加有效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埃尔卡斯·密尔萨在波斯国内徒劳地企图煽动起义，结果被沙王擒获。由于推翻塔赫马斯普的一切希望皆已破灭，苏丹只好回到伊斯坦布尔，于12月21日到达那儿。

这时，一有可能，沙王随时准备收复刚刚从他手中夺去的领土。1551年萨非王朝的骑兵蹂躏了凡湖北岸的阿赫拉特和阿迪尔杰瓦兹地

区，还击败了埃尔祖鲁姆省的省长，伊斯坎德尔帕夏的部队。苏莱曼命令大维齐尔鲁斯泰姆帕夏和鲁梅利省的省长穆罕默德·苏科鲁去收复亚美尼亚的失地。计划于1552年开始的战役推迟到1554年，因为在此期间苏丹在他本人与他的儿子穆斯塔法的关系上面临严重危机。最终去进攻波斯时，由苏莱曼而不是大维齐尔指挥。他于1554年4月从阿勒颇出发，穿过迪亚尔贝克尔和埃尔祖鲁姆到达卡尔斯。波斯的边防，特别是在埃里温和纳希万，这时遭到彻底摧毁，卡拉巴的富饶之乡经过他们烧杀劫掠之后变得一片荒凉。如果苏莱曼无法消灭沙王的军队（他们像前几年一样早就撤退并绕到奥斯曼帝国先头部队的侧翼），他至少要破坏长久以来一直是波斯人袭击小亚细亚的主要出发点的前沿地带。由于他的目的大部分已达到，苏丹便撤回到埃尔祖鲁姆，9月，在那里与沙王签订停战协定。1555年5月，在阿马西亚签订了奥斯曼帝国与萨非王朝之间的第一个正式和约。苏莱曼放弃了对大不里士、埃里温和纳希万的所有要求，但保留了伊拉克以及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和亚美尼亚西部。

与波斯作战的地区距离伊斯坦布尔十分遥远，所以，一般来说，苏丹要在6月之后才能进入沙王的领土。运输问题难于克服，因为萨非王朝的骑兵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山区地带骚扰奥斯曼帝国的纵队，使得骆驼和其他用于驮运的牲口常常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实际战争情况，必须在三至四个月内进行和完成每一战役。漫长而严酷的冬天突然降临，撤退时被雪围困的苦境是所有危险中使人最感害怕的危险。沙王牢记在查尔德兰的教训，避开所有打大仗的危险，在山谷地带坚壁清野，然后撤退，让边境地区的贝格去监视和阻挠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前进。对于这种回避战术和距离遥远、地形崎岖和气候恶劣所带来的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确实没有简单而有效的对付办法。苏莱曼的胜利并未使奥斯曼帝国有效而持久地征服东部地区。兼并格鲁吉亚、波斯所属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战争肯定会使该国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功甚至可能比失败的害处更大，因为需要许多要塞和大量驻军来阻挡萨非王朝的军队，同时要控制土库曼部落和高加索的信仰基督教的各个民族。苏莱曼发动的历次战役已使问题很清楚了：满足现状还是前进？伊斯坦布尔就此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不会很遥远。

1549年，即苏丹从波斯回来之后两年，他感到有必要再一次对奥地利宣战。大瓦代恩教区的主教马丁努齐无视伊萨贝拉王后及其忠实支持者要求他结束控制所作的努力，长期以来一直实际主宰着特兰西瓦尼亚。他明白自己在奥斯曼宫廷中不大受尊重，因为1548年苏里曼就曾警告过他不要无视伊萨贝拉及其儿子的利益，于是，他开始与维也纳的斐迪南暗中勾结。1551年，他强迫王后将特兰西瓦尼亚放弃给大公爵并以接受西里西亚的某些领土作交换。这时斐迪南派遣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在吉亚姆·巴蒂斯塔·卡斯塔尔多指挥下，去控制主要要塞。同年夏天穆罕默德·苏科鲁对利帕和泰梅什堡进行的袭击使马丁努齐深信，冬天一结束，苏里曼就会对帝国拥护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因此，他谋求在苏丹和大公爵之间充当调解人，希望以此维持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权力，而无论事物发展的趋势如何。他的行为使帝国拥护者们认为，他出卖了他们的事业。卡斯塔尔多在得到维也纳许可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判断，犯下致命的错误，1551年12月18日，他策划谋杀了马丁努齐。由于这件事，斐迪南失去了将特兰西瓦尼亚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一切希望。

1552年的那场战争对大公爵来说打得很糟糕。在塞盖丁，布达省长（beglerbeg）阿里帕夏击溃了由西班牙和匈牙利部队组成的一支军队，于4月占领维斯普雷姆，8月在富莱克再次战胜帝国军队。穆罕默德·苏科鲁和维齐尔艾哈迈德帕夏在特兰西瓦尼亚西南部攻克特梅斯瓦尔（从此以后一直处在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之下），然后沿泰斯向北迅猛推进，去进攻埃劳的要塞。但是，基督教徒守军拼死战斗，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0月只好放弃围攻。虽然战争一直持续到1562年，但在匈牙利战场上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真正重大的变化。因为大公爵和苏丹都未能发动持久的攻势。一方是由于缺乏进攻手段，另一方则是由于很快要投入进攻波斯的新战役并为奥斯曼帝国王位继承权陷入长期而危险的冲突。大公爵知道，他无法以武力驱逐扎波利亚的儿子杨·西吉斯孟德，他便在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中使用外交手腕以达到他的目的。维也纳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力求从苏丹的困难中获取最大的好处，他们坚持特兰西瓦尼亚应割让给他们的主人。苏里曼并不很想继续打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他深切关心国内危机，他还是坚持拒绝了这一要求。1561年，苏丹终于又能自由采取行动时，斐迪南已毫无有效的对付办法。1562年的和约实际上是重申1547年的和平条款。奥

地利向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支付贡金，数额同以前一样，3万杜卡特。特兰西瓦尼亚仍然是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附庸国。

1541—1562年的历次战役的结果出现三个截然不同的匈牙利：奥地利占领区，在最西北端；特兰西瓦尼亚占领区，在泰斯以东；两者之间是苏丹沿多瑙河中游占领的领土。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无企图将这个新的省份全部殖民化。而是在像贝尔格莱德和特梅斯瓦尔、布达、格兰和施图尔韦森堡这样的一些设防的大城镇附近建立起有效占领的“岛状区”，贝格及其瑟帕希斯骑兵部队以武装纵队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转移，事实上是作为驻军生活在外国土地上。帝国拥护者也培植了以他们自己的据点（如凯尼塞、拉布、科莫恩和埃劳）为中心的军政权。此外，双方都修建了被称为“帕兰卡”（用木材、泥土筑成再围上木栅栏）的那类小堡垒用以保护主要交通线和河流渡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基督教徒边境领主与穆斯林贝格不断进行游击战的不稳定的边境地带渐渐变成或多或少有些稳定的边界。虽然大公爵斐迪南缺少打一场再征服的大战役的手段，但他能够而且确实找到了建立一道抵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难以逾越的屏障的对策。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重建和完善占领区内的匈牙利要塞上，常常把这些任务委托给意大利人、瓦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的部队，即精通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的职业军人去执行。1564年斐迪南去世时，组织一个复杂的纵深防御体系的这一努力远远未完成。然而，早在完成之前，其效果就很明显了。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强攻的是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和决意不冒险打一场大阵地战的敌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打一场吃力而又浪费人力物力的围攻战。总之，这场战争不可能不增大摆在他们面前的时间漫长、距离遥远、地形复杂以及交通和后勤补给方面的一些根本困难。迅速征服的年代将很快成为过去；现在的胜利比过去花费更多而收效更少。因为在亚美尼亚，同样在多瑙河流域，奥斯曼土耳其人有效而合理的扩张几乎已达到最大限度。

苏丹登基时要杀死他的兄弟及他们的男性后裔以便消除内战危险，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惯例。因此，皇族王子们生活在极其严格的管束之下。随着他们父亲的年事增高，控制愈严厉，气氛愈紧张，这标志着在为新的统治时期开始的紧急时刻作准备。在1552年苏里曼还剩下的几个儿子中^[19]，长子是古尔巴哈尔所生的穆斯塔法。这位王子

深知，苏丹一直宠爱的妻子胡雷姆是他的死敌，她决心要搞垮他，以便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之一争得王位。胡雷姆已把诡计多端的鲁斯泰姆帕夏争取到她这一边，因为他娶了她的女儿米尔乌马公主为妻。鲁斯泰姆于1544年成为宰相，除了有短暂间隔外，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1561年去世时为止。这位帕夏力求组织和维持一个反对穆斯塔法的派别，将那些依靠他的人提拔起来掌权。[\[20\]](#)

苏丹的儿子们青年时代都要从伊斯坦布尔派出去管理小亚细亚的一些省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朝廷，有官员和辅佐大臣来教给他治国之术。这时，穆斯塔法掌管阿马西亚。为了反击胡雷姆和宰相的阴谋，他一直在努力争取得到他的私人随从人员的信任并努力争取得到土库曼部落、他控制下的瑟帕希斯（即采邑）骑兵、还有土耳其近卫军以及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显贵们的好感。他的努力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因为在1552年，当鲁斯泰姆作为对波斯发动新进攻的总指挥来到安纳托利亚时，军人中私下的抱怨显出一种不祥之兆：苏里曼年龄太大了，不适于带兵打仗，还说最好是立一位年轻而精力旺盛的苏丹为王。苏莱曼别无选择，只好亲自掌握预定参加波斯战役的部队的指挥权。他于1553年8月末离开伊斯坦布尔，向他的长子发出诏令，要他带领阿马西亚的瑟帕希斯骑兵队在外出行军途中与他会合。10月，在卡拉曼的埃雷利附近，穆斯塔法来到他父亲面前，结果立即被处决。

看来苏丹采取这次严厉的行动似乎也有正当的理由。瑟帕希斯或帝国内的“采邑”阶级，以及库勒（Kullar），即“苏丹的亲兵”（包括近卫军、皇室骑警团和许多在宫廷学院中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瑟帕希斯阶层是出生在土耳其，一般说来属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他们构成军队的主体，但是无法得到省级政府以上的高级职位的掌权机会。库勒是从战俘和在巴尔干地区强征的用以抵贡金的儿童中征募的人，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被训练成为一批精兵，用以几乎全部控制国家事务并在高级指挥部和省级以及中央政权中任职。在苏莱曼统治时期，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开始影响采邑阶层的地位和态度，频繁的远征所要求缴纳的赋税更加不堪重负，并使瑟帕希斯阶层更加意识到和妒忌让库勒所起的较大作用。农村地区的贫困也导致所谓“土匪”的产生，他们是一些被赶出家园的人，有时求助于通常是受封建武士纵容的匪帮，他们很希

望为像他们自己那样的铤而走险的事业效劳。可以说，穆斯塔法成了这次动乱的中心和象征。宽容他实际意味着所谓的危险不仅有在安纳托利亚彻底的反叛，而且还有因严重不满而引起的难对付的造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战斗中得到瑟帕希斯骑兵这样的一些精通兵法的军人的帮助。在埃雷利军营中，使人清楚地看到这种严重危险确实存在，因为聚集在该军营中的部队对穆斯塔法之死作出的反应十分强烈，以致苏里曼认为解除宰相鲁斯泰姆帕夏的职务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这次悲剧性事件的罪魁祸首。

这时，胡雷姆的两个儿子谢里姆和巴耶济德之间又发生严重冲突。危机进一步加剧的预兆在1555年变得明显了，那时，宫廷中有人策划阴谋使宰相艾哈迈德名誉扫地并想以此召回鲁斯泰姆帕夏，艾哈迈德因此而丧命。这年还发生以“假”穆斯塔法名义发动的短时间造反，这预示着奥斯曼帝国内仍然存在着不满情绪。只要谢里姆和巴耶济德的母亲还活着，他们之间就不会产生不能弥合的裂缝。胡雷姆依靠鲁斯泰姆，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控制了一部分能影响事态进程的显要人物。对于她的最终目的仍然只能作主观猜测而无法作明确论断。然而，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观察家倾向于认为她偏爱巴耶济德。

1558年4月胡雷姆的去世加快了内战的到来。在安纳托利亚动乱中得利的谢里姆和巴耶济德在土库曼的“土匪”和瑟帕希斯阶层中征集自己的军队。援军的确即将到来，但只是以对奥斯曼帝国政权充满严重后果为代价换来的，而帝国本身也显示出“采邑”阶级及其同盟者对“苏丹的亲兵”感到不满的迹象：几位王子不得不给予他们部队的大批军人以近卫军人的身份，从而使他们有希望进入库勒的特权阶层。1558年秋季刮起大风暴。与谢里姆地位相等的巴耶济德长久以来就力争从苏丹那里得到靠近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地理上的优势很可能决定争斗的结果，因为一旦苏里曼去世，王位无疑会落入最先到达帝国首都并夺取国库的儿子手中。当时苏丹将巴耶济德从库塔希亚（kutahya）调到更偏远的阿马西亚，同时谢里姆正从马尼萨转移到更遥远的卡拉曼的科尼亚。巴耶济德担心听从命令就意味着毁灭他的事业，于是公开反叛，这样使苏里曼别无选择，只好站在谢里姆一边加以干涉。巴耶济德于1559年夏天在科尼亚附近的战斗中被击败，撤退到阿马西亚。由于丧失了成功的信心，他逃往波斯。

苏丹沿东部边界调集部队，试图劝诱河间地带的乌兹别克可汗和高加索的首长们准备参加进攻波斯萨非王朝的战争。尽管波斯沙王已下决心要从好运中得益，但他也无意卷入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危险的新冲突中。因此，经过两年的外交活动，他同意交出这位倒霉的王子，以此换得一大笔酬金。巴耶济德于1561年9月被处决。长期的危机已结束。了解这次事件究竟给老苏丹造成多大的个人痛苦并无意义，但是，在威尼斯大使多尼尼认为是老苏丹说过的悲哀的话中，人们或许能觉察到少许真相：他很高兴看到穆斯林免受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内战带来的苦难，并感到他本人能平静地度过余生而不致在绝望中死去。[\[21\]](#)

与此同时，自1538年的第乌之战以来，沿阿拉伯海岸和在波斯湾中一直在进行时断时续的抵抗葡萄牙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已于1546年第一次将巴士拉置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小舰队和一个军火库。皮里·雷伊斯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中队，于1551年从苏伊士起航，袭击了马斯喀特和霍尔木兹，开往巴士拉然后返回苏伊士，留下的大部分部队被封锁在沙特阿拉伯。新的海军舰队司令穆拉德·贝伊于1552年试图冲破对波斯湾的封锁未果。西迪·阿里·雷伊思曾在伟大的海尔·阿德·丁手下当过海员，在普雷韦扎打过仗。他于1554年从巴士拉出发，在与葡萄牙人的交战中损失了一些船只，在乌克兰海岸外遇上大风暴受到严重损失之后，躲避在印度西部的苏拉特，他的舰队的残余部分在那里解散。在红海的非洲海岸上，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以来据有萨瓦金，这时，为了进一步防范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与葡萄牙人之间结成强有力的联盟，又于1557年占领了马萨瓦。尽管海战的规模不大，但在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穆拉德统治时期（1574—1595年）。那时，一个名叫阿里·贝伊的人率领一支以也门为基地的海军中队，执行在乌曼对马斯喀特的袭击并在非洲海岸袭击了马林迪和蒙巴萨。为了尽力在红海和波斯湾维持一支能抵抗葡萄牙人的舰队使奥斯曼土耳其人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补给品和设备、枪炮和木材都必须由陆路运到苏伊士或顺着伊拉克的河流运到巴士拉。适用于地中海的造船方法在阿拉伯水域却不管用。因此，必须找到具有建造和驾驶适用船只技术的技术员和船员。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一些困难以及在阿拉伯半岛缺乏良港等其他的困难，但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功。葡萄牙人没有力量取得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这一点甚至在苏莱曼去世之前就很清楚

了。由于穆斯林的反攻而逐渐获得重要性和动力，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古老贸易又重新繁荣起来，丰富多彩的商品又再次涌向埃及。亚历山大港在1564年前后所接到的大宗胡椒的货物量等于或许超过了当时到达里斯本的货物量。阿勒颇是从伊拉克到波斯的商队的起点，这时也繁荣起来，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香料和丝绸大市场之一。新旧两条贸易路线之间建立起不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最终要无可挽回地向绕非洲的海上路线倾斜，但是，只有当比葡萄牙更为强大的海洋国——荷兰和英国——闯入印度洋并为他们自己争得东方贸易的统治地位时才会最终打破这种平衡。自1538年的普雷韦沙之战以来，在地中海也一直在进行长期的战争。查理五世明白，他很快会与法国再次发生冲突，因此，他于1541年狠狠打击阿尔及尔，希望这样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北非海盗与法国海军重新合作的危险。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从巴利阿里群岛驶向非洲海岸，在那儿突遇狂风暴雨，损失太严重，所以放弃了这次战役。海尔·阿德·丁于1543年焚烧卡拉布里亚的雷焦城，并联合杜克·德昂吉安（Duc d'Enghien）指挥的一支海军中队夺占尼斯城，不过未能攻占该城的要塞。基督教世界十分厌恶的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在土伦港过冬，该城大部分人都被强行迁走，以便为穆斯林让出住房，所以事实上成了第二个伊斯坦布尔。接着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于1544年签订了一项和约，而且苏里曼于1547年同意给予奥地利的休战也包括皇帝在内。在此期间，海尔·阿德·丁于1546年夏季去世，留下许多素质优良的船长继续他的事业，其中著名的德拉古特（托尔格胡德·雷伊斯）于1551年从圣约翰骑士团手中攻占北非的黎波里，其后由于对地中海西部大肆掠夺，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最后下决心荡平他。但是，派去对付的黎波里（当时托尔格胡德以苏丹的名义统治该地）的一支大军遭遇灾难，由皮亚莱帕夏指挥的一支奥斯曼帝国舰队于1560年5月在杰尔巴岛进行突然袭击，大败这些基督教徒。这次辉煌的胜利鼓舞了苏里曼，使他试图攻占马尔他岛。土耳其海军司令皮亚莱于1565年4月1日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离开伊斯坦布尔，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的海盗集团也应召参加这次战役。围攻期间战斗一直极为激烈，但圣约翰骑士团拼死抵抗，一直坚持到9月，援军终于到来，并迫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基督教徒的事业在马尔他战役中取得胜利，并在苏莱曼去世5年后，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中再次取得胜利。然而，这些著名的胜利并未带来持久的好处。1574年，进行了一场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战

役，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突尼斯，这样就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解决了海战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北非是得救还是失掉而受穆斯林统治。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这时都效忠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而且作为地中海的三个海盗大国出现于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基督教统治的威胁在大约两个半世纪中事实上得以消除。

1562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协定在1564年斐迪南皇帝去世时即失效。虽然苏里曼愿意继续保持和平，但是，马克西米连二世皇帝与特兰西瓦尼亚的杨·西吉斯孟德之间的战争爆发使他感到愤怒。他要求奥地利的帝制拥护者归还某些属于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的城镇，他的这一要求被拒绝，战争因而不可避免。苏丹于1566年夏再次向贝尔格莱德进军。这是他的第13次也是最后一次战役。维齐尔佩特夫帕夏率领的一支强大的纵队事先被派遣占领特兰西瓦尼亚西部克勒什河畔的久洛。由苏里曼亲自指挥的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向锡盖特堡进发。其中的第一个要塞投降了，第二个也受到猛烈攻击。9月初，就在锡盖特堡陷落前，死神降临在这位老苏丹的头上。

苏里曼统治时期的辉煌业绩远不只是靠大规模的征战取得的。这一时期，人才辈出，涌现了像宰相易卜拉欣、鲁斯泰姆和穆罕默德·索科卢这样具有卓越才能的行政官员和政治家。在乌理玛（以伊斯兰教教法培训出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凯末尔-扎德帕夏和阿布·苏乌德。这是一个充分展现最典型的奥斯曼土耳其文化与文明的辉煌时代，诗坛王子巴基和著名建筑师锡南为这个时代增辉添彩。苏丹不但把大量的国税收入投入到边防建设上，如在罗得岛、贝尔格莱德、布达和泰梅什堡整修要塞。他还将国税收入用在麦加、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尼亚和卡法等地修建清真寺、桥梁、沟渠和其他公用设施。最重要的是，他在黄金角倾力美化首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大兴土木以完成由穆罕默德二世开始的这项任务，将拜占庭帝国统治末期处于民穷财尽、人口减少的君士坦丁堡改造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辽阔帝国引以为豪的中心。

苏里曼被他的人民称为Kanuni，即立法者。他不能改变或违反伊斯兰圣法这部涵盖人类思想和行为准则的广阔领域的法典。在基督教世界，人类思想和行为准则是属于世俗范围而不是宗教范围的事务。这些法令冠以他的名字，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其范围和性质都有点狭窄，更多的是解释而不是独创，但是，它们仍然象征着他为改善奥斯

曼帝国复杂的国家结构并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所作的长期努力。与他同时代的人强调指出，他热心于主持公道。威尼斯的红衣主教纳瓦杰罗对他倍加敬重，他写道，如果苏里曼能了解全面情况，他就不会使任何人受冤屈。

在这位苏丹处于权力顶峰和名声显赫之时见过他的人中，不少人记录下他们对他的个性和品质的永久印象。纳瓦杰罗看出他脸上有着“非凡的高贵气质”。对安德烈亚·丹多洛来说，他是一位贤明公正的君主，然而当他的帝国和他本人受到危险威胁时他又过于残酷。比斯贝克在描述奥斯曼帝国舰队在杰尔巴取得辉煌胜利苏丹归来之后马上就到清真寺去的情形时，觉察到他面部显现出的至多不过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坚定、严肃的表情而已。“那位伟大的老人的内心自制力很强，训练有素，能适应无论是多大的命运变化。”历史学家肯定、粉饰、有时又贬损死者的名声。关于苏里曼在他统治时期取得的胜利和成就方面所起的作用的最后定论应由将来的研究去裁夺，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对我们来说，他不会像当时对基督教世界那样，现在仍然是伟大的苏丹。

（曾佑昌 译）

[1] 欲知对奥斯曼帝国国家结构的分析，参见第3卷第十一章。

[2] 贝格勒贝格（beglerbeg），奥斯曼帝国的省长、总督，其职位次于宰相。——译者

[3] 维齐尔（vizier），指伊斯兰国家尤指奥斯曼帝国时的高官或大臣；大维齐尔（the grand vizier），相当于宰相；帕夏（pasha），是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译者

[4] 阿金吉斯（Akinjis）意为袭击者，此处指为获战利品而服役的轻武器装备的自愿骑兵。——译者

[5] 麦木鲁克（Mamluk）指13世纪至16世纪统治埃及的军人集团的成员。——译者

[6] 贝格（begs），中亚细亚、土耳其或莫卧儿印度的族长或长官。

[7] 参见本书边码第348页。

[8] 瑟帕希斯（sipahis）指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征的骑兵，见本书索引。——译者

[9] 阿纳多卢，即安纳托利亚。——译者

[10] 欲知斐迪南如何遇到这个问题，参见本书边码第348、470页。

[11] 参见J. 冯·汉默的日记，第3卷（佩斯，1828年），第621—625、639—644、647—652、665—671页。

[12] 关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波斯萨非王朝的兴起及其对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造成的威胁，参见本书第1卷第14章。

[13] 参见本书边码第343、352页。

[14] 另见本书边码第351页。

[15] 海尔·阿德·丁为报答对抵抗基督教徒所给予的援助，已归顺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

[16] 欲知对多里亚的行为的一种不同解释，参见本书边码第507页。

[17] 欲知葡萄牙人的这些活动，另见本书边码第596、599、604页。

[18] “约翰王”，即约翰·扎波利亚。

[19] 苏莱曼这时已过了壮年期，因为他生于1494年11月，或者按其他资料的说法，他生于1495年4月。

[20] 鲁斯泰姆的兄弟锡南帕夏于1550—1554年担任海军司令一职。大维齐尔知道，如果舰队牢牢掌握在他手中，穆斯塔法就难于跨过伊斯坦布尔海峡。

[21] 参见阿尔伯里的马尔坎托尼奥·多尼尼（1562年）：《威尼斯大使报告集》，丛书第3辑（佛罗伦萨，1840年），第3卷，第178—179页。

第十八章 1462—1583年的俄罗斯

伊凡三世于1462年继承他的父亲瓦西里二世的王位，莫斯科大公国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新纪元。到瓦西里动乱不安的统治结束时，莫斯科对大俄罗斯其他公国和共和国的霸权就已得到确认。但是，特维尔、梁赞、罗斯托夫和雅罗斯拉夫尔仍是独立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个共和国以及维亚特卡城还未效忠于莫斯科大公；沿第聂伯河和奥卡河上游的俄罗斯西南部国土还处于立陶宛的控制之下。而且，大俄罗斯民族的大多数至少在名义上还臣属于金帐汗国。

伊凡三世统治初期一直在为完成摆在面前的主要任务作准备。在着手从立陶宛手中夺回乌克兰之前，伊凡三世必须保障东部和南部边界的安全；首先必须征服诺夫哥罗德及其北方的帝国，才有把握将大俄罗斯的其余独立国兼并入莫斯科大公国并将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土拓展到波罗的海和白海。只有摆脱鞑靼人的有辱国格的桎梏，才能恢复俄罗斯自豪感与尊严，才能使俄罗斯列于世界强国之林。

15世纪60年代，西南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因此，伊凡三世能集中注意力对付强大而富侵略性的喀山鞑靼汗国。结果对喀山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1467—1469年）。除了1469年那次夏季大远征之外，这些战役都不过是些全面的侦察活动。这不仅使他获得了进攻喀山领土的宝贵经验，而且还有了一段平静的时期，1469年签订休战协议后的9年期间，莫斯科大公国的东部边境未受侵犯。由于东部边境有了暂时的安全保障，在其后的10年中，伊凡三世就能集中精力解决诺夫哥罗德问题。这个大自治共和国长久以来分裂为两派——受“多数派”支持的亲立陶宛的寡头政治集团和亲莫斯科的少数派集团。诺夫哥罗德无法长久维持其传统的独立，在雅热尔比茨和约（1456年）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伊凡三世只好等待亲立陶宛派与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勾结到一定程度时，他便可插手进来将他的“世袭财产”从东正教的宿敌手中拯救出来。这样他就能将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他的行动也有了正当的宗教理由。15世纪60年代末，这一机会终于到来了，那时，诺夫哥罗德请求卡西米尔兼并该城，将该城大主教置于基辅大教区的管辖之下，并给他们派一个王公来。不管在

1470年年底出现在诺夫哥罗德的那位立陶宛王公是否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来的，他在该城的存在很可能促成伊凡三世下决心采取行动；无疑是由于受到来自莫斯科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他匆匆离去（1471年3月），这使得亲立陶宛派作出最后努力，建议订立一个条约，想以此引起卡西米尔注意他们所处的困境。但是，条约尚未批准，卡西米尔还未能给他的同盟国提供任何帮助，伊凡三世就已彻底打败了诺夫哥罗德人（1471年）。诺夫哥罗德被迫声明完全断绝同立陶宛进一步交往，并将其面积相当大的数片北方领土割让给莫斯科。

然而该城至少名义上仍然是一个“自由城市”，保留了选择大主教的权利。直至1478年初，它才正式丧失其独立地位。在该城爆发反莫斯科情绪，“韦彻”（*veche*民众会议）愤然拒绝承认大公对诺夫哥罗德的统治权之后，伊凡三世包围了该城（1477年11月）并迫使该共和国接受他的条件。他下令搬走召集民众会议的那座大钟，也就是说，解散了韦彻——废除当地选举的市长的职位，而大公对该城拥有了完全的统治权。至于土地要求，伊凡三世没收了10个州的大主教的财产，有一半的土地属于6个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托尔诺克各州。但是还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制服莫斯科在诺夫哥罗德的敌人。由于得知诺夫哥罗德与卡西米尔和条顿骑士团的交往有谋反意图，伊凡三世发动了第三次进攻（1479年10月），接着处决和放逐了大批的人。到15世纪80年代末，又发现了一些谋反计划，结果，8000名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公民被迁移到莫斯科附近地区，在他们原有的土地上安置了从内地去的较可靠的人。同年（1489年），诺夫哥罗德最后一块前殖民地维亚特卡也被武力征服。从卡累利阿到乌拉尔的所有土地这时都成了莫斯科的领土。由于帝国不复存在，最可靠的公民被放逐，贸易也大大减少（1494年，伊凡三世关闭汉萨同盟驻该城的办事处），诺夫哥罗德再也不能反抗莫斯科。它被完全征服，就好像政治自由的最后一点残余已从俄罗斯的土地上消失了。

至于伊凡三世统治初期仍保持独立地位的大俄罗斯其余的领地，没有一个具有认真反抗大公的实力。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分别于1463年和1474年通过条约被兼并。诺夫哥罗德的陷落决定了特维尔的命运，因为自1478年起，特维尔的国土就被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包围。1485年秋，在最后一个大公逃亡之后，特维尔愿意接受莫斯科的统治权。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独立的普斯科夫共和国仅在名义上保

留了自治权，被兼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梁赞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外交政策完全受莫斯科控制，它的王公们不过是大公的附庸而已。

到15世纪70年代末，将大公的世袭领地“收集拢来”的过程差不多已完成。在紧急情况下，伊凡三世能依靠大俄罗斯所有领地的军事支持。然而，在完成从立陶宛手中夺取乌克兰这一主要任务之前，伊凡三世还须对付卡西米尔在南方的盟友，金帐汗国的鞑靼人。1472年，鞑靼人的首领艾哈迈德可汗，根据与卡西米尔国王签订的协议，入侵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伊凡三世意识到这种伙伴关系的危险性，因此，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中寻求同盟者。起初，克里米亚的蒙里-吉雷汗不愿卷入，但在被卡西米尔的同盟者艾哈迈德暂时驱逐出克里米亚（自1475年起受土耳其宗主国的统治）之后，他同意与莫斯科签订一个条约（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将在反对卡西米尔的进攻性和防卫性战争中联合作战，在遭到艾哈迈德的攻击时，每一方都同意帮助另一方。然而，尽管有了这个盟约，伊凡三世在1480年初还是感到自己不安全。这不仅是因为立窝尼亚骑士团（无疑是由于与艾哈迈德订有协议）在普斯科夫领土边界进行异常紧张的活动，而且还由于伊凡三世的两个兄弟安德烈和鲍里斯恰恰选择在这个时候叛逃。对伊凡三世来说幸运的是，卡西米尔拒绝援助这两兄弟。秋天，面对鞑靼人的侵略，他们听从劝说与哥哥重新和解。因为在1480年10月8日，艾哈迈德的军队已出现在莫斯科大公国领土西南边界的乌格拉河边。经过一场试探性的小规模战斗之后，双方都表现极为谨慎：伊凡三世是由于害怕立陶宛的干预，而艾哈迈德在期待立陶宛的干预。但是卡西米尔没有显示出要协同其盟军一起作战的迹象。不仅是因为蒙里-吉雷汗不时袭击使他忙于应付南边境的战争，而且根据编年史记载，“他还有内乱”。或许由于意识到没有卡西米尔的合作就不可能对莫斯科发动一场大战役，^[1]艾哈迈德撤走了全部军队。他的首都被来自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鞑靼人洗劫一空，而他本人也在1481年初被杀。

经过两个半世纪之后，鞑靼人从乌加拉河的撤退标志着鞑靼人施加的桎梏的结束，提高了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诺盖鞑靼人眼中的威望，并使莫斯科大公能够不再以可汗的附庸，而是作为有自主权的君王的身份进入欧洲外交领域。但是艾哈迈德的后裔仍然在不断进行骚扰，从而构成对莫斯科的潜在威胁。伊凡三世寻求以外交手段而不是

诉诸武力来消除这一威胁。他还必须寻求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友谊，因为他们在艾哈迈德驾崩之后已与卡西米尔有外交往来。1482年，蒙里被说服与卡西米尔国王断绝关系并进攻他的领土。结果基辅遭到劫掠（1482年9月），这是莫斯科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从此时起，蒙里成为大公的坚定盟友。要将喀山的鞑靼人纳入莫斯科的联盟范围却不那么容易，但是，通过利用可汗内部的王权之争，通过此时支持这个觊觎王位者，彼时又支持另一个觊觎王位者，伊凡三世就能保证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1487年，他的军队将蒙里的继子、亲莫斯科的穆罕默德·埃明捧上王位。他的继位还为莫斯科赢得诺盖鞑靼人的友好感情，因为穆罕默德与之有着婚姻纽带联系。这个为反对金帐汗国的残余势力而建立的联盟是非常牢固的。入侵克里米亚的几次尝试失败之后，艾哈迈德的子孙于1491年遭到沉重打击。尽管他们最后败于蒙里之手是在1502年，但从15世纪90年代初起，他们就不再对莫斯科大公国的南部边界构成严重威胁了。

伊凡三世与西部强国组成反卡西米尔联盟的成效甚少。1483年，他让长子伊凡与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四世之女叶连娜结婚，这样，伊凡三世就在立陶宛的西南边境有了一个重要的同盟国。与匈牙利的外交往来始于1482年，这是由于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尔文企图诱使伊凡三世同卡西米尔开战，以便转移波兰对匈牙利的注意力。但是，当马加什于1490年去世并由卡西米尔的儿子拉蒂斯拉斯（弗拉迪斯拉夫）继任波希米亚国王时，由于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是联合于亚盖沃王朝之下的，所以，匈牙利便中断了同莫斯科的外交关系。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关系同样没有成效。罗马国王在同匈牙利的拉蒂斯拉斯的斗争中一心想获得伊凡三世的帮助。而当罗马国王马克西米连于1493年不策略地提议组成一个包括波兰和莫斯科在内的反土耳其同盟时，伊凡三世便意识到不能指望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帮助。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关系就寿终正寝了。

虽然伊凡三世在西方的外交努力失败了，但他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强大的实力对立陶宛开战。由于他使喀山保持中立态度，而同诺盖鞑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有着友好关系，所以，他的东南翼是安全的。由于在1481年适时而成功地攻入立窝尼亚，结果有了10年的休战期，因此他对条顿骑士团已无所畏惧。到15世纪80年代末期，诺夫哥罗德不再使莫斯科感到担忧。第一次立陶宛战争并没有认真打

仗，只是一系列前线小规模战斗和谈判。到1491年底这场战争实际上夭折了。但是，第二年，卡西米尔意外死亡。立陶宛匆忙指定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为立陶宛大公，波兰的王位则落入他的年长的儿子约翰·阿尔贝特之手。前线爆发全面战争。懦弱的亚历山大无力应付局势，他徒劳地寻求波兰帮助。由于愿意以任何条件获得和平，立陶宛的贵族们最后建议亚历山大与伊凡三世联姻。1494年缔结和约。伊凡三世坚持要得到“全俄罗斯的君主（*Gosudar*）”的称号。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他获得大片领土，整个维亚济马地区和奥卡河上游两岸的一些小公国都割让给莫斯科。第二年，伊凡三世的严格信奉东正教的女儿叶连娜被送往威尔诺，嫁给信奉天主教的亚历山大。

到15世纪末，伊凡三世对立陶宛发动大战役的时机更为有利。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维持着谨慎策略的关系，这使他能保证得到苏丹的附庸蒙里-吉雷的连续不断的支持。他与丹麦的约翰保持友好关系，他对瑞典的战争（1495—1496年）帮助约翰战胜了瑞典（1496—1497年），从而确保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中立。就在开战前夕，反东正教的宣传日益加剧，企图将佛罗伦萨宗教联盟的信条强加在执拗的信奉东正教的立陶宛人身上，这促使边境地区的几个俄罗斯王公主动为莫斯科效劳。

战争于1500年夏季开始。一支莫斯科军队开往南方，占领了杰斯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差不多全部地区，南达普季夫利和切尔尼戈夫，西抵戈梅利。伊凡的其余部队对斯摩棱斯克构成威胁。立陶宛人在多罗戈布日附近的韦德罗沙河畔遭到大败（1500年7月）之后，立陶宛的处境十分危急。亚历山大徒劳无益地企图使蒙里-吉雷和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转而反对他们的盟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国王向伊凡提出调解，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接受调解，他们将出面干预。但是，亚历山大得到的唯一积极的帮助来自立窝尼亚骑士团。这些德国人入侵普斯科夫的领土，但是他们的胜利由于流行痢疾而夭折。为了报复，伊凡三世派遣一支军队去立窝尼亚。1501年秋，德国人在多尔帕特附近的赫尔曼德被彻底打败。

1502年，伊凡三世继续进攻立陶宛。他的目标是要夺取斯摩棱斯克。他的部队在围攻该城的时候，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支大军蹂躏了加里西亚和沃尼亚，向西远至克拉科夫。但是这次大劫掠太靠南方，未能起到援助莫斯科人的作用。同年秋天，解除了对斯摩棱斯克的围

困。匈牙利国王再次提出调解。这一次，他的使节给莫斯科带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请求：希望停止敌对行动，加入到反土耳其的十字军中来。匈牙利国王拉蒂斯拉斯的调解建议被拒绝。但是在第二年，签订了一项为期6年的停战协议。协议的条款完全有利于莫斯科。亚历山大（自1501年其兄死后成为波兰国王）被迫放弃占领的立陶宛东部领土（大致南部以杰斯纳河和色姆河为界，西部以第聂伯河为界）及以西德文纳河和第聂伯河上游为界的北部领土。莫斯科大公国的新边界就对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构成直接威胁。虽然伊凡三世未能从立陶宛手中夺回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全部国土，但是至少为将来征服西部奠定了基础。

伊凡三世的外交政策和他在“聚集俄罗斯领土”方面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统治时期较少内乱。大公显示出不仅能对外交使节，而且能对他自己的家族和波雅尔^[2]应付自如。在他统治时期的末期，他已成为这片领土上无可争辩的主人，即使是他宫廷中的最保守分子也不得不对他抱有敬畏之感。在与家族的所有交往中，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刚毅和一贯的冷酷。因为他并不满足于当家族的族长：“全俄罗斯的君主”，“沙皇与专制君王”（在他孙子的加冕典礼上都主教使用的称号）不能容忍限制他的权力，他的兄弟们也不能要求得到他们认为是自古以来属于他们的权利。伊凡三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到教会的公开支持。伊凡迈步走向绝对专制，而他的兄弟们却落后了。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放弃在王族内传统的平等意识，这是很久以前尤里柯维奇（Ryurikovichi）留下的遗产。长嗣继承制的惯例实际上已得到瓦西里二世的彻底确认，我们没有听说伊凡的兄弟们有夺取王位的企图。他们只是要求捍卫自己作为封邑王公自古以来应享有的权利。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伊凡不愿与他们分享世袭财产，这就引起他们的不满进而起来造反。纷争开始于1472年。伊凡的最大的弟弟尤里在那一年死去，没有留下后嗣。在遗嘱中他没有提到他的封邑问题，于是伊凡将其据为己有，使其余三兄弟大为不满。第二年，伊凡和他的两个大弟弟，安德烈和鲍里斯，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后者答应把伊凡及其儿子当作“兄长”，不谋求伊凡或其继承人的王位，也不干涉尤里的那份转归伊凡的遗产。

一个名叫季米特里·奥博连斯基-利科的人与大公发生冲突，他行使了所有“自由仆人”古来有之的权利，从原来效忠于大公转向效忠

于伊凡的弟弟鲍里斯，结果在后者的领地上遭逮捕并送往莫斯科，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兄弟们的不满。虽然这不是限制“离开”的权利的第一例，但他是第一次在大公的家族成员的领地上否认这种权利。鲍里斯向他的哥哥安德烈发泄他的不满：

我们的哥哥尤里死了一一他的所有遗产都归大公所有，而他一点也不分给我们。他和我一起攻取大诺夫哥罗德——但他一点战利品也不分给我们。而现在无论谁从他那儿跑到我们这里，不经审判他就抓走了。在他心目中他自己兄弟的地位还不如波雅尔。

1480年，这两位兄弟公开反抗大公。他们带着家人和侍从向西行进到诺夫哥罗德领地，希望得到卡西米尔的支持。面对两败俱伤的战争危险，伊凡派遣罗斯托夫大主教去恳求他的两个反叛的弟弟。但是，安德烈和鲍里斯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援助。在初冬时候，他们带着部队回来保卫抵御鞑靼人的乌格拉防线。这次造反结束了。但是，在准备同立陶宛作战的紧急关头，他经受不起国内再次发生武装反叛的危险。通过修改同他的两个弟弟安德烈和鲍里斯签订的协议（1481年和1486年），他强迫他的两个弟弟正式承认自己获得的领地（尤里及1481年死去的小安德烈的遗产，以及诺夫哥罗德和维特尔两国的领土）并重申他们不再同外国往来的誓言。然而，尽管有这些忠诚声明，伊凡三世还是怀疑安德烈会反叛，于是，只等找到一个借口就把他除掉。1491年，安德烈因本能派部队去援助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而授人以口实。他被人出卖而遭逮捕，与他的儿子们一起被监禁。三年以后，他死在监狱中。当都主教为他说情时，据说伊凡说过：“我死去时，他会谋求王位；如果他本人得不到，他会挑起我的子孙们兵刃相见。”

伊凡的家族纠纷并未因除掉安德烈而结束。在15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王朝危机，卷入这场危机的不仅有莫斯科大公国贵族和教会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还有大公家族的最亲密的成员。1490年，假定继承人，伊凡原配所生的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去世。伊凡三世面临指定谁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是指定他的孙子，即伊凡·伊凡诺维奇与叶连娜·斯蒂潘诺芙娜的儿子季米特里为王位继承人，还是指定由他的第二个妻子索菲亚·帕拉叶奥洛嘉所生的长子瓦西里为王位继承人。季米特里作为已故的生来就有大公头衔的王位当然继承人的儿子，无疑有更充足的理由做王位继承人。而且，他和他的母亲显然已得到宫廷中主要的波雅尔们的支持。他们不喜欢索菲亚·帕拉叶奥洛

嘉。而且，他们很可能在季米特里身上看出了他们所中意的王公的特点——温顺，年幼而体弱。另一方面，瓦西里也有理由做王位继承人。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后裔，因为他的母亲是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从编年史中提及的少量情况来看，他的支持者是宫廷司书和小贵族，“波雅尔后裔”^[3]新的服役阶级，即那些不是靠出身而是靠功劳取得现有身份和职位的职业人员——换句话说，其生存依靠他们为之效劳的君主的人。他们是特权贵族的天然敌人，是绝对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在瓦西里和索菲亚背后还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人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他反对叶连娜，如不是因其他缘故，则是由于她受了犹太教徒的异端邪说的影响。^[4]

1497年，大公被迫下手。一场要夺取国库并当场除掉季米特里的阴谋被揭露出来。这个集团的领导者（主要是波雅尔后裔和宫廷司书）被立即处决。瓦西里被软禁于宫廷，而索菲亚被指控窝藏“带有邪药的女人”（很可能是要用来毒死季米特里）而失宠。1498年2月4日，季米特里被加封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的大公。关于瓦西里和索菲亚遭到暂时挫折的起因，编年史只提到这次宫廷阴谋。但是，令人关注的是，1497年，叶连娜的父亲、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与立陶宛的亚历山大之间再次爆发敌对行动，而许多被处决的波雅尔后裔原先就与封邑王公的侍从和在立陶宛的莫斯科大公国移民有联系。然而，叶连娜和季米特里的胜利是短命的，1499年1月，莫斯科宫廷中两个主要的波雅尔，伊凡·尤里维奇·帕特里科夫及其子瓦西里被迫削发为修道士，帕特里科夫的女婿谢苗·梁波洛夫斯基-斯塔罗杜勃斯基则被处死。除掉他们之后，瓦西里便获胜了。他被加封为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大公。三年之后，叶连娜和季米特里被逮捕。季米特里被剥夺了大公的称号，而瓦西里被加封为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1502年4月14日）。编年史没有说明伊凡三世的态度前后180度大转弯的原因。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的极力劝说可能影响了伊凡三世的决定，从而使他的妻子和儿子得以东山再起。但是，比起王朝问题来，除掉波雅尔很可能与俄罗斯—立陶宛之间的事务有更多的关系。因为帕特里科夫父子和梁波洛夫斯基都与1494年的和平谈判及叶连娜和亚历山大的订婚有密切关系。在伊凡三世积极准备同立陶宛打仗时，他们可能会反对伊凡的侵略性外交政策。

不管1497年至1499年的王朝危机的起因是什么，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到伊凡三世统治末期，莫斯科大公国的贵族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不再能有效地反对大公。确实，在15世纪后半叶，在大公与波雅尔、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旧时的公国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只有少数以前的封邑王公的后裔保留了和他们祖宗时一样多的世袭财产。许多旧时的王公破产了，他们的土地被家族瓜分或抵押给修道院。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加入到莫斯科大公的仆役队伍充当“服役王公”。随着莫斯科宫廷中“服役王公”的出现，“自由服役”和“自由仆人”的旧观念自然就消失了。因为“自由服役”的本质在于自由离开的权利，即所有自由人选择为哪一个王公效劳的权利。从前一个独立公国与另一独立公国之间可以自由行使这些权利并在王公之间的每一个条约中作了保证。但是随着俄罗斯领土的积聚，所有的大俄罗斯公国实际上都被莫斯科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服役自由就成为一种过时的现象。一个王公或波雅尔可以转而效忠大公。但是“脱离”大公去效忠一个封邑王公，或更严重的是，去效忠于立陶宛大公，那就简直可以说是叛逆行为了。

但是，仅仅去掉王公间协议中的传统惯例（“我们的波雅尔和自由仆人应有〔脱离主人〕的自由”）还不足以防止背叛。对于波雅尔中的显贵，丹尼尔·季米特里耶维奇·霍尔姆斯基王公，无疑受到怀疑谋反或叛逃，伊凡三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1474年，霍尔姆斯基被逮捕，只是在签写了效忠誓词之后才获得释放。在效忠誓词中他写道：“我将为我的君主及其子孙效劳，至死不变，决不背离……去效忠他人。”8个人（包括都主教）为他担保。如果他背叛了，他们将被处以8000卢布的罚金。通过立誓和担保来将一个服役王公束缚到封建君主身上这一做法，虽然早在14世纪后半叶在特维尔和立陶宛就实行过，但由一位莫斯科大公加以应用，这还是头一次。

然而，一定不要以为，一个王公或波雅尔，一支加入大公的仆役队伍，就被剥夺了领地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保留并继续掌管可自由处置的庄园。而且，他还有任意处理世袭财产的自由，抵押、出售、交换或遗赠的自由。但是，莫斯科大公国的宫廷和莫斯科大公国的军队并非一律不让拥有土地的贵族任职。在许多情况，为大公效劳的王公和波雅尔由他们的侍从、仆人和士兵陪同，这些人又成为大公的“仆从”。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大公的服役

队伍中来。随着政府的日益集权化，就有必要不以世袭的可自由处置的庄园，而是以授予有终身使用权的土地来赏赐这个“服务阶级”。受赏土地的所有权一律取决于受赏人的服役期。这种军功领地制并不是新事物。赐予有条件拥有的土地的第一个记录可以在伊凡一世的遗嘱中找到。但是，只是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这种军功领地制才变得普遍化。论功行赏制完全取代了世袭财产制。

军功领地制的迅速发展必然要引起土地危机。大公的私有领地不足以满足政府的这种需要；国有的“黑色”土地也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对土地的需求只能靠分配兼并领土上被没收的大片土地来解决。其中，诺夫哥罗德国土能提供最丰富的土地资源。在1479年和1484年就已发生过小规模地将佃农从诺夫哥罗德驱逐到内地的事件。但是，在1488—1489年才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驱逐事件。8000多波雅尔、“富有者”和商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被迁走，安置在莫斯科公国领土的东部地区。他们的土地按军功领地制分配给那些来自“低地”、莫斯科地区及其邻近领土的“服役有功者”。这种大规模重新安置的确切规模不得而知，但从已有的资料来看，有1600—1800名服役有功者受到这种奖赏。其中，这些资料提到有73个王公家族成员，175个莫斯科公国旧时的波雅尔家族代表和280个 *posluzhil' tsy*，即：莫斯科公国从前的农奴和土地被没收的诺夫哥罗德的波雅尔，在大公的军队中服役而获得自由的职业军人。从对重新安置地的地形测量的考察来看，可以估计出，伊凡三世可能很重视后一类 *posluzhil' tsy*。在防御薄弱的前线地区新分配的土地大部分都交给了他们。后来，伊凡哥罗德（1492年建于与纳瓦城相对的纳罗瓦河东岸）的驻军几乎全部是诺夫哥罗德从前的仆从。通过这样用土地来酬劳服役军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捍卫国土，伊凡三世就在有潜在危险的地区创建了一支作战力很强的军事骨干队伍。只要他们效忠于他，他们就能靠君主得到自由和自己的土地。

虽然从诺夫哥罗德没收的领地都转为军功领地，数量达100万公顷，虽然在莫斯科兼并的其他地区也采用类似的方法，但是国家还是需要更多的土地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服役阶级的需要。伊凡三世把眼光移向教会拥有的大片土地，这就不足为奇了。在14世纪和15世纪，修道院已发展到与它们过去的大小和数量很不相称的程度。由于这些地道的殖民本能，敏锐的商业意识和利用王公和波雅尔出于宗教

目的的慷慨大方的能力，他们填满了自己的金库，扩大了领地，这都主要靠牺牲贫困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大面积的土地遗赠、抵押或出售给修道院。他们的代理人在土地市场上无竞争对手。但是教会连一部分财富也不愿献给国家。教会的辩护者们小心翼翼地给教会的财产罩上一层不可侵犯的神光。诚然，在攻陷诺夫哥罗德之后，伊凡三世没收了原属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和修道院的相当多的财产，并在1500年将数量不明的诺夫哥罗德教会财产转为军功领地。但这些都是零星的情况。除了在诺夫哥罗德的领地外，未经主教团的同意与合作而将教会拥有的土地转为世俗财产显然是难以想象的。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思想在教会内是根深蒂固的。此外，莫斯科大公能随心所欲地对待神职人员的时机还未到来。在鼓吹征讨立陶宛的异教徒拉丁人的时候，他不能冒犯国内的东正教代表人物。教会与国家之间不和不会给立陶宛境内的俄罗斯族东正教徒展示出一幅诱人的图景，而他又那么急于要他们支持他而背弃立陶宛。他的上策是：未事先通知大公，禁止新近兼并的一些领土上的土地所有者遗赠或出售地产，以此来制止私有土地流入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手中。

即使伊凡三世不愿公开讨论将教会拥有的土地转为世俗财产的问题，教会内的不满分子也要讨论这一问题。1503年在莫斯科召开教会会议来对付教会内的某些弊端劣迹。会议结束时，尼尔·索尔斯基长老建议，“修道院不应拥有土地，而修道士……应靠他们的双手自食其力”。毫无疑问，尼尔本人的行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对他来说，修道院拥有的地产是“隐修生活方式的致命毒药”，使修道士堕落，使其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灵修。但是，后来的一个资料上说，来自伏尔加河那一边的尼尔的许多支持者显然是受大公的召唤来参加会议的。尼尔的建议遭到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的反驳，他的反对意见坦率而实际。没有土地的修道院不可能吸引“虔诚而高尚的人”，他说：“要是没有虔诚的修道士，我们在哪儿去找都主教、大主教和主教？”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不用说服就支持约瑟夫。但是他们没有估算到大公的固执态度。他要求，对尼尔的建议作出的答复要亲自报告给他。教会会议的决定有宗教和历史两方面的理由支持，所以，三次报告给他之后，他才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决定。“支持教会拥有土地的人”即人们称呼的“约瑟夫派”取得了胜利。虽然尼尔的追随者，也就是“主张教会不拥有土地的人”或称“伏尔加河那一边的长老派”在接踵而来的论战中坚持他们的立场，并在后来还把希腊的

马克西姆和阿特米修道院院长这样一些有能力的人吸引到他们的阵营中来，但是有关将教会财产转为世俗财产的问题还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伊凡三世和他的继承人都未能推翻1503年宗教会议的这一决定。整个16世纪，教会的土地大部分一直未让国家掌握。

尽管教会在1503年取得胜利，其领导人又表现出固执且狡猾，但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就已经一边倒。在有关信仰问题方面，教会要求大公支持其决定，惩罚教会中的违法犯罪者。在政治争论中，教会别无选择，只好站在这位专制君主一边。在阐述国家的世俗权力和教会的宗教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棘手的任务时，教会发现形势所迫，只得承认前者要更胜一筹。没有人比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更清楚地认识到教会权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局限性。在他发动的反犹太教徒异端邪说的运动中，他看到如果适合他的意图，这位“信仰捍卫者”可能会多么碍事。而异端邪说的确对东正教的信仰和对国家都是很危险的。犹太教的异端邪说是1470年从特维尔引入诺夫哥罗德的。其信徒否定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并采用犹太教的某些宗教仪式。它很快就传播到莫斯科，不但传给了伊凡三世的王室成员（包括伊凡三世的儿媳叶连娜），而且，如果我们相信约瑟夫的话，还会传给都主教本人。吉纳夫大主教和后来的约瑟夫都坚持不懈地发动反对这些异端分子的运动。但是如果没有大公合作，他们将毫无办法，因为大公本人就要对1470年任命两名主要的异端分子担任莫斯科的重要职务一事负责，他自己的儿媳就受了这种异端邪说的影响。诚然，伊凡三世在1490年召集过反对这些异端分子的宗教会议，但是，给予那些有罪的异端分子的惩罚是很轻的。因此，这种异端邪说继续繁荣兴旺，传播开来。约瑟夫给那些当权派写信，私下与伊凡交谈，催促大公的忏悔神父运用他的影响。最后在1504年，也就是叶连娜及其儿子失宠两年之后，伊凡三世同意召开第二次宗教会议。主要的异端分子中许多人被革出教籍，处以火罚；有些人公开认错后被处以监禁。虽然一年后伊凡三世下令释放他们，但约瑟夫的任务实际上完成了。

约瑟夫对君主最高权力的阐述与反犹太教徒的斗争紧密相关，这不是巧合。正是他题献给大公的反异端的不朽著作《启示者》（*prosvetitel*）一书，把大公称为东正教信仰的保护者。他主张，沙皇的主要职责是捍卫东正教，惩罚坏蛋是国家的职责。只要大公在履

行这些职责中尽了微薄之力，就仍应服从君主。在约瑟夫的解释中，他还加了重要的限制：“如果沙皇把你引入不虔和邪恶的歧途，就不要服从他。”只是在1504年的宗教会议之后，这位君主才受到神化。

《启示者》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沙皇在本质上与所有人并无不同，但在权威上就犹如万能的上帝。”同时，俄罗斯的基督教赞颂者们详细阐述了莫斯科的拜占庭传统中的那些后来在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在修道士菲洛费的著作中定型了的理论。伊凡三世被称为“第二个康斯坦丁”；莫斯科被称为“第三个罗马”，“新以色列”。但是这些理论几乎都是由教会来阐述的。在当时的官方文章——在外交通信、书信、遗嘱、演说词、法令中，都很少或没有提到过莫斯科的拜占庭传统。大公不愿利用教会准备的一些过分俗套的语言，也不愿要求得到他妻子的继承权，他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他的军事和外交冒险事业的目标不是要从他的同盟者、克里米亚的宗主国君主苏丹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而是要从立陶宛和波兰手中重新夺回以前属于他的基辅前辈的土地。他要求得到承认的头衔不是全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皇帝，而是俄罗斯的君王。

伊凡三世于1505年10月27日去世。关于他的去世编年史家并无过分的颂扬之词。没有举国哀悼的场面。然而，他所做过的不仅仅是继续先辈的工作。他不是那种固执而无进取心、只会坐食祖先成果的莫斯科丹尼尔皇族的又一个子孙。他与他的先辈和直接继承者们不同之处在于：他以精明和富有远见而著称，有控制国际事务的非凡能力。他的军事战役可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是非常成功的。他的外交手法可能显得不灵活，但却卓有成效的。他很少有英明的或深得人心的统治者所具有的特征。1480年他面对敌人表现出优柔寡断引起大众的指责和教士们的责备。虽然他不受波雅尔们喜欢，却令他们感到敬畏。我们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已记录有的他的唯一乐趣就是大饱口福。外表上，他瘦高而略显驼背。他的相貌令人敬畏，据说妇女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晕倒过去。

伊凡三世用遗嘱确保了他的长子得到全部最高政治权力。瓦西里得到他父亲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是一些次要的城镇和地区，分给他的4个弟弟。此外，任何一个弟弟的土地若无继承人，都要全部转归大公所有。在莫斯科本地，从法院和海关所得的全部主要税收，本来已分给大公和他的几个弟弟，这时也几乎全归瓦西里所

有。瓦西里的弟弟们发现，甚至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也被剥夺了他们原有的许多权利。他们被禁止铸造自己的钱币或与外国保持关系。在与莫斯科毗邻和首都内他们的领地上，他们不仅失去了贸易权，而且还失去了刑事重罪的裁判权。

瓦西里就这样牢牢地确立了王权。伊凡三世完全有理由谨慎从事：立陶宛统治者和波兰国王都指望瓦西里登基会引起内乱。但是没有发生动乱现象。季米特里和他的母亲仍然被牢牢地关在监狱里；他们的支持者明智地保持沉默。瓦西里虽然年轻，但并不懦弱。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比他父亲更固执。他肯定更不容忍反对他的人，作风更专制，对下属更傲慢。他只缺少他父亲的伟大。他极其有效地完成和巩固了伊凡三世的事业——但仅此而已。

他未费吹灰之力，也没有大动干戈，就兼并了大俄罗斯其余的两块领地，普斯科夫和梁赞。第一个被正式兼并的是普斯科夫。在整个15世纪，这个共和国在抵御西方邻国所需的军事援助和内部管理两方面都一直差不多全靠莫斯科大公。它的事务由大公派出的长官（*namestnik*）管理。长官的权力在不断增大，而民众大会（韦彻）的权力却相应减小。在它“独立”的最后30年中，它的军事战役全由莫斯科指挥。然而，作为一个独立国，它的领地超出了大公的管辖范围。只有通过正式兼并，他才能有机会获得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土地。1509年秋季，有了一个结束普斯科夫独立的合适借口。瓦西里敏捷地利用了他的长官与普斯科夫之间争吵的机会。当仲裁失败时，他把问题纳入他自己手中来处理。1510年1月，韦彻钟被拆除，任命了两位主要负责军事的长官来代替原来的行政长官。整个城市的管理掌握在一名文官手中；300家主要公民被剥夺了房地产，放逐到内地，从莫斯科地区迁来同等数量的家庭来取代他们。普斯科夫成了莫斯科公国的一个省。11年后，梁赞也被正式兼并。当时，它的最后一位大公由于努力为重新获得其祖先的独立而与鞑靼人举行了秘密谈判，结果遭瓦西里逮捕。

在西方，瓦西里三世采取了和他父亲相似的外交政策。他巩固和扩大了伊凡三世在立陶宛俄罗斯族人中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在西南方未能继续挺进乌克兰。西吉斯孟德一世继承其兄于1506年登上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的王位。他开始为1507年初向莫斯科开战作准备，寄希望于波兰—立陶宛、立窝尼亚和喀山及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的大联盟。

但是，瓦西里抢先一步，通过暂时安抚喀山人，然后率先发起进攻。他还与立陶宛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米哈伊尔·格林斯基进行秘密谈判。米哈伊尔·格林斯基尽管参加了罗马天主教，却成为所有亲莫斯科的俄罗斯族人团结的核心。在战争的第一阶段（1507—1508年），战争散乱而未决胜负。格林斯基在波列西（Polesie）进行了骚扰活动之后，带着大批追随者和亲属叛逃到莫斯科。立陶宛被迫签订条约（1508年秋）。根据这项条约，伊凡三世所获得的全部领土，除第聂伯河畔的柳别奇外，承认归莫斯科所有。

4年中保持了不稳定的和平。但是，在1512年，在一心想通过攻城略地获取更大功名利禄的格林斯基的怂恿下，在条顿骑士团的首领因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而准备对波兰开战的激励下，瓦西里攻入立陶宛。他的进攻目标是第聂伯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城及周围地区。经过两次尝试（1512年12月和1513年6月），俄罗斯人终于在1514年7月成功地夺占该城。尽管两个月之后波兰—立陶宛取得极大（但未能充分利用）的胜利，斯摩棱斯克还是控制在俄罗斯人手中。然而，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拖延了5年。尽管与马克西米连签订了作战条约（1514年），又和条顿骑士团首领阿尔布里奇缔结了攻守同盟（1517年），但瓦西里不能指望对敌人采取一致行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波兰国王之间签订的维也纳条约（1515年）使前者与莫斯科签订的作战条约失效，说明他口是心非，狡猾奸诈。阿尔布里奇与西吉斯孟德之间的战争（1519—1521年）只能证明条顿骑士团的虚弱与衰落。经过一系列激烈而徒劳的战役，于1519年以莫斯科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规模入侵而告终。随后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在占领地保有原则的基础上，于1522年签订了为期5年（后来又延长到1534年）的停战协定。瓦西里三世的西部政策的直接目的已达到。俄罗斯西部防卫系统的焦点、西南方的文化和经济大门斯摩棱斯克已牢牢控制在俄罗斯人手中，并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如此。

瓦西里三世在东南边境地区面临的问题比他父亲面临的问题更严重、更复杂。因为伊凡三世尽力做到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平相处，几乎没有受到来自东方的干扰，而瓦西里三世在其统治的后半期，面临泛鞑靼联盟的威胁。泛鞑靼联盟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支持，是由克里米亚的吉雷王朝组建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不再是莫斯科的坚定盟友。自从1502年金帐汗国的残余遭到最后失败以来，他们再也不需要

莫斯科的军事援助。此外，他们传统上最容易受袭击的东部领土有一半现在已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但是，日益衰老的蒙里仍然喜欢劫掠性远征（在瓦西里三世统治的最初10年中，莫斯科占有的乌克兰领地两次遭克里米亚人的劫掠）。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吉雷制订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1521年，穆罕默德-吉雷的兄弟萨希布将穆罕默德·埃明的继承人、亲莫斯科的沙赫·阿里逐出喀山。同年，莫斯科大公国受到两面入侵。得到诺盖鞑靼人和立陶宛人增援的一支克里米亚鞑靼大军跨过科洛姆纳附近的奥卡河。同时，萨希布率领的一支喀山鞑靼人军队从东面包围莫斯科。只是由于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恰好在这个时候进攻克里米亚，被围困的首都才得救。然而，1512年的入侵标志着吉雷王朝政权的衰落。在一场试图征服阿斯特拉罕的徒劳战争之后，穆罕默德本人于1523年被杀。在其后的10年中他的后继者们太忙于互相将对方逐出汗国，结果对莫斯科未构成威胁。穆罕默德-吉雷一直伺机怂恿土耳其加入反莫斯科联盟，土耳其也不愿或者无力在任何重大的对外冒险事业中积极支持其克里米亚仆从。瓦西里三世无惧于萨希布在1524年正式承认苏里曼二世的宗主权，决心以武力将吉雷逐出喀山。但是，直到1532年，莫斯科人才成功地以前可汗沙赫·阿里的兄弟占·阿里取代萨希布的侄子和继承人萨发-吉雷。更多的历史事件证明，喀山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都不够强大，无法不依赖莫斯科而存在。它的暂时盟友，诺盖鞑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距离太遥远，且又陷入内部事务而不能给予有效援助。它的宗主国君主、苏丹，并未表现出要参与它的独立斗争。它的商人在俄罗斯见到的是销售他们商品的一个日益繁荣的市场而不是它的士兵的袭击场所。

在处理家族问题和波雅尔问题方面，瓦西里三世比他的父亲显得更不妥协让步。他毫不掩饰地鄙视他的几个弟弟。据说他在1525年曾问过他的近臣：“我死后谁来统治俄罗斯和所有的城镇及各行省呢？我要不要〔把权力〕交给我的几个弟弟？可是我的几个弟弟连他们自己的封地都管不好！”由于受到羞辱鄙视，受到大公的密探暗中监视，他们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或积极反抗他们的哥哥。他们的侍从人员须经大公仔细审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撤换他们的侍从。甚至要等大公夫人给她的丈夫生了两个儿子之后才允许他们结婚。波雅尔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对他们君主的专制行为感到满意。关于国家的各种问题，无须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大公却往往去征求宫廷司书的意见。这些人的血统及职衔都与莫斯科王公们的传统幕僚相去甚远。失

宠的波雅尔别尔先·别克列米舍夫抱怨说：“现在，我们的君主要把他自己和另外两个人关在卧室里处理各种问题。”正如别尔先本人亲身感受到的那样，久已确立的臣民“晋见”君主（即向君主诉苦）的权利，再也不倡导使用了。而臣民“脱离”大公的权利却以加强应用效忠誓词来进一步加以限制。大多数的波雅尔也不赞成政府的侵略性对外政策；因为频繁的战争——特别是在西部——川流不息地给他们的队伍中带进来新的边境小王公，充塞那业已臃肿的莫斯科朝廷，破坏了精心安排好的座次。

在教会中——更确切地说，在以都主教丹尼尔为首的占主导地位的“约瑟夫派”主教团中，瓦西里三世找到了一个心甘情愿的伙伴和俯首贴耳的帮手。丹尼尔不但在背信弃义地逮捕V. I. 舍米亚金（结果后者的封地被并吞）和诺夫哥罗德的塞弗尔斯基（1523年）中充当帮手，而且还认可了瓦西里三世与他那没有生育能力的原配夫人索洛莫尼亚的那桩不合教规的离婚，并让大公与米哈伊凡·格林斯基的侄女叶连娜结婚，这使他在教会内的对手、伏尔加河那一边长老派和大多数波雅尔感到十分厌恶。这些波雅尔一点也不愿看到皇族繁衍增多。然而，直到1530年，叶连娜才生下一个继承人，未来的大公和沙皇伊凡四世。三年以后，她的丈夫突然去世，将他的幼子托付给都主教和他妻子的叔父米哈伊尔·格林斯基。

瓦西里三世的去世使莫斯科宫廷中心怀不满的人的力量迸发出来。对大公不满的少数派展开了空前的夺权斗争。没有了瓦西里的专横管制，他的兄弟、遗孀、波雅尔都想确立他们自己的权威，但都以失败告终。密谋、政变、背叛、流放，一个紧接着一个。瓦西里的遗孀叶连娜得到她那肆无忌惮的情人奥博连斯基-捷列普涅夫王公的帮助，作为摄政者度过了风雨飘摇的5年，其间被除掉的不仅有瓦西里的那些无用的弟弟，而且还有她的叔父，显然是卷入了波雅尔推翻政府的阴谋。但是，只是在她于1538年死去后，波雅尔们才有机会摊牌。由苏兹达尔公国王公的后裔、势力强大的舒依斯基家族发动了一场政变，结果，奥博连斯基被捕并处死，释放了叶连娜统治期间被关押的波雅尔。在5年的动乱期间，政权在舒依斯基家族和他的对手、立陶宛的杰迪明的后裔别利斯基家族之间来回更迭。大主教的职位取决于当权派的恩赐，其间曾两度易手。王室领地被没收并任意分掉，国库遭抢劫，城乡被洗劫一空。地区长官一个比一个贪婪、凶残和腐败。直

到1543年，情况才有所好转。当时，13岁的大公的宠信沃龙佐夫遭到羞辱，盛怒之下，他叫宫仆杀死了安德烈·舒依斯基。格林斯基家族迅速抓住舒依斯基倒台的机会。在其后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仍然是无政府动乱状态。就连伊凡四世那庄严的沙皇头衔（1547年7月）和他与莫斯科古老的扎哈林家族的成员阿纳斯塔西亚的婚姻似乎也无法削弱格林斯基家族的权势。直到1547年夏天，在一些心怀不满的波雅尔们煽动下，莫斯科暴乱的人把沙皇的舅父尤里·格林斯基抓起来处死，格林斯基家族的统治连同动乱时代才终于结束。

如果说沙皇童年时代目睹的暴力和腐败场面使幼年沙皇的头脑受到扭曲，那么，他永远难忘的波雅尔的骄傲自大、自私自利和管理上的极端无能也使他在头脑中产生了对波雅尔的恶感。然而，系统而审慎地消灭波雅尔反对派的计划还没开始。接着，波雅尔的恣意妄为和专制君主的报复行动都暂时终止，出现一段由所谓“特选委员会”^[5]实施改革的时期，所谓特选委员会是指以年轻而又有能力的宠信阿达舍夫和很有权势的宫廷神甫西尔韦斯特为首的政府幕僚组成的私人小集团，其中包括某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波雅尔们。有关阿达舍夫和西尔韦斯特及其小集团的史料很少，而且都是间接得来的。有关“特选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权限的情况更是鲜为人知。伊凡四世对他们的改革活动的参与或赞同程度还不能确定。但几乎可以肯定，在16世纪40年代末期和整个50年代实行的这些改革富有远见，构想精明。他们的目标首先是要使行政管理集权和提高管理效率。因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俄国的领土大大扩张，而中央政府的管理却未能跟上，这就不得不要求采取这一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服役贵族的势力而损害了波雅尔的利益。

这些改革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在地方政府范围内进行的。陈旧的食邑制（*kormleniye*）是封邑时代的遗风。在食邑制中，地方行政长官由他们因效劳有功而受封赐的地区来供养，不定期征收大量的款项、实物贡金和各种税收（审判税、关税、婚姻税等）。这是一种极端过时的制度。这不仅使当地居民受苦：他们经常抱怨这些食邑贵族（*kormlenshchiki*）滥用权力，敲诈勒索，施用暴力，审判不公，无法无天；而且个别地方行政长官所采用的花样翻新的做法使国家也深受其害：在这种地方行政管理分权制中，完全缺乏统一性，难于在接通知后马上调动广为分散的指挥官和部队。还在沙皇幼年时期，就已

采取措施，设立“地区元老”（*gubnoy starosta*）的官职来代替地方行政长官掌管刑事审判机构。地区元老由地区代表从当地服役贵族和“波雅尔后裔”中选举产生，并用类似办法任命的下级官员协助，负责拘捕、审问和刑事惩罚。虽然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土匪而不是限制地方长官的法律权限（实际上他们仍然可以从刑事诉讼中捞取收入），不过，这是在以地方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权力来代替地方行政长官的专断权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在大改革初期，对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还作了一些限制。1549年，服役贵族脱离地方行政长官的管辖而只隶属于中央司法机关，并且得到对他们领地内的农民的审判权。1550年制定的大法规规定，地方行政长官举行审判时，必须有当地居民选举的代表出席。同时，还努力规范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征收的税款和合法收费。1555年，食邑贵族遭到致命打击。那一年，法律允许（但不强制）所有州县以选举产生的州县官员来代替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当地行政管理、司法和征税，所得税款直接归入国库而不是落入地方行政长官的腰包——这一措施立即有利于国家（因为当地官员可以集中而有效地由政府控制），各地居民现在都有机会摆脱食邑贵族的专横控制。

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军役人员（*dvoryanstvo*）的服役条件，提高他们的战斗力。1550年，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一些俄罗斯军役人员重新安置在毗邻首都的王室领地上。重新安置的目的是要为中央政府和莫斯科宫廷的大约一半的人（其中包括高级军官）在他们的机关所在地附近提供地产，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备战效率和“备战状态”。万一发生战争，随时可以调动，形成政府要员的可靠骨干队伍。根据1555年或1556年的（军役）法令，服役军人发现，其职责是由他所受赐土地面积来确定的，第一次能将他们的受封地遗赠给儿子，给后者提供一个继续其父亲服役的机会。除了土地以外，他们还开始得到定期发给的现金作军饷。还采取了一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措施：限制但没废除那种根据门第和职位高低来确定社会地位和官职的繁文缛节的体制；提拔第一批常备军骨干。同时，全国的军事指挥和公共行政管理大体集中，这反映在建立和迅速扩大政府各个部（*izby*，后来叫作 *prikazy*）。政府各部主要由司书掌管，集中处理像军事任命、封地的分配和外交这样的事务。

无论伊凡四世多么赞同改革，但他显然不能容忍这些改革者。1560年，特选委员会失势，阿达舍夫被调遣到多尔帕特，后来死在那里。西尔韦斯特被放逐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人们只能从伊凡四世给库尔布斯基（1564年他逃到立陶宛）的信中了解到阿达舍夫集团倒台的原因：在立窝尼亚战争问题上反对伊凡四世，鼓吹对克里米亚采取侵略政策，敌视阿纳斯塔西亚——更确切地说，敌视它的扎哈林家族——不愿让沙皇参加他们的会议，也不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不愿意充分满足服役贵族的要求，也不愿约束波雅尔的权力。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背叛。因为1553年伊凡四世病重时，他要求堂弟、斯塔里察（Staritsa）的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维奇及波雅尔们向他的幼子宣誓效忠，西尔韦斯特和“特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拒绝服从看来奄奄一息的沙皇，站到那些支持弗拉基米尔为王位候选继承人的波雅尔一边。虽然西尔韦斯特及其追隨者在1553年事件中的行为很可能反映了政府主要集团内部的分裂，是对抗扎哈林家族（据说阿达舍夫的父亲曾对沙皇说：“贵公子尚处襁褓之中；扎哈林家族将会统治我们”）而不是支持一次总暴动，不是用武力拥戴弗拉基米尔登上王位的尝试。然而，他们的行动却被伊凡四世理解为反对他本人的波雅尔大阴谋集团的一部分。

西尔韦斯特和阿达舍夫被撤职后，紧接着是免职、谋杀和流放他们的同党，这仅仅是最后清算的前奏。1564年的事件——伊凡四世在立陶宛的失败，他的将军、顾问和朋友库尔布斯基王公叛逃，两面受到入侵的威胁——使他精神错乱，他于年末发动了一场戏剧性的政变。他带着随从离开莫斯科，到了位于莫斯科与罗斯托夫中途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卡雅·斯洛博达。一个月后，他向莫斯科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文件指责教牧人员和统治阶级叛变并应对他父亲去世以来国内的整个混乱局面负责，他宣布决定退位；另一份文件告诉莫斯科的商人和全体市民，他对他们并无恶意。虽然说这是为试探民意而耍的花招，它却完全成功了。商人和市民请求都主教派一个代表团去见沙皇，恳求他回来。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回到16世纪30年代的混乱时代。然而，做梦也没有人会想到将要到来的不仅仅是混乱，而且还有恐怖。

伊凡四世回来了，而且是按他的条件回来的。他要求得到自行处理所有叛徒的权利。他宣布成立特别朝廷（special court），或沙皇

禁卫军（*oprichnina*）^[6]，最初由1000名特选人员组成。这些人被安置在某些地区内，住在这些地区的世袭贵族或领主，如果不是特别朝廷成员，都要驱逐出去重新安置在别处。国家的其余地区被称为普通辖区（*zemshchina*）^[7]，一切照常进行，拥有自己的波雅尔议会（*Council of boyars*），即贵族杜马（*duma*）、军队、司法体系和行政机构。只是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比如宣战，普通辖区的波雅尔须向沙皇请示。沙皇直辖区内的政府机构与普通辖区内的政府机构平行存在，然而，起初他们看来似乎是独立行事。国家被一分为二。后来，由于将“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暂时授予卡西莫夫的前统治者、鞑靼人西麦翁·贝克布拉陶维奇，作为普通辖区的首领；而伊凡四世只冠以“莫斯科公”这一谦虚头衔（1575—1576年），这就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的二元性。沙皇禁卫军的人数很快增加，他们所占的国土也随之增加。最后，特别朝廷控制了大约一半的国土，这是从北到南一片广袤的楔形土地。普通辖区逐渐被挤到不太富饶的边远地区。甚至莫斯科本身的某些街道和地区也单独划归特别朝廷管辖。特别朝廷成员从社会各阶层挑选，从平民百姓到有头衔的贵族都有。甚至外国冒险家也千方百计挤进这个队伍。他们穿特别的制服，必须发誓绝对忠于沙皇并保证与普通辖区的大贵族势不两立，以此将他们团结起来。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这个新国家的特选指挥官和行政官员；说穿了，他们就是沙皇的刽子手和秘密警察。

伊凡四世于1565年回到莫斯科，接着就进行了处决和流放。当意识到公开抗议沙皇禁卫军的劫掠只能遭到进一步报复时，反对派就转入地下活动。阴谋集团似乎一个接一个。1567年，揭露出一个（或许是捏造的）企图背叛伊凡四世去投靠波兰国王的阴谋，接着进行了3年的调查和大规模处决。在这些受害者中有沙皇的表兄弟、斯塔里察的弗拉基米尔王公，他同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一起被毒杀。有人报告说，诺夫哥罗德预谋叛国，加上该城未能筹措到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西部战争，结果遭到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沙皇禁卫军冲进该城进行屠杀、抢劫达到6个星期。据说死亡人数达6万人。1571年的灾难性军事事件：克里米亚鞑靼人洗劫莫斯科和经过7个月的围攻之后，俄罗斯人未能夺取雷瓦尔（塔林），这些都被伊凡四世归咎于普通辖区军队和沙皇禁卫军的叛国行为和作战不力。接着又处决了一大批人。但是，沙皇禁卫军并不总是能为他们的暴行找到合适的借口，于是干脆不用

预先提出“叛国”的指控，全城的人统统遭难。大主教因敢于提出抗议而被绞死。看来全国在经历一场血腥的内战，不过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内战，因为伊凡四世的军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遇到抵抗。

可是，沙皇禁卫军是否只是一件用于清算“波雅尔叛逆行为”的武器，一支建立起来并加以训练以满足偏执狂患者的残忍好杀和贪欲的残暴警察部队呢？抑或沙皇禁卫军是天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计划，是伊凡三世和重臣拉达（*izbranna rada*）的土地改革的合乎逻辑的延续，想要达到沙皇感到在正常环境下不能达到的目标，即需要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可靠的不受传统约束的军役贵族阶级来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呢？遗憾的是，由于这个组织的存在确实是煞费苦心地瞒过了外国，所以缺乏不带偏见的资料，使得很难评价建立沙皇禁卫军的目的，甚至连它的活动情况也无法了解。只能从效果来推出结论。作为一项社会实验，从长远来看，削藩制是成功的。在剥夺世袭贵族的权力和提高军役贵族的地位方面，它使由伊凡三世发起的改革过程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伊凡三世并没有给反对者造成伤害，或者说杀掉的也只是一小撮潜在的危险敌手，而他的孙子却使用整套谋杀和驱逐的办法，企图使全部世袭贵族都沦为军役阶级，并在国家的各个部门用他自己的特选贵族来代替他们。然而，尽管波雅尔阶级经过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清洗，从整体上已被消灭掉十分之一，而且经济上也破产了，终于让位于新兴贵族，最后放弃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莫斯科大公近臣的所有要求，但伊凡四世在努力消灭他们的过程中，还是认识到，没有他们无法进行统治。1571年的那场灾难证明，像库尔布斯基那样后来有沙皇禁卫军将军头衔的“卑鄙无耻的小长官”（wretched little voevodas^[8]），无法代替有经验有传统的波雅尔指挥官。在鞑靼人包围莫斯科后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证明了伊凡四世对这一点了解得多么清楚。沙皇直辖军本身也遭到清洗，它的许多最杰出的成员受到清算。它被禁止使用“禁卫军”这个词，违者将受肉刑惩罚——从那时起，它只是“朝廷”，并进行了重新安置——这一次颠倒过来：某些被没收的世袭财产部分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而那些作为地主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沙皇禁卫军军人自己又被替换并赐予新土地。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沙皇禁卫军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那么，采取这一措施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大量的土地被划为领地（*Pomestya*），沙皇禁卫军的暴行，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和地主随后变贫困，这些因素使得中部地区和伏

尔加河北部庄园的农民到东部新征服的伏尔加河地区的领土去，到南方顿河流域的大平原去，到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边境无人居住的地区去，寻找那更安全、更有收益的土地。不管是政府采取把农民束缚到土地上的措施，还是半心半意地试图把教会财产世俗化，都无法防止农业劳动力的危机。地主经常被迫采取诱拐邻近土地上的农业劳动者以便维持其庄园的生存，根本谈不上有效地经营好庄园或为战争努力作出必要的贡献了。中部和西部农业地区人口逐渐减少，到伊凡四世统治末期，在邻近立窝尼亚战场的诺夫哥罗德的一些地区，达90%的土地都闲置着。军役贵族无法完成他们的军事职责，军队缺员，国库空虚。沙皇禁卫军已堕落成仅仅是为西部长期战争从已经耗竭的口中榨取资源的工具。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所取得的伟大而持久的成就全都是在建立沙皇直辖军以前取得的，而征服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这一最伟大的成就却是在“特选委员会”统治时期实现的。在伊凡四世成年之前，喀山汗国再一次成为俄国身边的一根刺。1535年，亲莫斯科的占·阿里被谋杀，萨发·吉雷恢复了克里米亚的吉雷王朝。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袭击。相当大一部分莫斯科军队需要用来对付东部频繁的骚扰以及来自南方的经常性的入侵威胁。1545年，俄罗斯人进行出击。动乱与内部纷争降低了鞑靼人的作战能力。在1546—1552年间，喀山的王位曾六度易手。时而亲莫斯科一派得势，时而亲克里米亚一派得势。然而，直到又经过两次未能取胜的战役（1547—1548年，1549—1550年）之后，喀山才陷落（1552年）。对反抗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各族人民又进行了5年惩罚性征讨，喀山汗国才完全降服。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小诺盖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阿斯特拉罕的处境很复杂。小诺盖人一方面支持克里米亚的傀儡可汗，另一方面又支持亲莫斯科的大诺盖鞑靼人。但是，对来自莫斯科的压力的抵抗微不足道，1556年，俄罗斯人不战而夺得该城。阿斯特拉罕被兼并之后，伏尔加河以东里海低地的大诺盖人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此时，整个伏尔加河流域都被俄罗斯控制，国家东部边境有了安全保障；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道路打通了；通向中亚、波斯和高加索的贸易大道不再经过敌视莫斯科的国土。

东部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之后，显然，年轻而强大的莫斯科国不可能满足于南部和西部边境的现状。俄罗斯政府面前有3条扩张道路可

供选择：征服南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兼并西部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下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土；或者征服西北部的立窝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6世纪50年代政府不断地怂恿伊凡四世在这三条道路中选择第一条。从伊凡四世统治早期起，克里米亚鞑靼人就已表现出不愿与莫斯科谈判，结果成为长久的威胁。虽然他们还未强大到足以发动和维持全面入侵，但能以经常的袭击造成很大的麻烦和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当他们的敌人勾结起来发动这些袭击时，比如，在1535年，当他们在奥卡河发动及时的进攻援助立陶宛入侵塞维尔斯基地区时，或德夫列特·吉雷1552年在土耳其苏丹和波兰国王的怂恿下，试图转移俄罗斯人对喀山的注意力时。然而，重臣拉达鼓吹对克里米亚实行侵略政策几乎未取得成效。的确，从1556年到1559年，沿顿河和第聂伯河对鞑靼领土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但这些袭击更多的是带有大举进攻进行侦察的性质，而大举进攻并未进行。1560年政府垮台后，伊凡四世在南方转入防御。由防御工事体系——壕沟、木栅和防御土墙连接起来的城镇或据点组成的一系列防线在大草原北缘建立起来，以期能阻挡鞑靼人的入侵势头。后来建起一支永久性边防军，这些袭击便不再具有牵制作用和出其不意的效果。沙皇显然不愿卷入一场补给线和交通线过长的大战，或者在没有保证得到甚至还没有希望得到西方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去冒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作战的危险。

由于南翼经常受到威胁，加上波兰—立陶宛日趋统一和东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土耳其等国可能结成反莫斯科联盟，伊凡四世被迫放弃兼并西部俄罗斯国土的企图。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有利于去执行另一个看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总的来说也更有意义的任务——征服立窝尼亚。走这条路的确有很多理由，其中部分地是由于该国脆弱。利剑骑士团的军政权处于彻底崩溃状态；骑士团与独立的主教们之间几无团结可言；里加大主教公开持亲波兰立场，而骑士团首领菲尔斯腾贝格则赞同与莫斯科签订协议。从战略上看，夺取立窝尼亚不仅在立陶宛东部，而且在沿其整个北部边境对其造成威胁。但是采取这一行动路线在经济上的好处大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控制立窝尼亚意味着有了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而拥有纳瓦城和雷瓦尔港意味着能与西方进行直接贸易，从而使进口金属制品和武器并出口俄罗斯的天然资源变得便捷。此外，在波罗的海南岸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就有可能消除西方和北方强国设置的经济障碍。

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中，立窝尼亚问题一直是伊凡四世的外交和军事活动的基础。莫斯科的所有军事力量都花在征服波罗的海诸国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之中。之所以说徒劳无益，是因为没有舰队就不可能夺取或控制住沿海地区，还因为不单单是莫斯科在图谋立窝尼亚。在一场争夺骑士团和主教们的旧有领地的四方斗争中，莫斯科的利益很快就与丹麦、瑞典和波兰—立陶宛的利益发生冲突。然而，其他利益相关的国家行动迟缓。1558年的全面入侵使整个东爱沙尼亚（包括多尔帕特和纳瓦，但不包括雷瓦尔，因为它拒绝投降）成为俄罗斯的囊中之物。第二年初，拉脱维亚的北半部也被征服。只有到那时，与俄罗斯争夺立窝尼亚的未来敌手们才开始感到惊慌。在丹麦国王的调解下，签订了一个为期9个月的休战协定。在此期间，立陶宛与立窝尼亚骑士团的新首领凯特勒（他已代替亲莫斯科的菲尔斯腾贝格）签订了条约。双方同意为保卫骑士团，让立陶宛暂时占领立窝尼亚东南边缘地带作为交换条件。^[9]但只是1560年俄罗斯人在立窝尼亚中部的军事行动中又一次获得成功、骑士团真正垮台之后，其他强国才积极进行干预。按照1561年11月28日的条约，骑士团的所有领地都正式割让给波兰—立陶宛，凯特勒领有西南部新建立的库尔兰和塞米利亚公爵领地作为封地，成为波兰国王的附庸。同年，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应雷瓦尔的请求，占领了拉脱维亚北部，而西北部奥塞尔的主教领地已被丹麦国王的兄弟马格努斯占领。

为争夺北部地区面临与瑞典和丹麦作战，或者为争夺立窝尼亚南半部面临与波兰—立陶宛作战，伊凡四世选择了后者。丹麦与瑞典的关系日益恶化，最终导致七年战争（1563—1570年）。埃里克十四世的反波兰倾向导致莫斯科和瑞典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直到16世纪60年代末，伊凡四世都没有向西爱沙尼亚开战。在这段混乱而复杂的外交谈判期间，他唯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夺取波罗茨克（1563年），该城是通往波罗的海主水道（西德维纳河）的门户，控制着接近立陶宛首都的东部要塞。除了立陶宛于第二年在波罗茨克和斯摩棱斯克之间的乌拉和奥尔沙获得大胜（对俄罗斯人来说，幸运的是，立陶宛人未能乘胜追击）之外，直到其后10年结束时，与波兰—立陶宛几乎没有发生过冲突。在这段大改组和莫斯科公国国内大动乱的年代里，伊凡四世除了与立陶宛进行外交谈判和试图与英国和瑞典结成联盟以维持现状外，的确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然而，到16世纪60年代末，从莫斯科的立场来看，国际形势变得相当恶劣。英国没有

同俄罗斯缔结攻守同盟的任何意愿。西吉斯孟德的亲波兰的姻兄弟约翰三世于1568年取代疯狂的埃里克十四世而登上瑞典王位，这使想缔结永久性的俄罗斯—瑞典条约的希望化为泡影。波兰与立陶宛融合为单一国家的设想终于在卢布林会议上得以实现（1569年）。同时，土耳其人正在催促波兰结成反莫斯科的军事同盟。在大改组中，莫斯科获得的唯一盟友是丹麦，丹麦因西吉斯孟德干涉它在波罗的海上的海盗活动而感到恼怒。但即使是这样，在徒劳无益地对瑞典控制的雷瓦尔进行围攻中（1570—1571年），腓特烈二世也未能援助他的兄弟、沙皇新任命的立窝尼亚的附庸国王、俄罗斯军队西北地区总司令马格努斯。

在16世纪70年代初，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都不能或不愿发动一场大战。波兰—立陶宛国王需要和平以便实施卢布林会议确立的联合原则并考虑继承波兰王位的问题；沙皇正全力以赴地对付鞑靼人的入侵（1571年、1572年）并需要整顿王室。然而，伊凡四世并非对波兰事务不感兴趣。在西吉斯孟德死后王位空缺期间（1572—1573年、1574—1575年），伊凡四世两次提议自己为王位候选继承人，一次建议他任波兰国王，一次建议他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大公。不管他是否真的希望当选为国王或大公，他当选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西吉斯孟德的继承人、安茹公爵亨利逃走之后，伊凡四世的外交策略显然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大公爵恩斯特来阻止土耳其苏丹的附庸、特兰西瓦尼亚王公斯特凡·巴特里当选。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沙皇之间和平分割东欧这个建议总的看来似乎比一个由奥斯曼帝国政府支持的统一的波兰—立陶宛的强有力的国王要好。

随着斯特凡·巴特里当选而登上波兰王位（1575年年末），立窝尼亚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趁波兰国王正全神贯注于但泽起义之机，伊凡四世将全部军力投入到征服立窝尼亚的最后的战争努力之中。实际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俄罗斯人席卷全国（雷瓦尔和里加除外），迫使数量不大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退到德维纳河后面。这是伊凡四世最后一次成功的军事冒险行动。第二年，好运在高潮中发生逆转。马格努斯背弃沙皇，俄罗斯又无希望与英国或奥地利人结成联盟，所以，伊凡四世无力抵抗波兰和瑞典的联合猛攻，加上还有来自克里米亚的日益增长的入侵威胁。伊凡四世的西部要塞一个又一个地陷落——文登（1578年），波罗茨克（1579年）；1580年，斯特凡夺取战略中心大

卢基，以图楔入俄罗斯领土，从而切断伊凡四世驻立窝尼亚军队与俄罗斯的联系。只是由于缺乏经费，波兰议会又不热心，才迫使斯特凡放弃了更为宏伟的全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以试图夺取普斯科夫（1581年）把自己限制在只扩大立窝尼亚东部俄罗斯领土上的波兰走廊地带。在北方，到1581年底芬兰湾南部的几乎所有海岸地区都掌握在瑞典人手中。伊凡四世要再作进一步的抵抗是无法想象的。只是由于普斯科夫坚决拒绝投降才使沙皇在雅姆扎波尔斯基（*Yam Zapolsky*）和约（1582年1月）上免于接受更多的屈辱条件。这项和约是在罗马教皇的调解下缔结的。实际上，沙皇放弃了对立窝尼亚、波罗茨克地区和韦利日的所有要求。斯特凡作出的唯一让步是归还大卢基。第二年，整个爱沙尼亚，以及伊凡哥罗德的城镇和地区（*uyezdy*），雅姆、科波叶和科列拉都正式割让给瑞典。只有芬兰湾的极东端——奥雷萨克地区涅瓦河口两岸的一小块狭长地带留给莫斯科大公国。

伊凡四世于瑞典条约签订一年后去世。放荡的生活使他精疲力竭，对他儿子伊凡之死的悔恨心情使他备受折磨（两年前他在盛怒之下将儿子打死），1584年3月18日，他在下棋时突然死去。虽然通过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并使之殖民化，到伊凡四世统治末期已为俄罗斯在亚洲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丧失纳瓦（1581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白海——北德维纳航线（1553年为英国人侥幸发现）与英国和低地国家建立了每年定期的贸易而得到补偿，伊凡四世给他儿子弗多尔留下的却是一份残破的遗产。西北方的大冒险失败了。留给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甚至比战前还少。西部边界与瓦西里三世去世时几乎一模一样。在南方，入侵的威胁始终存在。但是，最令人沮丧的还是该国的内部状况。西部的长期战争，沙皇直辖军的掠夺和农村经济的剧烈变动使这个国家民穷财尽，国库空虚。中西部地区一片荒芜，百姓怨声载道。伊凡四世确实种下了内战的种子。英国大使费尔斯·弗莱彻在伊凡四世去世四年后写的文章中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这段统治的后果：

这项罪恶的政策和专制统治（虽然现已终止）给这个国家造成这么多灾难，自此以后全国怨声载道，仇恨难消（现在看来仍然如此），总有一天会再一次在国内燃烧成熊熊烈火。

（曾佑昌 译）

[1] 喀山的编年史家提出艾哈迈德撤退的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他提到，伊凡三世向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派出了一支突击队。

[2] 波雅尔——此处用于指莫斯科大公国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在16世纪通常有特殊的含义（指政府和军事等级制度中的一个专门的高级职位）。

[3] 波雅尔后裔——出生于贫穷的波雅尔家族的服役贵族成员；司书——16世纪在较重要职位上任职的原为文书或次要秘书的人，其中有些人甚至进入枢密院。

[4] 参看本书边码第545页。

[5] 重臣拉达（*the Izbrannaya Rada*），即特选委员会，是由库尔布斯基在他的《伊凡雷帝史》一书中给西尔韦斯特和阿达舍夫一伙人取的名字。

[6] oprichnina系俄语 о п р и ч н у н и н а 一词的拉丁化译名。按现行通用译法，它有三个基本词义：沙皇禁卫军；沙皇直辖区；削藩制。——译者

[7] zemshchina系俄语 з е м ш ч и н а 一词的拉丁化音译，意为“大贵族辖区”；（相对于沙皇直辖区的）“普通辖区”；“非直辖区”。——译者

[8] voevoda系俄语 в д е в о д а с к 一词的拉丁化译名，指（16—18世纪俄国城市或地区的）军政长官，亦指波兰的省长。——译者

[9] 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伊凡四世在致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1564年）把给予骑士团以重要的喘息时间归咎于重臣拉达。“（我记得），由于丹麦国王的狡诈建议，你给了立窝尼亚一整年时间作准备的情景。”

第十九章 1521—1580年的新世界

在科尔特斯一生作出的种种大胆决定中，没有比重建特诺奇蒂特兰，即墨西哥城，并使之成为新西班牙^[1]王国首都这一决定更为大胆或对未来影响更大的了。该地点有许多不利之处。该地是一个岛屿，沼泽地很多，因而很不利于健康；除了在湖中能捕到鱼之外，当地不产可供食用的东西；饮水须从数英里之外的查普特佩克山以昂贵的人工方式运来；该岛以堤道与陆地连接，而科尔特斯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都认为，这些堤道连同那些简易桥梁都会受陆地上的印第安人控制而不是受岛上的欧洲人控制。而且，岛上仍然居住着大批印第安人，潜藏在那些被科尔特斯拆除的建筑的废墟中。科尔特斯将这些建筑拆毁是为了将瓦砾倒入排水沟渠中以利于调动他的骑兵部队。总之，该地很可能成为陷阱，不能抵抗围攻，特别薄弱的环节是食品供应和供水。

尽管科尔特斯肯定知道该地经济上的缺陷，但他却力排众议。他认为这个地点对欧洲人如同对印第安人一样易守难攻。再者，他很可能希望避免使他的部下分散在仅仅部分征服的土地上。在那些地方，他们仍然可能成为新近被他们征服的人的牺牲品，或因他们自己的意见分歧而吃亏。最后，科尔特斯非常精明地意识到特诺奇蒂特兰的魅力，它的“名声和重要性”，他曾经表达过这一看法。基督教常常设法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自己与先前的文明融合在一起。通过再占有特诺奇蒂特兰，通过在其寺庙遗址上修建教堂和住宅，而不是将遗址留作阿兹特克人辉煌业绩的纪念馆，西班牙人不仅仅是毁坏该城被征服前的外貌，而且还把它作为宗教与政治中心而使自己融合于其传统之中。

在1522年和1523年整整两年中，重建工作继续进行。数目庞大的工匠和劳工被征调到该城。特斯科科人酋长伊斯特利尔斯奥奇特尔指挥这次征调行动。根据他的命令，墨西哥谷地的几乎全部劳动人口都被征调来参加修建工作。工伤事故和过度劳累使许多印第安人死亡，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在那些年代，天花肆虐。

传教士莫托林尼亚 (*Motolinia*) 将重建特诺奇蒂特兰列为使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备受折磨的十大瘟疫中的第七个，这是有道理的。西班牙指挥官以征服该地的同样狂热劲头指挥工程，整个工程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该项工程的规模使同时代的人感到吃惊。这座新城市在大小方面，在设计的豪华与规则性方面，堪与当时欧洲最大的都市相媲美。该岛16世纪20年代的人口肯定多达10万人以上，超过托莱多、塞维利亚或西班牙的欧洲本土任何其他城市。该城靠广大富饶的农村地区提供产品、控制从阿兹特克时代承袭下来的一个庞大义务劳工体系提供的服务来维持；这个劳工队伍的能力在初期看来几乎是无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混合城市，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在该城的各个聚居区毗邻生活。特诺奇蒂特兰的重建开始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成功地结合起来。自此之后，这一直是北美洲西班牙属地的特征。墨西哥城的建立为后来的许多征服者提供了竞相模仿的模式。

西班牙社会具有强烈的都市特征。在卡斯蒂利亚地区，设防自治市镇具有特权地位。正如历史上一直有时断时续战争的国家那样，这一点是很自然的。虽然贵族的收入来自农村的土地，更确切地说，来自所拥有的畜群，他们却把豪宅大厦建在城镇里。乡村生活是属于农民的，他们中许多人是摩里斯科人 (*moriscos*) ^[2]。在将基督教的西班牙从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的过程中，占领或重新建立设防城镇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预防措施。同样，征服墨西哥的卡斯蒂利亚人立足于自治市镇，却依靠周围的农村来养活自己，这也是很自然的。这些城镇在早期的主要作用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甚至于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很快丧失了，因为除了少数例外——新加利西亚的奇奇梅克人，智利的阿劳坎人——印第安人比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也要温顺得多。作为社会和行政中心，作为新统治阶级的据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的这些城镇在初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占领军的每一个长官首先关心的就是建立城镇，依法将它们组建为市并将其追随者安置到市政府中去做官。当然，大多数这样的城镇都不是像墨西哥城那样的城市，其中许多在初期仅是一些由草舍组成的临时营地而已。但它们与墨西哥城一样，都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依法组建为市，有权管辖周围的乡村，控制印第安人的劳动人口，依靠印第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在墨西哥城，就像后来在西印度地区的大多数其他城镇一样，占领军的军人们，或者说至少是其中较富有者，即自己出资参加战争者，成为维西诺（*vecinos*），即合法登记的住户。科尔特斯从他们中任命了第一届市政府，由12名市议员（*regidores*）（较小的城镇市议员的人数要少一些）组成市政厅（*cabildo*）。市议员们选出两名市长（*alcaldes*），与他们一起执政一年，到离职时，又选出他们的继承人，报经科尔特斯批准。这样，由维西诺圈内的人轮流执政。维西诺成员不是靠任何都市职业为生。因为尽管他们中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有，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军人，无论如何，他们到西印度来不是为了重操旧业。他们靠被授予的监护征赋区（*encomienda*）来供养。监护征赋制并不是一种新的制度，在西班牙，在从摩尔人手中夺取的领土内，在加那利群岛，以及西印度群岛，这种制度早就存在。但是，在墨西哥，它有了更精确的定义并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一个监护征赋区是当地的一个村，或是一个村的一部分，或是由许多村组成，“交托给”一个西班牙人——监护人（*encomendero*）管辖，其职责是保护居民，任命和供养村里的教会神职人员，负责该地区的军事防务。因此，占领军就作为半封建民兵定居下来，住在西班牙人建立的城镇里，但是靠乡村的供养为生。监护人有从他们管辖的村庄征收赋税来供养家庭。早期的赋税采用食物、棉织品和无偿的强迫劳动的形式提供。然而，赐予监护征赋区并不意味着转让土地所有权和司法权。监护征赋区并不是封建采邑，也不是靠奴隶劳动经营的庄园。至少在法律上印第安人是自由人，他们对自己占有的土地的权利也未受到损害。在墨西哥谷地，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印第安人原有的土地习惯法已规定要向统治民族交纳赋税、供养酋长和祭司、为庙宇和社区公用房屋提供钱物。西班牙监护人取代了阿兹特克统治者，取得了原来向后者交付的贡金和提供的劳役。作为起初的殖民办法，这种监护征赋制是符合逻辑的，而且显然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长久的制度却有严重的不利之处。监护人拥有强迫他人劳动的权利，这就为虐待和过度役使劳工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在西班牙人掀起建筑狂热时更易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法律条文上怎么说，印第安人对他们土地的控制权也有失去的危险。因为要是一个社区无法尽到交纳贡赋的义务，或若社区头人受贿赂，该社区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拍卖。

此外，由于监护征赋区供养的西班牙人的人数相对说来较少，至少在初期，所得的贡赋数额很大。科尔特斯自己在瓦哈卡谷地圈占了

一个很大的监护征赋区。按官方统计有23000个纳贡家庭，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但由2000和2000个以上的纳贡家庭组成的监护征赋区是很常见的。未得到监护征赋区的下级士兵有两种可能的选择：由于殖民地社会的状况起初完全不适于小规模农业或欧洲的贸易方式，因此，下级士兵要么继续当大监护人的随从（*paniaguado*），靠其慷慨施予为生；要么迁往新征服地，希望最终能获得属于他自己的印第安人。这种环境中的社会必然不安宁，各自为政、秩序混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任何政治制度的持久性，还取决于王室的确认。科尔特斯成功地获得对他初步安排的政体框架的确认，并精明地将阿纳瓦克地区的大部分村庄留给王室。但查理五世和他的谋士们自然怀疑监护征赋制及其封建蕴涵。因此，王室重新考虑之后，可能要修改这一制度。最后，以托钵僧修会传教士为代表的教会不可能长久满足于法律要求监护人执行的有关宗教教育的那些敷衍条文；尽管大部分监护人是教会的忠实信徒，但他们也不可能欢迎教会干预他们与纳贡者之间的事务。

对新西班牙的征服不仅是一场军事战役，而且是一场精神战役。反对军人统治的当地主要势力来自教会的斗士们——托钵僧修会的传教士。方济各会修士是根据科尔特斯本人向皇帝提出的要求第一批到达墨西哥的传教士。1524年派出的第一批方济各会修士——由弗赖·马丁·德·巴伦西亚领导的著名的十二门徒——以及他们的许多后继者，都是严格遵守教规的信徒，为执行传教使命受过严格的训练。由弗赖·多明戈·德·贝坦索斯领导下的第一批多明我会修士于1525年到达墨西哥，他们也同样严格遵守教规的信徒。他们是在西班牙教会改革中产生的精英，既代表激进的西斯内罗斯教派的观点，又代表了伊拉斯谟派的人文主义与渊博学识。弗赖·胡安·德·苏马拉加于1527年由查理五世任命为墨西哥的第一任主教，他是伊拉斯谟的著名拥护者。在他指导下在墨西哥印刷的教义书籍《简明教义》，以及给印第安人用作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的《基督教教义》，两本书都体现了伊拉斯谟思想的深刻影响；两者都强调宗教信仰重于善功，提倡无限制传播圣经教义。那些对墨西哥进行精神征服的人们因而是些大胆的宗教激进派；但他们又是一支精神军队的成员，其领导者与皇帝关系密切。在墨西哥殖民的最初几十年中，他们几乎不受约束；他们以皇帝的指示为名，篡夺了通常授予在俗神职人员的牧养和主持圣礼的

职权。他们在精神征服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使其能有效快速地达到其目的。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却对新西班牙的殖民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

传教士们所要求达到的皈依基督教不仅仅是表面形式的信奉，在施洗礼之前，须通过讲道，教理问答以及建立学校等方式精心进行宗教信仰训导。印第安人首领的孩子可以进学校接受基督教教义和欧洲生活方式的教育。当地的修士人数很少，要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教学、教理问答和施洗礼，只有通过将印第安人集中在靠近传教士传教的教会和修会中心附近的都市社会才能办到。修士们在已有都市居民的地方定居，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印第安人居住的新西班牙，人口集中的地区很少。像特诺奇蒂特兰、特佩阿卡或乔卢拉这样的首府城市以外的地区，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分散居住在稀稀拉拉散布于玉米地和豆类田地间的小村庄里。因此，传教士的许多精力都花在说服或强迫印第安人搬进教堂和修会周围为印第安人居住而新建的城镇中。他们认为，通过这些办法，新近皈依基督教的人不仅能在都市生活和传教教学方面得到精神上的益处，而且还能因与世俗的西班牙人隔离而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方面受益。在新西班牙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不是为欧洲人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而是为了保护印第安人不至于因与欧洲人接触过于密切而可能招致剥削和道德败坏，并使他们继续处于教会的监督之下。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修士们成功地确立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支配地位，这只能从印第安人的心理特点来加以解释。印第安人习惯于按照一系列复杂的宗教仪式来生活。这些礼仪支配着他们的所有集体活动，包括最重要的农事活动。礼仪与劳动是紧密相关、不可分离的。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后，庙宇被毁坏，异教舞蹈遭禁止，宗教信仰被迫改变，旧的宗教组织被削弱，有的地方甚至遭破坏。各种劳动——无论是为监护人所作的强迫劳动，还是有报酬的劳动，或为生存所从事的农业劳动——都已不再是社会宗教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需要。印第安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真空可以通过教会的宗教仪式和修建教堂的活动来填补，尽管这只是部分地、并且常常是表面上得到填补。修士们理解这种需要。在新西班牙的各个地方用印第安人的劳动修建的为数众多、规模巨大的教堂，尽管出于防卫上的考虑修得厚实坚固，同时也修得宏伟壮观，以适合取代异教神庙已丧失的恢宏显赫的需要。同样，远比欧洲常见的基督教礼仪更为复杂的壮观场面也是为了满足印第安人对他们已大部分丧失的昔日礼仪生活的渴求。另一方面，修会的这项对策必

然要妨碍对印第安劳工的控制，而西班牙人的经济活动需要依靠印第安人的劳力。这不但需要保护，而且需要扩大印第安人的公有制农业，以便供养传教城镇。此外，为了修建教堂、隐修院和新住宅，出于对印第安劳工的需求，传教团为获得印第安劳工直接与监护人和其他世俗西班牙人的需求相竞争。他们不受主教管辖是教区内无纪律现象的根源。以隐修院的修士们为一方，以监护人和在俗神职人员为另一方，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争夺殖民地权力的复杂斗争。然而，这场斗争没有马上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征服行动并没有停滞不前。当神职人员们开始进行精神征服的时候，科尔特斯的军官、竞争者和仿效者们就已从墨西哥出发，去寻找要征服的新帝国了。

科尔特斯本人从未忘记，发现和征服新西班牙源于要找到一条通往太平洋进而到达远东的路线。由于墨西哥已被征服，周围谷地的安全也已稳固，科尔特斯很快又重新开始探索，想要找到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条海峡，或者是能够成为太平洋探险基地的港湾。在他接着进行的远征中，只有远征帕努科——第一次由他本人指挥，第二次由桑多瓦尔指挥——其目标完全在大西洋沿岸。进行这些远征主要是为了反击牙买加总督加拉伊在帕努科地区进行的劫掠奴隶的活动。由科尔特斯组织的其余远征，其目的全都是为了开辟向西和向南探索的道路。1522年与1524年之间，米却肯和远至圣地亚哥河的大部分太平洋海岸地区被征服并以监护征赋区的形式授予西班牙人。1523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穿过特方特佩克进入危地马拉的马雅城市地区，并派遣克里斯托瓦尔·德·奥利德由海路去洪都拉斯湾，以便占领那里的有人居住的地区并寻找一条海峡。这两次远征不仅遇到自然障碍和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而且还遭到意外的反抗，那就是来自从达里安向北探险的佩德罗·德·阿里亚斯手下的人的反抗。征服美洲大陆的两大批人在沿现为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南部边界的地区相遇，一场危险的武装冲突看来一触即发。使局势更加复杂化的是，奥利德拒不服从科尔特斯的权威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指挥部。科尔特斯认为，必须亲自处理叛变和可能发生的内战。这是他一生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的军队越过尤卡坦半岛的基地向洪都拉斯进发，穿过的地区，要么是险峻的山脉，要么是浓密的雨林，极难通过。要跨越的一条河流及河边的沼泽地区，必须砍伐一千多棵树搭建一座浮桥才能通过。经过这次行军，马匹所剩无几。幸存的人员从森林中出来时身体都已拖垮，有一段时间，甚至精神上

也萎靡不振。不过，只要有科尔特斯就足以在洪都拉斯的西班牙人中恢复秩序。在他到来之前奥利德就已被杀身亡，还与来自达里安的人进行了外交协商，使洪都拉斯暂时附属于墨西哥。在此期间，阿尔瓦拉多表现出既大胆又忠诚，既冷酷又能干。他在危地马拉战役中取胜，四处劫掠，残酷无情。马雅人强健而聪明，具有发达的建城文化，但他们政治上不统一。阿尔瓦拉多利用两个主要的马雅民族卡克奇克尔人和基切人之间的仇恨从中渔利，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最终将他们征服。1524年，在接连三个选址中的第一个上建起西班牙城市危地马拉。以通常的方式将监护征赋区分配给该城的维西诺。一听到奥利德叛变的消息，阿尔瓦拉多匆忙北上，以图与科尔特斯会师，但他的支援结果是多余的。开拓危地马拉殖民地中断的时间很短暂。阿尔瓦拉多成功地将士兵们团结在一起，免受来自达里安的敌手的袭击。他于1527年到西班牙，回到美洲时已获圣地亚哥骑士头衔，他的危地马拉政府也得到确认。

科尔特斯于1526年由海路回到墨西哥。他离开墨西哥的两年期间，当地的世仇与嫉妒困扰着墨西哥城乡。一个又一个心怀恶意的告密者接连到西班牙去毁坏他的名声。他不久将被人取代，但在此期间，他又一如既往，精力充沛地重新开始整顿新西班牙的秩序，考察其沿海省份，力求找到通往东方的一条海路。自从占领墨西哥之后，整个太平洋探险计划已经改变。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已在为西班牙效力。他于1519年离开塞维利亚，向西航行去寻找香料群岛。同年，科尔特斯已离开古巴去征服墨西哥。尽管查理五世很可能不知道，但麦哲伦知道，葡萄牙人已在摩鹿加群岛进行贸易活动，并且为了到达那里历尽风险。麦哲伦这次航海经历众人皆知：在巴塔戈尼亚海岸外船舶失事，下属叛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条海峡水道的发现和令人惊心动魄的38天的经历；横越看来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船上的人不得不以老鼠和皮革为食；在拉德罗内斯和菲律宾上岸，岛上的人持不友好态度，麦哲伦及手下的40个人在同当地人的一场冲突中死去。指挥权交给西班牙航海家塞瓦斯蒂安·德尔·卡诺，他带领仅剩的两艘船从菲律宾出发向南航行，绕过婆罗洲海岸于1521年到达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登上蒂多雷苏丹的国土，受到苏丹的盛情接待。他们用商品换来大量丁香，并在蒂多雷建起一个货栈，留下一支小部队守卫，以为将来的远征作准备。由于同伙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次面临麦哲伦海峡的危险，所以德尔·卡诺把他的队伍分开。“特里尼达”

号起航横跨太平洋，向墨西哥海岸驶去，这艘船出发没多久就被葡萄牙人俘获。德尔·卡诺本人避开葡萄牙人，驾驶他那艘受重创的“维多利亚”号穿过望加锡海峡，横跨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带着宝贵的船货回到西班牙。这艘船已离开3年之久，这是航海史上的惊人业绩。德尔·卡诺与麦哲伦同享这次惊人航行的荣誉。他是第一位作环球航行的船长。

德尔·卡诺成功返回西班牙产生了两个类似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在摩鹿加群岛处于多少有点公开的战争状态。第二个后果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欧洲举行了一系列表面上友好的谈判。谈判期间，查理五世从西班牙派出第二支舰队，在洛艾萨率领下前往摩鹿加群岛。接着，查理五世传令给墨西哥的科尔特斯，要他派船跨过太平洋去增援洛艾萨。洛艾萨的远征遭到惨败。一支强大的舰队只剩一只船到达目的地，发现设在蒂多雷的货栈被葡萄牙人捣毁。科尔特斯非常乐意建立从摩鹿加通过墨西哥到西班牙的丝绸和香料贸易。他在太平洋沿岸装备了3艘船，1527年派遣它们随洛艾萨之后出发，由他的亲属阿尔瓦罗·德·萨维德拉指挥。但萨维德拉的遭遇并不比洛艾萨好。他的船只仅有一艘到达摩鹿加群岛，而且没有一艘返回。很清楚，无论在欧洲发生什么情况，葡萄牙人都控制着东方的局势，而西班牙人索要的价钱也在降低。当时查理五世皇帝正与法国交战，几乎无力偿债。于是在1527年，他想出了这样一个巧妙的主意：趁进一步降价之前，把他对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出售或者典当出去。1529年，尽管西班牙议会反对，萨拉戈萨条约还是正式签署了。根据这项条约，查理五世保证他在摩鹿加群岛的全部权利都归葡萄牙，以换取35万杜卡特现金，并任意确定该群岛以东15度为分界线。在其后40年中，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专心致志于美洲事务而未干预东方。直到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人才重新开始认真进行太平洋探险并实际立足于菲律宾。科尔特斯后来进行的几次太平洋探险是进行海岸勘察，其主要结果是发现了下加利福尼亚。

在签订萨拉戈萨条约那一年，科尔特斯到西班牙，亲自在朝廷上为他在墨西哥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并强烈要求得到王室的感谢。为了自身的利益他本来应该像阿尔瓦拉多那样早一点去西班牙。直到他的权威受到挑战，他的名声受到攻击，于忍无可忍时，他才放下探险、征服和开拓殖民地的紧急任务，这是他的性格。1527年，王国政

府建立了新西班牙上诉法院。该法院的检审法院院长努里奥·德·古斯曼是一位职业律师，又是一位生性特别残酷的征服者。科尔特斯离开新西班牙在洪都拉斯逗留期间，努里奥曾当过帕努科总督，靠向西印度群岛贩运印第安奴隶积聚了大笔财富，不过当时王室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是科尔特斯的私敌，又是古巴总督贝拉斯托斯的忠实追随者。自1519年起，贝拉斯托斯就竭尽全力反对科尔特斯这位征服者。努里奥及其共事的法官们被授权开始调查西班牙法院接到的对科尔特斯的多次指控的真相。这项调查拖延多年，有许多轻微的反诉，这是促使科尔特斯去西班牙的主要原因。因此，1529年，新西班牙的事务便留给努里奥负责。“老征服者们”都讨厌他，而且，他还深深卷入与托钵僧修会，特别是与势力强大而又毫不妥协的苏马拉加的纠纷中。苏马拉加之所以反对检审法院的统治，不是因为他支持科尔特斯，而是因为他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积极捍卫者。许多印第安人都成为努里奥及其同伙在他们获得的大片监护征赋区中猎取奴隶活动的受害者。他们的这些监护征赋区是从科尔特斯的拥护者那里没收得来的。苏马拉加向王室据理报告，努里奥对待印第安人的做法可能激起武装起义。他在墨西哥掀起一场激烈的反对努里奥的运动，最终在该城发布了一项全面禁令。努里奥截获了苏马拉加的大部分信件，但其中的一些控告信送达西班牙。1529年末，作出了将该省检审法院法官和财政官员全体免职的决定。努里奥在得知他失势的消息之前已于1529年带着一大批追随者离开墨西哥去开辟通往新西班牙西北部的新的通道（*entrada*）。他征服了那块后来被称为新加利西亚的地区，但造成很大的破坏。不过，他掌握新的指挥权的时间不长。他于1536年被捕并送回西班牙。4年后他死于狱中。

在作出撤换努里奥的决定之时，科尔特斯正在西班牙。他带上合适的礼品和一个印第安人杂技团到宫廷，受到皇帝的热情接待。他被授予瓦哈卡谷地侯爵的头衔，他在那儿的一大片监护征赋区也得到确认。除了这些奖赏之外，皇帝的谋士们还得确定对他能信任到何种程度，在新西班牙出现的危险局势中怎样利用他的才能。他们作出的决定很独特。科尔特斯回到墨西哥去当军区司令，指挥出现骚乱时可用的防暴部队，但没任命他为总督。文治又再一次交给一个检审法院去实施。这一次挑选法官时格外仔细，他们的能力和正直是毫无问题的，他们的个性和政策也会令传教团满意。该检审法院院长是圣多明各的主教塞瓦斯蒂安·拉米雷斯·德·富恩莱亚尔，而圣徒似的人道

主义者瓦斯科·德·基罗加又是他的同僚之一。这个由很有能力的律师和传教士组成的检审法院管理新西班牙达5年之久，尽管没取得多大政绩，却尽力执行王室的各项命令，对由征服者们建立的不完善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造，他们尽其所能对付科尔特斯周围形成的一些钩心斗角的派别。最后，王室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能由一位有实力的人物以高压手段来管理托钵僧修会的修士、印第安人和征服者们。于是，任命了一位拥有广泛权力的皇家总督。但这一次又没考虑任命科尔特斯。第一位皇家总督是一位军人兼外交官、名门贵族的后裔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他于1535年接管新西班牙政府。

关于科尔特斯，几乎没有更多可说的了。他提议率领部队去攻打新加利西亚的努里奥·德·古斯曼，但遭到拒绝。经王室同意，新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削减他的特权和财产，以尽可能狭义的方式来解释皇帝已授予他的各种奖赏。连他的监护征赋区内的印第安人也加以清点，以使其数量不超过已同意的23000人。他的太平洋远征计划因遭到反对而受挫。特别是由于门多萨到来之后，门多萨本人希望组织到墨西哥沙漠以北去进行半传奇式的“锡沃拉”探险。于是，一位伟大指挥官的精力就被限制到商业活动上，去管理他在瓦哈卡的甘蔗园和畜牧场，以及他在墨西哥城的房地产。1539年，科尔特斯终于对新大陆感到厌倦，他回到西班牙，在那里靠侯爵封地（*marquesado*）的收入过着舒适但乏味的生活。他作为一位征服半原始部落的远征军指挥官的名声在欧洲几乎一文不值。王室既不要他效力也不想征求他的意见，即使在那些他的效力和意见可能有用的地方，比如北非，也是如此。1547年，他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卡斯蒂列哈·德·拉·奎斯塔的家中去世。

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王室在新西班牙的政策不是单独针对科尔特斯的，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整个西班牙征服者阶层。其用意既是反封邑制度又是为了同情印第安人。长久以来，查理五世皇帝的谋士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反封邑制度就等于同情印第安人，或者至少是互为补充的。监护征赋制是问题之关键所在。托钵僧修会的修士们和当时的官吏们的看法也是如此。正面攻击这一制度既困难又危险，然而，最终废除这一制度是王室谋士中的激进派的目标。同时，王室决心抵制监护人将他们的监护区变为世袭或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封邑司法权的企图，力图削弱他们的特权并减少他们的人数。1530年，第二

届检审法院就已秘密指示开始由王室收回较大的监护征赋区以减少其数量。这项政策旨在防止具有潜在危险的殖民地封邑阶级的势力扩大，使印第安人摆脱繁重的劳役并加强王室的直接权威。

到1530年，王室的这项政策不仅已有主要的构想，而且实施细则也已确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用王室任命的领俸官员来代替那些在早期征服过程中自封的首领和总督。王室任命的官员有些是军人，有些是传教士，但绝大多数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律师。1511年建立起来处理西印度地区事务的卡斯蒂利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于1524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合法机构正式成为西印度事务院。该院以当时西班牙政府机构所特有的方式，兼有处理重要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的职能和咨询委员会及殖民地事务指导部的职能。虽然从法律上来说国王保留有立法权，但常常须由该院来行使这一权力，最多不过是走走过场，由王室点头而已。由于没有君主的亲自干预，该帝国由一个合法的政府机构来管理。

在西印度地区，如同在西班牙一样，职业律师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在圣多明各和墨西哥已建立了检审法院。到16世纪末，新大陆的检审法院的数目已达到10个。^[3]他们原来是上诉法院，后来也起内阁顾问委员会的作用，分别给各省的文职或军人总督当顾问。他们可以审理反对总督决定和行动的案件，可以单独向西印度事务院汇报。他们专门负责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沟通宗主国王室政府与具有外国文化的臣属民族之间的关系，抵制贪婪而混乱的殖民地社会的离心倾向。由于殖民地没有法学院，这些检审法院法官（*the oidores*）必然是从西班牙本土来的人充任，他们在教育、性情和兴趣方面都与西班牙征服者不一样。他们中那些真正执行王室命令的人常常与征服者们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那些接受了殖民地欧洲人的影响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又与他们争夺不义之财。

从初期起不仅高等法院，而且各省的财政部门也配备由王室任命的官员取代原来由征服者们任命的官员。王室在美洲的大庄园与殖民地的一般行政与司法系统严格分开。每个省的省会都有自己的财政局，保险柜，整套财务班子——司库、主管会计、罚没财产管理人。这些财政官员负责对贵重金属征收像五一税（*quinto*）这样的直接税；征收并出售从王室拥有的印第安社区所得的实物贡税；负责由王室事先批准的像官员薪俸这样的支付款；负责向西班牙定期汇寄盈余

金。财政官员直接对西印度事务院的会计署负责。未经王室事先批准，殖民地财政部门的任何开支都是不合法的。这样，没有任何殖民地总督能用公款建立私人王国。

王室不仅任命了法院和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而且早就开始削弱“老征服者们”在他们自己的据点、西印度地区自治市镇中的权力。1520—1521年发生在西班牙的科穆内罗斯叛乱给年轻的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于地方自治的市政当局的特权和意图、对于经常控制自治市镇的地方实权人物（*magnates*）怀有格外戒备之心。因此，新西班牙的这些自治市镇除了能从王室那里获得赐予的称号和绘有纹章的图案之外，别的就几乎一无所得。他们征收地方税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未经王室特别许可，他们的议会代表禁止聚会，而且严厉制止任何联合行动的倾向。不允许殖民地议会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在早期，王室就控制了大市政厅的内部成员构成。起初，在墨西哥，每年一次的市政议会议员选举他们的继任人，每年都报经总督批准，而在1525年，王室开始任命终身的市政议会议员。到1528年，整个机构都由这些终身的市政议会议员组成，除了两个市长职位的选举之外，其他选举都取消了。诚然，王室接受管辖者（*regimientos*）中许多人都是“老征服者”、监护人或当地的某些知名人士；但其他人都是带着任命书直接从西班牙来的，他们全都是沾国王或某个高官的光才得以身居要职。1529年，王室第一次任命了墨西哥市书记员（*clerk*），后来该市的大部分主要部门都一个一个地成了王室的囊中之物。从国王的角度来看，这种任命权是极为有用的，不需要花国库一分钱。它有效地阻止了自治市的独立倾向，却又保全了自治市的面子。

通过任命第一任总督，精心设计的王室任命殖民地官员的体制终于大功告成。总督的薪俸相当优厚，使其不屑于去搞小小的贪污受贿，但他本人任职与否须看王室是否满意。总督的权力很大，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广泛的地方官员任命权，几乎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部队，也无权花王室金库的钱。因此，他不可能搞独立从而给王室带来危险。此外，他受到检审法院法官的监视，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接受检查。像所有其他官员一样，在任职期满时必须接受考核（*residencia*），即对其任职期内的行为作法律调查。查理五世第一次挑选新西班牙总督时运气特别好。在门多萨的严格控制下，以当时

西班牙特有的行政管理方式，使人人受监督。西班牙征服者们的独立倾向看来处于牢固控制之下。教会修士们继续敦促政府修改有关土著的政策。很清楚，政府愿意采纳他们的这些意见。

然而，王室在新西班牙进行这些广泛干预的同时，其他的西班牙征服者已在遥远的南美洲忙碌着。门多萨到达墨西哥时，另一个同样庞大的帝国被西班牙人武力征服。在大为不利的环境条件下，传教士们和政府官员们又再一次发挥作用。自从占领达里安以来，那里的西班牙人中就盛传着在南方有一些文明而繁荣的王国，但长期未能探明其真实情况。古秘鲁主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位于高高的恩迪内（Andine）高原上，由高大挺拔的东、西科迪勒拉山脉护卫着。这里的海拔高度从9000英尺到13000英尺不等。盖丘亚人的印加王朝建立的军事统治已历时约400年。在西班牙人到达时，其版图从北到南绵延几乎2000英里，以库科斯为其首都。印加帝国在土地公有和广泛实行强迫劳动的基础上，靠严格的纪律将全国统一起来。这些纪律受一套复杂而庄严的对统治者的崇拜仪式制约，并由军事组织加以实施，该军事组织在各战略要点设置堡垒，储备军需品，在全国修筑了山区道路网和藤索桥。印加人的政治体制比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要严密得多，考虑到该地区极其困难的地形，其交通也算较好。但秘鲁人总的说来生性不那么好战，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已停止用人作祭品。他们的物质文化大部分尚处于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善于制作软金属制品，比墨西哥人更多地使用铜，大量利用金银制作装饰品，甚至能制作金银器皿。他们善于织造精美的纺织品，使用的不是棉花而是美洲驼毛和小羊驼毛。他们没有文字，使用一套结绳记事的方法，记载像交纳贡品之类的账目。他们的农业基础不是像玉米那样的粮食作物，而是块根食物，主要是各种土豆。他们的城市是用加工过的石头而不是用土砖建成，修建得坚固而精巧。像墨西哥人一样，他们不懂得使用车轮。但不同的是，他们有驮畜，美洲驼躯体不大，驮力也较小。

在西班牙人入侵前一个世纪左右，印加人已将他们的版图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厄瓜多尔，向南远达智利的马乌莱河，并扩展到秘鲁沿海平原上具有高度发达而独特的奇穆文化的地区。这些新近获得的地区是造成印加帝国没落的根源。达里安的西班牙人正是从北部沿海地区听到关于印加人的财富的传说的。由于那里的居民怨恨印加人的统治，所以，他们对欧洲入侵者，如果说不是热情欢迎，也是抱默然态

度。在达里安，由出生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两个富有的军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迭戈·达·阿尔马格罗以及一位名叫卢克（Luque）的牧师组成的联合组织开创了秘鲁的冒险事业。三人都在达里安当监护人，兼营农场和采矿。虽然卢克没有积极参与征服秘鲁，但是看来他曾提供了大部分创业资金。这几个合伙人花了4年时间进行沿海岸航行考察。在此期间，他们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促使他们同印加帝国洽谈要求签订一项正式条约。皮萨罗去西班牙时恰逢科尔特斯得胜回朝——这是一个吉兆。皮萨罗获得他将要征服的那个王国的督护（*adelantado*）和总督职位。他与4个同父异母兄弟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回到巴拿马。皮萨罗把阿尔马格罗留在巴拿马等待增援部队然后随同前往，他终于在1530年带着大约180人和27匹马出发去征服秘鲁。

皮萨罗到达秘鲁北部海岸的通贝斯时，恰逢争夺印加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处于决战阶段。瓦斯卡尔被他那篡位的异母兄弟阿塔瓦尔帕击败而遭废黜。阿塔瓦尔帕没有定都于库斯科，而是选择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作为首府。得知这场战争的消息使皮萨罗感到鼓舞。他在通贝斯地区立住脚并建立圣米格尔城之后便向内陆进军，直抵卡哈马卡。在这里，以正式会谈为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西班牙人杀死了阿塔瓦尔帕的大部分贴身随从并俘获这位统治者本人。靠突然袭击，靠有利的政治形势，靠那令征服者们自己也感到害怕的惊人勇敢，皮萨罗及手下的人在一个下午就决定了印加帝国的命运。阿尔马格罗带着200人在不久之后赶到。印加帝国的部队由于群龙无首，不能有效抵抗大约600人的征服者向库斯科进军。库斯科于1533年陷落并被洗劫一空。从库斯科劫掠来的黄金，连同阿塔瓦尔帕徒然希望赎回自由而收集的满屋子黄金器皿一起被熔化，除开属于王室的五分之一，其余的被瓜分了。这足以使这支军队中的每个人富足终生，不过能活到享受这笔财富的人并不多。

尽管困难重重，高山行军及其后进行的战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库斯科仅是皮萨罗所遇到的极其艰难困苦情况的开头而不是结尾。到此时，战役大致沿着科尔特斯在墨西哥作战的相同思路进行，但在占领库斯科之后，事态发展的进程就不相同了。与科尔特斯不一样，皮萨罗没有把权力中心建在该王国的古老首都，而在1535年建立了全新的西班牙人的首都——利马，即众王之城，位于近海的里马克谷地。从军事角度看，这一选择是合乎常理的，因为库斯科远离海港，

而在秘鲁的西班牙人需要依赖港口从外部世界得到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库科斯的多山环境使得西班牙人的主要兵种骑兵部队难于（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发挥作用。但皮萨罗的这一决定造成了西班牙人生活的沿海地区与印第安人生活的山区之间的明显分界线，从而丧失了一种使秘鲁人臣服于新的效忠对象的手段。墨西哥历史初期的特点是，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习俗迅速发生相互影响，而秘鲁从来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皮萨罗与科尔特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皮萨罗的不足之处是，他不是传统社会意义上那种有身份的人。在西班牙，他是出身卑微的农民的私生子。在西印度群岛，他是勇士中的勇士，靠着勃勃野心、无限的勇气，以及作战的技巧，夺得了领导权。他是文盲，因此需要依靠秘书。他很精明，却缺乏科尔特斯的魅力和外交策略，缺乏对人类环境的敏锐理解力和使已战败的敌人归附自己的天才。合法而不公正地处死阿塔瓦尔帕是一大错误，遭到许多西班牙人的谴责。此外，皮萨罗自己的阵营中有心怀嫉妒的对手，不久在征服者中产生了严重纠纷。从圣米格尔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该地总督贝拉尔卡萨尔应基多地区一些居民的邀请，已向北进军，以使他们摆脱印加总督的统治并将其据为己有。永不知足而好战的阿尔瓦拉多也在觊觎基多，他出人意料的到来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先是阿尔马格罗，接着是皮萨罗，匆忙赶往北方去防止内战。阿尔马格罗和贝拉尔卡萨尔（他们是老朋友）团结一致对付阿尔瓦拉多。在与皮萨罗会谈之后，阿尔瓦拉多同意回到他自己的管辖区。贝拉尔卡萨尔保住了他征服的基多。

与此同时，征服者皮萨罗的异母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带着消息和礼物前往西班牙，此时已带回公文，授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侯爵头衔，而授予阿尔马格罗的头衔是督护，其管辖区在皮萨罗的管区以南一个很不明确的地区。阿尔马格罗马上声称库科斯属于他的封地的一部分。皮萨罗拒绝放弃这座城市。经过保全面子的和解之后，阿尔马格罗起程去进行远征，探索和征服他的南方王国。他离开了两年。在此期间，他的军队横越现为玻利维亚的荒凉高原，远远地深入到智利，经由沿海的阿塔卡马沙漠返回。阿尔马格罗一伙人经历了饥渴寒冷的种种艰难困苦。他们损失了大部分马匹和自己的许多人员，却没有发现更多的城市，也没有劫掠到名副其实值钱的东西。他们于1537年4月回到库科斯，变本加厉地嫉妒皮萨罗的好运。

阿尔马格罗离开期间，皮萨罗不得不对付由曼科·印加领导的危险而广泛的印第安人起义。曼科·印加是瓦斯卡尔的继任者，皮萨罗曾想立他为傀儡统治者，但未成功。曼科未给利马造成任何影响，却紧紧围困库科斯并切断了这个城市与从沿海派来的增援部队的联系。印第安人的军队的人数太多，以可供使用的原始交通工具无法长久坚守阵地。6个月之后，曼科的军队人数开始减少。但皮萨罗还未来得及利用这一弱点，阿尔马格罗就带着军队从智利到达，从背后袭击曼科并将他打败。他带军进入库科斯，夺取了市政府和该地区。这是秘鲁的西班牙人的第一次内战——拉斯·萨林纳斯之战的根源。像秘鲁其后发生的多次骚乱一样，这次战争不仅是西班牙人两个派别之间的争斗，而且还是沿海地区与山区、利马市与库科斯市之间的争斗。利马获胜。在经过多次变化无常的形势之后，阿尔马格罗于1538年被击败，成了埃尔南多·皮萨罗的俘虏，并被处以绞刑。他曾是一个慷慨而得人心的领导者，他的死给皮萨罗树立了众多的敌人。3年之后，厄运轮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头上。1541年，他在利马被一伙“智利人”杀害。两个死去的头领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又突然爆发第二次内战——丘帕斯之战。

曼科·印加遭到失败之后，作为流亡统治者又活了10年。他很可能思索过降临在征服他的人民身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小股的武装抢劫者在大山之中互相追逐，战斗到死，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帝国正期待着一位组织能手。在拉斯萨林纳斯战争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受西班牙人影响的地区大大扩张了。贝拉尔卡萨尔将其领地从基多通过由原始部落居住的森林地区向北扩大到波帕扬，再向外进入与世隔绝但居住有筑城部落奇布查人的地区。这里，他的先遣队遇到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的先遣队。克萨达从加勒比地区向南沿马格达莱纳河抵达人口稠密、物产富饶的波哥大草原。这时，由于双方大致势均力敌，两位领导者商定了领土划分。圣菲·德·波哥大最终成为新格拉纳达西班牙王国的首都。贝拉尔卡萨尔在征服过程中又使用了一种新方法，他随军赶着一大群猪，在行军途中是食物来源，又是该国极有价值的新东西。他当了波帕扬总督。在阿尔马格罗勘察智利之后，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接着深入南方。他于1541年建立圣地亚哥城。瓦尔迪维亚的征服活动在两个方面不同寻常。由于皮萨罗之死，他发觉自己没有了主人，经圣地亚哥的维西诺推举，成为西印度地区少数几个当选总督之一，这与在维拉·克鲁斯选举科尔特斯的情

况大致相同。虽然没有找到黄金和定居的印第安人的文明，他却在世界最美丽富饶的山谷地带建成一个规模不大但完全以西班牙农业为基础的社区。

所有这些指挥官至少在形式上都曾是皮萨罗的副官。皮萨罗之死在秘鲁留下一个只能由王室填补的真空。所以，丘帕斯之战与早先的争斗不同之处在于：从西班牙派来的皇家总督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持有委任书的巴拿马新的检审法院院长瓦卡·德·卡斯特罗被派到秘鲁去调查那里的动乱情况。他被授权如果皮萨罗死去就继承这位侯爵的职位。因此，他掌握了皮萨罗这一派的指挥权，从而将它转变为一支皇家军队，用以镇压武装叛乱。阿尔马格罗一伙被击败，其中的许多领导者被处决。而更加困难的是，具有律师技能和耐性的卡斯特罗说服贡萨洛·皮萨罗放弃了以武力强行继承他兄弟权力的要求。

卡斯特罗参与丘帕斯之战是王室进行更加严厉干预的一个简短的前奏。王室的干预必然深刻影响到新西班牙和秘鲁的历史进程。十多年来，王室一直鼓励新西班牙的王室官员限制监护人的特权，但未采取有效行动。不仅是监护人的地位十分牢固，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势力，而且王室官员也很快把监护征赋制看作是西印度地区殖民化过程中西班牙人手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由像拉斯卡萨斯那样的传教士敦促朝廷通过的反封地制和人道主义的立法在殖民地遭到反对，至少直到那个世纪中叶，遭到奉命实施这项立法的官员们的反对。因为在殖民政府中任职的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的官员都知道，没有监护征赋制就不会有殖民化。即使是传教士们看法也不尽一致。殖民地的许多托钵僧修会的修士们，比如，多明我会的修士弗赖·多明戈·德·贝坦索斯反对没收西班牙征服者的监护征赋区。到16世纪中期，托钵僧修会的神职人员的豁免权受到主教的抨击，所以，他们被迫与监护人结成不稳定的联盟。拉斯卡萨斯及其他与他思想一致的人仍然对朝廷不断施加压力，而秘鲁发生的事件支持了他们的论点。在秘鲁如同在新西班牙一样，授予西班牙征服者监护征赋区，但几乎没有闲暇安闲地进行组织工作。不断打仗造成印第安人生命财产的损失远比在新西班牙大得多。传教士们的缓解作用也要小得多。到秘鲁被征服时，西班牙教会中的伊拉斯谟激进派已没有什么活力了。秘鲁没有一伙经过挑选堪与十二门徒相比的宗教狂热者，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和学习欧洲人的手工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没有在新西班牙那样大。另一方

面，殖民封地内的无纪律现象更加危险，王室更有充足的理由抨击他们的特权。

1542年，部分由于拉斯卡萨斯坚持的结果，王室对整个监护征赋制度实行全面打击。“西印度新法”是对整个殖民地全面管理的一部综合性法典，但最重要、最具创新意义的部分是有关监护征赋区的条款。所有监护征赋区在其现有的监护人死去时应收归王室。任何官员，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不允许由监护人担任。参加过秘鲁内乱的人其监护区应立即没收。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这最后一条将使秘鲁的每一个监护人立即丧失其管辖的印第安人。在新西班牙，门多萨以劝说或胁迫的方式叫受命执行新法的巡视员无限期停止颁布新法。然而，由于秘鲁没有实际上的皇家政府，所以，任命了第一个皇家总督，随同新一届的检审法院的成员一起被派去专门实施这部新法典。他就是布拉斯科·努涅斯·德·拉维拉，一位职业军人，性格刚毅，有勇无谋。由于他不听检审法院法官们的劝告，坚决要求贯彻他的命令，结果引起一场由贡萨洛·皮萨罗率领的武装造反。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努涅斯在1546年初被打死。在一段时间中，贡萨洛·皮萨罗成了秘鲁的实际统治者。如果他听从了他那坚定不移的军师卡瓦哈尔的意见，断然拒绝效忠王室，那么，他很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然而，尽管他性格散漫，但忠诚之心未改。他不太了解查理五世的蛮横专制日趋严重，因此，他像一个从强大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讨价还价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企图获得王室对他权力的承认。但是，不受约束的封地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政府中努涅斯的继任者是牧师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他已从巴拿马控制了海洋。谈判的结果仅仅是让他能在秘鲁登陆，将许多心怀嫉妒的人从贡萨洛那里分离出来，最后召集军队把他打败。贡萨洛及其主要副官于1548年3月被斩首。在征服秘鲁的这5个无法无天的兄弟中，只有埃尔南多幸存下来，最后死在西班牙监狱中。在整个总督辖区建立秩序的过程缓慢而又艰难。但到1560年，残忍的总督卡涅特得以宣告南部疆土已完全平定。殖民地公开的武装封建制度已被取缔。在秘鲁如同在新西班牙一样，政府官员代替了西班牙征服者。

虽然西印度事务院镇压武装叛乱的态度坚定不移，但也理解并接受了门多萨的中肯意见，认识到对监护人做得过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力求找到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1545年皇帝在马林签发的文件重

新确认了有关监护征赋区继承权的旧规定。像从前一样，这些监护征赋区可以延续两代人，实际上常常超过这一限期。另一方面，随后在1549年和1550年发布的一系列敕令禁止监护人强征劳役，特别是用印第安人做搬运工。因此，监护征赋制度虽然保存下来，但性质已改变。毫无疑问，监护人确实仍在非法强迫印第安人服劳役，但在法律上，他们只有收取印第安人的贡赋的权利。这些贡赋部分以贡金、部分以贡品交纳。贡赋数额的大小间或由监护人确定。这样定义的监护征赋制纯粹是为了收买“老征服者”及其后代使他们不致对立而支付的抚养金。监护区中未转让的或已收归王室的村庄委托给地区官员，即区长（*corregidor*）照管。这些区长职位（*corregimientos*）是临时的带薪职位，而不是终身的封赐，逐渐用来代替监护征赋制作为对在地地方效力的人的一种正常奖赏。引导印第安人作有偿劳动并为比一个村镇更大的社区的经济生活作贡献的问题不再由私人处理而是成为公众关心的事。虽然私人强征劳役已属非法，但授权给统治者可以强迫“闲散的”印第安人去找工作做；要求所有的印第安人村庄提供一周的限额劳工供雇来做公益劳动。这一制度在新西班牙通常叫作分配份额（*repartimiento*），在秘鲁叫作米达制（*mita*）。

在新西班牙，第二任皇家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实施了1545—1550年的立法，取得很大成功。贝拉斯科从1550—1563年统治该省，他为此目的而派出巡视员。在秘鲁，这些立法直到弗朗西斯科·德·托来多时代才得到有效实施。托来多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在12年的任职期（1569—1581年）内，他给秘鲁总督职位留下了确定持久的官僚政治印记；他还偶然下令处死最后一位公认的印加王子图帕克·阿玛鲁（Tupac Amaru）。如果没有社会和经济势力同心协力，在两届总督任期内要实施这些立法是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很清楚，防止用印第安人做搬运工的最好办法是鼓励饲养和使用牲畜。对于建立在监护征赋制基础上受限制的半封建社会的最佳矫正办法是给欧洲人提供能赖以谋生的其他职业，而又不冒犯他们关于不适合有身份的人的工作的偏见。事实上，在16世纪后半期，由于政府干预，物价上涨（因为贡赋大量以货币征收）以及印第安人口因瘟疫而减少，监护征赋区的价值逐渐下降，同时，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至少在新西班牙）或为挣钱，或为自己的缘故，学会了欧洲人的技能或提高了自己的手艺。硬币的使用范围扩大了，货币经济开始取代了直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经济形式；而西班牙人发现了远比旧的监护征赋制

更重要的新的谋生手段。在这些新的谋生手段中，最典型、最有利可图的是矿山和大牧场。

大部分西班牙征服者来自干旱的卡斯蒂利亚高地，那里的人长久以来一直喜欢从事畜牧业，放养部分游牧的畜群，而不喜从事农耕。这种爱好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而且有社会的和军事上的原因。它是几个世纪以来变幻不定的边疆地区时断时续进行战争的产物。畜群的主人，即骑在马背上的牧民，在新世界最能适应与旧世界相似的环境条件。的确，有少数地区条件得天独厚，如新西班牙的普埃布拉或新格拉纳达的安蒂奥基亚。在这些地区，西班牙地主在城市附近种植小麦供出售，或在港口附近种植小麦给船舶提供粮食。但是，在西印度大部分地区，饲养牛羊在门多萨时代成了富有的西班牙人的主要职业。新西班牙的每一位编年史家常常惊喜地提到该国饲养的牲畜数量庞大。门多萨亲自引进美利奴羊，它是早期羊毛工业的基础。这一产业偶然得到在其作坊中压制和虐待印第安劳工的恶名。墨西哥市场上牛肉的价格是养牛业迅速扩大的明显证据：1538年，4磅卖17个铜币；1540年，10个铜币；1542年，4个铜币。市政府发布法令将价格固定在最后这个数字上。贱价销售要受惩罚，因为城市的市政会议员几乎都是牧场主。由于牛肉价格这么便宜，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会挨饿或急需为拿工资而干活。拥有养牛场的大人物们有可能敞门迎客，还可能养大批家臣。除了在临近大城市的地区外，牛肉比较起来无利可图。这些牲畜的主要价值在牛皮和牛油。牛皮用于制造鞍具和防护服；牛油用来做蜡烛，并用做船舶外壳的涂料，保护船舶免受凿船虫的蛀蚀。屠宰过的牛在去掉牛皮和牛油之后，尸体任其腐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大规模养殖才能获利，而被授予牧场的主要是那些买得起牲畜的人。授予的牧场也未严格界定，起初是以一固定地点为半径计算，没有进行过边界勘测。尽管多次立法，尽管殖民地法院努力保护印第安人的财产，这些牲畜还是会闯入印第安人的未加围栏的玉米地。例如，在墨西哥城东北45英里的托卢卡山谷，1535年开始养牛。20年后，整个谷地有15万头牛。据托卢卡的方济各会修士说，除了少数被雇来做牧牛人的印第安人之外，当地的印第安人都逃到山里去了。因此，玉米价格从每法内格（fanega）^[4]值二分之一雷亚尔上涨到4雷亚尔。他们说，有些牧场主一户就养了15000头。由于牧场主和拥有牲畜的政府官员以及墨西哥城中靠捐款为生的在俗神职人员们施加影响，所以政府也无能为力。托卢卡仅是成百个例子中的一个。畜

牧业的迅速发展无疑是新西班牙中部人口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过度放牧又是引起土壤受侵蚀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使墨西哥自此之后大受其害。在秘鲁，有角的牛影响不大，但绵羊和用鼻子在土豆地里拱土觅食的猪在高原的许多地方造成类似的状况。两个地区的畜牧业，常常连同滥用监护征赋制度一起，往往会破坏印第安人的公有制农业而建立起属于欧洲人的大庄园。

起初是监护征赋区，然后是大牧场积累了资本，这使得大规模开采贵金属成为可能。在征服初期，金银的开采仅是进行勘察和在合适的河流里淘洗这样简单的事情。但是，大约在16世纪中期，在新西班牙的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银矿脉，而在现属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所发现的银矿是所有银矿中储量最丰富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粗加工生产取代了原始的淘洗法，建立了在当时堪称巨大的工厂来从矿石中提炼银，通常使用的是混汞法。这些开采导致非法的淘银热潮。于是，在采矿区匆忙成立特别法庭来登记所有权和解决争端。王室要求在所生产出的全部金属中占一份额，通常为五分之一。还用了大批管理人员来称重、测试和在银锭从矿场发出时盖上印章，然后将属于王室的部分拿出来。扣出经批准的付款后，属于王室的那部分银锭运到西班牙，同时，还有由个人运回国的数量更大的金银，要么用于投资，要么用于支付进口的欧洲商品。

虽然有些西班牙人，更多的是印第安人，以手工劳动进行开采，但典型的银矿主是以相当大的规模进行开采的资本家。采矿和畜牧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矿工需要有稳定供应的牛肉、皮革和牛油蜡烛，而从事这两种行业的人常常是同样多。像畜牧业一样，采矿业也使印第安人不堪忍受，不过方式不同。采矿业需要大量的挖掘工。进口黑奴满足了对劳工的部分需求，但大部分工作是由印第安人来做。虽然要付工资，但还是得在监护征赋制度下以强制手段来大量征募印第安劳工。过度劳累，食不果腹，更严重的是在拥挤条件下疾病流行，造成矿山中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印第安矿工又将流行病带回村庄。或多或少接受了欧洲生活方式、学会了欧洲人手艺的印第安人或在欧洲人居住中心附近从事传统手艺的印第安人得到有效保护，使他们不受虐待（当然无法使他们不得疾病），因而稍微富裕一些。那些能提供劳工的头人们也能发财致富。但是，那些待在村子里以旧方式从事劳动的印第安人是两个世界中生活过得最糟糕的。一般来说，随着这些省区

变得繁荣富裕，印第安人的人数也随之减少。特别是在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口一直在减少，由于疾病大流行，16世纪40年代人口锐减，16世纪70年代又再一次大幅减少。印第安人口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中叶。[\[5\]](#)

新西班牙和秘鲁都产银。西班牙人主要看重这一点。但秘鲁生产的银比新西班牙多得多，而除了生产勉强维持生活所需的東西外，秘鲁几乎不产别的东西。征服秘鲁的西班牙人社团仍然住在不大的社区里，有大量的钱可供使用，购买消费品的欲望非常迫切。而在新西班牙，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社会已开始相互交往融合。新西班牙物产富饶，却因征收银税的效率低下而短缺硬币。大量的私人汇款寄到西班牙，尤以科尔特斯庄园汇出的为多。将西班牙原产的商品沿海岸运到秘鲁去补充那些跨过巴拿马地峡运进来的昂贵的进口商品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随同这些中转商品一起运去的还有墨西哥产品（骡子、糖、果干、果酱），由西班牙人或印第安人工匠在新西班牙制造的欧式商品，以及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产品——光亮的黑石镜，上漆的葫芦瓢，羽毛制的花毯，等等。科尔特斯庄园将大笔钱投资到这一行业中，主要是运送它自己的产品。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6\]](#)是个地主，并曾在墨西哥当过官。16世纪60年代，他征服了菲律宾，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建立起横跨太平洋的定期贸易。结果，大量的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以类似的方式转运到秘鲁。正是因为开展了这种贸易，使得秘鲁出产的银悄悄流入急需硬币的东方，招致王室干预，最终在17世纪全面禁止总督辖区之间的贸易。

对贸易实行严密监管一直是西班牙帝国政策的特点。使太平洋事务从属于大西洋事务的意见完全符合这一政策。横跨大西洋的西班牙航运集中在塞维利亚港，从1543年起，完全被该城的商会所垄断。商会是势力强大的团体，不但有能力捍卫其特权地位，而且还可能滥用这种地位。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谎言诓骗，西班牙全国各地的商行都成了由塞维利亚商会为代理人的商会会员，将他们的货物以塞维利亚商人的名义托运。甚至外国的商行，德国的、英国的、佛兰芒的，也都采用这种办法。因此，真正的塞维利亚商会会员作大笔的委托业务，最终使他们自己的正规生意反倒显得无足轻重。塞维利亚是西印度贸易的瓶颈。王室通过它的代理机构贸易署（*the Casa de Contratacion*）实行严密监管，使这瓶颈变得更加狭窄。贸易署对西

印度贸易征收关税，接收和发送从美洲发来的税款。在贸易署内部有一个解决商务争端的法庭，一个水文部和一所航海学校。它审查移民和签发移民证，阻止犹太人和异教徒入境；检查船只以确保航海安全；审查海员以保证他们能胜任。有些商品，比如枪支和黑奴，须有特别许可证才可以出口。一般说来，实行许可证制度会阻碍正常的商业活动，这是令人不愉快的，而且会促使违法者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些巧妙的对付办法。

16世纪的西班牙主要是一个原料生产国，出口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换回外国商品。但它也有自己的工业，而且在某些产品（如丝绸、精纺羊毛织品、手套、皮革、军火和刀具）的制造方面，西班牙工匠不仅满足了大部分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还将剩余产品出口到西印度地区。1530年与1594年间，像布尔戈斯、塞哥维亚和托莱多这样的城镇人口增加表明，工业活动也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还赶不上西印度地区需求的增长速度。西班牙的经济结构很死板，这使出口贸易快速扩大极为困难。经济结构死板的原因有：人们普遍轻视单调的工作，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市政当局和同业公会排外保守；给予季节性流动养羊的特权毁坏了可耕地，从而导致粮食短缺；非生产性职业，特别是教会和军火制造业的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沉重的税收阻碍了资本积累；持续不断的欧洲战争。这些因素对卡斯蒂利亚影响特别大，因为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繁荣的商业中心与地中海关系密切，而对西印度地区的贸易没有多大兴趣。各地的详细情况不尽相同，但其中许多因素对西印度地区也发生影响，使那里的西班牙人更加依赖本地劳动力和进口的欧洲商品。整个西印度地区的市场迫切需要布匹、武器、工具和各种五金制品、书籍、纸张、葡萄酒、油和奴隶。除了由摩里斯科工人大量生产的油和葡萄酒外，西班牙商人无法以足够的数量或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口这些商品。因此，西印度地区的贸易对奴隶贩子、走私分子和非法商人有着长期的诱惑力。其中在16世纪前半期主要是葡萄牙人，但后来也有北欧人。约翰·霍金斯在16世纪60年代组织了三次大规模航行，将奴隶和纺织品运到加勒比地区。他是许多其他的佛兰芒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先驱。船货中占很大比例的银使得从西印度驶回本国的船只对抢劫者也有诱惑力。在法国与西班牙持续不断的交战期间，这些私掠船上的抢劫者主要是法国人，但后来也有英国人和荷兰人，而随时都有海盗进行抢劫。大约在该世纪中期，必须要由护航舰队运送金银。从1564年起，每年有两支

武装船队从西班牙出发，一支去墨西哥和墨西哥湾各港口，另一支去巴拿马地峡。两支船队都在美洲过冬，第二年春天在哈瓦那重新聚集一起返航。每支船队都由20艘至60艘帆船组成，通常由2艘至6艘军舰护送。不随其中一支护航舰队航行的任何船只禁止横跨大西洋，除非有特别许可证。包括以圣多明各和卡塔赫纳为基地的支援巡洋舰中队在内的这个体系由当时最伟大的海上指挥官佩德罗·麦嫩德斯·德·阿维莱斯筹划，总的说来是有效的。在大多数年份少数掉队的船只失踪，但是在16世纪，没有一次是整个航行被拦截而遭覆没的。定期航行一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1585—1586年，德雷克袭击沿海城镇获得成功，但其成果只是暂时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往来美洲运送的所有商品征收一系列沉重复杂的关税来支付护航舰队的费用。因此，船队的安全是用高价买来的。这一整套安排既大大延迟了殖民地得到商品的时间，又在这些商品最终到达时价格大大提高了。

整个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到西班牙的加勒比殖民地去做非法买卖的人主要是葡萄牙人。他们在亚速尔群岛的停靠港很有用，在西非有一系列奴隶临时禁闭营，通过与沿岸统治者签订的协定来维持。从16世纪初年起就已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蔗糖生产中使用非洲奴隶。后来，在墨西哥的内陆和沿海地区也使用非洲奴隶。经西班牙政府准许向这些殖民地提供奴隶的商人不得不从葡萄牙经纪人那里购买。葡萄牙奴隶主，要么作为分包者，要么作为走私者，常常为自己越洋载运货物。因此，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的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16世纪后半期已建立起来。那时，在葡萄牙自己的美洲属地巴西对奴隶的需求增大。在卡布拉尔登陆后的头30年或40年中，葡萄牙人由于完全忙于东方事务，除了将巴西苏木作为染色工业的原料来源和把巴西作为罪犯（*degredados*）的流放地之外，没有对巴西加以利用。法国伐木者到巴西海岸来的次数与葡萄牙人来的次数一样多。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法国人并维护对巴西的优先占领权，葡萄牙政府在16世纪30年代被迫采取积极步骤鼓励到那里定居。1530年，派出一支由马丁·阿方索·德·索萨率领的武装舰队去勘察从马拉尼翁到南里奥格兰德的3000英里海岸，驱逐法国定居者并抢夺法国船只。德·索萨在沿海地区花了两年时间，在巴西建立起头两个永久定居点：现在的桑托斯附近的圣文森特，以及巴西苏木产区中心伯南布哥，法国人已试图在那里建立一座要塞。1533年，约翰三世将巴西海岸（理论上还包括“分界线”内的内陆腹地）划分为12个指挥官管辖区，赐给叫作领主

(*donatarios*) 的大地主，要求他们自费到那儿定居并保卫他们的领地；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对于能诱导移居到那里的殖民者行使行政、司法和财政权力。这些权力是许多西班牙征服者求之不得的。然而，葡萄牙以一种纯粹的私人企业体制，既无法给巴西的快速移民提供人员，也无法提供资金。在17世纪晚期以前，既没找到黄金，也没找到钻石。在热带进行开发对于那些如果愿意就能在东方从事商业的人们几乎没有吸引力。最初的赐授土地有4块从来没有人要；有4块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到16世纪中期，只有帕南布哥和圣文森特这两块领地开始给它们的拥有者带来收益。法国的非法入境者继续光顾沿海地区。1549年，约翰三世认识到指挥官管辖区制度在定居和防卫上存在的弱点，所以，采取了建立皇家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宣布巴伊亚为巴西首府，任命托梅·德·索萨为总督。德·索萨在非洲和东方已有相当多的行政管理和作战方面的经验。随同他赴任的远征队中除了军人之外，还包括有移民、官员，和由马诺埃尔德·德·诺夫雷加率领的6个耶稣会教士。这个新建立的修会的会员在葡萄牙帝国在新旧两个世界上的扩张过程中将起重要作用。他们在图皮—瓜拉尼原始民族中的传教活动赋予巴西内地的整个历史一种鲜明的特征。诺夫雷加在巴西一直待到1570年死去时。他的传教活动时期与那位伟大的军人和行政官员、从1557—1572年任总督的梅恩·德·萨的政府任期部分重叠，并能左右该政府。梅恩·德·萨或许是殖民地巴西最强有力的缔造者。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要把法国人从巴西中部驱逐出去，并在法国人的主要营地附近建立起里约热内卢定居点（1567年）。他是第一位制定并实施一项始终如一的土著政策的总督，目的是要惩戒好战分子，转变异教徒的信仰，保护那些反抗奴役和虐待的人，特别是要废除吃人肉的习性并引导印第安人在农业区定居。西班牙人的政策中也含有这些目的，但是巴西森林中的印第安原始民族不如墨西哥中部或秘鲁高地的定居民族那样容易成为新入教者。所以，葡萄牙人的政策相应地要求低一些，成效也较小。

巴西的葡萄牙人社会具有显著的农村特征。没有墨西哥或利马那样的城市，而大部分“城镇”都只不过是些小村庄。除了维持生计的作物——本地的木薯和引进的玉米——以及野生的巴西苏木之外，主要出产从马德拉群岛引进的糖料作物。在巴西与在别的地方一样，糖料作物最适合用奴隶劳动力在较大的种植园里种植。巴西的印第安人不适合于做种植园的劳动，但葡萄牙人从西非获取奴隶比其他欧洲人

占有更有利的地位。到梅恩·德·萨政府任职末期，确立了奴隶住房与蔗田构成的“大家庭”模式。到1580年，有大约60家糖厂在进行生产。人口达到大约2万葡萄牙人、1.8万定居的印第安人和1.4万黑奴。稀稀拉拉的人口仅限于分布在海岸边缘地带，内陆腹地仍然无人涉足。但是，8个老的指挥官管辖区有了固定的居民点。首府巴伊亚在某种程度上已可以称得上城市了。即使如此，巴西还是几乎荒无人烟，但靠少数零散的葡萄牙人定居点却取得了适度的繁荣。1580年，阿维兹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国王枢机主教亨利去世，王位空缺。菲利普二世通过交替使用谈判、行贿、劝说与暴力等手段夺得了继承权。葡萄牙和葡萄牙属地都归西班牙国王统治。

1580年前，西班牙人就继法国人之后成为争夺巴西控制权的主要竞争者。1536年，佩德罗·德·门多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短命的城堡。这是在拉普拉塔河流域进行的漫长竞争中的第一次行动。门多萨手下的人于1537年建立亚松森。奥雷利亚纳于1541—1542年从秘鲁越过安第斯山脉，顺着亚马孙河乘独木舟作了惊人的航行，确立了西班牙人对分界线以西的亚马孙河流域的所有权。分界线被认为从南北两端穿越巴西。西班牙人在分界线南北两端的的活动不断引起里斯本政府的担忧。然而，实际上，东北海岸的葡萄牙人定居点距离这些活动地点很遥远。即使是1580年的事件也几乎没有对巴西造成直接影响。1582年在里斯本签发的诏书中，菲利普二世承诺让葡萄牙殖民地的商业和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总的说来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葡萄牙及其属地只不过是又一个加入到由各个王国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中去的国家，仅靠效忠于哈布斯堡国王而联合在一起。西班牙政府的影响仅以缓慢而且是不彻底的方式渗透到悠闲自在的巴西葡萄牙人社会中。

于是，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成了当时在新世界建立的所有欧洲人殖民地的统治者。伊比利亚人在征服和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不仅是军人和殖民者，而且还有行政官员、律师和神职人员都尽力为王室效劳。持久的王国建立起来；颁布了一大套成文法，规定了征服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君王和朝廷统治所有人的权力。这部立法的大部分，比如新法，以及1573年颁布的发现法，成了那个时代开明的典范。这部立法确实未得到彻底实施，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16世纪的大部分立法都没得到彻底实施；但是，拿薪俸的

职业法官应该是很公正的，由这些人任职的法院所作出的种种规定保证了王室的法令不仅仅是些好心规劝的话语。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征服、定居、立法、管理方面，而且在政治理论的抽象领域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的《印第斯关系法》（*Relectiones de Indis*）一书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征服的是非问题，这是现代国际法的开端。胡安·西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写了第一部内容详尽的专著来为较开化的民族征服和托管原始民族的行动辩护。拉斯·卡萨斯在他驳斥塞普尔维达的论点时，写下的不仅有一系列令人愤慨的罪行，不仅有对人道主义文献的杰出贡献，而且还有对人类自由和宪政的认真而有力的捍卫。在查理五世这位既是伟大国王又是超乎寻常的专制君主时代，谴责征服者（毕竟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王室的代理人）的暴行的文章，批判整个西印度地区事业的文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拥护诛戮暴君者的文章，都能得以传阅而不致引起反感，这是衡量16世纪的西班牙的自信、西班牙人对自由与法的尊重的一个尺度。相反，那些描写西印度地区政府并为之辩护的文章，其中有许多是由殖民地官员写的，例如，胡安·德·马提恩索（Juan de Matienzo）的《秘鲁政府》多半都显得语气温和且材料翔实。西班牙征服者的肆意掠夺和十字军远征似的热情很快被一种明智的、有良心且审慎的帝国主义所代替，这种帝国主义能大胆而自信地正视批评。部分由于这种原因，征服过程相当漫长。

然而，帝国主义也给征服者的祖国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负担，而其回报常常是虚幻的。许多西班牙人——征服者、移民和官员——都在西印度发了财。这是他们在西班牙无法梦想的事。但是，有胆量有才能的人漂流海外是西班牙的一大损失。西印度地区出产的白银支付了意大利和佛兰德军队的军费，这是帝国得到的最宝贵的奖赏，但最终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在西班牙流通的白银数量大量增加，到一定时候全欧洲流通的白银数量也随之增加，结果引起商品价格上涨并扰乱了已确定的金银双本位制比率。这些问题共同引起很大的混乱和重重困难。由于卡斯蒂利亚经济很死板，使得工农业无法对物价上涨产生的刺激作用作出适当的反应^[7]，结果必然使西班牙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

在汇到西班牙的硬币汇款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是王室征收的各种人头税岁入。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中期以前，西印度地区的这一岁入在王室的总收入中不是主要收入项目，大部分年份不到大约百分之十。16世纪的最后20年中，这一岁入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在1585年这一年就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另外，私人从西印度地区所得的收入也有助于增加西班牙的税收。因此，西印度地区的岁入虽然比西班牙国内外大多数应得的同期收入要小得多，但是其重要性也足以大大影响王室的政策，而且比单是通货膨胀会产生更大的隐患。一个国家不可能幻想单靠海外国民的成果生存下去而不在国内公众生活中产生腐化现象。早在1524年，卡斯蒂利亚议会就反对将摩鹿加群岛出售给葡萄牙的提议，其理由是，拥有该群岛可以给帝国带来除税收以外的稳定收益。议员们准备放弃他们唯一的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柜台——对财政补给的控制——以便减轻直接的纳税负担。根据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这一论点是合理的，但是这对西班牙宪政的未来却是一个坏兆头。拥有了西印度地区使菲利普二世越来越听不进卡斯蒂利亚议会的逆耳之言，也常常不顾贵族与平民的舆论。由于帝国主义政策取得胜利，舆论只好默认越来越多的专制主义做法。官僚专制主义可以说是通过接触从西印度地区传染到卡斯蒂利亚，在那里，人们自然更容易直接感受到，更难于忍受，不会因为距离遥远和时间耽误而缓减。卡斯蒂利亚是伊比利亚诸王国中最好战、最不富饶、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落后的。占有西印度地区使卡斯蒂利亚比该半岛上其余地区具有长久的优势。最后，对西印度地区价值的夸张估计增加了哈布斯堡王朝政策在欧洲许多地方引起的恐惧感和敌视态度，同时促使西班牙王室实行一项它无力坚持的国际政策，这必将使其陷入困境并最终招致失败。

（曾佑昌 译）

[1] 新西班牙指当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墨西哥。——译者

[2] 摩里斯科人（moriscos）指在西班牙已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原穆斯林。——译者

[3] 圣多明各，1526年；墨西哥，1527年；巴拿马，1535年；利马，1542年；危地马拉，1543年；新加利西亚，1548年；新格拉纳达，1549年；查尔卡斯，1559年；基多，1563年；马尼拉，1583年。

[4] 一法内格约为1.6蒲式耳。——译者

[5] 最近的一份证据充分的研究资料得出墨西哥中部地区的以下大致数字：1519年，1100万人；1540年，6427466人；1565年，4409180人；1597年，250万人。S. F. 库克与L. B. 辛普森：《16世纪墨西哥中部的人口》，载《伊比利亚——美洲》第31卷（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48年）。其他作者的估计数字大不相同，但下降趋势是普遍一致的看法。

[6] 参见本书边码第612页。

[7] 参见本书边码第49页。

第二十章 欧洲与东方

第一批由海路到达东方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498年开辟了绕好望角的新航线，很快便在阿拉伯海及其附近的陆地上显示其实力。到1509年，他们已击败了在第乌的主要敌人的舰队，抢劫了许多商船，洗劫了许多沿海城镇。其后的10年中，他们的影响日益扩大且更加稳固。葡萄牙的东方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从1509—1515年彻底改变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地位。与此同时，他在东方进行的王室贸易及建立的王室政府都已相当稳固。1509年至大约1520年期间是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活动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因为这段时期是葡萄牙国王野心勃勃地进行扩张并在亚洲建立起许多永久性机构的时期。1520年以后，国王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葡萄牙人的私人贸易却继续进行并日益兴隆，尤其是在16世纪后半叶。1580年，国王背负着治理国家的重担，而私商却从贸易中获得大部分利润。这无疑标志着自从15世纪初期以来，海外事业就未能实现葡萄牙王室对它寄予的希望。

迟迟未向东方派出十字军开始激发起葡萄牙人对东方的兴趣，“航海者”亨利亲王一心想探明位于奥罗河海岸的博亚多角以远的地方又进一步培养了这种兴趣。亲王是基督骑士团的军事总督，他于1421年向非洲海岸派出了第一批探险者。大约35年后，教皇授予基督骑士团以宗教裁判权和“远至印度”的贸易自由。即使不是在此之前，至少是从那时起，葡萄牙人很可能就有了由海路到印度的想法。他们并未很快找到这条路线，直至1488年，一艘葡萄牙船才从好望角东边经过。此后不久，约翰二世国王看来已接收到有关印度西部和非洲东南部港口的消息。这时几乎可以肯定，人们能够由海路到达亚洲。但是，直至1497年葡萄牙人才这样做。那一年，瓦斯科·达·伽马指挥一支皇家舰队进行第一次大航行。

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行为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伽马是奉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的命令航行的。曼努埃尔一世奉行与约翰二世（1481—1495年在位）同样的政策，把葡萄牙人在西非及其以远的活动看作是皇家官员的事务。他

通常不准许冒险者从事冒险活动，不给他们鼓励支持，派遣他们到亚洲，然后希望从他们冒险得来的利润中获取适度比例的利润。除少数例外，唯有国王才能派探险队到东方：他用皇家的岁入资助他们或给予贷款，力图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获取最大好处。他还任命了一些探险队的队长，给他们详细的指令并确定随同前往的人员。未经王室准许，法律一直禁止去亚洲，所以，16世纪到东方的葡萄牙人几乎没有个人冒险家。他们一般是作为王室的军人、文职人员或神职人员被派到那里去。他们一律由国王付酬，作为国王的仆从，他们有时感到自身很高贵。起初，这些安排使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行动格外有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将政策交给王室掌握。

国王曼努埃尔在东方似乎有两个主要目的。他想从亚洲进入欧洲的贸易中分得一份利润；他还希望给予他的敌人穆斯林以接连不断的打击。贸易与战争并行不悖。由于葡萄牙的财力有限，没有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就无法进行战争。同时，由于阿拉伯人牢牢控制了印度与近东之间的商业贸易，在东方与穆斯林的战争就是打击阿拉伯人。但是，葡萄牙人最初到达亚洲时，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单独行动感到心中无数，希望找到一个盟友。有时他们把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牧师国王”当作“祭司王约翰”。他的士兵给予的帮助将能弥补他们人数少的劣势。

葡萄牙人到达亚洲时，当地的情况对他们有利。当时东方水域几乎没有强大的海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是在沿海地区。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的葡萄牙人对占领大片领地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大片领地的手段。他们对沿海地区和海上感兴趣，因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的实力可以依靠舰队。16世纪初期，只有三个亚洲国家能在海上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把握对葡萄牙人进行挑战。这三个国家是：马穆鲁克的埃及和叙利亚帝国，印度的古吉拉特苏丹国和扎巴拉的爪哇国。其中的每个国家都有装有火炮的大型船只，葡萄牙人的枪炮只比埃及人和古吉拉特人的枪炮稍好一点。在远东，中国人偶尔派出能击退葡萄牙人的相当大的海军的舰队，将其从广东、福建或浙江沿海赶走。然而，在正德年间（1506—1522年），外国人在广州附近通常受到友好接待；广州是参与对南洋和西洋的贸易最多的[中国]城市。在马来群岛，马六甲苏丹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能够以轻型小船组成大舰队。他们的骚扰能力很

大，但是需要以占绝对优势的数量才能在公海上带着成功的希望面对葡萄牙人。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的一个小国卡利卡特的兵力也是如此。至于亚洲的其他地区，一些大国——暹罗、孟加拉、印度南部的印度教维查雅纳加（Vijayanagar）帝国、德里苏丹国，以及波斯——基本上都是陆上帝国，其统治者对海军问题几乎没有兴趣。在这段时期，日本正经历着一个内战时代；其海上活动纯粹是在中国沿海及附近地区进行海盗活动。东方的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庞大的海军。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舰队很快就控制了印度洋的许多地方，不过他们无法同时在许多地方维持控制权。

东方商业的性质也帮助了葡萄牙人。在16世纪，亚洲的贸易渠道通常很狭窄。由于贵重产品只出产于少数地区，就更助长了这一趋势。例如，胡椒主要产于马拉巴尔、苏门答腊的北部和西部、吉打和西爪哇。1500年左右，后三个地方所产胡椒似乎主要运往中国、暹罗、勃固和孟加拉。结果，马拉巴尔在当时实际上控制了向欧洲和近东出口胡椒的高额利润贸易。生姜是主产于马拉巴尔的另一种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而最好的桂皮则来自附近的锡兰岛。所谓的高级香料——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产于更为狭窄的地区。丁香只出产于摩鹿加群岛，而产于同一种植物的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只能在稍微靠近摩鹿加群岛南部的小小的班达群岛采集到。来自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商品，连同中国的出口商品，如锦缎、瓷器和麝香，要运到印度就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或巽他海峡，这两个海峡都很狭窄，容易被封锁。在15世纪末，中国和马来群岛的大部分西运商品显然要经过马六甲港。中国商品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运到印度是因为陆路运输困难而且费用昂贵，还因为在马六甲很容易采购到来自马来群岛、印度或黎凡特地区的出口商品。再往西，印度与近东之间的贸易主要经过红海或波斯湾入口处的狭窄水域。贸易还受到另一种限制，因为整个亚洲，季风使航行局限于一年中的某些时间。

1500年，亚洲国家的大部分海外贸易都掌握在外国商团手中。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海沿岸地区的贸易中居支配地位。在东非，他们统治着几个独立的都市；在印度西海岸，从马拉巴尔到古吉拉特，他们都有牢固的殖民地和强大的势力。外国商人在马六甲的势力也很强大，在那里，爪哇人、泰米尔人和古吉拉特人都建有重要的殖民地。在一些港口，大部分外国人都反对葡萄牙人。只是由于当地一个统治者的

支持，葡萄牙人才有了一些影响。这种情况发生在马拉巴尔。在马六甲，形势部分与此相反：有些商人对葡萄牙人持友好态度，其他一些商人和统治者则抱敌视态度。

某些商品只出产在少数地区，各种重要的贸易渠道很狭窄，与亚洲的一些统治者和商人的友好关系，这些情况都对葡萄牙人有相当大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干预东方的贸易。因为太多的市场是专业化市场，容易被搅乱，要不然就为穆斯林所左右。考虑到这种有利条件和葡萄牙人的海上强国地位，他们的处境至少是有希望的。葡萄牙人很快发现，当地人的钩心斗角即使他们感到为难、又对他们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看出，他们的舰队不仅能牵制东方的商业贸易，而且能设法使其改变方向：既然珍贵作物的产地仅局限于少数地区，他们就可以设法加以垄断。由于贸易渠道狭窄，他们就可以阻拦贸易渠道或征收通行税。各种有利条件促使葡萄牙人制订出大胆的计划。危险在于他们的目标会定得太高。人们很快便着手制订新的征服计划或夺取利润丰厚的贸易的计划，政府不断受到诱惑使其野心超过其财力。历代国王和历届地方长官必须把葡萄牙的国力有限这一点牢记在心：命运有时给予葡萄牙人的机会比他们能有益地加以利用的多。

尽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葡萄牙人并没有立刻在东方控制大权，也没有取得显赫的地位。瓦斯科·达·伽马的探险基本上是一次侦察活动。他指挥由4艘船和大约170人组成的一支小舰队。他受命将国书交给他所见到的各位王侯；他很可能还得到指示，要他告知每一位要人和基督徒：葡萄牙国王“是他的兄弟和朋友”。他于1497年离开里斯本。8个月后他到达莫桑比克，该地是阿拉伯人统治的东非港口之一。在那里，他受到不友好的接待。他沿海岸航行到更远的另一个阿拉伯殖民地蒙巴萨，又再次受到不友好的接待。只是在与蒙巴萨进行竞争的一个城市马林迪，他才受到盛情招待。然后他从那里跨过阿拉伯海到达马拉巴尔，于1498年5月20日在卡利卡特外的海面下锚泊船。伽马在卡利卡特逗留了3个多月，尽力与当地统治者建立亲密关系，并想得到大宗的当地产品。但他无甚成就。由于缺乏适合交换的商品以及强大的阿拉伯商人殖民地的敌视态度，使他未能得到大量的货物。阿拉伯人甚至煽风点火，引起伽马与卡利卡特的统治者萨穆里（*samuri*）[\[1\]](#)之间的紧张关系。1498年8月，这些葡萄牙人离开卡利

卡特，于1499年6月回到本国。除了东方商品的样品外，他们还带回这样一种印象：马拉巴尔的印度居民是信奉一种异端的基督教徒。

根据这一消息，曼努埃尔一世认为，他可以寻求萨穆里的帮助来反对穆斯林。为达此目的，他筹备了第二支探险队。这支探险队远比第一支大，由13艘船、1500人组成。指挥官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奉命在卡利卡特建立贸易关系和商业机构——代理商行，并让一些牧师上岸以便教导该地统治者和人民更好地信仰基督教。装上返程货物之后，卡布拉尔阐明葡萄牙人对穆斯林的态度，并发出警告说，他一定要在公海上攻击穆斯林船只，他要继续敦促萨穆里将阿拉伯人从卡利卡特赶出去，“因为这样做他就会尽到作为基督教国王的职责，要是他把他们从该国驱逐出去，不允许他们再到那里来，也不让他们在该国做生意的话”。卡布拉尔于1500年3月离开里斯本，于同年9月到达卡利卡特，但只剩下6只船。他很快发现，萨穆里不是基督教徒，葡萄牙人想得到特别优待的希望也随之化为泡影。卡布拉尔获准建立一个代理商行，但阿拉伯人限制代理商行做生意。企图制止这种阻挠行为，结果导致一场暴乱，48个葡萄牙人在这场暴乱中被杀，代理商行也遭毁坏。卡布拉尔以烧毁一些船只并炮轰该城来报复。然后他沿海岸南下到更远的科钦去，那是与卡利卡特对立的一座城市，先前他曾应邀到过那儿。他在那儿建立起代理商行，获得小批量的生姜和胡椒。1501年他起航回国。

曼努埃尔国王的计划失败了。想在印度争取到一位盟友所作的努力也一事无成。因为该计划原本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的。贸易方面所作的尝试成就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造成的。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繁荣的事业被宗教敌手削弱。从1501—1505年，在东方的葡萄牙人主要忙于力图在科钦和坎纳诺尔立住脚跟，全然不顾阿拉伯商人及其在卡利卡特的印度盟友的抵制。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几乎没有向外扩张。

1502年，曼努埃尔派瓦斯科·达·伽马去印度，强行要求补偿1500年所遭受的损失。伽马巩固了与科钦的友谊，加深了与卡利卡特的对立。在许多方面，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卡利卡特变得对葡萄牙人不安全，他们自然就要接受邀请到科钦去并尽力争取赢得该地酋长（*rajah*）的善意。与葡萄牙人的友谊会使科钦的实力增强，由此引起卡利卡特的敌视。所以，在伽马回葡萄牙之后，科钦必定会遭到

萨穆里的进攻。科钦的首长在遭到这一进攻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的国家实力较弱。他能挽救自己的唯一办法是请求葡萄牙人帮助。其结果是科钦最终要依赖葡萄牙人的支持：在1503年与1505年之间，其地位从朋友降为附庸。到1505年初，科钦已变为扈从国，其国防仰仗于葡萄牙舰队的指挥官，使葡萄牙政府背上了财政包袱。然而，葡萄牙人不得不保护科钦，因为它是他们在东方唯一的立足点。虽然伽马的航行产生了难题，但它也指明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科钦的虚弱使伽马能以定价在那里购买胡椒。1504年，王室又更进一步：那一年去印度的舰队指挥官奉命，在葡萄牙舰队停泊在科钦港湾期间，阻止任何船只离开科钦，企图以此获得垄断权。这有可能使科钦的依赖变得有利可图。同时，萨穆里的敌对态度不是很可怕。伽马的第二次航行证实了少数装备大炮的葡萄牙船就能胜过马拉巴尔的数量众多的轻武装小船。尤其重要的是，伽马的第二次探险给葡萄牙人带来第一批大宗的香料。这使得这一设想成为可能：如果能反复取得这样的成功，那么，在欧洲出售香料所赚得的钱就可以为葡萄牙人在东方单独执行的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提供资金。

甚至在伽马回国之前，王室就没有把注意力仅限于马拉巴尔。1502年和1503年，曼努埃尔派出小舰队到红海出口处游弋，奉命袭击穆斯林船只。1505年，他采取一项更为大胆的政策。那年3月，他派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去东方任总督和他的常驻代表。阿尔梅达领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指示。首先，他要在基卢瓦和安查迪瓦修建要塞。基卢瓦是一座怀有敌意的穆斯林城市，安查迪瓦则是印度西海岸外的一个岛屿，葡萄牙人在往返东方的途中通常在那里停泊补充淡水。其次，阿尔梅达要在坎纳诺尔和科钦着手修建其他的要塞。^[2]他的第三个任务是航行到红海出口处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构筑要塞，“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香料经过埃及国土，而除了我们，所有的印度人别想和任何人做生意，而且还因为那个地方靠近祭司王约翰”。从红海回到马拉巴尔时，阿尔梅达要在奎隆（科兰）新建一座要塞。奎隆位于科钦南方，是胡椒输出中心，葡萄牙人于1503年第一次到过那里。总督要监督运往葡萄牙的胡椒装船并对付卡利卡特，只有当科钦的首长和卡利卡特的萨穆里同意驱逐“麦加穆斯林”即阿拉伯人时，才能讲和。如有可能，阿尔梅达要派船到霍尔木兹海峡去并沿印度海岸北上去达布尔、焦尔和古吉拉特；在这里葡萄牙人要攻击所有的穆斯林船舶。除非这些地方的穆斯林统治者同意缴纳贡金并让葡萄

牙人进入他们的港口购买要塞所需的补给品，否则他不可能得到和平。最后，国王要求总督派考察队去锡兰、勃固、马六甲和其他地方考察。为了执行这些计划，阿尔梅达需要建立一支由12艘中型船只和15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

阿尔梅达领受的指示标志着一个野心勃勃的快速扩张过程的开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1521年曼努埃尔去世，在其后的10年中才逐渐停止。1505年，葡萄牙人开始尝试阻止或牵制穆斯林在东方的大部分海运贸易。同时，他们试图垄断向欧洲运输胡椒和生姜，并在东非和摩鹿加群岛^[3]之间的各个地区增加兵力。

阿尔梅达无法实行强加于他的全部计划，但他确实取得了许多成就。1505年，他在基卢瓦、蒙巴萨、安查迪瓦、坎纳诺尔和科钦建立了要塞。1506年，一支本来要去攻击穆斯林船舶的舰队偏离了航线，结果使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锡兰。同年，萨穆里在海上遭到惨败，葡萄牙人将穆斯林船只从马拉巴尔海滨地区赶走；1507年，他们在达布尔和焦尔以北发动战役。1506年，国王急于要在来自美洲的西班牙人造成的威胁来临之前抢先一步。依照国王的提示，阿尔梅达派遣人去马六甲，但他们未能到达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以远的地方。总督没有在红海的出口处建立起要塞，但这无关紧要。1506年，国王派出舰队夺取了索科特拉岛上的穆斯林要塞，他这时已将其作为在红海附近建立葡萄牙基地的地点。这一任务于1507年完成。大部分船只接着去了印度，但一支小型海军中队留下来封锁红海入口。其指挥官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不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去了霍尔木兹（位于波斯湾出口处），他于1507年10月使其成为葡萄牙国王的附属国，并开始在那里修建要塞，但由于当地的抵抗和一些葡萄牙人离去而未能完成。在此期间，另外的葡萄牙探险队于1505年在东非最南端的港口索法拉、1507年在莫桑比克着手修建要塞。

所有这一切构成形形色色的重要活动，但阿尔梅达很快就自食其果。1505年以前，葡萄牙人对穆斯林的袭击大部分限于对航行于马拉巴尔与红海之间的船只，而葡萄牙人的成功一直是来往舰队所取得的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就。从阿尔梅达到达印度时起，葡萄牙人的攻击就变得更为广泛有效。这时，穆斯林国家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关于萨穆里在努力与埃及和古吉拉特结盟的传说，还有一段时间谣传一支埃及舰队要来歼灭在印度的

葡萄牙人。随着1505年与1507年之间葡萄牙人活动的增多，结盟与舰队两者都成为现实。到1507年末，一支埃及舰队到达古吉拉特的第乌。次年3月，埃及人和古吉拉特人在焦尔袭击一支葡萄牙舰队并将其击败。这次损失惨重。此前葡萄牙人还遭遇到其他麻烦事。果阿的穆斯林统治者发起进攻是1506年放弃安查迪瓦的部分原因。同年，索法拉发生反抗葡萄牙人的起义；另一次起义于1507年发生在坎纳诺尔。对葡萄牙人来说幸运的是，穆斯林在焦尔没有乘胜追击、向南航行去进攻科钦。这样，葡萄牙人就有时间重新调集兵力。1509年2月，总督在第乌打败了敌方舰队。这次战役使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获得暂时的海上霸主地位。

几个月后，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成为葡萄牙的印度总督，一直掌权至1515年12月他去世时为止。他上任时发现葡萄牙人在陆上虚弱，在海上虽强但指导思想不对。有些要塞选址很差，其他一些受当地政治局势所牵制，葡萄牙人也一直未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舰队。阿尔布克尔克很快改变了这些情况。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依靠第乌战役而执掌政权。他死时留下的是创始阶段的海上帝国，有良好的海军基地，有能控制贸易路线的海军中队和一项针对亚洲商人的始终一贯的政策。阿尔布克尔克的思想体现在葡萄牙人在东方活动的许多方面。他取得的非凡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以至同时代的一个人这样写道：“穆罕默德被逼得走投无路，无法再向前进，只好尽可能设法逃走……事实是他将遭毁灭，而且必然遭毁灭。”

阿尔布克尔克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所具有的见识。他把他的政策与葡萄牙人的实力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赞同国王要垄断从亚洲到欧洲的胡椒和生姜运输的旨意，并支持阻止马拉巴尔与红海之间的贸易所作的努力。为了建立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商业贸易，他也不比曼努埃尔少操心。但是，在区分增加贸易与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他比他的君主更胜一筹。因此，他很少征收贡税，除非他同时得到征税和索取其他好处的固定权利。不这样做就要引起拒绝缴纳贡税，否则就要求葡萄牙援助该纳贡国抵抗其当地的敌手。阿尔布克尔克总是设法避免卷入亚洲的政治事务，除非介入后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他还希望改变对穆斯林船只的政策。他看到阿尔梅达时期不加区别地袭击穆斯林船只已引起广泛的怨恨，而给王室金库带来的只是小笔的收入。即使缴获的战利品很丰厚，也很难制止官兵骗取王室应得

的份额。最重要的是，阿尔布克尔克意识到，穆斯林普遍的敌对行动有埃及和古吉拉特的海上力量作后盾，可能使在东方的葡萄牙人遭灭顶之灾。1507年至1509年穆斯林的联合行动不是出于昙花一现的政治癖好，而是葡萄牙人与之为敌的强大而持久的势力作出的对抗行动。

阿尔布克尔克几乎没有平息穆斯林反抗的希望，因此他力求通过使穆斯林联盟的成员相互孤立来削弱这个联盟。为达此目的，他需要在战略地点建立要塞，他打算要修建的这些要塞有：亚丁、霍尔木兹、第乌和果阿，后来他又加上了马萨瓦。如果不是在所有其他城市的话，他也希望在果阿和某些城市使他的同胞成为统治者。他认为，只有当葡萄牙人有了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基地，他们才能维护自己在亚洲的权利，然后才能不受干涉和限制。每个要塞都应保卫一个港口，使葡萄牙船只能从港口开出去对抗敌人。阿尔布克尔克急于要防止埃及舰队再次冲进阿拉伯海。他认为埃及舰队会给葡萄牙在印度的敌人以希望和安慰。一旦建立起这些要塞，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处境就有了安全保障，前往红海的航道就会敞开，就能进攻吉达，或许还能进攻麦加。

阿尔布克尔克的计划需要大量的兵力，巨额费用。为了支付巨大的费用，他希望解决十字军东侵时遇到的与异教徒进行贸易的老大难问题。商业对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政府如同对耶路撒冷王国一样非常重要。但是，不可能像曼努埃尔一世建议的那样只与印度人进行贸易。阿尔布克尔克有些夸张地写道：“印度人和这些土生土长的基督徒几乎没有资本来迅速摧毁摩尔人的贸易和公司，因为摩尔人是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以大规模方式进行贸易，并拥有许多船只。”在东方进行贸易就是与穆斯林做生意。他们的商业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被葡萄牙人摧毁。阿尔布克尔克试图通过压垮穆斯林人的部分生意并把剩下的大部分生意控制起来以解决这一问题。他想要修建的要塞不是纯粹的海军基地。它们将位于重要的商业中心，控制住这些商业中心就将使葡萄牙人能控制亚洲的一些主要商业。到红海的所有贸易都将终止，但经特许可以继续同其他地方做生意。此外，阿尔布克尔克计划扩大王室在东方的贸易。

阿尔布克尔克掌权的第一年夺取了果阿，他打算将其变成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中心基地。接着在1511年夺占了马六甲。同年，葡萄牙人放弃了索科特拉岛上的要塞：阿尔布克尔克认为该岛没有任何实用价

值。1513年，总督进攻亚丁未果，但据说他接着进入红海在东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他试图通过谈判在第乌取得一个要塞而未成功，但他确实设法结束了与卡利卡特的战争。1513年，在阿尔布克尔克怂恿下毒死了前任萨穆里之后，新的萨穆里将卡利卡特的一处地址赠予葡萄牙人供修要塞用，并给予葡萄牙人优先购买所有胡椒的权利。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再次到霍尔木兹，在那里他使葡萄牙人牢牢立住脚跟。他计划于1516年到红海，但因他被解职和去世而作罢。从马来亚到波斯湾，他建立起他的国家的政权。到1515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以及马六甲与霍尔木兹两个城市附近地区已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威。他们在关键地方建有要塞，他们的舰队对贸易路线有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未能使葡萄牙人的事业在财政上做到自给，老是抱怨人员、金钱和物资不足。然而，在他任总督期间，王室贸易无疑是取得了进展。

阿尔布克尔克不是没有错误。他很可能过高估计了马来群岛的财富，而他在远东的政策可能鼓励了太多的同胞到那里去。在葡萄牙的事务中，他把贸易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可能使人们较少地考虑与穆斯林的战争。他可能还过分强调需要那些阿尔梅达认为既费钱又无必要的要塞。阿尔梅达曾写信给国王说：“你拥有的要塞数目越多，你的力量就越弱。把你的所有兵力都布置在海上，因为如果我们在海上没有强大的力量，那么一切都会立刻变得对我们不利。”事实看来是，阿尔梅达被海上力量的丧失带来的灾难弄得惶惶不安。阿尔布克尔克指望基地能使舰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可能对要塞抱的希望太大，但他通常小心地调整他的政策以适应在东方代表葡萄牙的几千军人和数十艘船只的需要和能力。尽管他有错误，但他极大地改善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地位。他死后，他的继任者花了许多时间来尽力巩固他已取得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阿尔布克尔克任总督期间，王室在亚洲的贸易和行政管理都变得更井然有序。到1515年，王室贸易已成为一项日常工作。王室要求垄断某些项目的亚洲贸易。1520年颁布的印度法令将这些项目定为胡椒、生姜、桂皮、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紫胶、丝绸和天然硼砂。未经王室允许，任何人——基督徒、穆斯林、印度人或其他人——不得染指这些商品的贸易。禁止大部分王室官员做任何自己的生意。这些规定并不总是得到遵守，葡萄牙人和亚洲人都违反这些规

定。在早期，由葡萄牙官员来执行这项禁止私人做生意的法律特别难处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薪俸直至曼努埃尔一世晚期部分是以实物支付的。甚至在正式取消实物薪俸之后，王室也无法阻止官员们做生意。他们的薪水通常很少，有时入不敷出。腐败暗中渐渐吞噬了国王的税收岁入，使他无法付给仆从以优厚的薪俸：低薪俸促使产生更多的腐败现象和更大的私人贸易倾向。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官员中私人做生意似乎已变得相当普遍。亚洲商人在别无选择时才遵守这项法律，在其他时候看来他们常常置之不理或靠行贿来绕过这项法律。葡萄牙政府无法做到绝对垄断。到1550年，亚洲商人已完全打破垄断。包括胡椒在内的香料又再次沿红海通行。阿尔布克尔克给亚洲船只发执照的计划从来没有得到普遍执行。分散的葡萄牙巡逻舰队无法监督东方的所有商业贸易。强大的巡逻舰队通常只分布在印度西海岸和霍尔木兹附近。即使在那些地方，走私也是可能的。

对亚洲的王室贸易部分由设在里斯本的印度商行（India House）来组织，它监督葡萄牙在东方的大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每年，船只从里斯本出发到马拉巴尔去为国王装运香料。王室通常给这些航行的船只发特别执照；他们应该与战舰截然不同，印度法规定，他们不应夺取任何战利品，也不得偏离给船长规定的航线。向海外航行的船只带有金银锭和铜器那样的商品用以支付购买香料的费用；他们还给葡萄牙人带去武器和补给品。金银锭可能来自那些希望能在欧洲得到部分回程货物的商人。在东方，皇家官员通常以他们垄断的商品进行全部的王室贸易。王室长期以来一直以伽马在1502年定的价格在科钦购买胡椒。当这个定价低于市场价时就很难买到胡椒。运回国的货物数量年年各不相同，但是，人们认为各船的总载货量大约为3万（葡）担[5]看来就相当不错了。档案记载很不完整，但是看来几乎所有的船货都是胡椒，特别是在早期。在印度的葡萄牙政府派王室贸易船去摩鹿加群岛和其他地方，但是这样做是否大大增加了葡萄牙的高级香料的进口是值得怀疑的。一旦船货到达里斯本，王室一般把它们卖给商人，但是曼努埃尔一世也为自己运一些到安特卫普去。

葡萄牙在东方的政府发展与贸易方面的发展一样重要。行政机构更为严格。在亚洲供职的人的姓名要记录入登录名册中，还要记载他们到达东方的日期，应得的薪饷。如果士兵被罚款或官员的账目出现差错，在花名册中就要加以注明，以便政府可以扣留应付给他的钱。

一般说来，公务人员有存款余额，因为政府不久就拖欠东方公务人员的薪俸。积欠薪饷可能使葡萄牙士兵感到非常窘迫，因为看来王室通常既不给他发免费的衣服、武器，也不提供膳宿。士兵常常得自己买武器，但是如果他是向政府购买，他可以从他的薪饷中扣除。如果薪饷积欠严重，他事实上不付任何武器费用。

如果公务人员的薪饷被拖欠五分之一，往往会发生以下情况：第一，公务人员可能以一定的折扣将他的薪饷领取权出卖给某个有现金的人。尽管不合法，但一直是这样做的。从16世纪早期起，人们大量买下士兵们的薪饷领取权并运用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影响让政府全额付给他们这笔钱。第二，士兵可能力图找到一位有权势的保护人来保护他。葡萄牙在东方的士兵未按正规的连或营进行编队，而纯粹是依附于个别的指挥官。在战时，指挥官总是显得相当慷慨，以便吸引最好的人来服役。第三，如果士兵找不到保护人，他可能沦为乞丐。第四，他可能出卖自己的武器。第五，他可能开小差去当冒险家。在以上五种情况中，除了第二种——依附于保护人之外——所有其他情况都是非法的或对葡萄牙政权有危险。部分是为了去除这些诱惑，阿尔布克尔克鼓励士兵与印度妇女结婚。他将土地送给那些已婚定居者，希望他们及其孩子能通过种地或某种手工技能养活自己。这样，政府就可以不花分文而又有后备兵员。这一制度并未像阿尔布克尔克计划的那样成功地实行。有些地方从来就没有吸引过许多定居者；在某些地方，已婚定居者吵吵嚷嚷要求特权，这就要花费王室钱财。

阿尔布克尔克尽力改革行政管理制度。他严格会计制度，大力反对私人贸易，但从来没有能消灭腐败现象。他死后，腐败更加严重，而努力控制腐败的治理办法变得更为复杂。王室代表发现难于控制散居在亚洲沿海地区和海岛上的人。军事基地的官员特别容易违抗命令，有时对总督的命令不予理会。每个要塞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或司令官，管辖要塞及其邻近城镇。他通过两三种官员来管理事务：陆海军军官维持驻地的纪律并指挥作战；王室商务代理及其下属经管王室贸易、收税以及支付开支款；在葡萄牙人直接管辖城镇的那些地方，当地知名人士有时负责由亚洲人组成的政府中的大部分事务。在早期，葡萄牙人对其亚洲臣民没有什么兴趣，除非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曼努埃尔国王规定，所有的基督教徒，包括亚洲人和葡萄牙人在内，都应平等对待。但是，在东方的官员经常不顾这一敕令。据说，那里的葡

葡萄牙人自高自大，不同亚洲人进行社会交往，实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因此，引起许多抱怨。然而，即使在16世纪上半叶，这种不良现象也不普遍。在与亚洲人作战时，葡萄牙人有时很残忍；公平地说，他们的敌人和朋友有时和他们一样残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东方的葡萄牙人往往不守法纪。每个要塞都有一位葡萄牙法官（*ouvidor*）来处理其同胞的犯罪问题。他的副手和土著警察负责逮捕违法者。不论是在葡萄牙还是在东方，都不能逮捕缙绅（*fidalgos*）、骑士、法官、法医或医生，除非他们犯了死罪。在其他情况下，只能叫他们交保证金以限制其行动：在东方一般说来这就是一种软禁。要塞法官对奴隶和普通士兵有完全的司法裁判权。其他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向印度总督提出上诉。当民事诉讼涉及大笔金钱时，可以向总督提起诉讼。起初，印度的首席法官（*ouvidor-geral da India*）处理这些上诉案件，到1544年王室才建立印度高等法院（*Relacao*）或大法官法庭。

在果阿和科钦，葡萄牙殖民者很快获得选举市政会的权利。其他社区最终也获得同样的特权。该世纪后半叶，这些市政会有相当大的权势。他们监督当地的贸易和公共机构，包括医院。国家承担生病的公务员的医疗费用。在几乎每个要塞，国家都为葡萄牙人开办了医院并提供经费，但通常不参加管理。私人慈善机构也补充了这一保健事业。到1520年，葡属亚洲有了第一个慈善堂（House of Mercy）；半个世纪后，慈善堂的数目达到将近20个，分散在从中国到霍尔木兹的重要殖民地中。这些由富裕而又有文化的人组成的兄弟会所举办、以捐赠和遗产所资助的慈善堂帮助穷人，开办一些皇家医院，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些医院。他们还密切注视死去的葡萄牙人的财产。严格来说，接管然后出售这样的私人财产应是王室官员的事。售后所得应归死者在葡萄牙或别处的继承人所有，留出一定的数额来支付死者生前所欠债务和酬谢那些曾为他服务的*provedor*。慈善堂的关注有助于制止欺骗行为和财产流失。在早期，国家自己承担慈善工作：给“该国贫穷的基督徒和贫困的葡萄牙儿童”分发救济物。

葡属亚洲没有正规的、具有一套完整等级制度和彻底尊重惯例的文职部门。国王作为恩宠的标志授予官职：人们是根据国王认可的功劳大小获得官职，任命官职是对过去效劳的一种奖赏或者是对前途很有希望的一种承诺。任命官员以个人条件为依据，不是一批人在某一

官职系列中按部就班地晋升。他们在东方的成功与失败主要是个人的事。葡萄牙在亚洲的行政机关强调个人而不是体制。它的协调性很差，缺乏团结精神。官员之间的争执困扰着要塞。这样的争吵在阿尔布克尔克刚刚去世的那几年招致危险。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两个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但是这些葡萄牙人由于既无纪律又不认真努力，结果一个问题也未获解决。一个是要求在亚丁建立一个要塞并沿红海向前推进，另一个是关注在远东的扩张。1516年，第一个问题似乎很重要。埃及的一支新舰队已组成，虽然最终它一事无成，但在一段时间里构成威胁。葡萄牙人干得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两位总督于1517年和1520年领导了两次对红海徒劳的远征。1516年和1518年，葡萄牙的小舰队起航去封锁红海的入口：第一支舰队根本就没到达目的地，第二支舰队也无所作为。

葡萄牙人在远东取得了更多的成就。1512年到1520年是他们在东南亚扩张的鼎盛时期。阿尔布克尔克曾希望那里的贸易将给锡兰西部的战争筹措军费。征服马六甲之后，他采取措施重振那里的商业。他手下的人积极支持他所作的努力：很多船只从马六甲出发去同孟加拉、勃固、苏门答腊、吉打、爪哇、摩鹿加群岛、班达群岛、彭亨、帕塔尼、暹罗和中国进行贸易。1519年，葡萄牙人甚至力图找到一个神秘的黄金岛，据说位于苏门答腊的西南部。这些葡萄牙航海者中大部分人是守规矩的，但他们有时袭击穆斯林船只。有关他们这种行为的消息或传闻使他们于1518年在孟加拉、1521年在勃固受到冷遇。

这次扩张也许太快，无疑很难控制。市场供货太多，葡萄牙人想要出售的商品价格下降而引起不满。从贸易中所得的大部分利润进入私人腰包，公众不满的呼声同样很高。有一两次，王室和总督也稍作努力企图维护王室对马来群岛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他们不敢采取强硬行动，因为害怕使在马六甲的商人破产。那个城市的葡萄牙人还面临军事威胁：1513年，他们不得不击退一次从扎巴拉开来的一支大型爪哇舰队的进攻；从1512年到1526年，他们经常遭到马六甲前苏丹的追随者的骚扰。马来人阴谋造反，死亡以及葡萄牙官员之间的争吵，增添了更多的麻烦。1520年以后，灾难接踵而来，葡萄牙人的扩张也就逐渐停止了。西班牙人对香料群岛——摩鹿加的兴趣增长使葡萄牙人的扩张受到严重挫折。西班牙声称，由托德希里亚斯条约所确定的界线应环绕地球延伸，摩鹿加群岛就在分配给它的范围内。为了避免

向葡萄牙当局公开挑战，西班牙国王没有派船通过绕好望角的路线去亚洲，而是宁愿寻找一条穿过新世界去东方海域的海峡。从哥伦布时代起，人们就已经在寻找这条海峡，但未获成功。1518年，曼努埃尔获悉，很快就要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正在筹备一支舰队，由斐迪南·麦哲伦指挥，打算经由当时还未发现的西行路线去香料群岛。葡萄牙政府感到惊恐。麦哲伦是一位葡萄牙人，最近他已在为西班牙效力。他曾在东方度过几年，1511年参加过夺取马六甲。如果他未能找到一条新路线，他可以经由原来已经走过的路线去那里。于是，国王着手对付来自西班牙的挑战。同时，他雄心勃勃地要在亚洲增加实力，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在那里是很有进取心的。1519—1521年间，他命令在东方建立7座新的要塞：在中国、摩鹿加群岛、苏门答腊、马尔代夫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岛每处将各修一座，就像在印度北部港口焦尔和第乌一样。其中在中国和摩鹿加群岛修建的那两座要塞显然是要用作抵御西班牙进犯的堡垒。麦哲伦的航行已作过描述^[6]；这里我们可以着重提到，在西班牙船只离开后，一支葡萄牙远征军到达蒂多雷，俘获了留下来的人，没收了他们的货物。1522年6月，葡萄牙人开始在摩鹿加群岛中的另一个岛屿特尔纳特修建要塞。

西班牙人未能在香料群岛保住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但葡萄牙人担心新西班牙远征军会航行到东方来。1524年，双方代表在巴达霍斯与埃尔瓦什之间会晤，以解决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问题；这些讨论很快沦为争吵而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在会谈结束之前，葡萄牙的新国王约翰三世给瓦斯科·达·伽马发布了透露内情的命令。伽马于1524年4月起航去印度当总督。自从约翰三世于1521年登基以来，他采取了一项比曼努埃尔一世更为谨慎的政策。面对来自西班牙的连续不断的威胁，他越来越小心谨慎。总督接到命令，拆毁在印度、锡兰和苏门答腊的4座要塞，但又叫他在巽他，即爪哇西部修建另一座。这些命令表明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事业的财务状况。1524年前，王室每年在欧洲从出售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所得的收入是否至多接近于在里斯本和安特卫普出售胡椒所得的钱的四分之一，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诚然，王室代理商在亚洲出售高级香料，但他们也出售胡椒。尽管从1511年到1520年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活动扩大了，但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的财政基础很可能仍然在1502年伽马就提出的胡椒上。更明显的是，葡属东印度——葡萄牙人用来泛指他们所征服的亚洲的一个名字——严重依赖从东方运到西方的胡椒的王室贸易以及欧洲市场上

胡椒价格的稳定性。其中的任何一项出了乱子都很可能会使葡萄牙的亚洲政府陷入困境。由于本国的财力有限，不可能给予什么帮助。胡椒的重要性显然能解释发布这一敕令的原因——一方面要在西班牙人很可能来到的胡椒产地巽他修建一座要塞，同时又要放弃其他几座要塞。1525年，国王很可能给总督发出过再次强调巽他的重要性的命令。王室一如既往地致力于防止胡椒供应出现竞争，但这时看来已准备放弃对摩鹿加群岛的高级香料的公开垄断。在知道另一支卡斯蒂利亚舰队即将起航去东方的情况下草拟了1525年的敕令。卡斯蒂利亚舰队于1525年7月起航，但是，7艘船中只有一艘抵达摩鹿加群岛。这艘船是旗舰，于1526年10月到达盖洛洛（Geilolo）岛附近海面。该船于1528年得到来自新世界的增援，并得到蒂多雷苏丹的帮助。船上的船员在1529年10月向葡萄牙投降前，造成很多麻烦。5个月前，查理五世皇帝在萨拉戈萨条约中已放弃了他对摩鹿加的所有权的要求。^[7]

在此期间，葡萄牙在中国和马六甲附近已遭到失败。1521年，中国人断绝了与葡萄牙的关系；次年，他们击退了一支小舰队，该舰队的指挥官来自葡萄牙，带有要在广州附近建立一座要塞的命令。1521年，葡萄牙人在夺取亚齐和宾坦时遭到失败。第一个地点是北苏门答腊正在兴起的一个苏丹国的首都，第二个是马六甲前苏丹的岛上据点，位于新加坡海峡的东南部。1521年，葡萄牙人在苏门答腊北部的巴塞建立了一座要塞，但在1524年又予以放弃。次年，宾坦的马来人围攻马六甲。直到1526年，从宾坦来的马六甲前苏丹被赶走之后，马来水域的形势才好转。但这时亚齐对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构成威胁，1526年到1529年之间，三次试图在巽他建立一座要塞均未成功。

在锡兰以西的地方，葡萄牙人遇到的主要麻烦是霍尔木兹造反和与古吉拉特以及在马拉巴尔海岸进行的战争。在马尔代夫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岛修建要塞的计划也很快失败了；在别处，在占领科伦坡的要塞6年之后，于1524年将其放弃；1525年，在卡利卡特的要塞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527年，灾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一年，对总督职位的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然而，16世纪20年代也不完全是那样凄凉无望。从1524年到1531年任葡属印度财政监督的阿方索·梅希亚改进了行政管理方法。洛波·瓦兹·德·桑巴约这位1527—1529年的无争议的总督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1523—1528年之间，葡萄牙设法

派出4支舰队去封锁红海入口。他们还在对第乌海军的战争中获胜，结果1529年在古吉拉特以惨败告终。

到那时，葡萄牙在东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作为一项国家的事业，葡属亚洲已开始缩小：其统治者的目光已变得狭窄。在长达9年的总督任期（1529—1538年）中，努尼奥·达·库尼亚将其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印度的西海岸，他在那里以沉重的代价换得小小的收获。他使葡萄牙人更深地卷入当地事务中，他的政策不如阿尔布克尔克的政策协调一致。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葡萄牙已大大衰落：尽管青铜时代已经到来，有些人仍然把它误认为是黄金时代。库尼亚于1528年起航去印度。3000名士兵随同前往：据编年史家卡斯坦埃达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壮观的随行队伍在葡萄牙的旗帜下前往亚洲。他于1529年到达印度，很快就在马拉巴尔海岸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1531年，他在离卡利卡特6英里的查利亚姆建立要塞。起初，他没有忽略红海：从1531年到1534年，舰队每年起航去封锁红海入口。他下令在第乌修建一座要塞，在他任职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全神贯注于这一任务。1531年，他率领葡萄牙有史以来在印度集结的最强大的舰队去第乌：据说船只总数达100多艘，载有8000人，其中有3000名葡萄牙人。这支军队除了炮轰城市和控制附近海岸之外未有建树。葡萄牙人于1532—1533年再次袭击古吉拉特海岸。这个苏丹国那时处境非常艰难，因为它正与葡萄牙人和印度北部新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同时作战。1533年，苏丹想在坎贝湾东岸的伯塞恩给葡萄牙人修建要塞用的土地，以此来收买他们。不到两年之后，库尼亚又得寸进尺，强行要求签订一个条约，在第乌给他一处修建要塞的地方。

葡萄牙人在第乌获得了他们早已垂涎的立足点之后，古吉拉特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争端并未结束。双方互不信任。1537年，苏丹在第乌港与葡萄牙人的混战中被杀。然后，在两位要求继承王位的人中，库尼亚力图支持其中的一个。由于总督支持的候选人被其对手击败，葡萄牙人在第乌的处境变得严峻起来。与新苏丹签订的一项休战协定仅仅短时间内缓和了紧张局势。1538年6月，古吉拉特人围困第乌，在最近的一年期间，葡萄牙人占领了该城及其要塞。到8月，只有要塞还保留在他们手中。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古吉拉特人先前曾向奥斯曼帝国求援。1516年至1517年，奥斯曼帝国已征服了埃及和叙利亚。土耳其人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们准备采取行动。1538年9月4日，一

支大型土耳其舰队在第乌港下锚停泊。^[8]1508年的险情已经再现。强大的敌人已经联合起来。土耳其人到达印度表明葡萄牙人在执行阿尔布克尔克的计划中犯了多么大的错误。那位伟大的总督曾坚持要在亚丁和第乌建立要塞，但他把亚丁放在第一位，并且他强调需要有海军在红海采取军事行动。在16世纪30年代，王室和总督显然把心思放在第乌的要塞上。他们对红海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在1535年和1538年之间，库尼亚没有派一支舰队到那里去。1538年9月，他忽视红海看来得到了报应。对葡萄牙人来说幸运的是，由于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土耳其舰队于1538年11月离去。第乌保住了。1539年，一位新到任的葡萄牙总督同古吉拉特达成和解。这时葡萄牙人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红海，他们打算在那里袭击土耳其舰队。他们还希望占领亚丁。1541年一支远征军确实航行到了红海，其中一些人还到达苏伊士，但他们发现防御太严，无法袭击土耳其人的海滩走廊地带。

16世纪30年代在锡兰以东的地区经历了一些危机，但没有一个是难以克服的。马六甲在1534年和1537年之间经历了同柔佛和亚齐的战争，但都安然度过而没造成多少损害。在摩鹿加群岛，葡萄牙人经历了更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贪得无厌的特里斯唐·德·阿泰德任特尔纳特要塞的指挥官期间。在他掌权这段时间里（1533—1536年）摩鹿加群岛大部分都起来反抗葡萄牙人，差一点将他们驱赶出去。阿泰德的继任者安东尼奥·加尔旺不得不平息这次起义。他还做了相当多的事情。他在特尔纳特的4年中，深受该国人民的爱戴，因此，据说那里的人民称他为该国之父。1533年，葡萄牙人在孟加拉遭到敌视；只有当该国统治者受到敌人猛攻时才变得友好起来。尽管在东南亚和印度发生骚乱，但在这10年中，葡萄牙的私人贸易很可能在东方海域的很多地方都增长了。国家可能受损，但一些私人却生意兴隆。

葡属亚洲的大问题仍然是财政问题。虽然阿尔布克尔克本来打算为政府提供大量的岁入。但他从来没取得成功：他的有些计划从未执行过，而有些计划又过于乐观。但至少他意识到葡属东印度必须筹集足够的钱来做到自给。他死后，葡萄牙政府对这一问题并不总是给予足够的考虑。16世纪30年代，它将大量军费花在海军舰队和陆军上，以此推行它那徒劳无益的计划。这就增加了它对经费的需求而又未能努力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官员中的腐败使问题更加严重。在16世纪，葡萄牙的历代国王从来没有得到他们在亚洲应得的全部岁入，而他们

还得经常超额付出商品和劳务费用。约翰三世力图制止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但是很难控制那些远离葡萄牙而易受强烈诱惑的人。看来改革很少取得持久的成功，因为在1520年前，告密者说在亚洲的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了。结果，16世纪30年代的额外开支迫使国王大量借款，且几乎无力偿还。他负债累累：1544年，欠了将近200万克鲁扎多，这是一笔巨款。16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经费缺乏困扰着葡属亚洲政府，它的虚弱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事。直到库尼亚离职时，葡萄牙的亚洲政权的衰落程度比表面看到的更加真实而严重。此后，该政府经费的严重短缺暴露了真相。兵员缺乏也变得很严重。1530年后，王室军队中开小差的现象似乎增多了。勃固和暹罗战争的爆发很可能轻轻地触及了这一问题，许多葡萄牙人在那里当雇佣兵。此外，可能还应强调指出精神上的衰退。虽然葡萄牙人仍然可以很好地打仗，但他们似乎已丧失了许多早期在东方的那种热情。这时很少有人谈论消灭穆罕默德。部分原因是，随着葡萄牙人终于在商业上和其他方面与穆斯林人有了更多的接触，自然就没有那么好战了。

16世纪40年代，两位总督力图改善财政状况。马丁·阿方索·德·索萨（1542—1545年任职）通过在果阿使货币贬值并派西芒·博特略去改革马六甲的关税收取办法来为国王筹款。在葡萄牙属地以外的地方，总督干预印度最靠近果阿的一个邦比贾布尔的政治事务，以便为他自己和王室谋利。索萨的继任者是唐·吉昂·德·卡斯特罗，他希望削减开支。由于与古吉拉特重新开战，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索萨还是卡斯特罗都未能找到解决葡萄牙财政困难的答案。1548年卡斯特罗去世时，国王仍然在印度卷入代价昂贵的纠纷之中，在国内负债累累。1552年，他欠债将近300万克鲁扎多。

有两件事情很可能将葡萄牙在东方的事业从加速衰退中挽救过来。一件是宗教复兴；另一件是葡萄牙人在亚洲的私人贸易的发展。

神职人员们在东方一直为葡萄牙人服务。圣方济各会修士们1517年在果阿建立了一座修道院。1518年，该城成为主教管辖区中心所在地。在早期，教会主要对葡萄牙人及其家庭行使职责；传教工作不是神职人员的主要活动之一，有时他们的行为在贵族（*fidalgos*）中或相互间未能维持高水准。在方济各·沙勿略于1542年到达印度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沙勿略是耶稣会的第一批会士之一，在其后的10年中，他广游亚洲，直到他在中国海岸外的一个岛上去世时，他一直

“贫穷而卑微，但并非不困惑”^[9]。在远东逗留期间，沙勿略给葡萄牙人一种新的理想：以改变宗教信仰来代替行将消亡的宗教战争思想；他还教他们接受更为严格的宗教纪律。

沙勿略及其继任者取得的成就甚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会士和其他修道会成员们更密切注意亚洲的葡萄牙人的信仰和道德。1557—1558年，在科钦和马六甲创建有副主教职权的果阿大主教辖区，在执行这一任务方面给了一些帮助。1560年在果阿建立宗教法庭给予了更强有力的帮助。修道会注重教育并修建了许多教堂，在世俗政权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像康斯坦丁诺·布拉干萨那样的虔信宗教的总督任职期间（1558—1561年），他们使果阿附近的许多印度人皈依了基督教。该邦颁布法令，给予改变信仰的特权。在葡萄牙属地以外的地区，从索科特拉到日本，宗教界都获得成功。1542年以前，在亚洲的葡萄牙神职人员中很少有人对他们周围的环境感兴趣，但是，耶稣会会士和其他修会成员这时都学会了亚洲语言并对亚洲人的信仰和教义作了一些研究。在有些地方，他们还尽力使统治者改变信仰。他们认为，要是统治者被争取过来，他的臣民就会跟着他改变信仰。在别的地方，他们在下层人民中努力传教。沙勿略本人对科摩林角海岸的贫苦渔民特别关心，给他们中的许多人施洗礼。其他耶稣会会士也进行这项工作：据说1552年那里的基督教徒达6万人，有30个大教堂。在锡兰，年轻的国王科特于1557年成为基督教徒。1579年，最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派人去邀请一些有学问的神职人员。3名耶稣会会士怀着很高但是错误的希望于1580年到他的宫廷去。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多明我会的修士们无所作为，但他们很可能是1562年在小巽他群岛中的索洛开始建立一个传教团。在摩鹿加群岛，基督教几经波折，虽然它从许多地方被赶走，但是，在安汶，1580年都还在坚持着。在中国，1583年前传教士没有取得进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地点是日本，特别是在九州岛。到1580年，在日本有85个耶稣会传教士。据报道，皈依基督教的人数达15万人。这些基督教徒中六分之五住在九州，大部分是在已改信基督教的领主的岛屿上。到1583年，据估计，整个亚洲皈依基督教的人达60万。

在耶稣会会士们以传教士的热情努力传教的同时，葡萄牙的私商也在亚洲各港口之间开展兴盛的贸易。16世纪后半期，这种商业很繁荣，在1580年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王室没有分享到这一

成果。它从来没有能控制住亚洲的私人贸易：它顶多收取点关税，而且经常是一无所获。它的注意力集中在从亚洲到欧洲的贸易上。1550年后，由于费用很高，加之阿拉伯人的竞争，这种贸易的利润较少。在16世纪70年代，国王甚至把两个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垄断权包租出去。只有一种私人贸易受到王室的强烈影响，那就是对日贸易，它可能是所有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一种。

葡萄牙人很可能在1543年发现了日本。之后他们很快开始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贸易，当时的情况使这种贸易对他们有利可图。中国禁止其臣民到海外，而且自1480年以来已对日本人关闭了它的港口。然而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日本又需要中国的丝织品。走私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一部分，供应不足的部分使葡萄牙人获得高额利润。葡萄牙人于1555年在澳门获得永久立足点之后，他们加强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从那时起，他们与中国当局的关系逐渐改善。在日本，葡萄牙人与九州签订了重要的贸易合同。1571年后，他们主要航行到该岛的新港口长崎；直到1590年，该城的政府实际上掌握在耶稣会会士和航海企业主管人手中。到1550年，葡萄牙人与日本的贸易已为王室所垄断。每年，国王或其印度总督把贸易额分配给在中日之间航行的船长。有时王室出售这段航行的特权：即使它不这样做，关税也给它带来一大笔利润。航海所得的岁入成了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是无法制止葡属东印度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

由于葡萄牙在欧洲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而更加需要新的收入。葡萄牙国王原来主要依靠安特卫普贷款，但是，经过155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那里的金融家的贷款能力更低了。甚至在此之前，缺钱就使得葡萄牙在东方的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1552年，土耳其人企图夺占霍尔木兹，但未成功。其后两年中，葡萄牙人在波斯湾与土耳其人的两次海战中取得一些胜利。但是，他们在红海就像第一次围攻第乌之后一样，没有进行反攻。1554年与1580年之间，他们主要忙于在锡兰和印度西海岸进行小规模战争和战役。1539年后，葡萄牙加快了对锡兰的干预行动。起初是为了保护对葡萄牙人友好的科特国王；后来这种干预行动是受传播基督教信仰的愿望的影响。战争和围攻时而中断葡萄牙人与僧伽罗人的关系史。到1580年该岛成了葡萄牙政府的费用昂贵的包袱。在印度的战争也增加了王室的财政负担。除了别的以

外，它还使得有必要在达曼、曼加洛尔、霍纳瓦和巴斯鲁尔（Basrur）建立要塞。

在马来群岛，葡萄牙人遭到多次进攻。1550年和1580年之间，马六甲不得不对付5次猛攻，其中3次是由亚齐发起的。亚齐正力求控制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1571年葡萄牙本土政府试图通过为马六甲设立一个单独的总督职位来改善事态。拥有这一职位的人很可能原打算征服亚齐。缺乏财力使这一计划失败。在16世纪70年代后期，葡萄牙人和亚齐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海战，特别是在新加坡海峡附近，葡萄牙人3次打败敌人。危险解除了，但并未根除。在摩鹿加群岛，连续不断的战斗和争端使葡萄牙人于1574年撤离特尔纳特的要塞，不过他们在蒂多雷和安汶仍然维持一些据点。西班牙人对西太平洋的兴趣是对他们在东南亚的又一个威胁。1542年，一支远征军离开墨西哥去“西部岛屿”建立一个殖民地，这个地方后来叫做菲律宾。这次远征失败了。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于1564年才组织了另一次远征。这支远征军由4艘船和350人组成，在米格尔·洛佩斯·德·拉加斯皮的指挥下从新世界出发。这些西班牙人于次年抵达菲律宾，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在宿务岛建立了一个定居点，然后慢慢地将他们的势力扩大到其他岛屿。1569年，葡萄牙人力图驱逐西班牙人，结果自己被赶走。两年后，拉加斯皮占领了吕宋岛的马尼拉。与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军事基地不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的主要是殖民地。然而，16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一位野心勃勃的总督统治期间，西班牙人曾想出一个征服中国的愚蠢计划。在同一时期，他们也试图在文莱获取权力，但成效甚微。尽管有这些计划，菲律宾还是渐渐安定下来，建立了正规的西班牙殖民体制。1583年，在马尼拉建立了检审法院。158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这一消息于1581年传到果阿，来自菲律宾的对葡萄牙属地的任何军事威胁都随之消失。在那里或在亚洲的任何其他地方，这一事件都没有引起强烈抗议。葡属东印度和平地递交到西班牙的菲利普手中。菲利普承诺，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领地仍将保持原来的组织机制。

菲利普控制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政府，但那个政府已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的确，它的显赫遗风犹存。要塞的数目从来没有这么多；政府机构非常复杂。然而，该国逐渐贫弱。它老是负债，如果它必须装备一支特别的远征军，通常感到非常窘困。它无法完全掩盖其尴尬的

处境，即使最贫穷的士兵也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且，对此有特别受人赞同的解释。根据他们的看法，所有的坏事可以归纳为两件：政府的贫困和官员的不法行为。这种看法有些道理，但它未能完全说明国家衰退的原因。早在阿尔布克尔克时期就存在腐败和经费短缺。实际上，该国的实力从来就没建立在充实的国库和纯洁的政府基础之上。更可能的是，在16世纪初，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依靠两个基础：国王与其官吏之间目的的统一和葡萄牙舰队的实力。

统一至关重要。印度与葡萄牙距离遥远不仅使国王难于控制东方的臣民，而且他因此几乎不可能迫使他们给予任何长期的支援。同时，贵族和官员们常常对权利抱有奢望。除了合法的特权之外，他们有时要求得到对皇家军事指挥官的咨询权。如果指挥官拒绝听从贵族的意见，就有可能遇到他们设置的障碍甚至可能被解职。最严重的是，贵族、骑士和王室官吏经常认为他们有得到国王奖赏的特权。他们往往把东方的职位看作是对他们过去效劳的奖赏。结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一般通过干预贸易或行政管理，以损害国王的岁入来赚取尽可能大的赏金。君主远在葡萄牙，无法制止这种不法行为。平民可能严重妨碍葡萄牙的东方政府，有时他们可以使其几乎瘫痪。如果国王想要在亚洲取得成功，如果他在那儿的政府要繁荣兴盛，平民不仅必须赞同他的目标，而且必须自愿地帮助达到这些目标。在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在东方的葡萄牙人似乎已有一个广泛一致的目标。在较小的问题上，如像一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或者是战利品的分配，他们常常意见相左。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在亚洲是为了同穆斯林作战并夺走他们的生意。在这个大问题上，国王、商人、军事领导人和神职人员都能达成妥协。在早期，东方的葡萄牙事业的总目标同时含有自私的和非自私的欲望而无有意识的自相矛盾。在亚洲，从贸易中赚取利润似乎就是狠狠打击穆斯林，而打击穆斯林似乎就是生财之道。

在曼努埃尔国王统治时期，有两个因素给予这种团结一致以实际的力量。第一个因素是葡萄牙人生活的活力；第二因素是国王对海外事业的指导。在16世纪初，葡萄牙国内轰轰烈烈的活动可与葡萄牙人在亚洲和非洲显示的活力相提并论。曼努埃尔式的装饰，吉尔·维森特的戏剧，诗歌方面著名的试验，古典研究的扩展和航海科学、法律与行政管理的进步全都始于这一时期。在亚洲，国王的控制增强了战

斗力，因为曼努埃尔至少防止了臣民分散活动而造成灾难性后果。精神团结、由一人领导，使葡萄牙人在1500年与1520年间横扫东方海洋。然而，在这段时期的末期，意志力已开始削弱。东方的事务比国王起初设想的更复杂。职责和兴趣不是在每一场合都能巧合。虽然穆斯林被消灭了，但葡萄牙的东方政府并不总是能赚钱。同时它又需要赚钱，因为没有钱它就无法生存。阿尔布克尔克力图解决这难题，但他取得的成效有限，他的方法为助长腐败开辟了道路。他死后，国家政策变得混乱不堪，更加含糊不定。与此相对应的是，平民却更不容易受国王控制。到1540年，原有的理想和利益的平衡状态几乎完全消失了。宗教战争的思想隐匿起来：除了一种模糊的意义，大多数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已不再把葡萄牙在东方的事业看作是十字军圣战。在危急时刻，葡萄牙人一般仍然会团结起来保卫国王的要塞，葡萄牙属地在受到进攻时仍然能进行坚强的防御。平时，平民们主要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奔波。由于失去了平民的密切支持，葡萄牙的东方政府衰落了。在16世纪70年代，它只能保卫属地，尽力在各处捞点小小的好处。虽然葡萄牙人保持了他们的活力，这表现在16世纪后半期的传教活动和广泛的私人贸易，而国家在这时却处于次要地位。

这样，到1580年，葡萄牙的亚洲政府虚弱无力，它所保留的权威主要是归于它的势力的第二个基础——舰队。葡萄牙人早期的成功表明，舰队和要塞能用于控制亚洲的一部分海上贸易。在16世纪后半期舰队使葡属东印度仍然具有一些影响，在1595年荷兰人到达东方之前，它未受到严重的挑战。即使在那时，其后150年是解决葡萄牙人所给予的教训的时期：在整个那段时期，海上力量都是欧洲人在亚洲的势力的主要基础之一。

（曾佑昌 译）

[1] *samuri*这个头衔来自马拉雅拉姆语 *tamaturi*或 *tamuri*，意为海王（*sea king*）。这个头衔的葡萄牙文正式译名是 *Samorim*。

[2] 葡萄牙人在1503年已在科钦修建了一座木头要塞。

[3] 参见本书边码第520、530页。

[4] 参见本书边码第520页。

[5] 1（葡）担（*quintal*）重量为128阿拉特（*arrateis*）。1阿拉特（*arratel*）的新重量为16盎司，等于1英镑。

[\[6\]](#) 见本书边码第568页。

[\[7\]](#) 参见本书边码第569页。

[\[8\]](#) 参见本书边码第521页。

[\[9\]](#) J. 布罗德里克 (Brodrick)：《圣·方济各·沙勿略》（伦敦，1952年），第526页。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bo, 奥布, 154, 155

Absolutism, see Monarchy; Political theory, 专制主义

Abu Su' ud, Islamic theologian, 阿布·素欧德, 伊斯兰教神学家, 532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耶稣会传教事业, 298

葡萄牙谋求结盟, 520, 530

“祭司王约翰”, 592, 596

Academies, learned,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学院（学会）, 15、16世纪的, 437

Acapulco (New Spain), trade with Manila, 阿卡普尔科（新西班牙）, 与马尼拉进行贸易, 583

Acheh (Achin), 亚齐, 606, 608, 611—612

Acquaviva, Claudio, fifth general of the Jesuits, 阿夸维瓦, 克劳迪奥, 耶稣会士第五任总会长, 300

Act of Appeals (1533), 上诉法案, 234, 463

Act of Dispensations (1534), 豁免法, 463

Act of Six Articles (1539), 六条款法案, 240—242

Act of Succession (1534), 继承法, 236

Act of Supremacy (1534), 至尊法案, 234; (1559), 250

Act of Uniformity (1552), 划一法, 245; (1559), 250

Adamites, Hussite sect, 裸体派, 胡斯分裂派, 191

Adashev, favourite of Tsar Ivan IV, 阿达舍夫, 沙皇伊凡四世宠臣, 551—554

Adashev, father of the above, 阿达舍夫, 前者之父, 554

Adelmann, Bernard, 阿德尔曼, 伯纳德, 104

Aden, 亚丁

葡萄牙企图占领, 520, 599, 604

为土耳其人占领 (1538), 521

‘Adiljevaz, raided by Safawids (1551), 阿迪尔杰瓦兹, 受萨非王朝侵袭, 525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在查理五世的欧洲领土内, 308—312, 315—318, 438—440, 444, 477—480; 西西里, 329—330; 米兰, 329—330; 西班牙会议, 332—333, 445, 449, 572; 西班牙影响的增长, 333; 城市同盟, 440—441

皇家会议, 444—446

皇家大臣, 446—447

财政与税收, 447—449

司法与法律, 449—452

政府政策与法令之实施, 452—454

地方行政, 453—454

在东部王国, 465—471

苏莱曼在埃及进行之改革, 511—512

在俄国的执政阶级, 541; 御用会议所进行的改革, 551—554; 伊凡四世的改革, 554—555

西班牙属下的美洲, 563—565, 569—570, 570—571, 588—590; 坚持皇家统治, 571—574; 西印度群岛会议, 572—573

在葡萄牙, 613; 在亚洲的葡萄牙人, 600—604, 606—607

Adrian VI, Pope (Adrian of Utrecht), 阿德里安六世, 教皇(乌德勒支的阿德里安), 70, 90, 252, 347—648

在卡斯蒂利亚作摄政者, 319, 333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斗争的关系, 342

Adwert Academy, 阿德沃特学院, 437

Aegean Islands, lost to Venice (1540), 爱琴群岛, 陷于威尼斯之手 (1540), 520

Aelian, on the art of war, 艾利安, 论战争的艺术, 483

Aemilius, Paulus (Paolo Emilio), historian, 埃米利乌斯, 保洛斯, 历史学家, 371, 384

Aeneas Sylvius, see Pius II, Pope, 埃涅阿斯, 西尔维乌斯

Africa, 非洲

耶稣会传教事业, 298—299

该洲的环航, 395

Africa, East, 非洲东部

土耳其人对海岸的袭击, 530—531

阿拉伯人对葡萄牙的抵抗, 596—597

Africa, North, disputed by Christians and Turks, 非洲北部, 为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所争夺, 324—326, 349, 517—518, 531—532

Africa, West,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非洲西部, 对美洲的奴隶贸易, 582—583, 585—587

Agricola, Mikael, bishop of Abo, 阿格里科拉, 米卡埃尔, 奥布主教, 154—156

Agriculture, 农业

农业经济的变革, 23—50; 在德意志和帝国, 29—36; 在英国, 36—44; 在法国, 44—47;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 47—50; 西班牙的落后状况, 321

在伊凡四世的俄国劳动力的缺乏和衰落, 556, 561

在新世界, 563, 566—567, 574, 578, 581, 587

Agrippa, Cornelius, 阿格里帕, 科内利乌斯, 404

Ahmed, Khan of the Golden Horde, 艾哈迈德, 金帐汗国可汗, 536

Ahmed, Ottoman pasha of Egypt, 艾哈迈德, 奥斯曼的埃及帕夏, 511

Ahmed Pasha, grand vizier, 艾哈迈德·帕夏, 首相, 524, 529

Aigues Mortes, negotiations (1538) betwe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I, 艾格莫尔特, 查理五世与弗兰西斯一世在此谈判 (1538), 220, 352

Aix-en-Provence, Calvinism in,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加尔文宗在此, 224

Akbar, Mogul emperor, invite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阿克巴, 莫卧儿皇帝, 邀请基督教教士, 610

Akhaltzikhe (Georgia), 阿哈尔齐赫 (格鲁吉亚), 524

Akhlat, raided by Safawids (1551), 1551年萨非王朝袭击阿赫拉特, 525

Akinjis, volunteer horsemen in Turkish service, 阿金吉斯骑兵团, 510, 512, 514—515

Akkerman, in Turkish possession, 阿克尔曼, 在土耳其人占领下, 522

Alamanni, Luigi, 阿拉曼尼, 路易吉, 501

Albacina, Capuchins at, 阿尔巴基那, 嘉布遣会在此, 280

Albert I of Habsburg, king of the Romans, king of Hungary and Bohemia, 哈布斯堡的阿尔贝特一世, 罗马人的国王,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191

Albert of Mainz, see Mainz, Albert of, 美因茨的阿尔贝特

Alberti, Leon Battista, Italian architect, 阿尔贝蒂, 莱昂·巴蒂斯塔, 意大利建筑家, 402

Albuquerque, Afonso de, 阿尔布克拉克, 阿方索·德

葡萄牙的东方总督, 591, 598—602, 604, 608

攻陷霍尔木兹 (1507), 597

对与穆斯林贸易的态度, 599, 613—614

被罢免和去世 (1515), 600

加强海上实力, 600

企图改革行政, 602

Alcala, university of, 阿尔卡拉大学, 292, 427—428

Alchemy, persistence of interest in, 炼金术, 对此术兴趣的持续, 403—404

Alciati, Andrea, Italian scholar, 阿尔齐亚蒂, 安德烈亚, 意大利学者, 372

Alciati, Giovanni Paolo, and Anti-Trinitarianism in Poland, 阿尔恰蒂, 乔凡尼·保罗和波兰的反三位一体说, 206—207

Aldrovandi, Ulissi, naturalist, 阿尔德罗迈迪, 乌利西, 博物学家, 392, 407

Aldus, see Manutius, Aldus, 阿尔杜斯

Aleander, Girolamo, cardinal, 阿莱安德, 吉罗拉莫, 枢机主教

与伊拉斯谟, 81, 90

在沃尔姆斯议会 (1521), 81—82

与法兰克福临时协定（1539），176

在巴黎讲学，418

Alencon, clandestine printing at, 阿朗松，在此秘密印刷，
213

Alencon, duchy of, united with France（1525），阿朗松公
国，并入法国（1525），440

Aleppo, 阿勒颇，511, 524—525, 531

Alexander I, king of Poland, grand duke of Lithuania, 亚
历山大一世，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186, 473, 538—539, 547

Alexander VI, Pope（Rodrigo Borgia），亚历山大六世，教皇
（罗德里戈·博尔吉亚），252, 539

Alexander of Ville-Dieu（Dolensis），his school
textbooks, 维莱-迪约（多伦西斯）的亚历山大，他的教科书，416,
418, 424—425

Alexandria, the spice trade at, 亚历山德里亚，在此的香料
贸易，531

Alexandrovskaya Sloboda, 亚历山德罗夫斯卡雅·斯洛博达，
554

Algiers, 阿尔及尔

查理五世远征的失败（1541），181, 325, 336, 351, 506,
531

为西班牙攻陷（1516），324；为海尔丁·巴尔巴罗萨所控制，
324；在土耳其宗主统治下，517, 532；海盗与土耳其人结盟，518,
520；攻打马尔他（1565），532

‘Ali Beg, Turkish admiral, 阿里·贝格，土耳其海军上将，
531

‘Ali Pasha, beglerbeg of Buda, 阿里·帕夏，布达总督，526

‘Ali Re’ is, Turkish admiral, 阿里·雷伊斯, 土耳其海军上将, 530

Allstedt, Münzer at, 阿尔斯太特, 闵采尔在此, 86—88, 111

Almaden, mercury mines at, 阿尔马登, 在此的水银矿, 313

Almagro, Diego de, companion of Pizarro in Peru, 阿尔马格罗, 迪戈·达, 皮萨罗在秘鲁的伙伴, 575, 576—578

Almaza, Miguel Perez de, royal secretary in Spain, 阿尔马萨, 米格尔·佩雷斯·德, 西班牙皇室大臣, 447

Almeida, Francisco de, Portuguese viceroys in the east, 阿尔梅达, 弗朗西斯科·德, 葡萄牙东方总督, 596—598

Almsgiving, see Social relief, 施舍

Altdorf, 阿尔特多夫, 109

Altenburg, reform in, 阿尔滕堡, 在此的宗教改革, 86

Altieri, Baldassare, and Protestantism in Vienna, 阿尔铁里, 巴尔达萨雷, 与维也纳的新教, 262—263

Altomünster, 旧明斯特, 104

Alva,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3rd duke of, 阿尔瓦第三大公, 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65, 329, 357

Alvarado, Pedro de, 阿尔瓦拉多, 佩德罗·德, 569

远征危地马拉 (1523), 567; 在秘鲁, 576

Alvarez, Emmanuel, Jesuit, 阿尔瓦雷斯, 伊曼纽尔, 耶稣会士, 425

Amadis of Gaul, 高尔的阿马迪斯, 381

Amasia, 阿马西亚, 513, 516, 528, 530

Amazon, river, descended by Orellana (1541—1542), 亚马孙河, 奥雷利亚纳顺流而下, 587

Amboina, Portuguese at, 安汶, 葡萄牙在此, 612

Amboise, the Placards, 昂布瓦斯, 海报事件, 220

Ambrogini, Angelo, see Politian, 安布罗基尼, 安杰洛

America, Spanish, 美洲, 西班牙属地

西班牙的征服和欧洲权势的开始, 21

宗教修会的传教, 298, 565—567; 卡马尔多利会基金会的计划, 278

行政设施: 西印度会议, 333, 445, 573; 监护征赋制(参免), 564—565; 检审法院, 569—571; 对皇室控制的维护, 571—574, 578—580, 590; 对总督的偶尔选举, 588; 新法律, 588; 立法的理论和行政管理, 588—589

农业经济, 581—582

与西班牙的贸易, 584—586; 卡斯蒂利亚的垄断, 312, 584; 韦尔瑟家族在委内瑞拉的利益, 313; 贵金属的出口, 321—322, 333, 589; 钱币引入对欧洲的影响, 16; 对维护西班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必要性, 335; 最终危害西班牙经济, 589—590; 对总督辖区贸易的禁止, 583; 英国和葡萄牙的插足者, 585—586; 奴隶贸易, 585—586

Amsdorf, Nicholas, bishop of Naumburg, 阿姆斯多尔夫, 尼古拉斯, 瑙姆堡主教, 86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51—52, 62, 313

再洗礼派在此, 127, 131

Amyot, J., his translation of Plutarch, 阿米欧, 雅, 他对普鲁塔克著作的翻译, 382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 70

拒绝世俗权威, 5—6, 97, 102, 123, 133; 施莱特海姆信纲(1527), 125; 受加尔文的攻击, 114, 129; 受克拉默的攻击, 130

茨维考的先知, 84, 110, 119—120

与闵采尔的关系, 88, 128

在奥格斯堡信纲中受谴责（1530），94，124—125

与茨温利发预言的礼拜仪式，101

该运动的起源，119—120；反对婴儿施洗，119，133；与德国农民起义的关系，121；受迫害，121—122；该运动在瑞士的要旨，122；被驱逐出苏黎世，122，125，205；在格里松斯地区，122，260

在瑞士以外的发展，122—132；布劳洛克和蒂罗尔，122，124；在意大利，122，251，262，264—266，268—269，255；与意大利反三一论的关系，268—269；摩拉维亚的胡布迈尔与胡特，122—124，200—201；胡特、维德曼和极端再洗礼派，123；胡特尔在摩拉维亚，他被火焚、遭迫害，123—124，131；摩拉维亚宗教团体与外界的联系，124，207；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与之联盟，124，265—266；萨特勒（自译）和施莱特海姆信纲，125—126；皮尔格拉姆·马尔贝克的事业和工作，126；梅尔希奥·霍夫曼的事业和工作，126—127；在斯特拉斯堡受谴责，127；在尼德兰的发展和遭受迫害（1535），127—129，131，318；在闵斯特的起义失败和受迫害（1535），127—129，130—131，166—167；约里斯派，131—132；门诺派，131；亚多·帕斯托、尼克拉斯，131

在德国受迫害，129；在英国受迫害，129—131，248；在丹麦，135，142，126；在匈牙利，205

早期的年鉴、赞美诗集，132

与中世纪神秘主义的联系，132—133，167

对文学的影响，370—371

Anastasia, tsarina of Russia, consort of Ivan IV, 阿纳斯塔西亚，俄国皇后，伊凡四世的配偶，551，553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512—513，528—529

Anatomy, see Medicine, 解剖学

Ancona, origin of the Capuchins, 安科纳，嘉布遣会起源地，279

Andersson, Lars, see Andreae, Laurentius, 安德松，拉尔斯

Andes, mountains, crossed by Orellana, 安第斯山脉为奥雷利亚纳翻越 (1541—1542), 587

Andreae, Laurentius (Lars Andersson), 安德烈埃, 劳伦蒂乌斯 (拉尔斯·安德松)

与瑞典的宗教改革, 146

第一部瑞典文新约, 147

在教会与国王关系上, 与古斯塔夫斯·瓦萨的冲突, 150—151

Andrey, brother of Ivan III of Russia, 安德烈, 俄国伊凡三世的兄弟, 536, 539—540

Andrey the Younger, brother of Ivan III of Russia, 小安德烈, 俄国伊凡三世的兄弟, 540

Anduze, Calvinism in, 昂迪兹, 加尔文宗在此, 224

Angela Merici, St. foundress of the Ursulines, 安杰拉·梅里奇, 圣, 乌尔苏拉会女创建者, 289—290

Angers, Calvinism in, 昂热, 加尔文宗在此, 224

Angouleme, Calvin at, 昂古莱姆, 加尔文在此, 114

Angouleme, Louise of Savoy, duchess of, claims inheritance of Suzanne of Bourbon, 昂古莱姆女公爵, 萨伏依的路易丝要求获得波旁的苏珊娜的继承权, 342

作为弗兰西斯一世的摄政者, 343; 要求采取反宗教改革家的行动, 217; 与康布雷条约 (1529), 345; 土耳其同盟 (1523), 348

Angoumois, 昂古穆比, 224

Anhalt, Wolfgang of Kothén, prince of, 安哈尔特亲王, 克滕的沃尔夫冈, 92—93, 350

“Anian”, Strait of, Spanish search for, 阿尼亚纳海峡, 西班牙谋取该地, 605

Anjadiva Island, Portuguese fort, 安查迪瓦岛, 葡萄牙要塞, 595, 597—598

Anjou, 安茹, 224

Anjou, house of, 安茹王室

在匈牙利, 188

要求占有那不勒斯, 305, 328

Anjou, Henry, duke of, see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安茹大公, 亨利

Annates, and Swedish breach with Rome, 首岁所得税, 及瑞典与罗马的破裂, 146; 英国议会剥夺教皇收取首岁所得税, 234

Anne, queen of Bohemia and Hungary, empress (consort of Ferdinand I), 安娜,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女王, 女皇(斐迪南一世的配偶), 471—472, 513

Anne Boleyn, queen of England, second consort of Henry VIII, 安妮·博林, 英国皇后, 亨利八世第二个配偶, 171, 230, 234—235, 237, 239—240, 249

Anne of Cleves, queen of England, fourth consort of Henry VIII, 克利夫斯的安妮, 英国王后, 亨利八世第四个配偶, 240

Ansbach, see Brandenburg-Ansbach, 安斯巴赫

Antioquia (New Granada), 安蒂奥基亚(新格拉纳达), 581

Anti-Trinitarianism, 反三一论, 206—207

塞尔维特的《三一论的错误》及被烧死, 117, 268

在波兰和摩拉维亚, 207, 209

在意大利, 251, 262, 264—265, 268—269

在格里松, 260

Antonio Maria Zaccaria, st, 安东尼奥·马利亚·扎加利, 圣, 287

Antonius, Lutheran preacher in Norway, 安东尼乌斯, 在挪威的路德派布道者, 142

Antvorskov (Zealand), 安特沃尔斯科夫(西兰), 135

Antwerp, 安特卫普, 16, 65, 134, 316

再洗礼派在此, 57

该地的印刷业, 213—214

防御工事, 491—492

Anwykyl, John, master of Magdalen College School, 安威凯尔, 约翰, 马格达伦高级中学校长, 425

Apollonius of Perga, geometer, 佩尔吉的阿波罗尼奥斯, 几何学家, 394

Apulia, raided by Turks and Moors, 阿普利亚, 受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袭击, 327, 518—519

Arabia, on the spice trade route, 阿拉伯, 在香料商道上, 520—521, 531

Arabian Sea, Portuguese control, 阿拉伯海, 葡萄牙的控制, 591, 598—599

Arabs, 阿拉伯人, 387—388, 391

对科学的贡献, 387, 391—392

与土耳其: 埃及在奥托曼统治下, 511—512; 523—524年的反叛, 511; 在也门的斗争, 521

在东方反对葡萄牙人, 593—594

Aragon, 阿拉贡

要求拥有查理五世所继承的那不勒斯, 305, 328

农民, 49

与卡斯蒂利亚联合, 301, 304—305

在查理五世统治下, 305, 440; 皇权与贵族的权利, 323—324; 行政管理, 445, 452—453; 阿拉贡议会, 333; 君王与国会的冲突, 456; 对传统自由的坚持, 439; 议会对税收的控制, 455

海上贸易的衰落, 312

Arason, Jon, bishop of Holar, 阿拉松, 约恩, 候拉尔主教,
144—145

Araucanian Indians, in Chile, 阿劳坎印第安人, 在智利, 563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393—394

与力学, 401; 著作译本, 391; 伽利略对他的研究, 402

Aretino, Pietro, Italian writer, 阿雷蒂诺, 彼得罗, 意大利
作家, 376, 385

Aretinus (Leonardo Bruni), historian, 阿雷蒂乌斯 (莱昂纳
多·布鲁尼), 历史学家, 371, 384, 419

Arianism, 阿里乌主义, 115, 117, 206—208, 269

Arimani, emancipation of in Italy, 在意大利的解放, 48, 26

Ariosto, Lodovico, Italian poet, 阿里奥斯托, 洛多维科, 意
大利诗人, 377, 380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371—372, 387

路德在爱尔福特对他的研究, 71; 他对亚氏的敌视, 72, 74

对宇宙的解释, 397—398, 399

他的科学观的接受和修正, 389, 401—402, 406—407

他的政治思想在英国的影响, 462

Armenia, 亚美尼亚, 524—525, 527

Armour, see under Warfare, 盔甲

Armstrong, Clement, 阿姆斯特朗, 克莱门特, 64

Arnald of Villanova, 维兰诺瓦的阿尔诺德, 403

Arnobius, 阿诺比乌斯, 372

Arnoldi, Bartholomew, 阿诺尔迪, 巴塞洛缪, 71

Art, 艺术

宗教改革时期是艺术史上的中止期，17

安特卫普作为艺术市场，61

应用于科学图解，390—391，406—407，409—410

在大苏莱曼统治下，532—533

葡萄牙建筑，613

印加工艺，574

Arta, Gulf of, 阿尔塔湾，519—520

Arthur, Prince, son of Henry VII, marriage to Catherine of Aragon, 阿瑟，王子，亨利七世之子，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230，231

Arthur of Little Britain, 小不列颠的阿瑟，381

Artois, inherited by Charles V, 阿图瓦，被查理五世继承，303

法国放弃对该地的要求，343，353

作为统治者，查理五世在该地的地位，440

Artvin, 阿尔特温，524

As (Asch), Lutheranism in, 阿什，路德宗在此，200

Asia, 亚细亚

伊凡四世建立俄国宗主地位，561

香料商道，593—594

基督教传教，609—610

Asia Minor, 小亚细亚，516，528

Aske, Robert, 阿斯克，罗伯特，237

Assaying, 炼金术，404

Assens (Denmark), 阿森斯（丹麦），136

Assisi, 阿西西, 279

Asti, Francis I renounces claim to, 阿斯蒂, 弗兰西斯一世
放弃该地主权, 343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549, 557

Astrology, 占星学, 396—397

Astronomy, 天文学

坚持中世纪和经典思想, 387

星系的绘制, 393

应用于航海, 395

托勒密体系, 397—398

哥白尼体系, 398—400

第谷·布拉伊, 400—401

Asuncion, Spanish settlement (1537), 亚松森, 西班牙定居
点 (1537), 587

Atacama, desert of (Chile), 阿塔卡马沙漠 (智利), 577

Atahualpa, Inca ruler, 阿塔瓦尔帕, 印加统治者, 575—576

Ataide, Tristao de, Portuguese captain at Ternate, 阿泰
德, 特里斯唐·德, 葡萄牙驻特尔纳特首领, 608

Athletics, in education, 体育, 在教育中, 420

Audley, Thomas, 奥德利, 托马斯, 486, 499—500

Augmentations, Court of (1536), 增收法院 (1536), 449—
450

Augsburg, 奥格斯堡, 340

作为贸易中心, 53, 65, 338

路德在此, 77—78; 奥科兰帕迪乌斯在此, 104; 再洗礼派在
此, 122; 胡特在此, 123; 放弃茨温利主义, 167—168; 加入施马尔

卡尔登同盟，350；被查理五世占领（1547），356；修道院财产拨归办教育，429

该地的学校，430

加入士瓦本同盟，478

Augsburg, bishop of, founds university of Dillingen (1551), 奥格斯堡主教，建立迪林根大学，435

Augsburg, Confession of (1530), 奥格斯堡信纲

圣岁教义，94, 111, 204

对再洗礼派的谴责，94, 124—125

为斯特拉斯堡新教教会所接受（1534），124—125, 163

在丹麦，139

在符腾堡被采用，166

要求召开总会议，170

与施马尔卡尔登条款，173

与法兰克福临时协定（1539），176

被排斥于雷根斯堡的讨论之外（1541），178

为1555年议会承认，185

被修正的1551年信纲，208

Augsburg, diet of 1525, 1525年奥格斯堡议会，340；1530年议会，93—95, 161, 165, 307, 350；要求召开总会议，170；1547—1548年议会与奥格斯堡临时敕令，112, 183—185, 299, 338, 356, 478；1555年奥格斯堡议会和奥格斯堡和会，3, 5—6, 185, 222—223, 338, 358

Augusta, Jan, bishop of th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奥古斯塔，扬，兄弟会主教，200, 203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路德的奥古斯丁主义，74；卡尔施塔特的奥古斯丁主义，79，85；茨温利对奥氏的研究，98；茨温利的原罪说与奥氏的对比，102；加尔文对奥氏思想的精通，118

其出版的版本，372

Aunis, trial of heretics, 欧尼斯，对异端的审判，224

Aussig, see Usti nad Labem, 奥西希

Austerlitz, Anabaptism in, 奥斯特利茨，再洗礼派在此，123—124

Austria, 奥地利

其权力的兴起与土耳其和俄国的压力相关，21

通过联姻，与勃艮第合并，301

查理五世继承哈布斯堡领地，301，305—306；割让给斐迪南，339—340

奥斯曼的袭击（1532），515，521—522

Auvergne, 奥弗涅，223—224，298

Averroism, 阿威罗伊学说，371

Avignon, 阿维尼翁，100，361

Avila, Pedro Arias de, Spanish governor in Darien, 阿维拉，佩德罗·阿里亚斯·德，在达里恩的西班牙总督，567

Aviles, Pedro Menendez de, and the Spanish convoy system, 阿维莱斯，佩德罗·梅嫩德斯·德，与西班牙的护航制度，585

Azerbaijan, 阿塞拜疆，516—517，525

Azores, 亚速尔，葡萄牙基地，585

Azpeitia, birthplace of St Ignatius, 阿斯佩蒂亚，圣依纳爵出生地，291

Aztec civilisation, 阿兹特克文明，563—564，566

Bab al-Mandab, strait, controlled by Portuguese, 曼德海峡, 为葡萄牙控制, 520

Bacon, Sir Francis, 培根, 弗朗西斯爵士, 411—412

Baden, Oecolampadius' debate with Eck (1526), 巴登, 奥科兰帕迪乌斯与埃克的辩论 (1526), 105

Baghdad, 巴格达, 516, 533

Bahia, as capital of Brazil, 巴伊亚, 作为巴西首都, 586

Bahrain, controlled by Portuguese, 巴林, 为葡萄牙所控制, 520

Baiburd, in Turkish possession, 巴伊布尔特, 在土耳其辖区内, 516

Baif, J. A. de, French poet, 巴伊夫, J. A. 德, 法国诗人, 378

Bailli, royal official in France, 法国的皇家官员, 453—454

Baki, Islamic poet, 巴基, 伊斯兰诗人, 532

Bakics, Pal, 巴基奇, 帕尔, 197

Balbus (Balbo), Hieronymus, archbishop of Goritz, 巴尔布斯 (巴尔博), 希罗尼穆斯, 格里茨大主教, 347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305, 518, 531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小麦贸易, 35, 58

安特卫普商人在此, 62, 69

俄国的野心, 558—560

Bamberg, early printing in, 班贝格, 早期印刷术在此, 361

Banat, the (Hungary), 巴纳特, (匈牙利), 188

Banbury, school at, 班伯里的学校, 425

Banda Islands, 班达群岛, 593, 604

Bandello, Matteo, Italian writer, 班戴洛, 马泰奥, 意大利作家, 381

Banking and finance, 银行业和财政

里昂为金融中心, 16, 65—66, 68

大银行衰落的原因, 16

安特卫普金融市场, 50

香料市场和南德金融家的兴起, 51, 53, 63

复式簿记的引入, 55

16世纪的支票、利息和经纪费率, 64—65

热那亚为金融中心, 65, 313, 322

兑换投机, 65

安特卫普的政府贷款运作, 66—68

加斯帕·杜奇的事业, 67—68

就高利贷问题咨询索邦神学院, 216

查理五世利用南部德国和热那亚家族, 312—313, 352, 356;
贷款以助他当选皇帝, 338—339

16世纪会计学方法的不精确, 317

购买建立在西班牙政府税收基础上的年金 (juros), 321—322

数学教科书, 394

Banska Bystrica (Besztercebanya, Neusohl),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194, 198, 347

Banska St' avnica (Schemnitz), 班斯卡—斯塔弗尼卡, 198

Baptism, 洗礼

婴儿施洗, 为卡尔施塔特否定, 88; 茨温利对它有疑惑, 100, 102, 120—121; 在维滕贝格受攻击 (1521), 119—120; 在苏黎世命

令进行出生登记，121；受塞尔维特的谴责，129

茨温利的新礼仪（1525），101；布塞尔的，111

Bar, Pierre, 巴尔，皮埃尔，218

Barbarossa, Khair ad-Din, 巴尔巴罗萨，海尔丁，347

取得对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控制权，324—325，518

袭击地中海地区，325，327，518，519—520，531

协助法国夺取尼斯（1543），353，513

去世（1546），355，531

受奥斯曼土耳其雇佣，518；投降谢里姆，518；被任命为海军大元帅，325，351

在普雷韦扎外取胜（1538），519—520，530

Barbary, pirates of, 柏柏里海盗，324，347

Barcelona, 巴塞罗那，291—292，301，305，339

作为商业中心衰落，312—313

Barcelona, Treaty of（1529），巴塞罗那条约（1529），345

Barland A., Dialogi, 巴兰德的《会话》，426

Baronius, Caesar, Cardinal, his *Annales Ecclesiastici*, 巴罗尼乌斯，恺撒，枢机主教，他的《教会通史》，371

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 巴塞洛缪，英国人，390

Barton, Elizabeth (the Nun of Kent), executed (1534), 巴顿，伊丽莎白（肯特的修女），被处决（1534），236

Bascio, Matteo da, founder of the Capuchins, 巴斯其奥，马泰奥·达，嘉布遣会创立人，279—280，282，286

Basil I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see Vasily III, 巴西尔三世，莫斯科大公

Basle, 巴塞尔

伊拉斯谟在此，70，105

宗教改革在此，奥科兰帕迪乌斯，86，104—106；闵采尔在此，88；政治与文化背景，96；参加基督教城市同盟，103；卡皮托在此布道和讲课，104，107；米科尼乌斯继承奥科兰帕迪乌斯，106；第一、二信纲（瑞士信纲），107，168；布塞尔企图就圣餐问题达成协议（1536），111；加尔文在此，114；大卫·约里斯，131—132；法雷尔，216；意大利茨温利派在此，266

茨温利在此受教育，97

印刷业和售书业，114，213—214，362，367，427

普拉特尔的学校，424，437

巴塞尔大学，96—97，106，427，434

Basra，巴士拉，521，530—531

Basrur，Portuguese fort，巴斯鲁尔，葡萄牙要塞，611

Bassein，Portuguese at，伯塞恩，葡萄牙人在此，607

Bathory，Istvan，see Stephen Bathory，king of Poland，巴托里，伊斯特万

Batthyany，Ferenc，包贾尼，费伦茨，199

Bavaria，巴伐利亚

农业，33—34

再洗礼派在此，132

耶稣会士在此，299

参加士瓦本同盟，478；和符腾堡，165

Bavaria，William，duke of，巴伐利亚大公，威廉，179，354—355

Bayazid，Ottoman prince，巴耶济德，奥斯曼王子，529—530

Beauce，博斯，224

Beaujeu, Anne, Pierre, Suzanne de, see Bourbon, 博热, 安妮, 皮埃尔, 苏珊娜·德

Beaulieu, E. de, 博利厄, E. 德, 221

Beaune,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博讷, 对路德派的迫害, 218

Beda, Noel, 伯达, 纳尔, 219—220

Beklemishev, Bersen, Russian boyar, 别克列米舍夫, 别尔先, 俄国大贵族, 550

Belalcazar, Sebastian de, governor of San Miguel, 贝拉尔卡萨尔, 赛巴斯蒂安·德, 圣米格尔总督, 576—577

Belgrade threatened by the Turks, 贝尔格莱德受土耳其威胁, 346; 受围困 (1456), 510; 被占领 (1521), 347, 510; 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196, 513—515, 527, 532; 苏莱曼在此设防, 533

Belleau, R., French poet, 贝洛, R., 法国诗人, 378

Belon, Pierre, work in zoology, 贝隆, 皮埃尔, 从事动物学研究, 407

Belsky family, in disorders during minority of Ivan IV, 别利斯基家族, 在伊凡四世少数派统治时期的混乱状况, 551

Bembo, Pietro, Cardinal, 本博, 彼得罗, 枢机主教, 370, 373, 375

Benefit of clergy, English legislation to limit, 僧侣的特恩, 英国立法对此进行限制, 229

Bengal, 孟加拉, 593, 604, 608

Berg, duchy of, 贝格公爵领地, 354

Bergamo, 贝加莫, 288

Bergen, 卑尔根, 142, 143

Bergen-op-Zoom, 贝亨奥普佐姆, 54—56, 63

Bergerac, Calvinism in, 贝尔热拉克, 加尔文宗在此, 224

Berlin, 柏林, 53

Bernardino of Asti, general of the Capuchins, 阿斯蒂的贝尔纳迪诺, 嘉布遣会会长, 282—283, 285

Bernardino of Reggio, Observant Franciscan, 雷焦的贝尔纳迪诺, 严规派方济各会修士, 281—282

Berne, the Reformation in: political back-ground, 伯尔尼, 宗教改革在此: 政治背景, 96; 结成基督教城市同盟, 103; 公开的争论 (1528), 105, 113; 它向独立前进并帮助日内瓦改革, 113; 加尔文和法雷尔拒绝接受伯尔尼礼仪, 115; 加尔文与卡罗里的争论, 115; 穆斯库鲁斯的上帝至上教义, 与加尔文教义的冲突, 116; 要求派代表前往威尼斯, 263

Berners John Bouchier, Lord, 伯纳斯伯爵, 约翰·鲍彻, 381

Berni, Francesco, Italian poet, 贝尔尼, 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诗人, 377

Berquin, Louis, 伯尔坎, 路易斯, 213, 216—218

Berry, trial of heretics, 贝里, 对异端的审判, 224

Berwick, permanent garrison at, 贝里克, 永久驻军于此, 489

Besancon, university of, 贝桑松大学, 417

Bessarabia, southern, occupied by Turks (1538), 比萨拉比亚南部, 被土耳其占领 (1538), 522

Bestiaries, 动物寓言, 406

Betanzos, Domingo de, Dominican missionary in New Spain, 贝坦索斯, 多明戈·德, 多明我会在新西班牙的修士, 565, 578

Beza, Theodore, 贝札, 狄奥多尔, 117, 204, 219—220, 370

Biberach, 比伯拉赫, 350, 355

Bible, the Holy, 《圣经》

伊拉斯谟的新约，17，98，104，147，155

路德：在维滕贝格讲学，72，74—75；圣经研究在其神学中占中心地位，74—75；他攻击惟教皇有权解释圣经之教皇声言，80；他对《新约》圣经的解释和翻译（1522），83—84，86—87；其后的第一本瑞典文《新约》，147；与其后的阿格里科拉的芬兰文《新约》，155；卡尔施塔特的态度，85；茨温利极端的圣经绝对权威观，100

圣经人文主义与瑞士和莱茵兰的宗教改革，96；在斯堪的纳维亚，134，139，142，154

圣经在茨温利思想中的中心位置，98；他对圣经的解释，99，101

苏黎世《圣经》，101—102

斯特拉斯堡圣经神学的合作教授，108

加尔文的圣经神学，116，118

再洗礼派与《圣经》，119，122，133

彼得·帕拉第乌斯的《圣经导论》，141

斯特拉斯堡1523年的圣经版本，147

阿格里科拉的《圣经祈祷书》，155

安德烈亚斯·诺普肯的研究和讲学，157—158

波希米亚的饼酒同领派拒绝教皇对圣经解释的权威，189

埃蒂安纳的出版物，214；在法国受谴责，224，373

索邦神学院抗议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的德文版本，219

在意大利天主教改革运动中讥讽圣经权威，257；保罗的影响，259；反对利用圣经进而发展改革思想，255

瓦尔德斯派对圣经权威的尊重，265

存留的中世纪圣经抄本，360

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372

拉丁通俗文本, 373

对神学家学术研究的反作用, 373—374

民族语译本, 382—383; 苏黎世诗篇, 101—102; 早期的出版, 365; 彼得森的丹麦文本, 134, 383; 第一部《新约》丹麦文译本, 135; 陶森的《摩西王经》, 142; 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圣经》(1550), 142; 冰岛文《圣经》, 144—146; 瑞典文《圣经》, 147, 152; 芬兰文《圣经》, 155—156; 在受胡斯影响的波希米亚, 189; 马扎尔文《新约》, 198; 德国的波希米亚通俗语文本, 200; 塞克卢恰的波兰文《福音书》, 201; 扬·布拉霍斯拉夫的捷克文译本, 203; 勒费弗尔的《福音书》和《旧约》, 215—216, 383; 在法国民族语文本诗篇的普及, 219—220; 马罗译本, 378—383; 廷德尔的英译本, 227, 383; 命令英国各教区展览民族语圣经, 238; 英文本马修《圣经》, 239; 怀亚特的诗篇, 383; 科弗达尔的译本, 383; 亨利八世对不加区别地阅读民族语《圣经》译本加以限制, 241, 436; 科尼什抱怨使用英文译本, 243—244; 布鲁乔利的意大利文译本, 251; 马莱尔米的意大利译本, 365; 奥利维坦的法文译本, 383; 路德的译本, 383; 埃克的德文天主教译本, 383

《圣经》在中学中, 416, 421

苏马拉加为印第安人编写的教义问答中敦促对圣经作普遍研究, 565

Bibliander (Theodore Buchman), 比布利安德 (特奥多雷·布赫曼), 101

Bicocca, battle of (1522), 比柯卡战役 (1522), 100, 342, 497—498

Biel, Gabriel, 比尔, 加布里埃尔, 71, 73—74

Biel (Switzerland), 比尔 (瑞士), 103

Bijapur, Portuguese interference, 比贾布尔, 葡萄牙对它的干预, 609

Billom (Auvergne), foundation of Jesuit college (1555), 比洛姆 (奥弗涅), 耶稣会学院在此建立, 223, 298

Bilney, Thomas, 比尔尼, 托马斯 (英), 227

Binewald, Matthias, 比内瓦尔德, 马蒂亚斯, 194

Bintan, Portuguese fort, 宾坦, 葡萄牙人要塞, 606

Biondi, Flavio, see Blondus, 比翁迪, 弗拉维奥

Biringuccio, Vanucci, 比林古奇奥, 瓦努奇, 393, 404, 482

Biro, Matyas, 比罗, 马贾什, 199, 205

Bitlis, 比特利斯, 516

Black Death,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黑死病, 对经济的影响, 26—27, 31—34; 在德国, 29; 在英国, 36, 39; 在法国, 44—45

“Black Martin” (van Rossem), “黑马丁” (范·罗塞姆), 315—316

Blahoslav, Jan, leader of 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 布拉霍斯拉夫, 扬, 联合兄弟会领袖, 203

Blandrata, Giorgio, 布兰德拉塔, 乔尔吉奥, 206—208

Blankenberg, George, archbishop of Riga, 布兰肯贝尔吉, 杰奥尔杰, 里加大主教, 159

Blaurer, Ambrose, 布劳雷尔, 安布罗斯, 86, 102, 166

Blaurer, Margaret, 布劳雷尔, 玛格丽特, 110—111

Blaurock, George, 布劳洛克, 格奥尔格, 121—122, 124

Blekinge (Sweden), revolt (1542), 布莱金厄叛乱 (1542), 151

Blois, 布卢瓦, 220, 224

Blondus, Flavius (Flavio Biondi), historian, 布隆杜斯, 弗拉维乌斯 (弗拉维奥·比翁迪), 历史学家, 371

Bobadilla, Nicolas, original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博瓦迪利亚, 尼古拉斯, 耶稣会士最初成员, 292

在米尔贝格战役中，282；在德国，298

谴责奥格斯堡临时敕令（1548），299

Boccaccio, Giovanni, Italian writer, 薄伽丘，乔凡尼，意大利作家，375，380

Bockelson, Jan (John of Leyden), 博克尔松，杨，（莱登的约翰），128—129，131

Bodenstein, Andrew (of Carlstadt), see Carlstadt, 博登施泰因，安德鲁（卡尔施塔特的）

Bodin, Jean, 博丹，让，17

Boemus, Johannes, 博穆斯，约翰尼斯，486

Bogota, conquered by Spaniards, 波哥大，被西班牙人征服，577

Bohemia, 波希米亚

社会结构，8，9；农业社会，35，36；君主与地主的斗争，464；贵族的权力，9，15，465；议会，466—469

与宗教改革，83，87；在摩拉维亚的再洗礼派运动，122—124，131，200—201；1547年的起义，472

人文主义在该地，192

与哈布斯堡皇族，199，346—348，464—465，471—472

土耳其的威胁，346—347，466—467

富格尔氏矿产利益，347—349

Bohemian Brethren, se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波希米亚兄弟会

Bois-le-Duc, riots (1525), 在布瓦-勒-杜克的暴动（1525），317

Bojador, Cape, 博哈多尔角，591

Bolivia, 玻利维亚，577，582

Bologna, 博洛尼亚, 170, 183

特伦托会议迁此 (1547—1549), 254, 356

宗教改革家们的著作之发行, 255; 该地的宗教改革运动, 256; 与布塞尔的联系, 264

Bologna, university of, 博洛尼亚大学

奥科兰伯迪乌斯在该大学从事研究, 104

新教在此, 264

人文主义在此, 418

Bona Sforza, queen of Poland, consort of Sigismund I, 博纳·斯福尔扎, 波兰王后, 西格蒙德 (西吉斯孟) 一世的配偶, 192, 201, 473

Boner, Seweryn, Polish humanist, 博内尔, 塞韦伦, 波兰人文主义者, 201

Bonn, Bucer invited to preach at, 波恩, 布塞尔应邀在此布道, 181

Bonner, Edmund, bishop of London, 邦纳, 埃德蒙, 伦敦主教, 171, 248

Books, the book trade, see Printing; Trade and industry (Printing), 书籍, 售书业

Bora, Katherine von, marriage to Luther, 博拉, 卡特丽内·冯, 与路德结婚, 90

Bordeaux, 波尔多

吉耶纳大学, 422—423, 437

科尔迪耶在此讲课, 424

路德派著作在此发行, 216; 对路德宗的迫害, 218; 加尔文宗在此, 224

Borgia, Cesare, 博尔吉亚, 切萨雷, 252

Borgio, Gian Antonio, papal legate in Hungary, 博尔焦, 吉安·安东尼奥, 教廷驻匈牙利使节, 194

Boris, brother of Ivan III of Russia, 鲍里斯, 俄国伊凡三世的兄弟, 536, 539—540

Borromeo, Carlo, see Charles Borromeo, St, 博罗梅奥, 卡洛

Boscan, Juan, Spanish poet, 博斯坎, 胡安, 西班牙诗人, 378

Bosnia, under Turkish rule, 波斯尼亚, 在土耳其统治下, 512, 521—524

Bossut, river, Turkish raids (1532), 博苏特河, 土耳其人袭击该地 (1532), 515

Botelho, Simao, 博特略, 西芒, 609

Botticelli, Sandro, Italian painter, 波提切利, 桑德罗, 意大利画家, 391

Boucher, Joan, 鲍彻, 琼, 130

Bouchet, Jean, 布谢, 让, 214

Boulogne, besieged by Henry VIII, 布洛涅, 被亨利八世包围, 353, 492, 494

Bourbon, duchy of, united with France (1523), 波旁公爵领地, 与法国合并 (1523), 440

Bourbon, Anne de Beaujeu, duchess of, 波旁女公爵, 安妮·德·博热, 342

Bourbon, Charles de, Cardinal archbishop of Rouen, 波旁, 夏尔·德, 枢机主教, 鲁昂大主教, 217

Bourbon, Charles duke of, 波旁, 夏尔公爵, 342—343, 345

Bourbon, Pierre de Beaujeu, duke of, 波旁, 皮埃尔·德·博热公爵, 342

Bourbon, Suzanne de Beaujeu, duchess of, 波旁, 苏珊娜·德·博热女公爵, 342

Bourbonnais, trial of heretics, 波旁, 对异端的审判, 224

Bourges, 布尔区

该地律师的专制主义思想, 211

与宗教改革, 222; 加尔文的研究, 114; 加尔文主义, 224; 文学的传播, 216; 对改革的抵制, 216—218

Boyle, Robert, 波意尔, 罗伯特, 403

Brabant, 布拉班特, 57, 316—317

农奴制的废除, 45

集贸市场, 55—56, 63, 66

16世纪中叶的人口, 60

为查理五世所继承, 303

与吕贝克反对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 313

被范·罗塞姆侵入(1542), 316

Brabant, John II, duke of, 布拉班特公爵, 约翰二世, 55

Bracciolini, Poggio, 布拉乔利尼, 波吉奥, 391

Braganca, Constantino de, viceroy in the east, 布拉干萨, 康斯坦丁诺·德, 在东方的总督, 610

Brandano, see Petroio, Bartolommeo da, 布兰达诺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21, 35, 353

Brandenburg, Frederick William, elector of (‘the Great Elector’), 勃兰登堡选侯, 腓特烈·威廉(大选侯), 21

Brandenburg, Joachim I, elector of, death (1535), 勃兰登堡选侯, 约阿希姆一世, 死于1535年, 353

Brandenburg, Joachim II, elector of, 勃兰登堡选侯, 约阿希姆二世, 179

斡旋于天主教徒和宗教改革家之间, 174

引入路德主义，353

拒绝查理五世建立诸侯同盟的计划，331

Brandenburg-Ansbach, George, margrave of,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乔治，93，429

Brandenburg-Culmbach, Albert Alcibiades, margrave of, 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阿尔贝特·阿尔西维亚德斯，182，357，480

Brandenburg-Kustrin, John (Hans), margrave of, 勃兰登堡-屈斯特林侯爵，约翰（汉斯），357

Brandenburg-Prussia, 勃兰登堡-普鲁士

权势的增长与俄国和土耳其压力有关，21；农民，35—36

Braniewo (Braunsberg), Lutheranism in, 布拉涅沃（布劳恩斯贝格），路德宗在此，201

Brantome, Pierre de Bourdeilles, seigneur de, 布朗托姆的领主，皮埃尔·德·布尔代勒斯，498

Brask, Hans, bishop of Linkoping, 布拉斯克，汉斯，林雪平主教，146—149

Brasso (Kronstadt), Lutheranism in, 布拉斯湖（克罗龙斯塔特），路德宗在此，198

Bratislava, see Poszony, 布拉迪斯拉发

Braunsberg, see Braniewo, 布劳恩斯贝格

Brazil, 巴西

染料木贸易，61，586

耶稣会宣教事业，298，299，586—587

葡萄牙定居点，586—587；与西班牙的斗争，587—588

农业和人口，587

Bremen, joins the Schmalkaldic League, 不来梅,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Brenz, Johannes (Johann Brentzen), 布伦兹, 约翰内斯 (约翰·布伦岑), 104

与在士瓦本哈尔的宗教改革, 86; 与奥科兰帕迪乌斯关于圣餐的争论, 91, 105; 在符腾堡, 166; 拒绝接受奥格斯堡临时敕令, 183; 为特伦托会议撰写信纲, 184—185

Brescia, 布雷西亚, 288—289

Breslau, 布雷斯劳, 53, 424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兄弟会, 167

手抄文本的倍增, 360

教育工作, 417

Briceno, Isabella, 布里塞尼奥, 伊莎贝拉, 266

Briconnet, Guillaume, minister of Charles VII, 布里松内, 纪尧姆, 查理七世大臣, 214

Briconnet, Guillaume, bishop of Meaux, 布里松内, 纪尧姆, 莫城主教

传略, 214—215

对传统教义的捍卫, 215

受指控, 216—217

去世 (1534), 219

Brie, trial of heretics in, 布里, 异端在此受审判, 224

Brieg, principality of, official adoption of the Reformation, 布里格公国, 正式采纳宗教改革, 165

Briesmann, Johannes, 布里斯曼, 约翰内斯, 159

Brittany, united with France, 布列塔尼, 与法国合并, 440

Brno (Brunn) , Ferdinand of Habsburg summons federal parliament, 布尔诺 (布吕恩) , 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召开联邦议会, 467

Broet, Paschase, 布勒特, 帕斯夏瑟, 292, 299

Bromberg, see Bydgosc, 布罗姆贝格

Brucioli, Antonio, 布鲁乔利, 安东尼奥, 251

Brueghel, Peter the elder, Flemish painter, 勃鲁盖尔, 彼得 (老) , 弗兰德画家, 403

Bruges, 布鲁日

葡萄牙香料集散地的建立 (约1460年) , 并转移至安特卫普 (1499) , 50, 55; 商业霸权转至安特卫普, 51; 意大利银行迁至安特卫普, 53; 外商的待遇, 55; 西班牙商人在此, 304

与科隆和安特卫普的陆路交通, 53

该地的早期印刷业, 362

Bruges, Treaty of (1521) , 布鲁日条约, 341

Brunfels, Otto, his work in botany, 布隆费尔斯, 奥托, 他的植物学著作, 407

Bruni, Leonardo, see Aretinus, 布鲁尼, 莱奥纳尔多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焦尔达诺, 400

Brunschwig, Jerome, *de arte distillandi*, 不伦什维格, 哲罗姆, 404

Brunswick-Grubenhagen, Ernest, duke of, joins the League of Nuremberg (1538) , 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公爵, 恩斯特加入纽伦堡同盟 (1538) , 354

Brunswick-Grubenhagen, Philip, duke of, joins League of Schmalkalden (1531) , 不伦瑞克-格鲁本哈根公爵, 腓力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531) , 350

Brunswick-Lüneburg, Ernest, duke of, and the Diet of Speyer (1526), 不伦瑞克-吕纳堡公爵恩斯特, 与施派尔议会 (1526), 92; 签署施派尔抗议宗声明 (1529), 93; 加入托尔高同盟 (1526), 340; 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531), 350

Brunswick-Lüneburg, Francis, duke of, at Diet of Speyer (1526), 不伦瑞克-吕纳堡公爵弗兰西斯; 在施派尔议会 (1526), 92;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531), 350

Brunswick-Lüneberg, Otto, duke of, joins League of Schmalkalden, 不伦瑞克-吕纳堡公爵, 奥托,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Brunswick-Wolfenbüttel, Henry, duke,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亨利

支持诉诸武力, 179

参加纽伦堡同盟 (1538), 354

被新教徒驱逐出去 (1542), 354

Brussels, 布鲁塞尔, 317—318

布鲁塞尔会议 (1522), 339—340

Bucer, Martin (Kuhhorn), German theologian and Reformer, 布塞尔, 马丁 (库霍恩), 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 17, 181, 261

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改革, 86, 108—110, 112; 几种圣餐观并试图达成协议, 91—92, 111—112, 161—162, 166, 167—170; 与四城信纲, 95, 111, 161; 在埃伯恩堡避难, 104; 与奥科兰帕迪乌斯为教会的教规制订计划, 106, 115; 他的……和“艰苦工作的福音”, 107; 对司法官的“宗教改革法规”的态度及对教会教规的关心, 109; 与农民战争, 109; 结婚, 110; 他的洗礼仪式, 111; 他对教牧工作和教义的看法, 111, 115; 他的传教热情, 111, 70; 拒绝签署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及遭流放, 112, 183; 他的人格和声望, 112; 在1528年伯尔尼辩论会上, 113; 他关于预定论的教义, 115; 与极端派和宗派主义者的斗争, 119, 124, 127, 167; 脱离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62; 与卡尔洛夫奇讨论, 175; 对法兰克福临时敕令的批判 (1539), 176; 与格罗珀和费尔特维克的讨论, 177; 在雷根斯堡议会上 (1541), 178; 与黑森的腓力的婚姻, 180

出生 (1491), 早年生活, 教育, 108; 与布劳雷尔的友谊, 166; 他对加尔文的影响 (1538—1541), 115, 118

在剑桥任教, 他的去世 (1551), 112, 130, 243

Buchanan, George, 布坎南, 乔治, 369, 437

Buchman, Theodore, see Bibliander, 布赫曼, 特奥多尔

Buda (Budapest), 布达 (布达佩斯)

作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联合君王的宫廷所在地, 191—192; 匈牙利议会的会议, 466

受土耳其人的威胁, 346; 被土耳其占领 (1525), 348; 属土耳其帕夏管区, 196; 土耳其对新教布道者的宽容, 197; 在土耳其统治下, 512, 523—524, 527

Bude, Guillaume, French scholar, 比代, 纪尧姆, 法国学者, 17, 372, 462

Buenos Aires, Spanish settlement (1536), 布宜诺斯艾利斯, 西班牙人定居处 (1536), 587

Bugenhagen, Johann (Pomeranus), 布根哈根, 约翰 (波梅拉努斯)

与宗教改革的传播, 86; 与布塞尔, 111; 反对霍夫曼的极端观点, 126; 对丹麦主教的授任, 140, 141; 对盖布尔·彼得森的授任, 143; 与安德烈亚斯·诺伯肯联盟, 157; 与波罗的海的宗教改革, 157; 与圣餐, 168; 与雷根斯堡议会 (1541), 179; 教育工作, 424; 受益于梅兰希顿, 424

Bullinger, Henry, reformer, 布林格尔, 亨利, 宗教改革家

对卡尔施塔特的敌视, 88

在苏黎世继续坚持茨温利的传统，103，163；瑞士信纲及瑞士归正宗教会的和解，106—107；对英国宗教改革的贡献，106，243；与极端派和宗派主义者的斗争，119，120，122，129—130；论闵斯特的再洗礼派，129；关于圣餐的看法，168；在波兰的影响，204；与法兰西的勒内的通讯，261；与威尼斯，263

Bundschuh rising, see Peasants' War

Buonacorsi, Philip, and humanism in Cracow, 博纳科尔西，菲利普，与人文主义在克拉科夫，192

Bure, Idelette de, marriage to Calvin (1540)，比雷，伊德雷特·德，与加尔文结婚（1540），116

Bureaucracy, development of, in administration, 官僚主义的发展，在行政管理工作中，444—446，448，453—454

Burgos,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布尔戈斯，工业和人口，584

Burgundy, county of, see Franche-Comte, 勃艮第郡

Burgundy, duchy of, 勃艮第公爵领地，7，15，22，52

该地的宗教改革进展，222

君权的增长，438—439

行政管理，444—445，452

Burgundy, ducal house of, 勃艮第公爵家族

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联合，301，303

他们的十字军远征努力，336

Burgundy, Charles the Bold, duke of, 勃艮第公爵，“勇敢者”查理，54，57，60

Burgundy,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445，452

Buridan, Jean, Galileo's debt to, 比里当，让，伽利略受益于他，389

Burlamacchi conspiracy, in Luċca (1547), 布拉马基阴谋, 在卢卡 (1547), 253, 263

Burlamacchi, Francesco, executed (1548), 布拉马基, 弗朗切斯科, 被处决 (1548), 263

Busbecq, Augier-Ghislain, imperial ambassador, 比斯贝克, 奥吉耶-吉兰, 帝国大使, 533

Busleyden, Jerome, 布斯列登, 哲罗姆, 28

Butzbach, John, 布茨巴赫, 约翰, 416

Bydgosc (Bromberg), Diet of (1520), 比得哥什 (布罗姆贝格) 议会 (1520), 473

Byzantium, see Empire, Byzantine; *as Ottoman* capital, see Istanbul, 拜占庭

Cabral, Pedro Alvares, 卡布拉尔,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 586, 595

Caen, Calvinism in, 康城, 加尔文宗在此, 224

Cahors,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卡奥尔, 对路德派的迫害, 218

Cairo, Ahmed' s revolt (1523—1524), 开罗, 艾哈迈德造反 (1523—1524), 511

Caius, John, his work in zoology, 凯瓦斯, 约翰, 他对动物学的研究, 407

Cajamaraca, capital of Atahualpa, 卡哈马卡, 阿塔瓦尔帕的首府, 575

Cajetan, Cardinal (Tommaso da Vio), general of the Dominicans, 卡耶坦, 枢机主教 (托马索·达·维奥), 多明我会会长, 386

要求路德顺服 (奥格斯堡, 1518), 77—78

Cajetan, St (Gaetano da Thiene), 卡耶坦, 圣(加埃塔诺·达·蒂埃内), 288—289

与朱斯蒂尼亚尼的友谊, 278

德亚底安修会的建立, 285—286

在罗马遭劫时受苦(1527), 287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256, 327, 531

Calais, 加来, 341

英国羊毛主要产地, 40

被英国所丧失(1558), 247, 249

在英国议会中的代表, 455

永久性英国要塞, 489

Calchiquel, Maya people subdued by Alvarado, 卡尔奇克尔, 马雅人被阿尔瓦拉多所征服, 568

Calepinus (Ambrogio Calepino), his dictionary, 卡莱皮努斯(安布罗焦·卡莱皮诺), 他的字典, 373

Calicut, 卡利卡特, 592, 594, 595, 600, 606

California, Lower, discovered by Cortes, 下加利福尼亚, 为科尔特斯所发现, 569

“Calixtines”(“Praguers”), Hussite faction, “加里斯丁人”(“布拉格人”), 属胡斯派, 191

Calvi, Francesco, bookseller in Pavia, 卡尔维, 弗朗切斯科, 帕维亚的书商, 255

Calvin, Gerard, father of John, 加尔文, 热拉尔, 让·加尔文之父, 114

Calvin, John, reformer, 加尔文, 让, 宗教改革家, 2, 99, 301

他在文学上的地位, 17, 116, 383

布林格脱离茨温利转向加尔文，106—107

与天主教徒和宗教改革家举行会议（1539—1541，1546），111—112，118，178

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112—119；与卡罗利争论（1537），115，117；与议会争论，115；返回日内瓦（1541），116—117；教会组织和法规，116；教育工作，116—117，424；与日内瓦大学，434

出生与教育，113—114；学识渊博，118，370；在巴黎，223；他的皈依，114；隐蔽生活（1533），旅行，到达日内瓦，114—115，129；在斯特拉斯堡（1538—1541），布塞尔的影响和斯特拉斯堡礼仪，108，115，110

《基督教原理》，114；修订版（1539）和法文译本（1541），116，383；后来的版本，其特点和重要性，117—118；在法国的流行，220—221，223—224

他的Psychopannychia，114，129

得益于其他宗教改革家，115，118

致萨多莱托书，115—116

与伊代勒特·德·比雷结婚（1540），116

他的神学观，118；他对圣餐的看法，116，118，169—170；他的《圣多礼小议》，116

在费拉拉与法兰西的勒内交往，261—262，267；与卡尔内塞基的接触，267；与瓦斯基

与极端派和分裂派斗争，119；谴责再洗礼派，114，125—126，129—130

支持查理五世反对保罗三世，182

与依纳爵·罗耀拉的比较，223

论“尼科代米主义”，267—268

Calvinism，加尔文主义

与反对君权，7

在尼德兰，131，318

在中欧，202；在波兰，203—205，209；在匈牙利，205—206

在法国，210—225

在意大利，251；在费拉拉，265；韦尔多派和加尔文派结盟，255；多梅尼基翻译《尼科代米纳》，264

伊丽莎白一世嫌恶加尔文主义，249

Calvinists excluded from Peace of Augsburg (1555)，加尔文派被排除于奥格斯堡和约（1555）之外，355

Camaldoli，卡马尔多利，278

Cambay, Gulf of，坎贝湾，607

Cambrai, Peace of (1529)，康布雷和约，93，217，334—335，352

Cambridge University，剑桥大学

布塞尔在此，112，130，243

约翰·维隆在剑桥，129

早期关于路德主义的讨论（小德意志），227

克拉默在此，233，238

对宗教改革的影响，430—431；皇家加强了控制，433—434

Camerarius (Joachim Kammermeister)，his educational work，卡梅拉里乌斯（约阿基姆·卡默迈斯特），他的教育著作，425

Camerino, Matteo da Bascio' s work during the plague，卡梅里诺，马泰奥·达·巴肖在鼠疫流行期间的工作，279

Camerino, Giulia Varans, duchess of，卡梅里诺，朱利亚·瓦拉斯女公爵，279，283

Campeggio, Lorenzo, Cardinal，坎佩基奥，洛伦佐枢机主教，13，94，231

Canary Islands, Spanish administration, 加那利群岛, 西班牙人的行政管理, 564

Canete, Andres Hurtado de Mendoza, marquis of, viceroy in Peru, 卡涅特侯爵, 安德雷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秘鲁总督, 579—580

Canisius (Peter Kanes), see Peter Canisius, 卡尼修斯(彼得·卡内斯)

Cannanore, Portuguese at, 坎纳诺尔, 葡萄牙人在此, 594, 597

Canterbury,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of, 坎特伯雷教会行省, 228, 415

Canton, Portuguese at, 广州, 葡萄牙人在此, 592, 606

Cape Comorin Coast, Xavier's mission, 科摩林海岸角, 沙勿略的传教活动, 610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569, 591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态度并非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产品, 20

农业资本的各种来源, 28—29, 32, 43; 在英国农业发展和总体前进之间的协调, 43; 与法国的对照, 46

Capito, Wolfgang Fabricius, 卡皮托, 沃尔夫冈·法布里丘斯

与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 86, 107—108; 在巴塞爾的教学和布道(1515), 104; 他的性格和学识, 107—108; 出生(1478)、教育、早期的职业, 107; 与农民军领袖会晤(1525), 109; 在斯特拉斯堡避难, 110; 结婚, 110; 去世(1541), 110; 在1528年伯尔尼辩论中, 113; 对再洗礼派的态度, 124—125, 127; 关于圣餐问题瑞士人与路德派之间的争论, 168; 与格罗珀和维尔特维克的讨论, 177

Cappel, abbot of, 卡佩尔修院院长, 103

Cappel, battle of (1531), 卡佩尔战役 (1531), 103, 106, 163, 350

Cappel, first and second Peace of (1529, 1531), 卡佩尔第一次和第二次和约 (1529, 1531), 103, 106

Capponi, Niccolo, 卡波尼, 尼科洛, 344

Caraccioli, Marino, cardinal, govenor-general in Milan, 卡拉乔利, 马里诺, 枢机主教, 米兰总督, 330

Carbcciolo, Galeazzo, Italian Calvinist, associated with Valdes, 卡拉乔洛, 加利佐, 意大利加尔文主义者, 与瓦尔德斯联盟, 265

Carafa, Gian Pietro, cardinal, see Paul IV, Pope, 卡拉法, 吉安·彼得罗, 枢机主教

Carhajal, Francisco de, associate of Gonzalo Pizarro, 卡瓦哈尔, 弗朗西斯科·德, 579

Caribbean Sea, English and Portuguese interlopers, 加勒比海, 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侵犯, 585—586

Carinthia, 卡林西亚, 339—340, 522, 524

Carion, Johannes, chronicler, 卡里翁, 约翰内斯, 编年史家, 371

Carlstadt, Andrew Bodenstein of, German Reformer, 卡尔斯塔特, 安德鲁·博登施泰因, 德国宗教改革家, 70

与莱比锡的辩论 (1519), 79; 对丹麦的访问流产 (1521), 84; 他对异象的热衷, 84; 在维滕贝格他的激进的改革方案 (1521—1522), 84—85; 布根哈根取代其在维滕贝格的地位, 86; 与安娜·冯·莫豪订婚, 84, 106; 他的神学与路德的比较, 85; 他在科隆和耶拿的学生, 86; 反对婴儿施洗, 88, 119; 圣餐象征说的教义, 88, 91; 与路德公开决裂, 遭放逐, 88, 120; 卷入农民战争, 89; 在巴塞爾挑起争斗, 106; 去世 (1541), 106; 在斯特拉斯堡, 110; 与苏黎世再洗礼派的起源, 120

Carnesecchi, Pietro, Italian reformer, 卡尔内塞基, 彼得罗,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帮助受迫害的改革家, 252

他的生涯, 与巴尔德斯的交往, 去世 (1567), 266—267

他受审, 270, 272

否定教皇的绝对权威, 273

与加尔文交往, 267

Carniola, 卡尼奥拉, 339—340, 522

Caro, Annibal, Italian poet, 卡罗, 安尼巴尔, 意大利诗人, 261

Caroli, Pierre, 卡罗利, 皮埃尔, 115, 117, 216

Carpi, Berengario da, his work in anatomy, 卡皮, 贝伦加里奥·达, 他对解剖学的工作, 409

Cartagena (de las Indias), Spanish naval base, 卡塔赫纳 (德·拉斯·因迪亚斯), 西班牙海军基地, 585

Cartography, 制图学, 61, 393, 396, 584

Casa de Contratacion, at Seville, controls foreign trade and navigation, 塞维利亚的贸易署, 584

Casalmaggiore, converts to reform in, 卡萨尔马焦雷, 该地改宗者实施宗教改革, 260

Casimir IV, king of Poland, 卡齐米日四世, 波兰国王, 473

从条顿骑士团接受西普鲁士, 194

与俄国: 诺夫哥罗德向其求援, 534—535, 535; 与鞑靼人结盟和谈判, 536—537

去世 (1492), 538

Castaldo, Giam Battista, Habsburg co-mmander in Transylvania, 卡斯塔尔多, 吉亚姆·巴基斯塔,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

哈布斯堡司令官，526

Castanheda, Fernao Lopes de, Portuguese chronicler, 卡斯坦埃达，费尔南·洛佩斯·德，葡萄牙编年史家，607

Castellio, Sebastian, 卡斯特利奥，塞巴斯蒂昂，116, 132—133

Castelnuovo, taken and lost by Venice (1538—1539), 卡斯泰尔诺沃，由威尼斯占领及复失 (1538—1539), 520

Castelvetro, Ludovico, philosopher and philologist, 卡斯特尔韦特罗，卢多维科，哲学家，语言学家，261

Castiglione, Baldesar, his *Courtier*, 卡斯蒂利奥内，巴尔代萨，他的《朝臣》，19, N. I, 213, 422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君主专制的增长，8, 304, 439, 589—590

贵族与城镇，49, 304, 319, 563

与阿拉贡联合，301, 304—305

勃艮第的查理（查理五世）即位，304—305；他作为统治者的地位，440

对外贸易的垄断，312

税收，318—321, 455

强迫摩尔人皈依（1502），324

行政管理，445, 453

畜牧业，581

在西班牙取得显著地位，由美洲属地协助，590

Castilleja de la Cuesta, death of Cortes (1547), 卡斯蒂列哈·德·拉·奎斯塔，科特斯之死（1547），571

Castre,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卡斯特尔，对路德派的迫害，218

Castro, Joao de, governor in the east, 卡斯特罗, 吉昂·德, 东方总督, 609

Castro, Vaca de, in civil war in Peru, 卡斯特罗, 瓦卡·德, 在秘鲁的内战中, 578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49

查理五世治下海上贸易的衰落, 312—313; 与热那亚的商业竞争, 324

皇室权威与贵族权利, 323—324

Cateau-Cambresis, Peace of (1559),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1559), 223, 225, 272, 335, 358

Catherine, queen of Sweden, first consort of Gustavus Vasa, 凯瑟琳, 瑞典皇后, 古斯塔夫·瓦萨的第一个配偶, 149

C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consort of Henry VII, 阿拉贡的凯瑟琳, 英国皇后, 亨利八世的配偶

她与阿瑟亲王的婚姻, 230—231

她的离异, 229, 230—233, 303, 433; 克拉默对她的废黜, 234—235

去世 (1536), 239

Catherine Howard, queen of England, fifth consort of Henry VIII, executed (1542), 凯瑟琳·霍华德, 英国皇后, 亨利八世第五个配偶, 被处决 (1542), 241

Catherine de Medicis, queen of France, consort of Henry II, 卡特琳·德·梅迪西斯, 法国皇后, 亨利二世配偶, 266

Catherine Ricci, St, 凯瑟琳·里奇, 圣, 289

Catholic League, of Nuremberg (1538), 纽伦堡的天主教联盟 (1538), 175—176

Cato, studied in grammar schools, 加图, 语法学校对他的研究, 416, 423

Cattani, Francesco, 卡塔尼, 弗朗切斯科, 267

Cattle rearing, in New Spain, 养牛业, 在新西班牙, 581—582

Caturce, Jean de, executed (1532), 卡蒂尔瑟·让·达, 被处决 (1532), 219

Caucasia, 高加索, 524, 530

Cavalcanti, Bartolomeo, 卡瓦尔坎蒂, 巴托洛米奥, 501—502

Caxton, William, printer, 卡克斯顿, 威廉, 出版家, 362, 365, 390

Cecil, Sir William (Lord Burghley), 塞西尔, 威廉爵士 (布格利勋爵), 130

Cellarius, Martin, and origin of Anabaptism in Zurich, 塞拉里厄斯, 马丁, 与苏黎世再洗礼派的起源, 120

Celsus, editions of *De re medica*, 赛尔苏斯, 《医学》, 391

Censorship, of books, 书籍的检查制度, 256, 259, 269, 363—364

“Centuriators of Magdeburg”, 马格德堡的世纪记年历史学家, 371

Centurione family, Genoese bankers, 琴图廖内家族, 热那亚银行家, 313

Ceresole, French victory (1544), 切雷索莱, 法国取胜 (1544), 353

Cervantes, Miguel de, *Don Quixote*, 塞万提斯, 米古埃尔·德, 《唐·吉珂德》, 12

Cesalpino, Andreas, his work in botany, 切萨皮诺, 安德烈亚斯, 他在植物学方面的工作, 408

Ceylon, 锡兰, 596

肉桂生产业, 593

葡萄牙人在此, 597, 606, 611

基督教传教会, 610

Chaliyam, Portuguese fort, 查利亚姆, 葡萄牙要塞, 607

Chalon, Philibert de, viceroy in Naples, 沙隆, 菲利贝特·德, 那不勒斯总督, 333

Chambord, Treaty of, between Henry II of France and German Protestant princes (1552), 尚博尔条约, 法国的亨利二世与德国抗议宗诸侯们签订的 (1552), 357

Chambre Ardente, 242, 451

Champagne, 香槟, 222, 224

Champier, See Martial, 尚皮埃尔

Chancery, Court of, 大法官法庭, 450

Chantries (in England), 礼拜堂附属的小室 (在英国), 244, 416

Chapultepec, 查普特佩克, 562

Charcas, Spanish administration, 查尔卡斯, 西班牙的行政管理, 572

Charles V, emperor (Charles I, king of Spain), 查理五世, 皇帝 (查理一世, 西班牙国王), 70, 115, 151, 159, 181, 265, 305, 497, 515

与宗教改革, 479—480; 沃尔姆斯议会和敕令 (1521), 81—83, 93, 339; 开始对宗教改革者进行迫害 (1523), 86; 施派尔议会和休会 (1526), 92—93, 479; 施派尔议会 (1529), 39, 94, 479; 奥格斯堡议会 (1530), 93—95, 161, 170, 350;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与战争, 163—165, 183, 331, 354—356, 479—480; 纽伦堡和约 (1532), 164, 175, 176, 350—351; 与哈格瑙和沃尔姆斯的争论 (1540), 175—176; 法兰克福临时敕令 (1539), 175—176; 雷根斯堡议会 (1541), 178—179, 307; 与黑森的菲利普结盟, 179—180; 奥格斯堡临时敕令 (1547), 112, 183—184, 356; 奥格斯堡和

约（1555），185，222—223，338，358，479；在英国玛丽的复辟，246—247；企图在那不勒斯引进宗教裁判所，328—329；他的诸侯同盟计划遭拒绝，331；同情伊拉斯谟主义，257，258，333

性格与政绩，6—7；他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理想的破灭，7，9—11，22，314—315；作为基督教世界之首领，301，303—304，306—307；帝王天职的概念，314，335—337；与帝国的统一，479—480

与教皇，6—7，253，307—308，443；同利奥十世结盟，341—342；联合对抗土耳其（1538），519；参见克雷芒七世；保罗三世

王朝统治，11，301，306；与丹麦王位，137，138，313—314；与阿拉贡的凯瑟琳，231，303；与玛丽在英国的复辟，246—247

财政困难，13，66—67，312—313，351，357

当选为皇帝和退位：对他继承皇位的前景所引起的担忧，78，307；被立为帝（1519），305—306，334；来自银行家的赞助，338—339；支持士瓦本同盟，338，478；加冕（1531），330；退位和退休（1555），318，332，335，352

与大议会，93—94，170，171，174，178，181—185，253—254，258，307—385

与盖尔德斯作战并将其吞并（1543），181，304，315—316，354

同意将锡耶纳给予奥地利的菲利普（1555），273

他的继承权的扩大，301—303；他来到西班牙（1517），304—305；他作为统治者的地位及对其领地的管理，313—314，378

他对战争的态度，303

反抗土耳其人的领导地位，303，336；马德里条约中的条款，343；与威尼斯和教皇结盟，519

与斐迪南一世：确保他当选为罗马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306，330—332，357；权力的授予，330—331；将奥地利公爵领地让予他（1522），339—340

提香画的查理五世肖像，307

他的经济改革, 312—315

镇压根特叛乱 (1540), 317

腓力二世继承皇位, 330, 331—332

出生 (1500), 337; 去世 (1558), 332, 335

计划与玛丽·都铎的结婚, 341; 与腓力二世的婚姻, 246—247

与德国的新大学, 434

与德国的立宪的发展, 477—480

与帝国的海外领地, 565, 568—569, 571—574, 578—580, 589, 605—606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查理七世, 法国国王, 438—439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查理八世, 法国国王, 214, 252, 336, 491

Charles IX, king of France, 查理九世, 法国国王, 474

Charles Borromeo, St, cardinal, archbishop of Milan, 查理·博罗梅奥, 圣, 枢机主教, 米兰大主教, 272, 288, 290

Charles Robert, king of Hungary, 查理·罗贝尔, 匈牙利国王, 188

Chartres, primary education in diocese, 沙特尔, 教区中的初级教育, 415

Chateaubriant, Edict of (1551), 沙托布里扬敕令 (1551), 224

Chateauroux, Calvinism in, 沙托鲁, 加尔文宗在此, 224

Chateau Thierry, taken by Charles V (1544), 蒂耶里堡, 为查理五世攻占 (1544), 353

Chaul, Portuguese at, 焦尔, 葡萄牙人在此, 597, 605; 海战失败 (1508), 520, 598

Chauliac, Guy de, *Chirurgia*, 肖利亚克, 盖伊·德, 387

Chaves, Alfonso de, on naval tactics, 沙维什, 阿方索·德, 论海军战术, 508

Cheb, see Eger, 海布

Cheke, Sir John, tutor to Prince Edward (later Edward VI), 切克, 约翰爵士, 爱德华太子(后来的爱德华六世)的家庭教师, 241

Chekiang, 浙江, 592

Chelcicky, Peter, and the Hussit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海尔奇茨基, 彼得, 与胡斯派兄弟会, 191

Cheng-te, Chinese emperor, 正德, 中国皇帝, 592

Cherchell (near Algiers), raided by Doria (1532), 舍尔沙勒(在阿尔及尔附近), 遭多里亚袭击(1532), 349

Chernigov, in invasion of Ivan III (1500), 切尔尼戈夫, 在伊凡三世入侵后(1500), 538

Cheshire,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柴郡, 在英国议会中派有代表, 455

Chiavenna, 基亚文纳, 487

Chibchas, Indians of Ecuador, 奇布查人, 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 577

Chichimeca, Indian tribe in New Galicia, 奇奇梅克人, 在新加利西亚的印第安部落, 563

Chieti, 基耶蒂, 286

Chievres, Guillaume de Croy, sieur de, see Croy, Guillaume de, 谢夫尔阁下, 见纪尧姆·德·克罗伊

Chile, 智利, 563, 575, 577—578

China, 中国

伊斯兰扩大到中国, 336

活字印刷术的使用, 361

海军力量, 592

与新西班牙的贸易, 583; 香料贸易, 593; 与葡萄牙的关系, 603—606, 611; 西班牙的征服计划, 612

Chivalry, 骑士团

国际法取代骑士公约, 11—12

对教育理想的影响, 19

浪漫故事, 381, 382; 对战争态度的影响, 501—502

Cholula (Mexico), 乔卢拉(墨西哥), 566

“Chosen Council” (Russia), “特选会议”(俄国), 551—552, 557—559

Christian II,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克里斯蒂安二世, 丹麦和挪威国王, 134—135, 137, 138, 143, 313

Christian III,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duke of North Schleswig, 克里斯蒂安三世, 丹麦和挪威国王, 北石勒苏益格公爵, 559

支持宗教改革, 135, 140—143, 145

即位(1534), 139—140

Christian V,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克里斯蒂安五世, 丹麦和挪威国王, 140

Christian Civic League (1528), 基督教城市同盟, 103

Christina of Denmark, see Milan, Christina, duchess of, 丹麦的克里斯蒂娜

Christology, 基督论

再洗礼派的基督论, 126—127, 131; 受约翰·胡珀的攻击, 130

饼酒同领派接受正统教义, 189

Chupas, civil war of, in Peru, 丘帕斯内战, 在秘鲁, 577—578

Church of the Brethren (Unitas Fratrum), Hussite faction, 兄弟会(合一兄弟会), 胡斯派支派, 191, 200

在波兰, 202—205, 208, 472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残留, 208—209

Church, Catholic, 天主教教会在宗教改革前, 1—3, 5

教会土地的世俗化, 1, 48, 94

天主教改革运动, 254, 257—258, 272—273, 288—289

与中世纪教育制度, 414—417

Church, Eastern Orthodox, 东正教教会

宗教改革前在东欧的势力, 187—188

抵制佛罗伦萨同盟(1439), 187, 538

在俄国: 作为东正教斗士的伊凡三世, 534—535; 支持专制政治, 539, 545; 支持瓦西里三世继位, 541; 反对教会土地世俗化, 544—545; 与国家的关系, 545—546, 550—551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会

宗教改革前此称谓的不确切, 228

教义, 由君王定义, 议会实施, 235

Churchwardens (*Kirchenpfleger*), at Strassburg (1530), 教区执事在斯特拉斯堡(1530), 109

“Cibola”, Spanish search for, “锡沃拉”, 西班牙对此的追求, 571

Cicero, 西塞罗, 369, 375

16世纪的版本, 367, 372

西塞罗主义, 373—374

各学校对他的研究，416—417，421，423

Cilicia, Turcoman revolt (1526—1528)，西里西亚，土库曼人起义 (1526—1528)，513

Cisneros, see Ximenez de Cisneros, 西斯内罗斯

Cittadella (near Padua)，奇塔代拉 (在帕多瓦附近)，271

Classics, 古籍

16世纪的各种版本，366—367，372

译本，382

古典学问和16世纪的科学，387，388—389，391—392，411—412，419

各学校中的研究，414—424，436—437

军事理论家对它们的研究，483—484

在葡萄牙的影响，613

Clavius, Christopher (Schlussel)，*Gnomonices*，克拉维厄斯，克里斯托弗 (施吕色尔)，《日晷测时学》，395

Clement VI, Pope, teaching on indulgences (*Unigenitus*, 1343)，克雷芒六世，教皇，论赦罪权的教理，75—76

Clement VII, Pope (Giulio de' Medici)，克雷芒七世，教皇 (朱利奥·德·梅迪奇)，146，149，159，165，257，266，271，400

与奥格斯堡议会 (1530)，94—95

与大议会，170—171，253

与新修会，278—279，282—283，286，289—290

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之离婚事，231—233，234—235，443

关心梅迪奇家族利益，252—253

去世 (1534)，265，283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斗争，212，252—253，307—308，342；加入科尼亚克同盟（1526），212，343；被皇家军队俘虏（1527），231，244；吉贝蒂的影响，257—258；秘密结盟反对查理五世（1524），342；巴塞罗那条约（1529），345；论康布雷和约（1529），345

为查理五世加冕为帝（1531），330；承认斐迪南一世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1529），345

Clergy, 神职人员

对宗教改革帮助不力，3；在丹麦，134；在英国，226—229，235，242；在法国，214；在匈牙利，188；在波兰，187；在意大利，251

路德攻击他们的立场，80

卡尔斯塔特的“人皆僧侣”观，85

萨克森神职人员遭蔑视，92—93

英国皇家对神职人员的控制，229，234；在法国，211

在意大利，神职人员的改革运动，257—258；在丹麦，141—142

特伦托敕令论修院（1563），299

宗教改革引起神职人员补员的困难，429

不再参预国家行政管理，446

在东部各国议会中有代表，467，469

在新西班牙由……任命和维持，564—565

Cleves, duchy of, succession problem (1538—1539), 克利夫斯（克莱沃）公爵领地，承继问题（1538—1539），354

Cleves, William, duke of, 克利夫斯公爵，威廉，175，181，316，354

Clichtove, Josse van, and Reform in France, 克利希妥夫，乔西·范，与在法国的改革，215—217

Cluj, see Kolozsvar, 克卢日

Coburg, Luther at, 科堡, 路德在此, 94, 161

Cochin, Portuguese at, 科钦, 葡萄牙人在此, 595—597, 601; 地方政府, 603; 传教团, 610

Cochlaeus, Johannes (Johann Dobeneck), German theologian, 科克拉乌斯, 约翰内斯(约翰·多皮奈克), 德国神学家, 105

Codure, John, joins the Jesuits, 科杜尔, 约翰, 参加耶稣会, 292

Cognac, League of (1526), 科尼亚克同盟(1526), 212, 340, 343, 348

Coimbra, Jesuit college, 科英布拉, 耶稣会学院, 297

Colet, John, dean of St Paul's, 科利特, 约翰, 圣保罗学校主任

创建圣保罗学校(1509), 417

his Brevissima instiutio, 425

论希腊文讲授, 427

Coligny, Gaspard de, admiral of France, 科利尼, 加斯帕尔·德, 法国舰队司令, 224, 301, 503

Colin, Jacques, 科兰, 雅克, 344

Colle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索邦神学院抗议建立该学院(1530), 219; 受皇家保护, 434

三种语言学院, 428

College de Guyenne, at Bordeaux, 吉耶纳学院, 在波尔多, 422—423, 437

Colmenzone (near Camerino), Capuchin hermitage, 科门佐内(在卡梅里诺附近), 嘉布遣会隐居之地, 280

Cologne, 科隆, 53, 80

激进的改革之发展, 86; 再洗礼派在此, 131; 赫尔曼·冯·维德改革企图的失败, 181; 查特豪斯修院, 276; 耶稣会的创立 (1545), 299; 天主教复辟 (1547), 356

Cologne, Hermann von Wide, archbishop and elector of, 科隆大主教和选侯, 赫尔曼·冯·维德, 181

Cologne, university of, 科隆大学, 79, 432

Colombia, Spanish conquest of Bogota, 哥伦比亚, 西班牙征服波哥大, 577

Colombo, Portuguese fort, 科伦坡, 葡萄牙要塞, 606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 605

Colonisation, 殖民

人力补员来自英国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43

葡萄牙在东方的据点, 602, 603

Colonna, Prospero, 科隆纳, 普罗斯佩罗, 341—342

Colonna, Vittoria, see Pescara, marchioness of, 科隆纳, 维多利亚

Comenius (Jan Komensky), leader of 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 科美纽斯 (杨·考门斯基), 统一兄弟会领袖, 203

Common Pleas, Court of, 民事诉讼法院, 450

Communism, 共产主义

闵采尔信仰的可疑证据, 87

再洗礼派对财产公有的态度, 122—124

遭克拉默谴责, 130

Comynnes, Philippe de, 科明内斯, 菲利普·德, 212, 384

Compactata (1436), 1436年协定, 190, 203

Compass, magnetic, 磁性罗盘, 388, 395—396

Compt, castle of (near Hesdin), 科普特城堡 (在埃丹附近), 503

Comuneros (Spanish), revolt of (1520), 科穆内罗斯 (西班牙) 叛乱 (1520), 310, 319—320, 339, 341, 573

Conciliar movement, 公会议运动

路德的态度, 78—79, 82—83, 170

波兰支持该运动, 186—187

Concordat of Bologna (1516), 博洛尼亚的政教协定 (1516), 98, 211—212, 215, 233, 443

Confessio Bohemia (1575), 波希米亚信纲 (1575), 209

Confessio Hafniensis (Copenhagen Confession), 哥本哈根信纲, 139

Confessio Pentapolitana (1549), 五城信纲, 208

另见奥格斯堡; 四城信纲

Confession, private, introduced into Swedish Church Ordinances (1571), 私下告解, 引进瑞典教会条例中 (1571), 153

Congo Jesuit mission, 刚果, 耶稣会宣教会, 298—299

Consensus Mutuus of Protestant Churches in Poland (1570), 波兰新教协议 (1570), 209

Consensus Tigurinus between Bullinger and Calvin (1549), 布林格、加尔文间的共同纲领, 107

Constance, 康斯坦茨

布劳雷尔和该地的宗教改革, 86, 102, 166

康斯坦茨信纲, 94

卷入基督教城市同盟, 103

与四城信纲，111

对路德圣餐观的态度，168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350

Constantine XI Palaeologus, emperor of the east, 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东部皇帝，541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336；作为奥斯曼首都，510—533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立宪运动的发展

西方君主与代表大会，455—458

在德国，477—480

在东部王国：地主贵族，465；代表大会，465—470；议会，466—470；斐迪南一世企图引进联邦制，467；选举式君主制，467；莫杰夫斯基为之辩护，476；世袭君主制的引进，471—472

Contarini, Francesco, Venetian ambassador in Spain, 孔塔里尼，弗朗切斯科，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323

Contarini, Gasparo, cardinal, 孔塔里尼，加斯帕罗，枢机主教，354

在雷根斯堡议会上（1541），112，178—179，259

应允军事援助查理五世，182

与天主教改革运动，251，258—259

与卡马尔多利会，277—278

力促承认耶稣会，293

Cooche, Robert, defends Anabaptism, 库奇，罗伯特，捍卫再洗礼派，130

Cop, Nicholas,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科普，尼克拉，巴黎大学校长，114

Copenhagen, 哥本哈根，139—140

宗教改革在该地，136；布根哈根封立丹麦主教，140—141；扬·拉斯基被驱逐，204；1527年议会的教会立法，136；1530年的议会，138—139；1533年的议会，139；吉苏尔·伊诺松在此，145

Copenhagen, Confession of, contrasted with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哥本哈根信纲，与奥格斯堡信纲的对比，139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哥本哈根大学，139, 141

Copernicus, Nicholas, 哥白尼，尼古拉，387—389, 393, 411

日心说，398—400

Copyright, of printed works, and privilege, 印刷著作的版权和特许权，363

Cordatus (Conrad Hertz), 科达图斯（康拉德·赫茨），193—194

Cordier, Mathurin, French Protestant, 科尔迪耶，马蒂兰，法国新教徒，114, 116, 424, 426, 436

Cordus, Valerius, naturalist, 科杜斯，瓦莱里乌斯，博物学家，392

Corfu, attacked by Turks (1537), 科孚，受土耳其攻击（1537），519

Cornwall, the rising of 1549, 康沃尔，1549年起义，243—244

Coromandel Coast, 科罗曼德尔海岸，597

Coron, lost (1523) and retaken (1534) by Turks, 科龙，土耳其人丢失（1523）和复得（1534），325, 518

Cortes, Hernan, 科尔特斯，埃尔南

重建特诺奇蒂特兰，562—563

在墨西哥组建政府，563—565；与秘鲁的皮萨罗对比，576

监护征赋区，564, 570—571, 583

他对太平洋的探索，567—568；派遣远征队去摩鹿加，569

遭诽谤被免职，568—571

退休回西班牙，去世（1547），571

Cortes, Martin, *Arte de Navegar*, 科尔特斯，马丁，《航海术》，396

Coucy, Declaration of (1535)，库奇宣言（1535），220

Councils of the Church, 教会会议（公会议，教务会议）

路德向未来的大会议呼吁，78，170；路德对唯有教皇有权召开教会会议一事加以抨击，80；在施派尔议会上（1526），93；在奥格斯堡议会上（1530），93—94；会议延期和分歧（1532—1535），170—171；新教拒绝保罗三世的邀请，171—172，178—179

教皇反对查理五世的态度，307—308

愿意在意大利召开，256，268

巴塞尔（1431），183，187，189

康斯坦茨（1414—1418），79，186，189

拉特兰（第五次会议，1512—1517），251—252，269，276

比萨（1512年公会议），214，443

特伦托会议（1545—1563），2，94，179，266，331，355，383；召集到特伦托（1545），182，253；迁至博洛尼亚（1547），休会，183，253—254，356；查理五世的不满，183；重新召开（1551），184—185，254；斐迪南一世努力使饼酒同领派与罗马和解，199—200；谴责两种方式的圣餐礼，203；匈牙利引进改革计划，208—209；休会（1551），254；天主教改革派的希望，270；在最后一届会议中，意大利主教占优势（1562—1563），274；宗教修会的改革和整顿，277，285，290；耶稣会的影响，297，299；有关修院的教会，299；通俗拉丁文《圣经》文本，373

Council of the North (England)，北方会议（英国），237，450

Council of the Welsh Marches (England), 威尔士边界会议
(英国), 450

Councils, royal, see Administration, 皇家会议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1—3, 301, 423

得益于印刷, 17

在东方国家中, 203, 208, 209

在法国, 222, 225

保罗四世与反宗教改革, 254, 272—273

在意大利, 269, 272—273

西班牙作为先锋, 333

在德国, 349

Courland, duchy of, 库兰公爵领地, 160, 559

Courtenay family, 科特尼家族, 239

Coverdale, Miles, 科弗达尔, 迈尔斯, 239, 383

Cracow, 克拉科夫, 192, 468, 473—474, 538

Cracow, university of, 克拉科夫大学, 187, 192, 201, 207

Cranach, Lucas, German painter, 克拉纳赫, 卢卡斯, 德国画家, 76

Cranmer, Thoma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克拉默, 托马斯, 坎特伯雷大主教, 130, 245

他的崇拜礼仪, 18, 241; 他的公祷书, 242—243, 245, 250

与亨利八世, 233—234, 240

在剑桥, 233, 238

被授任大主教(1533), 234

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 238

《四十二信条》（1553），245

他对圣餐礼的信仰，242—243，245

从欧陆引入宗教改革者，243，245

他的《教会改革法》，245

被烧死，248

Crema, Battista da, Dominican, 克雷马，巴蒂斯塔·达，多明我会修士，289，290

Cremona, 克雷莫纳，260，287

Crespy, Peace of（1544），克雷斯皮和约（1544），182，221，353—355

Crimea, Tatars of,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在土耳其宗主国的统治下，515，522，536，538，549

与俄国结盟，536，537—540，549；对基辅劫掠（1482），537；与俄国决裂，全体鞑靼人进攻莫斯科（1521），549；劫掠莫斯科（1571），555—556；在伊凡四世领导下的防御措施，557—558

波兰对联盟的希望（1507），548，558

受阿斯特拉罕的攻击，549；争夺王位，557

Croatia, 克罗地亚，21，465，512

议会，467，475

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疆界之争，521—522；招募的新兵在朗斯卡被击溃（1544），524

Cromwell, Thomas (Earl of Essex), 克伦威尔，托马斯（埃塞克斯伯爵），439；早年生涯和性格，233，239，247

他的主权观，234—235，443，457—458，463

他对教皇至上的攻击，234—235

被任命为灵性上的副统帅（1536），235

与修院的解体（1535），235—236

禁止求恩朝圣（1536），237

他关于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指令（1536），238—239

谋求与德国路德派诸侯结盟，171，238—240

与六条款（1539），240

失败与处决（1540），240—241

他对爱尔兰的政策，441—442

官僚行政管理体制的引进，444，448；作为皇室大臣的地位，
447

行使议会权力，457—458

并非是马基雅弗利的门徒，460

运用文字宣传，462，17

Croy, Guillaume de, sieur de Chievres, minister of
Charles V, 克罗伊, 纪尧姆·德, 谢夫尔阁下, 查理五世之大臣,
303—305, 318, 319

Cruciger, see Krzyzak, Feliks, 克鲁齐格

Crusades, 十字军, 11, 48, 75, 336

与基督徒对战争的态度, 502

作为葡萄牙与东方贸易的因素, 592, 600, 609, 613—614

Csanad, bishopric of, in Turkish hands, 乔纳德主教区, 在
土耳其人手中, 197

Cuba, 古巴, 568

Culmbach, see Brandenburg-Culmbach, 库尔姆巴赫

Cujas, Jacques, French legalist and political theorist,
居雅斯, 雅克, 法国法律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17

Cum Postquam (1518), decretal on indulgences, 78

Cunha, Nuno da, Portuguese governor in the East, 库尼亚, 努尼奥·达, 葡萄牙东方总督, 521, 607—609

Curione, Celio Secundo, reformer, 库廖内, 切利奥·塞昆多, 宗教改革家, 261, 263

Curtius, Quintus, 库尔提乌斯, 昆塔斯, 372

Cuzco, Inca capital in Peru, 库斯科, 在秘鲁的印加首府, 574—577

Cybo, Caterina, Princess, 基伯, 卡特琳娜, 公主, 264—266

Cyprian of Alexandria, St, 亚历山大的西普里安, 圣, 372

Cyprus, 塞浦路斯, 298, 347, 486

Czechowiz, Marcin, 切霍维兹, 马尔青, 207

Dabul, Portuguese at, 达布尔, 葡萄牙人在此, 597

Dalecarlia, revolt of the peasants, 达莱卡利亚, 农民暴动, 148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465, 467, 519—520

Daman, Portuguese fort, 达曼, 葡萄牙要塞, 611

Damascus, 大马士革, 511, 533

Dandolo, Andrea, 丹多洛, 安德烈亚, 533

Daniel, prince of Moscow, 达尼埃尔, 莫斯科亲王, 546

Daniel, metropolitan of Moscow, 达尼埃尔, 莫斯科都主教, 550

Danish language, 丹麦语

圣经和礼仪翻译, 134—136, 142

彼得·帕拉第乌斯的著作, 141

在哥本哈根议会上改革者坚持用丹麦语 (1530), 138

在挪威使用丹麦语阻碍了宗教改革, 144

D' Annibault, Claude, 丹尼包尔特, 克劳德, 507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吉耶里, 306, 375

Danube, river, 多瑙河, 196, 510, 512, 514—515, 522

Danzig, 但泽, 194, 560

宗教改革在此, 192, 194—195, 201—202

Darien, 达里恩, 567—568, 573, 575

Dauphine, Gattinara urges annexation, 多菲内, 加蒂纳拉力促兼并, 307

David, Ferenc, 戴维, 费伦斯, 208

Deal, Henry VIII' s coastal fortifications, 迪尔, 亨利八世的沿海要塞, 493

Debrecen, Reformation in, 德布勒森, 宗教改革在此, 199, 205

Decet (1521) , excommunicates Luther, 绝罚路德, 81

Decius (Jost Dietz) , 德西乌斯 (约斯特·迪茨) , 201

De donis conditionalibus (1285) , 44

Dee, John, 迪, 约翰, 394

De la Gasca, Pedro, viceroy in Peru, 德拉加斯卡, 佩德罗, 驻秘鲁总督, 579

De la Marck, Robert, 德拉马克, 罗伯特, 345

De la Perriere, Guillaume, 德拉佩里埃尔, 纪尧姆, 462

De la Ramee, Pierre, see Ramus, 德拉拉梅厄, 皮埃尔

De Las Casas, Bartolome, Dominican, 德拉斯卡萨斯, 巴托洛梅, 多明我会士

力促在西班牙美洲属地实施人道主义, 578—579, 588

关于政治理论著作, 588

De la Vega, Garcilaso, Spanish poet, 德拉维加, 加西拉索, 西班牙诗人, 378

De la Vela, Blasco Nunez, first viceroy in Peru, 德拉贝拉, 布拉斯科·努涅斯, 秘鲁首任总督, 579

Del Cano, Sebastian, 德尔卡诺, 塞瓦斯蒂安, 568—569

De l' Etoile, Pierre, teacher of Calvin, 德莱图瓦勒, 皮埃尔, 加尔文老师, 114

Delfino, Pietro, general of the Camaldolese, 德尔芬诺, 彼得罗, 卡马尔多利会会长, 278

Delhi, 德里, 593

Del Huerto, Garcia, his work in botany, 德尔韦尔托, 加西亚, 他对植物学的研究, 408

della Casa, Giovanni, Italian writer, 德拉卡萨, 乔凡尼, 意大利作家, 381, 422

della Rovere, Giuliano, see Julius II, Pope, 德拉罗韦雷, 朱利亚诺

della Volta, Gabriel, orders inhibition of Luther (1518), 德拉沃尔塔, 加布里埃尔, 命令禁止路德教权 (1518), 77

del l' Obel, Matthias, his work in botany, 德尔洛贝尔, 马蒂亚斯, 对植物学的研究, 408

de los Cobos, Francisco, minister of Charles V, 德洛斯科沃斯, 弗朗西斯科, 查理五世大臣, 309—310, 329

del Vasto family, supports Charles V in Italy, 德尔瓦斯托家族, 在意大利支持查理五世, 314

del Vasto, Alfonso Alvarez, marquis, governor-general and captain-general in Milan, 德尔瓦斯托, 阿方索·阿尔瓦雷斯, 侯爵, 米兰总督兼军区司令, 329, 330

Denck, Hans, Anabaptist, 登克, 汉斯, 再洗礼派, 110, 119, 122, 124

Denmark, 丹麦, 7, 30

与瑞典, 151, 559

声称拥有多罗西亚王位, 303, 313

驱逐克里斯蒂安二世, 313

与施派尔和约 (1544), 313—314

关心利沃尼亚的斗争, 559—560

Descartes, Rene, 笛卡儿, 勒内, 394, 412

Desna, river, 杰斯纳河, 538

Despautere, Jean (van Pauteren), his grammatical textbooks, 德斯波特勒, 让 (范·波特朗), 他的语法教科书, 425

Dessau, league of (1525), 德绍同盟 (1525), 92

Deventer, 代芬特尔, 127, 360, 417, 424

Devlet-Girey, Khan of the Crimean Tatars, 德夫列特-吉雷, 克里米亚鞑靼人可汗, 558

Devshirme, child-tribute levied by Turks, 土耳其征收的婴儿税, 528—529

Dieppe, Calvinism in, 迪耶普, 加尔文宗在此, 224

Dietz, Jost, see Decius, 迪茨, 约斯特

Digges, Thomas and Leonard, 迪格斯, 托马斯和伦纳德, 394, 400

Dijon,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第戎, 对路德的迫害, 218

Dillingen, university of, founded and recognised (1551), 迪林根大学, 建立和获得承认 (1551), 435

Diocletian, Roman emperor, 戴克里先, 罗马皇帝, 483

Dioscorides, Greek physician, 迪奥斯科里斯, 希腊外科医生, 387, 392, 408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n unruly behaviour of troops (c.1549), 《论公共福利》, 论军队违法乱纪行为, 487—488

Diu, 第乌

葡萄牙打败马木路克舰队 (1509), 520, 591, 598, 607

葡萄牙要塞, 599, 605, 607, 611; 土耳其人围攻, 521, 607—608, 611

Diyarbakir, 迪亚贝克尔, 513, 516, 525

Djan Ali, khan of Kazan Tatars, 占·阿利, 喀山鞑靼可汗, 549, 557

Djerba island, Turkish naval victory (1560), 杰尔巴岛, 土耳其海军的胜利 (1560), 532—533

Dmitry, grandson of Ivan III of Russia, 季米特里, 俄国伊凡三世之孙, 540—542

Dnieper, river, 第聂伯河, 538, 558

Dobeneck, Johann, see Cochlaeus, 多贝内克, 约翰

Doctors' Commons (London), as scholarly association, 民法博士协会 (伦敦), 学术性协会, 437

Dole, university of, 多勒大学, 417

Dolensis, see Alexander of Ville Dieu, 多伦西斯

Dolet, Etienne, 多莱特, 艾蒂安, 218, 219—220, 374

Domenichi, Ludovico, 多梅尼基, 卢多维科, 264

Don, river, Russian raids on Tatars, 顿河, 俄国对鞑靼人的袭击, 558

Donatus, grammarian, 多纳图斯, 语法学家, 360—361, 416, 424

Donini, Marcantonio, Venetian ambassador at the Porte, 多尼尼, 马尔坎托尼奥, 威尼斯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530

Dorat, J., French poet, 多拉, 让, 法国诗人, 378

Doria, Andrea, Genoese admiral, 多里亚, 安德烈亚, 热那亚海军司令, 253

脱离法国为查理五世服务并攻占热那亚, 313, 324, 344—345, 517; 攻占和丢失科龙 (1532, 1534), 325, 518; 在普雷韦扎被击败 (1538), 325, 351, 507, 519—520; 袭击舍尔沙勒 (1532), 349

海军战略, 507

Dorogobuzh, Ivan III defeats Lithuanians (1500), 多罗戈布日, 伊凡三世击败立陶宛人 (1500), 538

Dorothea, daughter of Christian II of Denmark, see under Palatine, 多罗西娅, 丹麦王克里斯蒂安二世之女

Dorpat, 多尔帕特, 157, 538, 559

Douglas, Gawin, Scottish poet, 道格拉斯, 高温, 苏格兰诗人, 379

Downs, the (English Channel), coastal defences of Henry VIII, 唐斯 (英国海峡), 亨利八世的海防, 493

Dragut, see Torghud Re' is, 德拉古特

Drake, Sir Francis, 德雷克, 弗朗西斯爵士, 585

Drava, river, 德拉瓦河, 510, 512, 515, 522

Drenthe submits to Charles V, 德伦特, 投降查理五世, 316

Dringenberg, Ludwig, his educational work, 德林根伯格, 路德维希, 他的教育工作, 417

Drohojowski, Jan, bishop of Kujaiwa, 德罗霍约夫斯基, 扬, 库亚伊瓦主教, 201

Dryander, Francis (Francisco de Enzinas), 德赖安德,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科·德·恩西纳斯), 243

Drzewicki, Maciej, bishop of Danzig, 杰维茨基, 马切伊, 但泽主教, 194

Du Bellay, Guillaume, 杜贝莱, 纪尧姆, 219

Du Bellay, Joachim, French poet, 杜贝莱, 若阿基姆, 法国诗人, 377—378

Dubois (Franciscus Sylvius), 迪布瓦 (弗朗西斯库斯·西尔维于斯), 213

Ducci, Gaspar, his financial career, 杜奇, 加斯帕尔, 他的财政事业, 67—68

Duchoul, Guillaume, on the noble art of war, 迪舒尔, 纪尧姆, 论战争艺术, 501

Dudley, Lord Guilford, 达德利, 吉尔福德勋爵, 246

Dudley, John, see Northumberland, duke of, 达德利, 约翰

Duna, river, see Dvina, 多瑙河

Duren (Guelders), taken by Charles V (1543), 迪伦 (居尔德斯), 被查理五世占领 (1543), 354

Durer, Albrecht, German painter and engraver, 丢勒, 阿尔布雷希特, 德国画家, 雕刻家

他在维滕贝格的工作, 76

透视几何学作业, 402

论筑垒工事, 484—485, 492

他愿意协助十字军, 502

Duma, council of boyars, 杜马, 沙俄贵族会议, 554

Dumolin, Guillaume, 迪蒙兰, 纪尧姆, 213

Du Moulin, Charles, 迪穆兰, 查理, 211

Dunbar, William, Scottish poet, 邓巴, 威廉, 苏格兰诗人,
379

Duns Scotus, scholastic philosopher, 邓斯·司各脱, 经院哲
学家, 98, 100

Duprat, Antoine, Cardinal, archbishop of Sens, chancellor
of France, 迪普拉, 安托万, 桑斯大主教, 枢机, 法国首相, 217,
220, 223

Durkop, Conrad, 杜尔科普, 康拉德, 158

Dvina, river (northern), trade route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德文纳河(北方), 俄国和英国的贸易通道, 561

Dvina, river (western of southern, Duna), 德文纳河(西部
和南部, 多瑙河), 158, 559—560

D'yaki, in Russian administration, 俄国的行政管理, 541,
550, 553

Dynasticism, 王朝统治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力量, 11; 哈布斯堡婚姻对安特卫普
发展之影响, 66; 查理五世帝国的建立, 301, 303, 337

与社会的关系, 19

约克王朝的废除威胁到在英国的王位继承, 239

East Indies, see Portugal (expansion), 东印度群岛

Eberhard of Bethune, grammarian, 贝蒂纳的埃伯哈德, 语法学
家, 425

Ebernburg, castle of the, 埃伯恩贝格城堡, 104

Eck, John (Johann Maier), 埃克, 约翰(约翰·迈尔)

与路德论战, 79

在沃尔姆斯议会上（1526），82

在巴塞尔与奥科兰帕迪乌斯争论（1526），105

与胡布迈尔的《论异端》，122

在雷根斯堡议会上，178

力促镇压波兰的路德派，201

他的《圣经》译本，383

Economic change, 经济变革

概况，23—29；在德国与帝国内，29—36；在英国，36—44；在法国，44—47，222，225；在意大利，47—49；在西班牙，47，49—50，584—585

安特卫普作为商业、财政、工业中心，50—69；葡萄牙大宗香料集散地（1499）和贸易的增长，50—51，55；大宗香料商品的撤离（1549），51，68—69；地理上的优越条件，51，52—53；英国布匹贸易的开始（1338）和增长，51，52，53—58，60；布匹贸易的衰落，69；南德的金属和布匹贸易，51，53；摆脱佛兰德，52；“民族”，51，53—55，57；意大利商人与金融家，53，63；黎凡特香料与葡萄牙的关系，53；贸易技术，54—55；布拉班特市场，55—56，63，66；靠勃艮第统治者赞助而崛起，57；1555年后失去政府支持，57—58；贸易额，进口和出口，58—59；工业，59—61；安特卫普本身参预外贸，61—62；常居的外国人，62—63；信贷支付、结算周期，信贷条款，63—65；现金支付的稀少，63；证券、利息和佣金率，64—65；汇兑投机，65；商品交换的投机倒把，65；不动产市场，65；保险（人身、航海），65；彩票和赌博，65—66；金融的重要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66；政府贷款利率，66—68；财政实力的衰退，68—69；国家与私人的破产，68，318，611

查理五世的经济政策，312—315

货币经济引入西属美洲，580—581；农业经济，581—582

Ecouen, Edict of (1559), against thetetics, 反对异端分子的埃库昂敕令，225

Ecuador, 厄瓜多尔, 572, 575—577

Eden, Richard, his translation of Cortes' s *Arte de Navegar*, 艾登, 理查德, 翻译科特斯的《航海技术》, 396

Edict of Nantes (1598), 南特敕令, 210

Education, 教育

斯特拉斯堡的施图尔姆研究院, 109, 422—423, 424, 426,
437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工作, 116—117

英国从占有教会财产中获益, 244

耶稣会, 203, 294, 296—299, 423—424

天主教改革运动中对教育的关注, 257

在修会里, 276, 287—288

兴办女子教育的新修会, 290, 296

特伦特会议对修院的规定, 299

传统教育结构, 414—417, 424

共同生活兄弟会, 417

人文主义的影响, 418—428

体育运动和军训的地位, 420

教育的方式与广义教育观, 421—422

梅兰希顿的影响, 424

大学, 426—429

宗教改革的影响, 428—433

世俗控制的增强, 433—435

教育变革的实际影响, 435—437

研究院, 437

莫杰夫斯基论国家的职责，476

在东方，610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四世，英国国王，237

Edward VI,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六世，英国国王，130，
236，241

出生（1537），239；与抗议宗的联系，245；王权至上，245—
246，249；对布塞尔的保护，112；与牛津的新教（抗议宗），431；
对大学的监管，433

Eger (Cheb, in Bohemia), 埃格尔（海布，在波希米亚），465
—466

Eger (Erlau, in Hungary), 埃格尔（埃劳，在匈牙利），
197，526—527

Egmont, Charles of, see Guelders, Charles of Egmont, duke
of, 埃格蒙特，查理

Egypt, 埃及

被土耳其人占领（1517），347，510，521；暴动（1523—
1524），511；苏莱曼一世时的行政改革，511—512

在香料贸易路线上，520；与葡萄牙人的冲突，520—521，530
—531，592—608

Einarsson, Gissur, bishop of Skalhlt, 埃纳尔松，吉苏，斯
考尔霍特主教，144—145

Einbeck, joins the Schmalkaldic League, 艾恩贝克，加入施
马尔卡尔登同盟，350

Einsiedeln, Zwingli at, 艾恩西德尔，茨温利在此，98

Eisenach, 爱森纳赫，71，168

Eisleben (Saxony), 艾斯莱本（萨克森），70，183，424

Elbe, river, 易北河，186，356

Elbing (Elblag), 埃尔宾 (埃尔布隆格), 194, 201

Elbogen, see Locket, 埃尔博根

Eleanor (of Austria), queen dowager of Portugal, Queen of France, consort of Francis I, 埃莉诺 (奥地利的), 法国皇后, 弗兰西斯一世的配偶, 343, 345

Elefant, Swedish royal ship, 象号, 瑞典皇家的船只, 504

Elena, queen of Poland, consort of Alexander I, 埃伦娜, 波兰皇后, 亚历山大一世的配偶, 538

Elena, grand princess of Moscow, consort of Vasily III, 叶连娜, 莫斯科大公夫人, 瓦西里三世的配偶, 545, 550—551

Elena, daughter of Stephen of Moldavia, wife of Prince Ivan Ivanovich, 叶连娜, 摩尔达维亚的史蒂文的女儿, 伊凡·伊凡诺维奇大公的妻子, 540—542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女王, 3, 130

在教会中的首脑地位, 246, 249

她不喜欢加尔文主义, 249

玛丽统治时的地位, 249

她的宗教信仰之谜, 249

她作为君主的地位与议会的关系, 457—458

Elkass Mirza, 埃尔卡斯·密尔萨, 524—525

Elyot, Sir Thomas, his Governour, 埃利奥特, 托马斯爵士, 191, 422, 436

Emden, Anabaptism in, 埃姆登, 再洗礼派在此, 131—132

Emilio, Paolo, see Aemilius, Paulus, 埃米利奥, 保罗

Empire, Byzantine, 拜占庭帝国, 21, 546

Empire,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国

农村经济和结构的变化, 29—36

与查理五世的国家的区别, 308

宪政的发展, 477—480

Ems, river, 埃姆斯河, 127

Enclosures, in England, 英国的圈地运动, 38, 42—43, 237, 244

Encomienda, 监护征赋制/区

西班牙人的管理方式, 扩展到墨西哥, 564—565; 皇室放弃它的努力, 571—572, 578—580

Enfants sans souci, their morality plays, 他们的道德剧, 379

Engelbrektsson, Olaf, archbishop of Trondhjem, 恩格尔布雷克特松, 奥拉夫, 特隆赫姆的大主教, 142—143

Enghien, Francois de Bourbon, duke of, 昂吉安, 波旁的法兰西斯公爵, 531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science to, 科学应用于工程学, 402

England, 英格兰

君主制的进展, 7—8, 438—439, 441—443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斗争, 10, 307

纺织业的发展, 16

农业结构和经济的变化, 36—44; 在土地分配过程中解散修道院的后果, 15

税收, 232, 442, 448, 453, 456

早期印刷, 362, 365, 366

行政管理: 专职科层机构的引入, 444; 首相, 444, 449; 人员的招募, 446; 王室国务卿, 446—447; 司法, 449—450; 地方的,

453—454; 会议, 454

战争: 组织与装备, 489—490, 495; 亨利八世的海防工事, 488—489, 491, 493—494; 重型武器的使用, 494; 海军的发展, 504, 507

在东方的扩张, 531

与俄国的关系, 560; 北方贸易路线, 561

Engraving, and illust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s, 与科学著作的说明(图解), 390, 409

Enriquez, Fadrique, admiral of Castile and co-regent, 恩里克斯, 法德里克, 卡斯蒂利海军上将和联合统治者, 319

Enzinas, Francisco de, see Dryander, 恩西纳斯, 弗朗西斯科

Eperiesch (Eperjes), see Presov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德西德里乌斯, 70, 255

他的哲学观点, 4, 18, 370, 392

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及其与他们的关系: 路德, 86, 90—91; 阿来安德尔, 81; 因宗教改革者的暴力而疏远他们, 90; 1521年之后, 对他们的敌视, 90; 茨温利, 98; 布塞尔, 108; 安德烈亚斯·诺伯肯, 157; 梅兰希顿, 184; 在东方王国中, 187, 192—193, 194, 198, 201, 204; 对反三一论的影响, 206—207; 在法国, 213, 434; 在英国, 228; 查理五世, 257—258, 333; 胡安和阿方索, 瓦尔德斯, 265; 耶稣会士指控伊拉斯谟, 294; 遭罗拉的拒绝, 297; 加蒂纳拉, 306; 论律师, 314; 在西班牙的衰落, 333; 论非暴力主义, 502; 在新大陆, 565

他的圣哲罗姆《圣经》版本, 104

在巴塞尔, 114, 213; 在宗教改革时的传单, 105; 受雇于弗罗本, 363

他对改革的态度, 174—175; 对奥格斯堡的失望(1530), 95

他的去世(1536), 219, 425

对他著作的谴责, 259, 364, 426

他对教育的影响, 417, 420—421, 421—422, 425—426; 在卢汶的三种语言学院, 428

对查理五世作基督教世界领袖的看法, 301

他的讽刺诗和书信, 369—370, 380

他编辑出版瓦拉的, 372

他对西塞罗主义的攻击, 373—374

他的新约, 372—373, 382; 宗教改革家受益于他, 17, 147, 155; 奥科兰帕迪乌斯协助, 104; 与卡皮托的合作, 107; 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 206—207, 372—373

Ercker, Lazarus, treatise on metallurgy, 埃尔克, 拉萨鲁斯, 关于冶金的论文, 404

Eregli, 埃雷利, 528

Erfurt, 爱尔福特, 71—72, 86

Erfurt, university of, 爱尔福特大学, 71—72, 75, 432

Eric XIV, king of Sweden, 埃里克十四世, 瑞典国王, 559, 560

Erinzjan, 厄尔津詹, 516

Erivan, 埃里温, 525

Erlau, see Eger, 埃劳

Ernest, archduke of Austria, 恩斯特, 奥地利大公, 560

Erzerum, 厄尔祖鲁姆, 516—517, 524—525

Esch, John van, Austin Friar, a protomartyr of the Reformation, 埃施, 约翰·冯, 奥斯丁修会会士, 宗教改革最初殉道者, 86

Essex, earl of, see Cromwell, Thomas, 埃塞克斯伯爵

Esslingen, 埃斯林根, 356

Este family, and humanism at Ferrara, 埃斯特家族和费拉拉的人文主义, 419—420

Este, Alfonso de, see Ferrara, Alfonso II, duke of, 埃斯特, 阿方索·德

Estienne, Charles, anatomical illustrations, 埃蒂安娜, 查尔斯, 解剖学图解, 409

Estienne, Henri, his Greek lexicon, 埃蒂安娜, 亨利, 他的希腊语字典, 373, 427

Estienne, Robert, printer, 埃蒂安娜, 罗伯特, 印刷商, 214, 362, 364, 372; 他的受谴责的《圣经》, 214, 362, 364, 372

他的Thesaurus, 373, 426—427

Estonia, 爱沙尼亚, 160, 559, 561

Eszek, 埃斯泽克, 515

Esztergom, 埃斯泰尔戈姆, 196, 197

Ethiopia, see Abyssinia, 埃塞俄比亚

Eton College, 伊顿学院, 416, 424

Eucharist, 圣餐礼

路德的观点, 80, 91—92; 与布塞尔的讨论 (1530), 161, 167—170

两种类型的圣餐: 路德所赞成的, 80; 卡尔斯塔特所赞成的, 84, 85; 胡斯派的做法, 189; 被谴责为异端, 189, 203; 在匈牙利, 199; 庇护四世在斐迪南一世领地上授权的圣餐, 203; 在英国, 242

变体说, 遭改革者拒绝, 80, 91, 101; 为饼酒同领派接受, 189

圣体合质说, 对路德观点的错误术语, 91

圣事的解释, 91, 168—170; 卡尔斯塔特, 88, 91; 奥科兰帕迪乌斯, 91, 104—105; 茨温利, 101, 102—103, 163, 168; 布塞尔, 91—92, 111—112, 161—162, 168—169

第一个瑞士信纲 (1526), 107, 168

梅兰希顿和维滕贝格协约 (1536), 111, 168—169

加尔文的观点, 116, 118; 在马扎尔信纲中的加尔文主义教义, 205; 在费拉拉, 265

再洗礼派的态度, 121, 125, 126

试图调和瑞士派和路德派的观点, 166, 167—170

饼酒同领派接受罗马教义, 189

奥格斯堡信纲遭扬·瓦斯基拒绝, 209

英国在爱德华宗教改革时期的争议, 242—243, 245

对韦尔多派的态度, 265

Europe, 欧洲

宗教改革时期是作为欧洲扩张的开始, 20—21

国内的争斗与海外扩张的对照, 21—22

中欧衰落的意义和西方的崛起, 22

Eusebius of Ancona, general of the Capuchins, 犹西比乌斯 (安科纳的), 嘉布遣会会长, 283, 285

Eustachio, Bartolomeo, his work in anatomy, 欧斯塔基奥, 巴尔托洛梅奥, 他在解剖学方面的著作, 409

Exchequer, court of, 财务大臣法院, 450

Excommunication, 绝罚

对路德的绝罚, 81, 157

苏黎世议会采用的权力 (1526), 102

奥科兰帕迪乌斯的, 105—106

对斯特拉斯堡已婚神父的绝罚（1523），108

加尔文和日内瓦议会间的争论，115

再洗礼派教义，125

在斯坎尼亚对福音派布道者的绝罚，139

对已婚教士的绝罚，受古斯塔夫斯·瓦萨的拒绝，147

对赫尔曼·冯·维德的绝罚，181

对红衣主教波尔的绝罚，249

Exposcit debitum (1550) , confirms the Society of Jesus,
诏书确认耶稣会，293

Exsurge Domine (1520)

谴责路德教义，79；被路德焚毁，81

Faber, John, vicar-general of bishop of Constance, 法贝，
约翰，康茨坦茨主教总代理，101，105，123

Faber Stapulensis, see Lefevre d' Etaples, 法贝·斯塔普朗
西斯

Falmouth, coastal defences, 法尔茅斯，海岸防线，493

Familia Caritatis, Anabaptist brotherhood, 再洗礼派兄弟团
契，130，132

Fanini, Fanino, 法尼尼，法尼诺，261

Fano , Giovanni da , Observant Franciscan , joins the
Capuchins, 法诺，乔万尼·达，严规派方济各会士，参加嘉布遣会，
283

Farel, Guillaume, 法雷尔，纪尧姆

与宗教改革，113；在斯特拉斯堡避难，110；被驱逐出日内
瓦，115；在巴塞尔，213，216；论法国的路德主义，215—216

路德对他风格的影响，212

Farnese family, 法尔内塞家族, 253, 273, 358

Farnese, Alessandro, see Paul III, Pope, 法尔内塞, 亚历山德罗

Farnese, Pier Luigi, see Parma, Pier Luigi, duke of, 法尔内塞, 皮尔·路易吉

Fasting, 禁食

茨温利的态度, 100—101; 与路德态度的对照, 163; 在匈牙利路德教义的实施, 193

Fathers of the Church, 教父们

在对圣餐礼的解释上, 改革者们利用教父著作作见证, 91—92

茨温利的研究, 98

文本的出版, 104, 372

加尔文所熟知的, 115, 118

安德烈亚斯·(克)诺伯肯对教父的研究, 157

吉贝尔蒂版本, 258

意大利天主教改革家们继承教父们的精神基础, 259

韦尔多派对教父的尊重, 265

塞里潘多会把宗教讨论限制在教父们所论述的问题上, 266

Fausto, Vettore, 福斯托, 韦托雷, 505

Fedor I, ts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弗多尔一世, 561

Felix of Cantalice, St, 菲利克斯(坎塔利切的), 圣, 285

Feltre, Vittorino da, 费尔特雷, 维托里诺, 达, 418—420

Ferdinand I, emperor, king of Bohemia and Hungary, 斐迪南一世, 皇帝,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174, 497

君主权力的巩固, 8—9, 202; 与议会的关系, 8, 466—470; 集权化, 470—471; 世袭君主制的引进, 471—472

与奥地利帝国的建立，21，339—340

在帝国内：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1530），165，306，330，340；作为德国帝国政府首领，330—331；继承皇位（1556），330，331—332，357，358；行政管理，478，479

宗教政策：奥格斯堡和约（1555），185；在匈牙利，197—198；在波希米亚，199—203，472；参加纽伦堡联盟（1538），354

继承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1526），196，199，345，348—349，417，513；与扬·扎波利亚的和解（1538），349，515，522—523；要求特拉西瓦尼亚的权利，526

与土耳其：1532年的谈判，351；要求归还被占城堡，514；拒绝和平的提供（1529），515；和平（1533），515—516；签订和平条款（1547），524，531；1562年的复兴，527；企图征服特拉西瓦尼亚，526—527；对边防的加强，527

控制维也纳大学，435

他的战争法规（1527），501

去世（1564），532

《关于土耳其在匈牙利的争战》也可参看Ottoman Turks

Ferdinand I (the Catholic), king of Aragon, 斐迪南一世（天主教徒），阿拉贡国王，303—304，312，441

在西西里引进异端裁判所，328

行政管理，449，452—453

Fernel, Jean, French physician, 费内尔，让，法国医生，410—411

Ferrara, 费拉拉

该地的改革，256，261—262，264—265

人文主义在此，261，418，419—420

作为文学中心，380

Ferrara, Alfonso II, duke of, 费拉拉公爵, 阿方索二世, 262, 273

Ferrara, Ercole II, duke of, 费拉拉, 埃尔科莱二世, 公爵, 261—262

Ferrara, Renee of France, duchess of, 费拉拉女公爵, 法兰西的勒内, 256, 261—262, 267

Ferrari, Bartolomeo, 费拉里, 巴尔托洛梅奥, 287

Ferufini, J.B., 费吕菲尼, J.B., 65

Field of Cloth of Gold (meeting between Francis I and Henry VIII, 1520), 金衣地 (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相遇之地), 341

Fieschi family, the Genoa conspiracy (1547), 菲耶斯基家族, 热那亚阴谋 (1547), 253

Fileno, Lisia, see Ricci, Paolo, 菲莱诺, 利西亚

Filofey, Russian monk and writer, 菲洛费, 俄国僧侣和作家, 546

Finance, see Banking and Finance, 财政

Finland, 芬兰, 153, 561

Finmark, the Reformation in, 芬马克, 该地的宗教改革, 142

Fiore, Joachim da, 菲奥雷, 若阿基姆·达, 87

Firenzuola, Agnolo, Italian writer, 菲伦佐拉, 阿尼奥洛, 意大利作家, 381

Firlej, Andrzej, 菲尔莱伊, 安德雷奇, 209

Fisher, (St) John, bishop of Rochester, 费希尔, (圣) 约翰, 罗切斯特主教

对奥科兰帕迪乌斯圣餐观的攻击, 105

他的殉道 (1535), 228, 236

反对攻击教会法庭，232

与君权至上，233

奥热什科斯基论及他，476

Flacius Illyricus, Matthaeus (Mattia Vlacich)，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马泰乌斯（马蒂亚·弗拉奇基），184，371

Flanders，佛兰德，313，316

纺织工业，16，27，318；在英国的弗莱明织工，40

农奴制的废除，45

权力转移到布拉邦特，50—51，57

16世纪中叶的人口，60

对再洗礼派的迫害，127

被查理五世承继，303；法国放弃主权，343，353，440

Fletcher, Giles, English ambassador, 弗莱彻，吉尔斯，英国大使，561

Flodden, battle of (1513)，佛洛顿战役（1513），489

Florence，佛罗伦萨，273，289

在安特卫普的银行家和商人，63，66—67

该地对改革的渴望，251；对改革的镇压，264；卡纳塞基在此，266

对梅迪奇统治的反叛（1527），253，344；梅迪奇统治的恢复（1529），253，345，487

参加反对查理五世行列，342—343

坚持萨沃纳罗拉主义传统，264，289，502

历史学家，384—385

人文主义，在教育中，419；帕拉图学院，437；茨温利与它的联系，98

马基雅弗利的生涯, 460

Florence, Union (of Churches) of (1439), 佛罗伦萨, (1439年的)教会联盟, 187, 538, 544

Florence, university of, humanism in, 佛罗伦萨大学, 人文主义在此, 418

Folengo, Teofilo, Italian poet, 福伦戈, 泰奥菲洛, 意大利诗人, 376

Fontainebleau, Edict of (1540), 枫丹白露敕令 (1540), 221

Forez, trial of heretics, 福雷, 对异端的审判, 224

Forty-two Articles (1553), 四十二条款 (1553), 130, 245

Fossombrone, Capuchin hermitage, 福松布罗内, 嘉布遣会隐居处, 280

Fossombrone, Ludovico da, 福松布罗内, 卢多维克·达, 278—280, 282—283, 286

Fossombrone, Rafael da, Capuchin, 福松布罗内, 拉斐尔·达, 嘉布遣会, 278—279, 281

Fourquevaux, Raymond de, on the art of war, 富尔克沃, 雷蒙·达, 论战争艺术, 482, 485, 487, 490, 494—497, 502

Fox, Richard, bishop of Winchester, 福克斯, 理查德, 温彻斯特主教, 428

Foxe, Edward, bishop of Hereford, 福克斯, 爱德华, 赫里福德主教, 171, 462

France, 法国

君权的扩张, 7, 438—439, 458

经济变革, 44—47; 农民的解放, 28—29; 农业发展, 29—30; 与安特卫普的贸易, 58, 63; 里昂与安特卫普间的竞争, 66,

68; 1557年的破产, 68, 222; 沿岸地区经济运动, 222, 225; 巴西染料贸易, 586—587

纺织业, 46, 448—449, 453, 455, 500

与教皇, 252, 443

早期印刷, 362, 365

行政管理, 440; 贵族权力的增长, 15; 皇家大臣, 447; 审判和法律, 449—451; 地方管理, 453—454; 官僚机构的发展, 453—454

军事组织和设施, 489—491; 伤残囚犯的待遇, 503—504; 海军, 504, 507

Franche Comte, 弗朗什孔泰, 303, 308—309, 341, 343, 353, 358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弗兰西斯一世, 法国国王, 115, 163

与君权的巩固, 7, 438—439

与法国的宗教改革, 114, 354; 对大议会的态度, 170—171, 173; 同情、思想自由和伊拉斯谟主义, 216—217, 434; 对异端的镇压, 220—222, 434

与教皇的关系, 211—212

帮助乌尔里希公爵收复符腾堡, 165, 212, 353

在马里尼亚纳取胜 (1515), 211, 334, 337, 340

在帕维亚被捕 (1525), 216, 342—343, 517; 被释放, 217

去世 (1547), 221, 335, 355

与努永条约 (1516), 304

作为帝国的候选人, 306, 338—339

与奥地利的埃莉诺结婚, 343, 345

行政管理, 444, 451

军队组织, 485; 雇佣瑞士兵, 340—341

Francis Borgia, St, 方济各·博尔贾, 圣, 297

Francis Xavier, St, 方济各·沙勿略, 圣, 292, 298, 609—610

Franck, Sebastian, 弗兰克, 塞巴斯蒂昂, 110, 119, 124, 133

Francois, Michel, on Reform in France, 弗朗索瓦, 米歇尔, 论法国的宗教改革, 217

Frankenhausen, battle of (1525), 弗兰肯豪森战役 (1525), 89, 120

Frankfurt am Mai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339, 478

与南德的金属和布匹贸易, 53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会议, 163; 参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加尔文与拉斯基相遇, 204

印刷品和书籍贸易, 213, 362

英国新教徒避难于此, 248

被查理五世占领 (1546), 356

在该地办学, 430

Frankfurt, Diet and Interim of (1539), 法兰克福, 议会和临时敕令 (1539), 175—176

Frankfurt an der Oder, university of,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 432

Freburg, university of (1501—1560), 弗赖堡大学 (1501—1560), 432

Frederick III (the Wise), elector of Saxony, see Saxony, 腓特烈三世 (智者), 萨克森选侯

Frederick II, emperor, 腓特烈二世, 皇帝, 406

Frederick I,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腓特烈一世, 丹麦和挪威国王

取代克里斯蒂安二世 (1523), 135, 143

与宗教改革, 135, 137—138, 142—143

去世 (1533), 139, 143

Frederick II,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腓特烈二世, 丹麦和挪威国王, 401, 560

Freedom and servitude, 自由和奴役

西方的变化, 25—26, 31, 33

东欧传统的或“真正的”服役的发展, 35

农奴制在英国的消亡, 37, 38, 40, 42—43; 在法国, 44—45, 46—47; 在意大利, 47—48; 在西班牙, 49

莫杰夫斯基对农奴制的批判, 476

俄国企图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556

印第安人在新世界的地位, 564—565, 580, 587, 588—589

在巴西的奴隶劳动, 587

Freedom of thought, 思想自由

宗教改革家的不宽容性, 4, 18

意大利失望的驱散, 268

茨温利激进主义与路德态度的对照, 100

胡布迈尔的《关于异端分子和烧死异端分子者》, 122

再洗礼派祈求宗教自由, 133

Free will, 自由意志, 73, 79, 90—91, 184, 199

Fregosi, French agent, 弗勒戈西, 法国代理商, 353

Freistift (form of tenancy of land), “自由制” (土地租赁的形式), 33

Frescobaldi family , Florentine bankers in the Netherlands, 弗雷斯科巴尔第家族, 在尼德兰的佛罗伦萨银行家, 66

Fribourg , Eternal Peace of (1516) , 弗里堡永久和约 (1516) , 340

Friesland, 弗里斯兰, 129, 316, 440

Frith, John, 弗里思, 约翰, 227

Friuli, 弗留利, 26, 48, 263

Frobenius (John Froben) , printer at Basle, 弗罗本纽斯 (约翰·弗罗本) , 巴塞尔出版家, 79, 104, 213, 362—363

Froissart, Jean, French historian and poet, 傅华萨, 让, 法国历史学家和诗人, 360, 363, 381

Froment, Antoine, 弗罗蒙, 安托尼, 113

Fronsperger, Leonhard, on war, 弗朗斯佩格论战争, 482

Frontinus, influence on sixteenth-century ideas of war, 弗朗蒂乌斯, 对16世纪战争思想的影响, 483, 503

Froschauer , Christopher , printer , and spread of Anabaptism in Moravia, 弗罗绍尔, 克里斯托弗, 出版家, 与再洗礼派在摩拉维亚的发展, 123

Fruntsberg, George von, mercenary captain, 弗伦茨贝格, 乔治·冯, 雇佣的首领, 487

Fuchs, Leonhart, his work in botany, 富克斯, 伦哈特, 他对植物学的研究, 407—408

Fulek, Turkish victory (1552) , 富莱克, 土耳其人的胜利 (1552) , 526

Funfkirchen, see Pecs, 芬夫基兴

Fuenleal, Sebastian Ramirez de, bishop of Santo Domingo, 富恩莱亚尔, 塞瓦斯蒂安·拉米雷斯·德, 圣多明各主教, 571

Furstenberg , Wilhelm von , master of the Livonian Knights, 菲尔斯滕贝格, 威廉·冯, 立窝尼亚骑士团首领, 558, 559

Fugger family, bankers, 富格尔家族, 银行家, 16

贷款给查理五世, 13, 338—339, 342, 352, 356—357; 租借西班牙军事修会的收益, 312, 339

与金属和布匹工业, 53

与安特卫普的政府贷款, 66

来自赎罪券的收益, 76

对矿藏的控制, 312—313, 339, 348—349; 在斯洛伐克的崛起, 194; 对匈牙利民族主义的愤恨, 347

Fugger, Anton, 富格尔, 安东, 13, 348, 357

Fugger, Jacob, 富格尔, 雅各布, 32, 338—339, 348

Funen (Denmark) , the Reformation in, 菲英 (丹麦) , 宗教改革在该地, 136, 139

Fukien, 福建, 592

Fust, Johann, printer, 富斯特, 约翰, 出版家, 361

Galen, 加伦

对他的继续研究, 387, 389, 391, 406, 409—410

版本, 372, 392, 427

草药, 405

Galicia, 加利西亚, 187—188, 538—539

Galilei, Galileo, 伽利略, 伽利列, 412

他的力学著作, 389, 402; 斜塔的传说, 402

与日心说体系, 399

Galle, Peder, 加勒, 佩德, 148

Gallicanism, 高卢主义, 211, 223, 433

Gallipoli, Turkish arsenal, 加利波利, 土耳其兵工厂, 518

Galvao, Antonio, 加尔旺, 安东尼奥, 608

Gama, Estevao da, raids Suez (1541), 伽马, 埃斯特旺·达, 掠夺苏伊士 (1541), 520

Gama, Vasco da, 伽马, 瓦斯科·达, 50, 594—596, 605

Gambara, Angelo Marco, 甘巴拉, 安杰洛·马尔科, 288

Gambara, Veronica, Italian poetess, 甘巴拉, 韦罗尼卡, 意大利女诗人, 377

Gandia, Jesuits at university of, 甘迪亚大学的耶稣会士, 297—298

Gandia, duke of, see Francis Borgia, St, 甘迪亚公爵

Gansfort, Wessel, mystical writer, 甘斯福特, 韦塞尔, 神秘主义作家, 167

Gap, Calvinism in, 加普, 加尔文等在此, 224

Garay, Juan de, governor of Jamaica, 加拉伊, 胡安·达, 牙买加总督, 567

Gardiner, Stephen, bishop of Winchester employed by Henry VIII, 加德纳, 斯蒂芬, 受亨利八世雇请的温切斯特主教, 230, 232

与宗教改革: 与对教士的顺服 (1529), 234; 他的保守主义, 240—241; 被囚 (1548), 242—243; 对1549年公祷书, 天主教的解释, 243; 玛丽的大臣, 247; 被反教皇立法的议会撤职, 247—248; 他在玛丽迫害期的作用, 248

Gattinara, Mercurino de, minister of Charles V, 加蒂纳拉, 梅尔库里诺·德, 查理五世的大臣, 305, 308, 312, 314, 333

他对帝国功能的看法, 301, 304, 306—307

与查理五世当选为皇帝, 306

他作为大臣的地位, 446

去世（1530），306，333

他为查理五世继承权制订的行政管理计划，308—309

在西班牙的税收，319

Geiler, Johannes, of Keyzersberg, 盖勒（凯塞尔斯堡的），
约翰内斯，107

Geilolo (Moluccas)，盖洛洛（摩鹿加群岛），606

Geissshussler, Oswald, see Myconius, 盖斯许斯勒，奥斯瓦尔
德

Gelido, Pietro, 杰利多，彼得罗，264

Gelli, Giambattista, Italian writer, 杰利，詹巴蒂斯塔，意
大利作家，375

Generalites, taxation districts in France, 法国税收区，
453

Geneva, 日内瓦，219，424

宗教改革在该地，5，112—119；它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加尔文宗
传播到法国，223—224；英国新教徒在该地避难，248；意大利新教殖
民地，263—264

该地的印刷术，213；文学检查制度，364

Geneva, university of, 日内瓦大学，434

Genoa, 热那亚

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统治，10；被帝国军队占领（1522），
342；被法国占领（1527），344；重归帝国控制，344—345，517；弗
朗西斯一世放弃要求权，343

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63，65，313，322；与加泰罗尼亚争
雄，313，324

菲耶斯基家族的阴谋（1547），253

“尼哥底姆主义”在该地，268

与罗马神爱祈祷会，285

海军力量，341，347，517—518

Gentile, Giovanni, 真蒂莱，乔瓦尼，206—207

Geogmpy, stndy of, 地理研究，97，396，419，and see Cartography

George of Podebrady, king of Bohemia, 波迪布拉德的乔治，波希米亚国王，466

Georgia, 格鲁吉亚，524—525

Gerard, John, his herbal, 杰勒德，约翰，他的植物志，408

Germanta, popular rising in Valencia (1519), 兄弟会，巴伦西亚的民众起义，323

German language, Luther' s influence on, 德语，路德的影响，18，79，83

Germany, 德意志

独立的资产阶级的衰落，15

它的核心重要性的衰落，22

人口，29，32

农业结构的变化，29—36

南德意志商人在安特卫普，51，53

胡斯运动的影响，191

德意志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影响，192

查理五世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301，305；担心菲利普二世继承王位，311

反宗教改革，349；耶稣会，298—299

早期的印刷，361—362，365

政体的发展，9—10，477—480

军事组织与装备, 489; 雇佣兵, 485, 487, 489

关于宗教改革

Gesner, Conrad, 格斯纳, 康拉德, 366, 392, 407

Ghent, 根特

作为贸易中心, 53, 58, 318

叛乱 (1537, 1539) 与镇压 (1540), 317, 352

Giberti, Matteo, bishop of Verona, 吉贝蒂, 马泰奥, 维罗纳主教

与教会的天主教改革, 254, 257—258, 267, 273; 与卡尔内塞基的交往, 266

他的印刷所, 258

与新的修会, 288

Gien,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吉昂, 224

Gilbert, William, *De Magnete*, 吉伯, 威廉, 《论磁石》, 396

Gilds, 行会

反对棉布生产在国内的扩展, 40; 安特卫普布衣会, 60

他们在巴塞尔要求改革, 96; 与明斯特的宗教改革, 166—167

在斯特拉斯堡形成中他们的观点, 107

查理五世与他的在尼德兰的政治力量, 316—317

麦斯达, 322, 445—446

塞维利亚的商会, 584

Giorgio, Francesco di, 乔治, 弗朗切斯科·迪, 492

Giovio, Paolo (Jovius), 焦维奥, 保罗 (约维乌斯), 485

Girey, Tatar dynasty, 吉雷, 鞑靼王朝, 549—550, 557

Girolamo Aemiliani, St, founder of the Somaschi, 吉罗拉莫, 阿埃米利亚尼, 圣, 索马斯基修会创立者, 288

Giustiniani, Paolo, Blessed, see Paolo Giustiniani, 朱斯蒂尼亚尼, 保罗

Glareanus (Heinrich Loriti), 格拉雷西阿努斯 (海因里希·洛里蒂), 97, 105

Glarus, Zwingli's ministry at, 茨温利在格拉普斯的教牧, 97

Glasney (Cornwall), reading school at, 格拉斯尼 (康沃尔) 的识字学校, 415

Glatz, see Kladsko, 格拉茨

Glinisky, Mikhail, Lithuanian landowner, 格林斯基, 米哈伊尔, 立陶宛的土地所有者, 548, 550—551

Glinisky, Yury, uncle of Ivan IV, 格林斯基, 尤里, 伊凡四世的叔叔, 551

Gnapheus (Wilhelm de Volder), 尼亚法埃乌斯 (威廉·德·博尔德尔), 370—371

“Gnesiolutherans”, controversy with the school of Melanchthon, 极端的路德派, 与梅兰希顿派的争论, 184

Gniezo, primatial see of Poland, 格涅兹诺, 波兰的大主教区, 186

Goa, 果阿

基督教传教, 297, 298, 609—610

被葡萄牙人占领 (1509), 520, 599; 反对葡萄牙人, 598; 地方政府, 603; 财政改革, 609

Gottingen, joins the Schmalkaldic League, 格丁根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Golden Horde, Tatars, 金帐汗国, 鞑靼人, 534, 536, 540

Gomel, 戈梅利, 538

Gonesius, Peter, Polish reformer, 戈内西乌斯, 彼得, 波兰改革者, 124

Gonzaga family, 贡扎加家族

在意大利支持查理五世, 314

参与瓜分伦巴第 (1559), 358

与曼图亚的人文主义, 419—420

Gonzaga, Ferante, 贡扎加, 费兰特, 333

任西西里总督, 327

任米兰总督和最高统帅, 329—330, 330, 356

Gonzaga, Giulia, duchess of Fraietto, wife of Vespasian Colonna, 贡扎加, 朱莉亚, 费拉耶托的女公爵, 韦斯帕夏·科隆纳的妻子, 266, 273

Gorski, Andrzej, 吉尔斯基, 安杰伊, 202

Goslar, joins the Schmalkaldic League, 格斯拉尔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Gotha, 哥达, 86, 173

Gottskalksson, Oddur, 戈特沙尔克森, 奥都尔, 144—145

Gouvea, Andre, 古维亚, 安德烈, 423, 437

Grace, 恩典, 恩宠

路德的态度, 18

桑城会议支持的传统教义 (1528), 217

Gran, taken by Turks (1543), 格兰, 被土耳其人占领 (1543), 524, 527

Granada, 格拉纳达, 324, 336, 452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法国大编年史》, 384

Grand Francois, French royal ship, 大弗朗索瓦号, 法国王室的船, 504

Granvelle, Antoine Perrenot de, Cardinal, minister of Philip II, 格兰维尔, 安托万·佩罗内·德, 红衣主教, 菲利普二世的大臣, 58, 310

Granvelle, Nicholas Perrenot de, minister of Charles V, 格兰维尔, 尼古拉·佩罗内·德, 查理五世的大臣, 177, 309—310, 329—330

Grassaille, Charles de, 格拉赛, 沙尔·德, 211, 462

Graubunden, see Grisons, 格劳宾登

Gravelines, battle of (1558), 格拉夫林之战 (1558), 483, 497

Graz, Tatar raids (1532), 鞑靼人袭击格拉茨 (1532), 515

Grazzini, Antonio Francesco, Italian writer, 格拉齐尼, 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作家, 381

“Great Elector”, the, see Brandenburg, Frederick William, elector of, “大选侯”

Great Michael, Scottish royal ship, 大米海尔号, 苏格兰皇家船只, 504

Great Poland, the diet of, 大波兰议会, 466

Grebel, Conrad, Anabaptist, 格里贝尔, 康拉德, 再洗礼派信徒, 102, 120—122

Greek language, 希腊语, 希腊文

茨温利的希腊文研究, 98; 奥科兰帕迪乌斯的, 104; 加尔文的, 114; 奥拉夫·佩特利的希腊文知识, 146—147

教士的怀疑, 219, 372

在学校的学习, 419, 421, 423; 在大学里, 426—427, 433—434; 在三种语言学院里, 427—428

Gregory XIII, Pope (Ugo Buoncompagno), 格雷戈里十三世, 教皇 (乌戈·布翁孔帕尼奥), 561

Greifenklau, Richard von, see Trier, Richard von Greifenklau, archbishop and elector of, 格赖芬克劳, 里夏茨·冯

Greifswald, university of,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432, 434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 216

Gresham, Sir Richard, 格雷欣爵士, 理查德, 64

Grey, Lady Jane, 格雷夫人, 简, 246, 248

Gribaldi, Matteo, Italian reformer, 格里巴尔迪, 马泰奥, 意大利改革者, 271

Grimaldi family, Genoese bankers, 格里马尔迪家族, 热那亚银行家, 313

Grimani, Giovanni, patriarch of Aquileia, tried on charge of heresy, 格里马尼, 乔瓦尼, 阿吉亚尔的宗主教, 被控异端而受审, 272

Grimma, convent endowment allocated to education, 格里马, 修院捐赠地, 分配用于教育, 429

Gringoire, Pierre, 格雷古瓦, 皮埃尔, 379

Grisons (Graubunden), 格里松 (格劳宾登)

再洗礼派运动在该地, 122, 260

反三一论在该地, 260, 269

卡斯泰尔韦特罗在该地避难, 261

Gritti, Andrea, doge of Venice, 格里蒂, 安德烈亚, 威尼斯执政官, 342

Groningen, submits to Charles V (1536), 格罗宁根, 屈从于查理五世 (1536), 316, 352, 440

Gropper, Johann, Catholic theologian, 格罗珀, 约翰, 天主教神学家, 112, 175, 177, 178, 181

Grosswardein, see Nagyvarad, 大瓦代恩

Grouchy, Nicholas, 格劳齐, 尼古拉, 437

Grynaeus (Simon Gryner), 格里纳埃乌斯 (西门·格里纳), 104, 106

Grzegorz of Sanok, archbishop of Lvov, and humanism in Poland, 萨诺克的格热戈日, 利沃夫的大主教, 与波兰的人文主义, 192

Guadalcanal, 瓜达尔卡纳尔, 313

Gualterotti family, Florentine bankers, 瓜尔泰罗蒂家族, 佛罗伦萨银行家, 66

Guanajuato (New Spain), silver mines, 瓜纳华托 (新西班牙), 银矿, 582

Guarino (da Verona), and humanist education, 瓜里诺 (达韦罗纳), 与人文主义教育, 419—420

Guatemala, Spanish in, 西班牙人在瓜地马拉, 567—568, 572

Guelders, reduced and annexed by Charles V (1543), 盖尔德斯, 被查理五世削弱并吞并 (1543), 181, 315—316, 354, 440

Guelders, Charles of Egmont, duke of, 盖尔德斯公爵, 埃格蒙特的查理

去世 (1538), 181, 316

与查理五世的战争, 304, 315—316, 345; 寻求法国的保护, 352; 战败并失去格罗宁根, 352

Guns (Hungary), 贡斯 (匈牙利), 349, 515—516

Gunther, Johann, *Institutiones anatomicae*, 金特, 约翰, 《解剖学原理》, 392

Guicciardini, Francesco, Florentine historian, 圭恰迪尼, 弗朗切斯科, 佛罗伦萨历史学家, 251, 384—386, 461

Guicciardini, Ludovico, on trade of Antwerp, 圭恰迪尼, 卢多维科, 论安特卫普的贸易, 50, 53, 58, 61—62, 64

Guise family,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France, 吉斯家族, 与法兰西的反宗教改革, 222

Guise, Charles de, Cardinal of Lorraine, Archbishop of Rheims, 吉斯, 沙尔·德, 洛林的红衣主教, 兰斯大主教, 223

Guise, Francis, duke of, 吉斯公爵, 弗朗西斯, 357

Gujarat, 古吉拉特邦, 596, 香料贸易, 521

海上力量, 592

抵制葡萄牙人, 521, 597—598, 606—608

Gulbahar, wife of Sultan Sulaiman, 古尔巴哈尔, 苏丹苏里曼的妻子, 528

Gustavus I (Vasa), king of Sweden, 古斯塔夫一世 (瓦萨), 瑞典国王, 146, 149

与宗教改革, 146, 147—152

与芬兰的宗教改革, 154

Gutenberg, John (Johann Gensfleisch), 古滕贝格, 约翰 (约翰·根斯弗里希), 361

Gutsherrschaft, rise of, in eastern Europe, 领主家族在东欧的兴起, 9, 36

Guzman, Nuno de, 古斯曼, 努里奥·德, 570—571

Gyalu, taken by Turks (1566), 吉亚鲁被土耳其人占领, 532

Gyldenstjerne, Knud, bishop of Odense, 于尔登谢恩, 克努, 欧登塞主教, 139

Gyor (Raab), 杰尔 (拉包), 197, 512, 527

该地主教在莫哈奇被杀（1526），196

Gyorgy, Frater, bishop of Nagyvarad, 捷尔吉, 弗拉泰, 瑙吉瓦劳德的主教, 205

Gyulafehervar (Karlsburg), 杰尔拉斐厄瓦尔 (卡尔斯堡), 197, 205

Haarlem, 哈勒姆, 127, 361

Habsburg, house of, 哈布斯堡王室, 56—57

在东欧扩张势力, 8

查理五世与其亲属的关系, 331—332

Habsburg-Valois struggle, 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斗争, 10—11, 216

教廷的态度, 10, 212, 252—254, 307—308

安特卫普与里昂争雄, 66, 68

结果, 双方消耗殆尽, 222—223

给意大利带来的经济贫困, 273

法国支持盖尔德斯家族, 316, 352

决定性力量的小结, 334—337

斗争的分期, 338

查理五世击败弗朗西斯一世成为帝国的候选人, 338—339

马里尼亚诺（1515）与法国人控制意大利北部, 340—341; 查理备战, 驱逐法国人, 340—342; 法国人在帕维亚战败和马德里条约（1525, 1526）, 342—343

法国人与土耳其结盟, 343, 351, 517—518

科尼亚克同盟（1526）, 343—344, and cf. 212, 340, 348

罗马被帝国军队占领, 劫掠（1527）, 344

法国入侵的失败（1528）, 344, 345

多里亚向查理五世投降，法国失去热那亚， 344—345
巴塞罗那和康布雷条约（1529）， 345
土耳其的威胁使斗争复杂化， 346—349， 351
德意志的宗教冲突， 349—351
尼斯休战协定， 351—352， and cf. 174， 220
米兰的继承权和1536—1537年的战争， 352—353， and cf. 220—221
再次开战（1542）， 克雷斯皮和约（1544）， 353， 354—355， 531， and cf. 181， 182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 355—356
法国与新教诸侯结盟， 1552—1554年的战争， 356—357， and cf. 225
查理五世逊位， 卡托·堪布累齐和约， 358
Haderslev（Denmark）， 哈泽斯莱乌（丹麦）， 135
Hagenau， 哈格诺， 111—112， 177
Hainault， inherited by Charles V， 埃诺由查理五世继承， 303
Halberstadt， see of， 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区， 76
Hall， Edward， chronicler， 霍尔， 爱德华， 编年史学家， 384
Halle， 哈雷， 83， 353
Haller， Berthold， Swiss reformer， 哈勒， 伯索德， 瑞士改革者， 113
Hamar， diocese of， 哈马尔主教区， 143
Hamburg， 汉堡， 204， 350
Hamelin， Philibert， Calvinist preacher， 哈梅林， 菲利贝尔， 加尔文派传道人， 224
Hanover， 汉诺威， 350

Hanseatic League, 汉萨同盟, 53, 62, 535

Harvel, Sigismund, English ambassador to Venice, 哈维尔, 西吉斯孟, 英国驻威尼斯公使, 262—263

Harvey, William, 哈维, 威廉, 409—410

Haschenperg, Stephen von, 哈希恩珀格, 斯蒂芬·冯, 493

Hausschein, Johann, see Oecolampadius, 豪施恩, 约翰

Havana, 哈瓦那, 585

Hawkins, John, 霍金斯, 约翰, 585

Hebrew, 希伯来语

茨温利的研究, 98; 奥科兰帕迪乌斯的, 104; 卡比托的希伯来语知识, 与伊拉斯谟的合作, 107; 汉斯·陶森, 136, 141; 奥拉夫·佩特利, 146—147; 斯坦卡罗, 207

巴黎大学神学院反对它的研究, 219; 教士的怀疑, 372

在大学里的教授, 427—428

Heckel, Lenart, 黑克尔, 莱纳尔, 205

Hedio, Caspar, 黑迪奥, 卡斯珀, 108

Heek, Alexander van, see Hegius, 黑克, 亚历山大·范

Hegendorff, C., *Diologi, pueriles*, 黑根多夫, C., 《儿童的对话》, 426

Hegius (Alexander van Heek), his educational work, 黑吉乌斯 (亚历山大·范·黑克), 他的教育工作, 417, 424

Heidelberg, 海德堡, 77, 108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海德堡大学, 104, 430, 432

Heilbronn, taken by Charles V (1546), 海尔布隆被查理五世占领 (1546), 356

Heiligerlee, battle of (1538), 海利杰利之战 (1538), 352

Held, Matthias, vice-chancellor of Charles V, 黑尔德, 马蒂亚斯, 查理五世的副宰相, 172, 175

Helie, Paulus, 赫利, 保卢斯, 134—136, 138

Helmed, battle of (1501), 赫尔曼德之战 (1501), 538

Helvetic Confession, 赫尔维希亚信纲 (1536), 107, 168; 第二次瑞士信纲 (1556), 107; (1568), 208

Henckel, Johann, 亨科尔, 约翰, 194

Henrician Articles, imposed on Henry of Anjou (1572), 强加于安茹的亨利的海因里希条款 (1572), 474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七世, 英格兰国王, 452

与君主权力的巩固, 7, 438

与英国的棉织产品在尼德兰, 54

他的爱尔兰政策, 441

财政手腕, 448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八世, 英格兰国王, 170, 304

与君主权力的巩固, 7—8, 443; 对国会的看法, 235, 455—458, 463

法国战争引起的财政困难, 13; 在安特卫普筹集贷款, 67

利用印刷宣传品, 17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斗争: 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谈判, 171, and cf. 238, 239, 240; 与弗朗西斯一世会面 (金布地, 1520), 341; 与查理五世结盟 (1521, 1522), 341; 同情科涅克同盟 (1526), 343; 与法国结盟 (1527), 344; 在1536—1537年保持中立, 352; 与查理五世结盟和围攻布洛涅 (1544), 353, 354, 492, 494, and cf. 10, 307

与公会议, 171

与安妮·博林的婚姻（1533），171，230，234—235；与简·西摩的（1536），239；与克莱沃的安妮的（1540），240；与凯瑟琳·霍华德的（1540），241

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216，229—234；查理五世的反对，231，303

与罗马决裂，王权至上，229，233，235，245—246；攻击教士特权，229；与克伦威尔企图结成反教皇的同盟，238—240；反对遭镇压，236—237

人文主义者的保护人，228

他的性格，230，237

解散修道院，235—236，and cf. 15，244

对新教义的态度，238—242；督促伊拉斯谟攻击路德，90；声称反对再洗礼派，130；路德派信徒在英格兰的遭遇，201，240；《七圣事辩》，228；“信仰卫士”的称号，228—229；关于教会里使用本民族语《圣经》的规定，238—239；对读《圣经》的限制，241，436

去世（1547），241，355

与波尔关系破裂，247

与圣保罗学院，425

大学的管理，434—435

爱尔兰政策，441—442

防御与战争：海防，488—489，492—494；大炮与轻武器的使用，489，494；甲冑的保护，497；海军的发展，504

Henry II，king of France，亨利二世，法兰西国王

得到梅斯·图尔，凡尔登（1552），185，212，357，and cf. 254

与耶稣会在巴黎的建立，223

压制改革，224

在西班牙做人质，217，343；被赎回，344

即位（1547），221

去世（1559），225，and cf. 3

向专制主义发展，439；行政管理，451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king of Poland, duke of Anjou), 亨利三世，法兰西国王（波兰国王，安茹公爵），209，445，472，474，560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亨利四世，法兰西国王，210，440

Henry, king of Portugal, Cardinal, 亨利，葡萄牙国王，红衣主教，587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of Portugal, 亨利，航海者，葡萄牙亲王，591

Henry Grace a Dieu, English royal ship, 亨利谢主号，英国皇家的船只，504

Herbals, 植物志，390，392，407—408

Heresbach, Konrad von, 黑雷斯巴哈，康拉德·冯，175

Heresy, 异端

英国的罗拉德派，227

俄国的犹太教派，545—546

异端分子移民美洲被禁止，584

Hermidad, Spanish police organisation, 海尔曼达德，西班牙的警察组织，440—441，445

Hermannstadt, see Nagyszeben, 赫曼斯塔特

Hertford, Edward Seymour, earl of, 哈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

Hertz, Conrad, see Cordatus, 赫茨，康拉德

Hesdin, the fortifications, 埃丹, 防御工事, 491

Hesse, Philip, landgrave of, 黑森的伯爵领主, 菲利普

击败弗兰克豪森的农民 (1525), 89

与抗议宗领袖, 92—93, 162, 340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62, 350, 479; 背离同盟与查理五世
结盟 (1541), 179—180, 354; 重新加入 (1544), 355; 战败与被
俘 (1547), 183, 356

与纽伦堡和约 (1532), 164

与符腾堡的乌尔里希的复位 (1534), 165, 353

与再洗礼派, 167

拒绝公会议, 173

与雷根斯堡会议 (1541), 178

重婚, 179—180

弗朗索瓦·朗贝尔的保护人, 213

他在威尼斯的代表阿尔蒂耶里, 263

驱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亨利 (1542), 354

Hesse, William, landgrave of, 黑森的兰德格拉夫, 威廉, 357

Hetzer, Ludwig German theologian, 黑策, 路德维希, 德国神
学家, 110, 124

Hilary, St, 希拉里, 圣, 372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391, 427

Hispaniola, sugar production, 伊斯帕尼奥拉, 蔗糖生产, 585

Historiography, 历史编纂学

现代历史方法的萌芽, 18

黑迪奥的教会史演讲, 108

早期再洗礼派的著述, 132

奥拉夫·佩特利的《瑞典编年史》, 150

在阿格里科拉的芬兰语《新约》中, 156

扬·布拉霍斯拉夫, 203

圭恰迪尼, 251, 384, 385, 386, 461

16世纪的拉丁文/拉丁文著述, 371—372

民族语的发展, 384—385

马基雅弗利, 384—386, 460—462

Hochstatter family, bankers, 霍赫施泰特尔家族, 银行家,
53, 66

Hoen, Cornelis, 赫恩, 科内利斯, 91

Hoffman, Melchior, Anabaptist, 霍夫曼, 梅尔希奥, 再洗礼
派, 130

生平与教诲, 126—127, 131; 在斯特拉斯堡, 110, 124; 在斯
堪的纳维亚, 128; 在多尔帕特, 157

Hohenzollern family, 霍亨索伦家族, 195

Holland, 荷兰

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兴起, 15

再洗礼派在该地, 129, 132

由查理五世继承, 303

对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被逐的反应, 313—314

被范·罗塞姆入侵(1528), 316

对课税重负的不满, 317

手稿书籍的买卖, 360

Holstein, 霍尔施泰因, 140

Holy Office, see Inquisition, Roman, 最高宗教法庭

Holy orders, 圣职

胡斯派坚持主教祝圣礼, 190

加尔文接受免除手礼, 116

“施莱特海姆信纲”（1527）中的再洗礼派的观点, 125

布根哈根给斯堪的纳维亚的主教祝圣, 140—141, 143

劳伦蒂乌斯·佩特利的祝圣礼, 150

Hollywood, John, see Sacrobosco, 霍利伍德, 约翰

Honavar, Portuguese fort, 霍纳瓦, 葡萄牙人的要塞, 611

Honduras, 洪都拉斯, 567—568

Honter, Johann, Transylvanian Lutheran, 洪特尔, 约翰, 特兰西瓦尼亚的路德派信徒, 199

Hoofman, Gillis, 霍夫特曼, 希利斯, 63

Hooghstraeten, Count of, governor of Holland, 霍赫斯特拉滕的伯爵, 荷兰总督, 19 n.2, 317

Hooper, John, bishop of Gloucester and Worcester, 胡珀, 约翰, 格罗斯特与伍斯特的主教, 130, 243, 248

Horace, in secondary education, 贺拉斯, 在中等教育中, 417

Horebites, Hussite sect, 霍尔比派, 胡斯派的一支, 191

Hosemann, Andreas, see Osiander, 霍泽曼, 安德烈亚斯

Hosius, Stanislas, Cardinal, 霍修斯, 斯坦尼斯拉斯, 红衣主教, 209

Howard family, 霍华德家族, 241

Huascar, Inca ruler, 瓦斯卡尔, 印加统治者, 575

Hubmaier, Balthasar, Anabaptist, 胡布迈耶, 巴尔塔扎尔, 再洗礼派信徒, 110

与再洗礼派的起源，120；因信仰受迫害，被逐出苏黎世，121；在奥格斯堡，122；在摩拉维亚，122—124；被处决（1528），123，200

在他的《论异端分子》中呼吁宽容，122，133

支持世俗权力，123

受加尔文攻击，129

Hull, coastal fortifications, 赫尔，海防工事，493

Humanism, 人文主义

对科学思想继续产生影响，17

与宗教改革，17；路德的谴责，80；与瑞士与莱茵兰的改革，96；茨温利与之的联系，97—99；奥科兰帕迪乌斯，104；加尔文，114；在斯堪的纳维亚，134—135，139，142，146—147，150，154—156；在波罗的海诸国，157；在东部诸国，192，201；在法国，214—215，218—219，222；在英格兰，228；在意大利，251—252，256，261，263，269；对隐修制度的否定性批评，276

加蒂纳拉的，306

对律师的影响，314

在早期印刷品中的反映，365

德国对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敌视，379

在教育中，296，297，418—428

passim, 436—437, and cf. 19 n. 1

在葡萄牙，613

Humber, river, 洪伯河，237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44—45，438

Hungary, 匈牙利

政体的发展：君主制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冲突，8—9，464；郡议会，466；国会，467；上、下两院的大国会，469；行政管理的模

仿，470—471；世袭君主制的引介，471

土地贵族与地主家族的兴起，9，15；土地拥有者与贵族的同一，465

再洗礼派受迫害，129

土耳其的入侵，181，212，346—347；贝尔格莱德受攻击（1521）与陷落，510；莫哈奇（1526），512—513，344，348—349；1529年和1532年的远征，514—516；边境的战斗，521—522；扬·扎波利亚死后的进攻（1540），523—524；土耳其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成功（1552—1562），526—527；费迪南德的边界防御工事，527

宗教改革前的教会，188

扬·扎波利亚与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在路易二世统治下，346—348；与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的斗争，196，348—349，471，513，522—523

征税，469—470

人文主义在该地，192

富格尔家族控制矿业，312，347，348—349

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即位时的扩展（1526），465；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1541—1562），后分为三部分，527

与俄国的关系，537

Hunne, Richard, London merchant, 胡恩，理查德，伦敦商人，227，232

Hunyadi, John, 亨亚迪，约翰，188

Huon of Bordeaux, 波尔多的于翁，381

Hus, John, 胡斯，扬，2，123

路德与，79，200

波兰人的支持，186

胡斯派教会在波希米亚，188—191

Husman, Rudolf (Agricola), 胡斯曼, 鲁道夫 (阿格里科拉), 393, 404

Hussite wars, 胡斯战争, 83, 468

Husum (Schleswig), 胡苏姆 (石勒苏益格), 135

Hut, Hans, Anabaptist, 胡特, 汉斯, 再洗礼派信徒, 120, 122—123, 127

Huter, Jakob, Anabaptist, 许特尔, 雅各布, 再洗礼派信徒, 122—124, 200

Hutten, Ulrich von, German humanist, 胡滕, 乌尔里希·冯, 德国人文主义者, 29, 70, 85—86, 104

Hutterites (Moravian Anabaptists), 许特尔派 (摩拉维亚的再洗礼派信徒), 123—124, 131—133

Hymns, 赞美诗/圣诗, 18

路德的, 86, 379; 丹麦语译本, 136

闵采尔的, 87

茨温利的, 98

布塞尔与公众在斯特拉斯堡的歌唱, 110

早期再洗礼派的赞美诗作品, 132

丹麦的赞美诗作品, 136, 142; 冰岛语译本, 145

在波兰和匈牙利, 193, 196

在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教会里, 189, 200

胡格诺派的, 219

作为中世纪抒情传统的延续, 379

Ibrahim Pasha, Ottoman grand vizier, 易卜拉欣, 帕夏, 奥斯曼, 土耳其的内阁总理, 532

在埃及的政府改革, 511

在匈牙利（1525），512，514

镇压土库曼人的叛乱（1526—1528），513

入侵波斯（1534），516

与威尼斯的友谊，519

被处决（1536），519

进攻也门（1525），521

Iceland, the Reformation in, 宗教改革在冰岛，141，144—146

Iconoclasm, see Images, 圣像破坏

Ignatius Loyola, St (Inigo Lopez de Loyola), 依纳爵·罗耀拉，圣（伊尼戈·洛佩斯·德·罗耀拉）

与反对宗教改革的斗争，222—224，298—299，301，333

与加尔文的比较，223

与基埃蒂会，287—292，296

出生（1491），早年的生活，与入教，291，296

摒弃修道院生活，291—292，294

他的《灵修》，291—292，296

在西班牙和巴黎的学习，292，and cf. 223

耶稣会的建立，292—293，295

当选为会长（1541），293

去世（1556），293

会规，293，296

对教育与学术的兴趣，296—297；尊重巴黎大学神学院，216

拒绝接受伊拉斯谟主义，297，and cf. 294

他的顺从的概念，295—296

与红衣主教波尔的联系, 299

Ile de France, trial of heretics, 法兰西岛, 对异端分子的审判, 224

Ilfeld, Neander' s school at, 尼安德在伊尔费尔德的学校, 437

Illuminism in Spain, 光照主义在西班牙, 333

Images, 圣像, 213, 217

圣像崇拜在维滕贝格受谴责, 84—85; 受卡尔斯塔特的谴责, 85; 被茨温利谴责, 100; 在芬兰, 154; 在匈牙利, 193; 被让·布歇谴责, 214; 在英格兰, 239

摘下圣像, 与圣像破坏运动的暴乱: 在维滕贝格, 84, and cf. 89; 在苏黎世, 101; 在巴塞尔, 105; 在波罗的海诸国, 157—158, 160; 在胡斯派的波希米亚, 189

土耳其人宽容反对崇拜圣像的抗议宗信徒, 197

列入约1559年的遗嘱里, 213

Inca empire and culture, 印加帝国与文化, 574

India, 印度

基督教传教, 297—299, 609—610

穆斯林势力扩展至, 336

葡萄牙人, 520, 591—600, 605

本地海军力量, 592—593

香料贸易路线, 593

Indian Ocean, 印度洋

香料贸易路线, 520

土耳其人与葡萄牙人争夺控制权, 531

荷兰人与英国人, 531

葡萄牙人的海军力量，592—593

葡萄牙人在马尔代夫群岛的要塞，605

Indians, of Brazil, under the Portuguese, 葡属巴西的印第安人，586—587

Indians (in Spanish America), 印第安人（在西属美洲）

在新西班牙与西班牙人的混合，563，583；获得使用土地的合法权利，564；小兄弟会的传教工作，566—567

拉斯·卡萨斯的慈善活动，578—579，588

他们的劳动，580—581；受雇于采矿业，582—583

Indulgences, 赎罪券

起源，扩展与滥用，75—76

路德与，77—78

茨温利拒绝允许销售，98

其表格的印制，361

Ingolstadt, 因戈尔施塔特，79，299

Ingolstadt, university of, 因戈尔施塔特大学，432，435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124，254，332，349

Inquisition, the, 异端裁判所（又译宗教法庭）

在西班牙，3，301，324，333，431，445

在意大利重建（1542），270，284，260，263，264，266—267，269，271，431

在西西里，328—329

在东方，610

Instrument-making, 工具制作，389，394，395，402

Insurance (life, marine), at Antwerp, 保险业（人身、航海）在安特卫普，65

Interim of Augsburg, see Augsburg, Interim of, 奥格斯堡临时协定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战争的规定, 在理论与实践, 12—14

外交: 特使与驻节使, 12—13, 446; 豁免权, 13, 262—263

宣传的重要性的提高, 483

Ipswich, Wolsey plans school, 伊普斯威奇, 沃尔西计划办学, 424

Iraq, 伊拉克, 516, 521, 525, 531

Ireland, 爱尔兰, 299, 441—442

Irenaeus, St, 依里纳乌, 圣, 372

Isabella (the Catholic), queen of Castile, 伊莎贝拉 (天主教徒), 卡斯蒂利亚女王, 303—304, 441

驱逐犹太人 (1492), 312

企图征服北非, 324

地方行政, 453

Isabella (Jagiello) of Poland, queen of, Hungary, consort of John Zapolyai, 波兰的伊莎贝拉 (亚盖沃), 匈牙利王后, 扬·扎波利亚的配偶, 205, 523—524, 526

Iskender Pasha, Ottoman beglerbeg of Erzerum, 伊斯坎德尔·帕夏, 埃尔祖鲁姆的土耳其贝勒贝伊, 525

Islam, 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征服, 47

罗耀拉渴望去传教, 298

它对基督教世界威胁的程度, 336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 516

律法, 532—533

与葡萄牙在东方的冲突, 592—600; *passim*, 613—614

Isle of Wight, coastal defences, 怀特岛, 沿海防卫, 493

Isny, joins the Schmalkaldic League, 伊斯尼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Issoudun,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伊苏丹, 224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298, 325

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 510—533; 兵工厂, 518; 苏里曼的建筑成就, 533

Istria, Protestantism in, 抗议宗在伊斯特拉, 263

Italian language, 意大利语

《语言问题》, 375—376, and cf. 368

它在国外的影响, 385—386

在科学论文中, 390

Italy, 意大利, 10, 22, 306

西班牙人的统治, 10, 93, 252—254, 273, 301; 行政管理, 309, 333, 445; 贵族对宗主国理想的支持, 314

意大利的外交方法延伸到西欧和南欧, 12—13

独立的资产阶级的衰落, 15

农业经济与结构的变化, 29, 30, 32, 43, 47—49

意大利商人和金融家在安特卫普, 53, 63, 66, 68; 安特卫普—里昂—意大利的金融关连, 65

弗朗西斯一世的入侵(1515), 212; 查理五世继位时法国人控制了北部, 304; 法国要求权的放弃(1559), 358

该地早期的印刷, 361, 365

教育的进步, 418—420, 422

Ivan I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伊凡三世, 莫斯科大公

继承瓦西里二世 (1462), 534

在俄国的领土扩张, 534—537; 平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549

与西部结盟失败, 537

在立窝尼亚击败条顿骑士团, 与休战 (1481), 537

立陶宛战争, 537—539

他的“全俄罗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538, and cf. 546

俄国的对内统治, 539; 镇压安德烈与鲍里斯的叛乱 (1480), 539—540; 决定由瓦西里三世继位, 540—542; 主张皇室的权力高于贵族, 军功领地制, 542—543; 在诺夫哥罗德重新分配土地, 543—544; 他与正教会的关系, 544—546; 教会土地世俗化被否决, 544—545; 镇压犹太教徒中的异端, 545—546

去世 (1505), 546

他的性格与成就, 546—547

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of Russia, 伊凡四世 (雷帝), 俄国沙皇, 7

出生 (1530) 与少数派, 550—551

采取沙皇称号 (1547), 551

重臣会议, 551—552, 553; 解散与报复, 554—557

鞑靼战争, 557—558

在立窝尼亚的野心与征服, 558—559; 重臣会议的反派, 553; 战败与扎波尔斯基海和约 (1582), 561

作为立陶宛与波兰的王位候选人, 560; 支持哈布斯堡的欧内斯特作候选人, 60; 1564年战败, 554

去世 (1583), 他的统治遗留下的东西, 561

Ivan, son of Ivan III of Russia, 伊凡, 俄国伊凡三世之子, 537, 540—541

Ivan, son of Ivan IV of Russia, 伊凡, 俄国的伊凡四世之子, 553—554, 581

Ivangorod, 伊凡哥罗德, 543, 561

Ixtlilxochitl, Texcocan chief, 伊斯特利尔斯奥奇特尔, 特斯科科人酋长, 562

Izbrannaya Rada, see Chosen Council

Izrael, Jior, 伊兹拉埃尔, 伊日, 202

Jachymov (Joachimsthal), 亚基莫夫 (约阿基姆斯塔尔), 200

Jagiellon, house of, 亚盖沃王室

东部诸王国君主权力的虚弱, 8, 188

与东部诸国的教会, 186, 188, 190—191; 未能建立起希腊天主教会, 187

在波兰与波希米亚, 464, 466

家族在波兰的统治消亡 (1572), 472

Jakub of Iza, Polish reformer, 伊萨的雅各布, 波兰改革者, 201

Janberdi al-Ghazali, pasha of Damascus, 占勃第·加扎里, 大马士革的帕夏, 511

Jane Francis Chantal, St, foundress of the Visitation order, 简·弗朗西斯·钱特尔, 圣, 圣母探访会的创立者, 290

Jane Seymour, queen of England, third consort of Henry VIII, 简·西摩, 英格兰王后, 亨利八世的第三个配偶, 239

Janissaries, Turkish professional soldiery, 禁卫军, 土耳其的职业军人, 486, 511—512, 528—529

Japan, 日本

基督教传教, 298—299, 610

有限的海军力量, 593

与葡萄牙的贸易，610—611

Japara (Java)，扎巴拉(爪哇)，604

Java，爪哇，593，604—605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St, founder of the Christian Brothers, 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圣，基督教兄弟会的创立者，296

Jena, 耶拿，86，88

Jena, university of, 耶拿大学，430，432，434

Jenson, Nicholas, printer, 詹森，尼古拉，印刷业者，365

Jerome, St, 哲罗姆，圣，98，104，372

Jerome of Prague, popularity of his writings in Moravia, 布拉格的杰罗姆，他的作品在摩拉维亚受欢迎，123

Jerusalem, 耶路撒冷

圣安杰拉·梅里奇的朝圣，290

罗耀拉的朝圣，291；他希望建立个据点，298

Jesi, Francesco da, general of the Capuchins, 杰西，弗朗切斯科·达，嘉布遣会会长，283—285

Jews, 犹太人，31

对犹太人印刷业者的抗议，219

在罗马被限制在犹太人居住区(1547)，273

被逐出西班牙(1492)，312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使用异端裁判所，324

在俄国镇压犹太教徒，545—546

被禁止迁徙美洲，584

Jiddah, 吉达，599

Jimenez de Cisneros, see Ximenez, 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

Jimenez de Quesada, Gonzalo, 希门尼斯·德·克萨达, 贡萨洛, 577

Joachim of Flora, 弗洛拉的约阿基姆, 282

Joachimstal, see Jachymov, 约阿基姆斯塔尔

Joanna (“the Mad”), queen of Castile, 胡安娜 (“疯女”), 卡斯蒂利亚女王, 301, 303, 319

Jodelle, E., French poet, 若代尔, E., 法国诗人, 378

John, king of Denmark, Norway and Sweden, 约翰, 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国王, 538

John II, king of Portugal, 约翰二世, 葡萄牙国王, 591

John III, king of Portugal, 约翰三世, 葡萄牙国王

在安特卫普筹集贷款, 67

与巴西的殖民地, 586

与在东方的扩张, 605—606, 608—609

John III, king of Sweden, 约翰三世, 瑞典国王, 560

John Albert, king of Poland, 扬·奥尔布拉赫特, 波兰国王, 473, 538—539

John Antony, of Kosice, Polish physician and humanist, 约翰·安东尼, 科西策的, 波兰医生和人文主义者, 194

John Chrysostom, St, editions of, 约翰·克里索斯托, 圣, 他的著作再版, 104, 372

John, Don, of Austria, natural son of Charles V, 约翰, 唐, 奥地利的查理五世的亲生子, 336, and cf. 532

John of Leyden, see Bockelson, Jan, 莱顿的约翰

John Sigismund Zapolyai (claimant to throne of Hungary), see Transylvania, 约翰·西吉斯孟·扎波利亚(声称有权为匈牙利王)

John Zapolyai, king of Hungary, 约翰·扎波利亚, 匈牙利国王

与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的斗争, 196, 471, 513; 被选为匈牙利国王(1526), 348; 在托克战败(1527), 348; 与斐迪南和解(1538), 349, 515, 522—523

他未能阻止抗议宗的流传, 197—198

与民族主义者反对德意志的影响, 346—348

被苏里曼一世承认和支持, 349, 513—515, 522—523

离开莫哈奇(1526), 512

与波兰的伊莎贝拉的婚姻, 523

他的去世(1540), 523

Johore, attacks on Moluccas, 柔佛, 进攻摩鹿加, 608

Jonas, Justus, German reformer, 约纳斯, 尤斯图斯, 德国的改革者, 84

Joris, David, Anabaptist, 约里斯, 大卫, 再洗礼派, 110, 131—132

Joseph, abbot of Volokolamsk, 约瑟, 沃洛科拉斯克的院长, 541, 545—546

Joseph Calasancius, St, founder of the Piarists, 约瑟, 卡拉桑齐奥, 圣, 慈善学校修会创始人, 296

Jovius, see Giovio, Paolo, 约维乌斯

Judaizers, suppression of their heresy in Russia, 犹太教徒, 他们的异端在俄国被镇压, 545—546

Jud, Leo, Swiss reformer, 尤德, 利奥, 瑞士改革者, 101, 129—130

Julich-Cleves-Berg, succession problem (1538—1539), 于利希-克莱沃-贝格的继承问题 (1538—1539), 354

Juhasz, Peter Melius, bishop of Debrecen, and Calvinism in Hungary, 尤哈茨, 彼得·梅利乌斯, 德勃勒森的主教与加尔文宗在匈牙利, 205

Julius II, Pope (Giuliano della Rovere), 尤里乌斯二世, 教皇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 10, 186, 252, 443

Julius III, Pope (Giovanni Maria Del Monte), 尤里乌斯三世, 教皇 (乔瓦尼·马利亚·德尔蒙特), 254, 272—273, 293, 435

“Junker Georg”, Luther’s pseudonym in hiding (1521—1522), “容克尔·格奥尔格”, 路德藏匿时的笔名 (1521—1522), 85

Juros, annuities funded on Spanish government revenues, 由西班牙政府税收资助的养老金, 321—322

Justice, administration of, 司法

在欧洲, 449—452

在西属美洲, 570—572; 罪犯的引渡, 586

在葡属领地, 603

Justices of the peace, 地方执政官, 453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

路德的教义的出现与发展, 73—75; 强调的减弱, 在丹麦, 139; 安德烈亚斯·诺伯肯的总结, 158

教皇派在奥格斯堡会议上坚持正统教义, 94—95

天主教徒与改革者之间的讨论, 111—112, 177—179

伊拉斯谟的双重含义的公式, 175, 177

酒饼同领派的观点, 189, 200

比罗的观点, 199

勒费弗尔·戴塔普的辩护/主张, 214
该教义在意大利的讨论, 251—252
尼哥底母派的观点态度, 268
巴尔德斯派希望特伦托(百科)会议作有利的/赞成的表述,
270
奥基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284
Justinian, emperor, 查士丁尼, 皇帝, 308
Jutland, the Reformation in, 宗教改革在日德兰, 135—137,
139
Kadan (Kaaden), Lutheranism in, 路德宗在卡丹, 200
该地签订的和约(1534), 165, 353
Kaffa, Sulaiman's buildings, 卡法, 苏里曼的建筑, 533
Kalender-oghlu, 卡连德-奥卢, 513
Kalocsa, archbishopric of, 考洛乔总主教管辖区, 197
Kammermeister, Joachim, see Camerarius, 卡默迈斯特尔, 约
阿希姆
Kampen, Anabaptism in, 再洗礼派在坎彭, 127
Kanizsa, 凯尼塞, 527
Kansuh al-Ghuri, Mamluk sultan of Egypt, 甘萨伍赫·高
里, 埃及的麦木鲁克人苏丹, 520—521
Karaman, 卡拉曼, 513, 516, 530
Karelia, 卡累利阿, 155, 535
Karlsburg, see Gyulafehérvár, 卡尔斯堡
Kars, 卡尔斯, 524—525
Kaschau, see Kosice, 卡绍
Kasimov, 卡西莫夫, 554

Kassa, see Kosice, 卡萨

Kassel, 卡塞尔, 166—167

Kautz, Jacob, Reformer, 考茨, 雅各布, 改革家, 110

Kazan, Tatars of, 喀山的鞑靼人

伊凡三世的远征 (1467—1469), 534, 537; 被瓦西里三世平息, 548; 参加全体鞑靼部落对莫斯科的进攻 (1521), 459; 吉里王朝被瓦西里三世推翻 (1532), 549—550; 被莫斯科征服 (1545—1557), 557; 立陶宛协助抵抗莫斯科 (1552), 558

波兰的结盟希望, 548

Kechety, Martin, bishop of Veszprem, 凯切特, 马丁, 维斯普雷姆的主教, 197

Kedar, 吉达, 593, 604

Kemalpasha-zade, Islamic theologian, 凯末尔帕夏扎德, 伊斯兰教神学家, 532

Kempis, Thomas a, 肯皮斯, 托马斯·阿, 167, 360

对再洗礼派的影响, 133; 对路德的影响, 133; 对罗耀拉的影响, 291

最早印刷的再版作品, 365

Kepler, Johann, astronomer, 开普勒, 约翰, 天文学家, 397, 401

Kessel, Leonhart, 凯塞尔, 伦哈特, 299

Ket, Robert, 凯特, 罗伯特, 243

Kettler, Gotthard, master of the Livonian Knights, 凯特勒, 戈特哈德, 立窝尼亚骑士团首领, 559, 160

Keyzersberg, see Geiler, Johannes, 凯泽伯格

Khair ad-Din, see Barbarossa, 海尔·阿德-丁

Kha' ir Beg, Ottoman pasha in Egypt, 海尔贝伊, 奥斯曼土耳其驻埃及的帕夏, 511

Kholmsky, Daniel Dimitrevich, Prince, 霍尔姆斯基大公, 丹尼尔·季米特耶维奇, 542

Khurrem, wife of Sultan Sulaiman I, 胡雷姆, 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妻子, 528, 529

Kiel, diet of (1526), 基尔会议 (1526), 135

Kiev, 基辅, 537, 545

Kiev, metropolitan of, 基辅大主教, 187, 535

Kilia, in Turkish possession, 基利亚, 土耳其的领地, 522

Kilwa, Portuguese fort at, 基卢瓦, 葡萄牙人的要塞, 596—597

King' s Bench, court of, 金斯本奇的法庭, 450

Kirchmeyer, Thomas, see Naogeorgus, 基希迈耶, 托马斯

Kiss, Istvan Magyari, reformer in Hungary, 基斯, 伊什特万·毛焦里, 匈牙利的改革者, 199

Kladsko (Glatz), 克拉茨科 (格拉茨), 465, 466

Klausenburg, see Kolozsvar, 克劳森堡

Knade, Jakub, 克纳德, 雅各布, 194

Knights' War (1522—1523), 骑士暴动, 339

路德拒绝与之交往, 85—86

布塞尔作济金根的牧师, 108

导致小贵族政治上毁灭, 478

Knipperdolling, Bernhard, Anabaptist, 克尼珀多林, 伯恩哈德, 再洗礼派信徒, 128—129, 131

Knopken, Andreas, 诺伯肯, 安德烈亚斯, 157—158, 159

Knox, John, 诺克斯, 约翰, 8, 99, 117, 130, 301

Kollam, see Quilon, 科兰

Kolomna, 科洛姆纳, 549

Kolozsvar (Cluj, Klausenburg), 科洛斯堡 (克卢日, 克劳森堡), 205

Komorn, 科莫恩, 512, 527

Konigsberg, 柯尼斯堡, 147, 159, 196, 201, 357

Konigsberg, university of, 柯尼斯堡大学, 196, 430, 432, 434

Konya, 科尼亚, 530, 533

Koporye, ceded to Sweden (1538), 科波叶割让给瑞典 (1538), 561

Korela, ceded to Sweden (1583), 科列拉割让与瑞典 (1583), 561

Kornel, Viktorin, Bohemian jurist, 克内尔, 维克托林, 波希米亚的法律学者, 475

Koros, river, 克勒代河, 532

Kosice (Kassa, Kaschau), 科西策 (卡萨, 卡绍), 198

Kosice, John Antony of, 科西策的约翰·安东尼, 194

Kotte (Ceylon), 科特 (锡兰), 610—611

Kozminek, agreement between Polish Calvinists and Bohemian Brethren (1555), 科日米内克, 波兰的加尔文派与波希米亚兄弟会之间的协议 (1555), 209

Koznemesseg, Hungarian landowning nobility, 匈牙利地主贵族, 465

Kremnica (Kremnitz, Kormocbanya), 克雷姆尼察 (克雷姆尼茨, 科尔莫克巴尼亚), 194, 198, 347

Kressling, Johann, Hungarian Reformer, 克雷布林, 约翰, 匈牙利改革家, 194

Krim Khan, see Crimea, 克里姆可汗

Kronstadt, see Brasso, 喀琅施塔得

Krzyzak, Feliks (Cruciger), 克日扎克, 费利克斯 (克鲁齐格), 204—205

Kustrin, Hans of, see Brandenburg Kustrin, John, margrave of, 科斯琴的汉斯

Kuhhorn, Martin, see Bucer, 库霍恩, 马丁

Kujawia, the diet of, 库贾威尼会议, 466

Kullar (“men of the Sultan”), 库勒 (苏丹的卫队), 528—529

Kurbsky, Prince, 库尔布斯基大公, 551 n., 553—554, 556, 559 n.

Kurdistan, 库尔德斯坦, 516, 525

Kusto (Finland), 库斯托 (芬兰), 154

Kutna Hora (Kuttenberg), 库特纳霍拉 (库滕贝格), 467

Kwanice, Walenty, Polish anti-Trinitarian, 克瓦尼斯, 瓦伦提, 波兰的反三一论者, 207

Kwantung, 广东, 592

Kyushu, Portuguese, trade with, 葡萄牙与九州贸易, 606

Lactantius, 拉克坦修斯, 372

Ladislav (Ulaszlo), see Vladislav, 拉蒂斯拉斯 (乌拉斯洛)

Ladrones Islands, visited by Magellan, 拉德罗内斯群岛, 麦哲伦访问过, 568

La Goletta (by Tunis), 拉戈莱塔, 325, 518

Lainez, James, Jesuit, 莱内斯, 海梅斯, 耶稣会士, 292, 297, 299

Lambert, Francois, of Avignon, Franciscan and reformer, 朗贝尔, 弗朗索瓦, 阿维农的, 方济各会士、改革者, 100, 108, 110, 213

Land tenure, 土地保有权

在英格兰租赁权取代了领主—佃农关系, 32—33

终止权, 35

英格兰的领地的租赁, 37

依据官册享受不动产者的出现, 41

俄国的军功领地制, 543, 553, 556

在西属美洲: 印第安人的, 564; 土著居民村落制度/监护征赋制, 564—565, 578—579

Landstuhl, siege and fall of (1523), 兰德施图尔被围与沦陷 (1523), 85—86

Lang, Johannes (d.1548), and the Reformation in Erfurt, 朗, 约翰内斯 (1548年卒), 与埃尔富特的宗教改革, 86

Lang, Matthaeus, archbishop of Salz-burg, 朗, 马泰埃乌斯, 萨尔茨堡大主教, 354

Lange, Johannes (d.1531), and the Reformation in Reval, 朗格, 约翰内斯 (1531年卒), 与宗教改革在雷维尔, 159—160

Langres,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朗格勒, 路德派信徒受迫害, 218

Languedoc, Gattinara urges annexation, 朗格多克, 加蒂纳拉敦促吞并, 307

Lannoy, Charles de, viceroy in Naples, 拉努瓦, 沙尔·德, 那不勒斯总督, 328, 333

La Noue , Francois de , French general and military writer, 拉努, 弗朗索瓦·德, 法国将领与军事著述者, 482

La Rochelle, Calvinism in, 拉罗歇尔,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225

Laski, Jan (Johannes a Lasco) , 拉斯基, 扬 (扬·阿·拉斯科) , 130—131, 204, 243, 245

Las Salinas, civil war of, in Peru, 拉斯萨林纳斯的内战, 在秘鲁, 577

Latimer, Hugh, bishop of Worcester, 拉蒂默, 休, 伍斯特主教, 18n.1, 99, 248, 429

Latin language, 拉丁文

奥拉夫·佩特利的瑞典—拉丁文辞典, 150

16世纪作品中的应用, 368—374; 它对意大利民族语文学作品的影响, 374—376; 被民族语/本地语取代, 385—386; 在科学论文中, 390

在教育中, 360—361, 414—426; 被拒绝, 商业语种受偏爱, 436; 三种语言的学院, 390

Latvia, 拉脱维亚, 559

关于宗教改革

Launay, de, Calvinist preacher in France, 洛内, 德, 加尔文派在法国的布道士, 224

Launceston, reading school in 1540' s, 朗斯顿, 1540年的识字学校, 415

Laurensen, Peder, 劳伦森, 彼泽, 136, 139

Lausanne, 洛桑, 113, 115, 424

Lautrec, Odet de Foix, vicomte de, 洛特雷克的子爵, 奥代·德·富瓦, 328, 341—342, 344—345, 498

Law, 法律

国际法问题，11—14，588

路德的学习，71

维滕贝格的穷人法规（1521—1522），85

加尔文的学习，114

再洗礼派否定法律程序，122，125，129—130；与早期的波希米亚兄弟会，191；波兰的反三一论的，207

奥拉夫·佩特利的《审判规则》，150

教会法庭在波兰，187，203，465，473；在匈牙利，193，203

英格兰：支付教会法庭的费用重负，227，229；受议会的攻击，232；宗教改革前的教会法，228；托马斯·克伦威尔对教会立法权的攻击，234；克兰默的《教会法的革新》，245；立法加强国教会的君权至上，235；英国的习惯法与大陆的多样化的对比，442；英国君主权力受限制，442，445；习惯法与合议庭，450；议会的成文法与习惯法，456—457；英国国王在议会中的君主立法权限，457—458

法学者对查理五世的支持，308—309，314

在论文中民族语言的使用，383

在大学里的教授，427

它的实施，449—452，478；西班牙的议会组织，333；西属美洲的法庭，569—570，571—572；在葡属海外殖民地，603

东部诸国的法学者，474—476

战争的条款与惯例，501，503

伊斯兰教的，532；作为立法者的苏里曼，533

俄国，552，554

新世界的理论与实践，588—589；《印度群岛的新法律》，579

在葡萄牙，613

Lazarillo de Tormes，托尔梅斯的拉萨里洛，381

Lebrija, Antonio de (Nebrisensis), Spanis, historian, 莱布里哈, 安东尼奥·德(内布里森西斯), 西班牙历史学家, 371

Le Ferron, Arnoul, French historian, 勒费仑, 阿尔努, 法国历史学家, 371

Le Fevre, Pierre, Jesuit, 勒费弗尔, 皮埃尔, 耶稣会士, 292, 298

Lefevre d' Etaples (Faber Stapulensis), 勒费弗尔·戴塔普(法贝尔·斯塔普兰西斯)

在斯特拉斯堡, 110, 213, 217

法雷尔的老师, 113

在巴塞尔, 213

- 他的《圣经》翻译, 215—216, 383
- 他的反教士论, 214
- 主张因信称义, 214
- 在莫城, 215
- 返回法国 (1526), 217
- 受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庇护, 217
- 去世 (1536), 219
- Legazpi, Miguel Lopez de, 拉加斯皮, 米格尔·洛佩斯·德, 583
- Le Havre, Calvinism in, 勒阿费尔,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 Leicester Abbey, death of Wolsey (1530), 莱斯特大教堂, 沃尔西之死 (1530), 232
- Leipzig, 莱比锡, 32, 53, 79, 170, 362
- Leipzig Interim (1548), 莱比锡临时协定 (1548), 183
- Leipzig, university of, 莱比锡大学, 431—432
- Leitha, river, 莱塔河, 186
- Le Jay, Gabriel-Francois, Jesuit, 勒热, 加布里埃尔-弗朗索瓦, 耶稣会士, 292, 298
- Leland, John, antiquarian, 利兰, 约翰, 古物收藏者, 384
- Lempereur, Martin, 朗佩勒, 马丁, 213
- Leo X, Pope (Giovanni de' Medici), 利奥十世, 教皇 (乔瓦尼·德·美第奇), 10, 187, 374
- 与茨温利, 98, 100
- 与哈布斯堡和瓦卢瓦的斗争, 212, 252, 341—342; 支持弗朗西斯一世作帝位候选人, 306, 338
- 小兄弟会分为住院派和守规派, 278—279

禁止路德派的著作（1520），363—364

教育工作，427—428

Leon, power of the nobility centred in fortified towns, 莱昂，贵族的力量集中在设防的城镇，49

Lepanto, battle of (1571)，勒班陀之战（1571），336, 532

Lexznó, Unity of the Brethren in, 莱什诺，兄弟会联盟在该地，202

Leutschau, see Levoca, 洛伊查赫

Levends, Turkish brigands, 土耳其土匪，529

Lever, Thomas, 利弗，托马斯，245

Levoca (Locse, Leutschau), Lutheranism in, 莱沃恰（洛策，洛伊查赫），路德宗在该地，198

Lewis I (the Great), king of Hungary and Poland, and the Church in Hungary, 路易一世（伟大的），匈牙利与波兰国王，与匈牙利的教会，188

Lewis II, king of Bohemia and Hungary, 路易二世，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471

他的宗教政策，188, 190；镇压路德派，193—194

他的宫廷中的人文主义，192

在莫哈奇被杀（1526），196, 512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346；让步，348

与哈布斯堡的玛丽的婚姻，513

Lexicography, 辞典编纂，150, 373, 426—427

Leyden, 莱顿，127, 318

Libavius, Andreas, his Alchimia, 利巴维乌斯，安德烈亚斯，他的炼金术，406

Liburnio, Niccolo, Italian writer, 利布尔尼奥, 尼古拉, 意大利作家, 375

Licet ab initio (1542), establishes the Holy Office, 《准许》谕令 (1542), 建立圣职部, 270

Lichtenstein, Leonard and John, barons of, and Anabaptism in Moravia, 利希滕斯坦的男爵, 伦纳德与约翰, 与摩拉维亚的再洗礼派, 123

Liegnitz, principality of, 利格尼茨公国, 165

Lily, William, high-master of St Paul's school, 利利, 威廉, 圣保罗学校的第一任院长, 425

Lima, 利马, 572n., 576—577

Limmat, river, 利马特河, 121

Lincoln, diocese of, Protestantism in, 林肯教区, 抗议宗在该地, 248

Lincolnshire, 林肯郡, 37, 237

Lindau, 林道, 111, 350

Lindsay, Sir David, Scottish poet, 林赛爵士, 戴维, 苏格兰诗人, 379

Linz, Ferdinand I summons federal Parliament, 林茨, 斐迪南召集联合会议, 467

Lippomano, Luigi, bishop of Bergamo, 利波马诺, 路易吉, 贝加莫的主教, 258, 288

Lisbon, 里斯本, 594

香料贸易, 521; 香料自该地直接提供取代了安特卫普的工厂, 68; 与亚历山大里亚争雄, 531; 在东方监管贸易, 601

Lisle, John Dudley, Viscount, see Northumberland, 莱尔子爵, 约翰·达德利

Lismanini, Francis, Italian, humanist, 利斯马尼尼, 弗兰奇斯,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192, 201, 204

Literature, 文学, 著述

总的概要, 宗教的占主导地位, 17—18

农业的, 30

拉丁文的(16世纪), 368—374; 戏剧, 426

本民族语的, 374—386; 拉丁文的影响, 374—375, 385—386; 诗歌, 376—379; 戏剧, 379—380; 浪漫作品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380—382; 古典著作和《圣经》的翻译, 382—383; 神学, 哲学与科学, 383—384, 386; 历史编纂学, 384—385; 本民族语言战胜拉丁语, 385—386; 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影响, 386; 科学的与医学的, 390

英文的, 378—379, 384; 克兰默的祈祷文, 18; 编写宗教小册子的影响, 18

法文的, 377—378, 384; 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 116; 反对改革思想的后果, 218—219; 拉丁文与意大利文的影响, 377, 386; 戏剧, 379

德文的, 379, 384; 路德的影响, 18, 83, 86—87

意大利文的: 《语言的问题》, 375—376; 它在国外的影响, 376—379; 彼特拉克主义, 377—379; 戏剧, 380; 历史编纂学, 384—385

军事的, 482—484

葡萄牙文的, 613

斯堪的纳维亚的, 144, 147, 150, 152, 379

苏格兰的, 378—379

西班牙的, 378—379, 384

Lithuania, 立陶宛, 9, 22, 36, 542

东正教会在该地的力量, 187, 538 and cf. 544

1569年联合以前独立于波兰，464，466，474，560；地方贵族议会，465；行省议会，466；在波兰的大议会中有代表，467；贵族的特权扩展至，474

俄国的战争：来自诺夫哥罗德的请求，534—535；伊凡三世的入侵，537—539；被亚历山大一世割让的领土，538；瓦西里三世1508年的战争与伊凡三世战果得到承认，548；斯摩棱斯克的丧失，548—549；与伊凡四世在立窝尼亚的冲突，559—561；1564年的胜利，554；伊凡作王位继承人，560；1582年的和约，561

受鞑靼人攻击（1482），537；（1502），538—539；（1519），549；与之结盟（1521），549；（1535，1552），557—558

“Little Germany”，Cambridge group，“小德意志”，剑桥集团，227

Littel Poland, the diet of, 小波兰议会，466

Liturgy, 祈祷文，礼仪，礼拜仪式，圣餐仪式

英国：克兰默的，18；公祷书（1549），242；（1552），245，250

德意志与瑞士：卡尔斯塔特略去弥撒中的感恩经，84；在路德的《弥撒经与领圣体》（1523），86；路德的《论会众中礼拜仪式的规则》，86；他的《德语弥撒》，86；其余的德语礼拜仪式，86；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的试验，86，87，111；茨温利在苏黎世的改革，101—102，and cf. 86，99，120；斯特拉斯堡的礼仪试验，110—111；对加尔文的影响，115；德贝尔的纽伦堡弥撒，136；在莱比锡临时协定中，183

斯堪的纳维亚：在哈德斯莱夫条例中的保守论述（1528），135；马尔默的弥撒（1528），136；在丹麦教会法规中（1539），141；本地语的礼拜仪式与奥拉夫·佩特利的瑞典语弥撒（1531），149，150；在劳伦蒂乌斯·佩特利祝圣礼中的天主教仪式，150；劳伦蒂乌斯·佩特利的才干，150；中世纪传统在瑞典受尊重，153；民族语的，在芬兰，154，155—156；新的礼仪规则在里加（1530），159

忠实于斯拉夫的，在加利西亚和立陶宛，187；与特兰西瓦尼亚，188

胡斯派教会中礼拜仪式的简化，189

匈牙利的本民族语礼拜的试验，193

在费拉拉采用加尔文宗的仪式，265

嘉布遣会礼仪的简朴，281

基督教礼仪代替阿兹特克人的仪式，566

Livellarii, emancipation of, in Italy, 自由农民的解放，在意大利，48

Livonia, 立窝尼亚

宗教改革，157—160

政治上解体，160

俄国的入侵：伊凡三世（1481），537；（1500—1501），538；伊凡四世的战争与战果，558—561；波兰的西吉斯孟希望结盟抵制俄国，548；莫斯科的反对伊凡四世的战争，553；俄国放弃要求（1582），561

Livy, studied by sixteenth-century military theorists, 李维，16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对他的研究，484

Llamas, used for textiles and transport in Peru, 天峰驼，在秘鲁用于纺织和运输，574—575

Loaisa, Frey Garcia de, expedition to the Moluccas, 洛艾萨，弗雷·加西亚·德，远征摩鹿加，569

Lochau, agreement of 1551, 1551年洛豪协定，357

Lodeve, Briconnète as bishop of, 洛德夫，布里松内任该地的主教，214

Locse, see Levoca, 洛策

Lohmüller, John, 勒米勒，约翰，158, 159

Loket (Elbogen), 洛凯 (埃尔博根), 200, 465, 466

Lollardy, in England, 罗拉德派在英国, 227

Lombardy, 伦巴第, 358, 375

London, 伦敦

出口贸易 (1540年的, 1550年的) 与安特卫普的比较, 59, and
cf. 50

扬·拉斯基在该地, 204

反教士主义在该地, 227

卡尔特修道院, 235, 276

学术组织, 437

London, diocese of, Protestantism in, 伦敦教区, 抗议宗在
该地, 248

Longa, Maria, foundress of Capuchin nuns, 隆加, 玛利亚,
嘉布遣女修会创始人, 290

Lonska, Turkish victory (1544), 朗斯卡, 土耳其的胜利
(1544), 524

Loriti, Heinrich, see Glareanus, 洛里蒂, 海因里希

Lorraine, 洛林, 222, 357

Lorraine, Cardinal of, see Guise, Charles de, Cardinal,
洛林的红衣主教

Louis IX, king of France (St Louis), 路易九世, 法兰西国
王 (圣路易), 336

Louis X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一世, 法兰西国王, 7,
343, 438—439, 441, 456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二世, 法兰西国王, 439,
443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世, 法兰西国王, 31, 44

Louise of Savoy, see Angouleme, 萨瓦的路易丝

Louvain, 卢万, 316

Louvain, university of, 卢万大学

伊拉斯谟在该地, 70; 1521年后对伊拉斯谟的敌视, 90

检查路德的著作, 79

汉斯·陶森在该地学习, 136

扎基拉克的学习, 154

著作的审查, 364

三种语言的学院, 428

Loyola, 291, and see Ignatius Loyola, St, 罗耀拉

Lublin, Union of (1569), 卢布林联盟 (1569), 464, 466, 474, 560

Lucan, studied in secondary schools, 卢堪, 在中等学校被学习, 423

Lucca, 卢卡, 63, 181, 273

布拉马基家的阴谋, 253

宗教改革在该地, 263—264, and cf. 255

Luchino, Benedetto, author of the *Beneficio di Jesu Christo crocifisso*, 卢基诺, 贝尔代托, 《受难的耶稣基督的恩惠》的作者, 262n.

Lucian, in schools, 卢奇安/琉善, 在学校里, 426

Lucretius, editions of *De rerum natura*, 卢克莱修, 《物性论》的再版, 391

Lucretianism, condemned by both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卢克莱修主义, 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谴责, 370

Ludolph the Carthusian, influence of his *Life of Christ* on Loyola, 鲁道夫, 加尔都西会会士, 他的《基督生平》对罗耀拉的影响, 291

Lubeck, 吕贝克, 21, 131, 139, 204

与波罗的海的, 139, 148, 313—314

加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350

Luneburg, see Brunswick-Luneburg, 吕内堡

Lukas , Brother , leader of Hussit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卢卡斯长老, 胡斯派兄弟会的领袖, 191, 200

Lull, Raymond, 勒尔, 雷蒙德, 403

Lusatia, Upper and Lower, 卢萨蒂亚, 上游的和下游的, 465, 469

Luther, Hans and Margaret, parents of Martin, 路德, 汉斯和玛格丽特, 马丁的父母, 71

Luther, Katherine, wife of Martin, 路德, 卡塔琳娜, 马丁的妻子, 90

Luther, Martin,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路德, 马丁, 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

对世俗权力的态度, 4, 162, 172, 203; 谴责叛乱, 89—90, and cf. 92, 163

偏爱信仰甚于理性, 4, 18, 74 (and cf. 72, 75)

他应感激印刷术, 17, 107

写作的才干与影响, 18, 79; 他的《圣经》, 83—84, 383; 它在无产阶级教育中的价值, 86—87; 被用阿格里科拉的芬兰语版, 155; 赞美诗, 86; 丹麦语赞美诗的翻译, 136; 《大教理问答》与《小教理问答》, 93; 瑞典文翻译, 139, 150; 波兰文的翻译, 196; 彼泽森翻译的丹麦语小册子, 134; 阿格里科拉的芬兰语的, 155; 在

法国的影响，212—213；对拉丁语文体的鄙视，370；在辩论中使用民族语言，383

出生（1483），70；去世（1546），70，183，355

早年的生活，求学，70—72，74—75

做奥斯定会隐修士，领受神父职，71—72，and cf. 276

修道院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与因信称义教义的提出，72—75，and cf. 81

赎罪券之争，75—79；九十五条论纲（1517），76—77

早期的斗争与支持者，77—79；《神啊，求你起来》（1520），79，81

与公会议：对公会议理论的态度，78—79，82—83，170；呼吁（1518）召开公会议，78；与保罗三世的邀请，171，172—173，182；他的《论公会议与教会》，173—174

赎罪券之争扩展到较广泛的问题，79—81；路德的公开挑战，80—81；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攻击教皇制，80；《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80；《论基督徒的自由》，80—81；焚烧教会书籍与路德被革除教籍（1521年1月，“相应”谕令），81

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1521），81—84

极端派与保守派的改革（1521—1524），与卡尔斯塔特的辩论，84—88

礼仪改革与试验，86—87

农民战争（1524—1525），88—90，121，219

婚姻与家庭生活，90

与伊拉斯谟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90—91

关于圣餐的争论，91—92

1527—1528年的教会视察，与路德的大、小教理问答，92—93

德绍同盟（1525），92

- 托尔高同盟（1526），92，103，340
- 施佩耶尔会议休会（1526），92—93
- 施佩耶尔会议（1529），与《抗议书》，93—94
- 奥格斯堡会议与信纲（1530），93—94，350
- 基督教联邦的思想在瑞士，他的学说的的发展，96—97
- 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他的崇敬，99
- 与茨温利的教义的差异，102—103，163；在大学里的影响，
- 431
- 关于奥科兰帕迪乌斯的重视圣餐论，104
- 他对布塞尔的影响，108—109
- 加尔文受惠于他，与他的分歧，118
- 与宗派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冲突，119；《反对神圣的先知》，88；与闵采尔的争辩，120；与霍夫曼的联系，126；在明斯特论再洗礼派，13，167
- 中世纪神秘主义对他的影响，133，167
- 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162，164
- 施马尔卡尔登条款，172—173
- 批评在沃尔姆斯辩论（1540）中提出的建议，177—178
- 与雷根斯堡会议（1541），178—179
- 与黑森的菲利普重婚，180
- 在曼斯费尔德辩论的仲裁，183
- 梅兰希顿后来放弃了他的最初的恩典的教义，184；与梅兰希顿决裂，259
- 承认受惠于胡斯，200
- 与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的友好关系，200
- 亨利八世的《七圣事辩》，228—229

主张义务教育，429

科涅克同盟（1526），212，340，343，348

关于1530年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

Luxemburg, duchy of, inherited by Charles V, 卢森堡公国，
由查理五世继承，303

Lyonnais, trial of heretics, 里昂地区，异端分子受审，224

Lyons, 里昂，342

作为商业与金融中心，16，65；与安特卫普在哈布斯堡—瓦卢
瓦之间的斗争中竞争，66，68；杜奇的经营，67—68；国王诏书的采
用，68；它后来脱离了新的经济趋势，222；1557年倒闭的后果，222

印刷与图书买卖，221，362，427

它在宗教改革的传布中的重要性，212—213，222；路德派信徒
受迫害，218；加尔文宗教会（1557），224

作为文学中心，378

Lyubech, retained by Lithuania（1509），柳别奇，为立陶宛
所保留（1509），548

Maas, river, 马斯河，51，53

Macao, Portuguese at（1555），澳门，葡萄牙人在（1555），
611

Macar, Jean, 马卡尔，让，225

Macchiavelli, Niccolo, 马基雅弗利，尼科洛，17，386

他对凯撒·鲍吉亚的崇拜，252

戏剧作品，380

历史著作，384—385

生活，460

政治思想，460—462

论战争的艺术, 483—484, 502; 防御, 493; 炮术, 497

Maconnais trial of heretics, 马孔地区, 异端分子受审, 224

Madagascar, Portuguese fort, 马达加斯加, 葡萄牙人的要塞, 605—606

Madrid, Treaty of (1526), 马德里条约 (1526), 217, 343

Maestrazgos, Spanish military orders, (骑士团的) 首领领地, 西班牙的军事修会, 321, 339, and see Orders, military

Magdalen College School, Oxford, 莫德林学院, 牛津, 425

Magdalena, river, 莫德林河, 577

Magdeburg, 马格德堡, 71, 183, 340, 350

Magdeburg, archbishop of, see Mainz, Albert of Brandenburg, archbishop of, 马格德堡大主教

Magdeburg, the “Centuriators”, 马格德堡“世纪派”, 371

Magellan (Fernaõ de Magelhaes), 麦哲伦 (费尔南·德·马加良斯), 568—569, 605

Magellan, strait of, 麦哲伦海峡, 568, 569

Magnus, king of Livonia, 马格努斯, 立窝尼亚国王, 560

Magnus, prince of Denmark, 马格努斯, 丹麦君主, 160

Magyars, 马扎尔人

在特兰西瓦尼亚, 465

路德宗与加尔文宗, 199, 205—206

Maier, Johann, see Eck, John, 迈耶尔, 约翰

Maigret, Aime de, French Reformer, 迈格雷, 埃梅·德, 法国改革家, 212, 216, 218

Maine, trial of heretics, 曼恩, 异端分子受审, 224

Mainz, Gutenberg' s invention of printing, 美因茨, 古滕贝格印刷术的发明, 361

Mainz, Albert of Brandenburg, archbishop of (formerly archbishop of Magdeburg and administrator of Halberstadt), 美因茨大主教, 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 (以前任马格德堡大主教, 哈尔伯施塔特行政官), 107, 163, 338, 354

与赎罪券之争, 76—77, 83

Major, John, 梅杰, 约翰, 114

Makran, 马克兰, 530

Malabar, 马拉巴尔

香料贸易, 521, 593, 601; 葡萄牙的商人, 593—594, 594—596, 606—607, 611

Malacca, 马六甲, 597

海军力量, 592

外国商人在该地, 593; 葡萄牙人, 599, 600, 604—605, 608; 对葡萄牙人的攻击, 604, 606, 611—612; 财政改革, 609

天主教会在该地, 601

Malacca, Strait, 马六甲海峡, 593

Malayan Archipelago, 马来群岛

本地海上力量, 592

香料生产, 593; 葡萄牙人, 604, 611

基督教传教, 610

Maldivé Islands (Indian Ocean), Portuguese fort, 马尔代夫群岛 (印度洋), 葡萄牙人的要塞, 605—606

Malindi, 马林迪, 531, 594

Malines, 马林, 580

Malingre, Mathieu, 马兰格雷, 马蒂厄, 214

Mallermi, Niccolo, his Italian Bible, 马莱尔米, 尼科拉, 他的意大利语《圣经》, 365

Malmo, 马尔默, 134, 136, 139

Malta, 马耳他, 517, 532

Mamluks, see Egypt, 麦木鲁克

Manco Inca, revolts against Pizarro, 曼科印加, 反抗皮萨罗的暴动, 577

Mandeville, Sir John, his *Travels*, 曼德维尔爵士, 约翰, 他的《旅行记》, 390

Mangalore, Portuguese fort, 曼加洛尔, 葡萄牙人的要塞, 611

Manila, 马尼拉, 572 n., 583, 612

Manissa, 马尼萨, 530

Manresa, Loyola at, 曼雷萨, 罗耀拉在此, 291—292

Mansfeld, 曼斯费尔德, 71, 183

Mansfeld, Albert and Gebhard, counts of, 曼斯费尔德伯爵, 阿尔贝特和格布哈德, 92, 350

Mantua, 曼图亚

 保罗三世召集公会议 (1535), 171, 173

 改革的理论传至, 260

 人文主义教育在该地, 419

Mantua, Federigo, duke of, 曼图亚公爵, 费代里戈, 173

Mantuan (Battista Spagnoli, Baptist of Mantua), in secondary education, 曼图安 (巴蒂斯塔·斯帕尼奥利·曼图亚的巴蒂斯塔), 在中等教育中, 417

Manuel I, king of Portugal, 曼努埃尔一世, 葡萄牙国王

与在东方的扩展，591—592，595—596，605，613—614；亲自出售香料，601

与亚洲人的遭遇，603

去世（1521），597

Manutius, Aldus, printer, 马努蒂乌斯，阿尔杜斯，印刷业者，362，365—366，372

Manz, Felix, Anabaptist, 曼茨，费利克斯，再洗礼派信徒，102，120—121，124，132

Maranhao, 马拉尼翁，586

Marbach, Philip, 马尔巴赫，菲利普，112

Marbeck, Pligram, Anabaptist, 马尔贝克，皮尔格兰姆，再洗礼派信徒，124，126

Marburg, Colloquy of (1529), 马尔堡会谈（1529），92，111，166

Marburg, university of, 马尔堡大学，430，432，434

Marcellus II, Pope (Marcello Cervini), 马尔切卢斯二世，教皇（马尔切洛·切尔维尼），254，271

Margaret of Austria, duchess of Savoy,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萨瓦女公爵

任尼德兰摄政，303—304，309，340，347；雇用加蒂纳拉，306；查理控制了奖赏、任免权，310—311；叛乱的威胁，317

建议选斐迪南为皇帝取代查理五世，306

与康布雷和约（1529），345

Margaret, duchess of Alencon, queen of Navarre, 玛格丽特，阿拉松女公爵，纳瓦尔女王

加尔文在她的宫廷，114；她与布里松内的交往，215；保护改革者，216—218

她的著述，212—213，220，378，381

Marienburg, West Prussian Landtag, 马林堡，西普鲁士的议会，195

Marignano, battle of (1515)，马里尼亚诺之战（1515），211，334，337，340

Mariology, 马利亚学，156，193，269

Marnix, Jean, secretary to Margaret of Austria, 马尼克斯，让，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大臣，447

Marot, Clement, 马罗，克莱芒，218—220，377—378，383

Marriage, 婚姻

苏黎世的立法与管理，102；在日内瓦，116

再洗礼派所有的明斯特的一夫多妻制，128

黑森的菲利普与两个妻子的婚姻，179—180

教会法中解除婚姻的依据，231

阿尔布克尔克鼓励与本地妇女通婚，602

Marriage, of clergy, 婚姻，神职人员的

路德的《论修道誓愿》，84

卡尔斯塔特的婚姻，84，106；路德的婚姻，90；茨温利的，100；策尔的，108；布塞尔的，110；卡皮托的，110；加尔文的，116；汉斯·陶森的，136；奥拉夫·佩特利的，147；匈牙利主教们的，197

已婚神甫在斯特拉斯堡被革除教籍，108

宗教改革前在冰岛已很普通，144

葛斯塔夫·瓦萨的观点，147

在瑞典取消神职人员守贞（1536），150

扎基拉克在芬兰的提倡，154

被酒饼同领派拒绝, 189, 200

斐迪南敦促许可, 199

在英国得到许可 (1549), 242

Marseilles, 马赛, 170—171, 224, 342

Marsiglio of Padua, influence on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 对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462

Martial (Benedict Champier), 马夏尔 (贝内迪克特·尚皮埃尔), 215

Martin V, Pope (Otto Colonna), 马丁五世, 教皇 (奥托·科隆纳), 187

Martinengo, Massimiliano Celso, Count, Italian reformer, 马丁南戈伯爵, 马西米利亚诺·切尔索, 意大利改革者, 263—264

Martinuzzi, George, bishop of Grosswardein, 马丁努齐, 乔治, 大瓦代恩的主教, 523, 526

Martyr, Peter (of Anghiera), 马尔蒂尔, 彼得 (安吉埃雷的), 371

Mary Tudor, queen of England, 玛丽, 都铎, 英国女王

她的统治预示着反宗教改革, 3, 204, 230; 天主教的复辟, 246—249, 273, 431; 迫害, 248—249; 大学的管理, 433

即位, 246

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 (1554), 247

去世 (1558), 249

计划与查理五世结婚, 341

枢密院的采用, 445

照顾年老残疾的士兵, 503

Mary of Habsburg, queen of Hungary and Bohemia, consort of Lewis II, 哈布斯堡的玛丽,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后, 路易二世

的配偶，192，303

与宗教改革，193—194

作尼德兰的摄政，307，309，313；查理控制了奖赏任免权，310—311；她努力保持中立，315；劝阻查理五世不要把土耳其战争扩大到地中海东岸，325；与萨克森的莫里斯的叛乱（1552），357

与路易二世的婚姻，513

Masawwa，马萨瓦，530，599

Maskat，马斯凯，520，530—531

Mass，弥撒

路德否认它有牺牲象征性，80；改革者一致的否认，91

卡尔斯塔特略去弥撒中的感恩经，84

教皇派在奥格斯堡会议上坚持正统教义，94—95

在苏黎世茨温利的圣餐仪式中被取代（1525），101—102；在巴塞尔被取消（1529），105；在斯特拉斯堡（1529），109；在伯尔尼和日内瓦，113

为死者举行的，在瑞典禁止（1544），152

在雷根斯堡会议（1541）上的分歧，178

布里松内为传统教义辩护，215；在桑城会议（1528）受到保护，217

在海报（1534）中受攻击，220

克兰默的观点，243

在卢卡强迫参加（1545，1549），263

巴尔德斯派的态度，265

“尼哥底姆派”接受天主教教义，268

Massacio，马萨其奥，278

Mathematics，数学，97，394—395，412

实际应用，393

代数应用于科学，394；阿拉伯的起源，391

算术，教科书，394；在中等教育中被忽视，419；印加计算方法，574

几何学，394；实际应用，393；应用于天文学，396—398；透视方法，390，402；作为学校的科目，419；三角学，394

Matienzo, Juan de, *Gobierno del Peru*, 马蒂恩索，胡安·德，《秘鲁政府》或译《秘鲁的统治》，589

Matthias Corvinus, king of Hungary, 马加什·科尔文，匈牙利国王，188，192，537

Matthys, Jan, Anabaptist, 马蒂，扬，再洗礼派信徒，127—128

Matthys (widow of the above), 马蒂（前者的遗孀），129

Mattiolo, Pietro, naturalist, 马蒂奥洛，彼得罗，博古学家，392

Maule, river (Chile), 马乌莱河（智利），575

Maxim the Greek, 马克西姆，希腊的，545

Maximilian I, king of the Romans and emperor elect, 马克西米连一世，罗马人的王和当选皇帝，78，306

与安特卫普，50，57，60

作勃艮第的查理（查理五世）的摄政，303

与努瓦荣条约（1516），304

去世（1519），338

试图改革帝国，477，479，489

与俄国的伊凡三世的关系，537；与俄国和波兰的战争（1514—1515），548—549

Maximilian II, emperor, 马克西米连二世, 皇帝, 203, 208, 332, 471—472, 532

Mayas, of South America, 马雅人, 南美洲的, 567—568

Mayer, Sebastian, 迈耶, 塞巴斯蒂安, 113

Mazovia, duchy of, 马索维亚公国

并入波兰 (1526), 464; 省议会, 466; 在波兰大议会里有代表, 467

Mazurier, 马聚里耶, 215—216

Meaux, 莫城, 214—216, 221—222

Mecca, 麦加, 347, 510, 533, 599

Mechlin, 梅奇林, 53, 61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35—36, 165

Mecklenburg, Albert, duke of, 梅克伦堡公爵, 阿尔贝特, 92

Mecklenburg, John Albert, duke of, 梅克伦堡公爵, 约翰·阿尔贝特, 357

Medici family, 梅迪奇家族

放弃教皇的政治野心, 10; 梅迪奇家的历任教皇的政策受家族利益的影响, 252—253

佛罗伦萨反对梅迪奇统治的暴动, 253; 被逐出佛罗伦萨 (1527), 344; 在佛罗伦萨重新确立 (1529), 253, 345

布拉马基家在卢卡的阴谋, 253, 263

控制锡耶纳 (1552), 264

Medici, Cosimo I de', grand duke of Tuscany, see Tuscany, 梅迪奇的科西莫一世, 托斯卡纳大公

Medici, Giovanni de' (delle Bande Nere), 梅迪奇, 乔瓦尼德 (黑帮的), 487

Medici, Giuliano de' , see Clement VII (Pope) , 梅迪奇的朱利奥诺

Medicine, 医药, 医学

格拉雷阿努斯的研究, 97; 塞尔维特的研究, 117, 411

再洗礼派中的医生, 200

医院, 257, 294

梅毒, 在意大利, 289; 印刷的著作, 390

民族语言在论文中的使用, 383

中世纪和古典思想的延续, 387; 肖利亚克的《外科治疗》, 387; 塞尔苏斯著作的再版, 391; 盖伦的, 392

帕拉切尔苏斯论医术, 393; 帕拉切尔苏斯的医疗化学学校, 403, 405—406, 411

酒的使用, 404

药效形象的理论, 405

解剖学, 406, 408—410; 解剖标本与解剖图, 389, 391, 393

第一部药典, 408; 药材, 405—406, 411

手术, 411

战争中的医疗服务, 503—504

天花被带入新西班牙, 562

葡属领地的医疗服务, 603

Medina del Rio Seco, repression of revolt against Charles V, 麦迪纳·德·里约·塞科, 反对查理五世叛乱的镇压, 319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土耳其—西班牙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10, 305, 324—326, 336, 346—347, 351, 517—520, 531—532

安特卫普贸易公司的形成 (1562—1565) , 69

Mehemmed II, Sultan, 穆罕默德二世, 苏丹, 510

Mehemmed Pasha, Turkish governor, 穆罕默德帕夏, 土耳其总督/执政官, 524, 526

Mehemmed Sokollu, Ottoman commander, 穆罕默德·苏科鲁, 奥斯曼土耳其的指挥官, 526, 532

Meissen, 迈森, 425, 429

Melanchthon, Philip (Schwarzer), German theologian and reformer, 梅兰希顿, 菲利普(斯瓦尔兹德), 德国神学家和改革者

学习神圣的语言, 79

合作修订路德的《新约圣经》, 83

他的《神学精义》, 84

对卡尔斯塔特的敌视, 88

在马尔堡会谈(1529)中拒绝妥协, 92

为1527—1528年教会视察所作的《训导》, 92

他在《奥格斯堡信纲》(1530)中的作用, 94, 173, 350

与“雷纳纳的文学社”的关系, 104

莱比锡图书买卖与他的著作的传布, 107

与1536年的维滕贝格协约, 111

与天主教徒和改革者的会议(1539—1541, 1546), 111—112, and cf. 219

加尔文受惠于他, 118

与斯堪的那维亚的宗教改革, 155; 在丹麦, 140—141; 对劳伦蒂乌斯·佩特利的影响, 150; 对乔治·诺曼的影响与瑞典的宗教改革, 151, 153; 在芬兰, 155, 158

与布塞尔在圣餐问题上看法一致, 在卡塞尔(1534), 166—167

受阻未与弗朗西斯一世会谈，171

与抗议宗的拒绝参加公会议，171—173

与施马尔卡尔登条款，172—173

在雷根斯堡会议上（1541），178, and cf. 259

与黑森的菲利普与两个妻子的婚姻，180

与维德在科隆改革的企图，181

与奥格斯堡临时协定（莱比锡临时协定）的修改，183—184

为特伦托会议起草认信文，184

路德死后的教义之争，184

他的著作在法国的传布，213；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谴责（1522），213

他的著作在意大利的传布，255；天主教改革者的态度，259；
与威尼斯的抗议宗，262

作为一名拉丁文体作家，370

扩充卡里翁的《编年史》，371

教育工作，424, 425

Melchiorites, Anabaptists, 梅尔希奥的门徒，再洗礼派，127

另见Hoffman, Melchior

Melius-Juhasz, Peter, and Calvinism in Hungary, 米柳斯-朱
哈茨，彼得，与加尔文宗在匈牙利，205

Memmingen, 梅明根，88—89, 111, 350, 355

Mende,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芒德，路德派受迫害，218

Mendoza, Antonio de, first viceroy in New Spain (1535),
门多萨，安东尼奥·德，新西班牙的首任总督（1535），571, 574,
579, 581

Mendoza, Diego Hurtado de, governor in Valencia, 门多萨, 迭戈·乌尔塔多·德, 巴伦西亚的行政长官, 323

Mendoza, Pedro de, 门多萨, 佩德罗·德, 587

Mengli-Girey, khan of the Crimean Tatars, 蒙里·吉莱, 克里米亚鞑靼人可汗, 536, 537, 538, 549

Mennonites, 门诺派, 131, 269

Mensuration, 测定法, 393—394

Mercator, Gerard, his projection, 默尔卡托, 吉拉尔德, 他的投影法, 396

“Merchant Adventurers” Company, “冒险商公司”, 54—56

Merchant Taylors’ School, London, 麦钱特·泰勒的学校, 伦敦, 427

Merindol, decree of (1540), 梅里多尔法令 (1540), 221

Messina, 墨西拿, 297—298, 312

Mesta, Spanish sheep-owners’ guild, 梅斯达, 西班牙牧羊业主, 同业公会, 322, 445—446

Metals, metallurgy, 金属, 冶金术, 403—405

Metz, 梅斯, 32

主教区, 被法国获得 (1552), 185, 212, 332, 357; 查理五世试图夺回, 332, 357, 492; 防御工事, 492

Mexia, Afonso,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 in India, 梅希亚, 阿方索, 在印度任财政监督, 606

Mexico, 墨西哥

由科尔特斯重建, 562—563

政权组织, 563—565, 572—573

修士任传教士, 565

牧场主的势力，582

Michelangelo 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17，377，391

Michoacan，conquered by Spaniards，米却肯，被西班牙人征服，567

Micyllus (Jacob Molshem)，米西鲁斯(雅各布·马尔什姆)，430

Middleburg，and the English cloth trade，米德尔堡，与英国的布匹贸易，54

Mignani，Laura，Augustinian，nun，米尼亚尼，劳拉，奥古斯丁会修女，288—289

Mihr-u-mah，Ottoman princess，米尔乌玛，奥斯曼土耳其的公主，528

Milan，米兰

改革者著作的流行，255；该地改革的传布，260

布拉马基被处决(1548)，263

巴拿巴派的建立(1533)，287

乌尔苏拉修女院，290

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争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去世(1535)时的战争，220—221，329，352，518；国内外反对查理五世和加蒂纳拉的政策，307，329；被弗朗西斯一世征服(1515)，337；教皇派与帝国军队驱逐法国人(1521)，341—342；法国人重新占领，在帕维亚战败(1525)，342—343；弗朗西斯一世放弃要求权(马德里条约，1526)，343；法国在康布雷和约(1529)同意斯福尔扎复位，345；奥尔良的沙尔去世(1545)时重归查理五世，353

西班牙人统治下的统治与行政，329—330

被菲利普二世继承，329，353，358

Milan, Christina, duchess of, wife of Francesco Maria Sforza, 米兰公爵夫人, 克里斯蒂娜, 弗朗切斯科·马利亚·斯福尔扎的妻子, 303, 307

Milan, Francesco Maria Sforza, duke of, 米兰公爵, 弗朗切斯科·马利亚·斯福尔扎, 220, 303, 307, 341, 343, 345

Milford Haven, coastal fortification, 米尔福德黑汶, 沿海防御, 493

Miltitz, Charles von, Saxon resident at Rome and papal envoy to Saxony, 米尔蒂茨, 查理·冯, 撒克逊驻罗马的代表和教皇派往萨克森的特使, 78

Minden, 明登, 175

Minorca, Barbarossa raids (1535), 米诺卡, 巴尔巴罗萨袭击 (1535), 325

Missions, 传教

耶稣会的誓愿, 294; 耶稣会的, 297, 298, 299, 586—587, 609—610; 葡萄牙人的, 298, 586—587, 595, 609—610; 修士们在西属美洲, 298, 565—567, 578—579; 在新西班牙由土著居民村落的领主委任和维持教士, 654, 565

Mochau, Anna von, wife of Carlstadt, 莫肖, 安娜·冯, 卡尔斯塔特的妻子, 84, 106

Modena, 摩德纳, 260—261, 264

Modestus, on the art of war, studied in sixteenth century, 莫代斯特, 论战争的艺术, 16世纪对他的研究, 483

Modrzewski, Andrzej Fryca, Polish royal secretary, 莫杰夫斯基, 安杰伊·弗里茨, 波兰王室的大臣, 193, 476

Mompelgard, the Reformation in, 蒙帕尔加德, 宗教改革在该地, 165

Mohacs, battle of (1526), 莫哈奇之战 (1526), 212, 344

它的后果，348—349；对匈牙利宗教改革的影响，196—197；对波希米亚的宗教史的，199—200

远征与交战，512—513；土耳其人使用大炮，497

Moldavia, 摩尔多瓦, 191, 522

Moldavia, Stephen IV, prince of, 摩尔多瓦亲王，斯蒂芬四世，537—538, 541

Moluccas (Spice Islands), 摩鹿加（香料群岛）

香料贸易与葡萄牙人，568, 593, 597, 604—605；抵抗葡萄牙人，608, 612；麦哲伦的与德尔·卡诺的航行，568

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的竞争，569；西班牙权力的出售，569, 604—606；卡斯蒂利亚的抗议，589

Molza, Francesco Maria, Italian poet, 莫尔扎，弗朗切斯科·马里亚，意大利诗人，377

Mombasa, 蒙巴萨，531, 594, 597

Monarchy, 君主政体

在西欧的发展，6—8, 438—444；巩固的社会效果，16；王室控制大学，433—444；与代议会的关系和它的利用，454—458

在西班牙，7—8, 15, 49, 438—440, 456, 458；查理五世即位时的卡斯蒂利亚，304, 305；他恢复了王室的权威，319—320；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323—324；在新世界，571—574, 578—580；新世界的占有加强了西班牙的专制主义，589—590

在东部诸国：斐迪南一世与巩固，8—9；与宗教改革，186, 188；在匈牙利的削弱，197, 206；王室与贵族的关系，464, 466—467；议会的选举，467；选举的君主政体受到莫杰夫斯基的辩护，476；与议会的关系，469—470；斐迪南一世取消世袭的君主政体，471—472；15、16世纪在波兰的衰落，472—474

在德意志的削弱，9—10, 479—480

在英国，36—37, 441—443, 445

瑞典，世袭制的建立，152

意大利诸国走向专制主义，273—274

查理五世继承哈布斯堡王朝作统治者，308，311，439—341

法国，438—440；王室对教会的控制，211；巴黎高等法院的反对，216；向专制主义发展，439，458

土耳其君主的男性亲属被害，527—528

俄国，539，542；与教会的关系，544—546；独裁政治，550；君主的称号，538，551，554

Monardes, Nicholas, his work in botany, 莫纳德斯，尼古拉斯，他的植物学，408

Monasteries, 修道院

在英国：解散从前的土地范围，42—43；解散，235—238，448；重新分配土地的影响，15；作追思弥撒的奉献金，244；将奉献金用于教育的后果，430

在农民战争（1524—1525）中受攻击，88—89

在斯堪的那维亚：在丹麦，139；在冰岛，145；在瑞典，148；在芬兰，154

在立窝尼亚受攻击，158，160

在波希米亚解散（1419—1434），190—191；在特兰西瓦尼亚，206

作为残疾军人的慈善组织医院，503

在俄国，544—545；在诺夫哥罗德，被伊凡三世占有，535

Moncada, Hugo de, viceroy in Sicily, 蒙卡达，尤戈·德，西西里总督，326

Monemvasia, lost by Venice (1540), 莫南瓦尼亚，被威尼斯丢失（1540），520

Money, 货币

佛兰德镑与, 58

在英国贬值, 69; 在法国, 339; 在葡萄牙占领下的印度, 609

加蒂纳提出统一帝国货币, 310

西班牙的, 352

哈布斯堡的斐迪南试图使货币标准化, 467

Mongols, 蒙古人, 21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 米歇尔·德, 386, 437

Montalcino, 蒙塔尔奇诺, 273

Montargis,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蒙塔尔吉, 224

Montauban,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蒙托邦, 路德派信徒受迫害, 218

Monte Corona, Camaldolese foundation and congregation, 科罗纳山, 卡马尔多利修院与修会, 278

Montefalcone, 蒙特法尔科内, 279

Monteleone, duke of, viccroy in Sicily, 蒙特莱昂内公爵, 西西里总督, 326

Montelimar, Calvinism in, 蒙特利马尔,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Montemayor, Jorge de, 蒙特马约尔, 豪尔赫·德, 386

Montluc, Blaise de, his *Commentaires*, 蒙吕克, 布莱斯·德, 他的《回忆录》, 482

Montmorency, Anne de, marshal and constable of France, 蒙莫朗西, 安娜·德, 法国的司仪官和皇家城堡的管家, 344

Montoire,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蒙图瓦尔, 224

Montpellier, the Reformation in, 宗教改革在蒙彼利埃, 218, 222

Montserrat, Loyola at, 罗耀拉在蒙特塞拉特, 291

Moors, 摩尔人

在西班牙的征服, 47, 49

在西班牙被迫改宗 (1502, 1525), 324

与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的对比, 563

Morata, Olimpia, Italian humanist, 莫拉塔, 奥林匹亚,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261

Morato, Fulvio Pellegrini, Italian humanist, 莫拉托, 富尔维奥·佩莱格里尼,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261

Moravia, 摩拉维亚

领主领地的增加, 35

再洗礼派, 122—124, 126, 200—201; 受迫害, 129, 131; 再洗礼派工匠的价值, 200; 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与之的联系, 124, 265; 意大利的流放, 269

路德宗在该地, 123, 200

波希米亚兄弟会在该地, 203; 并入波希米亚, 464—465; 议会, 466; 城镇选举代表的制度, 469

承认安娜 (路易二世的姊妹) 为波希米亚女王, 471

More, Sir Thomas, 莫尔爵士, 托马斯

他在文学的地位, 17; 风格, 18; 《乌托邦》, 459—460; 多梅尼基的意大利语译本, 264

与对教会腐化的批评, 226

与异端分子受审, 228

任大臣, 232, 450

他的君主观, 234

他的死 (1535), 228, 232, 236—237; 奥热霍夫斯基提到他, 476

Morea, 摩里亚, 518—520

Morel, Francois de, 莫雷尔, 弗朗索瓦·德, 224

Morigia, Giacomo Antonio, cofounder of the Barnabites, 莫里吉亚, 贾科莫, 安东尼奥, 巴拿巴会的创立者之一, 287

Moriscos, in Spain, 摩里斯科人在西班牙, 319, 324, 351, 583

Morison, Richard, pamphleteer, 莫里森, 理查德, 宗教书册作者, 462—463

Morone, Giovanni, Cardinal, bishop of Modena, 莫罗内, 乔瓦尼, 红衣主教, 摩德纳的主教, 177, 260

与天主教的改革运动, 272—273; 受到异端裁判所的谴责, 271; 转向强硬的正统, 272

与特伦托会议, 274

与耶稣会在德意志, 298

Morvan, trial of heretics, 莫尔旺, 异端分子受审, 224

Moscow, 莫斯科, 155, 545, 554

被鞑靼人围攻 (1521), 549; 被劫掠 (1571), 555—556

受斯蒂芬·巴陶里威胁, 561

Moscow, grand principality of, 莫斯科大公国, 534—536

Mosellanus, Peter, *Paedologia*, 莫塞拉努斯·彼得, 《幼儿学》, 426

Moxica family, Spanish bankers, 莫希卡家族, 西班牙银行家, 66

Mozambique, Portuguese at, 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 594, 597

Mühlberg, battle of (1547), 米尔贝格之战 (1547), 3, 202, 282, 331, 472

它的影响被帕绍条约消除 (1552), 332, 480

Mühlhausen, 米尔豪森, 88, 103

Müller, Johann, see Regiomontanus, 米勒, 约翰

Münster, 闵斯特

再洗礼派的控制, 6, 124, 127—128, 166—167; 被围 (1533—1534) 与陷落, 受迫害, 128—131, 133

该地的学校, 430

Münzer, Thomas, 闵采尔, 托马斯

生涯与信仰, 87—88; 对路德的敌意, 87, 120; 礼仪试验, 86, 87, 110; 与农民战争, 89, 120; 被俘, 被处决 (1525), 89; 与再洗礼派的关系, 88, 120, 128; 他对登克的影响, 122

Muhammad' Ali, pasha of Egypt,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的帕夏, 511

Muhammad Emin, khan of the Kazan Tatars, 穆罕默德·艾明, 喀山鞑靼的可汗, 537

Muhammed-Girey, khan of Crimean Tatars, 549

Mur, river, Tatarraids (1532), 穆尔河, 鞑靼人袭击 (1532), 515

Murad III, Ottoman sultan, 穆拉德三世, 奥斯曼土耳其苏丹, 530—531

Murad Beg, Turkish admiral, 穆拉德贝伊, 土耳其舰队司令, 530

Murcia, position of the peasantry, 穆尔西亚, 农民的地位, 49

Musculus, Wolfgang, 穆斯卡鲁斯, 沃尔夫冈, 116

Music, 音乐

乐器在尼德兰的生产, 61

卡爾斯塔特譴責教堂音樂, 85; 茨溫利的譴責, 100

茨温利的喜爱, 98—100

Mustafa, son of Sultan Sulaiman, 穆斯塔法, 苏丹苏里曼之子, 525, 528—529

Myconius (Oswald Geisshussler), 米科尼乌斯 (奥斯瓦尔德·盖舒斯勒)

与戈达的宗教改革, 86

敌视卡尔斯塔特, 88, 106; 在苏黎世提名茨温利, 98

在巴塞尔接替奥科兰帕蒂乌斯, 106; 与巴塞尔认信文, 107

Mysticism, 神秘主义

对路德的影响, 75, 133

在卡尔斯塔特的神学中, 85

对闵采尔的影响, 87

再洗礼派与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关系, 132—133; 明斯特再洗礼派与神秘主义的狂热, 166—167

米凯尔·阿格里科拉与, 156

在莱茵兰低地, 167

在法国与人文主义决裂, 218, and cf. 214—216

罗耀拉在拉斯托塔的经历, 292, 293

Nadal, Jesuit vicar-general, 纳达尔, 耶稣会代理总会长, 299

Nadasdy, Tamas, palatine of Hungary, 纳达斯迪, 托马什, 匈牙利的封建领主, 470

与宗教改革, 193, 199

Nagasaki, Portuguese trade with, 葡萄牙人与长崎的贸易, 611

Nagyszeben (Hermannstadt), 大塞本 (赫曼施塔特), 193, 198, 205

Nagyszombat (Trnava), 瑙吉松博特 (特尔纳瓦), 197, 208

Nagyvarad (Grosswardein), 瑙吉瓦劳德 (大瓦代恩), 196, 198

教区税收世俗化, 205

Nakhjivan, 纳希万, 525

Nantes,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南特, 224

Naogeorgus (Thomas Kirchmeyer), 诺乔治 (托马斯·基希迈耶), 369

Naples, 那不勒斯

巴尔德斯派的中心, 265—266, 284

反三一论, 270

新修会的修院, 282, 287, 289—290

与巴塞罗那的丝绸贸易, 312

被法国人包围, 344—345

作为文化中心, 375

Naples, kingdom of, 那不勒斯王国

该地的改革运动, 256; 试图引入异端裁判所 (1547), 328—329

被查理五世继承, 301, 305; 被菲利普二世, 358

安赫宾声称权力属己, 305; 阿拉贡与安赫宾派系, 328; 弗朗西斯一世放弃要求权, 343, 353

摩尔人袭击, 327—328

征税, 327

被法国人攻击 (1525—1528), 342, 501

Napoli di Romania, 那波利·迪, 罗马尼亚, 520

Narova, river, 纳罗瓦河, 543

Narva, 纳瓦, 543, 558—559, 561

Nassau, Henry, count of, 纳索伯爵, 亨利, 449

Navagero, Cardinal Bernard, 纳瓦杰罗, 红衣主教, 伯纳德, 533

Navarre, 纳瓦尔, 341, 440

Navigation, 航海

- 磁性指南针的使用, 389
- 印刷的影响, 389—390
- 几何学的应用, 393
- 大洋航海的发展, 395—396; 葡萄牙人的进步, 613
- 在塞维利亚由“贸易署”特许, 584

Neander, Michael, his school at Ilfeld, 尼安德, 迈克尔, 他在伊尔费尔德的学校, 437

Nebrisensis, see Lebrija, 内布里森西斯

Negri, Francesco, his *Tragedia del Libero Arbitrio*, 内格里, 弗朗切斯科, 他的《自由意志的悲剧》, 262

Negroes, 黑人

- 在巴西的奴役, 587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206, 259, 370

Nerac,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内拉克, 224

Nestorianism, Ochino's *De Trinitate*, 聂斯脱利主义, 奥基诺的《论三位一体》, 207

Nestorius, 聂斯脱利, 206

Netherlands, 尼德兰

欧洲贸易的中心，51—52；西班牙人的贸易，312—313；依赖于波罗的海的谷物，313；布匹工业，318；在东方的扩张，531；与俄国的北方贸易路线，561；16世纪后期的衰退，333

人口的估计数，60

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在该地，135；施佩耶尔和约（1544），313—314

法国的进攻（1542），181

耶稣会在该地，299

查理五世继承哈布斯堡的领地，301，303；菲利普二世的继承，358

第一次使用该名（*pays d' embas*），303

法国和西班牙的影响，304—305

勃艮第的公爵统治下的行政，308；哈布斯堡的，309，311，315—318，440，444；皇家会议，445；法律与司法，451

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时的政治制度，316—317；哈布斯堡制度的衰退，318；利用高等贵族支持君主权力，455—456

征税，315—318

行省的独立主义，317

摆脱帝国，357

查理五世达到拥有十七个省（1521—1543），440

关于经济变化，关于宗教改革

Neuchatel，纳沙特尔，113，213

Neusohl，see Banska Bystrica，诺伊索尔

Neva，river，涅瓦河，561

Nevers，Cordier teaches at，科尔迪埃在内韦尔任教，424

New Galicia，新加利西亚，563，570—571，572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 577, 581

New Spain, 新西班牙

重建墨西哥作首都, 562—563

都市上流社会的统治, 563, 566

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合, 563, 583

行政, 563—565; 上诉法庭的建立 (1527), 569—570; 首次任命总督 (1535), 571; 皇室控制的主张, 571—574, 578—580; 印度群岛议会, 572; 财政与征税, 572—573; 总督的权限, 573—574; 小兄弟会的传教工作, 565—567

监护公税制或译土著居民村制度, 564—565; 国王努力要取消, 571—572, 578—579

奴隶搜捕与买卖, 567, 570; 国王的反对政策, 572, 585—586

跨太平洋的贸易, 583; 远征菲律宾, 612

印第安人口锐减, 583

采矿, 582—583

农业经济, 581—582; 本地农业, 563, 566—567

Newton, Sir Isaac, 牛顿爵士, 艾萨, 403

Nice, 尼斯, 352, 531

Nice, Truce of (1538), 尼斯停战协定 (1538), 174, 220, 239, 352

“Nicodemism”, “尼哥底姆主义”, 267—269

Niklaes, Hendrik, Anabaptist, 尼古拉斯, 亨德里克, 再洗礼派信徒, 130, 132

Nikolsburg (Moravia), 尼科尔克堡 (摩拉维亚), 122—123

Nil novi, Polish constitution of 1505, 波兰1505年的宪法, 473

Nivernais, trial of heretics, 尼维尔内, 异端分子受审, 224

Nobrega, Manoel de, 诺夫雷加, 马诺埃尔德, 586—587

Nogai Tatars, 诺盖鞑靼人, 537, 549, 557

Nograd, taken by Turks (1544), 诺格拉德, 被土耳其人占领 (1544), 524

Norfolk, Ket' s rebellion (1549), 诺夫克, 凯特叛乱, 244

Norfolk, Thomas Howard, duke of, earl of Surrey, 诺夫克公爵, 托马斯·霍华德, 萨里伯爵, 237, 241

Norman, George, 诺曼, 乔治, 151—152

Normandy, the Reformation in, 诺曼底, 宗教改革在该地, 216, 218, 224

North Sea, 北海

与贸易, 35, 53

狭长形大船在该地的使用, 506

Northumberland, John Dudley, duke of, 诺森伯兰公爵, 约翰·达德利, 130, 241, 244—246

Norway, 挪威, 139, 143

Norwich, diocese of, Protestantism in, 诺里奇教区, 抗议宗在该地, 248

Novara, battle of (1513), 诺瓦拉之战, 481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独立的丧失 (1478), 534—535, 537—538; 公民被放逐到莫斯科, 535, 543; 土地的重新分配, 543—544

伊凡三世使教会财产世俗化, 544

犹太教徒的异端在该地, 545

伊凡四世的大屠杀, 555

伊凡四世时农业的衰退, 556

Novgorod Seversky, 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

被瓦西里四世吞并 (1523), 550

Noyon, birthplace of Calvin, 努瓦莱, 加尔文的诞生地, 113

Noyon, Treaty of (1516), 努瓦莱条约 (1516), 304

Nun of Kent, the (Elizabeth Barton), executed (1534),
肯特之女 (伊丽莎白·巴顿), 被处决 (1534), 236

Nuremberg, 纽伦堡, 53, 185

宗教改革在该地, 340; 奥西安德尔, 86; 闵采尔在该地, 88;
奥科兰帕迪乌斯, 104; 德贝尔的《纽伦堡弥撒》, 136; 该地改革者
在瑞典的影响, 147; 他们对使用武力的态度, 162

该地的教育, 424—425

Nuremberg, Catholic League of (1538), 纽伦堡天主教同盟
(1538), 175, 353—354

Nuremberg, Peace of (1532), 纽伦堡和约 (1532), 164, 175
—176, 179, 350—351

Nuremberg, university of, 纽伦堡大学, 75

Oaths, see Law (Anabaptist rejection), 誓言

Oaxaca, valley, Cortes s encomienda, 瓦哈卡山谷, 科尔特斯的
土著居民村, 564, 570—571, 583

“Obelisks” (Eck’ s attack on Luther), “尖石塔” (艾克
对路德的攻击), 79

Obolensky-Liko, Dmitry, 奥博连斯基-利科, 德米特里, 540

Obolensky-Telepnev, Prince, murdered, 奥博连斯基-捷列普涅
夫, 大公, 被杀, 551

Occam, William of, Luther and, 奥康姆的威廉, 路德与, 71—
74

Ochino, Bernardino, Italian Reformer, 奥基诺, 贝尔纳迪诺,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嘉布遣会会士, 265, 270, 284—285

与巴尔德斯的交往, 265, 270, 284

受维多利亚·科隆纳的保护, 266

背教, 267, 270, 284—285

在波兰, 206—207

在英国, 130

在摩拉维亚, 去世(1567), 124, 265

伊拉斯谟对他的影响, 206; 路德的, 284

Odense, 欧登塞, 136—137, 140

Oecolampadius (John Hausschein), 奥科兰帕迪乌斯(约翰·豪施恩)

与闵采尔的对路德的敌视, 87

与圣餐, 91, 104—105

出生(1484), 生平概要, 去世(1531), 104—106

求学与学识, 104—105

与人文主义的联系, 104

与茨温利的交往, 104

与教会戒律, 105—106, 109, 115

Oecolampadius, Wibrandis, widow of the preceding, 奥科兰帕迪乌斯, 维布兰迪斯, 前者的遗孀, 110

Odenburg, spread of reforming ideas to, 欧登堡, 改革思想传至, 192

Oka, river, 奥卡河, 538, 549, 558

Olah, archbishop of Esztergom, 欧拉, 埃斯泰尔戈姆的大主教, 208, 209

Oldenburg, Christopher, count of, 奥尔登堡伯爵, 克里斯托弗, 139

Olid, Cristobal de, 奥利德, 克里斯托瓦尔·德, 567—568

Olivetani, Pierre-Robert, his French Bible, 奥利维坦, 皮埃尔-罗贝尔, 他的法语《圣经》, 383

Olomouc (Olmütz), 奥洛穆茨 (奥尔米茨), 200, 209

Oltu, 奥尔图, 524

Opava (Troppau), 奥帕瓦 (特罗保), 465, 466

oprichnina, “special court”, instituted by Ivan IV, “特别法庭”, 由伊凡四世建立, 554—555; 它的目的与效果, 555—556

Orange,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奥兰治亲王, 威廉 (沉默的), 301

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 神爱祈祷会, 258, 266, and cf. 289

Oratory (of St Philip Neri), 奥拉托利会 (圣·菲利普·内里的), 289

Orders, military, 军事修会/骑士团

在西班牙, 49, 312, 339, 445, 568; 收入项目, 321

基督骑士团 (葡萄牙人的) 被赐予在非洲的贸易权, 591

金羊毛骑士团, 304, 318

医院骑士团 (以后为马耳他的), 失去罗得岛 (1522), 347, 510—511; 攻打穆斯林朝圣者, 510; 圣·安娜, 504; 镇守和丧失的黎波里 (1551), 517, 531—532; 受托保卫马耳他, 517; 坚守马耳他 (1565), 532

立窝尼亚的（刀剑骑士团），547；领地让与波兰（1561），160，559；与莫斯科的冲突，536；战败（1501），538；军事力量的衰退，558

圣地亚哥，312，568

条顿的：经济财富，31—32，35；与宗教改革，157—158，160；与波兰的关系，185—186，194—195，350，354，549；与俄国的关系，535，537，548

Orders, religious, 宗教修会

新修会与抵制宗教改革，3，275—300；入修会的教士，276—277，285—289，291—300；宗教改革前的改革与重新组织，257，295；从修士中转变过来的抗议宗领袖，276

宗教改革爆发时的状况，275—277；在波罗的海的，158—160；在丹麦的，139；在英国的，235—236；在芬兰的，154；在法国的，214；在匈牙利的，188，193，206；在意大利的，256—257，260，262；在波兰的，186—187

奥斯定会（圣奥古斯丁隐修会）：路德加入与发愿，71—72，276；住院派与严规派的分裂，72；海德堡大会（1518），77，108；不再支持路德，78；维滕贝格会议（1522），85；在意大利，256，260；在新世界的传教，298

巴拿巴会（圣保罗会），287—288

本笃会：在意大利宣传新教义的巡回宣教士，256

卡马尔多会，277—280

嘉布遣会，276—277，280；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作会长，265，270，283；他的背教，284；建立与早期的历史，279—285

加尔默多会：在意大利宣传新教义的巡回宣教士，256

加尔都西会：英国的殉道者（1535），235；与平信徒的交往，276；罗耀拉考虑加入，291

基督教兄弟会（由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创立），296

小兄弟会（方济各会），254；被逐出里加（1524），158；在匈牙利，208；谴责布里松内，216—217；在意大利宣教新教义的巡回宣教士，256，260，262；与天主教的改革运动，257；住院派与守规派，278—279；属灵派，279，282；守规派会士转入嘉布遣会，281—282，283；守规派成员转会被禁，284，285；对圣安杰·拉·梅里奇的影响，290；罗耀拉争取加入，291；国外传教活动，298，565—567，609

布道兄弟会（多明我会），254；反对路德，77；布塞尔与，108；在雷维尔受攻击，159；与天主教的改革运动，257；对圣菲利普·内里的影响，289；国外传教活动，298，565，610

真福童贞玛利亚会（玛利·沃德），290

奥拉托利会，215，289

慈善学校修会（由约瑟·卡拉桑迪乌斯创立），296

普雷蒙特雷修会，在波希米亚，203

仁爱女修会，290

耶稣会，254，277，285，291—300；与日内瓦改革者的比较，117，223—224；在法国正式承认（1561），223；拒绝与索马斯基会合并，288；对菲利普·内里的影响，289；国际性，291；成立，组织与早期的历史，291—299；教育工作，296—299，422—425；与反宗教改革，298—300，333，423；在波希米亚，203；在匈牙利，208—209；在波兰，209；在法国，223—225；罗耀拉去世时，299—300；拉丁文宗教戏剧，369，426；大学里的不满，431

索马斯基会，288

德亚底安会，277，280—281，286—287；创立（1524），285—286；暂时包括了索马斯基会，288；巴蒂斯塔·达·克雷马的影响，289；与罗耀拉，287，292，296；背诵日课，293

三一会（马塔的圣约翰的），135，136

乌尔苏拉会，289—290，296

执事（会督），在瑞典教会，145，151—152

Orebro, birthplace of Olavus Petri, 厄勒布鲁, 奥拉夫·佩特利的出生地, 146

Orellana, Francisco, 奥雷利亚纳, 弗朗西斯科, 587—588

Oreshak, Russian gains (1582), 奥雷萨克, 俄国获得 (1582), 561

Oresme, Nicole, 奥雷姆, 尼科勒, 389, 400

Origen, 奥利金, 98, 117, 372

Original sin, Zwingli's doctrine of, 茨温利的原罪教义, 102

Orlamunde, Carlstadt at, 卡尔斯塔特在奥拉明德, 88

Orleannais, trial of heretics, 奥尔良内, 异端分子受审, 224

Orleans, 奥尔良

加尔文在该地学习, 114, 129; 海报 (1534) 与加尔文逃离法国, 114, 220

Orleans, Charles, duke of, 奥尔良公爵, 沙尔, 217, 343—344, 353

Ormuz, 霍尔木兹, 596

葡萄牙人在该地, 520, 530, 599, 600; 纳贡, 597; 葡萄牙人的慈善所, 603; 暴动, 603; 受土耳其人的攻打 (1552), 611

“Orphans”, Hussite sect, 奥芬派/孤幼派, 胡斯派的一支, 191

Orsha, battle of (1564), 奥尔沙之战 (1564), 559

Ortelius, cartographer, 奥尔泰利乌斯, 地图绘制者, 396

Orvieto, 奥尔维埃托, 344

Orzechowski, Stanislas, his political treatise, 奥热霍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 他的政论文, 476

Osel, bishopric of, 奥塞尔主教管辖区, 160

Osiander (Andreas Hosemann), reformer, 奥西安德尔 (安德烈亚斯·霍泽曼), 改革者, 86, 183—184

Oslo, 奥斯陆, 139, 143

Oslo, diocese of, combined with Hamar, 奥斯陆教区, 与哈马尔合并, 143

Ostrosrog, Jakub, 奥斯特罗罗格, 雅各布, 202

Ostrosrog, Jan, Polish humanist, 奥斯特罗罗格, 扬, 波兰人文主义者, 192

Ot'ezd, "right of departure", in Russia, "离开的权力", 在俄国, 540, 542, 550

Otranto, 奥特朗托, 312, 336, 518; 奥特朗托海峡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人

君主制的地位, 8, 527—528

反对基督教世界的后果, 8—9, 21, 308

法国的结盟, 11, 212, 325, 336, 343, 348, 352, 517—518; 对哈布斯堡—瓦卢瓦斗争的影响, 346—349; 给予法国的商业特权, 517

苏里曼一世与进攻匈牙利: 对匈牙利教会的影响, 196—197; 1525—1526年的远征与莫哈奇之战 (1526), 196, 212, 348—349, 512—513; 占领布达 (1526), 196, 348, 512; 占领贝尔格莱德 (1521), 347, 510; 1529年的远征与包围维也纳, 349, 514—515; 支持约翰·扎波利亚反对斐迪南一世, 349, 513—514, 515, 522—523; 与斐迪南的谈判 (1532), 351; 和好 (1533), 515—516; 统治向摩尔达维亚扩展, 522; 扬·扎波利亚死后 (1540) 进攻匈牙利, 523—524, 181; 1547年的和解, 524, 531; 1549—1562年的历次远征与和好 (1562), 526—527; 被征服领土的统治, 527; 苏里曼的最后远征 (1566), 532

与西班牙争夺地中海, 324—326, 351—352, 517—520, 531—532; 占领罗德岛 (1522), 339, 347, 510—511; 进攻塞浦路斯 (1522), 486; 最后控制北非沿海, 532; 进攻马耳他 (1565), 532; 勒班陀之战 (1571), 336, 532

威尼斯的反对, 347; 和解 (1521), 347—348; 1537—1540年的战争, 351, 518—520; 贸易让步, 517

波斯战争: 谢里姆一世在查尔德兰的胜利 (1514), 347, 516; 苏里曼一世的入侵 (1534—1535, 1548—1554), 351, 516—517, 521, 524—526, 528; 波斯—奥斯曼土耳其的边疆, 516

战争的组织: 军队纪律, 484, 485—486; 复合弓, 495; 火炮的使用, 497, 512; 俘虏的遭遇, 503; 海军, 504, 507, 518, 521, 531; 供给和运输问题, 514; 伊斯坦布尔的兵工厂, 518

征服埃及和叙利亚 (1517), 510, 511, 521; 1520—1521, 1523—1524年的暴动, 511; 埃及的政府改革, 511—512

与葡萄牙人的冲突, 592—608, 520—521, 530—531

进攻也门 (1525), 521

关于苏里曼继承问题的争论, 527—530

与俄国: 对克里米亚的保护权, 536, 549; 与伊凡三世的友好关系, 538; 鼓励鞑靼人反对俄国, 558; 与波兰结盟, 560

Overijssel, submits to Charles V (1528), 上艾塞尔屈服于查理五世 (1528), 316, 440

Ovid, studied in grammar schools, 奥维德, 在文法学校里的学习, 416, 419, 423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70, 362, 417, 426

沃尔西建立基督教会 (1525), 227, 428

圣体学院的建立 (1517), 428

宗教改革的影响, 227, 430—432

皇家控制的加强, 433—434

莫德林学院, 425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567—569, 583

Pacifism, 非暴力主义

与茨温利观点的对照, 99

再洗礼派反对战争, 122, 125, 131, 133; 拒绝纳税, 123; 施
莱特海姆信纲中的论述, 125

被兄弟会教会放弃, 191

波兰反三一论者的讨论, 207

加尔文的谴责, 267

普遍的反, 502

Pack, Otto von, 帕克, 奥托·冯, 93

Pacta Conventa, imposed on Henry of Anjou by Polish
nobility (1572), 聚会协约, 由波兰贵族强加于安茹的亨利
(1572), 474

Padilla, Juan de, 帕迪利亚, 胡安·德, 319

Padua, 帕多瓦, 287, 297, 410, 481

宗教改革在该地, 262; 反三一论, 262, 269

Padua, university of, 帕多瓦大学, 255—256, 418

Paesschen, Dirk van, 佩施恩, 德克·范, 62

Paget, Sir William, 佩吉特爵士, 威廉, 242

Pahang, Portuguese trade, 彭亨, 葡萄牙的贸易, 604

Paix des Dames (i.e. Peace of Cambrai, q.v.), 夫人和约
(即康布雷和约), 335

Paix perpetuelle (Eternal Peace of Fribourg, 1516), 弗里
堡永久和约 (1516), 340

Palaeography, 古字体学, 373

Palatine, suspension of the office in Hungary, 巴拉丁, 在匈牙利职位的中止, 470

Palatine, Dorothea, electress, wife of Frederick, 巴拉丁, 多罗西亚, 选侯夫人, 弗里德里希的妻子, 303, 313

Palatine, Frederick II, elector, 巴拉丁选侯, 弗里德里希二世, 143, 302, 313

Palatine, Lewis V, elector, 巴拉丁, 路易五世, 选侯, 163

Paleario, Aonio, Italian reformer, 帕莱亚里奥, 奥尼奥, 意大利改革者, 262, 263

Palermo, 巴勒莫, 312, 326, 328

Palestine, 巴勒斯坦, 347

Palingenius (Johann Pincier), 帕林吉尼乌斯 (约翰·平西耶), 370

Palissy, Bernard, French potter, 帕利西, 贝尔纳, 法国陶工, 404

Palladius, Peder, bishop of Zealand, 帕拉第乌斯, 彼泽, 西兰的主教

与丹麦的宗教改革, 141—142; 冰岛的, 141, 145; 挪威的, 143

Pallavicini, Vincenzo, Genoese delegate to French, 帕拉维奇尼, 温琴佐, 热那亚出使法国的特使, 344

Pallavicino family, Genoese bankers, 帕拉维奇诺家族, 热那亚银行家, 313

Pallanza, converts to the reform in, 帕兰扎, 转向改革的信徒, 260

Pallson, Ogmundur, bishop of Skalholt, 帕尔松, 奥格蒙杜尔, 斯考尔霍特的主教, 144—145

Pamplona, Loyola wounded at, 潘普洛纳, 罗耀拉在该地受伤,
291

Panama, the Spanish in, 西班牙人在巴拿马, 572, 575, 578—
579

Pandolfini, Pier Filippo, 潘多尔菲尼, 皮尔·菲利波, 501

Pannartz, Arnold, printer, 潘纳茨, 阿诺尔德, 印刷业者,
361

Panuco, 帕努科, 567, 570

Paolo Giustiniani, Blessed, 保罗·朱斯蒂尼亚尼, 真福,
251, 277—278

Papacy, 教皇制/教皇统治/罗马教廷

削弱, 1—3, 5, 48

在英国的地位, 8, 228; 在法国, 211—212; 在德国, 75—
76, 80; 在匈牙利, 188; 在意大利, 251, 252—254, 256—257, 273
—274; 在波兰, 186—187; 在瑞士, 101

与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斗争, 10, 212, 252—254, 307—308,
341—342; 与尼斯停战协定(1538), 174, 352

与威尼斯的冲突, 252; 在1556—1557年结盟, 254

查理要求有在宗教问题的纠纷中作仲裁的权力遭拒绝, 307—
308

承认大学的学位, 434

与国家主权的冲突, 443

Papal States, 教皇国, 10

明矾贸易, 60

朱理亚二世的重新组织, 252

保罗三世的加强, 253

吉贝蒂对教皇政策的影响, 257—258

反三一论，269

西班牙统治时权势的增长，273

Papillon, Antoine, 帕皮永，安托万，213

Pappenheim, Ulrich von, master of the Imperial Knights,
帕彭海姆，乌尔里希·冯，帝国骑士团的首领，81

Pappus, Johannes, 帕普，约翰内斯，112

Paracelsus, 帕拉切尔苏斯，390，392—393，427

医疗化学学校，403，405—406，411

Pare, Ambroise, French Surgeon, 帕雷，昂布鲁瓦兹，法国的
外科医生，492，503—504

Paris, 巴黎

伊拉斯谟在该地，70

路德著作的流行，213，216；处决路德派信徒（1527，
1528），218

罗耀拉与耶稣会士，223，292，298—299；不信任耶稣会，298

印刷与图书买卖，214，221，361，362，365，367，372

Paris university of, 巴黎大学，417，433

加尔文的学习，113—114

罗耀拉的学习，292

高卢主义与王室的控制，298，433，434

不信任耶稣会士，298

阿莱安德尔的演讲，418

对新的教授方法的态度，428

Parlement of Paris, 巴黎高等法院，216，217，223，449，451

Parliament of England, 英国国会

亨利八世与之的关系与使用, 232, 235, 245—246, 455—456, 463; 他的离婚与它的生存的重要性, 457—458

沃尔西与, 232, 456

与宗教改革, 232, 235, 245—246

控制立法与征税, 8, 234—235, 455—458, 463

下院的构成与人数, 457

关于国会的会议

Parma, 帕尔马, 273, 290

Parma, Pier Luigi Farnese, duke of, 帕尔马公爵, 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 253, 273

Pasai (Sumatra), Portuguese fort, 巴塞(苏门答腊), 葡萄牙的要塞, 606

“Pascal’s paradox”, discussed by Simon Stevin, “巴斯卡尔的矛盾命题”, 西门·史蒂文的讨论, 402

Pascelupo, Camaldolese foundation, 帕塞鲁波, 卡马尔多利会的修院, 278

Pasquier, Etienne, French antiquarian, 帕基耶, 艾蒂安, 法国博古学家, 384

Passano, Gian Giacomo, papal envoy, 帕萨诺, 吉安·贾科莫, 教皇特使, 343

Passau, Treaty of (1552), 帕绍条约(1552), 185, 332, 479

Pastor, Adam, Anabaptist, 帕斯特, 亚当, 再洗礼派信徒, 132

Pastoralism, 牧养业

英国牧羊业, 41—42, 237

在秘鲁, 574—575, 581—582

在西班牙, 584; 麦斯达, 321, 445—446

Patani, Portuguese trade, 帕塔尼, 葡萄牙人的贸易, 604

Patrikeev, Ivan and Vasily, 帕特里科夫, 伊凡与瓦西里, 541—542

Patronage, 任命权, 奖赏权, 保护

对服务的奖赏, 19

查理五世的控制, 310—311

Paul III, Pope (Alessandro Farnese), 保罗三世, 教皇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

与特伦托会议, 171, 173—174, 253—254, 262, 356

与德国的宗教改革, 174, 176—178, 181

与查理五世在卢卡会面, 181

加强教皇国的组织, 253

去世 (1549), 254, 273, 356

与意大利的改革, 258, 262, 264, 271, 283; 成立神圣法庭 (1542), 270; 与奥基诺的逃离, 284

与修会的改革, 277

对新修会的兴趣, 288; 确认和支持耶稣会 (1540), 223, 293, 296—298; 与真福保罗·朱斯蒂尼亚尼的友谊, 278; 确认承认嘉布遣会, 283—284; 确认巴拿巴会, 287

与哈布斯堡与瓦卢瓦的斗争, 307—308, 355—356; 与尼斯停战协定 (1538), 174, 352; 他的中立政策, 253

拒绝承认柯尼斯堡大学, 434

与查理五世结盟, 与威尼斯反对土耳其人 (1538), 519

Paul IV, Pope (Gian Pietro Carafa), 保罗四世, 教皇 (吉安·彼得罗·卡拉法)

关于雷根斯堡会议, 179

革除红衣主教波尔的教籍，249，273

他的反西班牙活动，254

与天主教改革运动，254，258；后来的疑惑，266—267，272—273

对异端的镇压，266，267；反宗教改革，254，272—273；对卡纳塞基的谴责，266；神圣法庭，270，284；公布第一批禁书目录（1559），364

他对新秩序的鼓励，288

德亚底安修会的建立，285—286，287；索马斯基修会，288；嘉布遣会，288；与圣吉罗拉莫·阿埃米利亚尼联合，288；与他的多明我会修女，289；与巴蒂斯塔·达·克雷马，289；对耶稣会士的冷淡，293，299；承认耶稣会士社团，297

Paul of Chioggia, Capuchin, 基奥贾的保罗，嘉布遣会修士，279

Pauteren, Jan van, see Despautere, 保特伦·扬·范

Pavia, 帕维亚，255，260，353

Pavia, battle of (1525)，帕维亚战役（1525），212，216—217，307，334，336，348，482，517

瑞士的离弃，487

大炮和火器的使用，497—498

Pavia, university of, 帕维亚大学，418

Pawel, Grzegorz, Polish Anti-Trinitarian, 帕维莱，格热戈日，波兰反三一论者，207

Pays d' embas, 即尼德兰，303

Pays de pardeca, 即西属尼德兰，303

Peasants, 农民

他们在封建土地制中的地位，23—24，28

农民的解放，25—26；意大利，26，47—48；与新圈地的自由租赁相结合，38；在法国和尼德兰，44—45；黑死病的后果，31，33—34；在英国，39

在德国，33—36

在丹麦，137，139

在英国，37，41—42

英国牧场扩大之患，41—42

在法国，46

在西班牙，49

在瑞典的暴动，148

韦尔伯齐的《约法三章》，475

在俄国，556

Peasants' War，农民战争（1524—1525），33，82，88—89，109，120

路德的“告和平”和“反对杀人越货的草贼”，89—90，121

它与再洗礼派传播的关系，6，121

Pécs（Fünfkirchen），佩奇（芬夫基兴），196，524

Pedersen, Christian，彼泽森，克里斯蒂安，134，383

Pedersson, Geble, bishop of Bergen，佩代尔森，盖布莱，卑尔根主教，143

Pegu，勃固，593，596，604，609

Pellicanus, Conrad, Swiss reformer，佩利卡努斯，康拉德，瑞士改革家，101

Pemffinger, Mark，佩姆弗林格，马克，198

Penance, sacrament of，赎罪圣礼

补赎抵偿和赎罪券的起源和滥用，75

在英国遭抵制（1549），242

在雷根斯堡的争论（1541），178

嘉布遣会鼓吹的日常信纲，281

Penitentials: commutation of moral offences by money payments, 悔罪：用钱偿付道德过失，75

Penny, Wiliam, his work in zoology, 珀尼，威廉，他的动物学著作，407

Penon, the (Algiers), captured by Barbarossa (1516), 佩尼翁（阿尔及尔人），被巴尔巴罗萨占领（1516），324

Pentapolitan Confession (1549), 五城市联盟信纲（1549），208

Perenyi, Peter, 派伦伊，佩泰尔，199, 205

Peris, Vicente de, 佩里斯，贝森特，323

Perna (Finland), 佩诺（芬兰），155

Pernambuco, Portuguese settlement, 伯南布哥，葡萄牙人定居点，586

Persia, 波斯，524—525, 530—531

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

Persian Gulf, 波斯湾

穆斯林势力的扩张，336

葡萄牙的控制，520—521；与土耳其的斗争，530—531，611

Peru, 秘鲁

印加帝国，574—575

印加的农业，547；在西班牙统治下，582

西班牙的征服（1530），575—576

内战，577—578

国王攻击恩科米恩达制度，578—579

对皇家权威的维护，578—580

印第安人的待遇，578—579

钱币经济的引入，580—581

牛羊养殖业，581—582

采矿，582—583

与新西班牙的沿海贸易，583

Pescara, Ferdinando Francesco d' Avalos, marquis of, 佩斯卡拉，费迪南多·弗朗切斯科，德阿瓦洛斯，侯爵，314, 342, 498

Pescara, Vittoria Colonna, marchioness of, 佩斯卡拉，维多利亚·科隆纳，女侯爵

保护瓦尔德斯人，267

保护嘉布遣会修士，283, 284

她的精神影响，288—289

她的诗歌，377

Peter Canisius, St, 彼得·卡尼修斯，203, 299

Petersson, Lars and Olaf, see Petri, 佩特利，拉尔斯和奥拉夫

Peterwardein, 派泰尔沃尔代因，513

Petrarch, Francesco, Italian poet, 彼特拉克，弗朗切斯特，意大利诗人，363, 375

彼特拉克主义，375, 378—379

Petri, Laurentius (Lars Petersson), archbishop of Uppsala, 佩特利，劳伦蒂乌斯（拉尔斯·彼得松），乌普萨拉夫主教

与瑞典的宗教改革，149—150；与古斯塔夫·瓦萨的斗争，151；在威斯特拉斯国会（1544年）之后恢复了影响，152；瓦萨《圣

经》，152；他的后期活动，著述和1571年的教会规条，152—153

去世（1573），152

Petri, Olavus (Olaf Petersson)，佩特利，奥拉夫

出生（1493），教育，为瑞典的宗教改革而工作，146—147；瑞典文新约，147；与彼泽·哈勒之争，148；他的政教观，149；与古斯塔夫·瓦萨的斗争，150；著述及本地语礼仪，149，150；瓦萨《圣经》，152；在威斯特拉斯国会（1544）之后恢复了影响，152；芬兰本地语礼仪，155—156

他的婚姻，147

拉丁语字典，《审判规则和瑞典编年史》，150

去世（1552），152

Petroio, Bartolommeo da (Brandano)，佩特罗伊奥，巴尔托洛梅奥·达（布朗达诺），273

Petrovics, Peter，派特罗维奇，佩泰尔，205

Peurbach, Johann, astronomer，波伊尔巴赫，约翰，天文学家，400

Pflug, Julius, bishop of Naumburg，普夫卢格，尤利乌斯，瑙姆堡主教，175，178

Pforta, convent endowment allocated to education，普福尔塔，女修会划拨给教育的基金，429

Philip I, the Fair, king of Castile, archduke of Burgundy，菲利普一世，“美男子”，卡斯蒂利亚国王，勃艮第大公，54，60，301，303—304

Philip II, king of Spain，菲利普二世（另译：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48，57，61

独裁地重整西班牙，7—8，456，589—590

他与玛丽·都铎的婚姻（1554），247

与波尔决裂，249

在意大利, 254, 273, 329, 353

对宗教改革的抵制, 301, 333

行政管理, 309, 310, 333, 445, 449, 588

他的继承, 330—331, 358

与帝位的继承, 311, 330, 331—332

企图恢复年金(政府年金), 322

与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358

反对德拉古特在杰尔巴的失败, 532

获得葡萄牙王位, 587, 612; 葡萄牙对巴西的控制, 588

Philip Neri, St, and the Oratorians, 菲利普·内利, 圣徒,
与奥拉托利会修士, 289

Philippine Islands, 菲律宾岛屿, 568, 572, 583, 612

Philips, Obbe, Anabaptist, 菲利普斯, 奥贝, 再洗礼派信徒,
131

Philipson, Johann, see Sleidan, 菲利普森, 约翰

Philology, 语文学, 372—373

Philosophy, 哲学

路德在爱尔福特学习, 71

唯名论对路德的影响, 71, 74, 68

路德反对哲学侵入神学中, 72, 74—75

茨温利的研究, 98

神学上论战的后果, 370—371

本地语的使用, 383

16世纪哲学上的实用主义, 386

Piacenza, held by Farnese family (1545), 皮亚琴察, 被法
尔内塞家族控制 (1545), 273

Picardy, 皮卡迪, 46, 224

Piccolpasso, Cipriano, 皮科帕索, 奇普里亚诺, 404

Picheroni della Mirandola, 皮凯罗尼·德拉·米兰多拉, 505

Pico della Mirandola, Gianfrancesco, 皮科·德拉·米兰多
拉, 詹弗朗切斯科, 373

Piedmont, 皮埃蒙特

改革运动在该地, 256; 韦尔多派在该地, 259—260

法国入侵 (1537), 352; 法国放弃领土要求 (1559), 358

Pighius, Albert, 皮吉乌斯, 阿尔伯特, 112

Pignerol, retained by France (1559), 皮涅罗, 被法国保留
(1559), 358

“Pikharti”, Hussite sect, 皮克哈蒂, 胡斯派, 191, 202

Pilgrimage of Grace (1536), 求恩巡礼 (1536), 237—238,
454

Pilsen, see Plzen, 比尔森

Pinczow, Calvinism in, 平丘夫, 加尔文宗在此, 204—205

Pinkie, battle of (1547), 平基战役 (1547), 497—498

Piotr of Goniadz, Polish Anti-Trinitarian, 戈尼翁兹的彼
得, 波兰反三一论者, 207

Piotrkow, diet of, 彼得库夫, 1538年议会, 473—474

Pirates, 海盗

柏柏里的, 324, 347

基督徒海盗船, 510, 519

Piri Pasha, Ottoman grand vizier, 皮里·帕沙, 奥斯曼帝国行政官, 510

Piri Re' is, Turkish admiral, 皮里·雷伊斯, 土耳其海军司令, 530

Pirkheimer, Willibald, German humanist, 皮克海默, 维利巴尔德, 德国人文主义者, 104

Pisa, 比萨, 264, 269, 402

Pisa, university of, humanism in, 比萨大学, 人文主义者在
该地, 418

Pisotti, Paulo, general of the Observant Franciscans, 皮索蒂, 保罗, 方济各会总长, 283

Pistorius, Johann, 皮斯托里乌斯, 约翰, 178

Pius II, Pope (Aeneas Syivius Piccolomini), 庇护二世, 教皇(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米尼), 189, 419

Pius IV, Pope (Gian-Angelo de' Medici), 庇护四世, 教皇(吉安-安杰洛·德·梅迪奇), 203, 273—274, 293

Pius V, St, Pope (Michele Ghislieri), 庇护五世, 圣徒, 教皇(米凯莱·吉斯列里), 266—267, 272, 288

Piyale Pasha, Turkish admiral, 皮亚莱·帕沙, 土耳其海军总司令, 532

Pizarro, Francisco, 皮萨罗, 弗朗西斯科, 575—577, 579

Pizarro, Gonzalo, 皮萨罗, 贡萨洛, 578—579

Pizarro, Hernando, 皮萨罗, 埃尔南多, 576—577, 579

Placards (1534), 海报(1534), 114, 220

Plato, Platonism, 柏拉图, 柏拉图主义, 98, 213, 266, 393,
437

Platter, Thomas, 普拉特尔, 托马斯

出版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114

教育工作，414，416，424，437

Plautus, translations, of, in, Italy, 在意大利翻译普劳图斯的著作，380

Pleiade, school of French poetry, 七星社，法国诗歌流派，378

Plettenberg, Walther von,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普勒腾贝格，瓦尔特·冯，条顿骑士团大首领，157—159

Pliny, the elder, 大普林尼，213，369，406

Plutarch, Amyot's translation, 普卢塔克，阿米约的翻译，382

Plzen (Pilsen)，比尔森，191，200

Poitiers, Calvin and Calvinism at, 普瓦蒂埃，加尔文和加尔文宗在该地，114，224

Poitou, 普瓦图，46，224

布匹贸易，46

对异端的审判，224

Polanco, Juan, 波朗科，胡安，293

Poland, 波兰，384，560

君主统治的削弱，8，9，464，472—474

社会结构，8—9，35，36，465

再洗礼派，124

接受条顿骑士团的效忠（1505），186

骑士团放弃西普鲁士（1466），194—195

人文主义在该地，192

王国的扩张，464

立窝尼亚的包括（1559—1561），160，559；西普鲁士的包括（1466），194—195，464；立陶宛的包括（1569），464，466，474，560；东普鲁士的包括（1525），195，340，464，466；马佐维亚的包括（1526），466；地方贵族会议，465—466

省和全国议会，465—466，467—468，195

法律和财政，465—466，477

受鞑靼人袭击（1502），538—539

与俄国的斗争，在立窝尼亚，559—561

立窝尼亚的取得（1559—1561），160，559；1582年赢得胜利，561

Pole family, 波尔家族，239，

Pole, Reginald, Cardinal, 波尔，雷金纳德，红衣主教

出使英格兰（1539），239；他调解英格兰与罗马的关系，247—248；他对玛丽时代的迫害所负的责任，248，273

被绝罚，249

去世（1558），249，273

作为教皇的候选人，254，273

与意大利的天主教改革运动，242，258，270；他在维泰博的圈子，266，267；回归为严格的正统派，272，273

保罗四世对他的不信任，272—273，249

他的柏拉图主义，266

同情耶稣会士，299

Polish language, vernacular literature of the reform in East Prussia, 波兰语，在东普鲁士改革的本地语文学，196

Politian (Angelo Ambrogio Poliziani), 波利蒂安（安杰洛·安布罗焦·波利齐亚诺），373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论，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论述，17

路德对世俗权力的态度，4，86

与茨温利对比，103，163

瑞士：教会和公民纪律问题，96—97，102，105—106，116

在丹麦教会敕令（1539）中的基督教国家概念，140—141；奥拉夫·佩特利的观点，149；古斯塔夫·瓦萨与改革者的斗争，150—152

绝对主义：神圣权利，211；对它的限制，在塞塞勒和德·拉佩，459，462；比代与格拉赛勒，462；英国理论家不热衷它，462—463；在俄国，539，545—546

克伦威尔和主权，234—235，457—458，463

莫尔的主权概念，234；他的《乌托邦》，459—460

马基雅弗利，384—385，460—462

圭恰迪尼，384—385

圣杰曼论理性的法则，459

马扎尔和捷克作家们（维尔博奇，科内尔），465，474—475

波兰人（奥热霍夫斯基，莫杰夫斯基），476—477

受到新世界的问题的鼓励，588—589

Poliziani, see Politian, 波利齐亚诺

Pollenza, Capuchin hermitage, 波伦扎，嘉布遣会隐修处，280

Polotsk, disputed between Russia and Poland, 波洛茨克，俄国和波兰间的争端，559，561

Polybius, studied in sixteenth century, 波利比奥斯，在16世纪的研究，483

Pomerania, 波莫拉尼亚，35—36，165，434

Pomeranus, see Bugenhagen, 波梅拉努斯

Pomestye, life tenure of lands by Russiannobility, 军功领地制, 俄国贵族领地终身所有制, 543—544, 553, 556

Pomponazzi, Pietro, Italian scholar, 蓬波纳齐, 彼得罗, 意大利学者, 261, 371, 383, 392

Ponet, John, bishop of winchesterl, 波内特, 约翰, 温切斯特主教, 17

Poor, see Social relief, 贫困

Popayan, conquered by Spaniards, 波帕扬, 被西班牙人占领, 577—578

Population, 人口

在德国, 29—32

在路易十四时代, 法国人口的减少, 31

在英国, 37, 39

16世纪中期的尼德兰, 60

在新世界: 在16世纪20年代的特诺奇蒂特兰的人口, 563; 印第安人口的减少, 583; 巴西的人口, 587

西班牙人口的增加和工业, 584

Port Mahon, raided by Barbarossa (1535), 马翁港, 遭巴尔巴罗萨袭击 (1535), 325

Porta, Baptista, treatises on chemistry, 波尔塔, 巴普蒂斯塔, 化学论文, 404

Portugal, 葡萄牙

在东方的扩张和衰落, 21, 591, 614; 传教, 298, 595, 610—611; 土耳其的反抗, 520—521, 530—531, 592, 608各处; 海军在焦耳的失败 (1508), 520, 598; 在第乌的胜利 (1509), 520, 598; 对阿比西尼亚同盟的希望, 530, 592, 596; 摩鹿加群岛, 与西班牙的争端, 568—569, 604—606; 印第安法令 (1520), 600—601; 王室财政的困难, 608—609; 私人贸易的增长, 610—611; 海军力量的重

要性, 592—593, 600, 613—614; 香料生产和贸易路线, 593—594; 到印度的首次远征, 594—596; 作为总督的阿尔梅达, 596—598; 阿尔伯克基, 598—601, 602; 行政管理, 600—604, 606—607; 增加的抵制和葡萄牙势力的收缩, 606—608; 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606, 610—611; 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抗争, 612; 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基础, 612—614; 安特卫普贸易, 50—51, 58, 62, 66—69, 611

耶稣会士基地, 298

大洋航海的发展, 395—396, 613; 印刷术的影响, 389—390

议会的衰落, 456

在加勒比海贸易的侵权者, 585—586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获皇位 (1580), 587, 612

奴隶贸易, 585—587

巴西的定居点, 586—587; 与西班牙的斗争, 587—588

Posen, see Poznan, 波森

Postel, Guillaume, 波斯泰尔, 纪尧姆, 268

Potosi (Bolivia), silver mines, 波托西 (玻利维亚), 银矿, 582

Poznan (Posen), 波兹南 (波森), 201—202

Pozsony (Pressburg, Bratislava), 波若尼 (普雷斯堡, 布拉迪斯拉法), 198, 348, 467

Praemunire, statutes of, 王权侵害罪法, 228, 231, 233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1438), 布尔日国事诏书, 211

Prague, 布拉格, 87, 190, 348

人文主义的微弱影响, 192

耶稣会士基地, 203, 209

Prague, archbishopric of, 布拉格大主教座, 190, 203

Prague, university of, 布拉格大学, 192, 203

“Parguers”（“Calixtines”），Hassite faction, “布拉格人”（“圣杯派”），胡斯派, 191

Prayers, 祈祷

向圣徒祈祷：在奥格斯堡议会（1530）上，教皇坚持正统教义, 94—95；遭茨温利谴责, 100, 101；瑞典禁止向圣徒祈祷, 152；遭塞尔基拉克斯的谴责, 154；饼酒同领派接受, 189；在匈牙利受谴责, 193；布里松内对传统教义的捍卫, 215；英格兰改革者的敌视, 238—239

家庭，祈祷习俗引进瑞典, 150

为死者祈祷，在瑞典遭禁止, 152；在匈牙利受谴责, 193；英国改革者的敌视, 238—239, 244

米凯尔·阿格里科拉的祈祷书, 155—156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

布塞尔的上帝选民观, 111, 115

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 118；在匈牙利, 205

Presov（Epericsch, Eperjes），普雷绍夫（埃佩列斯赫，埃佩耶斯），198

Pressburg, see Pozsony, 普雷斯堡

“Prester John”，Portuguese hopes of alliance, “祭司王约翰”，葡萄牙人对结盟的希望, 592, 596

Prevesa, 普雷韦扎

多里亚，被土耳其人攻破（1538），325, 351, 519—520, 530；战术上的教训, 506—507

Prices, 价格

通货膨胀和社会骚动, 6；美洲硬通货的影响, 16；在英国（1546—1551），16；卡斯蒂利亚, 320—322, 589

对比价格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27, 31, 37

Printing, 印刷

与宗教改革, 17; 在德国和瑞士, 77, 104, 107; 再洗礼派在莫拉维亚的发展, 123; 在安特卫普, 134; 在斯堪的纳维亚, 134, 136, 147, 149, 152; 在柯尼斯堡, 196; 在法国, 213—214, 219—220; 在意大利, 255—256, 264

季贝尔蒂的印刷, 258

在索尔博内的印刷, 362

对学识的影响, 366, 427

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389—391; 与科学上的图解, 408—409

对教育的影响, 418

Prostitutes, associations for care of re-formed, 妓女, 关心已改邪归正妓女协会, 289

Protestation of Speyer (1529), 施派尔抗议 (1529), 93—94, 350

Provence, 普罗旺斯, 342, 352

Prus, Antonin, archbishop of Prague, 普鲁斯, 安东尼, 布拉格大主教, 203, 209

Prusinovsky, Vilem, bishop of Olomous, 普鲁西诺夫斯基, 威廉, 奥洛穆茨主教, 209

Prussia, 普鲁士, 9, 21, 34, 36

Prussia, Albrecht of Brandenburg-Ansbach, duke of,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普鲁士, 布兰登贝格—安斯巴赫的阿尔布雷希特, 公爵, 条顿骑士团大首领, 147—148

骑士团土地还俗与公国的形成, 195, 340, 466, 159

承认波兰的宗主权, 195, 464

采纳路德宗, 195—196, 201

参加托尔高同盟（1526），340；1550年同盟反对哈布斯堡，
357

与俄国结盟反波兰，548—549

Prussia, East (ducal)，东普鲁士（公爵领地）

与宗教改革，131，195—196，184，204

公国的建立，195，340，466

被布兰登贝格家族所继承，195

省议会，466

Prussia, West (royal)，西普鲁士（皇家领地）

被条顿骑士团割让给波兰（1466），194，195；省议会，466

路德宗在该地，194—195，201，205

Pskov，普斯科夫，534，536，538，547—548，561

Ptolemy, geographer and astronomer，托勒密，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372，387，396—398

Puebla (New Spain)，普埃布拉（新西班牙），581

Purgatory，炼狱

阿格里科拉所持的传统主义观点，156；被比罗否定，199；为布里松内所捍卫，215；在英国遭拒绝，238，243；被“尼科代米派”所接受，268

Putivl，普季夫利，538

Pythagoreanism，毕达哥拉斯主义，393

Quechua people, in Peru，克丘亚族，在秘鲁，574

Quiche, Maya people，盖切，马雅人，568

Quilon (Kollam)，Portuguese fort，奎隆（科兰），葡萄牙要塞，596

Quincey, de, at Meaux，金塞伊，德，在莫城，215

Quinones , Francis , Cardinal , general of Observant Franciscans, 基尼奥内斯, 弗朗西斯, 红衣主教, 严规派方济各会总会长, 283, 342

Quintana, Pedro, royal secretary in Spain, 金塔纳, 佩德罗, 西班牙国王大臣, 447

Quintilian, studied in schools, 奎斯提拉教派, 在学园中的研究, 421, 423

Quirini, Vincenzo, 奎里尼, 温琴佐, 277—278

Quiroga, Vasco de, administrator in New Spain, 基罗加, 瓦斯科·德, 新西班牙行政官, 571

Quito, Spanish conquest, 基多, 西班牙征服地, 576, 572

Raab, see, Gyor, 拉布

Raab, river, 拉布河, 515

Rabelais, Francois, French writer, 拉伯莱, 弗朗索瓦, 法国作家, 381—382, 386, 502

Radziwill, Mikolaj (the Black) , 拉齐维尔, 米科莱 (黑人) , 204

Ragusa, trade rivalry with Barcelona, 拉古萨, 与巴塞罗那的贸易竞争, 312

Ramus (Pierre de la Ramee) , 拉姆斯 (皮埃尔·德·拉·拉梅) , 428

Rares, Peter, voivode of Moldavia, 拉雷斯·彼得, 摩尔达维亚官员, 522

Ratisbon, see Regensburg, 拉蒂斯邦

Ravenna, battle of (1512) , 拉文纳战役 (1512) , 498

Recorde, Robert, his mathematical works, 雷科德, 罗伯特, 他的数学著作, 394

Red Sea, 红海

穆斯林势力扩张到该地，336；向葡萄牙开放，520—521；土耳其和葡萄牙的争端，530—531，596，608；葡萄牙的封锁，597，599，604，607；葡萄牙的侵入，599—600，608；重新开放香料贸易，601

Reff, Hans, bishop of Oslo, 雷夫，汉斯，奥斯陆主教，143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1—3，14；该阶段的定义，2—3；它的特点为人们注意，3—21；对教育的影响，428—433

在德国：路德和直到1529年的德国，70—95；从1530年到1555年，161—185；奥格斯堡议会和信纲（1530），93—94，350；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建立，162—163，349—350；纽伦堡和约（1532），164—165，350—351；符腾堡，165—166；瑞士和路德关于圣餐的观点，166—170；罗特曼在闵斯特，166—167；维滕贝格协议（1536），169；宗教大会，169—172，173—174，178—179，183；维滕贝格条款（1535），171；纽伦堡天主教同盟，175，353—354；法兰克福临时敕令，175—176；在哈格瑙和沃尔姆斯的争论（1540），176—177；雷根斯堡议会的失败，176—179；在科隆改革尝试的失败，181；施马尔卡尔登战役，181—183；奥格斯堡临时敕令，183—184；路德去世后的神学争论，184；特伦特会议（1551）未达成协议，184—185；新教诸侯的反叛（1552），185；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185，222；查理五世将宗教与政治融为一体，307；路德宗传入布兰登堡和萨克森，353—354；路德宗传入不伦瑞克—沃尔芬堡公国，354；教育的影响，429—432；帝国的联合，479—480

在瑞士和莱茵兰，94，96；茨温利和苏黎世的宗教改革，97—107；卡佩尔之战（1528—1531），103；奥科兰帕迪乌斯和巴塞尔的改革，103—107；在斯特拉斯堡，107—112；在日内瓦，112—119；教派，119—122；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相分离的瑞士改革者，162；瑞士和路德关于圣餐礼观点之争论，166—170；赫尔维希亚第一信纲，168；瑞士神学家在英国，243；吁请帮助，来自韦内齐亚的新教徒，263

在尼德兰，57，86，101—102，126—129，131—132，166—167，318

在丹麦，134—142；卡尔施塔特到来（1521），84；霍夫曼在丹麦，124；圣经中的人文主义，134；克里斯蒂安二世，弗里德里希一世和改革，134—135，137—138；在石勒苏益格的塔斯特和路德宗，135；哈泽斯尔乌敕令（1528），135；汉斯·陶森，萨多林和日德兰的宗教改革，135—136；马尔默，作为福音派的中心，136；在欧登塞议会（1525）和哥本哈根议会（1527）上的教会立法，136—138；哥本哈根议会（1530），138—139；哥本哈根信纲，139；1537年教会敕令，139—141；布根哈根的丹麦主教授职礼，140，141；丹麦教会的路德主义，141；彼得·帕拉第乌斯，141；汉斯·陶森的后期著作，141—142；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圣经》（1550），142

在挪威，142—144

在冰岛，144—146

在瑞典，146—153；在斯塔夫·瓦萨的作用，146；因神职人员头年收入上交问题与罗马决裂，146；奥拉夫·佩特里的著作，146—147；路德和南德的影响，147；第一本瑞典文新约，147；威斯特拉斯国会（1527），148—149；没收教会财产，148，149；路德宗祈祷的合法化，149；奥拉夫·佩特里的著述，149；劳伦丘斯·佩特里的生平和影响，149—150，152—153；乌普萨拉宗教会议（1536）和国教会的正式确立，150；乔治·诺曼和德国时期，151—152；威斯特拉议会（1544），152；恢复了劳伦丘斯和奥拉夫·佩特里的影响，152；教会敕令的最后草案（1571），153

在芬兰，153—156；马丁·斯屈特，154；本国语宗教作品和礼仪，154—156；塞尔基拉克斯和路德宗的传入，154—155；阿格里科拉的生平和著作，154，155—156

在波罗的海国家，157—160；德国居民的影响，155；沃尔马议会（1522）和雷瓦尔议会（1524），157；克诺普肯和里加的改革，157—158；西尔斯特·塔盖特梅伊埃尔，158；教会组织和礼拜仪式，159；在雷瓦尔的暴力，159—160；在立陶宛的路德宗，201；加尔文宗的优势，205

在意大利：同情伊拉斯谟主义，175；再洗礼派的主张和反三一论，122，124，206—207，264—266，268—269；在英国的意大利神学家，243；宗教改革和思想的渗透，251—252，254，255—256；天

主教的改革运动，251，257—259，270—271；反改革运动前的退却，272—273，4；宗教改革决议，258，259，277；个别人皈依了德国和瑞士的教义，254，255—256；新教运动的进展，259—261；在摩德纳的里奇，260—261；法国的勒内和费拉拉的新教，261—262；威尼斯版图内的新教，262—263；意大利新教文学作品，262—263；阿尔铁里及意欲获得德国和瑞士的帮助，263；卢卡，263—264；在城市和大学中对路德宗的镇压，对异端作品的禁止，264；韦尔多和韦尔多派，264—267；彼得罗·卡纳塞基，266—267；尼科迪米主义，267—269；神圣法庭的建立（1542），3，5，269—270

在波兰：背景，186—187；没有证据证明该地在宗教改革前受胡斯派的影响，191—192；人文主义的影响，191—192；改革思想传播到该地，192—193；德国在西普鲁士的影响，194；在但泽的路德宗，194—195，202；东普鲁士采纳路德宗，195—196，201，205；西吉斯孟一世的宗教改革及改革家的进步，201—202；波希米亚兄弟会在该地找到避难处，202，205，208；加尔文主义，拉兹维尔，乌斯基，茨鲁齐盖尔，203—205，208；反三一论，206—207，209；16世纪后期宗教的发展，208—209；在英国的波兰神学家，243

在匈牙利：背景，188，191—192；改革思想传播到该地，192—193；德国人口的影响，193—194；对改革者的迫害，194；政治形势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196—199，208；教会财产的没收，197；命令归还教会财产（1538），198；再洗礼派，205；马扎尔各诸侯接纳新教，198，199，205；路德宗的传播，198—199，205—206；加尔文宗的成功，205—206；反三一论，206—208；16世纪后期宗教的发展，208—209

在特兰西瓦尼亚：东正教的力量，188；路德宗的传播，192，198—199；在礼仪中德语的使用，193；加尔文宗的传播，205—206；教会财产的世俗化，205—206；对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特兰西瓦尼亚宽容法”，206；反三一论，206，207—208；16世纪后期宗教的发展，208

在波希米亚：胡斯派教会，188—191；天主教会，190—191；胡斯派，兄弟会，191—192；人文主义的有限影响，192；莫哈奇之战的影响，199—200；斐迪南一世的宗教政策，199—201；路德宗的发

展，200，123；加尔文宗在该地，202；兄弟会遭驱逐（1548），202—203，472；彼得·卡尼修斯和耶稣会，203；独立的饼酒同领派教会，203；斐迪南一世政策的失败和新教的确立，203；反三一论派的足迹，206；16世纪后期新教各派的优势地位，208—209；波希米亚信纲（1575），209

在法国：社会、宗教和理性的关系，210—211；国王对教会的控制，211，233；弗朗西斯一世的外交政策帮助了宗教改革，212，220—221；路德的影响，212—213；宗教改革著作的印刷和传播，212—215；反教权主义，214；布里松内和莫，214—216；议会和索邦神学院的反对，对路德著作的谴责，216—217，431；桑斯和布尔日省会议（1528），和对路德派的迫害，217—218；海报事件（1534），220；对异端的镇压，220—221；加尔文宗在法国，17，221—225；耶稣会士，223，298，299；在亨利二世统治下的镇压，224；火刑法庭，224，451；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8）后的迫害，225；亨利二世之死的后果，3，225

在英格兰：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226—242；政治比宗教重要，226，241—242；宗教改革前的教会状况，226—227，229；反教权主义，226—229，249；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229，230—233；沃尔西的职责，226—227，230；被指控犯有蔑视王权罪的主教区会议（1531），233；克伦威尔对教会立法权和财政权的攻击，234；论教皇的控制，234；至尊法案（1534），234；议会在革命中的地位，235；废除修道院，235—236，448—449；废除（天主教）小教堂，244；教会土地重新分配，15，42—43，236；反对宗教改革，236—238，452—453；“十条款和禁令”（1536），238—239；《基督徒的基本原则》（1537），239，241；1538年禁令，239；保守派和新教徒间的斗争，240—242；“六条款”（1539），240—241；被废除，242；克伦威尔的失势和被处决（1540），240—241；《必要的教义》（1543），241；亨利八世之死（1547），241

爱德华的宗教改革和新教教会的创建，242—246；萨默塞特的宗教政策，242—243；允许教士结婚（1549），242；1550年的授任仪式书，242；对圣餐礼的态度，圣礼之争，242—243；1549年的祈祷书，242，243；来自欧洲大陆的改革家们，106，243，245；清教主义的出现，约翰·胡珀，243；萨默塞特失势（1551），243—244；诺森

伯兰的政策，244—245；克兰默的1552年祈祷书和“四十二条”（1553），245，250，130；国王至尊地位的削弱，245—246

玛丽统治下天主教的反动，246—249，254，273，299；波尔调和英国与罗马的关系，247，249；反教皇立法的撤销，247—248；玛丽的迫害，248—249；欧洲大陆的英国难民，248；宗教复辟的失败，249

伊利莎白即位和新教的恢复，249—250；教育的影响，429—431；在大学中，432—433

西班牙和反三一论的起源，206；文学作品的秘密交流，213；西班牙神学家在英国，243

Regensburg (Ratisbon)，雷根斯堡（拉蒂斯邦），123

1532年的帝国议会，164，170；1541年帝国议会讨论和帝国议会，111—121，177—179，181，259；1546年的，182，355

Reggio (Calabria)，雷焦（卡拉布里亚），531

教会军事化管理（1540），确认耶稣会，223，293

Regiomontanus (Johann Muller)，his astronomical work，雷齐蒙塔努斯（约翰·穆勒），他的天文学著作，400

Reinhard, Martin, reformer, 赖因哈特，马丁，改革家，86

Reisch, Gregor, *Margarita Philosophica*, 赖施，格雷戈，《哲学的明珠》，387—388

Religionis Zelus, (1528) establishes Capuchins, “宗教热忱”，（1528）嘉布遣会的建立，280

Renato, Camillo, see Ricci, Paolo, 雷纳托，卡米洛

Rendsburg, 伦茨堡

国会（1525年的），135；（1542年的），140

Renee of France, see Ferrara, Renee, duchess of, 法国的勒内，265

Rentmeestersbrieven (bearer bonds), (债券) 持有者的债券, 68

Requests, Court of, 债权法院, 450

Reublin, William, Anabaptist, 罗伊布林, 威廉, 再洗礼派, 120, 122, 124

Reuchlin, Johann, German Humanist, 罗伊西林, 约翰, 德国人文主义者, 79, 104

Reutlingen, 罗伊特林根, 350, 356

Reval (Tallin), 雷瓦尔 (塔林)

俄国在该地的计谋, 558; 包围 (1571), 555; 包围 (1558), 559; (1575), 560; 邀请瑞典干预 (1561), 559; 被瑞典占领 (1570—1571), 560

宗教改革在该地, 155, 157, 159—160

Rhenanus, Beatus, German humanist, 雷纳努斯, 贝亚图斯, 德国人文主义者, 108, 371, 425

Rhine, river, 莱茵河, 51, 53

Rhineland, 莱茵兰

农业, 31

农民战争 (1524—1525), 88

再洗礼派在该地, 124—126

小学教育, 416

在该地的宗教改革时期

Rhodes, 罗德

被土耳其占领 (1522), 339, 347, 510—511; 苏里曼一世建要塞, 533

Ricci, Paolo (Lisia Fileno, probaboy identified with Camillo Renato), Anabaptist, and Anti-Trinitarian, 里奇, 保

罗（利西亚·菲莱诺，也许就是卡米洛·雷纳托），再洗礼派和反三一论者，260—261，268

Ridley, Nicholas, bishop of London, 里德利，尼古拉斯，伦敦大主教，130，243，248

Riedemann, Peter, Anabaptist, 里德曼，彼得，再洗礼派，126

Ries, Hans de, Anabaptist, 赖斯，汉斯·德，再洗礼派，132

Riga, 里加，21，560

宗教改革在该地，157—159

Rio de Janeiro, founded, 里约热内卢，建立（1567），587

Rio de Oro, explored by Portuguese, 里奥德奥罗，葡萄牙探测该地，591

Rio de la Plata, conflict between Spain and Portugal, 拉普拉塔，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斗争，587

Rio Grande do Sul, 南里奥格兰德，586

Rivius, Johann, deucational work, 里维乌斯，约翰，教育著作，425

Rodez,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罗德兹，对路德派的迫害，218

Rodriguez, Alonso, original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罗德里格兹，阿洛索，耶稣会最初的成员，292

Rome (ancient), 罗马（古代）

在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和意大利，47

马基雅弗利的态度，461

战争的方式，16世纪对它的研究，483—484，485

Rome, 罗马，70，72，255，264，266，279

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发行的赎罪券，76

受帝国军队劫掠（1527），212，344，231，253，287，308，

神爱社，258，266，285—286

犹太人被限制在聚居区（1547），273

嘉布遣会建立，282，283

德亚底安修会的建立，286

圣菲利普·内里的奥拉托利会，289

耶稣会士的基地，223，297—299

印刷术在该地，361，365

作为文化中心，375，380

Romuald, St, founder of the Camaldolese Order, 罗穆埃尔德，圣，卡马尔多利会创始人，278

Ronddelt, Guillaume, zoologist, 隆德莱，纪尧姆，动物学家，407

Ronnow, Joachim, bishop of Roskilde, 伦诺夫，约阿基姆，罗斯基勒主教，138，140

Ronsard, Pierre de, French poet, 龙萨，皮埃尔·德，法国诗人，17，213，378

Roser, Isabel, 罗塞尔，伊莎贝尔，296

Roskilde, the Reformation in, 罗斯基勒的宗教改革，138，140—141

Rossem, Maarten van, marshal of Charles of Guelders, 罗塞姆，马尔滕·范，盖尔德斯的查理之元帅，315—316

Rostock, 罗斯托克，131，204，350

Rostock, university of, 罗斯托克大学，135，154，432

Rostov, 罗斯托夫，534—536，540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罗滕堡, 89

Rothmann, Bernhard, Anabaptist, 罗德曼, 伯恩哈特, 再洗礼派, 110, 128, 167

Rouen, 鲁昂, 220, 224

处决路德派, 218; 海报事件 (1534年), 220;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Roumania, Hussitism in, and cf. Moldavia, 罗马尼亚, 胡斯派在该地, 191—192

Roussel, Gerard, bishop of Oloron, 鲁塞尔, 热拉尔德, 奥洛龙主教

与法国的宗教改革, 213, 215, 216, 217, 218, 220

论斯特拉斯堡的公共礼拜, 110—111

Rudolf II, emperor, 鲁道夫二世, 皇帝, 208, 472

Rumeli, Turkish province, 鲁梅利, 土耳其一省, 510, 512, 524

Russia, 俄国, 9, 21, 157, 159

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统治下君权的加强, 7, 539; “释奴”有改变归顺之权, 540, 542, 550; 对管理阶级的支持, 541; 维护王权控制贵族, 542; 瓦西里三世的独裁统治, 547, 550; 君王的头衔, 538—539, 551, 554

鞑靼: 金帐汗国的统治, 534; 伊凡三世使莫斯科解除了威胁, 536—537; 瓦西里三世的战争, 549—550; 伊凡四世的战争, 557—558

伊凡三世扩大了莫斯科统治大俄罗斯的君权, 534—536; 诺夫哥罗德土地重新划分, 543—544

伊凡三世的对内统治, 539; 军功领地制度, 542—544, 553

伊凡四世和选民会议, 551—554

伊凡四世的改革, 中小贵族采邑的划分, 554—557

伊凡四世统治下农业的衰退，556—557

对伏尔加领土的征服，557

在立陶宛和立窝尼亚的战争，伊凡三世的，537—539；瓦西里三世的，548—549；伊凡四世的，554，558—561

Rustem Pasha, Ottoman grand vizier, 鲁斯泰姆·帕沙，奥斯曼帝国首相，525，528—529，532

Ruthenia, strength of the Eastern Ortodox Church, 罗塞尼亚，东正教教会的势力，187—188

Ryapolovsky-Starodubsky, Semen, 梁波洛夫斯基-斯塔罗杜勃斯基，谢苗，541，542

Ryazan, 梁赞，534，536，548

Sa, Mem de, captain-general in Brazil, 萨，梅恩·德，巴西都督，587

Saar, valley of, Luther's preaching tour, 萨尔河谷，路德巡回布道（1524），88

Saavedra, Alvaro de, 萨维德拉，阿尔瓦罗·德，569

Sabacz, taken by Turks, 沙巴茨，被土耳其夺取（1521），510

Sachs, Hans, German poet and dramatist, 萨克斯·汉斯，德国诗人和剧作家，379

Sacramentarians, 形式论者，重视圣礼者

路德论厄科拉姆帕迪乌斯投向圣礼形式论者，104

在匈牙利，有可能的再洗礼派者，205

在意大利，该词的误用，255

库里奥内，在符腾堡，271

Sacraments, 圣礼

路德与茨温利，态度的对照，163

饼酒同领派接受罗马教义, 189

桑斯会议所支持的传统教义 (1528), 217

亨利八世的《七圣事辩》, 228

路德减为三圣礼, 被英国接受 (1536), 238

韦尔登派对圣礼的态度, 265

“尼哥迪米主义者”的看法, 268

Sacrobosco (John Holywood), *De Sphaera*, 萨克罗博斯科 (约翰·霍利伍德) 的《球体》, 387

Sadoletto, Giacomo, Cardinal, 萨多莱托, 贾科莫, 红衣主教, 258, 261, 370

Sadolin, Jorgcn Jensen, 萨多林, 耶尔根·延森, 136, 139

Safa-Girey, Khan of Kazan Tatars, 萨法-吉雷, 喀山鞑靼的可汗, 549, 557

Safawids, Persian dynasty, 波斯萨非王朝, 524, 525, 526, 530

Sahib-Girey, Khan of Kazan Tatars, 萨希布-吉雷, 喀山鞑靼可汗, 549

St Albans, 圣阿尔班, 226, 362

St Dizier, taken by Charles V, 圣迪济耶, 被查理五世占领 (1544), 353

Saintes, Calvinism in, 桑特,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St Gall, 圣加尔, 103, 121—122

Stint-Gelais, Mellin de, French poet, 圣热拉, 梅兰·德, 法国诗人, 378

St-Germain-des-Pres, Lefevre d' Etaples at, 圣日耳曼-德-普雷斯, 勒菲弗尔·戴塔普尔在该地, 215

St German, Christopher, 圣杰曼, 克里斯托弗, 459

St-Jean-d' Angely, Calvinism in, 加尔文宗在圣让-当热利, 224

St Paul' s school, 圣保罗学派, 417, 425

St Quentin, battle of, 圣康坦战役 (1557) , 254

Sainte Foy, Calvinism in, 圣福瓦,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Saintonge, Calvinism in, 圣通,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Saints, see Prayers (to saints) ; Images, 圣徒

Salamanca, university of, 萨拉曼卡大学, 14, 292

Salerno, Ferrante Sanseverino, Prince of, 萨莱诺王子, 费兰特·桑塞韦里诺, 328

Salmeron, Alfonso, Jesuit, 萨尔梅龙, 阿方索, 耶稣会士, 292, 297, 299

Salonika, Anabaptists in, 萨洛尼卡, 再洗礼派在该地, 124

Saluzzo, retained by France, 萨卢佐, 被法国保留 (1559) , 358

Salzburg, Matthaeus Lang, archbishop of, 萨尔茨堡大主教, 马特乌斯·朗格, 354

Sampayo, Lopo Vaz de, governor in India, 桑巴约, 洛波·瓦兹·德, 印度总督, 607

Sampson, Richard, 桑普森, 理查德, 50

Samson, Bernardino, 萨姆松, 贝尔纳迪诺, 98

Samuel, Andrzej, 塞缪尔, 安杰伊, 201

Samurin, title of ruler of Calicut, 萨穆林, 卡利卡拉统治者头衔, 594

San Andrea (Venice) , Sanmicheli' s fortifications, 圣安德烈亚 (威尼斯) , 圣米凯利的要塞, 492

San Angelo, castle of, Clement VII takes refuge in, 圣安吉洛城堡, 克雷芒七世在此避难 (1527), 344

Sanazzaro, Jacopo, Italian poet, 纳扎罗, 雅各布, 意大利诗人, 386

Sanctuary, dangers of the Privilege, 圣所, 庇护权的危险, 229

Sandomierz, the Consensus Mutuus, 桑多米耶兹的“穆图乌斯协议”, 209

Sandoval, Tello de, 桑多瓦尔, 特略·德, 567

Sandown, Henry VIII's coastal fortification, 桑当, 亨利八世的沿海要塞, 494

San Jeronimo de Yuste, monastery of, 圣热罗尼莫·德·尤斯特修院, 332

Sanmicheli, Michele, 圣米凯利, 米凯莱, 492

San Miguel (Peru), founded by Pizarro, 圣米格尔 (秘鲁), 由皮萨尔罗建立, 575

Sanseverino, Frederick, Cardinal, 圣塞维利诺, 弗雷德里克, 红衣主教, 284

Santa Anna, ship of Knights of Malta, 圣安娜, 马尔他骑士团船只, 504

Santa Fe de Bogota, capital of New Granada, 波哥大的圣菲, 新格拉纳达首府, 577

Santiago (Chile), founded, 圣地亚哥 (智利), 建立 (1541), 578

Santiago, river, 圣地亚哥河, 567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318

Santo Domingo, Spanish in, 圣多明各, 西班牙在该地, 572, 585

Santos (Brazil), 桑托斯 (巴西), 586

Sao Joao, Portuguese royal ship, 桑若昂, 葡萄牙皇家船只, 504

Sao Vicent, Portuguese settlement, 桑维森特, 葡萄牙定居点, 586

Sanlinia, 萨迪尼亚, 26, 48, 301, 305

Sarkilaks, Peder, 萨尔基拉克斯, 佩德, 154—155

Sarospatak (Zemplin), 萨斯帕塔 (曾普林), 205

Sattler, Michale, Anabaptist, 萨特勒, 米夏尔, 再洗礼派, 110, 121, 124—126

Sava, river, 萨瓦河, 196, 510, 514—515

Savonarola, Girolamo, 萨伏那洛拉, 吉罗拉莫, 206

对他的态度, 在16世纪的意大利, 251; 萨伏那洛拉主义传统的坚持, 265, 289, 502; 布尔拉马基阴谋 (1544) 中可能存在的萨伏那洛拉主义, 263

Savone, 萨伏内, 344—345

Savoy, 萨伏依, 113, 273, 352, 358

Sawakin (Red Sea), 萨瓦金 (红海), 530

Saxons, the “Saxon” towns in Transylvania and the Reformation, 撒克逊人,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城镇和宗教改革, 198—199, 206

Soxony, 萨克森

经济史, 34—36

1527—1528年的教会巡视, 92—93; 与瑞士的谈判, 162, 163; 新教传入公国 (1539), 176, 353—354; 停止派使节去特伦特, 185; 教会土地划拨用于教育, 429

Saxony, Frederick III, the Wise,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弗里特里希三世，智者，86

喜爱并保护路德，76—78，80，83；检查卡尔施塔特的激进纲领，85；驱逐卡尔施塔特，88

去世（1525），92

对施帕拉廷的使用，77，94

Saxony, George, duke of, 萨克森公爵，乔治，175

实施沃尔姆敕令，84

在弗兰肯豪森农民的失败（1525），89

去世（1539），176，353—354

参加纽伦堡同盟（1538），354

Saxony, Henry, duke of, 萨克森公爵，亨利；引进新教，354，176

Saxony, John,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约翰，87—88，351

与托尔高同盟（1526），92，340

签署施佩耶尔抗议书（1529），93

Saxony, John Frederick,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特里希，87—88，165，202，263，472

阻止梅兰希顿与法兰西斯一世谈判（1535），171；拒绝保罗三世召开全会的计划，171—173；与雷根斯堡国会（1541），179

在米尔贝格被俘（1547），183，356，472

驱逐不伦瑞克—沃尔芬布特尔的亨利（1542），354

Saxony, Maurice,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莫里斯；与查理五世结盟（1542），182—183，355

拒不承认奥格斯堡临时敕令，183

背叛查理五世，与法国结盟（1552），185，332，357，479

在公国中传入新教，354；重拨教会土地用于教育，429；在莱比锡大学推行路德宗，431

退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1542），355

接受选帝侯爵位（1547），356，355

去世（1553），357，480

打败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的阿尔伯特·阿尔西比亚德斯（1543），357

Sbardellati, Andras, bishop of Pecs, 斯鲍尔代洛蒂，翁德拉什，佩奇主教，197

Scaliger, Julius Caesar, 斯卡利杰尔，尤利乌斯·凯撒，374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7

Scania, and the Reformation, 斯卡尼阿和宗教改革，137，139

Sceve, Maurice, French poet, 塞夫，莫里斯，法国诗人，378

Schartlin von Burtenbach, Sebastian, 沙尔特林·冯·布滕巴赫，塞巴斯蒂安，355

Schaffhausen, 沙夫豪森，103，125

Scheldt, river, 斯海尔德河，51

与安特卫普的贸易，52—53

以通行税为证，59

Schemnitz, see Banská Štávnica, 谢姆尼茨

Schepper, Duplicius, Count of, 谢佩尔，杜普利齐乌斯伯爵，522

Schetz, Erasmus, Antwerp merchant, 谢茨，伊拉斯谟，安特卫普商人，63

Schinner, Matthias, cardinal, archbishop of Sion, 希内尔，马蒂亚斯，红衣主教，锡永大主教，100

Schlatt, Anabaptist meeting, 施拉特, 再洗礼派集会, 125

“Schleitheim Confession” (Anabaptist), 施莱特海姆信纲
(再洗礼派, 1527), 125—126

Schleswig, Christian, duke of, see Christian, 石勒苏益格
公爵, 克里斯蒂安三世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35, 140

Schleswig-Holstein, Frederick, duke of, see, Frederick
I, king of Denmark,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弗里德里希

Schlettstadt, 施莱茨塔特, 108, 417, 424

Schmalkalden, 施马尔卡尔登, 172

该同盟的建立和会议, 163, 350

Schmalkalden Articles, of Luther, 路德的施马尔卡尔登信
条, 172—173

Schmalkaldie Lengue,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49, 168, 173

建立 (1531), 162—163; 及成员组成, 350

为包括茨温利派进行磋商, 162—164, 166

与查理五世的谈判及纽伦堡和约 (1532), 163—164, 176

在全会上对参加者的态度, 170—173

为与英国结盟所进行的谈判 (1535), 171, 238—240

法兰克福临时敕令 (1539), 175—176

拒绝克莱沃公爵加入, 180

拒绝支持科隆的赫尔曼·冯·维德, 181

查理五世的战争准备, 182—183

在它支持下波希米亚的反叛 (1547), 202, 472

威尼斯新教徒吁请其帮助, 263

黑森的菲利普的离弃（1541），354；萨克森的莫里斯的离弃（1542），355；黑森重新加入（1544），355

乌尔里希公爵回归符腾堡（1534），353

它在反帝国统一中的影响，479

Schmalkaldic War, 施马尔卡尔登的战争（1546），112, 331, 354—356, 479—480

Schnepf, Erhard, 施内普夫, 艾哈德, 166

Schoeffer, Peter, copyist and printer, 舍弗尔, 彼得, 抄写者和印刷者, 361

Schoning, Thomas, archbishop of Riga, 舍宁, 托马斯, 里加大主教, 159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路德和经院哲学, 71—75

改革者拒用经院哲学范畴去解释圣餐, 91

茨温利的研究, 97, 98

与科学的探究, 392

Schools, see Education, 学校

Schwabisch Hall, 施瓦本·哈尔, 86, 166

Schwarz, Theobald, 施瓦茨, 特奥巴尔德, 86, 110

Schwarzach, imperial victory, 施瓦察赫, 帝国的胜利（1554），357

Schweinfurt, 施韦福特, 111, 163—164

Schwenckfeld, Caspar, radical reformer and mystic, 施文克菲尔特, 卡斯珀, 激进改革家和神秘主义者, 110, 119

与再洗礼派的关系, 124, 126, 127, 131

阿格里科拉的芬兰文译文, 155

Schwendi, Lazarus von, 施文迪, 拉扎勒斯·冯, 489

Schwertler (men of the sword), Anabaptists, respect civil authority, 施韦尔特勒(剑人), 再洗礼派, 尊重公民的权力, 123

Science, 科学

科学态度的出现, 1, 4—5, 412—413; 继续了人文主义的影响, 17

本地语的使用, 383—384, 411

古典和中世纪思想的坚持, 387—393, 403, 406, 411—412

乐器的制作, 388, 394—395, 402

绘画的影响, 389—391

艺术技巧和科学图解, 390—391

运用于工程中, 402

在中等教育机构中, 419

生物学, 406—407

植物学, 406; 植物标本集, 390, 392, 407—408

化学: 承袭伊斯兰教的明证, 391; 实践工作和观察, 393; 对炼金术兴趣的持久性, 403—404; 医疗化学学派, 403, 405—406, 411; 工业上的应用, 404—405

机械学, 401—402

光学, 388, 402

物理学, 387, 389, 401—402, 412

生理学, 406, 410—411

动物学, 406—407

Scotland, 苏格兰, 8, 362, 438, 490

Secemin, Cruciger at, 塞采明, 克鲁齐格在该地, 204

- Sects, see Anabaptists, 教派
- Secundus, Johannes, Basia, 塞肯达斯, 约翰内斯, 巴西亚, 369
- Segovia, 塞哥维亚, 319, 585
- Seklucjan, Jan, 塞克卢恰, 扬, 201, 501
- Selim I, Ottoman Sultan, 谢里姆一世, 奥斯曼苏丹
- 奥斯曼势力的扩张, 347; 被认为是阿尔及尔的宗主国, 324; 征服埃及, 510—511, 521; 查尔德兰的胜利 (1514), 516
- Seripando, Girolamo, cardinal, 塞里潘多, 吉罗拉莫, 红衣主教
- 与天主教改革运动, 270; 复归正统, 272
- 与瓦尔德斯结盟, 266
- 特伦特会议, 266, 274
- 他的柏拉图主义, 266
- Servetus (Miguel Serveto y Reves), 塞尔维特 (米格尔·塞尔维托·雷维斯), 110, 262
- 他的《三位一体的谬误》, 对加尔文的攻击并被烧死 (1553), 117, 129, 132, 268
- 他的医学著作, 117, 411
- 与再洗礼派, 124, 129, 268
- 他的《恢复基督教教义本来面貌》一书被毁, 364
- Servi, emancipation of, in Italy, 奴隶的解放, 在意大利, 25, 48
- Seven Years' War, between Sweden and Denmark, 瑞典和丹麦的七年战争 (1563—1570), 559
- Seville, 塞维利亚, 352, 563, 568, 584

Seysell, Claude de, political theorist, 赛塞尔, 克洛德, 政治理论家, 459, 462

Sforza, Francesco Maria, see Milan, Francesco, duke of, 斯福尔扎, 弗朗切斯科·玛利亚

Shah Ali, khan of Kazan Tatars, 沙赫·阿利, 喀山鞑靼的可汗, 549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17, 415

Shari' a, law of Islam, 沙里亚, 伊斯兰教教法, 532—533

Shatt al-' Arab, 沙特阿拉伯, 530

Sheepbreeding, see Pastoralism, 羊的繁殖

Shemyachich, V.I., 舍米亚奇, 550

Ships, shipping, 船只, 船运

大船直通安特卫普, 52; 安特卫普商船, 62

船的规模, 504

圆形船的流行, 506

经贸易署批准, 584

在葡萄牙与东方贸易中的规则, 601

在战争中

Shuisky, Andrey, murdered (1543), 舒伊斯基, 安德烈, 被谋杀 (1543), 551

Siam, 暹罗, 593, 604, 609

Siberia, colonised by Ivan IV, 西伯利亚, 被伊凡四世殖民, 561

Sicilian Vespers, 西西里晚祷 (1282), 326

Sicily, 西西里

宗教改革: 反三一论, 269; 宗教裁判所, 255, 328—329

耶稣会士在该地，297—298；为查理五世所继承，301，305；西西里人坚持保留特权，311；1516和1517年的崛起，326；财政和政府，326—327

与阿拉贡和意大利的贸易，312

Sickingen, Franz von, 济金根，弗朗茨·冯

与骑士战争（1522—1524），85，478；布塞尔雇请为随军牧师，108

去世，85

指挥士瓦本同盟，338；荒漠，478

Siculus, Marinus, Italian scholar, 西库卢斯，马里努斯，意大利学者，371

Sidney, Sir Philip, Italian influence on, 锡德尼，菲利普爵士，意大利对他的影响，386

Siena, 锡耶纳

受梅迪奇控制，254，262，273

对宗教改革的镇压，264

抵抗西班牙，273，482

Siena, university of, 锡耶纳大学，264

Sievershausen, 西弗斯豪森，357

Sigismund of Luxemburg, emperor, king of Bohemia and Hungary, 卢森堡的西吉斯孟，皇帝，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190—191

Sigismund I (the Old), king of Poland, 西吉斯孟一世（老人），波兰国王，188

与波兰的人文主义，192

他的宗教政策，201—202；在但泽对路德宗的镇压（1526），
195

他的王国的扩张, 195, 464

企图维护国王权威, 472—473; 向贵族让步, 473—474

同俄国的战争(1508—1509), 548

去世(1548), 202, 472

Sigismund II (Augustus), king of Poland, 西吉斯孟二世
(奥古斯都), 波兰国王, 476, 555

即位(1548), 204, 474

与波兰的反三一论派, 207

企图维护王权, 468, 472—473; 对贵族的让步, 474

与俄国的战争, 474, 554, 557—560

去世(1572), 472, 474

Sigismund III, king of Poland, 西吉斯孟三世, 波兰国王,
474

Signatures, medical theory of, 药效形象, 医学理论, 405

Silesia, 西里西亚

与宗教改革, 165, 198

被划归波希米亚, 465; 各级议会, 466; 在议会中所代表的城
镇, 469

在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统治下, 471, 526

Silvester, Russian priest, 西尔韦斯特, 俄国神父, 551—
552, 553—554

Simeon Bekbulatovich, Tatar ruler, 西麦翁, 贝克布拉陶维
奇, 鞑靼首领, 554

Simon of Erdod, bishop of Zagreb, 埃尔多德的西蒙, 萨格勒
布主教, 197

Simons, Menno, 西蒙斯, 门诺, 131—132

Sinan Muslim architect, 锡南, 穆斯林建筑师, 532

Singapore, Strait, 新加坡海峡, 606, 612

Sipahis, Turkish cavalry levies, 瑟帕希斯, 土耳其人所征的
骑兵, 512, 527, 529

与土耳其士兵不和, 528—529

Sirmium, see Szerem, 希尔米乌姆

Six Articles (1539), 六条款, 240—242

Sixtus IV, Pope (Francesco della Rovere), 西克斯特四世,
教皇(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 76, 276

Skytte, Martin, bishop of Abo, 斯屈特, 马丁·奥博主教,
154—155

Slaveray, see trade and industry (slave trade), 奴隶制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465, 467

土耳其的攻击, 515, 524

Slechta, Bohemian landowning nobility, 什列赫塔, 波希米亚
地主贵族, 465

Sleidan (Johann Philipson), his *Commentarii*, 斯莱达(约
翰·菲利普森), 他的《诠释》, 371

Slonczewski, Leonard, bishop of Kamieniec, 斯隆切夫斯基,
烈昂纳德, 卡米耶涅茨主教, 201

Slovakia, 斯洛伐克, 192, 194, 198, 347

Smaland, revolt in, 斯莫兰, 该地的叛乱(1542), 151

Smithfield Protestant martyrs, 史密斯菲尔德的新教殉道者,
248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受伊凡三世的威胁(1500、1502), 538, 538—539; 为俄国占
领(1514), 548—549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15—16, 19—20

基督教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礼仪组织, 566—567

在印加时期的秘鲁组织, 574

Social relief, 社会救济

在维滕贝格, 84—85

在意大利, 287, 289

耶稣会士的工作, 294, 296

莫杰夫斯基论政府的职责, 476

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中, 603

Socinianism, 索齐尼主义, 206, 268

Socinus, Faustus (Fausto Sozzini), 索齐尼乌斯, 法乌斯图斯 (法乌斯托·索齐尼), 206—207, 268

Socinus, Laelius (Lelio Sozzini), 索齐尼乌斯, 莱利乌斯 (莱利奥·索齐尼), 124, 206—207, 268

Sodalitas Litteraria Rhenana, 莱茵文学会, 104

Sofala, Portuguese at, 索法拉, 葡萄牙人在该地, 597

Sofia Palaeologa, grand princess of Moscow, second consort of Ivan III, 索菲娅·帕拉叶奥洛嘉, 莫斯科大公主, 伊凡三世的第二位夫人, 540—542

Soissons, taken by Charles V (1544), 苏瓦松, 被查理五世占领 (1544), 353

Sokotra Island, Portuguese at, 索科特拉岛葡萄牙人在该岛, 520, 597, 599, 610

Solent, Henry VIII's coastal defences, 索伦特 (海峡), 亨利八世的海岸防卫, 493

Solms, Reinhart, count of, on war, 佐尔姆, 赖因哈特伯爵, 论战争, 482

Sololgne, trial of heretics, 索洛涅, 对异端的审判, 224

Solomonina, grand princess of Moscow, consort of Vasily III, 索洛莫尼娅, 莫斯科大公主, 瓦西里三世的原配夫人, 550

Solor (East Indies), Christian missions, 索洛 (东印度群岛), 基督教的传教, 610

Solway Moss, battle of (1542), 索尔韦·莫斯战役 (1542), 489

Somasca (near Bergamo), 索马斯卡 (在贝加莫附近), 288

Somerset, Edward Seymour, duke of, 萨默塞特, 爱德华·西摩公爵, 245

(作为哈特福特伯爵) 在亨利八世治下支持新教徒方面, 241

他的性格, 242

枢密院遭他反对, 243

作为保护人, 他的宗教政策, 242—244

去世, 244

Sopron (Odenburg), 肖普朗 (厄登堡), 192

Sorbonne, College of, 索邦神学院

与宗教改革: 改革家著作的流传, 213; 遭到它的反对, 213, 216, 220—221, 364, 383, 431

它的声望, 216, 233

与法兰西学院, 219

民众对它的憎恨, 219

反对承认耶稣会士, 223

早期的印刷术, 362

对人文主义的不信任, 426

Soriano, Antonio, 索里亚诺, 安东尼奥, 333

Soroi, peder, 索罗伊, 佩德, 155

Sorsky, Nils, 索尔斯基, 尼尔斯, 544—545

Sousa, Martim Afonso de, 索萨, 马丁·阿方索·德, 586, 609

Sousa, Tome de, captain-general of Brazil, 索萨, 托梅·德, 巴西总督, 586

Southampton, coastal defences, 南安普敦, 海岸设防, 493

Sozzini, Fausto, Lelio, see Socinus, Faustus, Laelius, 索齐尼, 福斯特, 莱利奥

Spagnoli, Battista, see Mantuan, 斯帕尼奥利, 巴蒂斯塔

Spain, 西班牙, 22, 324

意大利的统治, 10, 252—254, 263; 与反宗教改革, 272—273; 与意大利专制主义的发展, 273—274

与安特卫普的酒和羊毛交易, 58, 312; 西班牙人定居在安特卫普, 62—63; 在安特卫普的西班牙银行家和政府贷款, 66; 在安特卫普的政府借贷, 67; 1557年的破产者和安特卫普财政力量的削弱, 68; 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 584

耶稣会士的基础, 298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统一, 301, 304

查理五世继位 (1516), 301, 304—305; 作为统治者, 他的地位, 314, 358, 440

行政管理, 19—20, 309—311, 444; 枢密院, 332—333, 445, 449, 572, 573; 兄弟会, 440—441; 财政, 449; 法律和正义, 451—452; (西班牙) 地方长官, 453

科穆内罗的反叛 (1520), 310, 319—320, 573

税收, 318—319, 320—321, 322, 448, 584; 税务细则, 320—321; 变化中的议会权力, 455; 来自新大陆的岁入, 448, 589; 当地人在新大陆, 573

城镇和贵族间的敌视, 319

未经加工的出产和工业，322，584

在瓦伦西亚崛起的“日耳曼人”（1519），323

摩尔人皈依（1502，1525），324

菲利普二世即位（1556），358

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核心，358

航海科学，396

战争：军事价值，485；火绳钩枪手，489，495，497—498；步兵，499；囚犯（战俘）和伤员的待遇，503；圆形船的使用，507；护航系统，585

再征服，563

与葡萄牙争夺摩鹿加群岛，604—605；权利的出售（1529），569，606

在巴西与葡萄牙的斗争，587—588

菲律宾的殖民化，612

与葡萄牙的统一，612

Spalatin（George Burkhardt），斯伯拉丁（乔治·布克哈特），77，84，94

Spalato，斯帕拉托，483

Spandemager，Hans Olufsen，斯潘德马格，汉斯·奥卢夫森，136

Spanish language，Latin and Italian influences，西班牙语，拉丁和意大利的影响，386

Speculation，投机事业

在安特卫普香料市场，51，65

对商品的“关心”，65

彩票和赌博，65—66

Speroni, Sperone, Italian writer, 斯佩罗尼, 斯佩罗内, 意大利作家, 377

Speyer, 施佩耶尔

施佩耶尔议会 (1526), 93; 休会期对沃尔姆斯敕令实施的检查, 92, 137, 340, 379, 479; 1529年的议会和抗议书, 93—94, 349—350, 479; 议会 (1542), 181; 议会 (1544), 182

在该地提出的争议 (1540), 176—177

施佩耶尔和约 (1544), 解决尼德兰和丹麦关系问题, 313—314

Spice Islands, see Moluccas, 香料群岛

Spices, see Economic change (Antwerp), 香料

Spiers, Francesco, 斯皮耶拉, 弗朗切斯科, 271

Spinola family, Genoese bankers, 斯皮诺拉家族, 热那亚的银行家, 313

Spis (Zips), Anabaptism in, 施皮斯 (齐普斯), 再洗礼派在该地, 205

Stabler (men of the staff), Anabaptists, 斯塔布莱 (棒人), 再洗礼派, 123

Stampa, Gaspara, Italian poetess, 斯坦帕, 加斯帕拉, 意大利女诗人, 377

Stanbridge, John, his educational works, 斯坦布里奇, 约翰, 他的教育著作, 425

Stancarò, Francesco, 斯坦卡罗, 弗朗西斯库, 206—208

Standish, Henry, 斯坦迪什, 亨利, 229

Star Chamber, Court of, 斯塔·钱伯伯爵, 444, 450, 451

Starkey, Thomas, 斯塔基, 托马斯, 17, 462—463

Statute of Labourers (1351), 劳工法, 39

Statute of Uses (1535) , 使用法, 237

Statutes of Merton (1235) and Westminster (1285) , 默顿法令和威斯敏斯特法令, 38

Staupitz, Johann von, 施陶皮茨, 约翰·冯, 72—73, 77—78

Stavanger, the Reformation in, 斯塔旺厄, 宗教改革在该地, 142—143

Stecker, Nicolaus, 斯特克, 尼古拉斯, 147

Stephen (Bathory) , king of Poland (formerly Prince of Transylvania) , 斯特凡 (巴托里) , 波兰国王 (前特拉西瓦尼亚君主) , 472, 474, 560—561

支持罗马教会, 206, 208, 474

Steterburg, battle of (1553) , 斯泰特堡战役 (1553) , 357

Stevin, Simon, his work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斯蒂文, 西蒙, 他在物理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工作, 402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146—147, 151

印刷业, 147

Stoicism, 斯多噶哲学, 371

Stragnas, 斯特兰奈斯, 147, 151

Stragnas, bishop of, employs Olavus Petri, 斯特兰奈斯主教, 雇佣奥拉夫·佩特利, 147

Straparola, Gian Francesco, Italian writer, 斯特拉帕罗拉, 吉安·弗朗西斯库, 意大利作家, 381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

宗教改革在该地, 86, 92, 94, 97, 107—112, 304; 参加了基督教民间同盟, 103; 约翰·施图尔姆学园, 109, 116, 422—424, 426, 437; 在该地的难民, 109—110, 213, 217, 248; 对分裂教派的禁止, 110, 124—125, 127; 礼仪实验 (1524—1534) , 110—111, 86, 101; 四城市联盟信纲, 111; 加尔文在该地, 115, 116; 斯特拉

斯堡教会的正式建立（1534），124—125；奥格斯堡信纲，124—125，163，164；斯特拉斯堡改革家在瑞典的影响，147；与意大利改革家的接触，264；参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350；归顺查理五世（1546）并接受临时敕令，112，356

再洗礼派在该地，110，124—125，126—127

早期印刷术在该地，361；书籍贸易，107

Strassburg, Confession of, 斯特拉斯堡信纲，94

Stuhlweissenburg, see Szekesfejevar, 施图尔韦森堡

Stumpf, Simon, 施通普夫，西蒙，120

Sturm, Jacob, leader of Strassburg Reformation, 施图尔姆，雅各布，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领袖，107，112，166

Sturm, John, 施图尔姆，约翰

斯特拉斯堡他的学园，109，422—424，426，437；被加尔文效仿，116

他的学派，417，424

Styria, 施蒂里亚，339—340，515，522，524

Subiaco, monastery of, printing at, 苏比亚科修院，该地的印刷术，361

Subinfeudation, 分赐采邑，37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 (1532), in England, 教士的归顺，在英国（1532），234

Suceava, occupied by Turks, 苏恰瓦，被土耳其占领，522

Suetonius, 苏埃托尼乌斯，372

Suez, 苏伊士

葡萄牙侵入（1541），520，608

香料贸易，521

土耳其海军基地, 521, 530—531

Sulaiman Pasha, Ottoman Governor of Egypt, 苏里曼·帕夏, 奥斯曼的埃及总督, 521

Sulaiman II (the Magnificent), Ottoman Sultan, 苏莱曼二世 (大帝), 奥斯曼的苏丹, 347, 357, 495

出生, 528

继谢里姆之位 (1520), 510

在埃及的行政改革, 511—512

继承权, 527—530

去世 (1566), 532

作为统治者, 他的统治和特点, 532—533

作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宗主国, 549, 558

他的出征, 并与法国结盟, 13

Sumatra, 苏门答腊

胡椒出产, 593; 葡萄牙, 604—606, 611

基督教传教, 610

Sunda, 巽他 (群岛), 605—606

Sunda Straits, on the spice trade route, 巽他海峡, 在香料贸易路线上, 593

Sun-dials, 日晷, 395

“Supcrintendents” (ordmarii) in the Swedish church, 在瑞典教会中的“管理者” (主教), 152, 145, 151; in Riga, 在里加, 159

Surat, Turkish fleet shelters at, 苏拉特, 土耳其舰只隐匿在该地, 532

Surrey, Henry Howard, earl of, 萨里, 亨利·霍华德伯爵, 241, 378

Surveying, 测量术, 393—394

Suzdal, princes of, in Russia, 苏兹达尔君主, 在俄国, 551

Svenicken, Alexander, 斯费尼肯, 亚历山大, 194

Swabian League, in the Peasants' War, 施瓦本同盟, 在农民战争中, 88

它对查理五世的服务, 331, 338, 478

将乌尔里希大公驱逐出维滕贝格, 331, 353, 478

成功地反对在帝国实施改革, 478

它的起源, 作用和解体, 165, 478—479

Sweden, 瑞典, 7, 30, 538

梅尔希奥·霍夫曼在该地, 128

古斯塔夫·瓦萨和独立于丹麦之外, 146

印刷术和书籍贸易, 147, 149, 152

在达莱卡里亚的农民暴动, 148

反对古斯塔夫·瓦萨的暴动(1542), 151—152

与俄国: 阿格里科拉的和平使命(1557), 155; 对爱沙尼亚领土的承认(1559—1561), 160, 559; 在埃里克十四世统治下的友好关系, 559; 约翰三世的敌视, 111, 560; 与波兰联合反对俄国在立窝尼亚, 560—561; 签订了雅姆·扎波尔斯基和约(1582), 561

与丹麦的七年战争(1563—1570), 559

Swedish language, 瑞典语

奥拉夫·佩特利的瑞典—拉丁语字典, 150

Sweynheym, Conrad, printer, 斯韦因海姆, 康拉德, 印刷商,

Swiss as mercenaries, 作为外国雇佣兵的瑞士人: 茨温利和雇佣兵兵役制, 103, 341; (纪律) 教规和道德, 484—485, 487; 为法国服务, 340—341, 490, 491; 在帕维亚, 487, 497—498; 在比科卡, 497—498; 步兵的建立, 499; 囚犯(战俘)的待遇, 503, 12

Swiss Brethren, 瑞士兄弟会

与再洗礼派的起源, 120; 在莱茵兰, 124—125; 关于圣餐礼的教义, 126; 门诺派的影响, 131; 最早的再洗礼派赞美诗, 132

Switzerland, 瑞士

瑞士对波兰人文主义的影响, 192

“永久和平”(1516)与支持弗朗西斯一世反对帝国, 340—341

Sylvester II, Pope (Gerbert of Aurillac), 西尔维斯特二世, 教皇(欧里亚克的热尔夏), 188

Sylvester, Janos, his Magyar New Testament, 西尔维斯特, 亚纳斯, 他的马扎尔语《新约》, 198

Syria, 叙利亚, 347, 510—511, 520

Szalkai, Laszlo, archbishop of Esztergom, 施尔考伊, 拉斯洛, 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 193, 196

Szegedin, in Ottoman invasion (1526), 塞盖耳, 在奥斯曼的入侵中(1526), 513

Szekesfejevar (Stuhlweissenburg), 塞克什白堡(施图尔韦森堡), 348, 513, 524, 527

Szekler “nation”, in Transylvania, 塞克勒“民族”(国家), 在特兰西瓦尼亚, 465

Szerem (Sirmium), 塞赖姆(希尔米乌姆), 197, 515

Szigetvar, taken by Turks (1566), 锡盖特堡, 被土耳其占领, 532

Sziklos, taken by Turks (1543), 锡克洛斯, 被土耳其占领 (1543), 524

Szlachta, Polish land-owning nobility, 什拉赫塔, 波兰地主贵族, 202, 205, 465

Taborites, Hussite sect, 塔波尔派, 胡斯派, 189, 191

Tabriz, 大不里士, 516—517, 525

Tahmasp, shah of Persia, 塔赫马斯普, 伊朗国王, 516—517, 525, 530

Tallin, see Reval, 塔林

Tamils, as traders at Malacca, 塔米尔斯, 作为马六甲商人, 593

Tansillo, Luigi, Italian poet, 坦西洛, 路易吉, 意大利诗人, 377

Tarascon, Calvinism in, 塔拉斯孔,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Tarsia, Galeazzo di, Italian poet, 塔尔西亚, 加莱亚佐·迪, 意大利诗人, 377

Tartaglia, Niccolo, 塔尔塔利亚, 尼科洛, 482, 493

Tasso, Torquato, Italian poet, 塔索, 托尔夸托, 意大利诗人, 377

Tast, Herman, Danish reformer, 塔斯特, 赫尔曼, 丹麦改革家, 135

Tatars, 鞑靼人

与梁赞大公谈判, 548

全鞑靼进攻莫斯科 (1521), 549

Tauler, Johann, Dominican mystic, 陶勒, 约翰, 多明我会神秘主义者, 75, 113

Taurus, mountains, Turcoman revolt, 托罗斯山脉, 土库曼反抗, 513

Tausen, Hans, bishop of Ribe, 陶森, 汉斯, 里伯主教, 135—136, 139, 141—142

Tavera, Juan, archbishop of Toledo, 塔韦拉, 胡安, 托莱多大主教, 329

Taxation, 税收

再洗礼派拒付, 123

在英国, 232, 442, 448, 453, 456

在法国, 46, 448—449, 453, 455, 500

在尼德兰, 315—318; 在税收记录中反映的安特卫普贸易, 58—59

在西班牙, 318—319, 320—321, 322, 448, 455, 573, 584, 589

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 327, 330

受代表大会的控制, 455

在波希米亚, 466—467; 在匈牙利, 469—470; 在波兰, 受莫杰夫斯基的批判, 477

与战争, 500

在俄国, 552—553

Tchaldiran, battle of (1514), 查尔德兰战役 (1514), 347, 497, 516, 525

Tegetmeier, Sylvester, 特格特迈尔, 西尔维斯特, 158, 159

Tehuantepec, 特万特佩克, 567

Temesvar, 泰梅什堡, 526, 527, 533

Ten Articles (1536), 十条款, 238—239

Tenochtitlan, 特诺奇提特兰, 562—563, 566

Tepeaca (Mexico), 特佩阿卡 (墨西哥), 566

Terence, 特伦斯

 特伦斯的翻译, 在意大利, 380

 在学校中的研究, 419, 423, 426

Teresa of Avila, St, 阿维拉的特雷莎圣徒, 333

Ternate (Moluccas), 特尔纳特 (马六甲), 605, 608, 612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91

Tetrapolitan Confession, 四城市联盟信纲, 95, 111, 161, 163, 208

Tetzel, John, Dominican, 泰泽尔, 约翰, 多明我会会士, 76—77

Thames, river, Henry VIII's Provision of coastal defence, 泰晤士河, 亨利八世海岸设防条款, 493

Theate (Chieti), see of, and the Theatines, 德亚底安 (基埃蒂), 德亚底安主教座, 及德亚底安修士, 286

The Hague, sacked (1528), 海牙, 被劫掠 (1528), 316

Theiss, river, 泰斯河, 526—527

Theodore I, tsar of Russia, see Fedor, 狄奥多尔一世, 俄国沙皇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 408

Thermes, Paul de la Barthe, seigneur de, 泰梅斯, 波尔·德·拉巴特, 领主, 庄园主, 482

Thicne, Gaetano di, Count, and cf. 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 蒂内, 加埃塔诺迪伯爵, 258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三十年战争 (1618—1648), 10, 27, 30—32, 35

Thomas Aquinas, St, 托马斯·阿奎那, 圣徒, 100, 118, 371

Thomas, Becket, St, his Shrine at Canterbury attacked, 托马斯·贝克特, 圣徒, 他的圣龕在坎特伯雷遭攻击, 239

Thorlaksson , Gubrandur , bishop of Holar , and the Reformation in Iceland, 索尔劳克松, 居布兰迪尔, 候拉尔主教, 与冰岛的宗教改革, 145—146

Thorn, 托伦, 194, 201

Thouars, Calvinism in, 图阿尔,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Thuringia, 图林根, 27, 88

Thurneysser, Leonard, Quinta essentia, 图尔内塞, 莱奥纳德的《第五要素》, 403

Thurzo, Elek, 图尔佐, 埃莱克, 470

Thurzo, Ferenc, bishop of Nitra, 图尔佐, 费伦茨, 尼特拉主教, 197

Tidore (Moluccas) , 蒂多雷 (马六甲) , 568, 605, 612

Tisza, valley of, Lutheranism in, 蒂萨河, 路德宗在该河流域, 199

Titian (Tiziano Vecellio) , Italian painter, 提香 (蒂齐亚诺·韦切里奥) , 意大利画家, 307, 391

Toggenburg, valley of, 吐根堡河谷, 97

Tokay, battle of (1527) , 托凯战役 (1527) , 348

Toledo, 托莱多, 47, 305, 585, 563

反对王权控制, 304, 310, 319

Toledo, Francisco de, viceroy in Peru, 托莱多, 弗朗西斯科·德, 秘鲁总督, 580

Toledo, Pedro de, viceroy in Naples, 托莱多, 佩德罗·德, 那不勒斯总督, 327—329

Tolfa, alum deposits, 托尔法, 铝的储藏, 60

Toluca (New Spain), 托卢卡 (新西班牙), 582

Tomori, Pal archbishop of Kalocsa, 托莫里, 帕尔, 考洛乔大主教, 196

Tondebinder, Claus Motensen, 通德宾德, 克劳斯·莫滕森, 136

Torda, Diet of, 托尔达议会 (1567), 208

Tordesillas, 托德希里亚斯, 319

Tordesillas, Treaty of, 托德希里亚斯条约 (1494), 604—605

Torelli, Louisa, Countess, foundress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 of women, 托雷利, 路易莎, 女伯爵, 妇女宗教协会创始人, 290

Torgau, league of, 托尔高同盟 (1526), 92, 103, 340

Torghud Re' is (Dragut), Turkish admiral, 托尔格胡德, 雷伊斯 (德拉古特), 土耳其总司令, 531—532

Torning (Denmark), the Reform in, 托宁 (丹麦), 宗教改革在该地, 135

Tortona, preaching of reform, 托尔托纳; 改革的布道, 260

Tortum, controlled by Ottoman Turks, 托尔图姆, 受奥斯曼土耳其控制, 524

Torun, Unity of the Brethren in, 托伦, 兄弟会联盟在该地, 202

Torzhok, 托尔若克, 535

Toul, bishopric, 图勒主教座, 185, 212, 332, 357—358

Toulon, 土伦, 531

Toulouse, persecution of Lutherans, 图卢兹对路德派的迫害, 218

Touraine trial of heretics, 图赖纳, 对异端的审判, 224

Tournai, 图尔奈, 316, 343, 440

Tourneys, see Warfare, 马上比武, 竞赛

Tournon, Francois de, Cardinal, 图尔农, 法兰西斯·德, 红衣主教, 217

Tours, and the Reformation, 图尔与宗教改革, 218, 220, 222, 224

Towns, 市镇

被禁止获得贵族地产的德国市民, 29

作为农业资本的支持者, 29, 32, 43

在意大利, 47—48

在阿拉贡与贵族结盟, 49

在卡斯蒂利亚和莱昂与贵族结盟, 49, 563

在西班牙与贵族的斗争, 304, 319—320

宗教改革有助于市镇的解放, 96

在波希米亚议会上所代表的市镇, 468—469

卡斯蒂利亚贵族的的城市特点, 563

作为新西班牙的行政中心, 563, 566; 王权的维护, 573

Trade and Industry, 商业和工业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大发展, 16—17

在德国, 34—35

在英国, 38—40, 43, 46

意大利贵族的进入, 48

在西班牙，49—50，312，584

斯特拉斯堡的地位和繁荣，107

再洗礼派工匠在莫拉维亚避难，200

里昂，作为商业的中心，212

在新世界：贵金属的出口，321—322，333，589；印加工业，574；新西班牙横贯太平洋的贸易，583；总督辖区间的贸易，583；西班牙的美洲市场，584—585；西班牙对新大陆的控制，584；对巴西的控制，586—587，61

化学的工业应用，404—405

莫杰夫斯基论国家（政府）控制的职责，476

土耳其对法国和威尼斯妥协，517

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野心，558；北方贸易路线，561

铝，60，404

军备，61，584—585；土耳其兵工厂（军械库），518

制陶业，404

蒸馏，404

染色，51，60—61，586，404

在安特卫普熏制鱼，60

家俱，艺术的目的，61

玻璃，404

谷物，35，60，312—313，520

皮毛，581，584

金属和矿藏，51，53，63；富格尔的势力，194，312—313，339，347—349；韦尔瑟的势力，312—313；论金属分析的著作，404；印加的金属制品，574；在西班牙的美洲，581—583

橄榄油，584—585

纸张, 61, 360, 585

印刷和书籍贸易, 61, 359—366; 法国的罢工 (1539), 221;
西班牙的美洲市场, 585

盐, 58, 312

丝绸, 312, 531, 583, 584

奴隶贸易, 567, 570, 582—587

肥皂的制造, 60

糖, 16, 60, 63, 585, 587

烟草制造, 16

酒, 27, 58, 584—585

羊毛和布匹: 英国的, 27, 40—41; 尼德兰的, 40, 318; 普瓦图
和皮卡第的, 46; 意大利的, 53; 西班牙的, 58, 312, 321, 584;
在秘鲁的印加人的, 574; 在新西班牙, 581

Transoxania, khan of, 河间地带的可汗, 530

“Trans-Volga Elders”, advocate secularisation of
monastic property in Russia, “外伏尔加长老”, 鼓吹俄国修院财
产世俗化, 545, 550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465, 475

在扎波利亚—哈布斯堡为匈牙利的斗争, 196; 在土耳其的宗主
权下, 523—524; 马丁努齐主教的控制, 526; 斐迪南一世征服它的企
图遭失败 (1551—1562), 526—527; 苏里曼帮助约翰·西吉斯孟反
对马克西米连二世 (1566), 532

土耳其的攻击 (1521), 510

Transylvania, John Sigismund Zapolyai, prince of, 特兰西
瓦尼亚君主, 约翰·西吉斯孟·扎波里亚, 196, 205, 523—524,
526, 532

Traversari, Ambrogio, 特拉弗沙里, 安布罗焦, 418

Trent, 特伦托, 253

Trent, river, 特伦托河, 237

Treptow (pomerania), 特雷普托 (波米拉尼亚), 157

Treviso, 特雷维索, 263, 269

Trier, Richard von Greifenklau, archbishop and elector of, 特里尔, 里查德·冯·格赖芬克劳, 大主教和选侯, 82—83, 85

Trinidad, del Cano's ship, 特立尼拉, 德尔·卡诺的船, 569

Tripoli (North Africa), 的黎波里 (北非)

圣·约翰骑士团派兵驻守, 517; 被土耳其占领 (1551), 531—532; 菲利普二世重新夺回遭失败 (1560), 532; 海盗船参加对马尔他的攻击 (1565), 532

Trivulzio, Teodoro, 特里武尔齐, 泰奥杜洛, 344

Trnava, see Nagyszombat, 特尔诺沃

Trolle, Gustav, archbishop of Uppsala, 特罗勒, 古斯塔夫, 乌普萨拉大主教, 146, 149

Trondhjem, diocese of, 特龙德耶姆大主教区, 143

Troppau, see Opava, 特罗保

Troyes, and the Reformation, 特鲁瓦和宗教改革, 222

Trutvetter, John, 特鲁特维特, 约翰, 71

Trzecieski, Jan, 切切斯基, 扬, 192

Tucher family, bankers and financiers, 图克尔家族, 银行金融家, 53

Tucher, Lazarus, banker, 图克尔, 拉萨鲁斯, 银行家, 66

Tubingen, university of, 杜宾根大学 (今译蒂宾根大学), 104, 166, 431—432

Tumbez (Peru) , arrival of Pizarro, 通贝斯 (秘鲁) , 皮萨罗的来到, 575

Tunis, 突尼斯

查理五世占领 (1535) , 301, 325, 336, 351, 518; 他的势力, 504

巴尔巴罗萨的占领 (1534) , 325, 518

被土耳其重新夺回, (1547) , 532

Tunstall , Cuthbert , bishop of Durham , de arte supputandi, 滕斯托尔, 卡思伯特, 达勒姆主教, 394

Tupac Amaru, Inca prince, executed, 图帕克·阿马鲁, 印加君主, 被处决, 580

Tupi-Guarani, in Brazil, 图皮-瓜拉尼, 在巴西, 586—587

Turcoman tribes, 土库曼部落, 513, 516, 529

Turin, 都灵, 352, 358

被法国占领 (1537) , 352; 被保留 (1559) , 358

Turner, William, attacks Anabaptism, 特纳, 威廉, 攻击再洗礼派, 130

Tuscany, 托斯卡纳, 48, 269, 274

Tuscany, Cosimo I (Medici) , grand duke of, 托斯卡纳, 科西莫一世 (梅迪奇) , 大公, 263—264, 274

获得西班牙封地锡耶纳 (1557) , 254, 273

保护卡纳塞基, 266, 267

Tver, 特维尔, 534, 536, 542

Tyard, Pontus de, French poet, 蒂亚尔, 蓬蒂斯·德, 法国诗人, 378

Tycho Brahe, astronomer, 第谷·布拉厄, 天文学家, 400—401

Tyndale, William, 廷德尔, 威廉, 228, 238

他的《圣经》, 227, 283; 与“马太的《圣经》”, 239

Tyrol, 蒂罗尔

再洗礼派在该地, 122, 124; 皮尔格林·马尔贝克的故乡, 126

查理五世继承, 301; 授予哈布斯堡的斐迪南, 339—340

查理五世割让给富格尔家族, 339

Uchanski, Jakob, archbishop of Gniezo, 乌哈斯基, 雅各布, 格涅兹诺大主教, 192, 209

Ugra, river, 乌格拉河, 536, 540

Ukraine, 乌克兰, 21, 536, 548—549, 557

Ulla, battle of, 乌拉战役 (1564), 559

Ulm, 乌尔姆, 126, 340, 350, 478

‘Uman, Turkish raids, 乌曼, 土耳其的劫掠, 530—531

Umbria, 翁布里亚, 279

Unigenitus (1343), teaching on indulgences, 《独生子》 (1343), 关于赎罪的教义, 75—76

Unitarianism, (上帝)一位论, 208, 269

“Unitas Fratrum”, Hussit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q. v.), 兄弟联盟, 胡斯派兄弟会, 191

Universities, 大学

协议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 (1530), 216, 233

路德主义传播到英国人中, 227

古典学识的保留, 388

语法学校的监督, 416

人数的增加, 417

在大学中的教学, 417—418; 人文主义的影响, 426—428

三国语言的学院, 427—428

宗教上不同的影响, 428—432; 入学人数的减少(附表), 431—433; 世俗控制的增加, 433—435

教皇承认授学位之权, 434

Uppsala, printing at, 乌普萨拉, 印刷术在该地, 147

1536年的宗教会议和与天主教的决裂, 150, 155; 接受1571年教会规条, 153

Uppsala, archdiocese of, 乌普萨拉大主教区, 146, 149—150

Uraniborg, Tycho Brahe's observatory, 乌拉尼堡, 第谷·布拉厄的天文台, 401

Urbino, as literary centre, 乌尔比诺, 文学中心, 375, 380—381

Urbino, Federigo, duke of, 乌尔比诺, 费德里戈公爵, 365

Usti nad Labem (Aussig), Lutheranism in, 拉贝河畔乌斯季(奥希西), 路德派在该地, 200

Usury, 乌苏里, 216

Utraquists (Hussite sect), 饼酒同领派(胡斯支派)

他们的教义和实践, 189—190, 200

斐迪南一世, 急于同罗马联合, 199—200, 202—203; 安东尼·普鲁斯的努力, 203; 正式承认为独立教会, 203

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统治, 208—209

波希米亚信纲(1575), 209

Utrecht, 乌得勒支, 316, 362, 440

Uzbek tribe, in Transoxania, 乌兹别克部落, 在河间地带, 530

Vadianus (Joachim von Watt), 瓦狄亚努斯 (约阿希姆·冯·瓦特), 97, 99, 126

Vaille family, Spanish bankers, 瓦伊莱家族, 西班牙银行家, 66

Valdes, Alfonso de, Spanish humanist, 巴尔德斯·阿方索·德,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 265

Valdes, Juan, Spanish humanist 巴尔德斯, 胡安,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

他对帕莱里奥的影响, 263

与意大利的韦尔多派, 264—267

伊拉斯谟对他的影响, 265

去世, 265

对“尼科迪米主义”的影响, 268

与反三一论者结盟, 269

被指控为异端, 269

对奥基诺的影响, 270, 284

Valdesians, their organisation and beliefs, 韦尔多派, 他们的组织和信仰, 264—267, 270

Valdivia, Pedro de, conquers Chile, 瓦尔迪维亚, 佩德罗·德, 征服智利, 578

Valence, Calvinism in, 瓦朗斯,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Valencia, 巴伦西亚, 361, 518

Valencia, kingdom of, 巴伦西亚王国, 49, 305, 323—324, 452

Valencia, Martin de, missionary, 巴伦西亚, 马丁·德, 传教士, 565

Valencennes, religious dramas, 瓦朗西安, 宗教剧, 379

Valla, Lorenzo, Italian humanist, 瓦拉, 洛伦佐,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206, 372—373

Valladolid, 巴利亚多利德, 304—305, 319—320

Valle, Battista della, 瓦拉, 巴蒂斯塔·德拉, 492

Valliere, Jean, 瓦利耶, 让, 216

Valois, house of, see Habsburg-Valois struggle, 瓦卢瓦王室

Valona, threatened by Francis I, 发罗拉, 受弗朗西斯一世威胁 (1537), 518

Valor Ecclesiasticus, record of ecclesiastical wealth in England, 《教会财产》, 英国教会财产录 (1535), 235—236

Valpo, 瓦尔波, 522, 524

Valturius, Robertus, his *De rerum militarum*, 瓦尔托里厄斯, 罗伯托斯, 他的《论军事》, 482

Van, taken by Sulaiman I, 凡城, 被苏里曼一世占领 (1548), 524

Van, Lake, 凡湖, 516, 525

Van Braght, T.J., Anabaptist, his *Martyrs' Mirror*, 范·布拉特, T.J., 再洗礼派, 他的《殉道者宝鉴》, 132

Van de Molen Brothers, at Antwerp, 范·德·莫伦兄弟会, 在安特卫普, 62

Van Parc, George, 范·帕克, 乔治, 130

Van Schoonbeke, Gilbert, 范·朔恩贝克, 吉伯特, 65

Varad (Transylvania), Lutheranism in, 瓦拉德 (特兰西瓦尼亚), 路德派在该地, 199

Varazdin, raided by Turks, 瓦拉日丁, 遭土耳其劫掠 (1544), 524

Vardai, Pal, archbishop, 瓦尔道伊, 帕尔, 大主教, 470

Vasa, house of, 瓦萨家族, 152, 474

Vasily 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瓦西里二世, 莫斯科大公, 534, 539

Vasily I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瓦西里三世, 莫斯科大公, 546, 561

他的继位和承袭 (1505), 540—542, 547

他的性格和成就, 547

并吞普斯科夫 (1509) 和梁赞 (1521), 547—548

在立陶宛的成功 (1508—1509), 548; 攻占斯摩棱斯克 (1514), 548—549

把吉雷王朝驱逐出喀山 (1532), 549—550

独裁地对待其家庭和贵族, 550

他的婚姻, 550

去世 (1533), 550

Vasteras, Diet of, 韦斯特罗斯议会 (1527), 148—149, 153—154; (1544), 152

Vatable, Francois, at Meaux, 瓦塔布莱, 法兰西斯, 在莫城, 215

Vaucelles, Peace of (1555), 沃塞勒和约 (1555), 222

Vaudois, the, 沃州, 113, 116, 221

Vecellio, Tiziano, see Titian, 韦切里奥, 蒂齐亚诺

Vedrosha, river, 韦德罗沙河, 538

Vega, Juan de, viceroy in Sicily, 维加, 胡安·德, 西西里总督, 327

Vegetius, 维吉蒂乌斯, 483, 484, 501

Vegio, Maffeo, educational views, 韦吉奥, 马费奥, 教育观, 419

Velasco, Inigo de, constable of Castile and co-regent, 贝拉斯科, 伊尼戈·德, 卡斯蒂利亚王室总管和联合摄政, 319

Velasco, Luis de, viceroy in New Spain, 贝拉斯科, 路易斯·德, 在新西班牙的总督, 580

Velasquez, Diego, governor of Cuba, 贝拉斯克斯, 迭戈, 古巴总督, 570

Velasquez de Silva, Diego Rodriguez, Spanish Painter, 贝拉斯克斯·德·西尔瓦, 迭戈·罗德里格斯, 西班牙画家, 17

Velika (Slavonia), 韦利卡(斯拉沃尼亚), 524

Velikie Luki, 大卢基, 561

Velizh, ceded by Russia, 韦利日, 被俄国放弃(1582), 561

Veltwyk, Gerard, imperial secretary, 费尔特维克, 赫拉德, 帝国大臣, 177

Venezuela, Welsers' interests, 委内瑞拉, 韦尔瑟的势力, 313

Venice, 威尼斯, 70, 81, 277, 282

抵制西班牙统治, 10, 273, 307

与宗教改革, 103; 文学的传播, 255, 256; 作为再洗礼派的中心, 265; 卡纳塞基在该地, 266; 反三一论, 262—263, 268—269

与教皇的抗争, 252; 结盟(1556—1557), 254

印刷术, 256, 361—362, 365, 366, 427

经济财富, 273, 312, 521

德亚底安修会在该地, 287

巴尔纳伯修会建立, 287

耶稣会士在该地，292；罗耀拉，298；威尼斯宪法对罗耀拉可能产生的影响，295

参加科尼亚克同盟（1526），343

抵制土耳其，347；和平（1521），347—348；1537—1540年的战争，351，518—520；土耳其的贸易妥协，517，292

作为文化的中心，375

玻璃工业，404

在教育中的人文主义，419

桑米凯利的要塞，492

舰只，504—505，507；用罪犯取代志愿者作划手，506；海运技能，518；被土耳其强征的水手，521

雇佣兵的雇佣，519

Venice, archbishops of, 威尼斯大主教

与胡斯派主教的圣职授任，190

Venloo, treaty of (1543)，芬洛条约（1543），354

Vera Cruz, 韦拉克鲁斯，578

Verancsics, archbishop of Esztergom, 韦龙奇奇，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208，209

Verboczi, Stephen, Hungarian jurist, 维尔伯齐，斯蒂芬，匈牙利法理学家，194，465，475

Verdun, bishopric acquired by France, 凡尔登，法国获得的主教管区（1552），185，212，332，357，358

Vergerio, Pietro Paolo, bishop of Capodistria, 韦尔杰里奥，彼得罗·保罗，卡波迪斯特里亚主教，171，270—271

教育观，419

Vergil, Polydore, historian, 维吉尔，波利多尔，历史学家，371，384

Vermigli, Peter Martyr, 韦尔米格里, 彼得马蒂尔, 130, 243, 263, 271

Veroli, home of Paleario, 韦罗利, 帕莱亚里奥之故乡, 263

Veron, John, 韦龙, 约翰, 129—130

Verona, 维罗纳, 287—288, 492

Veronese, Guarino, see Guarino, 韦罗内塞, 瓜里诺

Vesalius, Andreas, anatomist, 维萨里, 安德烈亚斯, 解剖学者, 387, 389, 409—410, 427

他的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389—390

解剖学图解, 391, 409

加伦的版本, 392

Vesprem, taken by Turks, 维斯普雷姆, 土耳其占领 (1552), 526

Viborg, 维堡, 135—136, 155

由奥博的一部分形成的主教管区, 155

Viborg, Jens, 维博格, 廷斯, 142

Vicente, Gil, Portuguese dramatist, 维森特, 吉尔, 葡萄牙戏剧家, 613

Vicenza, 维琴察

作为新教的中心, 262—263; 反三一论, 268—269

巴尔纳伯修会的建立, 287

Victoria, del Cano's ship, 维多利亚·德尔·卡诺的船只, 569

Vicuna, wool used for weaving, 比库尼亚, 羊毛用于纺织, 574

Vida, Marco, Italian poet, 维达, 马尔科, 意大利诗人, 369

Vienna, 维也纳, 123, 165
土耳其围城 (1529), 196, 212, 336, 349, 482, 492, 514—
515
耶稣会的建立, 299
Vienna, Treaty of, 维也纳条约 (1515), 548—549
Vienna, university of, 维也纳大学, 97, 432, 435
Villach, 菲拉赫, 357
Villalar, battle of, 维拉拉战役 (1521), 320, 341
Villefranche, Calvinism in, 维勒弗朗什, 加尔文宗在该地,
224
Villers Cotterets, Edict of, 维莱科特雷敕令 (1539), 221
Vilna, see Wilno, 维尔纳
Vinci, Leonardo da, 文奇, 莱昂纳多, 407, 410, 411
Viret, Pierre, 维雷特, 皮埃尔, 113
Virgil, 维吉尔, 375
在语法学校的学习, 416—417, 419, 423
萨里的《埃涅阿斯记》, 378
Virgin birth, see Mariology, 处女生子
Viterbo, Pole's circle at, 维特尔博, 波尔的小圈子在该
地, 266
Vitoria, Francisco de, 维多利亚, 弗朗西斯科·德, 14, 588
Vitruvius, 维特鲁威, 380, 483
Vives, Juan Luis, his influence on education, 比维斯, 胡
安·路易斯, 他对教育的影响, 421—422, 426
Vlachs, in Transylvania, 弗拉其人, 在特兰西瓦尼亚, 188
Vlacich, Mattia, see Flacius Illyricus, 弗拉西希, 马蒂亚

Vladimir Andreevich, prince of Staritsa, cousin of Ivan IV, 弗拉基, 米尔·安德烈耶维奇, 斯塔里察君主, 伊凡四世的堂兄弟, 553—555

Vladislav I (Ulaszlo, Wladislaw), Jagiellon, king of Hungary (Vladislav III of Poland), 弗拉迪斯拉夫一世 (乌拉斯洛, 弗拉迪斯拉夫), 姚吉埃隆, 匈牙利国王 (波兰的弗拉迪斯拉夫三世), 188

Vladislav II (Dobre), king of Bohemia and Hungary,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 (多布热),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 473

与匈牙利的教会, 188, 190

在他领地中的人文主义, 192

与韦尔伯齐的《约法三章》, 475

断绝与俄国的关系 (1490), 537; 调停立陶宛战争, 538—539

Voes, Henry, Austin Friar, 弗斯, 亨利, 奥斯丁会修士, 86

Volga, river, 伏尔加河, 536, 557

Volynia, raided by Tatars, 沃尼亚, 遭土耳其劫掠 (1520), 538

Vormordsen, Frans, 沃尔莫德, 弗兰斯, 136

Vorontsov, favourite of Ivan IV, 沃龙佐夫, 伊凡四世的宠信, 551

Vsehrd, home of Kornel, 弗谢赫尔德, 科内尔故乡, 475

Vyatka, 维亚特卡, 534—535

Vyazma, 维亚济马, 538

Wages, 工资

黑死病在英国的影响, 27, 39

Walcheren, 瓦尔赫伦岛, 52

Waldensians, 韦尔多派

与再洗礼派，132—133

在意大利，255—256，259—260

与茨温利派和加尔文派结盟，255

“尼科迪米主义”在其中，268

Waldshut, Anabaptism in, 瓦尔茨胡特，再洗礼派在该地，
121，126

Wales, 威尔士

与英格兰合并（1536），441；威尔士边界会议，450；在议会
中的代表，455

Walmer, Henry VIII' s coastal fortification, 沃尔默，亨利
八世的沿海堡垒，493—494

Ward, Mary, foundress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沃德，玛利，真福玛利亚学院女创始人，290

Wards and Liveries, Court of, 沃兹和利弗里斯的法庭，450

Warfare, 战争

正义战争问题，13—14，588；茨温利的态度，99—100，103，
341

列兵，在加泰罗尼亚，323

甲冑，61，496—497

大炮：枪的铸造，61；以数字为证，61；几何应用于造炮，
393；关于火药的条约，404；要塞的防卫，346，491—494；各种类型
的细目和制造（附表），494—495；亨利八世对枪炮的使用，494；在
激战中，497—498，89，512；舰船的诞生，497，505—506，508—
509；运输的花费，500；土耳其人，512，516，524

民团，国民自卫队，327，482，488—489，501

要塞，346，481，483—484，488—489，491—494

在学校的军事训练，420

艺术的发展（1519—1569），481—482；骑士习俗的衰败，11—12；围攻和驻防，481；文学，482—484，404；古代理论和实践的研究，483—484；马上比武，497，502；消费和赢利，500—501，13；战争习俗和对劫夺物的权利，501，13—14；斐迪南一世的战争条款（1527），501；囚犯的待遇，503；伤员和致残者，503—504；雇佣兵，481，484—487；受威尼斯雇佣，519；受东方统治者雇佣的葡萄牙人，609

武器：石弓，481，495；长矛，481，489；长矛和枪炮的混合，481，495，499；英国的弓，489，495；土耳其的复合弓，495

火器：手枪，481；滑膛枪，481；手枪手，481，496；火绳勾枪，481，483，489，495—500

步兵，483，498—500；弗朗西斯一世仿效罗马军团，484；西班牙，489，495，499

骑兵，483，497；火器的使用，496，498—499

道德和训练，484—485，486—487，488

常备军，486—491

运输和给养，504，514，524—525，577—578

海军，504—509；海军炮队，用于反对陆军，497；法国对海上力量的忽视，501；亨利八世发展海军，504，507；夺取船舰，504；设计，504—507；作为划手的志愿者和罪犯，506；商船的使用，507；战术，519；土耳其人，518；在苏伊士的海军基地，521；在东部水域，531；莫斯科在波罗的海缺乏舰只，558—559；西班牙的护航制度，585；东方国家的海上力量，592，596；葡萄牙在东方的海上力量，592，613—614

俄国边疆防卫，534

Warham, William,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沃哈姆，威廉，坎特伯雷大主教，130，233—234

Wars of Religion, 宗教战争（1562—1589），1，225，439

在法国的经济效力，44，222

Warsaw, Confederation of 1573, 1573年的华沙同盟, 209, 474

Wartburg, castle of, Luther, 瓦特堡城堡, 路德的避居地, 83

Warwick, earl of, see Northumberland, 沃里克伯爵

Watt, Joachim von, see Vadianus, 瓦特, 约阿希姆·冯

Weigel, katherina, 魏格尔, 凯瑟琳娜, 202

Weinsberg, 魏恩斯贝格, 89, 104

Weissenhorn (Bavaria) , lordship purchased by Jacob Fugger, 魏森霍恩 (巴伐利亚), 雅各布·富格尔购买的贵族领地, 32

Welser family, bankers and financiers, 韦尔瑟家族, 银行家和金融家

与金属, 布匹与工业, 53

与安特卫普政府贷款, 66

在委内瑞拉的利益, 313

分享西班牙军界的租借权, 313; 借款给作为皇帝候选者的查理五世, 338

Wenceslas IV, king of Bohemia, emperor, 瓦茨拉夫四世, 波希米亚国王, 皇帝, 31

Wenden, lost by Russia, 文登, 被俄国丢失 (1578), 561

Wesel, elementary education, 韦瑟尔, 小学教育, 416

Westerburg, Gerhard, reformer, 韦斯特贝格, 格哈德, 改革家, 86

West indies, Spanish administration, 西印度群岛, 西班牙的统治, 564

Westminster, Statute of (1285), 威斯敏斯特法令 (1285), 38

Westminster, Treaty of, 威斯敏斯特条约 (1527), 344

Weza, John of, archbishop of Lund, 韦扎, 约翰, 隆德大主教
在福兰克福议会 (1539) 上是帝国的全权大使, 175—176

White Russia, 白俄罗斯, 35, 474, 557, 560

White Sea, and the northern trade route, 白海和北方贸易路线, 561

Whittinton, Robert, his Latin grammars, 惠廷顿, 罗伯特, 他的拉丁语法, 425

Widemann, Jakob, Anabaptist, 维德曼, 雅各布, 再洗礼派, 123

Wied, Hermann von, see Cologns, Hermann, archbishop and elector of, 维德, 赫尔曼·冯

Wildhaus, birthplace of Zwingli, 维尔德豪斯, 茨温利出生地, 97

William of Moerbeke, translator of Archimedes, 穆尔贝克的威廉, 阿基米德的翻译者, 391

Williams, Robert, shepherd, on Henry VIII' s restriction of Bible reading, 威廉斯, 罗伯特, 牧师, 论亨利八世对《圣经》阅读的限制, 436

Wilno (Vilna), 威尔诺 (维尔纳), 468, 538, 559

Wimpheling, Jacob, 温普斐林, 雅各布, 104, 417

Winchcombe, Robert, abbot of Kidderminster, 温奇库姆, 罗伯特, 基德明斯特修院院长, 229

Winchester, bishopric of, 温切斯特主教座, 226

Winchester school, 温切斯特公学, 416

Windsor, Treaty of, 温莎条约 (1522), 341

Wismar, Jan Laski expelled, 维斯马, 扬·拉斯基被驱逐, 204

Wisseburg, Bucer at, 维桑堡, 布塞尔在该地, 108

Witmarsum (Friesland), 维特马孙 (弗里斯兰), 131

Wittenberg, 维滕贝格, 70, 171, 183, 356

宗教改革: 智者弗里德里希禁止销售赎罪券, 76; 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 77; 焚烧教规法和《起来, 主啊》, 81; 卡尔施塔特的激进纲领, 84—85; 布根哈根的著作, 86, 157; 与苏黎世和斯特拉斯堡形成对照, 92; 路德著作的出版, 84; 破坏圣像的骚动, 84, 89; 与再洗礼派起源有可能的联系, 119—120; 梅尔希奥·霍夫曼会见路德, 126; 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 135

梅兰希顿的学校, 424

“Wittenberg Articles”, 维滕贝格条款 (1535), 171

Wittenberg, Concord of (1536), 维滕贝格协定 (1536), 169, 173

Wittenberg, university of, 维滕贝格大学

作为宗教改革的宣传中心, 70; 路德的讲演, 72, 74—75; 在要求交出路德后, 对他的支持, 78—79; 梅兰希顿及对宗教语言的研究, 79; 委托去研究改革 (1521年10月), 84; 与《应有的宗教仪式》, 84—85; 对卡尔施塔特的敌视, 85; 陶森在该地, 136; 帕拉第乌斯, 146; 奥拉夫斯和劳伦丘斯·彼得里, 146, 150; 芬兰学生, 154; 阿格里科拉, 155; 匈牙利人, 198; 迪莫兰, 213; 神学教义, 427; 与莱比锡的路德主义, 431; 参加者表 (1501—1560), 432; 世俗的控制, 434

Witzel, Georg, 维策尔, 格奥尔格, 175

Wladislaw (Ulaszlo), see Vladislav, 弗瓦迪斯瓦夫 (乌拉斯洛)

Wolmar, Diet of, 沃尔马议会 (1522), 157; (1526), 159; (1554), 160

Wolmar, Melchior, teacher of Calvin, 沃尔马, 梅尔希奥, 加尔文的老师, 114

Wolsey, Thomas, Cardinal, archbishop of York, 沃尔西, 托马斯, 红衣主教, 约克大主教, 233, 436

他的烦恼, 226—267

建立基督的教会, 牛津 (1525), 227, 428

对路德主义的宽容, 227—228

他与教皇和国王的关系, 226, 228—229

他对英国教会的影响, 230

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 231—232

失宠和去世 (1534), 231—232

大陆政策, 341; 科尼亚克同盟 (1526), 343

计划在伊普斯威奇办学, 424

作为大臣, 他的地位, 446; 对大法院的利用, 450

他对议会的否定, 456; 1523年的财政需求, 232

Worde, Wynkyn de, printer, 沃德, 温金·德, 印刷商, 365

Worms, Diet of, 沃尔姆斯议会 (1521), 81—83, 92, 135, 339, 347; 争议和一致 (1540), 111—112, 177, 178, 180; 议会 (1545), 182

Worms, Edict of, 沃尔姆斯敕令 (1521), 83

由萨克森的乔治公爵推行, (1521), 84

施派尔条约 (1526) 推迟实施, 92

在奥格斯堡的确认 (1530), 93, 161; 坎佩焦的坚持, 94

立窝尼亚的抗议, 157

Wright, Edward, 赖特, 爱德华, 396

Wurttemberg, 符腾堡

查理五世获得 (1520), 331; 授予奥地利的斐迪南, 165

驱逐乌尔里希公爵（1519），353，478；他的复位和接受宗教改革，165—166，212，353

布伦茨在该地，184，185

维尔杰里乌斯在该地，271

Wurttemberg, Christophe, duke of, 符腾堡，克里斯托弗公爵，165，185，571

Wurttemberg, Ulrich, duke of, see above, Wurttemberg, 符腾堡，乌尔里希公爵

Wyatt, Sir Thomas, Poet, 怀亚特，西尔·托马斯，诗人，378，383

Wyatt, Sir Thomas (son of the preceding), 怀亚特，西尔·托马斯（诗人怀亚特之子），rebellion and execution (1554)，叛变和处决（1554），248

Wycliffe, John, 威克里夫，约翰，2，227

Wyttenbach, Thomas, 维滕巴赫，托马斯，97

Xanten, elementary school (1491)，克桑滕小学（1491），416

Xenophon, 色诺芬，372

Ximenez de Cisneros, Cardinal, archbishop of Toledo, 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托莱多大主教，324，565

作为卡斯蒂里的摄政，304—305，310

与多语种《圣经》合参，372

在阿尔卡拉的教育工作，427

Yam, ceded to Sweden, 亚姆，割让给瑞典（1538），561

Yam Zapolsky, treaty of, 亚姆扎波尔斯基条约（1582），561

Yaroslavl, 雅罗斯拉夫尔，534，535—536

Yazhelbitsy, peace of, 亚热尔比齐和约（1456），534

Yemen, 也门, 521

York, 约克, 237

York, archbishopric of, 约克大主教座, 266—267

York,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of, 约克大主教区, 228

Yury, brother of Ivan III of Russia, 尤里, 俄国伊凡三世兄弟, 539—540

Zabid, taken by Ottoman Turks, 宰比德, 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 (1538), 521

Zacatecas (New Spain), silver mines, 萨卡特卡斯 (新西班牙), 银矿, 582

Zagreb, meetings of Croatian diets, 萨格勒布, 克罗地亚会议, 467

Zakharin, family of, in Moscow, 扎哈林家族, 在莫斯科, 551, 554, 555

Zanchi, Giovanni Battista, on fortification, 赞基, 乔瓦尼·巴蒂斯塔, 在要塞, 483

Zanchi, Girolamo, Italian reformer at Lucca, 赞基, 吉罗拉莫, 在卢卡的意大利改革家, 263

Zapolyai family, acceptance of Turkish suzerainty, 扎波利亚家族, 接受土耳其为宗主国, 208

Zapolyai, John, see John Zapolyai, king of Hungary, 扎波利亚, 约翰

Zapolyai, John Sigismund, see Transylvania, John Sigismund, prince of, 扎波利亚, 约翰·西吉斯孟

Zaragoza, 萨拉戈萨, 305

Zaragoza, Treaty of, 萨拉戈萨条约 (1529), 569, 606

Zeeland, 泽兰, 15, 59, 303

Zell, Matthew, reformer, 泽尔, 马修, 改革家, 107—110

Zemplin, see Sarospatak, 曾普林

Zemshchina, Ivan IV' s use of the oprichnina against, 大贵族世袭领地, 伊凡四世利用中小贵族采邑与之对抗, 554—556

Zips, see Spis, 齐普斯

Zollikon, Anabaptism in (1525), 措利孔, 再洗礼派在该地 (1525), 121

Zumarraga, Juan de, first bishop of Mexico (1527), 苏马拉加, 胡安·德, 第一位墨西哥主教 (1527), 565, 570

Zurich, 苏黎世, 111, 263

茨温利和在该地的宗教改革, 86, 97—107; 政治和宗教背景, 96; 布林格的领导, 103, 106—107; 再洗礼派的起源, 120

雇佣兵服役制的结束, 99—100

Zwickau, Munzer' s ministry at, 茨维考, 闵采尔在该地的教牧工作, 87

Zwickau, prophets of, 茨维考的先知, 84, 110, 119—120

Zwingli, Bartholomew, uncle of the reformer, 茨温利, 巴托洛梅乌, 改革家茨温利之叔, 97

Zwingli, Ulrich, Swiss reformer, 茨温利, 乌斯里希, 瑞士宗教改革家, 2, 70, 261, 301

在马堡会议 (1529), 92

对奥格斯堡信纲的批判, 94

早期生活和学习, 97—98; 在马里尼亚诺战役 (1515), 100

论音乐, 98—100

在艾恩西德伦抵制销售赎罪券, 98

他思想中的中心因素, 98—99; 对圣餐的看法, 91, 101, 102—103, 163, 168, 243, 245; 人文主义的地位, 97—99; 圣经学,

98, 100, 102

与路德的关系, 99—100, 103, 163; 他的争论在大学中的影响, 431

他的布道, 99

他的婚姻 (1522), 100

对禁食的态度, 100, 101, 163

他对战争的态度以及苏黎世废止雇佣兵服役制, 99—100, 103, 341

他的“六十七条” (1523) 和对天主教教义的攻击, 101

与法贝尔的争论 (1523), 与教区当局决裂, 101, 105, 120

搬开神像及在礼仪上的改革, 86, 99, 101—102, 120

苏黎世《圣经》, 101—102

对按神意行事的地方官的态度, 102, 96—97, 103, 116

与再洗礼派, 102, 119—123, 126; 与施莱特海姆信纲 (1527), 125

基督徒市民同盟 (1528—1531), 103, 106, 163

去世, 103, 163, 350

与奥科兰帕迪乌斯的友谊, 104—105

布林格及向加尔文过渡, 106—107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形成, 162—163; 该同盟反对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162—164, 166

克兰默和茨温利主义, 243, 245

在意大利对他的教义接受, 251, 260; 天主教改革家的态度, 259

茨温利派与韦尔多派结盟, 255

Zwolle, Anabaptism in, 兹沃勒, 再洗礼派在该地, 127

3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1559—1610年

[英] R.B.沃纳姆 (R.B.Wernham)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3: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③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1559—1610年

[英] R. B. 沃纳姆 (R. B. Wernham)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3卷,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1559-1610年/ (英) R. B. 沃纳姆 (R. B. Wernham)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3,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ISBN 978-7-5203-2589-9

I. ①新… II. ①R…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559-1610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13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张湑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45.75

字数 728千字

纸书定价 1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Vol.3 :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ISBN 978-052104543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1559—1609年的欧洲经济](#)

[第三章 教皇，天主教的改革和基督教的传播](#)

[第四章 新教思想与宗教斗争](#)

[一 路德之后的路德宗](#)

[二 加尔文主义的发展和传播](#)

[第五章 以西欧为典型的社会结构，官职和政治](#)

[第六章 国际外交和国际法](#)

[第七章 陆军、海军与军事艺术](#)

[第八章 1559—1569年的不列颠问题](#)

[第九章 西欧与西班牙的势力](#)

[一 西班牙和意大利](#)

[二 1585年前的尼德兰与法兰西问题](#)

[三 法国的王位继承以及与英格兰的战争](#)

[第十章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帝国](#)

[第十一章 1566—1617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第十二章 波兰和立陶宛](#)

[第十三章 瑞典和波罗的海](#)

[第十四章 教育和学术](#)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政治思想以及宗教宽容的理论与实践](#)

[第十七章 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欧洲的抗衡](#)

[一 美洲](#)

[二 亚洲和非洲](#)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从1559年至1610年之间的半个世纪，无疑应归之为近代欧洲史上最为残暴而又充满宗教偏执的时期之一。在巴黎发生的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的大屠杀；在尼德兰发生的阿尔发公爵的“血腥委员会”蓄意策划的暴行和加尔文派乞丐党人的狂暴举动；在西班牙发生的对摩里斯科人的迫害——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野蛮行为；这个时代就其残暴性而言，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在16世纪后期的历史上，与人对人的残酷无情同样引人注目的，乃是人在事态面前的无能为力，他无法控制其环境或支配其命运。因此，在政治领域内，当时最强有力的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竟不能征服一个衰弱的英格兰或一个四分五裂的法兰西；对于他的叛逆的尼德兰，只能控制其一半疆土；而且，到他统治终结时，也像他登极时一样，处于破产状态。^[1]他的最高尚的对手，沉默者威廉，临死时已知道，要以彼此敌对的各派宗教互相容忍为基础，把他所热爱的祖国统一起来，那只是一个梦想，其渺茫程度并不亚于爱德华·凯利爵士和马可·布拉加第诺要把贱金属变为黄金的愿望。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抱负和成就之间的差距要小一些，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确定的抱负较低。而且，这一时期大多数统治者确定的抱负，的确比他们的上一代低得多。他们之中最有成就者之一，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不是首先以她的经常踌躇不决和巧于避免行动而著称的吗？

然而，如果说16世纪后期欧洲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们显得比他们的父辈稍逊一筹的话，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父辈目标过高而且企求过多。那个世纪之初，一系列幸运的——或许可说是不幸的？——联姻，使那位年轻的尼德兰统治者在1516年成了西班牙国王，继而在1519年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首脑，并通过选举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在此后40年间，这位查理五世皇帝，几乎连续不断地，而且通常作为主角，卷入欧洲各个角落的几乎每一场冲突——匈牙利、地中海地区和北非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主要以德意

志为中心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主要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法兰西君主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甚至还由于他的姊妹与丹麦国王联姻而卷入了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因此，每一场地方性的争端，都很容易影响到整个欧洲；而君主们的雄心，也很容易膨胀到觊觎整个大陆。查理五世非常认真地看待他的皇位，而法兰西国王也怀着统治帝国的幻想，甚至英国的亨利八世也梦想将他的女儿嫁给那位皇帝，从而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君主国”作为他们的遗产。

君主们追求的目标固然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大；然而，达到那些目标的手段所需的费用也逐年大增。单是新扩展起来的外交和情报机构网的费用本身，或许除了财力极弱者外，各国都能相当容易地负担起来。但是，由于火器的使用日增，新式陆军和海军耗资甚巨，以致到了这一世纪中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也濒临和陷于破产境地。当苏莱曼大帝于1566年去世时，土耳其人也几乎已经力竭财尽，而一些次等的强国则早已放弃了同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朝并驾齐驱的一切企图。例如英格兰，由于亨利八世和摄政萨默塞特竭力要控制苏格兰而被弄得匮乏不堪，先是在诺森伯兰控制下陷入了同法兰西附庸相差无几的地位，继而在半西班牙籍的玛丽·都铎统治时期，几乎陷入了被并入哈布斯堡联合体的命运。

由于逐鹿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衰竭下去，16世纪上半叶使欧洲纷扰不宁的那些巨大冲突也随之平息下来。在东面，基督徒和穆斯林土耳其人之间的长期战争逐渐冷却，变成一种舌战和仍具有爆炸性的共存关系。在中部，即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在路德教诸侯、天主教诸侯和哈布斯堡皇帝之间，确立了一种三方均势；这种均势虽不甚稳定，但受到各方珍重；而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就当时的状况而言，日益有赖于帝国最东部的边陲地区，有赖于奥地利的王公领地和波希米亚。在西面，1559年4月签订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承认了法国君主同哈布斯堡王室的西班牙支系之间的一种粗略而不稳定的均势。这两个庞然大物，仍然高踞于其他所有强国之上，它们之间的长期争端，现在得以暂时休止，但并未终结。

这些冲突中的每一项冲突，当其平息下去时，就留下了自己特有的政治体系；而且，在1559年以后，每一项这样的政治体系都日益脱离与其他体系的联系而越来越自行其道。这些体系相互脱离联系的趋势，由于下述事实而进一步加强，即查理五世于1555—1556年退位

时，把他留下的不易控制的庞大产业做了分割：他的儿子腓力二世获得了西班牙、西属意大利、弗朗什孔泰、尼德兰和美洲大陆；他的兄弟斐迪南一世获得了波希米亚、奥地利领土和皇帝的称号，由他尽其所能去拯救德意志境内和基督教帝国东部边陲的帝国权威。这一分割，消除了各个体系和冲突之间的联系环节，而那樣的环节曾使得查理五世时代的政治史具有统一性；1559年以后的50多年间，再也没有一个焦点或一个人物，可以使我們据以把欧洲的事件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这一变化也减少了促使当时的政治家们好高骛远的那种诱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雄心限制在欧洲大陆上属于自己所有的那片领土范围之内。

其他一些情况进一步促进了，而且几乎是强行施加了这种限制。各国政府由于从事战争和推行野心过大的对外政策，使自己面临濒于破产的财政困难；由于通货膨胀，这种财政困难在该世纪中叶以后不但持续不断，而且往往更加恶化。我们不再把“价格革命”看作单纯是由于1543年波托西矿山开发以后，白银从美洲突然涌入而产生的结果；犹如不把文艺复兴视为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希腊学者突然涌入而引起的一样。然而，美洲白银的洪流，倾注在其他更为深刻而长期的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运动的浪头之上，确实加速并加剧了价格的上涨，对于政府和所有收入比较固定的人们，造成一个空前困难的时期。

战争的平息，使得许多贵族缙绅不能从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唯一受过训练的职业，即打仗的职业，这就使得困难更为加重。那些贵族缙绅现在指望他们的政府派给肥差，或至少给以补助和酬偿，使他们能够按已经习以为常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当政府未能履行或未充分履行期待它承担的贵族供应者的职责时，贵族和缙绅们就毫不迟疑地转而反对它。玛丽·都铎的许多臣属，就是这样转而反对玛丽，并对推定的继承人伊丽莎白满怀着期待之意。因为伊丽莎白在取得王位之前，被认为是“一个开明的女人，不像她姐姐那样薄情寡义”。法国贵族对瓦卢瓦诸王和尼德兰贵族对他们的西班牙封君的大部分不满，都来自类似的缘由。贵族的不满，实际上几乎成了每个国家局势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至少西欧国家是这样。

使这种不满变得更加危险的是：政府虽然对外偃旗息鼓，但对国内事务却日益加紧干预。它越来越多地介入地方事务，而土地贵族长

期以来一直把那些事务视为他们自己专有的利益，视为自己的特权，朝廷的命令只有在他们同意时才能实际生效。由于政府的干预往往还威胁到其他一些地方利益以及其他的阶级，并总是引起市民和农民苛捐杂税的加重，土地贵族和缙绅就常常觉得他们自己是作为民众领袖挺身而出反对中央政府的扩张而维护地方排他主义和古老的特权。

情况还不仅如此。由于政府的活动不断增多，政府公务员的数量也就需要不断加大。必须支付合适的薪俸，才能确保他们效忠和工作有效率。然而，没有几个政府有足够的岁入能够给它们的公务员支付适当的薪俸，而那时也没有几个政府敢于像从前那样大量任用僧侣充当他们的文职人员。于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司空见惯的做法是指派人们担任官职时带有一种默契，那就是，只要他们的良心许可而那些有求于他们的人又甘愿解囊，他们就可以收取酬金、馈赠或赤裸裸的贿赂，作为他们微薄薪俸的补充。由此向前只迈一小步，就是出售官职、垄断权、特许权和职权，而购买者牺牲公共利益使自己得到补偿，也不会引起过多的追究。再往前只迈更小的一步，就是为了公开承认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即为了弄钱而设立官职，甚至设立世袭的官职，以供出卖。卖官鬻爵，出售政府专有的权利和特权，在整个大陆司空见惯，虽然程度各不相同。卖官售权的做法极易滥用，因为它本身就是由于极度困窘而采取的权宜手段。这种买卖即使在其滥用还远未达到臭名昭著程度的国家，也可能激起强烈的愤慨，1601年英格兰议会对垄断专利权的吵嚷就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围绕着这种制度，还滋生出一种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错综联系，这种联系极易演化成为相互冲突的派别集团，这也在伊丽莎白统治英格兰的晚年，在埃塞克斯—塞西尔的倾轧中显示出来。

可是，共同的负担和共有的怨愤，同样可能把地方性的和贵族阶层的不满，扩大成为全国规模的不满，并把这些不满融会成为某种全国性的对抗。当统治的王朝当局是外来者而且又不常驻当地时，这种局面尤其容易出现。例如，在尼德兰发生的反对西班牙的腓力的斗争，在瑞典发生的反对波兰的西吉斯孟的斗争，就是这样；或者，当一个女性君主的婚姻使她的王国面临被并入一个更大的政治联合体的危险时，这种局面也极易出现。例如，玛丽·都铎统治下的英格兰和玛丽·斯图亚特统治下的苏格兰就是这样。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自古传袭下来的、主要是消极的仇外心理，极为容易而且可能迅速地转

变成某种近乎新的积极的民族主义精神。^[2]而且，这种新的精神到处都开始程度不等地显示出它本身的力量；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都赋予人们一种新的觉悟，促使他们把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同个人对君主或王朝的忠诚区别开来。威廉·莎士比亚所说的“英格兰这块神圣的土地”，沉默者威廉所说的“整个的祖国”，已开始在人们心中激起热爱和忠诚，其强烈程度并不亚于一位“圣洁的女王”或一位“最高的天主教君主”所能激起的这种情感。这种区别越鲜明，对中央政府的反抗也就越容易爆发，而且越加具有危险性。

再说，在那样的情况下，不但心怀不满的贵族能够为由于政治上的不满而引起的广泛运动提供领袖人物；而且总是有饥饿的穷人为那些运动提供具有威胁性的无纪律的群众队伍。人类的大多数总是生活在饥饿的边缘，16世纪后期也不例外。的确，当时的人口增长看来已超过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贸易的发展，即使能够比以前更为经常地利用一个地区的多余产品去缓和另一个地区的匮乏，但同时又使为数更多的人受到市场波动的摆布，使实际工资被压低或受到抑制，使贫富差距增大。16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在英格兰发生的许多骚动，起因于安特卫普纺织品市场供应过剩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反响；16世纪60年代中期在尼德兰发生的剧烈骚乱，至少其中有一些是起因于波罗的海战争引起的谷物匮乏和与英格兰的争端引起的纺织业的失业。实际上，无论在什么地方，要发动一场骚乱都绝不是很困难的。德国农民起义和明斯特城过火行动引起的社会革命恐慌，由于1566年尼德兰发生的破坏圣像暴动或以后的巴黎群众暴乱以及法国其他地区的农民暴动这类事件而继续保持着强烈的影响。对暴民统治的恐慌，无疑有助于最终促使有产阶级转而支持中央政府——在尼德兰和法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些有产阶级或他们中的某些部分同中央政权的对抗，才打开了裂口；通过这些裂口，底层的社会不满才得以爆发出来，而这种爆发又进一步加剧了使政府结构遭到破坏的紧张局面。

引起君主们不安的最后的但不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上的对抗，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对抗。因为在当时，尤其在西欧，无论是保守、妥协而且通常是亲君主的路德派新教，还是无政府状态的、分裂的再洗礼过激派别，都已被激进的、不妥协的加尔文教排挤到一边去了。富有生气的新教的领导权，正转入那些不信赖君主而信

赖自己教会组织的力量和活力的人们手中。他们不顾加尔文本人的犹豫，越来越急于运用武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种战斗性的信仰，从其发源地——加尔文的日内瓦传播出来以后，就沿着政治阻力最小的路线，通过那些政府极为脆弱或受到严重挑战的地区迅速地扩展。这样，它的成功就主要是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莱茵兰；在低地国家的反西班牙统治的全国性反对派之中和苏格兰的反法兰西统治的全国性反对派之中；以及在法兰西本身。在法兰西，由于统治者的孱弱和王室力量单薄，这种战斗性的信仰有可能同贵族和地方派别不断增长的宿怨相结合并使之加剧。对于法兰西的胡格诺派，苏格兰的“圣约同盟长老团”和尼德兰的乞丐党，加尔文教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和推动力，而单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不可能提供那样的力量的。因为信仰的纽带比任何血统、利益或派系的纽带更强韧，通过它可以把贵族、市民和农民联结起来，把一个省同另一个省的人联结起来，去从事一项超越阶级区别和地方本位主义的共同事业。它给那些已经着手采取暴力手段去达到政治目的的派别，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效组织和一种不妥协的信仰的自信心。^[3]

但是，暴力总是引起暴力。加尔文教派的强有力的行动不久就引起了强有力的反行动。德意志的路德教诸侯憎恨加尔文教派的神学理论，害怕加尔文教派在他们的臣民中进行布道工作，担心它的战斗精神可能会破坏奥格斯堡和约以后在帝国境内取得的不稳定的和平。在德意志，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之间的纷争，很快就变得比新教同天主教之间的纷争更为尖锐。在英格兰也是如此，伊丽莎白一世尽管不愿监视人们的心灵，也不得不让安立甘教会的主教和最高委员会裁判所去对付那些“想要剥夺女王的[宗教]权威，并将它交给人民”的清教煽动者。在苏格兰，詹姆斯六世在抵制长老派教会企图把他当作“上帝的蠢臣仆”对待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还不只是来自北方的保守势力。甚至在提倡宽容的波兰，罗马教会在该世纪末也发动了它的反攻，并要求政府给予协助。

然而，宗教影响显得最为恶劣，而且对加尔文派暴力行为的反行动也最激烈的地方是法兰西和尼德兰。在1566年的破坏圣像暴动中，加尔文派诉诸武力和褻渎教会的行动，引起了天主教的反行动；这种反行动摧毁了初期的尼德兰反抗力量，并为阿尔发率领西班牙军队和血腥委员会未遭抵抗而长驱直入开辟了道路。天主教方面对加尔文派

10年以后发动的攻势的惊恐，导致了根特和平协定遭到破坏，并在1579年使暂时统一起来的尼德兰分裂成为对立的阿拉斯同盟和乌得勒支同盟。在法兰西，巴黎和其他城市的民众，在1572年几乎不需要什么诱因，就发泄了他们对胡格诺少数派的愤怒，因为胡格诺派的势力似乎已超过了天主教多数派所能容忍的程度。后来，由于一个胡格诺派的人有可能要继承亨利三世的王位，引起了法国为时最长也最激烈的最后一场宗教战争，即那瓦尔的亨利与天主教联盟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招致西班牙军队在法国的反叛者邀请下进驻巴黎，几乎要以法国的独立作为牺牲，奉献于宗教狂热的祭坛。

从16世纪50年代起，对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紧张和激愤因素的警觉，再加上明显的金钱匮乏，使大多数君主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野心受到限制。在最北边，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还在梦想“控制波罗的海”，并为此而进行战争；波兰国王在同立陶宛联合以后，还企望首先同瑞典然后同俄国建立范围更大的联合，以此作为实际的目标。但是，波罗的海国家比南边一些国家遭受的战争损伤要小，而且在瑞典国王和波兰的西吉斯孟国王方面，总是极易表现出瓦萨家族的妄想狂倾向。大多数的欧洲统治者都更多地受到环境的限制，在气质上也较少冒险性。深深感到他们对付自己统治区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和不满的手段极其有限，他们大多数人都极力避免让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来加重他们的负担，或给他们的国外对手提供任何机会来帮助他们自己的反叛者。1560年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干涉，1572年和1578年英法两国在低地国家的插手，16世纪90年代初期西班牙对法兰西天主教同盟的援助，都极其清楚地表明，外国敌对势力同国内反对派的结合，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广泛的愿望，在许多年间实际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就是希望避免重新爆发在该世纪前半叶曾经屡见不鲜的全面的大规模战争。王朝和民族之间的嫉恨现在当然并未终止；商业上的竞争仍时有爆发；战略上的利益仍然像以往那样敏感；君主们在涉及个人和王朝权势时仍然耿耿于怀。而且，一个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存在，对它的邻国是一种经常性的诱惑。由于每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不满情绪和反对势力，因此，16世纪后期的各国政府几乎总是能够指望从他们的敌对营垒里找到朋友，甚至或许找到武装的同盟者；这种情况在上一代人中则是罕见

的。因此，培植“第五纵队”，暗中支持反叛者，就成了16世纪后期治国之术中常见和公认的手段。它们之所以越加迅速地成为常用的手段，原因在于一个政府很容易对另一政府的反叛者给予非官方的支持，而不必采取任何公开的战争行动。然而，它们恰恰又是危险的手段，因为暗中支持反叛者同政府间的公开战争之间的界限是那样的模糊不清，以致最审慎、最谙练的政治家也极可能不知不觉地越过了这条界限。

因此，一种焦躁不安的谨小慎微情绪，强烈地影响着大多数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且突出地反映在它们的执行人的许多外交函件之中——阿尔发在1567—1573年从尼德兰发出的一些函件，至少就其担心同英国发生公开破裂的危险而言，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反之，在对内事务方面，却越来越倾向于轻率地采取引起恐慌的措施和暴力的解决方式——如腓力二世派遣阿尔发和他的军队于1567年开进尼德兰，卡特琳·德·美第奇断然决定除掉海军大将科利尼，此举导致圣巴托罗缪日的大屠杀；英国议会制定反天主教传教士的苛法；莱茵兰和南德意志的天主教会为了坚持他们在科隆、亚琛和多瑙沃特所追求的那些受到威胁的目标而日益诉诸武力。然而，这些不顾后果的补救措施绝非总能解决问题，而且几乎总是促使内部冲突大为加剧，更加不可和解。因此，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常常只是促使反叛者更加打定主意去求助于外国势力，并为外国势力响应他们的要求增强了诱惑力。

更糟的是，有了一种现成的途径，它使得一些政治派别很容易把他们自己同相当的国际宗教派别联合起来——如法兰西的吉斯集团同罗马教会、低地国家的乞丐党同加尔文教会就是如此。当然，这种倾向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占上风，因为宗教信仰仍是一种比政治的或政党的联盟更为坚强的力量。因此，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以后反对天主教的西班牙的斗争中，不愿接受新教的英格兰的援助；而反叛的阿拉贡，在1591年对于法兰西的胡格诺派国王也不感兴趣。然而，这种倾向使得所有的新教反叛者——法兰西的、尼德兰的、苏格兰的——都日益向新教的英格兰求助；所有的天主教反叛者——法兰西的、英格兰的、苏格兰的、爱尔兰的——则指靠天主教的西班牙。到16世纪80年代，新教保护者的角色被推给了极为勉强的伊丽莎白一世；天主教保护者的角色则被推给了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同样勉强的腓

力二世。非官方的和暗中的干涉，此时逐渐转变为公开的战争；各种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争端，开始汇合成为一场新的全面冲突。

不过，在本卷所涉及的这段时期内，直接卷入这一冲突的还只是西欧，也就是由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规定的那一部分大陆。中部的奥格斯堡和约地区，大都暂时安于享有不稳定的和平。波罗的海国家也还在自行其是，没有受到西欧纷争的太大影响——虽然德意志北部的汉萨同盟城市的新教势力，曾由于他们同西班牙进行的海军用品和谷物的有利贸易遭到英格兰的干扰，在16世纪90年代受到了严酷的考验。不过，这种纷争已开始波及德意志西部边境，波及莱茵兰；在那里，加尔文教会在巴拉丁选帝侯领地的建立以及好斗的特伦托天主教会^[4]从巴伐利亚的传入，正在爆发出火星，很容易造成燎原之势。危险增大的原因还在于，那个地区对尼德兰境内的西班牙军队的交通联络极为重要。莱茵兰的麻烦，不仅极可能迅速地向东波及德意志的其他地区，还可能向西蔓延到西班牙和它的对手那里。

这些情况，直到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还没有真正发生。因为16世纪末西欧的冲突提供了一些颇为明显的例证，表明欧洲的政治家和将领们无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支配局势。在1588年，西班牙人未能使自己的一兵一卒踏上英格兰的土地，而英格兰的水兵也未能在战斗中击毁半打以上的无敌舰队的战船。英格兰在次年进行反击，它的一支军队曾先后在科鲁尼亚和葡萄牙境内登陆，但是最后终于撤退，未能拿下任何一座重要城市。英格兰企图切断西班牙的美洲白银供应线的努力，也像西班牙人企图利用爱尔兰的起义的努力一样，未能得逞。那瓦尔的亨利在阿尔克和伊夫里对天主教同盟取得的激动人心的胜利，也像帕尔马在1590年参与营救巴黎、1592年参与营救鲁昂一样，并未获得决定性的效果。在尼德兰，战局同样也在各大河流沿线陷于僵持状态。在海战中，不必登上敌船而依靠炮火去消灭敌人的带帆战船组成的新式舰队，确实是一种新的作战手段，它的用法和战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充分掌握并使之奏效。同样确实的是，那瓦尔的亨利和帕尔马未能最终得到胜利果实，并不单纯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虽然如此，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使对于英格兰，它也持续了19年之久——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乃是它的胜负不分。到头来，所有的逐鹿者都精疲力尽而不得不暂时罢休。然而，正因为停战是彼此无力再战的结果，所以，1598年的法兰西与西班牙的和约、

1604年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和约以及1609年的荷兰与西班牙的协定，对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悬而未决。列强相继撤出了战斗，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也许是一个例外）而言，这仅仅是为了养好他们的创伤，充实他们重新厮杀的力量。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内，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虽然在许多年间曾遏制各国政府去冒险发动战争，但这些紧张因素却在不断增加，孕育着一场新的欧洲冲突。这些紧张局势使人们产生一种惶恐不安而又焦躁暴烈的精神状态，这往往导致举措失当，并常常过多地为一些眼前的麻烦和短期的问题所困扰。这就严重削弱了人们解决根本性的、长期性的问题的能力。他们被表面上的紧张局势缠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更深层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由此而引起的商业的变迁和工业的发展；政府的财政及其人员的补充和酬劳方式；协调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制定以及有效的外交事务机构的建立，等等。尤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至少要和乎共存，如果还不能友好相处的话。

在处理这些更深层的问题方面，某些地方确也有所进展。没有一个国家在控制物价上取得很大成就，虽然英国人成功地改革了他们的货币，建立了济贫制度；当他们未能使安特卫普成为他们的货物集散中心时，又另外开辟了他们的海上贸易。然而，即使伊丽莎白一世施政节俭，也未能真正解决政府经费拮据问题，而当政府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力求收支相抵时，就引起了第一轮宪政冲突，这场冲突以1642年的内战而告终。荷兰人的商业繁荣兴旺，而且扩张得比英国人还要显著；然而，这个联省共和国的三级会议在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政府体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却是微乎其微。西班牙人设法大量增加美洲矿山的白银产量，并能安全地横渡大西洋将白银运回来；然而他们未能阻止西班牙经济由上升转为下降，而这一转折标志着它长期衰落的开始。在德意志，虽然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路德派的和天主教的诸侯与城市基本上能够在一个帝国之内和平相处；但是天主教的和路德派的臣民被允许在一个诸侯统治下共处的情况，却极为罕见。1598年的南特敕令虽然迫使天主教徒同胡格诺教徒分享法兰西的权利，但也不得不让胡格诺教徒作为一个武装的、有组织的少数派存在于法兰西境内。

16世纪后期的人取得的成就如此有限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本身确实是很难解决的。由于它们是一些全新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存在加倍的困难。前一个世纪，特别是前半个世纪，在欧洲人面前展现了可供征服的新的陆地，给他们提供了新的、不仅耗费颇巨而且甚为复杂的用于征服的武器；这样，那个时期不但扩大了地理界限，促成了军事艺术的革命，而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演进，也得以达到更快的、罕见的速度。人类的每一项活动和制度在那个时期都发生了变化，遇到了挑战。尤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新的或经过更新的宗教观念的一次真正的核爆炸。在这样一个革新和扩张的时代之后，继之而来的只能是一个消化和巩固的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在1559年以后一个时期的政治事务中，大多数欧洲列强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出野心有所收敛，并日益集中力量在比较有限的内部治理方面来维护权威和改进统治方式。欧洲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发现和征服的伟大时代，已被一个定居和开发的时代所接替——至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这样；而英格兰、法兰西和荷兰的冒险家们还热衷于抢夺殖民地而不是效法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做法。我们还看到，士兵和水兵们在力求掌握他们的新式武器、领会使他们成为有效兵员的战术运用方式方面，也面临着许多课题。经济活动领域也是如此。虽然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经久不衰的扩张，还一直在推动着实业的发展，但是，到16世纪90年代，其速度也显著放慢。使实业界（也使政府）感到困窘的那些问题，大部分仍然是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呈现出来而又还几乎没有开始回答的问题。16世纪后期的人还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就，不可能回答人口增长、需求增加和物价上涨所提出的挑战。因此，在这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接踵而来的收缩，已经露出了端倪。

他们究竟为什么未能像他们18世纪的后裔们那样去迎接这些技术和科学上的挑战，这一点难以说清。技术和科学也像艺术一样，当然遵循着它们本身特有的发展周期。这些发展周期同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周期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个时期，科学或技术肯定都还没有达到它自身的一定发展阶段，因而还未曾做好准备去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同样确实的是，在大学以及整个教育领域里，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整理和应用前几代人倾泻出来的潮涌般的新见解；因为在这个领域也同样处于消化吸收的时代。然而，科学、技术的自然

发展，实际上，在大多数非宗教课题领域（与军事有关的那些领域也许例外）里的思想和实验的自然发展，显然受到了阻碍，因为人们几乎普遍地全神贯注于宗教上的激烈争辩。由于那些时代的大多数人思想上最关注的是宗教，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试图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分析，那我们就绝不可能理解那些思想和行动。

当然，在宗教领域，新思想进涌的高潮也随着茨温利、路德和加尔文的先后谢世而衰落下去了。这方面也像其他领域一样，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消化和阐释——这种关心在加尔文的日内瓦和特伦托的天主教会议上都同样明显。甚至路德派教徒也被驱使去写作他们自己教派的信仰告白书。互相对抗的教会，已经选定了他们的战场，并沿着设防日益周密的阵地掘壕据守，准备进行长期的神学壕堑战；在那样的神学战中，已很难看到该世纪中期以前存在的辽阔战场。现在，大多数人所向往的，是断然无疑的教义，渴望在对宗教提出的所有疑惑和挑战中，找到一种可以接受和遵奉的权威。而断然无疑的教义，最容易在封闭性的教会团体里取得。那些封闭性的教会团体，通过越来越严密地规定的信条和仪式，使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但是，隔阂孕育着敌视。尤其是因为所有的教派——除了少数几个人数不多而且遭到轻视的教派以外——都从中世纪基督教承袭了一种信念，认为只能有一个教会是真的，而那个真正的教会有权利而且也有责任运用暴力去维护和强制推行它的信仰。

这样一种互不相容的唯我独尊态度和轻易地诉诸武力的做法，促使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或迟或早地去同世俗政权结成紧密的联盟，并最终依附于世俗政权。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英格兰的安立甘教会和德意志各诸侯领地内的路德派教会里；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也是如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苏格兰加尔文派的长老教会也是如此。在法兰西，“一种信仰，一种法律，一个君主”被当作理想的目标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虽然在大多数时间，国王都太软弱，不能强制执行信仰或法律。教会与国家合为一体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把异端与叛国等同看待——由于被视为叛国者，天主教传教士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就受到绞死、剥出脏腑和肢解的野蛮酷刑。我们已看到，教会与国家合一如何把宗教上的仇恨注入了国与国的争端之中，从而使其加剧；如何促使国家内部的派别纠葛复杂得几乎不可调和；加尔文教派

和特伦托天主教会所具有的国际性，又如何使得局部地区的争端很容易汇合成为整个大陆的全面冲突。

教会与国家合一产生了另外一种结果：教会和国家的联合压力，使得知识界的力量过多地被驱使或吸引到神学和教派的狭隘领域之中。教育和学术被偏执地认为主要是造就信仰纯正的新教英国人或信仰纯正的天主教西班牙人的工具。最能直接而明显地服务于这些目的的学科，就最受青睐和得到最优厚的捐赠。这样一来，神学就取代了法学和医学的地位而成为大学中的主要系科；教义问答的学习，成了学校的重要必修科目之一。而且，神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教派正宗教义的束缚，常常把精力白白消耗在无聊的争辩之中。虽然这种争辩有时也激起一些对比较广阔的领域的探索，例如马格德堡的编年史家和巴罗尼乌斯^[5]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那些争辩所激发起来的学问不可能是完全公正无私的，探讨也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独立思考已完全被窒息，或知识的进步已被遏止。如果这样来谈论博丹和胡克的时代，第谷·布拉赫和真蒂利的时代，那自然是荒谬的。不过，在一个科学和魔法与纯粹妖术之间的界限还难以划清的时代，非宗教的学术成果通常得不到丰厚的报酬，却往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只有当学者们的思想和知识被实业家和商人、航海家和工程师这样一些从事实务的人们所吸收的时候，才可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后来首先产生了“科学革命”，继而促成了“产业革命”。16世纪后期的学者和教师们，大都潜心于从事比较初级的工作，即力图对那些思想做出鉴别，对那些知识加以传播。他们的精力主要是用于普及和描述；用于说明和提出问题，而不是加以突破以获得新的解决方法。

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它的晚期，有一个领域的成就，远远高出于一般水平之上；考察出现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令人神往的事。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和戏剧领域，在那些给人性提供一面镜子的领域，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最初一些年里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其他领域中，这样的高度是那些时代的人们根本达不到的。在民族语言的文学、戏剧以及音乐方面，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以及帕莱斯特里那和伯德，还有他们的同侪，把上一代人的努力，推进到了充分成熟的程度。绘画和建筑方面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极盛时期的灵感，通过提香和埃尔·格列柯传到了17世纪。本卷书内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对于这些成就略

加提及。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创造精神，主要地正是在这些发挥想象力的领域里，得以表现出来。至于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像它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一样，那是一个问题很多而答案甚少的时代，是问题超过人们的解决能力的时代。

（庞卓恒 译）

[1] 关于腓力二世的叙述参阅本书第239页及以下各页（本书中参阅某页均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译者注）。

[2] 然而对此尚有不同看法，参阅后面第6章。

[3] 参阅后面第9章。

[4] 指遵奉1564年特伦托宗教会议颁布的信誓的天主教会。——译者注

[5] 马格德堡的编年史家，指1559—1574年间编写的《马格德堡历代纪事》一书的作者们；巴罗尼乌斯，16—17世纪之交的梵蒂冈神学家、教会史家。——译者注

第二章 1559—1609年的欧洲经济

1559年的4月2日和3日，西欧列强在卡托—康布雷奇再次同意媾和。经过旷日持久的斡旋和犹豫之后达成的这一和解，必然要在欧洲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和约中享有其地位。历史学家们已经承认了它的这种地位，并以一般只有遇到结束欧洲长期争端的重大媾和行动时才会有那种大张旗鼓的声势来确认其重要性。他们那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虽然查理五世已经在上一年，即1558年的9月21日去世，但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才是他的戏剧性统治的真正结束。随着腓力二世的掌权和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无疑，它在戏剧性方面并不逊色，但却具有不同的而且是更为严酷的性质。它像是一个过时的旧式帝国，正在由一个更加讲求现实而又更加暴虐的人统治，这个帝国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中世纪的，而且这是合乎情理的，它是由难以估量，历史悠久的传统来维持的。因此，这样的帝国缺乏政治上的存在理由，并且不易显示其真实目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我们能否认为，它在经济上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呢？

可以肯定，一致之处绝非微不足道。和平使得国际经济恢复了它的活力，这就带来了显著的利益。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这一主要冲突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595年1月17日为止一直没有正式地恢复为公开的战争，西欧的经济活动享有了一个持久的安定和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正像伴随着军队复员而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出现了和平的欢乐景象：南方的美酒再次经常地大量销往北方。如果不是1559年或稍后的国际经济克服了直接面临的战后问题，进入一个建设的阶段，并导致了长期的繁荣高潮，谈论这些细节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样简单化地看待现实，会带来许多危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年间，出现了与查理五世时代所特有的那种状况截然不同的变化。价格继续上涨，但生活费用膨胀的同时，工资率也在提高。这一点在低地国家、佛罗伦萨、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英格兰都已被证实，而且，正如将要论及的那样，它具有重要的含义。

而且，在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本卷探讨的上限——之后，我们还可以转向另一个政治分段点，即1609年4月西班牙与起义的联省共和国之间的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在政治领域是一重大事件自不待言，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它意味着从根本上恢复到更为正常的和平状态。它是以另外三个和约为前奏的最后成果；那三个和约是：1598年5月2日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在韦尔万缔结的和约；1601年法兰西与萨伏依之间的和约；以及1604年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的和约。这一回合的媾和过程或许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各商业国家以多少堪称和平竞争的方式争夺世界资源，和平扩展到了七大海域，远远超出西欧事件的风暴中心，而且摆脱了种种惊恐、犹豫和障碍。

然而，绝不能认为，国际经济活动仍旧完全从属于政治事件的传统节奏。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不能否认，但政治是一回事，经济却是另一回事。

像政治领域中的情形一样，欧洲经济的发展是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年份为标志的：1557年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就是一例，尽管这主要是西班牙人的事件。随后发生的1575年和1597年的两宗破产事件，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使欧洲经济的基础本身发生了动摇。随后不久又发生了另一宗破产事件，即1607年的破产事件；此次破产当然应由腓力三世宫廷的惊人花销承担大部分责任。但是，正像条约、战争和事变构成政治史的主要因素一样，这些破产事件只不过是经济变迁的一种前兆。经过更加深入的考察，就会看到比较长期的运动，时而朝着一个方向，时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形成一种衰退与扩张交替出现的旋律。关于这种周期变化的序列存在的证据还远非确定无疑。然而明显的是，总的生产情况是有升有降的。物质生产的这种消长情况，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经济事态具有根本的意义。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可能在欧洲的一端与另一端并非一样。例如，法兰西的经济从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转而向大西洋投资，这样就在1536年到1564年左右的年代里经历了方向上的改变。低地国家直到1590年左右才恢复过来。如果我们观察较早的一个时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发生于1540年到1560年左右的16世纪中期的深刻危机，在英格兰就特别严重，而在查理五世末年和腓力二世统治初年的西班牙，则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如果根据现在的研究所证明的这些分期上的差别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差别对于基本趋势的分析研究就具有深刻的意义。至少，主要的特征一般说

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已经显示出与政治史的分期不相同的标志。遵循这些标志的经济史家，不会以1559年为其研究的开端，而宁愿从1565—1566年左右开始；也不会以1609年的十二年停战协定为其研究的终结，而宁愿截止到1619—1620年的商业危机；或者甚至截止到三十年战争的结束。那时，长期的衰退已表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次波及整个欧洲经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说，经济扩展的这些阶段本身并无明确的界限。在这些表面的运动之上和之外，总的经济活动因一种长期的上升趋势而得到加强，这是一种由其自身的动力所支持的趋势。的确，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时期构成了欧洲普遍复苏的一部分；它从15世纪中叶聚积力量，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的突然事变。1559—1609年这些年处于一个长得多的时间跨度里，从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加长了的”16世纪这一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从15世纪中叶直到三十年战争的祸乱。

不过，作为这一经济年代史的补充，还有历史地理上的考虑。要讲清楚16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复杂局面，是一项困难任务，因为欧洲各个不同地区具有局部的独立性，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在发展过程、内容和动因方面都极不相同。在南部和东部，意大利正在摆脱意大利战争的长期折磨而处于崛起的起点上。意大利战争既带来意外的收获，也造成了破坏。对意大利半岛来说，卡托—康布雷奇的号角预示着一段长期的和平。毋庸赘言，那里的重建需要集中的投资。在西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只拥有比较幼弱的经济。15世纪末期，它们投入了有利可图的殖民开发的冒险之中。大西洋所提供的许多致富的可能性，使它们在谋取财富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里斯本港（在一个短时期里），然后是塞维利亚，成了整个欧洲的主要中心和发展的焦点。在北部，另一个海港安特卫普，有力地延长了西班牙的隆盛时期。在北部诸国中，南尼德兰和北部的意大利，以拥有众多的商人、工匠和富裕城市为其特色。到16世纪中叶，它们的黄金时代已经暗淡起来。不得不效法低地国家模式的英格兰，则显得它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1543年到1544年之后，低地国家成了反对法兰西的战场，极易成为别国冲突的场所；而那些参与冲突的国家，好像是受到报应一样，不久就陷入了它们自己的内乱之中。战争在欧洲的一个地区被平息下去后，似乎随时都可能在另一个地区爆发起来。在该世纪中叶以后，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后，意大利和德意志成了比较和平的地区。另一方面，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很快就陷入了内战。它们成了欧洲

的战祸频仍之地，几乎同16世纪前半期的意大利一样。争端从来没有完全保持在地方范围以内，又为邻国的干预提供了借口。由此引起的入侵，不可避免地赋予了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的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性质。在德意志和低地国家以北和以东，是欧洲的边界地带——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也是分隔开来的经济地带，所拥有的人口、中心城市以及自由的或几近自由的土地都比较少。欧洲文明只是稀疏地传播到这些辽阔的边陲地区。在这里，战争的进行比西欧更为残酷，并形成了一种处于抢劫和经常性警戒之下的生活方式。波兰作为欧洲的堡垒，比前已提到的德意志受到更大的损耗。

这样一幅历史地理简图远远不是完整的。欧洲不是孤立的。这个大陆并不是自给自足的。随着海上贸易开发世界资源程度的日益发展，欧洲越来越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生存并发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用很大的力量夺得了殖民帝国。欧洲靠着这些帝国的扩张而兴旺起来：1557年，葡萄牙人在经过一段被默许的占领时间以后，正式占有澳门。1565年，米格尔·洛佩·德·莱加斯皮把阿卡普尔科同马尼拉联系起来，这样就为新大陆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之间的贸易开辟了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这些都是帝国开创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但还有其他许多事件，因为并不仅仅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扩展欧洲经济活动的范围。1553年，英国人的船只在他们的“总领港员”理查德·钱塞勒率领下，驶抵北极圈，在阿尔汉格尔建港，向沙皇表示敬意。通过沙皇的保护和照顾，1555年获得特许状的莫斯科公司得以插足俄罗斯的陆路和河道，并由此而染指波斯和东方的财富。

确定了这些时期和地理范围以后，我们的研究就可以转向1559年至1609年之间的欧洲的经济生活了。对物价、货币、生产和人口的一般考察，有助于勾勒出一个发展过程的突出特征的轮廓，而其全部复杂性则难以估量了。

首先谈物价与工资问题。从一开始就应指出，这种包括两个侧面的、传统的史学甚至在过去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也还未能充分解释这一多样化的欧洲经济发展过程。对工资水平总的来说还没有充分精确的了解；有时工资以实物支付，有时又以货币支付，这样就难以估量其真正价值。而且，物价系列代表着供求之间的平衡点的系列，由于没有掌握所有的情况，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从推论中得知。根据现有的材料，将物价与工资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比有希望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样说并不过分，这种研究至多不过是对不断演进中的经济现实做初步的估量，而这种估量大家已经比较熟悉。在从1559年到1609年的这一时期里，物价和工资都是逐渐上升的。虽然在16世纪中叶以前的一个世纪左右，物价就是一直上涨的，但在16世纪50年代以后，上涨的速度快得多，也明显得多。这使当时面临长期经济困难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印象。

猛然认识到那些现实情况，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运用16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的反响来说明这种缓慢的通货膨胀。新大陆的贵金属（首先是黄金，1519年以后又加上白银）通过西班牙首次进入欧洲，而西班牙则首先遇到了这一难题。随着该世纪中叶以后白银涌入的新浪潮的到来，持续通货膨胀的影响就特别明显了。马丁·阿斯皮利奎塔·德·纳瓦罗于1556年发表了《论利息》。这位萨拉曼卡学派的学者，很可能是把通货膨胀原因直接归之于输往欧洲的贵金属的第一人。问题的症结在于贵金属太多。在1566—1568年，即阿斯皮利奎塔的论文发表10年以后，法国爆发了西厄尔·德·马尔斯特罗瓦（Siewr de Malestroit）与让·博丹之间的那场著名论战。前者坚持的论点是，虽然按账面货币额来看物价上涨了，但按黄金和白银来计算物价实际上仍旧保持不变。博丹在他所写的《答辩》一文中，巧妙地推翻了对手的逻辑。他在该文的1568年的版本中说道：“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高涨的物价，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原因（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提到），乃是金银太多，在这个王国里，今天的金银数量比400年

前要多……物价高涨的第二个原因，部分地来自于垄断。第三个原因是物资短缺，而物资短缺的引起，既来自于贸易，同样也来自于掠夺。最后一个原因是国王和大贵族的奢侈，这种奢侈使得他们所喜爱的那些物品的价格上涨。”在英国，出现了《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福利的对话》，该文显然是在1549年秋天写成，但发表于1581年。内容是关于同类问题的对话。

[商人说]我感到，我们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这种情况要延续多久，我说不清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短缺，我从未见到过那样一种普遍的匮乏，不只是本国产的东西短缺，而且我们从海外买来的所有其他商品，诸如丝绸、酒、油脂、大料、茜草、铁、钢、蜜蜡、亚麻、亚麻布、麻纱布、绒料、床单、地毯；以及各种挂毯和缀锦、各种香料、各种杂货，如白色和棕色的纸，以及玻璃饮器、镜子和用于玻璃窗的玻璃；钉、针、刀子、短剑、有檐帽、无檐帽、凸花织品、纽扣和花边等等，全都短缺。我十分清楚，现在所有这些东西，比7年以前都要足足多花费我1/3的钱。而且，所有的食物也都是那样昂贵或者更加昂贵，而就我所知，这里并无货物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我们现在拥有的更多的粮食、牧草和各种牲畜，而且年年都拥有这么多的东西，真得谢天谢地。

他们全都面临同样的难题，而且迟早都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除了关于16世纪“经济学家们”的看法的这一简略概述以外，我们还必须补充历史学家们的看法。路易吉·伊诺第对博丹和马尔斯特罗瓦之间的那场争论所做的估价和观察，很能说明问题。的确，他的研究所考察的是这场争论的实际舞台法兰西的物价，包括“加长了的”16世纪（即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估算固然还值得商榷，但一般说来是有确实依据的。那些估算试图分别显示每一项目对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

表1 1471—1598年间法兰西“实际上”和“名义上”的价格上涨分析（参照路易吉·伊诺第的著作）

时 期	1471— 1472	1473— 1486	1487— 1514	1515— 1554	1555— 1575	1590— 1598
价格指数 (1471—1472 = 100)	100	111.5	106.6	161.6	265.2	627.5
按金银计算的记账图尔 币①实际价值指数 (1471—1472 = 100)	100	91.0	78.8	65.5	51.4	47.7
仅按图尔币贬值 计算的价格指数 (1471—1472 = 100)	100	109.8	126.9	152.7	194.6	209.6
按保持与贵金属等值的 图尔币并估计到其他作用的 因素计算的价格指数 (1471—1472 = 100)	100	101.5	84.0	105.8	136.3	299.4
按图尔币贬值计算的 价格上涨的百分率（马 尔斯特罗瓦的名义价格论）	—	86.73%	—	90.09%	72.27%	35.47%
按包括从美洲输入以后的贵 金属贬值在内的其他因素 计算的价格上涨的百分率 （博丹的实际价格论）	—	13.27%	—	9.91%	27.73%	64.53%

然而，这种计算虽有明确的结果，但16世纪后半期的通货膨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仍未解决。通货膨胀所涉及的领域要广泛得多，因而归根到底，那样一种说明实际上并不恰当。这无疑正是卡洛·西波拉在探讨“所谓的价格革命”时力图要加以证明的；他主张尽量缩小通货膨胀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如果把1559—1609年这段时期看作一个孤立的独自存在的时期，那的确是言过其实的。它实际上从属于远远超出这一时限以外的一个更为广阔而且也更为普遍的运动。这一时期独有的特点在于，各个不同领域的通货膨胀迅速地遍及整个欧洲。在这些年代里，一切都被价格运动所搅乱。在16世纪，这个世界大概是头一次遭遇到规模异常大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牢记

这一事实。的确，正像从《剑桥欧洲经济史》中复印出来的图1的两组曲线简括而明了地显示出来的那样，欧洲不同地区的物价上涨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各种物价并不是遵循着同一种趋势：金属、纺织品和一般工业产品、燃料和一般照明材料、饮料和谷物，各有其单独的价格变动趋势。工业产品的价格和农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这是一个主要的特征——也许是该世纪整个经济的试金石。一切供人们食用的东西，首先是粮食，遭受了最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欧洲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导致了结构和生活习惯两方面的变化，对那些变化将在下文中考察。在这里仅指出不同方面之间显示出来的差异就够了：一方面是食物费用，对通货膨胀极为敏感；另一方面是“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对通货膨胀不那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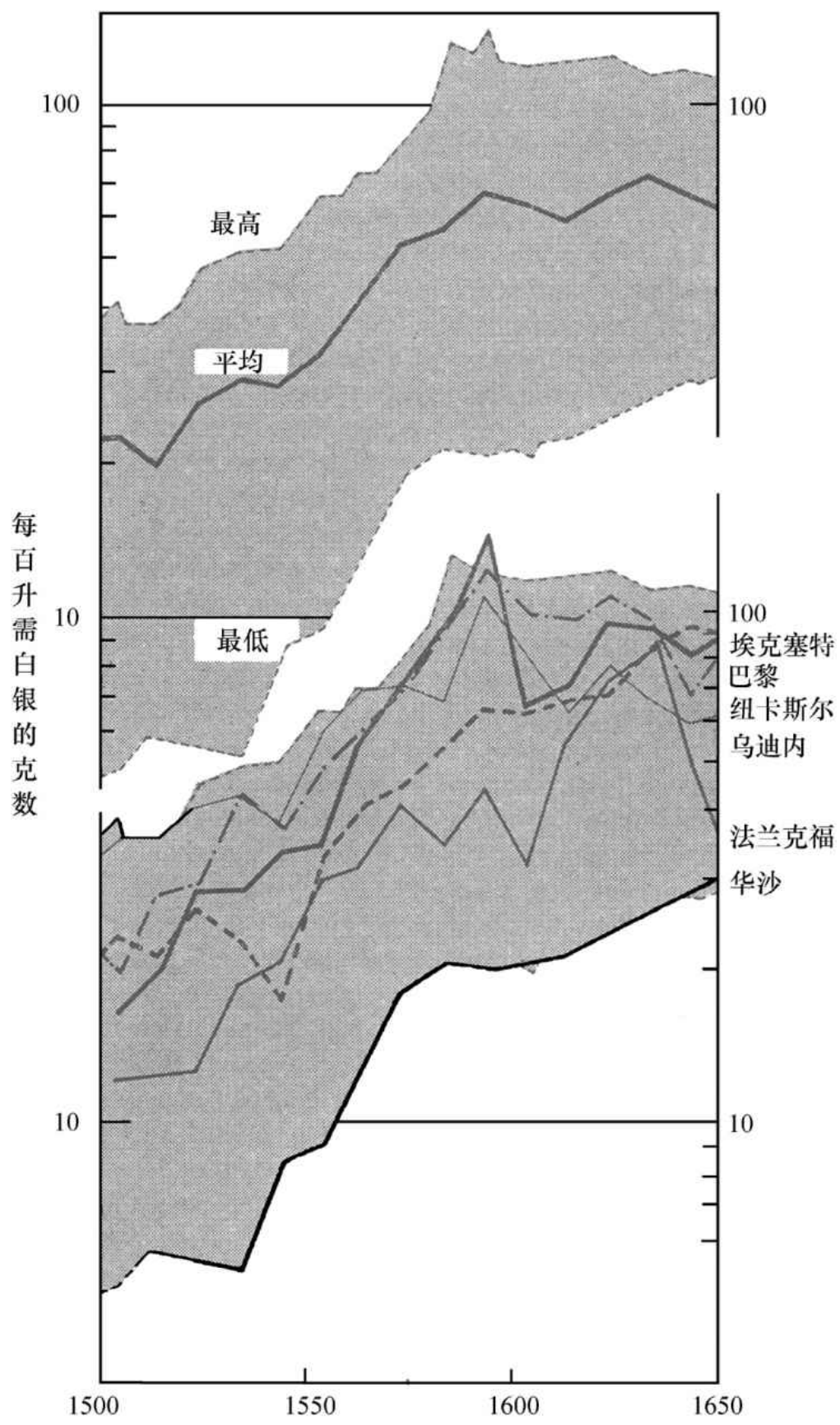


图1 欧洲的价格上涨

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生活水平问题。同我们所知道的多少还算比较清楚的价格变动情况相比，关于工资方面的材料则是远不能令人确信无疑的。仅仅根据以货币支付的日工资率的材料来估算就业率和个人收入的任何尝试，都必然是难以成功的，在雇佣劳动时而以货币付酬时而以实物付酬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一复杂问题上，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估量价格与工资的相互影响以揭示由此引起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方面，他们比前人更为谙熟。16世纪中叶开始的物价暴涨，导致了广泛的工资调整。但是，这些调整根本跟不上、或者很少跟得上物价的上涨。由此就有理由推断，生活水平是普遍下降了。例如，这一事实已从英格兰、法兰西、阿尔萨斯、巴伦西亚、维也纳、奥格斯堡和威斯特伐利亚境内的明斯特的史料中得到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这一事态同另一进程——商业资金的积累和贸易利润的增大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矛盾现象笼罩着整个16世纪，那时的繁荣往往是通过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除了对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估量以外，经济史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仍然是：这一运动对欧洲大陆的普遍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促使欧洲形成更密切的经济统一的压力，而且，这种统一虽然还未完全形成，但在大西洋沿岸各不同地区无疑是已经更为明显了。可以说，这种统一还没有遍及整个欧洲。在先进的西班牙与相对落后的东欧——例如波兰——之间，按白银计算的小麦价格水平的差异在15世纪末为7：1，到17世纪初还没有达到6：1甚或5：1的程度。然而，由价格水平暴涨所推动的趋于统一的压力，刺激了商业活动的全面扩张。这意味着商业资本的集中，而过去商业资本并不享有同样的投资机会。这种统一是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引起的，正是那种差异使得有可能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的确，这种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经济史家们已经证实，国际贸易差额常常是用金银来平衡的。西班牙由于从新大陆运进金银，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商业网络在西班牙半岛遇到了一个货币高压脊，那里按白银计算的价格比较高。在其他国家，首先是西欧边缘的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及其以外的东方国家）——同样商品的价格，就相对低一些。当时存在着一个按冯·

廷南（Von Thünen）的模式分区的辽阔的价格体系，在该体系中，按白银计算的商品价格，随着商品距离西班牙愈远而递减。这一情况经常引起旅行家和作家们的注意。当一位来自圣东日的新教绅士雅克·埃斯普连夏尔于1597年到达克拉科夫时，他注意到了波兰的生活费用只有法兰西的1/4。价格水平的差异刺激了商品的贸易，而且实际上还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让·博丹曾观察到，奥弗涅的劳工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而向西班牙迁徙。而且，较晚一些的历史学家们也说到小手工业者、小贩和流动农民流向西班牙的运动的规模。正是这些农民们使那些荒芜的阿拉贡土地重新有人居住。在卡斯蒂利亚，来自法兰西的劳工据说与宗教裁判所当局发生了矛盾；那些宗教裁判所的记录常常表明，这些可怜的老百姓既成了他们自己的信仰的牺牲品，同时也成了他们为对付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而采取的对策的牺牲品。

然而，如果说16世纪的物价是在连续不断地上涨，那也过于简单化了。这一长期趋势曾由于各种原因而多次被打断。前面已提到，在16世纪中期就出现过40年代和50年代的价格下降。即使在1560年以后，物价上涨趋势实际上也不是平稳地、连续地上升的。例如，歉收和时疫就使得长期趋势受到短期灾害的破坏。在尼德兰，根据W. S. 翁格尔的研究，1556—1557年出现的饥荒，是16世纪内经历的一个最糟糕的冬季；它还使得丹麦、英格兰和德意志西北部均遭受其害，但在瑞典受到的影响就没有那么严重。在锡耶纳，由于受到意大利战争结束阶段的损害，在1557年也出现了灾难性的因货物短缺导致的高价。在法兰西，严重的饥荒出现于1573年，即紧随着一年前的圣巴托罗缪日的仇杀和屠戮之后；在1586—1587年，然后在天主教同盟时期，即1590—1591年又出现匮乏。1595—1597年间出现的因缺货导致的高价，在整个欧洲的广大地域内引起了抱怨。这些匮乏虽然不如下一世纪那样严重，但对国际经济的广大部分仍是严峻的考验。

随着饥荒而来的是疾病、传染病，特别是瘟疫。对饥荒所做的评论在这里也适用：尽管存在着繁荣，但欧洲人的一般的健康和福利却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拥有繁华城市的人口稠密地区，往往成为牺牲品。在意大利，1576—1577年在西西里出现的瘟疫，很快波及意大利半岛。估计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是很多的：米兰死了17329人；热那亚28250人；威尼斯47721人；帕维亚16000人——不过必须考虑到这些数字有某种程度的夸大。根据报道，在1580年，瘟疫在巴黎夺去了12万人的生命，在马赛夺去了3万人的生命。在1565年，汉堡失去了

1/4的人口；1597年又使它失去了6213人。吕贝克在1597年死了7737人。据约翰·斯托的计算，伦敦在1563年的死亡总数20372人中，有17404人死于瘟疫，而且，后来在1593年，在死亡总数17844人中，有10662人死于瘟疫，这些数字大体上是可靠的。这的确是沉重的打击。

除了这些短暂的危机及其对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外，欧洲的商品体系在该世纪末已开始显露出紧张的征兆，表现出不能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在1590年以后，即无敌舰队溃败以后，结构上的弱点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西班牙遇到了根本性的危机；这个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16世纪90年代高峰期之后，金银的输入减少，面临着威力衰退的形势。那样一种危机必然要引起发展速度的减慢，而且必然要对商业体系和挤满欧洲市场的商人的贸易网络产生严重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更深入地考察。

二

价格水平的变化问题，必然引起货币和信贷问题。虽然这已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但是显然它并不只是单纯的金银和货币问题，而且包含着更重要的信贷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这些进程，我们必须返回到本章所讨论的时期以前去，至少应回溯到15世纪。早在那个时期，欧洲经济已经经历着一个缓慢的、几乎难以觉察的黄金升值过程。黄金这种最昂贵、最稀有的贵金属，是用原始的但却是有效的淘采技术生产出来的。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发现了黄金，例如，在莱茵河和塞纳河一带都有发现，甚至在18世纪，这些地方都还继续吸引着小股的淘金者。然而，最重要的产地是非洲。在那里发现的沙金更为丰富；黄金由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运到地中海沿岸，或者通过沿尼罗河河谷的另一条商路运到那里。当葡萄牙人于1474年到达几内亚海岸并通过圣若热达米纳要塞（1481年）保卫他们的利益以后，非洲的黄金贸易部分地但不是全部地被葡萄牙人转移到了大西洋。所有这些因素，在1497—1498年和发现绕过好望角的航路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加强了葡萄牙的经济势力。

然而，欧洲的货币周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黄金，它还靠白银来维持。虽然白银价值较低，但它的生产却较为困难。它的价值随黄金的相对充裕而增长；此种情况又反过来刺激了白银的生产。这尤其在15世纪末给中欧带来了利益，并给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那样的商业金融家带来了惊人的财富。虽然银矿开采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要挖掘新矿井和运用新的提炼方法，都需要巨额的投资。1451年，萨克森公爵准许用铅从铜银混合矿石中提取白银时，德国境内银矿的年产量没有一个能达到1万马克以上的重量。在1530年，有8个银矿声称其年产量达到1万至1.5万马克。这一成就的规模，从乔治乌斯·阿格里科拉的《冶金学》一书中多次被复制的版画可以见其大概。该书约写作于1533年左右，但1556年才在巴塞尔出版。重银币的铸造和流通是这一工业发展的另一证据：塔勒（Taler）银币于1484年在蒂罗尔出现；1500年在萨克森出现；1524年在奥地利出现；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是1518年在约阿希姆斯塔勒出现，著名的约阿希姆斯塔勒（Joachimstaler）银币就是在那里铸造的。

这样，形势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黄金充足而白银相对稀少。这一形势直到16世纪中期的衰退到来以前，没有发生逆转；而那次衰退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显露了国际经济的不同地区之间贸易条件所发生的变化，这类相互关系的变化完全出人意料，并充满着个别的灾难。这类变化在那些长期习惯于来自德国的白银与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黄金进行交易的市场上显得特别严重；那些黄金，更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从非洲，而后又从美洲（它最初以供应黄金为主）转运来的。来自美洲的黄金数量甚大，足以夺取来自几内亚的较为昂贵的黄金的市场。然而，随着16世纪后半期的到来，银矿在新大陆也开采起来，首先是在墨西哥北部的不毛之地：在萨卡特卡斯（1546年）、孔波斯特拉·德·拉·瓜达拉哈拉（1553年）、索姆布列特（Sombrete）、杜兰戈（1555年）、特雷斯特里罗（Trestillo）（1562年）、帕拉尔（16世纪末）。然后，在秘鲁，波托西山脉的惊人的丰富矿藏于1543年被“发现”了。用水银处理矿石的方法[混汞法，或者如墨西哥人所称的帕提奥（Patio）法]从1556年起在墨西哥开始采用（实际上有效地采用是在1562年以后），1572年以后在秘鲁采用（有效地采用是在16世纪80年代）。这一方法的采用，使得运到塞维利亚的码头和库房的白银数量不断增大。如图2所示，白银数量确实增加了；该图是根据厄尔·J. 汉密尔顿的经典著作绘制的，他把这些输入的最大值置于1591年至1600年的10年之间。然而，于盖特和皮埃尔·肖尼却把这一峰值置于下一个10年，即1600年到1609年。这可能是对的，但还没有被确定无疑地证实。

简言之，在本章所讨论的时期之内，国际经济处于白银升值的阶段，它的第一个后果是使德意志矿山的繁荣遭受严重的打击；它们实际上再也没有从16世纪30年代就已十分明显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其次，从整体来说，它刺激了欧洲的经济。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黄金价格迅速上涨。这两种贵金属实际上改变了地位，现在黄金逐渐从流通领域中消失。黄金价格的上涨是一种长期性事态，它对国际经济的全部影响，直到下一世纪开始时才被人们感觉到。然而，情况的变化在安特卫普的市场上很快就敏锐地反映出来了，因为那里的市场涉及这两种金属之间的调整。这一形势在其转折点上的特征，已被安特卫普的英国皇家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注意到。他在1553年12月20日写道：“这里没有金英镑，这是在安特卫普的市场上从未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这里除了西班牙人的里亚斯

（ryalls）银币以外没有别的支付手段，至于安吉尔（angelles）金币和索弗林（sovereynes）金币，这里是得不到的……因此兑换价非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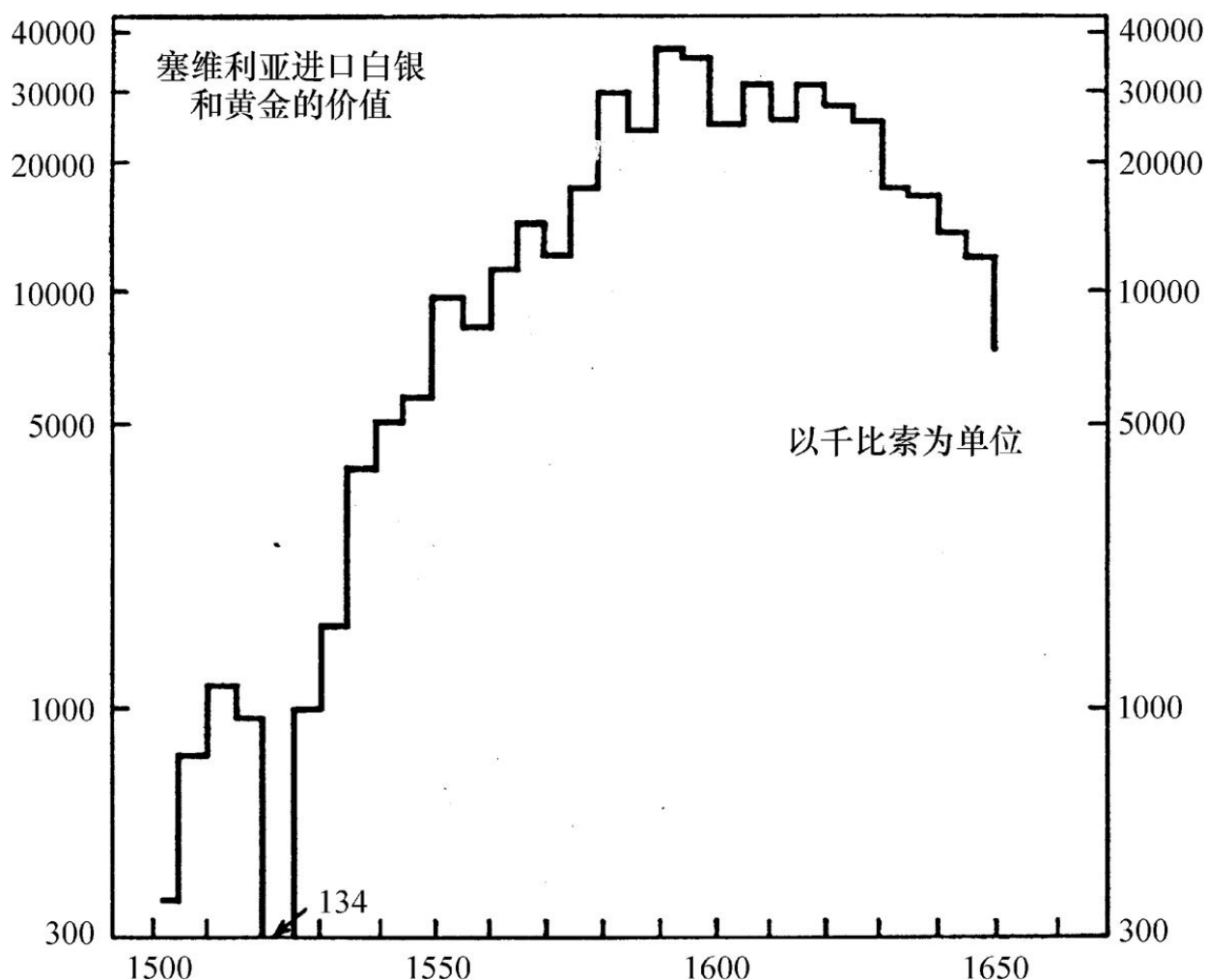


图2 塞维利亚金银锭的进口（据E. J. 汉密尔顿的著作绘制）

在这个阶段，西班牙成了贵金属周转中的无敌的主宰。它从海外获得大量的白银，还有黄金。虽然它所获得的黄金在重量上与来自新西班牙和铁拉菲尔梅的白银不能相比，但那些黄金毕竟使西班牙得以保持其欧洲黄金主要供应国的地位。西班牙实际上成了欧洲的金银保险库。与它形成对照的是，在经济上占有相当地位的其他国家，不论远近，都面临着如何参与争夺从西班牙再出口的金银锭的问题。为了把新大陆的财富保留在自己手里，西班牙原则上关闭了它的边界，但只不过是原则上关闭而已。黄金和白银很快就找到了外流的途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出现贸易逆差。对于这一点当代人仅仅有一些

模糊的认识。西班牙在肉类、小麦、衣料和其他制成品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它的食盐、羊毛和油脂的输出，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为饥饿的殖民地购进的商品。

这种矛盾现象在那些表面上获益最大的国家表现得最为严重。在17和18世纪，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其他国家，都引起了经济学家和顾问们的极大注意。他们无休无止地探讨这个问题：金银并没有创造财富。不过，还不应把西班牙的情况描绘得过于暗淡。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和托莱多，甚至在像昆卡那样的一些农业中心，西班牙的纺织业在16世纪末以前还没有丧失活力；到了大约1590年，西班牙才终于不得不打开它的国库，允许金银外流。如果我们采纳费利佩·鲁伊斯·马丁（Felipe Ruiz Mortin）的结论的话，就可以说，从那时起，从前曾把一部分利润投资于经营西班牙工业品的国际大商人和金融家，改为以硬币甚至金银块的形式输出他们的利润。白银的输出已变得十分方便了。

这些输出增加的原因，可以在西班牙的帝国政策里找到。由于1580年占领了葡萄牙，西班牙更深地卷入了广泛而费钱的大西洋政治活动之中。无敌舰队溃败以后，西班牙逐渐丧失其制海权。它不得不收缩活动范围，在成为欧洲大战场的低地国家去巩固它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它的前途被卷入欧洲强权政治的困扰之中，被卷入在德意志、波罗的海国家、英格兰、爱尔兰的角逐之中；在动乱的法兰西也同样被卷入。为了支持这一场巨大的争夺，它不得不筹划向低地国家支付巨额款项。在那里，安特卫普仍然是欧洲的巨大银行业中心之一，尽管已笼罩着战争的徒劳无益和胜负不定的阴影。那样的贷支，只有不断以巨额白银偿付军队费用并偿付市场到期应付的汇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实际上，不定期地运到塞维利亚交易所的金银，很快就按照一种预定的时刻表扩散到包括安特卫普在内的一些欧洲市场。这些不定期的舶来金银，通过借贷和汇兑转而连续不断地外流，特别是根据合同，即马德里的商人与西班牙国会之间的借贷合同。要维持这样的往来，就只能靠着汇票的“流通”和将白银从巴塞罗那护送着穿过地中海运往热那亚销售，因为1569年以后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航线对西班牙实际上已是半关闭的了。热那亚的银行家对于这种金融活动颇为擅长。他们控制了使用硬币和纸币的巨额交易，组织了与此相关的贸易安排。大约在1570年以后，热那亚人的鼎盛时期开始了，^[1]由此发端的一个世纪内，他们取代了富格尔家族的优势；富格尔家族在金

融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在1530年以后已随着德意志矿山繁荣的消退而衰落下去了。

白银从西班牙流出的途径，除了上述那些以外，还有走私。无疑，走私长期起着作用，这样说并未夸大其所占的重要地位。走私金银通过走私者的真正乐园比利牛斯山道从西班牙流入法兰西。驮着金银的骡队，翻山越岭，来到图卢兹、圣让—德吕兹和那个著名的仓库城巴约讷，那是一个巨大的走私中心；这样就使走私成了一项重要的活动。黄金和数量更大的白银，通过那些途径经常不断地流动着。

其结果是使得欧洲的货币体系坚挺起来。原来，特别是从1540年和16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硬币成色降低，由于铜银混铸的小硬币的泛滥而造成的困难，所有或几乎所有那些货币体系，都曾遭到灾难性的损害。这些劣币充斥市场，把成色较高的硬币排挤出了流通领域。这种局面曾十分严重，例如在汉堡地区就特别明显。在法兰西，著名的退斯通银币变成了成色低得多的杜赞（douzains）合金币。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在位时也遭到货币成色大为降低的损害；爱德华六世在位时，这种损害甚至更具有灾难性。随着西班牙白银支付量的增加，这些紧张局面普遍得以缓和。在法兰西，1553年以后恢复了退斯通银币的铸造；随着银法郎在1575年出现和1/4埃居在1577年出现，16世纪后期重银币普遍流通起来。联省共和国虽然与西班牙敌对，仍然愿意接受它的白银：联省共和国的里吉克斯达耳德（rijksdaalder）银币重29.28克，出现于1583年。不过，正如可以料想到的那样，最突出的成就仍旧属于西班牙的硬币。同1537年首次流通的埃斯库多（escudo）或皮斯托勒特（pistollet）金币一起，里尔银圆也大量出现，那是一种分量最重的著名的西班牙银圆，流通于整个欧洲。保罗·拉沃（Raveau）的研究表明：在普瓦图，从1575年以后，里尔银圆在那里大量流通，虽然那个时期法兰西的货币体系特别有利于银币流通。而且，同样的银币还随着西班牙的军队为了给腓力二世赢得人们的忠顺而进行的征战，涌流到了低地国家，既涌进了效忠的地区，也涌进了反叛的地区。从意大利的一些大港口——热那亚、里窝那、威尼斯——而且不仅从意大利，还从大港口马赛，那些银币渗流到了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各国）的市场，并从那里流到远东：在中国，商人们对那些银币欣然加以接受。

然而，这些硬币无论是投入流通领域的还是存入金库的，都并不代表16世纪的整个货币体系。除了实价硬币外，所谓记账货币也占有重要地位；同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记账货币的作用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这些虚值的信用性记账货币在不同国家有其特定的名称——在英格兰是英镑，在法兰西是记账图尔币，在意大利是各种里拉，在新卡斯蒂利亚是马拉沃迪，在佛兰德是盾。通常都用这些货币单位记账。当然，这些记账货币可以换算成实际的金银硬币，但兑换率并不固定。简言之，它们的实含价值是可变的。任何变更都必然标志着深刻的经济活动和结构的变化。

那时，理论家们已觉察到这个问题，1566—1568年在西厄尔·德·马尔斯特罗瓦（Siewr de Malestroit）和让·博丹之间的争论提供了这方面的充分的例证。人们通常归功于博丹，认为是他明确地提出了详尽的货币数量理论，并断定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是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马尔斯特罗瓦也并不是全错。应该说，在开始时，记账货币的膨胀，并不完全是紧随按贵金属计算的价格上涨而出现的。两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名义价格确实比其他价格远为敏感。实际上，必须把记账货币看作是代表着一个地区的交易水平，一种有着某种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经济体系的水平，并且代表着其收入能够抵偿其消费的程度。如果在某一特定经济中，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在国际上失调，其货币体系就会产生一个脆弱的因素，贬值也就接踵而来。因此，不同的记账货币，按白银之类的国际通货来衡量，如果发生相对地位的变化，就明确无误地表明，已发生了失调和内部经济局势的恶化。这些变化说明，欧洲经济的不同部分不仅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相对地位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体系：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仍然是稳定的，其余的则发生了货币贬值。表2列举了若干种主要货币地位的变化，对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概观：

表2 1530—1614年欧洲若干种按白银计算的货币贬值指数

地 区	所计货币 名 称	1610—1614 年 银价指数 (以 1530—1539 年为 100)
新卡斯蒂利亚	马拉沃迪 (Maravedí)	98.03
符兹堡	结算盾 (Rechnungsgulden)	91.87
那不勒斯	卡尔里诺 (Carlino)	87.34
法兰克福	结算盾 (Rechnungsgulden)	84.06
奥格斯堡	结算盾 (Rechnungsgulden)	83.02
奥地利	记账盾 (Rechengulden)	76.33
波兰	格罗希 (Grosz)	75.71
英格兰	英镑 (Pound sterling)	72.59
威尼斯	里拉 (Lira)	69.72
热那亚	里拉 (Lira)	67.71
法兰西	记账图尔币 (Livre tournois)	66.57
斯特拉斯堡	镑 (Pfund)	62.97
荷兰	盾 (Guilder)	60.13
西属尼德兰	盾 (Florin)	46.55
土耳其	阿斯贝尔 (Asper)	44.19

西班牙的货币直到该世纪终结时仍相当稳定。但是，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包括南北两部分）的币制则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它们为内战的动荡付出了沉重代价。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就常将白银的价格定得很高，因而在16世纪后半期，随着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增多而引起的变化，必然大为失利。

然而，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所需要的黄金和白银越来越多。但是，正如前面已提到的，黄金和白银运达塞维利亚交易所的数量，在1591—1600年这10年间达到了最高点。不过，金银大量流动的迟滞，比其实际数量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在这方面还必须充分估计1581—1590年这10年间的情况；那个时期，以10年为期而计算的运进金银块

数量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峰值。换言之，从1590年前后的困难年代起，运进的金银数量已停止增长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16世纪末经济变化速度的放慢而在欧洲开始出现的货币状况在17世纪是很常见的。当经济仍以较低的速度继续发展并且所需要货币量仍在不断增长的时候，货币的供应却开始迟滞起来，然后竟衰落下去。出现了一种迫切的需要：要求弥补现存流通手段的不足，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对待信贷手段，并转而采用低质硬币；先是铜银合铸的，后又变为纯铜的。这种货币的流通量日益增大。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著名的维塞尔银行，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各种低质币的混用而引起的困难，因为这种混乱状况已妨碍了大规模的贸易。

这种新形势首先在西班牙明显起来。在1596—1597年的危机和破产之后，政府转而铸造铜币。在1599年到1606年之间，价值2200万杜卡特铜币从西班牙的铸币厂发放出来（每个杜卡特相当于375个马拉沃迪）。对经济体系的这一干扰，产生了直接而严重的后果，甚至一个世纪以后，西班牙人还把这一货币政策视为一场最严重的灾难。欧洲其他国家也未能免遭同样的困难，不过在西班牙产生的影响使它们较为谨慎起来。法兰西就是一个实例：它从1577年以来已在铸造纯铜币，但在1608—1609年，面对新的形势，王室官员们对这一问题持审慎态度。同样的经验也提醒了瑞典、北德意志、低地国家的主管当局；其他一些国家——英格兰、威尼斯、葡萄牙（1640年前属伊比利亚集团）——面对铜币膨胀的局面更加无比地审慎。

信贷是一种更为重要的通货膨胀的力量，虽然它并不总是有成效的。欧洲的信贷规模自然是交易水平的一个函数。货物的流通、贸易收支的不断结算，全都需要信用，最终需要信贷，虽然正如考察记账货币的贬值时已经指出的那样，信贷体系向来离不开巨额的金银储备。16世纪末在欧洲流通的大量流通汇票，就是这一事实的证明。这些需求因更加广泛地使用较为先进的手段而得到满足，如汇票背书、再贷款协议（在汇票兑现前的流通期内提供短期信贷）和公共银行。这些发展，虽然在本章所述时期之末已经明显，但确切地说它应属于17世纪初期。

从另一方面来看，信贷的范围同贸易的网络，同遍及整个欧洲的港口、市场和集市上的商人的交往，是紧密相连的。热那亚的商业金

融家们的活动是一突出实例。他们立足于欧洲的传统中心意大利，并卷入了西班牙在大西洋的大规模的冒险事业；通过其遍及整个大陆的代理人，他们形成了一些沟通的渠道，国际经济重心从欧洲的南部向北部和大西洋的转移，就是通过这些渠道实现的。这样，他们就为荷兰的非凡成功开辟了道路。

荷兰实际上成了欧洲的一个有名的避难所。1579年的乌得勒支盟约第十三条宣告了宗教宽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因为到荷兰来的避难者自动地带来了早已建立起来的遍及整个欧洲的关系网。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饱受劫掠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突出实例。葡萄牙的犹太人首批直接抵达阿姆斯特丹，是在1598年或1597年末；到1609年其数额达200人。到1630年，阿姆斯特丹大约共有1000犹太人。他们带着自己的财富和经商的才干增添了北欧商业国家的繁荣。但确切地说，那样一种迁徙已成了整个欧洲范围的现象。从里斯本的有钱的门德斯家族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这一巨大运动的一个实例；他们于1536年途经伦敦、安特卫普、里昂、威尼斯和拉古萨，最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商界和金融界立足，其中一人就是后来的纳克索斯公爵，他闯出了一番惊人的事业。犹太人的扩散和其他人的迁徙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出色的遍及大陆的家族和商业关系网。

三

虽然价格、工资和贵金属问题有其特别的重要性，但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是总的供求关系问题。总的有效需求，首先是在一个传统的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表现出来的一套需求和需要，而那样的社会结构不容许有什么变化。其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存在不足之处、没有灵活性，而且发展中的障碍也很少得以克服。确切地说，这些结构总是使得人口的流动成为需求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在整个时期，人口因素起着决定作用。

从现有材料来看，欧洲的人口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期甚至中期，肯定是增长的。大约到17世纪中期，一个普遍的衰减过程开始了。在本章所讨论的一个短时期内，不可能对人口的增长做出一个精确的估计，特别是由于数量上的比较是极为概略的。按照历史学家们的估计，1450年左右，欧洲人口有5000万—6000万；1600年左右有8000万—8500万，不过约瑟夫·库利舍估计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洲人口高达9500万。这样，这些估计提供的增长数字是一个半世纪里增长了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大约增长了一半），亦即年增长率只有大约0.3%，小到几乎觉察不出来。然而，那是一个累计递增的数字。它给人们的物质生活甚至非物质生活中所取得的进步提供了力量。实际上，人们已经指出过，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三代人之间，欧洲增加的人口约在1000万人。这里所说的欧洲仅限于这样一个狭窄的大陆，即从大西洋到通常所说的界线乌拉尔山脉，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地中海，不过它只从理论上说是一个整体。除了这个区域外，还必须加上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其人口在1600年时按保守的估计大约有800万。总起来看共约有9500万或至多1亿人口。这就是说，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英里25人。在当时，这样的人口密度是非常高的。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口可与衰落的中国相抗衡而有余；那时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据估计约有5600万到6000万人口。按一种确有夸张的估计，欧洲约占世界人口的1/5，这些人口构成了一个稠密而富有生气的人群。

虽然不能说人口的密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中对一切都起着决定作用，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因素。首先，经过一个世纪的增

长以后，到16世纪末期，欧洲在世界上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活力。欧洲的人力是充裕的，城市、战争、殖民帝国以及甚至16世纪后半期的扩张，都是靠着这一人口资源来支持的。较多的人就意味着有较多的工作人手，意味着在分配货物与人力的道路上有更为频繁的流动，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信贷也显著增长起来。在整个16世纪期间，价格水平可能增长了5倍。而价格的上涨和贵金属支付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毕竟是由于人口显著增长的结果。

在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中，人的劳动能够成为价值的衡量尺度。欧洲诸国可以按照这个尺度来加以分类。尤利乌斯·贝洛赫已对16世纪末欧洲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做过估量。首先是人口规模。1600年左右，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德意志（约2000万）；然后是法国（其面积比现在稍小），有1600万；意大利为1300万；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合并）至多100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占的数字甚小——450万；苏格兰和爱尔兰为200万。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为140万，其中丹麦占60万。波兰的四个省，按贝洛赫的估计约拥有300万居民，不过，对一个面积较大的波兰（包括立陶宛）的人口所做的较晚些的估计，认为有80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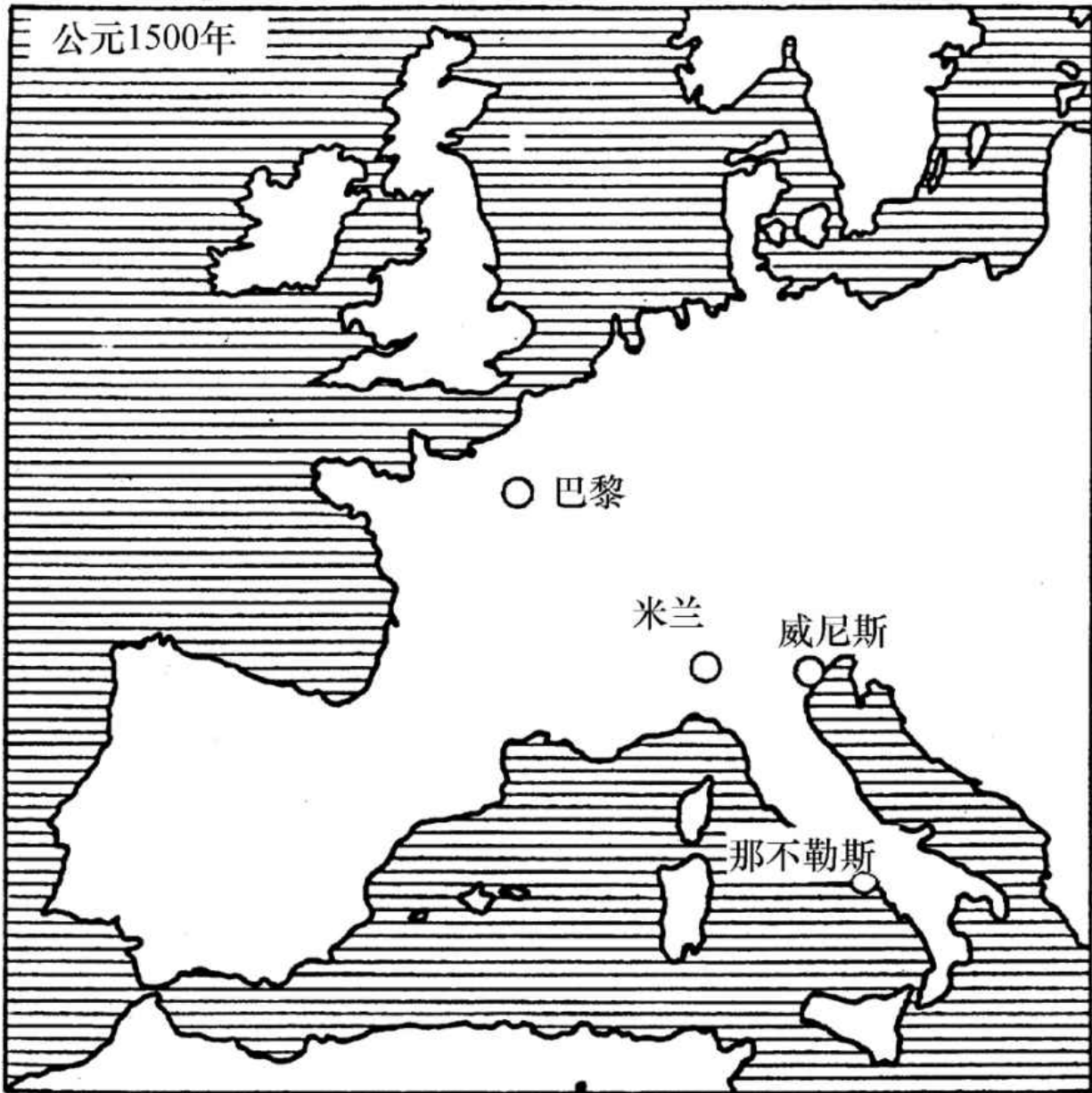
然而，从不同国家的人口密度，又得出另一种分类。意大利名列前茅，每平方英里为114人；其次是低地国家，104人；法兰西为88人；英格兰和威尔士为78人；德意志为73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最低，只有44人。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世界霸权角度来看，这最后一个数字是最引人注目的。不过该半岛山峦重叠，气候干燥；向外迁徙对降低人口密度必定起了作用。威尼斯驻里斯本大使于1572年给元老院写道：“在葡萄牙省，只要该地人口还在流向印度，人口就很难超过现有水平。”这种看法同样可以适用于西班牙。

这些关于人口密度和数量的数字似乎不大，至少从现代眼光来看是这样。但是，对16世纪的价格革命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如果按20世纪的眼光来看的话。一切都是相对的，16世纪必须首先按它自己的范围和活力的限度来判断。这样来看，拥有1600万人口和每平方英里88人密度的法兰西，显然就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蕴蓄着一种爆炸性的力量。意大利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它的人口密度更大。这意味着人口压力通过移民只是部分得到缓和，虽然压力的程度难以估计。这些

较小的数字绝不能视为无关紧要（16世纪期间从西班牙到美洲的移民每年为1000人）。这些数字标志着普遍增长过程中所固有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在城市中并非最不严重。

在1500年的欧洲，大约有五个城市拥有10万左右或更多的人口，它们是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和君士坦丁堡。到1600年，巴黎和那不勒斯已跨入拥有20万以上的人口的行列。在拥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除了威尼斯和米兰，还有另外七个：伦敦、里斯本、罗马、阿姆斯特丹、巴勒莫、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这些城市在这个世纪期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港口，特别是其中五个位于大西洋海岸。至于君士坦丁堡，则是一个特例，在该世纪末，它宣称约有40万人，实际可能多达70万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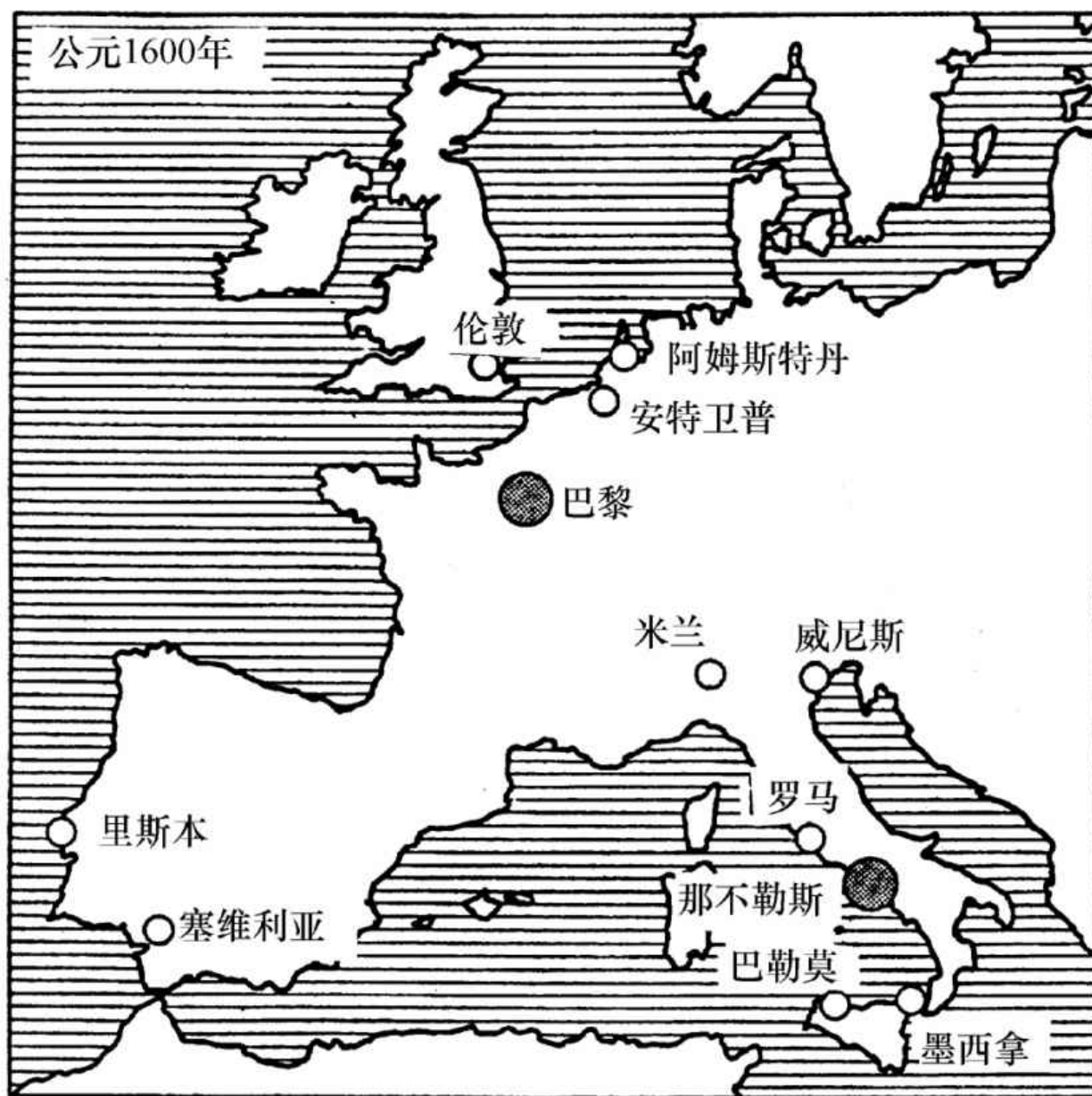
关于欧洲大城市的其他情况，见地图1和2。这些大城市的发展，促进了16世纪的长期而繁荣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这些城市都还没有达到大都会的水平。伦敦的大兴旺只是随着19世纪的到来才开始出现。



地图1 公元1500年欧洲的中心城市

关于城市这一复杂问题，还有许多可以谈的。城市并不都是属于同一等级。在16世纪，巴黎和伦敦从木材建筑的城市变成了砖石建筑占优势的城市。据传詹姆斯一世曾说，发生了“从木头到砖头”的变化。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城市的出色成就，我们就会看到伦敦是怎样成功地推行了宗教改革；并看到尽管1594年亨利四世凯旋进入巴黎，而巴黎仍然占了上风，因为那位国王已经“接到了训令”，接受了“绝对必要的条件”，即天主教会。这些生机勃勃的城市，乃是它们为之服务并起主导作用的那些巨大经济体系的极好明证。里斯本的居民很

快达到了10万，然后，像皮埃尔·肖尼指出的那样，从该世纪中叶就平稳下来。与此相反，在1530年据称有73522人而在1594年有114738人的塞维利亚，在17世纪还在继续发展，直到它再也不能阻止在美洲的大好时光的消逝和流入西班牙的金银之河干涸为止。



地图2 公元1600年的欧洲中心城市

然而，人口的变化并不总是像最初所想象的那样有利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就会使流浪者和盗贼也增多，他们在社会 and 法律的边缘上生活；人口增多还会使得对就业的需求增大，而这又产生出另外一个难题。简言之，人口的增长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也掺杂着负担和不便。可能正像阿尔弗雷德·索维（Sauvy）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速度）遵循报酬递减率，经历一个减缓的过程。在17世纪，欧洲的人口集中过程在不同地区都或迟或早地遭遇了严重挫折，西班牙尤为突出。在16世纪末，欧洲已成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地方，最稠密最富足的西欧国家尤其如此。像产业革命那样的技术革命也许能够拯救这一局势，但它发生在两个世纪以后。换言之，可能是生产水平未能达到所要求的高度，不能满足人口的需要。其结果是，供应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

四

归根结底，16世纪国际经济的症结在于生产如何能适应急剧增长的需求。这就需要对欧洲的生产量和生产率做一考察。

首先就农业这个第一部门来说，对生产数量的估计是不完备的。此处或彼处有一些样例，但它们只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和重要性。较新的成果之一，是汉斯-赫尔穆特·韦希特尔对16和17世纪东普鲁士一些地产的研究。它显示出不同种类谷物所占的相对地位：小麦仍旧是奢侈品，黑麦是基本的商品，大麦和燕麦是具有次等地位的春季作物。每公顷（略小于两英亩半）的平均收成是：小麦870公斤；黑麦760公斤；大麦700公斤；燕麦仅370公斤。较高的收成无疑是存在的，但那一般是例外情况。总的来说收成是中等的，因为谷粒一般比今天的小，播种较密，而取得的收成也比今天的低。实际上，如同对东普鲁士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收获量与播种量相比一般是很低的——4：1，5：1或6：1。而且，由于需要留给下一季播种的种子量大，这就大大减少了可用于直接消费的粮食。微薄的收成是农业的真正障碍。耕种面积可以扩大，但每当收获总量由此而增加时，平均产量却总是随之而降低。汉斯-赫尔穆特·韦希特尔的研究，对这一情况揭示得十分清楚，正如根据他的研究而做出的图表所显示的那样，它着重耕种面积与收获率之间的对照，也提示了增加谷物产量的困难。

谷物——面包毕竟是欧洲的基本需要——方面显示出来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畜牧业方面的情况，这一部门在没有人工培植的牧场的情况下，也不能满足对肉类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在16世纪大都还不知道培植人工牧场。因此，除了东欧和巴尔干的平原以外，欧洲的畜群稀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有一个方面在16世纪时的情况是良好的：养猪业有了巨大发展，因此，以各种方式保存起来的猪肉的消费量，也大为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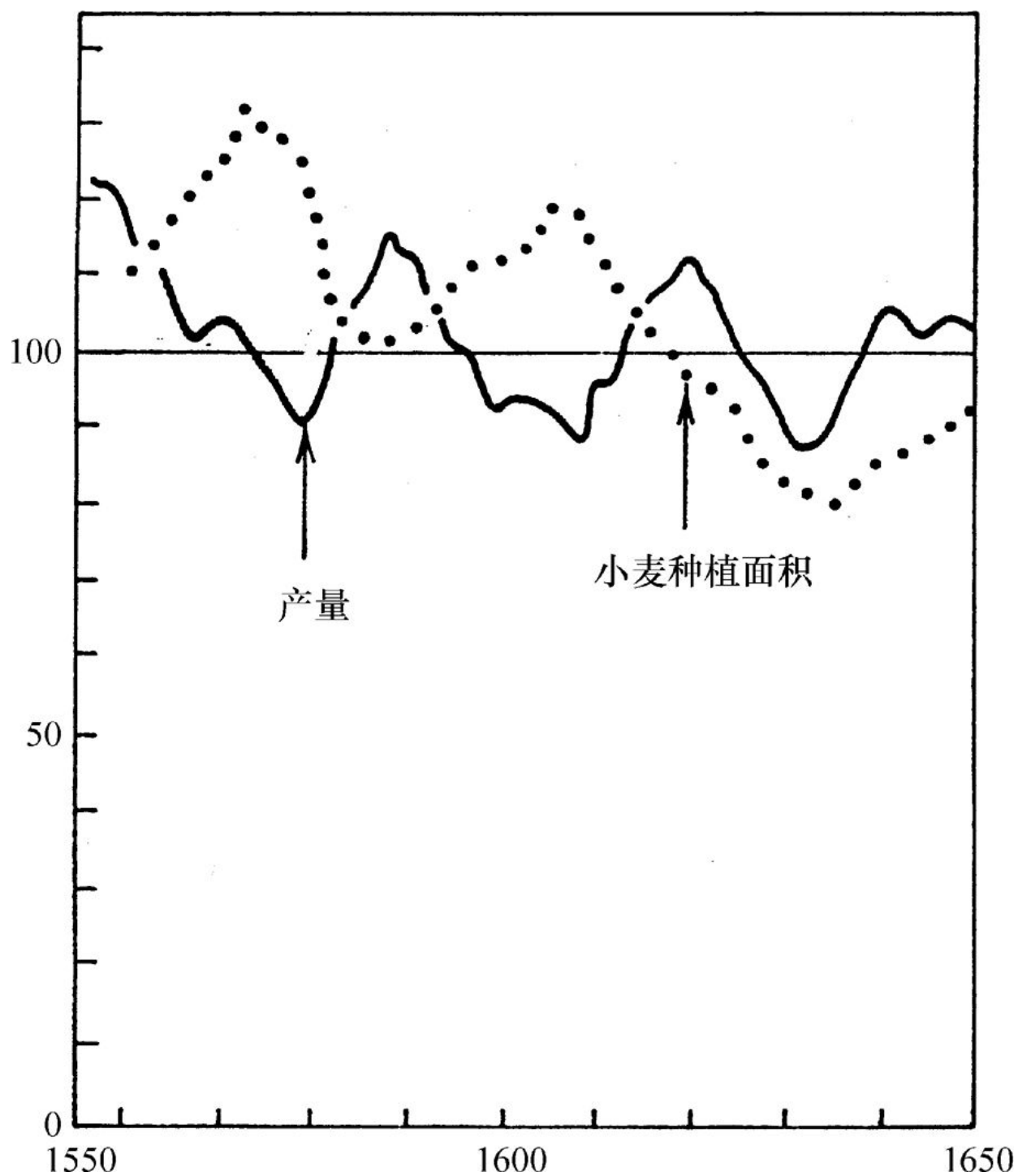


图3 在东普鲁士粮食产量
(根据H-H. 韦希特尔) (基数: 1549—1697=100)

总之，无论从农业还是从畜牧业都可看出，16世纪明显地受到种种局限和障碍的阻滞。按一般常规来看，如果每人每年的粮食——小麦或黑麦、或小麦和黑麦的混合粮——最低消费量为300公升，那么欧

洲每年约消费300亿公升谷物。或者，如果采用欧洲人口为8500万这个较小的数字来计算，则消费量为255亿公升。同样也很明显，欧洲的需要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这个时期的记载，充满了对饥荒和高价的怨言。粮食产量显然不能充分满足需求。

在过去，历史学家们曾付出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小麦的巨额交易，16世纪的趋势促进和扩大了这种交易。在16世纪期间，大批的小麦和黑麦船货从波罗的海输出，运往低地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1590年的危机之后，从北欧输出的粮食渗入地中海地区，从直布罗陀到热那亚，到里窝那，到威尼斯。这一交易由巨额的白银来支付，通过安特卫普的交易所结算，安特卫普是这些金融业务的中心；而阿姆斯特丹则承担了这一大宗货物的贮存和装运业务。小麦还从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输出。这些粮食的长途和短途运输，在许多文件中都有记载。这种运输是极为重要的，但其总量只占欧洲需求的一小部分。海路的装运量大约占粮食总消费量的1%或2%。粮食问题仍旧主要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城市和乡村所需粮食一般都是在短距离范围内解决。引人注目的小麦货运量，与欧洲的总需求相比，终归不过是一种无关大局的现象。然而，歉收和饥荒的年代就会使这种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压力在17世纪要大得多，简直无法比拟。

类似的形势也存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联省共和国的显著成就之中，这些地方专门从事肉牛和食用脂肪的生产。咸肉、奶油和干酪是一些地区大产业的基础。从地理范围和社会影响来看，这项生产的规模仍旧是有限的。对于捕捞青鱼和鳕鱼的远程渔业，也可以做出同样的结论。捕青鱼在多格滩进行，捕鳕鱼在纽芬兰近岸海域进行。这些鱼确是一项重要的食物来源，虽然助长着奢侈，但即使在欧洲内陆的斋戒期内也是颇受青睐的。纽芬兰近海渔业的发展增加了某些食品的供应，不过在17世纪以前鳕鱼的消费似乎还未显著扩大。

至于工业——手工业和手工工场——我们也仅仅知道一些局部情况。矿场，铸造场和钢铁锻造场的总产量仍不清楚。甚至纺织业那样的著名行业，使用的原材料和织出的布匹的总量也无从知晓。对农业所做的估计也适用于工业。虽然可能对欧洲的粮食消费总量做出一些合理的估计并得出一个近似的数据，但是这只是适用于那些需求弹性相对较低的商品。广大群众对铁和衣料的消费情况则不相同。人们常常喜欢依据那些对特别成功的实例所做的研究结果来估计，这样做是

靠不住的。例如呢绒生产虽然拥有集中的工匠和手工工场，但也由遍布乡间的家庭工业来进行——如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就是这样。而且，他们生产的往往都是高档产品。16世纪末，威尼斯年产2万匹纺织品都是奢侈品。塞哥维亚（1580年左右年产1.3万匹）或科尔多瓦（1566年左右年产1.7万匹）的纺织品，像坚挺的英格兰织物一样，都是优质产品。冈纳·米克维茨（Gunnar Mickwitz）指出，在16世纪末期的里加，来自英格兰和荷兰的纺织品，尤其是丝织品，都是供有钱的顾客享用的，农民则只能满足于粗劣的当地织品。同样，在西班牙，整个16世纪期间流行着农村织成的阿拉贡布（即提花灯芯绒），而且像位于曼卡地区中心的小城昆卡产的纺织品那样的本地衣料，用量不断增加。几乎不可能对社会较底层的各种不同的顾客加以重视，他们总是习惯于穿着本地产的甚至家庭织的亚麻布和大麻布。在法国，农民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使用粗呢绒。这样就很难对欧洲居民消费的毛织衣料或棉毛混纺衣料的总量做出估计，尽管对有限的奢侈性纺织品市场情况知道得比较清楚。工业还没有真正为群众性的消费而进行生产。工业还无法提供处于生存线边缘的穷人也能买得起的较低的最终价格，而处境暗淡的人民群众在当时是被限制在生存线边缘的。虽然这一论断主要只适用于所考察的那些方面，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

其次，这些工业还没有集中起来。每个经济区域大体上能自给自足。以西班牙为例，它本身拥有矿山和铁工场，白银矿和水银矿，盐场，造船场，硝石、火药和军械制造业；还有一整套纺织工业，既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甚至像塞哥维亚、托莱多和科尔多瓦那样的大城市也从事纺织业。然而，某些需要不能从当地得到满足。海盐为南方诸国所垄断，大量的盐销往英格兰（那里的盐价高昂无疑鼓励了煮盐业），销往尼德兰、德意志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盐是从塞图巴尔或圣卢卡尔启运，或者从法国境内的“港湾城”布鲁阿日启运，经海路到达那些地方的。与此相似，锡、铅和铜则是北欧诸国和德意志（它的白银财富在1530年左右达到极盛期）的垄断商品（匈牙利除外）。腓力二世甚至认为可以通过食盐封锁迫使反叛的低地国家就范，但其结果只是迫使反叛者从委内瑞拉海岸的阿拉亚开发美洲食盐。[\[2\]](#)

所有这些产品在重要市场上竞争激烈，除非它们特有的质量事先就决定了特定的顾客范围。威尼斯生产精呢绒和优质丝绸，铁拉菲尔

梅却生产次等的纺织品。英格兰的粗呢经由威尼斯行销到地中海东岸诸国，但通常并不与威尼斯的精美呢绒竞争，因为后者具有另一种特色。佛兰德境内的翁斯科特产的斜纹哔叽和细布也是这样，它们虽然与南德意志产的麻棉粗斜纹布一起在市场销售，但并未取代后者。16世纪的发展可能扩大了工业的分布，同时保存和恢复了旧工业。然而例外情况却证实了这样一条规律：欧洲工业分布的范围很广。后来，在17世纪，工业——我们的评述只限于这个部门——逐渐集中到一些比较有限的地区。

到处都在发展工业已成为规律，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从某些实例中逐年地追溯这一形势。例如，伦敦的短纤维呢的出口，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降低币值时期曾特别兴旺，到该世纪末又恢复到了同样的水平：在1598—1600年间平均年输出量为103032匹。威尼斯的呢绒，1540—1549年平均产量为8563匹，1600—1609年上升到22428匹（见图4）。在联省共和国的莱登，有另一桩可观的增长事例：1587年产斜纹哔叽23047匹，1610年增长到45557匹；1589年产粗斜纹布1200匹，1610年上升到14522匹；1600年产平滑短绒布2389匹，1610年上升到2726匹；1574年产床单布250匹，1610年上升到1422匹；1584年产台面呢3033匹，1610年上升到8202匹。实际上，莱登的总产量在1/4世纪里增长了1倍。

表3 威尼斯纺织品平均年产量

年 代	匹 数
1540—1549	8563
1550—1559	13240
1600—1609	22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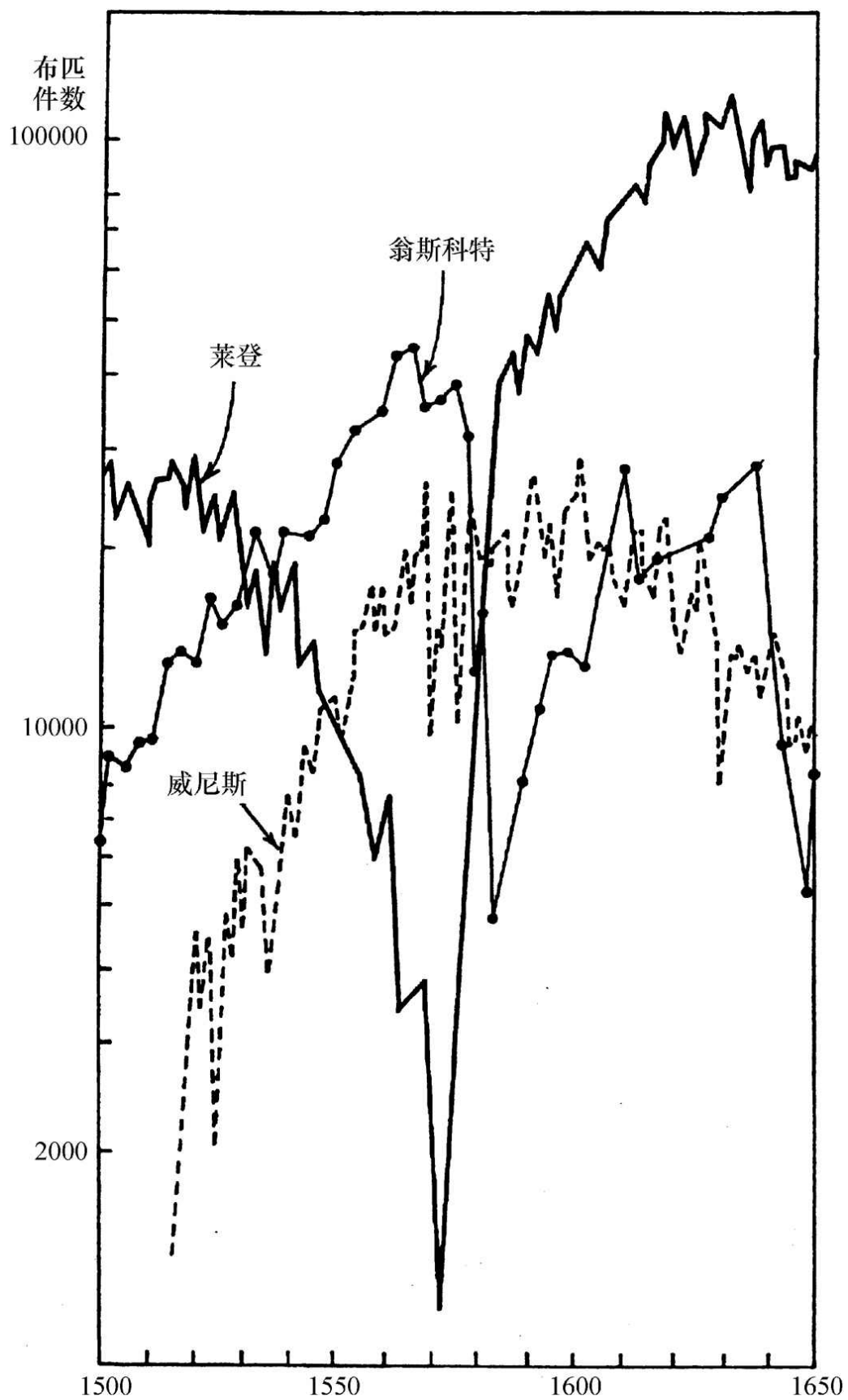


图4 威尼斯、莱登和翁斯科特的纺织品产量

表4 伦敦短纤维呢平均年输出量

年 代	匹 数
1500—1502	49214
1542—1544	99362
1545—1547	118642
1550—1552	110148
1598—1600	103032

这些当然都是孤立的数字。还有16世纪后半期德文和康沃尔的稳定的锡产量，秘鲁波托西的银产量。翁斯科特的织布业在16世纪80年代下降了，不过在该世纪末显出了恢复的迹象。但是，生产的总的运动才是必须注意的。有两个特别长的数据系列，即尼那·班格（Nina Bang）和克努德·科尔斯特（Knud Korst）编纂的松德海峡通过税数据以及于盖特和皮埃尔·肖尼发表的塞维利亚港的数据。这些数据当然都是关于贸易的而不是产量的。然而，贸易的变化多半同欧洲总的经济活动水平相联系。对通过丹麦的松德海峡的流通量的计算是不完备的，因为走私规模仍旧是一个不清楚的因素。不过，如果我们认为所用船只类型的排水量没有减少（这是很可能的，因为船只的规模在该世纪末显著增大起来），那么，所记载的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的数量从1550—1600年就增加两倍。我们还发现塞维利亚与新大陆之间横越大西洋的贸易也增长了两倍。皮埃尔·肖尼估计，在1550—1610年这60年间，来往于新大陆的船只吨位增加了3倍。

然而，尽管这些明显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但生产总量仍旧是相对不足的。显然缺乏潜力去克服分配过程费用高和群众消费水平低的障碍，去把市场扩展到有限的奢侈品范围以外，并达到能产生适应生产规模所需的经济效能那样一种企业水平。于是，破产现象在该世纪末期出现了。对于西班牙来说，无敌舰队的溃败和1590年后的困难年代标志着它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结束，而意大利和17世纪的整个国际经济也遇到了大体上相同的困难。整个商业体系受到了束缚，受到了一种无希望的前景的压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因缺乏创新精神而受到阻碍。在扩大信贷设施、建立和改进公共银行方面取得了

部分成就，但那是在贵金属的供应已经出现衰减的不利时机才取得的。共同所有和共同控制的大公司的出现——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质的深刻调整的外部标志。无须提到其他方面就很清楚，这一国际经济是与总的国际生活共命运的；在那样一种国际生活中，荷兰却从一个走向成熟和衰退的广泛运动过程中奇特地崛起，呈现出一种突兀而鲜明的对照。

我们能否提出一种评价来进行总结呢？16世纪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成就，而且它显然是在经济活动扩展过程中度过的。但这种扩展注定有一定限度。巨大的高潮已开始衰退，似乎它的兴起缺乏必要的势头来克服扩展本身产生的障碍和阻力。大规模贸易对于作为潜在消费者的广大群众显然未能起什么作用。很少有可能加强前进势头的新技术改革。经济活动逐渐转向分散、紧张并出现挫折。这些现象在16世纪晚期当然是并不鲜见的。无论如何，在16世纪90年代以后，破产增多了，既有公司和商人的破产，也有国家的破产。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意大利，经济成熟化的标志和衰退的阴影增多了，预示着17世纪停滞的来临。整个欧洲经济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好像已走过了奋进的顶峰，开始经历下降的、勉强维持下去的回头路程。

在信贷方面，未来的形式已开始显露出来，不过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总是能够克服国际经济中固有的困难。人们对金银的大量流通越来越习以为常，而且在力图扩大信贷体系过程中，实际上提出了一项巨大的改革。流通汇票，不是17世纪的发明，只是在17世纪里增加了数量。这一方式填补了或试图填补由于硬币或金银不足而留下的差额。在建立公共银行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方式。威尼斯在1587年建立了里雅图广场银行；西班牙于1604年、法兰西于1607年试图建立同样的银行，但都未成功。然后在1609年，即本章研究的最后一年，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维塞尔银行建立起来了，这是荷兰势力正在扩张，其贸易、金融事业兴旺的标志。兼有进取和谨慎特色的另一个标志，出现在英格兰，那就是扩大利用有限制的联合股份公司；1581年建立了黎凡特公司，它又自然地促成了东印度公司的建立（1600年），这是殖民地贸易的有力工具。荷兰人、英国人、丹麦人、法国人的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在17世纪初越过大西洋开辟了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并在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这些机构同巨大的商业世家的传统背道而驰。

这样，这一时期结束时，欧洲的商业领域出现了某种灵活性，但也同样清楚地预示着困难时代的来临。30年的战火即将冲击欧洲的基础。然后，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困境，连小小的联省共和国这个国际经济枢纽的黄金般的机运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全都陷入了缓慢而冷酷的困扰之中，而这乃是17世纪的特点。

（庞卓恒 译）

[\[1\]](#) 参阅后面第257页。

[\[2\]](#) 参阅后面第532页。

第三章 教皇，天主教的改革和基督教的传播

“他们到处都体现着令人厌恶的特伦托宗教会议的教义”，这是赫里尔·弗劳德对19世纪初期罗马天主教会做过的描述，他的这类断语都很简练，但往往也相互矛盾。认为特伦托宗教会议创造了近代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其真实程度究竟如何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自从特伦托宗教会议于1563年结束后，直到1869年，罗马教会再未召开过大会，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这300年间，情况确曾有了很大的发展。种种教义上的论争，多次引起教皇对某些类型的神学理论加以谴责。注定要在1918年编纂成为法典的教会法，尽管基本上没有改变，教廷利用罗马教会以行使监督权这一发展却是特伦托会议后的一件新事。在欧洲和远远超出欧洲的传教活动大大扩展了罗马天主教所影响的地区。然而，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为止，天主教在教义和实践方面一直未再做过堪与特伦托会议相比拟的那种全面的修订或改革。（1869—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目标有限，而且无论如何那次会议是中断了）因此，特伦托宗教会议肯定具有重大影响。那么它是一次革新的会议吗？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过是编纂和阐释了中世纪的教义和实践，人们对此极易忽略。这在教义方面非常明显，当时许多人认为教规的改革是革命的，以致引起天主教国家的猜疑，他们唯恐失去有利可图的对教会的控制权。但是这些改革在本质上往往只是恢复过去的原则，这些原则，例如主教对下级教士和信徒的控制，曾被中世纪的豁免权和特权所破坏。仅在宣布没有教士主持的私下婚姻无效方面，特伦托会议看来是放弃了传统的原则。对此问题，它倾向于东正教的态度，虽然或许是无意识的。东正教认为举行宗教仪式是基督徒的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

的确，特伦托的神父们不像我们时代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那样，认为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使教会现代化”。相反，他们把新教看成是对历史上的基督教的一次背叛。天主教的教义和实践必须从破坏圣像

者的手中拯救出来，而不能迎合新教所提出的批评。在这点上，他们与新教改革者恰好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真正的福音被曲解和掩盖了，如他们所宣称：这主要是由于教廷的篡权而使教会蒙受“巴比伦之囚”的苦难。在新教徒们看来，中世纪天主教及其特有的教义和习俗是“教皇制度”，它应由重新发现圣经真谛的人们加以反对和摧毁。这一观念，在一次由教皇召集的、由其使节主持的会议上，怎能得到赞同，甚至与之妥协呢？南欧高级教士占绝对优势的特伦托宗教会议也不可能对确实吸引了一些北欧人头脑的新教义感兴趣；在南欧诸国，新教不是未能就是不被允许扎根。值得提到的是开幕式仅有两名法国主教和一名德意志主教出席；而且据估计，在冗长的会议结束时，全体成员的3/4来自地中海区域，而其中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只是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年，由于以洛林枢机主教为首的有身份的法国主教代表团的参加，才加强了会议的力量；在此以前，法国实际上是对它加以抵制的。正如阿方斯·迪普隆（Alphonse Dupront）所说的，为了对付来自北欧和西欧的危险而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果变成了一次南欧的会议。

于是，大部分与会者认为特伦托宗教会议的任务是谴责异端，并以与异端相对立的立场阐释有争议的教义。他们并非不了解实际存在的弊端，这些弊端除了对教会起毒害作用外，还为新教徒批评者提供了论据，卡拉布里亚的圣马可的主教在1546年1月7日第二次开会的开幕弥撒后的布道中，就说了这样的话。随后枢机主教波尔又发表了著名的劝诫词，这是在其同事们的要求下写的，由会议秘书宣读。其中，把异端的兴起和基督徒道德的沦丧直接归罪于主教团。“我们像是失去了咸味的盐。”对这样公开的认罪，在场的主教们并未加以反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父们接受了许多世俗人士、特别是查理五世皇帝所赞同的似乎很有道理的观点：清除弊端，就能与新教徒和解。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新教徒特有的神学激进主义。新教徒认为这些弊端只不过是中世纪对福音的曲解而产生的病患的表征而已。事实上，正如最初关于会议程序的辩论所显示的那样，意见的分歧就在于此。多数人与皇帝的态度一致，主张改革应优先于教义的阐释。但是，保罗三世命令其使节采取相反的程序，而此计划亦不乏支持者。最后，由费尔特雷的主教托马佐·坎佩基奥首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

案：教义和改革一并进行讨论。这个方案几乎获得了一致的通过，然而在取得教皇的同意时则大费周折。此后，在整个会议漫长的过程中，每制定一个关于教义的法令，都要同时制定一些关于实际改革的法令。

任何一次大会的时间都没有像特伦托会议持续得如此之久。它始于1545年末，最后一次开会是在18年之后的1563年12月，而且还违背了西班牙国王的意见，因为他要求会议继续开下去。会议拖得这样久，首要原因并非辩论的时间长，而是欧洲动荡的局势迫使会议两次中断了很长时间。1547年3月，会议地址移至波伦亚，官方的（但也许是真正的）理由是特伦托出现了流行性斑疹伤寒。查理五世对此十分恼怒，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此种借口实属荒谬。他们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要把会议迁出帝国的领土，当时查理五世已在米尔贝格击败了新教叛乱者，因而认为这些新教徒在厄运当头的时刻将会派代表参加会议，并接受一致同意的宗教改革。少数西班牙主教公然反抗教皇并继续留在特伦托，迫使保罗三世不得不阻止波伦亚的神父们通过任何法令，而且在1549年他去世前不久，正式宣布中断会议。他的继任者尤利乌斯三世与皇帝达成协议，于1551年重返特伦托召开会议，稍后，允许新教徒的代表列席会议并陈述意见。

有些人认为，新教徒与特伦托会议之间的对话将使他们恢复统一，这种理论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正在此时暴露了出来。因为拥护改革的人无意妥协，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事实上他们要求会议的全部工作重新开始，宣告以前的决议无效；符腾堡人希望由中立的法官们解决争端，而不是由出席会议的神父们解决。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记得前面已经说过的，会议成员中，来自地中海区域的成员占了绝对优势，而且以前的会议，已经拒绝了新教的重要核心教义：唯信得救；至少在新教徒读到这些法令时是如此看的。再有，早在1520年，路德就已否认了教皇所召集的大会的权威；新教的原则是完全依据圣经行事。并且从新教徒代表要求给予安全保证可以看出，康斯坦茨会议如何对待胡斯，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僵局清楚地说明了那种认为只要做些实际的改革，就会消除新教徒对天主教制度的不满的观点是肤浅的。真正问题之所在是教义，对于宗教争端中的这一事实，从君士坦丁以来，具有政治头脑的世俗人士总是认识得很慢。今天，主张和解的神学家很可能认为16世纪的许多神学争端是由误会

引起的，有时仅是辞藻之争。而当时，那些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福音的人，以及那些坚持一贯传统的人，都很难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再者，如果要正式召开的宗教会议抛弃其庄严做出的决定，无异于破坏作为天主教基础的教阶制理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判断与接受教会权威之间的矛盾，而不能视为一种交易，就像奥地利的斐迪南手下那些在文艺复兴外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大使们认为的那样，他们极力主张接受新教徒的要求，让会议从头开始。对话的时机应在会议之初，而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对话的机会已经丧失了。因而，1551—1552年以这种方法谋求宗教和平的尝试注定要失败。

果然，时隔不久，由于战事重起，连会议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1552年3月，第二次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了。萨克森的莫里斯，以前曾是皇帝反对新教徒的同盟者，现在参加了新教徒的叛乱，并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结盟，共同作战，击败并几乎俘获查理五世，到5月，迫使他缔结了帕绍条约。由于担心新教徒军队可能向特伦托推进，教皇敦请会议暂停，尽管一些西班牙的和其他国家的主教反对，会议还是决定于1552年4月28日休会。10年之后才重新开会。在这第二个短暂的活动期间，会议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它阐释了圣餐中的圣体实在论，不顾新教徒的反对，坚持化体说（不过对于针对这项教义的任何一种哲学解释均不加可否），并且还解释了告解（忏悔）与终传（临终涂油礼）。在改革方面，会议加强了主教的惩戒权，并试图限制对教会封地的世俗授予权。但是，如果要解决一切需要阐释和纠正的问题，尚需做大量的工作。看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要想获得更多的进展，不是没有希望，但是必须加以推迟。尤利乌斯三世死于1555年，经过马尔塞鲁斯二世的短暂任期后，保罗四世继任教皇。这个暴躁的不稳重的加拉法^[1]早就以改革派中严厉而坚决的领导人闻名。他反对以过去孔塔里尼提倡的方式与新教徒进行任何妥协或谈判。保罗为一些野心勃勃而又寡廉鲜耻的亲属所累，他们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他的侄儿查理，教皇允许他掌握教廷的世俗政策），致使保罗卷入了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斗争；最后他发现并且被迫承认了其侄儿们的胡作非为，因而大失体面。他对改革真诚而又粗犷的热情，由于他仅应负间接责任的丑闻而失去了光彩。他在教皇任内，没有认真地试图复会，这对会议的名声，或许是件幸事。1559年保罗四世死后，新的美第奇教皇庇护四世几乎立即着手恢复宗

教会议。他将由一个截然不同的侄儿任秘书，即枢机主教圣查理·博罗梅奥，后来成为著名的主张改革的米兰大主教。

此时，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1555年，查理五世已被迫放弃在德意志重树天主教信仰的全部希望，并根据奥格斯堡和约容许每个王侯国家由其统治者决定其宗教信仰，因而正式承认了帝国的宗教分裂，此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他于翌年逊位，由其子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其弟斐迪南继承皇位，后者自1522年以来就已经统治着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于是，西班牙与帝国之间的联系中断了；西班牙本来就明显地倾向于埃拉斯都的民族主义天主教，如今，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了。斐迪南虽然利用耶稣会士在其领土上改革并复兴天主教，但他绝不赞同重新召开特伦托会议，认为这将刺激新教徒的感情。他一度要求在特伦托以外的地点召集一次新的会议，后来只是勉强地同意教皇的计划。法国因为一直猜忌特伦托会议并面临着胡格诺教派的问题，因而也采取了同样的路线。教廷费了很大周折才制止了她自行召集一次法国天主教会议。

通过持续的外交活动，障碍终于排除，宗教会议于1562年初在特伦托重新召开。最后的一系列会议持续不足两年。在那段时间里，它解决了以前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圣餐仪式中的饼与酒只限于主持圣餐式的神父享用以及弥撒的牺牲教义等问题。令人奇怪的是，从宗教改革之初就成为风暴中心的这两件事竟搁置了如此长的时间而未予解决。现在面对着将圣餐杯重新给予受圣餐人的强烈要求，使用饼与酒的圣餐都被禁止作为通常的仪式，而弥撒是真正的牺牲这一教义也被肯定下来。这两个法令加深了与新教徒的裂痕。但是到此刻，人们才确实认识到，通过宗教会议在欧洲恢复宗教的统一，纯属空想。特伦托的闭幕会的主要工作是对改革方案做最后的修正，希望根据这个方案使改革后的天主教会能把持异议的教徒一个个地争取回来。考虑到耶稣会士以及其他人在中欧已取得的成功，这也并非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天主教的主要使徒圣彼得·迦尼修虽然坚决反对在教义上对新教让步，但是他认识到皈依的主要障碍是当地教士生活放荡、愚昧无知和缺乏责任感。难怪特伦托宗教会议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教士生活守则的综合法令。接着，会议制定了一项原则，规定教士应在主教管理的神学院中精心地接受关于神学、灵性和生活法规方面的训练。虽然这项原则的全面贯彻费了很长

时间，但是它对特伦托宗教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世纪的教士训练工作杂乱无章，事实上这可能是发生教士丑闻以及教区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经过改革的教士队伍甚至不容许有意图纯正但缺乏训练者，更不容许有半改宗的没有明确使命感的动摇者或者贪婪地追逐名利者。但是，正如后来大量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什么也未能完全防止这样的人渗入教士队伍的危险；不过精心的训练能在授圣职前清洗他们中的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可使热心的供职者得到适当的训练，否则他们将不知如何做教导工作以及如何履行教士的职责。

在整顿教士生活的进程中，与神父们相比，主教们同样需要或者甚至更加需要获得如何行事的指令。在下达上述命令的过程中，特伦托会议从未充分正视的根本性问题，即教皇权威与主教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会议快结束时出现了，就像从前以间接的方式出现一样。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防止主教们经常地、习惯性地离开他们的主教区，就已成为中世纪晚期的一个特点。其实，这与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政治与世俗的事务发生兴趣密切相关。其主要根源在于早先教士对知识的垄断，这曾使他们成为国家有知识的公务员的唯一来源；但是，就像在许多情况下那样，尽管此种传统已无存在的必要，但仍然延续不废。主教有义务驻节于其全体教徒之中，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被承认为一项原则，但它是否具有神圣的法律根据则引起了争论。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一个神学上的争端，即主教的管辖权是否像许多（特别是西班牙的）主教所坚持的那样，直接来自上帝，还是实际上代表教皇的权威。在会议的不同阶段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后，这个涉及天主教全部理论的争端只得留作悬案。在1870年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在此期间经过多次辩论后，直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全面阐述了主教和教皇职权的“一体性”，才算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这种奇特的情况又引出了另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尽管关于教皇权力在当时新、旧教对抗中是一个辩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但是特伦托会议却没有就此做出全面的声明。这个问题被搁置了，仍然维持1439年佛罗伦萨会议所作的笼统解释，那时正在辩论与东正教合并的问题。在实践方面，特伦托会议的改革大力肯定并进一步确立了中世纪逐步建立起来的罗马教会的中央集权制，诚如腓力二世夸张的说法，他的主教们作为主教去往特伦托，却作为教区的教士回来了。再者，会议未及处理的许多问题都正式提交教皇做最后的决定。如有关礼拜式的改

革问题，其目的主要是大大减少具有中世纪特点的主教区之间的差异。1568年与1570年，庇护五世发表了保守的罗马公教祈祷书和弥撒书修订版，强制一切教区和宗教团体使用，凡其特殊的礼拜式的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都必须照这两部书的规定行事。这项措施在实质上很难达到完全的一致。更加重要的是由同一教皇于1556年发表的罗马教义问答，它是特伦托教义的简易读本，并发给教区教士作为标准教义传授给信徒。为了对特伦托会议的改革作权威性的解释，于1564年建立了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它在1566年和1587年获得广泛的权力，成为罗马教会的一个常设机构，特别是根据特伦托教规法担负在特殊情况下发布特许令的重大责任。早在1542年，保罗三世已建立了主持最高宗教法庭的枢机主教会议，它以中世纪以后的宗教裁判所的形式出现，除追捕与惩罚异端外，还拥有对教义做出裁决的广泛权力。这种权力于1587年因审查禁书目录的枢机主教会议的成立而得到充实，后者从它那里接管了禁书目录的审查权，这是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被认为是不道德和异端的书刊目录，并于1564年由庇护四世根据特伦托会议的决定公布。罗马教廷凭借这些官僚机构对教会的全部工作逐步建立起以前未能做到的更严密的控制。

特伦托会议后的罗马体制所实现的集权在我们当代受到许多批评。但不管其长远效果如何，对它所做的历史评价都必须考虑到它想要克服（至少是部分地克服）的对改革的障碍。教皇从罗马进行监督和发出指示的做法日益经常化，这并非完全出于贪图权力。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明眼人都能看出，教会恢复秩序和效率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世俗政权控制地方教会。从黑暗时代“私立教会”的年代起，认为教会财产和机构最终应由建立和资助教会的世俗达官贵人所支配的看法从未真正消失。在英国，14世纪的“圣职立法”最能说明问题，1533年的“亨利上诉法规”也表现出同一观点。在法国，1439年的布尔日国事诏书也包含着这种观点，它实际上排除了教皇对法国教会职务的控制。1516年弗朗西斯一世交出在教皇衰弱时期以此种方式取得的管理法国教会的权利，换取了一项条约，实际上给予法国国王任命法国一切高级圣职的绝对控制权，这真是历史的讽刺。魏拉尔特把1516年条约恰当地比作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的长子继承权。

[\[2\]](#)教皇得到正式任命主教的批准权，但必须以接受君主所选中的人为代价。魏拉尔特公正地总结条约的后果为，王室除了也偶尔任命合格的高级教士外，“根据阴谋或偏爱任命了不合格或无能的执事和修

士；主教区变成野心勃勃的家族的世袭领地；主教的管区和宗教团体放弃了灵性；本应用于慈善事业的巨额收入被滥用，实际上花在可耻的奢侈生活上；简言之，杰出人物在教会生活中反对麻木与冷淡的斗争只收到有限的效果”。后果之一是往往将大修道院交给这样一些院长管理，他们并非修道士，只是有名无实的传教士，他们靠修道院的收益过着完全世俗的生活。这种行为在词汇中留下了痕迹，法国把非本堂神父的世俗教士称为“阿贝”（意为“修道院长”——译者注），这种称呼沿袭至今。正如德国的侍者都被有礼貌地称为“掌柜的”一样。

世俗社会把教会职务主要视为赠予其仆人和宠幸者的奖赏，因而很自然地不欢迎特伦托会议提出的那种改革：只限那些为其神职受过良好训练和考核的教士担任教会职务。神学家的评论提供了关于谙熟现存制度的教士们如何看待特伦托会议方案的一个好例子。这些神学家就特伦托会议拟定的改革主教选举和设有主教座位的大教堂的教士团组织的计划向皇帝斐迪南提出建议：新主教要由教士团决定并通常从他们当中选出。在1563年5月的一份文件中他们指出了该计划在德意志将会碰到的困难。他们看到：某些德意志的设有主教座位的大教堂的教士团只接纳公侯、伯爵和男爵，主教也就只能从他们当中产生。在其他教士团中，其成员仅限于贵族和军界成员，而排除“平民博士”；有些教士团虽然吸收非贵族的博士参加，但其数目实际上比贵族成员少，而且他们的投票权受到限制。再者，贵族成员反对在他们担任主要圣职前接受考核。神学家们同意，此种教会习俗应该受到批评，并认为拟议中的改革是非常正确与恰当的。但他们又提出了一个中肯的问题，即改革如何付诸实行？当时缺少能够贯彻改革的人物。贵族们把大教堂视为他们的儿子们的栖身之地，哪怕他们还只是幼童，也不同意把他们排除于教士职位之外。因为由教士团当选为主教的那些人将成为帝国的选帝侯或公侯，所以贵族认为平民博士获得这些职位是不适当的。最后，改革的全部后果将是教会失去他们迄今一直从德意志贵族那里得到的保护。神学家们早就在他们的评论中指出，在一些大主教区的教会中，许多贵族已受到异端的影响，他们对世俗事务和军事比对神职工作更感兴趣。如果试图加强对教士团中担任主要圣职者的考核，这一改革将会激起愤怒，大主教和地位较高的主教将不愿进行考核，一些教士团，或其中的大多数成员，宁愿投奔新教，也不愿接受考核。

当然，这里所反映的是德意志宗教社会的特殊情况。在这里，部分地由于类似小型教皇国的公侯—主教统治领地占优势，致使教会上层神职人员绝大多数是贵族。但是，此种情况说明，在整个西欧，无论在理论上世俗社会与神职人员的界限是如何分明，他们之间在亲属关系上以及在政治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联系则是十分密切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互相依赖的。德意志的情况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并非独一无二。

特伦托会议后的事态进程确实表明，实现改革的障碍既在于那些将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和丑行视为正常的教士，同样也在于天主教当局的既得利益者。在这方面，法国是个突出的例子。从前面已提到的法国王室对教会实行的控制情况来看，这是不足怪的。法国还必须解除胡格诺主义和宗教战争所造成的对民族统一的威胁。加尔文派坚定地相信，他们所理解的教会有权依靠牧师和世俗长老的教务评议会实行教会自治。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他们将建立起能向国家进行有效挑战的教会政权，就像中世纪教会那样忠于超越国家权威的罗马教皇。随着世态的发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另一方面，集结在吉斯家族周围的天主教极端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实现反宗教改革的目标而谋求与西班牙结盟，这些人对国家、王权同样是一种威胁。在反对这两支力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称为“政治思想”的心理态度，它确信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不难看出，这种态度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希望保持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以便抑制狂热主义；这种态度也同样能够很容易地使世俗人士想分享教会收益的愿望合理化。诸种因素造成了称为高卢主义^[3]的现象，它在法国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一直延续到19世纪。高卢主义者追溯中世纪法国的国王们曾决定不承认教皇在世俗问题上对他们的权力进行任何控制的历史，再加上15世纪主要集中于法国的教会会议运动^[4]和反对教皇的民族主义倾向，高卢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6世纪高卢主义所持的立场主要是维护高卢教会的所谓“特权”，声称这种“特权”起源于教会的早期时代；还要求给予法国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教皇控制的自由。这种教会史观一举两得，既可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又可取悦于憎恨教皇的胡格诺派。有两个现成的特殊工具可用来传播高卢主义：一是巴黎议会，这是王室法官们对外封闭的集团，他们已经建立了法国王权的司法垄断，这时他们自称居于看守者的地位，防止国

王本人放弃其任何权利。第二个工具是久负盛名的巴黎神学院，如今自认为是法国教会的教义权威。议会曾反对1516年与教皇的协定，因为无论该协定给予国王在与教皇的合作中多么大的管理教会权，该协定似乎是以出售根据1439年国务法令取得的民族教会权利来做交易的。特伦托会议后，法国议会反对在法国颁布该会议的法令。理由是这些法令提高了罗马教廷的权力，并且使教会的管辖权摆脱了国家的控制。这种态度经常得到议会里权威人士和巴黎神学院某些神学家的支持。的确，直到1615年，法国教士会议才不顾世俗的反对，正式接受了特伦托的行政改革，并命令各行省的宗教会议接受。神学院和议会同时反对耶稣会，这就说明了全部问题，把耶稣会视为罗马教廷的近卫军和世俗控制教会的主要反对者是有道理的。担心耶稣会可能侵犯他们垄断神学教育和认为耶稣会是民族主义和君主制之敌的人们都反对耶稣会，它完全是顶着强大的反对力量才在法国立足并维持下来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直到大革命时代，法国教会一直是反对特伦托会议所极力促进的罗马教廷中央集权的中心；但同时，法国教会又由于特伦托会议曾谋求克服的许多行政的和教会的弊端而受到损害。法国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在欧洲的各个天主教国家中，情况大同小异。一直被视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的西班牙，事实上却是同教皇疏远了。特伦托会议闭幕不到一年时间，它确实接受了会议的法令。但是，在国王和国家的权利问题上都有所保留。恢复行省宗教会议是特伦托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但行省宗教会议在王室派员监督后，到1582年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教皇的训令必须在得到王室的同意后，才能在西班牙得到贯彻；研究圣德肋撒和圣十字架的约翰对圣衣会进行改革的人们会记得，除非腓力二世同意，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认为西班牙的埃拉斯都派天主教徒阻碍改革的程度和法国一样是不公平的，但他们也并未使改革更为顺利。国家的政策更难抗拒，因为西班牙教会在特伦托会议以前很久已由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枢机主教希梅内斯合作进行了许多改革。在西班牙的欧洲领土米兰和那不勒斯，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涉像在西班牙一样，也是强硬的，而且有时做得不像在西班牙那样明智。

总之，无论特伦托会议的意图如何，教皇国以外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实现其改革计划方面到处得仰赖国家的扶助，在宗教上分裂的欧洲

更是如此，天主教似乎只有得到天主教国家的武力支持，才能得以幸存。在这些国家看来，宗教主要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方面。与13世纪的英诺森三世的拉特兰改革不同，特伦托的改革不能由一个主教团根据来自罗马的命令贯彻执行。幸而存在着一种限定的因素。从天主教作为一种国家护符这层意义上说，不能有太多的污点，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污点都会被持异端者抓住，作为论战的武器。个别的改革者至少能公开向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们请求支持，以便将君主们声称给予保护和促进的宗教改革得为人们所尊敬。那些能取得统治者信任的人，像巴伐利亚和哈布斯堡领地的圣彼得·迦尼修等人，在这方面能做许多工作。

这一点在新世界也许更是如此。新世界的发现开辟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忠于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传教的先锋。在该地区，探险者和征服者最早打的旗号就是传播宗教信仰。起初，许多方面都不顺利。对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的剥削引起过拉斯·卡萨斯的愤慨；圣方济各·沙勿略发现，他在印度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在果阿的葡萄牙殖民者们不体面的生活。然而有意义的是，传教士可以提出抗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抗议能够奏效。而且，无论如何，教会海外机构的发展，教区的形成，教堂的建筑，传教基地的建设都得到了国家的赞助和支持。西班牙半岛的神学复兴是16世纪末年的显著特征。这一复兴在新世界起到了它的作用：大神学家们振振有词地论述征服的权利；而像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那样的伟大导师则根据自然法为非基督徒土著的权利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土著就更不待言了。他们根据人类之间应该团结和友好的理论，允许进行殖民，因而排除了独占性；但是同样的原则意味着殖民者有义务与土著居民共享美好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传教是合法帝国主义的一个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的社会与宗教状况是完美的。尽管遭受谴责，但对土著居民的剥削仍然继续。虽然教皇、主教们和教会会议坚持主张印第安人具有自然的和精神的权利，以及在原则上对奴隶制加以谴责，但仍未能防止暴行和虐待。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责难和主张，情况很可能更糟，至少当局和殖民者不能凭借教会的权威去为他们的恶行辩护。再者，可以设想，有些人可能

通过对教会的物质支持来解脱良心上的不安，从而有助于天主教信仰的传播。

在此期间，传教事业在教皇监督下进行集中管理还仅是开始。直到1622年，格列高利十五世才建立了传信部。他的继承者乌尔班八世在1627年建立了传信学院训练传教士，该学院拥有可印数种文字的印刷所。然而，教皇深深地意识到对外传教的极端重要性，仍旧在各方面尽可能地加以赞助。传信部有其前身。1568年7月，庇护五世在圣方济各·博尔吉亚的建议下，建立了一个枢机主教会议，以便在异教地区传教，同时建立了一个与其平行的组织，从事对欧洲持异端者的改宗工作。然而，实际上在最广大的天主教传教区，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领土，国家是支配的力量。并且，必须记住的是，从1580年起，葡萄牙被西班牙国王统治，他们把西班牙的埃拉斯都传统带到新领土，以支持业已存在于葡萄牙的此种传统。拉图雷特（Lataurette）总结了西班牙王国对传教活动的绝对控制。

全部传教士的选拔权属于君主，没有王室的许可，任何传教士不得前往或在一旦到达后离开新世界，当然，王室的许可通常是通过西印度群岛会议或与其有联系的一个局给予的……教皇把殖民地所有圣职人员的指派权授予君主。在理论上罗马保留了批准上述人选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新主教往往不等教皇的训令下达，就上任管理其教区。所有的主教、宗教团体领导人和教区神父均由国王提名。国王设立新主教区和划定它的管辖范围。有时，一个教区已经建立，人员已经指派，教皇尚不得而知。没有王室的许可，任何教会、女修道院或学校均不得建立……尽管罗马提出强烈抗议，但除非持有国王的许可证，教廷信函不准下达殖民地教会。西班牙美洲的主教的信件，未经过王室检查不许发往罗马。美洲教会会议的决定，均需提交总督审查。这些王室官员有权撤销这些决定，或将其提交西印度群岛委员会采取该委员会选择采取的行动。

因此，特别在新世界，传教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教会，也取决于国家。当然，从事物的表面判断，16世纪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几乎是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像欧洲黑暗时代那种规模的集体受洗非常普遍，不过更为耸人听闻的洗礼是在16世纪中叶以前举行的。即使数字夸大了一些，但数字肯定是很大的。1541年，特拉斯卡拉的主教宣称，他每周施洗礼和坚信礼达300人之多，听到格兰德河以南的墨西哥居民到17世纪初估计大部分都成了基督徒，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些事实很自然地引起一些问题，像许多世纪以前在欧洲一样，皈依基督教的人接受洗礼是屈服于强权还是希望得到政府的照顾呢？他们新建

立的基督教信仰有多大的真实性？对于这样的问题尚不能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是某些事实使人在做出犬儒主义式的回答以前，不得不三思。成批受洗是圣方济各·沙勿略传教活动的一个特征，经常是在葡萄牙政府尚未有效控制的地区举行的。在有些情况下，他的活动依赖于非基督教头人的善心。他在写到印度南部一个乡村时说，当他劝头人们接受洗礼时，他们回答说：

如无他们的领主——王公的同意，他们不敢成为基督徒。在该村有一名王公的官员，他来此为其主人征收捐税，我找到了他。当他听完我肯定要说的话后，他同意说成为基督徒是一件好事，并向村民们宣告准许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他自己却不愿按照他对别人的劝告而接受它。我随即给当地的头人们及其家族施洗，然后让其他的人受洗，老少均有。

因此，不能认为凡是基督教政府直接拥有权力之地，全部或大部的皈依者乃是出于畏惧或抱有世俗的希望。再者，大量事实表明，讲解教义的必要性得到了认识和满足。教义问答和信仰要略以当地方言大量出版无疑产生了效果。拉丁美洲至今保留着具有基督教外衣的印第安人异教习俗，这一点告诫人们对改宗的彻底性不要抱天真的想法；但是另一方面，印第安人按照他们的理解继续保持基督教信仰这一事实，同样使人不能轻易地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新世界或者在东方的工作全是表面的。完全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与欧洲相似的情况：尽管查理曼的传教士实行成批的洗礼是征服的直接结果；尽管中世纪的欧洲有大量或多或少地受洗为基督徒的异教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日后为16世纪的改革者们强调指出的迷信行为，但是，如果谁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大陆，他就是一位鲁莽的历史学家。的确，伟大的格列高利曾向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建议赋予古老的异教习俗以基督教的解释，16世纪天主教的传教士在某些地区可能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一战略。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未必会认为基督教对曾信仰原始的、有时是粗野的宗教的人们不可能有吸引力。有人已经指出：在北欧海盗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已经把异教视为过时之物，而且海盗们愿意考虑基督的教导，如同13世纪接受黄教的蒙古人一样。很可能，在16世纪的新世界，同样的因素起了作用，而且，同时在东方也是如此，尽管那里存在着印度教、佛教的势力以及伊斯兰教的竞争。

无论如何，天主教传教工作的显著成绩以及大批奔赴海外的主要出自新的、改革后的宗教修会的传教士们虔诚的英雄主义，对恢复与

提高天主教的声望并恢复由于宗教改革而打乱了的均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传教方面，天主教比新教早得多，并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新教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完全超过天主教。在双方的斗争中，由于天主教在海外开辟的地区比它在北欧丧失的地区越来越广阔，所以就领地而言，新世界弥补了旧世界的均势。

旧世界的情况如何？16世纪晚期，天主教在此地区取得了许多进展。我们把特伦托会议行将结束时与16世纪末期的情况做一粗略的比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到1563年，尽管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已用了一些时间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力量对比时有变化的地区进行工作，但是，改革的潮流看不出有逆转之势。奥格斯堡和约显然断送了查理五世为在德意志恢复宗教统一而做的努力，而且，路德宗教信仰在帝国的许多重要的邦中得到了保证。甚至在哈布斯堡的领地上，也不大明确官方是否照旧实行天主教的政策，同时教会本身受到许多居民的反对。自1522年开始统治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1556年即皇帝位，1564年去世。他的政策尽管是谨慎的，但基本上遵从天主教；其子和继承人马克西米连二世被合理地怀疑为欲与新教和解，并打算在其父死后立即驱逐维也纳的耶稣会。加之德意志的天主教会，甚至在其继续拥有权力的地区，在道德方面无所改善，依然是群众的笑柄。1564年3月，一名教区神父马丁·艾森格赖因写信给耶稣会会长莱奈茨，感谢耶稣会在德意志所做的工作，他本人由此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但是，他描绘了一幅关于天主教教士的阴暗的画面。

德意志的其余教士们似乎是睡熟了，并且高枕无忧，好像对我们面临的浩劫和许多灵魂的可悲堕落，他们丝毫没有责任一样。尊敬的教父阁下不能不含泪目睹一些教区和如此众多的教士的卑劣的状况，他们的穷凶极恶使天主教徒对他们极端憎恶，并招来持异端者的嘲笑。至今，他们不顾天主教徒的憎恶和持异端者的嘲笑，死抱着其恶习不放，甚至宗教的毁灭也不能促使他们改过自新。更确切地说，他们罪上加罪，日甚一日地惹怒了上帝……以著名的雷根斯堡教堂为例……你可以说雷根斯堡教区是一个罪恶的渊藪。在那儿你不仅能看到教士与情妇同居，而且有通奸和乱伦的以及犯有强奸和杀人罪的教士。在那儿，由于他们的罪恶，许多人被吓得脱离天主教的信仰，并使得一切持异端者更加坚定地信仰异端，有谁来指出他们的罪行呢？

直到1585年，德意志的情况是：“教士团的大部分由持异端者、买卖圣职者、纳妾者、酗酒者以及具有某些其他恶行的人组成。”此种例证不胜枚举。

在法国，尽管在特伦托会议时期勉强避免了与教皇的分裂，但是加尔文派发展了，得到了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并且组织了起来；宗教战争开始了，1562年发生了瓦西镇的大屠杀。在尼德兰，虽然查理五世企图通过宗教迫害全力镇压新教，但当腓力二世于1555年在那里继承父位时，新教在南方和北方不断壮大，并且日益成为加尔文派，并具有加尔文派所特有的全部组织力量和目标。在波兰，在构成1569年国会一部分的参议院中，新教的著名人士占有该院133个席位中的58席。1570年，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波西米亚兄弟会形成的政治联盟，使他们于1573年正式获得信仰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与天主教徒平等的地位。国王西吉斯孟二世极其勉强地被说服接受特伦托法令，而且直到1564年，耶稣会才开始在波兰活动。匈牙利于1547年国土三分，出现了一个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部狭长的新月形地区，一个土耳其的匈牙利，以及一个臣属于土耳其人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从此，匈牙利在宗教上也分裂了，土耳其的占领引起了混乱，这使新教得以传播，虽然格兰的大主教尼古拉·奥拉胡斯引进了耶稣会，但是由于从1564年至1576年期间统治这一地区的马克西米连二世实行妥协政策，而且在1568年尼古拉死后未能指派新的格兰大主教，致使多数大贵族皈依了新教。

因此，在特伦托会议行将结束之际，北欧、东欧和中欧的天主教一蹶不振；同时，在英格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复兴取代了玛丽时期的反动；法国看来很可能注定要归属胡格诺派。意大利和西班牙似乎是平安无事，但是在这两国，宗教异端已露出苗头，需要进行宗教迫害才能扼制其生存和传播。

到16世纪末，局面大为改观。在法国，那瓦尔的亨利早已看出巴黎是值一台弥撒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唯有天主教的王朝能够保住王位，并且既能使胡格诺派得到信仰自由，又能抑制天主教联盟反民族的狂热。在尼德兰，腓力二世由于执行愚蠢的政策，丧失了北方，但是最终使天主教在比利时的地位巩固下来，而且在联省共和国也未完全消失。在德意志，天主教会至少重新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新教的传播被扼制。新教徒的团结也由于路德派内部的神学争论以及他们对加尔文派的厌恶而严重削弱，后者以其纯粹的形式与作为隐蔽的加尔文宗引起了瑞士新教徒激进主义的传播，而路德曾毕生反对此种激进主义。哈布斯堡家族与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他们的领地

上实行了强硬的政策以支持受到压力的天主教。在匈牙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也开始导致潮流的变化。在波兰，斯蒂芬·巴托里与西吉斯孟三世先后统治的时期，尽管不得不准许新教信仰自由，但仍产生了天主教的复兴；同时，在1596年，由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协议，更加强了天主教的地位。这项联合协议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并入罗马教会，不过仍然保留其礼拜式和习俗。甚至在瑞典，娶天主教徒为妻的国王约翰三世（1568—1592年）曾设想与罗马重新联合的可能性，不过最后一无所成。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只是坚定了日益减少的少数信徒的信仰，但是他们至少防止了16世纪60年代似乎真有可能的罗马天主教的彻底绝灭。靠这股力量，詹姆斯一世足以玩弄信仰自由甚至重新联合的概念。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新教实际上已被消灭，难怪17世纪初可以见到几乎所有地方的新教徒都处于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状态，唯恐宗教改革最后有可能逆转。一种导致为生存而战的三十年战争的局势已在形成之中。

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命运的变化？在本章开头已从另一角度论述过，最明显的答案是天主教国家持信仰与国家政策相一致的政治态度。天主教国家就整体来说毕竟比新教国家更强大，至少当时从表面看来是如此。在帝国及其东部毗邻地区，天主教如无政治上的支持，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如以前路德宗如无信奉它的德意志诸侯的支持将会失败一样。对天主教和新教具有同样影响的“教随国定”的原则，必然是将宗教上的不同意见与叛乱（如果不是与叛国）等同起来，并且确保国家可以根据防止发生叛乱的需要，来迫害与折磨反对国教的人。尽管基督教诸侯的职责是支持他们认可的真理并克服错误这一观念一直存在，但在16世纪一般情况是，宗教迫害的主要动机是政治原因，即担心宗教上的分歧将破坏国家的统一与权力，而且会导致少数派与外国政权结成叛国的联盟。经验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德意志帝国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寻求与反对查理五世的其他国家联盟。在法国，天主教联盟和胡格诺派，双方都从各自的教派中谋求国外的援助。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一部分不信奉国教的天主教徒与西班牙共命运。在天主教方面，这一点既可解释为什么政府如前所述对教会事务保持严密控制；也可说明为什么他们坚信支持教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是政府的职责。同时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新教政府并非仅仅出于狂热的原因而认为天主教的宽容是不可能的，至少没有强有力的保证。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必定是十分密切

的，在天主教国家，它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而在新教国家则受到民族主义的反对。现代的观察家们能够看得出这对天主教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危害，但是当时大部分天主教徒似乎认为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这并不意味着如无国家的支持天主教会将会容忍与和解。即使在像圣徒一样的人士当中，由于对严格的正统教会的感情太强烈，以致和解也是不可能的。根据特伦托会议所做的改革，宗教裁判所是教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和解之无望。特伦托会议没有做出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立法，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中世纪的机构已于1542年由教皇保罗三世改组为“神圣的罗马会议和普世的宗教裁判所”或称“最高宗教法庭”。这是一个枢机主教委员会，他们在罗马教会控制的全部地区，在世俗政权准许的范围内，担任一切信仰问题和监督搜索与惩罚异端的最高法官。在这方面，埃拉斯都主义规定的限制也起了作用；世俗统治者宁愿在不受罗马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进行宗教迫害，在这种倾向中，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最典型的例证：这个名义上依赖于教皇的机构，实际上被一个国家的政府所攫取。在西班牙，世俗对教会领域的侵犯可追溯到15世纪，由于西班牙与穆斯林持续斗争的中世纪历史，加之伊比利亚半岛是中世纪犹太教的主要中心之一，世俗干涉教会就很自然地在这种状况中产生出来。一位近代作者曾说：“在中世纪的西班牙，种族和宗教迫害的根源是半岛三大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处的问題。”在1391年反犹狂热主义大规模地爆发并导致大屠杀之后，那里产生了改宗的问题，那些慑于暴行或工于心计的犹太人接受了洗礼。改宗，特别是在引起改宗的上述情况下，一向不能消除基督徒的怀疑，反而由于犹太人的富裕和他们在民族经济和行政管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加剧了。另一种因素是，与犹太人通婚对傲慢的西班牙贵族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由此相应地产生了一种为20世纪所熟悉的假科学的种族主义，即西班牙的“纯洁血统”概念，它助长了由西班牙历史所产生的宗教狂热主义。在这种易于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气氛下，自14世纪在阿拉贡已暂停活动、在卡斯蒂利亚已不复存在的宗教裁判所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请求下，根据教皇西克斯特斯四世的训令，于1478年重新建立，主要目的是搜索被认为仍在继续秘密实行犹太教礼拜式的犹太改宗者。它于1480年开始活动。不久，就声称发现了地下犹太教的流传及其危害性的证据，结果遍及全国的法庭网建立

起来了。其行为之残忍从一开始就震惊了罗马。早在1482年，西克斯特斯四世就发出了另一训令，减轻准许使用的审讯程序的残酷性，并准许向罗马上诉。斐迪南提出抗议，迫使西克斯特斯将此训令暂时搁置起来。1483年，多明我会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他的名字将成为一个笑柄）被任命为阿拉贡宗教裁判所总监，在此以前，他已经担任了卡斯蒂利亚的同一职务。值得重视的是，如前所述，这个托钵僧成了“半岛上其命令可通行全西班牙的独一无二的人”，因为当时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仅由它们的君主联姻才建立起松散的联合。

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开始就是在一个谋求统一的国家内与现实的国家问题（如果夸张地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它依然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国家机构就不足为奇了。在理论上，它的最终权威来自教皇，但实际上它受一个最高委员会的控制，其成员由国王任命，宗教裁判所总监是最高首脑，他虽根据教皇的训令任命，但事实上也由王室指定。尽管教皇从未放弃斗争，以便保持他对这个当初被迫成立的机构的一些权威，尽管教皇有时得到某些成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听任西班牙王国政府来控制这个所谓保卫该国信仰的主要工具。西班牙政权蔑视罗马的最惊人的事例见于西班牙的首席主教、托莱多大主教卡兰萨案。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卡兰萨在腓力二世作为玛丽·都铎之夫占有英格兰王位期间，于1554—1557年在英格兰从事扑灭异端的工作。1557年他刚刚被任命为托莱多的大主教，就被宗教裁判所总监巴尔德斯攻击为异端。巴尔德斯是多明我会士，也是伊拉斯谟主义以及新教的大敌。他根据与卡兰萨不和的另一多明我会士梅尔乔·卡诺的告发就提出了抨击。卡兰萨于1558年出版过一本关于评注教义问答手册的书，他并非才学出众的神学家，他的不明确的表述为对手提供了一些根据，同时也因为他早就有伊拉斯谟主义的嫌疑，并且在特伦托会议上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宗教裁判所于1559年将他逮捕后，竟然不顾特伦托会议对他的评注正式表示同意，以及教皇庇护四世的抗议和威胁；直到1566年，庇护五世才得以使卡兰萨离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控制，送至罗马由教皇处理。西班牙甚至把手伸到了罗马。到1576年，格列高利十三世才做出判决，尽管没有正式宣布这位大主教为异端，但仍将他的评注作为危险书籍列入禁书目录，并判处已经驯顺地公开收回其被判为错误的言论的卡兰萨流放至奥尔维耶托的多明我修会，为期五年。不过判决宣布之后18天，他就死于罗马了。既然西班牙国王利

用宗教裁判所能在教皇与西班牙最高教士之间插手如此之久，那么看到宗教裁判所惩罚王家海关官员，指责他们准许马群出境是为了供法国胡格诺派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可能按照它的理解促进了天主教的信仰，但是它是带着显著的西班牙特点这样做的，和西班牙一切其他的教会机构一样，均紧密地与王权相结合。

或许还值得提到的是，玷污了这一时期天主教历史的大屠杀，特别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也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紧密相连。约翰·尼尔爵士对于卡特琳·德·美第奇在暗杀科利尼的企图失败之后采取的态度所做的评论是十分恰当的。

处在这种局面下的人们往往求助于内心更深处的刺激。在绝望中，卡特琳突然想起了一条妙计。在她的女儿举行婚礼时，全国各地主要的胡格诺贵族都将被请到宫廷来，这真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这是通晓其古典历史和记得高傲者塔克文及罂粟花的故事的一代人不会不察觉而且果真察觉到的一个机会。卡特琳采用的就是这个计划。换句话说，这个狂热的女人决定，要将胡格诺派在巴黎的领导人全部杀光，以便将她自己 and 法国从致命的宗教纷争中挽救出来。

在16世纪的欧洲，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宗教暴力都是与政治原因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在当时的宗教战争、大屠杀和迫害中不易区分宗教狂热与民族主义狂热的动机。确如我们所处的世纪的经验所表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打算形成了一种心理学上的混合物，历史学家要想加以分析，即使不至于劳而无功，也很困难。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16世纪末天主教的突出成功完全归之于政治的或军事的因素呢？任何了解情况的人也不会把问题如此地简单化。信仰从来不能以政治手段为基础，也从来不能完全或主要依靠政治手段来发展。无论托马斯·霍布斯会怎样想，反正人们不会简单地相信国家命令他们信奉的都是真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功，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天主教的统治者，但仅靠他们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他们自己在支持天主教的教育、传道师和传教士时认识到的那样。诸如圣彼得·迦尼修（1521—1597年），他被描绘成德意志的使徒和第二个圣·卜尼法斯；[\[5\]](#)再如圣弗朗西斯·塞尔斯（1567—1622年），在新教的沙布莱传教，后为日内瓦主教，他不得不流亡在外，住在萨伏依的阿讷西。但他对新改宗的亨利四世的宫廷和全法国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们这些人肩负了恢复天主教的主要重任。但他们仅是一大批传道士中的杰出范例，其中大部分，并非全部来自宗教修

会，其中只有一部分名垂青史。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以巨大的勇气吸引着新教徒重返天主教的行列，并且做了一件同样必要的工作，即教育和增进了传统的，但是不热心的、或者丧失了勇气的天主教徒的信仰。这些人，即使也具有那个时代的流行看法，认为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武力是合法的，但是不把他们的信仰主要寄托在武力的功效上。圣弗朗西斯·塞尔斯亲自写道：“我经常谈到，不管是谁，只要是以爱心传道，都是有效地传播反对异端之道，即使他没有说一句反对异端的话。”并非所有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像这位日内瓦主教一样不愿引起直接的争论，但所有的传教士都认识到了正面教育的重要性。中世纪天主教的重大缺陷是世俗人士在宗教上的愚昧无知，这样既滋长了迷信，又使他们容易受异端传教士的影响；造成这种情况又大都是因为多数传教士知识浅薄，而且往往不善于传道。特伦托会议力求用神学院立法来克服上述缺陷的事前面已经提到。这方面的工作缓慢地产生了效果。教皇庇护四世在1565年初带头为罗马教区开设了神学院。1560—1584年的米兰枢机大主教圣卡洛·博罗梅奥，为其广大的主教区创立的神学院达三所之多。他在许多方面都是特伦托改革的模范主教，在改革的最后阶段起了显著的作用，他的伟大目标是按特伦托树立的典范改革他的教区。他本身的事例就可以说明多么需要进行改革。作为庇护四世的侄儿，他自12岁起已有修道院长的头衔，21岁就成为枢机主教，同时又是米兰大主教区的管理人，但直到1563年，他才被授职为神父，并祝圣为主教，到了1566年，其叔父去世后，他才被允准辞去自1560年以来主持罗马教廷的重任，并得以驻节于他在此以前不得不靠其代表进行管理的主教区。到主教区后，他不仅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事施舍和教牧工作，在1576—1578年的大瘟疫中亲自照顾病人，而且精力旺盛地开展巨大的改革工作，因而引起了西班牙统治者^[6]和无所作为的教士们的反对。他对卑微派宗教修会做了许多强制性的必要改革，以致该修会的人企图谋杀他。关于特伦托“新政”面临多么大的障碍，圣卡洛的业绩是最好的具体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当他1566年到达米兰时，他是80年来第一个常驻米兰的大主教）他的政策和活动还说明需要着重改革的方面。除了清洗行为卑劣的教士和提高整个教士的教育和灵性水平外，他还认识到需要更好地对世俗百姓进行教育，并且不仅要强制教士必须使用问答法传道，而且要建立基督教义协会，如经常指出的，它是200年以后由罗伯

特·雷克斯创立的英国主日学校的原型。这种学校据说有740所，3000名教师和40000名学生。

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为克服相同的或其他的障碍，人们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甚至在动乱的德意志也于1564年在艾希城建立了神学院。在法国，卓有成效的教区神学院的建立尚待下个世纪，但在西班牙要快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各宗教修会，特别是耶稣会，取得了许多超过单个主教区范围的效果。的确，耶稣会对教士和世俗百姓的教育工作在各方面都与他们的教牧活动和传教工作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耶稣会直属罗马教廷，所以他们的学院称为“教皇学院”；而且只要能得到世俗当局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受地方教会的惰性和因循守旧的习尚干扰。耶稣会士的教学内容与其组织一样至关重要。他们为未来的教士们提供了传统的经院式神学方面扎实的基础课程，并补充以对教牧直接有关的研究，诸如道德神学、布道和教育的技巧等。他们对处于早期训练阶段的未来的教士和预定要过世俗生活的人，充分利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者提倡的教育方法。耶稣会于1599年出版了《理性学习》，取代了1591年的初版，而初版又主要是由六名有经验的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编写的。该委员会于1584年由伟大的耶稣会会长阿奎维瓦建立，并于1586年提出报告。

《理性学习》包括适用于初级和高级教育的完整的规章，理论和经验并重；直到1773年耶稣会被查禁以前，一直被认为无须进一步修订，可见其质量之高。它包括教育的各个环节，从课堂方法到纪律，连同娱乐和体操的设备，直到学习的内容。根据《理性学习》的设想，最初的几个教学阶段都是一般思想训练，开设的各种课程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理性学习》所规定的训练不是专业化的或职业化的训练，而是一般训练，要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通才教育是最初阶段的目的，对于耶稣会士和未来的教士以及未来的教会在世俗界的骨干都是如此。这种教育方法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表现于从耶稣会内部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以及神学领域所培养出来的一批著名学者，而且也表现在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卓越的世俗人士，如卡尔德隆、塔索、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不论新教在教育领域的成就如何伟大，耶稣会和其他天主教教育家的工作即使没有超过他们，也可与之匹敌。

现在有必要转向在天主教复兴中大学所起的作用。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使中世纪大学的国际联合^[7]发生裂痕。魏拉尔特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当时欧洲对立的天主教与新教大学的分界线与罗马帝国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古老界线相一致，天主教方面的卢万、科隆、美因茨、迪林根、因戈尔施塔特等面对着新教的莱登、爱尔福特、马堡、蒂宾根及其友邦，这是学术界的分裂在地理上的标记。北部的天主教大学在保持与发展天主教的神学方面肯定起了作用，然而，天主教思想家最兴旺之地多在西班牙，如萨拉曼卡、阿尔卡拉、巴利亚多利德与在葡萄牙的科莫布拉均令人难忘。这里不像那些宗教冲突妨碍了公正的学术思想的地区那样，经院的传统没有受到新教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如科普尔斯顿所说：

人们或许会预期，遵奉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的生命和活力由于两种因素而最终枯竭：其一，14世纪唯名论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其二，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的产生。然而在15世纪和16世纪经院哲学的复兴是引人注目的，并且某些在经院哲学方面最伟大的名家均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之初。

他进而指出西班牙人在复兴中的优势，并列举出了伟大的维多利亚、多米尼克·索托、梅尔乔·卡诺、多米尼克·巴内兹、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的名字。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产生的学术界的分裂，这些堪与中世纪的伟大经院哲学家相比拟的巨人所做的工作，至今在罗马教会以外很少有人知晓。例如，苏亚雷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19世纪的巴黎版中，他的著作多达28卷，他不仅了解一切以往的形而上学家，从希腊到文艺复兴的思想家，而且在综述中归纳和批评了他们的体系，在此过程中以他自己的天才增添了许多创见。此外，他的研究和作品已超出了纯粹哲学，进入了神学、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由于在国际法领域所做的先驱工作，维多利亚或许是这些西班牙的伟大人物中今天最知名的一个。他死于1546年，的确是16世纪早期的一位人物。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使伊拉斯谟被猜忌并引起宗教裁判所迫害西班牙的伊拉斯谟派以前，维多利亚确实介绍了他非常钦佩的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观点；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班牙神学复兴的作家，并且是梅尔乔·卡诺和索托等人的导师。这两个人都死于1560年。下一代的杰出人物是巴内兹（1528—1604年）、巴斯克斯（约1551—1604年）、苏亚雷斯（1584—1617年）以及莫利纳（1535—1600年）。我们也不应忽略在西班牙以外讲

学和写作的著名人物，他们与专门性神学的总复兴密切相关，特别是圣罗伯特·贝拉明（1542—1621年），他自1570—1576年在卢万讲学，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在罗马度过，起初是耶稣会罗马学院讲授神学争论的教授，以后担任教皇的神学顾问。1599年他成为枢机主教，短期担任卡普阿大主教后，在罗马教廷任职期间去世，在此期间他被卷入了英王詹姆斯一世与教皇的争论和伽利略事件。他的全部生涯放在应用神学领域的时间多于纯神学领域，并且是天主教神学中过分纠缠于当时新教与天主教辩论倾向的突出代表。此种倾向使天主教神学的纯理论创造性比本来可以做到的要逊色一些。

的确，理论创造的内容之一注定要在16世纪结束之前在天主教阵营内部播下争论的种子，并且在下一个世纪发展成为关于詹森主义的激烈争论。宗教改革运动的争端基本上全部起源于有关神的恩典及其在人的拯救中的作用的不同观点。其起因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争论以至更远。因为这些观点起源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之教导，他的教导自5世纪以来对西方基督教思想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路德神学发生了如此深远作用的正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的解释，虽然路德也以个人经验得出的信念发扬了它；从而“唯信得救”成为所有新教徒共同的中心思想，实际上一切其他新教派别的信念都能直接或间接地溯源于此。由于这一点部分地代表了反对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以某种形式缩小上帝在人类得救过程中的作用的倾向，以致在反对新教时，有些天主教的思想流派很自然地倾向于重返更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奥古斯丁是牢固地树立在西方传统中的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而不能被忽视或明显地让给新教。正如魏拉尔特所指出的，在16世纪，新教与天主教争夺奥古斯丁这面旗帜。在我们论及的时代，这一争夺表现为对贝乌斯学说的争论。贝乌斯是自1541年到他去世的1584年间卢万大学的一位头面人物。这里不准备探讨他的观点的复杂细节，可以认为他的观点起源于一种感觉，即认为中世纪神学已经文饰了早期教会领袖们的学说，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学说；求助于“在异端信徒中依然享有一定声誉”的早期教父们，就能够很好地纠正和驳斥新教的学说，而无须求助于经院哲学。贝乌斯在此基础上得出这样的见解：强调堕落之人的无能为力，把这种人的自由意志缩小到最低限度，并把上帝的恩典仅仅理解为控制情欲的一种力量，而不是积极改变这种人的本性的一个源泉。在反对者看来，他的看法在实质上很难与新教的拯救观区分开来。1567年，他的观点遭到庇护五世不指名的谴责。起

初，贝乌斯与他在卢万的同事共同接受了教皇的训令，但后来声称训令并非真正谴责他的观点。贝乌斯耍了各种复杂的手段，他口服心不服，1580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强迫他明确地公开认错。但贝乌斯主义并未消亡。他在卢万创立了一个学派，在他去世后，其追随者们实际上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讲座，与认为是其观点主要对手的耶稣会的学说抗衡。詹姆斯·詹森是该讲座的第一个主持人，他是更为著名的科尼利厄斯·詹森的导师，詹森主义正是后者的遗产。这个世纪罗马教会内部无休止的关于神的恩典、得救预定论和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它们自奥古斯丁时代以来在西欧神学界已成为如此具有魅力的问题，以至于西欧神学界对逻辑的热衷和对个人宗教信仰的实际问题的关注，似乎都与这些深奥的问题密切相关。旧的多明我修会和新的耶稣会之间经常的潜在的竞争由于莫利纳主义的争论而公开化。莫利纳（1535—1600年）是葡萄牙埃武拉大学的一位耶稣会的神学家，他发展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理论，目的是要将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全能的力量协调起来。这一观点在他的名著《协调》中，于1588年在里斯本首次充分表述，此书1595年在安特卫普刊印了第二版。在这中间由多明我会士挑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他们坚持托马斯的学说。此学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肯定是属于奥古斯丁派；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国王都参与了其事。罗马注意到此事，但拒绝谴责任何一方。并非意外的是，莫利纳的观点于1587年在卢万被批判，甚至没有得到他最杰出的朋友、耶稣会士贝拉明和苏亚雷斯的完全赞同。但涉及的问题与耶稣会的实际教牧学说关系十分密切，所以莫利纳主义在耶稣会必然受到欢迎。耶稣会在其创立者圣依纳爵·罗耀拉发表《灵性的操练》一书后，非常强调一个人如果希望获得拯救，就需要持有坚定的信心；但新教徒、贝乌斯派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托马斯主义者恰恰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若无上帝的全能的恩典，人是无能为力的。西班牙大学中的激烈争论，终于迫使教皇采取行动，于1598年由克莱门特八世建立了著名的枢机主教咨询会议，开始调查这场争论。调查工作延至保罗五世任内，他于1607年以一项敕令结束了这一争论，允许双方保留意见，在教廷做出最后的判断以前，禁止他们互相攻击和责难，但教廷从未做出这一判断。有些人认为能够用人间的词汇阐释上帝的权力和他所创造的人的意志之间的确切关系而不涉及最终的秘密，除了这些人之外，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整个争论必定显得枯燥无味。但是这场争论生动地表明了这个时期罗马教会对神学的探

究是极为活跃的。思想肯定没有停滞，或许有人感到本来可以把精力用于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目的，而不必消耗在激烈的争论中，然而，争执的问题，如前所述，并非与实际的宗教无关。令人深思的是：与此同时，新教世界几乎也卷入了同样的争论，例如研究英国清教的人会看到，得救预定论概念对于加尔文派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事件也显示出，如在中世纪一样，大学在天主教生活中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并且成为教牧训练的坚强后盾。与大学密切相关的神学院的建立，并未削弱大学的影响，倒是往往提高了这种影响，因为一般教区的教士几乎没有文化，与学术生活脱节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还与中世纪时代一样的是宗教修会在传播福音和专门的教区工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宗教修会与大学的生活紧密相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大学生活。伟大的神学家几乎全部都是这个或那个修会的成员。因此，宗教教育通过正规的或世俗的教会人员从大学普及到世俗人士，这种宗教教育远比宗教改革以前更为系统和深入。然而，这个制度的建立是缓慢的，无知并非在各处都已消失，或者并未立即消失。事实确如圣文森特·德·保罗于17世纪在法国建立其教区传教团时所发现的那种情况一样。但是到了16世纪末年，在使宗教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方面，某种类似革命的东西，在罗马教会所属的广大地区完成了。

在这后面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事物。如果对于给一般人不仅带来知识而且带来虔诚的那些力量不加考察，那么对这个时期的叙述将是不完整的。宗教修会和教区教士尽力传给世俗人士的不仅仅是通俗的神学，真正领悟了改革原则的宗教修会和教区教士希望让世俗人士做祈祷、重视圣礼、实现基督徒的美德，并通过这一切达到圣德和正统。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最终力量在于灵性的复兴，这在16世纪中期以前就已开始了，但后来其活力继续增长。说明其目的最适宜的例子或许在于圣腓力·内里（1515—1595年）的毕生工作。这位佛罗伦萨人从1533年直到他去世，一直生活在罗马，于1551年成为教士，并且建立了奥拉托利会，此会尽管不发愿，但它是一个像修士那样生活的教士团体。他传道的全部目的是引导一般人不仅生活得体面，而且生活得圣洁，其手段一部分是通过忏悔；一部分是通过召集世俗人士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进行祈祷、讨论和娱乐。他的影响扩及教廷，尽管他

不接受任何官方职务，但他有时能够并确曾影响了教皇的行动。他几乎为罗马的一切关心天主教复兴的人士所熟悉与推崇，因为对于像圣腓力·内里所拥有的这种影响力来说，罗马是最好的战略基地，但他十分谦逊，无意控制教会的复兴。

圣腓力·内里在罗马所从事的工作，也被一连串像圣徒一样的人物在其他地方进行着。当时，这些去世后将被谥为圣者的、数量可观的教士与非教士，必然使每一个了解这个时期的人所感动，特别是因为特伦托会议后罗马的谥圣标准，如官方原则所显示，绝不是低水平的。“崇高的圣德”是基本的要求，它必须是严格的“崇高”，远远超过一般的虔诚和善功。与其他时期相比较，把16世纪晚期描述为圣者的时代并不过分，在此期间天主教所取得的成果，真正的秘密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这种圣德的增长一部分可归因于每个团体中由于其生存和生活方式受到挑战而经常表现出来的崇高的反应。“教会在危急中”的口号可能与“国家在危急中”具有同样激励人心的作用。但那些了解以往各时代中灵性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宗教史家们则欲寻找一种更深刻的原因，并使之与这个时期天主教生活的另一显著的特征相一致，即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复兴与发展。16世纪后半期是阅读灵性读物的时代，这与这个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以及无疑还有其他许多我们了解较少的人士能进入一种更为真实和更为深刻的灵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有名的故事讲到，圣依纳爵在潘普洛纳负伤后进行调养时，房屋里找不到一本他最喜爱的骑士传奇故事，觉得百无聊赖，于是不得不去读关于基督的故事和一系列圣人的故事，结果使他转而从事教会工作。在阿维拉的圣德肋撒的自传中，她清楚地表明：她之所以能超越16世纪早期修道院的马马虎虎的虔诚，应归功于奥苏纳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弗朗西斯科的《礼拜初步》一书。这本书为她开辟了沉思祈祷所可能开辟的新鲜视野。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创作灵性文学作品的时代。虽然它仅仅产生了圣德肋撒本人和在改革圣衣会过程中她的同伙圣十字架的约翰的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是公认的对神秘生活最深入的分析，超过所有这方面的著作。因此，这个时代是灵性理论著作极为突出的时代。事实上这些作品只是一大批灵性文学的群山之巅，它们都可与荒漠的教父时代和中世纪的古典作品相媲美，而且有时还要更高超一些。特别是圣十字架的约翰，在伟大的西

班牙神学传统的中心萨拉曼卡接受教育，并在他的作品中显示了对经院神学的精深知识，这一事实说明了西班牙的大学在神学领域中能产生出比枯燥无味的强词夺理的争辩更好的作品，与前已提到的关于神恩与自由意志枯燥的争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像一切在西班牙明显的新奇事物一样，神秘运动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怀疑。考虑到流行的光照派异端团体号称得到特殊的神启，并认为不道德的行为不会玷污灵魂，宗教裁判所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但是神秘运动得以继续存在并重新被确立为正统的事实更说明，西班牙的宗教不完全是过去常被认为的那种与盲从结合在一起的好斗的狂热主义。

16世纪晚期的天主教，就像今天受现代派天主教的攻击一样，在过去则是受新教和持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的攻击。最流行的是把它贬为“巴洛克^[8]式的天主教”。的确，它最喜爱的建筑形式存在浮夸的现象。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学派都否定巴洛克式或者认识不到巴洛克式与“洛可可”^[9]式的区别。在巴洛克式浮夸的装饰下，存在着一种力量和坚实，因而不能藐视它。同样，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的严格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可能表现为近乎自鸣得意地夸示对特伦托会议无条件肯定的态度）与巴斯噶在下一世纪加以嘲讽的那种感情用事的虔敬主义也是有区别的。虽然16世纪晚期的天主教被狂热与残酷所玷污，经常过度地囿于马基雅弗利的民族主义，而且现在看来似乎是缺乏目前所说的普遍的基督教精神，但是它具有深度和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它具有深沉灵性所激发的热情，这一切使得历史学家不可能将其作为一种基督教的失常现象而忽略不谈。

（于可 译）

^[1] 加拉法是保罗四世的原姓，其全名为Gian Pietro Carrafa（1476—1559）。——译者注

^[2] 以扫是以撒的长子，将继承权卖给了弟弟雅各，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1—25节。——译者注

^[3] Gallicanism，即教会独立主义。十五六世纪法国国王与部分天主教徒主张限制罗马教皇在法国扩张势力，并欲脱离教皇的控制。——译者注

^[4] 主张教会之最高权威应属于教会会议而不属于教皇的运动。——译者注

^[5] St. Boniface（约675—754年），英国传教士与教师，公元8世纪两度去德意志北部传教，任德意志总主教和教皇使节，最后被起义人民杀死。——译者注

[6] 参阅后面第258—259页。

[7] 参阅本卷第14章。

[8] 巴洛克，特指1550—1750年间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其特点是过分地雕琢与怪诞。——译者注

[9] 洛可可，为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译者注

第四章 新教思想与宗教斗争

一 路德之后的路德宗

在《新教史》这部巨著的第二卷一开始，埃米尔·莱奥纳尔将马丁·路德的去世描绘成对路德主义的沉重打击，并用此方法来对比加尔文之死对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这种对比不无贴切之处。因为路德宗过去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某个人物的宗教，这种人常常是一个激烈而又古怪的天才，但也是一个能够在几乎无与伦比的程度上影响并激励其信徒的天才。马丁·路德的影响能够延续到他死后，显然是由于他在欧洲和美洲的信徒们源源不断地撰写了关于他的思想的书籍。凡是听过某位庄重的路德宗信徒在决定某个问题时使用虔敬的字眼儿“马丁·路德说”的人都不会对路德宗的影响产生半点儿怀疑。尽管如此，与加尔文宗对于那位日内瓦的改革家于1564年（特伦托宗教会议结束不到一年）去世所做出的相对平静的反应相比较，莱奥纳尔把马丁·路德的死看成是他所创立的信仰的一个灾难也并不为错。因为加尔文创立了一个体系；他活在他的著作中，也活在他在日内瓦所建立的特征明显的教会政体中，这一教会政体为所有的加尔文教会建立了一种模式。路德则不是一位自成体系的人。人们几乎可以说他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憎恨体系和组织。的确，按照他所理解的福音，路德的原则主要就是人类仅靠信仰即可释罪；这一原则得到完整的宣讲而且与之一致的是，教会举行的礼仪，教会的组织以及礼拜的细节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根据当地和当时的喜好和需要做出不同的决定，这一原则说明了至今在路德教会中存在着的差别。

然而，与圣·方济各相比，还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他刚一去世，在他的教团内部很快就出现了争吵和分裂，其实，这种分歧甚至更早就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了，1546年路德的死也同样加速并恶化了路德教派中已在发展中的分裂趋势。路德本人和他最重要的门徒梅兰希顿两人气质上和智能上的不同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已导致了他们

之间观点上的歧异，只是由于彼此之间的友情才防止了分裂。马丁·路德一直认为梅兰希顿对所有的对立面都过于仁慈。“我像以赛亚，腓力像耶利米；他总是担心自己训斥的太多了，这正是腓力！”然而，他对于梅兰希顿的温和态度怀着一种默默的尊敬，犹如暴风雨中的海燕常常怜悯和平中的人们，“腓力在温和中前进，而我则在信仰中前进。腓力招致自己被吞噬，而我要吞噬一切，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这些只是部分说明了不仅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他们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在1530年宗教会议讨论《奥格斯堡信纲》时和后来在1541年雷根斯堡会谈（当时天主教与新教似乎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中，这种区别已变得十分明显。在这两次会议上，路德认为梅兰希顿背叛了过去。对于主要反映梅兰希顿立场的《奥格斯堡信纲》，路德起初表现为热烈赞同。他在写给萨克森选帝侯的信中说：“我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它无可挑剔……因为我做不到如此的温柔与和气。”他一直认为实现和解是梅兰希顿的长处，并将此作为对自己的强硬态度的纠偏补遗。正如他在为同侪对《歌罗西书》的评论而撰写的前言中所讲的那样：“我非常粗鲁、暴躁、激烈，总的说来非常好斗。我生来就是要和无数的魑魅魍魉战斗。我一定要清除残根和砾石，斩断乱丛和荆棘，整理荒芜的森林：但腓力先生却轻柔、和气地走来，以上帝慷慨赋予他的智慧将幸福播种并浇灌。”然而路德对梅兰希顿政策的再认识就不那么亲切了。在奥格斯堡，梅兰希顿曾自愿做出更多的让步企图换取与教皇特使坎佩基奥达成协议，他甚至表示：至少在一次宗教会议召开以前，只要允许圣餐中饼酒同领，允许教士结婚，他愿意承认教皇和主教们的权威。路德在从科堡写来的信中指责让步，理由是旧教徒只愿做出最低限度的让步，他明确地补充说：“我们越来越搞不清楚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让他们自行其是吧。”毫无疑问，如果路德参与了《信纲》的撰写，它就不会是那样一份温和的文件，而且肯定他也就不会超越这份文件一步。1541年在雷根斯堡，当与旧教徒就一份更为温和的声明展开争论时，两人之间的分歧表现得更为明朗了；当时，梅兰希顿作为新教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宗教会议。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双方就争论的关键问题——唯信得救——达成了协议，但路德本人却拒绝承认这个协议，认为它是一个“勉强拼凑的东西”，要求旧教徒明确改变其在主旨上的教义。而梅兰希顿则认为：双方同意的信条虽“不如提出的主旨重要”，但还算折中，并不太坏。

追述一下本卷历史时期之前的事件对于我们理解梅兰希顿的思想以及它与路德的思想之间的分歧是必要的。因为梅兰希顿这位路德的门徒比他的老师多活了14年，死于1560年，因此他痛苦地经历了路德宗信徒内部一直多少处于隐蔽状态的分裂。全靠其领导人公认的威望，才没有在他生前就演成分裂。除了和再洗礼派以及茨温利派这些激进分子的争论以外，路德还要对付自己门徒在教义上的偏离。一方面是“反律法论”，它将路德关于获救的人“永远公正，永远有错”这一矛盾的概念推进到坚持认为人的罪恶与上帝有关，因此，基督徒无须认真服从道德律法。另一方面，有一种后来被称作神人协作论（Synergism）的观点，它怀疑路德对自由意志的绝对否认，并设法为拯救过程中人的合作寻找一席之地。前者由阿格里科拉和申克所创，路德于1537—1538年对这种立场进行了攻击。后者主要以纽伦堡的改革者奥西安德尔为代表，他相信得救与承认基督为拯救者的那些信徒心中内在的基督紧密相关。路德对此没有加以攻击，也许正像莱奥纳尔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他心爱的门徒腓力·梅兰希顿也被指责持有类似的看法。梅兰希顿无疑清算了他最初与路德一致的观点，即人在自己的得救过程中绝对无能为力，而是变得不那么信奉得救预定论了。有一次，路德在桌旁说：“上帝拯救他希望拯救的人”，而梅兰希顿反驳道：“不，拯救那些希望被拯救的人。”

梅兰希顿所背离的不仅是这一点。1540年对《奥格斯堡信纲》加以修订时，他更改了路德一直坚持的圣餐圣体说，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瑞士对“真在论”的否认。的确，到路德的晚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提醒路德说，梅兰希顿暗地与他的看法有分歧，事实上等于在背后批评他，甚至还与旧教徒有通信来往，但路德不愿介意此事。而在梅兰希顿一方，由于惧怕路德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暴躁的脾气，也保持沉默。

事实上，无论路德与梅兰希顿过去关系如何密切，他们毕竟是两个具有不同气质和观念的人。梅兰希顿始终是一位学究，严谨的学者，注重说教的严密性的先生，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对公共秩序的重视，比路德认为的上帝为震慑邪恶者乃立君主的概念更加深刻。正如他所说：他之所以愿意在奥格斯堡宗教会议上做出让步，主要是为了“维护、加强和建立和平、和谐，以及教会秩序的权威”。也还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路德晚年，他急于一方面与旧教徒，另一方面与瑞士

的改革者实现和平。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列举了使他偏离路德宗的让步是对传统、理性、律法、权力和对立面做出的让步。另一方面，天性易于激动、性情暴躁的路德是从学究变成的先知，这总是一种危险的改行——尽管可以像他那样强化个人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路德认识到了他自己同他的既喜欢又猜疑的朋友之间在气质和观念上的区别。正是这一点再加上认识到梅兰希顿在任何方面都不适于继承他来维持路德宗的团结，也许使他于1538年写信给梅兰希顿时说出了下面这些话：

下个世纪将有多少个不同的教主？这种混乱将会更加严重。没有哪个教会愿意顺从别人的观念和权威，每个人都要树立自己的“拉比”：看一看奥西安德尔和阿格里科拉已经在干些什么……而且还会有多么可怕的诽谤！太放纵了！君主们避免这些邪恶的最好的途径是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但旧教徒却逃避这一步：他们太惧怕光明了！

在路德宗的范围内，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的预见。路德死后一些年，也是路德宗内部冲突剧烈的一段时间。在冲突中，不幸的梅兰希顿注定要迫不得已地成为中心人物。分裂的开始恰恰是由于梅兰希顿对和平的热忱，这是临时敕令的结果；1547年（路德死后两年）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击败信奉路德宗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后，企图把这个敕令强加给帝国。正如敕令的名称所示：它是一次妥协，企图在旧教与新教的分歧可以由某次宗教会议彻底解决之前，暂时维持两者之间的均衡。旧教对新教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让步，但要求他们保持，或更正确地说重新引入大量的旧教礼仪和庆典。这一做法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并导致许多在信念上不能接受这一主张的重要的宗教改革家自愿流亡——这也是克兰麦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将他们中的一部分吸引到英国进行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的原因。这一做法也遭到大多数新教诸侯的抵制。但梅兰希顿和他的同伙们却迎合了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制订的计划。莫里斯公爵虽然也是一个新教徒，但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之前与皇帝结成了联盟，而且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包括维滕贝格在内的萨克森选帝侯的地位，这是从他的亲属约翰·弗雷德里克那里剥夺来的。1547年，约翰·弗雷德里克夺回了选帝侯地位，但在米尔贝格战役后再次丢失，这次战役使他成了阶下囚。在宗教信仰上持灵活态度的莫里斯在战后曾望过弥撒，并自愿接受了教皇允许他保留还俗了的教会财产的决定。但他深知，要说服他的萨克森臣民接受皇帝1548年的临时敕令将会面临的困难，因而开始努力促成一种妥协，一种可能

为萨克森宗教会议愿意接受的他自己的临时敕令形式的妥协。这是1548年莱比锡临时敕令的来源，这样称呼它是为了与已经论及的帝国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加以区别，后者已于前一年5月经教皇批准后公布。由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崩溃以及那些不妥协的新教徒的反抗，似乎为莫里斯寻求的妥协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以阿姆斯特多尔夫和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为首的一些顽强的改革者躲到了自1521年以来一直作为路德宗堡垒的马格德堡，这座堡垒将于1551年被莫里斯以皇帝名义攻占；在攻占以前，像1689年在伦敦德里的情况一样，经过了一次成为新教英雄史诗的守城战。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第一次打破了路德宗遵循的消极服从统治者的理论，因为被围困的牧师们发表了一个庄严的声明论证抵抗无罪。

梅兰希顿与他在维滕贝格的支持者进行的合作正是在莱比锡临时敕令方面，梅兰希顿在这件事情中成了选帝侯的宗教顾问。他可能因莫里斯主要的世俗顾问是克里斯托弗·卡尔洛维奇而在良心上感到坦然一些，此人是一位伊拉斯谟主义者，在宗教事务中一贯持中立的立场。这是梅兰希顿能够理解的一种态度，人们还必须记住路德宗遵守的要顺从敬神的君主这一原则。再者，正如在1548年4月的一封信中揭示的那样，梅兰希顿受到一种反对路德的暴力和不妥协的思想的影响，在路德的领导下，他曾处于被他现在描绘为盲从者的地位。他说他过去的老师时常不顾自己的尊严，人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到有文化素养的梅兰希顿常常对路德的粗暴的争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说路德不关注公共福利。（如前所述，梅兰希顿对公众的安宁具有学者般的热爱）当他对福音派教会的建立感到遗憾，同时否认自己对分裂负有责任，而且公开承认毕生喜爱天主教仪式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假话。他的其他许多语言和行动表明了这种心理特点，不过，他并不总是首尾一致，在一封私信中，他曾批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并说这一敕令所倡导的仪式是愚蠢的。（当这封信未经他的允许付印发表后，他当众撕毁一份印件，以示他与这封信毫无关联！）当局势需要让步时，不仅他一人感到不必遵循路德改革的每一个细节，他还得到了其他著名的路德宗信徒的支持，如布根哈根和乔治·马约尔的支持。后者从1536年起便是维滕贝格的教授，后来他强调：为了最后得救，善行是必不可少的。

莱比锡临时敕令是一份包括15篇文章的文件，目的在于从信念和著作、教会的权威、圣礼、圣像的使用，按教规进行定时祷告的时间，为死者和斋戒者进行祷告的祈祷文这些方面促成旧教和新教在教义上的融合。它对萨克森的实际影响似乎很小。梅兰希顿本人写道，在那里的教堂中，人们继续做着2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谁也没想到要改变一下。梅兰希顿似乎也不真正相信这个敕令，一位批评家把它描绘成与魔鬼的共谋，对此，梅兰希顿曾经说过这是真实的。但一个人除此而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不管怎样，就连妥协的思想都难以长久。尽管1550年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宗教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说服新教徒派代表到特伦托宗教会议上陈述己见，但他们1552年在会议上的出现，对于使神父们接受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影响。他们的要求集中起来说就是：在以《圣经》作为唯一真理标准的基础上重新开会，俗人拥有投票权，反对教皇主持会议并享有否决权。1551年萨克森的莫里斯断绝了与皇帝的关系，并与其他新教诸侯结成联盟，这个联盟接受法国亨利二世的帮助。莫里斯向因斯布鲁克的推进导致特伦托会议匆忙中断并在以后10年中再未复会。同年8月，查理五世在帕绍被迫接受新教徒的条件。第二年，萨克森的莫里斯在一次反对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阿基比阿德的行动中被杀。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承认各个领主在领地内有权决定其宗教事宜，从而使所有的临时敕令全部成为废纸。

尽管如此，因查理五世暂时胜利而暴露出来的路德宗内部准备妥协者与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对于路德生前即已存在的观点上的分歧又增加了怨恨并导致了1548—1580年这32年间路德信徒之间激烈的争吵。不过，这些争论虽因其分裂特性而在关键时刻削弱了路德宗，却因一部明确解释路德教义的文集的诞生而结束，并因此而导致一种在路德死时似乎绝不可能实现的团结。但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从后来路德宗的历史中为自己找到部分根据，认为这种团结的益处大可怀疑，它势必把一种依靠虔诚态度多于依靠教义等等的宗教僵化成一种学术的形式，丧失了早期的锐气和吸引力。

如前所述，梅兰希顿发现自己不幸地成为目前正在激烈进行的这场争论的中心。在一个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梅兰希顿由于他那有影响的《恳谈录》（*Loci Communes*），已成为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有理论系统的神学家。此外，他还是已经成为路德宗信仰依据的《奥

格斯堡信纲》的主笔。人们已经注意到了那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即从长远来看，梅兰希顿对系统化的追求与路德本人易动感情而且有时不顾逻辑的特性是相互对立的；由于环境的力量，梅兰希顿的反对者最终接受了那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被称作真正的路德派（Gnesio Lutherans），曾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可能引起变化的观点。梅兰希顿作为路德弟子中之巨擘以及发起运动的主要学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但同时，人们又怀疑他动摇不定、三心二意，积极的革命者几乎总是把这归因于知识分子的特征。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些人眼中，上述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对于这些人，路德主义过去是，并且必须永远是与天主教会旧制度截然对立的。

由于再也没有路德这样一个开山祖式的人物靠强调对其个人的忠诚从中发挥仲裁者的作用或强制实现和平（如果路德给人留下的那个幻想破灭了的、固执而且越来越暴躁的形象真能做到这一点），这时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一开始就是关于不置可否论的论战，它因1549年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发表其《不置可否的真与假》（*De veris et falsis adiaphoris*）而爆发。要记住，在那些向北撤到马格德堡以对抗《奥格斯堡临时敕令》的不妥协的新教徒中，弗拉希乌斯是最重要的一位。对他们来说，莱比锡临时敕令与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同样该诅咒。当梅兰希顿和他的支持者们为莱比锡临时敕令辩护时，弗拉希乌斯等人激烈反对，梅兰希顿的理由是：莱比锡临时敕令所认可的天主教礼仪是“不置可否物”，即无关宏旨的东西；这些礼仪完全基于人类的传统，因此，与之妥协也就不是对上帝的谕旨的背叛。在弗拉希乌斯等人看来，在上帝与魔鬼、真理和荒谬之间没有中间位置可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是在攻击这样一种主张，这种主张不是说这些不置可否的事物本身是好的或有价值的，而是说它们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做法，虽然并非必不可少甚至也许应加以反对，但出于和平的目的，却是可以允许的，很像加尔文在另一场合下把安立甘宗祈祷书的某些细节描绘为“可以容忍的蠢话”一样。为这种态度辩护的人可从路德的传统中寻求支持，因为路德早期在维滕贝格曾反对过卡尔施塔特和其他人在他离开瓦尔特堡期间提倡的激进主义，当他返回后又恢复了被他们抛弃的，而且其中大部分路德自己后来也放弃了礼仪。进一步说，只有以圣经为中心和唯信得救的路德宗原则以及这一原则派生出来的圣礼观才是应该恪守不移的。除此以外，几乎所有的宗教礼仪和组织都是次要的，可以随着环境变化。对16世纪中叶维滕贝格

的神学家们起草的临时敕令的强烈反对，不仅显示出一个决心不再重复已经走过的道路的宗派的发展过程，而且说明了激进的路德主义的成长，此派远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路德一生的保守倾向，同瑞士改革者的态度倒更为接近。的确，这种激进主义也许标志着瑞士人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实质教义上）慢慢地从西南部向信仰路德宗的德意志扩散，瑞士人的思想很早就西南部的宗教改革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不置可否论的争论中，不仅那位符滕堡的路德宗改革家，在圣餐问题上坚决反对茨温利和加尔文的布伦兹，而且还有加尔文，都站到了反对维滕贝格派一边。的确，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立即就会发现这场争论与发生在英国的胡克与激进的清教徒之间就是否唯有圣经中明确证明了的的东西才是合法的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十分相似。

梅兰希顿在圣餐问题上对瑞士人的圣礼观表示赞同乃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瑞士人否认饼和酒被祝圣后发生任何变化，因而与布伦兹对立。根据路德的观点：基督的仁慈将属于神性的普在特征转到了圣餐中，因而可以在圣餐中真在，布伦兹以非常精确的形式提出了路德宗的真在论的教义。宗教改革的确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思想上的互相启发和天主教的反动的压力正在组合出奇怪的合作者。

1552年，梅兰希顿同以往一样在对立面的压力下抛弃了他对不置可否论的辩护，而且实际上，正如以前所指出的，由于查理五世1547—1548年暂时胜利的影响随着新教的复苏而渐渐消失，这个问题已经不太重要了。但这一争论势必将路德的观点分裂成“腓力派”和“真正的路德派”这两大派，两派分别将以维滕贝格和新的耶拿大学（1548年创建）作为自己的营垒。这一事实在继不置可否论以后的争论中变得更加明显。这场争论的焦点转到了路德关于拯救、关于必然得救或善行得救的概念上（事实上是过去的反律法论问题稍微变换了一下形式），也转到了自由意志问题上。路德坚持用以反对伊拉斯谟的概念是：人类具有或者屈从上帝或者屈从魔鬼的劣根性；而在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中，那些把路德这一概念推到极端的人遇到了“神人协作论者”（Synergists）的反对，他们希望承认人类在得救过程中有与上帝协作的某些权利。很难说腓力派在每件事情上都像真正的路德派所认为的那样站到了修正者和背离者一边，但后者这样认为也不无道理。这的确和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有相似之处，

一方不容许偏离马克思的语句，而另一方则被说成是偏离了他的语句。这种相似性还不止于此，就像今天有一些看似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当时也有一些准备超越路德的路德宗信徒，如阿姆斯特多尔夫，他想要声称善行对于得救是绝对的障碍。

这里不需要强调这一切对路德宗的团结的影响，甚至在政治方面的影响。路德认为：虔诚的君主应该关心并维护宗教的纯洁性。萨克森家族内恩斯特与阿尔贝特两个支系的长期争吵就这样于16世纪中期转到了神学方面。被阿尔贝特支系的莫里斯夺走选帝侯资格的恩斯特支系的约翰·弗雷德里克支持极端的路德派反对受到莫里斯的兄弟和继承人奥古斯塔斯选帝侯青睐的腓力派。约翰·弗雷德里克于1559年授权发布了《魏玛驳斥书》，不仅驱逐了所有路德宗的反对者，而且还驱逐了同情梅兰希顿及其朋友们的立场的人，旨在反对1558年另一些新教诸侯在法兰克福同意组建的联盟。值得庆幸的是，神学争论的错综复杂阻止了完全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政治分裂的进程。甚至在耶拿大学也出现了与反对自由意志的极端分子针锋相对的力量。从1557年便在耶拿大学担任教授的激烈的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因其观点认为人在上帝手中是被动的、犹如木头和石子一样而遭到了施特里格尔（Strigel）的抨击，后者是梅兰希顿的学生，也是一位教授。耶拿大学校长撤销了《魏玛驳斥书》并将争斗中的牧师们禁闭六个月，只是在得到新教诸侯和皇帝斐迪南一世亲自支持的大学中普通师生们的要求下才将他们释放。争吵继续进行，施特里格尔被免去教授职务。1560年他与弗拉希乌斯的关于《魏玛驳斥书》的长时间争论的结果不过是促使约翰·弗雷德里克公爵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弗拉希乌斯和他的同伙继续猛烈攻击他们的对手，而公爵则采取了埃拉斯都式的解决办法，他成立了一个宗教法庭，从牧师们手中接管了革除教籍和审查书籍的权力。弗拉希乌斯与他的大约40名支持者被免除职务。1561年施特里格尔被耶拿大学召回并复职，但翌年又去莱比锡任教授，这也许是明智之举。

面对加尔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这些激烈的争论直接威胁到路德宗的生存。诸侯们对此都有察觉，并且，当皇帝斐迪南提出要将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作为罗马国王的候选人和自己的继承人时，诸侯们看到了恢复团结的时机。斐迪南本人赞同向新教徒做出让步，但他那被路德宗老师们教育出来的儿子才真正与新教诸侯们进行了谈判，他

应允：只要新教徒实现了内部的团结，他就支持《奥格斯堡信纲》。1561年在瑙姆堡召开的诸侯会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黑森的腓力成功地使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梅兰希顿的圣餐观，对于严格的路德宗来说，这一观点与瑞士人的看法太相近了。他们甚至没有一致支持马克西米连当选，加尔文宗的支持者巴拉丁伯爵反对他，因此他不得不对天主教徒装作完全与他们信仰一致才在选举中获胜。甚至连约翰·弗雷德里克公爵被夺去萨克森领地也没有在路德宗内部带来和平。他被终身监禁，因为支持威廉·冯·格伦巴赫暗杀符茨堡天主教会主教的阴谋；阴谋者把公爵卷入了一个狂妄的革命计划，即要在瑞典以及尼德兰的和法国的头面人物的支持下使这位公爵成为皇帝，一个名叫陶森茨舒恩的疯狂的预言家以伪造的启示支持了这一计划。

当恩斯特支系的领地落入支持腓力派的阿尔贝特支系的选帝侯奥古斯塔斯的管辖下之后，公爵的兄弟和继承人约翰·威廉就始终支持耶拿的神学家们，直到他死于1573年。奥古斯塔斯怀着刻骨的仇恨追踪弗拉希乌斯，使他从一个又一个城市中被驱逐，但弗拉希乌斯在各处仍支持人类彻底堕落的极端观点，坚持认为罪恶已成为人性的真正本质。这场论战的激烈程度确实几乎难以想象，弗拉希乌斯的一个同伙维干德代表了它的精神，他认为“非狂热者不会爱基督”。1568年，阿尔滕堡的神学家们在一场当着约翰·威廉公爵的面，而且这位大人物也参加进去的辩论中，真正的路德派和腓力派之间的谩骂变得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连上帝也感到震惊从而通过异兆的显示将此告知了人类。（在16世纪路德宗思想里，从未远远地摒弃对天启和占星术的兴趣；梅兰希顿本人对占星术就很有兴趣，甚至连路德都难以使他放弃这一兴趣）

路德宗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同路德宗信徒们对加尔文主义的恐惧和厌恶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追溯到路德本人与茨温利的对立。1549年，茨温利的继承人布林格与加尔文宗在《蒂古里诺协议》中取得一致以后，那种厌恶必然明显地增强了。《协议》否认在圣餐的饼和酒中的真在论，真在论是彻底的路德主义者与天主教一致的地方，不过他们反对变体论。《协议》把那些拘泥于基督说过的话——“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人描绘成“迂腐的注解者”，路德在1529年的马尔堡宗教会议上就是那样做的，当时，他在饭桌上用粉笔写出：“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并且拒绝从其字面的意义上做任何细小的引

申。“宁做天主教徒也不做加尔文教徒”变成了路德宗的口号，而原教旨主义者把那些在他们看来其圣礼教义靠不住的路德宗信徒描绘成“隐秘的加尔文主义者”。反对这些人的势力非常凶猛。1574年，腓力派的约阿希姆·库里乌斯就圣餐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瑞士人的教义而得到维滕贝格神学家们认可并用来讲道，对此感到担心的选帝侯奥古斯塔斯似乎看不到反对真正的路德派的教派打算走多远，于是在《托尔高条款》中查禁了这篇著作。他还把隐秘的加尔文主义者的首领们付诸审判，一人被拷打致死，另一人被长期监禁。事实上，新教徒对新教徒的迫害变得越发普遍了。当曾在海德堡庇护过加尔文宗的巴拉丁伯爵弗雷德里克三世于1576年死去后，他的儿子路德维希要求其臣民恢复信奉路德宗，并从他的领地内驱逐了500或600名拒绝改宗的加尔文宗首领。巴拉丁伯爵此后一直信奉路德宗，直到1583年路德维希的兄弟约翰·卡齐米尔为他年幼的侄儿弗雷德里克四世管理领地时，才恢复信奉加尔文宗。

这里需要强调提出，皇帝马克西米连（1564—1576年）本人名为天主教徒，实际赞同路德宗，甚至在其奥地利领地内鼓励路德宗，对加尔文宗则不予支持。1566年，他在奥格斯堡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旨在排斥天主教和路德宗以外的一切宗教派别，但当他竭力使巴拉丁伯爵弗雷德里克放弃加尔文主义时未能得到大多数路德宗诸侯的支持。在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塔斯的领导下，他们坚持认为弗雷德里克除了关于圣餐的观点以外，还是忠于《奥格斯堡信纲》的。无疑，马克西米连对弗雷德里克的敌意起源于1562年后者反对他当选为罗马人国王，但马克西米连也由于他接受了他的路德宗老师们的教育而相信只有路德宗才具备的优点，也许他认为帝国中有两种宗教就足够了，尤其是如果新教左翼得势，他所追求的新教右翼与天主教的和解就会遭到破坏。

1567年马克西米连死后，他的儿子鲁道夫，一个彻底的天主教徒继承了皇位，这件事很可能是迫使路德宗整顿内部、实现团结的一个原因。而弗雷德里克三世之死使加尔文宗在巴拉丁伯国被推翻一事，也肯定使这个时机显得十分有利。整顿的第一步曾经迈出过。符滕堡公爵克里斯托夫是一位虔诚的路德宗信徒，在他的领地上，流行的争论造成的烦扰也不如在萨克森领地上严重。对于他的蒂宾根大学校长、热衷于团结工作的詹姆斯·安德烈埃，克里斯托夫公爵给以积极

支持。安德烈埃于1567年制定了五项条款以求建立团结的基础，这些条款同时得到了腓力派和真正的路德派的支持，但由于克里斯托夫公爵于1568年去世以及与他有着共同的团结愿望的黑森-卡塞尔的威廉对安德烈埃的疏远，没有取得深远的进展。1573年，安德烈埃重新执行这一任务，并发表了六篇倡导和平的讲道书，这使他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北德意志路德宗神学家们的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得到世俗统治者不伦瑞克的尤利乌斯重视的马丁·克姆尼茨；结果，安德烈埃根据讲道书形成了有11项条款的《士瓦本协议》，不久得到下萨克森公国的响应。1576年，萨克森的奥古斯塔斯迈出了独创性的一步，他的神学家们撰写了《毛尔布龙教义》。同年早些时候，他又在托尔高召集宗教会议，将《士瓦本协议》与《毛尔布龙教议》合并成为《托尔高教义》，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梅兰希顿的朋友和门徒们完成的。它的篇幅太长，不适用，这部《托尔高教义》被安德烈埃缩编成最后一版的《教义条款》的《梗概》，1580年在德累斯顿以德文发表，以此恰当地表示了对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50周年的纪念。对《托尔高教义》一书的评论后来编成了《贝尔根书》，它又转而发展为构成了《教义条款》第二部分的巨著《明信详解》。

对路德神学的明确阐述就这样产生了。由奥西安德尔翻译的第一个拉丁文本被认为有缺陷并加以修订，最后于1584年在莱比锡发表了权威性的拉丁文版本。这是一部长达17000字的大型文献，书前附有由路德宗诸侯、贵族及市政当局署名的长篇前言。由于随处可见的圣经引文，它显得冗长累赘，而且，它一面宣称除了圣经本身和传统的三大教义以外，最初的未曾更改的1530年《奥格斯堡信纲》构成了路德教义的准则，同时详细记载了自1530年以来出现的论战，这些论战尽管可以不同的标准划分，但近期一位作家在论述《教义条款》时列举了不下10次。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论战的次数很多，相互交错而且十分激烈；没有必要为了弄清这一时期路德宗的命运而详细描述所有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教义条款》本身就进行了描述，按莱奥纳尔的话说，“它是用历史学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因而对于历史学家具有很高的价值，它在回答宗教改革的进程遇到的问题时，每一个问题前面都加上一个不偏不倚的对环境背景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各种相互对立的论点都给予了冷静而又确切的界说”。正是由于这部著作不偏不倚的特性，才在某些事情上谴责了不同的宗派而没有颂扬其中任何一方；不过，诚如所料，它在抨击加尔文宗时极为严厉，而

且，有趣的是，其最严厉的部分不在圣餐问题上，而在它对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教义的批判上，说这些教义“都是虚假的，可怕的，渎神的”。“所有本应从圣经和圣礼中得到的慰藉，都被他们从虔诚的心灵中夺走了，因而在上帝的教会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在权威的路德主义那里，对“得救预定论”的信仰无论多么坚定，它都是慰藉的教义而不是潜在的绝望的教义。

从路德的信徒们自他一去世就爆发出来的，确切地说是在他生前就开始了的这场激烈论战所造成的纷攘喧嚣中，能够产生如此全面而又如此详细的协议，而且想不到还是在16世纪结束之前的20年，这看起来一定不亚于一个奇迹。争论当然没有立刻平息下来。从德国各地传来了神学家们批判这部《教义》的声音，迫使泽尔内克尔、克姆尼茨以及基希纳对此撰写了《辩解》并于1584年在德累斯顿发表。^[1]但是最终这部《教义》得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路德宗教会的承认。它受到了加尔文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这也是它越来越被视为继《奥格斯堡信纲》之后条顿式新教的第二个理论基础的部分原因。条顿式新教虽然没有能在其他地方取得重大进展，但吸引并打动了如此众多的德国人以及几乎全部斯堪的纳维亚人，而且一直维持至今，甚至当条顿人迁移到其他环境中仍一如既往，近代美国路德主义的活动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有人问（人们肯定会问）什么原因使得路德宗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并仍然以最重要的新教形式兴起于德国，也许答案的一部分恰恰在于路德主义和条顿人心灵之间心理上的亲缘关系。路德在1517年到1521年间很快就获得全国性的声望，这一点说明无论他的优点还是缺点都总是被看作德国式的。他不仅有意地并且直接地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即使他在后来失去了民心，特别是在农民战争期间；即使他最后没有能够使不止一部分德国人站在自己一边，但是他毕竟始终对德国产生着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产生影响。不是路德本人，而是路德的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其他部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加尔文主义摘取了路德主义所播种的全部果实。我们一直在加以描述的路德宗内部的紧张状态无疑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德国的路德宗信徒变得内省了，他们埋头于理解本宗派的争论之中，它也就很难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宗教。但任何一个体验过路德宗那种独

特的、确实无与伦比的对路德崇拜和虔信的气氛的人，哪怕体验的时间不长，都会想到更深刻的原因。路德宗信徒们就习惯于在这些东西中寻找自己的信仰的精髓，与东正教徒非常相似。他们反对加尔文宗不仅出于对其教义的厌恶，同样还由于加尔文主义者那种冷漠、理智的特征，而且正如前面引用《教义条款》中关于“得救预定论”的那段话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情绪主要来源于一种感觉，即典型的加尔文神学是冷漠无情、墨守成规、唯理主义的，对于那些热忱地信仰在基督身上显灵的上帝的的人毫无裨益，而这种信仰正是真正的路德宗信徒对宗教的态度中最深层的东西。路德宗从来不像天主教或加尔文宗那样苦修苦练。路德宗关于圣洁的观念大部分是其独有的，对于其他环境中的人来说，很难理解。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解释得如何新颖，路德宗其实保持了许多中世纪德国天主教的虔敬传统。与茨温利宗和加尔文宗不同，路德宗不是破坏圣像者，这在今天德国部分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更广大地区的路德宗教堂中都可得到证实；而且，他们没有笼罩在其他宗派的新教徒心中的对于感官崇拜的畏惧。路德宗保留下来的一些中世纪礼仪令人吃惊。它不仅在许多地方保留了中世纪的法衣，这使那些熟知加尔文主义者狂热地反对“教皇的破衣裳”的人感到惊讶；而且，路德宗并不总是严格地恪守在礼拜仪式中使用方言的原则，直到18世纪，在一些路德宗的大教堂里仍然可以看到使用拉丁语的宗教仪式。此后，拉丁语仪式被放弃了，但也不是由于任何新教的原则，而是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些只是见微知著的表象。路德主义植根于德国历史传统中，这一点也许是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人们不可能想不到，路德宗保留真在论教义的心理原因至少部分在于中世纪德国对于圣饼的突出的崇拜。当时，对圣餐原理解释可以说是无止境的，教堂的形象就是一所精致的“圣餐之屋”。在其他新教徒看来，真在论严重地抵消了路德对弥撒圣餐的全面反对，并确实妨碍了与瑞士宗教改革者结为同盟。从另一角度观察，德国天主教和路德宗在吟唱欢愉的通俗赞美诗以及把讲究仪式与朴实无华结合起来这些方面相似的情况，与其说是保留了专属于天主教或新教的东西，还不如说保留了德意志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至今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中路德宗仍然是条顿民族的宗教，其理论和实践一直未能广泛地引起其他民族的共鸣。人们同时也可以理解路德宗之所以能够度过被说成是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的16世纪晚期，最重要的原

因也许在于其被民族意识所支持的崇拜观和虔信观。与之俱来的当然还有这一历史时期明显表现出来的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神学家们很少感到压抑这一事实；自从路德在他的选帝侯那里找到他主要的赞助者和保护人之后，这种关系就成为路德宗的一个特点，而且，正是通过路德宗诸侯才在《教义条款》中重新建立了和解后的统一。

如果人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的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远离在德国降临的风暴，其余波也不算强烈。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1686年，《教义条款》才正式在瑞典的教会法规中体现出来，因为在那里，对《教义条款》的需要并不感到急迫。在丹麦，甚至连《奥格斯堡信纲》直到1574年才被接受，而在瑞典还要晚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中世纪的残余比在德国的路德宗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在礼拜和虔诚的信念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追随着路德宗的模式，而且感到与其德国弟兄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虽然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1560—1568年在位）是在加尔文宗信徒影响下接受的教育，但加尔文宗始终未能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站住脚。著名的乌普萨拉大主教劳伦蒂乌斯·佩特利在他1566年发表的《论教会的仪式和庆典》一书中极力赞扬路德宗的原则，反对加尔文宗的信念。在埃里克的兄弟下一位国王约翰三世统治时期（1568—1592年），一场企图与罗马重新统一的运动同样未能取得成功，约翰在1568年废黜埃里克之前，曾是芬兰公爵，并于1562年与波兰的天主教教徒凯瑟琳结婚，他也在波兰接受了乔治·卡桑德的神学，这种神学把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基本原理结合在一起。一位波兰耶稣会会员斯坦尼斯拉斯·沃尔泽维奇于1574年访问了斯德哥尔摩，会见了瑞典国王并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结果似乎是约翰于1576年试图采纳一本名为《红书》（*Red Book*）的新祈祷书，继一年前出现的《新教规》，它表明了国王倾向天主教的趋势。1576年又有一个耶稣会布道团到达斯德哥尔摩，其首领劳伦蒂乌斯·诺维古斯原为斯堪的纳维亚人，被国王任命管理神学院，即他正在创建中的斯德哥尔摩神学院。在他的帮助下，国王强制推行了他的新祈祷书政策。1577年一位更加著名的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塞维诺来到斯德哥尔摩，直到1578年他一直作为教皇的特使住在那里，在他离开瑞典前正式接纳国王加入罗马教会。

然而，这种信仰上的转变并不持久。约翰试图把瑞典的宗教恢复为罗马天主教，但阻力很大，而且罗马教廷一直不应允国王认为必不可少的让步。波塞维诺被任命为斯堪的纳维亚及北欧和东欧许多地区的教皇代表，于1579年返回斯德哥尔摩。但当约翰知道罗马方面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可以通融，即为了瑞典的皈依而放松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时，他改变了主意。所以，就在波塞维诺返回斯德哥尔摩之际，约翰宣布回到路德教会的团体之中。一个天主教的布道团在瑞典一直停留到1583年，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583年国王约翰的妻子死后，他驱逐了这个布道团。此后，直到1592年死去，他不顾重重阻力继续推行他那使瑞典教会半天主教化的总方针，但后来，他的失败很快就十分明显了。第二年年年初，摄政王南曼兰的查理公爵在乌普萨拉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接受了《奥格斯堡信纲》，恢复了1571年的《教会法规》（大主教劳伦蒂乌斯·佩特利的先于国王约翰的《新教规》的著作），并选举亚伯拉罕·安德烈阿·安格曼努斯为乌普萨拉大主教，他原为斯德哥尔摩语法学校的校长，反对《红书》的教会方面的主要人物并流亡达十余年之久。这一段历史实为一场政治上的大转变，因为王位继承人是约翰的儿子西吉斯孟，他从1587年起被选为波兰国王。他是在母亲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虽然父亲极力想使他成为一个路德宗信徒，但他始终忠于天主教。在波兰，他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促进者和耶稣会士的亲密朋友。另一方面，国王约翰的弟弟查理公爵、古斯塔夫·瓦萨（在其当政期间在瑞典开创宗教改革运动）的小儿子，却是一位热忱的新教徒，并且坚决反对他哥哥的宗教政策。这个问题与欧洲同时期的其他问题一样，既是一个宗教问题，又是一个外国统治问题。在1593年宗教会议的开幕式上，王家事务总管尼尔斯·于伦斯蒂纳在指出法国和尼德兰显示出来的宗教分裂的危险性后，以下面的这段话作为其讲演的结尾：

即使波兰国王来到这里，也绝不能让他凌驾于我们的信仰和意识之上，而我们亦必须遵守我们在这里达成的关于教义的协议。无论根据上帝的真言和意愿，在这里达成什么协议，它都必须以一种基督教的方式陈述出来，并为大家所赞同。最后，我祈求显灵的上帝成为我们这次宗教会议的最高主宰，求他决定会上的一切，使之变为对上帝的赞美和崇敬，并成为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坚强的支持和永恒的福祉。

在逐字逐句详细审阅了《奥格斯堡信纲》以后，在得到所有在场的贵族、主教和教士接受以后，大会的宗教事务主席尼古劳斯·奥赖·波特尼昂西斯宣布：“现在瑞典已成为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和神。”

一项为使全国服从这个乌普萨拉箴言的决定的计划，通过向各省分发副本的方式切实有效地贯彻下去了，在保存到今天的副本上还可以看到1934个显赫人物的签名。当西吉斯孟来到瑞典摘取王冠时，瑞典人要求他宣誓承认乌普萨拉决议，以此作为瑞典主教们为他加冕的条件，尽管决议中包含着不能容忍天主教礼拜的内容。西吉斯孟企图用波兰的大臣们统治瑞典，但遭到了抵制，1595年，瑞典议会违反西吉斯孟的意愿，承认查理为摄政王。查理与瑞典的声称有权与他分享权力的贵族政务会议发生了争执，他鼓动下层阶级反对这个会议，最后致使会议大多数成员逃往波兰。西吉斯孟于1598年入侵瑞典企图恢复他的权威，但在斯坦吉布罗（Stangebro）被查理击败。1599年，瑞典议会废黜西吉斯孟；1600年，查理当选为瑞典国王，是为查理九世。^[2]他表现出具有加尔文主义的倾向。他试图改变祈祷书，并根据糅合了腓力派路德宗观点与加尔文宗观点的1563年的海德堡《教义问答》提出一种教义问答。早在摄政期间，查理已经与大主教亚伯拉罕·安格曼努斯发生冲突，因为他显然反对后者用强暴的手段推行教會的规则——对犯人先用桦树条抽打，然后或者泼之以冰水或者对比较严重的罪行课处罚金。1599年，曾经支持西吉斯孟反对查理公爵的亚伯拉罕被教會停职，而后被投入监狱。教會不愿意剥夺他的主教职位，但是世俗当局使尼古劳斯·波特尼昂西斯当选为大主教；然而，他没有来得及被祝圣便死去了。1601年瑞典议会挑选欧劳斯·马提尼去接替他的职务。乌普萨拉教士会承认了这次选举，他得以被及时祝圣并在这个职务上一直到1609年去世。他是查理的加尔文宗化政策的强烈反对者，抨击王家的神学著作，反对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约翰·福布斯（1605年因抵制皇家的教會政策而被詹姆斯一世放逐）。1608年，查理在他的加尔文宗牧师米克罗尼乌斯的影响下，邀请约翰·福布斯参加在乌普萨拉举行的辩论。虽然福布斯声明无意将瑞典转变到加尔文宗，并说他仅仅想为苏格兰的加尔文宗信仰进行解释和辩护，但他仍然不得不面对组成这次会议的大主教、教授、贵族和学者们的普遍的敌意。他宣称的绝对的得救预定论招致了憎恶，欧劳斯·马提尼表示，与会人的耳朵因为听“这个陌生人说出的对上帝的亵渎

之词”而疲惫不堪了。又说“让我们祈求上帝来转变这个迷途者吧”。对此，福布斯谦恭地、但以真正的苏格兰人的顽强回答说：

“求上帝转变我们大家吧！”国王显然发现他的卫道士走得太远了，因而让他离开瑞典。他于1610年重返瑞典以求重新联合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查理九世在1611年去世以前，显然未能使瑞典改宗成加尔文派。

瑞典宗教史上的这些事件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的政治—宗教斗争惊人地相似，说明了路德主义不仅在德国内部而且在外都确定是一派不同于天主教和加尔文宗的有着自己精神的宗教。加尔文宗信徒喜欢认为路德主义是一个介于罗马天主教与严谨的新教之间的事物，但它并非如此。尽管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它的突出特点是埃拉斯都主义，但在瑞典，它却成功地顶住了一个国王的天主教倾向和另一个国王的加尔文宗倾向，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团结的中心。祈祷书问题在这些争论中居于中心地位，证实了前已提出的看法，即路德宗真正内在的力量来自其礼拜方式和热忱的虔敬。它是一个实践的而非理论的教派。

由此看来，16世纪末期出现的神学危机，虽然已经证明是危险的而且几乎是毁灭性的，但毕竟无损于一种将命运依靠信徒们的虔诚而不是依靠他们的理智的宗教。研究路德宗的历史学家们不无道理地倾向于认为因前面描述的论战而得名的“学究式的路德主义”时期是一种对于路德宗教改革的真正精神的歪曲并且是对路德的原则进行的干巴巴的转述。下一世纪出现的虔敬派运动极大地挽回了这种局面。但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而且它仍然只是说明：路德宗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和加尔文主义这上下两块磨石中生存了下来，而且其破损还是由于内部的争斗，这也许是历史上罕见的成功地反对似乎占压倒优势之敌的最惊人的实例。

二 加尔文主义的发展和传播

最近一位名叫阿兰·杜福尔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日内瓦的神话》，他在书中认为加尔文派信徒将日内瓦视为天堂，用一位英国人威廉·惠廷厄姆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虔诚的明镜与楷模”，而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的名言则把日内瓦描绘成“使徒时代以后人间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在这层意义上它当然是一个鼓舞着各地加尔文宗信徒的神话。对他们来说，日内瓦乃是新教的罗马，而且实际上日内瓦之于他们比罗马之于天主教徒更为重要。因为无论天主教徒怎样坚定地相信彼得座堂的灵气，诚实者总不得不承认罗马作为一个城市，即使在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奏效以后，仍旧发生的那些丑闻；而日内瓦则颇为理直气壮地宣称：它不仅提供了纯粹的教义，而且提供了道德和虔诚的楷模。尽管如此，正如杜福尔指出的那样，另外存在着一种反神话，它把日内瓦说成是荒谬和狭隘无情的教规之首恶。这些教规影响了天主教徒和那些因1553年烧死塞尔维特而被唾弃的新教徒。这种反神话憎恨日内瓦教规对福音自由的限制，并认为这座湖畔城市是骚乱之渊藪，在这里传播着有害于教徒忠顺的教义。

在神话背后的确凿事实中有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日内瓦作为一个宗教中心达到了路德的维滕贝格以及茨温利和布林格的苏黎世从未达到的程度，尽管它们也都有影响。日内瓦的确不仅是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讲到的一种系统的新教神学的发源地，而且是一种教会组织结构和教规的发源地，人们越来越认为它们与加尔文所宣称的一样：乃是根据新约全书和原始教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相当程度上，日内瓦是世界性的，而且在加尔文时代，它主要被一批从法国来的流亡者所控制，这些人长期受到日内瓦当地人的妒忌，被视为改变了这座老城的风范的外国侵夺者。日内瓦同时还挤满了从欧洲各地到此避难的新教徒以及人数日增的求学者，他们来到福音真理的发源地学习他们认为形式最纯洁的福音真理。在加尔文的要求下，日内瓦城于1559—1563年在俯瞰湖面的圣安东尼山上建造了日内瓦学院。学校的师资于1559年已配备齐全，它的第一位校长是加尔文的当然继承人狄奥多尔·贝扎，他于同年6月5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盛大仪式上

正式就职。这个学院最初至少有162名学生，3/4来自法国，只有四个日内瓦当地人，余下的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到1564年，学院共有1200名学生和300名高等生；因为当时学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适合初学者，称作学院或私立学校，而另一部分是培养高年级学生的，称作学院本部或公立学校。在学院中，经典著作在七个级别不同的班里依次讲授。学院的学生可以从学院提供的一系列课程中选择自己要听的讲座，这些课程包括：神学、希伯来文、希腊的诗人和伦理学家、辩证法、修辞学、物理和数学。同耶稣会的学校一样，教育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神学相结合，这种结合确保学生受到时人的崇敬，与耶稣会教育相似的还有：知识的灌输同虔敬的训练同时进行。大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一批受过训练的牧师，不断有人向加尔文提出派遣这种牧师的要求，尤其是来自法国的要求，但受欢迎的是那些具有世俗才学的牧师。随着学院的发展，又增设了医学和法律专业。正是从这所学院，不仅向法国而且向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输送了训练有素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粹分子，他们是整个16世纪晚期加尔文主义那令人难忘的扩张的最终根源。由他们做媒介，加尔文主义才确保得到对于新教的原则和最严密的组织形式深信不疑的信徒；因此，加尔文主义才能在欧洲各地对当地条件做出最小的让步或适应的情况下保持信念与组织上的独立。难怪除了在德国，加尔文宗能够把该世纪初路德宗宣传所散布的含混得多的改革倾向纳入自己的网络，并能有效地抵制那些激进的派系，这些派系虽因受到迫害而大量转入地下，但在对传统的宗教不满的人们当中还可以吸引那些头脑简单和比较天真的人。

由于法国与日内瓦邻近而且语言相通，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的故乡法国取得最迅速的发展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加尔文曾经直接了解法国宗教改革的初期阶段，而且从他逃往国外避难以来始终与那里的新教徒保持着联系。他的宗教反映了法国的理智主义和对明确定义的追求。确实值得怀疑的是：即使根本没有加尔文，法国的新教徒是否会永远满足于大体上是不系统的路德主义？要知道在本章前一部分所描绘的论战高潮中，路德主义向任何一种神学体系的发展都非常缓慢。法国还是一个在其发展过程中法律和律师起了而且一直起着巨大作用的国家，加尔文的神学反映出他本人早期研究法律的效果，因而引起了天性追求秩序和纪律的法国人的共鸣。关于宗教事务中的法律思想，对于路德来说，因受到保罗将旧约的律法与新约的意志自由和精神力量对比论述的影响，从而深感怀疑；对于路德的某些欢迎反律法

主义的追随者来说，则全盘否定；而对于加尔文来说，则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在《原理》中，他将上帝的道德律法的作用理解为三方面：首先，显示上帝要求我们为人正直，明镜般地晓谕我们：我们靠自己达到这个要求是无能为力的，随之而来的是沦入犯罪的处境，还有律法所暗含的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祸；其次，以惩罚的恐怖来抑制我们的邪恶；最后，为正直的信徒指出一条上帝期望他们走上的神圣的道路。路德并不一定全盘否定所有这一切，其实，其中一部分与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所讲的话非常一致；他说：“每当一个人知道了戒律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那么他将急于知道怎样才能恪守这些戒律，因为除非他严格恪守，否则将堕入地狱。”再者，加尔文比路德更为强调圣恩的作用，认为圣恩具有改变命运的作用，这种看法很接近天主教。但侧重点不同。对路德来说，道德律法首先是写在信徒心上的，他不像加尔文那样重视用教会法规来强制推行道德律法。这也许是加尔文更能引起法国人共鸣的原因之一，法国人的气质就是反对无政府状态，他们开始认识到强有力的政府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先决条件；对他们来说，一个给个人过多主动权的教会看起来是值得怀疑的。

也许有人认为：在日内瓦明显表现出来的加尔文宗纪律的严酷性与高卢人的气质格格不入，他们总要反抗那些看起来毫无道理的禁忌，而加尔文宗的纪律不仅要压制明显的罪恶，甚至还要压制那些偶然才会成为罪恶的娱乐，即使没有完全把罪恶与娱乐等量齐观，也几乎这样做了。但是如果这样看问题就会忽略高卢人性格的另一面，即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在战争时期，法国人将会同意限制自己的自由，而加尔文主义倾向于认为精神生活，尤其是在放荡年代里的精神生活，就是某种神圣的战争。事实上，法国的加尔文主义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投入实际的战争，因为它一开始就要面对法国宗教迫害的挑战，这种迫害后来导致了宗教战争。弗朗西斯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以及亨利二世当政期间都是以不断加剧对新教徒的迫害为标志的。1547年又建立了“火焰法庭”，仅其名称即可反映出它的目的。1551年那些被指控为异端的人被从市政和司法机构中清除出去。如果不是担心遭到总是妒忌教会力量的国家机构的反对，亨利二世和他的顾问们可能已经设立宗教法庭了。然而，新教仍在不断壮大，在贵族中甚至在王室中赢得了重要的改宗者。1557年圣康坦战役后，未来的胡格诺派领袖加斯帕德·德·科利尼海军上将在荷兰囚禁期间最

终接受了新教。他的兄弟弗朗索瓦·德·昂德罗在1556年前后改信新教，他们的另一个兄弟，枢机主教、博韦的领主和主教奥代·德·科利尼于1561年作为“新教的枢机主教”而引起轰动，因为他没有即刻辞去天主教头衔。1557年新教徒在巴黎郊区圣雅克街上的一所房子里召集了一次约400人的会议，大部分与会者是贵族，这次会议遭到突然袭击并被冲散，逮捕了130人。第二年5月，多达4000名新教徒在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俯瞰下的塞纳河彼岸举行了连续三个晚上的露天会议并高唱赞美诗。其领导人为那瓦尔国王安托尼·德·波旁，他又是弗朗西斯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女婿。一年以后，在巴黎又举行了一次新教的宗教会议，并起草了一份信纲，一些胡格诺派的首领希望将这一信纲完整地呈送国王，以对他施加压力；不过事实上，出于谨慎的原因，这份信纲被秘密地保存起来，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出示给统治当局。据说这次会议成立了全国性的加尔文教会的正式组织，但实际上它的范围似乎没有那么广泛。

尽管如此，就在过去一些年间，法国各地按照日内瓦的模式成立了大批地方教会，而且常常得到加尔文从日内瓦派来的牧师们的帮助。^[3]到1557年，在巴黎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而在其他地方，如图尔、布尔日和昂热，教会出现得甚至还要早些。加尔文亲自关注着这些发展，不过他那谨慎的心理使他对于发生在巴黎的那种公开显示力量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圣雅克街事件发生后，他劝告巴黎的加尔文宗信徒保持隐蔽。当他得知召集1559年宗教会议的计划后并不高兴，认为这样不够明智，但得到消息太晚以至于无法更动其计划了，不过他还是同意派三个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于会议即将结束时才到达。无疑，即使没有后来认识到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仍是影响深远的。因为，不仅会议的信纲是彻底加尔文主义的，同时它还根据日内瓦模式采纳了一项关于教会组织的计划，重要的是，鉴于法国不仅仅是个城市国家，它还规定设立省的和总的宗教会议，以便调整和控制地方上的世俗长老和牧师的宗教会议的工作和决议。即使这次会议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加尔文教会，但它指出了建立的方法。在这方面，它是建立在1557年或1558年（确切时间有争议）召开于普瓦捷的一次宗教会议的成果之上的，那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裁决发生在那里的一场围绕永恒的主题——得救预定论——的地方性争论，但也抓住时机起草了一个教规方案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尽管这一方案赋予在日内瓦处于属员地位的执事们以一些本堂牧师才拥有的权力并且允许

由公众选举执事、世俗长老以及牧师，但这个方案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的。在日内瓦，牧师们由那些已有圣职的人推选，然后再由民众机构批准选举结果，最后由人民在听了他们的布道之后对他们加以确认。加尔文曾希望世俗长老由俗人选举，但他不能一意孤行，不得不同意长老的人选应从管理该城市的三个市民会议中产生。因此，在普瓦捷采纳的那个方案反映了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内，少数人的团体中可能存在更广泛的民主，这个方案在1559年未做重大修改。1559年采纳的《教规》保留了公众选举执事的制度，但让宗教会议来选择本堂牧师，如同在日内瓦一样，将最后确认权赋予俗人。重要的是，巴黎宗教会议拒绝同意经常举行全部由牧师参加的宗教会议，这一点是日内瓦教会的根本特征。在每次宗教会议上，一方会众中的经过祝圣的牧师必须与其同侪中一个以上的长老或执事同行，他们在宗教会议上有发言权。

法国的加尔文派坚决反对任何有天主教教阶制度色彩的东西，如主教区汇合在省里大主教的权威之下，它们又都臣服于罗马教廷等等。1559年发表的《教规》中的第一篇文章便主张“任何教会不得声称对另一教会拥有主权或统治权”，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主张，各省或全国宗教会议的主席的权力要随着会议的结束而解除。同时，《教规》同普瓦捷会议早已做过的一样，坚决主张：任何地方教会都不得“在未经省宗教会议批准的情况下做出任何有益或有害于其他教会的重大事情”。这样一来，加尔文宗的组织体系就适合了国家的规模，而且还避免了教阶制度和教派自治主义。下面将要论述到，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牧师和俗人相互审议这一设想之上，加尔文宗坚决反对任何主教制度，它使主教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僧人集团，而且就教会管理来说，加尔文宗不允许经过祝圣的牧师们享有绝对垄断的权力。这就是加尔文在《原理》中宣称《新约全书》所提倡的体制，它经过诸如法国出现的地方性调适以后，将在加尔文宗取得自由行动权的各个地方建立起来。即使这个体制像任何以争论和审议为基础的体制一样，有可能导致宗派的形成和激烈的争论，但它给虔诚的信徒们所带来的力量和团结意识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因为1562年在奥尔良召集的宗教会议不得不解决对于更广泛的民主的要求。这时，对于胡格诺派的命运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出现了。^[4]1559年7月，亨利二世在一次马上比武的意外致伤中死去，随后由15岁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继位。直到宗教战争结束一直是狂热的

天主教徒领袖的有权势的吉斯家族发现了这个攫取权力的时机并且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机智地宣称：严格说来，这个少年国王已够法定年龄，在与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达成协议后，他们通过自己的侄女、苏格兰女王、弗朗西斯二世的妻子说服国王将管理大权委托给了他们。家族之间的角逐和对新教的明显威胁迫使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宣称应当有一个摄政期，并宣称他的兄长、那瓦尔的国王暨一旦瓦卢瓦家族直系绝嗣便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的安托尼·德·波旁有权成为摄政王。但他未能说服他那怯弱的兄长安托尼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于是，吉斯家族的一部分反对派就转而从事被称做昂布瓦斯阴谋的策划。这个阴谋的目的是，想逮捕国王和吉斯兄弟——弗朗西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查理；然后由一支在昂布瓦斯周围秘密集结的军队将使孔代夺得权力。但阴谋败露了，政府得以将阴谋者的军队一支支地肃清。

虽然这次阴谋从人员到动机都不仅仅是胡格诺派的，但除了它在导致宗教战争的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外，它还带来了宗教方面的重要结果。这次事件提醒了吉斯家族，并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宗教政策修改到减轻迫害，甚至倾听胡格诺派提出的由一次法国主教和三级会议组成的宗教会议解决全国性宗教问题的要求。这一方案在弗朗西斯二世去世（1560年12月）以及卡特琳·德·美第奇掌握摄政权之后取得了进展。1561年，实际召开了三级会议而且第三等级还呼吁召集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在其中俗人也有投票权。在这次会议进行的同时，还举行了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之间的普瓦西会谈，贝扎担任了加尔文宗一方的领导人。卡特琳想通过这次会谈求得宗教统一，但失败了。在这次失败后，1562年通过敕令的方式对胡格诺派采取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但不久之后吉斯公爵在瓦西镇对胡格诺派的屠杀断送了这个让步的计划，而且当这位公爵挟持了年幼的国王查理九世，并迫使卡特琳·德·美第奇接受了他的政策后，第一次宗教战争爆发了。这一阶段的战争于1563年好不容易才以昂布瓦斯和约^[5]而告结束。

所有这些事件明显地表明了法国的政治和宗教紧张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向那些比较虔诚的加尔文宗信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包括暴力、革命和战争在内的政治行动与他们的原则在什么程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在策划昂布瓦斯阴谋的过程中，他们就此请教过日内瓦的顾问。而且，人们发现贝扎为此写信给布林格，这对1549年将加

尔文宗和苏黎世的茨温利宗联合在一起的《蒂古里诺协议》的效果是一个有意义的证明。尽管加尔文后来竭力否认曾支持过这项方案，但他本人起初曾以不要出现流血事件为条件而谨慎地应准了这个方案；而且起事的首领拉勒诺迪得以在日内瓦征集了六七十名法国的“十字军战士”来执行这一方案。使加尔文恼火的是，让·莫雷利·德·维利耶四处报告说加尔文曾经应准过这整个的计划，莫雷利还应对1562年在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性加尔文宗教会议上有关俗人权利问题的辩论负责，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憎恨加尔文和贝扎在昂布瓦斯阴谋期间对法国政治的干涉。一年前，他发表了一本书，意在表明早期基督教教会管理一直非常民主，而且要求恢复这一原则。当他在出版之前把稿子交给加尔文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日内瓦的体制符合上帝的旨意。在这本书发表后，日内瓦对此书进行了公开的焚毁，书的作者被开除教籍，这本书还遭到奥尔良宗教会议的谴责。

而莫雷利在这里只是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法国加尔文宗俗人的感情，他们同后来的弥尔顿一样，开始认识到“新长老不过是为弊更甚的旧教士”，他们不仅憎恨天主教里的教权主义，同样憎恨经过改革后的教会里的教权主义。科利尼同情他们，尽管他像其他胡格诺贵族一样践踏少数俗人拥有的权利。这只是有关这一问题争论的开始。争取俗人权利的人们得到了两位学术界重要人物查理·杜穆兰和皮埃尔·拉米斯的支持。大多数现代逻辑学家认为：这两个人是一种新颖但不适宜的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在1576年，即皮埃尔·拉米斯死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的第四年发表的书中，他支持通过与布林格的友谊直接了解到的茨温利宗的原则，并反对加尔文宗。他要求被加尔文力图排斥在宗教事务以外的民事官员享有在教会事务中发言的权利。然而在此之前，拉米斯已经对教权主义开始了猛烈的口诛笔伐，这一争论使得贝扎亲自访问了1571年在拉罗谢尔召开的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教规》重新做了修改，进一步削弱了俗人选择牧师的权力。这场争论喋喋不休，直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使胡格诺派痛切地意识到分裂的危险。此后，宗教战争的加剧使得最初的问题似乎变成了生存下去的问题。1578年召开的圣福瓦宗教会议是大屠杀后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几乎全部议题都涉及军事；重要的是，它是16世纪最后一次由全国各地教会代表组成的会议，此后，地方教会对于宗教会议式的体制就不感兴趣了。继这次宗教会议之后的六次宗教会议（最后一次于1598年在蒙彼利埃召开）从未有一次能够拥有所有省份的代

表参加，而且每一次代表都超不过30人，虽然《教规》为俗人提供了与教士同等的代表权，但每次参加会议的教士都在一半以上。

正如罗米耶（Romier）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从1560年以后，必然成为一个军事团体的胡格诺派在各地都日益由建立在半封建基础上的作为“保护人”的俗人贵族所管辖。这一制度在1572年的惨案后已强化为一个由地方公民团体组成的胡格诺之国，它由一支军队和形式上是宗教会议的类似国会的民众会议统一起来。胡格诺主义变成一场俗人控制下的运动，但又与那些起初争取俗人在教会事务中享有同等权利的人们所理解的运动有所不同。它与受迫害的韦尔多派在17世纪将自己组织起来的宗教军队以及印度的锡克族人的宗教军事兄弟会十分相似。加尔文的政策在地方上没有被放弃，但起初那种通过宗教会议发挥作用的全国性教会的想法则由于宗教战争中为了生存迫切需要坚强的政治结构而被搁置一旁。这个体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同1598年南特敕令时的法兰西国家机制并行不悖。已经于1593年个人放弃新教的亨利四世，发现在一个独立于罗马并由国王控制的高卢教会中将天主教和新教重新团结在一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目标在1598年南特会议上曾加以讨论。所以，在1598年，根据南特敕令，除授予信仰自由和担任公共官职的权利外，亨利四世又允许加尔文宗信徒可在大约150座城市避难，其中大部分由国家供养的新教军队戍守，并由新教地方官负责管辖，就这样保留了将被黎塞留认为非常危险而要加以摧毁的国中之国的胡格诺派。正如前面一再指出的那样，胡格诺运动从一开始就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为一部分贵族和一些城镇，这两种势力都憎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法国政府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和君主越来越多地收回从前由贵族和地方社区行使的权力。君主对新宗教的压制只不过是进一步刺激了一种随时都可能引起暴乱的怨恨情绪而已。既然如此，胡格诺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场俗人的运动，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决心摆脱教士的保护并且反对日内瓦自诩为法国加尔文宗信徒必须向它寻求详细的精神启示的神圣教廷的倾向，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如果认为胡格诺主义作为一场全国性的叛乱正在抛弃加尔文宗的教义，那也是错误的。加尔文在昂布瓦斯阴谋问题上的态度可能显得捉摸不定。事实上，他面临着一种因自己的说教而造成的两难处境。他从路德那里继承来的教义建立在圣·保罗的《罗马人书》以

及圣·彼得书信第一篇中那些关于基督徒有义务顺从统治者——即使他们是非基督徒或暴君——的说教上，对此，加尔文在他的《原理》中加上了两个例外条款。他不仅坚持认为，上帝有时特别激励像摩西和俄陀聂这样的个人去领导人民与暴君进行斗争，他还承认：对于在其体制中存在着那种与斯巴达的掌政官相似、有权利和义务规范国王行动的官员的国家来说，这种官员可以合法地领导其人民反对暴君。这样一个主张很容易被站在胡格诺派前列的贵族和市镇当局所接受。在他死后，接替他成为日内瓦宗教领袖的狄奥多尔·贝扎又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这一反抗的权利。在1576年那篇匿名的但可以蛮有把握地认为出自他手笔的论文《行政官员对其属民之权利》中，他即允许反对暴君也允许反对崇拜偶像的统治者，只要这种反对是由有义务维护国家健全的下级官员们领导的。他还进一步谈到在统治者和代表人民选择统治者的下级官员之间的契约问题。一旦统治者由于管理不当而破坏了契约，立他为王的权力机构就应该将他废黜。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当然非常重要，它发表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作者认识到当时摆在胡格诺派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或者进行军事抵抗或者灭亡。这种局势与路德宗牧师在马格德堡由于抗拒1548年的临时敕令而遭到围攻时所处的局势很相似，^[6]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贝扎论文的一部分是根据他们的《教义的讲授与规劝》一书而来的。这部1550年发表的著作主张：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the Hohe Obrigkeit）企图毁灭真正的宗教，那么其权力也同样直接来自上帝的下级权力机构（the Unter Obrigkeit），不仅必须撤销它对最高权力机构的支持，而且必须支持虔诚的信徒去反对最高权力机构。（这当然很符合德国的情况；在那里，皇帝极力推行一种天主教的政策，而路德宗的诸侯们则支持并保护新教）西蒙·古拉特在他出版于1576年的《查理九世统治时期法国状况论文集》中收入了贝扎的文章，将它说成是1550年由马格德堡人发表的，现在又根据一些理由和例证加以修订和补充，但事实上这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

马格德堡牧师们的观念无疑对新教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中，不是消极地服从和死亡就是反抗和可能生存的两难处境正在自行显露出来，情况就更是这样；因而，从玛丽统治时期的英国流亡出来的约翰·波尼特、约翰·诺克斯和克里斯托弗·古德曼都在1556—1558年撰文批驳无条件服从的教义，这

种教义受到路德的推崇又由早期英国路德宗信徒约翰·廷代尔^[7]在他的《论基督徒之服从》一书中所极力倡导并于英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在英格兰广为传播。在法国，贝扎作品的流传只不过是一系列为胡格诺派反抗而辩护的加尔文主义者出版物的一部分，其中除了其他内容，社会契约的理论常常与为了信仰而奋起反抗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有1573年奥特芒流亡日内瓦期间发表的《法兰克高卢》，1573年和1574年分成两部分发表的匿名著作《法国复兴之始》以及1579年发表的匿名著作《反暴君宣言》（它常常被认为是迪普莱西-莫尔内的作品）。^[8]前面已经指出：1584年以后，由于安茹公爵之死，胡格诺派的领袖、那瓦尔的亨利变成了王位继承人，从而发生了一场异常的盟友关系的瓦解。正如菲克斯所说，从那时起，胡格诺派便成为正统原则的彻头彻尾的支持者。“从此，世袭的权利和萨利克法典成了他们的口号。而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才能找到他们对从前关于自由的理论的继承。”在法国事务中，倒是耶稣会的作者们根据同样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主张持异端的国王没有权利继承王位，而“罗骚”（Rossaeus）（可能是英国天主教流亡者威廉·雷诺兹）在他1592年发表的《基督徒契约共和国的合法性》中坚持这一理论并将法国的亨利三世列为与尼禄和伊丽莎白女王相等同的暴君。这样就出现了奇怪的思想上的巧合，一方面是加尔文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赞同教皇之绝对权威的天主教，从而使下一个世纪的菲尔默在攻击民众主权教义时讥讽他说：“枢机主教贝拉明和加尔文先生都对这条路备加注意。”

在尼德兰起义时期，虽然起义在开始时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不完全是一场加尔文主义的运动，但仍然必须解决同样的关于反抗权的问题。1581年，北方诸省废黜腓力二世的《誓绝法令》可以说是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同属一类性质的文件。与后者谴责乔治三世侵犯诸殖民地的权利因而援引“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法则”一样，尼德兰人援引自然法则并谴责腓力二世损害了他们的特权，特别是他们补充说以前腓力二世只是在接受了他们习俗的前提下才得到他们的忠顺的。他们没有援引神学的观点，而且由于起义者的宗教忠顺观十分复杂，他们也确实很难这样做。起义所产生的唯一一份重要的政治性论文，即阿尔特胡修斯的《政治韬略》（1603年），不仅在过了16世纪、当荷兰的自由已得到巩固以后才出现，而且在基调上也是世俗

的，甚至没有给有别于国家的社会集团——教会留出一席之地。它的作者虽然对神学做过研究，但主要是一位律师。此外，他虽然成为一个埃姆登城的公民，却不是荷兰人，而是德国人；该城在宗教上是荷兰加尔文教会的德国人大教区，臣属于尼德兰总宗教会议。虽然阿尔特胡修斯的论文重新提出人们熟悉的反对暴君的观点，还包括他认为建立偶像崇拜是那种制度的标志，而且在论文中为人民废除暴君的权利进行了辩护，但他对于详细解释关于国家社会理论的兴趣要浓厚得多。皮埃尔·梅斯纳尔把阿尔特胡修斯描述为“加尔文政治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也许是正确的，但这位作者也承认阿尔特胡修斯的观点更多地是来自奥特芒（其《法兰克高卢》一书的观点几乎完全建立在从法国宪法史中汲取的观点之上），而不是来自神学气味较浓的胡格诺派小册子的作者。“在《政治韬略》中有数千条圣经引文，然而人们在里面几乎嗅不出一点加尔文的、甚至迪普莱西-莫尔内的宗教思想。”正如梅斯纳尔指出的那样，《圣经》引文中出现的错误以及有时意想不到的用法，使人想到这些引文会不会转引自第二手著述。总而言之，圣经对他来说主要是一种历史例证的宝库，而不是政治—神学原则的权威性来源。他是新一代世俗的政治理论家的开创者之一，这些政治理论家一直发展到霍布斯那里；十分凑巧，霍布斯也是一个大量引用圣经的人。无论尼德兰起义对阿尔特胡修斯的思想产生了多大影响，这场宗教因素较弱的起义竟成为阿尔特胡修斯思想的真正启迪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上，尼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部分由于他们不必像从前法国的胡格诺派那样面对一个传统的本民族的自称拥有神圣权利的君主，而是在一个具有城市和地区自治的悠久传统的国家里面对一个被视为外国人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在为自己的反抗寻找神学依据时不必做到他们的法国兄弟所做的那种程度。

无疑，尼德兰是加尔文主义流传至今的第二大地区。加尔文主义是在16世纪40年代当查理五世将其残酷迫害的政策稍加减缓时传到尼德兰的，不过那场迫害主要是针对再洗礼派而不是针对较为正统的新教徒的。（据统计，从1523年至1555年，在尼德兰南部1500名至1700名殉道者中，约1000名为再洗礼派信徒；而北部240名殉道者中再洗礼派信徒占178人）这样，加尔文主义就是在风暴再次卷起之前，在可以使自己站住脚跟的相对和平的时期进入尼德兰的。加尔文主义并不是进入了一块处女地。路德宗已经很快地扩展到了这些在政治历史、语言和经济关系方面与德国紧密相连的地区。早在1523年，第一批路德

宗殉道者就已被杀害。但尼德兰的路德宗很快便开始具有自己的形式。莱茵河作为一条贸易水路为上游地区的瑞士和尼德兰之间提供了比较便利的交往，也许正是莱茵河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瑞士的宗教改革思想向尼德兰传播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到16世纪40年代布林格的作品在尼德兰非常畅销，而且盖尔认为在纯洁形式的加尔文宗到来之前，尼德兰的新教已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主要在圣餐教义上主张饼和酒并非基督的血和肉，主要是一种象征，他的这一看法也是有道理的。的确，在1549年的《蒂古里诺协议》以后，从发展起来的布林格的茨温利主义到完全成熟的加尔文宗两者之间只有一般相对来说很小的距离。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加尔文宗的“教规”。由于这主要来自斯特拉斯堡（加尔文曾于1538—1541年在那里度过离开日内瓦的流亡生活）的布塞尔的体系，可以相信，布塞尔的影响能够通过莱茵河非常早地直接到达尼德兰。人们肯定还记得加尔文对低地国家所抱有的特殊的兴趣。他本人出生在距离低地国家边境不远的努瓦永，母亲来自康布雷，他在斯特拉斯堡与之结婚的妻子伊德丽特·德·比尔（Idelette de Bure）是一位从列日流亡出来的再洗礼派信徒的遗孀，而且他有许多尼德兰朋友。他甚至可以在写给布林格的信中这样讲：“我是比利时人。”1544年，我们发现他与从里尔逃到斯特拉斯堡的流亡者普兰以书信的方式谈论过有关人们隐瞒自己为新教徒的做法，即“尼哥底母主义”，^[9]这一现象在当时的低地国家相当普遍。加尔文对这一做法的谴责在那里被认为过于严厉。根据普兰的请求，加尔文还撰文抨击再洗礼派，他们在尼德兰的宗教分歧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这样通信接触的结果之一是将卢森堡人皮埃尔·布律依（Brully）派往比利时，他曾接替加尔文担任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公众的牧师。皮埃尔·布律依根据在斯特拉斯堡与加尔文的接触中了解到的模式为图尔奈和瓦朗谢讷的教会奠定了基础，但他在这两个地方的牧师任职期很短，因为他很快就被逮捕并于1545年2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已有时间与激进教派进行斗争，而且他的出现与相当一批从尼德兰南部迁移到日内瓦以汲取加尔文教义的人们不无关系。

然而，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得以建立起来，这主要归功于居伊·德·布雷斯。他生于蒙斯，曾于爱德华六世时期侨居英国，从玛丽的反动统治下逃往瑞士并在那里结识了加尔文和贝扎。他返回到比利时，首先居住在安特卫普，后于1560年定居在图尔奈。在那里，他在布律依的成果之上建立了一个羽翼丰满的加尔文宗教会，在此基础

上，其他一些加尔文宗教会，如引人注目的里尔和瓦朗谢讷教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并由他担任整个教区的监督人。1561年他写了《比利时信纲》，或称《瓦隆人与佛兰德人改革后教会的信仰告白》。第二年，他天真地把它呈送给腓力二世，请求批准或批驳，同时声称它代表国王统治下“决不诉诸武力也不筹划阴谋反对其君主”的10万名臣民的信仰。这一做法可能是为了把加尔文宗与低地国家更为狂热的教派区别开来，还可能为了与反对腓力二世的统治方式的天主教派区别开来。这个天主教反对派1559年在根特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已经崭露头角。这一切对于极为正统的腓力二世来说，自然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但这份文件很快成为低地国家中加尔文宗信徒教义与教规的标准，取代了1550年从伦敦的瓦隆人会众那里借来的那些定式。1566年，这份文件经过修改后在安特卫普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得到确认，而且最后在1571年的埃姆登宗教会议上被定为必须遵守的教义。这份文件虽然对于1559年法国信纲有些增益，而且忠实地阐述了加尔文的教义，但它还是紧紧追随那个信纲的。但是，它提出管理各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的宗教法庭应由会众选举产生，从而反映了民主的思想。后来，它成为整个尼德兰加尔文主义公认的标准。

这一切使我们看到，在欧洲的这个角落中，真正加尔文主义的故乡是尼德兰南部，即现代的比利时，而不是后来只由加尔文宗与之发生排他性联系的尼德兰北部，这种联系是为了争取自由而与西班牙长期斗争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结果。在尼德兰北部，从边境以外传入的加尔文主义的普遍影响中，有一个独立的中心，即上文论及阿尔特胡修斯时提到的埃姆登教会。它是16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其组织者是一位名叫约翰·拉斯基的波兰人。他在查理五世推行临时敕令时逃往伦敦，在玛丽·都铎即位后返回埃姆登，不过后来移居到法国北部另一地区。拉斯基虽未与日内瓦进行过直接的接触，可他赞成加尔文的教规，而埃姆登的教会就是按照那个模式建立的。所以，这个地区成了“北方的日内瓦”，而且是加尔文宗向北部尼德兰传教的中心。但在1566年以前，完整的加尔文宗教法庭和宗教会议系统尚未延伸到尼德兰北部。

1566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所有这一切。^[10]1565年因签署协议而形成的贵族同盟此时向腓力二世的总督、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施加压力，抗议腓力早先拒绝召开三级会议，拒绝赋予当地贵族更多的权

力，这些当地贵族反对在低地国家宣布特伦托宗教会议的敕令，反对迫害异端。那份请愿书的呈送对象——腓力对于异端法做了一个姑息妥协的回答，但断然拒绝召开三级会议。这无疑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不过，毕竟是狂热的牧师们的偏激的说教鼓动了一次群众暴力事件的发生。从1566年8月至9月初，破坏祭坛和圣像的暴力从南部扩展到所有低地国家。这场暴动在多大程度上是预谋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对此尚无定论，但其结果有二：一是从民族运动中挤走了迄今为止一直进行合作的许多天主教徒，二是还激起了他们对加尔文信徒的敌意，向加尔文信徒发出了谴责。这些最终导致1567年腓力派遣阿尔发到尼德兰，并导致了阿尔发到达后立即建立起来的“血腥法庭”的暴行。在阿尔发到达之前，大多数作为加尔文宗信徒的好斗的同盟贵族举行了武装起义，但被挫败了；他们知道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卷入这次破坏圣像的暴动，但会被视为难逃责任者。他们没有得到已经对暴动表示不满的全国性领袖奥兰治的威廉、埃赫蒙德伯爵和霍伦伯爵的支持。总督很快就恢复了对国家的控制，而奥兰治的威廉由于预先已得知阿尔发前来的消息，隐退到了拿骚。

尽管如此，这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新教事业的灾难却促进了加尔文宗教规的发展，牧师们无疑已认识到面对即将到来的更多的困难就必须组织起来，所以为其会众建立起了宗教法庭。由于被大部分“乞丐”所抛弃，由于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而非宗教原因加入联盟的贵族的背离，也由于与路德宗的联合无法实现，而且奥兰治的威廉在与萨克森的莫里斯的女儿结婚以后也倾向路德宗，加尔文宗信徒显得十分孤立，因此自然要极力完善其教会组织。

由于阿尔发在1568年杀害埃赫蒙德和霍伦，从而把尼德兰投入到血雨腥风中，这使局面再次发生了变化。奥兰治的威廉第一次武装进入尼德兰并发动它来反对西班牙人的努力失败了。但在1572年，由于信奉加尔文宗的“海上乞丐”攻下布里尔城，起义开始了。法国的胡格诺派开始给予援助，结果英国的新教徒也给予了援助；在荷兰历史上被不太准确地称为反对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年）已经在进行中。奥兰治的威廉绝不希望这场起义成为宗教战争。直到1573年他本人才正式接受了加尔文宗的信念，而且他一贯要求出于民族利益对天主教实行宽容政策。但是1572年起义在荷兰和泽兰以外地区的失败，以及这两个省份中信仰加尔文宗的“海上乞丐”们坚持下

来的抵抗，他们一直在掠夺教堂和修道院，杀戮教士，驱逐被认为亲天主教的官员，这些都加强了认为民族的事业与加尔文主义的暴力可以合为一体的倾向。我们在这里不必涉及斗争的细节，而主要注意它对尼德兰宗教事务所产生的影响。1576年，由于西班牙哗变的军队对安特卫普的洗劫震惊了其他一些省份，使它们愿意与荷兰和泽兰签署和约，这时好像出现了一个宗教上停战的大好时机。根据根特和约，所有的外国军队都要撤离，反对异端的法律暂缓执行。加尔文宗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默认的荷兰和泽兰保证不攻击在其他省份已经确立起来的天主教信仰。新的西班牙总督、奥地利的唐·约翰在他1577年2月的《永久敕令》中虽然不情愿，但也还是同意撤出西班牙军队，恢复尼德兰的特权，并且在三级会议的同意下进行统治。而各省则应回报以承认他为总督，遣散自己的部队并保持天主教信仰。荷兰和泽兰的信仰加尔文宗的统治者当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其中只字未提容忍他们自己的信仰。而且，不久以后由于唐·约翰的急躁，战争很快又重新爆发，西班牙军队又返回了尼德兰。即使到这时，威廉仍对宗教和平抱有希望，并通过1578年提出的“宗教和平”建议几乎得以实现，这个建议将保证所有地方的信仰自由。然而，由于瓦隆的天主教贵族的疑虑和佛兰德的加尔文宗信徒的好斗与强硬，这个计划破产了；加尔文宗信徒中尤以在根特者为甚，他们无情地在根特和在佛兰德的其他地方尽可能地毁坏各种看得见的天主教的标志。

在这种局面下，1579年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同盟——一个是天主教的瓦隆省份（阿图瓦和埃诺）组成的阿拉斯同盟，另一个是加尔文宗统治下的包括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内的北方省份组成的乌得勒支同盟。1579年这个最早的划分大致同荷兰—佛兰德语和瓦隆—法兰西语之间语言的界限一致，正如海尔观察到的那样，这一事实说明：两个文化集团之间对立的感情已经形成，无疑因宗教的区别又进一步恶化，这种区别指的是现在新教已统治了北方，天主教统治着南方。但是，这并没有加强不久前颇为流行的进一步推断；当时，不成熟的种族论在一些历史学家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从而认为在天主教和罗马语族之间，在新教与条顿语族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即使语言可作为种族的一种可靠的标志（种族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种理论在法国仍会受到驳斥；在那里，新教始终未能铲除天主教，而且概括说来，历史上那些受斯拉夫人杂居影响最小的一些地区，正是天主教最强盛的地区。对于低地国家来说，这种理论就更难

成立了。因为甚至到1587年，加尔文宗信徒也只不过占荷兰总人口的1/10。再有，南北两方的最后分界线是根据西班牙一方的亚历山大·法尔奈泽及其继承者们同北方的拿骚的莫里斯之间此消彼长的军事命运和勇武胆略决定下来的。在有些地区，宗教分界已大大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操佛兰德语的比利时人比他们的瓦隆族邻居更接近天主教；而在荷兰，天主教在南部和西部仍占统治地位，所以目前人口中大约1/3为天主教徒。对于宗教信念来说，历史环境比语言或遗传基因所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

在尼德兰和在法国一样，战争削弱了加尔文宗牧师们的权力。奥兰治的威廉向来不希望教士对国家事务享有更多的发言权，还由于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对路德宗的同情比对加尔文宗多一些，情况更是如此。甚至虔诚的加尔文宗信徒腓力·马尼克斯·德·圣阿尔德洪德也对教士的统治很反感，一次在提到牧师时说：“他们可以大提建议，但不能下命令，不能让他们统治，他们应该让人们的心灵得到自由。”所以，联省共和国的建立以及他们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的束缚并没有给加尔文主义的宗教带来胜利。这样，1581年米德尔堡的宗教会议就对莱登的一位教授和执事加斯帕尔·柯莱进行了谴责，因为他拒绝接受《比利时信纲》，并且在与一位严格的加尔文宗伙伴、教授和执事朗伯·达诺进行争论时批评了加尔文主义的教规。莱登议会干预了这个事件，一位议员表示他将像抵制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样抵制日内瓦的宗教裁判所。其结果，那位曾经企图以严格的加尔文教义对在自己管辖下的莱登的瓦隆人教会进行调整，并企图将同一教义推行于整个教区的达诺离开了莱登。1591年，三级会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套新的教规，根据它，地方官员在选举牧师的问题上应与宗教会议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牧师的人选每次都应得到市长的同意。一次，拒不同意一个官方信纲和教理问答的阿尔克马尔的五位牧师得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和荷兰三级会议的保护。

的确，在联省共和国里向正统加尔文主义提出的第一次大挑战将以阿明尼乌主义的形式出现，它否认绝对的得救预定论的教义。这个教派以雅各布·赫曼德松命名，他在日内瓦受业于贝扎并于1588年在阿姆斯特丹获得牧师圣职。他以其拉丁文形式的名字“阿明尼乌”广为人知；在被阿姆斯特丹教会请来驳斥那位针对已被接受的得救预定论教义提出挑战的科尼尔特的观点时，阿明尼乌得出结论认为他赞同

人们指望他加以谴责的那些观点。在受到彼得·普兰修斯的攻击以后，阿明尼乌否认自己既违反了比利时信纲，又违反了海德堡教理问答；但同时，他明确表示：他觉得不一定要毫无疑问地接受加尔文对《圣经》的所有解释。阿姆斯特丹的市长想以召集牧师会议的方式解决这一争议，但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要求双方不要进行公开的争论。随着争论的继续，阿明尼乌要求普兰修斯把针对他的非难明确化，以便他能够给予答复，从而取得了和解。但阿明尼乌对得救预定论这种过激教义的怀疑有增无减，他甚至乐于引用像贝拉明和孔塔里尼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论证自己的观点。1603年，他在莱登被任命为教授的事引起了一场新的辩论，他当时主要的对手为弗朗西斯·戈马尔。这场争论把双方教会的和国家的最高当局都卷了进来，1608年，阿明尼乌在海牙举行的三级会议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为自己的说教进行了辩护。第二年，阿明尼乌去世，但争论仍在继续，而且牵扯到了荷兰的政治。荷兰的政治局势因拿骚的莫里斯与约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之间的争斗而被扰乱了，前者是奥兰治的威廉之子，荷兰总督，他反对1609年与西班牙签订的12年停战协定，后者是荷兰检察官，赞成该项协定。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支持被称作抗议宗的阿明尼乌派，而莫里斯则反对抗议宗。这次事件在一次加尔文主义信徒的全体大会上得到解决，这次大会于1618年在多德雷赫特召开，又称多尔德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已因私通西班牙的罪名而被送进监狱，还有一个阿明尼乌派的信徒、著名的格劳秀斯也和其他观点相同的人一起被关进监狱。这次会议谴责了阿明尼乌主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处死。就教义而言，这场争论的全过程表明加尔文宗的正统观念现在受到了怀疑，特别是受到那些对教士统治国家持有反对观点的人的怀疑。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显示了在联省共和国中教会与国家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以及（和法国一样）俗人在何种程度上关注着宗教事务。加尔文在日内瓦所进行的使教会独立于国家的斗争勉强获胜，当他发起的这个运动发展到一些面临复杂的国家管理问题的大国时，国家对教会控制越来越紧的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宗同样经历了当时天主教所经历的处境，即不得不依靠全国性政府的保护，而反过来又不得不服从它的控制。

这一事实可以从加尔文宗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命运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在那里，加尔文宗又一次卷入了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旋涡。严格

意义上的英国的加尔文主义是在1558年伊丽莎白继位后，玛丽时期的流亡者返回英国才开始的。加尔文对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并非没有任何影响，特别是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教师布塞尔此时结束了因为信仰而流亡英国的生活；同时，彼得·马特、约翰·拉斯基等应克兰麦邀请来到英国的人以及英国的一些宗教改革者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受到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体制是在1541年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因而在1541年到爱德华统治时期之间基本没有时间使其影响超过一般的程度。正是在玛丽统治时期，英国的流亡者与日内瓦的接触才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因为这时，英国人得以直接看到加尔文的体制是怎样运转的。特别是当法兰克福的英国逃亡者中恪守第二部爱德华祈祷书的人与赞同进一步改革祈祷书的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致使后者移居到日内瓦并发现他们在那里更加自由的时候，加尔文宗的影响就更大了。但有时人们往往忽视法兰克福的积怨不仅仅是由于祈祷书问题。从一开始，由于英国人在大陆的教会没有受到即使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仍然在英国保留的主教制度对教会组织的束缚，因此接受了一种他们在英国时看到的外来流亡者的教会体制，它在基本点上与加尔文主义的体制非常相似。1554年，他们选举了一个牧师和一些执事来“服务一段时间”，同时起草了一个大家发誓必须遵守的教规章程，其中包括成立一个由俗人长老和牧师组成的长老会，同时还规定罪恶昭彰者必须公开赎罪，并规定将桀骜不驯者革除教籍。这都是斯特拉斯堡一日内瓦教规所具有的特征，同时与克兰麦时期在已经确立的英国教会中采取的所有做法格格不入。由于法兰克福这座城市信奉路德宗，所以虽然在争论期间双方都确实寻求市民力量的介入，但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市民的力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长老会的体制在反对祈祷书的一派，即约翰·诺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于1555年离开法兰克福以后仍旧延续下去了。看起来，长老会体制正在取代其他一切教会体制已经没有问题了。事实上，在1556年制定的新《教规》中，唯一的改动就是把最终的权力给予了全体会众，人们批评前一个教规是“将一切都给了牧师”。他们明确宣布，新的安排并非不可更改，因为并不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在其中，“人的欲望”将像天主教徒那样“被加以压制并不可变动”。这里已经向更加民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更加广泛的民主是加尔文主义在日内瓦之外进一步发展后的特征，同时也是后来公理会教义的基础。同时必须加以提醒的是，甚

至就连对爱德华祈祷书恪守不移的人们也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它一致，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感到祈祷书的某些地方会冒犯法国会众，而法兰克福的官员们是允许英国人使用法国人教堂的。

这些情况之所以值得强调是因为有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只有在日内瓦的流亡者在1558年以后重返英国时，才赞成后来被称作清教主义的东西。相反，无论在哪儿的流亡者，好像没有人对失去了主教制度感到非常遗憾；而且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准备进行一场比1553年英国所达到的程度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结果，当1559年国会讨论解决宗教问题时，返回的流亡者甚至连争取立即恢复1552年的祈祷书都遇到了困难，它违背了女王要谨慎前进的愿望；然后，对祈祷书作了轻微的但是重要的改动，使之更加符合那些仍然相信圣餐中的“真在论”的人们的口味。在废除主教制度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1559年，政府很快就着手充实空缺的主教职位以及那些由于剥夺残余的玛丽时期的主教而造成的空缺。令人费解的是，虽然马修·帕克能够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伊丽莎白所不得不依靠的那些流亡者设立了新的主教职位；而且，就像后来他们说的那样：他们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人们希望他们加以实施的解决方案，他们觉得：如果自己拒绝高级教职，也许天主教已经卷土重来了。这样一来，当有人希望他们强制推行祈祷书的规程以对付那些拒绝遵守这些规程而又不受高级职务的约束的激进分子时，他们的地位已被削弱了。这是一个在16世纪60年代关于法衣问题争论中非常明显的事实，那时，不得不认真对付这样一些人，他们拒不穿戴1559年祈祷书规定必穿的“教皇的破衣衫”，或者抗拒祈祷书规定的其他礼仪。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尽管对神职人员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加以剥夺，但始终未能实现完全遵守规程；这部分地由于主教们总是面临缺乏合适的牧师人选的问题，所以对那些热忱的牧师，即使在遵守规程方面做得不够，只要不是无法无天，就不再求全责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就连那些最倾向于加尔文宗的第一批主教们，在他们的权力受到抵制后，也失去了对逐渐被称作清教主义的同情感；而没有从流亡生活中切实接触过加尔文宗的后来的几代人，认为加尔文宗的组织结构（加尔文宗的神学理论长期被奉为至高无上）是一种不适合英国国情的外国体制。

这一点随着国会不断努力引进新的礼拜仪式和加尔文宗教规而更加真实了。在这里，人们又一次看到：加尔文宗在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已经被注意到的那种俗人的优势，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教士会议由于被组成其上院的主教们控制，而且下院也不完全是清教徒，因此不适于充当引进加尔文宗信仰和教规的媒介，不过在坎特伯雷1563年的下院里，关于根据清教精神修改祈祷书的六项条款的建议被对方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所击败。正是这个挫折似乎对于清教徒把意向转到国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国会已经制订了最初的解决方案，而且有权否决教士会议的决定，除非女王对它加以认可。经验证明，这个附加条件在事实上是最根本的障碍，因为女王可能一直对国会下议院在1559年把一个关于祈祷书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她的做法心中不快。这个方案的新教色彩比她当时所希望的要浓一些，下议院阻挠恢复国王至尊地位的议案，直到这一议案与一个强制推行爱德华时期第二部祈祷书的议案同时通过为止。在所有的问题上女王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意进行进一步改革的迹象。^[11]尽管如此，清教徒们总还可以依赖下议院中一批坚定的清教绅士，他们随时准备为改进祈祷书，为引进加尔文的教规或加紧迫害抗拒国教的罗马天主教徒而提出动议。仅仅在最后一点上，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当时政府被天主教徒与西班牙进行合作的危险所警觉，本身也愿意强化惩罚。对于所有其他关于宗教的提议，女王都置若罔闻，尽管她的一些顾问对清教表示同情。

正是由于早先对僵局的体验使一些清教徒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行动。对于第一代清教徒来说，不管他们对日内瓦的教规如何羡慕，并不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它。然而到1570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气，它是近期以来一个在贝扎控制下的日内瓦对年轻人进行灌输所形成的，那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加尔文的体制甚至比加尔文本人所认为的还要重要。他们认为那不仅是《圣经》中所宣示的，而且是《圣经》所命令的；所以，违反它就是背叛了上帝的箴言。在英国持有这种绝对观念的领导人物是托马斯·卡特赖特，他于1570年在剑桥成为“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12]然后立即开始攻击存在于英国教会中的主教制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教会应由宗教会议管理。他以他所讲授的《使徒行传》为其观点的依据。十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流亡过或见到过日内瓦，这件事说明了加尔文宗信徒通过印刷和口述进行宣

传的功效。只是在他被未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当时的三一学院（卡特赖特所在的学院）院长、那年的副大法官约翰·惠特吉夫特剥夺了职务并被禁止布道以后，他才一度离开英国前往日内瓦以便在加尔文主义的发源地汲取其真理。清教徒要在1571年的国会中推行他的政策的企图失败了，由于在1572年再次遭到挫折，结果使这些人转而发动了一场笔战。开始的轰击是由他们的《告国会书》点燃的，它是在1572年国会仍未闭幕时发表的，导致了一长系列的文字交锋，以惠特吉夫特对《告国会书》的《回答》为开端。

正是在这个阶段，清教徒看来得到一些利用教会当局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机会。政府对于抗拒国教者的力量因在大陆神学院受训的英国教士们的到来而不断加强这一情况十分关注，而且十分自然地打算更多地依靠清教徒，他们虽然是些不顺从和好争辩的臣民，但毕竟是教皇制度的激烈的反对者。还有，自从1559年成为大主教以后一直极力维护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的帕克于1575年去世。第二年，约克大主教格林德尔接替了他的职务。他与帕克不同，他曾经是位流亡者，而且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清教徒，但赞成在教会中进行实际的改革。除了其制度和祈祷书，伊丽莎白的教会不受清教徒欢迎，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存在许多管理上的弊端，其中大部分是陈陈相因的中世纪恶习的残余。如果格林德尔的纲领得以贯彻，极端清教徒借以立足的大部分理由也许就消失了，而温和派则多少会感到满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格林德尔在“代神发言”（prophesyings）问题上与女王发生了冲突。“代神发言”是一种颇受清教徒欢迎的教士与俗人的经常性集会。会上，教士们解释《圣经》中的部分章节并相互驳斥对方的解释，而由俗人倾听。对于这些活动的看法自然不一致。对于清教徒来说，透彻地了解《圣经》是最为重要的，牧师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且学会怎样才能从《圣经》中引申出教义，同时，俗人则从他们的解释中得到教益。另一方面，争论的危险也明显存在，一个文化程度不高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俗人（都铎时期文化并不普及）很可能被搞得不知所从，误入歧途或骇异反感。从国王的观点来看，“代神发言”是这样一种场合，它很可能被用来制造即使不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混乱。格林德尔转移到坎特伯雷任职不满一年，女王便命令他对这种集会进行压制，同时减少各郡内特许传教士的数目。格林德尔拒绝服从，并根据自己所见，指出了传教和“代神发言”的价值；同时，他采取了一种正统的加尔文主义的态度（和传统

的天主教的态度一样），即世俗的君主不能支配宗教事务，倒应被其牧师所指引和限制。这在国王至尊被视为现存教会之关键的英国是一条危险的教义，肯定不会受到专横的伊丽莎白的欢迎。女王的反应是命令国王特许的主教们压制“代神发言”的集会，将格林德尔软禁起来并于1577年6月将他停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辞呈，但未等到辞呈被接受便于1583年死去。

继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伍斯特的主教、反清教论战中的首要人物惠特吉夫特。他在爱德华时期到达剑桥，并在那里成功地度过了玛丽时期，这似乎部分地由于彼得学院（他在此于1555年成为牧师会成员）的院长波尔内的保护。他劝惠特吉夫特在玛丽的特使们来到大学时对自己的观点保持缄默。惠特吉夫特虽然不是随波逐流之辈，但显然非常谨慎，而且对尊重当权者这种义务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这在都铎时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这种态度正是他当大主教时所推行的政策的标志。他所要求于清教徒的就是服从宗教法规。他与他们一样相信加尔文的神学理论，虽然没有采取其极端形式；但是他已经明确表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加尔文的教规是教会制度的唯一合法形式的人绝不同情。由于一个新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拥有强大的权力以行使王室至尊的管理权，它加强了惠特吉夫特本人对大主教区巡视的权利；在这个委员会的辅佐下，惠特吉夫特抵制了王家会议，因为其中一些重要成员在企图阻止他的行动时是出于对清教的同情。虽然他也想采取一些实际改革教会的政策，但却打击那些不顺从的教士。他得到了女王的恩宠，女王常常把他称作她的“穿黑衣的小丈夫”。在女王的帮助下他抵制了国会将清教政策合法化的企图。在这里受到挫折后，比较坚定的长老派清教徒尝试采取直接的行动。受到压制的“代神发言”被称之为长老监督会的半秘密会议所代替，它势必最终成为被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视为教会政府之正确形式的宗教会议或长老会。在他们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便在已建立起长老会组织的地区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使长老会的职能。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会成员、后来成为惠特吉夫特的得力助手并接替他担任了大主教的理查德·班克罗夫特于1589年在圣保罗十字架会堂所做的一次布道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主教团早已对1588年开始出现的马丁·马尔普雷莱特小册子感到恼火，它们用一种机智但恶毒的方式对各位主教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第二年，出版这些小册子的秘密印刷所在曼彻斯特附近它的第四个隐蔽处被发现，结果是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人受到追查和

起诉，只是作者一个也没找到。卡特赖特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入狱，罪名除了进行非法布道和抨击祈祷书之外，还有他知道小册子的作者却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虽然卡特赖特拒绝在谴责长老会的悔过书上签字，但他和其他被监禁的清教徒领袖在宣称他们信奉国王至尊后最终于1592年获释。他们曾经是长老监督会运动的领袖，这个秘密被班克罗夫特发现了，秘密一经发现，运动自然消亡。1593年，曾在苏格兰避难而后失策地返回英格兰的约翰·彭里被处死，这违反了按照当时的标准应对极端派清教徒领袖人物持宽容态度的政策。

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清教主义已不再能够向她的政府提出挑战。清教的力量并没有消耗殆尽，17世纪的历史事件将证明这一点；但它早期屡受挫折以及惠特吉夫特对它的强硬政策驱使它采取被事实证明是自取失败的冒险行动。一些坚定的加尔文宗信徒组织了脱离国教运动，试图完全弃绝国家教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像其玛丽时代的前辈一样，要以移居国外来对抗迫害。然而，他们的态度在多数清教徒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清教徒严格地恪守加尔文的原则，即无论国家教会中腐败的现象有多少，只要它确实没犯教皇派的罪过，一个教派就没有理由与之分裂，就像那些谴责旧约教会的腐败现象的先知们没有理由离弃圣殿一样。讲到这里有一点不可忘记的是：

“清教徒”这个名词包含了差别很大的许多观点。并不是所有要求改革英格兰教会的人都像卡特赖特那样完全按照长老会的原则行事。他们都是激烈反对教皇政治的坚定的新教徒，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祈祷书的某些特征，不过有些人主要的动机也许是不无理由地厌恶那些有损于伊丽莎白时期教会形象的确实存在的管理和财政方面的弊病。如果这些弊病得到革除，在他们的信仰中很可能会接受他们所厌恶的仪式和祈祷文，或至少容忍它们。虽然他们的神学理论都来自加尔文，但只有少数人极为严格地坚持加尔文关于教会制度的观点。

加尔文主义在16世纪的确没有能够征服英格兰。到16世纪末，作为一种神学和教会理论的加尔文主义正在丧失立足之地。在许多人看来，胡克那著名的《论教会体制的法则》损毁了加尔文的教会学说并为安立甘宗的体系赢得了坚强的支持。与此同时，在16世纪后期，主要在剑桥大学，对加尔文宗的得救预定论的批评逐渐加强，这与发生在尼德兰的阿明尼乌运动没有关系。正如H. C. 波特博士所写的那样：

“剑桥学派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在1610年以前将英国的任何一位神学

家称为‘阿明尼乌派’都是不恰当的。”^[13]加尔文主义确实在16世纪晚期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17世纪造成暴烈的和革命性的结果。但它始终未能征服全国性的教会，主要原因与在法国一样，即虽然没有采取战争的方式，但毕竟与拒绝接受它的全国性的君主发生了冲突。

在苏格兰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虽然其结局在16世纪末期显得并非完全不同。那里的决定性因素是：比之于英国君主，苏格兰君主是软弱的，而且也没有像法国国王那样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传统，尽管那种传统在宗教战争期间有所削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格兰的国王是在贵族的允许之下进行统治的，这就是为什么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从下面发起的运动，而不像在英国，是一个由国家控制的事件。后来，在詹姆斯六世当政时期，国王开始执掌权柄，出于理论上对独裁统治的热望，詹姆斯本人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他取得的权力。人们必须把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的变化放到这一政治背景下考察。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的“老盟友”关系的影响也具有明确的重要性。距离苏格兰最近的新教邻邦和在宗教改革中可能结成的盟友是世仇——英格兰，因此，苏格兰的新教徒不得不在民族主义的爱国立场和宗教的合并这二者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詹姆斯五世的女继承人玛丽是一个法国籍母亲——洛林的玛丽——的女儿，这位母亲出自法国天主教的领袖之家——吉斯家族，她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法国的皇太子妃，并曾短期担任法国的女王。当约翰·诺克斯打开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决定性局面时，在选择法国还是英国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已不是一种新情况了。亨利八世曾设法引导他的表弟詹姆斯五世走向与罗马决裂以及解散修道院的道路；他还通过贿赂贵族的手段，在苏格兰建立了一个赞同他但又不大可靠的团体；同时还设法缔结未来的爱德华六世与年幼的玛丽之间的婚姻。亨利八世死后，摄政王萨默塞特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他计划将这两个王国真正统一成为一个大不列颠王国。摄政王于1547年发动的平基（Pinkie）战役以及亨利八世生前发动的一些战役，由于它们导致破坏修道院甚至向苏格兰人散发《圣经》，从而确实对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

1547年战役使约翰·诺克斯脱颖而出。他已经转变为宗教改革者，而且正在为自己建立一个传道者的名声。和在英格兰一样，路德

宗的观点最先从欧洲大陆通过东海岸港口传入苏格兰，它的第一位殉道者帕特里克·汉密尔顿早在1528年就被烧死。一些更早的证据说明英国的罗拉德派在苏格兰西南部有某种程度的渗入。宗教改革很有可能成功，因为苏格兰天主教会的道德腐败与财力衰竭更甚于欧洲其他许多地方，原因在于其大量的教士淫荡放纵，很大一部分高级教职被利用来维持王室与贵族的私生子们的生活。的确，俗人对教会收入的侵占已成为一种传统，从而阻碍了后来经过改革的教会的正常捐赠。到16世纪40年代，新教的观点赢得了一部分贵族和地主的支持，这两个阶层一直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真正的堡垒和实权控制者。来自城镇市民的拥护几乎是同等重要的；那些穷苦阶层由于受教会勒索财物之苦而且眼见教会花费之奢靡，对于旧教也不会有深厚的依恋。然而，考虑到已经讲述过的上层阶级对教会财产的侵夺所达到的程度，我们切不可认为那些将成为“圣约同盟长老”的人，仅仅出于获取钱财的考虑就被驱动了。他们早已大量侵吞了教会的财产。

诺克斯本人在信念上的转变主要是受到乔治·威沙特的影响，诺克斯曾于1545年同他一起在洛锡安进行过一次布道旅行。此后不久，威沙特就被逮捕并于1546年在圣·安德鲁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诺克斯从他那里汲取了瑞士的思想，因为威沙特在被指控为异端后曾于1538年逃离苏格兰。而且还有可能在他约于1543年在剑桥做一次短暂逗留后即返回家乡之前曾访问过德意志和瑞士。他曾翻译过1536年的瑞士信纲，其中有布林格的手笔。业师的殉道对诺克斯确有影响并通过他著的《苏格兰王国宗教改革史》反映出来。这位一直相信在宗教上以暴力回敬暴力的诺克斯参与了对枢机主教比顿的刺杀活动。就在威沙特被处死的同一年比顿遇刺身亡，这部分是为威沙特而进行的报复。然后他们于1547年的复活节被围困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内。他们所期待的英格兰为支持他们而进行的干预为时太晚，诺克斯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被法国人抓获，法国人是七月份攻陷这个城堡的。在以后的两年中，诺克斯沦为一个法国的划桨奴隶。1549年获得释放后，他前往英格兰，并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宗教改革的左翼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玛丽时期流亡法兰克福的英国人中间的活动前已论及。这使他退到了日内瓦并终生信奉加尔文宗，不过，由于他支持为了宗教要进行革命和战争的原则使得加尔文并不喜欢他。在他离开苏格兰期间，宗教改革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贵族集团支持改革，“圣约同盟长老”正在迫使摄政女王——吉斯家的玛丽——进行宗教上的改革，他

们正在得势并几乎控制了个国家。1557年，部分贵族邀请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他曾于1556—1557年在那里暂住，从事布道和建立教会的活动，在他建立的教会中，圣餐可以根据他认为正确的原则加以进行。但使他烦恼的是，当他来到迪耶普时，发现另一些信件劝阻他不要回来，对此，他解释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们三心二意的迹象。伊丽莎白继位后，使他同样烦恼的是，由于他在被视为天主教拥护者的玛丽·都铎、苏格兰女王玛丽和吉斯家的玛丽统治时期曾写过一些针对女性统治的“可怕”的小册子，因而不受伊丽莎白的欢迎。这一来，要重返英格兰是不可能了，甚至不许他途经这个国家。这进一步促使他接受了1558年末收到的再次请他重返故土的邀请。他取道海上并于1559年5月在利斯登陆。

不管诺克斯是否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形势对于一场革命来说已经成熟。在他到达后的第十天，即5月12日（“搬家星期五”），修道士们根据年初张贴在他们门上的所谓“乞丐敦促书”的非官方文告，已到了离开其住所的期限。那些文告已预先告诉他们到这一天把住所让给穷人和弱者。再者，英国的《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已获通过的消息也传到苏格兰。吉斯家的玛丽命令新教传教士到斯特灵露面，显然想采取针对他们的法律行动。邓迪城的市民以及附近的地主们决定和他们的传教师一道前往，以便保护他们。他们行至刚刚接受新教的珀斯，那里的市长——领主鲁思文接到摄政王要求予以镇压的命令后拒绝执行。这样，正是在5月11日星期四这一天，即新教传教士们应该在斯特灵报到否则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一天之后，诺克斯在珀斯的圣·约翰教堂对胸中已经燃烧着革命火焰的会众进行了说教。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强烈地反对偶像崇拜”，这个具有诺克斯讲话时常见的暴烈口吻的声明意味着许多东西。紧接着，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为了贬抑他，一名神父开始做弥撒。一个男孩大声抗议并被这名神父敲打。为了报复，男孩向高高的祭坛上扔了一块石头，打碎了祭坛上方的一座神像，于是，会众立即打碎了教堂内所有的神像。随后，被诺克斯称作“大群无赖汉”的人们攻击了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首先砸碎神像，然后洗劫全院；根据诺克斯的说法，他们愤怒地发现方济各会虽自称以贫穷为天职，其修道院却陈设豪华，库藏奢侈。同样的遭遇也降临到多明我会和加尔都西会的修道院中，因此，两天之内，这些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只剩下四壁萧然了。一场大起义接踵而来，起义者在向爱丁堡进发途中，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双方达成了一

个停战协议，同意城市自行选择其宗教，同时在偶像崇拜被废除的任何地方均不得加以恢复，条件是不得进一步破坏教堂。这时吉斯家的玛丽调来法国军队以保护其政策，而新教徒则在英国秘密地与塞西尔进行会谈以寻求援助。对于支持反叛者心怀犹豫的伊丽莎白装做对此一无所知。10月间，起义者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向爱丁堡进军并占领了它。然后，以沙泰勒罗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为首的贵族们以苏格兰国王和女王、法国的弗朗西斯二世和他的妻子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名义正式废黜了吉斯家的玛丽的摄政王职位。但是由于缺少金钱（从英格兰送来的钱在途中遭到拦截），他们的军队瓦解了，只得忍辱撤到斯特灵。然而不久以后英格兰即开始插手，起初在海上后来扩展到陆地，迫使法国人签署了爱丁堡协议，并使他们撤出苏格兰。宗教改革受到了保护。吉斯家的玛丽刚好在协议签署之前死去，将新教作为一种民族宗教的道路现在已经开通了。[\[14\]](#)

1560年8月，苏格兰议会接受了一份信纲，禁止做弥撒，并同教皇断交。第二年，一个神职人员的宗教会议采纳了一本《教规手册》，随后有许多贵族和地主在上面签了名。然而，他们规定：所有教士都应终身保持他们现有的俸禄，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那些现正从事实际的牧师工作的新教牧师，这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占有的教会俸禄感到担心。（这本《教规手册》已规定：教会的收入应该用于对新任的牧师给予足够的支持，维修教堂建筑，救济穷人以及教育儿童）于是出现了一种持续很久的奇怪现象，旧的教会俸禄体制保留下来了，但绝大多数不掌握在业已成为国家教会的手中。1562年，玛丽女王在她丈夫死后返回她的王国（她从1550年后一直住在法国），此后，领有圣俸的教士和王家枢密院之间进行了协商，第二年年初决定全部圣俸收入的1/3应用来资助王室和新教教会，其余部分被正式确认给予圣俸的占有者。由于这1/3由王室征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而新教教会的份额有所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改革后建立的教会几乎从一开始便难以摆脱财力缺乏的困扰，由于一些多少有些相似的原因而与英格兰伊丽莎白时期的教会几乎一样。它在财政方面的处境在1573—1574年有所改善，摄政王莫顿促成了对教区进行的调查，揭发出一些隐秘不报的收入，而且将那1/3中给予教区牧师的份额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分配。以切实的步骤剥夺那些不适于进入改革后牧师团的圣俸享有者的努力失败了，但早在1566年就已规定领圣俸者出现空缺时，应将该圣俸分配给改革后的牧师。

这一切表明了，在苏格兰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加尔文宗的纯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屈从于俗人的愿望。从表面上看，苏格兰在1560—1561年就已成为第一个完全信奉加尔文宗的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诺克斯与回国后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之间的对立，她想在超出自己私下信仰的范围以外保留天主教时的无能为力以及甚至她私下信仰天主教也仍然受到抨击，这些都是人们常常讲述的故事了，还有使她丧失王位并不得不于1568年逃亡英格兰的一系列失策和意外事件也同样常被人们提起。尽管如此，她在苏格兰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如果他们取得成功，始终很可能出现宗教上的反动，特别是如果她在英格兰的天主教支持者使她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得以实现，情况更是这样。直到玛丽的已经被击溃的党徒于1573年因爱丁堡城堡被一支英格兰—苏格兰联军攻陷而最终覆灭以后，这种危险才似乎消失了。即便在这以后，詹姆斯六世似乎还在不时地向罗马以及苏格兰的天主教徒献殷勤。苏格兰的宗教改革无论看去怎样基于民众的支持之上，它从来没有感到十分安全，特别是在一个如此严重地依赖贵族们的不同倾向的国家里；对于这些贵族，机敏的诺克斯一直持有戒心。

1560—1561年的解决方案大体说来是加尔文宗的。信纲不仅用激烈的语言弃绝了罗马教会，并称之为“可怕的娼妓，恶毒的教会”，而且陈述了加尔文宗有关圣礼以及教会性质的教义，但对于得救预定论没有大加强调。尽管如此，《教规手册》虽然在布道和举行圣礼时坚持改革的观念，在教会制度方面则并不过分武断，而是反复讲到它为了管理而进行的安排是“权宜之计”。它规定了人们熟悉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体制，设置了长老和执事，不过与晚期长老制明显不同的是，这两种产生较晚的教职要每年选举一次。同其他的加尔文宗地区一样，一种反对教权主义的因素明显存在，特别是在长老和执事有权训诫和纠正他们的牧师并在必要时征得监督的同意将牧师解职时更是如此。监督的管辖范围大体上与以前的主教教区一致，设立监督本身就破坏了加尔文主义普遍的做法，因为在许多方面监督发挥着从前的主教的职能。他们在检查会众推选出的牧师候选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如果某个教区出现牧师职位空缺且在40天内未能选出牧师时，靠辅佐他们的委员会的帮助，他们自己就能选择牧师。虽然如此，他们并没有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牧师团或举行按手礼时必不可少的主持人。在选举和审查以后，允许一名牧师到某一教区服务的也还是他们。教会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众大会，但这一机构中不仅有监督

和牧师，还有贵族、男爵、自治市镇的代表。依照惯例，牧师们无权参加会议，而且也不鼓励他们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为了开会而离开教区。那些正式前来参加会议的牧师是由于会议处理的事情关系到他们本人，或者由于其监督者命令他们参加会议。结果会议上世俗人士的人数往往大大超过神职人员的人数。但考虑到新的教会在形成过程中俗人领导人物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不过应当加以补充的是，地方宗教会议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如同在法国一样，每个牧师由本教区的一位长老或执事陪同参加会议。

这并不是人们后来所理解的长老制，那种变化是因1574年安德鲁·梅尔维尔到达苏格兰而发生的。他在日内瓦度过了此前的五年，与贝扎保持着直接的联系。贝扎在教会制度上的观点变得比加尔文更为严格，加尔文允许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有教规上的区别。梅尔维尔和卡特赖特具有同样的观点，他很可能在日内瓦会晤过卡特赖特，而且和后者一样，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激进的一代信徒的领袖人物。那些和他具有共同想法的人都对由国家任命将要取代监督的主教（实际上就是这样称呼）特别不满。由国家任命主教这一方案经会众大会在1572年确认，条件是保留大主教、大执事、副主教等称号不意味着赞成教皇制度；不过他们提出：从严格的宗教职能来说，大主教只应被看作主教。（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1561年，这些称号并没有消失，而且一些享有这些称号的人接受了改革后的信仰，并参加了改革后教会的工作）这对梅尔维尔这类相信“牧师地位平等”原则的人来说是一种讨厌的事情。1578年，会众大会同意接受《教规手册第二编》从而使梅尔维尔取得了胜利，但苏格兰议会拒绝批准大会的决定，并且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建立标准样式的长老会的目的，即为执行教规成立牧师和世俗长老的法庭。1584年，政府做出了反对梅尔维尔观点的反应。当时议会通过的“黑色法令”强化了主教的权力，而且从长老会的观点来看，更加糟糕的是：这些法令声称长老们应服从的是国王而不是会众大会，同时肯定了议会的权威高于“近年来引起一些怀疑的”教会。1586年，一个妥协方案出台，内容为主教只应在牧师委员会的建议下行使管理权并应服从会众大会，而且允许建立长老会，会众大会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从这个时候一直到议会的法令正式承认长老会体制的1592年，形势朝着主教的权力逐渐缩小的有利于长老会的方向发展，但即使是在1592年以后，长老会的体制实际上也没有得到普及，而主教职制也没有被废除。1603年，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

王位，称作詹姆斯一世，在1604年的汉普顿法庭会议上，他激烈地表示他憎恶长老派，认为他们是与君主政体势不两立的，此后，他意图建立一个比较接近英国模式的主教体制。

的确，安德鲁·梅尔维尔纲领的基础是认为教会与国家即使由同一一些人组成，也应成为两个分开的共同体，而且否认国家有权控制教会。他不仅为争取建立长老会而斗争，同样还为争取会众大会对教会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斗争。1596年他与愤怒的詹姆斯六世在福克兰所进行的著名会晤概括了他的观点。当时，他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抗议已被驱逐的天主教伯爵亨特利和埃罗尔返回苏格兰。对于詹姆斯六世提出的未经他的允许牧师们无权召集会议的说法，梅尔维尔揪着国王的袖口作答，他称国王为“上帝的头脑简单的仆人”，同时在一大段高谈阔论中告诉国王“在苏格兰有两个国王和王国：一个国王是耶稣基督，他的王国便是教会，詹姆斯六世国王只是他的一个臣民，在这个王国中詹姆斯六世不是什么国王，也不是君主或首脑，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而已”。这是加尔文在日内瓦适用于一个君主国的原则。在这个时期许多问题的背后起作用的命题与反命题中的一个方面从来没有被阐述得这样清晰，这对命题与反命题是：一方面国家声称有权决定或至少管理其臣民的宗教；而另一方面教会声称有权根据上帝的谕旨做出决断并指望即使是统治者也应顺从其决断。具有浓厚的君权神授意识并对国王在教会中地位至尊的原则十分迷恋（这一点他后来在英格兰明显表露出来）的詹姆斯，必然把梅尔维尔感情的爆发不仅视为无礼，而且视为异端邪说和亵渎神灵。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姆斯拥有最终决定权，尽管几乎与此同时，圣安德鲁斯学院的牧师戴维·布莱克不仅讲道“所有的国王都是魔鬼之子”，而且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为无神论者，这样就引发了一场国际事件。伊丽莎白向詹姆斯抗议，詹姆斯把布莱克召到了枢密院，布莱克认为枢密院无权审判他的案件，但他还是被流放到苏格兰高地。在其他事务上国王也很难与教会相处。教会人士因他那骂人的习惯和他妻子的爱慕虚荣对他加以指责。11月间，他们要求对国王的国务大臣们加以谴责，因为他们对于听讲道一事漫不经心；12月，教会的监督人员坚持要不离国王左右，因为他们担心国王可能会改变宗教信仰或“至少把信仰自由引进来”，这大概是一个针对据说詹姆斯愿意容忍天主教的主张的讽刺。所有这一切激怒了政府，它宣布会众大会监

督人员的权力是不合法的，命令他们离开首都；规定凡被指控有煽动罪的牧师必须在枢密院受审；并且恢复了一项禁止反对国王和枢密院的言论的法令。爱丁堡出现的一场暴乱，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行动的机会。12月17日，一伙暴民大肆谣传说天主教徒举行叛乱并要杀害国王和政府人士以及制造混乱。詹姆斯国王迁到了林利斯戈并命令法庭也迁出爱丁堡，这将使该城不再是首都。城市当局慑于国王的震怒，将牧师都囚禁在城堡内，并且保证将来在未经国王允许时不让他们回来或接纳其他牧师，另外还缴付了一笔巨额罚金。1597年1月1日，詹姆斯得意扬扬地重入爱丁堡，后来议会承认国王有权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禁止教会法庭召开或禁止牧师布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1600年便发生了神秘的高里谋反案。高里伯爵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很受长老派的信任，在此案中，国王声言高里和高里的兄弟把他诱骗到了他们在珀斯的家中，企图绑架他。高里兄弟被那些援救国王的人所杀，五位明显不相信这一过程的爱丁堡牧师拒绝按照国王要求的措辞为他的幸免于难做谢恩祷告。这五位牧师中有四人最后屈服了，剩下一位——罗伯特·布鲁斯坚持到底，因而被流放到苏格兰的北部。这样，詹姆斯在他离开苏格兰去英格兰的前夕，在与一个不服从国家控制的教会相抗衡的过程中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后来，他在这方面变本加厉，甚至要由他的儿子来收拾因他的政策而丧失人心的后果。

已经有人指出：苏格兰的改革教会“以反对国王的造反开始，并且一直与废除君主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里加尔文宗摆脱了国家的控制；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仅这个世纪以教会受挫而告终，而且事实上它早期的反对君主政体的一些胜利也是在俗人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他们，这些成功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苏格兰贵族的力量，这里的形势就与德意志大体相似。在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得到了一些反对皇帝的诸侯的支持。即使在苏格兰，加尔文宗也摆脱不了伦纳德所说的“宗教改革的世俗化”。

在本章前面已经论述了一些德意志的加尔文宗的情况，也许这使我们在前只能稍加补充。如前所述，加尔文主义在德意志的胜利得力于“秘密的加尔文主义”在路德宗内部的渗透，就像得力于加尔文教会实际的发展一样。加尔文宗面临着一个更早的而且更得人心的改革

运动，它不得不顺应这场运动，至少要默默地顺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巴拉丁领地上，加尔文宗突出的成果——“海德堡教理问答”虽然成为加尔文主义者仪式书的标准，但还是与梅兰希顿的信徒们合作写成的。然而，虽然没有一个德意志城市在加尔文生前皈依加尔文宗，甚至连加尔文主义真正的发源地斯特拉斯堡在布塞尔于1549年辞职回到英国后，也变得坚信路德宗而反对加尔文宗并拒不接受“临时协议”，但加尔文宗确实在一些邦流行开来。前面已经提及：弗雷德里克三世统治时期，加尔文主义在巴拉丁领地取得了胜利，只是不彻底，弗雷德里克三世的继承人驱逐了加尔文主义者。还是在这个地方，那位注定要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一种自己并不真正同意的信仰的埃拉斯都，于1568年针对加尔文提出的教会有权不经行政当局批准即执行破门律的主张提出抗议。的确，在路德宗的“神圣的君主”这一教义如此盛行的国家里，加尔文主义总是要受到怀疑的。尽管如此，在1583年路德维希六世死后，约翰·卡齐米尔成为他的侄子弗雷德里克四世的摄政王，他将加尔文宗恢复成为巴拉丁领地的国教，而且一直保持到弗雷德里克长大成人。德意志的其他邦和城市也接受了加尔文宗。16世纪结束之前，在被路德维希六世从巴拉丁领地驱逐出来的布道者以及被萨克森选帝侯从维滕贝格驱逐出来的梅兰希顿的信徒们的影响下，加尔文主义赢得了拿骚、不来梅和韦瑟尔，而安哈尔特和黑森也有这种趋势。但加尔文宗要到下一个世纪当勃兰登堡选帝侯接受它之后才算获得最大的成功。它比路德宗教改革的成果要小一些。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德意志的加尔文主义主要成了那些对于保留了路德宗的真在论教义的《协议声明》不满的路德宗信徒的避难所。结果，那些成为加尔文宗的教会常常保留着梅兰希顿1540年改写后的奥格斯堡信纲，它在圣礼问题上修改了1530年最早的信纲的教义。尽管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加尔文教会制度的特征，但德意志的加尔文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成一格的。

在欧洲更靠东的地区，加尔文宗取得的进展大得多。它传入了波兰，[\[15\]](#)虽然波兰国王奥古斯都·西吉斯孟二世（1548—1572年）从来没有接受加尔文于1554年提交给他的计划，但他与加尔文有过通信来往并读过《基督教原理》。加尔文计划的内容是建立一个天主教和若干主教领导下的改革教会，这就是加尔文并不反对按照他的观念加以理解的主教制度的许多表现之一。波兰的加尔文主义再一次势必成为融合诸说的信仰。加尔文宗教会自16世纪50年代起在小波兰有了很

快的增长，1555年他们与大波兰的胡斯派波西米亚兄弟会共同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后者从波希米亚逃到波兰，承认兄弟会的信纲为共同的信仰声明并与兄弟会发生了联系。1556年约翰·拉斯基返回波兰，加强了加尔文宗的力量。他曾为加尔文宗与兄弟会和路德宗之间的联合而工作，虽然在他生前没有取得成功，但在1570年结出了果实。这一年，通过《桑多梅日协议》，加尔文宗、路德宗和兄弟会在相互承认彼此信纲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在棘手的圣餐问题上，接受了萨克森教会于1551年提交给特伦托宗教会议的信纲，那次宗教会议已经觉察到了它那种圆滑的模糊性。这次联合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宗教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564年耶稣会进入波兰后显然加强了。来自索齐尼主义和其他左翼派别的另一方面的竞争也促成了这次联合。

在波希米亚，加尔文主义是由曾经到过日内瓦和其他加尔文宗大学的出身贵族家庭的学生们传入的，它也发现在1575年波希米亚信纲的基础上与路德宗、新饼酒同领胡斯派和胡斯派的兄弟会的联合是可取的。那个信纲与其说是纯粹加尔文宗的还不如说是梅兰希顿的。在匈牙利，加尔文主义于16世纪中期传入，它在这里有不受日耳曼主义影响的有利条件；对于日耳曼主义，马扎尔人出于政治原因很不欢迎；但也许是由于同一个原因，加尔文宗发现在那里与路德宗合作是不可能的。1564年，政府同意两派分离，建立加尔文教会，它采纳了加尔文的《教理问答》和《瑞士信纲之二》。1576年的宗教会议接受了与苏格兰教规非常相似的教规法典，其中规定教会在监督或主教之下组织起来，以由所有教会组成的一个宗教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地方教会有带着加尔文宗特点的普通宗教会议的组织，但俗人的影响很大。介于地方教会和监督二者之间的有区域性组织机构，在这种机构中，教会的和世俗的官员并肩担任领导，每个主教也都有一个世俗的“监护人”作为其同事。在特兰西瓦尼亚，索齐尼主义是加尔文宗的重要对手，它正在获得（1564年终于获得）与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一样的法律保护。（必须牢记的是，匈牙利的很大一片地区处在土耳其君主的控制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匈牙利，反宗教改革运动盛行，而且在皇帝鲁道夫于1576年继位之后，宗教宽容也没指望了，甚至连他的前任马克西米连二世虽然赞同路德宗，但对加尔文宗也并不友好。

当时，除了匈牙利，正统的加尔文宗在中欧和东欧几乎不存在。它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不能使自己免于和其他新教传统混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很可能是他们坚强有力的原因。与贝扎继任以后日内瓦传统所表现的加尔文主义相比而言，加尔文本人对于地区的差别曾经要宽容得多，与其他新教派别寻求合作和联合的愿望也强烈得多。不管加尔文宗由于贝扎的态度在内部团结上取得了多大成功（阿明尼乌派挑起的争论表明这种团结并不稳固），它毕竟在西方失去了许多建立一个联合的可以在任何地方与特伦托会议后的天主教相抗衡的新教教会的机会。不管在教义方面还是在教会制度方面，过于严格的正统化都会在情况不利时导致失败，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激进的清教徒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断然拒绝妥协成了卡特赖特领导的运动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梅尔维尔在苏格兰的纲领可以说与此非常相似。事实上，加尔文宗对新教教义表现出最不容忍的态度；从加尔文本人那个时期开始，该教派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坚持国家有义务惩罚异端。它那日益增强的诉诸战争暴力的倾向起初是在宗教迫害的逼迫下产生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倾向严重损害了加尔文宗，因为暴力招致暴力。如果说法国的天主教联盟反对宗教宽容，胡格诺派也如此，而且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只要取得权力也是这样做的。加尔文宗的这种气质很容易使观察者忽略加尔文宗在其最佳状态下所能产生的真正的崇拜和虔诚的气氛，正是这种气质再加上它坚持要求信徒恪守的严格的教规使加尔文宗的形象成为一种生硬、严格、冷酷、淡漠的宗教。无疑，加尔文宗有时就是这样的宗教，由于在它经常教授的“得救预定论”和“弃民说”教义中使用的冷酷的逻辑，这种形象更为突出了。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能够而且确实产生了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教义的另一面，这种教义的成功大部分就靠这种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即便这样，留给历史学家进行最后反思的事实也许是，就连这样一个毫不妥协的、在它出现的任何地方人们都看到其发展的宗教最终都不可能顶住民族主义的国家管理机构对它的控制，一点也不比天主教和路德宗更能顶住这种控制。这是16世纪欧洲的国家干涉主义权力的又一例证。后来霍布斯所写的《利维坦》，^[16]在他加以描述之前很久就以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形式存在于实践之中了。

有两条途径，即使最终行不通，仍有可能使宗教团体摆脱这种与国家的对立；一条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一个乌托邦，即自我满足的

教会国家，其中宗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可供选择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不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作用并尽可能拒绝国家赋予的义务而努力退缩到国家领域以外。这两种措施都曾由宗教中与国教分离的左翼团体在16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尝试；其中的一些团体与新教思想的核心距离甚远，以至于把他们描绘成新教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形成了所谓的激进的宗教改革，其中有许多不仅仅是宗教分裂的运动，而且是社会改革或社会抗议的运动。不对这些运动加以论述，1559年以后的宗教观点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整的。

这些左翼团体中最主要的是一系列当时被人们称作再洗礼派的派别和团体，这个名称源于他们大多数否认婴儿时期所受洗礼的合法性。认为对于真正的洗礼来说，亲身的应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对那些在懂事之前已经受过洗礼的皈依者再施洗礼。这个名称并不恰当，既因为在这些团体中，从未达到这个名称所意味的团结和一致，又因为再洗礼的主张并不是他们信仰的核心。他们信仰的核心通常建立在相信圣灵对个人的启示之上，因而贬低了圣经的文字和表面的礼仪的价值，用一个严格的专门意义的术语来表述，他们的态度常常被称做“狂信主义”。在这一时期，“再洗礼派”一词确实成为一个被其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敌人大量滥用的词汇，就好像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一词被普遍使用一样，而且有一部分原因是相同的。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看来，正是1531—1536年在明斯特发生的再洗礼派革命最终败坏了再洗礼派的声誉，作为同样类型的狂信主义，把它与早些时候的德国农民战争联系起来，情况就更是这样。不仅他们表现出来的暴烈与狂热，还有他们采取的财产公有以及后来的多夫多妻的做法都震惊了整个欧洲。当革命被镇压下去，明斯特在天主教和路德宗联军的帮助下恢复其诸侯—主教制度以后，这种震惊仍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此后，再洗礼派更加不得不得成为地下运动，当局对其信徒的迫害也比对当时任何其他派别的信徒的迫害更加残酷，而且这种迫害被几乎所有宗教舆论认为是正当的。

我们已经在较早成为再洗礼派主要中心的低地国家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明斯特革命中一些比较激进的领袖人物确实来自尼德兰。也正是在那里，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也最引人注目的再洗礼派领袖门诺·西门进行了他的一部分传教活动。西门生于弗里西亚西部，1524年被任命为天主教司铎，直到1536年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尽管他早已

不相信变体论并因此而不再相信婴儿时期受洗的合法性。他对变体论的怀疑自他被授予司铎的那一年就开始了。颇为矛盾的是：最后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再洗礼派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恰恰是使他感到震惊并撰文加以反对的他们在明斯特的暴行。他认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引导，而他这位可能提供这种引导的人正因继续作为罗马教会的传教士而继续过着骗人的生活。起初，他在讲坛上极力传播自己认识到的真理，但到1536年，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教区开始了作为一个再洗礼派牧师的生涯，他不停地巡回布道并将尼德兰和北德意志那些分散的再洗礼派信徒组织起来。他们心灰意冷，有许多人因明斯特发生的过火行为而感到震惊。1540年他发表了《基督教教义基础》一书，这是一本用荷兰语写的教导手册，1554年和1558年又两次再版。在看待已被接受的“道成肉身”教义方面，这本书表现出了非正统的观念，他认为基督是圣父从上帝派下来的人，他通过玛丽亚降临于世间，但没有从她身上带来血肉。根据这一点，西门强调将所有不合格的陪餐者排除在圣餐之外的重要性，因为在圣餐中，虔诚者所食的是基督在天上的血肉。即使门诺·西门强调可以重新接纳悔悟者，但再洗礼派必须是一个脱离尘世、排除所有罪人的社会。西门于1559年死去，但其著作的生命力在延续，因为主要地正是由于他的著作才使再洗礼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以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生存了下来。尽管如此，即便是他也无法在其根本特征为分裂倾向的运动中保持团结。与他的信徒相竞争的是亨利·尼古拉（1502—约1580年）创立的家庭派。亨利·尼古拉最早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在埃姆登从事教学活动。不过他也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创立了“爱的家庭”，非常强调个人的虔诚体验并将礼仪和庆典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上，不过，他们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这些组织处于被认为具有高层次的精神启迪能力而被推选出来的长老们的控制之下。还有，门诺·西门死后，他的那些主要居住在莱登和哈勒姆之间地区因而被称作“水地派”的信徒，不仅在信仰上接受了一种非常自由的观念，而且放弃了再洗礼派同普通社会分离的特征，他们在1579年决定不开除任何人的教籍，哪怕他对任何信仰条款的解释都没有明确的《圣经》中的依据。1572年他们慷慨地向奥兰治的威廉为反对西班牙人的战争而设立的基金进行捐赠，同时准备履行国家赋予他们的义务。他们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名字浸礼宗，而英国17世纪产生的浸礼会就源于他们，因为他们与避难于尼德兰的英国布朗派分离主义者的接触后来鼓励了一些“水地派”移居英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那些因为在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问题上接受异端观点从而与传统基督教决裂最彻底的派别正是在东欧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安全的庇护所。这些观念往往来自南欧。在那里，讲求严谨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一旦在思想上与天主教决裂，找不到任何理由不对教会最持久的传统提出质疑。加尔文的受害者胡安·德·巴尔德斯和塞尔维特都来自西班牙，前者接受正统理论，但认为信仰的条款是主观的，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理解；而后者则认为无论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是基督二性论的教义都在《圣经》中找不到依据。

然而，还是意大利人莱利奥·索齐尼（其拉丁文名字为索齐努斯）开创了被称作索齐尼主义的反三位一体运动，在所有这类倾向中，它的影响最大，因而这类倾向便以它命名。1563年，他从避难地苏黎世发表了《对话三十篇》，首先抨击了加尔文关于圣餐的教义，继而抨击了得救预定论；他的著作否认了人们笃信无疑的三位一体教义，不过他的另一种解释也并不确定，并不清楚。这本书导致的诽谤迫使他离开苏黎世，最后在波兰诸侯尼古拉·拉济维乌那里找到了避难所，他的《对话》一书就是献给这位诸侯的。由于一道反对异端的法令，他又被迫离开了波兰，来到摩拉维亚寻求避难，在那里他于1565年死于奥斯特利茨。在本书里，要想用一章的篇幅阐述索齐尼主义的复杂历史以及它与再洗礼派运动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各地，索齐尼主义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重要性的宗教派别，而且在西欧也始终影响着一些个人和团体。作为证据之一，它说明这样一种情况：对中世纪正统学说的反叛一旦开始，即使大多数异端分子将其异端观点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某些人看来，那种学说中绝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不可怀疑的。再洗礼派表明：许多人（尤其是社会底层中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把他们对社会——中世纪宗教在其中兴旺隆盛——的不满加在了对中世纪宗教的不满上面；同样，另一些教派则认为：早期教会的教义决定没有任何理由比中世纪继承它们的教会做出的教义决定受到更多的尊重。从广义而言，一切新教都具有革命性，但正像在所有的革命中一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这一次革命的大范围包括从右翼的路德宗经过加尔文宗直到左翼各派。整个形势对于下一世纪欧洲的和平与统一是不祥之兆，而且经验证明：这种忧虑将成为现实。

（苏立昌 施青林 译）

[1] 参见后面第333页。

[2] 他在1604年以前一直没有真正登基，因为他的侄儿、约翰三世国王与信奉新教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约翰尚未成年，当时郑重其事地决定，当约翰成人后应把王位交还给他，但约翰明智地加以谢绝了，只是接受了一个公国。查理于1607年加冕，王位限定由他的后裔继承，但继位者必须是新教徒。

[3] 参见后面第282—284页。

[4] 对于这些事件更全面的阐述，参见后面第283—285页。

[5] 关于该和约的条款，参见后面第286页。

[6] 参见前面第76页。

[7] 应为威廉·廷代尔，原文此处有误。——译者注

[8] 参见后面第500页。

[9] 尼哥底母：《圣经》中人物，曾于夜间秘密拜访耶稣。参见《约翰福音》第三章。——译者注

[10] 关于这次起义的详细论述，参见后面第264—281、297及以下各页。

[11] 还可参见后面第212页。

[12] 英王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的神学教授职称。——译者注

[13] H. C. 波特：《都铎时期剑桥大学的宗教改革与反动》（剑桥大学，1958年），第408页。

[14] 参见后面第215—216页。

[15] 还可参见后面第12章。

[16] 霍布斯所写的书名，意为权力集中的国家。——译者注

第五章 以西欧为典型的社会结构， 官职和政治

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其表面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政治的多样性。很明显，普遍的教会分裂结束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的进程。由于中世纪自然法的腐朽和大量的现代主权国家当时还没有诞生，西欧各国为了寻求一种将它们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政治制度，陷入了难解难分的内部冲突（也有与邻国的冲突）之中。然而，一般说来，给观察16世纪末叶的西欧的历史学家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而是它们惊人的相似性。在它们面临的立宪问题和它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那个时代所有的政府具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所受到的压力多少是相同的。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压力冲破并超越了新民族国家的边境。

这个时期，整个欧洲都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遭受双重不断上涨的压力，即价格的压力和人口的压力。人口增长远远地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日用品价格不可避免地被迫急剧上涨。例如在西班牙，16世纪40年代经历了凶猛的价格上涨，在随后的数十年间，我们看到它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悲剧性的衰落，这是由于其沉重的海外负担：在尼德兰的消耗性的战争和一场海上的持久战，这一切使西班牙的经济体系日趋委顿。在法国，当她正置身于40年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加剧了自身的严重危机。在英格兰，16世纪中叶的通货膨胀给社会的动乱提供了一个契机，此时也正是宗教和立宪实验最棘手的时候。从那以后，通货膨胀的步伐放慢了。但是在16世纪最后的12年里，通货膨胀又恢复了先前的势头，就在那个时期，它与西班牙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恶化了，以致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行了一场战争。通货膨胀延续到了17世纪30年代。

如果说那时比较不发达的欧洲经济不能与人口增长的要求相适应，那么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容轻视的社会后果。例如，伦敦在16世纪后半叶期间，尽管受到风土病的严重影响，它的人口还是翻了一倍。这对城市和农村都造成了压力。“感谢上帝”，威廉·兰巴德在

1594年写道：“不论是杀戮还是疾病，都没有使我们遭受到极度的大量死亡，它们本来是可以减少我们过量增长的人口的。”但是，即使在屠杀和疾病以灾难性的力量介入时，人口的增长仍然没有大规模的减弱。欧洲大多数地区都证明，战争、饥饿和疾病的联合作用不足以筑成一道社会堤坝以阻挡人口集聚的浪潮，直到17世纪40年代潮水才开始退落。

人口对贫乏的和低度开发的欧洲资源的压力是不规则的；一些地区不得不忍受圈地地主的强行冲击，另一些地区则依旧与这种不稳定的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完全隔绝。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在传统的农业技术和目的方面，几乎看不出发生了什么改变，与此同时，地处中心的平原地区和伦敦附近各郡对当时的经济需求，特别是对内地的羊毛、首都周围地区的牛奶场和供应蔬菜的市场颇为敏感。这些变化不像当代人所欣然相信的那样迅速和广泛，但是它要比历史学家迄今所承认的社会情况更为不稳定和更为激进。在法国，经济压力比较小，这里既没有耕地变牧场运动的经历，也没有为满足土地所有制结构改变的要求而掀起的驱逐佃户运动。但是，在它的进程中，政治起了相当有力的作用。经过百年战争的长期蹂躏后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内战又再一次把法国河山置于军队的残暴践踏之下，特别是在它的东北部和南部。此后，在和平的间隙中，是领主们自己企图使人们重新回到离弃的土地上来。就像一段时期以前英格兰已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原先的租地使用权变得越来越难以实行了。新人是较为自由的——至少从租地使用权的意义上讲是这样。然而，一直到17世纪早期即内战结束的时候，这个过程才得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6世纪后半叶期间，压力正在以另外的方式发生作用。战争把人们从土地上赶走。

但是，无论是经济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后果，其社会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人口在不断流动。对于人口“推”和“拉”的因素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都有表现。“推”是把人口从土地上推走：或者是由于改耕地为牧场的变化使得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锐减；或者仅仅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地力所能承担的负荷。对人口的“拉”，来自因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有时发生在老城市，有时则在新城市。那种拉力——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的扩张超过了接纳城市的社会服务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因为，如果许多人由于希望寻

找工作而被吸引到城市的话，那么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长期的工作。当然，还会有一些人完全不需要工作。这样，欧洲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一样，都面临着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这里短缺工作，短缺房屋，短缺食品，短缺社会救济。这个问题不受国家的疆界或教会的教义的限制。它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不管修道院是解散了还是原封未动。巴黎不亚于伦敦，伊普尔不亚于约克，它们都发现其社会机构与人们对这些机构的要求是不相称的。与此同时，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同样地在寻找使社会得到改善的原则。同这些原则相比，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引发这些原则的基本事实：人口的流动性很大，不可能把流浪的穷苦人控制在地方的约束下。这一切都显示出了统治阶级的恐惧，他们害怕人员的流动和社会的动乱会把他们内部政治安定的薄弱之墙打开一道缺口。巴伦西亚的兄弟会反叛，明斯特的再洗礼教徒起义——这些事情发生在16世纪中叶那些中年掌权者的一生之中。这个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法国内战愈加加深了他们极其严重的社会忧虑。

这些忧虑在那个时期的立法上得到了反映和重申。在英格兰，1555年的织工法规和1563年的徒工法规回顾了一个被赋予一定的想象色彩的过去，即人口定居，不在社会上流动和人口不增加的过去。这个凭想象展现出的过去是用来为一种实际上行不通的、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辩护的。英国法律全书展示了不断增多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这些法规旨在反对纺织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反对无控制的流动，即从一种职业转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流动；反对服装穿着的奢侈——丝绸是社会上地位低于骑士身份而又有所追求的人们的象征，而骑士也在一心模仿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德国和法国一样，社会要求骑士阶级以合乎他们身份的方式生活；而在西班牙，社会的划分如此坚固，以至于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一边是世俗和教会的有闲阶级，另一边是所有忙于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

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一种扩张性的经济——纵令是缓慢的扩张，它总是要求一个流动的劳动力的储备库，况且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减少对失业救济的需求；然而此时政府却总是对这种无法控制的经济扩张抱有敌对态度。而在这种敌对态度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那些地方，低劣的道路和缺乏交通设施又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切

都阻碍了充分开发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道路。与此同时，失业和动乱互相纠缠在一起，陷入了当代社会的恶性循环。

当然，在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他们互为恶化的原因。16世纪期间，清楚地留下了这个痕迹；在所有阶级中，欧洲诸侯是那个时代破坏力量的最大受害者。因为剧烈的通货膨胀运动，既刺激了工业和贸易，也搅乱了那个不景气时代的秩序和稳定。它冲击了各国君主，而且，是在对他们损害最烈的财政方面。面对军费和内政外交开销的不断增长，他们发现，从土地上获得的岁入和从他们的议会上通过的税收与他们宣称的需要很不相称。从此，政府不惜付出丧失民心和施行恶政的高昂代价，采取了种种阴谋诡计，混淆视听，歪曲真相，有时甚至搞非法行径；从此，他们对那些被剥夺公权的贵族的财产实行严厉的没收，同时，只要有可能，也对教会财产实行同样的政策；从此，要求节俭的虔诚呼声十分微弱而且极少反响。整个欧洲各国君主日益窘困的悲惨情景都是一样的。苏格兰年轻的詹姆斯六世为了筹措足够的金钱去丹麦迎娶他的新娘，曾经历了十分困难的时刻；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儿子的洗礼不得不推迟举行，因为他没有钱去支付一个合乎他身份的典礼仪式。在英格兰，谨慎的女王有着较好的供给，但是对她的约束则更加难以忍受。当她查看战争费用和王室开支时，她与大臣们发生了严重的正面冲突，一次与莱斯特伯爵，另一次与王室审计官，她的震惊达到了极点。在法国，苏利认真地试图推行一项财政改革政策；英国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罗伯特·塞西尔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然而在英国，面对着奢侈过度的富有吸引力的宫廷和没有责任感的国王，一个大臣能做些什么呢？瑞典的模式是一个例外。这里的财政通货膨胀轻微而且发生得较晚。对于教会岁入的没收，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尽管在欧洲宗教改革前瑞典君主比苏格兰君主还穷，但在改革后他却比英格兰君主还富。因为教会的财产到了瑞典国王手中以后，就不再流动了——至少一直到进入17世纪以后很长时期为止。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却不是这样。西班牙君主接受教堂的实物税，他还从没收印加人的财产和开发美洲的银矿中使财富得到巨大的增加。但是，这些财富从来都是流动性的；到这个世纪的末期，西班牙的君主是欧洲所有君主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同时也是最贫穷的一个。

在德国，出现了一种复杂的危机。这里，教会财产的再分配没有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任何好处，并且它使得中央集权的瓦解又往前发展了一步。因为它出现的时刻正值整个体制都在呼唤着改革，帝国统治的全部观念都在受到抨击。尤其对于德国北部的诸侯来说，宗教改革使它们在反对教会和反对皇帝这两个各自独立的方面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在这个世纪的早期诸侯们经历过的那种德意志民族联合在一位心向德国的皇帝周围的场景消失了。相反，因诸侯强大而造成的离心过程更加快了。随着宗教改革在德国的展开，它对一个统一的罗马教会的敌意不断地强化着对一个声称全面统治的皇帝的敌意，这种声称无论多么微弱，都搅乱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成果。但是，富有侵略性的天主教西班牙给皇帝一个比全德意志的总和要大得多的财源和强得多的力量储备，这使他极容易做出这样的抉择：宁可要罗马，而不要改革。新教改革本应该在反对教皇的斗争中使德国统一起来，但事实上，它却在反对皇帝的斗争中分裂了德国。奥格斯堡“教随国定”的原则把各邦政治上的独立扩展到了宗教领域。在三十年战争的前夕，德国分裂得就像一幅由诸邦组成的镶嵌画，就差《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给予这些邦以继续维持下去的合法权利了。然而，在此以前，德国各政权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毁灭性的动乱。

王权的不稳定，反映了其命运与国王息息相关的那些阶级的更严重的不稳定。因为，如果说新的君主政体只有竭力苦斗才能维持和扩张其权力，那么旧贵族发现，他们的基础处于更严重的威胁下。统治阶级中的这两部分，以一种奇妙的关系携起手来。确实如此，国王发现抛开贵族去施行统治是困难的，然而，他们还发现与贵族一道进行统治同样也是困难的。苏格兰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苏格兰最高司法官的职位是在贵族中间世袭的，因而很难实现公正。但在整个西欧，贵族在社会中的作用一开始就自相矛盾。作为贵族，他们有传统的野心和竞争心，这常常与国王的和平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作为世袭官职的担任者——贵族中间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应维护一种法律和政治的制度，而该制度的延续又取决于对贵族自身力量的遏制。在波兰，王室的权威一直处于贵族的威胁之下，这对于任何一个其效率堪与波兰国民议会主持下的政府相比的好政府都是一个障碍。在瑞典，贵族们专心致力于靠损害王权来扩张自己的特权。在16世纪最后若干年中的法国，重现了一个世纪前英国玫瑰战争中诉诸武力的派别冲突，只是环境残酷得不可比拟。在英国，1569年北方伯爵

们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被都铎王朝的专制王权剥夺了政治权力的旧贵族集团的反叛；而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的造反，从许多方面讲，是新贵族领袖们的起义，他们未能再承袭第一代即他们家族的创建者们所享有的特权。但是，如果相信新的君主对较老的贵族抱有敌意，那么对君主态度的认识就过于简单化了，甚至歪曲了真相。现在已经证明，即使都铎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绝没有消灭旧贵族，而是雇用他们在国家供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仍然明显认为，稳定的贵族是她的政权的基本部分。女王拒绝用随意封授贵族的方法使贵族队伍膨胀和庞杂，她尽可能地在国家的主要官职中保留一些贵族，这是女王固有的传统主义的全部内容。神圣的女王宝座周围需要一些高等贵族做装饰，但这必须是一些解除了武装的贵族。女王向莱斯特的伯爵宣称英格兰只有一个女主人而没有男主人的话，也许曾对全体贵族讲过。不过事实仍然是，像郡长兼首席治安官这样的要害官职倾向于变成在某个郡最主要的贵族家庭里世袭。赫伯特家族从16世纪50年代到内战，除了一次间断外，一直担任威尔特郡的郡长兼首席治安官。多数贵族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然而，或许是作为贵族二元性和矛盾作用的一个象征，正是那个赫伯特——威尔特郡的郡长兼首席治安官，在17世纪40年代率领他的军队倒戈反对国王。

在这个时期，法国君主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演变成长期的流血斗争。人所共知，诱发法国内战的强大的世俗原因不亚于宗教原因，不过介入了当时斗争的强烈的宗教情绪把世俗原因掩盖起来了。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运动，在16世纪中叶首先吸引了商人和工匠；它早期的殉教者，像在玛丽统治下的英格兰一样，其出身都是最卑微的。但是到1562年内战爆发的时候，不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外省贵族，都参加到运动中来了，并且实际上接管了对运动的控制。^[1]当时的法国人就认识到了区别这一运动两翼的重要性，他们把一部分人描绘成“宗教的胡格诺派”，把另一部分人描绘成“国家的胡格诺派”。后者的主张远远超出了宗教异议。他们代表了长期以来法国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对巴黎政权，对王室和它的同盟军——天主教会仇恨情绪；最主要的是对吉斯家族的仇恨情绪，这个家族最密切地与教会保持一致，最严厉地反对这些外省的而且常常是日趋衰败的贵族们的目标和利益。（“外省贵族”这个措词的传统用法部分地混淆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如果在英国就不会被认为属于贵

族，而会被认为属于骑士阶级和乡绅家族）毫不奇怪，他们中的许多人——政治上的异端——变成了以地方上新教宗派的形式出现的宗教异端学说的保护者。鉴于王权对教会的控制相当重要，王权也当然要抵制把教会系统改变为自治的宗教会议。法国像英国一样，在那里可以认为“没有主教”就意味着“没有国王”。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一样，从新教革命中一无所得，然而所失甚多。

对于加入胡格诺教派的许多外省贵族来说，意识形态大概不如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重要：他们变得贫穷起来，因此他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或那个大贵族保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格兰（就像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英格兰那样）。不过，在苏格兰，对地方贵族的威胁不是来自像吉斯家族那样的极其强有力的天主教重要人物，而是来自像加尔文教会那样的一个假民主的组织。因此，在苏格兰，旧贵族和旧教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同盟，以反对加尔文教会。法国的趋势恰好相反，即使在法国人的宗教情绪极深地卷入的时候，对事态中心影响最大的还是政体方面的紊乱。法国在瓦卢瓦王朝统治下的最后数十年间，这种粗劣的封建制度演变出了一场内战。一个世纪前，英国的内战是在两个敌对的家族中间进行的，现在法国的内战是在三者之间展开的：吉斯家族、蒙莫朗西家族和波旁家族；还有卡特琳·德·美第奇那虚弱的政府，它企图控制局势但终属徒劳。争夺权力的斗争，从本质上讲，变成了争夺王位的斗争。最后，它也变成了维护法国独立的战争，特别是当吉斯家族企图把法国纳入西班牙势力范围的时候。自从16世纪60年代起，面临着法国统治体系可能完全瓦解的威胁，像让·博丹这样的人便寻求将所有的权威都集中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父王一个人身上。博丹强有力呼吁的目的也在于将各种信仰之间的差异缩小到最低程度。对于教徒们来讲，这种态度似乎是对信仰本身的贬抑。大法官洛皮塔勒提醒他的听众们不要忘记他所描绘的法国古谚：“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一个国王。”正是在这个时候，亨利·奥塞尔写道：“国家要像诸侯那样，坚持奉行信仰一致的原始教义。”在寻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像苏格兰贵族一样，法国贵族的贫困化，怂恿他们或者说是驱使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纵观法国进行的这些战争的各个方面都有通货膨胀和贫困等经济问题在起作用，不过把经济原因与社会变化的其

他原因分隔开来是不可能的，对于经济问题在瓦卢瓦王朝所追求而由波旁王朝所实现的大幅度削减地方自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番估价也是不可能的。在英格兰，部分贵族的经济衰退同样是明显的。但是鉴于目前关于英国社会结构的认识状况，我们不可能证实贵族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衰退和发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疑，像最近劳伦斯·斯通教授通过翔实的证据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吃、喝、结婚、盖房以至死亡等开支，把整个财产都耗尽了。据说，声名狼藉的牛津伯爵在对自己的妻子和岳父——杰出的伯利勋爵进行严酷的和反常的报复的过程中挥霍掉了所得的遗产。另一些贵族因土地管理方面的无能而丢掉了财产；还有一些贵族牺牲了私人地产，是由于在公共事业的服务中耗费了精力，或许还耗费了钱财。这后一部分人究竟有谁，很难明确地证实。因为，如果为王室服务而枯竭了他们的收入，那么这种服务同时还是他们财产、庇护和权力的源泉。莱斯特伯爵关于战争资金的处理受到严密的审查时，他抱怨说他被派到尼德兰去为女王作战，却没有给他任何物资，这怨言读来令人疑窦丛生。埃塞克斯伯爵被女王赐予了大批土地，并且从官职中得到很多收益，例如一个制造甜酒的农场，但他还是贪得无厌。牛津伯爵也曾受到女王的奖赏，不过那次是以牺牲伊利主教的利益为代价的。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些贵族之所以衰落，其社会原因往往大于经济原因。例如，如果一个贵族不幸地拥有一群都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嫁妆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宗教上不服从国教以及伴随而至的罚款，也可以使一个贵族完全破产。当然，无论贵族衰败的原因如何，他们还有继续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比如在领地上幸运地发现矿藏；在土地上应用新技术和新式的管理方法，这些技术和方法绝不是那些从城里出来的不断革新的商人和律师所能垄断的。但是毋庸置疑，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出任公共官职给那些能够得到这些职务的人带来的收入最为丰厚。官职在靠庇护关系获得后，它本身又成了庇护的工具，庇护就意味着有能力组成和掌握一批追随者，这种关系意味着可以从那些私下的请求者那里获取钱财，而且可以不公开地将公共财富攫为己有。如果一切顺利，通过求得庇护，就铺设了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力扩张的道路。不过它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微妙而又复杂的工具。既然它能够增强某个伯利的力量，那么剥夺它也就会使某个埃塞克斯愈加软弱。它对于西欧贵族的全部作用还有待做出充分的估计。不过，在法国，亨利四世有意识地竭力把地方贵族置于牢固的中央集权控制之

下，这一政策最终由他的后继者路易十四完全实现；在英国，詹姆斯一世将贵族的庇护制摒拒于政府的制度之外；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把庇护制变成了朝廷的恩宠。表面上，庇护制和恩宠似乎大体相同。但在事实上，庇护制是一种在它的时代恰当适宜并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而恩宠则仅仅是一种用公共财产对一些不相干的个人品质进行的奖赏。恩宠是在完全堕落的情况下的庇护制。然而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兴起和衰落的原因，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托马斯·威尔逊写于16世纪末叶的一段笼统的摘要，也许是我们至今所能了解到的最大限度：“一些人一天天衰落下去，另一些人按照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发展起来。”

尽管其原因不明，但是贵族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从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初，我们可以在英格兰看到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1529—1536年的宗教改革国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修道院长们从上院消失，主教们的地位下降，为削弱世俗贵族而大规模地增封新贵族——所有这些都发挥了作用。托马斯·威尔逊认为，专制王权故意以牺牲贵族为代价，帮助中产阶级上升，从而打击贵族的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威尔逊的这种事后认识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它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呈现的一种形势，而不是引起这种形势的政策。关于贵族衰落原因的另一个评论家走得更远，以至于这样说：在伊丽莎白时代初期，王权和下院单独构成了国会。即使这是一个极端的、确为悖谬的观点，竟然认为一个下院的议员比一个贵族更加重要；但是接下去，到下一个世纪，据更为现实的观察发现，下院能够控制的财富为上院控制的3倍。更有意义的是，弗朗西斯·培根在1593年争辩说：只有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才有权征税。这个原则只是到了16世纪，而且还经过一些困难，才最终被写进了英国宪法。

税收是问题的关键，它把英国的宪法史同法国的宪法史区分开来。因为，正当英国国会议员抓紧控制岁入制度的时候，法国的三级会议成员却被迫放松了他们的控制。英国的征税制度，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坚定地立足在国会同意的基础上的。然而在法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含混不清之处。克劳德·德·西塞尔于16世纪初期写作时争辩说：王室必须征收的赋税无须等待公众的同意。君主和人民由于相互的义务而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王室必须征收的赋税以及因此

而来的王室征税权，可以凌驾于国民的财产权之上。当然，国王应当谨慎从事。但是，政治上的慎重是一个无从捉摸的定义。在英格兰，所谓特别赋税，即在王权按照惯例征税以外的赋税，属于国会的权限范围。特别的要求必须经过国家专门的同意。在法国，诸如沙斯诺这样的理论家所维护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他们声称，特别税由当时的特别的条件决定，这就论证了国王具有的不经国会同意即可征税的紧急权力是合法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并不是任意征税。沙斯诺相当清楚：只要有必要性就能使国王行使紧急征税权成为合法的行动，否则这种行动就没有可以辩护的理由。但是既然存在这样的机会，即可以宣称已面临紧急状态，此时君主拥有全部权力，那么反对任意征税的宪法堤坝就可以被冲垮。英国国会议员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约翰·贝茨在1606年的庆典中，事实上抵制了国王不经国会便决定有必要征收特别税的权利。贝茨失败了，但是当时机来到的时候，国会议员们还是赢得了这场斗争。在法国，用宪法来抵制君主财政特权的斗争被粉碎了。在英国，宪法上的抵制造成政治上的僵局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后反对宪法者取得了胜利。确实，1614年举行了法国革命以前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它也是召开了“腐败国会”的那一年。（它所以被看作是“腐败”的，因为它甚至比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其他国会更为腐败）但是，在英国，国会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并且在25年以后，进行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宪法革命。在法国，三级会议既不为财政目的而工作，亦不履行对财政的控制，它在1614年后再也没有召开。它的终止使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旧制度得以成长，而1789年三级会议的重新组成又象征着旧制度的结束。

就是这个征税问题，西欧各国国会的存在和力量皆赖于此。因为，如果不是国会具有征税的权力，国王就不会有召集国会的动因。然而，如果国会掌握了这个权力，它就能够运用这个权力强行分享一份君主统治的权力。国王只能是或者损失金钱，或者损失权力。关于16世纪君主和国会的资产阶级之间紧密结合的说法，在教科书以外很难找到，充其量只是个波折重重的蜜月。西班牙从未出现过这种合作，德国也是如此。法国地方议会经常响应王室的要求，但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却没有权力审批资金，会议结束时没有君主致谢，君主也没有表示再度召开会议的任何意愿。即使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她忠诚的下议院之间被人称道的“爱情”表演，也往往以女王的眼泪而

告结束。王权和诸等级之间的合作最好时是一种不稳定的亲戚关系，最坏时则是一场不体面的争吵。

为了付清行政管理开销的账单和付给官吏们薪水，政府可在两件事当中做一件：或者寻求增加全国的税收；或者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听任官吏们从民众那里搜刮他们自己的费用。或者政府可以试着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增加直接税，在各个阶段都会遇到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论它是否得到各等级集团的同意。因为，直接税的冲击力的不平衡性和巨大的数额，常常极为沉重地落在最没有能力承受的那些人肩上。在诸如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里，国王的需要不依靠等级会议批准，相当大一部分的税收来自国民中抵抗最薄弱的阶层，例如农民阶层，但他们的财力也同样是薄弱的。从全局来看，税款来自对商业和工业的征税，例如西班牙的过境税。这是浅薄的权宜之计，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它对国家经济有害无益。英国的直接税制度尽管有许多弊端，但广泛地落在全民族肩上。这里，包括不受豁免的贵族，也包括免税的农民中最贫困的人。不过，征税事宜是紧紧地掌握在国会手中的。这样，英国政府也不得不转而依靠间接税了。

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早期间接税制度在这个国家比直接税有着更长的不间断的历史。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固定的混合物，由一些中世纪的权宜的税制组成，它们在后来的年代里以一种并未经过认真的更新的方式发挥作用。关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275年的古代关税，对羊毛、兽皮、锡和皮革的出口规定了关税。在此之上，再加上14世纪中叶的特别税，比较著名的是对酒和其他日用品进出口征收的吨税和镑税。从15世纪早期起，实际做法是将这种税收用于君主的生活开销。这本身就是一个妥协方案，因为商人和贵族们组成的反对派反对国王未经国会同意而不时地对这些商品征税。通过这个妥协方案，国王承认国会的同意是必要的，同时国会承认王室为了生活有享受这些关税的必要。然而，这个制度仍有疏漏。汉萨同盟有一项特殊权益，他们支付的税额低于英国人。也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关税的缘故，商品的价格被普遍地低估。在1558年，玛丽统治结束前不久，出版了一本新的价格比率书，由此，估价变得现实一些了。但是直到1608年以前，价格没有发生重大的上涨。同时，除了走私以外，整个的关税制度还充满了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此后，关税承包制度发展起来，国王把这些间接税的一部分让人承包，每年从

承包人收取一笔款项，并且听任承包人从关税中追求比国王迄今所能获得的更大的收益。伊丽莎白统治中期就曾实行关税承包，尔后多少有所收敛，到她统治的晚期又恢复起来，詹姆斯一世时得到广泛的应用。到了1625年，时值查理一世统治开端，国会打破了一项古老的惯例，只准国王征收一年的吨税和镑税。查理对此不予理睬，但是整个税收结构基本政策的弱点已暴露无遗，有目共睹。

在对商业课税问题上两派力量的集结，仅仅是特征之一，这些特征表明：下院和王室都认识到了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薄弱环节的中心在于其岁入制度。其余的商业税收不甚重要。王室食物征收权和先买权（王室一家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运输工具和购买食品的权利）使王室获得有限的收益，却激起了普遍的愤懑。一些税收还来自把某些工商业的垄断权授给私人。这些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最后一届国会上产生了严重的宪法危机，并且煽动起了反对派在下一代君主统治时期自始至终的不满情绪。同时，一方面是抵制，另一方面是无能和腐败，这些都使得政府仍对间接税抱有的无论多么适度的指望都被急剧地破坏了。除此之外，严重的商业萧条，例如发生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20年代的情景，使来自商业的原本不足的税收资源枯竭了。在西班牙，税收负担更为沉重，它以恶名昭著的过境税的形式进行：从几乎所有的商业交易中都要抽取10%的税收。在不同的时期，它已经变为每年交付一次的总金额——户籍税（encabezamiento）；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其价值高达50多万英镑。它榨干了西班牙王国里最多产的地区——卡斯蒂利亚。1572年一个类似的制度被强加于尼德兰，从而使尼德兰完全无法继续忍耐。造反的加尔文教派已经在一些工业和商业中心扎根，包括安特卫普在内；而且在过境税的征收中，整个商人阶级认识到他们的经济本身的生存已受到威胁。于是，自由、自治和繁荣都处于共同的危险之中，从而引发了猛烈的、不可征服的抵抗。结果，战争和维持远方军队所耗费的巨额开支，使得尼德兰从西班牙财政收支表上的进项变成了出项。尼德兰的团结抵抗是短暂的，但是它对西班牙资源的耗费却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

在法国和在作为宗主国的西班牙一样，对王室岁收的限制，与其说来自宪法的约束，不如说由于王室本身确实实地无力征收。三级会议既不能批准也不能阻止税收，只能把地方三级会议批准的数额做一推荐。国王甚至没有从1560年的三级会议得到一句提供这种帮助的

诺言。相反，国王从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得到一些善意的劝告，即可以号召第一等级——僧侣——在解决国家债务问题中承担较大的责任。僧侣接受了这一告诫，并且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国王也推导出了他自己的结论，既然不能获得三级会议的爽快的同意，干脆以行政决定强行征课酒税，同时，继续征收人头税。1576年的三级会议重新列举了它的前任的教训，确实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它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它自称奉行扩张性的天主教观点，并且专心致志于一种消灭胡格诺派势力的政策，但在建议拨配用于这一目的的专款时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在这里，三级会议的成员像17世纪早期英国国会议员一样，这些议员要求一种扩张性的对外政策，但却不批准用于维持这种政策的经费）在一次集会上，面对着这种两难处境，让·博丹作为第三等级的发言人表示了第三等级少数派反对靠暴力强行维持宗教一律的意见；同时也表示了第三等级中多数派反对贵族和僧侣享受的豁免纳税的意见。如果说博丹在他提出的第一个目标中未能使第三等级和他站在一起是一种失败，那么在抵制税收方面，则是成功的。他有礼貌地拒绝了王室筹款的要求，并且用这样的语言无可争议地阐明了宪法的立场，“代表们没有权力采取其他行动”。这是一次明白无误的宣称：不可能！

即便如此，也有其价值。三级会议与英国国会相比，无论从哪方面看，从来没有真正成熟起来。相反，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的社会结构、历史和心理中的各省自治显示出地方上的选举人不愿意允许他们的代理人发挥任何比代表更大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三级会议赖以生存的权力。因此，由于缺乏批准拨款的权威，三级会议也就从来没有获得与王权做政治交易的能力或分享任何政治统治权。由于无权拨款，所以它从来没有获得发号施令的权利。特权领域遭受到巨大冲击，这是伊丽莎白晚期和詹姆斯一世早期英格兰的特征；这在当时的法国是不可能的。相反，在16世纪最后1/3的时间里，护卫与反对法国王权的斗争发生在战场上；当波旁家族赢得胜利后，建立切实可行的国家自治政府的希望熄灭了几个世纪。17世纪的中叶，英格兰的问题也在战场上表现出来，但是其目标在长期国会的最初几个月里已经实现。英国的胜利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在西班牙，宪法斗争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不论在卡斯蒂利亚，还是在阿拉贡，西班牙国王面对的议会所提出的要求比法国三级会议

提出的要多得多。卡斯蒂利亚的议会根据传统宣称：没有它的同意，不得征收任何新税。然而，一般来讲，它不是个障碍，不过有一伙代理人也许会宣称，他们不支持在自己的行省里征收新税。然而，尽管卡斯蒂利亚议会比法国三级会议的代表性要小得多（它只是一些城市的代表，贵族和僧侣实际上未被召集），但它的代表们仍然能够约束选送他们来的城市。无论如何，经过议会同意而征收的款额与西班牙王室所要求的金额比较起来，总还是相应的小一些。阿拉贡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它的议会里有四个等级（贵族分为较大的和较小的两部分），议会是相当强有力的。在精力旺盛的、有着政治常识的贵族的领导下，议会顽强地而且很快成功地抓紧了它的特权和它的钱袋的口绳。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在1591—1592年的佩雷斯惨败[2]后，议会势力一蹶不振。由于叛乱的败北，使国王抓住这个机会削弱了阿拉贡的自决权，总之，侵蚀了贵族的利益。贵族的投票权——尽管还不是代表权，在议会里被削弱了。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对于国家使用税金的控制——它是对任何政策进行控制的基础——减弱了。[3]

16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发现它们面对着日益增多的需求和相对枯竭的财源。腓力二世实际上是以一个破产声明开始其统治的，法国的亨利二世也同样地由于他税收上的巨大亏额才加紧缔结卡托—康布雷奇条约。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从她姐姐那里继承了一大笔债务，而一种丧失信誉的通货则使局势愈加恶化。在她的统治中期，只能把国内严重的经济状况与在国外做出最低限度的承诺结合起来，但是，即便如此，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仍然是很脆弱的，而且未能幸存到她统治结束。然而，就连这样有限的成功也使其他君主望尘莫及。法国内战逐渐消耗了王室有限的资源，使君主政体元气大伤；西班牙国王的帝国负担远远重于来自新大陆的源源不竭的白银。为了寻求现金，各国政府左冲右撞，抛出了一条条最原始类型的权宜之计，他们不得不拍卖自身的统治机器以寻求解脱。为了国库的收入而败坏公职，这种现象在整个西欧司空见惯。这是饮鸩止渴式的破产的策略，它部分使政府的费用降低，部分使统治者获得必需的利益，但不是赞誉。如此笨拙的策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政府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中产阶级不能够，或不情愿为本国政府的开销承担主要部分。

但是，如果中产阶级表示不合作，那么在与中产阶级的相处中，王权自身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颇为暧昧。在法国，国王有时候反对行会寡头的势力，目的在于将他们更直接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下。然而这项政策仅仅得到很不均衡的贯彻实施。而且在另一些时候，王权又极为草率地出卖行会证书，这实际上是赋予人们建立作坊成为行会师傅所必需的资格。西班牙梅斯塔（养羊者的强有力的团体）的历史在16世纪末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这里，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强有力的绵羊贸易行会，他们都尽力牺牲对方以获取利益。例如，梅斯塔从国库全部地买下了绵羊税——这是为王室征收的一种税。当通货膨胀的时候，这样的协议给梅斯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从日益贫穷的国库买来的其他各种特权也同样获得了好处。但是，在把特权卖给梅斯塔后，政府现在又继续出卖特权反对梅斯塔，那就是将特权再卖给独立的绵羊主人们。同时，在把豁免旧税的特权卖给梅斯塔后，政府又对绵羊强征新税，这样，要求购买豁免权的整个过程又需重新开始。这种做法在最初是有效的，但是在可见的将来，它无异于杀鸡取蛋。17世纪早期梅斯塔彻底地衰落了，而在这个团体之外的农业也没有进行补偿性的改革以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花招只是一些例证，说明了遍布欧洲各地的一系列靠狡诈的手腕向经济活动征税的企图，这是把运行中的商业和工业过程当作一块财政海绵来榨取。它们势必导致经济的畸变，而且它以庞大的规模继续发展着。这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普遍地卖官鬻爵。这个术语本身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而设立的各种不同的程序。按其最简单的形式，它意味着由政府出卖现有的公职，或者出卖完全是为出卖而设立的特殊的官职。它还能够采取更迂回的形式，即出卖经济控制权。例如承包关税或专卖权——承包人以一大笔款项或收入作为担保，然后他们便可以任意地利用行政和管理手段尽其所能地榨取利润。最后，还可以采取通过大臣或他们的属员转让官职的方式开辟财源，这些大臣或其属员因让渡官职而索要报酬。报酬的形式五花八门，随便举几例，如礼品、酬金、津贴、贿赂。如果说出卖官职这一种方法可被描绘得如此散乱和多变，那么在实践中，现存制度所采取的方式往往不止一种。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双重目的上：它既把岁入带给王室，同时又把管理的重担加给私人。例如，关税制度的效能之低是声名狼藉的，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关税承

包。于是，在1570年承包给卡斯特莫·史密斯先生的关税扩展到伦敦和它周围一些港口的所有进口税。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20年，事实表明，它对王室和史密斯都是一种进项。但是批评包税制度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包税制在1588年被取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令人完全失望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关税的时期，结果，在这个世纪末叶，关税承包制度又重新恢复了。这等于明确地承认，间接的民间管理比政府本身经营对国库更有好处。当然，这不是指增设闲职或者许可贵族拥有专利权。他们挣得收入，但却没有用服务来报答。

对于官僚体制的需求，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宗教改革后的那个阶段，这个问题却表现得很紧迫，并且官僚的比重增大了。像以往那样，中世纪的国王总有一个官僚储备库供其支配。但是，官吏们的供给和薪水却来自别处，即由教会颁发。军人阶层的报酬大抵不是这样，它主要来自封建土地或国王岁入，或者来自被征服的人民。管理阶级由神职人员组成，并由教会供给；没有这个行政机构的基本框架，国王的统治从来不可能继续下去。但是到了16世纪，不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经历了教会的严重衰退。只有旧教方面的西班牙和新教方面的日内瓦是例外。管理者的天然储备开始减少了，而且无论如何，时代的心理也一点都不能容忍教会垄断政府官职这种想法了。换言之，王权不能再指望靠一个由教会出资维持的行政机构来管理国家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政府在国内与国外，在教会里和国家中，在地方和中央所承担的责任的扩大，行政管理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因此，16世纪出现的国务秘书遍布欧洲。通过他们，国王的大量指令传达到王国的各个角落，整个大陆各个部分的大量情报又反馈到他们那里。英国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国务秘书的办公处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和精心建制的机器；在法国，由于秘书们过着一种可怜的、劳累过度而又入不敷出的生活，这一机构仍然十分落后。同时，公文的产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可被恰当地称做文牍主义国王的话，那么英国公共档案馆和巴黎的国家档案馆里保存下来的文件对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情况可给予某种程度的说明。行政管理机构本身在增长，日益复杂化、专门化，而且费用高昂。每一个政府都依次遇到这样一个骇人的任务：以古老的、受限制的政府岁入来满足那种对人力和金钱挥霍无度的要求。这确实是16世纪晚期政府的危机。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危机的内在因素。

大概十分自然的是：一个公共职务的占有者，如果被许可终身任职，或者长期地担任该职，他逐渐地总有一天会把他的职位几乎视为一笔财产，一种他可以传给继承人的完全保有的不动产。尽管有议定书，有文件规定的极为复杂的形式，但是当这件事情的重要部分事实上不拘形式地在君主和大臣之间或大臣和受信任的助手之间私下进行时，情况更是那样。这就是法国和英国的国务秘书们的情况。对于卡特琳·德·美第奇时期的法国来说，这是一个惯例：国务秘书把他们的亲戚带进来，委以某种行政管理重任，训练其成为继承人。在英国伊丽莎白统治的晚期，伯利勋爵把他的小儿子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带进来，帮助处理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在监护法庭（Court of Wards）的一些更特殊的岗位上任职。作为一个才学兼优的学生，罗伯特·塞西尔在1596年晋升为国务秘书，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599年成为监护法庭的推事。就是在这同一个机构中，黑尔家族将办事员的职位保持了几代。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这种子承父业的方式可以有辩护的理由，因为一个家族积蓄了经验就能更有效地处理事务。但在16世纪，这种“让渡”的使用日益增多，官吏们把他们的职位安排给其他一些出了大价钱的人。这种行为的泛滥使国王们警觉起来。他们看到，任命官员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从他们手中溜走，而对于继任者的能力和廉洁又得不到任何确实保证。伊丽莎白嫉恨这种行为，却无力制止。在法国，尽管颁布了限制性法案，但是这种现象仍继续蔓延。^[4]在确实无法制止后，政府决定在这样的活动中分享一份利益。例如查理九世就是这样做的，他在1568年对让渡官职的行为征税。但是比政府在私下搞的交易中获得的任何一份都更重要的收益是，政府本身出卖——和为了出卖而设立——大量的国家官职。1604年的官职税并不是一个发明，而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完成，即许多官职的担任者实际上被保证有继承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向王室纳税。既然从官职中所获的利润大部分来自公众，因而这是国王在这个变迁的时期向国民征税的又一例证。但这个过程对当时社会的经济和结构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个煞费苦心的创造对那个自私自利的官僚圈子是有利的，但是却往往无助于王权。它对于17世纪早期发展专制统治的国王们必然是个束缚；法国国王被迫在现存的官僚之外去增设新官吏和新税收。总督这一官职的出现就是一个反映。17世纪中叶强征新税是已经形成的官僚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国内斗争中转而反对国王的原因之一。

在西班牙，那里的国王在从中央到地方广阔的范围内出卖官职（但是不出卖高级行政管理官职和任何司法官职），为了出卖，他们简单地设立了大量的不必要的职位。同样，在法国，这一进程的范围变得如此广泛，以致卢瓦索竟声称：城市里一半以上的市民都是职员。在英格兰，王室出卖地方官职的事有待调查；但在瑞士，格里松的执行官们是花了为数可观的钱买下他们的职位的，然后，他们便滥用这些职位以追求收益。在行政管理权上的交易深入到了政府自身的“心脏里”：法国的亨利三世以每个席位1.5万法郎的价格卖掉了国务会议的四个席位。而且，穿袍贵族上升为这个王国里确实享有免税权的第四个等级；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同时，贵族专利权的出卖，是为了眼前利益而卖掉将来的又一个灾难性措施。（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向教士们的孩子出卖合法性的专利至少对财政是无害的）在英格兰，出卖贵族头衔直到詹姆斯一世登基的时候才开始，结果为了岁入而设立了世袭的从男爵头衔。但是这些出卖没有牺牲长远利益，因为英格兰贵族不免税。的确，出卖从男爵身份的意义委实不小，它恰恰在1611年开始，当时以财政复兴为主要目的的“伟大的契约”刚刚瓦解。但是，如果说英格兰政府从来不把国家的高级官职交付拍卖，但在整个低级官员和政府准文职人员的圈子内私下的买卖官职活动却很猖獗。

政府和私人在财政事务方面的冒险精神相互作用的鲜明例证，表现在英国王室享有监护权和与此相关的封建义务问题上。中世纪的结束当然不是封建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封建权利的占有者还有那些买得头衔而加入到他们行列里的人，在他们所能施展的任何地方，从这些古老的占有权中榨取不断增长的、额外的收益。但是，唯有在英格兰，国王作为封建领主的权利在岁入体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并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法庭以发展并保护这些权利。主要由于骑士服役而形成的仅仅对土地的占有，其继承人即使未成年也要承受封建监护权强加的全部负担，其中包括这样的义务：结婚要遵照王权或买到监护权的那个人的意志，拒绝将意味着毁灭性的罚金。这样，封建婚姻权利超越了封建环境而残存下来，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在了大量的土地持有者的身上。这主要是一种国王的权利，一些疏疏落落的遗迹残存在其他领主身上；这个权利在许多时候卖给一个陌生人以换取一大笔金钱和一笔追加于监护人的土地的租金。在一些情况下，它导致严重的社会弊端和引起强烈的愤懑。但是它给王室带来金钱，并给王室的工作人员带来更多的酬金和好处。在

很多情况下，王权干脆把支付文职人员薪水的任务转让给地主阶级。但事情远不只是如此。在开发这些间接的财源和未经国会同意的税收中，王权正在避开对立面不断增长的、试图把政策和大臣们置于国会控制下的努力，尤其是在17世纪早期。王权在财政方面做如此变通，对于英格兰这类国家尤为必要。在那里，征收直接税和新的商业税必须经国会同意。因此，这种隐蔽的间接税征收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垄断提供了其中一例，监护权则是另一例。

由于私人控制权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扩张，下一个结果便是公共行政管理的本身受到不信任。因为，它似乎是以破坏公共利益来达到私人目的的，简言之：腐败。但是“腐败”一词的含义很少被限定，它被当时的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着，也被历史学家轻率地谈论着。当然，正义被欺骗行为和暴力所破坏的例证是大量存在的。当代的一首押韵诗写道：“朋友相勾结，法治就毁灭。”这样的例证的确存在：召来为王权服务的人却剥夺了王权。这些行为当然是腐败的；一个不成熟的或者报酬太低的行政机构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清楚地展示出这些特点。但是“腐败”一词在16和17世纪使用时所表达的含义被扩延并适用于一整套官员的额外津贴、礼物和各种好处，因而社会和政府的结构显得昏暗不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送礼实际上是交费，不过是政府所依赖的、效能低下的间接税收的一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具有双重标志，一是表明王权对其文职人员的控制只是初步的、不完全的；二是表明公共岁入严重的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税款来以直接的薪金维持国王的文职人员。确实，许多赠礼的目的是从牺牲公共利益中获得好处，但是更多的是常规的报酬，所有的人都赠送，所有的人都收取。这不是腐败，而是那个时代弊端丛生的税收制度中固有的一些事情。在任何一个近代时期的国家里，这种有缺陷的制度残留的程度与政府向全民族征税取得成功的程度恰成反比。

但是当赠礼的接受者不是文职人员们，而是国王的宠臣，如法国亨利三世的嬖幸或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的卡尔斯和维利尔斯们的时候，那又将如何呢？只有此时，这个制度才确实被歪曲而变得腐败了。只有此时，这些间接岁入才渗进了奢侈与贪婪那干涸的土壤。这时，该制度才变成无益的和畸形的，国家的利益牺牲给了一个颓废的朝廷。结果，正是“朝臣”这个词具有了腐败的含义。但是，这还可能把整

体与部分混淆起来。因为在人治政府的时代，“朝廷”意味着两种东西。从狭义上讲，它意指贵族和被召来从事宫廷直接服务的王室仆人，和那一切奢侈、仪礼和矫饰。在这个环境下，个人的宠幸盛行起来。但是“朝廷”也意指整个大臣和文职人员的实体，他们被召来担任王室公职。有时一位个人的宠臣同时也是一位大臣，英格兰伊丽莎白时期的莱斯特伯爵就是这种情况。许多当时的人对这一点理解得很正确，就像18世纪提出“朝廷”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报界人士一样。对于“朝廷”，他们简单地意指那个时代的公职机构，对于“国家”，他们意指公职机构以外的那部分。“朝廷”意指在威斯敏斯特的宫廷，但也意指白厅的行政机关。

集权政治这种模式在地方上以较小的规模再现出来。一个地方权贵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利益资源，在他领地上的官员都要受他控制，他还为首都推荐公职人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第一个10年中的诺福克公爵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在他于1572年被处决后，英国东部没有一个贵族能代替他。与此相反，庇护制度变成了地方上的上层绅士们相互仇恨的战场，这是由于他们重视威望并不亚于重视收益。例如，被任命担任或被解除治安法官的职务，鲜明地标志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沉浮。西部地区彭布罗克郡的伯爵们，一直受到请求官职的人们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副职官员的职位为人们求之不得，而在另一些郡该职位又很难满员。英国地方社会庇护制实行的程度很难估计，但很明显，它分布的范围很广，它以地域为基础，服务于一种灵活而又稳定的关系。这一点不仅从政治方面也可以从宗教方面观察出来：在上层人士的乡间宅第成为宗教异端（无论是英国的天主教还是法国的胡格诺派）在当地的中心地方，庇护制不仅从政治上、也从宗教上显示出来。地方经济结构对这一特征的反应不亚于社会结构。西欧在这个阶段远比东欧和更远的地区有更大程度的耕作自由。在后面这些地区，一种新的、较顽固的封建主义的土地形式正在出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却在抛弃封建主义的许多顽固的特性。不仅如此，在西方，地方乡绅势力依然残存下来，有时还发展得比较强大，但这种力量的维持是靠他们作为租金收取者的地位，靠一种新的社会组合。确实，租金的压力有可能像早年的人身奴役制一样冷酷并难以负担，然而社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采邑的领主正在变成村庄里的乡绅。

在法国的那些在官职上有既得利益的人们中间，至少在其上层，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这就是穿袍贵族，但他们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对于广布于整个法国各地的无数低级官吏来说，不可能与穿袍贵族联合为一个阶级。在英格兰，甚至在中央，政府的公职人员缺乏那种持久的兴趣和态度，这是不论在国会还是在全国为确保一批枢密院的坚定追随者所需要的。国会里庇护者的身份和官职授予权都不能保证一位要人在下议院就一些使国家产生对立的重大宗教问题或其他问题进行辩论时，得到确定的支持。伯利男爵在他的那些被保护人中搜罗了如詹姆斯·莫里斯那样的人，而莫里斯后来却以持少数派观点而使政府难堪。在17世纪前半叶连续数十年间，当忠实于王权还是忠实于原则之间的冲突加剧时，许多官吏违反国王的意愿而追求了原则或利益。法国也同样如此，在投石党运动时期，由于一种传统和利益的混合原因，许多官职的担任者认为他们自己与地方上的人民在反对政府方面是一致的。这些年的教训和前面所提到的情况证实了担任官职者的社会复杂性。欧洲各国政府官职的担任者们既没有组成一个有着广泛利益的、紧密结合的集团，也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或封闭的阶层。在英格兰，地方政府掌握在非职业官员的手里，最高为领主的代理人，然后是负责地方司法的治安官和教区的总管。在法国，自总督以下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业化程度高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指令都不能藐视地方的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官员们的忠诚。而且，没有途径从官职获得好处的那些人，更是有理由加深他们的不满；他们特别强烈地反对朝廷的宠臣，这些人只是由于巧言令色才得到宠幸的。然而，在没有政党政治的情况下，庇护制毕竟提供了行政指挥的广阔渠道，尽管是不适当的。

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召集来为政府服务的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官僚集团说成是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个术语很不准确，但它仍有一些可取之处，因为它把它的成员与旧贵族做了区别；那些旧贵族根据正在迅速衰落的传统而要求参与统治和充当顾问的世袭权。这个术语也把官僚与工匠和农民阶级做了区分。但是，它基本上是个开放的阶级，不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其结果，一方面是它常常使人相当迅速地升入贵族的行列（往往靠婚姻强化关系）；另一方面，它给那些出身卑贱但才干超群的人提供了一条晋升的途径。中世纪的教会经常提供这种途径，如枢机主教沃尔西的生涯就是英格兰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典型。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政治势力世俗化的进程已经有了长足

的发展。17世纪中叶，像劳德和贾克森那样的教士在新教国家里被擢拔到很高位置以及枢机主教们在天主教的法国掌权，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大多数高级官职中，教士已让位给律师和商人。在沃尔西之后，出现了托马斯·莫尔、托马斯·克伦威尔、格雷莎姆、西摩家族、达德利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法国，国务秘书中诸如德·劳比斯班、皮纳尔和维勒鲁瓦等人都是世俗人士。塞莱斯坦的约翰·梅特兰在15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的大法官，他是担任这个官职的第一个非主教亦非大贵族的人。反对这种进程的呼声不是来自软弱的教会，而是来自较老的贵族以及他们的扈从。英格兰北方的伯爵们于1569年起事，他们宣称的目标之一，就是清除像塞西尔那样的暴发户所产生的腐败的影响，这就重复了一代人以前的格雷斯科姆圣者事件的口号：清除暴发户克伦威尔。在瑞典，查理九世因依靠出身卑微的大臣而受到贵族的责难。确实，瑞典这个国家的律师、商人和企业家的数量与英格兰的和尼德兰的相比要少得多；职业官僚在那里也就迟迟成长不起来。瑞典更像天主教的西班牙而不像新教的英格兰和荷兰。但是在西欧，形势正在清楚地朝着有利于职业化的中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波兰那样的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官僚中产阶级可供政府支配，国家只能主要地依靠不负责任的贵族发生作用，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整个西欧各国的王权都经历了严重的财富衰竭，相比之下，商业的、工业的和占有土地的上层人士的财富则绝对地或相对地增加了。当政府发现它们正被迫承担更为沉重和耗资更大的国内管理、外交和战争事务时，这种差距就愈发加大了。16世纪的后半叶，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都承担着军事开支的重负，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它们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通过使用这种或那种手段，税收不得不一再增加；无论如何，间接税（或者征收商业税，或者利用过时的手段——例如监护权——征税）提供了最富有灵活性的财源。从低地国家对过境税的反应来看，税收有可能超过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这种情况又可能更快地走向耗费巨大、灾难严重的战争。在西班牙，对间接税的抵制是软弱的，但是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已经衰败了，而且社会也扭曲为优先考虑非生产性事务——最重要的是教会和军役。而且，如果说这个阶段是西班牙经济衰落的开端，那么它也是西班牙议会衰落的最低点，因为国王使自己从议会对税收的批准权中解脱出来了。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英格兰，宪法仅仅承认君主在税

收领域内有限的机动权。因而，1585年战争的来到以及战争对金钱的需求就给予国会一项日益增强的、影响政府的政策的权力——一项再也无法否认的权力。伊丽莎白试图靠节约开支来与之抗衡，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则靠把暧昧的特权政策使用到极限来与之抗衡。确实，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特权是如此之软弱，以至于只需1638—1639年苏格兰边境上一次小小的战争便把它粉碎得无法复原。

在英格兰，贵族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封闭的等级，掌握土地的绅士们也从来没有变成小贵族。因此，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相互关系比起他们与国王的关系来要亲密得多；在危机到来时，他们相互间共同之处比起他们与国王的共同之处也多得多。在各个郡里也是如此；同样，他们这些人在下议院里也都彼此相处融洽。弗朗西斯·培根说，治安推事会“把贵族和绅士结合在一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格兰有这样紧密联系的贵族和绅士。海外其他国家，贵族不参与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参与军事活动；司法事务属于穿长袍礼服的人；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贵族更加无知和暴虐；然而在这里，在我们中间，他们是和那些从事司法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武士他们同时也是和平的工具；这使他们堪称高贵”。

当然，这是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但是，像以往一样，培根触及到了事物的关键。毋庸置疑，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结合在这个时期比欧洲大多数国家要紧密一些。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与之并驾齐驱的另一个重要的关于宪法的事实是，直接税需要国会的同意，而间接税相对来讲较为固定。当其他的国家的宪政机构正被逐步废弃的时候，这两个重要的事实挽救了英国国会。

（侯建新 译）

[1] 参见后面第282页。

[2] 参见后面第250—251页。

[3] 关于西班牙拥有的意大利财产，参见后面第253—258页。

[4] 还可参见后面第316页。

第六章 国际外交和国际法

1559年4月2日和3日，于康布雷市郊主教城堡签署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一个时代的断然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和约签署者代表了三个主要的大西洋强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解决的主要争端是自1494年以来左右着欧洲强权政治的问题：谁应是意大利的主宰？意大利的命运最终决定于会议上，但桌旁既没有意大利的代表，甚至也没有教皇的代表；而一些利益攸关的方面，诸如佛罗伦萨、曼图亚和威尼斯的使节和密探却在70英里外的布鲁塞尔宫廷外边搜寻着零星的消息，这就是新时代的预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和教皇以及意大利各邦一样，始终对意大利的命运极为关注，甚至即使下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是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城市的归属问题，帝国的代表却也未参加会议。帝国的称号转属哈布斯堡家族的兄弟支系以后，皇帝便以东部边界守护者的姿态警戒着多瑙河，此后70年内只是偶尔稍许地介入西部事务。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企图在必要时不经其叔父斐迪南同意即解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的归属问题；用这三个城市换取法国撤出皮埃蒙特和萨伏依，这两个地方也是帝国的领地，而不是西班牙领地。这是一个最初的迹象，表明腓力二世确信：无论谁执掌帝国权杖并受领神圣罗马帝国选帝的称号，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查理大帝和腓特烈·巴巴罗萨之剑——都已由他的父亲传到他的手里。这个西班牙人确信帝国的实权以及与之相应的皇帝捍卫天主教信仰的主要职责已经转移到西班牙，这是新时代的又一个预兆。

以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为分界，并从此前和此后的国家角度来观察，1494—1559年这65年内的西欧外交史，呈现出基本的一致性；它使细节上的歧异所产生的影响大为减少。尽管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问题，尽管直接争夺的地区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但1559年以前，实质性的问题一直是：谁将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在从前的混战中，参战者始终出没无常，而且角逐各方时常改变立场；一系列的王朝事变使早先的混战转变为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之间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皇帝查理五世所负的多重职责使得他与各种外部牵扯的斗争复

杂化，其中包括德意志僧侣的神学争论，英国国王在国内给他制造的麻烦，法兰西与勃艮第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以及总是更为凶险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入侵。然而，自从贡萨尔沃·德·科尔多瓦越过墨西拿海峡以后斗争的主角就一直是西班牙和法国，而他们争夺的战利品始终是意大利。因此，把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后的整个65年定名为意大利战争时代似乎既合情合理又很恰当。

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在对意大利的征服中都得不到任何合理的利益；而且，无论鹿死谁手，外国统治都将是意大利的祸根，而对胜利者也毫无益处。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当时，像后来一样，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战争根源。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封建社会晚期根深蒂固的习俗。几乎在各国都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贵族除了进行战争没有任何其他正经职业；并且，的确也没有任何其他正当的生存下去的理由。君主们不断率领他们逐鹿疆场，以此防止他们互相残杀。除了欧洲的最诱人的战利品以外，欧洲这两个最强有力的君主还能为什么而战呢？他们厮杀拼搏，直到双方精疲力竭，这时，卡托一康布雷奇和约把意大利永久地奖给了西班牙。

意大利战争时代经历了主要对手及其重要盟友之间40余年的公开战争，与之相对，近20年的时间处于动荡的勉强维持的和平状态。在此期间，战争艺术当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理八世麾下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那支军队，因其瑞士矛手的密集方阵、能快速进攻的加斯科涅轻装步兵、重炮队伍以及以这一切为补充的主力部队——列队重骑兵，从而在向近代化作战能力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走在了参加福尔米尼战役的军队前面，而福尔米尼战役中的职业兵又走在阿让库尔战役中的封建征集兵的前面。但是，16世纪50年代曾在梅斯、圣康坦、格拉沃利纳和锡耶纳周围谷地参战的军队更为先进，以至于仅仅60年前在福尔诺沃交战的军队看起来就像中世纪的军队一样。在此期间，火器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堑壕阵地和围城战术也发生了彻底变革。火炮变得机动灵活了，骑兵也开始废弃长矛而依赖手枪。^[1]这种变化也许可以归纳为：此时，决定性的兵种不再是骑兵，而是步兵，结果头等军事强国不再是法国，而是西班牙了。

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谈判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亚于舰队和军队。在频繁的间歇期，战争被和平条约或休战协定所中断，没有一场战争能持续很久，盟友关系的宣告破裂，新联盟的缔结，新的“神圣

同盟”宣告成立以及寻求永远解决这样那样问题的会议的召开，常常中断战争的进程。整个战争期间，与盟国的外交联系始终不断，而与举棋不定的中立国也常常联系，敌对国之间的对话也时有发生。在这种紧张的外交活动的促进下，外交艺术获得了发展，至少像同一时期战争艺术的发展一样突出。

到中世纪晚期，西欧人已经发展起外交活动的四种方式。首先，他们使用非官方和半官方代表进行广泛的、多少属于试探性的接触。这些代表可能纯属间谍，表面上是私人身份，必要时，可加以完全否认；就像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和此后路易十一以及阿拉贡的斐迪南在意大利的某些随员一样。他们或者由私人委派，像尼科代莫·达·庞特雷莫利在佛罗伦萨居住的最初阶段那样；或者可能拥有某种公开的准外交官资格以充任合法代理人，甚至可能充任信使。他们可以被派出传递各类机密信件或进行各种预备性谈判，加固旧联盟或探索建立新联盟的可能性，消除友邦的疑虑或留心潜在的敌人。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机密（因为代理人和信使，其公开使命可能掩盖其真正使命，而官方代表即使运气好也很少能完全掩盖其意图），不拘礼节和行动迅速。其最严重的缺陷则是这些代理人在路途中或在其驻扎地引起怀疑时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他们缺少迫使国内同意某项协议的权威。

这些缺陷被第二种，也是最普遍的外交活动方式所弥补，即派遣公使团，其中的一名或几名使节持有赋予其相应特权及外交豁免权之特殊地位的文件，并被授权谈判某项特殊事务或传送特别信件。一般认为，组成这类使团对于解决争端、缔结和约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表示官方祝贺之意、呈递非常正式的信件或提出非常郑重的要求也是很适宜的。

15世纪时，通过非正式的代理人和通过委任使节进行的这两种外交活动方式常常为另外两种更高级的外交方式所补充。为解决争端、缔结和约，或制订共同行动计划，人们召集会议。例如实现法国与勃艮第之间和平的阿拉斯会议，又如庇护二世为组成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而呼吁召开的曼图亚会议。有时则致力于举行利害相关的各方势力的会议；诸如意大利的各种势力，或基督教世界各国，或卷入有待解决之争端的全体盟国，有时只有主要争端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常由一个被认为是中立的调停者主持，但也并非一贯如此。不过，

各方照例派出一个4—8人的代表团，配有自己的秘书、译员、信使和能干的助手；在预备性会谈中，代表们就日程安排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会议就以公开会谈和私下磋商这两种方式交替进行。

最后是国家首脑间面晤会谈。对于这类会议不存在任何定则。它们既有可能像路易十一和爱德华四世的皮基尼桥会谈那样因礼节和戒心而刻板生硬，也有可能像豪华者洛伦佐访问那不勒斯那样随便和不拘礼节，既有可能像大胆查理前往特里尔谒见帝国皇帝时那样富丽堂皇、隆重盛大，也可能像腓特烈三世在同一场合出现时那样简陋寒酸。会谈最初可能相当谨慎含蓄、不着边际，以至于同样的事情如果由使节们处理则要迅速得多；会谈或者私下进行，相当机密，致使历史学家们时至今日仍只能猜测事实上做出了什么决定。关于这类会谈，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君主们担着极大的风险。我们尚无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人身会受到威胁，不过这一点也可能是真实的，像路易十一在佩罗讷发现的情况那样。更普遍的缺点是那种必定与这类会晤伴随而至的过分的公开，它使会晤的失败比其他外交方式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而且它诱使双方做出无法实现的诺言，达成模棱两可的协议。自愿接受含糊不清、带有偏见，结果经常引起严重误解的决议。此外，还有这种可能性，两个各自抱有敌对目的的政界老手，在察觉到各自都不可能向对方让步时，必定会以比从前更为激烈的仇视态度结束会晤。因此，科米纳建议那些希望相互保持友谊的君主们永不相见。

15世纪的人们是知道这些风险的。但是，对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政治家们持始终不渝的乐观态度，统治者也有永不动摇的信心，这使他们到16世纪时，仍然在利用其他所有传统的外交方式的同时，继续寻求私人会晤。在16世纪国王间的各次会晤中，人们首先想到在“金衣原野”^[2]那灿灿金光下的重大失败，和查理五世两次出访英格兰的辉煌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却播下了烦扰的种子，未来的危害甚于在法国那次明显的失败。但是，尽管上述会晤的后果不到10年便显示了出来，亨利八世仍想跨过英吉利海峡与弗朗西斯一世对话；弗朗西斯和查理也都能够一度说服自己：通过他们在艾格莫尔特的面谈，无须各自谈判代表的耐心和教皇的机巧，出路已经找到了。而且查理五世几乎到了临近退位的时候，仍然确信，只要他能与法国国王会晤，就可以赢回外交和军事未能夺回的东西。

国际会议比国王会晤更不成功。然而，这半个世纪的开端毕竟是一次宣称以全面和平为宗旨的召开于康布雷的会议，尽管其全部成果只是成立了一个反对威尼斯的同盟；而这半个世纪的结束还是在同一地方举行的另一次谋求普遍和平的会议。同样，意大利战争时代目睹特使们的频繁往来，它们有时像1527年夏天沃尔西出使法国那样张扬矫饰，有时则平淡无奇、悄无声息。16世纪的外交活动像更早些时一样，使用非官方和半官方代表弥补公使们在微妙的谈判时的不足，或者在公开活动有危险或不适宜的场合代替公使。托马斯·斯皮内利爵士在尼德兰的头一年中可能就是这类人物。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吉安·贾科莫·帕萨诺，他代表路易丝（萨伏依的）前往英国与沃尔西会谈；还有为托马斯·克伦威尔去德国刺探路德宗诸侯动向的克里斯托弗·蒙特。在16世纪上半叶，或者说在近代欧洲强国的斗争中，相互敌对的君主们发现，他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所有外交手段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他们受野心驱使的任务的需要。

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后，欧洲事务中持续紧张的局势迫使较大的强国寻求常设的外交机构。非常幸运，这种机构是现成的。早在一百年前，维斯孔蒂家族为统治意大利半岛所做的最后努力造成了持续紧张的局势，意大利各邦被迫结合在一起；为了对付面临的压力和危险开始互设常驻使团。起初只是为了同盟之间便于进行外交联系，洛迪和约于1454年订立以后，除了战争造成的中断以外，在所有强大的邦及其主要的附庸邦之间这就成为惯例了。查理八世翻越阿尔卑斯山以前，意大利各主要的邦互派常驻使节已将近40年；而且，第一批意大利驻外使节也已经开始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宫廷中出现。各强盛王朝的内阁只需要把意大利的外交制度运用到他们那些与之并无太大区别的活动中和需求中，从而在来自意大利的代表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许多进口项目中再增加一项。在意大利战争最初的35年间，他们就这样做了。西班牙带了这个头，它通过阿拉贡完整地继承了意大利的外交经验；法国在帕维亚之辱^[3]以前一直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结果落后了。最初，与100年前的意大利一样，只有同盟国之间才互派常驻使节。但是，如同意大利的经验所表明，同盟的格局变动无常，因此，1559年以前，在欧洲强权斗争中具有主要利害关系的君主之间，只要处于和平状态，就在各自宫廷中保留常驻使节的现象似乎已经很常见了——正像洛迪和约时代的意大利，这种情况开始成为定则一样。

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以后，人们可能指望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的外交制度能与意大利外交下一阶段的发展相一致，建立起遍布西欧的驻外使节网。因为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毕竟是一个比洛迪条约更有约束力的和约。它的领土条款几乎沿用了一个世纪，它开启了一个在主要欧洲强国之间36年无正式宣战的和平时期。尽管它使西班牙上升到明显的优势地位；在它原有的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半岛的领土以及新大陆帝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勃艮第、尼德兰、弗朗什孔泰、米兰、托斯卡纳诸要塞和那不勒斯各省，但法国也没有处于根本无望的劣势地位，强固的领土主体并未缩小，而且由于获得了梅斯、图勒和凡尔登这些要塞，以及收复加来而得到了加强。再者，独立的萨伏依—皮埃蒙特公国的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世袭领地与西班牙的分离使西欧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地区，似乎预示着外交活动更为自由以及某种类似洛迪和约以后的意大利那样的均势政治的时期即将来到。

但这一预兆没有应验。外交活动的范围不是在扩大，而是不断缩小。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个损失，因为君主之间亲自会晤的时代也突然结束了。伊丽莎白女王从未离开英国，腓力二世从尼德兰回国后，也从未离开西班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中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的最后一位。卡特琳·德·美第奇在1564—1565年恢复个人外交的努力并不比她在巴约讷与阿尔发公爵的会谈成果更大，其努力既无成效也无结果。同样，大规模的欧洲和平会议的时代似乎结束了。如果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之后36年中大国间不存在正式宣布的战争的话，那么却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外交局势；但是，以意大利战争时代那种外交风格，通过正式的全面的讨论消除紧张局势的唯一努力几乎只有反常的英国—西班牙会谈，这次会谈于1588年初春在布尔堡召开，一直延续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炮声轰响在英吉利海峡。这次流产谈判的过程清楚地表明了时局的演变。会谈没有选择任何中立调停人，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双方都明白，不存在任何中立国家。英国人从一开始即对达成任何协议持悲观态度。西班牙人——更确切地说是帕尔马公爵指派的代表们——认为整个会议是一场骗局，故在谈判中始终毫无诚意，而且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力或委任。荷兰人的利益是会谈的焦点，他们却始终轻蔑地拒绝参加会议。但是，思想对立的两国代表之间的对话延续得如此之久，以至于整个欧洲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它。双方的狂热

分子都攻击谈判等于致命的自认软弱，明显背叛了双方君主各自维护而又彼此对立的原则。

整个16世纪下半叶，外交衰落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即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分歧，把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同过去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为首的任何对立相比，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对立更激烈得难以调和，壁垒也更加分明。雷根斯堡会谈破裂和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之后，双方的阵线开始进一步巩固。此后发生的每一事件，诸如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教皇党人在特伦托的胜利、以萨克森公爵莫里斯为首的德意志诸侯的反攻倒算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宗教改革的急剧左转，甚至一个出于虔诚和道德的行动都加宽了裂痕，僵化了对立。而过去，天主教信徒与加尔文宗信徒围绕米歇尔·塞尔维特的火刑案曾表现出在虔诚和道德问题上的完全一致。

在日内瓦人及其改宗者和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同盟者中，新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斗士。他们关于自己是上帝之选民的意识驱使他们为尽早把上帝的王国带给人间而忘我地工作。这种意识还赋予他们早期基督教殉道者或耶稣会传教士那种一往直前的勇气。从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尼德兰来到洛桑和日内瓦并在此受训成为牧师的任何一个流亡者都不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口才流利、其行为举止看上去适于向其母邦传播福音的人，还是一个随时准备为其使命献身的人，因为他坚信上帝选中了他去拯救至少是同胞中的一部分人，使之脱离谬误和偶像崇拜。加尔文骄傲地拒绝让教会服从世俗官员的专横统治，重申了格列高利七世的基本主张：人类社会结束之日即是众灵魂得救之时，上帝指定通过加尔文宗教会达到这一结局，它必须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这样他认定：无论哪里，只要他的少数追随者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他们就要恢复灵性反对俗权的古老斗争。

由于奠定了这一基础，加尔文创立革新教会的行动就比他通常口头解释《罗马书》中要求每个信徒服从“在上有权柄者”那一节说教的行动更为重要了。这个革新教会的组织简单、严密、灵活，即使离开那些有权柄者的支持甚至同他们对抗，仍足以渗透到其他国家。每个加尔文宗选区都有自己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它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细胞”，能通过分裂成倍增长，能在孤立中长久维持自身的存在，但也能够通过紧密、广泛得如同有人在精心指挥的宗教会议系统和通信网络使自己与任何特定地区同样的“细胞”联系起来，而

且无分国界内外。到16世纪60年代初，这些“细胞”一面到处都对损坏其联系网的任何打击都做出反应，同时在苏格兰则已经推翻了政府和教会，在法国试图实现同一目的，在尼德兰准备做某种类似的事情，在英国影响着公共政策，向东的渗透远及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日内瓦作为这张网的中心，成为培训潜在的革命者的学校和失败者的避难所。它总能否认对于在其狭窄疆域以外发生的运动的责任，与此同时，却向其活动分子提供作为精神支柱的思想和鼓励，提供书籍和小册子，为了推动共同的事业，只要时机到来，有时还提供武器弹药。

这个教会组织成熟而生机勃勃，它以政治手段推动宗教革命，并且有自己的共同主张和自成体系的教义；在特伦托最后一届会议闭幕前，罗马已经能够以一支在教义体系中同样坚定并在实际政治中同样灵活的反革命力量与之对抗。与日内瓦一样，罗马随时准备在有可能时利用世俗统治者，或在迫不得已时否认并推翻他们。无须日内瓦提醒，重新振作起来的罗马教会知道：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与基督徒的社会处在同一边界之内，而且每个基督徒的灵魂都应当首先忠于它。卡托一康布雷奇和约签署以前很久，加尔文的日内瓦和反宗教改革的罗马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条顿人的虔信派和寂静派，超过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怀疑主义和信仰调和论以及普遍存在的对世俗政权的服从，这种服从，在路德前往沃尔姆斯之后和雷根斯堡会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年都为可能实现的妥协和最终和解开辟前景。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无论是罗马还是日内瓦都不能设想双方斗争存在着任何结束的可能性，除非对方彻底覆灭。当他们尚未被革除教籍时，承认妥协和宽容只是为了获得喘息之机并寻找新的立足点。由于宗教问题支配了政治问题，任何与信仰上的敌人进行的谈判看上去就越来越像是异端和叛国。凡是导致天主教与新教分裂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的余地。结果外交接触不是像洛迪和约之后的意大利那样有所增加，而是减少了。特使团仍然时常来往于信仰对立的各大国之间，但不如从前频繁，而且常驻使节系统网没有扩大，而是实际上缩小了。

使永久性外交联系网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使馆礼拜堂问题。在16世纪前半期，甚至像托马斯·怀亚特爵士这样坚定的反对教皇和僧侣的人物仍然能够怀着没有什么不协调的感觉拜倒在巴利亚多利德高大的圣坛前，就像他的敌手优斯泰奇·加佩斯从一个顺从亨利八世的

主教手中领受圣餐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感觉一样。1551年，爱德华六世派驻帝国的大使坚持使用新的“英国公祷书”，而查理五世对于在自己宫廷中举行异端礼拜式的恼怒几乎导致了外交关系的中断；这时，使馆中特殊礼拜仪式问题才第一次变得尖锐起来。八年以后，使馆礼拜堂问题成为导致英国和威尼斯中止互换常驻使节的重要的、也许是决定的因素；而威尼斯是英国在1533年后与之保持永久性外交关系的唯一的意大利城邦。玛丽一世在她统治后期，利用其丈夫的代表，即西班牙驻威尼斯的常驻使节作为她自己的大使。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不久，就准备任命一名她自己派驻威尼斯共和国的使节，这时教皇郑重警告这个城市的议会，要他们严禁英国大使的随员中包括任何安立甘宗僧侣；而且，即使在使节驻地的密室里也绝不允许举行除天主教礼仪之外的任何礼仪。女王政府当然也不能给予威尼斯常驻英国大使那种威尼斯拒绝给她的使节的同样的特权；结果，女王在位的整个时期，双方都没有互相派遣常驻大使。当时，反宗教改革的教廷似乎并不像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那样坚信意大利人天生就属于天主教，并对新教的宣传具有免疫力。总而言之，教皇坚决反对在意大利土地上建立任何新教礼拜堂。西班牙真诚地拥护这一点，结果，整个16世纪后半期，在意大利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新教国家的常驻使节。

1568年，因为就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导致了英国驻西班牙使馆被关闭。约翰·曼博士是个既不机智也不冷静的人，而在他所处的位置上，机智和冷静却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英国—西班牙关系是如此恶化，以至于似乎无论什么事，曼博士都显得是故意使自己卷入与腓力二世政府或与宗教裁判所的纠纷，不久以后又同时面对后两者。然而，争端的实质在于可否允许使馆雇员参加那些只允许使节及其直系亲属和正式家庭成员参加的礼拜仪式。在这一问题上，教廷和西班牙官员表现得像曼博士一样专横而惹人恼火。曼的反应相当狂暴，招致被判处惩罚性拘留，后来又被驱逐出境。腓力二世谨慎地表明他并不想拒绝批准英国驻西班牙使节得到西班牙驻英国使节已获批准的特权，而仅仅是想限制这类特权，以避免对正统教会的反感，避免异端对他的天主教王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没有人接替曼博士，可能是因为女王的顾问班子相信曼本人的意见，即他遇到的麻烦是精心策划的骚扰英国使馆的政策的一部分，而且继续保留使馆必将招致更多的麻烦。

即使刁难英国使馆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策，它也不是腓力二世的政策，就像对西班牙驻伦敦使馆进行的刁难也不是伊丽莎白一世深思熟虑的政策一样。16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最突出的演变大概就是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关系逐渐的、显然不能逆转的恶化，尽管两国的统治者都是强大的君主，都拥有指导自己外交政策的权利并得到国民承认，并且都真诚地急于实现相互间的和平。作为君主，无论伊丽莎白一世还是腓力二世都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向对方开战，却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双方都担心战争的开支浩大。伊丽莎白是因为她的财力不足而且不愿对臣民征税，腓力则因为继承来的重负而步履蹒跚。双方都有直接而迫切的理由继续维持他们先辈旧有的反法联盟：腓力是因为尼德兰的叛乱始终给法国提供干涉的口实，伊丽莎白则因为她的推定继承人——苏格兰女王玛丽。在天主教看来，玛丽应是伊丽莎白王位的合法占有者，她有一半法国血统，而在文化和心理方面则是一个完全的法国人，为了她的利益，她那姓瓦卢瓦的夫弟，吉斯家的舅父们和表兄们向英国动武的危险始终存在。从战略上看，英国和西班牙互相依存。如果没有西班牙军队拱守着尼德兰南部，这里迟早会被法国吞并，英国还将看到，从乌尚特到斯海尔德河口的整个海岸被其宿敌占领，这是难以忍受的威胁。西班牙如果没有英国与之结盟，或至少保持中立，就不能从海上与尼德兰保持联系，就将被迫依赖经过阿尔卑斯山隘口和阿尔萨斯，或经过弗朗什孔泰这两条曲折遥远、花费昂贵、根本无法护卫的交通路线。同时，英国和西班牙彼此是最好的贸易伙伴。英国的布匹、锡和谷物在西班牙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并通过腓力国王在安特卫普的“商业冒险家们”到达西欧各个市场。与此同时，卡斯蒂利亚的皂碱和美利奴羊毛对英国纺织工业中的某些行业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对毕尔巴鄂刀剑的需求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英国顾客们仍旧急于得到西班牙的油、水果以及赫雷斯的葡萄酒。对于西班牙商人，英国可能是这样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他们一般不必用硬通货付账。

宗教最终使天然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从伊丽莎白继位后，以西班牙声称独占美洲贸易为焦点而发展起来的对抗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历史学家们一直指出：以此为开战理由值得商榷。把1558—1585年，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4]的英国商人所获平均年利润同此后18年在加勒比海和沿南美洲北海岸进行私掠和非法贸易所获的平均年利润相比，如果想肯定地说出前者比后者大

多少，尚需进一步研究关税记录以及塞维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公证人档案；但是几乎毫无疑问的是，那些英国商人的平均年利润更大。因为他们对塞维利亚的贸易一直大赚其钱，而私掠性远航的资助者则大破其财，如果继续干下去，最终必将破产。^[5]但是，完全用不着深入研究就可以指出：英国的清教徒及其胡格诺盟友对如下看法负有责任，即西班牙垄断西印度商业和葡萄牙垄断东印度商业这一状况的维持乃是出于对教皇敕令的畏惧，反抗教皇敕令需要一种特殊的新教式的勇气。

事实上，正像那些重要的天主教法学家、民法学家和神学家们一致同意的那样，教皇有权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东西只是对新发现的土地上的教会机构和传教活动的监督权。甚至，所谓的“分界线”本身，即亚速尔群岛以西370°子午线和加那利群岛中的费罗岛纬度线（显然北半球始终被排除在外），在根本没有任何基督教权威介入的情况下，就被这两个世俗强国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承认了。后来，教皇对“分界线”的认可，赋予该条约的约束力同任何其他类似的自愿在教廷备案的协议一样，既不大些也不小些。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最伟大的法律神学家非常清楚，教皇无权授予西班牙任何统治西印度人民或控制西印度各海域商业和航海活动的权力。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坚持认为，对新大陆土地唯一正当的主权（所有权）要求，必须立足于对以前空白领土的有效占领。至于宣告商业非法或禁止商业活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因为按照自然法和“万国法”（国际法），贸易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事实上，这是中世纪晚期普遍的情况。16世纪的宗教法学家和民法学家均表赞成，而且，当弗朗西斯一世拒绝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针对法国进入美洲以及南下非洲海岸提出的抗议时，他一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期间，法国坚持认为“分界线”只是卡斯蒂利亚王室和葡萄牙之间的私下协议，绝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公法的一部分，而法国的船长们否认伊比利亚人的垄断权，无论双方的君主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在卡托—康布雷奇，法国代表顽固拒绝签署以任何方式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南部海域要求的合法性的任何文件，这种要求实际上是把“超越此线即无和平”确立为国际法中的一个原则。1559年以后，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对手主要是新教徒，头10年以胡格诺教徒为主，此后是英国人，这完全是政治上的意外事件。

然而，到16世纪80年代，欧洲公众舆论开始忘记加勒比海的冲突并不总是宗教冲突的一部分。“非法的路德宗”几乎已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单词，而那些为自己的海盗活动不断充实人员、资金的英国船长们经常追逐的是双重利益：异想天开、很少实现的红利和以否定罗马教皇蛮横禁令的方式维持自己的新教信仰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侵入西印度群岛确实帮了新教徒的忙。他们并没有使腓力二世陷于严重的穷困，而德雷克1585—1586年的大劫掠给教皇西克斯特斯五世带来的喜悦似乎远远超过给他带来的烦恼。但是每一起类似事件都推动英国和西班牙更接近公开战争。

促进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公开战争是清教活动家以及英国和欧洲大陆上所有共济会（Common Cause）狂徒们的主要目标。1569年以后，还是英国天主教流亡分子的主要目标、教皇庇护五世及其继承者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耶稣会士和所有其他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活动家们日益重要的目标。在16世纪行将结束时，两派宗教狂徒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能够使用越来越可怕的手段。此时，双方都可以调遣一批具有阴险才干和殉道欲望的间谍，都有适于做达官的幕僚和君主的阁臣的学者和绅士为之效劳。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天主教徒在利用印刷报纸和公众布道坛时，已经学会了与宗教改革者同样娴熟的技巧和不择手段。结果，双方都能制造强大的舆论潮流，最终足以将发展道路上不顺从的政府和统治者裹挟而下。

宗教在16世纪时仍然是一种足以调动民众并压倒各个王朝和寡头统治者们的私利的强大势力，10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各国一直如此。在封建的君主国家里，贵族甚至平民都间或承认负有对君主个人效忠的义务。但是还不存在民族意识，甚至不存在作为人们挚爱、矢志对象的抽象统一体——国家的意识。但无论如何，这是意大利以外的情况。虽然人文主义者谈论着“祖国”（patria），并在这一时刻涌起某种对抽象的所谓“法兰西”或“英格兰”的盲目崇拜，如同古罗马人所说他们对罗马的情感一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祖国”只是“故乡”，他的国家不是法兰西或英格兰，而是安茹或德文郡。除了被汹涌的大海包围起来的英格兰以外，没有一个较大的领土国家曾明确划定过边界；而且，绝对没有任何一部分居民产生过“自然疆界”的概念或者与统治者的王朝利益及与其直接臣属有关之利益不同的“民族利益”的概念。

强烈的宗教情感会以两种方式之一影响各国社会。它可能会把他们团结在各自的君主周围，使他们或他们的主要部分统一起来，赋予他们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大多数英国人（据传说是“全部”）就是这样由于天主教十字军的威胁而团结在伊丽莎白一世周围，而大部分西班牙人，或至少是大部分卡斯蒂利亚人则团结在腓力二世周围，因为他们的光荣使命是：像前辈从摩尔人手中恢复西班牙一样从异端者手中收复基督教世界。这种情况只有在国家君主顺应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潮时才能发生。当君主不顺应时——亨利三世在位时的法国就是典型例子——国家就会以严重分裂取代统一，因申明信仰而形成的团结将取代对王室的忠诚。在整个西欧，宗教对立的全部后果是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新教，他们都决心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方面战胜对方。

意识形态冲突对外交事务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新的驻外大使制度的看法上。常驻大使如同常备军一样，从制度上体现了控制着新型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国家的权力。而且在习惯于把外交官员视为整个社会的公仆的社会里，驻外使节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怀疑的对象。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使这种怀疑增强为确认。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种宗教礼仪举行的方式违反了那个国家的法律和民俗认可的方式并大大地触怒了上帝以至于该判死罪的话，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在使馆紧闭的大门内举行的而减轻对上帝的冒犯。再者，既然与黑暗势力不可能和平共处，甚至不可能真正停战，那么异端国家的驻外使节在驻扎国除了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目的呢？伦敦狂热的清教徒和马德里、巴黎、罗马狂热的天主教徒就是如此推论的，在那些他们的压力尚未导致外交关系彻底断绝（有时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的地方，他们使尚未撤离的常驻外国使节的处境极为艰难。

不幸的是，公众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如果说约翰·曼博士在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前并没有和西班牙新教徒密谋策划，那只是因为他在西班牙根本找不到新教徒与之共谋。从思罗克莫顿到斯塔福德期间各任英国驻巴黎大使与胡格诺派领导人来往之密切，超过今天任何政府所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在胡格诺教徒公开叛乱时仍旧如此；又如西班牙驻伦敦的每位大使在整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深深卷入叛国阴谋活动中，按现代标准足以将他们驱逐出境；如果按照中世纪晚期法律，他们当中除了圆滑的德·西尔瓦以外，每个人都足以被判处极

刑。唐·贝纳迪诺·德·门多萨曾因参与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的阴谋而被逐出英国；此后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并在法国帮助组织“神圣同盟”，策划“障碍日”（Day of the Barricades）事件，最后以巴黎暴民公开首脑的罪名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他是宗教战争期间在外交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绝好例证。甚至那些被视为政治家并如此超脱了宗教混战的法国使节们也被公开的陷阱所坑害。沙托纳夫在伦敦主要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而被怀疑参与了巴宾顿阴谋；在他被召回以前几个月，实际上已被软禁，完全失去了作用和联系。几乎与此同时，朗利在马德里因为其君主愿意和异端者谈判而受到极大的不信任，以至于在吉斯公爵的谋杀案使他被完全隔绝以前，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人可与之交谈，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做。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和腓力二世由于其臣民们施加的压力而把他们推向彼此开战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世界间的外交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

在三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外交联系中断和外交机构逐步废弃的同时重新出现了更早时期的非官方的外交活动方式。伊丽莎白女王在与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系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只具有准外交官资格或根本没有外交官资格的代理人。她这样做有时是因为有关国家不愿意接纳受到异端君主正式委任的使节，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有时是因为女王实在不能承认那些她不得不与之交往者是与自己主权平等的国家，如荷兰三级会议、布永公爵和巴拉丁选帝侯。她的代理人的地位有多种差别，上自常驻海牙的使节和派往德意志诸侯邦的公使（他们除名称外，其他方面完全是大使），下至她只加以默认为的驻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领薪者”。与此同时，虽然她与法国和西班牙保持和平，但却接纳了法国胡格诺派和荷兰起义者的代理人——就像这些集团之间保持着联系一样。尽管他们的代理人来往穿行于荷兰和法国南部，但没有被他们必须穿越其国土的天主教君主承认为外交官。

天主教方面的办法多少有些不同。腓力二世本人只派遣公开的大使或秘密的间谍；不过，随着“秘密战争”的紧张局势不断增强，他越来越乐于利用他委派的使节所建立的与从事反叛和颠覆活动的集团之间的联系。但是，他的总督和代表，特别是在米兰和荷兰的代表得到允许（有时是接到命令）利用半官方的或私人的代理人于友邦或敌国进行联系。腓力和伊丽莎白在他们统治结束时业已恢复的外交技

巧，不像是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时的方法，倒更像爱德华三世和残酷者佩德罗时的方法。

分裂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内部外交联系的中断，并未被它外部联系的任何重要扩展所弥补。英国商人们在取道北角以外的北极水路寻找中国时，却找到了去莫斯科的路线和一位急需西方货物、急于与西方结盟的基督教统治者。伊丽莎白统治时，“莫斯科公司”开创了一系列对沙皇的半外交活动，目的在于确保商业特权和垄断。公司通常选择使节，并支付其开销，而使节则受女王委任和指导。在莫斯科，英国的外交比英国的商品激起了更为活跃的反响，其明显的成功促使英国的竞争对手荷兰和法国的商人也极力敦促本国政府与俄国进行谈判，然而伊凡雷帝及其直接继承人真正急于追求的是西方的支援以对抗波兰和瑞典，这使同盟协议未能形成，甚至没有交换任何常驻使节。从莱茵河和英伦海峡到波罗的海东部和波兰平原毕竟太遥远了，而莫斯科的习俗和价值观与西方的差距也太大了。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纳入西方外交界。

土耳其也是如此，虽然它能够通过其地中海平底船舰队和驻扎在匈牙利的陆军对占优势的哈布斯堡王朝施加最重要的军事压力，虽然它的先辈自从14世纪以来就一直与法兰克人进行谈判或战斗，虽然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遭到失败以后曾与立法者苏莱曼订立了牢固的同盟，并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常驻大使以确保这种同盟，土耳其仍然没有被纳入西方外交界。实际上，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推动或阻止土耳其海陆军行动方面，法国驻土耳其帝国大使的活动越来越少。16世纪60—70年代在希腊诸岛和北非沿海地区频繁发生的战争根本不是西方政治的反映，而完全是新月和十字架之间长期斗争的继续。1578年塞巴斯蒂安国王在阿尔卡萨-厄-克比尔去世以后，西班牙在伊斯坦布尔的外交活动就像法国一度表现过的那样活跃，而且在若干年间腓力二世的代表几乎不断地出现在那里。他的大使们谈成了一项休战协议，使土耳其和基督教世界之间保持了十几年和平，因为这一外交上的胜利他们在西方受到了赞誉。但是看来，他们得到的赞誉应像英、法外交官受到的责难一样少，因为1593年，土耳其重新向哈布斯堡王朝发起了进攻。1578年，像西班牙被引向葡萄牙和大西洋一样，土耳其被引向波斯和大草原，而后再像西班牙一样把对异教徒的战争转变为对异端者的战争。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出的那样：土耳其人转向

东方和15年后又掉头转向西方反映了土耳其人一段历史周期，其跳动的节拍与西方的不一致，如果不在土耳其档案馆内进一步做大量的研究，这种历史的模式就无从理解。西方驻土耳其帝国的使节们受到的反复无常的冷遇，苏丹一贯拒绝回复驻扎使馆的问候，对于这一切的解释也许有比野蛮的妄自尊大或拜占庭式的傲慢更充分的理由。

如果西方的外交活动在俄国人或土耳其人心中没有留下永久印象的话，那么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1559年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舰已经划破了地球温带和热带的全部海面，造访了每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而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尾随其后。但是，虽然他们努力与更强大的东方君主建立外交渠道，却一无所获。尽管在印度的莫卧儿皇帝和中国明朝皇帝这些最强大的君主看来，欧洲人的价值肯定非常小，但欧洲人在东方强权政治中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相互了解以提供对话的基础，更不足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文化差异甚至超过了人体的差异。与“敌人之敌交朋友”这一原则在伊斯兰世界得到的充分理解，与在欧洲外交界一样，但是，尽管以这一原则为基础，西班牙和奥地利试图与波斯国王订立同盟的努力仍然毫无结果。航海者亨利的幻想——使最西方和最东方的基督教国王联合起来——在16世纪后半期似乎一度即将实现，但最终归于破灭。结果，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土耳其人占领马萨瓦从而切断了葡萄牙人去往阿比西尼亚高地的通道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罗马教士和阿比西尼亚教士见面越多并且越是从学术上和内心里寻求使他们的礼仪和教规一致，拉丁教会和科普特教会的鸿沟就显得越宽。如果共同传统的继承者内部的宗教分歧给西欧建立已久的外交界带来分裂的威胁，那么不同传统的继承者之间的鸿沟，在当时通过外交途径显然是无法逾越的。

时至17世纪初，勉强而又松弛的西欧外交关系开始重新组合。亨利四世以一台弥撒赢得了巴黎以后，经验丰富的维勒卢瓦开始着手恢复从前法国外交活动的那种高效率。“在英国的冒险事业”的失败、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和尼德兰无可挽回的分裂在马德里和罗马唤起了对于宗教战争的得失重新估价的清醒认识。因此，当倾向和解的詹姆斯一世继位时，他能够重新设立以前英国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常驻大使馆。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常驻大使也出现在伦敦，并第一次在丹麦

和瑞典的宫廷里鞠躬致敬。然而宗教战争造成的相互猜疑并没有消除，直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立以后，现代风格的外交才在欧洲各地稳固地建立起来，正如将近200年前的洛迪和约以后，意大利各地确立的外交风格那样。欧洲只能缓慢地重新组建自己的外交界。

将要指导新型外交界的原则，即我们称之为“国际法”的原则，其形成过程更为缓慢。若在1610年以前谈论“国际法”为时过早；甚至在一直被称为国际法创立者的胡果·格劳秀斯发表其《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巴黎版）一书以后，谈论国际法仍为时过早；可能在1675年以前的任何时候谈论国际法都为时过早。国际法的系统化必须等到欧洲人已经习惯在许多独立的、充分自治的、完全自尊的主权国家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里生活，并养成了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语言和处事习惯后才能实现。因为，尽管一个笛卡尔主义流行的社会也许愿意相信，用一部从建立公理和推导结论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法典就能管理社会，但社会实际需要的却是对人们普遍的行为和感情的形式进行可以接受的合理化。既然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强制执行国际行为准则，国际法的任何体系可在何种程度上被人们接受都取决于它与流行观念协调一致的程度。显然，直到有关的人们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感受如何以前，任何一种针对西欧的国际法体系都不可能同现实产生多少联系。

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以前缺少一批合理而充足的、与我们将称之为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相一致的规则。只是西方没有把这些规则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群体——它适用于作为局部社会的一定阶级之间的关系，或适用于当一个阶级暂时受另一阶级管辖时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简单地视之为拉丁基督教世界习惯法的一部分。例如，从1250年到1500年间，教规法学家和民法学家就战争的正当理由、宣战的合理性、战争行为应遵守的限制以及中立国的权利等等问题谈了很多，但是他们很少在专门的关于战争法的论文中谈论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的大部分内容，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些标题下谈论的，诸如战争带来的争端、纠纷和磨难，自卫的权利以及将妇女、儿童、僧侣、善良的商人卷入解决争端之暴力行为的不合理性等。对条约的讨论是以对契约的说明和评论的方式进行的。在一桩赔偿案中，当人们协商佩鲁贾城的责任问题时曾援引一桩有关王室首脑的案例和另一桩有关制革匠行会的案例，似乎二者作为例证具有相等的作用。它们的

确如此。基督教世界的习惯法尊重特权，尊重等级森严的社会，也尊重地方和地区的习惯；但是它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形式上认为每个人以及每个法人社团在某些场合中应服从教会法，而在其他场合中应服从民法。结果，只是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人们才像是找到了一些能够直接认做围绕我们所谓的国际法的论述，例如关于捕押外国船只特许证和报复性捕押特许证的问题，大使的特权和外交豁免权问题等。

详细阐述基督教世界的习惯法，即教规与民法系统的结合，其大部分工作是由意大利法学家，尤其是巴尔特鲁斯学派完成的，但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其地方性习俗被强大的王家法庭加以归纳和维护的国家中，这种习惯法作为国际法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教会法学家的理论中，有时在实际上，教会最关注的是遵守条约，维持基督徒之间的和平以及管理同异教徒的交往；但是教会法庭的主要业务却与教会财产、特权以及圣礼仪式有关。人们只是偶尔注意到圣礼制度把英国同一个更大的社会联系了起来，至于类似在布莱克弗利阿斯^[6]的那次著名的审判中教会法庭公开以国际法庭的面目出现的情况，则更加少见。

随着15、16世纪君主制度的日益强盛，那些受过民法和教会法训练的王家官员们为了加强王权，并消除使习惯法的实施受到歪曲和阻滞的不公正现象以及有害的延误，使用罗马的司法程序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除了类似“星法院”那样的在国内借用并滥用民法的法庭以外，有时，代表国王个人的法庭仍不得不借用民法的原则，因为这些法庭的职能与中世纪类似国际法法庭的职能一样。例如，国王的法律顾问团的一个分支——“海事法庭”在执行航海法时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其依据就是民法的程序和后人对民法的诠释。国王的法律顾问团的另一个分支——“骑士法庭”把关于优先权和纹章的案件，关于雇佣兵和军需品的契约的案件，关于投降、人质、赎金的案件都合在一起，全部根据这样一些原则来裁决，牵涉到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对于这些原则的熟悉程度和英国人完全一样。某些民事案件则留待国王亲自处理，而不是授权顾问团解决，其中包括所有关于大使及其随员的案件，还有无法向其他地方起诉，涉及法律冲突并因而可按照罗马民法加以解决的各种诉讼。

整个中世纪晚期，在欧洲国家之间，处理这些事务的方法并没有多大差异。一个共同的法律制度，对于西方来说，早在需要确立的时

候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由北意大利的法律学派提供给西欧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这是这些学派的学者们的看法。到1559年，这种共同的法律制度在连绵不断的强权斗争及其伴随物——常驻大使制度二者导致的紧张局势下，已经顽强地生存了半个世纪了，对于这种紧张局势，它那些苦心孤诣的缔造者们是始料不及的。它还经受住了路德叛离造成的震动。此后，在1559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逐渐消逝；在再后来的一百年里它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致人们竟把中世纪的国家关系说成完全以弱肉强食为公理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似乎指导欧洲事务的理性原则是理性时代的发现。

让我们强调这样一点：消逝了的东西是思维的模式而不是行为或感情的模式。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和个人仍在活动，庞大的西方社会似乎处在法治之下，而大多数负责执行并解释各项法律的法庭仍在继续运作。为了适应压力和机遇的变化，特别是为了适应国家增长着的权力和自立能力，国际行为的模式确实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没有突然的飞跃或停顿，而且总的来说，这种变化比人们可能期待的要小一些，除非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通常比判断这种行为的标准更难改变。从长远看来，感情比实际行为变化更大，因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感情必然是比较一致的，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感情的变化总是要落在使它改变的事件后面。发生剧烈而又突然变化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更确切地说是语言表达模式。较为困难的并不是了解特定环境下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说明人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在14世纪期间，巴尔特鲁斯学派曾面临同样的难题。当时和后来一样，对国际关系领域中法律的尊重，依赖于合理的说服；因为，无论教皇还是皇帝都无力强制人们服从。为了劝导人们，巴尔特鲁斯学派从罗马法学家的武器库中拾取了一系列后来又为17世纪的人们使用过的同样的武器：笃信斯多噶的自然法，使全人类思想充满了基本相同的道德准则；还有随之而来的吸收异教民族习俗的愿望，以弥补武器总数的不足，但是巴尔特鲁斯学派还拥有两件其后继者没有的辅助性武器。他们能把自己的主张建立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假设上，即无论把教会的和世俗的权力分割得多么细，拉丁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的整体，整体的利益压倒任何局部的利益。宗教改革从法学家手中打掉了这一武器。另一件武器是：巴尔特鲁斯

学派能够通过求助于拉丁基督教世界近期历史传统证明有用的那部分异教民族习俗，来加强自己的论点并丰富在《民法大全》中关于调整国际关系的零星材料。到15世纪后半期，法律指南的编纂者们已经能从诠释、评注、评价、判决、先例的丰富库存中找到借鉴去解决国际关系中几乎任何难题——无论多么细小，多么微妙。从卡托—康布雷奇和约到比利牛斯和约^[7]之间这一个世纪的过渡时期的法学家们自愿放弃了这一已经掌握的强有力的武器。

那种促使建筑师、哲学家、语法学家、神学家、物理学家和画家们背弃各自的中世纪历史的逻辑也打动了法学家。他们还没有放弃从中世纪历史继承来的行为模式和技术，否则，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孤立无援，法学家、外交家以及建筑师和画家莫不如此。但是，他们却在尽力忘却自己的习惯和技术得自何处，尽力使自己直接立足于古代文化，故意闭起眼睛，跳过中间这几个世纪。新教坚持《圣经》，而且把《圣经》作为唯一的神学权威，这只是崇尚古典和渴望追本溯源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夸张做法的一面。这样，过渡时代的法学家，诸如艾罗尔特、真蒂利、布朗、基尔赫纳、沃尔泽维奇、阿亚拉、塞尔登、格劳秀斯和朱什，在他们试图涉及史无前例并且即使无人阻挠仍十分困难的问题时遇到了一种特殊的障碍。在欧洲，那些随着有自我意识，有充分权力的绝对主权国家的出现而提出来的问题，由于宗教战争的苦难更加复杂化了，其中有外交方面的问题。常驻大使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靠宗教狂热而使自己的良心摆脱了没有这种狂热时可能产生的一些顾忌，他们过于频繁地滥用其特权和豁免权，这些权利是他们的前辈们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场合中得到的。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必须受到多么严厉的谴责？怎样才能惩罚他们？真蒂利、奥特芒和帕斯卡利乌斯都曾尽力研究这一问题。其中也有战争法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暴乱者被赋予交战者的地位和外交代表资格并且得到普通战争法关于战俘、休战条款的保护？而且，究竟应和异端者保持多少信义？阿亚拉、基尔赫纳和沃尔泽维奇在同一个10年期间各自得出不同的答案，其中还有商业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异端分子能否依契约要求付款或索取贷款的利息？世界各海域应在多大范围内对各国商人都是自由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强力维持贸易垄断？卢万、萨拉曼卡和日内瓦的神学家们看到了这些问题十分棘手，塞尔登没能解决，格劳秀斯也没能解决。

当然，法学家们正在尝试去做的是：使欧洲各国政府的一般行为合理化，或是证明诉讼委托人或赞助人在争端中地位的合法性。然而，他们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否认使他们不能引用真正贴切的先例和根据。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些先例和根据十分熟悉。他们不能求助于波塔辛、贡萨尔沃·迪·比利亚选戈或杰森·曼那德；却不得不引用西塞罗、普鲁塔克和李维的话，不管多么不适用。他们不能以明智者阿方索、路易十一，甚至查理五世皇帝的行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却需要辛辛纳图斯、莱喀古士和以色列王大卫的支持。无怪乎，即使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似乎也总是空话连篇、吞吞吐吐、文不对题，无法与那些干脆利落、质朴无华并且稳重扎实的晚期法律注释家同日而语。

如何证明欧洲各国及其代表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这一问题的全部争论在理查·朱什的《外交法》（Jus Feciale）发表（1650年）以前几乎没有公开爆发。也正是朱什，首先使用“国家间的法律”（jus inter gentes）一词，说明他注意到了14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法学界已经给万国法（国际法）一词注入了新的含义。但是，尽管如此，也许胡果·格劳秀斯才确实应该得到国际法创立者的荣誉，像他的大部分同代人一样，他只是努力证明人们正从事的活动的合法性或者思考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为之辩护的标准、价值尺度和国际行为规则，像其他大部分人一样，主要来自他从未提到的中世纪历史。然而，是他第一个认识到了或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争论之展开，绝不能以一个凌驾于基督教诸国君主以及各共和国之上的一元整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必须以各个独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主权国家自身延续的利益为出发点，正是这些国家的集合体组成了多元的并且各具特色的西欧国际社会。这就是未来将呈现出的图景，而为了迎合未来，人们就必须忘记中世纪的梦幻。

（陈志强 译）

[1] 参阅第2卷，第16章。

[2] 1520年6月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法国的几讷和阿德尔之间会晤，亨利八世以大量金色饰物装饰其临时宫殿，因此得名。此次会晤成果甚微。——译者注

[3] 1524年弗朗西斯一世侵入意大利，次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战败，被西班牙军俘虏。——译者注

[4] 西班牙南部一海港。——译者注

[5] 关于某些不同观点，参见K. R. 安德鲁斯《伊丽莎白时期的海盗》（1964年版）。——编者注

[6] Blackfriars，英国伦敦市中心一区名。——译者注

[7] 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订立之和约。——译者注

第七章 陆军、海军与军事艺术

在1559年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以后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的士兵们每年都在某些地方进行着战斗、冲杀和围攻。这些行动很少有大规模的，而且无一不是决定性的。在陆地和海上，基督徒与土耳其人，天主教势力与新教徒之间的战斗在进行着；法国被30年之久的内战所困扰，而尼德兰的内战则长达40年。然而，战斗平息以后，国界仍按地理、经济活动、宗教和爱国情绪来划分，而不是用刀剑分割出来的样子。战争的花销在持续增长，筹集到的款项不足以使以前的战术课程或技术改进奏效，更不要说实现新一代军事专家提出的无数建议。定期支付军费的需要，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有更多的专职人员和某种类似永久性的机构，但在这方面很少作为。朝廷中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到达前线以前一次次地因公款被侵吞和效率低下而受到损害。这不是一个有建树的时代，也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的时代——尽管在以前的任何时代，战争从未如此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并通过布道坛、舞台、美术作品和书籍如此阴森地进入人们的想象力。

人们对战争的一再爆发习以为常。托马斯·迪格斯写道：“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谈论持久的和平，无异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篇》，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昆体良论及的演说家或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那仅仅是人们的期望，在这个严酷的时代里，战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同宇宙一道毁灭，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消除。”^[1]但是同16世纪上半叶相比，如果说反战主义减弱了，那么关于战争是否合法的自觉意识则增强了，要求说明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的呼声更加广泛了。另一部军事入门书指出：虽然《圣经》竭力劝诫基督徒不可残杀，一边脸挨打时送上另一边，但基督并不是要抹杀必然的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正义性，而是要伸张这种正义；并且，对于私人的复仇与执行国家官员的命令，为维护正义和带来和平而进行的民众的复仇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必须划清。认为上帝利用战争来执行其判决的观点被这个主张反击的时代里的教皇们欣然接受；在特伦托会议上，人们一边谴责个人之间的决斗，一边默许了国家之间的决斗。新的军事性的宗教团体成立了，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诺，军事

文献却提出：为保卫信仰倒下的战士有特别优先的机会使灵魂得救。归根结底，上帝是军队的主宰。而一篇意大利文章竟然颂扬说军事艺术高于所有其他的学问，理由有四：战争中瞬息万变的情况需要机敏智慧；它对于人的价值和荣誉是最好的考验；它带来尘世不朽的名声；瞬间的壮烈牺牲后，它可使灵魂上天堂——“而上天堂正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唯一目的”。^[2]对于这种容忍战争的观点，人文主义传统又加以富有哲学色彩的支持。它认为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承认西塞罗的“军事上的美德高于一切”和沃尔特·雷利爵士的观点：“战争是历史学常见的主题和重点。”这位纯粹的观察者认为：战争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君主们野心勃勃的本性。如果他注意到普遍流行的强调战争益处的三种观点，就会更加乐于接受战争源于君主野心的说法；这三种观点是：战争减少了多余的人口；战争激发了公民松懈的斗志；而且，用丹尼尔的话说，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就像“令人厌恶的清洁剂”一样清除着政治肌体中那些更令人厌恶的东西。如果再加上博特罗（Botero）的关于对外战争是控制公民政治激情的安全阀这类赞扬，卢肯所说的“战争的诸多用途”深得人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文学与戏剧对于战争这一主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宣传。几乎所有严肃的史诗研究者都承认战争不仅是史诗最重要的主题，而且可以说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细节。另一方面，民歌作者在写出如下歌词时对于掌握多少听众是有把握的：

你们这些人如饥似渴，

想在这里寻找欢乐；

这里有真正的战争，

再请听战场上血流成河。^[3]

关于围城与战斗的记事在军事新闻简报中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发表出来，这种书在这一世纪里越来越受欢迎。戏剧有时也报道时事，但在更多情况下主要表现的则是战争的魅力与恐怖，忠勇之士的情操和贪生怕死者的可耻，还有参军报国的高尚。就连和平也取代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和平只不过是得之不易的停战状态而已。

即使战争被认为不可避免，光荣神圣并且颇有裨益，但认为进行战争应有正当理由的这种情绪依然存在。当莎士比亚让他笔下的亨利五世在进攻法国以前问大主教：做这件事是否“名正言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他是在附和代表王室的牧师们对于1585年英国打算入侵尼德兰的企图提出的疑问。到16世纪末，阿奎那的“正义战争”的概念包括如下情况：为了维护土地、信仰、财货或自由；为了报复海盗行为；为了替受辱的使节雪耻；为了保护朋友和盟友；为了惩戒另一方撕毁条约的行为；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向敌人提供人员、军火和食物；一个合法成立的政府可以诉诸战争。作为这些条件基础的指导原则是：战争只有在作为一种自卫手段时才是合法的。这种图景因欧洲分裂出敌对的宗教集团并出现了某种类似实力均衡的东西而复杂化了。正义战争的概念被放宽到可对其他国家中的信仰相同者提供军援，可通过预防性战役在实力均衡的变化中抢先一步。当拉扎鲁斯·冯·施文迪（Lazarus von Schwendi）提出：只要一个君主断定其国家的基本补给受到威胁并且必须靠军队保护，他走向战争就是正义行为的时候，“正义战争”这一概念几乎被扩大到了极限。西班牙神学家莫利纳和格里高利乌斯·德·瓦伦蒂亚把原则放宽到如果一个君主的理由可能是正义的，即使无法证明，他也可以挑起战争；而国际间的律师们，由于认识到事实上很少有明显正义的理由而且对立面的理由有可能同样正当，认识到战争的胜负并不证明理由的曲直，因而把战争的合法权力赋予正式宣战并适可而止的一方。正是由于下一世纪的战争缺乏节制，才打动了格劳秀斯，使他再次提出正义与非正义的理由之间的区别问题。但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看来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的理由公正，并且不做无正当理由之事”，^[4]各国政府仍旧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战争决定辩护，而军事手册的作者们向普通的士兵解释说：如果他的君主命令他为了一个他怀疑为非正义的理由而战时，作为个人，他可以不必考虑这些。这样，这些作者们就恢复了古老的价值观念。正如莎士比亚使他笔下的英国士兵培茨在阿金库尔之战的前夕说的那样：“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是国王的臣民，那就够了。即使他是站在理亏的一边，我们这些人是服从我们的国王，那么也就消除了我们的罪名。”我们听到痛恨战争之残酷的抗议声，听到对那些不问缘由只为战争而生活并且除了戎马生涯蔑视所有其他职业的人的谴责，听到为铸剑为犁那一天的到来而进行的呼吁，但是除了从再

洗礼派那里，我们听不到人们这样来反对战争本身，即否认允许基督徒拿起刀枪的理由。

任何针对使用火药而不断进行的抗议都没有强烈到足以形成切实的限制。枪炮仍被指斥为邪恶和残忍，不仅《堂·吉珂德》的作者还有军事教科书的作者都在讨论枪炮对骑士的威胁（好像从很久以前的克雷西时代以来，那些无名的抛射物未曾降低骑士的作用一样）。没有任何明确的事实可以说明一种新的或改进了的武器由于道德的顾虑而遭到禁止。围攻安特卫普期间，詹贝利那著名的凶残的机器炸死了大约800人；人们对此的反应却是一种惊骇过后的赞赏。在一个充斥着有意无意的残忍或暴行的时代里，在一个高度重视工艺技巧的时代里，对枪炮在更大范围内的使用，唯一有效的阻拦只能来自军事上的保守派。他们是一些白刃战英雄，为了一种豪侠但落伍的对弓箭的维护，他们靠冲击战术而不靠也许很有价值的另一种东西来阻挡过分使用抛射物的行为。在堡垒里和野外战场上，在和平时期的仪仗队和文学的想象中，枪炮都受到欢迎，它们不仅对军事计划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感情。尽管它们效力欠佳，价格昂贵，但在16世纪的战争中它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都灵的美术馆里挂着一幅那个时代最误人的讽寓画。作者为卢卡斯·德·希尔，它描绘了“战争时代‘七艺’的命运”。她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山坡上，下面的山谷里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从天庭一次诸神的聚会那里，墨丘利送下来一个和平的信息准备告诉“七艺”：她们可以再次醒来了。冷酷的事实是他发现山坡上空无一人了，而他那些可爱的同侪们正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中。修辞学正以滔滔的训导和大幅的印刷品鼓动军队；数学正以平方根为军队设防；音乐（在视战争为一曲和弦这一概念的鼓励下）正用横笛和战鼓振奋军心；建筑学正对侧翼的堡垒进行最后的整修；天文学正把她的望远镜借给自己所偏爱的将军；语法正为胜利者的庆祝活动做记录；哲学则正在论证其合法性。战争与艺术，战争与学术，即使作为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也不再是矛盾和冲突的了。

然而，尽管有教会和世俗两界思想家对军事行动的认可和科学与艺术对军事行动的欢迎，在这种行动的吸引力面前，社会广大民众的反应则是冷淡的。各国政府都知道要建立一支军队颇为困难，除非招募各阶层的反叛分子、国际性的业余冒险者集团和职业性的雇佣兵组

织。在法国和西班牙还可招募贵族阶级，不过这两个国家的那种认为军人是教会以外的最高尚职业的传统也在迅速地失去力量。西班牙越来越不得不提拔外国人，而苏利则决定建立贵族的军事学校重新灌输尚武的情操。一次次企图从城镇和农村招兵扩大以国民军为核心的军队的尝试都失败了。杰弗里·盖茨哀叹：英国到处都是“高枕无忧的庄稼汉和娇柔挑剔的市民”，他们不择手段地逃避服兵役。同样，法国大法官米歇尔·德·洛皮塔勒抱怨说他的国民正在放下武器去经营他们的园圃和实业。从理论上说，战争对于高尚者仍然是高尚的事，但是每次战役都更增加了伊拉斯谟对《从未经历过的愉快的战争》一书附言那严厉的批注的力量。报酬是不固定的，食宿则更是没有着落，因为陈旧的补给方式竭尽全力仍难以满足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已远远超过后勤工作所能胜任的军队。正常收入以外的物质刺激非常少。军需承包人以及雇佣军团队的供应者也许能发财，^[5]那些向他们自己的小部队投资的人也至少有利可图。但除了这些人，参战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士兵们不再带着用战利品发的财退伍，释放俘虏的赎金也不易获得了，尤其是因为许多士兵是作为富有的“娇柔挑剔的市民”的替身去作战的。一旦战争正式开始，掠夺在理论上说是合法的，但是由此造成的行军时的纷乱，以及在一项军事行动完成之前使士兵们离开编队的诱惑导致了对掠夺加以管理的迫切要求。（就因为掠夺，新教徒于1562年输掉了德勒之战，基督徒输掉了1596年与土耳其人的刻利兹特斯之战）另外，城市通常经过长期的围困才陷落，这使市民们有时间藏匿他们的贵重物品，而运输的困难也使士兵们只能以极低的价格把战利品处理给平民商人，这些商人就是为此目的而尾随着军队的。

报酬低而伤亡率高。精确数字难以获得而且总是不可靠；许多人是因为医疗护理的不善而在战后死去的，真正的阵地上的伤亡只是物质匮乏导致的一长串死因和病因的一部分。在英国远征里斯本和不列塔尼期间，据估计从前一处生还者不到一半，从后一处生还者约1/2。另外，对于上战场的人们来说，比阵亡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福利缺乏保障。正如博特罗所说的那样：“人们躲避战争的危险往往主要不是因为害怕死亡，那一般并不造成多大的痛苦和折磨，而是因为害怕受伤和事故造成的残废和不幸。”他继续说：“如果一位统治者能使他的士兵们相信，一旦他们遇到不幸，他们将得到优待，不仅如此，一旦他们阵亡，他们的妻子、儿子、姐妹或其他亲戚都不会被遗忘，那么

这位君主就为说服士兵们直面炮火、箭矢和死亡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了。”^[6]接近这一理想的唯一国家是土耳其，它有一套年金制度，并且允许国外的驻军享受带薪假期。它在阿尔及尔的标准营房使欧洲旅行者们赞许不已。在法国，士兵的遗孀和子女可以免税，并且于1601年在巴黎为年老和病残的士兵建立了基督教慈善院；但在整个宗教战争期间，人们被动员入伍并随着战斗结束而被遣散，始终得不到任何帮助去恢复平民的生活。伊丽莎白的政府也被迫对付这一问题。当时，退伍兵逐渐成为那些身强力壮的乞丐行列中的危险分子。对这些乞丐，国家欠下了许多社会立法方面的保障。雇主们接到命令召回他们原先的工人；一套证件制度建立起来以区别真假退伍兵，目的是允许退伍兵进医院（如果他能找到一所医院），并靠教区征集的地方税得到一笔年金。但是效率的低下和对公款的侵吞再加上那些无权享受特权的人们滥用各项特权，使这微薄的福利并未给问题带来任何真正的缓解。在《伯里克利》中，当玛丽娜责备博尔特不该做妓院老板时，博尔特答道：“你让我干什么？上战场吗？一个人在那儿干上七年，如果丢掉一条腿，到头来连为自己买条木头腿的钱都不够。”国家在精心挑选战士，正确训练他们并定期向他们偿付报酬，使他们确信战争结束后可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这些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这种状况，即甚至那些深知一个国家是怎样地离不开军队这一职业的国家官员也会说出反对军人的话。伊丽莎白的重臣伯利在一封就养家问题垂训其子罗伯特的信中说：“依我之见，你断不可在战争中培养他们，因为靠那个职业为生的人几乎不可能是一个诚实的人或一个好的基督徒。另外，战争是一门用完就不再需要的学问。所以和平时期的战士就和夏天的壁炉一个样。”^[7]

因国民不愿参军同时政府又无法强迫他们参军而忧心忡忡的教会和出版界敲响了警钟。传教士们大谈懒惰的尼尼微城受到的天罚。军事著作的作者们谈起罗马军队因陷入致命的淫荡而在卡普阿战斗中无法御敌。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劫掠在英国激起了一场警告式的宣传，其高潮为一出效果粗俗的戏剧《警告伦敦》的上演。这出剧的情节不过是低劣的充满血腥气的对话。试看这一段：当劫掠正凶的时候，两个小孩子——马丁和伦基跑上台来，商量如何藏身；两名西班牙士兵冲进来，手执出鞘的剑，高喊，“宰了他们”。

马丁：求求您，西班牙老爷，别伤害我们。我们是可怜的孩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

伦基：好心的大伯别杀我小弟弟。

西班牙士兵甲：Fuora villiaco, sa, sa, sa, sa.

马丁：欧，西班牙老爷，别杀我姐姐，我爸爸是个可怜的瞎子，要是杀了姐姐，他也会死的。

西班牙士兵乙：割断这两个小杂种的喉咙！

无敌舰队也引起了同样的仇恨的宣传。托马斯·德洛尼（Delony）以一种扰乱人心的笔调描绘无敌舰队装载的货物中有一种特殊的鞭子；西班牙人带着它是为了在英国妇女的丈夫们眼前蹂躏这些妇女，然后再用来收拾男人们。这些鞭子

用黄铜箍在头上加固，

看着细长但不滑溜，

每当一鞭抽上去，

血如泉涌止不住。[\[8\]](#)

英国海军的胜利，与之俱来的军事准备，对于女王在蒂尔伯里检阅凯旋的军队的宣传，这一切并没有带来一支常备军能够带来的安全感。不过，人们在希求保护的同时，对一支这样的军队又确实担一份心，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暴君的工具。还担心任何自愿过戎马生涯的人有可能在离开战场回来时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或与社会为敌的流氓无赖。有人以创造性的方法尝试着解决这种两难的处境，他们出版了一类书籍，如同杰弗里·盖茨1579年的著作的题目那样，都以《替军人的职业辩护》为内容。在书中颂扬的主要不是现实中的士兵，而是理想中的战士。他忠诚、坚毅、谦逊、勇敢、虔敬、聪颖、健壮，能读会写，口若悬河，相貌英俊，吉星高照；这样奇妙的战士同那些被强拉到战场上去的不适合当兵的人——用像约翰·法尔斯塔夫（Falstaff）爵士这样的上尉们的话说是“当炮灰的材料”——相比，显得不可思议。但是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时不时因某位类似德拉努（de la Noue）或西德尼的人物的功勋而熠熠生辉，确实有益于保持戎马生涯及其目标的魅力和严肃性，而且从当时的战争来看具有某些真实性。

的确，16世纪下半叶以军事题材发表的书籍比下一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内发表的还要多。军事行动仍未标准化，而且因为没有常备军，军事训练就不得不部分地依靠书籍。再者，有一种留在国内的军人非常喜欢以阅读战争书籍为消遣，并且不冒风险地掌握操练、战斗队形以及扎营那令人神往的复杂性。人们感觉到了某些微妙敏感的东西，因为这些书直接涉及军事这样一个实践的部门。作者和译者们小心翼翼地加强这些书籍对士兵的实用性。他们讲述自己的作战经历，嘲笑那些在操练士兵时如果不中断下来向仆人高喊“喂——伙计，我的书本在哪里？”就不会继续操练的军官。[\[9\]](#)

要推测军事著作对战争实践产生了多大影响是困难的。可以肯定地说：某些国家完全没有受其影响，尤其是那些其作战方式与罗马方式大相径庭的国家，而大部分军事文学作品的共同点就是罗马方式。波兰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战争书籍拥有广大的读者，但是在实践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在其广袤的平原上利用骑兵为主的军队抵御凶悍的鞑靼人。值得疑问的是，那些有权改变自己国家军队的作战方式的人们是否大量阅读这类书籍？但不容置疑的是：马基雅弗利的《论战争艺术》仍有可以感觉到的影响力，而且古典时代的作者们，或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或者通过诸如尤斯图斯·利普修斯的《罗马的军事》（1598年）这样的译介，对于埃里克在瑞典和拿骚的莫里斯在尼德兰的革新起到了部分的推动作用。在人数更多、影响更小的读者中，这种著作的效果似乎是：以一种视战争为某种有定则的、复杂的职业性事物的观点取代了陈旧的视战场为个人勇武表演场的观点。这类著作引人入胜，它们解释了越来越常见的对战斗持犹疑和审慎态度的原因；解释了人们日益偏重精心运筹的战役而放弃猛打猛冲的原因；换言之，解释了不仅放弃投枪和长矛并越来越依靠发射物，而且越来越依靠日益成熟的推断的原因；这种解释正反映了军事著作的题目——战争是一门艺术。起初，“战争艺术”是一个古典词汇，在16世纪上半叶鲜为人用，到下半叶就比较常见了。这期间还常用到“模范士兵”和“标准防御工事”这些词汇。而且，虽然战争在过去与狩猎有类似之处，现在则常常把战争比作下棋。

尽管直率的雅各可以轻蔑地把卡西奥称作“伟大的算术家”，军事著作无疑助长了这样一个概念：战争需要数学知识。人们认为：要计算枪炮的射程，确定布雷点，测量并在地图上标出敌军的位置、设

计防御工事、给军队布阵以及决定弹药、矛、戟在所需要的战术单位中如何分发，这都离不开数学知识。因此，吉罗拉莫·卡塔内奥关于防御工事论著的第一篇就让读者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原理，亚历山大·范登比斯克的《军事算术学》（1571年）讲的是士兵有可能遇到的实践性的算术题。而伦纳德·迪格斯另一部著作的题目就足以说清其内容：《以统计学命名的一篇军用算术学的论著：摘要讲授数字以及分数和整数，还有方程式和代数的法则和数字代数的艺术，是职业军人的必修课程》（1579年），在如此吓人的题目之后，又让人不必惊慌的是：在讲给军需官的一章里发现了某种小学生常见的问题：如果1200夸脱谷物可以使400个士兵维持9个星期，请问2500个士兵维持40个星期需要多少谷物？指挥官的权杖以计数器的形式出现，上面标明：占据任一既定地区需要多少人，或者反过来说，一定的人数可占领多大地区。这种情况说明：依靠数学来指挥军队的做法不单纯是教科书中的游戏。在1588年入侵的惊恐以后，伦敦城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为志愿军官开设一个民办的数学讲座。还应该记住：荷兰最伟大的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同时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关于防御工事的著作，而伽利略在帕多瓦讲授过防御工事的理论。也许除了对于弹道学研究有所促进以外，战争给予数学家的东西肯定不如得自数学家的东西多。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军事教科书使数学深入人心而且通过强调测量学、统计学，强调使用象限仪、望远镜这类仪器，有助于使更多的人接受科学思想。

合格的士兵，检阅场上的队形，教科书里的战术以及高昂的斗志，这一切在文学作品中都是胜利的因素，而且似乎注定了只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从建立一支军队的第一步——招兵开始，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政府并不准备为一群有作战能力的人出钱；更有甚者，政府旨在利用招兵的机会整肃社会；地方上负责征兵的当权者们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摆脱流浪汉和可疑分子。他们确实不愿意从固定的雇工中招兵，因为很难在他们复员时为他们找到工作。当志愿者在当地应征时，谁也不去甄别适于当兵或不适于当兵的人。由于规定所有家道殷实的公民提供军事装备的立法比规定提供操练和武器使用的课程的立法更有效力，新兵往往是只有武器却没经过任何关于其用法的训练。

军事服役无诱人之处，这种情况使许多人当逃兵，政府赖以征集新兵的地方当权者和获准做这项工作的民间人士公开受贿并信心十足地坐等贿赂。有人尝试通过把最原始的花名册与送到转运站或营房里的新兵对照检查的办法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可能发生的顶替情况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部队在路上似乎经历了一场人和物方面的巨大变化。由于政府根据花名册提供薪饷、给养和装备，掌管钱粮的发饷官员和兵营长官只要使名单保持不变而在队列中造成尽可能多的空额就有利可图。为达此目的而施用的伎俩——从收买战士当逃兵到当管理名册的上级巡回检查时雇替身顶空额——其花样之多如同应分给连队士兵的钱和给养可能被其长官挪用的方法之多一样。政府发给的薪饷本来就十分微薄，而公务员和军官在分发之前又克扣一部分，处于夹缝中的士兵们只想着当逃兵或买到假的离队证明，或者投降敌人换得可靠的回乡证明。这样一来，在国家对一支部队的支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支部队的人员和素质却在持续地下降。更严重的是：由于指挥官无法弄清他能把多少人带上战场，也无法弄清在一次围攻的过程中或从过冬的营地出来以后还能剩下多少士兵，致使长期的计划无法制订。

这时，政府被迫起用三级人员来行使后来政府可以自身行使的职能：地方当局负责完成当地的征集任务并靠法律的效力迫使人们提供武器和装备；公务员把这样征集来的连队送到前线；承包人负责转运并为他们提供衣服、食物，还组织薪饷的运送和分发。从地方行政官的办事员、连长到战地会计每一层都克扣一部分。公众对于国家的部队也毫无敬意，每个平民都对军队抱有敌意；物价上涨了，运输的货物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款项也越来越难以筹集。

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以及更多地把出身而不是把军事经验作为得到最高级军衔的重要资格的倾向更进一步降低了军事效率。在危机到来的非常时期征集军队而在危机过后将其遣散的情况意味着没有稳步晋升的时间，从连级军官[中士(sergeant)、掌旗官(ensign)、中尉(lieutenant)、上尉(captain)]到团级军官[军士长(sergeant-major)、上校(colonel)或营区长(camp-master)]还不算这上面还有总军士长(sergeant-major general)、军械长(master of the ordnance)、总营区长(camp-master general)、骑兵总司令(captain general of the cavalry)或步兵上将。从连

级到团级或从团级到参谋本部每一级升迁时，对于所要求人选的类别都有不同的观念，越来越强调任职所需的管理能力和政治素质。所以，虽然上尉的军阶没什么辱没人的地方（上校们在他们指挥的团队里仍保留自己的连队，而上尉则依旧是最高领正薪的官阶），但一个军阶向另一军阶的升迁绝非易事，结果是：在团和参谋本部这样的级别上严重地缺乏训练有素的人。要任命一个出身高贵、政治上成熟而且富有军事经验的将军也绝非易事。只有西班牙军队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他们一上战场就是几代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并且以职业兵、雇佣兵的方式进行管理。正是西班牙人的经验通过军事教科书传到了军事职业较为落后的国家。另一方面，他们的最高将领是根据其政治能力任命的。人们怀疑任何纯粹的军事将领能否处理得了在战场上长年维持一支世界性部队所遇到的管理方面的问题，能否离开训练有素的文职参谋的出谋划策而做出必须做出的政治决定。

欧洲被分成两类国家，一类处于战争状态但征集不到战争所需的足够的部队，另一类处于和平状态但有大批的人渴望投入战斗。从第二类国家中，尤其是从意大利、德国和瑞士不断地有人流入第一类国家，尤其是流入法国和尼德兰。1573年阿尔发围攻哈勒姆的军队中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勃艮第人和南部尼德兰人，而守军中则有苏格兰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沃伦人。1610年拿骚的莫里斯在尤利尔的营地花名册显示：组成他的军队的是19个法国连队，6个德国连队，16个沃伦连队，8个弗里斯兰连队，35个英国连队和29个苏格兰连队。1569年，在蒙孔图尔，天主教一方的25000名士兵中有6000瑞士人，约4000意大利人，3000德国人还有几个沃伦人连队借自阿尔发。1578年葡萄牙的塞巴斯蒂安入侵北非的军队中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卡斯蒂利亚秘密征集而来）、德国人、沃伦人以及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斯蒂克利的英国人指挥下的教皇军队。尽管政府为自身利益不时地企图加以阻止，自愿从军者仍不断流往国外。法国人无视法国与土耳其的联盟前往北非或匈牙利同异教徒作战，德国人无视帝国禁令到法国参战。苏格兰人参加了波兰统治者的卫队，而在尼德兰，交战的双方都有英国人并不时倒戈。雇佣兵制和志愿兵制的结果是：在法国的内战中不仅同胞们同室操戈，德国人也在那里为双方而战，而按条约应为法兰西国王作战的瑞士人却按私下的约定为法王的敌人作战。从反对胡格诺教徒的瑞士新教徒到为阿尔及尔贝伊^[10]作

战的背教的基督徒，雇佣兵不断扮演着受到马基雅弗利指责的角色：将利益和个人的方便置于国家或信仰之上。

因为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名声变得比较响亮，对他的军事思想的推崇也在不断增强。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他对雇佣军的尖刻的攻击以及对国民军的提倡推动人们围绕三个题目热烈地争论：国民军将取代雇佣兵吗？常备军比临时召集的部队更好吗？志愿兵比义务兵更受欢迎吗？通过一位意大利作者于1558年写给一位法国读者的总结，[\[11\]](#)人们可以看到反对雇佣兵的论点：国民军士兵作战最勇敢，因为他们是为某种事业而战；他们忠于信仰并在困境中表现得更为坚韧不拔；他们不愿参加哗变或不忠的行动，因为其财产和家眷处于君主的统治之下；还可指望他们少干那些抢劫和掠夺的勾当；他们不会像雇佣兵那样带着“妻子”和孩子从而加重营地的负担；他们比较服从命令；战役结束后也较易遣散；他们的薪饷可以留在国内。还可提出一些理由来倡导国民军：雇佣兵契约普遍期限过于短、无法制订任何长期的计划，他们的团队军官把每一个契约都视为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的途径，因而比国民军团队又多了一层贪污者。而且同一个国家的雇佣兵以敌对双方的身份相遇在一个战场上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其后果实难逆料。

另一方面，由于投枪和火器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而这些武器只有在纪律严明的情况下使用才有效，又由于某种先天的特殊气质确实使某一民族被视为某种武器最好的使用者，军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看来，理想的军队是一支这样的军队，它在轻型和中型骑兵、突击和掷弹步兵、炮兵和工兵等各个兵种中都雇用了有专长者，并配备本国的最好的武器。然而，在实践中，当国民军与雇佣军对阵时看不出前者有多大优越性。像瑞典以及德国的一些诸侯国那样的试图建立大规模国民军的国家，由于管理上的困难，由于人民不愿服役而被迫修改或放弃了他们的计划。面对着把农民变成训练有素的士兵所需要的时间和钱财，花钱雇佣现成的士兵就完事大吉的做法是有吸引力的。

在提倡军队完全或大部分由国民组成的人们中间，围绕军中来自国民的部分是否应该成为常备军的问题存在着分歧。没有人反对常备的卫戍部队，例如法国沿海陆边界者；尽管他们数字可观，但是过于分散，不构成危险，而且他们对于国民的爱国热忱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一听到别人提倡常备军，顿时就回想起古罗马皇帝卫队的故技，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武装部分民众无异于煽动他们造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武装民众，也应选自穷乡僻壤，就威尼斯而言，应到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去征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可能建立一支由事实上与国家息息相关的绅士组成的常备骑兵，对于其社会性靠不住的步兵就只应在战争时期给以武装和训练。有人提出某种类似国民义务兵役制的建议，如英国的亨利·尼维特爵士于1596年在《保卫国家》一书中阐发的那样，但是没有结果。在法国，像德拉努、维热内尔（Vigenère）和迪普莱西-莫尔内这样的改革者建议以常备的步兵和骑兵骨干为基础，战时补充以征集到的兵员和雇佣军。但在韦尔万和约以前，这些建议一点也未实现。此后，亨利四世维持了一小支常备军的组织核心，但由于战士们随着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出现而被征集或遣散，其效率不稳定。拉扎鲁斯·冯·施文迪建议把雇佣军变回到他们的老样子——国民军步兵和反对职业骑兵为了收入不经特许就为外国人服务，并建议用强迫的军事训练，尤其是到土耳其威胁下的东部边界这类危险地区的训练增补这个职业性的核心。他的计划于1570年部分地被德国国会所接受，但是财政困难以及缺乏适当的管理机构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出于对雇佣兵的厌烦，古斯塔夫·瓦萨在16世纪中期在瑞典为真正的国民常备军树立了一个典范。^[12]在短期内，它先由志愿兵组成，然后是义务兵，这代表了欧洲的总趋势：即宁要义务兵，而不要人数又少又不可靠的志愿兵。但到16世纪末，人们发现雇佣兵的地位比以往更稳固了。由于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在以火器为主的战术中士兵的稳定性又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人们发现雇佣来的有专长的士兵比最清醒的义务兵都更靠得住，更能使自己适应变化。古斯塔夫·瓦萨的继承人埃里克重又使用雇佣兵，而“在所有不利于义务兵军队的证据中，最重要的是荷兰的经验：拿骚的莫里斯进行的伟大改革，在贯彻时依靠的是（当时的人们相信这些改革只能依靠）一支定期发饷的雇佣军”。^[13]

在指挥方面，人们从意大利战争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军事首长被文职特派员掣肘的事不常发生了，分头进行军事指挥的思想被视为不容置疑的邪魔。但是，一支军队一旦被政府组建起来，如何防止它不受控制地自行其是这一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尤其对于像英国那样的国家，它有时不动干戈、有时又进行野心勃勃的长期的两栖战役。只有在尼德兰，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那里，西班牙军队的总司令

(captain general) 同时就是那个国家的总督。此外，它还拥有其他国家的军事首长所缺少的东西：一个能够牢牢控制其军队的全部管理和军事机构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首长——总营区长 (camp-master general) 在营地、行军途中和战场上管理部队。他和他的参谋们有责任知道每个人在每一时刻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他之下是一个营房长 (quarter master) 管理一个建立起来的营地。还有一个宪兵官，他和手下人负责调解纠纷、维持秩序、监督食物的价格和出售。在每一团队中，这些人及其代表的素质对于冬季和围攻时期必须长期驻扎的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的组织能力甚至把管理随军妓女的事情也包括在内。每100个士兵应配备8个军妓。一位本身就是营地长官的西班牙作者写道：“首先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组织良好的情况下允许这种人的存在是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混乱；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像此时必须允许她们存在。否则，这些肆无忌惮的，身强力壮而且精力旺盛的士兵可能危害当地人民，骚扰他们的女儿、姐妹和妻子。”^[14] 附属于总司令的参谋部的更活跃的特种部队由军官中的精英组成，有些因功勋卓著而被直接任命，并不完全靠贵族出身。他们被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从掌握检阅直到领导特别危险的侦察工作。靠这个参谋部再加上一个传递命令的快速骑兵团，将军就能够对于营区长 (camp-master) 及其下属带到战场上的力量进行控制、指挥和休整。

西班牙军队的高效率举世无双。其纪律和士气一度堪称楷模的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衰败了。土耳其近卫军的效率降低了，混乱却加重了。由于把采邑给了那些找替身代替自己作战的平民，来自采邑的马匹质量更糟了，又由于骑兵仍是主要的武装力量，在位于帝国东部边界陡峭的山谷地带的一次围攻战役中，土耳其军队只能是停滞不前。

然而，西班牙人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在分队编组这种重要的事情上，他们曾经处于领先地位。要把士兵编成规模与旧式的随意组成的战斗单位——“营”基本一样的单位，大约3000人的团队曾经是一种合理的编制。从后勤管理上看，它是一个单位，通常作为一个整体投入战斗，而激励其士兵的是一种比任何部队都更接近团的传统的东西，只有像法国国王的苏格兰人卫队那样的精锐小部队除外。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团的规模无关宏旨，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在16世纪早期密集的步兵纵队声望正高的时候形成的大规模编队已经过时了，因

为决定作战方式的已是火绳短枪、滑膛枪和马枪，而不是重骑兵的标枪和长矛。既然步兵的队形很少需要抵挡大规模的冲击，处于密集纵队中心的大批战士就降到了无能者的地位。人们要求另一些可以使每名士兵都发挥其战斗力的队形。在编队规模的另一端，西班牙团队与英国和法国的团一样，由每队大约100人的一些连队组成，这些连队就是团队的缩影，它们把标枪手、戟兵和枪手混合编组。为了沟通连队与团队之间的断层，这些连队可按照要求联合成战斗队形。无论如何，多亏了一种天然的保守倾向和处于连级的上尉与团级的上校之间环节军官的短缺，战术单位才往往与后勤单位一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班牙团队先后被法国的军团（légion）和英国的团所仿效，这些单位每一次都比前者缩小了一些。从征兵和训练的观点看，每个连队100人是适当的，把团队作为一个后勤单位也是适当的。那个时代的改革者，值得注意的有瑞典的埃里克和拿骚的莫里斯，保留了小的连队和大的团队，但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战术单位——营。在瑞典，一个营包括525人，在联省共和国，一个营包括550人，并且培训了一类新军官来训练并指挥这些营。最后，军队有足够的人手掌握所有能够得到的武器，并有了能够经受严峻考验的潜力。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努力去改善军队的组织状况，军队仍然缺少训练和军官，还缺少一致性。类似团队制服的东西根本没有，更不要说一支军队统一的服装了。如果某些单位看上去一致，那是由于有钱的上尉或贵族一时高兴，或者由于地方征兵部门的命令或一个军队的承包人成批购买了某种特别的服装。虽然在各种各样的盔甲、制服和武器中，国家的标志还能够区别出来，但当同一国籍的雇佣兵为双方而战时情况就复杂了。为了作战，人们使用围巾或军上衣作为区分的标志。这些情况又使伪装十分容易，并因此而导致许多次成功的突然袭击。由于战场更加嘈杂而且士兵的语种更多了，用军鼓向步兵发布命令，用军号向骑兵发布命令时也更加精心。齐步行进时“准确、一致而又雄壮、华美的步伐”^[15]使部队的外观越来越统一。人们花费更大的努力去使每个战士服从为战役期间约束他们而制定的法规。这些法规由军事参议院颁行，从将军传达到上尉并通过他们传达到士兵当中。它们禁止战士赌博，渎神，把未得到允许的妇女带到军营里，酗酒，为寻找食物或饮料离开行军队伍或军营，抢劫宗教建筑或用来寄宿，杀害或洗劫非战斗人员，擅自改换连队或者离开连队，点名时不到场或者使用假名，聚众谋反或对长官缺乏应有的尊敬。人们制定

了法规来防止哗变、开小差或不履行军事义务，并且预防不同国籍的士兵之间的纠纷，预防传染病（使用厕所，埋葬死畜），制止因不加控制的抢劫而导致的混乱，并且为了预防士兵骚扰平民百姓，甚至不允许他们借住民房和购买当地的物资。这些原则上通行于所有国家的军事法规甚至在海外扩张时也发挥了作用，在那些地方，军事纪律不仅仅有助于征服，而且有助于维系民心，例如在弗吉尼亚，一位当时的作者报道说，假如托马斯·盖特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没有在尼德兰学到的军事法规，“我看不出来怎样才能防止全面的崩溃”。

[\[16\]](#)

士兵缺乏训练而且不同国籍者混杂一起的现状使人尝试着以提高士气来弥补军法在维持一致性时约束力的不足。在阿尔卡萨尔之战前夕，土耳其大臣的决定无异于拙劣的表演，他把刚去世的苏丹用担架抬着走遍军营，同时，苏丹的亲随们装模作样地一直与死者谈着话。但在北方，人们也使用了同样的伎俩，直到给将要出发进行袭击的士兵分发绞索，嘱咐他们不要带回活的战俘。教科书强调说当士兵学会仇恨敌人并坚信他们自己的事业时作战最勇敢；教科书还提出一个军事指挥官有必要掌握的能力之一是用以鼓动士兵的口才。长篇大论的演说，无论是将军所做并通过上尉们传达给士兵，还是在某些紧要关头向一小股动摇者发表的，无疑有助于使部队感到目标明确而又自信，还有助于使他们感到与那些地位高不可攀的人——他们的将军——产生了联系。这些讲给其情感极易被别人的话打动的人听的长篇大论内容各异，从诡谲的乞求到轻率的许诺或威吓。这类演说距离纯粹的文学如此之远，以至于文学的演说，例如在龙沙乞求天主教徒保卫巴黎免遭胡格诺教徒侵害的诗句中，其感染力倒来自对于战场实战的反映：

战士们、步兵们，你们放心，
孕育你们的贝娄娜是战争女神；
经过高卢弘扬了蓬勃的勇武精神，
你们是马尔斯的青年子孙。
如同地里钻出手拿武器的提坦，
胡格诺是树木把树叶变幻，
他们在准备战斗，

你们不必胆寒。

你们有钢制的铠甲、利剑长枪，
盾牌坚、护胸硬、合身的好军装，
弹药、手枪，火力猛，头盔闪闪亮，
都不如你们的脸，瞪眼敌胆丧。

你们不再像过去那样，
为了国王拓土开疆；
今天你们腰佩利剑，
为的是圣战和上帝的荣光。

尽管出现了火器，大多数士兵仍身披铠甲，而且就像这首诗所提示的那样，铠甲之所以有助于保持斗志，不仅由于其保护作用，还由于它在敌人眼中闪闪发光，使人惊慌。后一个原因使军事著作者提倡把铠甲擦得亮闪闪而不应弄得黑漆漆。然而，面对火器的威胁，人们改造了铠甲。身体的要害部位被造得可以抵御手枪或火绳短枪，为了减少日益增加的重量，不属于要害的部位，尤其是腿部的铠甲则被省去了。骑兵铠甲的变化不如步兵大，后者觉得片片铠甲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有可能就脱下铠甲，这又使那些记得罗马人就曾因此而轻易地被哥特人击败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的呼声；同时，另一些人尽管也为这种做法痛惜，但忧虑地表示经常披挂铠甲会使人驼背并使战士们在30多岁时就精力衰竭。皮革被用来保护不致命的部位，各种形式的紧身铠甲上衣也被广泛穿用。但是，如果说火器往往使铠甲简化，那么其他影响，如马上的长矛战、阅兵式，则往往使铠甲复杂化。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为平时的检阅和战时准备不同的铠甲，并且由于有些部位——如头盔——无法替换使用，某些非常漂亮的检阅用的铠甲同时也是为战时使用而设计。

这一代人已经见到16世纪晚期意大利文学艺术的其他表现形式日益深入人心，他们对于这一时期过分装饰的铠甲可能会持宽厚的态度，对于偏爱哥特式或马克西米连式铠甲的人来说，这让他们非常痛心疾首。铠甲在任何时代都未曾如此具有实用性以至于无法随着艺术潮流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为了获得复杂的装饰性效果而过多地雕琢和重新加热会损害金属的强度，同时，16世纪晚期甲冑制造者技艺的

成熟程度仍和从前一样，而且，在设计那将要抵御弹丸而非刀剑的甲片时，他能让光滑的表面因装饰而变得粗糙。在奥格斯堡、兰茨胡特、因斯布鲁克、米兰和格林威治这些大的生产中心，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简化产品——例如金属片重叠较少者、分为左右两部者以及分两半制作然后在中间合为一体的头盔——都开始生产以满足巨大的市场需要。为挖掘攻城的坑道时戴的头盔以及其他为攻城专用的厚重甲片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对于阅兵和游行用的漂亮甲冑以及君王或城市的卫兵用的特殊装备的需求，导致对于精心装饰的成套铠甲进行类似批量生产的工作，尤其在意大利北部。尽管成套穿破的铠甲数额也许没多大变化，但铠甲零片的总生产额却在稳步增加。人们仍然喜欢把铠甲作为外交礼品馈赠，并在当时的陪葬品和肖像画中给铠甲以殊荣，在这种行为背后决不仅仅是对一个没有枪炮的时代抒发怀古之情。

以同样的方式，白刃武器的数量和品种因战争、体育运动和游行的需求而增加了。在战场上，主要的武器是矛和剑——后者的护手变得精致了，以此弥补越来越少的用金属片保护手臂的情况——而戟和骑兵长矛的数量则减少了。在运动场上，军刀、双剑和标枪更受欢迎。为了仪式上的用途，人们使用一种样子像戟的古怪复杂而且有柄的武器，它使场面顿时显得豪华而又充满尚武精神。

虽然弩在马耳他被用来抵御土耳其人，并被有些西班牙部队用于尼德兰；虽然莱斯特在1585年曾带领一支长弓手连队到低地国家，而且人们直到16世纪末仍在用它对付爱尔兰人，弓箭毕竟成为一种逐渐废弃的武器了。在战术上，弓箭优于枪械，因为它发射速度快，便于在潮湿的气候下使用，分量轻因而可使士兵多穿铠甲，这些有利于弓箭的论点不如这一事实更有说服力，即弓箭已经大量存在，调换时费钱少，训练时不花钱，而火器的训练则要耗费弹药。然而，这时的军队中不可能保留在攻击或防守的作战中无足轻重的兵种。标准的步兵使用的发射武器有两种：一种是经过改进的、标准膛腔的火绳枪；另一种是较长、较重的滑膛枪，它只能凭借依托发射。尽管16世纪最初1/4时，轮式枪栓已经发明，而且将近16世纪末又发明了更可靠的用弹簧击发的装置，但这两种武器仍旧依靠火绳引发。火绳那粗糙但是简便的特点弥补其缺陷绰绰有余，这些缺陷是耗费火柴多，怕雨淋，夜间不便隐蔽，难以修整到适当的长度，重新装填弹药时要费事地去把

持它。16世纪60年代后期，滑膛枪进入尼德兰，此后不久又进入法国。从此，滑膛枪逐渐取代了火绳枪——除了在马背上以及步兵完成侦察任务时，在这些场合，16—20磅重的滑膛枪及其依托是太沉重了。尽管有时使用现成的装有火药与弹丸的子弹，火绳枪和滑膛枪的发射速度缓慢，结果人们发明了退后的做法，即允许每一排士兵退后并重新装填弹药，同时原先的后一排向前移动以占据前排的位置。在200码的距离内，除了最坚固的防弹甲以外，滑膛枪可以射穿任何东西，但人们普遍传说它在500码内都具有杀伤力。然而，它的准确性非常低。在作战现场上用模子制造的弹丸，不标准的火药，弹丸直径与枪筒直径之间的差额过大，这些是难以准确命中的部分原因。尽管有故事说：天主教徒昂布鲁瓦兹·帕雷伸手出墙去引诱攻击布尔日的胡格诺教徒，那只手马上就被射穿了，但准确的枪法只有可能属于极少数为狙击而装备有来福枪的战士；属于那些有钱的民间运动员，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的有来福线和轮式枪栓的枪。德国骑兵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手枪，此后这种枪越来越受欢迎：它的命中率更低，从短短的枪筒中喷射出的子弹是如此的飘忽不定以至于直接瞄准的射程超不出三步以外。尽管如此，人们仍认为其杀伤力足以使手枪取代长矛，使轮式枪栓取代填药装置。除了大批具有实战价值的长短枪支，人们还生产了其他用途的，尤其是为体育用途的枪支。这些枪支的装饰和机械巧夺天工。德国的制枪匠，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制枪匠，处于领先地位。手枪被做成多枪管、双枪机，它们被暗藏在钉头锤或战锤的把柄里，或精巧地与弩、剑和匕首合为一体。但是，这些有钱的体育爱好者或收藏家的玩具，尽管在一个方面显示了火器的魅力，却与发展那些构造简单而又杀伤力强大的军事武器没有关系，这种武器的制造工艺和准确性在19世纪击火帽以及便宜的刻制来福线的工艺这些发明以前没有多大的改进。

土耳其人在1565年进攻马耳他时使用了投石机，意大利军事机械师吉罗拉莫·马吉呼吁不要忘记投石机以防常规火器的短缺；尽管如此，这个时代的士兵所惧怕的重型发射武器还是只有火炮。虽然人们努力减少不同火炮的种类以减轻后勤的负担，但到16世纪末，教科书中仍能列举出大约40种火炮，从比滑膛枪重不了多少的小炮直到笨重的攻城炮和舰船炮。然而，四种主要的火炮显得最有用途，而且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王室的敕令以及其他地方的逐渐采用，使这四种火炮标准化了。它们是：大型加农炮，可以把1个重达50磅或更重的炮弹发射

到最远大约2000码的地方；中型加农炮，炮弹30磅，射程比前者近200码；大型长炮，比大型加农炮炮筒长，炮身轻，可把17磅重的炮弹发射到2500码的地方；小型长炮，炮弹比前者约轻一半，射程则一样。总而言之，由于加农炮可以在近距离内进行粉碎性轰击，适于斩关夺隘，而射程远、炮身轻的长炮则用于野战。各类中小类型的炮是最常见并且还要小一些的长炮。尤其是一种相当于英国小炮的长炮。它的炮弹重5磅，在交战和防御中都受欢迎。除了极少数体积小和造型奇特的炮以外，所有这些炮都从炮口装填，这种构造上的弱点有待于后部活动弹膛的装填速度被发现后才能得到改进。越来越多的火炮用铜来铸造。火药的质量改进了，因而金属的坚固程度也提高了。铁球是最常用的弹药，投石炮从前受欢迎是因为发射石球所需的火药较少而且这种炮可以造得薄些、轻些，现在尽管有许多仍在使用但不再制造了。偶然还把草皮当弹塞作为隔热物体从而发射烧红了的铁球；在海上以及在防守时（例如为了肃清突破口上的敌人）使用了连续发射。臼炮在攻城时比以前用得更少了。能爆炸的臼炮炮弹在专门研究射击术的著作里占有显要的地位，但使用它们是危险的，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它们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人们并非不知道纸制的或帆布制的弹药筒，但绝大多数的装填弹药的工作是用勺子直接从火药桶里舀，然后用点燃的火种引发弹药，那火种固定在火绳杆上，火绳杆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发明之一，它是武器与工具的结合，做成戟的样子来保留燃烧的火种。

要列举使炮手不可能命中目标的原因是件容易事。没有任何两门炮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出自不同的模子。为了保证炮弹与炮筒之间的游隙，允许出现明显的豁缝，因此，炮弹就不是在真正的中心线上出膛。火药的质量得不到保证，而装填量也不一致，尤其在刮风天。由于整个炮身的后坐力，每发射一次，炮基都要被破坏一次，有时会后退数英尺。炮弹的外形和重量也不一致。火炮都经过试验以确保它们自身不会爆炸，但未装瞄准器，也未检查其光滑性或为炮筒确立准确的圆心。当然，从攻城和交战部队的报告中，无疑可见到训练有素的只使用一门炮的炮手，能够对自己的武器熟悉到如此程度：靠他的技术和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武器的技术缺陷，但问题在于要有娴熟的炮手。只有像西班牙那样的国家建立学校并为射击训练所需的弹药投资，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海上的射击特别地不准确，部分原因就在于弹药太缺少了，不能用来进行训练。总之，在射击中，强调

射术少，强调摧毁力多，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炮弹的发射是用来攻坚，人们认为这时的射程是平直的，也就是说，大约600英尺。

枪炮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各国政府因此都试图对生产和出口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出售它们的利润是如此丰厚，以至于人们经常为出口特许争执不休和不断发生走私的情况。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没有自己的铸造业的国家从国外购买并欢迎走私者，葡萄牙蠲免了对大炮的进口税，西班牙在1611年塞维利亚的皇家铸造场投产以前一直大量依靠进口。荷兰是个大买主，瑞典在16世纪结束以前也是如此。法国也是进口国，因为大炮的铸造，无论是用铜铸还是铁铸，都是大规模的劳作并且经不起战争的动乱。出于上述原因，低地国家南部省份那一度繁盛的铸造业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也逐步被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抢走了自己的生意。^[17]火药也被以同样的方法控制着，倒不是为了防止暴民造反，而是为了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火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由于对硝石的需要难以从欧洲得到满足，伊丽莎白政府不得不与摩洛哥的异教徒进行非法的贸易。无论如何，人的情况怎样，军火也复如此。幸亏靠购买（合法的或非法的）有可能弥补一个国家自身资源的不足，才没有出现因国内的生产状况影响到重大的政治军事决定的情况。

部分由于国王的关注，部分由于贵族派头在这里留存最少，炮兵在其组织效率方面逐渐超过了其他兵种。从一门最大的炮所需要的人数和服务项目上可以推算出炮兵组织的规模。要拖曳这门炮，至少需要20匹马，如果雨后地面黏滑则需要30匹。为了给它构筑工事，并在发射以后把它拖回原位需要30名工兵。操作需要1组2—5人的炮手。还要有木匠、铁匠、轮匠分头照管它，与炮车随行的步兵卫士保护它，而它的火药和铁球（一次装60个）要求6辆以上的大车和40多匹马运输，每门炮就像是一个刀尖，而服务队则构成一个巨大而又笨重的刀柄。

最不服从组织的兵种是骑兵。事实上，骑兵在帝国服从的是一种独立的“绅士派头”的纪律；不过，这一兵种仍保持着最高的社会名望——尽管这种名望主要伴随着落伍的、全身披挂的战士。绅士们不再认为马背上的战斗比徒步的战斗有更大的价值。但是，出身特权阶层造成的独立不羁的传统使得把骑兵连有效地编成团队的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在任何战场上，骑兵都是不可缺少的兵种；当步兵单独保卫

自己时，它很少能顶得住一次骑兵的进攻。尽管在东部国家，例如波兰，主要的威胁来自骑兵的袭击，尽管在奥斯曼帝国，骑兵仍是人数居多的兵种，而西欧一般情况则是骑兵与步兵的比例为1：3以上。虽然全身披挂的骑士有时仍算得上一股力量，但他们的总数仍在持续地下降。最常见的三类骑兵是矛枪骑兵、手枪骑兵和卡宾枪骑兵。矛枪骑兵戎装上马以保卫后方免受敌军冲击；手枪骑兵配备有两支手枪、长剑和匕首，由于他们不必保卫后方，只是上马、射击、转移，也就无须骑乘好马；卡宾枪骑兵比其他两种骑兵的铠甲更轻，马更快，因为他们要侦察、搜索、传递消息，还要徒步作战。他们配备着长剑、匕首和一支轮栓式或燧发式火绳枪。他们用不着与敌人短兵相接。卡宾枪骑兵作为轻骑兵与徒步火绳枪手的综合，成了许多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因为他们作为火绳枪手骑到了马背上以躲避伤害而受到抨击；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所有骑兵中用途最广者而受到赞扬。而且，早在16世纪60年代，在仍受传统制约的法国骑兵部队中已经有了卡宾枪骑兵的精锐部队。围绕着以矛枪骑兵为一方，手枪或卡宾枪骑兵为另一方，二者功过优劣的对比，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因为，手枪骑兵的进攻虽然在理论上应该具有决定意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常常射击过早从而使他们的轮番进攻失去了决定意义；而在理论上不可靠的矛枪骑兵的进攻却被证明越来越有效，因为步兵变得越来越经不住冲击。

自从15世纪中叶瑞士投枪手出现以后，步兵发挥的主要作用已经导致骑兵比重的下降。这使难以养活足够骑兵的国家，无力筹措作为一个骑兵所需的费用的个人和发现骑兵不像步兵那样遵守纪律的指挥官们都感到满意。在越来越以包围圈进行围困的战役中，骑兵作用较小这一事实被人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只有法国人仍旧觉得靠两条腿作战而不是靠四条腿作战，总归有点不符合绅士的风度；对此，他们自己的改革者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这个时期，步兵逐渐减少铠甲，他们的武器也比较标准化了，长矛或滑膛枪已经取代了全部的（作为唯一武器使用的）剑和很大部分的戟。在一个西班牙的团队中，长矛与滑膛枪通常的比率是2：1，但是长矛的比重有增加之势。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比重的都不是理论上的乐观想法而是其他原因。比如法国人就从来没有喜欢过长矛，他们总是坚持使用火绳枪和滑膛枪，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出钱使其他国家的军队提着长矛。

在一个与今天相差无几的时代，古代世界的榜样还有用吗——军事问题的作者们这样问道。不过他们发问完全是为了做出响亮而又肯定的回答。枪炮的使用并没有破坏古代榜样的有用之处。重武器的样式有可能改变，但是对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的要求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还有应对士兵的勇武给以嘉奖，对他们按军功而不是按出身加以提拔，用操练和体育使他们适应作战的劳累，尤其是穿戴铠甲的极度疲惫。正是罗马人说出了如此不朽的警句：居安思危！也是罗马人分析并决定抵制永远存在的诱惑——给一支部队派去一个联合的指挥机构。一个能征惯战的民族关于战士的本性所说的话价值犹存这倒也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对于古代战术倾注的注意力也在日益增多。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现代武器，他们似乎都在读李维、恺撒或皇帝利奥的著作。瑞典的埃里克、拿骚的莫里斯和路易·威廉都研究过古代的军事著作。1595年，伯利勋爵说：“我们军队的布阵法就是从罗马人的dizeniers那里来的。”当亨利四世希望改进法国军队的战术时，他问苏利可否根据近代和古代世界的教科书“编纂一个对当代最有益处的文章集”。

对新战术的需要得到广泛的承认。据说，格朗维尔（腓力二世在尼德兰最信得过的大臣）在1559年曾对一个英国的使臣说：“你们的士兵是顽强、勇敢的，但这些年来他们接受了什么训练呢？而当今的战争艺术是士兵们每两年就要重新学习的。”^[18]然而，要学习它谈何容易。在以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布好阵式的会战极少见了，而且绝大部分战役规模小、时间短，作战的不是一些经过合理的计划组合起来的精锐的士兵，而是一些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最为久经沙场的军队——西班牙军队，在某种较小的程度上修改了自己的战术，团队的编制缩小了，并以敢死队的枪手作为其前锋。但是，老式的密集方阵虽然浪费，但却坚实；而为了把队形划得更小，伸展为单薄的线形的改革，虽然合理却好像有危险。这样做还需要逐个地对各部队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靠退后法维持火力的持续性和准确性，并且需要各部队之间默契的配合；但是，不仅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军官十分缺乏，还缺少单位之间的协作，更不必说一支军队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在一起操练或演习。在关于演兵场的文学作品与战场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些文学作品以马基雅弗利的《论战争艺术》一书中的图形为根据，演示出楔形、剪刀形、星形、锯齿形、风磨形和交叉方块形的队形，而在战场实践中，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或构成一支军队

的各方面因素。尽管总有人隐隐地抱怨说“罗马人的规则”必须恢复，尽管有拿骚的莫里斯那样的非凡的人们做出的榜样，士兵们或军官们对于经常而又严格的操练的必要性仍然认识不足，而大范围内的战术就取决于这种操练。最低限度的操练成为士兵既不固定又不必认真对待的事务的一部分，它只不过用来教会滑膛枪手如何使用他的武器，以使这些武器不至于构成对枪手本人的威胁更甚于对敌人的威胁。与教科书中的理想队形最接近的队形在战斗中见不到，但在行军途中或在秩序井然的营寨中可以见到。

西班牙、瑞士和德国步兵基本的队形是一个纵深坚固的长矛方阵，在四边，尤其在前面和拐角上由射手们加以保护，如果方阵被冲破，他们应当躲在长矛手中间。长矛方阵本身被冲破的事情很少发生，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大炮，几乎不被用在一场战斗的后期，而且只要方阵的外围和拐角处的战士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即使四面受敌，它也能打退数量占优势的敌人。或者它也许根本不参战。一位英国的观察家注意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见到战士们像在古代那样常常进行肉搏战。因为在这个时代，射手们控制并充满了战场，又有长矛手的坚强抵抗为后盾，所以，至少在士兵们进行大量肉搏战之前，绝大多数勇敢而又技艺精良的射手们通常已决定了胜利，或决定了最佳的结果，至少是明智的结果。”^[19]步兵方阵在成功地抵御进攻和在作为后备力量应该发挥作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远离肉搏战这两个方面使其使用者们对它抱有好感而不顾其笨拙，不想把它拆成小得多的单位。他们致力于以更多的射手环绕外围，并在中间提供一块空地使射手们可以得到比在拥挤的长矛手队列中更有效的保护。这些方阵两个或三个并列，分前卫、主体和后备三层。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炮兵、枪手和骑兵力图破坏这种格局，而长矛方阵则防守时坚如磐石，进攻时连续不断。

当有些国家继续把方阵作为战术单位的关键加以发展时，另一些国家，就像论及军队管理时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正在组建一些较小的单位以求用狭长的队列面对敌人以增强火力。这些队列由小型无纵深的方块队组成。法国人部分地由于不得不利用规模小而且习惯小型战斗的组织，但也有罗马人的前例为理论依据，由大拆小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亨利四世把他的步兵编成500人的营，并训练他们在横列中或变换的队形中互相支持；还有莫里斯那550人的营，每一个由分立的长矛

手单位和射手单位合并而成，可最大限度地施展火力并依靠机智的合作、快速的行动和骑兵的支持加以保护。这两种编制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要在陈旧、僵化、浪费但坚实的一方与新颖、灵活、火力更强但比较脆弱、经不起侧面进攻而且较难配备军官和加以控制的另一方之间做出抉择，那是下一个时代的事情。

当步兵的队形逐渐变得单薄的时候，骑兵的队形却变得厚实了。陈旧的呈一条细线状的墙式冲锋让位于大约15匹马一排的纵队进攻。无论靠其冲锋的势头，或者靠每一排上前者集中其手枪火力近距离射击然后闪开到一边再让后一排上前，或者双管齐下，用手枪射开缺口，然后发动一次冲锋把敌兵冲开，这种纵队都可以突破敌军的战线。人们很容易夸大早期意大利战争中骑兵的战斗力和从长矛到手枪这一变化中包含的退化；但只要敌军队形保持纵深，骑兵的冲锋单靠长矛和勇猛是不可能奏效的，而手枪，虽然缺乏一点“武士精神”并且被当时的传统主义者所不齿，却有可能在摧毁敌人的坚固性方面效果更大。在东部欧洲，为了对付骑在马上、来去如飞的敌人，长矛仍是骑兵最重要的武器，但西欧没有恢复使用长矛——一直到对机动性的追求导致部队又有可能被一次无后续的骑兵冲锋击溃为止。骑兵在战斗队形中的位置视参战人数而定，但按常规，骑兵被布置在两翼，以防备敌人的骑兵袭击步兵的侧翼，而且通常总有一支骑兵做后备。

野战炮兵发挥的作用不大但却很重要，尤其是在一场战斗的开始阶段。因为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在大炮的轰击下都坚持不了多久。从理论上说，军队应该配备有进行预备性轰击的中型重炮和在战斗过程中随处提供支援的轻型炮。在实践中，一支军队在被拉到战场上时很少能拥有它的全部装备，而在作战过程中把大炮挪来挪去的事情也很少见。另外，法国战场上通常使用3—5门大炮，在有些场合这一数字至少足以迫使敌人发起违背他的本意的进攻，甚至足以影响已经开始了的行动。人们在尼德兰的尼乌波特见到关于这两种效果的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海上的轰击迫使西班牙军队向内陆移动，而莫里斯安置在沙丘上的两门炮在战斗进行中帮助轰开了西班牙骑兵的第一排。

只有在防御方面，理论和实践才结合起来，并且证明把“艺术”一词同战争联系起来的正确性。关于构筑工事的书和理论构想的书令人难忘。意大利人仍在撰写大部分有关设防的书籍，而意大利的工程师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多地被聘用于欧洲以及海外，但是德国的丹尼

尔·斯佩克尔与荷兰的西蒙·斯蒂文著作中的原则在逐渐取得领先地位。意大利派的成就在于使中世纪的围护墙适应火器的时代。办法是：加厚，尽可能使其平面图变成等边等角的多边形，并用从钝角或直角形棱堡发射出来的侧翼火力加以覆盖，这种火力又得到塔楼的加强，塔楼是一种或者建于棱堡本身之上或者建于围护墙延伸部位的高耸的建筑。德国和荷兰派以及效法他们的法国人，把这一系统变为积极进取的系统，以独立或半独立的永久性工事向外面的敌军远远伸去，施展打击力强得多的火力，减弱围护墙的规模和重要性，同时加强棱堡的规模和重要性。等边等角的多边形仍是理想的形状。防御工事看着不高，但事实上是外加了一个斜坡。攻击者在看到防御工事的任何基础部位以前不得不攀上这道斜坡。在主要的城郭外面，大部分类似半月堡的辅助工事向外扩展，拒敌于远处，使他们不能集中进攻主体防御工事，迫使他们在广阔的包围圈上分散力量。并一步步、缓慢地冲杀前进。这种尽可能提供多层火力的防御系统被认为是静止的防御。就广泛而又典型的情况而言，16世纪中期的工程师们从要保卫的地方向外修建工事；北方派从宽阔的外围防御带向内设计，把开阔地的周边作为起点。围护墙及其棱堡，外围工事及其壕沟都被设计为互倚之势；每一寸表面，每一段壕沟都将处于近旁工事的火力扫射下。斯蒂文把这一总体性原则强调为“总之，扫清再扫清，我说过，这是当今设计堡垒最主要的目标和关键”。^[20]

斯佩克尔和斯蒂文预示了将由沃邦开创的有关防御工事的重要发展，但他们的体系包括要求进行精密的测量，和一道漫长的耗资甚巨的远离中心的野外环线。这一时期流行的还是较为简单的意大利体系。像马吉和马尔基这类工程师的军事思想通过对其著作的翻译成为国际潮流，这些思想也因到处旅行的工程师们得到传播。比如巴蒂斯塔·安东内利，他被腓力二世派到新大陆去制订一个杰出的计划以维护西班牙在那里的权益。马耳他、安特卫普、帕尔马诺瓦这些城市的非常出名的防御工事成为维护意大利学派的声誉的一系列样板。有棱堡的多边形，作为其基本原则是如此的灵活并可如此简便迅速地构筑，使它变成一种真正的国际样式，从哈瓦那到新纳瓦里诺，从莫桑比克到果阿和马考，从安特卫普到阿尔及尔，16世纪晚期的防御工事明显地属于一个派系。

新式样的防御工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且还是个时髦的东西。就像城市曾一度竞先建筑最大的教堂，市民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礼拜堂一样，现在城市力争在防御工事方面超过其他城市，而个人则骄傲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与某一棱堡联系起来。防御工事在城市规划中是不可分的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要满足和谐与比例适当这两个要求。在城市设计者与军事工程师之间并无畛域之分，同一个人通常发挥两种职能，负责从周边的半月堡直到中心广场的喷泉这整个城市的外貌。旅游者对于他们所拜访的城市的防御设施日益关注，从罗马附近的卡普拉罗拉到布列塔尼境内的克依昂，有钱的热心人在他们的别墅设计中也揉进了某些时兴的有棱堡的图样。

需要和时髦的结果造成了一次浩大的建筑与重修的工程。新的防御工事集中在三条反土耳其人的地带：一条南北走向的地带从维也纳经过卡尔施塔特、南下到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西岸直到克里特；另一条南北走向的地带包括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和马耳他设防的海岸，卫护着地中海中部；第三条东西走向的地带包括沿着北非海岸和西班牙南部海岸的设防区、巴利阿里群岛和撒丁。还有一些中心点，它们或者是两条防线的交叉点——如法国的东北边界，或者是占领军努力扎下根的地方——如西班牙在伦巴底和尼德兰南部。投入所有这些建筑活动的开支是浩大的，不仅要清除地面，构筑工事，还要偿付占用的土地，购买枪炮和军火，并在需要的地方驻扎一支卫戍部队。其中开支最大的是那些前沿地区，例如西班牙人在北非的阵地，它不得不靠海运来维持。为构筑防御工事筹措款项的办法各式各样：政府拨款，地方用现金、劳役、对出入城镇的商品征收的特别税加以资助；或由城市元老举债或出卖贸易特权和社会特权。在安特卫普，为了筹措建立城郭所需的100万金王冠币，所有这些办法都用上了。与这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的普利茅斯小型的防御工事，款项来自王室的一次拨款，代理长官的一笔馈赠，对小鲱鱼的一项地方税以及与此利益攸关者的捐赠，例如本地的居民，县里的绅士和与此城在贸易上利害相关的伦敦商人，但是所有这些还不够，低地国家还不得不把这个港口打入预算。像罗克鲁瓦和费罗伊登施塔特这样的新设防城市，靠许诺宗教自由、免费提供宅基地和建材，庇护某些罪行、蠲免某些赋税来吸引定居者，从而有能力偿付他们用于构筑防御工事的借款。对于这么多的防御工事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后果很少有人试图加以估算，例如其地租以及像吉尔伯特·冯·舒恩比克（他是安特卫普城防的主

要负责承办人）这样的人们的精力，更不要说这些防御工事在整个军费开支中所占的比重。

防御工事在何种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它16世纪丧失给大炮的优势地位很难估计。士气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能加强弱者的抵抗力，也能削弱强者的抵抗力。总之，如果攻击始终坚持并猛烈地进行，仅仅给养的限制就能使任何一座城池都不可能强大得足以坚守到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防御工事的北方派旨在不仅防止敌人，还要击退敌人，并组织凶猛、集中的火力轰击敌人的火力点和部队集结处。再者，使围攻者不得不分散其兵力和对垒工事的防御圈越大，围攻者的通讯与后勤的困难就越多，并且越经不住出击和来自外面的解围部队的打击。无论如何，即便要占领很小一个地方，似乎都颇费时日。而且军队不能把敌人占领的城镇留在后面而向前推进，自信数日之内即可攻克。新的防御工事是专家的工作，围攻也不例外，越来越依靠专家们确定进攻点，设计通向防御工事的壕沟系统。仍有人不愿承认有必要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围攻。直到16世纪末，指挥官们仍不得不亲自拿起铁锹说服他的士兵把挖壕沟修掩体当作士兵的部分工作，而不单单是民工的事情。人们常常试图靠机巧或诡计而不靠实力去攻打城镇，在指挥官及其雇主们意识到新发明或选自弗龙蒂努斯（Frontinus）著作中的老把戏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代替那缓慢的、有条不紊的步步进逼这一事实之前，许多智力被浪费在试制特种炸弹、远距离放火台、轻便的防弹装置等等上面。

绝大多数攻击行动包括：把两个或三个炮队安置在距离城墙最薄弱部分几百码的地方并且炮轰对方炮队所在的棱堡，直到一方打开了一个突破点而另一方无法发挥侧翼的火力。但最轰动那个时代的围攻——帕尔马对安特卫普14个月的攻击却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因为这次攻击采取的规模，还因为兼有方法上的坚韧和从事的试验。^[21]当刚刚接触到这个城市那闻名的棱堡防线和多边形城堡时，守军的命运在河水泛滥的城外旷野已经注定下来了。帕尔马对安特卫普的计谋在他向此城进军之前已经路人皆知了。可以增援这座城市的唯一方向是北方，沿斯海尔德河逆流而上；或西北方，用适当的方式决开堤坝使泛滥的河水深到足以让船驶越那高高的从斯海尔德河向东延伸的库文斯登堤。沉默者威廉的代表马尼克斯极力主张上述方案，但因屠夫行会对城市元老施加压力而归于失败；屠夫们不愿失去他们的牧草场。还

没来得及再做打算，帕尔马已经移师入境了；而尽管通向北方的土地被淹没了，库文斯登堤仍旧露出水面，成为补给的障碍。现在，补给只能从斯海尔德河顺流而下到达安特卫普。为了封锁这条路，帕尔马的工程师们修筑了一座著名的桥。他们从根特开挖了一条运河（在那里初步的构件已经做好），沿着这条运河，运来了一万株就地伐倒的树木和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的1500根船桅。这些材料被搭成了一座近2500英尺长的桥，中间的部分漂浮在船上，两端河水较浅的部分建在桩上，桩子深深地扎入河底并用交叉的横木加固，横木又被大钉和锁链固定。桥上道路的两侧筑有防弹胸墙，在每一端又加宽出来形成平台，从这里炮队能发射侧翼火力。在每一头的陆地上都有一座强大的炮台。为了粉碎任何来自被围城市的攻击，在上流一侧碇泊着一列船，三条一组地固定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平台，从平台上又伸出长长的顶端包铁の木柱，其他的船停泊在下游以备反击解围部队。

针对这一庞大的障碍物，安特卫普人发射了甚至更为著名的炸弹，即意大利工程师弗雷德里科·詹贝利设计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是两条被詹贝利做成浮动水雷的船。他把这两条船里面衬上砖，装满炸药，覆盖上一层砸碎的墓碑石和碎铁块充当榴霰弹并防止爆炸力消耗在空中。在这些上面他装上一层甲板并盖上易燃材料，以使这些炸弹看上去像是一些普通的火攻船。一条船上的引信是一根定时的火绳，另一条船上的定时装置为当地的钟表匠所造。计划是先让一队火攻船漂流下去摧毁保护桥的小船屏障，然后放出由水手操纵的定时炸弹（这些水手将在最后一刻游泳上岸）。最后，如果看到成功的信号，继之以满载士兵的船只去完成对桥的摧毁并占领两端的炮台。这次攻击在晚上进行。一条船毫无破坏力地漂到了岸边，但另一条碰到了桥并一直在那里燃烧；当时，西班牙士兵以为它是一条火攻船，没有多大警觉地试图用耙子把它上面的易燃物耙到水里。帕尔马本人还前来察看。完全出于一个幸运的机会当炸弹爆炸时他已经走开了。大约800名士兵被当场炸死并且带来了如此可怕的混乱以至于如果舰队从安特卫普驶出，这次围攻很可能被打破了。然而，这些混乱也影响了被派去侦察桥的荷兰水手，他们未能发出必不可少的信号。桥修好后安特卫普人唯一的机会就是占领库文斯登堤，当这也失败以后，这座城墙完好无损的城市除了投降外别无出路。[\[22\]](#)

当时的人们觉得守城与攻城在战事中的作用太大了，但事实上一定地点上的战役似乎并不具有决定意义——除了在失败的一方远离其基地的场合下，如葡萄牙人在阿尔卡萨。在欧洲，战场上的军队数额甚至很少达到2万人，而且，只要保障供给，把一支败军重新组建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结果，没有人十分急迫地要与敌人的有生力量决战，却把目标放在以占领要地迫敌退却方面以及使敌方在经济上窘困得无力继续作战方面。但是，即使像上述这样保守的说法可能比实际上采取的战略计划还要多。攻城战对于大多数军人所具有的吸引力以及它指出了明确的目标，这些事实无疑诱使指挥官们把作战就看作攻城，却不可能产生任何一点近代意义上的战略思想。因为那是这样一个时代：军事行动效率极低并且难以确保，^[23]而且财政问题与供给问题严重得无法从事长期计划。还有一种倾向认为：一支军队就是一种敌对的心理状况有形的显露，是一种武装起来的姿态，这种姿态只要一摆出来就部分地达到了目的，把它当作刺向一个明确目标的精确工具来使用是这一目的的延伸，但不是全部目的。没有人指望那些受着非战斗人员之拖累，攻打着一个个设防的欧洲城市因而疲惫不堪的小部队只靠一次辉煌的胜利或对要害地区的一次准确的行动就能决定一切，但其行动提醒人们注意：谈判已被加速推向战争。像拉扎鲁斯·冯·施文迪这样一些人的孤立的呼声强调必须集中注意力于战争结果，竭尽全力使其实现并不断地重新估计整个形势，^[24]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战役是某种只有当它开始进行以后才看得出水平的事物。只有两栖行动才必须在开始时就窥见结果，这种行动的成功有赖于战机的选择和军需品储备与运输的准确数量。抽象的“战略”概念是一种看待军事事业的方法；由于基本上没有“战略”概念，结果，那种任随军事行动被最初遇到的一些障碍所左右的倾向得到了加强。那些声称向士兵传授全部必须学习的知识并对战术问题如此津津乐道的教科书，对于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不能清晰地认识军事行动的目标也反映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缺少一种明确的、截然的划分。有许多战斗是非官方的；不过，政府时常试图将其臣民留在国内，究其原因，保存劳动力的愿望与限制他们涉足于别国战争的愿望至少同等重要。参加了葡萄牙人1582年进攻亚速尔战役的法国舰队就没有得到王室的正式批准。在英国于1585年正式援助尼德兰之前，许多英国人已经在为新教的荷兰而战，并在英格兰

征集了整连整连的士兵渡海前往尼德兰。即使当一个国家处于正式战争状态时，仍然有余地进行私下的活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诺里斯爵士在1589年订立的靠占领里斯本和亚速尔以重创西班牙的计划是作为民间冒险公司筹款的，女王是最大的股东。从给养的供应到战役的策划，政府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急切地把它的负担转嫁到民间个人的肩上，不顾这种做法意味着放弃统一性、持久性和对全局的控制。

陆地上的志愿服役与海上的海盗行为及其孪生兄弟——报复行为是齐头并进的。由于政府无力在其臣民的船只被海盗抢劫时保护他们，就出现了这样的做法，官方允许受到损害的一方可通过抢夺海盗的同胞的船上货物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借口报复，侵犯的行动从个人规模发展到国家规模。例如当时英国在大西洋上的私掠行为在1585年后得到鼓励，因为这种做法可代替与西班牙公开作战。海盗猖獗于各个海域：就连土耳其人也被迫建立了一支特殊的舰队以防基督徒海盗破坏他们在东部地中海的贸易。另外，武器的外流始终不断，不顾忌敌友关系也不管国家的政策。到16世纪末叶，某些战争物资被一致划定为违禁品而且各国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交战国有权阻止这些物资到达敌国。但是没有确定下来的是如何执行这一点以及什么是精确的中立地位，这导致了国际行为关系中高度的宽容，即使这些行为是进攻性的，仍不完全是战争行为。一个国家可以与其敌手和平共处，而其臣民们却也许正在陆上和海上厮杀；可以向敌手的敌人出借舰船和给养，允许敌手的敌人行军通过自己的土地而仍旧不是在任何正式意义上的战争行为。

16世纪中叶的军事思想很少顾及海上作战。舰船的用处被看作运送部队并在途中护航，到处骚扰敌人的海岸，封锁其港口，但在船只设计时，尤其是圆底船（round ship）的设计，军舰与总是构成主要战斗力的商船之间很少区别。只要海军战术主要为强行登船并以士兵的方式而非水手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海上的行动由陆军来策划并执行就无须以海军独有的方式思考问题。在此后两代人的时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军舰逐渐以一种不同于商船的方式来设计，舷侧炮战的战术使照搬陆军的做法减少了，在策划一次行动时，越来越注意倾听经验丰富的航海者们的意见。尽管有这一切，当16世纪结束时，海军仍是陆军的一门穷亲戚。海上的战斗很少被人写入书中；即使写到，其

位置总是在最后一、两章。甚至在英国这个海上利益迅速增长并在设计与驾驶战船方面独执牛耳的岛国里，也像过去一样，把重心放在向大陆运送部队或援助盟友在那里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人们为了陆上力量而牺牲了海军的行动，这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决不仅仅是人们在沿袭古典作家给予海战的地位。

在设计上发挥创造精神并且增加船只数量的情况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方。确实，土耳其的划桨战舰力量增强了，在勒班陀海战前两年的时间里曾以280艘划桨战舰和将近50艘其他船只向突尼斯发起过进攻。但是勒班陀海战使他们的舰队威望扫地，他们也没有再尝试恢复其作战方式。意大利各邦的划桨舰队按规模大小排列从威尼斯、热那亚直到皮埃蒙特地区，但它们的责任只局限于监视海盗，而在勒班陀海战以后，意大利人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足以表示他们抵制了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传统的行动，这种传统来自安德列阿·多里亚，也由于西班牙利用意大利牵制，但又不重创土耳其人免得使威尼斯得利的政策。

意大利各邦和土耳其都没有深入到从事其他大国正在忙于从事的漫长的横渡大洋的航行中，继续使用划桨战舰作为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类型的战舰。它速度快，而且当帆船因无风而停止或因逆风而受阻时，划桨战舰仍能使用。由于所有的划桨战舰在操纵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一国舰只与另一国舰只极易联合。但在北方，圆底船的海上价值更大，而且，在海上维持一艘划桨战舰的大批桨手的费用（即使作为罪犯不必付给他们工钱）构成了另一个因素，它导致对划桨舰只的使用只限于内河的巡逻。另外，人们对舷侧火力的兴趣越来越大，而划桨战舰的大炮只能安置在船头和船尾。但是，即使代表未来的是圆底船，那也是一种被划桨战舰的长形线条修正的圆底船。有一段时间，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战舰、桨帆并用战舰似乎成为理想的战船了。它是按划桨战舰的比例造成的帆船，为舷侧火力铺有甲板，有前后船楼，必要时靠每侧大约30支桨来推进。到16世纪末，桨帆并用的时尚消退了。但是，尽管大帆战舰作为主要的新型战舰已放弃了划桨，但划桨战舰在使大帆战舰保持长形线条上仍有其作用；而且为改进大帆战舰的机动性充当了一种试验模式。

大帆战舰在这一时期成为北方国家主要的战舰，并且很容易发展为更先进类型的战舰。它是人们认真讨论的产物。在讨论中实践的经验 and 先验的计算（它比到那时为止的船舶设计中的计算方法更加科

学）都发挥了作用。大帆战舰同商船相比，在长宽的比例上相对长一些；而且，即使没有平铺的甲板，它也只有退化了的前后船楼，而商船则保留着它那些甲板上的累赘。大帆战舰的体积有差异，可以是100到300吨，也可以是800或1000吨，这分别是1588年英国和西班牙最大船只的体积。（商船可能又大了一半，葡萄牙船只的佼佼者“修女迪奥号”达到1600吨）战舰龙骨的长度以及在这一时期也经过试验的帆的设计使战舰比商船更为灵活。但是，即使所有这些变化使大帆战舰特别适合于作战，它仍旧兼有商船的海上耐久力并且大得足以装运给养、军械而且还有剩余的空间可以装载战利品。它的独立作战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可以使政府在战时无须让商船与之配合的程度；另外，对于建造大到足以在战时使用的船只，政府仍旧在发放津贴。仍有人在为旧式舰船辩护，这种船浮出水面更高，带有巍峨的高层结构，这样显得强大有力而且在攻击和防备敌人上船这方面确有其长处。但是从每次关于平甲板还是凹甲板，覆盖式中甲板还是开放式中甲板，要速度还是要大炮重量的争论中，那中等体积、速度快、低船舷、方形船尾或有横梁的船尾并靠风帆推进的大帆战舰越来越成型了。英国的讨论最为活跃，在这里，由于海军部（Navy Board）的高效率，讨论的结果可以最迅速地加以利用，即使如此，从丹麦到葡萄牙也在制造堪称典范的舰船。围绕着舰用炮的类型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588年以前，西班牙人一直偏爱加农型大炮，它射程近但是能发射大而重的炮弹；英国人专注于射程较远但威力较轻的长炮；结果是，无敌舰队无法靠近英国舰队去摧毁它的船只，而英国人则虽能打到西班牙人，但是炮火的威力太轻，不足以造成重大伤害。此后的趋势就是增加舷侧炮的重量，尽可能使弹道接近直线。无敌舰队在驶入英吉利海峡期间炮火的不准确和效率低是惊人的。“整个行动期间，西班牙炮兵的全部战绩有赖于小艇‘快乐号’船长考克斯和20—40名水手，而为了做到这些，他们燃放了近10万发重型炮弹。”^[25]英国的炮手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表现导致人们在某些方面怀疑舷侧炮战应否取代强行登船战术。马修·萨克利夫于1593年写道：“那是一种胆怯而且无效的进攻方式，舰船应为果断的登船作战装备，当然还要‘航速高，拐向上风时迅速灵活’。”^[26]然而，另一位当代人显然感受到了进步；沃尔特·雷利写道：“在我生活的时代，英国舰船的外形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在计划取消中桅（这样就使得无论在海上还是在港内的大船都轻松许多）以后不久，又有了链式水泵，它的排水量为一般

水泵的两倍。我们后来又有了帽帆（bonnet）和曳帆（drabbler）。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还发明了翼帆、上桅帆、斜杠帆和中桅帆。用绞盘起锚也是新的，而且，我们装备的大炮也比以前好了。”^[27]“复仇号”能够抵挡住15艘西班牙军舰并且击沉其中4艘的作战方式，伊丽莎白的军舰没有一艘毁于风暴的事实都可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由行进中的舰船依次向敌舰的水上部分发射舷侧火力，在能够近距离平射以前不要匆忙射击并在射击时瞄准吃水线部位，这些已经变成帆船战术的主要内容了。早在1574年，腓力二世就受到警告说英国人用舷侧火力轰击船身而不是轰击索具已有30年左右了，不仅双方在大西洋上的小型战斗，还有1582年在亚速尔和1588年在英吉利海峡的大战的教训是，应该尽可能地不要匆忙射击，最好从编成队列行驶的船上发射，并且一次发射一侧的炮火。把队列战术编成精确的操典的工作尚有待时日，但是圆底船设计的发展说明这种战术可以最有效地用到圆底船上。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防守的队形，西班牙人的新月阵之强固是令人生畏的，任何敌船只要处于这种队形之一翼的下风方向，它就如同落入陷阱一样。但是，由于每次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人们并没有从那悲剧的重演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同北方相反，地中海在设计上仍以划桨战舰为基本类型，因此划桨战舰的战术仍是老样子。轻巧的划桨战舰其长度正好能在恶劣的天气下跨越三个浪峰，它成为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所使用的主要的舰型，各国之间区别不大。威尼斯由于把批量生产的方法与造船大家族在庞大的武器库内的竞争结合在一起而占有的领先地位已经变成传统的束缚；而巴塞罗那、马赛和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场主们由于与国家政策的结合不甚密切，进行了更加自由的试验从而使威尼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现在，她不得不通过改进帆与桨的设计，改进导致颠簸的船头形状，改进座位的安排来急起直追，不过这些都是温和的变化。北方对于大帆舰的挚爱在像马修·贝克这位造船主的图画中以及哈克卢特的描述中清晰可见，南方对于划桨战舰的挚爱也同样强烈，同样真诚。正如那些最尖刻的批评家针对16世纪中叶威尼斯的划桨战舰所说的那样：“完美的划桨战舰在各方面都应该像一个仪态万方的姑娘，她的每个姿势都应显得机灵、敏捷、活泼，同时又不失其庄重。”^[28]勒班陀战役只是无数小冲突的最全面的缩影；这些冲突都受到划桨战舰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的影响，即需要使炮火和冲撞力直指敌人、需要把适当的陆上

战术运用到那些靠桨使自己像骑兵一样灵活的船上。在基督徒的舰队里有圆底船，尽管人们指望它们能上前加强作为主体的划桨战舰的两翼，但还是认为它们与主要的战斗队形无关。在另一场合也许成为一场陆战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六艘桨帆并用舰的使用，当它们无法前进时就被艰难地拖着走，它们被每两艘并在一起停泊在基督徒舰队前方1英里的地方，用炮火帮助打乱用划桨从它们面前驶过的土耳其舰队的战斗队形，并像他们的敌人一样散开成为三个主要的集群。刺激海战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正是远涉重洋的贸易：英国急需有适于航海的远距离奔袭船，西班牙急需快速商船和专门用来通信、护航、护港的舰船，荷兰和葡萄牙需要那种能够在驶往南美或东印度的航行中保护自己的巨型货船。至于划桨战舰，由于很少驶到海克力斯之柱^[29]以外，就没有任何动力来促其改变了。

政府仍旧急于把大量冒险的计划交给有进取心的个人，但在海上作战这个领域里，某种类似战略思想的东西显露得最清楚：是计划由英国向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岸进行各种突袭，还是接受更为普遍的观念，即在特别要害的通道上长年保持一支执行警戒任务的小舰队，或者出动一支作为攻击力量的主力舰队去摧毁敌舰而不是在国内等着它们来侵犯，抑或集中摧毁敌人的战斗舰只而不是连商船也不加区别地予以袭击。不过，即使对海上行动的计划比对陆上行动的计划更容易进行通盘考虑，在贯彻计划时则几乎是同样困难的。人们能发现同样的效率低下、缺乏训练、贪污挪用的现象，补充人员的方式也不是一贯的。船上狭小的空间和腐败的食物这些条件严重地降低了每一次行动的效率。而且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缺少明确的舰队体系，即那种与效果日见明显的陆军编制相对应的体系；二是如何在一个舰队里平衡士兵和水手的权利。在后一个问题上，一种变化发生了，最明显的是在英国：水手们不再被看做是一支发布命令、操纵枪炮、进行战斗的军队服务的驾驶员，海军逐渐被看做是一支自成体系、自我维持的军队，军种间的竞争要受联合行动的限制。即使在英国，后来的冒险行动每次都与西班牙进攻杰尔巴的灾难性结局相差不远，1559—1560年，在杰尔巴，由于海军和陆军之间缺乏配合，西班牙惨败在土耳其人手中。如果说仍存在一种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一名陆上军人的倾向，那么另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就是他要依赖其海上同事们的献计献策，在那些陆战与海战技术分歧最尖锐的国家里，这种倾向也最强烈。

在陆地和海上，战争发生的气氛仍在变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人们对纸上的条约极不信任，而且国家之间的争端由于国内的和宗教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过去，由法律、基督教、社会和朴素人文主义混合而成的含混不清的思想基础曾有助于抑制士兵的破坏性的本能，维持这种思想基础的则是士兵们为之而战的那些直接的原因。现在，在从效率出发要求士兵更加无条件服从的同时，他的敌人也被非人格化了，成了一个异端分子或反叛者，一个没有权利的人，而士兵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这种改变了的气氛没有影响到战场，因为士兵在真正的战斗中的行为基本都一样；但是这种气氛确实影响到了如何对待平民、战俘以及被占领的城镇的居民，还败坏了谈判的方式。谈判的进程十分艰难，由于担心暗杀和奸诈行为，每项书面许诺都要求有人质做保证。16世纪前1/3的时间里规模空前的战争行为所导致的政治与法律的动荡尚未解决，法国的内战和信奉新教的尼德兰从西班牙分离的暴动又引起了更大的问题。再者，此时没有一场战争不能喻之为十字军。尽管宗教宽容得到为数不多的宗教派别和狂想者的倡导甚至实践，西班牙士兵则知道，他们的义务就是毁灭新教，同样，新教徒发誓要将崇拜偶像者和罗马的暴军斩草除根。携手并进的不仅有宗教和抵制，还有虔诚和征服。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拿起光荣的刀枪！
跟在高贵的诺里斯、
常胜的德雷克身旁。
血红的十字架，
是勇敢的英格兰的徽章。
在陆地，在海上，
用你的征服之剑，
杀出一条血路，
把宗教的虔诚弘扬。[\[30\]](#)

战争对个人勇武的否定还远未达到连侠肝义胆的姿态或慷慨大度的行为都容不下的程度，而且大部分由小冲突、小攻击组成的战役为勇猛和冒险者提供了许多机会。不过，战争的法律和惯例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法律基础之上、由那些常常以个人能力而不是以政治一军事能

力采取行动的人们创造的先例所形成的那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且对于将领们来说，作为个人而不作为一项事业的工具去采取行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仍有人挑动一人对一人的战斗（职业心理最强的西班牙将领从来不干这种事），但是甚至连接受这种挑战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对于有条件投降的城市的处置基于一个粗略形成的尺度，即对于围攻者抵抗越久，该城可以得到的让步就越少。不过，极端的顽强也可能从一个钦佩此举的征服者那里得到温和的条款。无论如何，阿尔发在尼德兰的有组织的暴行和帕尔马对城市守军及平民的残忍都是一种既定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允许西班牙军队自行补偿薪饷的不足并威慑其他城镇使之屈服。屠杀西舍的守军后，法尔内塞在一封信中向他母亲解释这是为了告诫其他城镇一听到西班牙军队的第一声炮响就要立即投降。在这里，选择的自由屈服于精心策划的暴行，就像土耳其人所追求的那样，他们杀害、拷打或奴役俘虏以散布一种可以瓦解斗志的恐怖。有时，一个城市的命运也许在一念之间决定下来。例如，苏利之所以饶恕一个固守之城的市民乃是因为替他们求情者为一绝色妇人。但总体看来，人们都认为对于异端分子或反叛者而言，处境是再坏不过的了。成千小伤痕的创痛很快就愈合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复元也很快；即使草民们受苦了，军事合同却使他们的强邻发了财。法国、荷兰、英国经过各自的战争显得比从前更富足了。但是，在被如此经常地从战争史中抹去的关于平民苦难的附录中，有材料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个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悲观和恐惧的时代。

（施青林 译）

[1] 《四篇悖论或政治论文》（伦敦，1604年），第109页。

[2] 阿农（Anon）：《骑兵操典》[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新丛书》第19种，142（1）第一]。

[3] G. G. 兰萨姆：《来自佛兰德的消息》，引自《军事著作与都铎时期的诗歌》（纽约，1951年），第141页。

[4] 马修·萨克利夫：《军队的行为、诉讼与法律》（伦敦，1953年），第2页。

[5] 详见弗里茨·雷德利克《德国的军事企业家及其劳工》（威斯巴登，1964年）第1卷。

[6] 《国家之理性》（P. J. 与D. P. 韦利翻译；伦敦，1956年）第10卷，第11章，第192页。

- [7] 乔尔·赫斯特菲尔德引自佩克的《渴求的珍本》，见《女王的卫兵》（伦敦，1958年），第257页。
- [8] 兰萨姆引自《军事著作与都铎时期的诗歌》（纽约，1951年），第132页。
- [9] 罗伯特·巴雷特：《近代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伦敦，1598年），第6页。
- [10] 贝伊是土耳其官职名称，参见第11章。——译者注
- [11] 加布里埃尔·西莫尼（Gabriele Simeoni）：《再生的恺撒》（巴黎，1558年），第114—116页。
- [12] 米歇尔·罗伯特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第2卷第191页称这支军队为“近代第一支真正的国民常备军”。
- [13] 米歇尔·罗伯特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第2卷，第203页。
- [14] 桑索·德·朗多诺（Sancho de Londono）：《论士兵消费的方式与途径，如何把军纪整顿得更好以及从前的状况》（布鲁塞尔，1589年），第35页以后。
- [15] H. G. 法默引自威廉·加勒德《战争艺术》（1591年），《16世纪与17世纪的行军》，载《军事史研究会刊》（1950年），第49页。
- [16] A. L. 罗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与美洲》（纽约，1959年），第76页。引自拉尔夫·哈默《弗吉尼亚，当前情况的真实说明》（1615年）。
- [17] 详见C. 西波拉（C. Cipolla）的《枪炮与船帆》（伦敦，1965年）。
- [18] J. U. 内夫引用，见《战争与人类进步》（哈佛，1950年），第30页。
- [19] 罗伯特·巴雷特：《近代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伦敦，1598年），第75页。
- [20] 译自*De Sterctenbouwing*（1594年），载《建筑数学》（1608年），第658页。
- [21] 时间最长的是奥斯坦德的保卫战（1601—1604年），但在这次战役中，这个城市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并组织反围攻行动。
- [22] 参见L. 冯·德·埃森的《亚历山大·法尔奈泽》第4卷《对安特卫普的围攻》一节中精彩的描述（布鲁塞尔，1935年），散见于书中。
- [23] 关于一个指挥官面临的问题所做的最好的说明见对于德拉努在尼德兰为新教事业服务的描述，载于《弗朗索瓦·德拉努通信录》[由P. 克文·德·沃克尔斯比克（P. Kervyn de Vokaersbeke）汇编，（根特，1854年）]。
- [24] 克莱格迪斯科尔（Kriegsdiskurs）（1577年），刊印于E. 冯·弗劳恩霍尔茨（E. Von Frauenholz）著《拉扎鲁斯·冯·施文迪（Lazarus Von Schwendi），第一个论证普遍义务兵制的德国人》（汉堡，1939年），着重参见第200、228、236页。
- [25] 米歇尔·刘易斯：《无敌舰队的大炮》，载《海员便览》第29版（1943年），第168页。

- [26] 《军队的实践、行动和律令》（伦敦，1593年），第280页。
- [27] G. J. 马库斯引自《英国海军史》（伦敦，1961年），第1卷，第58页。
- [28] 艾伯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引自《卡纳尔的克利斯托弗·勒班陀战役以前的威尼斯海军》（巴黎，1962年），第29页。
- [29] 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二岬。——译者注
- [30] 乔治·皮尔：《一篇告别辞》（伦敦，1589年），第23—28行。

第八章 1559—1569年的不列颠问题

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结束了一场已经成为“疲马之间的赛跑”的战争，虽然那场战争开始时确实并非如此。这是在精疲力竭的状况下实现的和平，而和平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在后来的许多年间，没有一个西欧国家感到有足够力量去冒另一场全面冲突的风险。不过，尽管全都怯于开战，但有些国家仍然怀有损害别国的意图。所有国家都苦于内部动荡的折磨，^[1]那种动荡造成消耗的局面，并随着宗教意识的危机而加剧；内部动荡又使得一切心存不满的势力反复燃起希望，试图去破坏1559年达成的解决办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该解决办法中，不列颠群岛占有关键性的地位。因为条约使西欧两大强国之一的法国几乎完全被另一强国西班牙的领土所包围。法兰西周围几乎完全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统治的地区：从西班牙本土，经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到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的港口、帕尔马和米兰，还有依附的科西嘉岛、热那亚和与弗朗什孔泰接壤的萨伏依—皮埃蒙特以及尼德兰。如果不列颠群岛或者至少英格兰岛能补充进来，就像玛丽·都铎与腓力二世成婚期间（1554—1558年）那样，那么包围圈就没有缺口了，而且基本上是牢不可破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国人不仅能够控制苏格兰而且能够控制英格兰的话，就可以把通过英吉利海峡和多佛海峡的海路对西班牙人关闭起来。尼德兰就会成为一个孤立的前哨。它同西班牙人的主要权力中心之间，就只有通过热那亚、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这一漫长的陆上路线才能取得联系，而那条陆上路线离法国边界不远，因而受到法国的很大威胁；因为法国保有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大主教管区，可以从那里控制洛林，而且法国暂时还保有皮埃蒙特的一些要塞，因此，如果能把英格兰拉入法国人的阵营，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整个体系就会受到危害。

由于这些原因，不列颠群岛的内部动荡使得它们在随后的几年内成了危险的地区和西欧角逐的焦点。动荡不定的主要政治原因是英格兰王位继承的不确定性，以及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声称她对王

位拥有最高继承权。斯图亚特王室提出这一要求的根据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的亨利七世的长女玛格丽特的婚姻（1503年）。亨利七世既已与英格兰的宿敌之一法兰西言归于好，又想通过那一联姻结束与另一仇敌之间的同样久远的宿怨。亨利八世进行的第一次法兰西战争（1512—1514年）损害了他的父亲在苏格兰的事业；不过，苏格兰人于1513年在弗洛登遭遇的灾难（詹姆斯四世死在那里）和詹姆斯五世的长期冲龄引起的混乱，使英格兰20多年间在其北部边界免除了严重的麻烦。实际上，法国一心倾注于意大利战争，使得许多苏格兰人怀疑这一“老盟友”的价值，并驱使一些人梦想与英格兰和睦相处。詹姆斯五世的成年和亨利八世同罗马的决裂，使那种梦想遭到破坏，因为正当亨利抛弃教皇之时，詹姆斯却越来越依靠教会帮助他恢复他的王国的秩序。由于害怕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成为教皇对主张分离的英格兰进行十字军讨伐的基地——这种恐惧由于查理五世、弗朗西斯一世和教皇在1538年缔结暂时的联盟而具有燃眉之感——亨利乃采取不顾一切的补救措施。趁着查理和弗朗西斯再次发生冲突（1542年），他马上就进攻苏格兰。有一个时期看来胜利在望。苏格兰人在索尔韦—莫斯遭到的另一桩不幸促成了詹姆斯五世的死亡（1542年12月14日），并导致了另一个漫长的冲龄期，因为新继位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在她父亲去世时才出生几天。与此同时，亨利八世借助于同查理结盟，占领了布洛涅（1544年），迫使弗朗西斯退出战争（1546年），切断了苏格兰人的外援。

但是，亨利八世还未能完成他的事业，未能使苏格兰就范或确保玛丽·斯图亚特嫁给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就死去了（1547年1月28日）。他的死亡同样也使得英格兰陷入国王冲龄的情况，而且很快就发生了派别斗争和社会混乱。最后的胜利者诺森伯兰公爵，由于忙于国内事务而不可能示强于外，于1550年3月将布洛涅卖回给法国，并从苏格兰撤退。在此以前很久，亨利八世的“粗鲁的求婚”已经把苏格兰人再次推入法国的怀抱。他们的童龄女王被送到法国王宫（1548年8月），并许配给皇太子做未婚妻，而她的母亲、吉斯家族的玛丽则在法国的军队和金钱支持下掌握了苏格兰的摄政大权（1554年4月）。

这样一来，苏格兰就几乎成了法国的一个行省，而斯图亚特王室对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成了瓦卢瓦王室的要求。这一要求在爱德华六世死去时没有明确提出来，因诺森伯兰正为了他的

儿媳简·格雷的利益而用孤注一掷的阴谋去排挤半西班牙血统的玛丽·都铎，这似乎是做着法国国王想要他做的事情。此后，玛丽·都铎取得了胜利，并且嫁给了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就使英格兰处于西班牙一边，正像苏格兰处于法国一边的地位一样。但是，由于她无嗣而死（1558年11月17日），再加上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继承了王位，又使危险重新加剧起来。

由于伊丽莎白是都铎王室的最后一位君主，当然没有人还去设想她会决定“作为处女而统治并作为处女而辞世”。然而，在16世纪的卫生和医药条件下，生死之间不过咫尺，正像伊丽莎白自己在1562年的重病突出表明的那样。如果她也无嗣而死，下一位继承人按血统就应该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确，玛丽并不受英格兰新教徒的欢迎，而且经过国会批准的亨利八世的遗嘱已经把斯图亚特王族排除于继承权之外。但在王位虚悬时，血统将表明比羊皮纸文书和新教教义更有力量。这一情况在苏格兰人和法国人中间所激起的希望，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即英格兰的枢密院和国会提出了请愿书，极力要求伊丽莎白及早结婚。

法国人也未尝不抱着更直接的希望。伊丽莎白作为安娜·博林的女儿，很难承认教皇的权威，因为教皇曾将她母亲的婚姻宣布为私通，并将她本人的出生宣布为非法。然而，在天主教眼光看来，否定罗马就会使她不配当女王。在那种事态下，玛丽·斯图亚特就不单可以宣称她是血统最近的继承者，而且还能成为当前的君主。事实上，玛丽·都铎刚一死去，法兰西的亨利二世立即宣布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法国皇太子为英格兰王后和国王。他们招待英格兰议和官员的宴会上使用了印有英格兰王徽的餐盘。亨利无意急切地强行实现这一要求，担心这样会危及和平谈判并引起同西班牙的灾难性战争重新爆发的危险。不过，这一要求从未被正式放弃，而且它的声明表明，法国并未完全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就是要利用不列颠政局的动荡来使它同哈布斯堡对手之间的对抗形势发生不利于对手的变化。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使法国跃跃欲试而又使西班牙十分焦虑的形势。当然，在1559年的局面下，问题的严重性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可靠的保证，可以防止局面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任何人想充分利用这种局面都必须冒另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想打这样的战争。即使如此，在和约签订前，腓力就已十分焦急地向伊

伊丽莎白求婚，只要她愿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而生活。而在和约签订之后，他又急切地怂恿他的奥地利表兄弟查理大公求婚。像伊丽莎白自己的顾问们一样，腓力主要关心的是她应该尽快结婚并生下孩子。但是他还感到，为了万无一失，她还必须与教皇和解，使法国人无法以宗教借口反对她。

伊丽莎白和她的顾问们也充分意识到了危险。他们还意识到，英格兰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依赖着西班牙控制下的安特卫普，它为英国的大宗呢绒输出提供市场并提供诸如武器那样的重要的进口货物。他们还知道，英格兰经历了11年脆弱的政府治理和宗教革命，这已使它纷乱不宁，加之国库空虚，军队陈旧而且装备低劣，海军已失去往昔的威风，力量日衰，因此，它无力同法兰西交战。然而，他们也同样清楚地知道，伊丽莎白要对其臣民保持控制是多么有赖于她的政策要成为——而且要明确地成为——“纯英格兰的”政策。她不能去重复玛丽·都铎的错误。她不能为了自己免遭法国反对而去做西班牙的附庸和教皇恩佑下的女王。于是，她很快就开始推行一套方针，其果敢和独立性几乎使西班牙人感到惶恐。

她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1559年4月的宗教决定，它实际上与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签订是同时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初的意图似乎只是重申王权对教会拥有的至尊地位，其他方面则尽可能不变。然而，她最终采取的政策更为大胆。清教徒和他们在国会中的朋友们的压力，可能推动了她进一步采取行动；或者，也许是她看到了与法国的媾和已确有保证，而西班牙又是那样急切地需要她存在下去，于是就决定比她最初认为是明智的做法走得更远。无论如何，王权至尊法案再次废除了教皇在英格兰的一切管辖权，同时，一体化方案又恢复了爱德华六世的第二部（1552年）祈祷书，只是稍作了一些修改；所有其他礼拜式均在禁止之列。的确，一体化贯彻得十分不彻底，而且在1563年以前伊丽莎白一直同罗马进行着秘密谈判，因此腓力二世得以说服教皇不开除她的教籍。然而，那两个法案已经十分明确地把英格兰置于新教阵营，因而使玛丽·斯图亚特更易于以合法的天主教继位要求者的身份去反对一个非法的异教篡位者。法国人仍然十分明显地不愿把这一继位要求推行到引起战争的程度。不过，如果英格兰人的进逼严重威胁到他们对苏格兰的控制，他们就可能不得不诉诸战争。

这种可能性由于1559年初夏在苏格兰爆发的革命^[2]而迫在眉睫。这场革命像尼德兰发生的反西班牙的革命一样，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而增强了势头，既带宗教性，又带政治性，还包含着经济上不满的因素。苏格兰教会的巨大财富为穷贵族和一个新兴的城市贵族阶级所垂涎，而且已经被他们大肆侵夺；他们带着嫉妒的目光看到边界那边的同侪们靠着对教会的抢夺而肥了起来。教会安然自得而又不以仁爱为怀，乃是穷人怨恨的原因，他们的怨恨在《乞丐敦促书》（1559年1月）中强烈地表现出来。教会纪纲废弛，对乡镇教区事业漠不关心，这使得它失去了信徒的支持，就像它自己的领袖们在得到允许召开的最后几次省区会议上所承认的那样，但为时已经过晚。教区的信徒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如饥似渴地期待着，但并未得到满足。于是他们许多人就热切地去倾听新教传道者讲述新的教义，那种新教义已穿过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边界和越过海洋传播过来。到1557年末，一些有影响的贵族人物加入到他们中去——阿盖尔、莫顿、格伦凯恩、厄斯金以及玛丽·斯图亚特的异母兄弟詹姆斯·斯图尔特勋爵。这些“圣约同盟长老”的加入，为新教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种政治力量；若没有他们，宗教改革运动就绝不可能拥有那样的政治力量。不过，他们的加入既具有宗教性，也同样具有政治性。

因为正是政治上的不满，才使得1559年的革命成为可能；那种不满所针对的是女王的母亲、吉斯家族的玛丽的的外来统治。她从1554年起当上了摄政。1548年开进来的法国军队，以及法国的金钱，才使她得以从汉密尔顿家族的首领沙泰勒罗公爵那里把摄政权牢牢地抓过来。她一直不过是亲法派的领袖，而她企图加强其控制的所作所为，只是促成了另一个派别的复兴，那个派别长期以来就反对与法国的联系。要塞里的法国驻军在市民中间激起了爱国主义的敌忾情绪。法国人占据了国家和宫廷要职，甚至最后由迪鲁贝充当枢密大臣，实际上取代了信奉天主教的戈登家族首领亨特利伯爵的地位；这就激怒了当地的贵族以及至少是一些当地的主教。到1559年时，这位摄政显然已为时过晚地采取了一种断然的立场去压制异端的发展，却把所有贵族和平民的不满、政治和宗教的不满都汇合了起来。因此，她力图制止在珀斯召开的新教大会，就使她在1559年5月陷入了与长老和圣约会众两方面的公开冲突之中。在那年的夏季，一场迅速扩展的暴动席卷了苏格兰低地和一部分苏格兰高地。洛林的玛丽和她的法国随从被围困在利斯。约翰·诺克斯回来帮助组织了一个革新的新教教会，使它充

满了加尔文教义的精神。圣约同盟长老团显然正在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权。

即使是厌倦了战争，但还担心异教在他自己王国内发展的亨利二世，对于法国的势力和罗马教会在苏格兰所受到的这种威胁也很难置若罔闻。不过，就在这个时刻，亨利二世在一次比武中偶然受伤身亡（1559年7月），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年幼的弗朗西斯二世继承王位，而法国的政策决策权则落入了玛丽的两个舅父——吉斯公爵和洛林的枢机主教手中。在争夺亨利二世宠信的斗争中，吉斯是温和的蒙莫朗西的主要对手；正是吉斯，曾于1558年从英格兰人手中夺回加来，现在他又成了法国天主教徒的初露头角的保护者。他那样一个人决不会听任他的身为摄政的姐姐毁于圣约同盟长老团之手。从他掌权之时起，苏格兰人就知道，他们迟早既要对付固守在利斯的摄政的兵力，还必须对付另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支军队在吉斯家族的另一位兄弟埃尔伯夫统率下很快就在皮卡迪开始集结，他们也知道，埃尔伯夫的军队一旦开到苏格兰，革命的前景就将十分黯淡。因为他们的运动虽然来势迅猛，却缺乏持久力。在内部，那些既反对法国又反对罗马的人们同那些只反对法国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除此以外，贵族们还被家族世仇所分裂，而且无论长老还是圣约会众，都没有钱支持他们的人去长期作战，甚至也无钱供给枪炮和攻城装备去攻陷利斯城。

面对法国人大规模干预的前景，苏格兰人转向了唯一能够援救他们的强国，即新教的英格兰。伊丽莎白已经在7月间帮助过他们从一次挫折中重振起来，那次她用法国货币支付了一笔秘密的援款，而且厚着脸皮欺骗法国大使。但是现在所需要的是某种更实在而且更为公开的援助——军队，攻陷利斯的攻城装备、武器、弹药，用来截击埃尔伯夫的战舰。英格兰也许能够提供这些重大援助。在没有风暴和气候方面的意外变故的情况下，她的舰队是能够对付埃尔伯夫的战舰的。幸亏塞西尔理财有术，幸亏招募了德籍雇佣兵，还幸亏格雷沙姆从安特卫普获取军备和军需品方面的功绩，她的财政和军事资源现在足以在利斯进行一次快速的决定性打击。不过，如果第一次打击失败，就没有什么后备力量来进行第二次打击了。同法国人的战争必定会接踵而来，在那场战争中英格兰将为自卫而历尽艰辛，苏格兰人的事业必败无疑，而法国人却拥有了一切口实郑重其事地提出由玛丽·斯图亚

特继承伊丽莎白王位的要求。即使西班牙认为可以去营救反对天主教保护者的新教叛乱者，西班牙人的干预也只能是把不列颠群岛变成一场新的哈布斯堡—瓦卢瓦冲突的战场，而经过那样一场冲突之后，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不可能期望保持完整无缺的独立性。简言之，如果伊丽莎白答应苏格兰人的请求，卡托—康布雷奇的整个安排就会再次陷入争议，而西欧的全面战争就会跟着发生。

因此，伊丽莎白的枢密院多少有点犹豫地建议她立即从海陆两路进行干预，而她于1559年12月予以拒绝，也就不足为怪了。她在陆路方面还不愿有所作为，因为派遣一支军队开进苏格兰，就意味着必定而且直接地同法国开战。不过，在她的国务大臣塞西尔的敦促下，她派遣威廉·温特爵士率领她的一部分舰队开抵福思湾。他应做的是在海上或在福思湾“对法国海军做点有实效的事情”，虽然还要“就你自己的果断”找到某种无损于他的君主的借口。至于法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种借口而不介意这种举动，恐怕没有什么把握。不过，击溃埃尔伯夫的舰队，至少就可以赢得时间，而时间将会表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驻法国的英格兰大使思罗克莫顿的报告中所称在法国反对吉斯家族的势力日益增长属实的话。即使如此，伊丽莎白和塞尔西也是在冒一场风险，它使一些顾问感到惊恐，使西班牙人感到震惊。

像通常那样，好运光顾了她。温特的船只安然冲过了风暴，但是风暴却摧毁了刚出海的埃尔伯夫的舰队。在另一支舰队准备就绪之前，就发生了昂布瓦斯阴谋（1560年3月），吉斯家族忙于应付国内局势。那桩阴谋虽然因运筹失当而流产，但却显出法国国内的形势不容许法国在苏格兰作进一步的干预或同英格兰进行严重较量。伊丽莎白已经通过贝里克条约（2月27日）把苏格兰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现在，在3月底，一支英格兰军队带着攻城装备越过了边界。

腓力二世被这一新教独立的前景所震惊，而且十分担心它的后果；他要求英格兰军队撤退，并提议派遣一支西班牙军队去维持局面，以待达成和解。然而，伊丽莎白已经缜密地衡量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两方的威胁，她把法国人从苏格兰赶出去并不是为了让西班牙人进来。腓力的要求和提议都被拒绝了。在没有大陆进一步干涉的情况下对利斯城进行了围困。吉斯家族的玛丽已经死去，该城于7月间投降。从法国派出的谈判使节们被授予全权去尽其所能争取最有利的议和条件，就是他们在爱丁堡缔结了和约。除120人外，全部法国军队马

上离境回国，把苏格兰留给信奉新教的亲英派治理，而正是他们的统治曾引起了反叛。按照这个条约，玛丽和弗朗西斯二世许诺此后不再使用英格兰的王徽和尊称，而且放弃玛丽对这个王国的一切权利要求。在一项单独的“特许”中，他们保证了苏格兰的法律和自由，许诺永远不再把法国军队派到那里，并答应只任用苏格兰人担任那里的高级官职。

实际上，玛丽和弗朗西斯坚决拒绝批准由他们授予全权的使节们所签订的条约。不过，这个条约毕竟是走向确保苏格兰独立并建立英格兰—苏格兰和睦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和睦关系使大不列颠免遭外部势力的干预，而在过去十几年间，大不列颠一直受着外部势力的威胁。苏格兰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同英格兰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罗马；另一派也同英格兰联合起来则是由于对法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军队第一次作为盟军开进苏格兰，而且作为朋友离开。

然而，苏格兰的独立和英格兰—苏格兰和睦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宽阔而牢固的。新教还不是苏格兰民族的信仰，而只是居统治地位的一个派别的信仰，而这个派别之所以得势，一半靠传教热忱，一半靠有利的政治局势。爱丁堡条约签订以后，政治局势也开始变化。老的僧侣和天主教贵族现在已鼓起了勇气，以为他们已可以维护罗马的信仰而不必因此就要支持法国人的统治。新教的首领们，特别是他们的领袖詹姆斯·斯图尔特勋爵和他们的最为足智多谋的政治家，莱兴敦的梅特兰，随着他们对法国的恐惧的消除，也开始对新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傲慢主张感到惊恐了。

“长老”同“会众”之间或者至少是同牧师之间的不和，随着召开等级代表会议解决爱丁堡和约搁置起来的宗教问题而显露出来了。1560年8月，他们通过了一些废除教皇在苏格兰的管辖权的法案；采纳了诺克斯和他的同事拟定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书；宣告任何举行或出席弥撒仪式的苏格兰人为有罪，初犯者没收动产，再犯者予以放逐，第三次犯者处死。这些法案在很少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虽然玛丽再次拒绝予以批准。然而，1561年1月的牧师《教规手册》就遇到了极其不同的对待。因为它涉及的远不只是教会的职司和教义问题。它提出了一种教会主持下的教育制度和赈济穷人与病残的方案。它主张教会对私人的道德和行为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并对公共事务拥

有发言权。它还要求占有旧教会的全部财产而无须向原来的僧侣或现在占有教会土地的众多俗人提供补偿。简言之，新的教会要求占有旧教会的全部财富和比旧教会拥有的全部政治和社会影响还要多的东西。等级代表会议对很多问题不准备让步。某些长老同意，如果原来的僧侣向新的牧师团体交纳补助金，就准许他们保有自己的土地。即使这一点也未能获得普遍同意或正式通过，长时间的争论只是暴露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派别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和。

然而，苏格兰的持续的内部动荡却为法兰西的不断加剧的内部动荡所抵消。弗朗西斯二世的死亡（1560年12月）突然结束了吉斯家族的优势。他们的对手蒙莫朗西家族和波旁家族，政略派（politiques）和胡格诺派，燃起了新的希望，一场权力斗争发生了，在两年之内就把这个国家投入了历经一代人以上的内战和宗教战争。那时，王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作为她的次子查理九世的摄政而执掌政权。她竭尽全力想法使敌对派别团结在王权周围，劝说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通过和平讨论解决他们的宗教分歧，因此她不可能冒险在国外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完全陷入自身权力斗争的吉斯家族，也不可能为他们的甥女玛丽·斯图亚特做多少事情，她现在作为国王的未亡人，对于身处法国的他们来说，价值已大为减少。

然而，玛丽还可以在苏格兰为吉斯家族，为法国，为罗马做些事情。约翰·莱斯利曾将一些老的主教以及天主教的亨特利、阿索尔、凯斯内斯和萨瑟兰等伯爵的建议转交给她。其中提出，她应当在阿伯丁附近登陆，集合北方天主教徒，领导他们反对爱丁堡。然而她不大可能认真采纳这项建议。不过她并不因此就屈服于诺克斯的指令：诺克斯表示，除非她首先改信加尔文宗，就不会容许她回来。因等级代表会议曾派詹姆斯勋爵到圣迪济耶见她（1561年4月），她从詹姆斯那里得知，新教长老们已准备允许她和她的随从私下举行弥撒，只要她接受现在的宗教安排，并同意他们做她的顾问。而且，詹姆斯勋爵还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会强迫她去屈从于伊丽莎白反复要她批准《爱丁堡条约》的要求。他们决不支持她现在就占有英格兰王位，但如果伊丽莎白无嗣而亡，他们就会全力支持她继承王位。

吉斯家族极力敦促玛丽接受这些条件并迅速返回苏格兰。他们在那里的事业几乎已被破坏殆尽，不过，如果她明智地行事，她可以使苏格兰的天主教免遭全部毁灭，还可以与法国保持某些联系。尤其是

现在看来，新教长老的介入已是说明伊丽莎白承认她在英格兰王位继承中的地位的唯一希望。至于玛丽是否具有实现那一任务的头脑或品质，或许还是个疑问。她才18岁，她“认为自己并不很聪明，但乐于接受明智的顾问和聪明的人士的指引”。她既然孤身一人在苏格兰，能够不像在法国听从她的舅父们指使那样去接受詹姆斯勋爵及其盟友的指使吗？显然，这正是詹姆斯勋爵和梅特兰所希望的事。如果他们能确保她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利，她能够不接受英格兰模式那样的温和的埃拉斯都式的新教吗？反正许多苏格兰长老宁愿接受这种温和的新教而不愿接受一些牧师们的神权政治主张。在一个苏格兰女王和一种宗教之下联合起来的大不列颠，就能保证苏格兰人可以抵制某种重复亨利八世的“粗鲁的求婚”或吉斯家族的玛丽施行的法国统治的情况。

当玛丽·斯图亚特于1561年8月19日踏上苏格兰土地时，她自己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对此我们就只能推测了。也许她自己的意图还远不如众多的历史学家设想的那么清楚；他们一直对那些意图进行着如此热烈而长期的争论。无论如何，在其后三年之间，她看起来是安于接受詹姆斯勋爵和梅特兰的指教，并像是在恰如其分地信守圣迪济耶的约定，虽然她也留心着不要使自己未来的行动受约束。她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当一群新教徒试图阻止她举行私人弥撒以后，她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概括说明了她的态度。该项声明以后又重新发表过几次；其中保证，一俟方便时机到来，女王就同等级代表会议解决一切宗教分歧。但是，它并未说明方便时机将在何时到来，也没保证最后的解决方式将类似于现在的方式。与此同时，它宣称不仅要对那些力图推翻现已确立的宗教形式的人们处以死刑，同时也要对以任何理由干涉女王侍从的任何人处以死刑。

牧师们继续在讲坛上大发雷霆，他们的会众则威胁着要杀掉“做弥撒的祭司们”。但是，在新教长老中间，正如诺克斯所忧虑的那样，“宫廷的圣水”不久就浇灭了这种热情。他们允许玛丽在巡游中以她的私人弥撒“玷污”斯特灵、珀斯、邓迪和阿伯丁。1561年11月，他们驳回了牧师们关于禁止这种“偶像崇拜”的正式要求，而且拒绝了关于他们没有义务服从一位崇拜偶像的女王的提议。在一个月里，他们又再次否决了通过《教规手册》的要求；而且他们虽然对所有的教会财产征收了1/3的税，但将课税所得的一半分配给国家，只留

一半用于维持新教牧师团体。事实上，这场冲突很快变成了新教长老和新教牧师之间的冲突，而不再是天主教女王同她的新教臣民之间的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新教长老们准备同天主教贵族或那些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首先效忠王室的贵族们分享政治权力。詹姆斯勋爵的两次出征和博思韦尔伯爵的流放，已迫使边境居民归顺。对亨特利和他那反抗的戈登家族的镇压（1562年10月），使得北方天主教徒慑服。玛丽热心地参加了对亨特利的征讨，其高潮是她将莫里伯爵爵位授予詹姆斯勋爵（11月），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当初到圣迪济耶时所抱希望是确有其事的。第二年春天，包括大主教圣安德鲁斯在内的48人被逮捕和定罪，其中一半的人被判处监禁；他们的罪名就是举行或参加弥撒。新教力量的这种显示，通过剥夺戈登家族和萨瑟兰的权利而更加突出，但这种力量的显示却再一次妨碍了新教牧师们在等级会议召开时赢得足够的支持去通过他们强烈要求通过的《教规手册》和为取得任何成果所需要的更加充分的规定。

表面上看来，这是莫里伯爵政策的又一次胜利。他已经控制了他在贵族中的政治对手。亨特利已经死去，而且他的后嗣已不能涉足官职；博思韦尔已被流放；诺克斯的最后一个贵族支持者阿伦已完全陷入了神经错乱。现在，莫里似乎也控制了新的支持者，甚至控制了长老会本身。但是，他同诺克斯是不和的。由于他拒绝听命于长老会，他已经沿着丧失长老会这个同盟者的道路走得很远了。而且，宗教再次变成政治争端。在各个地区，天主教徒都日益大胆地违抗禁止举行弥撒的法律，而新教徒，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却通过“契约”和盟约团结起来贯彻这项法律。随着双方敌忾情绪的增长，莫里的中间路线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最糟糕的是，他日益失去对女王的控制。他可能默许过，一旦等级会议解散就释放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和其他天主教囚徒。但是，看来他并不愿意答应1563年夏天为女王的侍从们在霍利鲁德举行的一次弥撒，那时女王本人已启程去西部巡游。诺克斯召集他的新教教友以压倒性优势出席了对破坏霍利鲁德弥撒的人们的审讯。当枢密院宣告诺克斯这一行为不构成叛逆罪时，玛丽怒不可遏，表露了她对莫里的监护日益不堪忍耐。

然而，使莫里的控制力遭到最大削弱的是他未能使玛丽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得到承认。早在玛丽于1561年8月刚返回苏格兰时，长老

团就派梅特兰去英格兰提出了这个问题。伊丽莎白再次提出批准爱丁堡条约的要求作为回答。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因为玛丽曾被正式宣布为英格兰女王，虽然她已停止使用这一称号，但从未正式放弃它。另一方面，条约要求她从此以后放弃这个称号和英格兰王徽。这一措辞形式不仅可用来否定她现在的王位要求，同样还可用来否定她将来继承王位的希望。因为经过法律确认的亨利八世的遗嘱，已排除了斯图亚特家族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而爱丁堡条约中的这一条款可用来加强遗嘱中此项规定的效力。因此，如果批准条约，就不但放弃了现在占有王位的一切要求，而且也放弃了将来继承王位的一切要求。现在，正如梅特兰早在1560年12月就向塞西尔提出的那样，苏格兰人的想法是，伊丽莎白应该承认玛丽为她的继承人，如果她本人无嗣而死的话；玛丽则应该批准经过如此修改的爱丁堡条约，并成为英格兰的可靠友邦和盟邦。

然而，要达成这样的妥协，还存在着严重障碍。障碍之一就是伊丽莎白本身。她愿意修改条约，让玛丽在放弃英格兰女王称号的同时，保留继承王位的权利。但是，她极不愿意承认这位苏格兰女王做她的继承人——实际上，她不到临终时绝不允许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她曾在她姐姐统治时期亲身经历过，在一位推定的继承人周围是多么容易产生各种阴谋，尽管当时那个继承人还不敢做得太过分，而且也不是一个毗邻王国的执政的女王。正如她向梅特兰说过的那样，她担心的是，如果承认玛丽是她的继承人，就无异于在她的面前铺开自己的裹尸布。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障碍。承认玛丽为继承人就意味着抛弃亨利八世的遗嘱。那个遗嘱是经过议会法案确认的，必须有另一个议会法案才能予以推翻。英格兰民族中有一个强大的、很有发言权的集团，他们在枢密院中有很大的影响，并在下院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他们来说，要在将来接受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半外国籍的君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简言之，伊丽莎白不仅有理由怀疑正式承认玛丽的继承权是否明智，还有理由怀疑那样做是否行得通。

尽管如此，当玛丽本人于1562年1月将梅特兰的建议提出来时，伊丽莎白表明她并非毫不同情。如果能够设法做出确实有效的保证，使她自己能继续占有王位，她似乎是，而且也许确实是准备承认玛丽的继承权。要设法做出这样的保证，几乎困难到不可能的程度。然而，

谈判虽然缓慢地却是一直友善地在进行着，到了1562年5月，还安排两位女王于初秋时节在约克或附近进行一次会晤。

正当此时，大陆事务又一次干扰进来。在法国，玛丽的舅父们再次取得了对国王和政府的控制权。因为卡特琳·德·美第奇的调和路线鼓励了胡格诺派大肆争夺优势地位，致使蒙莫朗西那样的温和的天主教徒把他们对吉斯家族的嫉恨抛到一边，并同吉斯家族联合起来去捍卫旧教信仰。波旁家族的首领那瓦尔的安东尼，出于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同他们联合起来。到1562年春，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向那位母后的权威挑战了。孔代和波旁家族的另一一些人，科利尼和夏蒂永，以及蒙莫朗西集团的另一些新教徒，不能容许对这种挑战听之任之而不加以抵抗。当吉斯的卫队在瓦西镇并非事出无因地屠杀了一些胡格诺会众时（1562年3月），双方的激愤爆发出来，导致了第一次宗教战争。

伊丽莎白最初力图不让这些事件影响她的苏格兰政策。她想帮助卡特琳在法国各派之间进行调停以达成一项和解，甚至或许通过对玛丽做出让步来促使吉斯家族妥协。但是，战争开始时卡特琳的权力就中止了，而且吉斯家族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于是，同玛丽的会晤不得不推迟。因为随着法国的胡格诺教派的挫折和损失的消息大量传来，一个英格兰议会势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那位吉斯家族的外甥女作为他们未来的君主。实际上已有迹象开始显露出来，似乎吉斯家族很快就要再次成为法国的主宰并能重新推行被昂布瓦斯阴谋和弗朗西斯二世的死亡所打断的计谋。还显示出一种可能，即腓力二世要保住他的尼德兰免遭异教传染的急迫心情（这种急迫心情已驱使他给予法国天主教徒以有限度的支持），可能胜过他对法兰西势力抱有的非宗教性的戒备之心。除非英格兰进行干预，去拯救胡格诺派并制止吉斯家族，即使西班牙宽厚地保持中立，玛丽也可能很快就获得法兰西的全部力量做她的后盾。而且，罗伯特·达德利勋爵和伊丽莎白的枢密院中的主战派认为，如果现在进行干预，她就可能像在苏格兰加强新教徒的地位那样，在法兰西加强胡格诺派的地位，使之成为对付吉斯家族的一个永久性的平衡力量和防止法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保证。她甚至还可能收回加来港，而以勒阿弗尔和迪埃普作为交换；后者正是孔代的使节正在极力加以出卖的地方。伊丽莎白同意了这一主张；她现在虽已不得不承认达德利不适于做她的丈夫，但或许较为愿

意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而听取他的意见。在8月里，她答应借给孔代14万英格兰银币，作为回报，孔代将勒阿弗尔交给伊丽莎白，直到加来交还给她时为止。

甚至在英格兰军队于1562年10月占领勒阿弗尔之前，孔代向宿敌出卖法兰西国土的行为，就几乎已经使法国各派感到震惊而清醒起来。他的几位追随者抛弃了他。吉斯于9月间向胡格诺派表示，只要他们不让英格兰人进来，就对他们普遍宽待。卡特琳于12月间也向孔代作了类似的提议，如果他能帮助促使英格兰人撤出去的话。然而，孔代不愿相信他的敌人的诺言而牺牲他唯一的盟友。伊丽莎白已让野心压倒了她早先打算促成一项和解的想法，拒绝放弃勒阿弗尔，除非把加来交还给她。于是战争就继续下去，而且各方面暂时都有利于吉斯。他在德勒的胜利（12月19日），使胡格诺派的军队被逐出了战场，并清除了他的大多数对手。因为圣·安德烈被杀掉，孔代被天主教徒俘虏，而蒙莫朗西则被胡格诺教徒所俘。那瓦尔的安东尼已在一个月之前受了致命伤。这样，在冲龄的查理九世的顾问大臣中，现在吉斯俨然占据了他以前在弗朗西斯二世顾问大臣中所占有的那种优势地位。驱使伊丽莎白进行干预的那种惊恐，已经变成了眼前的危险，这种局势必然会驱使伊丽莎白更深地卷入法兰西的争端中。

玛丽希望举行的会晤，就这样被往后推得更远了。她还有另外一些不能忍耐的原因。在1562年10月，伊丽莎白由于患天花而濒临死亡，据称在枢密院讨论王位继承问题时，玛丽的名字几乎没有被提到。后来，在1563年1月，英格兰议会开会了。不能指望它会对这一重大问题保持沉默，并非不可能的是它会强使伊丽莎白做出一项对玛丽的权利要求极为不利的决定。于是，梅特兰再次被派往伦敦，去力争玛丽的继承权得到承认，并力争许可为她向议会陈述理由。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提议由玛丽进行调解以确保与法国保持和平并归还加来，这一建议由于吉斯向英格兰驻法国大使提出了类似建议而显得更加增加了一点可信程度。

不过，梅特兰既准备了进行劝导，也准备了施加压力。他曾向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提出玛丽嫁给腓力二世的儿子唐·卡洛斯的可能性，并向卡特琳·德·美第奇谈及同法国的查理九世成亲的事。在这方面，梅特兰和莫里确实是在玩弄一桩非常危险的诡计。他们可能是想运用这样联姻的威胁促使伊丽莎白做出他们所需要的让步。可是，

如果谈判并未使伊丽莎白改变主意，而玛丽却嫁给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或法兰西的国王，那时他们的地位又将如何呢？苏格兰新教和不列颠独立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这一冒险碰巧暂时表明有其正确性，虽然并未带来利益。1563年1月，吉斯遇刺身亡。他的兄弟中，奥马尔和大修道院副院长于几天以后死去，埃尔伯夫被围困在卡昂，洛林枢机主教则已外出参加特伦托宗教会议。吉斯家族也像波旁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一样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所有这些大家族的首领或者只是一些幼童，例如那瓦尔的亨利和吉斯的亨利；或者是一些囚徒，例如孔代和蒙莫朗西。道路已经扫清，使卡特琳·德·美第奇得以再次掌权，把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各派联合起来，将英格兰人逐出勒阿弗尔（1563年7月），迫使伊丽莎白通过特鲁瓦条约（1564年4月）放弃对加来的要求。

不过，伊丽莎白在法国的干涉虽遭失败，却在阻止英格兰—苏格兰关系再次变成卷入大陆政治的危险关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那场干涉再次提醒那些企图损害别国的政府，要发动进攻仍然是多么危险。伊丽莎白帮助新教叛乱者反对他们的天主教君主已经吃了亏。从此以后，她虽然把法兰西、尼德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视为可利用来施加压力的集团而随时准备给予暗中的鼓励，但是当她已经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去同他们的合法统治者达成协议时，才采取不顾一切的最后手段，去怂恿他们发动公开叛乱。卡特琳·德·美第奇和比较温和的法国天主教派也准备达成一项谅解，以防止英格兰人对他们自己尚不稳定的事态进行另一次干涉，即使那样一种谅解意味着对玛丽·斯图亚特不利并拒绝以查理九世做她的丈夫。而且，不管围绕着卡特琳与阿尔发公爵1565年在巴约讷的会晤产生了什么传说，卡特琳的重新掌权，已使腓力二世对法兰西由来已久的全部疑虑重新复活起来。而且在此以前，由于唐·卡洛斯的疯癫，关于他与玛丽订婚的犹豫不决的谈判已告终结。这位苏格兰女王再也不能期望许身于法兰西的国王或西班牙的王子了，而且，再也没有一个其权势足以慑服伊丽莎白承认她的权利的大陆求婚者了。

实际上，即使与唐·卡洛斯订婚的威胁，对伊丽莎白的触动也只不过是微弱而缓慢的。因为，虽然议会在1563年并未敦促她指定一位继承人或选择一位丈夫，却使她更加敏锐地觉察到承认玛丽权利的实际困难。那年秋天，她一面提醒玛丽，如果同“法兰西、西班牙或奥

地利的孩子们”结婚，就会使承认变得不可能；同时她又带点含糊地提出，如果在国外，或者就在英格兰贵族当中，择一合适配偶，那将能使玛丽的权力得到审理，而且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能通过诸如长老团和下议院能够同意的措施而得到促进。1564年3月，她又往前走了一小步，提出了供玛丽选择的对象——罗伯特·达德利勋爵，为使其更为匹配，很快将他晋升为莱斯特伯爵。即使到那时，她也不愿答应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予以承认。正如塞西尔于1564年12月所写的那样，她必须靠着她的国家的法律和议会的同意来实行统治。

这里存在着难题。如果做更多的许诺，就不仅会在玛丽面前铺开自己的裹尸布，还会许诺出她自己履行不了的事。如果议会是1563年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那么，对苏格兰人的要求的最好的指望，正像后来对詹姆斯六世表明的那样，就是寄希望于时间和伊丽莎白的善意，而不是强行做出一项直截了当的决定。然而，那就需要比玛丽所能秉有的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耐心，难怪像梅特兰那样思路清晰的苏格兰人，也抱怨塞西尔“含糊其词，支吾其言”，或者怀疑“除了消磨时光，毫无意义可言”。

玛丽于是就转向了另一个求婚者，年轻的达恩利勋爵。达恩利的父亲在玛丽年幼时曾是同沙泰勒罗争夺摄政权的劲敌，在她继承苏格兰王位以后，又是争夺首要地位的一名劲敌。他的抱负受到枢机主教比顿的阻碍以后，就变成了承认亨利八世宗主权那一派人的领袖。他在1542—1549年的战争中为英格兰人而战，因而被作为叛国者而剥夺了权力，并从1544年起在英格兰过着流亡生活。他在那里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女士结婚，那位女士本是詹姆斯四世的遗孀、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同她的第二个丈夫安格斯伯爵所生的女儿，而那位伯爵曾领导过早年的亲英格兰派别。由于达恩利年幼，他的母亲又倾向于旧教，这就使得他不适合于在1559—1660年重新承担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承担过的角色，因为此时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不管怎么说也已经给伊丽莎白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同盟者。不过，达恩利毕竟还能够根据他父母双方的血统，在苏格兰王位继承顺序中提出对玛丽的下一轮继承地位的要求，并根据他母方的血统提出对英格兰的下一轮王位继承的要求。玛丽如果同他结婚，就能增强她在两个王国中的权力。

并无任何十分明显的依据去推测这桩婚事曾引起伊丽莎白的反对。1562年当伦诺克斯促进此事时，伊丽莎白把他关进了伦敦塔；但

是，他偕其妻子和儿子于次年被接回宫廷，备受荣宠。正如伊丽莎白向玛丽的使节梅尔维尔清楚地暗示的那样，她也充分意识到，那一设想在1564年已再次活跃起来了。然而，正是在伊丽莎白的要求下，伦诺克斯被允许回到苏格兰（1564年9月），在那里，他的地产被发还给他；也正是凭着伊丽莎白的许可，达恩利于1565年2月在那里与他相会。一个月以后，英格兰大使告知玛丽，如果她同莱斯特伯爵结婚的话，在伊丽莎白结婚或者宣布她决定永不结婚之前，不能宣告她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资格。这位英格兰女王除了明确敦促玛丽嫁给达恩利之外，几乎不可能再为达恩利扫清道路而做更多的事情了。那时正值达恩利出麻疹，这使得玛丽长时间地而且屡次地到他的床边看望；这样，由于政治加上了爱情，那场麻疹大概对事态起了促进作用。不过，当伊丽莎白禁止发布结婚预告时，玛丽感到她完全受骗了，而这种感情可能是十分真实的。它肯定驱使她更加下定决心嫁给达恩利，虽然她已把婚期推迟到7月底，以尽力去取得伊丽莎白的谅解。

伊丽莎白的目的这一次的确比平常更为高深莫测。思罗克莫顿曾报道有的谣传说，达恩利的婚姻并没有被女王陛下和她的枢密院看得像他们假装看得那么坏。法国大使也怀疑伊丽莎白“掩盖了她内心里实际上曾期待着它发生的那种喜悦”。的确，她的某些顾问对于鼓励那桩婚事曾表示大为震惊，因为它将为苏格兰人的王位要求和旧宗教提供支持，“苏格兰女王的权力所系的绳索，唯一就靠着它来系住”。然而，伊丽莎白的看法同她的那些较为倾向清教徒的顾问们的意见是很难等量齐观的。她从未同意过他们对她的为数较多的天主教臣民的不信任态度，因此也就很难同意这种说法，即认为“同达恩利勋爵结婚的危险……比同最有权势的外国君主结婚的危险更大”。相反，她可能真的认为那是走向使英格兰—苏格兰关系脱离大陆政治纠葛的另一步骤。因为玛丽既已结了婚，她能够做的就只是请求外国君主帮助她争得她的英格兰继承权，而伊丽莎白则能把一个王国视为她的嫁妆而伸出自己的手。还有，如果她那时已具有她在以后年月里所表明的那种想法，即认为只有一位男性国王才适宜于继承她的王位，那么，她就甚至还可能把玛丽的完婚以及那桩婚姻所给予她的英格兰祝福者们的期望，视为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一个步骤。同时，她既然已在不顾玛丽明确表示的愿望的情况下使玛丽结婚了事，她也就能使那位苏格兰女王谋求承认其继承权的唠叨不已的要求告一终结，那种承认实际上也是不可能予以许诺的。

结果却是，那桩婚姻竟使得所有那些由它引起的期望和忧虑全都被证明并无根据。因为达恩利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切品质，而他的妄自尊大又是那样令人不堪忍受，以致在结婚之前，伦道夫就担心“他不可能在这个民族中间长久生活下去”。玛丽的迷恋只是助长了他的坏脾气。由于“凡是不能使他满意的人，就不能使她高兴”，受害者首先就是那些自从她由法兰西回国就指导她的政策的顾问们。1565年4月，莫里同阿盖尔一起退出了宫廷和枢密院，沙泰勒罗为了自己的安全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到8月间，这几位人士和另一些长老举行了公开暴动，得到了伊丽莎白秘密送来的两三千镑的援助。他们竭力为自己的暴动辩护，为此而指控达恩利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并断言玛丽和他蔑视本国贵族顾问而宠幸诸如意大利籍秘书大卫·里齐奥那样的出身卑微的外国人，还企图取消新教。

那是徒劳的。在1559—1560年显得十分有效的攻讦之词，在1565年却没有产生什么吸引力，因为玛丽和达恩利并未做过可以证实那些攻讦之词的事情。玛丽曾在新教徒大会上拒绝了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要求（6月），但她再次向他们保证，她不会压制人们的信仰，而且她将像她已经决定的那样保存他们的宗教，直到等级会议能够同意做出一项最后的和解为止。达恩利虽然是按照天主教仪式同玛丽举行的婚礼，但在举行弥撒之前就退席了，而且在其后的几周之内不时地出席聆听新教传道。博思韦尔地位的恢复和影响的增长，以及戈登的亨特利伯爵爵位的恢复，都很难说明是天主教的阴谋，因为博思韦尔那时已是一名新教徒，而戈登至少已表示要成为一名新教徒。甚至对于玛丽秘密地向腓力二世祈求援助和保护（9月）以及向他和法国宫廷做出忠于旧教的表白（8月），人们也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因为既然伊丽莎白已在煽起叛乱并以战争相威胁，玛丽还能向别处求援吗？于是，当莫里起事时，他的许多新教盟友——莫顿、鲁思文、梅特兰——都袖手旁观。新教会众，即使在爱丁堡，也表现出罕见的冷漠态度。到10月间，“到处追捕”结束了，叛乱的长老们流亡到英格兰，莫里显然遭到了戈登集团在三年前遭到的那种挫折。

然而，玛丽由于听任达恩利自行其是，或者如某些人宁愿说的那样，由于让她自己的真正的却长期隐藏起来的意图暴露出来，这样就把她自己置于一种冷静的政策所不能容许的孤注一掷的地步。由于她破坏了若在一个世纪以后就会被称为“新教阵线”的组织，她就抛弃

了一种有组织的而且强大到足以使王室权威在她的整个王国受到尊重的力量。亨特利和阿索尔得以再度控制北方，博思韦尔控制了边界地区，诺克斯在西南部提供了一个新据点。不过，这是一个脆弱而且不相称的班子，难以驾驭那些未随莫里起事的情绪低沉的新教长老，即那些牵连较少的贵族，他们的封建本能在政府中心散发着混乱的气氛；也难以驾驭新教的会众，他们的好斗精神随着对天主教的每一次新的让步而重新增长起来。实际上，玛丽于1566年1月向教皇求援一举，甚至她的使节为求援而使用的语言都表明，若无及时而巨大的外援，她对于控制她的王国几乎已经绝望了。

固然，卡特琳和阿尔发在巴约讷的会晤（1565年6月）以及那次会晤引起的要建立一个天主教联盟的谣传，可能促使玛丽产生一种希望，认为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那时将会给她带来那种援助。然而，即便如此，她也是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因为从那种观点来看，她的策略是极不合时宜的。这两个天主教大国仍像以往那样，互相猜忌使它们不能共同行动，互相疑惧又使得他们不能各自行动，特别是由于现在英格兰已再次成了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随着孔代就任皮卡迪总督，腓力二世极为担心法国人会在他的尼德兰诸省煽起反抗高潮。1565年10月，他告诉教皇和玛丽的使节，他只准备给少许的钱秘密地帮助玛丽反对她的叛乱者。如果伊丽莎白向她进攻，他可能稍许多做一点事，但仍旧是秘密地而且是通过教皇去做。另一方面，如果玛丽在伊丽莎白健在时就要求占有英格兰王位，他就丝毫不给支持；他还严厉地告诫她，不要让一支法国军队开进苏格兰。法国政府有些担心的是，为一位信仰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进行十字军征讨，会危及国内尚不稳定的宗教和平。他们告诫伊丽莎白不要向她进攻，但他们的主要努力目标是促成两位女王重归于好。简言之，除非伊丽莎白向玛丽宣战，两个天主教大国都绝不会进行有效的干预。而伊丽莎白也不愿像孔代曾把她卷入法国一样，再让莫里把她卷入苏格兰。她只是在莫里的罪恶叛乱已经过公开而又认真的按正式步骤的惩戒之后，才允许他穷困潦倒地留居在英格兰。

这样，1565—1567年的苏格兰危机，结果并没有引起外国的严重干涉，而玛丽也不得不转而去依靠她能够在苏格兰国内聚集起来的那些力量的支持。她的最明智的方针，大概就是思罗克莫顿提出的那个方针，虽然他究竟是作为她的忠实的好心人还是作为伊丽莎白的诡计

多端的仆人而提出那个方针也许值得怀疑。如果她宽恕莫里，并在宗教事务上继续实行一项明确的温和方针，则她即使不能把整个民族聚拢到王权周围，也能缓和新教徒的恐惧情绪。但是，达恩利的反对，以及显然还有里齐奥的献策，排除了宽厚态度，尽管那才是真正明智的态度。她选择了或者说被促使去实行了一些只会激起反抗的措施——日益增加对莫里的死敌博思韦尔的宠幸；恢复戈登家族的地位；将天主教徒阿索尔和外国人里齐奥擢升到原由莫里和梅特兰占有的顾问职位；把原来的天主教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召来参加等级会议，该会议定于1566年3月举行，以宣布剥夺流亡的新教长老们的权利；甚至还谣传，里齐奥将被弄去取代莫顿当枢密大臣。

这一切又由于玛丽日益疏远她的丈夫而加倍危险起来。随着她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不合适而在为人上又多么靠不住，她对他最初的迷恋很快就消退了。她不敢满足他要继任莫里职位的野心，而正是他劝使玛丽把莫里从那个职位上赶走的。她越来越排斥他过问国事。她越来越依靠里齐奥提供建议，经常同他密谈到深夜。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关于里齐奥的记叙，难以使人相信他们的个人关系是无可指责的，虽然一直存在着新教徒关于詹姆斯六世血统问题的嘲弄。玛丽的轻浮的举止以及她对本地习俗的漠视，从前就已引起苏格兰人的惊异，但那时没有不道德行为的证据。现在她的行为就像几年前伊丽莎白同达德利之间的行为一样，极为轻率，足以引起恶意的谣言，并使得达恩利那样一个人确信无疑。当他发现自己已被排除于政权之外，并相信他作为丈夫已遭到欺骗时，他就同新教徒莫顿和鲁思文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同莫里联合起来。他们同意支持他剪除里齐奥，并保证若玛丽无嗣而亡，使王位由其丈夫继承。他则将采取措施恢复莫里和流亡者们的权利并最终确立新教的地位。在1566年3月9日的夜晚，这一交易的前一部分完成了。达恩利、莫顿、鲁思文和他们的同伙，把尖叫着的里齐奥从女王跟前拽走，并在她的门外将他杀死。次日，莫里和流亡者们从被到处追捕的状态下返回。

这一交易的其余部分没有履行。玛丽在表面上热情地欢迎了莫里以后，慢慢从达恩利那里探出了阴谋的原委，然后就说服他同她一起逃到邓巴（3月12日），在那里，博思韦尔、阿索尔和亨特利同他们会合。当她重新控制了国王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时，她就得以对莫顿和他的暗杀同谋者坚持实行了流放。在此，她暂时终止了复

仇。在三个月之内，她将面临16世纪分娩的一切危险。3月9日至12日那种考验的任何重演，对她和她的婴儿都将是致命的，而且她并不打算让出她的道路去助长她丈夫谋求王冠的野心。因此，莫里、阿盖尔和1565年的流亡犯就得到了宽恕。接着就出现了贵族之间的全面和解，博思韦尔、亨特利同莫里，阿索尔同阿盖尔都和解了。到4月底，他们全都回到了宫廷，并一齐出席枢密院会议。这种全体和睦的外观，一直延续到1566年6月19日玛丽的儿子、未来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出生之后。9月间，梅特兰被允许回到宫廷，并与博思韦尔重归于好，而在圣诞节的前夜，甚至莫顿和里齐奥的谋杀者们也得到了宽恕。

唯有达恩利被排除在普遍宽容之外。直到她的儿子出生之时，玛丽还保持着某些和睦的假象，尽管不让她的丈夫过问政务，并告诫贵族和使节们不要同他打交道。此后日益明显的是她的愤怒并未平息，虽然他本人长期不在宫中，并威胁说要逃往大陆。当她长途乘车去看望受伤的博思韦尔之后，由于对她的婚姻的失望，也许还有对她儿子安全的担心，可能促成了她在杰德堡身罹疾病（10月），至少梅特兰是那样想的。他给住在巴黎的比顿写道：“一想到他竟然是她的丈夫，而且她又找不到摆脱他的出路，这对她乃是一桩伤心事……多久会发生变化或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只有上帝知道。”

这些话具有一种不祥的意味，特别是当我们想到，玛丽总是强烈地依赖于一两个宠信的顾问，而现在则已日益明显地选中了博思韦尔伯爵，就会更加感到不祥。博思韦尔可能成为“一个极端果敢的领路人”，不过他总是热衷于采取不顾一切的补救措施。没有必要接受物议中编造出来的所有情节，那种物议旨在使人们相信，博思韦尔的目标是既要取代莫里的地位，也要取代达恩利的地位，而玛丽竟然把这种取代视为一种值得欢迎的可能性。如果真是如此——试图证明她对她的宠信纯属政治性的，并不十分令人信服——那么，对于达恩利来说，她在所有的男人中竟挑中博思韦尔来给予荣耀和爱恋，那就是一个凶兆。更为不祥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止博思韦尔的鲁莽。他并不是得人心的人。早在7月间，他就被说成是像里齐奥那样遭到其他贵族同样愤恨的人。不过，还没有什么人打算反对他们的女王的宠臣，而且某些人可能仅仅是乐意让他自行其是地去同达恩利打交道。

当玛丽回到克雷格米拉（11月）之后，显要贵族们究竟在那里达成了什么协议；玛丽究竟了解多少并同意了多少；在其后几周究竟发

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些都是属于有待探究的历史悬案中引起最激烈而又细致地争论的问题。莫里和莫顿未签订任何协议；阿索尔不了解任何情况。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博思韦尔、阿盖尔、亨特利、梅特兰以及其他人都曾同意以某种方式使玛丽“摆脱”达恩利。玛丽至少已了解到了那样的程度。1567年1月底，大约就是她给她的驻法国大使写信以尖刻的语言提及她的丈夫的同一天，她乘车到了格拉斯哥，表面上向达恩利表示了和解，那时她所患的天花或水痘已经痊愈。她带着他回到爱丁堡。他们在紧挨着城墙外边的长老教会活动场停留了几天。2月9日晚上，她和朝臣外出参加一个婚礼，让达恩利和他的一个仆人独自留在屋里。大约深夜两点钟，参加婚礼的人回来之前，一声剧烈的爆炸，炸毁了那所房屋抑或是它的一部分。人们在远处找到了达恩利和他那位仆人的尸体，几乎是赤身裸体的，而且被炸得模糊难辨了。

幸而没有必要在这里去考察那些由搜遍了证据的无数历史侦察家们对这一轰动社会的罪行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决定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过什么事情。而那时的人们——西班牙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人，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都认为很难不按照压倒一切的初次印象的证据去相信博思韦尔是谋杀者，而玛丽是他的同谋。而且，玛丽在罪行发生之后的行为，只会加强不利于她的假定。她对追查谋杀犯三心二意；她对博思韦尔的宠信有增无减；博思韦尔出席安排对他本人的审讯的枢密院会议；以及那场审讯的闹剧性质（4月12日）；这一切都使得国外那些为她祝福的人们大失所望。即使当时流行的对魔法和巫术的信仰，也难以使人们相信：她是被博思韦尔“诱拐”（4月24日），以及她在与博思韦尔串通起来使他离弃了亨特利的姐妹之后嫁给他（5月间），都是在违背她的意愿之下干出来的。因为，虽然达恩利对她的侍从里齐奥的谋杀无疑是一桩严重罪行，但对出身于瓦卢瓦王族高贵传统的玛丽来说，博思韦尔对她的人身的强占，毕竟应当引起不会更小的愤怒，如果那真是在违背她的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话。固然，巴克罗芙小姐的咒语必定发生过真正的效力，使得玛丽竟然在此后两年间拒绝牺牲她的强占者去挽救她的王位。

正是这桩婚事使她付出了王位作为代价。实际上，老百姓已经把博思韦尔看作公认的达恩利的谋杀者而强烈地予以反对。然而，在那

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在贵族中间找不出什么领袖人物了。一些人已经在克雷格米拉牵连得很深；另一些人，例如莫顿，曾经知道达恩利面临的危险，但并没有试图提醒他；莫里几乎过于凑巧地及时抽身到了圣安德鲁斯，后又到了法兰西，这反倒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对他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怀疑。除了诺克斯和阿索尔以外，没有人会欢迎对达恩利的谋杀案进行充分而公正的调查。不过博思韦尔的婚事，是另一个问题。它驱使民众既恨博思韦尔也恨玛丽，而且使贵族们得以出面领导。有几位贵族——阿盖尔、亨特利和梅特兰（即使博思韦尔的威胁没有吓坏他的话）——仍然感到同谋杀案牵连太深而不能反对那桩婚事。汉密尔顿家族的人则期待着年幼的詹姆斯夭亡而继承王位，因而同他们联合起来以排斥达恩利的兄弟。但是，当新教的莫顿和天主教的阿索尔执戈而起时，他们很快就聚集起一支徒众，使玛丽的队伍没有勇气加以抵抗。1567年6月15日，她在卡伯里山被俘虏，博思韦尔则脱身逃亡。即使到那时候，如果她愿意抛弃他，联合起来的贵族也可能消除民众要她让出王位的呼声。她的拒绝，促使他们强制她逊位给她的幼子詹姆斯六世，并以莫里（从旅途中将他召回）为摄政。

新教的长老们就像在1560年那样再一次执掌了权柄，而且似乎他们将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掌握权力。他们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至少在苏格兰低地是那样，那里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真正的中心。他们还有天主教领袖阿索尔以及诺克斯的有效的合作。到秋天，他们已迫使阿盖尔、亨特利和汉密尔顿家族的人们勉强地归顺。他们已将他们那位被废黜的女王当作囚徒控制起来。在1568年，她在汉密尔顿家族帮助下得以从洛赫利文城堡逃脱，但这只不过使她在朗赛德遭受一次更具有灾难性的失败（5月）；她由此看出，除了逃到英格兰，别无安身之地。当玛丽身为逃亡者时，国王还是一个孩子，他将被按照新教的信仰哺育成人，莫里现在已能指望完成被玛丽的焦躁和放荡行为打断了的工作。而且，由于有了年轻的詹姆斯，他就有了一个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候补人，詹姆斯可能远比他那信奉天主教的半法国籍的母亲更易于被接受；还有他那幼小的年龄，也会抑制他的支持者，使他们不至于受到用暴力手段去加速自然进程的诱惑。1567年革命乃是另一个漫长的步骤，它将使大不列颠既在地理上也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岛屿。

但是，在伊丽莎白看来，它可能是最后的一步。苏格兰的新统治者除了她以外不可能在国外找到别的人支持。天主教大国不可能认真干涉。当玛丽在卡伯里山丢失王位时，阿尔发公爵正从热那亚向尼德兰进军，一心要对1566年在那里发生的暴动进行报复。由于西班牙的整个陆军为此而在低地国家陷入的实际处境，腓力二世不可能打算在苏格兰进行冒险，因为那必然要引起同英格兰的冲突，还可能诱使法国人插手尼德兰。阿尔发的进军，还排除了法国对玛丽提供任何援助的可能。法国政府眼见西班牙军队沿着它的东部边界挺进而震惊，招募了一支瑞士军队来加以保护。胡格诺派则认为这是在巴约讷策划的“阴谋”的第一批行动，因而拿起了武器，把法兰西推入了第二场内战（1567年9月—1568年3月），而且几乎没有停顿又把它推入了第三场内战（1568年9月—1570年8月）。

西欧的风暴中心正从大不列颠转向尼德兰和法兰西。从此以后，它应当是来自于那些将对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体系提出挑战的大陆地区的内部动荡。如果说大不列颠并没有立刻安定下来，其原因在于英格兰的政策而不在于大陆强国的野心。正是伊丽莎白个人的政策，使玛丽的问题在苏格兰继续存在下去；正是威廉·塞西尔要负主要责任的那些政策，在英格兰本身引起了一场决定性的危机。

当玛丽倒台时，英格兰政府从自身利益的各个方面考虑，从国家和新教的安全来考虑，都必须接受她被推翻的事实，公布她的罪行，并坚定地同莫里联合起来，因为他的统治意味着新教和英格兰的影响在整个大不列颠的胜利。但是，伊丽莎白头脑中那种束缚着一位女王的神圣性观念，同玛丽一样强烈。她不能损害她的身份，也不能去同反叛者联合并宽恕废黜一位同侪女王的行为，因为那样就会给天主教君主们提供一个可以如法炮制用以反对她自己的先例。她首先试图促成一项和解，以期能使玛丽恢复名义上的君主地位，而将全部实权留归莫里执掌。这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断然拒绝，他们反对送回玛丽，除非是为了服刑。

接着她又力劝苏格兰人到一个由英格兰的顾问和贵族们组成的委员会面前陈述他们暴动的理由。玛丽或她的代表可以作出回答，而伊丽莎白则可在那时按照她自己的方针做出决定。苏格兰人再次加以拒绝，除非确保预先做出一项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他们送来了指控玛丽的罪状的副本和“首饰盒信件”的副本，他们断言那些信件是在谋杀

达恩利时玛丽写给博思韦尔的。他们以那些副本作为他们的理由的证据。这一证据如果能证明是真的，那是可以定罪的。伊丽莎白不得不再次向苏格兰人的要求让步。在约克举行了会议，然后又在威斯敏斯特继续举行，苏格兰人提出了他们的指控和首饰盒信件的原件。那些原件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湮没失传了，因此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判明它们的真实性——虽然总是有许多人试图那样做。不过，1568年的12月间，在威斯敏斯特，这些原件曾在连续三天的三次会议上被提出，并与玛丽写给伊丽莎白的确然无疑的信件做了比较，而且英格兰的委员们显然同意那是真实的；委员中包括那样一些即使信奉新教却是十分谙练而富有经验的人士，诸如塞西尔、尼古拉斯·培根爵士以及苏塞克斯伯爵，后者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饱识新学的学者”。保守而学识较浅的贵族们，如诺福克和诺森伯兰也在最后一天查阅了那些信件，而且表示了信服。即使如此，会议仍以未做裁决而告终。伊丽莎白出于自己的理由而不予恢复玛丽的地位，使她过着总还算得上体面的隐居生活。除此以外，她不会做更多的事。她不愿正式宣判惩办玛丽，而且，两年多以后，起诉证据才在布坎南的半官方的《侦破》（1571年）一书中刊印出来。伊丽莎白方面的这一沉默，把玛丽的明显罪行正好掩盖在一种疑云之中，因为需要有那样一种疑云，才能使玛丽仍然被看作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使她可以被描绘成一个遭到新教反叛者陷害的无辜的天主教女王，而那些反叛者自己才是他们凭以废黜她的那些罪行的人犯。这一沉默，再加上伊丽莎白的明显的同情态度，足以使亲玛丽派在苏格兰保持活力，并使它成为吸引其他不满因素的一块磁石，那些不满因素是伴随着莫里恢复爱丁堡政府权威的努力而产生的。

而且，玛丽在英格兰北方的出现，还促成了在那里点燃一场爆炸的导火线，那场爆炸的材料早已积累起来，而且1568—1569年的特定环境又为它提供了合适的气氛。英格兰的北方，偏僻遥远，重山叠嶂，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及其在北方的代表机构一直没有和解。那里的贵族和绅士一直保持着半封建的独立地位：在诺森伯兰，可以说人们只知道有一个珀西家族而不知有君主。都铎政府的整个倾向是要加强中央控制并限制地方独立性，而这同北方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新的经济趋势，商业、工业的发展和国家调节的加强，没有给这个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带来多少利益。尤其突出的是，北方在宗教上坚持旧的天主教，它震惊地看着1559年的决定牢固地确

立起来，看着议会里的清教徒的活动把它推到了离天主教甚至更远的地步。女王的首席顾问官威廉·塞西尔似乎是所有这些趋势和政策的化身，因此他在北方很快就变成了像30年前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样不受欢迎的人。

到此刻为止，北方不得不怀着日益增长的失望心情注视着这些变迁。伊丽莎白避免采取极端措施，避免暴力强制，而是使旧的习俗和旧的信仰单纯由于失去滋补因素而衰竭下去。随着老的天主教僧侣的亡故，再也无人接替他们，因为在英格兰已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按照天主教的信仰培养出他们的接班人。在世俗事务方面也是如此，压力继续施加着，但不是不堪忍受的。北方的生活方式慢慢地遭到暗中破坏，这一过程是如此迟缓而又无声无息，以至于无法为一种阻止这种衰落的急刹车提供迫切的理由或加以刺激。现在玛丽来到了，在某些人看来，她也许是一个逃避审判的戴着王冠的谋杀犯，但毕竟是一位逃避加尔文派反叛者的天主教女王，而他们自己的女王把她的前一副形象掩盖起来加以接待，只能鼓励他们按照后一副形象去善意地看待她。即使如此，还是需要某种刺激性诱因和取得超过地方范围的支持的某种现实前景，才能激发北方行动起来。

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在1568年底对于同西班牙的一场争端的鲁莽处理，正好提供了那样一个诱因。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溯到1567年的夏季，并转而考察尼德兰的情况。阿尔发率领西班牙陆军主力部队开到那里，乃是欧洲历史上的主要转折点之一。在此后100年间，那支军队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联络问题，成了西班牙政策中的一项主要的考虑和法国人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目标和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导因素。法国人那时还不可能对它做出什么事情。法国政府在1568年夏季还不敢让胡格诺教徒对奥兰治的威廉粉碎阿尔发的残暴控制的初步努力提供援助；此后，至少直到1571年，又因内战而排除了干涉的可能。可是，阿尔发的出现和他的行动方式也使得英格兰震惊起来。那些行动方式成了对英格兰与安特卫普的贸易的威胁，尽管如1567年7月与汉堡达成的协议所显示的那样，代替安特卫普的贸易场所已开始找到，然而，真正的威胁是战略性的。迄今一直是无害的主要实行地方自治的尼德兰，正如塞西尔所说的那样，本是新教的英格兰的外岸，可是却正在变成基督教世界最精良最笃信天主教的军队的兵营，而那里恰恰位于从英格兰人的政府和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延伸出来的

窄海的对面。当海峡里的私掠船、西班牙港口的宗教裁判所和约翰·霍金斯的西属美洲之航所引起的争吵已经破坏了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使局势更为严重。因此，从此以后，英格兰人的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西班牙军队从低地国家挤出去，并使那些省份的古老的自由权利得以恢复。

法兰西的衰落，使得英格兰更加急需采取行动。当载着热那亚银行家付给阿尔发军队的贷金的船只来到英格兰港口躲避风暴和私掠船的时候，机会来临了。伊丽莎白把那笔钱扣了下来（1568年12月），而且，由于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那笔钱在安特卫普交付完毕之前仍属于热那亚的银行家，伊丽莎白就敦促那些银行家把那笔钱借给她而不是借给阿尔发。这对阿尔发是一个沉重打击，^[3]而且把英格兰和西班牙带到了战争的边缘。它使得同尼德兰和西班牙的贸易停顿下来，并引起双方都扣留船只和货物。虽然阿尔发曾请求他的主子不要在他的其他的麻烦之外再增加一场同英格兰人的战争，英格兰人却只知道腓力二世驻伦敦大使的愤怒的抗议和威胁。

在震惊之中，许多人开始鼓动撤掉塞西尔的职务，抛弃他的政策。这种鼓动为许多的不满和许多的图谋提供了掩盖物和聚焦点，其中有莱斯特对塞西尔的忌恨，诺福克要娶玛丽·斯图亚特为妻的野心，北方天主教徒的尤为激烈的反叛企图。不过，虽然全都敌视塞西尔，却只有北方贵族打算用武力反对伊丽莎白。因此，一旦弄清楚塞西尔的政策就是女王的政策，反对派就解体了。诺福克在反复犹豫之后还是奉召到了宫廷，并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囚于伦敦塔中。他的大多数盟友都已变节，甚至北方也已经心灰意冷。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的伯爵在他们的妻子怂恿下起兵举事（1569年11月），但西北边的戴克不愿同他们联合。没有多久，他们就逃到边界那边去了（12月）。当戴克为时过晚地举兵反叛时，他也很快就被亨斯登镇压下去了（1570年2月）。

北方的暴乱结束了，我们所考察的不列颠问题也随之而结束了。伊丽莎白的政府和塞西尔在那个政府中的地位，安然渡过了国内的挑战。虽然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她的同党还能够给英格兰在苏格兰的朋友的统治带来麻烦，但他们推翻那一统治的希望已经很小了，而且还在逐年变小。要倒退到旧的道路，除了通过外国入侵，现在已经很难实现；而且，即使在天主教徒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见到

他们的国家通过外国的征服而回到罗马教会的行列中去。而且，当新教在苏格兰的得势保障了英格兰唯一的陆地边界的安全时，英格兰的日益增长的海上实力提供了抵制海上入侵的越来越大的保证。还有，“商人冒险家”集团在1569年与汉堡的贸易所取得的成功，已为西属安特卫普要求享有日益增大的经济独立性燃起了美好的希望。大不列颠已经不再由于衰弱、分裂和动乱而给大陆列强提供具有诱惑力的战场了。

紧接着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之后的10年的事变，确保了大不列颠的独立和新教的胜利，并为它的政治上的统一开辟了道路。那些事变从而也给西欧第三个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能，并使得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两大帝国势力的对峙有可能最终被多极的强国均势所代替。

（庞卓恒 译）

[1] 参见前面第1章和后面第9章。

[2] 参阅前面第112—115页。

[3] 关于阿尔发的困难，参阅后面第271—273页。

第九章 西欧与西班牙的势力

卡托康布雷奇和约（1559年4月2—3日）是对已故查理五世皇帝的帝国计划的终结所做的事后承认。^[1]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之间的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80高龄的教皇保罗四世憎恨西班牙人在意大利的统治而加速到来。主要的逐鹿者几乎都曾是不情愿地进行那场战争的；但是，那场战争由于难分胜负，而且甚至比以往的战争更费钱，因而曾是十分残酷的。现在，随着腓力二世同亨利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一个新的时代露出了曙光。

诗人龙沙吟道：

啊，和平！上帝的女儿，你把欢乐带给了我们

就像是一天的黎明时辰……

西班牙和法兰西的亲密结合

这一姻缘将永远保持爱情。

变化甚至比人们当时理解到的还要大，查理五世退位（1555年或1556年）后不到10年时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已在完全不同的水准上发展了。直到16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在它同国家联合起来的地方才取得了成功。当它变成革命运动时，如它在德国农民战争和尼德兰与北德意志的再洗礼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因为它仅仅得到了城市和乡村的下层阶级的支持。现在，革命运动首次而且十分突然地变成了全国规模的运动，包括了从工匠一直到王公贵胄的各个阶级或阶级的分子。意志坚定的少数人，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国家。^[2]他们不得不建立有组织的党派去同国家政权抗衡。他们或者通过国会或等级代表会议进行活动，或者以其他方式或迟或早地变成公开的革命党派。唯有凭着狂热的信念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保持下来的宗教信仰，才能够把整个王国范围内的贵族、市民和农民间彼此相悖的利益拢在一起。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和天主教神圣联盟，尼德兰的加尔文教派和“海上乞丐”，苏格兰的诺克斯的兄弟会和圣约同盟长老团，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特伦托宗教会议第三次会议之后，由于对天主教的信条和异端做了明确的规

定，只有那些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或者像卡特琳·德·美第奇那样在宗教问题上感觉迟钝的人，才会相信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还能调和起来。存在着两种选择：对反对派加以宽容或铲除。在一个长时期里，双方都不愿意接受前一种选择。

当这些巨大的力量开始崛起之际，西欧各国的政府本身正被一场严酷的危机拖住。查理五世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长期战争，过度消耗了他们的政府的资源。虽然西欧的经济生活正在发展，但它的可由赋税感触得到的那一部分却负担过重。货币的贬值降低了政府岁入的价值，同时也促使财政开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数字。在五年之间，尼德兰为战争支付了800万杜卡特，卡斯蒂利亚则在三年间支付了1100万。西班牙和尼德兰的政府都在1557年陷于破产，不得不把它们所有的债务的利息支付降低到5%。几个月后，法国政府不得不步其后尘。这些危机导致了第一次国际性的银行大破产。安特卫普和里昂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但奥格斯堡、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于难。由于贷款难以取得而且代价昂贵，各国政府就指望开辟新的岁入来源。在尼德兰，新的岁入只有经过等级代表会议允许才能得到。统治者们像臣民一样指望西班牙提供救济；但是，当腓力二世于1559年回到马德里时，他发现那里的财政状况甚至比布鲁塞尔还糟，人们很快就明白，原来在法国，王权当局不经臣民同意也不能进一步增加税收。正像在旧体制历史上十分常见的那样，财政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统治者需要金钱，而臣民不愿支付，两者之间的冲突，暴露了政治权力面临的全部难题。

现在需要的是坚定而富有经验的领导。但是在法兰西和尼德兰，恰恰在这个时刻失去了那样的领导。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传到了女人手中，就像几年以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做过的那样。一个政治性的社会，它所崇尚的精神是男性的勇武精神，而它崇尚的忠诚特性也是对君主个人而言的；在那样一种社会中，“不正常的女人统治”就只会使得政治危机难以控制。只有伊丽莎白一世克服了政治危机，由于她本身的资格，作为一个执掌权柄的君主，她比卡特琳·德·美第奇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拥有巨大的优势。[\[3\]](#)

西欧的这种政府危机，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关系。旧的角逐并没有随着查理五世和亨利二世的亡故而消逝。法国通过它对萨卢佐和皮埃蒙特的五个要塞的占领，还在意大利保留了一个据点。它在任何时候

都能威胁西班牙人在那个半岛上的优势地位，而且像以前一样，它在意大利不乏同盟者。它同尼德兰的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休止下来了，但并未解决。西班牙和法兰西两方面在德意志诸侯中都有同盟者和追随者。英格兰既没有忘记也没有甘心于加来的丧失。尤为严重的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府看来都没有稳定下来。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都能够进行干涉并严重打乱西欧的力量均势。这些就是剥去加蒂纳拉和查理五世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外表后裸露出来的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之间的斗争的真实内容。大臣和大使们就是那样看待的，而且是不存在幻想的。不过，没有什么人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始终一贯地遵循国家的严格的理性逻辑。他们和他们的君主都不免具有那种支配着他们的臣民的宗教感情。他们确信，他们的宗教上的对手纯粹是被物质和政治上的考虑所驱使的，而这些信念也迷惑了某些近代历史学家。但是，他们却同样地确信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虔诚，以之作为自己政策的推动力量，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比腓力二世更为确然无疑的了。因此，实际上政治动机的来由并不单纯，而政策也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的。大国之间的国家对抗日益与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冲突纠缠在一起，并日益转入国际上的宗教虔信派别之中。法兰西、尼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全都有自己国内的“第五纵队”——这一致命弱点，是查理五世、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从未遇到过的，尽管偶尔也发生过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因此，在20多年间，大国尽管经常处于战争边缘，但毕竟怯于发动公开战争。法国的内部弱点似乎给腓力二世提供了一个他的父亲查理五世皇帝毕生谋求而未得的机会：建立一个在哈布斯堡王室领导下的、反对天主教世界的敌人的天主教列强同盟。如果说，后来奥兰治的威廉把1559年的哈布斯堡—瓦卢瓦王室的联姻看成是西班牙和法兰西国王反对他们的臣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一桩共谋，那是把它过于戏剧化了；不过，至少他对腓力二世的宗教政策的估量是正确的。但是，要使法国保持衰弱状态，正有赖于天主教世界的敌人，即新教徒，而那些新教徒又是腓力自己的权力的致命危险。腓力二世的目标是既要保持法国的衰弱状态又要保持其天主教性质；他始终未能完全解决这一双重目标的矛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采取两面性政策的原因。

西班牙还不得不对付基督教世界的外部敌人，即奥斯曼土耳其。腓力二世是在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以后20多年间还一直进行着一场巨

大战争的唯一西方君主。他能够敦促法国王权同他一起去反对新教徒，但却一直未能促使法国帮助他去反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却在西班牙内部有他们自己潜在的同盟者，即摩里斯科人。如果说穆斯林的“第五纵队”从来也不可能像胡格诺教徒和“海上乞丐”那样期望夺取整个国家，但他们同当时拥有最强大的海陆军的国家结成联盟，毕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危险。因此，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危机与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几乎不相上下。

一 西班牙和意大利

查理五世未能确保将帝国传给他的儿子，^[4]但是帝国的实际存在并未由于他的失败而改变。腓力二世仍旧统治着西班牙和它在意大利、弗朗什孔泰、尼德兰和西印度群岛的属地。这些属地曾是查理五世的帝国实力、钱财和兵员的主要来源。西班牙的政策既摆脱了中欧问题的纠缠，又保持着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支系的叔父和堂兄弟的亲密关系，^[5]这至少在实际上对腓力有利。他同英格兰的玛丽一世的婚姻（1554年）是那样一种政策的顺理成章的补充，而且即使在玛丽去世（1558年）之后，也还没有立刻明显地表现出英格兰已不再继续作为或再度成为哈布斯堡的卫星国。然而，由于没有帝国称号，关于腓力二世帝国的性质就成了难题。查理五世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他的地位超乎寻常以及他的使命在于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君主国，依据的就是这个称号。留给腓力二世的是他的父亲的使命的另一部分，即保护天主教会。腓力于1566年写信指示他的驻罗马大使说：“你可以使教皇陛下确信：我宁肯丧失我的全部国家和100次生命（如果我有100次生命的话），也不愿让宗教和上帝的利益遭受丝毫的损害，因为我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做异端者的君主。”然而，即使教皇们也发现，往往难以在腓力的眼里区分出什么是上帝的利益，什么是西班牙君主的利益。

对其目标的这一正式表述，还忽略了帝国本身。无论是腓力，还是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人，从未制定出一种完整的帝国理论，以取代现已过时的查理五世时代的观念。在美洲，西班牙人征服了异教人口，并使他们皈依了基督教。西班牙的神学家和法学家讨论了他们的权利和征服者的权利。西班牙政府把那些权利编成了法律。但是，在基督教欧洲，腓力本人以及几乎其他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帝国仅仅看作是一个君主国，一个君主统治之下的国家集合体。从查理五世统治的晚期，它已日益成为一个西班牙人的帝国。^[6]腓力的继位使西班牙和卡斯蒂利亚占有了更大的优势；因为腓力只讲卡斯蒂利亚语，把他的官邸固定在卡斯蒂利亚而且在擢升要职方面使卡斯蒂利亚人比其他所有臣民都享有优先权。

卡斯蒂利亚人必然逐渐把他们自己视为帝国的统治者，虽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其他民族的敌视情绪日益增长。米兰总督阿亚蒙特侯爵给腓力的信（1570年2月2日）中写道：“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任何一个人，他臣属于西班牙的民族和帝国，并效忠于它们，而又不对它们的名称有所憎恶。”他还补充说，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特别真实的。他的观点得到了写在那封信上的一段未署名的批注的赞同，其中写道：“因为这些意大利人，尽管他们不是印第安人，却被当作印第安人那样对待，因此他们感到是我们在照管他们，而不是他们照管我们。”这是一种典型的统治种族的口气。

然而，腓力的帝国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按那种方式统治下去。腓力像他的父亲一样，是根据他的各个附属国的法律来维护他对那些国家的宗主权的。他的驻法国大使贝纳迪诺·德·门多萨在谈及亨利三世去世后西班牙继承法国王位的可能性时，^[7]为了竭力使法国人放心，把腓力的君主国比作那样一些大的修道僧团国家之一，在那样的国家中，虽然处在一个首领统治之下，在内部却没有一个民族支配另一个民族。在帝国的统一方面有那么一些进展，但那是用以满足防御和更有效的行政管理的需要的，并不是在实现帝国理想方面有任何进展。例如，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意大利属地里保持着对一切军事要地的严格控制。地方民兵和封建兵员的首领，则普遍留给当地人担任，因为腓力的政策就是要使意大利贵族心满意足。不过，正规的团队和城堡要塞口只能由西班牙人控制。在促进帝国统一方面的最大的行政进展，是1558年意大利属地议会的建立。腓力并不愿意看到老的阿拉贡人的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结构在他的统治范围内继续存在下去。在他看来，它受到了加泰罗尼亚传统的污损。它的最高机关阿拉贡议事会，是由阿拉贡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巴伦西亚人组成。新建立的议会则由卡斯蒂利亚和意大利的人员混合组成，起着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最高法庭的作用，并充当它们同马德里之间的行政联系环节。它至少在形式上比查理五世的体制是一显著进展。那时没有另一个欧洲政府那样清楚地了解其附属国的情况，也没有另一个欧洲政府监督其行政机构去那样注意细节、那样地关心其臣民的福利。然而，它的议员们几乎都是平庸之辈，对帝国面临的问题并无什么见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仍然靠国王和他的最亲密的顾问们去做。直到1588年，腓力才建立佛兰德议会，虽然尼德兰人早在1574年就要求建立。看来它并不是很有效率的。建立于1582—1583年的葡萄牙议会大约也同样如

此。因此，即使在促进帝国统一的行政方面的进展，仍是非常有限的。

帝国中心同其各个部分之间的最有效的联系环节，仍旧是以国王及其秘书们为一方，以副王和总督为另一方的每周、有时每天通信的制度。查理五世的个人主宰体制的变化，与其说是组织机构改进的结果，毋宁说是组成人员发生变化的结果。腓力二世不如他父亲幸运，因为他父亲还能从哈布斯堡家族中任命忠诚而有能力的成员代替他去统治其管辖地。犹如一个巨商家庭那样，^[8]哈布斯堡家族也已经开始由于“第三代的问题”而受到损害。腓力的异母姐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作为尼德兰的总督，表明她本人是忠诚可靠而且不乏才智的。但她缺乏她的姑母——匈牙利的玛丽的政治洞察力，后者曾为查理五世执掌同一职务。腓力的异父（母）兄弟，奥地利的唐·约翰，在腓力继承王位时还过于年轻，不能承担官职。他那虽然古怪但十分卓越的才能，后来为这位国王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即勒班陀战役的胜利。但是唐·约翰作为尼德兰的总督是一个失败者，而且他在31岁上早逝，可能使他得以避免了在朝廷受辱。腓力试图任用他的奥地利亲戚，在他的宫廷里精心抚育着几位年轻的大公。他们的确是忠诚的，但都是那样令人失望的平庸之辈，以至于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几乎仅仅在于他们的帝王之家的姓名所具有的那种正在消退的魔力。

这位国王的最大失望是他自己的儿子们。唐·卡洛斯（生于1545年）是腓力最初与同族人葡萄牙的玛丽结婚所生的孩子，早就表现出了精神失常的征兆，也许是通过他的双亲继承了疯人约安纳的遗传基因。他的悲剧性的死亡，给后世许多历史学家、戏剧作家和歌剧作家提供了难得的浪漫情节，特别是相传这位王子对他的年轻的继母、瓦卢瓦的伊丽莎白的爱情。^[9]事情的真相比较简单。在若干年间，腓力曾力图引导卡洛斯对国家事务采取一种负责任的关心态度。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位王子的罪恶的妄想狂，他的嗜杀狂，他对马德里市民和国王顾问们的粗暴殴打，以及他同尼德兰反叛者的背叛性的交往，使得他不适于执掌任何权柄，而且是国家的一个危险。腓力于1568年1月18日将他逮捕起来。只要腓力还要履行一个基督教君主对其臣民的职责，就不能不那样做。他就是那样写信告诉他那身为皇后的姐妹的，而且，他作为父亲的痛苦是以一位国王的矫揉造作的散文来表达

的。六个月后，卡洛斯死去了，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根据腓力的命令或以其他方式被杀的，虽然几天之间就在宫廷里出现了怀疑的传闻。

腓力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后来的腓力三世，并不疯癫。但这位年迈的国王正确地看到，不能对这个儿子的能力存有幻想。腓力家族的一个杰出的成员和他的唯一胜任的尼德兰总督是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儿子亚历山大·法尔奈泽。他的一生也像唐·约翰的一生那样，表现了腓力自己品质中的最大弱点——他那几近病态的多疑少信和反复无常。[\[10\]](#)

因此，腓力不得不退而指靠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上层贵族来充实他的副王和总督职位。他可以雇用法学家、教士和职业行政官员到他的议事会里充当国务秘书，而且一般说来，正像他父亲已经做过的那样，他也是乐于那样做的。但在任用副王和军事指挥官上就不可能那样做了。世家贵族憎恶长袍人物。胡安·德·维加写道：“彼辈不知何以得为国王，亦不知君主之伟大与权力所赖者何……复不知何为豪爽与荣誉。”卡斯蒂利亚的显贵在这些职位中自然是占有了最大的份额。腓力任用的西西里的9位副王中，6位是西班牙人；他的那不勒斯副王中，除格兰威尔1人以外，其余全是西班牙人；他的13位米兰总督中，10位是西班牙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和那瓦尔的副王职位，以及格拉纳达的总司令职位，根本就不可能任用非西班牙人。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的峥嵘岁月早已成为过去的事。[\[11\]](#)不过，对于老成持重的意大利贵族来说，厚赏还是有的，如果他们选择为这位天主教国王效劳的话。简·安德列阿·多里亚担任过这位国王的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佩斯卡拉侯爵和马可·安东尼奥·科隆纳曾任西西里副王。特拉诺瓦公爵也当过西西里副王；他还成了一名西班牙大公，并任过米兰总督。亚历山大·法尔奈泽当过尼德兰总督。在腓力三世在位时，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还当了总司令。

腓力二世任命来担任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级官职的唯一一个北方人，是勃艮第的安托万·佩罗内·格朗维尔枢机主教，他是查理五世的国务秘书的儿子，格朗维尔出自加蒂纳拉就过学的同一个弗朗什孔泰律师学校。他很少具有那位老国务大臣的帝国观点。不过他比腓力本人和他的所有其他大臣都具有一种更为明晰的关于哈布斯堡君主国性质的概念。腓力像他的父亲一样，力图通过他个人对官职的任命和一切形式的授予权的控制来统治他的帝国。那位皇帝试图对他统治下

的整个国土经常进行巡游，以此来克服这一制度的缺陷。这样，他的臣民就总能期待他们的痛苦将会得到解救，而他们的效劳也会得到报偿。^[12]腓力不能理解这一点。他批评他的父亲在经常性的巡游中耗费了时间、健康和金钱。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和格朗维尔邀请他再度巡访尼德兰，腓力找到了简便而有理的托词，予以推却。他说，如果他不带着足够的金钱和部队前往，他的权威就只会受损害而不是有所增益。但是，随着他的臣民的期待逐渐转为失望，古老的忠诚纽带也就毁坏了。人们不再相信那种由来已久的区分，即把贤明而善良的君主同他那些邪恶的、可以把一切罪恶归咎其身的大臣们分别看待。他们转而反对君主本人。于是，这种情况就在尼德兰发生了，它还在家门附近，在格拉纳达和阿拉贡发生了。^[13]格朗维尔从他在布鲁塞尔的有利地位上看到了风暴的信号。他于1563年给腓力写道，对西班牙民族的普遍不满，产生于一种疑虑，担心国王要把尼德兰降低到他的意大利行省的地位。然而，他们是他们全体的共同的君主，最好是表明，他并不只是把西班牙人看作他的嫡亲的儿子；因为人民正在使用这些说法，在佛兰德和意大利都是如此。对于居住在西班牙的尼德兰人授予一些教职和进行一些委托，可以增强领受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和追随者的忠诚，还可以使另外25000人怀抱着将来得到报偿的期望。某些大贵族可以被授予意大利的指挥官职。例如，奥兰治可以做一个称职的西西里副王，使其远离新教德国的恶劣影响，而且通过为国王效劳获得晋升而得到更大的满足。

这也许是对腓力二世统治的整个时期帝国的性质的一种最清晰的理解。同16世纪上半期的类似的理解相反，它不是出自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或政治家对帝国提出的一种理论上的正义主张，而是出自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员对帝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作的实际洞察。结果还是像往常那样，腓力认为可以轻易地把他的的大臣的建议束之高阁。他回答说，即使对嫡亲的西班牙人，他也不可能满足他们的一切企求恩赐的要求；如果把诸如意大利总督那样的要职，让那些在宗教信仰上并非绝无可疑的人去试任，那就太危险了。而且，奥兰治能够在副王职位的三年任期届满之时不会失望吗？因为腓力在这方面又与他父亲不同，他通常不愿让官员连任，他担心副王们会变得过于独立。这样，他就避免了继续任用一位将来会成为他的最有能力也最为坚决的敌手的人为他效忠和服务的机会。

实际上，这位国王并没有像他想要做的那么多地行使对任命权的控制。他的个人主政的制度是十分闻名的。全部工作都是在纸上，根据“谏议”进行的，也就是根据他的大臣们提供给他的备忘录、报告和劝谏而进行的。在马德里，或者在他那建在瓜达拉马山坡上的阴暗豪华的埃斯科里亚尔宫的修道堂中，这位国王独自一人在那间小办公室里工作，批阅报告，注视地图和数字，做出他的决定，或者像通常那样，拖延不决。即使他真有什么工作规则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选择文件或处理事务的先后顺序方面遵循何种规则。腓力从来不出席议事会议，担心他出席会妨碍顾问们发表他们的见解。其结果同他所希望的相反。顾问们知道，他们的意见是由会议主席或秘书向国王报告的。他们知道，国王可能佯装采纳他们的劝谏，却做出相反的决定。于是他们就竭力使自己的看法去适应尚未宣晓的国王的愿望。他们的劝谏变得保守起来，他们陈述的看法并非出自本心，而是经过修饰的。一位强有力的卡斯蒂利亚议事会或国务议事会的主席，一位埃斯皮诺萨枢机主教或格朗维尔枢机主教，就必然控制着政策的制定。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本来就很有实力的国务秘书的职位，落到像安东尼奥·佩雷斯那样机敏的人物手里，就必定会进一步加强，因为他比别的任何顾问大臣都更加了解国王。实际控制王室和帝国的任命权的，正是那样一些人物，因为即使像腓力二世那样勤于政务而且熟悉情况的君主，也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劝谏。这一制度实行的结果是，那些提出要求而未获恩准的人责怪国王特意创设“咨议”程序以便能够更加容易地拒绝他们，而那些得其所求的人则十分感激大臣和秘书们胜于感激国王本人。腓力的大臣和秘书们只要长期任职，一般都成了富翁。

哈布斯堡王室实行了一种大概算得上欧洲最有效率的驿递和邮传制度。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国王同其管辖地总督之间的通信联络，仍然是慢得惊人。但是，除了地理上的障碍以外，更糟糕得多的是腓力自己的习性。他虽然勤劳而审慎，但在他那总是企求了解更多下情的渴望中，隐藏着他在区分轻重缓急方面的无能和做出决策方面的犹豫不决的气质。他那十分令人赞叹的镇静自若，掩盖着一种时而出现的惊慌失措的趋势。例如，在1571年，他由于担心土耳其人入侵就突然下令要将巴利阿里群岛的居民疏散一空。又如在1587年，他下令圣克鲁斯侯爵在11月间扬帆进攻英国，却不考虑气候和适于海战的船只数量。这两次他的大臣们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不过，相反的情况更为

常见得多。1565年，西西里副王加尔西亚·德·托莱多想解除对马耳他的包围，就因没有命令而抱怨。^[14]也正是由于缺乏来自马德里的明确而及时的决策，导致腓力设在尼德兰的政府的权威遭到破坏。^[15]

运转而很少前进，是卡斯蒂利亚内政历史的固有特点，正像它是腓力的政府体制的固有特点一样。查理五世曾有效地解决了王国的一些内政问题。贵族热心地支持王权。^[16]城市政权已被取消。它们在国会里的议员继续自由地讨论一切国事，从外国人对国家经济的有害影响、苛重的赋税、一直到宗教裁判所的过于广泛的权力，以至国王本人的治国方式，都进行讨论。腓力总是希望收到有关这一切问题的备忘录和申诉书，但他甚至一次也不愿意接见议员。接受或拒绝他们的请求，也完全取决于他认为是否合适。他甚至还取消了一项国会竭力要保住的具有真正重要性的特权，即拒绝同意废除以前的国会会议已经通过的法律和特权。

枢机主教希梅内斯时代和康姆尼洛斯起义^[17]时的政治冲突已经转化成为宫廷派别阴谋和王国的各种法庭和议会之间的管辖权上的争端。在腓力统治的前期，两个人物主宰着全西班牙国家议会：即阿尔发公爵和埃博利亲王——西班牙籍的葡萄牙人吕伊·戈麦斯·德·西尔瓦。由于威尼斯的大使们早先记述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对抗，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说在马德里宫廷有两个政党或派别，即戈麦斯的“主和党”和阿尔发的“主战党”。近些年来，这两个派别又被认为，一个是具有“保守的”公社传统的派别（阿尔发），一个是具有“自由的”君主制传统的派别（戈麦斯），这个看法或许是有些想当然。[参阅G. 马拉尼翁著《安东尼奥·佩雷斯》一书，墨西哥，1947年版]它们与其说是党派，毋宁说是由家族关系和庇护与依附关系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集团。他们并不存在真正的政治冲突，只不过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个人的倾轧。由于家族之间交错通婚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派系。随着枢机主教埃斯皮诺萨受国王宠信而高升，特别是在戈麦斯去世（1573年）之后，早先的派系渐趋瓦解。派别变得更为复杂，其斗争的酷烈程度并没有减弱。

这些冲突给西班牙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法兰西和尼德兰的类似冲突的后果不相上下。它们使得一个本已办事过于拖拉的体制中的政

府职能受到阻滞，因为每个派别都竭力抵制另一个派别提出的主张。西尔瓦家族和门多萨家族，托莱多（阿尔发）家族和菲格罗亚家族，科尔多瓦家族，恩里克斯家族和古兹曼家族，这些家族集团之间的联系纽带笼罩了全国，并卷入了马德里宫廷权力政治角逐场上的每一项争端。它们日益纠缠到武将同文臣之间的权力冲突以及武将文臣同僧界朝臣的权利要求的冲突之中。在卡尔德隆的剧本《萨拉梅亚市长》中，腓力二世作为情节中的意外救星出现，去解决军队的一个贵族团长和一个小城市的农民市长之间的争端；当后者声称国王的审判权是唯一而不可分割的权力时，[\[18\]](#)国王做出了有利于市长的裁决。这肯定符合腓力自己的观点。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使饱受贵族的特权和小暴君专横之苦的臣民得以享有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恩泽和平等的审判。然而，正是由于腓力把他自己视为审判权的唯一源泉，他总是迟迟不介入他的朝臣的争端。他们每个人在法庭和国王的议事会里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腓力助长了他们之间的倾轧。他担心人们背叛他，这种担心导致他自己对他的大臣和朋友背信弃义。阿尔发公爵说道：“国王们把人当橙子来用。他们榨干了橙汁，就将橙子抛弃。”他自己的经历证明他的话确有道理，尽管他的忠诚从未动摇过。由于国王不可信赖，使得朝政受到败坏并使得政治上的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为争取权力和生存的生死斗争。德洛斯·贝莱斯侯爵说：“没有一个正派人能够经受得住那种状况。因为如果你得不到国王的宠信，他们全都会来欺负你；如果你得到国王的宠信，他们又会来夺去你的生命和荣誉。”腓力的政府体制，对于格拉纳达的织毯匠起义和阿拉贡的起义要负直接的责任；对于尼德兰的起义，则至少要负间接的责任。

在卡斯蒂利亚之外，腓力面临着两大难题：伊比利亚半岛周边国家的独立或自治问题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宗教和种族差异问题。当腓力于1559年从尼德兰归来时，宗教裁判所刚刚从一场“最可怕的阴谋”中拯救了西班牙，幸而及时发现才使得整个国家免于沦落。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是那样说的；他们逮捕了塞维利亚和巴亚多利德的一小批可怜的“路德派分子”，他们可能是从皇帝统治时期的比较自由的气氛中残留下来的伊拉斯谟派或启示派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强硬的宗教裁判所，连同其法庭和议会，它的神学家、法官、监狱和成千的俗界效命者，在1550—1600年的半个世纪之间追究了325个嫌疑者的新教观点。即使那一小批人中，许多也很难说是新教徒。整个的西班牙

传统，是在收复失地运动期间进行的几个世纪的反异教徒斗争中形成的，那种传统也竭力阻挡新教的推进。在每一个纯血统的西班牙绅士和市民的眼里，异端分子带有一种摩尔人或犹太人的气味。没有另一个民族对新教的宣传仍然那样地无动于衷。^[19]

如果说新教徒从未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新基督徒”则不然。力图把摩里斯科人同化于西班牙人的基督教社会的政策，在征服格拉纳达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贯彻，但在两代以上的时期里，取得的进展极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以及由于西班牙政府不愿花钱去建立一种有效的基督教教育体系。同化政策也没有在西班牙人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摩里斯科人也不可能成为教士，因为他们不能进入神学学校，那是为具有“纯洁素质”的人，即家族中没有掺杂穆罕默德教、犹太教或异端血统的纯基督教血统的人开办的。摩里斯科人既不能参加军队，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他们仍旧是二等臣民。一般说来，厌恶他们的人更多地是那些穷苦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些雇佣他们在其田庄上干活的大贵族们，和那些先前各代祖先已经几乎完全同犹太人和马拉娄人^[20]的血统相混合的人们。同样地，一般说来，许许多多的摩里斯科人总是被推向犯罪和遭到放逐。

从腓力统治的初期，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的地位就逐渐地恶化。^[21]这最初并不是由于任何政策决定而引起的。许多摩里斯科人赖以维持生计的丝织工业，由于禁止输出而受到损害，而禁止输出又是为制止西班牙物价上涨而采取的一种徒劳尝试下的强制措施。1560—1565年，对丝织品的课税增加了一倍以上；承包税收的人们，即使根据他们的包税活动的一般情况来从宽估计，也已超越了贪污渎职的限度，而摩里斯科人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剥夺对象。在精明的圣地亚哥博士主持下，一个政府委员会决定追查所有的地契，而事实上则主要是没收了摩里斯科人的土地。16世纪60年代，土耳其人发动强大的地中海攻势时，北非的摩尔人趁机袭击了格拉纳达海岸。他们的每次袭击，都有大量从该省放逐的摩里斯科人参加。西班牙到处谣传，有一个精心安插的间谍网笼罩全国，而全体摩里斯科人在土耳其舰队支持下已策划举行起义。

格拉纳达总司令蒙德哈尔侯爵伊尼果·洛佩斯·德·门多萨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人。他甚至受到了摩里斯科人的尊敬。他们把他视为自己唯一的保护者，既使他们免遭贪婪的基督徒损害，又使他们免遭嗜

杀成性的谢拉内华达山上的强盗芒菲斯人的侵袭。但是，几年以来，他同格拉纳达市议会和作为西班牙南部最高法庭的王室诉讼法庭之间，就地位的高低、司法权和内华达山牧场的所有权等问题，发生了争端。王室诉讼法庭又在类似一些问题上同宗教裁判所不和，而宗教裁判所同那位总司令又有争端。格拉纳达的格雷罗大主教支持蒙德哈尔对待摩里斯科人的宽厚政策，但他正忙于同他自己的教堂僧会之间的一桩法律诉讼。每一方都同圣地亚哥博士和他的地产委员会有争端。像通常那样，这些地方上的争端被上交到马德里；在那里，舰队总司令的对手们找到了德·洛斯·贝莱斯侯爵做他们的代言人；那位侯爵为一些有争议的地产而对蒙德哈尔怀有私愤。

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德里的政府决定断然行事，既解决摩里斯科人问题，又解决格拉纳达的政治危机。卡斯蒂利亚议会议长埃斯皮诺萨劝说国王重新颁布1526年的一道敕令，禁止摩里斯科人使用他们阿拉伯的、摩尔人的姓名、服装、饰品，禁止他们拥有武器，此外还下令毁掉所有摩尔式澡堂，这样就禁止了一切摩尔式的礼仪。尽管蒙德哈尔提出了抗议和警告，这道敕令仍于1567年1月1日发布。在此以前几个月，埃斯皮诺萨的门徒佩德罗·德萨已被任命为格拉纳达王室诉讼法庭的庭长。得到马德里支持的王室诉讼法庭，宣告从前由总司令行使的对摩里斯科人的司法管辖权现在应由它来行使。它自己的士兵接替了总司令的士兵，但他们并无经验。他们不能赶走强盗而只会压迫安分守己的摩里斯科农民。由总司令的部队勉强维持到那时的社会治安，现在已告崩溃。摩里斯科人眼见他们唯一的保护者总司令同王室诉讼法庭的斗争已经失败，就去同芒菲斯人共命运。他们从1567年开始策划举行起义。为防御海岸而加征的赋税，给1567年的歉收雪上加霜，使得暴动俨然成为解除西班牙人统治下的日益恶化的生存困境的唯一手段。1568年的圣诞节，他们行动起来了，那时正值总司令的大多数部队奉命开到海岸防御摩尔人的袭击。

西班牙对待摩里斯科人的政策，无论是同化还是弹压，都归于失败。西班牙人的分权制度，导致格拉纳达的行政机构在这最危急的时刻瘫痪无力。随后进行的镇压战争，暴露了出人意料的军事弱点。蒙德哈尔最初获胜，而且成果辉煌。到1569年2月，他似乎已弭平全省。但是，西班牙士兵的掠夺和暴行，驱使摩里斯科人重整旗鼓加以抵抗。腓力的士兵对待平民百姓的行为，特别是对待那些不被认为是善

良的天主教徒的人们行为，在西班牙的几乎所有战役中，都表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而且是致命的弱点。蒙德哈尔的私敌们劝说国王任用年轻的奥地利的唐·约翰取代他行使最高指挥权。在他名义上的领导之下，西班牙的将军们继续争吵。战争在双方都表现出惊人的残酷之下进行下去，又耗费了两年时间和西班牙城市大量的自愿捐助，才取得了胜利。

不过，西班牙并没有完全失败。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仍旧保持忠诚。起义结束后，采取了一种更为果断的措施，使同化政策取得成效。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被成千地迁入内地，分成小批，散处于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基督教居民之间。这作为一种组织上的手段，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其实施过程中，它似乎还不如20世纪对居民采取的某些类似的强制迁移措施那样粗暴。许多摩里斯科人在他们的新家园似乎处得相当不错，有的甚至还同原来的基督徒互相通婚。但是，作为同化这两个种族的一种手段，这一政策是失败的。西班牙语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缺乏，仍未加以弥补，其结果是这两个种族互不理解的状况继续保持下去。双方仍然是彼此仇视的。

从15世纪末开始，西班牙王室的政策就是要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统一起来。对于那些基督教王国，首先选择的办法是联姻而不是征服。只有葡萄牙还保持着独立，并没有急于改变现状，直到1580年左右，西班牙的财力完全花费于对穆斯林进行的巨大战争，还被尼德兰的暴动所消耗。葡萄牙仍旧是一个友好政权。一些西班牙大贵族宁肯让它独立；因为，一旦发生事情，他们的孩子们难道还能到别处去逃过国王的震怒吗？阿尔发曾经大胆地向腓力本人说明这一点，而那位国王也从来未曾忘记，虽然正是阿尔发最后为他征服了葡萄牙。

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从很年轻时就决心在摩洛哥进行一次十字军远征。包括他姑父腓力二世在内的审慎而现实的劝导者们，即使竭尽所言，也不能劝阻他。葡萄牙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但它的海军力量和里斯本商人的财富被用去开发它的海外帝国了。这个国家本身是贫穷的，王室财政数十年来就已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22]塞巴斯蒂安的军队力量有限，远不足以实现他的宏图。他自己的领导能力，既不成熟，也不堪重任。1578年8月4日，葡萄牙人的陆军在阿尔卡萨-厄-克比尔战场被摩尔人歼灭。19世纪以前所从事的最后一次基督徒征

服北非的尝试，以彻底惨败而告终。这位没有子嗣的国王也成了丧命者之一。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立刻变得尖锐起来。

塞巴斯蒂安的继承者是他的67岁高龄的堂祖父、枢机主教亨利。人们不能指望亨利会久留人世。但是，很快就十分清楚的是，无论葡萄牙人还是欧洲列强，都不愿接受一个西班牙人去继承王位。腓力不得不精心准备他的论据。他把格朗维尔召到马德里，终于认识了他的政治才干和扩张主义的气魄。他同苏丹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1580年3月21日），那本是他在三年前就开始进行谈判、原来并不热衷于达成协议的。在尼德兰和对待英格兰方面，西班牙人的政策都变得更加和解起来。在葡萄牙本身，阿尔卡萨-厄-克比尔的惨败，几乎导致了公众的士气彻底崩溃。贵族们全都有亲人阵亡。“没有亲人在战场上的商人和手艺人（然而他们中许多人本是有亲人在那里的）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它（即那场战役）当中进行投机冒险。”^[23] 贵族们绝大多数都由于纯粹的私人原因而分裂，有的支持腓力，有的支持葡萄牙的王位觊觎者布拉干萨公爵或支持另一个葡萄牙王位觊觎者，枢机主教国王的兄弟的私生子、克拉图的大修道院副院长安东尼奥。国会里的城市议员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国王亨利试图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只是加剧了混乱。

腓力机敏地利用了这一形势。他的那些写小册子的作者们大力强调他的继承权利。他的葡萄牙代理人克里斯托旺·德·莫拉成功地把贵族和市民、主教和大学教授拉到了自己方面。当亨利的一位大臣表明对于用金钱或头衔进行的贿赂无动于衷时，莫拉就为他所建立的一个女修道院提供了圣骨。穆拉写信给腓力说，难道国王陛下能够从埃斯科里亚尔宫的修道院偷走什么东西吗？否则，他就应该把持一些尸体，并说那是圣女的尸体。腓力认为事情不必搞到那个地步就能办妥。但是，当枢机主教亨利1580年1月31日去世时，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对西班牙人继承王位的抵制，仍旧极为强烈。腓力若不显示一下武力，就不可能成功。克拉图的大修道院副院长安东尼奥成了抵抗西班牙的公认领袖。他的宣传小册子揭示了已经降临到那些接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头上的灾难。普通民众和下层教士热烈支持他。但是，在卡斯蒂利亚，贵族和城市现在团结起来支持他们自己的国王。意大利各省提供了船只、金钱和军需品。组织了卡斯蒂利亚人的作战力量的

格朗维尔，劝说腓力把已经退休的阿尔发召了回来。1580年6月27日，腓力最后批准他的军队越过国界，开进葡萄牙。

葡萄牙人是没有指望的。他们的军队敌不过阿尔发的指挥能力和优势兵力。他们的一些防御工事遭到了破坏，因为上层阶级中讨好西班牙人的太多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发表了漂亮的言辞，却无力进行干预。里斯本于8月25日陷落，波尔图于10月陷落。有组织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当它还在继续时，一直是进行得很猛烈的，而阿尔发的军队也干了他们通常干的那些暴行。

腓力现在已能够宣告他拥有征服者的权利，他发现不那样做才是审慎的。在1581年的托马尔议会上，及随后的1582年的一项声明中，他许诺保留葡萄牙人的法律和特权，只任命葡萄牙人担任官职，而不推行卡斯蒂利亚的税制。他取消了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之间的关卡，使得他的新王国能够自由地输入大量必需的粮食。这是腓力在实现他的帝国的经济统一方面取得的唯一重大进展；不过，他认为它还不如许诺给他的新臣民的一项特权重要。1593年，关卡又重新设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葡萄牙人的殖民帝国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帝国而隶属于西班牙王权之下。葡萄牙人当时对这一安排十分满意。只是到后来，从该世纪末年开始，这种分离的害处才变得明显起来。那时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和货船，受到了西班牙的敌人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攻击，而西班牙人只是半心半意地予以保护。西班牙人并不是全然不乐于看到葡萄牙人被削弱，看到对他们自己的殖民地的进攻被转移到别的地方。

修道院副院长安东尼奥逃出了葡萄牙，并继续领导着一场反西班牙的宣传运动，竭力传播关于西班牙人和腓力残酷无情和不守信用的“骗人传说”。实际上，他只不过是英格兰和法兰西政治手腕中的一个卒子。然而，他的名字仍旧是葡萄牙境内反西班牙情绪的一个象征，普通人民由于推行卡斯蒂利亚的平等公正思想实际上得到了好处，因为正如威尼斯大使马泰奥·扎内所说，他们的贵族曾经把他们“当黑奴一样”对待。但是贵族们由于自己对腓力的恩惠的过分企求而感到失望；教士们仍持敌视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腓力会像对待卡斯蒂利亚教士那样压榨他们；有教养的阶级现在审慎地转而背弃卡斯蒂利亚，并开始寄希望于法国。吉尔·维森特和卡缪思曾经用卡斯蒂利亚语写过一些作品。这种兼通两种语言的风气，现在已逐渐过时。葡

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王权的合并，并未导致那个半岛的预期的统一。1640年，即使形式上的统一，也再次决裂了。

天主教虔信者伊莎贝拉曾说，她希望发生一次阿拉贡的起义，以使她有机会在那里确立与卡斯蒂利亚同样坚固的王权。腓力二世没有表示过那样的愿望。西班牙东部的一些王国是贫瘠而人烟稀少的。在巴伦西亚进行干预也太危险了，那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摩里斯科人。加泰罗尼亚是难以对付的，但还是忠诚的。它的古老的帝国传统与腓力的地中海政策十分适应。巴塞罗那的船坞给他提供了划桨战舰和熟练的海员，但是巴塞罗那在16世纪的贸易扩张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加泰罗尼亚的贵族也未能分享到帝国的果实。他们统治自己的地产，就像统治小型的王国，总是转入宗派之争，而且常常同无处不在的强盗匪帮携手合作。由护航队护送的美洲白银船，在从塞维利亚开往巴塞罗那和热那亚的途中，经常遭到袭击，而且有时是成功的袭击。被盗的白银被用于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获利丰厚的走私贸易。西班牙政府不无根据地怀疑，北部边界上的加泰罗尼亚强盗诸侯们可能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腓力只不过任命了几个他最信任而且最有资格的卡斯蒂利亚大贵族去当副王，让他们尽其所能去对付那些难题。

在阿拉贡，国王甚至不可能任命卡斯蒂利亚人去当副王。这里不幸的农村居民指望国王保护他们免遭残暴贵族的专横权力之苦。腓力十分乐于对那种请求作出响应，但是贵族和市民强烈坚持他们的特权。对卡斯蒂利亚人的由来已久的憎恨没有减少。腓力一直拒绝访问阿拉贡，也无助于他的事业。当他于1585年终于去访问时，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去解决里瓦戈萨这个大郡的职位继承问题，那里的居民正举行起义反对他们的封建领主比利亚赫莫萨公爵。阿拉贡的议会、贵族和“正义”法庭^[24]为卡斯蒂利亚人的这一干涉所震惊。任命一个卡斯蒂利亚人去当副王，又引起新的争端。1585年以后的几年里，这个王国的紧张局势迅速增长起来。

然而，1591年暴动的发生，却是由马德里宫廷本身的事件触发的。吕伊·戈麦斯死后，他的遗孀埃博利的公主朵娜·阿娜（Dona Ana）·德·门多萨在腓力的秘书安东尼奥·佩雷斯支持下，力图在宫廷保持埃博利的影响。很难像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去肯定佩雷斯和那位独眼公主是情人。不过，这位骤贵的秘书不但遭到

许多大贵族的敌视，而且在西班牙文官中还遭到他的对手们的厌恶。国王的宠信是不牢靠的，佩雷斯也了解这一点。他为了自卫而同各种派别密谋勾结：同奥地利的唐·约翰及其秘书胡安·德·埃斯科韦多共谋反对国王；又同国王共谋反对唐·约翰；甚至还可能同尼德兰的反叛者勾结起来既反对国王又反对唐·约翰。腓力对唐·约翰及其浪漫野心深为疑虑。他否定了唐·约翰提出的入侵英格兰以解救苏格兰女王玛丽并同她结婚的计划。1577年，他曾决定要在尼德兰推行一种缓和政策，而唐·约翰却再次使他卷入了战争。^[25]当唐·约翰派埃斯科韦多到西班牙去推进他的好战政策时，佩雷斯开始担心他对国王产生影响，还由于埃斯科韦多可能暴露他的阴谋而惊慌失措。佩雷斯就像处于类似情势下的卡特琳·德·美第奇在圣巴托罗缪日屠杀前夜所采取的行动方式那样，^[26]采取了反行动。要把埃斯科韦多描绘成与唐·约翰一样具有谋叛国王的邪恶天性，本是轻而易举的事。腓力也正像查理九世曾经做的那样，同意加以谋杀（1578年3月1日）。那不是像1572年那样的一次大屠杀。不过，腓力决不会原谅佩雷斯借他之手以杀人的事。1579年7月28日，他未加训诫就下令将他的秘书和埃博利公主逮捕起来。格朗维尔恰好已经来到宫廷筹划葡萄牙战役，那位国王已不再需要埃博利派了。

在此后10年间，佩雷斯仍旧是一个囚犯。然而，埃斯科韦多的家族和佩雷斯的敌手们要使他彻底毁灭。腓力现在又犯了他的第二个错误：他陷进了这些计谋之中；他相信了佩雷斯曾经哄骗过他，也相信了他一直在损毁经他手的文件。所有为证实这些所做的努力和一次告解都失败了。1590年4月佩雷斯越狱逃到阿拉贡，要求“正义”法庭予以保护。在这个法庭上，佩雷斯针对腓力对他的指控，现在首次以直接控告国王谋杀埃斯科韦多作为回答。那是在20世纪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事态，即一个人被一种专横的政府体制所迫使而叛国，他本人却又在那种体制中起过主导作用。腓力还有一张王牌，可以胜过阿拉贡人的特权。宗教裁判所当时根据一项虚构的异端罪，要求将佩雷斯转交给它的萨拉戈萨监狱。令人憎恶的宗教裁判所，以前从未那样露骨地表现为王室专制主义的工具。1591年的5月和9月，萨拉戈萨的民众两次阻挡将佩雷斯转交宗教裁判所的监狱。国王的特别代表在骚乱中被杀。对阿拉贡人来说，这意味着保卫他们的自由权利；对腓力来说，它意味着一场公开的叛乱，必须用武力镇压下去。1591年11

月，一支卡斯蒂利亚军队开进了阿拉贡，阿拉贡人的抵抗，几天之内即告崩溃。佩雷斯逃到法国，在那里继续进行他的反对国王的争讼。

腓力对“正义法庭”和许多暴动的首谋者进行了惩治，但他推行的法制上的改革却是相当温和的。从此以后，“正义”法庭可以被国王任意撤销；副王可以是一个外邦人，即一个卡斯蒂利亚人；多数表决通过代替了阿拉贡议会的要求一致同意通过的原则。这些改变连同司法制度上的某些非常适度的改革一起，使得西班牙王权在阿拉贡拥有了最高决定权，不过他们还是保留了那个王国的自治权。

卡托一康布雷奇和约使西班牙解脱出来，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的最强大的敌人土耳其。查理五世皇帝的征战已经表明，基督徒不可能对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进行有效的抗争，而土耳其人也不可能对西班牙人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的霸权进行有效的抗争。然而，稳定的均势还没有形成。西班牙人所处的地位比他们的敌人更为不稳定得多。苏丹在柏柏里海岸的附庸和同盟者，对基督徒的侧翼总是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对货船和意大利与西班牙南部那些不幸的渔村、小港的袭击，使人们经常感到这一威胁的存在。他们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的接触，使得西班牙这个强国的腹心部分也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只要柏柏里海岸的各王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它们造成的威胁就有可能防止。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而双方也都相应地制定了它们的战略。对于西班牙人来说，那一战略必须是防御性的。他们致力于两条海上战线，即地中海战线和大西洋战线；在那两条战线上，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战船难以互换使用。如果以划桨战舰对付划桨战舰，土耳其人能够建造得更多。在为圣约翰骑士团夺回的黎波里的战役（1560年）中，曾尝试以西班牙的意大利属地和同盟者的分遣舰队加以配合，其结果是基督徒的战船损失了一半以上，而且表明，若无海军优势，就连发动一次有限的进攻行动也是危险的。因此，保存他的舰队就成了腓力的海军战略的主要目标。不利的情况是，西班牙可能在它最不愿打仗的时候被迫进行一次海战，或丧失一个致命的战略要地。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土耳其人1565年围困马耳他期间，变得令人痛心明显起来。当土耳其人收缩包围圈时，圣约翰骑士团发出了越来越迫切的求救请求，腓力自己的总司令，西西里副王加尔西亚·德·托莱多，由于马德里缄默不答而失望。没有明确的命令，他不能让他的舰队冒险去抵抗土耳其的更强大

的舰队。经过几周犹豫之后，腓力决定抵抗。由于骑士团的奋勇守卫，还由于托莱多在未动用他的舰队的情况下就登陆增援的出色行动，这个岛屿得到了拯救。

那是一次险胜，但却是地中海战争的转折点。土耳其人在争夺地中海中部控制权的斗争中失败了，但这并不是立刻就清楚的，土耳其人仍然令人生畏。双方的船坞都竭尽全力建造战船。卡拉布里亚的叛教者、阿尔及尔国王乌卢杰·阿里，在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起义时虽然没有向他们提供什么援助，却趁机推翻了依附于西班牙人的突尼斯国王（1570年1月）。腓力赢得摩里斯科战争后，不得不立刻去对付这一挫折。随着尼德兰暂时平静下来，^[27]腓力得以集中力量到地中海方面，并参加庇护五世与威尼斯的反土耳其人的神圣联盟（1571年5月）。腓力缺乏他父亲那种十字军征讨热忱。在他看来，那个联盟至少可以给他提供一次机会，使他可以在对等的或优势的条件下面对土耳其人，并确保西班牙人在地中海中部和柏柏里海岸的地位。这一赌注赢得了巨大的报偿。1571年10月7日，联盟的舰队在奥地利的唐·约翰指挥下，在勒班陀实际上歼灭了土耳其人的舰队。然而唐·约翰的著名的胜利，道义上的影响多于实质上的影响。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从普通士兵塞万提斯到总司令唐·约翰，勒班陀是他们的圣克里斯平节日，再加上一种履行了西班牙人作为上帝捍卫者反对他的教会敌人的使命的光荣感。这种情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西班牙人为何会继续支持他们国王的宗教政策和扩张政策，即使面对着导致破产的费用和日益增多的灾难也一如既往。

然而，勒班陀战役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8]盟军之间在下一步的推进方向上的争吵，耗去了第二年通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塞浦路斯陷落了，而且没有重新夺回的希望。1573年3月，威尼斯同苏丹缔结了一项和约。神圣联盟可以帮助西班牙赢得战役，却不可能保护它的属地。威尼斯的背叛使得唐·约翰至少可以把力量集中到地中海中部。1573年10月，他占领了突尼斯；不到一年以后，它又丢失给了乌卢杰·阿里；阿里指挥一支土耳其人的舰队，其实力优势竟然使得西班牙人不敢冒险同它公开交战，似乎勒班陀战役从未发生过那样。腓力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地中海的那个短暂时期，已经过去了。他的财力资源被过度地消耗了。从1571年到1573年，小小的西西里王国就为唐·约翰的舰队支付了120万斯库迪^[29]，而在1575年，腓

力又不得不付出7.5万斯库迪，作为给西西里政府的直接补助，以防止它的财政崩溃。那不勒斯的财政状况甚至更糟。西班牙政府本身正蹒跚地走向它的第二次破产（1575年）。西班牙现在已深深地陷进了尼德兰。地中海的战略形势回到了马耳他被围之后的那种状况，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平衡。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和财政资源虽然仍比西班牙略胜一筹，但也是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而且它的政府也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它的另外一些边境问题。缔结一项协定的时间来到了。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的帝国之间的巨大争夺，变成了一种“冷战”，只是伴随着出现一些偶尔的无足轻重的劫掠。它的最后结局，不是由刀剑的铿锵声来决定，而是由两个帝国的内部事态的发展来决定。

像在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期那样，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防御问题也支配着西班牙同他的意大利属地之间的关系。不过，自1559年以后，处于帝国防御前沿线上的已经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而不是米兰。因此毫不奇怪，正是一位西西里的副王马可·安东尼奥·科隆纳对帝国防御问题提出了最清晰的系统论点。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对帝国存在依据的论证，也是由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提出来的。诸如科隆纳、多里亚和佩斯卡拉那样资深而显赫的意大利家族的成员，不可能接受任何使自己在为西班牙国王效劳方面处于比西班牙大贵族低一等的地位。由此，他们就必然要把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看作是在一个国际性而不是西班牙人的帝国中与西班牙人的各王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具有特别意义的是，科隆纳的论点集中在财政方面。他凭经验知道，西西里人对于交付给西班牙的每一个杜卡特都是斤斤计较的。然而，当土耳其人大举进攻时，这个岛屿的防御不能仅靠20万左右的杜卡特来支持。只有把国王的各个属地上的财源全部汇合起来，才能保证每一个属地的安全；因为它们全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必须互相帮助。科隆纳于1582年在给腓力的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陛下的事业由于缺乏金钱、人力和军需品而蒙受危险或损失，却由于一部分富足、另一部分匮乏而蒙受危险或损失”，以及由于大臣们的自高自大阻碍他们向自己的同伴提供充分的支持而蒙受危险或损失。

当加尔西亚·德·托莱多的舰队从墨西哥驶出去解救马耳他之围时，或者当唐·约翰的凯旋的舰队从勒班陀返航之时，西西里人易于看到同西班牙人联合的好处，他们的议会也愿意为帝国的防御做出贡献。

献。但是，当西西里人的划桨战舰受命不再在这个岛屿的海岸防御海盗袭击，而去参加阿尔发讨伐里斯本的远征时，帝国的好处似乎就全都为西班牙一方所独占。直到1580年左右，西西里同帝国的联合，在改善其行政管理以及打击横暴的诸侯和黑手党似的强盗而伸张王权和正义方面，还起着促进的作用。从那时以后，强迫因素变得极为严重起来。例如在1588年，西西里以现金和食物形式向无敌舰队提供的金额达50多万斯库迪。行政改革方面的良好效果，被日益盛行的卖官鬻爵的做法所抵消，腓力二世曾把向贵族出售司法管辖权的做法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他的儿子比他较少顾虑。1621年，贵族终于获得了得以购买他们领地上的司法管辖权的权利。向副王们发出的扶弱抑强的训令成了一纸空文。

西西里议会保留了它的特权和权力，因为王权从来不需要打击它。那个议会尽其所能地把可能从一个小国适度取得的钱财交纳给国王，而那个小国的仅有的经济资产就是它的粮食产品和生丝。与此同时，西西里也受到了它的议会的保护，使其免于蒙受那不勒斯和米兰所蒙受的那种程度的财政剥削。西班牙的统治并没有给西西里造成许多意大利历史学家所说的那种经济崩溃。更恰当地说，问题在于王权对掠夺成性的贵族和有产阶级的特权给予的默示支持，使得这个岛上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西西里仍然是一个拥有巨大宪制权利的国家，而其行政管理却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副王职位逐渐被看作其任职者名声的坟墓，就不足为怪了。在马德里，副王们的政绩主要根据其财政政策的成败来衡量。他们同贵族特权和农村无法无天行为的斗争归于失败。他们的对手可能经常与宗教裁判所打交道，从而逃避世俗法庭的审判。副王与宗教裁判所之间的管辖权上的争端，有时几乎导致整个行政的瘫痪。双方都诉诸马德里，而且双方都能在朝廷中找到朋友。或迟或早，腓力总会听到副王不忠的传闻，并将他撤职。[\[30\]](#)

与西西里相反，那不勒斯诉诸西班牙人的问题要少得多。[\[31\]](#)那里不存在对副王权力的有效的抗衡力量。贵族仍然是分裂的，因为当阿拉贡集团和安茹集团之间的宿怨比以前有所减弱时，西班牙人鼓励大量的热那亚人迁居到这个王国来，其中有将近200家贵族。他们的地位和财产有赖于王室的恩宠。而且，政府暗自挑起贵族和那不勒斯城市的民众议员（Seggi）之间的不信任。政府的官员，从副王以下，都

以其贪婪腐败而声名狼藉。相传密兰达伯爵在担任副王期间积聚了100万杜卡特。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不过，奥利瓦雷斯伯爵常说，一个人不应该企求担任那不勒斯副王，以求避免离职时的痛苦。

由于缺乏抵制政府财政要求的宪制保障，作为政府财源的赋税迅速增长起来，或许比物价上涨还快；在16世纪70年代，高达200万杜卡特，到1611年，几乎高达400万杜卡特。这笔款项的绝大部分，被用于防御和支付地中海舰队。但是，就像在西西里发生的情况那样，大约从1580年以后，日益增大的款额被用于支持西班牙在西欧采取的行动。副王们自己也不得不拒绝王室的金钱索求，因为已不可能从纳税人那里榨取更多了。那不勒斯像西西里一样，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半殖民地国家。它的贸易控制在热那亚商人手里，它的贵族放纵其附庸横行霸道，而不理睬王室要求副王扶弱抑强的一切训令。它的农民和小商人遭到阿布鲁兹强盗的绑架勒索。然而，西班牙人虽然是那样不得人心，却统治着那不勒斯，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可以接受的。威尼斯人阿尔维斯·兰多曾惊奇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王国像这个那不勒斯王国那样；它如此经常地尚未陷落已被征服；它处于永久性的被奴役地位……却能面对它的强敌经常夸耀自由和主权。”

米兰人的态度极为相似。伦巴第在60年间一直是列强的战场。面对着被毁的收成和遭劫的城市，米兰人不再愿为难以确保的政治独立的利益而战。西班牙人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继续把米兰看作西班牙的军事前哨，^[32]而既已有了和平，西班牙团队的勒索就深受怨恨了。但是，城市获得了它们原有的许多自治权，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拥有一些代表席位。中世纪民主的最后痕迹从城市政府中消失了，而它们的一些有权势的家族，现在垄断着全部的地方权力，指靠着西班牙国王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只有一次出现了对西班牙政权的严重威胁。1563年，腓力决定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推广到米兰。米兰人就像尼阿波利斯人对于1547年的同样企图所做的那样，^[33]予以激烈抵制。难道米兰不是最古老的基督徒城市之一而且连异教的嫌疑也从未沾染过吗？他们这样问道。暴乱也出现了。大主教、特伦托宗教会议和教皇本人支持市民。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权限而担心。腓力像他的父亲在那不勒斯做过的一样，不得不做出让步。

我们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米兰人财政状况的详细研究成果。看来赋税负担似乎没有增加到超过皇帝统治末年的程度。米兰是西班牙人在

欧洲的霸权的一个支撑点。国王从这里控制他的意大利盟邦和保持他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的联系。他可以从米兰挥军南下抵御土耳其人的威胁，或向北向西推进，在尼德兰或法兰西进行干预。绝不可使米兰人的反感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这个公国的绝大部分岁入和西班牙支付的巨额款项，不得不用来驻扎在伦巴第的军团。这位总督尽管在原则上拥有任意征税的权力，但在取得每一项额外征课的许诺时不得不同各个城市讨价还价。米兰政府的财政状况就这样每况愈下，但这个省份本身却从该世纪前半期的灾难中复兴起来。它的城市人口及其经济活动迅速增长。拥有10万居民的米兰，是欧洲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金属加工和军备制造业。一些较小的城市，如帕维亚或纺织业中心科莫，甚至发展得更为迅速。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属地中，唯有伦巴第能够从欧洲的物价上涨和市场扩展中获得利益。后来，在17世纪的瘟疫和战争年代里，米兰人竟把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几乎当作一个黄金时代来回顾。

虽然米兰人、尼阿波利斯人和西西里人对西班牙的统治从来只不过是勉强容忍，真正的谋求意大利独立的情绪，仅仅存在于那些还保持着独立的意大利人的各邦里。即使在那里，它通常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情感。如博卡利尼指出的那样，在意大利喜剧中，西班牙人代替尼阿波利斯人充当代表绝对空虚的木头人角色。意大利诸邦过于互相猜忌，以致不能携手合作去反对西班牙。不过，即使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与这位天主教国王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法国人的重新干预，为一些人所期待，又为另一些人所恐惧；而那种干预直到法国宗教战争结束以前，总是纸上谈兵而并无实际的可能性。

热那亚比任何其他邦都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西班牙君主国的命运。它的银行家把他们的金钱投资于西班牙人的借贷，并代替德国人充当了西班牙王权和西班牙财政包税人的主要债权人。它的商人和贵族在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定居，与当地贵族互相通婚，并垄断了很大一部分西班牙与其属地之间的贸易。斯皮诺拉指挥过腓力三世在尼德兰的军队。多里亚家族指挥过西班牙人的地中海舰队，同时又在故乡牢牢地保持着对亲西班牙的热那亚贵族集团的控制。只要秘鲁还在向塞维利亚输送白银，热那亚的财阀集团就能保持兴旺。从加莱亚扎·阿莱西为他们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中以及凡·戴克于17世

纪20年代为他们画的肖像中，人们还能领会到这个风雅、文明而又无情的社会的某些风韵。

与西班牙同热那亚的平静关系相反，它同教皇国的关系则充满了风暴。王国议会议长菲格罗亚曾说过：“在西班牙不存在教皇。”他以这句名言概括了摩擦的主要原因。不过，菲格罗亚的论点只是在一点上正确。西班牙国王拥有全部教职的任命权，其圣俸的总额，据同时代的人估计，达600万杜卡特以上。其结果是，西班牙的教士指望从马德里而不是从罗马求得晋升。西班牙王室的教职任命大权，是确保高级贵族、绅士和城市中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对它忠诚效命的有力手段。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代开始，西班牙的国王就有意地推行一种限制教皇对西班牙教会的影响的政策，他们坚持有权阻止教皇的某些训谕和敕书在西班牙公布。他们竭力阻止西班牙教会法庭向罗马提出上诉。16世纪上半期的教皇们在这些问题上还比较能委曲求全。但是，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则力图夺回已经丧失的地盘。

第一场公开的冲突，是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采取反对托莱多的巴托罗缪·德·卡兰萨大主教的行为而引起的。^[34]这一事件是佩雷斯事件在教会领域的对应产物。卡兰萨在腓力和玛丽统治期间曾促使英格兰异端分子重新归顺或施之以火刑；还以他那虔信热忱，把一些被疑为异端的人从安特卫普那比较安全的处境引诱到另外的地区，使宗教裁判所得以在那里将他们逮捕；他为此而给自己赢得了名声。但是，在他升任西班牙首席主教以后，心怀嫉妒的竞争者们向神圣宗教裁判所的最高议事会对他提出了控告，他本人就成了那样一种制度的牺牲品，而他曾是那一制度的极其热心而且取得成功的首倡者（1559年）。在西班牙本土，对这一控告的判决存在着怀疑。特伦托宗教会议最后宣告他的观点属于正宗。然而，这一案件根本的焦点不是卡兰萨的观点，而是教皇坚持一个主教只能由罗马来审判；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则坚持对一切涉及异端的案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王权支持宗教裁判所，因为正如枢机主教亚历山德里诺给罗马的信中所说：“这里的那些对审判权的最坚决的维护者们坚持认为，宁可惩办一个无罪的人，也不能让宗教裁判所的权力遭到任何削弱。”这一案件迁延了七年之久。然后卡兰萨被转交给罗马。这是教皇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又过了几年，教皇才敢于宣告他的实际上无罪开释的判决^[35]。

在意大利，关于教会审判管辖权的争端，甚至更为激烈。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对教会的控制，甚至比在西班牙本土上把持得更紧。他根据他的对教皇训谕的认可权，可以否决一切教皇训谕的公布，就像法兰西的国王根据他们的《审查法》可以做的那样。而且，在西西里，国王还行使着主宰权，即一个永远有效的教皇使节的权利和权力。这一权利要求的根据，是乌尔班二世给西西里的罗哲尔（Royer）伯爵的一项所谓的特许。教皇并非无故地要抵制那样一项权利，因为它实际上使得国王对西西里教会拥有那样大的权力，就像英格兰国王对英格兰教会享有的权力一样。这一抵制并未得到解决，而且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庇护九世于1867年正式废除主宰权为止。这是西班牙制度下的一种典型的事态：主宰权法庭逐渐强调自己的意志，不但同宗教裁判所（像它自己一样，坚持作为一个教会法庭不承认任何上司）发生冲突，而且同副王们所代表的王权发生了冲突。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大多数戏剧性冲突发生在米兰。在这里，那些冲突是特伦托会议之后经过改革的罗马教会采取反击行动的直接产物。其领袖人物是庇护四世年轻的侄子卡洛·博罗梅奥。他于1566年抵达米兰就任大主教职。在给腓力的忏悔神父的致辞中，他要求“以非常的严厉手段去迫使群众接受至高至善的目的”。像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那样，博罗梅奥建立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法庭，并把这个城市和公国组织在他自己的官员控制的管区之中。他的武装卫队把那些违背他的宗教训令的冒犯者立即投入大主教监狱。但是，当他着手把他的权力从监督教士的道德扩展到监督俗人的道德时，他就开始陷入了同世俗法庭的冲突。当他不顾阿尔武凯克公爵的制止而宣示特伦托宗教会议敕令和教皇的“当我主晚餐”训谕^[36]（它们禁止君主们向他们的臣民征课新税）时，他就同王权本身对抗起来。阿尔武凯克将大主教的代理人逮捕起来，并派军队占领了博罗梅奥的田庄。博罗梅奥以诅咒和停止教籍相回敬。他赢得了巨大的策略上的胜利。阿尔武凯克不得不乞求教皇赦免。他的继任者之一唐·路易·德·雷克森斯只是因为他离开米兰去当尼德兰总督才获得了赦免。博罗梅奥对米兰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在瘟疫流行期间的慈善和无畏表现赢得了朋友和对手的赞扬。但是他的贵族气派和独裁主义过于强烈，使他不可能期望成为反对现存政权的民众运动的领袖。无论罗马还是马德里都经不起把这场争执推向极端。腓力依靠教皇才取得了对在西班牙征收圣战税和其他教会税的承认。那是西班牙王权付出的代价，因为它没有像

其他欧洲政府不得不做的那样，去同构成王国中一个等级的教士们商讨税收问题。这些教会税一年可达200万杜卡特之多，为了那样一笔款额，腓力对他在米兰的代表们蒙受的凌辱可以予以容忍。

到腓力统治的末年，争端再次爆发，卡洛的堂兄弟和继任者费德里克·博罗梅奥，试图效法他的米兰教区的杰出的前任，准备将总督革出教门。但是胡安·德·贝拉斯科不是阿尔武凯克，他不为威吓所屈服。克莱门特八世也不是庇护五世。这位大主教没有从罗马获得支持。但是争端继续下去，甚至1615年的一次妥协也未予以最后解决。不过，从根本上说，教皇同西班牙君主国之间的关系较少取决于管辖权上的要求，而更多地取决于双方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和新教徒的政策。

佛罗伦萨和皮埃蒙特-萨伏依的公爵都是靠着西班牙的武力和外交维护其宝座的。萨伏依的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确实认为，他曾在圣康坦战役中征服了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引导腓力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迫使法国人签订了《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然而，尽管他有这一看法，而且与法国人联姻，但他从未忘记他对西班牙的依赖。萨伏依和皮埃蒙特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占领下解脱出来后，热烈地迎来了他们的公爵。议会授予他巨额的赋税；用这笔钱，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能够支付他的军队的费用。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让他的议会有什么效用。原来的城市统治阶级已经被25年的外围军事占领所摧毁。贵族们被私仇缠住，他们的地产被抵押，而且许多人被法国或西班牙收买，或同时被两者收买。他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无力捍卫自己原有的政治特权。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对他自己任尼德兰总督时遭受挫折的经验记忆犹新，于是就建立了一种严酷的体制，那是欧洲最严酷的专制政府体制之一。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由中产阶级的官吏来履行，他们完全依赖于公爵。贵族们在政治权力上的损失，由头衔和宫廷职位以及废除公爵对他们地产的任何实际干涉而得到了补偿，在那些地产上，农奴制通常都继续保持到18世纪。

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在那样牢固地控制着国家后，能够以从前任何一个米兰总督都不敢那样做的方式增加赋税。政府的财政收入从9万杜卡特左右增加到50万。公爵对于发展皮埃蒙特的工业生产曾予以极大注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弥补令人感到窒息的税率和他的常备

军的勒索。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威尼斯的大使们都谈到了荒芜的农田和几乎普遍存在的贫困与冷漠气氛。

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他的绰号是铁脑袋——至少还使他的国家摆脱了战争，而且还设法使法国人撤出了他们一直驻守着的城市。他的儿子夏尔·埃马纽埃尔一世（1580—1630年）则除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外，还推行一种想入非非的对外政策。他梦想得到葡萄牙或波希米亚、西西里或撒丁尼亚的王冠，甚至还梦想得到帝国的皇冠。法国的亨利三世死后，他荒唐地期望继承法国的王位或在普罗旺斯得到一个王国，由此而丢掉了征服日内瓦的可能性；这后一项目标本来既有某些历史的正当性，也有某些成功的希望。^[37]夏尔·埃马纽埃尔已经被视为实践国家理性的代表者而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他预示了19世纪“复兴”时期的萨伏依家族人物的特征。他的同时代人却未能以那样一种超然观点去看待他。他们只是看到：他在经济上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即使皮埃蒙特-萨伏依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幸存了下来，那也只是由于幸运和列强的利益（正如日内瓦的幸存一样），而不是由于它的公爵们的政策。

1530年，美第奇在帝国武力援助下推翻了最后的一次佛罗伦萨共和制。佛罗伦萨的贵族阶层在共和制下已蒙受沉重打击。他们在经济上不能自立，道义上不愿同共和派和民众合作，除了依赖美第奇的支持，别无选择余地。首先是亚历山德罗，然后是科西莫·德·美第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形势。他们把这个“元首国”变成了一个公国，一个警察国家，其专横暴虐的程度不亚于萨伏依公爵们统治的国家，只是其运转效能更高。贵族阶层从城市贵族变成了文官和宫廷贵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资本从工商业中转移出来，仅仅投资于银行业，或者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扩展他们在城外的地产。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未受损害（尽管科西莫对他的全体臣民都推行了严格的法制，而且还取消了佛罗伦萨城市的特权），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丧失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共和国的制度只是在形式上保存下来，因为公爵依靠自己的官吏避开了那些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当那些在共和制下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的人们去世以后，一些杰出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从马基雅弗利到奎恰尔迪尼和瓦尔基都再也找不到那些人的继承者。除了乏味的宫廷阴谋和公爵们的事迹以外，已没有更多的东西可写，而那些公爵们在欧洲大国政治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

用。佛罗伦萨人的创造天才，本是同城市国家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在公爵们严酷的宫廷社会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枯萎了，虽然美第奇还没有抛弃保护艺术的传统。但是，在创造性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方向上的转移，从文学和观赏艺术转向了自然科学和音乐，后面这两项活动在意大利历来不是同城市国家的艺术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领域，佛罗伦萨逐渐闻名遐迩，就像它一度以绘画和雕刻著称一样。[\[38\]](#)

美第奇家族的公爵们，确有家传根底，都是出色的金融家。在同时代君主中，几乎只有他们总是拥有偿付能力。科西莫一世的财政资源使他得以征服锡耶纳共和国（1557年），并对西班牙保持充分的独立，使西班牙把它当作是一个盟邦而不是卫星国来对待。超过这一限度是绝对办不到的。从1530年起，西班牙人控制了一些要塞，即托斯卡纳海岸的五个要塞，并对这个公国保持着一种军事上的制约。1570年，科西莫一世从教皇那里取得了托斯卡纳大公的称号。由于需要皇帝和腓力二世对这一称号加以承认，使得弗朗西斯一世（1574—1587年）甚至更加依附于西班牙。斐迪南一世（1587—1609年）得以较为独立地行事。与夏尔·埃马纽埃尔类似，他试图在法国同盟战争期间在普罗旺斯浑水摸鱼。最后他幸运地没有蒙受严重损失就撤了回来。

然而，托斯卡纳为支持它的统治者们的财政支付能力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赋税苛重，而且几乎所有的工业都处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谷物贸易、油脂贸易、造船和船运业，都由政府垄断。在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这些行业几乎全都被用来满足大公私囊的利益。在斐迪南一世统治时期，这个公国在一定程度上从16世纪80年代的衰退中复兴起来。里窝那这个真正的自由港口，成了北欧和西欧同地中海进行贸易的大集散地。但是停泊在里窝那的绝大多数大船都飘扬着荷兰或英格兰的旗帜。意大利航海业的极盛时代已经过去了。

意大利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是威尼斯。正如尼古洛·孔塔里尼和其他一些威尼斯政治家看到的那样，若无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威尼斯的持久独立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共和国必然是敌视西班牙的，这个事实在马德里和在里亚尔托[\[39\]](#)都被同样清楚地理解了，但是不可能发生公开破裂的问题。在土耳其人进攻时，威尼斯需要教皇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到16世纪中叶，威尼斯从丧失香料贸易垄断权的打击中至少已部分地得到恢复。亚历山大港和阿勒颇的威尼斯商人还能够从阿拉伯商队那里购买香料，并向正在扩大的欧洲市场提

供很大一部分货源。^[40]他们至少还能供应一些呢绒，阿拉伯和黎凡特的商人希望用那些呢绒交换他们的香料。威尼斯人在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庞大的呢绒纺织业。然而，色彩绚丽而且价格较低的英格兰粗呢和法国与荷兰的细毛哔叽在东方市场上比暗淡而昂贵的意大利传统纺织品更为畅销。这些产品使威尼斯的西方竞争者在黎凡特贸易中大获其利。而且，黎凡特的贸易是不稳定的。塞浦路斯战争（1570—1573年）^[41]和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海盗活动使商业中断，并导致有利市场的丧失。紧接着勒班陀战役之后的土耳其—波斯战争，减轻了奥斯曼海军对地中海的压力，从而有利于西班牙，但是它阻止了威尼斯赖以获得香料供应的东方的商队贸易。其结果是，威尼斯的贵族越来越倾向于把资本从商业中抽出来，投资于他们在威尼斯本土的地产。像18世纪的英国乡绅（他们正确地意识到了与威尼斯贵族的酷似性）一样，他们增进自己的地产，并建起了漂亮的帕拉第奥式的别墅，而当商业前景看好时，又重新投资于商业或工业。威尼斯的玻璃、陶瓷、金属制品、丝绸，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书籍，都是欧洲最精美的产品。当米开朗基罗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画完了他的最后一幅壁画和勾出了最后一幅草图时，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已没有一个画家具有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那样的才干，也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帕拉第奥相匹敌。与佛罗伦萨不同的是，威尼斯在观赏艺术未见衰落的情况下，还能够在音乐的新的发展中起到它的作用。弗朗西斯科·桑索维诺在1581年写道：音乐的故乡本是在威尼斯。50年以前那样说还不确切。再也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例证来证明这个意大利城邦的持久的创造活力了。但是，威尼斯经济生活的特点已发生了变化。在17世纪初期，威尼斯贸易的衰落已是普遍公认的。1610年，一项提案提交到元老院，建议给予外国商人以在威尼斯的各属地上从事贸易的广泛的权利，并允许他们获得威尼斯公民权。但是，既得利益、因循守旧，以及担心向宗教异端敞开大门，使这项提案遭到挫败，而或许也就由此断送了恢复威尼斯从前的商业优势的最后机会。

同往昔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或同时代的西欧相比，威尼斯的政治活动仍然是沉寂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变化并未搅乱社会的平衡。即使存在这一事实，面对着西班牙和土耳其政府的陆海军实力优势，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回旋余地都是很小的。促使他们分裂为“老式”家族和“新式”家族、“青年”贵族和“老年”贵族的那

些分歧，是态度和策略性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对西班牙或教皇加以抵制的问题，而不是政府或宗教的根本性问题。塞浦路斯战争使那些垄断首领职位达一百年以上的老年贵族和“新式”家族统治集团失去威信。在1582—1583年，松散地组织起来的一个年纪较轻的主要来自“老式”家族的贵族集团，设法减少10人委员会及其常务执行委员会[即松塔（Zonta）]的权力。这个集团的领袖列奥纳多·多纳托和尼古洛·孔塔里尼是早期威尼斯宗教改革家萨多莱托和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精神后裔。他们现在开始把共和国转向比较倾向于反西班牙、反教皇和亲法国的方向。1585年，他们坚持拒绝了西班牙人向威尼斯提供的一项有吸引力的出价，即取代葡萄牙人的香料贸易。他们颇有理由地担心这个共和国将会像热那亚那样变成西班牙的一个卫星国。他们承认了亨利四世对法国王位的继承，并竭力促使教皇西克斯特斯五世将他的政策转而倾向于法国。^[42]1605年，他们接受了教皇为反对这个共和国对其教士的控制而发动的挑战。这是一场审判管辖权的争端，就像西班牙同教廷之间的许多争端一样。不同于后者的是，它导致了一次彻底的决裂和教廷对共和国宣告停止其教籍（1606年）。新选出的教皇保罗五世（博尔盖塞），认为他能够在意大利人的小国中断然地确立教廷的最高权威。西班牙出于它对威尼斯的传统的敌视，竭尽全力怂恿教皇干下去。这个共和国的回答就是选举多纳托任它的首领。作为教皇的最危险的代理人的耶稣会士们被驱逐出境。多纳托和孔塔里尼的朋友修士保罗·萨尔皮出色地反驳了教皇的行为在教义上的正当性。这是天主教在意大利发生的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当西班牙以战争相威胁而亨利四世只能给予外交上的支持时，威尼斯接受了法国的调停和在直接争执点上的妥协。不过，实际上是威尼斯取得了胜利。共和国保持了使它的世俗政府不受教士干涉的充分独立。在随后的10年间，威尼斯面临了西班牙发动的一场更猛烈的攻击，这次是攻击它的政治独立的存在本身。而这次进攻也被共和国击败了。对于17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来说，正是这个圣马可共和国^[43]而不是萨伏依和美第奇的王公世家，挺立着捍卫了保存下来的意大利的自由权利。

二 1585年前的尼德兰与法兰西问题

1520年，当查理五世初次访问他新接收过来的王国之后离开西班牙时，卡斯蒂利亚的城市发动了起义，反对佛兰芒人统治他们的国家。^[44]1559年，角色颠倒过来了。这次是尼德兰蒙受了外国对统治权的继承，并被西班牙人的统治所震惊。然而，与1520年的西班牙的情况相比，并不存在任何更为严重的外国统治。

腓力二世从他父亲退位直到1559年期间在尼德兰的驻留，并不是成功的。他对尼德兰人来说显得是一个外国人，就像他的父亲最初对西班牙人显得是一个外国人一样。他的政府为支持法兰西战争而提出的金钱要求，引起了同尼德兰三级会议即各省等级代表联席会议的长期激烈的争端，等级代表会议中的贵族世家反对政府以任何努力推行一种新的而且较为公平的税制，因为那种税制不再把最沉重的负担加于穷人身上。在1577—1578年，三级会议授予了一项征税权，准许在九年之内每年可征收80万弗洛林，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应由它自己的监督官监督这笔钱的征集和开支。一些省的等级代表会议，特别是布拉班特、佛兰德和荷兰，在此以前已经那样做了，而且建立了自己的财政机构。现在这种做法就应扩大到在三级会议中有其正式代表的所有13个省份。其目的本来是实用性的，在于要防止把用于支付军队费用的金钱拨来偿付政府债务。佛兰德，后来还有荷兰，反对这一新制度，因为它们担心布拉班特在这一制度的管理中占主导地位。以安特卫普的银行家安东尼·范·斯特利兰为首的新的财政机关，也没有特别尽职或诚实地工作。政府当然认为那是对它的权利的一种严重侵犯和等级代表会议权力的危险的扩大。

正当腓力要启程返回西班牙之前，三级会议要求撤走由3000名西班牙军人组成的团队。这位国王曾要求将他们留驻尼德兰，既作为抵御法国的一支有效的防御力量，也作为防止这个国家本身可能爆发的反抗的一种可靠的手段。对哈布斯堡的扩张政策，对战争、苛捐杂税和牺牲旧有特权而扩大政府权力的一切反抗，全都集中到这场争端中来了。^[45]腓力不得不让步，但是他做得那样勉强和迟缓。从此以后，他断定不能信任尼德兰的三级会议。

西班牙人直接统治的唯一标志现在已被撤除。腓力离开时任命的政府，几乎是一个具有勃艮第传统的纯粹尼德兰人的政府。他任命他的异母姐姐、帕尔马公爵奥塔维奥·法尔奈泽的妻子玛格丽特为新的总督。玛格丽特是查理五世的非婚生女，她本人出生于尼德兰，对她的任命似乎是沿袭了那位皇帝开创的惯例：那位皇帝曾任命过他的姑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他的姐妹匈牙利的玛丽。身为金羊毛勋章团成员的上层贵族，占据了省总督职位。其中有几位贵族，包括颇有人望的战争时期的英雄埃赫蒙德伯爵，奥兰治亲王和他的朋友霍伦伯爵，成了国务会议的委员。上层贵族早已不再局限于谋求他们单纯的省区利益，而是在他们的君主的宽怀大度中谋求最好的晋升机会。在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里，哈布斯堡王室依靠他们推行了使17个省政府实现中央集权化的政策。腓力认为他能使他们继续保持忠诚。与此同时，他并不充分信任他们。他在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密令中，指示她在采取一切重大决策时，只能同格朗维尔、枢密院秘书维格利乌斯和绝对忠诚的贝尔莱蒙伯爵瓦隆等人商议，当然，最后的决定权保留在马德里，而这位国王，如众所周知，却又烦于做出决定。

玛格丽特的政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宗教和财政危机。异教迅速地传播着，这并不新奇。尼德兰的现存教会由于其世俗欲望和不能致力于满足民众的宗教需要，早已声名狼藉。伊拉斯谟和他的朋友们曾力图从内部改革教会，并逐渐向它灌输虔诚、开明与和睦的精神。他们对有教养的阶级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当更激进的宗教改革家开始出现之时，他们的思想还在发挥其影响。正是针对这些激进派别，路德派、再洗礼派和后来的门诺派，查理五世的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公告》。成百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处火刑。不过，迫害仍旧是零星地进行的，效果也极其有限。除了路德派以外，新教派通常并不触犯贵族世家统治阶级。但是这些教派中许多人，特别是受到伊拉斯谟思想影响的那些人，对于为了宗教信仰而对他们的同胞处以火刑的做法，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反感。那个《公告》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而主教们的宗教裁判所仍旧是极为不得人心的。

但是，从1560年前后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加尔文派的传道士第一次开始大量地出现。他们很快就已经能够向加尔文保证，他的著作越来越畅销。同法国的媾和导致了同法国新教徒的接触。加尔文本

人写道：“我也是一个比利时人。”他的学说从日内瓦、德意志和英格兰传播到尼德兰，那种传播工作几乎同在法国一样地组织得十分活跃。同样也是第一次，传道士们开始从贵族世家阶级中熏陶出了大批改宗者。在社会上，加尔文教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受尊敬者”，而洗礼派从来未能成为那样的人。正如天主教方面的观察者正确地看到的那样，传道士们在有失业和工人与工匠对经济不满的地方，成就特别显著；但是，当他们认为宗教只是掩盖经济野心的一种伪装时，他们就误解了加尔文宗的性质。正是其宗教魅力才使加尔文宗得以成为包容所有阶级的一种运动，并把野心勃勃的贵族或饥饿的纺织工人都吸引到它那里去。正是这一特点，使加尔文主义运动对现存秩序来说比先前的异端派别更加可怕和危险。

加尔文教派组织的发展比之在法国缓慢得多。^[46]对传道士和新教秘密团体的威胁是实际存在着的，不过他们越来越转入公开的活动。这个国家的气氛使得政府不敢推行一项严厉镇压异端的坚定政策。看来是加尔文教派组织了一场十分有针对性的宣传运动，使人民确信国王要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引进来。腓力并没有那样的打算，他知道那样做太危险了。此外，正如他在1562年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所说，尼德兰的宗教裁判所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更少慈悲，因为它甚至把那些已经悔过的异教徒也判了死罪。他始终没有理解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及其审判程序在整个欧洲激起的特别强烈的恐怖和憎恶情绪。但是，甚至直到加尔文宗的危险成为燃眉之急以前，他一直决心通过对尼德兰的教会进行一场彻底的组建，来加强教会权威并进行反对异端的斗争。1561年，教皇发布了设立14个新主教职位的训谕。把选择主教的权利从主教堂的特权中分割出去，转授给了王权。一些最古老最富有的修道院，特别是布拉班特境内的修道院，应向新任命的**主教**提供**主教岁入**。

对这一计划可予评论者甚多。它使得尼德兰的教会独立于科隆和兰斯的大主教管区，那两个大主教管区都处于国王管辖权限之外；它还使得一个以涣散闻名而且人员组成情况极糟的教会有了一个较为健全的组织，但是这个计划最后表明是极为不得人心的。修道院的院长们大声喧嚷反对损害他们的独立和收入。贵族们认为本来属于他们年轻的儿子们的任命和前程的丰厚报偿已从他们手中滑掉而转交给了可恨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他们同加尔文宗信徒联合起来，向人民诉说这

个计划是引进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第一个步骤。从皇帝统治的后期，上层贵族就已经看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对帝国权力的垄断。他们现在则拼命争取维护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权力，但是腓力只让他们得到权力的幻影。现在尼德兰教会的新的首席主教，马林的大主教，将在布拉班特的等级代表会议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而这位新的大主教就是枢机主教格朗维尔。

对于罗讷河下游的奥兰治小国的君主、尼德兰豪绅中的首富、拿骚的威廉来说，这不是仅仅关系到个人的问题。他的家族已有几代人为哈布斯堡王室效劳，而他本人曾是皇帝的一名大宠臣。他的政见同尼德兰的其他大贵族的政见一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同埃赫蒙德和霍伦一起，同荷兰省的等级代表会议为他们在该省财产的免税问题进行了几年的争执。作为荷兰和泽兰的总督，他总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反对等级代表会议。后来，他倾向于声称，他反对腓力二世，是从他为卡托—康布雷奇和约进行斡旋时开始的；当时亨利二世向他说到了一项计划，即那两位国王将协力镇压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异教徒。然而看来他只是逐渐地看出了腓力的政策对尼德兰的全部危险。这位狭隘的阶级利益的保护者逐渐转变成了国王的全体臣民自由权利的捍卫者。威廉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肯定无疑的是，他像大多数有教养的尼德兰贵族一样，憎恶一切形式的宗教迫害。他比他的贵族朋友更清楚也更早地了解腓力改革主教管区计划的含义：王权大为加强。国王一旦完全控制了尼德兰的教会，就不但能够更加有力得多地进行宗教迫害，而且还会日益加紧地排除贵族和等级代表会议的参政。然而，奥兰治并不打算同加尔文主义者合作。他们的不宽容态度使他感到厌恶。他的教养和他与名声显赫的选帝侯莫里斯的女儿、萨克森的安娜的婚姻，[\[47\]](#)使得他宁愿到德意志的路德宗诸侯那里去寻求支持。他对王权专制主义的反抗，仍然主要是那样一个大贵族的反抗；对他来说，他的国王只让他得到一点权力的幻影而不是权力的实质。正是格朗维尔，似乎就是王权专制主义的化身。从1561年起，奥兰治、埃赫蒙德和他们的同党就试图推翻这位枢机主教。

对于政府来说，由于财政危机使得玛格丽特和格朗维尔没有什么回旋余地，这一反对势力就更加显得严重。巨额的政府债务的偿付和法兰西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吞噬了额定的岁入和三级会议许诺的以九年为期的每年80万佛罗林的税款。军队和官员们的薪饷仍旧无力支

付。政府在国内的权威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玛格丽特不得不向等级代表会议请求予以财政援助，而每一次请求都变成了一场宪制危机，给等级代表会议和高级贵族提供了一次攻击格朗维尔和政府宗教政策的机会。腓力对此的反应是按他的禀性行事，力图挑起派别斗争，在上层贵族中拉一帮反一帮，尽管格朗维尔本人曾提醒过那样一种处事方针的危险。并不是所有的显贵都参加了奥兰治的反枢机主教的联盟。阿尔绍公爵和他的源远流长的瓦隆族^[48]的克罗伊家族整个庞大的家族亲戚集团，以及其他几个瓦隆族的贵族，都反对奥兰治和埃赫蒙德的政治领导并且保持着对政府的忠诚。像法国一样，党派往往是围绕名门望族的个人对抗而结合起来的。^[49]

1564年，以奥兰治亲王为首的大贵族联盟，借助于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反对格朗维尔的个人阴谋而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目标：使那位枢机主教免职并退隐到他的弗朗什孔泰的田庄。格朗维尔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后来还曾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他的主人忠实效劳；但是，对于贵族们来说，这是一次并无实际意义的胜利。这位枢机主教在政府中的同党，控告了贵族们的无能和腐败，也许不无道理。虽然奥兰治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今已是省的等级代表会议中的政府代言人，但议员们对这位贵族的财政要求，仍然像他们过去对待那位枢机主教的财政要求一样地不愿妥协。他们坚持要求一项更为自由的宗教政策，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处理国家的一切问题。贵族们支持这些要求。所有各派都向马德里发出抱怨，而这样也就增加了腓力对尼德兰人的不信任感。早在1563年，阿尔发公爵就建议砍掉半打大贵族的头颅，然而政府除了同意贵族要求以外别无选择余地。腓力没有力量采纳阿尔发的建议，即使他有那样的愿望。终于，腓力试图真诚地（虽然带着他通常那种令人生厌的犹豫）同贵族们合作，并至少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甚至全部要求，如埃赫蒙德在1565年访问马德里时所想象的那样。奥兰治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腓力不会真正把他对政府的控制权让给贵族，他也不会宗教问题上做出让步。在腓力于1565年10月写给玛格丽特的两封信中，他使所有的把尼德兰问题等同于昂布瓦斯公告^[50]所解决的问题的希望都归于破灭。这位国王写道，反对异教徒的敕令必须坚决执行，尼德兰的宗教裁判所必须继续行使其职能。在宗教形势得到改善以前，玛格丽特不要召开三级会议。最后，既然贵族们希望增加他们在国务会议中的席位，他现在就

任命奥兰治在尼德兰贵族中的最强有力的对手阿尔绍公爵为委员。玛格丽特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公布了国王的这些命令。她的估计是对的。腓力的信件成了促使革命爆发的信号。

尼德兰政府的软弱，特别是在格朗维尔去职以后，给加尔文宗的传道士们提供了利用尼德兰社会日益增长的紧张形势的机会。^[51]较底层的贵族开始大批地参加改革运动，并且很快就使宗教秘密团体具有了军事特征，那种军事特征已使得胡格诺教徒在法国成了那样令人生畏的一支力量。^[52]公开的群众集会举行起来了。妇女们在当中，男人们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武器武装起来，在一名新教团体的贵族成员指挥下，站着充当守卫。布鲁塞尔的总督官邸，无疑已注意到法国发生的事件，开始担心会发生公开的起义，或至少某些重要城市可能被新教徒夺取。1565年11月，一些下层贵族组成一个“妥协”同盟，其目标是促使政府取消宗教裁判所，并修改反对异教徒的敕令。其领袖人物是一些拥有几乎同金羊毛勋章团的大贵族同样社会地位的人：布雷德罗德是个粗鲁而嗜酒的人，同情加尔文宗；还有拿骚的路易，奥兰治亲王的兄弟，有点倾向于路德派。“妥协”同盟，如其名称所示，想要把那些讨厌政府宗教政策的天主教徒吸收进来，他们也那样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谈到如果政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就要使用武力。1566年4月3日，骑马进入布鲁塞尔的200名贵族，呈交了他们的有400人签名的请愿书，然而，他们除了在人数众多的豪华宴会上为他们的“乞丐”新绰号而干杯外，别无作为。下层贵族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南方各省，仍持观望态度。

真正的革命是由城市下层阶级发动起来的。手工艺人的工资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上去了，但那些没有手艺的工人的工资没有跟着增加。依赖外国原料和出口市场的纺织和航运业，总是时而急剧勃兴，时而猛烈衰退。丹麦和瑞典之间的七年战争（1563—1570年）和松德海峡对船只的暂时关闭，引起了其中的一轮衰退。英格兰—尼德兰之间为互相限制对方贸易而引起的争端，英格兰人在海峡的海盗活动，以及格朗维尔对英格兰商人支持安特卫普人抵制新主教管区的敏感的反应，这一切激化起来，导致尼德兰禁止输入英格兰呢绒和英格兰人把他们的主要贸易中心从安特卫普撤到埃姆登（1564年）。在安特卫普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和工资的急剧下降。1565—1566年冬天又加上了饥荒，人民把它归咎于粮食投机商和政府。1566年春季和夏季，物价

降下来了，但人民还是心存忧虑。在安特卫普和在瓦隆人聚居的佛兰德的纺织城市和乡村里，他们成千地聚集到加尔文宗的传道士那里，并倾听传道士们具有安慰性和煽动性的说教。上帝的选民从他们自己的城市的教堂被排除出去，而那些教堂里却充满了邪神偶像和充满了贪婪的高级教士们通过可恶的什一税从穷人身上勒索去的黄金和白银，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7月间，“妥协”同盟的激进派同意与加尔文宗的市民团体合作。8月里，出现了另一次意外的粮价上涨。8月10日那天，骚乱爆发了。在安特卫普和整个佛兰德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群众闯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了画像、雕像和祭坛。有某些迹象表明那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不过没有定论。在市政当局稳固地存在着的地方，如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发现很容易维持秩序和保护教堂。在另外的地方，例如在根特，似乎城市的神父们宁愿让教堂被毁，也不愿使他们自己的家庭遭到可怕的劫掠。全国弥漫着一种谣传，说是武装的新教徒的成群结队的掠夺者正向城市推进，将向神父和市政长官们发泄仇恨。这种成群结队的掠夺从来没有实际发生过。

布鲁塞尔的政府犹豫了两个星期。玛格丽特没有军队，也不能立刻弄清楚她可以依靠谁来恢复秩序。但是，“妥协”同盟中的天主教徒和温和派分子被这场暴乱完全吓坏了，他们现在急于要使总督确信他们的忠诚。玛格丽特得以劝说“妥协”同盟的领袖们解散了他们的团体，其回报是答应取消尼德兰宗教裁判所并修改反对异教徒的敕令。腓力送来了一些金钱，玛格丽特现在能够征集军队了。在1566年秋天和随后的冬天，布雷德罗德的武装队伍被解散了，天主教贵族击败了瓦隆人聚居的佛兰德地区的群众性加尔文主义运动。上层贵族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埃赫蒙德在内，向国王做了一次新的效忠宣誓。只有那些最受嫌疑的人逃到国外。奥兰治认为参加到他们当中去比较安全。他试图推行一种温和政策，既支持反对派的要求，又通过击败布雷德罗德对安特卫普的进攻来维护政府权威。他的政策遭到了失败，他同时受到了天主教徒和加尔文宗信徒的尖锐谴责。

17世纪治国术中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必须把起义扑灭于萌芽之时。苏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府未能那样做，接踵而来的灾难，对于每一个敏锐的天主教政治家来说，都是应该注意的。1566年夏天，腓力二世决定派遣他的最有才干的将领阿尔发公爵率领一支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庞大军队，开赴尼德兰去重新确立他的权威。像通常一

样，那样做耗费了时间，玛格丽特确信她那时已经击溃了反对派，恳求她的兄长不必再兴师动众了。在马德里，有人怀疑把那样大一部分国王的兵力投入到如此远离他们的基地和远离主要敌人土耳其的地方去是否明智，尼德兰贵族在宫廷里还有朋友。但是，腓力已拿定了主意，而戈麦斯集团则希望看到阿尔发陷进尼德兰政治的流沙之中。

阿尔发于1567年8月22日抵达布鲁塞尔，而且有效地从帕尔马的玛格丽特那里接管了权力。对于这位铁腕公爵来说，要由他来解决的问题包含着三个方面：他必须惩治犯了大不敬罪的反对派领袖；他必须使城市和省的行政完全依从于中央政府；他必须确保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有一个稳定的永久性的财政基础。第一个目标很容易地达到了。这位公爵在9月份逮捕了埃赫蒙德和霍伦，尽管他们拥有金羊毛勋章的全部特权。国王本人也跟着采取行动，在马德里逮捕了霍伦的兄弟蒙蒂尼。一个新建立的法庭戡乱委员会很快就以血腥委员会而闻名。它总共审讯和判决了大约12000名参加过前一年运动的人。就像通常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的那样，出现了许多告密者。相互信任本是任何社会的社会凝结剂，现在已开始遭到破坏。阿尔发的政策是一种蓄意制造恐怖的政策，而且暂时起了作用。当奥兰治亲王于1568年从德意志攻进尼德兰时，没有一个城市起来支持他。阿尔发趁机将埃赫蒙德、霍伦和其他几个贵族在布鲁塞尔的商业广场上处以死刑。此后，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奥兰治的薪饷不足而又缺乏训练的军队。作为一个将军，奥兰治亲王不是阿尔发公爵的对手。

阿尔发的第二个目标遇到了直接的对抗。省总督和城市议会反对政府干涉他们的行政和无视他们的特权。公开的反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最忠诚的天主教徒也持敌视态度，那却是显而易见的。阿尔发越来越激烈地向国王控告阿尔绍和努阿卡米，甚至控告从前唯命是从的贝尔莱蒙和维格利乌斯（Vighius），说他们是暴吏。阿尔发的政策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一个新党派诞生了，那就是政略派，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王派，但他们把自己国家的独立置于第一位，而把宗教置于第二位。阿尔发对腓力的政治作为不存幻想。这位国王迟早会听从他在尼德兰的对手们的意见，还会听从那些对手们在朝廷里的朋友，也就是阿尔发的政敌们的意见，就像他曾听从公爵本人而反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一样。

然而，阿尔发面临的最迫切的困难是他的财政问题。他要求按不动产价值缴纳一次性的百一钱税（即1%）。其次，他还要对一切商品征收10%的进口、出口和销售税。这项什一钱税类似于西班牙的销售税，将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税收，而且使政府不受等级代表会议的制约。那是16世纪的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着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合作的一个标志；对那些被统治者，甚至阿尔发也并不拥有单独地征课这些赋税的权力和机构。他不得不在1569年3月召开三级会议，不过三级会议预定只开一天，仅仅去确认那些新措施。

这一计划遭到了惨败。等级代表会议同意征收不动产税，但否决了什一钱税。阿尔发以严惩相威胁。那些仅仅由贵族世家代表人物组成的等级代表会议屈服了。商人们终归能够以抬高物价的方式把大部分赋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在布拉班特，由于那里的手工业者有代表参加等级代表会议，这些赋税被否决了。在佛兰德的大城市和瓦隆人聚居的省份里，曾经赞成征收那些赋税的代表们，开始担忧他们自己的生计，就像1520年在卡斯蒂利亚发生的情况一样。^[53]等级代表会议和城市议会在阿尔发的怒火和人民的激愤之间进退维谷，开始推行一种消极抵制的政策。与此同时，总督本人逐渐相信，10%的销售税将会给这个国家的贸易带来灾难；或者，由于国王对那个将使其臣民变成乞丐的计划的熱情已经明显冷却下来，他可能对此感到忧虑。于是，阿尔发逐步修改税则，直到它开始变得更像是城市 and 各省本身曾经征收过的那种赋税。但是，对大多数尼德兰人来说，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它仍然是一项永久性的赋税，而最重要的是，它仍旧过于苛重。在各个地方，对赋税的抵制都加剧起来了。市参议员们在市政大厅里谴责它，商店老板们在商业广场上咒骂它，神父们在讲道坛上诅咒它。其结果是，阿尔发那著名的什一钱税虽然被许多历史学家们说成是引起尼德兰经济破产的原因，实际上即使在已经减轻税额以后，也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城市里极为零星地征收过，而在大多数省份里根本未曾征收。^[54]等级代表会议向马德里派去了代表，又按照传统的议会授权征税方式，向阿尔发提供年征收200万弗洛林的许诺。阿尔发意识到他正在失去国王对他自己的建议的支持，于是就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谈判。他马上就陷进了所有那些令人烦恼的磋商、约定和拖延的麻烦之中，而那些麻烦给前几任总督的命运带来很大的不幸。1572年，当荷兰和泽兰已落入“海上乞丐”之手，而根特和布

鲁日就要爆发起义之时，阿尔发不得不完全放弃什一钱税和使尼德兰支付他的兵员薪饷的一切希望。这一负担如今落到西班牙和国王自己的金银库藏身上，而那时正当西班牙奋其全力反对土耳其人之际。

奥兰治从他的兄弟拿骚的诸侯领地组织了反对阿尔发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他日益确信，腓力的独裁只有靠武力才能推翻。但是，他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时还远远没有明确，也许他对那个目标本身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如今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背水之战：站在他一边的许多人都愿意同国王妥协，他却坚信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权力必须彻底予以摧毁。在以后的16年间，直到他于1584年去世之时，他抱着完全单一的意图追求这个目标。腓力认为自己是受上帝的委托来促使他的臣民信奉真正的天主教。为了达到这一神圣目的，他感到有责任必须运用他的王权，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实行最残酷的暴政。对于奥兰治的威廉来说，他认为自己是他的贵族权利和自由的捍卫者，是他的等级的权利和自由的捍卫者；而且，归根到底，是他的国家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反对政治专制和宗教迫害的个人良心的捍卫者。这两种观念之间没有沟通的桥梁。马德里的宫廷误解了威廉的动机，把这种动机看成是纯粹的野心；然而，把他看作起义后面的推动力量是正确的；若无他的决心和政治能力，起义绝不可能坚持下来。

拿骚的路易同科利尼和沃尔辛厄姆两人保持着联系，后来又同英格兰驻巴黎大使进行了接触。若无法国人或英格兰人的帮助，似乎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路易至少是毫不犹豫地要把17个省中的某些地区作为贿赂许诺给了可能的盟友。从尼德兰逃出的贵族们，组建了一支海军，即“海上乞丐”。他们的船只从埃姆登、拉罗谢尔和英格兰出发，打击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商业。他们的活动，以及伊丽莎白扣留载有热那亚人打算交付阿尔发的8.5万镑金钱的四条船只（1568年12月）之后进行的英格兰和尼德兰之间的贸易战，大大加剧了尼德兰的经济病态和下层阶级的不满。1572年4月，“海上乞丐”占领了荷兰境内的小港布里尔。然后他们开始逐个地夺取荷兰和泽兰境内的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态的进展方式十分相似。城市的贵族议事会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占多数，他们忠于政府，虽然他们讨厌阿尔发的宗教迫害和苛重的赋税。广大市民群众和他们一样，宁愿保持和平和忠君，而不愿有战争和革命。他们作为民兵组织成为城市卫队，自豪地坚持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保卫他们自己的城市，因而反对西班牙驻军进

城。阿尔发由于缺少金钱和部队，除了接受这一现状，别无选择。1572年5月，拿骚的路易夺取了靠近法国边界的蒙斯。由于科利尼控制着法国政府，阿尔发不得不担心法国可能进行一次全面的入侵。奥兰治正在准备从德意志向他进攻。阿尔发回到南方去首先对付这一最危险的威胁。他包围了蒙斯，并歼灭了被派去解围的一小股胡格诺军队。圣巴托罗缪日的屠杀（1572年8月24日）最后解除了他对这一战线的忧虑。奥兰治的进攻再次失败，而阿尔发现在可以脱身回到北方去了。

已经为时过晚了。荷兰和泽兰的乞丐党人已能指靠城市议会中的一个人数不多却十分坚定的狂热的加尔文宗少数派，还能指靠一部分民兵的同情。加尔文宗的传道士和组织者在城市民众中进行了工作，特别是在海员、造船工人和渔民中发展了皈依者。当乞丐党人的部队推进到一个城市时，加尔文宗的少数派就打开城门，迫使城市当局进行谈判。在大多数城市，乞丐党人是根据协议进城的。在战略形势许可的地方，一个坚定的市议会可以阻止他们进城。例如，阿姆斯特丹直到1578年还保持着对国王的忠诚，而米德尔堡抵抗乞丐党人的包围达18个月之久。它的市民在忠于腓力二世方面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不亚于莱登市民在其反对腓力二世的著名抵抗（1574年）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乞丐党人一旦进入城市，很快就破坏了同当局达成的协议。伴随着改革宗教的公开说教而来的，就是把教堂改由新教徒使用，破坏圣像和猛烈袭击修道院与修女院。某些乞丐党领袖人物把恐怖作为一种有意识地推行的政策，就像阿尔发做过的那样，直到奥兰治制止他们时为止。保王的和温和的市政长官以及城市民兵队的军官被乞丐党人的军官和虔信的加尔文宗信徒取代。在一个长时期里，信仰坚定的加尔文宗信徒仍是少数。只是逐步地通过学校的工作、宣传和官方压力，才把大多数居民拉到了新教方面。1572年7月，荷兰的等级代表会议在多德雷赫特开会，承认奥兰治亲王为他们的总督，名义上是国王的代表。[\[55\]](#)

革命现在有了一个巩固的基地。荷兰和泽兰由它们的等级代表会议和总督共同统治。奥兰治承认，他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于等级代表会议，而不再是来自于国王。但是，城市以及通过城市而产生的等级代表会议，仍被贵族控制着。在宗教方面，奥兰治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充分控制乞丐党人的运动及其追随的群众和确立对天主教徒充分宽容

的规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还能够利用乞丐党人来实现他在整个尼德兰推翻西班牙人统治的更为宏大的计划。

阿尔发在1572—1573年冬季几个月里发动的反攻，是猛烈而残酷的。他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胜利，并重新征服了一批城市。他终归失败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海上兵力。荷兰和泽兰的腹心地区对于陆军来说仍是难以攻陷的，因为它被巨大的河流和淹没着的沼泽防护着。1573年，腓力接受了阿尔发的一再请求，将他免职。他的政策已经失败，而且他在马德里的政敌已经破坏了国王对他的信任。他再也没有重新获得那种信任，虽然他还要为他的君主去征服葡萄牙。

新总督唐·路易·德·雷克森斯立刻抛弃了阿尔发的恐怖政策。他发布了一道大赦令，并最后取消了不近情理的什一钱税。但是，腓力拒绝对宗教争端做出让步，于是反对荷兰和泽兰的斗争就不得不继续进行下去。由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和西班牙人一起组成的保王军队，再次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也再次在与占据优势的乞丐党海军对垒中遭到失败。在忠于国王的省份，雷克森斯遇到昔日的特权阶级日益增长的反抗，他们从政府的困境中看到了夺回他们已失去的权力的机会，他不得不日益依靠马德里提供金钱来支付他的军饷。

西班牙承受不了这项日益加重的负担。腓力自从回到西班牙后，已经通过增加户籍税（encabezamiento）^[56]征课新的出口税，以及增加从教士征集的补助金，把他的岁入增加了一倍。然而，上涨的物价以及地中海和格拉纳达的战争，使得政府的开支甚至增长得更快。1573年，政府告诉国会说，它的债务总计已达到5000万杜卡特（查理五世退位时债务为2000万左右）。大约整个岁入的1/3被这笔巨债的利息支付所吞噬。腓力现在迫使那些表示反对的国会议员把户籍税提高到以前数额的2倍以上（1574年）。但是，卡斯蒂利亚的纳税者的财源已经耗尽了。有几个城市靠着征课商品税（alcabala）来代替户籍税，但收得的税额远远不能满足政府的期望。1575年9月1日，腓力的政府不得不停止偿付债务。

西班牙的第二次破产，在热那亚和安特卫普引起了一场金融危机，使得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向尼德兰输送货币赖以进行的整个复杂的信贷系统发生了障碍。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尼德兰的未发军饷的部队

发生了兵变。当那位总督去世（1576年3月5日）以后，部队完全失去了控制。国王在尼德兰的权威随着他的财政崩溃而崩溃了。后来，由于从新世界运来的白银大为增加，使西班牙的财政有所改善，国王的权威也部分地得到恢复。

这当然不是全部的实情。在国务会议里，以阿尔绍公爵为其领袖的政略派取得了主导地位。他们剥夺了叛乱团队的合法地位，而布拉班特的等级代表会议建立了自己的部队。1576年9月4日，这些部队在布鲁塞尔的城市民兵配合下逮捕了国务会议的委员。其中的政略派委员被释放，其权力转交给了更为革命的运动，即由布拉班特等级代表会议召开的三级会议。它的迫切任务是保护国家免遭叛乱士兵之害，并结束与荷兰和泽兰的内战。三级会议的这些目标中的前一项目标显然是失败了。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的部队开进安特卫普，杀了7000多人，使这个城市遭受了好几天的劫掠和屠杀。安特卫普和西班牙都再也不可能从这一物质上的打击和道德上的沦丧中恢复元气了。在此以前不几天，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同奥兰治亲王已达成一项妥协。这项根特协定（于1576年11月8日公布）要求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政府必须取得三级会议同意方可行事；取消反对异端者的敕令；以后再召开一次三级会议以解决宗教问题。这样也就默认了加尔文宗在荷兰和泽兰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天主教在其他省份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阿尔绍公爵和约”类似于同一年在法国达成的“大人和约”^[57]（又译默羞和约——译者注），是政略派的影响达到最高点的标志。

腓力面对着他近10年来政策的破产，仍然像往常那样不愿做出决策。他任命他的兄弟去做雷克森斯的继任者，希望唐·约翰的巨大威望能够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从1576年的春天到秋天，他没有在尼德兰采取干预措施，甚至也没有对他派驻国务会议的西班牙代表杰罗尼莫·德·罗达予以支持。唐·约翰于11月抵达，既没有带钱也没有带军队。显而易见，至少在政治方面，他和国王将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1577年2月，唐·约翰同三级会议签署了“永久敕令”。西班牙军队应予撤走，但是天主教应该在所有的省里恢复而无需咨询三级会议。荷兰和泽兰立即提出了抗议，召回了它们在三级会议的代表，并拒绝承认唐·约翰为总督。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唐·约翰试图确立他的权威。然而，三级会议和大贵族们不愿放弃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唐·约翰甚为明智，知

道他自己绝不适合于承担他那令人厌恶的任务。他在1577年2月写道：

“他们怕我，而且把我看成一个狂徒；我讨厌他们，而且把他们看成最大的无赖。”他现在已明白，三级会议和国王都不愿批准他的解救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计划。1577年7月24日，他重新变得更像一个军人的角色，攻占了那慕尔。战争重新开始了。现在它看起来已不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反对西班牙的民族战争。

奥兰治力图把所有的省份联合起来反对西班牙这一理想是达到了——但只得牺牲他的革命运动的统一性。在荷兰和泽兰，城市的贵族从来也不必同行会分享权力。乞丐党人的运动曾利用了工匠，但他们人数不多，又缺乏政治训练，难以独立地行动。贵族控制的城市议会，接受了经过改革的宗教，或者以一个贵族议员集团代替了另一贵族议员集团，他们仍旧保持着对城市的控制，并通过城市控制着等级代表会议。另一方面，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大工业城市里，工匠通过他们的行会在他们的城市政府中拥有一种固有的发言权和以革命性的行动维护政府的长久传统。他们和南方的上层贵族都不肯接受乞丐党运动的控制，也不愿接受奥兰治的有限制的革命和宗教宽容的政策。北方和南方的省份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区别，而这预示着尼德兰的最终分裂。[\[58\]](#)

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城市得以恢复了所有的特权，其中包括许多重大的行会权力。[\[59\]](#)与此同时，城市的市政长官仍旧是原来的天主教贵族，通常是阿尔发本人任命的。1577年8月以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斯海尔托亨博斯和根特爆发了社会和宗教革命。在布鲁塞尔，市政府中的平民分子选出了一个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它很快就控制了市政府。其他城市效法这一榜样，选出了它们自己的十八人委员会。那些委员会通常被加尔文教派控制着。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态发展方式，不断重复地发生。群众被许可或者被煽动去劫掠教堂和修道院；信仰天主教的市政长官被加尔文教派的人取代；十八人委员会任命它自己的人当城市民兵队指挥官；天主教市民被吓得默不作声。

没有任何地方的革命波及得像在根特那样广泛。在彼得·达西努斯的煽动性说教的激励下，在赖霍夫的能干而又雄心勃勃的首领和自封的民众保护人让·范·亨比泽的组织下，根特人把他们的革命传播到佛兰德的各个角落。在当地同情者的支持下，他们在布鲁日、伊普尔、奥德纳德和其他城市建立了革命的加尔文教派的政府。

1576年的政治革命已变成了一场社会和宗教革命，而这就破坏了反西班牙的共同阵线。在阿尔绍公爵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似乎城市已建立了一种政治和宗教暴政，它甚至比西班牙人的暴政更为可憎。大贵族们推翻了西班牙人在南方的统治，却发现自己不过处于与从前一样的无权地位。1577年秋天，他们邀请皇帝的兄弟马蒂亚斯大公来当总督；但是，当他们让他在布鲁塞尔就职时，却发现他宁愿同奥兰治亲王合作，三级会议已任命奥兰治为他的副手。

克罗伊和拿骚家族之间昔日的嫉恨，又重新炽烈起来。1578年1月，唐·约翰使贵族指挥的三级会议的军队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在让布卢战役之后进行的相互指责中，贵族们不无理由地抱怨三级会议未能给他们的部队支付军饷。他们开始或者以个人名义，或者以家族集团的名义，去同国王媾和，或者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作为“不满者”，指望法国和安茹公爵的支持。

奥兰治尽了最大努力去阻止分裂，并竭力使革命运动缓和下去。1579年8月，他带着军队进入根特，在赖霍夫和温和派的支持下，解除了十八人委员会的武装。亨比泽和达西努斯逃走了，但是伤害已经铸成。1579年1月，瓦隆贵族组成了阿拉斯联盟。6月，这个联盟同国王达成了妥协。

唐·约翰已于1578年10月死去，腓力任命他的外甥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儿子亚历山大·法尔奈泽去继任唐·约翰的职务。他第一次找到一位具备了担任这个最困难职务所需的一切品质的总督。33岁的法尔奈泽不像唐·约翰那样缺乏自信，也没有他那种解救被囚女王和为自己征服王国的任何浪漫幻想。他像腓力本人一样坚信国王事业的正义性，虽然按其气质和宗教信仰来说更像他那当皇帝的外祖父，而不像他那当国王的舅父。他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拒绝了腓力要任命他为总司令同时重新任命他的母亲玛格丽特为总督的提议。国王不得不让步，而且这一次授予了他的新总督充分的权力。除了国王的最高权力和维护旧宗教的问题以外，法尔奈泽可以自主地做出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让步。

在南方，贵族们有足够的力量把瓦隆人聚居的省份拉到他们一边去加入阿拉斯联盟，尽管在大城市里曾有过某些抵抗。法尔奈泽不得不再次同意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并在等级代表会议认可的条件下进行统

治。瓦隆贵族似乎觉得已经保存了根特协定的全部成果，而他们确实把那些成果看作他们的联盟的基础。然而，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国王的外籍军队迟早不得不再次召回。这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以及法尔奈泽的巧妙策略，逐渐造成了绝对有利于王权的政治力量的平衡。

北方各省在同一时间（1579年1月），根据它们各自对根特协定的解释，组成了它们自己的联盟。那是一种加尔文主义的和宪政性的解释，虽然组织联盟是为了针对信奉天主教的海尔德兰的等级代表会议的反抗。乌得勒支联盟（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弗里斯兰、海尔德兰、德伦特、上艾瑟尔；还有格罗宁根——但不是那个城市，而是那个省）把政权交给了等级代表会议和奥兰治家族。然而，它们之间的力量的平衡，仍旧是在一个多世纪中引起冲突的主要问题。

奥兰治原来主张建立一个北方各省的更为紧密的联盟。实际形成的联盟最终违背了他的愿望，因为它的不妥协的加尔文宗信仰，使他最终不可能实现他要在宗教和解的基础上统一各省的理想。而且，法尔奈泽在军事上的胜利，促使奥兰治亲王再次去寻求法国的援助。为了得到这一援助，他已准备把尼德兰的宗主权奉献给亨利三世的兄弟安茹公爵，因为国王本人拒绝那样做。那样的计划在马德里被看成是犯了叛国罪。腓力宣布奥兰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悬赏砍下他的首级。奥兰治以他的“辩护词”作为回答，那是反对腓力二世和西班牙的“骗人神话”的第一篇既有情操又富有想象力的声明。无论就论证的水平和语气的尖锐性来看，这时的宣传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在整个冲突中，加尔文教派和反保王派在这一宣传战中占有优势。保王派由于不愿因讨论国王对其臣民的政策而降低国王的威信，所以有口难辩。1581年，三级会议弃绝了他们对腓力二世的忠诚。

《誓绝法令》这样写道：“上帝创造人民不是要他们去做君主的奴隶，无论对与错都服从他的支使；而是要君主为了他的臣民，作为他的孩子们的父亲或作为他的羊群的牧人，而爱护和支持他们。”这段措词大概是有意模仿腓力常常给他的副王们的训令的措辞，因为惊人地相似。

安茹公爵这位新来的君主，各省现在已勉强向他作了一次忠诚宣誓，他本是法国政略派的领袖，但他的抱负是自私的。因此，所有的派别都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亨利三世由于担心安茹在法国的影响，乐于使他的精力转到国外去，同时也乐于无须他自己动手就

给西班牙造成麻烦。伊丽莎白也抱着类似的动机去同那位公爵进行她的开心的婚约斡旋；如果这样还能通过抬高安茹的声望而给法国造成麻烦，那就更好。奥兰治和三级会议需要安茹的名声和部队，却不愿让他在联盟的政府中拥有权力。尼德兰越来越变成了西欧一切政治和宗教斗争的聚焦点——一直到那时为止，尼德兰是法兰西和英格兰敢于对西班牙的霸权进行挑战的唯一的地区。佛兰德、布拉班特和东北诸省成了国际军队的战场：站在三级会议一边的有德意志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站在保王派一边的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仅仅对尼德兰人而言，它还是一场内战。

法尔奈泽开始有条不紊地去完成他的征服任务。没有再发生使居民恐怖的屠杀。如果一个城市重新归顺国王和原来的宗教，总督就答应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他们的许多地方特权。一个接一个的城市按照这些条件投降了。安茹的军队既无战绩，又不得人心。这位公爵本人发现他与三级会议的关系处得同唐·约翰与三级会议的关系一样不成功。在法国，他由于对异端和平民所做的让步而受到嘲骂。他像唐·约翰一样采取反行动。1583年1月，他试图占领安特卫普。这一次突击遭到了惨败，安茹迄今还保有的一点点威望也丧失殆尽了。

随着军事上一次又一次的转折，佛兰德的极端分子再次占了上风。亨比泽和达西努斯在逃走四年后回到了根特（1583年8月）。独裁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但是，正像革命运动后期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运动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变得比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更为重要。亨比泽和达西努斯公开同法尔奈泽进行谈判，并开始任用天主教徒取代加尔文教派的官员。这对于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来说是不堪容忍的。1584年3月，他们逮捕了亨比泽。8月4日，这位原来的独裁者被处死刑。但是，革命失败了。六周以后，根特向西班牙人投降。1585年3月，布鲁塞尔陷落，8月，安特卫普在被围困13个月后投降了。

从此以后，起义者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争端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了，革命时期已经结束。在南方，加尔文宗信徒和天主教徒不再在从前那种爆炸性紧张关系中混杂相处了。法尔奈泽驱逐加尔文宗的传道士，由于各种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成千上万的俗人追随这些传道士前往北方各省、英格兰和德意志。一个重建起来而且清除了异己分子的教会，得以把绝大多数居民拉回到天主教中来，而且这还没有动用宗教裁判所。那个时代流行的对异端分子处以火刑的风

气，可以被放心大胆地用来对付浸礼派和巫婆，而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反击。新教国家在使用这种做法时，至少在对付巫婆时，也是不落后的。同时，宗教和解的理想，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一个政治社会里和平共处并享有平等权利的理想，也已经破灭了。那一理想的最伟大的首倡者奥兰治，丧生于一个狂信者的子弹（1584年7月10日）。他未能保持尼德兰的统一。不过他在两个方面成功了：使得反对腓力二世的政治和宗教专制主义的斗争保持了活力，并作为一个政府首脑保持了与一个等级代表会议的合作。对于一个转变成革命者的保守的贵族来说，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就。在对他自己的国家和对欧洲的政治力量的估量方面，以及在运用来为他自己的目标服务的外交手腕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16世纪的革命领袖能够与他相匹敌。他并不总是能够驾驭那些力量；但在斗争的过程中，他的品格一直对他自己那一派产生影响，直到最后，一切原有的猜忌都平静下来，所有各派都接受了他的领导，虽然他们很多人可能对他的策略持有异议。奥兰治的威廉的许多动机和目的，仍旧是为他的同时代人所不了解的，正像仍旧为历史学家们所不了解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那身后获得的“沉默者”绰号，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他所反对的目标却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专制政府和宗教迫害。他那著名的临终之言“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和这个可怜的国家吧”已传遍各个省份。现在所有的派别都可以声称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他的实际的成就，以及在他身后赋予他的名字的那种神话般的力量，产生出了一种政治上的范例；它使得乌得勒支联盟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尽管还存在着组成联盟的各个城市和省的中世纪式的地方排他性。

在法国，紧随着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结束之后而出现的危机，发展得甚至比尼德兰的危机还要快。危机的原因本质上是相似的。亨利二世在1557年破产之后，又从他的不幸的臣民那里榨取了700万利弗尔的特别税。然而，这已经达到极限了。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已经发生了农民起义。贵族们虽被免除了赋税，但在为国王服役中耗费了他们的收入，并抵押或出卖了他们的地产；圣康坦惨败（1557年）后，被俘贵族又被索取了巨额赎金。和平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收入或职业。与英格兰的绅士不同，他们和他们年轻的儿子们不能靠经商发财。传统惯例和1560年的一项特别法律禁绝了那条道路。比较幸运的贵族可以进入教会；因为法国教会已经变成王权和上层贵族的庞大的职权任命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正如人们所说，“主教职位被当作

桂皮和胡椒一样出售”。然而，不幸的贵族们却加入到那些大声喧嚷着要求改革教会的人们的行列，使其数量不断增长。

在城市里，小手工匠师和小店主既苦于苛捐杂税，又遭到诸如1557年那样的歉收之后农村购买力周期性衰退的打击。帮工们目睹粮价比工资增长得更快，并发现行会日益施用权势顽固地阻止大多数人晋升为匠师。

那样一种形势为加尔文宗的传道士们提出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活动场所。他们的说教和圣经宣讲，以及他们举行的齐唱圣歌的仪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极为常见的情况是，本地神职人员既敌不过传道士们的口才，也满足不了那些生存已无保障的人民的精神上的渴求。而且，正像在尼德兰一样，革新后的宗教的魅力打破了阶级区分的界限。许多富裕市民和有专门职业的人，特别是他们中的妇女，被吸引到新教那里去了。

从1555年起，日内瓦派出了越来越多的传道士到法国去。他们全都是法国人，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贵族；因为吸收贵族皈依新教，本是加尔文的一项既定政策。无论在什么地方，新教团体一经建立，就选出它的长老和执事，以保证信徒恪守纪律，管理它的基金，而且一般说来，还照顾它的成员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大教区的牧师或主管一批小教区的牧师，都由狄奥多尔·贝扎或加尔文本人任命。这样，精神上的控制权就集中到了日内瓦，而整个运动既具有全国性政党的特征，又具有国际性政党的特征。从1559年以后，贵族大批地加入到运动里来，尤以南方为甚。到1562年初，大多数加尔文宗的团体都已使自己处于一个当地领主的保护之下。他的影响能够招来新的皈依者，特别是从那些还较少接触新教的农村居民中招来新的皈依者。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贵族带来了军事因素。宗教会所成了军事核心组织。武装起来的教徒的群众性聚会，在当地贵族及其家臣的保护下，开始袭击教堂，并公然蔑视政权当局和大多数天主教居民的感情而举行他们的仪式。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南方。1560年5月，他们在鲁昂举行的集会据说会众达2万人之多。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是，效忠国王的司令官带着5000人的军队，未能阻止人们拆毁他搭起的断头台和绞首架。

胡格诺派的骨干分子现在已按照有其省区的和全国的宗教会议的宗教团体的形式在省区和全国的规模上组织起来。1560年11月，克莱拉克宗教会议把吉耶纳省划分为七个“协商区”，每个区有自己的团长。1561年圣福瓦宗教会议决定为图卢兹和波尔多地区推举两个“保护人”。在这些人的控制之下，有了一整套教区领导人的教阶式体制，每个领导人都严格地对他的直接上司负责。到1562年，这套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吉耶纳、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完整地建立起来，而且它至少以大致相似的形式存在于法国其他地区。这样，运动的控制权就难免总是从传道士转到了贵族那里，尽管加尔文表示忧虑，并曾竭力加以阻止。

若不是由于政府软弱无力，这套组织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亨利二世曾决心要消灭新教徒。新教徒日益得势，是他同西班牙讲和的原因之一。然而，巴黎政府发现，它同布鲁塞尔政府一样，难以敦促它的地方上的天主教官员去执行反对其信仰新教的邻里乡亲们的敕令。许多官员同情那个运动，或者干脆参加进去，更多的人憎恶迫害。在整个1560年和1561年间，朗格多克的代理总督维孔特·德·茹厄斯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以越来越忧虑的心情，谈到他的权力正在崩溃，他的官员不堪信赖，胡格诺派的势力和影响日益增大，他们自称以国王的名义行事而凌辱忠于国王的天主教徒。

如果政府有力地支持它的省总督反对胡格诺派的斗争，形势还能够加以扭转。但是，政府恰恰已经再也不可能那样做了。亨利二世由于比武受伤，于1559年7月26日去世。弗朗西斯二世年仅15岁；虽然已到法定年龄，但显然过于年轻，不能由他本人进行统治。法国本已面临着社会、财政和宗教问题，现在又加上一重政治危机。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曾依靠上层贵族进行统治。借助于国王的恩宠，吉斯家族在东部积聚了庞大的地产，蒙莫朗西家族则在北方和法兰西岛积聚了庞大地产。波旁家族虽然曾由于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侍从武官长波旁犯下叛逆罪而倒运，但还是设法保住了他们在南方和皮卡迪的大部分财产。像大臣和省总督一样，这些大贵族在地方贵族中建立了庞大的依附关系网。市级和省级官员们指望他们使自己得以发迹晋升。亨利二世在世时，这些大贵族们的不可避免的倾轧，一直是局限在宫廷阴谋的固有范围之内进行的。现在弗朗西斯二世已经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吉斯兄弟们的怀抱，他们是他的妻子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舅

父。吉斯家的弗朗西斯公爵是梅斯的保卫者和加来的征服者；^[60]他的年轻的兄弟查理是洛林的枢机主教，他们组成了令人生畏的一帮。但是，他们的飞黄腾达必然要受到挑战。作为洛林家族的后裔，他们以自己的外籍出身自夸，借以强调他们对法国王权的忠诚和他们与一切法籍亲王的平等地位。他们的对手则把它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个有效的宣传话柄。年迈的侍从武官长昂恩·德·蒙莫朗西为他被排除于权力之外而愤愤不平。波旁家族公开为自己提出掌握权力的要求。他们与瓦卢瓦家族的亲眷关系最近，是在国王冲龄时能够享有固有的摄政权利的王族成员。这个家族的首领安东尼，由于他的妻子的关系，又是那瓦尔的国王；他缺乏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政党领袖的品格和意志力；他过于爱慕虚荣，也过于动摇不定。这使他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可靠工具。他的年轻的兄弟，孔代亲王路易，力图弥补他的缺陷。早在1555年，孔代就访问了日内瓦，表示了他对宗教改革的关心。然而他的动机和诚意仍然是有争议的，尤其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已变得对他很不信任。他无疑怀着为他和他的家族奋斗的野心，当然也意识到胡格诺运动政治上成功的可能性。当他取得法国教会总保护人的头衔时，波旁家族集团的巨大影响，就大都转加到了胡格诺派方面。当那位侍从武官长的侄子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德·科利尼至少把蒙莫朗西家族一部分扈从带入胡格诺派时，那种影响就进一步加强了。孔代就这样成了一个党派的领袖；那个党派是由贵族势力和加尔文教派团体的军事组织联合组成的，在经费上得到富有的银行家和信徒们自愿捐助的支持。这一组织的成员被一种宗教信仰激励起来：那种宗教又由于巧妙的宣传而保持着旺盛的热情；他们按照严格的共同纪律组织起来；贵族和工匠，士兵和温和的市民，都由那种共同的纪律而聚合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那是一个在此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刚强超凡的人”得以利用过的政治工具。而且，胡格诺派还把科利尼看作一个绝无可疑动机的领袖。像他那位当侍从武官长的叔父一样，科利尼毕生为他的国王效劳；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出色的组织者和严守纪律的人。他的皈依是缓慢的，而且表现了剧烈的内心冲突。他很少具有奥兰治那样的对专制政府的憎恶感。当他终于决定拿起武器时，那不是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战，更不是为他自己的国王而战，而更多的是为他的教友获得宗教信仰自由而战；如果可能的话，还为使国王摆脱迫害真正宗教的那些邪恶的顾问们而战。科利尼的目标的单一性，

使法国的胡格诺运动具有了尼德兰的加尔文宗运动从未达到过的统一性。

在弗朗西斯二世短暂统治的整个时期，政治和宗教上的激愤情绪惊人地加剧起来。出现了许多由双方挑起的地方性的暴力和迫害事件，那些事件引起尖锐的相互指责和进一步施用暴力。政府面临着4000万利弗尔以上的债务，但是为获得财政支持而召开的1560年的三级会议，表明它也像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一样难以对付。孔代在三级会议里有许多追随者。第三等级拒绝投票赞成征税，反而要求它应当决定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政府本身的组成。从1560年3月起，政府放弃了强制贯彻统一宗教的官方政策，颁布了一系列告示，准许信仰自由，但禁止武装集会。结果是各方都不满意。没有一个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在两种宗教下生存，就连反对在宗教事务上使用强制手段的大法官洛皮塔勒也不那样看。这里也没有可以促使政略派那样一个党派发展起来的机会。那些并不持有强烈的宗教观点或那些憎恶为了人们的观点而对其加以迫害的人，仍然希望召开一次普遍性或全国性的宗教会议来解决问题。

1560年3月，胡格诺派试图发动的第一次重大的突然打击行动，即昂布瓦斯密谋，彻底失败了。孔代被认为有某些牵连嫌疑而遭到逮捕。但是，政府的软弱无能已变得十分明显。英格兰大使从昂布瓦斯宫廷报告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比这个国家更令人吃惊。他们不知道应该怀疑谁，也不知道应该信任谁。”吉斯家族仅仅靠着给予王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以空前多的权力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弗朗西斯二世于1560年12月5日去世。孔代立即被释放出来，而波旁现在提出的要做10岁的查理九世的摄政的要求，要比在已达合法执政年龄的弗朗西斯二世继位之时提出的这种要求更加难以抵制得多。然而，王太后决定由她自己掌握摄政权力。卡特琳·德·美第奇具有一半佛罗伦萨一半法兰西血统；她长期以来就把她的个人利益与法兰西君主制的利益视为同一件事。她深信她应当效法圣路易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朗歇的榜样，把法兰西的王权完整地保留给她的孩子。唯有君主制才能使法国稳定并使它对西班牙保持独立。每一个派别，无论它的意图怎样善良，都必然会起到危害君主制的作用。因此，绝不能让吉斯或波旁控制政府。尤为重要的是，她必须赢得时间，使激愤冷却下来，使她的儿子长大成人，这才是卡特琳始终一贯地追求着的

目标——虽然在她的儿子未成年之时，甚至成年以后，她那一系列反复无常的策略令人困惑不解。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她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去维护她自己的权力。这一权力在她看来要达到多大的程度才算是它本身的终点，那是无法知道的。然而，卡特琳可以回旋的余地之狭小却是令人担忧的。若无上层贵族，她就不可能比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更能维持统治。像1567年前的玛格丽特和腓力二世一样，她只能耍宫廷政治手腕，因为她的政府没有钱去为它自己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卡特琳用了18个月的时间力图使亲王们和解，或者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就使他们互相反对以使其均衡。她还不得不时时分心去盯着腓力二世，他威胁着要进行干预以反对胡格诺教徒。

1560年11月29日，在洛林枢机主教施加巨大压力之后，庇护四世终于发布了再次召开特伦托宗教会议的训谕。但是，法国的事态对于卡特琳来说是变化得过于迅速了，使她不能等待特伦托会议的结果。1561年夏天，她劝使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家在普瓦西会晤，并力图达成一种共同的见解。这次“协商”失败了，与其说是由于卡特琳把宗教视为政治的一个部分并认为神学家可以像政治家一样被敦促去采取灵活策略进行妥协，毋宁说是由于双方都想得到君主的支持但都决不愿意接受君主充当他们之间的仲裁者。那本质上是查理五世所面对过的同一个难题，而卡特琳对它的理解也同那位皇帝一样肤浅。[\[61\]](#)

1561年秋天，吉斯帮和蒙莫朗西帮那时已联合起来，他们一起退出了宫廷。卡特琳未能处理好她同那位性格暴躁的侍从武官长的关系。当这位老人面临着要在虽然可憎却信仰正统宗教的吉斯兄弟和虽然可爱却信奉异端的侄子之间做出选择时，他选择了吉斯兄弟。他们一起向波旁家族的安东尼许诺帮助他收复那瓦尔王国被西班牙人占领的那一部分土地，从而把安东尼拉到了自己这一方面来。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都已武装起来，冲突日益频繁，卡特琳虽然苦思巧计，还是使得她在两个武装阵营之间无能为力。她加倍努力去促成和解。

《一月敕令》（1562年）正式公布了她同胡格诺派达成的妥协协定：准许新教集会在城墙之外举行，准许新教仪式在私人住宅举行。这是迄今对胡格诺派做出的最大让步，因而也就在天主教阵营中引起了相应的愤慨。一桩更大的突然事件触发了内战。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的追随者突然袭击了在瓦西举行的一次新教仪式，大约杀死了30人。在这种情况下卡特琳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力。孔代的部队集结到

了奥尔良，他能指靠2000个以上的新教教堂的支持。胡格诺派袭击了里昂、图尔、布卢瓦、鲁昂和其他一些城市，但是吉斯和蒙莫朗西率领他们自己的军队进入了巴黎。5月，公开的战争爆发了。

在法国已经有100年没有发生内战了，而且许多人认为内战是极为令人憎恶的事。胡格诺派领袖之一德拉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双方的贵族都决心保持绅士应有的礼貌而交战。主要由于王太后的努力，谈判从未停止。战争结束后，各派都联合起来，把英格兰人从勒阿弗尔驱逐出去，那原是孔代为获得军事和财政援助而割让给英格兰人的。^[62]然而，双方的军队都犯下了罪行，干过蓄意引起恐怖的行动，引起的失望是严重的。昂布瓦斯协议（1563年3月19日）准许新教徒有信仰自由，但只许贵族和他们的家属举行礼拜仪式，对于中产阶级则只许在每个大法官管辖区或司法区里的一个城市内举行。加尔文和科利尼尖锐地谴责孔代接受那些仅仅有利于他自己的阶级而牺牲新教会友群众的条件。和平协议留下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疑虑和恐惧。

只有王太后在摆脱战争时增加了权力和声望。她还一直是幸运的。那瓦尔已经在围攻鲁昂时被杀；侍从武官长和孔代都已被他们的对手囚禁。吉斯公爵已被一个胡格诺狂徒暗杀（1563年2月18日）。在拷问中，凶手牵连到科利尼。科利尼否认他曾唆使过刺客，但为上帝消灭了他那信仰上的大敌而表示庆幸。九年以后，又有许多人为科利尼和他的朋友们被谋杀而庆幸，虽然这些人也没有指使那场谋杀。

由于一些大人物已退出舞台，卡特琳现在能够有效地以国王的名义确立她自己的权威了。在四年的时间里，她尽力维持和平；但是她未能消除双方的恐惧，也未能阻止不时爆发的地方性暴行。特伦托会议的决议使双方的许多人都确信，再也不可能从神学上解决宗教问题了。以卡特琳为一方，以她的女儿、腓力二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阿尔发公爵为另一方举行的巴约讷会晤（1565年），被广泛地（而且是错误地）看作是巴黎—马德里轴心的建立，认为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法国和尼德兰的新教徒。

1567年夏天，当阿尔发带着他的军队从米兰沿着法国东部边界向尼德兰推进时，胡格诺派的全部疑惧似乎都得到了证实。宫廷里的心怀私愤的竞争者们在增加相互猜疑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没有证据表

明法国的天主教徒策划了一场进攻，但是孔代和科利尼认为已经作了那样的策划，并决定把国王夺取过来（1567年9月），以先发制人。胡格诺的军事组织又一次顺利推进，新教徒拿下了一批城市。但是针对宫廷的一次主要袭击失败了，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它甚至比第一次内战更严重，变成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全欧洲性斗争的一部分。政府得到了阿尔发的援助，并使用了瑞士人的军队。巴拉丁选帝侯派他的儿子约翰·卡齐米尔带着德意志骑兵去援助胡格诺派。他们已经成为国内战争的一个正式角色，而且大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次战争以签订隆瑞莫条约（1568年3月23日）和重申昂布瓦斯敕令而告结束。国王同意向德意志骑兵偿付战费。

那不过是一次为时几个月的休战。在宫廷里，洛皮塔勒和温和分子失去了信用。侍从武官长已经死了。吉斯兄弟重新掌权，而且找到了国王年轻的兄弟安茹公爵（后来的亨利三世）作为他们进攻性政策的有力的同盟者。双方都不愿意遵守条约的条件。胡格诺派仍然采取攻势。当他们不能完全控制一个地区时，就渗透到官衙中去，直到在王室行政系统中安插进一整套胡格诺派的官员，但不效忠于国王，而效忠于孔代和科利尼。威尼斯大使写道：“这样，他们就能在某一天，某一特定时刻，完全秘密地，在这个王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动一场起义。”这只不过是稍有夸大。它成了开战以来延续最久也最残酷的战争。安茹在雅纳克和蒙孔图尔击败了胡格诺派（1569年），但他们的组织坚固地保持下来；孔代在雅纳克的死亡又给他们带来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科利尼主持下的统一指挥。科利尼虽然是一个平庸的战术指挥员——他指挥的大多数阵地战都失败了——却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以一种迅速转移的战术保存现有的部队，从而防止了保王派的优势兵力对胡格诺派进行致命的打击。而且，他还拥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他甚至能够在不付钱的情况下就招募德意志骑兵，因为隆瑞莫条约已经载明，国王最后要向他们偿付。与此相反，卡特琳的将军们却互相争吵，而且总是不愿把战争推向最后胜利，因为怕失去他们有利可图的指挥权。政府财力薄弱，不可能把大量军队继续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去利用战术上的成果。而且，在胡格诺军队里有保王派贵族的朋友和亲戚。没有一方愿意使另一方彻底毁灭。

圣日耳曼和解敕令（1570年8月8日）再次恢复了现状。但是，胡格诺派第一次获得了驻守拉罗谢尔、蒙托邦、拉沙里泰和科尼亚克四

个城市的权利，以作为安全保证。卡特琳再次改变了方针。腓力二世已断然拒绝了她为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和查理九世提出的婚姻建议。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了摩里斯科人的起义如何暴露了那位天主教国王军事上的弱点，原来对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不予理睬。于是，卡特琳就让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同年轻的那瓦尔的亨利结了婚，她怀着特别的乐观情绪希望瓦卢瓦和波旁家族的联姻能平息这个王国的内部动乱。与此同时，她开始为伊丽莎白一世和安茹的婚事进行斡旋。此事并未告成，但是英法亲善导致了布卢瓦条约的签订（1572年4月19日），那是一个条件已充分成熟的防御盟约。它包括把英格兰的呢绒贸易中心从安特卫普迁到鲁昂的条款。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十分清楚的是这个条约是反对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布鲁塞尔的阿尔发政府为此大为吃惊。

1571年夏天，科利尼跻身于宫廷，并重新参加了国王顾问会议。他比卡特琳更为坚定地认为这个王国动乱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实行一项强有力的反西班牙政策。如果全体法国人都能联合起来去反对这个王国的宿敌，他们的比较晚近的仇恨就可能被忘却。从1568年起，科利尼就同拿骚的路易保持密切接触。“海上乞丐”曾以拉罗谢尔作为一个据点，并且把他们的战果与胡格诺派的私掠船的战果合起来共同享用。科利尼答应支持拿骚进攻阿尔发，乞丐党人1572年春天在泽兰和荷兰的胜利以及拿骚对蒙斯和瓦朗谢讷的占领，似乎呈现出一派大好前景。尤为重要的是，查理九世本人热心地支持这一政策。这位忧郁而富于幻想的年轻人，深为科利尼的坚强品格所倾倒。他忌妒弟弟的军功，现在梦想要为自己取得甚至更为辉煌的战果。

但是科利尼对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做了错误判断。三次内战留下的怨恨不可能因单纯显示一项对外强硬政策而得以平息。吉斯家族永远没有忘记他在弗朗西斯公爵遇刺案中被认为确有依据的牵连。卡特琳和安茹日益嫉妒他对国王的个人影响。西班牙大使和教皇使节疯狂地反对他。卡特琳日益担忧同西班牙爆发公开战争的前景。勒班陀战役不仅仅重振了西班牙的军威。阿尔发在尼德兰指挥着一支令人生畏的陆军，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了胡格诺派派去解蒙斯之围的一支小部队。她不能指望从英格兰或德意志诸侯那里得到什么援助。伊丽莎白已经向阿尔发做出了一个善意的姿态，用以抵消《布卢瓦条约》的影响。她于3月初把乞丐党人赶出了英格兰——此举产生了一个

出乎意料的、但却使伊丽莎白十分欣喜的结果：他们夺取了布里尔，并发动了泽兰和荷兰的强有力的起义。顾问会议和它的军事专家们同意卡特琳的主张，但是科利尼依仗国王宠信而加以反对。胡格诺派开始谈论改组国王顾问会议。他们为了使自身安全和宗教习惯得到保证这个有限的目标已经打了三次内战。如今在和平时期，他们似乎打算要夺取法国政府。

卡特琳使出她那样一个老练政治家的全部运筹计谋，策划了她的对付手段。吉斯家族随时准备置科利尼于死地。一旦这个危险人物死去，他对国王的不祥影响就化为乌有，政治力量就会重新得到平衡，王太后就能再次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法国也就能够从反西班牙的可能引起灾难的冒险中解脱出来。1572年8月22日，凶手刺伤了科利尼，但未能将他刺死。巴黎立刻陷入了一片骚乱。成千的胡格诺派绅士来到首都参加亨利和玛格丽特的婚礼——那桩婚事本是为结束国内冲突而安排的。他们现在要求对谋害他们的领袖的暴行加以报复。国王本人看望了受伤的科利尼，并答应惩办罪犯。情势转而不利于卡特琳，极为明显的是她和吉斯家族必有牵连，她的对策是采取孤注一掷的应急行动。

8月23日那个星期六，她促使国王相信：现在必须杀掉所有的胡格诺派领袖。顾问会议里的全体天主教徒表示赞成。似乎直到那时，卡特琳还只是想除掉比较少量的胡格诺分子。但在这个时刻她再次失去了对事态进程的控制力。安茹、年轻的亨利·吉斯公爵和巴黎商会会长，策划了当天晚上的屠杀。这件事并不难，巴黎下层社会的残忍脾性是十分闻名的。胡格诺教徒没有感觉到可疑。实际上，谁能怀疑到那样一场可怕的举动呢？不过，某种类似那样的行动在天主教中间已经议论了好几年，虽然还从来没有策划过。在小规模屠杀事件方面，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都不是清白的。8月23—24日的夜间，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以及随后的几天，数千胡格诺教徒被杀。这一次，吉斯目睹了科利尼的死亡才放了心；他等候在科利尼住宅的外面，直到凶手们把那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扔出窗外。在领袖人物中，只有那瓦尔和年轻的孔代亲王，靠着发誓放弃新教信仰，才得以幸免。屠杀扩大到了一些省份，又有数千人丧生。确切的数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63\]](#)

甚至阿尔发公爵也感到震惊，但肯定不会不高兴。在马德里和罗马，群众举行了谢恩祈祷。威尼斯的元老院甚至还以162票对2票通过以一次行列圣歌来庆祝这一称心事件。威尼斯人很快就有了另一种想法。卡特琳也是那样。处死科利尼符合她的意图，大屠杀却不然，因为那些屠杀破坏了法国的政治平衡，并把她再次投入吉斯帮派的控制之中。她向腓力二世和教皇夸耀这一行动，当然是认为那样有助于使她得到信任。她向伊丽莎白一世和德意志诸侯作辩解，把那一事件说成是自卫和吉斯帮的阴谋。她几乎是马上就再次开始同胡格诺派磋商，那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于是，重开内战就不可避免了。洛林枢机主教支持发表了意大利人卡帕卢比写的《查理九世的诡计》一书（1572年发表于罗马），那是对法国王室政策所作的充满想当然成分的叙述，旨在证明大屠杀是有预谋的。洛林十分正确地估计到，该书将成为新教徒的一种魔鬼经典，会使得他们将来更加难以同朝廷合作。正像极为经常地发生的情形那样，双方的极端分子都在互相为对方的利益效劳。

第四次宗教战争主要是保王派对拉罗谢尔的徒劳的围攻，再次以妥协而告结束；当时安茹需要和平，为了去接受波兰的王冠，因为他已被选为那里的国王（1573年）。只是到了那时，胡格诺的组织才达到了充分的发展，扩展到从多菲内穿越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直抵贝阿恩和吉耶讷这一广阔的弧形区域。像在尼德兰那样，这种取得成功的变革，总是变成地方化的，这既是由于反对中央政府干涉的共同的^[64]地方感情，也是军事形势所使然。也像在荷兰和泽兰一样，政治权力逐渐转归于等级代表会议。孔代亲王和那瓦尔亲王（分别于1574年和1575年）从宫廷逃出并返皈新教以后，等级代表会议就同他们联合起来行动。胡格诺派的宣传，现在比从前远为强烈得多地强调宪政理论，以反对法国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不过，新教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除南方各省以外，它已处于衰落之中。

它得以存在下来，要归因于它同政略派（*politiques*）的联合。阿尔发的戡乱委员会在几年间所做^[64]的事，法国的大屠杀在几天之内就做到了。那些屠杀驱使许多天主教徒去寻求一条摆脱宗教恐怖和国内冲突的道路，即牺牲国家的宗教统一而不是政治统一。^[64]这个政略派或政见反对派，像法国其他一些党派一样，是一个混杂的集团，它远没有像胡格诺派或后来的“同盟”那样严密地组织起来。其中有蒙

莫朗西家族及其扈从，法学家和政府官员当中的温和分子和伊拉斯谟派分子，其业务受到内战损害的银行家和商人，以及所有敌视吉斯家族的天主教贵族。他们的领袖是有权势的，但其为人则缺乏吸引力：阿朗松公爵是卡特琳的最年轻的儿子，后来又作为安茹公爵在尼德兰的干预而声名狼藉；他把政略派看作是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侍从武官长的儿子蒙莫朗西·当维尔是朗格多克总督，他关心自己在南方的权威甚于关心王室的权威。作为一个并无宗教兴趣的天主教徒，他许诺在他的统治下实行真正的宗教宽容。在政治上，他或者同国王结盟反对胡格诺派，或者同胡格诺派结盟而反对国王，总之是见机行事。他的政策中唯一具有一贯性的一点，就是他对吉斯家族的嫉妒。

内战断断续续地进行下去，联盟关系也不断变换。正如威尼斯的大使们所见到的那样，战争现在已深深地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法国社会的习尚了。吉斯、波旁、蒙莫朗西这些亲贵豪门家族意识到战争加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或者至少也加强了对他们统治下的省份的控制。较低层的贵族由于通货膨胀和他们的地产遭到蹂躏而陷入贫困，他们只能期望在战争中和在为某个大贵族效劳中重新走运。既然每个城市和省份都成了内战的前线，原本是和善的法国居民就养成了从事战争的风气。由于掠夺成性的军队破坏了商业贸易，并使得生活没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宁愿过掠夺者的生活，而不愿过被掠夺者的生活。

1574年，查理九世在24岁上死去，据说是被大屠杀的幽灵缠绕。安茹急忙从波兰回来戴上王冠，成为亨利三世。他虽然聪明，但没有他母亲那种对付艰难事务的坚韧和能力，要他去利用那些帮派领袖就不堪胜任了。他的挥霍无度使他在纳税人中不得人心。他的色情癖和对他的“宠儿”们的偏爱（虽然其中有些是勇敢而有能力的人），再加上他对军事的日益厌恶，使他遭到法国贵族和军界人士的藐视。虽然大贵族带着他们的随从和侍从打仗，朝廷却必须支付职业军队的大部分费用，并导致自己破产。1576年，亨利三世和卡特琳得出结论，认为胡格诺派不可能被消灭。阿朗松在斡旋中谈成了一项对胡格诺派极为有利的条约：他们可以在巴黎和宫廷所在地以外的任何地方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保留八个安全保障地；参加法务院的处理涉及新教徒案件的混合委员会。

“大人（即阿朗松）和约”是法国人的“根特协定”。在尼德兰，天主教极端派的代表是朝廷。它在宗教上的不妥协态度，加上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宗教和社会革命的加速发展，导致了妥协和议的破坏。在法国，朝廷现在成了许多天主教徒的怀疑对象。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天主教运动，它反而变成了主张改变现状和反朝廷的运动。地方性的天主教联盟或同盟，早在1560年和1562年就由地方上的当权人士、贵族和高级教士们组织起来了。“大人和约”签订后，这些地方性团体组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同盟”或“神圣联盟”。如果说胡格诺派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军事化的加尔文宗教团体同波旁家族派系的联合；“同盟”赖以建立的基础则是组成为地方性联盟的天主教军人贵族与吉斯家族派系的联合。胡格诺派向日内瓦寻求精神指导，并向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寻求物质援助，“同盟”派则向罗马寻求精神指导，并向西班牙和萨伏依的天主教统治者寻求物质援助。这样，这个时期所有主张变革现实的运动都同它们国境之外的强国和势力联系起来了。这增加了它们的力量，但也引起了运动内部的紧张关系，那些紧张关系大大强化了建立统一领导的困难。

1576年的“同盟”是作为一个天主教贵族党派而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本质上是保守的。亨利三世及其后继者应该按照他们的加冕誓言保持其权力；各个省份和等级代表会议的古老的权利应该予以恢复，这同中世纪的类似的封建纲领没有多大区别。然而，涉及“同盟”的组织方面的条款，则具有一种绝非中世纪的标记。一切成员都应该紧密联系，以互相保护；并服从他们的首领，而无须顾及任何其他权威。他们应当提供武器和人员，并惩治任何拒不履行者；“同盟”则应保护他们免遭任何报复。每个成员都必须宣誓遵守这些条款，违者逐出教门并受永远诅咒。在法国许多地区，“同盟”为了扩大组织，把教士和第三等级的人也吸引进来，正如胡格诺运动一样，吸收较低阶层入盟是为了提供群众性的支持。

这个新的党派的力量很快就在1576年的布卢瓦三级会议上明显地显示出来。它巧妙地操纵选举，胁迫选举人。“同盟”派的大法官和司法总监们试图阻止胡格诺教徒出席选举会议。在三级会议内部，他们以各等级和各省的古老特权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对国王权力的巧妙的进攻。他们未能赢得对政府的直接控制权，这使得极端的天主教徒像胡格诺分子一样，变成了一个反专制主义的党派。

亨利三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同盟”对他的独立地位的威胁，也知道它同马德里的密切联系。为了使它不能与自己对抗，如果可能的话，还使它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他宣布自己是它的领袖，以代替吉斯公爵的地位（1577年1月）。但是，天主教贵族并不愿意以他们笼统的为国王效劳的义务换来他们对他作为“同盟”首脑而要向他承担的非常明确而又广泛的义务。当国王力图利用同盟来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时，这个本来为了钳制国王而建立的组织，就逐渐分解而落入国王控制之下了。亨利没有从“同盟”那里取得多少帮助，而且在他对新教徒进行的新的战争中，也没有取得三级会议的财政支持。既然这已经落空了，那就还是把那样一个工具让吉斯家的亨利去掌握为好。而且，胡格诺派和政略派之间在目标上的不可避免的分歧，已经使得国王的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贝尔热拉克和议”即“国王和议”中，胡格诺派失去了许多他们不久前赢得的让步。国王宣布解散所有的联盟。

签订一项临时条约现在似乎已经有可能了。卡特琳不懈地为它而努力，她遍游南方各省，同政略派的总督和胡格诺派的首领磋商。局部地方的交火从未完全停止，不过除了一次短暂的公开战争（1579—1580年）以外，年迈的王太后设法制止了所有其他的战争。由于亨利三世和他的兄弟即现在的安茹公爵都没有子嗣，那瓦尔的亨利如今就宁愿等待良机以期继承王位。安茹把尼德兰看成是实现其抱负的一个有希望的场所，还向往着一桩英格兰的婚姻和下一轮的英格兰王位。法国各派的好战贵族，都愿意响应他的号召，去从事对外掠夺；或者，既然在那种事情上他们早已不是特别挑剔的了，就通过自己的国家来达到他们的愿望。吉斯也眼望着国外，像奥地利的唐·约翰一样，浪漫地梦想解救他的表姐玛丽·斯图亚特。腓力二世对他好言相许，就像他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做过的那样，但却没有向他提供实际帮助。西班牙政策的目标绝不可能是帮助法国插足于不列颠群岛。只要腓力还没有强大到无须法国帮助就足以进攻伊丽莎白一世时，他虽然可以暗自图谋她的性命，却要千方百计去防止公开破裂，因为他担心出现一个反对他的英法联盟。亨利三世和卡特琳从自己方面来说极为害怕西班牙的势力。他们支持亚速尔群岛的那位克拉图大修道院副院长，还支持身在尼德兰的安茹，虽然他们在官方言论上否定他，而且因为他抱怨对他支持不够而经常同他争吵。这样，腓力出

于对法国政策的不满而开始同那瓦尔的亨利商议在法国重开内战，实际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那瓦尔十分精明，没有陷入这一圈套。

然而，形势仍然是紧张的，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公开的战争只是在尼德兰进行，但列强们在调整阵地，并在他们对手的国土内建立“第五纵队”。在法国，没有一派满足于现状，也没有一派放弃了改善自己地位的愿望。1577年货币改革以后，由于存在着相对的和平和货币的稳定，经济生活开始复苏，这在西部的海港尤为显著，那里经营着西班牙—尼德兰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但是，赋税负担是加重而不是减轻了。1576—1588年，人头税（*taille*）增加了1倍，令人憎恨的盐税（*gabelle*）增加了2倍。农民、工匠和小店主破产了。大商人和银行家（其中许多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赋税承包人以及国王宠臣们则发财致富。1559年的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只是这时才达到它的高峰。

三 法国的王位继承以及与英格兰的战争

与土耳其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和征服葡萄牙，标志着西班牙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西班牙的最大危险再也不是在地中海，而是在大西洋了。法兰西和英格兰支持它在尼德兰和葡萄牙的敌人。德雷克和英格兰海盗蓄意非法地破坏西班牙与其殖民地的贸易，并掠夺西班牙国王和他的臣民的财富。教皇、枢机主教格朗维尔和腓力的西班牙籍顾问们强烈要求实行一项更富有进攻性的政策。国王本人逐渐确信，要保卫他自己的利益和教会的利益，就需要在西欧进行更积极的干预。

促使西班牙改变政策的直接诱因是安茹公爵和奥兰治亲王的去世（1584年）。甚至在安茹去世之前，联省共和国（即乌得勒支联盟）就向亨利三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提议，愿以尼德兰的宗主权相许。亨利三世再次拒绝。奥兰治的威廉的死亡和安特卫普的陷落，使联盟迫切需要援助以拯救自己。于是，伊丽莎白虽然也同样拒绝接受宗主权，却在1585年8月20日同意派遣5000人的军队在莱斯特伯爵率领下，开往尼德兰。莱斯特和另外两个英国人应在国务会议中拥有席位。扼控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河口的布里尔和弗拉辛交给了英格兰人作为基地，并作为偿付英格兰政府开支的担保。伊丽莎白逼着进行一桩艰难的交易，而且一直没有同西班牙完全破裂。不过，她第一次被卷入同腓力二世的公开对抗，而且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卷入得比她曾经预料得更深。

在法国，安茹的死亡搅乱了前些年间的不稳定的平衡。那瓦尔的亨利现在成了王位的直接继承人。面对着一个异端国王的幽灵，天主教徒恢复了“同盟”。它开始是一小批人组成的秘密团体，成员为巴黎中产阶级中狂热的天主教徒，主要是神父和专业人员。它的纪律、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对它的成员个人品德的严格要求，都同任何加尔文宗团体一样严肃认真。当这个团体在巴黎的匠师、行会和官员中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党派时，就同吉斯和天主教贵族们建立了联系。原来那个1576年的“同盟”，很快就在整个法国重新出现了。其标志是吉斯的爪牙、年迈的枢机主教波旁发表的一个声明；他提出继承王位的要求，以反对信奉异端的波旁的亨利。“同盟”派在一个又一个

的城市里撤掉了王室任命的司令官和总督，并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人，其借口是要确保贯彻一项坚定的反胡格诺政策。这并非最后一次：正在同一个革命运动作斗争的温和的政府，发现它本身被站在自己一边的一个极端派凌驾其上了。

1584年12月31日，腓力二世与吉斯和“同盟”签订了《茹安维尔条约》。他们同意承认枢机主教波旁的继承权，并共同协力消灭异端。腓力将向“同盟”每月预支5万杜卡特，并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同盟”答应帮助腓力收回那瓦尔的法国占领区，康布雷和他提出主权要求的其他一些城市，并答应胜利之后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这样，腓力二世就达到了他父亲一直为之力争而未达到的目标：同一个天主教法国结成在西班牙领导之下的联盟；但是，他仅仅是从法国的一个党派那里取得了它。条约本身还是秘而未宣的；不过，“同盟”与西班牙大使贝·纳迪诺·德·门多萨的接触是明显的。亨利三世和卡特琳极为惊恐，并再次转向了“同盟”方面。1585年7月7日，卡特琳和吉斯缔结内穆尔条约，国王在该条约中答应废除以前与胡格诺派和解的一切敕令。那瓦尔如今除了重开内战，别无选择余地。

吉斯现在不仅在财政上依赖西班牙来实现他的法国政策，而且还不得不放弃他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切打算，以便使他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这就使得腓力二世可以不受拘束地去推行他自己的计划。既然已经不再担心法国的干预，似乎最为顺理成章的事就是转而反对英格兰。那位英格兰女王已受到逐出教门的判决；她正在迫害她的天主教臣民；她把一位女王囚禁起来，而大多数天主教徒认为那位女王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利要比她自己的继承权利更为充分。而且，看来恰恰就是英格兰人的帮助，才使得在尼德兰造反的腓力的臣民敢于公然对他加以蔑视。宗教的、道义的和战略的动机就这样结合在一起，驱使腓力去从事“英格兰的冒险事业”；那一入侵的成功必将导致新教的决定性失败和国王在尼德兰的权力的恢复，以及西班牙对天主教欧洲的领导地位的加强。

腓力的决定把法兰西和尼德兰的内战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欧洲大战。既然法国的朝廷已经把主动权交给了“同盟”，既然“同盟”又依附于西班牙，西班牙的政治上的对立面，现在就只剩下新教徒了。

唯有这一次，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分野界限完全一致起来。就整个欧洲来说，似乎这场巨大斗争的决定性阶段现在已经开始了。

入侵英格兰并不是一个新想法，腓力的海军上将圣克鲁斯侯爵1583年就极力主张入侵，腓力从1585年春季开始认真筹划那一入侵。他的财政状况从1575年破产以来已得到改善。从新世界运来的白银，已增加到超过以往任何的预期量。^[65]西班牙政府直接抽取了“伍一税”（20%的税）和其他手续费。其余部分作为私人付款而运到西班牙，而且大部分钱流到为数不多的富商和银号手里。他们积聚了大大超过他们商业需要的巨额资本。威尼斯和荷兰的商人在他们的鼎盛时代从事国际贸易所用的资本，比鲁伊斯、斯皮诺拉和富格尔积聚的资本要少得多。安特卫普的被围攻，荷兰人对斯海尔德河的封锁，再加上新教徒私掠船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活动，使得商路不安全，并减少了投资机会。甚至矿山也往往不需要数十万杜卡特那样的投资。这样，那些大金融商号就只能把他们的资本用于政府借贷了——那是十分有利但又有很大风险的投资形式。于是，特别是西班牙政府，就能够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获得利息较低的巨额贷款。这就给这个时期陆军和海军活动的广泛增加提供了基础。1576年，弗莱明·奥德格尔斯特向腓力二世建议在他的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建立银行，并由马德里的一个董事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就像为促进西班牙帝国经济一体化而提出的其他大多数建议一样，这一建议也毫无结果。腓力二世仍旧处于银行家和他们那些具有高度投机性的汇票兑换买卖的控制之下。

^[66]

莱斯特在弗拉辛登陆之时（1585年12月），尼德兰的形势是危急的。法尔奈泽——他从1586年起成为帕尔马公爵——已向荷兰和泽兰南部的防御堡垒逐个地推进。在东北部，保王派从1580年起就控制了格罗宁根，那时它的总督伦内贝格伯爵参加了政见反对派，并同国王缔结了和约。在东部其他省份，天主教派仍然是强有力的，三级会议的权力不稳固。联盟本身已严重分裂。反对国王的起义，首先是一场各省反对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起义。如今各省并不愿意把它们刚刚赢得的自治权放弃给另一个实际上的中央政府。乌得勒支、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和弗里斯兰嫉妒荷兰、泽兰和它们在国务会议与三级会议中的主宰角色。荷兰为整个战争的人力物力付出了2/3的费用，因而对较穷省份的敏感反应也不耐烦。新教的胜利还没有解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系问题。荷兰的统治阶级，那些控制城市的贵族寡头们，已经接受了新教，但只是根据伊拉斯谟思想和宽容态度的教育与传统来接受的，而那种教育与传统正同他们在革命以前所接受的一样。与此相反，加尔文教派的传道士们却是不宽容而且唯我独尊的，要求对人民和市政长官都同样拥有宗教和道德上的监督权。他们得到来自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宗教避难者的支持，还得到小市民阶级、匠师和工人等阶层的支持，而那些人正是掌权者们在1572年革命中加以利用之后已经成功地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人们。于是，在国家和加尔文教会之间的冲突之上，又加上了寡头集团同平民集团之间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奥兰治本是伴随这些斗争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通过他的个人威望和一种令人惊叹的政治上的巧妙手腕，他设法使自己得以超脱于党派冲突之上，并得以防止它们造成联盟的解体。莱斯特不理解那些冲突，竟使自己成为那些派别中的一派的领袖。最初，几乎各派都满怀热忱。三级会议任命他为总督，授予他的权力比曾经授予安茹或唐·约翰的权力更为广泛（1586年1月）。但是，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的是他的地位动摇不定。他接受那个职位超出了给他的训令规定的范围。伊丽莎白很长时间拒绝予以认可，莱斯特伯爵的权威由此而受到损害。但是还有更糟的事情就要发生。伊丽莎白还在坚持她同西班牙谈判的政策。她派莱斯特到尼德兰去是为了给腓力二世施加压力，以便为她自己和联合省取得一项适度的和解。另一方面，尼德兰人对于取得那样一项和解的可能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想要把英格兰拖入他们同那位国王之间的战争。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分歧，莱斯特的使命陷入了绝境。

当他试图禁止荷兰和泽兰与西班牙和南方诸省之间的贸易时，他就同荷兰和泽兰发生了争吵，那项著名的同敌人的贸易（handel op den Vijand），如商人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使荷兰和泽兰赖以得到财力来支持战争。传道士们却认为那是一种背叛，而莱斯特同意他们的看法。1586年4月，他本人在乌得勒支驻足，那是反荷兰派的中心。他帮助推翻了那个城市的寡头政权，而使他自己同传道士和平民派结成联盟。既然有他们的帮助，又有军队，他预期可以迫使荷兰的寡头掌权者们就范。但是，他同尼德兰的军队指挥官们发生了争吵；他反对帕尔马的行动几乎全都是失败的；他的部队没有发军饷，而且有可能发生兵变。在绝望中，他请求伊丽莎白再给他送些钱去。但是那位

女王已经付足了许诺过的数额，或许还超过了那个数额。她的财力是有限的，而且她谋求和平比从事战争的心情更为迫切。1586年12月，莱斯特回到英格兰，以图获得更多的钱，并恢复他在朝廷中已经动摇的地位。

1587年1月，英国驻海牙领事威尔克斯报告说：“我们已开始变得使人民感到同西班牙人一样可恨；那些西班牙人统治他们征服的城市所用的手段，比我们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所用的手段还要温和一些。”当英格兰指挥官把代芬特尔和聚特芬要塞出卖给了帕尔马时，三级会议采取了行动。新任命的荷兰州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策划了一次对国务会议中的莱斯特党羽的清洗，并使奥兰治的年轻儿子，拿骚的莫里斯被任命为总司令。但是，英格兰人的援助仍旧比以往更为必需，伊丽莎白也被说服而派遣勉强从命的莱斯特再次登上他所说的“最危险而又最弯曲的航程”（1587年7月）。

莱斯特继续依靠加尔文宗信徒。他同三级会议和将军们的关系也就进一步恶化起来。他们指控他同帕尔马谈判。他否认此事，但那是真的。伊丽莎白愿意对西班牙做出尼德兰人所不能接受的让步。莱斯特谴责荷兰和泽兰，并将英国军队开进了荷兰人的一批城市。现在是第三次，一位总督试图对三级会议来一次突然袭击，而且又一次失败了。伊丽莎白的谈判政策使莱斯特甚至失去了他自己那一派、即乌得勒支的加尔文宗信徒和平民运动的支持。1587年底，他离开了尼德兰，而尼德兰既由于他试图为之效力的两个国家目标互不相容而受到了损害，同样也由于他个人不堪胜任要他充当的角色而受到了损害。

莱斯特的去职决定了城市寡头与尼德兰军事指挥官的联盟的胜利。平民运动在各个地方都失败了。三级会议现在相信，向一个外国君王提供宗主权的政策并不成功。在莱斯特时期的争辩中，荷兰的政论作家们提出了三级会议拥有主权论。这个机构现在决定将它付诸实行，并决定只通过联盟关系去获得外国援助。1589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说服了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的等级代表会议，把拿骚的莫里斯选为它们的总督。从1585年起，他已经是荷兰和泽兰的总督。他的堂兄弟威廉·路易行使了弗里斯兰的总督职权。这样，三级会议中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就被奥兰治家族特别是莫里斯所起的统一作用抵消。但是，它们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正如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问题一样，还没有得到解决；来自西班牙的直接威胁一旦

过去，那一关系问题还会引起新的冲突。不过在当时，这一威胁还压倒了一切考虑，甚至压倒了荷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怨怼，并使得这个不稳定的联盟继续保持着活力。

一般认为，腓力二世当时应该集中他全部资源去重新征服北方各省，并认为他本可以稳操胜券。然而，腓力已决定首先打击英格兰。苏格兰女王玛丽曾写信给门多萨（1586年5月20日），愿将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利让渡给腓力，并请求他将她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这给那位国王提供了一个为实现他的计划所求之不得的决定性的道义依据。帕尔马最初对他表示赞成。1586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帕尔马和圣克鲁斯都提出了详细的方案，从那时以来，远征的准备工作继续下去。困难是巨大的，腓力和他的顾问们对那些困难也并不抱有侥幸幻想，尤其对英格兰人的海战炮术优势和英格兰人可能要采取的战术不存侥幸之心。圣克鲁斯要求配备150艘战舰、360艘货船和辅助船只、9万人以上的兵力和2200门大炮，预计全部费用几乎接近400万杜卡特。这些预算额决不可能实现；而当后来决定由驻在尼德兰的帕尔马的陆军承担实际上的入侵任务时，那些预算额就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它毕竟是那个时代所能设想出来的空前巨大的联合军事行动。

拖延是不可避免的，费用超过了预算。德雷克对加的斯的袭击（1587年4月），流行病和恶劣天气阻碍了准备工作，而每拖延一天，单是支付军饷和维持部队的费用就达3万杜卡特。1587年的头五个月，腓力就给帕尔马送去了250万杜卡特，而那位公爵还拖欠着他的部队几个月的军饷。西班牙人讨厌让一个意大利人担任总司令，在腓力的大臣和将军中经常表现出反感。到1587年秋天，帕尔马已经确信，“英格兰冒险事业”并无成功的希望。腓力本人则时而对行动进行歇斯底里的指挥、时而又表现出他那更加常见的优柔寡断。1588年2月，圣克鲁斯去世。腓力有许多富有经验的将领，但他们当中没有显赫出众得足以博得其他人服从的人。格拉纳达和勒班陀战役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一位亲王或一位极为显赫的贵族才能使人们服从。如果他像唐·约翰那样本身并无指挥经验，可以给他配备技术性顾问。正是这一考虑，而不是传说的他对任用无能之辈的偏好，成为腓力任命麦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担任无敌舰队总司令的动机。^[67]这位公爵缺乏唐·约翰的气概，但眼前并没有一个唐·约翰可供差遣，而且，在果敢和决断方面，他表明自己无愧于最优秀的西班牙人的传统。

为了远征取得胜利，重要的是要使法国保持中立。因此，重新爆发的内战就对腓力起了帮助作用。从他的观点来看，那场内战打得不错。那瓦尔在库特拉击败了保王派（1587年10月20日），吉斯则在一个月后歼灭了那瓦尔的德意志盟军。只有亨利三世进一步失去了声望。1588年1月，吉斯派迫使他接受了比以前还要苛刻的条件，以作为继续保持联盟关系的代价。亨利曾答应伊丽莎白，在她遭到进攻时提供援助。他也许不会提供援助了，不过腓力必须弄清楚他是否还有可能那样做。“同盟”也并不信任他。他们后来声称，早在1587年春天，甚至更早，他们就策划了对巴黎的一次袭击。然而，袭击的时间，是通过门多萨同吉斯和巴黎的“同盟”委员们的接触，而由马德里来决定的，要同无敌舰队启航时间一致。吉斯应把国王控制起来，腓力则答应他那时将承认那位公爵和“同盟”为法国的临时政府，直到枢机主教波旁加冕为国王。必要时他还将以金钱和军队相助。

无敌舰队预定于1588年5月初启航，虽然实际上直到5月30日它才离开里斯本。5月9日，吉斯无视亨利三世的命令闯进巴黎。亨利本来有可能将他逮捕，但他犹豫了。在首都，气氛异常紧张。“同盟”分子很快加强了力量和信心。他们对这个城市干下的日益加剧的暴虐行径，被他们的死敌皮埃尔·德·莱斯杜瓦尔淋漓尽致地记载下来。已经显示过杀戮本事的巴黎暴民，被“同盟”的传道士们蓄意地煽动起来——这一次他们的口才堪与加尔文派相匹敌——直到把每一桩不幸和每一件罪恶都归之于加尔文派和政略派。人们谣传，国王宠臣埃佩尔农同胡格诺派勾结起来要火烧该城。5月11日，亨利把法国部队和瑞士人的部队调进巴黎，但下令不得对居民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巴黎人赶紧筑起街垒，把孤立的王军分遣队封锁起来。这一行动是“同盟”委员们精心策划并由吉斯指挥的。国王不得不恳求吉斯阻止对他的军队进行一场屠杀。次日，亨利逃出巴黎，而吉斯保持着对首都的控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亨利再也不能干预无敌舰队的出征。这次袭击虽然是针对国王和巴黎进行的，却把埃佩尔农和他的势力从皮卡迪赶了出去，使“同盟”有可能占领该省并掩护帕尔马的侧翼，以预防国王可能发动的进攻。

这一胜利并未使无敌舰队免于蒙受灾难（1588年8—9月）。对西班牙来说，那不仅是一次可怕的士气上和物质上的打击：它还毁掉了同伊丽莎白达成协议的一切希望，并促使英格兰无可挽回地站到了那

位天主教国王的敌人一边。他制订了再次进攻英格兰的计划；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法国去了。在那里，似乎西班牙的一切失败都还可以胜利地挽回。腓力再次加倍地押下赌注。但是，帕尔马深信，腓力只是在加重他从前的错误。

1588年的夏季和秋季，法国的“同盟”势力一直在增长。亨利三世除了按照吉斯的条件保持同那位公爵的联盟，别无选择余地。但是，无敌舰队覆灭的消息，恢复了他的勇气。9月，他把最接近自己身边的八个顾问解除了职务。他们都是卡特琳的工具，而这次宫廷革命标志着王太后影响的结束。1588年10月，三级会议在布卢瓦召开，那是1576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所有三个等级中，“同盟”再次拥有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多数。他们从广泛的侧面攻击亨利的行政管理；他们要求由三个等级共同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他们敦促国王更加有力地进行反胡格诺派的战争，同时又要求大幅度减轻赋税。亨利认为吉斯应对他所蒙受的一切侮辱负责。促使事态激变的最后一个小诱因是萨伏依公爵对法国占领的萨卢佐的进攻。国王认为那次进攻是“同盟”怂恿的。他想错了。因为夏尔·埃马纽埃尔像往常一样，仅仅是醉心于他的实力政治，而且，由于引起人们的情绪急剧地转向有利于亨利三世的爱国主义，几乎毁掉了天主教徒的联盟。

吉斯曾被提醒不要相信亨利，但是他正为他的众望和政绩而得意扬扬，不把软弱无力的国王放在眼里。他以通常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加防备地走进了亨利设下的陷阱，即布卢瓦的别墅，就在国王的面前被杀死了（1588年12月23日）。他的兄弟枢机主教吉斯被逮捕起来，并于次日被处死。当亨利把这一胜利消息告知卡特琳时，她正卧病在床。她对那一胜利的后果仍然表示怀疑。她于1589年1月5日死去。莱斯杜瓦尔说，她的死“并不比一只山羊的死引起更大的震动”。

立刻出现了一场反对国王的激变。索邦神学院宣告他为杀人犯和暴君，并宣告解除全体法国人对他的效忠义务。“同盟”成了一个公开的革命党派。他们认举吉斯的兄弟马耶讷公爵夏尔为枢机主教波旁（他已成了亨利三世的囚徒）的王国副长官。在普罗旺斯，法务院宣告“同盟”和各城市已弃绝它们对“杀人凶手亨利三世”的忠诚。在别的地方则不得不让“同盟”的军队出场，去威胁那些忠于国王的省法务院做出同样的宣告。几乎在每个城市的市议会里，“同盟”都有

力量雄厚的同党。在马耶讷的部队或当地“同盟”派贵族的家臣组成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几乎在这个王国的所有大城市里，都建立了革命政府。由三个等级的成员组成的秘密或公开的“同盟”委员会，监督着市议会，并把那些有保王情绪嫌疑的贵族和官员监禁起来。在图卢兹，通常由本为狂热的天主教徒的市政长官们（市长和市政厅人员）宣布支持“同盟”，而当法务院要维护国王权威时，暴徒们就闯进院里，杀死院长和法律总顾问。

在图卢兹，也像在其他一些城市里一样，法务院和市政厅之间的激烈对抗日益增长起来。内战和普遍的不安全，促使许多富裕市民撤回经商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学法律，并为他们购买官职。但是，高级法庭的成员，越来越不让外面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职位日益变成世袭职位。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发现他们的前程已被堵绝。他们不得不退而谋求省里的王室官职或市政官职。如果说在发生内战以前城市议会由富商控制着，如今它们已被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所驾驭，而这个职业法学家阶层怀有商人们从未向往过的政治抱负。1588年三级会议里的第三等级中，有一半的代表是律师，他们同他们的支持者一起，控制着法国的市政府。他们成了“同盟”提出的民众政府（即非贵族的政府）主张和城市与地方自治主张的热烈支持者。

恰恰是在巴黎，革命推进到了它的最大极限。“同盟”组织在全城16个区的每一个区里各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担负警察职能，并监督市政官员。这些委员会又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按照首都的区的数目称为十六人委员会，而实际的委员人数达到了50人。十六人委员会推行了要由巴黎来承受的第一次革命的恐怖统治。为了协调全国的运动，十六人委员会把它的代表派到各省，并吸收了各地城市的代表。

“同盟”的总委员会就这样控制了法国整个的“同盟”派自治城市网。

亨利三世完全未能采取措施推进他在处死吉斯公爵以后获得的有利形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公文仅仅在卢瓦尔流域的城市发生作用。1589年4月，他迫于形势，同那瓦尔的亨利结成联盟。他们依靠联合起来的武装部队向巴黎推进，并开始对首都的第一次围攻。当一个狂热的修道僧雅克·克列门特对这位国王行刺时（1589年8月1日），巴黎俨然已丢给了“同盟”。亨利三世临死之时，认举那瓦尔的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如果后者同意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对圣巴

托罗缪节的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三个人，都已在八个月之中死去，其中两人是遇刺身亡。

法国如今有两个国王，一个是胡格诺派的那瓦尔王，即法国的亨利四世；另一个是他的囚徒、枢机主教波旁，被“同盟”和天主教国家承认为查理十世。亨利是一位与科利尼极为不同的胡格诺派领袖。他的母亲把他培育成一个新教徒，但他并没有科利尼那般强烈而不可遏止的宗教信仰。他以一种对政治现实的领悟和一种可与奥兰治的威廉相匹敌的对机会的敏感来充实他的信仰。如果说科利尼是靠他的目标的单纯性和他的严格的诚实来对他的追随者发生强烈影响，亨利则是以他的综合着果敢、军事才干，特别是个人魅力的个人的吸引力来赢得人们的拥护。他的举止掩藏着一种与腓力二世同样强烈的独裁气质。直到他能够放纵那种气质以前，他一直使它受到严格的克制。他甚至比科利尼更少去谋求改变法国的政治制度或削弱他本人想要继承的王权。1589年3月，他宣布同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但拒绝单纯为了得到一顶王冠或30顶王冠而放弃他的信仰，以此来表明他的立场。他说，他永远不会把他的宗教强加于天主教的法国，但他的胡格诺教友也同样不应被人用刀剑来强迫改宗。这一宣言，对于那些为了支持“同盟”或为了保持艰难的中立地位而背弃了他的为数众多的保王派来说，是不够的。他不得不解除对巴黎的围攻。

如果天主教各派势力能够合作，那就很有可能阻止亨利继承王位。但他们在利益上的分歧太大了。腓力指示门多萨把由他自己或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克拉拉·欧亨尼娅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提出来，同时还要求将他承认为法兰西王国的天主教保护者。然而，教皇认为这一保护者地位应属于他自己。腓力二世和西克斯特斯五世之间的紧张关系惊人地恶化了。那一关系从来就不好，因为西克斯特斯五世试图在他的整个教皇任期（1585—1590年）内，针对西班牙的压倒性优势，保持教廷的某种程度的独立。他曾于1585年认可了对那瓦尔的逐出教门令，那时他认为亨利三世和“同盟”已真正联合起来反对新教徒。但是，腓力在亨利三世死后在法国进行的公开干预，使教皇担心，那个唯一能够与西班牙抗衡的天主教大国，可能丧失它的独立。这是威尼斯人向他提出的论据，而威尼斯是承认亨利四世的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教皇被这一论据深深打动了。腓力二世从他自己方面认为，他正以其全部力量来保卫教会，相比之下，教皇自己的力量是何

等微弱。作为较弱的一方，他应当追随较强的一方，那已是国王可以期待他予以满足的最低要求了。1590年初，西班牙和教廷之间比他们从保罗四世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彻底决裂。

西克斯特斯五世于1590年8月27日去世。为了保证腓力计划的成功，选出一个比较容易驾驭的教皇，如今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直到此时，腓力还没有直接干预过教皇的选举。他的驻罗马的使节只是曾受命要促成一位虔诚教皇的当选，并排除任何亲法国的候选人。这一次，他的大使奥利瓦雷斯伯爵向红衣主教团提出了一个名单，让他们只能在那个名单中选择。大多数红衣主教都从西班牙或其意大利属地获得津贴或岁入。他们的家庭成员依靠由西班牙的任命权谋求晋升。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容易受到西班牙压力的影响。无论在乌尔班七世（卡斯塔尼亚）的当选（他于当选后12天死去）问题上，还是围绕格列高利十四世（斯丰德拉蒂）的当选而进行的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中，奥利瓦雷斯都巧妙而无情地施加了那种压力。奥利瓦雷斯远远超出了给他的指令规定的范围，但腓力并不宣布他同自己无关——那是腓力三世时期的一种状况的预先尝试，那时，西班牙的政策已由那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雄心勃勃而又坚持己见的副王和大使们来制定。格列高利十四世是“同盟”的一个狂热支持者。他向法国送去了金钱和部队，还利用他的职位向“同盟”提供道义力量的支持。他于1591年10月死去，那是西班牙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奥利瓦雷斯再次使他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了。

西班牙的策略结果还是自取失败。当英诺森九世于1591年12月死去时，在红衣主教团中出现了一股坚决的反抗力量，反对使教皇成为“西班牙国王的礼拜堂牧师”。在极为秘密的斗争和最富戏剧性的记名选举中，腓力中意的候选人落选了（1592年1月）。红衣主教团推举年轻的枢机主教阿尔多布兰迪尼作为双方可以接受的候选人。这位克莱门特八世不是反西班牙的，但他已不再像他的前任那样依附于西班牙。他的政治观点是在西克斯特斯五世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后者把枢机主教的仪冠赐给了他，他不能立即撤销对“同盟”的援助，但是他也并不拒绝听取亨利四世密使的意见。那位国王应在教皇宽恕他以前表明他回到教会来的诚意。不过，重新和解的门已经不再关闭了。

腓力还能暂时地控制教廷，但他不能同样地控制他的其他同盟者。枢机主教波旁的死亡（1590年5月）把一大群法国王位的要求者召

唤到战场上来了。萨伏依的夏尔·埃马纽埃尔和洛林公爵立刻勾销了他们对普罗旺斯和香槟境内一些王国领地的甚为有限的要求权的竞争，而派遣他们的部队进入了那些省份。马耶讷对法国王位有他自己的企图，不过在那个问题上他甚至与自己家族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不信任西班牙人，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有所作为。1590年3月，亨利在伊夫里将他击败，然后就开始第二次围攻巴黎。城内粮食耗尽，总计有1.3万人死于饥饿。但是“同盟”的传道士和十六人委员会的恐怖制度阻止了投降。9月，帕尔马公爵率领他的西班牙老兵解救了该城。西班牙军队如今已在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作战。看来法兰西就要像尼德兰那样分崩离析。1592年，帕尔马再次干预，从亨利的威胁下解救了鲁昂。

马耶讷甚至不能控制他自己的“同盟”派。这位肥胖而又雄心勃勃的贵族，虽然比他的兄长较为诚实，也不那么富于幻想，却缺乏亨利公爵的个人吸引力和他那种既能获得同侪贵族的信任，又能博得“同盟”中的平民们的热烈赞扬的能力。“同盟”总委员会的贵族成员对十六人委员会的革命和民主政策越来越感到不安。反对任命“小商贩和一帮同盟派恶棍”去担任民兵队指挥官和高级市政官职的，并不只是莱斯杜瓦尔（L'Estoile）一人。1589年2月，马耶讷就已试图从巴黎的大资产者和法务院成员中任命14个人参加总委员会，以抵消其中的平民派势力。十六人委员会的回答是建立一个公安委员会，由他们自己选出的10人组成。1591年11月，他们打击了他们在巴黎最痛恨的敌人法务院。法务院院长布里松和两个审议官被逮捕起来，并以所谓的叛逆罪被处死刑。这一行动是以十足近代方式来辩解的：一是十分值得怀疑地声称，该法务院的其他成员是赞成采取那一行动的；再就是断言，反对民众的叛逆罪，如果合法手段不足以惩治，即使用非法手段也必须予以惩治。

这一行动导致了贵族同不妥协的十六人委员会之间的决裂。马耶讷于1591年12月逮捕了十六人委员会的几个成员，但拒绝采取反对传道士的行动或完全摧毁十六人委员会。然而，他想把“同盟”的贵族派和革命派拉拢在一起并保持平衡的尝试，就像奥兰治亲王10年前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同类形势下所作的类似尝试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天主教阵线的分裂在1593年的三级会议中变得最为明显，这届会议是马耶讷在腓力二世的压力下极为勉强地召开的。西班牙的大使提出由西班牙公主继承王位的主张，认为由于需要阻止一个异端者继承王位，停止实行把继承权留给男性的萨利克法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马耶讷遭到了攻击，而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持敌视态度。他们宁愿同亨利谈判。这位国王看准了能达到最佳效果的时刻，宣布他已决定重新皈依天主教。仪式于1593年7月25日在圣但尼举行。“同盟”的不同派别之间一条唯一有效的联结纽带，即对一个异端国王的恐惧，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正如同盟成员让·德·塔瓦纳所说，法兰西投入了那位国王的怀抱。亨利慷慨行事，向那些接受他的统治的司令官和城市大量奉送金钱、地产和官职作为贿赂。他对那位惊世骇俗的苏利说，这比征服他们要省钱得多。较低层的贵族由于缺乏诸侯和将军们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些时期以来就开始把他们的儿子分别安插到每一个对立营垒里去，以谋求安全。

巴黎是孤立的。“同盟”的城市之间的联系组织，已经被马耶讷的阴谋和亨利于1594年发动新的进攻所破坏。马耶讷已经通过他的1591年的“雾月政变”暗中破坏了革命领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只剩下一个唯一的盟友，就是天主教的独裁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就是革命的“反证法”，而它也是革命的终结。帕尔马已于1592年12月死去，当亨利第三次向巴黎进军时，驻在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已经再也不能来予以拯救。他于1594年3月22日进入了他的首都，几乎未遇到抵抗。像在其他每一个场合一样，他对那些曾经那样激烈地反对过他的人们并未施加报复。只有一小批传道士和“同盟”领袖被处以短期流放。

16世纪革命运动的一个矛盾现象，就是领导革命的人们并不是革命者。孔代和那瓦尔、奥兰治、吉斯和马耶讷，都并没有创立他们的党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像他们之前的许多贵族造反者一样，在于夺取现存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去推翻社会秩序或从根本上改变其国家政治的，甚至宗教的结构。然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被身为其领袖的党派远远地推上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道路。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构成最积极成分的下层贵族同富裕市民和城市民兵队的穷困的工匠一起，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按他们的经济要求和宗教信仰来说，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宗教是一种凝聚力，它把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聚拢在

一起，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组织和宣传手段，因而得以形成近代欧洲史上第一批真正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党，因为这些党派从来也只不过吸收了组成它们的每一个阶级中的少数。正是通过宗教，他们才得以求助于最底层的阶级和暴民，驱使他们在狂热的抢劫和野蛮的屠杀中去发泄他们对穷困的愤慨和对失业的绝望情绪。社会和经济的令人不满的状况，是双方征集力量的肥沃土壤，而民众性的暴政就既出现在加尔文派控制的根特，也出现在天主教派控制的巴黎。

从长远来看，即使宗教也不能使贵族同民众专政相调和，于是一方或另一方便被驱使去同从前的共同敌人结成联盟。在任何场合下，其结局都是革命党派的分裂和民众运动的失败。在城市的贵族世家设法保持了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控制权的地方，他们也设法达到了他们大部分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是，一旦站稳脚跟，他们就足以放手抛弃他们的大部分革命组织。只有在宗教领域，他们把他们的革命进行到了完全彻底的程度。然而，无论是荷兰的加尔文派还是法国的胡格诺派，其激进派都未能按照日内瓦的模式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严格的神权政治。当这些党派丧失了它们的革命动力并抛弃了关于社会内容的说教以后，它们很快就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支持。“同盟”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法国农民日益增长的苦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运动；那些运动反对领主和他们的地租，反对教士和他们的什一税，反对赋税征收者和他们的人头税（taille），但是他们并没有涉及宗教和政党。这些“扎克雷”运动逐渐汇集成为1594—1595年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克洛堪运动。他们同一个领主联盟进行了一场对阵战，而那个联盟是单纯为了打败他们而组成的。这一运动和17世纪的许多类似的暴动表明了法国农村社会和赋税制度的黑暗，但是直到1789年革命为止那些运动一直未取得政治上的成果。

1595年1月，亨利四世向西班牙宣战。科利尼未能做到的事，他却取得了成功。那就是使统一的法国去反对它的外部敌人。9月，克莱门特八世在平息了对高卢教会（它曾声称它有权不经过教皇而宣布对亨利的宽恕）的愤怒之后，终于被说服去宽恕了亨利。这位教皇的宽恕，使剩下的大多数“同盟”成员转到了国王方面。马耶讷在10月采取了和解行动，只有梅尔克公爵在布列塔尼坚持到1598年。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像在法国国内事务方面一样，这场对西班牙的战争，是政略派把国家需要置于宗教需要之上的主张的胜利。欧洲的国家制度已

开始形成特定的形态。仅仅在10年以前，荷兰人还一直在寻求一个外国的元首。如今，尼德兰的联省共和国已被法国国王和英国女王（后者有点勉强）当作一个平等伙伴接收到一个联盟里来。实际上，西班牙已不再致力于镇压一场起义或干涉一场内战，而是致力于反对西欧主要强国的公开战争。

这种战争的压力表明西班牙的财力是承受不了的。卡斯蒂利亚的国会虽然没有什么权力，却是直言不讳的，它早在1588年就要求知道，如果西班牙穷一些，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是否就会好一些。五年以后，他们的讽刺甚至更为尖刻了，当时，他们请求国王从尼德兰和法兰西撤回他的军队，认为那样做就会使那些拒绝接受神圣的天主教信仰的人们受到最有力的惩治，“因为，既然他们想堕入地狱，那就由他们去吧”^[68]。1596年，腓力的政府陷入第三次破产，而这场危机再次遍及欧洲的所有金融中心。不过影响是暂时的，来自美洲的白银输入量还在增加，有这个基础，腓力就还能继续借债。只要西班牙的军队能得到军饷，他们就能表明自己还拥有战术上的优势。他们夺取了加来，而亨利四世和伊丽莎白都曾为它的占有权而激烈争吵（1596年4月）。一年以后，他们拿下了亚眠。这使亨利耗费了六个月的最紧张的努力去夺回该城。现在双方都体面地满足了，而教皇的使节得以议定韦尔万条约（1598年5月2日）。西班牙放弃了加来，而在其他大部分方面则恢复了卡托—康布雷奇和约规定的条件。1559年法国人曾把该项和约视为一次重大的失败；而在1598年，他们却把韦尔万条约说成是“法国在500年间缔结的最有利的条约”。那是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人的势力在欧洲引起的恐惧的一个标志。

伊丽莎白埋怨亨利同西班牙缔结该项条约是背信弃义，正像荷兰人埋怨她在1586—1588年同腓力的谈判一样。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有某些理由互不信任，但是教皇使节希望法兰西—西班牙结成反英格兰的同盟，却是过于乐观了。亨利保持了他对英格兰的宽宏大量的中立，并继续暗中支持他的荷兰盟友。

无敌舰队溃败以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在双方都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下去。英格兰人在1589年和1596年对伊比利亚大陆的进攻（埃塞克斯进攻加的斯的著名远征）是颇为壮观的，但在战略上却无实际意义。在这些年代里，英格兰人在诺曼底对亨利四世的冒犯和想要控制布列塔尼以反对西班牙人的企图，妨碍了对西班牙的进

攻。腓力于1596年和1597年派遣了新的有威力的舰队入侵英格兰，但它们被风暴击毁了。英格兰的舰长们能够在加勒比海或亚速尔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合算的劫掠，或者像格伦维尔指挥“复仇号”时所做的那样，打出以寡敌众的漂亮仗。但是，西班牙人重新组织了他们的海军，并使他们的舰只适应于对付英国人的战术。他们对通往西印度的海上航线的控制权保持下来了。英格兰人能够夺取一些孤立无援的船只，但是运载大量金银的护航队都能安全通过。

1601年，西班牙人在他们可望得到当地援助的地方尝试着向英格兰发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西班牙人在爱尔兰进行一次登陆这并不是一个新想法：在为无敌舰队的远征做准备时，就曾进行过认真的考虑。蒂龙和奥唐奈的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两位爱尔兰领袖同西班牙保持着联系。他们在1596年就请求阿尔贝特大公做他们的君主。爱尔兰的起义成了英格兰政府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本来可用于反对西班牙的海战的金钱和部队被挪用了，就像在早些时候被挪用于援助亨利四世一样。不过，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且兵力不足。芒斯特和康诺特的起义已经失败。西班牙人未能冲出他们1601年9月在那里登陆的小港金塞尔。蒂龙和奥唐奈从阿尔斯特南进，去与他们会合，但被代理总督蒙齐伊打得惨败。1602年1月2日，西班牙人在体面的条件下投降。

西班牙人发现同爱尔兰人的合作并不轻松。双方现在都为失败而互相指责。因为对双方来说，那都是他们的希望的终结。奥唐奈逃到西班牙，蒂龙则向代理总督屈服。爱尔兰至少是暂时平定下来了。詹姆斯一世于1603年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提议同西班牙谈判，那时，腓力三世抓住时机结束了他已不可能指望取胜的那场战争。伦敦条约（1604年8月19日）标志着西班牙企图摧毁英格兰新教的尝试的结束。但是它成功地保住了葡萄牙，抵抗住了英格兰人想要推翻腓力二世的继承权的一切努力，它还完整地保持了它对西印度殖民地及其贸易的垄断权。像韦尔万条约的情形一样，双方都保全了体面。

腓力二世曾经设想，他的英格兰计划或法兰西计划如能取得成功，就意味着对尼德兰反叛省份的讨伐必定成功。身居布鲁塞尔的帕尔马更接近于事态演进的所在地，他也看出了那些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腓力的英格兰计划和法兰西计划都将失败，而随着那些计划的失败，也就会失去征服荷兰和泽兰的一切指

望。他仅仅是极为勉强地率领他的军队去解救巴黎和鲁昂，明知他这样做会致命地削弱自己抵御荷兰人的北方战线。他从鲁昂返回时已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帕尔马是腓力最优秀的将领，而且直到最后他仍然是未曾被击败过的人。他以他的坚定和温厚帮助国王的事业免于道义上的破产；而腓力的不宽容、阿尔发的恐怖和唐·约翰的野心却把它推向了那种破产。但是腓力无视他外甥的劝告，而且最后抛弃了他，就像他曾抛弃他的许多最忠实的仆人一样。帕尔马在宫廷里的政敌们利用了他对国王政策的反对态度。他们把无敌舰队的失败归罪于他。尼德兰的西班牙将领们讨厌他们那位意大利籍的司令。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死去了（1592年12月2日或3日）。他还不知道，丰特斯伯爵已经启程去取代他的职务，并要把他送回西班牙。这位公爵曾请求允许他退隐到意大利，腓力就连这一点也不愿信任他。

丰特斯是阿尔发公爵的内弟，他解除了帕尔马任命的意大利籍和佛兰芒籍的顾问们的职务，任命了西班牙人；那是直接违背阿拉斯条约的。年迈的阿尔绍公爵和比利时贵族再次提出抗议，但没有结果。马蒂亚斯的兄弟恩斯特大公，在他那短暂的总督任期内也未能改变这一形势。但是，西班牙人再也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场成功的战争了。年轻的拿骚的莫里斯已经重新组建了联省共和国的军队。他已经稳扎稳打地把西班牙人从格罗宁根、上艾瑟尔、海尔德兰和他们在莱茵河、马斯河以北的桥头堡赶了出去。在1590年到1595年之间，正当国王的军队在法国作战时，他摧毁了针对荷兰和泽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而那是帕尔马以极大的努力和匠心建立起来的。

从那以后，战略形势还是稳定的。1600年，莫里斯进攻佛兰德；但佛兰芒人没有起来支持他。1604年，西班牙人再次在一个意大利人、热那亚的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侯爵的率领下，攻占了奥斯坦德。此后，他们也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如今北方和南方都已构成了适度的防御前线。

在尼德兰的这场漫长斗争的首倡者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那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永久分裂。尽管各省极力保护本省的地方权利，但它们曾经感到它们在一个共同的统治者之下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到腓力二世的统治结束时，30年的战争岁月已经使得宗教方面、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和政治常规方面的差别加大了，以致北方和南方不仅已被士兵和堡垒的界线分割开来，还被一条互不了解和冷淡旁观的不可

逾越的鸿沟分割开来。腓力在临死之前把尼德兰交给了他的侄子阿尔贝特大公；他是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兄弟，也是马蒂亚斯大公和恩斯特大公的兄弟；腓力还把他钟爱的女儿伊莎贝拉·克拉拉·欧亨尼娅公主许配给了他。大公和公主夫妇的君主地位（这对夫妇已开始被那样地称呼）是受到秘密协议严格限制的，国王保留着最高权力。然而，实际上他们享有很大的独立；而且，腓力三世的软弱的政府往往更多地听从他们的领导，而不是领导他们，犹如它的那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副王和大使们所处的情况一样。^[69]大公和公主再次把瓦隆贵族拉回到政府里来。在1598年和1600年，他们两次获得南方各省三级会议的支持，去敦劝北方诸省恢复他们原来的忠顺，答应它们完全自治并信仰它们自己的宗教。由于马德里不愿让南方的流亡者回去，还由于北方诸省对西班牙人意图的不信任，这些尝试失败了。正如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看到的那样，最根本的是个权力问题。当大公和公主拒绝三级会议就增税提出的抗议，并无视它关于监督政府财政的要求时，这一点就变得极为清楚了。南方的三级会议直到1630年时未曾再度召开过。省的等级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贵族、城市和团体保留着他们许多原有的特权——这足以使他们对大公和公主的统治感到满足，而不愿为了同北方统一去冒一场起义的风险。具有自己的传统和忠心的比利时，已开始崛起了。

在北方，大家如今都很自信而且乐观。经济发展与军事胜利并驾齐驱。阿姆斯特丹开始取代安特卫普的地位而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从南方来的避难者带来了新的工业手艺和商业联系。联省共和国经济意义最大的贸易在欧洲。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是荷兰船只在印度洋的出现。尽管在打仗，西班牙如果不利用荷兰人的商品和船运，就连它在尼德兰的军队的供应也无法提供。这一贸易遭到交战双方的猛烈攻击，但它却是极为有利的。1595年腓力二世下令禁止荷兰船只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港口，并在里斯本没收了一批荷兰船只。但是，早在这一打击临头之前，荷兰人已决定绕过伊比利安半岛的各港口而直接从西印度群岛贩运他们的香料。16世纪末年，一批竞相争抢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建立起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劝它们联合起来。1602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东印度联合公司”开办起来了——在将近200年间，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冒险事业之一。荷兰人如今已在损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况下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他们再次用实力取得了西班牙不允许其忠顺的臣仆取得的东

西，因为比利时仍旧被完全排除于西班牙帝国的贸易之外。政治独立的好处不可能显示得更加明显了。联省共和国如今已进入它的“黄金世纪”。

但是战争还不得不进行到底。英格兰—西班牙条约已使得联省共和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盟邦。西班牙政府也遭到了又一次破产（1607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斯皮诺拉每月所需要的3万杜卡特，已经无法筹集。大公和公主开始进行和谈。经过40年战争岁月以后，困难是巨大的。在北尼德兰，莫里斯和在战争中发了财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们唯恐丧失他们的权势和利润。腓力三世不愿使联省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失望，也不愿承认叛逆者的主权。斯皮诺拉和大公与公主在宫廷里必然会有的那些敌对势力反对议和。荷兰人则要求封闭斯海尔德河并自由出入西印度群岛，这就威胁到了西班牙帝国本身的经济生存线。亨利四世作为调解人而行事，但他对联省共和国的宗主权有他自己的打算。就这样，经过两年艰难的讨价还价，达成了一项妥协。荷兰人达到了他们大多数目标，但只是以12年为期的—项协定（1609—1621年），到它期满以前，欧洲已卷入另一场一代人的战争。

1598年、1604年和1609年的三个条约，标志着腓力二世宏伟计划的失败，那一计划原是要通过在西欧确立西班牙的政治霸权来击败新教。他开始时并未怀有任何那样的抱负。不如说那是一种政策，一种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间从他在一系列比较局部性的问题和时机上所做出的反应中形成的政策。为了它的实现，他牺牲了西印度群岛的金银和他的西班牙臣民的鲜血与财产。当他于1598年9月13日死去时，西班牙政府的债务约达1亿杜卡特。这笔债款的利息大约要耗去全部岁入的1/3。西班牙政府的财政从来未曾完全恢复元气，而在17世纪，因为摇摆于货币的膨胀和紧缩之间，又陷入了新的破产。西班牙经济的根本弱点是无法补救的。^[70]加于平民身上的毁灭性的赋税负担，阻碍了投资和经济增长。军人、教士和文官的社会权势，把居民中最富于进取精神的分子从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吸引了出去。一小批商人和金融家的成功，并不能抵消这一趋势。经济学家兼伦理学家塞洛里戈在1600年写道：“这些王国看来想要变成一个生活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之外的、着了魔的人们的共和国。”由于西班牙人自己不能向他们的殖民地供应它们所需要的而且乐于用优质白银付款的纺织品、武器和其他加工产品，他们就不得不从他们的盟邦、对手甚至敌人那里输入这些

产品。西班牙人虽然热心地捍卫了同他们的殖民帝国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却不能阻止欧洲的其余地区分享它的利益。

腓力二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他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生活下去，把赌注压在波托西银矿的日益增加的产量上，总是期望取得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以为那就能使他的国库和他的臣民得到一个长久的休养生息机会来恢复元气。不过，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他在地中海击败和牵制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攻势。他击退了对意大利的进攻从而使它保存下来，并给了它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在伊比利亚半岛，他继续进行了天主教国王们已经开其端绪的统一事业：在他继承下来的王冠之外，又加上了一顶葡萄牙的王冠：还抑制了阿拉贡的过分的自由权利。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他已为天主教会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的确，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丢掉了，尼德兰的北方七省也是那样，虽然他希望那并不是不可挽回的。但是，他在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看来也要丢掉的时刻拯救了它们。他阻止了异教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传播。或许他还拯救了法兰西，因为难道不是他的干预才迫使亨利四世用一台弥撒去购买巴黎吗？在欧洲各地，他都增强了教会对新教进攻的抵抗力，并帮助它们去夺回已经失去的阵地。处于“黄金世纪”的西班牙，同时在绘画、文学、宗教和伦理思想方面也取得了它的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社会，一个把自己视为正统基督教的道义领袖的社会；一个由于意识到它的国王是欧洲的仲裁者、它的军人从土耳其人和异端者威胁下捍卫了基督教世界、它的水手和传教士为西班牙和基督征服了一些大陆，因而感到自豪的社会。

与尼德兰不同，法兰西维护了它的政治统一，不过只是勉强做到了。胡格诺教徒是失望的，并为他们的领袖改变信仰而吃惊。他们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议论着重开内战：3500个胡格诺绅士仍然能够把25000名战斗人员推到战场上去。亨利四世看到他们的威胁性姿态可能并不感到忧虑，因为那可以使他较为容易地说服天主教徒相信需要达成一项和解。他向双方做出了互相矛盾的许诺，不过他公开地而且经常地确认他对原来的党派负有的义务和他决心不用暴力强迫任何一种宗教。经过反复磋商而制定的南特敕令（1598年4月或5月），是以前那些许诺有限的宗教宽容在敕令形式下的延续。新教徒被赋予信仰自由和可以在他们从前举行礼拜仪式的地方举行礼拜的权利，只是巴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除外。他们还被给予担任任何公职的

权利。在巴黎的法务院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审议厅，在那里，10位天主教审议官和6位新教审议官审理一切涉及新教徒的案件。为了保证这一敕令得到遵守，他们被允许在几百个安全保障地点驻军防守，由王国的国库支付经费。作为这些让步的回报，天主教徒的礼拜仪式被允许可以在新教徒从前阻止它举行的地方去举行。

它是一次未使任何一方满意的妥协。法务院拒绝认可这一敕令。国王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还不得不去进行劝说、诱骗和威胁，直到他们最后同意。他表明他在处理这一危机方面是极为出色的。克莱门特八世大发雷霆，极力反对。他威胁说，他在宽恕亨利时所做的“越过鸿沟的一跃”，还可以跃回去。但是他在为教皇国获取费拉拉方面需要法国的援助，而且像法国的天主教徒一样，他终于很不体面地屈服了。

胡格诺派未能使法国改奉新教。他们由1562年时的2000个会堂减少到不足800个。北部和东部各省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完全丢掉了——那是“同盟”的明显成就之一。不过，在南方，从吉耶讷经朗格多克到多菲内，他们仍然是强大的。那是一个国中之国，而且是存在于那样一个时代，那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宗教宽容，只不过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要；那时几乎人人都确信，一个健全的国家必须是在它的国界以内没有竞争者。从本质上说，南特敕令可以被看作是宗教宽容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于大多数同时代人来说，它只是把两种宗教信仰并存于一个政治实体之内从而把问题暂时搁置了起来。

亨利四世在1598年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法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建。^[71]大多数同时代观察者都一致认为，法国从内战最后阶段的可怕破坏中恢复得惊人得快。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其肥沃的土地，没有被毁掉。艰苦的劳动恢复了已被荒芜的田园，重建了被烧毁的房屋，到1609年时，法国出口了大量的谷物，以致英格兰大使在报告中说，它“夺走了西班牙从西印度群岛弄到那里去的全部白银和黄金”。国王的胡格诺老战友苏利重新组建了王国财政管理机构。它变得比较有效率而且稍许廉正一点儿了，但赋税只比内战期间略有减轻。苏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国赋税制度。人头税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农民的税。贵族不交这项税，而且越来越多的资产者获得了免税权，其途径是当官、购买贵族证书，或干脆通过窃取。苏利设法使大约3000万利弗尔的财政预算中达到了一年100万利弗尔之多的盈余，连

亨利也夸耀他的充盈的国库。但是，国库的储存夺去了这个国家急需的资本，而沉重的税率，如诺曼底等级代表会议所抱怨的那样，使这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承受的沉重负担就像它仍处于战争时期一样。政府用于大肆夸耀的道路、桥梁的重建和用于海军的费用，只是王室的花销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法国农民来说，过上亨利希望于他们的“锅里有鸡”的日子的人家，是寥寥无几的。

亨利那巨大的王室开销实际上也并非全是无聊的挥霍。他不得不花费大量金钱去酬劳贵族，吸引他们到他的宫廷中去，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内战只是法国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一种暂时解决方式。许多人已经在为这一派或那一派效力中花光了他们的财产。物价还在上涨，而又很难调整地租使之跟上物价的上涨。年轻的儿子们难以得到眷顾。在教会里还可以谋取前程，但教会也在内战中丧失了大量财产，而且天主教的舆论如今也开始要求它的教士达到较高的标准，而那是许多半文盲的乡绅难以达到的。他们视为荣耀的暴力和掠夺的嗜好，如今已由于国王维护的和平而无法施展。他们在干犯国王敕令的决斗中找到了某种补偿，那种决斗往往被组织成为街头对阵战，在那些对阵战中，他们每年可互相杀死数以百计的人。

上层贵族，城市和法务院那样的高贵团体，面临的问题甚至更大。亨利是不难抛开三级会议的。在1593年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上，它与其说是为争取一种永久性的政治体制而抗争，毋宁说是为争取实行一项与一个外国联合起来的宗教政策而抗争。因此，亨利的胜利使得三级会议在国内得不到力量或支持去反对他的专制独裁。重建起来的王权并不那么显得是对古老权利的一种压制，而更像是对一个外国的胜利。同时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法学家们阐发的政治思想，那时几乎一致地支持国王专制制度。在尼德兰，反天主教派就必定是反保王派。因此，它的胜利就导致了立宪政府在联省共和国的确立。在法国，两个极端派别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保王派，因而也是立宪派。保王的政略派于是也就成了反立宪派，这一点在“同盟”抨击君主制时特别清楚。因此，政略派的胜利也就是专制制度和神圣王权的胜利。亨利曾对勃艮第省等级代表会议说：“人民可以拥有的最大特权，本应在于享有他们的国王的洪恩。”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瓦卢瓦王朝的最后几代国王，已经由于恩赐和单纯的篡夺而丧失了许多国王权利。亨利四世本人在换

取“同盟”派的贵族和城市的支持时，也不惜牺牲朝廷权利。有一些城市，而且不止是胡格诺派的城市，他的军队不能进入，他的公文只有取得当地市政长官的许可才能在那里生效。各省的总督攫取了王室官员的任命权。亨利的老盟友、朗格多克的蒙莫朗西·当维尔和多菲内的莱迪吉耶尔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他们的省区。恢复国王权威的捷径是没有的。亨利通过经常地施加压力，巧妙地利用个别场合下的有利条件，逐步地把它夺取回来。大领主被严格地排除于他的顾问会议之外。苏利虽然被封为贵族，却是出身于小贵族家庭，而且是个胡格诺教徒，因此在天主教徒中没有拥护者。总之，他很不得人心。亨利的其他一些顾问大臣出身于长袍贵族，就是英格兰大使所说的那种“笔墨绅士”，他们从前是亨利三世或“同盟”的官吏，如今又热衷于为新国王效劳。上层贵族，特别是保王派和政略派贵族，由于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而心怀不满，他们确有某些理由感到，国王对他从前的敌人比对待那些在他改奉天主教时支持过他的朋友更为慷慨。亨利在位时期发生的两次最危险的阴谋，都是以他的老盟友比隆元帅和布荣公爵为首进行的。

朝廷甚至未能完全控制它自己的官吏。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法国那么多的官吏：从最高层的法务院审议官，到司法总管辖区和大法官辖区的官员，直到卑微的行会与市场官员。朝廷按照这些官职的岁入及其赋予为官者的地位来出售这些官职，而且还不断设立新的官职。这些官职的数目估计达5万以上。内战期间，官职的出售和任命变成了贵族庇护方式的一部分，“同盟”的诸侯们巧妙地利用它来争取城市里的支持者。当亨利四世的王位继承权已经肯定下来时，“同盟”任命的官员们为了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就背弃“同盟”而转向国王。这一变动清楚地显示了1593—1595年决定性的政治胜利的原因。1604年，苏利推行官职税，即按官职价格每镑征收4先令的年税，这项赋税的交纳使官职变成了世袭职位。征收这项赋税的最初目的大概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但是它取得了削弱官员们依赖上层贵族任命权的效果，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它后来受到了黎塞留的保护。它还使得有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同这个国家的君主政体和政府联系在一起。正如英格兰大使在1609年所写：国王“……同教士、贵族、绅士和司法官员一起分享从老百姓那里夺来的战利品……至少在和平时期他们可以靠着它称心如意地过下去；不过，一旦时过境迁，那就难免没有危险”。[\[72\]](#)

厌战情绪和亨利的聪明与果断，再加上他那巨大的个人魅力，使得朝廷在许多方面恢复了曾经失去的地位，但是政治形式仍旧是不稳定的。正像许多观察者已经预见到的那样，国王的去世以及一次新的国王冲龄期，使法国君主制的命运再次陷入摇摆不定之中。

亨利四世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因为他需要和平以进行重建工作，还因为他已经达到了直接的目标，即法国国界的恢复。然而，由来已久的敌视依然存在，因为对西欧的支配权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任何一方都经不起公开的战争，双方现在都把其政策的目标指向法国周围的一些小国：萨伏依、瑞士诸州、洛林和莱茵河沿岸的德意志诸侯国。这里有一条战略要道，即著名的西班牙大道；西班牙通过那条大道使它同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的交通联系畅通无阻。当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封锁海峡时，除了在更远的东边有一条通过瓦尔泰利纳的通道，就别无其他通道了，但是那条通道被认为政治上既不安全，地理上也不方便。因此，双方都用尽一切外交手腕，力图夺回或取得西班牙大道的控制权，还时时力图争夺瓦尔泰利纳通道的控制权。只有一次，它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公开交战。当夏尔·埃马纽埃尔未能归还他于1588年占领的萨卢佐时，亨利侵入了萨伏依。西班牙的威胁性姿态，驱使他缔结一项急迫的但也并非不利的和约。他放弃了萨卢佐，换得布雷斯、比热和热克斯这样一些罗讷河以西的讲法语的萨伏依人土地（里昂条约，1601年1月17日）。这意味着法国人至少暂时退出了意大利，并使夏尔·埃马纽埃尔腾出手来去进行他最后一次夺取日内瓦的不成功的尝试（1602年）。但是，西班牙大道现在在一个重要地段上压缩成为萨伏依人领土的一个狭窄咽喉地带，即谢兹里谷地内的蓬德格里辛（Pont de Gresin），变成了萨伏依和西属弗朗什孔泰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法国人随时可以很容易地切断这一环节。[\[73\]](#)

西班牙同英格兰的和约以及同联省共和国的休战协定并未缓和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围绕着尤里尔、贝格和克莱沃等公国的继承权而引起一场争端，并涉及皇帝和新教联盟时，亨利四世决定进行干涉，以阻止哈布斯堡势力向莱茵河下游延伸。外交形势是不利的。英格兰和联省共和国不愿同西班牙决裂。德意志新教诸侯并不热情对待法国在德意志的干涉。夏尔·埃马纽埃尔由于眼盯着米兰，怂恿亨利干下去，但是他过去的经历不能使人们相信他的实力和可靠

性。不过亨利看来已决心摊牌。他征课了新的而且极不得人心的捐税，军队已处于战备状态。他对布鲁塞尔和马德里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他同大公和公主有一桩私怨。他曾追求年轻的孔代亲王的漂亮的妻子。孔代带着他那不太情愿的夫人逃到了布鲁塞尔。大公和公主使他们的体面得到保证，并拒绝把他们送回法国。亨利的无忧无虑的恋爱又一次引起一场严重的政治转折。孔代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唤起了广大胡格诺派的回忆；除了亨利与玛丽·德·美第奇所生的孩子以外，他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而要抨击那些孩子的合法地位，总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即使那样，战争也还不能肯定就要爆发。已经不是第一次，亨利利用他的恋爱来掩盖更微妙的政治企图。他的真正意图仍然是一个谜。他正要离开巴黎去集合他的军队时，拉瓦亚克的匕首把他刺中了（1610年5月14日）。像刺杀亨利三世的凶手一样，拉瓦亚克深信自己是在完成一桩虔敬宗教的功业。亨利的长子路易十三世还不满九岁。他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的摄政政府立即同马德里达成了协议。

亨利四世的死亡推迟但未能阻止新的欧洲战争的爆发。卡托—康布雷奇条约签订以后的50年间，许多问题已得到解决。法国仍旧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英格兰维护了它的独立和具有自己印记的新教。北尼德兰赢得了自己的独立，至少已暂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16世纪中期巨大的政治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西欧各国的内部结构方面，还是它们的相互关系方面，都是如此。在下一个50年里，它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庞卓恒 译）

[1] 关于和约条款，参见本书第2卷第249、358页。

[2] 参阅前面第155—156、160—161页。

[3] 苏格兰女王玛丽也是那样，但是苏格兰王室权威在她的母亲吉斯的玛丽摄政期间已大受损害。

[4] 参阅第2卷，第331页及以下各页。

[5] 参阅第2卷，第302页。

[6] 参阅第2卷，第332页及以下各页。

[7] 参阅后面第303页。

- [8] 参阅第2卷，第309页。
- [9] 特别是席勒，还有威尔地的歌剧脚本作家J. 米利（J. Méry）和C. 迪·洛克尔（C. du Locle）。
- [10] 参阅后面第310页。
- [11] 参阅第2卷，第319页。
- [12] 参阅第2卷，第310页。
- [13] 参阅后面第244—247、249—251页。
- [14] 参阅后面第252页。
- [15] 参阅后面第276页。
- [16] 参阅第2卷第314页。
- [17] 康姆尼洛斯起义，即爆发于1520—1522年的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译者注
- [18] “全部的审判权要集于您一身。”
- [19] 还可参阅前面第61—62页。
- [20] 马拉娄人（Marranos），特指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境内被迫改奉基督教而仍然暗自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译者注
- [21] 关于摩里斯科人第二次起义原因的这一段论述，主要根据K. 加拉德（K. Carrad）著《第二次织毯匠起义（1568—1571年）的原因》。加拉德教授让我看了他的打印稿，并同意在此处加以引用，为此，我应向他表示谢意。
- [22] 参阅第2卷，第608页及以下各页。
- [23] I. 德·弗朗基·科内斯塔基奥：《葡萄牙王国并入卡斯蒂利亚王权的经过》（布朗特译，伦敦，1600年），第55页。
- [24] 参阅第2卷，第323页。
- [25] 参阅后面第276—278页。
- [26] 参阅后面第289页。
- [27] 参阅后面第271页。
- [28] 参阅后面第353—354页。
- [29] 19世纪以前的意大利银币。——译者注
- [30] H. G. 凯尼格斯贝格：《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政府》（伦敦，1951年）。
- [31] 参阅第2卷，第327页。

- [32] 参阅第2卷，第329页。
- [33] 参阅第2卷，第328页及以下各页。
- [34] 参阅前面第62页。
- [35] 参阅前面第62页。
- [36] 训谕名，当时常以训谕中的第一句话为该训谕命名。——译者注
- [37] 参阅后面第305页。
- [38] 参阅H. G. 凯尼格斯贝格《是衰落还是转移？》，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第5辑，第10页（1960年）。
- [39] 里亚尔托（Rialto），威尼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 [40] 参阅后面第366页。
- [41] 参阅后面第352—354页。
- [42] 参阅后面第303—304页。
- [43] 威尼斯共和国的别称，因圣马可教堂坐落于此而得名。——译者注
- [44] 参阅第2卷，第304页及以下各页，第318页及以下各页。
- [45] 参阅第2卷，第318页。
- [46] 参阅后面第281—283页并参阅第100—102页。
- [47] 参阅第2卷，第185、332、357诸页。
- [48] 瓦隆族居住在比利时，操一种法语方言。——译者注
- [49] 参阅后面第283—284页。
- [50] 参阅后面第286页。
- [51] 参阅第2卷，第318页。
- [52] 参阅后面第282页。
- [53] 参阅第2卷，第319页。
- [54] J. 克拉伊贝克斯（Craeybeckx）：《佛兰德省及其16世纪的地方财政》，载《根特近代史和考古学会议记录》（1950年），还可参阅《阿尔发的什一钱税是一个秘密吗？》，载《乌得勒支历史学会稿件与文告》资料76（D1.76）（1962年）。
- [55] 我对荷兰和泽兰革命的阐释，大体上采纳了P. 盖尔《尼德兰起义》（伦敦，1932年版）一书和H. A. 恩诺·范·格尔德关于那一时期的许多论著的观点。
- [56] 这里使用的这个术语，参阅第2卷，第320页及以下各页。

[57] 参阅后面第292页。

[58] 我要感谢E. 科斯曼教授和科斯曼女士，他们提示我注意到了这一重要问题。

[59] 参阅第2卷，第316页。

[60] 参阅第2卷，第357、249页。

[61] 参阅第2卷，第307页。

[62] 参阅前面第220—221页。

[63] 最新近的估计，见于P. 埃尔朗热《圣巴托罗缪节的屠杀》（巴黎，1960年）；奥布赖恩的英译本《圣巴托罗缪之夜》（伦敦，1962年）。

[64] H. A. 恩诺·范·格尔德：《尼德兰起义和法国宗教战争》，载《乌得勒支历史学会全会文集》（1930年），第29页。

[65] 参阅前面第25页的图表。

[66] H. 拉佩尔：《西蒙、鲁伊斯和腓力二世的“供给契约”》（1953年），第14页以后，第103页以后。

[67] E. 埃雷拉·奥里亚（Herrera Oria）：《腓力二世与“英格兰冒险事业”期间的圣克鲁斯侯爵》（1946年），第87页。

[68] C. 桑舍斯·阿尔博诺斯（C. Sanchez-Albornoz）：《西班牙历史之谜》第2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年），第346页。

[69] 关于腓力三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的内政史，参见第4卷第14章。

[70] 参阅第2卷，第320页及以下各页。

[71] 参阅E. 拉维斯《法国史》第6卷，第2页（1905年）中所引的J. H. 马里埃热的话。

[72] G. 卡鲁：《谈谈法兰西的国家》，载于T. 伯奇《英格兰、法兰西和布鲁塞尔各宫廷之间的谈判的历史述评》（1749年），第462页。

[73] 我要感谢杰弗里·帕克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本节包含的许多材料，还促使我注意到有关西班牙大道的详尽文献。

第十章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帝国

[1]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标志了德意志事业的短暂停顿，结果是查理五世皇帝既不能在帝国境内建立有效的君主制度，又不能镇压路德宗异端。由于不愿成为双重失败记录的当事人，查理把为履行和约颁布法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兄弟斐迪南——一个君主世家的开创者，其统治权力将要在德国的东部边陲持续大约三个半世纪。斐迪南的权力的基础乃是他的兄长让与他及其后裔的土地：历来属于奥地利大公领地的“恩斯河流域上下”两部分，从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伸展到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的阿尔卑斯诸省以及古代哈布斯堡家族在士瓦本和沿上莱茵的一些分散的残存地产。除此以外，由于同亚盖沃家族的嗣女结婚，斐迪南获得了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连同其属地提出王位要求的权利。这一要求经过以后这两个王国里议会的选举表决而加强了力量，尽管在波希米亚有些人反对，在匈牙利则有很多人反对。这样一来，由他直接宣称拥有统治权的领地，就令人瞩目地扩展到了中欧的大片地区：从阿尔萨斯到喀尔巴阡山，从西里西亚和北德意志平原的卢萨蒂亚，向南到亚得里亚海。1558年他正式当选为皇帝，继承了他兄长的王位。因此，不仅额外地获得了对德国其余地区，也获得了对意大利北部、现在的法国东部和尼德兰部分地区的不可争议的统治权。不幸的是，斐迪南可以指望行使的真正权力比他的庄严地位可能提供的要少得多。我们将会看到，帝国的组成结构是多么支离破碎。他那些次要的属地——匈牙利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特兰西瓦尼亚王公的手里，就是掌握在土耳其人的手里，后者从1541年起就占领了首府布达和该王国的中部。波希米亚及其相邻省区成了强悍有力而且难以驾驭的贵族们活动的场地。甚至在自己固有的世袭领地上，各个等级也不那么顺从。最严重的是，教会的衰败和异端的渗入，到处使现存的问题复杂化。这些就是斐迪南、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1564—1576年）和他的孙子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所面临的总形势。

历史学家们对这三位君主的评论是苛刻的，然而，在那些把权力建立在变化不定的遗产上的统治者中间，斐迪南和马克西米连至少表现得比多数人好。这些统治者没有谁成为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不过，斐迪南是一个机敏灵活、在某种程度上颇有吸引力而且比他兄长稳重的人。而马克西米连则快活热情、禀赋聪明、具有独立思考的气质，而且深谙如何妥协、善于结交，并避免了宗教偏见的极端倾向。这个家族对艺术的敏感尤以马克西米连和鲁道夫为甚，但是后者表明，对于加诸于他的那些令人生畏的要求，他的不堪胜任是灾难性的。他在维也纳接受了等级会议的效忠以后，退居到布拉格的赫拉德琛。在漫长的当政时期，他越来越不愿离开这个僻静的山顶宫殿。他在与各式各样的学者、空谈家，从开普勒、第谷·布拉赫、约翰·迪伊到最臭名昭著的江湖骗子的交往中，在搜集古董和艺术品中寻求乐趣。他对天主教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使他失去了他的顺应潮流的父亲得自新教徒的许多尊敬。但他的行动变得越来越迟疑，他对科隆战争——他在位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德意志危机——的干预，拖延得如此之久，以至于毫无效果。1594年后他不再出席帝国议会。1598年底以后，他的精神恍惚不定。从1600年以后他依靠卑微的臣仆同外界保持联系。他被长期以来不断发作的忧郁症所折磨，在这期间停止履行公务；不仅他的大臣们无法接近他，甚至外国使节们也发现很难受到接见。由于病势日重，他越来越少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迫切性乃至现实性；越来越被怀疑和迷信所压倒，顶多不过任性地干预一下政务。政府停止了运转。这个王族的其他成员终于被迫采取一致行动废黜了他。就这样，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所体现出来的皇帝对德国事务的亲自关心，在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冷淡下来了。在他任皇帝时，帝国逐渐变成了只不过具有一个行政机构的幻影。

哈布斯堡家族每一代政治上的衰弱由于家族地产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加深了。查理五世传给弟弟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那些省份。整个勃艮第的遗产，虽然大部分在帝国版图内，却转归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腓力，还把米兰公爵领地（同样是皇帝的一个采邑）也传给了他。查理好像确实考虑过某些安排，以便把皇帝的头衔在斐迪南死后传给腓力。这样一来，这个头衔便可由家族的两个分支轮流继承，不过幸而没有试图完成这一计划。尼德兰曾是查理五世的财政支柱，其收益的丧失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深切感到衰弱的根源之一。斐迪南曾经继续进行其祖父马克西米

连开始的努力，在世袭领地中把政权集中于政府，甚至计划把它们建成一个单一的王国。可是他逐渐连这个不确定的通往宪政统一的方法也放弃了，并通过遗嘱在三个儿子中间分割了他的地产。二儿子斐迪南大公，于1564年分得了德意志西南部领地以及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这两个阿尔卑斯省份，前者拥有通往意大利之路的战略地位、宝贵的铜矿和银矿。三儿子查理大公分得了阿尔卑斯的其他省份：施蒂里亚、长林西亚和卡尼奥拉。大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对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帝国皇位的继承在斐迪南生前已作好安排，但除此之外，他仅仅继承了奥地利大公在多瑙河流域的领地。因此，他没有足够的财源以维持皇帝的尊贵排场和保护基督教世界的东翼不受土耳其人的侵犯。马克西米连二世又有六个儿子，但到这个时候，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被轻率地分割的做法停止了。他的大儿子鲁道夫二世，继承了他所有的领地，并于1578年用金钱成功地赎取了他五个兄弟对土地的要求。

毫无疑问，为了补偿由于分割哈布斯堡领地带来的损失，每一代人都存在着家族团结的强烈感情。它把马克西米连二世和他的兄弟们、斐迪南大公和查理大公联系在一起，正如它曾把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斐迪南一世结合在一起一样。存在着一些私下的家庭协议，并且时常以内部通婚来重新维系每一代堂（表）兄弟姐妹的关系，并显示王朝联系的力量。例如，马克西米连二世娶了他伯父查理五世的女儿，随后他又成了他的堂兄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岳父，从而成了腓力三世的外祖父；腓力三世也娶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位公主为妻。西班牙支系由于断断续续出现的没有男性继承人这一威胁而处于不利地位。在1568年唐·卡洛斯去世和1578年未来的腓力三诞生之间这10年中，马克西米连成了西班牙和勃艮第领地的推定继承人。这种前景使他有理由在对自己领地内的异端表示有限的同情时犹豫不决。甚至当唐·卡洛斯还在世时，这一前景就驱使他包括他的继承人鲁道夫在内的两个儿子送到西班牙去完成他们的学业。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哈布斯堡家族近亲结婚与协商的密切方式，重要的是联姻的不断更新有助于在每一代人中重新建立家族的团结。从查理五世起，这种团结一直指导着每个王子的行动。

但是，要阻挡住土耳其人不断的威胁，仅靠家族团结是不够的。土耳其人业已在匈牙利中部牢牢站稳脚跟。这个时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由于处在保卫基督教世界东翼反对异教徒的地位而处境严重不

利。正式的战争在1562年已由斐迪南一世结束，但所订和约却把他的战利品留给了敌人；并且皇帝不得不每年支付一笔屈辱的贡金。和平未能持久，1556年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王子的阴谋诡计，导致了苏莱曼一世亲率大军出现在匈牙利，对奥地利的入侵似乎迫在眉睫。这次行动由于年迈的苏丹去世而作罢，1568年签订的另一个协定重申了六年前已达成的条约。从1593年到1606年又进行了13年全面的战争。1606年，苏丹和皇帝在齐特瓦托罗克签订了一项重要条约。^[2]皇帝支付了赔款（名义上称“礼物”），以有利于土耳其的方式调整了边界，但停止缴纳年贡。以后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正式冲突。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前沿地区，正式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总是非常模糊。苏丹的权威从来不足以制止他的地方指挥官劫掠勒索，认为一次大规模入侵实际上不在酝酿中的看法是很不可靠的。16世纪后期在匈牙利西部和克罗地亚曾有一个荒凉的乡村开阔地带，在这个地区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冲突。在基督教一方搜集到的叙述当地的英雄行为和勇士业绩的民间故事和史诗中记载了这些冲突。在前线的后面，故事就显得消沉了，描写的是从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农民中征集士兵；对已被榨干血汗的人民征集税金；以及残暴的雇佣军很少顾及与之相处的乡亲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在更高的阶层中，则是捉襟见肘的皇帝，他或者没完没了地向奥地利的各个等级以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议会索要金钱，或者向他的那些统治阿尔卑斯各省的叔伯们、兄弟们寻求帮助。除此以外，他甘冒加剧德国政治紧张局势的风险，召集德意志帝国国会要求津贴，以资助防务。在更深刻的背景上，形成了从波兰到波斯的一张外交网和一条把他和他那无比富有的西班牙堂兄弟连接在一起的金色链条。

把土耳其人对斐迪南一世和他的两个继承人的不断威胁说得很严重是不会言过其实的。在评价他们的德意志国内政策时，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第二个严重的弱点在于他们声称要用家族的纽带去治理的那些领地的分散性和离心力。遗产分割已经阐述过了，在这里必须进一步讨论他们在宗教方面时常不得不采取的权宜政策。的确，他们如何对待自己领地上的新教臣民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衡量他们的虚弱程度的可靠的尺度。匈牙利也许是个例外。它无疑是帝国范围之外的一个独立王国，只有它的西陲处在哈布斯堡权限之内，但就在这里也很难阻止先是路德宗、然后是加尔文宗甚至反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传播。1606年，鲁道夫二世最终不得不默许（虽然十分

勉强)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在他的第三个属国中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3]但波希米亚仍然很难约束。它同样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关于它是否处于帝国之内，法学家们一直争论到18世纪。在15世纪，它曾是异端的发源地，而下一个时期内异端教义很快就在这里扎下了根。16世纪下半叶，路德宗在波希米亚取得了支配地位，但也有各种形式的饼酒同领派、波希米亚兄弟会和加尔文宗。当时，正统的天主教徒减少到成为瓦解中的少数，而耶稣会的宣传进展也很慢。曾经选举斐迪南一世做他们统治者的桀骜不驯的捷克地主们亦不害怕接受一位具有专制思想的外国人登上王位，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有充分把握。哈布斯堡国王们对他们的钱包的依赖（这些钱包只有在布拉格召开议会时才打开）确保了他们的自由。的确，使布拉格寡头统治者保持忠顺的需要，不仅时常影响斐迪南一世的大政方针，也时常影响马克西米连二世。

在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各省，哈布斯堡王朝的活动范围比较自由。虽然从16世纪20年代起路德宗的观点在这里很容易被接受，但这里毕竟不是新教教义的发源地。教会的抵抗力十分薄弱。教会财产被课以重税以支付抵抗土耳其人的费用，亦时常成为贵族劫掠的目标。教区内的教士们经常被拖欠薪金而且他们愚昧无知，修道院的房屋破烂不堪，那些对其教士的困境至少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的主教们常常是一些远方的高级教士，他们对其辽阔的主教管区所知甚少。教会在多瑙河大公领地内的明显的弊端主要出现在帕绍主教和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区内，他俩都是帝国的权贵，统治着位于边界以外的他们自己的公国。甚至在16世纪的后期，他们也并不总是十分热心，由于他们的地位如同外国人一样，结果使奥地利的宗教权威人士和世俗权贵之间总是很容易产生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摩擦。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是由贵族们引进的，只有蒂罗尔除外，这里的农民受影响最大。改革的进程表现在以下方面：经常被召开以投票解决土耳其战争的经费问题的等级代表会议要求自由地宣讲《圣经》；容许路德宗牧师在地主们的城堡里举行新的礼拜式并教育他们的子女；最后，给农村的生灵们派去在教义上持怀疑态度或彻头彻尾的异端牧师。到16世纪的第三个25年，在所有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里，特别是奥地利上恩斯河地区，许多农村都已背离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历史上著名的奥地利家族，如斯塔勒姆贝格、温迪施格雷茨、特劳特曼斯多夫，现在多半是新教徒了。只有在居民的政治势力比地主小得多的城镇里，

政府才能阻碍——虽然无法制止——路德宗思想的发展。还有可能根除再洗礼派运动和更为狂热的异端的最初的萌芽，因为奥地利贵族不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那样，对它们不予支持。

面对异端的这一攻势，斐迪南一世行事谨慎。他自己的信仰没有发生动摇，这无疑要部分归功于他所受的西班牙教育。但是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使他甚至在镇压贵族中的异端分子时，也无法从保卫东部边界的任务中分出兵力。他采取措施去阻止教会生活的进一步腐化，除此以外他只能寄希望于路德宗异端像它的先驱者们那样，在适当的时候自行衰落并灭亡。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十分明智的。他感到及时的让步会加速路德宗衰亡的过程，因此他在特伦托宗教会议上的代表坚决主张教会改革，主张给予教士结婚的权利并允许俗人在圣餐中饼酒同领。至于马克西米连二世的观点就不那么简单了，他的头脑对于新思想并不那么排斥。路德宗信徒在他的随从中占据了一些有影响的地位，不过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则被他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他不愿意像他的堂兄腓力二世疏远尼德兰贵族那样疏远自己的贵族。他接受了宗教分裂这一事实，虽然并不宽宥过激派分子，但仍不偏不倚地鼓励复兴天主教教会生活并建立官方的奥地利路德教会。他在这方面走得那么远，甚至从北德意志招来了两名路德宗的神学家来组建官方的奥地利教会并为它制定礼拜的仪式。1568年他在原则上允许奥地利贵族在一定限度内信奉奥格斯堡信纲，1571年又承认他们有权不仅在其城堡里，而且在他们的领地上举行新的礼拜仪式。这是一点有限的自由，但这一让步却足以激怒天主教徒。直到鲁道夫二世继位之后，才停止执行允许对路德宗宽容的政策，并且逐渐变得对他们的宗教活动限制越来越严。同时，查理大公在1578年被迫对他的路德宗贵族和市民让步。在1596年他的儿子斐迪南成年之前，他一直无法有效地着手铲除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的异端。斐迪南大公在蒂罗尔的任务十分轻松，因为他所面对的反抗显然要软弱一些。到16世纪末，由于大多数人的皈依和对少数倔强分子的驱逐，异端就这样处于被挤出阿尔卑斯领地的过程中，只有在少数遥远的山区，农民得以安静地坚守其新教信仰。

虽然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许除马克西米连二世以外）全是教会的忠诚的儿子，但是天主教在他们家族领地内最终取胜只能在一般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支持。无论斐迪南一世还是马克西米连二世，除了

限制路德宗的发展以外，并未打算直截了当地做更多的事，而鲁道夫二世在他遥远的布拉格的宫廷里所能做的也只是解除新教徒在朝廷中和执政部门里的官职，施行限制路德宗礼拜仪式的法律，并对复兴天主教的领导人扩大他的圣职授予权。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内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进展，跟德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运动。其开端为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传教活动和教育工作。最高指令来自罗马，1552年在这里建立了培训教士的日耳曼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革新的罗马教廷想要更多地重视德国事务，从格列高利十三世起，教皇在德意志设置了四个使节，每个地区一个。他们的职责除了在天主教诸侯的宫廷中代表教皇以外，还包括监督地方教会组织、监视主教和其他职务的选举以及全面嘉奖虔诚者。为了在罗马建立一个对所有这些活动统一指挥的机构，1573年设置了德意志信徒会议。在德国本地，天主教复兴的最富有创造力的中心是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它当时处于耶稣会的影响之下；尽管斐迪南一世早在1541年就曾邀请耶稣会士到维也纳来，但他们定居在那里不如因戈尔施塔特学院那样有影响。一代新的信徒和受到教育的天主教徒逐渐形成，从他们中间，在适当时候可以选拔很多热心的教士和主教从而着手按特伦托会议上神父们的精神恢复教区生活。到16世纪的最后25年，天主教的复兴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对异端进行最后的打击。分析运动的内在的原动力，是一项常被历史学家遗忘的任务，他们只能指出像彼得·迦尼修这类耶稣会圣僧的勤勉生活，或者记录学校和大学的开设以及虔诚活动的恢复等。

天主教复兴运动在奥地利的领导人是梅尔希奥·克勒斯尔，一个维也纳新教徒面包师的儿子，他在青年时期被一个耶稣会士改变了信仰，随后升任大学校长、主教，最后当了枢机主教。他的最有影响的职务是从1580年起在哈布斯堡领地内担任的帕绍主教区的代理主教，直到1602年他当上维也纳的主教。晚年，他被卷入上层的政治活动中，在17世纪初政府和哈布斯堡家族事务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十分可喜的。但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到16世纪末，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小城镇明确地恢复了天主教。然而，在乡村地区，天主教的攻势和宣传起初毫无进展。再加上1593年土耳其战争重新开始而带来的财政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促成了第二年的农民暴乱。这次血腥的暴乱（1594—1597年）把包括路德宗信徒在内的地主们推入了政府的怀抱。指挥将暴乱镇压下去的戈特哈尔德·冯·斯塔勒姆贝格本人就是

一个新教徒。他的胜利反而为天主教重占农村开辟了道路；因此，到17世纪初，这位贵族跟他城堡中的路德宗小教堂成了异端攻势唯一值得注意的残余，而这种攻势曾一度几乎席卷了奥地利；由于农民与他疏远了，而政府的政策又越来越严厉，他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必须有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异端贵族们最终就范。但是到1600年，路德宗在阿尔卑斯领地中几乎快被消灭了，而且甚至在奥地利，它也被天主教的复兴所紧密包围。由于宗教上的这些变化，一个曾经把各地反对大议会的三个等级联合起来的危险的纽带消失了。这样一来，哈布斯堡家族由于他们领地内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而获益匪浅。不过，他们一直缺乏力量和人才去充分利用那样形成的有利形势，甚至完全不能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坚持一项政策。

帝国的称号体现了一个很古老的观念，直到16世纪末它们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某些权威。但是，帝国的诸侯们以皇帝的封臣的名义曾经一致决定，绝不容许德意志按照英国或法国的模式发展成为一个可能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自治权的统一国家。然而，也存在着一个确实的帝国宪法的框架，它的组成部分是有活力的；在16世纪，从马克西米连一世直到马克西米连二世，人们曾多方努力试图找到一个一致的基础，以便使构成帝国宪法的各部分更具功效。虽然这些努力成效甚微，但在16世纪最初的25年里，或在1555年宗教和约缔结以后，奇妙的帝国制度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了一定作用。从前那种世界主义的隔离物大部分被悄悄地抛弃了，帝国的结构与德国统治阶级的需求吻合得更加密切了。当时，在官方文件中，帝国已被一致称作“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预示这个新国家地位的是斐迪南一世和他的继承者们既不在罗马加冕，也不由教皇加冕，只是在法兰克福由美因茨大主教加冕，简单地称作“德意志国王”，然后再进一步取得法律上容许的称号“当选的罗马皇帝”。从前，他们的权威得到认可的领域超过了使用德语的地区。对北意大利古老的宗主权至多不过是外交辞令，洛林的公爵们从1542年起已经转向法兰西，而不是转向东方，由于波希米亚的地位实际上等于一个外国，所以几乎没有斯拉夫人生活在帝国范围内。另一方面，尽管公认没有实效，马克西米连二世仍关注着使非德意志的边沿地区归回到他统治下的问题——不管1552年以后法国人已占领了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也不管从1558年起利沃尼亚成了敌对的邻居们争夺的猎物。

皇帝的职位由选举产生，不过事实上，在16、17世纪里，人们同意皇位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内代代相传。为了能够顺利地继承，形成了一个惯例，每个皇帝在生前就确立其长子当选并加冕为“罗马人国王”。虽然法学家们把罗马皇帝的广泛的权力归于他，但是他的职位实际上有各式各样的约束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查理五世起，所有的皇帝在他的正式当选前都必须签署一个自由特许状（Wahlkapitulation）；这些文件一次比一次更为详尽，从而事实上把皇帝变成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君主，只能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或至少在选帝侯们同意的条件下行使权力。选帝侯包括三个僧人：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大主教；以及四个俗人：莱茵的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萨克森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他们拥有的特权有可能把他们与帝国境内其他的诸侯们截然分开，不过这些诸侯们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基本的平等地位。这个诸侯等级为数约80人，50个僧人，30个俗人。其次是帝国的中等贵族，大概有150人，其中有些人，例如奥尔登堡伯爵或者东弗里斯兰伯爵，不亚于大多数诸侯的统治者。在他们之下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帝国骑士，人数大概有2000人，或更多一些。他们每人都直接占有属于皇帝的领地，虽然那也许不过是一座山麓有几间农舍的山顶堡垒。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同应该效忠于这个或那个帝国诸侯的大贵族们相比，权势较小而且钱财较少。最后，帝国还有66个自由城市，这些规模不等的小城市共和国有的是像吕贝克或纽伦堡那样巨大的经济中心，有的仅仅是在黑森林地区的筑垒乡村。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城市对帝国都是完全自由的，许多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独立地位，而一些最为著名的城市则坐落在这个或那个诸侯的领地之内。

各个等级根据宪法规定的地位主要通过帝国的国会，即德意志帝国议会来体现。议会在德国历史上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因为主要由于土耳其的威胁，皇帝时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召开议会以求筹得金钱。这样，它就成了各个等级发泄愤懑的场所，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议会还是讨论德国普遍利益问题的场所。它在某个自由城市开会，通常在雷根斯堡，并在三个院举行。第一院仅由六个选帝侯组成（波希米亚国王只在选举新皇帝时出席），他们孤高地傲然而坐。第二院里是帝国的其他诸侯，每人有一票表决权；那个时代有一种倾向，即当某个诸侯家族的领地被分割时拒绝再额外增加选票，不过它未曾严格地实行过。中等贵族的三个代表也获准在这个院里占有

议席，帝国的骑士们在帝国的议会里没有任何发言权。第三院包括51个自由城市的代表；不过，对于它在立法问题上赞成权或反对权是否合法的问题仍有争议。对帝国具有约束力的法令经美因茨大主教促使前两院同意其措辞时，这些法令便是制定了；经皇帝批准以后，这些法令便从皇帝和三个等级之间的协定的形式予以颁布。然而，还有一种颁布法令的古老形式被保存下来了，根据这种方法，法令就像皇帝的敕令那样简单地予以公布——这类敕令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限制教会保留权利的法规，它曾构成了宗教和平的一部分。^[4]帝国议会还有权批准皇帝收税。通过投票决定的税收以其特殊的名称“罗马月”著称于世，因为它最初被用来支付皇帝到罗马举行加冕礼的旅行费用。现在，它有助于维持帝国军队，不使土耳其人逼近。

在1555年以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帝国议会一直维持着富有成效的立法活动。它能反映出一种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经济政策，在其极盛时期，它是创立德国政策的场所。派遣代理人的习惯虽有所发展，但尚未变得如此普遍，以致使会议无法为私人的接触和非正式的讨论提供机会。它能够把复杂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委托给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作委员会（Deputationstag），这个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开会，并能采用比全体会议更有条理的方式进行商议。不幸的是，帝国议会的会议在弥合敌对的宗教信仰之间的鸿沟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新教徒在马克西米连二世统治期间富有首创精神，但是1576年的帝国议会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党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一旦在公开声明的路线上形成明显的分裂时，显然第二院里的天主教徒可以指望获得多数票，而在第一院里，萨克森选帝侯和经常追随他的勃兰登堡同僚的态度通常较为缓和，并赞成皇帝支持的任何政策。这样一来，较为好斗的新教徒最终被引向反对多数裁定原则从而破坏会议工作的地步。帝国议会召开时的正式议程主要是给予皇帝金钱、为皇帝反对土耳其的防务拨款；可是，会议一旦召开，诸侯们立刻便对执行关系到宗教和约的安排而争执起来。在16世纪最后若干年，每次会议的争执都比上次尖锐，建设性的立法实际上已不可能。在1594年的帝国议会上，天主教徒的观点经投票得以通过，而皇帝也得到了补助金。三年以后，在另一次帝国议会上，选帝侯巴拉丁伯爵和他的盟友们——“一致的诸侯们”拒绝承担由多数代表投票通过的支付一笔补助金的责任。无论这件事的正当理由是什么——政治观点并非无关紧要——它无异于在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上否定了帝国议会的权威，而历史学家们通常

认为它是通向战争的里程碑。不过，它并没有破坏帝国议会以后各次会议的职能。

帝国不但有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立法院，而且拥有法院。公认的帝国法院是德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它是15世纪后期改革运动的产物，其最后形式确定于1555年。它只是一个意义有限的德意志上诉法院，因为它仍是为帝国的贵族和自由城市服务的；帝国的臣民们的问题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当据认为本地不能为他们主持公道时才会由它审理。尽管如此，它在维持罗马法原则的一致性和牢固性上对德国法律程序仍有一些影响。它是德国三个等级的而不是皇帝一人的创造物。皇帝只任命院长，并在另外24名法官中任命4名法官。它设在中莱茵的施派尔，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有一定距离。直到1588年，它的诉讼每年都由德意志帝国议会任命的受理上诉委员会（Visitationskommission）加以复审。德国最高法院的缺点时常是明显的，而且缺点在不断增多。法官们的薪金理论上由三个等级缴纳的税款支付，事实上从未完全付足过。因此，法官们的总数通常少于编制，其中有经验、能力强的法官常常会被别处薪金更高、更有保障的职位所吸引。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很多，而案件却往往一拖再拖。例如，富耳达男修道院院长对符茨堡主教的著名的起诉被搁置达25年之久，到1602年才做出裁决。^[5]因此，皇帝试图用既更有效率又听他指挥的法院来代替这个像蜗牛一样的机构就毫不足怪了。这一目标由斐迪南一世在1559年实现，当时他把自己的宫廷会议变成帝国法院——德国枢密院；这个机构无疑效率较高，但因它完全附属于皇帝而不受信任。它与德国最高法院同时行使裁判权。它的受理范围从16世纪80年代起显然地扩大了。

既然帝国不仅有一位皇帝，而且多少有些立法机构和法院，也许有人会问，能够指靠什么样的行政和军事机构去实施法令或合法的裁判呢？回答只能是：没有一个能指靠得上。马克西米连一世在位期间的宪法改革的确从法律上认可了一批地方治安组织的机构，它们被称作“连环”（Circle），按照帝国以自助维持治安的模式组织起来；但是“连环”只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莱茵兰有效地起过作用，这些地方的小封建领主们能够合作而不必担心一个强大的邻居利用“连环”作为统治他们的工具。1555年精心制定的安全法令（Executionsordnung）的一个目的在于发动“连环”和帝国的各种组

织机构来对付破坏治安者，但是贯彻这一法令则是一件很缓慢很困难的事。近代国家的一整套行政和强制机构，在英、法两国早已有治安官和法官与之相联系，而在德国，这种机构根本不是与帝国的古老而不健全的制度相联系，而是与名义上属于它的领地相联系，特别是与那些被强有力的、有进取心的家族统治的地区相联系。然而，帝国的体制结构仍然很重要。无疑，有朝一日某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找到办法取消各等级的自由，从而在德国建立统一的君主政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当时，现存法律和惯例只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其中诸侯、骑士和城市互相争夺，各行其是。在皇帝与各个等级之间，大小诸侯之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甚至在法律和混乱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均衡，在标志着查理五世统治末期的那场内讧之后，没有人愿意再冒风险去打破这种均衡。正如帝国体制所允许的那样，这场游戏的规则有时可能被忽视，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公开否认，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些规则说些动听的话，它们的存在毕竟比弱肉强食的原则提供了更多的安全。

16世纪晚期，在帝国的边界以内，有几个欧洲重要的公国常常被那些也许产生于新教或天主教的宗教复兴的人们所统治着，这些人比他们的祖先更为率直、更为勤勉，他们不常以武力谋求权力，而是靠建立一种政府机构以使他们可对其臣民的生活加以全面的控制。因此，热衷于研究德国近代行政方法起源的历史学家必须转而注意内部的发展。例如，奥地利大公领地、巴伐利亚公爵领地、或者萨克森和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内部的发展，而无须注意帝国的体制。比较大的诸侯们事实上是在向充分的自治发展。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且由于禁诉特权（*Privilegium de non appellando*）保护他们免被其臣民在帝国法庭对他们提起诉讼。他们豢养着自己的军队（常备军尚未出现）。现在，他们在精心建立自己内部的行政体系了。1555年的宗教和约除了使他们的权力合法化以外，还使他们的臣民按照他们的指示尊奉路德宗或天主教。

尽管这些主要公国的行政程序很难概述，但某些共同的特征还是值得一提的。维护诸侯权威的最基本的武器在各地都是他们的议事会。在15世纪末以前，在最先进的公国里，议事会已经由律师和职业人员而不是由贵族来充任其工作人员了。因而在16世纪，诸侯们的议事会已发展成为行政官员组成的政府部门，他们精通最近采纳的民法

原则，用它来判决法律案件并随时准备修改它来保护诸侯的权利以反对土地所有者、城市和教会。在很多公国里，由两三个心腹顾问组成的处理最高事务的核心集团已经逐渐形成。萨克森在1574年，巴伐利亚在1582年，勃兰登堡在1604年，都正式出现了这种“枢密院顾问官”。议事会还紧紧控制着教会。在信奉路德宗的州里，诸侯的最高权威毋庸置疑；即使在天主教的领地内，从巴伐利亚以下，诸侯也严密地控制着自己领地上教会的组织和人选，没有哪一个教皇敢反对他们。财政管理部门也逐渐发展成为诸侯政府的一个专门机构，有正规的审计人员和监督征收货物税、森林税和矿产税等的各种部门。16世纪，与管理传统赋税的诸侯议事会并行不悖，常常可见到一些地方上各等级的议事会，其目的在于监督经他们投票通过的用于特别需要的土地税和其他税。这种议事会的权力在大多数公国里日趋衰落。在巴伐利亚以及别的地方，议事会经常因为王侯的利益而被压榨，直到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并逐渐消失为止；不过，这样的发展尚不普遍。在培养职业的管理人员阶层和建立国家宪法结构的过程中，哈布斯堡家族在他们的世袭领地中时常领先，奥地利的政府模式常为德国各地所仿效。

近代意义的州拥有堪与西欧的那些现时仍在发展的机构相比拟的行政机构，哪些领地正在发展成这样的州呢？要列出一个明确的名单来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这样说，除了一两处以外，它们都在内地和德国的东部。在这些地方，自由城市和规模很小的公国所起的阻碍作用比西部小得多。大多数小统治者没有力量采用新的管理方法，他们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家长式统治方式上，一直到19世纪初被波拿巴所消灭。大概有一打左右的世俗公国有力量支撑结构更严密、效率更高的行政机构，并足以维持一种独具的政治特性。在这些世俗公国中，在16世纪晚期的政治生活中特征突出者除了已经叙述过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外，还有萨克森和巴拉丁选帝侯领地和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现在如果注意一下每一个都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这些领地，将有助于弄清楚帝国政治生活的进程。

萨克森选帝侯统治了一半以上的中世纪萨克森公爵领地，他属于哈布斯堡家族中年纪较小的一系，或称阿尔贝特支系，同时他的堂兄弟恩斯特或年长的支系则统治了剩下的西部地区。查理五世不久前把选帝侯的爵位由年长的支系转给了年纪较小的一支，而使堂兄弟们分

裂的怨恨还有许多。年长的支系——通常在提到时称“萨克森公爵”以区别于“萨克森选帝侯”——提供了一个由于每一代分割遗产而导致家族权势衰败的典型实例。由于其领地被逐渐分割，它沉沦为一群小公国。与此同时，萨克森选帝侯由于强制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而保持了其完整性。厄尔士的矿产长期以来为萨克森选帝侯们提供了有用的财政支持（不过此时已在减少），如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曾得益于波希米亚、匈牙利、蒂罗尔和卡尼奥拉的金属生产一样。从1553年到1586年萨克森选帝侯领地由奥古斯塔斯一世统治，他是一个忠诚的路德宗信徒，一个新型的、井井有条的管理者。在外交事务中，他是一个谨慎小心、头脑冷静、稳健克制的政治家。他利用其地位吞并了领地附近的各种小片的教会土地。但是他也和历代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和马克西米连二世尤其密切。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与他认识到自己的选帝侯身份得自皇帝的恩宠有关，但是与其邻居、宽容的波希米亚国王保持友好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在危机时刻，萨克森选帝侯的影响力十分有利于达成妥协与和平；例如，当1569年发生于法兰西和尼德兰的事件似乎预示着德国将爆发一次新的宗教冲突的时候。

奥古斯塔斯晚年对加尔文宗领导下的新教极端分子产生了敌意。1580年，他试图通过公布深孚众望的神学家们起草的精确的信仰声明，即《教义条款》，[\[6\]](#)来团结路德派。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路德宗诸侯和城市都同意这样做。因此，在以后的年月中德国的新教徒分裂成三个集团——路德宗内支持或反对《教义条款》者以及加尔文宗。奥古斯塔斯的儿子和继承人克里斯提安一世放弃了《教义条款》，在他的大臣尼古劳斯·克雷尔博士的影响下，开始喜爱从前由腓力·梅兰希顿所发展的教义。他也改变了他父亲小心谨慎的对外政策，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1586—1591年），通过1591年帮助成立“托尔高联盟”（帝国内新教徒诸侯的同盟）这件事，偶尔显示了一下他的选帝侯身份的关键地位。这个联盟是由于西班牙军队不断出现在莱茵兰所激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派遣军队援助法国的亨利四世，但也很有可能把这样的军队用于德国。正是由于萨克森的调解之声消失了，使德意志诸侯形成两个鲜明的宗教阵营的分裂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克里斯提安的早逝现在就成了能否避免一场全面战争的重要因素。由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克里斯提安二世尚未成年，所以萨克森选

帝侯区由摄政政府管理。幸运的是，他们恢复了传统的、稳健的和顺应潮流的政策。克雷尔失宠了，后来被处死。

巴拉丁选帝侯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与萨克森选帝侯一样突出，不过方式很不同。巴拉丁选帝侯的领地比较小，也比较分散。它包括界限分明的两部分：下巴拉丁，位于中莱茵，德国最动乱地区的中心；和上巴拉丁，恰好位于波希米亚的西部和巴伐利亚的北部。宗教改革运动直到不久前弗雷德里克三世（1559—1576年）继任为选帝侯才传入巴拉丁领地，他在领地内发现了一个自生自灭的各种宗教倾向的混合物。1562—1564年他开始推行一种新的方针，用加尔文宗的模式改造他的教会。这是使人大吃一惊的革新，根据帝国法律，这是非法的，因为宗教和约只允许诸侯们在路德宗和天主教之间作出选择。加尔文派进入莱茵河流域的巴拉丁领地牵动了各个方面。它不仅在帝国内给这个新奇的、偏激的教派以牢固的立足点，而且使选帝侯与法国和尼德兰的加尔文派反叛者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得到教皇支持的皇帝，尽最大努力开动1555年安全法规这个机器，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人愿意用武力反对选帝侯。因此，他走上了自己的路——一条大胆而又独立的路，它与他那认真而又狂热的信仰正相符合。在自己的公国里，他不偏不倚地驱逐了修士、修女和犹太人。在外面，他与天主教邻居们、施派尔主教和沃尔姆斯主教不断进行激烈的争吵。在西部，他开始实行前进的政策。在英国的资助下，他的家族成员指挥的军队时常被派往法国去援助胡格诺教徒，另一个从未实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夺取法国人占有的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主教区。弗雷德里克这些冒险的计划严重触犯了帝国的法律，它们在莱茵河流域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局势，但是没有任何办法使这些计划终止。在他儿子路德维希（1576—1583年）短暂的统治时期巴拉丁领地重新转向了路德宗，但是在他的年幼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四世统治时期，加尔文派又恢复了。同时，加尔文派向各处发展；拿骚-迪林根伯爵于1578年，自由城市不来梅于80年代初接受了加尔文宗。

跟莱茵河流域的巴拉丁领地一样，统治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是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一个支系。不过，他们堂兄弟之间无论在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没有相同的思想。16世纪，巴伐利亚的领地是上多瑙河一片紧密相连、森林覆盖的地区，由于公爵的家族从1578年起采用了长子继承制，其领地的完整性得到了保证。其居民不足100万，大致相当于

同时的苏格兰。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公爵是阿尔勃莱希特五世（1550—1579年）和威廉五世（1579—1597年），他们两人都是有文化素养的诸侯，对艺术家和音乐家尤其是对著名的作曲家奥兰多·迪·拉索提供了赞助。他们在奖掖艺术上的豪爽大方一直是财政困难的原因。他俩都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坚定的领导者，威廉公爵个人的宗教虔诚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最后退位并隐居到了修道院里。巴伐利亚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宗教问题在16世纪中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深陷于松散与混乱中的教会；同时，在他的三个等级中他必须和四五十个拥有土地的贵族打交道。在这些中间，路德宗的思想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情况与他的邻居、皇帝斐迪南在奥地利所遇到的情况相似。也跟斐迪南一样，他力图取得教皇和宗教会议的让步，并且与帝国中某些新教徒诸侯关系友好，他喜欢追求艺术和学校甚于处理公务。有几年，他尝试着与他的贵族们妥协，但是，由于1558年任命了一个耶稣会的好朋友西蒙·塔杰乌斯·埃克做枢密大臣，他的政策变得强硬起来了。1563年他勇敢地抵制了等级会议并乘胜前进，占领了帝国的小飞地奥滕堡，其伯爵也是公爵领地内的一个地主、那里的一个突出的新教徒。公爵在这里发现了据说牵连到许多他的贵族们的证据，这些人立即被逮捕并受到审讯。等级会议依据宪法进行的对抗被粉碎，现在通向强制实行宗教统一的道路打开了。不久以后，公开宣称的新教徒被迫在放逐和改宗之间作出抉择；到16世纪末，望弥撒完全变成了国民义务。教会的改革照样进行，由耶稣会士指导，公爵则严加监督。

1563—1564年的政治危机是巴伐利亚历史的转折点。它不仅仅使公爵能最终彻底铲除异端，而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此后，公爵的特权不再因等级会议的侵犯而受到严重的威胁，等级会议的召开越来越少，终于在下个世纪初停止召开。同时，行政改革为公爵领地内的宗教和政治的统一提供了支柱。这种内部的革新有助于公爵迈步向前，并且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因此，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是以巴伐利亚的影响在德意志事务中达到于极点为标志的。公爵就在当地主持着兰茨贝格同盟，这是一个维护南德意志和平的公国之间的联盟。此外，宗教的分裂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由于世俗的选帝侯有三个是新教徒，而且由于皇帝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感到烦恼以及按照其本性无论如何不能称职地担负真正的领导，巴伐利亚便代替皇帝成为帝国内天主教事业的无可怀疑的卫护者。在罗马，巴伐利亚的

影响力是强大的。甚至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也是密切而又友好的。几个世纪以来使慕尼黑和维也纳宫廷关系紧张化的苦乐参半的竞争暂时停止了。相邻的王朝被家族的纽带联结在一起，阿尔勃莱希特公爵娶了斐迪南一世的女儿，同时，他的女儿又嫁给了施蒂里亚的查理大公。对于他的岳父以及后来对于他的内兄马克西米连二世，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都是一个亲密的、可以信赖的顾问。未来的皇帝斐迪南二世与他的巴伐利亚堂兄弟们一起在因戈耳施塔特接受教育。

巴伐利亚权力扩张的最有成效的方面是帝国境内的教会的地产。我们将要看到，其中大部分为了天主教而营救下来了。许多世纪以来，帝国的教会地产为德国第一流家族的次子以下的孩子们提供了职业和馈赠。他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选任圣职，但是由于现在新教徒对于大多数美缺丧失了被选资格，就为巴伐利亚和其他天主教家族留下了更多的机会。阿尔勃莱希特公爵充分利用这些增多了的机会，不倦地为他的幼子恩斯特聚敛了许多兼任圣职的薪俸。这个年轻人没有担任教士的禀赋，既非特别虔诚，更远非贞洁；但是他得到告诫，现在公爵的领地已是不可分割的，他只能指望从教会得到馈赠。由于明显的政治理由，任何一个教皇都不能拒绝慕尼黑宫廷现在所谋求的必要的特许和确认。恩斯特王子11岁时在萨尔茨堡以一个牧师会会员的职务开始了他的非凡的事业，后来他不仅担任了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而且陆续得到了弗赖辛、希尔德斯海姆、列日和明斯特的大主教职务。这样，不管他愿意与否，他成了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大权贵，而且不仅他的父兄支持他，西班牙和教皇也是他的后盾。在以后的若干代中常常出现这类主教兼职的情况；威廉五世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他的幼子们准备有俸的圣职。家族的威望是以牢靠地保证巴伐利亚王朝的幼子们从1583年到1761年不间断地占有科隆选帝侯的职位。

16世纪德国普遍的政治紧张局势不能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原因。宗教的对抗起了很大作用。帝国结构内力量均衡的不稳定也有关系。还有在诸侯、伯爵、骑士和城市之间无休止的局部性的斗争；其根源各式各样，有宗教的、财政的、王朝的甚或纯粹私人的。不能企图在几页篇幅内充分评述这些根源造成的所有的不和或事件，但是有可能作出某种一般的评述，并勾勒出帝国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实体其衰落过程的粗线条。1555年宗教和约对著名的“教随国定”原则的确认（尽管没有直截了当的确认），在世俗统治者所关注的范围内，使他

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地上按照他们的选择确定信仰——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而不发生法律问题。这无疑给德意志西部、北部的局势带来了稳定，这里的公国强大而且世俗力量占优势。没有任何巨大的障碍去阻止像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或者巴伐利亚和梅克伦堡公爵这些权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臣民。美因河与莱茵河流域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些地方，小块的诸侯领地、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拥挤在一起，这里在宗教和约颁布时，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疆界既没有划清，也不稳定。德国西部不安宁的另一个原因是和尼德兰及法兰西邻近。在尼德兰，从1568年起加尔文派反叛者为了生存而一直进行着战斗，在法兰西，内战尽管不完全与宗教有关，但仍有很大关系。在16世纪，欧洲的疆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帝国的西疆尤其如此。这些个别的战争汇成全面的大战的可能性总是不太遥远。法兰西和尼德兰两国的新教事业吸引来了德国的士兵，而加尔文宗则从两国向东渗入。当法国虚弱的时候，巴拉丁的诸侯们向法国扩张领土，正如亨利四世后来准备入侵德国以打击哈布斯堡王朝一样。从尼德兰来的西班牙军队被用来支持莱茵河流域的天主教的事业，这个地区无论如何都是连接热那亚和尼德兰之间交通的生命线的一部分。

当1555年宗教和约签订时，反宗教改革的力量在德国尚未开始动员。异端正在到处发起攻势。在较大的世俗诸侯中，只有哈布斯堡家族、巴伐利亚公爵和于利希-克莱沃公爵仍信仰天主教。几乎所有的自由城市都背叛了教会。特别不稳定的是教会公国的立场，我们现在必须对他们加以讨论。直接领有皇帝土地的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首先经由多半出身贵族的牧师会会员和修道士的选举获得其职位，然后由皇帝和教皇批准。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有时便成为辽阔的领地上的主人。他们受到了比他们更有权势的世俗邻居的压力，特别是在北方；但是在西部和南部，由于他们领地中各阶层的地方性的热忱，他们的独立地位得到了加强。路德宗诸侯们采取惯用的手法加紧控制附近的教区：他们仍按惯常的程序把自己的亲属或代理人推举出来，只是被选中的新教徒候选人不能指望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是作为终身的未被祝圣的“执政官”进行统治。一旦时机成熟，世俗邻居的公开吞并就会到来。斐迪南一世和德意志帝国议会在宗教和约签订的时候，曾试图借助于制定“教会保留圣职”的原则这一关键性条款使当时的局势明朗化。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决心改信路德宗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必须依法空出其职位。路德宗的诸侯们反对这个规定，他们从未承认这

个必将阻止他们吞并教会地产的原则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斐迪南又企图用一个单独的宣告来安抚他们，即在那些路德宗已经立足其上的教会领地里，他并不希望打乱现状。由于帝国议会没有参与制定这个宣告，它的法律意义也就微不足道。这个没有任何人感到满意的妥协是否扼制了帝国内的教会公国进一步从这一教派向另一教派的转移是颇值得怀疑的。

这样，帝国的教会地产在1555年前途未卜。在以后若干年里，天主教徒们以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关注着可疑的或公开的异端者被提名进入帝国北部的各个主教教区和修道院；例如，路德宗在1561—1562年强行进入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在1564年又进入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区。就这样，为把这些公国最终并入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的道路正在铺设中。往南，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边缘地带，在法兰克尼亚和莱茵兰，有最富庶、最重要的教会领地。这些地方仍由天主教的高级教士统治，不过，无论它们的主教教堂牧师会，还是其各个社会阶层都不能免受路德宗的影响，前景是黯淡的。在这些神职诸侯中有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大主教，他们作为选帝侯在帝国内占有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此外，既然他们的四个世俗同僚中有三个现已成为新教徒，那么在选举团中维持天主教的多数就全靠他们了。他们中任何一人的背叛将不仅意味着异端在中莱茵战略和商业要道地区的得势，而且意味着新教徒当选为皇帝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对欧洲政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6世纪80年代，强制贯彻“教会保留圣职”这一原则的努力在德意志西部随着争夺科隆选帝侯职位的激烈斗争而达到了高潮。但是，在追溯这次决定性的冲突之前，有必要简短回顾一下出现于东方的，对帝国和平的两个其他威胁。

1555年和解后，在帝国内首次对和平的惊人破坏发生在法兰克尼亚。在这里，帝国的符茨堡主教区、班贝格主教区和其他教会公国近来无力保护自己免遭劫掠成性的邻居们的祸害，特别是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的侯爵阿尔伯特·阿基比阿德的祸害。这个野蛮的小诸侯一心要以损害上述主教区和教会公国为代价，在美因河流域为自己分割出一个公国来，这项事业仅仅由于1557年他的去世才告中止。他的追随者中曾有骑士威廉·冯·格伦巴赫，他现在转而服务于年迈的诸侯萨克森公爵。这个新的恩主企图借助法国的津贴利用格伦巴赫把他的堂兄弟萨克森选帝侯逐出其领地。由于1559年欧洲战事结束，这个

计划无法实行了。但是，格伦巴赫已经开始了无法无天的活动：他侵入符茨堡主教区的领地，刺杀了其任职者。现在，他可以不受阻碍地把其劫掠活动扩展到符茨堡主教区内和周边地区。要贯彻皇帝所宣布的驱逐令是不可能的，安全法规所规定的机构也无法启动。法兰克尼亚“连环”的诸侯们因其脆弱的地位而战栗，难以自保。符茨堡的新主教又受到了严密的束缚。最终，萨克森选帝侯出于自卫而采取行动，他受命于皇帝，在1567年结束了这个祸根；格伦巴赫被捕获，处以死刑，他的恩主终身监禁。但是，花了八年时间才平息了骚乱，它在整个德意志引起了巨大的混乱，这充分说明了教会诸侯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帝国维护治安机构的软弱。

第二个事件也与符茨堡主教区有关，不过起源于其近邻——帝国的富耳达修道院。修道院院长是主教区西部的一个重要公国的统治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路德宗在这里已不仅仅是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少数余留的修道士放弃了隐居生活，在城里建立了单独的家庭。牧师们举行饼酒同领圣餐式并教授路德的教义问答手册，而公国的地主们则公开承认自己是新教徒。1570年，修道士们选举了巴尔塔扎·冯·德恩巴赫担任空缺的男修道院院长。他是个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据信为路德宗的同情者。他立刻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鲜明的抉择：或者任凭路德宗信徒自由行动，其前景是使修道院最终世俗化，或者禁止他们的信仰。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修正了他的宗教观点——他似乎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经过神学理论训练——并且用皈依者们的全部热忱来信奉天主教。他恳求耶稣会的帮助，1573年在富耳达为他们建立了一所学院并给予资助；同时，他禁止在城中让俗人拜受圣餐杯，并不久即明确表示他的目的在于结束公国中路德宗的活动。这立即引起了皇帝的诺言是否有效的问题，因为皇帝曾应允，已经在教会领地上建立起来的路德宗不应受到扰乱。富耳达的修道士和贵族求助于邻近的新教徒诸侯，他们立即强烈要求修道院长放弃他的政策，解散耶稣会；但修道院长却转而倚靠他强大的盟友，其中包括巴伐利亚公爵。在1574年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在德意志中部要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人们投诉于皇帝，他命令诸侯们不要干涉富耳达的修道院。最后，由于总是通情达理的萨克森选帝侯决定不纠缠此事，一场战争才得以避免。教皇命令修道士们服从，修道院长继续自己的路线，危机渡过了。

修道院院长巴尔塔扎的激进措施并不是对富耳达新教徒挑衅的结束。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他的邻居符茨堡主教尤利乌斯·埃希特·冯·米斯佩尔布鲁恩1573年意想不到的干预，他无疑在对手中会继续占上风。尤利乌斯主教也是一个年轻的高级教士，生于1545年，科隆耶稣会学院的学生，热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是一个狡猾的律师——并且是一个当选后耽搁了两年才接受按手礼和圣职授任仪式的野心家。他向修道院院长建议搞继承契约——一种独特的德国计谋，按照这种计谋，两人中的后死者将继任先死者的职位。这是要造成主教区和修道院永久合并，由此形成一个单一的、较大的和防卫较好的天主教公国。当修道院长巴尔塔扎拒绝这个诡计后，主教立即和富耳达不满的贵族和修道士结盟，侵入该公国，于1576年6月迫使修道院院长辞职。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对领土的贪心甚至在天主教诸侯中也会引起烦恼。它也意味着天主教事业的一次失败，因为至少在此刻尤利乌斯主教不得不放松对富耳达的控制，以此回报他的同盟者们。在他头上的暴风雨比他可能预期的来得更快、更猛。修道院院长巴尔塔扎向教皇和皇帝上诉，在德国最高法院告发了这位主教。诉讼拖了很长时间，25年后才做出有利于修道院院长的裁决，他在1602年恢复了统治。这期间，尤利乌斯主教不得不从1577年3月起将富耳达移交给帝国的一个行政官，在他的统治下，反宗教改革运动再次向前发展。后来，尤利乌斯主教值得仿效的进展都集中于道义方面：他以铁腕统治符茨堡、驱逐异端的传教士，压制牧师会成员要求参加政府的希望，他与美第奇一样，奠定了诸侯专制的基础。他一直活到1617年，其长期统治的特征是天主教得到明显的复兴，以及通常认为是由于他的德政而带来的种种繁荣。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是一个有鉴赏能力的艺术保护人、一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是法兰克尼亚那些样子奇特的著名的“尤利乌斯式”教堂和其他建筑物的勤勉的建造者。

为控制教会公国而进行的斗争在争夺科隆选区时达到了白热化。科隆既是莱茵兰也是帝国制度的堡垒。大主教选帝侯的公国范围很大，领地包括莱茵河沿岸和威斯特伐利亚两部分，前者与西班牙属下的尼德兰接壤。尽管天主教仍占优势，科隆本身——它不臣服于大主教，而是帝国的一个自由城市——驻扎着耶稣会的一个总部，但是异端已有某种程度的渗入了。公国里的各个等级都被一种休戚相关的地方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有助于增强领地的独立精神。大教堂的24名牧师会员掌握了选举大主教的权力，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因家族纽带

而与当地的地主家庭联系在一起，并且一同组成等级会议的第一院。1562年牧师会选举了考特·弗里德里希·冯·维德担任大主教，他是一个守旧派牧师，仍旧相信通过明智的让步有可能诱使异端者回到传统的信仰，因此并不赞成特伦托宗教会议对教义的界说和颁布。这种态度使他与罗马教皇的使节科敏顿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诸侯发生了纠纷，1567年他以辞职摆脱了困境。牧师会选出的继任者是一个精力旺盛、好酒贪杯的年轻贵族——扎伦廷·冯·伊森堡伯爵。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甚至是残忍的天主教党人。他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曾作为一名领饷的雇佣军上尉与阿尔发一道在战场上服役。但是，他不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准备接受圣职的授任。因此，他仅仅作“当选的大主教”而颇为唐突地统治着科隆。在他的选帝侯任期内，人们普遍希望他不要长期驻留，不过有些新教徒邻居则试图劝说他结婚，并进而坚守他的公国。他使这些人失望了。1577年，人们长期盼望的他的辞职实现了，他隐退去管理得自父亲的遗产并娶了一个妻子。牧师会不得不再次选择一个新大主教。

这一次，尼德兰的纠纷和天主教日益聚集的反动势力使选举具有不平常的政治意义。自弗里德里希大主教辞职以后，巴伐利亚公爵的两眼紧盯着科隆选帝侯的职位，在西班牙腓力二世和教皇的支持下，他推举他的次子、恩斯特亲王——弗赖辛和希尔德斯海姆的现任主教——为他的候选人。为了迫使人们接受他的要求，来到科隆的不仅有罗马教皇的使节、皇帝的专员，而且有从马德里、布鲁塞尔来的特使以及从美因茨、特里尔等类型的主教区来的代表。在大教堂牧师会中确有一个强大的天主教派，但这不是关键。科隆也和别处一样，牧师会与选帝侯历来不和，而且扎伦廷大主教的高压手段加深了双方的敌意。所以，牧师会会员对于任命一个拥有强大后盾的巴伐利亚王子当他的继任人表示冷漠。他们的动机根本不是政治上的需要，宗教上的要求也仅是次要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薪金和津贴，以及选帝侯区财产的管理。在他们中间事实上只有三个彻头彻尾的新教徒，他们与希望把选帝侯领地拉向异端的邻近的帝国诸侯们保持着接触。但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大诸侯家族的代表使他们屈服于特伦托戒律规范这一前景的人则要多得多，而且他们的选票起决定作用。以微弱多数当选的候选人不是恩斯特亲王，而是另一个年轻人格布哈德·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他是奥托·特鲁赫泽斯枢机主教的侄子，奥格斯堡的前主教和耶稣会早期的赞助人。他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天主教

徒，但在原则上并不太严格。在选举方面接受按手礼和授任圣职的仪式，不过，跟恩斯特亲王一样，他从未亲自从事任何教士的工作。经过一阵犹豫，教皇及皇帝批准了他的职务。

格布哈德大主教起初为人审慎，但自从1580年初他开始沉迷于与他所爱慕的一位修女结婚的想法以后，危险的形势出现了。他最初的想法是为了和她结婚，辞去大主教职务。但是，那曾经徒劳地诱惑他的前任既要结婚又要保住职位的同样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地方上的因素十分有利：荷兰人在西边正为生存而战，拿骚伯爵和其他新教徒引诱者则位于他的东翼，在选帝侯领地里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内已有一些异端。正是大主教区在帝国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才使他的计划显得如此草率。1582年夏，格布哈德着手确立盟友，萨克森选帝侯和其他稳健的新教徒们踌躇不前。另一方面，由于恩斯特亲王在1581年当选为毗邻的列日的主教，使天主教一方的势力得以增强；而且在1583年1月，与其说出于宗教热忱毋宁说出于对大主教的一切行动的经常性怀疑，科隆大教堂牧师会通过召集选举区内的等级会议开始对这些行动进行抵制。与此同时，格布哈德正式容许新教徒的信仰自由，按照路德宗的仪式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然后退回到他的领地的威斯特伐利亚一带，准备自卫。3月，教皇免去了他的大主教职位，命令牧师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次，在教皇、皇帝和帝国的天主教诸侯的请求下，大教堂牧师会的成员们满足了恩斯特亲王的要求，不过完全是在给予他们普遍的年金与贿赂的馈赠之后。罗马教皇的使节后来承认，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好的财运。成功的候选人与他们是一丘之貉，他本来宁愿到其他地方去寻欢作乐，只是因为教皇的命令，他才断绝了新近的桃色关系，前往科隆。他的入城仪式结束了这一荒唐而又重要的事件的第一阶段。这里接着发生了长期的、举措失当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从尼德兰来的西班牙军队起了决定性作用。双方都不能按期给士兵发饷，他们靠蹂躏这个国家为生，城镇被洗劫，败兵遭屠戮，异端者被驱逐，这一地区陷入悲苦之中。直到1589年，格布哈德的最后一支守军才投降。但在此前很长时间内，恩斯特已被普遍承认为科隆的选帝侯。

天主教派在科隆的成功与帕尔马统治下西班牙势力在尼德兰的恢复，标志着德意志西北部如此广阔的帝国主教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把不来梅大主教区从路德宗手中拯救出来的希望是渺茫的，因为那里

到处都是异端并被新教徒的领地所包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挽救帕德博恩和奥斯纳布吕克主教区，它们和不来梅在1585年主教空缺；它们的牧师会的确拒绝了恩斯特亲王，但是帕德博恩选了一个靠得住的天主教徒，奥斯纳布吕克所选中一个可靠性差一些。当恩斯特亲王当选为明斯特主教时，他就有能力在下一年得到第五个主教区。这些变动的结果不但给恩斯特亲王带来一个兼领圣俸的大公国，而且在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从波恩到距离北海仅几英里的这片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保证了对天主教的鼓励和推行。这是天主教事业在全德意志令人振奋的发展。与此相反，远在莱茵河上游，科隆战争产生了另一种决定性的后果。格布哈德主教和他在科隆牧师会中的三个新教同盟者还是斯特拉斯堡帝国主教区的大教堂牧师会成员。当天主教牧师会试图开除那三人时，他们进行了抵制。而且因为这里的市民与科隆不同，他们是路德宗教徒，使那三人能够继续留在牧师会的会所中。牧师会此后分裂为二，当1592年主教去世后，出现了双重选举：路德宗信徒选举出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幼子，天主教徒则选举出洛林的枢机主教，他已经是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的主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法兰西政治上取得新进展的先锋。多亏哈布斯堡在西德意志的世袭领地距离很近，皇帝在这里才能作为调停者进行干预。1598年洛林的枢机主教与皇帝最终达成协议，据此，他被承认为主教，同时指定利奥波德大公做他的继任者。既然使天主教徒们这样达成了协议，现在就有可能逐渐排除霍亨索伦家族提出的要求了。最后，一笔金钱使之收回了要求。这样，斯特拉斯堡主教区也脱离了异端，不过，其代价是容忍了法国的影响。

在德意志西北部和莱茵兰，天主教勉强获得的胜利在得到保证以前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即于利希-克莱沃公爵领地（这个地区唯一的世俗大公国）的继承权问题。它的领地与科隆选帝侯领地及其他教会领地难解难分地混杂在一起，很难想象，这些领地落到天主教手中会不损害其邻居。各种势力对于于利希-克莱沃领地继承权所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极为复杂，而且在这里不可能尝试对他们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审核。这足以说明继承权问题在科隆战争后首先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威廉老公爵从1539年就开始统治，他现在衰老多病。年轻时他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无常。他四个女儿中的三个嫁给了新教诸侯；尽管异端远未占优势，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毕竟已在他的公国里扎下了根。他现在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跟他唯一活下来的儿子约翰·威廉一样。

但是1589年以后，约翰显然失去了理智，不适合执掌政务。有了一个年迈的公爵和一个疯癫的后嗣，一系列令人吃惊的、不仅动摇帝国的政治结构而且动摇欧洲政治结构的事件所需的背景形成了。当老公爵于1592年去世时，各方面都提出了摄政的要求，但经与公国等级会议协商，摄政权授予了疯子公爵的妻子，由帝国加以监督。她是巴伐利亚公主，尽管在私生活中不无丑闻，却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她在1597年被阴谋家们谋杀，但是情况允许约翰·威廉娶第二个天主教妻子，这次是一位洛林公主，她接着进行统治。当1609年疯子公爵去世时，属于勃兰登堡和诺伊堡家族的他的两个姐妹的新教代表获胜了——不顾皇帝、帝国的反对，也不顾令人畏惧的一次法国干涉的威胁；法国的干涉在最后时刻由于亨利四世被刺得以避免。同时，居民们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一致信仰，有时是由于来自尼德兰的西班牙士兵那残忍而又非法的“帮助”。于利希-克莱沃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比较冷静的一代接受了新的观点，即诸侯与其臣民不一定要信仰相同的宗教。在此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莱茵兰确实取得了胜利。

最后有一点值得一提。本章对德国政治领域的概括研究，使我们自始至终了解了对莱茵兰和法兰克尼亚的争夺情况。但是还有其他的、次要的线索，根据其中某些线索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到政治图像。^[7]帝国的自由城市也像教会公国一样动荡不宁，而且它们的历史也同样严重影响着政治事件的性质。当时的英国旅行家可能会对奥格斯堡或者纽伦堡这些著名地方的宫殿和石筑宅邸钦佩得目瞪口呆，为德意志人的富有而沉思。但是，他也会注意到附有整天有人守望的角楼的坚固的围墙，能立即发出响声的报警装置，储藏丰富的城市军火库，以及储备能够供应一年的粮秣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极不安定的标志。16世纪中期，所有自由城市的政府，除科隆和亚琛以外，全属于路德宗，甚至这两地也有许多异端；与之平衡的是：在其他许多自由城市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天主教少数派。公开的摩擦到处可见。在士瓦本的一些城市里，例如1569年在乌尔姆，天主教徒被从保留下来属于他们掌握的教堂中排挤出来。在科隆，由于驱逐不信国教者，异端被迫转入地下。在亚琛，从尼德兰逃难来的异端移民导致了一系列调解和妥协，到1598年为止，抱着相反信仰的信徒一直可以和平共处。最后，由于形势过于紧张，亚琛也像德国西北部多数地区一样完全恢复了天主教。在宗教方面，17世纪初，将看到自由城市多瑙

沃特复旧。在这里，到1600年，耶稣会的传教工作将使天主教徒集结起一个人数增加、意志坚定的少数派。随后，在新教徒的市议会和天主教斗士之间发生的争吵导致了势力强大的邻居——巴伐利亚公爵作为皇帝的正式代理人在1607年进行了干涉。公爵随后吞并了这个城市以补偿进行干涉所花的费用，用宗教原则掩盖强权政治，手腕之巧与在欧洲其他地方见到的一样。这一事件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除了公然挑衅以外，它还说明了在自由城市长期衰弱的时代里诸侯权力则在不断增长。

这样，16世纪末的奥地利家族由于遗产权的转移和分割，还要努力对付土耳其的威胁，所以在帝国内缺乏维护自己权利的力量。它的统治者掌握着一个伟大国家的政治机构，这个国家基本上还是繁荣的，不过其实际权力主要操在分裂的诸侯寡头手中。在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统治期间，帝国的机构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党同伐异，政治上缺乏现实精神，以及最后鲁道夫二世的真正的疯癫妨碍并毁坏了它的运作。科隆战争造成了一次从法律形式堕入完全靠暴力的危机。但是，德国政治生活恶化的基本原因在于围绕宗教仇恨产生的两极对立；一方为加尔文宗的新信仰，另一方为以耶稣会为先鋒的天主教的复兴。在1555年宗教和解时期，加尔文宗并未在德国站住脚，当时耶稣会活动的意义也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天主教的复兴表现在它夺回了德国西北部，不过在天主教的领地中仍保留着异端的巢穴，17世纪初教派之间疆界划分的明朗化，在1555年，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也许是非常乐观的。双方日益高涨的宗教热情主要在遍布德意志的教区、学校和大学里表现出来，在这一章里，公开冲突的历史是从政治事件和人物个性的角度加以描述的，因为这段历史是发生于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事件：在这个世界里，帝国内诸侯之间的敌意和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允许这段历史如此展现。这些因素造成了最终的、必然的模式，宗教争端就按照这一模式不断激化。

（王文定 译）

[1] 编者注：作者在本章中用的是“Reich”（德语：帝国、王国）和“Kaiser”（帝王）两词，而且希望照那样印入本书，但为了统一用语，同意换用“Empire”（英语：帝国）和“Emperor”（皇帝）两词。

[2] 参看后面第360—365页。

[\[3\]](#) 参阅第4卷。

[\[4\]](#) 参阅后面第337—338页。

[\[5\]](#) 参阅后面第339—340页。

[\[6\]](#) 参阅前面第82—84页。

[\[7\]](#) 对于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某些论述可以在这套史书的以后各卷中找到。

第十一章 1566—1617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和声望曾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他去世以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帝国内外的紧张形势和压力，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如果不对苏莱曼苏丹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制度的某些主要特征加以最低限度的考察，就不可能理解1566年以后那些事态的总趋势。

苏丹皇室绝不只是一个满足皇帝私家需要的家务管理机构。它所包括的范围比帝国宫廷的机构和设施要大得多。在皇室组织内，包括有中央行政机构的成员和国家的高级行政部门的人员；省级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还有中央政权机构的武装力量——近卫步兵，皇室的骑兵部队（有时被称为波尔特的西帕希）^[1]和诸如炮兵、工兵那样的各类特种兵团。这个皇室的众多人员，一般都具有“基尔曼”[ghulām (pl. ghilman)]的身份。这个词译作“苏丹侍从”比译作“奴隶”为宜。因为它并不像“奴隶”一词的含义那样，具有地位低贱的意思。相反，它是在国家机构中拥有特权和威望的标志。招募皇室侍从人员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把苏丹的土耳其穆斯林臣属^[2]排除在基尔曼行列之外。具有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的出身，乃是进入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坚集团所必需的资格。苏丹所能招募到的侍从，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来源：在反对基督徒的海陆战役中擒获的战俘；进贡或购买而来的俘虏；此外，还有被称作“德伍希尔迈”（Devshirme）的儿童，即每隔一定的时间，从帝国的基督教臣属——就种族出身来说，首先是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征集的进贡儿童。由于从这些来源征集的人员年龄都不大，通常只是儿童或青年人，后来他们就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不单是直接强制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他们所处的新环境的压力、榜样的力量以及为苏丹效劳的晋升前景所致。一个新成员的实际前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具有高超的才智和身体素质。那些天赋最好的新成员，被送进宫廷学堂，在那里接受伊斯兰教、军事学、治国方策和行政管理的教育。经过多年训练以后，在他

们风华正茂之时，其中最有才干的将被派遣为各省的总督（桑雅克贝伊）。他们中的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擢升为管辖几个省的大总督（贝勒贝伊）。然后，如果他们官运亨通，还可以进踞大臣（维齐尔）之职，进入“帝万”（Diwān），即管辖帝国重大事务的国务会议，在那里占有一个席位。至此，最高的官职——首相（大维齐尔）的职位——已是可望到手的了。然而，在选到宫廷学堂受教育的这些比较幸运的人中，只有极少数能获得高官显职，大多数只能担任朝廷和中央行政机构的下层职位或皇室骑兵部队的下级官职。

没有被挑选到宫廷学堂的战俘和“德伍希尔迈”儿童，要在这个国家的辖地范围内，首先是在小亚细亚，从事若干年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奥夫兰拉”（ajemioghlanlar，外籍青年）——在适当的时候，就被召回到伊斯坦布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照例被编入近卫步兵团。苏丹的皇室机构还包括波尔特的西帕希^[3]。这种骑兵团，总共有六个。其中两个由出身于穆斯林的人组成，但他们是招自奥斯曼帝国范围以外地区的。其他四个团，一般是从宫廷学堂抽调的学员所组成的。在那些军械兵、炮兵和工程兵等特种部队的人员中，有战争的俘虏，有从“德伍希尔迈”中征召来的儿童，还有基督教徒出身的背教者。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这一体制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基尔曼的身份是不能继承的。这些隶属于皇室的人们的后代，一般都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而被融入帝国穆斯林的居民之中。第二，除某些例外，基尔曼所获得的赖以谋生的不是地产，而是从中央政府岁入中定期用现金付给他们的固定薪俸。

然而，苏丹还控制着一个战士阶层，其数量比皇室的武装部队大得多，而且在地位上与他们也有区别——这就是称为西帕希的“封建”骑兵。他们驻扎在帝国的大多数省份中，但不是所有的省内。这些骑兵，根据苏丹的号令应召前来作战。作为履行这种义务的报酬，授予他们足以保持作战能力所需的采邑。一个采邑是由一块叫作“剑地”（Kilij）的核心地段和被称为“增补地”（terakki）的增添地段所构成的。“剑地”用以提供被认为是足够维持西帕希自身生活费用的最低收入。增补地每次增加一块，用来增加采邑收入的总额，以酬赏服役时间长而又有功的人。每个西帕希都必须自备作战装备——武器、帐篷、驮畜，等等。此外，当他的采邑产值增加时，他得按其

收入的比例，自费供养和武装一个或更多的杰布里（jebeli）骑兵武士，并率领他们一同出征。

称为西帕希的“封建”骑兵的采邑，有两种主要级别：（1）提马尔：每年产值从2000—3000阿克切至19999阿克切；^[4]（2）齐阿迈特，每年产值从20000到99999阿克切。从前，提马尔和齐阿迈特的授予权属于大总督。然而，后来大总督仅保有最低级别的提马尔授予权，其他所有采邑一概由中央政权授予。每个西帕希都希望能通过忠于职守使其采邑从低等级别升为高等级别。

西帕希对构成其采邑的土地并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这样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他们只享有土地的用益权，即享有从这块土地上居住和耕作的农民那里按规定领受以现金和实物缴纳的某些贡税的权力。西帕希的身份在一定范围内是世袭的。在通常情况下，其采邑可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实际上有时不只是一个儿子可以得到小片采邑。如果某个西帕希死后没有儿子或其子没有能力履行一个兵士的义务，其采邑的“剑地”部分就可以归属为曾跟随死去的西帕希作战而最有功的杰布里。然而，可以进入“封建”阶级行列的人并不限于那些历史悠久的西帕希家族的成员和跟随他们作战的杰布里。例如，那些隶属于苏丹皇室并且有基尔曼身份的某些高级显要人物的儿子就有权得到一个提马尔或一个齐阿迈特，采邑大小依其父亲的职位而定；穆斯林志愿兵也可以得到一份采邑，作为他们在战场上作战格外英勇的奖赏；还有，宫廷学堂出身的人也常进入这个“封建”体制。

在帝国实行“封建”制度的每个省内的西帕希，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他们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阿列贝伊”。^[5]他们的职责之一是在出征时，召集省内的西帕希。阿列贝伊的职位是一个西帕希可能达到的最高职位。省级行政机构的高级职务——桑雅克贝伊和贝勒贝伊——只能由具有基尔曼身份的那个有特权的中坚集团的成员们担任。桑雅克贝伊和贝勒贝伊除必定负有行政和管理的职责外，还要在战争时期指挥本省的西帕希。这些高级官员享有被称为“哈斯”（特殊的）的大采邑的收益。这种采邑，每年提供10万阿克切以上的收益。按规定，桑雅克贝伊每年收入不少于20万阿克切；贝勒贝伊不少于100万阿克切——此外，他们供职的时间越长，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收益就越多，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增补地。因此，首次就任

桑雅克贝伊或贝勒贝伊时所获得的最小“哈斯”，相当于一个拥有提马尔或齐阿迈特的西帕希的剑地。每个桑雅克贝伊和贝勒贝伊也必须按照其采邑产值的比例装备若干杰布里，并要率领他们一同出征。这些大官员中的有些人所供养的骑兵武士，实际上比规定的多得多。不过，这种称为哈斯的采邑，是没有继承权的，连提马尔和齐阿迈特采邑那种有限的继承权也没有。哈斯采邑不属于个人，而是从属于桑雅克贝伊和贝勒贝伊这个职务，随着任职人员的更迭而易手。

在战争、政治和行政管理等领域中，奥斯曼的国家权力和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苏丹侍从”基尔曼的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封建”西帕希在各省的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构成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但他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国家最高权力和显赫等级之外。被排除在外的人实际上包括苏丹广大的穆斯林出身的臣属，^[6]也就是说，排除在军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方面之外。这种身份的划分很不合理，但是，只要帝国保持兴旺，只要这个体制总的来说能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出身的成员，都得到明显的利益，这种划分就能或多或少得到普遍的接受。然而，当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发展趋势开始进入相反的进程时，这种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以至逐渐消失。1566—1617年，奥斯曼人面临新的不利情况，这种局势使帝国的某些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衰落进程中的最初阶段。

在奥斯曼人中，有许多人试图探索其衰落的原因。有一位乌利马[穆斯林的神学家和法学家，精通教律（沙利阿）^[7]，即伊斯兰教的圣法]，名叫哈桑·阿卡菲，是波斯尼亚人，他在1596—1597年间写的一篇论统治机构的短文中，对下列现象深表痛心：帝国中司法制度腐败；未经长期供职考验的无能之辈出任国家最高职务；奥斯曼军队昔日曾以服从命令、纪律严明和勇敢善战著称，如今已大为失色；苏丹已堕入安逸和放纵的生活之中；大臣们相互之间倾轧陷害；妇女对国事处理的影响已为众目所瞩，对武装部队及其装备无定期的检阅，兵士们常有侵犯帝国臣属居民的严重暴行，而在与伊斯兰教敌人作战时则由于未能采用最新的战争技术而遭到失败；玩忽职守，贪污腐化，任用宠信和贪婪财货，使奥斯曼政治体制有崩溃的可能。对于帝国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科丘·贝伊提交给苏丹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的一份著名奏折，作了类似的分析。它比哈桑·阿卡菲那篇短文

所涉及的方面更为广泛，而且更为详尽。科丘·贝伊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概括如下：苏丹已经不再率领他的军队出征，而且也不再出席国务会议；亲信宠臣获得了高位，而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则得不到重用；阴谋诡计和贪污受贿已在各级大臣和中央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中流布成风，并且渗透到所有各级行政机构中；后宫往往对国家事务施加有害的影响；极其铺张和奢侈的生活，使帝国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逐渐沦丧。

哈桑·阿卡菲和科丘·贝伊这样一些人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不可否认的是，苏莱曼大帝以后的苏丹们，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他们既不在战时统率其军队，也不专心致志地为国家大事而操劳。他们的玩忽职守无疑助长了各种弊端的发展。后宫的妇女们，例如苏丹瓦利德（在位苏丹的母亲）和苏丹卡色基（给苏丹生过男孩的嫔妃），决定着那些获得或失去她们宠信的高级官员们的命运。而嫁给大臣或其他高官显贵的奥斯曼皇族的公主们，则拼命地抬高他们的丈夫的职位及其孩子们的利益。在中央行政机构权贵中盛行的拉帮派和搞阴谋的风气，往往决定着政府的政策，甚至决定着重大事件。过于频繁地任命、罢免或调动高级官员之类的弊端，意味着奥斯曼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像以往那样有效了。然而，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在哈桑·阿卡菲和科丘·贝伊的文章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这些因素，只能当作一些症状，而不能当作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科丘·贝伊确实较为详尽地探讨了一些意义更为深刻的细节问题，如近卫步兵数量的增加；让苏丹的穆斯林出身的臣民进入他们的行列中去；帝国“封建”体制和财政事务日益混乱。然而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一些表面的症状，而不是衰落的根本原因，衰落的真正原因还必须到其他方面去探索。

改变和破坏奥斯曼国家的“古典”制度、迫使它们朝着新的和不利的方向演进的各种力量中，最重要的或许莫过于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奥斯曼帝国东征西讨的昌盛时期持续了将近三个世纪之后，到了1560—1617年间，在亚洲，特别是在欧洲，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其后果是巨大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在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基督教世界之间；它存在的理由是圣战（吉哈德），也就是为了逊尼派即正统的穆斯林信仰的利益，而与异教徒进行的战争。对奥斯曼人来说，不论是战士还是经师，边境的推进除了可以获得物质的报酬

外，还带来了对于他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奥斯曼的军事组织、行政机构、土地占有和税收制度，都只适应于国家在扩张中的需要。现在，当战争的推进缓慢下来的时候——在苏莱曼大帝晚年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局面——这些制度就无法与正在稳定下来的边境所带来的那种新的不熟悉紧张局势相协调。

谢里姆二世统治时期（1566—1574年），最主要的事件是征服塞浦路斯。这个小岛从1489年起就归威尼斯管辖。寻找对威尼斯重新开战的论据是不难的：例如，在亚得里亚海东岸沿威尼斯飞地边境存在的摩擦；国务议事会^[8]未能对付所谓的乌斯科克（以达尔马提亚的塞尼为基地的海盗）；聚集在塞浦路斯的基督教海盗出没于黎凡特的海域中，他们袭击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和从海路前往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穆罕默德·索科利首相力求防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其中有比里帕夏^[9]、穆斯塔法帕夏和乌卢杰·阿里帕夏——使苏丹相信用不着花费过多的力量和费用，就能夺得塞浦路斯。谢里姆二世继任王位时曾于1567年正式恢复了土耳其政府和威尼斯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和平状态。这时穆夫提^[10]阿布-苏乌德提出一项费特瓦（根据沙利阿的原则，即根据伊斯兰教的圣法提出的法律上的意见），宣称如果为了恢复曾经被穆斯林统治过的领土，如塞浦路斯那样的地方，就可以允许废除和平条约。威尼斯立法机构的一些成员，主张割让塞浦路斯以换取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新的商业特权；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向苏丹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赠以厚礼，和他们取得和解。但是，在威尼斯和在伊斯坦布尔一样，主战派占了优势。国务议事会深信：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必将得到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所以，在1570年春季当奥斯曼正式提出割让塞浦路斯的要求时，他们的拒绝是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关闭了通向进一步谈判的大门。

1570年7月，穆斯塔法帕夏率领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在塞浦路斯登陆。此时，教皇庇护五世也正在尽力促成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盟。然而，在他们的谈判过程中却充满了怀疑、拖延和钩心斗角的气氛。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原因，不久就清楚了。正像1537—1540年^[11]一样，西班牙专心致志于在北非实现其野心和保卫西部地中海的利益不受来自阿尔及尔海盗的侵犯；而威尼斯则致力于维护其在黎凡特残余

的主权，二者很难一致。西班牙腓力二世应教皇庇护五世的请求，终于同意派出一支分遣舰队去援助威尼斯。但是，直到1570年8月底西班牙和罗马教皇的分遣舰队，才在克里特岛的苏达与威尼斯的舰队会合在一起。然而，由于基督教舰队高级将领意见分歧，仍然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当奥斯曼于9月9日攻陷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消息传到离小亚细亚南部海岸不远的卡斯特洛里索时，他们的全部舰队在毫无重大战事的情况下，就驶回克里特岛，并由那里开往意大利海域。

在1570—1571年冬季及以后，西班牙、罗马教皇和威尼斯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终于在1571年5月15日签订了建立正式联盟的协议，其目的是将作战范围从地中海东部扩大到北非。一支新的基督教舰队在1571年9月集结在墨西拿。但已经太晚了，来不及援救塞浦路斯。威尼斯在这个岛上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法马古斯塔在被围困了将近11个月之后，已于1571年8月1日向奥斯曼人投降了。然而，基督教舰队在奥地利的唐·约翰指挥下，却取得了一项显著的成就，1571年10月7日在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实际上消灭了奥斯曼的全部舰队。虽然这次战役打破了自1538年普雷韦扎战役以来奥斯曼人所享有的海上优势；但是，勒班陀战役只能被看作是一个胜利的象征，而没有取得积极的实际成果。对于想乘胜扩大战果的基督徒来说，在地中海进行海战的时机还十分遥远，而且在勒班陀战役中他们的船只和水兵也损失惨重。在1571年的冬季和1572年的春季，奥斯曼人以最大的顽强的努力建立和装备了一支新的大型舰队。这支舰队在杰出的将领乌卢杰·阿里帕夏统率下，于1572年左右在距离凯里戈、纳瓦里诺和莫东不远的海域，挫败了基督徒要赢得第二次而且是针对其穆斯林敌人的决定性战役的企图。基督徒舰队在1572年战役中，实际上未能取得任何重大战果。

威尼斯对于这次战争的结果甚为不满。这次战争耗费巨大而又未能取得胜利；而且还失去了它在黎凡特的商业，以及它习惯于从奥斯曼帝国输入的重要的粮食供应。于是它谋求与苏丹媾和，在1573年3月以割让塞浦路斯和赔偿巨额战费而与苏丹达成了和议。西班牙被剩下单独和奥斯曼人作战，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北非。查理五世皇帝早在1535年就在突尼斯建立了一个保护国。港口要塞拉戈莱塔成了西班牙统治这个保护国的主要的根据地。1569—1570年冬，乌卢杰·阿里帕夏率军由陆路从阿尔及尔进入突尼斯。西班牙所扶植的穆斯林亲王从

那里逃往拉戈莱塔避难，帕夏攻下该城，并在城内驻兵。奥地利的唐·约翰从西西里驶往突尼斯，在1573年10月把它重新置于西班牙统治之下。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但也注定是不能持久的。1574年7月，乌卢杰·阿里帕夏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突尼斯面前。经过短期的围困以后占领了这个城市 and 拉戈莱塔要塞。奥斯曼在1574年征服突尼斯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实质上，它标志着西班牙和奥斯曼争夺北非的长期冲突的结束。这场冲突是为了决定究竟是将北非置于基督教统治下还是仍旧由穆斯林统治。依附于苏丹的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作为海盗国家即将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明显地标志着这场冲突的解决有利于穆斯林，而西班牙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斐迪南开始的对非洲沿岸的征讨则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塞浦路斯战争使奥斯曼人在尼科西亚、法马古斯塔和突尼斯战役中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在人力和武器弹药方面的损失也很可观。而勒班陀战役几乎摧毁了他们的海上有生力量；其后，他们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匆忙地建立一支能与基督教舰队相抗衡的新舰队，这些都使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而，奥斯曼人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拿下了塞浦路斯和突尼斯。可是，从1578年到1590年，与波斯进行的长期战争，使他们在人力物力上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而获得的却是一个性质不明确、时间不长久的胜利，这在后来的事态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

苏莱曼大帝在反对波斯的战役中，已将伊拉克和小亚细亚的埃尔祖鲁姆和凡湖^[12]周围的地区并入奥斯曼帝国。1555年在阿马西亚签订的和约，将这些征服地割让给奥斯曼人。奥斯曼帝国政府这时没有理由担心波斯重新向小亚细亚进行宗教和政治扩张，尽管萨非王朝创始者沙·伊斯梅尔（卒于1524年）统治时期曾因向小亚细亚扩张而名声大振。过去的紧张局势和不信任的因素，仍保持着许多从前的影响：把奥斯曼和波斯分开的仇隙是，前者属于逊尼派，即正统的穆斯林，而后者则笃信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奥斯曼控制的小亚细亚地区存在着许多亲什叶派的人们，所以被苏丹政府所怀疑；还由于奥斯曼和波斯的领土边界划分不明确而产生的地方争端，引起了无休止的刺激。此外，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立变得更为复杂。苏丹和沙（波斯王）为了取得高加索山区各小公国的臣服关系而互相竞争，这些小公国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这个广阔地区的西部处于

奥斯曼的影响之下，而东部地区则属于波斯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廷臣谋求和特兰索萨尼亚的乌兹别克土耳其人建立并加强一个有效的协议。这些土耳其人信仰正统穆斯林，是萨非政权的死敌，因为萨非王朝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对波斯东北部呼罗珊大片省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在欧洲政治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很强的信念，认为沙的军队也许是可以用来阻止奥斯曼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有力工具。所以，奥地利、威尼斯和西班牙这些国家，便常常与波斯互派大使和进行外交上的交往，但由于交通上的困难，他们未能结成一个反对奥斯曼人的联合阵线。

在奥斯曼和萨非王朝争夺的这个广阔地区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俄国人向黑海、高加索和里海的推进。伊凡四世于1552年征服了喀山，四年以后又征服了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俄国军队向南推进远达高加索高原稍北的捷列克河。沙皇所造成的这种局势，使奥斯曼帝国政府不能忽视。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商人以及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朝圣者，经常感到难以经由萨非王朝的波斯进入奥斯曼帝国。现在，这些穆斯林通往黑海沿岸的道路，也变得难以通行。苏丹作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的保卫者在伊斯兰教世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有责任保卫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利益。此外，苏丹不得不考虑的是，俄国继续向前推进将给奥斯曼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明显的不利。1569年，奥斯曼军队试图征服阿斯特拉罕，但未能成功。这次战役未能实现的目的还包括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开掘一条运河。开掘这样一条运河，将使奥斯曼有一条由黑海沿着顿河经过伏尔加河一直到达里海的航路。毫无疑问，伊斯坦布尔的廷臣们所考虑的绝不仅仅限于将伏尔加河下游周围地区的土地置于奥斯曼控制之下。打通到达里海的通道，意味着可以同特兰索萨尼亚的乌兹别克可汗直接接触，并且可以把兵士、武器弹药运往高加索的中心地区和波斯北部。阿斯特拉罕战役的失败，确实使奥斯曼人不能利用顿河和伏尔加河向萨非王朝发动新的战争。可是，奥斯曼人并未因此而放松寻求通向高加索北部的其他通路的战略可能性的劲头。事实上，1578年开始的与波斯的大战期间，奥斯曼确曾打算让其军队从克里米亚跨过库班草原进军到里海海岸。

苏莱曼大帝的出征，已经显示了奥斯曼人在对波斯作战中所面临的困难的严重性：运输线太长，气候严酷，地形不利，可作战的季节

太短，后勤问题严重，以及在人力、畜力和给养方面损失太大。^[13]这样一场战争对奥斯曼士兵来说，除了要冒死亡、负伤和疾病等通常的危险外，还要饱受酷暑严寒的折磨（一位德国人于1553—1555年在帝国旅行时，曾在伊斯坦布尔见过一些人由于在东部前线冻伤而失去了双脚）；并要在遭受萨非王朝破坏的地区忍受饥饿；有时还由于大部分骆驼、骡子和马匹死亡，不得不丢弃大量武器弹药和帐篷。此外，由于沙的军队惯于采用退却、骚扰和躲避战术，在城市中和土地上不给敌人留下可以利用的东西，因此奥斯曼人掠夺战利品的希望是极小的。当时史料记载表明，东方的几次战役，对奥斯曼军队的士兵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尽管中央政权想方设法刺激他们的士气，甚至让正统的逊尼派的乌利马以法律形式宣布：什叶派也和基督教徒一样，是他们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仇敌，因此把战争中掠夺的什叶派穆斯林作为奴隶出卖是合法的。如此偏激的措施注定得不到积极的响应。

沙的军队利用“焦土”战术，一般来说避免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对奥斯曼军队进行骚扰后就撤退到自己领土的深处，因此，奥斯曼人很难迅速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奥斯曼人曾数次占领大不里士，随后又放弃，这样做收不到什么效果，伊斯坦布尔的廷臣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很困难的抉择：或是满足于东部边界的现状，或是在新的战争中扩大作战范围，使战争的性质升级。如果不想重复在早先几次战役中所经历的艰难的前进和疲惫的后退那种令人心灰意冷的过程的话，唯一可供选择的另外一条路就是：发动全面的进攻，并坚持下去，在奥斯曼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上不惜任何代价以获得彻底的胜利，并永久占领埃尔祖鲁姆和凡湖以外的广阔地区。

使奥斯曼人最后终于下决心重新发动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沙·塔赫马斯普（1524—1576年）在位末期，波斯国家内部又增长了严重的危机。昔日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北部前来支持萨非国家创始人伊斯迈尔的土库曼人，已在波斯获得军人贵族的特权地位。^[14]在伊斯梅尔时期作为萨非运动的动力和团结因素的宗教热情已经开始冷却；土库曼部落之间的世仇暴露出来。此外，在伊斯梅尔的儿子塔赫马斯普统治时期，来自格鲁吉亚、切尔卡西亚、希尔凡和达吉斯坦的各类高加索人，已在国家的宫廷事务和武装部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对土库曼人的统治地位构成一种新的严重威胁。因

此，在塔赫马斯普死后，土库曼各部落之间以及他们与这个政权内的高加索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爆发为公开而又激烈的暴力行为。

土库曼人和高加索人这两个主要派别，都在利用王族内部的屠戮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因此，这两派人之争在表面上就成为王室纠纷。高加索派系企图同土库曼人的乌斯达克鲁部落结成联盟，来推戴自己的王位候选人登上王位，结果由于他们的被保护人塔赫马斯普的儿子海德·米尔扎于1576年5月被谋害而告失败。塔赫马斯普的另一个儿子伊斯梅尔在土库曼派系推戴下登上了王位。在他不到两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几乎杀掉了萨非王室的全部男性成员，还把一些最有权势的埃米尔（王公贵族）和显要人物也都处决了。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增加了恐惧和不信任，使他的什叶派臣民怀疑他倾向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这就导致了他在1577年11月的倒台和死亡。

阴谋诡计和派别斗争的风气，仍然存在于整个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统治时期（1577—1587年）。这位君主由于患病而半盲，他只不过是土库曼酋长们手中的工具而已。这种风气还影响着高加索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小公国。其中有些小公国由于长期受萨非王朝的影响，已分别与沙的宫廷中的某个派别结合在一起，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在抗击奥斯曼人于1578年开始的进攻时，其士气不仅受战争实际状况的影响，而且随萨非政权派别斗争过程而变化。伊斯坦布尔的某些高级官员，如著名的穆斯塔法帕夏和锡南帕夏更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与波斯的长期斗争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苏丹穆拉德二世（1574—1595年）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尽管穆罕默德·索科利宰相为如此雄心勃勃的冒险事业的后果担心，因而提出相反的意见，苏丹还是决定试图永久占据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广阔地带。

在波斯战争时期，埃尔祖鲁姆是奥斯曼人的主要基地，他们沿着陆路经过小亚细亚或是通过海路直达特拉布宗，可以把士兵和军需品等运到这个地方。1578年夏天，奥斯曼最高统帅穆斯塔法帕夏在这里集结了大量的近卫步兵和波尔特的西帕希，还有埃尔祖鲁姆、迪亚巴克尔和锡瓦斯的“封建”西帕希，以及祖伊卡德尔、卡拉曼和阿勒颇的“封建”西帕希。奥斯曼人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征服格鲁吉亚及其相邻的领土。这个广阔地区此时已分为许多小公国：卡特利（包括第比利斯）、卡克提、伊米勒提、萨姆茨基，即默斯基亚（包括阿哈尔齐赫，即奥斯曼人所称阿尔通卡勒）；古里亚和明格列利亚等小公

国。穆斯塔法帕夏于1578年8月在彻尔德尔湖附近打败了波斯人，就在一个月占领了第比利斯，并留下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穆斯塔法帕夏随即向里海沿岸地区移动，在那里又战胜了波斯人，这一胜利使他能够强渡卡纳克河（或称阿拉赞河），然后占据了阿拉什。这个地方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因为它控制着从第比利斯通向希尔凡的沙马基（Shamakhi）和达吉斯坦的杰尔宾特的道路，也控制着通向甘贾、埃里温和大不里士的萨非诸要塞的道路。在阿拉什，穆斯塔法帕夏在撤退到埃尔祖鲁姆的冬季营地以前，对已侵占的领土的管理工作和未来的作战做了安排：把卡特利和第比利斯改为奥斯曼的一个省；卡克提仍由从属于苏丹的一个格鲁吉亚君主来统治；在苏呼米，由奥斯曼的一个帕夏管理黑海东岸地区的事务；将攻克尚未降服的希尔凡和达吉斯坦的任务交给奥斯曼帕夏统率下的一支独立部队来完成。在奥斯曼人向埃尔祖鲁姆撤退过程中，伊米勒提、古里亚和萨姆茨基的君主们表示愿意归顺穆斯塔法帕夏。奥斯曼人在这次最初的主要战役中，获得了很大胜利，但是离彻底的胜利还很远。为了巩固对格鲁吉亚的控制，他们于1579—1584年采取了艰苦而耗费巨大的行动：1579年在卡尔斯修建了一座大堡垒；1583年占领了埃里温，并重新修筑了防御工事，1584年在通往第比利斯的路上，如在哥里、托马尼斯和洛里修建了不太复杂的防御工事。此外，奥斯曼人为了“护送”人员和物资来支援第比利斯和其他地区的驻军，每年还必须进行大量的并且往往是艰苦的战争，因为他们时常遭到萨非人和他们的格鲁吉亚同盟者的封锁和骚扰。

这期间，奥斯曼帕夏在里海西岸地区进行了一连串辉煌的战役。虽然他于1578年在库拉河打败了波斯人，但他所统率的军队却未能夺取希尔凡。于是，他们便撤退到杰尔宾特，在这里可以控制位于达吉斯坦山脉和内海之间的一条大约6英里宽的狭窄的沿海通道。从1579年直到1583年，奥斯曼帕夏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和以寡敌众的情况下一直坚守在那里。1582年底，他终于得到足以发动反攻的增援，鲁美利的精锐部队从克里米亚的克法渡过库班河与捷列克河到达杰尔宾特。这次行军十分艰巨，几乎走了12个星期，沿途不断受到高加索北部的卡尔梅克部落和吉尔吉斯（切尔卡西亚）部落的骚扰和袭击。1583年，奥斯曼帕夏在萨穆尔河畔又赢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从而把波斯人从达吉斯坦和希尔凡驱逐了出去，这里的沙马基和巴库两地不久就向这位胜利的将军投降。此时奥斯曼帕夏奉命将克里米亚重新置

于奥斯曼的控制之下。这是因为鞑靼可汗作为苏丹的一个诸侯逃避义务，拒绝派遣骑兵到高加索去作战。奥斯曼帕夏穿过库班草原，等到乌卢杰·阿里帕夏统率的海军前来支援时，攻陷了克法并任命一个新的可汗即位，穆拉德三世在伊斯坦布尔迎接这位著名的将军，以表示对他的最高的尊敬和宠爱，而且在1584年7月将他提升为首相来酬谢他的无比的功绩。

奥斯曼在1585—1588年出征的主要目的，就是征服阿塞拜疆。奥斯曼帕夏战胜激烈的反抗，于1585年挨近到大不里士，占领了这个城镇，并在此设防。后来由于萨非军队持续的压力，他在艰苦的退却中死去。大不里士、第比利斯和埃里温这时必须对付波斯人反攻的压力，这些地方的驻防军虽然陷入极为困难的处境，但他们却一直坚持到奥斯曼东部前线新的最高统帅费哈德帕夏于1586年前来解救。1588年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奥斯曼人攻克了甘贾和卡拉—巴格的肥沃地带。同时，1587年以伊拉克为基地在西加拉—札德·锡南帕夏指挥下进行了协同作战，这位巴格达的贝勒贝伊，终于在波斯的西部边界占领了两个省——洛雷斯坦和哈马丹。

在这次战斗的后期，导致萨非政权分裂的部落世仇突然爆发成新的暴力行动。抗击奥斯曼人的杰出人物、沙·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的儿子哈姆扎·米尔札被谋杀了。于是，穆罕默德·胡达班达于1587年6月被迫将政权让与他的另一个儿子阿拔斯（1587—1629年）。此外，在1588年和1589年特兰索尼亚的乌兹别克土耳其人侵入呼罗珊，占领了赫拉特、马什哈德和内沙布尔。由于急需克服国内派别斗争，并把乌兹别克人驱逐出去，沙·阿拔斯认识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与奥斯曼人的战争。在1590年订立的和平条约中，沙将大不里士和属于阿塞拜疆的甘贾与卡拉—巴格地区，以及希尔凡、格鲁吉亚、洛雷斯坦和库尔德斯坦的沙拉祖尔割让给苏丹。

在对波斯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场新的冲突在奥斯曼的欧洲边界开始形成。从1568年以来，虽然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保持着和平状态，但是在沿着界线不明确的边境地区，穆斯林“加齐”们^[15]与基督教边境地区统治者之间无休止的袭击与反袭击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局势随时都可能爆发成更为严重的战争状况。^[16]边境地区的“小规模战争”，如1587年在科潘、布达和坎尼扎附近以及1588年在锡克索发生的冲突，其规模已使那种相互怀疑的

和不稳定的和平有被破坏的危险。波斯尼亚的贝勒贝伊哈桑帕夏，于1591年和1592年两度侵入克罗地亚并包围了库帕河畔的锡萨克。同时，伊斯坦布尔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其中像锡南帕夏这样最有权势的人们，都极力主张苏丹对奥地利进行战争。就在这个时期，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消息传来：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加齐们于1593年6月在锡萨克被击溃，伤亡惨重，波斯尼亚的哈桑也在被杀者之列。于是穆拉德三世终于接受了主战派的意见。

在多瑙河畔进行大规模进攻，对于奥斯曼作战的战术和人力物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与匈牙利人作战就像与波斯人作战一样，必然会遇到一些需要克服的时间和路程、气候、地形和后勤方面的巨大困难。^[17]此外，与苏莱曼大帝早期统治时期的战争相比，此时的实际战争的机动性要小得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力图建立强大的防御屏障来抵御奥斯曼人。奥地利的大公即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1558—1626年在位）鼓励日耳曼人和那些从奥斯曼统治下的地方逃出来的斯拉夫和匈牙利难民到基督教的边境地区定居，给予他们宗教上和财政上的特权，作为对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由于采取了这些最初的暂时性措施，结果出现了克罗地亚和温迪施边区，从亚得里亚海沿着乌纳河和库帕河，一直延伸到萨瓦河和德拉瓦河上游地区，建成了一个防御体系，不久便配备了它本身的组织完善的军事设施，而且在1578年以后，其财政主要依靠卡尼奥拉、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的税收。这些措施使基督教徒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抵抗，他们的边防逐步得到加强，而且斯拉夫和匈牙利难民不断被招募来充实边防力量。这就激起了波斯尼亚的加齐们的强烈反应，以致引起1593年的战争。维也纳政府还力求改善和加强仍由基督教徒控制的主要要塞，如坎尼扎、拉布、科莫恩和埃劳。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要塞网，保护比较重要的通路、河流渡口和进入大要塞城镇的入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快速制胜的前景暗淡了，奥斯曼人不得不以其要塞为基础建立类似的防御体系，如贝尔格莱德、泰梅什堡、施图尔韦森堡、布达和埃斯泰尔格姆等要塞，每一个都控制着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小据点。这时，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隔着防御工事相互对峙，他们各自的统治地区就以这些工事为界。实际上，双方的边界沿着多少比较稳定的界线逐渐固定下来了。

奥斯曼人所面临的一个不小的困难，就是与他们对峙的军队的性质。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能够把当时最精锐的一些士兵，如德国人、瓦隆人和意大利人雇佣军，招来为他服役。这些雇佣军如果薪饷太低确实是难以控制并容易骚动的，然而他们却是最精于作战技术的职业军人。哈桑·阿卡菲感到痛惜的就是基督教徒使用了新式手枪和大炮，而奥斯曼人迄今尚缺乏这类武器。因此，基督教徒与苏丹的军队相比，肯定已占优势。

此外，虽然宗教改革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变化，但是，从“基督教徒大家庭”这个古老观念中所产生的那种思想感情和信念，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宗旨是要使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不分种族和语言，都忠诚地团结在一起。在同穆斯林仇敌作战的号召下，仍然有大量志愿兵应召前往匈牙利前线服役，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一位基督教徒把1593年进行的战争说成是为祖国和宗教而战。皇帝鲁道夫二世宣布他的军队将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盾牌，这只不过是反映了同代人的信念。奥斯曼帝国引起了基督教徒的巨大兴趣，许多人去读分析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和弱点的新的和老的著作；出现了许多有关的德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报纸和专著，并译成其他种文字。这些出版物论述了战争的过程和胜负，往往十分详细，并且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这个时代的一位威尼斯作家拉扎罗·索兰佐，在论述1593年开始的战争时说，“这场战争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18\]](#)这个评价绝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继波斯尼亚的加齐们在锡萨克溃败以后，接踵而来的匈牙利大战又持续了13年漫长的艰苦岁月（1593—1606年）。在这次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人不得不在多瑙河下游应付严重的局势。在此以前，那里是隶属于苏丹的，而在1594年，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举行了几次起义，并与奥地利联合起来。这三个公国的失控对于由伊斯坦布尔通往贝尔格莱德、布达和格兰的交通路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多瑙河是当时向匈牙利前线运送枪支弹药的十分重要的航道。同时，它还使奥斯曼人失去了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那里取得的大量粮食、肉类、马匹和其他牲畜。所以，奥斯曼人就不得不用相当大的力量来保卫多瑙河这条水上通道。这对正在多瑙河中游作战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显然是有利的。然而，当时这三个多瑙河国家与奥地利所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上的。特兰西

瓦尼亚的君主西吉斯孟·巴托里，由于年轻时受到周围天主教耶稣会的影响，因而有雄心和热情去领导一场新的反抗奥斯曼人的战争。他还想恢复从前匈牙利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控制。这种愿望与瓦拉几亚有权势的大公米哈伊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且，作为古老的已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斗中灭亡的匈牙利王国的继承人，哈布斯堡绝不会放过任何把特兰西瓦尼亚置于其直接统治下的有利时机。^[19]波兰也插手摩尔达维亚的事务，在战争过程中，屡次对摩尔达维亚进行武装干涉，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西吉斯孟·巴托里，由于意志不坚定，放弃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王位而将它让给了皇帝鲁道夫二世，可是后来又重新登上王位，这样一来，就使多瑙河北部地区更加混乱了。瓦拉几亚的米哈伊自称代表皇帝的利益，在1599年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1600年又占领了摩尔达维亚。他的成功引起了波兰人在摩尔达维亚以及瓦拉几亚地区的干涉；此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和被派往援助他们的帝国军队也联合抵抗米哈伊。1601年米哈伊大公被谋杀。接着，神圣罗马帝国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约有四年之久。在此期间，帝国采取了反对新教和当地士绅的措施，没收大贵族的一些财产以消除他们的影响。此外，还委派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担任官员，充当中央集权制的哈布斯堡王朝政权机构的工具。结果，特兰西瓦尼亚终于在西吉斯孟·巴托里的一位最有才干的助手斯蒂芬·博奇考伊的领导下，放弃了与皇帝的联盟，并且重新谋求与苏丹的谅解。这种结盟的变化，对长期的匈牙利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奥斯曼人的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的军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收复了早些时候丢失给帝国军队的领土。这种结盟的变化还使特兰西瓦尼亚在与皇帝和奥斯曼苏丹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独立自主权，而且不久便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匈牙利战争的最初几年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是不利的。虽然他们在1594年攻陷了拉布大要塞，但是这次胜利不足以抵消1595年格兰（奥斯曼统治下的多瑙河中游最北端的要塞）向帝国投降所造成的损失；以及锡南帕夏领导下的奥斯曼军队在此期间向倒向皇帝一边的瓦拉几亚发动全面进攻时，在多瑙河下游的久尔久被击溃所招致的惨重失败。由于局势严重，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在位）不得不在第二年亲临战场。奥斯曼人选择了坐落在靠近狭窄走廊地带的匈牙利埃劳要塞，作为1596年战争的主要攻击目标，因为该狭窄走廊地带是通

往特兰西瓦尼亚的帝国交通路线。在集结了强大兵力的帝国部队能够抵达并救援埃劳以前，这个要塞已在1596年10月12日向苏丹投降了。随后便是在那里进行了这次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野战。起初，奥斯曼人被迫后退，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最后于1596年10月26日在迈泽凯赖斯泰什的殊死战斗中，奥斯曼人击溃了基督徒。这个战役虽然未能立即产生重大的结果（实际上进行战争的季节早已过去），但是已使帝国方面无法实现其迅速取胜从而把奥斯曼人从其所控制的匈牙利领土上驱逐出去的愿望。

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艰巨的围攻战，穆斯林和基督徒双方都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帝国方面虽然在1598年重新占领了拉布，但是他们决心夺取布达的企图失败了。奥斯曼人在这一年想要占领瓦拉日丁的打算也落空了。但奥斯曼人在1600年取得了一个显著的胜利，攻下了坎尼扎要塞，尽管这个要塞处于沼泽地带之中，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尽管1601年基督徒在企图收复坎尼扎要塞时被击退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他们包围并攻克了施图尔韦森堡，不过第二年又丢失给奥斯曼人。1602—1604年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布达和佩斯附近，前者是帝国方面企图攻占而未能得到的要塞，而后者则是奥斯曼想要重新夺回的要塞——它在1602年已被基督教徒所攻陷。直到1605年当特兰西瓦尼亚又倒向苏丹一边时，这场战争才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一年中，奥斯曼人在这场战争最后的一次主要战役中，收复了格兰和几个小要塞，其中有维谢格拉德、维斯普雷姆和帕洛塔。

这时，维也纳也和伊斯坦布尔一样，要求和平的愿望已经占了上风。特兰西瓦尼亚起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使战争的形势变得有利于奥斯曼人。情况清楚地表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奥地利不会有多大收获，甚至还确实可能遭受很大的损失。1606年6月达成了一项协议，解决了斯蒂芬·博奇考伊和皇帝鲁道夫二世之间的分歧。苏丹早在1605年已将特兰西瓦尼亚许诺给予博奇考伊，并允许他继任匈牙利的王位。这项协议也规定博奇考伊及其继承人可以保有特兰西瓦尼亚。至于国王的称号，协议中只字未提。苏丹还迫切想结束多瑙河畔的长期战争。自1596年以来，小亚细亚就一直在燃烧着反叛的火焰。此外，1603年波斯的沙·阿拔斯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其目的是要重新占领在1590年割让给苏丹的大片领土。所以，不

与奥地利媾和，奥斯曼政府就腾不出手来扑灭反叛的火焰并阻挡萨非王朝的推进。

1606年11月，皇帝和苏丹之间签订了和约。长期战争使人清楚地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奥斯曼人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未能粉碎哈布斯堡王朝的抵抗。他们那庞大的作战机构，已经延伸到他们有效控制的范围以外，在沿多瑙河中游的遥远而辽阔的平原上，几乎被拖得精疲力尽。举行和谈的地点，尤其是和约本身的条款，反映了自苏莱曼大帝黄金时代以来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均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皇帝，而不利苏丹。在此以前，奥地利想与奥斯曼达成协议时，不得不派遣使节去伊斯坦布尔。但是，这次和平条约的缔结与过去不同，一扫苏丹向求和的敌人开恩的那种架势。最后一次和谈会议是在匈牙利边界齐特瓦托罗克（Zsitva-Torok）的中立地带举行的，它位于基督教的科莫恩要塞和穆斯林的格兰要塞之间，齐特瓦河从那里流入多瑙河。奥斯曼人在那里接受的条款，与其说这是出于担心在小亚细亚所面临的危险，不如说是承认了从1593年开始的战争实际上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对于皇帝来说，在一次付清总共20万盾的“礼物”以后，无须再向苏丹进贡，从而结束了他和他的祖先自从苏莱曼大帝时代以来所尽的义务。此后，苏丹在未来所有的外交往来中要给予皇帝应得的最高礼遇，亦即要平等相待。同时，每一方都保持了他们当时所控制的领土。所以奥斯曼人继续保有在1593年臣属于他们的匈牙利领地，只是增加了埃苏和坎尼扎两个要塞——作为13年艰苦战争的微薄报偿。

与波斯和奥地利进行的长期战争，除了它们的直接后果外，对于奥斯曼国家某些根本制度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战争本身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永久占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领地，奥斯曼人就要建造许多要塞，并派驻能熟练使用火器和围攻技术的驻防军。奥斯曼在匈牙利前线的作战机构，承担着进攻要塞的艰巨任务，而这些要塞往往是由熟练掌握最新作战技术的有经验的职业军人来防守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丹的“封建”武士——奥斯曼的西帕希的作用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这时，在东方前线（在西方前线则尤其是这样），最急需的是受过使用火器训练的步兵和诸如工程兵、炮兵等特种部队。“封建”西帕希是按照古老的奥斯曼传统训练的，因而不适应新的作

战方式。由于作战方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增加奥斯曼中央政府机构的雇佣军，以及近卫步兵和帝国皇室的其他特种军团。

中央政府机构的武装部队在激烈的战争行动中经常首当其冲。在东方前线艰难的战争中，由于死亡、受伤和疾病而遭受的损失是惨重的，近卫步兵就是个例子。西方前线的情况更为残酷。一位基督徒说过，匈牙利的战争犹如“人类的屠宰场”，^[20]因而帝国皇室的精锐部队在那里也不得不承受严重的损失。

既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雇佣军，又需要补充在这次长期战争期间遭受的巨大伤亡，这两个需要结合起来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过了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新兵来源根本不能满足这种双重需要。过去新兵来自战争中掳获的、赠送的或购买的俘虏；此外，还有德伍希尔迈，即从帝国基督教的臣属居民中征召来的进献男童。与此同时，由于战争急需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也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例如，把外籍青年补充到近卫步兵军团，尚未完成训练就将他们投入战斗。面对这种状况，奥斯曼政府不得不支持另一种解决办法，这种方法混淆了甚至取消了当时尚存在于基尔曼与国内穆斯林出身的人之间的界限。于是，开始大量吸收穆斯林出身的人参加近卫步兵和中央政府的雇佣军，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团体，诸如“库尔卡尔达西”（Culcardasi）即“库尔兄弟”（“库尔”就是“基尔曼”），这些人也同样是从穆斯林出身的人招募来的，并授予同“苏丹侍从”一样的特权和地位。由于背离了奥斯曼统治的“古典”体制，也就使基尔曼的传统精神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传统精神讲求高超的战术和严明的纪律，它曾对奥斯曼国家的伟业起过巨大的作用。

1566—1617年间，对于奥斯曼人来说，在商业、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出现了新的因素和新的势力，其中有一些显然是不利的。在南方，遥远的红海、印度洋和波斯湾各水域，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之间断断续续拖了很久的战争正在接近于结束。1580年，奥斯曼舰队在阿里贝伊统率下，从也门驶往乌曼，袭击了葡萄牙管辖的马斯喀特。1584年，阿里贝伊沿着非洲东部海岸南下，直抵马林迪。1589年，阿里贝伊再次采取同样的冒险行动。但是，这次在舰队到达蒙巴萨时，被来自印度西部果阿的一支占有优势的葡萄牙舰队击败。奥斯曼对葡萄牙在印度洋水域的统治进行的最后一次挑战，就这样结束了。葡萄牙人并没有力量完全控制从印度经过伊斯兰教国家通向欧洲的那条古

老的贸易路线，这是早就清楚了。自从他们紧跟着瓦斯哥·达·伽马侵入印度洋以后，曾使经过红海和波斯湾到达黎凡特诸港口的极为有利的转运贸易中断了很长时间。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葡萄牙的力量和影响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于是这一贸易又恢复起来：东方的香料和其他舶来品，此时不仅绕过好望角运来，而且重新通过苏伊士和巴士拉大量运到地中海沿岸。因此在1550年以后，阿勒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经营香料和人们渴求的波斯丝绸。同时，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也繁荣起来，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富有和重要地位。然而，这次复兴起来的古老的转运贸易，好景不长。因为比葡萄牙人强大得多的海上国家英国和荷兰随后进入了印度洋，不久就牢牢地控制了环绕非洲的海上通道。

英国人和在他们以后的荷兰人，现在开始侵入地中海。以前，英国人的商船队有时在诸如威尼斯和法国这些在奥斯曼帝国内享有商业特权的基督教国家的保护下，曾冒险进入黎凡特海域。当时在伦敦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还不存在发展密切而有利的贸易关系的条件。英格兰的商人还没有从苏丹那里获得特许权。他们在地中海的航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在国内也没有强大的机构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直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中期，才出现比较有利的形势。这时，商人们已拥有特许股份公司这种适当形式的金融机构、比以往更多的资本，以及与黎凡特发展贸易的浓厚兴趣，因为经过中东的古老的转运贸易显然又恢复了。1578年，威廉·哈伯恩作为伦敦商人爱德华·奥斯本和理查德·斯特珀的代表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得到苏丹穆拉德三世的恩赐和优惠，在1580年获得特许：在奥斯曼帝国享有与法国和威尼斯同样的商业特权。1581年，奥斯本和斯特珀与他们的同伙于1581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允许他们成立一个与黎凡特进行贸易的商业公司。在英格兰任命常驻奥斯曼政府的外交使节以前，1580年从苏丹获得的特权，一直属临时性质。1583年，哈伯恩成为黎凡特贸易公司驻伊斯坦布尔的首任代理人，同时，还是英格兰驻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任“代表”，也就是大使。他任此职直至1588年。

法国和威尼斯都不愿看到同他们争夺利益的新竞争者插足于黎凡特。此外，如果苏丹允许英格兰在他的统治范围内独立经营贸易，就会使这两个基督教国家失去数量可观的领事签证手续费，以前英国船只有付出这种费用才被许可悬挂法国的或威尼斯的旗帜航行。因此，

驻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大使和威尼斯代表，不择手段地力图破坏哈伯恩的谈判，但是没有成功。1583年，穆拉德三世将三年前他曾授予英格兰的贸易特权正式肯定下来。奥斯曼人无疑认识到，与英格兰这个基督教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可以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因为英格兰是海上强国，而且同奥斯曼人一样，也是与哈布斯堡王朝相敌对的。然而，哈伯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1578—1580年），就克服了他在伊斯坦布尔所面临的一切困难，这仍然是使人感到惊讶的。下面谈到的一个因素，对他顺利完成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

奥斯曼人因先后与波斯和奥地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作战物资，致使这类物资奇缺。英国的商人有财力，而且也愿意提供这类短缺的物资。西班牙驻伦敦大使贝纳迪诺·德·门多萨曾在1579年指出，奥斯曼人从英格兰得到了大量的锡，这是制造青铜大炮必不可少的金属。从英格兰发运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货物，包括破碎的铜钟和铜像（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从英国教堂抢劫来的掠夺物）、钢铁、铅、铜、火绳枪、滑膛枪、剑刃、硫黄石、硝石和黑色火药等。一个英国人（从1603年至1605年是奥斯曼人的俘虏）曾写过，近卫步兵“除了从被征服的基督教徒那里得到的，或是从英格兰运来的以外，没有一粒能用的火药”；而且英国人“在君士坦丁堡开设了三个销售武器和军需品的公开店铺……出售100磅黑色火药要23—24哂金诺，而在英格兰仅值3镑。锡在君士坦丁堡也是这个价格。一支滑膛枪卖5—6哂金诺；而在英国买一支普通的滑膛枪只用2马克，最好的仅值18先令”。^[21]

贸易无疑是促使英国人到黎凡特去的原动力，但是，在英格兰驻奥斯曼政府首任大使威廉·哈伯恩任职期间（1583—1588年），政治上的考虑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哈伯恩和巴顿为了英格兰和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利益，曾多次要求奥斯曼人对西班牙发动海上的攻击。而且巴顿好像欢迎1593年以前的几年中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趋势。从他下面这段话或许可以看出他的真实看法：“据我的浅见，使上帝的一个仇敌反对他的另一个仇敌，使异教徒反对偶像崇拜者，这样做不会冒犯上帝，因为在他们争吵不和时，上帝的教民^[22]就可以休息，并增强力量。”^[23]

从事作战物资的贸易，败坏了当时英格兰的良好声誉。这种海上贸易违反了基督教世界古老的习惯法——禁止把作战物资出售给异教

徒。那种古老的教义确实已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强制力，但是，以这种教义为基础的思想方式和感情，仍在新教和天主教的欧洲继续保持着，尽管此时已在衰退之中。所以，具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们认为，这种贸易“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是一种可恨而且有害的邪恶的活动”。哈伯恩和巴顿试图在奥斯曼政府达到的政治目的，对于英国声誉的损害也不小。代表罗马教会写文章的宣传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从英格兰被驱逐的天主教徒，诸如威廉·艾伦、约瑟夫·克雷斯韦尔、托马斯·斯特普尔顿、威廉·雷诺兹、理查德·罗兰和威廉·吉法德）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他们有充分理由痛斥这两个大使和他们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王是基督教的叛徒。托马斯·斯特普尔顿宣称，女王和他的仆人的最大的不虔诚，乃是煽动奥斯曼人进攻基督教世界。这种宣传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效果，使伊丽莎白女王极为不安。因此，她不得不采取主动的措施，以消除此种宣传在英格兰国内和欧洲其他地方所激起的焦虑和不信任情绪。对女王最有害的指责之一，就是将奥斯曼人和奥地利人之间于1593年爆发的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她。当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怂恿苏丹攻击西班牙这个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时，德国的新教徒很可能保持沉默。然而，他们却不会同意怂恿奥斯曼人向奥地利大举进攻。因为如果对奥地利的进攻成功的话，势必危及德国新教徒自身的利益。所以，伊丽莎白女王为了抵消逐渐增长起来的对她的不信任，在1593年派遣克里斯托弗·帕金斯带着她的指令到布拉格向鲁道夫二世申明她是无辜的。帕金斯特使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皇帝郑重地表示，由于女王对于即将到来的匈牙利战争没有责任，这使他感到满意。可是，在匈牙利战争时期（1593—1606年），天主教的宣传仍继续不断，并且连遥远的俄罗斯都受到了影响。英格兰驻奥斯曼政府大使爱德华·巴顿陪同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参加了1596年的战役。此战役使埃劳和迈泽凯赖斯泰什的基督徒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他和苏丹一起出现在战场上，对那些在莫斯科的天主教代理人是很有利的。受罗马教皇和帝国宣传的影响，俄罗斯人（罗马教廷狡猾的情报部门这时已预见到俄罗斯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潜在的并将最后毁灭它的敌人）通知伊丽莎白女王，他们对于巴顿的行为以及运输作战物资的事情感到惊愕和担心。女王不得不再一次为她的声誉进行辩解。首先，她在1597年通过在俄罗斯从事贸易的一个商人做这项工作。后来，在1600年她又将理查德·李爵士派往莫斯科，诡称巴顿是被苏丹强迫到1596年战场上的；而且英国人并未卖给奥斯曼人

武器或其他作战物资。直到事态发展表明西班牙无力征服英格兰，而且奥斯曼帝国也无力压服奥地利时，这场宣传战才开始沉寂下去；而且英国人在黎凡特所进行的争议较大的贸易，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与波斯和奥地利作战的年代里，奥斯曼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币制一直是以银阿克切或称阿斯佩尔（asper）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的岁入和支出也都用它来计算。长期以来，奥斯曼人和欧洲各国人民一样，也为一再出现的金银不足而感到苦恼。这类贵金属的严重不足，不时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为了应付这种困难和压力，历代苏丹乃将银矿控制起来，并鼓励进口银币和银块，而限制其出口；在国家商业方面，扩大以实物而不是以现金进行交易的那些部门；并在必要时降低硬币的成色。然而，大约在1580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上述情况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美洲白银被认为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的“价格革命”的主要起因。人们认为，白银数量的大量增加引起了长期的通货膨胀。白银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入热那亚和拉古萨，然后渗入到奥斯曼帝国。当大量的白银通过国际商业渠道流向东方时，在流经的每一个国家都造成了类似的后果：物价猛涨、货币贬值和成色降低、伪造货币、投机倒把，等等。但是，这种强调流通手段突然大量增加的作用，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待“价格革命”的观点，近年来已受到很多的批评。近来的一些分析认为，物价的上涨不是由于——至少不是单纯由于——从新世界流入贵金属造成的，而是由作用相等或甚至更大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现在已经注意到一个因素，这就是人口的增长比生活必需的物质生产的增长更快，从而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失调。确实有材料说明，当时奥斯曼帝国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小亚细亚人口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因此，无疑应把“价格革命”归因于许多不同原因的相互作用，而不应归因于单独一个原因所起的作用。然而，要说白银向东方的流动与奥斯曼国家当时的通货膨胀无关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从最低的估计来说，白银东流在奥斯曼人当时所面临的复杂而不利的局势中，是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再者，通货膨胀的发生，正是奥斯曼政府被迫不得不为先后对波斯和奥地利进行的长期战争筹集和支付巨额款项之时；同时也正是奥斯曼政府不得

不大事扩充雇佣军和中央政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从而意味着进一步大量增加政府支出之际。

奥斯曼政府为了缓和当时财政上的困难，于1584年颁布法令，规定每个阿克切即阿斯佩尔的含银量由1/5迪拉姆（diram）减少到1/8。这一降低硬币成色的措施，使当时苦于应付对波斯战争巨大开支的政府，暂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这样做也包藏着严重后果。阿克切与杜卡特兑换率，由60比1下降至200多比1。外国的金币和银币开始排斥减了成色的奥斯曼硬币，甚至从其国内市场把它驱逐了出去。由于开支很大，货币又不断贬值，奥斯曼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措施和所提出的要求就越来越苛刻，从而加剧了广大居民因物价上涨而感受到的艰难困苦。

通货膨胀猛烈地冲击着依靠固定收入的各阶层人们。在国家文职、行政和宗教人员当中，许多官员往往由于薪俸太低而且经常拖欠，难以维持生活，因而通过营私舞弊和贪污受贿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在帝国皇室的雇佣军当中，也出现了不安和危险的骚动情绪。过去不准参加而新近刚参加近卫步兵的人员，对于破坏这支著名部队所具有的服从和忠实的老传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近卫步兵中，以及其他领饷的军队中，纪律涣散现象的显著增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的薪给是以数目固定不变的现金支付的。由于物价的上涨，他们的薪给已经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正常需要，因此他们要求发给大量的赠品和增加薪给。这种要求带有很大的威胁，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因为如果不予满足，最终他们就会起来反抗苏丹及其大臣们。1589年，当政府打算不是用旧的成色好的硬币，而是用新的降低了成色的硬币发给他们薪给时，近卫步兵发动了叛乱。三年以后，即在1592年，波尔特的西帕希也发生了兵变，因为他们的薪给没有发足。1603年，波尔特的西帕希再次发动的叛乱尤为严重。宰相哈桑帕夏诱使近卫步兵镇压了这次叛乱。他们毫不犹豫的干预——这是造成后来他们和帝国皇室骑兵部队之间的怨恨的一个根源——表明“苏丹侍从”以前那种联合一致的团体精神，在不利事态的影响下，消失得多么迅速而彻底。

价格革命也影响了“封建”西帕希，因为他们依靠来自其采邑的固定收入为生。甚至在此以前，这些“封建”骑兵就已感到远方的出征使他们在供应和装备方面担负的费用太重，而他们所获得的战争俘

虏和掠夺物却愈来愈少。因此，不言而喻，通货膨胀对“封建”阶级的打击必然十分严重，而拥有低等或中等产量的提马尔的西帕希首当其冲。这样的采邑在小亚细亚似乎比在巴尔干半岛多得多。此外，由于在中央政权机构的人员中增长的阴谋诡计和贪污腐化，宫廷的宠信和大投机商获得了提马尔和齐阿迈特。伊斯坦布尔政府为了寻找更多的税收来源，将正常变动过程中空闲出来的大量采邑收回，故意不予重新授出，留作政府自己来使用。提马尔的数量从此开始逐渐缩减，而称为“喀西沙希”的苏丹领地则相应地增加了。

“封建”体制之所以日趋瓦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从其耕地上逃亡。这种现象意味着，由于缺乏劳动力，常使采邑的收成减少。甚至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正当帝国的权势和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卢特菲（Lutfi）帕夏在1541年被免去宰相职位后，在他写的题为《阿萨夫纳米》（*Āsāfnāme*）的短文中，就感到有必要提起注意农村人口减少的危险性，并建议向农民征收的税额不要过高，并防止农民遭受省政当局可能施加的压迫。

帝国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耕地的增长。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硬币成色降低，以及中央政权机构和省当局此时所施加的财政压力所造成的结果，逐渐出现了许多无业游民[称为“孤尔伯特太费希”（*ghurbet tā' ifesi*）或“勒亡达特”（*Levendāt*）]，尤以小亚细亚为最。他们都是被迫从农田上逃亡的人，其中有些人为了解除困苦而沦为强盗；另外一些人则流入当地城镇，成为漂泊不定、难以管理的无产者。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随时都会闹事。“勒亡达特”和“封建”西帕希所感到的抑郁和不满，到1553年时都集中在苏莱曼大帝的儿子穆斯塔法身上。穆斯塔法在那一年被处死以后，苏莱曼剩下的两个儿子谢里姆和巴耶济德为了奥斯曼王位的继承权问题发生了内讧（1558—1559年）。这两个王子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军队，设法获得了“封建”西帕希及其杰布里武士以及被迫逃离农田的穆斯林的支持。然而，为了取得这些人的支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谢里姆和巴耶济德不得不授予这样招募来的大量士兵以一定的地位，使他们在身份和权势方面与中央政权机构的雇佣军和“苏丹侍从”相同。^[24]需要做出这样大的让步，表明在恶劣形势的压力下，帝国的穆斯林出身的臣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愿接受他们自己被排斥在以往只有帝国皇室成员才能享有的国家最高权力和特权之外这种状况。显然，通货

膨胀的袭击、中央政府苛刻的财政政策和“封建”体制的日趋瓦解，更加扩大和加剧了农民从其耕地上逃亡的现象，从而使帝国各省已普遍存在的骚动日益严重，甚至达到了爆发危机的程度。这时在小亚细亚出现了真正的威胁，那就是不满现状的“封建”阶级和农民可能会联合起来发动叛乱，来反对中央政权机构及其拥有特权的人员。而这是最难对付的叛乱，因为参与叛乱的将会有“勒亡达特”，他们有许多人曾作为非正规兵参加过对波斯和奥地利的战争，并已获得了作战经验。这场叛乱还会得到有熟练的作战技术的“封建”西帕希及其随从的援助。

事态的发展确实如此。从小亚细亚征召来为1596年的匈牙利战争服役的“封建”骑兵，在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中消极应付。而且，应召前来作战的西帕希，有相当多的人不上战场。战后被晋升为宰相的西加拉-扎德·锡南帕夏采取严厉措施来对付这种局势。有关这个时期的奥斯曼编年史，把1596—1610年期间席卷小亚细亚的巨大叛乱浪潮，归因于上述严厉措施在“封建”西帕希中间激起的强烈怨恨和“勒亡达特”的日益增长的骚乱。奥斯曼人把这个运动叫做库卢吉-哲拉尔延（*Khurūj-i Jalaliyān*），即哲拉尔叛乱。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一个叫作阿布达尔哈利姆（*Abd al-Halīm*）的人，被称为卡拉·雅兹吉（即“黑书记”），还有他的兄弟德里·哈桑。他们进行掠夺的地区是从鲁哈（乌尔法）直到锡瓦斯和开塞利，从小亚细亚南部的阿尔比斯坦地区直到北部的贾尼克地区。伊斯坦布尔政府企图离间卷入起义高潮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封建”西帕希（他们大部分是被授予采邑的武士，但收入不多），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那些“勒亡达特”中最知名的人物；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受经济和财政的压力而逃离农田的为数众多的无业游民。确实，一旦“勒亡达特”和起义民众失去西帕希的合作，遍布小亚细亚的不满情绪对中央政权机构的威胁显然就小得多了。奥斯曼政府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表明苏丹的穆斯林出身的臣属是如何坚决地闯进拥有显赫的权势和特权的领域，而在此以前，这个领域是属于拥有基尔曼身份的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出身的人的。卡拉·雅兹吉接受苏丹的任命，当上了桑雅克贝伊，即省长；后来他的兄弟德里·哈桑被提升为贝勒贝伊的职位（管辖几个省的总督）。与此同时，卡拉·雅兹吉和德里·哈桑的一些最重要最密切的追随者，也得以进入“苏丹侍从”的行列。然而，这种措施赢得的仅是暂时的和部分的胜利。在小亚细亚又出现了新的叛乱。

头目，例如，在艾金和萨鲁汗，在布鲁萨地区，在卡拉曼和西利西亚。因此，对叛乱分子采取坚决行动的必要性，一年比一年更为紧迫了。这一情况很能说明为什么在匈牙利前线的战况一出现有利于奥斯曼的局面，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就愿意与奥地利人言和。有才干有魄力并在齐特瓦托罗克（Zsitva-Torok）享有盛名的穆拉德帕夏，因在那里建树的重大功绩而被任命为宰相。在一连串的严酷战斗中（1607—1610年），他用欺骗、背信弃义和武力相结合的手段粉碎了这次起义。他残酷无情地扑灭了大部分的反抗，在这个已经遭受了几十年劫掠的国家，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然而，经济和社会不满的基本原因仍然原封未动，并将在今后继续起作用。

与此同时，在1603年奥斯曼人和萨非王朝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战争。波斯的沙·阿拔斯（1587—1629年在位）在他统治的最初15年期间，征服了在萨非国内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的土库曼酋长们及其部族，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无情控制之下。他扩充了从高加索尤其是从格鲁吉亚招募来的雇佣军，并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这些士兵已不再具有部落的特性，而只隶属于他个人，并构成了阿拔斯所征召的所有部队的坚强核心。这些部队被用来对付在1587—1597年间从特兰索尼亚一再侵入呼罗珊从而构成很大威胁的乌兹别克土耳其人；并在其后，在1598—1602年间，把乌兹别克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领土。这位沙在成为波斯的真正主人，并战胜了乌兹别克人的挑战后，立即把注意力转向重新征服在1590年被迫让与奥斯曼苏丹的那些地区。他通过英国人安东尼·雪利和罗伯特·雪利这样一些使者，力图 and 欧洲的某一个或更多的国家建立一个反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联盟，结果失败了。然而，即便没有基督徒的援助，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那些国家里恢复萨非王朝的统治的时机也已成熟了。因为奥斯曼在高加索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武装占领，在这个广阔地区内，只是控制了交通干线和重要的战略中心。或许除了在长期受奥斯曼影响的某些西部地区以外，奥斯曼在高加索其他地区的统治时间太短，尚未建立巩固的基础，因而广大人民对奥斯曼的统治依然感到格格不入，而且其中大部分人还与萨非政权保持着昔日的密切关系。此外，奥斯曼帝国正在对奥地利作战并忙于应付小亚细亚的叛乱，这种情况也给沙·阿拔斯带来明显的有利条件。这种条件究竟多么有利，这在1603—1607年短暂的五年内就很清楚了。奥斯曼在高加索的统治本来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此期间倒塌了，几乎完全变成一片残砖碎瓦。大不里士、埃里温和

甘贾、杰尔宾特、巴库和沙马基、第比利斯，甚至卡尔斯也都相继落入沙的军队的手中。在结束对奥地利的战争并将小亚细亚的起义镇压下去以前，奥斯曼实际上腾不出手来发动真正的反攻。因而奥斯曼在这些年间只是进行了时断时续的抵抗，而且收效甚微。1605年，西加拉-扎德·锡南帕夏向大不里士推进，但是在这次战役中遭到了失败；由于损失惨重，撤退到凡城和迪亚巴克尔。穆拉德帕夏将小亚细亚的叛乱镇压下去以后，于1610年进军到大不里士并洗劫了这个城镇，因为沙·阿拔斯在这里并没有设防。然而，在这次战役中也只有这一仗值得称道，因为帕夏不久就撤退到埃尔祖鲁姆的冬季营地了。实际情况是：苏丹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在位）和他的大臣们由于考虑到国外持久战和国内无法根绝的叛乱的巨大压力，都不想与波斯进行一场大战，因为这场战争很可能和1578年开始的战争同样艰苦和旷日持久，而所取得的结果也只能是暂时的。于是这两个国家在1612年媾和，奥斯曼人交出1590年割让给他们的大片土地。由于对协议条款的解释发生了争执，1615年再次爆发敌对行动。1616年奥斯曼人包围了埃里温，并重建卡尔斯要塞。但是，由于艾哈迈德一世于1617年去世和奥斯曼的一支军队于1618年在巴格达附近溃败，这场战争很快就结束了。1618年9月缔结的并于1619年9月批准的和平协议实际上重申了1612年协议的条款：奥斯曼人再次放弃了1590年割让给他们的土地，也就是同意恢复到苏莱曼大帝晚年时期存在的状况。

奥斯曼帝国在其几乎无力控制的各种力量的冲击下，在1566—1617年间从强盛繁荣的顶点坠落到明显的衰落状态，虽然还只是刚刚开始。对于奥斯曼人在这些年间的教训，总结得最好的或许是一位英国人，从1621—1628年任英格兰驻奥斯曼大使的托马斯·罗爵士。他作了很恰当的评价。他写道：奥斯曼帝国可能“存在下去，但是永远不能再崛起了”^[25]。

（高仲君 译）

[1] 关于这个名词详见第348页注。——译者注

[2] 然而，帝国的伊斯兰教、法律和教育机构的控制权，还是专门保留给了苏丹的穆斯林出身的臣属。

[3] “波尔特的西帕希”这个名称，通常用以指皇室骑兵部队——它来源于意大利语的Spahi di paga（有饷的西帕希），但不能和“封建”骑兵相混淆，虽然后者通常也被称为“西帕希”（有关他们的情况，见下面第373—374页）。

[4] 阿克切（akçe）或阿斯贝尔（asper）是奥斯曼的一种小银币；按照苏莱曼大帝时期实行的兑换率是60阿克切等于一个威尼斯金币杜卡特（ducat）。

[5] 阿列（土耳其语），意为排列成阵势的一队士兵。

[6] 参见前面第347页注。

[7] 沙利阿（shari‘a）本意是“到饮水处的道路”“康庄大道”。——译者注

[8] 国务议事会（Signoria）又称小议会，是威尼斯城市共和国的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就是它的共和国政府。——译者注

[9] 帕夏（Pasha）是一种官衔，原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统帅的最高称谓，后又用以称呼在他统治下的各省总督。——译者注

[10] 穆夫提（Mufti）是法律顾问，苏丹在每一个城市和大镇都委任一个穆夫提，负责解释圣法。——译者注

[11] 参阅第2卷，第519—520页。

[12] 参阅第2卷，第516—517、524—526页。

[13] 参阅第2卷，第526页。

[14] 参阅第1卷，第404—406页，萨非国家形成的简要说明。

[15] 加齐（ghāzi），即“护教战士”，一般意译为“击败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勇士”，因未能完全符合原意，故从音译。——译者注

[16] 参阅第2卷，第521—522页。

[17] 参阅第2卷，第514—515页。

[18] 索兰佐：《奥斯曼帝国》（费拉拉，1599年），序论第4部分。

[19] 参阅第2卷，第512—513页。

[20] A. 塔都希（Tarducci）：《战争机器，古今军纪与兵营》（威尼斯，1601年），第38页。

[21] 《国家历年文献，西班牙部分》（1568—1579年）第609号，（1580—1586年）第256号；T. 雪利（Sherley）爵士：《论土耳其》（E. D. 罗斯编），拉姆登杂文出版社，第16卷，第7期，第9—10页。

[22] 即新教徒。

[23] I. I. 波迪（Podea）：《关于伊丽沙白女王的东方政策（1590—1593年）的探讨》，载于《通史杂集》第2卷，第9页（克卢日，1938年）。

[24] 参阅第2卷，第527—530页。

[25] 《托马斯·罗爵士于1621—1628年出使奥斯曼政府时的谈判活动》（伦敦，1740年），第809页。

第十二章 波兰和立陶宛

亚盖沃王朝在中欧和东欧统治了将近200年，它的最后一个男性后裔西吉斯孟·奥古斯都于1572年6月25日在他所喜爱的克内申乡间别墅逝世了。这位极为威严而又非常仁慈的君主，在语言学方面很有才华，并且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学家和演说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和热心的挂毯收藏家。他没有后嗣，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那主要是他生前建立的。这个王国是一种联盟，由从前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统一在亚盖沃王朝之下而形成。它包括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及其罗塞尼亚人领地、马索维亚公国、王领普鲁士（但泽、波美拉尼亚）、公爵领地普鲁士、库尔兰（Curland）公国和利沃尼亚。这个庞大的联盟既被称为王国，又被视为“共和国”（Rzeczpospolita），正如西吉斯孟·奥古斯都过去经常说的那样，它是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组成的共和国。这就着重地指出，这个联盟虽然包含有几个在信仰、种族和语言方面都不相同的民族，但它却共同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有一个中心议会和共同的对外政策。西吉斯孟·奥古斯都在其统治期间规划了联盟的思想，又在他的遗嘱中将其留给自己的国家。显然，这个方案在他死后能否继续下去，能否成为欧洲这个地区政治力量的源泉，在稍后的将来即可见分晓。

这个“共和国”在16世纪后半期大约有800万人口，而到17世纪前半期则有1000万以上。这个数字包括利沃尼亚的20万人、公爵领地普鲁士的30万人和库尔兰公国的12万人在内。如果不包括北部的（瑞典人的）利沃尼亚及北方公国，它的面积总计有99万平方公里，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政治单位之一。它的人口分布极不均匀，西部密度较大。大波兰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9人，小波兰为23人（克拉科夫伯爵领地）和12人（卢布林伯爵领地），马索维亚为24人，利沃夫区为10人，沃伦和波多利耶为7人，乌克兰为3人。在居民中有一种从居住很稠密的地区向东部迁移的趋势，有些人从马索维亚移居波德拉谢和立陶宛部分地区，还有些人从波兰的其他地区迁到波多利耶和基辅乌克兰。在1582年以后，利沃尼亚的人口也因移民的到来而有所增加。这些迁移，导致了有些地区的人口在血统、语言和宗教上混杂起来。

社会分化已相当严重。贵族构成最高的等级，并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他们认为本阶层所有成员是完全平等的。但无论理论上怎样，实际上并不平等。其经济地位就差别很大。几十个家族占有广阔的区域，有时候包括几百个村庄和一些小城镇，因而在公共事务上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一大批贵族每人拥有三个或更多的村庄，但许多贵族只有1—2个村庄。最后，一半以上的贵族和农民一样，除了一窄条土地外什么也没有；他们自己耕种着这块土地，只是由于他们的贵族身份和不依赖于地主而与农民有所不同。也有一些贵族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土地而成为无地者（*impossessionati*）。他们常常从土地占有者（*possessionati*）那里租种土地或受他们雇用管理地产；其中也有些人进入城市与市民混杂在一起。富豪贵族和乡村贵族虽然在经济地位上差别很大，但他们都享有公民权，参加各伯爵领地的议会，并通过他们的代表参加国会。因而在选举产生的国会里可以看到：贫穷的农民贵族远道步行而来，而富豪贵族则由其臣属和随从前呼后拥，形成壮观的行列。

贵族散布在全王国的所有地区，但他们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各地不同。富豪贵族的大地产主要在王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在立陶宛、沃伦和乌克兰；在波兰本土只有少数大地产。贵族在人口中百分比最高的是在马索维亚和波德拉谢地区，在那里占20%以上。在立陶宛各地区的百分比大约也是20%。在整个共和国各地，贵族大致不到总人口的10%。然而，一半以上的贵族是乡村贵族，他们除了一窄条土地外一无所有。

在贵族中，除了经济上的差别之外，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也普遍地存在差别。有些贵族在波兰的大学或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外的大学受过教育。在政治首脑当中，例如国王政府大臣约翰·扎莫伊斯基曾经担任过帕多瓦大学的校长；波兹南伯爵斯塔尼斯拉夫·戈尔卡担任过维滕贝格大学的校长。有些权贵也像国王那样，在家中豢养着艺术家、建筑师和文学家。然而，多数贵族并没有受过教育，对比之下，他们举止粗野、眼界狭隘，尤其是那些必须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贵族更是如此。

在贵族中存在的另一个差别，即在参议院拥有席位的家族和没有席位的家族之间的差别。参议院成员的资格虽然不是世袭的，但实际

上是由一批数量有限而且权势较大的家族把持着；但是，国王偶尔也推荐一些可望更忠于他的政策的贵族进入参议院。

贵族们十分明白他们自己等级中的平等原则，根本不希望通过授予充分公民权而把这一平等原则扩大到其他等级。贵族们坚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为下等阶层生来就不应在国家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种主张并不适用于教士，他们仍享有中世纪的教会特权，虽然这些特权正被逐渐削弱；例如在1565年，教会法庭的“世俗之臂”（*brachium Seculare*，由国家协助执行其起诉状）被取消了，这大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力。同时，大主教、主教和许多大教堂牧师会的职务也总是落到贵族手里。到1607年，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高等会堂、高级教士们了。不过，僧侣等级和整个贵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社会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其中有些是土地所有者，也有些没有土地。在一个村庄里有土地的农户大约有12户左右，土地使用条件由习惯法或契约来规定。凡自己没有可耕土地的人们，总是在封建领主庄园或其他某个农民占有的土地上干活，报酬是实物，有时也支付现金。他们也可能拥有供自己使用的一间房舍和一小块土地，或是依靠他们的雇主供给食宿。

农民占有的土地与14和15世纪相比要少多了，通常是半个“兰”（*lan*）左右（约20又3/4英亩），有时只有1/4个“兰”，分别相当于15或7摩格（*morgs*）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法迁移的人们继续寻找较好的环境，有时这些人要被依法追捕回来，有时则不加追捕。他们除了有提供实物贡品如鸡蛋或家禽的义务外，还要交纳货币地租，为雇主提供使用自己牲畜的劳役。16世纪时，货币价值跌落，这对农民是有利的。但是，这时封建主已扩大了他们的地产，因而对于劳役的需要也增加了。所以到16世纪末这些劳役地租的数额在全国各地变得极不相同，甚至连邻近的村庄有时也很不一样。一个占有半“兰”土地的农民一周要服2—3天的劳役，偶尔也受到甚至更多的勒索。而那些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则只提供劳动人手。

劳役的增加被认为是地主方面破坏了契约，但它是逐渐形成的，还没有引起任何大规模的反抗。显然，地方性的反抗是有的。例如，1574年武科瓦、奥布沙、鲁赞耶斯和扎姆什的农民对劳役的增加和类

似的压榨提出了抗议；1604年维普日和其他一些村庄的农民也提出了这样的抗议。随着东部各省的空旷地区被开拓为殖民地，在波多利耶、沃伦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村庄和小的城镇。它们的居民比波兰本土的居民享有较好的经济条件，通常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免交货币地租，并且实际上也不存在劳役。

王室领地的农民可以越过当地的庄园法庭向国王上诉，国王往往同意他们撤销不公平判决的要求。私人庄园的农民不能向国王上诉。他们完全隶属于其教会的或世俗的封建主，这些封建主为农民组织了法庭，有时颁布必须遵守的法令，有时则准许村社有一定限度的自治。

在16世纪里，城镇的人口虽然还没有西欧城镇的人口多，但已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到16世纪末，克拉科夫已经有28000多居民，波兹南大约2万，但泽超过7万，华沙大约有2万人；而卢布林和利沃夫各有1万多居民，塔尔布隆格、托伦和比得哥什的人口也达到这个数字。立陶宛最大的城市是维尔诺，大约有25000居民。波洛茨克大约有7500居民，布列斯特为6000，基辅为4000，弗洛基米尔（Vlodimir）为4000，格罗德诺为3500。在全国有一些小城市只有1000—3000人，不仅经商而且务农。一方面，一些小城市在17世纪初就显示出衰落的迹象，而较大的城市却在这个世纪中叶以前一直稳步地发展。大城市属于王室并享有自治的特权，而小城市通常为私人所有。大约有100个城市在此期间是由私人兴建的，包括扎莫希奇（1580年）在内，这座城市以其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而著称于世。

市政厅是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也是市政生活的中心。许多市政厅采用文艺复兴晚期的风格进行了新建或重建，但在小城市里市政厅皆为木材所造。许多新教堂是由市民或贵族兴建的。司法由特别市政法庭掌管，市议会掌管城市的行政和财务。城市通常装有输水管道并设有公共浴池。虽然这时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吸收了一些下层市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市议会，但这些市议会主要掌握在上层分子（富商和行会师傅）手中。私人城市的封建主和王室所辖自治城市的国王代理人对中介人不放心并自己规定价格，在市议会中强行贯彻他们的决定。这种不断增长的干预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

在16世纪，许多城市都失去了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特权，只有但泽还继续保持着那些特权。但泽的市民能够通过他们对出口商品的控制全面影响价格，这对生产者极为不利；但泽垄断了与海外商人的贸易并且阻止了内陆城市和贵族同海外商人的任何直接联系。由于贵族成功地使自己被豁免了出售自己的产品或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时缴纳过境税和关税的义务，内陆城市的商人已经苦不堪言了，而但泽的这种特殊地位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内陆城市商人的财政困难。

除了经济的和社会的差别外，全国居民还被宗教信仰造成深深的隔阂。欧洲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分界线正穿过这个国家；近来，新教各宗重新引起对宗教问题的兴趣，并从天主教和东正教中赢得了皈依者；同时争论性的著述也大量增多。不信仰基督教的居民以犹太人和卡拉派信徒为代表，还有定居于立陶宛的穆斯林。

除了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语言上也存在着差别。半数以上的人口说波兰语，他们主要居住在中部和西部的伯爵领地，与西部边境另一侧讲波兰语的居民紧密相邻。居住在人口稀少的东南部的是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和从其他省迁来的移民。在立陶宛东部的是白俄罗斯人，而北部则是立陶宛本地人。在利沃尼亚住有拉脱维亚人，其北部是爱沙尼亚人。使用德语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公爵领地普鲁士、利沃尼亚的城市、王领普鲁士，还有大波兰的一些城市；在那里，使用德语的民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波兰化了。在整个王国，城市居民已经混杂在一起，其中包括犹太人、意大利人和苏格兰人，在东南部还包括亚美尼亚人。

在亚盖沃王朝时期选举国王已成惯例，但举行选举的方法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1573年1月，当国会开会时，就曾决定反对任何代表制度，而采用个人分别直接投票的方法。人们非常看重的是选举的自由性和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的必要性：“起支配作用的，不应是暴力、金钱和欢呼声中一致同意；而是公正的辩论、共同的利益和坚定的信仰。”这个选举国王的国会是由参议院和各伯爵领地议会所组成的，参议院的成员来自王国各个地区，而实际选举则在各伯爵领地进行。各伯爵领地的议会由在国会中拥有代表的各个伯爵领地的所有贵族（包括参议员）和一些城市的代表所组成。选举人把写好的选票密封好，由伯爵领地议会送到参议院，那里是清点选票的地方。选举揭晓后表明，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兄弟瓦卢瓦的亨利以压

倒多数获胜。少数派终于让步了，按照反对派领袖约翰·弗利吉的话来说，这是为了不使“我们的国家毁灭和我们自己成为导致流血的原因”。于是，他以王国政府司法官的身份宣布亨利当选为国王。

1573年的选举基本上是以纪律和良知为特色的。参加选举的大约有4万人，而且出版发行了大约70种各类小册子，包括1200多册法国大使的演说辞。除了一阵短期混乱外，司法官能始终维持选举的良好秩序，并且对10万人的食品供应也安排得很好。

然而，1575年和1587年举行的两届选举虽然参加的人数很少（1575年大约只有15000选民参加），但相比之下却是秩序混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改变了选举的程序。贵族为了防止参议员从前在伯爵领地议会的影响，决定不要参议员参加而单独召开议会。这就导致了两个截然分开的派系，二者之间的协调行动很难实现。此外，贵族大议会实际上已不起作用，而标志首届选举特色的那种有秩序的辩论已被叫喊声和欢呼声所代替。由于国外的阴谋诡计、贿赂以及权贵武装侍从的到场而使整个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少数派拒绝让步，以致在两次选举时，各有两个候选人被宣布当选为国王——1575年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斯蒂芬·巴托里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连二世；1587年是西吉斯孟·瓦萨和哈布斯堡大公马克西米连。

这三次选举都受到国际形势的极大影响，这种国际形势在西吉斯孟·奥古斯都统治晚期就已显现出来了。西吉斯孟·奥古斯都在与瑞典（1568年）和土耳其达成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曾建立了一种政治制度。瑞典的约翰三世和西吉斯孟的妹妹凯瑟琳结了婚，西吉斯孟要约翰三世来帮助他反对俄国；不但要他援助利沃尼亚边界，还要封锁波罗的海，以阻止俄国得到武器弹药的供应。1568年西吉斯孟恢复了从前与土耳其缔结的条约，因为这时土耳其的东北部边界受到俄国的威胁，而在欧洲东南部又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西吉斯孟还谋求和法国友好，因为法国在1541年就与瑞典缔结了条约，并且在1572年又恢复了与土耳其所订的条约。有迹象表明，西吉斯孟设想由瓦卢瓦王室成员继承他的王位。从1566年以来他就公开奉行一条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这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和靠近波罗的海的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利益与他的利益相抵触。所以，西吉斯孟拒绝支持1571—1572年反土耳其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在前三次选举期间多数

派选举人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两个主要基点之上的：反哈布斯堡的情感和与土耳其人和平交往的愿望。因此他们认为要支持某个哈布斯堡或俄国的候选人是不可能的；而法国、瑞典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候选人无疑顺应这种国际形势。他们还认为十分重要的波罗的海问题，将由法国或瑞典候选人加以更为圆满的解决。忠于亚盖沃王朝的深厚感情也有利于西吉斯孟·瓦萨，他是西吉斯孟·奥古斯都的妹妹凯瑟琳的儿子，并得到西吉斯孟的另一个妹妹、巴托里的遗孀安妮王后的坚决支持。

在1573—1632年这段时间里，当选的国王们在其统治的年限以及统治的特点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瓦卢瓦的亨利在位不到两年而在波兰则统治了不到五个月（1573—1575年）；斯蒂芬·巴托里在位10年（1576—1586年）；西吉斯孟三世瓦萨即位时年仅21岁，在位45年（1587—1632年）。无论这三个国王的统治方法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的君主却不能从其思想中消除对他们母国的关心，这对其国内和国外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亨利为了确保他继承法国的王位而置波兰王国于不顾。巴托里常常制订反对土耳其人的计划，因为土耳其人正在威胁着他的母国特兰西瓦尼亚。西吉斯孟在其长期统治的全部时期内，使波兰和立陶宛的利益完全服从于他谋求担任瑞典国王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这种态度必然会加深政治上的对立并扰乱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国王与国会的关系上尤其是这样，因而人们越来越觉得必须有一个本国的王朝。

经过三次选举，昭然若揭的是：每个空位时期都给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国际关系造成了一次令人不安的动荡局面。那些在空位时期争夺王位的外国君主们，在选举结束后仍继续进行阴谋活动，谋取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利益。新当选的国王不但要安抚这个国家，使内部事务得到控制，而且还面临着对付国外阴谋的艰巨任务，从而浪费了本来能够被用来实施更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的时间和精力。

亨利得到全体一致的推选，没有竞争者，而且在国际上似乎也已建立起了十分令人满意的地位。然而，由于他竭力要收回曾对贵族做出的过大的让步却在国内遭到了困难，而正是这些让步才确保他得以当选的。^[1]在举行谈判时他还在巴黎，他拒绝了他的大使在选举时以他的名义承担的沉重的财政责任，而且还准备在抵达波兰时继续这场斗争。他打算从海路去但泽，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同意他和他的舰队以

及将去参加利沃尼亚军事行动的4000名加斯科尼步兵从这条航路通过。但是，丹麦国王根据莫斯科的授意在途中设置障碍，而且他与莫斯科的停战协定一经恢复，就摆脱了他对一支军队的紧迫需要，于是他取道陆路通过神圣罗马帝国。跟他一起前往的是他的顾问们，其中有些是法国的主要政治家，如讷韦尔公爵、雷茨和皮布拉克地区的司法官。他于1574年1月在克拉科夫即位。他在加冕典礼的誓言中断然拒绝批准《亨利条款》，因为其中含有限制他的权力的某些条文，同时一些伯爵拒绝用他的名义来执行法律；亨利的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对。由于1574年6月查理九世的去世，他为了不失去对法国王位的继承觉得必须返回巴黎，所以没有时间解决这些问题。法国人设想这两个王国在亨利的统治下联合在一起，但波兰人对于他的离去变得不耐烦起来并宣布了空位时期。亨利的当选对法国也有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得不为拉罗歇尔解围。此外，选举亨利的新教徒制定了《波兰宣言》，正如杜阿努斯所说的，其用意在于改善新教徒在法国的地位。然而，查理九世把它们看作试图对法国内政加以干涉，所以并不急于接受这些建议。

斯蒂芬·巴托里在1575年12月15日当选，并于1576年5月1日即位。他立即采取措施反对拒绝承认他为国王的但泽。这是一个经济问题。1570年国会条例抑制了但泽所享有的独占特权，并把该城市纳入整个王国的经济生活中。但泽的市民趁空位时期恢复了他们失去的地位，而且以恢复其失去的所有特权作为承认斯蒂芬的条件。否则，他们将继续支持哈布斯堡的候选人，而且他们这样做得到了丹麦的支持。在使他们承认巴托里之前，只有进行武装干涉。但泽被迫支付一笔赔偿金，然而国王也答应在下届国会中将他们失去的特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他的竞争者皇帝马克西米连在1576年10月12日早逝，整个政局已置于斯蒂芬的控制之下，这就使马克西米连的最后一批支持者承认了他的统治权。

西吉斯孟三世当选后的局势并不那么平静。他于1587年10月在但泽附近的奥利瓦登陆时，受到但泽市议会的欢迎，然后向克拉科夫慢慢地南下。这里的政局十分混乱。已故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的小儿子哈布斯堡大公马克西米连越过西里西亚的边界，打算用武力为自己取得王位。然而，王国政府大臣、有才干的约翰·扎莫伊斯基迅速调动军队救援克拉科夫，在贝奇纳战役（1588年1月24日）最终歼灭了哈

布斯堡军队。大公被俘并被监禁了将近两年。正如哥斯利基主教指出的那样：哈布斯堡遭到的这个灾难恰恰发生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的同一年。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并未轻易放弃对波兰王位的要求。经过长期的谈判，在1589年3月19日缔结了一个和平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哈布斯堡王朝，特别是马克西米连必须放弃对波兰王位的企望，还要停止在王国内策划阴谋。他们还得承诺决不帮助莫斯科反对波兰或瑞典。西吉斯孟三世、鲁道夫二世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多数成员都先后批准了这个条约。人们希望通过国会在1589年对这个条约的批准给国内外带来最后的安定；但是，马克西米连出人意料的举动把混乱时期一直拖延到1598年。尽管由于国外的阴谋和国内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极易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而使国家处于困境，但是各民族仍忠于西吉斯孟·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共有的共和国这一思想，而且他们之间在领土上的联系也显得更加牢固了。

波兰一立陶宛这时所接受的对于王权概念的解释揭示了王权的一些因素。当选的国王要由选举团的全体成员授予权力，这一点在1573年《选举国王宣言》中被明确地指出：“我们授予他波兰国王的称号……并把这个王国交给他治理。”另一方面，在加冕典礼仪式上当一位当选国王作为真正的国王和君主以“圣冠”加冕，并以“基督敷圣油于这位国王以授予其权力”为词敷圣油时，他就成为神圣职位的占有者了。此时国王被提醒要记住他的王国和权力乃是来自于上帝。正像加冕典礼誓言《契约》和《亨利条款》所表明的那样，还存在着一种中世纪的契约因素，其中所有的规定必须作为当选的条件来接受。在加冕典礼的誓言中国王要保证坚持和遵守王国的各项成文法和习惯法。《契约》宣布了国王本人的义务：如提供一支陆军，建立海军，使一定数量的青年接受教育和偿还一定的国债。1573年的《契约》是经亨利和法国的查理九世签署的，颇有国际公约的特点。不久这种国际特性就消失了，虽然它还保持着同样的名称和原有的形式，但在内容方面已成为与有关的候选人协商的结果了。《亨利条款》引出宪法改革的要求，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为了限制王权。另外，国王还必须每两年召开一次国会的例会，而且未经国会同意他不得进行战争或征税。

虽然有这些限制，国王保有的权力还是相当大的，正如讷韦尔公爵在为亨利拟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而且，国王个人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亨利条款》中的“非绝对服从条”威胁到国王的权力，亨利坚持以能够消除其直接危险的方式加以理解从而削弱了这个条款对于王权所造成的威胁。不过，虽然条款在宪法上的作用已被削弱，但对贵族心理上的作用还继续存在着。后来又规定：对于国王采取任何反对行动之前，都必须预先警告他三次，1607年和1609年，这一条款就以上述语句陈述了出来。实际上，这就把《亨利条款》中的重要内容几乎全都取消了。亨利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曾不顾反对，在王室领地实行将使他增加收入的财政改革，他心中还有其他各种改革方案。巴托里在国会辩论时毫不让步，而且有几次成功地强征了比从前允许征收的数额高得多的税金。当他被提醒应遵守契约关系时，他反驳道，各等级的人首先必须记住他们自己由契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一经被各等级的人选为国王，他决不想受制于任何人。在西吉斯孟三世统治时期，波兹南的城守奥斯特洛洛格也对贵族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西吉斯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的尊严和特权，有时甚至到了使贵族无法忍耐的地步。不过，使西吉斯孟的地位遭受极大损害的，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的对外政策引起大多数贵族对他的不信任。

国王具有各种权力和特权。他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最高的军事权力。既然他对王国的治安负有责任，未经他的同意而召集的任何集会都是非法的，其组织者要受到惩罚。在他的大臣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争执，国王都是仲裁者。掌管印刷出版事务的权力也被授予他所选定的人。最重要的是，世俗的和教会的所有高级官职都由国王来任命，这是国王的势力的汹涌之泉。巴托里和扎莫依斯基及其追随者合作，被他授予职务的大部分人选自这一伙人，这就引起兹波罗夫斯基家族和其他人的不满。当西吉斯孟三世发觉与扎莫依斯基的合作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他便指派自己的拥护者去占据参议院的席位。结果使得新教徒多少受到些冷遇，因为他们大部分追随扎莫依斯基，后来他们都拥护泽布尔茨多夫斯基并且支持他的反叛。巴托里于1578年在波兰，1581年在立陶宛建立了最高上诉法庭。1585年王领普鲁士开始处于波兰最高上诉法庭的管辖之下，乌克兰则于1589年被置于其管辖之下，但仍使用罗塞尼亚语。城市不在这些上诉法庭的管辖之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法庭。国王用这样的方法将他不能处理的审判事务

托付给法庭，而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留给自己在国会法庭解决。国王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国王权力的最大限制是，有些事情必须通过国会（Sejm）才能去做。实际上，如果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对媾和、战争或征税等问题做出决定。斯蒂芬·巴托里和西吉斯孟三世两人都感到这是他们最大的困难。当他们需要征税以便继续进行战争时，他们要依赖国会的决定，如果国会反对，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或延缓其计划。两位国王都试图与国会合作；他们根据法律每隔一年召开一次国会，甚至有时还召集一次特别会议。巴托里像他的前任西吉斯孟·奥古斯都一样，能靠其讲演来影响下议院（众议院）并常常赢得议员们赞成他的计划，特别是在扎莫伊斯基及其同伙支持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西吉斯孟三世就不那么成功了，猜疑的情绪在他和国会之间逐渐加深，使得大多数贵族不与他合作，并且常常导致公开的分裂。国王在上议院（参议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能够支配国家的政策。当参议员提出意见时，他有权终止讨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王不赞成两院的决议案，他都有权加以反对或否决。

1606年，西吉斯孟在国王拥护者的支持下，试图进行一些合理的和极其必要的改革，包括增加常备军，无须每次都经国会批准的固定的年度税收，还有国会本身及其程序上的某些改革。他建议坚决执行多数人表决通过的原则。这个原则并未被最近以前的几届国会所遵守，而且会议的进程也由于少数派的反对而中断了。他还想对演说时间给予某些限制，以便缩短辩论。国王的建议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支持。1605年的国会由于少数派决不妥协而陷于完全分裂的状态，齐兹科夫斯基主教在谈及这届国会时讽刺地问道：“难道这就是自由吗？更确切地说，这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他想要改革国会辩论的进行与停止的标准。王国政府法官米斯科夫斯基，立陶宛的大法官卢·萨皮哈，王国政府大法官普斯特洛康斯基和其他大臣都表示赞成改革。他们坚信农民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也关心社会改革。他们认为贵族也应当纳税，因为所有的财政负担都落在“我们贫穷受苦的国民”——农民的肩上是不公平的。

然而，大多数贵族由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反感并怀疑国王与这个家族相勾结，因而强烈地反对这些改革，他们怀疑国王可能还企图实行对他们不利的专制统治从而在国内事务中密谋反对他们。所以他们

拒绝接受国王提出的所有改革。这两个因素的悲剧性的纠缠给王国日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克拉科夫伯爵泽布尔茨多夫斯基是一个想在政治活动中扮演扎莫伊斯基角色的有抱负的天主教徒。加尔文教派的领袖贾努斯·拉济维乌大公，则利用反哈布斯堡的情绪在1607年发动了反对国王的叛乱。他们叛乱是为了保卫贵族的特权和自由，而为了享有这种特权和自由则不管国家要遭受多大的牺牲。例如，斯塔尼斯拉夫·斯塔德尼基曾说过，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这样的原则——每个领主都应在自己的庄园里享有绝对支配权。国王在波兰指挥官斯塔尼斯拉夫·佐尔基耶夫斯基和查尔斯·肖德基耶维奇的支持下，在古佐夫战役中粉碎了这次叛乱，但是他没有利用军事胜利的机会将其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中去，于是改革再一次被拖延下来了。

可以说，巴托里和西吉斯孟都是能与国会合作的立宪君主。他们具有一种少有的美德：能够耐心地倾听那些极为冗长的演说，对这些演说的时间甚至连国会本身也不能加以缩短，而且这些演说往往使得辩论毫无结果。西吉斯孟三世并不打算取消国会，只是想要实行某些改革，以使其效率更高。然而政府的体制在这期间正在发生逐渐的变化，不过这并不是某些改革而是事态发展的结果。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时机又错过了。国王渐渐地失去了他的权力，贵族开始召开国王无法控制的非法的会议了。

除了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外，还有宗教方面的分裂，宗教改革大大加深了这种分裂，而且它占去了国会越来越多的时间。这时天主教会已开始进行内部的整顿，并转入对新教的攻势。在格涅兹诺和利沃夫这两个大主教区的管辖下，有16个主教区（1613年增加到17个），其规模和基金都大不相同。克拉科夫主教区辖地56000平方公里，像这样的一些主教区大得使主教难以有效地工作。又如克拉科夫及其牧师会拥有385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多个村庄，像这样的一些教区都有很雄厚的基金。其他有些主教区，如基辅和卡缅涅茨则很穷。然而，天主教教阶组织的上层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首席大主教——格涅兹诺的大主教不仅在教会的事务中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在空位期间作为摄政王召集国会，在某些其他场合有权召集参议院开会。主教们在参议院拥有席位，并常常被国王或参议院指派执行重要的使命。其他的天主教僧侣不能参加国会，只能主持地方的和主教区的宗教会议。这种情况在特伦托宗教会议以后屡见不鲜，该会议的决定在1577年被这里

的天主教会所接受，国王则早在1564年便已接受了它。这些宗教会议有助于在全国僧侣中促成道德上的革新和宗教信仰上的复兴。

随着耶稣会的到来，引进了新的教育制度。在1564年和1610年间，耶稣会创办了大约20所或30所学院，在17世纪初几乎有1万名青年男子在那里学习。维尔诺大学就是受耶稣会控制的，其校长是彼得·斯卡尔加。1611年，他们打算在波兹南，后来还打算在克拉科夫创办高等院校，但为克拉科夫大学所反对，因为这所大学本身已在国内其他地方创办了几所学院。教皇把天主教的两所传教士学院交给耶稣会管理，这两个学院分别设在布拉涅沃（1578年）和维尔诺（1587年），专门为斯堪的纳维亚和利沃尼亚培养传教士。在这里培训出来的大部分是瑞典教士，还有少数英国教士。1580年，扎莫伊斯基在扎莫希奇创办了一所大学。

东正教的情况就不那么景气了。在基辅总主教管辖下，它的七个主教教区、修道院都有相当雄厚的基金，不过其基金的数额也是大不相同。然而，主教们并不是参议院的成员，其任命权也掌握在国王手中，对于各个保护人提出的推荐，国王通常还是应允的。实际上，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格斯基大公——基辅伯爵及有势力的东正教权贵——在1592年就从西吉斯孟三世那里取得了一项特权，即国王答应只有这位大公提出的候选人，才能被任命为主教。这位伯爵被认为是东正教的世俗保护者，在1597年他甚至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那里得到主教特派使节的正式称号。奥斯特罗格斯基的信件表明，东正教由于缺少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僧侣和领导人，这时正经受着严重的危机。1576年，他在奥斯特罗格创办了一所希腊—斯拉夫式的学院。在利沃夫和维尔诺的其他学校则是由一些世俗的慈善团体所创办的。卢卡利斯就是奥斯特罗格学院的一位教师，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然而，波西耶主教和特尔勒基主教以及某些显要的世俗贵族，却试图通过与罗马联合去解决问题并得到罗马教皇的使节波罗涅提的鼓励；同时，耶稣会也在为实现联合而行动。彼得·斯卡尔加在其《教会的联合》（1577年）一书中，曾设想保留东斯拉夫人的仪式，而且最终得到教皇的同意。奥斯特罗格斯基对此事似乎并无反感，但他的方式不同。这从他在1583年到1593年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设想一种更为广泛的联合，这种联合将包括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教区，以及摩尔达维亚的东正教会。但是，当时的谈判正沿着另一条路线进行着，主教们

没有同他磋商，就把大家一致同意的联合条件送到罗马，而这些条件涉及的范围却比较有限。因此，奥斯特罗格斯基反对所有的联合计划，并与新教徒恢复了他在1584年的联系。他在1595年写信给克里斯托弗·拉济维乌大公，要求与新教徒共同反对联合的建议，于是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在1599年组成一个“同盟”，以协调他们的行动。1596年，在布列斯特的东正教会议上，正式接受了与罗马联合的条件，但是东正教的两位主教在一些世俗人士（包括奥斯特罗格斯基在内）的支持下拒绝签字。那些不愿联合的东正教徒吃了不少苦头，直到1607年，国王才重新认可了这部分东正教臣民的权利。即使在这时候，他们的地位仍不完全令人满意。但在1606—1607年叛乱时期，东正教却给予国王以支持，这是意味深长的。

新教传播得相当广泛。在1591年大约有800个新教的教堂在活动，这还不包括王领普鲁士、公爵领地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教堂在内，在这些地方路德宗占多数。大波兰的路德宗信徒较少，像奥斯特洛洛格、戈尔卡和托米基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家族充当了他们的保护者。他们在贵族当中赢得了一些信徒，但主要活动在城市。立陶宛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泽和托伦的学院虽然实际上是为讲德语的路德宗信徒设立的，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路德宗信徒。在博卡诺夫和维尔诺，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学院。

加尔文宗此时已牢固地扎下了根。他们在小波兰的贵族和市民当中力量很强；在大波兰势力较弱；而在利沃尼亚又要强一些，那里的忧郁者拉济维乌大公成为加尔文宗的保护者，并且发起翻译了著名的布列斯特《圣经》。到16世纪末期，加尔文宗在小波兰大约有250个教堂，在立陶宛大约140个，而在平丘夫、塞西明、基耶丹尼和其他几个地方则建立了一些很不错的学院。

波希米亚兄弟会在1548年逃亡到波兰并定居在波兹南地区，到1570年他们在这个地区已有64个教堂，而且在莱茨琴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保护下开展活动。莱什诺城成了他们主要的精神中心，特别是在简·阿莫斯·科门斯基担任他们的学校校长以后，情况更是如此。

在西吉斯孟三世统治时期，阿里乌教派的人数已有所增加，这个教派又称作反三位一体论教派或波兰兄弟会。他们内部又分裂成若干思想对立的派别，其中最大的是索齐尼派。拉库夫有他们的一所学院

和一个印刷所，因而成为波兰阿里乌派的中心。他们的势力还扩展到许多省，特别是在建有几所学校的沃伦。小贵族和一些市民通常是他们的支持者。1612年他们有400名代表参加拉寇辛宗教会议。1618年，大约有460名代表出席了这种会议。会议由一些享有盛名的阿里乌教徒领导讨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国际上的反三位一体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阿里乌教派拥有像维尔诺城守约翰·基斯卡这样有权势的保护者。他们接受对《圣经》作自由的和唯理主义的解释。他们中有些人否认基督的神性，也否认基督徒有权携带武器或参加世俗政府。在社会方面，由于受到摩拉维亚的再浸礼教徒的影响，他们谴责奢侈的生活，谴责对农民的压迫和反对富人的特权。1605年出版的《拉寇问答》后来被译成许多种文字。

1570年，三个主要的新教教派在桑多梅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自从1555年以后，加尔文宗和波希米亚兄弟会就已达成了谅解，这时路德宗又参加了进来，于是形成了新教派的联合阵线，但阿里乌教派被排除在外。他们都同意和睦相处，但每个教派都保留着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礼拜仪式。他们同意共同举行全体的宗教会议，并且起草一个共同的教义问答，但后一项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不过，在讲德语的路德宗信徒中出现了反对派，他们倾向于仿效德国路德宗采取的对加尔文教派不妥协的态度。由于这个原因，桑多梅日协议很快就失效了；1595年在托伦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宗教会议上，路德宗退出了协议。然而，在同一年他们又与东正教重归于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新教徒的地位。

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关系，是由空位时期1573年的华沙“同盟”通过的原则确定的，根据这个原则，人们一致同意各派宗教信仰之间应当保持和平并且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人们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恐怖仍然记忆犹新。这项“华沙和约”由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世俗贵族签了字，主教中只有弗朗西斯·克拉辛斯基一个人出于和平的美好愿望在上面签了字。亨利当选后批准了这个和约，其后继者无不认可，因而成为宗教政策的主旨。

1573年的和解，似乎含有“教随国定”的原则，但这仅是在拥有地产的等级内，从总体上并未影响宗教自由的国策。在领主接受了新教的那些地区出现了这种情况：天主教僧侣被驱逐，教堂也被封闭了，或是供改革后的宗教仪式所用，尽管为了举行这种仪式常常建立

一些新的教堂。虽然旧教徒因逃避改革后的教会远走他乡去寻找旧教会好像有时受到了惩罚，但是强迫人们接受其领主的新教信仰的情况并不多见。雅各布·赛尼恩斯基抱怨拉济维乌强迫住在其领地上的阿里乌教徒参加加尔文教会；同样的怨怼有时也向着天主教地主而发。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改变了领主或领主改变了宗教信仰，某一教会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两次或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宗教归属。在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这些变化往往有利于天主教会。但是，有些领主还是愿意尊重其农民或市民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徒扎莫伊斯基不仅允许在他的扎莫希奇和萨罗格罗德领地内建立犹太会堂而且允许建立亚美尼亚和希腊教堂；东正教徒奥斯特罗格斯基在其奥斯特罗格领地上帮助建立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还帮助建立清真寺。

国王们也遵循同样的政策。巴托里虽然支持天主教会和耶稣会，但也任用新教徒，让他们担任顾问。在1571年特兰西瓦尼亚选举时，巴托里的最大竞争者和敌手科尔涅亚的加斯帕·贝克斯（1520—1579年）就是一个阿里乌派信徒；几年以后，他和巴托里取得了谅解，定居于波兰，并且成为国王最忠诚的顾问。西吉斯孟三世和他的婶母、已故国王的遗孀安妮，都与他的姐妹安妮·瓦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安妮·瓦萨也是个新教徒，她在西吉斯孟三世统治早期是他最亲密的顾问。安妮·瓦萨在瓦维尔城堡有一个新教的小教堂，后来，西吉斯孟结婚时又把王室领地布罗德尼察和戈卢布赠予了她，她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教中心。而且，她经常充当新教徒的保护人。王室家族内的这种温和态度对于整个国家的生活也许不无影响。

在西吉斯孟·奥古斯都去世时，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相当强大了。新教徒在众议院占大多数，在参议院的世俗成员当中，天主教徒为70人，新教徒为60人，东正教徒为3人。新教徒拥有24种印刷刊物，天主教徒有21种，而且许多新教学校也已经创办起来了；但是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几乎没有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与此同时，天主教徒终于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转机的出现可以归之于许多原因，其中包括多米尼克修会那种虽不引人注目但却很扎实的工作，宗教会议的决定所推行的种种改革，主教的乡村巡视，以及后来耶稣会的活动。因此，改奉天主教的人数增多了。

构成1573年“联盟”基础的原则，多年来起了良好的作用，虽然不时也发生暴力事件，但都是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极端分子们造成的。

在1574年和1587年，克拉科夫的加尔文宗教堂两次遭到破坏。国王谴责这种行为，并且下令惩罚这种罪犯。巴托里的立场尤为坚定，他说，他不准备看到任何信仰“靠暴力，靠火与剑，而不是靠教育和良好的榜样”来传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1591年在维尔诺和克拉科夫，1611年又在维尔诺和卢布林，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路德宗信徒在但泽、托伦、埃尔布隆格和里加对天主教徒发动过袭击，而且有时也对加尔文派进攻。这些事件逐渐导致一种互相指责的气氛。新教徒指责政府的司法程序太慢，因而要求实行1573年曾被允诺但尚未被国会通过的《联合审理法》，它规定建立特别法庭和审判程序以审理此类罪行。另一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天主教徒已经甘心于他们60年来所遭受的损失——教堂及其附属的土地、任职权、什一税、教会司法权，等等。天主教会急于要至少收回一部分失去的特权，力图与贵族取得一致，并且还起草了一份文件——《地位互占法》，然而，总的来说贵族们却不愿意这样做。

几届国会都讨论了宗教问题，但天主教派是分裂的，一些人遵守较为严格的信条，而大多数人却在扎莫伊斯基的领导下与新教徒联合起来拥护华沙“联盟”的原则。他们与扎莫伊斯基一致认为，和平与秩序最为重要，包括宗教分歧在内的任何分歧，都应服从和平与秩序的需要。结果《联合审理法》和《地位互占法》都未被国会通过，因为不可能达成共同的协议，但在1593年和1596年却达成了短期的暂时协议。然而，某种《联合审理法》终于在1631年被国会所通过，这样，在这整个时期内就避免了宗教战争。

波兰—立陶宛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利沃尼亚问题上，这个问题将在另一章中论述。这里只需要说明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与其波罗的海邻国的关系是以利沃尼亚问题为转移的。然而，波兰与俄国的关系，在西吉斯孟时重点已从利沃尼亚转移到立陶宛对斯摩棱斯克和锡维尔地区的要求上来了，这两个地区是16世纪初立陶宛丧失给俄国的。1582年，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在雅姆—扎波尔斯基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停战协定；利沃尼亚和波洛茨克划归巴托里，而大卢基则划归俄国。俄国无意以这种条件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是准备通过重新停战来维持现状；它在1591年实现了为期12年的停战，在1601年又实现了为期20年的停战。然而，波兰与立陶宛的廷臣们由于面临着与瑞典关系不断恶化的问题，向俄国提出了一个影响深

远的建议，这似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项建议是在伊凡雷帝死后于1584年首次提出，并在1601年又重新提起，这一次是由立陶宛大臣卢·萨佩哈专程前往莫斯科提出的。

这是一项关于波兰—立陶宛与莫斯科联盟的建议，包括一项友好条约，一项共同的对外政策，在两国所有地区定居和婚姻的自由，对天主教和东正教少数派实行宽容等类似的条款。这项建议设想：最初是二主并立，但是其中去世较晚的一位将成为唯一的共同的君主。俄国人在其反建议中，拒绝了所有比较自由的条款，而事态的发展更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打乱。俄国进入混乱时期，一部分乌克兰和波兰的大贵族，既有东正教徒也有天主教徒，都对两个德米特里取得王位的要求暗中给予支持，后来西吉斯孟也以特维尔的尤利安的后裔这一身份对沙皇王位提出了要求。这些情况导致了17世纪第二个10年中俄国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长期战争，后者最终获得了斯摩棱斯克。

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令人不大满意，尤其是在西吉斯孟三世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内。马克西米连逃跑并越过国境以后就拒绝承担其誓言，这样，1589年的本津和比托姆条约也就失去其意义了。马克西米连及其家族的另一些成员再一次开始为哈布斯堡王室夺取波兰王位而策划阴谋，尽管这时西吉斯孟三世即位已经两年了。他们恢复了“奥地利”党在波兰内部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的活动；并且试图通过西吉斯孟的父亲、瑞典的约翰三世来劝说他的儿子放弃波兰王位而把全部精力转向瑞典；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还开始与西吉斯孟直接谈判。但是，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的争执——至少有两个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马克西米连和恩斯特）争夺波兰王位——而使形势变得十分混乱。鲁道夫二世皇帝至少起初仍然信守1589年的条约，并不支持马克西米连的要求。对于马克西米连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不承认这个条约，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哈布斯堡的势力在欧洲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恩斯特设法与西吉斯孟保持接触，并以波兰—立陶宛王位的哈布斯堡候选人的身份暗中答应西吉斯孟，如果他放弃王位并返回瑞典，他将与瑞典签订友好条约，放弃对爱沙尼亚的全部要求，还付给西吉斯孟40万盾。西吉斯孟特别关心的是其瑞典王位的继承权不受威胁，这种关注之强烈使他在雷瓦尔与其父会见后曾考虑直接回到瑞典，但其决定则是相反的。马克西米连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秘密谈判，并于1592年将它公布于世，这件事使波兰

的哈布斯堡的支持者感到极大的忧虑，他们因恩斯特和马克西米连而分裂成两部分；同时，这件事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扎莫伊斯基的追随者中间引起极大的不安。他们认为“外国人在他们之间拿我们进行讨价还价”。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情绪有所加强，舆论还转而反对国王对这件事的参与。在扎莫伊斯基的鼓动下，国会于1592年召开，对整个问题进行调查；所有卷入哈布斯堡阴谋活动的人们都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国王的权力和尊严也受到很大的损害，国王和他的大多数臣民之间的感情留下了裂痕。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情绪和对国王可能与他们达成秘密谅解的担心，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几年以后泽布尔茨多夫斯基的反叛。^[2]扎莫伊斯基在1592年的国会上发言，极为强硬地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对王位的要求。他在1589年就曾试图通过国会的法令拒绝承认他们作为候选人。国王对此也发表声明说他并不打算离开王国。不过，虽然恩斯特很快就被腓力二世委派为尼德兰的总督，但是马克西米连直到1598年才放弃他的要求。

霍亨索伦家族设法从波兰—立陶宛在利沃尼亚和瑞典的战斗中得到了一些利益。阿尔贝特的儿子、第一位普鲁士公爵阿尔贝特·弗雷德里克在1576年向巴托里宣誓效忠，1578年，巴托里把继承普鲁士封地的权利授予霍亨索伦家族中的选帝侯系，如果安斯巴赫支系绝嗣的话。按照1525年的协议，继承这片封地的权利已经被限制在安斯巴赫的霍亨索伦家族内部，而这次的授予是打算满足勃兰登堡藩侯的愿望，因为巴托里考虑到他那即将到来的反对莫斯科的利沃尼亚战争，希望与霍亨索伦家族建立友好关系。阿尔贝特·弗雷德里克精神失常，因而巴托里任命选帝侯乔治·弗雷德里克作为他的公国的监护人和行政长官。1589年，西吉斯孟三世认可了巴托里的安排，包括对监护权的安排和对这片封地继承权的授予的安排。1603年，乔治·弗雷德里克去世，这为任命一位更加倾向于波兰利益的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西吉斯孟过于重视霍亨索伦家族在他与瑞典的查理所进行的战斗中的态度而没有利用这个机会，1605年，他任命约阿希姆·弗雷德里克为新的选帝侯。西吉斯孟的决定没有与国会磋商，贵族们普遍认为国王失掉了把普鲁士公国与王国政府更紧密地联结起来的好机会，特别是普鲁士各阶层由于不满勃兰登堡的统治，从1566年以来，曾几次向国王求助。他们在国会辩论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抗议，但是西吉斯孟不仅不可能、也不愿意改变他的决定。此外，约阿希姆·弗雷德里克的儿子约翰·西吉斯孟在1611年被授予普鲁士封地，这就使

霍亨索伦家族中的选帝侯系获得了对公国的控制。然而，西吉斯孟三世制定的1605年和1611年法令也使他加强了对普鲁士的宗主地位（根据个人宗主权之扩张），这两个法令规定：对于某些问题可以从公爵领地法庭上诉到王室法庭；国王有权干涉公爵领地的某些内部事务；公国每年要向王国国库缴纳30万兹罗提的年贡，每当在王国中征税时再缴纳相同数额的税款；波兰商人可以自由通过勃兰登堡领地在瓦尔塔河上航行；最后，如果霍亨索伦家族中的选帝侯系绝嗣，公国遂即并入波兰王国。

人们普遍要求与土耳其保持和平关系，巴托里于1577年重申了与土耳其的和平条约。然而，和平也曾屡次受到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哥萨克侵入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领地所造成的。他们常常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例如1594年），皇帝想用这种方法在土耳其与波兰之间制造麻烦。鞑靼人通常施以报复，而土耳其人在1590年甚至打算发起战争。这场战争由于英国大使巴顿的斡旋（他不愿使荷兰失去波兰的谷物）才得以避免，而且在1591年又重新恢复了和平条约。土耳其、波兰和帝国之间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利害冲突有时发展得如此激烈从而导致武装入侵。^[3]这三个大国为了控制黑海地区并试图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而展开角逐。他们反对并瓦解了瓦拉几亚的米哈伊为统一罗马尼亚诸邦所做的努力。扎莫伊斯基在1595年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并且违反土耳其人和皇帝的意愿，把杰里米·莫希拉安插为土耳其在这里的总督候选人。1600年，他的兄弟西蒙·莫希拉在瓦拉几亚就任；这样，波兰的势力就扩展到了多瑙河。扎莫伊斯基还要在特兰西瓦尼亚扩张他的势力，这又与土耳其人和皇帝的希望相抵牾。1615年以后，土耳其在摩尔达维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因此将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方。1621年波兰在霍京取得胜利之后，与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协定：土耳其人保证阻止鞑靼人进攻波兰，同时波兰也保证钳制哥萨克人对土耳其的袭击。与此同时，帝国的军队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

到了17世纪最初10年，亚盖沃王朝最后两代君主以后的国际形势已经完全变化了。1609年的俄罗斯—瑞典条约更加恶化了波兰—立陶宛与瑞典本来就在不断恶化中的关系。波兰—立陶宛与奥地利在1612年所缔结的条约表明敌视哈布斯堡的政策已被放弃。波兰—立陶宛卷入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卷入了连绵不断的与瑞典和俄国的战争。

西吉斯孟·奥古斯都在东南方的乌克兰和北方的利沃尼亚所承担的军事责任，是在这两个地区建立防卫组织以保护其人民免遭不断攻击的危险。这一责任之重大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1572—1601年间，鞑靼人在南方发动过30多次大规模的入侵，此外还有许多次小规模进攻。

1564年，国王和国会授权组织一支4000多人的常备军，但这实际上很不够用。征召封建贵族从军的办法已不能有效地施行，所以军队的主要来源，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主要依靠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些来自国外。巴托里使其军队现代化，在1578年他把来自各王室领地的农民用新的步兵编制组织起来。他还重新组织了炮兵和技术兵种，大大发展了军事绘图法。他还招募了一些哥萨克人组成一支特别分遣队，并且雇佣住在立陶宛的鞑靼人。成为负担的大片遗留地产，如扎莫伊斯基和奥斯特罗格斯基所建立的地产，在其契约中都包含有防卫事宜的条款。其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维持一支数百人的军队，修缮城堡和要塞，提供必需的武器装备。城堡周围的开阔地都分给骑士，他们必须准备好在需要时服兵役。

使用雇佣兵给国王带来了一些困难，并且增加了集结一支军队所需的时间。国家征集军队须经国会批准，而召集国会本身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国会批准，再去征税，而这又要费去几个月的时间。总之，建立起一支军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有时甚至更长。17世纪的国家机器笨拙不堪，国王要想推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王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建立在劳役制基础上的农业，到16世纪末，劳役制几乎在各地都取代了过去的地租制。农产品，特别是谷物的产量每年都在增加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口需要。然而，这使得农民的经济地位更加恶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劳役压在了他们身上。主要在东部进行的垦荒加重了劳动力的短缺。在波多利耶、沃伦和乌克兰一些地区，与王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建立了许多村庄。东部开拓者的经济地位要比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民好一些。扎莫伊斯基一人就曾建立了60多个村庄。

随着庄园制度的确立，骑士贵族的特征完全改变了，他们更像农夫而不像骑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农业越来越感兴趣。最初，

他们采用从农民那里学来的传统的耕作方法；后来，一批提倡较好的耕作方法的手册出版了，其中要数安策尔姆·戈斯托姆斯基发表于1588年的手册最好。他们大多采用三圃制的耕作方法。主要的农作物是黑麦，但也种有燕麦、大麦和小麦；还种植大麻和亚麻，部分出口，部分供应给亚麻制造业。由于通往黑海的出口的丧失，而去里加的河道尚未完全开通，谷物的运输困难很大，这使畜牧业在王国东部有了很大发展。在喀尔巴阡山麓的南部和其他一些地区，畜牧业也兴旺起来。养蜂和池塘养鱼往往是农业的重要补充。奥斯威辛公爵领地就是最重要的鱼类养殖中心。

庄园制度给予封建主某些独占权作为其封建特权。一个封建主拥有磨坊，该地区的农民必须使用他的磨坊；他还垄断了酿酒坊并控制着酒的销售。这些特权加强了封建主的经济地位，使其所在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他。封建地主与冶铁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国各地都有铁矿可以开采：主要是在琴斯托霍克，拉多姆和扎莫希奇。一般而言，小生产者要从封建地主那里租得开矿、冶铁和生产铁器的权利。采矿和建立炼铁工场、铸造工场所需的资金由一方或双方共同提供。租金要用现金支付，有时也可用实物支付。但是，制造铁器的工场通常规模很小，雇用的熟练或不熟练工人很少达到30个。他们的产品有铁条、铁器或专为农民所需的工具。克拉科夫、但泽、利沃夫和其他一些城镇建立了一些铸造工场，在那里制造为他们自己使用的和供军队使用的大炮、炮弹和枪支。人们还铸造钟来满足教堂的需要。

在此期间，书报的印刷量不断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造纸业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出来的玻璃、布匹、亚麻制品主要供应当地的市场。各种产品皆为城镇里的工匠和其他小生产者所造，他们都组织在当时仍然存在的手工业行会中，甚至还在建立新的行会。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满足了下等阶层、中等贵族和市民的需要。但是，富有的贵族和市民却去购买更为昂贵的进口货物，从而使国家的货币不断外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使国家的经济自给自足，扎莫伊斯基鼓励生产奢侈品。他在1605年的国会上指出：与其像现在这样出口原料，不如把他们用于国内生产还要好些。在扎莫希奇生产的摩洛哥皮、哥德华皮和其他种类的名贵皮革事实上比进口皮革的价格低得多。挂毯和高质量地毯的主要产地是马索维亚和扎莫希奇，后来还有布罗迪，后

两个地方深受东方风格的影响。此外，还有专为军队生产的各种帐篷。需要精巧工艺的钟表和其他产品也制造出来了。在利沃夫已能生产昂贵的土耳其式的马鞍。在有些行业里，工匠们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有时，一些城市的议会，如利沃夫市议会，禁止进口那些当地产量充足的产品。巴托里曾把制造当时尚未生产的某些特殊产品的垄断权授予不同行业的人们。显然，当时人们倾向于自给自足的商业原则，虽然这种原则还没有被政府普遍采用，但在地方上已经实行了。然而，工业投资并不充足，这或许是由于下等阶层生活条件的恶化，各地对工业品的需求下降的缘故，至少这是一部分原因。

在奥尔库什和亨齐内有铅矿和银矿，并在那里建造了铸造工场。17世纪中叶以前，这里铅银产量一直稳步增长。16世纪初期，铅的年产量仅3000桑特纳（Centners，1 Centner大约等于50千克），在16世纪末期，达到2万桑特纳，到17世纪中期达到5万桑特纳。银在同时期内的年产量分别是250格尔兹纳（grzywnas，1 grzywnas等于200克）、1500格尔兹纳和6000格尔兹纳。小生产者逐渐消失，这有利于企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

采盐业主要是在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一带。采盐业是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其年产量在20万桑特纳以上。整个行业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和管理人员，每星期按照其能力发给工资。另外，在东南部喀尔巴阡山麓也有一批盐场，主要属于国王，但有时由私人小生产者开采。这些盐场组织成一个约有1000人的企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但也掺杂着一些封建因素。

在16世纪出现的一些大庄园，特别是东部各省的大庄园，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大的一些庄园分别属于拉济维乌、奥斯特罗格斯基、扎斯拉斯基和威斯尼奥维奇家族以及其他几个家族。其中有些是由遗产形成的。组织经营最好的大概是约翰·扎莫伊斯基的庄园了。除了自己的私有地产外，他还拥有部分王室领地的使用权，共有17479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3个小城镇和816个村庄。这些土地大部分位于扎莫希奇和贝尔兹地区，但也有一部分散布在其他各省。这些庄园组织得卓有成效，它有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手，划分为一些较小的经济单位，但整个经营都置于扎莫伊斯基一人的监督

指导之下。谷物的生产、牲畜的饲养和工业的发展都受到同样的重视。每年收获的谷物在满足了地产上非生产人员的需要后，还有大约3700拉斯特（Last）可供出口。出口的谷物大部分是用自造的大船沿维斯图拉河运送的，利沃尼亚出产的谷物部分运到里加，部分运往普斯科夫；大波兰出产的谷物沿瓦尔塔河运到什切青。饲养马匹是为了当地市场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牛，特别是公牛的饲养是为了向农民提供牵引畜。有些出口了，有些则留给了当地市场。养羊主要是为了取得羊毛，这些羊毛在10个工场里被织成毛织品供地产内的农民穿用。110多个养鱼塘养殖的鱼在当地市场出售；还出产蜂蜜和蜜蜡。17个铸铁工场生产铁器，特别是农具。5家玻璃工场生产玻璃制品。有大约130个水力磨坊为农民使用，还有20个锯木场和漂白亚麻布的作坊。整个领地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每年都有预算，强调经济效益和合理开支。

海上和陆地的贸易在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初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大。陆上的贸易路线是：从王国的东部出发，穿过南部的利沃夫或北部的维尔诺，再往西在波兹南或克拉科夫会合。从这里继续前进可达弗罗茨瓦夫或法兰克福，最后到达莱比锡和纽伦堡。另一个道路网是由南至北的：从匈牙利经新松奇、克拉科夫、华沙和托伦到但泽；从摩尔达维亚经利沃夫、桑多梅日、托伦到但泽；还可以从西里西亚到波兹南和但泽。

由于陆路运输费用昂贵，所以总的来说水路运输更为重要，尤其是对远程运输来说更是如此。水路甚至还可以用来运送军队。维斯图拉河及其支流是使用最多的一条河，这是当时但泽得以发展成为波罗的海最重要港口的原因。运输货物到什切青可经瓦尔塔河；在东北部，德维纳河是通往里加的航道。一旦国王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取得黑海的出海口，他们就竭尽全力地使整个德维纳河成为他们领土上的内河，以作为通往立陶宛的运输线，还可在接通第聂伯河后作为通往乌克兰的运输线。梅梅尔河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用作通往柯尼斯堡的航道。当时，波兰—立陶宛吸引着波罗的海的绝大部分贸易，而其中的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但泽。根据波罗的海海峡通过税的登记记录，从1562年到1574年从事波罗的海贸易的全部船只中到但泽的占59%，少数船只肯定是去波兰和利沃尼亚其他港口的，其余的才是到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去的。

但泽和其他港口的主要出口物是谷物，特别是裸麦。从1555年起，每年输出额大约是14000拉斯特，到17世纪初期年输出额有时竟达10万拉斯特以上（1618年的输出额是12.9万拉斯特）。同时还输出小麦、燕麦和大麦，但数量较少。仅次于谷物的最重要的输出品是木材及其副产品，还有造船用的柏油、树脂、索具和钾碱。在16世纪后半期，由但泽输出的钾碱较少了，大部分是由德维纳河和里加输出的。输出品中不仅有铜、铅、铁、钢，还有蜜蜡、亚麻、大麻、亚麻布、兽皮、皮革以及各类裘皮。

经波罗的海沿岸港口输入的主要货物，有上等织物、青鱼、盐、酒和南方的水果。在此期间，仅但泽一个港口营业额每年平均在1000万兹罗提左右。

在波罗的海上与波兰—立陶宛进行的贸易，主要掌握在荷兰和弗里西亚商人手中，其次是英国商人。1585年，在通过松德海峡来往于但泽的船只中，52%是荷兰船，24%来自东弗里斯兰，12%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在和汉萨同盟各城市进行竞争的英国商人，开始与埃尔布隆格（埃尔宾）进行谈判，以争取新的市场。1579年建立了东方公司，在埃尔布隆格开设了一个销售英国货物的商业市场。商人们获准自由贸易而没有任何在但泽时所加的那些限制。这个措施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并且也受到巴托里的鼓励，因为其目的就在于打破但泽的贸易垄断。1583年，埃尔布隆格与东方公司签订了一项条约，人们预期它将得到国王和国会的正式批准。但是，看到自己在贸易上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但泽竭尽全力阻止国王批准这项条约，并请求扎莫伊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影响。结果，国王没有正式批准这项东方公司与埃尔布隆格之间达成的条约。他不过是确认了英国商人从前与埃尔布隆格所商定的权利。但泽取得了胜利，其贸易垄断地位有了保障；因此，但泽于1585年同意把每年过境税收入的一半呈缴给国王。国王此时正忙于部署反对土耳其的事宜，也希望在北方有个和平局面。

与德意志各公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陆上贸易主要是公牛（17世纪初每年有60000头）、猪和马匹。此外，还有大量的亚麻、大量的各类皮革以及蜂蜜、蜜蜡。进口的物品有铁制品和一些纺织品。向土耳其的输出品，包括铅、武器、刀剑、裘皮和某些种类的纺织品；从土耳其输入的则有丝绸、地毯和一些昂贵的东方奢侈品。从俄

国进口的有裘皮、东方货物（包括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则有铁器、纺织品和纸张。

到17世纪初期，对国外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奢侈品的需要量不断地增长，但来自下层社会的需求却不断地下降。虽然大量的货币流往国外去换取奢侈品，而没有投资在国内的工业和其他事业上，进出口似乎还能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缓慢发展着的货币危机不仅使下层贵族的处境每况愈下，也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

政府并没有承担起扶助贫困的责任；没有像莫德任斯基在1558年出版的《完美之国》中极力主张应由它承担的那样，而是把这个责任留给宗教的和私人的慈善团体去承担。乡村和城镇确实有一些医院，都是由修道院、地主或市民创办并维持的，但设备都不很好。在战争或饥馑造成的特殊困难时期，或农民因失火等灾难遭受损失时，通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免去他们的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他们有时还可以得到贷款或实物。

宫廷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巴托里曾说：宫廷应是“高尚的行为和讲求道德的生活的楷模和镜子”；在1566年，卢克·古尔尼茨基根据波兰情况注译并改编了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从而把一个完美朝臣的形象传播开来。虽然国王由选举产生，但宫廷总是保持着王室的尊严和荣耀。因为国王个性不同，宫廷的气氛也迥然各异。亨利的宫廷充满了法国气派，这和斯蒂芬·巴托里宫廷的朴素风尚以及西吉斯孟三世统治时期模仿西班牙宫廷那僵硬的规矩和豪华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室没有像亚盖沃王朝后期那样庞大，但是，使宫廷成为艺术和文化中心的传统却保持下来了，因而国王们都赞助艺术家和作家。

巴托里在克拉科夫郊外重建了沃布佐夫宫，西吉斯孟三世在那里设计了一个意大利风格的花园。除了其他建筑，他还在华沙修建了一座宫殿，是由阿布拉哈莫威茨设计的。西吉斯孟收集并委托制作的艺术品，同样以意大利风格为主，一些权贵和富有的市民也纷纷仿效。国内第一流的艺术家，如沃伊采赫·波尔茨莫夫斯基、克里斯托弗·博古谢夫斯基、马丁·考伯（Kober）和意大利出生的托马斯·德拉·贝拉都深受外国流派的影响。在西吉斯孟·奥古斯都的宫廷里，瓦茨拉夫·萨莫杜尔斯基开创的音乐传统也被他的后继者们延续下来了，

他们不仅组织了瓦维尔大教堂的唱诗班，而且组织了宫廷管弦乐队，后来又成为皇家歌剧院。在第一流作曲家中，尼古拉·戈莫尔卡和马丁·利奥波利塔在创作中仍保持了复音的风格，而尼古拉·杰林斯基则采用了新的“威尼斯式的应答唱法”。

在那些年里还出版了大量的历史著作，都是波兰文或拉丁文的，有的描写近代，也有的叙述遥远的过去。1582年，斯特里耶科夫斯基在有关波兰、立陶宛、俄罗斯的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描述了立陶宛的历史。1584年，巴托茨·帕普罗齐出版了关于波兰纹章学的著作。两位信奉新教的作家，斯维也托斯拉夫·奥泽尔斯基和赖因霍德·海登斯泰因分别于1572—1576年和1572—1603年描写了前两次空位时期的历史。保罗·皮亚塞斯基和斯塔尼斯拉夫·乌宾斯基著有西吉斯孟三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关于改革后教会的历史，有后来的安德鲁·韦杰尔斯基[雷根沃尔修斯]的著述。斯塔尼斯拉夫·卢宾耶齐论述了阿里乌教派。有些政论家和政治家试图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一种理论来论证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还是西塞罗和他的关于公民权利和职业不平等的理论。许多作家对农民所受的压迫表示叹惜，例如，塞巴斯蒂安·彼特利希在其用波兰文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所作的注释中，就表示了这种思想。彼得·斯卡尔加也曾说过：

“谁通过了不公正的法律并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以便压迫穷人……谁就要遭到报应。”但是，几乎所有作家都支持选举制度，虽然他们也都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卢克·古尔尼茨基在《一个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对话》中，建议用代表制度代替个人分别直接投票的办法。然而，坚决拥护牢固的君主制度和强有力的政府的克里斯托弗·沃尔泽维奇在其《贵族的自由地位》一书中（1598年出版），仍旧要求保留国会。但是他要求国会工作得更有成效，并且特别强调臣民的责任：“某些人或许对立法感兴趣；但对所有臣民来说，服从并执行法律才是更为必须、更为有益的。”

（高仲君 译）

[1] 参阅第2卷，第474页。

[2] 参阅前面第388页。

[3] 参阅前面第11章。

第十三章 瑞典和波罗的海

在16世纪中叶，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和那些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那时北方国家的政治形势与其目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都继承了古代文化遗产，尽管继承的程度各有不同，而且近几个世纪以来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文艺复兴，它与古典的古代文化有着自觉的联系。从前那种政治分裂的状态，在法国得到了部分解决，在伊比利亚半岛正在解决，而在意大利则仍然相当严重。在地中海东端，“铁幕”的另一边是东方文明世界。若干世纪以来，它在很多方面对南欧起过促进作用。现在这种联系已被破坏，欧洲与远东的绝大部分贸易已沿着新航路进行了。

同样，在16世纪中叶，波罗的海东、西两侧在宗教、教育、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主要分界线的一方是俄罗斯，另一方则是它的邻国瑞典—芬兰和波兰。然而北欧和南欧的差别也很大。与那些南方国家相比，北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是很不发达的。文艺复兴的精粹在当时的北欧只留下极少的痕迹，而且主要是在艺术方面。但是，宗教改革的纲领却迅速而有效地传到德意志北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只是在群众当中所起的影响没有在某些社会团体中特别是中等市民阶级和政界人士当中所起的影响那样大。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波兰获得成功，但在其他国家并没有获胜。宗教改革的胜利意味着摆脱了旧文化的束缚，并且结束了最重要的国际势力对北欧的控制——但尚无任何现成的东西来取代它。

经济方面的差别也相当大。除了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诸城市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以外，北方国家是不发达的农业国。瑞典的萨拉银矿很难与南方国家的源源不竭的贵金属相匹敌，而且其产量在迅速减少。斯堪的纳维亚的主要出口商品最初是兽皮和畜产品，它被汉萨同盟所垄断。此外，挪威还输出干鱼，瑞典输出铁和铜。瑞典的这两种出口商品到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初有了很大的增长。

当东方和西方在南欧的边界关闭得越来越紧，并向其他方面开辟新的出路时，北方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时，波罗的海东部和西部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交往已日益重要。与俄罗斯的贸易引起广泛的注意，甚至引起西欧的关注。各种方式的接触在尝试进行，试探紧跟着试探，一个计划又盖过另一个计划，尤其在与瑞典有关的地方情况更是这样。在早期（1557年）俄罗斯进攻了利沃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并于1558年占领了注入芬兰湾的纳罗瓦河上的纳尔瓦城。^[1]俄罗斯因此扩展到了邻近波罗的海的地区。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出现了。

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俄罗斯已发出了第一次打击。结果，俄罗斯开辟了通往波罗的海的贸易路线。骑士团内部的恐惧在增长，条顿骑士们到处寻求外援。结果，所有邻近的强国不久都被卷入。波兰对于利沃尼亚的命运十分关注。丹麦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想使其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兄弟马格努斯亲王得到爱沙尼亚沿海的厄塞尔（õsel）岛。爱沙尼亚的主要商业城市、属于汉萨同盟的雷瓦尔，向瑞典国王请求援助。古斯塔夫·瓦萨不愿介入骑士团的事务，但其子埃里克十四，于1560年即位后立即对雷瓦尔表示同情。这就播下了波罗的海国家大规模利害冲突的种子。

16世纪期间，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要通过厄勒海峡（松德海峡）。对俄国市场的输出路线通往芬兰湾和里加湾，对波兰和立陶宛市场的输出路线通往波罗的海东南各港口、里加湾和普鲁士城镇。更南方的来自东欧的商路是经由克拉科夫和莱比锡的陆路；就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陆路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商人冒险家在16世纪50年代开辟了一条从北方通往白海的新航路。

自中世纪以来，俄国的海外贸易一直控制在外国商人手中。最初，其贸易要通过诺夫哥罗德；后来参与控制的有爱沙尼亚的雷瓦尔、利沃尼亚的里加和普鲁士的一些城市，主要有柯尼斯堡和但泽。西欧对俄国商品的需求量甚大，如大麻、亚麻、皮革和珍贵裘皮、蜡和牛油。瑞典历史学家阿图尔·阿特曼曾分析过当时俄国的市场以及它的产地和销路情况。雷瓦尔以谷物作为其主要的出口商品，其次是出口来自俄国内地的商品。里加出口的主要产品是俄国的亚麻和大麻。柯尼斯堡也主要出口这两种来自立陶宛和俄国的产品。但泽是波兰和立陶宛的大港，主要出口维斯图拉河流域的木材、沥青和谷物，俄国的产品还从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港口集中到但泽运出。

这种经济战略形势在许多方面决定了那些北方王国的命运。丹麦在此居于关键地位。从作为古老的松德海峡统治者开始直到1658年，丹麦一直控制着松德海峡两岸。卡尔马同盟结束后，对这条贸易上的咽喉要道加以控制就更为重要了。特别是在16世纪，尼德兰在这个地区扩大了贸易，英国也开始关注这里的商业利益时，情况更是如此。此外，丹麦还占据了位于波罗的海中部的哥德兰岛，丹麦昔时的领地还包括自1658年以来成为瑞典领地的斯科讷、布莱金厄及哈兰等省区。布胡斯被划入挪威属地。当丹麦到达爱沙尼亚并占领厄塞尔时，瑞典被包围的态势就更加明显了。

瑞典必须跨过约塔河口周围的一窄条地峡才能进入西部海洋，所以要同西欧交往主要得依靠丹麦。瑞典王国的东部——芬兰正好延伸到俄国边境的诺夫哥罗德，所以瑞典此时对东方非常关注，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这种东方政策一直是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明显特点。

在本书论及的这一时期开始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三位富有政治意义的人物去世了。象征着贵族占绝对优势的受制于人的丹麦王克里斯提安二世死于1559年；[\[2\]](#)同贵族关系很好，并在贵族势力下进行统治的丹麦王克里斯提安三世也死于同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死于1560年。

决定丹麦新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权力的登基誓言把更多的权力给了政务会并承认了贵族的经济特权，政府的大权落到了贵族手中。瑞典的新国王埃里克十四即位以后，就总的情况来说没有引起体制和行政机构的变化，但埃里克的地位倒确实发生了变化，他的异母兄弟约翰公爵和查理公爵在自己的领地上取得了某种实际的独立权。埃里克同他们的冲突由于约翰拥有的芬兰公爵的地位而加剧了。当约翰同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奥古斯都的妹妹凯瑟琳·亚盖沃妮卡结婚时，约翰对波罗的海东部的染指变得更为露骨了。

丹麦王克里斯提安三世和瑞典王古斯塔夫·瓦萨都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制度，这使得他们国家的财政更加稳定，而且国王也能更好地管理国家。丹麦的国际地位是依靠雇佣军和一支强大的舰队维持的，其资金大部分来自对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所征收的过境税。古斯塔夫·瓦萨不但建立了由瑞典士兵组成的陆军（这支队伍曾在1555—1557年

同俄国的战争中经受考验），他还奠定了瑞典海军的基础。埃里克十四继续加强这种事业。当时，都在政务会领导下的贵族，丹麦的贵族的势力超过了瑞典的贵族。瑞典政务会的作用没有丹麦政务会的作用大，瑞典议会仍是十分重要的。在1560—1612年瑞典的历史中，王权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不断出现的题目，因此，瑞典议会才有机会确立自身的权力。

概括地说，这就是将要叙述的事件进程的背景，这些事件是：瑞典在波罗的海建立了统治权，这个统治权在下个时期中将使瑞典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正是控制着松德海峡和吕贝克并最终决定着瑞典对外贸易的丹麦切断了瑞典与欧洲中部和西部的直接联系，古斯塔夫·瓦萨一直坚持认为：与隔离力量的另一边建立外交和商业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仍然力图保持同丹麦的友好关系，1541年缔结的同盟加强了这种关系。

不过，他的儿子埃里克甚至在其作为王储并且驻节在瑞典西南的卡尔马城和城堡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将用来包围丹麦的东西。埃里克特别注意丹麦在布莱金厄和斯科讷河口的城堡。在他继位之前，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婚状况在外交上可能会起的作用，并开始同英格兰的还未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谈判缔结婚姻。此外，埃里克的父亲同俄国的战争和他兄弟约翰在芬兰的公爵领地曾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向东方。他心目中想要东西方联合，而且他派往英格兰的使节在向伊丽莎白力陈同埃里克结亲的有利因素时也公开说到了这种联合。俄国对纳尔瓦的征服和雷瓦尔向瑞典的求援，促使埃里克卷入了波罗的海事务中。在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强有力的立脚点，将会使他更有希望得到西方、南方、丹麦—挪威的另一边国家的援助，并且在同俄国的贸易关系中占据关键地位。

瑞典国内形势使埃里克更渴望这样做。约翰公爵（后来的国王约翰三世）正从其驻地奥博推行着一条他自己的积极的外交路线。作为给他内兄——波兰的西吉斯孟·奥古斯都一笔贷款的抵押物，他接受了一些利沃尼亚的设防城堡，它们正位于当时瑞典在北爱沙尼亚占领区的后方，这导致了公开的内战。埃里克出兵进攻约翰，1563年春俘虏了约翰并把他关押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堡。此时，瑞典占据了雷瓦尔

和爱沙尼亚的绝大部分地区（1561年），这就使外交政策变得更为复杂了。在争夺正在瓦解的条顿骑士团的过程中，丹麦和波兰都是瑞典的对手，这些国家同瑞典的关系急剧恶化。另一个纠纷是埃里克提出所有芬兰湾贸易都要归瑞典控制；他企图以此保持雷瓦尔作为航运俄国货物最重要港口的地位，并让芬兰的维堡城也保持这样的地位。他试图以封锁纳尔瓦来支持自己的要求，而纳尔瓦是汉萨同盟的商人可以直接同俄国贸易的地方。这种情况又引起了同汉萨同盟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同吕贝克的冲突。瑞典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就这样产生了天性乐观的埃里克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瑞典同其邻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埃里克企图在丹麦后方建立政治联系的计划也遭到了挫折。根据当时的政治传统，他为其计划采取了联姻谈判的形式，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苏格兰和黑森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但是，尽管向伊丽莎白的求婚由于他在她即位前即已开始而颇为有利，尽管英国的一些人很感兴趣地观察着此事，但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后来的人们认为这种结果是势所必然的，但在16世纪60年代初，当伊丽莎白利用她个人作为外交谈判诱饵的天才还未完全揭示出来时，这种结果并不明显。埃里克和他的使节提出的诱饵是通过瑞典控制大部分俄国的出口商品的可能性。自从英国商人把注意力转向白海航道之后，他们当然会受到这种前景的引诱。不幸的是，丹麦控制着松德海峡，特别是当时丹麦国王也正在向伊丽莎白求婚；但埃里克十四通过其大使指出：可以开凿一条穿过瑞典的运河（的确，大约300年后，这个计划实现了）。

然而，在伊丽莎白和她的顾问们看来，同瑞典联姻的好处还不够明显。仓促做出的向苏格兰女王玛丽提亲的努力又使埃里克一方显得不很严肃认真。在丹麦后方寻求重要盟友的第三次努力（1562—1563年）也一无所获。这次是向最重要的路德宗诸侯之一、黑森伯爵兰德格拉夫·腓力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提出的建议。当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火燃起之时，瑞典仍旧孤立无援。同样归于失败的是后来在洛林求婚以便获得支援的企图；那里的孀居的女公爵是丹麦克里斯提安二世的女儿，她对其父亲的王国仍保有继承权。

1563年秋，瑞典与丹麦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根据传统的观点，这次战争是两个长期对立的北欧王国的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国王通过武装冲突来发泄其感情的结果。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一个注重象征物的时

代，所以，两国的徽章之争无异于火上浇油的说法颇为人们所信。丹麦历代国王从未放弃自卡尔马同盟以来在瑞典的权利。1546年，克里斯提安三世在丹麦的国徽中并入了瑞典的国徽图案——三顶王冠，这个在中世纪常见的谱系学图案使人联想起对初生基督顶礼膜拜的“三贤人”。为了对此表示抗议，埃里克十四在瑞典国徽的两个角落中并入了丹麦和挪威的国徽图案，并为自己辩解说挪威和瑞典曾在中世纪不长的一段时期中同属于一个国王，而丹麦的图案——三头狮子——并不代表丹麦，而是代表新近赢得的雷瓦尔。

关于国家标志的争端，从前被认为是1563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上所述，这场战争显然另有根源。丹麦对松德海峡的控制，瑞典力求通过波罗的海东部港口控制俄国贸易是两国政府深知的经济现实。当丹麦为了加紧这种控制而染指于崩溃瓦解中的条顿骑士团时，当瑞典试图同南方和西方外国势力组成同盟时，一场冲突就不可避免了。1563年9月，丹麦弗雷德里克二世向瑞典最薄弱的部位发动了进攻——这是瑞典仅有的通向西方的港口、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埃尔夫堡（Elfsborg），其位置坐落在离现在哥德堡大港不远的地方，哥德堡港当时还未建立。埃里克和他的异母兄弟约翰的内战成了丹麦手中的武器，而且丹麦还有训练有素的雇佣军和经验丰富的军官这一优势。此刻，瑞典和吕贝克的战争也爆发了。吕贝克不能容忍瑞典控制俄国贸易的要求，并认为瑞典对爱沙尼亚的侵犯特别是同雷瓦尔的同盟威胁了它自己的东方贸易，这种贸易在许多年以来对它一直是生死攸关的。最后，波兰统治者也不得不对毁灭其妹夫约翰公爵命运的事件以及瑞典对爱沙尼亚的干涉做出反应。在这条战线上，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就这样，通常所说的北方七年战争（1563—1570年）开始了。北方诸国的扩张目标不可避免地彼此相撞了。

在这里，不必对瑞典—丹麦战争的细节加以描述。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对每一个角落进行的野蛮破坏造成了双方前线上的怨恨情绪，而且加深了由于宣传和在卡尔马同盟内争斗100年所导致的普遍的敌意。在破坏时有一条野蛮的逻辑：双方都要使对方那些可用作军事基地的地区成为焦土；再者，瑞典还不得不冲出丹麦的包围。双方的高级将领都怀着令人恐惧的顽固意识去推行他们的计划。年轻的瑞典军队顽强地抵抗了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雇佣军，瑞典的埃里克十四是一个称职的军队组织者和“总参谋长”，不过他不能统率军队，因为他

在面对敌军时总是丧失冷静。在瑞典，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丹麦的司令官丹尼尔·兰卓——一位祖籍荷尔斯泰因的天才战略家。

丹麦取得了最重大的战术上的成功，但瑞典以海上胜利弥补了在陆上所受的挫折。埃里克努力建设了一支近代化的舰队，这支舰队初期受挫之后，在能干的克拉斯·克里斯滕松·霍恩将军指挥下，已能够打通去往德意志北部的航路，并保证最基本的供给。因此，在一段长时期里，战争不分胜负，而敌对双方都显露出力量耗尽的征兆。

埃里克十四是个富有天才的人，但在权衡其政治目标时缺乏现实感。当时的瑞典人没有哪个像他那样熟谙欧洲文化，他是一个音乐家、作曲家，曾广泛地阅读过古典著作并通晓当时时兴的科学——占星术。但他重理论的思维使他难以理解政治乃是一种可行性的艺术。在他身上，也有瓦萨家族的通病——疑心过重，它时常以疯狂迫害的形式暴露出来。变化无常的情绪使他忽而妄自尊大，忽而万念俱灰。

埃里克的顾问们，主要是国务大臣约兰·佩尔松——一个牧师的儿子——通常以非常严厉的手段捍卫中央政府的利益，以此对抗行政官员和贵族阶层。国王和某些贵族集团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些贵族集团中有中世纪末期产生过一些摄政王的斯图勒家族，还有约翰公爵的其他支持者。1567年国王处死了几个最为显赫的人物；正是此时，人们才发现他精神处于失常状态。他病愈之后，正式娶长期与之私通的农家女卡琳·蒙斯多特为王后。约翰公爵在他的异母兄弟精神失常之时已被释放出狱，而现在（1568年）正值丹麦战争期间，约翰同他的弟弟查理公爵领导了一场贵族的叛乱。埃里克在斯德哥尔摩被俘，被废黜并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度过余生，1577年去世。

埃里克下台之后，贵族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约翰公爵当选为国王，瑞典议会加冕他为国王约翰三世。在确立了贵族特权之后，新国王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同丹麦媾和。1567—1568年的冬季，丹麦军队在兰卓的指挥下已经深入到瑞典的东部，而瑞典的军事行动却受到了内战的牵制。条约对瑞典是苛刻的，但由于丹麦与瑞典同样精疲力尽，使苛刻的程度有所减弱。1570年的什切青和约规定：瑞典必须为仍在丹麦控制下的埃尔夫堡缴付一笔可观的赎金，而且瑞典企图控制俄国的一部分贸易的计划也必须搁置起来。的确，瑞典保住了爱沙尼亚，而且此后与波兰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瑞典的新国王是波兰国王

的妹夫，情况自然如此。丹麦想在爱沙尼亚取得一个立足点的企图也未能成功。但是，埃里克十四的两个主要目标——打开通向北海的出海口并控制通往俄国的贸易路线——同样一无所获。纳尔瓦的贸易再次对吕贝克以及其他地区开放，而丹麦对波罗的海入口的扼制也未被打破。此外，在战争期间，松德海峡的过境税收于1567年从船只税改为吨位税和货物税。这意味着丹麦增大了经济收入，而且，征收过境税的埃尔西诺（赫尔辛格）成为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关键地区。

埃里克十四试图保持同俄国的可以容忍的关系，在一次危机时刻甚至透露他准备把约翰的妻子凯瑟琳·亚盖沃妮卡送给沙皇伊凡四世，因为伊凡四世曾向她求婚未成。因此，约翰三世和伊凡四世此时剑拔弩张并在信中相互谩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约翰并不打算放弃他兄弟企图控制俄国贸易的计划，他只是在寻找新的途径。在他的授意下，瑞典向东方的扩张矛头直指俄国，而且能指望波兰成为一支友好的力量。与波罗的海东部的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6世纪后期甚至波及北欧的价格革命也刺激了这一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欧商人前往波罗的海国家。对俄国市场传统的产品及波罗的海东南角出口的木材和谷物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而且，不仅英国的商人，还有逐渐增多的尼德兰商人也沿着挪威海岸另一条全新的道路抵达1586年新建的阿尔汉格尔港。

在这种情况下，瑞典自然继续向东方扩张。不久，约翰三世再次封锁了纳尔瓦并重提了过去提出的关于控制东方道路的要求，这一要求暂时与波兰一致，而丹麦不会干涉，因为尽管它垂涎于此，但无力付诸行动。然而俄国在东方先发制人了，它进攻了瑞典占领的爱沙尼亚。瑞典全靠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才得以保全它的占领区，苏格兰人和日耳曼人雇佣军都被投入了这场战争。到16世纪70年代末，波兰新国王斯蒂芬·巴托里（1575—1586年在位）猛烈地反击了俄国人并最终占领了利沃尼亚；他也是约翰三世的姻亲兄弟（娶了凯瑟琳·亚盖沃妮卡的姐妹安妮）。波兰由此取得了通向里加的咽喉商道的控制权。波兰战争使瑞典的处境有所改善。法国出生的蓬杜·德拉加尔迪统率瑞典军队之后，取得了对俄战争中一系列决定性胜利。随着1581年对纳尔瓦的占领，所有芬兰湾的战略要地都控制在瑞典人手中，而且纳尔瓦的封锁亦能行之有效。但最终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大部分俄国贸易仍能通过波兰港口进行，还有一部分通过阿尔汉格

尔。1581年俄国与瑞典停战，第二年波兰同俄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该条约承认波兰对利沃尼亚的占领。瑞典与波兰虽然没有相互间的直接支持，但却都在另一方的政策中得到了益处。

瑞典在东方发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确实，瑞典某些极受欢迎的产品的出口量增加了。较为先进的炼铁方法使得条形铁取代了原始的奥斯蒙铁^[3]，而且在16世纪后半期，这种冶炼产品的出口量增加了1倍。铜的产量也在增加，特别是在16世纪80年代及以后，当时首先因为发现了新的矿脉，其次由于技术的改进，达拉纳（大科帕尔贝里）大矿的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一个仍旧主要靠以物易物为其经济活动的国家里，要为正在推行的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筹措款项并非轻而易举，瑞典政府每时每刻都要应付严重的财政困难。断送埃里克十四统治的内战暂时平息了，但贵族仍不满足于新特权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也没有当时的丹麦贵族所拥有的令人羡慕的影响政府事务的势力。另外一个内部斗争的根源是古斯塔夫·瓦萨最小的儿子查理公爵，他声称独立地占有瑞典中部的一个公国，其中包括一些极为重要的产铁区。

不过，约翰三世无意放弃他的对外政治计划，他从两个途径来实施其计划。第一，王朝的联合，即瑞典同波兰的联合，以此控制波罗的海东部；第二，设法控制那条通过阿尔汉格爾的俄国的贸易路线。

约翰同波兰公主凯瑟琳的婚姻使他产生了王朝联合的念头。当斯蒂芬·巴托里于1586年死后，约翰提出让他和凯瑟琳所生的儿子西吉斯孟作为波兰王位的候选人。早先，宗教改革在波兰取得了进展，但反宗教改革派进行了回击而且罗马天主教徒赢得了胜利。西吉斯孟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仅在表面上同情路德宗信徒的约翰本人也曾起草过一部天主教祈祷书，希望能在瑞典推行开来。此外，16世纪70年代他开始了同天主教国家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其部分目的是想从王后的母亲、米兰的博纳·斯福察那里得到一笔遗产。约翰的美学志向（主要表现在他修建了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巍峨的城堡上）同他对神学的兴趣是一致的。对他来说新教的瑞典同恢复了天主教的波兰实现王朝的合并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什么不好。1587年他成功地使有着古老波兰王室名字的西吉斯孟当选为波兰国王。在选举时，波兰曾提到爱沙尼亚同利沃尼亚合并的要求。这种合并将使波兰控制经过芬兰湾的俄国商路和一个有利的军事位置。然而，约翰不会接受这一要求，从他

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此事一直拖到西吉斯孟成为这两个王国的国王的时候。

如果说1561年获取爱沙尼亚以及1581年征服纳尔瓦被视为16世纪瑞典的波罗的海政策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话，那么，筹划瑞典同波兰—立陶宛之间人身的联合就可以称为第三阶段。西吉斯孟当选为波兰国王使瑞典更侧重于东方，想象中的某种联合王国可能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和商业地位。但这种联合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们在西吉斯孟即位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仅仅几年之后，这些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逐渐改变了瑞典对外政策的全过程。

约翰三世的与俄国贸易相关的第二个计划由于这条经过阿尔汉格爾的新路线的重要性不断增大而得到推动。这一时期丹麦在松德海峡征税的账目簿记表明，每年有2000条尼德兰船只，130条英格兰船只（以及数量更少的苏格兰船只）来往于松德海峡。1579年，英格兰成立了一个东方公司专营同普鲁士、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贸易。至于白海贸易，引用的数字当然不会十分准确，但据估计每年有40—60条船驶入北方，其中主要是英格兰的，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这条路线的重要性因此也不断增加。而且，这条路线是自由的，未被控制的——尽管丹麦宣称它有权征收赔偿费以弥补过境税的损失，因为这些船只不是通过松德海峡而是驶向白海，穿过“丹麦王国的腹地”，即沿挪威西部和北部海岸的水域航行。沙皇给予组成莫斯科公司的英格兰商人以北俄罗斯贸易的垄断权，但后来，在1586年他们失去了这种权利。北部的边境很难明确划定，约翰三世认为即使对此地他也有当然的领土权。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制订出来了，但又都归于失败。然而，瑞典向白海的扩张计划将会被重新提出，可见，这些计划制订得多么广泛而又周密。它们的目标显然是控制整个俄国同西欧的贸易。

前面已经提到的瑞典在16世纪80年代的内部冲突，在约翰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变得更为尖锐。国家财政状况的虚弱，表现为货币不断地贬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576年，因为约翰力图使其新的祈祷书得到承认，导致了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严重的冲突。几名反对者被迫辞去圣职，激烈的宗教论争开始了。反对派的领导人是查理公爵，他严格地恪守“纯粹的教义”，并在其公国内不给新祈祷书以任何立足之地；但他并不是没有加尔文主义的倾向。瑞典由此产生了三个相

互冲突的集团：国王、查理公爵、贵族，冲突的中心是政务会议。新一代贵族已经成长起来，其中文化素养最高者都在欧洲大陆受过教育，他们对历史，特别是从前贵族所起的作用的历史感兴趣，并且熟知当时反君主的人们的政治信条，如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关于起义和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理论。他们公开地同情中世纪的贵族立宪派，这个派别曾在卡尔马同盟时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6世纪80年代，各派的成分不断变化。先是国王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查理公爵。查理在自己公国内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并被排除出政务会议成员之外，而政务会议在每逢未来的联合国王西吉斯孟驻留波兰期间，将要代行统治瑞典之权力。西吉斯孟在波兰即位后，感到处境艰难，因为瑞典显然无意放弃爱沙尼亚。西吉斯孟于1589年去雷瓦尔会晤约翰。因局势的恶化而信心丧失殆尽的约翰，要求儿子离开波兰同他一起回瑞典去。但出席雷瓦尔会议的瑞典政务会议的贵族成员们坚决反对此事，同时又抱怨约翰统治的政策。约翰不得不屈从，西吉斯孟又重新返回波兰。

这次雷瓦尔会议的结果使约翰同政务会议之间很快出现了裂痕。国王转而向查理公爵寻求支持。他取消了压制公爵的法令，兄弟俩此刻有了共同的理由去反对贵族。一些政务会议中的贵族被撤销职务。为了批准新政策，召开了瑞典议会。尽管此次议会无意完全批准国王的政策，但确实给了约翰和他的兄弟某些支持。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到1592年约翰去世，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始终未同被革职的政务会议中的贵族成员重新和好。

在新国王到来之前瑞典的形势十分复杂。以被革职的贵族为首的贵族阶层在集结他们的力量。大多数牧师开始反对新祈祷书和天主教。查理公爵也再次掌管了他自己那管理有序而又团结一致的公国，并且无意放弃在王国中半独立的亲王地位。

此时一位新的主角出现了，这就是西吉斯孟。他并不愿意让他在瑞典的世袭权力有所削弱，由于他从作为波兰国王的最初几年起，对于那些贵族就产生了不愉快的回忆，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和一批与他认识一致的顾问们还企图在瑞典恢复天主教。这些顾问中最突出的是罗马天主教使节、反宗教改革派的领袖人物马拉斯皮纳神父。约翰三

世的通过王朝联合而扩张瑞典的设想造成了一个他没有预想到的局面。

西吉斯孟可以指望对他有利的广大民众的舆论的支持，也可以指望贵族特别是在芬兰的几名忠诚的贵族的支持。但是对其计划的抵制也属预料之中。1593年，所有的“异端”都受到了责难，同年3月，路德宗牧师在乌普萨拉召开了宗教会议，开始组织起来抵抗天主教可能采取的行动。查理公爵同政务会议平息了彼此之间的争吵，决心保卫他们的权力，抵制新的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王权所可能采取的任何计划。1593年9月西吉斯孟的波兰舰队到达斯德哥尔摩群岛。1594年在乌普萨拉举行的他的加冕仪式上，查理公爵和一大批追随者都在场，国王在这里见到了他的臣民。

王权、公爵和贵族立宪派之间的斗争就这样集中到了宗教问题上：是国王按照自己的意图确立非路德宗教徒（主要是他的波兰臣属）公开做礼拜的权利，还是瑞典议会迫使国王应允他将与瑞典议会的宗教观点一致？政治问题同宗教问题以这一时期典型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了。国王被迫让步，不得不聆听贵族们对绝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抨击，“……在瑞典至今还没有听说世袭国王成为专制的统治者”。在失望和沮丧之下，西吉斯孟不久即返回其波兰王国；在他离开瑞典期间，由查理公爵和政务会议——亦即贵族阶层——一同取得了瑞典国家的统治权。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没有一种被作为最后的、确定的政府形式而接受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公爵和政务会议同意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致行动捍卫国家权力，以反对西吉斯孟真实的或别人臆测中的为专制主义和反宗教改革而采取的行动。

但公爵和政务会议的同盟过于脆弱，难以持久。在1595年召开于南雪平的瑞典议会上，这个同盟就已开始破裂了。公爵比政务会议更偏激地坚持地方政府独立于国王，他还利用平民的支持来实现他的意图。内部矛盾很快就激化了。克拉斯·弗莱明、约翰三世的原公爵领地——芬兰的总管，拒绝接受查理公爵提出的这种政体。查理要求解决同弗莱明的矛盾，但政务会议动摇了。在查理的支持下，芬兰农民起而反抗弗莱明（1596—1597年），但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公爵此时已经向政务会议挑战并求助于瑞典议会，议会于1597年在阿尔博加召开；在所有的政务会议成员中，仅有一人参加。从此，查理公爵和平民组成了反对西吉斯孟和贵族的统一战线。局势很快紧张起来，以至

于几个政务会议的贵族逃到了波兰的西吉斯孟那里。他们于1598年同西吉斯孟和他的军队一起乘船回到瑞典。同查理公爵的军队发生了几次战斗，但未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西吉斯孟突然退却，把那些叛逃的贵族交给了他的叔父，留下瑞典的政府问题悬而未决，率军返回了波兰。公爵占领了瑞典和芬兰仍旧效忠国王的城镇及城堡；审讯和流血随之而来。1600年在林雪平召开的瑞典议会上，由各等级组成的特别法庭判处了几名被指控的贵族死刑并执行了判决。贵族立宪派被暂时压服，西吉斯孟由于波兰事务缠身，也未能重新组织反攻。同波兰的同盟已不可避免地破裂了。约翰三世雄伟的计划所产生的结果与其原来的设想完全相反。

然而，最初的目标在一个方面有所进展。正当西吉斯孟和他的瑞典臣民的相互冲突变得明朗起来的时候，瑞典从它同波兰的联合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如上所述，瑞俄战争前期，即16世纪80年代初，瑞典由于波兰也同俄国作战而处于有利地位。1581年以后，瑞典与俄国之间一度停战，但1590年战事又起。瑞典的攻击目标直接对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周围对贸易至关重要的地区以及白海地区，以求取得对北方贸易路线的控制。但这些目标均未能实现。结果，1595年在条西纳签订了和约，由于瑞典与波兰的同盟仍然有效，从而使瑞典人的谈判基础十分有利。瑞典人没有达到他们的真正的目的，但保住了纳尔瓦；原则上双方同意在芬兰的维堡和在雷瓦尔可以进行自由贸易，但只有瑞典人可以同纳尔瓦进行贸易。波罗的海政策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而真正的收获比预期的要小一些。从此，俄国贸易将经过波兰控制的港口和阿尔汉格尔。不过瑞典在芬兰湾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尽管同波兰的关系破裂了，但瑞典并未放弃其最初的计划。查理公爵（后来的国王查理九世）继承了他的兄弟们的计划；而且，在同俄国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由于16世纪90年代瑞典的事件，这些计划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冒险了。埃里克十四曾对波兰采取对立的方针，但是对俄国却力求保持友好的关系，甚至不惜做出巨大的让步。约翰三世虽然不时地站在波兰一边作战，但俄国是他在东方的主要敌人。当查理九世成为瑞典国王时，瑞典同波兰的关系已明显敌对，现在的问题是同俄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埃里克十四同丹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企图打破丹麦对瑞典的包围。丹麦和瑞典双方都战得

精疲力竭，但冲突并未得到解决。瑞典不断向东方扩张，虽说没有直接向丹麦挑衅，但也使得两国关系复杂化了。特别是瑞典企图抵达北冰洋和白海的计划引起了松德海峡彼岸国家的担忧。查理九世将把其前任们的计划推进多远呢？

查理像他的兄长一样，具有一种迷人的但又多变的气质。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演说家的鼓动天才——这种天才在埃里克十四和约翰身上是缺乏的——使他赢得了平民对他的政策的支持，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令人信服的宣传的能力。在政治斗争中，埃里克和约翰都未能够完全利用瑞典议会去争取权力也没能够赢得它的支持，尽管埃里克在这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无疑，查理把自己看作继承并完成了父业的人，而且尽管他的政治手腕有时是玩世不恭的，但他并没有摒弃何为正当以及何为瑞典政治传统的意识。虽然专横跋扈，但他的确想和瑞典议会合作，议会的权威也确实支撑着他的统治。最近的研究表明，他的政治观念一般说和贵族立宪思想并非格格不入，他个人同政务会议中的贵族的冲突也掩盖不了这一点。

瑞典议会再次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同从前一样，它包括四个等级：贵族、教士、市民、农民。它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召开，在17世纪最初10年中，召开的次数相对频繁一些：在1600年、1602年、1604年、1607年都曾召开。由于它在16世纪90年代的争吵期间所起的作用，以及国王必须把重要的问题提交给它，所以瑞典议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政务会议同样也恢复了它的一些重要作用：任命新贵族来充任那些被免职者的职位。政务会议和瑞典议会还要考虑外交政策问题，政务会议的态度有时相当审慎。

如前所述，查理九世力图继续他的两位兄长开始的向东方的扩张活动。同波兰既没有达成关于王位竞争的协议，也没有解决爱沙尼亚问题，波兰仍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查理决定以瑞典的爱沙尼亚作为基地，进行对波罗的海东部的战争，因为雷瓦尔的市民和爱沙尼亚的贵族都是新教徒并都忠于瑞典。但在利沃尼亚进行的对波兰的战争中，瑞典受到了许多挫折。查理并不是一个善战的将军，而波兰骑兵则节节胜利。1601年瑞典军队曾向迪纳河（Düna）挺进，在这初步的胜利之后，1602年查理受到了利沃尼亚三个等级的拥戴，但波兰军队随后就开进了利沃尼亚，逐退了瑞典军队并逼近爱沙尼亚。1605年查

理再次进攻利沃尼亚，并开始围攻对俄国贸易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里加，但在克尔克霍姆兵败，被迫率残部回到瑞典。战争又继续了几年，仍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在查理的战略中，一贯坚持计划并最有成效的部分无疑是他力求实现的对波兰港口的封锁。然而，战争很快转到了新的战场。

在俄国历史上，17世纪的开始是以内战、起义、党争为标志的。其表面原因是1598年古老的王朝伴随着费奥多尔（伊凡雷帝之子）一起灭绝所致。他的位置由他的妻兄、普希金戏剧和穆索尔斯基歌剧中的主角鲍里斯·戈东诺夫接替。伊凡四世的小儿子德米特里于1591年被杀，但1604年出现了一个自称德米特里的觊觎王位者。他得到了波兰和波雅尔^[4]中反对鲍里斯的人们以及国民中很多团体的支持。波兰因此把对俄战争推进到了俄国领土上。鲍里斯死于1605年，不久后，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也被杀，伪德米特里也于第二年被杀。一位波雅尔、瓦西里·叔伊斯基当选为沙皇，但权力非常有限。在以后的年月里，两个新的伪德米特里先后揭竿而起，瓦西里于1601年被废黜。这些风暴式的事件构成查理九世对俄外交政策的背景。

鲍里斯·戈东诺夫曾主动于1599年同查理进行过数次谈判，而且谈判在此后几年中仍继续进行。鲍里斯拒绝承认条西纳和约，要求对它进行修改。查理为自己着想则极欲维护他在东方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纳尔瓦，但同时又想同俄国保持合理的友好关系。第一个伪德米特里和他的波兰支持者对鲍里斯的攻击使局势变得有利于瑞典，沙皇对查理变得较为顺从了。谈判一直进行到鲍里斯去世，德米特里上台后又继续进行，但毫无进展。查理认为形势处于转折点，正是此时他想到要力求与土耳其结盟来对付俄国，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瑞典对外政策的传统。随着瓦西里即位成为沙皇，形势转变得又一次有利于瑞典，因为当时瓦西里和他的支持者们憎恨波兰。

查理九世实现其对俄政策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但哪一种途径都以同波兰的关系为转移，查理主要期望从新的反波兰的俄国政府得到支持，但俄国内部尖锐的纷争使他清楚地看到，在如此不稳定的环境中，不会有任何建树。他认为直接的干涉倒可能会带来更持久的成果。

在这里概述的瑞典外交政策的发展过程中，俄国的两个地区非常重要，即拉多加湖周围地区和芬兰湾的东部区域，以及北上白海的出海口。俄国内部的纷争或许为瑞典提供了机会，使之有可能在上述地区获得急欲获得的势力。在关于北冰洋的外交事务中，查理九世贯彻的是约翰三世的主张，因而同丹麦—挪威发生了冲突，这在下面将会看到。这就是查理九世决定直接干涉时的俄国局势：被内部争斗撕得四分五裂。1608年，当瓦里里惊悉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的成功而对与瑞典结盟表示关注时，新一轮谈判又开始了。1609年新年伊始，双方达成了协议，是年2月签订了条约。它重申了条西纳和约，结成了同盟以反对西吉斯孟和波兰，一支由5000多人组成的瑞典军队将派往俄国，然后，凯斯霍姆省及其要塞将交割给瑞典人。这个省包括拉多加湖西岸和北岸，以此控制了俄国贸易路线的关键部位。根据这一条约，瑞典既打击了波兰，又实现了控制俄国出海口这一既定的传统目的。

这是瑞典外交政策所迈出的决定性的第一步。它对波兰的挑衅导致西吉斯孟立刻采取行动；瑞典军队及与之并肩作战的俄国人取得的胜利更加快了这一行动。当时，这支瑞典军队在雅各布·德拉加尔迪（1581年占领纳尔瓦的蓬杜·德拉加尔迪的儿子）的指挥下击溃了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的军队并从诺夫哥罗德向莫斯科推进。此时，波兰对俄宣战；波军对斯摩棱斯克进行了围攻并向莫斯科推进。德拉加尔迪在1610年6月的克鲁希诺村的战役中被打败，波兰人占领了莫斯科，沙皇瓦西里被迫下台。

俄国的波雅尔们形成了对立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推举西吉斯孟的儿子弗拉基斯拉夫为沙皇的候选人。如果他当选，将形成联合的东方战线，粉碎瑞典的外交计划。然而，波雅尔中的另一派对波兰人非常敌视，不可能接受弗拉基斯拉夫作为候选人；再者，西吉斯孟对他儿子能否胜任沙皇之职也感到怀疑。俄国的反波兰派开始同德拉加尔迪进行谈判。当德拉加尔迪为了报答瑞典对他的帮助，要求新沙皇应该是一位不依附西吉斯孟的人时，查理九世的年轻的儿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被推举为沙皇的候选人（1611年）。但是，德拉加尔迪对于候选事宜不抱多大希望；他所关心的是占领瑞典渴望得到的领土。他率军开往诺夫哥罗德，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同地方当局商定：他们应置身于瑞典国王保护之下，他们应该做的则是在俄国大选中，把王位交给

查理九世的一个儿子——古斯塔夫·阿道夫或更年轻的查理·腓力。尽管这是对波兰王朝合并政策的又一次令人惊讶的抵制行动，但德拉加尔迪进行谈判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外外交事务的领导人对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反应如何呢？这些消息直到查理九世临死时才传到斯德哥尔摩。耐人寻味的是：这次王朝的合并同30年前约翰三世的波兰—瑞典合并计划十分相似，它曾一度使瑞典控制俄国贸易的梦想显得有可能实现，但它只是短暂的愿望而已。

查理九世的外交政策同他的兄长埃里克十四的政策在一点上相似，即像雪崩一样，一块松动即形成连锁反应。对诺夫哥罗德和北俄的征服将意味着传统计划中的那一部分的实现，王朝的合并将使这个计划最后完成。但是同埃里克时代那样，问题并不简单。最严重的问题是处理好同丹麦的关系，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由约翰三世制定并由查理九世推行的北冰洋海域政策。丹麦同瑞典虽于1570年达成和议，但两国的敌对状况并未因此而消除，形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埃里克想从丹麦后方取得支持的计划由查理继续推行下去，他寻求同各种新教力量的同盟——与汉萨，与德意志西部、北部诸侯，与荷兰和英国——但都未成功。对于那些认识到波罗的海贸易在其经济政策中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的西欧国家来说，控制松德海峡的丹麦无疑是北方主要的力量。莎士比亚把《哈姆雷特》的场景放在埃尔西诺一事说明西欧普遍对这个过境税征收港感兴趣。

1588年以后，丹麦产生了新的统治者——克里斯提安四世，他到1596年才达到法定的国王的年龄。丹麦的外交政策仍遵循旧的路线。为确保对瑞典南部和西部出海口的控制，丹麦建立了一系列的要塞，从布莱金厄东部的克里斯蒂安努珀尔到瑞典北部通向北海的地峡的布胡斯。但查理九世在荷兰帮助下在瑞典西部地峡上建立了新城哥德堡，该城市民被授予同拉普兰的贸易、取道白海驶往俄国以及在北部海域捕鱼的特权。在这个对旧的计划的扩展中包含着一种连贯性和必然性，在瑞典取得对纳尔瓦贸易的控制而它又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以后，下一步的方向就是白海。建立哥德堡是白海计划的一部分，在谈及对俄国的政策时，曾论述过这一计划。查理对北方海域的关注同在拉普兰和饲养驯鹿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他还是个公爵时就曾把驯鹿群送到德意志。在奥劳斯·马格努斯关于瑞典人种奥秘的伟大著作于

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出版以后，拉普兰的异国情调吸引了许多人，但对查理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考虑。

瑞典可能会在瑞属拉普兰建立一个基地，从而控制北冰洋沿岸和俄国北部出海口，这种想法对于一直声称对沿着挪威海岸通向白海的道路拥有主权的丹麦当然是一个刺激。瑞典向东方的扩张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因此丹麦主动向波兰提出一些建议。当时远方的北部地区还没有确定边境线，在条西纳同俄国签订和约之后，瑞典要求占有部分北冰洋海岸。丹麦认为这威胁到了丹麦对于“丹麦国王领土”的权利。丹麦、挪威、波兰（英格兰除外）这三个国家构成了《哈姆雷特》一剧的时代背景，这一事实反映了英国人眼中看到的北欧外交政治形势中重要的侧面。

查理九世即位之后，丹麦在同瑞典的谈判中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瑞典声称对纳尔瓦贸易有决定权，瑞典对波兰港口——尤其是对里加港——的封锁，以及其他有关贸易的战略决策都激怒了这个邻国，而且对查理九世作为合法的瑞典统治者的地位同样可以提出异议。进入17世纪后，各种谈判一直在进行，但都未达成协议。克里斯提安四世需要战争，主要因为瑞典的东方政策在1610年前后出现了转机，而且因为丹麦—挪威对北冰洋的统治势必阻碍瑞典的扩张。1611年初，丹麦国王向政务会议提交了对瑞典开战的计划，其充分的理由是查理不愿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形势很像北方七年战争开始时的形势：即没有西部和南部的支持，在东部又存在着严重的、其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的瑞典却面临着丹麦的进攻。丹麦仍旧占有地理和战略上的优势，并决心保持他在松德海峡和绕道挪威去往俄国之路的关键地位。1611年春，克里斯提安四世发动了进攻。瑞典当时正陷于其东方政策的复杂旋涡之中，这种政策紧紧缠住了瑞典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雅各布·德拉加尔迪，而且瑞典的国王也倒在了病榻上。查理九世死于同年10月，丹麦的主攻方向直接对准重要的城堡和城镇卡尔马，它位于瑞典东南方，埃里克曾在这里登上公爵宝座。卡尔马的城防司令向丹麦人投降。瑞典的形势十分危急，这主要是因为查理和政务会议之间过去的不和所造成的。而且，瑞典国内的这种状况似乎成为克里斯提安四世偏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查理一意孤行，不惜流血地执行他的兄长们的外交政策使瑞典走向了毁灭的边缘。8月初，卡尔马沦入丹麦人手中，德拉加尔迪于1611年7月底同诺

夫哥罗德签订了条约，大约与此同时，形势在两条战线上都发展到了转折点。16世纪60年代的那种困境以更加糟糕的形式重现了。这使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瑞典的政务会议必须在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战争与放弃瑞典东部扩张所得而退却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这个决定对波罗的海地区以后数十年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查理于1611年10月死后，根据1604年在诺尔雪平的瑞典议会上通过的继承法，查理的长子古斯塔夫·阿道夫继承了王位。作为国王，他称作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此时他16岁，根据继承法规定，他将在18岁达到继承王位的“半”合法年龄，满24岁才达到完全的合法年龄。阿道夫是一个早熟的富有天才的孩子，从10岁起就开始旁听关于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1611年底在尼雪平召开的瑞典议会上，虽然他很年轻，但被欢呼拥戴为全权国王。他的即位誓言决定了他的权限，誓言中说明，在未经政务会议和瑞典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他不得对哪些事务做出决定。在制定法律、宣战、停战、结盟时都必须得到这种同意。未经咨询政务会议和被征税和征兵的措施涉及的那些人的同意，不许征敛额外的税收，也不得征召士兵。古斯塔夫·阿道夫按照14世纪以来的古老法律行事，所有等级的特权都被保留下来。对于贵族，在1612年列举了他们的特权的细节。贵族阶层对高级职务的独占权被确定下来，其经济特权也有所扩大。贵族领地上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税收外，通常免除一切义务以及兵役，属于贵族主要领地上的或生活在这些领地附近的农民对国王没有任何义务，这些义务都转而由贵族履行。贵族阶层，特别是大贵族阶层，据此得到了自16世纪后半期以来就力求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从埃里克十四时代的约兰·佩尔松直到最近的查理九世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国王的顾问大臣们丧失了他们的影响力。新一代的贵族在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的领导下，在瑞典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首席大臣，这个职位属于其传统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国家五重臣之一，它们分别是执法的高级总监（drots）、陆军元帅（marsk）、海军元帅（amiral）、国王政务会议首席大臣（kansler）和掌管国家财政的国务大臣（skattmästare）。所有这些职位都于1611年做出了安排。

瑞典政府这种调整和创立部分新机构的过程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丹麦人的战果仍然相当可观。1612年春丹麦占领了埃尔夫堡，因而同北方七年战争时一样，瑞典同北海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不过，

同年丹麦舰队占领斯德哥尔摩的企图失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并未像预料的那样很快被征服，为丹麦服役的德意志雇佣军的巨额费用又严重地削弱了丹麦的财政力量。因此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开始了和谈，调停人也不愿意看到波罗的海的动乱，以及丹麦势力在那里进一步增强的前景。1613年，丹麦和瑞典双方在克奈勒德签订了和约，其内容对瑞典来说是苛刻的。条约规定瑞典必须放弃所有对北冰洋沿岸的领土要求并允许丹麦船只在利沃尼亚和库兰诸港口特别是在里加港进行自由贸易。再者，丹麦将占有埃尔夫堡及其附带的大片领土，直到瑞典付清100万里克斯达勒（Riksdaler）赔款为止；这一赔款期一直延续到1619年，其数额相当于瑞典国家四年的总收入。因此，大约有10年期间瑞典完全同斯卡格拉克海域和北海断绝了来往。

同样严重的东方问题仍未解决。查理去世前不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诺夫哥罗德到达斯德哥尔摩，但瑞典政府对于如何对待德拉加尔迪出于私利而采取的王朝政策举棋不定。起初，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意作为俄国沙皇候选人，但在1612年他决定把这个候选人位置转给他的弟弟查理·腓力，腓力曾作为两个候选人之一而在俄国被提起过。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对于以这种方法向东方扩张深表怀疑，后来的事件证明他是对的。查理·腓力于1613年夏启程前往诺夫哥罗德，但停留在芬兰东部的维堡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期间，波兰人被驱逐出俄国，紧接着西吉斯孟又败于一次新的战役。1613年2月，米海尔·罗曼诺夫就在党争纷扰中当选为沙皇，5月他接管了莫斯科。1614年初，在明确看到俄国的新政府将存在下去以后，查理·腓力回到了瑞典。瑞典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德拉加尔迪当时仍以一支有2000多士兵的瑞典军队控制着诺夫哥罗德，但对于一个同时要为埃尔夫堡筹措赎金的国家来说，要维持这种局面是困难的。

瑞典同俄国的和谈开始了，英国居间调停；中介人是莫斯科公司在伦敦的代办，熟悉俄国情况的约翰·梅里克。荷兰也一度参加了谈判，1617年斯托尔博沃和约的结果是俄国承认了沙皇瓦西里交出的凯斯霍姆省，而且还进一步割让了英格曼兰（Ingermanland）；这样瑞典据此不仅获得了环绕芬兰湾最里边整个海岸的控制权，而且获得了有利于芬兰的一段边境地区，实现了其东方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古斯塔夫·阿道夫向瑞典议会强调了上述成就的经济意义。但是，这时的形势已不同于60年前了。从那以后，俄国的通过涅瓦河和芬兰湾的

贸易已大为减少了，现在最重要的出海口在白海和属于波兰的里加港。瑞典企图控制白海未成，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丹麦战争，二是英国中介人为这条航路成为自由航路而努力。所以到目前为止，瑞典在实现其目标时，其东方的征服政策未能同其贸易政策协调一致。

1614—1616年波兰和瑞典曾一度休战，尽管在俄国问题上，两国处在间接对立的状态中。波、瑞曾进行过多次谈判，但都完全失败了，瑞典的企图是：一旦同俄国取得有利的和平，就对波兰边境发动进攻。1617年两国重新开战，不久，瑞典一方就露出了重蹈覆辙的迹象。不过，瑞典争夺东欧出海口霸权的斗争进程已属于史书中的下一个篇章了。

仍有待考察的是瑞典如何才能向丹麦偿付埃尔夫堡的巨额赎金。主要靠两条途径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其一是稳固地提高大科帕尔贝里铜矿的产量，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其二是同国际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主要得靠荷兰。丹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即使发生变化也是有所增强，荷兰对于这种统治以及松德海峡征敛过境税的负担深感不安；这种情况对瑞典很有利。如果波罗的海的主权落入一个扼守着唯一通道的国家手中，将阻碍他们努力扩大同波罗的海东部城市进行的获利日益丰厚的贸易活动。瑞典政府以一种垄断的形式收购本国的铜产品并且出口换回将用来偿付埃尔夫堡赎金的货币，1615年出口量约为1600吨。尼德兰发挥了中介人的作用并向瑞典提供了必要的贷款以按照规定偿付赎金。此外，还征收了沉重的赋税。国王和亲王们缴付了他们的年收入的将近1/3。一个农民付两个里克斯达勒，雇农付一个，女仆付半个。在关键时期，国王和他的亲属以及几个贵族献出自己的银两供铸造硬币。在关于埃尔夫堡赎金的记载中，留下了一幅描绘瑞典当时情况的宝贵的画面。赎金按照条约规定如期偿还，1619年初，丹麦将埃尔夫堡要塞以及同瑞典相连的地区交还了瑞典。这个国家同斯卡格拉克的直接联系所受到的威胁，这是最后一次。

同荷兰的关系也富有政治色彩。早在1614年，瑞典、荷兰就曾在海牙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协定。把它与吕贝克（也因丹麦的优势而感到不安）同荷兰之间更早些时候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联系起来看，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瑞典—荷兰协定的目标是保证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自由，并维护盟友在这个地区的自由和权利。这个协定的有

效期为15年，瑞典最终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来自波罗的海以外地区的援助，它曾是埃里克十四同英格兰、苏格兰、黑森、洛林谈判的目的之一。这时，在波罗的海地区有最大的贸易利益需要保护的是荷兰，而且这种利益似乎受到丹麦的威胁。这就是瑞典希望看到的可以带给它援助的局面，促成这一局面的有利因素是，作为扩张的直接结果，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的势力增强了。这种势力还会不断增强。

处在17世纪初的瑞典王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结构的农业国。然而耕地面积扩大了，芬兰移民已经开发了瑞典中部的森林地区。农民生活与季节的变换与播种和收割密切相连。农产品几乎满足了他们的全部需要，只有用来保存食物的盐是必须从外面得到的商品。其主要谷物是大麦和黑麦，主要食物是粗黑面包、咸肉和鱼，就着水、牛奶或麦酒咽下去。在夏天和屠宰季节，鲜肉调剂了单调的口味。城市居民人口仅占5%，有人试图部分地根据两次埃尔夫堡赎金的记录，对瑞典的人口加以估计。结果为：1570年前后是43万—83万人之间（不包括芬兰人口）；1632年达到85万人，外加35万芬兰人，这个数字并不精确，也许是其高限。

从古斯塔夫·瓦萨时代开始，这个王国就开辟了一种行政力量的源泉。地方政府的权力掌握在采邑管理人和治安官手中，他们一般没有贵族身份。他们的账簿要受到严格的审核。贵族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不断减少，他们为中央政府效力的报酬来源于国王赠予的土地和赋税收入。他们的经济特权也属于其中一部分。在这里，为标志着下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播下了种子；那时，贵族为国家的效力越来越多，只有迅速增加土地赠予和赋税收入才能满足偿付贵族之需。对于一个以物物交换为经济形式的国家来说，要向在国家的中央政府、外交部门和军队中最重要的供职者提供有效的报酬体系，那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瑞典贵族在这个社会中正在取得新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人放弃了乡绅的地位，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的同代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其上一代人——都把自己训练成为公共事务的职员或官员以及军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关于贵族特权的文件中说：每个贵族都要“使自己的孩子在知识、美德和经验的熏陶中成长”。由于贵族阶层对重要的职位有先占权，加之新的酬劳制度，瑞典扩张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社会效果。

大约在1615年左右，瑞典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把外交政策置于陈旧的框子里并使国家再次变得在波罗的海事务中无足轻重；还是继续扩张，彻底征占俄国出海口并实现与丹麦的最终决战？前者曾使它在克奈勒德和约中不得不承认丹麦有权使用瑞典徽章，这在那个注重象征物的时代里乃是一个重大的让步。没什么可犹豫的。人们对政治权势和商业要地的渴求，以及对官场中锦绣前程的希望都与民族浪漫气质的复活结合起来了。这种复活表现在精神上，即为瑞典学者所称的“古老哥特”的精神，还表现在年轻的国王对国家和自己的潜力所抱有的坚定信心上。与波兰战端重开，直接目标就是要控制东欧最重要的商道之一——从迪纳河到里加。出口铜时令人鼓舞的经验以及在外交上实现的同西欧长期的接触，对于将来都是很好的预兆。瑞典为控制波罗的海主权的奋斗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高永生 赵进中 译）

[1] 参阅第2卷第18章。

[2] 参阅第2卷第5章。

[3] 以前从瑞典出口到英国等地的一种优质铁。——译者注

[4] 中世纪俄国社会中和国家政权机关中的上层分子。——译者注

第十四章 教育和学术

在考察宗教改革时期以后的教育成就时，不能脱离当时广泛存在的文化落后的社会背景。即便是在欧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里，也可能会有半数的男人和超过半数的妇女是文盲。至于维也纳以东和波罗的海以北的地区，人们的文化水平就更落后得多。虽说文盲的比例是农村高于城镇，妇女高于男子，穷人高于富人。但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几乎所有的阶层中都有文盲存在。如果有谁受到过某种程度的系统教育，那他准是幸运的特权者或者是非凡的不懈努力的求学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这样认为，这个时期青年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比从前大大地增加了，而且青年人热情地利用了这些机会。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可以把这些教育机会分为三类来考虑，即普通教育、学徒教育和大学及中学教育。我们对其中的第一类了解甚少，而对最后一类了解很多，但它们对于欧洲的前途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我们看来，普通教育可以被认为是挣脱拉丁化而获得的教育。其授业范围五花八门。虽然不识拉丁文的大多数人在其他大多数领域中也仍是一无所知，但有些人还是称得上颇有知识，至于能获得像帕利西那样的多方面学识的人则仅属个别例外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在其研究领域中有所造就的非拉丁学者们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都是走自修的路。以各国的地方语为基础的教学仅限于某些初级课程：阅读、写作、简单算术及教义问答等。这种教学不抱什么奢望。并且，在当时各种类型的教育中，普通教育无疑组织得最糟糕。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专门为那些将来不打算学拉丁语的孩子们兴办了一些学校；我们也时常听到有些私塾先生被市议会廉价聘请去教授阅读和计算。人们指望男孩子们在开始学习拉丁语之前应当学会阅读本国语言，许多文法学校也为此而开办了特殊的班级。但是除苏格兰之外，这些特殊班级通常还是招收那些有意于将来进一步攻读文法课程的学生们。在这类教育中，官方的努力成效甚微，人们是互助办学的。

为少年开办识字班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普遍情况。有些教师情操高尚，义务教书。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教师们是一些靠正当手段挣钱的清贫男女。他们中少数人受过适当的教育，但很多人本身就识字有限。我们还发现一些职业童师挂出牌子来招收年龄较大的学生，诸如那些其教育被忽略了的少女或学徒。这类教学有些可能是富有成效的，但也肯定有许多是浅薄并且敷衍了事的。不过，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能够阅读、书写和计算，还就靠这些成千上万的贫贱教师们不成系统的、组织不善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普及，也为技术进步和一般知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不坚实。

凡是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稍有提高的人们都在追求某种程度的初等教育。相对而言，学徒教育像拉丁语教育一样，其好处只能为很少的一批人所享受。在估量学徒教育的重要作用时，我们有必要记住，这种教育制度具有双重目的。现任师傅的子弟们可以不受那些外来者必须具备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和不受那些把农夫和苦力的子弟拒之门外的条件的限制，这些都说明这种教育既要训练技艺娴熟的工匠的入门者也要对入门者的人数加以控制。而且训练的内容价值不等，对某些简单的手艺来说，这种训练只不过是要求掌握某些机械模仿的技艺以及按社会承认的模式形成学徒的工艺风格。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把学徒教育看作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某些领域中这种教育远远超出了简单训练的范围。像比林古乔的《论烟火制造》（1540年）、迪格斯的《论角度测量》（1571年）和齐默尔曼的《检验手册》（*Probierbuch*, 1573年）这些技术专著当时都以各种主要语言在各地出版。它们对加工方法产生了影响，而有抱负的初学者们肯定要从它们当中寻求帮助。购买、销售和记账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是日常的工作，即使是它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也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和一些简单的算术知识；至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没有坚实的基础知识是无法进行的。早在15世纪，诸如卢卡·帕乔利的《算术》这类关于数学的一般著作就已经讨论了会计学的内容：在意大利商务界，关于如何书写具有法律和商业性质的信函的论文长期以来很受欢迎。100年之后，又出现了约翰·布朗的著作《阿维佐商人》（*Marchants Avizo*, 1589年）。此书针对实业活动不仅提出原则汇编，而且有广泛的注释，因而得以一版再版。贸易界同时也站到了学习外语的前列。当时不少语法书和会话手册的前言中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还知道，萨拉维亚主持的南安普敦法语学校的学生们的学习课程是非常广泛的。因而毫不

奇怪，商人和其他手艺人都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文法学校学习知识以便为将来的学徒教育打下基础。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迅速扩大，当时像托马斯·希尔这些人写了不少介绍综合知识的简易手册，内容从天文学到养蜂学应有尽有，在读者中最热心的正是那些学徒们。

当我们把视野从以本国语为基础的教育和学徒教育转移到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教育上时，我们看到了一种大不相同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那些个别人士的无组织的工作；而是大批组织完好的机构。到1550年，这些机构正处于其漫长发展过程的中点，这个过程开始于14世纪，一直发展到19世纪。因此要想理解1550年到1600年之间中小学校和大学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对其过去和未来都加以考察。

中世纪的教育机构五花八门，类别繁多，而且没有人尝试将它们协调起来，因此我们不能说存在着某种类似统一的教育制度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从13世纪以后探索出一种模式，即使它从来不是普遍的，但却极为常见，足以被视为主导的教育模式。这个时期高等学校的数目成倍增长，并且提供了当时社会认为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它的最高层包括三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以下的一层是诸艺——逻辑学，或多或少地辅之以修辞学或数学。学习诸艺是为更高层的科目打基础，但它们同时也为大批级别较低的教士提供一般教育。一所大学一旦建立，它往往不仅要把邻近地区较高级课程的教学控制起来，而且还要开设高于初级阶段的语法课程。这样，教授基础拉丁语的工作就成了留给大学城内中小学校的唯一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语法内容被降低为既非古典语言又毫无文采的日用拉丁语。由于很少追溯到14或15世纪以前的时代，所以当学生们转向逻辑学之后，文法课就失去了早先形成的与文学的联系。逻辑就是教学内容，大学就是塑造人们思想的教学机构。

我们看到155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抵制上述模式的进步阶段。这种抵制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早在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就曾指出：一般教育比职业教育更有价值，并且争辩说这种一般教育应当以文学而不是以逻辑学为基础。他们的纲领是：赢得对大学中修辞学课程的控制权，通过对其质量的改进提高这门课的地位。他们的见解逐渐支配了当时的知识界，但是百余年来，在有组织的教育中他们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教授修辞学的人文学者扩大了他们的授课范围，

把古典作品也包括在内，希腊语在常规课程之外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课程，但逻辑学仍然是诸艺之首。在所有重要的大学中，专业科目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直到15世纪末，当文艺复兴扩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时，才带来了更为根本的变化。

论述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一条明显不同的发展线索。中世纪的大学最初只不过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它们并不打算对学生们的道德修养进行指导。后来到了14世纪，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应当包括品德培养的内容。这种认识在新建学院对学生生活加以管束中得到制度化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置于这种管束之下；到了15世纪末，品德培养已经成为人文学者教学大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如果人文学者们一直都把精力集中于大学方面的话，尽管他们对上述观念的继承仍很重要，但不可能取得那么富有革命性的成果。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按人口比例来说，大学的数目比意大利要少一些。在某些地区，比如在尼德兰，中小学校在教育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不可避免的是：随着人文主义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中小学校的改革立刻引起了人文主义追随者们的关注。他们在学校中增设古典文学的新课程，学院开始注重学生道德的培养，这些都使人文主义对更低年龄段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像代芬特尔学校、圣保罗学校和吉耶讷学院这样的院校，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所实施的知识和道德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生活的一种基础，因而，能够同那些以逻辑学为宗旨的大学课程分庭抗礼。

下一步改进是宗教改革的成果。对罗马的叛离使得人文主义者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小学中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在意大利，由于国家政权未能有效地在所有地方进行干预以促进改革，大学中的保守主义曾一度能够阻止新学术的冲击。但是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旦展开，各国政府又热衷于维持特殊的宗教信仰，那么国家政权的干涉就不可避免了。在新教的德国和天主教的西班牙，神学逐渐支配了大学生活。法学和医学丧失了以往的优势地位。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些注释圣经的工具语言则在诸艺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再者，对亚里士多德持怀疑态度的新教徒，出于对布道的关心而十分重视口才，竟至于使逻辑学屈居于修辞学之下而把修辞学当作诸艺之首；而且由于新教徒的许多首领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所倡导的

修辞学是以模仿古典文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后的大学中，语言学和文学的教学都被用来服务于宗教论争的目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宗教改革看作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然而在很多地方，由于那里对立的宗教信仰势均力敌，结果教派之间的斗争不是引起改革而是阻碍了改革，这就强化了学术上的保守主义，最后使大学在完成其使命时更加软弱无力。

我们绝不可由于梅兰希顿和希梅内斯的成就而抹杀这样的事实，即总的来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同样感到大学难以控制。由于文法学校的教职人员数量较少和素质较低，又是在有限的地区招收学生并且处于地方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结果这些学校在人们希望年轻人沿袭父辈信仰的那些地方，成了便利得多的工具。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加尔文派的教师（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布坎南和科迪埃）曾经参与过人文主义者们最有抱负的实验，如吉耶讷学院的改革，即把中小学的课程与完整的诸艺科目结合起来。吉耶讷学院的改革（1534年）后不久，斯图谟在斯特拉斯堡进行了完全新教内容的影响大得多的建设性工作（1538年）。斯图谟采用了巴黎大学中蒙泰居等学院的做法，也吸取了他自己在列日的由共同生活兄弟会主办的人文主义学校中的经验，再现了新的教育法中常见的全部特点，比如使用古典拉丁语，增设希腊语，仔细地划分班级（最初定为8个年级，后来改为9个年级），坚持提拔贤能并注重学生们的道德培养。他还试图像吉耶讷那样在文法课程之后实行五年更高级的教育。为了这种教育，先在文法学校最后两年教授逻辑学和修辞学以作为入门课。可是他的名望并不仅仅建立在把人文主义的观点应用于新教的目标上。至少在两个方面他确实无疑地超过了前人。在斯特拉斯堡，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道德培养采取了某种特殊的教派的形式。这种学校并不满足于仅仅培养出好人，它的目标是培养出好的新教徒。因而与此同时，各门古典课程中都剔除了那些属于异教的内容。这些古典课程的地位被降为仅仅教授古典语言和古典辩论。斯图谟改变了人文主义者在这个领域中的这种传统。而且他之所以应被人们缅怀是因为他的这一变革的效果使得文法学校成为完全适合当时宗教斗争需要的教育机构。各地的学校都迅速地仿效斯特拉斯堡学校的制度，这些地方有洛桑（1547年）、波兰的平丘夫（1556年）、日内瓦（1559年）、德国，后来又有英国。但是遵从斯图谟的表率成为最重要获益者的并不是与他属于同一教派的人。研究耶稣会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认

为罗耀拉并没有沿袭斯特拉斯堡学校的组织结构。至于他与斯图谟在纲领方面的相似之处，则是因为他们采纳了相同的人文主义模式。但是两人都以相同的方法来运用他们的模式，这一事实说明他们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耶稣会的学校招收的学生是10岁而不是6岁，他们的学校分为5个年级而不是9个年级。他们从较低的年级就开设希腊语。但是从新教育法的两个基本特征来看，耶稣会的学院（第一所学院1548年开办于墨西拿）实际是斯特拉斯堡学校在天主教阵营中的翻版；那两个特征一个是把智力训练与宗教训练相结合，另一个是使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都从属于修辞学。

这样，到1550年，欧洲已处于一场教育革命的产前阵痛之中，这场革命的酝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新体制的基础已经奠定，以后的发展主要是这些现有改革的传播和扩展，这是16世纪后半期的特征。这场教育革命到来的标志是：1561—1562年萨拉曼卡大学颁布的新校规，1566年斯特拉斯堡科学院被授予帝国特权，1575年建立了莱登大学，在新教的德意志和英国建立了大量的文法学校，最重要的是，耶稣会创办的学院令人惊异地大量出现。到1600年这类学院已将近250所。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学校数量的增加，而且这些学校的主要特征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但是在这些学校的特征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尽管微小但仍然值得注意的变化。在1550年以前，这类新建学校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仍然没有确定。1512年圣保罗学校和1528年在伊普斯威奇的沃尔西基金会学校的课程仅限于拉丁语会话、阅读和写作。1543年，萨克森的莫里斯雄心勃勃地设想普福塔、迈森和格里马的学校已增设了希腊语和逻辑学。1538年，斯图谟曾设计了一个14年一贯制的课程，可以学完为获取文科学位有关的全部知识内容；1552年，罗耀拉的《章程》曾认真考虑过一个相同的课程范围的可能性。至于从这种混乱状态中理出头绪，则只能是下半个世纪的任务了。

当斯图谟和耶稣会士们开始把他们的更广泛的计划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发现很难把学生们吸引到他们的高年级中来，因为他们不能授予学位。他们不得不把那些开设较高学科的机构单独编为一组从而为它们谋求获得大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多数纯拉丁语学校也都逐渐开始增设希腊语。所以到了1600年，中学教育的正规形式不外乎是两种，或者是单纯的“语法”课程：拉丁语、希腊语和修辞学；或者

是“语法”课程之外再加上逻辑学、算术和宇宙结构学，所有这些课程都处于很低的水准上。这些课程都力求适应从6岁到16岁的年龄范围。与此同时，各大学也不再耗费精力去教授语法。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开始提高，这样，中小学也就可以自由地支配他们所选定的教学领域了。

如果说13世纪是大学的时代，那么16世纪可以无愧地被称为是文法学校的时代，这些学校体现了人们对教育的希望已经从灌输人文主义转向适应宗教斗争的需要。他们的目标可以用伊拉斯谟的话表述为：雄辩加虔诚。更确切地说，他们有三个主要的目标：教授古典拉丁文，教授修辞技巧，激励宗教热诚；尽管这三者是互相独立的追求目标，但已融合成一门单一的学科。

文法学校的教育无疑是从学习阅读开始的。有些儿童在家里或在小型私塾里已经学过这些，但也总有不少学生没有受过这种初步教育，所以文法学校的校长总要为这些学生开设一个特别班。他们使用角帖书作为入门，这种书是包括一个字母表，一个音节表，再加上主祷文或者对这几样加以补充的选材更广泛的阅读材料，是包括使徒信条和圣诫的初级读本。这类书在大多数地区是以本国语言发行的，但也发行拉丁文本，因为某些文法学校的校长坚持即使对初学者也要教授拉丁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教科书的内容都是宗教性质的。关于16世纪的教育家们热衷采用的方法，这是一个粗略的例子。他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希望能一箭双雕，他们特别喜欢选择那些可以同时教授语言技巧和虔诚习惯的材料。

当儿童学会识字以后，就进入低级学校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低级学校的学年数占不到学制总年数的一半，在斯图谟的九年制中占四年，在伊顿的七年制中占三年，在耶稣会的五年制中占两年。在这种低级学校中，儿童们学习拉丁文法并掌握足够的词汇去写简单的作文和阅读较浅的拉丁文作品。到这个世纪的中叶，中世纪的流行读本实际上已经从西欧各国的课堂中绝迹：亚历山大·德·维勒迪约著的《教义》一书发行的295版当中仅有9版是在1525年以后发行的。由人文主义者实行的语法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至此便完结了。作为标准的正确用法已经确立起来。可是大多数的学校教师们仍然墨守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文法，这些文法以消除不正确的拉丁语为第一目标，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定义不妥的语法规则和一大批不规则用法的表格。这

场语法改革的第二阶段导致了以使读者易于掌握的形式出现的词法和句法。当1540年皇家宣布把利利语法的修订本作为英国学校的必读本时，第二阶段的改革才算开始。这本书是由科利特、伊拉斯谟和其他一些人最初为圣保罗学校编写的，它包括了明确的英文解析，并列表来帮助记忆。此书的权威化体现了新教学法的一项胜利。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佩利森于1535年对迪斯鲍特利乌斯的著作所做的修订虽然在法国和意大利受到某种欢迎，但比1510—1515年的原作强不了多少。耶稣会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合适的语法，当他们在阿尔瓦雷斯的《规则》（1583年）一书的简写本中找到答案时，却发现许多本教派的教师不愿意放弃原先流行的迪斯鲍特利乌斯或莱夫里哈的教本。在语法的教学中确有一些进步，但它出奇地缓慢。

低等文法学校中的作文都是采取简单造句的形式，或者翻译本国语或者将老师给出的原句加以改写。在这种初级阶段，学完语法之后最重要的学习自然就是阅读。像《多纳特》（*Donat*）和《教义》一样，中世纪一贯推崇的八位作者的著作都曾风行一时，特别是“加图”的著作曾多次再版。但是到了16世纪后半期它们都被淘汰了。寓言中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和“加图”著作中的斯多噶主义倾向都不符合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伦理标准。它们的缺陷还不仅于此。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基督教道德的需要很敏感的话，他们对于学习技巧的兴趣也比其前辈更加浓厚了。他们已经发现，一个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由简到繁，在试图教育年轻人时尤其如此。他们的目标就是用那些对于学生心智来说在内容的虔敬与程度的难易方面更加适合其发展的读物来取代中世纪的教科书。教义问答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鲜明的内容。但是每个教派为了指导本教派的神学家而编撰的教义问答，对于课堂教学来说都过于复杂，因此又出现了一些简写本。诺埃尔教义问答的历史就很典型。此书编纂于1570年，它的拉丁文本有长、中、短三个版本。后两种版本都被译成了希腊文，而前两种版本都有英译本。如果再加上祈祷书的问答本，一共有七种不同的版本。祈祷书的问答本相当于诺埃尔最短文本的英译本，因为从各方面看两者都很相似。在当时，似乎每个英国的学校都至少要读其中的四个版本，有的试图读完七个版本。

可是，无论这些教义问答读本如何简单，都无法作为语言教学的理想教材。如果要一个学生会讲拉丁语，那么就不仅要使之养成灵魂

得救所必需的心理特性，还必须使之掌握符合其需要的词汇；认识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这个时期典型的教科书——学校会话。这类教科书中最简单的要算是埃瓦尔都斯·加卢斯的《少儿对话》，只有这本书完全属于初级水平。该书出版不久即有了许多地方语言的译本，例如有一个匈牙利文版本（1531年）。此书的修订本直到1660年还被查尔斯·胡尔采用着。但是这本会话读本并非是同类教材当中的优秀范本，因为在单词学习的最初几个阶段中没有为教师提供多少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技能，教师喜欢把他们的精力放在那些高于初等水平的教科书中。在这方面，沙德的《少儿箴言集》（莫塞拉纽斯[Mosellamus]，1518年）和伊拉斯谟的《会话》（1519—1530年）都是开创性的著作。沙德注重现实的内容，他的对话读本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德国学生生活的精彩画面。伊拉斯谟则写入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时弊的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作品对青少年来说是太艰深了，并且，都没有提供那种被认为适宜的道德教育。因此，实验仍在继续。1538年，比维斯提出了按难易程度分级教授对话的原则。1543年，夏泰永把圣经故事改写为对话，从而提供了与教义问答不同的宗教读物，它旨在为语言教学目的服务。到了1564年，一部对以前的教科书所有长处兼收并蓄的教科书问世了，它是优美拉丁文的范本，内容难度循序渐进，迎合青少年的兴趣而且还富有道德意义。这部《会话》的汇编是由新教徒校长马图林·科迪埃写成的，被译成法、德、英、荷多种文字后，在16世纪再版20次，17世纪再版64次，18世纪56次，19世纪27次，完全可以称之为中世纪以后最为流行的一部教科书。

此外，唯一像这些会话读本那样深受欢迎的古典原著就是西塞罗的各种书信选。在耶稣会的学校中这些书信选比当时的教科书更受欢迎，不过耶稣会最好的教师之一——斯潘麦勒（蓬塔努斯）曾编写了一些优秀的对话读本，这些读本对于天主教青少年如同科迪埃的读本对于新教青少年一样大有用处。新教学校在使用科迪埃或夏泰永的读本的同时，也使用斯图谟选自西塞罗的书信。至于其他的作者，比如泰伦提乌斯、“加图”、“伊索”（人文主义者的译本）也时而出现在低级学校的课程中，但他们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作者那样受欢迎。语法书、会话读本和西塞罗书信选是初级教材的主要内容。

对人文主义学者来说，写作课程的内容包括分析、记忆和综合，学校对于这三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某种促进作用。

高年级的学生们要熟悉众多的拉丁文作者，比如西塞罗，他的《书信集》《论同盟》《论忧郁》《论伤害》，此外恺撒和萨卢斯特也备受推崇。可是也有许多课程都推荐查士丁、库尔提乌斯、李维的讲演，昆体良和西塞罗的《论区分》及《反论》。耶稣会学校特别重视西塞罗的演说词和《论演讲》。泰伦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及奥维德的《变形论》和《哀歌》同那些著名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一样，都是经常性的读物。上述作家在课程中出现的次数比别的古典诗人或那些人文主义者，如奥西亚特、托马斯·莫尔、曼图阿努斯和帕林吉纽斯等人要多得多；有时，后面这些作家的著作却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读物。

显然，对于校颁课程科目所提供的这些材料只能有保留地接受。一位作者被提到，并不证明他的作品被认真地研究过。在其教学效果方面各学校很不相同。温切斯特学校在著名校长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管理下，其四年级确实是把《田园诗》作为一个学年的课程来读的。在一些大型的耶稣会学院中，每一个年级都有一名教师，基本上能够完成官方规定的教学大纲。但是像1560年的伊顿学校，两个教师要负责七个年级的教学，教师所能支配的授课时间使他不可能在每个年级的规定教材中讲授超过30多页的内容。至于教材中所剩部分，必须靠男学生们自己去阅读——如果他们确实读的话。然而，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肯定，阅读总是为后来的写作打基础的。男学生们运用手中的笔记本，并被培养得注意所学文章的细节而不是其全部大意。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学生借助伊拉斯谟的注释就能够通读整个古代文学。学生依靠自己的阅读所积不多，必须想法加以补充。因此，我们发现各学校都广泛使用一些手册，在其中选自古典作家们的语言学和修辞学材料被整理成了容易吸收的形式。

这些手册中最重要的是词典。人文主义学者对于词典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剔除谬误的注释典故，给当局提供参考资料，并删去那些本来更适于放到百科全书中去的材料。但是16世纪晚期的词典与15世纪词典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加上了本国语的解释。意大利人卡莱皮诺于1502年编辑的广为流行的多语词典一再扩大，直到1590年包括了11种语言。与此同时，还出版了许多用于特定国家的词典，比如安东尼奥·德·莱夫里哈编辑的《拉丁语—西班牙语词典》（1492年），罗贝尔·埃蒂安娜的《拉丁语—法语词典》（1538年），1531

年劳赫富斯的《拉丁语—德语词典》，1538年埃利奥特的《拉丁语—英语词典》，该词典于1552年又被库珀所修订，并且，罗贝尔·埃蒂安纳1544年在法国，威索尔斯大约1554年在英国都出版了专门适合学校学生用的简明词典。

对词典的内容进行增补以便有助于查找恰当的词汇或成语词组，这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论文题目。此外，一些著名人文主义学者编的教科书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洛伦佐·瓦拉的《风雅》（初版于1471年），1511年伊拉斯谟的《常用动词》，还有一些较晚近的作品，如1558年小阿尔多·马努齐奥的《美丽的鲜花》。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模仿西塞罗式的作品，1535年尼佐利的《观察》的出版更加有力地促进了这种趋势，此书于1568年作为不朽的《西塞罗文库》而获得再版。

还有一些手册选辑并汇编了各种题材的内容，颇有裨益。如果你要对某个简单的概念精雕细琢，你可以从伊拉斯谟的《格言集》的拉丁文本和希腊文本中或从大量模仿他的作品中找到关于格言的材料。从1538年米兰都拉的《花朵》中可以找到诗歌的比喻，从1568年纳塔利·科梅斯和1556年卡尔塔利的作品中找到关于神话故事的材料。另一个资料宝库是1561年查尔斯·埃蒂安纳的历史、地理、诗歌大词典。最新的研究表明，不仅在男学生们的作文中，而且在当时最好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许多古典参考资料都取材于这些杂集。难怪到文艺复兴结束时，热心的读者所得到的古典遗产已经过转抄、肢解并且按字母顺序分类排列了。

作文，即为了各种目的对自己的材料加以安排的做法，仍旧主要通过模仿来学习；在这方面，流行的教科书首先是伊拉斯谟、海根道夫和迪特尔的范文集，它们提供了书信的样板，然后是关于4世纪希腊修辞学家阿夫托纽斯作品的课程，这些作品包括了不同风格的散文的范例，1542年由洛里克在其拉丁文译文中加以注释和扩充。

对模仿的这种偏爱甚至发展到了忽视正规地学习修辞学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受到非议。它在耶稣会学校中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耶稣会的控制范围以外，1543年拉米斯的《论辩术》广泛地讨论了如何引出争论并驾驭争论，这本书首先是在法国，1580年后在德国和英国逐渐流行起来。模仿法主要对拉丁学者有用，它有利于一种

推想的方法，其结果可适用于本国语言的写作，因此，当新文学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起来时，摒弃模仿法就是难以避免的了。到了下一个世纪，拉米斯派方法的胜利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教授希腊语的方法与教授拉丁语是一样的。尽管1591年以后耶稣会曾经尝试过同时教授这两门语言，但是希腊语在整个16世纪中一直只是中学高年级的一门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仍很迟缓。斯卡普拉的《字典》是最早为学校教学而编写的字典，直到1579年它才问世，克莱那杜斯最先编写的语法书一直广泛流传于世，直到格雷策尔（1593年）和卡姆登（1597年）分别写出取代它的新著时为止。初学者首先要读希腊文的教义问答手册和西比斯的著作，一年之后再读伊索克拉底、狄摩西尼、普鲁塔克、卢奇安的作品，最后才能接触到荷马、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作品。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们的作品当然也不会被遗忘。巴西勒、克里索斯托、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的作品在耶稣会学校和新教学校的课程中都可以找到。但是很明显，希腊语的教学不像拉丁语的教学那样完整。从教学时间来看，前者比后者要少些，在阅读希腊语作品时，也常常要借助于拉丁语的译文。直到1575年前后许多学校才认真开设希腊语，它只是拉丁语的辅助学科，是从事拉丁语写作时的例证材料的一个补充来源。我们看到被偶尔提及的其他课程，其地位也确实如此。即使某些地方的高才生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即使在某些较大的耶稣会学校或德国的新教学院的高年级里也曾尝试教授一些逻辑学、宇宙结构学和数学，这些学习也从未超出初级阶段，它们从未严重影响过16世纪学校注重修辞学这一特点。

学校从不开设今天支配我们思想的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课程；同样，尽管有其人文主义倾向，对于希腊—罗马人实际情况的介绍却也是极其有限的。学校课程的意向就是一种与基督教信仰完全一致的道德观。它提高会话与写作的能力。它使全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一套共同的观念和关于人类利益正常发展的共同经验。把这个时期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看，这些成就足以使人相信教育是成功的。

当我们从中等教育转向高等教育的考察时将会发现，曾经促进了文法学校发展的宗教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有助于而是有害于大学的发展。就中等教育而言，需要建立新的学校和适应时代要求的学科，曾对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对于大学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已经有众多的大学存在，没有多大必要去建立新的大学。而按照时代的要求改变体制，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已经确立了的制度；而且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变糟了。

随着欧洲逐渐被划分成一些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大学丧失了它们一贯具有的国际性。它们变成了地区性的中心，为它们坐落在其版图内的国家服务。1564年勃兰登堡的居民被禁止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大学以外的任何大学求学就是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个极端的例证。这样一来，各大学的学生人数都下降了。在德国，如果一个大学能有20名教师和400名学生，那就算不小的规模了。就连牛津大学，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每年攻读学士学位的总人数也很少超过100人。

所谓国家控制，还意味着各国政府对于最关心的问题要给予特别注意，也就是说要维持某种恰好在当地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信仰的方式。神学在各大学中都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在中世纪神学就曾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到这时仍被认为是对教士进行正规训练的一部分，因而它吸引了大批的学生。神学教授们的地位很高，而且常常对他们在大学中的其他学科的同事们的观点进行严格的监督。

神学地位的提高相应地引起了法律学和医学地位的下降，尽管如此，如果神学家们能趁此机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倒也无碍大局。然而论战的需要使天主教的辩护中充满了僵化守旧的倾向，并且在新教派中引起了剧烈的纠纷。^[1]惠特吉夫特和卡特赖特在剑桥的争吵乃是在大陆上导致大学分裂的路德主义者、加尔文主义者茨温利宗与反三位一体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拙劣的翻版。在巴黎，天主教同盟的党徒们密谋要撤换他们的改革派同事。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无法促使真正的学术繁荣发展，谁也不打算宽容真正的改革。那些已经实施了的改革往往成为宗教冲突导致的敌对行动的牺牲品。在法兰西学院，拉米斯激发的对数学研究的兴趣被那些仇视他的新教立场的人们所断送。爱德华时期对牛津大学课程的重新编排被那些在伊丽莎白时期得势的温和派所否定。到头来，除了神学获得了新的地位以外，其他正式学科的状况在各地都仍然几乎是中世纪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衰落时期，因为多少还能看到一些进步的迹象。新教徒们除了他们在斯特拉

斯堡、日内瓦和爱丁堡的学术机构最终都获得了大学的地位以外，还建立了耶拿大学（1558年）、黑尔姆施塔特大学和莱登大学（1574年）以及都柏林大学（1591年），而1593年建立的马里斯卡尔（Marischal）学院则使阿伯丁再次兴旺起来。由于耶稣会士的努力，天主教派的建树还要多些，如墨西哥大学（1551年）、利马大学（1551年）、迪林根大学（1554年）、杜埃大学（1562年）、蓬塔穆松大学（1572年）、维尔诺大学（1578年）、符茨堡大学和罗马的格列高利大学（1582年）和格拉茨大学（1585年）。这些大学中有几所主要研究神学，而扎莫希奇的研究院所赞助的维尔诺大学和两所拉丁美洲的大学则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即如何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传播到陌生的地区中去。

另外，中世纪的课程科目虽然已经过时，然而却奇特地富有弹性。比如，人文主义教育曾被介绍为修辞学和哲学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到1550年以后，它几乎在各地都得到了承认。甚至在考试制度仍沿用中世纪方式的牛津和剑桥，也都允许人文主义教育在其各学院中蓬勃发展，以至于逐渐在一般的大学本科学生的教育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四大学科^[2]和传统医学课程的庇护下，科学也有了某些进步。深受传教经验鼓舞的耶稣会士鼓励地理学的研究。萨拉曼卡大学开设了天文学讲座，并把哥白尼的论著列为必修教材。意大利培养出了卓越的数学教授；英国值得夸耀的有凯厄斯、雷科德和一股科学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汉弗莱·吉尔伯特的建立研究院和格雷沙姆学院（1596年）的计划。解剖学在帕多瓦大学、波伦亚大学、巴塞尔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都非常兴盛，动植物解剖已成为一项平常的实践活动。在迪奥斯科里斯的著作的推动下人们对植物的兴趣导致了若干植物园的建立。

宗教法规学者从新教派的大学中被驱逐出去，接着民法学者也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怀疑，这时，法学研究领域受到严重的损失。可是在这方面，低落趋势再次得到缓解，因为在西班牙宗教法规有所复兴，而在布尔日大学、日内瓦大学和真蒂利上任后的牛津大学中进行着一些卓有成效的民法教育。尽管组织涣散，并且常常被权贵的私利所误导，但是大学的课程体系仍然足以反映出更广大的学术界的意向，即使仅仅从侧面加以反映，但毕竟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与学术之间的差距，或者说对于人类知识遗产加以传授的努力与加以发扬的努力之间的差距在16世纪特别明显。各大中学校的课程甚至连人类知识的传统领域都没有全部包括进去，至于那些正从各方面加以开发的新兴学科能被包括进来的就更少了。当时许多有学识的人在教育界谋生，但也有不少学者与此无缘，而是靠职业收入、赞助或私人财产维持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在学问中做出巨大进步与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并无多大联系。

通论16世纪的学术，当然是逐项考察最为便利。但是和教育的情况一样，必须首先论述某些一般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宗教论战。相互对立的教派总是指望学者们为他们的教义和主张提供论证，加以支持；这些教派对学者们施加的压力最终使得相当多的精力被放在神学上和放在历史学和政治思想的某些分支方面。同时，宗教观点的分歧，意味着那些与宗教问题无关的学科有可能比以前较为自由地发展。研究这些科目的人们，已感到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使新发现的东西与某种官方的宇宙结构学吻合。教会当局仍然试图控制法学、哲学和科学思想，但这种控制的做法总是时紧时松，而且尽管这种控制在个别情况下可能造成灾难，但总体来说，它们已经丧失了教会在中世纪曾经行使的强制力量。

其他一些值得考虑的影响，其效果和范围要小一些。但是，民族主义的激情，人文学者所兴起的崇古热，日益增长的对于实际知识和技术成就的尊重，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确定研究哪些问题和采用什么方法。它们影响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并且，随着书籍销售量的增长，这些兴趣此时第一次在形成学术模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学，不论其学生人数还是其著作数量，都居各科首位。除了应当属于政治思想范畴的关于教会政体的争论以外，最重大的论战就集中在上帝意志与人类愿望的关系问题上，天主教拼命论证恩宠的效应，而新教派则竭力鼓吹得救预定论。在这些问题上，对前一种观点，做出重要新贡献的是耶稣会士路易斯·德·英利纳，在第二种观点上则是荷兰神学家阿明尼乌。二人都要维护人类意志的自由，反对僵死的必然决定论。圣餐问题是这场斗争的另一个焦点。特伦托宗教会议确定了圣餐的救赎性质，而许多新教徒则表示反对。该会议还明确坚持变体论，反对从同体论直到索齐尼派主张的饼酒不过是纪念物这个范围内所有的圣餐观。最后，某些非正统的思想家试图推演出一

个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弗斯都·索齐尼倡导理智与宽容，并主张只保留那些对于确保个人的宗教利益必不可少的教义。这样，他就以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斗争的面目出现了。他的教义在东欧得到明显的支持，杰出的波兰神学家西蒙·布德尼强调这些非正统的学说，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

在圣经的研究方面，自16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投入大量的精力，而1540年罗伯特·埃蒂安娜的著名译本说明当时的学术界对于圣经文本所能做的工作已经有效地完成了。但是对这部译本中经文的修订及教义上的抵牾使人们希望有新的译本。在英国，1560年的日内瓦译本、1568年的主教译本和里姆斯的译本分别体现了加尔文主义、安立甘宗和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勒费弗尔的法文译本在1582年被卢万的神学家们所修订。1570年布德尼的波兰文译本具有反对三位一体的倾向。对基督教初期的神父们的研究是阅读圣经和神学发展的必要补充。这项工作是由伊拉斯谟做出良好的开端以后，相对来说，进展不快。小佛罗本、莫莱尔斯（Morels）和小弗雷德里克·莫莱尔（Morel）的希腊文译本的出版填补了一个明显的空白。在乌克兰、奥斯特罗斯基（Ostrogskhi）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开始把希腊早期的神父们的作品译成斯拉夫语。但是，大规模研究这些神父的时代尚未到来。

在哲学方面，我们看到复杂的遗产有了多方面的发展。一个有影响的成就是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复活了经验哲学家的思辨哲学。他的折中主义著作《形而上学论文集》受到斯科特斯、奥康姆和阿奎那诸家的影响，比其他作品都更多地保存了作为欧洲思想中一股有生力量的经验哲学。他的思想活动不超出他的信仰和方法的界限，但在这个界限内则是自由地思考。他所表现出的多产与敏锐是他的那些较少正统思想的同侪们，比如切萨皮诺和扎巴莱拉等人所望尘莫及的；这两个人是意大利阿威罗伊（Averroist）派和亚历山大派的领袖，因畏惧教会的责难而缩手缩脚，这使他们仅限于指出困难之所在而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另外一项重要的进展就是在巴黎进行的逻辑学的教学改革，这项复杂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从混乱中理出点头绪。中世纪七艺中的逻辑学曾经以12世纪皮特勒斯·希斯帕努斯的著作《逻辑学大全》为基础。它与现代的数学逻辑有亲缘关系，但是缺少一套适当的符号系统。它的解释者们曾陷于烦琐定义的纷乱头绪

中。反对它们的人文主义者在15世纪积蓄了力量。莱茵兰学者勒洛夫·赫伊斯曼（鲁道夫·阿格里科拉，1444—1485年）把逻辑学当作修辞学的一个分支，他复活了人们对于盖然性和论题逻辑的兴趣，这实际上是一种记忆方法，有助于发现论证。他的追随者有在巴黎的斯图谟和皮埃尔·拉米斯（1515—1572年）。然而拉米斯所关心的与其说是逻辑学，还不如说是如何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他那受到大肆宣传的方法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先从广泛的定义开始，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划分直到具体的事例，这种排列可以想象为空间上的金字塔，它把人们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减少至便于教授的一些形式，但却抹杀了各学科之间的严格区别。他的这种复杂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思想当作个人的活动，是性格的表露，因而是可加以图示的，可以定量的，而且同语言是相独立的。这种体系把思想的内容与其语言的外壳分离开来。拉米斯无力探索他的理论的哲学内涵。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地位并不高。但是他的方法论和他对非语言性思维的偏爱却具有强烈的影响。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教育大协会（Great Didactic）和皇家学会都带有拉米斯的烙印。

经院哲学和拉米斯主义都是从大学中诞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潮从渊源上讲就没有这么尊贵了。它是从新柏拉图主义的推测中产生的，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并且经常与一些神秘的做法有关，这些迎合了15世纪的学者，而教会的反对则使这一理论的追随者们备受苦楚。泛神论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将留到别处再讨论，但是被它所吸引的科学思想家们却易于受到大范围的迫害，帕拉切尔苏斯即是一例。类似的情况还有米雷，他通过文学接触到这个思想，在罗马（约1565年）他的关于柏拉图的讲演遭到禁止。最著名的系统解释泛神论的是乔达诺·布鲁诺，他被监禁并于1600年被施以火刑。泛神论关于任何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都是上帝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的观点之所以招致攻击是因为它排斥了一般法则，或者说排斥了上帝与人沟通的可能性。它从根本上损害了基督教和有形教会的主张。

如果我们不把经院哲学的复活考虑在内，16世纪晚期哲学引起我们兴趣的地方主要是它对经验主义的促进。特勒肖的略带空想的著作《论自然》（1565年）与新柏拉图主义同出一源，他认为所有真知都来源于感觉的材料。尼佐利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的攻击，目的在于更新修辞学，但他坚持认为一般概念并不代表事物本质，此说有

一种附带的作用，即把个别事物确认为真理的主要源泉。拉米斯主义则致力于整理这些事实并使之摆脱语言的障碍。关于个性独特的泛神理论支持了尼佐利的观点。怀疑主义对泛神论也有好处，它的发展与大学无关。它的主要阐述者是蒙田和图卢斯市的医生弗朗西斯科·桑切斯，他们否认真实知识的可能性，注重通过观察获得的近似的知识。这些理论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都为发展思维的科学模式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另一类不同的思想体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就是新斯多噶主义，它在那些受到宗教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里十分流行。但是像利普修斯和杜·韦尔这样的斯多噶主义者称不上思辨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是在艰难时世中寻求生活准则的道德家。

那些阻碍哲学发展的势力却促进了政治思想的发展。从前路德和加尔文都曾支持过文艺复兴后的国家所主张的专制主义观点，因为认识到不借助于强大的世俗势力，改革后的宗教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他们的继承者们又发现，如果不向世俗势力挑战，宗教上的少数派就无法生存下去。16世纪50年代人们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评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所使用的概念都是从中世纪作家中借用的，但由于所强调的重点的变化，倒也有新奇之处。[\[3\]](#)

历史写作受到的影响与政治思想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史学方法的发展。有些人文主义史学家曾过高地重视写作风格，却忽视了准确性，或者说是过于欣赏战争情节和假想的演说。可是比翁多曾探讨过建立考古学的可能性；埃理阿斯·西尔维乌斯探讨了研究人种学的可能性。奎恰尔迪尼从古典史学著作中学会了如何分析政治阴谋。波利多尔·维吉尔在积累和筛选原始素材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人文主义学者是实验家，研究其著作的人们将会发现在这些著作中含有大量的建议。但是，这些著作未能形成一套连贯的方法学传统，因此我们对于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历史编纂的一个“新学派”已经兴起了。这些人文主义者的继承者们造诣各不相同，本领日益增长，各自遵循其先辈指引的不同方向。在这段历史中只有缓慢的转化，而没有急剧的变革。

编年史是一个与中世纪相联系的史学形式，1550年以后不仅在俄国和土耳其，而且在瓦赞所在的法国和霍林希德所在的英国仍然十分

流行。同样，我们看到波尔·克罗默在1555年，苏格兰人布坎南在1582年分别编写了国别史，这些著作成为他们的人文主义拉丁文杰作的标志。巴罗斯效仿李维的方法于1553—1565年编写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历史。乌尔塔多·德·门多萨1572年的著作《格兰纳达战争》以萨卢斯特和塔西佗为样板。然而，通观这个时期的历史，不难看到，这些编年史和仿古作品只不过是出于流传广泛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幸存物。史学的其他方面也在日益发展。荷兰的律师斯莱丹受其新教同侪的委托，准备编写一部宗教改革纪实，此书成于1555年。布林格描述了宗教改革的开端，诺克斯于1566年描写了它在苏格兰取得的胜利。1554年克雷斯潘在法国，1559—1563年福克斯在英国为与其信仰相同的人们写成了一部殉教者列传。这些人从内心里渴望把新教事业最明白清楚地宣扬于世，因此他们被鼓吹者的技巧所吸引，在写作时叙述生动，旁征博引，使用的论证却没有严密的逻辑，尽是肤浅的说教。他们绝非不偏不倚，在核对自己的材料的真实性时常常是漫不经心。

上述这些特点也表现在某些以更遥远的过去为题材的同类作家身上。《马格德堡世纪史》（1559—1574年）的作者们立意证明罗马教会以往的短处；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罗列事实，企图通过大量的证据来使人信服。但是他们不加考证地接受了许多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材料，并且不惜剔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材料。梵蒂冈的图书管理员巴罗尼乌斯回敬了他们的指责。他手中拥有大量未公布的档案材料，这使他的作品集比对手们的更有说服力。十二对开本的《教会年代记》（1588—1607年）成为教会史资料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可是在已经蔓延开来的宗派思想的熏染下，就连学识渊博的巴罗乌斯，尽管比马格德堡的那些合作者们更加勤奋、更有学问并且更加诚实，但也时常做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手脚。

这些介入宗教争论的行为，虽然鼓励了宗派思想，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一股动力源，它促进了引用文献、加以分析和明确表达的好习惯。但是我们绝不能对它们估计过高，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其他领域对史学方法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6世纪是崇古主义的春天，福谢、利兰、贝尔和斯托这些人在爱国热情和自发激情的推动下，对于几乎是未曾被人接触过的地方性历史遗迹进行了发掘和考察。他们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实际材料，而他们挖掘出的丰富资料在帕基耶的《法兰西研究》（1560—1621年）一书中和卡姆登的《大不列颠》（1586

年）一书中表现了永久的价值。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家们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不断寻求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人们对于历史的全面理解得到了深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进步就是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博丹在1566年出版的《获得历史真知的方法》一书中讨论了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还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描写其海外领地时第一次详细论证了气候和自然资源可以怎样地塑造一种文化。在这方面，游记文学，比如哈克卢特的游记选集，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至于其他附属性的研究，影响就比较小了。但是人文主义学者们所写的关于罗马人的家庭、人民大会和法庭的专题文章，以及博丹、奥特芒和托马斯·史密斯对于中世纪的和当时的风俗制度的研究，都毫无疑问地有利于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解释历史。瓦萨里所著的《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一书（1550年）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活动中的一个曾被忽视的侧面。而像里巴达奈拉的《罗耀拉》（1572年）这样的传记著作，像罗耀拉、卡丹、切利尼和圣·特雷莎这些人的自传著作，以及蒙田的《短文集》都反映了人们对单个人物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导致人们摒弃了罗马人的静态心理学，并且为更细微地分析人物动机奠定了基础。

我们必须提到另一个特殊的重要成就。古罗马人的《实录》（Fasti），于1546—1547年在罗马广场被发现。最早将其编辑出版者罗伯泰洛和西戈尼奥曾用它来修正李维的历史年表。此发现后不久，J. J. 斯卡利杰就在他的《年代考订》（1583年）一书中更加精密地完成了一部以年代顺序为基础的古史编年纪要。

历史学家们也逐渐学会更好地行文。它可部分地归因于本国语写作风格的普遍改进，但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间接结果。到了16世纪末，未受过任何专门文化训练的社会活动家们能够提笔写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这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写作往往非常真实而又生动。而且，它们作为同时代历史学家的原始素材，对正规的写作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期里，在法学研究方面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革。特伦托会议的法规以及在1564年被授权解释这些法规的枢机主教团的工作

都为新法典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近代时期罗马教会的以教皇权威至高无上、不容怀疑为内容的教会法规。新教派面对着使教会法规与既定教会的职责相符的难题，竭力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推动改革，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归于失败了。民法也同样由于中世纪秩序的瓦解而受到了影响。许多法律概念都随着封建主义的逐渐消失而变得陈旧了。人文主义者建议回到剔除了中世纪成分的《查士丁尼法典》，这条路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古代根本不同。对于大陆法学家的工作，我们必须放到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他们先是力求把古代法典置于其原有的环境中加以解释，在正确解释之后，才从这些古代法典中引出一整套基本的法学原理。西班牙人阿戈斯蒂诺和法国教授蒂尔内布继承了人文主义者对古罗马法律制度的分析工作。居雅斯编辑了《狄奥多西法典》，戈德弗罗伊编辑了《民法典》。居雅斯在他的《法典简要注释》一书中，试图把法律的基本原理缩编成不言自明的公理。科克在英格兰也试图解决这个简化法理的问题，他像居雅斯一样依靠自己的历史感，但他是把习惯法而不是把罗马法作为出发点的。以上这些尝试没有一项取得完全的成功，但在使欧洲混乱的法律遗产适应近代社会需要这方面，它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由一种科克式或居雅斯式的保守方法加以解决的。普遍的教会垮台以后，主要的民族国家彼此对峙却没有一个仲裁者，因而必须建立某种体系来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曾经较早地引起过维多利亚的弗朗西斯的注意，但是这一时期对解决这个问题贡献最大的是意大利人真蒂利，他后来成了牛津大学的教授。他在《自然法》一书中为国际法奠定了基础，并指出了一些应用国际法的细节，从而为格劳秀斯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在古典研究方面，一个被称为伟大的学术时代开始了。伊拉斯谟的继承者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校订原文并对费解的读物进行注释或修订。除费德鲁斯的作品于1596年被介绍以外，比较著名的拉丁作者和大多数比较著名的希腊作者的著作都已经出版。包括阿纳克里翁和朗吉努斯的作品（1554年）、马可·奥勒利乌斯的作品（1558年）、彼翁和摩斯科斯的作品（1565年）在内的24部书籍，如今填补了那比较明显的空白。但是许多类似《校订规则》的书都是草率编成的；而且即使对于那些较好的版本，由于新手稿的发现和评论方法的改进仍给校订者留下了广阔的余地。罗伯泰洛在1557年撰写了第一篇关于原文

鉴定的论文，此后，发表各种杂文读物就成了获取名誉的捷径。这不仅为成熟的作家韦托里、同样也为年仅22岁的作家利普修斯和坎特带来了名望。各种新版本从出版社里大量涌现出来。朗班的《卢克莱修》，韦托里的《埃斯库罗斯》和《亚里士多德》，利普修斯的《塔西佗》，约瑟夫·斯卡利杰的《马尼利乌斯》，卡索邦的《阿特纳奥斯》都被列为这个时代值得夸耀的主要著作。

相比之下，人文学者们所研究的其他领域进展很小。已经论述到的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的某些著作具有传世的价值，但是除了斯卡利杰关于编年史的论文以外，没有一部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西塞罗主义仍然是活跃的课题，从前伊拉斯谟和本博所争论的那些要点，现在又被米雷、拉米斯、利普修斯和加布里埃尔·哈维重新拿来争论。那些除了西塞罗的词句以外不想引用任何其他作品的模仿者们的任务由于尼佐利的《辞典》的发表（1591年再版）而变得容易了，而且由于得到斯图谟和耶稣会的权威的支持，西塞罗主义在文法学校中获得了胜利。可是在这些学校之外，在严肃的作家中，西塞罗主义很快就失势了，我们可以从利普修斯摒弃西塞罗的句式转而喜爱塞内加的跳跃式风格中看到这一点。一旦我们认识到西塞罗主义对本国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设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长期关注这场奇特的争论了。认为各种语言在其发展史上都要经历一个“古典”时期的理论（语言在这个时期发展得近乎完美），当它与人们认为拉丁语具有天然的优势的想法结合在一起时，就有可能使建立伟大的近代文学的希望破灭。因为当一门完美的语言就在某位作者手边时，他为什么一定要竭力使用另一种尚不成熟的语言呢？进一步说，承认西塞罗句式是一种理想的句式，就可能迫使像法语和英语这样的词尾不变化的语言采用与其自然结构不相适应的形式。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6世纪的作文教学中，模仿法仍然主要是一种用来代替正规修辞学学习的方法，并且正如拉米斯所阐明的那样，本国语作家认为真正有用处的还是修辞学。这样，反对西塞罗风格的人们实际上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为新文学而战。

人们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也抱着类似的兴趣。这篇曾被忽视的论文在16世纪中叶声誉鹊起，并在文学界而不是学术界广为流传。虽然这本书再版数次，但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诗歌理论著作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此书本身的版本和注释。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

是普遍化了的经验”这一概念，筑起了一座理性的堡垒以便和那些诋毁想象文学中的虚构成分的人们抗衡；另外，亚里士多德对于叙事诗和悲剧的详细评论也帮助了那些希望在本国语言中引进这些文学形式的作家们。继卡斯特尔韦特罗之后的大多数评论家都希望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化概念中找出严格的规则，这是一种要求规范化的近乎独断的精神状态的标志，它表明人文主义的没落。才华出众的帕特里齐在1586年著有《论诗学》，他独自倡导着一种更加有机地看待文学和文化成就的观点。

对于人文学者的研究领域来说，最后还有两个值得提到的学科，这就是考古学和语言学。在考古学方面，人们对古代铭文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但主要感兴趣的却是罗马的古迹和雕塑。在这个时期，拉菲利、德·卡瓦来利斯和瓦卡对这些古迹首次给予了图示说明。因为罗马代表他们国家的历史，所以使他们得到鼓舞的可能主要是曾经引导过帕基耶和卡姆登的那种精神而不是人文主义的热情。在语言学方面，在众多研究语法和句法的学者中没有谁的视野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需要。但是这个时代有一项重大的进步值得赞扬：1572年亨利·埃蒂安纳出版了希腊文的《辞典》；并且，还应当提到一篇理论性的论文《诸种语言释疑》（1555年），作者格斯纳在此论文中采用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通观这个时期的古典研究，我们必定会注意到约瑟夫·斯卡利杰和卡索邦同伊拉斯谟和本博之间的差距。1500年时为首的人文学者都是知识界的先锋，并且其中许多人都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可是100年后他们的继承者们却是一些学究式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最富有实效的思考失去联系。这种使人能力降低的冷漠可能是几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时，许多知识领域的发展都超过了古典时代曾经达到的水平。各学科的学者的兴趣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样不自觉地被吸引到希腊文或拉丁文中去。并且，既然懂得盖伦、查士丁尼或阿基米德的原著已不再可能使人在医学、法学或科学研究领域中名列前茅，人文主义学者也就势必不再重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专长。使得古典著作成为打开各门知识宝库钥匙的条件已不起作用了，并且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其他力量积极地促使人们进一步缩小了兴趣的范围。在那些为古典学者提供大学职位数额最多的国家里，对古典原著批判校勘的热潮也最为高涨。对专家地位的竞争使得人文学者们把精力集中在原文

校订这一分支里，在这个领域中能够最有效地衡量出竞争者们的技能和勤奋。并且，宗教上的褊狭也促使人们乐于选择这个领域。帕莱亚里奥在罗马被指控为异端，利普修斯在新教派的莱登大学中也遇到重重困难。思考是危险的，做校订工作倒不大可能触犯章法。

对于希伯来语和其他东方语言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古典研究。它们对于基督教的重要性确保其在大学和某些比较进取的文法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些学校的学生却满足于一般水平的成绩，而这些语言中范围广泛的文学作品在多数情况下只形成简单的文法课。其他领域的著名学者们，像贝拉明和弗拉希乌斯，像法兰西学院教授本尼狄克·热内布拉尔那样的天主教徒，像洛桑大学的谢瓦利埃那样的新教徒，像斯坦卡利和特雷梅里奥那样的意大利流亡者，像科隆大学的约翰·伊萨克那样的犹太人，都尝试过解释希伯来语的基本要素的工作。还有少数学者如拉米斯的弟子之一帕尔马·卡耶和意大利的卡尼尼奥将工作范围扩展到对其他东方语言的研究上。但是对东方传统的认真研究大部分都留给犹太人自己去做。一些重要的犹太法典学者，如约瑟夫·卡洛和阿扎利亚·戴·罗西、历史学家约瑟夫·本·乔舒亚和神秘主义者以撒·卢里亚都属于这个时代。

由于正规的学术界忽视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这方面只取得了缓慢的进展。一个想学习外语的人或想掌握本国语的正确用法的人可以求助于书籍。甚至像匈牙利那样偏远而又不幸的国家也有自己的语法书和词典。想当作家的人被鼓励使用本国语写作。亨利·埃蒂安纳撰写了论述法语优点的论文，托马斯·威尔逊试图对同胞们解释修辞学的奥秘，他们都可以借助大量的本国语著作。但是在这些实用性的成果与文学指导之间仍然有一道鸿沟，由于得不到大学的帮助，私人的努力要填平这道鸿沟进展甚微。那些对本国语研究的兴趣可追溯到但丁的意大利人，到15世纪已经在系统研究意大利语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到16世纪，法国人也仿效他们的做法。1542年，梅格利发起了对拼写法的讨论。1578年，亨利·埃蒂安纳抨击了借用意大利语的做法。1583年布尔古安开创了对拉丁语系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即使在法国，仍有大量工作尚未进行，其他国家也绝无例外。

关于科学另有专章论述。在这里，关于其成就无须多论，只想说明这些成就能使我们正确认识那些我们一直在加以讨论的不属于科学的著作所具有的重要性。16世纪后半期是墨卡托、伽利略、斯蒂文和

维埃特的时代，血液循环的发现和第一架望远镜的制造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这50年中科学的进步，对于未来世界概况的形成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参照这种贡献去衡量另一些人产生的持久影响，无疑也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苏亚雷斯对于天主教徒的思想，胡克对于安立甘宗信徒的思想，真蒂利之于格劳秀斯，斯卡利杰之于本特利，弗里齐和博丹之于孟德斯鸠。更有启发意义的是把同时代的科学与神学的成就加以对照，进行比较。那时科学得到的赞助微乎其微，只有少数献身者们从事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今天的人们仍不可或缺。神学研究具有职位和权势的诱惑力，它吸引了一大批有抱负者的智慧和精力；但是，虽然占有一切有利条件，神学研究却未能给人类的知识遗产增添什么明显的成果。这一次上帝没有保佑阵营强大的一方。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讨论教育和学术时一直把欧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但我们现在必须对欧洲几大地区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别加以论述。以本国语言为基础的初等教育在苏格兰组织得最好，在那里，诺克斯的卓越的规划，尽管由于缺乏资助而打了折扣，但在教区学校中仍留下了值得纪念的教学成果，这些成果为学生进入文法学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德国的新教地区可以感受到梅兰希顿的影响。在波希米亚，以本国语为基础的初等教育具有自觉的民族主义特点，在文化水平历来比较高的瑞士各州和尼德兰的情况也是这样。英格兰有些落后，拉丁诸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也是如此。在波兰和在匈牙利的一些独立地区，本国语的教学基本上限于德国人定居地。在土耳其控制下的地区内，以及在俄国，就像伊凡四世所抱怨的那样，本国语教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拉丁学校曾被新教改革者和耶稣会复活。由于宗教冲突对教育热情有刺激作用，那些距离天主教和新教势力冲突点最远的地区，诸如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南部，到1600年时，教育基础也就最差。不过，甚至在法国，建议每个城镇都要设立一所学校的皇家文告也被普遍地忽视了。爱尔兰正与外国入侵者打得难解难分，匈牙利一度蓬勃发展的教育体制在土耳其入侵和新教派敌视的双重打击下完全崩溃了，这些都是教育受到极大忽视的特殊事例。在波兰东部地区（该地区大大深入到目前俄罗斯的版图内），来自西部的宗教竞争由于这里还有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居民而变得更复杂

了。在沃伦地区的奥斯特罗格，人们在1570年试图建立一个斯拉夫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三位一体的学会。1586年，东正教的升天兄弟会成员们在利沃夫创建了一所拉丁文学校，用罗马天主教的武器对付罗马天主教的压力。在更靠东部的俄国境内，除了在一些神学院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都不存在。1551年，伊凡四世说服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更有效地培训神职人员，但却从未实行过。

一般说来，宗教斗争对于大学都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这一派或另一派稳定地得势，大学也逐渐从这种不利的影响下复元。虽然新教派内部的纷争减缓了这种复元的速度，在大不列颠、德国和瑞士毕竟出现了复元。宗教战争在法国最为严重，教育的衰落期持续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其衰落期的开始也没有德国早。然而，法律的教学在外省却相当兴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学效果优于平均水平。意大利的大学是因为它们设法保留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西班牙的大学则是由于诸如苏亚雷斯这样纯粹的正统派总能保证它们得到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是它们的权限都没有达到像卢万大学或新建的莱登大学那样高的水准。尼德兰人由于对贸易的兴趣，不拘一格的性格以及比较宽容的传统，从而为取得学术成就创造了一个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为有利的环境。

教育体制的差异必须同学术活动的分布一起来考虑。神学家、政治思想家（特别是研究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各国都大有人在。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会法规学家除外）和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们除布拉赫和苏亚雷斯等少数例外，都来自一个包括意大利北部、瑞士、法国、尼德兰和英国南部的中心地区。这种普遍现象与大学的作用之间的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大学的课程表中没有历史课和政治思想课，历史和政治思想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的推动下发展的，与学校教育的效能并无关系。当时的知识界做出贡献的其他知识领域都在大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对这些学科来说，一个学科能够获得普遍进展是与它受到当地高等教育中心有效的重视分不开的，各国都是如此。如果说在别列津纳河以西的欧洲各地都可以找到卓越的神学家的话，那是由于神学在各大学中都占有受尊崇的地位。如果说大多数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都出自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中心地区的话，那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大学比周围地区的大

学更加热心地致力于研究哲学（而不是经院哲学思想）、民法和科学。德国在以前的半个世纪中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方面都曾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说它的这些学科现在落后了，那是由于梅兰希顿改革见效之前德国大学的衰落以及这次改革后神学地位的提高。如果说西班牙学者们在经院哲学和教会法规方面的研究光彩夺目的话，那是由于西班牙一直在大学课程中保留了这些中世纪的学术重点。

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与学术成就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此刻让我们把视野开阔一些，看一看这个时代各个阶级的文化生活（即使仅仅局限在欧洲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地理范围内），并且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在欧洲人的心智普遍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大学之内还是在大学之外学术研究所具有的明显的重要性丧失了。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人们对于本国语文学的发展和在教士阶层以外的文学的传播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文化的普及比它的提高远为重要的时代。那些既煽动听众也教育听众的传道士们，那些宗教手册的编纂者们（在东欧某些地区，宗教手册是地方印刷厂的唯一产品），那些戏剧家、翻译家以及诸如希尔与米扎乌尔德这类编纂传奇故事的历史学家们，还有那些忙碌的各种各样信息的提供者，都是建造未来世界的有力的建筑师。

当然，在普及的进程中也会损失不少东西。神学家们微妙的语言再次出现时成了标语口号。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推论被占星术士用来为其谎言增加骗人的深奥。到16世纪末，翻译家们已做了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即至少可以从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译文（常常也可以从其他语的译文）中读到最优秀的古典作品，只有某些抒情作品和戏剧作品除外。但是翻译并不体现古典文化遗产普及过程的最后阶段。《变形记》、特洛伊和金羊毛的故事，都以上千种形式被转述，到了社会最底层就变成了一些肤浅的简写本与通俗本。而且，对于众多的人，包括像匈牙利这样一些整个的民族来说，这些简略的故事正是他们了解古典的主要源泉。至于那些传播科学知识的人们，作为其资料来源的盖伦、普林尼、托勒密等人的著作本身就是陈旧过时的。

但是这些缺欠并不重要。欧洲中等阶级的教育不是经过一代、两代甚至三代所能完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过程的初始阶段也只能是使书籍变得更为人们所熟悉并使教育变得不再完全是专家们的秘传。当时的使用本国语文写作的作品使这一点成为现实。这一成就意

义重大。再过两个世纪之后，人文学者们所把持的古典遗产，科学家们的重大发现，以及苏亚雷斯所发扬光大的经院哲学，都融会进了突然崛起的中等阶级的文化中。同样，起初为了培养宗教的捍卫者而创建文法学校和改组中世纪大学的做法，成为导致后来的一些改革的步骤，这些改革建立起了产业革命的教育制度。在当时的观察者看来，反宗教改革这个时期似乎充满了各种计划和党派，它们正把人类拖向一些彼此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些观察者认为，未来属于牵引力最强的那些方面。然而我们发现各股力量的牵引方向完全一致，或者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基本一致。溪水沿着一些方向迥异、蜿蜒迂回的河道奔流，但是最后它们都汇集在一个共同的河口。

（陈冀邢 译）

[1] 参阅前面第3章、第4章。

[2] 中世纪大学中的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译者注

[3] 参阅后面第16章。

第十五章 科学

在16世纪前半期，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乃至革命性的新著作出版问世，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结构》，这两本书碰巧都是在1543年出版的。除天文学和解剖学外，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还有许多其他的著作都是16世纪中叶以前完成的，比如帕拉切尔苏斯和费内尔的医学著作；贝隆和隆德莱的动物学著作；卡丹^[1]和塔尔塔利亚的数学著作；努内斯、奥隆斯·菲内和格马·弗利修斯在航海学与制图学方面的著作。开普勒、伽利略和哈维的主要著作都是在1610年或更晚才开始撰写的。因此，16世纪后半期的科学家们，与其说是发明创新者，不如说是巩固继承者。除第谷·布拉赫和威廉·吉尔伯特以外，几乎没有出现名闻遐迩的人物和令人惊叹的创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那些将要掀起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人们长大成人了，正是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为革新受到了训练，做好了准备。阿卡邦当特的法布里休斯本人是一位可敬的二流科学家，人们常提起他，是因为他是哈维的老师而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成就。但是，尽管16世纪后半期的科学家们一般说来很少成为观念转变的开创者，可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一种必不可少的而且颇有裨益的联系沟通了对权威的尊崇和对新奇事物的自觉意识，前者推动了16世纪早期的发明，后者推动了17世纪的创新。人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仍然十分强烈；事实上，直到1550年以后，希腊语的数学著作才完全变得可以吸收利用，其中阿基米德的影响尤为重要。希腊科学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出发点，但是无论多么缓慢，对古代的尊崇总在被对新奇事物的自觉意识所冲淡，这也许得益于通过探险展现出了一个古人从来不知道的新世界；并且，对权威的依赖掺杂进了可喜的和强烈的反偶像思想，它往往表现为文艺复兴那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和责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所有的科学不外乎数学、医学或巫术。在大学和新建的人文主义学院里以及在讲座上，数学更多意味着应用的和实践的数学，而很少意味着纯理论的数学：即理论天文学、航海学、制图学、力学、弹道学、城防、测量学乃至往往使数学的声

誉被人怀疑的占星术。医学是一门大学课程，它包括植物学，后来又包括了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在大学之外，还有外科学，这是一门管理严格的手艺；还有帕拉切尔苏斯首创的药物化学，讲述化学药品的制作和使用，并且还夹杂着其创始者的反偶像和反正统的思想内容。在这个时期中，巫术占有最突出的地位。这时的巫术已分为黑术、白术和自然法术三个类别，尽管黑术和白术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然而神秘地研究自然作用力的自然法术却比浮士德的传说征服了更多人的心灵。自然法术比黑术和白术更受人崇敬，但它在总体上也带有一些非法巫术的魔力。在16世纪，尽管人们公开声称巫术和自然科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却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自然法术是一种半神秘主义、半实验性的科学。自然法术学者们完全是严肃认真的而且有广泛的实践；这就使自然科学家的普遍的形象是半巫师半贤哲，这种形象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当时没有一位实验科学家摆脱了巫术的诱惑，约翰·迪伊和第谷·布拉赫构成两个侧面。约翰·迪伊本人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占星师，是一个有创见有才能的数学家，后来离开英国在欧洲大陆漫游；尽管摆脱不了环境的支配，他仍是一个坚定的唯灵论者。第谷·布拉赫则是一个最近代化的、推崇理性的、相信严格观测的天文学家，然而他也相信炼金术和占星术在探求自然的真正本质方面可以提供与纯天文学同样多的东西。到这个世纪末，开普勒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轻易地摇摆在数字神秘主义与精确的天文学之间，企图向人们表明自然法术本身并不必然阻碍科学的发展——尽管当时的“新”科学家们都正在转向敏锐的构成科学革命基本特征的理性主义。这样，自然法术就从神秘主义进入实验科学，并且继续发展直至最后与工程技术相结合，这一点自16世纪初就开始形成优秀的传统，并由列奥纳多·达·芬奇卓越地表现出来，这种传统在以后的钟表制造师、天文仪器制造师以及机械师的工作中得到了继承。

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之一是人们对于普及科学的兴趣大为增强，这种增强一部分是通过本国语著作，一部分是通过插图书籍吸引人们的兴趣，一部分是通过奇妙事物的力量，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展示已经掌握的科学知识所具有的实用的一面。早先的学者们曾经把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力求把古典的希腊科学介绍给高等学校里的但还算不上专家的读者们。现在，这些学者们又把拉丁文译成本国语，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科学知识既送给工匠、航海家、工程师这些“实践

者”，也送给绅士们，他们包括朝臣、外交人士和资助者，他们是能够影响学术界和实践界事件进程的一些人。这样，一部法文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在1559年出版了，它是由人文主义者、诗人、数学家佩尔蒂埃翻译的。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570年出版，它的意大利文版则在1575年问世，译者是科曼迪诺，一位有才华的数学家和学者。本国语版本的译者们不仅限于学者的范围，一些并非专家学者的人也在利用人文主义者翻成拉丁文的版本。例如，亚历山德里亚的海洛著的《气体学》一书在1575年被科曼迪诺译成拉丁文，因而首次广泛流传。此书的影响力在于它是最早讨论空气的物理性质的著作，并对于流体和气体的机器及玩具做了认真的描述。这本书的拉丁文本后来被一批实践者译成了意大利文，为首的是阿利奥蒂，他以此书为工具，宣传他自己的机械发明。这两类翻译者的目的都很清楚，那就是把古老的智慧介绍给当代的读者。人文主义最初可能是一场贵族的封闭的运动，为少数人所把持；而到了16世纪中期，至少科学界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把那种激昂的离经叛道精神（所有人文主义者的特征）转到了广泛地传播学问的方向上来，并且几乎是以令人感动的精神渴望着教育那些不能自己教育自己的人们。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应用数学和应用工程学的著作无论是用本国语或是拉丁语撰写的，都一方面指责“纯学术”著作本身没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抱怨海员、工匠、机械师和炮手这些普通人的愚钝，这些人固执地使用陈旧的单凭经验去做的方法，而不愿意接受那些过分急于传授知识的学者们所发现的新方法。罗盘制造者罗伯特·诺曼是第一个著书讲述磁学的工匠，他可能会抱怨说，吸收实践者的知识的学术著作实在是太少了；而一位博学的数学家在编写应用数学时，又往往会感到实践者们总是不愿意听他那无疑更为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事实上，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学者和工匠们的互相接近开始初见成效了，尽管成效还不显著，但它是靠学者和普通人共同的积极努力实现的。

在这个普及知识的时代，有两个学科获得了被工匠与绅士同时注意的特殊优势，这就是工程学和制图学。工程学使得许多装帧精美的图书得以问世，这些图书中有各种真实的或想象的机械发明的插图，对于这许多代表着文艺复兴时代印刷装订技术的可爱的书籍，在那个新的机械时代，谁不喜欢翻阅它们呢？这些书籍中有雅克·贝松的《数学和力学机械汇编》（里昂，1579年），配有精巧复杂的动力装置插图；有阿戈斯蒂诺·拉梅利的《设备与人力机械》（巴黎，1588

年），以优美的法文和意大利文出版，配有几十种以水力、人力或风力推动的泵、磨、吊车、桥梁、喷泉及兵器的插图。丰塔纳写了《如何移动方尖碑》（罗马，1589年），描述他移动梵蒂冈方尖碑的过程，书中有精美的插图和有趣的文字说明。此外还有不少次要的著作，它们一部分以中世纪的传统为基础，一部分以文艺复兴时代晚期人们对复杂机械发明的喜爱心情为基础。这类书中有福斯特·维兰齐奥的《新机器》，在它的现存的一些版本里，不仅有拉丁文的，还有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和德文的对机械的说明。建筑师佐恩卡1607年在帕多瓦出版了《机器与建筑的新图解》。另一位建筑师布兰卡1629年在罗马出版了《机器》一书，还有弗朗塞斯科·马奇1599年在布雷西亚出版的《军事建筑》，它只是在风格上稍有不同。书名还可以列举许多。虽然意大利人在机器的发明与介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到17世纪初也开始出版关于气体和流体装置的书籍。16世纪初，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航海著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到了16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在这个领域中开始取代这两个国家，因为这时英国的船只正在公海中处于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关于航海和制图学的英文著作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普及程度上确实都是非常突出的。尽管荷兰仍然保持着地图贸易中心的地位，但是一流的制图商们与英国市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地图在一些国家，尤其在英国，流行的程度就像机械方面的著作在意大利那样。约翰·迪伊在为亨利·比林斯利的英文本《欧几里得几何》所撰的前言中写道：

某些人是用地图来装饰他们的门厅、客厅、寝室、过廊、书房或藏书室，还有些人需要地图是因为对于历史事件感兴趣，比如战役、地震和天气现象等史书记载的事件，由此势必形象地看到那地点、其周围地区、与我们的距离以及其他的情况。也有些人是想一目了然地看一看土耳其帝国的庞大版图、莫斯科帝国的辽阔疆域，也想了解一下确切知道的自觉信奉基督教的某一小片地方。至于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就为数不多了。有的为了指导自己在遥远国家的旅行或者为了弄清别人的游历。总而言之，人们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而喜欢、爱惜、寻求并使用地图、海图和地球仪。

确实，出版地图册的原始动机在于为国内的绅士们提供资料 and 消遣；海员有一张海图就满足了，这种海图往往是从一张印制的地图上透描出来的。事实上，工程师、绘制地图的理论家和航海家正在取代占星术师在中世纪享有的宫廷科学家的地位（不过约翰·迪伊成功地身兼这两种角色）。另外，数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扩大了。

除了仍旧处于比较古老的传统状况下的自然史和植物志外，自然科学对公众的吸引力并不大。游记文学虽然广为流传（那时正是哈克卢特的大型文集——《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发行的时代，此书于1589年出版，1598—1600年又出版第二集），但这类书比较注重的是对勇敢的冒险行为进行肤浅的描述和说明，而不是对新发现的地区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的介绍。尼古拉斯·莫纳德斯在16世纪早期出版了描述西班牙的新大陆的书，这部著作被约翰·弗兰普顿译成英文，并于1575年在一个诱人的标题——《来自新大陆的喜讯》下出版。这部书确实记叙了一些新的植物和动物，何塞·达科斯塔所著的《西印度群岛自然史和道德史》（这里西印度群岛指秘鲁和墨西哥）也作了同样的描述。这部书是1591年在西班牙出版的，1601年有了英文译本，1606年又出现了法文译本。雷利首次对弗吉尼亚探险时，队伍中不仅有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而且还有约翰·怀特，前者在1588年出版了《新大陆弗吉尼亚的实况简报》，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后者所绘的该地区印第安人、植物和海洋生物的图画和写生，活泼可爱，引人入胜。

尽管许多学者们深知有必要把他们的学识加以普及，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工作还是不自觉地投入到了发展自己学科的理论方面。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出版，它们主要用拉丁文写成，内容涉及当时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医生和自然史学家们在各自领域里认为是主要的问题。这些书籍中有一些著作仅仅注意说明过去是如何停滞不前；而更多的著作，哪怕是试探性的，还是涉及了在更深入地弄清特定的问题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16世纪晚期，数学领域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在天文学、航海、宇宙结构学和物理学领域中的应用。纯数学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引人注目，但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个时期的数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先进的希腊数学的吸收和发展；第二，数学符号的改进和扩充；第三，类型越来越多的代数方程式的求解方法。

希腊数学对16世纪仍然有很大的作用，用新的和准确的拉丁文译本来取代或补充中世纪的版本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都是由一些有才能的数学家们完成的。比如，费德里戈·科曼迪诺（1509—1575年），他是瓦尔比诺公爵的数学家，在利用阿基米德的分析方法确定固体的重心方面做了即使算不上重要的至少是有益的工作。他更大的名望在

于他一系列优秀的译著，其中有：阿基米德的著作（威尼斯，1558年；波伦亚，1565年）；阿波罗尼奥斯的著作并附有对帕普斯和欧托休斯的评论（波伦亚，1566年）；帕普斯的著作（比萨，1588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译著激励着他的弟子如吉多·乌巴尔多·德尔蒙特（1545—1607年）去研究关于阿基米德的问题。同样，当时最优秀的几何学家之一弗朗西斯科·莫罗利科（1494—1575年）对圆锥截面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又精细的研究，他把圆锥截面当作锥形平面来处理。这项研究尽管与阿波罗尼奥斯的观点对立，但毕竟是在其激励下进行的。并且，他还把自己的数学发现应用到对光学的探索中去。1575年在巴塞尔出版了丢番图著作的第一部拉丁文译本，译者是克胥兰德，这对于代数学的研究是一个新的促进。

毫无疑问，代数学是16世纪数学中最有成果的一个分支。虽然现代的数学符号直到下个世纪才发展起来，但在这一阶段里，在寻求符号表达公式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每个数学家其实都在尝试使用新的符号。虽然这种趋势使得每一部新著作都难以阅读，它仍然是普遍的符号系统最终赖以产生的途径，因为它正把每一种具体情况下最好的表达方式融会到一起。在16世纪的前半期，德国的代数学者们（cossists）像米夏埃尔·施蒂费尔（死于1567年），就率先进行了统一数学符号的尝试。例如，他们创造了表示平方根的现代数学符号。在意大利首先使用这个符号的是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1537—1612年），他是一位严谨的但缺乏首创精神的数学家。人们在整个16世纪中不断地探索，试图为开方和乘方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符号，这反映出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这两种运算之间的关系。同样，西蒙·斯蒂文（1548—1620年）在小数方面发表了重要的著作《十分之一》（1585年），其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新颖，因为人们早就认识小数了；也不在于它的符号，因为斯蒂文的符号极不方便。它的重要性在于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在运算的简便与清晰方面，小数优于分数。上述研究工作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是对数的发明，发明人是纳皮尔（1614年）和布里格斯（1617年），这一发明使计算过程大为简化。

16世纪前半期对于某些类型的三次方程求解问题存在着普遍而激烈的争论，16世纪后半期，人们则较为关心如何使已知的各类方程的求解方法更为普遍化。拉菲罗·博姆贝利于1572年出版了他的《代数》，当时只有他和极少数人承认虚根的存在，从而使他能够解决在

此以前不可约简的方程，但是他真正成为有影响的人物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事。真正的普遍解法直到弗朗索瓦·维埃特（1540—1603年）的著作问世才得以完成，他在1591年出版了《解析技巧入门》，这是最早的真正的符号代数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首次使用符号表示已知数和未知数。这样就能够用公式表达真正普遍性的结果。维埃特在方程解析和探求简略的求解方法方面也做了重要的工作。托马斯·哈里奥特（1560—1621年）在代数上的贡献可与维埃特相比。他可能受到过维埃特著作的影响，但他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在把方程分解为其简单因式方面。但由于他不承认负根或虚根，他的研究缺乏真正的普遍性，他的《实践解析的技巧》一书是在他去世10年后才出版的。

这个时期的数学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它使人们很难去估价单个数学家的相对重要性，这个特征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与科学是一个整体的特征极不相符。数学家们被分割成国家学派的一个原因是符号的发展状况，在这个时期，符号还不具有世界性。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只是到了后来的数学家手中才发挥出巨大的效力：比如维埃特的著作成为激励笛卡儿的源泉，而哈里奥特的著作则成了英国学派特别是沃利斯的渊源，因此他自然要大肆宣扬哈里奥特的首创之功，法国数学史学家们对此颇有訾议。当时有许多著作以手抄本流传，并直到作者死后才得以出版，因而出现上述情况是非常可能的。值得我们认识其重要性的是，16世纪后半期数学家们的贡献虽小，但确实为下一个世纪数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16世纪后半期的天文学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数学不同的情况，这是因为哥白尼使希腊科学的激励作用荡然无存，天文学家们不得不去奋力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300年来日心学说在教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常常使现代的人们无法理解哥白尼的理论在实质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因为哥白尼不仅把天文学整个颠倒过来了，而且正如路德所断言的那样：“哥白尼把人们习惯的世界观完全颠倒过来了。”托勒密的天文学是加以数学化的普通人的天文学。而哥白尼的天文学与日常的共同感知的天文学格格不入。这种普通人的天文学把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主张论述得如此明确以至于初等天文学至今仍从这个毕竟是唯一能被我们的直观所认知的宇宙开始。因此难怪16世纪许多最优秀的天文学家都反对哥白尼的理论，他们不仅从宗教和物理的观点

出发，而且也从共同的感觉出发。也难怪当时的哥白尼派学者们比较著名的是其神秘主义的一面而非其理性主义的一面。甚至哥白尼学派本身也承认新的理论不适于进行基础教育，米夏埃尔·梅斯特林（1550—1631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这样一些讲授天文学的哥白尼派学者也赞同罗伯特·雷科德在《知识的城堡》（1556年）一书中所下的断语：一个没有托勒密天文学作基础的学者就不具备理解新学说价值的天文学素养。如果一个人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对于当时大多数天文学家都未能转变为哥白尼主义者就不会感到奇怪；值得奇怪的倒是：如此复杂并且在数学上如此深奥的理论居然得到那样广泛的传播，人们是那样经常地谈论着哥白尼的名字并且给以普遍的尊敬。实际上，许多引证哥白尼的人真正引证的都是哥白尼学派或普鲁坦尼星表（Prutenic Tables）中的材料，普鲁坦尼星表是伊拉斯谟·赖因霍尔德1551年根据哥白尼的理论编纂的，其实他本人并不属于哥白尼派。普鲁坦尼星表比原先的《阿方索星表》具有明显的优点。总体来说，科学家们在引证这些材料时丝毫也没有轻蔑或贬低之意，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新天文学的迫切需要，人们甚至在1500年以前就广泛地意识到了这种需要。

并非所有对哥白尼的赞扬都意味着接受了他的理论，因为所有严肃的天文学家们都承认哥白尼的能力，并且在欣赏哥白尼的观测技能方面，比愿意这样做的现代历史学家们更胜一筹。而且，直到这个世纪末，除了在极端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中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从神学的立场出发去反对他的假说。虽然许多天文学家热衷于讨论甚至赞成这一假说，同时却感觉不到有必要公开尊奉这一终究仍是一种假说、未得到观测证实的理论，但是这种假说被引用的次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人们讨论哥白尼理论的兴趣。实际上，一个相信哥白尼理论的人不得不抛开观测的结果来信奉这一假说。开普勒的老师、迈克尔·梅斯林尽管没有观测到任何恒星视差，可他仍然坚信哥白尼的观点。他是一个能干的天文观测家，是他首次正确地解释了地光反照现象。在坚持哥白尼理论的其他科学家当中，还可以指出下面这些人：克里斯托弗·罗特曼，他是黑森-卡塞勒伯爵威廉四世的天文学家，但他并未写出任何拥护哥白尼学说的论文。J. B. 贝内德蒂通过间接的知识非常赞赏哥白尼的理论，但他本人毕竟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数学物理方面。在法国，关于哥白尼的讨论很少，只有本都·德·蒂亚尔（约1521—1605年）的论著讨论了这方面的内

容，他是七星诗社的成员之一，在宗教战争的黑暗时期活跃于亨利三世宫廷内外的非正式的科学院对百科全书进行的讨论中，他受命负责科学部分。本都对于哥白尼主义产生共鸣倾向的部分原因与后来的乔达诺·布鲁诺一样，认为哥白尼主义与卢克莱修的宇宙多元论是一致的。当然还要提到开普勒（1571—1630年），他在1596年出版了《宇宙结构的奥秘》，此书宣称其作者为一个不妥协的哥白尼主义者，书中还有雷蒂库斯的《最初的故事》作为附录，他是哥白尼的最早的信徒。《宇宙结构的奥秘》一书还显示出其作者是一个有才能的数学家和令人信服的数字神秘主义者，因为书的中心论题是说各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值之间存在着一个几何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五个规则的柏拉图实体的内接圆球和外接圆球来表示。毫无疑问，这种设想既令人信服，又表明了卓越的数学技能，这使年轻的开普勒引起了第谷和伽利略的注意。不过，与开普勒后来的努力相比，这只是小试锋芒。在这个时期，只有少数人主要以数学为根据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开普勒便是其中之一。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以往在天文学方面业绩平平的英国对哥白尼的学说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比欧洲大陆对哥白尼的兴趣更大。罗伯特·雷科德虽然认为哥白尼的学说对青年学者太深奥了，但他称赞哥白尼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观测方面极为勤奋的人”。^[2]约翰·迪伊（1527—1608年）在为约翰·菲尔德的《1557年日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别称赞了哥白尼的观测技能。爱德华·赖特（约1558—1615年）尽管只写过一些关于航海的书，也被同时代的人们誉为哥白尼主义者。真正的最早用英文（在所有本国语中也是首开纪录者）来解释哥白尼理论的是托马斯·迪格斯（死于1595年）所著的一部引人入胜的篇幅不大的著作，名叫《天体妙述》，这是他为他的父亲的《永久的预言》1576年版本所写的附录之一。此书为通过占星术的考察随时观测天气和灾祸编制了表格。哥白尼主义同神秘主义的这种结缘在这个时期也是不足为奇的。《天体妙述》一书作为《永久的预言》的一部分，到1605年为止再版七次，它实际上是哥白尼第一本书的绝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对此，迪格斯加上了一些简要的评论和一张宇宙的图解，有趣的是他宣称恒星的范围无止境地扩大，直到“幸福之城”也就是到苍穹，即神学意义上的天国。基督教神秘主义与这个关于哥白尼的宇宙无限性（这并不是哥白尼自己的理论的一部分）的最初的声明结合起来，使人们不禁怀疑乔达诺·布鲁诺是否确

实没有受到迪格斯的影响。迪格斯知道这种对天体概念的放弃，意味着认为各星体由于距离不同，其体积必然大小不等，但他发现不难想象很多星球一定非常之大。迪格斯很显然是一个彻底的哥白尼主义者。要确定威廉·吉尔伯特具有哥白尼主义的实质就比较困难。同时代的人把他划为哥白尼派，但是没有文字依据可以表明他是否曾用日心说的理论思考问题。他对于磁学的研究使他深信，亚里士多德只对天体赋予灵魂而不把灵魂赋予地球是错误的，因为他发现地球也有磁性，这说明地球同样也是具有活力的。1600年版的《磁学》的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满怀激情地捍卫了地球按日自转的观点，因为既然地球也具有磁性，就一定也有运动能力。他说：“相信地球每24小时围绕自己的轴心旋转一周，比相信包括太阳、行星和恒星在内的整个天空每24小时运行一周容易得多。”在他死后才出版的《我们的地上世界的新原理》（1651年）一书中多次提到这一论点。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指出：吉尔伯特从天然磁石中悟出了一条原理。因为吉尔伯特写作此书可能与《磁学》同时（他死于1603年）。他在《我们的地上世界的新原理》一书中指出：月球可能也有磁性，因此造成了潮汐，而且很可能也是由于磁的作用才使行星保持在各自的轨道上。这种观点有趣而又新颖，而且吉尔伯特关于磁灵的理论可能对开普勒产生过某些影响；但它不一定就是哥白尼的观点。

直到16世纪末，哥白尼学说并未遇到来自宗教方面的反对。毫无疑问，路德曾以《圣经》为根据抨击过这个假说，因为约书亚当初发令要其静止不动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并且路德的朋友和弟子梅兰希顿在《物理学要义》（1549年）一书中也声称日心说与圣经和自然哲学都是相矛盾的。这种强调把经典作为权威的做法除了对第谷外，对其他路德宗信徒也产生了某些影响，但是没有约束力。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主义者和安立甘宗信徒都可以自由选择。直到1612年以前，天主教会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正式的声明。实际上，在1600年以前，天主教神学家们对于这样做毫无兴趣，尽管特伦托宗教会议决议显示出对于圣经的权威越来越强调了。这样，西班牙神学家迭戈·德·苏尼加在1584年出版了《论职业》，在书中他轻易地证明了当时人们通常所称的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与圣经并不矛盾。乔达诺·布鲁诺案件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强烈地使公众注意到哥白尼的假说面临着被打成异端邪说的可能性。布鲁诺并不是个科学家，没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但他是一位有创见而又非常正统的哲学家，他的泛神主义思想境界很高，超

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将对后来的哲学家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醉心于神力和自然力的统一，并且正是由于哥白尼主义提出了宇宙结构的统一，因而他才赞同这一观点。他还接受了卢克莱修关于宇宙无限性以及宇宙中有无数个世界的观点（他是第一个相信物质宇宙无限的哥白尼派学者，这与迪格斯的神学宇宙无限的主张不同）。由于他的泛神主义观点和异端邪说而不是由于他的哥白尼主义，罗马宗教裁判所把他监禁起来，然而八年的迫害并没有从精神上征服他，最后于1600年把他烧死于火刑柱上。此后，在宗教裁判所看来，哥白尼主义与异端邪说即使不是区分不开，也至少是密切相连的。

由于开普勒的成熟著作发表于这个世纪完结之后，我们说16世纪下半叶有创见的天文学家是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尽管他对哥白尼的理论很尊重，但他不是哥白尼主义者。确实，第谷作为一个天文观测家的名声比他作为一个天文理论家的名声大得多，不过他对于这一点并不介意，而且事实上他的观测工作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正如他在1598年出版的《天文仪器的更新》^[3]一书中回忆说，他是在莱比锡学习古典文学时作为一种消遣而开始阅读基础天文学书籍的，目的是帮助自己培养更准确的观测能力。他发现，手头上的星表虽然对于恒星来说颇为精确（当然，他后来自己又制作了精确得多的星据表），但是在推算行星的位置时误差却很大，1563年他通过观测土星与木星的会合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使他感到困扰，被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所激动；他添置了更好的仪器并逐渐埋头于科学探索中。他曾一度认为炼金术比天文学更有趣，直到1572年在仙后座突然出现了一颗新星，从此决定了他终生的研究方向。他在1573年出版了自己的观测报告《新星》，使他获得了丹麦国王的赞助，国王异常慷慨地封他为文岛的领主，他在那里建造了天文堡大天文台。从1576年到1597年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并配备有许多能干的助手和在当时来说种类齐全的第一流天文仪器。

1572年出现的新星很自然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位于人们很熟悉的一个星座当中，并且最初的亮度和金星相同。第谷、迪格斯和梅斯特林都认真研究了这颗新星，试图测出任何视差，由于什么也没发现，他们全都得出结论说它属于恒星之列。但并非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人坚持认为它确实在移动，这种移动是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还有人（包括迪伊）则认为，它一定正在沿着一条

从地球延伸的直线远去，比那种认为它完全是一颗新星的观点更合理地解释了亮度的变化。第谷的研究最为彻底，他在这颗新星光亮减弱的过程中认真观察了它的颜色变化（新星皆有此特点），并且最坚定地认为这颗新星位于理论上讲不发生变化的天空里。这样第谷通过观测而走向反亚里士多德的立场。16世纪晚期对天文学家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出现的一连串用肉眼都能看到的天文现象是少见的。第谷使用他在天文堡建造的新型精密仪器，并采用他摸索出的新观测技术，从1577年到1596年观察到了六个彗星。在如此纷繁奇异的天文现象的刺激下，公众发生极大的兴趣以及通俗的天文学书籍蜂拥问世，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书籍都预告将有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相应的大灾难发生，虽然第谷虔诚地信奉占星术，但他觉得还没有掌握足够可靠的观测证据，因而无法做出精确的预言，这也是他研究天文学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做一些粗略的预测还是可能的，正如1574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公开讲演中宣称的那样，这些预言对人类是有用处的，因为一旦有人理解了星球的影响，他就可以阻止和避免这些可能来临的祸患。迟至1598年，他把这一看法总结如下：

当我终于对天体的运行轨道有了更准确的知识以后，我也不时地重新研究起占星学，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尽管门外汉和大多数学者甚至包括若干天文学家们都认为这门科学不过是无意义的闲事，但它确实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加可靠；它不仅在发挥气象学的影响和天气的预报方面确实可靠；而且，假设没有偏差地确定了时间，假设根据天空的实际情况利用了星体的轨迹和星体进入某一确定空域的路线，假若准确地知道了星体移动的方向和转动的次数，那么在用算命天宫图做出的预言方面，它也是确实可靠的。[\[4\]](#)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怎样说，第谷像他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们一样相信占星术；但是平心而论，他对占星术的相信只不过使他对于天文观测以及合理解释这些观测结果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他把观测彗星的结果精心详细地叙述出来，其小心翼翼的程度不亚于他的观测，正是这些观测使他确信，由于彗星没有表现出视差因而说明它们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认为、他的追随者们所坚持的那样处在月下的范围，而是处在星际空间。它们实际上都是些普通的天体，运行的方式类似于行星。这种观点不但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相抵触，而且也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如果说彗星围绕太阳运行，这必然意味着说它们与行星的轨道是横切的，如果行星处在水晶球层内，那么这是讲

不通的。第谷宁愿放弃水晶球层这个观点，显然他并不担心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行星保持在各自的轨道上？他的助手开普勒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把行星牵引向太阳的力量是一种“引起运动的灵魂”。

在主要论述彗星的《星空新发现》一文中，第谷首次描述了他自己的关于世界体系的学说，并宣称这个构思在五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首创资格的问题，因为1588年一位默默无闻的天文学家尼古拉·雷默斯发表了《天文学基础》，提出了和第谷一样的学说体系，并且还加上了地球每日旋转的学说。一场激烈而又无法得出结论的争辩就此产生，第谷和雷默斯互相指责对方为剽窃者）。第谷接受不了地球运动的观点：因为没有观测证据来说明这种现象；物理学常识是与此相反的（因为他认为，如果地球是处于转动之中，那么从塔顶落下的一块石头就绝不会落到开始下落那一点的正下方地面上。这个问题将被下一代人争论不休）；并且圣经也是当然地反对这种观点（第谷是一位路德教徒）。第谷的体系以观测到的似乎真实的现象合理而且自然地取代了托勒密体系中的缺陷，同时保持了在第谷的观念中如此偏重的地心说，而摒弃了哥白尼主张的那种令人难受的大地在无休无止地运动着的理论。根据第谷的观点，所有的行星都在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旋转，整个太阳系又围绕地球一月亮体系运转。这种学说从数学上讲与哥白尼的学说是相同的，只是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前提是人们必须愿意放弃水晶球层的观点。因为第谷学说的缺陷正在于，它认为围绕地球的太阳系轨道与火星和内层行星的轨道是交叉的，这种情况只有确实不存在水晶球层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第谷以前对彗星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学说由于其简单明了合情合理而备受推崇，再加上一种第谷不肯接受的以地球自转代替恒星转动的观点，在17世纪前期得到了那样一些人的广泛欢迎，他们觉得托勒密的体系已经陈旧而哥白尼的体系又过于新奇使人没法接受。

天文学的重要用途之一就是帮助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许多世纪以来都是如此。自从13世纪以来，人们就不安地认识到儒略历不准确，这就是说，复活节的日期以及其他每年变动日期的宗教节日都与尼西亚会议做出的明细规定不相符了。复活节是从春分点之后的第一次满月开始计算的；在尼西亚会议时（公元325年）春分点已经从当初的3月25日移到了3月21日；到了16世纪，官方历与太阳历之间的差别已超

过10天，而且只会越来越糟。各种宗教会议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科学家当中一般都认为现有的天文学知识还不足以矫正这个误差。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时期，终于出现了一种新历而且被采纳了。这个新历是路易吉·李利奥研究出来的，他是那不勒斯的一位医生，也是天文学家，他在新历被正式采用之前去世。新历的采用最后是在克拉维乌斯的监督下进行的，他编写了一个详尽的计算说明，发表在1603年出版的《对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恢复罗马历法的说明》一书中。这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在每400年中去掉3个闰年，而只保留那些可以被400整除的年份作为闰年。也就是说，1600年是闰年，但1700年、1800年和1900年都不是闰年。对复活节的计算方法也重新作了调整，李利奥的计算方法依据的是“岁首的月龄”，即根据每年1月1日的月象为基础，这是一种随意规定的方法，它迎合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数字神秘性的偏爱，也满足了尼西亚会议所规定的条件。在天主教国家里，尽管大多数显得勉强，但很快就都接受了新历，而新教国家一般都是拖延到18世纪才接受。新历固然是技术天文学的一个成就，但更是教会管理效能的成就。

应用数学和应用天文学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领域就是航海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制图学。迫于大西洋航行的实际需要，航海方法有所改进，但是最首要的改进是在海员个人的技能方面，而不是在整个航海事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于应用科学来说，航海是一个可以创造大量明显成果领域。但在16世纪的前50年里，像法国的奥隆斯·菲内、低地国家的格马·弗利修斯（1508—1555年）和葡萄牙的佩罗德·努内斯（1492—1577年）等人提出的推动改进的建议，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影响了16世纪后50年里的数学实践者。这些人与他们的老师们不同，能够提出可以产生实际效益的建议。英国航海业引人注目的成就使英国的数学家和仪器制造商们对于用何种方式帮助海员们完成跨越无海图海域的壮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使低地国家作为热衷于这种努力的中心的地位受到了英国的挑战。

16世纪前半期的作者们倾向于提出一些虽然基本正确但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却过于不切实际的方法。格马·弗利修斯曾建议使用时钟来测定经度；其他人也曾提出过一些参照恒星观测月球的晦暗、会合或移动以此确定经度的建议。海员们发现这些方法太困难了，不宜在当时的船上使用；而且没有一个水手尝试着安装雅克·贝松设计的那

种复杂的为了观测平稳而配有水平环的座椅。^[5] 罗伯特·休斯（1553—1632年）对这类发明统统做了激烈的抨击，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两次参加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他在1594年评论说：通过已经知道的月球的运动来确定经度的方法，

既不可靠又不容易。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多。另外一些人则另寻出路：他们想通过观察两地子午线之间两分时刻的差数来确定经度，他们认为借助日晷、时钟或计时的玻璃沙漏、滴漏等装置也许能完成这种观测。但是经过长期严格而又精确的检验之后，所有的学者都放弃或拒绝了这些由来已久的奇想（至少比较成熟的评价都是这样）。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发挥人们希望它们发挥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轻狂的骗子，他们公开兜售这些低劣玩具似的或者更糟的东西，而且大加伪装和吹嘘，以使某些有良好声誉和品质的人受骗、破费。而这些好人所拥有的也许是钱财多于学识和眼力。但在这里，我不想对这些仪器的毛病和不牢靠多做揭露；我只是想告诫这些因为上当才认清那帮家伙的人们，当他们为自己的钱财哭天抹泪（姑且这样形容）的时候，为那错买了的便宜货后悔就太晚了。应该远离那些轻狂的骗人的流氓。^[6]

也不是所有的水手都反对天文定位方法；到16世纪中期，通过观测太阳在子午线上的位置或者通过观测围绕天极的星体来确定纬度的方法的确已经经常使用了，以至于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与纬线平行的航行法。其做法是，第一步是尽可能快地找到所需要的纬线，然后再沿此纬线向东或向西航行，一直航行到目的地为止。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会增加航行距离，但是它比起尝试着利用那些确定经度的纯理论方法要牢靠一些。学者们可能会坚持认为采取大圆周航行的路线可以使距离缩短些，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所缩短的距离是很少的，一般来说不足以抵偿它所引起的麻烦，并且这种方法还忽略了水手们凭经验已经掌握了的主流风向。约翰·戴维斯在他的《水手的秘密》（1594年）一书中对背测竿做了描述。背测竿的发明使得确定纬度的工作比较容易了，特别是到了下个世纪，经过改进之后，它发展为戴维斯设计的象限仪。16世纪晚期，有三种新途径被用来帮助水手们进一步弄清他们所在的经度，它们是测程仪的发明、磁差的研究和航海图的改进。测程仪和改进了的航海图使水手们可以利用船位推测法更加安心地航行下去，而且在那个时期，与其他任何可以用来在海上确定经度的方法相比，这种船位推测法要精确得多。测程仪是英国人发明的，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为英国人所独占。最早记述但不是发明这种测程仪的是威廉·伯恩。他在1573年出版了《航海要求》，由于在1600年之前此书

已经有了六种版本，所以虽然在17世纪早期以前别人谁也没有对这种仪器加以讨论，它却已经广为人知了。测程仪的使用，再加上它按照测量出的间隔逐点标出的航线，使陈旧的测量船速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过去的方法之一是在一段定好的时间里盯住船边一块移去的漂浮物并在甲板上步测出距离。在实际操作中，航线上标出的各点之间的长度、用来计时的玻璃沙漏的刻度以及对一度地球弧线的估计长度（这些对于船位推测法的精确度是必不可少的）都是不精确的。如果水手们蓄意让船落在预定的位置后面，他们一般就会满足于这种不精确，正如他们所说：宁可离预定目标还有一天的航程也比哪怕只超过这个目标一发炮弹射程那么长的距离要好一些。爱德华·赖特是最早指出有必要精确测量地球大圆周弧分的学者之一。他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数学家，曾于1589年陪同坎伯兰伯爵进行过对亚速尔群岛的远征航行。赖特根据天文知识对地球圆周进行了估计，然而对地球表面真正地进行测量则是到下一个世纪才开始的。

在大西洋上的航行引起了人们对罗盘的磁差现象的注意；因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指北针都指示着比真正北极偏东一点的方向，而在大西洋西部海域，罗盘的磁偏角却是向西的。威廉·吉尔伯特在《磁学》一书中坚持认为荷兰人在新赞伯拉（Nova Zembla）发现的偏西磁差表明存在着一条沿东北方向穿过北极海面的通路，因为他相信磁差是由于罗盘指针受到大面积大陆吸引而造成的（他设定磁极是地球的极，而不是天极，因而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他认为如果东部方向存在大面积陆地的话，在高纬度地区是不可能存在偏西磁差的。由于16世纪早期人们就知道了磁差的存在，因而罗盘制造者们习以为常地使磁针在罗盘刻度盘上有所偏斜；这样，罗盘在制造时，磁针在刻度盘上就指向正北了。论述磁学和航海学的作者们都严厉指责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使水手们在确定自己实际上所处的位置时会遇到不必要的困难。有许多人建议说，磁差可以被用来确定经度。实际上，西蒙·斯蒂文于1599年在荷兰发表的《识天术》（赖特同年出版英译本）中就集中探讨了这种设想。他认为：只要知道纬度和磁差，就可以推算出海上任何地点的位置。吉尔伯特认为各地的磁差恒定不变，因而同意斯蒂文指出的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于航海的好办法，因为他认为水手们没有能力进行足够精确的观测。所以吉尔伯特认为最好还是把磁倾角作为航海中的辅助参考。伦敦的一个罗盘制造者罗伯特·诺曼发现了如下现象：他习惯于

在指针磁化之前就把它装到罗盘上去，并且发现正是磁化作用造成指针总是倾向地面，如果指针比较长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1581年，他在《新魔力》一书中仔细描述了这一观察现象，并使用了一个磁倾角计。吉尔伯特详细记述了诺曼的工作，并且相信，在天空布满云的情况下，测量磁倾角是推算纬度的简便方法。他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与那种徒劳无益的磁学原理之间的歧异是多么巨大，它是多么顺遂人愿，多么有益又多么神奇！当水手们在连续阴天的气候中漂泊在海面上而且无法凭借任何天空中的发光体来判断他们所在的位置或区域时，只要稍微动一下手并使用一个小仪器就可以测出自己所在地点的纬度并安心航行了。[\[7\]](#)

但是利用磁倾角，就同利用磁偏角一样，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磁倾角在逐时逐年地不断变化，仅仅在吉尔伯特著述之后30年左右，这一现象就被发现了。

吉尔伯特的观察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用什么方法或无论在哪里，他这个有学问的科学家总是极其渴望着去帮助实际工作者。为此，他经常用本国语写作，或把有用的章节译成当地语，特别是英语。法国人最先向英国水手提供了他们的《航海指南》，这是一本关于航程、靠岸、浅滩和潮汐等有用资料的手册。到1588年这本手册被另一本叫《舵手》的书所取代，它是从荷兰文翻译成英文的，荷文原名为《海员便览》，出版于1583年，作者是卢卡斯·詹斯宗·韦格纳尔，这是一部欧洲海岸线的航海图集。并标明可满帆航行的方向。书中还有新月以及日落的参照表、一个恒星一览表（约100颗）、关于制作测量天体角度的仪器以及复制海图的各项说明，还有计算太阳子午圈高度的若干公式。这本书对航海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多次再版，也证明其深受欢迎。

《舵手》书中的海图都是“平面图”，也就是说这些海图没有采用投影法来绘制，只是把地球假设为一个平面而不是球面。正如托勒密所知，如果不变形的话是无法将球面绘制成平面的，而且很显然，在两极地带这种失真最严重，因为子午线都收聚于两极。可是在平面图上这些子午线在各纬度上都是等距的。许多像佩德罗·努内斯那样的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评论，其中努内斯提出了斜程海图的优点，在这种海图中，罗盘恒定指示方向的航线（罗盘方位线）是一条直线。能够沿罗盘方位线航行是相当称心如意的，可是斜程航线很不容易描绘

到一个平面上，不过可以标记在球面上，因而常有人宣扬地球仪的作用并不时用作航海时的辅助仪器。要想绘制出一张真正的斜程海图，需要根据数学进行球面投影。努内斯无力完成此项工作的数学计算，实际上墨卡托也不行，尽管是他绘制了第一张斜程海图。墨卡托是一位数学家，在卢万大学受业于格马·弗利修斯。他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从事地图、海图和地球仪的绘制工作（在这方面，他和其同时代的奥特利乌斯[1527—1598年]不同，奥特利乌斯仅限于收集和出版地图，而对于地图和海图的绘制和镌版毫无所知）。墨卡托的制图技巧相当高明。例如，有一些地球仪制造者最早从理论上求出贴到地球仪上的那些三角形的正确的长宽之比，墨卡托即为其中之一。他把整个地球分为12个三角形，从两极起每个三角形剪去20度，再用另外两块圆形材料覆盖南北两极从而确保比一般方法绘制的地球仪与球面更加精确地相符。他发现，为了使平面图与球面保持一致，随着纬度圈离赤道越来越远，其间隔也应该越来越大，在1569年绘制“水手专用海图”时，他就是这样做的。但他没有说明自己用来推导出正确的间隔距离的理论是什么。这张海图用处很大，但是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才能使其他人也绘制出这种海图。甚至墨卡托本人也没有再次采用这种形式；他在1588年、1590年和1595年分三部分出版了一本地图集（是他最初采用阿特拉斯[Atlas]这个词作为地图集的专门用语）。这个图集 中的地图，有些是平面图有些则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投影方式。最后还是爱德华·赖特弄懂了圆柱投影法，解释了它的绘制方法和使用方法。他的解释是在1599年出版的《航海中的某些误差》一书中进行的。正如副标题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些“由于海图、罗盘、测量天体角度的仪器以及日落数据表和恒星数据表制作不当或使用不当而造成的误差”，因而，他对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了“检验”和“校正”。在这些误差中第一个误差就是使用平面海图，因而他解释了墨卡托投影法，提供了罗盘方位表，并指出如何在知道两个位置的经纬度的情况下使用表格和海图来计算由此到彼的距离，并教给水手们如何在新海图上标绘航线才能得到最大的益处。赖特确实是精彩地解释了墨卡托投影法：

想象一下要把一个上面绘有子午线、纬线、航程线以及所有水路标志的球形表面绘制到一个与之同轴的凹形圆柱的内壁上，先像吹任何膨胀体一样让这个球形表面膨胀起来，在膨胀过程中使它表面各部分都相等（也就是说经线和纬线都均等），直到球形表面围绕圆柱体内沿着两极的方向

全都接触并贴附在圆柱体上；这期间，球形表面的每条纬线从赤道向两极依次增长，一直到纬线的直径与圆柱直径相等。结果子午线也在散开，直到彼此的间距与它们在赤道上的间距相等。这样，我们就能最容易地理解球形表面是如何扩展成为一个圆柱并因此成为平行四边形的平面了。[\[8\]](#)

赖特还实际绘制了一张地图来演示如何使用这种投影法，这张地图后来由他的朋友哈克卢特出版了，但是他的罗盘方位线图表和制图方法已经被荷兰的制图师乔多库斯·洪迪乌斯（1563—1611年）所采用。洪迪乌斯在英国居住时曾经接触过赖特的手稿，他许诺说未经赖特许可绝不会发表有关的任何内容，但是，正如他向数学家亨利·布里格斯所坦白的那样，“金钱动摇了我”。赖特终于出版了《航海中的某些误差》[\[9\]](#)这本书，其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洪迪乌斯运用了他的成果。（除洪迪乌斯之外，还有些人也了解赖特的成果，提到过或运用过这些成果，比如布伦德威尔和哈里奥特就是如此。）正像赖特所指出的那样，墨卡托投影法已经成为更多的像威廉·布勒乌这样的数学绘图师所利用的作图方法。威廉·布勒乌（1571—1638年）曾与第谷·布拉赫一起搞过研究工作，在受荷兰三级会议委托编写一部完整的航海指南时，他第一次采用了新投影法来绘制海图，并于1612年出版了他的《航海指南》。最初，人们只在绘制海图时使用墨卡托投影法；至于1600年以后大量流行的那些廉价的通常都是袖珍本的地图集，大都是非常陈旧的地图或海图的复制品。确实，如果说墨卡托投影法推广的速度十分缓慢的话，这主要是由于有能力绘制自己的地图的绘图师们数目仍然很少，像墨卡托、洪迪乌斯、布勒乌和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都属于这类绘图师。（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在1574—1591年间自行勘测了英格兰。）而绝大多数所谓的制图师，其实不过是地图复制者和出版商，他们只能缓慢地着手复制这种比较复杂的墨卡托式地图。然而，到17世纪中期，这种诞生于16世纪晚期的制图法还是牢固地确立了其地位。

精确的物理学在16世纪后半期是沿着它已经部分地经历过的道路发展的，即发展了前一个时代的动力学和久远的古代的静力学。在动力学方面，中世纪的动力理论曾经获得过改进，比如塔尔塔利亚在弹道学方面的成果；此时，J. B. 贝内德蒂（1530—1590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严密的公开反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理论。例如，他坚持认为两个落体的相对速度并不取决于两者的绝对重量之差，而是取决于两者的比重之差；物体下落的速度也不是取决于它的绝对重量，而是取决

于它的相对重量。物体的相对重量等于实际重量减去介质阻力。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相对重量等于实际重量除以介质阻力。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在没有阻力的介质中（即真空中）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而贝内德蒂则意识到，在真空当中所有的物体都将以相同的速度下落，因而他认为真空这一概念从动力学角度讲是可以接受的。贝内德蒂的动力学还不是伽利略的动力学，但是他的动力物理学对年轻的伽利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静力学的复兴方面，最杰出的人物就是阿基米德学派的西蒙·斯蒂文。斯蒂文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是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他在重心和流体静力学方面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阿基米德的研究成果。斯蒂文对永恒运动理论的反对，对斜面上物体平衡状态的解释以及他发现的流体静压佯谬（流体对于某一固体所产生的压力是随着该固体的面积和流体柱的高度不同而变化的，而不是随着流体量的多寡而变化），都为诸如笛卡儿和帕斯卡等下一代科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是医学的副产品。植物学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草药知识有助于医疗，而动物学则是因为它对于人体构造能够提供解剖学方面的启示。当然，这种惯例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波伦亚的市议会成员卡尔洛·鲁伊尼在1598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解剖某种动物的综合性的论文，题为《论马的解剖和疾病》，在马身上进行了维萨里曾经在人身上做过的试验，并且同样取得了成功。无论是谁，只要把鲁伊尼的精美的插图与早先出版的极其粗糙的马解剖图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这并不常见。总体来说，甚至就连最长于鸟类解剖和胚胎学的动物解剖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1522—1605年）或他的学生沃尔克·科伊特（1534—约1576年）这样的学者也从不忘记这类工作的真正意义最终还是为医学服务。阿尔德罗万迪是波伦亚大学的药物学讲师，而通过对科伊特的描写中包括的那些肌肉解剖的内容也使我们看出，他认为他在人体解剖方面的工作最有价值。对草本植物和其他植物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反映文艺复兴时期愉悦地赞美自然的例子屡见不鲜，但仍然倾向于注重其实用价值，泰奥弗拉斯托斯就是这样做的。与以往时代一样，人们对动植物研究的极大兴趣仍然一方面在于解剖学和生理学，另一方面在于医药与手术实践。

在各个大学里，当然也是医学诸科拥有的教师人数最多。帕多瓦大学突出地保持了维萨里所奠定的这一传统。因此，甚至对于阿卡邦当特的法布里休斯（1537—1619年）这样的学者，人们知道较多的也是他在人体解剖而不是胚胎学方面的广泛研究。也许理应如此，因为在这个时期胚胎学的研究无论何等出色，也只是原有的传统科目的延续而已。研究者只不过是模仿亚里士多德的做法，逐日打开正在孵化中的鸡蛋，尽可能仔细地跟踪小鸡的变化过程。科伊特和法布里休斯二人都沿用这种方法并观察到了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的许多现象，但因为没有显微镜，也就找不到任何对基本理论的要素进行修正的依据。法布里休斯还研究了关于人和动物胚胎的发展，并把自己的工作与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血管、心脏和肺的研究联系起来。法布里休斯的前辈雷尔多·科伦波（死于1559年）曾经讲授过肺循环的学说，然而从法布里休斯关于呼吸的著作中和他最著名的（也是最短的）论文《论静脉瓣》（1603年）中可以看到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发现。法布里休斯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瓣的人，然而他第一个认识到这些器官究属何物并且首次在出版物上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法布里休斯确实把这些器官当作阀门并且看到它们的作用在于控制血液的流动，这极为清楚地揭示出当时常用的机械数量众多，而且机械的构造已在某种程度上使关于机械的概念成了科学意识的一部分。由于他确信血液在血管中沿着两个方向流动，因而他从未详细考察过这些瓣的真正的功能，而是设想它们只是在间歇式地工作以避免由于引力的影响而使所有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四肢中去。扩大这种与机械的类比，并且认识这些瓣确保血液沿着一个方向流动，即流向心脏，这个任务留给了哈维。

安德列亚·切萨皮诺（1519—1603年）处于这个主流之外，这有点不可思议，也许仅仅因为他属于比萨大学和罗马大学而不属于帕多瓦大学。他用颇为不同的方法对血液和肺的生理机能进行了研究。切萨皮诺曾是雷尔多·科伦波的学生（科伦波既在帕多瓦大学也在比萨大学任教），所以切萨皮诺肯定从科伦波那里学到了他关于肺循环的理论。他在1588年发表的《研究漫谈》一文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热心地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辩护，他急切地把心脏的作用抬到高于大脑（从意识的角度讲）或高于肝（从供血的角度看）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他详尽讨论了肺循环，第一次使用了“循环”这个术语，并且正确地显示，如果用一根绳子把一只手或脚扎紧，绳子上部的静脉

就会胀起来。他得出结论说，当人们睡觉时（也就是情绪平静时），各条静脉就把它所有的血都输送到心脏里去了；当人们醒来、因而情绪兴奋时，静脉中只有一部分血流入心脏。在他死后出版的《医术实践》（1606年）一书中，切萨皮诺明确指出：血液是从心脏的两侧流出来的。如果切萨皮诺对人体生理学的兴趣再大一些而为亚里士多德辩护的兴趣再小一些，他的研究工作也许会更加深入，他的思路也许会更加清晰。至于切萨皮诺对哈维有什么影响，已经无法确定，因为哈维从未提到过切萨皮诺的成果。切萨皮诺关于植物学的著作《论植物》（1603年）同样也是一个自己的创见与浓厚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混合物。他对植物构造及其果实种类的分析研究尤为突出。

这个时期的医学和手术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总体来说还很难从医疗工作的角度来判断这种变化的价值。帕拉切尔苏斯在这个世纪早期就试图建立一个以神秘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医学学校，摒弃正统的医学方法，引进化学药物。神秘主义就是极端的学说，而且甚至在16世纪也常常使较有理性头脑的人们眼中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正如英国外科医生威廉·克洛斯如实讲述的那样：“在这里我同样认为就帕拉切尔苏斯说点什么才好，但是我必须承认他的学说中有一种深刻地超出我的智力或理解力所能加以解释的含义。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说，我运用了他的某些外科发明，感到它们都是出奇地高超并值得大加赞赏。”^[10]但是要消化吸收帕拉切尔苏斯的医学比理解其神秘主义所遇到的问题更多，因为对于化学药物的危险和剧烈，人们当然会抱有疑虑，特别是在使用化学药物的最初几年。甚至就连对于治疗梅毒确实有用的汞，使用过量即为剧毒，并且很难成功地掌握恰当的用量。锑是很受帕拉切尔苏斯及其弟子们欢迎的催吐药，但药力极为剧烈，它的化学性质也是直到16世纪结束时才弄清楚的。很少有哪位作者是彻底的帕拉切尔苏斯派；更多的是像亚历山大·冯·苏科顿或约瑟夫·杜·切斯尼这样的人，前者在他的《锑的秘密》（1575年）一书中对含锑药物给了过高的赞誉，但又急于表示，尽管他很敬重帕拉切尔苏斯，但他的知识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帕拉切尔苏斯的学说；约瑟夫·杜·切斯尼是亨利四世的御医，有时用一些灵验的处方为自己的亲帕拉切尔苏斯立场争辩。巴西尔·瓦伦廷1604年出版了《锑的凯旋车》一书，此后，人们才对锑的化学性能和医学性能有了彻底的了解。奥斯瓦德·克罗尔（1580—1609年）的著作《皇家化学》为编写医药化学教科书开辟了道路，该书首次发行于

1608年，并在整个17世纪上半期内大量再版；而让·贝甘1610年出版的《化学入门》则为后来的所有化学教科书提供了模式。

把化学物质列入药品所带来的进步在16世纪充其量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毫无疑问，16世纪在外科手术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外科医生的地位更加重要了，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对他们的需要也增加了，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疾病——梅毒，它之所以归外科医生治疗是因为其早期症状是外部性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舰长们和将军们日渐需要更多的外科医生，他们需要作战时由私人外科医生陪同前往，医生们也因之而获得大量的经验。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在16世纪是最引人注目的职业，他们都受过军医训练。这些人的增多促使对于外科治疗新规则的产生和一个即使没有上过大学也仍然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兴起。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约在16世纪中期都改进了对外科医生的教育和管理。在英国，伦敦当局要求学徒们到理发师—外科医生学院去听课，这些课程都是由约翰·凯厄斯和威廉·克洛斯这样的学者们讲授的。在新经验的影响下，新的治疗方法发展很快。例如在1514年乔万尼·达·维戈曾宣传用烙铁来处理火器造成的伤口，因为他认为这种伤口都是有毒的。20年后，法国的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1510—1590年）撰文不遗余力并颇有成效地批驳了这种方法。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盖尔（1507—1587年）在他的著作《某些外科手术》（1563年）一书中劝告人们适度的包扎，而不要用烙铁。他也许是受到了帕雷的影响，也许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帕雷再次发现了在截肢手术中用结扎动脉来制止出血具有明显效果。这个方法在1594年由雅克·吉耶莫发表；仅两年之后，英国当时的科学权威威廉·克洛斯（1544—1604年）就率先发表了论述这种方法的著作，他在吉耶莫的书中读到这种方法，然后在自己的病例记录《观察必读的有利的书》中描述了这种方法。运用普通的概念和熟练的技巧来完成变化无穷的外科手术的可能性使得外科学在16世纪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奋斗领域，比直到19世纪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这个时期较有进取心的外科医生们所写的病例书就是引人入胜的了，一方面由于他们展现出的技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对传统的医学和内科医师们进行的尖锐的批评。那时的内科医生们都充满猜忌地保护着自己的权利并拒绝让外科医生干预内科治疗。这些外科作者们绝非从前那些没文化的理发匠，他们之所以选择使用本国语来写

作，一方面是借以表明他们反对内科医生使用的大学拉丁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最广泛的读者。

在17世纪和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被划归为实验科学的领域，其中，许多东西在16世纪时还是属于自然法术的范围。尽管弗朗西斯·培根对自然法术很欣赏，但它与经验哲学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自然法术可能也有所启示；如果说自然法术兼有神秘主义与实验的特征倒更确切些。许多自然哲学家都急不可待地摒弃了传统的和比较缓慢的求知方法并把法术作为理解大自然的捷径。这些与浮士德同时代的人可能会与马洛笔下的浮士德一同高呼：“哲学令人讨厌而又晦涩朦胧，法学和医学都不过是雕虫小技，神学则是三者中最卑贱的，真正使我心醉神迷的是法术！”即使对于严肃认真的人们，大学的课程也显得贫乏枯燥，而性格比较热狂的人们转向一种虽然未必走得通但是毕竟希望较大的求学之道就不足为奇了。16世纪的人们把自然法术看得特别神秘和反正统，但认为它有用并值得研究，一个人可以把法术与理性的科学结合起来却一点不觉得调和二者有什么困难。约翰·迪伊是一个有才能的数学家，在航海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术士和唯灵论者。对他来说，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自然法术，他把这种法术叫作“喻旨术”，并不遗余力地赞扬说：

这种自然法术告诉人们如何从实际的理性的经验中得出各种数学方法所探求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所推断的一切有价值的结论。另外，一方面由于都是学问，而且靠它自己的正确的方法，自然法术扩展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领域；另一方面，单就它自身而论，借助于数学和自然哲学，它又更深入地发挥了完美的经验的作用；在这方面没有哪一门学问能经得住正式的挑战。我可以称之为科学，而非法术，因为它所具有的优点和专长超过了如此众多、如此强大的法术和科学。而且由于它依靠经验而发展，依靠经验寻找因果关系并且把结论本身放回到经验中去，就应该称它为“实验科学”。[\[11\]](#)

迪伊相信，当词语和数学的论证不能达到目的时，“‘喻旨者’就参与进来并领导向前。根据他的实验学说的顺序，经验是自然和数学这两门学问的主要的和最终的动力”。在迪伊和其他自然法术师们看来，要理解较难理解的自然力，关键就是经验或实验。尽管开普勒企图借助于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神秘主义去窥探天体运动的秘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经验，无论感官的还是神秘的，都是真正的关键。自然法术仅限于那些靠逻辑和数学无法理出头绪的领域，即物质

属性和自然力的奥秘得不到解释的领域。在炼金术、光学、占星术、气体力学、水力学、地质学、磁学和电学这些领域中充满着神奇的现象，并且无法用数学法则来解释其原因，因此就成了自然法术自称按照经验即可领悟的哲学范围。经院哲学对此一无所知是众所公认的，它只能甘拜下风。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自然法术将会演变为实验科学，但当时仍然是属于法术和神秘主义。经验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炼金术一方面是对点金石的神秘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在理性地寻求有用的药物（尽管后者也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总之，自然法术是神秘的学问。J. B. 德拉·波尔塔（约1535—1615年）在他的定义中对这两者进行了谨慎的区分，他说：

有两类法术：一类是不光彩而且没好处的，因为它只能和恶鬼搅在一起，包括了妖言惑众和邪恶的好奇心，因而被称之为妖术……另一种就是自然法术，所有优秀的智者都承认并接受它，并且对它大加称赞和推崇；没有什么比它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和重视的了。[\[12\]](#)

不过人们还是猜想波尔塔的“自然奥秘研究会”是在寻求非法的神秘法术，这也可能确有其事。例如，这些神秘主义的内容说明了为什么迪伊不愿出版他的著作，因为他觉得科学知识仅仅是传授给初学者的。第谷·布拉赫对于自己的炼金工作的评论证实了这种感觉是怎样地浸染了当时的人们：

我也非常认真地进行过炼金术的研究，或者说是化学实验。而且，我之所以在这里时而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实验所涉及物质与天体及天体的影响有一些类似之处，因此，我通常把这门科学叫作地上天文学……我将很乐意地与那些对此有兴趣并了解一些这方面知识的君王、贵族及其他要人和学者们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只要我确信他们出于善意并愿意保密，我将时而向他们提供一些资料；因为，让这些材料公之于众既没有什么用处也不理智；尽管许多人都装作理解了这些问题，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按照自然的要求以正当而且有益的方法来恰当地对待这些秘密。

[\[13\]](#)

然而，人们这时也正开始厌恶这些秘密，他们肯定已经认识到探讨这些秘密使得他们被怀疑是正从事比自己所愿意从事的工作更为低劣的事情。波尔塔的《自然法术》出版于1558年（全书共4卷），经过多次再版以后，于1589年又出现了一个内容扩充了的版本。这本书所讨论的题目显然通俗化了。它的范围所及，从动物的繁殖到妇女的美

容，从仿造黄金到烹调技术，从钢的锻炼到光学、水力学、气体力学和天然磁石的奇妙。波尔塔颇为奇特地把迷惑人们感觉的骗术与一种严格的实验探索精神结合起来。他对事物的内容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其表现形式：所以他研究光学所涉及的就是如何使近物显得远些或者使远景显得近些，这正是他为什么描述光学镜头和照相机暗盒的原因。他对天然磁石的兴趣主要在于设计玩具，不过他对大蒜会影响天然磁石作用的迷信说法也进行了实验性的检验，并发现和他的怀疑一致，那纯属胡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于知识的欣赏就是为了知识本身，或者说为了乐趣，由此而来的就是一种同样程度的对学识的炫耀。波尔塔引用阿基米德原著的热情，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位数学家。应该承认，这种通俗化的自然法术水平不高，但是炼金术、光学气动机械却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公开地叙述和讨论，它预示着将为下个世纪的实验科学大造舆论。

自然法术中科学的一面几乎与实验科学合为一体了。威廉·吉尔伯特关于磁学的伟大著作即是一例。吉尔伯特的《天然磁石和磁性物体论》一文是学者的科学而非大众的科学，不过他在考察磁学文献时并没有排斥波尔塔，实际上也没有排斥任何自然法术学者。他对于地球磁灵所做的近乎抒情的描绘，以及他对于磁力是一种赋予生命的并且无处不在的力量深信不疑，都使他的潜在的哲学思想与自然法术非常接近。同时这篇文章又是自13世纪以来第一篇开创性的磁学论文，第一次对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吉尔伯特成为第一位明确区分电与磁的学者。他论证了地球的磁性；证明了罗盘指示的是地极而不是天极；他宣称天然磁石不可能引起永恒的运动；他还论证了如何制造人造磁铁（锤打一根沿南北方向放置的铁条），他认为天然磁石与被地球磁力所磁化的铁矿石同属一类东西，而且还讨论了磁学在航海和天文学方面的用途。他的验电器在当时是一种有用的科学仪器，并且在自然法术中又是一种常见的、令人着迷的玩具。学者们都把这篇论文看作是一篇伟大而又重要的自然哲学论文；普通人则在此文中看到了自然法术的绝顶佳作。伦敦的铁匠很快就造出了一块大磁铁，能够提起24镑重的铁锚，这种奇妙的方法显示出一种奥妙的自然力量。像罗伯特·玻意耳（1629—1691年）那样的17世纪的物理学家们总想以纯粹物质的原因来解释这些神秘的力量；吉尔伯特则满足于演示这些神秘的奥秘的力量的存在和它们发生作用的情形。这就仍未跳出自然法术的窠臼，而不是不仅描述现象、还要理解现象的自然哲学。

显然，在自然哲学可以声称已经引发一场科学革命之前，还必须在实验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中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观点。16世纪的科学家们急切地探索了许多领域并且欣喜地认为他们正在把所有的学问都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看到了古代人指出的方向并循此方向前进，也看到了古代人失败的地方并试图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尽管把古人的工作推进了一步，却很少以新的研究方法跳出其窠臼。这样，由于他们对机器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古人，头脑的呆板也远甚于古人。尽管工程学兴旺发达，如此典型地代表着17世纪科学许多最佳成果的在机械方面的类推和关于机械方面的概括却很少被运用，法布里休斯的例子就说明在追求这种意向时多么犹豫。16世纪中具有真正独创性的成果，也许只有自然法术这一门，而且如果自然法术仍然名实相符，它就不可能是科学的。约翰·威尔金斯于1648年出版了《数学法术》一书，但它并不比戴维·布鲁斯特发表于1834年的《自然法术书信集》更接近于波尔塔的著作。自然法术在吉尔伯特那样的人手中几乎变成了实验的自然哲学，但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吉尔伯特过深地植根于16世纪的土壤中，以致无法超越当时的思想和局限性，这个任务只有等待伽利略来完成。伽利略虽然受的是16世纪的教育，但和吉尔伯特相比毕竟属于年轻一代，并且他的著作《光明的信使》也是直到1610年才问世的，而在这时吉尔伯特已去世七年了。伽利略的确超越了当时的思想局限，这个事实也是其天才的标志。科学革命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其成就：它更多地体现在使这种成就成为可能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里。

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中期科学家们所采取的不同的联合形式也充分地揭示了这两个时期的差别。一般而言，16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16世纪的学者组织都是非正式的。这些组织常常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旧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与弟子关系，这基本上是师徒的关系；另一种是赞助者与受赞助者的关系，即富人为了使自己得到教益、消闲或声望而供养或补贴学者；此外还有一种类型：秘密团体中新加入者之间互相怀疑和猜忌的关系。第谷的天文堡是第一种类型的好例子，青年学者们从欧洲各地聚集到那里受一两年的训练或从事研究。哈里奥特与雷利之间的关系属于第二种类型，因为哈里奥特是一些自然哲学家、法术哲学家和神学哲学家的首脑。可以作为第三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个松散的团体，据说是吉尔伯特组织起来的。另一个比较正规的团体是“自然奥秘研究会”，它是由德拉·波尔塔创建的，该

组织由于被教皇怀疑在从事妖术而遭到镇压。在这些组织中，最好的是致力于教育者，最糟糕的是大搞神秘主义者，但它们共同的动机都是要使那些外行们了解掌握某一门知识的奥秘。那种以自由、平等地献身于独自从事或共同追求科学知识的精神汇聚到一起的组织形式当时根本不存在，那种科学知识是深邃的理性的知识，它与法术的、学究式的或神秘的学问势不两立，这种倾向如此鲜明地反映了17世纪上半叶的特征。

总体来看，我们可以说16世纪的学者们追求的是关于事物的知识，并且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但仅此而已。这些知识是多方面的，是无止境地渴望知道，特别是知道自然界奥秘的结果。因此，总体来说，16世纪的科学是描述性和实践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更谈不上什么综合性。天文学家、解剖学家和自然法术家们都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但是无法找到明确的表达方式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尚且未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帮助人们以理性的和简单的术语来理解自然界的作用，也未能勾勒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因为第谷的体系不是建立在基本原理之上，而是仅仅停留在事物的外表和可能性上）。这一任务留给了下一代学者，他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进展，以至于完全可以认为产生了一次革命。然而即使是革命，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进行革命的人们直接地依靠了上一代人的成就。第一代革命的科学家当中有许多人都把前辈当中的某一个人当作自己的老师和师傅，认为是他指导并鼓励自己踏上了一条新的求知之路。尽管16世纪晚期的科学家们实际上未曾找到成功地研究自然界的线索，但他们已经开始摒弃旧的方法，并且指出了许多可能走通或绝无希望的途径。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已经指出了可能获得的知识有多少，同时也就指出了有待探索的知识有多少。他们留给自己的学生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自然界的作用是可知的，而他们的学生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找到了方法，获得了真知。

（陈冀邢 译）

[1] 此处原书错印为Carden（卡登），应为Cardan（卡丹），翻译时我们做了纠正。——译者注

[2] 《知识的城堡》（伦敦，1556年），第165页。

- [3] 此书由汉斯·雷德、伊利斯·斯特罗姆根以及布伦特·斯特罗姆根编译为《记第谷的仪器和科研工作》（哥本哈根，1946年）。
- [4] 《天文学仪器的更新》，第117页。
- [5] 《宇宙盘或宇宙仪，用于通过数学在天空、大地或海洋进行的所有的观测》（巴黎，1567年），在第29页有一幅这种设备的图画。
- [6] 《论地球仪之应用》，引自1638年英文版（1889年为了哈克卢特协会而发表于伦敦）。
- [7] 《磁学》[纽约，1958年，1900年，奇斯威克（Chiswick）印刷版的复制本]。
- [8] 第1部分，第2章。
- [9] 《航海中的某些误差》前言。
- [10] 《1544—1604年的威廉·克洛斯文选》[F. N. L. 波因特（Poynter）编，（伦敦，1948年）]，第46—47页。
- [11] 亨利·比林斯利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英译本前言（伦敦，1570年）。
- [12] 《自然法术》第20卷（伦敦，1669年），第1—2页。
- [13] 《天文学仪器的更新》，第118页。

第十六章 政治思想以及宗教宽容的理论与实践

在意大利以外，16世纪的政治思想集中于宗教改革引起的问题上。首先，普通的个人被迫处于一种全新的形势下。这是一种对其平静和安全充满极严重威胁的形势。一个个普通的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宣称，第一次不得不为自己做出抉择：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教会。诚然，中世纪就曾有过异端运动，但即使像英格兰的罗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那样最重要的异端运动也是地区性的。它们对信仰没有构成全面的危机。对于大多数信徒来说，罗马是天主教信仰的堡垒，凡被它谴责的信条都被当做不容置疑的异端邪说而被毫不犹豫地加以摒弃。没有疑问也就无须做出抉择。但到16世纪，罗马本身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和一位论派形成了，还有像再洗礼派这类人数较少的分支。迥然各异的神学理论发展起来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宗和一位论派的理论，对立的神学家们彼此厉声指责对方为异端或反基督的逆种。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教派都沿袭传统的观念，认为世俗的权力机构有义务镇压异端。对于这一世纪早期的大多数君主来说，出于各种复杂的个人目的，他们十分愿意履行这种义务。因此，任何个人，无论对自己的信仰和所皈依的教派做出的抉择多么暧昧都将使自己处于丧失性命、自由或领地这种极端惩罚的风险之下。许多人做出了这种抉择；而世俗统治者则发现自己被扑灭异端的企图所缠绕，但其失败又使他们的统治更加混乱。因此他们也面临一个最终结局的实际问题，即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在自己的领地之内扑灭异端？正是这些问题的直接性和急迫性导致了16世纪如此关键如此紧张的争论。

当时这些崭新而又陌生的困境决定了16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发展的路线。神学家们的论战，如此众多的教派都自称独占真理，这种状况动摇了将真伪截然划分的武断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曾使人们相信宗教迫害是合理的。在宗教宽容成为政治上的一种需要之前，人们对它加以原则性的讨论，并以信仰神圣的名义谴责对个人的强制行为。

其次，完全因为君主们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承认镇压异端义不容辞，原先只是私下的、个人的辨别真伪的问题成了决定一个人是否忠君爱国的公开的、政治性问题。它又形成了关于抵制权的争论。在臣民一方，那些已经感受到或担心自己也许将不得不感受惩治异端法令之威严的人以及那些不甘心做顺民的人通过重申权威来自群体的教义证明反抗的合法性。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利。君主们出于自己的立场，因为认识到如果坚持竭力压制异端就可能瓦解其统治而感到震撼，发展出了君权至上的理论或者国家以独立、自治为其特征的理论。他们关心的是对秩序的需要。16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的争论就集中在这两个焦点上：宗教宽容和抵制的权利。

1542年7月21日，保罗三世颁发了《特许起始》敕令，重新组建了罗马的宗教法庭，使之成为整个西部基督教世界的权力中心。它有权审理堕落者、动摇者以及所有那些被视为拥护异端、赞助异端或为异端辩护的人。它有权判处监禁、没收和死刑，并能号召教会和世俗当局执行判决。当然，这项敕令并没有开创一项政策，它只不过是把在西欧各地执行的力度各不相同的一项传统的政策更有效地组织实施。例如在法国，自从1521年路德的著作受到谴责后，许多男男女女就已被施以火刑了，自从1537年的《公告》事件以后，迫害更加剧了。

宗教迫害与敕令序言中所肯定的原则相比，还算不上这一敕令最为重要的结果。序言简短地重申了阿奎那^[1]提出的主张进行宗教迫害的观点。阿奎那把异端分子和异端行为同伪币制造者和叛国行为相比，用类推的方法争辩说，既然仅仅危及肉体 and 财产的世俗罪行应受到死刑的惩罚，那么危及灵魂的罪行应怎样惩罚才严厉得多呢？这个观点基于一系列假设：即在真伪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分界线，因此，只有教会的教义体系独一无二地代表着真理；所有其他的体系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错误，因为接受真正的教义是灵魂得救的唯一途径；接受真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行为，因为一旦接受了它，就不可能忘却，而只可能故意否认它；教会是共同的整体，对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损害就是对整体的损害。这些假设在1542年被如此普遍地接受，以至于无须在敕令中对它们详加论述。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只是做出结论，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使之免犯该诅咒的罪过，就必须镇压异端；对于冥顽不化者和故意堕落者必须用这样的方法处置，即不仅要消灭

他们还要防止别人也犯类似的罪行。全部议论都是出自对教会关心，而不管异端分子的艰难处境。

可是无论是这道敕令还是由产生这道敕令的观念导致的对异端的迫害都没有在天主教论著者中引起任何争论。保罗三世的行动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的必然的运用，随之而来的是中世纪教会所确定的行为。

10年后，加尔文促成了对米歇尔·塞尔维特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罪名是对三位一体的异端观点；这时，一个全新的形势形成了。在加尔文为了替自己的行动辩解而写于1554年的《答辩》中，他的观点与保罗三世的观点如出一辙。他认为对明显的、顽固的异端者必须当做对真理的反叛者处死，他们有可能诱使其他人陷入他们那样的可诅咒的境地。加尔文的价值观仍是传统的。他的目标是以一个武断的体系取代另一个武断的体系，二者主张的绝对性和封闭性毫无区别。他甚至可能更加强调世俗政权有责任充当教会之剑并在教会的指引下斩除那些不敬上帝的人。

但是与保罗三世的行动不同的是，加尔文的行动立即使宗教改革者舆论哗然。塞尔维特的死对新教徒的观念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他是应改革后的教会的要求而被烧死的第一个人。在此之前，改革者们怀着某种复杂的骄傲情绪，认为只有他们自己在为真理而受迫害。塞尔维特的死向人们提出了最纯粹的宗教迫害形式的问题，这不可能不引起重视。他的学说与任何类型的可以合理地将他作为秩序之敌加以打击的社会颠覆主张（诸如再洗礼派的主张）毫无关系。使他被处死的罪名是他对三位一体持有独特的观点。但他并未试图宣传这些观点；他用拉丁语在一本面向知识分子的书晦涩地表达了这些观点；而且，正如卡斯特利恩指出的那样，在加尔文意识到为了进行反驳应对这些观点加以注意之前，即使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有注意到塞尔维特所不得不说出的东西。对此事的义愤在改革者当中引起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所有有关的原则都被提了出来。无论其价值观如何古老也无论其意图如何保守，当加尔文和其他早期的改革者们将中世纪教会的专断体系置于他们自己的评判之下并为了一种认为个人判断或选择的经验能够拯救灵魂的教义而排斥中世纪教会的圣礼制度时，他们确实动摇了中世纪关于权威这一概念的基础。

第一批看出加尔文的行为揭示了异端问题的人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名人，他们出于偶然或被吸引在16世纪中期的若干年中曾以不同的方式在巴塞尔逗留。最有影响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蒂莱，一位从前的加尔文信徒，他谴责因观点不同而进行迫害，从而挑起了这场争论；还有贾科莫·阿孔乔，一位以军事机械师的身份来到英格兰的意大利人，他就教义争论带来的祸害写了一本书，并进行了卓越的心理分析；以及一位论派的神学家弗斯都·索齐尼或索齐努斯。对于阿奎那提出的“要不要镇压异端”的问题，他们以坚决的否定做出回答。他们的观点明显一致，这使他们通过提倡宗教宽容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导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他们关心的不是教会整体的安全，而是个别“异端分子”的艰难处境。

因此，人们看到基本的问题是真理问题，关于它，我们知道什么？如何得知？在其论著《可疑的科学》中，卡斯特利恩提出了知识与信仰的区别，从而奠定了反迫害论据的基础。我们所能认识的只能是真理，它有赖于经验的感知或“证明”，即通过可以接受的前提推导出必然的结论。但我们能够信仰并非真实的东西。信仰的基石不是证据或“证明”，而是“相信”，“相信”是有关的信仰者对被视作权威者的话不加怀疑地接受。信仰的开始就是知识的终结，因为是什么或可被确定是什么属于知识的范畴。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种情操，因为它建立在愿意相信的行为上，而不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理性的结论上。在这场难见分晓的持续半个世纪的争论末期从事著述的博丹借他笔下的自然哲学家托拉尔巴之口以更加怀疑的语气谈论这个观点。神学家们多次试图把宗教划入科学的领域并试图显示宗教的原则从确定的前提到必然的结论都能得到证明。但他们总是失败；而一旦他们取得成功，信仰也就被这一行为本身毁灭了。因为正是根据这些神学家的说法，信仰是简单的顺从行为，无须用信仰者所知道的地上之事加以证明。

但是既然宗教的真理基于信仰而非基于知识，那些必须相信的东西又如何确定下来呢？这种简单的顺从行为必须献给哪个权威呢？提出上帝不是通过一个绝对可靠的教会进行启示而是通过给人以灵感的圣经进行启示的说法并没有解决这个关于权威的问题；它只是改换了形式，使之成为对圣经的解释问题。面对证据，许多人都不能同意加尔文在《答辩》中提出的圣经无须解释的观点。加尔文争辩说：认为

圣经需要解释完全是渎神地提出我主万能的上帝欲揭示一切的意图失败了。那些既不能接受天主教的对一个绝对可靠的教会的信赖、又不能接受加尔文派的圣经观的人们，必然采取与二者不同的立场。他们声称每一个信徒有权根据自己内心的启迪和良知的指引为自己解释圣经。他们是16世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虽然和加尔文不一样，但是自觉而又谨慎。他们是自我满足的提倡者。

卡斯特利恩于1554年以马丁·比尤斯这一假名发表了《论异端或应被追究者》，因塞尔维特被烧死而对加尔文发起了攻击。这本书节选辑录了各式各样的作者，从圣奥古斯丁到诸如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这样的当代改革家的文章论著。这本书是献给黑森的威廉的。在一篇很长的前言中，卡斯特利恩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和所有后来赞同他观点的那些人的出发点都是否认加尔文主张的人类中存在着截然划分的前定的弃民和前定的选民这一教义，并把他们的论据建立在认为拯救全人类才是神的意旨这一基础上。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来，信仰必然是所有人内心的领悟，因而必然是单纯的，因为他们坚信每个人都肯定能在圣经中为自己找到它。他们争辩说基督的福音起初是讲给穷人和下等人听的，并被穷人欣然接受，然而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中的学者却拒绝它。由此出发他们争辩说未受教育者所领悟的东西以及基督徒中普遍认可的东西就是福音的道义内容，是基督宣示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他们的“成果”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使我们得知真正的信徒有可能得知的东西。

从强调正确的操行而不是正确的观点到向那种专断的体系发起攻击只有一步之隔。索齐尼以巨大的能量和雄辩的才能发起了这一攻击。尤其在他的《论信与功》中。尽管他本人和因他的教导在东欧和低地国家形成的会众都被当时的人们认为以反对三位一体的学说而著称，他们自己则是把所有的教义都看作次等重要的。对于索齐尼来说，信仰的本质不在于人们应对上帝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例如对基督两种特性所固有的形式的精确观念，而在于要用正确的心理倾向去领悟从基督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活方式。福音的神示和信仰者的标志就是按那种方式生活。因此，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加尔文宗的神学家们推演出的独断的体系都受到了抵制，抵制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那体系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对于人们相信的灵魂得救来说，它不是必需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索齐尼派”认为基督教的神学内容与伦理

学内容可以分开，这是他们的显著标志。对于绝大多数信徒来说，二者是互相包含的。

人们还对独断之见进行抨击，理由是坚持这种独断之见就会产生分歧，因为人们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就福音的精确教义内容取得一致。卡斯蒂莱推论说那只是一个观点问题。阿肯西奥从论战导致分裂这一点对论战给予最有力的打击。1561年，他写了《魔鬼的谋略》，目的在于说明：劝诱一个人相信他在自己的臆测中找到了排斥所有其他人的真理，就是一种陷人于傲慢之罪的奸计。由此生发出愤怒、嫉妒和权力欲，所有的教义论战都说明了这一点。论战一旦开始，人们寻求的就不是真理而是自己观点的胜利。

这些原则削弱了任何人可因其信仰而受到合理的惩罚这一观念的基础，因为那种只有邪恶才会抵制绝对客观真理的基本假设被推翻了。真理是主观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他可以相信的东西。阿孔乔说：我们必须做的事是谦虚地追求真理。谁都相信自己拥有真理，但无法表明他拥有真理，而且即使他拥有真理，他所相信的东西对于灵魂的得救也并非必不可少。

因此，知识与信仰的区别不仅引出了被显示为真理的东西与被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而且引出了可被客观地证实的东西与通过相信而在主观上领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因此“索齐尼派”必然坚决地把强迫人们信仰的行为谴责为反对光明的罪行。因为你相信只有你自己拥有真理就迫害那些与你看法不一致的人，你就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法利赛人犯了同样的罪过。

显然，当时的形势对于这一思想革命是有影响的。卡斯特利恩于1554年能说出一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的话：根本不存在可用来划分“异端”的标准。此处的真诚信徒到彼处即是异端分子，如果一个人到处旅行，并希望免遭迫害，他就必须像兑换他的钱币一样改变信仰。

这个论点逻辑上的归宿就是无论对什么样的信仰都要无条件地宽容。很少有人愿意走那么远，大部分论战者都认为存在着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客观的终极的真理，检验的标准就是一致同意。由于思考没有超出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写作的对象又是基督教社会，这使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推论：既然人们在教义上的分歧是因为他们都相信耶

稣是上帝之子，相信他的生活和教诲是一切美德的表率，这个事实说明上天的启示不言自明。当他们争辩说必须相信的正是福音的道德教诲而不是其教义内容时，他们信仰的根据不仅在于最单纯的人们都可以理解的福音的道德教诲这一面，还在于要求人们一致接受的只有这一面。

但是，博丹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是以其所有作品都涉及范围广和结论有创见而著称的。在他的《共和六书》以及《西普塔普罗梅赫》（Heptaplomeres）两部著作中，他激烈地争辩说人必须有宗教信仰，无神论是人类最大的祸害。但他在后一部著作中论证，如果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普遍一致，那么基督教的情况就并不比任何其他宗教的情况更好。在他的论述中不仅涉及天主教徒、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信徒，而且涉及穆斯林、犹太人、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因此，他把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当时所知的所有信仰领域。因而当断言基督教的真理不言自明时，作为基督徒主要对立面的穆斯林则反对说它没有被人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更有甚者，在讨论将近尾声时他对耶稣生活模式所示范的神圣性进行了大篇幅的抨击；也就是说，恰恰抨击了被认为应当普遍接受的福音的那一面。理由是它对于许多人是无法接受的，与他们的英雄主义理想是背道而驰的。讨论结束时，他指出唯一能使人们一致认可的事情是：把摩西十诫当作基本真理的概述，这些真理不仅仅是观点问题，而且要靠直觉把握，因而具有普遍的真实性。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承认摩西十诫，因为在承认《旧约全书》是上帝感召之言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哲学家与怀疑论者承认摩西十诫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有一种作为理性的东西而被所有人知晓的自然宗教，用哲学家引证圣保罗的话就是“写在异教徒心上的律法”，即可以退而称之为十诫的道德箴言。所有这些人最终都承认：一个人一旦超越了这一点，就没有与别人一致的地方了，而他也就不是处于真理的范围内而是处于观点的范围内了。观点是可以坚定地信守的，但除了与那些已经信守这些观点的人以外，它们最终是难以与人沟通的。怀疑论者说，如果第一诫得到信守，上帝得到崇敬，他自己准备以人们采取的任何形式这样做。

《西普塔普罗梅赫》这本书与众不同。在16世纪，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那种结合：一方面热诚地相信人必须信仰上帝，另一方面又极端地超脱那个信仰的表现形式。它很少表现16世纪的思想的

任何方面，以至于博丹没有勇气发表它，直到他死后很久，这部著作才以手抄本的形式为人所知。^[2]它巨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个有创见的知识渊博的人做出的论述，他比正在进行争论的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如果把教会建立在人们对信以为真的事物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将产生无数的教会，因为宗教的真理没有数学那种可以迫使所有有理性的人取得一致意见的不证自明的力量。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为任何具体的宗教形式要求特权。博丹个人所信的肯定常常是想象中的宗教。他把基督教列在自然宗教的范围之外，并认为它建立在信仰或对权威的服从上，但是能够把那些圣者所具有的知识传授给人们的权威是什么，他从未提起。

要使反对宗教迫害的观点被人们接受，根本的方法是抨击整个的关于异端的概念，但是大量的争论却集中在以镇压的方法对待异端这种政策是否适宜这一更为紧迫的问题上，他们满以为这些问题能够辨清。加尔文为了替迫害塞尔维特的行为辩解，把他的观点建立在说明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杀死渎神者和偶像崇拜者和上帝让以利亚消灭巴力教的预言家这一圣史神迹的基础上。但是卡斯特利恩排斥《旧约全书》，认为它对于生活在新的宗教制度下的基督徒来说已经不适用了，并从《旧约》转而求助于《新约》。因为基督教诲的目的在于养成人们的品行而不是形成他们的观点，在《新约》里就没有因为人们的信仰而对他们加以屠戮的要求。相反，我们必须原谅他人直到70乘以7的次数。关于莠草的比喻直接要求我们不要试图铲除不信上帝者，因为那样有可能同时毁掉相信上帝者。宗教迫害是危险的，考虑到所有人的判断都可能错误，被毁灭的东西就非常可能是真理而非谬误。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人们鉴于当时大量存在的出于恐惧而决定信仰的例证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宗教迫害迫使人们犯下虚伪的罪过。与上帝之言背道而驰的宗教迫害产生了邪恶的后果。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方法与结果并无必然联系。卡斯特利恩在献给爱德华六世的圣经译本的前言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使用逼迫人的刀剑这种尘世的武器来进行只有用说服人的语言才能进行的精神上的战争是荒谬的。几年以后，在《论异端》中，他把路德的布道词《世俗政府》作为对这种效果的议论也包括了进来。路德从权力分割的教义谈起，认为有一个属于基督的上帝的王国还有一个属于法官的世俗的王国，只有后者才有强制权。“异端是一种精神产物，刀剑斩不断，烈火烧不尽，洪水也

淹不死。”暴力无济于事，因为精神是强力无法进入的。每个人对相信自己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承担责任，其他人就像不能替他决定能进天堂还是下地狱一样，也不能替他决定应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错误的，“上帝的话就是驳斥异端的唯一根据；而如果这没有奏效，世俗的强迫仍旧无济于事——纵使把这个世界淹没在血泊中”。暴力只能禁锢人的手和口，并因此把人们推上万劫不复的道路，因为这是在强迫弱者违心说谎。值得注意的是，在阐释中世纪的权力分割教义时，路德和卡斯特利恩考虑更多的不是制度及其权限，而是两种不同的训诫及其正确应用。

这些观点首先得到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人的拥护，他们本质上不是狂热的，却是喜欢刨根问底的。加尔文轻蔑地称他们是“尼哥底母派”，因为他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表面上遵奉天主教信仰实际上对天主教教义漠不关心。《特许起始》敕令颁布以后，他们四处迁徙，这促成了这样一些教派的形成：它们的信纲基于尼哥底母派的教义并把宗教宽容当作其主要教条之一。这类意大利人中的大部分跟随莱利奥·索齐尼（莱利乌斯·索齐努斯）去往波兰，并在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一位论教派组织。另一方面，在荷兰，针对加尔文神学的严厉性尤其是针对得救预定论的信条出现了自发的地方性的反抗。抗议者们通过他们的代言人科恩海特反对强迫性的信纲，理由是没有一种教义体系能够或者应该加以强制推行，他还批评加尔文信徒无视基督教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和人性，这种特性要求心灵通过信仰自由地接受上帝的活的语言。

在所有的这类讨论中，议论都集中在为了维护真正的宗教而进行宗教迫害的伦理根据上。但实际形势不仅使宗教迫害赖以成立的基础性假设受到排斥，而且第一次产生了使宗教迫害在实践上难以进行的条件。1554年，卡斯特利恩已经向国王和诸侯发出警告：宗教迫害导致秩序混乱，对此，出于义务及自身利益，他们必须设法挽救。1562年，眼看着法国将要陷入一场看来毫无结果的混战，他编纂了《向荒凉的法兰西进言》，想以令人担忧的急迫感指出：宗教迫害不仅是罪恶的，也是无效的。对于双方来说，“铲除不敬上帝者”和剿灭对方的企图都不可能奏效，双方太势均力敌了。把法国从难以承受的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接受彼此宽容的原则。博丹认为关于教义的争论是使国家衰弱的原因之一，由此产生的愤怒只能导

致武装冲突。关于原理的争论吵不出个结果，因为它是得不出结论的，由此产生的怀疑则会导致无神论，而无神论会动摇所有的权威的基础。当博丹本人要编纂一部关于宗教争论的评述并着手写作《西普塔普罗梅赫》时，他还解释说那将仅限于学者中的私下讨论。

对于世俗的统治者，无论是德国的诸侯、法国的廷臣还是英国的国王或女王，无须提醒他们宗教争论会产生政治影响。他们关注的不是真理而是秩序，而且随着这一世纪的进程，日益明朗化的是任何响应天主教或加尔文宗的领导人的号召企图铲除不敬上帝者的行为都只能使已经分裂的社会陷入混乱。有责任感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会决心拒绝履行这类义务。法国大法官米歇尔·德·洛皮塔勒在其著名的演讲中迈出了第一步，这次演讲是1561年在奥尔良三级会议开幕时发表的，那正是宗教战争的前夕。这次演讲之所以著名，与其说因为实际上讲出来的东西，不如说因为其言外之意。一方面，他默默地拒绝了天主教和加尔文宗主张的国王有义务确立并维护真正宗教的教义，另一方面也驳斥了路德主张的精神世界处于世俗统治者权限之外、对于这类事情世俗统治者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教义。德洛皮塔勒站在维护国家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政治家的职责就是维护和平与秩序。只有他们有资格评价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且只有他们有权力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任何力量也不能强迫法国政府尝试着靠暴力确立某种宗教，因为这种尝试显然会导致混乱。但是只要能够促进和平，它也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它认为适于对付宗教争端的行动。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可以看到对他的观点的清晰表述。为了恢复和平，亨利四世以其国王的权威允许在他的王国里两种宗教活动并存，并划定了使之得以并存的区域。

无论德洛皮塔勒意识到与否，他所说的话，还有法国政府通过1598年的行动所做的暗示，有着深远的意义。德洛皮塔勒是在断言：国家之生存在于它自己有保卫和平与安全的权利，在于它有不考虑任何把它当作工具的更高的精神权威而决定自己的行动的权利。14年后，作为国王的仆人和“政略派”成员并且赞同上述观点的让·博丹在他的《共和六书》中将国家主权原则的内容清晰地表述了出来。国家的鲜明标志是最高主权，这是一种本质上无限的、不可分割的、无条件的权力；因为，如果谁有权对他人施加限制或提出条件，这个事实本身就使谁（他或他们）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那些被赋予这种

权力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和政策，委任所有官职的人们是公理的源泉和公理所求诸的最后保障，他们有权要求臣民做出忠诚宣誓并要求臣民无条件地服从。的确，博丹要求他的统治者服从神律和自然法的指引。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律法与任何有组织的教会的教义是一回事。对于他来说，这种律法是缩写在摩西十诫中的道义原则，他后来在《西普塔普罗梅赫》中着意展示了摩西十诫独有的绝对合法性。

如果说，在认识国家的生存在于它有自己的权利而且可以自行其是并成为其所有公民行动的准则，因而爱国主义就变成最高尚的情操这方面，博丹为了维护道德规则的优先地位而没有像马基雅弗利及其同时代的意大利人走得那么远，这种说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博丹笃信最深的是道德规则的优先性和普遍性。国家的目标就在于建立正确的体制以使其臣民不仅得到和平与安定，也得到公正与真理。但是一个不愿意这样做的统治者的权威与其说是无价值的，不如说是不合法的。博丹把暴政也包括进各种可行的国家形式之内并且否认暴君的臣民有任何权利进行武力反抗。他没有提到教会或君主与教会的关系。但是，显然他认为决定在宗教事务中奉行何种政策的权力属于君主，因为国家的生存有赖于统治者能否阻止争论造成的分裂。他奉劝君主全面禁止争论，因为它对宗教和秩序都是致命的威胁。这样，博丹的君权说就包括了一种政治自主的理论在内。他把国家视为有能力指引人们实现其目标的唯一组织。鉴于人们互相承认公正的原则，激发对上帝的崇敬，国家的职责就是创造使他们可以这样做的条件。这就是他说国家的法律必须与神规和自然法一致的本意。

法国将要陷入其中的无政府状态是试图强行确立真正的宗教的结果；显然，正是无政府问题迫使法国人创立了一种主权国家的理论。当马基雅弗利把统治者视为可以自行其是的人时，他只不过是把意大利人已经进行的他所熟悉的实践活动加以系统论述而已。而法国人需要的是思想和实践的革命。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接受了充当教会镇压异端的执行者的角色并且从而承认了精神目标的优先地位。而亨利四世则第一次给国家带来和平和秩序并据此原则来对待异端。

当然，德国的诸侯们依法确立那种他们所期望的宗教形式的权利，因为1555年在奥格斯堡接受“教随国定”原则而得到了正式的承认。但是那里的结果不如西方大君主国中明显。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使每个诸侯有可能无视其臣民中为数不多的意见相左者的要求。他可以

确立“真正的宗教”而无须冒世俗灾祸的风险，因为可以指望不服从者撤到某个邻近的与其信仰一致的侯国中去。因此，在德国也就没有产生以国家权力为题进行讨论的大量文献。在那里，主要的冲突不在诸侯与其臣民之间（除了像农民暴动或在明斯特发生的再洗礼派起义这类零星的事件），而在诸侯与皇帝之间，因而按照为数不多的统治者特殊的权利加以解决。

但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一样，不可避免地必须努力解决宗教分歧问题。伊丽莎白及其谋臣们在世界观的世俗性与对秩序关心的专一性方面与“政略派”如出一辙。但他们的問題是以颇不相同的方式提出的。由于宣称国王对于“世俗的与宗教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享有至尊地位从而靠法律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公众的礼拜形式，在英国就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环境。英国政府的行动在其内涵上显得比法国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更加具有革命性，因为这些行动似乎驳斥了那种仍被普遍接受的传统观点，即教会与国家必须截然分开的观点。这些行动还提出了比法国的形势所能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远为绝对的国家主权理论。法国的国王们仅只是规定了教会的法律地位，而教会的本源毫无疑问是独立的。

伊丽莎白的朝臣们确实企图通过坚持国家具有完全世俗的特征并把宗教排斥在政治以外来回避革命性的理论。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做出自相矛盾的事，因为他们认为公众的礼拜仪式的一致是公共秩序的保障。惠特吉夫特高声问道：“如果让每个人都抱着随心所欲地生活的幻想，这合适吗？”他进一步详细讨论了如果允许人们这样将会发生的“不可忍受的争论和极度的混乱”以及已经处于外部威胁下的国家将会面临的危险。因此，为了公共秩序，英国靠法律强制推行了一套审定过的礼仪，并以违者处以罚金的方法要求人们参加公共礼拜仪式。对望弥撒者的罚金增加了，而坚持定期的非国教教派的秘密集会则据1581年条例受到驱逐。但是异端不再是应予起诉的罪行，而且不得要求任何人对自己的信仰做任何声明——除了享有圣俸的教士，这在当时只是得到圣职的条件之一。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贯穿始终的是她力图促进庄重而又适当的表面秩序；同样贯穿始终的是她无意命令一个人应当信仰什么或者深入了解人们敏感的心灵。

1570年由教皇发布的废位敕令使得形成那样一种政策困难得多了，这种政策应该顾及信仰与行动的区别并且不触动前者。此后，作

为一个罗马天主教信徒，事实上就等于要拒绝女王提出的把她作为王国合法君主加以服从的要求。根据1581年的保持女王臣民忠顺法，那些带头使臣民与罗马教廷和解的人可被判处叛国罪，因为这种行为被视为引导臣民改变其忠顺的立场。1583年，一份名为《在英格兰的公正执法》的小册子捍卫了上述法令，它坚持认为镇压耶稣会传教士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危及女王的统治。它又补充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任何人承认教皇在精神上的至尊地位，只要他不以此为根据拒绝承认女王的权威。对耶稣会士的非常严酷的措施，尤其在女王统治的最后10年中，总是采取以叛国罪进行审判的形式。无论某项具体的定罪是否公正，政府采取行动的原则正如洛克于一个世纪后在他的第一封《论宗教宽容的信札》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只是在宗教信仰导致有损国家利益的行动时才干涉它，但在那种情况下，它可以采取它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

事实上，不可能使女王的许多臣民都确信在人们的信仰与表达信仰的方式之间可加以这样的区分。那些为数很少的、认为国家只应关心纯粹世俗事务的人们在原则上反对用法律确定宗教礼拜的形式。这些人是分离主义者，第一个系统表述其主张的是罗伯特·布朗。1582年，在他的《论宗教改革》一文中，他特别强调国家应对宗教不闻不问，并把所有代表教会制定条款的企图谴责为毁灭教会真正的特性。他坚持关于上帝的选择的教义，认为信仰是上帝与个人的灵魂之间关系的建立，靠这种关系，得到再生的人从罪孽深重的尘世中分离出来。教会就是这种个人自愿组成的团体。在《表白书》与《真实而简短的宣言》中，他详细阐述了“聚合教会”的思想。他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根据聚合教会的原则行动并进一步为了做礼拜而组成了独立的小共同体。1592年，伦敦教堂的牧师弗朗西斯·约翰逊和他的53名会众因常去非国教徒活动的秘密场所而被驱逐出境。

正如布朗指出的那样，他的教义反对任何由国家建立教会的企图。任何以强制手段组建教会的努力必然是行政官吏的工作而不是圣灵的工作，因而也就根本不成其为教会。他毫无顾忌地指责硬性建立的教会是政治的工具，指责其中的主教没有神圣性。他的观点导致在原则上相信宗教宽容，因为既然人类再生是圣灵自由地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且教会是再生者的组织，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不仅绝不能在宗教

事务上强迫或惩罚人们，还必须使他们在聚合和决定聚合的方式时同他们的信仰一样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维护宗教宽容的方式与欧洲大陆的情况很不相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布朗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保持个人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完整性，不如说是清除当圣灵自由地发挥作用时遇到的所有障碍物。他比大陆上的伙伴们更加直接地面对随之而来的一个权威性教会解体为无数自愿的联合体这一结果。

女王的大多数臣民不同意布朗的观点。他们与女王一致，认为统治者与教会状况息息相关。但是极端的天主教徒和极端的新教徒都拒绝承认现在这个靠法律建立起来的教会的权威。他们认为它之所以没有约束力是因为那是女王自己设计出来为她自己目的服务的东西。她的责任在于建立真正的宗教，而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就不应由她来决定了。国教教会的权威受到排斥，一方面因为它否认了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主教组织与据称圣经指定的长老会形成的教会组织不一样。另外，尽管罗马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同样不愿意承认它，但还是关系到他们政治上是否忠顺的问题。罗马的废位敕令清楚地提到：世俗国家只有依照教会的要求形成其政策时，才能要求基督教臣民对它效忠。而且当清教徒卡特赖特在他的《再告国会书》中说“国家必须与教会一致，因而政府必须与教会组织一致”时，他所指的也只能是同样的东西。

因此，对女王政府的抵制集中到了她的宗教政策上，理由是她用她所选择的形式来建立教会或建立教会这一行为本身超越了她作为世俗统治者的权限。因而在英格兰，君权问题就成了国王至尊的问题。如果要斥责抵制行为，就必然要维护法律建立教会的事实以及这个教会的形式。安立甘宗的主教们首先进行了这种维护，他们立即发现自己卷入了全部关于世俗统治者权威的争论中。有必要说明：世俗统治者的权威扩展到了规定公众的礼拜形式的程度，使英国人关于国家主权的观点具有了独特的、“不可输出”的形式。

这场争论起初限于个人之间的论战。比尔逊主教在他发表于1583年的《基督徒的服从与非基督徒的暴乱之间的真正区别》一文的对话中回击了枢机主教艾伦的《为英国天主教辩护》，惠特吉夫特在他的《回答》与1572年发表的《为回答辩护》两篇文章中向卡特赖特发起了攻击。他俩采取的立场是反对极端的天主教徒和加尔文宗信徒所持的政治上的奥古斯丁主义，但并不反对把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区分开

的教义，也不反对涉及最终目标时精神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教义；他们只是要对这些条文加以重新界定并在这样做的同时从两方面对权威的概念进行深层的修改。

比尔逊说：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真正的天主教会是全体信徒的合体，它的精神体现在“被所有虔诚的基督徒普遍接受的基督的教会那古老而又神圣的原则”里；或者，像惠特吉夫特认为的那样，体现在“被一切人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候所相信的经久的传统中”。最终的权威存在于直接表现出来的“一致的忠诚”里面。以这些为根据，早期的教会领袖们的著作以后的神学在中世纪教会里的发展被当做败坏信仰的最初的积淀而且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事物而加以抵制。这最初的积淀和普遍的认可就是惠特吉夫特在他的《为回答辩护》中称之为教会体制的实质和内容的东西，它被所有的基督徒，不分君王和其他人当做普遍的永恒的信条而完全接受。他和比尔逊都强调握有世俗之剑的君主对信仰的内容和圣礼的举行绝无管辖权。反之，他们的作用是“支援并保护”教会去反对其敌人。

但是在教会作为信徒集合体这层意义上说，比尔逊和惠特吉夫特都不承认另外的管辖机构。比尔逊说：教皇，甚至三级会议都不能约束教会。任何人或团体都没有赖以管理教会的神灵之剑的权威，它仅仅存在于圣经中。因此，惠特吉夫特把“已经得到充实的教会体制的实质和内容”与“获得这种实质和内容的方式区别开来”。既然前者是普遍的、永恒的，那么后者就应当根据“时间、地点、人物的状况而做出安排”。他俩一致认为，进行安排的人就是基督徒君主。比尔逊坚持极端的君权神授观。君主们是直接由上帝安排在其位置上的，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代表权力的世俗之剑，不仅可以强制别人，而且可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它就是一种势必要不仅管理凡俗事务而且要扩展到教会事务上的力量。他认为：君主在教会里面负有一份与主教负有的同样大小的职责。君主必须通过惩罚所有的异端和阴谋来保卫教会，并根据主教和牧师们的劝告决定礼拜的方式从而使之井然有序。因此，惠特吉夫特在其《回答》一文中大胆地宣布了具有革命性的教义：应该认为，基督徒的国家与一个被视为一些组织机构的基督徒的教会是同一的。“我看不出国家与教会之间有那种可使它们被看作分属不同的法律和管理者的两个集团的区别，只除非教会与一个异教的崇拜偶像的国家并立。”

这个例外是重要的，因为“所有世俗国家的正确目标”就是建立普遍的基督教会，只有基督教社会中的基督徒君主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将这一目标具体化。作为一个基督的官员，他的义务就是这样做，而且他所做的必须与基督徒的信仰以及从教会的源头流传下来的做法一致。即使因为每个基督徒君主有权指定公众的礼拜方式而可能导致礼仪的多样化，这仍是可以接受的，那并不会破坏神圣的天主教和使徒们建立的教会的完整性，“因为圣者的教会不是靠表面的礼仪维持下来的。”

总的来说，安立甘宗的主教们不是欧洲大陆上那样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拒绝一切根据圣经的模式或任何其他模式组建新教会的愿望。对他们来说：英格兰的教会一贯就是历史上的天主教和正统教会的延续。因此，他们从未在拯救灵魂所必需的真理与个人可自行决定的那些事情之间进行区别。如上所述，惠特吉夫特认为让每个人都抱着按自己愿望生活的幻想是不适宜的。他们加以区别的是每个自称基督徒的人必须承认的教会在信仰内容方面的权威和每个臣民必须服从的基督徒君主在教会制度方面的权威——只要这种规定永远“不损害信仰”。因此，尽管把教会与国家认同为一，安立甘宗的主教们对神法高于俗法这一点比博丹要明确得多。他们把这一点看做历史上基督教会的信条和圣礼。

在这方面，有人主张不许抵制国王至尊，也不许抵制伊丽莎白时期将其付诸实现的方式。但是这个主张是武断地表述出来的，因而使英国所有论战者中最伟大者——理查德·胡克也感到不满。他论战的目的很普通，即揭露清教徒不求诸传统的教会而求诸个人良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胡克不满足于做出结论，他想揭示原因。因此，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一书中他开始着手在一般背景中考察当时的以及直接的形势，考察人们视之为理性事物的正确规则的原理。

他与清教徒之间激烈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在如下观点的对立上：以个人堕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境况是怎样的？对于加尔文和所有那些从他的神学派生出来的新教派别来说，人类的自由意志及其理性的洞察力皆因其堕落而遭破坏。意志和理性都屈从于情欲，因此，不靠启示人类就无由得知真理，不靠圣德的强行推动人类也就无由培养美德。对于如此堕落的造物，可感知的上帝只是其不可知的愿望，上帝“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因此，蒙圣恩之

处，堕落的本质即行消失。只有少数选民和无罪者可获得真理；人类的绝大多数处于外围的黑暗中，沉陷于他们的无知与罪恶的天然状态中。

胡克的观点远远没有这么偏激。尤其是他比较相信人类在自己行为的范围内，靠理性的能力可以得到趋向真理和善行的正确指引，凭借这种能力所有的人都分享一种神圣的天性。因此，尽管堕落，所有的人都自然地追求真理，倾慕美德。卡斯特利恩在他的《可疑的科学》中指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不容商榷地断言，被堕落所败坏的只是人类的愿望，尽管由于愿望的错误的指引，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健全发展受到了阻碍，但这种能力是败坏不了的。胡克把他全部的论据建立在这样一种推想上，即认为理性具有效力并且高于愿望。

因此，《论教会体制的法则》一开始就讨论觉察到的宇宙的合理秩序。它之所以是一种秩序因为它在永恒的规律的支配下有条不紊地运行，这规律是上帝为他自己以及他的所有创造物所遵循而创立的。因此，每一种创造物运行的特殊模式无不源于这种永恒的规律。它们是自然法，被它的各种对象必然地、不自觉地遵循着。唯一按照上帝的形象加以制造的人类，作为自愿服从的对象被理性的规律所支配。胡克关于理性的概念是托马斯·阿奎那式的。他不仅把理性看成是慎重考虑本质上不合理的达到目标的手段，还把理性看成是对价值的直觉认识。由于理性是人类赖以得知什么是真和什么是善的天赋，它就为愿望的趋向规定了目标。人类堕落本质的暴露与其说表现在愿望完全屈从于情欲，还不如说表现在主次的颠倒使他们追求直接的满足这种较低的善，而不是顺应上帝为他所有创造物指定的模式那种较高的善。罪恶不是为了邪恶的目的去追求邪恶；胡克认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来自上帝，依其本性皆善。罪恶是通过混淆价值的等次，偏重较低的善而忽略较高的善以致引起的对于神圣的和谐秩序的破坏。

从这些前提中胡克推导出集体的权威高于个人判断这一结论。清教徒们争辩说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握有真理，这在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傲慢和臆测。理性是上帝的，并给予所有堪称为人的人。任何事物的真实性得到普遍相信后就足以证明它的确真实。“在所有时代都为人所共知的东西肯定是天性告诉了他们……因为所有人的声音就是上帝本身的宣判。”胡克与博丹一样，把普遍的认可作为检验真理的标

准，而且认为，由于上述原因，普遍的认可必然基于理性的洞察力。但他把这个观念用于一个十分不同的目的。博丹用它说明不确定性，因为在人们相信的大多数事情上很少有全体一致的情况出现。胡克则用它建立集体权威高于个人观点的学说。

把国家划入自然状况，胡克就能够做出结论说，国家同时既是神意的显示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自然地希望与他人交往”，这部分因为人类具有交往能力，部分因为要通过彼此的帮助满足需求。因此，他们生活在政治团体中，这些团体又构成国家体制；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交往的本能推动产生了一种有意地、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努力。因此，法律和政府的形式是由人们设计出来并在人们一致认可下建立的。任何具体的政治团体都是“他们对于联合方式或共同生活方式的规则公开地或不公开地一致认可的表现”。而且由于人类就是这种堕落的创造物，他们就不仅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还需要实证法赋予理性的规律以“约束”或强迫的力量。然而，实证法与自然法不同，它受时间和地点的制约，因为它是由“各种具体的目标”形成的，但它的基础同那些政治团体的形式一样，在于人们的一致认可。

“公众未认可不成其为法律”，胡克据此驳斥了许多他同时代的安立甘宗信徒及其后继者认为的政府直接具有法理上的神圣性的观点。政府与法律的形式决定于人类的明智，因为理性是上帝赋予的手段，人们靠它可以在社会中指导自己的生活。

但是尽管胡克把国家以及所有的国家行为都建立在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他的教义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它不是源起于任何天赋权利的理论，也不包含人数的计算或多数裁定原则。他的内心世界与阿奎那比与洛克近得多。作为个体，谁也无权对任何他人提出要求。但是构成政治团体的人们的整体可以共同对这一团体中的每一个别成员提出要求。只有整体才大于部分而且部分被整体所决定。个人同意与否在整体对其成员的权威面前的作用如此微弱，以致法律和习俗无论多么陈腐，它们在人们一致同意加以改变之前仍被认为立足于它们所约束的那些人的一致认可之上，因为直到改变发生之前，它们始终具有集体智慧高于个人偏见的权威。因此，胡克否认任何个人或个人集团有权抵制普遍赞成的既定的制度，或抵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古老的传统。

但是，胡克无疑是个13世纪类型的理性主义者，而不属于18世纪的类型。他认为：要达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与上帝的和谐，理性是

正确的指南，但不是足够的指南。同阿奎那一样，他认为这个超自然的目标需要超自然的法律来指引人们去实现。一种不是基于理性的推动而是基于上帝的恩典的神法是存在的。但对他来说，如同对阿奎那一样，神恩并不取代天性，而是使天性臻于完善；理性的局限因启示而得到超越，愿望的混乱因神恩而得到澄清。

这些前提使得胡克可以认为清教徒的要求违背了英格兰关于公众宗教信仰的法律。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像苏亚雷斯和枢机主教贝拉明这些当时的信奉阿奎那学说的人们分道扬镳。与比尔逊和惠特吉夫特一样，他把包括了所有因信仰基督而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普遍的教会同一个被认为由这些人组成团体的教会区别开来。前一种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并且整个属于神法的范围；后一种教会则被他划入自然法范围。一个为了超自然的目的而存在的超自然的社会以及那个目的赖以实现的教义和教规正是神法适用的范围。不过，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其基础与政治团体的基础是一样的，即是说，这种基础是对于联合的自然趋向和对于联合的约束力的普遍认可。以这些为根据，胡克和惠特吉夫特得出结论说教会与国家是一体的。二者不可能因目标不同而分开，因为虽然自然与超自然的事物等差有序，它们也不能因组成它们的人不同而分开——在“全体国民皆信”的地方，这一事实本身使国家成为一个教会。^[3]

在所有的基督徒联合成一个国家之前，“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在宗教方面蕴含着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政治团体”。为了秩序，一个一元的社会要求单一的政府。在英国，那个政府就是国会中的国王；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它对管理宗教的关心同对维持秩序的关心一样强烈。

他的教义当然不是埃拉斯都主义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提出政治自主的理论。他强调教会和国家都是人组成的社会，这些人为教会和国家的目标——实施更高级的法律付出努力。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只是在它们建立在理性的法律基础之上时才是有效的；教会的法律和习俗则只是在它们建立在神法的基础之上才有效。伊丽莎白政府在世俗事务中是否合法没有遇到争论，而胡克对此也未加留意。但有人对她建立的宗教提出了疑问，因此《论教会体制的法则》一书的中心部分对惠特吉夫特的断言的真实性进行了详细的证明；惠特吉夫特说：

“在英格兰的教会中，我们获得了拯救灵魂所必需的所有宗教观

点……人们传授这些观点时的纯正和完美与使徒时代以来的任何教会都一样。”胡克的著作没有引起任何一个清教徒的重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设想的理性的效力以及所有由此产生的观点。清教徒关于法律的观念是唯意志论的，而不是唯理论的；他们不在有理性的人们做出的集体评价中寻找真理，而是在开化的选民中寻找真理；他们不承认信仰与教会制度之间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圣经中，提到所有这些东西时都毫无差别。

为了维护王室的最高统治权，安立甘宗的教士们一致同意官方的观点：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威包括根据法律决定公众礼拜的形式的权威，他们还一致认为未经批准的礼拜形式是不可容忍的。但是他们做出结论的根据不同。他们与认为国家纯粹是世俗事务、仅应干预秩序而不可染指宗教的观点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争辩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也就是一个普遍教会中的教会，而在基督徒官吏身上兼有管理世俗和宗教事务的权力。这里所包含的浓厚的主权意识由于人们非常普遍地相信君权神授观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反抗由上帝指定的统治者的造反行为不仅是世俗的罪过也是灵魂的罪恶。在把同意作为负有服从的义务之基础这一点上，胡克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是独特的，不仅在英国人当中而且在整个西方人当中都是独特的。发布命令的权威建立在那些接受命令者的同意这一基础上，这种观点在任何地方都为抵制权造成借口。

在英格兰和法国，坚持主张权威和服从权威的义务是那些珍惜和平与秩序的人们对宗教纷争做出的直接反应。假如不存在按照其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强有力的集团，这种主张就没有必要了。与向往秩序相对的是向往自由。它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并不是由索齐尼主义者和那些在原则上相信信仰自由的人们建立的，矛盾的是，它由完全拒绝所有宗教宽容观念的加尔文宗信徒所建立。

加尔文本人在《基督教原理》的最后一部中论及世俗权力时，谴责抵制行为，全部理由是它陷入了与制度对抗的反叛行为中，而那种制度因为它存在就必然是神意的安排。官吏是“上帝的奉职者”，抵制他们就是抵制上帝的法规。同时，他主张官吏的第一义务是建立真正的宗教，惩罚邪恶者为其第二义务。但是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坚定的加尔文宗信徒在法国、苏格兰和低地国家要求通过抵制保护自己，反对迫害，这种形势刚一形成，建立真正宗教的义务就被加以强调而对

异端的或邪恶的君主仍须服从的义务就不再提起了。^[4]把建立真正宗教的职责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在1579年出版的作者不详的《反暴君宣言》^[5]一书中，这一点得到清楚的阐述。作者大大发展了加尔文的观点。“实在的权力”不再被认为在所有情况下都直接代表了万能的上帝不可测知的愿望。世俗的国家被描绘成君主和人民在上帝面前为建立真正的宗教而订立的双方契约的产物。每一方都是对方的保证人。君主的责任是建立真正的宗教并惩罚异端和渎神者；人民的作用是通过抵制君主任何有损于这一目标的行为来迫使他这样做。当然，这要首先假定这些契约不会带来实践中的困难，因为加尔文宗的教会已经明确地传授了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从宗教上抵制的教义发展到政治上的抵制是很容易的一步，在16世纪最后25年里，加尔文宗的大部分领袖人物迈出了这一步。加尔文的简单的圣保罗式的教诲在两方面得到了升华。首先，君主的功能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惩罚邪恶者，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还在于维持公正的秩序，这是相对于在精神领域建立真正宗教而言的世俗领域的职责。对加尔文关于臣民与君主关系的教义更具有瓦解作用的是第二方面：尽管实在的权力是上帝规定的，人民则以神圣的行动者的名义采取行动。在诸如狄奥多尔·贝扎这样的作者和《反暴君宣言》的作者身上，实现了从神权政治理论向用人民权利这一术语表达的世俗的国家理论的转变。

在1576年贝扎的《行政官员对其属民的权利》中可以首先见到这一发展。他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上帝，因此，服从的义务也就是顺从上帝的义务。但是贝扎把职位与占有职位的人加以区别。一个职位所具有的权威是神授的，但是提供人选来充任这一职位的权利则属于人民。因而具体的统治者是人民任命的，因此应该就其权力运用的正确与否向人民负责。三年后，《反暴君宣言》的作者通过考察人民权利的基础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追述了关于最初的自然的无罪状态那种非常陈旧的假说，但是在他对于这一题目的处理中有某种新颖而又意义深远的地方，这使得与其说他向后看到了一种古老的黄金时代或伊甸园的概念，不如说他向前看到了未来的国家本质的概念。他说人类的本性是热爱自由和痛恨奴役的，因此他们不允许对自由的任何减损，除非带来某种利益，比如保卫和维持公正的秩序。当“我

的”“你的”这类词汇开始使用，围绕财产的纷争出现以后，这一步就不得不走了。因此，国王受命保卫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免遭外敌侵犯，保护其中的弱者免遭强邻的鲸吞。在人民与国王之间，一个契约由此产生，根据这个契约，国王无条件地保证进行公正的统治，人民则有条件地保证服从——只要国王的统治是公正的。国王与暴君之间的古老的区别——暴君根据自己独断的愿望施政而国王根据法律施政——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这种区别的含义改变了。法律的地位之所以优越，与其说假定它与公正的秩序一致，不如说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做出的决议。人民不仅是政府的根基，也是法律的源泉，因为众人的集体智慧比任何个人的单独智慧总能更好地造福于公众。因此，国王从人民那里接受的不仅仅有他的职位，还有法律。他是法律的保障和工具；法律是一个贤明君主的灵魂并赋予他行动、意识和生命。他的加冕誓言庄严地要求他履行与他的人民订立的契约并根据他们制定的法律公正从事。

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政府契约而不是一个社会契约。它假定人类的自然状况就是社会的状况，而且正是群体的人推举一个国王并与之订立契约。从作者就抵制问题所说的话中，这一点是清楚的。对异端国王或暴君必须予以抵制和废黜，但是这种责任不属于任何普通的人，而是属于担任公职的官吏，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代表民众的整体采取行动并在国王面前对公共利益负责。“普通的单独的个人不能拔剑反对暴君，因为国王不是由单独的个人而是由全体人民拥立的。”如果官吏的行动失败了，个人除了祈祷、顺从或逃亡以外没有任何补救方法。贝扎同意这一观点。这两个作者都充分意识到这样的危险：一旦承认在契约遭到破坏而个人的义务要求他们抵制君王时每个人可以自行其是，就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假定所有担任公职的人都能作为政府官员分担君主的责任。如果作为最高官吏的国王未能履行义务，这义务就落到作为较低官吏的国王的臣属们身上。这是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观点。在《反暴君宣言》中，作者描绘了对国王负责的国王官吏与对国家负责的王国官吏之间的区别。后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他们有责任根据契约保持权利并在国王未能履行其关于宗教或公正的义务时以人民的名义举起抵制的大旗。博丹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争辩说，公职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国王，国王只有提供公职人选的权力，因此每个担任

公职的人都有责任使公正原则得到贯彻，而不能以服从王室的命令为理由替自己开脱。

在这一段论述中将讨论的是自由的概念。加尔文主张的人类原始的自由已因堕落而丧失，目前人类处于一种被罪恶和政府所奴役的状况的教义已全部被摒弃。生命与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标志：“自然法告诉并命令我们维护并保卫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以此对抗所有的伤害和暴力；离开自由，生命就索然无味。”政府不再被看作是对于罪恶进行神圣的惩罚和纠正的机构，而是各种权利赖以得到保障的手段。服从的义务不再是对神意安排的戒律的无限服从，而是对民众拥戴的统治者有限的服从，条件是他要为人们拥戴他的目的服务。这就是说，在政治术语中，自由被构想为应由政府加以保障的事物。但是显然，当贝扎和《反暴君宣言》的作者为了替抵制辩解而把人民权利作为权威的直接来源以取代神权时，他俩谁也没有把人民权利建立在任何一种个人天赋权利的理论基础上。他俩都谴责个人的抵制，认为自由是全体民众为了共同利益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和制定自己的法律的集体权利。法国人的认识则是从全体加尔文主义者的公社出发，这种公社对法国的王权进行了共同的抵制。

然而，一位名叫乔治·布坎南的苏格兰人在其著作《苏格兰陪审员的权力》一书中预见到了后来的天赋权利说的所有基本内容。他从人类天生的社会性开始论述自己的观点。人天生是社会性的；与生俱有的要求即是上帝的要求；社会的最高形式——“那被称做国家的以公正原则联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合体”——是上帝最喜欢的社会形式。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先决条件，他进一步争辩说那个政府必须来自人民。这样一来，他主要强调的与其说是人们天赋的自由——如上所述，它也可看作集体的自由——还不如说是他们天生的平等，这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内容。“根据自然法则，一个平等的人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僭取凌驾于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上的权威，因为我认为，在那些在其他方面与之平等的人们中间这是不公正的，对命令和服从的回报都是平等的。”如果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那就谁也没有天赋的权力去命令他人。但是不可能僭取的东西可被给予。在这个基础上，他说人民是一切法律的源泉，并可任命所有的公职，他们服从君主，遵守法律的目的在于保证共同利益和互惠互利。换言之，公正的秩序是个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尽管没有明说，但似乎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使国王

得到任命的契约的参与制定者也必然是一些个人。这种暗含的意思在他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证明诛杀暴君为合法——时显得更清晰了。破坏契约的国王就是暴君和公众的敌人。推翻一个这样的国王是所有战争中最正义的，这一使命不仅可由全体人民的公开行动来完成，也可由他们中间的任何个人来完成。鼓吹诛杀暴君的风险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如果说乔治·布坎南的平等原则意味着他认为他那自由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分别地有条件地同意拥立某一国王，契约的破坏也就破坏了与每个人的信义，因此可以符合逻辑地推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权采取行动。

布坎南的另一部不太深刻的著作有这样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即在书中完成了把纯世俗的国家理论同其宗教来源分开的工作。此书同《反暴君宣言》一样，没有一个章节论及国王建立真正宗教的义务或者臣民方面抵制异端统治者的责任。作者悄悄地避开了16世纪国家的这一面。国家的建立以人类与生俱有的社会性为基础，民众的政府则以人民的天赋平等为基础。国家为保障利益而存在，而抵制则完全表现为抵制不公正的现象。

在下一世纪，继承这一代加尔文信徒的人们进一步从这些关于国家必要形式的前提中抽取结论并争论代议制度无与伦比的效能。这种要求在16世纪已经提出，不过不是在论及抵制权的文章中。16世纪下半叶国王们与他们赖以施政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使人们自从古典时代以来第一次关心起政体的形式，尤其关心国王与其领土上的各个等级、与议会或国会的关系。因此讨论趋向于集中到具体的形式及其历史背景而不是泛泛的哲学概念。博丹开其先河，他根据自己的国家观念重新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六种基本形式的划分。因为主权是国家的象征，他只承认国家的三种体制：一个人进行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共同统治的贵族政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但他在国家的形式及其运作的方式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国家与政府之间进一步做出了自己的区分。国家的任何一种形式都能通过正常地具备另外两种形式中之一种的特征的机构发挥作用。这种分析使他能对实际政体的多样化做出比亚里士多德简单的六种划分远为准确和透彻的说明。尤其是通过这种分析，他能将他对君主政体的强烈偏爱与他对某种等级代议制的信任调和起来，前者因为统一和灵活而成为唯一可信赖的有效国家形式，后者因为臣民可以表达其意愿并诉说其怨言而增加

前者的稳定性。因此他把法国和英格兰描绘成具有民主政治作用的君主国，并坚信这是应该选择的比其他所有形式更高级的政体，因为它最稳定。

博丹之所以偏爱这种我们应称之为立宪君主制的政体，纯粹出于权宜的考虑。对他来说，可能存在的各种政体形式都同样合法，所有现实的法律制度和习俗都是环境的必然产物。他距离认为民众的任命具有任何具体效力的观点如此遥远，以至于他坚持认为服从的义务与服从者的同意毫无关系。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无论民众的整体还是构成整体的个人在任命统治者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都不起任何作用，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上帝，法律的权威来自统治者。因此，在一个立宪君主政体中各等级的作用仅只是提供咨询。

但是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在这场讨论中也和在其他讨论中一样，没有哪位作者能够以博丹那种哲学的超然态度分析形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直接联系到具体的事件上，而且在对这一事件的印象加以详细解释时遵从某种先入为主的关于合理制度的理论，例如德西塞尔或迪·埃兰联系到了法国的君主制。在所有这类作者中，最有趣的是弗朗索瓦·奥特芒，他把某种等级代议制度与自由认作一体，并在这种意义上把自由看作合法国家的基本标志。他的论文《法兰克高卢》是暴政与自由的对比，暴政以恺撒对法兰克人的强行征服和后来罗马统治的普遍特征为例，自由的状况则流行于法兰克人中、希腊城邦里以及日耳曼人、英国人和阿拉贡人当中；这些地方通过民众大会对人民进行统治。对未来发展意义深远的是：在这里，暴政与合法政府的对比不是专制政府与法治的对比，而是一个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实行压制的政府同一个以公众利益为宗旨的政府之间的对比；前者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野心因而可以假定它与人民的愿望相悖，而后者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它建立在人民愿望的基础之上并因此而靠人民的忠诚加以维护。奥特芒继续争辩说，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可靠的，在其中，拥立或废黜国王、宣战或媾和、制定法律、颁赠荣誉、任命官职这些最高权力都属于民众会议或三级会议。“自由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以自身的代价和危险使每件事情得以完成的那些人，还应该在这些事情的完成过程中具有权威、参加意见，因为关系到所有人的事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他认为自从751年丕平当选后，在法兰克人中远已成为古老的制度了，但随着国王专制权力的增长而被逐渐地侵

蚀。这种情况已经由于下述做法的发展而显示出来：官职变得可以世袭，使法律得到批准和生效的权力从民众会议转到了最高法院，也就是说，转到了作为国王傀儡的律师们手中。他始终认为一个这样的政府是暴虐的，因为它专断。自由是制度合理的政府必不可少的标志，只有当政府掌握在等级代议机构或其前身——“民众会议”手中的时候它才是可靠的。奥特芒把“民众会议”等同于法兰克时代的民众集会，而且认为在卡佩王朝国王们的大会中，这种民众集会成为永久的形式。尽管弗朗索瓦·奥特芒只参与讨论了法国的政体，但是显然在他心目中自由就是以政治的术语表达的，而且等同于代议制。

在英格兰关于政体的争论迟至17世纪才开始，因为直到那时，曾在法国发生的国内动乱和冲突的情况才又在英国出现。当那场争论到来时，与法国的情况基本一样，一方是主张君权神授的专制主义者，另一方是主张民众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后者当中的霍布斯在把专制主义同关于权威必然具有代议制特征的理论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显示了与胡克同样的特色（在其他方面则大不相同）。《反暴君宣言》、博丹的《共和六书》以及奥特芒的《法兰克高卢》都被译成了英文，法国宗教战争中的经验与文献在英国的争论中被大量引用，这一切并不奇怪。

16世纪下半叶，关于政治上的义务，明显的中世纪观点让位于明显的近代观点。在16世纪中期，无论是天主教、路德宗或加尔文宗的作者们强调的都是统治者和臣民的义务，因为国家和所有其他的机构都是根据它们在拯救灵魂的设想中所起的作用为出发点加以评判的。它们的存在根据法理是神圣的，因为要贯彻教规。到16世纪末，强调的重点转到权利方面。国家日益被视为属于自然状况，是那些为了使某些利益得到保障的人们的产物。奥特芒和布坎南已经给自由赋予了绝对的价值，博丹则给自由和所有权赋予绝对的价值而没有把它们同灵魂得救的任何设想联系起来。关于国家的职能是保证个人享有其天赋权利的理论在17世纪以前尚未呈现为充分的意识。但是奥特芒、博丹和布坎南都认为尊重臣民的自由和所有权是制度合理的国家的标志。

这种改变是16世纪新出现的个人主义的一个侧面。胡克正在退回到出发点上，他认为整体决定部分，维持每个成员物质和道德幸福的政治集团高于其中个别的成员。而他的绝大部分同时代人则把个人视

为一个完全自足的单位。这种观点首先在宗教问题上显示出来，如把个人信仰抬高到位于教会总体权威之上并肯定宗教宽容的原则。在16世纪结束以前，这种观点在政治问题上也逐渐显示出来。人与人之间生来平等的信条，再加上推论统治者的权威基于臣民同意的基础上以及他享有的权力局限在臣民赋予他的限度之内，这些都是在宗教事务中可以全靠个人信仰的主张在国家事务中的反映。二者都标志着陈旧的集体观的衰落。认为教会是一个组织为共同整体的圣会，享有对其全体成员发布指令的神授权威的这样一种观念正面临认为教会是一些联合体，它们由对于所奉的共同信仰取得一致的一些个人联合而成的观念的挑战。统一的民族国家克服了中世纪政治社会中团体生活的多元状况，它也是个人的联合体，是由一些对于自愿在其中生活的法律、习俗看法一致的个人联合而成。在16世纪，改革后的教会的组织原则是这样一些信纲，在这些信纲中，那些一致认为对于灵魂得救必不可少的信条被加以界定；所有未包括进来的教义和实践是每个成员私人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17世纪国家的组织原则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确定了一些目标，而政治团体的建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契约各方义务的限定都是为了这些目标。对于教规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承认权威的向往让位于对于自由和保障权利的向往。在证明一个观点时，人们越来越少地到圣经中寻找反映上帝意旨的启示，并且越来越多地到历史中寻找人类经验的证据。

（施青林 译）

[1] 《神学大全》第二部分之二，论题11，第3条。

[2] 拉丁文译本于1857年由L. 诺阿克首次发行，译文较粗劣，R. 肖维利发行了早期的法文译本，加了评介（巴黎，1914年）。

[3] 关于对《论教会体制的法则》一书的后面几部分的著作权问题的讨论，参阅C. J. 西森的《胡克先生明智的婚姻》第4章（剑桥，1940年）。

[4] 参阅前面第94—100页。

[5] H. L. 拉斯基以《保卫自由反对暴君》的标题翻译出版（伦敦，1924年）。

第十七章 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国际的抗衡

一 美洲

在腓力二世登上西班牙和西印度的王位时，征服者的时代已经结束。大规模入侵活动的首领几乎都已去世。有的是由于受伤和劳累而过早地死去，有的则死于嫉妒的竞争者的刀下。也有少数人在令人心烦和争讼不已的退隐生活中度过他们的中年，科尔特斯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有任何人获准长期统治那些他们为王室征服的省份。到1558年，已经建立了世俗的和教会的行政机构，并在数量、效率和开销上迅速增加。征服者在他们自己的凶悍性格方面并没有继承者。米格尔·洛佩斯·德·黎牙实比在1561年着手征服菲律宾时，已是墨西哥的一位官员；他的取得巨大成功的入侵活动，以他的外交才干和组织能力著称，不是以他的作战技巧著称，而且的确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取得成功。弗朗西斯科·德·伊瓦拉是杜兰戈的征服者；西弗朗西斯科·德·乌迪诺拉建立了萨尔蒂洛，并在科阿韦拉定居下来，他们是上一代征服者的典范，虽然有时也惯用暴力，但还是开采白银和饲养牲畜的企业家、殖民地的组织者，而不是半野蛮帝国的征服者。实际上，已经没有帝国可供征服了。在北美，科罗纳多于1540年的远征一无所获，只是发现了一些贫瘠的丘陵和被大群“野牛”以及零零落落的同野牛一样野蛮的印第安人所占有的显然无边无际的草原；只凭武力或才智的人们在那里是没有生存余地的。虽然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那繁荣的但相对来说面积不大的城镇拥有白银矿藏并可以为征服者提供战利品；但直到1582年埃斯佩霍（Espejo）勘探格兰德河上游时，这里才被人们所知。1598年，胡安·德·奥尼亚特率领的远征队“占领”了新墨西哥，但这次占领不过是一个仪式，在此后的100年中，实际上普韦布洛人的村庄几乎没有受到西班牙人的骚扰——除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

在南美洲，智利南部潮湿的松树林和东科迪勒拉巨大的热带雨林，对探险者来说，确实是难以通行的严重障碍，因而这里没有明显的吸引力。1557年，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对智利的阿劳坎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讨伐，但从其结果及其意图来看，主要是一种带有惩罚性和军事性的保卫边界的措施。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安第斯山东部兴建了一些新的殖民地（著名的加拉加斯建于1567年），但马尔多纳多的目的是为了勘探亚马孙河上游地区并定居在那里，结果不出所料，彻底失败了。奥雷利亚纳著名的旅行是顺流而下，想通向靠近河口的殖民地，结果也没有成功。圭亚那沿海的沼泽地带，被想象为“金色王国”的门槛；但在16世纪后期，这只不过是少数耽于幻想的西班牙人的一种难以言状的梦想，诸如特立尼达的总督埃尔南多·德·贝里奥。他后来成为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俘虏，并把他的黄金狂传给了逮捕他的人。贝里奥建立了一些小堡垒；但西班牙在圭亚那或在特立尼达的殖民地都未遭受过严重的袭击。

在南美洲东部漫长的海岸线上，葡萄牙人稀疏地定居在他们的甘蔗园和小的乡村城镇里。他们的主要敌手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法国人。法国人对沿岸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勘察并砍伐巴西苏木以后，在科利尼的支持下于1555年在里约热内卢湾建立了殖民地。这些移民顶住了葡萄牙人的攻击；直到1567年，16世纪最有才干的巴西总督门·德·萨终于把他们赶了出去，并在海湾岸边建立了圣塞巴斯蒂昂城。葡萄牙人可以从西非获取奴隶，因而要比其他欧洲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到门·德·萨的统治结束时，按照“大家庭”的样子建立的奴隶居住区和甘蔗种植园已经建立并扩展开来，到1580年已有大约60个制糖厂投入了生产。居民大约有20000葡萄牙人、18000定居的印第安人和14000黑人奴隶。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的合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1582年在里斯本发布的特许状中，腓力二世答应把葡萄牙殖民地的商业和行政管理权留给葡萄牙人，而且他大体上履行了这个诺言。因此在16世纪，对于住在巴西的葡萄牙人并未加以干涉；直到17世纪，那里食糖利润不断增大，才使西班牙人企图以官僚机构对其加以控制，同时也引起了荷兰人的入侵。

西班牙人对属于自己的沿海地区从不怎么关心，在1580年以后更不怎么重视，因为这时他们再没有理由惧怕葡萄牙人的入侵了。从1537年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不断地被占领，到1580年这个殖民

地才被承认为永久性的共同基地；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走私者比对移民者更为重要。这里是通往秘鲁的后门，也可作为与巴西进行秘密交易的通道。自然，这在西班牙官方的眼中并无可取之处。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得到利马或马德里的援助，所以多年来仍是一个乡村。在16世纪末期，另一部分殖民地在今天属于阿根廷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门多萨、科尔多瓦、萨尔塔建立起来；但这不是由来自海岸的人而是由从秘鲁翻山越岭过来的人们建立的。这些移民都是朴实谦和的农业居民，他们的主要职业是给上秘鲁的矿山提供骡子、谷物和肉类。甚至最初由逆河而上的人们所建立的巴拉圭的亚松森同大西洋沿岸也只有很少的固定联系，而且这点联系还是秘密的。在16世纪晚期它失去了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少许的贸易。所有这些小块殖民地都很难维持。它们没有矿山也很少有贸易，因为那时西班牙本土的航运还没有扩展到使用拉普拉塔河，而且也禁止到那里去。它们从未成为扩展或征服的重要中心，直到18世纪时，在其附近的那些尚未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部落仍然是令人头痛的事，有时甚至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在腓力二世时，西班牙在美洲的勘探和扩张已渐渐停了下来，但这绝不仅仅是由于越来越确信那里已没有什么探索的价值了，因为关于这一点仍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也不是由于征服者们后继无人。实际情况是，在任何殖民帝国扩展的进程中，雇佣兵的首领迟早必然要让位于政府公职人员，冒险军人要被资本家或移民者（或兼有两种身份的人）所代替，拓荒的传教士也要被教区的教士所接替。对西班牙帝国来说，这样的替换在查理五世后期已经开始，到腓力二世时已大体完成了。尽管如此，在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仍有很多冒险家，他们能够并且在另一种情况下愿意向帝国已知的边界以外地区进行探险、征服和殖民活动。贵金属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诱人之物了。西班牙人完全可以建立农业殖民地，他们在智利、安蒂奥基亚和中墨西哥的普埃布拉盆地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扩张几乎停了下来，直到很晚以后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佛罗里达才有移民，阿根廷尚不为人所知，弗吉尼亚则留给了英国人。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谨慎和人为的限制政策造成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所有征服者都已经成为国王的代理人。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得到王室的承认，或是他们的活动未经王室批准，他们

就无法奖励部下或在他们杂乱纠合的军队中维持纪律。总有一些妒忌的对手和不忠诚的副职官员随时准备抓住一些领导人在指挥权限上的任何明显的过错。因而这些领导人小心地维持着一种奉公守法的外表。科尔特斯从不忘记这种教训，所以他能以一个富翁的身份寿终正寝。贡萨洛·皮萨罗虽然是一位能干而又有名气的将领，但他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竟忘了这种教训，结果以丢掉脑袋而告终。没有一个征服者——特别是在腓力二世的绝对统治下——能够设想不经国王或国王的代表总督的批准就进行一次成功的入侵活动。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这样的批准很少见，而且应允的条件十分吝啬。此外，普通立法所制定的各项规定和条件也使从前那种残暴无情的入侵活动几乎不可能进行了。1573年的《海外发现管理条例》是腓力二世为了征服者有所遵循而颁布的著名的仁慈法典。其中规定：“无论陆上或海上的发现者，均不得诉诸战争或进行征服；不许支持一派印第安人来反对另一派；不许卷入同当地人的纷争；不许对他们有任何伤害；不许拿他们的任何财产，除非是他们自愿送给的或以物易物换来的。”^[1]按照这些条款来衡量，没有人赶得上科尔特斯，更无法与皮萨罗或努尼奥·德·古斯曼相比。

这样审慎地制止武力扩张，多少反映了王室反对早期征服者的残暴行为的意识；这些残暴行为由于传道的托钵僧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人道主义宣传已被公布于众了。多明我会的传教士拉斯·卡萨斯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西普尔韦达关于印第安人的地位的轰动一时的争论，直到1551年才在巴利亚多利德结束。奉命裁决他们争论的一个由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们组成的法庭并未对此做出确切的结论，但总的来说，拉斯·卡萨斯争得了荣誉。新的政策也多少反映了腓力本人的性格和信心。这位伟大而谨慎的国王自然是想先行巩固而后扩张，先观望再起步。他坚持要做其前任从未做过的事情，即最全面、最详尽地搜集他的帝国内各地区的情报资料。他知道西印度地区空虚的边界，知道已有移民的各省境内大片尚未开发和尚未勘探的地区，还知道就住在可对要害地区发起攻击的范围以内的野蛮而又顽强的部族，这些要害地区包括巴拿马地峡和从萨卡特卡斯向墨西哥和韦拉克鲁斯、从波托西向阿雷基帕、从库斯科向利马运送白银的驼队必经的山路。直到1561年，在新西班牙北部的萨卡特科和瓜基基利（Guachichile）印第安人中间还爆发过一次广泛而又危险的起义。印第安人的反抗并不是内部危险的唯一根源。西班牙首领们在秘鲁进行的一连串内战，到1548年

以贡萨洛·皮萨罗被处死才告结束；但是要在所有总督的管辖地建立起秩序，则是一个漫长而又困难的过程。到1560年，总督才宣布南部地区已经得到和平，而殖民地的武装封建势力也已被镇压下去。又过了15到20年，在伟大的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时期，才终于把机构完整和效率较高的行政机构建立了起来。

为了安全起见，在现有的省份能够住上勤劳的西班牙人和定居的印第安人，并由有才干而又顺从的文官进行管理之前，腓力希望停止进一步的征服是自然的。但停止扩张最首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已经注意到西印度作为王室税收来源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王室从一开始就从西印度群岛获得了一些收益；但关税和印第安人的贡品等，却是微不足道的。直到查理五世的统治结束以前，甚至王室对开采出来的、或对从印第安人那里抢劫来的少量贵金属所征收的“伍一税”，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在新西班牙北部的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以及属于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大量丰饶的银矿。用各种方式大量生产天然的矿石迅速代替了原始淘洗的方法。为了从矿石中提炼白银建立了大型工厂（指那个时代的大工厂），并普遍采用天井或与汞混合来提炼白银的方法。一股真正的白银洪流开始流入西班牙，几年以后王室的银税（quinto）成为其税收的主要来源。被滚滚而来的白银所吸引的西班牙移民的人数增加了，而其他名目的税收也变得丰厚得多了。在腓力二世即位时，他从西印度获得的收益几乎是他全部岁入的10%，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考虑到腓力的大量债务及其对欧洲所承担的巨大义务，下列措施必然要成为王室政策的主要目标：急剧地增加西印度的税收；把西班牙人的资本和才能以及印第安人的劳力集中到开采银矿和其他带来财政收入的活动；坚持发展现有的有利可图的各省，而不允许在遥远的地区和投机性的新的入侵活动中耗费精力。

在查理五世时，包括行政、司法和财政在内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已在西印度牢固地建立起来了。^[2]腓力二世在文官管理方面相对来说没做多少改进，他建立了三个新的王室诉讼法庭——查尔卡斯（1559年）、基多（1563年）、马尼拉（1583年）。在腓力统治时期，殖民地的官员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之所以必然如此，一方面由于西印度普遍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由于国王坚持要求做到的琐碎而又详细的报告，并要保存记录以备查询。腓力还特别在西印度和中央都极其精心

地制定了国库的机构和制度，以便清查王室的账目。他开始更加严密地由中央（实际上是由他个人）控制官职的任命，并且为了王室的利益把已经存在的出卖有俸官职的做法制度化。这种出卖官职的做法成为岁入的重要来源；到17世纪时，已扩大到出卖更高、更重要的官职而且成了一种流弊；然而在腓力二世时期，对此一直是加以限制并小心抑制着的。国王常常拒绝西印度群岛会议的劝告，试图用许多其他方式从新大陆增加他的收入，不受欢迎但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过境税（alcabala）在1575年推行到西印度，并成为可与银税相比的税收来源。尽管其行政费用不断增加，但从西印度所得的纯收入还是稳步地增加了。在1585年（公认为最高年份）来自西印度的收入几乎达到王国全部收入的1/4。

为了增加来自西印度的岁入而进行的这种不断的艰苦的努力最终要靠当地印第安人的劳动才取得成效。美洲大陆各王国固有的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大量组织严密的劳动力，所以西班牙殖民者在早期养成了过度浪费劳动力的习惯。然而，在整个16世纪，印第安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在这个世纪里，缓慢而持续的衰减过程又因三次或四次大范围的流行病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打击而更加严重，从而使其人口一蹶不振了。虽然这只是对中部墨西哥推算出来的不精确数字，^[3]但毫无疑问，在所有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有经常接触的那些省里，其过程大致相同。同时，西班牙人和被认为是西班牙人的梅斯梯索^[4]的数量，则由于自然增长和外来移民而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增加。仅从新西班牙来看，在这个世纪中叶到末期，总计从大约5万人增加到超过10万人，但随着银矿、养牛场和欧洲型农业的发展，他们对印第安人劳动力的需要大大超过其增长的比例。所以，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那些常见的详细的立法条例，绝不仅是出于对印第安人福利的父亲般的关心（虽然这确是很真诚的），而且还出于需要以最经济和有效的方法来利用日趋减少的劳动力供应。1545—1546年，天花病的流行使新西班牙和秘鲁都受到了传染，随后在1549年和1550年便以立法权力从私人手中强行征集被迫劳动者，并把他们交给公众事务部门。总督和王室诉讼法庭有权批准从印第安人村落招募成批的劳动者，他们被政府或私人雇主临时雇用和从事专门的劳动（付给工资），如采矿、食品生产、建筑和各种公共建筑工程。除此以外，“懒惰”的印第安人也被强迫从事有固定工资的职业。这时，秘鲁总督辖区仍处于混乱状态；

但在新西班牙，这些并不太严格的做法，在以后的25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白银生产最初的大发展时期。印第安的人口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没有发生传染病，所以人口的衰减比较缓慢。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是由大量输入黑人奴隶来补充的，而且人口的一般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1576—1579年间另一种严重的传染病蔓延到新西班牙，而且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事实表明，黑人对于疾病的免疫力并不比印第安人强。随后便是疯狂地寻找劳动力。“自由”劳动者的工资自然有极大的增长。在新西班牙，对于分派制劳工的招募已被当时的总督恩利克斯从临时的和偶然的招募变成定期的经常的招募了，而且对它的需求量也稳步增长起来。在秘鲁，这种改革更加剧烈。一次最厉害的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正是波托西丰富的浅层矿脉已渐渐被采掘殆尽，需要更深的矿井去采掘矿石并需要更高的技术来分解矿石的时候。万卡韦利卡的大汞矿作为对波托西的一种补偿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为了开矿，还为了把矿工们需要的食品和燃料运送到荒凉的波托西山地，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总督建立了米达制（mita），这一制度要求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劳动力大约占这个省幸存下来的成年男性印第安人的1/7。每年大约有14000名劳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前往波托西，这些有期服役者是那些为了工资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工的自由矿工的补充，此外，还有奴隶；但奴隶也由于疾病传染而大量死亡。托莱多坚持要为有期服役者提供一所配有一位住院医生的医院，但是按照波托西当时的历史学家加普舍的说法，这些印第安人害怕医院更甚于害怕矿山。

自从1576年以后，对于分派制劳工的使用必须主要限于采矿和食品生产方面。在3/4个世纪里，曾经代表新西班牙特征的大规模的教堂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自从征服以来第一次出现了食物的短缺。城里的市场要靠生产玉米、水果、蔬菜、家禽、饲料、木柴和许多其他必需品的印第安人提供；但印第安人的农村由于实行分派制而使其人口减少了一半，并被夺走了大量幸存的劳动力，因而难以养活自己，没有剩余可供出卖或贡献给委托地占有者。小麦是西班牙人雇用印第安人为西班牙人的消费而种植的，但由于缺少劳动力，产量也下降了，所以从1578年起政府就不得不开设有权强行收购和限定价格的国有粮仓。过去既便宜又丰富的肉类现在变得短缺并且昂贵了，不过此中还有其他原因。家畜，尤其是在公共牧区自由放牧的绵羊和山羊势必繁殖到其生存条件的极限，然后又势必破坏其生存条件。在墨西哥

中部的广大地区和秘鲁的山谷，包括大片在征服以前曾种着庄稼的土地，第一次变成了公共牧场，继而又变成光秃秃的被侵蚀的荒野。结果，游牧的做法被更多采用，因而更加毁坏了印第安人的耕作，使被毁坏的土地越来越多。到16世纪末，在整个西印度（顺便应指出，也在西班牙）绵羊的头数以及繁荣的毛纺工业都急剧地衰落下去。牛对土地的破坏性比绵羊小一些，仍保持着原来的数量；但是牧场主将其迁移到离城市更远的新牧区，这就使肉类的供应越来越难以维持，而经营牧场的收益只能越来越依靠皮革和牛脂了。所以在1576年以后，这个世纪中叶的那种小康繁盛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1596年，另一次灾难性的传染病使新西班牙的经济再一次猛烈低落。从总督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16世纪末，幸存的印第安人一直濒临饿死的边缘，而在歉收的年景里，一些西班牙人的城市也经历了近乎饥荒的情况。这种情况，在17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经常出现。

印第安人人口的持续减少使西班牙人不得不自己生产食物，不再依靠印第安人的供应了。曾经像王侯采邑一样的委托地只能收取微薄的年金，几乎不够向国王交纳申请的费用。西班牙人拥有的并由其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是食物短缺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西班牙人集中的采矿区。分派制劳动对于这种形式的大庄园里的工作，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太严重，到16世纪末雇佣劳动已在乡村和矿山都日益普及起来。印第安人只有离开他们的乡村到西班牙人那里寻找工作，才能逃避分派制和贡税的负担，而这种负担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自然地加重了。通过劳役抵债制，劳动力还越来越固定在地产上和矿井里，因为在萧条时期，印第安工人很愿意接受预付的食物、衣服和钱财并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这些预付债务很难全部偿清；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债务世代相传，永无穷尽。所有这些原因，使建立这种庄园的那些地方的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印第安人公社迅速瓦解了。政府虽然有时通过立法来制止向印第安人放债，但从长远来看，对此也只能默认而已。这种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反映在王室的教会政策中。查理五世时，政府曾把在西印度传教和教会管理的任务交给托钵僧会的传教士，这些托钵僧认为他们自己和印第安人的利害关系大部分是一致的。他们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并用印第安语传教。他们的政策也和王室的政策一样，维护印第安人公社及其土地的完整，并且防止他们与世俗的西班牙人接触，但他们必须纳贡并提供有限的劳役。在这个方面，他们曾找到一种暂时解决的方法，即由委托地占有

者控制的殖民地社会。但是，委托地占有者封闭的家长式统治终将成为经济和行政发展的障碍，也会刺激国王，正如委托监护制本身一样。在腓力二世时，王室的政策突然改变了。正如西普尔韦达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鼓吹的那样，印第安人不仅基督教化了而且西班牙化了。他们将学习西班牙语，而且将作为工匠和劳工融合在西班牙人的社会中。为了教会的目的，他们最终被置于直辖教区的管辖之下。由主教控制的并得到王室支持的1565年和1585年的墨西哥宗教会议，逐步地但是坚决地实施了特伦托宗教会议的敕令，即任何传教士如果不服从主教团的权威，他们对俗人就没有救治灵魂的管辖权。修道会的势力和特权越来越小，而那些教区僧侣的势力和特权则日益增强。教区僧侣的数量也增加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移民增多的结果，另一方面则由于克里奥尔人^[5]教士阶层的出现，他们凭借大学（墨西哥大学和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都创办于1551年）的教育和宗教法庭（1572年建于西印度）的戒律而处于优势地位。教区里的官僚式的教士集团，其中一部分为克里奥尔人，对于偏远省区的传教事业毫无热情，也不关心保护那些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印第安公社，使其不与世俗的西班牙人接触。那种以朴素单纯为基础的建立印第安人基督教的目标从视野中消失了。培养土著教士的愿望也随之破灭。圣方济各会对印第安人进行高等教育的富有想象力的尝试大部分已被放弃。著名的圣地亚哥-特拉特洛尔科印第安人学院，是1536年在最初的两任总督和一些较为开明的委托地占有者支持下创办的，这个学院屡经变迁一直维持到1576年；但那年的流行病夺去了大部分学生的生命，教师们也丧失了信心，从此它再未恢复原状。到这个世纪末期，这个学院的校舍已毁坏得无法修复，只剩下两个房间成了梅斯梯索儿童的小学校舍。它的命运是注定如此的。新西班牙圣方济各会的编年史作家门迭塔在追述查理五世的统治时，将它描述为黄金时代，并将科尔特斯比做西班牙的摩西；如果那个狡猾的冒险军人读到这个描述，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只要印第安人还保持淳朴，托钵僧就是他们最忠诚的朋友。到16世纪末，这些托钵僧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或者安心地隐居在自己的修道院里，或者把他们的传教热情转到殖民地偏远地区的更不开化的土著中去，他们中有许多人最终这样做了。

在16世纪最后25年中，西印度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破坏性严重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的危机。这期间，西班牙本土也发生了一场经济的和人口的危机，直到18世纪开始以后才结束。西班牙无力吸收殖民地

出口的皮革、染料、食糖和其他产品，对于西印度这些商品生产的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样，西班牙工业越来越不能以优惠的价格向美洲的西班牙城市提供足够数量的产品，这就更加深了殖民地生产因亏损所造成的困难。在西班牙经济上机会的减少加上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促使更多的西班牙人（既有俗人，又有僧侣）移居到西印度，虽然那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在整个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大部分时期里那里的食物比西班牙要充裕一些。因为殖民地社会的性质，这些移民对于西印度来说，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增加劳动力，也是只增加了很少一些；相反，却增加了许多吃饭的人。最后，西班牙王室的财政困难亦迫使它不断地榨取更多的资金，即美洲的居民越来越难以提供而且几乎全部以白银提供的资金，同时也给西班牙的货币形势造成不良的后果。由于西班牙和西印度的经济和人口的危机正好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之间就这样相互激化了这两种危机带来的损失。

在这种国内困难日益严重的时期，虽然不得不改变政策，但政府的持续不变的方针和坚定不移的目的仍是把白银安全定期地运往西班牙。但是装运白银的船只反而成为战时的敌国私掠船与平时的海盗主要的攻击目标。直到16世纪最后几十年，西班牙的敌国一直很少考虑去夺取西班牙和美洲的土地。这个帝国看上去过于强大、过于遥远因而不能发起公开的进攻，而且进攻的代价也太高了。欧洲的其他沿海国家寻求更简便的方法阻止可作为军费的白银运往西班牙并据为己有，他们或在海上用武力夺取，或通过非法贸易获得。结果是新世界各国间的对抗长期集中在加勒比海路，通过此海路，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和热带产品运往东方，新世界的西班牙人为过舒适的生活所主要依赖的欧洲的酒、油、手工业产品运往西方。在查理五世与法国的长期争夺中，来往于西印度群岛的运输船一直是法国攻击的目标。1555年雅克·索利对哈瓦那的劫掠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政府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修筑城堡以保卫港口和到西印度群岛的通路，用武装的船舰保护白银的运输。的确，在腓力的统治开始时卡托—康布雷奇和约以大部分有利于西班牙的条款解决了两个强国一直在为之公开争斗的问题。但西班牙人不相信和平会维持很长时间，也不相信法国政府能够或者甚至愿意控制那些私掠船的船长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海盗行为。问题还不仅是海上的劫掠，根据当时的经济理论，非法贸易几乎成为一个具有同样危险性的威胁。

来美洲的殖民者们十分需要奴隶和各种制成品，他们有大量的硬币供其使用，但法律却规定他们只能与既贪得无厌又效率很低的特许商人打交道，这就为走私商提供了极好的市场，很值得冒险前往。在16世纪60年代，外国商人的走私活动第一次成为西班牙政府在加勒比地区的严重问题。走私商大部分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开始，这些走私商们的首领是机敏、多才的约翰·霍金斯。霍金斯于1562—1568年间组织了四次前往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性远航，他亲自指挥了其中的三次。他在英国装上布匹和杂货，再到西非海岸装上直接从商人手里买来的奴隶，他打算把货物和奴隶卖给定居在西印度的西班牙人，然后把返回英国时装运的食糖、皮革和白银搞到手。这样，霍金斯的计划开辟了后来称之为三角贸易的航线，打破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的垄断权。但霍金斯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事偷袭式的走私贸易，更不愿进行公开的海盗行为。他似乎已经产生了郑重的希望，要从西班牙取得特许证，使其贸易合法化。英国和西班牙和平相处，有着传统的友谊；霍金斯闻名于塞维利亚地区，在那里有朋友和商业上的顾客；他准备缴纳一切合法的税金；而且为了报答给予他进行贸易的特许证，他将作为私掠船主为西班牙国王服务，帮助国王清除西印度群岛水域的海盗和外国走私商人。特别是，他估计到了佛罗里达海峡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而且知道法国试图由勒内·德·洛多尼埃在佛罗里达海岸建立据点，这将对西班牙的海上运输构成极大威胁。霍金斯希望把这个殖民地摧毁于初建时，以此显示他的服务的价值。

虽然作为商业冒险来说，霍金斯的前两次远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总的来说他的计划完全失败了。他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和低级政府官员们很愿意与他合作，这是正确的。但在最后一次的返航途中，由于连续的恶劣天气，他不得不来到墨西哥湾，被迫在圣胡安—德乌卢阿的韦拉克鲁斯港避风。在那里他遇上了从西班牙驶来的一支护航船队。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他的船只大部分被击毁，他和仅存的15个同伴历经艰辛，于1569年1月才回到英国。这场战斗和其后对英国遇难者的虐待，在英国引起了反西班牙的情绪。整个事件清楚地表明，西班牙政府不容许任何类型的私商在美洲海域活动，任何外国人都被看作是海盗，如被抓获，就要受到如此之虐待。因此，西印度群岛的外国商人必须是秘密地前往或是很好地武装起来前往。同时，西班牙人在这个地区的新的部署表明，他们能够为自己做到他们不允许霍金斯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这可能也是霍金斯失败的原因之一。

加勒比地区的海陆联防，无论针对的是私掠船、海盗还是走私犯，都需要有统一的指挥。这个任务在16世纪60年代交给了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他是当时最为精明强干的海上指挥员之一。梅嫩德斯的第一项重要行动就是在1555—1556年间护送一支返航的船队。1561年，他被任命为西印度航线舰队总司令，1562年，他以总司令的身份率领这支当时已经横渡过大西洋的最大的船队出海并返回，这支船队有49艘帆船，其中有6艘是军舰。在此后的两年中，他致力于建议国王制定一部关于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法规，这部法规于1564年和1566年间公布于世。他的建议有三个要点：（1）为横渡大西洋的船只强制护航；（2）在西印度群岛主要港口设防并建立军舰修造所；（3）组织以西印度群岛为基地的、以巡查主要商业航路为目的的巡洋舰分队。

自1542年以来，护航制便用于战时了。那时，西班牙每年横渡大西洋的单程船运总量达到约相当于现代容量的10000吨。从1542年到与英国的战争爆发以前，运载总量大约增长了1倍。许多船只是比较小的。尽管在整个16世纪里船只的平均吨位呈增长趋势，但是，最大的船也很少超过600吨。离开圣卢卡尔的船只的数量，每年差别很大；梅嫩德斯时代，平均每年为60到70艘。按照16世纪的水平，这要算是一支大船队了，它需要有相当的力量加以组织。梅嫩德斯全部给以强制护航，但是，对于那些航速快、武器装备良好的有可能得到特许例外的紧急航行则另当别论；而且，梅嫩德斯赋予护航制以固定的、有特色的例行法规，这项法规为人们遵循了一百多年。去新西班牙的船队，被安排在每年5月离开圣卢卡尔，并经常通过莫纳海峡进入加勒比海域。到达加勒比海后，去往洪都拉斯和大安的列斯群岛的船只就分道而行。大多数的船只通过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南部，穿过尤卡坦海峡再跨过墨西哥湾，到达韦拉克鲁斯。霍金斯在圣胡安—德乌卢阿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支船队。前往巴拿马地峡的船队于8月份离开圣卢卡尔沿着稍微偏南的航线，驶过向风群岛。部分船只驶向大陆上的小港口，船队的主要部分在农布雷—德迪奥斯抛锚（后来又在贝略港抛锚）。在农布雷—德迪奥斯，船队卸下给秘鲁的货物，装上白银。而后，在卡塔赫纳的避风港内停留。这两种船队都在西印度过冬。前往巴拿马地峡的船队于1月份起锚返航，它们沿着一条西北方向的航线行进，直到可以绕过圣安东尼奥角到达哈瓦那。通常讲，这是一段舒适的右舷风向的航行。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船队于2月从韦拉克鲁斯出

发，经过3—4周的艰苦努力，迎着贸易风，于3月份到哈瓦那赴约。哈瓦那为航海船只扼守着这个唯一的方便的墨西哥湾出口。船队在此地整修、装贮食物，力图结伴而行并在初夏回到西班牙，为的是赶在飓风季节到来之前顺利通过热带水域。船队乘风破浪，穿过困难、危险的佛罗里达海峡，向北航行，直到可以赶上偏西风从而驶过大西洋。每次护航的任务都由战舰执行；根据国际形势和可供使用的船只的情况，派出2—8艘战舰护航，就靠这些战舰去抵御埋伏在巴哈马和亚速尔群岛的劫掠船。

哈瓦那是护航制度的中枢要地，至少对于回国航行是这样，因此西班牙的敌人对它最为重视。梅嫩德斯把哈瓦那建设成一个几乎难以攻陷的要塞，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抵御了敌人的进攻；他还在哈瓦那建起一座造船厂，不但能利用当地木材建造轻型战船，还可以整修各种类型的船只。他摧毁了引起霍金斯注意的法国在佛罗里达的居留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西班牙的圣阿古斯丁要塞；他在古巴加强了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的防御。但他的构筑防御工事和组建海军巡逻船队的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经常拖延。直到1582年前，一直没有打算在加勒比海配置常驻舰队，在这一年，有两只桨帆并用舰扬帆划行横渡大西洋，从里斯本驶往圣多明各。其中一只在驶达后不久便失事被毁，另一只的水手们发生了哗变。无论是以圣多明各为基地，还是后来以卡特赫纳为基地的桨帆并用舰都是效果平平，桨手难以补充，日常费用高昂。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国王的海军参谋们一再向他进言要在西印度群岛保持一支真正的帆船舰队，但是对此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直到17世纪30年代由于海上灾祸屡屡发生，才痛苦地明确感到需要，但为时已晚。虽然西印度群岛对于西班牙至关重要，可是欧洲战事的危急导致不断地从西印度调走船只，因而只有梅嫩德斯的精神和毅力才能保证他们具有哪怕是防御的力量。

梅嫩德斯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年代，是紧张活动的年代，而且全面地看，也是取得显著成效的年代。他死于1574年；但他构筑基地、训练和组建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船队的事业，已由许多有才能和有精力的后继者（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儿）继承下来，使西班牙的众多殖民地在经历了消耗巨大的长期海战之后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与西班牙的交通联络并未中断。

梅嫩德斯在西印度群岛从事最伟大的活动的整个时期，对西班牙的大西洋航线加以保护并维持秩序的任务，困难愈来愈大，花费愈来愈高。虽然宗教内战的原因使法国暂时退出了国际战场，可是法国的海盗们却仍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活动，而英国的劫掠者也愈来愈大胆，宗教仇恨更加增强并扩大了他们的贪欲。不久，由于尼德兰的反抗和与英国的公开战争使这两个北大西洋最强的沿海国家把战船和私掠船派往加勒比海，并形成了可怕的力量，从而在针对西印度群岛进行独立指挥的报复性远航方面出现了另一个海上奇才——弗朗西斯·德雷克。

正如梅嫩德斯是保卫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的中心人物一样，德雷克成为攻击那里的中心人物。德雷克生前死后都被他的同胞看作是海军奇才和新教徒信仰的化身。他制造了以勇敢的海盗和富有而又无力自卫的西班牙人为内容的传说，这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政策。他是英国大群贫穷的绅士们的英雄和模范，他们是一些小地主，迫于物价暴涨和社会变化而从事私掠活动，也可以说是“搞条船并果断地使用它”。对西班牙人来说，“德雷克”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名字。实际上，德雷克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西印度战略计划，代替了许多分散的小股劫掠；他有效地贯彻了自己的计划，获得了很大的但并非彻底的成功；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掠得了大量战利品，并严重地削弱了西班牙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但并没有打破西班牙对加勒比地区领土占有的垄断权。

德雷克作为一个非法商人开始其与西印度群岛的关系，并在圣胡安—德乌卢阿结识了霍金斯。从这以后，他便基本上成为一个官方授权的私掠船船长，而他于1570年和1571年进行的两次远航兼有奴隶贸易和全面勘察的作用。在1572年，也就是西班牙大使被从英国驱逐后的第二年，德雷克扬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重大劫掠；在这次只用两条船和70多人的著名的远航中，他突然袭击了农布雷—德迪奥斯，并劫获了由秘鲁满载银子越过地峡的三列骡马队。战利品足够德雷克一伙的每一个人终生富有。

在1574年，也就是梅嫩德斯去世的那年，英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勉强地暂时和解了。但英国的船长们还继续“造访”加勒比地区，带着强制拘捕证同较小的居留地和逃亡黑奴们做生意，或从事小股劫掠的活动。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取得可与德雷克相比的成果。他们的政府

任随他们去做海盗自谋生路，他们中间有些人——包括德雷克的朋友、于1576年鲁莽地袭击地峡的约翰·奥克斯南——被西班牙人捕获处死。梅嫩德斯已经成功地把加勒比海搞得即或说不上是西班牙湖，至少对单纯劫掠的人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游弋海域。从未把自己看作海盗的德雷克在那些年里对西印度不闻不问。从1577—1580年，他撇开此事进行了他那次伟大的环球航行。他在这一次航行中完成了迪亚士、达·伽马和麦哲伦三人多年来分别完成的航行。这次航行的成就是巨大的；但除了夺取卡卡夫戈（Cucafuego）以外，它对美洲形势的影响是精神上的甚于物质上的，长远的甚于直接的。它大大提高了英国的海上威望；它发现了一条绕过合恩角通往太平洋的航线，这条通道比麦哲伦海峡危险少些，不过对于当时的舰船来说，危险也少不了许多；它打破了当时西班牙对于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海面航行的垄断；迄今为止，那一直是一种真正的而非仅仅法律意义上的垄断；由于地峡以及通过地峡运输的财富有受到两侧攻击的危险，从而大大增加了西班牙政府对殖民地的忧虑。

在1585年英国和西班牙开战的局面已经确然无疑之前，德雷克一直没有再在加勒比海露面。那年“出航西印度群岛”的行动已不只是劫掠，而是由20多只帆船组成的船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行动。这个计划与30年前法国人所制订但从未实现的计划相似。这个计划的内容包括：首先攻击圣多明各和铁拉菲尔梅的港口城镇，特别是卡塔赫纳；而后与黑奴们协同从陆地攻击农布雷—德迪奥斯和巴拿马，以求控制经过地峡的陆路的两端；最后夺取哈瓦那。德雷克的希望是由英国的常驻军队固守哈瓦那和卡塔赫纳。如果成功就会使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交通补给体系土崩瓦解。还有可能使西班牙在许多年内或许永远得不到在欧洲作战的资金，把西印度向英国开放并任其开发。到16世纪末，这个计划的构思已经证明了西印度群岛在欧洲国际对抗中的重要地位。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军将领及政府官员们多次制订了与德雷克计划完全相似或部分相似的计划。有些和德雷克一样，暂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加勒比海确实太大，岛屿过于分散而又荒无人烟，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征服。更何况大规模水陆作战的指挥官所面临的士兵的健康问题，要比早些时候打了就跑的袭击者严重得多，因为他的大批官兵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陆地上生活并作战，从欧洲来的海上和陆上的生力军由于热带战役可怕的死亡率而消耗殆尽。西班牙人、蚊子和气候一同挫败了每一次袭击。

西印度群岛和铁拉菲尔梅的行政首府圣多明各，是西班牙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它那石砌的建筑物和宽阔的街道与广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有防御工事和为数不多的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守军。攻取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英国指挥官在西印度群岛所企望的最为野心勃勃的战绩。德雷克夺取这座城市所采用的战术，与索利（Sorel）早年在哈瓦那采用的一样，但使用的兵力却是索利那时的10多倍。给这座城市的繁荣景象带来的破坏是严重的，也是永久性的。所有主要建筑物都被掠夺一空，要塞炮台上的大炮和军需品都被拆掉，守岛船队的船只也在海港被烧毁。

德雷克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卡塔赫纳，这是一座比圣多明各小得多的城镇，但在战略上却重要得多，又因准备装运西班牙的货物和金银矿都在这里集结储存，所以它也可算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争夺地。卡塔赫纳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德雷克却不顾它那组织良好的勇敢抵抗而对它发动了攻击；在德雷克进行的包括错综复杂的危险的领港工作和冒着汹涌澎湃的大浪同时登陆在内的全部两栖行动中，大概这是最辉煌的一次。然而，在战斗进程中，英国部队由于伤亡和疾病已由原来的2300人减员到大约800名健壮的人。由英国驻军守卫卡塔赫纳毫无问题。德雷克决定放弃进攻地峡的打算，转而进攻开曼群岛，之后又攻打了圣安东尼奥角，对他的船只进行整修并使人员恢复精力后，他想在那里截击从新西班牙来的船队。但是，5月的天气很坏，船队平安地偷偷溜过了。德雷克断定哈瓦那的防御太强大以致不能攻克，便于1586年6月启航回国，只在中途停下来摧毁了圣阿古斯丁正在建设中的防御工事，它们位于倒霉的法国人在佛罗里达的居留地。

这次“出航西印度群岛”虽然在更大的目标上是失败了，但却给西班牙领地在物质上造成巨大损失，并使西班牙的威望遭到更大损失。西班牙当局没有忽略他们失败的教训。在16世纪90年代，尽管在欧洲迫切需要船只和部队，还是把西印度群岛的陆上和海上防御进行了全面的加强。安东内利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他是当时最好的军事工程师，他在波多黎各构筑了非常好的工事，成为加勒比海防御中的处于上风的棱堡；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这个地方对西班牙人具有的直接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出于不使它被西班牙的敌人所用的关键性需要。与此同时，加勒比海各基地之间的交通联络也由于装备了快速急遣船艇而得到了改善。1595年，又一支庞大的舰队在德雷克和霍金斯

的共同指挥下驶离英国；在这次将成为他们俩最后的远航西印度群岛的行动中，他们发现西班牙人早有准备并有能力抵抗。英国人在圣胡安—德尔波多黎各被挫败，但十分奇怪的是，三年以后，那位才能稍逊的坎伯兰竟夺取了这个地方，然而未能守住。他们放弃了再次攻打卡塔赫纳的计划，在地峡（西班牙人为了更易于守卫的贝略港而放弃了农布雷·德迪奥斯），一支由精选出来的750人组成的分遣队从陆路攻打巴拿马，但被一场暴雨和西班牙的伏兵赶回到他们的船上。在德雷克死于贝拉瓜沿岸海面以后，托马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接替他指挥。他在佛罗里达海峡遭到佩德罗·梅嫩德斯·马尔克斯指挥的强大的船队的截击，不得不在一场连续的战斗中冲杀出去，这是在西印度群岛发生的正规舰队之间的第一次海战。这次战斗不是决定性的；但正值西班牙在欧洲遭到惨重的失败并且不可能拥有后备船只和兵员去增强西印度群岛的防御时，这次战斗扫清了加勒比地区的袭击者。

在16世纪，法国和英国总想打破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贸易和领土垄断的企图，总的来说就这样都归于失败了；即或有些成效也是暂时的。零散的袭击事件继续不断发生，要冒着危险从事的大宗的走私贸易发展起来了。新近来到加勒比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的战争使他们在失去了葡萄牙的海盐之后，在这个世纪的最末几年才在委内瑞拉沿岸开始了有利可图的贸易。他们把制成的商品带来，再把从阿拉亚天然盐田挖掘出的盐以及烟草和皮革带回欧洲。但是，西班牙人仍有办法对付他们。在1605年，路易斯·法哈尔多在阿拉亚捕获了12只荷兰船，并一度中断了这种贸易。总之，委内瑞拉和附近岛屿毕竟是边缘地区；加勒比海贸易的主要根源地并未受到损害。

在1596年，根据海牙条约，亨利四世的法国以及英国和联省共和国结成了一个反对西班牙的同盟，它看起来强大得足以肢解西班牙帝国。一支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很快就消灭了加的斯港的全部美洲护航舰队，从而使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交通联络中断几达两年之久。这个同盟也未能履行其条约；法国人退了出去并于1598年签订韦尔万条约单独媾和。根据后来的解释，亨利四世是想在这一条约中确保分享美洲贸易。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种企图；即或进行过这样的努力，它们也是不成功的。已经筋疲力尽的西班牙缺乏人力、船只和财力来负担其巨大的责任，可是仍不考虑公开准许外国商人进入其加勒比禁区。西印度群岛继续吸引着冒险家们，而且愈来愈

多，但他们的事业仍仅限于走私和袭击，这种活动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堕落为海盗行径。

出航到西印度群岛的利润和风险说明了长期以来英国和法国的冒险家们不愿意效仿西班牙人的做法到未被西班牙占领的地区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定居点。在西印度群岛劫掠战利品的希望之大足以使到别处从事更富有建设性的冒险活动既缺乏私人资本又无国家援助；而那些自愿的定居者和商人面临的障碍是存在着被认为要对私掠船的袭击负责的危险。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层原因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既然西班牙人已把美洲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全都占领并设防了，剩下值得冒险和花费去并吞的就没有什么了。事实是，这种观念并非确然无疑。雷利就是一个不相信这种观念的人，他看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名征服者；但雷利是个例外，在西班牙的委内瑞拉和葡萄牙的巴西之间的圭亚那——大河密布的无人地带——引起了一些幻想。在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驱使人们到北美洲沿岸探险的主要动因并未立即导致他们去建立殖民地。捕鱼业的价值的确是很有吸引力；但捕鱼的人并不考虑定居。从西北进入中国的通路带来的是贸易，不是殖民地。金银对于英国人的吸引力肯定像对西班牙人的吸引力一样强烈；但是就连伊丽莎白时代那些思想活跃的人们，乃至女王本人，都认为在一片辽阔的大陆上无目的地寻找是毫无希望的。在1576年、1577年和1578年弗罗比歇的三次航行，由于带回的金子全是假的而宣告失败，这使探险家们的猎金活动推迟了许多年。

被殖民地本身的好处所吸引而在美洲开拓殖民地的新的兴趣首先在那些从爱尔兰获得了有关经验的英国人中间萌生出来。爱尔兰位于去美洲的路上，许多想在美洲建立定居点的英国西部人，如吉尔伯特、格伦维尔、雷利等，都是曾在爱尔兰建立定居点的重要人物，他们自然会想到把自己的经验在更有前途的环境和更容易控制的民族中间加以应用。土地在16世纪的英国是进行投机和投资的最大的唯一的出路，但是土地的投机生意使地价日益高昂而且许多地产已无利可图，因为占有土地期间管理十分麻烦，王室封建占有权加在土地上的负担也十分沉重。一些“爱尔兰”派认为，在美洲可望获得大片便于管理的地产，他们还可以用封建贵族的权力来支配。印第安人作为劳动力有可能（而且的确是）人数太少，过于落后，但是被从英格兰土

地上赶走的那些人构成的自耕农移民，则可望使之相信生活在野蛮的印第安人中间比生活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中间还要好。

在1578年颁布给汉弗莱·吉尔伯特的特许证——建立英国殖民地的第一个特许证——中，对于发现和征服都有记载，但没有明确规定吉尔伯特探险的目的地。他的意图只能部分地根据后来的事件和部分地根据他的著作加以推测。著名的《发现通往中国的一条新路》一书，读起来像是给弗罗比歇的中国公司做广告宣传，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开拓殖民地的兴趣；但是，虽然此书直到1576年方才出版，但其中大部分早在10年前就已写成，那时吉尔伯特还没前往爱尔兰。另一方面，他在1577年写的信件和呈文中包含了想象力丰富、内容广泛的建议，这不仅反映了他在爱尔兰的经验，还反映了理论地理学家们，特别是著名的约翰·迪伊对他的影响。吉尔伯特似乎想开拓两个定居地，一个在北美洲东岸的北部，另一个在南部。南部定居地将作为大规模袭击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的基地，北部定居地作为前往中国路上的驿站。此外，北部定居地的目标还在于尽可能控制班克斯渔场。构成这个设想的既有知识也有想象；在班克斯捕鱼的60年间，英国人在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中因为缺少大量便宜的盐而受到了损失。这样，他们就不能在海上把湿着的鱼用盐腌在桶里，只能在岸上把鱼晾干。因此，虽然在班克斯海面捕鱼的英国人居于少数，但在纽芬兰海滩则人多势众，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夏季营地和晾鱼场地。或许就是基于这种优势，他们取得了领土主权。整个计划首尾一贯，非常周密。可以说，它是同年德雷克开始在太平洋完成的计划在大西洋上的翻版。它实际上收获不大。1583年，吉尔伯特在他最后一次航行中“占领”了纽芬兰，既然没有人对这一宣称提出认真的质疑，纽芬兰就属于英国了；在当时，所谓“占领”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对渔民几乎毫无意义。在返回途中，吉尔伯特溺水而死。倘若他成功地建起了一个殖民地，印第安人就要受苦了；在爱尔兰，他对待被征服的民族始终是非常苛刻残忍的。

雷利马上就着手推行他的异母兄弟提出的计划。他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北美洲海岸的南段。于1584年雷利得到特许证，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同年他便出海远征探险。1585年，由格伦维尔指挥的第二次远征在罗阿诺克岛开拓并建立了一个定居地，它位于卡罗来纳班克斯水湾与浅滩之间。这个地方很不适宜，没有深水抛锚地。也和早先那

些冒险家一样，这些开拓者对定居者所需要的来自母国的给养和援助重视不够。不久以后这些定居者便失去了信心，所以当德雷克出航西印度群岛返国途经罗阿诺克时，他们便搭乘他的船回英国去了。几个星期后，当格伦维尔的接济性质的远征队到达时，发现他们都已走了。1587年，雷利派遣了一支由100多名男女组成的新的移民队，令其前往切萨皮克湾，那里抛锚停泊的条件较好。但是，他们还是在罗阿诺克定居并自谋生计。1588年年初，一次小规模接济性远航由于被海盗袭击而未能渡过大西洋；无敌舰队造成的危机从中妨碍了格伦维尔以更强的力量出航；直到1590年一支远征队才到达罗阿诺克，发现殖民者已不见踪迹。至今无人知道他们遇上了什么事。这就是16世纪英国人企图在北美洲定居的结局。它们都纯粹是私人的企图。女王除了给弗吉尼亚命名外，对他们毫无帮助；当然，说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女王的支持，雷利根本无法参与开拓殖民地的计划。雷利本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圭亚那。他对圭亚那的探险考察，以及为这些活动辩护的企图，给全世界留下了一部英语的散文杰作《辽阔、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在这部著作中，他附带赞赏了西班牙人的勇气、技艺和顽强精神。但是，在宫廷供职多年后的雷利不是一位征服者；在克服热带探险的艰难困苦方面，他也无法与其竞争者贝里奥匹敌。雷利在圭亚那根本没有开拓殖民地。他的同时代的人——利、哈考特、罗，虽然希望不是太高，只是热衷于烟草种植，而没有想要建立“金色王国”，但结局亦不见得更好。结果，若干年之后，倒是荷兰人取得了成功。

对于所有拓殖活动来说，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私人自发的经济刺激；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指导、保护和时而加以限制的政策。这两方面的因素同等重要；缺少一方，另一方就不会有什么成效。在16世纪，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不够强大。绝大部分资助者、投机者、商人看不清海外殖民冒险活动对他们的好处。的确，英国存在着土地与劳动力的矛盾问题，而且愈来愈尖锐；但自耕农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到爱尔兰而不是到美洲去寻找出路。同时，与赚钱较快、红利较多的袭击活动相比，长期的、建设性的定居地政策对英国政府就毫无吸引力了。在英国，所谓政府的支持和组织，在16世纪从来不过是简单的呼吁，即每当西班牙在某处宣称拥有统治权时对它提出抗议。1577年，吉尔伯特提出了他的最有说服力的请愿书，名为《论女王陛下如何给西班牙国王制造麻烦》，

主张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捕鱼船队进行无端的攻击。同样，到罗阿诺克的冒险活动，就政府的关注而言，也仅仅是攻击西班牙的侧面运动，并非头等重大的利害关系。法国在卡托一康布雷奇和约之后，对袭击西属西印度群岛或开拓美洲殖民地最感兴趣的人们，是来自大西洋港口的胡格诺派教徒；而在这个被宗教战争所分裂的国家里，天主教政府既不能也不愿意支持异端反对派的殖民活动。因此，在16世纪末仍和16世纪初一样，在美洲定居的殖民地还仅仅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后这两个国家在西班牙的王冠下实现了松散的统一。所有其他国家在开拓永久性居留地方面都一无所获，只有少数几个幻想家期待过某种值得获取的东西。

在17世纪最初的若干年里，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时，欧洲人的居留地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开始扎根。私人资本和政府援助联合在一起，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在没有半开化易驯服的土著劳动力的地区开拓永久性的殖民地。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日益认识到过去对西班牙估计过高，西班牙的力量主要是一个靠它的威望和美洲的金银所维持的错觉。西班牙人缺乏舰船，他们的许多舰船都已陈旧。由于缺乏物资和熟练的技工以及在设计和制造方面的保守倾向，使西班牙在舰船和武器的发展上落后于英国和荷兰。由于深陷于欧洲事务，他们还缺乏战斗人员、水手和士兵。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运银船队和这些船队途经的航路确实保护得很好，但正是由于把战船和守军集中于西印度群岛，才使得西班牙无力保护它在美洲其他地方独占的权利。更何况西班牙人对此已失去兴趣。1590年，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去搜寻弗吉尼亚居留地以便予以摧毁，但却不知道它早已销踪绝迹。当时曾计划在切萨皮克湾建立居留地并构筑工事，以防英国人对这里再做打算。这些计划都落空了，机会也失掉了。到1602年，政府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再次限制扩张，负责的官员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也无保留价值而想放弃它。当英国开拓者力主在北美洲东部用不着攻击西班牙人时，他们是正确的，对西班牙人可不加考虑。

在英国，导致态度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于在西部从事种植业将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了新的估计。过去那种直截了当的对土地的欲望和对金银的追求，还是那么强烈；但是还考虑到了在美洲的殖民地能够出产其他英国迫切需要的产品：廉价的食物，特别是鱼；葡

萄酒和干果之类的美味，它们一般从法国或地中海地区进口；烟草——一种在欧洲得到迅速普及的美洲产品；最重要的是木材、大麻和松脂一类战略物资，它们通常来自波罗的海地区，而且可能被敌人的海军所切断。另一方面，殖民地区将成为英国工场主独占的市场；就连印第安人也能学会讲究“斯文”并穿着绒面呢衣。开拓殖民地能转移（想象中的）过剩人口，使需要救济的穷人变成有用的劳动者或小自耕农，从而解决由于农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普遍的失业问题。诚实的非英国国教徒，如不图谋反对国王，也会找到平平安安做礼拜的地方。天主教徒的首脑人物曾援助过吉尔伯特；反对国教的人后来就定居在新英格兰。殖民对每一方——政府、投资人、移民——都有好处。结果，出现了对大规模船运业的需要，这个行业平时是海员的职业，战时则是海军力量的来源。

宣传机构在创立这种新的乐观主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把兴趣集中于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小哈克卢特的毕生努力。他是地理出版业的主要创办人。我们所了解的早期的美洲航海路线，几乎全应归功于他。他是衔接两次弗吉尼亚探险热的继往开来的人物，第一次在16世纪80年代，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在下个世纪开始以后，取得了永久性立足点。最早激发他的兴趣的是吉尔伯特的计划。他在早期的短文《论西部种植》中提出了大胆的主张：应该把到北美洲开拓殖民地作为国家以及私人的事业和资源去考虑。这种主张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响，因为哈克卢特的意见未被女王和她身边的顾问们采纳；但是哈克卢特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断地写作、报告、出版、进言。他结识了绝大部分主要的冒险家。他的《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是一部包括了历史研究以及对原始记录加以精心保留和科学编辑的不朽之作。其他的航海国家没有一个拥有这样的著作。对于哈克卢特同时代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对过去成就的记录，也是对新的努力的激励。他的著作弥补了约翰·戴维斯那样的科学的航海家以及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们著作的不足，其中包括优秀的可以直接谒见女王的约翰·迪伊。在哈克卢特之后还有一大批其他小册子的作者，他们中许多人都很有才能和说服力。后来，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诗人和剧作家接着进行宣传。英国有影响的人物、政治家、廷臣、财政家，逐渐地都接受了哈克卢特的思路。没有一个殖民地能比弗吉尼亚和纽芬兰得到更多的“好评”。

年迈的女王死后，从袭击向拓殖的转变加快了。詹姆斯一世于1604年与西班牙媾和，并坚决要求他的臣民维持这种和平——正如雷利从他的损失中觉察到的那样。许多颇有名气的船主十分善于在战争期间进行私掠活动，但在和平时期则不许他们从事海盗活动。相反，在另一方面，政府并不反对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以和平方式开拓居留地。1604年，在伦敦条约的谈判中，詹姆斯宣布他愿意承认西班牙对它已经有效地占领的全部领土享有垄断权，但不承认西班牙对美洲尚未被占领的地区也享有权利。1609年，有效占领的原则，体现在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暂时结束签订的安特卫普和约的一项正式条款中。这个原则成了一项国际法原则，被法学家们明确承认，也得到大部分沿海国家的默认。正如詹姆斯必然希望的那样，1604年的默认包括了从1606年起英国在弗吉尼亚进行的拓殖活动。

英国在美洲所有的殖民地都建立在那样一些地方，那里土著居民稀少，未开化，如果人多则构成威胁，但又过于野蛮而无法作为劳动力来雇佣。16世纪的失败使开拓者得出了教训，即他们迁移的社会团体必须有技术熟练的欧洲人作为劳动力。还必须采取某种方式诱使这些人移居。他们移居的费用，从英国向他们提供的工具、种子和装备都必须由开拓者偿付。无论是风险、责任还是花费，都是个别私人或小型合股所不能胜任的。拓殖活动要想成功，必须是联合股份的冒险事业，在其中，许多人可以投入他们的金钱而不必以身冒险。要成立这样一个既有对土地的合法权利和对移民的统治权威，又有要求海军保护的权力的公司，一份皇家特许证是必不可少的。在1606年、1609年和1612年授予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证，其形式主要应归功于托马斯·斯迈思爵士的毅力和才能，他是伦敦的大商人并成为公司的第一任财务管理人。这些特许证由一般用来授予贸易公司的那类特许证改写而成；它们在国王、为计划筹措费用的城市商人和移民之间建立了最初的、意义深远的协作模式。公司的总管理权委托给全体股东。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股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投资，即购买股票；每股价值12镑10先令，这是安置一位移居者的预算。另一条途径是投入他本人，这也可使他成为股东，即自费携同家眷和仆人移居到弗吉尼亚。一个人相当于一股。在初期共同劳动之后，土地便按投资比例分配给各股东，不管他们是否移居者。移居的股东便成为耕作者或自由农，只向公司交付很少的免役税。最初他们自己组成，后来选举代表组成殖民地会议。在他们下面的社会等级还有合同仆人，亦即

由公司或单个雇主出资移居来的人，他们必须在一定的年限里以劳动偿还，合同期满便有希望成为佃农或自由的持有土地者。

董事们，以及所有投资者，都希望从免役税、从他们本公司从事的贸易以及从对其他商人贸易的征税中抽取其红利。他们发了很多有关营利性农作物的种植法、开矿法和海军补给品贮存办法的指示。这些指示从未得到贯彻。在最初几年，移民们即使在英国的帮助下也难以解决吃、住和防卫问题。在他们到达几个月内就死亡过半。最初，如果不是约翰·史密斯的鼓舞人心的领导能力和他同印第安人的接触，不是那些最早的领导人物的特性（他们是一批老练的纪律严格的军人，靠着野蛮的纪律保证了他们的人去开垦、耕作而不是到森林中去打猎和寻找金矿），也许已经全部死掉了。移民们靠着种植单一的专为销售的作物——烟草，从接近于饥荒的只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挣脱出来。烟草的种植和烤制方法是在向圭亚那航行的途中从西班牙人那里学到的。烟草在弗吉尼亚很容易种植，也很容易卖给荷兰商人，他们再运到欧洲去卖。靠这种方法，于1607年5月在泰德沃特海滨上建立的小镇詹姆斯敦生存并成长壮大起来，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大西洋帝国的发端。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北方奠定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帝国的基础。自从卡托一康布雷奇和约以后，法国在美洲大陆的利益受到了限制，所以毫无成效；但是法国的深海捕鱼者却在班克斯捕鱼业的发展中占了突出的地位，在16世纪后半期来自比斯开港口的人们开始在圣劳伦斯湾和圣劳伦斯河口港湾就已开始从事赢利的捕鱼和捕鲸事业。法国的海员们到岸上找寻木材和水，晾干鱼或提取鲸油时，第一次发现同印第安人以物易物，用工具和小五金器具换取毛皮长袍的贸易可以赚钱。毛皮长袍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衣着，也是他们唯一可供销售的财产。裘皮服装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特别是海狸毛皮，作为一种很耐穿用的厚呢的原料，在北欧是价格昂贵的商品。卡蒂埃于1534年怀着抵达太平洋的希望进行首次勘察的那条大河，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法国人来说，始终没有失去其吸引力。而现在又开始产生了新的经济上的意义。位于萨格奈河与圣劳伦斯河汇合处的塔杜萨克，已成为季节性的毛皮市场所在地，它的前景如此乐观以至于在1588年，国王被说服授予卡蒂埃的两个侄子一项贸易垄断权，以使它们保证建立一个殖民地。这个计划以及后来的一些计划，均未见成效。1598年，拉罗什

在塞布尔岛开拓了一个短命的殖民地；1599年，沙文企图在塔杜萨克建立永久性殖民地，未获成功。加拿大因其严冬、花岗岩、冰冷的湖泊以及阴暗的枞树林，对于拓荒者来说真是片冷漠无情的土地。捕鱼人只在夏季同它打交道。

然而，鱼和毛皮毕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法国人要想把这个地区的渔场和毛皮贸易有效地垄断起来，就必须在那里开拓永久性居留地。亨利四世继位以后，从王室得到首尾一贯的支持的前景有了改善。1605年，一位新的专利权获得者——德·蒙茨在阿卡迪亚湾沿岸即现今的新斯科舍成功地建立了居留地。像弗吉尼亚一样，阿卡迪亚在它最初的年代里也有一位常驻的历史学家，即精力充沛的马克·莱斯卡博，他记录了殖民地开拓的艰苦过程。它逐渐发展为一个由能吃苦耐劳、自给自足的捕鱼人和农夫组成的不大不小的村落。在1610年，它接待了最早的两位到达新法兰西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的到来意义深远。到1613年，这个居留地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因而引起弗吉尼亚公司的妒忌和敌视。它将成为一百多年中争执的关键。

圣劳伦斯河流域是一个大得多的问题。撒母耳·德·尚普兰和被他激励的追随者们对这条大航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它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通向太平洋，而是进入美洲大陆的腹地。尚普兰刚好来自布鲁阿日，它是维持渔业的盐的重要产地。作为海员、绘图学家和科学家，他从不发现一个北方秘鲁的黄金梦。他是17世纪最伟大、经验最丰富的探险家之一，在他的探险生涯中始终得到政府和他的商人赞助者的充分信任。通过他的一位曾在西班牙海军做过领航员的叔父帮助，他于1599—1600年在西属印度群岛旅行达两年之久；他对自己经历的公开报道第一次为他博得皇家的赞赏。从1603年直到1635年去世，他完全投身于探索北美洲的事业。从1604到1607年这三年时间，完全用于对芬迪湾和缅因海岸的细致考察。除此之外，他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圣劳伦斯河流域。他是广泛应用印第安人的独木舟去做内河旅行的第一位欧洲人，这对未来是重要的指示。他最早发现了五大湖，并最早认识到在注入圣劳伦斯河的一条较小的航道——萨格奈河、渥太华河、黎塞留河——上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在1608年，不顾塔托萨克地区的巴斯克人垄断者是否同意，尚普兰在100英里外的上游俯临狭窄河湾的悬崖上建立了魁北克，并利用没人可与他竞争的同印第安人的关系把毛皮贸易集中到了这个新的居留地。魁北克是一个贸易站而

不是殖民地；它的居民不仅从法国运进商品，还运进大部分食品。他们与法国和内地的印第安人的交通联络，全是通过水路。奇怪的是，尚普兰从未意识到这个水上贸易站的战略弱点：哈得孙河谷像一支矛枪直指新法兰西的心脏。根据印第安人的传说，他肯定知道尚普兰湖有一个通向大西洋的出口。建立魁北克之后仅仅一年，即1609年，哈得孙发现了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口。不久，荷兰商人便开始从海边逆流而上开发这条河的贸易。然而，这对新法兰西的威胁还远在未来，长期以来魁北克一直是通往加拿大的要道。

法国在美洲发展的年表，与英国的历程极其相似。这两个国家的行动使人联想到棋盘上或者有意互相模仿或者进行战术对抗的情景。棋子的巨大变化和棋盘的漫无边际的尺寸，直到1610年以后很长时间才完全明朗；但在那时，这场竞赛的总貌还是能够辨认的。虽然并非毫无争议，西班牙人总之是得到了加勒比海和美洲的“腰部”。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英国人在大西洋沿海新建立的小型居留地都已经扎根，并且由于对方在远处的存在而变得心怀忌恨。在安特卫普和约之后获得自由的荷兰人，也在海岸等待抓住有可能进行掠夺或运输的任何机会。在这个棋盘上，堂而皇之的武装对抗持续了200多年。

二 亚洲和非洲

直到16世纪末，除了西属菲律宾群岛外，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能够行使军事和政治权力并从事团体商业活动的欧洲人只有葡萄牙人。在葡萄牙国王保护下工作的官员、军队、移民和商人以及牧师，是欧洲在从东非到中国这片广阔地区的唯一代表。他们的东方帝国印度公司——亚洲舞台上一个确立起来的为人熟知的角色——说明如何在遥远的东方组建欧洲的企业问题第一次得到了解决。存在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诸如：管理问题，即如何在本国和海外建立某种对空前遥远的地方实行有效控制的中介手段；航海、补给和防卫上的各种技术问题；政治问题，即如何处理与亚洲一些具有侵略性的不过常常相互敌对的国家的关系；商业问题，即确保香料贸易垄断权以及在欧洲适合东方市场的产品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购买力以维持贸易的问题；以及把政治、贸易同基督徒义务结合起来的道德问题。那些首创性的解决办法，并非全都一样有效，但都很有趣，有些办法则被其他在亚洲的欧洲强国采用。

向海外扩张的原始动力来自王室，而印度公司在整个16世纪一直保持着皇家企业的性质。^[6]它的主要目的是经商，直接控制亚洲贸易并确保国王作为经纪人的利润。这种以经商为首的动机可能被大谈十字军反对穆斯林以及个人荣耀的编年史家们^[7]或专为教化、激励信徒而写作的传教士们搞得模糊不清了，但印度公司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贸易性企业，而非征服和殖民的工具。

为了管理海外事务，在里斯本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如：印度院，负责海运、外销的货物和销售进口香料；军械处，负责招募船员，提供船长、领航员、航海图以及航海用的仪器和武器；高等上诉法院，任命海外的司法人员，制定海外的司法条例；道德军纪局，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其中最繁忙的机构是印度院，它负责处理由海外运来的全部货物，一一登记，凡属私人物品则进行征税，凡属国王采购的物品则进行贮存以备销售。设在佛兰德的皇家代理店在16世纪前半叶的业务，以及后来增添的向商业辛迪加按合同供货的业务，也都由印度院监督。印度院还负责为开往国外的舰船备办货物，洽谈造船事

宜，监督粮食给养的筹措，保存所有去往东方人员的花名册和全部来往信件的副本。

所有海外部门都由国王的五人枢密院监督和协调，而且，尽管它有许多任务，但在1569年以前一直没有专设印度事务大臣，而且这个职位在1578—1584年间也空缺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机构运转发生故障。在1580年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王国的合并更加剧了复杂性。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许诺尊重葡萄牙及其公司企业的独立身份和权益，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所有海外部门的日常业务，统由新设的葡萄牙财政委员会、驻里斯本的葡萄牙总督和位于巴利亚多利德的葡萄牙议会中的印度事务大臣三方审查，然后呈送日理万机的国王。如果说印度公司因为国王直接关注而受益，它也因为相互掣肘的、常常是相互对立的上司过多而受损；它总是人员不足，永远陷于琐碎事务中。在这种管理体制中必然存在犹豫不决和拖沓耽延。

随着其胡椒、香料和其他东方商品赖以销售的市场体系的崩溃，印度院的负担更重了。这些商品曾是每年两次运往安特卫普的皇家代理店，在那里销售给主要来自德意志南部的商业辛迪加，从而在欧洲各地分销。这种体制一度运转良好；葡萄牙人能够半垄断胡椒和香料，而赫希斯泰特尔家族、韦尔瑟家族、曼利希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则可以供应德意志的白银和匈牙利的铜，这都是印度和非洲贸易所需要的。安特卫普作为国际商品和货币市场而日益发展，曾经进一步促进了业务的开展。但是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对亚洲胡椒贸易的控制被大大削弱了，而在欧洲，法国人对葡萄牙人开往安特卫普的船只的攻击，迫使国王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外国的、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船只。与此同时，作为白银供应者的南部德意志人也受到美洲白银货流的冲击，他们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也受到荷兰人日益增长的通过松德海峡的海运贸易的挑战，而他们的国内市场又因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横遭破坏。1548年，葡萄牙人在安特卫普的代理店关闭，有利可图的转运贸易被放弃，北方市场的卖主只得在里斯本直接从印度院采购。尼德兰对帝国财政要求的抵制愈来愈强，1557年西班牙政府破产以及德意志南方失败的连锁反应，继之以葡萄牙于1569年宣告停止支付然后是尼德兰的起义，对斯海尔德河的封锁和安特卫普被洗劫，所有这些都使再想恢复以安特卫普为基础的那种贸易方式已经不可能了。

退出北欧意味着国王失去了一份收益，但更严重的是黎凡特的胡椒和香料贸易的复兴。它在16世纪40年代就很明显了，而到50年代已构成了威胁。土耳其人的势力在1538年进入亚丁，1546年进入巴士拉，从而打开了通向印度洋的通道；奥斯曼帝国因1539年与法国的同盟以及于1540年与威尼斯媾和而重新打通了南欧之路。此后，古老的黎凡特地区与亚洲的贸易迅速复兴。富格尔家族把他们的黄铜出口转向威尼斯，到1558年他们不再在里斯本购买香料，而在亚历山大港购买香料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同一时期，威尼斯驻阿勒颇领事把从巴士拉到阿勒颇的由商队进行的香料转运描绘成“我们的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到16世纪60年代晚期，荷兰和英国的观察家们估计，欧洲的胡椒约有一半是经黎凡特航路运抵的。由于欧洲消费量的增长和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香料价格不可能大幅度下降，但葡萄牙人利润的削减仍然是惨重的。大型商业辛迪加的投机生意进一步影响了里斯本市场，到1569年国王在安特卫普宣告停止支付。1570年，国王塞巴斯蒂安被迫进行果断的变革，放弃了王室对胡椒和其他香料贸易的垄断。这时，他的所有臣民都可以经营这些货物，并把马拉巴尔诸港口向采购者开放。要他们承担的唯一义务是：必须把全部香料运往里斯本，并在那里向印度院缴纳税金。

这个措施等于承认：保卫北非以反对穆斯林、保卫西非以反对欧洲人并忙于开发巴西的负担使国王无力经营里斯本与果阿之间的全部贸易。黎凡特贸易的复兴同样表明：葡萄牙的力量在亚洲已过度紧张了。因为忙于应付当地人对马六甲海峡和摩鹿加群岛的猛烈攻击，再加上由于开辟了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而进一步扩张，使得印度公司的海军舰队不能再定期扫荡红海和波斯湾里土耳其人的桨帆并用舰，也不能再封锁商人们在东南亚开辟的新的香料贸易线。此外，1557年国王约翰三世死后，在11年的摄政期内削弱了王室对东方官员的控制，从而敞开了纵容胡椒和香料走私的漏洞。正如威尼斯领事所解释的那样，运到开罗的香料“都是经葡萄牙士兵放行的，他们在红海控制着印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听国王的命令，因为他们要想在那个地区谋条生路，只能靠出卖肉桂、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生姜、胡椒和其他药材”。1569年，国王塞巴斯蒂安对印度公司的行政管理进行的改组，1580年后腓力二世的进一步强化，部分地挽回了在印度的局面；同时，阿拉伯半岛和也门反抗奥斯曼的起义，1570年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重开战端以及谢里姆二世死后土耳其出现的混乱都更加严

重地破坏了黎凡特商道。即使这样，在这个世纪结束以前仍有相当数量的香料继续运抵黎凡特。

1570年取消对香料贸易的限制，并未导致葡萄牙私人企业的增长。由于驱赶犹太人，本国的商人阶层被削弱了，他们无力从国王手里接管贸易，特别是因为国王还保有白银和铜的出口垄断权。因此，从1575年起，国王被迫不得不在印度和欧洲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把香料的采购和海运以及在欧洲的分销都承包了出去。第一个印度合同一年提供30000公担胡椒的货源，承包人投资并由印度院为他所运到的货物付款。第一个欧洲合同，希望在其意大利领地上建立商业中心的腓力二世、托斯卡纳大公以及德意志南部集团老主顾都想签订；塞巴斯蒂安委托给政治上无害的德国的康拉德·罗特，他同意在里斯本一年购买20000公担，并为塞巴斯蒂安在北非的冒险活动提供大批直接贷款，可以用胡椒偿还。

几乎没有几份合同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罗特因为黎凡特货源的短缺而在1578年企图把印度合同纳入他的欧洲合同，从而实现对胡椒的囤积居奇。他想与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塔斯合伙，使莱比锡成为胡椒的北方销售中心，但这个目标正值英国和荷兰都在北欧海路上进行劫掠的时候，它过于庞大，到1580年罗特破产了。当时腓力二世已是葡萄牙国王，他再次想把胡椒市场由敌对的北方转移到意大利。他建议以优惠价格向威尼斯提供葡萄牙的胡椒，结果遭到拒绝，又想卖给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结果都是徒劳。因此，从1591年起，印度合同落入意大利人和在西班牙的富格尔家族之手，而欧洲合同落入洛威拉斯卡（Rovelasca）、韦尔瑟家族、富格尔家族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伙之手。无论印度合同还是欧洲合同，对参与者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由于亚齐人对马六甲的攻击和1592年英国掠夺富饶的马德雷德迪奥斯，使得印度海运一年预定30000公担的数额只完成了一半。在欧洲，与英国和荷兰的贸易于1585年被禁止，后又发生了无敌舰队的覆灭，1596年加的斯港受到攻击和1598年塔古斯河被封锁。大约从1590年起，由于黎凡特贸易迅速复兴，即使在荷兰人和英国人尚未先后绕过好望角去往东方之前，葡萄牙与亚洲的贸易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葡萄牙国王把管理果阿与里斯本之间的贸易以及里斯本与欧洲市场之间的贸易夺回手中的努力失败了。他被排挤出去往北欧的转运贸

易。他企图摆脱富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和他们同伙的控制也未能成功。他甚至未能阻止外国人进入印度：总督和他的官员们由于授予印度承包人以优先权而承担着一一种不得人心的责任，这些承包人的代理人、萨塞蒂、科龙等人都在果阿和胡椒港口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葡萄牙在保护其印度贸易船的大西洋航线不受英国、法国和荷兰私掠船队攻击这方面，也存在很大困难。在亚洲，靠军队维持胡椒贸易的收益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国王在那里能够动用的军队——护航舰队、要塞驻军、军事远征队——从来就规模不大。北非和西非、巴西和西班牙的战争机器的需要以及在亚洲出现的主要威胁都成为人口不多的葡萄牙的沉重压力。看来，继它在西方的衰落之后在东方的衰落也在所难免。

假如印度公司的生存要依赖与欧洲的贸易和本国所能提供的军队，那么它的衰落就肯定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里斯本与果阿之间的物质联系已衰弱到极点。一切运往印度公司的人员、钱财和货物，都要塞进4艘、5艘或者6艘船只组成的一年一次的船队里：在16世纪50年代每年约为5000吨，在16世纪结束的这一年最多增长到10000吨。大约有3000人可以随同一位新的总督上船——他的亲属、仆从和奴隶，还有上任就职的贵族、牧师、商人和士兵——在其他年份还要少些。但在这些人当中平均只有2/3能够平安抵达印度——或许到这个世纪末更少一些。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装货容积和利润，船体愈来愈大和愈来愈难以操纵，而改装时又马虎了事，这些使沉没船只的数量愈来愈多。国王无力预付资金也使得许多已经应该报废的舰船仍在航行。即使舰船平安抵达果阿，人员的损失也是骇人听闻的，因为许多士兵本来就来自里斯本的贫民窟，浑身是病，挤满船舱，船上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都十分缺乏。每三年总有一大批贵族携带家属和奴隶离去回国，^[8]他们作为船长、经纪人等等的任期已经届满，因此本国出生的葡萄牙人每年在印度公司增添的总人数确实非常有限。

据估计，在任何一段时期，在印度公司辖区内的为军队服务的本国出生的葡萄牙人从未超过6000或7000人。在一些主要的要塞——莫桑比克、霍尔木兹、第乌或马六甲的驻军，只有几百兵员；在企图征服锡兰时，用了一支不到1000名葡萄牙士兵的军队，差一点取得成功。但是，除了这少数葡萄牙人之外，还必须加上在他们自己首领麾下参战的当地雇佣军；还有托帕斯（Topazes），即土生的欧亚混血基

督徒；也有大批私家奴隶，其中有非洲人、马来亚人和日本人；参战的还有亚洲盟军，如科钦或蒂多雷；最后还包括卡萨道（Casados），即结了婚的葡萄牙移民，他们随时可应召参加当地防卫。这些卡萨道被国王分配给村庄居住，条件是以自费供养的战马和滑膛枪手应召服役。有这样一支混合的当地军队，以葡萄牙士兵为中坚，印度公司在这个时期不但站住了脚而且在一些地方扩大了它的领地。

作为沿海和岛屿的企业，印度公司的防卫最终要靠葡萄牙的海上兵力。但这支兵力也是很有限的并且从未圆满完成其复杂的任务。因此，当它在西方对付奥斯曼的威胁时马六甲就被危险地暴露在亚齐人的攻击之下，而当它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时，奥斯曼又悄悄地洗劫了马斯喀特。但在整个16世纪，除了丧失摩鹿加以外，葡萄牙人在亚洲海域避免了任何永久性的败绩，他们为其大帆船和沿海船队保持了畅通的海路。这个成就并不是靠来自葡萄牙的舰队，而是靠在亚洲建造或购买的船只取得的，因为大帆船只是偶尔出航到东方水域服役。在果阿皇家造船厂，采用卡纳拉的柚木，伯塞恩的桅杆和圆材，马尔代夫群岛的椰皮纤维，古吉拉特的帆布建造了大批的大帆船。在1555年由12艘舰船编成的果阿中队毁于大火之后，总督巴雷托在他任职的三年内能够用在印度建造的舰船将其全部替换。但是，除了远距离的直属王室的航行，诸如驶往莫桑比克、摩鹿加和中国以外，从不使用大帆船，而用多桅快帆船、带桨快帆船和轻便船只。这些船只和用来护航并保卫沿海的带桨帆船一样，也是在印度建造的。不仅船在当地建造，船员也在当地配备，无论海军舰队还是商船队，其船员的主要部分都是由阿拉伯人、马来亚人、爪哇人和日本人以及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渔民组成。正如林索登评论商船船队那样，他发现只有船长和领航员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控制着亚洲的主要航路并且占据了陆上的关键据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人驾驭并指引着亚洲人的工具、技艺和精神。正如英国利用印度士兵征服印度帝国一样，葡萄牙也是利用阿拉伯水手、非洲奴隶和欧亚混血的基督徒来保卫印度公司的生存。

作为军事和政治机构的印度公司在16世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自治。与葡萄牙本土的海上联系非常脆弱，而对像摩鹿加这样一些地区的官员能够实行的控制显然极为微弱，因为从果阿到那里需要一年半时间，而从里斯本到那里则需要两年半时间。从财政角度看，也

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度公司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果阿与里斯本之间的胡椒和香料贸易，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满足了欧洲消费量的一半甚至还要多些，但国王得到的利润却很难给在亚洲企业工作的欧洲人提供费用。官员、士兵和教士的薪金，维持护卫舰队和防御工事的费用，对在亚洲传教事业的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当地的岁入和利润中提取。部分税收是土地税，例如卡萨道缴纳的封地租金，还有从寺院土地征收的土地税，它转而支付给牧师们。但比这些远为重要的是关税收入，到这个世纪末，关税几乎占印度公司正常税收的2/3。因为贸易要往来于狭窄的航道，[\[9\]](#)所以占有少数战略据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亚洲各港口之间的贸易。另外，通往霍尔木兹、果阿或马六甲这些传统的货物集散地的正常贸易往来，由于强行对亚洲人的船舶实行卡尔塔斯（Cartaz）制，亦即安全通行证制而有所加强。安全通行证必须在葡萄牙代理店取得，而且必须注明停泊的港口，这样就把贸易控制在葡萄牙海关官员手中。因为有特遣舰队游弋于东非海岸以及通往波斯湾、印度西部和马六甲海峡的通路，迫使大部分来往于西亚的海上贸易不得不或者以向印度公司缴纳关税的形式，或者以向葡萄牙官员行贿的方式缴纳通行费。

除了这些正常税收以外，还必须加上官员们以国王的名义从事贸易的利润，以及专为印度公司从事贸易的利润。这样，在东非的象牙贸易中就有一份扣在了莫桑比克监理的手中，阿拉伯的马匹贸易为霍尔木兹监理职务提供了报酬的主要部分，而在1587年，则把古吉拉特的靛蓝贸易权授给了建造印度贸易船的承包人。还有某些航行的收入，如每年去往摩鹿加的丁香船、去往班达的肉豆蔻船、或者获利甚丰的中国之行的收入，都可能或者分配给公家的专项目的，如装备一支舰队或一个城市的防御工事，或者赠给某个宠幸的官员，或者甚至公开出售。

还有一种十分活跃的私人手中的港口间贸易，由葡萄牙官员和定居者们单独经营，或与亚洲商人合伙经营。支撑着印度公司的大部分财富，就产生于这种与海上掠夺和滥用职权混杂在一起的商业过程中。从东非到中国到处都可以发现葡萄牙商业冒险家的小团伙，有时从葡萄牙国土内操纵市场，但常常在正规拓居地的范围之外建立起来，如在沿赞比西河逆流而上的地方，在阿比西尼亚，在东部印度沿海的内加帕坦、圣托梅（San Thomé）和胡格利，在沙廉或大城，在印

度尼西亚各个港口和中国沿海地区。有组织的官方贸易的努力到处都遇到个人的小型企业与之匹敌，他们有的是商人，也有领航员和船长，从阿拉伯海到中国海一系列贸易地区都靠他们来沟通。

这些地区中首要的是连接着东非与红海、波斯湾和印度西部的地区。葡萄牙的影响早已在从索法拉到马林迪的阿拉伯和阿拉伯—非洲沿线岛屿上的居民点上确立起来；多亏了他们城邦之间的争夺，葡萄牙海军对东非海域的控制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遇到挑战。莫桑比克是葡萄牙人最重要的拓居地，通过莫桑比克海峡驶向印度的大帆船就把这里作为补给基地，还把他们中间患有坏血病的船员和客商送到这里就医或埋葬，而返航回国的船队没有绕过好望角时也在这里避风。这里还是琥珀、乌木、奴隶、象牙和黄金的活跃的贸易基地。其中最有魅力的首推黄金。葡萄牙人发现在索法拉的阿拉伯人在从事来自马尼卡地区的砂金贸易，他们开始排挤这些中间人并在沿赞比西河上溯200英里的塞纳和帕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前哨站，由挑夫组成的商队每年都到那里的莫诺莫塔帕帝国或马绍纳兰部落联盟的黄金市场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用念球和棉花换取黄金。在1583年，林索登估计，每年搜集到的黄金量是9吨。象牙贸易也很重要，主要是运往古吉拉特。从1559年起，莫桑比克的监理获准每年从中分得多达100条的长牙。^[10]最后，在莫桑比克和赢利较小的蒙巴萨的北方集市，有经常性的奴隶贸易，在好年景买个儿童只要几个先令，而在坏年景用很少量的稻米就行。买进的奴隶被运到印度再卖给殖民者和贵族，还有许多被送往马六甲和中国的澳门，有效地增强了那里的殖民地的战斗力。在果阿和莫桑比克之间，春季从果阿运走棉花、丝绸、某些种香料、小麦和稻米，而在秋季运回黄金、象牙、奴隶、乌木、蜜蜡和龙涎香；无论是官方贸易还是私人贸易，在16世纪末其重要性都在稳步增长。

官方禁止葡萄牙人从事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的红海贸易，而且有一支游弋的舰队以防止亚洲船只向那个地区偷运胡椒和香料。但是，走私却使官方的控制毫无办法，而且葡萄牙的个人也在这种贸易活动中得利，他们或是通过亚洲合伙人发送货物，要不然就默许违法行为从而索取贿赂。从红海运出精细的羊毛织品和丝绸、黄金和白银硬币、大受欢迎的阿比西尼亚奴隶，进入红海的有印度棉织品、靛蓝、香料和药材，还有许多到麦加朝圣的香客。

在南阿拉伯半岛，从盟友基申（Kishin）到葡萄牙人设在马斯喀特的代理店，提供马匹、驼毛衣料、糖和小粒珍珠，而从波斯湾的咽喉要地——霍尔木兹，除了运出大体相同的商品外还有染料、波斯丝绸和地毯。在葡萄牙人的所有殖民地中，霍尔木兹是最能赚钱的一个。在16世纪80年代，林索登描绘它是“所有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商品的集散地……而且那里通常住满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各国人；还有威尼斯人，他们为了购买从印度大量运到这里的香料和宝石长住此地”。

在印度本土出现了一些新的居留地，如北部的达曼和马拉巴地区的门格洛尔，但整个贸易方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1572年，莫卧儿大帝阿克巴征服了古吉拉特，给葡萄牙殖民地造成新的军事威胁，但其所建立的统一与秩序，以及把古吉拉特和马尔瓦与莫卧儿的中心地区——朱木拿河和恒河流域联系起来而对贸易的促进却是很有价值的补偿。再往南部，当德干高原的穆斯林苏丹于1565年推翻印度人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时，葡萄牙人的贸易无疑遭到暂时挫折，因为维查耶那加尔每年要通过果阿输入多达1500匹的阿拉伯战马。它还购买大宗的黄铜、水银、朱砂、珊瑚和其他欧洲产的奢侈品，以及香料檀香木和中国丝绸，反过来，也为霍尔木兹的贸易乃至欧洲的贸易提供印染精美的棉布。到16世纪末，穆斯林的比贾布尔和戈尔孔达已经部分取代维查耶那加尔成为买主，但或许尚未完全取代。^[11]在马拉巴的胡椒和生姜产地，葡萄牙人可能也失势了，这是因为葡萄牙监理们的暴行导致了一连串持久的战争，把绝大多数沿海统治者都卷入了这一方或那一方，激起了一股至少持续到1599年的攻击葡萄牙人沿海船运的浪潮。从1575年开始，印度合同商每年从马拉巴得到的胡椒，比正常情况下30000公担的一半多不了多少，至少部分可归因于这些政治动乱。但总的来说，印度西部的贸易是否就此衰落，似乎尚难断言，据当时的观察家们描述，直到16世纪末，果阿一直处于繁荣的黄金时代。

环绕孟加拉湾出现了一些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有些是正式组建起来的，有些则是海盗的隐蔽藏身之地，但全都不在印度公司的直接管辖之内。在最南方，内加帕坦的地位继维查耶那加尔衰落之后也大大下降，但现代马德拉斯附近的圣托梅却成为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德林达依之间商业往来的一个活跃的贸易中心，并以其精美的印花棉布著称。其他一些居留地建立在奥里萨这一盛产稻米的地区，科罗

曼德尔海岸的粮食就由这里供给；而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孟加拉在恒河上的主要港口——胡格利，从1580年以后，就被葡萄牙人占领了一大片。这里也有大宗的食品贸易，如稻米、食糖、黄油和食油，还有达卡地区的薄纱织物贸易和来自恒河下游的丝绸贸易。在东部的吉大港和若开则是奴隶贸易，这些奴隶都是偷袭东孟加拉俘获的。在这里和在缅甸南部的葡萄牙人，正如林索登描述的那样，既无政府也无警察，“以野人一般的方式……”生活着。

在这一连串海盗据点以东，政府在马六甲重申了它的主权，这是在亚洲主要交通要道之一建立的巨大堡垒和商业中心。政府的目的是保卫和控制印度洋与中国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因为在这里没有内陆商业，食品供应全靠海运并靠关税生活。虽然马六甲总是受到在柔佛的马来亚统治者以及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苏丹的敌视并受到二者在经济上的竞争，但它的自然条件保证了它在商业中的生存能力。运往这里的有来自欧洲和黎凡特的奢侈品、印度西部的鸦片、古吉拉特的素白布和花布、科罗曼德尔的印染布和孟加拉的粮食、马来亚的锡、东苏门答腊和西爪哇万丹的胡椒、中爪哇和东爪哇的稻米、帝汶岛和索洛群岛的檀香木、班达地区的肉豆蔻和干皮、安汶和德那地的丁香、婆罗洲的黄金和樟脑以及从所有经销中国货的印度尼西亚港口集中来的中国货，所有这些使其保持着最复杂的中介港的贸易结构。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经常受到亚齐、柔佛和北爪哇的贾帕拉的猛烈攻击，在半个世纪里共有10次或12次之多。也有人以不懈的努力来瓦解其贸易。当柔佛同印度的联系中断以后，马来亚的统治者试图用武力夺取与东苏门答腊胡椒港口以及与班达、婆罗洲的贸易。同样，作为马六甲海峡以外的穆斯林势力的亚齐人在西苏门答腊开辟了胡椒种植场，并开辟了沿那条海岸经巽他海峡到香料群岛的航线，从而巧妙地挫败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与此同时，亚齐与贾帕拉建立了联系，它的女王曾两次攻击马六甲，并且对穆斯林班达和安汶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据威尼斯人报道，在16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有多达50艘的亚齐人的舰船装运着胡椒和香料直驶红海；由此可以表明，亚齐人给葡萄牙人的垄断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

但是，在马六甲、亚齐和柔佛之间的争夺形成了真正的鼎足之争，亚齐人与柔佛和东苏门答腊的马来亚人之间诉诸武力的争夺，对于此三强来说，比他们同葡萄牙人的敌对还重要得多。在这个世纪最

后几十年，首先是马来统治者，其后是亚齐的苏丹都曾谋求与葡萄牙人结成军事同盟。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同样使马六甲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没有遭到任何毁坏。如果柔佛降价来和马六甲抢生意，葡萄牙官员们就会聚集在这里低价收购。即使贾帕拉作为香料贸易地要抵制葡萄牙人对班达和安汶的攻击，它自己作为中爪哇稻米的出口口岸对马六甲所提供的巨大粮食市场又有着强烈的兴趣。葡萄牙官方贸易出于政治原因倾向于兴都东爪哇（Hindu eastern Java），而葡萄牙人私下却与穆斯林中爪哇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万丹作为头号穆斯林之邦有可能支持穆斯林在香料群岛的抵制，但从1560年到1573年却签订合同：每年为果阿总督派来的船只提供10000公担胡椒。由于亚洲敌国间的争夺，以及东南亚各个贸易中心之间在商业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在马六甲的为数不多的葡萄牙人能保住自己的权益。尽管战争以及马六甲官员的敲诈勒索、滥施权力，但从关税收益看，港口贸易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仍在增长。

然而，这种增长掩盖了葡萄牙人好运道的根本变化。马六甲原本是葡萄牙人的基地，他们从这里可向班达群岛、安汶和摩鹿加群岛这些上等香料的产地进发。在那里，他们曾利用当地的争夺，靠在安汶岛和德那地设防的基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这样，虽然由于香料生产随着欧洲人购买量的增加而广为分散，并由于在那片岛屿的世界里无法摧毁土著人的贸易，因而葡萄牙人从未取得过垄断权；但是，在用棉花、稻米换取丁香、肉豆蔻的贸易中，葡萄牙人毕竟一度取得了统治地位。

然而，德那地和安汶岛对葡萄牙人来说可算是海角天涯，从马六甲到那里需要一次季节风，而从果阿到那里需要两次季节风，这使得总督对葡萄牙的那些监理、代理店和贵族的控制总是显得极其微弱无力。王室每年两次贩运丁香和肉豆蔻的航行，其结果是给王室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少，而给王室官吏们带来的收益却越来越多。因此，从1535年开始允许私人个体贩运，但仅限于丁香，条件是要把1/3的货物按固定价格卖给政府。私人对种植者的即时偿付多于王室的代理店，因而确保自己得到作物中最好的部分，把碎屑废物留给了王室。王室则以强迫的方式收购丁香，命令岛民进贡，而且在纳贡前必须把所有的丁香清理干净。但王室的困难还不止于此，因为在香料帆船抵达马六甲并把丁香换船转运时属于王室的1/3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挪用侵吞

了，因此从1562年以后不得不严禁在马六甲换船转运。即使如此，王室的收益仍很有限，因为负责航运的贵族和在王室船中载有货物的或者与之同行的私商们都要在实际利润中捞一把。

这样一来，印度公司既没有能够维持住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也未能保住王室投资管理香料群岛和筹办每年香料航运所应得到的收益。但其控制不力的后果远不止此，更具有灾难性的是，由于这一地区地方官员的劣迹和暴政，以及传教士的褊狭，导致了1556年以后以穆斯林岛民为主的反抗葡萄牙人的浪潮，在德那地、安汶和班达的葡萄牙人要塞相继失守；只是由于蒂多雷和德那地之间的争斗，再加上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帮助，才使葡萄牙人在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船舶和钱财后保住了香料群岛的据点。贸易并未中断，因为葡萄牙人提供的货物需求量很大，而且还有很多中介人，通过他们可以进行采购。尽管如此，要不是葡萄牙人在这个时期开辟了同中国和日本的经常性贸易，香料贸易所面临的动乱一定会使马六甲的商业遭到破坏，并且可能削弱它的军事力量。

在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南部，并在广州享有经常性贸易达七年之久。后来，由于不懂明朝用来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的进贡制度，再加上葡萄牙监理在广州使用强暴手段，导致明朝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严禁葡萄牙人同中国进行贸易。因此，从1521年起，葡萄牙人的贸易便成为在中国沿海岛屿进行走私和海盗兼有的活动了。正是在这些地方，葡萄牙人结识了日本人。他们在16世纪40年代以前接触的日本人是得到宽宥向明朝进贡的使团成员，后来则是与他们结成同伙的海盗，就这样他们又打开了通往日本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葡萄牙同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都掌握在个人手中，虽不是正式贸易但有时获利甚丰。在同中国或日本能够建立固定的贸易关系以前，必须在马六甲之外再建立某种较适宜的永久性基地。葡萄牙人最终在澳门建立起这样的基地。在广州的中国官员选定了这个半岛作为海关，这可使外国人远离广州。从16世纪40年代起，葡萄牙人就在这里秘密从事贸易；1554年，或许是作为在珠江近海帮助抵御海盗的回报，中国当局准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永久性定居点。葡萄牙人在这里以及福建和镇江从事的贸易，开始时只是他们在马六甲、暹罗、爪哇岛和中国沿海同中国商人进行的贸易往来的扩展。这些贸易包括很少一些欧洲货物，如毛织品、金丝线和珊瑚，还

有印度棉花和鸦片、非洲象牙和乌木、苏门答腊胡椒和摩鹿加香料以及帝汶的檀香木。葡萄牙人买回的货物有：丝和丝织品、瓷器和漆品、大黄、麝香、铜和金——所有这些都是亚洲转口贸易中的大宗商品，现在也是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但是，由于从澳门向日本的经常性贸易的开展，这种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16世纪40年代起，由于日本的暴力行为，明朝中断了日本同中国的正式贸易往来。结果导致走私活动猖獗，继而变成海盗行径。海盗从1545年起便大规模入侵中国沿海，最终洗劫了像南京这样一些重要的城市。中日正式贸易的断绝，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充当中间人以极好的机会。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利用可进入广州这个巨大市场的便利条件，同日本最西部岛屿九州的大名^[12]建立了有利的贸易往来。已经致力于自己封地内经济的发展的大名，很欢迎葡萄牙人，于是葡萄牙人在大名管辖下的长崎建立了极好的据点。从这年起，澳门与长崎之间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往来。

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日本的白银，是构成这种贸易基础的两种主要货源。在中国，白银按与黄金的比价计算，其价值是在日本或欧洲的两倍；由于中国对白银的渴求似乎不可遏止，葡萄牙人作为金银的中介商获益匪浅。有助于葡萄牙人获利的原因是：日本银矿的开采和冶炼在这个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个原因是：1545年发现波托西以后西班牙的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到16世纪末，每年从里斯本运往中国的白银价值大约20万克鲁赛多（Cruzado），相当于葡萄牙人对欧洲胡椒的全部投资，还有每年从日本运来的价值10万克鲁赛多的白银以及经菲律宾运来的数量虽然不稳定但相当可观的美洲白银。这些白银用来在广州买进生丝或丝织品运往日本，运往亚洲其他地区进行转口贸易，还运往欧洲和西班牙美洲。中国还供应黄金，它在本国脱手有利可图，如若运到印度转卖得利更高，因为在印度，金银比价比在日本更为有利。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货源外，还有一些特有商品，如麝香、大黄、瓷器和漆器，从日本输出的彩色屏风、兵器和铜。大约到1560年，明朝对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的禁令放宽了，中国的商船主又恢复了他们的海外贸易，同时由于日本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得到统一从而出现了建立一支日本商船队伍的审慎的努力，使澳门的繁荣仍旧持续到这个世纪末。虽然葡萄牙商人未能在澳门、马六甲、印度和霍尔木兹垄断贸易，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富商、与日本西部

大名以及秀吉将军、与爪哇统治者、与印度科罗曼德尔和古吉拉特的商人结成同盟，从而为葡萄牙贸易的更大繁荣提供了基础，作为一个商业组织的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末那样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亚洲市场这种互相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单与葡萄牙联系起来的“国家”贸易的增长，使印度公司获得了自发的活力，它补偿了国王约翰三世死后葡萄牙对资助的削减。通过贸易获得的财富，常常被贵族们的暴行、鲁莽、傲慢和妒忌所消耗掉，如在马拉巴沿海和摩鹿加发生的那些战争所揭示的那样；但在16世纪下半叶，印度公司的防御能力甚至其继续进攻的能力都得到明显的证实。例如，这个时期在东非沿赞比西河上溯所发生的那次即使无效仍堪称重大的战役。又如1585年土耳其酋长米尔·阿里·贝伊利用阿拉伯人对葡萄牙监理压迫的不满情绪，激发了基卢瓦以北酋长们的叛乱，一支果阿远征队劫掠了法札（Faza）和蒙巴萨，迅速地压服了沿海地区。当米尔·阿里在1588年带着增援部队再一次出现时，从果阿开来的由20艘帆船组成的第二支舰队把他的部队围在蒙巴萨，在那里他们被津巴人（一群吃人生番）吞噬一光。其后，酋长们残酷无情地接踵而至，但在蒙巴萨的耶稣堡——一座宏伟的意大利风格的军事建筑的典范，保护了远征队在那里的生存。[\[13\]](#)

再往东方，虽然奥斯曼人沿红海推进，直达波斯湾顶部的巴士拉，劫掠马斯喀特，夺取巴林，围攻霍尔木兹，但葡萄牙人给以还击，接连三次摧毁了奥斯曼人的舰队，并在红海发起进攻，再次扫清了他们的海上航线。在印度，半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的权力在第乌得到了巩固，并扩展到达曼，实现了他们对坎贝湾的道路以及古吉拉特赢利丰厚的贸易的控制。在古吉拉特的苏丹领地四分五裂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想把苏拉特作为庞大的战利品夺取到手。虽然由于莫卧儿人的进军捷足先登，但他们仍能保住达曼以对抗这个新兴强邻的所有威胁。更加令人难忘的是，焦尔和果阿在唐·路易斯·德·阿泰德总督指挥下取得的成功的防御战，它延续了10个月，抵御了得到卡利库特王国海军部队帮助的比贾布尔和戈尔孔达的苏丹们的大规模联合进攻。与此同时，在马六甲也打垮了亚齐统治者的进攻，因此可以认为：1570—1571年是葡萄牙人的东方军事编年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

在这个世纪最后的几十年，葡萄牙人还进行了一项新的重大征服活动——征服锡兰。他们与锡兰的贸易往来是一个长期的例外，即由设在科伦坡的不设防的代理店来从事。但是，由于低地的科特王国三个王子之间兄弟相争，导致葡萄牙人以雇佣军食品供应商的身份闯了进来。到16世纪中，葡萄牙人在与王子达马帕拉的联盟中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方。这位王子在1557年改宗基督教，从而失去了僧伽罗人的同情和支持。这时葡萄牙人在政治上的冒险活动已被证明是格外地不成功，因为对立的王子玛亚杜恩和他的儿子拉贾辛哈很快就征服了所有低地，直抵科伦坡城下。在1582年，拉贾辛哈把他的权力扩大到高地的康提王国，并在1587—1588年以一次合围把科伦坡逼到了绝路上。葡萄牙人的对策是推出一个宣称有权享有康提王位的竞争对手，从而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直到1593年死亡结束了拉贾辛哈的事业。其后，葡萄牙人便以达马帕拉的名义迅速收复了低地王国，这是他们的盟友于1580年将它遗赠给葡萄牙国王的。1591年，葡萄牙人又把他们自己的提名者安插在贾夫纳——锡兰北部的泰米尔人王国。只剩康提有待控制。1594年，征服锡兰的第一任总监在得到从印度来的生力军以后，带领军队北上进入康提，并有真正康提家系的末代国王的女儿伴随。他们很快就夺取了首都，并立公主为王。在七年时间里，果阿总督一直在策划把这个幅员为葡萄牙的一半大的国家——锡兰的三个王国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大部分地区由印度公司的地方军驻守。

但是，没过几个月，总监就与僧伽罗人民及其军队反目为仇；1594年10月6日他的军队在丹丘被消灭。于是，整个岛屿揭竿而起，一场低地的葡萄牙人与康提统治者之间持续50年之久的战争由此开始，双方都耗尽了土地和资源，最后得利的是荷兰人。不过，到这个世纪末，唐·哲罗尼莫·德·阿兹维达恢复了局势并且再次残酷压榨康提，同时，葡萄牙人把村庄当作封地加以分配，并开发了肉桂、槟榔、大象和宝石等有价值的贸易。如果说征服锡兰的企图是不明智的，那么为取得最后胜利进行斗争的这种顽强性，仍然是印度公司惊人活力的标志。

在锡兰以外更远的地区，在私人企业而不是在国有企业方面，葡萄牙人的冒险精神得到发扬。在印度东海岸的居留地，葡萄牙商人的业务与果阿的管理联系十分松弛。在吉大港和若开，葡萄牙人公开以海盗的面目出现，主要是贩卖从恒河三角洲掳掠的奴隶，同时，作为

强大舰队的船长们，他们还威胁着若开王国的独立。葡萄牙冒险者和雇佣兵也常出没于缅甸和暹罗，最出名的一位名叫腓力·德·布里托，他受若开人的雇用，从因为战争精疲力竭的勃固王国手中夺走了沙廉，并成为沙廉的统治者。不久，他便不再效忠于若开人，自己单独统治了沙廉达14年之久，甚至还娶了为首的孟人酋长的女儿为妻。他的权力可以说是相当稳固的，因而在17世纪早期，果阿当局便在沙廉建立了海关。

在马六甲东面，葡萄牙人的命运在16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剧烈的波折。在这个远及望加锡和摩鹿加的岛屿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许多个人靠做商人和小船长谋生。^[14]但是，由于派往摩鹿加的官员的贪婪和粗暴惩罚，不时在葡萄牙人中或针对他们的土著盟友发生暴力事件，导致在60年代爆发了当地人普遍的叛乱。巴布·乌拉——被杀害的德那地统治者的儿子——与爪哇、苏禄和棉兰老诸岛的穆斯林结成同盟，围攻葡萄牙驻军并最终把他们从德那地驱赶了出去。来自扎巴拉和格里西（Grisee，一个大型的穆斯林教育中心）的压力也使葡萄牙人从希图岛上的安汶堡中被驱赶出去，与改宗的基督教徒一起在莱替莫（Leitimor）半岛上避难。只是由于蒂多雷和德那地之间的敌对行动，加上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帮助，葡萄牙人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在摩鹿加保留了一个据点。也许，从果阿这么远的地方能够挽救下任何东西就是非凡之举。葡萄牙人仍能继续在澳门和长崎站住脚这也确实是非凡的。

16世纪下半叶，果阿以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传教活动，而这要耗费印度公司的人力和资源，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印度公司的军事和商业成就必然显得更加非凡。从15世纪以后，历任教皇都承认葡萄牙国王在其海外帝国的教会管理和传播福音事务中有权授予圣职。在1534年，葡萄牙在亚洲活动范围的扩大因果阿被升格为主教区而得到承认，其辖区由好望角直到中国。1558年，果阿又被晋升为大主教区，并将副主教区设在科钦和马六甲。1576年，为了在中国和日本传教，在澳门建立了单独的主教区，而到1588年，日本也被开辟为单独的主教区。在这整个地区之上，国王以远东传教会的名义，保持着他的权力，而拥有大主教权力的果阿仍旧是大主教区的中心。

在16世纪30年代以前，教会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监督在亚洲的葡萄牙人的宗教生活上。只是在1534年印度南部的采珠人——帕拉瓦人

（Paravas）——以获得政治庇护作为交换条件接受了基督教，才第一次使方济各会打开了大规模传教的领域。以后，随着葡萄牙人向果阿北面推进，又取得更大成功；方济各会建立了许多宗教团体，开办医院、孤儿院和学校，还在果阿为当地的基督教徒子女设立了一所神学院。然而，还是在1542年耶稣会到来以后，传教活动才开始受到国王的全面关注和大力支持。在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作为国王的听忏悔牧师和顾问主管了高等教育，并在科英布拉建立了一所培训传教士的学校。在印度，当局也提供了帮助，首先是向皈依者授予低级官职和财政优惠，后来则采取强迫手段，诸如摧毁葡萄牙占领区内的偶像、取缔异教节日、驱逐婆罗门教和穆斯林教的教长以及没收用于供养庙宇和清真寺的财产。这些手段中最苛刻的是：对于刚刚死去父亲的未成年者，虽然母亲还健在，仍要从其亲属处带走并培养成基督徒。

[\[15\]](#)1560年，主要由于方济各·沙勿略的推动，在果阿建立了宗教法庭，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手段。宗教法庭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引人注目。从像阿方塞奎阿这样的宗教审判官之间的通信来看，他们更关心的是地位和薪水，而不是灵魂，但宗教法庭还是令人烦恼地坚持下来了。

耶稣会会士不仅使力量有了可观的增加——到1560年，他们在亚洲地区已有124人，他们还带来了训练有素的智能、热情和纪律。在这个世纪中，多明我会的会士也大量到来，1572年以后，又有奥古斯丁会的成员大量到达，所以在这个时期传教士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印度自然是首当其冲。方济各·沙勿略开始在仅仅名义上是基督教徒的帕拉瓦人中间住了两年，并与一个单独行动的耶稣会神父在荒芜的海岸上培训当地的传道师以继续这项工作。他还试图改变葡萄牙人自身的道德行为。他树立了一个教育儿童的典范，在果阿建立了一所学院培训各民族的青年让其在各自国家中传教，并着手把教义问答、信条和祷文翻译成当地语言文字。（在最后一项成就方面，他可算是一位典型的耶稣会会士，同所有其他僧团相比，耶稣会士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去掌握当地语言，编纂了许多早期的字典和文法书，还对他们努力使之改宗的那些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从16世纪60年代起，非常隆重举行的大规模皈依仪式，在果阿的旧征服地（北起伯塞恩，南至科钦）到处都在进行。同时，耶稣会和方济各会还兴建了大量学校和学院，以巨大的努力来巩固这种成果。今天存在于伯塞恩地区、果阿、马拉巴和锡兰的实力雄厚的罗马天主教会，就

是他们事业的经久的成果。必须指出，虽然允许大批印度人成为寺院外的教士，但从不吸收他们进入正式的僧团。方济各会传教士则按照他们的会规禁止接纳皈依者，即使对于葡萄牙人，如果出生于当地，也不愿予以接纳。耶稣会也同样拒绝接纳皈依者，巡视员亚历山德罗·瓦利纳尼就直截了当地把所有的黑人，无论是非洲黑人还是印度黑人，统统划入“天生尽做坏事、被卑劣的本能所驱策并且被欧洲基督教徒所蔑视”的一类。

这个时期的另一特征是，企图把存在于印度的古老的圣托马斯教派暨叙利亚基督徒组织置于葡萄牙人控制之下。方济各会修士早就想使他们靠近罗马，从1541年起就在格朗格努尔为叙利亚基督教徒的男孩子们开办了一所学院。在1551年和1555年，迦勒底的大教长们在罗马由教皇之手为他们举行了授任礼，而当东方联合教会的大教长指派的主教们抵达果阿时，耶稣会便想加快步伐把他们纳入远东传教会或置于国王庇护之下。主教马尔·约瑟夫被他们两次逮捕并作为异端送往欧洲，根本无视国王授予他的地位以及教皇庇护四世的命令：印度的叙利亚教派的管理权应保留在本派主教们的手中。耶稣会士们在进行了直接的攻击之后又要弄阴谋诡计，为了获准建立一个为叙利亚教士而设的神学院而支持马尔·约瑟夫。1585年，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攻击这位主教为异端，并且在这位主教死后，果阿大主教任命了一名印度的基督教徒接替他，条件是承认罗马的最高地位并谴责迦勒底的大教长们。最后，1599年，在丹皮尔宗教会议上，在雇买来的科钦拉贾的世俗力量的支持下，这位大主教在叙利亚教派中引进了新的宗教形式，并把它正式置于宗教法庭和东方传教会之下，把在整个这一地区的教会管理权交给了耶稣会。

在南方，耶稣会会士似乎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在北方，一个更大的成果——说服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信奉基督教——却落空了。在攻打苏拉特时，阿克巴遇到过葡萄牙人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579年，他写信给果阿，要求派“两位有学问的教士带着主要的律法书和福音书来”。果阿选派了三位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阿奎维瓦、西班牙人蒙塞拉特和波斯人皈依者恩利克兹（Henriquez），组成第一个传教团去往莫卧儿。由于锡兰、马尔代夫群岛和马拉巴的统治者们早些时候的皈依，他们满怀希望地向阿格拉出发了。他们发现阿克巴是一个口头信仰但显然并不正统的穆斯林，他已经与印度教徒、耆那

教徒及祆教徒进行着宗教讨论，现在三个基督教徒又加入了这种讨论。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拥有充分的布道自由。伟大的艾布勒·法德尔被指派教他们学习波斯语并筹备福音的翻译工作。王子穆拉德也被指定接受他们的教诲。尽管如此，他们并不了解皇帝的思想。而且，阿奎维瓦在没有能实现他那很高的期望后，于1583年离开了宫廷。1591年，阿克巴要求派遣第二个传教团和翻译福音，“我希望通过他们的神圣的教条，能够死而复生”。耶稣会会士再次北上，受到阿克巴的礼遇，并被允许开办学校。但是，穆斯林的敌对情绪非常激烈，皇帝没有任何准备皈依的表示，这次传教活动夭折了。在1594年，阿克巴第三次要求派遣传教团，总督担心莫卧儿帝国向德干高原推进，出于政治目的说服了耶稣会士答应这次要求。传教团由哲罗姆·沙勿略神父率领，他一直陪伴阿克巴到1605年阿克巴去世，死时仍未皈依基督教。在莫卧儿宫廷建立的永久性传教团，使耶稣会能够向欧洲介绍帝国高度发展的印度—波斯文化，这不无政治效果，但从未使耶稣会一度期待的宗教目标得以实现。

在西面，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在非洲酋长国和波斯湾这些难以开展工作的穆斯林地区一无所获，他们的主要任务成为劝说被运往果阿途中的奴隶们皈依基督教。耶稣会士对赞比西河的入侵以殉道告终，长期以来，他们为使信仰基督一性论的阿比西尼亚人服从罗马而进行的努力也终归失败。他们在这里的希望是：阿比西尼亚皇帝需要葡萄牙人的武装支援以阻挡奥斯曼帝国的推进，这将导致自上而下的皈依；但是尽管耶稣会的主教们得到了听众并在17世纪确保了统治者的忠诚，但由于第一任耶稣会主教热衷于攻击异端，从而导致民众的反对，致使传教士被驱逐。

在东面的香料群岛建立了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但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有许多毁于当地人为反抗官员暴政和传教士压迫而进行的起义。然而，耶稣会在日本通过统治阶级所做的努力，在半个世纪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方济各·沙勿略在他巡视整个亚洲传教地区时热情地报道日本人是“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人”。他们是珍视荣誉的人，令人惊奇地自制、好客、好学，没有中国人那种仇外心理，虽然很贫穷，但常常有文化，对皈依基督教大有益处。对日本人来说，则发现葡萄牙贵族颇像日本的武士阶层，而耶稣会教规中的自我牺牲、对幸运的淡漠，也颇像武士道。

沙勿略在日本西部登陆，那里的军事领主岛津和大友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并保持着安定局面，急于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葡萄牙人的崭新的滑膛枪和帆船贸易，看来都很受欢迎，沙勿略在离开前，已使九州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

在他返回果阿后，又一批耶稣会传教士被派往这个有希望的新地区。起初他们人数很少——到1570年才只有20人，其主要工作是在日本西部贫穷农民中间进行传教。但是，自从与澳门的贸易变为每年一次用大帆船航行这种固定方式以后，就有可能向九州大名伸出贸易的诱饵，其中有些大名，如丰后的大友宗麟接受基督教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在1569年，耶稣会从另一个基督徒大名大村那里得到作为赠礼的长崎，这里的整个行政管理权和港口税收都被委托给了耶稣会士。在府内也取得了很大成功，那里的一位已经加入了耶稣会的葡萄牙商人，用他的财产创建了医院，并用与澳门的贸易收入资助传教活动。

然而，耶稣会传教士急于到达首都京都。1550年沙勿略发现京都受到战争的破坏，直到1559年加斯帕尔·比莱拉在幕府将军的保护下才在那里确立了一个立足点，而这位将军可能是受了幕僚中皈依者的影响。在那里，以及在堺市的港口，有大批武士皈依了基督教。当1564年天皇下令驱逐耶稣会士时，他们可以躲避在那里。甚至在一些中部省份，也有一些贵族皈依了基督教，其中包括摄津的重要的大名家族，正是这个家族在1569年把日本的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观察家和书信作者路易斯·弗罗伊斯介绍给了正在崛起的织田信长，当时他正致力于征服整个日本中部地区。弗罗伊斯给信长留下良好印象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信长刚刚控制了京都，并将在1573年推翻将军从而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与参加内战的佛教各宗进行的长期的政治斗争，在1580年以摧毁伊香保城堡而告终，这使信长和在宗教上与佛教存在冲突的耶稣会的接触更加密切了。这就有利于耶稣会在京都地区的望族和权贵当中赢得大量的皈依者。到1580年摄津的人口中有1/3成为基督教徒，在中部各省大约有15000人信奉了基督教，因而在一些主要城镇出现了教会学校、神学院和壮丽的教堂。而且，他们皈依基督教绝不是出于任何对商业或政治利益的考虑。

1579年，耶稣会的巡视员亚历山德罗·瓦利纳尼到达日本后，更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传教活动。和在印度一样，他把主要力量放在彻底改变宗教信仰的准备工作上，在有马和安土开办了神学院，在臼杵

开办了一个修道院，在府内开办了一个学院。他还强调为了传教进行语言训练的必要性，这是为了接受、适应当地的文化模式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同日本的改宗者、神学院的学生和问答式教学者来往而做的准备工作；他还认为日本人“在整个东方最易于表现出高尚的基督徒的性格，而且事实上已经如此”。

1582年，织田信长遇刺身亡，丰臣秀吉继承他完成了统一日本的进程。由于中部各省的军事反抗已被粉碎，丰臣秀吉在若干年中主要致力于重建行政管理机构，大范围清丈土地，并建立了一个中央的官僚体制。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还要扫除佛教反对派最后的残余，他仍然以友好的方式对待耶稣会士，甚至在他的宫中允许改宗。他本人则同样表示出很想赞助葡萄牙人的贸易。后来，他在1587年突然颁布命令：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必须在20天以内离境。关于他的动机仍然众说纷纭，但是看来很可能是因为耶稣会惯常在统治阶级中间争取皈依者因而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秀吉在中央政权巩固以后，准备征服边远各省，他的首要目标就是九州。那里，耶稣会士与大名的关系已经开始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例如，在一个非基督教的部族萨摩构成征服九州的威胁时，副大主教加斯帕尔·科埃略（Coelho）就鼓励基督徒大名向马尼拉请求军事援助。而且，在1586年秀吉接待科赫并向他概述了针对九州的计划时，他鲁莽地答应给以海军援助，并提出把基督徒大名带到秀吉一边来。耶稣会士们这种关于政治权力的自供，或许很能说明那道驱逐令的原因。驱逐令本身还谴责葡萄牙人把日本人卖为奴隶，破坏神道和佛教的殿堂，怂恿大名强迫其人民信奉基督教。虽然科埃略最初的对策是武力抵抗，并呼吁大名和澳门来支援，但耶稣会士们不久便决定采用一种更圆滑的对策，即顺从。秀吉对此事并未抓紧，贿赂地方官也铺平了道路，而且耶稣会对人民又恢复了一种不强迫服从的牧师职能。驱逐令虽未撤销，但在1592年瓦利纳尼从果阿回来时，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而且到1592年时，已有几百位耶稣会士在日本工作，有的甚至在首都工作。到1596年，日本可能已有30万人皈依了基督教，从1587年以来，接受洗礼的不会少于6万人。

葡萄牙人试图进入的最后的大传教区是中国。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固执地拒绝外国使节、商人和传教士。甚至在同意商人们在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进入广州以后，耶稣会的要求，诸如他们的会长佩雷斯在

1565年提出的到内地讲学的要求，仍遭到坚决的拒绝；而从马尼拉或澳门擅自进入的企图，遭到了几乎是灾难性的失败。在澳门和马尼拉都出现了用武力强行入侵的倾向，但是瓦利纳尼决意用笔作为他的武器。根据他的指示，年轻的尼波利坦·鲁杰罗于1579年开始了读、写、说中文的学习任务。在没有得力的教师和帮助的情况下，要学会说中国的方言和官话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正如鲁杰罗本人认识到的那样，他必须不仅以商人的面目，而且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

1580年以后，鲁杰罗可以出入广州了。在那里，他对中国礼节的注意以及他那恬静而又好学的习惯为他赢得了当地官员的赞赏。到1582年，他把译成中文的摩西十诫呈送他们。后来，一位新总督为调查澳门的情况，召集葡萄牙人到其驻在地肇庆府来说明他们的意愿。鲁杰罗是被派去的代表之一。他恰当地奉送了各式各样的礼品，从而使他的说明很顺利地接受了。然后又有更多的礼品被发送到肇庆，1582年12月，鲁杰罗再次登程前往省会，这次带着一座报时钟。他提出了希望获准作为中国臣民定居学习中国文化的请求，这个请求被接受了，寻求日久的入口找到了。1589年以前，一组包括利玛窦在内的传教士一直居住在肇庆，他们知识丰富，用一些精巧的玩具贿赂地方官员，以富有同情心的启发谨慎地介绍他们的宗教，靠这些，他们赢得了信任。1589年以后，他们获准访问其他一些省城，利玛窦来到江西省会南昌，并在那里开辟了另一个教会中心。同时，利玛窦用中文把欧洲的科学和基督教的教义编写出来，加以出版；他还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从中为他的宗教获得了许多术语，他试图把基督教与中国风俗和儒家传统调和起来，这在后来引起了很多争议。最后，他在16世纪末到达北京，并被获准在那里定居，耶稣会在中国的伟大事业开始了。

但是，葡萄牙人在远东不可能不受干扰地独自发展他们的贸易和传教活动。西班牙人是在遭到三次巨大失败后才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对于香料群岛的要求，那是由麦哲伦远征队最先提出的。为了远征这个地方，西班牙从1559年起就开始进行更加认真的准备，到1565年，在海军上将黎牙实比率领下的5艘舰船和400名士兵从新西班牙抵达南菲律宾。他在宿务登陆，虽然那里的资源有限，还极可能受到来自棉兰老的穆斯林的攻击，但是这个经受住了葡萄牙人三个月围攻的拓殖

地，因为与来这里的中国民间船只进行的贸易而受到鼓励，并在1571年成功地扩展到吕宋的北部，在该地区的马尼拉建立了一个新的首府。多明我会的影响使腓力二世命令黎牙实比不要用暴力和非正义的手段去开拓其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示在宿务和马尼拉都被成功地贯彻执行了。

西班牙的菲律宾在早期发展起来的殖民地社会组织，同葡萄牙的印度历来的情况相比，作为定居殖民地的色彩要浓重得多。从美洲移植来的根本制度是一种庄园，即委托监护制，接受委托的西班牙人向当地居民征收贡赋。所有成年男子都要以劳役、实物或香料的形式缴纳贡赋，而接受委托者则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接受基督教做准备。例如，黎牙实比把他所控制的2/3的居民分散给私人委托地占有者，其余的1/3留给了国王。显然，这种制度很容易产生弊端，如贡赋征收者超额征收，使用暴力和敲诈勒索，甚至奴役菲律宾人。最后这项弊端被萨拉萨尔主教于1581年采取的行动所制止，他当时得到了一项教皇敕书的支持，1591年后又得到了王家立法的支持。但是，西班牙加在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上的负担，由于与中国发展积极的贸易而确实减轻了。中国人把丝绸、瓷器、一些转口的黄金和奢侈品运到新西班牙，同时他们还把殖民者所需要的金属器具、五金器具、家具、牲畜和食物运来，并把大量手工业者和工人移居到他们自己单独的居住区——马尼拉城外的帕里安。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服务性行业，如商业性菜农、面包工人和工匠，而对其帆船贸易征收的3%的税使菲律宾的岁入增加了很大一部分，到16世纪90年代初期多达岁入的1/5。他们人数的不断增加引起了治安问题，但他们提供的劳工和税收却使必须压在菲律宾人身上的负担有所减轻。到17世纪20年代已有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人定居在马尼拉并积极从事贸易活动，这就使私人委托地占有者的数量和重要性都减弱了，而且征收的贡赋实际上已成为有节制的人头税了。

西班牙人很早就与前来菲律宾的日本人有所接触，而一度如此致力于把他们排除在摩鹿加群岛以外的葡萄牙人，由于德那地和安汶岛的叛乱而不得不请求他们给予支援。但是，西班牙与日本和香料群岛都没有建立起重大的贸易往来：日本人并不需要白银，也不相信西班牙人的政治意图，菲律宾无法供给香料群岛的居民所需要的棉花和食物，而且西班牙人需要的香料也是有限的，因为从美洲到欧洲的贸易

是独家经营的。因此，马尼拉的贸易就成了专门从事用来自新西班牙的白银向中国货物直接交换的贸易。早在1573年，就有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把712匹中国丝绸和22300件精致的镀金瓷器和其他瓷器运到阿卡普尔科；到1600年，有40—50艘较大的适于航海的帆船一年一次由中国抵达那里。他们运来的货物是由一些与澳门同属一个体系的代办整批购进的，然后按照投资的多少分配给每个股东。虽然如此，也常常有人抱怨这些货物的价格。所以，自1575年起就试图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而且，特别是在两个王国联合起来以后，试图清除葡萄牙人的猜忌并扩大与澳门的贸易。这两项努力都未成功，中国船主们的控制依旧牢不可破。不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是有利可图并继续发展的，尽管王室的规定打算限制白银从新西班牙向菲律宾出口。

菲律宾可以看作是一个商业中心，那里是美洲白银换取中国货物的地方，也是连接大西洋贸易与亚洲贸易的另一个港湾。但是，西班牙也把那里看作广阔的进行传教冒险的地方，为了支持传教事业，王国政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最初的10年间，在菲律宾岛上只有少数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但在1578年方济各会士到达这里以后又有多明我会士和耶稣会士到达，因而在第二个和第三个10年间来到这里的传教士总计有100到300人。到16世纪末，在西班牙统治下的60万菲律宾人中大约有一半人受了洗礼。

传教士的到来也带进了一股势力，根据拉斯·卡萨斯的传统，传教士们随时准备猛烈地抨击委托监护制的弊端，准备遏止奴役菲律宾人的倾向。牧师们还竭力消除当地的债务奴役制，它是当地酋长们权力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皈依者，要他们提供搬运、摇桨、建筑教堂的劳役；而且，由于他们也要在贡赋中分一份来维持自己，他们本身就可以说是剥削者。人们谴责托钵僧会为举行圣礼而过多索求，有一段时间，奥古斯丁会陷入混乱，许多会士利用他们掌握的精神权威无偿获得食物的馈赠并且低价获得可资贸易的货物。在分布广泛的教区中，要制止这些偶然性的弊端变得异常困难：那种通常用来维持纪律的集体生活常常不可能做到，甚至在经过严格挑选的耶稣会士中，由于传教地区的闭塞也导致了一些人的堕落。此外，尽管一道教皇敕书使腓力二世有权强制要求人们服从主教进行管理的权威，但是各僧团顽强地反对这种控制。由于缺少任何值得一提的世俗教区工作，传教活动就完全依靠修士，他们更有能力反抗主

教。而且，在许多地区的农村只有他们是有效地出现在那里的西班牙势力，因而同样更有能力反抗行政当局。耶稣会的这种专制结构是某种保护措施，但是较为民主的、具有三年一选传统的托钵僧会士在一段时间里其风纪也明显地败坏了。然而，当传教范围在如此迅速地扩大着的时候，所有教派都苦于人力的短缺，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由西班牙人组成。当地人、克里奥尔人以及本地出生的欧洲人都被排斥在外。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既为了防止来自棉兰老岛的入侵者，也为了减轻牧师工作的负担，把皈依者像在墨西哥那样编组成更大、更严密的村庄的努力也失败了。就这样，在起初一些年里，菲律宾群岛被认为是一个难以开拓的地区。一种措施的确缓和了这种困难的形势：菲律宾被分为若干彼此隔绝的大语言区，每个地区各分派一个与别处不同的僧团；结果很好，使得传教士对语言和风俗的学习容易一些了。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产生了关于当地习俗的法典，而这些法典只要不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和活动相冲突，就允许其继续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因为传教士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菲律宾人就免去了学习西班牙语之劳。

几乎直到16世纪末，从反方向绕地球的伊比利亚人一直几乎垄断地掌握着一条与亚洲联系的捷径。尽管如此，其他的欧洲人也忙于寻求通往东方的路，其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人的进展。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的统治下，大俄罗斯完成了统一，于是开始向南、向东扩张。甚至在15世纪晚期莫斯科就与赫拉特和波斯互派使节了。1552—1554年在完成了对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征服后，俄国人就取道伏尔加河以及里海与亚洲中部的许多汗国和萨非朝波斯建立了更加长久的关系。在这10年里，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得到许可向东推进。到1581年，这个家族和他们的哥萨克部队越过乌拉尔山脉。在伊里克消灭了鞑靼汗国，这就为通过连接水系与水系之间的便利的陆路跨越西伯利亚打开了通道。到1604年，对珍贵的黑狐皮和紫貂皮等新物资的贪求把哥萨克人和皮货商吸引到托木斯克并在10年以后到达了中国边境。

在这由于向东方的推进才开始扩大的贸易中，国家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例如，皮货是国家与波斯进行商队贸易的大宗物资，在那里交换由波斯王室垄断的丝绸。皮货还由一批经过挑选的政府商人去阿斯特拉罕出售给前来那里的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商人。还有一些皮货在

莫斯科出售给欧洲商人——在这些欧洲商人中，有经由钱塞勒于1553年发现的白海航路到达那里的英国商人。

这条白海航路的开辟正值英国人寻求一条能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它既能避免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发生冲突，又能为日益衰落的呢绒贸易开辟新的市场。于1555年合并成立的莫斯科公司旨在进行一次去往中国的旅行。这里发展起来的贸易包括鱼、鲸油、牛脂、亚麻和皮货，然而最初的意图始终没忘，因为在1557年的时候，安东尼·詹金森带着沙皇为中国之行所开的通行证，沿伏尔加河南下到达里海。在布哈拉他发现东去的道路被战争封锁了，然而他注意到了前往中国的商旅交通的细节。1561年他再次出访，这次是试探与波斯人做生意的前景。1562年他到达加兹温，受到沙·塔赫马斯普的冷遇后和印度商人进行了一次有希望的香料贸易谈判，然后带着一大批丝绸取道希尔凡回到俄罗斯。他在1564年和1565年两次去往波斯，主要是为了获取生丝，但是对香料仍念念不忘。1566年，沙赋予他们一项有利的特权，而且，还激起了用一种薄粗呢顺利地换取丝绸和香料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次有限的贸易：1568年得到了400磅香料，1569年在波斯把数千匹呢绒卖掉后，购得了价值3万英镑的丝绸和香料。假如英国商队没有遭到伏尔加河地区的哥萨克的抢劫，这样一次返回肯定会推动与波斯进行更为活跃的贸易。相反，在1579年又进行了一次旅行之后，莫斯科公司对此不感兴趣了。

这部分地是由于英国人和黎凡特之间的贸易的复兴。安特卫普的衰落和阿勒颇、亚历山大港的复兴，在同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中日益严重的政治阻力，希望与土耳其政府结成即使不是军事的也至少是商业的联系，这一切导致了1580年与穆拉德三世达成新的条约。1581年，黎凡特公司在伯利和沃尔辛厄姆的支持下，得到了王室颁发的特许状。1583年，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条约展期，在最初五年中，进行了大约27次商业航行，获得了可带来丰厚利润的货物，其中包括来自波斯和印度的生丝、香料和靛蓝。这样，在控制亚洲贸易并绕开伊比利亚人方面，黎凡特公司在俄国公司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此外，黎凡特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从间接的渠道获得亚洲的商品，因此在1583年，公司派出一些商人从阿勒颇出发到了波斯湾和印度。拉尔夫·菲奇是其中之一，在1591年回到英格兰之前，他曾远达缅甸和暹罗的边界。伊丽莎白给黎凡特公司的第二个特许状更扩大了公司

对菲奇所发现之地的垄断权。在俄罗斯公司面前忽隐忽现的亚洲贸易之希望，在黎凡特公司面前则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这一前景再次证明是海市蜃楼。詹姆斯·兰开斯特和本杰明·伍德企图从海上航行到印度的尝试失败了，而荷兰于1595年进行的首航却一举成功。1598年，至少有22艘船从尼德兰出发向东航行，到1599年已有4艘满载着胡椒和香料归来。有一段时间，黎凡特公司希望那些已经在黎凡特的荷兰人面对海路之风险和伊比利亚人的敌对行动从而意识到在黎凡特的贸易更为可取。然而，到1599年底，阿勒颇的英国人已在削减他们对香料的购买量，而在伦敦，人们正在计划成立一个东印度公司以继荷兰人之后绕过好望角。虽然这个计划因伊丽莎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被搁置了一年，在1600年快结束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终于得到了特许证，它的人员和总督似乎都是从黎凡特公司的海军力量中抽调而来的。

荷兰人直接介入亚洲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与英国人并无二致。就在英国因为葡萄牙在安特卫普的市场衰落而蒙受损失的时候，荷兰则确实有所增益，因为他们接过了大部分向北欧船运并分销香料的业务。但是荷兰人对于来自西班牙的敌视感受得更快更痛切，所以他们也一同寻找通向亚洲的经过极地的道路，并第一个跟着英国人走向白海，然后又走向黎凡特。同样，他们也加入到了大西洋上的私掠活动和对葡萄牙的西非殖民地发动的攻击中。但是到1585年以后，当腓力二世采取日益严厉的措施禁止和伊比利亚诸港口进行贸易时，在从事绕过好望角前往香料群岛这种充满风险的海上航行方面，荷兰人的准备比英国人更加充分一些。荷兰人在财政实力、管理技能和海上作战经验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通向东方的海路和葡萄牙人在亚洲从事贸易的方式，荷兰人也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从为印度承包人服务的荷兰人那里，从多年来就安插在印度公司的心脏为果阿大主教服务的林索登处，从里斯本的豪特曼处，他们搜集到了地图、常走的路线和内容详细的情报，这使他们在1595年能对准最薄弱的环节发起进攻，即巽他海峡和万丹港。豪特曼的第一次航行，虽然收获甚少，但安全返回，这就足以促使大批的公司急于进一步追求成功。在七年之中，有由八个独立的公司装备起来的65艘船出海航行，一些取道麦哲伦海峡，而大多数船只则绕过好望角前往爪哇和香料群岛。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船只像范·内克指挥的远航那样，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利

润，而另一些则像豪特曼的第二次远航那样以悲剧告终。然而，很快就明朗起来的是：分散竞争的航行体制对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害无益的。沃尔维克在马都拉因为豪特曼所施行的暴力而蒙受损失；同样，范·凯登在亚齐也受到了损失；没有一个公司能够顺利地维持为成功的贸易所必需的永久性代理店；竞争使得价格上涨、货源不稳；当老阿姆斯特丹公司在1599年派出一支舰队奉命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竞争对手——荷兰公司时，葡萄牙人也最后决定用武力来驱逐这些入侵者。1597年，荷兰三级会议试图劝说荷兰公司和泽兰公司组织联军；1599年，阿姆斯特丹市的市长促成了阿姆斯特丹和北荷兰的公司的合并。但是到1601年，分裂之危险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荷兰三级会议把所有公司的代表都召集到海牙，以讨论联合的各种条件。在争论和商讨之后，1602年3月组成了东印度联合公司，荷兰人将利用这个既从事商业贸易，又有武装力量的工具去摧毁那个在亚洲已有一个世纪历史的葡萄牙人的帝国。

（高仲君 译）

[1] 《关于西印度群岛上……未发表的文献集》（马德里，1864—1881年），第16款，第142条。

[2] 参阅第2卷，第572页。

[3] 参见第2卷，第583页，注释①。

[4] 西班牙语Mestizo的音译，原指混血儿，在中美和南美指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儿。——译者注

[5] 在16—18世纪时指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译者注

[6] 参见第2卷第20章，第601—604页。

[7] 加斯帕尔·科里阿例外，他的著作《印度传奇》着重说明了经商目的，并论述了贸易和行政的机构组成。

[8] 迪奥戈·德·库托（Diogo de Couto）指出，在1559年去东印度经商返国的两只商船载有1137人；见《亚洲》一书，10卷本第7卷，第8篇，第13章，第262页。

[9] 参阅第2卷，第593页。

[10] 加尔西亚·德·奥尔塔（Orta）在1562年形象地描述，莫桑比克的大象之多就像欧洲的母牛一样。

[11] 迪奥戈·德·库托 (Diogo de Couto) 坚持认为，维查耶那加尔的衰落是对葡萄牙人贸易的沉重打击。见《亚洲》一书，10卷本第8卷，第15章。

[12] 当时日本各领地（名田）的最高长官。——译者注

[13] C. R. 博克塞和C. 德阿泽维多：《耶稣堡和在蒙巴萨的葡萄牙人》（伦敦，1960年）。

[14] 关于他们的活动，见M. A. P. 梅林克-罗洛福斯《亚洲贸易和欧洲影响》（海牙，1962年）。

[15] 告密者提供上述事实，可得到孤儿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奖赏。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achen, 亚琛, 8, 345

‘Abbās, 阿拔斯, 波斯国王, 360, 364, 374—375

Abbots, 修道院长

世俗的, 51

领地上的, 帝国境内, 337

Abbruzzi, 阿布鲁兹, 强盗, 255

‘Abd al-Halīm (kara Yaziji), 阿布达尔哈利姆（卡拉·雅兹吉）, 土耳其起义领袖, 373, 374

Aberdeen, 阿伯丁大学, 439

Abo, 奥博, 407

Abrahamowicz, 阿布拉哈莫威茨, 建筑师, 402

Abul Fazl, 艾布勒·法德尔, 阿克巴的历史学家, 550

Abūl-Su ‘ūd, 阿布-苏乌德, 穆夫提, 352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耶稣会进入, 539, 540, 550

Academy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自然奥秘研究会, 476, 479

Acadia (Novia Scotia), 阿卡迪亚（新苏格兰）, 530—531

Acapulco, 阿卡普尔科, 17, 554

Acconcio, Giacomo, 阿孔乔, 贾科莫, 工程师, 483, 485

Accountancy, 会计学, 428

Achin, 亚齐, 535, 537, 541, 542, 546, 558

Acosta, Josed' , 阿科斯塔, 何塞德, 自然史学家, 457

Acquaviva, Claudio, 阿奎维瓦, 克劳迪奥, 耶稣会会长, 65, 549—550

Act, declaration, of Abjuration (Netherlands), 宣称誓绝法令 (尼德兰), 99, 279

Acts of Parliament, 国会的法令, 成文法 (英国)

 上诉法 (1533年), 51

 至尊法 (1559年), 114, 212

 统一法 (1559年), 114, 212

 织工法 (1555年), 128

 徒工法 (1563年), 128

 保持女王臣民忠顺法 (1580年), 492

Addled Parliament, 腐败国会, 135

Aden, 亚丁, 土耳其进入, 534

Adiaphoristic controversy, 关于不置可否论的论战, 78—79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散见于126—148

 西班牙帝国的, 238, 254, 507, 510, 511

 皮埃蒙特-萨伏依的, 260

 德意志诸公国的, 331

 奥斯曼帝国的, 347, 351

 瑞典和丹麦的, 406—407, 423, 425—426

Admiralty, Court of, 海事法庭, 167

Adrian VI (of Utrecht), 阿德里安六世 (乌得勒支的), 教皇, 240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197, 319

Adzuchi, 安土, 耶稣会传教士进入, 551

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 见Pius II条

Aerschot, Philippe de Croy, duke of, 阿尔绍公爵, 腓力·德·克罗伊, 268, 271, 275—276, 277, 310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希腊剧作家, 版本, 446

‘Aesop’, ‘伊索’作品在学校中, 435

Affonsequa, 阿方塞奎阿, 宗教审判官, 548

Africa, 24, 160, 非洲

东部, 366, 539—540, 545, 550

北部, 191, 197, 251, 353—354

葡萄牙人进入, 247, 534

西部, 葡萄牙人进入, 534, 558

Agents, diplomatic, 外事代办, 151, 153, 162

Agostino, Antonio, 阿戈斯蒂诺, 安东尼奥, 法学家, 446

Agra, 阿格拉, 549

Agricola, Georgius, 阿格里科拉, 乔治乌斯, 《冶金学》作者, 24

Agricola, Johannes, 阿格里科拉, 约翰内斯, 宗教改革家, 74, 75

Agricola, Rudolphus (Huysmann), 阿格里科拉, 鲁道尔夫 (赫伊斯曼), 442

Agriculture, 农业, 36—38, 127

产品的价格, 20

在波兰, 397—398, 400

在瑞典, 425

在西属美洲， 513

Ahmed I, 艾哈迈德一世，土耳其苏丹， 375

Aidin (Asia Minor), 艾金 (小亚细亚), 374

Aigues-Mortes, 艾格莫尔特, 153

Ajemioghlanlar (foreign youths), 阿杰米奥夫兰拉 (外籍青年), 奥斯曼帝国, 348, 366

Akbar, 阿克巴, 莫卧儿帝国皇帝征服古吉拉特, 540

耶稣会士向他传教, 549—550

Akçe (*asper*), 阿克切 (阿斯贝尔), 奥斯曼钱币, 349页注, 370, 371

Akhaltzikhé (Caucasus), 阿哈尔齐赫 (高加索), 358

Alay begi (officer of sipāhīs), 阿列贝伊 (西帕希官员), 349—350

Alba,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duke of, 阿尔发公爵, 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243, 244, 290

以及血腥委员会, 6, 102, 291

书信, 7—8

会晤卡特琳, 154, 222, 225, 287

他的军队, 181

恐怖政策, 207, 274, 275, 310

向尼德兰进军, 229, 270, 287

他的困难, 232, 268, 271—274

征服葡萄牙, 247, 248

从尼德兰召回, 275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和威尼斯182, 353,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 347

Albert, archduke, 阿尔贝特大公, 309, 310

Albert, duke of Prussia, 阿尔贝特, 普鲁士公爵, 395

Albert Alcibiades, 阿尔贝特·阿基比阿德, 勃兰登堡侯爵, 77, 338

Albert Frederick, 阿尔贝特·弗雷德里克, 普鲁士公爵, 395

Albistān (Asia Minor), 阿尔比斯坦 (小亚细亚), 373

Albrecht V, 阿尔勃莱希特五世, 巴伐利亚公爵, 334—335, 336

Albuquerque, duke of, 阿尔武凯克公爵, 米兰总督, 258—259

Alcabala (Spanish tax), 过境税 (西班牙税收), 136, 137, 147, 271, 275, 511

Alcalá, 阿尔卡拉, 大学, 66

Alcazar-el-kebir, 阿尔卡萨-厄-克比尔, 葡萄牙战败于此, 200, 247, 248

Alchemy, 炼金术, 454, 463, 476

Alciati, Andrea (Alciat), 奥西亚特, 安德列阿 (奥西亚特), 人文主义者, 435

Aldobrandini, 阿尔多布兰迪尼, 枢机主教, 见Clement VIII条

Aldrovandi, Ulisse, 阿尔德罗万迪, 乌利塞, 解剖学家, 472

Alençon, duke of, 阿朗松公爵, 见Anjou, Francis, duke of 条

Aleotti, Giovanni Battista, 阿利奥蒂, 乔万尼·巴蒂斯塔, 工程师, 455

Aleppo, 阿勒颇, 358

贸易, 262, 366, 534, 557

Alessandrino, 亚历山德里诺, 枢机主教, 258

Alessi, Galeazzo, 阿莱西, 莱亚扎, 建筑师, 257

Alexandria, 亚历山大港, 贸易, 262, 366, 534, 557

Algebra, 代数学, 458—459

Algiers, 阿尔及尔

土耳其军队在此驻扎, 175

贝伊的雇佣兵, 181

设防, 197

此地的海盗, 353, 354

‘Ali Beg, 阿里贝伊, 奥斯曼军事指挥者, 366

Alkmaar, 阿尔克马尔, 牧师们, 105

Allen, William, 艾伦, 威廉, 枢机主教, 369, 494

Alpujarras, 织毯匠, 起义, 244, 246

Alsace, 阿尔萨斯, 158, 319

Altenburg, 阿尔滕堡, 辩论, 81

Althusius, 阿尔特胡修斯, 政治理论家, 99

Altun Kal’ e, 阿尔通卡勒, 公国, 358

Alumbrados, 光照派, 71

Alva, duke of, 阿尔发公爵, 见Alba条

Alvarez, Emmanuel, 阿尔瓦雷斯, 埃马纽埃尔, 学者, 434

Amasia, 阿马西亚, 和约, 355

Amazon, 亚马孙, 河谷, 508

Ambassadors, 使节, 见Embassies条

Amber, 琥珀, 贸易, 539

Ambergris, 龙涎香, 贸易, 539

Amboina, 安汶, 541, 542, 543, 547

Amboise, 昂布瓦斯

阴谋, 94, 95, 97, 215, 285

布告, 95, 268, 286, 287

America, 美洲

殖民者进入, 43; 西班牙人, 237, 507—523; 英国人, 523—530; 法国人, 530—532; 葡萄牙人, 508

天主教传教士进入, 54, 56—57, 507, 510, 514—515

北部, 路德宗进入, 84

宣称拥有主权, 159—160

参见silver条

Amiens, 亚眠, 西班牙占领, 308

Amiral, 海军元帅, 官职(瑞典的), 422

Amsdorf, Nicolaus von, 阿姆斯多尔夫, 尼古劳斯·冯, 宗教改革家, 76, 79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05, 270, 274

银行, 30, 43, 311

避难所, 31

人口, 34

贸易, 37, 311

航运业, 533

老公司, 558

Anabaptism, 再洗礼派, 5, 74, 123—124, 234, 324, 391, 480

受迫害, 100, 123, 265, 482

和平主义, 173

‘Anacreon’, 阿纳克里翁, 出版其著作, 446

Anatomy, 解剖学, 研究, 439, 453, 454, 472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摩里斯科人迁往, 247

Andelot, François d' , 昂德罗, 弗朗索瓦·德, 科利尼的兄弟, 92

Andes mountains, 安第斯山脉, 508

Andreae, James, 安德烈埃, 詹姆斯, 学者, 为路德宗的团结而写作, 82—83

Angermannus, Abraham Andreae, 安格曼努斯, 亚伯拉罕·安德烈阿, 乌普萨拉大主教, 87, 88

Angers, 昂热, 加尔文教会在此建立, 92

Angus, Archibald Douglas, earl of, 安格斯伯爵, 阿基巴尔德·道格拉斯, 223

Anhalt, 安哈尔特, 120

Animism, 泛神论, 442—443

Anjou, Francis, duke of (earlier duke of Alençon), 安茹公爵, 法兰西斯(前阿朗松公爵), 278, 293

 去世, 98, 294, 295

 成为尼德兰统治者, 279, 280, 293, 294

 与伊丽莎白一世, 279, 288, 293

 与胡格诺派, 288, 289, 292

 与政略派, 291

Anjou, Henry, duke of, 安茹公爵, 亨利, 见HenryIII条

Anna of Saxony, 萨克森的安娜, 奥兰治的威廉的妻子, 267

Anne (Jagiellon), 安妮(亚盖沃), 斯蒂芬·巴托里的妻子, 383, 392, 411

Anne Vasa, 安妮·瓦萨, 392

Annecy, 阿讷西, 63

Ansbach, 安斯巴赫, 霍亨索伦家族的, 395

Antilles, Greater, 大安的列斯群岛, 518

Antimony, 锑, 药用, 474

Antinomianism, 反律法论, 74, 91

Antioquia, 安蒂奥基亚, 509

Antiguarianism, 崇古意识, 404

Anti-trinitarianism, 反三位一体论, 125, 323, 484
在波兰, 390, 391, 441
参见Socinianism条

Antonelli, Batista, 安东内利, 巴蒂斯塔, 工程师, 196, 522

Antonio, 安东尼奥, 克拉图的大修道院长, 248, 249, 294

Antwerp, 安特卫普, 16
与英国的贸易, 5, 158, 211, 214, 232, 269
作为金融中心, 26, 27, 37, 235, 275, 533
人口, 34
加尔文主义传入, 101, 137
遭劫, 被西班牙人, 103, 176, 276, 534
围攻与陷落, 174, 198—199, 280, 295, 296
防御, 196, 197
相对而言避开了宗教裁判, 257
内部的动荡, 270, 277
停战, 528
葡萄牙王室在此的代理店, 533—534

衰落, 557

Aphthonius, 阿夫托纽斯, 希腊修辞学家, 437

Apollonius, 阿波罗尼奥斯, 希腊数学家, 457, 458

Apprenticeship, 学徒教育, 428—429

Aquaviva, Claudio, 阿奎维瓦, 克劳迪奥, 见Acquaviva 条

Arabia, 阿拉伯半岛, 535

马匹输出, 538, 540

Arabs, 阿拉伯人, 为葡萄牙服役, 537

Aracsh, 阿拉什, 土耳其占领, 358

Aragon, 阿拉贡, 8, 61, 153

人口恢复, 22

议会, 139

议事会, 238

副王职位, 240, 250

起义, 244, 250, 251

摩里斯科人, 246

Arakan, 若开, 541, 547

Araucanians (Chile), 阿劳坎人 (智利), 507

Araya (Venezuela), 阿拉亚 (委内瑞拉) 盐输出, 39, 523

Arboga, 阿尔博加, 瑞典议会在此召开, 416

Archaeology, 考古学, 447—448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 17

过境贸易, 411, 412, 413, 416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希腊科学家, 453, 457, 471, 477

Architecture, 建筑学, 13

意大利的, 262

“尤利乌斯式”巴洛克, 340

瑞典文艺复兴, 413

Arctic Ocean, 北冰洋, 见White Sea条

Arequipa (Argentina), 阿雷基帕 (阿根廷的), 508, 509,
510

Argyle, Archibald Campbell, earl of, 阿盖尔伯爵,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 212, 224, 227, 228, 229

Arians, 阿里乌教派

在波兰, 390—391

一段历史, 403

Arima, 有马, 耶稣会传教活动进入, 551

Aristocracy, 贵族政治, 503

与战争, 3, 150, 174

与君主政治, 130—134

参见Nobles条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希腊哲学家, 403, 446, 472

与新教徒, 430

《诗学》, 447

物理学, 461, 464, 471

论政治体制的类型, 503

Arithmetic, 算术, 427

Arizona, 亚利桑那, 507

Armada, the Spanish, 西班牙无敌舰队, 9, 154, 177, 525, 527, 535

其炮火, 204

为之进行的准备和付出的款项, 254, 296, 299—300

失败, 301

重新组建, 308

Armada de la Carrera de Indias, 西印度航线舰队, 518

Armadillas (cruiser squadrons), 巡洋舰分队, 518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波兰境内, 381

Armies, 军队, 174—201

胡格诺派的, 96, 97; 荷兰的, 178, 181, 183, 185, 194, 280, 298, 310; 波兰的, 178, 191, 397; 瑞典的, 178, 183, 185, 287, 407, 410; 帝国的, 183, 361; 葡萄牙的, 181; 法国的, 183, 192—194; 西班牙的, 183—185, 193, 238, 246, 275, 280, 305; 土耳其的, 175, 184, 356—357, 365—366, 371; 波斯的, 374; 丹麦的, 407, 409, 410

军医, 474

Arminianism (Remonstrants), 阿明尼乌教派 (抗议派), 105, 112, 122, 488

Arminius (Jakob Hermandszoon), 阿明尼乌 (雅各布·赫曼德松), 105, 441

Armour, 铠甲, 使用及装饰, 187—188, 192, 256

Arms (*armes blanches*), 武器 (白刃), 174, 188—189

参见Firearms 条

Arquebuses, 火绳枪, 192, 368

Arques, 阿尔克, 战役, 9

Arran, James Hamilton, earl of, 阿伦伯爵, 詹姆斯·汉密尔顿, 218

Arras, 阿拉斯

同盟, 6, 103, 278

会议, 151

条约, 310

Arsenal (Lisbon), 军械处(里斯本), 532—533

Articuli Henriciani (Poland), 《亨利条款》(波兰) 384, 385—386

Artillery, 炮兵, 在军队编制中, 191, 195

参见Guns条

Artisans, 工匠

在法国, 131, 287, 295, 306

在尼德兰, 269, 271, 277, 297

与学者, 455

Artois, 阿图瓦, 103

Arts, 艺术

战争与艺术, 174

在佛罗伦萨, 261

君主与艺术, 320, 334, 335, 410

划分专业, 大学中, 429

Asia, 亚洲, 欧洲在这里的利益, 532—558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372, 373

反叛, 364

Asientos (loans), 合同(借贷), 27

Asper, 阿斯贝尔, 见 *akçe* 条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落入俄国人手中, 355, 356, 556

Astrology, 占星术, 81, 410, 452, 454, 463—464

Astronomy, 天文学, 65, 439, 453, 459—465

与历法, 465—466

与航海, 466—467

Asunción (Paraguay), 亚松森 (巴拉圭), 509

Ataide, Dom Luis de, 阿泰德, 唐·路易斯·德, 葡萄牙总督, 545

Atheism, 无神论, 486

Athenaeus, 阿特纳奥斯, 希腊作家, 446

Atholl, John Stewart, earl of, 阿索尔伯爵, 约翰·斯图尔特, 216, 226, 227, 228, 229

Audiencia, 王室诉讼法庭, 245—246

在西属美洲, 511, 512

Aufklärung, 启蒙运动, 85

Augsburg, 奥格斯堡

和约, 2, 8, 10, 48, 58, 77, 319, 336, 491

信纲, 73, 74, 77, 83, 86, 87, 120, 324

宗教会议, 74, 77, 82

临时敕令, 75, 76

铠甲和枪炮输出, 186, 189

银行危机, 235

宫殿, 344—345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St, 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 57

Augustine of Hippo, St,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 67—68

Augustinians, 奥古斯丁会, 在亚洲和非洲, 548, 550, 555

Augustus I, 奥古斯塔斯一世, 萨克森选帝侯, 333, 535
与路德宗, 80, 81—82, 83

Aumdae, Charles of Lorraine duke of, 奥马尔公爵, 洛林的沙
尔, 221

Austria, 奥地利
分离, 与西班牙, 154
哈布斯堡家族, 与帝国, 319—346
大公, 319, 322, 323—324, 326, 331

Avocats, 律师, 302

Ayala, Diego de, 阿亚拉, 迪耶戈·德, 法学家, 168, 169

Ayamonte, marquis of, 阿亚蒙特侯爵, 米兰总督, 238

Ayrault, 艾罗尔特, 法学家, 168

Ayuthia, 大城, 539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奥斯曼推进, 359, 360

Azeveda, Don Jeronimo de, 阿兹维达, 唐·哲罗尼莫·德, 546

Azores, 亚速尔
这里的法国舰队, 201, 294
战斗, 204
拦截西班牙舰队, 309, 519
坎伯兰对这里远征, 468

Azpilcueta de Navarro, Martin, 阿斯皮利奎塔·德·纳瓦罗,
马丁, 学者, 18

Baab Ullah, 巴布·乌拉, 547

Babington plot, 巴宾顿阴谋, 162

Bacon, Sir Francis, 弗朗西斯爵士, 培根, 134, 148, 462, 475

Bacon, Sir Nicholas, 尼古拉斯爵士, 培根, 230

Baghdad, 巴格达, 贝勒贝伊, 360

Bahamas, 巴哈马, 519

Bahrein, 巴林, 奥斯曼人夺取, 545

Baius, Michael, 贝乌斯, 米歇尔, 神学家, 67—68

Baker, Matthew, 贝克, 马修, 造船主, 205

Baku, 巴库, 359, 375

Bale, Robert, 贝尔, 罗伯特, 古物专家, 444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197, 209, 242

Ballistics, 弹道学, 453, 471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贸易, 37, 401

 波兰, 382, 383

 瑞典, 404—426

 参见Scandinavia条及具体国家

Bamberg, 班贝格, 主教区, 338

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 里雅图广场银行, 43

Bancroft, Richard, 班克罗夫特, 理查德, 坎特伯雷大主教, 110

Banda, 班达, 538, 541, 543

Bañez, Dominic, 巴内兹, 多米尼克, 学者, 66, 67

Banks, 银行, 30, 42, 43, 296—297

国际破产, 235

Banks of Newfoundland, 纽芬兰海岸, 渔业, 525, 530

Bantam, 万丹, 541, 542, 558

Baptism, 洗礼, 123, 124

Baptists, 洗礼派, 124, 280

Barbary coast, 柏柏里海岸, 251, 252

Barber-surgeons, 理发师—外科医生, 474

Barcelona, 巴塞罗那, 27

造船主们, 205, 249

Barley, 大麦, 生产, 36, 398, 401, 425

Baronetcies, 男爵的爵位, 出售, 143

Baronius, Caesar, 巴罗尼乌斯, 凯撒, 枢机主教, 12, 444

Barret, Robert, 巴雷特, 罗伯特, 军事著作家, 177, 194

Barreto, Francisco, 巴雷托, 弗朗西斯科, 印度总督, 537

Barros, João de, 巴罗斯, 若昂·德, 历史学家, 444

Barter economy in Sweden, 瑞典的物物交换, 412, 426

Bartolists, 巴尔特鲁斯学派, 166, 168

Barton, Edward, 巴顿, 爱德华,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节, 368, 369, 396

Basel, university of, 巴塞尔大学, 439

Basil St, 圣巴西勒, 作品在学校在, 437

Basil IV (Shuisky), 瓦西里四世 (叔伊斯基) 莫斯科的沙皇, 418, 419

Baskerville, Sir Thomas, 托马斯爵士, 巴斯克维尔, 军人, 523

Basra, 巴士拉, 这里的土耳其人, 366, 534, 545

Bassein, 伯塞恩, 537, 548, 549

Bates, John, 贝茨, 约翰, 商人, 135

Bathory, 巴托里, 见Sigismund 条; Stephen 条

Baths, 浴池, 公共设施, 波兰城镇里, 380

Battalion, 营, 在军队编制中, 185, 194

Bavaria, 巴伐利亚, 334—336

- 保持天主教信仰, 59, 337
- 地产, 322, 335
- 私人顾问, 331
- 作为科隆大主教的幼子们, 336, 341—344
- 吞并多瑙沃特, 345

Bāyazīd, 巴耶济德, 苏里曼之子, 372—373

Bayonne, 巴约讷

- 走私中心, 27
- 卡特琳与阿尔发会晤, 154, 222, 225, 230, 287

Béarn, 贝阿恩, 胡格诺派在此, 290

Beaton, David, 比顿, 戴维, 枢机主教, 113, 223

Bedzin, 本津, 条约, 394

- ‘Beggars’ (*gueux*), ‘乞丐’, 在尼德兰, 102, 269, 277
- ‘*Beggars Sea*’ (*gueux de mer*), ‘海上乞丐’ 1, 103, 273, 275
- 与加尔文主义一致, 6, 8, 234
- 在荷兰和西兰, 272, 274, 288
- 被从英格兰逐出, 289

‘Beggars, Summons’， “乞丐敦促书”， 114, 212

Beglerbegi (governor-general)， 贝勒贝伊（总督）， 奥斯曼帝国内， 348, 349, 350

Beguín, Jean, 贝甘, 让, 科学家, 474

Bekenntnis Unterricht und Vermanung (of Magdeburg pastors)， 《教义的讲授与规劝》（马格德堡牧师们的）， 98

Békés, Gaspar, 贝克斯, 加斯帕, 392

Belgium, 比利时, 311

此地的天主教, 59, 104

此地的加尔文宗, 100—101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361, 362

Bellarmino, St Robert, 贝拉明, 圣罗伯特, 67, 68, 99, 105, 448, 498

Bells, 钟

破钟出售, 从英格兰, 368

铸造, 398

Belon, Pierre, 贝隆, 皮尔, 动物学家, 453

Belz, district of, 贝尔兹地区, 400

Bembo, Pietro, 本博, 彼得罗, 枢机主教, 447, 448

Benedetti, J.B., 贝内德蒂, J.B., 数学家, 406, 471

Benefices, 圣职

俗人授予, 47, 51

在苏格兰, 115—116

与西班牙王室, 257

Bengal, 孟加拉, 541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理查德, 学者, 449

Berg, duchy of, 贝格公国, 317

Bergen, Book of, 《贝尔根书》, 83

Bergerac, Peace of, 贝尔热拉克和议, ‘国王和议’, 293

Berlaymont, count of, 贝尔莱蒙伯爵, 265, 271

Berrio, Hernando de, 贝里奥, 埃尔南多·德, 特立尼达总督, 508, 526

Berwick, Treaty of, 贝里克条约, 215

Besson, Jacques, 贝松, 雅克, 机械师, 455, 466注

Beza, Theodore, 贝扎, 狄奥多尔, 加尔文主义者, 90, 95, 96

 《行政官员对其属民的权利》, 97, 500

 强调加尔文的教规, 108, 117, 122

 任命牧师, 282

 他的国家理论, 500, 501, 502

Bible, the, 圣经

 路德宗教义之源, 67, 97

 在阿尔特胡修斯的著作中, 99

 向苏格兰传播, 112

 翻译, 390, 441

 解释, 462, 483—484, 487

 参见New Testament条

Bijapur, 比贾布尔, 540, 545

Bilbao, 毕尔巴鄂, 158

Billingsley, Sir Henry, 比林斯利爵士, 亨利, 学者, 456, 476 注①

Bills of exchange, 流通汇票, 31, 43

Bilson, Thomas, 比尔逊, 托马斯, 主教, 论及真正的教会, 494, 498

Bion, 彼翁, 诗人, 著作的版本, 446

Biondo, Flavio, 彼翁多, 弗拉维奥, 历史学家, 443

Biringuccio, 比林古乔, 著《论烟火制造》, 428

Biron, Charles de Gontaut, duke of, 比隆公爵, 沙尔·德·贡道, 法国元帅, 阴谋, 316

Bishoprics, 主教职位

新的, 在尼德兰, 266, 269

出售, 在法国, 281

帝国的王子主教, 337—343

三主教职, 见Metz, Toul, 和Verdun条

Bishops, 主教

枢机主教波尔论及, 45

义务与权限, 47, 49

授住, 51, 337, 389

伊丽莎白时代早期, 107—108

有名无实的(苏格兰), 117, 118

布朗论及, 493

Bishops' Bible, 圣经主教译本, 441

Black, David, 布莱克, 戴维, 圣安德鲁斯学院牧师, 118—119

‘Black Acts’, ‘黑色法令’, 118

Black Forest, 黑森林, 328

Black Sea, 黑海, 355, 396

Blaeu, Willem, 布勒乌, 威廉, 绘图师, 470—471

Blanche of Castile, 卡斯提尔的布朗歇, 285

Blekinge, 布莱金厄, 省区, 406, 407

Blois, 布卢瓦, 286, 293, 301

 条约, 288

Blood, 血液, 循环的发现, 449, 472—473

Blundeville, Thomas, 布伦德威尔, 托马斯, 作者, 470

Boccalini, Trajano, 博卡利尼, 特拉加诺, 讽刺作家, 256

Bochnia, 博赫尼亚, 附近的盐矿, 399

Bocskai, Stephen, 博奇考伊, 斯蒂芬, 在特兰西瓦尼亚, 363, 364

Bodin, Jean, 博丹, 让, 政治哲学家, 12, 22, 132, 138, 445, 449, 483, 497, 502, 505

 辩论, 与马尔斯特罗瓦, 18, 19, 29

 所著《共和六书》, 486, 489, 505, 506

 所著《西普塔普罗梅赫》, 486—487, 489, 490

 论及政体形式, 503—504

Boguszewski, Krzysztof, 博古谢夫斯基, 克里斯托弗, 艺术家, 403

Bohemia, 波希米亚

 新教在这里, 121, 156, 323—324, 326

 王室, 260, 319, 321

 国王, 作为选帝侯, 327

 金属生产, 333

 教育, 450

Bohemian Brethren, 波希米亚兄弟会, 59, 121, 323, 390
 在波兰, 390, 391

Bohemian confession, 波希米亚信纲, 121

Bohus, 布胡斯, 此处的城堡, 420

Bohuslän, 布胡斯, 省区, 406

Bojanów, 博卡诺夫, 路德宗学院在此, 390

Bokhara, 布哈拉, 556

Boleyn, Anne, 博琳, 安娜, 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 211

Bologna, 波伦亚
 特伦托会议转移至此, 46
 协议, 53
 大学, 439

Bolognetti, 波罗涅提, 教皇使节, 389

Bombelli, Raffaello, 博姆贝利, 拉菲罗, 数学家, 458

Bonaparte, Napoleon, 波拿巴, 拿破仑, 332

Bonn, 波恩, 343

Books, 书籍, 贸易, 440

Bordeaux, 波尔多, 282

Borgia, St Francis, 博尔吉亚, 圣方济各, 55

Boris Godunov, 鲍里斯·戈东诺夫, 莫斯科沙皇, 418

Borneo, 婆罗洲, 541

Borromeo, St Charles, 博罗梅奥, 圣卡洛, 枢机主教, 米兰大主教, 48, 64—65
 向王权挑战, 258—259

Borromeo, Federico, 博罗梅奥, 费德里克, 米兰大主教, 259

Borzymowski, Wojciech, 波尔茨莫夫斯基, 沃伊采赫, 艺术家,
403

Bosnia, 波斯尼亚, 拉齐, 360, 361

Botany, 植物学, 439, 454, 471—472, 473

Botero, Giovanni, 博特鲁, 乔万尼, 论战争, 172, 175

Bothwell, James Hepburn, earl of, 博思韦尔伯爵, 詹姆斯·
赫伯恩, 218, 224, 227, 229

与玛丽·斯图亚特, 226, 228

Botniensis, Nicolaus Olai, 波特尼昂西斯, 尼古劳斯·奥赖,
瑞典教士, 87, 88

Bouillon, 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ne, duke of, 布永公
爵, 奥弗涅的图尔的亨利

阴谋, 316

Boulogne, 布洛涅, 亨利八世占领, 210

Bourbon, Anthony of, king of Navarre, 波旁, 安东尼, 那瓦
尔的国王, 92, 94, 220, 221, 283

死亡, 221, 286

Bourbon, Charles, cardinal of, 波旁, 沙尔, 枢机主教, 提出
王位要求, 295, 300, 302, 303

死亡, 305

Bourbon, House of, 波旁家族, 132, 138, 216, 220, 283

Bourbon, Louis de, 波旁, 路易斯·德, 见Condé, prince of条
Bourbourg, 布尔堡, 此处的英—西会谈, 154—155

Bourges, 布尔日

国事诏书, 51, 53

加尔文教会进入, 92

围攻，189

在此传授法律，440

Bourgoing, Francis, 布尔古安，弗朗西斯，学者，449

Bourne, William, 伯恩，威廉，学者，467

Bows and arrows, 弓箭，废弃，174，188

Boyars (Russian nobles), 波雅尔（俄国贵族），418，419

Boyle, Robert, 玻意耳，罗伯特，物理学家，478

Brabant, 布拉班特，省区，103

赋税264，272

天主教，266，313

三级会议，275—276

城镇，277

国际军队进入，280

避难者离开，297

Bragadino, Marco, 布拉加第诺，马可，炼金术士，1

Braganza, João, duke of, 布拉干萨公爵，若昂，248

Brahe, Tycho, 布拉赫，第谷，见Tycho Brahe 条

Branca, Giovanni, 布兰卡，乔万尼，建筑师，456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加尔文主义进入，120

侯爵，选侯，327，329，337，395

私人顾问，331

吞并诸侯—主教领地，338

霍亨索伦家族，343

Brandenburg-kulmbach, 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 338

Braniewo, 布拉涅沃, 传教士学院, 389

Braun, Konrad, 布朗, 康拉德, 法学家, 168

Brazil, 巴西, 508, 534

Brazil-wood, 巴西苏木, 508

Brederode, Henry count of, 布雷德罗德伯爵, 亨利, 269, 270

Bremen, 不来梅, 120, 334

 大主教区, 343

Brenz, Johann, 布伦兹, 约翰, 路德宗改革家, 79

Brès, Guy de, 布雷斯, 居伊·德, 加尔文主义者, 101

Bresse, 布雷斯, 317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联合协议, 59

 人口, 380

 东正教会议, 390

 圣经, 390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兄弟会, 431

Brewster, David, 布鲁斯特, 戴维, 《自然法术书信集》, 478

Briggs, Henry, 布里格斯, 亨利, 数学家, 458, 470

Brill (Zeeland), 布里尔 (西兰)

 海上乞丐占领, 103, 273, 289

 用做英国基地, 295

Brisson, Barnabé, 布里松, 巴尔纳贝, 法务院长, 305

British Isles, 不列颠群岛, 内部动乱, 欧洲政治, 209—233

Brito, Philip de, 布里托, 腓力·德, 沙廉总督, 547

Brittany, 布列塔尼

 英国人远征, 175, 308

 西班牙军队进入, 305, 308

Broadsides, 舷侧, 海战中, 202, 203, 204

Brodnica, 布罗德尼察, 王室领地, 392

Brody, 布罗迪, 地毯产地, 399

Brotherhood of the Assumption (Orthodox), 升天兄弟会 (东正教), 450

Brouage, 布鲁阿日, 盐产地, 531

Browne, John, 布朗, 约翰, 《阿维佐商人》, 428

Browne, Robert, 布朗, 罗伯特, 分离主义者, 492—493

Brownists, 布朗主义者, 124, 492

Bruce, Robert, 布鲁斯, 罗伯特, 爱丁堡牧师, 119

Bruges, 布鲁日, 272, 277

Brully, Pierre, 布律依, 皮埃尔, 加尔文宗牧师, 100—101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乔达诺, 学者, 442, 460, 461, 462

Brusa, 布鲁萨, 地区, 374

Brussels, 布鲁塞尔, 149, 235, 269, 317, 341

 惩治, 271

 反叛, 276, 277

 被帕尔马攻陷, 280

Bucer, Martin, 布塞尔, 马丁, 宗教改革家, 100, 106

Buccleugh, Lady, 巴克罗芙小姐, 228

Buchanan, George, 布坎南, 乔治, 加尔文宗教师, 431, 444, 505, 506

《侦破》, 231

《苏格兰陪审员的权力》, 502—503

Buda, 布达, 360, 362, 363, 364

土耳其人进入, 319, 361

Buddhism, 佛教, 57, 551

Budny, Simon, 布德尼, 西蒙, 神学家, 441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508—509

Bugenhagen, Johann, 布根哈根, 约翰, 宗教改革家, 76

Bugey, 比热, 317

Bulls, 敕令, 见papal bulls条

Bullinger, Heinrich, 布林格, 亨利希, 宗教改革家, 81, 95, 100, 444

Bullion, 金银块, 进口, 在塞维利亚, 25

参见Gold; Silver; Spain条

Bure, Idelette de, 比尔, 伊德丽特·德, 加尔文之妻, 100

Bureaucracy, 官僚体制, 141—147

Burghley, William Cecil, baron of, 伯利男爵, 威廉·塞西尔, 142, 146, 222

论服兵役, 176, 193

其政策, 214, 230, 231

支持黎凡特公司, 557

Burgundy, 勃艮第, 150, 320

三级会议, 315

Burma, 缅甸, 541, 547, 557

Byczyna, 贝奇纳, 战役, 385

Bydgoszcz, 比得哥什, 人口, 380

Byrd, William, 伯德, 威廉, 作曲家, 13

Cacafuego, 卡卡夫戈, 夺取之, 521

Cadiz, 加的斯

 德雷克袭击, 299

 埃塞克斯远征, 308, 535

 护航舰队被消灭, 523

Caen, 卡昂, 埃尔贝被围困于此, 221

Caesar, 恺撒, 军人对他的研究, 193; 学生对他的学习, 435

Cairo, 开罗, 香料贸易通过

Caithness, George Sinclair, earl of, 凯斯内斯伯爵, 乔治·辛克莱, 216

Caius, John, 凯厄斯, 约翰, 学者兼医生, 439, 474

Calais, 加来

 英国丧失, 154, 213, 220, 221, 236

 西班牙夺取与放弃, 308

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巴尔卡的卡尔德隆, 佩德罗, 66, 243—244

Calendar, 历法, 修订, 465—466

Calepino, Ambrogio, 卡莱皮诺, 安布罗焦, 辞典编纂人, 436

Calicut, 卡利库特, 王国, 545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509

Calivers, 火绳枪, 188, 192

Calvin, John, 加尔文, 约翰, 去世, 11, 72

关于不置可否论的论战, 78, 79

《原理》, 90, 91, 121, 499

与法国, 91, 92—93, 282, 286

与世俗权力, 95, 97, 155, 443, 499—500

与尼德兰, 100, 265

与英格兰, 106

与诺克斯, 114

《教理问答》, 121

与孔代, 284

与塞尔维特, 482, 483, 487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12, 89—122, 480

路德宗的排斥, 5, 59, 81, 83, 84

传播, 5—6, 8, 58, 80, 337

在尼德兰, 5, 6, 58, 100—106, 156, 234, 265—266, 269,
270, 274, 276, 277, 279, 280, 297, 307, 488

在德意志, 6, 100, 120, 280, 333, 334, 345

在苏格兰, 12, 88, 106—107, 112—120, 156

在法国, 52, 58, 90—97, 122, 131, 156, 281—286

在波兰, 59, 121, 390, 391, 393

在巴拉丁, 80—81, 82, 120, 334

在斯堪的纳维亚, 86, 88

在英格兰, 102—112

在波希米亚, 121, 323

在匈牙利, 121—122, 156, 326

好战精神, 155—156, 269, 282

批判, 458^[1]

Cambay, 坎贝, 海湾, 545

Cambrai, 康布雷

会谈, 149, 153

西班牙声称拥有主权, 295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剑桥大学, 439

卡特赖特在此, 108—109

惠特吉夫特在此, 109—110

此地的神学家, 111—112

诺克斯在此, 113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威廉, 古物专家及历史学家, 437,
445

Camoëns, Luis Vaz de, 卡缪思, 路易斯·范斯·德, 诗人,
249

Campeggio, Tommaso, 坎佩基奥, 托马佐, 费尔特雷主教, 45,
73

Canada, 加拿大, 530

Canals, 运河

帕尔马的, 从根特, 199

开凿建议, 408

Canara, 卡纳拉, 柚木来源, 537

Caninio, 卡尼尼奥, 学者, 449

Canisius, St Peter, 迦尼修, 圣彼得, 48—49, 54, 63, 326

Cannons, 火炮, 种类, 189—190

西班牙海军的, 204

Cano, Melchior, 卡诺, 梅尔乔, 多明我会士, 62, 66, 67

Canoes, 独木舟, 印第安人的, 531

Canonisation, 谥圣, 其标准, 70

Canter, Dirk, 坎特, 德克, 学者, 446

Canterbury, 坎特伯雷, 教区, 107

Canton, 广州, 543, 544, 552, 553

Capalupi, 卡帕卢比, 作者, 290

Cape San Antonio, 圣安东尼奥角, 518, 522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24, 366, 558

Cape Horn, 合恩角, 521

Capital, 资本

 开矿, 24, 296, 398

 波兰工业, 399

 香料贸易, 535

Capoche, 加普舍, 波托西历史学家, 513

Caprarola, 卡普拉罗拉, 197

Caracas, 加拉加斯, 508

Caraffa, Gian Pietro, 加拉法, 基安·彼得罗, 见Paul IV条

Caravels, 多桅快帆船, 537

Carberry Hill, 卡伯里山, 战役, 229

Carbines, 卡宾枪手, 192

Cardan, Girolamo, 卡丹, 吉罗拉莫, 数学家, 445, 453

Cardinals, 枢机主教, 会议, 50, 55, 61

Carew, Sir George, 卡鲁, 乔治爵士, 驻法国大使, 316

Caribbean Sea, 加勒比海

这里的印第安人, 54

商船私掠, 159, 160, 309, 516—517

贸易路线, 518

英国攻击, 520—521

Carithia, 卡林西亚, 省区, 319, 321

新教传入, 325

岁入, 361

Carlos, Don, 卡洛斯, 唐, 腓力二世之子, 221, 222, 239, 321

Carlowitz, Christopher, 卡尔洛维奇, 克里斯托弗, 埃拉斯都主义者, 76

Carmelite Order, 圣衣会, 54, 71

Carniola, 卡尼奥拉, 省区, 319, 321, 333

新教传入, 325

岁入, 361

Carpathian mountains, 喀尔巴阡山脉, 319, 398, 399

Carpets, 地毯

波兰的, 399

波斯的, 540

Carracks, 大帆船, 537, 551

Carranza, Bartolomé de, 卡兰萨, 巴托罗缪·德, 托莱多大主教

宗教审判, 62—63, 257—258

在英格兰, 257

Cartagena (Colombia), 卡塔赫纳 (哥伦比亚), 518, 519
 被德雷克袭击, 521, 522

Cartari, Vincent, 卡尔塔利, 文森特, 神话学家, 437

Cartazes (safe conducts), 卡尔塔斯 (安全通行证), 538

Cartier, Jacques, 卡蒂埃, 雅克, 探险家, 530

Cartography, 制图学, 397, 453, 455, 456, 466, 469—471

Cartwright, Thomas, 卡特赖特, 托马斯, 神学者, 117, 122, 493
 攻击主教制度, 108—109
 与惠特吉夫特的争论, 109, 439, 494
 入狱, 111

Casados (Portuguese settlers in India), 卡萨道 (葡萄牙在印度的移民), 537, 538

Casaubon, Isaac, 卡索邦, 以撒, 学者, 446

Casimir, John, 卡齐米尔, 约翰, 见John Casimir条
 ‘Casket Letters’, 首饰盒信件, 230

Caspian Sea, 里海, 355, 356
 土耳其人在附近的战役, 359

Cassander, George, 卡桑德, 乔治, 神学家, 86

Cassiopeia, 仙后座, 其中的一颗新星, 463

Castellion, Sebastian, 卡斯特利恩, 塞巴斯提安, 学者, 482, 485, 496
 反对宗教迫害, 482, 483, 484, 487—488

Castellorizo, 卡斯特洛里索, 353

Castelvetto, Lodovico, 卡斯特尔韦特罗, 洛多维克, 447

Castiglione, Baldassare, 卡斯蒂利奥内, 巴尔达萨尔, 外交家, 作者, 402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161, 237—238, 242—243, 264

法国工匠进入, 22

宗教裁判所, 23, 61

通货, 28, 29

赋税, 137, 138—139, 235

肥皂输出, 158

摩里斯科人移入, 247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副王职位, 240

与腓力二世, 249—250

Cataneo, Girolamo, 卡塔内奥, 吉罗拉莫, 论防御工事, 178

Catapults, 投石机, 攻城武器, 189

Cateau-Cambrésis, 卡托—康布雷奇, 条约, 2, 8, 139, 160, 209, 259, 267, 308, 516

其决定作用, 14, 16, 149, 154, 234

Catechisms, 教义问答, 诺埃尔的, 学校用, 434; 阿里乌, 391

Catechismus Romanus, 罗马教义问答, 50

‘Cathay’, 中国, 524—525, 556

Cathay Company, 中国公司, 524

Cathedrals, 主教座堂, 俗人控制 (德意志), 51—52

Catherine (Jagiellon), 凯瑟琳 (亚盖沃)

约翰三世的妻子, 86, 382, 406, 411

西吉斯孟·瓦萨的母亲, 383

Catherine de Medici, 卡特琳·德·美第奇, 法国王后

在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中, 8, 63, 289—290

与吉斯家族, 94, 295

作为摄政王, 95, 132, 216, 285

与阿尔发会晤, 154, 222, 225, 287

调解过程, 220, 235, 285—286, 292, 293

驱逐英国人, 221—222

商讨婚姻事宜, 288

影响的结束, 301

死亡, 302

Catherine of Poland, 波兰的凯瑟琳, 瑞典的约翰三世的妻子,

86

Catholic League (France), 天主教联盟 (法国), 122, 292—293, 295, 301—305

外国盟友, 6, 7, 59, 60, 300

反对宗教宽容, 122

利益相悖, 234, 306, 316

Catholicism, 天主教, 44—71

与加尔文主义, 6, 8, 156—157

在波兰, 6, 388—390, 391, 392, 393

特伦托会议上的, 8, 12, 44—46, 86—87

在西班牙, 8, 12, 54—55;

在西属美洲, 54, 56—57, 507, 510, 514—515

在德意志, 8, 51—52, 58, 59, 83, 337—344, 345

在英格兰, 12, 60, 493

在法国, 52—53; 参见Catholic League条

在尼德兰, 59, 266, 269, 270, 273, 276, 277, 280, 292

在瑞典, 60, 86—87, 412, 414, 415

在苏格兰, 60, 113, 116, 216—217, 218

中世纪的, 64, 85, 166, 482

在意大利, 263

在帝国, 320, 323, 325—326, 329, 335

与英国和土耳其贸易, 369

参见missionaries条以及具体的宗教团体

‘Cato’, 加图, 作品在学校中, 434, 435

Cattle, 家畜, 饲养, 398, 400, 401, 507, 513

Caucasians in Persia, 波斯的高加索人, 357, 374

Caucasus mountains, 高加索山脉

土耳其与波斯的争夺, 355, 358, 374, 375

俄国人挺进, 355

奥斯曼的统治, 375

Cavaleriis, de, 卡瓦来利斯, 德, 古物专家, 448

Cavalry, 骑兵, 182, 184, 191—192, 195

Cayet, Palma, 卡耶, 帕尔马, 学者, 449

Cayman island, 开曼群岛, 522

Cebes, 西比斯, 作品在学校中, 437

Cebu (Philippines), 宿务 (菲律宾), 553

Cecil, Robert, earl of Salisbury, 塞西尔, 罗伯特, 索尔兹伯里伯爵, 129, 142

Cecil, William, 塞西尔, 威廉, 见Burghley 条

Cellini, Benvenuto, 切利尼, 班维努托, 自传, 445

Cellorigo, 塞洛里戈, 经济学家, 312

Cereals, 谷物, 见grain 条

Cerigo, 凯里戈, 354

 Çerkes tribes (Caucasus), 吉尔吉斯部落 (高加索), 359

Cervantes, Miguel de, 塞万提斯, 米盖尔·德, 小说与剧本作者, 13, 252

Cesalpino, Andrea, 切萨皮诺, 安德烈亚, 自然主义者, 441, 473

Ceylon, 锡兰, 葡萄牙人征服, 537, 546

Chablais, 沙布莱, 63

Chaldean, 迦勒底, 教长们, 549

Chambre ardente, 火焰法庭, 92

Champagne, 香槟, 洛林公爵对王国提出要求, 305

Champlain, Lake, 尚普兰, 湖, 531

Champlain, Samuel de, 尚普兰, 撒母耳·德, 探险家, 431

Chancellor, Richard, 钱塞勒, 理查德, 航海家, 北海航行, 17, 556

Channel, the English, 英吉利海峡

 作为西班牙海路, 27, 209, 317

 海盗, 296

Chao-Ch' ing, 肇庆, 553

Chapuys, Eustache, 加佩斯, 优斯泰奇, 西班牙使节, 157

Charcas, 查尔卡斯, 王室诉讼法庭所在地, 511

Charlemagne, 查理曼, 57, 149

Charles V，查理五世，皇帝，152—153，237

广泛地参与，1，150

分割遗产，2，48，237，319，320—321

被萨克森的莫里斯打败，37，77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44，45

与路德宗，58，75，77

与英格兰，152—153，157，210

Charles I，查理一世，英格兰国王，137，148

Charles VIII，查理八世，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150，153

Charles IX，查理九世，法国国王，289，385

未成年时，95，216，285

对让渡官职的行为征税，142

与玛丽·斯图亚特，221

死亡，292，384

Charles X，查理十世，法国国王，见Bourbon，Charles条

Charles IX，查理九世，瑞典国王，88注，147，417—420，422

作为摄政王，87—88

死亡，292，421—422

作为南曼兰公爵，406，410，412，414，415—416

建立哥德堡，420

Charles，查理，施蒂里亚大公，211，321，325，336

Charles Emmanuel I，夏尔·埃马纽埃尔一世，萨伏依公爵，
260，301，305，317

Charles Philip，查理·腓力，瑞典查理九世之子，420，423

Charles the Bold，大胆查理，勃艮第公爵，在特里尔，152

Charters for colonisation, 殖民特许证, 529

Charts, 图表, 456, 469—471

‘Chase-about Raid’, 到处追捕, 225, 226

Chasseneuz, 沙斯诺, 政治理论家, 135

Châteauneuf, Claude l’ Aubespine, seigneur de, 沙托纳夫大人, 克劳德·劳比斯潘, 法国大使, 162

Châteillon, Sébastien, 夏泰永, 塞巴斯提安, 教师, 435

Châtelherault, James Hamilton, 沙泰勒罗公爵, 詹姆斯·汉密尔顿, 151, 213, 224

Châtillon, cardinal de, 夏蒂永, 枢机主教, 见Coligny, Odet de条

Chaul, 焦尔, 保卫, 545

Chauvin, 沙文, 殖民者, 530

Cheçiny, 亨齐内, 矿区, 399

Chemistry, 化学, 454, 474

Chemnitz, Martin, 克姆尼茨, 马丁, 路德宗神学者, 82, 84

Chenkiang, 镇江, 544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525, 527

Chevallier, Antoine, 谢瓦利埃, 安东尼, 学者, 448

Chile, 智利, 507, 509

China, 中国

贸易, 17, 534, 538, 541, 543—545, 554—555

欧洲钱币输入, 28

人口, 32

明朝皇帝, 164, 543, 544

耶稣会进入, 552—553
与菲律宾, 554
Chittagong, 吉大港, 541, 547
Chivalry, 骑士, 法庭, 167
Chocim, 霍京, 战役, 396
Chodkiewicz, Charles, 肖德基耶维奇, 查尔斯, 388
Christendom Latin, 拉丁基督教世界
 习惯法, 166
 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168
 与伊斯兰教的边界, 322
Christiam I, 克里斯提安一世, 萨克森选帝侯, 333
Christian II, 克里斯提安二世, 萨克森选帝侯, 未成年, 333
Christian II, 克里斯提安二世, 丹麦国王, 406, 408
Christian III, 克里斯提安三世, 丹麦国王, 406—407, 409
Christian IV, 克里斯提安四世, 丹麦国王, 420—422
Christina of Hesse, 黑森的克里斯蒂娜, 408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夫, 符滕堡公爵, 82
Chronicles, 编年史, 444
Chrysostom, St, 圣克里索斯托, 作品在学校中, 437
Church and State, 教会与国家, 12, 51—54, 60—61, 105, 155, 258—259, 307, 480—506
 对于路德宗, 85
 对于加尔文宗, 95, 97, 118, 155, 443
Church of England, 英格兰教会, 12, 493, 495, 499; 参见 Supremacy, royal 条

Church, Orthodox, 东正教会, 见Orthodox条下

Cicero, 西塞罗, 罗马演说家, 172, 403, 435, 其作品在学校中, 435

Ciceronianism, 西塞罗主义, 447

Çildir, 彻尔德尔湖, 附近的战役, 358

Cilicia, 西利西亚, 374

Circassia, 切尔卡西亚, 357, 359

Circles (security organisations in empire), 连环(帝国治安组织), 330

Cities, 城市

- 人口与增长, 33—34, 35, 127—128
- 胡格诺派的避难城, 97, 288, 292, 313
- 防御工事, 197, 345
- 帝国的自由城市, 328, 337, 344—345
- 波兰的城市人口, 380

Clairac, 克莱拉克, 宗教会议, 282

Classical studies, 古典研究, 446—447

Classis movement, 长老监督会运动, 110, 111

Clavius, Christopher, 克拉维乌斯, 克里斯托弗, 数学家, 458

- 与历法, 465

Clement VIII (Aldobrandini), 克莱门特八世(阿尔多布兰迪尼), 教皇, 69, 259, 304—305

- 赦免亨利四世, 307, 314

Clément, Jacques, 克列门特, 雅克, 刺杀亨利三世者, 303

Clenardus, 克莱那杜斯, 语法学家, 437

Clergy, 教士

教育和训练, 49, 64, 65, 325, 429

作为行政人员, 49, 141, 147

在德意志, 58

纳税, 在法国, 137—138

国家控制, 在威尼斯, 263; 在帝国, 323; 在葡属印度, 538

在波兰, 379, 389

在西属美洲, 514

Cleves, 克莱沃, 公国, 317

Clocks, 钟表

生产, 399, 454

在航海中, 466

Cloth, 呢绒, 38—39, 40, 41

西班牙的, 26—27, 38

英国的, 38, 39, 40, 158, 211, 262, 269

威尼斯的, 38, 39, 40, 41, 262

荷兰的, 40, 41, 262, 269

意大利的, 256, 262

法国的, 262

波兰的, 398, 400, 402

欧洲的, 在亚洲, 544, 557

Cloth staple, 呢绒主要贸易中心, 英国的, 269, 288

Cloth of Gold, Field of, 金衣原野, 152

Cloves, 丁香, 葡萄牙人从事贸易, 535, 538, 541, 542, 参见
Spices条

Clowes, William, 克洛斯, 威廉, 外科医生, 473, 474, 475

Coahuila, 科阿韦拉, 507

Cochin, 科钦, 537, 548, 549

 主教区, 547

Coelho, Gaspar, 科略埃, 加斯帕尔, 耶稣会士, 552

Cognac, 科尼亚克, 胡格诺派驻防, 288

Coimbra, 科英布拉

 大学, 66

 传教士学校, 548

Coinage, 币制, 28, 29, 30; 银币, 24, 27

 英格兰的改革, 10

 在奥斯曼帝国, 29—30, 370, 371

Coiter, Volcher, 科伊特, 沃尔克, 解剖学家, 472

Coke, Sir Edward, 科克, 爱德华爵士, 法官兼作者, 446

Colet, John, 科利特, 约翰, 教务长, 433

Coligny, Gaspard de, 科利尼, 加斯帕尔·德, 海军上将, 95, 220, 273, 508

 死亡, 8, 63, 289, 290

 皈依新教, 92

 作为胡格诺派首领, 284, 286, 287, 288

Coligny, Odet de, 科利尼, 奥代·德, 枢机主教, 92, 220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439

Collège de Guyenne, 吉耶讷学院, 430, 431

Colleges, 学院, 建立与发展, 389, 430

Collegium Germanicum, 日耳曼学院, 在罗马, 325

Collegium Regium Stockholmense, 斯德哥尔摩神学院, 86

Colloques, 协商区, 胡格诺派的, 282

Colloquies, 对话, 为学校所用, 434—435

Cologne, 科隆, 8

 大学, 66

 主教区, 266, 327, 338;

 战争, 320, 336, 340—343, 345

 耶稣会学院, 340, 341

Colombo, 科伦坡, 546

Colonies, 殖民地, 10, 16, 17, 43, 55

 西班牙的, 17, 196, 237, 507—523, 532, 554—556

 葡萄牙的, 249, 508, 537—538

 法国的, 508, 530—532

 英国的, 523—530

Colonna, Marc Antonio, 科隆纳, 马可·安东尼奥, 西西里副王, 240, 253—254

Colonna family, 科隆纳家族, 253

Columbo, Realdo, 科伦波, 雷尔多, 医生, 472

Commandino, Federigo, 科曼迪诺, 费德里戈, 数学家, 455, 457

Commendone, Giovanni, 科敏顿, 乔万尼, 教皇使节, 341

Comenius (Jan Amos Komenský), 科门纽斯 (简·阿莫斯·科门斯基), 390

Comes, Natalis, 科梅斯, 纳塔利, 神话学者, 437

Comets, 彗星, 463, 464

Communes, Philippe de, 科米纳, 腓力·德, 国家人员, 历史学家, 152

Commons, House of, 下议院, 见Parliament条

Communications, 交通状况, 128

哈布斯堡王朝的体系, 242

Communion in both kinds for the laity, 俗人饼酒同领的圣餐, 48, 73, 324, 329

Como, 科莫, 作为纺织业中心, 256

Companies, 公司

管理与合股, 43, 367

军队组织, 184—185

得到殖民特许, 529

Compass, 罗盘, 468—469, 477

Compositio inter status (Poland), 地位互占法 (波兰), 393

Compostela de la Guadalajara (Mexico), 孔波斯特拉·德·拉·瓜达拉哈拉 (墨西哥), 银矿区, 25

Compromise (Netherlands League), 妥协 (尼德兰同盟), 269—270

Comuneros (Spain), 康姆尼洛斯 (西班牙), 243

Conciliar Movement (fifteenth century), 教会会议运动 (十五世纪), 53

Concord, Book of, 条款书, 83

Concord, Formula of, 教义条款, 83—84, 85, 86, 120, 333

Condé, Henry, prince of (i), 孔代亲王 (ii), 亨利, 290, 291

Condé, Henry, prince of (ii), 孔代亲王 (ii), 亨利, 317

Condé, Louis de Bourbon, prince of, 孔代亲王, 路易·德·波旁, 胡格诺派首领, 94, 220—221, 225, 284

被捕与获释, 285

在第一次内战中, 286, 287

死亡, 288

Conestaggio, I. de Franchi, 科内斯塔基奥, I. 德·弗朗基, 历史学家, 248

Confessio Belgica, 比利时信纲, 101, 104, 105

Confession, Scottish, 苏格兰信纲, 116, 216

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 基督教义协会, 65

Confucianism, 儒家思想

Congregatio Germanica, 德意志信徒会议, 在罗马, 325

Congregation, 会议

最高法院枢机主教的, 50; 参见Inquisition条

禁书目录的, 50

传信的, 55

咨询的, 69

奥拉托利的, 70

‘Congregation, Lords of the’, 圣约同盟长老团, 113, 114, 213—214, 216, 234

Congregationalism, 教会会议至上主义, 107

Congresses, diplomatic, 外交机构, 151—152, 153

Connaught, 康诺特, 此地的起义, 309

Conquista, 征服, 北非, 354

Conquistadores, 征服者, 54, 507, 509—510

Conscience and Military Orders Board of (Lisbon), 道德军纪局 (里斯本), 533

Consensus Tigurinus (1549年), 蒂古里诺协议 (1549年), 81, 95

Consistories, 宗教法庭, 加尔文宗的, 110

Constance, 康斯坦茨, 会议, 与胡斯, 46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门德斯家族在这里, 31

 人口, 33, 34

 造船主, 205

 总主教区, 389

 参见Istanbul条

Constitutions, 政体, 关于其形式的讨论, 503—505

Consubstantiation, 同体论, 教义, 441

Consulage, 领事权, 得到, 367

Contarini, Gasparo, 孔塔里尼, 加斯帕罗, 枢机主教, 47, 105, 263

Contarini, Nicolò, 孔塔里尼, 尼古洛, 威尼斯政治家, 261, 263

Contracts, 合同

 军事的, 208

 香料的, 535

Conversos (Spain), 改宗 (西班牙), 61

Convocations, ecclesiastical, 教士会议, 108

Convoy system, 护航制度, 516, 518—519

Coolhaes, Gaspard, professor, 柯莱, 加斯帕尔, 教授, 104

Cooper, Thomas, 库珀, 托马斯, 字典编纂者, 436

Coornaert (Coornhert), Dirck Volckerstzoon, 科尼尔特 (科恩赫特), 德尔克·沃尔克斯宗, 政治家及神学家, 105, 488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哥本哈根大学, 463

Copernicus, Nicolaus (koppernigk), 哥白尼, 尼古拉 (哥白尼), 天文学家, 459—462

著《天体运行论》, 439, 453

Copper, 铜, 39, 540

用于铸币, 30

蒂罗尔的, 321

英国的, 368

波兰的, 401

瑞典的, 404, 412, 424, 426

匈牙利的, 533, 534

日本的, 544

Coptic church, 科普特教会, 165

Cordier, Mathurin, 科迪埃, 马图林, 加尔文主义者, 431, 435

Córdoba (Argentina), 科尔多瓦 (阿根廷的), 508

Córdoba (Spain), 科尔多瓦 (西班牙的), 其纺织品, 27, 38, 39

Córdoba, Gonzalvo de, 科尔多瓦, 贡萨尔沃·德, 西班牙将领, 150

Coromandel (India), 科罗曼德尔 (印度的), 541, 543

Coronado, Francisco Vasquez de, 科罗纳多, 弗朗西斯科·瓦斯克斯·德, 探险家, 507

Corpus Christianum, 基督教徒大家庭, 观念, 361

Correa, Gaspar, 科里阿, 加斯帕尔, 编年史家, 著有《印度传奇》, 532注

Corsica, 科西嘉, 209

Cortes, 议会

卡斯蒂利亚的, 138—139, 243, 308

阿拉贡的, 139, 250

其衰败, 147—148

葡萄牙, 248

Cortés, Hernando, 科尔特斯, 赫尔南多, 西班牙军人, 507, 509, 510, 515

Coruña, 科鲁尼亚, 英国人登陆, 9

Cosmography, 宇宙结构学, 研究, 437

Cossacks, 哥萨克, 396, 557

在波兰军队中, 397

东移, 556

Cossists (algebraists), 代数学者们, 458

Cottons, 棉花, 印度的, 539, 540, 541, 544

Councils, 委员会 (或译作“会议”)

血腥 (恐怖), 1, 6, 102, 271, 291

教会, 44—50, 465; 参见Trent, Council of条; 西班牙人的, 西印度群岛的, 56, 511; 阿拉贡的, 佛兰德的, 意大利的, 238; 葡萄牙的, 239, 533

十人 (威尼斯的), 263

国务 (尼德兰的), 275—276, 297; 英国人在其中的席位, 294, 298

十八人（尼德兰的），277，278

瑞典的，407，414，415，416，417，422

Counter-Reformation，反宗教改革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44—54

 进展，59—71，121，325—326，334—346，404，412

 与外交，155—163

Counter-Remonstrants，反对抗议宗，105

Courland，库尔兰，377，423

Court and Country，宫廷与国家，英国，145

Courts，法庭

 最高委员，6

 宗教的，166，379

 海事，167

 骑士，167

 帝国，329—330

 上诉（波兰），387

Couto, Diogo de，库托，迪奥戈·德，历史学家，536注，540注

Coutras，库特拉，战役，300

Coxe，考克斯，船长，航海者，204

Cracow，克拉科夫

 此地的价格，22

 人口，377，380

 亨利加冕，384

 扎莫伊斯基救援，385

主教区, 388
大学, 389
宗教动乱, 392, 393
铸造场, 398
商路经过, 400, 405
Cranganore, 格朗格努尔, 方济各会在这里的学院, 549
Cranmer, Thomas, 克兰麦, 托马斯, 坎特伯雷大主教, 75
Crato, 克拉图, 其修道院长, 见Antonio条
Crécy, 克勒西, 战役, 173
Credit, 信贷, 发展及效果, 30—31, 42, 43
Crespin, Jean, 克雷斯潘, 让, 研究殉道者的史学家, 444
Cresswell, Joseph, 克雷斯韦尔, 约瑟夫, 天主教宣传家, 369
Crete, 克里特, 197
Crimea, 克里米亚, 356, 359
Croatia, 克罗地亚, 322, 360, 361
Croll, Oswald, 克罗尔, 奥斯瓦德, 药用化学的著述者, 474
Cromwell, Thomas, 克伦威尔, 托马斯, 埃塞克斯伯爵, 政务家, 147, 153, 231
Croquants (peasant rebels), 克洛堪 (农民起义者), 307
Croy, 克罗伊, 家族, 268, 278
Cruzada (tax), 圣战 (税), 259
Cuba, 古巴, 518
Cuenca (Spain), 昆卡 (西班牙), 其纺织品, 27, 38
Cujas, Jacques, 居雅斯, 雅克, 法学家, 446
《法典简要注释》的作者, 446

Culcardasi, 库尔卡尔达西, 奥斯曼帝国内, 366

Culverins, 炮, 189, 195, 204

Cumberland, George Clifford, earl of, 坎伯兰伯爵, 乔治·克利福德, 468, 522

Curaeus, Joachim, 库里乌斯, 约阿希姆, 路德宗神学家, 81—82

Curia, 朝廷, 教皇的, 44, 86

Curriculum, 课程, 学校的, 435

Customs duties, 关税义务

英国的, 136—137; 包税, 140—141

卡斯提尔与葡萄牙之间关税的取消, 248—249

在里斯本对香料的征课, 534

印度公司的收入来源, 538

马六甲的, 542

中国在澳门征收的, 543

Cuzco, 库斯科, 510

格列高利学院, 439

Cyprus, 塞浦路斯

被威尼斯割让给土耳其, 253, 354

土耳其人针对这里的战争, 262, 352—354

Czechs, 捷克人, 与帝国, 323

Czestochowa, 琴斯托霍克, 铁矿区, 398

Dacca, 达卡, 541

Dacre, Leonard, 戴克, 伦纳德, 反叛与失败, 233

Dāghistān, 达吉斯坦, 357, 358, 359

Dalarna, 达拉纳, 铜矿, 412, 424

Dale, Sir Thomas, 戴尔爵士, 托马斯, 弗吉尼亚元帅, 186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182, 353

Damão (India), 达曼 (印度), 540, 545

Dampier, 丹皮尔, 宗教会议, 549

Daneau, Lambert, 达诺, 朗伯, 教授, 104

Danture, 丹丘, 葡萄牙人败于此, 546

Danube, river, 多瑙河, 321, 396

土耳其人进犯, 360, 362—363

Danzig, 但泽, 377, 393, 400

人口, 380

贸易, 381, 384, 401, 405, 406

路德宗学院, 390

铸造场, 398

Darnley, Henry Stewart, earl of, 达恩利伯爵, 亨利·斯图尔特, 玛丽·斯图亚特之夫, 223—224, 226—227

死亡, 228—229

Dathenus, Peter, 达西努斯, 彼得, 荷兰布道师, 277, 278, 280

Dauphiné, 多菲内, 315

胡格诺派在这里, 282, 290, 314

Davis, John, 戴维斯, 约翰, 航海家, 467, 528

De Auxiliis (Congregation), 枢机主教 (咨询会议), 69

De las Casas, Bartolomé, 拉斯·卡萨斯, 巴托罗梅, 多米尼克会士, 55, 510, 555

De l' Aubespine, Claude, 德·劳比斯班, 克劳德, 法国国务秘书, 147

De l' Estoile, Pierre, 德·莱斯杜瓦尔, 皮埃尔, 论天主教同盟, 300, 302, 305

De la Gardie, Jacob, 德拉加尔迪, 雅各布, 指挥官, 419—420, 421, 422, 423

De la Gardie, Pontus, 德拉加尔迪, 蓬杜, 指挥官, 412

De l' Hôpital, Michel, 德·洛皮塔勒, 米歇尔, 大法官, 132, 174—175

温和政策, 284, 287, 489

De la Noue, François, 德拉努, 弗朗索瓦, 胡格诺派军人, 177, 182, 200注, 286

De la Ramée, Pierre, 德·拉·拉米, 皮埃尔, 见Ramus条

De la Renaudie, Godefroi, 德·拉勒诺迪, 戈迪弗鲁瓦, 95

De la Roche, 德·拉罗什侯爵, 殖民者, 530

Deacons, 执事, 加尔文宗的, 93, 101, 116, 156, 282

Decalogue, 十诫, 其绝对效力, 486, 490

Deccan, 德干, 此地的穆斯林苏丹们, 540, 550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年), 独立宣言 (1776年), 99

Declaration of the States (1581年), 诸省宣言, 见Act of Abjuration条

Dee, John, 迪伊, 约翰, 数学家和占星士, 320, 454, 461, 463, 525, 528

被征引, 456, 475—476

Del Monte, Guido Ubaldo, 德尔蒙特, 吉多·乌巴尔多, 数学家, 457

Deli Hasan, 德里·哈桑, 土耳其起义领导人, 373, 374

Delight, “快乐号”, 小艇, 204

Della Bella, Thomas, 德拉·贝拉, 托马斯, 艺术家, 403

Della Porta, J.B., 德拉·波尔塔, J.B., 论自然法术, 476, 477, 479

Delony, Thomas, 德洛尼, 托马斯, 被征引, 177

Demetrius, 德米特里, 伊凡之子, 394, 418

Demetrius, pseudo-, 伪德米特里, 394, 418, 419

Democracy, 民主政治, 503

在加尔文主义中, 93, 101, 107

Demosthenes, 狄摩西尼, 学校课程中, 437

Denmark, 丹麦

饥谨, 23

人口, 33

奥格斯堡信纲, 86

与瑞典的战争, 269, 408—411, 420—423, 425

与波兰, 384

要求厄塞尔岛, 405, 406

得到埃尔夫堡的赎金, 411, 423, 424

Denuntiatio electi regis (Poland), 《选举国王宣言》(波兰), 385

Deputationstag (Committee of Reichstag), 委员会(国会中的委员会), 329

Derbend, 杰尔宾特, 358, 359, 375

Dernbach, Balthasar von, 德恩巴赫, 巴尔塔扎·冯, 富耳达男修道院院长, 339—340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 勒内, 哲学家, 66, 459

Desembargo do Paço (Court of Appeal), 高等上诉法院, 里斯本, 533

Despauterius, 迪斯鲍特利乌斯, 语法学家, 433

Devaluation, 贬值, 银货币, 29 (表2)

Deventer, 代芬特尔, 298, 430

Devshirme (child tribute, Ottoman empire), 德伍希尔迈 (作为贡品的儿童, 奥斯曼帝国), 347, 348, 366

Deza, Pedro, 德萨, 佩德罗, 246

Dharmapala, 达马帕拉, 王子, 546

Dhū 'l-kadr, 祖伊卡德尔, 358

Dias, Bartholomeu, 迪亚士, 巴托罗缪, 航海家, 521

Dictionaries, 辞典, 436

Dieppe, 迪耶普, 114, 220

Diether (von Isenburg), 迪特尔 (伊森堡的), 大主教, 他的范文集, 437

Digges, Leonard, 迪格斯, 伦纳德, 数学家, 178, 428, 461

Digges, Thomas, 数学家, 171, 461, 463

Dillingen, 迪林根, 大学, 66, 439

Diophantus, 丢番图, 数学家, 其著作的译本, 458

Dioscorides, 迪奥斯科里斯, 植物学家, 439

Diplomacy, 外交, 2, 151—165

Discipline (Calvinist) of 1559, 1559年 (加尔文宗的) 教规, 93; 修订, 96

Discipline, Book of (Scotland), (苏格兰的) 《教规手册》

第一版, 115, 216, 218

第二版, 117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关于公共福利的对话》, 被征引, 18—19

Dissection, 解剖学, 439

Distilling, 酿酒坊, 在波兰, 398

Diu (India), 第乌 (印度), 537, 545

Diwan (Council of State Ottoman empire), 帝万 (奥斯曼帝国的国务会议), 348, 357

Diyārbekir, 迪亚巴克尔, 358, 375

Djerba, 杰尔巴, 西班牙人在此战败, 206

Dnieper, river, 第聂伯河, 401

Dogger Bank, 多格浅滩, 渔场, 38

Dominicans, the, 多明我修会

与耶稣会的竞争, 68

在波兰, 392

在亚洲和非洲, 548, 550, 553, 555

Don, river, 顿河, 356

Donato, Leonardo, 多纳托, 列奥纳多, 威尼斯国务活动家, 263

Donauwörth, 多瑙沃特, 8, 345

Dordrecht (Dort), 多德雷赫特 (多尔德)

宗教会议, 105

等级代表会议, 274

Doria family, 多里亚家族, 253, 257

Doria, Gian Andrea, 多里亚, 简·安德列阿, 海军将领, 202,

Douai, 杜埃, 耶稣会学院, 439

Douglas, Lady Margaret, 道格拉斯女士, 玛格丽特, 223

Douzain (coin), 杜赞 (钱币), 28

Dover, Straits of, 多佛海峡, 209

Drake, Sir Francis, 德雷克爵士, 弗朗西斯, 520—523, 525

劫掠活动, 160, 201, 294, 299

Drama, 戏剧, 13

反映战争, 172, 176

意大利的, 256

Drava, river, 德拉瓦河, 361

Drenthe, 德伦特, 省区, 279

Dreux, 德勒, 战役, 175, 221

Drill, 操练, 在军队训练中, 193, 194

Drots, 贵族高级总监, 官职 (瑞典的), 422

Du chesne, Joseph (Quercetanus), 杜·切尼斯, 约瑟夫 (克西塔努斯), 医生, 474

Du Haillan (Bernard de Girard), 杜·埃兰 (伯纳德·德·吉拉德), 作者, 504

du Moulin Charles, 杜穆兰, 查理, 96

du Roubay, 迪鲁贝, 苏格兰枢密大臣, 213

du Vair Guillaume, 杜·韦尔, 吉尧姆, 道德学家, 443

Dublin, 都柏林, 学院, 439

Duels, 决斗, 316

被特伦托会议所禁止, 171

Düna, river, 杜纳河, 见Dvina条

Dundee, 邓迪, 114, 217

Duplessis-Mornay, Philippe, 迪普莱西-莫尔内, 腓力, 99, 182

Durango (Mexico), 杜兰戈 (墨西哥), 银矿, 25, 507

Dutch, the, 荷兰, 见 Holland 条; Netherlands 条; United Provinces 条

Dvina, river, 德维纳河, 400—401, 418, 426

Dyes, 染料, 贸易, 515, 540

Dynamics, 力学, 471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 42, 311, 558

 英国的, 42, 43, 557

Easter, date of, 复活节, 465

Eastland Company, 东方公司, 401, 413

Eboli, prince of, 埃博利亲王, 见 Silva, Ruy Gómez de 条

Ebony, 乌木, 贸易, 539, 544

Ecclesiastical Causes, 宗教事务, 委员会, 110

Eck, Simon Thaddäus, 埃克, 西蒙·塔杰乌斯, 巴伐利亚枢密大臣, 335

Economics, 经济

 欧洲的, 14—43, 126—129

 波兰的, 379—381, 397—402

 斯堪的纳维亚的, 405—407, 412, 425—426

 美洲殖民地的, 511—514, 527—530

 印度公司的, 532—547

Edinburgh, 爱丁堡

新教徒占领, 115, 116

骚乱, 119

条约, 215, 216, 217, 219

Education, 教育, 427—440, 450—452

宗派主义的, 11, 12

在天主教复兴中, 65—69, 389

在日内瓦学院, 90

对于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来说教育的缺乏, 245, 247

Edward III, 爱德华三世, 英格兰国王, 163

Edward, IV, 爱德华四世, 英格兰国王, 152

Edward, VI, 爱德华六世, 英格兰国王, 106, 112, 155, 210

Egmont, Lamoral, count of, 埃赫蒙德伯爵, 拉姆拉尔, 尼德兰人首领, 102, 265, 267

在马德里, 268

向国王起誓, 270

被处死, 271

Eichstadt, 艾希城, 神学院, 65

‘Eighty Years War’, of Netherlands against Spain, 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 103

Eisengrein, Martin, 艾森格赖因, 马丁, 教士, 被征引, 58

‘El Dorado’, “金色王国”, 508

Elblag (Elbing), 埃尔布隆格 (埃尔宾), 393, 401

人口, 380

Elbœuf, Francis de Lorraine, duke of, 埃尔伯夫公爵, 弗朗西斯·德·洛林, 213—214, 221

Elders, 长老, 加尔文宗, 93, 101, 116, 156, 282

Electors (Empire), 选帝侯 (帝国的), 327, 328, 329

Electricity, 电, 477

Electroscope, 验电器, 478

Elephants, 大象, 贸易, 546

Elfsborg, 埃尔夫堡

被丹麦占领, 409, 423

瑞典赎买, 411, 424, 425

Eliot, Sir Thomas, 埃利奥特, 托马斯爵士, 辞典编纂者, 436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英格兰女王, 1, 154, 210—211, 235

与清教徒, 6, 108, 109, 114, 119

维护新教, 8, 222

俭约的行政管理, 129, 139, 148

与西班牙, 158, 211—212, 232, 308

其代理人, 162—163

婚事谈判, 211, 279, 280, 407, 408

与苏格兰, 214—215, 220

与玛丽·斯图亚特, 219, 221, 223—224, 230—231

与法国, 220—222

与尼德兰, 232, 289, 294, 295—298

截获阿尔发借到的款项, 232, 273

支持与黎凡特的贸易，367；支持与波罗的海的贸易，401；支持与东方的贸易，557

对天主教宣传的反应，369—370

世俗的世界观，491

Elizabeth of Valois，瓦卢瓦的伊丽莎白，腓力二世之妻，234，236，239，287

Elsinore (Helsingor)，埃尔西诺（赫尔辛格），411，420

Embassies，使节，151，156，325，556

常驻，153—154，156，165

礼拜堂问题，157—158

政治上的卷入，161—162

Embryology，胚胎学，472

Emden，埃姆登

教会，99，101—102

宗教会议，101

英国呢绒贸易中心移往此地，269

海上乞丐的基地，273

参见Friesland，East条

Emigration，移居，22，33，516，524，527—529

Emmanuel Philibert，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萨伏依公爵，259—260

Emperor (Holy Roman)，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权力与头衔，326—327

选帝侯，327—328

Empire (Holy Roman)，帝国（神圣罗马人的），149，319—416

土耳其人的威胁, 59, 150, 183, 319, 322; 与土耳其人的战争, 326, 360—365, 369

境内的宗教改革, 130, 314

同西班牙分离, 184

与波斯的交往, 355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443

Employment, 雇佣机会, 要求, 34

Encabezamiento (tax), 户籍税(税收), 137, 275

Encomiendas (grants), 委托(恩惠), 241, 514, 554

Engineering, 工程学, 454, 455—456, 478

England, 英格兰

经济, 5, 15, 16, 23, 126, 127, 128; 通货, 10, 28, 29; 人口, 33; 农业, 127

贵族与君主政治, 130—131; 行政管理与税收, 132—137, 144—145, 146—148; 出售职衔, 143

天主教, 12, 60, 493; 宗教变化, 59, 135, 212; 加尔文主义, 106—112; 加尔文宗避难者向这里, 280; 宗教与政治, 160, 491—499

王位继承的不稳定, 209—224

使节, 157—158, 367, 368; 与西班牙的关系, 158—159, 209—212, 232, 293—294, 295, 296, 299—301, 308—309, 317; 与苏格兰的关系, 210, 214—215, 219—220, 221—224, 230—233; 与法国的关系, 211, 212, 220—222, 288; 与尼德兰的关系, 232, 269, 273, 289, 294, 295—298; 在波罗的海充当中间人, 423

海军, 202, 203, 206, 214; 侵入加勒比海, 160, 517, 520—521; 航海术与制图学, 456, 466—469, 在美洲的殖民地, 523—530

贸易, 与西班牙, 158—159; 与地中海, 191, 367—368; 与土耳其, 368—370; 与波罗的海, 401, 406, 413; 与东方, 556—557

教育, 431—432, 450; 学术, 451, 461

参见Elizabeth I 条

Enns, river, 恩斯河, 319, 324

Enríquez, Martin, 恩利克, 马丁, 总督, 513

Enríquez family, 恩利克家族, 243

‘Enthusiasm’, “狂信主义”, 123

Épernon, Jean Louis de Nogaret, duke of, 埃佩尔农公爵, 让
• 路易斯 • 德 • 诺加利, 300—301

Epidemics, 流行病, 在欧洲, 23; 在美洲, 512, 514

Episcopacy, 监督制度

在英格兰, 106, 107

与苏格兰, 116—118

与加尔文, 121

Erasmianism, 伊拉斯谟主义, 62

在西班牙, 67, 244

在尼德兰, 297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狄赛德里乌斯, 学者及神学
家, 67, 79, 175, 265, 447, 448

与教育, 433, 434, 436, 437, 441

Erastianism, 埃拉斯都主义, 48, 54, 61

路德主义中的, 85, 89

Erastus, Thomas, 埃拉斯都, 托马斯, 神学家, 120

Erfurt, 爱尔福特, 大学, 66

Eric XIV, 埃里克十四, 瑞典国王, 86, 406—410, 417

其军队, 178, 183, 185, 410

其臂章, 409, 426

Erivan, 埃里温, 要塞, 358, 359, 375

Erlau, 埃劳, 要塞, 361

陷落于苏丹, 363, 365, 369

Ernest, 恩斯特, 大公, 394

作为尼德兰总督, 310, 394

Ernest, 恩斯特, 亲王(巴伐利亚的)科隆大主教, 336, 341—343

Errol, Francis Hay, earl of, 埃罗尔伯爵, 弗朗西斯·海, 118

Erskine, John, 厄斯金, 约翰, 212

Erzerum, 埃尔祖鲁姆, 355, 357; 作为奥斯曼人的基地, 358, 359, 375

Erzgebirge, 厄尔士, 矿产, 332—333

Escorial, 埃斯科里亚尔, 241

Escovedo, Juan de, 埃斯科韦多, 胡安·德, 唐·约翰的秘书, 250

Escudo (coin), 埃斯库斗(钱币), 28

Espejo, Eugenio, 埃斯佩霍, 尤金尼奥, 医生及探险家, 507

Espinoza, 埃斯皮诺萨, 枢机主教, 242, 243, 246

Esprinchard, Jacques, 埃斯普连夏, 雅克, 旅行家, 22

Essex, 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 罗伯特·德弗罗, 133

造反, 130

远征加的斯, 308

Estado da India, 印度公司, 532—538, 543, 545, 546, 547

Estates, 各个等级, 帝国内, 319, 320, 322, 326, 328, 332, 335

Estates General (France), 三级会议 (法国), 53, 94—95, 306, 315

与税收, 134—135, 137—138

在布卢瓦召开, 293, 301

Estienne, Charles, 埃蒂安纳, 查尔斯, 学者, 437

Estienne, Henri, 埃蒂安纳, 亨利, 语言学家, 448, 449

Estienne, Robert, 埃蒂安纳, 罗伯特, 学者, 436, 441

Estonia, 爱沙尼亚, 394, 405, 417

瑞典夺取, 408, 411, 413, 414

Estonians, 爱沙尼亚人, 381

Eternal, or Perpetual, Edict, 永久敕令, 103, 276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164—165

Eton, College, 伊顿学院, 433, 436

Eucharist, 圣餐

其中的真在论教义, 47, 74, 79, 80, 81, 85, 107, 441

与俗人, 48, 73, 324, 339

“象征”说, 79, 100

Euclid, 《欧几里得几何学》, 译本, 455, 456

Europe, 欧洲

经济, 14—23

社会与政治, 126—148

奥斯曼入侵的结束, 352

内部教育的差距, 450—451

文化的公布，451—452

Evora (Portugal)，埃武拉（葡萄牙的），大学，68

Execution of Justice in England, The (pamphlet)，《在英格兰实行宗教迫害的合法性》（小册子），492

Executionsordnung (security statute)，安全法令，330

Fabricius, Hieronymus, 法布里休斯，希伦尼谟，解剖学家，453, 472

Faith, 信仰

唯信得救的教义，46, 67, 72, 73, 78

其本质，483

Fajardo, Luis, 法哈尔多，路易斯，西班牙海军首领，523

Falkland, 福克兰，118

Famagusta, 法马古斯塔，353, 354

Familists, the, 家庭派，124

Famine, 饥馑，38

与物价，18, 23

在西属美洲，513, 514

Farnese, Alexander, 法尔奈泽，亚历山大，见Parma条

Farnese, Ottavio, 法尔奈泽，奥塔维奥，264

Fasti, 实录，罗马的，445

Fathers of the Church, 教父们，早期的，68, 437, 441

Fauchet, Claude, 福谢，克劳德，古物专家，444

Faust, 浮士德，454, 475

Faza, 法札，劫掠，545

Field, John, 菲尔德，约翰，《1557年日记》的作者，461

Ferdinand, 斐迪南, 大公, 321, 325

Ferdinand I, 斐迪南一世, 皇帝, 58, 320

继承, 2, 48, 319, 320—321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7, 51, 324

宗教政策, 80, 324—325, 335, 337—338

与土耳其订立条约, 322

建立新法庭, 330

起用避难者, 361

Ferdinand II, 斐迪南二世, 皇帝, 321, 325, 336

Ferdinand, 斐迪南, 阿拉贡的国王, 54, 61—62, 151

Ferhād Pasha, 费哈德帕夏, 360

Fernel, Jean François, 费内尔, 让·弗朗索瓦, 医生, 453,
472

Ferrara, 费拉拉, 教皇国的, 314

Ferro (Canaries), 费罗 (加那利群岛中的), 159

Feudalism, 封建主义

在英格兰的残余, 143—144

关于土地的, 东欧, 145

以战争为习的, 153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 352, 373

波兰的, 398

殖民地的, 510

‘Fifth column’, “第五纵队”, 7, 236, 237, 294

Figuerola, Cristobal, Suarez de, 菲格罗亚, 克利斯多巴尔·
苏亚雷斯·德, 国事活动家, 257

Figueroa family, 菲格罗亚家族, 243

Filmer, Robert, 菲尔默, 罗伯特, 政治著述者, 99

Fine, Oronce, 菲内, 奥隆斯, 与航海, 453, 466

Finland, 芬兰, 404, 406, 407

- 农民起义, 415—416
- 边境, 424
- 人口, 425

Finland, Gulf of, 芬兰湾, 405, 412, 416, 419, 424

Firearms, 火器, 182, 184, 188—192

- 引进的效果, 2, 9, 10, 11
- 在意大利战争中, 150
- 对其非难, 173
- 在攻城战中, 198—199
- 在波斯军中, 374
- 参见arquebuses, calivers, muskets, pistols条

Firlej, John, 弗利吉, 约翰, 波兰的少数派领导人, 382

Fish, 鱼

- 北海与纽芬兰渔场的, 38, 524, 525, 530
- 波兰的池塘喂养, 398, 400
- 干鱼, 挪威人的出口, 404
- 在俄国的贸易, 556

Fitch, Ralph, 菲奇, 拉尔夫, 商人, 557

Flacius Illyricus, Matthias, 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 马特西亚斯, 路德宗改革家, 76, 78, 80, 81, 448

Flanders, 佛兰德, 省区

加尔文宗信徒, 103, 270, 277, 297
议会, 238
税收, 264, 272
落入西班牙人之手, 280
莫里斯侵入, 310
保持天主教信仰, 313
Flax, 亚麻
 波兰的, 398, 401
 俄国的, 405, 406, 556
Fleming, Klas, 弗莱明, 克拉斯, 芬兰总管, 415
Flodden, 弗洛登, 战役, 210
Florence, 佛罗伦萨, 149, 162, 535
 议会, 50
 银行危机, 235
 美第奇家族的统治, 259, 260—261
Florida, 佛罗里达
 与西班牙, 509, 527
 法国人定居, 517, 519
Florida Channel, 佛罗里达海峡, 517, 519, 523
Florin, 盾, 28, 29
Flour mills, 磨坊, 在波兰, 398, 400
Flushing, 弗拉辛, 英军基地, 295, 297
Foists (ships), 轻便船只, 537
Fontana, Domenico, 丰塔纳, 多米尼克, 建筑师, 455—456

Forbes, John, 福布斯, 约翰, 加尔文主义者, 访问瑞典, 88

Formula of Concord, 教义条款, 见 *Concord, Formula of* 条

Formularies, 范文集, 437

Fort Jesus, 耶稣堡, 蒙巴萨, 545

Forth, 福思, 湾, 214

Fortifications, 防御工事, 195—200, 253, 453

帝国境内自由城市的, 345

加勒比地区的, 516, 522

Foxe, John, 福克斯, 约翰, 殉教者史学家, 444

Frampton John, 弗兰普顿, 约翰, 翻译者, 457

Franc, 法郎, 28

France, 法兰西

经济, 15, 126, 127; 饥谨, 23; 通货, 28, 29, 30; 人口, 33; 小麦出口, 37

加尔文主义, 5, 6, 52, 58, 90—97, 122, 131, 156, 281—286;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5, 48; 天主教, 52—53 (参见Catholic League条)

君主制与贵族, 130, 131—132; 税收, 134—136, 137—138, 142—143, 281, 284, 294, 314, 316; 破产, 235, 281; 与教皇的训谕, 258

军队, 150, 175—176, 183, 192, 193, 194; 防御工事建筑的派系, 196

宗教战争, 16—17, 127, 216, 236, 293, 505; 第一阶段, 58, 95, 219—221, 286; 第二阶段, 230, 287; 第三阶段, 230, 288; 第四阶段, 6, 274, 290—292; 天主教同盟的发展, 292—293; 天主教同盟与王位继承, 295, 300—306; 农民起义, 281, 307; 南特敕会, 313—314; 重建法兰西, 314—316; 宗教与政治, 489, 490

对外关系，与西班牙，6，7，159—160，209，232，236，279，288—289，290，292，294—295，306，307，309，337；与苏格兰，112，115，210；与土耳其，163，367，382，534；与意大利，210，263；与英格兰，211，212，220—222，288；与德意志，337；与瑞典，382

教育与学术，450，451

殖民地，508，530—532

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154，158，209，237，317

Francis I，弗朗西斯一世，法国国王，152—153，283

与1516年契约，51

统治期间的宗教迫害，92，490

与伊比利亚人的垄断权，159—160

同盟关系，与苏里曼，163；与皇帝和教皇，210

Francis II，弗朗西斯二世，法国国王，94，283

作为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115，213，215

死亡，216，285

Francis of Assisi，St，阿西西的圣方济各，72

Franciscans，方济各会

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教育，515

在亚洲，548，549

在菲律宾，555

Franconia，法兰克尼亚

连环，330

教会领地，338

Frank，Sebastian，弗兰克，塞巴斯蒂安，484

Frankfurt-am-Mai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400

英国避难者在此，106—107，113

皇帝加冕于此，327

Frankfurt-an-der-Oder，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438

Frederick Barbarossa，腓特烈·巴巴罗萨，149

Frederick II，弗雷德里克二世，丹麦国王，405，406，409

与第谷·布拉赫，463

Frederick III，弗雷德里克三世，皇帝，在特里尔，152

Frederick III，弗雷德里克三世，巴拉丁选帝侯，倾向加尔文主义，80—81，82，120，334

Frederick IV，弗雷德里克四世，巴拉丁选帝侯，82，120，329，334

Free will, problem of，自由意志问题，79，80，496

Freising，弗赖辛，主教区，336，341

Freudenstadt，弗罗伊登施塔特，198

Friesland，弗里斯兰

省区，279，297，299

商人，401

Friesland, East，东弗里斯兰，327，401；参见Emden条

Frisia，弗里西亚，123

Froben, Jerome，佛罗本，杰罗姆，翻译希腊文者，441

Frobisher, Martin，弗罗比歇，马丁，其航行，524

Frois, Luis，弗罗伊斯，路易斯，耶稣会士，551

Fronde, the，投石党运动，146

Frontiers，边境

帝国与土耳其之间，197，322，360，361

常常不确定的, 337

奥斯曼与波斯领土之间, 355

Frycz, 弗里齐, 449

Fuentes, Pedro de Acevedo, count of, 丰特斯伯爵, 佩德罗·德·阿克韦多, 310

Fugger family, 富格尔家族, 金融世家, 24, 27, 533, 535, 536

资本, 296

新对策, 534

Fukien, 福建, 544

Fulda, 富耳达

反对修道院长的诉讼, 330, 339—340

耶稣会在这里的学院, 339

Funai (Japan), 府内 (日本), 551

Fundy, Bay of, 芬迪湾, 531

Furs, 毛皮, 贸易, 401, 402, 404, 405, 530, 556

Gabelle (salt tax), 盐税, 294

Gale, Thomas, 盖尔, 托马斯, 外科医生, 474

Galen, 盖伦, 希腊医生, 作为权威, 452

Galileo Galilei, 伽利里奥·伽利略, [\[2\]](#)天文学家与哲学家, 66, 179, 449, 453, 459, 460, 471, 478

Galleasses, 桨帆并用舰, 203, 205

Galleons, 大帆船, 203, 205, 537

Galleys, 划桨战舰, 203, 205

在加勒比地区, 519

葡萄牙人的, 537

Gallicanism, 高卢主义, 53, 307

Galliot, 带桨快帆船, 537

Gallus, Evaldus, 加卢斯, 埃瓦尔杜斯, 《少儿对话》的作者,
434

Gama, Vasco da, 伽马, 瓦斯哥·达, 探险家, 366, 521

Ganges, river, 恒河, 540, 547

Ganja, 甘贾, 要塞, 358, 360, 375

Garrard, William, 加勒德, 威廉, 军事作者, 185

Gates, Geoffrey, 盖茨, 杰弗里, 论述服军役, 174, 177

Gates, Sir Thomas, 盖茨爵士, 托马斯, 弗吉尼亚总督, 186

‘Gathered Church’, the, “聚合教会”, 492

Gattinara, Mercurino, 加蒂纳拉, 莫库里诺, 律师和大法官,
236, 240

Gelderland, 海尔德兰, 279, 297, 299, 310

Gembloux, 让布卢, 战役, 278

Gemma Frisius, Rainer, 格马·弗利修斯, 雷内尔, 天文学家,
453, 466, 469

Gemstones, 宝石, 贸易, 540, 546

Génébrard, Benedictine, 热内布拉尔, 本尼狄克, 教授, 448

General Assembly (of Scottish Kirk), 会众大会 (苏格兰教
会的), 117, 118

Geneva, 日内瓦

作为宗教中心, 89—90, 156, 169

高等学校, 90, 431

法国的态度, 97

英国与之接触, 106, 108, 109
诺克斯在此, 113
与萨伏依的夏尔·埃马纽埃尔, 260, 317
法律教育, 440
Geneva Bible, 日内瓦圣经, 441
Genoa, 热那亚, 257
瘟疫, 23
银行家, 27, 28, 31, 235, 275, 370
贸易, 37, 255, 257
划桨舰队, 202
与西班牙, 209, 337
从这里向阿尔发贷款, 232, 273
Gens de robe, 法官, 316, 330
Gentili, Alberico, 真蒂利, 阿尔布利科, 法学家, 12, 168—
169, 440, 446, 449
Geography, 地理学, 研究, 439
George Frederick, 乔治·弗雷德里克, 勃兰登堡选帝侯, 395
Georgia, 格鲁吉亚, 357
土耳其人推进到此, 358, 359, 360
波斯人在此招募新兵, 374
Germania, 日耳曼尼亚, 起义, 128
Germany, 德意志
饥荒, 23; 白银生产, 24, 25, 26, 27, 39, 533
人口, 33; 通货, 29, 价格, 332, 334; 与葡萄牙的香料贸易, 533, 534

“教随国定”的原则，2，10，48，77，490—491；加尔文主义，6，120，280，333，334，345；路德宗，6，82，84，333—334，337—339；天主教，8，51—52，58，59，83，337—344，345；宗教改革，129—130

防御工事的建筑派别，196；输出雇佣兵，287，337

帝国与德意志，319—346

教育，431—432，450

Gesner, Konrad von, 格斯纳，康拉德·冯，《诸种语言释疑》的作者，448

Gex, 热克斯，317

Ghent, 根特

和平协定，6，103，276，278，279

三级会议，101

帕尔马的运河起点，199

动乱，270，271，272，277

奥兰治进入，278

落入西班牙之手，280

民众的暴政，307

Ghilmān (personnel of sultan' s household)，基尔曼（苏丹王室侍从）347，348，349，350，366

Ghurbet tā, ifesi, 孤尔伯特太费希，见 *levendāt* 条

Giambelli, Frederico, 詹贝利，弗雷德里科，军事机械师，其“爆炸机”，174，199—200

Giffard, William, 吉法德，威廉，天主教宣传家，369

Gilbert, Sir Humphrey, 吉尔伯特爵士，汉弗莱，探险家，439，524—525，526，528

Gilbert, William, 吉尔伯特, 威廉, 物理学家, 453, 461—462, 468—469, 477—478, 479

Giurgiu, 久尔尔, 奥斯曼人败于此, 363

Glasgow, 格拉斯哥, 228

Glass, 玻璃, 生产, 400

Glencairn, Alexander Cunningham, earl of, 格伦凯恩伯爵, 亚历山大·坎宁安, 212

Globes, 地球仪, 地理学的, 456, 469

Gnesiolutherans, “真正的路德宗”, 78, 79, 81, 82

Gniezno, 格涅兹诺, 主教区, 388

Goa, 果阿

天主教在此, 55, 547, 548, 549

防御设施, 197

驶离的葡萄牙舰队, 366, 537

贸易, 534, 536, 538, 540

防御战, 545

Godefroy, Denis, 戈德弗罗伊, 丹尼斯, 法学家, 446

Golconda, 戈尔孔达, 540

此地的苏丹, 545

Gold, 黄金

来自新世界, 18, 25

来自非洲, 24, 25, 539

流通减少, 26

来自中国, 544, 554

Golden Fleece, 金羊毛, 勋章团（尼德兰）, 265, 271

Golub, 戈卢布, 王室领地, 392

Gomar, Francis, 戈马尔, 弗朗西斯, 神学家, 105

Goméz, Ruy, 戈麦斯, 路易, 见silva条

Gomólka, Nicolas, 戈莫尔卡, 尼古拉, 作曲家, 403

Goodman, Christopher, 古德曼, 克里斯托弗, 清教神学家, 98

Good works, 善行, 教义, 76, 79

Gori, 哥里, 359

Górka, Stanislaw, 戈尔卡, 斯塔尼斯拉夫, 波兹南伯爵, 378

Górka family, 戈尔卡家族, 390

Górnicki, Luke, 古尔尼茨基, 卢克, 波兰作家, 402, 403

Goslicki, 哥斯利基, 主教, 385

Gostomski, Anzelm, 戈斯托姆斯基, 安策尔姆, 其农业手册, 398

Göta, river, 约塔河, 406

Gothenburg, 哥德堡, 其建立, 409, 420

Gotland, 哥德兰, 岛屿, 406

Goulart, Simon, 古拉特, 西蒙, 《法国状况论文集》编者, 98

Goverment, 政府

 活力增强, 3—4, 8

 来自宗教的挑战, 5—10

 借贷, 296

 政治理论, 480—506 (散见)

Gowrie conspiracy, 高里谋反案, 119

Grace, 恩典, 神圣的, 教义, 67—69, 441, 498; 加尔文的观点, 91, 496

Grain, 谷物

价格, 20, 22

生产, 36—38; 英国的, 158; 葡萄牙的, 249; 西西里的;
254; 法国的, 314; 土耳其的, 354, 362; 波兰的, 396, 397, 398,
400, 401

波罗的海贸易, 405, 406, 411

在西属美洲, 509, 513

Grammar, 语法, 研究, 429; 利利的, 433; 参见schools条

Gran, 格兰

教区, 59

省区, 361, 362, 363, 364

Granada, 格拉纳达, 240

反对摩里斯科人的军事行动, 245—247, 275, 300

Granvelle, Antoine Perrenot, 格朗维尔, 安托万·佩罗内, 枢
机主教兼行政官员, 240, 294

谈论作战, 193

在尼德兰, 241, 265, 267—268

在西班牙, 247, 248, 268

Graz, 格拉茨, 大学, 439

Great Didactic, the 教育大协会, 442

Great Poland, 大波兰, 377, 381, 400

Greco, El (Dominico Theotocopuli), 格列柯, 埃尔(多米尼
柯·狄奥托柯普洛), 画家, 13

Greek, 希腊文, 研究, 429, 430, 431, 432, 437

Greenwich, 格林威治, 铠甲输出, 187

Gregorian College, 格列高利学院, 罗马, 439

Gregory I , 格列高利一世, 教皇, 57

Gregory VII, 格列高利七世, 教皇, 155

Gregory XIII, 格列高利十三世, 教皇, 62, 68
与历法, 465

Gregory XIV, 格列高利十四世, 教皇, 304

Gregory XV, 格列高利十五世, 教皇, 55

Gregory Nazianzen, St, 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 其作品在学校
中, 437

Grenville, Sir Richard, 格伦维尔爵士, 理查德, 309, 524
其建于罗阿诺克的定居地, 525

Gresham Sir Thomas, 格雷沙姆爵士, 托马斯, 商人, 26, 147,
214
学院, 439

Gretser, Jacob, 格雷策尔, 雅各布, 学者, 437

Grey, Lady Jane, 简·格雷女士, 210

Grimma, 格里马, 学校所在地, 432

Grindal, Edmund, 格林德尔, 埃德蒙, 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
110

Gripsholm Castle, 格里普斯霍尔姆堡, 408

Grisee, 格里西, 穆斯林教育中心, 547

Grodno (Lithuania), 格罗德诺 (立陶宛的), 人口, 380

Groningen, 格罗宁根, 省区, 279, 297, 310

Grotius, Hugo, 格劳秀斯, 胡果, 105, 168, 169—170, 446
《战争与和平法》的作者, 165
论正义与非正义的理由, 173

Grumbach, Wilhelm Von, 克鲁姆巴赫, 威廉·冯, 阴谋者, 81, 338—339

Guachichile Indians, 瓜基基利印第安人, 510

Guanajuato, 瓜纳华托, 银矿所在地, 511

Guerrero, Francisco, 格雷罗, 弗朗西斯科, 格拉纳达大主教, 245

gueux, 乞丐, 见Beggars条

Guiana, 圭亚那, 雷利远征, 508, 524, 526, 528

Guicciardini, Francesco, 奎恰尔迪尼, 弗朗西斯科, 历史学家, 261, 443

Guienne, 吉耶讷, 省区, 那里的胡格诺派, 282, 290, 314

Guilds, 行会

在法国, 140, 281, 295

在西班牙, 140

在尼德兰, 277

在波兰, 398

Guillemau, Jacques, 吉耶莫, 雅克, 医生, 474—475

Guinea, 几内亚, 葡萄牙人在这里沿海, 24

Guise, Charles de, 吉斯, 查理, 洛林枢机主教, 94, 213, 283, 285, 290

在特伦托会议上45, 221

参见Guise, House of条

Guise, Francis, duke of, 吉斯公爵, 弗朗西斯, 94, 95, 213, 220, 283

被暗杀, 221, 287

参见Guise, House of条

Guise, Henry, duke of, 吉斯公爵, 亨利, 221, 289—290, 293

阻碍亨利三世支持伊丽莎白, 300—301

被暗杀, 301

参见Guise, House of条

Guise, Louis, cardinal of, 枢机主教吉斯, 路易, 被暗杀,
301

Guise, 吉斯, 家族, 215, 283

与天主教, 8, 52, 131, 220, 292

确立权势, 94

与西班牙, 132, 295, 300, 301

与玛丽·斯图亚特, 158, 217

衰败, 216

恢复鼎盛, 220—221

与卡特琳·德·美第奇, 285, 287, 289, 290

与蒙莫朗西家族结盟, 286

Gujarat, 吉吉拉特

贸易, 537, 538, 539, 541, 545

莫卧儿帝国征服, 540

Gunnery, 射击术, 190

Gunpowder, 火药, 190, 191

出口, 向土耳其, 368

Guns, 枪炮, 188—191, 195, 361, 398

海军的, 190, 204, 299

参见firearms条

Guria, 古里亚, 公国, 358, 359

Gustavus Adolphus, 古斯塔夫·阿道夫, 瑞典国王, 422, 426
 作为俄国王位候选人, 419, 420, 423

Gustavus Vasa, 古斯塔夫, 瓦萨, 瑞典国王, 87, 405
 常备军, 183, 407
 死亡, 406

Guyenne, 吉耶讷, 学院, 430, 431

Guzmán, Nuño de, 古斯曼, 努尼奥·德, 510

Guzmán family, 古斯曼家族, 243

Guzów, 古佐夫, 战役, 388

Gyllenstjerna, Nils, 于伦斯蒂纳, 尼尔斯, 瑞典王家事务总管, 87

Haarlem, 哈勒姆, 围攻, 181

Habsburgs, 哈布斯堡家族, 239, 321—322
 与瓦卢瓦家族的斗争, 150, 236
 在奥地利的, 与帝国, 2, 59, 233, 237, 319—346; 与意大利, 256; 与土耳其, 322, 360; 与特兰西瓦尼亚, 362; 与波兰, 382, 383, 385, 388, 394—395

haciendas, 大庄园, 其发展, 514

Hague, the, 海牙
 三级会议在这里, 105
 在此签订与瑞典的协定, 425
 条约, 523

Haidar Mīrzā, 海德·米尔札, 与波斯王位, 357

Hainault, 埃诺, 103

Hakluyt, Richard, 哈克卢特, 理查德, 地理学家, 445, 456, 470, 528

Halberstadt, 哈尔伯施塔特, 主教区, 338

Halland, 哈兰, 省区, 406

Hamadhān, 哈马丹, 省区, 360

Hamburg, 汉堡, 23, 28, 232, 233

Hamilton, John, 汉密尔顿, 约翰, 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被监禁, 218

Hamilton, Patrick, 汉密尔顿, 帕特里克, 新教殉道者, 113

Hamor, Ralph, 哈默, 拉尔夫, 论军事法规, 186

Hampton Court, 汉普顿法庭, 会议, 118

Hamza Mirzā, 哈姆扎·米尔扎, 波斯沙之子, 360

Hanse towns, 汉萨城市同盟

 贸易, 8, 401, 404

 关税特权, 136

 与埃里克十四的冲突, 408

Harborne, William, 哈伯恩, 威廉,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 367, 368, 369

Harcourt, Robert, 哈考特, 罗伯特, 探险家, 526

Hare family, 黑尔家族, 142

Harem, 土耳其后宫妻妾, 其影响, 351

Harriot, Thomas, 哈里奥特, 托马斯, 数学家, 457, 458—459, 470, 479

Harvey, Gabriel, 哈维, 加布里埃尔, 诗人兼修辞学家, 447

Harvey, William, 哈维, 威廉, 医生, 453, 473

Hasan, al-kāfī, 哈桑·阿卡菲, 著文论国政, 351, 361

Hasan Pasha, 哈桑帕夏, 大维齐尔, 360, 371

Havana, 哈瓦那

防御工事, 197

劫掠, 516, 522

护航制度的枢纽, 518—519

夺取的计划, 521

Havre, 阿弗尔, 见Le Havre 条

Hawkins, Sir John, 霍金斯爵士, 约翰, 远航, 232, 517, 518, 520, 522

Hebrew, 希伯来文, 研究, 430, 437, 448

Heere, Lukas de, 希尔, 卢卡斯·德, 画家, 174

Hegendorff, 海根道夫, 其范文集, 437

Heidelberg Catechism, 海德堡《教义问答》, 88, 105, 120

Heidenstein, Reinhold, 海登斯泰因, 赖因霍德, 作者, 403

Helmstadt, 黑尔姆施塔特, 大学, 439

Helvetic Confession (2nd), 瑞士信纲 (第二部), 121

Hembyze, Jan van, 亨比泽, 让·范, 277, 278, 280

Hemp, 苧麻, 贸易, 398, 401, 405, 406, 527

Henriques, 恩利克兹, 波斯裔耶稣会士, 549

Henry V, 亨利五世, 英格兰国王, 莎士比亚笔下, 172

Henry VII, 亨利七世, 英格兰国王, 209—210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英格兰国王, 2, 152—153

他对苏格兰的政策, 112, 210

遗嘱, 211, 219

Henry II, 亨利二世, 法国国王

与萨克森的莫里斯结盟, 47, 77

统治时期对新教徒的迫害, 92, 267, 283—293, 490

死亡, 94, 213, 283

财政困难, 139, 281

与英国王位继承, 211

Henry III, 亨利三世, 法国国王

拒绝尼德兰王冠, 279, 294

作为安茹公爵, 287, 288, 289

作为波兰国王, 290, 382, 383—384, 402

继承法国王位, 292

与天主教联盟, 293, 295, 300—302

被刺杀, 303

Henry IV, 亨利四世, 法国国王（那瓦尔的亨利）, 303, 489,
490

在宗教战争中, 6, 9, 300, 305

变为天主教徒, 34, 59, 63, 96, 303, 306, 313

统治, 133, 313—318

其军队, 183, 193, 194

与威尼斯, 263

婚姻, 288, 289

作为王位继承人, 293, 294, 295

与西班牙的战争, 307, 308, 337, 523

被教皇所宽恕, 307, 314

被刺杀, 318, 344

Henry, 亨利, 葡萄牙国王, 枢机主教, 247, 248

Henry, 亨利, 葡萄牙亲王, 航海者, 164

Heraldry, 徽章

波兰的, 403

丹麦与瑞典的, 409, 426

Herat, 赫拉特, 360, 556

Herbals, 植物志, 456, 472

Herbert family, 赫伯特家族, 131

Heresy, 异端

被当作叛国罪, 12, 60, 480, 481, 492

与特伦托会议, 45

与加尔文, 122

与法律, 169

与宗教裁判, 258

与哥白尼主义的联系, 462

赞成与反对宗教迫害的观点, 481—489

在英格兰不再成为可被指控的罪行, 491

Hermendszoon, Jakob (Arminius), 赫曼德松, 雅各布 (阿明尼乌), 神学家, 105, 441

Hero, 海洛, 亚历山大里亚的, 希腊科学家, 455

Herrings, 青鱼, 波兰入口, 401

Hesse, 黑森, 新教在此, 82, 120, 408, 484

Hides, 皮革, 贸易, 136, 401, 405, 514, 515, 517, 522

Hideyoshi, Toyotomi, 秀吉, 丰臣, 日本将军, 545, 552

Heldebrandt, Franz, 希尔德布兰特, 弗兰茨, 宗教改革家, 75

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 主教区, 336, 341

Hill, Thomas, 希尔, 托马斯, 学者, 429, 452

Hinduism, 印度教, 57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 518

Hispanus, Petrus, 希斯帕努斯, 皮特勒斯, 中世纪逻辑学家, 442

Historians, 历史学家, 443—445

- 耶稣会的, 65
- 与反对土耳其的战争, 362
- 波兰的, 403

Hitu island, 希图岛, 547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托马斯, 哲学家, 63, 99, 122, 505

Hochstetter family, 赫希斯泰特尔家族, 金融家, 533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家族

- 勃兰登堡的, 343
- 其中的安斯巴赫支系, 395
- 与普鲁士, 395—396

Holinshed, Raphael, 霍林希德, 拉菲尔, 编年史家, 444

Holland, 荷兰, 见 Netherlands (to 1579年) 条; United Provinces (after 1579年) 条

Holland, 省区, 103, 275, 276, 309

- 三级会议, 264, 267, 274
- 落入海上乞丐之手, 272, 273, 288, 289
- 在乌得勒支同盟中, 279, 297, 298

Holy League, 神圣同盟, 庇护五世反对土耳其的, 252, 253, 353

- 在法国, 见 Catholic League 条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见Empire条

Holy Union, 神圣联盟, 见Catholic League条

Holyrood, 霍利鲁德, 在此举行弥撒, 218

Homer, 荷马, 希腊史诗诗人, 其作品在学校中, 437

Hondius, Jodocus, 洪迪乌斯, 热多库斯, 地图绘制者, 470,
471

Hondschoote (Flanders), 翁斯科特 (佛兰德) 呢绒生产, 39,
40, 41 (图4)

Honduras, 洪都拉斯, 518

Honey, 蜂蜜, 波兰生产, 398, 400, 402

Hooker, Richard, 胡克, 理查德, 神学家, 12, 79, 449, 506

《论教会体制的法则》之作者, 111, 495—499

Hoole, Charles, 胡尔, 查尔斯, 教育家, 434

Hoorn, Philip de Montmorency, count of, 霍伦伯爵, 腓力·
德·蒙莫朗西, 102, 265, 267; 被处死, 271

Horace, 贺拉斯, 罗马诗人, 其作品在学校中, 435

Horn, Klas Kristersson, 霍恩, 克拉斯·克里斯滕松, 海军将
领, 410

Hornbooks, 角帖书, 433

Horses, 马匹

土耳其人的供应, 362

饲养, 在波兰400, 401

解剖, 472

阿拉伯, 538, 540

Hospitals, 医院

在波兰, 402

在波托西，513

在印度，548

在日本，551

Hotman, François, 奥特芒，弗朗索瓦，共和主义者，169，445

著《法兰克高卢》98，99，504，505，506

Houtman, Cornelis, 豪特曼，考尼利斯，航海家，558

Hradschin, 赫拉德琛，布拉格，320

Huancavelica, 万卡韦利卡，汞矿，513

Hudson, Henry, 哈得孙，亨利，探险家，531

Hudson, river, 哈得孙河谷，531

Hues, Robert, 休斯，罗伯特，论航海仪器，466—467

Hugli, Bengal, 胡格利，孟加拉，539，541

Huguenots, 胡格诺派

对其实行宗教宽容的敕令，10，59，95，97，286，288，292，
293，313—314

其外国盟友，60，162，220，292

对其屠杀，见st Bartholomew条，Vassy条

其组织，96—97，131，282—283

变为正统派，98

在新世界，160，526

内部的利益分歧，234

领导人，284

在宗教战争中，286，287，288，290

渗透，进入官府，287

代表会议，291

有限的成功, 307

Humanism, 人文主义, 65, 448

与战争, 172

其作品在学校与大学中, 429—430, 433, 436, 439, 443

科学的, 455

Hurniliati, 卑微派, 宗教团体, 64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127

Hungarian War, 匈牙利战争, 362—365, 369

Hungary, 匈牙利, 59

新教派在这里, 121—122, 156, 323, 326

作为其王位继承人的哈布斯堡家族, 319, 321, 362

土耳其人在这里, 322

金属生产, 333

离开这里的避难者, 361

波兰在这里的利益, 382

忽略教育, 450

Hunsdon, Henry Carey, baron, 亨斯登男爵, 亨利·凯里, 233

Huntly, George Gordon, earl of, 亨特利伯爵, 乔治·戈登, 118, 213, 216, 218, 224, 226—227, 228—229

Hus, John, 胡斯, 约翰, 宗教改革家, 46

Hussites, 胡斯派, 121, 480

Huysmann, Roelof (Rudolphus Agricola), 赫伊斯曼, 勒洛夫 (鲁道夫·阿格里科拉) 学者, 442

Hveen, island, 文岛, 463

Hydrostatics, 静力学, 471

Hymns, 赞美诗, 在路德宗的崇拜仪式中, 85

Hypocrisy, 虚伪, 罪过, 因宗教迫害而引起, 487

Iatrochemistry, 医用化学, 454

Ibarra, Francisco de, 伊瓦拉, 弗朗西斯科·德, 杜兰戈的征服者, 507

Î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 283

Illiteracy, 文盲, 427

Illuminists, 启示派, 244

Images, 圣像, 对其破坏
 在尼德兰, 102, 270, 274
 在珀斯, 114

Imereti, 伊米勒提, 公国, 358, 359

Impossessionati (Poland), 无地者 (波兰), 378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异端对此的观点, 124, 125

In coena domini (papal bull), “当我主晚餐” (教皇训谕), 258

Index, congregation of the, 禁书目录枢机主教会议, 50

India, 印度
 莫卧儿帝国的皇帝, 164, 540, 545, 550
 发自这里的商路, 366
 葡萄牙在这里的企业, 532—541, 545

India House (Lisbon), 印度院 (里斯本), 532, 533, 534, 535

Indian Ocean, 印度洋, 311, 366, 534

Indians (American), 印第安人 (美洲的)

其权利, 55, 510

普韦布洛, 507

起义, 510

人口, 512—514

西班牙对他们的政策, 514—515

Indies, 西印度群岛

会议, 56, 511

参见West Indies条, Caribbean Sea条

Indigo, 靛蓝, 贸易, 538, 557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政治思想中, 480, 506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539, 541

Industry, 工业, 38—42

铠甲生产, 187—188; 火器生产, 189, 190—191, 398

皮埃蒙特-萨伏依的工业, 260

在波兰, 398—399

Infantry, 步兵, 184, 192—195

Inflation, monetary, 通货膨胀, 3, 18, 20, 24, 29, 235

在英格兰, 126; 在法国, 291; 在西班牙, 312; 在奥斯曼帝国, 370, 373

Ingermanland, 英格曼兰, 割让给瑞典, 424

Ingolstadt, 因戈尔施塔特, 大学, 66, 325, 336

Innocent III, 英诺森三世, 教皇, 54

Innocent IX, 英诺森九世, 304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77, 187

Inquisition, 宗教法庭, 罗马的 (最高法院枢机主教会议), 50, 61, 481; 与哥白尼主义462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西班牙的, 23, 61—63, 67, 71, 157, 232, 243, 244, 245, 251, 268

在西西里, 254

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建立的企图, 256

卡兰萨之案, 257—258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主教们的, 在尼德兰, 265, 266, 268, 270

在果阿, 548

Intendant, 总督, 官职, 143, 146

Interims of Augsburg and Leipzig, 奥格斯堡与莱比锡临时敕令, 75, 76—77, 98, 101, 120

I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 197

Ipswich, 伊普斯威奇, 学校所在地, 432

Iraq, 伊拉克, 355, 360

Ireland, 爱尔兰

造反, 9, 309

英国征服, 165

忽略教育, 450

在这里的殖民地, 524, 526

Irtich, river, 伊里克河, 鞑靼汗国在此, 556

Iron and steel, 钢铁

尼德兰的, 191

英国的, 368

波兰的, 398, 400

瑞典的, 404, 412

Isaac, John, 伊萨克, 约翰, 希伯来文学者, 448

Isabella Clara Eugenia, 伊莎贝拉·克拉拉·欧

仁妮娅, 腓力二世的女儿, 要求法国王位, 303, 306

婚约, 310

Isabella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 阿拉贡的斐迪南之妻, 54, 61—62, 249

Isenburg, count, Salentin von, 伊森堡伯爵, 扎伦廷·冯, 科隆大主教, 341

Islam, 伊斯兰教, 57, 350

皈依, 347

什叶派, 355, 356, 357

参见Muslims条

Ismā 'īl I, 伊斯梅尔一世, 波斯国王, 355, 357

Ismā 'īl II, 伊斯梅尔二世, 塔赫马斯普的儿子, 死亡, 357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希腊修辞学家, 其作品在学校中, 437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348, 362

驻这里的使节们, 163, 164, 367, 368—369

奥地利的议和特使在这里, 364

参见Constantinople条

Istruzione per i cavallegieri, 《骑兵操典》, 172注①

Italian Wars, 意大利战争, 149—151, 183, 210

Italians, 意大利人

在西班牙服务, 240, 253, 266

在波兰, 381

Italy, 意大利, 404
经济, 16; 瘟疫, 23; 通货, 28, 29; 人口, 33; 进口谷物,
37
新教派, 59, 60; 教会改革, 64—65
常驻外使节, 153, 154; 境内不容新教使节, 157
与法国, 235—236; 与西班牙, 238, 253—268, 311; 与帝
国, 319, 327
设防术, 196; 舰队, 202; 教育与学术, 429—430, 449,
450, 451
Ius gentium, 异教民族习俗, 168, 169
Ius naturae, 《自然法》, 446
Ivan III, 伊凡三世, 莫斯科大公, 556
Ivan IV, 伊凡四世 (伊凡雷帝), 莫斯科沙皇, 163, 355,
393, 411, 556
与教育, 450
Ivory, 象牙, 贸易, 538, 539, 540
Ivry, 伊夫里, 战役, 9, 305
Jacqueries, “扎克雷”, 307
Jaffna, 贾夫纳, 王国, 546
Jageillon family, 亚盖沃家族, 319, 377, 381
Jalālī rebels, 哲拉尔叛乱, 奥斯曼帝国, 373
James I, 詹姆斯一世, 英格兰国王, 见James VI of Scotland条
James IV, 詹姆斯四世, 苏格兰国王, 209, 210
James V, 詹姆斯五世, 苏格兰国王, 112, 210
James VI of Scotland and I of England, 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
暨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 112, 129, 227

与教会, 6, 118—119
与天主教, 60, 67, 116
与庇护制, 133
出售职衔, 143
常驻外使节, 165
与西班牙媾和, 309, 528
Jamestown, 詹姆斯城, 弗吉尼亚, 530
Jānik, 贾尼克, 地区, 373
Janissaries, 近卫步兵, 347, 348, 358, 365
 衰落中, 184
 允许穆斯林进入, 352, 366
 其武器, 368
 哗变, 371
Jansen, Cornelius, 詹森, 科尼利厄斯, 伊普尔的主教, 68
Jansenism, 詹森主义, 67
Janson, James, 詹森, 詹姆斯, 68
January, Edict of, “一月告示”, 286
Japan, 日本
 与日本的贸易, 534, 543—545
 对华贸易, 544
 主教区, 547
 耶稣会士在日本, 550—552
Japanese, 日本人, 服务于葡萄牙, 537
Japara, 贾帕拉, 541—542, 547

Jarnac, 雅纳克, 战役, 288

Java, 爪哇, 541, 542, 545, 547, 558

Javanese, 爪哇人, 服务于葡萄牙, 537

Jebeli (Turkish men-at-arms), 杰布里 (土耳其武士), 349, 350, 373

Jedburgh, 杰德堡, 227

Jena, 耶拿, 大学, 79, 80, 439

Jenkinson, Anthony, 詹金森, 安东尼, 商人, 556

Jerez, 赫雷斯, 产酒, 158

Jesuits, the, 耶稣会士, 160, 492

在德意志, 48, 57—58, 339, 340, 341, 345

在法国, 53

在帝国, 59, 323, 325

在波兰, 59, 121, 389, 392

其教育工作, 65—66, 325, 389, 431—432, 433, 435, 436, 439, 450

在瑞典, 86

被逐出威尼斯, 263

在新法兰西, 531

在亚洲, 548—553, 555

在非洲, 539, 540, 550

Jews, 犹太人

在阿姆斯特丹, 31

被逐出西班牙, 31, 535; 被逐出巴拉丁, 334

在西班牙, 61, 245

在波兰，381

作为学者，448—449

Jihād，圣战，352

Joachim Frederick，约阿希姆·弗雷德里克，勃兰登堡选帝侯，
395

Joachimstaler (coin)，约阿希姆斯塔勒（钱币），24

Joanna（‘the Mad’），约安娜（‘疯人’），腓力一世的妻
子，239

John III，约翰三世，葡萄牙国王，534，545

John III，约翰三世，瑞典国王，60，86，382，394，417

作为芬兰公爵，406，407—408，409

成为国王，410

与俄国的关系，411

其政策，412—413

在雷瓦尔会见西吉斯孟，414

死亡，414

John，约翰，瑞典查理九世的侄儿，88注

John of Austria，Don，奥地利的唐·约翰，250，278

作为尼德兰总督，103，239，276，277

勒班陀的胜利者，239，252，353

在格拉纳达的指挥，246

占领拉古莱特，354

John Casimir，约翰·卡齐米尔，巴拉丁的，82，120，287

John of the Cross，st，圣十字架的约翰，54，71

John Frederick，约翰·弗雷德里克，萨克森的，75，80，81

John Sigismund, 约翰·西吉斯孟, 勃兰登堡的, 被授予普鲁士领地, 396

John William, 约翰·威廉, 于利希-克莱沃公爵, 344

John William, 约翰·威廉, 萨克森公爵, 81

Johnson, Christopher, 约翰逊, 克里斯托弗, 温切斯特学校的校长, 436

Johnson, Francis, 约翰逊, 弗朗西斯, 牧师, 492

Johore, 柔佛, 541, 542

Joint-stock companies, 联合股份公司, 43, 367

Joinville, 茹安维尔, 条约, 295

Joseph ben Joshua, 约瑟夫·本·乔舒亚, 学者, 449

Joyeuse, Vicomte, de, 茹厄斯, 维孔特·德, 朗格多克代理总督, 283

Judaism, 犹太教, 伊比利安半岛上的, 61

Juliana of Tver, 特维尔的尤利安, 394

Jülich, Juliers, town of, 于利希城, 尤利尔, 181

Jülich-Cleve, 于利希-克莱沃, 尤利尔, 公国, 317, 337, 343—344

Julius III, 尤利乌斯三世, 教皇, 重返特梭特召开会议, 46

Julius 尤利乌斯, 维尔茨堡主教, 340

Julius, 尤利乌斯, 不伦瑞克的, 82

Jumna, river, 朱木拿河, 540

Junks, 帆船, 菲律宾征税, 554

Justice, 公正原则

卡斯提尔人的, 在葡萄牙, 249

布坎南的公正观, 503

Justice of the Peace, 治安官, 146, 148, 330

Justicia, 正义法庭

 在阿拉贡, 250, 251

 在西西里, 254

Justin, 查士丁, 罗马作者, 435

Juxon, William, 贾克森,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147

Kaffa, 克法, 359

Kakheti, 卡克提, 358

Kalmar, 卡尔马, 407

 同盟, 406, 409, 414

 丹麦人强攻, 421—422

Kalmyk tribe, 卡尔梅克部落, 359

Kamieniec, 卡缅涅茨, 主教区, 388

Kanak, river, 卡纳克河, 358

Kandy, 康提, 546

Kanizsa, 坎尼扎, 要塞, 360, 361

 落入土耳其人之手, 364, 365

Kansler, 首席大臣, 官职(瑞典的), 422

Kara Yaziji, 卡拉·雅兹吉, 土耳其的起义领袖, 373, 374

Kara-Bagh, 卡拉-巴格, 地区, 被土耳其人占领, 360

Karaites, 卡赖特人, 在波兰, 381

Karamān, 卡拉曼, 358, 374

Karlstadt, Andrew Bodenstein of, 卡尔施塔特, 安得鲁·勃登斯泰因, 宗教改革家, 78

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 197

Kars, 卡尔斯, 要塞所在地, 359, 375

Kartli, 卡特利, 公国, 358

Kaysari (Asia Minor), 开塞利 (小亚细亚), 373

Kazan, 喀山, 俄国征服, 355, 556

Kazvin, 加兹温, 556

Kelley, Sir Edward, 凯利, 爱德华爵士, 炼金术士, 1

Kepler, Johann, 开普勒, 约翰, 天文学家, 320, 453, 460—461, 462, 464, 476

Kerestec, 刻利兹特斯, 战役, 175

Kerjean, 克依昂 (布列塔尼), 197

Kexholm, 凯斯霍姆, 省区, 419, 424

Khādim al-Haramain, 两座圣城 (麦加和麦地那——译者) 的保护者, 苏丹作为, 355

Khāss fiefs, 哈斯 (特殊的) 采邑, 350

Khāss-ī shahī (domain of sultan), 喀西沙西 (苏丹领地), 372

Khāsseki Sultans (consorts of sultan), 苏丹卡色基 (苏丹嫔妃), 351

Khlesl, Melchior, 克勒斯尔, 梅尔希奥, 主教兼枢机主教, 326

Khurāsān (persia), 呼罗珊 (波斯的) 355, 360, 374

Khurūj-i Jalāliyān (insurrection) in Ottoman empire, 库卢吉—哲拉尔延 (叛乱) 在奥斯曼帝国内, 373

Kiejdany, 基耶丹尼, 加尔文宗学院所在地, 390

Kiev, 基辅

 人口, 380

 天主教教区, 388

东正教大主教区，389

Kiliĭj (fiefs of fendal sipāhī)，剑地（封建西帕希的采邑），349

Kilwa (E. Africa)，基卢瓦（东非），545

King of the Romans，罗马人国王，327

King's Peace, the，国王和议，见Bergerac, Peace of条

Kings, election of，选举国王，波兰，381—382

Kingship，王权，见Monarchy条

Kinsale (Ireland)，金塞尔（爱尔兰），西班牙人在此，309

Kirchner, Timotheus，基希纳，蒂莫修斯，神学家，84，168，169

Kirk o' Field，长老教会活动场，228

Kirkholm (Salaspils)，克尔克霍姆（萨拉斯皮尔），战役，418

Kishin (Arabia)，基申（阿拉比亚），540

Kiszka, John，基斯卡，约翰，维尔诺城守，391

Klushino，克鲁希诺，战役，419

Knäred，克奈勒德，和约，423，426

Knights of the Empire，帝国骑士，327

Knights of st John，圣约翰骑士团，252

Knox, John，诺克斯，约翰，宗教改革家，113—114，116，213，218

在日内瓦和法兰克福，89，98，166

著《苏格兰王国宗教改革史》，113，444

其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书，216

其教育计划，450

Knyszyn, 克内申, 377

Knyvett, Henry, 尼维特, 亨利, 著《保卫国家》, 182

Kober, Martin, 考伯, 马丁, 艺术家, 403

Koçu Beg, 科丘·贝伊, 其奏折, 351—352

Komenský, 科门斯基, 见Comenius条

Komorn, 科莫恩, 要塞, 361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401, 405, 406

Koppan, 科潘, 360

Kotte, 科特, 王国, 546

Kouwenstein dyke, 库文斯登堤, 199, 200

Krasiński, Francis, 克拉辛斯基, 弗朗西斯, 主教, 391

Krell, Dr Nicholaus, 克雷尔博士, 尼古劳斯, 萨克森大臣,
333

Kristianopel, 克里斯蒂安努珀尔, 要塞, 420

Kromer, Martin, 克罗默, 马丁, 历史学家, 444

Kron, 科龙, 在印度的代理人, 536

Kuban, river, 库班河, 359

Kuban steppe, 库班草原, 356, 359

Kulpa river, 库帕河

Kura river, 库拉河

Kyoto, 京都, 551

Kyushu, 九州

大名, 544

这里的皈依者, 551—552

La charité, 拉沙里泰, 胡格诺派驻防, 288

La Goletta (Tunis), 拉戈莱塔 (突尼斯), 354

La Rochelle, 拉罗谢尔

宗教会议, 96

海上乞丐在这里的基地, 273, 288

胡格诺派驻防, 288

围攻, 290, 384

Labour, 劳动力

流动性, 22—23

在美洲, 512—514

Labour dues, 劳役

在波兰, 379, 397

在新西班牙, 512

Ladoga, Lake, 拉多加湖, 419

Lafreri, Anton, 拉菲利, 安东, 古物专家, 448

Lakes, the Great, 五大湖, 531

Lambarde, William, 兰巴德, 威廉, 历史学家, 127

Lambin, Denis, 朗班, 丹尼斯, 学者, 编纂卢克莱修的作品集,
446

Lancaster, Sir James, 兰开斯特爵士, 詹姆斯其远航, 557

Lancers, 矛枪骑兵, 192, 195

Land, 土地

使用权, 127

投机, 524

Lando, Alvise, 兰多, 阿尔维斯, 威尼斯人, 论那不勒斯, 255

Landsberg League, 兰茨贝格同盟, 335

Landshut, 兰茨胡特, 铠甲输出, 187

Langside, 朗赛德, 玛丽·斯图亚特败于此, 229

Languages, 语言学

在波兰, 381

研究, 428, 448—449

传教士与语言学, 548, 551, 556

Languedoc, 朗格多克, 315

出口小麦, 37

农民起义, 281

胡格诺派, 282, 283, 290, 314

西班牙军队在这里, 305

Lapland, 拉普兰, 420—421

Larum for London, 《警告伦敦》, 176

Laski John, 拉斯基, 约翰, 宗教改革家, 101—102, 106, 121

Lasso, Orlando di, 拉索, 奥兰多·迪, 334

Latin, 拉丁文

使用, 在路德宗的崇拜仪式中, 85

研究, 427, 429, 432, 433—437

西塞罗的, 447

外科医生的抵制, 475

Latvians, 拉脱维亚人, 381

Laubespine, 劳比斯班, 见De l' Aubespine条

Laud, William, 劳德,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147

Laudonnière, René, de, 洛多尼埃, 勒内·德, 殖民者, 517

Lausanne, 洛桑, 155

学校所在地, 431

Law, 法律

教规, 44, 368, 440, 445

宗教法, 路德与加尔文对此的态度, 91

“自然法”, 99, 126, 168, 171, 446, 490, 497

国际法, 165—170, 446

战争法, 173

德意志的, 329

罗马人的, 329, 445—446

研究, 429, 430, 438, 440, 445—446, 450

民法, 440, 446

习惯法, 英格兰的, 446

作为法律源泉的人民, 501, 503

Lawyers, 律师

皇家的, 在法国, 53

作为占有官职者, 302

Laynez, Diego, 莱奈茨, 狄埃戈, 耶稣会将军, 58

Lead, 铅

使用, 在提炼白银时, 24

生产, 39; 在英格兰, 368; 在波兰, 399, 401, 402

League, 同盟, 见Catholic League条, Holy League条

Learning, 学术, 440—452

与战争, 173

Leather industry, 皮革生产, 在英格兰, 136; 在波兰, 399, 401; 在俄国, 405

Lebrija, Elio Antonio de, 莱夫里哈, 埃利奥·安东尼奥·德, 学者, 434, 436

Lefèvre of Étapes, 埃塔普勒的勒费弗尔, 其圣经译本, 441

Legazpi, Miguel Lopez de, 黎牙实比, 米格尔·洛佩斯·德, 葡萄牙海军将领, [\[3\]](#)17, 507, 553, 554

Leghorn, 里窝那, 28, 37, 261

Le Havre, 勒阿弗尔, 英国人在这里, 220—221, 286

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莱斯特伯爵, 罗伯特·达德利, 133, 232

与伊丽莎白, 129, 131, 145, 220

在尼德兰, 188, 295, 297—299

议婚, 与玛丽·斯图亚特, 222, 223

Leiden, 莱登, 见Leyden条

Leigh, Charles, 利, 查理, 探险家, 526

Leipzig, 莱比锡, 400, 405, 535

Leith, 利斯, 法国派被围困在此, 213—215

Leitmor peninsula, 莱替莫半岛, 547

Leland, John, 利兰, 约翰, 古物专家, 444

Lennox Matthew Stuart, earl of, 伦诺克斯伯爵, 马修·斯图亚特, 223, 229

Leo I, 利奥一世, 东罗马帝国皇帝(453—474年), 研究其战术, 193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454

Leopold, 利奥波德, 大公, 343

Leopolita, Martin, 利奥波利塔, 马丁, 作曲家, 403

Lepanto, 勒班陀

战役, 202, 205, 239, 252, 289, 353—354

此战的经验, 300

Lescarbot, Marc, 莱斯卡博, 马克, 阿卡迪亚的历史学家, 530

Lesdiguières, François de Bonnt, seigneur of, 莱迪古耶尔领主, 弗朗索瓦·德·博讷, 多菲内的总督, 315

Leslie, John, 莱斯利, 约翰, 罗斯的主教, 216

Leszcynski, 莱茨琴斯基, 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保护人, 390

Leszno, 莱什诺, 390

Lettres de maîtrise (France), 行东证书 (法国), 140

Levant, 黎凡特, 28, 352

贸易, 366, 534, 541; 纺织品贸易, 39, 262

英国人在这里, 367, 368, 557

Levant Company, 黎凡特公司, 43, 557

Levendāt (rootless men), 勒亡达特 (流浪者), 在奥斯曼帝国, 372, 373, 374

Lewis William of Nassau, 拿骚的路易·威廉, 见 William Louis 条

Leyden, 莱登

纺织品生产, 40, 41 (图4)

大学, 66, 432, 439, 451

教会, 104

抵制乞丐党人, 274

Liberty, 自由, 概念, 502, 505, 506

Licet ab initio (bull), 特许起始 (敕令), 481, 488

Liège, 列日

主教区, 336, 342

学校所在地, 431

Lilio, Luigi, 李利奥, 路易吉, 天文学家, 465

Lille, 里尔, 101

Lily's Grammar, 利利语法, 433

Lima, 利马, 510

耶稣会学院, 439

圣马科斯大学, 515

Limpieza de sangre, 纯洁血统, 61, 245

Linen, 亚麻, 39

‘Lines of Demarcation’, 分界线, 性质与效力, 159—160

Linköping, 林雪平, 瑞典议会在此召开, 416

Linlithgow, 林利斯戈, 119

Linschoten, Jan Huyghen van, 林索登, 让·惠更·范, 航海者, 537, 539, 558; 被征引, 540, 541

Lipsius Justus, 利普修斯, 尤斯图斯, 学者, 443, 446, 447, 448

著《罗马的军事》, 178

Lira, 里拉, 28, 29

Lisbon, 里斯本, 16

人口, 33, 34

英国远征, 175

商人, 247, 534

落入西班牙人手中, 248

无敌舰队由此出发, 300

没收荷兰船只, 311

印度公司, 532—533

富格尔家族离去, 534

Literature, 文学, 13

反映战争, 172, 177—179, 207

西班牙的, 313
本国语的, 428, 451—452
反映殖民地, 528
Lithuania, 立陶宛, 大公国, 33, 377, 378
 其城镇, 380
 人民, 381
 上诉法庭, 387
 新教, 390
 要求, 针对俄罗斯, 393
 第一部史籍, 403
Little Poland, 小波兰, 377
Liturgy, 礼拜式
 天主教的改革, 50
 路德宗, 85, 89
 约翰三世为瑞典所订, 86, 412, 414
 针对奥地利教会的, 324
 参见Prayer-book条
Livestock, 家畜, 饲养, 36, 404, 513
 参见Cattle等条
Living-standards, 生活标准, 下降, 20—22
Livonia, 利沃尼亚, 377, 382, 395, 400
 在这里的利害冲突, 327, 393, 405, 407
 人民, 381, 397
 波兰征服, 411

战役，417—418

港口，423

Livre tournois，记账图尔币，28，29

Livy，李维，罗马历史学家，444，445

被法学家征引，169

为了战术而研究其著作，193

其作品在学校中，435

Łobzów，沃布佐夫宫，402

Lochleven，castle，洛赫利文城堡，229

Locke，John，洛克，约翰，哲学家，492

Lodi，洛迪，和约（1454年），153，154

Log，测程仪，航海的，467

Logarithms，对数，458

Logic，逻辑

改进教学，96，442

研究，429，431，432，437

Lollards，罗拉德派，113，480

Lombardy，伦巴底，197，255，256

London，伦敦，34

瘟疫，23

人口，33，126

呢绒输出，40

西班牙使节在此，162，165

城市数学讲座，179

条约, 309, 528

Londono, Sancho de, 朗多诺, 桑索·德, 西班牙军官, 被征引, 184

‘Longinus’, 朗吉努斯, 著作的版本, 446

Longjumeau, 隆瑞莫, 条约, 287, 288

Longlée, 朗利, 法国使节, 162

Long Parliament, 长期国会, 138

Lopez de Legazpi, 洛佩斯·德·黎牙实比, 见Legazpi条

Lords, House of, 上议院, 见Parliament条

‘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 圣约同盟长老团, 苏格兰, 113, 114, 213—214, 216, 234

Lori, 洛里, 359

Lorich, 洛里克, 学者, 437

Lorraine, 洛林, 209, 317, 408

Lorraine, 洛林, 其枢机主教, 343

Lorraine, Charles de Guise, cardinal of, 洛林枢机主教, 吉斯家的查理, 见Guise, Charles de条

Lorraine, duke of, 洛林公爵, 305; duchness of, 女公爵, 408

Los Vélez, marquis de, 洛斯·贝莱斯侯爵, 244, 246

Louis XI, 路易十一世, 法国国王, 151, 152

Louis XIII, 路易十三世, 法国国王, 318

Louis XIV, 路易十四世, 法国国王, 133

Louis of Nassau, 拿骚的路易, 269, 273, 288

Louis of Savoy, 萨伏依的路易, 153

Louvain, 卢万

大学, 66, 68, 451, 469

神学家们, 169, 441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见Netherlands条

Loyola, St Ignatius, 罗耀拉, 圣依纳爵, 68, 70, 431, 432,
445

Loyseau, Charles, 卢瓦索, 夏尔, 作者, 143

Lübeck, 吕贝克, 328, 411

瘟疫死亡人数, 23

与瑞典, 407, 408, 409

与荷兰的协定, 425

Łubieński, Stanislaw, 乌宾斯基, 斯塔尼斯拉夫, 作者,
403

Lubieniecki, Stanislaw, 卢宾耶齐, 斯塔尼斯拉夫, 作者, 403

Lublin, 卢布林, 393

人口, 377, 380

Lucan, 卢肯, 罗马史诗诗人, 172

Lucian, 卢奇安, 希腊作者, 其作品在学校中, 437

Lucretius, 卢克莱修, 罗马诗人, 446, 462

Ludwig VI, 路德维希六世, 巴拉丁选侯, 恢复路德宗, 82,
120, 334

Lukaris, Cyril, 卢卡利斯, 西里尔, 总主教及教师, 389

Lukowa (Poland), 武科瓦 (波兰), 379

Luria, Isaac, 卢里亚, 以撒, 神秘主义者, 449

Luristān, 洛雷斯坦, 省区, 360

Lusatia, 卢萨蒂亚, 319

Lutfi Pasha, 卢特菲帕夏, 土耳其的大维齐尔, 372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 宗教改革家, 11, 67, 72—75

否认教廷权威, 46

反对瑞士的激进主义, 59, 78, 81

其德意志本质, 84

著《论基督徒的自由》, 91

与专制主义, 443

反对哥白尼学说, 462

论分权, 487—488, 489

Lutheranism, 路德主义, 72—89, 480

与国家, 12

与奥格斯堡和约, 58

在帝国中, 58, 324—325

在波兰, 59, 390, 391, 393

在德意志, 82, 84, 120, 333, 334, 337—338, 339

在斯堪的纳维亚, 85—86

在尼德兰, 100, 265

在西班牙, 244

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323, 324, 326

Luzou (Philippines), 吕宋 (菲律宾), 553

Lwów, 利沃夫, 377

人口, 380

教区, 388

学校所在地, 389, 450

生产与贸易, 398, 399, 400

Lycurgus, 莱喀古士, 斯巴达的, 169

Lyons, 里昂

银行危机, 235

胡格诺派进入, 286

条约, 317

Macao (Macau), 澳门, 545, 552

葡萄牙人进入, 17, 543—544, 547

防御设施, 197

运往这里的奴隶, 539

教区, 547

Macassar, 望加锡, 547

Machiavelli, Niccolò, 马基雅弗利, 尼科洛, 政治家及作者,
261, 490

著《战争艺术》, 178, 181, 193

Madre de dios, “修女迪奥号”, 葡萄牙商船, 203, 535

Madrid, 马德里, 235, 238, 290

派出的使节, 341

Madura, 马都拉, 558

Maestlin, Michael, 梅斯特林, 米夏埃尔, 天文学家, 459,
460, 463

Magdeburg, 马格德堡

围攻, 76, 98

大主教区, 338

Magdeburg Chroniclers, 马格德堡编年史家, 12, 444

Magellan, Ferdinand, 麦哲伦, 斐迪南, 探险家, 521, 553

Magellan' s Strait, 麦哲伦海峡, 521, 558

Maggi, Girolamo, 马吉, 吉罗拉莫, 军事工程师, 189, 196

Magic, 法术, 454, 475—477

Magnetism, 磁学, 455, 461—462, 468, 477—478

Magnus, Olaus, 马格努斯, 奥劳斯, 教士及作者, 421

Magnus, 马格努斯, 丹麦亲王, 405

Maha Bandara, 玛哈·班达拉, 德哈马帕拉的王子, 546

Main, river, 美因河, 其流域的动荡, 337, 338

Maine (America), 缅因 (美洲), 531

Mainz, 美因茨

大学, 66

大主教们, 为皇帝加冕, 327; 作为选帝侯, 327, 328, 338

Maitland, Sir John, 梅特兰爵士, 约翰, 塞莱斯坦的, 苏格兰大法官, 147

Maitland, William, 梅特兰, 威廉, 莱兴敦的, 215, 217, 225, 227, 228—229

在英国的使命, 219, 221, 222

Major, George, 马约尔, 乔治, 路德宗教授, 76

Malabar, 马拉巴, 540, 545

Malacca, 马六甲, 538, 539, 545

亚齐人的进攻, 534, 535, 537

其重要性, 541—543, 547

Malaspina, 马拉斯皮纳, 教皇特使, 415

Malaya, 马来亚, 输出锡, 541

Malays, 马来人, 服务于葡萄牙人, 537

Malcontents, 马尔康坦, 在法国, 见Politiques条

Maldives, 马尔代夫, 椰皮纤维输出, 537

Maldonado, Lorenzo, 马尔多纳多, 洛伦佐, 探险家, 508

Malestroit, Sieur, de, 马尔斯特罗瓦, 西厄尔·德, 与博丹的论战, 18, 19, 29

Malindi, 马林迪, 366, 539

Malta, 马耳他

 土耳其人在此, 188, 189

 保卫, 196, 197

 围攻, 242, 252

Malwa (India), 马尔瓦 (印度), 540

Man, Dr John, 曼博士, 约翰, 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 157—158, 162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111

Mangalore (India), 门格洛尔 (印度), 540

Manica, 马尼卡, 输出黄金, 539

Manila (Philippines), 马尼拉 (菲律宾), 552, 553

 贸易, 17, 554

 王室诉讼法庭, 511

 西班牙人从这里援助葡萄牙人, 543, 547, 554

Manilius, 马尼利乌斯, 著作的版本, 446

Manlich family, 曼利希家族, 金融家, 533

Manorial system, 庄园制度, 在波兰, 398

Månsdotter, Karin, 蒙斯多特, 卡琳, 埃里克十四之妻, 410

Mantua, 曼图亚

议会, 152

Mantuanus, 曼图阿努斯, 人文主义者, 435

Manufactures, 工业品, 38—42

殖民地的需要, 515, 516

参见Industry, and individual products条

Manuzio, Aldo, the younger, 马努齐奥, 小奥尔多, 著《美丽的鲜花》, 436

Maps, 地图, 见cartography条

Mar Joseph, 马尔·约瑟夫, 主教, 549

maravedi, 马拉沃迪, 28, 29

Marburg, 马尔堡

大学, 66

会谈, 81

Marcellus II, 马尔塞鲁斯二世, 教皇, 47

Marchi, Francesco, de, 马尔基, 弗朗西斯科·德, 军事工程师, 196, 456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利乌斯, 著作的版本, 446

Margaret, 玛格丽特, 苏格兰王后, 亨利七世的女儿, 209, 223

Margaret, 玛格丽特, 弗朗西斯一世的姐姐, 92

Margaret of Austria,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265

Margaret of Parma, 帕尔马的玛格丽特, 尼德兰摄政, 239, 264—265

其统治, 102, 235, 270, 285

与腓力二世, 240, 268

被阿尔发代替, 271

Margaret of Valois, 瓦卢瓦家族的玛格丽特, 法国亨利四世之妻, 288, 289

Marie de Medici, 玛丽·德·美第奇, 法国亨利四世之妻, 318

Mariner's Mirror, 《海员便览》, 204注, 469

Marischal College, 马里斯卡尔学院, 阿伯丁, 439

Marlowe, Christopher, 马洛, 克里斯托弗, 诗人, 475

Marnix, P. van, 马尼克斯, P. 范, 见Ste Aldegonde条

Maroons, 逃亡黑奴, 加勒比地区, 520, 521

Marriages, 婚姻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4

教士的, 73, 324

对国王的义务, 在封建制度下, 143

Marseilles, 马赛, 23, 28

造船主, 205

marsk, 陆军元帅, 瑞典官职, 422

Martin Marpretate tracts, 马丁·马尔普莱雷特小册子, 110—
111

Martini, Olaus, 马提尼, 欧劳斯, 乌普萨拉大主教, 88

Martyr, Peter, 马特, 彼得, 宗教改革家, 106

Martyrs, 殉教者

天主教的, 在英格兰, 12

新教的, 在尼德兰, 100; 在法国与英格兰, 131

Mary of Guise (of Lorraine), 吉斯家族的玛丽(洛林的), 作为苏格兰摄政, 112, 114—115, 210, 213, 235注

死亡, 115, 215

Mary of Hungary, 匈牙利的玛丽, 239, 265

Mary of Lorraine, 洛林的玛丽, 见Mary of Guise 条

Mary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玛丽, 239

Mary Stuart, 玛丽·斯图亚特, 苏格兰女王, 112, 115, 209—233, 235注

她的丈夫, (弗朗西斯二世), 94, 115, 213, 215; (达恩利), 223—224, 226—227; (博思韦尔), 226, 228

与诺克斯, 114, 116

被囚, 231, 276, 296

议婚, 与唐·约翰, 276; 与吉斯家的亨利, 293; 与埃里克十四, 408

向腓力让渡继承权, 299

Mary Tudor, 玛丽·都铎, 英格兰女王, 2, 3, 4, 114

婚姻, 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 157, 209, 210, 237

死亡, 210

Mashhad (Persia), 马什哈德(波斯), 360

Mashonaland, 马绍纳兰, 539

Maskat (‘Umān), 马斯喀特(乌曼), 366

Mass, 弥撒

其牺牲教义, 48

在苏格兰被禁止, 115, 216

Massawa, 马萨瓦, 土耳其人占领, 164

Mathematics, 数学, 65, 453—454, 457—459

在战争中, 178—179

为通商，428

在学校中，437—438

在意大利，439

与地图绘制，469—470

Matthias, 马蒂亚斯, 大公, 尼德兰总督, 278

Maulbronn, Formula of, 《毛尔布龙教义》, 83

Maurice of Nassau, 拿骚的莫里斯, 联合省的军事统帅, 104, 298, 310

战术, 178, 193, 194

军队, 181, 183, 185

作为联合省的总督, 299

Maurice, 莫里斯, 萨克森选帝侯, 75

与亨利二世结盟, 47, 77, 155

他所建立的学校, 432

死亡, 77

Maurolyco, Francisco, 莫罗利科, 弗朗西斯科, 几何学家, 457

Maximilian I, 马克西米连一世, 皇帝, 320, 330

Maximilian II, 马克西米连二世, 皇帝, 320, 321

容忍路德宗, 58, 59, 80, 122, 324, 325

作为波兰王位候选人, 382, 384

死亡, 384

Maximilian, 马克西米连, 大公

波兰选举, 382

囚徒, 385

逃跑, 394

弃权, 395

Mayadunne, 玛亚杜恩, 王子, 546

Mayenne, Charles de Lorraine, duke of, 马耶讷公爵, 沙尔·德·洛林, 302

与同盟, 305—306

与亨利媾和, 307

Mazovia, 马索维亚

公国, 377, 378

地毯, 399

Meat, 肉类, 在西属美洲, 509, 513, 514

Mecca, 麦加, 352, 355, 540

Mechanics, 力学, 453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337

Medici, Alessandro de, 美第奇, 亚历山德罗·德, 260

Medici, Catherine de, 美第奇, 卡特琳·德, 见Catherine条

Medici, Cosimo de, 美第奇, 科西莫·德, 佛罗伦萨公爵, 260—261

Medici, Ferdinand de, 美第奇, 斐迪南·德, 托斯卡纳大公, 261

Medici, Francis de, 美第奇, 弗朗西斯·德, 托斯卡纳大公, 261

Medici, Lorenzo de, 美第奇, 洛伦佐·德, 访问那不勒斯, 152

Medici, Marie de, 美第奇, 玛丽·德, 见Marie de Medici条

Medicine, 医学

在战争中, 175, 174

研究, 429, 430, 438, 439

内容，454

植物学对医学的附属地位，454，471—472

Medina，麦地那，穆斯林圣城，355

Medina Sidonia, Alonso Perez de Guzmán, duke of, 麦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被任命为无敌舰队总司令，300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保卫，针对土耳其人，197，251—252

英国人与荷兰人在这里，367

与波罗的海相比较，404

Mehemmed III，穆罕默德三世，土耳其苏丹，363，369

Mehemmed Sokolli，穆罕默德·索科利，大维齐尔，352，358

Meigret，梅格利，拼写家，449

Meissen，迈森，学校所在地，432

Melanchthon，腓力，梅兰希顿，腓力，宗教改革家，72—79，333

兴趣，对于占星术，81；对于天文学，462

与教育，431，450

著《物理学要义》，462

Melville, Andrew，梅尔维尔，安德鲁，加尔文宗信徒，117

其纲领，118，122

Melville, Sir James，梅尔维尔爵士，詹姆斯，223

Mendes family，门德斯家族，金融家，经历，前往君士坦丁堡，31

Mendieta, Gerolamo，曼迪耶塔，吉罗拉莫，编写新西班牙的圣方济各会的历史，515

Mendoza (Argentina), 门多萨 (阿根廷), 508

Mendoza, Doña Ana de, 门多萨, 朵娜·阿娜·德, 埃博利的公主, 250

Mendoza, Don Bernardino, de, 门多萨, 唐·贝纳迪诺·德, 西班牙大使, 162, 238, 295, 299, 368

Mendoza, Diego Hurtado de, 门多萨, 迪戈·乌尔塔多·德, 历史学家, 444

Mendoza, García Hurtado de, 门多萨, 加西亚·乌尔塔多·德, 探险家, 507

Mendoza, Íñigo López de, 门多萨, 伊尼果·洛佩斯·德, 见 Mondéjar, marquis of 条

Menéndez de Avilés, Pedro, 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 佩德罗, 西班牙海军将领, 518—520

Menéndez Marqués, Pedro, 梅嫩德斯·马尔克斯, 佩德罗, 西班牙海军将领, 523

Mennonites, 门诺派, 265

Mercator, Gerardus, 墨卡托, 杰拉尔多斯, 数学家, 449, 469—470, 71

Mercenaries, 雇佣军, 174, 181—183

在英国军队中, 214

在尼德兰, 287, 288

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内, 322, 361

在波兰军队中, 397

在丹麦军队中, 407, 409—410, 423

在瑞典军队中, 411

在葡属东方, 537, 546

Merchant Adventurers, 商业冒险家们, 158, 233

Merchants of Paris, 巴黎商会, 其会长, 290

Mercoeur, Philippe Emmanuel de Lorraine, duke of, 梅尔克公爵, 腓力·埃马纽埃尔·德·洛林, 307

Mercury, 汞

靠其提纯白银, 25, 511, 513

药用, 474

万卡韦利卡矿, 513

贸易, 540

Mericke, Sir John, 梅里克爵士, 约翰, 莫斯科公司代办, 423

Meskhia, 默斯基亚, 公国, 358

Mespellbrunn, Julius Echter von, 米斯佩尔布鲁恩, 尤利乌斯·埃希特·冯, 维尔茨堡主教, 340

Messina, 墨西拿, 254, 353

耶稣会学院所在地, 432

Mesta, 梅斯塔, 西班牙养羊者团体, 140

mestizos, 梅斯梯索人, 512

Metz, 梅斯, 诸侯—主教领地, 149, 154, 209, 327, 334, 343

Meuse, river, 默兹河, 295

Mexico, 墨西哥

白银采掘, 25

天主教会, 56, 515

耶稣会学院, 439

人口, 512

土壤侵蚀, 513

大学, 515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510

Mező-Kereztés, 迈泽凯赖斯泰什, 战役, 363, 369, 373

Michael (Romanov), 米海尔 (罗曼诺夫), 俄罗斯的沙皇, 423

Michael, 米哈伊, 瓦拉几亚大公, 362, 363, 396

Micronius, 米克罗尼乌斯, 瑞典的查理九世的宫廷牧师, 88

Middelburg, 米德尔堡

宗教会议, 104

围攻, 274

Middle classes (bourgeois, burghers), 中等阶级 (市民)

在苏格兰支持新教, 113

与君主专制, 134, 135, 139—140

官僚队伍从中补充, 148, 302

在尼德兰, 270, 273, 297

在法国, 282, 286, 291, 305, 306, 314

对其进行教育, 452

‘Mignons’ of Henry III, 亨利三世的“嬖幸”, 144, 292

Milan, 米兰

瘟疫死亡人数, 23

人口, 33, 256

教会与国家, 54, 258—259

圣卡洛·博罗梅奥, 64—65

在西班牙统治下, 154, 209, 240, 253, 254, 255—256, 320, 535

输出铠甲, 187, 256

与萨伏依公爵, 317

Milton, John, 弥尔顿, 约翰, 诗人, 95

Mindanao island, 棉兰老岛, 547, 553, 556

Ming, 明, 中国皇帝, 164, 543—544

Mingrelia, 明格列利亚, 358

Mining, 开矿, 投资, 24, 296

 在波兰, 398

 在西属美洲, 511, 513

Ministers, 牧师, 加尔文宗的, 其任命, 93, 101, 116—117

Mir Ali Bey, 米尔·阿里·贝伊, 545

Miranda, count of, 密兰达伯爵, 那不勒斯的副王, 255

Mirandula, 米兰都拉

 《花朵》, 437

Missionaries, 传教士, 44, 54—57

 在英格兰, 12

 西班牙的, 在美洲, 54, 56—57, 507, 510, 514—515; 在菲律宾, 555—556

 为他们开办的学院, 55, 389

 葡萄牙的, 在东方, 547—553

Mitayos (labourers in New Spain), 有期服役者 (新西班牙的劳工) 513

Mizauld, Antoine, 米扎乌尔德, 安托万, 编年史家, 452

Modon, 莫东, 354

Modrzewski, 莫德任斯基, 著《完美之国》, 402

Mohács, 莫哈奇, 战役 (1526年), 362

Mohyla, Jeremy, 莫希拉, 杰里米, 摩尔达维亚的土耳其总督,
396

Mohyla, Simon, 莫希拉, 西蒙, 摩尔达维亚大公, 396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从土耳其转入帝国, 362

波兰干涉, 363, 396

东正教会, 390

Molina, Luis de, 莫利纳, 路易·德, 神学家, 67, 68, 173,
441

Molucca Islands, 摩鹿加群岛, 534, 537, 538, 542, 547

战争, 545

Mombasa, 蒙巴萨, 366, 539, 545

Mona passage (Caribbean), 莫纳海峡(加勒比海区), 518

Monarchia, 主宰权(在西西里), 258

Monarchomachs, 反君主派, 414

Monarchy, 君主政治

在苏格兰, 112

其财力的衰竭, 129, 139, 147—148

与贵族政治, 130—134

绝对权利与神圣权利的观点, 135, 315, 494

与外交, 152—153

在法国, 315

选举的, 在波兰, 381, 385—387, 395, 403

在瑞典, 410, 415—416, 422

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理论, 501, 503

立宪的，504

Monardes, Nicolas, 莫纳德斯，尼古拉斯，著《来自新大陆的喜讯》，457

Mondéjar, Iñigo López de Mendoza, marquis of, 蒙德哈尔侯爵，伊尼果·洛佩斯·门多萨，格拉纳达总司令，与摩里斯科人，245—246

Money of account, 记账货币，28

monfis (bandits), 芒菲斯（强盗），245, 246

Mongols, 蒙古人，黄教，57

Monomotapa, 莫诺莫塔帕，地区，539

Monopolies, 垄断

专卖带来的收入，4, 137

与价格，18

伊比利亚人声称垄断与美洲和东方的贸易，159—160, 312, 516, 521, 528

托斯卡纳政府的，261

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被威尼斯打破，262

但泽市民对贸易的垄断，381, 384, 401

在波兰，398, 399

葡萄牙国王的垄断，对香料，534；对白银与铜的出口，535

Mons, 蒙斯，101

夺取与围攻，273—274, 288, 289

Monserrate, 蒙塞拉特，耶稣会士，549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米歇尔·德，443

著《短文集》，445

Montaigu, 蒙泰居，学院，431

Montauban, 蒙托邦, 胡格诺派驻防, 288

Montcontour, 蒙孔图尔, 战役, 181, 288

Montesquieu, baron de, 孟德斯鸠男爵, 449

Montigny, Floris, Lord of, 蒙蒂尼的领主, 弗洛里, 271

Montmorency, Anne de, duke of, 蒙莫朗西公爵, 昂恩·德, 法国将军, 221, 283, 286, 287

Montmorency, House of, 蒙莫朗西家族, 283

- 与吉斯家族的冲突, 132, 216
- 与吉斯家结盟, 220, 286
- 作为政略派, 291

Montmorency-Damville, Henry, duke of, 蒙莫朗西·当维耶公爵, 亨利, 朗格多克总督, 291, 315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 宗教会议, 96
- 大学, 439

Monts, Pierre de Guast, sieur de, 蒙茨先生, 彼埃尔·德·古阿斯特, 530

Moors, 摩尔人, 袭掠格拉纳达, 245

Moravia, 摩拉维亚, 324, 402

Moray, Lord James Stewart, earl of, 莫里伯爵, 詹姆斯·斯图尔特大人, 新教贵族的领导人, 212—213, 215, 218—219, 221

- 作为信使去见玛丽·斯图亚特, 216—217
- 退出宫廷并反叛, 224, 225
- 返回并获得宽恕, 226—227
- 离开并前往法国, 228—229
- 作为摄政王返回, 229

More, Thomas, 莫尔, 托马斯, 人文主义者及大法官, 147, 435

Morel, Frédéric, 莫莱尔, 弗雷德里克, 学者, 441

Morelli, de Villiers, Jean, 莫雷利·德·维利耶, 让, 95

Moriscos, 摩里斯科人, 在西班牙, 244—247, 249, 288
作为土耳其人潜在的盟友, 237, 251

Morocco, 摩洛哥, 191
葡萄牙人败于此, 200, 247, 248

Morrice, James, 莫里斯, 詹姆斯, 伯利的幕僚, 146

Mortars, 臼炮, 攻城武器, 190

Morton James Douglas, earl of, 莫顿伯爵, 詹姆斯·道格拉斯, 苏格兰摄政王, 116, 212, 225, 226—227, 228—229

Moschus, 摩斯科斯, 希腊诗人, 著作的版本, 446

Moscow, 莫斯科, 163, 369—370
教区, 389—390
波兰人占领, 419
使节, 556

Moslems, 穆斯林, 见Muslims条

Mountjoy, Charles Blount, baron, 蒙齐伊男爵, 查理·布朗特, 309

Moura, Christóvão de, 莫拉, 克里斯托旺·德, 腓力二世的代表, 248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539
防御工事, 197
防守, 537

Mughal (Mogul), 莫卧儿, 印度皇帝, 164, 540, 545

与耶稣会士，550

Muhammad Khudabanda，穆罕默德·胡达班达，波斯的沙，358，
360

Mühlberg，米尔贝格，战役，46，75

Mules，骡子，秘鲁矿山用，509，520

Mundt，Christopher，蒙特，克里斯托弗，外事代办，153

Munich，慕尼黑，宫廷，335，336

Munster，芒斯特，起义，309

Münster，朋斯特

再洗礼派在这里的革命，5，123，124，128

主教区，336，343

Murād III，穆拉德三世，土耳其苏丹，358，359，360

允准英格兰的贸易特权，367，557

Murād IV，穆拉德四世，土耳其苏丹，351

Murād，穆拉德，王子，550

Murad，Pasha，穆拉德帕夏，大维齐尔，镇压起义，374，375

Muret，Marc Antoine，米雷，马克·安托万，人文主义者，
442，447

Muscat，马斯喀特，被土耳其人劫掠，537，545

葡萄牙人在此，540

Moscovy Company，莫斯科公司，17，163，413，423，556—557

Music，音乐，13；在法国，260；在威尼斯，262；在波兰，403

Muskets，滑膛枪，188—189，192，194，368，557

Muslims，Moslems，穆斯林

在西班牙，61

在奥斯曼帝国, 347, 350, 373, 374

朝圣, 352, 355, 540

在立陶宛, 381

从葡属印度被逐出, 548

参见Islam条

Mustafā, 穆斯塔法, 苏里曼之子, 被处死, 372

Mustafā, Pasha, 穆斯塔法帕夏, 土耳其军事指挥, 352, 353,
358

Mysticism, 神秘主义, 461, 473, 476

关于数字, 454, 460, 465, 476

帕拉切尔苏斯的, 473

Myszkowski, Gonzaga, 米斯科夫斯基, 冈萨加, 波兰政府法官,
387

Nagasaki, 长崎, 544, 547, 551

Namur, 那慕尔, 被唐·约翰攻占, 277

Nanch' ang (kiangsi), 南昌(江西), 553

Nanking, 南京, 袭掠, 544

Nantes, Edict of, 南特敕令, 10, 96—97, 313—314, 489

Napier, John, 纳皮尔, 约翰, 数学家, 458

Naples, 那不勒斯

人口, 33

教会与国家, 54, 258

在西班牙统治下, 154, 209, 238, 240

沿岸设防, 197, 253

所受的经济剥削, 253, 254, 255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332

Narova river, 纳罗瓦河, 405

Narva, 纳尔瓦

俄国人占领, 405, 407

瑞典封锁, 408, 411

瑞典赢得, 412, 413; 失而复得, 416, 420, 421

Nassau, 拿骚

奥兰治的威廉在此, 102, 273

转变为加尔文宗的, 120

Nassau, Louis of, 拿骚的路易, 见Louis of Nassau条

Nassau, Maurice of, 拿骚的莫里斯, 见Maurice of Nassau条

Nassau-Dillingen, count of, 拿骚-迪林根伯爵, 接受加尔文宗, 334, 342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 161, 506

在数学界, 459

Natural history, 自然史, 456—457

Naumburg, 瑙姆堡, 诸侯会议, 80

Navarino, 纳瓦里诺, 354

Navarre, 那瓦尔

总督职务, 240

西班牙对法属部分的要求, 295

Navarre, Anthony, of, 那瓦尔的安东尼, 见Bourbon, Anthony of条

Navarre, Henry of, 那瓦尔的亨利, 见Henry IV条

Navies, 海军, 202—206

火器, 2, 9, 190, 204

土耳其的, 201, 202, 252, 354, 355

英国的, 202, 203, 206, 214

威尼斯的, 202, 205

西班牙的, 252, 353, 527; 参见Armada条

葡萄牙的, 366, 534, 537

丹麦的, 407

瑞典的, 407, 410

Navigation, 航海, 453, 456, 466—471

Navy Board (England), 海军部(英格兰), 203

Naxos, Mendes, duke of, 纳克索斯公爵, 门德斯, 31

Neck, van, 内克, 冯, 其远航, 558

Negapatam, 内加帕坦, 539, 541

Nemours, Treaty of, 内穆尔条约, 295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442

Neostoicism, 新斯多噶主义, 443

Neri, St Pilip, 内里, 圣腓力, 70

Netherlands, 尼德兰

经济, 15, 16; 饥谨, 23; 通货, 28, 29, 30; 人口, 33; 肉乳生产, 38; 铸造业, 191

加尔文主义, 5, 6, 58, 100—106, 156, 234, 265—266, 269, 270, 274, 276, 277, 279, 280, 297, 307, 488; 路德宗, 100, 265; 天主教, 59, 270, 273, 276, 277, 280, 292; 再洗礼派, 123; 新主教区, 266, 269

西班牙大道通向这里, 209, 229, 287, 317, 337; 西班牙统治, 240—241, 247, 250, 264—269; 破产, 235; 金融危机, 267,

275; 抵制西班牙的征敛, 137, 147, 271—272; 起义, 反对西班牙, 99—103, 158, 268—278

永久的分裂, 59, 278—279, 310

与英格兰的关系, 232, 269, 273, 289, 294, 295—298

关于1579年以后的内容, 参见United Provinces条; 以及Belgium条

Nenberg, house of, 诺伊堡家族, 344

Neva, river, 涅瓦河, 424

Nevers, duke of, 讷韦尔公爵, 384, 386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442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531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507, 509

New Navarino, 新纳瓦里诺, 防御工事, 197

New Testament, 新约, 90, 94

New World, 新世界, 新西班牙, 见America条

Newes from Flaunders, 《来自佛兰德的消息》被引用, 172

Newfoundland, 纽芬兰, 528

渔场, 38, 525, 530

占领, 525

Nicaea, 尼西亚, 宗教会议, 历法, 465

Niclaes, Henry, 尼古拉, 亨利, 家庭派的创立者, 124

‘Nicodemism’, 尼哥底母主义, 100

‘Nicodemists’, 尼哥底母主义者, 488

Nicosia, 尼科西亚, 陷落给土耳其, 353, 354

Niemen, river, 梅梅尔河, 401

Nieuport, 尼乌波特, 战役, 195

Nishāpūr, 内沙布尔, 360

Nizzoli, 尼佐利, 学者, 436, 443

Nobles, 贵族

在苏格兰, 113, 115, 132

在法国, 130, 131—132, 281, 282, 286, 305, 306, 316

在波兰, 130, 147, 378, 383, 386, 388, 391—392

在英格兰, 130—133, 148

在西班牙, 240, 249, 250

在意大利, 240, 254, 259—260

在尼德兰, 265, 266, 268, 278

在帝国, 324, 326, 327, 335

在瑞典, 407, 410, 414, 416, 422, 425—426

在丹麦, 406, 407

在俄国, 418, 419

Noblesse de robe, 穿袍贵族, 143, 146

Nobunaga, Odo, 信长, 织田, 日本的将军, 545, 551, 552

Noircarmes, Jan de, 努阿卡米, 让·德, 尼德兰贵族, 271

Nombre de Dios, 农布雷—德迪奥斯, 518, 520, 521

Norfolk, Thomas Howard, 4th duke of, 第四代诺福克公爵, 托马斯·霍华德, 145, 231, 232—233

Norman, Robert, 诺曼, 罗伯特, 罗盘制造者, 455, 468

Normandy, 诺曼底

沉重的赋税, 281, 314

英国在这里的侵犯, 308

Norris, Sir John, 诺里斯爵士, 约翰, 英国军人, 201

Norrköping, 诺尔雪平, 瑞典议会召开于此, 422

North Sea, 北海, 343, 423, 425

North-west passage, 西北通道, 514

Northern Rebellion (1569年), 北方反叛 (1569年), 130, 231—232, 233

Northumberland, John Dudley, duke of, 诺森伯兰公爵, 约翰·达德利, 2, 210

Northumberland, Thomas Percy, earl of, 诺森伯兰伯爵, 托马斯·珀西, 231, 233

Norvegus, Laurentius, 诺维古斯, 劳伦蒂乌斯, 耶稣会, 86

Norway, 挪威, 404, 421

Nova Ordinantia Ecclesiastica (Sweden), 《新教规》, 86, 87

Nova Zembla, 新赞伯拉, 468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405, 416

德·拉加迪叶在此, 419—420, 423

Nowell, Alexander, 诺埃尔, 亚历山大, 其教义问答, 434

Nowy Saçz, 新松奇, 400

Nunẽz, Pedro, 努内斯, 佩德罗, 地理学家, 453, 466, 469

Nürnberg (Nwremberg), 纽伦堡, 328, 400

造枪匠, 189

建筑物, 344—345

Nutmegs, 肉豆蔻, 葡萄牙人经营, 535, 538, 541, 542

参见spices条

Nyköping, 尼雪平, 瑞典议会在此召开, 422

Oats, 燕麦, 生产, 36, 398, 401

Obsza (Poland), 奥布沙 (波兰), 379

O' Donnell, Hugh, 奥唐奈, 休, 起义及逃跑, 309

Officers, 军官, 在军队中, 180, 183—184, 185, 238

Offices, 职衔

- 出售, 4, 140—141, 142—143, 254, 511
- 与监护制, 133
- 指定, 腓力二世的, 240, 241; 在波兰, 386
- 胡格诺派渗入, 287
- 对职衔征税, 在法国, 316
- 贵族得到高级职务的权利, 在瑞典, 422, 426
- 官职的责任 (博丹), 502

Officials, 官吏

- 官僚阶层的发展, 141—147
- 在奥斯曼帝国, 347, 351, 370

Oláhus, Nicholas, 奥拉胡斯, 尼古拉, 格兰大主教, 59

Oldenbarnevelt, Jan van,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 让·范, 荷兰议长, 105, 298, 299, 311

Oldenburg, 奥尔登堡伯爵, 327

Olivares, count of, 奥利瓦雷斯伯爵, 西班牙大使, 255, 304

Oliwa, 奥利瓦, 384

Olkusz, 奥尔库什, 矿区, 399

Omura, 大村, 日本大名, 551

Oñate, Juan de, 奥尼亚特, 胡安·德, 探险家, 507

Opium, 鸦片, 贸易, 541, 544

Oporto, 波尔图, 陷落给西班牙人, 248

Optics, 光学, 458, 477

Orange, House of, 奥兰治家族, 299

Orange, prince of, 奥兰治亲王, 见William the Silent条

Oratory, Congregation of the, 奥拉托利会, 70

Ordenanzas sobre Descubrimiento, 《海外发现管理条例》, 510

Orellana, Francisco de, 奥利雷亚纳, 弗朗西斯科·德, 探险家, 508

Öresund, 厄勒海峡; 见sound the条

Orissa, 奥里萨, 541

Orléans, 奥尔良, 宗教会议, 94, 95

 胡格诺派军队在这里, 286

 三级会议在这里, 489

Ormuz, 霍尔木兹, 537, 538, 540

 被围攻, 545

Orta, Garcia da, 奥尔塔, 加尔西亚·德, 539注

Ortelius, Abraham, 奥特利乌斯, 亚伯拉罕, 地理学家, 469

Ortenburg, 奥滕堡, 被巴伐利亚所占, 335

Orthodox Church, Easten, 东正教会, 44

 联盟, 在乌克兰与天主教会, 59, 389—390

 在波兰, 381, 389—390, 391, 392, 450

Orzelski, Swietoslaw, 奥泽尔斯基, 斯维也托斯拉夫, 作者, 403

Osborne, Sir Edward, 奥斯本爵士, 爱德华, 商人, 367

Ösel, island of, 厄塞尔岛, 405, 406

Osiander, Andreas, 奥西安德尔, 安德烈阿, 宗教改革家, 74, 75, 83

Osman Pasha, 奥斯曼帕夏, 土耳其军事指挥, 359

Osnabrück, 奥斯纳布吕克, 主教区, 343

Ostend, 奥斯坦德, 西班牙人的围攻与占领, 199注, 310

Ostróg, 奥斯特罗格

 学院所在地, 389, 450

 宗教自由, 392

Ostrogski, 奥斯特罗格斯基, 康斯坦丁大公, 389—390, 392

 地产, 397, 399

Ostroróg family, 奥斯特洛洛格家族, 390

Ostroróg, 奥斯特洛洛格, 波兹南城守, 386

Osuna, Francisco de, 奥苏纳, 弗朗西斯科·德, 方济各会士, 著《礼拜初步》, 71

OŚwiécim, 奥斯威辛, 公爵领地, 398

Ōtomo, 大友, 日本武士, 550, 551

Ottawa river, 渥太华河, 531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347—376

 衰败, 2, 375—376; 通货, 29—30, 370—371; 人口, 32, 370, 372; 作用, 347—352, 365—366, 371—374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 59, 150, 319, 322; 针对它的十字军, 152; 其军队, 175, 184, 356—357, 365—366, 371; 围攻马耳他, 188—189, 242, 252; 针对它的防御工事, 197; 其海军, 201, 202, 252, 354, 355; 武器贸易, 与英格兰, 368—370

战争，与西班牙，236—237，245，251—253，313，353—354，534，535；与威尼斯，253，254，352—354，534，535；与波斯，164，262，355—365，374—375；与神圣罗马帝国，326，360—365，369

关系，与波兰，363，382，396；与瑞典，418

Oudegherste，奥德格尔斯特，建议，在西班牙帝国建立银行，296

Oudenaarde，奥德纳德，加尔文宗政府，277

Overijssel，上艾瑟尔，省区，279，297，299

赶走西班牙人，310

Ovid，奥维德，其作品在学校中，435，452

Oxenham，John，奥克斯南，约翰，海上首领，520

Oxenstierna，Axel，乌克森谢纳，阿克塞尔，首席大臣，瑞典的，422，423

Oxford，Edward de vere，earl of，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133

Oxford，牛津，大学，438，439，440

Pacioli，Luca，帕乔利，卢卡，数学家，428

Pacta Conventa (Poland)，《契约》（波兰），385

Paderborn，帕德博恩，主教区，343

Padua，帕多瓦，大学，179，378，439，472

Painting，绘画，13

意大利的，262

西班牙的，313

Palankas (small forts)，小要塞，361

Palatinate，巴拉丁选帝侯领地，来因地区，333—334

伯爵，作为选帝侯，327，329

加尔文宗在这里，80—81，82，120，334

Paleario, Aonio, 帕莱亚里，奥尼欧，学者，448

Palermo, 巴勒莫，人口，34

Palestrina, Giovanni de, 帕莱斯特里纳，乔万尼·德，作曲家，13

Palingenius, 帕林吉纽斯，人文主义者，435

Palissy, Bernard, 帕利西，伯纳德，陶工及自然史学家，427

Palladio, Andrea, 帕拉第奥，安德烈阿，建筑师，262，

Palmanova, 帕尔马诺瓦，模范的防御工事，196

Palota, 帕洛塔，要塞，364

Pamphlets, 小册子，笔战，尼德兰，279，299

Panama, Isthmus of, 巴拿马地峡，510，520，521，522

Papacy, the, 教皇宫廷

与西班牙，47，160，257—259，294，303—305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49—51，285

与法国，53—54，292

管理传教工作，55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冒犯，62，258；威尼斯的冒犯，263

至高无上的地位，155，445

与声称要垄断贸易的伊比利亚人，159

与英格兰，210

玛丽·斯图亚特求援，225

使节，在德意志，325

参见各教皇条目

Papal bulls, 教皇训谕, 258, 481, 488, 492, 493

与西班牙, 54, 257, 258

与法国, 258

Paper industry, 造纸, 波兰, 398

Pappus (of Alexandria), 帕普斯 (亚历山大里亚的), 数学家, 著作的译本, 457

Paprocki, Bartosz, 帕普罗齐, 巴托茨, 纹章学作者, 403

Paracelsus, 帕拉切尔苏斯, 医生, 442, 453, 454, 473

Paravas (pearl fishers), 帕拉瓦 (采珠人), 548

Paré, Ambroise, 帕雷, 布鲁瓦兹, 外科医生, 189, 474

Paris, 巴黎, 34, 131

暴民, 5, 6, 290, 300

围攻, 9, 303, 305, 309

瘟疫死亡人数, 23

人口, 33

新教徒, 92

慈善院, 175—176

吉斯与蒙莫朗西进入, 286

天主教同盟, 300—301, 302

接纳亨利四世, 306

排除胡格诺派仪式, 313

参见*parlements*条

Parker, Geoffrey, 帕克, 杰弗里, 317注

Parker, Matthew, 帕克, 马修, 坎特伯雷大主教, 107, 109

Parkins, Christopher, 帕金斯, 克里斯托弗, 被派往布拉格,
369

Parlements, 国会, 505

在巴黎, 53, 305, 313

外省的, 292, 302, 315

Parliament (England), 国会 (英格兰)

与清教徒, 108, 109, 212

与赋税, 134—135

长期国会, 138

其授职权, 146

与亨利八世的遗嘱, 211, 219

与伊丽莎白的继承人, 221, 222

Parliament (Scotland), 国会 (苏格兰), 与新教, 115, 117
—118, 216, 218

Parliaments, 国会

在意大利: (西西里), 254 (皮埃蒙特-萨伏依), 259

在波兰, 378—379, 392, 397; 选举国王, 381, 403; 与国
王, 386, 387, 395

参见 *Estates General (France)* 条, *Reichstag (Empire)*
条, *Riksdag (Sweden)* 条, *States General (Netherlands)* 条

Parma, 帕尔马, 公国, 属于西班牙, 209

Parma, Alexander Farnese, duke of, 帕尔马公爵, 亚历山大·
法尔奈泽, 309—310

解救巴黎, 9, 305, 309

作为军队统帅, 104, 198—200, 207

作为尼德兰总督, 240, 278, 298

进行收复, 280, 297, 298

与西班牙进攻英格兰, 299, 300, 301

死亡, 306, 310

Parral (Mexico), 帕拉尔(墨西哥)银矿, 25

Pascal, Blaise, 巴斯噶, 布莱斯, 哲学家及数学家, 71

Paschalius, 帕斯卡利乌斯, 法学家, 169

Pasquier, Etienne, 帕基耶, 埃迪耶讷, 律师及作者, 445

Passano, Gian Giacomo, 帕萨诺, 吉安·贾科莫, 外事代办,
153

Passau, 帕绍

条约(1552年), 47, 77

诸侯—主教领地, 323

Pate (Africa), 帕泰(非洲), 539

patria, 祖国, 其概念, 161

Patrizzi, Francesco, 帕特里齐, 弗朗西斯科, 哲学家及科学家, 447

Patronage, 庇护, 133

在地方上的社会里, 145—146

Paul III, 保罗三世, 教皇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5—46

重新组建宗教裁判所, 50, 61, 481

Paul IV, 保罗四世, 教皇, 47—48, 234

Paul V, 保罗五世, 教皇, 69, 263

paulette (tax), 官职税(赋税), 142, 316

Pavia, 帕维亚, 23, 153, 256

‘Peace of the duke of Aerschot’， “阿尔绍公爵和约”，
276

‘Peace of Monsieur’， “大人和约”， 292

Pearl, river (China)， 珠江（中国）， 543

Peasant nobles (Poland)， 农民贵族（波兰）， 378

Peasants, 农民

在法国， 136, 281, 307, 314

起义， 在奥地利， 326

逃离， 从土地上， 在奥斯曼帝国， 372, 373

在波兰， 379—380, 387, 397, 403

起义， 在芬兰， 415—416

与瑞典国会， 422

Peasants’ War (Germany, 1525年)， 农民战争（德国的， 1525
年）， 5, 84, 123, 234

Pedro the Cruel, 残酷者佩德罗， 卡斯蒂利亚国王， 163

Peele, George, 皮尔， 乔治， 著《一篇告别辞》， 207

Pegu, 勃固， 王国， 547

Peking, 北京， 553

Peletier, Jacques, 佩尔蒂埃， 雅克， 数学家， 455

Pellisson, Jean, 佩利森， 让， 迪斯鲍特利乌斯著作的修订者，
433

Penry, John, 彭里， 约翰， 清教徒， 被处死， 111

Pensions, 年金， 军人的， 175, 176

Peonage, 服役， 为偿债， 在西属美洲， 514

Pepper, 胡椒， 贸易， 533, 534, 535, 540

参见spices条

Perez, 佩雷斯, 耶稣会会长, 552

Pérez, Antonio, 佩雷斯, 安东尼奥, 国务秘书, 139, 242

阴谋与被囚, 250—251

Perne, Andrew, 珀恩, 安德鲁, 神职人员, 110

Perpetual Edict, 永久敕令, 见Eternal Edict条

Persecution of heresy, 对异端的宗教迫害

政治动机, 60

主张与反对的观点, 481—489

Persia, 波斯

与之贸易, 17, 366, 540, 556—557

奥斯曼与之开战, 164, 262, 355—365, 374—375

外交接触, 322, 355, 556

内部危机, 357—358

Persian Gulf, 波斯湾, 366, 534, 538, 540, 550, 557

Persson, Jöran, 佩尔松, 约兰, 埃里克十四的国务大臣, 410

Perth, 珀斯, 114, 213, 217

Peru, 秘鲁, 508—509, 512—513

境内的银矿, 25, 257; 参见Potosi条

内部战争, 510

Perugia, 佩鲁贾, 166

Pescara, marquis of, 佩斯卡拉侯爵, 西西里副王, 240

Pescara family, 佩斯卡拉家族, 253

Pest, 佩斯, 围攻, 364

Petri, Laurentius, 佩特利, 劳伦蒂乌斯, 乌普萨拉大主教, 86, 87

Petrycy, Sebastian, 彼特利希, 塞巴斯蒂安, 学者, 403

Pforta, 普福塔, 学校所在地, 432

Phaedrus, 费得鲁斯, 罗马寓言作者, 作品在学校中, 446

Philip II, 腓力二世, 西班牙国王, 239, 312—313

继承物, 2, 48, 209, 237

婚姻, 与葡萄牙的玛丽, 239; 与玛丽·都铎, 157, 209, 210, 237; 与瓦卢瓦的伊丽莎白, 234, 236, 239, 287; 与伊丽莎白一世议婚, 211

破产, 1, 14, 139, 235, 275, 308; 被银行家所左右, 297

作为天主教的卫护者, 8;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6; 50; 与教廷, 47, 257—259, 303—304; 挫败新教之计划的失败, 312

文牒工作, 141, 239, 241—242; 外交实践, 163; 在西班牙的统治, 237—244, 249—251

关系, 与英格兰, 158—159, 232, 293—294, 295; 计划入侵英格兰, 254, 296, 299—301, 308

关系, 与帝国, 149, 394; 与殖民地, 196, 508, 509—510, 511, 533, 535; 与法国, 220, 236, 288, 290, 292—295, 306, 309, 与葡萄牙, 247—249; 与土耳其, 252, 253, 353; 与意大利, 254—257;

离开尼德兰, 264; 派遣阿尔发到尼德兰, 102, 229, 270; 尼德兰政策, 268—269, 275, 276, 278, 280; 尼德兰否认对他的忠顺, 99, 279

参见Spain条

Philip III, 腓力三世, 西班牙国王, 240, 257, 321

破产, 15

统治, 304, 311, 312

接受詹姆斯一世的和议, 309

Philip, 腓力, 黑森的领主, 80, 408

Philippine Islands, 菲律宾群岛

西班牙的征服, 507, 532

由此增援葡萄牙人, 543, 547, 554

西班牙在这里的政体, 554—556

Philippists (Lutheran sect), 腓力派 (路德宗派别), 79, 81, 82

Philosophy, 哲学, 其发展, 441—443

Physicians, 医生, 475

Physics, 物理

数学的, 471

实验的, 478

Physiology, 生理学, 454

Piāle Pasha, 比里帕夏, 352

Piasecki, Paul, 皮亚塞斯基, 保罗, 作者, 403

Pibrac, Guy du Faur, 皮布拉克的领主, 居伊·迪·福尔, 384

Picardy, 皮卡迪, 283, 301

Picquigny, 皮基尼, 152

Piedmont, 皮埃蒙特, 149, 202

法国重得这里的要塞, 236

Piedmont-Savoy, 皮埃蒙特-萨伏依, 154, 209, 259—260

Pietist movement, 虔敬派运动, 89

Pigs, 生猪, 波兰出口, 402

Pikemen, 矛枪手, 在战斗中, 150, 192, 194

Pilgrimage of Grace, 格雷斯科朝圣者, 147

Pinart, Claude, 皮纳尔, 克劳德, 法国国务秘书, 147

Pinczów, 平丘夫, 加尔文宗学院所在地, 390, 431

Pinkie, 平基, 战役, 112

Pirates, 海盗, 201, 262, 352, 516, 520, 543, 544
 英国的, 269, 294, 520
 阿尔及利亚的, 353, 354

Pisa, 比萨, 医疗学校所在地, 473

Pistoleers, 手枪骑兵, 192, 195

Pistols, 手枪, 189, 192

Pitch, 沥青, 贸易, 401, 527

Pius II, 庇护二世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 教皇, 443

Pius IV, 庇护四世 (简-安吉罗·德·美第奇), 教皇, 48, 50, 62, 64
 重新召集特伦托宗教会议, 285
 与叙利亚的基督徒, 549

Pius V, 庇护五世 (米歇尔·吉斯莱乌里), 教皇
 改革礼拜仪式, 50
 其宣传机构, 55
 与卡兰萨, 62
 谴责贝乌斯主义, 68
 企图挑起英一西战争, 160
 神圣同盟, 针对土耳其的, 252, 253, 353

Pius IX, 庇护九世, 教皇, 258

Pizarro, Gonzalo, 皮萨罗, 贡萨洛, 探险家, 509, 510

Placards, 《公告》, 在尼德兰针对异端的, 265; 《公告》事件, 法国, 481

Plague, 瘟疫, 在欧洲城市中, 23, 64, 259

Plancius, peter, 普兰修斯, 彼得, 105

Plato, 柏拉图, 希腊哲学家, 作品在学校中, 437, 442

Pliny, 普林尼, 罗马自然学者, 做为科学权威, 452

Plutarch, 普卢塔克, 希腊传记作者, 169, 437

Plymouth, 普利茅斯, 设防, 197—198

Pociej, 波西耶, 主教, 389

Podlachia, 波德拉谢, 377, 378

Podolia, 波多利耶, 377, 380, 397

Poissy, colloquy of, 普瓦西会谈, 95, 285

Poitiers, 普瓦捷, 宗教会议, 93

Poland, 波兰, 377—403

经济, 17, 378—379, 397—402; 物价, 22, 280; 通货, 29; 人口, 33, 377, 380; 城镇, 380—381

天主教, 6, 59, 388—393; 新教, 59, 121, 156, 390, 391, 393; 索齐尼主义, 121, 390, 488; 东正教, 381, 389—390, 391, 392, 450

贵族, 130, 147, 378, 383, 386, 388, 391—392; 军队, 178, 191, 397; 选举君主制, 385—387; 教育, 450

插手匈牙利战争, 362—363; 关系, 与土耳其, 363, 382, 396; 与瑞典, 382, 393—395, 408, 411, 416—417, 426; 与俄国, 382, 384, 393—394, 402, 419

大波兰, 377, 381, 400

小波兰, 377

Pole, Reginald, 波尔, 雷金纳德, 枢机主教, 在特伦托宗教会议上, 45

Polish Brethren, 波兰的兄弟会, 390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 440, 480—506

politiques, 政略派

在法国, 53, 216, 279, 285, 291, 293, 307, 315, 316, 489

在尼德兰, 271, 275—276, 279

Polotsk (Lithuania), 波洛茨克 (立陶宛的), 393

人口, 380

Polydore Vergil, 波利多尔·维吉尔, 见Vergil条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377

Ponet, John, 波尼特, 约翰, 温切斯特主教, 98

Pontà Mousson, 蓬塔穆松, 耶稣会学院所在地, 439

Pont de Gresin, 蓬德格里辛, 在西班牙大道上, 317

Pontremoli, Nicodemo da, 庞特雷莫利, 尼科代莫·达, 外事代办, 151

Poor, the, 穷人

救济, 在英格兰, 10, 176; 在波兰, 412

流浪, 128

Population, 人口

增长, 5, 9, 11, 32—34, 126—128, 370, 372

在奥斯曼帝国, 32, 370, 372

在米兰, 33, 256

在波兰, 377, 380

在瑞典, 425

在西属美洲, 512

Porcelain, 瓷器, 中国的, 544, 554

Portugal, 葡萄牙

经济, 16, 24, 247; 人口, 33; 进口武器, 191

在西班牙统治下, 8, 27, 55, 247, 248—249, 294; 英国人登
陆, 9

声称帝国内商业垄断, 159; 葡萄牙帝国, 在西班牙统治下,
249, 508; 东方利益(印度公司), 532—547; 传教工作, 547—553

Possevino, Antonio, 波塞维诺, 安东尼奥, 耶稣会士, 86

Postulata Polonica, 《波兰宣言》384

Potash, 钾碱, 波兰出口, 401

Potosí, 波托西, 银矿, 3, 25, 40, 313, 510, 511, 513, 544

Poullain, 普兰, 加尔文宗逃亡者, 100

Pound sterling, 英镑, 28, 29

Poznań, 波兹南, 378, 386, 389, 400

人口, 380

波希米亚兄弟会在这里, 390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布尔日国事诏书, 51, 53

Prague, 布拉格

鲁道夫二世在此, 320, 325

寡头政治, 323

Prayer-book, 祈祷书

伊丽莎白的, 78, 107, 108, 212

爱德华的, 106, 107, 157

Predestination, 得救预定论, 教义, 69, 88, 93, 116, 125
 《教义条款》的评论, 83
 被阿明尼乌派否认, 105
 剑桥神学家的批评, 111—112
 围绕此说的争论, 441, 484
Pre-emption, 先买权, 137
Presbyterianism, 长老会制度
 在法兰克福, 106—107
 在英格兰, 110—111
 在苏格兰, 117—118
Presidios, 要塞, 掌握在西班牙手中的托斯卡纳的, 154, 209,
261
Prevesa, 普雷韦扎, 战役, 353
 ‘Price revolution’, the, 价格革命, 3, 10, 11, 20, 370
Prices, 价格, 17—24, 32—33, 126
 在尼德兰, 259, 270
 在法国, 281, 314, 315
 在德意志, 332, 334
 波兰城市中的规定, 380
 参见Inflation条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制, 在德意志诸侯领地上, 332, 334
Principalities, 诸侯领地
 帝国的, 327, 331—337; 教会的, 52, 337—343
 多瑙河流域, 362, 363, 396
Printing-presses, 印刷所

多种语言，传信学院的，55

与公众舆论，160

在波兰，386，390，392，398

Privateering，私掠船活动，159，160，201，232，296，309，516—517，520，523，536

Processus confederationis (Poland)，《联合审理法》（波兰），393

Propaganda，传教

在小册子中，279，299

对殖民地，528

Propaganda College，传信学院，建立，55

Propaganda，Congregation of，传信会议，见Congregation 条下，‘Prophesyings’，代神发言，被禁止，109—110

Protectors of Huguenot churches in France，法国胡格诺教会的保护人，282，284

Protestantism，新教，44—45，72—125

其领导，5，8

在特伦托宗教会议上被代表，46

其革命性要旨，125，155—156

在帝国议会中，329

抵制新历法，466

参 见 Calvinism 条；Lutheranism 条；Puritanism 条；Socinianism 条等

Provence，普罗旺斯，302，305

输出小麦，37

与意大利诸公爵，260，261，305

胡格诺派, 282, 290

为天主教同盟所做的声明, 302

Prussia, 普鲁士, 382

粮食生产, 36, 37

王领（但泽波美拉尼亚）, 377, 381, 387

公国, 377, 381, 395—396

Prutenic, Tables, 普鲁坦尼星表, 460

Pskov, 普斯科夫, 400, 416

Pstrokoński, 普斯特洛康斯基, 王国政府大法官, 387

Ptolemy, 托勒密, 亚历山大港的地理学家, 452, 459, 469

Public Safety, Committee of (Paris), 公安委员会（巴黎）, 305

Puebla Valley, 普埃布拉谷地, 509

Pueblo, Indians,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507

Puerto Bello, 贝略港, 518, 522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防御工事, 522

Puritanism, 清教主义, 107—111, 493

在新英格兰, 442

Purveyance, 征发权, 137

Pyrenees, Peace of the, 比利牛斯和约, 168

Qaro, Joseph, 卡洛, 约瑟夫, 学者, 449

Quadrant, 象限仪, 467

Quadrivium, 四大学科, 439

Quart d'écu (coin) 四分之一埃居（钱币）, 28

Quebec, 魁北克, 531

Quintilian, 昆体良, 罗马修辞学家, 作品在学校中, 435

Quinto (tax), 银税 (赋税), 296, 511

Quitio, 基多, 王室诉讼法庭所在地, 511

Raab, 拉布, 要塞, 361, 363

Radom, 拉多姆, 铁矿, 398

Radziwill, Prince Christopher, 拉济维乌, 克里斯托弗大公, 390

Radziwill, Prince Janisz, 拉济维乌, 贾努斯大公, 388

Radziwill, Prince Nicolas, 拉济维乌, 尼古拉诸侯, 125

Radziwill, Mikolaj (The Black), Prince, 拉济维乌大公, 米科拉伊 (忧郁者), 390

Radziwill family, 拉济维乌家族, 399

Ragusa, 拉克萨, 贸易, 370

Rajasinha, 拉贾辛哈, 王子, 546

Rakocin, 拉寇辛, 阿里乌派宗教会议, 391

Raków, 拉库夫

 阿里乌派学院所在地, 390

 教义问答, 391

Raleigh, Sir Walter, 雷利爵士, 沃尔特, 479, 524

 论战争, 172

 论英国舰船, 204

 远征, 弗吉尼亚, 457, 525—526; 圭亚那, 508, 524, 526, 528

Ramelli, Agostino, 拉梅利, 阿戈斯蒂诺, 论述机械的作者, 455

Ramism, 拉米斯主义, 442, 443

Ramus (Pierre de la Ramée), 拉米斯(皮埃尔·德·拉·拉米), 96, 439, 442, 447; 著《论辩术》, 437

Randolph, Thomas, 伦道夫, 托马斯, 大使, 224

Rantzau, Daniel, 兰卓, 丹尼尔, 丹麦军事将领, 410

Ratio studiorum (Jesuit), 《理性学习》(耶稣会), 65

Ratisbon, Colloquy of, 雷根斯堡会谈, 73, 155

Rauchfuss (Dasypodius), 劳赫福斯(达西波迪乌斯), 学者, 436

Ravaillac, François, 拉瓦亚克, 弗朗索瓦, 刺杀亨利四世的人, 318

Real (coin), 里尔(钱币), 28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真在(圣餐中的基督), 教义, 47, 79, 81, 85, 107

Reason, 理性, 胡克对此的概念, 496—497

Rebellion, 反抗, 加尔文宗论这种权利, 97, 99, 第十六章

Recorde, Robert, 雷科德, 罗伯特, 数学家, 439, 459, 461

Recusants, 不服从国教者, 在英格兰, 60, 109, 133

Red Book (Swedish Liturgy), 红书(瑞典祈祷书), 86

Red Sea, 红海, 366, 534, 539, 542, 545

Reformation, the, 宗教改革, 67, 79

担忧, 60

效果, 对于大学, 66, 430—431

其世俗化倾向, 120

“激进”运动, 123—125, 234

其政治结果, 在德意志, 129—130; 在帝国, 324

其政治问题480—506

Refugees in Amsterdam, 在阿姆斯特丹的逃亡者, 31; 在日内瓦的, 90; 在法兰克福的, 106; 在亚琛的, 345; 定居在帝国边缘地区的, 361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主教区, 58

会谈, 156

帝国议会在此召开, 328

Regiments, 团, 在军队编制中, 184—185

Reichshofrat, 德国枢密院, 330

Reichskammergericht, 德国最高法院, 329—330, 340

Reichstag, 德国议会, 183, 320, 327, 337—338

结构与权威, 328—329

Reindeer, 驯鹿, 饲养, 420—421

Reinhold, Erasmus, 赖因霍尔德, 伊拉斯谟, 天文学家, 460

reîtres, reiters (German cavalry), 德国骑兵, 189, 287, 288

Religion, 宗教

与政治, 8, 306—307

主要关注的, 11—12

与科学(哥白尼), 462

个人意识, 480, 506

自然的, 486, 487

Religion, Wars of, 宗教战争, 见France条

Religionsfrid, 宗教和平, 建议(1578年), 103

Remonstrants (Arminians), 抗议派(阿明尼乌的), 105, 112, 488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3, 404, 430, 477

Rennenberg, count of, 伦内贝格伯爵, 297

Repartimiento, Labour, 分派制劳工, 在西属美洲, 512, 513, 514

Requesens, Don Luis de, 雷克森斯, 唐·路易·德, 米兰总督, 259

 在尼德兰任总督, 275

Retz, seigneur de, 雷茨的领主, 司法官, 384

Reval, 雷瓦克, 394, 414, 416, 417

 向瑞典求援, 405, 407

 被瑞典占领, 408, 409

Réveille Matin des Français, 《法国复兴之始》, 98

Revenge, 复仇号, 其行动, 309

Reymers, Nicolas, 雷莫斯, 尼古拉, 天文学家, 464

Reynolds, William, 雷诺兹, 威廉, 天主教宣传家, 369

Rheims, 兰斯, 主教区, 266

Rheims Bible, 兰斯圣经, 441

Rheticus (George Joachim), 雷蒂库斯 (乔治·约阿希姆), 460

Rhetoric, 修辞学, 研究, 429, 430, 431, 432, 433, 447

Rhine, river, 莱茵河, 100; 沿河的西班牙大道, 317

 巴拉丁伯爵, 327; 参见Palatinate, Rhenish条

Rhineland, 莱茵兰, 319

 加尔文主义, 5, 8

 输出黄金, 24

“连环”，330

动乱，337

教会领地，338

Rhône, river, 罗讷河，317

Ribadaneira, Pedro, 里巴达奈拉，佩德，论罗耀拉，445

Ribagorza county (Aragon), 里瓦戈萨郡（亚拉冈），250

Ricci, Matteo, 利玛窦，553

Rice, 稻米，贸易，539, 541, 542

Richelieu, 黎塞留，枢机主教，法国政治家，97

Richelieu, river, 黎塞留河，531

Riga, 里加，393, 398

 过境贸易，38, 400, 405, 406, 412

 与瑞典，418, 421

Riga, Gulf of, 里加湾，405

Ríjhove, 赖霍夫，其首领，在根特，277, 278

Riksdalder (coin), 里吉克斯达耳德（钱币），28

Riksdag, 瑞典议会，407, 417, 422

 与国王，410, 415, 416, 422, 424

Rio de Janeiro bay, 里约热内卢湾，508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509

Rio Grande, 格兰德河，507

Rizzio, David, 里齐奥，大卫，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224,

226

Roanoke island, 罗阿诺克岛，525, 526

Robortello, Francesco, 罗伯泰洛, 弗朗西斯科, 学者, 445, 446

Rocroi, 罗克鲁瓦, 设防城市, 198

Roda, Gerónimo de, 罗达, 杰罗尼莫·德, 西班牙在尼德兰国务会议中的代表, 276

Roe, Sir Thomas, 罗爵士, 托马斯,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 376

其美洲远航, 526

Roger, count of Sicily, 西西里的罗哲尔伯爵, 258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与其界线一致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野, 66

Roman Empire, Holy, 神圣罗马帝国, 见Empire条

‘Roman months’ (tax), “罗马月” (税收), 328

Rome, 罗马

人口, 33

新发现物, 50, 325, 439

尼利在这里的工作, 70

古代的军事榜样, 187, 193

Rondelet, Guillaume, 隆德莱, 吉约姆, 动物学家, 453

Ronsard Pierre de, 龙沙, 皮埃尔·德, 诗人, 186—187, 234

‘Rossaeus’ (William Reynolds?), “罗骚” (威廉·雷诺兹?), 98

Rossi, Azariah dei, 罗西, 阿扎利亚·戴, 学者, 449

Roth, Konrad, 罗特, 康拉德, 胡椒贸易合同的签订者, 535

Rothmann, Christopher, 罗特曼, 克里斯托弗, 天文学家, 460

Rouen, 鲁昂

帕尔马解围, 9, 305, 309

胡格诺进入, 282, 286

建议将英国呢绒贸易中心移于此, 288

Rovelasca, 洛威拉斯卡, 胡椒贸易合同的签订者, 535

Rowlands, Richard, 罗兰, 理查德, 天主教宣传家, 369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442

Rózaniec (Poland), 鲁赞耶斯(波兰), 379

Rudolf II, 鲁道夫二世, 皇帝, 320, 321

继位, 82, 122

精神病, 320, 345

统治, 323, 325, 362, 364, 369

与同波兰签订的条约, 385, 395

Roggiero, Neapolitan, 鲁杰罗, 尼波利坦, 学者, 在中国, 553

Ruhā (Urfa), 鲁哈(乌尔法), 373

Ruini, Carlo, 鲁伊尼, 卡洛, 解剖学家, 472

Ruiz family, 鲁伊斯家族, 296

Rumeli, 鲁美利, 其部队, 359

Russia, 俄罗斯

贸易, 17, 163, 402, 405—406, 413

天主教代理人, 在此, 369

关系, 与波兰, 382, 384, 393—394, 402, 419; 与瑞典, 396, 411—412, 416—417, 418—420, 423—424

扩张, 向南方, 355; 向东方, 556

国内战争, 418, 419

教育, 450

Russia Company, 俄罗斯公司, 557

Russians, White, 白俄罗斯人, 381

Ruthenia, 罗塞尼亚, 377, 381

Ruthven, Patrick, baron, 鲁思文男爵, 帕特里克, 珀思的领主, 114, 225, 226

‘Rutters (Routiers), 常走的路线, 468, 558

Rye, 裸麦, 生产, 31, 37, 398, 401, 425

Rzeczpospolita (Polish commonwealth), “共和国” (波兰共和政治), 377, 385

Sá, Mem de, 萨·门·德, 巴西总督, 508

Sable Island, 塞布尔岛, 530

Sacramentarianism, 圣餐象征论, 79, 100

Sacraments, 圣礼, 告解与终傅, 特伦托宗教会议与圣礼, 47

Sadoletto, Jacopo, 萨多莱托, 雅各布, 威尼斯宗教改革家, 263

Safawid, 萨非, 王朝, 波斯, 355, 356, 357

Saguenay, river, 萨格奈河, 530, 531

Ste Aldegonde, Philippe van Marnix, sieur de, 圣阿尔德洪德先生, 腓力·冯·马尼克斯, 104, 199

St André, Jacques d’Albon, seigneur de, 圣安德烈先生, 雅克·达尔邦, 死亡, 221

St Andrews, 圣安德鲁斯, 113, 218

St Bartholomew, 圣巴托罗缪, 屠杀, 1, 8, 63, 96, 274, 289—290, 391

St Dizier, 圣迪济耶, 协议, 216, 217

St Germain, Edict of Pacification of, 圣日耳曼和解告示,

288

St-Jean-de-Luz, 圣-让-德吕兹, 27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 530, 531

St Mark' s, Republic of, 圣马可的共和国, 见Venice条

St Paul' s School, 圣保罗学校, 430, 432, 433

St Quentin, 圣康坦, 战役, 259, 281

St Thomas, Community of (Syrian Christians), 圣托马斯教派 (叙利亚的基督徒),

Sainte-Foy, 圣福瓦, 宗教会议, 96, 282

Saints, 圣者, 作为圣者时代的16世纪, 70

Sakai (Japan), 堺市 (日本), 551

Sala, 萨拉, 银矿, 404

Salamanca, 萨拉曼卡, 大学, 66, 71, 169, 432, 439

Salazar, 萨拉萨尔, 主教, 554

Sales, St Francis de, 塞尔斯, 圣弗朗西斯·德, 日内瓦主教, 63, 64

Salic Law, 萨利克法典, 306

Sallust, 萨卢斯特, 罗马历史学家, 作品在学校中, 435, 444

Salt, 盐

 贸易, 39, 425, 523

 波兰的矿产, 399

 与英国渔夫, 525

Salta (Argentina), 萨尔塔 (阿根廷), 508

Saltillo, 萨尔蒂洛, 507

Saltpetre, 硝石, 191

Saluzzo, 萨卢佐, 236, 301, 317

Salzburg, 萨尔茨堡
 大主教区, 323
 牧师公会, 336
Samtzhé, 萨姆茨基, 公国, 358, 359
Samur, river, 萨穆尔河, 战役, 359
Samurai, 武士, 其中皈依基督教者, 551
San Agustín (Florida), 圣阿古斯丁 (佛罗里达), 519, 522
St Antonio, cape, 圣安东尼奥角, 518, 522
San Juan del Puerto Rico, 圣胡安-德尔波多黎各, 522
San Juan de Ulúa, 圣胡安-德乌卢阿, 517, 518, 520
San Lúcar, 圣卢卡尔, 518
San Marco (Calabria), 圣马可 (位于卡拉布里亚), 主教
San Marcos de Lima, 利马的圣马科斯, 大学, 515
San Thomé (India), 圣托梅 (印度), 539, 541
Sanchez, Francisco, 桑切斯, 弗朗西斯科, 医生, 443
Sandalwood, 檀香木, 540, 541
Sandomierz, 桑多梅日, 400
 其协议, 121, 391
Sanjak-begi (governors), 桑雅克贝伊 (总督), 奥斯曼帝国, 348, 350
Sanlúcar de Barrameda, 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 这里的商人, 159
Sansovino, Francesco, 桑索维诺, 弗朗西斯科, 论威尼斯的音乐, 262
Santa Cruz, marquis of, 圣克鲁斯侯爵, 海军统帅, 242, 296, 299, 300

Santiago (Cuba), 圣地亚哥(古巴), 519

Santiago, Dr, 圣地亚哥博士, 土地委员会, 245—246

Santiago del Estero, 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 508

Santiago Tlatelolco, 圣地亚哥-特拉特洛尔科, 印第安人学院, 515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519

 被德雷克占领, 521—522

São Jorge da Minha, 圣若热达米纳, 要塞, 24

São Sebastião (Brazil), 圣塞巴斯蒂昂(巴西), 508

Sapieha, Lew, 萨皮哈, 卢, 立陶宛大法官, 387, 394

Saragossa, 萨拉戈萨, 这里的宗教裁判所, 251

Saravia, Hadrian à, 萨拉维亚, 哈德良·阿, 教士, 428

Sardinia, 撒丁, 197, 209, 260

Sarpi, Fra Paolo, 萨尔皮, 保罗修士, 263

Sarukhan, 萨鲁汗, 374

Sassetti, 萨塞蒂, 在印度的代理人, 536

Satsuma clan, 萨摩部族, 552

Sava, river, 萨瓦河, 361

Savoy, 萨伏依, 149, 292, 317

Savoy-Piedmont, 萨伏依-皮埃蒙特, 154, 209, 259—260

Sawmills, 锯木场, 在波兰, 400

Saxony, 萨克森领地

 境内的银矿, 24

 选帝侯的, 75, 80, 327, 329, 333, 337, 339; “私人顾问”, 331

公爵的, 80, 332, 338

其教会的信纲, 121

Saxony, Maurice of, 萨克森的莫里斯, 见Maurice, elector of Saxony条

Saxton, Christopher, 萨克斯顿, 克里斯托弗, 绘图师, 471

Scaliger, Joseph, 斯卡利杰, 约瑟夫, 历史学家, 445, 446, 447, 448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7, 8, 404—426

经济, 17

人口, 33

异教与基督教, 57

宗教变化, 84, 85—89, 389

教育, 450

参见Danmark, Norway, Sweden条

Scapula, 斯卡普拉, 他的《字典》, 437

Schade, 沙德, 教育家, 434—435

Scheldt, river, 斯海尔德河, 199, 295, 312

封锁, 296, 534

Schenck, 申克, 宗教改革家, 74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肉乳生产, 38

Schmalkaldic League, 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60, 75

Schmalkaldic Wars,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47, 155, 533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66, 441, 442

Schools, 学校

耶稣会的, 65, 389

军事的，174

宫内的（伊斯坦布尔），348

地方语言的，427—429

语法，427，429—438，450

教区的（苏格兰），450

在印度，548

Schutters (citizen guards in Netherlands)，民兵（尼德兰的市民武装），273，274

Schwendi, Lazarus von, 施文迪，拉扎鲁斯·冯，军事著作者，173，183，200，201注

Science, 科学，439，453—479

进展的限度，11，12

在佛罗伦萨，261

参见具体科目

Scotland, 苏格兰，210—231，334，408

加尔文宗，12，88，106—107，112—120，156

天主教，60，113，116，216—217，218

贵族，113，115，132

同英格兰的关系，2，210，214—215，219—220，221—226，230—233

1559年革命，114—115，212—213，215—216

教育，427，450

Scots, 苏格兰人，在波兰，381

Sea Beggars, 海上乞丐，见Beggars条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葡萄牙国王，其摩洛哥十字军，181，247

放弃香料垄断，534

组织印度公司，535

Secretary of State，国务秘书，职务

其普遍出现，141，147

家内保有，142

西班牙此职的重要性，242

Secymin，塞西明，加尔文宗的学院的所在地，390

Segna (Dalmatia)，塞哥纳（达尔马提亚），352

Segovia，塞哥维亚，纺织业，26，38，39

Seine valley，塞纳河地区，黄金输出，24

Sejm (Polish parliament)，波兰议会，130；进一步参考
parliaments条下

Selden, John，塞尔登，约翰，法学家，168，169

Selīm II，谢里姆二世，土耳其苏丹，352—353，372，535

Selnecker, Nikolaus，泽尔内克尔，尼古劳斯，84

Seminaries，神学院，建立，64—65，69；在果阿，548

Sena (Africa)，塞纳（非洲），539

Senate (Poland)，参议院（波兰），见Parliaments条下

Seneca，塞内加，罗马政治家及作者，447

Separatists，脱离国教者，111，124，492

Sepúlveda, Juan Ginez de，西普尔韦达，胡安·吉尼斯·德，
人文主义者，510，514

Serfdom，劳役制

在皮埃蒙特-萨伏依，260

偿付债务，在西属殖民地，514，555

Servetus, Michael (Miguel Serveto), 塞尔维特, 米歇尔
 被施火刑, 89, 155, 482, 487
 异端观点, 125, 482

Settsu (Japan), 摄津 (日本), 551

Setubal, 塞图巴尔, 39

Seven Years War of the North (1563—1570年), 北方七年战争 (1563—1570年), 269, 409—411

Seville, 塞维利亚, 16
 输入金银块, 25—26, 30
 人口, 34
 过境贸易的流动, 40, 41, 159, 517
 路德宗信徒在此, 244

Seymour, Edward, 西摩·爱德华, 见Somerset, duke of条

Seyssel, Claude de, 西塞尔, 克劳德·德, 134, 504

Sforza, Bona, 斯福察, 宝娜, 米兰的, 412—413

Shahrazūr (Kurdistan), 沙拉祖尔 (库尔德斯坦), 360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剧作家, 13
 被征引, 4, 172, 173, 176, 178
 确定哈姆雷特的地点, 420, 421

Shamakhi, 沙马基, 358, 359, 375

sharī‘a (sacred law of Islam), 沙利阿 (伊基兰圣法), 350, 352

Sheep, 羊
 对其征税, 在西班牙, 140
 饲养, 400, 513

Sherley, Antony, 雪利, 安东尼, 赴波斯使者, 374—375

Sherley, Robert, 雪利, 罗伯特, 赴波斯使者, 375

's Hertogenbosch, 斯海尔托亨博斯, 起义, 277

Sherwan, 希尔凡, 557

Shimazu, 岛津, 日本军事贵族, 550

Shipbuilding, 造船, 205

西班牙, 249; 尼德兰, 269; 哈瓦那, 519; 印度, 537

Ships, 舰船

数量与吨位的增长, 40—42

海军的, 202, 203, 205

西班牙的, 527

葡萄牙的, 536

Shirvān, 希尔凡, 357, 359, 360

Shoonbeke, Gillebert von, 舒恩比克, 吉尔伯特·冯签订契约者, 198

Siam, 暹罗, 544, 547, 557

Siberia, 西伯利亚, 556

Sichem, 西舍, 守军被屠杀, 207

Sicily, 西西里

防御工事, 197

在西班牙统治下, 209, 238, 253, 254—255

主宰权在这里, 258

Sidney, Sir Philip, 西德尼爵士, 菲利普, 军人及诗人, 177

Siegecraft, 攻城术, 198—200, 365

Sieges, 围攻, 对此后投降城市的处置, 207

Siena, 锡耶纳

饥荒, 23

被佛罗伦萨征服, 261

Sieviński, Jacob, 塞尼恩斯基, 雅各布, 392

Siewier, 锡维尔, 立陶宛要求主权, 393

Sigismund II (Augustus), 西吉斯孟二世 (奥古斯都), 波兰国王, 377

其统治, 59, 121, 382, 397, 407

Sigismund III (Vasa), 西吉斯孟三世 (瓦萨), 波兰国王, 382, 402

加冕为瑞典国王, 但起了誓, 4, 87—88, 414, 415—416

统治时期的宗教, 59, 389, 392

在波兰统治, 383—388

与哈布斯堡家族, 394—395

与普鲁士, 395—396

Sigismund Bathory, 西吉斯孟·巴托里,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

Signory (*Signoria*) (Venice), 国务议事会 (威尼斯), 157, 352, 353

Sigonio, Carlo, 西戈尼奥, 卡洛, 学者, 445

Sikhs, 锡克族人, 96

Silesia, 西里西亚, 319

Silk, 丝绸

做为地位之象征, 128

对其征税, 西班牙, 245

意大利的, 254, 262

波斯的, 366, 540, 556, 557

中国的, 540, 544, 554

Silva, Ruy Gómez de, 西尔瓦, 吕伊; 戈麦斯·德, 埃博利亲王, 162, 243, 250, 271

Silver, 白银

美洲输出, 3, 9, 10, 18, 25—26, 30, 257, 275, 296, 308, 313, 507, 511, 516, 517, 544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 17, 544

铸币, 24, 27

德意志矿区中输出, 24, 25, 26, 27, 39, 533

走私, 27—28, 249

蒂罗尔输出, 321

在奥斯曼帝国中, 370

波兰输出, 399

瑞典输出, 404

日本输出, 544

参见Potosí条

Simeoni, Gabriele, 西莫尼, 加布里埃尔, 作者, 181

Simons, Menno, 西门, 门诺, 再洗礼派, 123—124

Sinān Pasha, 锡南帕夏, 358, 360

在久尔久被击溃, 363

Sinān Pasha, 锡南帕夏, 西加拉-扎德, 360, 373, 375

Sipāhīs (Turkish feudal horsemen), 西帕希 (土耳其封建骑兵), 348—349, 350, 358

他们中的骚动, 365, 372, 373

Sipāhīs of the Porte (household troops of the sultan), 波尔特的西帕希 (苏丹王室部队), 347, 348, 358

哗变, 371

Sisak, 锡萨克, 围攻和战役, 360

Sitvatorok, 齐特瓦托罗克, 见Zsitva-Torok条

Sivas (Ottoman empire), 锡瓦斯 (奥斯曼帝国), 358, 373

Sixteen (committee of Catholic league), 十六人委员会 (天主教同盟的委员会), 302—303, 305

Sixtus IV (Francesco della Rovere), 西克斯特斯四世 (弗朗西斯科·德拉·罗韦尔), 教皇, 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61—62

Sixtus V (Felix Peretti), 西克斯特斯五世 (菲利克斯·佩雷蒂), 教皇, 160, 263, 303—304

Skagerack, 斯卡格拉克, 409, 423, 425

Skåne, 斯科讷, 省区, 406, 407

Skarga, Peter, 斯卡尔加, 彼得, 维尔诺教长, 389, 403

Skattnästare, 国务大臣, 官职 (瑞典的), 423

Slaves, 奴隶

在美洲, 508, 512

贸易, 516, 517, 539, 547

保卫印度公司, 537

阿比西尼亚的, 540

Slavs, 斯拉夫人

在帝国中, 327

在奥斯曼帝国中, 347, 361

Sleidan, Johann, 斯莱丹, 约翰, 律师, 444

Smallpox, 天花

伊丽莎白一世患染, 221

流行性的, 在西属美洲, 512

Smith, John, 史密斯, 约翰, 殖民者, 529

Smith, Sir Thomas, 史密斯爵士, 托马斯, 学者及国事活动家,
445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393, 394

波兰人围攻, 419

Smuggling, 走私, 136, 540, 544

从西班牙走私金银, 27—28, 249

走私枪炮, 191

在加勒比地区, 517, 523

Smythe, Mr Customer, 史密斯先生, 卡斯特莫, 关税承包者,
141

Smythe, Sir Thomas, 史密斯爵士, 托马斯, 商人, 429

Social services, 社会服务, 127—128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 见Jesuits条

Socinianism, 索齐尼主义, 125, 441, 484—485

在波兰, 121, 390, 488

Socinus, 索齐努斯, 见Sozzini条

Söderköping, 南雪平, 瑞典议会召开于此, 415

Sofala, 索法拉, 539

Solida Declaratio, 《明信详解》, 83

Solor (Indonesia), 索洛 (印度尼西亚), 541

Solway Moss, 索尔韦—莫斯, 战役, 210

Sombrete (Mexico), 索姆布列特 (墨西哥), 银矿所在地, 25

Somerset, Edward Seymour, duke of, 萨莫塞特公爵, 爱德华·西摩, 摄政王, 2

平基战役, 112

Soranzo, Lazaro, 索兰佐, 拉扎罗, 《奥斯曼帝国》的作者, 362

Sorbonne, 神学院

作为教义的权威, 53

谴责亨利三世, 302

Sores, Jacques, 索利, 雅克, 劫掠哈瓦那, 516, 522

Soto, Dominic, 索托, 多米尼克, 学者, 66, 67

Sound, the (Denmark), 松德海峡 (丹麦)

过境贸易的流动, 40—41, 401, 405, 413, 533

封锁, 269

丹麦的控制, 407, 408, 409, 420, 424

过境税的改变, 411

Sovereignty, 主权

人民的, 原则, 98—99

君主的, 在英格兰凌驾于教会之上, 110, 493

对新世界的, 159

国家的, 169, 170, 481, 490, 491, 497

其责任, 501

Sozzini, Fausto (Socinus), 索齐尼, 弗斯都 (索齐努斯), 神学家 441, 483, 484—485

Sozzini, Lelio, 索齐尼, 莱利奥, 弗齐尼主义的创立者, 125, 488

Spain, 西班牙, 234—318

破产, 1, 15, 139, 235, 275, 308; 需要金银, 9, 10, 25—26, 275, 296, 308, 313, 511, 516, 544; 经济, 15, 16, 26—28, 42, 126, 129, 297, 312; 通货, 30; 人口, 33; 工业, 38, 39; 赋税, 136, 137, 138—139, 140, 147, 245, 275

宗教裁判所, 23, 61—63, 71, 157, 232, 243, 244, 245; 埃拉斯都主义的倾向, 48, 54, 55; 与特伦托宗教会议, 46, 54; 宗教歧异, 59, 60; 宗教教育, 65

社会, 128, 313; 出售职衔, 143; 国内政治, 242—247; 大学, 450

军队, 183—185, 193, 238, 246, 275, 280, 305; 进口枪炮, 191; 海军(地中海的), 252, 353; 海军(大西洋的)见 Armada; 与土耳其的战争, 236—237, 245, 251—253, 313, 353—354, 534, 535

关系, 与法国, 6, 7, 159—160, 209, 220, 232, 236, 279, 288—290, 292, 294—295, 307, 309, 337; 与英格兰, 158—159, 209—212, 232, 293—294, 299—301, 308—309, 317; 与爱尔兰, 309; 与教廷, 47, 62, 160, 257—259, 294, 303—305

统治, 在葡萄牙, 8, 27, 55, 247, 248—249, 294; 在尼德兰, 8—9, 99—103, 137, 235, 239—241, 250, 264—281; 在意大利, 238, 240, 253—263

殖民地, 在美洲, 17, 196, 237, 507—523; 在菲律宾, 532, 554—556; 与葡萄牙同在东印度, 533, 543, 547, 554; 对香料群岛提出要求, 553

参见Philip II 条

Spanish Road, the, 西班牙大道, 209, 229, 287, 317, 337

Spanmueller (Pontanus), 斯潘麦勒(蓬塔努斯), 耶稣会教士, 435

Speckle, Daniel, 斯佩克尔, 丹尼尔, 军事著作者, 196

Speculation, 投机

在土地上, 524

在香料上, 534

Speier, 施派尔

帝国法院所在地, 329

这里的主教, 334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 554, 558

这里的基督徒社团, 550

参见Molucca Islands条, Ternate条

Spices, 香料, 贸易, 262, 263, 311, 532—535, 540—543,
557

Spinelly, Sir Thomas, 斯皮内利爵士, 托马斯, 外事代办, 153

Spinola, Ambrogio, 斯皮诺拉, 安布罗吉奥, 总司令, 240,
257, 310, 312

Spinola family, 斯皮诺拉家族, 296

Stadnicki, Stanislaw, 斯塔德尼基, 斯塔尼斯拉夫, 波兰军官

Stahremberg family, 斯塔勒姆贝格家族, 324

Stahremberg Gotthard von, 斯塔勒姆贝格, 戈特哈尔德·冯,
326

Stancari Francesco, 斯坦卡利, 弗朗西斯科, 学者, 448

Stångebro, 斯坦吉布罗, 战役, 88

Staper, Richard, 斯特珀, 理查德, 商人, 367

Stapleton, Thomas, 斯特普尔顿, 托马斯, 天主教宣传家, 369

Star Chamber, Court of, 星法院, 167

State, the, 国家

与教会, 12, 51—53, 60—61, 105, 155, 258—259, 307,
480—506

民族主义的发展, 122, 307

主权, 169, 170, 481, 490, 491, 497

世俗理论, 500

States General (France), 三级会议(法国), 见Estates General条

States General (Netherlands), 三级会议(尼德兰)

与腓力二世, 101, 102, 268, 279

与唐·约翰, 103, 276

与赋税, 264, 267, 268, 272, 278, 284

States General (United Provinces), 三级会议(联省共和国), 105, 162, 297, 299, 558

与加尔文宗信纲, 104; 与阿明尼乌派, 105

States General (Southern Netherlands), 三级会议(尼德兰南部), 311

Statutes, 法令, 见Acts of Parliament条

Stephen Bathory, 斯蒂芬·巴托里, 波兰国王, 382, 402, 411

统治期间的宗教, 59, 392, 393

其统治, 383, 384, 386—387, 397, 399

关系, 与霍亨索伦家族, 395; 与土耳其, 396; 与英格兰, 401

Stettin, 什切青

和约, 410—411

Stevin, Simon, 斯蒂文, 西蒙, 数学家, 179, 196, 449, 458, 468, 471

Stewart, Lord James, 斯图尔特领主, 詹姆斯, 见Moray, earl of条

Stifel, Michael, 施蒂费尔, 米夏埃尔, 数学家, 458

Stirling, 斯特灵, 114, 217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 耶稣会进入, 86
- 丹麦人进攻, 423

Stockholm archipelago, 斯德哥尔摩群岛, 415

Stolbova, 斯托尔博沃, 和约, 424

Stora Kopparberg, 大科帕尔贝里, 铜矿, 412, 424

Stow, John, 斯托, 约翰, 古物专家, 23, 444

Straelen, Anthony van, 斯特利兰, 安东尼·范, 银行家, 264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

- 加尔文宗在此, 100, 120
- 教区, 343
- 学校, 431, 432, 433

Strategy, 战略

- 军事的, 200—201
- 海军的, 206

Strigel, Victor, 施特里格尔, 维克特, 耶拿的教授, 80

Strogonov family,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556

Strykowski, 斯特里耶科夫斯基, 历史学家, 403

Stuhlweissenburg, 施图尔韦森堡, 要塞, 361, 364

Stukely, Thomas, 斯蒂克利, 托马斯, 军人, 181

Sture family, 斯图勒家族, 410

Sturm, John, 斯图谟, 约翰, 教育家, 431, 432, 442

Styria, 施蒂里亚, 省区, 319, 321

新教进入， 325

岁入， 361

Suárez, Francisco, 苏亚雷斯， 弗朗西斯科， 神学家及哲学家，
55, 66, 67, 68, 441, 449, 498

Suchten, Alexander von, 苏科顿， 亚历山大·冯医学作者， 474

Suda (Crete), 苏达 (克里特), 353

Suez, 苏伊士, 366

Sugar, 糖, 贸易, 508, 515, 517, 540

Sukhum, 苏呼米， 土耳其人在此， 358

Sulaimān I (the Magnificent, the Lawgiver), 苏莱曼一世
(大帝， 立法者)， 土耳其苏丹， 163, 322

波斯战争， 355, 356

Sully, Maximilien, duke of, 苏利公爵， 马克西米连， 306

财政改革， 129, 314, 316

建立军事学校， 174

一次宽恕， 207—208

Sultan of Turkey, 土耳其苏丹

王室， 347—350

本质的衰落， 351—352

作为穆斯林的保护者， 355—356

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拉平， 365

Sulu island, 苏禄岛， 547

Sumatra, 苏门答腊， 541, 542

Sunda straits, 巽他海峡， 558

Sunni (orthodox Muslims), 逊尼派 (正统穆斯林), 352, 355, 356

Superintendents, 监督

在苏格兰教会中, 117

在匈牙利教会中, 121

Suprema, 最高委员会,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会议, 62

Supremacy, 至尊地位, 王室的, 凌驾于英格兰教会之上, 与伊丽莎白, 108, 110, 111, 212, 491, 495

与詹姆斯一世, 118

Surat, 苏拉特, 545

围攻, 549

Surgery, 外科, 454, 474—475

Surveying, 测量学, 453

Sussex, Thomas Radcliff, earl of, 苏塞克斯伯爵, 托马斯·拉德克利夫, 230

Sutcliffe, Matthew, 萨克利夫, 马修, 军事作者, 173, 204

Sutherland, John Gordon, earl of, 萨瑟兰伯爵, 约翰·戈登, 216, 218

Swabia, 士瓦本

哈布斯堡家族在这里的世袭财产, 319

“连环”, 330

Swabian Concord, 《士瓦本协议》, 83

Sweden, 瑞典, 404—426

经济, 129, 412, 425—426; 行政管理, 147, 422, 425—426; 出口, 404, 426; 贵族, 407, 410, 414, 416, 422, 425—426; 人口, 425

宗教, 60, 86—88

军队, 178, 183, 185, 407, 410; 进口枪炮, 191; 去往别国的雇佣兵, 287

与丹麦的战争, 269, 408—411, 420—423, 425; 为埃尔夫堡偿付赎金, 411, 423, 424

关系, 与波兰, 382, 393—395, 408, 411, 416—417, 426;
与俄国, 396, 411—413, 416—417, 418—420, 423—424

Switzerland, 瑞士

激进的宗教在这里, 59, 78, 81; 对尼德兰的影响, 100

出售职衔, 143

投枪手, 150, 192

去往别国的雇佣兵, 在法国服役, 192, 287, 301

西班牙大道通过这里, 317

教育与学术, 450, 451

Sword blades, 剑刃, 英国出口, 368

Synergism, 协作主义, 74, 79

Synods, 宗教会议, 391, 415

加尔文宗的, 93—94, 96, 101, 105, 117, 156

天主教的, 在波兰, 389; 东正教的, 390

Syphilis, 梅毒, 474

Syriam, 沙廉, 539, 547

Syrian Christians, 叙利亚的基督徒, 在印度, 549

Szamotulski, Wacław, 萨莫杜尔斯基, 瓦茨拉夫, 音乐家, 403

Szárogród, 萨罗格罗德, 这里的宗教自由, 392

Szikso, 锡克索, 在帝国边境上, 360

Szyszkowski, 齐兹科夫斯基, 主教, 387

Tabriz, 大不里士, 357, 358, 359

 割让给苏丹, 360

 沙收回, 375

Tacitus, 塔西佗, 罗马历史学家, 444

Tactics, 战术

 研究, 193—195

 海军的, 204—205

Tadoussac (Canada), 塔杜萨克 (加拿大), 530, 531

Tagus, river, 塔古斯河, 被封锁, 535

Tahmāsp, 塔赫马斯普, 波斯的沙, 357, 557

Taille (tax), 人头税 (税收), 138, 294, 307, 314

Taler (coin), 塔勒 (钱币), 24

Tallow, 牛脂, 贸易, 405, 514, 556

Talmud, 犹太法典, 研究, 449

Tapestries, 挂毯, 波兰的, 399

Tar, 柏油, 贸易, 401, 406

Tarducci, A., 塔都希, A., 军事作者, 365

Tartaglia, Niccolò, 塔尔塔利亚, 尼科洛, 数学家, 453, 471

Tartars, the, 鞑靼人, 359, 396

 入侵波兰, 178, 397

 被俄国征服, 556

Tasso, Torquato, 塔索, 托卡托, 诗人, 66

Tausendschön, 陶森茨舒恩, 预言家, 81

Tavannes, Jean, de, 塔瓦纳, 让·德, 天主教同盟的, 306

Taxation, 赋税, 散见于, 126—148

 英格兰, 134—137, 143—144, 148

 法国, 134, 135, 136, 137—138, 142—143, 281, 284, 294, 314, 316

 西班牙, 136, 137—139, 140, 147, 235, 245, 246, 275, 312; 对教士征税, 129, 259

 意大利, 254, 255, 256, 260, 261

 教皇有关训谕, 258

 尼德兰, 264, 267, 268, 271—272, 275, 278

 帝国, 328; 为同土耳其作战, 322, 323, 324, 329

 奥斯曼帝国, 372, 373

 波兰, 387, 388

 瑞典, 424

 银税, 在西属美洲, 511

Tea, 茶叶, 402

Telescope, 望远镜, 449

Telesio, Bernardino, 特勒肖, 贝纳迪诺, 443

Temesvár, 泰梅什堡, 要塞, 361

Tenasserim, 德林达依, 541

Tenth Penny tax of Alba, 阿尔发的什一钱税, 271—272, 275

Terraki (land allocations to sipāhī), 增补地 (分子西帕希的土地), 349, 350

Tercio, 团队, 在西班牙军队中, 184—185, 192, 193, 238

Terek, river, 捷列克河, 355, 359

Terence, 泰伦提乌斯, 罗马剧作家, 作品在学校中, 435

Teresa, St (of Avila), 圣德肋撒 (阿维拉的), 54, 70—71, 445

Terlecki, 特尔勒基, 主教, 389

Ternate, 德那地, 541, 542, 543, 547

Terranova, Charles de Aragon, duke of, 特兰诺瓦公爵, 查尔斯·德·阿拉贡, 米兰总督, 240

Terror, 恐怖

做为阿尔发的政策, 207, 274, 275, 310; 帕尔马的政策, 207; 乞丐党某些领导人的政策, 274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造成的, 266

在法国宗教战争中, 286

天主教同盟在巴黎的, 302

Teston (coin), 退斯通 (钱币), 28

Teusina, 条西纳, 和约, 416, 418, 419

Teutonic Order, 条顿骑士团, 405, 408, 409

Textiles, 纺织品, 38—41

参见cloth, silk等条

Theodore, 费奥多尔, 沙皇鲍里斯之子, 418

Theodore, 费奥多尔, 俄国沙皇, 418

Theology, 神学

研究, 12, 429—430, 438—439

对教士进行神学训练, 49, 65

在西班牙的复兴, 55, 67

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 430, 451

有关著作, 440—441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 希腊作者, 472

Thirty Years War, the, 三十年战争, 9, 16

Thomar, 托马尔, 议会, 248

Thomas Aquinas, St, 圣托马斯·阿奎那, 481, 497, 498

Thomists, 托马斯主义者, 68

Throckmorton, Sir Nicholas, 思罗克莫顿爵士, 尼古拉, 大使, 162, 214, 223, 226

Thuanus (Jacques-Auguste de Thou), 杜阿努斯(雅克-奥古斯特·德·图), 历史学家, 384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希腊历史学家, 作品在学校中, 437

Tidore, 蒂多雷, 537

与德那地的竞争, 543, 547

Tierra Firme, 铁拉菲尔梅, 521

Tiflis, 第比利斯, 358, 359, 375

Tilbury, 蒂尔伯里, 在此检阅部队, 117

Tīmār (fief), 提马尔(采邑), 349, 350, 372

Timber, 木材, 贸易, 401, 406, 411, 527

Timor, 帝汶, 541

Tin, 锡, 生产, 39

英国的, 40, 136, 368

马来亚的, 541

Tintoretto, Jacopo Robusti, 丁托列托, 雅各布·罗布斯蒂, 画家, 262

Titian (Tiziano Vecelli), 提香(提兹阿诺·维克利), 画家, 13, 262

Tlaxcala, 特拉斯卡拉, 那里的主教, 56

Tobacco, 烟草, 523, 526, 527, 530

Toledo, 托莱多, 其纺织品, 27, 39

Toledo, Francisco de, 托莱多, 弗朗西斯科·德, 新西班牙总督, 510, 513

Toledo García de, 托莱多, 加尔西亚·德, 西西里副王, 242, 252

Toleration, religious, 宗教宽容, 与政治思想, 480—506

 确保宽容的问题, 10

 在乌得勒支同盟, 31

 反对, 122, 235

 奥兰治的威廉所主张的, 267, 274, 277, 280

 蒙莫朗西·当维耶在朗格多克实行的, 291

 南特敕令, 314

 匈牙利对新教徒实行的, 323

 在波兰, 391—393

 参见Huguenots条下

Tomanis, 托马尼斯, 359

Tomicki family, 托米基家族, 390

Tomsk, 托木斯克, 556

Topazes (Indian Christians), 托帕斯 (印度基督徒), 537

Tordesillas, 托德西利亚斯, 条约, 159

Torgau, 托尔高

 条款, 82

 教义, 83

联盟, 333

Torquemada, Tomás de, 托尔克马达, 托马斯·德, 宗教裁判总
监, 62

Toruní, 托伦, 393, 400

人口, 380

路德宗学院所在地, 390

宗教会议, 391

Toul, 图勒, 诸侯—主教领地, 149, 154, 209, 327, 334, 343

Toulouse, 图卢兹, 27

加尔文主义在这里, 282

宣布支持天主教同盟, 302

Tournai, 图尔奈, 加尔文宗教会在此, 101

Tours, 图尔, 加尔文宗教会在此, 92, 286

Trade, 贸易, 31—43

发展, 5, 10

利润的增长, 22

与海上战争, 205

根据“万民法”, 无处不自由, 159—160

为贸易进行教育, 428

非法的, 见Smuggling条

对贸易征税, 见Customs duties条

参见具体国家及货物

Trades-routes, 商路

从印度, 366

穿过欧洲, 400

在西印度, 518

Transhumance, 游牧, 在西属美洲, 513

Transoxania, 特兰索萨尼亚, 此地的土耳其人, 355, 356, 360, 374

Transport, 运输, 32, 400—401

Transubstantiation, 变体说, 教义, 见Eucharist条下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319, 322, 396

索齐尼主义在这里, 121, 488

与奥地利一同反对土耳其, 362, 363

重新归顺苏丹, 363, 364

Trautmannsdorf family, 特劳特曼斯多夫家族, 324

Travel, 旅行, 文学的反映, 445, 456—457

Treason, 叛国罪

异端即为, 12, 60, 480, 481, 492

与信仰之敌谈判即为, 156

Trebizond, 特拉布宗, 358

Tremellio, Emmanuel, 特雷梅里奥, 埃马纽埃尔, 学者, 448

Trent, 特伦托, 宗教会议, 11, 44—50, 285

斐迪南在会议上的使者, 47, 51, 324

对会议改革的反应, 在德意志, 52—54, 341; 在法国, 52—54; 在西班牙, 54; 在意大利, 256, 258

保留宗教法庭, 61

会上的新教徒, 77

与教皇的最高地位, 155, 445

明确教义与异端, 234

与卡兰萨, 258

与圣餐, 441

与圣经, 462

与主教权威, 515

Trestrillo (Mexico), 特雷斯特里罗, 银矿所在地, 25

Trier, 特里尔, 152

这里的大主教, 做为选帝侯, 327, 338

Trinidad, 特立尼达, 508

Tripoli, 的黎波里, 属于土耳其, 252, 354

Troyes, 特鲁瓦, 条约, 221

Truchsess, Otto, 特鲁赫泽斯, 奥托, 枢机主教, 342

Truchsess von Waldburg Gebhard, 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 格布哈德, 科隆大主教, 342, 343

Tübingen, 蒂宾根, 大学, 66, 82

Tunis, 突尼斯

土耳其的占领, 202, 253, 354

臣属西班牙的国王, 252

Tunnage and poundage, 吨税和镑税, 136, 137

Turcomans, 土库曼人, 在波斯, 357—358, 374

Turin, 都灵, 美术馆所在地, 174

Turkey, Turks, 土耳其, 土耳其人, 见Ottoman empire条

Turnebus, Adrien, 蒂尔内布, 阿德良, 教授, 446

Tuscany, 托斯卡纳, 154, 261

此地的大公, 535

Twelve Years Truce, 十二年停战协定, 西班牙与联省共和国之间, 15, 105, 312, 317

Tyard, Pontus de, 蒂亚尔, 本都·德, 学者, 460

Tycho Brache, 第谷·布拉赫, 天文学家, 454, 462—465

与皇帝鲁道夫, 320

作为炼金术士, 476—477

Tyndale, William, 廷代尔, 威廉, 路德宗信徒, 98

Tyrannicide, 诛杀独裁者的人, 503

Tyrol, 蒂罗尔, 省区, 319, 321, 333

新教徒在此, 324, 325

Tyrone, Hugh O' Neill, earl of, 蒂龙伯爵, 休·奥尼尔, 309

Ukraine, 乌克兰, 377, 378, 380, 387, 397, 401

教会的合并, 59—60

学者们, 441

'*ulemā* (Muslim theologians and jurists), 乌利马 (穆斯林神学家与法学家), 350, 356

Ulm, 乌尔姆, 天主教徒被挤走, 345

Uluĵ 'Ali Pasha, 乌卢杰·阿里帕夏, 阿尔及尔国王, 252, 253, 352, 354, 359

Unemployment, 失业, 128

贵族与缙绅, 3

在安特卫普, 269

与殖民, 527

Uniat patriach, 东西方联合教会大教长, 549

Unitarians, 一位论派, 480, 488

United Provinces (North Netherlands), 联省共和国 (尼德兰北方), 162

经济, 15, 31, 43, 191, 208; 接受西班牙的白银, 28

作为避难所, 31; 此处的宗教, 59, 104—106

拒绝忠于腓力二世, 99, 279; 战役, 279—280; 提供王位, 294; 与莱斯特, 297—299; 加入1596年的三方联盟中, 308; 继承, 310—311; 与西班牙订立十二年停战协定, 15, 105, 312, 317

贸易, 在尼德兰与敌人进行, 298, 311; 与波罗的海, 401, 406, 412; 地图生意, 456, 466; 与美洲, 523, 531; 与亚洲, 557—558

Universities, 大学, 11, 12, 429—431, 438—449, 450—451

与天主教复兴, 66—67, 69

在波兰, 378

在西属美洲, 515

参见有大学的城市名

Unna, river, 乌纳河, 361

Uppsala, 乌普萨拉

教士的会议所在地, 87

争论, 88

宗教会议, 415

Uraniborg, 天文堡, 463, 479

Urban II, 乌尔班二世, 教皇, 258

Urban VII (Castagna), 乌尔班七世 (卡斯塔尼亚), 教皇, 304

Urban VIII, 乌尔班八世, 教皇, 55

Urdiñola, Francisco de, 乌迪诺拉, 弗朗西斯科·德, 征服者, 507

Ushant, 乌尚特, 158

Uskoks (Dalmatian corsairs), 乌斯科克 (达尔马提亚的海盗), 352

Ustājlū, 乌斯达支鲁, 土库曼部落, 357

Usuki, 臼杵, 耶稣会在这里的皈依者, 551

Utraquists, 饼酒同领派, 323

Utrecht, 乌得勒支, 省区, 279, 297, 299

 同盟, 6, 31, 103, 279, 281, 294

 莱斯特在这里, 298

Uzbek Turks, 乌兹别克土耳其人, 355, 356, 360

 侵入波斯, 374

Vacca, 瓦卡, 古物专家, 448

Vacuum, 真空, 其概念, 471

Val de chézery, 谢兹里谷地, 在西班牙大道上, 317

Valdés, Fernando de, 巴尔德斯, 费尔南多·德, 宗教裁判所总监, 62

Valdés, Juan de, 巴尔德斯, 胡安·德, 与信仰条款, 125

Valencia, 巴伦西亚, 128, 240

 摩里斯科人, 246, 249

Valenciennes, 瓦朗谢讷, 101, 288

Valentia, Gregorius de, 瓦伦蒂亚, 格里高利乌斯·德, 神学家, 173

 ‘Valentine, Basil’, 瓦伦廷, 巴西尔, 474

Valignano, Alessandro, 瓦利纳尼, 亚历山德罗, 耶稣会巡视员, 549, 551—552

Valla, Lorenzo, 瓦拉, 洛伦佐, 人文主义者, 436

Valladolid, 巴利亚多利德, 157, 510
大学, 66
“路德派分子”, 244
葡萄牙议会在此, 533
Valois, House of, 瓦卢瓦家族, 3, 132, 210, 233
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 150, 236
Valtelline, 瓦尔泰利纳, 与西班牙, 317
Van, Lake, 凡湖, 地区, 355, 357, 375
Van, Caeden, 冯·凯登, 商人, 558
Van Dyck, Antony, 凡·戴克, 安东尼, 画家, 257
Van Neck, 范·尼克, 商人, 558
Vandenbyssche, Alexandre, 范登比斯克, 亚历山大, 军事著作
者, 178
Varaždín, 瓦拉日丁, 要塞, 363
Varchi, Benedetto, 瓦尔基, 贝内蒂托, 佛罗伦萨历史学家,
261
Vasa family, 瓦萨家族, 7, 410
Vasari, Giorgio, 瓦萨里, 乔尔乔, 著《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
家和雕塑家传》, 445
Vasquez, Gabriel, 巴斯克斯, 加夫列尔, 学者, 66, 67
Vassy, 瓦西镇, 屠杀, 58, 95, 220, 286
Vatican Councils, 梵蒂冈大公会议, 第一次和第二次, 44, 49
Vauban, Sébastien de, 沃邦, 塞巴斯蒂安, 法国将领及军事工
程, 196
Vega, Juan de, 维加, 胡安·德, 西西里副王, 240
Velasco, Juan de, 贝拉斯科, 胡安·德, 米兰总督, 259

Velike Luki, 大卢基, 划归俄国, 393

Venezuela, 委内瑞拉, 荷兰与之贸易, 523

Venice, 威尼斯, 261—263

 瘟疫死亡人数, 23

 贸易, 28, 37, 296, 367

 人口, 33

 呢绒生产, 38, 39, 40, 41, 262

 对外关系, 153, 157, 252

 海军, 202, 205

 与土耳其的战争, 253, 254, 352—353, 354, 534, 535

Vera Cruz, 韦拉克鲁斯, 510, 517, 518

Veranzio, Faust, 维兰齐奥, 福斯特, 关于机械的作者, 456

Verdun, 凡尔登, 诸侯—主教领地, 149, 154, 209, 327, 334, 343

Vergil, Polydore, 维吉尔, 波利多尔, 历史学家, 443

Veronese, Paolo, 委罗内塞, 保罗, 画家, 262

Vervins, 韦尔万, 条约, 15, 183, 308, 523

Vesalius, Andreas, 维萨里, 安德烈阿, 解剖学家, 453, 472

Vestiarian controversy, 关于法衣问题的争论, 107

Vestments, 法衣, 路德论其穿用, 85

Veszprém, 维斯普雷姆, 364

Vettori, Francesco, 韦托里, 弗朗西斯科, 学者, 446

Viborg, 维堡, 408, 416, 423

Vicente, Gil, 维森特, 吉尔, 剧作家, 249

Vienna, 维也纳, 197, 320

耶稣会在此, 58, 325

克勒斯尔的活动, 326

Viète, François, 维埃特, 弗朗索瓦, 数学家, 449, 458—459

Vigenère, Blaise de, 维热内尔, 布莱斯·德, 军事改革家,
182

Viglius (Wigle van Zuichem), 维格利乌斯(维格尔·范·祖
伊赫姆), 法学家, 265, 271

Vigo, Giovanni da, 维戈, 乔万尼·达, 外科医生, 474

Vijayanagar, 维查耶那加尔, 印度帝国, 崩溃, 540, 541

Vikings, 维金人, 57

Vilela, Gaspar, 比莱拉, 加斯帕尔, 耶稣会士, 551

Villahermosa, duke of, 比利亚赫莫萨公爵, 259

Villedieu, Alexandre de, 维勒迪约, 亚历山大·德, 中世纪课
本的作者, 433

Villeroy, Nicolas de Neufville, seigneur de, 维勒鲁瓦大
人, 尼古拉·德·努菲叶, 法国国务秘书, 147, 165

Vincent de Paul, St, 圣文森特·德·保罗, 69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Duplessis-Mornay), 《反暴君宣
言》(迪普莱西—莫尔内), 98, 500—502, 505

Virgil, 维吉尔, 作品在学校中, 435, 436

Virginia, 弗吉尼亚, 186, 457, 509, 525—526, 527, 528

烟草种植, 530

Virginia Company, the, 弗吉尼亚公司, 529, 531

Virtim method of voting in Poland, 在波兰的个人分别直接投
票的方法, 381, 403

Visconti, Giangaleazzo, 维斯孔蒂, 詹加莱亚佐, 代理人, 151, 153

Visegrád, 维谢格拉德, 364

Visitationskommission (Empire), 受理上诉委员会 (帝国), 329—330

Vistula, river, 维斯图拉河, 400

Vitoria, Francesco de, 维多利亚, 弗朗西斯科·德, 教师, 55, 66—67, 446

论新世界的主权, 159

Vives, Juan Luis, 比维斯, 胡安·路易, 学者, 435

Viziers, 维齐尔, 348

Vlodimir (Lithuania), 弗洛基米尔 (立陶宛的), 其人口, 380

Voisin, 瓦赞, 编年史学家, 444

Volga, river, 伏尔加河, 356, 556

Volhynia, 沃伦, 377, 378, 380, 397

阿里乌教派在此, 390

Voralberg, 福拉尔贝格, 省区, 319, 321

Wagenhaer, Lucas, Janszoon, 韦格纳尔, 卢卡斯·詹斯宗, 469

Wages, 工资或薪饷, 17—24; 提高, 14

在尼德兰, 269

奥斯曼帝国军人的, 371

‘Waggoner’ (aid to navigation), “指北针” (有助于航海), 468

Wahlkapitulation (Charter of liberties, Empire), 自由特许状 (帝国的), 327

Waldenses, 韦尔多派, 96

Wālide Sultan (mother of reigning sultan), 苏丹瓦利德
(在位苏丹的母亲), 351

Wallachia, 瓦拉几亚

从土耳其人手中转入帝国, 362

波兰的干涉, 373, 396

Wallis, John, 沃利斯, 约翰, 数学家, 459

Walloons, 瓦隆人, 103, 104

充当雇佣兵, 181, 275, 361

贵族, 278, 311

Walsingham, Sir Francis, 沃尔辛厄姆, 弗朗西斯爵士, 首席秘
书, 273, 557

War, 战争, 7—10, 171—208

为战争而征课, 147, 148, 235

作为封建社会的习俗, 150—151

与基督教世界习惯法, 166

作为一场十字军运动, 206—207

法国人的特长, 291

与奥斯曼帝国, 352, 365—366

军火贸易, 368—369

Wards, Court of, 监护法庭, 142

Wardship, 监护, 封建权利, 143—144

Warsaw, 华沙, 400

人口, 380

“同盟”, 391, 392, 393

这里的宫殿，402

Warships, 军舰，见Navies条

Warszewicki, Christopher, 沃尔泽维奇，克里斯托弗，论国会，403

Warszewicki, Stanislas, 沃尔泽维奇，斯塔尼斯拉斯，耶稣会法学家，86, 168, 169

Warta, river, 瓦尔塔河，396, 400

Warwijck, 沃尔维克，商人，558

Waterlanders, 水地派，124

Wawel, 瓦维尔，大教堂唱诗班所在地，403

城堡，392

Wax, 蜜蜡，贸易，400, 401, 402, 405, 539

Wegierski, Andrew (Regenvolscius), 韦杰尔斯基，安德鲁（雷根沃尔修斯），作者，403

Weimar, Confutation of, 《魏玛驳斥书》，80

Welser family, 韦尔瑟家族，金融家，24, 533, 535, 536

Wesel, 韦瑟尔，皈依加尔文宗，120

Weser, river, 威悉河，343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与之贸易，43

控制，521

参见Caribbean Sea条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评议会在此，230

Westmorland, Henry, Neville, earl of, 威斯特摩兰伯爵，亨利·内维尔，233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 165

这里的土地, 340

Whaling, 捕鲸, 530

Wheat, 小麦

 价格, 22

 生产, 36, 37, 398, 401; 在西属美洲, 513

White, John, 怀特, 约翰, 弗吉尼亚的开拓者, 457

White Sea, 白海, 556

 通过此处的贸易, 405, 408, 413, 416, 424

 瑞典与白海, 413, 416, 417, 419, 420, 421, 424

 参见Archangel条

Whitgift, John, 惠特吉夫特, 约翰, 坎特伯雷大主教, 110—
111

 与卡特赖特的争论, 109, 439, 494—495

 论教会与国家, 491, 498

Whittingham, William, 惠廷厄姆, 威廉, 神职人员, 89

Wied, Count Friedrich von, 维德, 考特·弗里德里希·冯, 科隆大主教, 341

Wieliczka, 维利奇卡, 附近的盐矿, 399

Wieprzec, 维普日, 380

Wigand, John, 维干德, 约翰, 神学家, 81

Wilhelm V, 威廉五世, 巴伐利亚公爵, 334—335, 336

Wilkes, Thomas, 威尔克斯, 托马斯, 298

Wilkins, John, 威尔金斯, 约翰, 著《数学法术》, 478

William, 威廉, 于利希-克莱沃公爵, 344

William IV, 威廉四世, 黑森—卡塞勒的领主, 82, 460, 484

William Louis of Nassau, count, 拿骚的威廉·路易伯爵, 弗里斯兰的总督, 193, 299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 沉默者威廉, 奥兰治亲王, 1, 280—281, 306

退隐到拿骚, 102, 270; 组织反抗阿尔发, 273

从德意志攻入, 103, 232, 271, 274

与腓力二世, 236, 241, 267, 279

受挫于阿尔发, 274

成为荷兰与泽兰的总督, 在联省共和国中, 274

维护统一的失败, 277, 278, 279

与莱斯特, 297

死亡, 280—281, 294

Wilno (Lithuania), 维尔诺(立陶宛的), 393, 400

人口, 380

大学与这里的学院, 389, 390, 439

Wilson, Thomas, 威尔逊, 托马斯, 外交家及学者, 134, 449

Winchester College, 温切斯特学院, 436

Windisch march, 温迪施边区, 帝国的, 361

Windischgrätz family, 温迪施格雷茨家族, 324

Windward Islands, 向风群岛, 518

Wine, 酒

对酒征税, 136, 138

来自西班牙的, 158

波兰进口, 401

Winter, Sir William, 温特爵士, 威廉, 海军将领, 214

Wishart, George, 威沙特, 乔治, 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113

Wisniowiecki family, 威斯尼奥维奇家族, 产业, 399

Wisselbank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的维塞尔银行, 30, 43

Witches, 女巫, 280

Withals, John, 威索尔斯, 约翰, 辞典编纂者, 436

Wittelsbachs,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巴伐利亚的, 其宗教政策, 59, 334—335

Wittenberg, 维滕贝格
 大学, 75, 79, 378
 路德在此, 78, 90

Wladislaw, 弗拉吉斯拉夫, 西吉斯孟德三世的儿子, 俄国王位的候选人, 419

Wolsey, Thomas, 沃尔西, 托马斯, 枢机主教, 146, 152, 432

Wood, Benjamin, 伍德, 本杰明, 其远航, 557

Wool, 羊毛
 英国的, 127, 136
 西班牙的, 158
 波兰的, 400
 美洲的, 513

Woollens, 毛织品, 欧洲的, 面向亚洲, 544, 557

Working classes, 劳动阶级
 在尼德兰, 297
 与革命运动, 307

Worms, 沃尔姆斯

路德在此, 156
其主教, 334
Wright, Edward, 赖特, 爱德华, 科学家与数学家, 461, 468,
470
Wroclaw, 弗罗茨瓦夫, 400
Würzburg, 符茨堡
其主教 (I), 被刺杀, 81
其主教 (II), 被富耳达男修道院院长起诉, 330, 340
主教区, 338—339
耶稣会学院所在地, 439
Wyatt, Sir Thomas, 怀亚特爵士, 托马斯, 157
Xavier, St Francis, 沙勿略, 圣弗朗西斯
在印度, 55, 56, 548
在日本, 550—551
Xavier, Jerome, 沙勿略, 哲罗姆, 耶稣会士, 550
Ximenes, 希梅内斯, 枢机主教, 54, 243, 431
Xylander, Gulielmus, 克胥兰德, 古利耶尔穆斯, 学者, 458
Yam Zapolski, 雅姆-扎波尔斯基, 393
Yemen, the, 也门, 366, 535
York, 约克, 128, 219, 230
Ypres, 伊普尔, 128, 277
Yucatán channel, 尤卡坦水道, 518
Zabarella, Francesco, 扎巴莱拉, 弗朗西斯科, 441
Zacatecas (Mexico), 萨卡特卡斯 (墨西哥), 银矿所在地,
25, 510, 511

Zacateco Indians, 萨卡特科印第安人, 510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 539, 545, 550

Zamch (Poland), 扎姆什 (波兰), 379

Zamość, 扎莫希奇, 380

- 大学所在地, 389, 439
- 当地的宗教自由, 392
- 生产, 398, 399

Zamoyski, John, 扎莫伊斯基, 约翰, 波兰王家大法官, 378, 385, 386, 387, 395, 396, 401

- 建立大学, 389
- 宗教宽容, 392
- 产业, 397, 398, 399, 400

Zane, Matteo, 萨恩, 马泰奥, 威尼斯大使, 249

Zasławski family, 扎斯拉斯基家族, 产业, 399

Zborowski, family of, 兹波罗夫斯基家族, 386

Zebrzydowski, Nicholas, 泽布尔茨多夫斯基, 尼古拉, 克拉科夫伯爵, 其反叛, 386—387, 388, 395

Zeeland, 泽兰, 省区, 103, 279, 297, 558

- 奥兰治的威廉担任总督, 267, 274
- 反抗西班牙人的战斗, 275, 276
- “海上乞丐”, 272, 273, 288, 289

Zi ‘āmet (fief in Ottoman empire), 齐阿迈特 (奥斯曼帝国的采邑), 349, 350, 372

Zielinski, Nicolas, 杰林斯基, 尼古拉, 作曲家, 403

Zimba tribe, 津巴部落, 545

Zimmermann, 齐默尔曼, 著《检验手册》, 428
Zótkiewski, Stanislaw, 佐尔基耶夫斯基, 斯塔尼斯拉夫, 388
Zonca, Victor, 佐恩卡, 维克多, 建筑师, 456
Zonta (Venice), 松塔 (威尼斯), 263
Zoology, 动物学, 453, 472
Zouche, Richard, 朱什, 理查德, 法学家, 168, 169
Zsitva-Torok, 齐特瓦托罗克, 和约, 322, 364, 374
Zuniga, Diego de, 苏尼加, 迭戈·德, 神学家, 462
Zürich, 苏黎世, 90, 125
Zutphen, 聚特芬, 出卖给了帕尔马, 298
Zwingli, Huldreich, 茨温利, 乌尔利希, 宗教改革家, 11, 81
Zwinglianism, 茨温利宗, 74, 100

[1] 有关内容不在458页, 而在485页, 疑为印刷错误。——译者注

[2] 以区别于其父“Vincenzo Galilei”。——译者注

[3] 黎牙实比是西班牙海军将领, 英文版此处有误。——译者注

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法国的优势地位 1648—1688年

[英] F.L.卡斯滕 (F.L.Carste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5: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1688

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法国的优势地位 1648—1688年

[英] F. L. 卡斯滕 (F. L. Carste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5卷, 法国的优势地位: 1648-1688年/
(英) F. L. 卡斯滕 (F. L. Carste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4-1688

ISBN 978-7-5203-2591-2

I. ①新… II. ①F…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648-1688年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2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张湉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45

字数 713千字

纸书定价 1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第5卷，主题为法国的崛起，主要论述了欧洲各国的经济问题、科学、哲学、政治思想的变迁、艺术流派的变化、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法国的外交政策、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法国的艺术思想和文学成就；国别史中有论述了荷兰共和国、王政复辟之后的英国，总体论述了欧洲和北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这一时期欧洲和亚洲的状况、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发展、欧洲的两个古老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北欧和俄国在这一时间段的主要发展脉络。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5: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1688

ISBN 978-052104544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前言

本卷前八章致力于叙述17世纪下半叶欧洲史中的共性，而后的九章论及西欧国家——法国、联合省、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它们在美洲和亚洲的属地、欧洲和其他大洲之间的联系，最后八章则叙述中欧、东南欧、东北欧和东欧诸国，这一世界与该时期贸易和企业迅速发展的西欧大相径庭。本卷涵盖的年代为1648—1688年这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总是严格按照该断限撰写，特别是在这两个断限并非很明确的时代标志之处。在论述法国和英国以及欧洲与北美的章节中，将投石党之乱和王位虚悬之变放在第四卷叙述，而将路易十四的亲政和查理二世的复辟作为本卷之始较为符合逻辑。其他若干章有始于某个新国君登基或结束于某个国王去世的，因而逾越了断限，以致或多或少涉及1648年之前和1688年之后的事情：于是有关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章延至瑞典查理十一世的去世，有关波兰的一章延至国王扬·索比斯基的去世。哲学、政治思想、艺术和建筑，欧洲与亚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勃兰登堡的兴起的各章涵盖了第五卷和第六卷两个时期，即从1648年至1715年，因为在这几方面将两个时期合并起来叙述更为适宜。本时期中的其他某些领域，例如音乐，将放在第六卷中讨论。

本卷主编希望借此机会向伦敦大学的诸位同仁致以谢忱，他们承担了艰苦的翻译任务，在许多章节中，这意味着重著和诠释。他们是：国王学院的J. F. 博什博士，翻译了法国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一章；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A. D. 戴耶蒙德先生，翻译了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章；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拉恩希尔德·哈顿博士，翻译了斯堪的纳维亚一章；斯拉夫和东欧学学院的J. L. H. 基普博士，翻译了有关波兰和俄国的各章；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W. 皮克尔先生，翻译了政治思想一章；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P. 韦利夫人，翻译了意大利一章。本卷主编向妻子致以最深挚的谢意，因她自始至终襄助编辑、比较和审核众多历史学家的来稿工作。

F. L. 卡斯滕

1960年3月

于伦敦，韦斯特菲尔德学院

目录

[出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导言：路易十四时代](#)

[第二章 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

[第三章 科学活动](#)

[第四章 哲学](#)

[第五章 政治思想](#)

[第六章 教会和国家](#)

[第七章 艺术和建筑](#)

[第八章 国家的社会基础](#)

[第九章 欧洲舞台上的法国外交和对外政策](#)

[第十章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第十一章 法国在艺术、思想和文学方面的成就](#)

[第十二章 荷兰共和国](#)

[第十三章 王政复辟后的英国](#)

[第十四章 欧洲和北美](#)

[第十五章 西班牙及其殖民帝国](#)

[第十六章 葡萄牙及其殖民帝国](#)

[第十七章 欧洲和亚洲](#)

[一 欧洲与亚洲的联系](#)

[二 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第十八章 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第十九章 三十年战争后的意大利](#)

[第二十章 哈布斯堡诸领地](#)

[第二十一章 穆罕默德四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

[第二十二章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

[第二十三章 勃兰登堡的兴起](#)

[第二十四章 扬·索比斯基去世前的波兰](#)

[第二十五章 俄国：欧化的开端](#)

[索引](#)

第一章 导言：路易十四时代

缔结于本卷起始年代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欧洲历史上最具有灾难性的战争之一，而且标志着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即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的终结。尽管宗教事件和宗教动因仍然在许多欧洲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中至关重要，但是宗教疆界却无进一步变化：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保住了1648年确立的国教。只有一些宗教少数派，或离乡背井、迁往他国，比如奥地利的新教徒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或获得正式承认，如英国的非国教教徒。当然，在本卷和下卷所涵盖的时期中，东南欧的伊斯兰教统治确实趋于瓦解，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变化；它使匈牙利人和其他巴尔干基督徒得以从土耳其宗主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并没有改变其居民的宗教信仰。甚至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1648年缔和以后宗教疆界依然维持稳定。尽管在随后数十年中若干德意志公侯家族改变了其信仰，主要由路德宗改奉罗马天主教，但其臣民没有追随其后，而是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恐怕只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两败俱伤，宗教冲突才极其缓慢地趋于平息，宗教仇恨才开始减少；于是法国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和南特敕令的废止（1685）重又煽起新的仇恨的火焰。当时欧洲一些主要思想家和作家试图使基督教各派信仰能和睦相处或者梦想一种无所不包的宗教。在许多领域里也出现了对世界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理性的探讨的情况，而科学和知识的长足发展则对此起了促进作用。这种探讨实为18世纪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发轫。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改造和统一梦想的破灭，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曾一直怀有这样的梦想，而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斐迪南二世皇帝再次企图使之变为现实。此后，该帝国只是一个由许多邦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尽管它存在到19世纪初叶，然而，就连在表面上也不再是一个头号基督教国家。尽管1648年之后帝国内部多次试行进一步改革，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主宰欧洲一个多世纪的大联盟，即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奥地利哈布斯堡两大王室的联盟，不再是一个强大的联合。“战无不胜

的”西班牙军队在罗克鲁瓦被孔代率领的法国军队所击败不仅标志着哈布斯堡权力的衰落，而且对未来事件来说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尽管帝国在持续不断地解体，但这种衰落对诸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影响还是比对他们的西班牙同宗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他们受到土耳其人的强大压力，这些土耳其人在柯普吕利父子的有效治理下重又采取征服政策，直到1683年维也纳之围以后巴尔干的局势才发生逆转，此后哈布斯堡的军队征服了大片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但是统一的哈布斯堡国家仍然未能产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继续是欧洲的主要王族之一，他们的存在确要比其他统治家族长得多，因为他们的对手柏林和莫斯科在17世纪下半叶才刚刚开始奠定其未来强盛的基础。然而，最为重要的地位无疑属于波旁王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法国优势最为显著的标志，尽管和约签订之时路易十四年方10岁，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还将持续11个年头。

在1661年亲政之初，年轻的路易十四审视欧洲的形势时，他的秘书能够按照他的命令以充分的理由写道：

西班牙不能从其巨大的损失中迅速恢复过来；它不仅没有资财，而且亦无威信，就金钱或人力而言都不能有所作为，并受制于与葡萄牙的战争……其国王年事已高，健康状态令人怀疑；他仅有一子，年幼且相当孱弱……

我一点不惧怕皇帝，他当选只是因为他是奥地利王室的成员，而且受到有关帝国各邦领地之协议的多方束缚……^[1]首先是选侯们将如此苛刻的条件强加给他并几乎不用怀疑他会愤恨，因而始终对他不信任。帝国中另有一群诸侯则正在为我所用。

瑞典只会与我保持真诚和持久的关系，它刚刚失去一位伟大的国王^[2]，在其新国王尚属年幼之时，它所期望的只是维持其所征服之地的统治。丹麦由于先前与瑞典的战争而遭到削弱，其境况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因而只想和平与恢复。

英国在祸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只想在重新拥立的国王的统治下加强其政府，而且那位国王对法国是素抱好感的。

荷兰及其统治者的全部政策只有两个目标：维持贸易和削弱奥兰治家族，哪怕最小的战争也会阻碍他们这一和那一目标的实现。我持友善态度就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支持……

如果说这就是路易十四统治之初的时势，那么在随后的岁月中这种势力均衡朝着甚至更加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变化。在这一时期中，法

国对欧洲的控制远比罗马时代之后任何一国对欧洲的控制要全面得多。当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统治下重现这种辉煌时，那在时间上要短得多，而严格说来拿破仑的权力也只限于欧洲大陆；至于路易十四则权倾部分美洲，威震斯图亚特的英国。在胜利结束1672—1678年战争后，路易十四能够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我展示了法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取得的成就，对此我感到荣耀。法国向我的盟国提供了数百万^[3]，我随心所欲地花费我的金钱；我找到了吓破敌胆、震慑邻国以及使诋毁者陷于绝望的办法。我所有的臣民竭尽全力地支持我：在军队中他们骁勇善战，在我的王国里他们群情激昂，在外国土地上他们勤勉灵活。简言之，靠着自己的成就，法国证明了它与其他国家的迥异之处。

法国强大端赖于其四分五裂的邻国的孱弱，端赖于其自身的资源、财富、人口和陆海军。法国拥有1800万至1900万居民，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英格兰的3倍多，是联合省或葡萄牙的8倍多，甚至比俄国莫斯科还要多。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使法国能够维持一支平时可达10万之众而战时远远超过此数的军队。在杰出的将领孔代、蒂雷纳和卢森堡的统率下，它领先于对手，成为其他欧洲国家军队的楷模。在军事教育、城市攻防技术以及有效的军队管理等方面树立了榜样。由陆军大臣勒泰利埃所创设的军队总监理顺了混乱的军队财政和在被占领国家中征收特别税的制度。尽管许多外国雇佣军团仍在其中服役，法国军队却不再由一些半独立的部队组成而是正在向一支国家军队发展；绝大部分法国贵族也选择了职业化军官的生涯，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法国的军事重心依然集中在欧洲和陆地上，但科尔培尔建立了一支海军，这使法国成为大西洋上第三大和地中海第一大海军强国；法国的征兵制度，即适用于所有海员和渔民的海军征兵令，使法国在海上与其对手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尽管农业耕作方式原始且农民负担沉重，但法国肥沃的土地仍能够养育大量且相对密集的人口。在17世纪后半叶，虽然农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工业仍在科尔培尔有效的指导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的干预、指导和支持在一个资产阶级宁可投资土地、公债和官位而不是贸易和工业的国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科尔培尔伟大的功绩在于他提供了法国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和更为重要的首创精神，以及向路易十四提供了其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手段。科尔培尔这一榜样鼓舞了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比法国更不得不以国家行为替代

中产阶级自发活动的国家。在法国，不仅奢侈品工业，而且基础性的纺织品工业、铸造炼铁业以及兵工和造船业都从国家的津贴和保护中大获其益。双海运河（Canal des Deux Mers）和其他运河的开凿大大改善了内陆交通系统。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尤其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得到大幅度扩张。但是，科尔培尔按照荷兰和英国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贸易公司易于对创建它们的国家形成依赖，并因政府的干预而阻碍其发展。

法国的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扩展到文学、思想、艺术、教育、生活方式和时尚等领域。几乎在所有方面法国都遭到受法国直接威胁的国家的批评和谴责，但在“伟大的世纪”^[4]中，这些攻击并不能阻止法国文化的胜利进军。法语越来越成为欧洲许多地区上流社会、有教养者和上层阶级的通用语言。由欧洲最擅于社交的女士所主持的巴黎沙龙甚至在俄国莫斯科也很快为人们所模仿，而凡尔赛宫的艺术和建筑、歌剧和芭蕾舞、排场和风格更是令欧洲每一个王公倾倒，他们为之殚思竭虑，竞相仿效。就富人和上层阶级而言，在服饰和发型、烹调和园艺、家具和室内装饰等方面，法国的时尚独占鳌头。甚至驱逐胡格诺教徒之举也完全出人意料地导致在收留他们的国家里奢侈品工业的建立、法国语言和文学的扩散以及法国艺术和文学的传播，那些流亡者对于收留他们的国家之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反过来，欧洲王公贵族的子弟被送往法国瞻仰凡尔赛宫的瑰丽恢宏，就地学习法国的成就和生活方式。1651年凡尔赛第一次上演芭蕾舞剧《爱神的胜利》时，观众中就有安斯巴赫侯爵、汉诺威公爵、荷尔斯泰因公爵和符腾堡公爵以及其他王公。

由于罗马的贫困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和教廷的衰落，法国遂成为艺术的中心。而在法国，巴黎和凡尔赛又成为新的艺术之都。宫廷单靠自己的财力就能提供像意大利城市在三十年战争之前所提供的那种大规模艺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赞助。科尔培尔使国王成为艺术和各皇家学院的主要资助者，这些机构则受科尔培尔的控制，他是艺术鉴赏的最高仲裁者。国家组织艺术创作，使之成为渗透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并企图自上而下地规范一切的绝对专制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法国，巴洛克文化几乎为宫廷所垄断，它奠定了指导艺术的原则。像国家的政府机构一样，艺术必须一统、严谨和鲜明，必须由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管束，艺术家个人像社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一样，除了

为国家服务和服从它的法规之外，不允许有任何自由。艺术的职责是为路易十四歌功颂德，这一任务由各皇家学院实施。画家勒布朗被任命为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和设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以及戈布林花毯工场经理，在这些地方他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勒布朗监督它们的制作计划的实施，且亲自设计了许多作品。用于皇家宫殿和花园的装饰品和雕塑从它们的工场中被生产出来，因而凡尔赛艺术的发展是以勒布朗独裁的规程和原则为基础的，正是以这种方式，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突出地树立起来，法国文化成了绝对专制主义驱使的女仆。不计其数的“太阳王”^[5]的半身和全身雕塑、浮雕和画像从工场向四面八方输送，或者说，受国家之命播撒国王的光辉。各皇家学院的专制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类似的学院的榜样，带来了甚至更为不幸的影响。勒布朗是一位卓越的工匠，但“路易十四风格”呆板单调，我们自己时代中的例证足够生动地表明，艺术不可能像军队一样统率而无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这一时期在文学领域法国首先展示了自己的天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夸耀能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璀璨夺目的名字，如莫里哀、拉辛、拉封丹、塞维尼夫人、帕斯卡、波舒哀、布瓦洛和拉罗什富科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但绝不是全部）的迅速成功归因于国王的荫庇。的确，路易十四对文学施加的有益影响要远比对艺术和建筑的大得多，因为他公开声称欣赏富丽堂皇的场面之言对后两者来说有着相当不幸的后果，正是这种欣赏给予其同时代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为如此众多的欧洲国家的官方艺术树立了标准。但事实仍然是，在他的荫庇和监督下，艺术和文学繁荣了起来，并使法国成为一个不止在军事领域领先的国家。

以其名字命名其时代的国王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怎样统治法国的？就连他的批评者和敌人也不得不崇拜他。因其贬低法国贵族而对路易十四耿耿于怀的圣西门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路易十四生来要君临一个辉煌的宫廷。于衮衮诸公之中，路易十四像蜂王一样以其体态、勇气、优雅、俊美、神采甚至声调以及所有威严高贵和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而卓尔不群，并显示出如果他生来只是一个不仕绅士，他同样会出类拔萃，在喜庆娱乐场合独领风骚，以豪侠义举为人称道，以及会极尽风流倜傥之能事……^[6]

另一位观察家威尼斯大使普里米·维斯康蒂后来报告说：

国王对国家事务守口如瓶。大臣们参加枢密会议，但只有当考虑成熟并做出明确决策时他才向他们吐露自己的计划。我真希望您能见见这位国王。他的表情神秘莫测，眼睛像狐狸的一般。除了在枢密会议上与他的大臣讨论外，其他场合他对国事闭口不谈。当他训谕廷臣时，也仅仅说限于他们的特权和职责范围之内的话。他的言论即使再毫无意义也犹如宣示圣谕一样……[\[7\]](#)

路易十四的确从两位红衣主教的统治和自己童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绝不能有一位首相，绝不能让高级教士和大贵族参与军国大政。在写于1661年亲政之初的《回忆录》的开头部分中，他就强调：“从我童年起，每每有人当我的面提起‘懒王’和‘宫相’的名称时我就感到痛心疾首……”[\[8\]](#)路易十四决心从一开始就亲自掌权并承受因此而必须承受的沉重工作负担——忠于职责绝不仅仅是某些18世纪的统治者才具有的特征。他的日常生活有条有理，从醒来到就寝，事无巨细均必躬亲。工作占据了他许多时间，还去参加精心组织的宫廷仪式，这种仪式是在他统治时期从西班牙宫廷引进的，甚至更加令人劳累。正如国王训导王太子所说：“但是我要很简要地告诉你，无论这个工作会如何令人不快乐，我觉得它还是不像其他活动那样使我厌恶，因为我总是认为，一个人在他履行职责时所得到的满足是他最大的愉悦。我经常感到奇怪的是，尽管热爱工作是一位君主至关重要的品质，但人们还是发现，它又是君主中如此缺乏的品质之一……”[\[9\]](#)虽然这只是一幅具有理想色彩的图画，但毋庸置疑，路易十四毫无怨言地将其一生奉献给了那些极其辛苦的日常工作，在半个多世纪中他是法国真正的主宰。遗憾的是，路易十四的告诫在18世纪没有被遵从，法国国王们又成为“懒王”了。

路易十四视监督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一切细枝末节为自己的职责，然而政府的体制并无改变。尽管经科尔培尔和其他大臣的努力它得到整治并提高了效率，但对“旧制度”基本特征却未做任何革新，这就最终在后来导致了它的垮台。特权阶级，尤其是贵族免纳赋税制度仍在实施，虽然科尔培尔设法减少享受人头税和其他赋税豁免权的人数并强迫那些不够资格享受特权者纳税。然而，路易十四需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实施其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因此，卖官鬻爵继续进行，数以千计无用的官职仍在被设置出来，它们的拥有者可以享受赋税的豁

免。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行会的垄断权得到扩大，新的工业部门受到它们的控制，另一方面工匠们还是出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被迫加入行会。如果说私人创新精神和私人资本投资缺乏的话，那部分是因为法国国家提供了不用负担风险并导致社会地位提高的投资机会。最高官职的拥有者最终会有资格进入贵族这个主要社会集团的行列，或者与之通婚。尽管贵族在衰落，法国社会还是受他们的准则而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准则支配的。

路易十四既不是改革家，也不是伟大的将军。奥兰治的威廉、瑞典的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三世、波兰的扬·索比斯基、勃兰登堡的大选侯都统率自己的军队亲临战场；但路易只有在他的臣仆眼中才似乎是一位军事天才。1673年7月马斯特里赫特陷落后，甚至伟大的科尔培尔也奉承国王说：“国王陛下所有的战役都有那种令人惊讶和目瞪口呆的特征，它们摄人心魄，使人除了崇拜之外别无其他念头……人们得承认，这种获得荣耀的非凡方式除了陛下尚无人敢想象……”^[10]10个月后占领了贝桑松，科尔培尔写道：“主上啊，人们不得不每日静心屏气，来崇拜、感激上帝，因为我们生于像陛下这样一位国王的统治之下，他那无边无际的威权只有他自己的意志才能加以限制……”^[11]路易十四干预军事行政和管辖的具体事务，这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军事领袖的不足之处，希望也在这个领域体现他的意志，因为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国家对军队的统治权建立了起来。1674年德·丹皮尔军团的一位上士因在荷兰服役功绩卓著而受到表扬时，他的将军得到通知说：“国王陛下要求德·丹皮尔军团有空缺时将拉弗勒提升为中尉，同时奖赏500里弗赫。”^[12]1683年一名士兵因组织抗议非法克扣个人军饷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并被枪决，卢瓦奉命写下指令道：“陛下认为对该士兵的处理等于谋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对他的惩办是正确的……我正命令德·拉谢塔迪先生拘留主持军事法庭的军官，逮捕同意扣留军饷的指挥官……”^[13]国王在诸如此类的行动中表露出来的形象多少异于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即使认为这是他进行控制的手段，那也显示了他对为他赢得荣耀的各色人等的关心。

的确，获得荣耀是路易十四实行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动机。为了训导王太子，国王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观察到我总是工作持之以恒，决策当机立断，一贯热爱我的人民，渴望国家的伟大，对真

正的荣耀锲而不舍地追求……”^[14]国王甚至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生活，路易十四认为“我们在自身的爱情上所耗费的时间绝不能损害我们的公务，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总是维持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权威，不经过辛勤的劳动二者绝不可能得到维持……”

荣耀的追求不仅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进行，而且还运用了外交手段。在路易十四亲政之初，西班牙和法国两国驻英大使因位次问题曾导致了一场伦敦大街上的斗殴，尽管法国方面有着特地派去的军官和士兵的帮助，但还是吃了大亏。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被迫为此道歉并不得不把在所有宫廷的优先地位让给法国的外交代表。这次“胜利”后路易十四评论道：“我不知道自有此王国以来曾否发生过任何更加令人荣耀的事情，……我要一直为此感到开心的……”接着对王太子训导说道：“如果发生的问题就像我刚刚对你讲的那样，即涉及你在世上所拥有的地位、你的王权也就是涉及国王之事而不是个人私事，你就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决不要背叛你的先辈的荣耀，也不要抛弃你的后代的利益，你只不过是这些荣耀和利益的保管人……”^[15]

路易十四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维护王国的光荣和力量、国王君临百姓的崇高地位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位置的主要魅力所在的卓越超群”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是一幅路易十四眼中有关国王的图画：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所有的愿望都向他诉说；只有他能够接受所有尊崇，只有他是一切希望之所在……每一个人都视他的恩赐为所有利益的唯一源泉，只有逐渐亲近国王或引起他的注意，一个人才可能升官晋爵，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渺小、无能、劳而无功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他在自己领土上所放出的光芒通过传播辐射到外国的省份。他的声誉之翼将他隆盛的辉煌崇高形象带向四面八方。犹如是自己臣民的崇拜偶像那样，他很快引起邻国的惊叹，如果他能利用这种优势的话，那么无论在帝国内外，一切都是他的囊中之物……^[16]

国王不仅是绝对统治者，而且“天生拥有对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所有的一切物业的充分和自由的支配权”^[17]。任何针对君主的叛乱，无论该君主是如何的无道，路易认为都是弥天大罪，因为“让国王君临百姓的上帝要求把他们视为他的代表而加以尊敬，只有他自己才有权力去审查他们的行为。他希望无论是谁生为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条法则如此清楚和普遍适用，它的制定不仅仅有利于君主，而且也有益于那些作为实施对象的人民；他们如若违犯它，就决

不能不使自己面临较之他们假装防止的过失远为严重的邪恶……”

[\[18\]](#)上帝是君主的唯一仲裁者，而运筹决断之权又只为君主所有，社会的其他成员只有一种功能，即执行统治者颁布给他们的命令。[\[19\]](#)君权神授之理论没有比这位最强大的拥护者阐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

路易十四既然笃信君权神授，便不能容忍他的臣仆和盟友的批评或反对，他们只能接受他们不得不服从的敕令。1684年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接到一份粗鲁的通知说，国王希望加快剿灭皮埃蒙特韦尔多教派所据谷地的异教徒，为此他要借给公爵法国士兵和一位将军。于是卡蒂纳率兵侵入这些谷地，他对待韦尔多教派信徒的方式甚至连法国驻都灵大使都提出了抗议，但是国王却回答说：“萨伏伊公爵真幸运，他的患病使他免去了一大堆对付那些叛成者的麻烦，我毫不怀疑他会从中得以自慰，因为所失去的那些臣民，可以用更为俯首帖耳的人来替代。”[\[20\]](#)但是，路易十四也将付出代价，尽管胡格诺教徒的迁移仅使法国失去很少一点人口，可是失去他们的技能和失去那些曾在法国舰队服役的新教水手的代价却远非能轻易得到弥补。法国的天主教徒不能填补因南特敕令废止令所造成的损失。国王的政策在欧洲所引起的震惊成了组成反对他的联盟的黏合剂，许多著名的胡格诺派军人，如舍姆贝格元帅在反法联军中任职。如果路易十四真诚地相信他是在秉承上帝意志的话，那么不是法国而是它的敌人从中大获其益。的确，当时的欧洲各国所承认的各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无不与宗教教条有关。天主教阴谋事件表明，在英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也是严重的，但比起法国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来，这一事件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尚未见宗教迫害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并伴之以如此严重的恐怖，直至二百五十年之后迫害犹太人事件才又出现此类情况。如果说反对路易十四的许多呼声是出于私利和偏见的话，那么他个人要对这种政策负责也是事实，至少在诸新教国家中信仰的多样性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一些小公国里，例如在特兰西瓦尼亚，它们所实施的宗教宽容是颇为突出的；有不少国家统治者信仰的宗教迥异于其大多数臣民的，这一事实易使当局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皮埃尔·贝勒、洛克和莱布尼茨的著作有着类似的作用。尽管存在路易十四的政策，但较为宽容的精神已开始传播，宗教狂热的风暴趋于平息。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政府和行政管理领域，欧洲的统治者们不仅崇拜路易十四的制度，而且迫切想要在自己的国家里仿效。法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官僚制度，这对加强君主的权力至关重要。1660年查理二世在“周游”后回国，他对法国的治理规则印象至深并试图将之引入英国，但不很成功。除法国外，各国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初级的，所谓国家机器往往为大贵族家族所控制，具有封建性而非听命于君主的特点。通过其示范作用，法国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权力是如何受到削弱的，国王是怎样使自己摆脱领主和诸大家族的牵制，从而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官僚机器和常备军之上得以成为专制君主的。在巴伐利亚，三十年战争期间马西米连一世使自己成为绝对专制君主，他的继承人斐迪南·马利亚（1651—1679年）于1669年最后一次召集议会，之后便将领主一脚踢开，尽管他们愿意向他提供一大笔款项。在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破坏了领主的权力，按照法国军队总监的原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正是因为三十年战争之后境内的精疲力竭和经济衰落使得他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本邦。在满目疮痍的巴拉丁和同样遭劫的巴登—杜拉赫侯国，君主由于类似的原因使自己成为绝对专制君主，1668年该侯国最后一次召开议会，而荷尔斯泰因公国议会也在1675年最后一次举行。帝国内各邦君主的官员开始替代领主所组成的机构，国家地位之重要是三十年战争之前所未有的。尽管在一些地方作为一种体制，领主尚未消失，但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三十年战争期间随着斐迪南二世和反宗教改革对各地主要是新教领主的胜利，同样的过程开始了，并随着战胜土耳其人、夺得匈牙利的进程而继续发展，尽管那里的领主尚有着某些影响。

在丹麦，情况亦复如此，在那场国家被征服和打败的战争结束后，绝对专制主义被引了进来，因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拒绝缴纳偿还因战争而背上的巨额债务所需要的赋税。贵族对任何修改宪法的顽抗遭到削弱后，通过与三级会议签订条约，权力转到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1648—1670年）手中。1665年新宪法作为“国王之法”被制定出来并颁行。在瑞典，则是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及因之而欠下的大量债务导致采取绝对专制统治的，在时间上要比丹麦晚20多年。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的财政困境迫使他强迫贵族归还已让渡的王家土地，该政策得到了其他等级的支持，所以在上述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绝对专制主义的发展是以君主与没有特权的阶级之间的联盟为

基础的。另外，在勃兰登堡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巴伐利亚，绝对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有效联盟基础之上的：贵族的特权，尤其是赋税豁免权得到确认，贵族占据国家和军队的高级职位，成为担任公职的贵族；而在法国，路易十四则将贵族排除在政府之外，他在政府中所录用的是资产阶级成员。在瑞典，像在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那样，向绝对专制统治的过渡花费了许多年的岁月，在这期间议会逐渐失去其重要性，会议开得越来越短。绝对君主专制的采用与其说是一项君主预先策划好的政策，不如说似乎经常是环境使然，尤其是一场灾难性的或失利的战争之后王室捉襟见肘而陷于财政困境；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希望拥有一支常备军以加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因此绝对君主专制往往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几乎难以察觉，也决不声张。

在许多国家中，等级会议继续召开，但已丧失了过去的权威，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或者中欧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各议会。在英国，查理二世在他统治行将结束之时成功地使自己独立于议会，并且更改城市特许状（borough charters），此举旨在保证将来议会对他俯首帖耳，反对党辉格党弄巧成拙，为国王的狡猾战术所击败，遭受迫害后瓦解。后来只是因为詹姆斯的冥顽不灵才使其兄的成就毁于一旦。直到1688年革命，英国的宪政发展并未十分迥异于大陆各国，而是显现出类似的轨迹，常备军的建立增强了查理二世的控制能力，犹如瑞典的查理十一世和大选侯的常备军那样。专制统治似乎在整个欧洲获得了胜利，君权神授论达到了鼎盛。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作家与国教教会所传播的教义提供了新型君主国家得以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公认的理论的统治地位，其终结的标志是光荣革命和约翰·洛克的著作。

另一些欧洲国家，例如瑞士、威尼斯和波兰，不存在更大的集权化或者更大的君主权力的趋势，但它们是些衰落的、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其疆界之外没有多大影响。只有一个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一般趋势的例证，即联合省，它是一个拥有联邦宪法的贵族共和国。的确，它的宪法具有如此浓厚的联邦性以致只有荷兰省的优势地位才给予整个结构以某种凝聚力和目的性，而且1672年革命后奥兰治家族在战争中重振其权势并提供联合省所需要的领导。整个17世纪荷兰人称霸波罗的海贸易，该贸易为欧洲的舰队提供了木材和海军补给品，同时他

们还在与东方的贸易中独占鳌头，那是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得的，并企图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如果说在其他领域法国的模式为人尊崇的话，那么在商业和造船方面荷兰的榜样则是无与伦比的。荷兰的大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得到了从法国到勃兰登堡，从瑞典到葡萄牙等国的仿效。

联合省的力量基于其良好的财政状况。当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库匮乏，收入不稳时，荷兰人是大借贷者并向许多国家提供援助。该共和国总是拥有清偿能力，它的各公司总是能够调集新的财政资源；其股票和证券的买卖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所未见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不仅仅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或法国的任何类似机构均不是其对手。英国企图将荷兰人排斥在它与其殖民地的贸易之外，但几无作用。作为统治阶级，摄政者们与商人和放债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共和国的政策就可能根据他们的利益而制定。贸易和企业经营的成功导致令人惊叹的繁荣，至今在贵族邸宅和流经阿姆斯特丹、多尔德雷赫特、哈勒姆、莱登和其他城镇的运河沿途，昔日的富庶依然可见。它也导致了艺术的兴盛，部分是因为有钱的荷兰市民对群像、内部装饰的需求以及他们对绘画的投资。肖像画，陆地和海上风景画，有关旅舍、市民住宅、船舶以及都市生活的绘画使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流芳百世。如果说法国的文化具有严重贵族化的特点并主要影响欧洲上层社会的话，荷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但是荷兰在欧洲的影响局限于贸易和金融范围内。

然而，甚至荷兰的繁荣也经不起持续不断的战争的消耗，因为像17世纪上半叶一样，其下半叶也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期。在西欧，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大战持续到1659年，而1667年当菲利普四世驾崩后路易十四入侵西属尼德兰，战端再起。孱弱的西班牙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反对正在为赢得自由而战的葡萄牙人；只是到经历了28年战争后的1668年，葡萄牙的独立才获得承认，以后再也未引起问题。接着轮到葡萄牙人与荷兰人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这期间他们丧失了其东方帝国的绝大部分，但成功地重新占领巴西。在西欧结束上述战争后仅仅数年，1672年路易十四入侵荷兰共和国，再次发动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持续到1678年。该共和国还与英国展开了三次海上战争。直到1648—1688年这一时期中的最后十年，和平才重新回到西欧。但很快，路易十四的另一次进攻又打破了和平，而和平间歇期的

所谓收复属地、占领斯特拉斯堡以及他向巴拉丁提出的要求均已预示了这场战争。战事不仅连绵不断，而且经常残酷异常。法国军队在尼德兰和巴拉丁的行径尤其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也许标志着如此的军事方式不再被认为是正常的了。但是，当时最严重的暴行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刚结束之后，那是在1689年头几个月中，这期间巴拉丁遭受了第二次浩劫。

战争同样普遍发生在北欧和东欧，但是，除了与所有西欧国家有关的波罗的海霸权问题，这些战争总的说来与西欧的那些战争是分别进行的。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不仅是瑞典与波兰、丹麦争夺北欧霸权的战争，而且俄国、勃兰登堡、哈布斯堡，甚至特兰西瓦尼亚也逐渐卷了进来；一支荷兰舰队介入战争，帮助丹麦人反对荷兰在波罗的海的对手瑞典。战争的结果是瑞典的权势达到巅峰，占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另一方面勃兰登堡获得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这对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为18世纪初普鲁士王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另一场战争没能打破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权势，瑞典海军仍然控制着这一海域。直至17世纪末，环绕波罗的海沿岸所建立的广袤而分散的瑞典帝国仍然在它的控制之下，向它提供相当多的收入和开展兴隆的贸易。虽然17世纪下半叶在罗曼诺夫朝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迄至当时瑞典帝国尚未出现崩溃的迹象，但该帝国行将被罗曼诺夫朝最著名的沙皇所毁灭。只是在波兰、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争夺乌克兰的斗争中，俄国的扩张获得重大进展，到达第聂伯河，占领位于其西岸的基辅，在南方建立了对哥萨克人的统治。尽管俄国此时还不是一个大国，但它日后的伟大已初显端倪，只是未为西方所注意罢了。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是波罗的海的贸易，而瑞典通过其贸易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德意志领土已与西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争夺乌克兰和进取黑海地区的斗争却完全超出了西方列强关心的范围。

然而，东欧的另外一场大冲突确实在西方得到了回响：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斗争，当时在柯普吕利家族两代能干的宰相治理下的土耳其已获得引人注目的复兴。在威尼斯共和国和土耳其争夺克里特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威尼斯人没有获得任何有效的援助。通过海战的大获全胜，1669年干地亚要塞终于投降，土耳其人把东地中海变成了他们的内湖。然而，他们向多瑙河流域的挺进因开始威胁维也纳而引

起某些反应。一支法国部队和大量德意志部队参加了拉包河畔的圣戈塔德战役（1664年），此役蒙泰库科利将军使土耳其人遭受了一次重大挫败，其后的和平持续了将近20年。1683年土耳其人的另一次大进军使他们直逼维也纳城下，此为苏莱曼大帝以来他们所未竟之伟绩。维也纳被围的消息引起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忧虑。由于此“皇帝驻蹕之所维也纳确受20万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围困之噩耗并因之震惊莫名”，符腾堡等级会议中断了其议程。^[21]但是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进行军事援助，路易十四无意将哈布斯堡从困难中解救出来，倒是波兰国王扬·索比斯基伸出援救之手。这是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对欧洲形成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已经开始了。

土耳其人没能使自己适应西方军事战术的变化，也未能吸收西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因而他们迅速被逐出匈牙利。与他们作战的军队不仅由奥地利军即哈布斯堡军组成，而且包括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军队，它们由洛林的查理公爵、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埃曼纽尔选侯、巴登的路易侯爵以及萨伏伊尤金亲王所统帅。帝国诸邦在反对异教徒的斗争中恢复了某些它们昔日的团结；这大概是欧洲最后一次显示其十字军精神。只有最信仰基督的国王^[22]有意从西部袭击帝国以使土耳其人摆脱哈布斯堡的压力，因而恢复了弗朗西斯一世与苏莱曼大帝之间原有的联盟。人们也不能真的认为基督徒们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解放者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徒与不信奉国教者担心哈布斯堡会采取反宗教改革的步骤，一直密谋反对哈布斯堡并举行起义的马扎尔贵族怀疑他们会压制匈牙利人的政治自由。一位曾参加圣戈塔德战役的人怨气冲天地说：“由于人们不知怎地感到绝望，宁愿希望土耳其人到来，而不是我们，他们到处啸聚在一起，杀害落到他们手中的人，因而他们几乎比主要的敌人更对我们造成危害……那些居心叵测的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不可靠性难以形诸笔墨……”^[23]基督教军队确实优于穆斯林军队，但是巴尔干人依然提出了胜利者不能解决，也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

欧洲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身范围之内，欧洲国家的贸易主要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但是这是一个大海外公司的时代，殖民冲突在大国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在东方，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葡萄牙人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赶走，建立起对利润颇丰的香料贸易和与日本贸易的垄断权；恰在17世纪中期过后它占领了好望角和锡兰

岛，因而获得通向东印度群岛的航路。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仅占据第二位，1682年它被荷兰人从爪哇的万丹赶走而丧失了印度尼西亚的据点。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地位甚至更为软弱，尽管通过他们的传教活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远远多于信奉新教的国家。美洲的图景相当不同。在那里葡萄牙人成功地从荷兰西印度公司手中夺回巴西，165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交出其一块属地。虽然荷兰、英国和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确立自己的地位获得成功，但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国依然没有受到影响。西班牙在欧洲的衰落在美洲尚未有直接的政治后果，但是它的大部分贸易落入了闯入者之手。

在北美洲，荷兰人甚至更加不成功。建立于17世纪初的新阿姆斯特丹及其外围据点没有发展成为荷兰人的大属地，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它们就为美洲殖民地要大得多、人口也较多的英国人所占，就这样沿海岸建立起来的英国属地之间的空隙得到了弥合。虽然荷兰曾成功地收复新阿姆斯特丹，但布雷达条约（1667年）确认它归属英国，从此以纽约之名成为英属美洲帝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这是英国国务活动家正在美洲建立的一个帝国，所以尽管在殖民地及其业主中出现离心倾向，但是一种帝国的政策仍在缓慢地形成。英国殖民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荷兰，而是来自法国。甚至当英国和法国在欧洲还是亲密盟友时，法国就威胁要阻止英国人翻越阿勒格尼山脉并挺进其殖民地腹地。然而，加拿大法国人的地位要比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低得多，其人口要少得多，越发需要依赖法国的移民和援助（实际获得的甚少），还一直受到来自法国的干预的妨碍。在北美洲，国家行动和国家干预代替不了英国殖民者的开创精神和他们从国内中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财政支持，这一点被证明是毋庸置疑的，本来可以向法国的殖民地主动提供这种支持的胡格诺教徒未被允许向美洲殖民提供，就连法国对加拿大的军事援助也是远非充足的，因为陷于欧洲战场的路易十四不允许这样分散兵力，以至于本时期结束时法国的殖民地在收缩而不是在扩张。首先法国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欧洲。

只有在这两个海上国家，工商业才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地谈论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在欧洲主要国家中，也只有这两个国家的贵族及其准则没有左右社会生活，国家没有具体干预经济生活，那里上上下下的充分“社会流动”使自发的增长

成为可能，个体企业家能够主动地在海内外开发新的事业，贸易无须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和保护也能繁荣起来。甚至复辟时期英国的辉格党贵族和托利党乡绅也与城市中产阶级及其经济活动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或者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产阶级处于衰落之中；在东欧他们还尚未产生。在法国，他们的雄心严重局限于购买官职、头衔以及当国家的官吏，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积累微乎其微，本来可资利用的剩余资本为几乎毫无间断的战争所强加的庞大军队和沉重负担所吞没。因此，尽管较之中欧和东欧各国远为先进，法国在与海上国家的竞争中仍落在了后面。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即科学和技术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荷兰和英国也处于领先地位；该领域的发展看来也是与存在于这两国的更为主动的经济氛围和那里正取得的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这一时期对英国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拥有伊萨克·牛顿、罗伯特·波义耳、威廉·哈维、理查德·洛厄、克里斯托弗·雷恩以及皇家学会（1660年建立），任何其他国家几乎都无法与之比肩。法国拥有笛卡儿和帕斯卡尔，但他们俩却都属于上一代人；路易十四时代没有产生任何伟大的法国科学家。

1648—1688年是法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在文化、文学和艺术领域辉煌荣耀的时期。但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其他一些领域的发展对未来更为重要，如金融和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宗教的更为多样性和宽容。在这些领域，不是法国，而是两个海上国家荷兰和英国处于领先地位。荷兰行将把第二把交椅让给英国，这一变化在这一时期已因它丧失其北美殖民地而显露出来。但这首先归因于它较为有限的资源、较少的人口以及由于路易十四的征战而使联合省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历史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这些战争并没有使法国获益，获益者是荷兰最大的海上对手，并且为路易十四徒劳地指望将其领回天主教世界的另一个新教国家。对英国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结果不是增强了天主教的力量，而是导致了一场使英国加入路易的敌人一边，因而从物质上对于挫败他野心勃勃的计划做出贡献的新教革命。因此，路易十四弄巧成拙，当法国盛极之时，即为它的衰落之始。英国和荷兰在奥兰治王室的统治下联合起来成功地击败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本卷结束的年代为光荣革命之年：不祥之兆已经显现。

- [1] 参见本卷第18章原文第446页。
- [2] 参见本卷第22章原文第522—523页，有关查理十世的去世和丹麦战败等情况。
- [3] livres，里弗赫，时法国货币单位，价值相当于当时1磅白银。——译者注
- [4] 专指17世纪的法国而言。——译者注
- [5] 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 [6] 《圣西门公爵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Duke Saint-Simon），贝尔·圣约翰译，伦敦1900年版，第2卷，第357页。
- [7] 路易斯·伯特兰：《路易十四》（Louis ），纽约和伦敦1928年版，第292—293页。
- [8] 《路易十四文集》（Euvres de Louis ），巴黎1906年版，第1卷，第6页。
- [9] 《路易十四文集》，第1卷，第105页（1661年）。
- [10] 《路易十四文集》，第3卷，第412—413页。
- [11] 《路易十四文集》，第3卷，第503页。
- [12] 转引自W. H. 刘易斯《光辉的世纪》（The Splendid Century），伦敦1953年版，第149页。
- [13] 转引自W. H. 刘易斯《路易十四外传》（An Informal Portrait），伦敦1959年版，第129页。
- [14]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4页（1666年）。
- [15]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292页（1667年）。
- [16]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66—69页（1666年）。
- [17]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121页（1666年）。
- [18]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336页（1667年）。
- [19]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26页（1666年）。
- [20] 转引自W. H. 刘易斯《光辉的世纪》，第46页。
- [21] 斯图加特国家档案馆，大事卷，第91卷，第7页（1683年7月12日）。
- [22] 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 [23] 斯图加特国家档案馆，大事卷，第64卷，第573—574页（1664年8月8/18日）。

第二章 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

人们有时说，政治史上的里程碑，诸如那些用来划分本卷所涉及时期的事件，同经济史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如果这话导致人们认为，撰写各国的经济史居然可以不提及政府的行动，就好像经济生活存在于真空之中，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那这句话将极其有害。诚然，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确实没有留下任何实际影响。在英国农夫或西班牙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中，英国的查理丢掉脑袋或西班牙的查理丢掉帝国等事件与他们关联甚微。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英国革命之间的40年里，没有任何创新大大改变欧洲各种主要经济活动的成本、产量或生产方式。这并非总是因为人们不做努力；今天科学所能做的事情，当时的国家都曾努力予以鼓励，虽然无所成效。这并不是说经济生活完全停滞不前，而仅仅是强调两个事实：其一，对延续和变革必须予以谨慎的衡量；其二，虽然在某些层次上进展缓慢，不太注意政治史上的突发事件，但在另一些层次上，这些突发事件却是实实在在的。而对于足智多谋者的所有创造，没有任何现成的历史法则可循。

本章的第一部分将概括地评述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的主要趋势。在这里，国家政策的影响基本上是不被涉及的。本章的第二部分将考察呈现在当时政府面前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性质，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将简单地讨论“重商主义”思想及其与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关系。

从仅存的有关17世纪的零星而又杂乱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人口总趋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6世纪的人口增长似乎到17世纪30年代就已结束，在某些地区甚至更早。随后，在17世纪中后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下降、停滞期，或至多也是缓慢增长而已。17世纪30—90年代，瘟疫、战争、饥荒以及其他导致死亡的事件以非同寻常的剧烈程度时时袭击欧洲各族人民，尽管它们在各地的频率明显不同。

继17世纪30年代遭受瘟疫的沉重打击后，欧洲许多地区在随后的30年里被瘟疫再度光顾。1646—1648年，伦敦、柴郡和英国其他城镇再次遭到瘟疫袭击；1648—1650年西班牙部分地区，1649—1650年慕尼黑，1654年哥本哈根，1655年阿姆斯特丹和莱登也再次发生瘟疫。1656—1657年在意大利许多地区暴发的那场瘟疫死亡人数更多。利古里亚和那不勒斯王国所受的打击最大。仅那不勒斯城可能就丧失了其人口的50%。有人估计，当1665—1666年瘟疫最后一次大规模降临英格兰时，大伦敦地区死于这场灾难的可能有10万人之多。虽然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些城镇也损失惨重，但其他地区所受的打击却不那么严重。英格兰大瘟疫是这一时期瘟疫的最后一次大暴发，尽管瘟疫在欧洲肯定还没有绝迹。例如，曾在1653年和1657年严重受损的但泽，在1660年再次遭到瘟疫的袭击；此外还有1664年和1666年的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1679—1680年的西班牙南部以及1680—1681年在三十年战争中伤亡巨大的马格德堡和莱比锡，也都再次受到瘟疫的侵袭。

周而复始的流血战争，是17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战争作为死亡的直接杀手，其意义并不很大；但作为死亡的间接杀手，一些战争却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肯定，以海战为主的英荷战争对英国和荷兰的人口发展来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三十年战争，或在此以后30年里席卷波兰和普鲁士的各种战争，对某些参战国家的某些地区的人口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死于战斗的人数远远少于死于战争所造成之状况的人数。以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方式进行的战争对人口有三种主要影响：第一，它刺激战争地区的人口迁移到较可安身的城镇。第二，由于战争既加重食物供应的负担，同时又破坏农业，因此它很容易使粮食歉收转为地方性的饥馑。第三，由于战争促进人口流动并降低原本已经很低的营养标准，它就为传染病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现成的渠道。^[1]

故三十年战争期间和三十年战争之后所发生的人口减少在其性质和起因方面是极其复杂的。各地的减少数量也相差很大。德意志的西北部、从卢森堡到吕贝克一线以北地区以及瑞士、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只遭受了很一般的损失，而弗赖堡的某些城市则损失惨重。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从德意志西南至东北一线，大致从斯特拉斯堡到斯特拉尔松。据估计，勃兰登堡、马格德堡、图林根、巴伐利亚

和法兰克尼亚平均损失50%的人口；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科堡、黑森、符腾堡和巴拉丁平均损失60%—70%的人口。不过，历史学家对这些数字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数字很可能过高。而且，这些损失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战争及战争所造成的各种状况或后果。例如，在17世纪的前30年，奥格斯堡的平均人口约4.5万人，1630—1680年只有约2.2万人，但在战争爆发前，其人口就一直在下降。范围广泛的战事并没有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而结束，其影响也不只限于德意志。法国东部一些地区也饱受三十年战争之苦。在1648年后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波兰的情形同样是到处村庄荒芜、房屋倒塌、人口流徙、经济衰退；普鲁士在经受了1655—1660年的瑞典—波兰战争后，也是如此。再向西，长期遭受战争厄运的西属尼德兰，1667年又再次遭受战争的厄运。而由于路易十四在1672年发动的战争，历史还将再次重现：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农民从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移居荷兰，现在他们又从荷兰逃走，以避开长驱直入的法国人；巴拉丁刚刚从先前的浩劫中慢慢恢复元气，1674年，它再次受到战争的劫掠，1688—1689年则又遭到更野蛮的劫掠。

战争对17世纪欧洲人口和经济生活的危害被夸大了，这对于三十年战争和德意志来说更是如此。人们指责战争，往往是因为战争太轻易地被认为意味着死亡，也许还意味着迁徙。一个地区的人口减少没有被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人们往往过低估计战后恢复的程度，并把许多主要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归之于战争。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发生了几次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歉收。导致歉收的部分原因是气候恶化，尤其是交替发生的暴雨和严重干旱，这些歉收对人口的消长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像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90年代那样影响深远、最具破坏性的饥馑没有发生于1648—1688年；但在这40年中却有三个歉收期，其中有些歉收是非常严重和广泛的。1648—1652年，欧洲各国的庄稼相继歉收。在阿姆斯特丹、巴黎、莱比锡和但泽，粮价猛涨到饥馑年月的水平。1649年，英国的粮价达到了该世纪的最高点；西班牙和瑞典的歉收也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紧接着是10年的粮食丰收和粮价下跌，随后欧洲许多地方的粮食又一次歉收，主要是1660—1663年。这次危机的程度因人而异，最严重的是在法国，那里出现了地方性饥馑。1662年3月，布卢瓦的一名医生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布卢瓦现在这样凄凉的景象，这里有4000

名从邻近教区逃来的[穷人]。在乡村，饥馑更为严重。农民没有面包。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肉食，一旦一匹马倒毙，他们便蜂拥而上，分而食之。”^[2]这种情形并不只是法国和1662年所特有的。在较长一段时间的粮食丰收之后，1675—1679年，欧洲又出现了第三次粮食歉收。这次歉收的范围不大，也不如前两次严重。尽管佛罗伦萨、西班牙、德意志和瑞典部分地区的粮价猛涨，但英国和法国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到本卷所涉及时期临结束时，各国不时出现零星的歉收，在一些国家，1683—1685年是荒年，但未造成严重和广泛的粮荒。

瘟疫、战争和饥馑的意义不能单纯从人口减少的角度去衡量。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也同样促使流民、贫困、济贫等问题变得紧迫且严重，并改变了经济繁荣或衰落的地理格局。这些格局的持续又同死亡浪潮过后的人口增长密切相关。当然，有些地区没有能够从人口减少中恢复元气，但另一些地区却随出生率的迅速上升而出现了人口的骤增。这将产生进一步的负担，使已经很高的儿童人口比例更高，并使对食物和就业的需要大大增加。当时欧洲的人口状况——整个欧洲大陆约有1亿人——很不稳定、波动性大、年轻人的比例居高不下，而由于死亡率比较高，人的寿命比较短（平均为30—32岁）。

我们只能大致地指出人口下降和增长的地区。西班牙、意大利、西属尼德兰、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地区、波兰以及匈牙利似乎不仅是人口减少，而且经济也处于衰退之中。但在这些国家，并非所有地区的人口都在下降，也不是一直都在下降。尽管西班牙的人口据估计在该世纪从约800万下降到了600万，但人口下降绝大部分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前；尽管卡斯提尔的许多城镇人口下降了，但加的斯和马德里的人口却大大增长。尽管那不勒斯的人口从1656年瘟疫发生时的3万人减少到1688年的1.86万人；但在威尼斯，虽然1630年也发生了瘟疫，其人口却得到回升，而其在17世纪90年代的人口数约为13万人，这与它1630年之前相差不大。随着米兰的衰落，都灵和里窝那的人口却因此迅速增长。在德意志，奥格斯堡、爱尔福特和纽伦堡的人口有所下降，而柏林的人口虽然也曾减少，但在1688年时却迅速增加到了约2万人；尽管但泽和吕贝克的人口下降，但汉堡、不来梅和维也纳的人口却上升了；尽管威斯特伐利亚的许多地区人口丧失严重，但埃森镇的人口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情形基本相似。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上升阶段，其人口状况不管发生了什么具体变化，都可能缓慢地增长了，至少也是持平。这些国家都躲过了最激烈的战争暴行。法国没有遭受意大利那样的瘟疫；1649年之后的几次歉收对英国的影响比较小；荷兰各城镇的人口继续增长，移居荷兰的人口可能超过荷兰移居国外的人口，在南特敕令被废止以后尤其如此，这有助于保持人口的稳定。伦敦的人口肯定有所增长，17世纪30—90年代可能翻了一番，达到50万——比整个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快得多——这就使伦敦和巴黎一样，成为欧洲仅有的两座人口超过40万的城市。整个17世纪，瑞典、挪威和瑞士的人口似乎也与这几个国家一样稍有增长。

在整个欧洲，农业仍然是绝大多数人主要的经济活动。1688年所采用的耕作方法仍同1648年时大同小异。确实，这一时期过于短暂，处于一个技术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中，人们还无法看到什么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在某些地区，一些在16世纪引进的新作物和新技术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专业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在此前几十年间，荷兰在土地排水和土壤改良方面的先进性就得到了成功的展示，到这时，英国和法国便进一步仿效这些技术。在其他地区，由于大自然再次成为主宰，田野里又杂草丛生，庄稼汉纷纷离开土地，即使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的耕作方法也很原始且效益不高，他们一如既往地穷困潦倒，即使连当时那么低的生活水准也达不到。例如，在西班牙，由于早就松垮的牧主公会组织进一步衰败，那些耕作业凋敝而畜牧业兴盛的地区状况毫无改善；在德意志和波兰，一些荒芜地区在这个时期内并未轻易地恢复其土壤潜能。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古老的条耕制、敞地制和两到三年轮播一次的做法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盛行；与法国北部和不列颠西部地区一样，其间散布着源自克尔特人宅边地和远田耕作相结合的耕地制，或点缀着大量沼泽、森林、荒地和粗放畜牧业，这是一切公认的耕作制度中很少见的。在耕作方法和租佃关系上，各地区和各国都不尽相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尼德兰（尤其是佛兰德）在当时的人看来似乎是小规模集中耕种蔬菜、蛇麻草和水果等专门作物的典范。大约在这个时候，用三叶草和其他“人造草”改良牧场的做法也从低地国家传到了英国。另一项重要的农业变革是在轮耕地中播种萝卜之类的

饲料，这项变革常常被认为是在18世纪发明的，但事实上它在这个时期已在英国东部出现了。尽管农业作家们日益提倡这些做法，但这些做法还远未流行。至于作为这个时代标志的农业专家，几乎只有英国才有，如理查德·韦斯顿爵士、约翰·沃利奇、威廉·布利思和塞缪尔·哈特立伯都是英国活跃于17世纪中叶为数颇多的农业专家中的几位，欧洲其他国家很少有谁能与他们媲美。他们大量利用佛兰德和荷兰地区盛行的做法，但这些国家本身却似乎没有产生什么有关农业改良的著作。

这些年间，欧洲粮食的专业化和贸易模式随各个地区的变革进程而有所变更。尽管东欧仍是主要产粮区，但从波罗的海沿岸诸港口出口的粮食却削减了。从但泽港运出的粮食（主要是裸麦），在1618年达到了顶峰；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其出口量波动极大，到1649年达到了一个颇高的数字，在随后的19世纪50年代又急剧下降，尽管在此后有所上升，但再也未达到世纪初的水平。尽管如此，这些地区谷物的生产对欧洲经济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粮食贸易仍由荷兰控制，它将别国的粮食运往国内，养活本国众多的人口，或再出口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输往地中海各国。一般来说，法国和英国生产的粮食能够自给。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歉收年里也从东欧进口粮食，但在这一时期，它们还是产生了日益增加的剩余粮食以供出口。法国的粮食定期销往荷兰、西班牙或葡萄牙；而在17世纪70—80年代，少量但源源不断的英国剩余粮食也从伦敦运出，主要运往荷兰和美洲殖民地。肉类食品或特殊作物继续外销，尽管其数量一般来说都不大，但有时在出口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这类东西有：荷兰的黄油和奶酪、佛兰德的蛇麻草、爱尔兰的牛和牛肉、法国的酒等。

从上述的人口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粮价出现了暂时性的急剧下降和持久性的上涨，1620—1650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粮价达到了当时的最高点，随后40年的粮价便呈现稳定或稍稍下降的趋势，尽管有些国家年与年之间波动很大。这些情况对社会不同阶层所产生的影响不一。小农业生产者由于余财不足，而且在总是不景气的市场出售粮食，因而受到不利的影响；挣工资的劳动者在有工可做之时，其实际工资略有增长，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经济条件下，他们常常没有工作；对土地拥有者来说，很少有迹象表明，价格过程的变化

本身显著到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或挑战。而且大体上说来，这时地主和佃农的关系继续按15世纪和16世纪形成的方式向前发展。

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波兰以及东欧各地，土地贵族对已沦为农奴的农民丝毫没有放松控制。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容克尽管受到某些暂时的挫折，但一般都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进而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在西欧，法国的农民虽然基本上不受农奴制的束缚，但由于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并通过各种办法使土地获得更大的收益，农民的封建负担日益加重。穿袍贵族和资产阶级增加了对土地财产的占有权。例如，在第戎附近肥沃的粮食和葡萄产区，资产阶级通过对土地的投资，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并帮助备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恢复生产。在瑞典，由于国王将先前转让给贵族的土地重新收回，对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农奴制的威胁已经消除。这项从1654年开始，在1680年以后更加有力地实行的“还原”（源自瑞典语的reduktion）政策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尽管这种政策肯定没有使贵族破产，但它明显减少了贵族的土地份额。^[3]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实行分成租耕制（法国的平分交租制、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大庄园制）的大地产旁边进行耕作的是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他们自己又雇用工薪工人，并跻身较高的社会阶层；在荷兰省，与自由农民并存的是奥弗利塞尔和格尔代尔兰德的农民，由于沉重的封建负担，他们的自由受到削弱；在英国，随着土地资产和租佃农场继续其逐渐的但又成功的发展，庄园及其封建结构日益失去其重要性，这在地产管理和租佃关系两方面都是如此。许多敞地依然存在。但在本时期明显日益受到重视的圈地却越来越多地用于耕作而不是畜牧；农业专家极力推崇圈地是改善耕作的一种办法，在实践中有时也确实如此。由于粮价下跌和小地产的适应能力不强，中农和小农压力重重，尽管他们的命运可能仍然比欧洲大陆的许多中农和小农要好得多。土地乡绅阶层，常常由于日趋富裕的资产阶级以及律师、商人的加入而扩大，以其地产为生并乐于将之租出作为农场，他们是英国农村特有的阶层。在本时期，尽管土地乡绅也受到内战及战后余殃的影响，但作为一个阶层，其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并未受什么损害。

工业和贸易上的变化走势遵循了一种类似于人口和农业之变化的地理模式。此前业已开始走下坡路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业，在本时期也未能有所好转。例如，威尼斯布匹的产量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在迅

速下降，到80年代已下降到大约100年前的1/10。甚至在利凡特市场，威尼斯的布匹也正被英国布匹、荷兰布匹及日益优良的法国布匹所取代。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况也未见好转；尽管一些古老的中心仍然保持其作为奢侈品产地的重要地位，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农村工业有所发展，但这些不足以抵消总的衰落。里窝那是意大利最耀眼的明珠，它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其鼓励外国商人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带到这个港口的生意，它成了英国在地中海地区贸易的主要集散中心。与意大利工业的命运密切相连的是，随着菲利普四世和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更为明显的衰落，^[4]西班牙的市场继续萎缩。纺织业和金属工业萎靡不振；羊毛出口贸易由于意大利需求的下降而损失惨重，尽管它继续供应着北方的工业，但却日益受到外国商人的控制。殖民地贸易也越来越成为除西班牙商人外的其他各国商人互相争夺的肥肉，这些国家主要包括荷兰、英国和法国。西属尼德兰也进一步失去昔日的荣耀。由于屡经战祸，饱受法国的威胁，地位又为荷兰所取代，西属尼德兰的贸易和工业开始衰落，例如，翁斯科特连同其著名的纺织业原本就已经衰落，1657年又最终受到法国的劫掠。1648年由于荷兰继续坚持些耳德河禁止航行，安特卫普港因此进一步衰落。

在东方，帝国法定疆界内的各类领地的经济也在继续衰落。在战乱袭来之前，德意志南部各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就一直在减少；如果说纽伦堡和奥格斯堡在这些年间几乎没有恢复它们往昔的富裕，这部分是由于商业活动已普遍地由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汉萨同盟早在战前就打了败仗，而瑞典人则使其情况变得更糟。荷兰、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及其商人进一步加强了对从莱茵河到奥得河的德意志贸易的北部重要出口进行控制。妨碍德意志经济发展的壁障是难以逾越的：远离日益扩展的新兴贸易地区，无力参与殖民争夺；由于经济与政治的分裂，沿河商路上关卡林立，再加上帝国各地的度量衡和货币五花八门；此外，农民生活贫困且缺乏自由。我们不能因为深恶痛绝三十年战争而无视这些壁障的存在，但也不能夸大绝对衰落的程度。西里西亚的亚麻布工业成为欧洲的主要纺织制造业；莱比锡在颇大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汉堡则蒸蒸日上，在商业和金融方面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欧崇尚商业的国家对木材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瑞典令人惊诧地跻身于欧洲强权政治之后，其主要经济力量仍然在于铜和铁。1650年，瑞典的铜产量达到了顶峰，尽管此后略有下降，但在1687年前仍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经过16世纪后期的技术革新，瑞典的冶铁工业发展迅速，在本时期，瑞典出口的铁在欧洲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其他次要的大宗出口商品还有焦油和木材。有相当一部分焦油来自瑞典统治下的芬兰森林；而在这个对造船业至关重要的物品上，瑞典享有像对铜和铁那样的近乎垄断的控制权。至于在木材生产方面，挪威仍然领先于瑞典。

羊毛和精纺绒线在英国的工业和贸易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金属制品、煤和粮食在其出口中占有较大（尽管仍然很小）的份额，尤其是随着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到本时期结束时，羊毛和精纺绒线的地位下降了。英国从美洲进口的烟草和蔗糖以及从印度进口的白布和丝绸，其数量均迅速上升，伦敦成为将这些商品转口欧洲的贸易中心，以及将欧洲货物转运到殖民地的运输中心。

英国贸易模式的这些变化不是英国所特有的，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变化是对荷兰商业优势最初的实质性挑战的组成部分，荷兰的商业优势在1649年前后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有所削弱，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时间内依然保持着。荷兰的船只和商人仍然支配着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贸易、东方的香料贸易、输往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以及有“荷兰最主要的行业和主要的金矿”之称的北海鲱鱼业。如果说17世纪40—50年代法国商业有很大一部分在荷兰人手中，那么在17世纪70—80年代，已有较大部分的法国商业掌握在了法国人手中。来自波尔多和南特以及来自伦敦和布列斯托尔的商人开始在对加勒比海和西非的复合贸易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继续发展，以及166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立，[\[5\]](#)在亚洲的国际竞争加剧了。

欧洲海域内的贸易在欧洲的贸易中显然仍占最大的份额。但英国和法国商业新的急剧扩张导致了来自美洲种植园主和殖民者或印度和非洲商站的较小但却持续的需求，这些需求有助于刺激供应布匹、陶瓷、盆子、铁钉和纸张等普通生活必需品的国内产业。转口贸易的不断增长，也鼓励这两个国家的加工业同荷兰的加工业一争高下，例如这些年间在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食糖加工业。尽管人们很迟才感到进口印度纺织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到17世纪80年代，这些纺织品

的巨大进口量终于导致国内怨声四起，并刺激有关人士进一步努力促使国内生产的多样化。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和美洲这些商品的产量和输入欧洲的数量日益增加，它们的价格不断下降。在17世纪初至80年代间，伦敦的弗吉尼亚烟草的价格猛跌；糖和印花布的价格也呈相似的趋势。一方面，这些价格下降的趋势加速了农业价格的下跌，并使绝大多数工业品价格大体上保持稳定，或稍稍下降。另一方面，有些工业由于实行保护政策而日益繁荣。在令人心悸的投石党运动以后，法国的工业和商业生活在国家的坚决保护下再度恢复生机。科尔培尔建立的许多新兴工业，例如挂毯、鞋带、镜子、奢侈品，常常是手工制作的，很不经济；但麻布、丝绸、羊毛、纸张和金属工业却正在成为大宗的出口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受到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6]这一蠢行和悲剧的冲击，但当时法国仍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在本时期，工业和贸易组织变化不大。尽管当时已出现一些大的企业，但生产活动的单位一般来说仍然很小，这与当时的技术和金融状况是一致的。

一些大型的由国家特许的垄断性贸易公司的存在，并不能妨碍个体商人或合伙商人的稳定发展，他们有时侵入也就是“闯入”公司的活动范围，有时则在公司的范围之外活动。在欧洲海域里，合股的或“有规章的”庞大组织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无法给人以希望。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它在1655年将其活动中心迁往多德雷赫特——面对闯入者的咄咄逼人之势以及特权贸易招致普遍反对的情况，早已节节败退，终于在1689年丧失了它的垄断权；利凡特公司、东方公司和俄罗斯公司也逐渐衰落，例如，到1673年，波罗的海的贸易实际上已不由东方公司控制。科尔培尔对他创建的各种贸易公司所寄予的很高期望，也极少是由与欧洲贸易有关的人士实现的。另外，在争夺殖民地贸易的斗争中，大公司则仍然占有优势；而新的公司，尤其是法国的新公司，纷纷建立，加入英荷两国原有的大公司的行列，^[7]然而，尽管像英国皇家非洲公司那类由国家倡办的公司在开拓贸易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却没有哪个公司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财富和影响，也没有哪个公司不受在其控制之外非法活动的商人的困扰，这些商人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意。

在工业方面，一旦技术允许，欧洲各国都越来越多地使用某种家庭作业或外包制作业的办法。在佛兰德或朗格多克，德文郡或西里西亚，绝大多数纺织品都是由从事纺织挣工资的农民在家里制作，再由熟练的城市工匠最后完成的。在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小作坊日益证明将风力或水力（主要是水力）运用于工业过程是可能的：如小麦的碾磨、漂洗、造纸、铁的切割和矿石的碾碎等。在冶铁和玻璃制造业方面，偶尔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生产单位，这反映了技术对集中的需要。当然，还有为数不多的特大企业。有些是国家创办的，如由于当时海军的不断发展而不得不建立的大型兵工厂和船坞；另一些则是因一些著名企业家的个性而规模特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荷兰商人、金融家、工业家兼军火商路易·德·海尔在瑞典建造的大企业。作为瑞典最大的铁器制造商、船主、造船商和各种制品的制造商，他于阿姆斯特丹的货栈为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双方、葡萄牙的革命军和英国的王党分子提供军火。尽管他在瑞典建造了一幢著名的豪华邸宅，但1652年他却是在其故乡阿姆斯特丹去世的。

就金融状况而言，一方面仍然是以诸如农民、劳动者、织工等众多老百姓为对象所从事的小生意，他们通常欠了当地商人、农场主或发放纱线的外包商大量的钱；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或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赋税的增加，无论是威尔特郡，还是博韦地区，信贷网络都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正如路易·德·海尔从交战国家无止境的军事需求中发财致富一样，一些大金融家（例如给马扎然贷款的银行家巴泰勒米·埃尔瓦）也从这些国家的财政需求中大发横财。伦敦的银行家有些原来是金匠，他们的出现也许是本时期英国金融史上的主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经营政府债务的私营银行家变得举足轻重。在这时，英法两国尽管有过规划，却都还没有建立诸如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古老基金会、生意兴隆的汉堡银行或1656年在瑞典建立的银行那样的公共银行，最后那家银行于1661年在欧洲首次发行了寿命很短的纸币，并在1668年成为瑞典银行。168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在兑付金银硬币存款方面获得进展，即发行随即在商界广泛流通的票据。与此同时，1672年爆发的战争导致了一场类似于金融危机的事件，汉堡银行暂时中止付款；英国国库也停止支付而使伦敦的某些金匠受到损失，尽管这肯定没有使他们破产。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受不了太过频繁地侵犯金融家的利益。

各国政府都一再面临有关国家财政的种种紧迫性的问题：如何敛钱以求实现国家或王朝的野心，如何搜刮以满足宫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如何筹款以进行战争。尽管曾试图节约，却都是偶一为之而且很不得力；开支通常总是上升，于是收入不得不也要与之相称。于是不得不在一个国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的社会里，迅速征收较多的税收；再者，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的财富主要由一心要求特权和权势的小集团或阶级拥有，对于这些人，没有哪个统治者能泰然加以藐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常常对各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财政需要则影响了政策的许多方面。

对土地和财产增收直接税是人们熟知的办法，但这种办法的可行性不大。例如在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地方，贵族和教士之类皆豁免了许多税项，要对他们征税既是危险之举也是绝无可能的，而从较为贫穷的阶层中勒索更多的钱财，也往往不是易事；又如在英国，由占有土地的财产税缴纳者控制的议会，其权力是对国王和克伦威尔之流的野心的有效制动闸。

作为法国最大的一个税收来源，人头税显然是科尔培尔改革所关注的。征集人头税的方法多种多样，而各种异常状况和免交的名目也极其繁多；结果，实际缴纳人头税的是那些比赤贫者境况稍好的普通乡村群众，因为要求赤贫者纳税毫无意义。贵族和教士可以不交人头税，为数不少的富人、有权势者和有些特权的人则逃税。科尔培尔千方百计降低人头税的税率，改善人头税的征收办法，但由于战争的需要，人头税又被提高，1667—1668年略有上升，1674—1678年则上升幅度较大；尽管如此，在科尔培尔掌权结束时，法国人头税的税率仍比富凯掌权时低20%左右。然而，即使当人头税的税率下降时，科尔培尔采取严厉的征税办法仍然使负有其他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的阶层不堪重负。因此，当战时税率提高时，抗议之声四起，紧张形势加剧，拖欠情况增多。与法国的人头税恰好相反，英国的直接税并不专以穷人为征收对象而对富人有所豁免。因此，英国的直接税额较有弹性。但早期的这些税种没有一个能有效地汲取商人、金融家或律师的收入——这些人的财富积累可能最为迅速。1644年英国所采取的逐月估税办法，在护国公时期一直是主要的税法，而在查理二世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有时也使用过，这种征税办法很可能比其他大多数办法要好。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沉重的战争负担使直接税的税率居高不下。尽管

如此，直到王位虚悬时期的最后年月，英国才出现严重拖欠税款的情况，并且这种直接税也没有成为人们主要抱怨的对象。1662年开征的炉灶税则不是如此。征收炉灶税主要是为了补充在复辟时授予查理二世的明显不敷的年金。同以往的课税或古老的补助金相比，炉灶税涉及更低的社会阶层。因此，它立即产生了麻烦，实践证明这种税很难征收，并且因为它是从大陆引进的一项新税而进一步引起了反感。

激起公众更为强烈反对和不满的是一些间接税以及当时统治者经常征收的各种临时税。本时期内，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征收某种形式的货物税或营业税。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征收直接财产税的可行性有限，关税和货物税便成为特别重要的税收来源。但要提高关税的税额，就要有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或者大幅度提高当时的关税税率，或者两者兼得。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些，尽管英国可能最接近这样的水平。还有调节关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为国际经济战中日益重要的武器，有时这种调节甚至会损害关税在国内财政中的重要性。再者，未经彻底改革的旧式关税管理体制有时也会严重妨碍提高岁入的努力。于是对国内货物的生产或销售进行征税的办法就被采纳或扩大使用范围，因为这样可以触及比土地税或财产税所能触及的更为广泛的财富，并可为降低出口税率或关税领域的其他动作提供方便。

对众多日用商品征收数额巨大的货物税，构成了荷兰税收制度中关键的一部分。荷兰通常尽量避免采取增加海外贸易负担的财政措施，而是采取那些能将负担转嫁到普通人日常生活开支中去的措施。一般来说，其关税都比较低，这一点对荷兰的重商主义经济至关重要，1651年战争爆发后，荷兰不得不增加关税。但荷兰的贸易不再迅速发展，关税收入也趋于减少。因此，即使为财政目的而调节关税曾是政治或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关税此时也已是一项没什么前途的国家财政来源了。结果，在本时期，荷兰开征货物税并扩大其范围；此税日益引起愤慨，并使联合省在其鼎盛时期成为欧洲课税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

其他国家提高间接税之事也时有所闻，西班牙的宫廷生活奢侈无度，并在经济不断恶化、帝国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进行持久的不成功的战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必然使事态更加恶化的征税规模，在本时期，大宗物品税^[8]和商业税都提高了；商业税1664年提高了14%，而

作为可以对所有交易征收的销售税，商业税代表着对经济生活的一个沉重负担。在法国，科尔培尔一方面降低人头税，另一方面又提高倍遭憎恨的盐税和国王特享税；1661—1683年，特享税的征收量增加到4倍。^[9]由于勃兰登堡选侯国对外贸易不多，仅有的一点也都很不景气，且贵族大多享受免税特权，故关税或直接税几乎不能为大选侯提供多少收入。因此，所有税收特别是货物税——17世纪70年代，货物税占普鲁士公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在大选侯与三级会议的斗争中越来越显得突出。他的胜利和战争所花的是绝大部分由城镇和农民承担的沉重的赋税。尽管英国的关税收入有所上升，但如果没有货物税，克伦威尔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岁入都将远远不敷支出。1643年，为了筹措内战费用，英国开征货物税，它迅速成为从事其他战争和镇压暴乱的支柱。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仅存的对啤酒和其他一些饮料征收的货物税作为国内间接税仍被保留下来，但数额大大增加，到16世纪70年代，该税约占总税收的1/3。

鬻官制作为屡试不爽的筹措应急资金的方法，在法国继续得到广泛的利用。许多官职伴有豁免人头税的特权；而在第一次投石党运动期间，法国又设置并出卖了许多官职，以渡过国家实际上濒临破产的难关。尽管科尔培尔在对荷兰开战前进行的改革使得用于紧急用途的收入迅速增加，但他最终仍发现自己无法摒弃那种造就一个追官逐爵之资产阶级的办法，因为它有助于财政紧缺的国家。这种做法在其他地方虽然也有所闻，但在国家的收入中通常不占重要份额，尽管本时期西班牙政府的财政困难使得它卖官鬻爵的举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鬻官相仿的是出售征税权。这是标准的一箭双雕之举：既提高税收的数量，又从包税人那里预支税款而先行动用收入。因此，包税人自然成了当时最遭人忌恨的人物。在荷兰，货物税很早以前就已包出，此时也仍是如此。在英国，关税承包制在王位虚悬时期一度被废除，1662年恢复，1671年终被永远废除；不过，在本时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货物税仍被包出去，炉灶税也断断续续被包出。法国的间接税仍然由包税人征收；尽管科尔培尔热忱地清除富凯掌权时期的混乱，但他很快又增加了包税人的数目。例如，1674年，法国设立烟草专卖，将专卖权包给一个金融家联合组织；这引起了骚乱，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加的收入。1673年，科尔培尔颁布重要敕令，要求所有行业都要组成公会，并向国家交费以换取国家颁布其组织规程——他将此项费用的征收权正式包了出去——这种财政措施与英国在伊丽莎白

一世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大量的管理特许令或行会垄断特许状非常相似。

关于各国的财政措施，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英国的长期议会出售国王、主教和债务拖欠人的土地；瑞典将王室土地重新收回；科尔培尔整顿王室地产，使其收入大大增加；17世纪80年代奥罗佩萨试图整顿西班牙财政，其努力不可避免地以不受欢迎而告终，他本人被撤职，而西班牙的国库收入仍居低不升。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借贷问题要进行考察。

荷兰公共借贷体系在效率上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效率，荷兰人就难以幸存了。尽管荷兰人要承受税收和大量国债负担，但他们仍然以很低的利率投放公共贷款，并且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利率。1649年联合省国会仿效荷兰省的做法将利率降低到5%，从第一次英荷战争起荷兰的国债增加，德维特在1655年设法将利率降低到4%，尽管这也受到一些反对；此后的另一次兑换举措又使利率降低到了1672年的3.75%。与此同时，一些城市以更低的利率贷款，如阿姆斯特丹1664年的贷款率为3%左右。相反，他们的对手英国，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备有公共资金以偿付债务的制度，仍然像以往那样得过且过。在护国公时期，各类商人纷纷预付金钱作为特别税的保证金；而查理二世则从金匠的银行或东印度公司的巨头那里借债。王位虚悬时期利率为8%的“国家信用票”根本无法兑现；而此后滥发国库券之举又最终导致1672年的“停兑”事件。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公共借贷体系是削弱英国国力并进而导致国王的外交一塌糊涂的一个重要因素。1675年后，查理二世竟成为领取路易十四津贴的傀儡。在本时期，法国在安排自己的公共借贷方面也无所进展。未能支付国债券到期利息的失措，促使法国1648—1649年投石党运动的爆发。贿赂、贪污和混乱是马扎然和富凯掌权时法国财政的特征。科尔培尔抨击国债券以及领年金者并大大减轻国家的利息负担。不过，人们对1672年利率为5.5%的公债和1674年发行的利率为6.25%的国债券反应极为冷淡，这也许表明，在科尔培尔将法国誉为欧洲信用最好的国家之时，这个太阳王之国的信用并不好。

与国家财政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问题。如何维持并恰到好处地增加国内硬币的数量呢？货币的匮乏会阻碍赋税的交付，或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生活的不景气。从美洲流入的金银已逐渐变得无足轻重。

考虑到欧洲总体经济活动量的可能增加，因同东部、地中海东岸及波罗的海贸易的扩展而对贵金属需求的确凿增长，以及政府税收和开支的明显上升，美洲白银流入量的缩减就意味着在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贵金属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其供应量却日益减少了。因此，在这个世纪，欧洲各国的信贷业务和用于铸币的非贵重金属（尤其是铜）的使用大大增加。

在西班牙，菲利普四世进一步滥发原已相当可观的维隆币^[10]。这种铜币似乎占这个时期西班牙货币量的90%以上：贵金属实际上已不再进入流通领域；1650—1680年，银行对维隆币的溢价增加了4倍；西班牙政府忽而实行通货膨胀，忽而实行通货收缩，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使金融极不稳定，使经济衰落雪上加霜。^[11]1640—1680年法国的铸币量大为增加，金块源源不断地从西班牙流入，尽管如此，科尔培尔仍由于经济中缺乏货币而迭遭麻烦。相当一部分流通媒介，尤其是17世纪60—70年代的流通媒介，由劣质的银币和铜币（1655—1658年铸造了大量铜币）构成，人们不断抱怨许多优质的金银已流出法国。成色最足的荷兰铸币到处受到欢迎，它们被出口用于苏格兰、印度、俄国或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活动。佛莱芒的利克斯银圆和杜加通金币一直大量进入荷兰的流通渠道，经过1659年的改革，这两种铸币正式被纳入荷兰共和国的金融体系；“银行票据”和“通行货币”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被合法化了。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基尼初次亮相，这是刚刚成立的非洲公司的黄金产品。1663年，饰有花边的铸币（法国已经使用）被引入英国；对造币厂的种种训令被取消了；1672年和1684年，铸币中又增加了铜锡合金的半便士和1/4便士的硬币。瑞典货币的发展最非同寻常。1625年，瑞典实际上采用了铜本位制（意在既想增加铜在国外的价格也想维持铜的生产水平），这迅速导致了铜币的产生，并基本上以之替代了银币。这种铜币奇大奇重；一枚面值10塔勒的铜币重约43.6磅，1649年面值2塔勒的矩形标准铜币宽9.5英寸。

各国对控制贵金属流出国境的问题反应不一。尽管荷兰偶尔也做出控制的姿态，但实际上却继续充分允许这种流动；欧洲和新世界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荷兰，其中相当一部分又重新流出荷兰，以资助贸易或供应西方世界的造币厂。1663年，英国最终废除了禁止金银出

口这一古老的做法，一方面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法律对实际上早已发生的事实的追认。

西班牙继续禁止贵金属出口，但在整个欧洲都明显出口贵金属的情况下，这种立法徒劳无益。在法国，政府圈内仍以“保护金银派”的观点占上风；当时一方面在地中海东岸贸易中大量金银财富的外流引起了国内的极大震惊，另一方面在与加的斯的贸易中大量金银财富的流入也得到国内的赞同。^[12]尽管存在过某些例外情况，但科尔培尔继续实行禁止铸币和金银出口的政策，千方百计保证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商业活动只是出口法国的货物，而不是法国的金钱，然而实际上往往做不到。

这些限制贵金属外流的努力，不仅是金融政策，而且也是商业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政府看来，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如何在一般被认为是大致恒定的国际贸易总量中为本国争得最大的份额；二是如何控制本国的份额，造成贸易顺差和贵金属的净进口。对于那些从事较广泛的国际贸易斗争的国家来说，还有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扩大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到本时期才有的，解决这些问题也都有历史先例可循。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争取欧洲经济霸权的战斗中出现了一些最早最大的搏击。

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都应直接来自生产国或用产地的船只运输；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所有产品，只能用英国人或殖民地人民拥有并由他们担任船员的船只运输进口；《航海条例》还作了各种旨在使捕渔业和海岸贸易操纵在英国人手手中的规定。该条例符合英国人的各种愿望（很容易获得公众利益认同），也符合诸如利凡特公司和东方公司这些急于要减少正与它们竞争之舶来品的贸易集团之要求。之所以在这个时期颁布《航海条例》，并在此以后发动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商业不景气有关。该条例打击了荷兰，而在由此引发的战争中，荷兰的贸易和船运所受的损失比英国大。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该条例并不切实可行，它为经过修改，更具强制性的1660年《航海条例》的出台铺平了道路，这一条例与1662年、1663年、1664年和1673年的有关条例一起，形成了后来所谓的“航海法”或“旧殖民体系”的核心。

这些法律规定，同殖民地的贸易只能用英国人或以英国船员为主的殖民地船只运输；殖民地的一些货物，如蔗糖、烟草、棉花、生姜、靛蓝和其他染料木，只能出口到英国本土或英国的另一处殖民地。1663年，英国颁布《大宗货物法》，将集散地的旧规则运用到殖民地贸易中，以利于英国商人：欧洲的货物不能直接运往殖民地，而必须运往母国，然后再在母国改用英国建造的船只运往殖民地。欧洲的某些特定货物只能用英国的船只或货物生产国的船只运往英国；出自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某些货物则被完全禁止进口。1673年颁布的法案规定，当法案列举的商品从一殖民地运到另一殖民地时，必须征收关税，这主要是与设置一个班子以便对殖民地贸易进行限制有关。

在这一系列立法中，没有什么新的思想。长期以来西班牙就一直试图阻止外国人染指其殖民地贸易。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大量鼓励本国运输业发展的先例。然而，英国的立法具有更突出更持久的重要性：由于英国工业、贸易和船运发展迅速，这就使英国有可能满足殖民地越来越多的需求，因而有可能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就西班牙而言，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英国的航海法常常遭到破坏，同时不断修改，并且它们与英国在非洲、亚洲或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关联不大；但由于这些法律有效地将殖民地贸易同母国联系起来，因而毫无疑问有利于英国在美洲的贸易，抵挡住了在欧洲其他势力的竞争，并有助于伦敦转口贸易的发展。

在这场国际经济战中，法国的政策也同样富有活力。建立拥有垄断权并得到国家许诺或实际支持的特许公司以促进本国贸易、反对外国竞争，这种久试不爽的伎俩，早为欧洲各国所采用。科尔培尔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清理早期遗留下来的公司，另一方面带着羡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目光，1664年建立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1665年建立了在北非开展贸易活动的公司，1669年建立了北方公司，1670年和1673年先后建立了利凡特公司和塞内加尔公司。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规模庞大，拥有巨大的权力和王室的订单，但在本时期东印度公司却是一场失败的投资，尽管它为以后法国在印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印度公司则于1674年被解散，法国的移民地成为国王直辖的殖民地。^[13]虽然如此，法属加勒比海的贸易和蔗糖的生产仍然增长迅速（尽管相当一部分是在公司管辖范围以外生产的），荷兰的控制被削弱了。与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地一样，这里也采用了排外制

度：所有外国船只都不能进入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科尔培尔以海军为后盾有力地实行了这一政策。由于法国的贸易和运输业不断发展并逐渐能够发挥其应起的作用，法国的强制措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虽然不时也发生冲突，这与英国的商业一样，但与西班牙的商业不同。其余的公司中以北方公司最为重要。该公司的创立是科尔培尔建立海军这一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荷兰对波罗的海木材和海军用品的控制，但这一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到17世纪70年代末，该公司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它的特权到1689年才被最后取消。

在本时期，瑞典、丹麦和勃兰登堡表面上都在非洲、印度或西印度群岛拥有贸易公司，而且有时还很活跃，但事实上，它们大都是那些寻求在荷兰东西印度公司范围外活动的荷兰商人经营的公司。在英国，对垄断组织的日益厌恶，大大阻止了人们更多地依靠建立新公司的做法。除为了争夺荷兰的渔业生意而不得不建立的且不很成功的一些渔业公司外，本时期建立的仅有的大公司是1670年由国王特许的哈得逊湾公司以及1672年建立的皇家非洲公司。前者在创建初期的大部分时间主要在加拿大同法国的移民争夺生存权。^[14]而皇家非洲公司直到1689年前后一直比较成功，从经济上来说，这种成功也许是华而不实的，尽管从国际贸易方面来看，肯定有助于英国对奴隶贸易的参与。

在战争间歇时期，各国试图通过谈判签订商约，以实现用更激烈的办法达到其未能实现的目的。1654—1656年，克伦威尔同葡萄牙、丹麦、瑞典、荷兰和法国签订了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1654年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葡萄牙签订的条约。^[15]该条约迫使葡萄牙给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以充分的贸易自由，它标志着英国开始控制葡萄牙的商业。1661年，荷兰和葡萄牙也签订商约，允许荷兰参与葡萄牙贸易，但这一商约无损于英国对葡萄牙贸易的控制。1662年的法荷条约和英荷条约几乎未能遏制不断增强的商业敌对状态；而1667年结束第二次英荷战争的和约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方战时的财政枯竭所致。在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英荷经济冲突时代的结束，这不是因为战争条约已解决了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路易十四和科尔培尔的勃勃野心面前相对沉寂了下去。科尔培尔在1663年同丹麦和瑞典谈判的条约都是他为推进法国在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所做之

努力的较次要的部分。法国和英国之间日益紧张的经济关系表现在两国1663—1674年断断续续进行的商业条约谈判毫无成果。法荷冲突之后，诸如路易十四在1678年尼曼根和约中所获得的那些政治好处肯定由于科尔培尔的经济野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抵消了，那打击就是1667年关税的放弃。[\[16\]](#)

关税、关税战和贸易禁运都是具有多重目的的经济武器。在本时期，它们被用于税收利益、贸易平衡、发展船运业，或用以鼓励或保护工业。

科尔培尔是使用这些手段的主要提倡者。首先，他设法整顿长期存在的对国内外货物所征税收的混乱状态，因为它已妨碍法国的经济生活；其次，他把关税用作法国工业的防御性武器以及对付荷兰和英国贸易的进攻性武器。他实现第一个任务的主要手段是1664年制定的关税税率，实现第二个任务的主要手段是1667年制定的关税税率。这两个税主要关心的都不是增加岁入。尽管1664年的改革只限于五大税种这一领域，但它却是能将该领域五花八门的税收统一为单一的关税。这次改革的总倾向带点保护意味，对纺织业来说保护意味还要浓一点。1667年的关税法则使保护性质几乎变成了侵犯性质。该法只涉及少数货物，但税率常常比以前翻了一番，尤其是对进口的纺织品。尽管该法没有改变五大税种外的税收的混乱状态，但它却覆盖了整个法国。再者，它导致了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加剧，而且这种局面在1670—1671年日益恶化，因为科尔培尔加强了1665年规定的特惠糖税，此举鼓励了法国蔗糖加工场和种植园贸易的发展，并打击了重要的荷兰糖业利益。1671—1672年，荷兰随即对法国的酒和白兰地采取了报复措施。正如这一日益扩大的经济争夺是触发随后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样，放弃1667年关税法对科尔培尔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科尔培尔在战争情热开始迸发之时，曾使其主上陶醉于法国行将消灭荷兰商业的美梦之中。

对英法争夺而言，1667年的关税法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1648—1649年，双方实行了一阵短暂的贸易禁运之后，有一段时间商业敌对暂时蛰伏。但1654年、1664年，尤其是1667年法国对英国棉布所征关税的增加，使伦敦有影响力的商人掀起一阵阵激烈的反法运动。主要是出于感情用事而不是实事求是，英法贸易被说成是英国处于逆差的地位，从而导致英国贵金属流入法国。1678年，英国禁止法国主要

货物进口，理由是这“将使本国的国库枯竭”。尽管英国1685年废除过这一禁令，但这只是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的一个短暂的停顿。1689年以后，英法双方重新相互实行货物禁运和寓禁关税。到这时，整个英国的关税才显示明显的保护主义特征。

关税不仅会导致报复，而且，作为保护工业的一种手段，关税也表明值得保护的工业已存在。可能只有法国在本时期能成功地使用这些手段，因为只有它最接近于当时国家的理想，即国内既拥有各种所需物品，同时也拥有巨大的工业潜能。在荷兰，保护工业关税同这个转口帝国的其他要求相悖；英国的商业则早已因有航海法的保护而招致报复，故而它也承受不了更多的风浪了。但尽管没有哪个政府能指望成功地通过这些办法来振兴工业，它们却都未因此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甚至法国都发现自己不能完全不要荷兰的商品；勃兰登堡政府也被迫大大改变以往禁止外国工业品进口的做法，这种由大选侯最初的成功激发出来的做法，并未使该邦的本地工业取得预期的发展。在许多不能或不愿采用科尔培尔式严厉措施的国家，同样的总趋势是很明显的，即降低对工业品出口和必要原料进口的税率，增加对工业品进口和必要原料出口的税率。这种趋势在瑞典很明显，尤其是自17世纪50—60年代起。例如，瑞典对铜和黄铜制品出口所征的税少于对未加工的金属出口所征的税。西班牙在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关税政策曾实际上有利于外国商人的进口，但即便在该国，17世纪80年代也做出了保护本国的丝绸和羊毛工业的努力。英国对羊毛、漂土和其他原材料出口的禁止，到克伦威尔时仍在继续，并在复辟后的议会法律中得到体现，尽管1668年英国放弃了阻止粗皮革出口的努力。

比商业政策更直接的是当时盛行的鼓励、保护或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在这方面，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堪称楷模。科尔培尔认为，在一个井井有条、气势恢宏的经济中，工业应占有巨大的比重。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科尔培尔资助行会，赏赐垄断权，赋予其他特权，发放津贴，对工业生活实行由非常详尽的规章所构成的严密控制。最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奢侈品的工场，这些奢侈品有挂毯、精致的家具、小地毯、陶瓷、威尼斯玻璃和镜子。哥白林双面挂毯和手工织的绒毛地毯因此获得新生，并发展为皇家制造业；类似的企业在博韦和奥比松也得以建立或受到国家的支持。威尼斯工人被吸引到法国（尽管威尼斯共和国想尽办法使他们待在威尼斯），享有特权的制镜公司也建立

了起来：到1680年，科尔培尔夸口，这一项皇家制造业就使威尼斯每年损失100万里弗尔，实际上，这些奢侈品主要是炫耀辉煌而不是其对整个法国经济的重要性；它们的经济价值也远不能与它们在艺术上和文化上对欧洲的巨大影响相提并论。

就科尔培尔的思路而言，法国人不应购买外国布这一点似乎也很重要。于是范·罗贝斯被从荷兰挖到法国，并在阿布维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具有高度特权的并很快名扬天下的工场，以制造当时在英国和荷兰生产的各种布；在勃艮第建立了一家制造哗叽的公司，由政府给予资助；朗格多克的工业也得到政府的资助，以鼓励它的产品出口到利凡特。里昂的丝绸工业由于科尔培尔亲自安排的王室大宗订单而繁荣起来。制铁工业获得某些保护（瑞典的铁不能完全省掉），国家铸造厂也创办了起来以制造大炮；在罗塞福尔、土伦和布雷斯特建立了巨大的兵工厂和船舶修造厂，它们都属于当时最大的工业设施之列。科尔培尔以控制工业作为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步骤，在这方面，他展示了惯有的经济保守主义。他利用现有的陈旧机制，从中形成了一个集中控制并通过按察使（即新设立的制造业视察员）和行会起作用的庞大机构。羊毛纺织业备受他热情的倾注。17世纪60年代，法国将中世纪式的详细规则发往众多城镇，接着实行相应的国家控制，强调必须实行统一标准以及建立行会组织的必要性。尽管1673年敕令[\[17\]](#)的基本内容是关于财政方面的，但它完全符合科尔培尔的工业观。他在世时，法国行会的数目有了增加，他死后，数目继续增加。另外，这些行会总是成为行会师傅的排外组织，被中央政府用来训练工人。随着行会的增加，工匠组织也有了发展。其中的一些组织尤其是在诸如造纸行业一类的技术工匠组织开始进行罢工。政府便通过进一步制定规章制度来制止企业纠纷的加剧。

各种促进工业和贸易发展的类似例证在整个欧洲到处可以看到，只不过规模没有这么大罢了。一些经济机构也建立了起来：1650年英国设立贸易委员会；1651年，瑞典建立商业协会；1665年，维也纳建立商业同业公会。萨克森、巴拉丁和勃兰登堡也努力维护和开展由国家予以资助的经济活动；1665年，慕尼黑建立了包括丝绸制造公司在内的一批特许公司；南特敕令废止前后，英国、荷兰和勃兰登堡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有技艺的工匠移居本国，以吸引新教避难者；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英国也允许并鼓励贵族从事贸易或工业活动；运河纷纷

开凿了出来，1666—1681年，虽然没有法国“双海运河”那样宏大的工程，但仍有大选侯开凿的连接施普雷河和奥得河的运河（这样就把柏林和布雷斯劳联结了起来）。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调节都被视为鼓励工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荷兰经常调节其捕渔业，以维护在整个欧洲闻名遐迩并到处销售之产品的质量、声誉和价格。荷兰在莱登和阿姆斯特丹的纺织工业仍然受到行会的控制，所生产的棉布均在行会会所接受检查并打上封印，以核实是否符合详细制定的规格。威尼斯及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纺织品制造中心也实行类似的控制，尽管它们原是继续想通过维持质量促使工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由于这些中心坚持生产人们不再需要的、既过时又昂贵的那种布，便无法满足新的要求。尽管许多农村地区的纺织业逐渐摆脱了行会的控制，像糖类加工或枪炮制造这样的新兴工业常常不受行会的控制，但只有英国能不断地在全国范围内摆脱国家或城市当局的控制。行会是继续趋于衰落了，而英国政府虽然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急于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它倾向于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政策，而不是通过对工业的直接补助或类似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最有特色之处是它最感兴趣的工业活动是查塔姆、伍尔威奇和德特福德的海军造船厂。在本时期，这些造船厂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将经济史同社会史分离开来，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也不切实际。正如政府要尽力解决经济问题一样，政府也要尽力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个时期，政府实际上面临着三个方面的社会问题：济贫、保证就业以及在遇到非常情况时保证食物的供应。对政府的努力，必须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待，即低就业和广泛贫困持续不断，社会中许多劳工都是工作时有时无，而暴徒和骚乱又时常对专制政府战战兢兢地加以维护的公共秩序构成了地方性威胁。使人们“不偷不饿”（当时的人如是说）是比道德说教更具说服力的政策。而且这几十年欧洲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状况也促使欧洲许多地区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了值得注意的行动。

在这被战争搞得困顿不安的年代，各国政府旨在打击乞丐、流浪汉和懒汉（身体健全的失业者）的旧政策具有特别明显的新活力。英国在内战爆发后以及1648—1649年不景气年月里的状况就是如此，此后这种活力又体现在1662年的《社会福利法》之中。在法国，科尔培尔用人们熟悉的法令来对付懒汉；同样，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的

波希米亚和瓦萨王朝统治的瑞典，人们对乞丐也啧有烦言，于是政府对乞丐采取了镇压的政策。通常是对懒汉进行体罚或将他们逐出城市或教区，而越来越残暴的措施也并非只是信奉较为严峻新教教义的国家才实行。这个时期，建立各种济贫院以及多少带点强制地将穷人关在里面的做法大为增多。1656年，法国建立了著名的巴黎济贫院；1673年，巴黎济贫院收容了6400多人，其各个附属机构也收容了不少人，在院内就食的各色人等既有妓女、弃婴，也有老弱病残和在各行各业劳动、身体健康的穷人。此外，尤其是从17世纪50年代以后，不仅法国的其他城市，而且欧洲各国包括荷兰、瑞士、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城市，也都建立了许多类型上相似，但规模较小的济贫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英国建立教养所之举并无多大进展，复辟以后，用于济贫院外救济的济贫税日益增加，这就引起了批评并导致英国建立了与伦敦监狱相类似的公共济贫院。创办以上这些机构的动机颇为复杂：或出于宗教上的慈善；或意欲清除街上日益增多的具有潜在危险的流浪汉；或期望通过被收容者学会一门手艺有利于本国的工业（通常是纺织业）。但实际上，这些济贫院几乎没有用提供工作的办法来济贫，更谈不上通过鼓励工业的发展来增加财富了。

控制食品贸易的做法大致遵循传统的方针。对国内的食品贸易有许多规定，尽管具体做起来大相径庭，但通常采取的仍然是交替使用的两套熟悉办法，即丰年允许出口，荒年禁止出口。这几十年间的粮食出口异常自由，主要是因为粮价下跌，以及在两次歉收之间有较长时间的丰年，而不是什么已普遍有了“自由贸易”思想。1647—1650年的危机岁月，欧洲许多地方出现了因食物昂贵而发生暴乱的情形，在这之后便是17世纪50年代的粮食丰收，各国广泛废除出口限制。1661—1663年粮食歉收，各国再次限制粮食出口，然后又长期实行出口自由：在大选侯领地，1663—1673年不限制粮食出口，1665—1688年则完全不限制粮食出口；在法国，1669—1674年，粮食可以自由出口，1675—1683年改为禁止出口，1686—1689年又允许自由出口。这种政策尽管出于社会方面的动因，但其他方面的影响也起了作用：西班牙急需粮食迫使它鼓励进口；荷兰在国际粮食贸易方面的利益促使它实际上对粮食贸易不加任何限制；容克地主在出口粮食方面的利益促使他们反对对德意志北部港口的粮食出口施加任何限制。

只有很少几个国家试图实行长期一贯的农业保护政策：荷兰通过对进口奶品施以高额关税，确实保护了国内奶品制造业；丹麦保护农业的努力往往与限制出口相交替；瑞典在1672年实施的保护措施昙花一现；科尔培尔通过免除对大部分粮食课以关税刺激粮食出口，除此之外，他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兴趣是木材而不是食品，这反映在1669年的那份著名而又全面的法令——《河泊森林管理法》中。大多数国家总的趋势是为了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或商人的直接利益偶尔采用控制。只有一个国家明显地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英国。1654—1670年，当粮价不超过规定的水平时，英国允许粮食出口；而在1670年，不管粮价是多少都允许出口；1673年则又实行了对粮食出口给予补助金的制度，该制度尽管在1681年一度被取消，但在1689年又再次恢复了。同时，当粮价较低时，对粮食进口便征收高额关税，当粮价较高时，便征收低额关税。这样，英国确立了延续较长时间的、保护英国农场主的体现为谷物法的政策。在此期间，英国也取消了对谷物贸易的各种限制。尽管后来在特殊情况下偶尔也对粮食贸易进行控制，但新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并标志着英国已抛开通过控制保证分配平等的旧方法，而转向了保护生产者发展及依靠不断扩大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方法。

这个时代（实际上是1500年前后至1800年这3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常常被冠以“重商主义”或“重商体系”的名称。亚当·斯密在1776年首次阐发“重商体系”这一概念时，将17世纪和18世纪初商业政策的某些方面系统化，并认为这些政策是荒谬的，因为它们并未带来经济上的效益。1个多世纪后，施莫勒和坎宁安把重商主义描述成立国的一种理想，从而使“重商主义”这个术语在知识界再次盛行。此后，“重商主义”的思想逐渐演变为模糊的和包罗万象的统一体，它解释不了什么东西，却把很多东西隐藏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本章所考察的种种政策行为背后，肯定有许多各国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共有的态度和信念。这些在各种著作、小册子、书信或敕令中所表达的概念，如同这些政策本身一样，在经济思想史中被贴上了“重商主义”的标签。但这种由形形色色的思想、假设和偏见汇成的大杂烩，同当今被称为经济学的系统分析有很大的差别。它们在内容、性质、实践者及与政策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同。“重商主义”主要出自两个相互联系的来源：一是那些关心特定问题或进行专项游说

的政治家或商人所做的经验性观察；二是对经济生活所长期持有的或很少产生疑问的看法。前者包括诸如出口金银会造成铸币匮乏这类的实际问题，即商人和财政大臣们都感困惑的问题。我们似乎不太需要把这些人当作独特的“重商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被贴上“重商主义者”的标签，主要是因为后代人不顾古今时代的不同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判断当时所找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第一个来源有时无意识地吸收了第二个来源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假设。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有：商业、货币和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多少有一个固定的量；供求两方面的境况通常是不太能变通的；政府应像管理政治事务那样管理经济事务。

这些观念不是本时期所特有的，甚至也不是16世纪和17世纪所特有的。有一些假设就现代工业主义之外的经济生活总环境而言远非毫无道理；有一些甚至在当时就逐渐同现实脱节了。由于这些假设对那些忙于指导当时欧洲新兴国家和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的人们之思维产生了持续影响，因而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些假定不能单独用以解释政策，也没有决定政策。在实践中，经济政策现在也仍然往往是经济假设和直接问题的不知结果如何的产物，取决于杰出人物的个性并部分地由经济生活的短暂繁荣或不景气决定其时效。简单地贴上“重商主义”的标签，乃是掩盖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影响之因素的多样性。但历史性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再也难以揭下；而如果这个特定的标签只是用来表示支配当时行动的各种态度、假设或无系统的概念，那它或许可以为某些分类方面的目的服务。因为这些态度、假设和概念肯定是曾加以利用的，而且它们的故步自封，他们的基本静止和保守的性质也促使当时的紧张局面和冲突更加恶化。

这一时期有关经济事务的著作硕果累累，其中的许多著作对要求调查并开发国家资源的种种建议显示了不断增长的兴趣。通过像活跃于维也纳商业同业公会的科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约阿希姆·贝歇尔和医生、发明家兼经济学家威廉·贝蒂爵士之类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我们似乎站在了处在科学发现的新世界和固守传统观念的旧世界交界的地带。在17世纪60年代，贝蒂和约翰·格朗特一起开创了在当时被称为“政治算术”的社会统计学领域。贝蒂积极参与刚刚创建的英国皇家学会的活动，该学会只是当时几个学术机构中的一个（除此以

外，还有法国的皇家科学研究会、佛罗伦萨的试验科学院），这些机构有助于激励人们对经济和科学问题感兴趣。

事实上，在17时期，这个刚刚形成的科学世界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科学界基本的经济思想同当时大多数著作所体现的习惯思想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像《荷兰的利益》一书（1662年出版，主要由彼得·德拉·考特撰写，但通常被认为是扬·德维特所著，该书后来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即署了德维特的名），似乎散发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气味。但从一个商业共和国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它大体上只是一篇爱国檄文。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著作，例如罗杰·柯克的著作。但更典型的是在冯·霍尼格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奥地利随时都能如愿超越所有国家》（1684年版）或安德鲁·亚兰顿所写著作的小标题《英格兰的海上和陆上发展或如何使荷兰不战而败》（1677年版）里所展示的情绪，而乔治·唐宁之类的人物充满活力的活动，则充分体现了重商主义实践的现实。唐宁坚持执行反荷政策，并起草了《航海条例》。

在体现“重商主义”政策方面，科尔培尔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突出。作为一名天才的行政人员，他对经济生活的理解与当时的普通人并无二致，只不过他的理解更全面而已。他的观点显示了传统“重商主义”著作所有的墨守成规性，而有些观点与他在其中呼风唤雨的缓慢变化着的世界日益不相称。当在美洲和东方的新兴贸易分支迅速开辟显然开始使关于世界亘古不变的古老说法不再确切之时，当他本人忙于建立从事这些贸易的公司之时，他竟仍拘泥于商业活动有一个恒量的观念，并视一些新兴贸易的开发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故而，他在1669年告诉他的主上的话便是合乎逻辑的了。“商业是所有欧洲国家之间无论是平时和战时都在进行的一场永恒的战斗，谁都想从中夺取较好的一杯羹。荷兰、英国和法国皆是这场战斗的参与者。”
[\[18\]](#)“重商主义”所有的概括性特征都呈现在了他的内外政策，他对贸易、工业和贫穷的态度之中。对他的记忆以及他的影响，使这些特征永久地存在着。正如路易十四的法国为有抱负的小诸侯们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模式一样，科尔培尔的国家经济主义也为诸侯们正统的经济保护主义提供了模式。科尔培尔也许是唯一一位真正的“重商主义者”。

- [1] 详见本卷第18章边码第434—435页。
- [2] A. P. 乌什：《法国1400—1710年粮食贸易史》（哈佛，1913年）第210页上所引。
- [3] 见本卷第22章边码第521、533—544页。
- [4] 见本书后第15章边码第369—377页。
- [5] 见本卷第17章，边码第418—421页，第427—429页。
- [6] 见本卷第7章，边码第141页。
- [7] 见本卷边码第36—37页。
- [8] 大宗物品税（Millones），指对酒、醋、油、肥皂和蜡烛所征的税。——译者注
- [9] 关于法国诸税，见本卷第10章边码第230—231页，第242页。
- [10] 一种含铜的银合金币。——译者注
- [11] 见本卷第15章边码第370—372页。
- [12] 见本卷第15章边码第376页和第17章第402页。
- [13] 见本卷第14章边码第357、361页。
- [14] 见本卷第14章边码第359—366页。
- [15] 见本卷第16章边码第394页。
- [16] 见本卷第9章边码第219页和第12章边码第296页。
- [17] 见边码第33页。
- [18] 《科尔培尔书信、指令和备忘录汇编》，P. 克莱蒙编（巴黎1861年起陆续出版），第6卷，第266页。

第三章 科学活动

1648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实验。布莱兹·帕斯卡的内弟F. 佩里埃（替代按计划原要亲自进行实验的帕斯卡）带着一些玻璃管和一定数量的水银攀登奥弗涅的多姆山。他发现在登山时，每到一个停留地，气压计中的水银柱就下降了一些，及至到达山顶，水银柱只有23英寸高了。这次实验是对下列观点是否正确的直观验证，即气压计内的水银柱系由其外部气压维持：每当把气压计带到较高的大气层时，其水银柱就会下降，从而说明气压也下降了。这种现象本身在意大利早就有人发现；帕斯卡关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气压计内的水银柱就递减的论断并无多少创意；验证这一论断的实验也极其简单。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实验，又是在法国进行的，且得到广泛的宣传。这种情况可谓理应如此，这是时代特征之体现，因为这个时候正值法国科学几个具有巨大创新性的时期之一。科学方面的变革最早是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发生的；其时宗教狂热则使16世纪中期巴黎大有希望的科学复兴付诸东流，并把发展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太阳中心说的大辩论和引入实验研究法拖到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才实现。然而从这时起，如同巴黎在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等方面是欧洲的主宰一样，法国在科学方面也跃居主导地位，直到英国经验主义发起挑战时，才退到后面。

在思考17世纪法国的科学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笛卡儿，而且这样做一点也没有错。^[1]笛卡儿的著作及其影响在前一卷中业已加以讨论，但1648—1688年这一时期仍可恰如其分地被称作笛卡儿主义时代。笛卡儿逝世于1650年，亦即被其追随者奉为圣经的《哲学原理》一书出版6年之后，他所提供的科学的解释方式被引用和研究，那是下一个时代之事。笛卡儿祖国的同胞[笛卡儿在国外居住期间，一直通过不屈不挠的马兰·梅森神父（1588—1648年）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他入籍国荷兰的同胞最为热切地接受了这些解释方式并加以宣传。[有人认为就科学而言荷兰仿佛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种荒谬的看法却提供了多德雷赫特学校校长伊萨克·比克曼（1588—1637年）为什么能对青年笛卡儿的才智产生影响的理由。]可是如果说笛卡儿在

法国占有新的居支配地位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肯定不是唯一的。梅森等人同样促使法国科学家注意伽利略的发现；培根和哈维的著作都曾为法国科学家读过；还有新出现的化学哲学家这一流派也非常活跃。伽桑狄复兴卢克莱修的原子论与笛卡儿的坚持机构论原则，这两项壮举几乎发生于同时，而在数学领域，笛卡儿也有罗贝瓦尔、德扎尔格和弗马等才智出众的竞争对手。到17世纪中叶，法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也颇为坚实，梅森同外省的通信表明，法国科学力量已不局限于首都这个中心了。

相比之下，牛顿、波义耳、雷恩、雷和霍克少年时，英国由于宗教和政治争论而四分五裂，也就不能自夸在知识领域有什么建树。培根提出的宏伟计划仍然没有落实。年老的哈维已放弃了科学，一心一意侍奉国王，尽管他早年的研究成果在《论动物的生殖》（1651年）一书中得以保留下来。在伦敦，格雷欣学院几乎已是暮气沉沉，而几所古老的大学则由于内战和宗教清洗而无法专心致志。只有从两件事所表露的大胆精神间或可以预告未来的英国皇家学会在科学上的卓越地位：一是1645年前后创立的伦敦一家哲学俱乐部的活动；二是克伦威尔后来对诸如约翰·威尔金斯和约翰·沃利斯等人的庇护。还有笛卡儿的影响也强烈地影响着英国，这一点同样可以证明此时在英国存在着一种激荡人心的科学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士和外交家威廉·鲍斯韦尔爵士都与笛卡儿保持着通信联系；剑桥大学的亨利·莫尔则在一些重要的论点上对笛卡儿提出异议。数年后，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开始抱怨他们的大学忽视现代思想，因为这里没有像牛津大学那样开设笛卡儿哲学的课程。尽管如此，皇家学会创立伊始的一些年轻会员，如牛顿和霍克，都是在这两所大学中受到笛卡儿思想的哺育才成为坚决的机械论哲学家的。

在意大利，伽利略的朋友和学生没有几个活得比他长；1642年他的去世（牛顿生于这一年），标志着意大利对现代科学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每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或哲学家都不再理所当然地服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或怀疑哥白尼的假设的合理性。在意大利，伽利略本人曾经预言教士态度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现在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不乏天才的科学家，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没有争论的问题。意大利天文学家焦万巴蒂斯塔·里乔利为旧世界观作了最后一次精彩的辩护（《新

天文观测集》，1651年）——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但绝不是荒谬的著作——却没有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为新的观测和理论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如人们所料想的，意大利最为活跃的科学中心是佛罗伦萨。伽利略的关门弟子之一，佛罗伦萨的维琴佐·维维亚尼（1621—1703年），努力使其老师的名声永垂青史。他是试验科学院的主要人物，该科学社团得到梅迪契家族的庇护，并得到他们的资助，1657—1667年在佛罗伦萨非常活跃。这是一个人数不多、入会条件非常严格的社团，并能获得一些很好的仪器；但当梅迪契公爵的兴趣下降时，该社团便瓦解了。正如该社团的名称所表明的，其任务多半是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实验，但他们试验并无任何计划。许多伽利略曾建议但未实际进行的有关物体运动的试验终于在该院进行，不过并不总是取得成功。此外，托里切利的真空理论为试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主题，而波义耳在1660年所描述的一些试验也在该院再次得到了验证。为了院内人员进行冷热试验，制造了优美的温度计；受热膨胀、水的不可压缩性、黑色火药的威力以及毛细管的吸附力都得到检验。记载该院活动的《自然试验记事》（1667年）饶有兴味地描述了当时在进行科学试验时所遵循的固定套路。它提供了许多新资料，特别是记载了在进行和解释试验时所遇到的困难；证实了许多早已存在的看法；不过除了验证“大自然是否摒弃真空”这一问题外，并没有解决任何重要的问题。皇家学会创立初期所进行的许多试验也属于这种类型：试验结果多半难以理解且无法得出结论。

《自然试验记事》全是一些纯粹是试验报告的颇受注目的例子，就其记载对象而言，它不同于科学革命第一阶段的任何著述，就像试验科学院是第一个纯粹为了同仁合作进行试验而成立的社团一样。在古老的科学社团中，林琴科学院最为著名（伽利略曾以自己是其一员而感到骄傲），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互助会；从未定期聚会，而其成员也从不进行共同的活动。17世纪下半叶一些规模大得多的科学社团在宗旨上全都或多或少是更为法兰西斯·培根式的，在德意志，人们对科学的兴趣直到这个世纪末，实际上仍然仅限于各城市科学俱乐部的活动；当然，也有数学家和哲学家在大学里从事科学活动，但在莱布尼茨^[2]（1646—1716年）脱颖而出之前，也就是说，直到本时期结束前几年，并没有出现过杰出的人物。德意志的社团有些仅仅致力于医学研究；另一些则专心致志地通过试验（以一种相当陈旧的方式）揭示自然的“奥秘”，即研究仍被看作是神秘或自相矛盾的物理现

象。他们所发表的一两本书，如卡斯帕·肖特的《大自然和七艺的魔力》（1657—1659年版）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

在法国，除了皇家科学研究会外，还有各地的科学俱乐部；而英国则是皇家学会一统天下。英国皇家学会的奠基人念念不忘培根的计划，尽管他们从未享有实施计划所必需的财政资助。皇家学会将培根曾经赞同的关于工艺方法的记述汇编成书；将调查表发到海内外征求意见；为旅行者提供建议；制定应从事的试验一览表。皇家学会的程序规定，任何的初次试验必须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上进行，而任何假设和原理如无合适的试验可加以证实，都不得提出来讨论。学会还规定，会员所报告的试验结果、解剖分析或自然奇珍，都必须在格雷欣学院当众展出。和《自然试验记事》一样，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也使读者感到迷惑不解；显然，会员们都希望进行试验和了解试验，但试验没有连续性，缺乏计划性和目的性，任何一次讨论题都同下一次讨论题，亦即任何一次聚会都同下一次聚会没有联系。有明显的迹象可以表明，为试验而试验的做法会妨碍有组织的贯彻始终的科学调查研究。最后会员们终于都不再试图进行任何重要的合作活动，以便从事各自的研究并仍不时报告其研究情况。

事实上，英国皇家学会从未制订详细的研究计划，也没有使自己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其起源可上溯至1648年前不久在格雷欣学院或其附近聚会的一群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所成立的一个非正式俱乐部，其中有些成员在克伦威尔时代移居牛津，鼓励那里的一些杰出的年轻人进行科学工作，并且先是于1660年组成一个正式社团，其后于1662年又成为皇家特许的社团，可它从未失去其宽松的性质。经常参加聚会的会员并非全是科学上的饱学之士或关心科学事务的专业人员。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皇家学会的业余性和盲从性——尽管这两种特点偶尔也会表现出来——那就会导致误解，因为一般来说学会的讨论是切合实际的，也是有根有据的，可它又是一个愿意对任何一时投其所好的论题加以关注的社团，任何严肃的演讲者在学会中都能一抒胸臆，并且学会基本上不受外界影响。就其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性质而言，英国皇家学会与法国科学研究会十分不同。法国科学研究会成立的时间稍迟于英国皇家学会，尽管在此以前很久，巴黎科学家就定期聚会。约从1648年开始在原子论哲学家伽桑狄（1592—1655年）的主持下和阿贝尔·德·蒙莫庇护下聚会的一班人，于1657年通过其研究

会的章程，并且大约就从此时起同英国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们进行了联系。正当法国科学研究会内部分歧重重之时，路易十四开始亲政，这就为在最高当局庇护下重组研究会提供了机会。经向科尔培尔吁请后，1665—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研究会形成。尽管存留至今的该会章程中最早为1699年制定的那一份，但是该会的成员人数是有限制的；他们均由国王任命，获得津贴，并被要求经常参加研究会的会议，一般来说，这些会议不对参观者开放。因此，像伊夫林和佩皮斯这样的名家都无缘造访。法国皇家科学研究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则不是），尽管它的成员是多半可以自由思考自己所选定的问题，但偶尔也要服从官方的要求。其中最著名的成员、荷兰籍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最终由于无法忍受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政策，只好断然辞职，离开巴黎。作为一种补偿，法国皇家科学研究会也享有一些英国皇家学会所没有的利便。国家出钱建造了一座很好的天文台供其使用，种种物理试验也在这座天文台进行。一些耗资巨大的活动，例如在法国测量子午线长度，派遣天文队到卡宴等，都是依靠国家的资助才得以进行的。[\[3\]](#)

这时的各种科学社团，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全国性社团，不仅给予科学上的才智之士以某国某地的荣誉，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共同进行试验的机会；同时，这些社团在国际上也具有重要地位。除惠更斯外，法国皇家科学研究会还有两名外国的天文学家，即意大利的卡西尼和丹麦的勒默；英国皇家学会选举外国会员，并同欧洲大陆和新英格兰保持广泛的联系。巴黎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经常在伦敦得到讨论，反之亦然。拉丁文和法文在学术界仍是通用的国际语言；例如，罗伯特·波义耳的英文著作在阿姆斯特丹用拉丁文重印，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后文简称《哲学学报》）也是如此。（法国皇家科学研究会直到1699年才出版正式的论文集。）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通过密切的私人通信网保持联系，早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即通过这种方式通报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论点。像《学者杂志》《哲学学报》（都创刊于1665年）和德意志的《博学学报》（1684年）等都使这种系统的书信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广泛流传。17世纪下半叶的一些最主要的著作，最早都发表在《哲学学报》上，意大利的马尔皮基和荷兰的列文虎克也以之为发表著述的园地。这种学术交流的发展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最重要的成就，尤其适合科学的需要。报纸、期刊甚至书

籍都比以前流传得快，而以前例如伽利略的研究报告到达法国和北欧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因此，有可能参与科学活动的人大大增加，新期刊的涌现是扩大科学活动基础的主要原因。

17世纪60—70年代科学活动和科学宣传的这种迅速扩展，主要表现为国王亲临学会和科学研究会，贵族参与学会和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就新旧方法和观点的优劣所展开的讨论，向农民、制造商和航海家所做的宣传，以及国际上著名科学家之间进行的激烈竞争等。这是充满希望的伟大时代（而在这之后，人们的活力和热情逐渐消退）。这部分是欧洲复原的一个方面，部分是法英两国在其他方面十分显著的民族自信心的表露；这更可以说是一种胜利在望的情绪之产物。在伽利略时代，人们仍然要同以往的压迫做斗争，备受保守批评的折磨。他们不能不满怀渴望祈求成功；他们的后人则由于意识到业已取得的成功而十分振作。他们只需继续做下去，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在业已证明是成功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世纪中期“新哲学”不再需要更牢靠的证据了。人们仍然希望地球的运动能得到证明；用望远镜观天的效果仍不完善；化学家和医生的种种推测仍遭到激烈的辩驳；血液的循环仍有待于证明和解释；力学的基本理论仍迫切需要准确的阐述。尤其是，机械论哲学中有关自然奥秘的新思想互相矛盾，并且不可靠。笛卡儿哲学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并加以验证，新科学观的核心是机械论哲学。在对重新描述自然界做出明显重要贡献的因素中，有许多还未越出观测性描述、纯数学理论或经验主义试验的范围。这类发现不管如何重要，其本身都不能像笛卡儿所谋求的那样，对自然现象提供更深层的解释，它们既不能阐明物质始终如一的特性，也不能阐明自然得以永恒活动所依赖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旧哲学更深奥的信条，如经院哲学家对形式和本质的区分，除非受到具有同样普遍性的理论结构的挑战，否则仍然神圣不可侵犯。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有关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用新的自然秩序观完全代替旧的自然秩序观；只有当这一任务取得巨大的成功时，人们才能证明它是否合理。

这种成功是由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赢得的，事实上这也是在反对笛卡儿主义（但不反对他曾谆谆教诲的科学态度）的情况下取得的。科学革命的这种成功概括了科学革命最

近所取得的许多进展，尽管这种成功并非直接依赖所有这些进展。因此，对其中的一些进展，必须首先加以描述。

伽利略为哥白尼的天文学所作的辩护极其有说服力，他驳倒了物理学上所有反对地球运动的意见，并提出新的观测证据反对托勒密的太阳静止体系，但也造成了几何学上的混乱。他的天体物理学过于简单，以至难以令人相信。笛卡儿的宇宙论解释了恒星、太阳、行星和地球的性质；陈述了引力的由来，解释了行星为何公转以及它们的轨道如何保持其稳定性；但与伽利略一样，笛卡儿也不太注意天文几何学的精确性。至于物理学理论也不能使数学天文学家感到满意。当时无人注意到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存在于开普勒所提出的定律之中，而行星理论（天文学家专心致志于此理论已有1500余年）也被忽视了；人们的注意力全被望远镜吸引住了。多年来，望远镜一直是一种很小的粗糙的仪器，它的使用者常常观测不到伽利略用他所喜爱的“眼镜”所观测到的东西。后来有了改进，即用凸型放大镜替代伽利略望远镜中的凹透镜，并提高磨镜技术。到1680年前后，40—50英尺长的望远镜已不新鲜，100—200英尺长的巨型望远镜也曾试制过。放大的水平已提高到足以解开土星变化无常的外观之奥秘^[4]，甚至足以观察到土星光环区。除了环绕土星运行的四颗著名的“梅迪契星”外，天文学家又发现了土星的五颗卫星。借助在望远镜视镜上增设的测距器，天文学家可以准确测量它们的运行轨道和运转周期。根据这种对土星诸卫星的观测，勒莫在1676年推断出，光束绕地球轨道一周的时间约为20秒。赫维留在但泽研究了彗星和月面学；弗拉姆斯蒂德在格林威治重新编绘恒星图，并观察月亮的运动。这种探测望远镜几乎还要经过1个世纪才能测及太阳系以外的范围，但到1687年人们已收集到足够而又准确的资料，使万有引力的理论可以根据行星、彗星和月亮的行为来加以证实。事实上，天文学让人浮想联翩；它所揭示的这些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是否像丰特纳尔在1686年所设想的那样也有人住呢？功效最大的望远镜能使肉眼深入银河和太空的深邃之外，却探测不出群星有何近似，也未使人产生遥远的太空有极限的印象：宇宙是否是无限的？经过1个世纪的观测活动，乔尔达诺·布鲁诺的想象已变为合理的科学推测。

观测天文学能否定或支持一个对其复杂但有清晰格局的现象所做的解释；此外，要做出一种解释还需要许多别的学问，尤其是适合的

数学分析。17世纪初，开普勒在力求确定行星轨道的真正形状时，尽量利用传统的几何学手段，然而以数学方式来表述一个有关行星运动的物理学理论，其所涉及的问题要艰难得多。笛卡儿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他曾断定行星是在一种以太涡流中环绕太阳运转的，不过他未从数学上检验这种运动的状况。（牛顿进行了这种检验并证实一种涡流不能使行星具有其已被测出的速度。）尽管如此，由于笛卡儿将代数学和几何学结合起来，为可用以驳斥其自身物理学的数学演算打下了基础。问题的实质是，用数学的方法处理物体的曲线运动这一问题，已大大接近于解决。^[5]希腊的几何学家解决了所有情况中最简单的一种，即圆周运动问题；17世纪末的数学家则能处理比较复杂的曲线——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在古代，人们也已熟悉这些）、摆线以及重曲线等——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既方便又普通。事实上，绝大多数数学家所关心的在纯数学领域的一些发展——导致微积分学产生的一些发展——其主要特征都因不断解决了力学上的问题而顿时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所解决的问题如：根据沿水平旋转的一个转盘上的一点找出其旋转曲线的特征；或两端悬起的一条完整的链条所呈现的曲线的特征。尽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被提出之时用数学方法来加以解决是颇为困难的，但所取得的计算结果却对物理学的价值不大；而当各种力对物体的作用得到研究时，由此所产生的类似问题才对物理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进的数学对力学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力学理论又对天体力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本时期的前半段，惠更斯的力学研究出类拔萃；尽管他在纯数学方面没有展示出最高的创新才能，但他的成就如同牛顿的一样，是任何缺乏杰出数学才能的人无法达到的。这些成就直到1673年才全部发表（《摆动的时钟》），却是很早即1657年就已开始研究的成果。惠更斯对摆动物体的动力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从中他意外地获得了重力加速度的准确数值），并进而发现了计算做圆周运动之物体的向心加速度的方法。他也研究了弹性和非弹性物体的冲击力，修正了笛卡儿所论述的各种错误原则。然而，惠更斯没有努力把他力学上的理论运用到天体运动中去；更为奇怪的是，天体运动提出的问题似乎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尽管他是一位热心的观测天象者，并花了大量精力来建造自用的天文望远镜。虽然他十分清楚笛卡儿在《哲学原理》一书中的许多错误以及笛卡儿的推理具有先验性，但他基本上仍是笛卡儿主义者，尤其是在宇宙论方面。他坚持这样的

看法，即地球的引力和行星的公转是由一种以太涡流引起的，因此牛顿所遵循的思路他是没有的。

与绝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惠更斯可能也没有觉察到开普勒定律的极端重要性。约在1645年，有些天文学家承认开普勒解决了行星运行的准确轨道这一古老的问题，尽管一般来说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是从哥白尼和伽利略反对托勒密和蒂科·布拉赫这个角度加以考察的；这一引起论战的问题使开普勒在数学方面所付出的复杂劳动被掩盖了。从1660年起，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观点才为人普遍接受，例如意大利的笛卡儿信徒阿方索·博雷利就是在1666年接受的。更为重要的是，大约在相同时候，牛顿通晓了开普勒的第三定律。与惠更斯一样，牛顿也计算了作圆周运动之物体的向心加速度（不是在1665年就是在1666年）；他把这一数据同开普勒的行星运行第三定律联系起来[\[6\]](#)，承认各行星的向心加速度是同其至太阳之平均距离的平方值成反比。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提出一个重大的具有变革性的概念。笛卡儿早已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有某种力量将行星推向太阳，各行星就会沿直线进入太空——事实上，正是笛卡儿最早正确阐述了惯性定律，而这正是惯性的结果。据此他解释了太阳周围的以太涡流如何（按他的想法）促使行星向心旋转，以致它永远只能围绕轨道旋转，而不会逸出。如今牛顿相信这种朝着太阳的向心力必定总是与至太阳之距离的平方值成反比的：他闯入全新的思想领域，提出这种朝着太阳的向心力就是称为地球表面引力的另一种力量。既然地球有这种引力，为什么体积要大得多的太阳以及其他行星就不会有这种引力呢？而且为什么这种引力不会从物体的近处无限地扩大到太空呢？经过简单运算，牛顿再次相信，如果地球对月亮有着一种吸引力，就像地球对靠近它表面的重物体具有的那种吸引力，只是其力量和地球与月亮之距离的平方值成反比，那么这种吸引力的大小就会是“十分接近”防止月亮通过自己的运动完全脱离地球所需的力度。（如果牛顿在1666年更正确地了解地球的大小，那么他所提出的意见就几乎是完善的了。）如果所有这些推测都是正确的，笛卡儿所提出的以太涡流就会对解释行星运动的原因毫无作用了。

在1666年，牛顿对这些推测是否正确并没有把握；因为他有关月球运动的试验似乎表明有点不一致。当时还没有其他现成的手段可用

来修正这些推测。他缺乏详尽的天文实际资料；更为严重的是，他那初步的颇为粗疏的研究是建立在圆周运动这一不精确的假设之上的，而他从开普勒那里得知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又从英国天文学家霍罗克斯那里得知月球的运动轨道也是椭圆形的。用动力学分析这些实际运动，在数学上有巨大的困难。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再次将牛顿的研究同其前辈笛卡儿的研究联系起来。因为牛顿无疑是一位机械论哲学家；他无疑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由粒子构成的，物质的每一个特性或特质可以根据其粒子做出解释，引力也不例外。如果由无数粒子构成的凝聚体具有引力，那么构成这种凝聚体的每一个粒子肯定也具有引力。而要说明庞大物体的引力特性如何从粒子的引力中产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由于这些原因，牛顿闭口不向别人谈自己关于天体力学的思想达20年。他不对任何人提起他自知无法证明的一个假定，看来他甚至低估了这个假定的重要性。实际上，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更深入地探究力学，尤其是在向心力作用下运动的物体的力学（这一点他后来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篇中做到的），并进一步表明这些力学原则适用于天体运动（这一点他后来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三篇中做到的）；第二个任务是理顺引力确切的来龙去脉，认清它是与物体最终的粒子结构因而也与物体的总质量相联系的基本自然力之一。说得明白一点，这样做可以对引力做出解释。如果牛顿做到这一点，他的研究就完全可以同笛卡儿等量齐观，尽管在数学和力学方面牛顿要高明得多；不过，牛顿从未称心如意地完成第二个任务，因此只好把物体的万有引力（他表述了万有引力的作用定律）视为事实上存在的某种事物，尽管其由来无法加以说明。遵循这一方针，牛顿在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删去了他原已写好的大胆地把引力作为一项力学原则加以申述的一个结论。^[7]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作为机械论哲学家的地位仍然昭然若揭，不过这一点不是通过做出引力起因的推测这一形式显示出来的。人们很难不相信这是牛顿万不得已才采取的一种方针，也很难不相信他没有想过要像笛卡儿那样完整地用力学来解释引力，而且看来他很可能在这20余年中一直在寻求如何做出这样的解释。

牛顿关于用力学解释引力之起因的种种思想，说明他对笛卡儿所提出的原理之反应是复杂的，这在当时英国其他科学家的推理中也很

明显。这些科学家接受了笛卡儿提出的一些基本前提并发现其非常有用。这些前提有：物质由粒子构成；自然界的所有现象都是由粒子的相互运动产生的；这些运动与动力学定律相符。他们甚至相信有作为中介的以太，其粒子比那些普通物质的粒子要微小得多，分布也宽松得多，而且可能具有不同于普通物质粒子的特性。（牛顿本人在其较为思辨的看法中就是以这种以太为出发点的。）他们像笛卡儿本人一样，相信宇宙的机械结构：在一个毫无中断的连锁过程中总可由结果追溯出原因，直到在物质和以太的结构与特性中找出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他的创世并不是机械的，而是像生物学家尼赫迈亚·格鲁所写的（使用一个不断重复的明喻）：

宗教和圣经教导我们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而哲学则教导我们万物是由大自然创造的，对此[我们不必认为]有什么矛盾之处；这只不过是说：认为表的摆轮是由下一个齿轮的推进而转动的看法就是要否认那个齿轮以及其余的齿轮都是由发条推动的；也就是要否认发条和所有其他部件之所以能一起动起来是由于其制造者的作用。因此，尽管应该假定有上千个原因在起作用，但上帝可能是造成这种结果的真正原因：因为整个大自然是上帝亲手制造和掌握的一架大机器。[\[8\]](#)

这些就是17世纪末所有科学家都抱有的主要思想。在他们毫不严密的思想框架中，或多或少偏离笛卡儿本人所设想的对特定现象的解释是十分可能的，也就是否定笛卡儿的以太涡流和笛卡儿关于光的概念等，但他们仍然是机械论哲学家，坚信笛卡儿科学的基本信条，甚至可能比笛卡儿及其一些追随者更坚定。因此，某人赞成机械论的解释，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如伽桑狄）对希腊的原子论或结构严密的笛卡儿体系完全满意。

最早将这一点表述得十分清楚的是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波义耳信奉机械论哲学，这是从未有人怀疑过的；他常常公开赞扬机械论哲学，把用机械论解释现象视作科学革命的核心，经常通过试验来表明机械论哲学的正确。然而波义耳自称在其早年的科学家生涯中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不受种种体系之武断的摆布，一直避免读笛卡儿和伽桑狄的著作。（人们也许会奇怪，既然如此，他又是如何通过学习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呢？）在其第一部重要科学著作（《关于空气的来源及其影响的新的物理力学试验》，1660年版）中，波义耳在计划、实施和解释物理的或化学的试验方面都显示了行将对此后30年的科学具有启发作用的独创性；他对笛卡儿假设的或武

断的概念也表示怀疑。他难以确定笛卡儿用广延性来解说物质是否正确；他难以接受笛卡儿对真空的否定。他的试验并未使他完全否定笛卡儿的种种假设；但他要求必须提出试验来证实这些假设。然而他本人也看不出，除了以空气的粒子构成为根据的力学假设，还有什么能解释空气的伸缩性。

波义耳后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书名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学说的倾向：《形式与特性的起源》（1666年）、《机械论哲学的优点与根据》（1674年）、《挥发性的力学原因》（1675年）、《电的力学结果》（1675年）、《热与冷的力学原因》（1675年），以及其他许多就科学各个方面说明用力学进行解说之优点的著作。特别使波义耳感兴趣的是化学。早在前一个世代，范·海尔蒙特就试图建立化学哲学，但波义耳却是第一个借用他的自然哲学，即机械论或粒子哲学的思想，并以之解释化学现象的人。他宣称他的目的是检验一下“借助粒子哲学……加上化学实验，我是否能比学术界或化学家所惯于分析的更明白地解释一些特殊的问题”^[9]。波义耳的化学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物理学理论：他是通过研究试剂的物理结构及其粒子运动来解释化学反应的。他既不使用也不发明专门的化学概念（例如，他否定化学元素的概念），除非这些概念对描述他所使用的物质和他所进行的试验必不可少。

在这方面，波义耳与他自己那代和他以前的几代化学家十分不同。首先，他之所以对化学现象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将之视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的证据——尽管他确实也由于这些化学现象本身而变得对它们十分感兴趣；不过他并不把化学看作是一种基本技艺或技巧。那些稍早于他的敢于阐发一种理论的化学作家，诸如帕拉切尔苏斯和稍微收敛的范·海尔蒙特，曾做出一些故弄玄虚和深不可测的解释，这些解释部分源自炼金术，但与理性哲学几无关联。相应的，哲学家也不重视这些解释。其他不为创设理论狂热所迷惑而像一般人那样著述的化学家，则把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纯粹看作是溶解、过滤、沉淀、纯化和晶化等技术的综合体，只要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特定的物质，即可获得特定的产品。这些化学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化学是制备有效药物的一种技艺，亦即他们以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方式加以看待的一种功能。对化学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那些对冶金、染色、玻璃制造以及其他工业所涉及的科学方方面面感兴趣的化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

有关这些工业的科学取得了显著的经验主义进步。不过情况依然是，在波义耳强调化学技巧的重要性之前，像笛卡儿那样的自然哲学家几乎对之未加注意。波义耳从事研究之日，正是对化学变化（如燃烧，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还是帕拉切尔苏斯的）的解释已开始变得苍白无力，而对化学的可操作部分正以完备和合理的方式加以描述之时，因此，他既能表明这种被人忽视的实验形式可以提供有关物质属性的极其有价值的资料，又能表明有一种合适的物质理论就可以解释化学家业已知悉的所有事实。别的化学家没有哪一个看得有他这么透彻。事实上，波义耳正在试图将早已在物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目标，即用微粒子的结构及其特性来解释一切事物，扩展到凭经验属于化学的领域。这就可以使化学严格地等同于甚至依赖于物理学；而波义耳的应用于化学的机械论哲学所产生之影响，又解释了牛顿为何如此注意化学试验以及用粒子的结构和力量对这些试验所做的解释。

不难判断，这种用物理学理论解释化学事实的尝试是不成熟的。尽管粒子假设能解释许多单项试验，例如关于在酸中溶解金属以及盐的生成的试验，尽管这种解释能提供有利于深入了解化学反应一般性质的洞察力，但波义耳和牛顿都未能成功地构筑以试验所得事实为坚实基础的完善的理论。他们所做的假设彼此关联并不密切，从未串联成像物理学理论那样的理论。不过，这种欲使化学成为一种理性的和合乎机械论之科学的最早尝试绝不能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从此以后，化学被当作自然哲学一个专门的分支，而且很快就不再像其发展初期那样被认为充满异常现象了。再者，像波义耳这样的富于哲理性的化学家都能证明他们在科学操作方面并不比他们以经验为根据的同行逊色，因而做了不少工作使化学试验脱离作坊和厨房的环境。

在当时及其后，燃烧这一特殊问题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燃烧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发酵，与其他发酵（和腐烂）一样，也是由于使粒子猛烈活动而产生热。燃烧还能同某些化学反应中由于相似的活动所产生的热相比拟。然而，燃烧同热光和火焰有特别的联系，而且与其他产生热的过程不同，一般的燃烧只有当空气存在时才会发生。有些明显发冷的物体——如磷光物体——也会发光，这一事实又增添了复杂性。英国的机械论哲学家（霍克、梅奥、波义耳和牛顿）在这个问题上都曾提出过说法，不过这个问题既不是由他们的粒子假设加以解决的，也不是在17世纪得到解决的。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

同热纯粹是一种运动的思想却是一致的（而18世纪的化学家则不得不把热描述为一种难以捉摸的液体）。他们认为燃烧是由于所有可燃物质中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硫黄”粒子，并进一步认为热活动是这种“硫黄”粒子同另一种粒子，即在空气和其他物质尤其是硝石中存在的“亚硝”型粒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就这样，燃烧和产生火焰的现象是借助于被假定在其他化学反应中起作用的某种机械过程来加以解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光本身的出现也是用机械论来说明的。

光及其规律、光的传导以及色的形成，对科学一直是种挑战，在应付这种挑战方面，中世纪较古代成功。几何光学——通过反射和折射探讨呈直线的光线——早已达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但有关光的起源和性质的思想却仍然很不成熟。因为几何光学并不解释光是什么、光何以能产生色感以及光为什么会被液体和固体反射和折射等问题。解释光的这些特性的物理学理论实际上始于17世纪下半叶，是以笛卡儿的推测为基础的。笛卡儿在几何光学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工作；他在关于光的理论中，把光解释为光源放射出的物质以太的压力；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光感是这种压力对视神经发生作用的结果。他的后继者则在光学上分成两派，各自继承了他的一部分理论。持发射论的一派，把光看作是发端于四面八方的一股粒子流。持脉冲论（此论颇与声的传导说相似）的一派，则把光源视作在以太中所形成的一种由其中心向外传播的跳动或振动运动。和笛卡儿的想法一样，这两种想法都是机械论的；两者都涉及粒子运动，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可能从实证上将它们区分开来。

牛顿是发射论最强有力和最多产的支持者，尽管他最终承认，不能将光线和粒子流作简单类比。他认为，脉冲论不能解释光的直线传导。他在光学上的一些发现，亦即在1672年的《哲学学报》上所描述的，都因他被认为坚持发射论而难以为他人接受。面对人们对他的批评，牛顿论辩说，他的这些发现都是实验所得的事实，或者说都是从这些完全与假设无关的事实中必然会得出的推论。他根据巧妙而准确的试验做出推想：白光并非像人们所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单一和均一的，而是由各种颜色成分混合而成，如能恰当地将这些成分彼此区分开来——如采取让白光通过玻璃柱的办法——就可证明这些成分才是真正单一和均一的；因此，色并不是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白光的变更引起的。再者，每一种有色的成分都有恒定的折射潜能；不

管折射角度的大小如何，蓝色光线的弯曲度总是比红色光线的弯曲度大。分离后的各成分能使之重新聚合在一起产生与未分离前的白光相同的光，但如缺少其中的某一种成分，就不能形成普通的白光。

1665年，霍克和格里马尔迪两人分别最先描述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干扰”的现象和衍射光波，是年，牛顿刚开始进行其光学试验。与霍克和格里马尔迪一样，牛顿发现，除了折射外，其他办法也能使白光产生颜色。他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研究都是很深入的，但他用以解释有色成分分离的机械论假设却不太成功，也无法验证。他最大的成就是，认为当白光照射到某一物体上时，光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有色成分能比其余成分得到更强的反射，这是由于物体表面粒子的性质所致。例如，如果绿色反照强烈，其他颜色反照比较弱，被反照物体就呈绿色，这与通过透明物质的透射是相似的。^[10]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表明了照射在物体表面的粒子流如何能弯曲过来以致再度显现，就是说如何能被反射，同时指出其角度遵循着正确的光学法则。他总是认为，折射、干扰和衍射都是物体内部或其附近的一种力对光束发生作用并使之弯曲的结果。^[11]色的出现是因为这种力对光束的某些成分有着较之对其余成分较强的作用，因而使它们产生差异。

牛顿在出版物中总是（或几乎总是）注意把从实验中直接获得的有关光的结论和还未得到论证的有关光的解释性假设区分开来。他的研究具有持久科学价值的地方在于前者，尽管他的假设有着长达1个世纪的影响。在这些假设中，他之一贯使用粒子结构的概念以及物体粒子和光粒子互相吸引的概念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像在万有引力理论中一样，物理学再次基本上被简化成粒子力学。由于脉冲论的提倡者也使用类似的结构概念（尽管他们不同意牛顿关于在粒子内部具有引力和斥力的看法），他们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要把以太的振动活动同反射和折射物体的粒子结构联系起来不太容易。霍克在《显微术》（1565年）中用来说明色是如何由于构成白光的脉冲受到扰乱而产生的那一单纯假设，被牛顿在1672年发表的文章证明是不成立的。惠更斯准确地为脉冲论创立了反射和折射的几何学（《论光》，1690年），但他没有试图解释色的形成。尽管后来的理论家是以惠更斯的分析为依据的，但在当时的机械论哲学家看来，牛顿的假设更易于接受，更能说明问题。这些假设之所以看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满足

了当时对物理学的理论或假说该起什么作用的期望。这些期望既在视野上过于短浅又在要求上过于热切，以致限制了这个时代科学思想发展的范围。

17世纪下半叶的科学著作只有一小部分讨论基本理论和基本假定。物理科学多半不是从数学上就是从实验上加以探讨的；虽然波义耳就其明确地和详细地为机械论哲学进行辩护而言可算是个例外，但即便是他的著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致力于考察自己的试验的。其他物理学家（如惠更斯、牛顿和马略特）所发表的著作，也主要是关于试验的报告或以数学的方式阐述自己的主张。另外，笛卡儿自然哲学的解释者（与在对自己有用时才采用笛卡儿思想的数学家和实验家不同）则几乎不用数学论证，而且进行实验也仅仅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学说。由于人们偏向亚里士多德哲学，且对机械论颇有憎厌之情，笛卡儿的科学原则在起初受过抵制，而后才成为一种时尚。这些原则由耶稣会教士广为传授，其中之一名雅克·罗奥尔特的写了著名的有关笛卡儿派科学的教科书（《物理学》，1671年），此书直到下个世纪仍有很长一段时间备受欢迎。罗奥尔特对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没有添入什么理论的东西，只是加进了一点实验的结果，似乎却把笛卡儿的物理学和宇宙论解说得十分有理，而且其口吻比笛卡儿更为肯定。笛卡儿的物理学自成体系，其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的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在把它作为体系进行教授时，必须要强调他用粒子力学普遍解释现象的方式。而且作为一种体系，笛卡儿的物理学之目的是要解释整个宇宙，而不是详尽地描述或分析特定的现象（如笛卡儿本人在其他著作中曾做过的那样）。然而，即使将这类著作以及那些不能算作笛卡儿机械论的解说者，但明显赞同其机械论的作者所写的著作除外，机械论哲学在物理学家中无疑仍占统治地位。正如霍克在谈到其英国皇家学会的同事时所说的，“他们认为有理由可以做出猜想，那些通常被认为由（经院哲学所说的）特性以及公认的超自然因素所引起的物体作用，都是由大自然的一些小机械引起的”。这些“小机械”，亦即物体的复杂结构，就是粒子结构。虽然在基本思想及其运用上取得了共识，也有着大量共同的语言、类推以及对机械论哲学真理的基本阐述，但各科学家（自诩为笛卡儿主义者的仍需除外）在处理特定现象——光学、化学反应、气体力学、燃烧、磁学时，又不尽相同。因此，机械论的解释不是千篇一律或确定的。

牛顿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构成物体的粒子之间有着各种引力和斥力在起作用（他未规定其性质和数量）。若干年后他曾这样问道：“物体的小粒子是否有着它们在远处能借以不仅对光束而且在彼此之间也发生作用的某种动能、特性和力量，才使自然界的绝大部分现象得以产生的呢？”这一广泛的假设在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时绝未引起注意。另外，地心“引力”概念本身就足以使严格的机械论者尤其是笛卡儿主义者烦扰不安。那种认为物质的粒子和总体该是相互吸引而不是被一种以太物质的压力推到一起的看法，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已被推翻的超自然力量说法的复活。（牛顿后来曾小心地坚持说他在提到“引力”和“斥力”时，并不想否定这些力有可能是由仍不清楚的机械冲力造成的。）牛顿对粒子机械论的看法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即已基本成形，尽管其思想几乎无人知道。他的粒子机械论比以前的任何粒子机械论都更缜密，更有影响；但是早期机械论哲学原有的那种弹子球撞击似的简单明了却没有了。不过，我们必须把笛卡儿学说信奉者和牛顿学说信奉者之间的争执暂且搁下不提。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一部将机械论哲学和物质的粒子结构都作为无须论证的普遍假设加以探究的书籍，它为机械论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牛顿的宇宙观较之笛卡儿的宇宙观，丝毫不差地也是机械论的。但是笛卡儿所谱写的是“一部物理学的美的传奇”（惠更斯语），其机制是想象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宇宙观则在数学上和观测上都是无懈可击的^[12]；牛顿用可以论证的理论替代笛卡儿假设的机械世界。木星和土星的卫星、行星的公转、月亮和潮汐的运动、钟摆的摆动、重物的下落、液体的流动以及回声本身都能证明牛顿理论的正确性。而且正如牛顿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的，适用于整体的真理也适用于局部：我们只能用从我们确信微粒这个无形世界是机械的看法精确地推断出支配可见现象的定律，恰如我们是通过唯一可以办到的对肉眼可见物体的实验来证实我们对微粒世界的看法。牛顿在论述“力”的概念时（例如在论述支配粒子运动之力时）比笛卡儿走得更远，并为19世纪和20世纪“场”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微观世界和肉眼可见世界这两个层面上都同样有着不同的力在起作用：其中有三种力（引力、磁力和电力）是可以直接论证的；另一些力，例如物体借以对光产生作用的力以及与化学反应有关的力，能从实验中推断出来；还有一些力，例如使物体坚硬的凝固

力，看起来是势所必然的，却较不易由实验加以证实。上述所有这些力既能解释一个由在空间分布得极为稀疏的粒子组成的世界为何是稳定和坚固的，又能说明这样的世界为何能运动、变化、发展和衰落。在所有这些力中，牛顿只熟悉一种力即引力；只有引力在一种数学体系的范围内能加以理解，其定律和作用也能百无一失地通过观测和实验来证实。牛顿的粒子和力的宇宙是机械论的宇宙，而且他展示了引力的机械结构。这是机械论哲学的胜利，但同牛顿的愿望相比，这种胜利也许是“一场卓越实验的微不足道的结果”。正如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前言中所写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根据力学原理得出的推理而推知其他自然现象[就像他曾知引力现象那样]，因为有很多理由促使我猜想，这些自然现象全都可能依赖于某些力，由于这些力，物体粒子以迄今尚不清楚的原因或者被彼此驱赶到一起，并凝聚成固定的形状，或者互相排斥和退缩。

牛顿的著作有许多段落表明，与其他机械论哲学和笛卡儿哲学的信奉者一样，牛顿也认为，随着对粒子结构解释的日益复杂，错综复杂的粒子结构不仅适于了解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而且也适于了解生物过程。上面引用的尼赫迈亚·格鲁的一段话^[13]表明，一个博物学家的要求同物理宇宙者对宇宙的描述没有什么不相容之处。直觉和肌肉的控制、营养与生长、呼吸与心脏的跳动、生命的这些和那些特性都可以用机械论的原则来解释，尽管哲学家们在这样做时保持笛卡儿将心灵和肉体分开的思想^[14]。例如，帕拉切尔苏斯和范·海尔蒙特很早以前就强调生物体内的生理过程和生物体外的化学过程的相似；现在既然化学能用机械理论来解释，那么这种理论可扩大到生理学上去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实验的进步对此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波义耳的气泵试验以及其他有关实验使人想到，呼吸与燃烧十分相似，恰与古老的生命似火的比喻符合。动物与火都需要空气——或者说，像后来所证明的，需要空气的某些成分，一旦大气层为其他东西所污损，动物与火都不能幸存。再者，一头因故不能正常呼吸的动物，如通过风箱向其肺部注入新鲜空气，则仍能成活。这与解剖学认为肺的功能是使人体全身血液逐渐接触到新鲜空气是一致的；而且明确的结论已由劳尔的论证得出，即静脉血（进入肺部的血）和动脉血（流出肺部的血）外观上的不同是由静脉血接触到的空气所致，这种现象能在体外复制。因此，有人坚持认为，空气中存在的一些物质（当然是一些通称为“亚硝”的粒子）进入血液，为生命所必需，就

像这也是为火所必需的一样。这些粒子纯粹是假设的实体，一般来说，它们在改变血液的外观或一般的生理方面说不上有什么貌似有理的作用，但由于使用机械论哲学的方法，新理论使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具有全新的意义，就像马尔皮基对血液从动脉通过毛细血管流到静脉的实际观察从解剖学角度为它提供了确证一样。血液不仅可以看出是流动的，而且血液先是通过肺然后流向全身的运动有何作用得到了一种解释。

有关呼吸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卓有成效地将物理学的思想移植到生物学中去的例子，这在17世纪是不可多得的。这种移植乃是英国医生约翰·梅奥在1668年和1674年出版的著作之核心，他详述了波义耳、霍克和劳尔的基础工作。梅奥尝试充分揭示“亚硝一动脉”粒子的生理学功能，也把它视作了解各种物理和化学现象的工具；在这方面，这种移植的危险性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它模糊了相对简单的物理作用与远为复杂的生物作用之间的差别。化学家们倾向于把有关的有机体活动——例如植物或血液的净化——看作与一个简单的无机体过程完全一样，这是化学理论与实践长期存在的弱点。更糟糕的是，化学家们甚至认为植物像晶体一样“生长”，或认为动物可以说成是一个由轮子和牵线操纵的木偶。原理是说得通的，但劳尔有一段话（1669年）——“如果你要问我空气中的亚硝精通过肺脏到达血液使其颜色变得更深的途径，那么反过来你能否告诉我，存在于雪中的另一种亚硝精所借以进入品尝家的饮料并使其夏季饮料变冷的微孔呢……”——却令人读后就会意识到这种行将移植的“幼芽”之脆弱以及哲学家对有关环境变化之认识的模糊。从理性上说，这种情况与有些实验者（包括劳尔）在试图将动物的血移植到人体内这种事实所存在的情况并无二致：如果实验搞得越好，那么结果就越会是不幸的。

对其他生物学问题的研究——人和动物对食物的摄取和消化，植物在土壤和水中的生长，直觉尤其是视觉的形式，哺乳动物胎儿的发育方式等问题——不是尝试将物理学的新技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是谋求根据物理学的思想进一步弄清已知的一切。这两种努力都不很成功，尽管人们或许会提出，像尼赫迈亚·格鲁所做的努力使得未来很有希望通过化学分析决定植物的成分。生物学领域的活动分为三大类，且规模要大得多，其取向主要是列举和描述事实，而不是了解功能与生长。

首先要说的是，绝大部分医学界人士一直对人和其他物种的结构感兴趣。广而言之，到17世纪中叶，一般人体局部解剖学业已相当发展，除了随后要提到的显微镜观察外，这个时候的侧重点是比较解剖学，或者像法布里齐乌斯和卡塞利亚很早以前就已开始的对特定器官或结构进行比较的专门和详尽的检验。以下一些学者积累了大量的动物学知识，他们是主要解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克劳德·佩罗（1613—1688年）和法国科学研究会其他成员；在3本书中描述了100多个物种的杰腊德·布莱西斯（1625—1692年）以及阿姆斯特丹一些与他保持联系的学者；自然博物馆的成员，尤其是苏黎世的约翰内斯·冯·穆拉尔特（1645—1733年）；英国的约翰·威利斯（1621—1675年，主要解剖牡蛎、大螯虾和蚯蚓）和爱德华·泰森（1651—1708年）。泰森是英国第一个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动物解剖学家，他（还有别的人）解剖了美洲的三个物种：响尾蛇、西猯和负鼠。他有关“小矮人”（黑猩猩）的著作指出，“小矮人”即使不是人，那也不是猴子。这时的技术发展迅速。杨·斯瓦姆默丹首先采用将蜡和水银注入标本的有效方法；解剖博物馆纷纷出现，当然例证是有什么就用什么的。有些动物学家，如斯瓦姆默丹（还有英国的霍克、劳尔和雷恩）从解剖转向实验；因此用机械刺激青蛙的神经就可使青蛙肌肉挛缩的现象，引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有着一个解剖者的丰富经验的笛卡儿，就曾试图用稀薄液体的流动来解释从外部感觉器官到大脑的感觉传送以及从大脑到肌肉的“信号”传递；而阿方索·博雷利在《动物的运动》（1680—1681年）中更是试图将纯机械论方法推进一步。然而斯瓦姆默丹早已证实，肌肉在收缩时，其体积并未增加；他认为，不如说其体积有所减少。

所有这些有关动物学的研究大大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并澄清了遗留的问题，尽管动物学家们不顾摆在眼前的解剖证据，仍拒绝将海豚和其他鲸目动物归于动物类而将之归入鱼类。例如，鱼的鳔已经了解清楚，昆虫的眼也是如此，对各种哺乳动物、两栖纲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循环和生死机制已有可能进行了解和比较，尽管仍有许多空白，也犯了不少错误。某些简单的概括已可勾画出，例如某一动物胃的类型和肠的长度与其通常的食物有关。1668年，弗兰西斯科·雷迪（实验科学院的成员）为驳倒传统的动物学谬见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甚至伟大的哈维在这一点上也自相矛盾），许多动物——青蛙、蜜蜂、“北极鹅”、昆虫，尤其是寄生虫

——都是自发地从脏物和腐物中滋生出来的。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经过简单的观察和实验（让肉在细布下腐烂，从而使苍蝇无法接近它）以及解剖，雷迪证明，上述那些被推测是自发产生的动物，都是通过正常的方法繁殖的。只是被苍蝇叮过后，腐烂之物才产生蛆，蛆又变成蛹，同种的苍蝇就是由蛹孵化出来的。他直率地断言（17世纪后期的绝大部分博物学家也赞同这一断言，尽管后来争论又以新的形式恢复），所有植物和动物只能由同种亲本产生的种子和卵繁衍出来。由于接下来的推论必然是物种的繁衍之所以能维持并非出于偶而是依靠遗传，因此雷迪就有效地为下列永无改变的物种遗传概念之得到公认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该概念就是同类总是由同类遗传而来且无重大变异。

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也为上述遗传概念提供了其他佐证，这就是依赖显微镜的第二种类型的生物描述。它所提出的思想看来要确立物种的不变性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之事。经过斯泰吕蒂的开创性观察（1618年）之后，显微镜到1660年前后已成为生物学家不可或缺的工具，马尔塞洛·马尔皮基、罗伯特·霍克、杨·斯瓦姆默丹和亨利·鲍尔几乎同时都在使用。马尔皮基和霍克所使用的是复式显微镜，这种显微镜在光学上和机械上都是较为煞费苦心的，但笨重、不稳定，而且有效的放大率只有60—80倍。制作真正有效、大功率的显微镜的技术问题要到1830年前后才得以解决。与后来的列文虎克一样，杨·斯瓦姆默丹也使用简单的双凸透镜，这种显微镜易于操作，也能放大60—80倍。列文虎克是制造专供自己使用的小透镜的能手——他为自己制作过400余架显微镜，因为他将之逐一用于不同的目的，并达到放大300倍，足以令他观察到某些细菌。即使是马尔皮基（1628—1694年）和杨·斯瓦姆默丹（1637—1680年）的功率较差的显微镜也实际上足以令生物学产生新的分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马尔皮基是动植物组织学的奠基人；而马尔皮基和杨·斯瓦姆默丹则分别研究了蚕和蜉蝣由生到死的全过程，从而共同创立了昆虫形态学。马尔皮基对小鸡心脏发育过程的描述，现已被说成“或许是17世纪所有生物学家中最惊人的观察成就”^[15]，而杨·斯瓦姆默丹则无疑就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昆虫学家。两人对生殖提出了相同的看法：马尔皮基所依据的是其对小鸡结构的追溯，而杨·斯瓦姆默丹所依据的则是其发现，即在昆虫的某一发育阶段，幼体形态、蛹形态和成虫形态可以是此藏于彼地共存的；他们得出结论，胚胎预先就存在于卵中。其结构并未

成形，也未发生作为受精结果和发育期间呈现的变化；它只不过是扩大和逐渐明显。根据这种理论，物种变异是不可能的，因为母本无须依赖父本和其他任何环境就预先产生了其后代；事实上，在后来的有些变动的胚胎预存说中，所有的卵都被认为是在创世时产生的，都像囊包似的藏于彼地，直到每一个相继的成体成熟为止。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1632—1723年）是三大显微镜学家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个不折不扣主张胚胎预存说的学者。他声称曾在一个1/8豌豆大小的胚胎中观察到一只羊的完整形态；不过，精子的发现（1677年）使他相信，父本是预先形成的胚胎的真正根源。正如他在给格鲁写信时说的，“如果你们的哈维和我们的德·格拉夫^[16]能观察到1/100，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像我一样认为，只有父本的精液才是形成胚胎的唯一根源，而所有妇女所能做出的贡献就是接受精液并培育之”^[17]。没有人曾在精子的头部观察到“侏儒”，尽管出版有种种想象的描述；但支持卵泡学说者和支持精源说者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列文虎克在其他方面更值得注意。尽管他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且仅能用荷兰文写作，但从1672年起，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向英国皇家学会和朋友们写了约300封信，许多书信涉及面广，绝大多数是谈自己的显微观察。在显微解剖中，他对壁虱、跳蚤、大螯虾、龙虾、蚊子和蚜虫进行了观察，尽管他从未向斯瓦姆默丹那样得心应手。他对精子作了详细的比较研究。他发现了单性生殖（在蚜虫的体内）。他检验了牛奶和鲜血的“小球”以及植物的常规结构——也就是那些赋予粒子理论以直观可信度的现象。与其他早期的显微镜学家一样，他把自己的目光专注于几乎所有看上去大有希望的主题，因此他的书信看上去也是从一个观测跳到另一个观测而没有什么条理或连贯性，尽管列文虎克显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而是能进行较为连续的和有目的的观察。例如有一天，他在用自己的显微镜观察一滴雨水时，惊奇地发现雨水中充满了微生物（原生动物），他描述了其中许多可以辨认的物种；又有一次，他检验了自己的牙屑，观察到了显然是细菌的物体，而且也描述了其中几个可看作是与从各种不同渠道获得的细菌相同的物种。列文虎克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拥有满足好奇心的技术，又是一位兢兢业业、有洞察力的观测者，这就使他成为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他的显微镜打开了一个以前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全新的微生物世界，这比月亮上有动物还不可思议；事实上，正是由于

如此不可思议，故而他的许多报告在起初无人相信，因为他的观测只有少数几个（如对“醋鳗”即线虫的观测）是易于用其他显微镜重新进行的。

迄至这时为止，这个新创造出来的亚世界并未造成分类学的问题，但是人们有可能会遇到旧自然科学史经常遇到的由于缺乏合适的描述术语和识别手段而立即产生的问题。这就形成了第三种类型的生物描述。到17世纪中叶，生物学的分类问题有着巨大的困难，因为这时的知识还不足以设想出一种“天然”分类（利用许多物种的特性），也无切实可行的“人为体系”（以少数一些经过选择的特性为基础）。在最后一批传统的植物标本集（以英国为例就是1640年帕金森的《植物志》）中，有数千种植物及其变种得到描述；但用于专门性描述的语言不足以达到其目的，而且尽管植物标本集的排列十分便于药剂师使用，可这是一种拙劣的植物概略，掩藏了物种之间天然的密切关系和创世“计划”。分类问题在植物学中特别尖锐，但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鸟类等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尽管有着自文艺复兴以来博物学家们所做的一切，但有条不紊地列举和描述这一艰巨任务仍有待于其17世纪的后辈去完成。这些后辈刚刚具备了一些条件，即植物学家重新恢复的为了植物本身而不是将之作为药源而进行研究的兴趣，以及动物学家重新恢复的为了动物本身而不是将之作为人类身躯不完整的模型而进行研究的兴趣。这一任务有可能降低为仅仅是收集并分类的狭隘工作，仿佛博物学家的唯一职能就是从事这些活动；不过这种情况在17世纪要比18世纪为少。

特别是，17世纪后半期的杰出博物学家约翰·雷（1627—1705年）就是以他讨论分类原则的广度、他对生态学的关注以及他对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兴趣而著称的。他的研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除了植物学方面的庞大工作和未完成的昆虫学工作外，他还同法兰西斯·威洛比一起写了关于鸟类和鱼类的著作。他因此是最后一位伟大的自然百科全书编纂者，他既不是分类学专家（如后来的林奈，其研究有使约翰·雷的研究相形见绌之势），也不是像当时的动物学家那样的专题作家。尽管约翰·雷基本上不是研究功能的专家，但他明智地采纳了其他人的发现。和雷迪一样，约翰·雷认识到自然繁衍这一通常看法的荒谬性：和格鲁一样，约翰·雷相信植物也有性别，这一问题是卡梅拉里乌斯在1694年比较充分地加以解决的；而且约翰·雷被有

关体液流动的性质和效用的争论所吸引。他也不相信物种形式永不改变的极端教条主义观点；相反，和霍克尤其是和丹麦人尼尔斯·斯滕森（或斯蒂诺，1638—1686年）一样，他认为化石是可信的有机体遗存。这一观点的论据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一些化石（例如斯蒂诺的鲨鱼牙齿）同现存物种的相似结构的不可区分性，因而总是缩小了说明那些显然不同于现存物种的化石问题。但是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了，后一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肯定是代表着那些只生活于往昔，也许只生活于某一较早世界的生物。

毫无疑问，生物学的描述性著作尽管就其内在复杂性而言，并未超过同期的物理学同类著作，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在生物学中，实验也是几乎像观察一样必要，而且在某些方面，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不是数学的关系，但其复杂性也几乎不亚于物理学的问题。不过，要是人们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博大和机械论哲学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即物理学总要成为建立在精确事实构筑起来的较为单薄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庞大的符合几何原理的上层建筑，那么正相反，生物学总是一味堆积其由事实组成的基础而不建立理论性的上层建筑。17世纪的生物学家不如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勤于思考，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实干——采集、解剖、绘图、注解。虽然生物学家的思想结构被注入了新的成分，但仍包含各种传统的、不确定的或派生的思路。生物学的概念缺乏那种物理学的概念迅速获得的明确性和权威性。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表明这两大科学分支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化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不是将这一分支看得比另一分支进步。17世纪的生物学家确在科学上造成了革命；但这种革命与实验学家、机械论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造成的革命不同。它没有带来巨大而又全面的思想革命；它没有改变演员们活动的舞台之范围和质量。

因此，尽管当时研究17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例如威廉·沃顿（《对古今学术的反思》，1694年），可能更多地提到其生物学领域而不是物理学领域，尽管更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哈维的发现和约翰·雷的成就而不是伽利略和牛顿所取得的成果，但最使哲学家们关注的却是物理学和数学的创新（今天的情况大致仍然如此）。正是牛顿在阐明宇宙基本机械法则时所取得的成就之恢宏，令洛克和本特利钦佩不已，后来又招致莱布尼茨和伯克利的批评，更往后又激励了伏尔

泰和法国的哲学家。在洛克看来，牛顿所设想的一种证据比《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所发表的需要用动力学来论证椭圆转道的证据要简单；在本利特看来，牛顿对其引力思想提出了一个详尽的解释。除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较为专门的哲学问题（如牛顿不止在一处特地加以讨论的归纳法问题以及数学推理与物理现实的关系问题）外，它还促使读者探究上帝在牛顿描述的机械宇宙中的作用，也就是笛卡儿曾使其读者的脑海里也产生过的问题。笃信宗教的牛顿决不会相信上帝在创世完成后就歇了手。相反，他让自己毫无遮拦地受到莱布尼茨的批评，或者说，在牛顿看来，上帝是一位不完美的工人，他得经常维修其机器才能使之运转。因此，要么上帝对创世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要么上帝的干预并未像他所可能做到的那么完善。这个各持一端的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只要哲学家愿意，就可以无休止地辩论下去，但就物理学而言，实际的答案是上帝早已被地球上的聪明才智赶出了宇宙。不管传说的拉普拉斯的嘲讽是如何亵渎神灵，它只是说出了一个公认的主张。在生物学方面，当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将生命和智慧的概念同神的概念分离开来。在该领域，这场比较复杂和令人激动的辩论一直要拖到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

[1] 关于笛卡儿，见本卷第4章边码第74—77页和第11章边码第251—252页。

[2] 关于莱布尼茨，见本卷第4章边码第82—85页；第5章边码第114—117页；第6章边码第145—146页。

[3] 相形之下，一方面英国国王对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1675年）的资助总是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却为埃德蒙·哈雷提供航海设备，使他能测定恒星在南方天空的位置。

[4] 这是由于其光环的不同倾角造成的，这使土星有时看起来像是伴有两个相邻的星座。

[5] 正如《哲学原理》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中遇到的每一个数学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到这一世纪末，纯数学思想中与当时物理学有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几乎还未得到开拓。不过，在惠更斯、牛顿、莱布尼茨及其继承者的著作中，主要的直接障碍已经克服。

[6] 该定律规定：各行星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值同其运转周期之间有一固定的比率。

[7] 关于被删去的那个结论的某些内容，见之于牛顿20年后出版的《光学》一书所附的《诂问》篇中。

[8] 《植物结构》（伦敦，1682年），第80页。

[9] 《试图使化学实验有助于说明粒子哲学概念的一些实例》，载《论文集》（1772年），第一卷，第356页。

[10] 牛顿表明，在白光中呈现各种颜色的物体，当其被一种单色光照射时，就会鲜明程度不等地呈现这种颜色。

[11] 《光学》：“诘问之五”等。

[12] 至少在原则上如此！正如牛顿的批评者所指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非没有错误。

[13] 见边码第57页。

[14] 牛顿（例如）并不赞赏笛卡儿用以区分心灵和肉体的方式，但他没有对这种区分的基本必要性提出异议。

[15] F. J. 科尔：《比较解剖学史》（伦敦1949年），第180页。

[16] 子宫卵巢滤泡的发现者，当时被误释为哺乳动物的卵（冯·贝尔于1827年第一次观察到）。

[17] 1878年3月18日：《书信集》（阿姆斯特丹1941年），第二辑，第335页。

第四章 哲学

在哲学史中，17世纪是同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洛克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哲学家的学说是欧洲的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标志。这些学说之所以得到发展，又同当时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有密切的关系^[1]；它们采用了新的基本概念和认识方法；它们对整个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导致以笛卡儿的哲学解释世界的进程有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早期文艺复兴思想所特有的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体的概念让位于这样的观点。即所有现象都能设想为近似机械的各种运动。因此，按照这种观点，所有原因都是先期发生的运动，而且本身都是直接生效的原因，亦即所有物理变化都是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和冲击的结果。随着机械论观点的逐渐得到流行，传统的终极原因论，即主张大自然的各种进程都是由要实现某一特定目的的趋势决定的学说，逐渐失去吸引力。新的解释方法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还在于它似乎特别成功。它使一个科学家不仅能解释自然，而且用法兰西斯·培根的话^[2]来说，还能操纵自然，言下之意，只要了解各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就能在特定场合预见它们，因而也就能支配自然。

第二，随着运动被承认为所有自然进程的本源，事情就日益明显，尤其是对凯普勒（1571—1630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来说，现实世界的结构基本上是量的结构，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可简化为质的区分。因此，合适的科学解释方法应是借助数学系统地阐述运动的法则。数学所特有的许多特征自然提高了它在以往的声誉：它的术语易于理解；它的定义准确无误；它的命题互有联系；它的论证无懈可击。要使对真理的表述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舍此可能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数学方法在17世纪解决科学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它被逐一运用到其他研究领域，例如伦理学、政治理论、法学和神学。它尤其被当作哲学推理的样板。总之，当时的理性主义哲学就存在于一种对清晰之理性直观和严密之演绎体系的渴望之中。对哲学家还有一个期望，即他们应终结地

解决，也就是说，通过演绎论证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和有关整个现实世界根本性质的问题。到这时为止，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在性质上的种种不同还不明显。正如哲学家们通信内容范围之广泛和门类之多样所表明的，他们常常也是博学多才之士，如莱布尼茨；或者至少旁通许多知识分支，如霍布斯。不过，这时总的趋势不是像文艺复兴时那样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以致才智常被认为等同于学问，而是为了使知识一体化，并获得一种便于推理的判断力和用几何学论证的方法。

在另一层意义上，当时的哲学也是无所不包的。它渗透到整个社会，包括受过教育的妇女的沙龙。哲学的主要工具据称是机智或理性的“自然之光”^[3]，而这可以认为是每一个常人都具有的。因此，哲学的真理应该没有问题，一般是明白易懂和放之四海都可接受的。再者，正如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法国人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在《方法论》（1637年）中所表明的，哲学著作有可能用地方语言来写，也有可能写得既清晰易懂又有说服力。笛卡儿自己的哲学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在他生活多年且其所有重要著作都写于那里的法国和荷兰也是如此，而且在他死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宫廷后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不过，笛卡儿哲学的权威性绝不是无限的：它一直都到处遭到强有力的批评和反对。这是一个以产生众多著名思想家而自豪的“天才的世纪”^[4]。甚至笛卡儿的密友和崇拜者——巴拉丁的伊丽莎白公主（1618—1680年）^[5]（笛卡儿1640年出版的《哲学原理》就是献给她的）也承认，她发现笛卡儿的学说中有几点既古怪又难懂。此外，笛卡儿哲学本身就有助于破坏人们对正统哲学的尊重并树立批评性讨论的风气，因而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意味深长的是，笛卡儿的《沉思录》（1641年）第一版收有为批评该书而写的6篇《反论》以及他本人的《答辩》。对《沉思录》提出《反论》的人士中有托马斯·霍布斯和皮埃尔·伽桑狄。事实上，对笛卡儿哲学批评最厉害的那些人都是现代经验主义的奠基者。他们也受到科学发展的激励。但他们认为，所有知识最终都不是建立在先验和演绎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可感觉证据以及由经验得出概括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经验主义者的方法绝不是反数学的，但它同笛卡儿哲学特有的形而上学的和思辨的目标却是相悖的。

笛卡儿哲学之所以能在17世纪占有主要地位有许多原因。第一，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旧式哲学不同，笛卡儿哲学是系统的，所用术语也

是专业的。笛卡儿本人是位天才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解析几何学即坐标几何学，首倡用数学的广延性、数字和运动对自然做出机械论的描述。第二，他认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其说是依赖于已知的知识，不如说是依赖于自知和认识能力。导致他做出这样判断的是两个假定：其一，他能仅仅从他在思索这一事实推断出自己的存在；其二，他所直接感受的一切必然是精神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感受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客体。他那关于对现实的认识总是与心理有关的学说，一方面导致唯心论和现象论（将认识的客体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倾向）；另外导致哲学上的心理说（即通过对心理状况和心理活动进行反省解决认识问题的一种主张）。笛卡儿首先把注意点放在认识的方法而不是放在认识的内容上，亦即放在认识论而不是放在本体论上，因而他对现代知识出现“分支”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笛卡儿的起点是一种怀疑主义态度，不过，他是以此态度作为与各种在行的怀疑论者进行斗争之武器的。他坚持认为，甚至最一般的怀疑都意味着思考，而思考又意味着思考者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这种方法论上的怀疑，其最大的优点是，怀疑成了过滤器：它从偏见或权威强使人们相信的事物中分离出人们有权自行相信的事物。事实上，说“我思”与说“我在”一样，都是在说某种意义上不容置疑之理：怀疑或否定某一事物都恰恰是在证明它是真实的。另外，现代存在主义者之所以对笛卡儿称颂备至，是因为笛卡儿是从一种存在判断前提即从一种事实上的真理着手的^[6]。然而，即使笛卡儿的起点是事实，但它在逻辑上却不是必然的；而且即使它是理性的真理，但它并非充分增进知识的。笛卡儿的困境在于，他的体系缺乏他认为已经提供了的基础。

为了给自己的体系提供其他必要的佐证，笛卡儿决心要证明全能和真实的上帝之存在。他使用三个论据，其中有一个是11世纪坎特伯雷的安塞姆使之著名的所谓本体论的证据。这种精心设想出来的证据也称物理学—神学证据，并不受笛卡儿青睐：它涉及终极原因的概念，而笛卡儿是将终极原因排除在他对自然的机械论解释之外的。所有传统的论据，尤其是本体论论据，现在都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本体论论据基于这样的假定（为休谟和康德所驳斥），即存在是一种属性。不过，要指着任何一位17世纪的哲学家说在其体系中上帝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却是非常困难的。牛顿的物理学就非要假设有一个机

械师不可，甚至像霍布斯这样的唯物主义者都有保留地接受上帝为第一推动力和最高立法者的思想。

将神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这两个领域产生的问题都比较容易得到解决。但上帝的概念尽管这时几乎没有保留什么传统的意义，却仍能在17世纪的哲学，尤其是在笛卡儿的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实体”普遍感兴趣。笛卡儿给“实体”下的定义是，实体是与上帝一样能自行存在，或者只需要上帝的同意就可存在的。于是由心物并存的双实体论所产生的认识论的困难，笛卡儿的门徒约翰·克劳贝格（1622—1665年）认为，这就说明要诉诸上帝的干预是合理的。如果说在笛卡儿看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实体，那么认识就不会是两者之间发生联系或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必然是人类心灵内在特性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性最终是以上帝独断专行的、高深莫测的旨意为基础的。

由于笛卡儿立论的基点是任何事物的发生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因而他认为自己能表明物质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之外而存在的；即表明物质是由原子构成，而它们的基本特性是广延性及类型，即形状、大小、位置和运动。一方面，与伽利略一样，事实上也与当时的绝大多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家一样，笛卡儿也认为，上面这些所谓的基本特性（都是可用数量表示的特性）能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述，因而它们是科学认识唯一合适的对象。另一方面，笛卡儿和其他思想家都认为，像颜色、声音和气味这些可以感知的特性都不能代表物质的真正特性，因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特性只是由运动着的原子构成的。笛卡儿的研究方法特别激进，这表现在他认为所有感知，包括对基本特性的感知，虽然可用作区分事物本质的标志，但至少部分是虚幻的，而且只适用于生物学。尽管笛卡儿在物理学中偶尔也强调经验的价值和必要性，但他的总倾向是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先验的直觉和演绎推理的方法来了解客观世界的真正性质。

笛卡儿的物理学之主要特性是将物质同广延性等同起来，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一，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笛卡儿的这一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本体，它无所不在并为天地万物所共有。第二，这一理论表明，既然世界是同质的和无限的，那就没有中心点或固定点。笛卡儿的成就在于：他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系统的科学表达，这集

中表现在他的运动理论中。他认为，既然无限的、同质的空间没有一个地方有绝对的意义，那么运动就不能被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位移，即物体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应被理解为物体从一个近旁转移到另一个近旁。笛卡儿通过将运动放在一种几何变化中加以考察，证明运动总是相对的：他能表明，正在离开所在环境的物体与所在环境本身的运动是一样的多。笛卡儿利用这种运动的相关性观点阐述了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牛顿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有所认识，并且将之限制在非加速的运动范围内，因而其论证只能留待爱因斯坦去完成。

总的来说，17世纪人们对相对论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这部分是由旅行家所述见闻蕴含的方方面面引发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怀疑论思想的传播。霍布斯曾说，老一套的印象等于没有印象；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多视角的体系；帕斯卡和马勒伯朗士则集中思考这样的见解：“就事物本身而言，很难说它大或小。”这种思想为莎士比亚所推崇（莎翁发现，“时间的快慢因人而异”^[7]），而且行将在斯威夫特教长“有关相对论的初级论文”^[8]《格列佛游记》（1726年）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笛卡儿物理学的许多部分，尤其是被第一个写笛卡儿传记的贝利神父描写为其“自然的传奇”那部分，很快就过时了。其中之一是涡流说，即按照机械论原则对宇宙的起源和构成的一种解释。另一个是他对心灵和肉体相互影响并在松果腺中合二为一的烦琐解释以及对动物是纯粹的自动物这一论断。还有一个障碍是他将物质等同于广延性，这就给圣餐说和创世说提出了难题。

由于以上的原因，遂有笛卡儿是无神论者的指责，并在1663年其著作被列入罗马的禁书目录之中，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被剔除。也是因此之故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年）在其《随想》（1670年版）中也抱怨道：“我无法原谅笛卡儿。在其整个哲学中，他总是想能撇开上帝行事。”^[9]帕斯卡几乎以现代“存在主义”的方式，用“心灵的理性”和“事实的真理”来反对笛卡儿的机械论观点及其理性至上原则。尽管帕斯卡从小就受到笛卡儿哲学的熏陶，而且本人也是著名的数学家，但他坚决认为，科学方法决不能单凭自己的牌号就产生出确切无疑的道理。他尤其为无限小和无限大这两座“深渊”所困扰，而且由于学术界的种种雄图壮志，向他表明都是无法实行的，他逐渐

变得对哲学进行怀疑和嘲弄，并成为宗教信仰中的天启玄义的坚定信徒。

使笛卡儿哲学看上去更加合乎教会当局口味之举是由笛卡儿的主要门徒尼古拉斯·马勒伯郎士（1638—1715年）完成的。他把笛卡儿的学说同圣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论说融合在一起以达到目的。和笛卡儿两个年长的门徒路易·福奇和热罗·德·科德穆尼一样，马勒伯郎士强调笛卡儿“一切事物都需要神的支持才能继续下去”这一论说的重要性；并由此推断，上帝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原动力。从这一断言出发，他就能进一步推导出两条学说。第一，偶因论，即把心灵与肉体明显的相互作用解释为上帝干预的结果：每当我决定移动我的身体时，上帝就移动我的身体，同样，每当我的身体改变位置时上帝就使我的心灵产生感受。尽管是安特卫普的阿诺德·海林克斯（1625—1669年）在其《伦理学》（1665年版）中第一次精心阐述偶因论使之自成体系，但这种理论此前就已为笛卡儿派普遍接受。偶因论有两种，一种是上帝在每一个特定场合都进行直接干预，另一种是上帝的干预是间接的，只是在创世时一次性干预了事。马勒伯郎士最终采用了第二种偶因论，这种偶因论非常接近于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

马勒伯郎士以偶因论为基础，发展了他的第二个主要学说，即万事万物均可归因于上帝之学说。这一学说基于三个假设：（1）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思想；（2）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3）既然每一个心灵不可能拥有无限的固有思想，那么认识肯定存在于神对才智之士的启发。马勒伯郎士主要著作《追求真理》（1674—1675年）的纯精神的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以及安托万·阿尔诺（1612—1694年）的《真假理念论》（1683年）对这种认识论的激烈批评，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是当时最著名的争论之一。很快在英国，也有一位对《追求真理》进行批评的人士即约翰·洛克与马勒伯郎士的一位著名门徒约翰·诺里斯（1667—1711年）展开了相似的论战。

马勒伯郎士的影响实际上非常之大。他为皮埃尔·贝勒（1647—1706年）的怀疑论以及伯克利主教所做的事物最终均是上帝的思想这一结论，提供了前提。他也推动了大卫·休谟（1711—1776年）出现象论及其否定经验的必然联系的主张。尽管马勒伯郎士本人是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者而非创立者，也像法兰西斯·培根一样对人类错

误的原因特别感兴趣，但他最终是个玄学家，缺乏英国经验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常识性的治学方针和分析的方法。莱布尼茨把笛卡儿的绝大多数追随者看作仅仅是注释者^[10]，而马勒伯朗士却毫无疑问是笛卡儿的追随者中最有独创性的，而且确实是他们的公认领袖。但没有哪一种笛卡儿哲学的流派能与竞相辉映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牛顿和洛克的体系相抗衡。有一种倾向特别不利于笛卡儿哲学，即逐渐揭示出笛卡儿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内涵而破坏了笛卡儿基本的唯实论，这种倾向在海林克斯的《形而上学》（1691年）及其门徒理查德·伯索吉的《论理性》（1694年）二书中十分明显。实际上，笛卡儿哲学体系唯一具有持久影响的是其方法，这在西欧已被受过教育的人普遍采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则被编入扬森派教徒安托万·阿尔诺和皮埃尔·尼科勒（1625—1695年）合编的最有影响的有关笛卡儿哲学的教科书——田野静室出版的《伦理学或思维的艺术》（1662年）中^[11]。

笛卡儿哲学中的难点，有一部分（但非全部）是由巴鲁赫（或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1632—1677年）克服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其家原在葡萄牙，后定居荷兰。他主要受笛卡儿的启发，但也受惠于新柏拉图主义和文艺复兴时的哲学家，如乔尔达诺·布鲁诺，当然，他还得益于希伯来传统。斯宾诺莎44岁即英年早逝，其死后出版的主要著作《伦理学》（1677年版）给尚未入门的人制造了困难，而且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点像经文。但有许多人却大为欣赏其宽广的视野、其思想实质以及其道德说教的力度和精妙。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按照定义、公理、证明和推论等步骤进行了几何学似的论述。斯宾诺莎“在考察人类活动及其情绪时就像在考察线、面或体一样”^[12]，这也促进了他力求获得科学客观性的目标。

他的第一步是要表明，只能有一个本体即上帝，这个本体必然是广大无边的，因为如果有两个本体，那么它们就会互相限制，就不能像真正的本体那样要求不证自明。由此得出一条十分非正统的信条，那就是就上帝而言不可能有什么创世的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就会包含有上帝与自然的差别，立即包含有两个本体。这种把逻辑运用到神学的做法，还有斯宾诺莎在其《神学政治论》（1670年）中揭示出基督教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对《圣经》的评注，对传统教条的根基都是一打击。由于他用机械论的方法解释自然，否定关于上帝的种种拟人的观点以及人有意志自由，因而就像马勒伯朗士这样的笛卡儿派信徒和

贝勒这样的怀疑论者都把他谴责为无神论者。毫无疑问，人们对他的了解往往是不够的，而诺瓦利斯称他是“陶醉于上帝的人”^[13]，尽管此说不无偏颇，却可能较为正确。斯宾诺莎本人把自己的非正统看作知识独立的一种表现，他对知识独立珍视无比，竟在1673年拒绝接受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因为他担心，一旦接受教席，他的教学就必然会贴上官方的标签。尽管他被逐出基督教教门和犹太社区，但他仍是幸福豁达的人。他以磨镜为生，坚持自己的行事准则；生活在无知者中的自由人应尽量不要接受无知者的恩赐。

斯宾诺莎哲学其余的所有特征均可根据他的本体观推导出。尽管他着迷于本体必定是绝对的广大无边的这一思想，他仍论证说，本体只有在一个方面（例如空间）不是广大无边，但它肯定也是有无限特性的。在他看来，人类的智慧迄今只弄懂其中的两个特性：广延性和思想。也就是说，在宇宙中，凡是精神的东西，同时也是广延性的一部分，反之，凡是作为物质事件发生的，也会作为心理活动发生。因此，对斯宾诺莎来说，并不存在心灵和肉体，如何能说是互为因果的问题。在他看来，精神和物质是一个本体处在同一状态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这种观点不可思议的含义是，在斯宾诺莎看来，说我们觉察到物质客体，只是就我们的身体受到物质客体的影响而言的，因而感觉实在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变化。进一步的含义则是，广延事物或物质变化的次序与上帝和人们头脑中逐一发生的思想之次序完全一样。这就导致斯宾诺莎认为，物质世界中的所有联系单靠先验的推理就能发现，根本无须借助观察。这样，他抹杀了原因与结果这种事实上存在的联系和前提与结论这种逻辑上的联系之间的差别。这是斯宾诺莎为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所付出的代价——休谟和康德定会认为这是一个高昂的代价。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可由其形而上学原则直接推断出来。正如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尤斯图斯·利普修斯（1547—1606年）和威廉·都·韦尔（1556—1621年）所复兴的古代斯多噶学派一样，斯宾诺莎也会认为，要了解人的性质和目的，就必须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认为，按照有限的生命所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程度，这些生命经受破坏其内在平衡的种种情绪。正如他所设想的，问题在于如何逃避这种“束缚人类的桎梏”。他以其“自然倾向”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与霍布斯和莱布尼茨一样，斯宾诺莎认为努力维护自己

的存在是每一事物的本质。就人类及其比较发达的思想而言，这种倾向表现为希望抵制自身对外部原因的依赖，从而使自己不再成为激情的奴隶，也就是表现为积极的和源自本性的行为。每当我们对自身、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进行逻辑思考，或用斯宾诺莎的术语，形成“合适”的看法时，大抵都会产生这种倾向。斯宾诺莎论证说，因此人的自由与幸福是随着他脑海中合适看法的增多而增加的。

有两条重要限定必须牢记。第一，在斯宾诺莎看来，说一个人是自由的，不是指他的行为是不能确定的，而是指他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强制，亦即不由外部因素确定。第二，尽管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有当其行为受他的理性支配时才是自由的，但他太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了，以致不能不赞赏愉悦和有益的情感^[14]。再者，斯宾诺莎对斯多噶派的认为理性有能力驱除激情的唯理智论发起了挑战。他对心理的洞察使他意识到，激情只能被另一种更强烈的激情限制或替代。这种理论传递了一个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的启示：不是通过反对邪恶来避免邪恶，而是通过唤起爱心和愉悦这些积极的激情来避免邪恶。同样，斯宾诺莎认为，学问必然体现为对知识的爱：对神理智的爱。

斯宾诺莎关于道德进步和个人幸福最令人信服的一个建议是，我们只要对一种困扰人的消极情绪形成清晰和明确的概念，就能使之不产生任何危害。然而，他的伦理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是，任何事物都必须从其与整个自然秩序的必然联系着眼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应视之为“处在一定形式的永恒之中”^[15]。他认为，道德与科学定律的真理相互关联，它不会因颂扬、指责和主观看法中所固有的短视而受到歪曲。斯宾诺莎将所有权威、教条、奖惩从道德领域清除出去，这就使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生存。另外，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没有“责任”概念；此外，他的一元论的本体观混淆了伦理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的一般区别。正是他哲学体系中的这种单一性和无所不包性，使他获得了泛神论者的称号，这也使他在18世纪末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和德国唯心主义者中留下了美名。

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两位哲学家也有着鲜明的不同，这从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来看是显而易见的。斯宾诺莎是一位孤独的几乎

是圣徒般的人物，专心致志于单一的目的；莱布尼茨则是一名廷臣和外交家，他既致力于世俗计划和官方活动，也致力于对各种知识的追求。同样，作为哲学家，他们的主要视角也不一样。与斯宾诺莎不同，莱布尼茨的出发点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亦即不是神本体，而是众多单独的本体，他称之为单子，他的一本主要著作的书名即为《单子论》（1720年）。他认为，所有的本体都是精神的，即使看起来是物质、运动和广延的事物，实际上也是精神的。尽管莱布尼茨早年曾自许为伽桑狄和霍布斯的信徒，但在巴黎逗留期间（1672—1676年），他舍弃了他们的机械论体系，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励性的大事之一。他发现这些体系赖以存在的原子观尤其不能令人满意。他论证说，真正的本体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是无广延、不可分割和有机的；它必然是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物质的能量中心。

莱布尼茨之所以得出有许多单个本体的看法，主要是由于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所有的陈述都能用主语—谓语的形式加以恰切的表达。第二，任何真正肯定陈述的谓语都包括在主体概念中，因此，所有真正的陈述都成了分析性的。这两个假设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明莱布尼茨为何深信，一个单个本体的概念实际上永远包含着它所能产生的一切事物。他在《形而上学论》（1685—1686年）中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一重要著作直到1846年才面世。不过，曾有一份摘要寄给阿尔诺，在随后的著名通信（1686—1690年）中，阿尔诺一直反对摘要中主要的学说，因为他认为这些学说的遗患是否认人和上帝的所有自由。

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并不完全基于他的推理^[16]。单子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是开放的和能动的体系，而不是斯宾诺莎那样的封闭的和静止的体系。莱布尼茨终于认为，上帝的万能在一个丰富多彩的、由无数的本体构成的世界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为“无限”的概念所迷住。在数学方面，这导致他不依赖牛顿而独立地提出了微积分（1676年）。在形而上学方面，这使他假定，每个单子内有无数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思想状态，形成一个只有一种无限延长的分析才能充分展示的微型宇宙。难怪当他见到有人用显微镜发现细胞和精子这些新事物时欣喜若狂，因为他本人正在试图解释一个不可分割的机体内部究竟是何形状。在他看来，本体的特

性是由于一些他称之为“欲求”的内在原则之作用而逐一连接产生的感觉。

莱布尼茨十分重视认定自然界中没有跳跃现象的连续律，而这行将在现代科学中起重要的作用。不过，在他看来，连续律只适用于单子内部的发展，而不适用于单子外部的东西。事实上，他认为单子既不能对它外部的东西产生作用，也不受它外部的东西的影响，每一个单子都是“无窗户的”，也就是说，它们彼此完全分离。他确信，本体的“自给自足”是心灵自由和不朽的保证；这使他的哲学较之其持机械论的对手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单子论的这种优势也伴随着一个不利的方面。笛卡儿将思想和广延性分开的呆板做法，重又出现在任何两个单子的间隔之中。

莱布尼茨的困难在于，按照他的前提来解释譬如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子群体的树木是如何能被作为另一个孤立单子群体的心灵感觉到的，同样，一个人又是如何挥动手臂或踢球的。他是以其著名的预定和谐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最大的哲学问题。他的看法是，对于一个单子在任何特定时间自发产生的无数感觉或内在状态中的任何一种，其他的单子也一定会碰巧产生一种相应的感觉或状态；各种看起来是精神与物质和心灵与肉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心灵各自发展之间存在令人十分惊讶的适应性或同步性的结果。因此，莱布尼茨说，单子从各自的角度“反映”宇宙。

就莱布尼茨看来，单子的透视之所以必定各不相同，是因为他提出的“充足理由原则”，由此他推断出其大部分物理学和自然神学。充足理由原则认为，一个事物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总是有充足理由的，其发展过程完全由根据上帝总是选择最优秀的而来的一条准则决定。莱布尼茨希望他的宿命论为自由意志留下余地，因而他论证说，充分理由是一种“无须强制的倾向”。看来几乎无人相信这一论点，而伏尔泰更是以嘲笑的口吻提到莱布尼茨的“不充足理由”[\[17\]](#)。莱布尼茨提出的另一条著名原则是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或形形色色事物的不同性原则）。早在他1663年写出其博士论文《论个别原则》起，这一原则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在一种像他所提出的那样的哲学体系中，下述两点肯定会成为必然的真理：如果事物是两个，那么它们就可以分辨；如果它们不可分辨，那它们实际上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因为根据他的前提，可用以独特地提到一个本体的唯一办法

是从其与其他本体没有共同之处的特性着眼。莱布尼茨所说的特性是包括时间和位置这些境遇在内的。他把这些境遇看作现象中的一种秩序而且完全是感性的。由于这一观点，他在晚年一门心思同塞缪尔·克拉克（1675—1729年）进行了那些著名的而且就他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的通信。克拉克为牛顿的学说辩护，即空间和时间都是真正的实体，也就是说，是自行有权存在的，而不是空幻地存在于思想本体之中。而在莱布尼茨看来，这种学说纯粹是一种虚构，尽管普通人觉得似乎有理，但实际上科学已将之推翻。

莱布尼茨在实现使科学成为统一的百科全书这一理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大大超越了雷蒙德·吕里（1235—1315年）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人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乔治·达尔加诺和约翰·威尔金斯所提出的人为符号论。他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创造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不如说是构筑一种能使若干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不证自明以及能使所有论证都可简化为计算的规则体系。莱布尼茨在其年轻时写的论文《组合之艺术》（1666年）和后来写的一些文章中，精心设想了一种逻辑计算，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特征”，其中包括估计种种可能性的精妙方法。他的符号逻辑成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先驱，但其成果不是被人遗忘就是直到他死后200年才出版。到这个时候，这些成果早已为后辈逻辑学家独立地做出。莱布尼茨逻辑学的主要缺陷是，他没有考虑种种关系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些关系都可归纳为属性。鉴于他对数学推理的分析本该使他意识到这一错误的，故而上述缺陷就更令人惊讶了。此外他知道并欣赏约阿希姆·容的《汉堡派的逻辑学》（1638年），容第一个探究了种种关系和非三段论推理形式的逻辑，200年后，波尔、弗雷格、皮尔斯和罗素使之更加完善。另一个引起异议之处是，莱布尼茨自称他的计算能应用到数学以外的领域，甚至能应用到知识的所有分支。这一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抽象的计算只能在演绎体系，也就是说在那些以某些精确限定的概念为起点的体系内发生作用。计算绝不能展示一般经验主义论述所特有的内涵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也不能展示构成这些论述一部分的各种含义。

莱布尼茨之所以这样自诩，是因为他相信存在着一个和谐的且天生合乎推理的宇宙。故而在在他看来，不同思想领域的界限不仅应该忽略不计，而且应该抹去。因此，他在《神学体系》（1686年）中，设

计出一种使基督教的重新统一以之为基础的普世理性神学，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没有解决各教会之间的冲突。由于他具有兼容并蓄的头脑，他无疑是最后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因而也是第一个不把未来的科学进步是看作个别天才的工作任务，而是看作共同合作的结果的人。而且正如他大量的通信不顾战争和宗教歧见而能激励当时欧洲整个知识界一样，他那为在德意志、奥地利和俄国建立科学院制订的计划所体现的鼓动精神也大大激励了人们。再者，他毕生都在鼓励远赴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致力于欧洲和东方的文化融合。尽管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极其全面，但因过于试图同对手——如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解释，偶然性和必然性——趋于一致，反而难以令人信服。他的世界和笛卡儿的世界一样有着不可思议之处，尽管充满他的宇宙的奇迹，在他看来，仍然都是理性的奇迹。

莱布尼茨着重强调的结论是上帝创造了所有可能选择的世界中美好的一个，至少是最可臻完善的一个。他在《神正论》（1710年）中表达了这种乐观主义，批评了怀疑论者皮埃尔·贝勒。里斯本地震后4年，伏尔泰在其《老实人》（1759年）中通过潘洛斯博士这个人物嘲笑了《神正论》，尽管他在《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中充分承认莱布尼茨的杰出地位。由于通俗易懂，《神正论》与贝勒《词典》都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就这样，它导致笛卡儿哲学在欧洲知识界霸权地位的衰落。同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为新教关于上帝和每一个信徒直接交流的教条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支柱^[18]。

在哈雷大学数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弗（1679—1754年）的影响下，莱布尼茨的学说变成了学院哲学，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年）就是在它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康德从莱布尼茨那里继承了对洛克经验主义的批判以及知识概念具有先验性的学说。莱布尼茨的个体观和发展观，同样也刺激了浪漫主义的反应；然而由于这些观点同传统的对本体和主谓逻辑的看法联系在一起，已不再令人满意。另外，他对观察力概念的使用却对现代的学说，尤其是对怀特赫特和罗素的学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莱布尼茨的主要著作之一《人类理解新论》（写于1703年，并于死后即1765年出版）是对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年）的回答。该书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明显地指出了当时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与当时的经验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17世纪期间，

经验主义已使自身成为主要传统，甚至已开始对笛卡儿哲学的权威发起挑战。两派成为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支持并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得益于当时的科学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集中于不同的地区。理性主义流派集中在欧洲大陆，而经验主义流派则集中在英国。新科学观在伦敦皇家学会（建于1660年）中得到特别明显的体现，该学会坚定不移地全力拥护法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英国经验科学的成就，尤其是艾萨克·牛顿的成就，足以使伏尔泰产生深刻印象，以致认为这个世纪可称作“英国的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19]。这一评论表明了当时的英国对欧洲思想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在此之前，欧洲的思想主要是受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拉丁传统影响。

然而，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一位重要先驱是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年）。与同时代的笛卡儿一样，伽桑狄也是法国人。他本人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家，没有受过数学的训练，除了最先明确阐述惯性定律外，并无其他什么发现可言。然而，他是一位严格认真的观察者，尤其是在天文学领域，而且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崇拜者。他的出名是由于恢复并捍卫古希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学说。1647年和1649年之间，他在几篇独立成篇的著述中发表了这种将科学和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也就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文集（1658年）中的《哲学论文》。最初，原子论假设中大部分貌似有理的东西来自那先验的论证，即世界上唯一的本体是一些数量无限无法察觉的，单一和不易损坏的物质粒子，因为这些粒子的运动和相互关系足以解释自然界的生长和毁灭过程。在伽桑狄的时代，实验证据使原子论受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欢迎，而伽桑狄自己的独特成就则是使早先已有人加以说明的古代的原子论适应新的科学发现，不过，他也将基督教神学和终极推动力的信条以及人的灵性添加在机械论哲学之上，因而他的哲学体系远非同质和系统的。

伽桑狄的一条主要学说是，我们的知识来源于感性知觉。由于他也教导说，刺激我们感官的物质，其特性只产生现象，这就导致他得出以下结论：尽管物质是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最终是不可认识的。他的这一学说既从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图·埃皮里库斯和皮埃尔·沙朗（1541—1603年）那里得到佐证，又重现于洛克的著作和英国随后的思想发展之中。因而他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观点，并在颇为重要的对《沉思录》（1641年）的第五篇《反

论》中，用这种观点反对笛卡儿最初的系统怀疑及其科学可论证性的最后概念。伽桑狄怀疑态度的一个含义是，所提出的有关原子和真空的知识，亦即其哲学的基础，本身并不是经验的，只能通过理性的推导才能获得。他实际上归结出这样的论证：一方面，知识必须超越和修正经验。另一方面，他拒绝接受最终未得到观察证实的理论。他的不足之处是未能恰切地表明理性与感知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伽桑狄的影响还由于他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而有所增进，他认为时间和空间尽管既不是本体也不是属性，但仍是绝对的实体。一方面，这种观点打破了久受敬仰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另一方面，它与亨利·莫尔和艾萨克·巴罗类似的理论一起，构成了牛顿科学的形而上学框架。另一个从伽桑狄的学说获益匪浅的科学家是罗伯特·波义耳（1629—1691年），尽管他的微粒子哲学与伽桑狄的哲学有所不同，亦即他否认运动是物质的内在特征。恰恰正是伽桑狄的这种能动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年轻的莱布尼茨的兴趣。尽管洛克很少承认自己受惠于前辈的思想家，但仅从莱布尼茨的证词^[20]即可明显看出，他从伽桑狄那里吸收了心像一张白纸的思想以及物质也能思考的主张——这两个概念都触及正统的笛卡儿流派哲学的基础。除了萨米埃尔·索尔比埃雷等为数不多的医生外，伽桑狄并没有真正的信徒，许多人是通过1615年法兰西斯·贝尼耶就他的体系所作的节略而又较易理解的表述来了解伽桑狄并表示赞同的。人们之所以很少把伽桑狄作为经验主义的一位开拓者来加以讨论，其原因之一是，他的思想具有无从捉摸的特征^[21]；另一个原因是，同英国经验主义者较为时新的主张相比，他的体系有相当一部分很快显得陈旧。

第一个沿着新实验哲学的路线描绘出令人信服的一幅宣扬与宗教经义完全分离的知识和科学方法图景的哲学家是法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培根认为，事物的元素和现象的总和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因此，借助合适的归纳理论，人们应该能够穷尽对自然的认识。在其《新工具》（1620年）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发现因果律的方法，即所谓的消元法，他声称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单纯列举的论证方法更令人满意。他认为，归纳性证据的基础是观察和收集经验事实。不过，他也承认，除此之外，还必须进行审慎的试验，对实例进行认真筛选，不受拘束地使用新方法。在他看来，实验才能与推进才能的结合有助于实现知识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能实现增强人对自然的

控制这一实际目的。再者，他在其著名的关于“谬论”的学说中，概括了他所认为的阻碍真理和进步的种种谬误和偏见的产生原因。尽管培根关于“增进学识”的总概念非常重要，但他关于理论和科学论证功能的概念却无甚创见。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感到培根的哲学体系中很少有他们在哲学上感兴趣的東西。培根主要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早期会员和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有所影响。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是一位比培根更敏锐更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尽管由于他的唯物主义、他的人性利己论以及他在《利维坦》（1651年）^[22]中设想的人为政治秩序，他在生前和死后都被斥为激进分子和无神论者。英国内战期间有段时间，他旅居巴黎，这个地方，他曾在1634—1637年来住过几年，并被引荐给梅森神父（1588—1648年）。当时以梅森为中心集结着广泛的形形色色的知识界人士。梅森本人是个折衷主义者，写过几本有关自然哲学的二流著作。他致力于把理性、经验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加以宣扬，既不大满意培根的单方面经验论，也不大满意笛卡儿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目标。在他的倡议下，伽桑狄和霍布斯各自提出对笛卡儿《沉思录》的批评。促使此二人彼此接近的主要因素并非他们共同信仰的经验主义，而是他们都是笛卡儿的论敌。但霍布斯是一位比伽桑狄更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并宣讲一种像霍尔巴哈和拉美特利的伟大18世纪体系那样在原则上保持一致的唯物主义。他不仅反对笛卡儿的多元论，而且宁愿根据运动而不是广延性来设想物质。尽管如此，他的机械论哲学与笛卡儿的哲学仍有许多相同之处，事实上，两者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他们在1641年的通信由于彼此指责对方剽窃而中止。

霍布斯对感觉问题特别感兴趣，认为这既是外部物体的运动，也是我们人体组织的运动。虽然在他看来，愉快就是“内心的运动”，思考就是“头脑内的运动”，但他却把一个美好的目的定义为引起向自身运动之运动，而把努力定义为一种开始的运动。这种对运动的强调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这种观点把宗教信仰中不变的、非物质的目的都排除在他的科学概念之外；其次，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以纯几何学来看待自然的思想。

事实上，霍布斯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产生兴趣后的第二年即写出《本原简论》（约1630年），这是其主要著作之一《论物体》的雏形。他的主张是，科学或哲学知识无一例外是对运动有效原因的

演绎探究，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论点的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他的这种理性主义同培根所开创、英国皇家学会加以实践的新实验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看来，新实验哲学是“自然史”，而不是“自然哲学”。在这方面，他无疑受到伽利略和哈维的分解—综合法的影响，这种方法是帕多瓦学派阿威罗伊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向他提出了原因或创始如何解说的思想，据此，各种现象，包括人的本性和世俗社会的本性，都能像几何图形那样按照本原合理地恢复本来面目。当然，霍布斯的问题是要解释在几种有关现象的定义或原因分析中哪一种是正确的。因为他认识到关于构成后果基础的原因之假设是一种推测的结果，事实上有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据以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尽管霍布斯使知识的经验基础处于突出的地位，但他对实验论证或事实真相并不真正感兴趣；总之，他未能表明这些论证或真相与科学的先验推导有联系。

霍布斯的“超唯名论”（莱布尼茨语）^[23]和他一贯的真理论都有着同样的倾向。在霍布斯看来，理性知识是与一般概念息息相关的，因此必然始终都要使用词语；因为他以为，“世界上没有比名更普遍的东西”^[24]。再者，他认为将名强加于物体是一种任意的行为，因此所有的定义都是规定性的。他认为，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真理肯定在句子中各个词的逻辑联系中，通过正式的“推断”过程才能掌握；与笛卡儿的由明确而又清楚的思想构成的直观不同，霍布斯的观点并未告诉我们有关事物真正性质的任何东西。

不过，霍布斯就语言所作的分析仍然有助于经验主义的发展，有助于使哲学和科学摆脱有关普遍本质的信条。就此而言，还有就他所认为的没有一种演绎论证本身是描述客观现实的观点而言，霍布斯是休谟和现代实证主义的先驱。但是霍布斯除了是坚决的经验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外，无疑也是17世纪最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之一。

这个时期，英国绝大多数理性主义者接受了唯灵论者的玄学思想，相信“心灵预感”，也就是说，相信据称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各种基本观念。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针对霍布斯，毫不奇怪，自从笛卡儿同亨利·摩尔通信以及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关于灵魂不死的论文发表（1644年）以来，笛卡儿在英国的影响就一直在扩展。促使唯心主义和唯理智者观点盛行的另一股思潮尤其具有伦理和宗教的特征。这一思潮由坎布里的赫伯特勋爵（1583—1648年）发轫，到剑桥柏拉

图主义者这一著名学派时臻于繁荣。该学派的奠基者是本杰明·威奇科特（1610—1683年），而主要代表则是亨利·莫尔（1614—1687年）和拉尔夫·卡德沃思（1617—1688年）。柏拉图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寻求将神学同哲学综合起来，这与主张将神学同哲学分离的培根、霍布斯、帕斯卡和贝勒不同。可是这个时代尽管宗教仍占统治地位，但毕竟仍有许多此前一直很神秘的事物成功地得到了解释。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是理性，或者用威奇科特常用的一个词语来说，即“主的烛光”。

赫伯特勋爵在他的《论真理》（1624年）中主张一种构成许多特定形式信仰基础的宗教真理，对此理智不能不加以同意，因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承认自然宗教而不是天启宗教，这是无神论者同时也是英国国教无主见派神学家的特征。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们特别有吸引力的是如下的争论，即道德判断和所有永恒的真理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非加尔文和笛卡儿所宣扬的是由于神的旨意。柏拉图主义者这种对待伦理的方法是对17世纪道德哲学最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有一份功劳，卡德沃思也是如此。卡德沃思写了两本书，即《真正理智的宇宙体系》（1678年）和他死后于1731年出版的《论永恒不变的道德》。他对道德理论中所涉及的逻辑问题的研究，为随后英国道德理性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与当时法国的格言作者拉罗什富科和拉布里耶尔津津乐道的道德心理学截然相反的。另外，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的形而上学著作并非总是消除了奇怪和晦涩的理论，如卡德沃思的“可塑的天性”学说或莫尔的空间具有精神性的观点。他们的著作均有思想漫无边际和存在大量陈腐的学问之弊病。假如第三代沙夫兹伯里伯爵（1671—1711年）在《特征》（1711年）中没有对道德理性主义做出更加精炼、更加正式的表述；那它就绝不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一种能打动人们理智的力量。沙夫兹伯里特别喜欢柏拉图关于爱和美的学说。

约翰·洛克（1632—1704年）一度当过沙夫兹伯里的私人教师，与剑桥柏拉图主义者所讨论的非常相似的问题，促使他对哲学感兴趣。正如其《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一书表明的，他直到晚年仍受无主见派的影响。另外，甚至在洛克访问法国（1675—1679年）之前，伽桑狄的经验主义就已对他产生了初步影响。而在法国逗留期间，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学者，其中有伽桑狄著作的通俗传

播者弗朗索瓦·贝尼耶。他也同罗伯特·波义耳以及与创建皇家学会有关的实验科学家们有着私人关系和专业联系。此外，他还是著名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的朋友和门生。洛克本人是医学博士，毕生一直对肉体 and 心灵保持同样的兴趣。他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他由第一代沙夫兹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引入公众生活，在库珀垮台后，他逃到荷兰（1683年），1689年初，他作为奥伦治威廉的扈从回到英国[\[25\]](#)。

在其早期著作之一即用拉丁文写的《论自然法则》（写于1664年）中，他所选来加以讨论的论题后来成为其在《政府论》（1690年）[\[26\]](#)中提出的影响很大的政治学说的基础。洛克对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是自然法是如何成为众所周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的；二是自然法的约束力范围中的道德问题。他用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该书是他的主要成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与该书试图解决的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的争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洛克是第一个不再把哲学看作与其他特殊科学基本相似的超级科学，而是把它纯粹看作对其自身问题的一种批判性探究的人。他的目的是要研究知识的性质、起源和范围。在采取这种“历史的简明的方法”和“不太熟练的劳动者”态度时，他表明自己既大胆又不招摇，因为他的许多过于理性的同时代人认为，如果没有巨大的先验的抱负，那就等于宣布哲学破产。洛克另一个很重要但很少受人注意的对哲学的贡献是，他在《人类理解论》第三篇中对词和定义之性质的研究；他期望这会导致“新型的逻辑和批评家的产生”。

然而，洛克的研究一开始便造成了混乱。尽管他在若干重要方面都受到笛卡儿的影响，但他和在他之后的伯克利以及休谟都确信，不仅当一个人在思考时，而且当他感知一个物体时，他所直接面对的都不是真正的事物，而仅仅是他的心理过程或思想。在洛克的著作中，“思想”这一关键词一直是十分模糊的，可以指感知的对象、映像、心理活动及概念等不同的事物。另一难题与他那受到莱布尼茨和康德二人攻击的著名信条有关，即他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官或内省的经验。洛克仅仅对思想的起源作心理学的描写，而没有坚持为

了使概念有意义，概念必须得到感官观察的验证，至少是间接的验证，因而削弱了自己的说服力。

不管洛克如何表述，他在《人类理解论》第一部分对先天思想的否定仍具有重要意义。这导致舍弃笛卡儿和当时的许多神学家所声称的只用推理法就能论证宇宙的先验假定。众所公认，与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一样，洛克也认为知识的基本构成是简单的要素。他的成就在于，他第一个认真地将分析技巧同彻底的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加以实践。不过他也受到了指责，人们认为他所得出的有意义的简单思想都是简明的观点纯粹是一种假定，并非如他本人所认为的是哲学分析的结果。

构成洛克“新的思想方式”的另一个思考同样具有令人困惑的后果。洛克论证说，如果要保持虚幻感觉和真实感觉之间的区别，那至少必须用一些与我们之外实际存在的事物有因果性依赖关系并且相似的概念来指称这些事物。他自然要将物体的所谓首要特征诸如广延性、形状和运动挑出作为真实：一方面，这些特征均可视为直觉感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另一方面，笛卡儿哲学的一条学说，即心灵不能直接感知物质对象而只能感知自己的思想，由于流传已久而很难消除。这样就产生了约翰·萨金特在《坚持实在哲学》（1697年）中就已注意到的难题：如果一个物体和特性甚至在原则上没有也不能被直接感知，那么我们如何相信该物质实体，如何了解它们的特性，如何说我们的思想与这些物质实体相似。这种学说不仅是个说不通的假设，它简直是哲学神话。伯克利主教（1685—1753年），一位比洛克较为一贯的经验主义者，就以彻底否定二元论来避免上面提到的难题：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人类认识原理》（1710年）中，他否定世上只有“心灵”及其思想的说法。然而，尽管洛克从未放弃对现实进行现象主义的分析，但他仍然感到不能放弃关于物质特性的传统观念，也就是说不能放弃关于物质本体的传统观念。不过，他把这种观念纯粹看作是理性的假设，在严密的经验主义前提下是无法加以论证的。他承认，尽管物质本体的概念指某些实际的存在，但这是不完善和模糊的，只是意味着“有一些东西，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27]。他那遭到伍斯特主教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1635—1699年）强烈反对的令人吃惊的观点，即认为上帝可能已赋予物质以思考力，正如伏尔泰正确地指出的^[28]，这种观点不是要否认心灵的非物质性，而恰恰

是承认，只好请笛卡儿原谅，物质本体的性质依然处在认识范围之外。

因此，洛克重视真实本体和名义本体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一方面我们对譬如说金的实际本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却对金的名义本质，即与其特征中那些被发觉彼此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的成分有关的思想了如指掌。不过，他指出，经验虽能为我们提供有关个别和特殊的思想，但无法提供任何概念或总体思想，故而不诉诸经验也能解释我们在一个事物的概念中始终发现的特质。他承认这一任务还是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解决。他在有关一般概念性质的传统争论中采取了概念论的立场，这是一种与柏拉图派的唯实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形式论和霍布斯的唯名论均相对立的理论。在他看来，像“金”这种总体名词是头脑中一种抽象的一般概念，归根结底是从事物本性之间的相似性得出的。他的错误在于认为一个思想要成为一般的思想，那它必须显示其本身具有一般性的特征。伯克利发现，一种思想是否具有一般性，完全在于此思想之使用以及它与其他思想的关系，休谟对伯克利的这一成就称颂不已。洛克认为抽象的思想极其重要，在他看来，知识就存在于对这种抽象思想同意或不同意的观念之中。他曾声称我们自身的存在和“一位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除此之外，他只承认那些不涉及实际存在的科学才具有认识的确定性。在他看来，纯数学即具有这样的确定性，道德哲学也是如此；他由此得出了他所喜爱的但又难以理解的观点（霍布斯、雨果·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也持相同的看法），即伦理学是可论证的科学。

一般来说，一方面，洛克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至少他否认笛卡儿的假设，即先验的推导是对世界的描述。他确实毫无怀疑地认为，对实际存在的物质的知识依赖于特别观察的证据。然而，他没有进一步认为所有推理都是一种归纳或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总是可以获得确定无疑之事物，因为他决不是一位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洛克将理性与经验融合在自己的理论中，无疑扩大了其理论的应用范围，但也产生了一些缺陷。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两个因素的各自作用，尽管他肯定已注意到了在伽桑狄和霍布斯的学说中就已十分显著的理性与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也未曾试图将之消除。他素不喜欢走极端，这就阻止了他成为贯彻始终的唯心主义者或现象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怀疑论者，因此不会因他思想中忽

视体系而过于不安。虽然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也是17世纪哲学家中最少具备形而上学倾向的，但他却坚定地信奉某些设想，其中之一就是处理哲学问题时采取常识性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颇具吸引力，但当他在处理某些复杂问题时，却缺乏必不可少的独特技巧。

尽管如此，洛克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者。他的认识论对年轻的伯克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被圣公会教士和无神论者用于宗教上的革新。伏尔泰、孔狄亚克和后来所谓的空想家都把他奉为哲学家中最明智的一位：与他的理性主义的先辈一样，他没有写出一部“心灵的传奇”，而是庄重地奉献了心灵的“历史”。因此，在欧洲大陆，他的方法和他的学说或得到诚心诚意的宣传，或被转化为新的感觉论和联想心理学的原则。

故而，广泛地说，从笛卡儿到洛克这一时期，欧洲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伟大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盛行；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兴起。整个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是非物质的精神与物质的肉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思想的方式加以认识的是否正确。理性主义哲学家热衷于抽象思维，他们的出发点是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一是哲学问题与数学问题一样，不仅可以通过说理令人信服地论证，而且也可以通过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论证来加以解决。二是哲学推理尽管被视作先验的和演绎的，但仍然是对现实的描述。经验主义者则趋向于认为，认识的所有原料，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的意义和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最终都来自观察，任何关于世界的结论都是不可论证的。经验主义的真正成就是它消除了较为深奥费解的传统形而上学，并代之以可以在心理数据、归纳概括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探究的问题。同时，理性主义玄学家以其自己的方式同样取得了进步。尽管仍为宗教观念所支配，但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家。事实上，他们对人、自然和真理的批评性和科学性的研究，对传统神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哲学思想同刚刚发展起来的科学基本概念的密切联盟（不是融合）——这是17世纪的一个普遍特征，而且为欧洲所特有——在笛卡儿、霍布斯和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思想家利用他们在数学上的空间和运动概念以及对合适逻辑学和方法论的重要性之强调，大胆预示了随后科学理论的发展。形而上学体系的一个缺陷是，它们的恢宏气势以及力图使现实完全可以认识的目标，主要

是以一切出自人为为代价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观依然流行以及普遍不能将因果联系的思想同逻辑意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也是产生难题的原因。在道德理论领域，虽然有些理性主义哲学家（如斯宾诺莎）以具有新的洞察力见长，但另一些（如笛卡儿）则无甚贡献。另外，认为道德判断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们固有的公平和合理性的那种得到广泛传播的观点对启蒙时代仍有吸引力。总的来说，17世纪的哲学，无论是理性主义类型的，还是经验主义类型的，都为18世纪的理想——理性和人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并不是说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如狄德罗和达朗伯）或其他任何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主要是指某些哲学家。实际上，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他们也比17世纪的任何哲学家更着意于历史。尽管如此，仍然是17世纪的哲学提出了并传下来一些重要的新问题；他们毕竟迈开了第一步，尽管不总是对的，但仍然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尽管笛卡儿、霍布斯、莱布尼茨和洛克的许多理论已经过时，但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对认识论的影响，在3个世纪后仍然存在。

[1] 关于科学革命，见本卷第3章。

[2] 《新工具》（1620），第一篇，第三条格言。

[3] 笛卡儿：《方法论》，第一部分以下；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以下。

[4] 这一提法见A. N. 怀特黑德：《科学与现代世界》（剑桥1926年版），第3章。

[5] 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之女，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外孙女。

[6] K. 雅斯贝斯：《笛卡儿与哲学》（柏林1937年版），第15、30页。

[7] 《皆大欢喜》，第三幕，第二场，第326行。

[8] 语见A. S. 爱丁顿：《空间、时间和引力》（剑桥1920年版），第32页。

[9] 《随想》，第77片段，（布伦奇威克编）。

[10] 莱布尼茨1679年6月22日致马勒伯朗士的信，见普鲁士科学院编《文论和书信全编》（达姆施塔特1906年版），第二编，第一卷，第473页。

[11] 关于田野静室和扬森主义，见本卷第六章边码第132—136页。

[12] 《伦理学》，第三篇，前言；《神学政治论》，第一章，第四节。

[13] 《残篇断简》，卡姆尼茨编（德雷斯頓1929年版），第1730条。

[14] 《伦理学》，第四篇，命题第45，注ii。

[15] Sub quadam aeternitatis specie: 见《伦理学》第二篇, 命题第44, 推论ii。

[16] 不过, 这是B. 罗素的开拓性著作《莱布尼茨哲学评说》(伦敦1900年版) 以及L. 库提拉特《根据未刊布的文献论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巴黎1901年版) 两书中的主要论点。

[17] 《书信集·1741年5月5日致梅朗》, 贝斯特曼编(日内瓦1955年版), 第11集, 第108页。

[18] 《单子论》, 第83页以下。

[19] 《路易十四时代》, 第31章, 见《全集》(巴黎1878年版), 第14卷, 第535页。关于英国皇家学会和牛顿, 见前第3章, 第50—51页; 第55—57页, 第61—65页。

[20] 《人类理解新论》, 第一部, 第一章开头。

[21] 与其学说有关的引起争论之点, 见《皮埃尔·伽桑狄》中的演说, 综合法国国际中心(巴黎1955年版)。

[22] 关于霍布斯及《利维坦》, 见本卷第5章边码第103—105页。

[23] 尼佐利乌斯版的前言, 见《哲学论文和书信》, 莱姆克编(芝加哥1959年版), 第1卷, 第199页。

[24] 《利维坦》(伦敦1651年版), 第13页。

[25] 关于第一代沙夫兹伯里伯爵, 见本卷第13章边码第306页, 第314—319页; 第14章第332—334页, 第344—345页。

[26] 关于洛克和《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 见本卷第5章边码第119—121页。

[27] 《人类理解论》, 第二部分, 第13章, 第2节。

[28] 《哲学书简》(1734年), 第13封, 兰森编(巴黎1909年版), 第1卷, 第170页。

第五章 政治思想

17世纪曾被称作西欧理性主义的英雄时代，而“理性主义”这一术语确实准确表达了这个时期思想的三个基本特征。这就是，第一，伽利略的传统与笛卡儿的传统相结合，也就是说，新的数学—力学科学与自然法思想相结合；第二，政治思想从神学中分离出来；第三，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具有创造性思维。很少有哪个世纪在哲学方面如此富有创造能力，很少有哪个世纪的政治理论如此大胆地企求抵达智力思索的最高峰。但这个时期大哲学家所产生的魅力，对研究这个时期思想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们极易将这些哲学家的创见与其影响混淆起来，极易将这些哲学家在后来具有的重要性与其在同时代人中的影响混淆起来。这些哲学家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远远超前于其时代——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要到很久以后才在思想史上留下明显的印记。斯宾诺莎的重要性最早系由歌德全面揭示出来的，而莱布尼茨的重要性则首先是由德国唯心主义者全面揭示的。故而，同17世纪以后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代的思想史更不能置于真空中予以考虑，而是必须将之同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条件联系起来，因为此时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在不断采取新的形式。

这一点在本卷所涵盖的时期内尤其正确。在本卷所论述的事件中，两种基本政治态度的对比得到了鲜明的呈现，而17世纪的冲突正是围绕这两种基本政治态度发生的——一是颂扬王权神授的思想，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就是这种思想的化身；另一是基于理性的社会契约论，光荣革命赋予这种理论以新的更广泛的历史重要性。这些事件也明确显示了各国中谁有资格在政治理论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状况所发生的变化。这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中没有法国人，这并非偶然。法国的优势在这整个时期都在其他方面留下了印记，并且扩展到形形色色的艺术和学术生活领域，但独独未在仅限于少数精英的政治思想界体现出来。博丹的伟大发现，即他所提出的国家主权是一种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之概念，是法国在整整100年中对这个时代的理论所做出的唯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这一概念显

而易见是为专制君主有权进行国内外统治的主张提供理论根据的。在此以后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仅仅是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和阐明。

人们常常强调，无论就法国国内还是法国国外而言，路易十四选择做出赞同个人统治决定的时代都是十分有利于加强王权的。因为做出这个决定正值两个重要和约签订后国际局势已趋缓和之际，其时宗教冲突正逐渐不太显眼；而随着“参政的国王”使其自身摆脱了全权首相的监护且其本人逐渐成为所有政府活动明显的中心，君主制正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通观全欧，17世纪中叶的革命骚动和其他危机的迹象导致人们渴望和平，这反映在思想世界中，反而促使人们看重无可争辩的君主权力的种种好处。

所有这一切必须牢记在心，如果我们要了解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在他的时代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的话——这种吸引力部分是基于他在强权政治上的成功，但至少在某程度上也与对欧洲各君主均有影响的一种关于理想统治者的普遍而一致的看法有关。因此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必须重视路易十四对自己以及对君主这项专职的看法。积极的政治家——特别是成功的政治家——很少感到有必要使自己主张的目的和法律根据理论化。他对其职位的权限、责任和伦理的看法通常来源于他的实际经验；这种看法只写入与其活动有关的预定逐日付诸实施的文件之中。路易十四的情形也是如此：他的政治思想和观念只能从这类史料中，亦即从书写日期为1666年和1667年的《对王太子的训谕》中推断出来。这些训谕一般都被错误地冠以“路易十四回忆录”之名，但较为确切的是，这些训谕应归入“政治遗嘱”一类，因为其最重要的内容是描述法国所需要的模范国王的形象，也就是国王希望他的王位继承人牢记在心的原则和经验之精髓。确实，这一著作并非出自国王自己之手，而是侍臣根据记录和一般指示写成，尽管不乏修饰和文字上的添加之处，但仍有理由认为，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及其君主观的写照。

该著述中的专制权力概念一仍旧贯：国王是上帝在尘世的副摄政；他的指路星辰是公共福利；他的行为准则由其自身良知决定，而无须因此对任何凡人负责。然而在这个文件中，神圣的使命仅仅成了一种俗套的表述。国王履行统治者的职能时所采取的方式及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得到了阐释：不是将这些方式归因于一种神圣而又不可思议的恩典的启发，而是以一种明显是合乎理性的心理加以分析。君

主高于所有凡人，他的这种地位被视作特殊品质的来源，因而不管统治者的能力和经验如何，他都拥有这样的来源。由于君主凭借出生和继承权，或生来就是统治者，或受命登极，因而只有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广阔视野，致使他获得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决策力。这就使君主能凭借他与其他凡人所共有的智力和常识得出不寻常的结果。事实上，这种高瞻远瞩使他有能做更多的事；相当超脱地看待自己身上理性与激情的冲突，并在关键时刻站在正确的一边。然而，只有与其自身热情的操劳，也就是说与其行动和宵衣旰食同时产生效果，才使统治者的崇高地位具有意义，并在上帝和凡人面前证明其合法性。因此，《对王太子的训谕》完全成了要国王不停地勤于政事的一种忠告，也是激起人们对徒有君主之尊，而不积极履行君主职能之统治者的憎恨的一种尝试。

每每有人指出，《对王太子的训谕》所公开宣扬的只是路易十四本人的光荣。他的努力竟然处处被看作是决定的唯一源泉，以致那些为法国专制君主制铺平道路的先人连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但如果认为这一著述仅仅是对路易十四追逐权力和荣耀的夸张描写，那就将是一个错误。它真正强调的是国家和统治者的完全合二为一。如果人们看到路易十四本人在《回忆录》中对“朕即国家”这句真伪莫辨的警句所做的如下较为完备的表述：“当朕为国家着想时，朕是在为自身操劳。国家的昌盛也就是朕的荣耀”，那么就连这一警句也没有了常常被人认为带有的那种轻浮腔调了。统治者这个“朕”体现在行动即体现在宵衣旰食上，因此就成为国家的精髓即主心骨；就这样，国家与国王本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一分荣耀就会增加国家一分权势和威望，因而只有不倦地为国操劳才能使他产生使命感。个人的地位与国家的地位，还有荣耀的企求——统治者的支配欲——与国家的利益在观念上是没有分开的。

在这方面，《回忆录》可以看作专制主义理论经过某种“现代化”洗礼的典型证据。即使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其内里仍可清晰地分辨出一种传统的宗教职责观；但这种宗教职责观的真正内容都失去了，因为统治者的自然属性及其发展都以一种新的和纯心理学的方式加以解释——甚至在当时，这种解释看来也难以要求得到任何神学论据和伦理论据的支持。旧的王权神授理论如今可以说是由十分接近于17世纪理性主义的论据加以支持和证实，正是这一点将《回忆录》同

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一个伟大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也就是同根据人的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对人性进行“教化性”的观察联系起来。总之，有关统治者这位“九五之尊”在紧要时刻不得不予以承认的法律、伦理和宗教种种限制的问题并未被认真地提出来。将所有政治权利和政治智慧都归于统治者“自然属性”的做法，预示着路易十四统治末年的浮夸和衰退。在法国那个伟大君主统治时代灿烂的开端，在那位年轻的统治者陶醉于其最初迅疾获得的胜利之际，他还不可能了解专制君主制的基本道德问题，也就是说，还不可能了解作为凡人的君主拥有的有限能力与他在理论上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回忆录》的理性心理学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最多只是隐瞒了这一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本身变得清晰可见时，才会有人谋求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而此事之成为可能，又只有在法国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回顾君主制所负的神圣使命并苦苦加以思索之后。这正是路易十四君主统治最杰出、最雄辩的解释者波舒哀所选择的方法。

波舒哀思想活动的特点是他涉及各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并用完全不同的文字形式加以表达。要全面评价波舒哀的政治思想，就必须涉及他的所有活动领域：他是写《世界史教程》的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写《新教演变史》的驳斥谬误的神学家；是写《法国教会》的研究教会政策的专家；是写《悼诔集》的雄辩的布道师；也是17世纪各教会大论战中莱布尼茨的对话者。不过在本章中，我们只讨论他一部属于狭义政治学的著作——《根据经文论政治》。该书动笔于其壮年时期（1677年），并且使他一直为之忙碌到去世之时。

波舒哀的《根据经文论政治》不是一部纯理论著作。相反，它服务于一个突出的实际目的，即教育王太子。在专制君主制度中，教育王太子是一件与公共利益攸关的事。《根据经文论政治》这一奇异的书名既令人发生误解，又是当时条件的产物。该书给人的印象是，波舒哀想否定政治，因而也就是想否定国家有权独立于神学而存在。该书似乎是要用《圣经》的权威来取代对国家性质的理性和系统的检验，事实上人们往往就是这样理解或者说曲解此书的书名的。事实上，波舒哀用以立论的《圣经》根据即便不完全是肤浅的，也肯定不是首要的。有人也许会说，引证的《圣经》根据主要不是用来支持他自身的立论，而是用来驳斥其对手的立论的，尤其是新教的抵抗权理

论，由于这种理论用《圣经》来论证，因此必须用《圣经》来驳倒它。

然而，波舒哀经常引证《圣经》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根据经文论政治》中所展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肯定不是由《圣经》激发的。《圣经》仅仅是用来强调波舒哀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事物。在他看来，理性基本上足以揭示使帝国具有合法性的缘由和回答该世纪的重大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因此，波舒哀能够允许世俗世界在一定范围内决定自身的法律并按照对自身和人性的认识来解释历史与政治——因为他以其神学家的身份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从属于人类难以理解的神的救世计划的。在波舒哀看来，国家的权力不仅源于神的安排，而且也源于自然的必然性。只有当大自然促使每个人不可避免地服从于君主，乌合之众才会形成国家。这种观点不禁令人吃惊地联想到霍布斯；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是如此相似，以致有人认为霍布斯对波舒哀有直接的影响。我们既不能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波舒哀肯定知道霍布斯其人，霍氏的著作有几种译本为路易十四统治时的法国所知。因此，这位17世纪最革命的思想家很可能向保守的波舒哀提供过可用于适合他自己需要并与原罪的教条相一致的论据——这是一种奇怪的理智上自我矛盾的倾向，但如果对照它的时代背景来看，就不太奇怪了。因为最打动霍布斯的读者的以及大陆读者最易了解的，并不是霍布斯学说中隐藏的革命内容，亦即并不是其理性地指出专制权力源自服从之契约的理论，而是这种内容所采取的可用以驳斥抵抗权那种颠覆性理论从而支持正统统治者权力的论述方式。

当然，波舒哀知道自古典时代以来历史上存在过多种形式的国家和政府，而且他谨慎地不把君主制说成唯一合法的权力形式。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权力一旦被传统奉为神圣并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那就基本上不会受到批评。但君主制与神的旨意最为接近，因为它最能摆脱无政府状态，并为和平与秩序提供最好的保证。在《根据经文论政治》中，波舒哀认为君主制有四个基本特征，这就是神圣性、家长式统治、专制性、与理性相协调一致。第一个特征所描述的是君主制的起源，第三个特征所描述的是君主权力的范围，而第二个和第四个特征都与统治者的职责有关，它们所描述的都只不过是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对君主的行为没有强制力，只有指导力，但它们在波舒哀的

政治思想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品质构成了波舒哀区分专制政府和专横政府的重要根据。在波舒哀看来，专横政府同任何有序的政权截然对立，因而也与正确理解的专制政府相对立。专制政府和专横政府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两种政府的最高权力都不受任何人的制约。但在专横政府中，臣民是奴隶，成了使该政府显得野蛮狰狞的那种无法无天专横的牺牲品；而在专制政府中，臣民则享有受特定传统和理性要求约束的一种权力之有效保护，这是一种承认上帝为所有凡人定下的种种限制之政权。当波舒哀向君王进言时，他竭尽其笔力描述了这些限制：“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是他在树立你们为人类谋福利的权力。然而，你们这些受人尊崇的君主啊，也是血肉之躯、尘土之身，也要像常人一样死去。”

这种对专横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区分，包含有对波舒哀生活于其中并为之而写作的那个君主制国家的含蓄颂扬。因为在那里，即在最古老、最值得崇敬的形式——世袭君主制——中，专制政府与一种传统法律秩序的联系，在他看来，肯定以可作样板的方式展现出来。波舒哀知道并使用lois fondamentales（基本法）这一在法文中具有许多不同含义的概念，不过他在使用该词时超越了他那个时代通常具有的含义，不仅把个人自由，而且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性也包括在内。在这方面，波舒哀同极端专制主义的提倡者分道扬镳，后者坚持君主的专制权力应扩大到其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拉布里耶尔在《品格论》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把这种思想描写成“谄媚之语”；但他非常清楚利用这种思想的不仅是奉承之徒，而且也有严肃的作家，在那些作家看来，这一思想是以一定的逻辑源自“绝对权力”这个概念的。而路易十四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概念。

波舒哀的《根据经文论政治》不能算作17世纪最伟大、最深刻的政治著作。该书在将神学与推理结合时过于折中，过多特别的辩护，以致不能纳入该时期大思想家的著作之列。尤其是，《根据经文论政治》不是哲学著作，与其作者以及它所服务的国家一样，该书属于政治与神学合二为一，而且早已被新时代抛诸脑后的那个旧世界。然而，正是这种理智上的矛盾，使《根据经文论政治》能正确表述这样一种权力，即这种权力的存在理由和合法依据在于其本身，在于它体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权力分量，在于它自身的成就，在于它可能有的保存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于围绕着它的宗教启示的光环。所有这一切

在波舒哀的《根据经文论政治》中都被一一指出并得到发挥，同时有两个对当时人肯定有启发性和极有说服力的论据加以佐证，这就是，他以上帝的旨意和尘世的功利来证明君主制的合理性。一方面，他指出君主制具有使其优于其他所有政府形式的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以传统作为所有合法性的最有效的根据，因而他也能表明，传统在政府日常活动中的良善影响如何使君主拥有的无限权力变得可以忍受，亦即它如何使国王最恭顺的臣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序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以法律为基础并为传统所尊崇，同时对专制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因为对他来说关心和保护其臣民是最高职责。波舒哀的“上帝的副手”不是其权力以令人惊恐的一致性扩大到众多孤立个人头上的“利维坦”；他的权力凌驾于国家和各阶层的臣民之上，但反过来，他通常也得尊重古老的习惯和久经考验的宪法。

与所有政治思想领域的伟大传统主义者一样，波舒哀的弱点在于，就他看来，法律和习惯是混同的，因此政权能否存在就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决定性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波舒哀政治理论的中心点是“根据因袭习惯（prescription）而取得权利”的思想，100年后，“prescription”成了伯克保守政治观中的关键词。当波舒哀著书立说之时，法国的专制主义在现实和理论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波舒哀处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成熟过程的最后阶段，他所系统表达的理论彻头彻尾为他所颂扬的政权提供理论的依据。但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亦即最终打败波舒哀描述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君主政权的那股力量，这时已清晰可见且气势逼人。波舒哀活着的时候就已在朱里厄和莱瓦索的争论性著作中看到了这种力量的挑战。不过，《根据经文论政治》是在“伟大君主统治时代”鼎盛期写出的，其时新理论巨大的爆炸力似乎正前所未有地为君主制思想战无不胜、强劲无比的力量所扼制。这是专制主义信条最为盛行的时刻，事实上这种信条行将在其受到最严重挑战的国家——英国——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并从后来的发展着眼，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看起来就像一场昙花一现的宪法妥协；但在当时的观察者看来，其意义却要大得多。复辟未流一滴鲜血，轻而易举就取得了胜利，看起来就像神通过一个判决来斥责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这一判决有利于查理一世奉神意为之殉难的世袭君主制。人们或许会感到奇怪，王权神授理论不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而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得到

最强烈的表述——这一事实，只有当人们追溯这个世纪上半叶震撼英国的宪法大冲击时才能得到理解。这场大冲突的实质部分是，英国注定要比其他国家更明确地显示这个时代两大相互冲突的政治原则。当争论开始时，没有人能比英国杰出的御用学者以更显著或更具挑战性的方式提出专制主义的政府理论，也没有哪一个地方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抵抗权学说得到像在英国那样的强调。在大叛乱中，抵抗权理论所向无敌，并征服了国家本身，直至克伦威尔独裁时期才自行否定。然而，如果抵抗权没有同宗教群众运动的冲突密切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斯图亚特君主在同议会的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把自己同惹人憎恨的主教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挑战。托马斯·霍布斯敏锐地看到了这两者的联系，如果说正是这种认识最早使他的思想发生革命性转变（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也是当时条件的产物。

尽管霍布斯最伟大的政治著作《利维坦》直到1651年才出版，但仍是其基本特征在早些时候就已得到表述的一个全面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利维坦》出自霍布斯的一个信念，即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能陈述得像几何学陈述各已知图形大小之间的关系一样精确。在这部著作中，该时期的数学思想（霍布斯是其开拓者之一）被极其大胆、极其严密地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就霍布斯看来，只有纯理性和源自理性的数学方法才能有效地应用于对公共生活的观察之中；先前所有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的哲理上的思考，在他眼里都受到激情和教条式偏见的影响。从这一观念出发，托马斯·霍布斯善于思索的头脑形成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类学，这与英国内战令人丧气的经历不无关系。恐惧这一天然推动力，也就是霍布斯亲身体会过的那种力量，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政治思想体系中，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政治行为，都被视作出于安全 and 自我维护的需要。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古典的自然法理论的根本否定。导致人们建立国家的不是其社会属性而是理性的要求，理性教诲人们应把横死视为最大祸害而予以避免。与其他任何持久的人类关系一样，国家的形成不是源于仁慈而是源于彼此的恐惧。为避免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互相残杀，众多个人同意无条件地服从单个人的意志，这一单个人也就成了具有最高权力的“伟大利维坦”。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维坦”究竟代表何种政府形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但霍布斯明确表示，他认

为君主制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在君主制中国家和君权的合为一体得到最明确的体现。

正是霍布斯对这种在其同时代人中非常流行的君权观念作了最广泛的解释，也正是霍布斯认为君主享有迄今为止一个人让与另一个人的最完全的控制权；在霍布斯看来，君主的权力确实是无限的。君主是正义的源泉和法律的制造者，他的权力可以扩大到私人生活最为隐蔽的领域。对于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财产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不存在的。国家是所有宗教和世俗法律的唯一解释者。上帝的戒律通过世俗权力之口来传达。教会及其宗教仪式并无真正的宗教使命，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为全权的国家提供宗教权威的外表。总之，国家本身被神化，因为其权威破坏了任何个人的职责，甚至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是如此。这一残忍的“人间上帝”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他提供的服务，以及无条件服从他的人所感到的对安全的需要。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最终可能会陷入的不可思议的窘境。他的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孤立的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些人经过冷静的思考，将自身交由一个全权的国家加以保护。霍布斯思想中的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使他的学说明显不同于现代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尽管人们常常错误地将它与之相提并论。

因此，霍布斯的学说一方面为最极端的专制主义思想辩护，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它的迷惑力。在其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哲学中，国家完全失去了那种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以往就连最大胆的思想家的想象也认为有必要以之围绕神授的王权及其选定的工具的。这一点较之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说明，霍布斯和他所处的国内环境（即复辟时期英国的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他那长达九十有余的一生是在此环境中结束的。在欧洲大陆，霍布斯长期被视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以至于与他完全敌对的人也从他那里借用思想；而在英国人们则一直把他视为“不信教的创始者”，把他声名狼藉的“利维坦”神话视为出现专制主义和专横政府的祸首。霍布斯曾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克伦威尔专制独裁的一边从而背叛了皇家的大业，“利维坦”不就是因出现克伦威尔的专制独裁而得到唯一体现的吗？在英国人眼里，除了霍布斯狼藉的名声之外，还会联想到那场与传统的大决裂，而霍布斯自己的国家学说事实上正源自那场大决裂。正是要救治这种与传统的破裂才使复辟的君主制具有意义和效用。复辟能够而且必须

依据的唯一理论就是已被抛开的英国君主制传统——这是一种专制的却不是暴虐的传统，它既诉诸感情又诉诸政治理性，其基础是自然继承而不是某种人为设立的君权。同其他体制相比，这种体制更不能否认神授是其合法性的源泉。所有这些优点都被统一在古老的王权神授的理论之中，这种理论现在业已以更适合其时代的形式重新振兴。内战时期王党的口号——不抵抗、世袭权不能废除、消极服从——成为极为流行的向复辟君主表示忠诚的口号。

王权神授理论的流行及其有限的潜能，都是颇有代表性的，这体现为：在复辟时期的英国，王权神授理论有众多支持者，但缺乏第一流的新理论家。在罗伯特·菲尔默爵士从内战时期就开始撰写的《家长制》中，王权神授理论得到了表述。尽管该书迟至1680年在作者去世多年后才出版，但很快一版再版，变得风靡一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既不是因为其思想深刻，也不是因为其文字优美。如果不是洛克在《关于世俗政府的第一篇论文》中的著名驳斥使它在政治思想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很可能很早就被人遗忘了。不过，洛克认为该书值得一驳，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该书在当时的政治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家长制》之所以获得成功，有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它把君权至上的两个主要论据，即它源于神授，以及其天然和理智上的合理性，特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菲尔默明确地将重点放在第二个论据上，因为他可能隐约地感到，这比任意将他在论证王权神授时不得不依据的《圣经》引文掺和在一起更能令人信服。绝大多数王权神授理论的拥护者在论证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和神的认可时都把《圣经》中存在过王权作为依据，菲尔默则不然。他说，由于君主制同大自然是和谐一致的，因而君主制必然得到上帝的激励和创立。他的整个立论基础是将君主制等同于家庭，将王权等同于家长权。在这一论说中，菲尔默用“国王是其民众之父”这一古老的比喻为专制主义理论提供理性的证据，因此菲尔默事实上成了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家长制理论的奠基者。这种理论为君主制的捍卫者提供了新的论据，它召来了自然法则的佐证，从而不会对君主制的神圣性产生怀疑。在菲尔默看来，圣经仍是所有政治智慧的最后来源，但菲尔默不是仅仅把圣经看作引经据典的文库，而是看作对早期社会及其君主——家长制政府起源和性质的一种真实描述。他有着霍布斯、洛克以及所有契约论的支持者从未

有过的想法，也就是他认为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天然和必要条件，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所决定的人为产物。这种论点使他回归到有点像亚里士多德有关国家起源的伟大理论。不过，由于菲尔默认为《旧约》中描写的家长制社会事实上是可供所有时代借鉴的唯一天然典范，这样就使他自己陷于易遭攻击的危险境地，他的理论迟早要成为现代自然法理论无情逻辑的牺牲品。洛克善于批判的眼光很快看到，菲尔默的理论其弱点是，在现代社会与原始形式的家长制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他毫不费力就能证明，《圣经》中所显示的政治社会的开端绝不是天然的。由于菲尔默试图使父权成为所有政治权力的来源并把现代国家——在菲尔默看来就是世袭君主制——的产生追溯到亚当时代，因而其论点的说服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实际上这是王权神授理论在理性上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然而正是这一事实有助于产生一种与之对抗的意见，从而导致最终以新的更合逻辑的有关国家和社会起源的思想替代王权神授理论。

当波舒哀在法国写他的《根据经文论政治》，而王权神授理论正在英国取得官方理论的地位之时，在荷兰有一位死于孤独的思想家也不自觉曾证明专制权力的合理性，尽管他是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并得出不由自主的结论。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巴鲁赫·德·斯宾诺莎常被认为酷似霍布斯——连其同时代人也如此认为，他们对他有误解，尤其是他们把他看作一个大无神论者；事实上，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相似性绝不是表面的。他们都急于对宇宙做出理性的解释，都相信以几何学为基础的思想方法，都重视权力和权力欲，都对人性持基本上是悲观的看法，亦即都认为人性是由激情和欲望支配的。但这些相同的观点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在霍布斯的体系中，所有关系都是以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思想方法来加以解释的；而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所有关系则扎根于超验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上帝与大自然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整体，而自然界的所有不和谐则永恒地联系在一种神圣的和谐之中。就连各种自然状态的争斗，在霍布斯的机械论思想中，也仅仅被简洁地和严峻地看作一个事实；而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中，则以一种兼有一元论和泛神论的哲学加以阐明，使自然事物的力量上升为上帝永恒力量的工具。正是这种确实开黑格尔思想之先河的见解使斯宾诺莎的思想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并使他在所处时代的思想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斯宾诺莎这种严格、冷静、明显不受环境影响的思想同当时的政治现实发

生了冲突，作为一个思想家，斯宾诺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他的伦理理想与他眼中的现实世界之间处于紧张状态的产物；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他的思想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的。

斯宾诺莎在两本著作中详细讨论了政治问题，一本是写于1665年前的《神学政治论》，另一本是《政治论》，该书在他1677年去世时仍未完成。在这两个年代之间，他的亲身经历增加了他对政治的了解，其结果就是他在后一本著作中作了好些独特的修正。斯宾诺莎是在一个当时被当作政治自由之堡垒和宗教宽容之先锋的国度里获得其体验的。正是在荷兰，也许只有在荷兰，那些由于宗教原因而被逐出自己国家的人士才能太太平平地生活。然而就连在这里，这些避难者也完全过着隐匿的生活，在正统教士猜疑的眼光下打发时日，他们所接触的仅限于几个恩主和朋友。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同时受到了荷兰共和国内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以最严厉言辞进行的评判，这一事实很快使他遭到与诸如门诺派那些教派的信徒相同的命运，门诺派享有的宗教宽容非常有限，并时有被剥夺之虞，他们同代表着英国清教的独立派教徒和公理会教徒保持着密切联系。看来可以肯定：斯宾诺莎对他们是熟悉的，甚至知道他们的某些民主管理教会的理想；这在多大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基本政治信仰，那是一个至今讨论不休的问题。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在《神学政治论》中，直接民主——在平等公民集会上做出的大多数人统治——被描述为“最自然”的统治形式，并被斯宾诺莎用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君权的性质。必须承认，以此方式产生的国家有着霍布斯笔下的国家所有的基本特征；但其基本政治民主仍是一种理想，即使它在实践上会导致霍布斯著作中的那种全能国家的产生。在《神学政治论》中有一句名言，即“国家的真正目的是自由”，它提出了作为各种形式政治组织的最终目的之概念。

斯宾诺莎最后如何回答“何种类型的国家是最好的？”已不得而知，因为《神学政治论》残本刚好在斯宾诺莎论述民主问题这一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但他最初的态度到这个时候肯定已变得不那么固执，表明这一点的是如下事实：正是这时，他在其论证中提到了另两种古典型政体，即君主制和寡头政治，并利用两者作为主题，借以进行有关可能有的最好政体之性质和功能的讨论。事实上，有许多迹象

可以表明，这一改变是由他对自己生活于其下的特定制度的亲身感受所促成的。与当时所有的“共和国”一样，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基础也有着明显的寡头政治的烙印；这一点在斯宾诺莎在世时尤为明显，因为人民大众和王室与寡头政治抗衡的力量——奥伦治几代亲王控制下的执政制——已将其大部分权势让与显要的商人阶级，该阶级的发言人约翰·德维特大议政在国会中是首要人物^[1]。这位具有广泛修养和哲学头脑的政治家同斯宾诺莎有过一些交往，这些交往至今常常有人予以过高的评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斯宾诺莎是德维特的一名崇拜者，在1669年定居海牙以后对其具有选举倾向的祖国的政治日趋熟悉。他生活在一个鼓励文化繁荣的富裕国家的政治中心。极有可能的是，他目睹的证据使他相信，他如此重视的知识自由在这种政体下比在民主政体下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民主政体中常常会发生未可预料、充满激情的群众运动，而在他所生活的世纪里，这种运动又几乎总是同宗教热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斯宾诺莎本人肯定目睹了他所欣赏的政权在狂热暴徒的可怕暴力下土崩瓦解。实际上，他看来是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后^[2]，约翰·德维特及其弟被暗杀的见证人。上述入侵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之起点，路易十四在这场战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也是专制君主制对寡头共和国，大陆强国对商人和水手的国家，进攻政策对防御政策，物质力量对道德原则的胜利。整个事态表明，就连最自由的宪法都不能保证国内外的安全。即使像斯宾诺莎这样遁世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结论，因而一定是他本人的痛苦经历才导致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明显修正自己的政治思想：“国家的功能纯粹是而且只能是保证和平与安全；可见，最好的国家是，人们在它那里和睦相处，他们的权利在它那里不受侵犯。”

就这样，斯宾诺莎也委曲求全地仅让知识分子在私人领域享有思想自由，从而结束了其关于理性在国家中的地位的伟大独白。实质上，这是当时明事理的自由思想家同这个世纪的全能国家达成的审慎的妥协。权力属于国家，而且——由于强权和权利是同义的——国家也有权做任何使自己能存在下去的事。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国家利益——国家愿将思想自由的权利给予无条件承认其权威的人。实际上，导致斯宾诺莎证明全能国家之合理性的是与霍布斯同样的个人主义动机，即国家是个人安全和思想自由的保障者，不过在斯

宾诺莎的论证中，这一观点能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而且也思考得更透彻。尽管斯宾诺莎哲学骨子里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冲动，但仍不能摆脱17世纪思想的局限所强加给他的功利主义的束缚。这些局限是，第一，由于自然法理论得到普遍接受，习俗总是从众人的共同需要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第二，当时的政治和宪法状况，使最富独创性、最有主见的思想家也都经久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权以及事实上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能摆脱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时代都居于支配地位，并构成政治思想家与政治现实发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尽管常常是隐蔽的、未被承认的根由。斯宾诺莎是在做出种种伟大决定之时期的一个主要风暴中心遭遇政治现实的。一个恰好与他同龄的同时代人，塞缪尔·冯·普芬道夫，则是在相对宁静的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诸邦国遭遇政治现实的。仅仅这一事实就意味深长地说明历史因素和民族因素所赋予德意志17世纪自然法理论的一些特征。

德意志同其他地方一样，17世纪中叶也成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事实上，德意志的变化也许最明显、最清晰可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德意志各诸侯国上升为独立国家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进程。正是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那种专制君主国的胜利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些德意志小邦国而不是在大王国，个人对专制主义的压力感受最深。然而，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狭隘并非毫无活动余地；在某些方面，德意志的政治思想从中获益匪浅。和其他地方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德意志的政治思想家也乐于把新的数学科学和自然法结合在一起，但他们在德意志工作的特殊条件导致他们把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新思潮汇入西欧思想的伟大哲学长河之中。在这种面积很容易就丈量清楚的德意志蕞尔小国里，政治思想家不可避免地要同事实密切接触。正是因为国家干预生活的每个方面，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任何可靠的学术生活或科学活动只有采取为君主服务的形式（如大学教师、法律顾问或外交家）才有可能进行，故而政治理论几乎总是关注着日常的政治经验，这就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倾向于吸收诸如历史学和财政学等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之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政治理论提供了可靠的知识领域，使它更接近于现实。

三十年战争的后果有助于加强政治理论和日常政治经验的这种结合；因为战争及其结果给德意志各邦国提出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以及宪

法和公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必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考虑和解决。各邦国政府在试图解决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时，从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学术力量，即业已世俗化的自然法观念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同盟。这种观念为要求君权的主张提供了可能是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这类君权不能像较古老的王国那样诉诸王权神授理论。当这个产生宗教改革的地方其宗教活力业已枯竭之时，这类君权不受教义束缚的特点具有特殊的价值。在这些既小又穷以致强权政治很少有发展余地的邦国，其臣民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就被视为国家最高的而且确实是真正的目的。早在17世纪，自然法理论就是使德意志——只有德意志——专制主义和启蒙思想相结合的根源。当斯宾诺莎受到全欧宗教界诋毁之时，却有一位德意志选侯即“一冬国王”之子帕拉丁的查尔斯·路易，给他以大学教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查尔斯·路易想弥补其父所造成的那场灾难，不仅要采取补偿战争导致的物质损失的办法，而且要采取一种具有远见的宗教宽容政策。

这就是德意志当时最富建设性的政治思想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在著述时的政治和智力背景。普芬道夫生于1632年，其时正是战争犹酣之际。他的家庭环境朴实无华，其父是萨克森的一名新教牧师，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神学家，但普芬道夫却致力于研究法律、哲学和自然科学。在耶拿，普芬道夫受到日后也教授过莱布尼茨的数学家兼哲学家魏格尔的影响。正是魏格尔介绍普芬道夫读笛卡儿的《方法论》，或许还曾介绍他读伽利略有关物质世界的描述。因此，普芬道夫接触到了当时新的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潮流，同时他在雨果·格劳秀斯和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中了解到了自然法这个崭新的世界。作为瑞典驻哥本哈根大使的家庭教师，他不自觉地同世界事务发生了联系，因为1659年丹麦—瑞典战争爆发时，他遭逮捕，并被囚禁了8个月。他利用狱中空闲的时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书《法学知识要义》。对普芬道夫以及当时另一个伟大的法律思想家格劳秀斯来说，无缘无故和纯粹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囚禁的遭遇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经验，构成他们对自然法原则进行反思的背景。被释放后，普芬道夫到了荷兰，从而大大拓宽了其政治和历史视野。但是他后来还为一位德意志王公服务，担任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和自然法教授，视之为发挥自己专长的所在。不过，普芬道夫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与其说他是一位学究式的法律家，不如说是一位哲学家和政治作家。直到他应瑞典国王之邀抵达隆德后，他才成为自然法和国际法教授。正是在瑞典，他

于1672年出版了以《自然法和国家法》为书名的主要著作，确立了他 在欧洲的声誉。晚年，他变成了一位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为 瑞典国王服务期间写了一部瑞典帝国史；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死时是勃 兰登堡选侯的宫廷史官。

这些事实指明了17世纪一个德意志学者和国际法专家能从事活动的 环境，其中有些方面在这个时代是颇为典型的。它们也展示了普芬 道夫在自然法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普芬道夫的目标是 通过把各种学科及其方法结合在一起，使自然法理论形成体系。他把 哲学、历史和数理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把这些学科不同的方法 熔成一个单一的新统一体。这种将数理证明和经验性调查研究相结合的 做法是他对学术最富创造性的贡献，但这也限制了他的视野。因为 正是这些完全不同的方法的性质，使得任何将它们结合起来并将成果 应用到自然法领域的尝试都不可能完全成功。结果，他内心的理性主 义和经验主义发生冲突，尽管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理性主义者 相信自己通过理性能够找到一条道路通向人们在道德、法律和政治方 面必须遵循的那些自然法原则和基本法原则。但经验主义者发现自己 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问题——自然法的起源问题——尽管通过理性可以 认识这一问题，但仅靠理性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普芬道夫认 为自然法的起源同历史的经验相矛盾，他才既否定格劳秀斯认为法律 源自社会本能的理论，也否定霍布斯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源自自我保 存本能的与格劳秀斯相反的理论。因此，他不愿做出有关任何社会契 约的假定，因为这种假定找不到历史证据；而是假定一种孤苦无依或 “低能”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无时无刻不在，并迫使个人形成社 会。通过这一世俗化的形式，路德认为国家源自上帝所制定的权宜之 计的论说清晰地 在普芬道夫的思想中得到共鸣。在普芬道夫看来，法 律基本上也是必然的产物，不是表达什么神意的，而是表达某种明确 是人意的东西。这就产生了普芬道夫毕生对之探讨的问题，即自然法 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国家之间的联系问题。诚然，他与霍布斯一 样，没能将国家的权力同自然的支配看作是同义的；然而，他已非常 接近于这一观点——再次与格劳秀斯形成对照——把体现在国家之中 的自然法视为成文法的唯一源泉。

普芬道夫的体系是由在他之前出现的一些观点综合而成，因为作 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是博丹而且更是霍布斯的一个信徒。他也追随

这个世纪的时尚，认为国家是无限君权的所在地，它不受任何教会或政治权威制约，并在种种权利上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最为清晰地表明这一点的是他那众所周知的对德意志特殊宪法问题，即帝国与各邦的关系的态度。

一方面，德意志人所拥有的同属一个民族的意识同他们在这个世纪政治现实中遇到的新的国家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深深扎根于德意志的历史之中。在法国，国王的专制权力连同其宗教基础长期以来一直同国家对统一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英国，国家的利益与统治者的特权之间也从未有根本性的冲突，尽管对王权的范围和限度是有着激烈争议的。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新的君权观念只有利于各邦，随着这一观念的深化，不可避免地使帝国形同虚设。自主的小君主国的国家利益同包含所有小国的帝国这座古老大厦的利益之间，小君主国和帝国彼此对帝国传统宪法的解释之间日益增长的反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增加了重新明确规定帝国和它松散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要求。普芬道夫就是众多着手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人士之一。早在建立全面的自然法体系之前，他就发表了一部分分析和批评帝国宪法的书，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直至今天仍是德国政治文献中的经典著作之一。

当然，在普芬道夫之前，德意志已有许多重要的并广泛被人阅读的论述帝国思想和宪法的论文，而且普芬道夫也充分利用了这些论文；不过这些文章都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因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党派性的。另外，普芬道夫自称已提出了一些比较现代的而且确实是革命性的东西；他旨在采取一种科学的方法，因而包含了对现存国家进行推理性的评论。他可能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为他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个毫无光彩的书名《德意志帝国状况》，并以“意大利旅行家塞维里努斯·德·蒙扎巴诺”这一假名发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其独创性并不在于经常被引用的把帝国描写成宪法“怪物”的段落，而是在于其全新的和鲜明的不受当时所有政治权威束缚的独立性。他既不为邦主国君和三级会议的特殊利益辩护，也不为哈布斯堡皇帝的特殊利益辩护。他的立场完全是帝国的立场，但这一帝国由于没有任何单一的君权，因而在普芬道夫看来它是一种国家间的联盟，而不是一个单一国家。不管作为通晓政事者的他对此感到多么遗憾，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却不能不指出，历史的发展已导致帝国永远

背离单一国家的结构；一些持久的事物只能在由许多新的地区性邦国构成的框架内得到发展。由于这一理由，他把帝国视作由各国组成的联盟，而且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对德意志的宪法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对历史上不可改变的事实的冷静估计，是同普芬道夫政治思想的一个深层特征，即他对政治世界问题所采取的“资产阶级”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他早已从现代社会“统治者”与“臣民”互相对立面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视之为理所当然之事。他关于改革的详尽建议表现出同样的“资产阶级”精神。他的许多要求——通用的货币、废除关税和贸易障碍——对德意志市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利益具有特别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普芬道夫堪称18世纪城市文明的前驱者之一，而德意志的城市文明又是在开明专制的保护下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开明专制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他的名字同这种典型的德意志式专制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据说，他的理论就是“创立来衡量”这种专制主义的。然而，他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这类小专制君主国家却不应估计过高。在普芬道夫看来，君主不如国家重要，因而他必须把国家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普芬道夫也坚持基督教具有超常性的思想，尽管他摒弃教条那种日益狭隘的影响。国家肯定不是为了教会而存在，但在信仰事务上，国家没有任何强制权。普芬道夫把教会看作国家这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团体的一部分；但他也把每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社会看作是基督教的——他所说的基督教是新教。纯哲学的自然宗教并未为他所设想的国家提供充分的伦理基础。这一点尤其使他既区别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又区别于托马西乌斯教条式的理性主义及其对天启宗教的敌视，尽管如此，在后来所有的德意志政治思想家中托马西乌斯仍是与他最为接近的信徒。

普芬道夫以显著的方式体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和他所在的德意志环境特有的种种政治思潮。他的明白确切和独到见解足以表达所有这些思潮，但他不是个创世天才。的确，这一点说明了其影响和声名所波及的范围，这种影响和声名在德意志要到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弗崭露头角后才暗淡下来。他效法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建立体系的做法，但也表明了这个世纪对其政治作家所要求的实际意识和不作空想。他也完全拥有这个世纪乐观地相信理性力量的态度，但仍扎根于自己的新教传统。大思想家的哲学洞察力在他

那朴实、缺乏思辨、有时相当枯燥和迂腐的头脑中是没有的。普芬道夫在学术上的这些缺陷，曾被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看出过，他曾经说普芬道夫是“一个少见的干练的法理学家，却是一个渺小的哲学家”。

如果将普芬道夫同做出这一评论的那位著名得多的人士对比一下，那么这些缺陷就会表现得十分明显。无疑，莱布尼茨也代表着他所生活的世纪，而且其意义要比普芬道夫重要得多。但每一个天才都会遇到的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同他的时代完全合拍；他的视野超越了他的时代，但又每每受制于这个时代。第一个特点特别适合于莱布尼茨；第二个特点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他，即尽管命运注定他有大福，但他最终却死于孤独和失望。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只完成了一半。造化并未让他记下其毕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他的政治思想是混杂在他的基本哲学、科学和宗教伦理思想的总内容之中的。它从未形成一种能使他在政治思想史中占明确地位的精密而又自成一体的理论。他的思想部分的也是由一个卷入政治决策过程的人强烈的愿望所决定和支配的，哪怕他同这种过程只有些许关系。这也使莱布尼茨有别于他同时代的其他大思想家；在他看来，有关政治和政府的资料不仅构成了巨大的观察领域，而且他感到不得不在自己有限的可能范围内积极予以干预。尽管他不是职业的政治家，但他毫不犹豫地使用政治武器为他的庞大计划服务，因此他的生命似乎是同当时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各种出使活动以及在为王公雇主起草备忘录的过程中，耗尽了某些最好的才能。诚然，没有什么比下列事实更能说明德意志状况之狭隘和贫困了，那就是这个时代最弥足珍惜和最为自由的思想家居然屈居居尔夫世家史官之位，从而依傍于一位王公，以致在几乎是羞辱的依附他人的情况下终其一生。因此，莱布尼茨的许多政治著作纯粹是为了促进王朝的利益而作，或只涉及一时一地的事情。

甚至他最著名的政治著作《埃及人的智谋》和《基督教战争》也是如此。因此，这两本著作最好被看作当时历史的史料集，而不是莱布尼茨最深层信念的载体。这些深层信念所涉及的是一些远非纯日常政治领域的思想领域（确实只是在表面上涉及），即涉及莱布尼茨的欧洲文化概念，涉及其建立一个全面的科学组织的计划，以及涉及其基督教情感。这又给他提出了三大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德意志，也就

是帝国与其他民族和邦国的关系；二是如何克服宗教分裂；三是如何解决基督教信仰和机械科学理论的日益增长的冲突。只有将莱布尼茨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与他那个时代习惯的思想范畴结合起来考虑时，才能最深切地感受到他体现出来的学术上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他似乎是预见未来几个世纪的先知，是正在发展的学术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向导，而这些力量未来的重要性是其同时代人无法见到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继续依赖于他那整个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观念。

这在他对待自身所处的德意志政治环境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他看来，中世纪的皇帝概念仍具有某种意义；帝国是一个比纯粹的国家联盟要大不知多少的实体；帝国是具有基督教性质的君主机构。尽管他肯定希望帝国首先是德意志的帝国，但他也把帝国看作整个西方的象征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欧洲学术统一体的象征。在他看来，帝国“概念”，也就是他希望看到人们也理解的帝国“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意义与他哲学中“和谐”这一中心概念的意义相同——一种较高层次的统一体，其中的各个部分都保留了自身的特征。由于这一原因，尤其是因为帝国包含多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他希望保持古老的帝国宪法。也由于这个原因，他视帝国为欧洲国家共同体和欧洲均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如果整个欧洲大陆由法国君主进行统治，那么无论是帝国还是欧洲都将受到最严重的威胁，而且当时各国权势关系的变化在他眼里似乎已使法国君主的统治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莱布尼茨“帝国爱国主义”的根源，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针对法国及其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不过，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整个世界的统一要比德意志帝国重要。自从他会晤过彼得大帝之后，俄国在他眼里似乎为欧洲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充满希望的园地。同时，他企盼着遥远的中国有可能加入以欧洲观念和基督教观念为基础的世界文明体系。他思想中的本国倾向和世界倾向——德意志的爱国热情连同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经常融合在一起。就像他的科学院计划既包括古老的帝国又包括整个文明世界一样，他的爱国主义目标也以谋求一种基本上是世界文明为终极，因而甚至在他充满失望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仍然这样写道：

“我把天堂看作我的祖国，把所有进行正确思考的人士视为我的同

胞。”但这种以普遍和谐为哲学指导的世界文化公民的概念，不止限于思想的领域。尽管带有一清二楚的理性主义色彩，它却有着基督教的背景，因而考察时必须将它置于这种背景之下。

从表面上来看，莱布尼茨一直是路德宗新教徒。但他的基督教信仰具有普世同宗的内容，能摆脱任何教条的束缚；而由于德意志的宗教分裂格外刺眼，也就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德意志那样能使他更深切地感到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悲惨后果。他把这种分裂看作德意志民族的不幸，同时也看作欧洲宗教和政治和平的障碍。他一生中花去不少时间，积极投身于各种使基督教重新联合的“和解”运动，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最高目的即理性统治的各民族基督教大联合的一个步骤。正是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同波舒哀在著名的通信中发生了争论——他这位“新科学”和新教德意志最伟大的代表使自己站到了路易十四的天主教君主国最伟大的知识界代表的对立面。“和解”运动失败了，这场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与政教依然联结在一起的政治现实相冲突，也是与特伦托会议后天主教^[3]坚定不移之基本教条相抵牾的。

当莱布尼茨徒劳地弥补敌对宗教信仰之间由来已久的裂口时，他又看到了新旧两教的门下都出现了一条新的很大的裂口——基督教与当代科学之间的裂口。他对这一事实之认识以及对其在未来的重要性之估计，表明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莱布尼茨全面接受了他那个时代的理性乐观主义，他始终相信科学知识的理智和道德力量，始终相信通过自己同时在哲学上和科学上进行努力，就能使人类更幸福、更美好。就这一意义来说，莱布尼茨始终是“启蒙运动”的一分子；但与此同时，莱布尼茨也预见到了他自知是其代表之一，且为其提供了推动力的一种趋势之久远后果。他看到了理性主义的理智推断所隐含的危险，因而他试图警告善于应用理性主义的人士，指出他们“是在为威胁欧洲的普遍革命准备着一切”。这些惊人之语是他在世纪之交同约翰·洛克进行论战时写的。他在后半生写出这样的著作绝非偶然，因为这本著作包含了我们最后以一本名作的书名——《欧洲良知的危机》——加以命名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包括17世纪的最后20年和18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是学术生活各个方面发生突然变化的准备时期，也是政治思想潮流显然加速变动的时期。

本章所讨论的政治观点，在一些重要方面彼此颇有差别，而且它们来自十分不同的哲学、个人和民族环境。然而它们都拥有一个尽管也许是表面的但却是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有助于证明全权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甚至那些避免使用任何历史和神学论据而只依据自然法的作家，都把自然法看作强大君权的理性根据；而就17世纪的才智而言，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和功利性正是通过这种理性根据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显示的。然而，自然法的辩证性质，都导致它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包含证明截然相反的政治概念之合理性所需的一切，只要出现这样的条件，即个人的“自然”权利被置于个人所归入的团体之上，以及有人进而主张国家的基础和维持不是依赖于君主的主权而是依赖于人民的主权。这种学说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武库之中了。它在中世纪时就有人设想过，但只是在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才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以它来反对敌对国家并使其成为宗教肯定之事而充满激情的，不是哲学家富有洞察力的头脑而是加尔文教派的伦理和宗教要求。它是由一位德意志加尔文宗教徒约翰内斯·阿尔特胡修斯在17世纪初发展成为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理论的。

然而，甚至这种学说也不能不采纳这个时代思潮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契约论；这一理论赋予个人许多权利，尤其是宗教权利，使每个人都感到这些权利是其生来就拥有的，既不能浪费也不能放弃。一系列具体的和含蓄的政治要求都能在这一理论中找到独特的合理性，而这些要求，就像在大叛乱时期的英国提出的，几乎导致国家本身的毁灭。确实，看来是与人民主权原则一起抬头的无政府这一妖魔，成了专制君主制捍卫者最有力的反驳论据之一，而1660—1685年，专制君主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顶峰。尽管如此，人民主权仍然是当时最有影响、最具支配力的政治观念。它没有被不利于其发展的条件打败，而仅仅是受到限制，一旦这些不利条件有所变动，就能使它恢复生气。

同一年发生的两个事件造成了这种变动，尽管这两起事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威胁大部分人按自己的方式作礼拜的权利。一是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赦令”；二是詹姆士二世在英国继位。迫害胡格诺教徒这一反宗教改革最后的，也是为时已晚的行动，唤醒新教世界的知识分子起来反抗那位法国君主，而法国的加尔文宗教徒在其新基地荷兰也对专制主义发

起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在英国，詹姆士二世的政策对一个新教国家有着这样的作用，即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并使王权神授理论面对一场挑战。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都提出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要求，而两者的结合又使人民主权的原则具有革命性的力量。然而，法国迫害胡格诺教徒的后果要到很久以后才显示出来，因此它并未明显削弱法国的专制主义，而英国统治者更迭的后果却是立即的和革命性的；因为光荣革命诞生了一位不再依赖神授观念和继承权而是由议会召唤而登上王位的君主，尽管人们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这是光荣革命的解决办法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光荣革命的解决办法不仅最终成功地解决了几乎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宪法争执，不仅是势力均衡发生全面变动的起点，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它没有找到洛克这样一位有影响的诠释者——洛克把它作为合乎理性地组织国家的典范介绍给整个欧洲——也无关系。

在历史上，很少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当时思想家对它的诠释能像光荣革命和洛克的《政府论》那样相互契合并且相互补充。然而，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要是明智，那就不要把洛克的论文看作是纯粹的应景之作，不要将之看作纯粹出于党派目的有意识地为1688年革命辩护而写的。洛克的基本政治思想不完全是在革命的影响下才形成的。在他写《政府论》前，这些政治思想即已在其头脑中趋于成熟。再者，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并没有依赖他的论点，因为他们所需以及所使用的智力武器在英国宪法冲突所产生的大量论战文章中就可以找到。人们也常常忘记，洛克的理论同传统的辉格党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革命—辉格党”最著名的论点之一就是“国王与人民的最初契约”，而这种契约——在他们看来——已为詹姆士二世所破坏。另一方面，在洛克的理论中，并无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政府契约”，而只有共同组成“文明社会”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因此，洛克的契约是前政治的；国家的权力不是来自一项契约而是来自自由人民交给统治者的一种可以取消的“信托权”。

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洛克依然是其同时代人和后人所认为的那种辉格党宪法原则的辩护士。因为洛克为这些原则提供的辩护，不仅适合当时的物质和政治需要，而且也与永远正确的纯理性要求相一致。在进行这种辩护时，他以明了、通俗和谦和的笔调对革命解决办法作了极其适合时代倾向的诠释。他先后对其同时代人和整个18世

纪的巨大影响均依赖于这两种特色的结合。他的政治哲学肯定不完全是新的，但却是长期广泛涉猎该领域的成果。他据以构筑其体系的材料都可以在无数先驱者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找到。事实上，他的许多基本观点，其他人业已更仔细地思考过或更精彩地提出过。但是，洛克以更大的清晰度和更为稳健地对这些观点重新进行系统表述，并将之与对自然状态的人之动人描写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一种体现政治生活中不断变化的事物秩序之整个精神实质的理论。事实上，洛克的理论准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即宪法冲突的激情已让位于谋求解决的合理愿望；有所节制的宗教虔诚已促使人们发现米尔顿的宗教激情像霍布斯的所谓“无神论”一样不合时宜；而“经大众同意建立的政府”也被视为安全的保证和安享私有财产的保障。

如果将洛克的学说对照他在写《政治论》时从未忽略的政治现实加以衡量，那么他的学说，尤其是其自相矛盾的说法，也就无须解释，或至少消除了其中的某些自相矛盾之处。确实，洛克将其政治理论包裹在一般的哲学概念中，但这无法掩盖17世纪英国宪法的历史特征。洛克所描述的大量拥有天赋权利的彼此一模一样的个人这一虚构图景的背后是其同胞在英国所处的被掩盖了的现实。他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语言所描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所了解的以及当时所熟悉的英国宪法的机制和运作。事实上甚至他讨论较多的分权理论，也精确表述了英国国家最高机构之间实际权力分配的总情况。凡是看上去似乎描写不对的地方，那只不过是后来的宪法发展而有所超越所致；但在当时，他的描述是非常接近于现实的。这种理论之所以将重点置于权力分离之上而忽略权力间可能的联系，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使然，这就是人们对国王时刻怀有戒心的不信任看来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致要求最大限度地将立法和行政分开。如果说在他看来司法权力和治理权力在与立法机构对立时总是要合为行政机构的，那么这一事实也仅仅是反映了体现为议会的立法机构具有更大的力量。

洛克可能先是以议会为最高权力，然后又创造另一种“最高权力”即人民来限制议会的权力；初看起来，这似乎有点令人困惑莫解，但事实上这只是对当时“法律上的”统治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之间区别的典型表述。洛克带着有点近乎恐惧的情绪避免使用“统治权”这个词，因为在他看来，它已被霍布斯用得不可信了，但他知

道它的意义以及可能转化的意义。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力”只不过是议会的“法律上的统治权”，所采取的是这种统治权在17世纪所发展成的并为光荣革命所肯定的形式。同样，人民的“最高权力”只不过是“政治上的统治权”，说到底立法机构是要对之负责的。但人民的权力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显示出来；只是通过创建国家这一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威时，它才重新采取行动。在两次行动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人民权力仍是消极的，而立法机构则是“最高权力”。洛克给予作为一个政治群体之人民的唯一权利是当从前合法的立法机构失去信任时才可进行的有限制的反抗权。因为洛克绝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辉格党人一样，他全盘接受传统的宪法，就他们毫不动摇的观点看来，这种宪法业已完全为光荣革命所恢复。

于是18世纪的人们从洛克的著作中看到的，是英国宪法这个基本上完整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后代给予他以几乎是典范地位的原因。这同样也是他的思想引起人们很大误解的原因。当产生这些思想的环境早已改变时，这些思想仍被看作政治智慧中的不易之言。他如此有效地帮助炮制的有关英国宪法的神话，像一片灿烂的云彩在他身后飘荡，使他成为西欧启蒙运动的精神之父，以及这一运动产生深远的思想后果和政治后果的精神源泉。另外，在英国本土，他被视作稳定和传统的有力辩护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从洛克到卢梭以及从洛克到伯克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可辨的影响线。

[1] 见本卷第12章边码第279—291页。

[2] 见本卷第12章边码第293—294页。

[3] 见本卷第六章边码第145—146页。

第六章 教会和国家

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感到十分失望：兵刃相见的结果，并不像双方极端分子所曾指望的能给自己带来最后的胜利，而只不过是使宗教分裂的局面长期存在下去；于是天主教徒、路德宗教徒和加尔文宗教徒不得不在一个各种思想以及体现这些思想的制度正发生巨大变化的欧洲和平共处。但是和约签订后的40年，不仅存在着各教派之间的彼此憎恨以及试图消除这种憎恨的努力，而且在西欧和南欧的好几个国家，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有的是，这种冲突单纯表现为世俗权力和官方承认的教派之间的冲突；还有的是，由于存在宗教少数派（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或两者都是），形势更为复杂。

乍看起来，政教关系这个地方性问题在本时期似无理由会出现加剧甚或显著变动的情况。17世纪中期并未受到像宗教改革这样尖锐而普通之危机的震撼。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些即便不是惊人的，但也是十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好几个国家（既有天主教国家，也有新教国家）出现一种趋势，即其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因而越来越难以容忍与己竞争的或自己身旁的权威，这样的权威要数教会最为重要，因为教会要求人们绝对的忠诚。对于这个问题，路易十四做出如下有利于国家的判定：“国王是绝对的主上，他们天生对俗人和教会的一切财产均有完全而又自由的处置权，也就是说，可以像一个明智的分配者根据自己国家的需要来使用这些财产”；他又说，“那些神秘的名堂，即教会的特权和特许……与所有信徒，不管他们是俗人还是出家的，都有着同样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同样是这同一位母亲的儿子，不过……这些特权和特许既未免除俗人也未免除出家的服从君主的义务，福音就明确告诚信徒：他们得服从君主”。^[1]随着更明确地视君权为国家象征之思想（不管如何表述）渐渐发展，那种把教会看作平等伙伴的观念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余地了，至于神权政治，那更是一点门儿也没有了。这种政教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绝大部分采取传统的形式。反对教士豁免权以及反对教会司法权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如今国家更有能力，也更想使之有效。教士缴纳的各种捐税早已成

为大多数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教会那些未经挖掘的财富，对于难以支付其高昂战争费用的政府来说，仍然具有挥之不去的诱惑力。国王及其较有势力的臣下长期以来就在试图将教会的圣职授予权收入囊中，为自己所用，而到这个时候，这种剥夺行动更是无情地进行着。当国家利益更为公开地支配欧洲统治者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时，王权神授的理论成为强调（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君权的无可置疑的源泉，并给予国家以独特的宗教上的认可。因此，教会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世俗政府的一个有用的，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尽管教会的影响是到处都未加以低估的：例如所有统治者都意识到，调节布道坛的声调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艺术。把教会当作国家一个部门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只是到这个时候，才更有实现的可能。

然而，在某些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智力氛围的变化。开始于17世纪上半叶的思想与观点趋于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进程加快了步伐，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健康的，却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旧秩序中的许多事物。笛卡儿哲学开辟了一些连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去走的道路。实验科学所促进的实证方法逐渐导致人们对书本权威提出质疑，而对待历史则更带批判性了。尽管这些新的思想方法已在开花结果，但其全部成果是在1688年之后而不是之前才明显起来的。在本时期更具即时重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社会便利和物质繁荣的论点，在对贸易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中产阶级获得较多政治权力的地方（如在联合省以及较小范围内的英国），正在赢得一种新的尊重和影响。甚至在神学界，认为强调人们可以接受的观点要比争论其分歧点可能更为有利的思想也逐渐占据上风，不管它在德意志是采取诸说融合的形式，或在英国是采取宗教信仰上自由主义的形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注意到了教会大分裂所带来的耻辱，并谋求促成教会重新联合的计划；新教徒更是开始认真提出信仰自由的主张，尽管这被看作是因未能消除所有宗教分歧，故而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然而，到这时为止，无论是国家提出的新主张，还是思想界的日益自由化，都不表示宗教生活强度的广泛消退，以扬森派、寂静派、虔敬派和清教及其所有变种为形式的宗教生活，显示了基督教在寻找新的表达形式方面的勃勃生机。的确，有一个论点似乎颇为有理，那就是在某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反宗教改革的力量到这个时

候才全面展示出来。事实上，正是世俗统治者的野心，与宗教信念的这种强度并驾齐驱，才使得这个时期政教关系具有独特性，仿佛夹入宗教战争时那阵急风暴雨和18世纪那种昏昏欲睡局面之间的一个过渡。当然，政教冲突的程度并非到处都一样，在有些国家，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经常发生摩擦，而不是呈公式化的对抗。

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宗教势力在力量上也不尽相同。路德宗由于缺乏国际性的组织，总是倚重于世俗的支持，但绝不是一味屈从。加尔文宗由于17世纪初内部发生分裂，开始失去一些冲劲，到1648年已不再能赢得超国家的忠诚，尽管它的势力在较小的范围内仍极其强大，罗马依然拥有广泛的影响，操纵着大量一心尊重其权威的坚定信徒。耶稣会和托钵修会属下的国家性机构以及教皇使节坚决拥护教皇至上主义。在激励对土耳其人发动进攻方面，教皇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其他方面，其政治力量已逐渐衰落：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所有重要和约都完全置教皇于不顾，这一方面表明教皇的声望江河日下，另一方面也表明欧洲生活日益世俗化。每次教皇选举以及每次新的红衣主教提名，都显示出罗马教廷容易受到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大国的压力。不过，在一位才华出众或充满活力的教皇治下，罗马仍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需要认真对待的一股力量。由于众多的原因，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和亚历山大七世（1655—1667年在位）都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克雷芒九世（1667—1669年在位）和克雷芒十世（1670—1676年在位）则通过温和公正的努力，赢得较为普遍的尊敬。不管怎么说，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在位）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仍是一位无愧于伟大传统的教皇，他那沉着的固执完全堪与路易十四的所有外交手腕和暴力相匹敌，而他的品性也赢得了整个欧洲的称慕。

在德意志，这一时期教会与国家的历史有许多方面都是对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的注解。该条约系由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三世与瑞典人以及双方的盟国签订于1648年10月24日，而且就其主要宗教条款而言，基本上是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的扩充而不是修正。据约，加尔文教徒经过多年争吵之后最终获得了与《奥格斯堡信纲》之信徒相同的权利，而信奉加尔文宗的各地君主与信奉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各地君主一样，享有决定自己土地上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利（宗教改革权）。还规定了特别办法，以便一旦统治者改变自己的信仰时（例如，1613

年，勃兰登堡的约翰·西吉斯蒙德放弃路德宗而皈依加尔文宗），所在邦国的国教得以保持不变。尽管条约的措辞模棱两可，但也有一些条款允许给予那些与统治者信仰不同的臣民以某些实际的宽容，不过除了几个规定的地区，这不适用于哈布斯堡的任何领地。凡是1624年就已存在的各种礼拜自由，包括公众的和私人的，都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希尔德斯海姆教区除外），直至教会重新联合时为止。那些在1624年除了进行与统治者相同的宗教仪式之外并未享有履行宗教仪式自由的信徒，现在都被给予私人礼拜的权利和用自己的信仰教育自己孩子的权利；这些教徒不会被剥夺任何世俗的权利或死后不能举行基督教葬礼的权利。不过，另有一条款似乎允许将非国教徒强制迁移的行动。这些条款在实际上究竟产生多大的效果，这很难说，但在理论上却是达成了一个相当宽容的解决办法，同欧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情况相比，德意志的形势要有利一些。

特别重要的是就三十年战争期间争夺非常激烈的教会领土和圣职任命权进行了裁决。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旷日持久，其主要困难是如何确定一个对解决各种土地的归属具有决定意义的日期，最后选定了1624年1月1日（尽管这不适用于皇帝的世袭土地），这个日期对新教徒有利，因为它无视1629年《复原敕令》^[2]的后果和天主教徒的一些重要军事占领，而仅仅把新教徒所垂涎的许多教堂留给天主教徒。因此除非在条约中有特别规定，不管何种教派在1624年1月1日前所拥有的主教区、宗教设施或教产都保持不变，直到教会实现重新联合时为止。为使这一裁决具有永久性，做出一条决定：如果神职人员改变了信仰，其神职也随之失去；此外，如果总教堂的牧师会人员不属同一教派，则今后在会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将各占相同的比例。这些措施阻止了进一步世俗化，也消除了改宗新教的主要物质诱因。结果，新教势力在北方依然很强，但在南方则是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符腾堡公国和巴拉丁是南方仅有的两个大新教地区。

英诺森十世在其1648年11月颁布的《对主殿之忠诚》的简短诏书中对上述解决办法的谴责，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德意志天主教徒除接受和约外，别无选择。当然，双方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而且在某些地区，条约的规定很难实现：例如，在1634年后修道院得到恢复的符腾堡天主教徒慢条斯理地放弃其重新获得的财产。天主教强有力的传教活动，哈布斯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及法国以“德意志自由”

的“保护者”自居而时时准备干涉德意志事务的行径，不断令人萌发新教地位和普遍和平岌岌可危的担心。1653年由帝国议会中的新教成员建立的福音派同盟和1658年建立的既有天主教诸侯参加也有新教诸侯参加的莱茵联盟，除了其他较为特定的政治目标之外都在寻求坚持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中有关宗教条款的途径。但是尽管互不信任，和约的字面意义却并未遭到重大破坏，然而其精神实质则常被置之不顾。

在德意志各邦内部，一时成风的政教问题大相径庭。认为宗教上一致是国内团结的必要前提这一强烈信念继续支配着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尽管1648年条约的条款以及（特别是哈布斯堡诸领地内的）紧急事件都阻碍着完全的重新天主教化。在战争引起的纷乱最为厉害的地方，对教会进行全面重组有时是必要的，例如查理·路易选侯于1649年复位时，莱茵巴拉丁所进行的加尔文宗或归正宗教会的重组就是如此。同年，宗教法庭恢复原状，但和约措辞的模棱两可，导致人们经常对以下问题发生争执，即加尔文宗是否将被视作官方宗教，而查理·路易选侯的宗教宽容观以及对教会重归统一的关心，又使归正宗无法获得选侯全心全意的支持。在黑森-卡塞尔，信奉加尔文宗的方伯威廉六世与为决定教团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以致1657年最终成为法律的那项计划是在不顾归正宗牧师极力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勃兰登堡大选侯本人是一位加尔文宗信徒，他发现很难使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路德宗教徒（在他的臣民中占压倒性的多数）与加尔文宗教徒和平相处。他本人对神学争论漠不关心，但路德宗牧师却不是这样，结果在1662年引发了严重麻烦，那年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代表被召来柏林讨论重新联合的问题，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牧师们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互相谩骂对手的做法发展到恶意中伤的地步，以致在1664年有一敕令禁止这种人身攻击，禁止公开批评其他教派，并要求牧师在写作时遵守敕令的规定，否则将被革除教籍。路德宗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包括著名的讲道牧师兼赞美诗作者保尔·热拉尔）进行抵制；腓特烈·威廉千方百计使热拉尔恢复原职，但他在1666年再行辞职去了萨克森，并公开声明，“我无法把加尔文宗教徒视作基督徒”，这倒是与官方的政策更为一致。这批不顺从者获得勃兰登堡议会和柏林市镇的支持。在普鲁士公爵领地，处于正统地位的路德宗特别强大，这里的加尔文宗教义很迟才被完全宽容，而加尔文宗教徒则不能担任绝大多数重要的官职。另外，在克莱沃公爵领地，大选侯却是被迫保护路德宗教徒不受加尔文宗多数派的

欺压。尽管腓特烈·威廉反对天主教教义，但对自己土地上的天主教少数派一般地持宽容的态度，就像他对自己土地上的索齐尼派教徒和门诺派教徒也持宽容态度一样。他在1662年和1664年所颁布的信教自由敕令，除了宗教和智力上的信念外，希望增加本土的人口和促进本土繁荣可能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因，不过他确实对教会重归统一感兴趣，并试图在自己的领地上促进这种统一，尽管没有取得成功。他对待教会问题基本上持专断和世俗的态度，他把自己视作自己土地上的最高主教。

虽然德意志新教的政治领导权在某种程度上已落到了勃兰登堡手中，但萨克森（1648年时，其选侯曾坚决反对加尔文宗教徒在帝国中享有平等权利）仍然以路德宗为正统，而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大学是丝毫未加修改的路德宗信仰的发源地。不伦瑞克开明的黑尔姆施泰特大学内主张不同信仰妥协调和的思想占据上风，该校有一位温和的神学家乔治·加里斯都在1650年曾评论道，“如果事情继续按萨克森选侯的主张发展……我们就会有一位新教皇和一种新宗教”。汉诺威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其统治者约翰·腓特烈公爵已于1651年改宗天主教。他虽未能给与其同一教派之臣民以很大的宽慰，但他却把各教派的杰出人物，包括伟大的莱布尼茨，罗致于自己身边。他的继承者埃内斯特·奥古斯都之妻，即不幸的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之女索菲娅，继续支持教会重归统一的计划，而她的影响有助于使汉诺威成为心平气和而又合情合理地讨论宗教问题的中心。

整个这一时期，大家族继续垄断着天主教与新教的主教职位和教会财产。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控制北德一大批主教区，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则常常控制另一些主教教座，而新教的世家大族则更为牢固地控制着世俗化的主教区，尤其是在北德地区。德意志的天主教大教堂和新教大教堂的许多受俸牧师，即便不一定要由有贵族血统的人士担任，但也要求由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担任，这也就加强了贵族对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控制。不过出身高贵和政治牵连不一定就意味着无能：本时期最著名的两位教区的掌管者是明斯特主教克里斯托费·伯纳德·冯·加伦和帕德博恩主教费迪南德·冯·菲尔斯滕贝格。

西班牙及其欧洲属地的历史、葡萄牙（1640年获得独立）的历史以及威尼斯的历史，三者都充分表明：尽管统治者和人民同为坚定的

天主教徒，不存在宗教少数派问题，而新思想产生的影响也较为微弱，但有关政教关系的各种麻烦还是有可能发生。在西班牙，教会与国家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致西班牙教会有时被说成是国家教会，西班牙国家则被说成是教会国家；而异端裁判所归国王而不是归教皇控制则更是这种政教关系的典型。不过，人们常常会夸大双方利益一致的一面。所有眼光敏锐的批评家都承认，西班牙的教士和僧侣过多，西班牙教会的财产也过多（约占全国1/5的土地），而其所缴纳的赋税与其财富很不相称，尽管它对政府贡献甚大，而且一般来说国王也从异端裁判所的聚敛中获益匪浅。教会的状况也难以令人满意。由于特伦托公会后所发起的建立神学院的运动在西班牙裹足不前，绝大多数乡村教士穷困潦倒且其中许多人愚昧无知。主教团主要由一些勤奋工作和严肃认真的人组成，不像当时的法国和德意志那样明显具有贵族成分；不过，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富裕教区与卢戈和奥维多这样的贫穷教区之间仍形成大有关碍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国王不同，西班牙国王除东西印度外，拥有很少的圣职授予权，即使他们所能行使的圣职授予权中有些也是来自教皇的赐予。与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的各种教会管理机构也为大小贵族的获利大开方便之门，而种种弊端所受到之欢迎大概也不亚于所受到之谴责。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西班牙充满崇奉天主教的热情，但菲利浦四世仍在寻求某种办法限制天主教会的财富和权力。部分地在教皇的支持下，他发动了改革教士和各宗教团体的运动，禁止进一步增加永久保有的财产，并对教士征收某些赋税。但反对任何根本性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以致改革未取得多大的成功，而菲利浦本人（1643年受到修女玛丽亚·德阿格雪达的强烈影响）也没有全身心投入改革运动。在查理二世的未成年时期以及后来在其凄惨的亲政时期，很少有进一步的作为，而事实上其母后的忏悔神父即奥地利耶稣会会士尼塔尔神父于1665—1669年掌握政治权力，标志着教士重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在1667年，改革各教团之议再次引起争论，因而建立新的宗教团体更为困难。尽管1680年查理二世同法国的玛丽·路易斯结婚时，宗教裁判所曾做出判决以示庆祝，为此有118人被判刑，有些后来还被烧死，但宗教裁判所的权力还是稍稍有所削减；1677年，查理宣称只在涉及俗人和世俗财产问题时开除教籍的做法才为不合法，故而仍在企图抑制宗教裁判所过多的司法权力。但这些措施并未预示西

班牙崇奉天主教的热情有丝毫真正的减退。相反，作为反宗教改革重要结果的传教活动不断发展，耶稣会的活动尤其大获成功。

在西属尼德兰，尤其是在卢万大学的影响下，扬森派教义（详情见后）传播极广，并使政教之间产生了独特的麻烦，特别是在下列问题上，即教皇的诏书应由什么权力机构来公布，教皇的诏书是否一定要得到国王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以及罗马在该地的司法权限。在那不勒斯和米兰，西班牙当局同教皇也发生冲突，主要是在教皇的权限、避难权以及对被镇压的宗教团体之土地如何处置等问题上。在最后一个问题上，罗马与威尼斯和热内亚两共和国之间也存在冲突。由于西班牙的领土也毗邻教皇国，教皇除了嘴上说说褫夺教权和其他教会惩罚之类的话之外，不敢贸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因而西班牙控制的各地政府与教皇的关系，主要是一些摩擦而不是公开冲突。

在这一时期初期，葡萄牙教会就一种特定意义而言乃是政治的牺牲品。正在领导葡萄牙人进行反对西班牙争取独立斗争的布拉干柴王朝国王若昂，于1654年派索多费塔修道院院长到罗马去游说，要求有权提名主教的主张，这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也是为了加强自己对本国的控制。如果教皇同意若昂的这一要求，也就等于承认若昂为合法统治者，由于西班牙仍然非常强大，这样做将十分危险，故而英诺森十世决定自行派主教到出缺的瓜达、米兰达和维塞乌三主教区。在法国的支持下，若昂（他曾威胁要召开全国宗教会议）未经教皇批准就任命了另外三个主教区的主教，这样就关闭了和解的大门。当罗马的亲西班牙派和亲法国派在承认若昂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时，葡萄牙教会每况愈下。到1649年，葡萄牙只有一位主教的合法性无可置疑。僵局是直到1668年才打破的，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了和约，这也就有可能使出缺的主教区得以按照教规补充主教，国王在未来的提名权得以解决，教会的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宗教分裂的威胁也终于消失。当1667昏庸无能的阿丰索六世被废黜而由其弟佩得罗二世继位时，又发生了另一场危机^[3]。在法国的影响下，阿丰索之妻、萨伏依的玛丽·弗朗索瓦为了使自己能同佩得罗结婚，向里斯本而不是向罗马申请解除同阿丰索的婚姻；再者，特许她同前夫之弟结婚的是她当时在法国的叔叔、红衣主教旺多姆，而不是教皇，因此其合法性颇值得怀疑。路易十四利用玛丽·弗朗索瓦维持法国在葡萄牙的利益，千方百计阻止罗马的干涉；但由于那位王后心存疑虑，克雷芒九

世最终将问题提交给红衣主教会议，由其批准此项重新缔结的婚姻。直到这一问题解决后，葡萄牙和罗马才能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在17世纪后期，双方的摩擦相对来说比较少。

通观本时期，威尼斯与教皇之间的麻烦非常独特。一方面，教皇为支持威尼斯对土耳其进行的战斗而慷慨地从教产和教士赋税中拨出大量补助金充作战费，例如在1653年、1657年、1660年和1667年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双方在教会的司法权、主教的提名权、对宗教裁判所权力的遏制，以及驱逐耶稣会会士（至1657年才重新予以接纳）等问题上常常发生冲突。1684年威尼斯加入神圣联盟^[4]，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英诺森十一世讨伐土耳其政策的一个胜利，但在教会事务上，威尼斯人决定维持他们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双方之间依然紧张如故。

法国是政教各种激烈冲突的中心。这不足为奇。第一，路易十四是当时最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而他那自诩为一个以神授王权、历史传统和国家利益为根据之权威的姿态，更在许多方面同教皇发生冲突；而且由于路易十四可以依赖法国教会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派别支持自己的反罗马事业，因此这种冲突中含有教会内战的因素。第二，路易十四之尊重正统和偏爱一律又与久已确立的对其新教臣民以及对其天主教的扬森派臣民的宽容政策格格不入。第三，本时期法国的宗教生活明显地富有活力，且形式多样，而众多各阶层各教派的法国人又同样明显地对自己的国王充满了爱戴之情，这就使许多人面临一场以最尖锐形式表现出来的向谁效忠的内心冲突。无论是教皇的政策，还是路易十四的政策，都缺乏一致性。例如，罗马对待扬森派教义的态度，在英诺森十世时和在英诺森十一世时就有很大不同；而路易十四希望宗教一律，也迫使他一方面欢迎，另一方面又反对教皇干预法国的宗教事务。

法国教会中限制教皇权力的传统或多或少限制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所有的教会争执。但限制教皇权力者的观点不易概括。在1648年，既不存在“限制教皇权力主义”一词，也没有任何精确表达的理论可用这个词来称谓，即便在1682年出现了“四项条款”，但到1688年仍无“限制教皇权力主义”。然而，时人每每谈到“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教会”及其“特权”时，总把它们视为同教皇的企求和教皇至上主义要求相对立的事物，而法国人也怀疑在教皇的企求和教皇至上主义要

求背后，西班牙在作祟。然而，对法国国王、巴黎索邦神学院的教师、巴黎高等法院和法国主教而言，这些词的内涵是不同的。国王所持的限制教皇权力主张，是要维持1516年的《波伦亚教务专约》和其他协议，而且随着客观形势的需要，更是以法国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无须经过任何中介，并有权处置所有世俗财产和教会财产那种自夸自耀的大话为依据，进而要求控制法国教会。巴黎索邦神学院则谋求维护各种准则，包括捍卫宗教会议的权威，反对教皇至高无上；捍卫主教制这一神圣机制，反对下列主张，即认为教皇是普世主教，教会是教皇属下的一个专制王国，所有其他权威都不过是教皇所差遣的代表。主教们限制教皇权力的活动要软弱无力得多，他们是凭借国王的支持来反对教皇或世俗的侵袭，故而常常成为政治需要的牺牲品。高等法院则急于保证国王在世俗事务方面的独立性，并驳斥任何下列的主张，即认为法国天主教所拥有之权利的基础是教皇可以废除的某种特权，或纯粹是一种惯例。他们以早期教会史的资料为佐证，利用自己的学识对近世教皇的企求发起挑战，并大肆宣传国王应对教会行使君士坦丁尤其是查理曼曾经享有的那种权力。5年一次的教士大会提供了定期广泛宣传这些观点的场合，在这样的大会上，国王往往能获得宝贵的捐献。

然而，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赞成限制教皇的权力。事实上某些团体，例如耶稣会和托钵修会，都拥有强烈的教皇至上观点，坚持教皇是教会所有权力的源泉，贬低主教和宗教会议的重要性，并强调教皇在有关信仰的争论方面是永无谬误的。但是尽管修士在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影响微不足道，可耶稣会会士虽因其神学上的道德观而普遍受到猜疑，仍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通过听取忏悔指导许多法国人（包括国王）的精神生活，并在他们创办的学校中训练法国名门望族的男孩。在虔信者有着巨大影响的各种宗教改革中心，教皇至上的思想也不弱。称得上是虔信者的那些善男信女绝不是单一的团体，但他们都具有宗教狂热，其天主教教义地道得无懈可击，他们都顺从其精神导师的旨意，且都打心底有着要使主的王国在尘世扩张的个人责任感。他们深受下列著名人物的启发：法国奥拉托利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贝吕勒（1575—1629年）、强调博爱行善的坚韧改革家圣樊尚·德保罗（约1580—1660年）、创立圣苏尔比斯神学院的让-雅克·奥利埃神父（1608—1657年），以及以其力主更好地训练教士的工作和促进人们敬拜耶稣圣心而享有盛名的虔诚传教士圣让·厄德（1601—1680

年）。虔信者既在对人类问题的抨击上注重实际，而在其对上帝的态度上又是神秘莫测的，他们既充满自我克制的理想，但又知道把宗教生活消磨在有效工作之中是最受欢迎的。因此他们通过各种社团开展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成立于1627年的“圣礼会”，该会后来在1666年由于政府对其秘密活动方式和深不可测的力量产生怀疑而被取缔。

“圣礼会”通过其有影响的成员（包括许多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世俗人士）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求改革道德之道，促进传教活动，推行慈善事业，抵制假冒新教的异端或扬森派的潜在危险。由于强调有效工作和直接行动，绝大多数虔信者不相信学术，也不相信五花八门的限制教皇权力理论所倚仗的历史论据和法律论据。该团体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势，受到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和玛丽亚·特利莎以及宫廷中许多显贵的支持。他们所施加的影响，加上马扎然微妙的外交，可能足以解释法国为什么有相当一段时间能同教皇保持比较平和的关系，直到1661年路易十四因对其母后进行反抗才改变了法国政策的基调。

扬森派运动是本时期政教关系上发生第一次危机的诱因。扬森派运动得名于1638年在伊普尔主教任内去世的科内利乌斯·扬森。卢万和巴黎分别于1640年和1641年出版了他的《奥古斯丁书》。尽管此书在西属尼德兰影响很大，但其作用却是在法国最为明显，因为法国有扬森的生死之交、圣西尔修道院院长让·迪·维吉耶·德奥拉纳，他在此前20年建立了一个以严明戒律和禁欲苦行思想为基础，促进反宗教改革活动的派别，该派别从贝吕勒和奥拉托利会受惠匪浅，并在神学上从圣奥古斯丁的教义中吸收了许多东西。到1640年，该派别中最重要的是由温文尔雅的阿尔诺家族把持的田野静室和圣西尔一些赞成他对耶稣会会士及其不严肃神学进行攻击的朋友和崇拜者。扬森派运动也像限制教皇权力的运动一样，都不是有凝聚力和统一的运动。但扬森派的支持者有着一些共同的信念，尤其是关于皈依和命定的信念，他们认为只有当神恩降临时皈依才能有效，并宣告那些未蒙神恩的人将陷于永远沉沦的境地。这种明显苛刻的教义，由于1643年安东尼·阿尔诺那本具有广泛影响的《论常领圣体》的出版而有了促使道德和精神生活发生革命的力量。该书批评放任分子和耶稣会会士的思想，并主张在忏悔者的悔悟未经证实之前不能拜领圣体。尽管教皇于1643年发布的《最高训谕》诏书谴责《奥古斯丁书》，但扬森派的力量在接着的几年中继续壮大；通常它能获得巴黎高等法院和巴黎索邦

神学院部分教师的支持，不过反对扬森派的力量也颇为强大。不仅耶稣会会士是难以和解和强有力的敌人，而且政府原来隐藏未露的不信任感也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敌意，当时有着很高地位的扬森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包括巴黎大主教的副手德雷斯红衣主教，被怀疑参与投石党运动^[5]。扬森派运动对教会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威胁确实不容忽视；但政府进行干预的结果之一却是加强了限制教皇权力运动中国王最不易控制、最可能产生新的摩擦的那些因素。

1649年是新阶段开始的一年，当时巴黎索邦神学院理事尼古拉斯·科尔内拿出一些宗教主张供其同事非难，据说其中有5条来自《奥古斯丁书》；尽管当事人上诉巴黎高等法院要求进行干预，但所有主张仍遭到谴责。当教皇被请求对此判定予以确认时，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势力展开了新的反对行动。英诺森十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经过多年的讨论，该委员会的结论体现在1653年5月教皇颁布的《适逢》诏书中，其内容是对五条主张进行谴责。扬森派分子反驳说，尽管教会在信仰方面永无谬误，谴责那五条主张也是合法的，但问题是这些主张事实上在《奥古斯丁书》中根本找不到，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就不能说是永无谬误的；于是法律（droit）和事实（fait）之间的这种区别从此成为争论中头等重要的事情。马扎然担心罗马对囚禁德雷斯会感到不满，同意公布教皇的上述诏书，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招致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者的批评。在颇费一番功夫之后政府才得以劝使法国教士特别大会于1654年3月宣称：五条宗教主张是“因其本来的意义即扬森的意义”而遭到非难的，该决议并经英诺森的九月敕书认可。这些裁决摧毁了扬森派关于法律和事实之间有所区别的论点，而马扎然和图卢兹大主教皮埃尔·德马卡计划要所有教会人员都签名同意使用反扬森派信条的礼仪书之措施，又于1656年9月为教士大会——这次大会也确认了1654年特别大会的各项举措——所批准，这就进一步减少了任何和解的机会。与此同时，扬森派遭受着时坏时好的命运。1656年1月，安东万·阿尔诺被逐出巴黎索邦神学院，但布莱兹·帕斯卡（一位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保持密切联系的“大人”之一）为阿尔诺及事业辩护而写的《致外省人书简》却成了扬森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刺激剂。然而，尽管礼仪书还没有强制普遍实施，扬森派也还有着反对教皇权力者的支持，但政府与扬森派的敌对状态甚至在1661年马扎然去世前就有所增强。

路易十四的亲政开启了一个进行残酷迫害的时期。种种措施用来对付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该院在持对法律与事实之间有所区别的观点仍可予以宽容之时抵制签名同意礼仪书的行动就已颇为广泛；而在宽容取消之后，该院的修女是“完完全全地”拒签，而且还有昂热、博韦、阿莱特和帕米尔四地区的主教加入了反抗的行列。为了结束一小撮妇女、几名主教和神学家违抗教皇、国王和全国教士大会旨意的局面，路易十四于1665年2月要求亚历山大七世提供一部附有礼仪书的宗教法规并权威性地规定所有教士和修女都应签字予以同意。这位国王的呼吁与他最近对罗马所采取的侮辱性政策却是令人难以理解地很不合拍。1662年，教皇的科西嘉卫士与法国大使的随员在法尔内斯府邸（法国驻罗马大使馆所在地）发生冲突，此事发生后路易十四拒绝了教廷的任何道歉或和解的举动，出兵侵入阿维尼翁，并威胁教皇国。最后亚历山大七世被迫于1664年同意屈辱的比萨条约，据约，要在罗马树立一角锥形石柱，以示教皇接受法国的要求，即从此以后罗马教廷不再雇用科西嘉人为卫士。

然而教皇出于一贯敌视扬森派的信条，难以拒绝路易十四的要求，但2月15日发布的《传道制度》诏书仍巧妙地强调宗教争论的处置纯属专归罗马管辖的事务，对此国王和主教都是无能为力的。于是需要有一点正当理由来劝使巴黎高等法院登记根据教皇诏书拟出的敕令以及附加的内容，即在签字同意礼仪书时（此事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不得使用任何“区别、解释或限制”。四名主教拒绝接受国王的这种限定，并在要求其下属教士签署时听任他们自行判断是否做出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区别。红衣主教皮里奥西之当选为教皇（克雷芒九世）——主要是法国外交的结果——促使这场如今已是混淆不清而又部分毫无意义的争论得到暂时的解决。通过在里昂进行的卓有成效而有时又不择手段的谈判，四名主教被说服于1668年向教皇谢罪，并“真心诚意”签字赞同宗教礼仪书。1669年年初，为庆祝这一“教会和平”，铸造了纪念章，阿尔诺受到国王和教皇使节的接见，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修女重又被允许拜领圣餐。在接下来的10年里，扬森派问题处于沉寂状态，但涉及政教关系的其他争论成了这场运动后期主要的内容。

有关国王特权的冲突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早以前，法国国王就得到了所谓的“世俗特权”（*regale temporelle*），即可收取主教

区在主教空缺期间的税收，但有四个大主教区声称有豁免权，故而有相关世俗特权实施范围的争论非常激烈。路易十四通过1673年颁布的，1675年又予以重申的敕令，将此项要求扩大到整个王国。他还提出了新的“宗教特权”（*regale spirituelle*）要求，即当主教区主教空缺时有提名权，对某些女修道院以及对捐献物享有特权而又无须履行教化灵魂之责。此举不是出于财政的目的；事实上，由此获得的税收几乎总是留给下任主教使用，而从1641年起习惯的做法是将2/3的税收返回该教区，1/3用于使新教徒改宗。路易十四很可能认为“世俗特权”是国王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此外还希望达成其所辖领土的行政统一；这对扩大其授职权的范围也显然是有利的。他那意欲充分应用教务专约条款的愿望业已体现在1668年将该专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而在新获得的阿图瓦和鲁西永，也出现了类似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1673年和1675年的两道敕令均未得到罗马的同意，但同样也未引起罗马即时的抗议。有效的反抗来自两位主教，即阿莱特的主教尼古拉斯·帕维隆和帕米耶的主教弗朗索瓦·德·科莱，这两位主教都赞同扬森主义，都是积极的宗教改革家；他们的教座地处偏僻的比利牛斯山区，远离对他们的富裕教区主教同道有着牢牢控制权的凡尔赛上层世界。争端是政府挑起的，它对自这两位主教任职以来其教区所曾空缺的一切圣职进行了重新提名，理由是这两名主教都没有像世俗权所涉地区的所有教士如今均被要求做到的那样宣誓效忠，因而他们的教会收益从未得到发还。先是帕维隆，接着科莱也步其后尘，将所有接受国王任命的这些教士革除教籍。两人都向各自的大主教乃至教皇申诉，但1677年帕维隆去世。于是路易十四采取了一个意在将冲突无限期延长下去的行动。他下令没收科莱的教产收入。英诺森十一世直接进行干预，向法国国王发出一系列批评性的训谕，并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虑整个国王特权的问题。

相互猜疑，加上一些偶然的事情，加深了裂痕。新教皇十分尊重安东尼·阿尔诺，赞同扬森派教义中严格的道德内容以及法国扬森派的一些轻率言行，这就使路易十四重新对扬森派运动产生了担心，而这场运动在1679年由于隆格维尔夫人和雷斯的去世以及国王的大臣、阿尔诺家族成员蓬波内的失宠，已失去一些有势力的支持者。不过，力量均势发生了变化，因为国王几乎不可能获得教皇的帮助。路易

十四有关国王特权的政策最明显的后果是，扬森派同坚持教皇至上的势力，而不是同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国王恢复对扬森派的敌意，体现在一系列小规模迫害之中：将扬森派分子逐出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禁止接受新的见习修女，将安东尼·阿尔诺流放。路易十四对教皇本人也怀有敌意，因为教皇就像路易十四确信教皇的干预会产生危险一样，坚信世俗的侵袭具有危险性。1679年后，路易十四这位最为崇奉基督的国王的政策是由激进的科尔培尔派操纵，而不再是由比较温和的勒泰利耶操纵，故而他行将发现英诺森十一世是一个危险和果决的敌人。

到1681年，事态似乎陷入了僵局，这对路易十四要比对教皇更为严重，因为路易十四希望罗马做出一些让步：再者他也确实担心自己会被教皇革除教籍。但是谈判很难进行，因为外交关系已几乎中断，路易十四派往罗马的特使、红衣主教德斯特雷是一位只会加剧而不会解决冲突的人物。尽管如此，仍有一种可能，即制造一场危机，迫使教皇要求法国国王帮助制服限制教皇权力的批评，为此鼓动法国教士对最近罗马谴责让·热尔贝所写之书一事表示愤慨，该书是应1665年教士大会之请而写，并为1670年教士大会所称赞。不过，认为这样的局面一旦制造出来就能随意加以控制的想法，后来证明是一种代价很大的错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越来越明显，英诺森十一世非但不向路易寻求帮助来恢复教士的秩序，而是宁愿让法国教会完全陷于混乱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

1681年春，法国所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主教会议，在审议热尔贝的书和英诺森十一世最近发布的训谕之后，建议召开全国教士会议或教士大会：相比之下，第二种会议更合适，因为第一种会议可能会导致完全意想不到的宗教分裂。罗马对这些威胁无动于衷，路易十四被迫于6月16日决定在10月召开教士大会：10天后，路易十四获悉英诺森十一世已令红衣主教西伯同德斯特雷谈判。教士大会的准备工作委托办事干练、抱负不凡的大主教阿尔莱处理，其靠山就是罗马的死敌科尔培尔。宰相勒泰利耶及其儿子兰斯大主教真诚希望和解。希望法国教士在教皇和国王之间进行调停，以解决争端。大会开幕时波舒哀所做的著名布道可能就包含有勒泰利耶的这一计划：布道强调教会团结，既称赞法国教会的自由，又称赞罗马教廷的权威。大会所选出的两位主席，即阿尔莱大主教和勒泰利耶大主教，彼此猜疑，相互妒

忌。在国王特权问题上，勒泰利耶派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即说服路易十四同意修改自己有关宗教特权的要求，而教士则同意扩大国王的世俗特权。勒泰利耶大主教随即致信教皇，希望结束冲突，但英诺森十一世只是将信交给为审议国王特权而建立的红衣主教委员会。

于是，大会转向第二个议程，即批准著名的“四项条款”。政界与宗教界在发表这类声明是否合宜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科尔培尔最终使国王相信，在罗马与巴黎关系不好的情况下，重新说明法国关于教皇权力范围的信条将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如果说立即重新达到和解是真正所需要的，那么这一声明是一不可思议的失算。“四项条款”（最后由波舒哀起草）主张：第一，在世俗事务方面，国王和世俗君主无须服从任何教会权力；第二，康茨坦茨公会议的教令（关于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效的；第三，教皇必须符合教规地行使其权力，也必须尊重法国天主教会的习惯；第四，尽管教皇在信仰问题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敕令对教会也有约束力，但其判断如未获教会赞同，就不是不可改变的。这四项条款同1663年巴黎索邦神学院提出的六点主张有许多相同之处，尽管相似词句的措辞往往经过巧妙的改动，但是真正的新鲜之处是，这些“准则”是第一次由主教们以法国教会的名义发表的。1682年3月，国王发布命令，使“四项条款”成为法国神学教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法国教士大会在收到英诺森十一世关于国王特权的《慈父爱心》训谕以后，对教皇的愤慨有增无减。教皇用尖刻的言辞谴责与国王的协议，申斥法国主教们交出教会权利的怯懦行为：整个会议期间，教士们都对罗马大发其火。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的事情，路易十四决定结束教士大会。总之，他是想同教皇讲和，就像英诺森十一世由于关注着土耳其的威胁，也希望同路易讲和。但“四项条款”是严重的障碍。在整个法国，“四项条款”激起了广泛的反对。更糟的是，巴黎索邦神学院也是个十足的刺头，以致路易十四所说的所有法国教士都站在他一边的大话被证明完全是丢人现眼的一派胡言。在罗马，虽然由于红衣主教的分歧以及英诺森十一世担心会引起教会分裂，拖延了对“四项条款”的正式谴责，但令罗马不快的实际后果非常糟糕：英诺森十一世拒绝将授职诏书发给所有参加教士大会的主教，而且由于路易十四不会承认参加教士大会的主教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因

而没有一个主教职位能按教规予以补充，结果到1688年，有35个主教区空缺。

事态再度陷入僵局。英诺森十一世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对路易十四1685年镇压异端也无动于衷。1687年法国驻罗马大使德埃斯特雷公爵去世而导致的特许权事件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3年前，英诺森十一世即宣称，在法国同意放弃那些使罗马难以维持其法律和秩序的广泛外交豁免权之前，他不会再接受任何新任大使。路易十四对此要求置之不理，派出蛮横的拉瓦尔丹侯爵继任大使，后者无视教皇将他革除教籍的判决，并声称他在执行其主上的命令时不应受此判决。因此1688年初，有人偷偷地告诉最崇奉基督的国王，说他已得到长期担心的革除教籍的判决^[6]。这时在法国出现种种议论，有的主张干脆将教务专约丢开不管，有的主张召集全国宗教会议或诉诸宗教公会议；法国检察长塔隆在巴黎高等法院抨击教皇在世俗争执中使用宗教武器相威胁的行径。不过，路易十四再次由于强烈的政治原因而试图同教皇和解。在即将举行的科伦选举中，他希望教皇支持他提名的候选人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并希望用放弃外交方面的权利来换取教皇在这方面的合作和对各主教的确认。双方的谈判再次破裂。于是，国王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夺取阿维尼翁和入侵教皇国；他发起声势浩大的宣传战，破坏教皇在欧洲的权威和声誉。他指责英诺森十一世在宗教领域支持异端，包括扬森派和寂静派教徒，而在世俗领域又试图使神圣罗马皇帝用来对付土耳其的武装掉过头来反对法国。法国教士实际上被割断了同罗马的一切联系，法国各地都在谈论教会分裂。据说，在国王的顾问中仍然很有影响的阿尔泰在丧失了获得红衣主教头衔的一切机会后，仍乐意接受高卢宗主教的职务，这是黎塞留也曾追求过的一项目标。但是由于路易十四致力于欧洲战争以及英诺森十一世在1689年8月去世，故而法国在1688年10月入侵阿维尼翁后未再采取任何极端措施。在教皇亚历山大八世统治时，双方都提出和解的动议。但教皇颁布的《纷繁之间》这一训谕谴责法国教士大会擅自做出1682年那样的声明，这就表明争吵远远没有解决。不过在英诺森十二世时，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1692年，英诺森十二世确认了那些未参与教士大会的主教之职位，而一年后，在各位参加教士大会的主教都向他呈交了一封道歉信之后也确认了他们的职位。法国国王撤回了普遍宣传“四项条款”的命令，尽管这些条款没有被明确禁止。关于国王特权的冲突仅仅是停止，而不是得到解决；不过在这方面，

路易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因为除康布雷和里昂外，他保留了世俗特权，而宗教特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尽管官方对胡格诺教徒的政策是同其他政治和教会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法国新教的历史肯定要单独加以考虑，因为它涉及的是另一种问题，即国家与宗教少数派的关系问题。17世纪中叶，胡格诺派的前景似乎并不是毫无希望，因为南特敕令的主要条款历经五十余年的冲突和紧张后仍然幸存下来。但事实上，这种征兆并不妙。南特敕令之所以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接受，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宗教宽容，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有两个宗教，而是因为这两个教派在当时都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自1598年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反宗教改革运动缓慢地但强有力地法国天主教中爆发出来，而胡格诺派也失去了原先的活力，从贵族领导的好战的团体转变为以遵纪守法的官员和中产阶级成员为主的派别。比较开明的天主教徒和许多新教徒之间都弥漫着怀念旧日宗教统一的情绪。然而，尽管这种敦促教派和解的情绪令人称颂，但它却在未来的争斗中削弱了胡格诺派的武力，恰如他们当中不断增强的宗教应受国家支配的思想以及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国王的几近盲目的崇拜和谄媚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即使在路易十四亲政后很久，胡格诺派仍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蒂雷纳直到1668年才成为天主教徒，吕维尼和绍姆贝格则从未改变信仰，到南特敕令被废除时，新教徒中包含富甲一方和身份不低的人，他们在法律界和其他职业中颇具影响以及像银行家那样强大；在法国南部，他们拥有大量土地。

在马扎然武权时期，尽管教士大会和圣礼会施加压力，要求削减胡格诺派教徒的特权，但官方政策变化不大。但是路易十四虽说这时只是个一般的信教者，可他坚信，国家中存在不止一个教派就会破坏全国的团结并危及政权，而教士也吁请他“效法伟大的君士坦丁行事”，镇压异端。国王起初想维持南特敕令的条款，但由专门委员会严格加以解释，此外，对新教徒尽量不表示恩宠或给予提升。路易十四也清楚地注意到，一个健康和受人尊敬的天主教会，其本身就会鼓励人们改宗。事实上，像扬森派教徒阿尔诺和尼科纳，尤其是像波舒哀（在《就有争议的问题概述天主教教义》中）这些人所表现出的论辩技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69年2月，国王发表宣言，准确阐述了这种强制政策，该宣言及其他法令限定新教徒在1598年业已被国王兼

并的地方做礼拜，并命令毁掉自1598年以后建立的教堂。例如，这道法令就导致多菲内有8座教堂、普瓦图的74座教堂中的64座、拉罗舍尔有13座教堂被毁。

实施这些命令的严厉程度视国王政策的需要而摇摆不定，但政府仍希望采取说服而不是暴力的办法。蒂雷纳曾计划举行一次宗教会议把比较温和的胡格诺牧师争取过来，而1666年波舒哀与胡格诺教徒费里，以及1678年波舒哀同克洛德也进行过讨论。此外，财政和神学方面的考虑也被认为妨碍了改宗；郑重放弃原来信仰的行为意味着牧师不可避免地要失去生计，在俗信徒也是如此。从政府基金和自愿捐款中拨出的金钱不足以救济这类人。因此，1667年，建立了由改宗教保罗·佩利松掌管的改宗基金，其中包括来自无人主持之修道院和无人领取之圣俸和一部分根据国王特权从主教区抽取的收入；埃提安·勒加缪所在的格勒诺布尔主教区有许多人改宗，这证明拥有充分资金的重要性。佩利松的做法招致多方面的批评；事实是很难区分什么人真诚改宗，什么人纯粹是投机取巧，也很难避免买卖圣职的恶名；许多改宗者的犬儒主义是无法加以掩饰的。

各种情况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路易十四采取残酷迫害的政策，甚至南特敕令撤销后，这一政策还在推行。它的潜在动机肯定是想一劳永逸地铲除异端。但更迫切的动机是他要让英诺森十一世感到难堪：他为天主教所做的努力越大，就会越发使教皇要么表示出感激之情，要么令自己在全体基督徒眼里成为异端的支持者。路易十四表现得比教皇更富有天主教色彩，这也是符合其反哈布斯堡政策的；如果说利奥波德一世对教皇支持的天主教重新统一的政策虚与委蛇，路易十四则要以自己热切关心维护正统的表现打动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路易十四把自己看作君士坦丁和查理曼再世，这与他强烈的荣誉欲也是一致的。认为他个人的转意归主（这一转变要到1686年才真正发生影响）是这种政策的主要——甚或是次要——原因的说法，并无证据加以佐证；再者，路易十四的听取忏悔神父，拉雪兹神父——上述说法往往被认为是他炮制的——其政治重要性可能非常有限。迫害的发端和继续也不是源自曼特农夫人的劝说：她在一封可信的通信中表示过不赞成其敌人卢瓦所主张的暴力办法；而常被人援引来证明她也参与制定迫害政策的信件却已被证实是18世纪伪造的^[7]。

加快反胡格诺教徒行动的步骤，可从以下事实看出：1661—1679年，法国共通过了12个反胡格诺教徒的法令，而1679—1685年却不下85个。这类法令有许多涉及对宗教和个人自由所施加的虽然细小却是愈益无法容忍的限制，不仅与成年人有关，而且也与儿童有关。1681年，普瓦图按察使马里亚克使龙骑兵强制进驻胡格诺派教徒家这一臭名昭著的计划形成制度，尽管有人批评这种使用暴力的行径，但该计划在1685年仍被扩大到其他地区。结果，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地区，包括图卢兹、波尔罗、拉罗舍尔、普瓦捷和蒙彼利埃等财政区以及马赛、奥比松、卢丹和鲁昂等城镇，在名义上都重新皈依天主教。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使枢密院发出工商业蒙受损失的惊呼声。与此同时，着眼于重新统一或收容的令人分辨不清的努力仍在继续，这部分出于真诚的动机，部分纯粹是政治手段；在对待胡格诺派教徒以及可耻地使用暴力的背后，隐藏着某种信念、某种希望，甚至还有点基督教兄弟之间的爱。而且即便是暴力也能由圣奥古斯丁崇高的权威加以辩解，他曾经教诲人们，强制虽然不能导致改宗，但可以为一个人接受改宗准备条件。波舒哀在其布道词《从内心深处进行强制》（1685年）中也这样认为。

1685年10月在巴黎高等法院注册的《枫丹白露敕令》扼杀了法国归正宗，其理由是既然现在大多数法国人都是天主教徒，归正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按照该敕令的规定，除阿尔萨斯外，所有新教教堂均要毁掉，新教徒公开的和私下的礼拜悉遭禁止，所有牧师均被命令在15天内离开法国，但成年在俗教徒禁止移居国外。新近给予的一些特权，诸如新改宗者可以免税等，终于取消。信仰自由是允许的，但这毫无意义。在反对如此对待胡格诺派教徒的人们中，站在最前列的是格拉诺布尔主教勒加缪，他抨击强制拜领圣礼和继续使用龙骑兵的做法。未来将表明，新教是受到了威胁，而不是被扼杀。当废除南特敕令引发的那阵兴高彩烈的情绪刚过，国王、教士和在俗教徒便发现新的问题又取代了旧的问题。

最为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在欧洲许多地方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应，而在那些地方，例如英国和德意志某些邦国，路易十四实际上又是最急于要拥有好名声的。但天天都有胡格诺派避难者来到这些地区，这比路易十四的宣传更有说服力。移民的总数很难确定，有可能达到20万人以上。联合省、英国、勃兰登堡、瑞士、北美和南非都接纳了许

多胡格诺教徒，并通过他们获得了在牺牲法国利益的情况下促使自己国家走向繁荣的手段。法国的宗教生活遭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害。暴力、强制的渎神的拜领圣餐以及贿赂公行，使天主教声名狼藉，而自17世纪上半叶以来相对不重要的在宗教上持自由见解的思想逐渐得势。在另一方面同样严重的是，英诺森十一世不为路易铲除异端的行动所打动。他的训谕语气冷淡，在国王特权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而罗马举行感恩礼拜和正式庆典的意义也为下列事实抵消了，那就是路易十四暴力政策的反对者勒加缪升任红衣主教。总的来说，路易十四针对新教的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比他迫害扬森派教徒或争取国王特权的计划还要差。所有这些举措中自相矛盾的因素太多，而在各次行动中教会势力进行抵抗的能力又都为世俗权力大大低估了。

在以新教为官方宗教的西欧国家——联合省、英格兰和苏格兰——政教关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这些国家的国教即官方认可的教会都不受罗马教廷这样的国际组织的监督和支持，但如果因此认为它们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也是错误的；例如，加尔文宗的神权政治传统就是抵制世俗控制的一个壁障。其次，新教之具有分裂倾向的特性，连同其强调个人自我拯救而不尊重权威的见解，就导致在国教之外还兴起了一些教派，而在一个宗教一统思想仍然强大的时代，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不能忽视这些教派之存在的。最后，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少数派常常会招惹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担心，尽管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相称；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人们总是怀疑罗马天主教徒是破坏新教和国家自由的外来力量的代理人。

经过17世纪最初二三十年激烈的教会争吵，联合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欧洲最宽容国家的声誉。这与其说是联合省改变法律所致，毋宁说是未能将法律付诸实施所致，而这种宽容政策又是无执政时期（1650—1672年）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都加以遵循的。为多尔德公会议所斥责和放逐，但得到摄政阶级强烈支持的阿明尼乌派，实际上得到广泛宽容，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享有完全的礼拜自由；他们与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和约翰·洛克保持联系，表明他们在知识界具有较高的地位。威廉·坦普尔爵士在《对联合省的观察》（1673年出版）中，把阿明尼乌派描写成具有国家党派特点的一个党派，而不是教会中的一个派别，但这种说法由于下列事实而很难得到

证实，即1660年前后莱登主张包容各种教义的科齐乌斯与严遵加尔文宗教义的富蒂乌斯之间爆发了关于神恩和释罪的争论，尽管摄政派和奥伦治派像在关于为奥伦治亲王举行公开祈祷仪式的争论时那样各自支持一方。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新教派别众多，犹太教堂到处可见。天主教徒在东部各省、各财政区和阿姆斯特丹人数颇多，他们的地位较为复杂。尽管他们的公开礼拜得不到法律保护，但实际上，他们只要缴纳罚金就能享有很大的礼拜自由；同样在实际上而非在理论上，他们通常是被容许有公民权利的。坦普尔并不是为下列现象所触动的唯一观察家，即一个主要关心于维护秩序和促进繁荣的政府所显示的普遍不采取强制措施的状况和总的宽容气氛；而荷兰之所以繁荣部分是因为他们实行宽容，这一点常常被人指出是一经验，但迄今为止欧洲其他国家很少有加以效法的。不过对这一世俗化试验所进行的宣传——这种宣传由于联合省的另一特色即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而得到大大的促进——从长远看来，却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荷兰的报刊成了自由欧洲的报刊，而荷兰各城市则成了各种信仰和民族的流亡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1660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圣公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恢复国教的地位，于是无国教的革命时期宣告结束。长老会在促使国王复辟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理所当然要求国王做出某些妥协，由于克拉伦登和吉尔伯特·谢尔顿（从1663年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高明的本领，因在促使国王复辟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而理所当然地希冀获得某些特权的长老会，彻头彻尾中计失败了。几乎一点也没有耽搁，主教区和教区的管理又按原有的方式进行，王位虚悬期间出售的教会土地也收回了。1661年4月，查理二世采用圣公会仪式加冕；5月，新选出的骑士议会按照公祷书领圣礼。圣公会与长老会代表从4月开始举行的萨伏依会议和新议会都无什么事情可干，只有接受既成事实；除了教会法庭外，英国教会恢复了1640年的原状。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对教士的征税是通过议会而不是通过教士会议进行，这不是始于王位虚悬时期，而是1664年克拉伦登与谢尔顿之间私下协议的结果。此后，教士会议由于失去了财权，因而很容易就被搁置一边，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会没有正式的喉舌。

根据1662年5月的《信仰划一法》，清教徒被逐出英国教会，“不顺从国教者”（Dissenter）和“不信奉国教者”（Nonconformist）

这两个名称表明他们在国教外的新地位。对有些教派的侮谩要比对长老派的侮谩轻，因为这些教派深信改宗教挑选出来的同仁之谊无须政治统治权来促其实现，而长老会派则具有全面的国家教会观。逐出英国教会也意味着迫害，此举时断时续，但有时很激烈，这要视中央政治、地方官员的憎恨程度及其不同的办事效率而定。此后，如果成为一个不信奉国教者，那就要失去一些公民权利，也被禁止进行公共礼拜。《市镇机关法》（1661年）使不顺从国教者不能进入他们主要力量所在的市镇之机关，而礼拜也是被禁止的。天主教徒亦复如此。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初12年，以及天主教阴谋事件和拉伊农舍密谋案^[8]后的反动时期，由于1664年和1670年的两个《宗教集会法》，1665年的《五英里法》以及法规全书和教会法庭仍然保留之旧法律的作用，不信奉国教者在许多地方吃尽了苦头。政府的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至今依然是有争议的。尽管许多不信奉国教者在政治上并不产生危害，但共和主义和不顺从国教者之间旧有的联系很难消亡，因而有着认为不满分子会利用宗教集会作为掩护来进行煽动叛乱活动的看法就很自然了。

查理二世归附于罗马的确切日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当在政治上可能的时候，他都试图使天主教徒得到一些照顾，而且也愿意把不信奉国教者包括在自己的计划内。但是由于谢尔顿的反对，查理二世在1662年制订的特许计划胎死腹中。而议会对国王关于暂缓执行成文法（即便是教会事务方面的）之批评，又导致1672年的《容忍宣言》在发布一年之后被撤销。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天主教徒在接下来的10年特别痛苦：约克公爵改宗天主教的消息（到1673年已人尽皆知），关于多佛条约不利于英国自由和新教之秘密条款的猜疑，以及对路易十四侵略的担心等，全都有助于促成体现在1673年和1678年两个《宣誓法》中的反天主教政策，并在1678—1681年的天主教阴谋事件和排斥危机中臻于极致。^[9]不过国王的巧妙的不动声色，挫败了辉格派阻止詹姆士继承王位的企图：托利派创立了百依百顺地服从君主和捍卫英国国教的种种理论，以对抗辉格派关于对所有新教徒实行宽容、把天主教完全排除出所有重要官职和实行有限制之君主制的纲领。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对苏格兰教会采取了更多的暴力行动。阿盖尔和沃里斯顿的约翰斯顿两人皆被处死，表明国民誓约派不会被宽

恕，而1661年恭顺的议会通过的废除法则取消了自1633年以来的所有立法，从而为枢密院恢复令人憎恨的主教制开辟了道路。另外还有两项措施导致了长达28年的冲突：一个措施是以“主教之罗网”著称的法令，即对不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施以重罚，并导致户外集会成为非法，往往强行加以驱散；另一个措施是恢复私人对圣职的授予权，这对所有曾直接从其管区信徒取得教职的人谋求保荐和主教有俸职位是非常必要的。令政府感到惊奇的是，居然有二三百名牧师抗命不遵，他们后来成为兼有教士和世俗信徒参加的反对派的基本上不肯妥协的核心，这个反对派不顾时或夹杂着抚慰的最带强制性的措施，一味违抗解决办法。1679年，危机终于发生，这一年令人憎恨的夏普大主教遇刺身亡，而蒙茅斯在博恩韦桥也打败了四分五裂的叛乱者。拒绝承认查理为王之卡梅伦派的最后一搏，遭到军事力量的镇压。这些麻烦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在革命中正式重建非主教制的长老会，而不是神权政治的胜利。

当这种冲突不断在欧洲许多国家发生时，这个时代的一些优秀思想家日益关注天主教会重新统一和宗教宽容的问题。其中每一位，无论是教士，还是俗人，在口头上都支持教会重归统一的思想，不管种种使之成为现实的尝试会带来多大的疑问。一方面，在宗教宽容方面，各人的意见不太相同，因为宗教宽容要使教会和国家两者都需要的统一和一致那一古老原则丧失掉了。不过，宗教宽容又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目标。各教会重新统一只能通过广泛自愿，或强制改宗，或各教会放弃独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从教会看来，宗教宽容所要求的是默认其他教派的错误，从国家看来，则是相信放弃一致是安全和合宜的。本时期由于日益世俗化以及越来越多的知识实验，是非常适合于宗教宽容之发展的，尽管其进程非常缓慢并且不平衡。

教会重归统一运动在17世纪下半叶并非新事物。抱有世界主义观点的苏格兰人约翰·迪里耶曾将自己的统一计划呈送给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奥克森斯蒂尔纳，并试图使克伦威尔对这些计划感兴趣；而格劳秀斯和夸美纽斯也是支持这一运动的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在较后时期的促进教派和解的努力中，有三个人比较著名：莱布尼茨、波舒哀和克利斯托瓦尔·德罗哈斯·斯宾诺莎。从小受路德宗熏陶的莱布尼茨最初显然为约翰·克里斯蒂安·冯·布瓦涅伯格提出的教会重新统一计划所吸引。此人是一位改宗天主教的人士，并在思想开放的美

茵茨选侯约翰·菲利普·冯·申博恩的宫廷中颇有影响。1676年，莱布尼茨应邀担任一位路德教邦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即汉诺威公爵约翰·腓特烈宫廷的图书馆馆长，从那时起到他1716年去世，他那无穷的才智一直在寻求某种使教会重新统一的方法，他不停地写信给黑森—莱茵费尔斯方伯、佩利松、波舒哀和任何可能同情这一事业的人。他认为所有教派如果都以圣灵为内心的指南，以圣经为外在的向导，那么它们通过推心置腹的讨论，就能在基本的信仰原则上达成一致；他也极力强调内心契合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不是外在团契的一分子，而在内心相互契合。他看上去甚至准备满足天主教的要求，以致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他是个秘密改宗者。他与波舒哀的通信在有关特伦托公会议的权威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斯宾诺莎主教也正通过亲自劝说和政治手段，试图实现同样的目的。1673年，他代表利奥波德一世皇帝周游整个帝国，为对土耳其的战争争取援助，而在归途中又向罗马报告了自己为教会重归统一所做的努力。利奥波德对其东部和西部两条边界的关注以及英诺森十一世对土耳其问题的兴趣，导致他们赞成任何可能促使其目的实现的权宜之计，因而斯宾诺莎所认为的他在德雷斯顿、柏林、汉诺威和海德堡遇见的新教徒都真诚地希望教会统一的有点天真的想法也得到了认真的对待；但教皇设立的检验教会统一可能性的委员会却得出了不太令人乐观的结论。1678年和1682年，斯宾诺莎再度做了努力，尽管满怀希望，但收效不大。他的主要目的是为基督教全体大会的召开开辟道路，而且为做到自由讨论，他渴望停止遵循或执行特伦托公会议的先例和决议，不应视新教徒为分裂教会分子。但反对教会统一的力量十分强大，而且事实上，1689年英诺森十一世的去世和1695年斯宾诺莎的去世，都使教会重归统一运动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

宗教宽容则取得了较多进展，尤其是在德意志的某些邦国和联合省。有利于宗教宽容的观点常有人从理论上加以陈述。例如在英国王位虚悬时期，下列一些论点得到了论证，即地方长官无须过问宗教事务；国家可以安全地庇护不止一个教会；真正体现基督精神的是不会镇压异端的。此外还有这样坚信无疑的看法：一个人只要不闹事，就应允许他进行他所喜欢的礼拜活动。但仅仅用这类理论无法使统治者及其臣民普遍相信实行宽容是安全的和有利的。只有随着唯物主义的考虑日益重要，人们才会确信：一个人的宗教信念和他作为臣民的忠诚与有用性无关；而一个国家要变得富裕和繁荣，就应无视种种宗教

障碍。理论论证和实例论证的结合很好地体现在约翰·洛克和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交往上，洛克到1667年已初步形成了其宗教宽容理论，而沙夫茨伯里伯爵这位强有力的政治家则认为英国如果能像联合省那样实行宗教宽容，英国就能与荷兰并驾齐驱，成为商业大国。^[10]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准备普遍地实行信教自由：洛克和沙夫茨伯里都会拒绝给天主教徒以宗教自由。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做法常常比法律规定得要自由，而且宗教宽容原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业已奠定。不过，宗教宽容的发展绝不是普遍的：如果说英国议会于1689年通过了宽容法，而法国却在4年前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重新回到了举国一致的理想上来。

然而，教会重归统一计划和宗教宽容计划只是体现当时独特气氛的两种形式。另一个某种程度上超越国界和教派界限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把宗教看作是个人的而非公共机构的（同时也就是并非一味凭智力的）事情，这或多或少又与作为17世纪下半叶一个特征之最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的吸引力消退有关。例如，在英国，贵格派教徒把清教关于圣灵渐进启示的信念扩展到他们可以放弃教会的圣礼以及教士和俗人的区别上。在德意志信奉路德宗的地区，以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为首的虔敬派运动特别强调所有信徒都是教士，因而在俗信徒可以在教会中起一定作用；同时把着重点放在宗教经验而不是教义和神学之上。斯彭内尔创立的研究圣经的聚会（虔敬会）是他传播自己学说的唯一方式。寂静派（在其发展过程中，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米格尔·德·毛里诺斯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否认所有外务有任何作用，并以一种完全消极的态度来取代这些外务，主张一种“灵魂和肉体寂灭”的境界，只有从这种境界上帝才有可能使灵魂进入纯爱状态。尽管莫利诺斯的教义是真正崇高纯洁的，但在1687年仍遭到谴责，而另一寂静派人物居伊昂夫人的著作在法国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所有这些运动都倾向于使传统手段，即个人通过国教获得神恩，成为多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方面的发展体现为以荷兰的阿明尼乌派、英国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和圣公会思想开明分子为代表的宗教见解上的自由主义，他们寻求对神学和教会问题做出一种合理的不偏不倚的看法，试图强调基督徒之间达成一致的共同基础，而不是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他们崇高的学术地位以及当时最有活力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联系，使他们在这些新思想正感染着欧洲最有才智之士的时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国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形式主义和排他性的一种全面彻底和充满反感的对抗，而当时有些评论家正确地认为这些倾向包含着非常真实的危害：自然神论和无神论行将在17世纪末找到直言不讳的提倡者。但是保守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耶稣会会士连同其所谓的放任不拘的道德观（表现为诡辩以及特别表现为或然论）之广泛憎恨，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影响之大。流行的盲目崇拜和虔敬行为依然要比任何新思想更能吸引人民大众，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所声称的神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对那些判断能力一般的善男信女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世俗化的倾向到处在增长。宗教渐渐变成主要是个人关注的事情，而非国家该负的责任，而国家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少的人认为它是通过一个神所指派的统治者建立来确保上帝目的之实现，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国家的目标是人的安全和繁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事情必然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不是一种共同执行神所指定之任务的伙伴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一种以利害关系和独特利益为主导目标的注重实利的密切结合。

[1] 《一位国王在治国之道方面的训诫：路易十四致其继承人的信》，J. 朗衣编，赫伯特·威尔逊译（伦敦1924年版），第149页。

[2] 关于《复原敕令》，见第4卷第11章。

[3] 见本卷第16章边码第396页。

[4] 见本卷第19章边码第471页；第20章边码第498页。

[5] 关于投石党运动，见第4卷第16章。

[6] L. 冯·帕斯特：《教皇史》（E. 格拉夫译，伦敦1940年版），第三十二卷，第363—4页；J. 奥锡伯尔，《路易十四与英诺森十一世的对抗》（巴黎1949年版），第11—13页。

[7] 关于这类证据的批述，参见丁·奥锡伯尔《路易十四与新教徒》（巴黎1951年版）第91—94页。

[8] 关于这两个事件，见后第13章边码第313—314页，第317页。

[9] 见后第13章边码第310—314、316—317页。

[10] 对照第十四章边码第332—333页、第338—339页。

第七章 艺术和建筑

罗马是巴洛克艺术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17世纪上半叶的许多非意大利裔艺术巨匠，如鲁本斯和伦勃朗、贝拉斯克斯和普桑，如果与罗马的艺术活动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话，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造诣。尽管165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探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艺术时，仍需给予罗马以应有的重视。

所有巴洛克艺术的第一代巨匠——安尼巴莱·卡拉奇（1560—1609年）、卡拉瓦乔（1573—1610年）、圭多·雷尼（1575—1642年）和建筑师卡洛·马代尔诺（1556—1629年），都已在1650年以前去世。弗莱姆·鲁本斯（生于1577年）则在1640年死于安特卫普。第二代艺术大师中的大多数，即大致出生于16世纪最后10年的那些人，此时仍活在世上。他们当中有亚力山德罗·阿尔加迪（1595—1654年）、安德烈亚·萨基（1599—1661年）、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年）、佩德罗·达·科尔托纳（1596—1669年），还有那不勒斯的雕塑家及建筑师科西莫·凡扎戈（1598—1682年）、威尼斯的建筑师巴尔达萨雷·隆盖纳（1598—1682年）以及最出类拔萃的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年）。在这一代难以置信的强大阵容中还有一些非意大利人：贝拉斯克斯（生于1599年）卒于1660年；普桑（生于1593年）卒于1665年。这群人中最年长的弗里斯·哈尔兹（生于1580年）卒于1666年；伦勃朗（生于1606年）卒于1669年；克罗德·洛伦（生于1600年）卒于1682年。所有这些艺术家都是在17世纪30—40年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只有不多几个人活到70、80年代以后的。

第三代艺术大师诞生于1610年至1630年之间，是本章主要论及的人物。1650年前后，他们创作了早期作品，并在17世纪50—60年代臻于成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位能和上一代艺术大师并肩媲美。诸如那不勒斯的马蒂亚·普雷蒂（1619—1699年）、萨尔瓦托·罗查（1615—1673年）、贝纳陀·卡瓦里诺（1616—1656年）、鲁卡·乔尔丹诺（1632—1705年），罗马的卡罗·马拉蒂（1613—1699年）以及热那亚的焦凡·巴蒂斯塔·高利（1639—1709

年）这样一些画家，他们都师承卡拉瓦乔、安尼巴莱·卡拉奇、萨基和科尔托纳。建筑师卡洛·丰塔纳（1634—1714年）主宰罗马的时尚达数十年之久。这一代雕塑家中也没有人能接近贝尔尼尼和阿尔加迪的水平。第三代的艺术家们诚可敬佩，他们多才多艺，天赋极高，但毕竟缺乏前辈那样开阔和完美的视野。

意大利以外的情况也相当类似。在法国，普桑的正宗继承者是夏尔·勒布伦（1619—1690年）；在西班牙，穆里略（1617—1682年）、瓦尔德斯·莱亚尔（1630—1691年）和克劳迪奥·科埃略（1642—1693年）都是贝拉斯克斯的衣钵传人。范戴克去世后，彼得·莱利爵士（1618—1680年）才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肖像画家。在荷兰，那些行家里手都承袭了伦勃朗的传统，因而与伦勃朗相比，就连其中最杰出的弗美尔·范·德尔夫特（1632—1675年）在水平上也颇有差距。

尽管贝尔尼尼活到1680年，并享有国际声誉至死，但罗马作为欧洲艺术之都的地位却日益衰落。虽然人们永远无法对这种变化做出全面的解释，但有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罗马教廷的权威就一直遭到削弱，而在亚历山大七世去世（1667年）之后，教皇的荫庇更是大不如前。17世纪最后数十年内，罗马的艺术家往往梦寐以求有用武之地，而意大利其他各邦的艺术活动却蒸蒸日上。在威尼斯，尽管17世纪上半叶是一空白的时期，但由于热那亚人吉安·巴蒂斯塔·兰杰蒂（1625—1676年）、德意志人约翰·卡尔·洛特（1632—1698年）、佛罗伦萨人塞巴斯蒂亚诺·马佐尼（1615—1685年）以及其他1650年以后在那里从事活动的人士之作用，遂开始了一个艺术复兴过程，最终导致18世纪早期威尼斯画派的灿烂辉煌。富裕的热那亚共和国把重金投向艺术领域。尽管1657年经历了一场大瘟疫，热那亚仍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绘画和雕塑流派傲然屹立；尽管热那亚有一些天赋极高的艺术家如焦凡·贝内代托·卡斯蒂廖内（1610？—1665年）和焦凡·巴蒂斯塔·高利前往他地寻求发展，但热那亚的大量宫殿和教堂在这一时期仍被装饰一新。然而，发展最显著的是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都灵在精力充沛的查理·伊曼纽尔二世（1638—1675年在位）的治下进入一个扩充和装饰的伟大时期，这位君主的建筑师阿梅代奥·迪·卡斯泰拉蒙特、弗兰西斯科·兰弗朗奇，尤其是古拉里诺·瓜里尼，把皮埃蒙特的首都变成了一个

金碧辉煌的巴洛克风格的城市。早在17世纪中期以前，那不勒斯已经吸引来一批杰出的罗马画家：多梅尼契诺和兰弗兰科都在那里客居多年。1656年的大瘟疫虽对本地的艺术天才造成很大的摧残，但那不勒斯画派仍占据了支配地位，以致在长达两代人的时间里傲视意大利而无对手。

在重心从罗马向意大利南部和北部转移的同时，又出现巴黎争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中心之挑战。1661年，当年轻的路易十四决定亲政时，巴黎开始领导欧洲的潮流。回想起来，贝尔尼尼那次对法国首都所进行的失败的国事访问，似乎表明公众已经认识到罗马在艺术事务方面的声望不断下降。法国国王之所以向这位意大利艺术大师发出邀请，是因为似乎只有他才能赋予卢浮宫这座法国国王宫邸以一种与法国这个世上最伟大的王国相称的外观。但是，当1665年秋贝尔尼尼离开巴黎之时，法国官方态度发生了变化。1667年路易十四决定舍弃贝尔尼尼的计划，选择了一个庄严的法国式设计作为卢浮宫朝东一面改建的根据。这个设计是克洛德·佩罗（1613—1688年）、路易·勒沃和勒布伦通力合作的结果，而其冷峻刻板同贝尔尼尼方案的浮夸堂皇之间的差异，正表明新时代总的风格取向。

为了有助于理解1650年以后的国际艺术状况，有必要对17世纪早期以来并存着的各种风格流派作一评估。其一就是狭义的巴洛克风格——一种充满活力的浮夸的风格，其渊源可以上溯到16世纪威尼斯艺术大师提香和韦罗内塞的“印象主义的”绘画技巧以及柯勒乔在帕尔马教堂的天顶装饰中大胆采用的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17世纪早期，鲁本斯糅合了威尼斯的色彩主义和佛兰德的现实主义，创立了巴洛克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乔凡尼·兰弗兰科和佩德罗·达·科尔托纳又引进另一些细微特色。前者是通过他在罗马和那不勒斯所创作的带有令人屏息凝神的柯勒乔式魔力的天顶画来达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其热情洋溢的装饰风格来达成，这种风格把韦罗内塞、柯勒乔、拉斐尔的体验和古典艺术融入一些十分密集的构图之中。

第二种较为古典的趋向源自安尼巴莱·卡拉奇在其为法尔内塞家画廊所作的壁画中臻于极致的那种华丽风格。这种能激动人心但有点冷峻的风格是以仔细研究大自然、古代文物、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以及威尼斯派的色彩主义为其根基的。任何“巴洛克”艺术家都不能无视这种风格的潜在影响：它给鲁本斯和佩德罗·达·科尔托纳以熏

陶，它令贝尔尼尼仰慕不已，它也为普桑的古典主义开辟了道路。第三种重要趋向一般称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只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方便用语。它过去曾经被而且现在仍在被不正确地应用于卡拉瓦乔的作品和（较有道理地）应用于北方那种十分精细的复制图。它是用来指大众化类型的上乘作品以及诸如客栈和场景那样的“下里巴人”题材的绘画；它也用来指对实物的直接临摹以及对宗教雕像的不加修饰的描绘。

这三种趋向在整个17世纪都在竞争获得公众赏识和首要地位，而且很难找出一个时候不是三派并存的局面。总的说来，巴洛克潮流在17世纪20—30年代占有优势，从40年代以后则是取向改变为崇尚“巴洛克古典主义”。卡拉瓦乔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对前两股潮流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未被教廷、宫廷和贵族认可为官方风格。

有几个法国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在这关键的10年间艺术风格错综复杂的情形。曾在意大利游历和作画多年的西蒙·武埃（1590—1649年），在其返回巴黎很久之后，以意大利巴洛克手法创作了《教堂即景》（藏于卢浮宫，约1641年）——整个构图包含了一扫无遗的斜行排列、以透视法描绘的远景和一群流露各种感情的比例巨大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生活在罗马的普桑创做出了诸如《吕贝卡和埃丽莎》（藏于卢浮宫，1648年）那样的精心布局、仿佛浮雕一般的绘画，明显地参照了拉斐尔和古代的典范；这是一幅与武埃完全不同的严谨的古典作品。路易·勒南的油画《晚餐的农民》（藏于卢浮宫，约1645年）把观赏者引入一个如实描绘的农家场景之中；“下层生活”的服饰和摆设——农民的穿着、破烂的裤子、厨房的器皿、猫和狗——无一不画。但是与弗朗科或科尔托纳的任一作品相比，武埃已经背离了巴洛克风格，趋向于古典标准；同以后的勒叙厄（1616—1655年）相比，普桑的作品仍有巴洛克作品的浓艳和热烈的色调；与荷兰风俗画相比，人像比例的巨大和正面构图的简朴都有勒南的现实主义从属于古典主义。因此，有古典主义的性质是上述三幅画的共同特征，专门术语的障碍并不妨碍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证方法或许会将这三种主要潮流分别与各自特殊的民族性情和特质联系起来。意大利人贝尔尼尼也许会被视为巴洛克流派无可匹敌的代表；法国人普桑也许会被奉为古典主义的拥护

者；而荷兰人伦勃朗则也许会被认为是北部现实主义的无可比拟的倡导者。即使这种观点可以赞同，那么这几位大师早期的创作生涯也还是揭示了他们信奉相似的价值观念。早期的伦勃朗显著地运用源自卡拉瓦乔的注重光线的手法，他以突出的三角形和斜行布局进行构图，他对崇高姿势和意大利比例巨大之形体显露出兴趣——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年轻的贝尔尼尼对雕塑的解释和普桑在这同一时期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情况。正是以这种巴洛克风格为起点，每位大师各自向着一种纯属个人的风格发展。但是在他们后来的风格中也仍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三者都发现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组成的简单结构要比他们早期繁复的巴洛克式构图更适于表达强烈的感情。

后期的普桑，醉心于以道德和理性的方式对待艺术，将其信念体现为一些清教徒式的朴素形体和几乎令人生厌的刺眼色彩。伦敦收藏的他于1657年所创作的《圣母领报》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译者注）收藏的创作于稍后时期的《入埃及途中》就是典型的例子。贝尔尼尼后期作品通过在一个明显生硬的形体组成的框架内表示愈益强烈的动势来反映17世纪天主教礼拜中的一种神秘倾向。这可以从《有福的鲁道维加·亚尔贝托尼》（藏于罗马里帕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1674年）以及加布里埃莱·丰塞卡的半身雕像（藏于罗马卢西那的圣洛伦佐教堂，1668—1675年）两件作品中得到证明。伦勃朗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都是感情越深，就越显得静穆。他既不需要贝尔尼尼式的外露狂热，也不需要普桑式的塑像般的人物形象和古典的构图，来表达心醉神迷的心态。他的后期绘画作品表现出彻头彻尾的静穆，极端简单的人物融入空间，而整个空间也洋溢着感情。

这三位伟大的艺术家既体现了，又应答了时代的渴望。他们像非常灵敏的共鸣板对自己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做出反响。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贝尔尼尼一直享有教皇之官方艺术家的地位，接连为五位教皇服务。他那南方的花哨和激情，他那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征服公众心灵的才能，他那善于描绘令人意乱神迷的肉体状态的手法，他那能使信徒深切感到一种强烈超自然体验的本领——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他要担当天主教正统艺术家的角色。

普桑在罗马生活了40年，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却居住在巴黎。随着年事的增高，他的资助者和朋友主要由商人和银行家、政府官员和

律师组成，这些人信奉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同样也崇尚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斯多噶主义。他们把普桑作品中的伦理主题和审慎的古典主义视为自己胸中珍藏的理想在绘画上的表现，并为之欢呼雀跃。

伦勃朗的艺术植根于信奉加尔文教之荷兰的市民文化中。他的泛神论使得世间万物，下自卑微的跛脚动物，上至从空中而降的暴风骤雨，都变得高尚有灵。他所铸成的革命可以从他的宗教绘画作品中得到最充分的判定。他是第一位全盘放弃天主教历史悠久的肖像画法的画家。南方的艺术家总是通过肉体的完美来展示基督的神圣本质。在伦勃朗艺术生涯的早期，他也是以这种艺术语言来解释基督的。但他逐渐把基督想象得既丑陋又卑微，以致最终他对圣经故事的不按传统的个人的解释远远背离了天主教的官方艺术。

贝尔尼尼的历史使命主要在天主教的南方，在那里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法国的甚或可以说欧洲的17世纪下半叶以至18世纪的古典艺术，是从普桑的作品和思想中汲取了力量。北欧的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绘画的进一步发展则无法同伦勃朗多年的成就截然分开。

然而，这些艺术大师们后期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个人风格并未被年轻一代艺术家心领神会。1650年以后不久，全欧都感受到一种拉平的趋向：个人表达能力在削弱，紧张局面在松弛，而且尽管不同的艺术流派仍在坚守阵地，但在法国霸权之下出现了一种国际风格。这种归于一律的风格本质上是古典主义的，但也许称它为“巴洛克古典主义”较为正确。贝尔尼尼、普桑和伦勃朗三人的生涯表明这种国际风格谋求其支配地位的斗争在三个艺术上最为重要的国家——意大利、法兰西和荷兰都采取了不同形式。

从中世纪起，意大利人就把创作巨幅的壁画看成画家的首要任务。17世纪下半叶的画家们正是在这个领域中贡献出其最好的才华。除了不多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罗马教堂和宫殿中最为豪华的巴洛克式饰物都是在1650年之后创作的，常常安在一些很古老的建筑物之内。这类作品中最为炫耀的是高利于1672—1683年为耶稣会发源的教堂——16世纪下半叶建立的杰佐教堂所创作的壁画，以及安德里亚·波佐在圣伊格那齐奥教堂绘制的巨大天顶画（1691—1694年）。高利壁画的戏曲性效果，源自像贝尔尼尼那样的把画中大块暗区和明区并列的手法，源自引导观众视线逐步穿透天空的无限深处，亦即基督的

圣名出现于闪亮光线之中的画中最明亮区。另一同样归功于贝尔尼尼的手法需要评说一下：高利把壁画和着色灰幔掺和在一起，让天顶画的某几部分溢出至拱顶建筑——这一设计旨在尽可能强烈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高利形成对比，波佐把象征着圣伊格那蒂乌斯被尊为圣徒过程的一大群人物形象置于能引起错觉的建筑框架之中，此框架以一个想象的结构大大拓宽了真实的空间。这种被称为透视法的手法源自一种博学多闻的文艺复兴传统，但从未在如此大的画面上加以采用。上述两种类型的巴洛克式天顶画——一种是让人像打破限制它们的框架，使之看来更逼近于观众；另一种是用透视法拓宽绘画的空间，使得绘入的情景似在极远的距离之外——都有着热心的追随者，主要是在18世纪奥地利和德意志的巴洛克艺术之中。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繁荣时期的巴洛克壁画，看来都给人以一种假象：意大利绘画是朝着国际古典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当高利正从事其在杰佐教堂的壁画创作时，卡洛·马拉蒂却在出自阿尔蒂里世家的教皇克雷芒九世（原文误，应为十世——译者注）的家族邸宅的巨大天顶上创作《克列门西的胜利》（1673年以后）。他放弃了巴洛克各种能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壁画的构图复归于明晰简练，同时有着重新确立富于立体感的单个人物形象之重要地位的尝试。在高利和马拉蒂争雄的斗争中，高利的难以理解的晚期巴洛克风格在马拉蒂的理性古典主义面前毫无取胜的可能。早在17世纪70年代，马拉蒂的胜利已确定无疑。不久以后，就连高利的风格也开始失去其强度；尽管有着波佐在圣伊格那齐奥教堂的创作，但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马拉蒂的风格已经主宰了罗马。

马拉蒂的古典主义与安尼巴莱·卡拉奇的宏大堂皇的“早期巴洛克古典主义”几无共同之处。诚然，它和马拉蒂的老师安德烈亚·萨基在17世纪40—50年代所付诸实践的庄严的、绘画上的“全盛期巴洛克古典主义”有密切的关联。然而身为第三代艺术大师的马拉蒂进一步走上了将巴洛克和古典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加以调和的道路。他沿着一条易于令人赞同的中间路线前进：他的绘画几乎没有什么难以捉摸之处，不会叫观众困惑莫解或激起深沉的情感。掺杂适量的欢快绚烂色彩是他的“晚期巴洛克古典主义”的特征。正是这种风格——巴黎无疑对之起了促进作用——受到了全意大利至少是整整一代艺术家的效法。

但意大利人从未完全服从于一种模式。在有关鉴赏的事情上，从不存在一个有权发号施令的中心组织。“一致”的精神在意大利总是受到怀疑。一个在罗马客居了30年之久并于1673年在那里去世的那不勒斯人萨尔瓦托·罗查就是一例。这位才华横溢却一贯离经叛道的人长于战争画、风景画和海上画，以苍劲的笔法描绘出带着罗曼蒂克气息的狂暴场景。罗马以外的一些强调个人风格的艺术家的声势日盛的全盛期和晚期巴洛克古典主义做出强烈反应。在威尼斯进行创作活动的马佐尼和兰杰蒂前面已经提到。同样的，瓦莱里奥·卡斯泰洛（1624—1659年）及其热那亚的衣钵传人也爱好强烈的对比和浓烈的色彩。那不勒斯人马蒂亚·普雷尔和卢卡·焦尔达诺——两人都曾在亚平宁半岛上走南闯北地作画——在其绘画作品中展示出一种17世纪末最后数十年里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地区都罕见的与其匹配的蓬勃力量。所有这些艺术家以及许多未曾提及的画师偏爱在一块块小色区运用浓彩酣笔和粗放地杂陈并列而不喜欢平和地涂彩着色，他们宁可用令人意想不到的色彩对比而不取色调的和谐平衡，他们以狂暴的动势、戏曲性场面乃至新神秘主义来对抗古典派的柔和修饰。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意大利的巴洛克绘画史是与雕塑和建筑的历史平行发展的。由于贝尔尼尼艺冠群伦，雕塑家的地位蒙受了不利的影响。无人能忽视贝尔尼尼：为友为敌，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即使是他的对手也在其荫庇之下生活。1650年以前，即在阿尔加迪和迪凯努瓦在世时，还是一个众彩纷呈的时代。但1650年之后不久，保守的埃尔科莱·弗拉塔（1610—1686年）领导了贝尔尼尼派的右翼，而进步的安东尼奥·拉吉（1624—1686年）则领导了贝尔尼尼派的左翼。研究他们成就的最好依据是坐落在新广场的圣阿格涅斯教堂的巨大的大理石雕塑（1660年）。拉吉这位在其同代人中最具天赋的雕塑家，在杰佐教堂的中殿和十字形耳房的长廊上装饰的一大组灰泥像，完全服从于贝尔尼尼晚年的神秘风格。但是弗拉塔却领导了一个大流派，意大利各地的雕塑家云集门下。弗拉塔和拉吉于1686年去世时，这一代还在世的著名雕塑家只有多梅尼科·圭迪（1625—1701年）。尽管他平平庸庸，但仍被奉为罗马雕塑家的第一人。有一点很有特征意义，那就是他与法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1677年接受了一项任务，在凡尔赛宫雕塑一组大理石群像；但由于他仍对贝尔尼尼的华丽风格亦步亦趋，这组雕像使法国宫廷很不满意。

正是在这时，亦即法兰西学院在罗马建立（1666年）之后，法国雕塑家大量涌入这座不朽之城。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长期留在罗马，并接受了重要的制作任务，其中有P. S. 莫诺（1657—1733年）、G. B. 泰奥东（1646—1713年）和P. 勒格罗（1656—1719年）。因此，到17世纪末，法国对罗马雕塑的影响超过对罗马绘画的影响。卡米洛·鲁斯科尼（1658—1728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罗马流派的自主性。但他的后期巴洛克古典主义——与绘画上马拉蒂的风格虽不同时却极为类似——一直到下个世纪初才盛行起来。

由于贝尔尼尼的威望，罗马作为雕塑艺术国际中心的地位比作为绘画中心的地位维持得更为长久。整个17世纪以至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的雕塑家也前往直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从事创作，甚至在德意志、波兰、葡萄牙、英国和其他地方找到急于需要他们提供服务的恩主。但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热那亚和威尼斯涌现出了一些欣欣向荣的地方流派。佛罗伦萨人费尔迪南多·塔卡（1619—1686年）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托斯坎尼当地不喜夸张的风格。正是费拉塔的学生乔万尼·巴蒂斯塔·福吉尼（1652—1737年）的作用，贝尔尼尼派的雕塑在佛罗伦萨达到了其顶峰。在热那亚，则有了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当地巴洛克派雕塑家，即菲利波·帕罗迪（1630—1702年），而且热那亚流派以后的发展实有赖于他的突出成就。威尼斯吸引了北方各国的雕塑家。其中精力最旺盛的是若斯·德科尔特（1627—1679年），他生于伊普尔，曾在罗马学艺，1657年定居威尼斯。他把巴洛克式雕塑引进了威尼斯并由他的合作者和学生把他那种别致的风格带进18世纪。

罗马的堪称上乘的巴洛克建筑，有一些属于我们正在考察的时期。贝尔尼尼在建筑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在1656—1670年接到的。他所建筑的三座教堂中，奎里纳尔山上的圣安德烈亚教堂（1658—1670年）最负盛名。那是一座在椭圆形地基上建造的小型建筑物，从中可以充分品味到贝尔尼尼对色彩和光的颇受注目的运用，以及他精妙地将建筑和雕塑融为一体的手法。建筑物的所有重要线条都集中在那尊似乎要越出拱顶、扶摇直上的圣安德鲁塑像之上。他那被尊为圣徒的形象主宰了整个空间。因而，当参观者一进入教堂，就立即被这种“神秘的动势”所吸引。现代评论家有时认为贝尔尼尼建筑中的古典韵味和他绘画中的巴洛克精神存在着矛盾；他们显然没有理解到贝尔

尼尼通过赋予其所设计的教堂以一种完全非古典主义的含义，恰恰给古典形式注入了崭新的内涵。

如果原计划付诸实施的话，卢浮宫应该是贝尔尼尼所设计的最重要的世俗建筑物，而它对欧洲建筑的影响将是惊人的。即便如此，依照他的计划所制作的雕刻仍产生了一种从布拉格到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都能感受到的影响。贝尔尼尼在罗马为红衣大主教弗拉维奥·基吉所建造的府邸（1664年以后；今基吉—奥代斯卡尔吉宫），推出了一种带有革命性的府邸设计。由一组紧密的巨大柱式建筑组成的连接方式，外观庄严的中心大厦和粗琢的两侧较低厅堂并排排立，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优雅平衡（当18世纪建筑物的正面加长时，这样的平衡就受到了影响），楼层色彩基调逐层转换的微妙变化——所有这一切都组合在一个真正高贵典雅、富丽堂皇的建筑设计中。贝尔尼尼为巴洛克式的贵族府邸树立了一个程式，为欧洲大多数国家所遵循和仿效。

贝尔尼尼于1656—1667年完成了他在建筑上最伟大的成就，即圣彼得广场，尽管他面临着有关地形、结构、象征意义、圣餐仪式和美学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但他应付自如，并创作了古往今来众口一词加以称羨的伟大建筑之一。由四排圆柱支撑的敞开的柱廊，张开宽阔的双臂环抱着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广场，在长方形教堂前面构成了供节庆使用却十分安静的场院。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自成一体、独立式的柱廊被用于相似的目的。它给人以气势夺人的庄严宏伟的视觉印象。在后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任何建筑能比圣彼得广场更酷似希腊建筑，而在17世纪之前，也不可能以如此自信的方式对待建筑形式的传统原理。圣彼得广场的古希腊气质只有那位本质上是雕塑家的最伟大的巴洛克艺术家才创造得出来。在此后差不多有200年的时间里，贝尔尼尼的广场对城市设计者来说一直有启发作用。

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和佩德罗·达·科尔托纳在17世纪上半叶创作了他们各自某些最佳的建筑成果。尽管他们分别代表了全盛期巴洛克风格中极不相同的方面，但他们的晚期风格都表现出在建筑形式和色彩基调上有着明显简化和放宽的倾向；因此也许可以断言，他们也是顺应趋向古典主义这个大潮流的。然而，这种倾向在新广场的圣阿格尼斯教堂的建造规划中表现得尚不明显。这座教堂原由吉罗拉莫·拉伊纳尔迪和卡洛·拉伊纳尔迪于1652年开始设计，一年后又由博罗米尼接过手来并作了较大的修改。1657年，当轮到卡洛·拉伊纳尔

迪接替博罗米尼时，他又立即在还有可能改动的地方对博罗米尼的设计做了调整。尽管教堂竣工历时多年，而内部装饰也直到17世纪末才完成，但这个教堂仍应基本上被视为博罗米尼的制作。它是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等于是从全盛期巴洛克风格出发对布拉曼特为使圣彼得教堂形成中心而设计的方案进行了修改。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根据类似的紧凑空间的设想创做出由正面、尖塔和圆顶构成的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建筑群。如果没有这座重要建筑物的出现，便无法想象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会接连不断产生中心辐射式的设计和双塔式的正面设计。

对比之下，博罗米尼最重要的后期成果，即传教总会神学院的教堂和正面（1662年），却因过于是一种个人的独创而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就该教堂的内部而言，他打破了大多数巴洛克建筑所遵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规范，即把墙壁放在突出的地位并使用柱式以实现有节奏的连接方式。在这里，柱式构成一个连贯的结构“骨架”，让人联想起哥特式的建筑方法。把博罗米尼在圣菲利浦·内里奥拉托利会所设计的正面（1673年后若干年）与传教总会神学院的正面相比较，就可发现他的风格在这25年间发生了变化。大量细部装饰没有了，多层的墙面刻画以及花花绿绿的一大堆几乎是喜庆的色彩也没有了。一切富有特色的东西都已被简朴化而缩减至最低限度，产生了一种压抑的几乎是梦魇般的效果。传教总会神学院的教堂和正面以其令人饶有兴味的简朴和非正统的推理恰当地给博罗米尼的建筑师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除了请过贝尔尼尼之外，科尔培尔还曾邀请佩得罗·达·科尔托纳为卢浮宫提供设计方案。这些设计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他为亚历山大七世拟以之装点科伦纳广场的一座齐吉家府邸所作的设计，也许可就失佚的卢浮宫设计有何特色提供一点线索。他为出自齐吉家的教皇所作的设计图纸——现存梵蒂冈图书馆——表明在巴洛克建筑中第一次出现气势磅礴的排柱竖立在粗琢的地板上，掩映着凹面的墙壁。在科尔托纳后期的建筑制作中，两座引人注目的教堂之正面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和平圣玛利亚教堂（1656—1657年）的正面把凸式和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由剧场结构演变而来的小广场的自成一体：教堂犹如舞台，广场犹如观众席，两侧的房屋就像包

厢。在维亚拉塔圣玛利亚教堂（1658—1662年）的正面中，科尔托纳在简化方面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庄重的圣玛利亚教堂那种朴素的陶立克建筑中已经出现的古典主义倾向在此处进一步加强了。同科尔托纳早期的圣马丁纳和圣卢卡教堂的浓装艳饰相比，不难发现，这里清晰明亮，只有不多几笔重彩。

三位建筑大师——贝尔尼尼、博罗米尼和科尔托纳，每位都对日后建筑史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罗马，卡洛·丰塔纳（1634—1714年）把贝尔尼尼热情似火的风格转变成具有世纪末特征的学院风格。丰塔纳最初是以建筑制图员以及科尔托纳、拉伊纳尔迪和贝尔尼尼在制作时的建筑制图员和文书的身份开始其建筑生涯的。他自己的制作始自1665年以后，而其晚期巴洛克风格，即一种不折不扣可与马拉蒂的手法相比拟的建筑风格，集中体现在科尔索的圣马尔切洛教堂（1682年）的正面设计中。他刻苦勤勉、博学多闻、书生气十足，为教堂、陵墓、圣坛、喷泉、节庆装饰，甚至为雕塑群做了无数设计。他头上那顶三位艺术大师衣钵传人的桂冠使他的画室成为四方胸怀大志的建筑师云集之所。西西里人菲利波·尤瓦拉（1678—1730年）、奥地利人菲舍尔·冯·埃拉赫（1656—1736年）、德意志人M. 达尼埃尔·柏培尔曼（1662—1736年）、英国人詹姆斯·吉布斯（1682—1754年）全都曾受教于他门下。正是通过他，许多巴洛克基调在18世纪初被广泛接受。

源自博罗米尼的那股艺术潮流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追随他的主要是那些蔑视传统惯例、醉心于能动空间和表达清晰等观点的建筑师。他的衣钵传人不在罗马而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以及奥地利和南德意志。但是博罗米尼式的装饰线条、窗棂和门框、拐角的解决办法以及其他细部处理，很快就成为国际通用建筑语言的组成部分。科尔托纳也许是以其想象力丰富的装饰风格而最具感染力。这种风格在佛罗伦萨庇蒂宫的大公府邸套间的天顶（1640—1647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尊贵和雄伟的结合，欢庆、倨傲和壮丽的结合，决定了他的装饰手法在国际上得到仿效而被采用于贵族和皇家的居宅之中。“路易十四”风格并非出自其他单一的流派而是源于庇蒂宫的装饰风格。

另外还有两位活跃于17世纪下半叶的建筑师值得加以特别的注意。尽管罗马人卡洛·拉伊纳尔迪（1611—1691年）不如前面所提及

的三位大师那样卓越，但他是和他那个时代一些卓越的建筑任务有关的。17世纪60—70年代，他完成了坎皮泰利的圣玛利亚教堂、瓦勒的圣安德烈教堂的正面以及波波洛广场诸教堂的建造。坎皮泰利的圣玛利亚教堂（1663—1667年）是罗马最令人感兴趣的巴洛克建筑之一。其内部如其外表一样，把意大利北部善于描绘景物的特色和罗马典型的庄重风格独特地融为一体。在此之前，意大利北部的“小建筑正面”（两个天篷似乎套在一起）从未和罗马建筑在柱体方面加大——从壁柱变为半独立柱再变为独立柱——这一特色结合在一起。这种新型的巴洛克正面设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不断地被重复采用。坐落在波波洛广场的几个教堂（1662—1679年），其建筑过程比较复杂。而在某一阶段，贝尔尼尼和卡洛·丰塔纳也曾参与其营造。这些教堂引发了一个城市规划的棘手问题，因为他们不仅构成广场的一个巨大的正面，而且高高矗立在楔形的地基上，使长长的街道尽头统一并突出出来。这种把街道和广场编织为一体的做法是一种新的城市规划，但它后来是在法国而不是在意大利有广阔发展前景。

第二位建筑名人是古拉里诺·古阿里尼（1624—1683年）。他1666年在都灵的定居开创了皮埃蒙特建筑的极盛时代。古阿里尼原是塞廷会的教士，最初从事神学、哲学和数学的研究工作。他在麦西那（1660年）开始从事建筑创作，在接受萨伏依的查理·伊曼纽尔二世的邀请之前，已在巴黎和里斯本有过一些成果（均已不复存在）。他在都灵建造的主要建筑物——毗邻大教堂的至圣的耶稣殒布教堂（1667—1690年）、圣罗伦佐教堂（1668—1687年）和卡里尼亚诺广场（1679年以后）——都在欧洲建筑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列。他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博罗米尼的追随者。诚然，两位建筑师都是不落俗套的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博罗米尼刻意追求结构的匀称和统一，而古阿里尼的建筑却有意表现出矛盾、令人吃惊的不协调、外表上的不连贯以及错综复杂的墙界。他把筒型壁和圆顶叠套入一种闻所未闻的混合形式之中的做法、他那完全不合西欧传统的精致拱顶、他的有些创造所表现出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古阿里尼试图给予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以艺术表现形式。也许可以不算过分地这样认为：这位笛卡儿和德扎尔格之新数学的忠实门徒是想以建筑设计来暗示“无穷”这个数学概念。他设计的纵向教堂——没有一座留存至今——常有呈波浪形的墙壁、复杂的拱顶系

统以及种种令人困惑的空间形态的组合。德意志和奥地利巴洛克建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设计。

从古阿里尼的建筑转向讨论法国的艺术状况时，我们看到了一种简直可以说从绚丽归于平淡的进程。古阿里尼于1662年开始营造巴黎的塞廷会圣安妮-拉-罗亚尔教堂之日，正值法国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开始形成而意大利不顾规范和华而不实的做法又遭到怀疑甚或嫌恶之时。法国古典主义在1630—1660年的兴起，是和法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历程齐头并进的。所有在这一时期成熟的艺术家都完成了向形形色色的古典主义手法的过渡。除了两位最伟大的建筑师即弗朗索瓦·芒萨尔（1598—1666年）和路易·勒沃（1612—1670年）之外，也许还可想到下列一些重要画家的名字：17世纪40年代，菲利波·德·尚帕涅（1602—1674年）开始改变他早期根源于鲁本斯的巴洛克风格，并逐渐信奉极其简朴的风格；乔治·德·拉图尔（1593—1672年）早年的卡拉瓦乔式的风格被一种冷漠和完全孤独的风格所取代；加斯帕·杜盖（1615—1675年）起初是一位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后来接受了其姻兄普桑的影响；厄斯塔什·勒叙厄（1616—1655年）起初模仿武埃的巴洛克手法，最终却以冷峻和十足的拉斐尔式绘画风格结束了其艺术生涯；塞巴斯提安·布尔东（1616—1671年）早期以多样的方式作画，但在后期却严守普桑式绘画风格。

这些艺术家基本上属于前路易十四时代。他们都是独立的艺术家，随心所欲，不附庸时尚。他们当中活到17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克劳德活到1682年）都成了明日黄花式的人物，成了一个业已结束的时代的遗老，其时即1661年之后科尔培尔已控制了法国的艺术。

科尔培尔很快就决定把艺术活动集中于某个艺术家的领导之下。他选择了多才多艺的夏尔·勒布伦（1619—1690年）。勒布伦在装饰艺术方面的天才以及他的第一流的组织能力都说明他属于新的时代。1663年，他被任命为戈布兰工厂的总监，其经管范围较其名称所揭示的要广泛得多。他对一支由画家、雕塑家、雕刻家、织匠、细木工以及其他人员组成的大军拥有最高权力。由于这些人的通力合作，世上出现了一种富丽奢华，自命不凡，同时又是迂腐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冠上那位法国国王的名字是恰当的，因为它主要是为他的扩张野心服务的。

为了从理论上控制艺术创作，科尔培尔把注意力转向各种学院。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尽管成立于1648年，但到1663年才获得其组织章程。第一批拥有精心设计的教学计划的正规艺术学校是16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的。科尔培尔就是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他那在巴黎的学院由于存在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有着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大纲，号称具备各种学院式的训练以及讨论正确艺术规范的正规讲座，因而成为全欧洲艺术学院的典范——这是一种还需10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发展。科尔培尔要求给予学院以绝对的权威。学院的成员均被授予垄断性的特权，只有成为学院成员的艺术家的可能有一帆风顺的艺术生涯。所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同样通过新建立的各种学院而受中枢控制。舞蹈学院建于1661年，铭文和纯文学学院（与种种博学问题有关）建于1663年，自然科学院建于1666年，音乐学院建于1669年，建筑学院建于1671年。1666年在罗马还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其宗旨是专门使艺术家们能在古典文化的源头接受训练。

当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开始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时，他们使工艺和“艺术”之间开始出现一道鸿沟。然而，作为离群索居的创作者的艺术家同社会上其他人员之间的分裂问题是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得到解决的。与中世纪的手艺人并无二致，法国的艺术家再次被纳入一种社会体制，但无不丧失他们得来不易的自由。他们这些人与访问巴黎时的贝尔尼尼之间所存在的反差之强烈超出任何想象之外。意大利人从未体验过中央集权专制和官僚制度的精神氛围。贝尔尼尼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他的法国同行则张起口来声音直发抖。对于他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他们目光短浅的教条主义，尤其是对于他们为人处世时的奴颜婢膝，贝尔尼尼都嗤之以鼻。他说，“只有在信仰问题上才必须有服从，而在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人是完全自由的”[\[1\]](#)。

尽管如此，法国学院的教学仍深深扎根于意大利的艺术理论。这种古典主义的理论源自亚里士多德并在文艺复兴时代由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首次加以系列的阐述，其核心原则是一件艺术作品所体现的综合性必然是一个理性和选择过程的结果。乔万尼·贝洛里（1615—1696年）这位学识渊博的文物学家、瑞士女王克利斯蒂娜的图书馆馆长、罗马古典主义艺术界人士的朋友和顾问以及普桑和迪凯努瓦的密友，在一次演讲中对这个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陈述。这个题

为《论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思想》的演讲是1664年在罗马的圣路加学院进行的。贝洛里的理论由普桑加以实践。作为一名画家，他的创作过程是理性的，他通过精密的计算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古代艺术的客观特性，因为根据当时的思想，古典艺术家已就对自然的完美选择方面臻于极致，因而创造出具有理想之美的作品。普桑的方法在法国的绘画和雕塑学院是教学内容之一并被奉为圭臬。画家塞巴斯提安·布尔东在对其学院同仁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讨论了这种手法：“当画家依据活人模特儿作画时，他还应当在另一张纸上对此形体作一番研究，尽量使之具有古代雕像的特征。”^[2]勒布伦曾在其一次演讲探索普桑的作品《拾穗者》（藏于卢浮宫）中每个人物的古典原型。在这些人手，艺术几乎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学科。普桑的作品和贝洛里的《论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思想》是支撑17世纪下半叶法国艺术大厦的两大支柱。

但是，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普桑的朋友和资助者大多数属于那个阶级——的需求和宫廷的需求是截然不同的。诚然，古典主义——一种理性的、易教易学的风格，一种不容奇思异想并苛求统一的风格——对于严格要求中央集权化的专制制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最恰当的艺术表达手段。另一方面，宏伟壮观、合乎礼仪的庄严肃穆、崇高卓越和趾高气扬在君主和宫廷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且作为满足这些要求之载体的巴洛克风格又是现成的。因此，路易十四时代的官方艺术与当时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路易十四风格”最精确的定义应当是古典主义原则约束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佩得罗·达·科尔托纳对这种很快就在国际上流行的法国后期巴洛克艺术的形成，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是这种风格的最高成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也是法国在其历史上一个英雄时代所获得的光荣的象征。1668—1671年，当勒沃把一座旧宫殿纳入一个规模要大得多的设计方案时，新的凡尔赛宫开始成形。现在看到的那座巨大花园的正面连同其550码以上单调的水平面是经过朱尔斯·阿杜安-芒萨尔（1646—1700年）1679—1689年的改造和扩建而成的。著名的镜宫也属于这一时期，它是由艺术家大军的统帅勒布伦负责加以装饰的。过大的规模、熠熠闪光的材料、内部的堂皇高贵和浮夸——所有这些是欧洲那个最注重

朝仪的宫廷以及一个业已升格到过度奢华和一味炫耀的宫廷社会之真实写照。

在这个时期，法国的花园设计和城镇设计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对“巨大”的嗜好。但是，这种“巨大”受到理性和准则的约束。皇家工程总监、法国巴洛克式正规花园的创建者安德烈·勒诺特尔（1613—1700年），是位眼光卓越且天赋极高的人。凡尔赛的一些花园是他最大的成就。各花园的巨大空间均按对称和几何学的原则来布置。笔直的大道和修剪整齐的小树林、楼梯和瀑布状台阶、大池塘和喷泉、瓶饰和雕塑，融合成一幅壮丽的图案。有人说得好：法国式的花园“教给人们以秩序。在路易十四时代，它也教给人们以宏伟”^[3]。勒诺特尔还设计了凡尔赛城的规划，长长的街道辐辏于凡尔赛宫前面的广场，这些街道的布局与花园中道路的布局极为相似。因此，整个城市和公园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王宫都是中心点。

笔直的大道，其尽头是汇聚林荫小道的最佳景点的极其深邃的远景，有着向外辐射街道的圆形广场、集中于规则广场作为终端景物的纪念碑、服从于一个连贯设计的街道两旁、整个区域的统一规划——尽管法国城市规划中的这些因素大部分有着较古老的、部分是来自意大利的渊源——这些因素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前从未被精心地和连贯地结合于如此大规模的规划之中。巴黎正是在那些岁月中形成其城市的外形特征的。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荣军院四周富丽堂皇的环境以及汇聚于沃邦广场的街道，为18世纪和19世纪同样雄心勃勃的规划树立了典范。

除了这些在城市规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外，单座建筑物仅有少数值得一提：四国学院（1661—1662年）——仍接近于罗马的巴洛克风格，是建造子爵谷城堡的建筑师勒沃所建；巨大的荣军院连同其由利贝拉尔·布吕昂设计的严肃的有拱顶的院落（1670—1676年）及其高大的圆顶教堂——此教堂俯视一个后来由朱尔斯·阿杜安-芒萨尔所设计的形成中心的平面图（1679—1708年）；最后还有简朴的古典式的圣德尼门（1672年）——系尼古拉斯-弗朗索瓦·布隆代尔（1618—1686年）所设计，其《皇家学院建筑学教程》（1675—1683年）概述了该学院崇尚理论的教学。

17世纪上半叶法国的雕塑处于低潮。雅克·萨拉赞（1588—1660年），以其负责营建的位于尚蒂伊的孔德亲王亨利·德·波旁墓（1648—1663年），开创了典型的法国式巴洛克古典主义。弗朗索瓦·安圭埃尔（1604—1669年）和米歇尔·安圭埃尔（1613—1686年）兄弟体现了类似的倾向，米歇尔·安圭埃尔在卢浮宫为太后居室所作的具有古典风格的科尔托纳式装饰以及他那著名的耶稣诞生塑像（圣罗什教堂，1665年）就是例证。但是把法国雕塑提到新高度的却是三位较年轻的艺术家——弗朗索瓦·吉拉尔东（1628—1715年）、安托万·柯塞沃克（1640—1720年）和皮埃尔·普热（1620—1694年）。特别是吉拉尔东，由于深受勒布伦赏识，因此在凡尔赛宫的装饰上起了主要作用。他的代表作是为公园的一个洞室所制作的人物众多的群雕《由宁芙仙女陪侍的阿波罗》（1666年）。他在这件作品中巧妙地把希腊雕塑的经验和已故的普桑的经验融合起来。最为年轻的柯塞沃克独树一帜地回归到了更自由的、巴洛克风格更明显的雕塑观念中去。这在他为凡尔赛宫创作的许多户外塑像和喷泉上还表现得不太明显，但在户内装饰中，特别是在镜宫和阅兵场的内部装饰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就在阅兵场他创作了其最具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巨大的椭圆形壁面上凯旋的路易十四骑在马背上的灰泥浮雕。柯塞沃克的一些半身雕像表明他在表达力和洞察力上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预示着新时代的曙光。但是本时期真正处于主流之外的艺术家是普热。他那种极其鲜明的独特性使他不可能为科尔培尔在世时的宫廷所重用。他曾投在意大利的佩德罗·达·科尔托纳门下学艺，并在热那亚工作6年（1661—1667年），此后其余生是在土伦和马赛两地度过的。他最著名的两件作品，《克罗托纳的米罗》（藏于卢浮宫，1671—1683年）和《亚历山大与狄奥西尼斯》浮雕（藏于卢浮宫，1671—1693年），揭示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狂放风格，他从米开朗琪罗处所受到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从罗马巴洛克大师处所受到的影响。

信奉天主教的西属尼德兰与南方的艺术思想有紧密联系。鲁本斯和范戴克完全主宰了17世纪上半期，而且他们的影响历好几代而不衰。他们的直接衣钵传人有亚伯拉罕·范·迪彭贝克（1596—1675年）、泰奥多·范·蒂尔登（1606—1676年）和伊拉斯谟·奎林（1607—1678年）等人，但他们完全由于两位巨星的光芒而黯然失色了。唯一的例外是安特卫普的大师雅各布·约尔丹斯（1593—1678

年），他长于描绘充满活力的佛兰德生活，但他的影响在其后期生涯中逐渐低落。

佛兰德画家有许多起初都模仿意大利风格，主要是卡拉瓦乔的风格，只是到最后他们才崇尚日趋古典化的法国风格。贝尔托莱·弗莱马勒（1614—1675年）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他的学生热拉尔·莱勒塞（1640—1711年）曾写有一部有关构图原理的名著，他就完全为法国艺术和雕塑学院所左右。即使是创作风俗画的画家，如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从事过大量创作活动的戴维·特尼尔斯（小特尼尔斯，1610—1690年）也未能摆脱那个时代趋向等同的倾向。莱勒塞定居于阿姆斯特丹城以后，在那里享有名不符实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末，他那种肤浅的带有法国宫廷烙印的讽喻和神话竟然在信奉清教的荷兰激起如此之大的热情，因为荷兰的绘画是沿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的。

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信奉新教的荷兰几乎没有给官方绘画留有余地。荷兰画家不受罗马教廷的恩赐和监护，不受制于君主和宫廷所强加的桎梏，因而驳斥了华丽的风格以及传统肖像画法的种种约束，他们的追求远远超出了南方艺术理论所规定的范围。整个可见的世界都为它们所涉足。因此，17世纪的荷兰出现宗教意象画、静物画、陆景画、海上画、风俗画、各种类型的世态画、个别市民肖像画和市民群像画等创作的空前繁荣。许多荷兰画家是为艺术市场而不是为恩主作画。结果，早已出现的艺术经纪人和拍卖场承担了调节供求的重要角色。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17世纪荷兰艺术家的光辉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家相形之下黯然无光。而且，普通的荷兰人把购买名画看成投资，“因此一个普通的农民花上两三千镑购买名画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伊维林语）。事实上荷兰的绘画很快被欧洲每一个国家所收藏。

荷兰的各种画派源远流长，而此时又都已发展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杨·范·戈因（1596—1656年）、阿尔伯特·克伊普（1620—1691年）、卡雷尔·迪亚丁（1622—1678年）、雅各布·范·雷斯达尔（1628/9—1682年）、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1636—1672年）和迈恩德特·霍以玛（1638—1709年）专画风景画；彼得·克拉斯（1597/8—1661年）、威廉·海达（1594—1680年）、杨·德·海姆（1606—1683/4年）、亚伯拉罕·范·贝耶伦（1630/1—约1675

年)和威廉·卡尔夫(1622—1693年)主要画静物画;老小两位威廉·范·德·维尔德(父子)、杨·范·德·卡培尔(1624—1679年)和鲁道夫·巴克惠森(1630—1708年)专画海上画;杨·范·德尔·海登(1637—1712年)和杰里特·贝克海德(1638—1698年)专画城市风景画;彼得·萨恩勒丹(1597—1665年)和埃曼努埃尔·德维特(1617—1692年)专画城郊风景画;彼得·萨恩勒丹(1597—1665年)和埃曼努埃尔·德维特(1617—1692年)专画教堂内壁画。

专门化甚至发展到更细微的地步。不少画家只专注于他们所选择领域内的某种特殊的对象。埃特·范·德尔·尼尔(1603—1677年)只画月光和冬景;菲利普斯·沃弗尔曼(1619—1668年)专画带马的风景;保罗斯·波特(1625—1654年)只画带有牛群的风景;菲利普斯·科宁克(1619—1688年)专画全景画;阿拉特·范·埃弗丁根(1621—1675年)擅长画山岩瀑布;杨·韦尼克斯(1640—1719年)是狩猎静物画的大师;而梅尔希奥·德洪德库特(1636—1695年)则嗜画家禽。

大批艺术家擅长于创作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世态风俗画。他们当中有彼得·科德(1598/1600—1678年)、安东尼·帕拉梅德兹(1601—1673年)、杰拉德·道(1613—1675年)、杰拉德·泰尔博什(1617—1681年)、塞缪尔·范·霍赫斯特拉滕(1627—1678年)、加布里埃尔·梅齐(1629—1662年)、彼得·德·霍什(1629—1677年)、杨·维米尔·范·德尔夫特(1632—1679年)和彼得·杨森斯(约1640—约1700年)。下层社会的世态画则有下列一些第一流画家在创作:杨·斯滕(1629—1679年)和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1610—1685年)及后者的两个学生科内利斯·贝加(1620—1664年)和科内利斯·迪萨尔特(1660—1704年)。

这些不断探索的结果似乎是对微观生活各个方面做出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展示。那些拘泥于古典主义教条的人对此完全不予赞同。莱雷塞指责道:“我们经常带着疑惑听到画家们相互劝说……只需模仿自然就足够了……[这些画家]只不过是把他们所见到的生活临摹下来……[然而,一个画家却应该如此描绘自然],即不是描绘它通常呈现的状况,而是描绘它达到最为完美状况时所应呈现的样子。”

[\[4\]](#)但实际上,这些荷兰画家远未坚持“按他们所见”描绘自然,而是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决不应忘记,视觉是淀积于我们头脑

中的思想、概念和传统的混合物，而纯粹的视觉以及对视觉的完美描绘必须被视为一种流行的奇谈。由此可以明显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荷兰画家也受到了可以简单而切合地被称作“风格”的那些限制的拘囿。

彼得·德·霍什的艺术生涯具有典型性。他那早期的以强烈的明暗对照法为特征的巴洛克阶段，与弗里斯·哈尔斯的艺术圈子有联系，与帕拉梅德兹和科德有联系。在伦勃朗的学生卡雷尔·法布里蒂厄斯（1622—1654年）以及弗美尔的影响下，他的绘画在1655—1665年进入“古典”阶段，具有热烈而明亮的风格。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借以成名的出色的屋内景物画。所有这些作品，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那样，结构有力和紧凑。与画面平行的方格图案地板限定空间，而纵深的布局，即透过门廊和庭院的深景，也是按平行的层次排列的。看似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人物每个都通过有效的空间协调稳妥地定位于图画之中。此时，此绘画手段已被用来按“生活的原状”绘制对生活的印象。这位艺术家总是选择一个近视点（这种方法在荷兰有悠久的传统），这样一来，图画不是被抛入一个理想境界，而是强烈地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其他一些设计构思，例如偏离中心的投影点或在空间一角安置附带景物等，都增强了随意得来的生活的印象。在17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霍什的艺术生涯进入了受法国影响的“学院式”阶段：构图趋于冷酷，处理手法变得简便，色调转冷，上流社会的群体和优美的奇闻逸事取代了室内场景。这一发展过程与荷兰的三个社会阶段相吻合，即解放战争之后的英雄时代、日益兴旺的荷兰资产阶级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及处在路易十四霸权阴影下的社会趋于贵族化阶段。

德·霍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据以做出概括性的论述。故而在17世纪40—60年代，画家侧重于描绘中产阶级的家常生活，此后则偏爱描绘严守礼仪的上流社会。泰尔博什、梅齐和胡格斯特拉滕都可证明这一潮流。弗朗斯·范·米埃里斯（1635—1681年）和戈德弗里德·沙尔肯（1643—1706年）增强了他们的老师杰拉尔德·道的作品中那种冷漠、刺眼和矫揉造作的特征。泰尔博什的学生卡斯珀·内彻（1639—1684年）专画满身绫罗绸缎的理想化人物。贝加的绘画表明即便是通俗的世态画也失去了粗野的欢快情调。

其他画家的经历也完全可以用来补充说明上面所观察到的结论。奎普在其艺术生涯之始，就显示出伦勃朗中期的暖色调。后来，他的色调转冷，而其风景画的结构也日趋古典化。塞贝玛的作品同雷斯达尔的浓密而连贯的风景画相比，显得单薄而不连贯。甚至连伦勃朗的学生在风格上也出现了大转变。尼古拉斯·马斯（1632—1693年）也许是最明显的一例。17世纪50年代，他还是那位艺术大师紧密的追随者，但是到60年代，就完全变为以贵族的立场和浅淡低沉的色调创作上流社会肖像画。最后，可以肯定地这样说，甚至伟大的弗美尔也没能超脱这个模式。他的早期绘画显示与意大利巴洛克风格有紧密联系（例如，《基督降临玛丽和玛莎之家》，1654/5年，藏于爱丁堡）。在17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他已几乎自成一家：他的构图极其简练，而其色调的天鹅绒般柔滑的光泽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在1666年前后创作的《情书》（藏于阿姆斯特丹），已经表现出对画面空间的奇特破坏和冷漠的色泽。他那非凡的想象力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减弱了。

同绘画的辉煌繁荣相比，绘画的姐妹艺术在尼德兰南北两部分的地位显得不太重要；但是正当南部巴洛克式建筑和雕塑呈现一片丰富多彩的发展景象时，北部的教堂和公共建筑却很少需要雕塑装饰，而且很快就转而反对与天主教复辟有密切联系的建筑上的喧嚣风格。甚至早在17世纪中期以前，雅各布·范·坎彭（1595—1657年）和彼得·坡斯特（1608—1679年）已引进了一种质朴的清教式的古典主义而使荷兰建筑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其最大的里程碑式的制作就是范·坎彭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本时期第三位伟大建筑师是菲利普斯·芬博恩斯（1608—1675年），他趋向于赋予这种风格以更优雅的法国特征。

在那个时期，南部的堂皇教堂属于另一世界。它们的外观给观众留下了近似于罗马巴洛克风格的印象；但它们也包含着法国的特征，而它们的浓烈而笨拙的装饰又源自本土传统。威廉·赫苏斯（1601—1690）在卢万建造的耶稣会教堂——圣米歇尔堂（1650—1671）；吕克·法里德赫尔贝（1617—1697）所建的教堂——其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位于梅杰林的不落俗套的汉斯威克圣母院；一位无名建筑师所建造的布鲁塞尔贝吉纳教堂的正面（1657—1676年）都是南部教堂建筑风格的极好范例。坐落在布鲁塞尔神奇的大广场上的那排狭窄而高高的

房子，连同其大量混杂的装饰，则表明当地的建筑是如何完整地保持了其地方风格。

南部的雕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少数多产的艺术世家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迪凯努瓦家、奎林家和费尔布吕根家。他们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深受法国雕塑的影响，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把贝尔尼尼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同鲁本斯的佛兰德尔现实主义糅合起来。没有谁比吕克·法里德赫尔贝更接近于把鲁本斯变成造型艺术的中介，而且法里德赫尔贝培育出一个大流派。相形之下，极其多产的让·德尔库（1627—1707年），却始终坚持贝尔尼尼流派的风格。由于荷兰的雕塑家奇缺，结果只好对阿尔特斯·奎林（老奎林，1609—1668年）委以装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重任。这是荷兰此类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他的助手中有荷兰龙布·费尔许尔斯特（1624—1696年），此人和维尔伦·德·凯泽一道负责修理那座工程极其繁重却无主次的将隆普海军上将墓（位于Delft 的Oude Kerk，1655—1658年）。这个陵墓为17世纪下半叶荷兰的许多陵墓建筑提供了样板。费尔许尔斯特是荷兰影响最大的巴洛克雕塑家，但他及其后继者的风格只能视为更具活力的比利时流派的一个感情色彩不浓的支派。

艺术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与艺术在低地国家和法国通常的境遇十分不同。复辟时期既没有仿效法国的榜样出现一位光辉夺目的宫廷恩主和一种权威性的宫廷风，也没有像荷兰那样出现庞大的市民公众对艺术怀有兴趣。对艺术的荫庇和赞助掌握在贵族和乡绅手中，他们的口味远不算高雅。内战和共和国事实上使原来集中于查理一世宫廷的优雅艺术兴趣遭到毁损而难以为继。在复辟25年之后，一部讨论绘画著作的作者威廉·阿格林比用如下话语评价了这种断线局面的影响，“我们的贵族和乡绅除了少数对高尚的艺术显著地表示过好意外，总的说来谈不上是什么鉴赏者，因而他们不可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的促进者”，接着他哀叹道，“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度里，我们是唯一缺乏对艺术家给予珍视的国家”。^[5]

尽管艺术的状况如此不景气，但仍有一位其重要性远远超出这个岛国的建筑师，即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1632—1723年）。他起初是个科学家，早在1657年就被任命为伦敦格雷欣学院的天文学教授，而后在1661年又是牛津大学萨维利天文学教授。他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始终对科学事业怀有热忱。^[6]他30岁时，做出其第一次多

少有点业余性的建筑设计。1666年的伦敦大火后他的巨大机遇来了，他那用之不竭的创造力也就大有用武之地。1669年他被任命为总监，负责重建被毁的教堂以及圣保罗大教堂，并维修和建筑皇家宫邸和公共建筑。从1670年到17世纪90年代，他所部分或全部修建的伦敦教堂不下55座，其中34座一直存留到1940年的大轰炸。这些教堂有许多在中心设计上采取了大胆的尝试（例如，圣斯蒂芬·沃尔布鲁克教堂，1672—1687年；圣斯威辛教堂，1677—1686年；圣玛丽·阿布丘吉教堂，1681—1686年），而且尽管他在建筑形式方面的知识很一般，但所运用的结构原理却往往是新的，且在欧洲大陆上罕见其匹。

圣保罗大教堂（1675—1710年）是雷恩最杰出的成就，也是后文艺复兴欧洲最上乘的建筑物，教堂的精妙圆顶至今仍俯视着伦敦城。大教堂的建筑耗去了雷恩数十年的心血，数以百计的设计草图表明：从总体设计乃至每个细节在最终定型之前都经历了反复修改。这样一个缓慢而成的设计，说明了建筑学上出现一种体现皇家学会精神的经验主义方法。正是这种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精神透露出也许可以称之为雷恩任意使用当时建筑学词汇的情况。在他的设计中结合了塞里奥和伊尼戈·琼斯、帕拉第奥和贝尔尼尼、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佩得罗·达·科尔托纳和博罗米尼、朱尔斯·阿杜安-芒萨尔和其他许多人的艺术基调，但是结果却是产生了一项和谐的作品，其冷漠含蓄与欧洲大陆正在风行的晚期巴洛克古典主义十分类似。

同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城的教堂相比，雷恩的其他建筑显得无足轻重。他为查理二世建造的温彻斯特宫（1683—1685年）已不复存在。1698年大火后，他为白厅所设计的宏伟方案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汉普顿宫（开始于1689年），亦即将枢机主教沃尔西的居宅加以改造和扩建以用作威廉和玛丽的宫邸，是雷恩的失败之作。但他为格林尼治医院设计的宏伟计划可以和他的教堂建筑相媲美。玛丽王后倡议为海军官兵建立一所医院，作为在切尔西为陆军官兵所建立的皇家医院之对应建筑，此事是由雷恩在1682—1691年完成的。伊尼戈·琼斯的学生约翰·韦伯在泰晤士河畔为查理二世建造的宫殿（1663—1669年）应构成这个总体设计的一部分。雷恩设想了一个高雅的布局：两排绵延的狭窄长廊轴对称地指向作为远景终点的由伊尼戈·琼斯设计的王后宫邸。这一堂皇的设计，可称作17世纪的英国最为雄心勃勃的

设计之一，于1694年开始具体化。它那自鸣得意的规模可以说深受凡尔赛宫的影响，而相对而立的两排长长的柱廊和两座高大的圆拱顶建筑物又重新提起并变通了那些前人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和波波洛广场建筑时首次加以考虑的问题。

雷恩的成果完全主宰了那个时期。也许仅次于他的罗杰·普拉特爵士（1620—1685年）也值得一提，他是一位绅士出身的建筑师，在伯克郡的科尔斯希尔创作了复辟时期乡村别墅的样板（1649—1662年；毁于1952年），这种巨大而庄严的结构与查理一世时代伊尼戈·琼斯的建筑物相比，较少古典味，却较多岛国情调。佩皮斯和伊夫林的密友休·海（1622—1684年），使自己适应于荷兰的古典主义。他那最佳的创作——肯特郡的埃尔萨姆山林小居，原本应该建在荷兰。威廉·托尔曼（小托尔曼，1650—1719年）也值得注意，因为他于1687—1696年对德比郡的德文夏公爵的宫殿般府第在查茨沃思的雄伟正南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托尔曼后期的作品被两大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穆尔（1661—1736年）和约翰·范布鲁（1664—1726年）的光芒所掩盖。他们两位的合作始于19世纪即将終了之前，建造了约克郡的霍华德城堡。正是他们在以后的20年中以非正统的、引人注目的、能激发情感的且带有明显巴洛克特征的风格取代了雷恩那样冷漠手法。

这个时期没有一位英国雕塑家可以自诩做出杰出成就。曾在法国和罗马学艺并在威尼斯工作多年的约翰·布什内尔（约1630—1701年），实际上只是把意大利后期巴洛克的枯燥形式引入英国。凯厄斯·加布里埃尔·西伯（1630—1700年）在伦敦纪念碑的座基上留下了一幅罕见的、具有豪华风格的精妙的巴洛克式寓言浮雕。他晚年在汉普顿宫和圣保罗大教堂的制作足以证明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爱德华·皮尔斯（约1630—1695年）创作了几座优秀的半身雕塑像，其中最佳者，即雷恩半身塑像（1673年，藏于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馆），表现出一种令人想起柯塞沃克的亲密而直截了当的手法。最后，格林灵·吉本斯（1648—1721年）是一位技压群伦的木雕师。他所雕的花环和帘帷装饰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表明他深受低地国家雕塑的影响。

同大陆上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的状况相比，英国的绘画主要是集中于绘制肖像画。诸如罗伯特·沃尔克（约1605—约1685年）和伊萨克·富勒（1605—1672年）等平庸之辈，在范戴克于1641年去世

以后继承了这位绘画大师的传统。然而，早在共和国时期，来自威斯特伐利亚苏斯特的彼得·莱利（1618—1680年）就以最优秀画家的姿态出现在英国。他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的崇高地位，只有范戴克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地位可以拿来相比；但他以国际流行的不自然的风格画出的赶时髦的肖像画，完全没有范戴克那种热情、精神和善于刻画人物性格的深度。莱利规定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肖像画的发展道路。来自卢卑克的戈弗雷·克内勒爵士（1646/9—1723年）曾在阿姆斯特丹投于伦勃朗的学生斐迪南·博尔的门下，1674年定居英国后成为莱利帝国的传人。他是个极有天赋的画家，却由于他从其宛如“流水线”的画室中制做出许多随手画成的肖像，以致他的职业名声大受损害。

英国绘画的其他领域大多数也是由长期或短期居住于英国的外国侨民开辟的。以豪华风格做出的寓言壁画，其巨擘在17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是意大利人在安东尼奥·韦里奥（1639—1707年），更往后则是法国人路易·拉盖尔（1663—1721年）。拉盖尔是勒布伦的学生，1683—1684年定居于英国。海景画由荷兰人威廉·范·德·费尔德（1611—1693年）及其子小威廉（1633—1707年）引进英国。地貌风景画家杰出的代表有波希米亚人文塞斯劳斯·霍拉（1607—1677年）、荷兰人列奥纳德·克尼夫（1650—1721年）和佛兰德尔人杨·西贝雷赫特（1627—1698年）。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真正具有活力的本土画派才得以诞生。

三十年战争的大破坏导致德意志艺术活动的中断，而复苏的进程也极其缓慢。由于艺术的自主发展长期被压制，德意志日渐依赖于外国的艺术家和国外的教育。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南部总是向着意大利，而信奉新教的北部则向着荷兰。来自法兰克福的平庸的约阿希姆·桑德拉特——由于撰写了一部当代艺术家的历史著作《德意志学院》（纽伦堡1675年）而声名大噪，以及较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海因里希·舍恩菲尔德（1609—1675年）——主要在奥格斯堡颇为活跃，他们都曾在意大利寓居多年；石勒苏益格人于尔根·奥芬斯（1623—1679年年）和柯尼斯堡人米歇尔·列奥波德·威尔曼（1630—1706年）都曾在荷兰学艺，并在他们作品中使范戴克和伦勃朗的风格带上感伤情调。这样一些相当庸俗的画家根本不可能是1700年以后德意志和奥地利出现巴洛克壁画惊人繁荣的先兆；而德意志绘画的独立性、

丰富的创造力、自由的想象力和深刻的观察力是靠约翰·米歇尔·罗特迈尔（1654—1730年）、科斯马斯·达米安·阿萨姆（1686—1739年）以及其他许多人取得的。

意大利的雕塑家、毛粉装饰师和建筑家并不总是一流的，但就17世纪后期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成果而言，他们也有一份功劳；可从1660年前后起，本地雕塑家大量涌现，其创作风格酷似意大利后期巴洛克式，时而还带有源自后期哥特艺术的民族传统。他们中最杰出的是巴尔塔瑟尔·佩尔英泽尔（1651—1732年），有着一个堪称典型的履历。他在成为德累斯顿宫廷雕塑家之前，曾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他的作品处处令人想起贝尔尼尼、普热和威尼斯的巴洛克风格。出乎意料的，德意志出了一位真正具有国际范式的晚期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家，那就是安德里亚斯·施卢特（1664—1714年），而且更为奇怪的是，他竟是一个北德人。1694年，他被任命为柏林的宫廷雕塑师。他的杰作是大选侯的骑马雕像（1692—1703年），在历代最杰出的骑马雕像中居第二位。就风格而言，此塑像主要趋向于意大利的晚期巴洛克风格，而不是法国的古典主义。德意志的雕塑与德意志的绘画一样，在新的世纪进入了黄金时代。这主要体现在巴伐利亚和多瑙河沿岸地区。这时的雕塑家们以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优美雅致的、有时甚至是带着明显乡土特征的柔弱风格取代佩尔莫泽尔和施卢特的国际巴洛克风格。

宫廷和教堂建筑起初也几乎全为意大利人所垄断。慕尼黑的塞迁会圣·卡耶坦教堂是三十年战争后最庄严的建筑，由阿戈斯蒂诺·巴雷利以罗马瓦勒的圣安德列亚教堂为范式于1663年开始营建，并在1675年以后由恩里科·祖卡利接手。而当约翰·丁岑霍菲设计出位于富尔达的大教堂时，德意志才有自己的建筑师，但他们起初也是遵循意大利的传统。巴雷利还负责营建在慕尼黑附近的宁兹堡之宫殿（1663年）；还有罗伦佐·贝多尼和吉罗拉莫·萨尔托里奥负责营建在汉诺威附近的赫伦豪森之宫殿（1665年），以及祖卡利设计在慕尼黑附近的施莱伊斯海姆之宫殿（1701年）。维也纳在1683年被围之前，一直笼罩在异教徒的阴影下。那个时期以后，才开始进入辉煌的重建时代。这项任务主要落在菲舍尔·冯·埃拉赫（1656—1723年）和约翰·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1668—1745年）这两位天才身

上；无数有天赋的建筑师为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建筑艺术自中世纪以来最辉煌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18世纪初，当英格兰、德意志、奥地利发展出繁荣的艺术中心时，低地国家和西班牙却没有这样的艺术复兴。艺术在这两个地区的衰落都不能说与政治和经济灾难无关。在17世纪上半叶临近结束以后，西班牙绘画以迅速而无可挽回之势日益衰退。诚然，在整个17世纪下半叶，一些有天赋的画家仍在继续创作。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末代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标志着全国衰败状态达到最严重的程度。他的宫廷画师唐胡安·卡列尼奥·法·米兰达（1614—1685年）只是菲利普四世的宫廷画师贝拉斯克斯的不像样的仿效者。传至卡列尼奥的继承者克劳迪奥·柯埃洛（1672—1693年），马德里画派也就寿终正寝了。

西班牙其他艺术中心的境遇也大致如此。瓦伦西亚流派传到里巴塔尔的学生赫罗米诺·哈辛托·埃斯皮诺萨（1600—1680年）手中便销声匿迹。格兰那大最后一批有相当地位的画师则是集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于一身的天才的阿伦索·卡诺（1601—1667年）、佩德罗·德·莫亚（1610—1666年）和胡安·德·塞维利亚（1643—1695年）。科尔多瓦流派在祖尔巴朗的学生安东尼奥·德尔·卡斯蒂略-萨韦德拉（1616—1668年）之后就无人可提了。塞维利亚在17世纪曾出现一个由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穆里略（1618—1682年）领导的蒸蒸日上的流派。虽然有一部分不甚起眼的学生把穆里略的技法传到18世纪，但自从易于冲动的胡安·德·瓦尔德斯·莱亚尔（1622—1691年）这个不修边幅但极有天赋的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去世之后，塞维利亚流派的伟大传统也随之湮没。

所有这些画家把贝拉斯克斯和祖尔巴朗的坚毅和庄严的现实主义转变成优雅的、精致的，有时是令人焦躁困惑的手法；用通常给观赏者以情节怪异、华而不实、缺乏真诚的印象之精湛技巧取代前辈大师令人心悦诚服之直接手法。这批画家当中最卓越的是以描绘圣灵怀胎的许多绘画作品而闻名的穆里略，用西班牙的术语来表达，他把冷漠的风格发展为热烈的风格，最后又发展成一种浮夸的风格；这些术语表明了从17世纪40年代到1682年他逝世时，其艺术风格的进程。他晚期风格所表现出来的压抑的色彩和形式以及多愁善感是17世纪最后几

十年西班牙绘画的特征。总的来说，西班牙的发展总趋势同欧洲其他部分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恰如意大利最为感情奔放的装饰均属晚期巴洛克式，恰如法国没有任何建筑装饰在壮丽辉煌方面可与镜宫相比，西班牙的装饰艺术在旧王朝末期也开始转向具有意想不到独创性的狂暴喧嚣、浮躁激昂的风格。同西班牙的绘画相反，17世纪西班牙的建筑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果。几乎没有建筑在庄严和新奇上能与卡诺建造的格拉纳达大教堂（1664年）的正面相提并论。有好几个世纪，西班牙教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崇高的圣坛、祭台后部的高架式圣坛屏饰，因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西班牙的后期巴洛克式最为突出，富丽的装饰图样在1650年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从那时起，三种艺术在创造令人销魂夺魄的巴洛克作品的过程中统一起来。贝尔纳多·西蒙·德·皮内达创作的塞尔维亚的卡里达德教堂的崇高祭坛（1670—1673年）、何塞·贝尼托·近里格控（1665—1725年）在塞哥维亚大教堂（1686—1690年）以及在萨拉芒卡的圣埃斯特班教堂（1693—1696年）创作的祭台后部的高架，都是由布满装饰和栩栩如生雕像的螺旋柱有力地组成的巨大的彩饰结构。这些革新者当中，除了丘里格拉家族的艺术家的之外，还有莱昂纳多·德·菲格罗亚（约1650—1730年）、佩得罗·德·里贝拉（1683—1742年）、纳尔奇索·托梅（1742年去世）以及最为重要的弗朗西斯科·乌尔塔多（1669—1725年）。必须提到，他们在建筑和装饰上的创作绝大多数属于18世纪头几十年。这种风格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代表作是装饰过度的格拉纳达的卡尔特修道院的圣器收藏室（1713—1747年），据说它是乌尔塔多的创作，但无确证。

这个时期的雕塑家在塑造糅合西班牙的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于其中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多彩圣徒像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佩得罗·德·梅纳（1628—1688年）在托勒多大教堂的圣弗朗西斯塑像（1663年）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后继者何塞·德·莫拉（1642—1672年）的作品看来更具修饰性，更讲究，以期令人出神入迷（格兰那达的圣布鲁诺教堂），这也成了那个时代特征性的标志。

至17世纪末，基本上由法国学院所强行推广的国际古典主义已丧失了吸引力。一种新的精神——反教条的，生气勃勃和热情洋溢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的——在许多地区已崭露头角，其证据就是，威尼斯画派异军突起，热那亚出现富丽优雅的巴洛克装饰，西西

里兴起精美的建筑，一种典型的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巴洛克式风格出人意料地繁荣，英国向一种雄浑有力、激动人心的巴洛克式风格转变，西班牙的装饰风格趋于丰富多彩，最突出的是柯塞沃克、佩尔莫泽尔、施鲁特这代人孜孜追求的巴洛克式的自由。所有这些基本上发生于同一时期的事，却因民族和地区特性的不同而各具特征，因而它们看似互不相干。然而，有生命力的思想总是具有不可抵挡的传播力。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新态度产生于灌输学术的大本营即巴黎，因而它在欧洲内部引起反响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个行动是巴黎的艺术理论家罗歇·德皮莱（1635—1709年）于1673年发表了《关于色彩的对话》，这不啻是投出了一颗炸弹，因为他认为学院派的偶像——普桑在运用色彩方面是个失败者。相反，他贬低普桑的同时，把鲁本斯颂扬为伟大的巴洛克潮流的宗师以及卓越的色彩运用者。结果在普桑和鲁本斯的支持者之间，即所谓的“普桑主义者”和“鲁本斯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更糟的事接踵而来。德皮莱在其1677年的《关于色彩的谈话》中，将矛头直指古典主义本身的权威性。他坚持认为，正是对古代典范的紧密遵循才毁了普桑。在17世纪临近结束之前，这场论战以德皮莱的胜利而告终。他的友人、一个坚定的“鲁本斯主义者”、画家夏尔·德·拉福赛（1636—1716年）被选为学院的院长。因此，艺术家们自动不再相信古典主义的教条，为18世纪早期法国绘画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

罗歇·德皮莱善于把当时困扰年轻艺术家的问题表达出来，因此他在整整一代人狂热地信奉古典主义的永恒价值之后，为自觉振兴巴洛克艺术作了准备。他抨击学院派一贯正确说的妙语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即打开了非专家批评的闸门。巴黎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座法国的首都不仅是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所在地，而且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闻且对艺术有浓厚兴趣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这个敏感的群体开始喜爱探讨和争论，对艺术的目的有其独特的见解。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开始抬头。因为与学院派的原则相比，公众要求艺术应当用于娱乐而不是用于训诫，应当诉诸情感而不是诉诸推理能力。如同古典理论一样，这种新的观念也是在意大利率先酝酿成熟的。画家佩得罗·达·科尔托纳和耶稣会教士奥托内利在他们的《论绘画》（1652年）一书中首次热烈倡导以令人快乐这一享乐主义原则作为绘画的宗旨，并在巴黎引起了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杜博斯神父在他的

《诗歌和绘画评论》（1719年）中把艺术的最高裁判权交给有教养、热心艺术的公众。因此，17世纪后期，在艺术家和公众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对18世纪艺术的发展，而且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甚至对现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M. 德尚特卢：《骑士贝尔尼尼的法国之游日记》（M. de chantelou, Journal de voyage de Cav. Berninen France），L. 拉兰内编，巴黎1885年版。

[2] A. 德·蒙太隆：《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会议记录》（A. de Montaiglon Procsès-verbaux de l' Academi royal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巴黎1875年版。

[3] P. 拉维丹：《法国建筑》（P. Lavedan, French Architecture），企鹅丛书，1956年版。

[4] Het Groot Schilderboek（阿姆斯特丹1707年版）。上述摘录摘自英文本《绘画的艺术》（伦敦1778年版），第100页。

[5] 《关于绘画的三篇对话》（伦敦1685年版）。

[6] 见前第三章第50—51页。

第八章 国家的社会基础

17世纪的后50年充满那么多的变故，其间西欧和中欧生活表面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致乍一看来它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各阶级发展以及相关的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假设可以通过探索某些重大变化及其联系来验证，而从最明显的变化，即战争的社会方面的变化着手探索，将是合适的。已有人写道——而且这可以作为公认的加以接受——从1560年前后到1660年前后，欧洲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1]军备、战术和战略改变了。它们现在需要新型的纪律、新的舰队与常备军组织以及技术和一般知识的新的、更集中的应用。后勤供应的财政与行政机器、政治控制体系以及武装力量的社会构成，都被改造一新。

军事革命的影响由社会史的一个突出事实显示出来：陆军和舰队比先前要庞大得多。不考虑土耳其人的陆军，我们可以说先前曾在一个单一的司令部下集结的最大兵力，是1632年时听命于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17.5万官兵。但这是一个顷刻即逝的结合体，并未维持下去，而路易十四在其陆海军中，多年保持了超出此数1倍多的现役兵力。有某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无法征募它们先前招收的那么多兵员。但是，也有新的军事强国，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它在1640年媾和后拥兵2000人，而在1688年身处和平之际拥兵3万人。对于某些国家，海上军备不像陆上军备那样始终必不可少；但是，欧洲的舰队同样增加了。武装人员的总数大得多，而且这种增加是持续的。有进一步增长，绝无普遍下降。虽然欧洲人口日增，人丁减少的国家仅是例外，但这些陆军和舰队不仅更加庞大，而且吸收了作为兵员来源的人口的大部分。

这些事实被援引来支持下述理论：战争首先是一种手段，社会借此摆脱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过大压力。接受此种观点的社会学家把战争描述为延期杀婴，并且试图用统计资料证明在某些时期里战争造成的死亡数目与婴儿死亡率成反比例变动。他们认为，过度增长的人口逐渐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结构。就这一时期而言，这种理论多半是从正确

的判断出发的，即欧洲总人口正在增加，造成生存资料的紧张。例如在法国，人口据信从1600年前后起持续增长。存在向外移民，包括胡格诺派移居国外，但从1666年起，科尔培尔立法鼓励早婚和组建大家庭。1678—1688年，法国人丁兴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1688—1714年的杀戮和饥馑造成或许多于5%的减少，直到18世纪末期，再未发生过类似的爆发性变动。

在关于人口统计事实的现有知识水平上，必须反驳说，这种解释简直无法证实。就法国，也就其他国家而言，同时代和19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家所依靠的主要资料——教区登记簿、税收统计表等——是有缺陷的，而且甚至目前这个领域的考据研究还几乎尚未开始。^[2]没有理由假定科尔培尔的措施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即使有，它们对该国总人口——不管其职业和年龄组合如何——的影响不一定会有助于说明战争的起因。征兵并非仅仅意味着从法国所有适龄男子中征召一部分入伍。它主要限于较缺乏手艺和居无定所的男子；它也几乎完全出于自愿，除迫切“征召军士”时外；而且，它是国际性的。法国军队中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与之对阵的军队同样是混合而成。如果对所有事实都加以验证，就可能证明仅仅法国才有爆炸性的人口形势。这一结论很可能影响到关于列国相对侵略性大小的意见分歧，但目前它无法被证明是有理的。就整个欧洲来说，事情未表明军队的扩展吸收了可以得到的人员供给，也未表明人口压力驱使人们从军。有许多证据显示，各国政府很难征召其不愿从军的臣民入伍；还有许多证据显示，它们提供武器、弹药、舰船、装备、运输、给养和军饷的能力已到了极限。

人口统计资料本身既不能解释战争的起因，又不能解释这一时期军队的规模；而且，也不要指望它除了有助于勾勒多种社会力量在其下动作的某些条件外还将起更多的作用。战争爆发前的爆炸性结构是一个全社会的结构，正如战争是许多社会成分构成的一项活动。军事革命是各种变化的复合体，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在贯通社会生活的原因和后果的交互影响中有其作用。除非并且直至某种新的分析把它分解为各个比较简单的成分，我们才可以把这场革命列为变化的因素之一。在其他因素中，最容易辨认的是经济因素。这个时期属于资本主义正在欧洲扩展的时代。关于家庭、地位和继承的不同法律制度，随同各异的政体，与经济因素的作用相交错并且使之复杂化，然而私有

财产制度本身是变化的永久源泉，如果这仅仅是因为当人们随心所欲各显其能时，他们当中有些将发财致富，有些将破产变穷。如上所述，广而言之欧洲人口愈益增多。同样广而言之，它愈益富裕。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国家里较高的社会阶层作为集体控制更多的财富，国家为战争目的支配更多的资源。至于农民、雇工和手艺人的命运，很难概而言之，因为即使不论战争的骚扰，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与这些经济因素相互渗透的是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尤其为这个时期所特有，那就是通常被称为科学运动的思潮。[\[3\]](#)

在科学运动的社会影响中，最容易追踪的是它通过技术改进产生的影响，即在工业、运输、农业和战争中产生的影响。它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中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难以追踪，因为在这样一些方面应用科学思维习惯的结果几乎同应用常识的结果一样。科学运动本身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别，不管真假，差不多还未从不加区别的“自然知识”中定形。[\[4\]](#)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运动是一股高效思维的浪潮，其结果和实践者的高效所造成的结果相似。治国贤明的决心完全独立存在，它同有助于改进航海的天文学无关，或者同在工业上——尽管尚未在农业上——有用的冶金术或化学无关。和这一实用的决心相比，制定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科学原则的企图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或至少是极难寻踪的结果；不过，它们确实做出了某种贡献，而且在一个领域这些结果昭然可见，这就是在当时所有学问中最精确、最进步的数学领域。在数学中，“纯粹”和“混合”之间的区别已是人所熟知的，[\[5\]](#)而现在人们理解到，混合数学既包括社会应用，也包括技术应用。

依靠直接应用数学知识来改善行政管理的最简单例子，是约翰·德·维特所提出的改革终身年金的建议。几个世纪以来，尼德兰的公共当局一向举债，而作为报答，它们在贷款者的有生之年始终支付年金。据知图尔奈镇在1229年就这么做了。因为它们不知道任一贷款者将活多久，它们就无法预料在未来任何一年里究竟有多少钱必须以年金的方式付出。整个进程是估测性的。到17世纪中叶，时值其大战开始之际，荷兰有议会着手把合理的财政技术应用于举债。1655年，它折算它的某些借款，以便从较低的利息率中得到好处。然而，它缺乏同终身年金领取者进行这种讨价还价所依凭的数字。大约在此时，数

学家们从概率规则的新研究中发现了计算生死或然性的方法。1669年，这个思想在伟大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与其兄弟之间的私函中得到讨论。不知道它是否从他俩中任何一个传到了约翰·德·维特那里，也可能他独自偶然地想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1671年，在一份理所当然出名的备忘录中，德·维特将其提交给他的主人——荷兰省议会之前。这份备忘录得出一个结论：以4%的利息率，按照相当于16年收益支付的终身年金是一项有利的投资。这里并不是假定议员们能懂得这个结论。他们的议政采取了预防措施，即附上了约翰尼斯·许德的一则表示支持的声明，后者是一位数学家，阿姆斯特丹市议会成员，后来成了那里的市行政官。自此开始，保险统计学迅速成长，在公共财政和私人保险业中广泛传播。[\[6\]](#)

实际上，德·维特关于估计寿命的数字尚缺确切的统计学基础。第一份过得去的人寿表是在1693年由埃德蒙·哈雷从布雷斯劳的死亡率数据中计算出来的。新的原则也没有取得全面成功。在同一年，即1693年，因战争急需金钱的英国政府出售了14%的终身年金，两年后它请求年金领取者以相当于4年半收益的低比率将其年金转换成为期96年的一项“财产”。在这两个场合，它都没有做出任何年龄区别。在荷兰，迟至1810年，海牙市政府仍以一种不随在世期间年金应予支付者的年龄而变动的比率出售终身年金。然而，当哈雷计算他的人生寿表时，有见识的舆论已接受了这一思想：应用于行政管理的数学可以构成一个正规的知识领域。17世纪50年代，威廉爵士佩第受雇绘制用于分配爱尔兰土地的地图和表格。从这一实际工作，他转入了较广泛的推理，发明了那些声称至少与科学思想类似的用语。他于1672年撰写“政治概览”，并且（一度在牛津讲授人体解剖学之后）于1691年发表其《爱尔兰政治解剖》。第三个用语，即他在1683年发表的一部书的标题中使用的“政治算术”，变成了广泛流行的措辞。英国政府部门尽力运用统计学。它希望取得宝贵成果的两个领域是人口统计和贸易统计，即政府能够最容易地收集大量数据的两个领域。在人口统计方面，它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取得进步，而在设立很晚才出现的全国人口定期普查制度以前，也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在商业统计方面，它干得好些。1696年，在战争与财政危机之际，它开设了西欧国家所办成功的第一个统计机构，即进出口总稽查处。该处准备的商业数字在议会讨论和对外谈判中被使用，但是，处理这些数字的官员们知道它

们是有缺陷的，而且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算术始终更多的是一种抱负和纲领，而非国家实践中的有效因素。

事实之广泛、系统的收集以及调查办法，并非威廉·佩第爵士的私人发明，而是当时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其工具之一是问题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制订了一种题目表，在国外的旅行者应当据此收集科学资料。它的一些早期成员就像其他人先前做的那样，报道海外各国的资源，把科学观察同经济观察结合起来。在法国，科学比在英国更紧密地和政府配合。科学院是科尔培尔官方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机构；它予以技术很大的注意。尽管它不干预国事，但它的某些工作同某些行政管理新方法之间关系密切。科尔培尔的施政方略是将调查结果交付常识审断。他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学习欲望”^[7]。1663年，官员们受命开始彻底调查国家的状况。他们要收集所有可得到的地图，如果必要就予以改正，还要报告财政、经济资源和活动、税收以及军事、教会和诸多方面的可能同政府有关的一切。在以后的岁月里，科尔培尔及其下属使用和改进了统计学、制图学和参考书。《王家目录》是他的创新之一，他注意档案分类。就像英国科学家那样，他坚持运用一种明晰的叙实风格。

以科尔培尔的调查为基础的政策由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固定下来，并予以实施。少数同国王密切接触的大臣向精心挑选的一群地方行政官发号施令。按察使们精明机灵，干劲充沛，有国家的全部力量做后盾，法国沿科尔培尔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它一直享有和平，它本来会沿同一方向走向更大的繁荣。然而，就像英国的政治算术一样，科尔培尔主义仍是一项未实现的纲领，这除了战争外还有其他原因。原准备用几个月进行的1663年调查从未完成。1697年，博维利尔公爵向各省按察使送交了一种几乎相同的问题表，后者将起草关于其财政区的备忘录，用于王孙布戈尼厄公爵的教育。这发生在路易十四在位的第二个时期，即战而不胜的时期，而博维利尔属于批评政府的一个贤人集团。他们当中最伟大的是法国元帅沃邦，他以军事工程师闻名，像佩第那样从实际勘查和绘制地图发展到形成关于税收和治国的思想。但科尔培尔和以前同他想法相同的那些人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他是重臣，但也是改革家；他代表了一种与许多既成制度的实质格格不入的精神。政府新部门的合乎理性的管理被置于

一个社会、政治有机体之上，该有机体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继续成长，并创造体现它自身原则的新东西。

在国王的治国职能和他作为国家及其传统的象征性领袖的地位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矛盾。历史学家们不再相信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但那是他的极端颂扬者和极端反对者认为他具有的地位。波舒哀写道“整个国家在他身上”^[8]，胡格诺派最著名的政治小册子则异口同声地说：“国王占据国家的位置。”^[9]专制主义的官方理论确实没有夸大国王在政府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有人代表他写道：“国王的职能主要是让真知灼见起作用，永远自然而然地、毫无困难地起作用”^[10]；但是，欺骗之类的办法被用来制造一种表象，即事事以他的意志和作为为转移。国王内阁中的四名文臣具有重要的职能。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主簿官。他被授权假冒国王签名，而他干得那么好，以致没有人能说出到底是他还是他的主子在签名。国王把一些时间花费在徒有其表的例行公事上，例如每月一次开会检查三种财政登记簿。总稽核大声朗读数字，每念过一项国王便发出一个音节“bon”（“好”）。欧洲另有一些统治者比路易十四更勤勉，也是更地道的实干家；他注重责任虽然是真诚的，但在法国内外造成的印象却比不上他的大肆挥霍。

在以他的名义汇集而成的《回忆录》中，有一些关于君主用故作姿态来争取民望的著名见解。人们根据所见来判断所未见。看来可能是过度的花费会给民众造成一种非常有利的高贵、权力、财富和伟大的印象。这一段完全没有谈到建筑，但在另一段里国王本人草草地写下一笔：“大建筑之宏伟辉煌。”^[11]他在凡尔赛的宏大建筑工程开始于1668年。到1682年宫廷完全并最终设置于该处，那以后国王便难得巡视他那15英里之外的首都了。1693—1700年以及自1706年到去世，他从未作此旅行。他周围的官员和侍从相当于一个万人殖民团体。在他的最后两次战争的灾难性岁月里，开支不得不削减，但对法国的统治仍旧在这个非凡的场所和非凡的环境中施行，直到1789年革命爆发。

官方理论把法国君主制度的虚饰说成是富强的表现，并且强调它使一人政府更能被接受；然而，这一辩词没有说服每个观察者。生于荷兰、定居英国的贝尔纳·曼德维尔争辩说，宫廷的奢侈并非出于纯

粹的政治目的，而是为奢侈而奢侈。他写道：“凡实权所在之处，设想生活节制或简朴会使得在位的掌握实权者受人鄙视，是荒唐可笑的，从皇帝到教区助理牧师，莫不如此。”^[12]他叙述了荷兰共和国的恢宏伟大与德·维特个人生活节俭之间的对比，这一对比从德·维特在世期间就是文学话题。^[13]法国君主制的庞大机器是独特的法国条件的产物，它既是力量的标志，也是虚弱的标志。

在凡尔赛，路易十四身处法国贵族阶级的顶端大放光彩。这一世纪中叶的内战中，起源于封建的世袭贵族被镇压下去。它不再聚集于国家立法会议中，而在那些议会仍旧开会、以便允准税收的省份中，按察使们不再非得维持王权不可，而只是玩弄各种操纵把戏。一方面，在宫廷中，就像确实在全国各地那样，盛行着一种普遍的追求封号、官位和显贵标志的渴望，这使得国王能依靠一套精心构设的礼仪，来同样地利用暴发户的野心和破落户的需要。在军队里，指挥职务和晋升机会大都依社会等级而定；但大臣勒泰利耶和卢瓦确立了国家对军队的权威，于是国王在这里取得了又一个不断延展的施恩赐福的大领域。贵族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种姓。最高爵位可以得自授予，而且有规避家谱门第限制的办法，这些限制名义上堵住了新来乍到者的仕路。其他阶层的新富人即使自己未升到较高的等级，仍可以把女儿嫁给上峰，从而使自己的后代成为贵族。另一方面，贵族在本质上仍旧处于一种特权地位。许多贵族行使领主管辖权。中央政府在限制这种权力方面无重要成果，它被严重滥用的例子，至少在比较闭塞的地方并非绝无仅有。地主无论贫富，侵犯公共权利，而自1667年以来颁布的各项国王敕令未能使之收敛。最重要的是，贵族免于纳税。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沃邦和政府的其他批评者将这一特权视为国家岁入改革的主要障碍。政府对此也有所认识，以至于通过1695年的人头税法设立了第一项普遍赋税。然而，这一原则创新的规模太小，未能减少弊端。

这样，佩剑贵族本身就是中央集权控制的障碍。它还是一个不断增大的障碍体系的核心。教会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与贵族相联结。它也是王室施恩赐福的领域。教士受聘处理国家大事，尤其是外交。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剥夺了内韦尔公爵挑选小主教区克拉姆西的主教的权力，从而完成了他对法国各主教区的控制。并非所有的主教区都是富庶之乡，但拥有这些以及700个修道院，国王便支配了绝大多数教会

要职。他运用这一权力笼络和控制贵族，对相较而言属于少权或无权阶级的低级教士几乎毫不关心。不过，教会的依赖性小于贵族。它每5年举行一次教士大会，以便对它自己的“无偿捐赠”进行表决，它还发放其他赠款和贷款，这些是必须通过谈判获取的。高卢教会，即使忠心耿耿，理论上仍是个独立的盟友，享有它自己的各种特权和豁免，它并未提供一种制衡贵族的势力。对胡格诺派的迫害限制了，同时也加固了社会组织中的教士成分。

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下一个集团是穿袍贵族。像封建贵族那样，高等法院的成员在内战中未能实现自己的某些权利要求，在路易统治时期始终遭到贬抑。他们的职所是在巴黎和某些省会，凡尔赛非其置身之地。然而事实上，他们和全体法律界人士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投身法律界和投身官场之间，没有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界线。所有在这一或那一领域占据要职的人，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而两个领域之间存在对流。按察使选自行政法院审查官的队伍，后者的职能部分地是司法性的，其数量在1689年固定为88人。司法职位由君王任命的高官占据，不过，有两样东西使法官和官员免于成为单纯的衙吏。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自己的特权，担任较高等级官职——屈指可数的廷臣们几乎全都来源于此——是爵位贵族的全部特权；而在资产者官吏这一层次上，则有许多其占据者可免于纳税的职位，它们的数目不断增加，因为它们全都可以买卖。这种制度并不仅仅限于法国。就其本身而言，它并非不合情理：当走马上任的新官向离职的前任付款时，他是为这个前任的退休生活提供某些资助，并且保证多少留神其新职责。然而，这种制度显然可能导致缺乏效率、敲诈勒索和贪污舞弊。路易十四的政府虽然明白这一点，而且经常试图就其所知采取行动，但它在财政上抛弃不起这个因袭的制度。国家本身出卖官职，有时是世袭官职，并且在官职易手时分得一份红利。于是，为维持这些交易的市场价格，官职任期得到保障，伴之以官职或名义官职的成倍增加。买下或继承它们的人自然并非全都称职。这一制度在科尔培尔时期扩展到与商业和工业有关的许多职务，以后又扩展到与海军管理相连的某些官位。1681年的一项敕令授予一大批官职占据者免税权。在18世纪，据估计有4000个被授予贵族爵位的官职，而路易统治前期官职总数据估计达4—5万。

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政府活动，特别是战争和备战活动的膨胀，造成了从少数统治者到体力劳动者的每个层次上新的就业机会，而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其任务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专门化了。工商业的新繁荣，即使是以它范围外的活动为代价人为地支撑的，也具有类似的影响。这意味着组织工作、职员工作和贸易业务的发展，意味着资产者比例的增长，而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资产者精神的兴起昭然可见。但是，从上面赐予特权和地位的制度，同其他倾向相结合，掩盖和歪曲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为了王权的利益，内战后显出某些复兴迹象的市政机关被削弱。在经济事务中，除一部分例外，大城镇——例如像马赛“共和国”——丧失了往昔所有的那种自治。在政体上，它们的自治是狭隘和自私的寡头集团自治，在按察使们代表无权选举者进行干预时无力抵抗。1692年，市长们变成了“官员”，从而被纳入互相妒忌、各自拥有既得私利的附庸们组成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就如在凡尔赛，除了争邀王室的宠惠外不思进取，而新兴的资产者就像廷臣那样刻意追求特权和显贵标志。不仅法官，还有医生和银行家，为自己获取了免服封建徭役的权利，但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已。会计职业正在出现，但是，据说不是为雇主而是为顾客工作的独立会计师，那是法院指定的记账员性质的，即官员性质的。没有出现下述情景：专门职业者通过控制开业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形成旨在维持其技巧、社会服务和酬赏之间的均衡的紧密组织。工商业者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商会和官方主持下的其他会社构成科尔培尔所建机构的一部分，但商人们不是试图改造旧的市镇生活或在这些新基础上有所建树，而是抱住为自己争取爵位或类似头衔的计划不放。这样，本来会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那个群体，由于同特权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关系而分化和再分化。

社会分裂为上层、中层和下层等级的观念运用到当时的法国，确实没有什么用处。这时存在着特权者和无特权者之间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之上是逐级增大的财富和尊贵，但许多分割阻碍了由于职能和生活方式的类似以及共同利益感而联合起来的各阶级的形成。在该线之下，从富裕农民和工匠到最穷的雇工，其物质福利迥然不同。在法国这一大区域内，农业甚至工业关系的千差万别，就像土壤、地形和自然资源方面千差万别一样。最穷者的最坏情况是可怕的，而且不仅仅是在1662年。1662—1709年这样的荒年。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年度，令人震惊地爆发了骚乱，甚至反叛。这些在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

中，比在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显得更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除了在官方密函中，没有关于处决和部队调动的报道。然而，它们全都是地区性的，从未有过遍布全国的不满运动。1662—1663年波旁有乱，1664—1666年加斯科涅和贝阿恩有乱，1670年继瓦赖有乱，1675年布列塔尼有乱，等等。镇压所需从未超出当局的能力；它们也从未对不满运动做出仅仅意味局部与有限的和解的让步。政府比在该世纪中叶时强大，而能显示它开始自认对全国民众的福利负有责任的证据，则犹如凤毛麟角。

一个国家有效的中央集权控制，意味着中央和个别公民之间没有中间权力。路易十四的国家在确立与公民的直接接触上殆无进展，唯公民作为纳税人方面除外。当1688年强制兵役以自卫队的形式被小规模采用时，服役者的挑选任由每个教区决定。没有哪个民政机关保存有民众的洗礼、结婚和丧葬，这些登记都由教士来做。1667年的一项敕令在其他内容之外，还规定登记册的副本应当发往书记室，即大法官管辖区的档案保管室，但即使总能妥善地邮寄——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登记册对民用目的而言也毫无用处。在新近兼并的佛兰德和阿尔萨斯领地，如同在布列塔尼和比利牛斯，政府未曾认真地以其他实用语言为代价强制推行法语，但这与其说是出于任何开明政策，不如说是因为政府没有同老百姓直接交流的任何需要。在例外情况下，可能存在直接交往，例如在航海注册的场合。为海军征兵目的，所有以航海为生的人都被登记在册，但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仅影响到集中于海港并且容易辨认的一小部分人。

尽管其行动的范围和深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限，但路易十四王朝仍给整个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这一或那一方面被许多国家奉为楷模。甚至在武运逆转后，它的军队仍然被仿效。它的建筑、花园和礼仪成为时尚。它的某些行政成就同样易于模仿。1670—1690年，伦敦、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和柏林经过改善的街道照明，或许就受到1667年始任警察总监的拉雷尼所作榜样的促进，后者为巴黎提供了6500盏反射式烛灯。然而在较大的事务上，法国发挥影响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行的社会条件。在西属尼德兰，一个许多方面类似于法国毗邻地区的小国，贝尔盖克这样的大臣有可能适应科尔培尔的思想和方法。在英国，斯特拉福德时期存在过一次提高行政效率的运动，而当内战期间议会党人组织起来时，又开始了另一次运动。王政复辟

时从法国返回的流亡者没有带回这方面的任何教益，但法国近在咫尺，以后的岁月里君权拥护者中间比较能干的人从法国经验获益匪浅。1682—1688年，森德兰和戈多尔芬不是代表本国的保守主义，而是代表一种欧洲大陆的，即法国的理想。他们的政策由于许多政治的和政体的原因遭到拒绝，但其失败也归因于社会障碍，它们与确定法国中央权力之限度的那些障碍迥然不同。威廉三世对法战争期间，决定性的、持久的改革得到推行，但它们极少或全非起因于法国的激励。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则出色的附注中表明，可以根据加拿大的情况更好地判断法国旧制度的行政集权。在那里，妨碍它自由发展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有许多并不存在。那里几乎没有贵族；教会不占支配地位；司法没有古老的制度和惯例方面的渊源；封建主义传统或已丧失，或微不足道。因此那里完全不存在市政或省政机构；行政干预无所不在，一切创制来自法国。但是，在邻近的同样脱离欧洲社会纽带的英国诸殖民地中，他却看到截然相反的情形：生气勃勃的地方政府和殖民地政府、个人主义、微不足道的中央集权管理。[\[14\]](#)对这一反差的解释存在于两个国家的差别之中。

由英王统治的3个王国在宪法上是各自独立的。在整个路易十四时期，它们看来始终有可能再次因内战而分裂。它们实际上确实经历了一场革命，而爱尔兰在3年内是个战场。即使政治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在苏格兰，甚至在英格兰，法律和秩序也不比在法国维持得好多少。尽管这3个王国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却仍能够维持着强大的舰队和可观的陆军而不耗尽其国库或破坏其脆弱的统一，法国观察家们对此惊诧莫名。它们能够如此，确实表明了一个事实：甚至在军事革命之后，战争的需求并未深深地渗入社会结构中去。兵员征召没有干扰工业的人力供给，甚至海军的强制征兵虽然打搅了远洋商船队，也不见得使之缺乏必要的海员。军需供应对民间消费者而言没有造成严重的短缺。战争带来的损失和不便没有使现有的不满加剧到危险程度。凡未遭敌人入侵的任何交战国，情况都可能是如此；然而，英国存在着使这一点在那里格外适合的条件。英国已达到一种地步，即经济改良和改组远未因战争而倒退，实际上因此而得益。再者，在整个欧洲，国家的需求对社会造成的压力确实仍然甚小；然而在英国，社会结构状况使它们的压力比在法国更小。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以及与爱尔兰的关系这两大问题仍未解决，但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中，它们之中每一个都有了如此的变化，以致在无数影响和利益纽带的基础上，它们成了驾驭问题，而非主权问题：爱尔兰被重新征服，苏格兰最终加入了一个政体联合（1707年）。这两国都是相对简单的国家，在社会组织方面变化较小。在英格兰，某些重要方面对任何中央集权改革的需要比在法国要小。那里没有国内经济壁垒。除某些无关紧要的反常情况外，法律统一，司法管理处于单一的控制之下。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激进的财政改革；而且，尽管存在某些古怪的中世纪残余，但这在事实上得到了完成。不过，在战争、司法和税收领域之外，不存在官僚队伍，国家雇用的人员寥寥无几。它和构成民众的个人所作的接触并不比在法国密切。它不干预凯尔特语。在1660年以前的清教统治插曲期间，或许主要出于宗教原因，地方治安法官所作的出生、结婚和丧葬登记取代了往昔教士所作的洗礼、结婚和丧葬登记。旧制度随王政复辟卷土重来，但1695—1696年登记程序有所改善，自那时起所有婴儿出生都需要通知教区牧师。登记册副本仍旧不呈送任何民政当局，呈送主教当局者则如凤毛麟角。不存在近似于法国民政部那样的机构，甚至模仿法国航海注册的尝试也不成功。政府缺乏实施这一政策的任何官员，简直不能或完全无法（在商业统计领域之外）利用调查技术。有一次，商务部想知道王国全境在济贫税方面征集了多少钱，收集这项资料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来自教区牧师的漏洞百出的报告。

在这个例子中，了解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项有力的政策的愿望遭受挫折，部分是因为缺乏使这一愿望得以实行的机构，部分是受阻于一个保守的社会之惰性。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表明这种惰性显得足以抵制王权的坚定努力。两位国王——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运用法律程序侵袭政治上招惹麻烦的自治城市自由权。结局同法国发生的情况相反，英国市政寡头集团的继续存在表明了英国社会的某些主要特点。自治城市被革命拯救，革命则是由贵族进行或至少是由贵族领导的。

如同法国贵族那样，英国贵族在内战中地位有所损伤。他们当中多数是保王党人，由于王政复辟而得益。然而，他们不再是封建首领了。1629年，一位荷兰人观看了在白厅举行的嘉德勋位授予典礼，当时每位骑士率领各自的一列随行绅士。他不禁想起两年前见过的在其

议会中的波兰贵族。^[15]英国的大亨似已不再给人这种印象了。宫廷仪式繁简适中。爵位带来特权，但绝非司法管辖权或免税权。世袭封号的持有者为数很少；虽然贵族的次子拥有显赫的称呼，但除高等贵族外此类名目绝无传至第三代的。因此，贵族的直系亲属联系广泛地散布到一个统治阶级内，它对于新来者甚至比法国贵族更加开放，而且不同工商业财富上层正式分离。存在土地贵族，但它一方面同较小的地主结盟，另一方面同实业界和专门职业界的人携手。它有权有势，然而通过公共机构并作为统治阶级的领导成分行使权势的。其成员对某些最高官职拥有优先的要求权，在竞争任何这类官职时占据上风。这一竞争由于集团和政党的形成而制度化了，但在立法议会中的公开讨论——即使不加报道——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官员任命和大臣行为的总控制。有一些非常显贵的世袭官职，但它们不再附带实权，而在低级官职中，世袭是无足轻重的。在陆军和国家机构中，官职都被买卖，但随着国家财政的改善，这一制度得到了限制。它在陆军中被置于某种程度的监督之下，它从未给予文职官吏任何类似于永久的职位。这样，对中央集权和创新倾向的抵抗就有了一个与在法国所不同的基础。这是控制议会两院的复合社会阶级的集体保守主义。通过它们，这个阶级经常是依靠在地方性的特殊问题上的立法，来处理在法国属于按察使及其僚属管理范围的事项。

教会的地位比在法国低。诚然，国王挑选26个主教，并行使某些次要的圣职授予权；主教作为上院议员，是处理教务的主要成分，而教士——与法国的教士不同，可以结婚——正变得在上下两个等级层次上都更紧密地和统治阶级相联结。但是，指定教会人员担任高级世俗公职的惯例已经衰亡。事实上，从1689年起，在法律上，国教会并不囊括整个民族。它还放弃了自行表决自身赋税的权利，并且此后它甚至未曾为纯粹的教会目的认真地利用教士大会。它的团体意识由于教见分歧而遭到损害，它的影响与其说行使于全国范围，不如说局限于各个教区。

城镇中的地方政府被允许我行我素，其程度足以既为奉公的主动行为，又为可耻的贪污舞弊行为提供余地。在某些政府有殷实人士任职的大城镇里，情况最佳。负责实施济贫法的选任官员在流行思想的限度内，可以为缓解穷人的贫苦大有作为。全国性立法未能使这一体制合理化。一项经过改革的济贫法本可以不那么宽容人类的弱点，而

且尽管滥用职权之事甚多，但现有法律确实意味着地方当局承认至少对“值得救济”的穷人负有一种责任。

在城镇以外，负责实施济贫法的官员如同警官和其他教区官员，以各种方式从属于地方治安法官。这些治安法官由君主任命，任务主要是在小事上对他们寒微的邻居执掌司法；当聚集于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时，他们不仅集体地监督教区警务与行政，还作为行政当局行动。在理论上，郡和教区相似，是个“责任单位”：郡民对国王负有责任，郡官则保证其履行。在实践中，它是个自治的行政区，而许多郡如此辽阔，以致与其说是地方分区，不如说是区域。这一时期的地方治安法官大都是乡绅，达官贵人们并不在本乡直接处理这些事务。他们把这种日常工作留给地位较低的人去做，当然，只要他们想施加影响，就会左右这些人。这样，各郡是由员外统治的，他们被描述为“治外寡头”，这或许带有过多的贬义。国王通过巡回法官，偶尔也通过国务大臣，同他们联系。他们同国会议员有个人联系，并且掌握选举这些议员的选票，因而国会的地方立法至少会考虑到某些地方利益和舆论。看来没有人哀叹缺乏专业行政等级体系。

如同在法国，英国产生了对专门职业和商业工作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分工，但结果迥然不同。它没有使律师界和法官界的组织发生明显的变化，它们具有自身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社团。在其他法律界分支中，出现了某些变化。这些分支从未有过任何社团组织。律师被进一步划分，更明显地同地位较低的初级律士分开。医学专业的两大分支威望都有提高：治病技术有很大改善，行医成功的报酬更加丰厚。人们没有创设出新的专业团体，但现存的团体没有一个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活跃。兽医学在法国正开始得到研究，但在英国显然并非如此。建筑师更显著地同营造商区别开来，但他们没有组成协会。存在会计师，他们大都是会计业务从事者兼教师。很奇怪，他们的专业似乎在苏格兰得到了比在英格兰更充分的发展。

无处可见将新兴的专门职业置于政府庇佑之下的任何尝试。如果说有什么动向，那就是它们日益远离政府，而非趋近政府。它们还以另一种方式变得更加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分。它们的工作有独特的吸引力，在其中，教育和出身方面的优势可以助人飞黄腾达。比较得意的成员开始同达官显贵接触。因此，人们开始认为某些专门职业比经商或工业更适合于绅士。地主的次子们现在远不是那么普遍地在伦敦或

外省市镇学徒了。查理二世统治期间，有关当局宣称从事批发商业同贵族纹章相兼容，而且所有门户对之洞开的商界阔佬确有人在；但在教会、法律界和陆军，以及还有医学界，获得公众的尊敬，这使它们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三种职业中，陆军实际上是一种新职业，其加官进阶的习惯逐渐使乡绅的眼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法国相比，英国更加近似于一个具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之环境，但或许这样说更确切些：在英国，虽然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因众多纽带而相联结，无处与之截然分开，但仍然有着某种独立的影响。

无论其长处和短处可能是什么，在英国独特的社会秩序中不存在任何能吸引外国人模仿的东西。西方世界的另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及其与经济安排有别的政体和行政安排，也是如此。在独立战争这一革命时期过后，那里确实有过成功的，甚至自觉的努力，以达到欧洲关于良好政治的公认标准。到世纪中叶，联邦政体业已成熟，并且确立不移。尽管发生了一连串惊人的危机，但它注定要延续下来，历经17世纪和18世纪，而外国观察者未料到这一点，情有可原地未能懂得它具有适于持续生存的坚实基础。七个主权省的政体各自大不相同，而且共和国领土的某些部分甚至在这些省之外。威廉三世，作为他自己的奥兰治领地内的君主，是该行政区的高官，也是七个省中五个省的高官。在他的众多职务中，每一项都带有不同的权利和职能，当他试图将其扩大时，总是处于戒备的目光之下。在每个省里，都有特殊的地方性妥协，以便在城乡之间、贵族和其他地主之间、选任当局和世袭当局之间、全权议会和行政官员之间以及公共权力和私人影响之间，达到平衡。在占支配地位的荷兰省，各大城镇，特别是大都市阿姆斯特丹，一般能压倒反对派，然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省内都如此。整个共和国的总意愿，只有通过一个复杂得无可言喻的操纵和谈判过程才能达成。联邦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官僚机构，而且除财政外，实际上没有民政当局。大部分由外国雇佣兵构成的陆军属于联邦，海军指挥则统一于海军统率之下；但是，船坞、军需供应和舰队兵员配备隶属于三个沿海省内五个独立的社区。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情况，共和国仍然行使了按其人口成比例大于英国或法国的权势，而且在某些内政领域，例如监狱管理和济贫，它广泛地受到赞颂。仅仅根据沿海各省巨大的财富及其独特的经商经

验，是解释不了这个矛盾现象的。荷兰人还有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性。他们的统治阶级异乎寻常、范围不清，但它拥有许多适于担任要职的人，而且惯常给予他们既不过小，又不过大的职权。比起法国或英国的统治阶级，它更显著地由文官占据优势。它拥有一群职业官员，即各市镇、各省和联合省议会中的受过法律教育的“受俸者”（pensionaries）和“登记者”（griffiers），[\[16\]](#)其中包括一些乡村地主和许多城市贵族阶层的成员。这些人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是活跃的商人，但他们是有产者，在其他各种财富之外还拥有城乡的不动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并且依靠一种像其他国家里的世袭制那样的排他性之圈内增选制度，保持了对许多官职的垄断。在其他方面，他们并非同商人和专门职业者构成的“资产阶级”中较为成功者一样缺乏社会联系。牧师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固然存在国教会，但它没有全国性组织，只有省级组织，而且在它之外存在一个很大的被容忍的少数教派。在它的长老会组织中没有高级教士，也没有拥有国家公职的牧师。

当各种机构虽然在理论上看来难以操作，却运转得令人满意时，其原因不大会仅仅在于那些行使权势的人。很可能还由于存在某种相关的社会和法律自由，存在着广泛散布于一般民众中的某些积极的心理和性格特质。部分是因为中央机构的缺乏使得实际上不可能强求一致，但也因为它们的自我珍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在荷兰人中间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少遭到干预。就在一个难以缜密验证的领域有可能进行的比较而言，荷兰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民族。大众读写能力看起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许多种类的知识看起来已广泛传播。无论城乡，很大数量的各类民众，似乎已从由来已久的职业教育中受益匪浅。有些公共事业本质上只能依靠汇合对当地的了解和判断力才能举办，亦即依靠允许跨越某些财产和权势壁垒的自由讨论。最好的例子是负责筑堤和排水的当局，工程需要、财务考虑和互相冲突的地方利益都必须由它予以协调；它们一部分是经选举产生的，民众的生计乃至性命都取决于它们的决定。在此类经验中，无数各自照管本身眼前事务的微小的社会细胞，产生了一种公共精神，而这种自由市民机体为国家上层建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比那些统治阶级显得比较突出、思想观念比较涣散的社会更加牢固。[\[17\]](#)

当时，与法国不同，上述两个开明的国家一直未被外国仿效。即使是法国的影响以及风格和行事方式趋于一致化的其他倾向，尽管并非流于表面，也几乎完全未促进任何新的欧洲统一。并非只有战争才扩大了国际差异。在我们考察过的三国之中的任一国里，其导致了国家加强其自身机构，向其臣民提出更多要求。当它在紧急情势的压力下这么做时，它不得不附和所承袭的社会传统，于是虽然整个大陆在许多方面一致地对军事革命做出反应，但其结果进一步巩固了每一国的特性，加深了它们之间的裂缝。它促使另一个，而且是在地理上更广阔的社会进一步加深分裂，那就是大致由易北河经德意志边界直至阿尔卑斯山分隔开的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之间的社会分裂。这主要是相反类型的农业关系之间的分裂，但这些必然涉及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相应的反差。在西部，土地耕作者比较自由；在东部，他们就不那么自由了，而且所受的奴役正在变得更加严酷，更加系统化。

在法国，虽然王室所作的有利于农民的干预并无实效，虽然一些大领主正在巩固和增加他们的领地，但从法律上看大多数农民作为个人是自由的。瑞士和德意志西部以及英伦三岛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有许多大地主和无地的雇农。在此种关系甚至更普遍的西班牙，除加泰罗尼亚外，农民中间没有什么活跃的骚动。在意大利，封建管辖权和其他封建残余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自由的经济关系而减轻了。在葡萄牙，农奴制于1702年在王家领地上被废除。但在东部，相反的趋势占了上风，大平原地区尤其如此，那里较大的领地为利润而进行谷物生产，以便由海路输出。甚至在丹麦，就像在德意志东部以及往南到波希米亚和瑞士那样，地主压榨佃农，其途径不是通过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而是通过压迫性的管辖权和徭役。在较北的地区，不存在联合抵抗。在丹麦，小不动产持有者早已消失。1660年，腓特烈三世使王室权力绝对化时，[\[18\]](#)对农民的怨诉完全置若罔闻；腓特烈四世于1702年为西兰和拉兰两地颁发的解放敕令是一纸废文，农民的状况在18世纪期间继续恶化。然而再往南去，就可以看到骚动。在新兴市镇贵族主宰农民的瑞士，1646—1653年有过决定性的冲突，此后再无混乱，人们做出了某些让步来缓和不满。在波希米亚，一连串局部暴动之后，1680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农民起义。皇帝用武力镇压了叛乱，但他也颁授了《柏杜比尔诏书》（或称《徭役权益法令》），意在约束大地主的压迫。不过，直到一代人以后，皇帝的敕

令才带来实质性的改革。在匈牙利，1677—1710年的全国性叛乱使一场反对地主的社会运动走入了歧途。

德意志一半在一个区域，一半在另一个区域，已经有了自己的确立不移的行政经验，而某些德意志诸侯曾先行实施了近代中央集权政治。在16世纪，随着邦主发展为国君，一种新型的官员掌管了财政、司法和军事管理。奥地利、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使用他们，并且采用了单一的总委员会辅之以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制度。大多数官员受过大学法学院教育。直到18世纪，德意志诸大学才完全承认与法学无关的社会研究领域，因而着手训练学生在开始被人称为财政的领域从事官场生涯。但是，此项发展的基础已在奠定之中。1694年哈雷大学创立，1687年托马西乌斯在莱比锡用德语讲学。德意志最杰出的政治、经济思想来源于受过法学训练的官员。其中某些人摆脱了约翰·约阿希姆·贝歇尔（1635—1682年）为其头号阐述者的、虽有启发性但不可靠的规划者心态，作为讲究实际的管理人员埋头写作，设计改良措施，特别是增加岁入。他们不是科学家，但他们熟悉地图、勘察方法以及简单的计算。由于德意志诸邦较小，官员们在从政生涯中常常易地而仕，将自己的经验带往所去之处，若干作者还声称可以为全德诸邦出谋划策，目的是改进整个帝国的治理水准。法伊特·路德维希·冯·泽肯多夫（1626—1692年）便是个好例子，他的著作在德意志以外享有盛名。他为勃兰登堡选侯效劳，但他写的书却在选侯领地之外发行，其意在通用。

因此，当勃兰登堡的统治者们建立自己个人的中央集权体系时，他们就有了现成的有用工具，而军事革命有利于这一企图，就像它在其他德意志诸侯国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很可能在其他各邦，从军生涯开始吸引贵族家庭的成员。勃兰登堡的最危险的邻国是瑞典，它是一个穷国（如同勃兰登堡本身和普鲁士），依靠无情利用其人力和金钱资源壮大了军事力量。瑞典的例子提供了某种启示，甚至在18世纪，正是按照瑞典的方式，以适当的登记为基础的征兵制在普鲁士王国得到采用。大选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出身和利益方面，与他那由若干部分组成的辖地之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完全认同。在勃兰登堡本地，他是路德派臣民的加尔文派统治者。他同普鲁士的联系纯粹是王朝的。他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得到的富庶的西部各主教区和公爵领地，在社会结构和经济

利益方面与他的世袭领地迥然不同。由于这些单元广为分散，又缺乏可防守的自然疆界，强大的军队和严密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在军队里，法国的榜样至高无上；法国建筑式样和风格留下了痕迹。但制度在总体上与法国的根本不同，并且是根据对社会力量如此准确的估计而强行施加的，以致在最初的既非十分激烈，亦非旷日持久的冲突之后，它一直安然无恙，直到法国革命战争为止。改组工作从陆军扩展到财政：中央战备基金于1674年设立。军需部（它除名称外几乎完全未受惠于法国人）成了一个管辖一切的新的中央政府的核心，陆军、财政和内政各部，事实上全部国家中枢部门，都从这个主干分叉生出。在西部诸地，例如克莱沃和马尔克，社会关系同相邻的荷兰和德意志领地类似，即在一个比较富裕、人口比较密集的经济体中，城镇和乡村的利益不再是彼此对立的，贵族对自由农民的统治权大多已丧失。因此，虽然地方机构已被削弱，到1672年选侯已能任意摆布它们，但他并没有压制它们。以税收方面的很大让步为代价，他允许议会继续生存。然而，在其东部领地——那是贵族构成最强大的成分——他剥夺地方三级会议的控制权，以此为新的财政制度扫清道路。他所以能够造成这些剧变，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同贵族的两面性的联盟。诸市镇过于虚弱，不能同贵族分庭抗礼，因而他限制它们的权利。他授予贵族特权，包括封建领主权利和免税权。但是，从未有像在法国那样贵族作为一个集体阻碍专制主义的任何危险。大选侯与其联盟的另一方面在于，他将他们拉入酬赏丰厚，但要求严格的国家公务。较大的地主家庭开始向军队提供军官，向官僚机构提供官员。“各军需处中的领导职务几乎全由贵族担任。腓特烈·威廉任命的34个参谋官和机要参谋中，有29个是贵族，它们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容克。”^[19]这一有权有势的从政贵族之不同于法国贵族，并不甚于它所效劳的君主制之不同于法国的君主制。选侯有自己的宫廷和宫殿，在其中法国的影响昭然可见；腓特烈·威廉的继承者登上了国王等级；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专制统治者是足以成事的君主。

从已作的关于法国、英国、联合省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论述中，可以引出某些一般的结论，它们在相邻各国的考虑中也被认定是成立的。欧洲的社会结构正在若干重要力量的作用下变化着，其中没有哪一种力量是独立于其他力量而发生或起作用的。知识——科学知识和实用知识两者——增长了；国家加强了对其臣民的控制；它们在互相间的战争中使用如此得到的力量；它们可以获取的财富和人力资

源增加了。由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原因，社会分野已遵循新的分化线，在为更大、更多样化的中产阶级开辟发展余地方面尤其是这样。但在每一个共同体内，这些倾向都遇到了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它们披上了独特的当地外衣：在法国是特权和地位；在英国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惰性；在尼德兰是中央机构寥寥无几；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中央集权君主制之下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些反差，以及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反差，非但远未消除，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一种新的全欧文化正开始打磨生活方式、艺术和文学，使其表面平整划一，但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层次，在财富和力量的组织方面，差别却变大而非变小了。

[1] 迈克尔·罗伯茨教授在其就职讲演《军事革命》中用语（讲演日期不详，1956年在贝尔法斯特出版）。

[2] 见P. 古贝尔[《教区登记簿》，载于《年鉴》第9卷（1954年）]。他认为，来源于此的资料只是到1730年前后才成为可靠的。对于17世纪任何国家估计寿命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因而对年龄适宜于从军的男子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变化也几乎一无所知。

[3] 见前，第三章。

[4] 约翰逊博士在《随笔》第14期（1750年）第5页上谈论的显然是指数学：“必定只同思想有关的纯科学与其定理应用于生活之间的差别”。钱伯斯版《百科全书》（伦敦1728年版）第一卷第二篇把“自然的和科学的知识”同“人为的和技术的知识”区别开来。

[5] 例如见威尔金斯《数学的魔术》（伦敦1648年版），题献页和第95—97页。

[6] 这份备忘录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有P. J. L. 德·夏特勒翻译的带评论的法文译本：《约翰·德·维特关于计算终身年金的报告》（海牙1937年版）。

[7] 当拉舒瓦西神父写到这点及其“无数次运用”以“维护科学的地位”时，他指的是一般知识，而非科学知识。见《回忆录》（乌得勒支1727年版），第一卷，第115页。

[8] 《根据经文论政治》（巴黎1709年版），第五卷，第四篇，命题一。

[9] 《受法国奴役者的悲叹》（著者不详，阿姆斯特州1689年版），第23页。先前被认为是皮埃尔·朱里厄所著，但很可能出于米歇尔·勒瓦松之手。无疑，“国家”一词的意思在这两句话里并非完全相同，它在路易临死时所说的“我去了，但国家在我之后仍然存在”一句里也是如此。此句见《文集》（巴黎1806年版），第二卷，第491页。

[10] 《受法国奴役者的悲叹》（著者不详，阿姆斯特州1689年版），第23页。先前被认为是皮埃尔·朱里厄所著，但很可能出于米歇尔·勒瓦松之手。无疑，“国家”一词的意思在这两句话里并非完全相同，它在路易临死时所说的“我去了，但国家在我之后仍然存在”一句里也是如此。此句见《文集》（巴黎1806年版），第一卷，第21页。

[11] 《受法国奴役者的悲叹》（著者不详，阿姆斯特州1689年版），第23页。先前被认为是皮埃尔·朱里厄所著，但很可能出于米歇尔·勒瓦松之手。无疑，“国家”一词的意思在这两句话里并非完全相同，它在路易临死时所说的“我去了，但国家在我之后仍然存在”一句里也是如此。此句见《文集》（巴黎1806年版），第一卷，边码第193、225页。

[12] 《蜜蜂的寓言》，F. B. 凯伊编（牛津1924年版），第2卷，第164—166页。虽然有些可疑之处，但看来整个这一段早在1714年就写了。

[13] 曼德维尔提到威廉·坦普尔博士，他的《联合省见闻》（伦敦1673年版）的第113页写到这点；不过，坦普尔读过科西莫·德·梅迪契的游记，后者也写过这一点，见G. J. 霍普韦尔编（乌得勒支1919年版），第247页，写于1669年。

[14] 《旧制度和大革命》（巴黎1856年版），第385—387页。

[15] A. 波特：《历史学会会刊》第17卷（乌得勒支，1936年版），第84页。

[16] pensionaris一词是指“受俸者”，即领取薪金的官员；约翰·德·维特在荷兰省议会之下担任的raad pensionaris一职是指“受俸的议员”。英语译法“议政”（council pensionary）和“大议政”（grand pensionary）完全不符其意。联合省议会的主要职员担任的“登记员”一职，就像与法国的“注册员”（greffier）那样，大致与“书记员”（secretary）同意。

[17] 这句话大致采用福克马·安德里亚（S. J. Fockema Andreae）语，参见他和其他人合著的《荷兰通史》（乌得勒支1953年版），第6卷，第62页。这值得称颂的一章看来提供了对荷兰共和体制建于其上的社会现实的首次明确阐述。

[18] 见第二十二章，原文第524页。

[19] F. L. 卡斯坦：《普鲁士的起源》（牛津1954年版），第264页。

第九章 欧洲舞台上的法国外交和对外政策

路易十四时代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方面一个充满创新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它比不上文艺复兴时代。例如，常设大使馆最初建立于16世纪期间，而且正是在那时，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平衡的思想——后来被称为“均势”——在意大利，特别是在威尼斯发端。长期以来，君主们满足于仅在重要时节互派大使，例如在他们希望结束一系列谈判或签订一项条约之时，将批准或否定既成结果的权利留在自己手里。然而逐渐地，随着大使人数增多，将他们派往大多数重要外国首都的常设岗位无限期工作，成了通常的做法。当这些大使中有一人去世或辞职时，将立即任命一位继任者，以此，外交成了大贵族们试图借此显身扬名的职业。由于大使通常都被赋予各种荣誉，因而不乏补缺者。各大国首都自然是最为人所追求之地。这样的岗位并不要求有过人的能力，而是需要倾听，通常是只听不说，仅需偶尔随机应变地说句真话或假话。不过，许多大使成了有用的观察家，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给本国政府的报告构成了国际关系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正是意大利人，特别是威尼斯人，从15世纪末起开始任命常驻大使。稍后，教廷起而仿效：其大使名单——他们仅派往天主教国家——用拉丁名称被叫作“教皇使节”（nuncio）——在16世纪后半叶以前看来是断断续续的。最后依从通常做法的是俄国沙皇，始于17世纪末的彼得大帝。

路易十四在所有欧洲大国都派有常驻大使，唯俄国除外。在不那么重要的国家，例如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他派驻低级代表——不过是“驻扎官”。不管哪里，只要他断定一个大使并非必要，他就任命一位以“特命使节”为头衔、特权较为有限的常驻公使；在维也纳就是如此，因为他不愿承认奥地利人给予西班牙大使的优先权。在瑞士，法国大使常驻索勒尔，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将由驻日内瓦的一位“驻扎官”和驻格里松州的另一位相辅助。“全权使节”的头衔没

有很精确的含义，通常赋予任何负有重要的临时使命，例如签订条约的人。

这些各种各样的国王代表大都选自上层佩剑贵族。此类贵族并非必然比其他人更能干，但国王认为他们能在国外造成一种较深的印象；另外，在其官俸和津贴太少、不能维持恰当的生活水平的场合，贵族因为通常拥有大量个人财产，能够支取他们自己的资金。很少有教士得到任命，尽管所受的教育使他们通晓最有用的国际语言——拉丁语。路易十四在位伊始，外交官中间穿袍贵族寥寥无几。但随着岁月推移，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直至他们开始，甚至在较重要的外国首都代表国王。和教廷的关系展示了特殊的问题。首先，可能成为大使的人很少谋求驻节罗马，因为在教皇的都城生活太昂贵，以致他们很容易倾家荡产；其次，由于巴黎和罗马彼此猜忌，国王坚持要从若干候选者中挑选教廷代表，即教皇使节，这是一个仅仅强加于教会首领的手续，任何其他君主却不用受此拘束。作为主要履行代表职能的高级官员，大使们难得参与驻在国的生活，虽然在巴黎他们中间有些人作为交谈，或更经常为玩纸牌而成为沙龙常客。

路易十四特别注意维护他作为对外政策指导者的权力，总是将他的外交官员置于不折不扣的从属地位。甚至在这个领域辅佐他的廷臣——外交大臣，也几乎不过是个执行官。他亲自准备、有时甚至执笔撰写所有外交书简；但随时间推移和困难增多，他得允许协作者有较大的自主余地。金钱在外交中，特别是在路易十四的外交中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国王在执政之初任意开销，以便在国外争取朋友和盟国。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依靠他的津贴乃臭名昭著之事，许多国会议员以及荷兰和英国的大臣也并非与贿赂无涉。一位荷兰名人在1671年写道：“法国到处撒钱，到处购买她所无法征服的东西。”如果法国的金钱礼物在荷兰和英国是有效的，那么它们在德意志这个良心最易购得的地方就是创造了奇迹。勃兰登堡的大选侯，最拮据的德意志邦主之一，只要有好处，从来是有求必应。不过，他和其他许多邦主一样，并不感到因接受津贴而非得长期受制于相应的义务不可。一位老练的大使在使命完毕返回国内时写道：“无可置疑，我们在瑞士的谈判中取得的几乎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们的金钱。”于是银行家们发现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外交辅助者。不过，这只延续了一段短暂的时间，1700年后，军费吮吸了所有可用资源，“金雨停了”。

国际均势的思想最初得到表述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它被分割为许多邦国，因而是大国纷争的一个渊藪。此后，在17世纪前半叶，这一思想在某些地方被援引，用于保护受法国政策威胁的德意志诸邦。在16世纪，国际法仍处于襁褓之中。17世纪期间，它开始激发对基本性质的研究，但其原则仍然远未构成一套合适的法典。它几乎不外是一些被所有欧洲或“文明”国家承认和遵守的习惯。如果这些习惯未得到遵守，就有可能予以制裁，但很难确切地说它们究竟在哪里实施过。在国际法学领域，最杰出的早期著述是德尔夫特的法学家格劳秀斯（雨果·德格鲁特，1583—1630年）的大作。他扬名四海，但在生前却未享有一切应得的尊崇。

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任何进步能超出格劳秀斯以前就已达到的程度。明斯特会议和由此产生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然并不标志任何显著的进展，但早先的任何会议和条约都无法与之比拟。著名国际法史学家欧内斯特·奈斯说道：“它们使得正在欧洲土地上缓慢地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正式地固定化了。”但在1648年后，正如在此以前那样，均势观念仍是由国际法专家所掌握的。在它被用来界定各个国家之间总的关系以前，它以许多种不同方式被人应用：人们谈论贸易和航海的均势，或宗教均势。因而每一种霸权，在它有可能露头的无论哪个领域，都遭到谴责。那个世纪的晚些时候，法国以外的国务家们使用均势思想来汇集反对路易十四政策的论据，这个政策正在昭然可见地称霸欧洲大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由于错误和挫折越积越多，许多法国人也开始运用类似的理由，而且这项准则将支配18世纪。

要谈论这个时期的国际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术语“国际惯例”看来更适合些，因为尚不存在对国际生活形式具有权威的任何法律体系。这些惯例绝非十分古老的，若要在中世纪去追寻它们纯属徒劳。国际法是近代的一个创造，它的发展非常缓慢。先前人们在试图预见未来时，通常考虑的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命运。现在有了一种逐渐增强的倾向，那就是按照一个比较有限的单元来思考，即欧洲，或者宁可说人们开始称之为“欧罗巴实体”。因此，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含混不清的开端绝无惊人之处。战争惯例自然是最先吸引理论家们注意的惯例；格劳秀斯因其《战争与和平法》而成名，战争在这部书里比和平突出得多。

对我们来说就像对当时人一样，最有趣的方面来自海战及其惯例。各主要海上大国即联合省、英国和法国最为与之休戚相关，但其他国家，例如威尼斯和葡萄牙，同样关心所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反对海盗这一常患的斗争中，中世纪期间即已制定了法规。取自普通法的一套规则汇编——《奥勒隆习惯法汇编》，是早在12世纪形成的，很可能出自普瓦图附近的法属诸岛。格劳秀斯本人撰写了《海洋自由论》，反对葡萄牙人垄断印度洋的口实，这就是为葡萄牙产生激烈争执的来源。在别的地方，威尼斯人自16世纪以来声明对亚得里亚海的主权要求激起了众多抗议，引起某种国际论战。只是后来在18世纪期间，公海自由观念才被普遍接受。奈斯认为，这些权利要求可以用“防守和监护海岸的必要、出自财政措施的动机或居民的物质需要”来解释。1664年起，路易十四将注意力转向那些使马赛商业不断遭受损失的柏柏尔海盗。他派遣一支分舰队轰炸阿尔及利亚的吉杰利，以后几年里又攻击了阿尔及尔，该国最后于1666年签订了一项条约——那些不受尊重、依靠时刻准备使用武力来维护的条约之一。突尼斯不久仿效阿尔及尔，而在守约方面并未显得更专一。

在整个这一时期里，海上礼仪问题吸引了各海洋大国，特别是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关注。当两艘国籍不同的舰船在海上相遇时，习惯上要彼此致礼，这可以通过鸣放礼炮或扬旗致意来做到。17世纪以前，即证明对此事比伊丽莎白一世更敏感的英王詹姆士一世即位以前，这种礼节行为并未引起困难。1603年法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的一起有关严重事件通过外交渠道得到了解决。然而，路易十四是个每逢自己和本国的威望受到威胁时就显得特别傲慢的大君主，在他的统治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比较困难了。他统治初期发生的一个事件促使海军国务大臣科尔培尔说道：国王“对致敬和荣誉问题极为在意”。他的臣属，无论是舰队统帅还是一般海军指挥官，不得不坚持每个海员都必须给予法国旗帜一切应有的敬意。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前，这个问题主要造成了英国人同荷兰人的对立。1654年的威斯敏斯特条约首次庄严地承认了致敬权，其方式自然有利于获胜的英国人。这些安排虽然含糊不清，但在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时由布雷达条约予以肯定。与法国的争执延续了几十年。黎塞留1635年未能获取一项基于严格的互惠权利的协定。因此，必须重新从头做起。路易十四统治早年，曾有一位外交官被解职，原因是他起草了一项在北海给英国人优先权、在大西洋给法国人优先权的协定。谈判再次开始，但由于双方的自傲

同样强烈，不可能达成协定。结果，法国人和英国人避免海上相遇，即使在他们是盟友时也如此。

在同西班牙的关系方面，情况也并不见好。1679年和1680年，法国的舰队司令们接到正式命令：如果西班牙军舰不先致敬，就追击它们并进行挑战。1685年，图维尔和沙托—雷诺在阿利坎特附近遇到一支西班牙舰队，要求其指挥官向法国旗帜致敬。遭到拒绝后他们便发动攻击，尽管法国同西班牙正和平相处；直到打死许多西班牙人之后，这位海军司令官屈从，他们才后撤。此类事件经常发生，而且因为1671年的一项敕令禁止所有西班牙兵船首先致敬，情况就更是如此。同荷兰人的争端甚至在两国按照尼曼条约（1678年）恢复和平后仍然继续下去。1687年，图维尔在遭遇荷兰海军副帅时予以袭击，迫使他致敬。第二年，一支荷兰舰队与图维尔的舰队就同一问题在西班牙海岸外激战，结果双方伤亡甚重。

科尔培尔采取了与其君主同样傲慢的观点，他在1677年写道：“法国要求所有其他国家必须在海上向她鞠躬致敬，就像在国王宫廷里那样。”同一年，一套“有关海军事务之敕令、宣言和法规”发表，开篇便是关于致礼问题的毫不妥协的规则。接着在第二年，给了热那亚人一顿严厉的教训，他们同马赛进行不断的海上竞争，拒不承认法国声称的权利。一支被遣去要求先行致敬的法国分舰队在遭到拒绝后，发动了一场发炮千发以上的轰炸。1684年，即6年过后，一次海军大讨伐进行了更加可怕的炮击，迫使热那亚总督本人访问凡尔赛进行谢罪。

对于打算作为朋友对待的土耳其人，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温和。1668年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奉命使其分舰队不显出有关国籍的标志，以便在遇到苏丹的任何舰船时避免致礼。柏柏尔诸国的待遇有所不同，虽然它们正式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权：1681年同阿尔及尔所订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每当法国皇帝（国王在这些国家喜欢采用的称号）的某艘舰船在阿尔及尔港外下锚停泊，它就应当得到比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舰船更多的礼炮致敬。吕斯维克条约（1697年）缔结后，海上礼仪趋于松动了。那时，认为不应向英国舰船或任何王国的舰船提出任何要求，而在前一年驻伦敦大使还不得不处理最后一桩英法有关的争端事件。自此，恫吓政策便只针对悬挂共和国旗帜的舰船。

在早期的海事法中，近海或“邻近”水域的概念引发过严重的争执。近海水域被认为与“公海”或“开放海域”相反；但是，近海水域究竟终止于何处，应怎样确立其界限呢？为确定其范围，17世纪有过许多关于炮火射程的议论，而这一定义最后得到采纳，尽管已迟至下一个世纪。与此同时，“公海”被认为是“自由海”，这两个措辞常常彼此通用，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即反对某些国家试图确立对邻近水域的垄断权。英国法理学家、国际法研究者约翰·塞尔登发表了《闭海论》，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对立；路易十四则感到有必要在1681年的海军大条令中，按照“陆缘海”一词被人了解的那个概念进行界定。他宣布：“所有在新月满月期间海水所覆盖以及水退而暴露的地方，直到海滩为大潮所及之处，一概算作近海水域。”但是，由于地中海几乎全无海潮，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这一方式解决的，“冬季的最大海浪”则被用来替代“大潮”。

战时出现的其他一些国际问题，正开始逐渐依靠普通惯例得到解决。不管战斗是发生在陆地还是发生在海上，通常都有俘虏要交换。这是通过交换一些等级相同的军人或用一个军官交换若干士兵来做到的。倘若一方偶然不能换回自己被另一方扣押的所有俘虏，那些未被认领的就可以被送去服苦役，就像按照普通法被对待的罪犯一样。在陆地战争惯例中，必须提到所有交战者迫使战区居民用金钱或实物纳贡的权利。有关重要的“纳贡条约”的极好例子发生在法荷战争期间：尼曼根和约缔结前数年里，法国钦差与代表荷兰的西班牙钦差在利斯河畔的佛兰芒小镇德因泽，旷日持久地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大钟权”的奇异的惯例，即舰队指挥官有权搞去被征服市镇的铸钟。像大多数其他惯例一样，这项权利是灵活的，可作各种解释。1711年，当迪盖—特鲁安夺取里约热内卢时，他声称有此权利，然后宣布如果该城为铸钟付他一笔赎金，他就满足了。

在出自海事惯例的许多国际制度中间，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领事馆。它似乎来源于一部海事惯例汇编——据信13世纪时写于巴塞罗那的《海上领事馆》，在地中海提供《奥勒隆习惯法汇编》在大洋上实行的同一种服务。不过，这一制度的起源仍相当模糊。领事们最初是那些经常出入某个港口的合格的外商代表，早在14世纪和15世纪就可以在意大利的所有大港口看到，后来在西班牙以及法国的佩皮尼昂、

艾格莫尔特和蒙彼利埃也有，16世纪时又见于昌盛的新兴国际贸易中心马赛和里昂。起初他们被称为“海上领事”，然后被称为“商人领事”，最后，例如在法国的领事被区别于别国的领事时，被认作“法国领事”。法国领事在意大利诸港口比在奥斯曼帝国出现得晚些。他们看来一开始就是王家官员，像所有担任官职者那样接受国王签署的“委任状”：他们被命令亲自履行职责，除非经王室授权不得托人代理。但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这个职位可以用钱买卖，于是一个领事馆总交易会在1683年出现了。不过，国王仍保有挑选某些岗位任职者的权利，例如在亚历山大——后来转至开罗——的岗位。在能够交换领事以前，必须清除许多障碍。吉耶纳海事法庭抗拒在波尔多委任外国领事，理由是他们构成对它的某些特权的侵犯，这直到1659年和约缔结后才被克服。类似的问题使得与联合省的领事交换搁置至1662年，与葡萄牙的领事交换法国人在1667年条约中占据上风之后。一般说来，在某个国家设置法国领事显示了法国商业势力的长足进展。因此，鉴于法国在利凡特地区的贸易优势，17世纪初埃舍勒斯有四个法国领事馆（亚历山大、士麦那、塞得港和阿勒颇）并不令人惊异。它们的权利和管辖范围在同土耳其政府达成的每个协定或“投降书”的专门条款中得到规定。1681年海军大条令——它对于我们关于领事业务的知识极为重要——命令它们不仅为路易十四的臣民的利益，而且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利益行使其保护权和管辖权。

中立制度值得特别叙述，因为自那时以来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6世纪，这个词和这种制度就已为人所知。中立在路易十四时期和在早100年前完全一样，而和以后时代里它所变成的大不相同。尚未有任何邦国被授予持久的中立地位，例如像瑞士邦联自1815年后享有的那种地位。一个有理由为本身安全担忧的国家可以从各交战国那里，或者也许从预料会发生战争的邻国那里收到中立证书。历史学家们有时把“中立证书”混同于“安全证书”。一种证书可能是另一种证书的派生物：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以致除了现在实践中“安全保障”与“中立”保障非常相似外，无法作更明确的断言。无论如何，属于一个较早时期的“安全证书”在路易十四时代是看不到了。

早期中立的特征在于，虽然任何保证不参与战事的国家可以期望免遭与战争相伴随的各种祸害，但是它习惯上允许交战国在尊重其完整、独立及其臣民福利的条件下穿越其领土。简言之，中立主要受无

害通过权的支配。正如法学家们的态度显示的那样，这项权利基于习俗，而非国际法；举例来说，格劳秀斯承认无害通过，但规定了各种各样旨在保护有关领土上居民的条件，例如部队应当分成小队通行，应当支付，必要的话预付赔款，以便赔偿无法避免的损害。三十年战争期间，自由市斯特拉斯堡得到了法德双方交战者对其中立的承认；但它们双方都使用它在莱茵河上的桥梁，直到1681年法国人占领该城为止。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最突出的例子，是1672年法军在入侵荷兰前夕穿越西属尼德兰的部分领土。^[1]法国与联合省没有共同边境，它只有穿越属于西班牙的领土，才能在陆上和敌人接触。集结在沙勒罗瓦周围北部边疆的法军贸然越界，显然未遇到任何抵抗，并且分若干阶段到达了列日主教区，其统治者受法王法律上的约束。所剩的只是军事问题，因为过了列日就是荷兰领土。

拉丁语仍旧是外交使用的主要语言，但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它使用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所有国际协定皆用拉丁语制定的通则已有了例外。这样的例外在路易十四时代成倍增加，而且最后将变成通则。有人不正确地断言，到1678—1679年的尼曼根会议时，拉丁语已经被摒弃了。外国宫廷正在做出榜样：1663年，勃兰登堡选侯签订了一个既用拉丁语，也用法语起草的条约。然而，法国政府与帝国政府在尼曼根缔结的条约用的是拉丁语；只有与此同时的法国—西班牙条约是用法语和西班牙拟写的。直到1714年的乌得勒支谈判，亦即恰在路易十四统治之末，帝国的外交官们才在与法国缔结的协定中运用法语。此后，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

关于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的对外政策已有了许多论述。与路易十三时期相反，并不缺乏文件，因为它们此时开始被有规则地保存起来，外交部和陆军部的文件尤其丰富。然而直到不久前，它们还未被系统地探究过，历史著述所依据的几乎不过是先入之见。因此有人曾问，路易十四的各项不同事业是否像黎塞留的事业那样由一个中心思想支配。19世纪中叶的一位历史学家米涅宣称，这位大王的整个对外政策以西班牙继承问题为枢纽，但事实上这个问题仅仅支配他的统治时期的后段。这个最突出的系统化尝试所以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功，仅归功于其作者的才能，今天它是不能被当真的。

不那么有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多数仅仅是国际法学家——声称，路易十四心怀完成“法兰西统一”的抱负，办法是将所有通行法

国语言和文明，但仍与之分开的领土并入王国。难以参照文件或事实来证实此种断言。旧制度下的人们没有我们所说的“法兰西统一”观念；兼并一个新省在他们看来只是增大了王国和国王的权势。路易十四和当时的国务家们也未赞成著名的建立法国“天然”边疆的计划。以莱茵河为疆界的观念，同法兰西统一的观念一样，没有影响政策。黎塞留留下的一条准则有助于说明他指导了20余年的整个或几乎整个政策，那就是“阻断西班牙的发展进程”；然而，要寻找一条可以应用于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的这样一种简洁的准则，纯属徒劳。

但显而易见，在其整个统治期间激励路易十四的主要动机是寻求“荣誉”。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个观念也从某些对外政策秘密文书——虽然来自统治初年，特别是1661年和1666年——表露出来，它们虽然出自他的某个大臣笔下，某些地方却经过他的仔细改写和订正。不幸的是，他未遵从一位前辈人蒙克雷蒂安对当时的君主路易十三的忠告，那是在一部相当奇怪地题名为《政治经济学论》的著作中：“陛下，你面前有两条取得荣誉的大路：一种路引导您直接同土耳其人异教徒作对……另一条路向那些您将欣然遣往新大陆的人们敞开着，您可以在那里建立和繁衍新法国。”追求荣耀成了路易十四的纲领。他按照可能产生的荣誉来衡量40多年里送上门来的一切机会。他青年时的同代人雷斯枢机主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使人们变得真正伟大、超凡脱俗的，是热爱崇高的荣誉……”然而，只能依靠胜利，因而是依靠战争来赢得荣誉。战争将是他统治时期的主要事务，而且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由于他的所有贵族别无他事可干，便敦促他进行预料其中有机会使他们自己立身扬名和获取实惠的战争，情况确实如此。无论何时，只要有利的时机一出现，他就肆无忌惮地宣战，并且兴高采烈地投身战斗。临终时，他才为时过晚地责备自己“过分热衷于荣誉”。

他在世时的法国按照其居民数目是欧洲列国中最强大的。这位国王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能推测，因为尚无人口统计资料。历史学家们此后计算法国有1800万或1900万人，而那个时代的其他两个大国，英国有550万—600万人，西班牙也是同一数目。如果说第一场战争即移归权战争是针对西班牙的，那么随后的战争就是法国打小国荷兰，其过失在路易十四看来是在西属尼德兰并通过签订三国同盟与法国作对。尽管如此，他仍宣称只发动“正义的”战争，而他称为“正义

的”，是那些不违背诸如信守庄严承诺等基本的公共道德原则的战争。公平地说，他为信守前约作了无休止的努力，尽管未取得无可争辩的成功。大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斯写道“他背弃了他曾许下的几乎每一项诺言”。这个指责过于广泛，因为事实上路易十四显得一贯希望信守诺言，而且他真心实意地非难那些自认为不受诺言约束的国务家。什么标签适合他那种使法国血流成河的极其好战政策？拉维斯称之为“好大喜功政策”，但它可以更简单地被称为威望政策。法国是欧洲首强，国王又意识到其头号大君主地位，因而要紧的是所有国家都应顶礼膜拜法国的优势。否则，就必须强迫它们这么做。

这位国王迷恋于辉煌荣誉的结果之一，在于他为外交职位挑选人员常常不是因为他们具备业已证实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等级，可以在各国撑住其地位。例如，扬·索比斯基时期在波兰供职的法国外交官显得全无才智。他们根本不懂得激励波兰国王的动机，使得路易十四对这位君主的真实意图迷惑不解。虽然路易十四大肆贿赂，但他似乎多少忽视了在国外取得影响的另一种手段——宣传。黎塞留雇用了一帮收取酬金的文人，他们说明他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必要的话还为之辩护。路易十四却未显出同样的兴趣。虽然小册子作者之多莫过于他统治期间，但那些人首先为他的敌人效劳。荷兰报刊尤其使得反对法国政策的流言蜚语充斥欧洲。这位君主雇用的作家大都是无足轻重之辈，至少在他统治的较早和成功的时期里是如此。统治末年，失望和挫折成倍增加，财源业已枯竭，金钱的作用便减小了，靠印刷品进行的宣传变得越来越重要。

国王的个人职责只是从1661年开始才起作用，因为在此以前，即他的冲龄期，枢机主教马扎然仍旧执政。因此，是马扎然对结束多年的反西班牙战争的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的签订起了主要作用。这一值得纪念的和约问世前不久，马扎然同英国结成军事同盟，据此敦刻尔克将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之后交给英国。于是英国人协同围困敦刻尔克，于1658年占领该地。然而不久后君主制在英国复辟，路易利用查理二世的财政需要收回了敦刻尔克，代价是一大笔补偿费。讨价还价延续了1年有余，但最后商定是金额400万锂，3年内付清；但是，实际支付的只有350万锂（约29万镑），然后年轻的国王隆重地进入了敦刻尔克。

同一年，洛林问题给路易十四提供了取得重大外交成功的机会。洛林和巴尔两公爵领地在两个地方与王国接壤，它们的西部边境与梅斯、图尔和凡尔登（1552年被兼并）这三个主教区相接，它们的东部边境则与1648年大部分变为法国领土的阿尔萨斯相连。作为一项安全措施，法国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占领了这些公爵领地；但根据比利牛斯条约，他们将其归还，只保留在某些情势下的过境权。1661年，马扎然得到明确保证：作为完全归还巴尔的报答，穿越这些公爵领地的战略道路将成为国王的专有财产。统治该邦的查理四世大公拒不批准这些安排，继续在巴黎过着他在三十年战争末期开始迷恋的那种寻欢作乐的生活。同样在巴黎，他的侄子和王储查理亲王（未来的查理五世）全神贯注于这些公爵领地的独立问题。这些情况使路易十四产生了同查理四世订立新约的想法，它将被称为蒙马特尔条约（1662年），因为它是在冠以此名的修道院签订的。这个修道院当时由吉斯郡主——她那著名家族的末代后裔——掌握。在这个场合，此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易所。为交换一大笔补偿金，查理四世大公共意将其邦国转让给法王，这样在他去世时它们将永久地同法国王权合并。洛林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这个家族的吉斯一支，都晋级为法国的“王族”。

年轻的国王在签订这个条约时的自豪并非为随从们所共有，反对意见甚多；“王族”这一称号赋予接替法国王位的某些权利，它所享有的深厚敬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在洛林亲王查理发现丧失了继承权的同时，那些当时作为王国最高行政官和王室会议成员的王族们却强烈抗议，把这当作贬低他们那一等级。路易甚为失望，但仍使该条约由巴黎最高法院登记，从而使之立即生效。不仅如此，他还立刻做出安排，由法国官员管理公爵领地的财政。可是，洛林的南锡最高法院以宣布该条约无效来恫吓查理四世，结果他于1663年命令臣僚承认未来的查理五世，宣布自己解除所有前约，根据是国王为迁就巴黎最高法院而对该条约添加了一项补充条款。路易十四在一个时期里力图诱使他信守承诺，并且于1663年夺取了小镇马尔萨尔，但仅此而已：在洛林大公查理四世于1675年去世前许久，这项条约就被认为过时了。

兼并敦刻尔克和洛林并不是表明新国王在对外关系中采取的政策之仅有事件。还有对西班牙政府和教廷施加的侮辱，其原因在于这位

国王把发生在伦敦和罗马有关礼仪问题的某些事件解释成对法国及其国王声誉的冒犯。在罗马建立了一座方尖碑，以便使这个事件以及所作的赔偿永远留在人们脑海中。对于像路易十四那么骄傲自大的人来说，这两个强国被迫屈膝是个吉祥的开端，自此他相信可以为所欲为了。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第一场战争爆发于1667年。此即所谓移归权战争，是对传统的敌人、法国从1635年至1659年与之争斗的最后对手西班牙开战。“移归权”一词须作解释：存在于西属尼德兰诸邦，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布拉邦特的移归权，是指再婚情况下继承权被移交给原配所生子女，他们的父亲在生前始终不过是用益权享有者。法国人声称，这项权利应当适用于费利佩四世去世时——他在尼德兰只被认为是个用益权享有者，他的首要继承人、女儿玛丽亚·特利莎，即路易十四之妻，应当在她父亲去世时占有尼德兰。诚然，她已经在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中宣布放弃对西班牙继承权的一切要求，但这项放弃被规定取决于在18个月内付一笔陪嫁金，而这从未偿付。

西班牙王位继承这一重大问题尚未出现，但已初露端倪，并且在路易十四整个统治时期无时无刻不占据法国人的头脑。从最初几年起，就存在这样的猜测：西班牙王位是否会空缺？1661年，费利佩四世的幼子在一次疾病后夭折，只留下两个姐妹，这时全世界回荡着何等的激动！不过，人们预料另一个孩子会降生。那就是未来的查理二世，他在病痛折磨中苟延残喘40年，使王位继承问题拖过了那个时期。假如这个孩子不是王子，而是公主，那么西班牙的历史，或许全欧洲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鉴于情势，路易十四希望在费利佩四世去世（1665年9月）后，玛丽亚·特利莎据以放弃其继承物的法令立即被废除，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必须同联合省达成一项谅解，他们关于西属尼德兰另有己见。这很快就做到了，因为自从法国援助其独立战争以来，荷兰人就是它的朋友，他们在西班牙国王去世前不久同意：在此情况下玛丽亚·特利莎应当占有西属尼德兰。

没有人能够预见荷兰的政策即将转入相反方向。尽管有原则性的协议，但荷兰人并不喜欢法国人占领尼德兰的某一部分。不管是否愿意，路易十四在通过外交渠道得知这种情势后接受了一项妥协：荷兰人将留给他该国的南部，包括康布雷、圣奥梅尔、菲尔讷和尼瓦波尔

等镇；作为交换，他们将得到直至奥斯坦德的整个沿海地带。谈判持续了1年，与此同时费利佩四世奄奄一息，荷兰人对承认所谓移归权犹豫不决。西班牙国王死后，不得不做出决定。形势令人为难，因为英国恰已卷入同荷兰的战争，荷兰人正在根据1662年防御同盟的条款要求路易十四予以支持。可是，路易十四支吾搪塞，为规避履行义务而杜撰了种种借口。起初，他派遣一些部队与正在对明斯特主教作战的荷兰人合作，并许诺提供海军援助打击英国人，以此证明他的善意；但此后，他命令所有法国战舰避免与英军发生任何冲突。这样，1666年的大部分时间过去了。

与此同时，为预料中的对西战争法国正在作外交准备。必须圆滑地对待英国人，因为据某些方面说她打算支持西班牙人。事实上，这两大国的殖民野心使之陷入不断的冲突，而英王查理二世在与西班牙作战多年后，多少审慎地向葡萄牙人提供支持。路易十四认识到，只要他付出代价，就能轻而易举地同葡萄牙结盟。1667年4月，法葡条约签署，它保证，一旦战争在低地国家开始，便将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而有利于法国人。西班牙人似乎没有及时认识到威胁他们的危险，因为某种懒散支配了马德里官场。尚未万事齐备，帝国仍待中立化。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是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两人的连襟，但在法国人们担心哈布斯堡家族这两个分支的传统团结会再一次起作用。为争取皇帝中立，路易十四期望在帝国内取得那些身为法国附庸的诸侯的支持，特别是其领地邻近尼德兰的邦君，即美因茨和科伦的选侯、于利希和贝格公爵、明斯特主教等的支持。法国的外交努力凭借金钱取得成功，而到1667年春天英荷战争由于瑞典调停而趋于结束时，已经万事齐备。路易十四避不宣战，仅向马德里送去了一篇辩词——《论王后玛丽亚·特利莎对西班牙君主国诸社会等级的权利》，在其中他以他妻子的名义阐发了基于移归法的观点。接着在几星期后，他发出战斗号令。蒂雷纳被任命为总司令，不过国王通知随从说，他打算同蒂雷纳一起出征，以便亲自了解战况。

蒂雷纳以大约5万人马向北朝布鲁塞尔总方向进发。西班牙将领麾下不过约2万人马，不得不丢弃那些最为暴露的防御工事，即把它们炸毁，因而法国人几乎一枪未放便进了该国。仅有几处进行了徒有其表的防守。唯一有组织的抵抗发生在里尔，那里战斗持续了两周。此后从9月初起，军队准备过冬营房，而皇帝受阻于路易十四同莱茵诸选侯

的协议，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总而言之，1667年诸事顺利，直到下一年困难才开始。

事实上，荷兰人在入侵尼德兰一事中并未扮演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一位英国外交家写道：“荷兰人感到，一旦佛兰德纳入路易十四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国家就将不过是法国的一个沿海省。”荷兰大议长约翰·德·维特试图调解，询问路易十四在哪些条件下将同意媾和。遭到拒绝后，他再作尝试，这次是威胁将站在西班牙一边进行干涉。路易十四于是显示自己更愿和解，指明在任何和谈中除康布雷和佛兰德的一小部分外，他将坚持还要拥有弗朗什孔泰和卢森堡。这首次交换意见后不久，路易十四反过来提出某些建议，其中最根本的后来以“抉择”著称：要么西班牙人割让他前一年要求他们给的领土，此外还须同葡萄牙媾和，要么法国将占有此后征服的所有领土（主要是里尔、图尔内和库尔特雷）以及先前要求的地方，卢森堡除外。这些新建议被德·维特非常冷淡地接受了。

路易十四如此做的原因在于，他感到他近来的敌手英国由于已经按照布雷达条约同荷兰媾和，出于对法国权势日盛的担忧准备扭转政策。如果事情只是由手头拮据的查理二世决定，那么法国的金钱本来无疑会战胜英国的恐惧；但是，必须考虑到议会，而议会因为法国人的征服——卢万不久将受到威胁——大为不安，断定必须找到制止他们的某种手段。议会的这一立场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外交，导致1668年1月23日在海牙签订了一项新的英荷条约，据此两国将在交战国之间调停。为了使自己的调停有时间产生结果，这两国徒然要求战事暂停直至5月。不久后，瑞典加入它们的行列，海牙三国同盟由此问世。路易十四眼见3个新教国家转而反对他，而他多年来与这些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这场战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束，因为路易十四力图在盟友的援助下预先解决尼德兰这一难题。他仔细地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好处自然由他占取。而且，为了使自己不公开承担义务，路易十四由中间人科隆选侯将这个方案告知皇帝。起初，皇帝不想激怒他的西班牙盟友，因而推诿搪塞，但多亏互相让步，一项原则性协议于1668年1月达成。不过，战事并未就此结束。隆冬时节，路易十四派遣一支军队入侵弗朗什孔泰；不到一周，贝桑松就向孔代亲王投降，两周后多尔也停止抵抗。英国人与荷兰人随即要求立即停火，法国不得不毫不拖

延地予以同意，特别因为这两个调停者恰已根据一项持久性条约把军队联合起来。媾和条件体现在亚琛和约（1668年5月2日）之中，它们允许法国保有一切根本的东西，即它在尼德兰的征服地，它得归还的只是弗朗什孔泰一地。路易对小小的荷兰民族站在他的西班牙敌手一边勃然大怒，发誓有朝一日要教训他们。这就是将在1672年爆发的战争的目的，那场战争将吸引欧洲的注意力达6年之久。在它爆发之前的岁月里，国王设法在外交上孤立荷兰人，同时继续对他们进行自他的统治开始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经济战。

荷兰商船不仅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数量最多，在印度洋也是如此。在地中海，荷兰旗帜已经部分地取代了法国旗帜，而且几乎找不出荷兰商人寥寥无几和不受尊敬的法国港口。但是，这也造成了对那个国家的难以抑制的敌意。富凯授权在1659年采取了一项引起轩然大波的防御步骤，即规定对所有出入法国港口的外国船只征收每吨50^{先令}的税。科尔培尔致力于同一个政策。他估计，荷兰人拥有一万五六千艘船只，而为英国所用的只有三四千艘，为法国所用的只有五六千艘。他不久便谴责荷兰竞争之祸害。“像我们已经在陆上摧垮了西班牙那样，我们必须在海上摧垮荷兰。荷兰人无权篡夺所有商业，……很清楚，只要他们仍然是贸易霸主，他们的海军力量将继续增长，使他们强大得能够扮演欧洲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的角色，并能够制约国王的计划……”

因此，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1664年和1667年，关税两度作了有害于他们的变更。支配法国市场的荷兰精糖几乎完全被排斥。然而，经科尔培尔怂恿组成的各海上贸易公司变得衰弱无力，因而一切都取决于已经爆发的关税战是胜是负。亚琛和约缔结后，荷兰人为报复1667年关税而不断提高他们的关税，例如在1670年和1671年。冲突中的另一个因素，是荷兰民族使路易十四产生的厌恶感。他们犯了自己组建共和国之罪，在这位对自己的特权如此自豪的专制君主眼中是恶不容赦的。我们所称的“专制主义的”法国君主制，在他看来是天下楷模。他在投石党运动的骚乱中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观点。英国君主制复辟后，路易厌恶议会体制，对议会反对之强烈深感震惊；长久享有共和制度的荷兰人遭到了同样的抨击。受命起草其《回忆录》的一

位大臣写道：“这些机构由那么多人头组成，缺乏可以被美好情感之火温暖的心脏……”

威尼斯那样的贵族共和国也未在路易十四那里得到较多的青睐，他不止一次地显示过对它的恶感，这特别是因为它偏爱哈布斯堡家族，而非波旁家族。1680年，一位威尼斯驻巴黎大使在一个有启发性的短句中崇敬地概述了国王：“此君王显然正谋求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国，而且离此目标已相去不远矣……”1678年，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一个受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密切监视并向其纳贡的半独立的共和国——试图与法国接近。尽管他的代表（一位元老院成员）是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朋友，而且同波舒哀关系友好，但仍免不了在抵达巴黎后不久被逐出，并被迫离开法国领土。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干预，拉古萨才成功地避免了奥斯曼帝国的报复。

如前所述，法荷敌对有许多原因。1672年，即决裂前夕，荷兰人被法国新的关税激怒，决定禁绝法国进口一整年。这招致了冲突。其他大国将对交战国采取什么态度呢？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移归权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斗争一方面被英国，另一方面被瑞典——海牙三国同盟的第三个成员——打断，而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同时受到荷兰人和法国人的拉拢。1667年年底，他同路易十四缔结了一项中立条约，条件是即将来临的战争不会发生在德意志领土上。1672年法荷战争之初，他仍保持中立；与此同时勃兰登堡大选侯许诺援助其荷兰教友，科隆大主教和选侯则站在法国一边。皇帝起初给予法国中立的实惠，后来缔结了一项盟约，授权路易将列日主教区——他是该地兼任主教的君主——用作作战基地。他甚至将一支约18000人的军队交给路易十四支配，后者许诺供养他们。此后不久，他的邻居之一明斯特主教承诺将部队同科隆的部队联系。法国人利用了这些协定，以便准备就近攻击。卢瓦在这个时刻特别出众。他从1662年起担任国务大臣，与其父勒泰利耶一起负责军务，他还在利奥纳于1671年9月死后代理外交大臣，等待新任命的大臣蓬波内侯爵出使瑞典归来后上任。卢瓦安排在科隆领土上储存粮食和弹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些是在荷兰购买的。到1671年年底万事齐备，因而战事得以在1672年春天开始。

法国人一路无阻地穿过西属尼德兰^[2]到达列日，从那里入侵联合省，他们的右翼受到科隆选侯部队的掩护，必要的话还会得到它们的

增援。只是在更南面才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在莱茵河左岸，法国迄今只拥有在阿尔萨斯的领土，那是在1648年获得的，通过长期处于路易十四控制之下的战略大道同香槟连接。^[3]这些大道穿越洛林和巴尔两公爵领地，它们由于查理五世公爵拒绝批准1662年条约，实际上是独立的。因此，路易十四于1670年留意在这两个公爵领地建立了军营。南锡将在荷兰战争进行期间作为法国部队的驻扎之地，洛林地区则不得不缴纳法国政府索取的巨额捐助。

中世纪期间，法国与其东部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友谊，按照外交家和国务家们的说法，它是以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的古老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当法国国王们同哈布斯堡家族发生冲突时，他们在德意志诸侯眼中似乎是其受到帝国野心威胁的传统自由权利的捍卫者，但到1672—1678年的荷兰战争时，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德意志舆论对明斯特条约给予法国的让步感到诧异，自此开始反对一切法国扩张，即使在它不威胁德意志领土时也是如此。1673年，路易十四在莱茵河两岸都取得了进展后，这一敌对舆论的滋长被人注意到了。

帝国事务中的一位要人是约翰·腓力·冯·申博恩——美因茨大主教兼选侯，他将选侯团主席与帝国宰相的职能集于一身。他热情关心公共福利，因而积极献身于和平事业。他很早就声明反对在维也纳宫廷占上风的西班牙势力，敦促废除哈布斯堡家族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联盟。1658年，在皇帝利奥波德当选以前，他成功地使一项“选帝纲要”得到采纳，该纲要禁止新皇帝无论在意大利或在低地国家援助西班牙。^[4]然后，这位大主教同邻国缔结了一个防御同盟，它不久就具有了反帝国盟约——莱茵同盟——的性质，年轻的法国国王参与其中。^[5]但是许多德意志人指责说，这个同盟阻止帝国在移归权战争期间帮助尼德兰，因而中了路易的诡计；而且，这些怀疑一旦出现，就由于几个事件变得越加强烈。君不见一支法国小部队于1664年越过德意志，征服了美因茨选侯的远方属邦图林根的埃尔福特镇？1667年，一桩更大的事件引发了持久的国际争吵：巴黎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学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国王对帝国的正当要求》，在其中德意志舆论觉察到了一整套计划。群情如此激动，以致国王不得不将作者送往巴士底狱反省数周。正如路易十四和美因茨选侯两人都认识到的，同帝国开战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大。后者向帝国议会建议，应当创设一支能够取代哈布斯堡部队捍卫帝国的帝国军队，但各邦君主的本位

主义和自高自大挫败了这项建议，与此同时法军继续致力于征服尼德兰。1670年，当路易十四全神贯注于洛林诸公爵领地时，这个想法又被提出。荷兰战争伊始，美因茨选侯建议莱茵河附近的所有诸侯正式结盟，他再次受阻于同胞们的惰性，战争爆发后不久便郁郁而终。不仅如此，巴伐利亚于1670年和法国结盟，其选侯许诺在帝国选举中投国王的票。看来在这个地区有理由怀抱希望。德意志离实现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

军事行动进行之际，荷兰人几次向路易十四送去媾和建议。他的一位大臣致函驻海牙大使：“他们要继续犯错误，这很好，因为如果出现让他们领教陛下严厉手段的机会，他将由此在世人眼中更有理由。”然而，1672年后路易拒绝被拉入谈判，不管谈判建议出自联合省议会抑或出自共和国的首席行政官——最初是大议政约翰·德·维特，然后是拿骚家族的代表、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威廉。

荷兰人发觉自己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围困。^[6]英国人与其法国盟友站在一起，从海上进攻，因为根据多佛条约（1670年6月）查理二世已成为路易的领受津贴者和同盟者。东部边境受到科隆大主教兼选侯及其盟友明斯特主教的威胁。两条河流——伊瑟尔河与瓦尔河——转而用作防御线。一些海堤被决开，淹没了远处的领土，此时正值路易十四亲临督察孔代所率大军浩浩荡荡地跨过莱茵河的某个弯道。不久后，被围困于恰是本国心脏地带的荷兰人派遣大使前往法国，表示可以割让某些市镇，作为和平谈判的预备。路易十四不肯，理由是愿被让予的地方难以防守，这导致了谈判的失败。他后来写道：“后代人将随意把这一拒绝归咎于我的野心以及我报复所受荷兰人侮辱的渴望……我不会试图为自己辩护。雄心和荣誉（即追求荣誉的渴望）在君主身上总是可以原谅的，在一位像我这样得天独厚的青年君主身上尤其如此……”战争的第一阶段归于结束，路易十四差不多一帆风顺。虽然小镇布瓦勒迪克似乎必定遭受像其他被占领地点同样的命运，但目前无法夺取它，甚至无法靠近它。

全欧洲都开始关注威胁荷兰的厄运。皇帝虽然曾许诺中立，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勃兰登堡选侯的恳求，同他缔结了一项军事盟约（1672年6月）。他们的分遣部队向莱茵河进发，突入科隆选侯和明斯特主教部队的后方。蒂雷纳折向东方，试图迎击它们，切断它们同基地的联系；与此同时，远超出马斯特里赫特向前推进的奥兰治亲王围困了沙

勒罗瓦镇，但他不久因为法国增援部队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该地。在随后的冬季里，一段短暂的严寒导致法军可以在封冻的滩地上推进，但1673年1月的突然解冻迫使他们后撤了。从那时起，荷兰人的军事形势趋于好转。由于他们不懈的外交活动，瑞典插进来自荐调停，并劝使英法两国同意在科隆举行和会。然而，和谈尚未开始，就被路易十四取消，因为他认为荷兰的建议不充分。不过重要的是，恰逢此时法国人在一场国王亲自同沃邦元帅一起参加的壮观的战役中，最后夺取了马斯特里赫特。

1673年夏季，轮到西班牙正式在其尼德兰属地参战了，这就孤立了法军。此后不久，奥兰治的威廉突破面对他的兵阵，同莱茵河岸的帝国军队会师，并且占领了科隆选侯的首府波恩。于是路易十四不得不决定局部撤出荷兰。1674年开始，法国在外交和军事两方面的处境继续恶化；而且，英国同意与联合省媾和。^[7]德意志诸邦大多开始响应皇帝的恳求，支持他反对路易十四，甚至勃兰登堡选侯也重新加入了联盟。法国被迫在几乎所有边境上作战，面临巨大优势兵力的威胁。1674年年底以前，大多数被征服地都被夷平和被放弃，战争主要针对哈布斯堡家族进行。打击西班牙霸权是个容易回归的传统；但此外还必须完成对阿尔萨斯的占领，必须保卫在尼德兰尚存的征服地。确实，1674年8月在沙勒罗瓦附近的瑟内夫进行的是一场大战役，在那里国王军队面对着皇帝、勃兰登堡和西班牙的军队；它是一场防御战，但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奥兰治亲王退回了他的荷兰基地。虽然在1674年战役后几乎全无法军留在荷兰领土上，但马斯特里赫特仍在法国手里，它是个孤立的前沿阵地。

在尼德兰的这些胜负不决的战斗持续了3年。受海水泛滥保护的阿姆斯特丹城只是从远处受到威胁。但荷兰内部的混乱严重，以致很快就提出了新的和平建议；它们又一次遭到轻蔑的拒绝。然而，荷兰人逐渐重获主动权，1676年奥兰治的威廉试图收复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尝试失败了，接着1年后在卡塞尔附近的旷野上再度败北。与此同时，终于决定在尼曼根举行和会，整个1676年被用于解决形式、规范和礼仪问题。第一个谈判的是联合省议会，它从英国只得到了道义支持，这是查理二世无法拒绝给予的，尽管法国以金钱相诱。此外，奥兰治的威廉向这位国王的侄女玛丽公主求婚恰好已成功，这导致了1678年3月英荷防御性友好条约的签订。鉴于这一新的飞来横祸，路易十四断

定必须立即媾和而不再拖延。他放出风声，说他要求于荷兰人的将只是一项新商约，不会索取领土割让。据此，尼曼根条约（1678年8月10日）将马斯特里赫特归还联合省，所附保留条件是必须在该地维持天主教信仰。下一个月里缔结了同西班牙的条约，它规定归还1668年取得的北部边境上的某些地方，其他地方被用来代替它们（即埃尔、莫伯日、伊普雷等地），这便利了领土防御。此外，弗朗什孔泰被认可为法国的一个省。导致战争的经济困难完全以有利于荷兰人的方式得到解决，法国的1664年和1667年关税被中止。科尔培尔无法熬过这一挫折；不久后，他于1683年死去。帝国并非缔约一方，直到6个月后才接受和平。

尼曼根条约后，西欧有一段颇长的和平间歇期，路易十四在此期间试图恫吓其对手而不剑拔弩张。这就是“收复属地”时期（1680—1683年），即按照“收复属地法庭”的决定在和平时实行兼并。这些法庭设在布赖萨赫（为阿尔萨斯）、贝桑松（为弗朗什孔泰）和梅斯（为洛林和巴尔）。政府批准这些法庭通过的裁决，后者奉命证实国王所声称的在边境附近领土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兼并是由梅斯高等法院组织的法庭进行的，它每日得到或许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发明者卢瓦侯爵的指示。由于这个法庭的裁决而被夺取的领土置于梅斯高等法院的管辖之下，被附属于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或被附属于洛林和巴尔两公爵领地，至少在1697年大多数专横的兼并由于吕斯维克条约而被废除以前是如此。在幸免于这一修改的领土中，有在萨尔的、后来由沃邦筑工事设防的以萨尔——路易十四知名的那个地方。受影响的最远领土是特里尔以下摩塞尔河一个拐弯处，那里筑有蒙罗亚尔要塞，它于1698年连同周围领土被归还。

1680年8月，法国宣布对整个阿尔萨斯享有主权，斯特拉斯堡和米尔豪森除外。1681年9月，斯特拉斯堡被并入王国；它仍是个帝国自由市，开始被我们认作是阿尔萨斯的首都，而阿尔萨斯的大部分业已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并入了王国。一项精心准备的计划导致法国部队未鸣一枪便进入该市。当时正于法兰克福开会的帝国议会愤怒地抨击法国，甚至以另一场战争相威胁。但是，未等这些威胁引起任何可能打断“收复属地”之进展的行动，它就散会了。

路易十四与法国的命运，将在莱茵河与些耳德河之间关键地区决定。实行“收复属地”政策的国王把矛头转向受到梅斯法庭裁决影响的西班牙领地。1684年，他派遣克雷基元帅围困卢森堡，因为马德里政府不肯将它连同亦以此名相称的那个公国的领土让予法国。该城拒不投降，因而遭到封锁。但是，这次围城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据悉土耳其人包围了维也纳（1683年7月）。^[8]路易觉得不能全不理睬皇帝向所有基督教统治者发出的求援呼吁；他还感到为难，因为法国如此长久地维持了同土耳其人的友好关系，以大有利于法国同利凡特地区的贸易。他决定不干预，任凭遭受国外的严厉谴责。当威胁着维也纳的危险由于扬·索比斯基国王和波兰军队的突然干涉而烟消云散时，路易十四响应了荷兰提出的列强普遍休战的建议，它正在由集会于雷蒂斯堡的帝国议会斟酌。鉴于法国新近在尼德兰的成功、对卢森堡的征服和对特里尔的占领，因而达成了一致。1684年8月15日，雷蒂斯堡休战协议缔结，20年有效，法国被听任占有其征服地，包括“收复的属地”。

然而第二年，南特敕令废止令（1685年10月）重新唤起了国内外正在消沉下去的宗教激情。新教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路易十四，而德意志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皇帝起初没有表态，但是，由于路易继续干涉德意志事务，特别是干涉巴拉丁事务，威胁要为巴拉丁女伯爵夺取该领地，他因而被激怒，终于参加了那个以奥格斯堡同盟著称的联盟。该同盟于1681年9月问世时仅包括某些新教国家：瑞典与联合省。路易十四通过与勃兰登堡选侯签订一项新的津贴条约，取得其中立；但是，西班牙于1682年参加了同盟。雷蒂斯堡休战协议几乎不过是某种原则肯定——差不多是一项表示善意的行动，因而在它期满失效以前许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年）就已来临并结束。1688年秋，路易入侵巴拉丁领地。这场突袭之后，皇帝决定与法国决裂，战争爆发。英国直到1688年革命后才加入盟国行列，这次革命爆发是因为詹姆士二世——一名罗马天主教徒——疏远了信奉圣公会教义的一大批舆论。由于路易十四选择入侵巴拉丁领地而非联合省，奥兰治的威廉得以带着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英国。在新君威廉三世和玛丽统治之下，英国毫不拖延地加入了奥格斯堡同盟。

此时开始的法国历史新篇章被一位作者题名为“法国权势的衰落（1685—1697年）”，这可是严重的夸张。无疑，国王统治时期最辉

煌的岁月已成往事。南特敕令废止令持久地疏远了新教国家，其中有路易的两个盟友——勃兰登堡和瑞典。^[9]在这个著名的重大失误之外，他又加上了某些历史学家所称的“虚张声势”，但这实际上不过是空洞的自大：他拒不跟随其他君主宣布放弃大国的大使们在罗马行使的避难权。然后，在教皇革除法国大使的教籍后，路易下令占领教庭的古老领地阿维尼翁，甚至威胁派军进入意大利。尽管年事渐高——已50多岁——但路易十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任何大胆的打击都是可能的，在他生涯的巅峰，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的荣耀仍然光彩炫目。在巴黎的一个自此被称为“胜利广场”的地方，一座向他表示敬意的纪念像适才矗立起来（1686年3月）。在战争中以及用“合法的”兼并手段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路易十四没有认识到他已唤起了法国无法独自抵挡的力量。1688年，路易十四处于权势巅峰。但统治时期的后半段将带来权势衰落；他对威望和荣誉的不懈追求成功地使得大半个欧洲联合起来反对法国。

^[1] 见后，第227页。

^[2] 见前，原文第205页。

^[3] 见前，原文第209页。

^[4] 比较后面第十八章，第431、446页。

^[5] 见后，第十八章，第431页。

^[6] 1672年战役的详情，见后第十二章，第292—295页。

^[7] 见后，第十二章，第295页。

^[8] 见后，第二十一章，第515—516页。

^[9] 关于尼曼根和约后法国与勃兰登堡的关系，见后，第二十三章，第554页；关于法国与瑞典的关系，见后，第二十二章，第540—541页。

第十章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随着1661年3月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开始了年轻的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在从他作为5岁幼童继承王位后的18年里，实权掌握在这位红衣主教手中，首先是奥地利的安娜摄政期间，然后是国王于1651年达到法定成年以后的10年。马扎然统治初年直到1653年投石党运动崩溃，是个混乱时期，终致发生内战。^[1]不仅马扎然两次被迫出国，而且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建立的专制政体受到严重威胁；巴黎筑有街垒，大贵族和最高法院憎恨专制主义，落在海峡彼岸斯图亚特君主头上的命运一度似乎威胁着他那年轻的法国外甥。

然而，部分由于马扎然的权变狡诈，法国君主政体经投石党之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5年内战除破坏了法国大部分地区外，一无成就，广大民众只盼望和平。马扎然的手一盘散沙，无法继续斗争；投石党运动崩溃后的8年里，法国开始了它历史上最专制的君主统治时期。在对外事务中，马扎然通过签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黎塞留发动的同皇帝的战争；他在死前两年，同西班牙缔结了比利牛斯条约，这项条约不但终止了两国之间为时1/4个世纪的战争，而且标志了西班牙欧洲霸权的告终以及通过西班牙和奥地利两哈布斯堡家族同盟来包围法国的威胁的结束。自从1653年返回法国，这位红衣主教大权在握，无所不能，并且腰缠万贯，过的是享尽荣华富贵的君主般的生活。

22岁的年轻国王决定，马扎然不应有宰相继承人；他立刻表明，他打算既称王，又统治，而他的大臣们将直接听命于他。诚然，他起先保留了从马扎然传下的3个人作为顾问，即老练的外交家利奥纳、陆军国务大臣勒泰利耶和财政总监富凯。富凯是个野心无限的人，在马扎然之下捞取了大量财富，他在沃克斯—勒维科姆特的华丽府邸便是这一财富的象征。不仅是文人学士出于势利的奉承，而且首先是他同贵族界和包税商界的联系——他们依靠他据以管理国家财政的种种复杂的权宜措施大发横财——使他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角色。但1661年结束以前，他被逮捕，他的职位被废除，而他在内阁中的交椅被他的

敌手、红衣主教马扎然的另一个工具科尔培尔获取。这位来自兰斯的商人之子将从富凯垮台到1683年去世为止始终掌管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尽管直到1665年他才被指定担任新设立的总稽核职务。

从1661年路易十四开始执掌政权到1688年九年战争爆发之间的时期，标志着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和专制君主制的顶点。但是，历史学家们近来已确定，以军事荣誉、太阳王崇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的不朽杰作为特色的这几十年远不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尽管这些年里工商业方面有所进步，但整个国家生活仍然受农业支配。直接从事土地耕种的大众以及主要收入来源在农村的上层阶级，其生活水平都取决于农业是否昌盛，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从1660年前后开始，并且除匮乏时期外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农产品低价，造成了不仅削弱农业本身，而且削弱法国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

因此，一个英国旅行者，像1675—1679年在法国不同地区居住过的哲学家洛克，不仅看到了凡尔赛的辉煌、由路易十四及其倨傲的情妇蒙特斯庞夫人臻于完满的光彩以及庆贺法国武功的营火；他还生活在一个处于农业萧条痛苦之中的国家里。“法国的地租”，洛克在1676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已“在这寥寥几年内跌落了将近一半，原因是人民贫困，货币匮乏”^[2]。在歉收仍不仅意味着饥饿，而且可能造成受影响地区大量人口实际饿死的经济中，农产品价格的这一下降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随同一个匮乏时期而开始，它在受影响地区可与在位后期的严重危机，即1693—1694年和1709年的严重危机相比。在巴黎，投石党运动结束后不断下跌的小麦价格在1661年上涨到每一瑟蒂埃33锂以上，1662年又上涨到近39锂；由于这些是月平均价格，在这两年最为短缺的月份里价格肯定上涨得更厉害，以后在1673年下跌到月平均略低于10锂，1688年下跌到略高于8锂。在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麦价格模式与此类似：涨至1661年的每一蒲式耳47先令和1662年的38先令以后，它们在我们所述时期的其余时间里摆动于28先令和14先令之间。在东南方的多菲内省，格勒诺布尔和罗芒之类市镇的小麦价格波动却有所不同：格勒诺布尔1679年和1680年的小麦价格同1662年时一样高，而在附近的罗芒1679年也是个高价年头。任何既定时刻，在法国的那些主要不是因为相距遥远，而是因为运输系统原始和运费高昂而互相隔开的地区，不同谷物的价

格会相差极大。当一个地区五谷丰登、价格低廉时，一个邻近地区的大众却会因为粮食短缺和价格暴涨而遭遇贫困、疾病和死亡。

不过，在这30年里农产品价格的总趋势是下降的。要估量这对于法国经济，即使在农业领域的影响殊非易事。无疑，面包价格高昂时深受其苦的是一大部分民众，他们在面包价格下降时能得到某种解救；但是，这或许会因为经济活动普遍萎缩导致收入能力丧失而被抵消。如果说税收之外的封建贡赋和教会什一税负担沉重地搁在农民肩上，那么贵族和教士得自土地的收入也下降了，并且减少了他们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塞维尼夫人及其表亲比西一拉比坦的书简内有多处暗示，透露出17世纪70—80年代她们在出售领地产物以及从农民那里榨取封建贡赋和地租方面经历的困难。我们必须在这个价格低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来考虑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在他执政的最后25年里，情况将变得更糟，1693—1694年以及1709年的灾难性饥荒年代尤其如此；不过，我们必须记着：1660—1715年的整个时期，甚至此后，法国深受农产品低价之苦——连同这在一个仍由土地支配的经济中所意味的一切——间或出现歉收、价格飞涨和民不聊生，有时甚至饿殍遍野。

在考查路易及其大臣治理的社会时，我们绝不能轻信法律标签。理论上，那个社会由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事实上，虽然在第三等级大众（即平民）之上凌驾着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但教士同社会其余部分一样，分裂为少数显贵和广大一般成员，前者已经差不多垄断了教会的所有最好职位，后者则是从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行列中吸收进来的。根本的分裂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分裂。但这不是全部实况：如果说，随着大革命逐渐临近，富有的资产者将越来越难攀入贵族行列，那么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仍然存在若干阶梯，凭此中产阶级的富有成员可能使他们自己及其家族攀入贵族等级。后者远非一个封闭的种姓，贵族成员和平民之间的鸿沟远非不可逾越，正如科尔培尔和卢瓦之类路易十四大臣的家族飞黄腾达所表明的那样，这一个过程已不那么显著的规模，贯穿于整个时期。

教士名义上是国家的第一等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富两极。某些教区神父，特别是较大市镇的，相当富裕，但大多数神父只领取可怜的津贴，观念上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大众常常极少区别。教会中的最好位置被国王用来酬赏对君王的效劳，因而大都掌握在大贵族

的幼子或国王的大臣们手中。许多大主教和主教是头等大贵族，他们不是在自己的教区，而是在巴黎的私邸和凡尔赛的前厅内度过一年里尽可能多的时间，享受首都的社交生活，使自己始终得到国王的注意，并留心使自己和家族成员升官晋爵和获得新宠惠。一位主教可能兼任一个宫廷教职，再加上掌管两三个修道院，享有由此而来的丰厚收入。至于贵族的幼子和女儿，有各种较低级的教会职位可供选择；同样，对他们来说，有一个职业尽管是可取的，但远不是必需的。宫廷修道院长往往从他们以代管名义上占据的职位中获取大量收入，他们的世俗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喜剧和讽刺散文中经常遭到谴责。

贵族包括从王族往下直到新近通过购买贵族证书或购买带封号的地产而取得贵族等级的“暴发户”，是个极复杂的阶级。旧封建家族的后代，即所谓佩剑贵族，可以继续占据高级军职，并且装点宫廷门面，他们若要维持与其阶级相称的奢华的生活水准，现在也大半依靠以年金、礼物和获利丰厚的挂名闲职为形式的国王恩惠。旧贵族中不那么幸运的成员，其位于外省的府邸往往破落衰败，穷得无法为儿子购买一份军职，或为女儿置办嫁妆，更不用说出入宫廷了。这样，在旧佩剑贵族的成员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一边是神气活现的廷臣，在卢浮宫或凡尔赛宫阿谀奉承国王，留意为自己和子女攫取任何肥缺或年金，另一边是外省的乡绅，其谱系同样，甚至更加古老，但其命运已如此衰败，以致他虽然为自己的等级而自豪，却与农民并无二致了。

不仅如此，一种新牌号的贵族——穿袍贵族——已通过购买王室会议和最高法院之类高等法庭中的各种官职，在上一世纪前后成长起来。这些富有的资产者后代现在声称有权同最显赫的旧贵族并驾齐驱；这些人除了拥有在其职位上——这些职位同他们的爵位一样，现在是世袭的——投入的巨资外，一般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在巴黎以及第戎或波尔多之类大省会周围，高级文官和法官已经为自己聚敛了大地产。他们不仅像任何其他贵族那样征收封建贡赋，还从他们逐渐获取来充实其财产的土地上抽取大量地租。他们是敏锐的实业家，力求用公正的或邪恶的手段，从已经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最大收益。

出卖官职为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成员开放了一个巨大的投资场所。这些官职中许多只提供蝇头小利和有限的社会威望，但也存在一两千个职位，它们使其占有者或其后代享有贵族等级的社会威望以及

相关的特权。有巴黎高等法院审查官和行政法院成员职位，各按察使和国务大臣就是从中挑选的，正如最高法院和其他高等法庭之中有无数职位一样。如果说此类职位占有者的贵族身份相对而言是近来才有的，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仅由于拥有地产，而且由于和较老的贵族家庭通婚而得到加强。他们能给女儿提供的大量嫁妆以及他们在巴黎或外省享有的权势，吸引了旧贵族中间未来的亲家。科尔培尔这样的商人之子能成为三位公爵的岳父，巴黎和外省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则经常通过婚姻与宫廷贵族相联。例如，塞维尼侯爵夫人出身于旧封建家族，但她的祖母属于穿袍贵族，而她的外祖父是个富有的包税商。

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贵族血统和财富的混合还见于贵族与财界之间的关系。财政家依靠君主的财政需要而致富，不管是作为国库官员，还是作为包税商。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举借钱款以及卖官鬻爵之类所有各种财政上的权宜措施，为那些往往出身平凡，但具有必要的技巧和道德上肆无忌惮的人提供发财致富和跻身贵族的各种途径。在纸面上，尽管这些资产者或农民之子（当时的一流财政家有不少据称是从男仆起家的）腰缠万贯，爵位加身，但离宫廷贵族仍相距甚远。实际上，可观的嫁妆，连同应付紧迫的债务的很大一部分可用现金，对于合格的贵族少爷的父母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路易十四时代最著名的回忆录作者圣西门公爵虽然狂热地依恋其等级，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公爵夫人是个包税富商的孙女；她的父亲压抑了贵族傲气，娶了这位富有的资产者的女儿，以便能继续他的从军生涯，并且买一块能将新近获得的公爵封号附于其上的地产。还有，在塞维尼夫人的书简中，我们可以领略这么一个故事：她的女儿和女婿格里尼昂伯爵怎样为恢复家世，被迫使他们的儿子和一位包税富商的女儿结婚；无疑，这对格里尼昂夫妇的自豪感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但他们必须面对事实：鉴于债台高筑，只有同一个富有的资产者家庭联姻才能使他们免于财务灾难。

这些包税商不是社区中受人欢迎的成员；他们遭到其榨取对象——纳税人的憎恨，并被当作资产者暴发户而受贵族鄙视。不过，没有他们在筹款方面的援助，君主政体就无法生存，而他们常常因聚敛起来的财富让自己置身于社区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让他们及其子女通过购买爵位和通婚爬上贵族等级。因此，在法国史上的这个时期，贵族变成了一个非常混杂的群体，在其中旧封建家庭的后代分明只占少

数，并且确实常常依靠与新贵们的女儿通婚而幸免于破落；它的大部分成员，则是在上一个世纪前后从中产阶级吸收来的，这归因于授予任职者世袭爵位的官职制度，也归因于用爵位交换现钱——它得自于贸易，或更常见的是得自于掌管政府财政——的贵族证书制度。

殷实的资产者的抱负仍然是跳出他所属的那个遭人鄙视的阶级，转入贵族行列。获取巨富之路尚不在于工商业，而是在于王室财政，与此同时，取自工商业的资本许多被耗费于购买公债、官职、土地和爵位。财运亨通的资产者非常渴望摆脱商人之类受人鄙视的称号，他不是将资本用于新的实业领域，而是宁愿将它花在此种非生产性的投资上，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他本人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在荷兰与英国，成功的商人志在为求富而将生意做大，当时的许多作家把法国的情况与之比较，指出法国工商业由于法国商人对本身职业的鄙视而受到的损害；法国商人的一个念头是跳出这个职业。

工商业仍旧大都组织在行会制度的基础上，即一个师傅由雇工和学徒协助，在自己的店铺劳作。行会规章规定了一名师傅可用多少学徒，他们在多大年龄上可以被接收以及学徒期有多长，每个等待被接纳进行会的人选必须做出何种手工艺品，还有特定行业中将用怎样的方法制作产品。行会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一切竞争，不管它是来自本行会的成员还是来自外人，以便建立垄断。在多数大城镇，不同行业按行会组织起来，尽管并非到处如此，即使科尔培尔鉴于它们是个非常有利的岁入来源而在这些年里努力增加其数目；但在一般城镇里，甚至所谓自由行业事实上也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监督之下，按行会组织起来的行业同未组织起来的行业很可能没有很大区别。

大多数行业的技术自中世纪以来殆无变化，因此该国工业的大部分仍旧是小规模经营。在大多数场合，师傅只拥有寥寥几个房间，它们既充当居室，也用作业务生产场所；他在那里同一小群雇工和学徒一起工作。所有各种贫富人等都能在行会中见到，上自殷实的布商或金首饰商，下至鞋匠和皮革匠之类较穷的手艺人，他们往往艰苦挣扎以求收支相抵，相对于市镇居民的数量，他们的人数很多。

行会制度在两个方面正在显示出解体的迹象。在底层，一般雇工越来越难取得师傅身份，这一特权正愈益趋于由师傅的儿子和女婿独占，他们得到各种偏爱。结果，在城镇里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核心，

当然其人数相对而言暂且无足轻重。虽然雇工们有自己的协会——现代工会的先驱，虽然路易十四时代发生过罢工，甚至造反，但这些是罕见的和间或出现的，而且总是被轻而易举和极为凶狠地镇压下去。

在天平的另一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置身于行会之外并凌驾其上的大商人。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有了某种进展，即使存在着运输缓慢、运费高昂以及在国内运送的货物不得不缴纳厘金所造成的障碍，这些厘金是在道路、桥梁与河流上征收的通行税，以及包税商对于经过一个省或若干省份运至另一个省或若干其他省份的货物征收的关税。如后所述，科尔培尔将竭尽全力按照重商主义原则刺激工商业。

比起散居乡野或生活在大小村庄数以百万的人，城镇总人口仍然甚少，即使我们不仅把中产阶级和工匠，而且把一个家务劳动代价低廉的时代里的大量男女仆人以及那种在城镇近郊从事农业的更多民众计算在内。在当今时代，农民的命运不易简述，至少在展现非常复杂的事实时人们迫切希望避免绝对乐观或绝对悲观的极端情况下是如此。那时和现在一样，一个人究竟是在法国的哪个部分试图依靠土地奋力谋生大有区别——是在富饶的盛产谷物的北部地区，还是在峰峦迭起或陵原相间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再者，这还取决于所从事的农业类型；诚然，对饥谨的担忧导致在每个地区都种植谷类，不管就此目的来说是多么不利，而且在那些完全不适合、现在已看不到葡萄的地区继续种葡萄，但专业化的开端已昭然可见；葡萄更集中种植于某些有利的地区，在那里以葡萄酿酒的人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资金抛在一种作物上。在任何既定的季节，这些人的命运大有别于主要种植谷物或生产奶制品的其他农民。

各管区之间以及每个社区内部，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差异很大。很大一部分土地由两个特权等级，即教士和贵族掌握，而特别在城镇附近，亦由中产阶级掌握。教士的地产有大有小，从几无立锥之地到田连阡陌，尽管平均而言后者并不像人们曾相信的那么大。贵族成员，包括旧贵和新贵两者，继续拥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一般来说在西部大于在东部，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往往正在爬向贵族等级的城镇资产者掌握的。不过，仍有很大部分土地是农民的财产，当然它们须负担世俗或教会庄园主索取的封建贡赋；但即使在农民占有量高达50%的例外地区，他们的众多人数意味着平均地产甚小。在某个村庄，几名

殷实的农民可能拥有不在教士、贵族或资产者手中的土地的很大部分，但其余农民会只剩一小块土地，或一无所有。

农民租赁的土地数量也有类似的区别。特权等级和中产阶级手中的土地大都出租给佃农。这些佃家中有些是富裕农民，自己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而且一般都有足够的资本来过富裕生活并得以支付租金。但普通农民，特别是在中部和南部，是收益分成制佃农（*métayers*），他们少有或没有土地，无法支付货币地租或提供适当耕种土地所必需的种子、农具和牲畜。地主不得不提供这些东西；作为酬报，他取得收成的一部分，通常是一半。在贫困的分成制佃农和富裕的有地农或租地农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更下层的是无地或近于无地的雇农，他们在某些地区是个很大的群体，依靠为富裕农民劳作而尽力谋生。洛克访问波尔多附近著名的葡萄酒之乡格拉维之后，在日记（1678年9月15日）中写道：“在此地同一名穷苦的农妇谈话，她告诉我们她有三个孩子；说她丈夫通常每日得7¹/₂ 索，衣食自理，即维持五口之家。她在能有工作时——这是难得的——每日实际可得3¹/₂ 索或3.5¹/₂ 索。别的时候她纺大麻，那是为了制作自家的衣服，并不赚钱。她家五口人就靠这每日7¹/₂ 索维持衣食、缴付房租和人头税、预备过礼拜日和圣日。”^[3]正是这一阶层的农民，连同其妻儿，为在附近城镇的商人控制下——特别是在北部——经营的家庭手工业提供了一支劳动后备军。

尽管贫者和富者之间有各种差别，但所有农民都同样要向领主缴纳封建贡赋和履行徭役。如果说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某些贡赋由于币值降低已变得不那么艰巨，那么根据农民收成按比例以实物支付的贡赋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它们引起了所有各种苦恼，就像领主对碾谷，特别是对狩猎的垄断那样；农民的收成不时遭到严重损害。而且，以实物和货币形式缴付的封建贡赋并非农民的唯一开销。还有什一税，它往往不是由他的教区牧师，而是由神父分会或修道院的代理人征收。此外，主要的税收仍旧由农民承担。首要的直接税即人头税本质上是一种对平民的税收，在这些里农民承受最重的负担，因为城镇居民经常获得部分的，甚至完全的免税权。在不同省份和每个省内的不同管区之间，人们所承担的赋税大不均等，而在每个村社内部，同样存在这些不均。例如，大地主会利用自己的权势设法减少对其佃农征收的赋税量，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是如此

他们能收取更高的地租。洛克在1677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如此折磨法国农民的情势：收税者通常极不均等地确定其税率。”间接税也沉重地落在农民肩上。虽然盐税的分量各省大不相同，但它像人头税一样沉重。其他赋税，例如过境税，特别是消费税，既麻烦，又妨碍农产品，尤其是酒的销售。就像我们时代似乎经常出现的那样，酒价是低廉的，在这样的时候消费税会减少销售，并且夺走农民靠设法卖出产品所得的大部分收益。

在评估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忍受强征赋税的能力时，我们必须记住，农民缴纳的税收，连同封建贡赋和什一税，必须出自一种仍旧原始的农业。土地三年里至少有一年休耕，甚至每隔一年就休闲，特别是在南部。每逢收获，产量低得惊人，留种占了前次收获的一个颇不相称的部分。千千万万农民不是为市场生产，而是自囿于维持生计的农作。甚至在丰年，他们中许多人拥有或租赁的土地仍不足以使自己和家庭不断面包——城乡大众的主食；像无地雇农，他们不得不用部分时间为比较富裕的邻人干活，以便维持生计。在荒年，例如路易十四亲政伊始法国很大部分地域发生的那样，价格暴涨，甚至那些不存在绝对匮乏的地区也是如此，结果不可避免地因为饥荒和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穷苦农民不得不应付这些高物价，而正是与此同时，他自己的收成由于年景不好比往常更加不足，在乡下能找到的活计也恰恰由于歉收而更少了。比较富裕的有地农民或租地农在一定限度内境况较好——只要他自己的庄稼未毁，并且至少有某种剩余可高价出售；不过，他的家庭和其他受赡养者的谷物需求，加上必须留作种子的大量谷物以及被领主和教士的代理人以封建贡赋和什一税形式运走的谷物，将使其收成大打折扣，除非他特别走运。穷苦农民可能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趋势而多少得些实惠；他们为自己及其家庭糊口而不得不买进的谷物能以低价取得。一方面，这几十年的农业萧条减少了较穷的农民可以找到的工作量，他们不一定完全无地，只是要依靠一定数量的工钱使收支相抵。另一方面，较富的农民无疑看到自己的收入因为产品卖价低廉而减小了；赋税、封建贡赋和什一税随着价格跌落更沉重地压在他们肩上，那些租地者则往往发现在较早的高价时期里固定下来的租金现在已成了一种重负。

认为路易十四时期没有相当富裕的农民是错误的，但他们只是少数。拥有颇多地产的，或能租赁颇多土地的农民（他们可能兼行征收

某个贵族的租赋，或某个修道院的租赋，连同其什一税），构成了一个乡村资产阶级，远高于中农和贫农群众。但是，后者占绝大多数，而且在某些地区无地雇农已经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大军。农民大众的生活相当接近于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水准，考虑到当时农业的原始状况他们不仅处于贫困的危险之中，而且面临饿死的威胁，如果谷物歉收证明确实严重的话。那个时代的一个标记，就是路易十四统治的全盛期农民造反此起彼伏。它们是分散的，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们毕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农民中盛行的潜在不满。

当然，城乡下层的这些骚乱和武装反叛绝无新奇之处，在那一世纪早些时候黎塞留的权势如日中天时已属多见。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太阳王尽管荣耀非凡，在独裁期间却始终遭到对他无情的税收政策的抵抗。有时这些起义得到本地区上层阶级的暗中支持，有时它们的矛头部分地指向当地贵族的封建压榨。但是，无论起源怎样不同，它们表明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许多居民感到自己的命运是多么难以忍受。即使我们撇开用绞刑和苦役加以镇压的较小骚动，仍然存在需要动用大量军队才能扑灭的一系列区域性反叛。1662年，在布洛涅地区开征新税导致了武装反叛，在一场激战中近600名造反者被杀、受伤或被俘，约3000人被捕。不少人被处死，400人被送去服苦役。两年后，在该国另一端的比利牛斯地区，爆发了一场反对开征盐税的叛乱，持续了若干年。它由一名贵族领导，此人最后得到恩赦，被授予法国陆军上校衔。更严重的是1670年发生在法国南部另一区域维瓦雷的反叛。被间接税制度激怒的造反者们由一位前军官率领，最后被调集前来的大军粉碎。大约100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遣服苦役。为同联合省的战争筹措资金所必须征收的新税引起了1675年两场特别严重的叛乱——在波尔多和布列塔尼。在波尔多，下层人民由邻近地区的农民支持，迫使省长和高等法院中止征税。作战季节一过，国王便派大量部队进驻该省的冬季营地——这是对居民的可怕惩罚，他们现在被迫俯首帖耳，他们的首领数以十计地被绞死。更加严重的是布列塔尼此起彼伏的起义，在那里农民揭竿而起，矛头既指向收税人的敲诈，也指向贵族的剥削。军队到达后进行的镇压蛮横凶残，死刑不计其数，士兵们横行该省，一路劫掠、拷打、杀人。

这就是路易十四于1661年开始统治的法国，以后30年中他将在那里使专制主义达到其历史巅峰。在考虑他及其大臣们这些年里统治法

国的方式时，我们必须记住1661年时的青年国王纵然野心勃勃，但不老练，而且尚无自信，同1688年领导法国投身九年战争的那个人——他历经变迁而成熟，享尽成功和赞颂——大不相同。他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人，但他给王政带来了勤勉和自律的品质、基本的正义感、知人之明以及一开始在逮捕富凯前他所演出的滑稽剧中就表现出来的那种隐瞒真实情感的能力。在体格方面，他天生结实，经得住所有各种纵欲行为和他那个时代的落后医术，而且仪表堂堂，一副国王长相；尽管他彬彬有礼，但扈从和兵士奉召与他谈话时会不寒而栗。他在廷前夸示拥有许多情妇，直到王后于1683年死去以及他同曼特农夫人秘密结婚为止。1678年，当他穿过巴黎前往根特围城阵地时，洛克在日记（2月7日）中写道：“他坐在王后的八驾马车内，与其同车的是王后蒙特斯庞夫人。”他不准这些情妇干预政事，但承认她们的某些孩子，以其充实他那人丁不足的合法家庭。

从一开始，年轻的国王就决心当他自己的王国的主宰。他是天命之王，只对上帝负责。不管一位君主有多邪恶，其臣民的任何反叛在他看来都是不赦之罪。这相比于路易在10—15岁经历的投石党内战难忘岁月中王族、大贵族和最高法院和平民的颠覆理论和叛乱行径，有天壤之别。既然马扎然已退出舞台，他便决意确保自己不重演黎塞留掌权时他父亲扮演的角色。不仅如此，他还与法国君主制的古老传统决裂，即不让任何王室成员参与宫廷会议，即使是他未成年期里至少名义上统治法国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路易的大弟——“殿下大人”——终生被排除在任何权位之外，被迫在宫中打发日子。路易也不让王族参与宫廷会议，其中最显贵的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孔代亲王；高级教士也不行，因为他不愿看到两位红衣主教即黎塞留和马扎然的统治重演；所有大贵族亦然，即使是伟大的军人蒂雷纳，唯战争期间除外。

圣西门公爵在其《回忆录》中把路易十四治下的政治制度概括为“城市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任命的大臣出身较为卑微，其地位全倚仗他的恩惠，因而完全忠诚可靠。在新政权下，大量政事继续由一系列宫廷会议处理；但是，实权在总稽核和诸国务大臣手里，他们在国王的直接监督下工作。这些官员中，几个特权者——其数目不定，1661年时有3个，在位后期有时颇多——被召集到最高枢密会议即“高级委员会”，在与中国王与之讨论对外事务问题和内政总方针。

在君主统治的这个部分，有几位杰出的大臣，他们是勒泰利耶，陆军国务大臣，后任大法官直至1685年去世；他的儿子卢瓦，接任其陆军大臣之职并支配政府，直至6年后去世；让-巴蒂斯特·科尔培尔，逐渐占据总稽核、海军国务大臣和营造总监的位置，直至1683年去世。这些都是新人——勒泰利耶属于穿袍贵族，通过各种宫廷会议慢慢升官晋级，而科尔培尔是个十足的商人之子。大贵族们现在已丧失了任何权力（整个路易统治期间，其中只有两人被提升到国务大臣之列，即使如此他们在国事方面也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正是在遭到鄙视的中产阶级的成员帮助下，这位新国王开始实施统治。这些大臣能够有其地位，他们及其家庭所受的君恩能够延续，都依靠国王。他们的效劳由其主子用所有各种荣誉和特权予以酬赏。他们被允许在任内变得极端富有；他们的儿子获准继承或被授予有利可图的教会职务；他们的女儿则嫁给领受大量金钱赏赐的大贵族；他们及其儿子还被允许通过购买地产和爵位来掩盖自己的中产阶级出身。然而，尽管路易重赏其效劳，他决心限制其权力。他们没有一个会被允许达到将使之成为第二个黎塞留或马扎然的权势。因而他设想，凭借不完全信赖他们中任何人并通过助长大臣之间以及不同大臣家族（即勒泰利耶家和科尔培尔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每天同大臣一起切实工作几个小时，或分开理事，或开会商议，但一切决定都由他一人做出。

这至少是他的政府所依据的理论。实践则无疑颇为不同。在当时的颂辞和某些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路易像半神半人，以相称的大睿大智料理17世纪欧洲最大国家的一切内外事务，对其谦恭的大臣和国务秘书口授每个问题的答案。尽管他对肩负全部国务扬扬得意，但他的决策必定常常是受了他的幕僚们的启示，后者更了解详情，能够以引起他们所希望的结果的方式介绍情况。国王始终可以让人留有他亲自决策的印象，而事实上他的大臣老是自行其是。

身居中央的国王及其幕僚们的决定要能贯彻到全国，就必须有行政机器。自相矛盾但必不可免的是，路易设立的高度个人形式的政府导致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逐渐建立起来。中央政府的决定由按察使在各省贯彻，他们像大臣与国务秘书那样，出身于中产阶级，而且由于可以随时被召回，能够被指望作为王室权威的代理人忠诚地履行他们的职能。黎塞留，特别是马扎然执政时，按察使已经在法国政府

中起某种作用。然而，正是在路易十四和科尔培尔治下，中央政府依靠持久地雇用这些代理人在所有不同省份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只是逐渐地，这一制度才形成，按察使才被赋予特殊职能，并且给予一个特殊的管区由其治理，直到例如他们被召回或派往别地为止。确实，到1689年，布列塔尼省才有了一名按察使。

这些官员是现代省长的原型，其职能概括在“司法、警务和财政按察使”这一全称之中。按察使必须监视本省的司法管理，以便防止其胡作非为；他有权主持省内任何法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亲自审理案件。他的职能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他必须始终留心权势人物，即贵族、教士和官员，这些人可能滥用权势以抵抗王权。他还负责镇压所有骚乱和颠覆活动。在一些由他自行任命的非官方业余助手（“代理人”）的协助下，他逐渐接管了负责评估和收集人头税的官员的很多职能。他届时前来指导本省不同教区的估税工作，核实收税者名单，并且评估那些运用权势取得未经许可的免税权利或使自己及其佃农的税额算得太低的人。最后，随着君主政体利用城镇和村庄的负债状况来取得对其行政的控制，按察使越来越多地干预地方政府。

17世纪60—70年代生长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新形式，被增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上，它并没有摧毁它们。这些过去对王权施加某种制约的机构，其权力虽然有许多被剥夺了，但仍在苟延残喘。三级会议诚然从未召集过，但它们只是被忘掉，而不是被废除。在路易十四的冲龄期最高法院试图自行充当抵抗专制主义斗争中的民族代表，现在却不再被允许染指国事。不过，尽管路易十四竭力侮辱它们，使之虚弱无力，但并未正式剥夺它们在国王敕令交其登记时提出抗议的权利，他所做的是取消这项权利的任何实际意义。在终至1673年的一项皇家文告的一系列敕令中，他坚持所有敕令一俟提交给最高法院，后者应立即予以登记，不作任何修改或限制，要提抗议——如果有的话——只能在此之后。直到路易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摄政时，最高法院才重获其政治权力，这是随大革命临近它们将越来越带破坏性地加以使用的一件武器。与投石党运动中它们起的显赫作用相反，整个路易十四个人统治期间它们始终被置于从属地位。

迄此，各省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可以证明是国王扩张权力的障碍。省长被允许扩大自己的声誉和权势达到危险的程度，正如投

石党运动这一晚近的例子再度表明的那样，它们可以被转用来反对王室权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重演，路易不再指定省长任职终身，而是一次只任职3年，如果在任者行为令人满意就可以延任。因为其延任要以行为堪作表率为条件，省长们就不大可能像在黎塞留和马扎然之下那样在本省内兴风作浪。确实，为了双倍保险，路易十四的做法是使各省省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宫中，处在他的眼皮底下，而他们的许多职司由按察使接管。但是，路易十四仍然没有废除这个旧制度来为新制度开道，他只是使得省长的作用无害于他的权威，办法是把这个职位蜕变为一项有利可图因而人们趋之若鹜的荣誉，以此来装点王族和大贵族。

市镇仍继续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力，虽然它们早已失去一度拥有的大部分自由。伴随按察使权力的发展，中央政府在地方事务中的影响增强了。这里如同别的方面，某些自治形式仍被允许存在下去，但其实质已丧失大半。到头来，甚至市长的正式选举也在许多城市中停止了，因为他们现在已变成通过买官取得其职位的终身官员。

在保留由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派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或省议会的各省（即“国中之中”），按察使的权力不那么广泛。最重要的“国中之国”是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它们的特权令缺乏议会的省份——占大多数——的居民大为羡慕，因为一般来说就它们的人口比例而言，它们被要求缴纳的税款较少。不过，那里的状况实际上是否显著好于该国其他地方，是有疑问的。“国中之中”绝不是民主政府的典范，因为各项事务主要操纵在富有的寡头阶层手中，他们主要来自两个特权等级，赋税征收之差异与其他地方同样之大。但是，这些省份确实享有自行征税的特权，而且还有权用“无偿捐赠”的形式向中央政府缴纳自己的那份赋税，其数量通过同国王代理人的谈判确定。

省自治的此种残余极少可能为路易十四所好。不过，他仍未直接废除这一制度，他所做的是剥夺省议会的实权。议员们或因恐吓，或因贿赂而俯首听命。不仅如此，路易十四还抛弃了允许他们在着手表决“无偿捐赠”之前表达该省怨艾的旧制度。更重要的是，他摒弃了这样一个惯例：索取的比他预期得到的多，然后通过他的代理人同议员们就最终要缴付的数量讨价还价。现在，国王要求一个确定的总数，议员们不得不立即表决。自此，数额不断提高，没有任何人敢提出最轻微的抗议。朗格多克省议会两次会议期间，洛克逗留在蒙彼利

埃，他就两次会议的情况写道（1676年2月8日）：“它们……具有议会的一切庄严和外表。国王提建议，它们就此进行辩论，做出决议。全部区别在于，它们从不拒绝——有人说不敢拒绝——国王的任何要求。”另一则日记（1677年3月7日）很好地反映了议会的这种屈从是前所未有的：“一位议员告诉我，他20年前也参加了一次议会，当时国王索取七八十万图尔城锂，他们认为这太多了，因而一文不给，但现在他们不敢这么做。”自从其间发生这场冲突的投石党运动结束以来，情况已经改变。现在，一位专制君主权力如日中天，除了迅速地满足他不断提高的要求外，别无他法。

这样，在17世纪60—70年代，所有可能多少抑制王权的机构——最高法院、各省省长、省议会和市议会——都逐渐被剥夺了任何实权。在中央和各省，政府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阶级，也没有任何阶级组合能对政府机器施加任何有效的限制。普通民众，即农民、工匠、所有处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层次以下的人们，在其统治者或上层阶级眼里完全微不足道。实际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第三等级限于中产阶级的较富裕阶层，即食利者、官员（全国和地方政府中征收直接税和掌握司法的官职占有者）、银行家、包税人和商人。诚然，某些最重要的官员，即最高法院法官，没有理由爱戴路易，因为他剥夺了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任何发言权，但在一位强有力的国王之下唯有服从。国王如此厌恶他们，以致试图贬低他们的职位，并且使他们的儿子更难继承他们，办法是坚持规定凡有父亲、兄弟或舅子在最高法院供职者，概不能被该法院任用；尽管这样的敕令始终是一纸废文，但法官们不得不予以登记。同样确实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官员，即负责征税和在低等法院从事司法管理的官员，由于按察使愈益重要而被剥夺了许多权力。不过，他们的怨艾无足轻重，不成问题。总的来说，中产阶级是这个时期里绝对君主制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记得中产阶级和国王之间久远的、最终粉碎了封建贵族权力的联盟。他们关于投石党运动劳而无功的痛苦经验加强了他们对强大有力的君主政体的忠诚，只有这种政体才能给他们安全和稳定。他们远未怀抱他们后代的颠覆思想——这些后代在1个世纪后将要求拥有与他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相称的政治权力——而是认为专制主义是拥有稳定的政府所需付出的合理代价，并把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当作某种天命来接受。有抱负的资产者的一个想法，是赚足钱，使他自己和子女能够上升到贵族等级。

在两大特权等级中，只有教士才拥有某些独立自主的残余权力。每隔五年，它的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教士大会上相聚一堂。它不缴纳直接税，而是交付一种自愿的捐助，即“无偿捐赠”，其数量由国王和教士大会谈判确定。不过，教士拥有的那种独立受到严厉限制。自从1516年宗教协定把任命所有重要教职的权力让予国王以来，没有哪个希望投身教会生涯的人经得起招惹一位强有力的国王生气。结果，高级教士远非挺身反对路易的政策，而是急不可待地充当扈从。

至于佩剑贵族，对国王恩惠的依赖终于完成了贵族的转变，即从17世纪前半叶好骚动的半封建爵爷转变为驯服的廷臣。王族和大贵族在投石党运动中作了最后一试，他们不再拥有一帮贵族家臣以及这一世纪早些时候使他们能对君主国开战的小规模军队。在路易十四统治下，他们不再能用离开宫廷、在他们控制的外省竖起造反大旗来要挟讹诈国王。如果某个贵族离开路易十四的宫廷，那么其原因在于国王把他放逐到他的领地——一种可怕的惩罚，既意味着所有恩惠告终，又意味着去过百无聊赖的生活。

作为蓄意规划的政策，路易十四以一种法国史上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方式，使他的宫廷成为贵族的社会生活中心，最初是卢浮宫和巴黎地区的其他王宫，然后从1682年起是凡尔赛宫。他把凡尔赛从他父亲的并不奢华的狩猎别墅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宫殿，一位在国内绝对专权、在欧洲由于近来获胜而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居住地。凡尔赛宫是太阳王的住所，铭刻着他的豪言壮语：“举世无双”，扇扇宫门带有他的金制的伟大标志。宫殿的设计意图是向其臣属展现一座圣庙，用来膜拜一位半神。路易十四的日常生活、王家和廷臣的日常生活，根据最严格的礼仪来规定，与其父亲和祖父宫廷的自由轻松的气氛截然相反。连处理礼仪的细枝末节，都有意予以最大的关注，在路易十四看来，这里事无巨细无不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使国王在其他人类之上。

为防止贵族胡作非为，他坚持要他们进宫。贵族进来了，不仅因为宫廷生活适合他们的奢侈和娱乐情趣，而且因为这是获得国王掌握的恩惠的唯一途径。除非他们在宫中亮相，他们没有机会得到任何东西。不管什么人提出某个缺席贵族的姓名、为之求赏时，国王总是答道“我不认识他”。贵族们债台高筑，捉襟见肘，往往沦落到要用赌博和各种腐败行径来增加收入的地步，因而成天在宫中注意觅取某种

会使他们解脱财务窘困的职位或年金。为了献殷勤，他们力图每逢国王公开露面——在他起床时刻和就寝之际，或者往返宫廷会议或教堂途中——使自己引起他的注意。

一位大贵族现在所能得到的最可夸耀的荣誉，是在国王内府或王后或其他王室成员的家政中拥有一个高级职位；所有这些位子每逢空缺或因需要而设立时，都引起了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除了为酬赏殷勤和驯从而赐予此类职位外，国王还向得宠的廷臣赏赐年金，或赐予有利可图的闲职，给他们的女儿提供嫁妆，给他们的幼子提供主教肥缺或其他高级教职，甚至替他们还债。

结果，贵族们现在完全俯首帖耳。不管他们在私下可能怎样思量所沦入的依附国王的可怜景况，他们在公开场合还是争先恐后地拍马奉承，以便求宠于国王。他们为了使自己和妻室能穿着昂贵的服装出席宫中举办的盛大宴会而不惜债上加债，在典雅和斯文的虚饰之下过一种伪善和钩心斗角的生活，每时每刻留心抓住任何可能一去不返的宠惠。这样，路易就成功地使那些曾是王权的最危险敌人的大贵族的后裔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在路易统治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法国财政和经济生活由科尔培尔指导。作为大臣，他从未能自行其是。除了不易争取国王批准其政策外，他还面对同僚的竞争、往往是公开的敌意。他生前最后几年尤其如此，当时他发现卢瓦已取代他成了国王的宠臣。不仅如此，他能够取得的实际成果受到双重限制：国王从事的战争以及农产品低价和经济困难的这几十年的不利气候。

科尔培尔的整个政策所依据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全无新颖之处。^[4]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在其中，人民的财富和福利将保证国王的伟大。他按照正统的重商主义方式认为，这个目的能首先通过尽量增加本国的金银储备来达到。他对联合省的商业权势印象特别深刻，尽管同法国相比它是个小国，但由于其巨大的商船队而享有繁荣昌盛。科尔培尔力图把这一商业霸权从荷兰那里夺过来，办法是建设一支巨大的商船队，在法国创办新工业和尽可能排斥外国进口，同时在国外销售并用法国船只载运尽可能多的出口品。

科尔培尔完全明白法国在工商领域的软弱无力：交通条件糟糕，国内关税壁垒林立，法律和度量衡五花八门，商业阶级中缺乏事业

心，他们醉心于购买官职和非生产地使用资本，还有最严重的一一不堪承受的赋税负担。他以改革和经济进步方式所能取得的成就，受到当时社会的固有障碍的限制。作为总稽核，他全力谋求复苏财政局面。他从马扎然和富凯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1661年，下一年的岁入、甚至1663年的部分岁入已提前耗尽。在纳税人缴付的8300万锂中，只有3100万锂进入国库，差额大都进了征税官和包税商的腰包。为修复局面，科尔培尔迫使征税官们吐出部分收益，并且偿还一大部分公债，这个步骤尽管不得人心，但对国库非常有利。到1667年，国家岁入总额已增加到9500万锂，净岁入增加到6300万锂。这就是说，在6年里科尔培尔成功地把国王收入的有效部分翻了一番。

这个结果是通过各种改革取得的。他试图使国库账目有些条理，并且极大地增加了来自王室领地，特别是来自森林的收入。他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改革人头税评估和征收方面的弊端；例如，他想象把在数目有限的省份中征收的一种土地税推广到全国，还想象实施全国调查，以便能在公平的基础上评估土地价值。在实践中，他被迫将自己局限于枝节问题的改革。他竭力查获那些僭取爵位，因而免交人头税的人，迫使他们缴纳他们的那份；他指示按察使确保富人不滥用其当地权势把此项赋税负担推到不那么富裕的人肩上，并确保贵族不减低其农民的人头税以便从他们那里榨取更高的地租。这些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因为此种弊端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在其中就像洛克就贵族所说的那样（《日记》，1676年9月29日）：“这项负担被尽可能地转嫁给农民，他们从这些人的劳动中尽可能多地榨取，挖空心思盘剥农民。”科尔培尔本想设法缓和征收人头税的严厉办法，但在这方面他的努力仍旧毫无成果。诚然，他减低了人头税额，但这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农民随着间接税的进一步增加不得不承受主要负担。

简言之，科尔培尔的财政改革计划收效甚微，弊端在现存社会制度中根深蒂固，而且出自路易扩张主义野心的（以及出自他本人的经济政策的）战争要求越来越重的赋税。路易统治时期的战争于1667年开始，便不得不用所有各种权宜手段筹措款项，直接和间接的两种赋税很快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这反过来又阻碍了他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繁荣的计划。尽管科尔培尔不择手段，1680年的净岁入只有6100万锂，支出却达到9600万锂，这就是说即使不算从前些年里的1200万锂

以上累欠款，也亏空3500万锂。他反复吁请路易减少开支，但无反应。

在经济领域，科尔培尔谋求扩展工业，以使法国尽可能自给自足。他认为，要进一步发展法国的传统工业并引进新工业，就必须使工业企业拥有比组织在行会中的工业更多的资本和更大的生产力。他建立或改组了一些王家工场，例如在巴黎的戈布兰花毯作坊，那是国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名目相同的私有企业，他通过向业主提供诸如补贴、无息贷款以及在某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内对某种特殊产品的垄断权等援助，使之问世。这些新工业有些集中在工场内；更普遍的是它们部分或全部依靠家庭手工业，雇用城镇中以及郊外农民中可获得的劳动力来生产丝绸、棉布和亚麻布之类物品，行销国内市场或出口。科尔培尔竭其权力所能扩大法国工业的范围和增加其产量，从纺织到采矿和冶金，亦不忘为陆海军制造武器和舰船。他从国外引进新器械和新工艺，还有熟练工人。例如，洛克在卡尔卡松注意到，从荷兰引进的技工被成功地使用，以便创建当地的织布业：“他们依靠80个荷兰人，开始摸索到织造细布的窍门；大约五六年后，科尔培尔先生便精于此道。现在除大约12个人外他们都走了，但已将手艺留下。”

（1677年3月6日日记）。他甚至减少了严重干扰生产的频繁的教会节日。为了改进法国制造品的质量，他定下了包括原料准备和制造工艺之类事项的详细规章，并且建立了一个保证它们得到遵守的检察官机构。亚当·斯密在一个世纪后轻蔑地写道：“他力图用警察局那样的模式进行管理。”^[5]

为了保护这些新工业免受外国竞争之害，科尔培尔对进口品征收新税。他在1664年的第一套关税比较适度，但三年后他使之翻了一番，为的是毁灭法国的商业大敌荷兰人。他们立即通过对法国货征收重税来报复，这场经济战终于在1672年导致了两国间的武装冲突。随后的长期战争对科尔培尔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后果，到头来，他在尼曼根条约中被迫降低了关税。

科尔培尔妒忌英国与荷兰从其大贸易公司，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6]获取的财富。像他之前的黎塞留那样，他试图在法国建立类似的公司以仿效它们。1664年，他创设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被授予法国与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其他公司也按类似的方式建立起来，从事与美洲、非洲、黎凡特地区和北欧的贸易。但是，尽管国王和王族以身作

则认购资本，中产阶级却绝不渴望将自己的金钱掷入他们所认为的投机冒险之中。到头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撤销，与印度群岛的贸易对所有商人开放，条件是他们使用该公司的船只和贸易据点。科尔培尔死后继续存在的公司独此一家。

尽管这个时期的经济气候不利，尽管特权贸易公司失败，而且他的高关税制度被迫撤销，但科尔培尔确定取得了某些成果，即使它们被证明比他梦想的要有限得多。他确实成功地扩展了法国工业的范围，提高了它的产品质量，而且如果说在1683年他去世和路易十四统治结束之间经济挫折严重，那么他已为将来做出努力，因为他建立更强大的法国工业的梦想有许多将在18世纪的历程中实现。他做了一些改善国内交通的工作，因而，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著名的两海运河在他去世前两年胜利竣工。他给予船主们的补贴导致造船量大增，法国逐渐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商船队，使得海外贸易，特别是同北欧、西班牙、利凡特地区和法属殖民地的贸易大为扩展，法国开始同贸易大国英国与荷兰并驾齐驱。

联系法国过去的历史和传统来考察，路易十四及其大臣从他1661年掌权起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一种革命的面貌。专制主义在其全盛时代表与传统的决裂，在许多方面是明显的。无疑，使法国王室上升到这一权力巅峰的过程非常缓慢，循序渐进长达几百年，而且亨利四世、黎塞留和马扎然在17世纪对加强其地位所作的贡献极为重要。但是，随着路易十四稳固执政，君主独占大权，使自己提高到凌驾于王族、大贵族和所有其他贵族之上，而把他们夺抑到与全国民众同等无能为力的境地。加于王权之上的所有传统制约——三级会议和省议会、各省省长和市议会的独立权力、高等法院的政治和管理职能——统统被置若罔闻，或被迫偃旗息鼓，以便使国王的无限权力通行无阻。在中央，不再有黎塞留或马扎然那样权位显赫的宰相；国王把他认为适当的权力托付给一小群大臣和国务秘书，这些人由于出身平凡并完全仰赖他的宠惠，是他的忠实工具；在外省，依靠全国各地持久设立其代理人即按察使，中央政府的命令转化为实际行动。

不过，尽管新制度在若干方面具有革命性，尽管路易十四在其长久统治的这个时期使得自己至高无上，他的权力乃至他所谋求实现的变革仍受到各种限制。他没有以任何根本的方式改变他1661年掌权时看到的现存社会。他没有能触及这个社会的深刻分裂及其显著的不平

等，它们是以出身和财产的微妙混杂为基础的；如果说他鼓励而非阻碍中产阶级的最富阶层上升到贵族行列，并且剥夺了贵族阶级的所有政治权力，使之完全依附于他自己，那么他仍未触动其社会和财政特权，以及这些特权所包含的一切弊端和不义。在所有各种层次上，他所统治的法国仍远非真正统一。度量衡混乱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罗马法和无数种习惯法规混淆不清。在经济上，虽然科尔培尔进行了某些温和的改革，但这个国家仍旧被一套阻碍经济进步的复杂的国内关税体系搞得四分五裂。没有贯彻于全国各地的统一的赋税制度；每个省都独自征税，用不同办法并以不同程度的优惠或苛刻征收不同次数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一些省份设法保住自己的议会以便享有其好处，另一些省份则丧失了自己的议会，而大多数省份从未有过此种机构。如果我们暂且退后一步考虑一下奈克和卡隆之类大臣将在100年后描绘的行政混乱不堪和财务大不公平的图景，路易十四所行革命的有限性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完成法国统一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实现一场真正的革命，尚待1789年的人们。

这些年里荣誉辉煌的路易十四常常被说成是法国人民大众祈祷的应验，他们祈祷出现这么一位国王：他将是随之而来的王权与秩序的化身。无疑，大众感激王国的安定，这与投石党运动期间的混乱和破坏截然相反；对路易十四统治这些年里的赫赫战功感到的自豪无疑加强了这些感谢和赞美之情，即使我们不照本全信拉辛和莫里哀、布瓦洛和拉封丹以及一大批二三流作家笔下涌出的颂扬太阳王的赞辞。在艺术领域，例如在17世纪80和90年代佩罗之类“现代派”的著述中，流露出一种对近来法国文明成果的新的自豪感，这一文明现在被认为超过了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或意大利和西班牙之类现代对手的文明。不过，假如我们不怀疑路易十四的这一时期里歌功颂德者的诚意，我们仍然要纳闷法国人民大众是否真像某些后来的作家认为的那样对生活在这些年代里欣喜万分。有迹象暗示——经常不只是暗示——社会大多数阶级心怀不满。大贵族抱怨被排斥在宫廷会议之外并依赖国王；最高法院法官及其身后的大量较低级官员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和按察使的越俎代庖导致他们丧失权势而耿耿于怀。战争意味着不堪承受的赋税重担以及遭人怨恨的部队驻屯重担压在平民肩上。经济发展趋势不利，而且根源于农业技术和运输的落后状况，谷物匮乏、面包昂贵甚至饿殍遍野的威胁无时不在。大众的预期寿命依旧取决于丰歉莫测的下次收成，这一经常的恐惧直到下个世纪才被解除。100年后，

在倒霉的路易十六在位时期，大众不在歉收年头遭受贫困，但他们至少摆脱了饥荒和疾病的威胁，这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能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造成出生率急剧下降。100年后，在歉收年头或由于其他原因发生过骚动，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绝无席卷整个省的叛乱，这种叛乱却是科尔培尔和卢瓦时期难以忍受的赋税和封建压迫的结果。

这几十年里，法国在欧洲无可匹敌。诚然，由于投石党运动和经济萧条，它的人口看来维持原有数量，或甚至略有减少。但它以1800万或1900万居民之众，在人数上是欧洲头号强国——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要比今天小得多，其中德意志和意大利不过是松散的小邦组合，每一个小邦总人口大大少于法国人口。它的头号对手，是拥有约700万人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连同其各异族领地；它远远超出500万（或至多600万）人口的英国和西班牙以及1400万人口的俄国。用现代标准衡量，城镇甚小，但在17世纪欧洲的普遍状况中，许多法国城镇可算具有十分可观的规模，尽管可能只有两个省会——里昂和马赛达到了5万至10万的居民数量。如果说拥有差不多50万人口的巴黎本身小于伦敦，而且离这个国家居民总数的10%相距甚远，那么它毕竟无疑是法国的最大城市。它同伦敦一起，在当时的欧洲占有独特的地位，既是交通和商业的一大中心，又是行政当局的所在地，而且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文化首府。

1688年11月威廉三世在托贝登陆又一次使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此时路易十四掌权已达27年。这位1661年从马扎然手中接管政权时还缺乏经验和信心的青年，现在已年届半百，因为超过1/4个世纪中几乎无限的权力和责任而变得庄重严肃，但又沉浸在他往昔的胜利带来的谄媚氛围之中。他还要继续统治的27年将带给他在国外遭受许多挫折和失败，而在国内，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同交替出现的农业萧条和面包价格飞涨与饥谨相结合，将使得整个制度的批评公开化。他在国内外取得如此权力所付的代价将变得昭然若揭，以致所有法国人都一目了然。

[1] 关于投石党事件，见第四卷第16章。

[2] J. 洛夫编：《法兰西旅行记》（剑桥，1953年版）。

[3] 当时1年索的价值略少于1英国便士。

[4] 较充分的讨论见前，第二章，第43—46页。

[\[5\]](#) 《国富论》，第四篇，第九章。

[\[6\]](#) 关于这些公司，见后，第十七章，第398—402、417—429页。

第十一章 法国在艺术、思想和文学方面的成就

1660年在法国文明的编年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一年。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在年轻的路易十四面前上演，斯居代里小姐发表了她的《克雷莉娅》的第十卷，也是最后一卷，从而结束了使她的许多读者翘首以待、挂念不已的四个春秋。下一年，由于内战而失望并从一位不得人心的宰相——马扎然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法国，急不可待地欢迎其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国王，后者许诺要充分提供医治无聊厌倦这一民族弊病的灵丹妙药，即军事荣誉和国家威望。在文学方面，有一派杰出的作家才思敏捷，还有皇家赞助撑腰，他们要使其前辈中的文体冗长、好使说教者声誉扫地，并要给现代最壮丽的宫廷饰以经久不灭的光彩。

但是，这一荣耀将证明是短暂的。30年后，这些伟人大都与世长辞或变得默默无闻。莫里哀于1673年死去；拉辛活到1699年，在生前最后10年里作品寥寥；布瓦洛1685年隐退到他在奥特伊尔的郊外宅邸时，已是夕阳西下，巅峰逝矣；拉封丹1693年失去其女赞助人后，在忏悔和神学研究中寻求慰藉；甚至塞维尼夫人在1691年后也几乎不再撰写书简，因为那一年她住到在普罗温斯的爱女家去了。在宫中，早些年的轻快活泼被阴沉的虔信主义体制取代，而法国似乎在追随其国王的情绪。诚然，法国的智力活动仍多——谁能阻止法国人去思考？但是，凡尔赛宫不再起带头作用了。

对每个生活领域进行中央集权控制是路易十四统治的特色。报纸受到审查，此事仍由巴黎大学以及由政府通过巴黎最高法院实行。城市里的印刷所须经特许，不时有异端书籍被公开焚毁，例如在1685年，戏剧演出审查制不如报刊审查制那般严格，这显示了国王的个人爱好，但应当补充说，对言论自由的干涉一般是不定期和反复无常的；而且，书籍和小册子从国外，特别是从荷兰源源流入，有助于抵消审查制度的影响。在其他领域有可能保证较大的一致。卢瓦从乌合之众当中创建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科尔培尔控制了工商业，并且为

每一种活动，包括艺术制定法规，他的目标是把甚至最富于想象力的努力纳入一个王家机构的控制之中。法兰西学院于1634年创建，接着1648年王家绘画和雕塑学院成立，它由科尔培尔和画家勒布朗改组。

[\[1\]](#)作为营造总监，科尔培尔在各学院的协助下规定了艺术家和雕塑师要遵守的规则，结果削足适履，这个国家的富于想象的生活有许多被精心纳入其规范。另外，学院制度有助于提高艺术家的地位。在此之前，他是个匠师、行会成员；现在，他同王家学院的联系给了他一种专业地位。至于熟练的手艺人，可以通过在戈布兰作坊训练一个时期改善自己的前途，这个作坊是制造花毯和家具的王家工场，宫廷画家和装饰师勒布朗的亲自监督确保了产品的精良。只有演员置身于这个有意组织的人才协作之外。路易因为承认莫里哀而冒教士等级诅咒的风险；但是，尽管有国王的这种支持，是否让这位伟大的演员兼剧作家享有基督教葬礼的问题仍引起了麻烦。

人才集中的最具体的表现将在凡尔赛宫里看到。16世纪期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在法国家庭建筑，特别是卢瓦尔乡村府邸中昭然可见；下一个世纪里成就甚多，著名的是亨利四世、黎塞留和马扎然装点了巴黎，在那里增添的罗亚尔宫、讷夫特和卢森堡宫如此引人注目，以致巴黎作为都城可以与罗马媲美。在都市以外，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是沃勒维孔宫，它由勒沃设计，1661年建成供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所用。勒沃在一组艺术家、雕塑师和装饰师的协助下，成功地使这座大厦成为法国同类建筑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它的华丽的内饰和精心规划的花园无与伦比；不幸的是，它清楚不过地证实了在1661年导致这位古怪的大臣倒台的财政舞弊。沃勒维孔宫按照比意大利风格拘束的一种巴洛克风格设计，是凡尔赛宫的楷模；的确，艺术家、雕刻、雕塑乃至许多园林灌木都是从一处照搬来用于另一处的。国王对他童年时投石党运动中巴黎群氓作乱[\[2\]](#)记忆犹新，决意不住在卢浮宫；因此，他差遣一些艺术家合作建造一座宫殿，它如果只按照规模和代价衡量，是个动用无数公款可以造就何物的令人信服的明证。[\[3\]](#)

凡尔赛宫在巴黎以西约12英里，它所以令人瞩目，不是因为设计的宏伟（这因附加建筑和改建遭到了破坏），而是因为它的按几何形状安排的花园和精致的内部装饰。花园由勒特尔规划，为给喷泉供水费了许多劳力进行挖掘。供国王和王后个人用的大套间是1678—1681年在勒布朗的监督下装饰的。对路易来说，它是个炫耀其统治荣誉的

舞台，是个显示过分的富丽堂皇和金碧辉煌——而非始终表现鉴赏力——的标志。

对于法国绘画艺术的演进，凡尔赛可能造成了一种不幸的影响。勒布朗虽然精于装饰，却是个平庸的画家，他为艺术家们制定了一套规章，^[4]其中有些规定了最适于表现各种感情的“姿势”。各学院帮助维持观念和技艺的这种一致，必须仿效的楷模也按先后次序被确定：雕塑方面是古典大师；绘画方面是拉斐尔和罗马画派，普桑尼随其后。贝里尼之类威尼斯画家则不被选用，因为他们的色彩太浓，甚至荷兰和佛兰芒艺术也被排除，因为过于“资产者化”和过于朴实。坚持此类原则很可能使得法国绘画艺术偏离了它的自然轨道。普桑和克劳德·热莱·洛林已经在风景画方面创造了一种优良的传统，但他们在罗马度过自己的大部分艺术生涯，因而不能被认为是典型的法国画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受到波尔罗亚尔影响^[5]的肖像画家菲利普·德·尚帕涅，虽然程度较小；他的以雕版形式著称于世的晚期肖像画，表现出扬森派理想的严肃性。就此而言，尚帕涅代表了17世纪生活中不特别适合用绘画艺术表现的一个方面。该世纪早些时候，勒南三兄弟——安托万、路易和马蒂厄——在创作一种不加雕琢的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这特别表现在他们的农民风情画中；同样的浑然一体还可见于亚伯拉罕·博斯和齐治·德·拉图尔的绘画。所有这些艺术家都表现了一种个人风格的功力；他们的作品具有真正艺术的逼真和令人折服。把它们同勒布朗用来装饰凡尔赛宫的寓意场景画对照，人们不能不为后者背离传统的朴实和直率而遗憾，因为艺术家置身于无论怎样谦卑平凡的景象和人民中间，毕竟比在通常不过给挂毯或地毯提供庸俗图样的丘比特和阿波罗中间，更有可能找到灵感。^[6]

因此可以断定，像在建筑和装饰方面那样，凡灵感和刺激来自路易本人，其结果至多是普普通通、不见新颖。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尤其明显的是戏剧、音乐和诗歌，在那里国王的影响造成了较为幸运的结果。要评价这些，就必须指出与法国文明中所具有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有关的某些因素。首先是蒙田的影响。每个人都读他的《随笔》，每个人都熟悉他的文化怀疑主义，即所谓皮浪主义；许多信徒赞美他健全的常识和中庸之道，它们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各种过火言行截然相反。他像他的许多同代人那样，从蓬波纳齐和帕多瓦学派那里引申出一种对奇迹和神启的怀疑，一种与其说导致无神论或不可

知论、不如说导致将信仰和理性——心灵可能在其间来回摆动的两极——相对照的态度。总的来说，他认为基督教未能创造出一种值得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媲美的文明，因而他师法古典作家。以他南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生活乐趣的敏锐的鉴赏力，蒙田虽然承认了解文明的各种令人烦恼的难题，但不让它们干扰他消化，这是一种受到许多代法国人欢迎的态度。

同样重要的是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的影响。对于笛卡儿，智慧成了一连串不间断的序列的结果，而非学问或经验的结果；宗教与神启和神秘主义分离，取得了代数方程式的乏味的确实性。从一开始，笛卡儿早就留意博取教会的欢心，后者拿不准如何对待这个不邀自来的伙伴。笛卡儿主义支配欧洲思想直至1730年前后（当时牛顿学说在欧洲大陆开始被接受和应用），它显然趋向于自然神论或不可知论，但完全不否定公认的宗教信条。这使得这套学说比较容易渗入西欧的思想中去，助长了贬低真正的艺术不可或缺的形象因素或感情因素。结果如我们所知，诗歌受到损害；或宁可说，它被韵文取代。不仅如此，由于它摒弃学问和传统，并且以推理本领取代之，整个哲学探究领域就对所有来人开放了。我们可以不懂拉丁文，但都确信我们有常识。要在思想领域遨游，学术通行证不再是必需的了。这种智力平等是第一项人类平等。

笛卡儿理性主义由于同扬森主义^[7]的联系而得到加强。简言之，以尼科勒和凯斯内尔为其著名人物的扬森派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采取一种与加尔文派不无相似之处的态度：他们把人类的堕落当作自己神学的开端，否定那些据信耶稣会士急于提供的灵魂拯救之助。扬森派人士坚持其正统，仍然留在教会之中，并且看来以他们的清教主义——没有更适当的词可用——（一度）感染了甚至像波舒哀这样的铁杆天主教徒。因此，戏剧和舞台（通常由耶稣会士为之辩护）既遭到新教徒，也遭到法国多数神父的激烈指责。正如笛卡儿主义者剖析了头脑一样，扬森派剖析了心灵；这两派合起来解释了17世纪后期如此独特的自我分析，即对人类行为内涵的探究。不仅如此，扬森主义还蕴含着某种宿命论，因为人的命运已经由神意预先注定了，这一观点很符合关于必然可命定的希腊观念，而这两个思想成分在拉辛的诗歌里和谐地结合起来。

可以把另一个伟大的著作家同源於蒙田、笛卡儿和扬森派的影响相联系。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年）——他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成就另作论述^[8]——使自己同扬森派的大本营田野静室联结起来，因为他的姐妹是该修道院的一位修女，也因为像笛卡儿那样，体验过某种他以“皈依”来解释的神启。他写在碎纸片上的《论思维》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收集和编辑，这些相互独立的思想固然完全不协调，但提供了有关所谓教学的一项有趣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帕斯卡不过是蒙田和笛卡儿的信徒。他认为正确的推理是引导人生的唯一可靠的指南。理性显示了文明的极端人为性——比利牛斯山一侧的真理到了另一侧就成了谬误；正义不过是碰巧被确认的东西；气候和机遇决定了人类一大部分行为。但是，这些事实虽然在别人那里得到默认，甚至引起某种程度的乐趣，在帕斯卡心中却造成了不安和沮丧。他从笛卡儿获取的教训在于，我们的各种假设能得到证实的不过凤毛麟角；他从扬森派引申来的教训则在于，我们的同胞中得到拯救的是如此寥寥无几。而且，同其他宗教相反，基督教由于坚持某些心理状态而很难实行。的确，它的许多精神可能同人类生理要求相冲突。这些要求还可能同理性相对立，因而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人类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内在冲突”。

帕斯卡比任何其他教义辩护士都更加可怕地意识到有教养者信奉基督教教义和接受神启所面对的困难。在这方面，他和差不多同时代的波舒哀截然相反，后者对每个显然不符合他的信仰的事物置若罔闻，用这种简单的办法享受达到完美信仰的幸福。《论思维》深为关切这些矛盾；因此，帕斯卡以一种几乎绝望的，把每个可谓相反的事物同自己的信仰相对照，即使这个事物不过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这样，他的证据不过等于一系列集中起来的看法，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从未取得数学同行笛卡儿声称达到的那种程度的确定性；的确，他有时似乎暗示只有放弃理性和克制肉欲，灵魂才能得到安宁。他自己的内心平静看来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心理经验之影响，造成了坚强得足以抵抗生理吸引的结果。拉辛可能经历过类似的体验；无疑，他的许多剧中人因为“内在冲突”而心理崩溃。帕斯卡虽然活到1662年，但和路易十四时代没有密切的关系，也不能把他和天主教的任何伟大传统联系起来。他的确是个“孤独者”。

灵感在帕斯卡看来是独处冥思的结果，才智则是在同雅士淑女的交往中形成的，并且在交谈中自然表现出来。17世纪后期和整个18世纪的条件有利于交谈达到高水平，因为今天困扰我们的那么多事情当时可以留给别人去做——仗由军人和水手去打，贱活由仆人去做。按照布瓦洛的看法，一个人光写书还不够，还必须在健全的社会中生活和谈话。据拉布里耶尔称，口语可以达到比书面语言更完善的境地，因为它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发声说出的，这种真实的环境（无法在书中再现）使它具有分量和意义。这就有了“情趣”一词的一种专门用法。一首诗可能有“情趣”，这不是指它“富有生气”，而是因为那么多妙语佳句用一种出乎意料和打动人的方式把通常无缘的事物结为一体，以此引人入胜。路易十四说拉辛充满“情趣”，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成为文艺的明确目标的谈话才能。

在整个这一方面，妇女起着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17世纪没有什么解放女性的作为；但是在法国，公侯们的妻女已经在该世纪中叶解放了自己，当时贵族的投石党运动^[9]给她们提供了发表著述的机会。做媒和撰写回忆录是那个时期的女士们充分自我表现的领域；不过，在那个世纪的早些年里，妇女就已经把人们聚合在沙龙之中，朗布耶夫人的沙龙便是个著名的例子。在这些聚会中，一位男士可以在自己的看法公开发表以前先作预演，或可以在一个新思想开始流传以前先行了解；或者，他可以写一本明智的文明史，因为他的女赞助人抱怨历史书籍是那么愚蠢，沙龙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因素。一位妇女为了成功地主办沙龙，不一定非得受过很高的教育，她只需要有女人气质。她能很容易地在她的男性崇敬者中间煽起竞争；她可以抑制粗鲁和激烈，还能够依靠母亲的机智，使放肆和浮夸行为丢脸。当一位过分轻信的修道院长翻来覆去地讲述一个被斩首的圣徒双手捧着自己的头颅走了多少步时，她或许会耐心听讲，但也会插进一句令其哑口无言的妙语：“大人，不是新货价不高。”笛卡儿主义对理性的莫大尊崇很符合在法国占上风的这种理智，并且有助于证明德莱顿的评论之有理：法国人长于批评，英国人长于作诗。

从妇女起着重要作用的这种文明中，出现了与专业玄学家有别的“哲学家”，即思想探究者；在原先满足于报纸和浪漫作品的闲人和社交妇女中间，阅读一些严肃的著作也因此蔚然成风。拉布里耶尔说下面的话时或许想到了这一点：在法国，大议题是禁区，因而文人学

士常常不得不诉诸冷嘲热讽。这些表达方式在英国一向不那么流行，那里自1689年后，教会和国家比较宽容；但旧制度下的法国情况两样，在那里政府和统治集团总是设置了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压制背景。按照“口说无凭，书写为据”的原则，较为大胆的人物可能更喜欢口述言谈，而非公开出版的著作。因此在许多沙龙里，早在大革命以前革命格言就可能已是老生常谈了。

这种由于凡尔赛的支配而加强了法国生活社交化反映在法语之中。在整个17世纪，随着本国语言逐渐取代拉丁语，人们不再操两种语言，不得不使他们在母语适应前用拉丁语——无论怎样不适当——以应付诸多的需要。这种取代的意义由笛卡儿表述在《方法谈》一书中：“如果我用法语，而不是用我的导师的语言拉丁语写作，那么这是因为我希望，只运用自然理性的人将比那些只相信旧书古籍的人更好地评判我的观点。”“自然理性”对“旧书古籍”的这个胜利是该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在科学的进步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证明。^[10]然而，本国语言现在不得不接过先前由一种国际专业语言履行的任务，不大大扩展自己，这个胜利就不会取得。此一过程难免是漫长的，本国语言的许多新词汇难免保留了与其拉丁祖先的联系，这些联系如此密切，以致它们始终未完全融入日常用语，因此就有两种词汇被使用：一种用于具体事物和简单的情感；另一种用于抽象概念和比较深奥的思想方式——第一种简单直接，第二种则往往模糊不清、捉摸不定，在学术领域不无价值。有时，这些词汇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同代的或接近同代的作家那里占上风：例如英国的班扬和德莱顿，法国的莫里哀和波舒哀。这是法国人对英语和英国思想两者施加有力影响的方面之一——这种影响绝非仅限于本章阐述的时期——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媒介，许多包含抽象观念的拉丁词汇加入了英语惯用法，从而便利了哲学或半哲学论题的讨论。

同样在这个时期，法语变得更加灵活了。它同英语相比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长处：它更自由地使用虚拟语言，为此只要改变动词中的几个字母，这样即使在同一个句子里也能方便地从断言性陈述过渡到假设性陈述；而在英语中，凡虚拟语气只能蕴涵于动词 to be 的曲折变化的场合，要表达语气的变化就必须使用should或 might之类词汇。结果在法语中，人们可以方便地用曲折而非平铺直叙的方式进行表述，这对流畅地阐述一个抽象论题极为有利，因为可以运用不同程度

的强调或暗示，而无可能性陈述或他人的观点被误认为断言绝对事实的危险。请看帕斯卡1656年《致外省人书简》中所作的范例。这些书简卓越地揭示了对诡辩术的滥用。它们的作者意在显示半真半假和有意省略之类方法，据此你能够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而且他的揭示由于如此有节制而更加有效。帕斯卡在取得这一成功的过程中，显示了法语因其灵巧易变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武器；在先前的论辩作家会大肆咒骂的地方，他却以戏谑和讽刺使读者开心。他或许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依靠熟练地遣词用字，歪曲真理甚至常识是多么容易。饶有意味的是，他突然停写《致外省人书简》，因为他作为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担心它们的成功可能会无法弥补地伤害耶稣会士，甚至天主教会。果然如此。正是在《致外省人书简》中，伏尔泰和其他启蒙哲学家看到了他们祖国语言的潜力的明证；更有甚者，先前用拉丁语体面遮盖着的种种神学荒谬，现在被阳光一般清晰的语言暴露出来，任凡夫俗子取笑。认为18世纪的怀疑主义取自敬畏上帝的帕斯卡之多，不亚于它取自持不可知论的贝勒，是不无理由的。因为，用法语撰写的一部机敏之作，在一个时期里可以危及一座神学巨厦，就像它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可以证明是对旧制度的一纸宣战书。

这些考虑可以帮助明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天才们的独特成就。国王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大功劳是起了赞助作用，舍此凡尔赛宫富于想象力的成就可能会小得多。莫里哀的情况尤其是如此。路易识其才华，授予其剧团官方地位，充当这位剧作家的儿子的教父，保护他免受教士阶层的干扰和可能的迫害。莫里哀（1622—1673年）是J.B.波克兰的俗名，家具商的儿子——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事实，因为这是从商业阶层上升为名人的少数例证之一。莫里哀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著名的奥尔良法律学校获得详尽的法律知识，这后来对他大有裨益；像以后的狄更斯那样，他了解法律界及其内幕。他组织了一个剧团，在各省旅行演出，1659年定居于巴黎。国王于1660年亲临观看的《可笑的女才子》一举成功，他因此名声大震；但是，他那大胆的《伪君子》（1664年）重新招致了教士阶层的敌意，被禁止公演。此后他的剧作接二连三地迅速问世：《唐璜》（1665年）、《愤世嫉俗》（1666年）、《屈打成医》（1666年）、《吝啬鬼》（1668年）、《浦尔叟雅克先生》（1669年）、《贵人迷》（1670年）、《女学者》（1672年）以及《没病找病》（1673年）。正是在扮演上

述最后一个戏的主角——极端多疑的阿尔贡时，莫里哀突然发病身亡。

莫里哀的名声是从《可笑的女才子》开始的，这是一出嘲笑“过分文雅”即讲话矫揉造作的独幕喜剧。每个文明民族都会在某时候产生此种文化赘疣。在法国，赘疣就是过分文雅，而莫里哀所看到的是朗布耶侯爵夫人的沙龙，她从1610年起向那些不满宫廷俗气的文人雅士敞开其巴黎宅邸“当屋”的大门。在这个小圈子里，某些词汇和短语特别受人喜爱，一个自有其惯例和夸张词汇的浪漫天地取代了污秽的外部世界。《可笑的女才子》给我们提供了一出酣畅欢闹的喜剧，在其中两个年轻小姐玛格黛隆和卡特霍丝由于两个假贵族的身份大白而最终不再想入非非，后者实际上是她们觉得平庸乏味的两上真诚追求者的男仆。处于幕后的是女主角的父亲和叔父戈尔吉布兄弟。他们对其过度夸张的言辞束手无策，还有侍女玛洛蒂，她的尖刻的现实主义帮助消释了女主人的夸夸其谈。然而，甚至莫里哀也未成功地摧垮矫揉造作习气，1672年他在《女学者》一剧中再次使用了同一个主题。

这里所以简析《可笑的女才子》，是因为它确立了莫里哀的大多数剧作所遵照的模式：情感和癖性在家庭生活的亲密关系中相互作用。在法国，家庭生活一向被隐蔽起来，奉为神圣；这位剧作家在洞察其亲密方面达到了一种非如此就不能取得的力度和中肯。在这些室内剧中，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作为其他人的陪衬而行动——或许是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或女主人与其追求者之间的不协调；而侍女则总是作为法兰西基本特性的那种常识的阐述者。在家庭的框架之中，莫里哀嘲讽了某些人物典型，例如守财奴、极端多疑者、渴望爬上贵族地位的资产者、神经过敏的悲观主义者和宗教伪君子；许多法国人在嘲笑剧作家所描绘的这些反常人物中，是在嘲笑他们自己，而健康的笑是人类生活中最有益于身心的事情之一。他也没有饶过有学问的专门职业；的确，《没病找病》是对他那个时代行医术的最尖刻的指控：只有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才渴望经过医生治疗活下来。

《伪君子》大概是表现这种家庭内相互作用的最好例子。几乎不用说，作者不是在指责宗教，甚至也不是在指责宗教狂，而是抨击恶人往往披着宗教外衣向宗教表示的敬意。17世纪的法国直到60年代为

止，存在着一个企图强制推行较高的道德标准和遵奉教规的组织——圣礼会，^[11]它肆无忌惮地使用密探和告密者来打击行为不检的丈夫和思想自由的市民；不过，它看来因为过于放肆而导致解散，尽管其余毒尚存。通过两个主角——伪君子达尔多弗和奥尔贡，莫里哀展示了宗教欺骗怎样能够使老实人上当；第一个主角是文学上斯蒂金斯^[12]的原型，而第二个主角是轻信伪装虔诚者的受害人。这一“魅惑”过程导致受害人的品格堕落，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妻子已被恶人勾引；更糟的是，他强迫自己的女儿嫁给破坏和腐蚀了这个家庭的达尔多弗，莫里哀冒着很大的风险，暗示宗教的外表可能不过是饕餮和淫欲的伪装，并且暗示此类邪恶行为可能通过上流人物所鼓励的一种特别的诡辩术而得到“容忍”。

然而，莫里哀远不止是个讽刺作家。他的早年生涯充满了贫困和奋斗；他由于家庭不幸而悲痛，忧郁寡欢的气质使他深思人类生存的奥秘。他的笑往往掩盖着他的泪水。他的肖像显示了一副在17世纪少见的面容：双眼露出的既有幽默也有哀愁，脸上缺少这个时期的肖像画中很常见的那种自满神态。拉辛把他称作沉思者。他更多的是在个人关系的纽带，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关系中看到了残忍和不义。这些纽带常常造成悲剧，例如贪婪的父亲或母亲挫伤了女儿的天性，这或是因为结婚必须先置嫁妆，或是因为从钱财角度看她的心上人不可取。他以此种方式，倡导了最基本的女权之一。总的来说，他是这样一些惯例和偏见的死敌，墨守于这些惯例和偏见造成了那么多不幸；他是所有真诚、自然和出自本能的事物的朋友。这部分地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他作为戏子，大半生是社会贱民，而几乎没有什么比受到社会排斥更能激励个性。在这方面和在想象力之丰富上，他使人想起另一个社会贱民：英国的不信国教者丹尼尔·笛福，他俩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革者，都深刻地洞察到由于民众的宽恕而难以驱除的种种邪恶。

作为人和剧作家，莫里哀和让·拉辛（1639—1699年）截然相反。拉辛像其同时代的众多名人那样，出身于从事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家庭，本来很可能投身法律界或教会。但是，他并非就读于某一著名的学院或公立中学，而是在15岁时进了“谷仓学校”，那是一所邻近田野静室的学校，受代表该修道院以及聚居附近的俗人们的扬森主义支配。拉辛一度是个孤僻的学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学习专心，

甚至如饥似渴，这不仅使他对希腊戏剧了如指掌，而且使他异常敏感和专注自我。他所受的训练包括本国语言练习——一门在当时的课程表中不常见的课目。而且，他从田野静室汲取了一种对简朴的清教和宿命论的同情心，他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有许许多多将受其影响。拉辛的血统含有斯堪的纳维亚成分，据某些作家说这导致了他性情中的某种无情甚至凶狠；与此同时，他可能从法国祖先那里吸取了他那女性般的敏感与文雅，他曾想进入教会，只要能得到一个薪俸优厚的职位。但是，他虽然一度主持安茹的一个小修道院，却不得不放弃从教生涯的想法。他曾暂时背弃田野静室，并且未善待早些时候待他为友的莫里哀，从而显示了自己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他与女人私通，这并非一贯有益于他的名声；的确，他在这些奸情中表现出一种冷漠，这有时是那些熟知异性奥秘的人才会有有的。在分析妇女心理，特别是初入中年的妇女的心理时，他显露了解剖学家而非情夫的鉴赏力。他的性格不同寻常，并不总是让人喜欢。

拉辛还是个谜。《菲德拉》在1677年的失败归因于那个大挑拨离间者布永女公爵（马扎然的侄女）——他可能得罪了她——组织和导演的同行倾轧。这一事件似乎毁了这位剧作家。在此后12年里，他默默无闻；然后，另一位妇女出现了，那就是路易十四之妻曼特农夫人，她请他编一出宗教剧，由她在圣西尔的神学院的年轻小姐们表演。于是有了《爱丝苔尔》（1689年），紧接着又有《阿达莉》；然后是又一个沉寂时期，直到他于1699年死去。与此同时，他结了婚，有了家庭，而且同田野静室重归于好。据说，他在凡尔赛宫失宠了，因为他在《爱丝苔尔》和《阿达莉》两剧中含沙射影地提到独裁者，也因为他公开表示同情农民；或者，他可能经历了某种类似于帕斯卡有过的心理经验，这迫使他放弃了舞台。这些事情引起了许多猜测，其中有些猜测荒唐无稽。看来肯定无疑的是，他那与莫里哀相比不大容易受到赏识的天赋，表现在他对感情危机和严峻形势的深刻说明之中，这种说明是按照冷酷无情的逻辑和天命难逃的宿命论来进行的，并且用韵文——通常缺乏想象，但充满使人感到断断续续的精确和水晶般的清晰的对句——来陈述。英国文学中绝无与此相似的东西；拉辛在法国以外从未得到充分的赏识。

拉辛成功地探索了妇女心理的奥秘，这一点由他的剧作对异性的巨大吸引力得到了证实。基于欧里庇得斯的《伊波利特》撰写的《菲

德拉》就是一个好例子。女主角菲德拉是忒修斯的妻子和帕西法厄的女儿，爱上了她丈夫与其前妻的儿子伊波利特，并向她的保姆和心腹奥埃农承认了这一不正当的情感。忒修斯死去的谣言引起了虚假的希望，菲德拉发觉伊波利特与阿里亚厄相恋，因而在折磨女主角的激情之上又添加了妒忌，由此加深了悲剧迫近感。在其自我分析中，菲德拉憎恶她的激情，并对它的命中注定的后果感到恐惧；她的意志与命运作了徒劳的抗争。伊波利特暴卒，菲德拉自尽。只有一位艺术大师才能使这样一个主题免于陈腐。

对妇女心理的这种深刻分析，还可见于《伊菲革涅亚》以及他后来创作的剧本《爱丝苔尔》和《阿达莉》。1689年2月，塞维尼夫人观看了由曼特农夫人在圣西尔的神学院的年轻小姐们演出的《爱丝苔尔》。她给女儿写道：

我很难告诉你这出戏使我多么感动；这是某种不易形容、永远无与伦比的东西；因为它如此完美地把音乐、韵文、歌唱和角色融为一体，毫无缺憾；扮演国王和伟大角色的姑娘们看来表演出色；观念全神贯注，唯一的遗憾是一出如此美妙的戏剧竟会闭幕。剧中的一切都是朴实无邪、崇高感人的。它对圣经的忠实令人肃然起敬。所有咏唱都切合取自赞美诗和名言集的歌词；它们因此而美不胜收，催人泪下。

其他观众并不这样衷心赞颂这出戏。确实，有些人把它解说成是个讽喻作品，爱丝苔尔隐喻曼特农夫人，她的对手凡西迪隐喻蒙特斯庞夫人，傲慢的阿曼则是指卢瓦侯爵。阿曼在第三幕说的下面几行台词，被某些人认为是描述国王与其大臣卢瓦之间不幸的关系：

他知道，他欠我一切，为了他的光荣我把悔恨、恐惧和羞辱踩在脚下；我以铁石心肠行使他的权力，使得法律如同废纸，使得无辜者痛苦呻吟。

可能的是，到1689年，拉辛已经像他的许多明智的同代人那样深感失望。

还有两个伟大的著作家，他们虽然并非国王的十足信徒，但被搞得同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可以将其见解当作王家关于历史、政治和诗歌的观点的半官方表态。他们是波舒哀和布瓦洛。成为莫城主教的雅克·贝尼涅·波舒哀（1627—1704年）性格复杂。虽然他无可指责地信奉正统，但就笛卡儿主义者和扬森派信徒赞成一种较为严格、合理的道德而言，他同情这些流派；然而另一方面，他全不同情寂静

派，这导致他疏远了费奈隆。作为一个争论者，他在《新教演变史》（1688年）中有效地利用了据信是新教事业最虚弱的一点，即同天主教会表面的统一相反，新教分裂成无数通常敌对的宗派。他还全不隐瞒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不管新教徒其他方面可能怎样，他们反正不能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这个观点绝不是这位主教独有的。

正是作为王太子的导师，波舒哀写成了两本用来教诲其王家学生的名著。《根据经文论政治》一书提供了世袭君权来自神授的最充分的证明。这一信条是从《旧约全书》引申出来的，其中认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国王及其臣属所效法的楷模。^[13]另一本书《世界史教程》是个尝试撰写一部文明通史的有趣的例子，包含了对万事发生原因的某种完整的解释。对这位主教来说，找出答案是轻而易举的。他认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条件都同帝国的兴亡毫不相干，这些变化纯粹是神的意志和意图的表现。上帝只启示犹太人和基督徒；即使希腊人也只被给予一小部分神恩；所有其他文明不过是盲目崇拜偶像。于是，人类历史是基督教发展的记录，而且饶有重要的是，波舒哀所考察的历史终止于查理曼大帝。对作者及其大多数同代人来说，中世纪几乎不过是如日中天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以前露出一缕曙光。波舒哀的世界史是此类书中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他的后继者不得不提出别种非常不同的解释，所用的语言不像这位莫城主教特有的那么威严和铿锵。

在另一个文学领域，即悼念死者——总是贵族——美德的祭文或悼词方面，波舒哀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声誉。几乎没有什么文体会比一位显贵的悼词更虚伪的了，因为在这个场合阿谀奉承不会有害，而且我们大家都同意应当尊崇美德；但是，老式的悼词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称赞的：它的用意不仅仅是加入业已喧闹的歌功颂德，而且是趁此机会灌输从死者树立的榜样中引申出来的道德教训。波舒哀的前人在这个高度专门化的文学领域常常是以使用牵强附会，甚至荒唐可笑的明喻为特征的，他们的葬礼说教并不总是具有此种场合要求的尊严。但不能说这位莫城主教有此弊病，他所作的悼词不仅庄重，而且甚至有几分威严。他的主题是将尘世生活的虚荣与灵魂的永恒相对照；死亡对他来说既是毁灭者，也一样是拯救者；正是在它面前，他极清晰地阐明了那些要在日常生活的琐碎言行中实施的天主教要义。他的神学体系不容许有丝毫怀疑，却为树立楷模——无论生者或死者——提供

了广泛的余地。以这种方式，波舒哀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中许多精华的半官方阐释者。

另一位半官方阐释者是布瓦洛-德普雷奥（1636—1711年），专长诗歌和鉴赏。他是个注册官的儿子，就读于巴黎的博韦学院，在那里学神学和法律。一度供职于巴黎最高法院后，他献身文学，很快因讽刺散文和翻译朗吉努斯的《论崇高》而声名鹊起。1673年，在多年仔细修改后，他发表了《诗艺》，随后又发表了《读经台》。1677年他和拉辛一起被任命为国王的史官，1684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在古典派和现代派的竞争中，他站在古典派一边，因为他崇奉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贺拉斯。的确，人们一直认为，你若有任何值得一说的东西，它已经由这两人中的一个远为精彩地说过了。1685年，布瓦洛隐退到他在奥特伊尔的郊外宅邸，在那里他从未再有过早年的灵感，去世于矗立着圣徒小教堂和司法宫的旧巴黎的心脏，即后来伏尔泰栖身的那个街区里。有如塞缪尔·约翰生，他本质上是个城里人，对他来说溪流田野单调乏味，山丘峻岭狰狞可怖；他还像约翰生那样，几乎只是为交谈和文学而活着。一个是英国常识和保守主义的坚定卫士，另一个是法国精神和完美表述的坚定卫士，而这种完美表述只会源于把献身于文学事业作为毕生孜孜所求之士。

布瓦洛将他苛刻的标准应用于前两代法国文学中一切幼稚者或愚昧者；这两代中固然包括高乃依和斯卡龙，但也包括许多戴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桂冠的平庸之徒。在他的前一辈中，有不少人按照以篇幅冗长弥补灵感缺乏这一原则来处理英雄或圣经题材。于是，摩西、大卫、克洛维和圣路易充斥道德教诲为其唯一特色的史诗，直到1665年沙普兰发表长达24000行韵文的《女郎》。要戳破这些气泡并不难。

《读经台》就做到了这一点，它根据圣徒小教堂内发生的一系列真事写成，涉及两个教士，其中一个抗议读经台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唱诗班。这引起牧师会中两派大斗。一个特大的读经台建造和设立起来，目的是更完全地挡住抱怨者的视线。他们从动口咒骂到动手殴斗，接着是一场书籍战，其中印有枯燥沉闷的史诗和蒙昧主义的评论之最大号对开本提供了重炮，用来对付八开本的轻火器，包括斯居代里小姐的十卷《克雷莉娅》。有如伏尔泰、布瓦洛从不放过戏弄人的机会，如果一箭双雕就更受欢迎。《读经台》表明，对写作史诗来说17世纪的法国太老了。确实，布瓦洛靠用夸张的语言来描写荒唐事

件，使得那些在英雄色彩大减的时代试图让荷马和维吉尔的诗才永葆青春的前辈们声誉扫地。因此，他坚持认为诗歌应当是诗人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的表现。他还利用机会来讽刺教士，讽刺他们的鸡毛蒜皮之争、他们的贪婪和对于享有应得的尊敬的执着。像当时那么多受过教育的法国天主教徒那样，布瓦洛按照传统过复活节，参加弥撒，取笑教士等级集团。

更重要的是《诗艺》。它虽然几乎不长于一千行，却费了5年才写成。文稿被交给友人阅读，以征求意见，诗的部分章节念给国王听，后者表示赞同。因此，这部诗可以被认为是对古典主义的半官方阐释，正如它在西欧开始被人理解的那样。虽然借鉴于贺拉斯之处昭然可见，但《诗艺》远远超出纯粹的模仿，而且有许多容易记诵，也值得记诵的诗行。它的主要训示是，你要有好文笔，就必须有好构思——你的构思必须在逻辑上是笛卡儿式的，在其中你从一个确实性进到另一个确实性。自然、理性和真理互相表现，它们提供了诗艺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献身艺术的人应当是个优雅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应当通过同上流社会、包括女界的接触完善自己的气质。因此，健康的交谈是帕那萨斯^[14]山坡上必不可少的一项礼节，匀称平稳的亚历山大格式取代了那些痉挛的六韵步诗行，在那些诗行中特尔斐^[15]的神谕被表现得含糊不清。诗人不是幻想家，而是社交动物；他的作品应当具有善于言谈者的贴切、简洁和机智。虽然必须有灵感，但它应当予以严格的控制；文体必须通过长时间精巧修饰达到完美程度；决不能有平庸的诗作，正如没有低劣的钻石那样。语不惊人誓不休；或者，如教皇所说，最终、最伟大的艺术是“涂抹”的艺术即裁剪删削。这些原则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直到18世纪后期才被自由表达个人及其奋斗的浪漫派取代。布瓦洛的格言隐约地体现了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这个社会以性格和行为的标准概念为基础，毫不同情异国情调和标新立异，对陈词滥调和愚昧昏庸总是十分敏感。

至此，我们已叙述了那些可以同凡尔赛宫密切相关——因为他们直接受到国王鼓励——的艺术家、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个领域，即音乐领域，在那里可能建立起这种和谐与富有成果的联系。^[16]艺术和音乐史家随意使用“巴洛克”一词来概述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或者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术语，意指从某种较严谨的或“经典的”模式偏离或甚至退化。这个词容易被滥用。该世纪早些时候，芭蕾舞流行，

并且同宫廷关系密切，以致通常被称作“宫廷芭蕾”。马扎然时期的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强烈，这有助于宫廷芭蕾转化为歌剧，这一演变主要是由佛罗伦萨人詹巴蒂斯塔·吕里（1632—1687年）实现的，他在1652年进宫效劳；后来，他成了国王的音乐指挥，几乎完全垄断了戏剧表演所需的乐谱创作。依靠行使这一专制权力，他发了大财。他的专制还扩及其乐队，后者要服从一种无异于路易十四对其廷臣和臣民所施行的纪律。吕里对歌剧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前奏曲和进行曲，这两者特别适用于表现弥漫于凡尔赛宫的那种威严感。

在神殿最深处伺候路易的高级教士们便是如此。在神殿门槛上，则有这样一些名士才女：他们虽然未热情地的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但仍同宫廷相连，因而是社交界的一部分。拉罗什富科公爵弗朗索瓦（1613—1680年）就属于这个范畴，他是投石党运动的一个失望的幸存者，所著《格言》在1665年首次出版。这些将美德归结为自爱的著名警句代表了一个变得具有深刻自知意识的社会，试图检验和揭示那些在一种爱好交际的生活方式中确保成功的原则。它们具有一种生硬和尖刻的智慧，出自沙龙中辛辣的辩驳而非书斋中深沉的思考。它们的现实主义可能多少得益于蒙田；它们的尖刻可能来自这位经历了投石党惨败的显贵人物的耻辱；它们的简练机智在交谈中是那么有力，出现在印刷品上却丧失了几分锋芒。把它们同奥斯卡·韦尔德的格言比较，便可估量丧失了多少锋芒，后者如此有效是因为有交谈作点缀。不过，《格言》所以没有更尖刻归因于一位妇女。拉罗什富科和妻子分手后，与同样是独身的拉斐德夫人同居；在这个新家庭中，公爵的玩世不恭之态有所收敛，夫人则热衷于撰写一部历史小说，在其中显示即使在法国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也能（在上层）找到爱情及其种种纠葛。她就她那忧郁的伴侣写道：“拉罗什富科先生赋予我精神，而我改造了他的灵魂。”此乃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就两人都是周围社会的尖刻批评者而言，人们可以方便地把拉罗什富科同拉布里耶尔（1645—1696年）归为一类，然而，前者是公爵，后者却是贵族的家庭教师。他以此种身份侍候伟大但傲慢的孔代亲王，这方面的经验导致他深入地思考生活和行为问题。他从翻译希腊人物作家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入手，在《品格论》（1688年）中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来阐明当时非常流行的自省习惯，同时并非不明白对生活的这一纯否定态度所包含的牺牲。他写道：“批评的愉快剥夺

了我们被非常美妙的事物深深打动而感到的满足”，就批评既可能导致严谨也可能导致拘谨而言，他这是在指出法国古典派的弱点之一。不仅如此，他还说“一个生为基督徒和法国人的人，发现自己只好写讽刺散文；大主题是他不得入内的禁区”，这表明他明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限制取得富于想象力的成就的障碍。拉布里耶尔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他把良好交谈的要求概括为有予有取：“凡同你交谈后满意他自己及其机智的人，对你也感到完全满意。”关于妇女，他自然有许多议论。他认为她们中间极端者较多；她们要么比男人好得多，要么差得多。她们的生活不是受原则控制，而受心灵控制。当他写“恨的代价小于爱的代价”时，他是在概括那种对他同代人具有如此魅力的激情心理。

另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合理人生行为指导者是让·德·拉封丹（1625—1695年），一位林业总监的儿子。他喜爱研读古典著作，一度曾供职于他父亲掌管的部门。在沙托推勒里（香槟）他的家中，他掌握了详细的自然和野生物知识。恰巧，年轻暴躁的布永女公爵在沙托推勒里，遇上了这位诗人，把他带回首都。结果，拉封丹被介绍进上流社会，特别是女界。在寡居的奥尔良女公爵羽翼下，他经常走访卢森堡的一群时髦人士，行为举止如同男领宾员。他被介绍给大财政家富凯，这使他得到了一项年金，至1661年该大臣落难时停发。与此同时，他结婚成家，有3个儿子。不过，他把家庭撇在一边，因为他不想受家室之累。由于他希望在巴黎生活，他还卖掉了林业监护官职位。拉封丹对道德完全无所谓，他解脱了家庭顾虑和挣钱谋生这一乏味的生存之道，不过这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甚至绅士的方式做到的。在对他的“彩虹女神”和“斑鸠”萨布利埃夫人起了恋慕之心以后，他在1672年与之同居（她已同其丈夫分手了），此项安排被这位贵妇描述为：“我养了一条狗，一只猫，还有拉封丹”。专长科学和哲学的萨布利埃夫人在以后20年里给这位诗人提供了一个窝，他在这个窝里能够同猫分享对两件事——舒适和生存——的渴望，还可以实践一种令人惬意的自然主义，那是以他对存在之原理的本能感知为基础，来自他如此通晓的野生物世界。对一位诗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才能，在这个矫揉造作的时代尤其如此；当法兰西学院于1694年选他为院士时，它显示了罕见的眼力。1693年，萨布利埃夫人去世，这迫使他转到较虔奉宗教的另一家去，在那里以道德教诲度过残年。对

所有这一切的最好评语出自伺候他的一位婢女：“上帝不会残忍得要来诅咒他。”

第一版《寓言》于1668年分6册出版，随1694年第12册发表而出全。在后几册中，拉封丹多少更加自由地运用其文学手段。他选择这一表达手段可能是受了苏格拉底学说的影响，这一学说认为可以通过诗和寓言的形象化描绘最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诲。确实，他在开头6册的导言中说，苏格拉底在生前的最后日子里忙着用韵文改写《伊索寓言》。“我们是动物王国内所有善恶好坏的缩影”；在这些所谓低等动物的简单故事里，我们可以像在镜中那样看到自己。要寻找它们的意图的任何理论很可能是徒劳的。拉封丹本质上是个“爱交际的”社会生物，和莫里哀、拉辛和布瓦洛匹配，组成一个四重奏小组，他们在“白绵羊酒馆”的欢乐聚会上讨论各自的作品，犯规者罚以诵诗一首，或甚至读一页沙普兰的作品。

1682年，像通常那样由于一位贵妇的缘故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把他推到了前列。那一年以一种新药——奎宁引进法国而著称，这种药被称为金鸡纳，被用来专治热病，取代传统的腹泻和放血；这项创新引起了专业药学家和业余药师之间的激烈争论，后者深信新药有效。在投入这场吵闹的人当中，有那位悍妇布永女公爵——拉封丹的第一个伯乐，现在似乎是奎宁的发现者。她要他写一首诗赞扬这种东西的药效。女公爵的这位老被庇护者一向渴望表现感激之情，因而同意了。因此奎宁可能是唯一特别由一位诗人公开做广告的药物；而且，为了描述其成分，作者看来探索了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学问。他在所著《普叙赫的爱情》的序言中，已经坦率声明：“我的主要目的—向是让人高兴”，那是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诗集，而他所写的一切都适合于我们每个人的童心。其他诗人在有目的的飞行中高翔，他却像“帕那萨斯山上的蝴蝶”一般飞来掠去；他的同代人在人类激情的微妙纠葛中挣扎，他却关注那些最终决定动物——不管我们叫它高等动物还是低等动物——行为的基本现实，那是即使一只蝴蝶也能懂的。以此方式，他成了一切战略中最简单的战略的专家，这种战略维持生灵的两大部分之间的平衡，即饥饿者与饱食者、精明者与自负者、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平衡。

然而，拉封丹让读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他诗如泉涌，以致经常在自己的信中不由自主地押韵吟诗；用这个手段，他达到了在散文

中无法达到的一种灵巧和简洁，其效果由于使用那种当时逐渐过时的16世纪法国的丰富词汇而更加强烈。在语言技巧以及对诗行韵律的敏锐听觉之外，拉封丹还具有一种戏剧意识，因而每个寓言通常都是一出独立的悲剧或喜剧，其来龙去脉以一种无法仿效的简洁和技巧娓娓道出。至于要从《寓言》中学到的教训，那是简单不过的——我们可以从狐狸、狼和老鼠那里学到大半。因为，鉴于每个人都威胁它们，它们不得不发展一种特殊技能，用来对付它们更温和、更受尊重的邻居的虚荣或朴实。“只要是狼，就必须像狼那样行动”；它腹中空空必须进食，这可不是它的过错。丛林之中斗智不绝，死亡乃败之惩罚；然而，这种竞争往往是温文尔雅的，因为经常有予有取，而且我们都能互相帮助。死亡和苦难必不可免，但我们必须耐心顺从：

死神前来超脱众生，
但我们切勿离开所在的地方；
好死不如赖活——
人类的格言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我们当中那么多人从其中的世俗智慧中汲取了我们的最初教益，所以《寓言》像《格里佛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那样，特别受到我们的钟爱。仅凭大名，就使得这位诗人的曾孙女在恐怖时期免上断头台，这表明了拉封丹在法国文明中被赋予的地位。

17世纪的道德观是以人和兽之间的截然区别为基础的，一个有灵魂，一个被设想为甚至全无智力，除了像人的一件财产那样，没有资格得到保护。笛卡儿提出了一种愚昧和残忍的论点：动物无感情；他的同代人以及许多后代人根据这一假设行事。结果在基督徒看来，要从动物界引申出一种行为理论是极不可能的，直到拉封丹表明在我们之中杰出者的行为和我们声称瞧不起的动物的行为之间，有那么多、那么接近的相似之处。如果这些类似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修正词汇，因为诸如“兽性的”“野兽般的”和“动物的”之类词语，总是被用来指这样的人类行为：它如此可鄙，以致只能同归属于另一等级的生物之行为相关联。甚至在最高雅的上流社会中，不管怎样精巧地掩饰，弱肉强食仍可能是最终的法则；或者，用寓言家的话说：

“越不让自己任人宰割，就越好。”拉封丹大概并无讽刺之意，但他把一向被截然分开的两个世界相提并论，这就可能无意犯下了一桩异端罪，它大得躲过了人们的注意，甚至他自己也一无所知。然而，不

管我们可能赋予《寓言》何种意义，每个人都同意它们讲得那么优美，以致本身就是乐趣。这些诗的魅力不在于韵律，而在于诗行的抑扬顿挫和简洁，它们写来毫不费力，以致拉封丹——一位诗王——必须被认为是这个矫揉造作、墨守成规的时代里最自然的作家。

拉封丹大概像依靠自然界生活的野生动物一样，极少鉴赏自然界；而且，直到以后的一个时代，人们才在自然界里寻求与自己比较真诚的情绪酷似之物。但是，塞维尼夫人堪称鹤立鸡群，就词汇之丰富、表达用语之多及其反映情绪之灵巧贴切而论，她的散文风格类似拉封丹；因此不奇怪，《书简》像《寓言》那样，在每个时代得到每个阶层的喝彩。若干因素说明了17世纪后期书信撰写的高水平——杂志和报纸比较缺乏，交通困难，这使得书信特别受欢迎，因为那上面的消息很可能被转告给朋友和邻居们；邮政逐渐改善，在这一世纪的后期尤其显著。塞维尼夫人《书简》的第一版在1697年发表，它们大部分是1671年至1691年间寄给她女儿格里尼昂夫人的，后者当时与丈夫住在遥远的普罗温斯。女儿看来有点儿傲慢和冷淡，并未完全呼应她母亲的爱。这种爱激发了在文学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的书简的写作。就像在一幅全景画中那样，它们使我们能至少追寻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的外观——1664年对富凯的审判；著名的公开处死，例如处死两个投毒者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和瓦赞夫人（塞维尼夫人在后者被处死时微微战栗）；为1671年布列塔尼省议会的一次会议增光添彩的社交活动；次年关于法国人在横渡莱茵河时遭受伤亡状况的报道所引起的恐惧（她儿子参加了战斗）；伟大的蒂雷纳元帅阵亡（1675年）——读他的英雄业绩对塞维尼夫人来说似乎像吟诵罗马史；她对“可厌的山谷”即田野静室的访问，在那里她聆听修女们开导人的谈话，思考她自己的拯救问题。这些只是较为有名的事件中的少数几个，它们在读者的心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塞维尼夫人的书简表明，她几乎不把在田野里见到的农民当人看待；但在这一方面，她是同她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一致的。尽管如此，至少在一个有趣的方面，她与当时的时代不同。她热爱她在布列塔尼的莱罗歇尔地方的宅邸，在那里披着月光孤独地漫步，回顾那些她甚至不愿向女儿透露的悲凉想法。她热爱树木，习惯在树干上刻写感情冲动的文句；她热心倾听鸟啼雀鸣，而且在月下特别富于思想。所有这些都预示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但最强烈的，是她给予一个冷

淡的女儿的爱——“我的女儿，请永远爱我吧，你是我的灵魂。”塞维尼夫人是文学中最伟大的母亲。

一种确实无疑的女性风格可以在坎布雷大主教弗朗索瓦·德沙利戈纳克·德拉莫特·费奈隆（1651—1715年）的作品中觉察到，这一风格可能是由于他作为一所女校督导的经验而形成的，该校专收近期“皈依”天主教的良家闺女。他从这项职业取得的教训体现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论女子教育》（1687年）之中。在他那个时代，他几乎独一无二地认识到妇女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以及给她们良好教育的必要；然而，像他的英格兰同代人哈里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那样，他认为女性本质上是从属的，一个女人只能在天然施加的限制内获得幸福和成为有用的。正是对天然性的这一强调使他的理论具有独创性，因为他主张应当尽可能顺从学生的天然爱好，宣称教育不是一个用信息塞满头脑的过程，而是提取和指导头脑中已有之物的过程。以此，费奈隆的论著先行展示了《爱弥儿》的思想；在所谓“诗式散文”——一个与内容而非形式更有关的短语——方面，他也是卢梭的先行者。费奈隆作为理想主义者和乐观派，相信人性本善，这最清楚地显示在所假设的“无邪年华”期间，并且极明显地和专制政府之下的腐败相反。这位大主教推崇自然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他先于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他把所有靠吸取这一财富养肥自己的人视为寄生虫。

1689年，费奈隆成了路易的长孙即勃艮第公爵的导师，犹如波舒哀是这位公爵的父亲即王太子的导师。还可以举出两者别的相似之处。波舒哀写了《世界史》，费奈隆则写了《泰雷马克历险记》，于1699年问世。这两部由大教士专门为被指望有朝一日统治法国的学生写的书，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前一部书声称在专制王权的演进中揭示了上帝的意志，后一部著作则表明这一意志怎样可以更好地用君主施行仁义和才智来解释。基于《奥德赛》，《泰雷马克历险记》中有两个理想国：一个是勒佩提克，在那里通过消除私有财产来保障幸福，另一个是勒萨伦特，在那里通过将权力局限于一个世袭贵族阶级（以与金银贵族相对照）来取得同样的结果。这两种国家都以农业为基础；奢侈品和过多的财富被禁止；统治者通过避免炫耀和在战争以外的活动中追求自己的荣誉来发扬美德，影射路易十四之意显而易见。费奈隆的理想国有如一个致力于崇拜苏格拉底的修道院。近乎禁

欲主义的节俭是其规则；音乐、戏剧和诗歌将加以管理，为的是只促进最高尚的情感，如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那样。统治者必须不断干预臣民，以便发扬美德；人被迫行善。希望在一个较晚的时代里（也是从自然出发来争辩）能迫使人获得自由。从《泰雷马克历险记》到《社会契约论》和法国大革命并不远。对旧制度的第一次有效打击不是出自无神论者或激进分子，而是出自虔诚的帕斯卡和德行高尚的费奈隆。

因此，费奈隆代表了路易十四统治年代里从伟大想象力成就时期到批评现存制度时期的转变，当时有思想的法国人关注着随国王专制主义而来的两大恶果：国内的苦难和国外的仇恨。可能，在这么一种气氛中伟大的文学无法繁荣，至少在当时的法国是如此，因为这个民族的创造性生活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巴黎和凡尔赛。可以把这种集中状态同18世纪较为健康的扩散状态相对比，后一状态的范例如伏尔泰，他虽然是巴黎人，大本营却在瑞士边境附近的费尔内；如孟德斯鸠，他如此密切地同波尔多相连；如卢梭，他几乎一直漂泊不定，在令人嫌恶的社会中生活。相反，太阳王发出的炫目光芒只照亮了一个小圈子；当这一光芒暗淡时，剩下的只是阴影和黑暗。可能是纯粹的偶然机会把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头30年光彩夺目的这么一群卓越的天才聚集在一起；或许，这个现象可以用国王和宫廷给予的直接鼓励和引导来说明；或许，从国家正欣欣向荣，即将步入远大未来的信念中，产生了某种激励。在伊丽莎白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中，人们可以追寻到某些这样的因素。在法国，大约1700年以后，它们就不易看清了。

我们能怎样描述路易统治时代早年令人惊异的成就呢？这些成就非常多样化，以致我们必须对接受任何单一的定义谨慎从事，如果下定义是可能的话。不过，我们对一件事是可以有把握的，那就是妇女的影响。在法国，这一影响通常既有激励作用，亦有裨益，这同英国的情况相反，在那里查理二世宫中有那么多妇女纯粹是唯利是图的，而且在那里妇女一般来说还未同文人学士结交，直到晚些时候才如此。法国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活跃、更有才智的国家之一；性和美味佳肴在那里不是禁忌，而是可以仔细鉴赏、区别对待的东西；伴侣关系不一定有婚姻誓词使之神圣，但仍可以建立在某种才智或精神交流的基础上，博得的是尊重而非耻辱。在英国，若有这样的伴侣关系，

就不得不小心掩盖起来。在法国的两大圣人中，有一个是侍女，这对妇女在法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把莫里哀除外（人们或许可以大胆假设）：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才子们若无其女朋友的聪颖、见识和魅力，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最后人们或许会在本章论述的时期内，是否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觉察到法国的影响？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接受下述事实：这个时期，而且实际上是整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个以威胁和武力为基础的法国霸权时代。存在反对这一霸权的愤怒的抗议和反应；在每个受到凡尔赛威胁的国家，无数小册子作者和讽刺散文家不仅对太阳王及其代理人，而且对他主宰的文化进行了尖刻的谴责。这种敌意在德意志与荷兰格外强烈，它们有特别的理由憎厌其强邻的傲慢。因此在这些国家，法国特征和文化被嘲弄为腐败堕落的，与条顿人的“诚实”和“刚劲”截然相反。在整个欧洲，流亡的胡格诺派教徒为谴责路易十四及其臣民系当今蛮族的浩瀚文库增添文字，以此火上浇油。

复辟时期的英国是个例外，或明显的例外。可以把这同查理二世的个人榜样和名望相联系，他的情趣更多的是法国式的，而非英国式的。他喜欢用一句机智的话来抓住一个论点，总是宁愿选择舒适而非艰苦，对异性全无腼腆之态——所有这些是高卢人，而非撒克森人的品性。但是，王家的影响在施加于音乐和戏剧时，并不总是恰当的，甚至也不是长久的。他把音乐重新引入教堂，而清教徒却一直把它逐之门外；不过，这种音乐由吕里使之流行的浅薄妖娆的曲调构成，它们被证明几乎不过是一种对伟大传统之主流的偏离，该主流为普赛尔和布洛成效卓著地予以恢复。复辟时期的戏剧也是如此，它并非失于猥亵，而是失于空虚。在建筑方面，凡尔赛宫为英国和许多大陆国家提供了榜样；在装饰艺术方面，戈布兰家族的成就帮助保证了18世纪家具制作的高水平。梨和油桃的种植丰富了园艺学知识；还可以说，从法国引进那些最初被认为是诱人堕落的奢侈品的东西使生活变得更加愉快。学法语成了时髦，即使在两国敌对之际。吕斯维克条约（1697年）缔结后不久，伦敦的报纸上就出现广告，大肆宣扬教授“正宗凡尔赛”法语的机构。

然而，并不是非得在这些时髦楷模或直接模仿的范围内来寻找法国想象力成就的经久影响。法国在英国施加了支配性影响的是文学批评领域，是关于诗歌艺术功能的总概念。两个饶有趣味的人物帮助促

进了这个过程。一个是在英国的法国流亡者夏尔·德·圣埃夫勒蒙（1610—1703年），他以非正式的文学使节的资格，促进对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更加流行，并且有助于提供一个现身说法，使文人们明白交谈的重要性。据认为，他有这么一个格言：理想人物是能够思考的法国人和能够谈话的英国人。圣埃夫勒蒙本人是个多产但非杰出的作家，他为德莱顿及其同代人提供了一个温文尔雅和过分讲究的范例，它同本地文艺的自然和新颖那么截然相反。两种理想被放在一起对照，结果形成了某种折中。

“恳请回答，有什么比写一出正规的法国戏更容易？有什么比写一出不正规的英国戏——例如弗莱彻的或莎士比亚的戏——更难？”

^[17]这些话出自德莱顿笔下，但尽管如此，他被证明是法国影响得以进入英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他深知本国伟大的文学成就和许多外国模式的陈腐，选择和运用那些他认为有助于纠正英国褊狭性的法国理论和实践的精华。他热心师法高乃依，试验在英雄剧中使用韵律，在对白中有效地使用之，从而为文学全盛时期对句的广泛流行及其高水平铺平道路。拿他1667年发表的《非凡的年代》来同《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年）和《牝鹿与豹》（1687年）比较，就可以表明他取得的进步。他早先的诗显露出一种较旧时代中的真正的灵感，但修养不够，而后来的作品则以更紧凑、更严密和更深刻著称。很可能就是这种法国影响促使他追求“精心遣词，准确造句”^[18]，把形式和表达当作思想和灵感必须限于其中的手段来研究。

德莱顿使之适合于英国的是布瓦洛，而非高乃依。1680年至1681年间，他协助W. 索姆爵士翻译《诗艺》，这几乎是代表官方承认布瓦洛是文学鉴赏的现代公断人，有如亚里士多德和朗吉努斯在古代那样。马尔格拉夫伯爵的《论诗》（1682年）和罗斯康芒伯爵的《论译诗》（1684年）突出地表明了这一承认。如此有才干的指导和如此高贵的庇护确保了法国文学典范的影响。德莱顿断言：“才智通过最浅显的语言传达得最好；一个伟大的思想用平凡的词汇表达以致愚者亦能领悟时，最值得称赞。”^[19]坚持清晰易懂是法国文学鉴赏的特征，正是在这一方面法国影响在英国最为有力。也应当想起，欧洲思想受到的最大智力影响仍是笛卡儿的思想，这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转变了17世纪的思想，渗入有着教养或才智足以接受它的人士的每个国家。笛卡儿的影响同布瓦洛提倡、德莱顿实行的原则和谐

无间，因为这三个人全都表明了流畅、严整和准确的优点，即使他们的成就是以独创性或想象力不足为代价的。这些特性在18世纪欧洲的文学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尽管如此，在路易十四个人统治头30年期间的法国精神产品中，仍有某些独特的、无法仿效的东西。它的平庸之作可以复制，它的想象力天才的成就独一无二。寓言家有许多，拉封丹只有一个；书简作家有许多，塞维尼夫人只有一个；道德家和说教者有许多，波舒哀只有一个。拉辛空前绝后；莫里哀必须被认为和莎士比亚并驾齐驱，而不能把他和他的同代人或模仿者等量齐观。这些作家虽然表现出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明确痕迹，但必须被包括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可以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经久不衰的成就正在于此，这同他行使的军事和政治霸权之昙花一现截然相反。

[1] 关于法国诸学院的更多详情，见前，第七章，第161页。

[2] 关于投石党运动，见第四卷，第十六章。

[3] 在本段及其下续数段中，作者得益于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的佳作：《法国的艺术和建筑（1500—1700年）》，鹈鹕丛书1953年版。

[4] 《情感画教授法》。

[5] 关于波尔罗亚尔和扬森派，见前，第六章，边码第132—134页。

[6] 关于法国绘画的更多详情，见前，第七章，边码第160—162页。

[7] 见第四卷，第四章。

[8] 见第四卷，第四章。

[9] 关于这一点，见第四卷，第十六章。

[10] 见前，第三章，边码第47—72页。

[11] 见前，第六章，第132页。

[12]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人物的姓，指那类道貌岸然的骗子。——译者注

[13] 关于波舒哀和君权神授说，见前，第五章，第99—102页。

[14] 希腊南部的山，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译者注

[15] 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殿而出名。——译者注

[16] 关于音乐，见第六卷，第三章。

[\[17\]](#) “论戏剧诗艺”（1688年），载《约翰·德莱顿杂文集》，W.P.凯尔编（牛津1900年），第一卷，第77页。

[\[18\]](#) “论戏剧诗艺”（1688年），载《约翰·德莱顿杂文集》，W.P.凯尔编（牛津1900年），第一卷，边码第95页。

[\[19\]](#) “论戏剧诗艺”（1688年），载《约翰·德莱顿杂文集》，W.P.凯尔编（牛津1900年），第一卷，边码第52页。

第十二章 荷兰共和国

17世纪下半叶，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迅速发展，但在荷兰共和国，这却是个巩固而非变革的时期。体制、经济和社会的框架实际上仍然和17世纪初期一样。唱主角的伟大国务家约翰·德·维特和威廉三世并未改组政治体系，甚至导使荷兰各政治派别（共和派和奥兰治派）分裂的问题，也同那些在1618年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奥兰治亲王莫里斯分开，在1650年将阿姆斯特丹和威廉二世分开^[1]的问题相差无几。在该世纪下半叶无疑存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但整个来说这些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竞争的派别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而非社会集团之间和重大政治原则之间的冲突。要解释这一局势并不难。到1650年，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扩张已达到了逾此便不易发展的地步，但它无法消除政治体系中那些业已造成危险冲突的不确定因素和紧张。

荷兰生活的复杂使人很难描述该国的社会结构。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别如此重要，以致没有任何笼统的概括能符合事实。弗里斯兰省养牛的乡绅农场主或格尔代尔兰德省拥有重要封建特权的贵族，在利益、权势甚至语言方面，几乎无法同荷兰省的城市显贵比较。格尔代尔兰德省和上艾塞尔省的租地农场主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地区，首先为满足个人需要而劳作，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同于荷兰省——欧洲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租地农场主，后者专门从事工业用商品化作物的种植和园艺，而不种谷物。然而，荷兰省在7个省中影响最大，因此只论述荷兰省的主要阶级可能是无可非议的。荷兰省的社会等级结构事实上很简单。贵族人数不多，组成一个严格封闭的等级。它没有很大的政治或经济权势，大部分土地由城市资本家拥有。贵族同城市自由民显贵家族没有联系，不对它们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到17世纪中叶，荷兰资产阶级已形成其典型形态。17世纪初通过商业致富并开始政府在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家族构成了事实上统治该省的寡头集团。它们提供了城市行政当局、省议会以及大贸易公司董事会中的任职者，连同这些职务而来的是指派担任城乡许多低级职位的独占

权利。很难估算属于“摄政”范畴的人共有多少；如果做一个完全谈不上准确的草率估计，也许为在荷兰省每1000个人中有1人属于摄政家族。它们的财产状况几无人知；显然，一个像霍恩那样的小镇上的摄政可能与阿姆斯特丹百万富翁有着同样的偏见和社会特权，但在省或全国政治层次上的权力和影响自然无法与之相比。到这个世纪中叶，大多数摄政已退出实业，把他们的金钱用于市、省和中央政府发行的终身年金、乡村地产或东印度公司股份的投资。他们已经使自己联合成一个社会集团，尽可能阻止其他家族加入其行列。他们显然有时获得了贵族头衔，并建造了漂亮的乡村宅邸，但仍然基本上是城市显贵，对某些形式的集约农业兴趣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里在泽兰和其他省，寡头集团的封闭导致了一种把官职当作多少可讨价还价的私有财产的观念。在法国，官职的买卖造成了穿袍贵族，而在荷兰共和国，正是寡头的贵族地位导致了不折不扣地表现同一思想的做法。统治家族开始按照事先同意的某些规则瓜分城乡公职，以便减缓日常争夺权力和利润的激烈斗争。然而，这一发展尚未结束，它渗入荷兰省相当缓慢，还未触及阿姆斯特丹。在许多年里，该市首席行政官科内利斯·德·格雷夫·范·泽伊德波尔布鲁克——一位非常精明的政客——保护约翰·德·维特政权免遭一群竞争者侵害。但他于1664年死后，极为激烈的冲突爆发了，这个城市朝秦暮楚，摇摆不定，孤立自处和无所不能的摄政少数人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使得省政府陷于瘫痪。

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构累赘复杂：它在事实上并不构成一个共和国，而是7个主权省的联邦，每个省都有其特性。联邦政府虚弱无力。最重要的联邦机构是联合省议会，每个省向它派出一个必须按其首长指令投票的代表团。联合省议会做出一个责成所有成员遵守的决定需要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不过，每天在海牙开会数小时的这个联合省议会有重要的任务要履行。它作为联邦的代表而行动，处理对外事务，控制国防和联邦税收，税额是按照一个固定模式在各省间摊派的，荷兰省缴纳58%左右。最后，它提名联邦的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这两个职务通常由奥兰治亲王担任。然而，联合省议会显然不是一个主权实体。主权归于各省的议会，它们的组成状况五花八门。荷兰省议会由19个各持一票的代表团构成，分别代表贵族和18个城镇。在省议会恰如在联合省议会，重要的决定通常是全体一致做出的：荷兰共

和国政府的原则是不得强迫其任何成员服从多数。在实践中，一个决定只有经过长时间谈判并且依靠主要国务家们的劝诱才能做出。

政府内的离心力有时受到两个重要官员的制约，他们是大议政和执政。大议政是荷兰省议会的法律顾问，作为省议会及其各委员会的主席而行动，带领省代表团参加联合省议会，往往负责共和国与荷兰驻外大使的通讯，接收后者的函件。一个精力充沛、才智出色并得到荷兰省内各城市行政当局信任的人，不仅能在本省，而且能在整个共和国行使决定性的权力。执政的职能比较含糊。担任荷兰省执政的总是奥兰治亲王。他由拥有主权的省议会任命，因而在理论上同大议政一样是个省政府官员。但是，由于他一向同时是几个省的执政（荷兰、泽兰、乌得勒支、上艾塞尔和格尔代尔兰德省通常提名奥兰治亲王，在联合省议会中没有代表的格罗宁根省和德伦特往往也这么做，弗里斯兰省则一向指定这个家族的拿骚分支的成员为执政），并且还充当联邦的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因而他当然参与联邦决策。不仅如此，他的贵族出身的巨大威望及其伟大家族的名声，还使他具有一种未经任何宪法规定，但仍然真实和重要的权势。

这个世纪的前半叶，荷兰省议会和执政之间始终关系紧张。40年代，荷兰省的寡头统治集团反对陆、海军统帅兼弗里斯兰以外各省执政腓特烈·亨利的黠武主义和王朝至上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的用意是继续同西班牙战争，并通过腓特烈·亨利之子威廉二世同查理一世之女玛丽结婚来加强奥兰治家族的地位。腓特烈·亨利希望支持英国内战中的王党事业，这引起了担忧和愤怒。但是，他在1647年死去；1648年，摄政们称心如意地在明斯特同西班牙媾和。然而，他的儿子、被指定担任其父亲一切显要职务的威廉二世年少气盛，喜欢冒险，他由于议会的这一胜利而感到沮丧，不久就自以为强大得足以向荷兰省和阿姆斯特丹挑战。这场冲突似乎十分严重，充满危险。但突然间，他于1650年11月6日死去。荷兰的国务家们发觉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形势之中。威廉二世的独子威廉三世于11月14日出生。他母亲玛丽·斯图亚特和他祖母即腓特烈·亨利的遗孀阿米莉亚之间的激烈冲突，破坏了他幼年生活的平静。在大多数省份，甚至未想到要指定弗里斯兰执政来行使威廉二世的职能，只有格罗宁根和德伦特领地才指定用此种方式填补空缺。这样，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联合省议会有代表的7个省中，有5个省实行真正的共和制，尽管在海牙的王宫里

一群加尔文派牧师和亲英贵族与冒险家仍在为奥兰治王朝的伟大而密谋策划。

此后近乎完全实行共和统治的22年，构成了荷兰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1651年，荷兰省议会试图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奠定基础，办法是在海牙召集所谓大议会，并且建议赋予这个机构——它拟议是所有省议会的联席会议，因而是联邦各省主权的总和——独断地决定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权利。按照荷兰省的看法，仍大致由威廉二世的门徒支配的联合省议会不是履行如此困难的任务的合适场所。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各省派往大议会的代表并不比派往联合省议会的代表更有权力，拟议的最高权力会议事实上只是个大使会议。结果，大议会（1651年1月至8月）无法产生任何建设性的计划，任凭自己沉溺于引经据典、混淆不清的讲演。唯一重要的决定是关于陆军的。现在，军务的处理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取决于七省中每个省的主权意志，结果陆军处于分裂为七支省军的严重危险之中。因此，大议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把一种无疑是邦联主要性质之一的倾向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正式予以确认。正如约翰·德·维特所说^[2]，联合省不是单个共和国，而是多个共和国。

约翰·德·维特不久成了共和派的领袖（这归因于他在1653年被指定担任的大议政一职）。他不仅努力维护新的、没有执政的政体，还尽力在思想方面为之辩护。它被他的追随者们称作“真正自由的制度”，而且有德·拉库尔特兄弟之类优秀的评论家和斯宾诺莎那样一位自成体系的哲学家为德·维特服务。这一文人的活动使该时期具有一种思想冒险的特征，即年轻人——1653年德·维特本人27岁——试图同笨拙的妥协所搞糟的往昔决裂。不过，该政权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崇尚教条的方面，只是非常复杂的现实所包含的因素之一。约翰·德·维特及其同事使各种传统的、可敬的倾向具有了具体形式。腓特烈·亨利和威廉二世的王朝政策在统治阶级中间，特别是荷兰省统治阶级中间激起公愤。因为它们导致了后果无法估量的冒险。威廉二世死后，权力的自然得主能够致力于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力了。原则上他们一向拥有主权，但从未充分行使之。他们立即堵塞了执权力渗入城镇和市行政当局的所有渠道。各个省议会决定，市行政官的年度选举今后将只是城镇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总是通过原有成员增选新人来实行。所有外界影响，特别是某些情况下有权从若干被荐候选人中

做出挑选的执政的影响，皆被取消，一小群统治家族的权力更加巩固。这一小群统治家族构成了德·维特派的最有力的后盾。尽管他们并非全是“德·维特分子”，但其中最重要的，特别是在荷兰省和阿姆斯特丹，把一个实际上给予他们垄断权力的政权一直视为当时最好的政权。

然而，这个政权并非仅仅是一个狭隘阶级的独裁。它深深地植根于全体居民的生活之中，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同人民大众分享其权力，而是因为它们背离大众，让大众自行其是。因此，共和政权得到许多不信奉国教者的默然支持，他们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加尔文派少数的褊狭之害。它得到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各派的支持，得到知识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支持。它不干扰许多非常活跃的宗教革新小集团骚动不息的发展，明智地把维特各极端派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过火行为当作自己的唯一任务。宽容原则是实利主义的，而不是基于任何哲学原则。摄政们一向不厌其烦地重申：建立加尔文派的独占统治将不可避免地毁灭对外贸易。

到17世纪中叶，很可能近一半荷兰人。（包括布拉邦特）仍然忠于天主教信仰。在荷兰和乌得勒支两省的城镇里，许多传教士获准进行其部分秘密的活动。这些省的大多数农村人口确实是天主教徒：荷兰文明继续渗有罗马的成分并不可惊。这没有改变天主教徒的处境依旧岌岌可危这一事实。荷兰共和国从官方角度说是个新教国家，天主教徒虽然被允许在愿意为当局不予注意而付出代价的条件下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但发觉越来越难保住他们在市行政当局中的地位。但是，并非不信罗马天主教，就只能信加尔文教。在总共或许约200万人口中，大概有1/3属于正统的加尔文教，因而该教仍然是尼德兰起义期间的那个样子，即少数人的信仰，尽管程度自然小得多。此外，有无数小教派大胆地表达对基督教义的极端自由的解释，甚至表达一种非基督化的宗教，以致把它转变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哲学。

不信国教者无疑支持宽容的摄政们的政府，但在它作生死斗争时无法挽救它。这本需要有一个坚实的组织，但他们没有。不过，荷兰人民的深刻分裂可能有助于解释一个必须被认为是17世纪荷兰史的显著特征之一的事实，那就是政府发生许多变迁，但无伴随着同时代英法两国剧变的暴力。1618年至1619年、1650年和1672年的事变都是根本性的冲突，却未发展成革命，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荷兰政体的易

适应性和普遍的繁荣部分地解释了这一点。然而，使得界线分明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并使得党别分歧在其中如同沙中之水一样消失的复杂的宗教分歧，肯定大有助于造成所有政体的根本羸弱，大有助于一种政体顺利地取代另一种政体。

理解摄政统治的反对派的性质殊为不易，但至少它的某些因素是清楚的。不需有任何想象力就能明白，德·维特在荷兰省以及尽可能也在其他各省消除奥兰治家族势力的方式排除了与这个大家族的追随者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同样明显的是，奥兰治派想继续腓特烈·亨利和威廉二世的那样已引起如此强烈的敌意的政策。一小批加尔文派牧师仍然怀抱着进行一场反西班牙圣战的理想。这些人当然反对摄政们的宗教宽容，反对他们的爱拉斯谟原则以及他们完全缺乏宗教劲头。中产阶级下层的牧师和统治家族之间明显的社会差别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冲突。但是，远为重要的是人口中各大集团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对省议会统治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由政治讲演和小册子鼓动起来的，但它更经常的是自发地出自经济危难和政治怀疑。英荷战争引起染料价格暴涨，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和深刻的怀疑，它们导致了城镇中的强烈动荡，对一个被疑为叛国通敌、庸碌无能的政权的抗议呼声此起彼伏。

然而，这些民众运动直到1672年强大得足以推翻政权为止——那是在1653年的首次失望之后——一些年里并未不断发展。相反，它们的激烈程度减小了。促成“真正的自由制度”在1672年软弱不堪的一个更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祸起萧墙。奥兰治派摄政们在某些城镇和省份保留了很大一部分势力，而且随威廉亲王逐渐长大，他们的地位变得愈益强固。不仅如此，城镇当局内部往往由于争夺权力、自私自利和个人恩怨而产生的尖锐冲突自然易于向外蔓延，并与外部的冲突合为一体。某个被德·维特的友人之一赶下台的摄政很容易地自称为奥兰治派，从而给全国性党派之争火上浇油。现代历史学家已经仔细研究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一现象，没有理由假定它未曾在其他城镇发生过。

因此，按照悬殊的社会差别来解释政治斗争是不够的，尽管它们无疑构成了大冲突得以产生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把政治发展同经济形势联系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或许令人惊异的是，1651年以前的奥兰治时期荷兰经济出现了大膨胀，而在如此急于保护商业利益的共和政

权之下它却停顿了下来。只是在1680年前后，经济才开始复苏，该过程一直持续到威廉三世去世。势头如此惊人的发展所以暂时放慢，不是因为荷兰商业总的结构或者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宗货物市场的结构有任何基本变化。^[3]这是由该世纪中叶以后导致停滞的短暂变化引起的，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谷物贸易——共和国“商业之母”——在1652年至1680年间严重下降，其原因更多地在于维斯杜拉河流域的某些歉收、战争、西欧和南欧谷物需求的减少，还有最重要的是17世纪60—70年代期间袭击欧洲经济的普遍萧条，而不在于愈益激烈的竞争。要说荷兰经济发生危机，未免大为夸张。商业的某些重要部门停止扩展，但同时其他重要部门急剧膨胀。1648年后同西班牙的通商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这导致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为一个首要的贵金属市场。荷兰在俄罗斯的经济霸权得到巩固。工业看来未受损害。正是在这些年里，仅次于里昂的欧洲最大制造业城镇莱顿在织布业方面取得了它最大的进展，荷兰省北部赞河流域的工业也迅速增长。不过，这没有改变下述事实：17世纪初的普遍扩展在1650年后停止了，德·维特执政时期出现了经济困难，某些部门甚至出现了不很严重的衰退。

这样，在荷兰的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观察到一种类似的现象。顶峰看来已在脚下，除了试图保住已有成果外，别无所求。德·维特的体制不管在思想上可能多么赶时髦，在实际上是保守的。他对国内外事务的处理，是试图以一种无比精明的方式稳定局势。事实上，他的整个政策是对动乱倾向的反应，因而——考虑到共和国的饱和状态——是在捍卫荷兰的根本利益。

威胁上述体制并最终瓦解了它的两个动乱因素是政治性的，即英国和奥兰治这对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们都不是德·维特所能消除的，而他抵消其影响的能力又有限。在荷兰共和国多亏欧洲政治舞台变动不定而能扮演仲裁者角色的那些年里，英国是个危险的，但不一定是殊死的敌人。当法国企图接管西班牙遗产——欧洲霸权——变得昭然若揭时，英国对外政策便具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它促成均势的转变。奥兰治问题也显得极为严重，到威廉亲王成年时它已支配了局势。德·维特的伟大，荷兰共和国的伟大仅限于西班牙称霸与法国称霸之间、威廉二世成年后的活力与威廉三世成年后的活力之间的过渡期，它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伟大。

荷兰人未预见到英国敌意将会采取的形式。它主要是经济敌意。英国人固执地认为，世界贸易的总量是固定的，他们渴望的那一份额非得取自别人的不可，在实践中就是取自荷兰人的那份。因此，英国的敌意是侵略性的，而荷兰的反应是防御性的。这一敌对很大程度上卑下得令人吃惊：关于日常竞争的目光短浅的恼怒、对细枝末节过分敏感、夺取荷兰船只并将其当作战利品出卖的渴望。但也有原则之争：主宰不列颠海域的思想同荷兰人称为海上自由原则的那种体制或缺少体制的相对立，他们在自己的商业权势至高无上或可望成为至高无上的任何地方都坚持这一体制。只是过了许多年，并且在新的可能性出现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世界商业本身是可以扩展的，两个资本主义竞争国可以在无须摧毁对方的情况下都繁荣昌盛。

17世纪的三次英荷战争未促进经济问题的解决，它们的发生源于对世界事务的一种狭隘的解释，而没有给英荷任何一方带来多大好处。这些经济敌对行动所以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并且迫不得已地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因为结束西班牙霸权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开始法国霸权的1667年移归权战争之间的那个欧洲相对平静的短暂时期里，没有任何比较广泛的政治利益来抑制这些强烈的妒忌，或无论如何阻止它们发展成战争。当1672年查理二世发动第三次对荷战争时，人们觉得，20年来似乎是经济扩张的合理纲领的一项政策正在变成可怕的冒险。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荷兰共和国，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荷兰人惴惴不安和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清教革命的发展。几乎没有人不把弑君视作对宗教、道德和公法的严重冒犯。但是，摄政们冒了很大风险来阻止威廉二世把共和国拖入这场斗争。无疑，当那位执政突然死去，荷兰国家似乎成了一个纯粹的共和国时，英国革命者们大感宽慰。克伦威尔做了一次有力的尝试，想使英荷关系远超乎经济竞争之上。1651年3月，他派遣使团去海牙，带着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议：建立两个新教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同盟，甚至联邦。这是个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对荷兰人来说，实现该计划将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要多给联邦那么多东西。不难理解，这个计划被抛弃了。然而，摄政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以为他们傲然拒绝克伦威尔违背伦敦商人意愿而作的寻求英荷关系问题政治解决的尝试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海牙居民在宫廷及其牧师集团鼓动下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这加强了英

国使节的沮丧感和强烈愤怒，他们返归伦敦，没有带回任何替代克伦威尔计划的可取方案。经济争斗再度变得毫无约束。1651年10月，《航海条例》通过，这事实上是对荷经济战的宣战书。12月，一位荷兰大使被派往英国，要求将其取消，但未能提供任何报答。随后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爆发。

这场战争对英荷关系史的意义不如对荷兰共和国内部事态发展的意义那么大。双方都未取得明显的优势，两年后斗争以平局告终。不仅如此，克伦威尔在1654年比在1652年有更多的理由来结束这次经济妒忌的随意发作。1652年时，尚有理由怀疑轻蔑地拒绝他的建议是出自顽固的亲斯图亚特的奥兰治派。1654年时，这些担心不再有道理了。荷兰省的共和体制经受住了考验。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1652年夏天，民众运动似乎很可能会迫使当局任命威廉三世担任他祖上的显要职位。当然，并不存在解决内外政策问题的合理周全的奥兰治方案。1652年在东部诸省、1653年在荷兰与泽兰两省的几乎所有城镇发生了不计其数、有时是危险的骚乱。它们力图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是对政府的怀疑以及战争痛苦所造成的绝望情绪。1651年期间，1652年尤甚，阿姆斯特丹谷物交易市场上的价格直线上升，贸易和捕鱼业的瘫痪导致了大量失业。在这一促使泽兰省某些摄政确信有必要改弦易辙、为奥兰治亲王腾出更大余地的危险的政治危机中，约翰·德·维特被指定为荷兰省大议政。他知道共和政体是多么不得人心，据他估计他只得到千分之一的“普通百姓”^[4]的支持。他也认识到，如果在摄政中出现一个能赋予民众的不满以政治形式的派别，“一个小儿姓名无意义的发音”^[5]也会变得很危险。德·维特设法依靠机智勇敢的言辞来克服这个危险。

使德·维特和克伦威尔倍感宽慰的是，奥兰治运动一无所成。不仅如此，德·维特还证明尽管极为勉强但仍愿意让荷兰省议会表决克伦威尔的要求：永不任命一位奥兰治亲王担任执政或陆军统帅（1654年的《排斥法案》）。虽然克伦威尔对此庄严保证感到满意，但这只是非常可怜地稍许反映了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把两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新教共和国，一个显然将排除斯图亚特和奥兰治西大家族的共和国。多亏有这项妥协，威斯敏斯特和约（1654年）才得以签署，但它没有解决任何经济问题。

其他省议会对《排斥法案》的抵制远不能同1653年奥兰治运动之激烈相比。既然民众痛苦的根源——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便平静下来。联合省议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荷兰省的决定，这一决定虽然在法律上有理由，但从联邦角度看颇为专横。在荷兰本省，德·维特1654年后成功地巩固了他那一派。城镇卫戍部队得到加强，或者在必要情况下由更可靠的卫戍部队取代，而在市政当局中，德·维特设法安置朋党，他们往往是他自己的亲戚，他可以通过他们施加影响。通过他的妻子所属的比克尔家族以及他自己的家族，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整个省政府。不过，说服城镇和省议会做出决定并非无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而政权的立法活动少得异乎寻常。只有在两件事上德·维特能采取决然的行动。他将荷兰省债务的利息从5%减至4%，由此省下的钱另外用于分期偿债，希望全部债务能以这种方式在41年内偿清。联合省议会采取了一项类似的措施。与此同时，部分陆军骨干部队被解散。无疑，这些决定是合理的。荷兰陆军的惊人衰退不是因为这一削减，而是因为缺乏一位总司令，因为在这个无中心的国家里裙带风气和出头主义的蔓延。

德·维特在荷兰省以外的影响自然更小，尽管有幸比他的宪法地位和原则所允许的要有力些。大议会宁愿各省独立，这有利于各摄政小集团，德·维特却不能有什么大作为来抵制这一事态的发展。但是，他不得不干预那些使某些省四分五裂并导致多年无政府状态的频繁冲突。令人惊讶的是，市政府或省政府内部的所有冲突，不管是在荷兰省还是在上艾塞尔省和格罗宁根省，都似乎相当自然地奥兰治主义和“真正的自由制度”之间的对立吸收了。不过，德·维特在荷兰省的政权受到其他省内竞争性效忠的威胁这一事实本身，使他成了在本共和国以外各主权共和国内所进行的冲突中休戚相关的一派。的确，荷兰省的省共和制不能局限于自身的范围，它要生存就必须抹掉急于在北尼德兰地图上明确画出的省界。如果说在这个被政治壁垒所分裂的国家里存在某种统一，那么这不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超越于它们之上，而是因为政治激情使然。

虽然这个政府在国内事务中虚弱无力，但在它作为荷兰商业利益的代表而行动并且能利用荷兰省巨大的金融力量时，它的对外政策确实可以是非常有力的。约翰·德·维特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及其后巩固了自己一派，此后他便能以一种比较果断的方式在国外维护荷兰

势力。他对波罗的海问题的干涉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对外政策的特点，这个问题由于荷兰经济依赖波罗的海贸易而对荷兰省来说极端重要。当瑞典开始谋求在那些地区的霸权时，荷兰人就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和维持均势。荷兰现在的政策是基于同丹麦的友谊，而该国要求在松得海峡征收高关税，但其目的不是摧毁荷兰的贸易。1649年时，共和国与丹麦之间已经缔结了盟约，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反瑞典倾向，松得海峡关税问题则由于荷兰愿意每年交纳35万盾税款而得到了解决。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这些新关系起了作用。瑞典多少支持英国，丹麦则多少支持荷兰共和国。不过，德·维特在1655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发动的反对勃兰登堡和波兰的战争期间，成功地保持了中立，并且取得了瑞典的一项保证：荷兰的贸易不会受到任何损害（1656年埃尔宾条约）。

德·维特之所以不情愿使共和国介入波罗的海战争，是因为他担心英法两国几乎肯定会站在瑞典一边。只是在这一危险变得不那么严重后，他才放弃了中立。1657年丹麦对瑞典宣战，但查理十世始终占上风；他围困了丹麦首都，根据罗斯基勒和约（1658年）取得了挪威部分地区、松得海峡东岸以及两位国王将阻止外国战舰进入波罗的海的保证。这项条约并未结束战争。1658年夏，查理十世再度进攻，希望能把丹麦国王赶下王位。波罗的海问题显得极端严重，因为从荷兰的观点看让松得海峡两岸都落入瑞典统治之下是不可容忍的。最后，德·维特派荷兰舰队前往松得海峡，它击败了瑞典人，解了哥本哈根之围。1659年5月，紧张的外交活动导致了海牙协约：英国、法国与荷兰共和国表明，它们把罗斯基勒条约——以一种不利于瑞典的方式来解释——视为波罗的海局势的基础，决定迫使两位北方国王维持这一协议。确实需要动武，而荷兰舰队提供了武力。瑞典军队停止抵抗，查理十世于1660年2月去世之后哥本哈根和约签署，它大有利于荷兰人。

在这个复杂的事件中，德·维特显示了高度的政治家才能。他的处境曾很困难。在冲突的第一阶段里阿姆斯特丹已经倾向采取激烈行动，而这位大议政认识到如此强硬的做法势必造成共和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因此，只是英国由于克伦威尔去世而被削弱以及法国无法显示其力量后，德·维特才采取行动。多亏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他才能主动促成三国联合干涉，不冒风险地达到荷兰的目

的。荷兰共和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大国来行动。他审慎地、有节制地这么做。他能如此行事，是因为对手暂时虚弱。

摄政们1648年后怀有一个幻想，即共和国依靠审慎的中立能够摆脱国际强权斗争，1658年和1659年的局势使这个幻想破灭了。商业利益迫使共和国介入政治活动。荷兰的国务家们不管怎样勉强，已学会承认共和国的大国地位，并接受由此而来的责任。德·维特渐渐变得活跃起来。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和英国的王政复辟驱散了满天阴霾，德·维特现在看到了实现一个宏大计划的机会。既然没有哪个大国仍然被战争或同盟缠住手脚，他便试图造就一个荷兰共和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防御同盟，这个同盟若能实现将大大加强荷兰人的地位。德·维特正确地认识到，同潜在大国的友谊是共和国维持本身地位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英国与共和国无法达成妥协。德·维特显然低估了英荷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说服邻国接受自由贸易体制的困难，这一体制将使拥有较好舰队和大得无与伦比的金融力量的荷兰人阻抑其竞争对手的发展。留下的唯一可能是只同法国结盟，德·维特对此毫不犹豫。1662年，这一同盟缔结，并且与一项符合荷兰人希望的商约相联系。很难认为德·维特可以另有所为。共和国之易受伤害迫使他寻求外国支持；英国的敌意以及西班牙和皇帝的羸弱限制了他选择盟友的余地。不仅如此，法荷同盟还意味着德·维特的成功，因为法国国务家们原先同威廉二世保持密切的关系，多年来对共和制深感怀疑，现在却承认了它的力量和稳定。

德·维特认识到，他的政策不管可能怎样无法避免，都充满着危险。在这个时期，法荷合作即使并非反常，也是极其脆弱的。从荷兰的观点看，科尔培尔主义恰恰同法国的领土帝国主义一样难以容忍。然而，通过为危险的南尼德兰问题谋求一项解决办法来遏制后者的努力在1664年失败了，尽管德·维特坚持不懈并且足智多谋：路易十四不愿被一项本会加强和巩固法荷同盟的妥协捆住手脚。事态发展证明德·维特是对的。英国与共和国的关系在1660年后没有改善。不久就很清楚，查理二世希望放任对共和国的经济斗争，而克伦威尔在同联合省议会打交道时从未忽视过的共同宗教利益不再起抵消作用了。两个航海国家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在西非和北美，英国非洲公司开始了一场得到海军支持的进攻，它给荷兰西印度公司造成了那么严重的损害，以致联合省议会决定命令舰队回击。战争在非洲进行了一段时

间后，又在欧洲爆发（1665年1月），两三个月后，两国交换正式宣战书。

这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战争。^[6]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经济利益也起了首要的作用；但那时的形势多半受制于克伦威尔的高度理想主义和奥兰治—斯图亚特家族联系所包含的内在危险。1665年时，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发挥影响。荷兰人对战争准备不足，但比1652年时信心大得多。荷兰省的财政状况极好。该省1664年和1665年在筹集大量低息借款方面毫无困难，有充足的现金供其使用。海军的状况不是很好，但装备舰船轻而易举。德·维特怀着强烈的决心致力于改善舰队，起初有所失望，以后便成功地使之强大起来，以至无可匹敌。陆军是个麻烦得多的问题。1665年9月，爱争吵的明斯特主教怀着得到英国支持的期望入侵东部诸省，当时没有荷兰部队可用来阻挡他，只是由于法国干涉他才终于被迫撤退。法荷同盟的用处清楚地表现了出来。法国人虽然宣战（1666年1月），但未参加对英实战，尽管如此他们的态度有助于孤立查理二世。当德·维特靠支付高额津贴成功地把丹麦拉到自己一边时查理二世便陷入了彻底的孤立，而钱款拮据却使那位斯图亚特君主无法把瑞典拉入战争。

因此，1667年4月在布雷达开始和谈时，荷兰的地位是有利的。查理二世有没有别的牌可打？他有可能允诺支持路易十四，后者正值外交像云集布雷达之际侵入了南尼德兰，并使其军队迅速北进。但是，德·维特迅速而有效的行动阻止了查理二世从一个他看来有利的事态中捞取好处：袭击梅德韦（1667年6月）粉碎了这位国王的希望。此后，实现媾和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多亏了德·维特有政治家风度的、现实主义的节制态度，布雷达和约（1667年7月）不失为一项达成妥协的认真尝试。非洲的海岸角城堡和新尼德兰割予英国，苏里南和东印度群岛的普洛—伦岛割予联合省议会。荷兰人喜爱的某些原则得到了接受。英国承认船只所挂国旗决定其国籍，上船搜查违禁品的做法被比较文明的方法取代，违禁品本身的定义被局限于战争用品。不过在实践中，这一安排并未打通两国间任何富有成果的政治合作的道路。对共和国的经济讨伐的激烈程度几乎未见减小，但荷兰人的魄力和通情达理有助于澄清气氛。

路易十四对荷兰人这次显示武力印象深刻，立即邀请德·维特同他一起安排关于南尼德兰的妥协。谈判证明是困难的和缓慢的。当它

们实际上陷入僵局时，查理二世决定迫使德·维特采取反法政策，这导致了1668年1月著名的三国同盟。德·维特尽量小心谨慎，担心他同法国的关系会被英国扰乱，然而没有成功。荷兰、英国和瑞典的三国盟约由于抑制了法国扩张显然是英荷外交的胜利，但事实上大议政只是勉强签了字。它结束了他对法国的谨慎政策，加剧了孤立危险。然而别无他法。查理二世以及被科尔培尔激烈的反荷关税政策大大激怒的荷兰省议会迫使德·维特默许了这一行动，其最终后果是他很有理由担忧的。

这样，荷兰共和国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也被日益增长的危险困扰。德·维特的外交天才无法阻止各大国逐渐摆脱虚弱状态，无法使它们不被荷兰的财富和势力——这部分地归因于它们自己的缺陷——所激怒。同样，在国内政策方面，德·维特的成功恰好有助于损害他的地位。他对奥兰治问题的处理是高明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不能不影响到共和国内部的局势。查理二世是威廉三世的叔父，《排斥法案》遭到这位英王的厌恶，因为它是克伦威尔炮制的，它也遭到德·维特的厌恶，因为它来自外国对荷兰省内政的干预。它在1660年被废除；然而，被奥兰治派的希望和奥兰治派的诡计所扰乱的泽兰、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三省希望走得更远得多，建议授予威廉其祖先的职位。但只要荷兰省拒绝，它们的行动就必定仍属徒劳，而荷兰省确实拒绝了。德·维特有理由害怕那位亲王复位，不仅因为反共和倾向可能再度发作，还因为这将重新打通斯图亚特家族势力渗入荷兰国家的渠道。王朝利益很可能再度变得压倒一切，那正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最害怕的。然而总得有所动作。德·维特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他宣布：荷兰省虽然不准准备自缚于任何坚定的承诺，但愿意承担教育年幼的亲王学会履行其祖先所行职能的责任。言下之意是，如果奥兰治家族能被调教得默认严格的共和政体，并且断绝同外国君主的联系，它就将获准在国家内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查理二世自然反对它。一个充满共和派摄政之国家利益观念的奥兰治亲王，不会是削弱这个可恨国家的工具；而继续把他用作引起使之瘫痪的冲突的关键人物要有利得多。英国驻海牙大使唐宁和亲王的廷臣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亲奥兰治宣传运动，它是促成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若干民众运动的一个原因。这些运动虽然不像50年代初那么激烈，但强大得足以促使某些摄政改变想

法，要求奥兰治王朝复辟。在这种情势下，加上对英战争正在进行，德·维特再次拿出他那个让威廉三世受荷兰省议会教育的计划，它在1666年得到贯彻。王宫里清除了危险的阴谋者；若干个月后某些奥兰治派成员的诡计被揭露，这导致其中一人被处死。德·维特本人承担了向亲王教授“统治之术”，即如何处理政治难题的任务。可以肯定，部分地由于这些措施，一些年后威廉三世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自己超脱了王朝的和幼稚地亲英的奥兰治宫廷传统。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荷兰省议会于1667年决定宣布省执政之职同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之职不能兼任，并且干脆废除了荷兰省的执政职位（《永久条令》）。这无疑是德·维特的成功，与他战胜查理二世相得益彰。

但是，《永久条令》没有解决政体问题。首先，很难争取其他省做出类似的决定；直到1670年，德·维特才成功地说服它们步其后尘，而且即使那时也只是勉强的和有保留的。不仅如此，军权与政权的这一分离不管原则上多么正确，在一个像荷兰共和国那样的国家里是否有道理值得怀疑。某位奥兰治亲王在被任命为省军总司令后，用什么办法使之置身于政治之外？1668年，威廉三世以贵族代表资格被接纳为泽兰省议员，1670年他又进入了省务会议。这两个职务都是政治职务。

德·维特的声誉在1667年和1668年达到顶点。荷兰省议会责成威奎福尔特撰写1648年至1668年的荷兰共和国历史，这是一个小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小段时期，但那么重要，以致只有过去时代最辉煌的史篇才可比拟。^[7]然而，甚至在荷兰省，也有严重的危险威胁着大议政。他的权力本身使他遭到先前朋友的嫉恨。1664年，在支持德·维特的政策方面劳苦功高的泽伊德波尔布鲁克死后，阿姆斯特丹看来脱离了他那一派的影响，因为野心勃勃而不加掩饰的法尔克尼尔得势，最后背弃了这位议会领袖。在阿姆斯特丹，甚至有人建议改变大议政一职，任命一个外交国务秘书。这个计划没有贯彻。

要笼统地解释德·维特权势的衰退并不难。但是，作为对法战争的后果他在1672年垮台时却令人惊异。总的说来，荷兰人似乎没有预料到法国的进攻。1668年后，德·维特的对外政策颇为消极。但在因其掉以轻心而批评德·维特之前，必须考虑到荷兰人一般都似乎不明白他们在国外所激起的嫉恨的程度，这种嫉恨将在1672年导致法英两国联合进攻荷兰共和国。整个1670年和1671年，利率始终低下。令人

惊奇的是，荷兰人怎样在同英国的频繁的谈判中捍卫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即海洋自由，而未认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激怒了对手。虽然荷兰人是大旅行家，海牙是欧洲新闻业中心，但他们几乎不了解外国。他们独树一帜，不同样具有17世纪某些最突出的倾向，即君主专制主义、重商主义和巴洛克风格。他们的政治社会形式，他们的贸易结构，他们的文化特征，往往像是偏离了17世纪的模式。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的中世纪晚期生活方式及其城市和省份独立的光荣，使他们如同当时世界的局外人。他们在一个经济危机严重的时期里绝无仅有的繁荣，他们清醒的宗教宽容精神，他们的贵族自由制，几乎与那个世纪格格不入。德·维特任职时期，同欧洲的这种分离倾向似乎越来越强烈了。

因此，遭遇1672年的进攻，像是同巴洛克专制主义和巴洛克政治观念盛行国家的一场痛苦的接触。要问是什么原因特别激发了斯图亚特和波旁君主们的恼怒纯属徒劳。这个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宣告了启蒙时代，尽管其生活方式陈旧老式——连同它那惹人妒忌的财富，是个反常现象和挑战。科尔培尔主义、路易十四被伤害了的自尊心、查理二世肆无忌惮的方法及其冒险的国内政策、欧洲商人中对荷兰人的传统仇恨——所有这些导致了多佛条约（1670年），据此法王和英王协议进攻并彼此瓜分这个贵族共和国，就像另一个贵族共和国波兰在一个世纪后被瓜分那样。英国将得到些耳德河口的某些城镇和岛屿，但法国尚未确定它打算攫取什么；威廉三世将取得所剩部分的主权；这样，一个怪僻的畸形物就会被灰飞烟灭。

德·维特在1671年加强其外交地位的尝试没有成功。皇帝和西班牙都不准备做出承诺，瑞典则选择与法国结盟。明斯特主教和兼管列日主教区的科隆大主教乐于敞开其领土，让路易十四胜利进军共和国。1672年开始时，联合省的外交孤立几乎无以复加。将近3月底时，英国宣战，4月初法国起而仿效。虽然1668年的一种荷兰勋章以约书亚使太阳停止转动来刻画太阳王，但1672年5月路易还是开始进军联合省。10万以上法国大军由路易十四亲自指挥，毫不困难地于6月12日在埃尔顿附近跨过莱茵河。荷兰军队约3万人，士气低沉，其指挥官严重地受制于各省议会对于部队行使的权威，这些部队的饷银是由其捐款支付的。尽管德·维特加以抵制，联合省议会却于1672年2月任命威廉三世为陆军统帅，但仅以一次战役为限，而且附有多少束缚其手脚的

条件。虽然1671年时决定、1672年初又再次决定增加陆军，但未立即见效；在荷兰领土上的外围防御被击溃后，这位陆军统帅只得将其部队撤到护卫荷兰省的水体防线之后。

早在6月底，共和国的命运似乎就已确定了。路易十四在乌得勒支省建立了大本营。他的军队控制了乌得勒支和格尔代尔兰德，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则占据了上艾塞尔和德伦特两省以及格罗宁根省的一部分。然而，格罗宁根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而挽救了弗里斯兰省。东部诸省的陷落犹如望风披靡。它们看来准备脱离联邦，进一步往东寻求效忠对象。6月初，上艾塞尔省的贵族向明斯特主教屈膝投降，以为联邦的解散已成事实。在被罗马天主教君主占领的地区，到处展开了一场宗教革命。罗马天主教教士重新占有了他们旧日的教堂和修道院，并且在葬礼和列队行进祷告仪式中公开露面。耶稣会士在许多城镇设立学校。不过，新教并未遭到禁止，没有什么地方看来出现了任何严重的紧张局势。罗马天主教的解放根据占领当局的命令进行；然而，荷兰天主教徒惯常效忠于目前正逐渐变成荷兰盟友的西班牙，而非法国，因此路易十四的部队没有被当作一支解放大军受到欢呼，他的措施也没有在仍旧独立的各个省的罗马天主教徒中间引起任何反响。然而，被征服地区的天主教徒试图恢复其往昔地位的热情表明，在他们看来这个新教国家的覆灭是多么确定无疑了。

在传统上不仅是共和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其军事中心的荷兰省，失败主义同样盛行。考虑到灾难性的形势，我们大可惊讶它竟然局限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荷兰省议会在几天里大为动摇，以致看来有可能在斗争开始之前就放弃斗争。动摇的原因在于，力劝省议会务必抵抗到底、需要时撤往阿姆斯特丹这一最后据点的德·维特，突然被驱出了实际政治舞台。6月21日晚上，他遭到4个年轻的奥兰治党徒袭击，受了重伤。若干天以前省议会已同意与敌人谈判，但只是到现在谈判才开始。然而，不久事情就很清楚：法国不会满足于一项合理的妥协。当得知它的过分要求时（7月1日），面临下述任务的已不再仅仅是省议会：决定是否接受旨在结束共和国之伟大的侮辱性要求。

在这些命运攸关的日子里，随着敌人兵临防御很不充分的边境，荷兰省议会还面对另外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战争爆发后，奥兰治派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宣传攻势。民众运动在多尔德累赫、鹿特丹、果达、哈莱姆等城镇被煽动起来，其目的在于使奥兰治亲王重获他祖先的传

统要职。大多数市政当局决心废除《永久条令》，立威廉三世为荷兰省执政。星期天（7月3日）的夜里，荷兰省议会做出了困难的，但不可避免的决定。泽兰省议会一天前亦如此，联合省议会则匆忙任命威廉三世为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废除了强加于他的限制条件（7月8日）。

威廉三世执政后做出的首批政治决定之一，是建议省议会不要接受法国提出的媾和条件，把战争继续下去。这项建议得到采纳，谈判破裂。与此同时，荷兰省的紧张越来越严重。民众完全未因任命威廉三世担任其祖先的要职而满足。奥兰治派在7月初的成功被认为还不够，尽管各城镇恢复了执政提名市行政官的权利。7、8两个月里，接连不断的民众骚动逐渐损害了市政当局和省议会的权威，它们有时是由奥兰治派煽起的，从未遭其镇压。在这些骚乱中表现出的主要不是对摄政阶层本身的仇恨，而是对其政策的怀疑。8月初，伤势业已痊愈的德·维特辞去大议政职务，但仍然受到被竞相阅读的奥兰治派小册子的谴责。人们认为，德·维特因其反奥兰治政策招致斯图亚特家族的仇恨，他一直宁愿投降法国而不愿让亲王复位。8月20日，这位伟大的国务家及其兄弟科尔内利斯遭海牙暴徒杀害，而省议会和市政当局都不敢、威廉三世则不愿意驱散这些暴徒。

威廉三世利用被煽起的情绪。他奖赏某些凶手；若干牧师则赞颂上帝睿智地惩罚了这个可恨者。这一令人厌恶的行动过后7天，荷兰省议会决定任凭亲王随意处置各市政府。奥兰治派的头领们终于如愿以偿。威廉三世促使那些由于依附德·维特体制而受害最深的摄政们辞职。9月，159名市政当局成员——荷兰省的现任摄政总计约500名——被奥兰治派取代。这不是一场彻底清洗，也不是一场社会革命。新成员属于不同家族，但和被免职者同属一个社会集团，顺便提一句，后者未被骚扰或被激怒。事情就此结束。9月27日，省议会宣布大赦。民众的骚动平静下来，若有必要则遭到终于感到安全的市政府的镇压。上述经过表明，要把1672年的事件称为革命是错误的。不仅政体得到了尊重，而且省议会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任命威廉三世担任完全合法的职务；甚至不存在一项革命纲领，因为小册子里罕见的民主改革要求几乎不能被当真看待。这些月里愤怒和怀疑的结果是一桩凶杀，是某些统治家族被别的统治家族取代，是一位奥兰治亲王受命担任其祖先拥有的职务。

敌人一直坐视荷兰省的事态，而未试图从中渔利。什么因素最终阻止了路易十四予以致命的一击？是过早的自信或软弱无力，还是水体防御？他的哪些期望落了空？近6月底时，他本来多半能插入荷兰省，但他按兵不动，傲慢地等待着并未如愿以偿的投降。他没有重新发动进攻：将近7月底他返回法国。他那减少到2万人的威武之师在敌国境内无所事事，直到共和国的军队依靠荷兰省用之不竭的财力得到加强，其外至孤立由于同皇帝、西班牙、洛林和丹麦的条约而被冲破为止；于是，法国人在1674年被迫撤退。与此同时，英王查理二世迫于国内舆论而媾和。他一无所得。从战争爆发时起，荷兰舰队阻止了英军登陆。在一系列重要的战斗中，荷兰海军将领们维持了自己的海上优势。第二次威斯敏斯特和约（1674年）是以战前原状为基础的；与它同时订立的一项商约承认荷兰的自由贸易原则。顺便说一句，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英国人从这些原则得到了好处，因为多亏中立，他们能够填补荷兰人在法国缺下的空缺。若干个月后，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也媾和了。

这些事态完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它作为巴洛克强权政治的冒险而开始，1674年后却成了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传统冲突。尽管如此，看起来像是法国对于被哈布斯堡家族包围的传统恐惧正在逐渐发展成赢得欧洲霸权的渴望。这无论如何是威廉三世的看法；荷兰摄政们不久对一场不再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不直接威胁荷兰独立的战争失去了兴趣，也不想为之耗费金钱，而他却开始确信荷兰负有与法国称霸图谋作斗争的使命。荷兰人在危难之际被迫使用的手段——与尽可能多的反法国家结成联盟——成了他的一项政策工具。

这个联盟虚弱无力。1675年和1676年的战役是非决定性的；荷兰人在1676年试图在地中海建立海上优势，结果是荷兰在埃特纳战役中获得小胜（米歇尔·德·勒伊特在这次战役中阵亡），而法国在巴勒莫战役中大胜。1677年，法国占领了南尼德兰的一些城镇，但无法阻止威廉三世围困查勒罗依（他未成功地夺取该镇）。然而，1677年在欧洲史上非常重要，因为英荷关系突然改善了。英王查理二世同意其弟詹姆士的女儿玛丽嫁给威廉三世：就他而言只有对外政策的动机在起作用，因而斯图亚特家族与奥兰治家族之间这第二次婚约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第一次，那次是将威廉三世之父与查理一世之女结合起来，它仅仅增加了奥兰治王朝的荣耀。威廉三世努力维护欧洲均势，

毕生奉行著名帝国外交家德·利索拉（死于1674年）在《司法和国家之保护者》中如此令人信服地提倡的那种信条。威廉知道，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这种均势体系就绝不能建立起来。1678年3月英荷签署了一项防御同盟条约，此事将在许多年里左右欧洲的历史。

1676年，和谈在尼曼根开始，但进展很慢。威廉三世坚决反对和谈，因为他看到法国在多么成功地促使荷兰共和国的摄政们，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摄政们相信应当脱离欧洲同盟单独媾和；战争对共和国非常有害，财政负担沉重，中立国商人占据了先前由荷兰人主宰的市场。1678年8月，法国人与荷兰人确实单独签订了一项和约，它并非对荷兰人不利；同科尔培尔的保护主义制度截然相反，路易十四废除了1667年的寓禁税，让荷兰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但是，威廉三世得知媾和消息后勃然大怒，遂对法军发动进攻，然而圣但尼（蒙斯附近）战役以他近于败北而结束。各盟国不情愿效法荷兰去媾和，但又无力单独把战争继续下去。路易十四放弃了他的大多数征服地，仅保留弗朗什孔泰和瓦朗谢讷以及南尼德兰的康布雷和圣奥梅尔。虽然他远未达到目的，但战争以他取得外交胜利而告终。欧洲同盟破裂了，要轻易地恢复它则不大可能。

威廉三世正确地认为尼曼根和约是他的一个失败。此后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其间法国利用自己优越的外交地位兼并了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蒙贝利亚尔以及意大利北部卡萨莱的德卡波利（1681年）。皇帝、西班牙、荷兰共和国和瑞典在1682年春天签订的四国同盟条约只是为了维护尼曼根和约的条款，共和国内强有力的主和派以及一心关注对土耳其的新战争的皇帝，准备相信路易十四所作的不想背弃这些条款的保证。尽管如此，全面战争的危险仍不断加剧。1683年12月西班牙对法宣战，法军开始在卢森堡、不久后在南尼德兰作战。威廉三世竭尽全力劝说共和国帮助西班牙。奥兰治亲王同不仅得到荷兰省，而且得到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支持的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意见分歧看来到了严重关头。一时间似乎他会动用武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到头来，在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讨论、严厉的措施以及大量言辞激烈的小册子出笼后，他屈从了顽固的反对者们的愿望。这直接导致了西班牙和皇帝签订屈辱的雷蒂斯堡停战协定（1684年8月），据此他们把卢森堡和斯特拉斯堡割给法国人，为期20年。

只是在1685年，路易十四使他的军队筋疲力尽，以轻率的极端主义糟蹋了他那辉煌的国际地位。废除了南特敕令以及大量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其中许多在荷兰共和国避难——在新教徒中间点燃了宗教战争的火焰。一个新的反法同盟渐渐形成。1685年，勃兰登堡与荷兰共和国签订防御同盟条约。一年后，皇帝、西班牙以及大多数德意志小邦加入了奥格斯堡联盟，该联盟使它们有责任维护现存的诸条约。路易十四完全明白自己的政策激起的反应；但他未像他在70年代后期曾做的那样以审慎与和解来重新树立威望，而是用最不妥协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法国宗教迫害的景象以及定居荷兰并且发动了一场有力宣传的许多胡格诺派难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678年以来支配荷兰共和国的那种不愿打仗的情绪开始消退。当威廉三世看到有可能取代其叔父兼岳父詹姆士二世时，他要求省议会予以支持，而路易十四的过分自信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国王确信其警告将制约固执的奥兰治亲王，但他1688年秋天的德意志战役给威廉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省议会准许亲王出海，为他配备了足够的陆军和精良的舰队，1688年11月12日他前往英国。

极广而言之，1674年后威廉三世的对外政策那么明显地属于欧洲史，以致荷兰史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关于它的力量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它本身。他的国内政策首先以其消极性质而引人注目：他没有改变共和国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必要的。他拥有的权力很大；他必须进行的战争要求他全神贯注。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王室出身、大胆得几乎鲁莽的人竟然维持了寡头统治集团的狭隘框架及其资产者观点和对大众的人文主义者的鄙视；而且似乎自相矛盾的是，通过利用它们，他加强了寡头统治的倾向及其弊端。原因大概主要不在于他对政体问题显然的漠不关心，而在于他洞察了荷兰省政治制度的性质。或许，他那不愉快的青年时代在他心中激发了对摄政思想的厌恶，但也正是这些早年的经验使他懂得必须多么审慎地对待摄政，他们的抵抗可以有多么可怕。1674年，他做了一次取得某种全权统治地位的有趣的尝试。当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荷兰与泽兰两省议会于1674年2月决定使执政成为世袭职务。联合省议会则于1675年4月就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职位做了同样的决定。很清楚，这些决定只是肯定了一个被1650年和1651年的事态打破的老传统，并未给解决政体问题提供多大帮助。更重要的是乌得勒支、格尔代尔兰德和上艾塞尔三省的事态。

外国军队撤离这些省份时，荷兰省提议不让他们恢复在联合省议会的席位，希望以此使它自己在议会中的票数更占优势。威廉三世看到了危险，非常强烈地反对该计划，以致它只得被弃置。1674年4月，这些省重返联合省议会。但随后，荷兰省诱使议会授予威廉三世自主地组织各省内部管理的权利。他不仅急剧改变了各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而且采用所谓“行政规则”，它们虽然保持了旧的形式，但赋予他在这些省份内几乎绝对的权力。接着在1675年1月，格尔代尔兰德省给予威廉三世——这肯定是他所授意的——旧的公爵头衔，这将使他不仅具有最高权力，而且具有君主地位。威廉三世没有在不同其他各省商量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头衔。他做对了。在荷兰和泽兰两省，普遍的反应是非常敌对的。公共资金减少，犹如一场政变迫在眉睫。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位亲王一旦被立为格尔代尔兰德公爵，就不能不给他荷兰和泽兰两省君主的头衔。在泽兰，有人公开宣称此种事态发展将有害于国家的经济地位，因为人们预料，专制政府将损害人们对例如贴现银行和东、西印度公司这样一些机构的信心。独头政府按照定义等同于专制政府的观念是所有荷兰共和派分子的老生常谈，它被证明甚至在奥兰治派分子中间也很流行，因为在荷兰和泽兰，正是那些原来最起劲地力求恢复奥兰治家族统治的城镇现在转而最猛烈地反对这个计划。威廉三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结论。1675年2月20日，他通知格尔代尔兰德省：他无法接受最高统治权。

这是这位亲王急剧改变政体的唯一尝试。但是，随着他的政策逐渐集中于结束法国帝国主义扩张这一个目标，他对权力和金钱的需求增大了；这仅靠合宪手段已无法取得，他不可避免地要曲解宪法。不仅他的祖上莫里斯和腓特烈·亨利这么做过，甚至约翰·德·维特也使自己的行省职能变成了某种形式上不符合宪法的東西。但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对于系统地利用德·维特为加强自己的势力已经利用过的同一种寡头做法也并非犹豫不决。然而，德·维特时期重用亲友的政府在威廉三世统治之下必定堕落为重用佞臣的政府。他力求在市议会和市政府、省议会和联合省议会中安插那些信誓旦旦盲从他的人。在泽兰省，他的亲戚拿骚—奥吉克利用其王室代表的地位，以极其肆无忌惮的手段行使一种完全违宪的权力。在其他某些省里，暴露威廉三世策略手段的丑闻大白于天下，但这些曝光并未导致他改变政策。例如在鹿特丹，威廉三世的走卒令市议员候选人承诺当选后服从执政的一切指示，违者罚以没收4000盾保证金。威廉三世虽然未直接介入此

类事件，但并不试图杜绝它们，也不想阻止一个封闭的寡头集团的兴起。相反，为了他的对外政策，通过破坏摄政们的职责和独立性，他加速了这一发展。

回顾这四十年里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人们有着看到一条攀登之路的印象。在德·维特时期，只是在1648年才获得完全独立的这个国家成了一个强国，在威廉三世统治之下，它找到了一项头等重大的历史任务。然而，这个印象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威廉三世之下达到的巅峰状态是衰落的开始。国内局势恶化；寡头集团的滥用权力与日俱增；财政陷入紊乱。英国与共和国之间的个人联合——这个术语从严格的宪法观点来看当然是可以指摘的——给荷兰的竞争者提供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超过其对手的机会。

1680年以前，17世纪荷兰的富有创造力的天才都已去世：1669年伦勃朗去世，1672年德·维特去世，1675年杨·弗美尔去世，1676年米歇尔·德·勒伊特去世，1677年斯宾诺莎去世，1679年约斯特·范登·冯德尔去世。荷兰文明的灵性似乎变了。赫伊津哈把荷兰17世纪文明的特征描述为对于欧洲模式的偏离、一个例外而非典型。^[8]荷兰人看待自然的现实主义方法，他们对巴洛克式富丽堂皇的怀疑，他们行为的朴实无华，他们生活和写作风格的无序即不受文学抑或政治成规的束缚，他们基本的宽容与温和，使他们成了欧洲的局外人。1680年后，这一独创性减小了。恰好在威廉三世成功地抑阻了法国帝国主义之际，法国古典主义开始渗入荷兰文学。然而，并非只是外国影响剥夺了荷兰共和国的深刻的独创性，使之服从欧洲的主流。与此同时，外国正开始采用荷兰的观念与荷兰的社会模式。启蒙运动能够依赖荷兰的许多成就。而且，其他国家的社会环境难道不也逐渐地按照同一个方向在发展？严格的寡头政体在专制君主眼中是个如此怪异和恼人的现象，但它毕竟预示了一种普遍的欧洲模式。17世纪在共和国内形成的、从阿尔特胡修斯贵族立宪主义导向斯宾诺莎民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哲学，有时给人这样的印象：它走过了18世纪从洛克和孟德斯鸠到卢梭将遵循的同一个历程。荷兰共和国不再像先前那样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反常物，这可能是它衰落的部分原因。

^[1] 关于这些冲突，见第四卷，第十二章。

[2] 《约翰·德·维特书简》，R. 弗勒因和G. W. 克恩坎普编（阿姆斯特丹1906年出版），第一卷，第62页。

[3] 荷兰经济特征与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细节，见第四卷，第十二章。

[4] 《约翰·德·维特书简》，R. 弗勒因和G. W. 克恩坎普编（阿姆斯特丹1906年出版），第一卷，第96页。

[5] 《约翰·德·维特书简》，R. 弗勒因和G. W. 克恩坎普编（阿姆斯特丹1906年出版），第一卷，边码第161页。

[6] 又见下面第十三章，第309—310页。

[7] A. 德·威奎福尔特：《联合省的历史》（阿姆斯特丹1861年版），第一卷，第2页。

[8] J. 赫伊津哈：《作品集》（哈莱姆1949年版），第二卷，第45页。

第十三章 王政复辟后的英国

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重获英格兰与苏格兰王位，几乎与此同时，他的表弟、法国的路易十四执掌王权。这两个事件都意味着一个空位时期的结束和君主个人统治时代的开始。两位国王执政伊始面临大不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在特征和体制方面截然相反；然而到1685年，即查理去世那一年，法国和英国表现出明显的近似，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不再是真正议会制了；在这两国，新教徒都受到迫害，而且英国甚至有可能沦为差不多是法国的附庸。这一情况的由来是本章的主题：它如何被革命扭转则是另一章的主题。^[1]

克伦威尔于1658年9月去世，紧接着是一个军队将领弗利特伍德、兰伯特和蒙克争夺最高权力的时期，约20个月；直到1660年1月，蒙克——那个时代最狡黠、最不坦率的人，才率领苏格兰占领军开进英格兰。这位将军把军队留在附近的芬斯伯里，然后前去“鼓励”（即给予未经请求的保护）在威斯敏斯特的残余议会余党，它现在剩下大约40名议员，他们代表着发起了一场大叛乱的长期议会之遗老。蒙克有足够的眼力看到只有通过非军事力量才能和平地复辟君主制，因而他把那些被1648年12月普赖德清洗所驱逐的长老会教徒中的幸存者带回下院（1660年2月），以此完全压倒了下院所剩的少数共和派和空想派残余分子。3月16日，这个业经充实的长期议会发表自行解散的宣言，称下院的“单独表演”不会损害上院的权利，因而预告了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恢复。随即，国务会议忙于起草一个据信可以约束查理权限的方案，现在查理被召回王位已成定局，因为下院中的长老会多数派是君主主义者。大选重新产生了一个保皇党占优势的下院；与此同时，长老会贵族也在上院占据其席位，不久又有一些回国的流亡者进入了上院。1660年4月25日开始议事的代表国会决定王国政府由国王、上院和下院构成；查理被立为国王，其复辟之年未被称作他在位的第一年，而是第十二年。5月25日，国王抵达多佛，复辟由此告成。

最后两位男性斯图亚特国王治下英国历史的主要线索甚至从以上的事件略述就能推导而出。人们会注意到，复辟不是如查理及其胞弟

詹姆士流亡期间试图安排的那样，通过国外干涉实现的，甚至也不是通过国内军事政变实现的，而是通过先行重设议会两院（不管议员人数怎样减少）实现的；人们也会看到，蒙克自始至终担负着领导角色，他得到信奉君主制的长老会分子的帮助，也得到他麾下并不信奉君主制的军队之赞同。蒙克在采取保皇政策时背叛了他的士兵，后者是信仰共和、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被遣散老兵中间的长期不满，它导致了許多密谋活动，特别是在查理统治初年。由于这个原因，该时期许多的立法可以被认为是出于恐慌的立法。与分离派不同，长老会分子考虑的是一个国教会、一种有限君主制和一个有权有势的世袭贵族阶级。在整个英吉利共和国和护国主时期，他们始终不信任克伦威尔；他们在第二次内战中为国王作战，并且在他儿子的复辟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假定，即使不对分离派教徒实行宽容，至少应对他们自己实行宽容。在这方面，他们像蒙克的士兵们那样被出卖了。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假设，即至少内战的某些教训将被引以为鉴，且将对国王施加限制，以便防止公众记忆犹新的事件重演；查理一世的悲剧怎么会不成为一种界定得更明确的新型君权的出发点呢？然而，不幸的是，有许多人从那个悲剧中引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血债要用血来偿。很长时间内，舆论截然分裂为这些对立的思想派别。查理尽管是作为一个议会制君主，也即作为一个倚赖议会而非倚赖自己的国王回国，但是，我们很快要叙述的一些事件却割断了他和他的继承者同那个把他从流亡中召回国内的机构之间的联系，并导致在1688年被推翻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君权。

为什么议会未能对这位复辟的国王施加条件？答案可能在于，查理及其军师爱德华·海德——日以后的克拉伦登伯爵——决心不屈从于任何条件；另外，代表国会的下院在无休止地谈论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之后并无结论，可能因为他们之中没有哪个有足够的主动性或胆量提出一项法案，或至少拟定一项决议。早在1660年4月的布雷达宣言中，查理已经规避做出任何明确的宽容承诺；海德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也极力主张各项措施应予协调，以便尽可能地防止施加限制。于是，1660年复辟的国王就像他父亲先前那样不受约束。而且，直到1675年为止，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能把查理的统治权描述成议会制：由于下院为王室年俸提供的钱款不敷所需，议会便总有希望利用王室的财政困境（这种希望也未能实现）。另外，在1675年以后，最初于

1660年授予的年俸证明足可应付和平时期的用途而有余；因此，除非投身战争，查理便不依赖议会。詹姆士在他唯一一届议会开幕时处于同样的局势。相当清楚地解释这两位国王之统治的主要事实就在于此。

下面就按这条思路进行叙述。代表国会希望在查理得自国王领地和王家特权的收入以外，授予他适当的终身年俸。所需的总额议定为每年120万镑，国王不仅须以此支付王家庄园的维护费用，而且须支付海军的平时维护以及法官和驻外使节的薪金。直到1697年才确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王室年俸法》；在此以前，议会给予的年俸既用于个人花费，也用于国家开支。为了凑足这每年120万镑的议定数额，代表国会决定查理可终身得到来自关税的年俸，通常估计每年约40万镑，加上来自国内消费税的每年约30万镑，其中每年10万镑永久给予王室，以补偿由于废除监护法庭而丧失的收入。此外还加上若干杂项，例如来自邮政总局和印花税以及1661年后来自炉灶税的收入，据假定，这些款项每年总共产出约100万镑。事实上，产出没有那么多；因此，在国王统治的头12年里债务不断增长，结果是1672年的“关闭国库”，即承认部分地破产。查理没有得到下院的公正待遇。然而1660年的立法者们不可能预料到，由于通商贸易的大发展，关税和消费税的产出会如此增长，以致给予了国王超过120万镑的年俸，而且这一年俸可以合法地收到而无须依靠议会。在查理于1674年被迫退出第三次英荷战争后，此种情况便一目了然了，其时荷兰人被留下进行对路易十四的战争，英国则坐享中立带来的各种难得的好处。到詹姆士登基时，这种通常被称为世袭年俸的岁入已达200万镑左右。这就是查理在1675年以后、詹姆士在1685年议会授其终身年俸以后在财政上独立于议会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的政策。

前面说过，为查理的年俸所作的安排是同废除监护法庭连在一起的。该法庭由亨利八世设立，以便从所有根据免租使用权占有国王土地的人那里榨取在他们先前所服徭役等价的钱款，并且将那种曾是中世纪领主特权的个人监督强加于那些佃农身上，特别是强加于他们的幼年子女和寡妇身上。受此影响的佃农主要是以服军役为条件占有土地的人，实际上包括所有今天会被说成是土地所有者阶级成员的人。通过依法废除该法庭，这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便从一种与遗产税制度不无相似的制度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包括最主要依靠土地而致富的

人，从名义上的佃农变成了实际上的全权所有者。这个法令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废除了一切封建占有权，因为“誊本保有权”未被触及，直到在20世纪被废除为止它仍旧是一种重要的占有权，故英国的地主在他们保持领主特权的任何地方继续对其誊本保有权佃农行使“封建”权力。但与此同时，地主们以一种落在每个消费者头上的额外税收为代价得到了解放；而且，他们注定要享有另一种好处，因为1660年后尽管有一些叛乱，但无内战，故因叛国罪而被没收财产的可能性便很小。除了几乎完全落在他们肩上的土地税负担外，地主们在1660年后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和有力的地位。确实，作为土地全权所有者，他们自认为不属于几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国家中唯一完全可靠负责的成分。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实。它造成了若干重大的后果。他们对土地的全权所有——我们倾向于把这和特权或垄断相联系——逐渐与广义的自由等同起来，即与行动自由等同起来，不管他们是作为大陪审团成员还是作为下院议员，而且，这种全权占有被视为是免受恐吓，而非反对贿赂的最好保障。这一区别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完全自然的，并且构成1688年革命和18世纪政治的基础。

代表国会实现的复辟安排有两个主要目的，即结束政体实验时期和从空位过渡到君主制。关于第一个目的，先是默然假定，后来又正式规定：查理一世未予同意的所有法令和条例统统无效；不过，这些措施中某些最重要的经过修改和扩充被重新载入了法典。一个例子是1660年的《航海条例》。根据《赔偿法》，还活着的“弑君法官”和其他大约20个人——他们未能及早改头换面——未获宽恕，其中约有12个人，包括亨利爵士韦因，被处死刑。土地解决方式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为已发生那么多交换和购买被没收土地之事，以致无法设计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王家和教会的土地被收回；若干著名保皇党人的土地根据专门立法归还原主，但是小人物们只能靠自己打官司寻求力所能及的补救办法。通过这一方式，许多篡政期间轻而易举地得到土地的克伦威尔分子获得了跻身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永久资格，不久辉格党便从这种田连阡陌的新土地贵族那里吸取力量。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660年的事件不被说成革命，而被说成复辟。在几乎不过8个月时间里，代表国会完成了过渡，成功地处理了每一个紧迫问题，唯有土地解决方案和在布雷达宣言中含糊做出的

宗教宽容许诺除外。与此同时，保皇主义潮流不断上涨，在从1661年5月延续到1679年1月的保皇党议会，即复辟时代长期议会的初期各次会议上达到了顶峰。这个议会在其18年的历程中完成了英国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演进。它的性质无疑受到多次补缺选举的影响，但其成分基本上保持不变，即由许多土地所有者及其提名者构成，加上少数商人、律师、官吏和陆海军军官——一群参差不一的人，其中或许有青年保皇党人组成的核心，他们逐渐成长为心怀不满的中年辉格党人。

骑士议会开张伊始即通过了各种旨在使国王解脱束缚或控制的措施。第一，有一项法规授予他一切海陆武装力量的最高控制权；第二，另一项法规大大扩展了叛逆法的范围，因而使国王能更容易地对付批评者和反对派；第三，《许可法》设立了一种新官——出版审查官，他对未获许可出版书籍的作者和印刷者行使广泛的权力；第四，一项压制骚动性请愿的法令限制了臣民的请愿权；第五，《市镇机关法》试图把市镇机关成员资格限于圣公会教徒和忠君者。这最后一项措施通常不很准确地被当作《克拉伦登法典》的一部分，它确立了后来经1673年和1678年《宣誓法》扩展了的原则：这些原则被当作完全公民资格的先决条件，即宣誓效忠最高权力，宣誓不抵抗，加上至少每年一次按照英国国教会的仪式行圣礼。根据《信仰划一法》（1662年），一切领薪俸的教士，凡未获得圣公会主教任命者，必须放弃薪俸，这项措施到头来使得许多在今天被当作低教会派或福音派的教人和俗人加入了新教的不奉国教派，从而加强了该派的力量。圣公会的垄断以这一方式创立起来，范围所及包括教会、大学、中小学，后来还包括公民资格本身。

剩下的事只有处罚非国教教徒，包括长老会教徒。依靠1664年以后通过的、多少有理由称为《克拉伦登法典》的一系列措施，此事得以告成。1664年的《宗教集会法》禁止为宗教目的举行5人以上的集会；1665年的《五英里法》禁止所有未宣誓的教师和讲道者进入自治市镇周围五英里之内。与这些措施并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反对非国教教徒的运动，民兵被动用来援助市政当局。对于这些严厉行为，查理本人即使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那也极少，因为此时他倾向于宽容；英国国教会的教士们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负立法责任。事实看来是，国王不得不予以默许，否则就得不到议会特别拨款。责任在于下院的多数议员，他们正一意复仇，即报复处死查理

一世一事。在他们看来，所有各种非国教——长老会、教友会和浸礼会之类——都可能是叛逆；只有通过依附英国国教会，一个人的忠诚才能够检验出来。至于罗马天主教徒，仍然受制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严厉立法；但实际上这一立法既不统一，也未严厉地实施于天主教俗人，这些人虽然遭到种种不便，但不受迫害，亦非绝无公民权。然而，在查理的统治结束以前，尽管他们的地位依然如旧，对他们的态度却完全改变了，英国人的心灵中注入了那种一直留存到近期的对罗马天主教制度的怀疑和仇恨。

到1661年4月，英国的王政复辟可认为业已完成。在那个月里，国王流亡期间服侍其左右，后来直到1667年落难流放为止一直作为非正式首席大臣行事的海德大法官，成了克拉伦登伯爵；蒙克将军被封为阿尔比马尔公爵；适时变换其效忠方向的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成了阿什利男爵，后来又成了沙夫茨伯里伯爵——辉格党的缔造者、国王最可怕的对头。圣乔治日，即1661年4月23日，查理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并被慷慨地涂满圣油。确实，涂油证明如此灵验空前绝后，因为他将作为一个极成功的瘰癧“触摸者”^[2]大得民望。加冕之后便是结婚。这于1662年5月21日在朴茨茅斯举行，他在那里通过两套仪式娶了布拉干萨的凯瑟琳公主，一套是圣公会仪式，另一套是天主教仪式。年轻的葡萄牙新娘带了丹吉尔和孟买作为部分嫁妆，其中第一个地方经过一段岌岌可危的占领之后于1683年投降。第二个地方后来成了英国在印度的权力的基础。这项婚姻得到路易十四赞成，他渴望获取英国和葡萄牙的帮助来对付他的岳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确实，路易急于看到这桩婚事告成，以致提供了大约5万镑。这样，查理在其统治初年就被搞得立誓保证促进其法国表弟的图谋。

与这些事态并行，王政复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完成。总的来说，爱尔兰在1660年到1688年这一时期里是比较幸运的，主要因为斯图亚特家族同情属于凯尔特族的爱尔兰人，也因为他们有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为其效劳，他是最能干的爱尔兰总督之一，从1661年到1668年，而后从1677年到1684年任此职。这位公爵的官运最初与他的国务同僚克拉伦登的官运联结在一起，后者在受国王宠信方面不久就被阿林顿和白金汉之流华而不实的年轻人超过；但是，巴特勒在1677年有幸重新得势，并且在“天主教阴谋”和斯图亚特反击的困难岁月里始终成功地指导爱尔兰国事。奥蒙德公爵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英国

宫廷走卒对爱尔兰世代相传的剥削。他还大力鼓励发展当地手工业，特别是亚麻纺织业。为此目的，他从法国和佛兰德斯引进熟练工人，但这一行业后来集中在新教盛行的北爱尔兰。一般说来，爱尔兰的复辟解决方案和英格兰相似。1662年，根据一项《爱尔兰信仰划一法》前不久制定的祈祷书被强加于爱尔兰（新教）教会，所有教师和牧师都被要求宣誓不抵抗和弃绝庄严盟约。^[3]罗马天主教徒被撤销官职，但他们并未遭受迫害。爱尔兰议会两院复会，但其提出法案的主动权大大受制于英国枢密院的控制；结果，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立法大都不过是英国法规的翻版，其中许多只对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有利。因此实际上爱尔兰天主教徒仍然是贱民，但至少他们的手工业受到鼓励，并且不受干涉地奉行自己的宗教。

像在英国那样，土地解决办法是最困难的问题，而且原因相同，因为篡政时期被没收的大量土地已经几易其主。1641—1643年的爱尔兰叛乱^[4]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当时大量新教徒遭到剥夺，克伦威尔的征服也是如此，其间许多天主教徒被英国士兵和“冒险家”即土地投机商夺去了土地。这一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阶级据信同情共和，在复辟时期的国务家们看来显然是可恶的。而且，英国宫廷里有人坚持要获赏大量爱尔兰土地，而在爱尔兰有许多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土地的“教皇党良民”。查理一世同情这最后一类人，但不得不为廷臣而牺牲他们。总的结果是，在近8000名被剥夺的罗马天主教地主中，只有约1300名被发还地产，同时许多士兵和冒险家不得不弃其所有。由此可安排的土地被大片地赏赐给宠臣，其中许多是不在地主。即使在这个较为慈善的时期里，他们的大部分代理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凶狠苛刻也使得英格兰佬这一称呼遭到爱尔兰人的厌恶。

要不是苏格兰这个北部王国被交给变节的苏格兰人，英格兰佬的称呼就会在那里遭到同样的厌恶。这些人有许多最初反对圣公会制度，但既然旧祭坛已被打翻，他们便急不可待地要迫害他们先前尊崇的先知。假设斯图亚特家族决定在这北方确立伊斯兰教，这些人就会甘愿变成土耳其人。他们当中引人注目的是约翰·梅特兰，即后来的劳德代尔伯爵、苏格兰枢密院大臣，他实际上统治苏格兰直到1680年为止，他古怪地兼粗俗、迂腐和绝对忠于其君主这几种性格于一身。斯图亚特家族对故乡几乎全无感情，它的新教和贫困引起他们的厌

恶；由于缺乏多少保护臣民自由的体制，这个北部王国处在外国王代理人的掌握之中孤立无助。实施这一制度的严厉程度与日俱增。1661年，“苏格兰教会”恢复，这意味着查理一世曾极不明智地强加于苏格兰人的圣公会制度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有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的世俗首领阿盖尔伯爵被抓去“审判”并被处死，其罪名是在给蒙克的私信中（此信由蒙克交给了宫廷）使用了含有赞成英吉利共和国之意的术语。这预示了不久后其将如何对待长老会教徒和盟约派。

历史学家们强调这些保皇党人是偏执者，但应当补充说，并不只是保皇党人才有那种品性。苏格兰缺乏像英格兰存在的那种有力的地方管理；陪审员们可以因为自己的评判而被课罚金和被监禁；除很少例外，法官们在政治审判中都服从行政权力的意旨。古老的王国三级会议仍然（以一院方式）在爱丁堡的议会大厦开会，但按照法律，诸等级混合是被禁止的，因而第三等级由商人和手艺人构成，他们由于局限于工商事务而被禁止就行政管理发表意见。这一管理由听命于白厅的苏格兰枢密院支配。王室籍的实施旨意的另一个机构是章程委员会，它通常奉旨行事，决定要提交三级会议的措施。由于这些原因，17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无政治生活可言。司法由男爵法庭，即半私设的法庭管理，设在爱丁堡的最高法院由阿谀奉承的法官们主持，其谄媚成性甚至超过了威斯敏斯特厅的法官。可以随意用严刑拷打来逼人“坦白”，拇指夹（从莫斯科地区引进）在这个时期里被用来取代不适于腿细者的“刑靴”。这些事情不重要，因为苏格兰是那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它们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注解。毫不奇怪，许多逃脱“法网”的苏格兰人在荷兰避难，后来同奥兰治的威廉一起返回故国。

然而在复辟之际，这些还都是未来之事。在英格兰，人们确实感到如释重负：军队和圣人的统治结束了，国家终于被交还给理所当然的国王。国王决心把两个不易吻合的目的结为一体；他要自行其是，并且避免再去国外旅行；他在第一个目的上的相对成功和在第二个目的上的完全成功是无比精明和政治直觉的结果。

他当时的声望由于第二次英荷战争^[5]的指挥方式及其事态发展而稍有跌落。并非只有佩皮斯才看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水手们所陷入的绝境，他们得不到薪饷，吃半腐败的食物；还有1667年梅德韦之耻，

当时一些最好的海军舰船被荷兰小船烧毁或拖走。克拉伦登被顺手找来充作这些事情负责的替罪羊，结果他被迫流亡国外。第二次英荷战争给查理造成了外交困难，因为那时路易十四恰好由于同联合省的条约承担了义务，作为盟友前去援助它们。在英国方面，这场战争是应遭受荷兰竞争或公开敌意之害的贸易界势力之请而打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场民族战争，但查理不情愿开战，因为这会导致同法国兵戎相见。尽管如此，路易仍颇讲义气地对待其表兄，尽可能少地援助他那落得单枪匹马的荷兰伙伴，并且向查理保证充分理解其难处。战争因布雷达条约（1677年7月）而结束：英国获得纽约与新泽西，但荷兰人保留普洛一伦岛与荷属圭亚那，法国则保留阿卡迪亚与法属圭亚那；换言之，英国未能取得香料贸易立足点，而荷兰人在海上依旧强大。1668年三国同盟的组成使得斯图亚特和波旁两家的关系再度经受考验，该同盟是英国、联合省和瑞典反对路易侵略的同盟。查理对此不幸的力量组合所作的私下道歉在凡尔赛被顺利地接受了，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他正受着异教徒和腐败立法者的摆布。此外，路易毫不怀疑（据称）多亏法国才独立的荷兰人已经忘恩负义。因此1668年后西欧形势有如下述：路易对一个先前的盟友义愤填膺，他只给过它名义上的支持；他向一个先前的敌人表示友好，他给予其国王秘密的同情。为何不公开同查理携手反对荷兰人？如果荷兰人被消灭，难道不大大有利于英国的天主教事业？因战胜英国的头号对手而得到加强的斯图亚特国王将处于得以在其骚动不安的臣民中促进正统信仰事业的地位。

路易十四的大臣科尔培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可以通过英法针对联合省的商业同盟而不是通过战争来毁灭荷兰的繁荣。旨在缔结这么一项条约的谈判开始举行，但它们主要由于法国坚持要英国采用法国的度量衡标准而破裂了。于是，路易十四取代其大臣施展身手；两国使臣继续来往于海峡两岸，但现在是为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目的，即谈判那个逐渐被称为多佛密约的东西。到1669年已达成一致意见：路易将为两项特别事务向查理提供津贴——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和进行一场对荷兰的毁灭性战争。该条约于1670年5月22日和6月1日签署。根据其条款，查理同意站在路易一边对荷兰作战。路易则有鉴于此许诺每年支付300万锂（约25万镑），并答应查理将分得瓦尔赫伦岛、斯鲁依和卡德兰为战利品。如果路易取得对西班牙领地的任何新权利，查理将协助贯彻这些权利。他还承诺宣布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但何时

这么做由他自己决定，其酬赏将相当于大约16万镑，连同6000兵马用来镇压可能随此项宣布而来的动乱。在“五人团”（人们如此称呼查理的5个幕僚组成的非正式小组）成员中，只有克利福德和阿林顿知道内情，其他3人阿什利、白金汉和劳德代尔对交易的宗教部分一无所知。

从1671年4月到1673年2月，议会休会。在这一时期，查理试图搞一项折中，它似乎可向兑现多佛密约之宗教条款的目标有所迈进。这就是1672年3月25日发表的《免罪宣言》，据此国王中止实行一切惩治非国教教徒和所有拒不宣誓者的刑法。罗马天主教徒将被允许在自己家里做礼拜。根据这个措施，只有王家才会受损，因为它将不得不丧失迫使不从国教者缴纳罚金所得的收入。至于对荷战争，查理受到不断增长的债务影响，这些债务使他不得不默许“关闭国库”（1672年1月）。于是，在《免罪宣言》发表两天之后他对联合省宣战。因此，与同前两次英荷战争不同，第三次英荷战争完全不是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国王自己主动发动的，目的是获得领取法国津贴的资格。

当议会在1673年2月复会时，下院多数在上院的一个权势集团支持下要求撤销《免罪宣言》理由是：只有立法部门才能中止在宗教事务中实施刑法。正是在这件事上人们可以察觉到出现了一个与宫廷派有别的下院反对派——“选民派”，因为它没有荣获王室承认。也是在此时，大法官沙夫茨伯里得知了多佛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他于是转而组织上院反对派，甚至查理也无法挑拨议会一院反对另一院。国王不愿为天主教徒牺牲自己利益，遂于1673年3月8日收回了免罪宣言。他做得很及时。他还不止于此。几天后，他同意了第一个《宣誓法》，该法规定所有拒绝宣誓效忠最高权力并按英国国教仪式行圣礼者及不肯弃绝圣餐化体信条者不得担任公职。其直接后果是前不久改变信仰的约克公爵詹姆士不再能担任海军大臣之职；一个不那么直接的后果是议会迫使查理通过威斯敏斯特条约（1674年2月）退出了战争。按照这项条约，荷兰人同意交付一笔赔偿金，但除此以外它的条款是非决定性的，而且没有为英国人打开东印度群岛的门户；另外，英国现已中立，便能够夺取其对手和敌人的某些市场。[\[6\]](#)

同时，在1673年9月发生了一件不祥之事：“改宗者”詹姆士同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结婚。詹姆士从第一次婚姻（同安妮·海德）得到了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她们从小信仰新教；关于国王

和王后，其永无后嗣现在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了。人们还肯定，詹姆士将靠他的新妻得到后嗣，的确，这个生育力问题在公爵选择新娘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路易对这一选择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多少意味深长的是，反对派恰好与开始担心王位继承问题同时出现——担心英国最终将由一个天主教王朝统治，它将与大陆上的同类王朝结盟并将确认异端为万恶之首。这种担心已经表现在议会坚决要求撤销《免罪宣言》和迅速通过《宣誓法》之中。重要的是，主动采取这个步骤的不是教会，而是立法部门，并且是为了一个世俗目的：在可以通过法规做到的限度内尽力维护当时被认为不可分离的两个事物——新教和英国独立。

研究由1678年《宣誓法》扩展了的1673年《宣誓法》，可以看出该法案中除提供圣礼明证外，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神学；否定性的神学有许多，即否决罗马天主教中某些根本的信条；其余是由旨在确保宣誓忠诚和服从的政治保障条款构成的。最后，根据1678年宣誓法，所有这些誓言和弃绝辞都必须“以明白通俗的词意”做出，意即此是俗人的信仰表白。直到1829年，这些法令才不折不扣地实施完毕；而在那以前的很长时间内，这套制度被放宽，以利于那些未曾宣誓而担任官职的新教徒；而且，以一种今天不易说明的方式，宣誓法逐渐被圣公会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教徒等当作保护英国独立、抵抗威胁的堡垒。更有甚者，这套制度逐渐同启蒙运动以及宽泛的宗教宽容[7]联系起来，并受到伏尔泰的称赞[8]，因为它的效果是创立一种爱拉斯模式的教会，在其中教士阶层安分守己，不得拥有它在18世纪的法国所行使的那种秘密的和不负责任的权势。

在这1673年，多佛条约仍严格保密，但以上列举的公开事件使当时许多人怀疑其存在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是对的。即使国王信任他们并解释说打算尽少遵守诺言，他们也不会放心。英国人此时表明的担忧是合理的担忧，它们被公开事态证明不无理由，并能通过参照秘密事态而得到证实。因此，不能把它们当作“宣传”的结果而置之不理。查理二世在承担多佛密约的义务时，更关心的是取得法国的金钱，而不是试图把天主教强加于英国；但是，我们能否同样吃准约克公爵的性格和意图？几乎因为其弱点而在全英国颇得民望的查理与其胞弟截然相反，后者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的优点——勤勉、宗教热情、坚韧不拔以及不惜任何代价来达到目的的决心。正是因为这一

点，许多英国人——圣公会教徒和忠君者——开始将詹姆士视为威胁，一种因1673年后数年中不断加深的怀疑而上升为恐怖的威胁。

为什么1673年的合理担忧变成了1678年即“天主教阴谋”之年的胡乱惊恐和歇斯底里？历史学家们是否曾令人满意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诚可怀疑。部分答案至少可以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那就是在“天主教阴谋”前夕的1677年通过的一个措施——《防止欺诈法规》中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规定，作为价值10镑以上货物买卖契约有效的条件之一，买卖双方应签署一个字据或备忘录。议会试图以此来（虽然是间接地和部分地）对付那种据知是当时头号社会恶习的行为——伪证。在一个盛行发誓的时期，许多店主乐意上法院以便作伪证（通常在其学徒的协助下）：某某未来顾客已口头约定某些购买；而《法令全书》则提供了这一恶习盛行的最佳证据。当时，伪证若属初犯，只算是轻罪；这样，一个偷了5先令的人很可能被绞死，而假如他依靠做伪证致使一名无辜者死亡而得到了同样数目的钱，他只被罚以一小笔罚金和戴枷示众。不幸的是，普天之下孤自疾呼反对这一罪行的是（著名的）无神论者霍布斯^[9]，这个事实可能导致许多善良虔诚的人容忍一种显而易见的邪恶。关于伪造票据，情况也是如此，在该世纪末年英格兰银行钞票的发行促使立法部门修改法律以前，伪造票据甚至还未开始被看作一项重罪。因此，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杜撰离奇的阴谋故事，诬陷知名和杰出的人士，希望依据编造的或经伪誓的证据将他们置于死地，并不显得特别卑鄙或无耻，尤其是因为能够那么便宜地得到专业造伪者的效劳。这甚至也不是一件冒险的勾当，因为一旦被揭穿，可能只会导致戴枷示众，或许还是在同情的旁观者面前。

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阴谋”并信誓旦旦地加以证实，几乎是17世纪时的一桩嗜好。泰特斯·欧茨要不是因为当时那种对他来说十分走运，但对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大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来说却十分倒霉的形势，可能永远只能默默无闻。他的第一项本钱是惊人的记忆力，他能记住自己的所有谎言；第二项是他的神学博士学位，据推测是由萨拉曼加大学授予他的；第三项是他精明的心理学才能，这使他能够觉察到利用近十年来一直在增长的恐惧和猜疑之时机已经成熟。然后是“天赐”，即信仰新教的地方法官像德蒙爵士贝里·戈弗雷遭暗杀后的尸体，1678年10月在汉普斯泰特附近发现。戈弗雷不幸

接受了欧茨信誓旦旦的作证书，内容是关于一个由教皇和耶稣会士的大“阴谋”，其主要目的为暗杀国王，由詹姆士取而代之，随后将是普遍屠杀新教徒。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事情一目了然：由于戈弗雷这位并非情愿地掌握了那么多秘密情报的人活着太危险，他一定是被耶稣会士除掉的。以后几个月里横扫英国的歇斯底里浪潮极为汹涌，以致除了国王（他可能继承了苏格兰高地人的预见力天赋），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人物都相信有此阴谋——的确，相信有此阴谋成了衡量爱国主义的标准。在整个这场事件中，沙夫茨伯里起了带头作用，他同欧茨合作训练证人，结果，有大约20个受害者丧命。

这个阴谋的影响可以从某种党派分野的产生中看到。有许多公众舆论二元化的先例，早在1673年就有证据显示议会里的这么一种不一致，虽然议会长期以来一直不愿公开承认此种分野的存在。然而，正是这场“天主教阴谋”使得这种最终将创造出当今党派政治的二元化成为一种普遍和全国性的现象。这起初是宫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简单竞争。宫廷的支持者包括信奉世袭君权神授论及其相关的消极服从或不抵抗论的人，这一理念倡导服从神权君主的合法指令并屈从他的非法指令。这些信条的提倡者自称甘愿服从君主，甚至到不惜殉难的地步，但实际上他们不那么蠢。此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圣公会教士争辩说，没有必要从他们自己中间提供殉难者，因为查理一世已经代表他们献身了。斯图亚特家族不时被认为是愿意利用爱尔兰恶棍来反对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人，因而“托利”即“爱尔兰”凶手一词便成了称呼这些君权支持者的绰号。他们从自己的教科书即《旧约全书》中提取了神权君主可能出错的确证；事实上，他出错的可能大于正确的可能；不过，由于他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臣民除了承认上帝以此间接方式惩罚人类罪恶外，对此几乎毫无办法。

正如爱尔兰提供了一个恶称那样，苏格兰提供了另一个，因为在英格兰生活中没有任何足够凶狠的骂人话可以适用。正是在这个时期，北部王国的事态在英格兰观察者看来又一次变得重要了。这些事态不得不予以简述。在苏格兰西南部有许多长老会信徒，他们由于拒绝服从圣公会而失去法律保护并遭到迫害；1678年年初作了刺激他们叛乱的尝试，办法是把一批多达六千名被称为“高地主人”的高地盗匪安置在他们的农场和宅地中。这一尝试失败了：那些部族民带着掠获物撤走，而许多苏格兰人则移居北爱尔兰。1679年5月又来了一项罪

行，进一步激怒了舆论并导致了残酷的报复，这就是暗杀遭到仇视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詹姆斯·夏普，接着在几星期后格拉亨（克拉弗尔豪斯的）败于一批盟约派之手（德拉姆克格战役）。这使得查理政府派蒙默思公爵前往北方，指挥将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增援的部队。但是，在爱尔兰天主教徒抵达以前，公爵成功地在博思维尔布里格战役中打败了装备不良的盟约派（1679年6月）。到此时，宣布不再效忠斯图亚特家族，或“逃亡”或积极叛乱的长老会极端派已经以“辉格党人”著称。这一绰号现在被用来称呼那些先前被称为“选民派”的批评查理政府的英格兰人。

这个党派包括了一大部分富商和非国教教徒，并在上院占有许多席位。的确，它是个贵族党，其教徒中有许多人拥有头等赛马的事实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托利党人的牛津大学比辉格党人的纽马基特大学差得多。辉格党人几乎无一例外是新教徒，他们敢于批评君主，理由是他的政策正在危及民族信仰，正在导致英国臣属于路易十四。或更确切地说，他们敢于批评他的大臣，例如丹比伯爵，他们在1678年年末试图弹劾此人。但他们失败了，因为查理预先完全赦免了他。辉格党人从处死查理一世的悲剧及其无所成效之中得出了一个教训，即坚持切中要害地指控国王本人有罪是无用的——指控必须对着国王的代理人；因此，他们重新拿起传统的普通法准则“国王无谬误”，并在下述意义上运用之：大臣必须对国王的所有公共行动负责。由于这一责任只有通过议会弹劾才能执行，辉格党人从一开始就坚持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因此，他们是主张议会主义、议会制政府和大臣责任制的党。与此相反，力量主要来自低级教士和乡绅的托利党人坚持要毫无保留地服从君主个人的特权。他们献身于英国国教会。不过，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即这个高教会的党派由于厌恶信仰新教的非国教教徒，被视为同情天主教甚于同情新教，而且许多圣公会牧师弃绝了同改革教会的任何联系。唯一能肯定的是，查理二世把主教和牧师们的支持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非国教教徒越受到惩罚，这一支持就越有力。

自然，这两个绰号遭到许多被如此称呼的人拒绝，议会两院也不存在可以被贴上其中任何一个标签的党派。因为政客们不是按照党派隶属关系来考虑问题的，而且政府的“基石”仍旧不是党派信条，而是家族、利益和部族集团。也不存在任何关于个人正直与否的区别，

因为所有党派不管名称如何都包括某些声名狼藉者和许多腐败者。但这并不是说辉格党和托利党没有区别。一种简单鲜明的二元主义已被议会外举国上下急切地接受了，虽然这仅仅是因为那么多人按照两方竞争的方式想问题，而两方竞争在英格兰一向比在其他地方更流行。因此，最初讲解党派区分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群氓。这种区分可以被扩展到许许多多生活领域。饮料、誓词、旗帜、守护神、赛马场、卖酒处和咖啡馆都被按照阵线这方或那方排列起来，其中每一方在对方看来都是由一种超人的权力领导的：一方由恶魔调度，他因为是头号批评者而显然是辉格党魁；另一方由罗马娼妓担任统帅，她在“纯蓝”的辉格党人面前招摇其鲜红的服饰——整个图景以艳丽的色彩提供了一个即使最卑贱者也能理解的模式。对于一个骚动不安、青春年少的民族，这整个是天赐之物，因为每人都是可以决定站在哪一边。不仅如此，为数众多的赛马场还提供了一个安全阀门，在那里过剩的热情可以分散在更为多样的竞争者身上。英国的党派政治最初不是表现为学术辩论的文雅滥调，也不是表现为议会运作的老谋深算，而是表现为贫民区里和绞刑架下的下流谩骂；由于这种方式，英国人在取得选举权以前就已变得关心政治了。

与此同时，“天主教阴谋”迫使议会面对一个斩钉截铁的问题：是否应当不准约克公爵詹姆士继承王位？如果不准，那么谁将继承？他的长女玛丽（嫁给奥兰治的威廉）？或者查理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倘若他继位可能根据“一种有限指令”施行统治。不过，这些问题不是非要在查理统治时期回答不可，这主要归功于当时的老臣哈利法克斯的辩才，上院拒绝了下院在1680年11月提交的《排斥法案》。这就把王位留给了詹姆士。短命的牛津议会在1681年3月18日解散，就查理来说这标志着议会制政府的结束；与此同时，法国津贴的恢复提供了英国政策将从属于凡尔赛谕旨的某种保障。既然议会、排斥和阴谋都已清除，詹姆士便作为其兄长的军师和副手走到台前，在这个意义上詹姆士的统治在他登基前四年就开始了。1683年所谓的黑麦酒店密谋给辉格党人提供了一个反守为攻的好机会或好借口；而且，在杰弗里斯法官的帮助下，宣判著名的反对宫廷者犯有叛国大罪显得轻而易举。威廉勋爵罗素和阿尔杰农·西德尼就这样被除掉了。把地位较低的辉格党人送往彼岸一事则使刽子手杰克·凯奇忙个不停。沙夫茨伯里同其他许多人流亡国外。泰特斯·欧茨下狱，不是由于作伪证，而是由于无力缴纳因诽谤约克公爵而向他征收的10万镑罚金。

对查理和詹姆士两人来说，这是个复仇时期。复仇开始于对自治议员选区的处置，许多选区已重新被下院批评者甚至宫廷的敌人控制。于是，这些选区的特权遭到“特许令状”的审查，而且它们几乎全被改组，以便保证只接受圣公会教徒和忠君者。由此，市镇机关的围墙，包括伦敦市府的围墙，在杰弗里斯面前像耶利哥城墙一般坍塌了。宫廷希望的是，通过选区的改组，假如不得不召集议会，那么也只有“合适的”市选议员才会被送往威斯敏斯特；也因此，可以信任经过改组的市镇机关的行政司法长官来召集“合适的”陪审员，这些人在任何关系到君主的诉讼案中会提供他们被期望提供的评判。这一反市镇机关的运动所依据的理论至少是如此。与此同时，针对信仰新教的非国教教徒的刑法加紧实施，在某一案件^[10]中，全靠地方当局的勇敢行动，才防止了用龙骑兵来蹂躏乡村。在苏格兰，不那么幸运的是民众和行政权力之间没有出现任何中介；因此，在长老会的苏格兰像在胡格诺派的法兰西那样，这是个“杀戮时期”，两点钟被判罪的人到五点钟就被绞死。

查理二世于1685年2月16日死去，终年55岁。他在世最后几年多少显得身心俱衰。这些岁月对他来说是个平静的时期，对他的国家来说则是个不稳定的和平时期，这种和平是由他的胞弟和刽子手帮助促成的。“Rien n’ avance les choses comme les exécutions”；英国在政治上沦为了法国和苏格兰那样的状况；只有爱尔兰依然如故。不管历时多短，英伦三岛是一个体系的组成单位，这个体系把它们同可敬的、“状况良好”的大陆国家联在一起。这个体系最温和、最合理的阐发者是伟大的法国主教雅·贝·波舒哀。在他为查理和詹姆士之母亨丽埃塔·玛丽亚死时（1669年）所致的悼词中，这位主教强调英国在一些年里被不敬权威的和老是渴望变革的情绪所折磨。这一“狂热的追求新奇的过度激情”是拒绝天主教信仰造成的，而只有天主教信仰才“有使人安分守己的一定分量”。上帝惩罚那些背离真正信仰的民族。按照波舒哀的说法，亨丽埃塔·玛丽亚确信只有通过恢复天主教才能恢复英国的秩序，而她的长子已经在天主教徒中间找到了他最好的臣仆。查理一世的过错不像他的反对者强调的那样在于固执或背信弃义，而在于宽厚。^[11]这些就是末代男性斯图亚特君主们默然信仰的宗教—政治制度之原则，它们以一种符合其庄严场合的精致和有分寸的方式宣示出来。查理在照此行事以前不得不等待时机；詹姆

士未及登基便在照此行事。这种制度也不可能靠经验，甚至失败和灾难得到修改，因为它具有神学教条的极端僵硬性：詹姆士本人便是明证，他在流亡期间最后悔的是他过于宽大。对这么一种制度的功过，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它的存在与含义毋庸置疑。

波舒哀正确地认为英国人是个好骚动的民族；但是，他完全不懂有助于抑制骚动，甚至赋予它某种方向感的条件，因为他的经验局限于法国，而法国是个同英国的不正常相反的“正常”国家。这一不正常以如此众多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致大多数外国观察者都同意说英国人疯狂，其确证是他们中有那么多人履行公务但不拿报酬。英国在其法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不正常。刑法几乎像大陆国家的刑法一样严酷，因为法律的主要目的仍被认为不是保护人，而是保护财产。另外，从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到英国最西端的小村，法律是一致的，而法国却存在着成文法地区与习惯法地区的差别。后者包括了大约300个实行不同法规的专区。而且，陪审制是英国司法程序所特有的，在1670年，因布歇尔一案，陪审团裁决不可违背之原则首次得到维护。除了有因此案而取得了某种独立性的小陪审团外，还有由殷实的全权所有者组成的大陪审团，它们是无法被轻易吓倒的。这种团体进行预查，以便决定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交审判，由此便给臣民提供了某种保护，使之在行政部门为惩罚批评者或持异议者而诉诸法庭的任何场合免遭其害。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1681年11月，当时国王试图根据一项捏造的叛国罪指控除掉沙夫茨伯里。由辉格党人组成的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拒绝了控诉状，理由是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叛国证据，这是查理及其政府的一次重大失败。不过，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因为通过改组自治议员选区，他们希望确保只有身为托利党人的大陪审团成员才会被重新选入。

复辟是在一个清教徒作法律改革实验的时期之后发生的，这些实验直到边沁时代才得出成果；但与此同时，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由于添入法典的许多内容而引人注目。其中有1666年通过的《诉讼时效法规》。所有战争都造成可能无法确定一个男人是死是活的情况，这可能对其妻子和后嗣大为不利；因此，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通过这个法规设立了一个专断的，但并非无理的时限，即在国外失踪、没有任何活着的证据长达7年，此后即可假定已死。沙夫茨伯里的“增进保障臣民自由及防止监禁于海外之法令”，更普遍地被称作《人身保护令

修正法》，甚至被称作《人身保护令法》。查理于1679年5月正式将其颁布。人身保护令状是个古老的匡正办法，旨在保证被拘留者能现身法庭，以便使其拘留原因得到公开的调查，但在实践中，行政部门有许多进行干预的途径。于是就发明了一个程序，据此，拘捕令只能由一位高等法院法官颁发，并且只能在一定期限内颁发。拘捕令可能不得不申请若干次，而且即使给了也可能经过长时间拖延才送交，在犯人被囚于海外——例如泽西——的情况下就是如此。沙夫茨伯里的法令起源于早先旨在防止监禁于海外的措施，它纠正了这些弊端，并且为现代人应用这一匡正办法奠定了基础。这一匡正办法可称各英语民族的司法所特有的，与那些政治嫌疑犯可以被秘密地、无限期地监禁的制度形成对照。当詹姆士宣称他希望看到《宣誓法》被废除时，他添了一句说《人身保护令法》也应废除。

要不是由于下述事实，这些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英国普通法不管可能多么严重地被柯克（Coke）和其他法学家曲解，却毕竟被认为向臣民提供了抵抗行政部门侵犯的权利和救策，这些权利和救策并非近来所得，而（据假设）是远古之物，是其他国家，包括英格兰的紧邻苏格兰的法律所没有的。议会的高等法院是这些东西的古老而又备受尊崇的守护者，它是这个国家的最高裁判者和审判者，而国王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基本成分，这同受君主个人控制的巴黎最高法院截然相反。议会下院当时所起的作用到现在还未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充分阐释，那么它使当时的外国观察者完全迷惑不解又有什么奇怪呢？诚然，下院大多数议员乐意收受贿赂，不管贿赂是来自丹比伯爵还是来自路易十四或别的什么人，因为私下腐败同当众声明高尚原则并非总是互不相容。但是，下院以其集体的身份宣称充当英国一切财产全权所有者的代言人并因此取得了力量。就个人而言，仅少数的议员受显著的个人利益之影响，但作为集体，他们在国内外享有世界上任何其他代表机构无与伦比的威望。可以贿赂这些英国人，但无法吓倒他们；查理懂得这一点，但詹姆士全然不知。还有，说他们是代表，并不是从他们乃受命于成千上万选民这一现代的意义来说的，而是指他们包括乡绅、贵族次子、行政官员、陆海军军官、商人和律师，从而代表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各阶层。

最后，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地方行政。一个巨大的官员等级体系，从高官显宦到衙门小吏，从世俗臣僚到主教牧师，合作履行着使

骚动不安的英国人安分守己的任务。这个体系的顶端是各郡的郡长，郡长在副手协助下监管民兵，并通过类似地方议会的机构评估财产所有人，以确定他们要为这一本地武装捐助多少。这些官员不时干预选举进程，他们还提供了一条使枢密院了解地方情感并使中央的压力得以行使的渠道。在实践中，郡长出自贵族和较重要的绅士家族。一个对这些人感到放心的国王对全国也感到放心，因而詹姆士二世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罢了官是不明智的。地位次一等的是警官和治安官。警官负责管理郡监狱和执行死刑，通常任职一年，其职务被认为既麻烦又费钱。治安官人数较多，他们执行绝大部分的郡行政和司法工作。他们或者单独，或者两人一组，或者通过每季例会——该郡所有治安官的集会——来履行职责，应付法典要求的无数任务，如颁发啤酒馆执照、发文确定私生子的父亲，或判处不服规章者缴纳罚金或银铛入狱，等等。治安官们都是财产全权所有者和国教教徒，通常他们拥有的法律知识不超过可以从道尔顿《乡村正义》之类的标准手册所能获得的范围。他们中许多人欺压下民，不容异己，不过，他们是不领酬金维护一种制度的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在一个心思活跃的国民中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些并不是行政体系仅有的官员。教会仍然对俗人行使某种教规控制，一般是通过主教管区法庭。对于村民，有副主教巡视实施管辖，届时通过罚钱、苦行赎罪或革除教籍来教训骂人成性者、未婚先孕者、不守安息日者以及教区内所有一贯捣蛋者。没有任何人卑贱得不配教会达官理会。此外，人们并不总是认识到昔日的领主裁判权不管怎样残损，仍在许多地区存在，通常是在那些有着誊本保有权者的地区存在，誊本保有权者必须出席由代表领主的管家主持的习惯法庭：在那些法庭里，誊本保有权者的“效忠仪式”或陪审团可能不得不就五花八门的，主要同土地耕种有关系的罪过和犯规行为做出裁决。乡村的监控权不属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也不属于追击手无寸铁的村民的龙骑兵，而是属于本地平民，他们中许多人生活穷苦，毫无名望，而且他们全都习惯于那种属于自治要素的合作和公众服务。这里存在一个紧密结合的、井然有序的世界，远离白厅的放荡淫逸和凡尔赛的奴颜婢膝。詹姆士二世自讨苦吃地试图颠覆的正是这个执拗的、无法突破的世界。无论是波舒哀还是路易十四，都无法想象新教的英国拥有这么一种存在于地方行政中的制度：它靠大众参与一大批多半没有报酬的地方公职有效地保障了秩序。

这个时期英国的王室政策及其中央和地方体制的概况就是如此。国家从这一政策中得到了一大好处——置身于大陆上的各场战事之外，这使它能够节省资源，积聚供它以后在与法国的长期斗争中使用的财富。它从自己的体制中获取了一种实业精神，使它能够在全国间占据显赫的地位。伦敦是这个越益繁荣、越益开明的英国之缩影。不过，这里必须注意一下其间的区别。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市今天被认为几乎毫无二致，尽管它们仍由彼此独立的行政当局管理，但在历史上，它们互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对。威斯敏斯特有其修道院、宏伟的王宫以及议会两院，它以哥特式的建筑体现了民族历史的四大支柱——教会、王室、立法部门和法律之间的结合。相反，伦敦有其码头、市场、商店和大约50万人口，是个庞大的贸易都市，一个紧密凝聚的平民共同体和王国的社会中心。这两个中心在那么多世纪里彼此分立和显著有别是具有历史趣味的，因为议会和法院两者都在神圣庄严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与伦敦街头喧闹的世俗忙碌恰成对照。结果，英国的议会程序和司法进程保持了一种举世无双的尊严和强烈的传统感。两市之间也不仅仅是相对，还存在相互作用。从伊丽莎白一世时起，下院的各议员集团也许慑于圣斯蒂芬教堂那庄严得令人敬畏的形象，采取了一种在议会史上意义重大的惯常做法，即在伦敦的小饭馆聚会，以便讨论此后在下院付诸实行的联合行动。而且，这些社交和讨论的机会还似乎有助于“缓冲”政治分歧的影响，并为政治生活提供较广泛的基础。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虽然远非一致，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伦敦的咖啡馆为这个事实提供了一则显例。它们在查理统治时期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场所，政府开始担心它们是叛乱的渊藪；它们的主顾们可以读到一些报纸，其中许多是可疑的报纸，而且，说不准在此种看起来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拘无束、半秘密的交往中会策划出什么阴谋。因此，当局几度试图取缔它们，但没有坚持下去，而且它们的确也为政府的侦探提供了有用的落脚场所。正是依靠从一个咖啡馆收集到的证据，泰特斯·欧茨被判诽谤约克公爵罪，而非伪证罪。另外，当时的一些人赞扬咖啡馆，因为它们有助于人们增进交际；交谈往往补充了书本传达的信息，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作为教育场所起到了群众大学的作用。由于观点相似的人往往相聚于同一地点，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专门化。“小孩咖啡馆”受泰特斯·欧茨和辉格党人青睐，“格雷咖啡馆”则为托利党人喜爱，别的一些咖啡馆与文学相联

系，例如德莱顿主座的“威尔咖啡馆”。俱乐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绿绶带俱乐部”是其中最著名的，“排斥问题”争执之际沙夫茨伯里的支持者们经常光顾那里。

伦敦的自由民拥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特权。首席行政官即市长占据一个特别威严，特别有权的地位；他主持的市自治机关里有王国最大的商业巨头；在某些时候，例如在复辟和革命之际，该市便以其集体身份几乎像王国的一大等级一般行事。而且，它的财政经管得那么好，以致在威廉执政期发生变化以前，“伦敦商会”被认为提供了比任何政府机构更好的投资担保。就财富和生活方式而言，伦敦商人可以和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最显贵的贵族匹敌，与他们混杂在一起的还有律师和医生之类的专门职业者以及数量激增得令人不安的大批掮客、保险经纪人和中间人。伦敦正在成为世界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的中心。劳埃德公司起源于查理统治时期的一家咖啡馆，火灾保险则始于1680年。虽然伦敦还没有大学，但实行学院生活方式的四个法律协会提供了所谓的第三所大学，从而给该市五花八门的居民成分增添了又一种元素。还有一个阶级——贵族——现在正半永久地在首都定居下来。一些主教已经有了城市宅邸；由于西区和圣詹姆士区的发展，许多贵族成员在伦敦度过其大部分时光，这一新鲜事遭到那些对贵族职能持较老看法的人的指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政府对伦敦的大膨胀不是感到自豪，而是感到害怕，因为有那么多居民被视为辉格党人或非国教教徒，而且在那里有无数搞阴谋的机会。

该市人口和重要性的这种增长部分地起因于这么一个事实：经过随1666年大火灾而来的重建，伦敦成了一个很惬意的居住地。重建工作按照一项依法生效的明确计划进行；街道、小巷和房屋按照规模和重要性分类；建筑物的高度和所用的建筑材料事先予以规定。与此同时，街道照明和供水予以改善。结果，中世纪的伦敦连同其狭窄的弄堂和木制房屋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甚至在今天亦可称相当宽广、相当坚固的街道、广场和建筑。圣保罗教堂仍在重建过程中，雷恩忙于建造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如砖石之海中颗颗明珠般光彩夺目的教堂和大厦。随着新生的首都逐渐显形，英国人必定很有理由感到自豪。英国尚未占据欧洲的第一把交椅，但其力量的基础已经具备，那就是自然资源、高度熟练的劳工、性能优良并配有精

干水手的舰船，还有一个商业之繁盛可比迦太基、环境之舒适可比巴黎的大都市。

自然资源可以通过述及土地得到说明。首先是在例如汾泽地区开垦沼泽地，这项事业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着手，1663年再度展开。由此开垦的土地特别肥沃，起初被用来生产植物油。类似的一项改良是圈地改良，在此时期这不一定是为了把可耕地变成牧场，而往往是为了更加有利可图地使用土地，因而在大城镇周围和矿区里圈地活动频繁。大法官法庭核准了若干项此类圈地，只坚持必须得到一切有关的土地全权所有者同意，但专门鼓励地主圈地的立法却是没有的。尽管如此，“改良”地主正在出现，而且总的来说存在一种对土地潜力的更广泛的兴趣。至少有一位著作家建议种植三叶草、苜蓿和萝卜等新作物，而马铃薯则得到了更多的食用。农业中这一更大进取精神的最好证据见于皇家学会1664年开始进行的调查。那一年学会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乔治克尔委员会”，它向著名的农学家们发出问题表，征询有关他们所在地区的土地类型、粪肥、农具以及一般种植水平的信息。答复显示了种植水平颇高，并且表明，特别是在播种新的禾本科植物方面，18世纪农业的许多创举在17世纪已有了先兆。

对谷物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地主得益。的确，正是在查理统治时期，一项确立津贴制度的1673年法令开创了谷物法，谷物出口贸易由于这一制度而开始。这样就创设了某种使种植谷物有利可图的稳妥办法，因而使更多的土地得到了耕种。苹果——广泛酿制苹果酒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最流行的水果。但主要由于法国的影响，它的垄断现在受到甜瓜、梨、桃子和油桃的威胁。这些新奇水果装点着南部带暖房的园圃，比较耐寒的水果则生长于肯特郡和塞文河谷的大面积果园，从而丰富了使英国农村如此独特的多样化。由木材需求刺激而展开的造林活动也加强了这种多样化，伊夫林的《森林志》往往与道尔顿的《乡村正义》一起并排摆在乡绅们藏书甚少的书房里。他们更富有的邻居正开始对风景园艺感兴趣，尤斯顿宅邸（属阿林顿勋爵）、艾尔索普宅邸（属桑德兰勋爵）和克莱夫顿宅邸（属白金汉公爵）之类新建或重建的乡村府第之庭园布局便是明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展将主要见于中部和南部，因为北部仍然地贫人稀，甚至尚未开发，仍然缺乏那些在别处正成为英国生活特征的舒适愉快的事

物。在苏格兰边境，生命和财产都不安全，位于卡莱尔的监狱通常塞满了北方的抢牛者，其中大多数走“悬路”^[12]魂归故乡。

复辟时代的英国基本上仍是个农牧业国，村庄大都从事家庭手工业。全国散布着一些在有限的意义上可称为工业区的地区，即其居民并非只靠谷物或羊毛过活，而可能是全部或部分地从事某种手艺或工业。于是有相当一些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往往位于当今工业区以外的地区，例如在福雷斯特奥夫迪安·肯特郡的威尔顿区和苏塞克斯郡的金属制造业。铅仍旧取自德比郡皮克区的铅矿——铅后来成了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相反，康沃尔的采锡业逐渐衰败，因为这种金属可以更便宜地从别处获得。在凯西克和斯塔福德郡开采的铜正得到广泛使用，它是在伦敦沃斯尔沃思和罗瑟尔黑瑟两区设有铸造工场的黄铜业之基础。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已经是金属工业的中心，一个以其铁钉、枪炮和五金用品著称；另一个则以其刀剑刀具闻名。

盐比较重要。它取自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的咸水盐场；1671年后柴郡的井盐得到利用，东北海岸则有采盐锅，借助来自达勒姆和诺森伯兰的燃煤，在锅中蒸发海水制盐。中部的煤矿帮助促进了伯明翰地区的金属制造业，但主要供应来源是达勒姆和诺森伯兰西部的浅矿坑，达勒姆出产的煤用船从纽卡斯尔运往伦敦和泰晤士河上游。不过，在熔炼和供暖方面煤绝没有取代木柴和炭，因此没有理由谈论这个时期有什么“工业革命”。不仅如此，当时的蒸汽机仍是一种原始装置，主要用于将水抽出矿坑，而工业继续依赖水力。运输与一个世纪以前的状况相比几乎全无进步，因为它仍然依靠河船和海岸航船，或者依靠往往强不过小径的道路。河流改善良多，使之更易航行；但是，直到将近一个世纪后，工业或交通才变革一新。

纺织业特别重要。曼彻斯特——一个有如伯明翰那般的“开放”市镇，即不受制于加诸“封闭”市镇即自治市镇的各种约束——是棉纺织业中心，依赖从东地中海地区输入的一种劣质原棉。棉制品提供了一类可贵的毛料替代物，因为它们更容易洗涤，因而更卫生。不过，毛纺织业仍然是英国的基本工业。它的制作过程要求家庭全体成员的合作；它的产品是出口贸易的基础；它的管理是这个世纪里几乎年年都通过的法规的主题。英国的国务家们相信，自然赐予英国特惠，它们最清楚地表现为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可以找到的羊毛品种繁多，而这归因于英伦三岛内的降雨量和土质有很大的差异。甚至

取自萨里的窖坑、用来消除成品毛布所含油脂的漂白土，都被认为是英国独有的，因为这种脱脂黏土似乎尚未在大陆上得到开采。英国的布匹通常是用不同地区的羊毛混合制成的。在这个行业中，追求品种繁多不亚于追求质量优良，每个地区专长生产一种旨在满足专门用途或专门市场的织物。与之类似，资本主义渗入工业的程度也多种多样：它正出现在资本家把羊毛“放给”家庭手工业工人的约克郡西瑞丁，而在威尔特郡和西南部的布匹城镇则更为进步，那里存在大规模生产和较多的分工。

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大部分归因于国内工业与国外市场相吻合。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船和海员。这个体制分明建立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即剥削那些天命注定要在世界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内“穷人”和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劳动。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因为地主们确信不断扩展的海外贸易是他们自己昌盛的最好保证。而且与法国人不同，他们毫不反对让他们的儿子从商，只要是做批发商或海外贸易就行。英国产品必须始终有足够的“出孔”，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除个人商贾外，还有东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和皇家非洲公司^[13]之类的大贸易公司以合股企业的方式提供着这种“出孔”，这种合股企业在大空位晚期的短暂宽松时期以后，是以各种程度的垄断为特征的。这三家互相间囊括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可航水域的公司有个相似点，那就是它们的一大部分出口由布匹构成：种类和质地不胜枚举，适合外国不同气候及其市场需要的布匹。为了保证这种多样性，其中每个公司都惯常从英国的若干个郡获取供应，后者就因此同某个海外市场直接联系起来。然而，这个体制是脆弱的。各公司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法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时尚的变化影响需求，进口商能够吸收的英国布匹数量起伏很大，结果是在主要依靠这个或那个公司的地区可能有持久的失业。这一脆弱性可以说明一个事实：17世纪里几乎没有哪一年无人抱怨布匹贸易衰败——的确，工人们通常被置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上。这一脆弱性还有助于解释英国为何采取了《航海条例》中表明的替代办法，即主要为再出口而鼓励从北美洲南部种植园和西印度群岛进口原料。

政府注意到这一情况。不少枢密院下属委员会与经济专家及商人磋商，法令通常是在同利益有关的各方磋商后起草。复辟时期正值某种帝国意识发端之际。克伦威尔的《航海条例》主要是想限制荷兰渗

透，而1660年的《航海条例》更具有建设性，因为它将一项誓言加诸所有殖民地总督，并且列举了糖、烟草和棉花等必须在英国上岸并主要为了向别国再出口的原料。于是，英国的政策便是一种海洋政策，旨在确保获取运费，促进建造大船，创造训练航海技术的机会，使进口尽可能限于原料或“半成”品，以此交换制成品，尤其是布匹、皮革制品和包括钟表在内的五金制品，连同数量各异的谷物、鱼、锡、铅和煤。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在此结构中占有其指定位置。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以烟草换取英国制成品。^[14]德文郡的捕鱼船队从纽芬兰取得鳕鱼载往西班牙和葡萄牙港口，在那里以此交换酒和油。贩奴船把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载糖而归，这些糖在伦敦码头被用来交换打算运往西非市场的制成品。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进口用布匹换得的丝绸、坯布、薄纱织物、新奇玩意、瓷器和茶叶，^[15]苏格兰不得同美洲种植园通商，但苏格兰人被允许在那里定居，苏格兰港口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粮食贸易也发展了起来，而且，苏格兰制糖者获准直接进口其原料。爱尔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根据1670年至1671年的航海条例，来自种植园的“被列举”货品不再能卸于爱尔兰港口，而且，由于进口爱尔兰牛被认为有害于英格兰的地租，这一贸易遭到1666年至1667年间一项法令的禁止。对羊毛和布匹施加了类似的限制，但大量羊毛被走私到外国，而且爱尔兰经济还得益于正常的马匹和粮食出口贸易。

1674年2月英国退出第三次英荷战争使英国商人得以夺取荷兰人的若干市场，而且，由于查理抵制了公众关于他应对路易开战的要求，他便间接地促进了英国海外贸易事业。这项与法国和平相处的政策在他的继承者时期继续实行，它有助于说明英国财富的不断增长及其经济的日益繁荣，1675—1688年，这种繁荣主要是由于海外贸易和转口贸易。尽管英国还不是一个欧洲大强国，但他正在积聚资源，使他最终能在长期的对法斗争中坚持下去，甚至超过这个敌手，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海上力量和较为现代的公共财政制度。不过，到考验时期开始的1689年，英国的税收还只是抽取了该国可用财富的一点零头。我们已经提过构成王室世袭年俸的税收，这些年俸是1660年和1685年分别授予查理和詹姆士的。议会还不时授予税款，通常是为了专门目的，例如造船或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项起初称为估定税的征税，名义针对财产征收，但实际上几乎完全针对土地征收。这通常是按照一个

确定的比率，例如每镑地租征收2先令或4先令，据估计按照1先令的比率每年可出税款约50万镑。这在安妮在位时期标准化了，称作土地税，并由于对法战争的耗费而成为财政制度的一个持久成分。同海关税和国内消费税一起，土地税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税收。还有其他许多种税收，例如人头税、炉灶税以及对酒之类进口品征收的专门税。但三种主要税收以不断增长的款额依旧提供大部分的岁入。

绝大部分税是承包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收益事先抵押给金融家和辛迪加，这些人就先期提供一笔总付的金额以及支付一笔若干年为期的租金同财政部做成交易。以此方式政府立刻收到大笔现钱，但条件代价高昂，因为包税人的利益分明在于正常时期捞取尽可能多的利润，非正常时期——例如瘟疫、战争或贸易据称萎缩的时期——要求大量租金“亏空额”。在当时国家缺乏训练有素的征税人员的时代，包税人通过征收分配给他们的税款补偿自己的预付，还能够用先前包税的利润为新的包税筹措资金。在这些情况下，财政部所能做的莫过于同包税人达成尽可能好的交易和抵制“亏空额”要求。这就是丹比伯爵托马斯·奥斯本相当成功地实行的政策，他是1673—1678年的财政大臣。依靠谨慎理财，他成功地减少了大有倾覆行政当局之势的债务，而这使他能够实行对下院议员有组织、有系统的贿赂，以此对抗法国大使的慷慨赠予。这样，丹比就给查理帮了大忙，以后他将证明是詹姆士最有力的对手之一。

查理用度拮据主要是由于这么一个事实：他任凭坏女人摆布，又受一套过时制度的支配，这套制度不得不应付一个较为现代的国家之需要。国家岁入的各个源泉仍然封闭在各个防水密舱之中，每个密舱负担一项债务或支付。如果这一源泉整个或部分干涸，那么支付就以同一比例中断，一项资金的短缺无法从另一项资金的余裕中得到弥补。尚无任何资金统一。这一事实比欺骗或疏忽更能说明了当时的大部分财政混乱。例如，一个因供应基金匮乏而年金中断的廷僚或权臣自然会乞求国王命令财政部把他的年金转到一个较好的账户上。这一“转换”只有通过另一“转换”才能做到——把一项已有充足资金的债务或支付转到一笔坏账户头上，这样一来小人物们必然成了受害者。这样的会计方法比事实上的欺骗更有助于说明卑微无权者——尤其是海员及其家庭——为什么受到冷酷无情的损害。斯图亚特勋章的阴暗面就在于此。

人们常说，英国前进了而斯图亚特家族却原地不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主要令人感兴趣的是，基于不可变原则的个人统治制度与一个在各个生活领域都经历着显著发展的民族之间越来越悬殊。我们过分倾向于假定，最得人心的那位斯图亚特国王的在位经历是与该国的最大利益一致的，这两者往往最截然相反。在工业组织、海外贸易指导、议会制度政府、公共财政以及思想成就这一最高领域等各方面的实验和经验，全都有助于造就这么一个英国：它大有能力在最末几位斯图亚特国王之后生存下去，并最终作为后来的大不列颠脱颖而出。

[1] 见第六卷，第六章。

[2] 昔时迷信，瘰癧经国王一触，即可痊愈。——译者注

[3] 见第四卷，第十八章。

[4] 见第四卷，第十八章。

[5] 又见前，第十二章，边码第288—289页。

[6] 又见前，第十二章，边码第295页。

[7] 如1689年《宽容法》所示。罗马天主教徒未被包括在这个措施范围内，仍然不能享有种种资格，但不受迫害。

[8] 见于《英国人信札》。

[9] 《利维坦》，第二十七章。

[10] 即希罗普郡案件。证据见于查理统治时期的国家内政文件第438束，第29号，查尔斯·霍尔特和其他高等法院法官致森德兰函，1684年12月8日和15日。

[11] 雅·贝·波舒哀：《法国的亨利埃塔之悼词》。

[12] 即靠绞刑架。

[13] 关于东印度公司，见后，第十七章，边码第417页以下。

[14] 见后，第十四章，边码第348—349页。

[15] 见后，第十七章，边码第399—401、409—410页。

第十四章 欧洲和北美

就法国人和荷兰人对英国政治的影响进行评价，就无法理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治时期的国内发展。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同样是如此。在那里，法属加拿大殖民地牢固地确立起来，并且生机勃勃，即使它人口稀少。与印第安人的联盟、毛皮贸易的必需以及法国传教士和毛皮商的冒险性格，导致法国人向内地扩张，而英国殖民者的性格、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及其殖民地邻近开放的可航水域的位置，加强了他们以严格的社区形式定居的倾向。英国人眼光向着大西洋的贸易和供给；他们向内地伸展时进程缓慢，但所过之处尽行占取之事，在满足法国人探险、通商和通婚的地方为定居而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

1660年时加拿大人口约2000人，与此相比英国殖民地势强人众。新英格兰诸殖民地（普利蒂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纽黑文、缅因和新罕布什尔）到1640年人口已达约20800人，南部（切萨皮克湾）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人口约17300人，而英属西印度群岛已共计拥有约38000人。不过，新英格兰诸殖民地之间有很大差别，新英格兰殖民地与南部种植园之间几无相同之处，甚至英国在大洋沿岸的阵地也被法属阿卡迪亚殖民地和控制了良港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属新尼德兰殖民地断开了。由此可供英国殖民者利用的外国海运使他们能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贸易而不顾英国法律，而在殖民地事务方面，复辟时期英国政府的主要兴趣在于力图使夹在法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北美殖民地就范。

斯图亚特君主政体复辟带来的是政策延续，而非政策中断，因为英吉利共和国和护国政府不仅在欧洲维护自己国家的地位，而且在公海和海外坚持其权利。英国殖民者们试图利用内战作为申明其一定程度的独立之机会，而共和国容忍了许多自称的权利，只要不涉及效忠斯图亚特家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动于衷，一俟处死国王的喧嚣平静下来，殖民地便交托给国务会议监管，后来又由一系列专门委员会监管。在这一切背后，存在一种情绪，它支持发展帝国的凝聚力和均衡，支持将可能创立的如此帝国之经济、殖民和军事方面结为一体。

在17世纪前半叶摧毁伊比利亚国家海上霸权的一直是荷兰人，而非英国人，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应当由荷兰人来夺取这一伊比利亚国家海上霸权所控制的殖民地财富。然而，荷兰西印度公司未能使巴西变成荷属殖民地。1654年，在累西腓的最后据点降服，荷兰在巴西的领地拱手交出。^[1]这并不意味着荷兰西印度公司就此完结，因为西印度群岛已变得比大陆更重要，而且人们承认，英国和法国所属的西印度领地在经济上依赖荷兰人。阿姆斯特丹既是欧洲巨大的制糖中心，也是其毛皮大市场；然而，尽管它对北美大陆的贸易很重要，尼德兰人却未在那里成功地建立起人口众多或有活力的殖民地。不过，荷兰人的那种地位，特别是在把其他民族的殖民地产品输送到欧洲市场方面的地位，使得法国和英国所制定的政策是处心积虑地反对荷兰人的权利。如果英国要靠殖民地得利，荷兰所声称的权利就必须予以拒绝。可是，荷兰人的许多做法不能不加以模仿——而且也这么做了。然而大获成就的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不是克伦威尔共和派时期；但他们阐发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论点和在其中整体可以起作用的主权理论。这就是1650年法令所作的划时代的宣告：殖民地“从属和依赖，并且应当从属和依赖英国……并且服从英国议会所制定或将制定的法律和命令”^[2]。

1660—1688年这一时期，克伦威尔的观念及其做法得到了采用和适应。当然个性和着重点有所变化，而且复辟时期本身从殖民政策的角度可以划为两段，但目的始终是一贯的。直到1675年前后，英法的共同政策可以基于法国赞成斯图亚特君主政体及其在英国重新确立罗马天主教会的计划；这两国是反荷盟友，实行一种克伦威尔式的直接反荷政策。从1675年前后起事情变得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必须把斯图亚特君主政体和英国人民区别开来，后者不会容忍法国的许多计划，不管君主政体会接受多少，而且英法两国的殖民抱负迟早必定会使彼此对立。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英法竞争取代了反荷同盟。在前后两个阶段，英国殖民地以及有关的英国政策都占据了舞台中央。英国殖民地人口众多，目标明确，欣欣向荣，非法属与荷属殖民地可比。殖民地问题总是同海上力量交错在一起；正是布莱克的舰队向荷兰人挑战并维护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权利，正是塞缪尔·佩皮斯的舰队确保了英国的地位。英国殖民地的优越地位由于英国政府的基调而更加突出。

这是个持续不断、目标明确地进行试验的时期。纵然方法和细节有所变化，但目的始终如一，那就是按照帝国模子铸造各不相同、各自独立的殖民据点，把许多部分结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和军事单位。这同克伦威尔的政策一脉相承，而且的确在方法上也一脉相承。《航海条例》再度颁布，并载有“列举”条款，以便把殖民地产品——糖、烟草、黄木和别种染料木——无一例外地统统输往英国。在复辟的君主政体之下，如同在共和国以及前几位斯图亚特国王统治之下那样，殖民地事务由国务会议及其下属的各委员会掌管，而不是由议会掌管，尽管1650年法令宣布主权归于议会。据法定，枢密院负责殖民地问题，该机构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被设立来处理贸易和种植园事务。随后一系列别的委员会建立起来，可是，克拉伦登作为首席大臣如此忙于内政和欧洲事务，以致殖民地问题被轻视了。就殖民地而言，他的统治方式之特点是与设置多重会议和政务委员会一样缺乏有效的治理。

从1667年克拉伦登垮台到1676年约克公爵詹姆士开始有效地控制殖民地事务，大权握在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3]手中。这个时期里，某种帝国政策和经济的概念得到明确的阐述，而从对殖民抱负和殖民利益不无同情的有效管理看来很可能把帝国的不同成分结合在一起。沙夫茨伯里的殖民管理经验溯源于克伦威尔国务会议的种植园专门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1668年贸易委员会——其中包括约克公爵詹姆士和鲁珀特亲王——首先试图设计出某种实施《航海条例》的手段。他们在1669年报告中说殖民地总督和殖民地居民都不遵守这个条例，建议派代表前往殖民地，海军军舰则应捕获违反这些法律的船只。可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虽然克伦威尔时代对西印度贸易的重视大半犹在，但沙夫茨伯里及其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并不恪守定规，唯其反荷含义除外。

甚至对荷兰人，沙夫茨伯里也非一成不变地反对，他处理贸易差额这一麻烦问题的方法以视野宽阔并能考虑汇款和贸易条件等长远问题而引人注目。但是，如果说在制定和实施某项充分贯彻航海条例来取得贸易顺差的政策方面，沙夫茨伯里及其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多少缺乏逻辑和远非教条，他那么坚定地确信商人的利益必须予以考虑，但商人不得支配政策。下面的命令最好地概括了他的委员会的基调（这些委员会1670年和1672年进行过使其成员少而精的改组）：种植

园贸易应予管理，“以致彼等更能相互裨益，并作为整体有益于吾王国，由此吾王国有益于彼等”。^[4]

沙夫茨伯里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的帝国经济，但在追求这一目的时抱宽容态度，乐于承认殖民地的利益和出于权宜的要求。当1671年马萨诸塞的殖民者们看来很可能挣脱其依附关系时，查理二世催逼采取强硬态度，但（用种植园会议成员，日记作者伊夫林的话说）“较为理解该殖民地之暴躁易怒情绪者皆完全反对之”，结果送去了一则“抚慰文书”或“客气的信函”。^[5]作为首席大臣，沙夫茨伯里猛烈抨击荷兰人，力图夺取其殖民地贸易，并在1673年2月告诉上院“就利益和倾向两者而言，荷兰省议会都是英国的永久敌人”^[6]。到11月，沙夫茨伯里这位旧共和国人士开始发觉多佛条约的隐秘含义^[7]，开始憎恶同法国结盟的必要。他变成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甚至反对他一直那么热情支持的对荷战争的领导人物。他的倒台远不止是个人悲剧；它为约克公爵詹姆士及其同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教条武断敞开了通道。贸易大臣会议——枢密院下属的一个旧委员会——重新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出现，意图是在处理殖民地方面充当“十分严格的裁判官”，确保王室权威。主权问题的争辩是围绕管理至关重要的贸易关系，而不是围绕本可宽容或不计较殖民者的抽象问题进行的。详细的调查表被分发给各殖民地总督，而海关专员报告说，所有在实施贸易法方面获取殖民地总督和商船船长合作的努力都证明全然无效。

这套制度距离强制推行一种英国为交易中心的贸易如此之远，以致优势似乎越来越在新英格兰一边。波士顿、塞勒姆和普罗维登斯的商人和船长们大发其财，靠的是把新英格兰的食品和制成品输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能比英国商人卖得便宜，并能买到靛青、烟草和糖，以便运往新英格兰或欧洲的外国港口。1673年，依据一项《促进贸易法》做了制止偷漏赋税的尝试。船主必须具结，保证殖民地贸易中的关键商品只运至不列颠的港口或另一个殖民地，在这后一个场合，他们必须缴纳“种植园税”，相当于他们若将货物运至不列颠港口所应缴纳的税款。海关收税官和检查官被任命在殖民地供职，这就以一种特别困难的形式引起了主权问题，因为此等官员不是对当地政府负责，而是对英国王室负责。

对于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甚至贸易大臣们都有点儿小心翼翼。他们不知道马萨诸塞及其卫星地区会接受多大的依附性。但对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牙买加和巴巴多斯，他们自认为处于较有力的地位。他们否决了牙买加法律是国内法的要求，从而否认该岛议会有权立法，并报告说国王应当保留改变甚至废除该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1678年，卡莱尔伯爵作为总督被派出，他坚信积极和专制的政府，意在为牙买加确立一个新的专制模式而不同议会进一步磋商。他几乎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抗议并导致僵局，而他本人感到总督不应过分受制于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在巴巴多斯，贸易大臣会议的行动也激起议会反对外来法律，激起总督反对干预他的权力和庇护。

1679年，关于《排斥法案》的争执^[8]导致沙夫茨伯里和约克公爵詹姆士的敌人一度掌权；但是，贸易大臣会议在机构上大致如故，追求大致相同的目的，还仔细检查法律和贸易实践，不断干预官员任命。然而，他们同君主政体龃龉，被殖民地总督激怒和漠视。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牙买加议长塞缪尔·朗宣称：“作为英国人”，殖民者“不应该受制于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法律”。^[9]此刻，贸易大臣会议事实上放弃了努力：他们接受了一项牙买加岁入法的现实，代价是继续旧宪法。而在任命巴巴多斯总督问题上，他们审慎地放弃了较为教条的专制革新。不过，殖民地的法律必须送往母国核准，它们必须“尽可能”同英国的法律一致，国王保留拒不承认之权，总督保留否决权。贸易大臣们未改变自己的原则，他们在同牙买加实行妥协之际，建议应当获取一项永久的岁入法案，此后总督及其提名的官员可以几乎不理睬当地意见，并且极少有必要召集议会。

各岛需要确保它们的岁入恰当地用于它们自己的目的，但只有在总督们能够为自己搞到某种经常性收入的情况下，贸易大臣会议才能使之摆脱议会。用于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岁入被置身于身居伦敦的专员手中，他们由财政部任命。在牙买加，议会于1683年通过了一个21年有效的岁入法，代价是默认英国法律在该地有效的要求，与此同时，关于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和有权否决强加的军事义务的要求则被放弃了。于是在西印度群岛，岁入控制权掌握在王室提名的专员手中，国王核准或拒绝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治力量对比仍摇摆不定，但至少原则似乎业已确立，贸易大臣会议维护了所声称的最高统治权、任命官员权以及任何关于协调的帝国经济的思想都必

须依据的贸易法之效力。然而，随着查理转而反对支配贸易大臣会议的排斥主义者，这个机构成了贯彻国务大臣指令的单纯的行政管理委员会。

北美像西印度群岛那般充满活力，并且同样意义重大。在这里，马萨诸塞是最重要的，而且岁入问题和被指定的审计官也对促使分歧的产生起了作用，因为贸易和对贸易征税在马萨诸塞比在任何其他殖民地利害关系更大。到1660年，马萨诸塞已有大约4万人口，其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实体已确立不移。英国殖民地的伸展无疑表现了内部的不和，但也表现了殖民者的实力和目的。虽然背离正统清教是建立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殖民地和建立康涅狄格的一个主要原因，但马萨诸塞仍保有突出的地位，这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在处于创立过程的帝国经济中谋求独占鳌头。不仅航海条例遭到随心所欲的违背，欧洲货物被直接运往殖民地，而且此种违禁品从新英格兰殖民地运出，载往其他殖民地，特别是载往西印度群岛。为了支付与这么一个体制有关的费用，殖民地产品被直接载运到欧洲而不经英国港口，航海条例中的“列举条款”如同虚设。

当英吉利共和国让位于复辟的君主政体时，马萨诸塞正处在转变状态。随着人口增加，清教寡头集团越来越成为少数。1662年，这个权势集团由于“折中契约”而被扩大了，依照此约教会成员的孩子可以被接纳入教会，因而可以是自由民，即使他们没有经过皈依，不算是教会社团的正式成员。同一年，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发生了同等重要的变化。普罗维登斯、普利茅斯、纽波特和沃威克等居民点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们不得不同样担忧马萨诸塞的敌意和罗得岛上印第安人的敌意（他们从后者那里真心实意地购买了土地）。它们在1644年作为普罗维登斯殖民地 from 英国议会取得了授予它们自治权的合法状，在1663年又由于国王确认议会的授权而证实了自己的分立地位和民主体制。

康涅狄格也显示了同马萨诸塞政体的重要区别：在议会选举中投票的权力不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财产资格限制——1657年定为30镑动产，1662年增至外加20镑不动产——使得一半以上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不过，无选举资格并非基于宗教原因，而且尽管总督必须是某一经批准的教团成员，但他是按照正常的选举权由民众选出的。政府之开明引人注目：完全不存在统治马萨诸塞的那种神权贵族。部分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土壤肥沃和毛皮贸易），康涅狄格欣欣向荣，到1662年已有15个镇和大约5000人。马萨诸塞眼光向东，指望发展海上贸易，康涅狄格则眼光向西向内，指望开发大陆。当1663年康涅狄格请求王家特许状时，它不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自治，还得到了可观的伸展：北接马萨诸塞南濒大海，从纳拉甘西特河到南海的所有领土，连同邻近诸岛。这被解释成直至长岛，后来又被解释成康涅狄格的边境延伸到太平洋。虽然这在1663年言之过早，但温思罗普的说服力、康涅狄格的忠诚及其有目的的政策则关系重大。

康涅狄格的成功大半以纽黑文为代价，后者主要从商，因而在经济上同马萨诸塞以及同荷兰人和瑞典人抵牾，并靠接纳康涅狄格南部和长岛的市镇组成其联邦政府。然而，这个政府未经王家特许状核准，纽黑文本身由于窝藏1660年从英国逃到美洲的两名弑君者而显得“目无陛下，顽固邪恶”。当局公开赞颂国王，申明自己是忠臣，但徒劳无益，这个殖民地由于非自由民的选举权要求以及它同康涅狄格的边境争端而被削弱了。当新的特许状给予康涅狄格对纽黑文领土的合法所有权时，它几乎完全无力抵抗吞并：组成纽黑文联邦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地屈从，“出于必要地”加入了康涅狄格。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际，罗得岛似乎也会被更有力或更精明的邻居——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和康涅狄格吞并，其中每个邻居都声称有权占有它的某些领土。于是，罗得岛于1661年请求授予特许状，大力强调自己的忠诚和宗教宽容的广度。虽然康涅狄格的特许状显然授予其罗得岛领土，但仲裁维护了罗得岛的权利要求，并且确定了两个殖民地之间的疆界。1663年，罗得岛取得王家特许状，它带来了凝聚力和 political 稳定。

马萨诸塞在人口数量和财富方面毫无疑问地超过其邻居，但无法那么容易地同君主制的英国实现和解。它比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更显著地漠视航海条例。它曾发觉将1651年的克伦威尔“条例”置之不顾是有利的，后来发觉1660年的条例规定驶往殖民地或将殖民地产品载往欧洲的船须具结和担保，并将所有因违背其条款而被没收的货物的1/3给予总督。马萨诸塞在内战和共和国时期曾设法避而不作支持任何一方的承诺，现在却发觉这在君主制下是不可能的。1662年，它被命令以最庄严的方式公开赞颂国王和在所有问题上循规蹈矩，随后又来了一道命令，责成授予圣公会教徒充分的礼拜自由，授予一切拥有必

要财产的人以选举权，不管其宗教信仰如何。诚然，与此同时特许状得到了肯定，但它严重地削弱了马萨诸塞清教寡头集团的权力，并在1662年的情势下含有将被强求服从贸易法规的威胁。向康涅狄格和罗德岛表示的偏爱冒犯了马萨诸塞，随之而来的无穷争端引起了国王政府的关注。于是，在1664年派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所负的使命是诱使新英格兰服从国王，解决边界争端，平息殖民地内的冲突，调查它们的法律和行政，并且降服荷属新尼德兰殖民地。

这个专门委员会对马萨诸塞并无特别的敌意，至少它的指令内容是如此，委员们在那里开局顺利。但到1665年，这个殖民地已在否认他们有权接受上诉或行使任何司法管辖权；他们怒气冲冲地败归英国，向查理建议采取强硬路线。马萨诸塞幸免于难，部分是因为害怕它处于叛乱前夜，部分是因为克拉伦登垮台，还有部分原因是它自称忠诚不贰，并且赠送了26根大桅杆供海军之用。不过，紧接着委员们大发雷霆地离去后之所以有一个平静的繁荣和满足时期，主要是政治形势使然，而不是由于多少听信了殖民地的效忠言辞，东部沿海地带的贸易仍不是任何实施航海条例的认真努力之对象。

从贸易大臣委员会的观点看，在新尼德兰的荷兰人的大罪过是控制了易洛魁联盟的毛皮贸易，并且听任英国定居者出卖烟草和购买欧洲货物而置航海条例于不顾。荷兰人占据了海岸上的一个战略据点，他们同纽黑文的边界已在1650年由条约确定，但他们的权利要求却从科德角沿海岸向下延伸到特拉华湾，而且控制了哈得孙河口、长岛西部以及从哈得孙内陆直至其前哨据点奥兰治堡的道路。但是，他们内部分裂，其主要市镇新阿姆斯特丹使自己独立于曼哈顿岛政府的管辖之外，总督彼得·斯特伊弗桑特无法与其荷兰同胞共事，依靠的是那些在建立荷兰民族殖民地失败后被接纳为居民的英国人和其他异族人。1663年，种植园会议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汇报驱逐荷兰人的可能性；1664年年初，约克公爵詹姆士从查理得到了用于实现征服的4000镑金钱和授予他这片领土的特许状。上下两院也同仇敌忾地反对荷兰人；下院对贸易衰减进行调查并接受了商业公司的判断，即荷兰人是一切困难的渊藪，而且据宣称在荷兰人控制新尼德兰的情况下，要在英国殖民地实施航海条例是很不可能的。

英国派遣一名专员约翰·斯科特去维护皇家权威，与此同时康涅狄格声称有权占有韦斯特切斯特县和长岛的荷属市镇。斯特伊弗桑特

总督得不到荷兰本土支持，因而打算接受这些要求。但是，斯科特宣布长岛将被赐予詹姆士，而且正当荷兰人、康涅狄格和斯科特忙于谈判——它们导致康涅狄格把斯科特投入牢狱——之际，国王授土一事在英国有了明显发展。詹姆士任命理查德·尼科尔斯为其领地的副总督；议会同意在一场（沙夫茨伯里竭力主张的）对荷战争中支持国王；查理指定了访美专员，并且宣布意欲征服新尼德兰。只派了四艘舰船，但专员们被授权要求英国殖民者提供帮助，舰队将波士顿当作头一个目标。在那里，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因为马萨诸塞很清楚它的贸易依赖荷属殖民地。在波士顿度过的一个月使得荷兰人疑虑全消，以致斯特伊弗桑特准许某些舰只起锚驶往库拉索，他自己则前往内地平息一场印第安人起义。当8月底英国舰队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堡附近海面时，斯特伊弗桑特虽极想一战，但只得投降，新阿姆斯特丹一枪未放就落到英国人手里，成了纽约。荷兰人被允诺可以像英国臣民一样自由地在曼哈顿定居，荷兰舰船则可以自由驶回本土；航海条例被废除，以便允许他们从荷兰输入印第安人所必需而英国制造商无法提供的货物。可是，虽然新阿姆斯特丹如此轻易地沦陷了，但英国人不得不用武力来征服哈得孙河上游奥兰治堡一带以及特拉华湾阿姆斯特泰尔堡一带的各个据点。

如此突然发生的战争导致英属殖民地与法属殖民地的边界直接相连，保证了对北美大西洋沿岸商业和军事中心的控制，以及导致新英格兰殖民地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直接相连。征服使以新阿姆斯特丹的外国人控制时所不可能期望的方式维持帝国政策成为可能，不可避免地，它是对马萨诸塞的商业独立和波士顿水手的狠狠一击。

给詹姆士的土地赐予及其使用还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该项领土被夺取以前，他把哈得孙和特拉华之间的土地授予约翰·伯克利爵士和齐治·卡特里特爵士，这两人都是热烈的王党分子、积极的好事者，并都深深地关注扩展英国殖民地的努力。为纪念卡特里特曾任泽西总督而被命名为新泽西的那片领土，据认为是整个约克领地中最适合于农业的。它居民稀少；在北部，荷兰人取得了哈得孙沿岸的贸易据点，而未作有效的农业殖民；在南部，零星散布的瑞典人、芬兰人与荷兰人社区被新政权留下继续占有其土地。领主们虽然是王党分子，保证维护帝国统一，但并非褊狭顽固。1665年2月，他们颁布了一

系列“特许规章”，说明土地将予以分配的条件和保障宗教、财产与选举自由。

可靠的政府大有助于向新泽西殖民，然而，纽约总督理查德·尼科尔斯同样开明和急于吸引定居者。他慷慨大方地授予日后成为新泽西北部的土地，从而引起了从其授地中获利的新英格兰人与领主们派出的总督小菲利普·卡特里特之间的龃龉。卡特里特从泽西带来了讲法语的移民，在伊丽莎白镇及其周围定居，引起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移民的疑忌。领主们本着开明精神准许自治、宗教宽容和陪审制，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镇民会议的发展，而总督与清教移民（他们继续殖民新泽西）和解的努力则付诸东流。他们维护尼科尔斯的授地以及他们从印第安人购得的土地，否定领主们所声称的权利。此后两年局势混乱，骚动不止，但领主立场坚定，虽然他们稍微修改了“特许规章”的条款，而且查理充分支持他们从约克公爵詹姆士那里获得的权利。尼科尔斯的授地被否决，移居者们收回了自己的权利要求。

领主的权利得到维护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么一个事实：1673年，23艘舰船兵临斯塔腾岛，收复纽约。詹姆士堡的英国驻防军只有80人，总督外出在长岛，荷兰人之得手差不多有如英国人早先占领该地那样轻而易举。他们强求居民宣誓效忠联合省，一名步兵军官安东尼·科尔弗被任命为新尼德兰总督，整个长岛置于他的管辖之下。新泽西被吞并，第三次英荷战争似乎很可能会使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获得的这一合算的成果实际上丧失殆尽。大多数殖民者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荷兰的统治，这一统治并不难受，而且使他们无须拿起武器抵抗任何来自英国的征伐。由于居民们一般都安然保有土地，加上新英格兰殖民地迟迟不发动进攻，新尼德兰似乎可以稳定下来，逐渐进入繁荣状态。它现在处于联合省，而非西印度公司的直接统治下。可是，荷兰省受到英法同盟的沉重压力，于1674年准备出价换取英国的中立和善意，此即威斯敏斯特条约，它将新尼德兰交还英国统治。

据认为，荷兰的再征服使得约克公爵的所有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授予统统失效，1674年英国统治恢复则是个新的开端。因此，詹姆士在给1674年由他任命的纽约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的指令中，授权后者统治特拉华湾东岸至康涅狄格河西岸的所有领土。这导致安德罗斯同东、西新泽西两殖民地发生了冲突。卡特里特抗议如此否定他所获得的授予；他从詹姆士那里得到了先前新泽西东部的所有权，

小菲利普·卡特里特被派出担任总督。他证明既有效率，又得民心，安德罗斯发觉要对东新泽西强行贯彻公爵所声称的权利是不可能的，确实，他发觉詹姆士本人不会支持他。尽管同菲利普·卡特里特有私交，但安德罗斯仍将卡特里特带往纽约审判，结果只是发觉陪审员们接受了卡特里特在东新泽西的管辖权实属合法和得自国王的说法。东新泽西民众坚决拒绝纽约的统治；当这桩公案被提交英国时，詹姆士否定了安德罗斯，放弃了自称对东新泽西拥有的所有权利，并且证实了他给卡特里特的授予。

与此同时，伯克利将他得自詹姆士之授予的权利卖给了一批教友会教徒，后者已经占据了在特拉华的新泽西殖民地。可是，这些教友派相互间龃龉甚多，以致威廉·佩恩不得被召来解决他们的争端，而詹姆士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使得租地使用权很不确定，结果西新泽西的殖民进展缓慢。1676年，教友派设法划定了他们与东新泽西的分界，并且得到了卡特里特对其土地所有权的承认。不过，他们无法同安德罗斯达成一致。他把伯克利地权的购买者之一约翰·芬威克像卡特里特那样强拖到纽约受审，要求交代为何在约克公爵的领地内僭称拥有占地权，而当1676年协议划定了卡特里特和伯克利两项地权的分界时，他坚持认为这并未否定詹姆士先前的地权。

1677年，一批刚来自英国的教友派历尽艰辛，在特拉华河上游建立了自己的小镇伯灵顿。他们打算创建一个自治社会，怀揣一部宪章草案，载于佩里及其同人在他们离开英国以前为其草拟的“特许规约”之中。无人将有权支配他人的良心。在服从英国法律和特许规约的前提下，一切法律可由殖民地立法机关制定或废止。这个机关将由佩恩及其领主同人提名的一位行政官和居民们自由选出的一个议会构成，议会有言论自由和充分的议会特权，行政官则无权征税。宗教自由、陪审制、审案公开以及请愿权利得到保障；将无债务监禁，也无死刑——即使叛国也不处死，除非议会有令。所设想的对当地民主控制的唯一限制，是向领主们缴纳免役租和他们有权提各行政官。这样的自治是同安德罗斯感到不得不代表詹姆士提出的要求相抵触的。但尽管有这一不定因素，教友派仍有效地广招移民，使得西新泽西日益兴盛。然而，所有权始终未得到解决，直到天主教阴谋事件^[10]时期为止。当时，佩恩向詹姆士——他与之相交甚笃——提出，新泽西提供了一个极妙的机会，可以借此显示一旦即位，他的统治将多么公

正。这是个精明的、非常世故的论据，于是詹姆士放弃了对东、西新泽西的所有主权，它们都不再是纽约的要求对象了。

詹姆士及其总督确实显示了斯图亚特家族滥授领主权利，但不乐意出让政府主权的倾向。不过，他们对移居者的态度并非难以忍受或令人不满。尼科尔斯上校作为纽约的首任总督，对荷兰移居者抚慰有加，向康涅狄格提出的权利要求则不失分寸。从字面上看，给詹姆士的赐予使康涅狄格丧失了康涅狄格河以西的所有土地，但尼科尔斯同意从哈得孙河以东12英里的海岸上一点往北，再往西北划定疆界。他鼓励贸易和航运，组织司法区，与印第安人缔约，并由于高雅的智慧而享誉。但詹姆士禁止他授予纽约自治权，尼科尔斯只得自己来制定法典。他不能规定设立市镇会议，但他从荷兰人那里借取了拥有有限地方权力、经选举产生的警察和监督员的观念，把拥有土地，而非跻身教会作为有权投票选举这些官员的条件。尼科尔斯授予绝对的宗教宽容，并且在加诸他的限制之内为这个城市制定了一部开明的宪章。他随之召集长岛各镇的代表组成议会，允诺给予同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一样的自由和豁免权利。按照标准的斯图亚特主权理论，选举产生的代表要核准一部业经起草的法典，办完此事即返回本地，使得选民们愤怒不已。尼科尔斯完全无法满足他们关于修改赋税、控制民兵和选举行政长官的要求，近乎作乱的不满情绪在长岛经久不息。在荷兰重新统治期间，他们设法维护自己的独立，但随英国统治在1674年恢复，他们被迫回到纽约名下，仍旧没有所渴望的自治权。

作为英国权力恢复后詹姆士的代表，安德罗斯要求绝对服从其命令，同时他又对移居者们表示个人的友好。他未能赢得他们的忠诚，但改善了市镇布局和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生活，并且一直试图取得对公众情绪的某种让步。詹姆士确信任何让步都会导致得寸进尺和扰乱良好的政治，因而拒绝，纽约便依旧是唯一的移居者不能分享立法权的殖民地。在这里，如同在西印度群岛，围绕贸易和岁入问题出现了危机。到1681年，纽约的商人已在拒绝缴纳关税，就像西新泽西的教友派和东新泽西的领主殖民者那样，存在着广泛的不满。安德罗斯奉召回国，以便首先对纽约的制度未能产出岁入的报道做出回答，詹姆士则在1682年许诺设立议会，条件是提供足够的岁入。

新总督托马斯·唐甘是个极富同情心和目标始终如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在纽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他带来了召开议会的特许

状，这个议会将由不动产终身所有者的代表组成，享有辩论自由和在税收与立法问题上同总督和政务会议协商的权力。1683年10月，17名代表在纽约正式聚会，通过了若干法律，并按照仔细效法英国议会成就的方式起草了一部《选举权和自由权宪章》。詹姆士在其兄在位的最后几个月里，正像佩恩劝告的那样，极想用自己对新约克的所作所为来使英国人相信他将是一位多么通情达理的国王。他不顾自己前不久所作的声明，接受了这部宪章，但不到此项文件能被送出，查理二世就去世了，纽约成了贸易大臣委员会直接控制下的一个皇家殖民地。接着，詹姆士作为国王否决了他先前作为王位继承人颁发的那个特许状，而且着手实行一项计划，即促使所有领主殖民地和特许殖民地更密切地互相依赖，并且更密切地依赖王家。它部分地出于经济目的，但很容易看出也出于军事目的，它忽视了殖民地各自的不同特征和不同利益。这是建立某种新英格兰领地的计划，詹姆士和贸易大臣们希望把纽约和其他北部殖民地一起并入其中。

注意力并非完全局限于北部各移居地，亦非完全集中于对付来自加拿大的法国威胁（尽管这很重要）。弗吉尼亚以南横亘着直至西班牙殖民地边境的广阔地区，仍然几乎毫无人烟。1629年时曾向罗伯特·希思爵士授地，但未能导致殖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该地区无人问津。然而，当蔗糖和过度殖民使得巴巴多斯要为蜂拥而至的移民寻找出路，加上当复辟政府看来威胁着在共和国之下享有的自由时，巴巴多斯人便转向弗吉尼亚以南的荒原；1663年，查理二世颁发了卡罗来纳特许状——一项明确无疑的领主占有特许状。领主就是那些聚集在沙夫茨伯里身后、占据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席位的廷臣，他们力求在领主权力的基础上使得一种相互依赖的帝国经济臻于完善。大致仍是这批人促使国王于1670年授予他们巴哈马群岛，还进一步授予他们哈得孙湾及其周围领土。他们神通广大，目标明确撇开夺取新尼德兰不论，获得卡罗来纳授地大概是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成就。它囊括了从北纬31度线到36度线的领土，往西直达南海，领主们在这些土地上可随意行使租佃权。他们是专制领主，可以组建民兵，征收关税，设立法庭，制定和执行法律，并且授予信仰自由和贸易自由，只要这些是英国法律所容许的。他们还能召集由自由民或其代表组成的议会。

当早先的权利要求被撒在一边时，组织巴巴多斯移民来定居的道路却开通着。但巴巴多斯人呈交了一份规定充分自治权的宪法草案，

所得到的答复是一项反建议，其中包括设置由领主任命的总督和政务会议，然后领主代理人着手起草以“特许规章”为形式的折中方案。这些代理人有在巴巴多斯的经验，因而比领主会容忍的要开明些，结果直到1665年，一套新的、在宗教、自由选举和请愿权问题上开明的特许规章才问世。即使那日1665年从巴巴多斯出发的一场远征仍以大败告终。

在此关头，沙夫茨伯里携带1665年授予的新特许状前来统治卡罗来纳。议会被召集起来，移民舆论不久就要求用比较容易、比较现实的方法授地。移居者们希望出外从事农业，而不是被领主们成群地赶入市镇，他们希望依照弗吉尼亚（他们中许多人来自那里）实行较简单的授地方式和得到丰厚的地产。在此种待遇下阿尔伯马尔地方的居留地牢固地扎下根来，沙夫茨伯里便转而支持在波尔罗亚尔的南部居留地，与此同时他和领主们的秘书翰·洛克为该殖民地起草了著名的《基本法》。这是个学究式的蓝图，设想将土地划分为公爵领地、大庄园、男爵领地和永久租地，民众定居在管辖区中，一个殖民地有四管辖。它打算创设一个由伯爵领主和地方政要构成的世袭贵族阶级，领主们将成为世袭高官，不动产持有者则担任低级官职并选举其议会代表。处于自由民之下的将是管区属民，他们以封建的方式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个“封建信条与17世纪社会理论的杂烩”几乎毫无实效。有几处男爵领地被展示出来，但《基本法》的主要价值在于显示了领主型启蒙派人士的思想。他们希望实行宗教宽容、陪审制和有限自治，但也希望有一种贵族统治形式，并且认为一个殖民地若要繁荣，就必须在英国有其母体，即领主或公司，以便组织人员和资本供给。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组织了一场殖民远征。领主们提供了经费，而远征者在巴巴多斯得到增援后，否认领主所声称的权利，在阿什利河畔建立了查尔斯敦。沙夫茨伯里打算在他的三个感兴趣的地方（查尔斯敦、阿尔伯马尔和百慕大）之间发展商品交换，因而负担不起让移民们离开的损失。他从英国和巴巴多斯招募了更多的移民，领主们则随殖民地议会于1671年开始活动而表示愿意妥协。1672年时，有大约400名定居者，1682年超过1000名，到1685年已超过2500名。移民不断涌入，他们来自法国，那里胡格诺派教徒被禁止在法国殖民地寻求避难，也来自巴巴多斯和其他殖民地以及在领主的组织下来自英

国。自1682年起，定居场所开始延伸到内地，同时一个更便于贸易和防守的新查尔斯敦在阿什利河与库珀河连接处建立起来。

来自一个小部落印第安人——韦斯托族人——和南面西班牙人的危险延缓了向内地的扩张，不过经济生活却发展顺利，欣欣向荣。尽管领主们在理论上忠于《基本法》，但他们足够现实，并不坚持要求恪守细节，而行政“简单易行，令人满意”。可是，随着第一代领主去世或因斯图亚特君主主义压倒排斥派而遭贬黜，新的观念取得了支配地位。最初是抱怨一小撮特权者在垄断毛皮贸易。然后，殖民者们拒绝了《基本法》修正案，原因不在于它们苛刻（因为它们的用意是限制领主权势，将较多的权利赋予民众代表），而在于它们是未经讨论由当局颁行的。领主们变得更加好施淫威和令人难忍。到1684年他们已逼得总督辞职，因为他们坚持总督之责是治民而非治于民。随詹姆士二世登基，新总督坚持每个议会成员都必须宣誓忠于詹姆士、效忠领主和接受《基本法》，凡拒不宣誓者都被拒于门外。尽管卡罗来纳的经济命脉在于各殖民地之间以及殖民地和附近西班牙居民点之间的贸易，但领主们因为害怕失去特许状，仍恪守《航海条例》，从而加剧了他们同移居者之间关系的紧张。该殖民地准备造反，总督宣布戒严，并且拒绝召集另一届议会。《基本法》不起作用，一个唱对台戏的总督上台亮相，但遭领主拒绝。显然，在领主的英国专制主义观点同殖民者的需要相冲突的场合，只有武力才会使这些观点永世长存。

卡罗来纳领主的大部分心思自然用于在查尔斯敦的南部拓居地。但在北面阿尔伯马尔附近的肥沃地段，有一块富有生机的定居地，其成员主要来自弗吉尼亚，加上某些教友会教徒。他们主要从事满足生活必需的农耕，除烟草和毛皮外极少同外界贸易。这一贸易几乎完全由新英格兰商人控制；领主们极力主张阿尔伯马尔应当把货物直接运往英国或应当同南部拓居地做生意，但纯属徒劳。1677—1678年麻烦临头，当时殖民者们决议不缴纳对出口到其他殖民地的烟草所征收的每磅1便士税款，监禁了总督、议会议长和差不多所有议员，夺权达一年之久。领主们设法驱逐了一名民众指定的总督，但他们自己任命的总督却在赴任途中被阿尔及利亚海盗劫持，直到1683年才抵达。此时，阿尔伯马尔已经局面大乱，殖民者们抓住了这位总督，将他赶

走。卡罗来纳分明显示了航海政策促使那些需要殖民地互相通商的海外商人们疏远之力量，显示了领主无法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

伴随所有这些变化，教友派人数不断增加，到他们的领袖乔治·福克斯于1672年千里迢迢前来探视时，弗吉尼亚（连同在阿尔伯马尔的一个分支）、东部新泽西、罗得岛和马里兰已经有了他们的社区。他们一般缺乏政治影响，生活在怀有敌意的政府之下，但在罗得岛，教友派主宰局势，提供了多名总督和议员。早先关于在美洲购买领土、让教友派可以不受干预地独自生活的各项建议，全都一事无成，直到1680年威廉·佩恩吁请国王赐予马里兰北面向北延伸的所有可耕地为止。这位教友派人士同王室的交情使得贸易大臣委员会能善待其要求，结果1681年的一项王家特许状赐予佩恩下述领土：东邻特拉华，至“北纬三又四十度”——这一短语后来导致了严重的争端。在南面，边界成一个半环，自纽卡斯尔（约克公爵坚持要保留该地）向北和西北延伸，直到同40度线相交，然后向西沿该纬线伸展5个经度。佩恩渴望拥有入海通道，这使他和巴尔的摩发生了争端，后者对特拉华河西岸的荷兰人与瑞典人拓居地拥有法定所有权。1682年，詹姆士终于将纽卡斯尔拓居地和特拉华河右岸直到其河口的所有领土割让给佩恩；这导致巴尔的摩出来否认他有权利作此种授予，但贸易大臣委员会在1685年年底决定所争议的领土不属于巴尔的摩。

佩恩成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领主，可以在其自由民的参议和同意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任命法官和行政官，赦免罪过，设立市镇和自治选区。他的行政和司法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而且虽然对自己的殖民地宽宏大量，他仍在着手立法以前承担起行政事务。他组织遣送移民，发布那些导致有计划地安排费城市区布局的命令，与此同时他手下的代理总督奉命召集政务会议，接受人民的效忠，确定边界和分配土地，维持治安，颁发条令，但不召集议会。不过，当佩恩提出殖民地政府组织条例时，他显得是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尽管表面上应用同大多数殖民地政体一样的体制，但他将大权给予殖民地政务会议这一经选举产生的机构，而不给总督任何独立于政务会议的权力。接着，佩恩于1682年乘船前往其殖民地，召集由土地全权所有者选举的议会，并在确定殖民地边界和授予一切居民公民权之后，在“大法”中提出了该殖民地的原则。死刑将只用于惩罚谋杀和叛逆，信仰自由则予以保障。法律面前的民主平等将是这个新社会的标志。

佩恩打算维持同印第安人的友好关系，和他们缔结条约，向他们支付所占土地的代价。他的特点是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他花了许多时间使他的殖民地开花结果。当他于1684年返回英国时，费城的居民已超过2500人，殖民地总人口超过8000人，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各种民族成分和语言互相混合——瑞典人、荷兰人、芬兰人、威尔士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法国人、丹麦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及其语言互相混合。形成了繁盛的贸易，其中心在费城，市场在西印度群岛和其他殖民地；城乡之间颇为均衡，亚麻、玻璃和皮革制品补充了剩余农产品。但佩恩返回英国后，宗教和政治争执发展起来，政务会议表现出了一种演变为寡头统治集团的显著趋势。1685年，佩恩派遣了一名新总督布莱克韦尔船长，他不是教友会教徒，决心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但是，反对派促成他被召回，佩恩允诺接受政务会议可能选出的任何总督。争执继续下去，由于教友派自己内部的分裂而更加激烈。虽然这个殖民地仍旧兴旺，但它作为“神圣的实验”却是一出悲剧。

弗吉尼亚几乎完全未引起贸易大臣委员会和各殖民地之间的商讨，直到后来才如此。它大半依靠烟草出口，一直向控制欧洲烟草市场的荷兰人偷运货物。该殖民地还算繁荣稳定，利用复辟时期的政体紊乱宣布最高权力在其议会，选举威廉·伯克利爵士为总督。弗吉尼亚在他治理下重新效忠斯图亚特王朝，他则奉命承认其议会合法，并且促成通过必要的法律，但也须保证航海条例得到遵守和抑制烟草的过多种植。伯克利不久就成了几乎绝对的统治者，任命自己的政务委员，将一批富有的种植园主集合在自己周围，与此同时议会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寡头机构，脱离了它本应所代表的民意。选举权限于不动产保有者，而不合理的税收、不明智的开销和行政管理弊端造成了一种由于烟草价格波动不定而具有爆炸性的形势。

1675年，两名拓居者被印第安人残酷地剥了头皮，这引起了一场凶猛的讨伐，整个边境地区朝不保夕。伯克利总督年老体弱，议会则证明同总督一样无能为力。担惊受怕的拓居者们选出了自己的领袖——年轻的纳撒尼尔·培根，入伍充当他麾下的志愿兵，然而他们被宣布为乱党，被勒令解散。培根叛乱一直延续到1676年为止，当时培根占据并捣毁了詹姆斯敦，随即死于热病。他死后，叛乱者缴械投降。国王虽然许诺赦免，但怨恨不已的伯克利处死了其中若干人。一

位新总督赫伯特·杰弗里斯上尉随后抵达，同时一个专门委员会被任命来审查弗吉尼亚事务，一支载有5个正规连的舰队被派去粉碎叛乱（它已经平息）。新官们就该殖民地的怨艾向国内呈送了一份不无同情的报告，而叛乱后颁发的特许状肯定了殖民地议会控制税收的权利，并且把将来授地之事留给国王决定。经济失衡无法轻易纠正，看来烟草问题的解决除贸易自由外别无他途，但立法限制了贸易可得以开展的港口的数目，愤怒的种植园主们开始依靠毁坏邻人的作物来强行实施他们自己的限额制度。新总督与议会不和，詹姆士二世垮台的消息传来时另一场叛乱似乎已不可避免；威廉和玛丽被正式立为国君时，弗吉尼亚如释重负地承认了他们；它需要英国，既为了出售烟草，也为了购买必需品，因而它即使不自在却仍然留在帝国之内。

马里兰注定要深深地隐入政治争端，因为其领主巴尔的摩勋爵——一个公认的罗马天主教徒——十分关心保证信仰自由，而且根据他的特许状拥有几乎绝对专制的权力和特权。英吉利共和国时期，他的权威被否定，一度清教徒似乎很可能会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府。然而，由于宗教问题次于贸易和防务问题，巴尔的摩设法使他的所有权得到贸易委员会承认，针对那些正在声称有权不经他同意而颁布法律的拓居者议会来维护他的合法权利。主要依靠任命一位能干和富有同情心的总督，即年轻的菲利普·卡特里特，巴尔的摩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在马里兰，烟草种植同样是唯一的产业。高地的土地肥沃，其出产足以使种植园主和农场主满意，尽管价格在下跌，而且人们惯于挥霍浪费。劳力取自雇工和黑奴，烟草充当缴纳各种赋税和费用的通货。马里兰没有航运业，因而它的烟草大都靠有意规避航海条例的新英格兰人的船只载运。巴尔的摩对此极为同情，因为他坚持认为关于烟草的困难不在于出产过多，而在于航海条例限制了市场。不过，他大面上仍照章办事，征收应付的款项，坚持船主必须呈交保证书。

1675年，巴尔的摩勋爵去世，其子卡尔弗特继承，一种远为专制的体制随之确立。卡尔弗特确实努力增加贸易、促进繁荣，但他依靠操纵各利益集团而非争取民众合作来统治；他的亲友控制了行政当局，政务会议同议会争斗不休。此外，这第二代巴尔的摩勋爵不得不对付佩恩以及对于切萨皮克湾临河土地有争议的权利要求。此项争端导致两位领主于1684年同抵英国，在那里巴尔的摩被拘留，直到1688年革命为止。他拥护“老觊觎王位者”的声明如同过眼烟云，风波不

兴，因为马里兰民众居住分散，政治行动困难。然而，关于耶稣会士大肆活动、试图煽动印第安人屠杀清教居民的谣言沸沸扬扬，领主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和他用专制主义方式进行统治的企图引起了猜疑，而当没有任何旨在承认威廉与玛丽的命令发布时，猜疑更甚。1689年，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一个协会建立起来，以便捍卫新教信仰并承认威廉与玛丽。巴尔的摩的努力由于他远在英国和缺乏贸易大臣们的支持而削弱。虽然他未被正式取消特许状，但他们不支持他的权利要求，因为怀疑他反对他们把美洲各殖民地联成一体并强行实施贸易限制的计划。马里兰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皇家殖民地，领主的权利要求被置若罔闻。

尽管马萨诸塞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重要，但纽约和泽西拓居问题在一些年里占据了英国的注意力。只是在马萨诸塞卷入一场严重的印第安人战争时，贸易大臣们才比较关心起来。这是在1675年，当时菲利普王统率下的万帕诺亚格族印第安人袭击在罗得岛的教友派控制的殖民地。其他部族不久也参加进来，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被拖入战争，整个边境地区笼罩在焚烧、剥头皮和杀戮的恐怖之中。迄此，关系友好的纳拉甘西特大部族遭到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和康涅狄格的进攻，目的是预防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罗得岛、普利茅斯、马萨诸塞饱受劫掠之苦，直到1676年夏天菲利普王发觉不可能维持其部族联盟的团结以及8月间他本人被杀死为止。印第安人抵抗欧洲人对大西洋沿岸地带之权利要求的最后一次认真的尝试，连同这场战争一起告终。不过，印第安人突入了殖民地的核心地区，摧毁了成长之中的庄稼、市镇和村庄。饥荒在战后接踵而来，毛皮贸易被毁，新英格兰同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通商也遭到同样的厄运。

菲利普王之战胜负未定之际，爱德华·伦道夫作为特派专员抵达波士顿，调查和汇报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状况。他是斯图亚特王室所称权力的坚决支持者，也是后来斯图亚特国务会议主张的那种帝国统一贸易体系的坚决支持者。他还是英国国教会的忠实成员，僭取权力的清教政府在他看来纯属邪恶。为了使马萨诸塞更加依附于国王，他建议发布一项责问其特权的令状。往昔的指控今日重提。选举权受到限制，边界以损害马萨诸塞的邻邦为代价得到伸展，非自由民成为征税对象，向英国提出的申诉被否决；清教徒们规避航海条例，私设造币局，铸造他们自己的货币，从而减少了国王的收入，破坏了帝国贸易

体系。该殖民地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减轻这些指控，它似乎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特许权利，而非忠于国王；奉派前往伦敦的代表被吩咐不讨论任何质询特许状的问题。只是当英国商人促使国王（其收入据他们声称一年减少了6万镑）下令禁止同新英格兰贸易时，马萨诸塞才通过了一项实施航海条例的法律。

为实施航海条例，伦道夫充当了海关的征税官、检查官和搜索官，他以这些资格拥有干预商业的无限权力，但要迫使人们服从航海条例却几乎无能为力。他宣称，商人和船主同外国领土进行贸易，地方行政官则纵容这些破坏航海条例的行为，这一说法得到了弗吉尼亚总督和新罕布什尔总督的支持。贸易大臣会议开始详细讨论将新英格兰诸殖民地统一为一个自治领的设想，因而确定马萨诸塞的特许状本身必须废除，正如国王成功地取消了许多英国自治城市的特许状那样。^[11] 检察总长奉命对该殖民地提出起诉；伦道夫心满意足地递交了责问令状，特许状遂于1684年10月被宣布无效。

这就使贸易大臣会议面临设计一个比较合适的政府形式的任务。他们决意把各殖民地统一起来，废除马萨诸塞的特许状就是总行动的一部分。伦道夫的使命适用于所有新英格兰殖民地，贸易大臣们在他的推动下断定，特许殖民地和领主殖民地一般都无法同他们的计划调和。凡是在某种程度的主权已被让予的地方，立法权力动摇了同殖民地商业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航海条例。康涅狄格、罗得岛、东西两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卡罗来纳、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的特许状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责问令状的查询。1685年查理二世之死，蒙默思叛乱之动荡，加上不可能创立那么多替换的政府，使它们幸免于打击，唯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泽西殖民地除外。然而，事情已变得一目了然：既无可用之钱，亦无可用之人来为每个殖民地配备它自己的总督和行政当局，联合则将简化防务问题，最重要的是简化施行航海条例的问题。贸易大臣们亟欲组织联合，遂同意将缅因、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和纳拉甘西特地区这几块殖民地并入马萨诸塞，并且答应一俟其特许状被废除，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也立即并入。

尽管特许状被废除，马萨诸塞却被允准继续其往昔的总督、地方行政官和议员体制，而且当贸易大臣们于1685年将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置于马萨诸塞管辖下时，他们是在王室庇荫下实现了该殖民地长期以来用一种独立方式谋求的扩张。康涅狄格也被合并在这个新英格兰集

团内，该殖民地的政务会议提议服从这一解决办法，尽管立法议会要求同纽约合并。还剩下纽约本身。查理二世驾崩、詹姆士登基时，他可以避不授予纽约“自由权和特权令状”，把他在那里的领地视为一块能加入新设想的联合体中去的王家殖民地。担心法国行动的唐甘总督确信除非康涅狄格和东西两泽西并入纽约，纽约无法提供充足的防御，当他得知康涅狄格已被并入新英格兰时，他便认为造就足够的军事实力的唯一办法是把纽约并入那个联合体。

唐甘的建议很有分量，1688年颁布了一项新的令状，规定自佩马奎德河到宾夕法尼亚的所有英国殖民地加入新英格兰自治领。按照贸易大臣会议的提议，其政体将由国王挑选的总督和政务会议加上民选的议会构成。然而，詹姆士删除了涉及议会之处，立法、征税、设立法庭之权归于总督和政务会议，而且他们自己充当初审法庭。将有权利向英国的法庭上诉，殖民地的法律必须提交英国批准。废除民选议会纵然有斯图亚特专制主义的味道，但路途之遥远以及殖民地内部与各殖民地之间的利益之盘根错节，使得议会的价值大有疑问；而且民选议会，特别在马萨诸塞，并不总是民主的或代表大多数人的。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废除它们是结束清教徒统治的唯一途径，况且政体之苛刻由于宗教自由的授予以及规范与稳定土地租赁制的措施而得到了减缓。

主张殖民地的联合大半是出于军事原因。1674年，威斯敏斯特条约结束了对荷战争，但使国家和殖民地处于法国进攻的威胁之下，并且成为法国玩弄诡计的对象。新英格兰自治领连同康涅狄格被认为掌握着一支拥有13279名民兵的武力，把纽约加进来又多了2000名。这样，大约有200名士兵的正规部队得到了15000名民兵组成的后备军的支持，这是一支巨大的防御力量，是在任何看来合意的时机夺取加拿大法属殖民地的有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总督被授予部队的全部指挥权。然而，将自治领扩展到包括纽约证明是削弱了它，而不是加强了它；辖区过大，难以进行适当的联络。自治领本应带来的联合的好处烟消云散，它丧失了变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单元的任何可能性。

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被挑选为自治领的总督，他刚正不阿，但有一段经历评价不佳，那就是在纽约总督任内施政冷漠无情以及同西新泽西的教友派和东新泽西的领主争长论短。他的任务够难的，因为清教徒们拒不接受新体制。在自己的议会被取消后他们宣称，他们被

“剥夺了作为英国人的自由权”。临时政府钱库空空，又无征收直接税的权力，势必虚弱无力，于是便征收间接税（进口关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虽然这没有像征收直接税会引起的那样招致严重的反对，但就贸易征税的这整个问题是有争议的。贸易大臣会议想把新英格兰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帝国贸易体系，而马萨诸塞的商人却亟欲表现最起码的服从，亟欲获取将使他们能坚持从事非法贸易的修改。采取了一些争取实施航海条例的措施：波士顿、塞勒姆、伊普斯威奇和格雷特岛这四个港口被定为货物可进入自治领的唯一场所，还设立了一个负责审理走私案的海军中将法庭。但是，伦道夫促使条例得到适当贯彻的努力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海军中将法庭也不能被信赖做出廉洁的判决。

伦道夫失望但决心不变，他大力敦促派遣一位正式的总督，安德罗斯的差使遂匆匆确定，结果他作为除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外——针对它们的责问令状虽然已发出，但其特许状仍旧有效——所有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总督，于1686年12月抵达波士顿。罗得岛宁可屈膝服从，也不让自己的特许状被废除，康涅狄格则在不久后加入其列。过去临时政府对下民安抚体恤，为实现自治领的统一和维持拓居者平和无事而有所作为，现在安德罗斯却持有一种固执得多的观点，而且一开始就受到奉命“连根拔除一方体制”之掣肘。他忠于斯图亚特家族，广泛宣扬“老觊觎王位者”的诞生。这样，光荣革命的消息传到美洲时，安德罗斯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王党分子，于是爆发了叛乱。波士顿是造反中心，要塞、城堡和王家兵舰被夺占，伦道夫被关进普通牢房，总督本人遭监禁。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却推翻了新英格兰自治领。康涅狄格和罗得岛恢复了特许状，改组了政府。马萨诸塞过深地卷入了同王权的冲突，以致它的反对行为并非对它全然有利，它在英国的代理人纵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使其特许状得到恢复。只是在1691年，威廉和玛丽才授予其特许状，而那时它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了。选举资格根据财产，而非根据宗教信仰受限制，允许从地方法院上诉至御前会议。不过，新的特许状扩展了马萨诸塞的边界，使之包括缅因和新普利茅斯，从而使短命的自治领的一个重要思想——防御法国人——持久化了。

同英国殖民地愈益增大的分量相比，法国人在加拿大的权势和稳定性微不足道。法国威胁的大小取决于统治者的决心、从欧洲获得的

支持和谋取印第安人部落作为辅助力量的决心。问题之巨大以及实现一个横跨大陆（不管它可能证明有多宽）和南北长度达1500里格的法兰西王国的可能性被认识到了。然而，法国的力量完全投入在欧洲的斗争，成就之微恰与机遇之大相反。

为了取得在北美的霸权，为了维持其殖民地生活所依赖的毛皮贸易，法国人确信必须粉碎易洛魁联盟的势力，即莫霍克、奥内达、奥农达加、卡尤加和塞内卡这“五大族”印第安人的势力。因为易洛魁人同休伦族和其他印第安部族作对，毛皮正是通过后者的土地输往在魁北克、三河城和蒙特利尔的法国市场，而且它们是法国人的盟友。易洛魁人和哈得孙湾的毛皮贸易相结合。他们从荷兰商人那里得到武器并向其输送毛皮，蓄意骚扰和摧毁法国殖民地。在1640年前后的第一次易洛魁战争期间，法国人接受了这么一个结论：要使自己摆脱易洛魁人的威胁，他们就必须通过征服或购买其土地的办法来使荷兰殖民地保持中立。但是，法国深受投石党运动的折磨。国内政府的虚弱导致其在新世界的政策无效，在那里法国的安的列斯群岛领地被卖给了私人领主，“百人公司”让位于加拿大的“农民公司”，而阿卡迪亚内战成了英国人1654年夺取该殖民地的前奏。蒙特利尔几乎被放弃，只是在节骨眼上才来了救助，即补充激励这个小拓居地的基督教信仰的厄尔苏拉教士以及少量增援士兵。

所有这些对英国或荷兰的殖民利益几乎没有蕴含任何严重的威胁。确实，假如法国人要有效地对付受易洛魁人包围这一威胁，就必须把矛头转离英国和荷兰的势力区，复兴其北路贸易。例如，渥太华族印第安人欢迎法国贸易，乐意同法国结成反易洛魁同盟。甚至同印第安人中间的盟友相处，法国也感到很困难。到1660年，他们在加拿大的总人口不足2000人，只能在那里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要有最大的决心。易洛魁人在蒙特利尔的房舍和农田周围徘徊，妇女外出干活时遭到劫持，男人则无时不带武器。这一年，一帮易洛魁武士沿圣劳伦斯河而下，意欲灭绝法国人、占领魁北克。然而，一个由16人组成的忠勇小队在蒙特利尔小要塞的司令官亚当·多拉德率领下，在蒙特利尔以北的圣劳伦斯浴血奋战，将其挡住了8天。他们全体阵亡，但易洛魁人撤走了，法国殖民地得救了。

这年晚些时候，渥太华印第安人驾着一批满载的独木舟，给魁北克送来了毛皮，这使得殖民者们能够维持生计。但是，易洛魁人仍是

无时不在的威胁，1661年三河城司令官皮埃尔·布歇被派往法国请求援助。布歇带回了大约100名新殖民者，但无军事支持。尽管总督吁请援军，说以此他能使路易成为美洲主宰，但一无所获，直到1665年当土耳其人在匈牙利被击退后路易才向魁北克派去了大约1200人的卡里兰—萨利埃团。这极为壮观地增加了法国的力量，因为先前总督只掌握大约30名正规士兵。更重要的是新的利益意识和紧迫感。法属美洲帝国的宏图得到采纳，驻加拿大总督和按察使的个人品性则使这些宏图具有了实际分量和方向。

加拿大在一名新总督、久经沙场的宿将特拉西侯爵治理下，重新振作起来，这同援军的抵达相得益彰。1665年，在圣稣尔斯地神学院领导下享有一种独立地位的蒙特利尔，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然而，准备不足便对易洛魁人进行冬季战役，结果没有打败或消灭他们。

“五大族”之中有四个族接受了和约，但莫霍克族仍坚持战斗。特拉西亲自领导了又一场征伐，穿过香普兰湖直入易洛魁领土，焚烧村庄，毁坏粮秣，但无法控制后撤避免决战的易洛魁人。这是部署在北美的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队所作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特拉西使莫霍克族忍饥挨饿，大受羞辱。不清楚他们是否正式表示过屈从，但直到1687年为止法国人和易洛魁人之间不再有纠纷了。

特拉西对易洛魁人的攻击是防御性的，因为殖民地的生存危在旦夕；然而，它们也是一项旨在统治北方的宏图大略的组成部分。法国力量的这一展示紧接着英国夺占荷兰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英国人的抱负所激起的。在纽约，詹姆士的总督尼科尔斯本来很乐意进攻法国人，但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不那么急切，结果他未动手。在欧洲，路易受到尼德兰人若遭进攻便须予以援助的条约束缚，遂提议调停，当克拉伦登轻蔑地拒绝了他的干预时，于1666年对英宣战。可是在英国殖民地，这个消息迟至10月才为人所知，那时特拉西已经把他的军队安全地撤出了易洛魁领土。

英国进攻加拿大的机会因此丧失了，由于路易看来不乐意攻打英国本土，而是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坚决的进攻，使得英国在背风群岛的领地（特别是圣克里斯托弗岛）损失惨重。英国遭到瘟疫和火灾蹂躏，贫困不堪，内部分裂，因此亟欲求和，而路易同样着急，以便入侵西属尼德兰，维护他声称的西班牙遗产继承权。^[12]于是，两国在1667年年初协议将被征服的背风群岛归还英国，将阿卡迪亚归还法

国。英国并未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败北，布雷达条约肯定了它对美洲荷属殖民地的占有。路易关心西班牙遗产的欧洲部分甚至关心建立一个美洲帝国的宏伟前景。荷属殖民地落于英国之手——由此得到了法国承认——意味着北美局势发生了无论怎样高估也不会过分的变化，因为奥林奇、曼哈顿和哈得孙河是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在毛皮贸易方面的有力竞争者，而一切印第安贸易所用的小币——贝壳数珠——主要取自长岛海滩。不仅如此，转归约克公爵的领地使得美国人和法国人彼此接触和斗争，并且切断了法国人沿海岸向南推进的路线。从此，每当法国人似乎不可能向圣劳伦斯河以南行进，就必定引起英国人的担忧，而每当英国殖民者似乎准备跨过阿勒格尼，准备从海岸地带动身进入内地——法国人若要向南扩张就必须凭借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来穿越的内地，法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面临威胁。

竞争在美洲的地位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冲突；然而，法国专心致志于在欧洲的事业，虽然它正处于权力顶峰，但在欧洲几乎处于依附地位的英国人在美洲得势了。不过，驻加拿大的法国官员并非暮气沉沉或目光短浅。让·塔隆作为1665—1668年和1670—1672年的按察使，弗隆特纳克作为1672—1682年和1699—1701年的总督，给加拿大带来了本来很可能改变北美地图的知识和决心。对塔隆而言，主要问题在于拓居殖民地。他通过有组织地征召男女青少年，使加拿大的人口从大约3000人增加到近7000人，而且在卡里兰·萨利埃团被调回法国时，有大约400名官兵作为居民留了下来。土地以庄园领地的方式授予，庄园主有义务在其土地上安置数目固定的移民。但在1666年科尔培尔告诉塔隆：路易认为为了殖民加拿大而减少法国的人口是轻率的，因而拒不接受他旨在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计划；1672年，他不得不报告说没有任何可用于加拿大的岁入。

然而，法国存在着真正的兴趣。1663年，王室接管该殖民地作为其财产，并且采纳了一项计划，即通过建立庞大的西印度公司把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方的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北方殖民地和亚热带殖民地应当按照类似于英国的帝国倡导者们此时正在接受的那些方式互通有无。塔隆的热情总是多少同他的私利混杂在一起，他对西印度公司缺乏热情归因于他满足西印度贸易。不过，他仍作了认真的努力来鼓励捕鱼和航运，工业则开始在纺织、皮革加工、酿造和造船等方面显露端倪。对塔隆来说，这样一些发展不过是扩张的前奏。他被美洲舞

台之辽阔所激励。必须获取曼哈顿和奥林奇，必要的话诉诸战争；欧洲战争提供了征服广袤无垠、蕴藏财富的美洲土地的巨大机会，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法国殖民地不扩展到佛罗里达和新英格兰殖民地边界，甚至扩展到墨西哥。因此，对法国意图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

布雷达条约限制了这两个殖民者集团的野心；所有占领地都必须归还原主，法国对新尼德兰关键地区抱有的任何图谋至少在当时不得被放弃。然而，莫霍克族印第安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法国的威望如日中天。加拿大内部有个强有力的派别，它要求的不过是官府默许它扩张法国领地，使之囊括易洛魁人的土地，直入南方和西方。随约束易洛魁人之后，出现了规模可观的西向运动。在这个向法国人运送毛皮的印第安人不得不冒险穿越敌区的时期里，法国人从圣劳伦斯外出求觅毛皮，法国传教士则穿林越野寻找印第安人。休伦族在散布到苏必利尔湖和密执安湖附近地区以及渥太华族在散布到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同新的部族发生接触，向其传授了对欧洲货品的需求及其毛皮的潜在市场。毛皮贸易因此渗入内地。向北朝哈得孙湾扩张的、苏必利尔湖西南的苏族和该湖以北的克里族，是被纳入法国经济圈的两个最大的部族。

向北扩张没有被忽视，但向南和向西扩张处于优先地位。如果只是因为法国人最了解的那些印第安人在易洛魁人的阻碍面前退回到了密执安湖及其周围地区。关于南海的议论甚多；渥太华族控制下的正常的毛皮商路是从圣劳伦斯顺渥太华河折向北方，塔隆却于1668年派了一队人马探查经安大略湖和辛科埃湖的南向路线，并于1669年派遣路易·若利埃顺渥太华河前往休伦湖北岸，经过休伦湖往南到圣克莱尔湖，再到深入伊利湖的狭地，并经陆路到达安大略湖西岸。在那里，若利埃遇到了一群法国人，他们正在经安大略湖探查伊利湖周围地区的途中，试图找到南部和西部的印第安部落。若贝尔·勒内·德·拉萨尔是这群人的领导者，但他由两名圣稣尔比斯修道会的传教士陪同，他们的参加既显示了激励法国人行动的传教热忱，也表露了对耶稣会士自命的权利的妒忌。拉萨尔的首要想法是从易洛魁人地区向西南方行进，将他身后的大小湖泊置于法国控制之下，直指新西班牙——这是许多法国人，包括塔隆在内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密西西比河（在关于印第安人的报道中称作“俄亥俄河”）会通往南方和西方，流入加利福尼亚湾和太平洋。圣稣尔比斯修道会士抵达密执安湖

时，发现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和密西西比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毛皮商比比皆是，而一个耶稣会传教团已经在格林贝站稳脚跟。虽然毛皮商们漂泊不定，目不识丁，因而其同游范围只能猜测，耶稣会士却意志坚定，行动协调，到1679年他们的传教团已经确立不移。

塔隆1668—1670年身在欧洲，同科尔培尔磋商政务。他为自己的扩张计划取得了不大不少的支持，还得到了一个静修会传教团的帮助，帮助他以及圣稣尔比斯修道会士抑制耶稣会士的势力。在若利埃、拉萨尔、圣稣尔比斯修道会士和耶稣会士所获成就的激发下，他于1671年派遣使者前往苏圣玛丽——在那里苏必利尔湖水流入休伦湖——去宣称法国对一边连接北部和西部海域，另一边以南海为界的全部土地拥有主权。

这样，法国的野心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和正式的表现——拉萨尔正从安大略湖向南行进，与此同时，来自密执安湖的耶稣会士为南下密西西比河做好了准备。甚至从法国来了这样的训谕：“加拿大殖民地扩展之后，对于该国以及为国王陛下效力而言，没有什么比发现前往南海的通道更重要。”^[13]此项训谕由弗隆特纳克伯爵路易·德布阿德带到美洲，他于1672年抵达加拿大担任总督，变得一心要实现其天定命运，梦想魁北克将来会成为一个美洲大帝国的首都，坚信塔隆的设想和计划。尽管如此，法国的扩张仍无法按计划实行。弗隆特纳克本人对耶稣会士并无敌意，但塔隆有，科尔培尔和路易则怀疑他们的教皇至上观点。

若利埃同耶稣会士一起，在他们位于密执安湖和休伦湖之间麦基诺地方的传教机构中度过了冬天，他还同耶稣会的雅克·马奎特神父一起，从密执安湖畔的格林见到了威斯康星河，并因此在1673年6月到了密西西比河。他们对这条大河径直流向南方感到失望，当行至西来的密苏里河与它们的交汇口时，他们怀疑是否不应该溯此而上，因为印第安人报告说它将通到一片开阔的大草原和另一条流入加利福尼亚湾的河流。他们过了俄亥俄河河口，但随后拨转船头，开始朝北行驶。背着枪的印第安人（背枪表明他们同欧洲人有贸易接触）告诉他们：离海只有10天路程，假如他们继续行进，就会遭到被武装的印第安人以及在其旅行终点会碰上的西班牙人袭击的严重危险。他们完全确信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而不是流入加利福尼亚湾，并且把这个消息带回加拿大。

这个消息使加拿大边疆大为激动，因为它证明有一条可航水道从加拿大通向墨西哥湾，证明一个法属北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将把英国人限制在阿勒格尼为界的沿海地区之内。可是，路易深陷于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几乎或完全腾不出力量用于加拿大。为使英国中立，不仅值得向斯图亚特家族提供路易在多佛条约中允诺的支持，也值得在新世界多多默许，袖手旁观，结果弗隆特纳克不得不放弃从法国得到增援的一切希望。甚至无法指望有系统的移民，特别是移入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法国殖民地所必不可少的年轻姑娘。弗隆特纳克虽然坚强有力，野心勃勃，并且确信加拿大的潜在实力，但被迫采取同他本来很可能选择的相比不那么直接、不那么倚权仗势的方法。在到1682年为止的他的第一个总督任期内，他没有得到任何军事增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英国地位的巩固以及远北地区的竞争，它们是随英国哈得孙湾公司着手开辟一条通向克里族和迄此运往加拿大的特等毛皮之来源的海上航线而来的。

创立哈得孙湾公司的主意出自两个富有事业心的加拿大皮货商皮埃尔·埃斯普里·拉迪松和梅达尔·舒阿尔·格罗塞耶。他俩都是从小来到加拿大，在旅行和经商中熟悉印第安人。他们于1659年将资财并在一起（他们是连襟），为的是乘舟行至威斯康星森林区。在那里，他俩同苏族印第安人一起过冬，春天时折回苏必利尔湖遇见克里族印第安人，从他们得知：北方大海湾以及可以在那里得到的毛皮财富。他们回到蒙特利尔，确信有必要经海上而非从加拿大经陆路抵达这个叫作埃尔多拉多的地方，并且亟欲求得法国的支持。然而，他们返回的航行违反了不准同森林区印第安人通商的禁令，因而被处以罚金，被迫缴纳对其毛皮征收的税款，并遭到嘲笑。他们决心贯彻自己的计划，先后在法国和新英格兰谋求支持。正当苦苦等待之际，他们遇到了从英国派出的钦差，其任务是确定各英国殖民地的边界和促使它们对斯图亚特家族称臣效忠。这两个加拿大人经乔治·卡特里特劝说，相信可以从英国获得支持，并被带到了伦敦。他们发现，查理本人对他们的叙述和计划大感兴趣，一批正在拟订均衡的帝国政策的贵族和国务家则准备给他们有限的帮助：两艘海船于1668年从伦敦驶出，其中格罗塞耶乘坐的一艘在哈得孙湾度过了冬天，装载上等毛皮回国。

这批廷臣及其在伦敦城里的合伙人被获取厚利的希望所激励，极力鼓动有可能驾船穿过哈得孙湾找到一条西北通道，结果他们在1670年为哈得孙湾公司争取到了一项划时代的特许状，它宣布了英国的领土权利，同法国对往南的土地所声称的权利相对应，因为查理使该公司成了海湾沿岸的、进入海湾的河流所流经的所有土地的绝对领主。法国人正开始形成关于自己声称拥有的领土的某些实际的概念，英国人却对这个特许状的深远内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海湾的据点无足轻重，他们渗入内地的力量微不足道。他们确实能以一种在北极海域航行的令人仓皇失措的能力驶入海湾，而且他们的货物招引印第安人前来与之贸易。但是，他们几乎或完全没有对法国人进行挑战，或维护他们那巨大的世袭财产的所有权，他们甚至使自己相信他们的抱负可以同法国人的权利要求相调和；对他们来说，严重的竞争是在毛皮贸易方面，而不是在对于土地的任何战略性要求方面——结果事实上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哈得孙湾从未对加拿大构成军事威胁，虽然它可能像是（对法国人来说它有时确实像是）造成了从北方包围的危险。

在法国，对于从加拿大作任何扩张的支持微乎其微，以致哈得孙湾公司的开发行动毫无困难地得到了容忍。科尔培尔确实准备过一次前往海湾的远征，要是能达到目的的话，本来会抢在英国人前面，塔隆则于1671年从蒙特利尔派出了一支陆上远征队。一名青年军人德尼·德·圣西门和一名年迈的耶稣会士阿尔巴内尔神父，同印第安人一起行进至哈得孙湾海岸，正式宣布这片土地归法王所有。可是，当美国人于1672年返回并建立起更多的永久性据点时，他们没有遇到法国的反对，逐渐地、顺顺当当地在鲁珀特河畔、奥尔巴尼，后来又在纳尔逊河畔扎下根来。然而，法国人继1671年远征后再接再厉，不久就在注入海湾的各条河流的源头做着毛皮生意，而且1674年阿尔巴内尔再度露面，肩负弗隆特纳克安排的任务——诱使英国地位所依赖的那两个皮货商效忠法国。

其他探险者随后到来，路易·若利埃本人于1679年访问了英国据点。虽然弗隆特纳克妒忌地注视着英国人的发展，但法国政府命令他维持“和睦友好”；他不乐意支持耶稣会士的计划，致力于围绕加拿大的毛皮贸易展开的内部纷争，并像关心朝北发展那样对朝南扩张感兴趣。西印度公司在加拿大未获成功；1674年，它的特许状被废除，加拿大又一次变得完全依附国王，这进一步证明扩张缺乏后劲或支

持。作为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情况下维持殖民地这一政策的一部分，殖民地居民将被集中在市镇和村庄里，他们被阻止四处游荡寻找印第安人和毛皮。毛皮贸易的进行往往依靠向印第安人提供烈酒，对于他们白兰地是迷人的嗜物，也是严重的危险。印第安人喝醉酒时杀气腾腾，行为不可意料，因而教会从一开始就反对烈酒生意。它被指责为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拉伐尔主教在1669年公开予以明确的谴责，并以革除教籍相威胁。世俗当局也明白印第安人酗酒作乱的危险，但无法赞成如此毫不留情的谴责，因为这与加拿大的生活和贸易关系太大。持久的权力之争在1678年到了严重关头，当时弗隆特纳克主持了魁北克议会的一场大辩论，大多数议员赞成烈酒贸易自由。1679年时进行了折中，即在市镇和市场里烈酒确实可以卖给印第安人，在那里据称为害极浅、监管有效，但不得将任何烈酒带进丛林，因为在丛林中贸易无法予以控制，而且一旦印第安人失控作乱就无计可施。

甚至这种折中也由转运许可证制度加以修改，它允许某些皮货商从事丛林贸易。理论上他们的人数限为25名，并且未明确许可做烈酒生意。但在实践中，皮货商的数量总是超过许可证的规定，而且他们总是带着烈酒。据说，差不多整个加拿大都卷入了违禁贸易，尽管科尔培尔三令五申，弗隆特纳克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偷漏。他有参与此种生意的重大嫌疑，他申辩道，此外唯一的选择是听任毛皮流向荷兰人和英国人，他还同某些劣迹昭彰的皮货商有私交。因此，皮货商推动了法国势力违背法国宫廷政策向南向西扩张。除了旨在创立一个法兰西帝国的宏伟计划外，他们满足了一项实际的需要，因为易洛魁人正在恢复元气，开始进逼到俄亥俄流域和渥太华领地之内，结果使毛皮转而流入奥林奇和纽约。为了反击易洛魁人的威胁和保护渥太华到蒙特利尔的通道，弗隆特纳克于1673年亲自率领一支400名官兵的队伍前往安大略湖，在那里建筑了弗隆特纳克堡。它的位置很合适，令易洛魁人望而生畏，并且防止了渥太华族加入易洛魁人同英国的联盟。从理论上说，弗隆特纳克堡本应当由安大略湖以南的另一个法国据点来补充，后者将扼守去纽约的易洛魁贸易通道。弗隆特纳克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自行其是地建筑了弗隆特纳克堡，但未建筑这个将具有过分明显的反英性质的南部要塞。

佩恩打算维持同印第安人的友好关系，和他们缔结条约，向他们支付所占土地的代价。他威胁，特别是威胁英国人向内地扩张的任何

设想。拉萨尔结束了他1669—1672年的游荡，未找到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路线，但他的活动绝没有停止。与其说他是纯粹的探险家，不如说是个毛皮商，他渴望在大湖地区、俄亥俄河流域与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规模地发展这一生意。建立一系列据点将使得法国拥有占据大陆心脏地区的权利；它在宣布这么一种权利并以建立大小要塞使之具体化后，必须进行殖民和实施统治。拉萨尔有塔隆的有力支持，设法同易洛魁人合作，从他们那里他似乎学到了徒步远行的本领，这使他不必要像法国人通常那样要依赖独木舟与河流。易洛魁人重新变得雄心勃勃，加上易洛魁人与伊利诺族人之争的战争扰乱了毛皮贸易，促使拉萨尔启程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在两次远征之间的岁月里，他试图组织前往安大略湖，然后到密执安湖的大船——而非独木舟——运输，并且获得了授权他发现西部、设立要塞以及只要他不把生意做到蒙特利尔便可在5年内垄断密西西比河贸易的专利证书。1682年年初，他带着一支由独木舟组成的强大船队启程，这支船队可以使他穿越任何障碍；4月间，他抵达墨西哥湾，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占有之。这是针对西班牙人而非英国人来炫耀法国自命拥有的权利。然而，假如法国人在此大河河口建立一块可防守的殖民地，并将河谷占为己有，英国殖民地就会被封闭和受到限制。路易斯安那将证明对法国没有大价值，但密西西比河谷现在已被人知，对毛皮的追求将吸引法国人进入南部英国殖民地背后的边远地区。

这一南下趋势展示了对任何英国扩张抱负的真正威胁，但弗隆特纳克支持的主要是达尼埃尔·格莱耶尔松·迪吕的向西挺进，后者打算在苏必利尔湖以西地区建立一个毛皮贸易体制，并且控制西行路线，或许是通往西海的路线，就像拉萨尔希望控制去南海的通道那样。1679年，他在该地区的苏族印第安人中间落脚住下，可是，当得知一群静修会传教士身陷囹圄时，他便不再继续往西探险；他折向南方去营救他们，然后返回魁北克，去回答有关他正在组织未经批准的贸易这一指控。向苏必利尔湖以西的行进把他带到了一个地区，在那里他建立的据点阻止了毛皮继续流向纽约，并使他接触克里族和阿西尼本族印第安人，他们的毛皮是经温尼伯湖或尼比贡湖运至哈得孙湾的。他的工作暂时被打断了，因为杜切瑙作为按察使虽然赞成弗隆特纳克的目标，但对于纵容违禁毛皮贸易（以及与之伴随的白兰地贸易）致使人口分散的危险看法截然不同，而且由于他，迪吕甚至弗隆特纳克本人才遭到指控。按察使和总督两人同样确信有必要对抗哈得

孙湾公司、监督耶稣会士、占有纽约和通过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来堵住英国人，1682年他们都被召回法国。

这一召回是不幸的，因为易洛魁人正在又一次变得强大起来。虽然继弗隆特纳克担任总督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前副都统安托万·勒菲弗尔·德·拉巴尔表现了对英国利益的强烈敌意，而且按照其性情和信念属于扩张派，但他从法国得到的指示却出于一种担忧，即稳固的拓居可能成为扩张的牺牲品，拓居地本身可能会居民稀少以致不安全。弗隆特纳克的补救办法是实行使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并且与之通婚的政策，以此造出一批数目众多、忠实可靠的混血人口。然而，尽管混血儿已经是加拿大生活的一个特色，但事实证明他们厌恶农耕，嗜好狩猎和游荡。法国人有理由担心人口分散的后果，拉巴尔得到的指示是扩张不利，他应当拒绝批准出航，唯拉萨尔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可以例外。显然，易洛魁人很快将再度发难，英国人会支持他们，英国人与哈得孙湾接触的潜在危险在法国被认识到了。

拉巴尔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在1682年大火灾之后重建魁北克。这使他委身于当地居民中最有力的人，依赖起夏尔·奥贝尔·德拉舍内耶。他首先是个毛皮商，在大多数行业有买卖，并在殖民地财政事务中举足轻重。他的首要目标，是使加拿大从进入美洲大陆的陆上门户变成渔场和哈得孙湾毛皮贸易的海上门户。耶稣会士阿尔巴内尔在诱使格罗塞耶和拉迪松重新效忠法国方面起了作用，派遣一支法国海上远征队前往哈得孙湾的计划则同英国《排斥法案》遭到惨败、沙夫茨伯里以及许多对哈得孙湾公司和对有关英国殖民利益之一般组织感兴趣的人丧失权力相重合。该公司历经政治变迁依然生存下来，虽然公司董事差不多全换了，然而，法国的反对随着变动的形势并在德拉舍内耶的有力推动下变得更加强烈了。1682年，德拉舍内耶在法国促成建立哈得孙湾公司，组织两艘法国船从魁北克出发远航，把格罗塞耶和拉迪松带到了流入哈得孙湾的纳尔逊河。尽管法国的船只和货物不理想，但有这么两个老手在场，法国就占了一项大优势。英国哈得孙湾公司尚未在纳尔逊河畔建立一个据点。他们在1682年的远征被法国人抢了先，人员被俘，并入法方，就像有一次从波士顿出发的未经许可的远征那样。

这样，法国的哈得孙湾公司在临湾的毛皮贸易的心脏地带拥有了一个小据点，并且取得了大量毛皮货，它们大都是用来交换从英国船

和新英格兰船上获取的货物的。两国仍然和平相处，纳尔逊河畔发生的事件导致了无休止的外交磋商。法国的挑战是严重的，如果它持续不断，或者法国人能够有利可图地使用如此获取的毛皮，它就很可能威胁英国在哈得孙湾的地位。不过，毛皮买卖所依据的价格是按照财政家（据设想）的利益予以严格控制的，这些财政家承包殖民地的上缴岁入，以提交定额岁入来换取毛皮税款和参加此种贸易的独占权利。被抛进这一体系的毛皮的数量只受限于居民获取毛皮的能力。于是，价格不能下降，法国毛皮市场货满为患，僵化不活，而且来自哈得孙湾的上好生皮尽管对商人们很有吸引力，但在殖民地内部引起了很大困难。

不仅如此，把海湾当作海上门户还违背了拉巴尔的政策，因为他抵达加拿大后不久就宣布他不会英国人占有沿岸贸易做出挑战，但若他们将其“可厌的小要塞”伸展进内地，他就会加以反对。事实上，不存在英国人如此渗透的任何迹象（有关的谈论也极少），拉巴尔的威胁是若利埃、弗隆特纳克和迪吕大致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阻断会把毛皮往下带到海湾的阿西尼本族、苏族和克里族印第安人。法国人占领流入海湾的河流的源头可以大有助于窒息英国人的贸易。他们的总政策如此这般，而不是从海上正面攻击英国据点。到1684年，迪吕已经在克里族的地盘上站稳脚跟，同纳尔逊河畔的法国小据点有通信联系，自信不用碰英国人一下就能把他们赶出海湾。

1684年，拉巴尔开始派遣法国使者从陆上经内米斯考湖七月海湾进发，他们将在该湖湖畔建立一个据点，阻截往下同英国人的贸易，就像迪吕正在更西面阻截它那样。与此同时，他批准组建一个北方公司，这是官方哈得孙公司的一个活生生的加拿大翻版，它进行了前往海湾的又一次海上远征，以便向1682年远征建立的那个小据点补充粮食和提供增援。这不是一次充满活力的冒险，遇到了某种意外的反对。科尔培尔的继任者们极力希望不触怒英国，他们不仅因为拉巴尔在远征哈得孙湾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予以申斥，还说服拉迪松和格罗塞耶重新为英国效力并拆毁他们亲手建立的据点。拉巴尔还因为赞成在西面和南面进行挑战而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在那里，迪吕负责建立了苏必利尔湖以北和尼比贡湖畔的法国据点，米契利马基纳克和底特律则被开发为法国据点。此外，还有许多任意妄为的皮货商把越来越多的欧洲货物带进了五大湖地区，严重地破坏了渥太华族和其他印第安

部族的中介贸易，这些部族转向“纽约的佛来芒人和英国人”寻求更为价廉物美的货物，转向易洛魁人寻求反法援助。

到1683年，拉巴尔已确信易洛魁人将始终与法国人敌对，将不断试图困死法国人的毛皮贸易和搞垮他们的据点。打预防性战争在加拿大得到普遍支持，于是他聚合了一支800人的队伍，进行了一场战役，结果法国人缔结了一项实际上由敌人操纵的和约，尽管他并未在公开的战斗中败北。他在困窘之中求助于纽约总督唐甘，请他在法国人和易洛魁人之间进行仲裁。他们先前的通信本应使拉巴尔对唐甘怀有充分的戒心，知道他将敌视法国人自称的权利，因为他宣称法国人无权在伊利湖、休伦湖或密执安湖湖畔建立据点，在他看来，圣劳伦斯河与安大略湖北岸构成加拿大的边界。他同意把易洛魁人召到奥林奇，然而是一种强调他们是在他管辖之下的方式。拉巴尔接受了这一点，从而在实际上放弃了法国人根据1667年特拉西同易洛魁人缔结的条约声称拥有的宗主权，并且丧失了加拿大殖民地所有各阶层的好感。他和他属下的按察使、强烈支持他进攻易洛魁人的德默勒被召回国内。

1685年，拉巴尔由老练的军人德农维勒侯爵取代，后者从法国带来了职业军队。人们期望他将维护法国的地位，对抗易洛魁人以及纽约的英国人和哈得孙湾的英国人。在这些事务中，对抗哈得孙湾的英国人首先得到确定，而且取得了极显著的成功。德拉舍内耶组织的、代表魁北克最有进取心的商贾的北方公司，取得了纳尔逊河贸易为期30年的营业授权，代价是支持在海湾的又一次冒险。这将对英国据点的一次明白无误的军事进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进行。1686年3月，100个人乘独木舟从蒙特利尔出发，由一位年轻的正规军人德特鲁瓦骑士指挥。不过，这次远征的力量来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水手组成的特遣队，来自著名的勒穆瓦纳家族三兄弟的领导。法国人到达海湾时，发现英国人均未戒备，他们在一系列情绪振奋的小规模战斗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据点和一艘又一艘船只。到8月中旬德特鲁瓦启程返回加拿大时，纳尔逊河畔小小的新据点已成了留在英国人手中的唯一据点，法国人则利用取自英国人的货物大做生意。

英法两国形式上和平相处，德特鲁瓦并无夺取英国据点的命令，而只是受命擒拿变节的加拿大人拉迪松。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广为人知（甚至英国人也知道远征是筹划好的！），他的成功获得了热烈的

欢呼。但两国钦差们对实际事态一无所知，他们于1686年11月会晤，缔结了一项条约，“为了平息和终止两位国王在美洲的臣民之间已经出现或今后可能出现的所有争执和争端”。法国人很清楚德特鲁瓦的成功，但在条约签署以前一直装作不知道，因为它是基于一项承认现状的协议，因而使德特鲁瓦夺取的海湾据点留在法国手里。南特敕令刚被废除，英国商人在法国处境艰难，而且尽管詹姆士二世看来大致坐稳了王位，但他的亲天主教和亲法政策正在引起不安；由于担心议会的反对会阻止缔约，条约签订以前进行的谈判是保密的。所以，当这项条约牺牲了英国在哈得孙湾的地位这一点变得一目了然时，对詹姆士的怨恨大为加剧。这项条约还将印第安阵地拱手出让给法国人，因为每个君主同意不援助对方可能与之作战的“野蛮的印第安人”。英国所声称的对易洛魁人的主权完全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允许法国人运用自己的部队进行一场全面的预防性袭击。

法国人占了便宜，可是这项条约没有什么实效。唐甘形式上赞成英国的抚慰法国人政策，但这是组建新英格兰自治领的时期，是欲盖弥彰地准备一支挡住法国人，如果希望的话压倒法国人的军事力量的时期。对唐甘来说，同易洛魁人的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新英格兰自治领遭到了来自各个殖民地的强烈反对；而且在1686年年初，当法国人正在北上哈得孙湾之际，他召集了一次易洛魁五族大会，说服他们相信法国人的进攻不可避免，最好是抢先动手。唐甘本人准备于1687年春天夺取在尼亚加拉和米契利马基纳克的法国据点，这样将在这些至关重要的据点上阻截法国人向南扩张。

至于德农维勒，早就认识到获取纽约的必要，正在极力主张詹姆士二世可能出于自己的需要用它来换取法国的支持。然而，哈得孙的据点纵然可以牺牲，纽约却不能用来做交易，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所依赖的毛皮看来很可能遭到抢劫和被转向纽约，德农维勒接受了加拿大倘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的结论。虽然笼罩着表面的是和平，但在法国人邀请易洛魁人到弗隆特纳克堡赴宴，然后抓住20—50人送往法国充当苦役奴隶之后，战争行动便无法长时间推迟了。这是一次背信弃义的打击，但它像是很有希望成功。唐甘知道，法国人有大约1500名正规军人可以调遣，而英国殖民地互不团结，只能依靠民兵的勉强支持，因而不愿通过支持易洛魁人而挑起公开的战争行动。但是，当德农维勒于1687年7月在安大略湖

湖畔聚集起部队，并得到加拿大民兵和渥太华族印第安人协助时，他却发现无法使易洛魁人投入战斗。他们撤退了；他洗劫了他们的土地，烧毁了他们的庄稼，但是，他们的伤亡微乎其微，一俟他离开就立刻卷土重来。

随后，耶稣会士的影响导致易洛魁人派使节去蒙特利尔谈判，但这些使节在途中遭到米契利马基纳克的休伦族印第安人屠杀，这被算在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账上。易洛魁人决心进行复仇战争。在纽约，安德罗斯总督正式将他们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大约2000名用欧洲武器装备起来的易洛魁人进攻加拿大，德罗维勒除撤退外别无他法。加拿大以外的法国人被召回，任何人不准离开这个殖民地。底特律、尼亚加拉和弗隆特纳克的法国据点被撤空；易洛魁人拆毁了这些据点，并且由于胜利而趾高气扬，一队队人马回去游弋，直到大西洋，甚至到佛罗里达。向法国发出的派遣更多正规部队，以此可望既推倒易洛魁人也推倒英国人的吁请，有如石沉大海。加拿大只有招架之功，总督和居民们处于恐惧之中，不仅害怕自己的抱负化为泡影，还害怕肉体上被消灭。1689年8月，一千多个易洛魁人袭击并屠杀了拉希纳的法国居民。300多名受害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惨遭残杀，法国人惊恐万分。拉希纳屠杀结束了德农维勒开始的事业。在一个以不断制订扩张计划为特征的时期终了时，加拿大殖民地减少到只剩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几个小据点。维持了英国对于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前荷兰据点的占有权，与其说是较为洋洋大观的新英格兰自治领，不如说是同易洛魁人的联盟；来自加拿大的“防御性”扩张政策的威胁暂时消除了；为拯救加拿大，召回德农维勒和派遣弗隆特纳克第二次出任总督被认为是必需的。

[1] 详情见后，第十六章，第385—386、393页。

[2] G. L. 比尔：《英国殖民体系的起源》（纽约1908年版），第362页。

[3] 关于他，见前，第十三章，边码第306、314—319页。

[4] 公共档案馆30/24/49/8-11号文件。

[5] H. B. 惠特利编：《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伊夫林先生日记与通讯集》，伦敦1906年版，第二卷，第260—262页。

[6] 《下院议事录》，第十卷，第246—247页。

[7] 见前，第十三章，第310页。

[\[8\]](#) 见前，第十三章，边码第317页。

[\[9\]](#) A. P. 桑顿：《复辟时期的西印度群岛政策》（牛津1956年版），第199页及通篇。

[\[10\]](#) 见前，第十三章，边码第313—314页。

[\[11\]](#) 见前，第十三章，边码第317页。

[\[12\]](#) 见前，第九章，边码第210页。

[\[13\]](#) J. 巴特利特·布雷布纳：《北美探险者》（伦敦1933年版），第252页。

第十五章 西班牙及其殖民帝国

1648—1688年，对西班牙来说是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包括人口统计方面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等种种危机。1648年，17世纪的经济萧条正处于它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而到1688年，经济复苏已经昭然可见，特别是在东部。这反映了欧洲一般发展的变化，在人口统计方面也起作用，海岸地带人口增长，内地人口则保持不变或甚至有所减少。这还是一个边缘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期，中央集权趋势则遭到挫折。当1652年加泰隆人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时，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没有强行施加专制君主制的充分权威，反而重新确立了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这是和那种可以在菲利普四世和查理二世（1665—1700年）的西班牙政府中看到的新法理主义一致的，并且和这个边缘地区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相当。

在国际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了西班牙建立哈布斯堡霸权的计划土崩瓦解。西班牙从大国地位退下，缩回本土。它只关心保护自己的殖民地，特别是自己的本土免遭路易十四帝国主义的侵害，与此同时查理二世无一子嗣的情况使得整个西欧都对西班牙垂涎三尺。这个变化有力地影响了精神生活，激发了对西班牙历史所含意义的深思，并且引起了欢迎新思想的人们与仍旧忠于16世纪精神的人们之间的争论。

要准确地估计西班牙在我们考察的时期里有多少人口，证据不足，而专家们各持己见。奥拉古埃和鲁伊斯·阿尔曼萨认为在整个世纪里人口数始终在800万左右，冯·贝洛赫和J. 汉密尔顿伯爵却认为它下降了25%，降至600万左右。但在随便哪个估计中，重要的是同前一个世纪的增长形成的反差，这种反差在经济领域同样显著。近来的研究显示了17世纪最后1/4时间里西班牙的经济恢复。人口统计曲线的最低点似乎同1648年至1654年的大瘟疫相吻合，这场以西地中海为中心的瘟疫不仅影响了从安达卢西亚到鲁西永的西班牙东部沿海地区，而且也从南方和从阿拉贡侵袭到内地。瘟疫袭击造成的严重创伤一旦愈合，人口便开始增加。有一种显著的趋势，即沿海地区的人口趋于增

加，而内地的人口趋于减少，加泰罗尼亚和整个西班牙都是如此。因此，尽管驱逐摩里斯科人对阿拉贡和巴伦西亚造成损害，卡斯提尔逐渐丧失了它的领导地位。或许饶有趣味的是，西班牙现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或政变——它使菲利普四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胡安·何塞于1669年崛起掌权——是在加泰罗尼亚开始的，得到阿拉贡王国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边缘地区都增加了人口：鲁伊斯·阿尔曼萨就显示加利西亚在这个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人口略有减少，而在同葡萄牙的漫长的战争期间则减少得厉害。

经济萧条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即分化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大量穷人，而法律和习俗两者都使得体力劳动被当作不光彩的。中产阶级破产没落，只是随着1680年后的普遍经济恢复才开始重振家业。不仅如此，贵族癖在17世纪变得更加强烈，王室滥发贵族证书，甚至滥封西班牙大公头衔，查理二世时代的大臣巴伦苏埃拉^[1]的情况便是如此。该世纪末奥苏纳公爵对国王写道：“以前最多付4万比索来取得一个卡斯提尔贵族头衔，但现在陛下把这种荣耀赐予只付4万铜里亚尔的人们”——这就是说，只付最初金额的1/8。教士的人数也同样地增加了，有些真有才能的人进了教会，其他人则是为了发财得势，或仅仅为了糊口。据保守的估计，1660年前后教士人数多达20万。至于比较贫穷的阶层，所有权威学者都一致认为农民和工匠的人数大为减少，而无赖、游民、乞丐和盗匪的人数却增加了——这是经济萧条的结果。17世纪西班牙的一个特征，是财产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即大土地贵族手里，他们同教会和王室一起拥有全部土地的95%。各种各样的土地改革方案相继推出，但它们全无实际结果。

J. 汉密尔顿伯爵的统计表明，来自西印度的贵金属输入从1621年至1625年起大幅度减少，这是在菲利普四世在位早期，恰逢奥利瓦雷斯伯爵的对外政策需要有大量财政资源和一个健全的经济之时。这一减少，加上其他物质资源的耗竭，加剧了国家的贫困，并促使王室丧失了在欧洲的很多事业赖以进行的资财。因此，在西班牙在欧干涉的重负导致国库运转失常且又不可能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末代哈布斯堡国王的货币政策是铸造越来越多的铜币。这不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到1620年前后美洲银矿有被采尽的危险时，银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久后——1640年危机时——白银实际上从流通中消失了。这个世纪末，巴西黄金恢复了贵金属的地位并有助于已经提到过的经济复苏，

但是，直到1680年为止，一些欧洲国家不得不退回到发行铜币。铜变成了一个贫困破落的经济的信用手段。在西班牙，不时被货币重新定值和银根紧缩所间断的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损害了贸易。铜币大膨胀时期是1634年到1656年，即实行奥利瓦雷斯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发生1640年危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导致西班牙失败以及持续不断地同法国和葡萄牙两面作战的那些年头。通货膨胀在1642年愈加剧烈，所采取的形式是分别按照两倍和三倍于币面价值的比例来重铸两马拉维迪和四马拉维迪的硬币。这导致了价格陡涨和白银溢值190%。结果，在几个月内通货急剧紧缩，十二和八马拉维迪的钱币贬到两马拉维迪，六和四马拉维迪的钱币则贬到一马拉维迪。战争的需要迫使政府在1651年再一次乞灵于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下一年里新的通货紧缩。

1656—1680年被描述为货币灾难时期。政府采取新的通货膨胀措施，直到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为止。随后，它试图实现有效的通货紧缩，办法是不再使用40年来未以币面价值流通的铜币，代之以“坚挺的铜币”。尽管如此，通货膨胀仍持续下去，钱币铸造依旧大规模进行，白银溢值又上涨了150%。为了防止灭顶之灾，政府把三年前发行的铸币的价值减少到一半，于是白银溢值在1664年下降了50%；但在1665年到1680年期间，通货膨胀再次达到令人眩晕的高度。私铸钱币和采用伪币促使白银溢值涨至275%，并使1680年急剧的通货紧缩不可避免。这次紧缩导致批发价格下跌了45%；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29年危机时美国的物价只下降了38%，就能领会它的严重性了。通货紧缩之剧烈终于使货币混乱之中有了秩序，6年后形势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了。

汉密尔顿伯爵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大致完整的这一时期里价格和工资变动的统计图景。菲利普四世和查理二世的战争似乎对这些变动只有轻微的影响。例如在1650年，即在对法战争最激烈的关头和欧洲多年不息的争斗之后，价格有显著的下降，而这个世纪里最剧烈的价格上涨发生在1663年到1664年，当时尽管有对葡战争，但相对而言是平静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循环交替、货币和经济的混乱以及价格和工资的不相称——工资比价格涨得快——造成了一种灾难性影响。这整个情况适用于卡斯提尔王国。在巴伦西亚，1651—1673年期间的工资和价格俱明显下降。工资在1680年达到了17世纪最高点，1681—

1687年下降，1689—1692年再度上涨；价格则于1689年跌落，1690—1692年大致不变。在加泰罗尼亚，我们只有关于工资的资料，1640—1659年它们在战争影响下涨了两倍，而在该世纪最后1/4时间里变得比较稳定。按照价格和工资的数字我们可以断定，在菲利普四世和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工资名义上够买生活必需品，可是，货币混乱使人几乎无法估计它们的真正价值。而且，可供较贫穷阶层使用的唯一货币——铜币的不断贬值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纳税负担严重地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在这个时期里，贵族作为进行统治的少数，其失败变得显而易见了。自从查理五世即位伊始城市公社和兄弟会的叛乱^[2]被粉碎以来，它垄断了权力，而自从菲利普三世（1598—1621年）在位以来，政府大权掌握在属于贵族的国王宠臣（莱尔马、奥利瓦雷斯、阿罗）手里，现在，它在自己的盾形纹章的金碧辉煌中衰微了。对问题了如指掌的莫拉公爵把17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贵族描述为“一个步履蹒跚、穷困破落和缠扰不休的寡头统治集团”。毋庸置疑，贵族的数量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在它比较可疑的边缘部分（大家族依靠有利的联姻扩充自己的财产）和在地位低微的下级贵族中都是如此。这些下级贵族构成了贵族中间的一种无产阶级，像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是个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的西班牙文学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使该国神魂颠倒的对于骑士和下级贵族头衔的狂热追求。一些人谴责下级贵族的“可鄙的虚荣”，另一些人则将他们视为懒散无聊的生活方式的体现者。1680年剧烈的通货紧缩之后，有一种反对贵族无所事事的倾向。一项国王敕令规定拥有工场和作坊同贵族地位可以兼容，只要业主雇用领取报酬的雇员来经营它们。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吃尽一切社会苦头却沾不上任何社会实惠的纳税国民可以从购买贵族证书中得到许多好处。下级贵族为换取免税权利不得不服军役。当国王政府因为亟须而不得不限制这些免税权利时，下级贵族便顺从地缴纳一般税，但不缴纳个人税，并且抓住那种使他们免入纳税名册而杜撰出来的法理不放。

西班牙贵族阶级亦可被说成“联合贵族制”的制度承担了直接的权力责任：即一位特别受宠者通过议事会主持政务。到这个时候，它的创造能力便达到了极限。然而，这种制度失败了。对荣誉的过分崇拜和鄙视劳动，以及由此而对节俭和资金用于生产企业的厌恶，在当

时就像在较早的时代一样，致命地影响了西班牙的社会生活。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在1680年的财政灾难来临前夕，社会理论家阿尔方索·努内斯·德·卡斯特罗写道：“让伦敦出产上好衣料，荷兰出产麻纱，佛罗伦萨出产手织呢绒，印度出产毛皮，米兰出产锦缎，意大利和佛兰德出产亚麻织物……供我国首都享用吧；这证明世界各国为马德里提供手艺人，证明她是万城之王，因为天下为她效劳，而她不效劳于任何人。”

教士的人数也增加了，这部分地是危机迫使许多人在教会寻求方便的谋生手段的结果。当然，有许多杰出人物，他们的品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数量的巨大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为了纠正这一事态发展产生的弊端，查理二世于1689年向他的所有主教发出通告：“取得低级教职者的人数近来如此众多，以致在许多村庄难以找到不任教职的年轻未婚男子；许多壮年人在其妻亡故时成功地谋得教职；几乎所有如此行事者皆享有法律豁免权，生活得更加自由，免纳赋税，免于其他俗务。”因此，他劝诫主教们此后暂停教职授任。毋需强调教会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王室忏悔神父的影响。由来已久的宗教对立，甚至政治对立，使得多明我会士同方济各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钩心斗角，使得耶稣会士同宗教裁判所和王权齟齬冲突。寂静主义是宗教骚动时期的一个典型运动。正如未格尔·德·莫利诺斯神父在其《精神指南》中陈述的那样，它把彻底的消极和内心的平静当作至圣至尊，因而灵魂并不渴求德行和完美，不从事任何外在活动。人在这种状态中不可能有罪，即使外表看来他像是有罪的。莫利诺斯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但他的思想在法国、在居伊昂夫人和费奈隆^[3]的圈子里影响最大。

关于卡斯提尔的商人和自治市民，我们所知极少，虽然经济萧条肯定加剧了他们的人数不足。在寡头体制下，受过教育的平民在议事会的官僚职位上徒然耗费精力，而不能像例如科尔培尔在法国那样在政务中起直接作用。奥利瓦雷斯用平民取代西班牙大公担任权臣的计划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对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阶级知道得多些。1635年开始的对法战争致命地打击了对意大利南部的繁盛的加泰隆出口贸易；对于经济繁荣的这一威胁有助于说明中产阶级在1640年对菲利普的热烈拥戴。1635年的战争还影响了巴塞罗那同安达卢西亚和东南部各港口的贸易，因为法国私掠船在那些水域频繁出没。后来加泰

罗尼亚被法国兼并使得无法抵挡法国的竞争和经济奴役的加泰隆商人倾家荡产。加泰罗尼亚的大资产阶级持有强烈的反法情绪，1652年奥地利的胡安·何塞之进入巴塞罗那被欢呼为解放。只有很少的“新人”，显然是那些同里窝那和马赛做生意的人才亲法。

1640—1659年的事件所引起的分裂过后，加泰隆中产阶级的团结重新确立起来，它同君主制的合作则由于第一位在东部地区寻求其主要支持的西班牙政治家——奥地利的胡安·何塞明智的努力得以确保。1653—1697年，巴塞罗那一共向国王政府缴纳了高达6377591加泰隆镑的巨款。就财政合作而言，奥利瓦雷斯的计划实现了。商人们对17世纪后半叶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复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个公国对查理二世君主制的支持是同抛弃经济保守主义并行的，这种经济保守主义使得加泰隆人依附于地中海贸易。此后，他们开始注视北欧和美洲。由费利乌·德·拉·庞亚带头的一代加泰隆人强调工作和贸易的必要，极力主张组建一个同西印度贸易的公司。1674年，阿拉贡作家多默把加泰隆人奉为西班牙勤劳的楷模。1680—1700年，塞维利亚的贸易减少了一半，而巴塞罗那的贸易几乎翻了一番。此外，加泰隆纺织业得益于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的自由贸易条款，因为要对付法国人、英国人与荷兰人的竞争，就必须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同这些国家的产品一比高低。在这些年里，未来纺织工业的基础奠定了。

按照保守的估计，1650年前后在西班牙的外侨人数大约为15万。宗教宽容政策慢慢显露端倪。1630年的英西条约规定，侨居西班牙的英国臣民的宗教信仰只要不引起公愤，就应当予以尊重。根据1641年的西班牙—丹麦专约，菲利普四世准许新教徒入境。1679年的一项敕令旨在增加外国工匠的移入，而不提宗教问题。最强大的外侨群体是法国人——约7万名商人、农民（其中许多有助于埃布罗河谷和巴伦西亚原野在摩里斯科人被驱逐后重添人口）、牧人和工匠。从菲利普四世即位伊始，葡萄牙人逐渐地取代了热那亚人，1640年时他们在塞维利亚已有了一块住有2000名商人的兴旺的殖民地。葡萄牙人依靠其非洲领地，能为西属西印度供应现成奴隶。[\[4\]](#)

最后大量到来的外国人是英国人与荷兰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班牙在这个和约中承认了荷兰独立——缔结后，西班牙政府赞成同荷兰的贸易，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件反法武器。荷兰同下安达卢西亚这一前往西印度的门户的贸易，有助于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主要货

币市场。英国人由1665年条约和1667年条约授权，得以在西班牙开办商业，并在该国拥有一名商业法官。1648年往后，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俱出现于各个加泰隆港口，购买帕纳德斯和拉马雷马出产的烈酒。在西班牙经济的贫弱状态中，这些外国商号起了一种有害的作用，因为它们差不多垄断了美洲贸易。当时的著作家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谈到西班牙的衰落。经济学家桑乔·德·蒙卡达不无理由地声称，外国人正在享用该国财富的最好部分，左右公私财政，占据许多肥缺和官职。

劳动阶级由农民和工匠构成，比例大约是4：1；他们的人数在这一时期里减少了。农民的处境非常艰难。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针对大土地贵族的有效行动，尽管某些著作家，例如博瓦迪利亚在其《地方长官及其僚属的政策》（1649年）中，大声疾呼有必要处理这些蹂躏农民的“有权有势的恶霸”。那个时代的作者们描绘的图景是阴暗的：可怜不堪的住处，不足果腹的食物，封建领主的压迫。城镇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一些。行会丧失了自治地位，被置于国家权力之下。1679年“贸易和货币委员会”的建立涉及工匠活动的集中化，因为它的职能包括监督行会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事务。行会的排外性和限制性变本加厉。然而，它的特权和它对工作自由的敌意同正在发端的工业制度发生了冲突。卡拉塔尤的代表会议（1678年）曾做过完全废除行会的尝试。但是，哪里钱多，行会就在哪里兴旺发达，正如“马德里五大行会”（它在18世纪将变得举足轻重）的建立所表明的那样。

不时流行的经济危机使贫困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国家的反应是限定必需食品的价格，但这只能使事情更糟，因为农民发觉更加难以谋生，他们抛弃土地，使得失业人口大增。神职人员也试图通过在修道院施舍食物来减轻苦难，但不分对象一概救济的做法使得乞讨不再丢脸，并把它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尽管如此，某些教士仍对局势作了明智的反应，因而1664年时，一个向有病的工人和那些由于气候而无法工作的人分发食物的机构在帕伦西亚建立起来。

驱逐摩里斯科人（1609—1614年）以及随后人口重新移入之缓慢艰难使西班牙农业经受的严重打击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后果。产量很低，土地提供5%纯收益便被认为是丰饶多产的了。小土地所有者逐渐破落。王室和“牧主公会”（著名的畜牧者联盟）之间的密切关系依然如故，使得后者能够规避代表会议的抨击。1680年的一项敕令回顾

说，半个世纪以前有若干牧羊产地羊群达5万头之多，而“现在万头以上的羊群很难见到”。

在所考察的时期里，卡斯提尔的手工业处于危险境地，尽管1680年后因为政府采取的行动而有了一些希望的征兆。1655年，托莱多、塞维利亚、巴伦西亚、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的各个城市感到必须引起国王注意它们的困境。托莱多地区在1663—1680年有7000架以上丝织机关机歇业，到1685年只剩下了500架。塞哥维亚的呢绒制品生产也类似地衰落了。1679年，梅迪纳塞利公爵创设了“贸易和货币委员会”，并且指示西班牙驻外使节输送技师和工匠。影响着卡斯提尔手工业的那种变化由布尔戈斯的衰落和马德里的兴起得到体现，后一城市同加的斯的贸易以及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庄园有联系。

手工业萧条说明了西班牙对外贸易遵循的历程。1575—1675年，西班牙和西印度之间的贸易下降了75%。17世纪末（1691年）法国的一份备忘录说，在到达加的斯的5300万至5500万磅商品中，只有250磅属于西班牙商人，而1300万至1400万磅属于法国人，1100万至1200万磅属于热那亚人，1000万磅属于荷兰人，600万至700万磅属于英国人，600万磅属于佛兰芒人，400万磅由汉堡商人掌握。对外国国民所做的贸易让步在西班牙自1648年后签订的条约中司空见惯，并遭到西班牙作家的抨击。例如，我们在巴里翁努埃的《阿维索》（1654年10月）中读到：“一幅机智的讽刺画最近出现在罗马。它描绘一头肥壮的、乳房硕大的母牛，额头上写着‘西班牙’。这头母牛在给许多小牛喂奶，小牛表示英国、佛兰德、荷兰、法国、德意志、意大利。”

导致赋税越来越沉重的王室财政拮据，在卡斯提尔议事会主席给国王的报告中显露出来。菲利普四世在1654年告诉代表会议，财政部征收的1800万杜卡岁入中，王室仅仅得到一半，因为另一半已经抵押出去了，并说债务已达到12000万杜卡。在1662年的代表议会中，据称卡斯提尔缴纳的税款已从850万杜卡增加到1600万杜卡。王室岁入首先来自卡斯提尔的税收，在较小程度上来自阿拉贡王国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自愿贡赋。1610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只缴纳了60万杜卡自愿贡赋，纳瓦拉缴纳了10万杜卡。在这上面还必须加上那不勒斯和米兰缴纳的160万杜卡。来自西西里、马略尔卡岛和佛兰德的收入被这些地区的防务耗费了。在1610年的总岁入1564.8万杜卡中，只有

70万杜卡来自这个半岛的卡斯提尔以外的各王国，而卡斯提尔的消费税一项就有510万杜卡。1674年，在全部3600万杜卡中，卡斯提尔提供了2300万杜卡以上。仅此并未证明赋税不均，因为在各王国中还有地方税。然而，各自独立的赋税制度的存在本身就倾向于造成不平等，在终至1640—1652年战争的奥利瓦雷斯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斗争盖源出于此。

17世纪中叶以来，西属美洲经历了一场经济衰退，它对西欧有严重影响。财政上的原因迫使末代哈布斯堡国王在美洲遵循一种“廉价”政策。正如塞斯佩德斯·德尔·卡斯蒂略所写的那样，这一政策导致对外采取防御态度，它无法阻止某些损失，例如失去在新世界的贸易垄断和加勒比地区建立起的外国殖民地。对内的结果则是一种分权化，它对越来越富的克里奥耳人^[5]后裔有利，并且引起了那种在独立战争后变成民族特征的区域差别。在1660年前后，西属美洲人口据估计大约为1036万人，其中380万人在墨西哥，160万人在秘鲁。大多数人（或许占80%）属于土著，其余按多寡排列是黑人、白人、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以及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到此时，生活在西班牙的有效管辖之下的土著已皈依了基督教。经济原因说明了旨在保护印第安人的立法何以部分地归于失败，而且大约在此时印第安人口降到了最低点。由此而来的人力短缺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在所考察的时期里，西属美洲的社会结构主要由金钱而非人口出生决定。征服时代的旧贵族^[6]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地主，尽管1680年的《西印度法》禁止地产的转让和过分集中。在一个经济普遍萧条、贸易受到限制的时期里，种植园以城镇为代价兴旺发达；它们是一些结构复杂、大半自给自足的单位。克里奥耳社会的领导集团由种植园主、行政官和下级贵族构成，最后一种人由于王室广泛出卖封号而数目众多。较低的阶是商人和工匠。非熟练劳动由印第安人、黑人以及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提供，而奴隶劳动正在逐渐让位于自由劳动。采矿，例如在万卡维利卡的水银特许开采，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进行的，人道主义的考虑同经济需要相冲突。沉重的赋税负担说明了征服时代旧的特许地主何以消亡；1687年，一项高达50%的一般抵押被强加在他们头上。除了栖身于庄园的印第安人，还有宗教团体管理的皈依者村落，在巴拉圭的耶稣会士村落就很有名。17世纪期间，西属美洲教士阶层手里集中了巨大的财产。耶稣会士和教区僧侣

变得特别多；许多克里奥耳人参加了修道会；教会产生了像胡安娜·伊内丝·德·拉·克鲁斯修女那样的著名人物。

在殖民地政府中，所有官职除最重要的（例如总督职位），都予以出卖。官价上涨，薪俸却保持不变，结果官僚机构愈益腐败，官职买卖愈益兴隆。例如1688年，一名克里奥耳人得到了一项要职，他以此在马德里交换了若干市长职位，价格在1500—4000比索。当返回利马时，他又以15000—56000比索卖出这些官职。西属美洲的官员是生意人，他从自己的职务中捞取资本，并将可观的一部分国家岁入转入自己的腰包。

农业境况艰难，因为母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和殖民地生产者的利益经常彼此冲突。1650年后，西属美洲的矿业产出大幅度下降。大西洋贸易也遭受了损害；1634年以后西印度船队不再年年出航。贸易垄断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世纪末时外国人是西印度和下安达卢西亚之间贸易的主要得益者。走私日甚一日：据估计，1686年时合法贸易只能满足西属美洲市场1/3的需要，其余2/3必须通过走私。1623—1655年，即在三十年战争和此后的法西战争期间，英属、法属与荷属殖民地在小安的列斯群岛建立起来，为走私者提供了同加勒比海西属诸港口贸易的良好基地。1680年后，葡萄牙的萨克拉门托殖民地是普拉特河地区商业渗透的焦点。与此同时，扩展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的任何尝试都因为利马享有的垄断而遭受挫折（直到1778年查理三世采取开明措施时为止）。

西班牙殖民体系的特征是：开支不足以赚取与之相抵的和适当的收益，它也不敌外国的竞争。一旦丧失了制海权，王室便完全依赖限制性的和完全无效的立法作为反走私的武器。外国走私者自然能以比合法商人低得多的价格售货：他们的商品能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因为西欧其他地区工业化的程度高于西班牙，价格水平在西班牙就比较高。更重要的是，走私者不用缴纳关税，并且不支出西印度船队所涉及的一般经营管理费用。对他们的货物的需求不断，当地居民甚至行政当局纵容他们的活动。王室的反应是试图封闭次要的贸易路线，因而把西属美洲分成一个个自治的经济单位（这是有助于说明在取得独立后事态发展进程的又一个因素）。眼下正在土崩瓦解的垄断权一向由卡斯提尔人掌握——半岛上其他王国不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纳瓦拉、阿拉贡、巴斯克诸省和加泰罗尼亚时常要求参与美洲的管理和

与美洲的贸易。主要障碍看来不在于王室，而在于下安达卢西亚的商人和官员们强大的既得利益。直到1701年才做出了允许这些地区分享利益的第一个行动，而真正有效的措施直到1778年才采取。

西班牙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政治进展反映了同经济进展一样的总趋势。在查理二世统治下，中央集权政策——它由奥利瓦雷斯在1626年时给菲利普四世的一份著名备忘录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并且引起了1640年的危机——改变为分散权力和恢复合法性的政策。西班牙君主制问题拖延不决，直到18世纪开始时为止（1716年菲利普五世的《新种植敕令（Decretos de Nueva Planta）》），而且事先经过了一场内战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因此，西班牙构成了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走向绝对君主制这一西欧普遍趋势之例外：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政体结构上没有显示任何变化，当然1668年承认葡萄牙独立除外。在加泰罗尼亚，菲利普四世于1652年批准了这个公国的宪章和特权，当时奥地利的胡安·何塞麾下的军队占领了巴塞罗那。奥利瓦雷斯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失败，加上在欧洲战败后支配卡斯提尔的悲观情绪，排除了任何立即建立一个绝对君主制的企图，这个绝对君主制本来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卡斯提尔以外各王国的自治体制。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们1479年在统一半岛（唯葡萄牙、纳瓦拉和格拉纳达除外）时赋予该君主国的政体结构在本质上一直生存下去，直到18世纪初为止。

1640—1652年，集权和分权的提倡者们迫不得已地采取了更极端的立场。在卡斯提尔，奥利瓦雷斯政策留存的影响，先是对加泰隆人起义的反应，唤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它最终证明是西班牙统一的催化剂。在加泰罗尼亚，对奥利瓦雷斯方案所作的反应加强了地方上对传统法令和传统特权的依恋，这些法令和特权虽然是社会和政治安宁的一种保障，但妨碍了该公国的复兴，而这种复兴正在引导加泰隆人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国外遭到的灾难，最重要的是加泰隆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导致奥利瓦雷斯于1643年年初垮台。然而，菲利普四世管不了自己，他受到一位德行高尚、心地善良但几乎毫无政治意识的修女玛丽亚·德·阿格雷达的强烈影响。国王的新宠臣是奥利瓦雷斯的外甥唐·路易斯·德·阿罗，此人从1643年到1661年去世为止始终执掌实权。菲利普四世在统治的最后4年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重新征服葡萄牙，但未成功，因为葡萄牙在维科萨镇（或称蒙特斯科罗斯）打了胜仗。

不久后（1665年9月17日）菲利普去世，死前指定他的年方四岁的儿子查理继承王位；摄政权将由太后奥地利的玛丽亚·安娜执掌，她将得到一个摄政委员会襄助。

摄政期一直延续到1675年；在那10年里，无论是玛丽亚·安娜还是摄政委员会成员，所能做的莫过于在内外危机中挣扎求生。玛丽亚·安娜把实权交给她的忏悔神父——德意志耶稣会士埃贝哈德·尼塔尔，他在政治上像她本人一样无能。爆发了一场反对尼塔尔政权的叛乱，它由菲利普四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胡安·何塞和女戏子玛丽亚·卡尔德隆领导，后者是一个丧失了自信心、盼望救世主的社会的一线希望。胡安·何塞得到阿拉贡王国的无条件支持，他推翻了尼塔尔，但缺乏亲自执掌大权的决心。一名“宫廷无赖”费尔南多·德·巴伦苏埃拉由摄政授予权柄。巴伦苏埃拉十分善于组织狩猎和野餐，他能为宫廷提供种种娱乐，假如要把西班牙国事抛诸脑后的话，这些娱乐则必不可少。

1675年，查理二世达到亲政年龄。他的在位时期又延续了25年，其间他一直疾病缠身，曾几次濒临病死，身心严重失调。从1675年到吕斯维克和约签订（1697年），路易十四一直对佛兰德和比利牛斯边境施加无情的压力；而在国内，若不是胡安·何塞的救世主姿态（他因为早死才免于彻底失败），便是巴伦苏埃拉的无聊轻薄。处在幕后的有王后奥尔良的玛丽·路易莎和后来娶的诺伊贝格的玛丽亚·安娜——她俩都未给查理二世生下所盼望的王位继承人，还有法国大使、廷臣和忏悔神父：所有这些人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断纠缠可怜的国王。在这种腐败的气氛中，少数几个国务家——例如梅迪纳塞利公爵和奥罗佩萨伯爵——的努力显得更为突出。前面已经提过“贸易和货币委员会”的建立以及随1680年通货紧缩而来的经济恢复。查理二世在位的最后几年被王位继承问题所支配；他捍卫皇权的尊严，力图维持西班牙的领土完整，从而成为真正的一代伟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欧洲从明斯特会议和奥斯纳布吕克会议中脱颖而出，它以均势观念取代了奥地利—西班牙霸权观念。同法国的战争继续打了11年，直到克伦威尔和马扎然之间的同盟迫使菲利普四世屈从法国的要求。西班牙在1658年沙丘战役中的新失败导致马扎然和阿罗在比达索瓦河口的雉岛举行谈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这项和约保护了法国边境，分裂了加

泰罗尼亚：法国获得阿图瓦、鲁西永、塞尔达内一部分和它东部边境一些重要的要塞，即格拉夫林、朗德勒西埃、勒克斯努瓦、阿韦纳、菲利普维尔、马林贝格、蒂翁维尔和蒙梅迪。考虑到皇帝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王位的权利，路易十四娶了先前注定要嫁给一位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利莎。虽然菲利普四世规定玛丽亚·特利莎要放弃她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这是以一笔50万金埃斯库多的补偿费为条件的，而业已枯竭的西班牙国库搞不到这笔钱。半个世纪后，这项婚姻将使西班牙王位归属法国波旁家族。比利牛斯条约还把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量贸易利益给了法国。

查理二世的西班牙面对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不得不进行接连不断的战争，与此同时欧洲列国期待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逐渐死亡，甚至还签订了瓜分西班牙的密约（在1668年和1688年）。1667年，路易十四援引布拉邦特民法的一条准则，把它当作国际法准则，据此以其妻玛丽亚·特利莎的名义宣称有权占有西属尼德兰。^[7]当西班牙拒绝这一要求时，路易十四发动了移归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英国、荷兰和瑞典组成的联盟与之对抗。1668年，法国将其军队占领的弗朗什孔泰归还西班牙，但保留了在佛兰德的一些战略据点。西班牙特命全权代表佩纳兰达伯爵宁愿丧失这些据点而保有弗朗什孔泰，希望以后用该地来交换鲁西永和丢失的塞尔达内一部分。也是在1668年，查理二世被迫在里斯本条约中承认葡萄牙独立。经过4年脆弱的和平，路易十四发动了一场打击西班牙、联合省和帝国的新战争。根据尼曼根和约（1678年），西班牙将弗朗什孔泰和在佛兰德的更多一些地方割给法国。这些重大的领土损失清楚地显示了西班牙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灾难性的衰落。

然而，艺术、文学和学术领域的图景却全然不同。加泰隆哲学家何塞·费拉特尔·莫拉认为，使西班牙在当时同其余西方基督教文化有别的，是它对立于是流行的西欧理性主义而着重于情感。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在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一部关于乱无章法的论述”）和笛卡儿（《方法论》）身上体现出来。反宗教改革运动肯定对知识生活，特别是对西班牙文学施加了深刻的影响；它的非观和失望可能同菲利普二世即位以来该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立、西班牙军队在欧洲的失败以及西班牙丧失大国地位有关。历史学家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尔诺斯把塞万提斯的西班牙同卡尔德隆的西班牙作对

照，说在前者理性支配情绪，而在后者正好颠倒过来。阿梅利科·卡斯特罗关于犹太人和摩尔人对西班牙民族性格的决定性影响的论点，现在是很有名的。无论如何，讲究荣誉准则和风行宗教寓言剧的西班牙，即卡尔德隆的西班牙，将其文化偏好表现得一目了然。对异教徒进行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西班牙人一心关注宗教问题。这有助于解释神学和哲学之压倒实验科学，也有助于解释神秘的、禁欲主义的诗作和卡尔德隆的戏剧所具有的象征主义。一个浸透宗教精神的社会虽然很容易为它的被压抑的感情找到宣泄口，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集体逃避现实导致了演戏和斗牛之类大众娱乐，而个人逃避现实则是远离日常生活的严酷，躲进内心虔诚的小天地和造型艺术的绮丽世界中去。当现实不再能被置若罔闻时，尖刻的讽刺小品和毫不宽容的声讨檄文便指向菲利普四世宫廷那华而不实的小圈子，指向轻浮的救世主义，这种救世主义是那些在查理二世在位时期指望奥地利的胡安·何塞来匡治所有弊端的人们所怀抱的。

在所考察的时期里，文学在西班牙繁荣昌盛。神学和哲学没有达到它们在16世纪的高水准。在纯科学和实验科学方面，西班牙几乎全无贡献。但有一位杰出人物，即哲学家巴尔塔萨·格拉西安，他那复杂的哲学小说《爱挑剔的人》在西班牙境外赢得了盛名。萨维德拉·法哈尔多、涅雷姆布尔格、拉莫斯·德尔·曼萨诺和索洛尔萨诺·佩雷拉是著名的律师。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桑乔·德·蒙卡达和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是最杰出的。在历史学领域，重要的著作家有索利斯、梅洛、尼古拉斯·安托尼奥、拉斯塔诺萨、多默和费利岛·德·拉·庞亚。戏剧舞台由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主宰。他是诸如《圣礼短剧》、《人生如梦》（一部构思宏大的哲理剧）和《萨拉梅亚的镇长》（一部将宗教、荣誉和君主制理想化的戏剧）等如此多种多样的作品的作者。在建筑方面，巴洛克风格由于何塞·丘里格拉而完全占了上风；在雕塑方面，西班牙的虔诚找到了天才的诠释者。^[8]这个时期还是西班牙绘画的一个辉煌时期：有画技精湛、创作了《西班牙古典舞蹈》的何塞·里贝拉，有描绘宗教情节和神秘场面的苏巴朗，有情调悲观的巴尔德斯·莱亚尔，有擅长刻画圣母玛丽亚的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还有菲利普四世宫廷肖像画家和历史题材绘画大师、首屈一指的迭戈·委拉斯开兹，他创作了

视觉艺术史上一些特别重要的作品。[\[9\]](#)正是在这些领域，西班牙的伟大在它衰落的时期依然存在。

16世纪至17世纪初，在卡斯提尔王国强有力的领导下，西班牙在近代世界的形成中起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18世纪里，半岛各边缘地区相对于卡斯提尔的落后脱颖而出，以便分享新的生活水平和正在欧洲传播的启蒙文化。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出现了一段岁月，其间人口减少，经济贫困萧条，社会、政治僵化，精神孤立，1630—1690年特别严重。西班牙面对资本主义和科学的新世界，照旧是贵族当道，闭门反思，不顾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能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诸它的限制做出反应。

[\[1\]](#) 见后，边码第380—381页。

[\[2\]](#) 分别为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卡斯提尔地区的城市起义和巴伦西亚等地的城市起义。——译者注

[\[3\]](#) 见前，第六章，边码第147页。

[\[4\]](#) 见后，第十六章，边码第386页。

[\[5\]](#) 这里指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译者注

[\[6\]](#) 即政府委托来控制和保护土著村的西班牙人，这些村庄的居民必须为此种旧贵族服役。这是一项旨在防止奴役土著人的制度。

[\[7\]](#) 见前，第九章，边码第210页。

[\[8\]](#) 西班牙的雕塑和绘画详见前，第七章，第173—174页。

[\[9\]](#) 关于委拉斯开兹，见第四卷，第七章。

第十六章 葡萄牙及其殖民帝国

17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约有人口200万，分布于自13世纪中期以来就已占有的3.4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之上（每平方英里55人）。因此，葡萄牙在人口统计方面的地位要强于人口密度仅约为每平方英里31—34人（总人口不到600万人）的西班牙，与人口比葡萄牙多不了多少的联合省相比亦不逊色。但是，由于饱经战祸，直到该世纪末人口并无增长。首都里斯本至少有16.5万居民，这一数字与阿姆斯特丹不相上下。居民在1.6万—2万人的城镇有4个：大学城英布拉，北方大港波尔图，南方谷物中心埃武拉，新近跻身这些大镇之列的埃尔瓦什，它是独立战争中的重要堡垒。另外还有30个城镇居民超过千户，它们大多数位于南方。

葡萄牙帝国从南美延伸到中国。在巴西——其辽阔的版图当时由“旗队”（bandeiras）^[1]进行测绘，其人口在17世纪前二三十年亦增长迅速，但后来由于与荷兰的战争和制糖业的衰退而受到严重影响，直到该世纪末才缓慢恢复增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东北部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亚马孙河流域以及马拉尼昂。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总数为50万，其中约1/5为欧洲人。总督府所在地萨尔瓦多（巴伊亚）至少有8000名欧洲人以及大量的有色人口。里约热内卢的规模大致相同，而衰落中的奥林达和新兴的累西腓各有约2000欧洲人。圣保罗则一直较小。佛得角、几内亚和圣多美总共约有2.5万—3万居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人口数量不能确定，有8万—10万。在印度，陷于衰落的果阿之居民不超过5万人，在整个远东葡萄牙人似乎不到1万。澳门无疑是最繁荣的中心，并未因对日本贸易的丧失而受到打击。在这里约有6000名不信基督教的华人和一二百名华人基督徒，以及千余户葡萄牙人共同生活。

环绕世界而又总共居住着不到300万人口的葡萄牙帝国，其轴心原是好望角航路，由于荷兰的扩张，现在该航路的作用已经降到微乎其微，东方葡萄牙人社区的人们主要依靠在那里经商维持。一些贵族仍然到东方去谋求发财致富，例如总督路易斯·德·门东萨主要通过

莫桑比克的贸易，8年中聚敛了400万—500万克鲁查多（cruzado）。莫诺莫塔帕的黄金贸易从该世纪初每年不到1吨增长到1667年的1.5吨。从1675年起葡萄牙人试图将这种贸易向西发展，把莫桑比克作为巴西奴隶的主要来源地。来自印度洋的船舶一般停泊于巴伊亚或者其他巴西港口装载糖和烟草，这就意味着帝国实际上成了以非洲和巴西为基础的大西洋帝国。

在巴西，糖厂主和商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糖厂是贸易的唯一基础。1645年葡属巴西约有300家糖厂，每年生产大约80万阿罗巴（arroba）^[2]糖。荷属巴西约有150家大糖厂，产量为葡萄牙糖厂的一半多一些。1654年年初荷兰人最终被赶走之后，糖厂达400—500家（包括数量不断增长的小厂），年产量超过120万阿罗巴。这些糖厂中的3/4集中在圣罗克角与巴伊亚南部之间的地区。当这一地区向欧洲提供蔗糖时，里约热内卢的工厂尽管也生产糖，却以生产销往非洲的烈酒为主。种植园的甘蔗由奴隶耕种，他们也为工厂提供劳动力。与烟草的种植和制作形成对比的是，这种在结构上既有庄园制又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是由黑人和白人、奴隶和自由人、富人和穷人来共同经营的。为了种植烟草，巴西在圭亚那和安哥拉购买它所需要的奴隶。同时烟草在欧洲的消费及其向东印度群岛的出口在稳定增长。巴西烟草垄断了葡萄牙市场，其价值1638年达到1.55万克鲁查多，1642年翻了一番，1659年再翻一番。随后的十年仍在增长，1666年有8万阿罗巴烟草运到葡萄牙，1672年为12.8万阿罗巴。巴西第三项出口物品是主要砍伐于东北部的木材，它的出口由王室垄断。巴伊亚的内地、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出产牛皮，年产量1.5万—2万张。最北部出产细木工、建房和造船所需的木材。1654—1670年巴西向葡萄牙的年出口总值是900万—1000万克鲁查多。

1640年的葡萄牙王朝复辟^[3]尽管未切断巴西与西属美洲的所有联系，但是给贸易带来严重损害。确实，有些小船不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实力强大的里约热内卢省督萨尔瓦多·科雷亚·德萨与波托西之路（the Potosi road）上的图库曼有着家族和经济上的联系。但是荷兰人1637年占领米纳的圣若热，1641年又占领罗安达和圣多美，并控制它们直到1648年。而葡萄牙人发现向巴西提供奴隶很困难，因为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每年运送2000名奴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不再能定期进入波托西之路。1640年前葡萄牙人

曾拥有向西属西印度输送奴隶的特许权，现在这种贸易的恢复十分缓慢。

几内亚和安哥拉之占有曾提供了葡萄牙与西属美洲的主要联系点，从而获得它所亟须的里亚尔^[4]。葡萄牙人现在仍然控制着这些非洲海岸，但从佛得角到贝宁他们的地位极不稳定，总处在荷兰的压力之下。他们之所以仍然坚持下去，是因为他们要维持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烟草和来自里约热内卢的烈酒等物资的供应。1648年重新占领的安哥拉成了巴西奴隶贸易的中心，但是猎取奴隶现在得深入内陆，代价也就更大了。圣多美岛变得萧条了：它的蔗糖不再具有重要性，而且随着米纳的丧失它也失去了在几内亚贸易中的地位。就像在几内亚的同胞一样，佛得角群岛的葡萄牙人在黑人世界和许多国家参与并充当中间人的非洲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除此以外，该群岛在大西洋经济中还起着某种作用，因为它们盛产食盐，一般向德意志、英国和丹麦出口，偶尔也由荷兰贩往安的列斯群岛。皮革是出口葡萄牙的主要产品。但是，尽管佛得角群岛位于通往巴西的贸易路线上，却几乎不向巴西贩盐，因为这种生意会损害宗主国的利益，可是少量的走私还是存在的。

亚速尔群岛是从西属西印度群岛、巴西以及东印度群岛返航的停靠港，因而为走私者和海盗们所看重。该群岛向葡萄牙提供谷物，尽管酒类也很重要，但葡萄牙政府将向巴西提供的物品限制在每年3艘船。马德拉群岛处在通往巴西航路的外侧，它的糖产量下跌了，但酒类的产量却在上升。这里对巴西出口也是受到限制的（每年2—3艘船）。英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荷兰，成为马德拉群岛酒的愈来愈重要的买主。

帝国经济的神经中枢是葡萄牙本身，它使自己的经济结构适合于上述状况。葡萄牙3/4以上的土地未经开垦。谷物生产占地约225万零500英亩，年产量约为1500万蒲式耳。因此每年需要进口（从亚速尔群岛、法国、西班牙以及波罗的海地区）225万—275万蒲式耳，换言之占全国谷物消费量的15%—18%。葡萄牙工厂向巴西和非洲的殖民者提供高质量的面粉。葡萄、橄榄、水果和蔬菜的种植面积估计超过150万英亩，并随殖民地和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扩大。约在1675年仅葡萄牙北部就出口了3万大桶酒^[5]。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葡萄牙特制葡萄酒生产的开始时期。1678年就有408大桶葡萄酒输往英国。还有，除了向北

欧出口传统的无花果、葡萄干和杏仁外，从1635年（该年董·弗朗西科斯·马什卡雷尼亚什将中国的柑橘带到里斯本）起柑橘开始移植到葡萄牙中部的沿海地区，40年后仅向英国出口的柑橘就价值5万克鲁查多。法国进口同样数量，荷兰以及其他北欧国家所购的数量也有其一半。为满足殖民地和北欧市场的需要，橄榄种植遍及全国，由于独立战争的战火毁坏了阿连特茹的橄榄园，广泛种植就更为必要了。

然而，最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是盐，尤其是萨杜河流域出产的盐。1657年出口了8万—9万穆依德（muid）^[6]，1669年与荷兰所订的条约估计至少提供10.7万穆依德，价值32.1万克鲁查多。荷兰是最大的买主，估计达到葡萄牙食盐出口总数的4/5。除了食盐生产，葡萄牙的工业规模极小。葡萄牙渔民早就被从纽芬兰沿海赶走，作为葡萄牙大多数人主食的鳕鱼不得不从英国渔民那里购买。另外，造船业在王朝复辟后重新恢复，里斯本、波尔图、伯南布哥、巴伊亚、里约热内卢都有造船厂，而制造小船则有亚速尔群岛，但它们所使用的栎木和大麻得来自但泽和里加，锚、帆以及火炮则主要由荷兰人供应。在纺织方面葡萄牙对外国的依赖也同样严重。

葡萄牙向巴西、非洲以及诸岛屿出口的产品包括葡萄牙酒、烈酒、油类、面粉、食盐，某种程度上还有家庭生产的布匹和亚麻布，以及织物、纸张和产自其他国家的金属制品。在里斯本、波尔图、塞图巴尔和法鲁，驶往欧洲各港的船舶装载着葡萄牙的酒、油、水果、食盐和苏模鞣料^[7]，西班牙的羊毛，来自东方的钻石和药品，来自巴西的糖、烟草和木材，以及来自一些殖民地的皮革。由于拥有糖和烟草，葡萄牙能够从西班牙获得用于出口的羊毛、谷物，而首先是能用它平衡贸易和铸币所需的全部白银。

价格因商品不同而有波动，但在1666年到约1668年之前，一般趋势是稳定的或几乎察觉不到的上涨。这之后谷物、食盐和橄榄油还保持稳定，而在1668年到约1690年衰退期间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大跌。两个时期的基本差异显然是由战争向和平的过渡所引起的。但也有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如果以白银来表示价格，价格最初都是稳定的，接着普遍下降了，殖民地产品下降比例尤其显著。当时在价格下跌时货币政策起着制衡作用。17世纪30年代后期，葡萄牙的两个黄金产地米纳和阿尔金丢给了荷兰，而巴西和莫桑比克还不是能发挥作用的供给地。因此，货币依靠进口，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年代金币稀少而白银丰

富，铜仅起着很小的作用。葡萄牙的财政体系与西班牙有着紧密联系。对葡萄牙来说幸运的是，总的来看它的贸易出超，糖和烟草能够平衡西班牙的谷物和羊毛；在西班牙南部出售货物换取西班牙铸币的外国商人再用这些铸币支付他们所购买的葡萄牙食盐。

葡萄牙帝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自16世纪末起发生了深刻变化。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使葡萄牙通过好望角航路的运输业下降到其原有规模的1/3以下。政府和商界认识到它们没有对付这些大公司竞争的充分准备，国家资本主义和个体商人的活动不得不让位于这种新形式的企业。戈梅斯·索利斯首开这种新形式东方贸易，但他的公司仅从1628年维持到1632年。王朝复辟后首先是耶稣会士维埃拉力主对巴西的贸易采取同样的政策。1647年和1648年的沉重损失——一份可能有所夸大的官方报告说，在总共300艘船中，1647年损失了108艘、1648年损失了141艘——导致国王若奥四世建立起拥有125.5万克鲁查多资产的巴西贸易公司。种种关键性步骤是在1649年2月采取的：受到异端裁判所处罚的新基督徒^[8]，其财产予以豁免，而被没收的财产的管理权也从宗教法庭转交给财政委员会（the Conselho da Fazenda）。该公司被授予向巴西出口酒、橄榄油、面粉和鳕鱼的垄断权。各有18艘舰船的2支舰队建立起来并保持下去，以便组成一个从葡萄牙到巴西的专门护航体系。此举得到来自糖、烟草、皮革和棉花税收的资助，包括舰船的保险和租用费。这家公司具有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葡萄牙某些最强大的贸易家族——例如王朝复辟时期最有实力的金融家杜瓦尔特·达·席尔瓦——以及外国资本家，特别是意大利的资本家都是它的股东。

但是，这家公司的经营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一方面，由于将资本和贸易集中于几个港口，小港口的繁荣受到威胁，因而使地方城镇贫困化。另一方面，一个以贵族为中心建立起来并由反宗教改革的意识形态和对新基督徒的敌意构筑成的社会，有着反资本主义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赞成维护异端裁判所的特权。商人常常被或对或错地指责为像犹太人那样行事，于是受到多方催逼而又目光短浅的政府总想没收他们的商品。1658年5月，对4种商品的出口垄断被取消了，尽管对公司进行了补偿。1659年1月摄政同意各委员会和议会的要求：授权财政部动用受到处罚的新基督徒的财产，并在2月取消了这些财产所享有的豁免权。公司的末日即将来临，1663年它改变

为一个皇家委员会，同时股东得到了补偿。但是，尽管它受到了指责——护航不力、向巴西供应不足，但它却在危难之际拯救了里斯本与巴西的贸易。一旦危险过去，小港口和小商号便时来运转了。

1640年12月，1580年被菲利普二世篡夺并由菲利普四世和五世非法保持的葡萄牙王位归还给了唯一正统的葡萄牙王朝——它的权力并未因时间流逝而消失。这也体现了正统的国家和政府体制的恢复，从而结束了西班牙的暴政。大量政治和法律文献涌现出来，用以证明王朝复辟的合法性、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并树立新政权在国内的权威。某种官方信条在1641年的议会上形成，并在1656年国务委员会会议中得到界定和发展，即如果权利是通过作为中介的人民来自上帝，那么王国应将全部权威转移给国王。这是一个明确的契约，它规定在国王公正地进行统治的情况下，负有服从的义务，同时授予国王强制臣民服从的权力；另外，它又逼迫国王尊重自然法则与本国的准则和习惯，允许反对暴政或篡位的起义，在出现这类情况时，举国有权另立新王。因此在1640年，篡位的暴君被驱逐，合法的掌权者得以复位。有鉴于在1385年王位空缺时议会曾选过一个国王，此次布拉干萨公爵在议会召开之前就被庄严地宣布为王，并宣誓登位，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1580—1640年王位并不空缺，而是被人篡夺，故而葡萄牙人恢复了1580年前一直存在的政府。

新税未经专门召集的议会之批准不得征收；储君须在议会召开期间宣誓；议会还需在发生继承问题时做出决定，而国王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军国大政上要与议会磋商。1620年至王朝复辟期间议会未曾召开，在整个西班牙统治时期只不过召开了4次。然而，1641—1688年议会召开过8次，都是在里斯本，它在复辟后的重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王室合并前，议会的作用也远远没有中世纪重要（1500—1580年仅召开过7次）。因此，这是一个早已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具有世袭君主官僚机器，这些在1640年都得到了恢复，但是由于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行政方面的改进而组织得更好。议会由分别集会的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大贵族和土地贵族；大主教、主教和高级教士；来自92个大小城市的代表（每个城市2名）。这些代表由普通贵族、地方官员、市民、行会代表、市法官^[9]等人所组成的市政会议选举产生，贵族和有身份的教士常常被选为城市代表。

议会的作用是不正常的和有限的，复辟后的葡萄牙在两种政体之间摇摆：一种由各委员会和高等法院进行治理，国王的权力限于指派其成员和最一般的指导和监督；另一种是由国王及其秘书进行治理，各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只是行政机器的必要附件。严格地说，不存在内阁政府，大臣的职责由国务秘书、财政总监以及各委员会主席和高等法院院长履行。在君主个人统治期间，这些职责由某些受宠的秘书和顾问履行；在以上两种情况中，那些呈递文件给国王签字的王室内侍（Despacho）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产生于16世纪的国务秘书处的权力极为广泛，举凡国内、殖民和外交等方面的政策以及武装部队均受其控制。1643年年底，国王从中分出处理一定官阶的文武官员和地方长官任用事务的人事秘书处（Secretariat of mercês e expediente）和处理任何一个委员会送呈文件的签字事务的掌玺秘书处（Secretariat of da assinatura）。国务秘书确保了政府的连续性，如维埃拉·达·席尔瓦1642—1662年一直任此职。但政府首脑有时是国王宠幸的一位大臣，有时是机要秘书（如1662—1667年），这是由卡斯特洛·梅略尔伯爵所恢复的一个职位，在他被放逐后即取消了。

国务委员会设于1569年，它继承原有的枢密院，显然是一个最高机关，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决定最高文武官员以及实际上决定教士的任免。大贵族即使不问事也有国务委员的头衔。国务委员包括公爵、侯爵、伯爵、大主教和主教，但未曾有过地方官员和其他人士。

国防委员会设于1640年12月，3年后确立了其机构职责。所有国务委员均有权参加国防委员会，但其正式成员是各省督军、重要的指挥官、炮兵将领、舰队司令、巴西总督和最高法院的2名法官，还有1名秘书。该委员会任免陆海军军官，监督城防、海军军备、军械库、铸造工厂和医院，负责战争的总体指挥。

财政委员会指导财政、经济和商务的行政管理，其首脑是3名均为贵族的总监（Vedores），代表着特殊的利益。该委员会由3—5名受过法律训练的委员、1名审计官，以及4名秘书所组成。从属于该委员会的有清算法庭、印度委员会（case de India）、造币厂、民用船厂和仓库、领事馆、海关和其他税收机构，以及巴西贸易公司及其后继者巴西商务委员会。

由于与西班牙的战争所产生的新的财政要求，也由于1641年和1642年的议会希望保持对供应的控制，1643年1月设立了三级会议，作为一个代表贵族、僧侣和市民的常设机构。它的任务是确定和分配战争税和监督战时财政管理。它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插手某些商业部门，而它最初的职能则降到控制一些不太重要的赋税。

也是在1643年殖民委员会替代了印度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为1名贵族，成员包括6名委员（2名贵族和4名律师）、1名秘书和2名书记。它的任务涉及所有海外领地的治理（除司法管理）、组建商船队，以及制定除巴西之外的殖民地商业政策。

司法完全由最高法院控制。最高法院最初由国王亲自主持，自16世纪下半叶以后由1名大贵族担任院长。它由6名法官（desembargadore）组成，其中1名是高级教士，他们有若干秘书、书记以及1名司库协助工作。法官享受贵族的地位。该法院任命所有较高等级的地方法官和司法官员，能取消某些法令，调解民事司法和教会司法范围内的矛盾，同意或拒绝上诉，决定赦免，规定教士的俸禄，限定继承权以及各种特权，还得认可教皇使节呈递的教皇敕书。大法官法庭是其附属机构。最高法院之下有里斯本上诉法院，负责葡萄牙南部和中部所有民事和刑事诉讼；北部案件由波尔图上诉法院审理，尽管某些案件仍归里斯本上诉法院审理。道德和秩序委员会（Mesa da Consciencia e Ordens）管理军队并在有关道德的问题上向国王提供咨询，例如对受到异端裁判所谴责的那些人的财产处理问题。

因此，国家机器牢牢地掌握在大贵族、教会上层人士和法官的手中，在君主和百姓之间是一套组织完善的官僚机构，其三个主要部门分管着战争、司法和财政。但这种结构也包含封建和地方权力的残余：一方是军界头领和那些在其封土之上拥有征税和封官之权的人士；另一方是拥有自己法官以及选举产生之村法官的自治市镇。然而，这些市镇当局是由具有一定收入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组成的，在大城镇中且有1名贵族主持。选举每3年进行一次。在主要城镇中，各行会的代表组成行会联合会，它从属于市议会，负责经济管理和公共场所的维护和治安。

贵族和商人牟利的渴望（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以及向西属西印度贩卖奴隶）使菲利普二世吞并葡萄牙成为可能；于是这些阶级和

主张抵抗的普通百姓分道扬镳了。但是开始于1620—1625年的帝国经济和财政危机、新的国际形势、威胁到其特权和前程的中央集权化政府——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贵族和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然而却是那些来自下层的压力、那些由饥馑和横征暴敛所引起的人民起义驱使他们进行反叛。王朝复辟的发动者们希望能控制局势，因而只是到复辟成功之后才谋求大众的认可。他们中的某些人曾参与镇压1637年的反叛，例如1642—1662年担任国务秘书的维埃拉·达·席尔瓦。贵族、高级教士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仍然依恋二元君主国，想方设法使两个国家重新合并。对他们来说重新合并意味着某种强大的联合力量可以对付新兴的海上强国，意味着作为货币基础的美洲白银、糖和烟草向西班牙的倾销、西班牙羊毛的再出口、特许贩运黑奴的利润，以及里约热内卢和布谊诺斯艾利斯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而且许多家族与西班牙有联系。某些葡萄牙头面人物仍然为西班牙效劳，其中如汉内考特之役的胜利者董·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尽管在罗克鲁瓦遭到失败）；拉莫特之役的胜利者董·菲利普·达·席尔瓦；莱里达的守将格雷戈里奥·德·布里托。所有这些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

葡萄牙人希望王朝复辟能给他们带来与荷兰的和平并最终收复某些失去的领土，但实际发生的却是在欧洲得以休战而在海外则战争仍在继续。因此，葡萄牙不得不发动两场战争：一场是1652—1661年为争夺殖民地和贸易控制权在海上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战争；另一场是1640—1668年在陆上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为了进行与西班牙的战争，葡萄牙需要与联合省保持良好关系，因为该国是葡萄牙的主要市场且是葡萄牙海军补给品、桅杆、大炮和小麦的主要供应国。反过来，荷兰的鱼也离不开食盐，并且它所需要的西班牙羊毛是通过葡萄牙进口的。这样在欧洲实行了互利的休战，但在海外却不是这样。在东方，尽管163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签订了协定，荷兰还是得到了好处；好望角航路不再是葡萄牙帝国的轴心。然而在大西洋，葡萄牙占了上风，1641年被荷兰占去的安哥拉和圣多美在1648年被夺了回来，这就决定了巴西的命运，因为其奴隶的来源现在为葡萄牙所控制。葡萄牙人和土著在马拉尼昂的叛乱持续了18个月之久，荷兰人最后不得不从这里撤离，而且他们也从未设法控制巴伊亚。实际上，荷兰人稳定控制东北部（1630—1635年征服）仅持续了10年。1645年伯南布哥发生叛乱，豪斯在巴多卡斯被费尔南德斯·维埃拉击

败。游击战开始了，还得到来自葡萄牙的帮助。1648年3月，维埃拉和尼格莱罗斯赢得第一次瓜拉拉皮群岛战役的胜利；1649年2月，弗朗西斯科·巴雷托率领的援兵获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由于巴西贸易公司的建立，商船可以安全地往返巴西和葡萄牙之间。1654年1月，在巴西的荷兰人投降。他们失败的原因何在？1652—1654年英荷战争无疑牵制了他们，但1650—1654年葡萄牙也在与英国打仗。葡萄牙的外交使荷兰人的增援有所滞缓，但对在巴西的荷兰人援助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荷兰国内西印度公司与贩运食盐和羊毛的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荷兰的中央政府是软弱的，举足轻重的是赞成贸易而不太赞成殖民的阿姆斯特丹。而且，人口分布的因素也有利于葡萄牙，在巴西的荷兰军队中相当大的部分是雇佣军。最后还有葡萄牙人移民和土著对荷兰统治的自发而猛烈的抵抗。

葡萄牙同时在与西班牙作战。在比利牛斯条约签订（1659年）之前，西班牙尚不能利用其全部力量；但王朝复辟时的葡萄牙既无防御系统又无现代军队，另外还缺少将领（有些将领正在卡塔罗尼亚或弗兰德斯服役），甚至军队的养马场也被西班牙人关闭。这是一场边界战争，村庄遭受袭击，牲畜和粮食被夺来夺去，农田和橄榄园也备受蹂躏。然而，在这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中，葡萄牙到处构筑了要塞，组建了一支能赢得阵地战并由才华出众的将领统率的军队。受到罗克鲁瓦战役的鼓舞，马蒂亚斯·德·阿尔布凯克在蒙蒂霍战役中击败莫林根男爵，接着守住了埃尔瓦什，打退了由托雷库萨侯爵所指挥的一支强大军队的进攻。1648年固守奥利文萨以抵御莱加利斯侯爵的进攻同样获得了成功。然而激战只是在法国和西班牙进行谈判时才恢复，因为葡萄牙希望和平解决。在葡萄牙受挫于巴达霍斯并丧失奥利文萨和莫拉之后，董·桑绍·曼努埃尔和坎塔涅迪伯爵在埃尔瓦什战役击败西班牙的骁将唐路易斯·德·哈罗，赢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1659年1月）。在独立战争中，葡萄牙野战部队的数量达到4000—5000骑兵，1万—1.5万步兵以及20门大炮。一般说来，葡萄牙处于守势：它的目标是获得对其独立的承认而不是征服。

葡萄牙的国内外处境确实十分严峻。罗马教廷顽固地拒绝承认，20年中没有一个强国帮助过葡萄牙，它也不被允许加入国际条约。对法国来说，它只不过是与西班牙斗争中的一个走卒。迫于内外危机，国王和政府官员摇摆不定，有时赞成孤注一掷的政策，他们一会儿不

顾国务委员会和高等法院的反对，打算把巴西东北部割让给荷兰以换取白银，一会儿又考虑放弃本土给西班牙而退守殖民地。承受沉重压力的政府又为自己制造新的困难：它的君主专制意识形态导致它在英国内战中去支持王党，这一唐·吉诃德式的政策终致其在1650年向克伦威尔发起公开的挑战。布莱克截击了巴西舰队，1654年葡萄牙被迫接受了克伦威尔的条件，将它的帝国向英国贸易开放。该政策的影响在英国王政复辟后仍然存在。布拉干萨的凯瑟琳与查理二世的联姻（1662年5月）虽然给葡萄牙带来了英国的支持，但花费达200万克鲁查多并肯定了英国的贸易特权地位（嫁妆丹吉尔和孟买仅具次要的意义）。从巴西和安哥拉被赶走的荷兰人看到英国大获其利，便在1657年秋季进攻葡萄牙，调动40艘舰船封锁塔古斯达3个月之久，1668年8月签订了一个使葡萄牙经济遭受灾难性影响的和约。作为他们承认葡萄牙拥有巴西、安哥拉以及圣多美（无论怎么说对该地的统治已牢牢建立）的回报，荷兰人得到了400万克鲁查多（以食盐贸易的收入支付）和与英国同样的贸易权。

1661年是葡萄牙权力的最低点，其国内局势有助于解释这一点。起初，若奥四世与议会和各委员会共同进行统治：接着他抛开议会，通过其大臣与各委员会一起施政；最后转向个人统治，助手是他的秘书们，尤其是自王朝复辟前就一直担任他的秘书的派斯·维埃加斯。1656年11月若奥四世驾崩，王朝的地位因此变得微妙起来，因为其长子董·特奥多西奥死于1653年，次子董·阿丰索身体羸弱，神经不正常。所以出现一种意见，希望召集议会以宣布阿丰索不宜继位而让其弟佩德罗登基。其母后路易莎赞成这种解决办法，但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大多数贵族和主要教士则是很乐意看到由一个女人长期进行摄政，接着又是一个治国无能的国王统治的前景。他们1656—1662年6月掌握着实权，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合法地行使着这种权力。但是，尽管埃尔瓦什战役获得大捷，外交事务却发生了灾难性的转变：葡萄牙被排除在比利牛斯和平之外，与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与英国联姻和与荷兰缔约又把帝国的经济置于外国人控制之下。

摄政本来在1657年就该结束了，阿丰索时年已届14岁，但唐娜·路易莎延长了其统治，希望阿丰索能够康复，或者更愿意伺机将佩德罗扶上王位。她加强君主统治企图的失败归因于她所依靠的恰是统治

阶级中反对变更基本政策和管理方法的那些人。因此，现行政策所遭受到的重大失败和形势前所未有的严峻导致希望变革的人改向依靠阿丰索。1662年卡斯特洛·梅略尔伯爵被迫将权力从母后转交给国王。索萨·马塞多成了国务秘书，各委员会和高等法院被迫接受了一个内阁控制的政府。

葡萄牙利用英国对葡荷条约的敌视（英国的贸易因此要遭到损失）拖延到1663年才批准它，而且实际付款直到1669年签订新约时才兑现。葡萄牙还希望阻止英国人在葡属殖民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统治。卡斯特洛·梅略尔设法利用法国以争取与西班牙缔结有利的和约，而不卷入法国的计划太深。1661—1662年，西班牙的进攻暂被制止，但1663年摆脱了其他承诺的西班牙又鼓足全力，5月占领了埃武拉。然而，葡萄牙的军队和防御系统的重组进展甚大，因为蒂雷纳派来由绍姆贝格率领的600名法国官兵，随后英国人也派来一些团队。1663年6月，董·桑绍·曼努埃尔和佩德罗·德·麦哲伦赢得阿梅西亚尔大捷并光复埃武拉。这是对葡萄牙20年的苦心准备和新政府坚强果敢的报答。

由于西班牙不会接受一个有利于葡萄牙的条约，又由于作为调停者的英国希望不惜代价地迅速解决，卡斯特洛·梅略尔于1667年3月与法国签订了联盟条约。主和集团和英国的外交均以搞垮梅略尔为目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法国的外交亦是如此。法国人认识到，梅略尔希望与他们结盟只是将之作为向西班牙施加压力的手段，他不会与设法首先把臭名昭著的亲英国务秘书索萨·德·马塞多赶下台的路易十四进行合作。在国内，统治阶级不喜欢以内阁替代各委员会构成的政府，因为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老百姓也因战争所造成的艰苦状况而深表不满。卡斯特洛·梅略尔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广泛，外国使节注意到，由于缺乏决定性的和确凿的支持，他的明智的意图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贯彻，他也难以抵制上层贵族，尤其是在各委员会中反对他的马里亚尔瓦侯爵。1662年，由于飞黄腾达使他极端地墨守成规，卡斯特洛·梅略尔拖延解决王位继承问题。但大多数国人不赞成让一个无能的疯子当国王，因为如果佩德罗在他的哥哥之前去世就将引起一场严重的，甚或致命的危机。

当各种明显相互敌对但实际上却是互补的力量正联合起来反对卡斯特洛·梅略尔之时，董·佩德罗与年轻貌美的王后、萨伏依的玛丽

• 弗朗索瓦的恋情也在发展。她是内穆尔公爵的女儿，1666年嫁给不幸的阿丰索，无疑希望干预朝政并君临国家。1667年9月，董·佩德罗及其党徒成功地将卡斯特洛·梅略尔赶下了台，他逃往一座修道院，后来又亡命英国。接着王后去修道院避难，在那里她提出解除婚姻的请求。基于阿丰索不能生育，其弟和国务委员会劝他放弃王位，实际上他立即遭到监禁（直到1683年去世）。阿丰索的婚姻被解除，因为它从未完成。4天后，获得摄政王身份的佩德罗与萨伏依的玛丽通过代理人而成婚。1668年1月议会宣布佩德罗为王储，同时也肯定了阿丰索的被黜，因为他无力治理且不会生育。这些事件使葡萄牙避免了一场继承战争。不足的是，这种变化导致了葡萄牙1668年2月仓促与西班牙媾和，1669年又与荷兰缔结确认1661年旧约的新约。主和集团的胜利是法国的失败，索萨·德·马塞多的倒台和佩德罗的婚姻是英国的失败，王后没有实现统治，佩德罗亦是如此，正如1670年圣罗曼所写的那样，葡萄牙政府现在掌握在贵族的手中，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王朝复辟之后葡萄牙的政治实际上比其殖民地远为贵族化。人民确实怨声载道并时有爆发。1642年2月约10名贵族逃亡西班牙，因为国内发生反对贵族的骚乱，但由于7月贵族的阴谋被压制，骚乱遂告平息。1657年7月，政府进行战争的方针含混不清，因而里斯本的市法官和行会代表前往法国大使馆申明葡萄牙对法国的友谊并谴责某些大臣亲西班牙。当1663年5月埃武拉向西班牙人投降时，里斯本的群众占领街道，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从而帮助了卡斯特洛·梅略尔政府。而在1667年，里斯本的法官、市议会和行会在使马塞多和卡斯特洛·梅略尔倒台的过程中又起到远不能被忽视的作用：老百姓似乎希望让佩德罗成为政府首脑并得到继承权而不废黜和流放阿丰索，但他们受到贵族的操纵。1672年4月，里斯本的行会以暴力公开威胁贵族不准卷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阴谋，法官再次起到了政治和外交作用。

然而，自治市在海外比在国内更有影响。1643年丹吉尔人民发动反对总督（他仍忠于西班牙）的斗争，将他撤换下来并承认若奥四世的统治。1642年马拉尼昂人民发动了起义，最终迫使荷兰人撤出。在圣保罗和桑托斯，耶稣会士被驱逐，中央当局受到挑战。1660年11月里约热内卢人民发动起义反对权势很大的科雷亚·德萨，直到次年4月才被镇压，而这时圣路易斯和贝伦又起来反对耶稣会士并赶走他们。

在果阿，1652年一场大起义导致总督奥比杜斯伯爵被驱逐，而孟买人民则使该城交给英国接管之事延迟了若干年。

总之，在王朝复辟时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贵族和高级教士手中，无论如何他们都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1665年法国领事注意到，教会权力极大；1669年据一位意大利人观察，耶稣会士不正常地拥有很大权力。但是，面对统治阶级政治态度的不明确，正是由市法官、自治市和行会（尽管议会不允许它们过问最高层面的事务）所表现出来的普通老百姓的精诚团结并通过他们的威慑和行动维护了葡萄牙的独立。

[1] 17世纪进入巴西内地搜捕奴隶的葡萄牙远征队。——译者注

[2] 1里斯本阿罗巴约等于32英镑。

[3] 参看第4卷第15章。

[4] 当时西班牙和西属美洲通用的银币。——译者注

[5] 一大桶约为105英加仑。——译者注

[6] 1葡萄牙穆依德约为23蒲式耳。

[7] 用漆树叶粉制成，作染色、鞣革之用。——译者注

[8] 指在中世纪西班牙统治下为免受迫害接受或假装接受基督教但暗自仍坚持原信仰的犹太人和摩尔人。——译者注

[9] 市法官由拥有财产的人选举产生。

第十七章 欧洲和亚洲

一 欧洲与亚洲的联系

在16世纪，葡萄牙人改变了亚洲与欧洲贸易的进程，但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其内容；他们中断了在东方有利可图的贸易，但没有根本改变其模式。从该世纪末叶起，他们的竞争者荷兰人和英国人对亚洲的运输业进行了较为根本性的重新组织，促进了孟加拉的丝绸和爪哇的糖分别在日本和波斯的销售。他们也将更多的亚洲商品运往欧洲市场，向马拉巴补充苏门答腊的胡椒，引进靛青和食糖，并做起那有用的压舱商品即硝石的生意。葡萄牙人原已发现印度粗棉布在非洲和巴西殖民地有销路，而新来者又发现这种棉布也适于销往欧洲——白布适于制床单、毛巾和餐巾，花布则适于制帘帷、被子和装饰物。

亚洲商品更为大量地涌进欧洲市场发生在1650年之后。胡椒和香料在这种扩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市场上不再独占鳌头。硝石仍然是重要商品，因为在比哈尔发现了新的供应来源，它能够满足欧洲因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频繁而引起的需求。随着一连串能干的莫卧尔总督不断地肃清若开人（Arakanese）和葡萄牙海盗的活动地区，类似的发现，即孟加拉廉价的生丝最终也得到了利用。17世纪30年代，波斯生丝输往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状况部分地为荷兰人和英国人所改变，来自孟加拉价格更低的丝进一步破坏了原有模式。更便宜和更充裕的供应，加上身怀技艺的避难者的流入和因意大利的战争而引起的暂时性保护，促进了英国丝织业相当规模的发展。正如乔赛亚·柴尔德爵士在1681年所夸耀的，东印度公司“最近数年中发现了一条将各种生丝运到本王国的途径，它们比土耳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任何产地所提供的还要便宜”。

来自孟加拉和爪哇的糖似乎前景看好，但像靛青一样，不能与西印度的产品竞争，然而在亚欧贸易中有两种新产品，即咖啡和茶确实取得了成功。这两种药物分别对布道时的昏昏欲睡者以及肥胖与抑郁症者有特效，它们随着供应量增加和价格下降一时成为流行的饮料。

17世纪60年代荷兰人和英国人每年各购进2万磅咖啡，它是更为广泛的红海贸易中的一种商品。到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英国人和法国人^[1]以及荷兰人共进口了300万磅咖啡，这桩买卖是如此重要以致他们的代理商爬上也门的山冈并以现金支付，专载咖啡的船舶从穆哈直驶欧洲。茶叶价格的下跌和茶叶的最终普及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但到1700年英国人从中国年进口茶叶达到100吨，而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未来的重要性已显露端倪。

新饮料的普及阻止了酗酒并导致新的公共场所的出现。数十家咖啡馆在阿姆斯特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伦敦它们成了一种组织，即非正式的俱乐部；在巴黎的咖啡馆，由于镜子、分枝烛台和大理石贴面桌子等摆设应有尽有，成为深受才士和作家青睐的聚会所在。如朗伯德街上的劳埃德那样的咖啡馆被用作商人和船主的碰头地点，从那里能够搜集信息，介绍买主给卖主。它们也被用作工人和商人们阅读当天报纸的政治中心^[2]。报纸的某些大众教育作用应归功于咖啡馆，因为人们就是在那里阅读和讨论它们的。艾迪逊（Addison）的希望是，通过《新观察报》让哲学“深入俱乐部、茶桌和咖啡馆”。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发展出现在如下的认识之后：从红海到摩鹿加的亚洲人迄今用作衣料的印度棉布也可以成为欧洲人的衣料。在17世纪初叶，棉布只用来遮掩非洲奴隶的身体，装饰欧洲人的墙壁和家具，而在英国“那些对高价的亚麻布望洋兴叹而又想模仿富人的人”则用其覆盖死者。到该世纪后半叶笛福（Defoe）记述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人们对东印度商品的普遍喜爱达到了如下程度：过去仅仅用作地毯、被子等以及给小孩和普通百姓做衣服的擦光印花布和印花棉布现在成了我国贵妇人的衣料，……擦光印花布从铺在她们地板上荣升到穿在她们的身上，从鞋布荣升为裙料。不仅如此，它还钻进我们的房间、卫生间和卧室，帘帷、垫子、椅子，甚至床铺本身使用的都是印花棉布或者印度的织品……”^[3]

衬衣、领饰、护腕和手帕都用印度的棉布和丝制成，平纹细布的褶边、棉织袜替代了丝或羊毛制品。

这种时髦不限于英国，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促进这些商品在国内销售的第一家，但是它在亚洲的基础比荷兰狭窄，商品的选择性也较有限。印度的商品风靡欧洲：不仅作为高级时髦织物的科罗曼德尔印花布或古吉拉特锦缎是这样，棉布也是如此，因为它耐洗且价格低廉，这就使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是又一种商品，像糖、烟草或稍后的茶叶一样，以其价廉打开了新的巨大需求市场。各家公司都着手利用这种形势。英国的经理人员很快订购了大批便宜的白布、帆篷布和长衬衣布，“以供大量的缝制穷人衣服之用”。白布成了农民、仆役和中产商人家庭的普通衣料。

上述变化反映在进口数字中。荷兰的棉布进口量从1650年的5.5万匹上升到80年代中期的约20万匹；英国同期进口量从不到10万匹急增至200万匹。法国、丹麦和葡萄牙都增加了进口，而从1715年起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也积极购进丝绸和棉布。由于荷兰人和英国人是纺织品的大宗再出口者——伦敦海关署的记录证明他们积极与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以及美洲殖民地做生意，许多人在健康和舒适方面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廉价棉布使人们得以用可洗的“亚麻布”蔽体和铺床。

进口如此巨大数量纺织品——鲁昂1686年纺织品的销售占总销售171.3万里佛尔中的156.2万——的公司显然要不断与欧洲的羊毛、丝绸和亚麻工业竞争，并因后者敌对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在联合省，供当地使用的白布进口长时间内数量相当少，但英国人牟利的消息逐渐克服了所有的敌对情绪。法国在东印度利益甚小，卢瓦正忙于发展自己的纺织业，1686年它颁布禁令，不准出售东方丝绸、印度印花布以及在法国印染的印度白布。但旨在阻止亚洲纺织品拥进的壁垒不得不通过若干新禁令和敕令来不断加强。惩罚愈来愈严厉，在瓦朗街，77人被判处绞刑，58人被用刑车处死，631人被发送到海船为奴。但是印花布的使用仍然继续扩大。实施禁令的明显后果是破坏了法国的棉布印染业而使英国同行最终渔利。至于平布——可做领布、颈圈或床罩的白布，可做南方人的头饰、方围巾以及围裙的平纹细布则准许由法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尽管对来自英国和联合省的进口品要课以寓禁税。由于走私，在1691年甚至白棉布都被禁止购进，而法国东印度公司只有同意在白棉布上加盖政府的戳记之后，才被暂时允许重新进口。

英国的商人与工业主的竞争较为平稳，格洛斯特郡的棉布业主从1675年的请愿起，花了25年的时间才使一项反亚洲纺织品的法案得到通过。在那些年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聚集起来。土耳其公司攻击东印度公司，因为孟加拉的丝与波斯的丝进行竞争。丝织业主攻击东印度公司——尽管该公司是他们所使用的生丝的供应者——因为它促进了孟加拉丝织业的迅速扩张，这使印度的丝价在40年中下降了50%。

（该公司曾派遣英国的拈丝工、染工和图案设计师去印度以改进那里的丝绸生产。）羊毛业主和棉布印染者也抵制对他们的市场的侵占。

1696年，英国下院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穿着印度丝绸、白布和在英国印染印度白布的法案，但在上院所有经营和加工印度棉布、丝绸的人形成反对势力，否决了该法案。第二项法案亦告失败。1679年一群斯皮塔尔菲尔兹（Spitalfields）暴徒袭击东印度公司总部，并在下院外闹事。骚乱和小册子的论战持续到1700年4月法案的通过，它禁止使用“波斯、中国和东印度生产的所有熟丝、孟加拉绸缎和丝毛混合制品以及所有在那里缀上图案、印染或着色的白布”。

该法案与法国的禁令相比有两点不同：它允许进口印花纺织品用于再出口不受限制；允许平布的进口及其在英国印花。由于在下一个议会会期举行的会议上白布税也被降低，该法案的后果之一是刺激了英国印花业的发展。丝绸和印花布的进口贸易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贸易量的约2/3一直用于再出口，也有相当一部分继续进入英国市场。1719年戴维·克莱顿注意到，白布在沿海地区零售比在伦敦批发便宜。由于印度印花布与英国印花布的竞争因此而仍然是棘手的，于是攻击的下一个目标便对准了这种棉布。1720年在经历了多次请愿和骚乱后，一个法案相应地被通过，它规定“……除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种植和生产的之外，禁止使用和穿着其他一切经印花、缀上图案、着色或染过的白棉布”。

这场反新商品涌入的斗争旷日持久，其特点之一是长期的小册子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整个与东方的贸易都一直受到攻击。对该贸易的反对是普遍的，因为它冒犯了几乎所有金银通货主义者、重商主义者或保护主义者政策的信条。1686年法国的一份备忘录表达了这种指责：亚洲贸易不是为法国制造业提供市场和换回金钱，而是吞没无数的金银，反过来所提供的只是蹩脚的布匹，而且它们还排挤掉像丝绸和毛织品这样优良的法国工业品。

对贵金属流失的谴责并不新鲜，但改变贸易模式使得问题更为严重。咖啡要现金收购。在莫卧尔境内欧洲商品有着市场的古吉拉特，却购买布匹很少，而在几乎没有什么欧洲商品与之进行交换的东部印度，却购买很多。要从亚洲转口贸易中牟取黄金来支付给科罗曼德尔和牟取铜钱、白银来支付给孟加拉愈来愈困难。主要从横越大陆的丝绸和棉布贸易中所获得的少量金银，是来自波斯湾和古吉拉特。铜钱一般可以从日本获得，但日本在1668年停止了大量白银出口，1685—1686年又停止了黄金的出口。到1700年甚至荷兰也不得不把它原本很有节制的金银出口提高到500万弗罗林。

针对“金银通货主义者”，东印度贸易的捍卫者提出若干论点。法国的经理们宣称，他们在亚洲没有廉价购进的那些商品在欧洲要以高昂的价格才能购得，并称他们的再出口所得要超过原先付出的金银；塞涅莱告诉路易十四说，公司的所有金银均得自加的斯，作为在西班牙转销货物的回报。但是，即使这在个别一些国家是事实，就作为整体的欧洲而言，这是不切实的。不仅不存在世界范围的信贷体系——所以人们需要用金钱把几个大洲的信贷系统联结起来，而且正如彼得·德·拉库尔德1662年在其《论荷兰的利益》一文中所宣称的，与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不能通过商品和劳务，而是只有通过黄金和白银来进行。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亚洲能从欧洲大量进口的商品尚不存在，能大量利用的劳务也极少。

但是与亚洲贸易不仅使欧洲的金银枯竭，而且抢走了欧洲老百姓的饭碗。这就是工业品方面——纺织品、瓷器和扇子——的新贸易如此受人反对的原因：该贸易有悖于重商主义者强调生产反对消费、强调出口反对进口的理论。为回答这种攻击，东印度贸易的捍卫者不得不系统地提出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柴尔德和戴夫南特强调了在最廉价的市场上买东西的价值——正如亚麻布商们所表达的那样，“自由贸易能使各种各样的商品变得便宜，劳动的便宜能促进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又能带来财富和人民”。^[4]1701年出版的《有关东印度贸易的若干思考》预言，竞争将促进节省劳力机制的发明，它通过降低成本使市场扩大和生产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即进一步的分工将使成本再次降低。但是，就连先进如斯的论点也于事无补，因为17世纪90年代刚发生过失业上升的情况。当羊毛和地产业似乎危在旦夕时，“一群崇拜恶魔和为一天挣半便士而卖力的异教徒所生产的”^[5]白布

同样没有希望。有关羊毛业事关重要的古老信条战胜了东印度利益集团的有关论点。

但是，羊毛出口在1640年占伦敦总出口的80%—90%，而在1700年已不及50%。到1700年亚洲和美洲商品的再出口约占英国出口贸易总量的30%，这还不包括西印度中转贸易中的无形输出。英国几乎同荷兰一样坚定地从事再出口和运输业。海外和殖民地贸易利益已成为国家利益，在欧洲它将由和平条约来规定，并通过武力来捍卫。

17世纪后半叶与亚洲贸易模式的显著变化导致如此引人注目的争论，这种变化主要是荷兰和英国的杰作。它们已经崛起，在贸易和军事力量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形失色。然而，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兴趣与其实力相称地在东方传播新教。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业的打击也是对商业所支撑的传教事业的打击，但是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国的传教士为弥补损失而辛勤努力。到17世纪末叶，罗马天主教在亚洲独占鳌头，因为荷兰和英国的推进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贸易公司进行，对它们来说攻击亚洲的宗教就意味着贸易的损失。相反，罗马天主教传教团经常得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持，在印度和菲律宾他们将相当多的收入供教会使用。欧洲的新教徒陷于相互攻讦或听命于漠不关心的君主，没有兴趣去过问国外的传教团。另一方面，反宗教改革的爪牙也都是传教的机构。自海路开通以来，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一直在亚洲传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塞廷会士和耶稣会士很快就将其活动扩展到海外。直到18世纪新教传教团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质量和生气，也无任何新教机构堪与作为传教训练和指导中心的教廷传信部，甚或与1658年成立于巴黎的海外传教会相提并论。对于150年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建立的拥有教堂、神学院、大学、医院、图书馆以及印刷所等财富的教会组织，新教徒们望尘莫及。1672年卡雷神父发现天主教社区中心无所不在；从波斯湾班德孔葡萄牙奥古斯丁会士的教堂、苏拉特的方济各会传教团、达曼的静修派教会、由印度一位世俗人士管理的美丽的马希姆教堂、巴塞因的多明我教会、塔纳的耶稣会办的学院、果阿的加尔默罗会教堂直到比焦利姆的塞廷会修道院。当穿过印度时，他看到戈尔孔达的教堂，东海岸圣索美（San Thome）的耶稣会会士和马德拉斯的方济各会士；在荷兰控制的马拉巴海岸，从奎隆向北，他发现大量处在耶稣会

神父或印度牧师管辖下的天主教社区。对于所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所及或者其国民作为私商、雇佣兵或海盗所深入的地区，其他旅行家提供了同样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在承认他们的职责是同异教徒布道的同时，倾向于把重心主要放在争取信天主教的土著改宗新教上，因为强大的天主教社区通过语言和宗教与葡萄牙人相联系，对荷兰人的霸权构成了政治威胁，这种威胁绝不亚于对真正信仰的公然冒犯。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锡兰西部和北部，所有社区都已接受了天主教，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设有相当多的由土地收入提供经费的天主教堂和学校。在马拉巴，除了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教堂外，大约47个叙利亚教会尊奉天主教信条。荷兰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从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赶走所有罗马天主教神父，并对窝藏者施以重罚。但是很多人从康提和马都拉的安全地带继续他们的布道，而奥拉托利会士约瑟夫·瓦滋还从果阿组织了一个赴锡兰传教团。第二个步骤是禁止使用葡萄牙语，命令人民学荷兰语。但迟至18世纪80年代一位马拉巴的荷兰指挥官还在抱怨说：“一个讲话无人明白的荷兰传教士的热情在马拉巴海岸怎么能够抵挡得住成千个具有必要的语言知识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奔忙。”^[6]到19世纪在锡兰的英国官员仍要学习西班牙语，到20世纪卡利卡特的印度基督徒还使用葡萄牙语做祈祷。

荷兰人只有当他们使用土著语言——泰米尔语或僧伽罗语，更远的东部为马来语——或者改编葡萄牙语的著作为其所用时才获得成功。他们掀起了一场运动，在很多学校中使用详细问答法以向儿童灌输新教教义，尽管其大部分效果被这些儿童家庭的影响所抵消。他们还将政府官员的录用和贸易许可证的发放限于新教的信仰者。有些诸如穆斯林的集团，其在宗教和经济方面的竞争特别令荷兰人恼怒，对于这样的集团他们则施以特殊的压力。但像在荷兰一样，宗教宽容而商业价值常常大于加尔文教徒的宗教热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确显示了不允许传教士们建立一个具有自己影响和利益的加尔文教会的决心。集权化传教管理、教会对学校的监督、与荷兰教会的直接联系，这一切均在禁止之列。传教士均属公司所雇用的人这一点是明确规定的。一当葡萄牙人的直接军事威胁减退之后不仅意大利加尔默罗会士，而且葡萄牙耶稣会士也允许进入荷兰领地。

英国人在亚洲几无领土且为葡萄牙的盟国，故而传教的必要性要小于荷兰人。他们向海外商站派遣牧师，但没有在土著中传播基督教。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 P. C. K）建立于1699年，国外地区传播福音会（S. P. G）建立于1701年，但直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传教士才有点值得注意的业绩。

新教在亚洲第一次真正的传教活动是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德伦格巴尔的丹麦路协教的传教。此事是1706年由布吕曹（Phutschau）和西根巴尔发起的，但到头来他们不是向丹麦的商站和要塞布道（尽管他们曾这样做过）而是使异教徒皈依。他们刻苦学习掌握了葡萄牙语，西根巴尔还精通泰米尔语。两人都准备在亚洲度其一生。他们曾在德意志的虔信宗的中心哈勒学习，正是通过哈勒的A. H. 弗兰克，他们的工作为世人知晓。弗兰克有着广泛的通信联系，他将他们的信函登载在哈勒的刊物《志报》上，利用这些信函所引起的兴趣为传教筹措资金。现在许多人们所熟悉的方法当时是煞费苦心的，例如布道信箱、挨户募集、布道演讲等。英国人的兴趣通过安妮女王的丹麦丈夫乔治的路德教牧师贝希姆（Bohme）而激发了出来，因而德伦格巴尔得到了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的资助。为更加同心协力地传播新教而努力进行的首次宣传鼓动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这预示着传教活动未来的重大发展。

然而，基督教在亚洲的新的传教活动主要不是来自新教国家，而是来自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天主教邦国。意大利加尔默罗会在印度德干建立了传教机构，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布道遍及中国的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和湖南。1660年，被任命为中国、东京（越南地名——译者注）和安南代理主教的法国海外布道会三位传教士受战争和气候所迫来到暹罗首都大城府。他们发现这里具有作为其传教团的中心的种种便利，于是花了25年的时间建起一座教堂、一所真正的神学院、若干教会学校以及一所附有门诊部的医院。他们与对暹罗宫廷有影响的希腊冒险家福尔肯的接触导致路易十四与暹罗互换使节并派出一支军事远征队，旨在使暹罗国王皈依并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1688年暹罗国王的去世和福尔肯的失势结束了法国和耶稣会与暹罗的联系，尽管海外布道会仍长期将暹罗作为其在东方的主要中心。海外布道会的一些传教士启程赴中国，但法国在华的传教活动主要来自路易十四所派出的耶稣会士。1688年，因其科学上的造诣而中选5位耶稣

会士抵达北京并受到皇帝的热情接待，而其葡萄牙同事对他们则相当冷漠。他们的队伍很快得到大大扩充，此后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科学和将中国介绍给欧洲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力量也进行了重新配置。1614年日本驱逐传教士，葡萄牙耶稣会士和他们的一些日本信徒转移到东京和交趾支那，在那里他们建立了相当规模的传教机构并成为宫廷数学家。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后来加入了耶稣会士的行列或在中国沿海省份建立了新的阵地。因荷兰占据马六甲而流离失所的其他传教士起初到达望加锡，然后来到索洛、弗洛勒斯和帝汶岛，在那里多明我会士及其信徒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荷兰人的袭击。圣何罗修道会在缅甸布道，塞廷会则看中了婆罗洲。

上述这一切成果不经冲突是无法取得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介入因教皇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特权而变得困难起来。两王室都肩负着在亚洲维持教会和发展信徒的责任，反过来他们被授予广泛的特权，这种特权实际上是把两国统治者对本国教会所行使的绝对控制权扩大到亚洲。无论它们原已减少的财力所承受的压力有多沉重，也无论它们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它们对亚洲各国所能进行的政治和商业控制，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小心翼翼地坚持其在东方传教的保护权。果阿和马尼拉的教会当局之间的争吵原就不可开交；当非伊比利亚的传教团出现在东方时矛盾变得复杂和尖锐了。法国传教团被看作对政治、商业和教会垄断的威胁。1612年教廷传信部的建立和派遣代理主教赴亚洲被当作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控制教会的挑战。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竭尽全力对罗马施加压力，力图防止教会“干涉者”抵达亚洲，对已抵达者则设法消除其影响。

有一位葡萄牙总督，即若昂·努内斯·达库尼亚，1668年曾狂妄地宣称，他将吊死任何未经葡萄牙王室批准而来到东方的主教。考虑到这种态度，1658年被分别任命为中国、东京和安南三地代理主教的三位法国海外布道会传教士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通往东方的难走的陆路以避开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区。1673年教皇克雷芒十世签署了一份敕书，言明三位主教不受果阿的大主教和异端裁判所的管辖。对此葡萄牙人设法与罗马讨价还价：可以承认代理主教的神圣权威，但他们须不是法国人。葡萄牙人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否则法国人就会成为“贸易的主人，原因在于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人与向他们布道

的人之间所必然形成的联系”。妥协没有达成，1717年进入葡属澳门的教皇使者铎罗根据来自果阿的命令被软禁至死。

有关管辖范围的问题由于教派之间的争夺而变得更为复杂。对于菲律宾，西班牙王室早就做出一宗一区的规定，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避免争执。在日本的耶稣会士抱怨马尼拉来的托钵修道会会士不顾王室敕令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后来还随他们来到中国。在孟加拉，当耶稣会士到那里开设传教据点时奥古斯丁会士表示抗议。然而，各派修道士又联合起来反对修道院外的土著教士的成长，并反对建立主教监督和巡视的通常程序。海外布道会的创建人则相信，只有当教区教士都是修道院外的教士并像他们的主教一样都出身自当地家族，亚洲的教会才能真正扎根并求得自身蓬勃的发展。他们还进一步相信，这样一种教士必须从修道院外的教士中产生，因为修道士总是保持对其教派的服从。菲律宾的情况确实正是这样，在那里大主教的要求或者王室的敕令都不能使各派修道士将某个教区的管辖交给修道院外的教士，尽管两所菲律宾大学培养出了许多合格的人才。海外布道会在其暹罗的大本营为暹罗和毗邻国家训练了不少土著教士。一位中国人被任命为代理主教。在印度，一位出身婆罗门的奥拉托利会士同样被任命为比贾普尔的代理主教，但这类任命数量极少且引起很多摩擦。事实上，欧洲人操纵和领导的各教派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种族偏见。它们制定严格的规则拒不承认欧亚混血儿。奥古斯丁会加斯帕神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大多数其他亚洲人是一群下等人，“确如格拉西安机智的评论那样，日本人是亚洲的西班牙人”。但是受到最猛烈攻击的是耶稣会士所使用的方式。人们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企图在亚洲的上层人士中谋取他们在欧洲所经常施加的那种影响。他们被指责利用这种影响反对其他教派并扩大其商业利益。上述批评不无根据。耶稣会士坚持在莫卧尔宫廷传教，他们希望布西神父与沙杰汉达拉·谢科之子——在他身上似乎体现了苏菲派神秘主义，有着与印度教和基督教类似的某种倾向的友谊会给他们在北印度的传教带来成功。在中国，同样的政策似乎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耶稣会士不仅挤进了一个长期以来对传教士封闭的国度，而且在中国政府中被擢升到显要地位。他们甚至以非常圆熟的手腕处理好由供职于明朝变为供职于清朝的棘手问题。1692年康熙皇帝公开宣称他欣赏他们给朝廷效力并容忍其宗教。但是这种政策的代价是高昂的，基督教的荣辱与统治者个人的成败与一朝一代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印度，1658年

达拉·谢科为坚定而虔诚的穆斯林奥朗则布所击败，这导致一段时间内北印度传教活动的迅速衰落。在日本，耶稣会士专门着眼于贵族圈子，这引起了幕府将军政治上的怀疑，而较为谦卑的托钵修道士在他们的活动中从不这样做。许多在中国和印度的最有才能的传教士因出任廷臣、天象观察官、绘图师，甚至画师和乐师而备受谴责。特别是当上满清官吏的耶稣会士，其模糊不清的地位遭到批评。耶稣会士本身内部意见分歧。1655年罗马教廷枢密院谴责汤若望神父接受参与修订皇历的职务；尽管1664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允许汤若望的后继者在钦天监工作，但从事历法——其最终作用是有关天文学的——工作的传教士的地位从来不是令人愉快的。

耶稣会士的其他传教方式甚至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耶稣会士早就感觉到需要学习东方的语言和文明，欧洲的先生们在亚洲被证明是聪明的学生。他们的学识使他们成为称职的廷臣，他们对亚洲社会的了解使他们意识到社会势力的力量。在南印度的马布赖，德·诺比利及其后继者在传教中认识到种姓制度的力量以及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与低等种姓的等同。葡萄牙人的食肉、酣饮和大吵大嚷的习惯使他们印上了低等种姓的标记，尽管他们一般并未与低等种姓的妇女通婚。耶稣会士试图消除印度人心目中的这种联想，他们不与该海岸地区的葡萄牙人来往，像令人尊敬的印度教遁世者那样生活以及注意素食和合乎礼仪的整洁这样的问题。他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吻合印度教所设想的一位宗教导师应予恪守的规矩，在外表上又是如此严格地模仿印度的社会习俗因而很快就招致他们是异端的非议。1704年派往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教皇使者铎罗就谴责了耶稣会士的入乡随俗的方式。

在中国，耶稣会士也寻求在外观上符合当地期望的一位教师或圣哲所应有的行为，尽管他们发现在中国人们尊重的是学问而不是禁欲主义。他们强调基督教教义与至贤先师孔子——其著作已被他们孜孜不倦地翻译过来——的训导是一致的。他们允许其信徒继续参加与祭孔和祭祖有关的仪式。这种态度与多明我会士的态度大相径庭，后者毫不让步地声称那些礼仪是偶像崇拜，结果导致他们被暂时赶出了中国。海外布道会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在它出版的“传教士通报”（1669年）中警告其成员不要以牺牲基督教教义去打通传教之路。

以上冲突还发展到了欧洲。多明我会士和耶稣会士先后将各自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上陈教皇。扬森派教士卷入了争论，旁查托（Pantchateau）猛烈攻击那种使基督教义适应中国思维习惯的做法。关于耶稣会士，他说：“他们在中国闭口不谈耶稣基督的贫穷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对多明我会士将耶稣受难像置于教堂的圣坛上甚为不满，因为他们说中国人厌恶他”。耶稣会士奋起反击，1699年他们从康熙皇帝那里获得一份圣谕，上称祭祖和祭孔如耶稣会士所说的那样纯粹是非宗教性质的。但异教皇帝的裁决难以一锤定音。1703年铎罗被派去调查，1707年他判定那些礼仪是偶像崇拜并加以谴责。尽管由此而引起中国的敌视，并且后来导致压制和迫害基督徒，但是这位使者的谴责又为1715年教皇的《自该日》通谕所加强，教皇要求所有传教士有义务宣誓服从该通谕里毫不含糊的规定。

在亚洲的传教激起了就马拉巴和中国礼仪问题而展开的敌对和冲突，尽管这起初发生在教会内部，最终却通过大量出版物交给了大众评判。但是，与东方的联系也有着较少不祥色彩的副产品。新物产、新工艺、新设计和新的艺术形式大量涌入。如果说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话，那么其直接后果却是鼓励了瓷杯和瓷茶壶的使用，它们的制作原料和设计均受到称赞。1700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就带回英国146748件瓷器，其中有那些玛丽女王在旅居海牙期间就已大感兴趣的小巧玲珑的瓷塑像和瓷花瓶。而当1710年迈森获得成功时——在威尼斯和代尔夫特青花器皿的制造业已失败的基础上生产出第一批真正的欧洲瓷器——它所利用的仍然是中国和日本使其流行的花纹图案。

如果说“瓷器”逐渐欧洲化，那么漆器也是如此。法国宫廷的财产目录和船货清单表明，大量的漆柜、漆桌、漆盘以及扇形漆器家具是从国外进口的。但到该世纪末，有关自行制作的手册已在出售，伯明翰和巴黎生产出精美的漆器，它们“模仿日本的风格”，绘有典型的花鸟图案。

东方纺织品的引进也使得欧洲接受了新颖的彩色图案和设计。随着欧洲人眼光的逐渐适应，原先一味追求的深暗色彩让位于更为鲜明的色彩。擦光印花布和丝绸衣料因其高雅的东方情调而备受青睐。在17世纪80年代那些繁荣的年头里，英国代理商的原则就是购买“所有新颖、华丽或别致的商品”。然而，人们对“举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时

新纺织品”的兴趣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衣料上，对其他纺织品各公司宁愿使用印度传统的设计以适合英国人的胃口。（荷兰代理商丹尼尔·哈瓦特认为，科罗曼德尔的工匠太笨，除了模仿别无能耐）1677年英国从孟加拉订购丝绒时同时送去“为指导织工而绘在纸上的图案”，印度和西欧之间经常交换样品和图样。

因此，欧洲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风格的变化，而这种情形有时又对生产者的审美观产生长期的影响，譬如中国的瓷器就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英国绒线绣床帏的刺绣图案取自印度的纺织品，但也一直有人提出英国人为印度纺织品提供了图样，而他们的东方情调又源于更早阶段中国对欧洲的影响。^[7]因此在18世纪当设计图样由印度送往中国进行模仿时，广州的工匠得到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被一改再改而面目全非的图案。

对东方风物的兴趣也反映在宝塔、突出的屋檐以及某些欧洲建筑的亭式设计之中。如勒孔特（Le Comte）或肯普弗所描述和艾迪逊所喜爱的那样，房屋内部的装饰模仿中国贴上墙纸，室外花园带有中国和日本园林理论的痕迹。在这些花园里人们可以容易地发现像阿勒颇松、白桑树、紫丁香和木槿属植物这样的从亚洲引进的树和灌木。

这一时期所引进的其他东西可能要比在美学上有吸引力的事物更为实用：蓖麻、野生香泻树、罗望子树、菝葜、芦荟以及圆荚肉桂。无论是有所用途还是美艳动人，它们是所涌入的植物新品种的一部分，这股名副其实的大潮刺激了欧洲植物学的研究。1678—1703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H. A. 范·雷代·托特·德拉肯斯泰因总督撰写的12卷《马拉巴植物志》，内附印度画师所绘实物大小的花卉、水果和种子插图1784幅。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位医生保罗·赫尔曼从锡兰的植物中提取有关物质并每年送回国内标本材料、植物和种子，当他当上莱顿大学植物园主任时就种植观察它们以研究其药性。G. E. 伦菲乌斯1652—1701年在东方为荷兰效力期间，曾就此为他身后出版的不朽著作《安汶岛植物志》^[8]准备了材料；而德国医生和植物学家肯鲁弗则利用在长琦港出岛（Dcshima）荷兰商站的逗留期间考察了日本的植物。荷兰出版的植物学著作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但欧洲遍地都有其他观察敏锐的植物学家在从事研究工作。负责巴黎御花园（现为植物园）的图尔纳福尔作了多次著名的中东考察之行，当攀上阿拉拉特山时他发现高度与纬度一样对植物的分布有着影响。詹姆斯·佩蒂

弗按照他的指导所收集的材料，为《皇家学会哲学会刊》提出了关于马德拉斯植物的若干论述。

做这些工作的不止才华横溢的业余爱好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定期将有关材料从巴达维亚送回荷兰的试验室和药物园。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合作撰写了一部植物史巨著。植物材料搜集的不断增加促进学者为分类谋求一个科学基础，这种科学基础是——在R. J. 卡梅拉里乌斯发现花卉的特性和博洛尼亚的马尔皮基把比较分析法应用到植物学之后——由林耐首次奠定的。从动物学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影响。亚洲对收集者和观察者的开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个人和大公司带回奇异的野生动物或所收集的蛋、骨架和皮。例如，1681年伊夫林要求旅行者向皇家学会报告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收集品中具有特色的是所有各类的动物和昆虫。”莫卧尔帝国属下印度的山猫和鹿被饲养于圣詹姆斯公园，鹈鹕、印度鹅和马来亚的食火鸡被收养在伯德凯奇禽鸟场。凡尔赛的动物园饲养了大象和其他外国动物，佩罗根据新的比较分析法对它们进行了解剖和分类。

地理学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如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从事的那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进行了航海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公司留驻阿姆斯特丹的绘图专家向航海家提供海图并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校正，巴达维亚的舵手则送回国他们的观察材料“以免丢失经长期努力才收集到的大量数据”。科尔培尔既为实际利益又为纯科学研究而设立的皇家科学院派出地理远征队，其考察结果于1693年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敦请领港协会负责人发文，要求船长们提供地理、气象和天文学资料。用这种方法，培根和笛卡儿的合作研究才有望得以实现。

处于贸易主航道上的那些亚洲地区逐渐得到大量记载，但纯科学的探险几乎不存在。除了为马尼拉帆船所利用来往返阿卡普尔科的狭窄的贸易信风带以外，太平洋地区仍然没有受到勘查。1638年日本对除了受到严密监视的荷兰人之外的所有外国人实行闭关，这留下了有关日本北方列岛状况和堪察加与鞑靼和美洲之间关系的不解之谜。对于亚洲内陆的了解，除了商人经常光顾的港口和集市外，欧洲主要依靠传教士。耶稣会士的科学素养在这方面被证明是难以估价的。1655年卫匡国（Martin Maitini）主要根据中国的资料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格吕贝尔和德奥维尔从北京经青海到拉萨，之后经加德满都到阿

格拉的旅行途中收集到更多的资料，它们被发表在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插图本中国概况》上。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Gerbillon）旅行抵达黑龙江，1696年和1698年又陪同中国官员参加蒙古族“部落大会”。从这些远行中他带回不少得自天象观察的方位资料，并有从俄国商人那里收集来的有关贝加尔湖的资料。

耶稣会士的一项主要地理学工作是根据皇帝旨意使用科学方法绘制中国地图。该工作开始于1707年，他们沿着1500英里的长城进行测量和确定方位。然后工作移到朝鲜四境——它最终被鉴定为是亚洲的一个半岛，接着进入东部省份，最后到了云南。关于西藏资料是第二手的，得自经特殊训练的喇嘛。这项工作结束于1717年，与早先的资料综合起来构成了首次在北京绘制地图的基础，1735年发表于巴黎德昂维尔（d'Anville）的地图集中。1688年在黑龙江畔的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译者注）一直在迅速推进越过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与效力于中国的耶稣会士相会合。欧洲人通过海路和陆路深入亚洲的过程至此完成。尽管俄国的材料是粗糙的，而且是信手拈来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是由远至太平洋沿岸做皮毛生意的哥萨克所提供的，但它们最终使完整地绘制亚洲地图成为可能。

在绘制亚洲地图的同时，欧洲对绘入地图的这片土地表现出不能满足的好奇。商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市场和贸易路线、运转的度量衡和货币等一大堆情况。就像林索登对以前的世代做出了贡献，塔韦尼耶的著作《航海》提供了有关商品和贸易的丰富材料对现今的世代做出了贡献。其他人的好奇是空想旅行家的好奇。对于因廉价印刷品而产生的新兴中产阶级读者群来说，他们可以不断地获得《旅行记》和《环球航行》（丹皮尔、卡雷里和安深所作）之类的读物，它们或是单独一卷或是鸿篇巨制，常常附有大量插图。

许多游记仅仅提供了有关亚洲的老生常谈和极为肤浅的记述，它们是那些并非通晓当地语言的人从港口和市场上道听途说得来的。但也有一些旅行家以更为广泛的兴趣和更为科学的态度对亚洲作了介绍。夏尔丹百是一个服务于波斯国王宫廷多年的珠宝商，他了解当地风情，带有感情地撰写了有关波斯的文字。贝尼耶充分利用他为一位莫卧尔显要贵族效力的机会，而诺克斯则利用被监禁在康提的机会写下了《锡兰岛的历史联系》一书（1681年）。另外还有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荷兰半官方著作，它们的作者长期在亚洲工作，这使他们能够

同时利用东印度公司和土著的资料，例如巴尔道斯（Baldacus）有关马拉巴和锡兰的著作，哈瓦特有关科罗曼德尔的著作，以及那位记述安汶岛植物的博学多闻的伦菲乌斯有关各岛屿历史和民族的著作。

将亚洲介绍给欧洲的还有传教士，在某些方面他们最有资格担负此项任务。他们在亚洲终其一生。他们常常是优秀的语言学家，编写词典和语法，大量地进行翻译，为丰富的藏书而广泛地搜求典籍。他们还接触了当地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当法国传教士科学家在北京的宫廷忙碌的时候，葡萄牙耶稣会士则在乡村腹地奔波——但他们仍抽出时间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和沙俄帝国科学院进行通信联系。如果说他们天生就有偏见的話，那么也远不如安深明显，此人将狡诈和欺骗说成是东方人独有的行为。

所有的传教团体都刊布了传教报告以激起人们对其工作的兴趣。耶稣会士发表得最多并且最有技巧。来自其传教士的书信集每年以多种文字刊布。另外还有特别报告，例如由阿格拉学院院长博特略所撰的有关莫卧尔帝国的报告，以及历史著作，例如德·梭扎所撰、1710年在里斯本出版的《耶稣基督所征服的东方》。所有这类作品中最为流行和最有影响的是1702年开始出版的《有益而奇妙的书信》（*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它是一部有关亚洲资料的最新百科全书，穿插以润色过的逸闻趣事。

通过这些书信集、游记、大量见多识广的私人往来信函以及1665年后通过学术性杂志，欧洲认识到了与自己一样重要的亚洲文明的存在，它具有另一种历史、社会结构和宗教。如哈瓦特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人的优越感不得不逐渐让位于差异的概论。

由于阿拉伯语对圣经研究和利凡特贸易的重要性——牛津大学第一位劳德讲座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科克就效力于阿勒颇的利凡特公司——该语言首先得到研究，伊斯兰文明也成为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的第一种文明。由其自身的资料展示出来的伊斯兰世界受到更为同情的看待，所以剑桥大学的西蒙·奥克莱甚至强调起西方受惠于它的种种。夏尔丹对于灿烂的波斯文明的描述、海德关于其宗教名胜古迹的著述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新印象。

尽管对莫卧尔帝国还算清楚，但对印度的了解还是要少一些，因为了解其伟大的关键在于懂梵文。但是在北印度的商人和传教士使用

的是波斯语，在南印度使用的是泰米尔语、孔坎语或其他一些方言。直到18世纪30年代马杜赖的传教团才得到梵文手稿，而直到该世纪末才被读懂。因此，对于印度宗教和哲学的任何了解都不得不借助于本地方言的诠释和摘要而获得。令人惊异的是，荷兰牧师亚伯拉罕·罗杰斯、贝尼耶、传教士卡尔梅特和庞斯竟能穿透繁缛的印度教礼仪和迷信活动的外表，深入了解吠陀和往世书以及印度教哲学的主要流派。

然而，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又令人不安的。有关它的信息，学术性的或普通的，大量涌进欧洲。像曾德昭（1667年）和阿弗利尔（1692年）所撰的记叙作品（他们的著作在12年内出了3个法文版本以及英文、荷兰文和德文的译本）、历史著作、年代表、有关中国科学的描述以及耶稣会士的儒学著作译本蜂拥而至。旅行家们详细描述了中国城市的富裕繁华和人口密集，传教士则强调中国道德和行政管理的出类拔萃和古朴风雅。但如果说波斯或埃及文明还能与类似的欧洲古典社会和圣经世界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则是截然不同和陌生的。远在天边而又自给自足的中国，其人民和语言是对欧洲人所遵从的一元论概念的挑战。对中国的研究使得对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起源建立某种新认识成为必要，使得对公认的宗教信条提出许多质疑，并为欧洲的不满现状者提供了全新的社会模式。

在公认的历史正被怀疑所动摇的欧洲，只有拉丁文圣经^[9]地道的年代记曾有望叫人确信一些事情。埃及和亚述有点勉强地被包含在年代记里，但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其编年史连绵不断，而其起源可远溯至大洪水时代以前。这是一个支持佩莱尔的异端邪说的能单独成立的证据，佩莱尔认为亚当只不过是犹太人的祖先，而大洪水仅仅为地方性事件。利用希腊文旧约圣约可能会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关时间范围和地球年龄的概念被大大地改变了。

如果说世界要更为古老，那么它也更为广袤，不再局限于波舒哀的《世界史教程》^[10]所说的狭窄范围之内了。由于人类同源的一元论概念很难消失，人们仍然努力去寻找人类及其文明的共同起源，如果发源地不是在犹太人那里，那么可能是在埃及。但是，亚洲种族多样化的情况表明，文明可能不是注定存在的，而是地方环境的自发产物。夏尔丹认为，各国的气候是人们的偏好和习惯产生的主要原因。帕雷宁报告说中国人相信“水土”的影响。这些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理

和气候对于人类的影响感兴趣的开始。此外，寻找语言的同一性——莱布尼茨认为汉语可能是世界语言之母——确实产生了某些积极的成果。1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研究导致像拉斐伦吉乌斯和埃利希曼这样的学者注意到波斯语与希腊语和德语的相似性。该世纪下半叶赫伯特·德·雅各尔辨认出爪哇语中的梵文和泰米尔外来语，乌特勒支的莱兰德注意到太平洋岛屿、马来群岛以及马达加斯加的许多语言源于同样的马来语词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因此而发端。

中国引起的宗教问题甚至更为深刻。对其职责有着可以理解的热情的耶稣会士描绘出一幅有关中国人的鲜明的图画：他们道德高尚，尊礼守法，这尤其给舆论留下深刻印象。在孔子的学说中——对它进行攻击是不明智的，他们发现中国人崇拜真正的上帝的明显痕迹。1688年奥尔良公爵问道：“读到孔子出色的伦理道德学说，能不相信他就是一位基督教徒吗？”不知道基督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基督徒境界，在印度，西根巴尔就印度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翻译了某些泰米尔语著作，特别以此来表明“在多大程度上一位甚至没有《圣经》的异教徒通过其天资能获得有关道德法则的知识”。耶稣会士勒孔特声称有过这样的时刻，中国人已在实践极纯的道德学说，其余的世界则仍处于邪恶和腐败之中。然而这一观点在1700年遭到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注）的正式谴责，多明我会士证明儒家道德属于无神论的道德，教皇也将中国的有关礼仪斥责为偶像崇拜。在欧洲多明我会士和扬森会士与耶稣会士之间展开的冲突同样也在中国发生，即托马斯主义和莫林那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尊奉得救预定论和仰赖上帝慈悲的信念与恪守道德法则的异教徒也能得救的信念之间的冲突。过去对耶稣会士行为放荡的指责又闹到了国内。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如勒孔特所担心的那样，有人得出结论说，没有宗教的帮助一个庞大的帝国也能繁荣，一个民族也能尊礼守法。作为人类经验和理性的实践总结的道德产生出值得赞赏的政治硕果。在中国理性时代早已到来。当看到孔子如何“使君权为哲学所约束，使暴力温顺地服从于理性”^[11]时，启蒙思想家感到兴高采烈。其他人在亚洲也发现了有教益的楷模，皮埃尔·培尔并未忘记将路易十四的不容异端与康熙皇帝的宗教宽容作了比较，而孟德斯鸠也对宽容怎样在亚洲盛行的现象作了评价。沃邦发现，中国的全国人口普查可作为改进法国经济管理的一种方法。贝尼耶发现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可作

为君主们的教科书，而中国政府就是他所希冀的欧洲开明专制统治的样板。在印度，他注意到缺少强大的地主的重要影响。已在忙于对本洲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的欧洲就这样也从亚洲汲取了各种经验。

中国以及亚洲其他的国家和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较小程度上左右欧洲人的思想，就在于这种比较的可能性。它们提供了人们所向往和要求的样板，提供了在当时尚无法安然无恙地表达出来的思想，也就是为欧洲新的观念提供了外部根据。它们的多样性和陌生感刺激了调查和探究。它们所提供的答案既充分又带有危险性。讽刺作品选择虚构的航海作为其所喜爱的手法，借土耳其、波斯或中国人之口说出作者最严厉的批评，这样做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亚洲给予欧洲人新颖的服饰、新的风格以及植物新品种，也使他们了解了某种新鲜而古朴的风俗习惯和新视野。

二 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欧洲在亚洲最强大的组织。该公司的力量基础在于它的海权，但就陆地而言，它在亚洲的活动中心是西爪哇的巴达维亚。从巴达维亚和马六甲要塞（1641年从葡萄牙人那里夺得）荷兰人能够控制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以及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海域，这里是从印度洋到东方，或者从摩鹿加或中国海到西方的船舶的必经之地。以该中心为依托，荷兰人得以阻止其葡萄牙和英国竞争者维持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任何重要的贸易联系，而他们自己却可以稳固地发展由从日本延伸到波斯的商站构成的商业体系。在公司雇员看来，这一商业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摩鹿加群岛，即传奇般的“香料之岛”。公司对班达群岛的控制使它垄断了肉豆蔻及其副产品肉豆蔻干皮的供应，安汶、塞兰岛及其在摩鹿加群岛南部的毗邻之地向公司大量提供丁香。在摩鹿加群岛北部，荷兰人或者通过与德那地苏丹达成协议，或者进行惩罚性的军事征伐，设法在他们尚未去开发的岛屿上禁止种植丁香以便获得对该产品的有效垄断。到1656年最为雄心勃勃的远征已告结束，德那地苏丹臣服于公司，公司对丁香生产的控制也许可以说是富有成效了，但它对摩鹿加群岛北部的控制直到1663年才完成，其时西班牙从蒂多雷岛上撤走了它的卫戍部队，岛上的苏丹失去了保护。荷兰人所牢固控制的另一个“香料之岛”是锡兰。在这里他们打着康提国王辛哈的盟友的旗号，约于1658年把葡萄牙人从他们的所有沿海要塞中赶了出去，并无视与康提统治者的协议而擅自占据了最重要的地方。占领加勒、科伦坡和尼甘布造成了他们控制锡兰西南肉桂丰产区的既成事实，而他们与辛哈国王的协议使他们获得了该海岸对外贸易的垄断权。

17世纪中叶，或者通过强行割让，或者通过武力占领，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对其他一些地区进行政治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有好望角（1652年殖民化，作为通往欧洲海路上的停靠港）；中国台湾北部沿海的一个设防商站（建于1624年），从这里可以开拓与中国的贸易；以及南印度原先为葡萄牙人所控制的港口杜蒂科林和那伽钵亶，荷兰人分别于1657年和1658年占领该两港以防止葡萄牙人对锡兰发动反

攻。然而，总的来看，除香料垄断地区以外，荷兰的控制范围并不是这一类带有政治控制性的，而是建立于亚洲独立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一些商站。例如所谓“摩鹿加群岛的左臂”的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10个商站，它们供应的布匹可用以代替金银，作为交换媒介从苏门答腊和西爪哇购买胡椒。在布利格德——该地在那伽钵亶被占领前一直是这一带海岸各商站的大本营，荷兰人筑起要塞以防止葡萄牙人的袭击，所有商站都在某种程度上设防以进行自卫。但是，尽管在某些地方荷兰代理商付出年租金以取得对他们所居住城镇的管理权，但荷兰人的治理从未扩大到内地。他们没有控制纺织品生产地区，他们的地位最终还是依赖当地统治者的善意。这在孟加拉的胡格利河、西印度的古吉拉特尤其如此。这两个地区都处在莫卧尔帝国疆界内，所以政治上独立于它是根本不可能的，生意尽管兴隆，但如果当地总督的财政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随时都可能被中止。同样，设在穆哈的阿拉伯咖啡商站和波斯的丝绸商站以及设在东南亚大陆诸国的一些小商站也是如此。但是，在政治不利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商业利益的最典型的例证是设在日本的商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活动吓坏了日本政府，它禁止日本与外部世界的所有交往，在这之后唯一被允许进入日本的只有荷兰人。1639年以后荷兰代理商的活动被限于长崎附近的小岛，即出岛，允许停靠的船舶数量也受到严格控制。

同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地位与荷兰公司相比要远为一般。由于没有资金或者不想去追求以海上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商业垄断政策，它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对付荷兰人的敌视也迄无进展，1628年后它在那里唯一的落脚点是设在西爪哇万丹的一个商站，该地的统治者是反对荷兰人的。公司在印度东海岸和孟加拉的商站尽管有其商业上的重要性，但数量远远少于其荷兰竞争者。像该地区荷兰人的商站一样，它们的建立最初是为了向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市场提供布匹，直到1652年才从万丹加以管理。此后，东部管区的首府设在马德拉斯，公司被允许在此修筑城堡，即圣乔治堡，并对该城行使行政控制权，作为交换将海关收入的一半缴付戈尔孔达国王。然而这一时期的公司的主要努力集中在印度西海岸，17世纪初叶它在这里得以在商业上树立相对有利的地位，而荷兰人的努力则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英国的主要商站设在古吉拉特的苏拉特，但英国人也在内陆艾哈迈德巴德、布罗奇和阿格拉建立起贸易中心。作为1622年与伊朗国王联合驱逐霍尔木兹岛上的葡萄牙人的回报，英国人获得在波斯港口冈布龙落

脚的特许，免征通行税。这就使他们能够开展波斯和印度西部之间有利可图的易货贸易。他们在该地区的贸易由于苏拉特商站经理政治上的主动性而得到长足发展，此人1635年与葡萄牙驻果阿总督达成一项地方性谅解。东印度不包括在1630年英国与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签订的和约之中，但是1635年协定（由1642年英葡条约所扩充并由1654年克伦威尔所签订的条约所确认）不仅给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在东方带来了和平，而且向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开放了除澳门以外的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由于除了与联合省进行战争时不再需要护航，公司因此能够利用当地的小船发展“西部地区”（此为荷兰人对印度和波斯海域的称呼）的转口贸易；不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有着自己供应来源的荷兰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能开拓马拉巴海岸的胡椒和其他产品的贸易。

到17世纪中叶荷兰和英国各自的公司亚洲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不同也许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各自的母国组织的差异与它们在荷兰和英国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差异。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先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霍伦、恩克赫伊鲁、鹿特丹代尔夫特以及米德尔堡等六家公司的联合体。这些有关公司作为分公司仍然存在并派代表参加董事会，该董事会为公司安排常设中央管理机构。公司的资金来自尼德兰所有的商业中心。它最初的资本大约为650万盾，几乎十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创时的资本。各分公司和总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是各城市统治家族的成员。因此，公司的中央指令有分量，能对个体股东施加支配性影响。同时，公司通过私人关系与政界联系密切，它是该国在亚洲名副其实的代表。它获得的特许状除了给它好望角以东贸易的国家垄断权外，还授予它与亚洲国家签订条约、享有全部主权的占据领土、修筑要塞、征募军队以及发动战争的权利。董事们的地位是如此牢固以致他们能动用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和利润在亚洲进行政治性的固定投资，而不用担心个体股东的挑战，这些股东不能审查公司的账目。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17世纪初根据皇家特许建立起来的，特许状授予“总督和进入东印度贸易的伦敦商业公司”以好望角以东贸易的国家垄断权与购买土地、起诉和被起诉以及使用一枚印玺的权利。然而，该公司并不拥有其荷兰对手所拥有的广泛的军事和外交权力，它的特许状效力不能扩大到与英国国王和睦相处的其他基督教君主所占

据的地区，除非它受到特别邀请去那里做生意；它与英国政府也没有紧密的联系。斯图亚特王朝的对外政策经常与公司的利益相左，1635年当需要用钱时，查理一世将在公司垄断区域内的贸易许可证授予另一家敌对的商业辛迪加。公司的事务由总裁、副总裁、司库以及24名“委员”即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处理，这些董事每年在全体股东大会上选出，但公司在它存在的前半个世纪中没有固定资本。公司成员投资于一系列海运或合股项目，每一项逐次完成，资金和利润也逐次分掉。经营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由于总裁和“委员”们都是大股东，他们的命运依赖于东方商品的销售和再出口，而且他们年年当选。1653年他们所拥有的股份比400个小投资者加在一起还多。然而，他们的权力仍然受到限制，因为所有的股东，不管其投资多少，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是平等的。大多数小股东除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外对公司的活动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将总裁和“委员”看作代表而不是经理人员。这些董事因而不得不顶住分红的压力，以便他们能筹措资金对公司设在亚洲的商站进行固定投资，在亏损的年头也能使贸易维持下去。他们的困难因内战造成的混乱和前途难卜而大大加深。然而，1657年10月奥利弗·克伦威尔授予公司的特许状标志着其命运的转折。它使一个长期性合股公司第一次建立了起来，每一股东根据其持股比例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相应的投票权，通过这一方式公司官员和大股东取得了对小股东的支配权。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颁布的特许状使增强公司实力和稳定性的这些因素永久化了。通过与宫廷紧密的私人联系和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对外政策，公司的地位得到大大加强。1660年以后，英国公司执行贸易政策连续性的能力与荷兰公司不相上下。

就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言，1660—1684年是它的兴盛巩固时期，在此期间大都是以战争为推行政策的手段。公司的董事关心利润甚于获得领土，他们尽可能设法将其权力限制在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一最小范围内，避免卷入亚洲国家内部的冲突。但是部分因为当地政治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部分因为他们坚持垄断和消灭当地对手，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候荷兰人不得不用武力来扩大其势力。首先他们从新获得的锡兰一些基地出发，将他们在印度洋的竞争者葡萄牙人打击得毫无招架之力。从1636年起，他们断断续续地对葡萄牙人的大本营果阿进行封锁。1661年他们派遣由里伊科弗·范·贡斯指挥的一支舰队进攻马拉巴海岸的葡属港口，夺取了奎隆和克朗干努尔两

城，尽管他们未能夺取葡萄牙人在科钦的主要地位。同年葡萄牙和荷兰在欧洲签订和约，如果该和约能获得迅速批准，科钦或许还能得到拯救。然而，这一谈判因葡萄牙的盟友查理二世的干涉而被耽搁，他不情愿看到荷兰人获得英国人根据1635年协议在葡属殖民地所享有的贸易特权。和约直到1662年才获得批准，而直到数月后有关官方消息才到达东方。这一延宕造成了科钦的命运。1661年9月，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巴达维亚驶向马拉巴海岸，在经受了数次攻击之后，1663年1月该城陷落。随后对坎纳诺尔的占领完成了对葡属各港口的征服，这些港口交由锡兰总督管辖，从而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得以实际垄断该地区的胡椒生产。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荷兰人在摩鹿加以外的地位依赖于与当地统治者所签订的商务条约，那些统治者给予公司各种进出口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垄断权。然而也有一些印度尼西亚有实力的贸易中心不肯默认这种状况，荷兰人便处心积虑削弱他们的影响。这些贸易中心之一是坐落在苏门答腊北端的亚齐苏丹国。这个国家是该地区伊斯兰教影响和贸易的主要中心，并对马来半岛西侧的产锡国霹雳和苏门答腊西海岸的胡椒产区拥有宗主权。1637—1659年公司与亚齐签订了一系列商务条约，获得了胡椒出口的垄断权并分享了霹雳锡的出口，但是这些条约未能得到遵守，尽管荷兰人的经常性封锁防止了这些货物出售给其他客商。有鉴于此，荷兰人在1660年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他们在苏门答腊的西海岸若干港口建立行政机构，鼓励马来居民摆脱亚齐人的控制。1663年帕伊南条约导致荷兰公司对巴东、蒂古和因德拉普拉进行保护以换取对贸易的垄断，到1670年亚齐人被从因德拉普拉沿岸驱赶回其本国境内。同时荷兰海岸的巡航和在霹雳河口附近的天定岛上荷兰要塞的修筑有效地使亚齐人再也不能染指锡的贸易。同一时期荷兰公司还巩固了它在苏门答腊西海岸的地位。巴东周围“被保护”地区的反抗遭到了镇压，所利用的是安汶和布吉斯的雇佣兵。在公司驻该地区代理人雅各布·皮茨的怂恿下，公司委任巴东高原米南加保人的一位头领为米南加保国的统治者，接着承认他为西海岸所有其他小国的君主，反过来荷兰人在那里的贸易得到确认并获得巴东周围的一片领土，后来公司在西苏门答腊的大本营就设于此。

此时一股对荷兰商业优势比亚齐更为危险的威胁正在发展，那就是西里伯斯西南的望加锡苏丹国。在摩鹿加诸统治者的独立被镇压之

下去之后，望加锡成了这一海域穆斯林势力最重要的中心，它也被印度尼西亚人用作从毗邻出产香料的岛屿走私丁香的基地。它还是英国人、丹麦人和葡萄牙人等其他欧洲人的活动中心，荷兰人一律视之为不速之客。1653年和1660年望加锡和荷兰发生冲突，其统治者企图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组成反荷联盟，并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欲与英国公司携手，这最终决定了马策伊克（荷兰总督，1653—1678年）发动对望加锡的征服战争。1666—1668年年轻的科内利斯·斯佩尔曼指挥了这场战争。彭加条约（1668年11月）使苏丹的权力缩小到仅管辖望加锡城及其郊区。它先前在此范围以外的领土以及属国坡尼、布通和松巴哇均落入荷兰宗主权之内。在望加锡本地，公司强制行使其贸易垄断权，驱赶所有非荷兰欧洲人，宣布其铸币为合法货币，并在城中心建起要塞“鹿特丹”。考虑到以上条款的苛刻性，无怪乎在条约得到实施前还要进行一次征战。

亚齐和望加锡归附以后，公司的权利扩展到爪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打蓝和万丹的政治不稳定所引起的。16世纪末马打蓝国由一位王公所建立，将爪哇中部和东部大部分高原和丰饶的平原以及北海岸原先独立的港口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年轻的皇帝阿莽古拉特一世（1645年登基）继承其祖先的事业，对这一广袤的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并削弱地方首领的权力和穆斯林阿訇的影响。但他的垄断措施特别引起北海岸半独立国家君主的敌意，1674年他们在马都拉的统治者特鲁纳耶约的领导下起来反抗。1669年被斯佩尔曼从望加锡赶出去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受到荷兰人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陷于困境的鼓舞，他们希望利用这场运动打击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势力。同一时期，西爪哇万丹的阿甫杜尔法达·阿根想方设法从其邻居的麻烦中得到好处，占领了巴达维亚以南和以东的马打蓝西部省份。阿甫杜尔法达（1651—1683年在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强劲对手，其首都是欧洲人和穆斯林商人的活动中心，他与麦加和土耳其的联系使他成为穆斯林反荷舆论的当然领袖。荷兰人自然因其大本营有为万丹的领土所包围之虞而感到直接的威胁。尽管荷兰人占领了苏腊巴亚，海军采取了行动——此二者都旨在阻止给予叛乱者以供应和增援，但是1677年阿莽古拉特一世最终被推翻一事还是在公司官员中引起意见分歧。里伊科弗·范·贡斯和斯佩尔曼都赞成干涉并在爪哇建立公司的支配权，马策伊克不赞成，他年龄较大，关心维护在荷兰董事中所享有的小心谨慎和善于经济管理的声誉。由于阿莽古拉特

的儿子前来避难，答应做出商业和领土让步以换取荷兰的支持，争论尖锐化了。1678年1月马策伊克的去世最终解决了问题。范·贡斯和斯佩尔曼先后继任为总督（分别为1678—1681年和1681—1684年），他们主持推行了他们所一直赞成的政策。在范·贡斯的指挥下，特鲁纳耶约的叛乱遭到镇压，阿莽古拉特二世重新登上其父的王位。1682年斯佩尔曼利用万丹的王朝冲突废黜了苏丹阿甫杜尔法达，并使其子、以哈只苏丹闻名的阿甫杜尔哈尔替代他为王。这两位新统治者都依赖荷兰人的支持，并对荷兰公司将他们扶上王位而付出战争代价感恩戴德。在公司这方面，它获得了爪哇对外贸易的实际垄断权，驱逐了所有其他欧洲人，包括关闭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万丹的商站。同时荷兰公司还割取芝沙丹尼河地区，该地区从巴达维亚向南穿过爪哇直抵大海，并将马打蓝和万丹分开。公司还将港口三宝垄和井里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从1684年始，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遂无任何重要对手，他们摧毁了所有重要的独立贸易中心，处在能对爪哇诸国进行控制的地位。虽然荷兰人一直不是任何大片土地的直接统治者，但从该年起我们似可正确地称这一地区为“荷属东印度”。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绝对优势之日，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开始陷于危机之时。1660年后的若干年中，英国设在印度的商站和殖民地数目不断增加，出现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苏拉特和马德拉斯这些中心地区得到巩固，而且也反映于孟加拉商站贸易的发展，以及在马拉尼海岸地区一些殖民地建立了起来以重开胡椒贸易，该贸易因葡萄牙人所控制的港口落入荷兰人之手而一度中断。然而，公司最重要的收获是孟买岛。该岛最初在1661年作为与葡萄牙联姻协议中的一部分落入查理二世之手，但国王发现它无利可图。1662年派出的皇家卫戍部队实际上直到1665年才控制该岛，这时因染病卫戍部队的士兵从500人减少到102人，因而1668年查理二世高兴地将它交与东印度公司以换取每年10英镑的代役税。孟买的潜在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作为印度西洋岸贸易和船运中心具有优越地位，而且在于它不从属于任何印度邦国的控制或不在地方省长的管辖范围之内，易于防御陆路的进攻。它被交由苏拉特控制，主要由于杰拉尔德·昂吉尔（苏拉特管区负责人）的努力，它很快成为一块兴旺的居留地。那里建立的造币厂所制造的硬币在整个西印度迅速赢得普遍接受；尽管疾病流行，其人口到1671年仍上升到6万，公司官员已习惯地称呼它为“殖民地”。然而，公司为获得孟买而与王室发生的联系不

无令人困窘之处。各商站中来得较早的清教徒和1660年以后派来的保皇党高级职员之间泾渭分明，或者这一时期通常能得到各殖民地许多英王官员的支持。两派之间和军政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结果印度和圣赫勒拿（该岛1673年作为停靠港被长期占据）发生多次叛乱，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在叛乱中力图以国王的名义接管政府。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一次的叛乱是1683年和1684年孟买的军事指挥官理查德·凯格温所领导的叛乱。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查理二世信守诺言支持公司当局，并对不满分子施加影响以使他们俯首帖耳。

军人也要求在印度商站有关事务的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企图反映了军事因素对维持公司在印度的地位之重要性与日俱增。例如，昂吉尔不得不去维护西海岸殖民地的安全，以对付强大的马拉巴海盗，对付马拉塔人（他们在1664年和1670年劫掠了苏拉特），以及1673年对付荷兰人对孟买的非分之想。在马德拉斯地区和孟加拉，由于在奥朗则布皇帝统治期间（1658—1707年）莫卧尔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削弱，英国的利益也愈来愈陷于危险之中。马拉塔首领西瓦吉和莫卧尔军队之间的战争使西海岸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西瓦吉能随心所欲地截断孟买的陆路贸易，抢劫更南的商站，因此1674年公司官员被迫与他达成协议。然而，莫卧尔人要求让其雇佣的海上辅助兵员，即金吉拉的黑人利用孟买及其港口，如若不然他们是有能力对苏拉特商站进行报复的。就这样孟买遭到两面夹击。当莫卧尔舰队躲入孟买港并使一支军队在那里登陆时，马拉塔人做出反应，他们对其他英国殖民者进行报告。1679年敌对双方分别占领了孟买港中的不同岛屿，附近水域成了战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导致法国和荷兰为争夺位于马德拉斯南郊的圣索美城展开激战，而且荷兰海军一支分舰队打乱了正常的航运秩序。1677年西瓦吉率领一支6万人的军队把他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内陆因马拉塔人的劫掠而一直混乱不堪，马德拉斯城本身也受到了威胁。1681年混乱达到了顶点，一个地方首领就能封锁马德拉斯并使它陷于饥荒的边缘。只是到1683年奥朗则布御驾亲临南印度并征服戈尔孔达之时，某种表面的秩序才得以恢复。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英国商站转而处于莫卧尔帝国的宗主权之下（1687年）。在孟加拉，帝国政府的软弱不是表现在那里的秩序混乱上，而是表现在“纳瓦布”（即总督）及其官员能放肆地自征贸易税而不受上级检查。从1656年起，东印度公司开始享有豁免在那里的所有赋税的自由，条件是每年支付3000卢

比。然而在1672年，当时的“纳瓦布”什塔汗觉得自己很强大，足以不顾这一协议，禁止了贸易，直到他的附加要求得到满足。孟加拉的贸易特别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因为商品需从内地装船顺流而下到达设在胡格利的主要商站，这里距公司船只能够到达的最近点约有20英里远。1677年，什塔汗暂时离职，公司以支付2.1万卢比再次获得赋税豁免权，1679年他复职，次年公司从皇帝本人那里获得一份确认上述安排的敕令。然而什塔汗不理这一套，重新征收他自己的赋税，并允许其地方官员敲诈勒索，任意征收能中饱其私囊的附加税。1685年当公司驻胡格利的官员要求允准往下游迁移时，他加以拒绝并派军队包围了一些商站。

印度发生的这些情况，以及1682年英国人被荷兰人从万丹赶走，导致公司董事会放弃了80年来始终不渝地加以坚持的政策，即将其活动限于和平贸易并令其商品和殖民地的安全依靠当地政府的保护。英国人转而决心在其殖民地设防，以武力维护其贸易的安全。政策的这种变化与乔赛亚·柴尔德爵士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681年到1687年间五任公司总裁，对公司董事会具有主要影响，与他同姓的约翰·柴尔德爵士1682—1690年担任公司驻苏拉特管区负责人和孟买总督。1684年他们以位于苏门答腊东南的明古连的设防商站替代了万丹。为推行其印度政策，他们派出一支由10艘舰只和700名士兵的远征队。这支部队受令帮助从孟加拉撤出公司雇员，占领孟加拉湾东北岸的吉大港并进行设防，在那里建立具有自己造币厂的第二个孟买，作为在印度东北部进行贸易的可靠中心。这种做法以及切断西海岸和孟加拉湾的所有地方航运路线，其目的是想让皇帝和“纳瓦布”接受以下主意，即给予英国人优惠的贸易条件并能在以后表面尊重英国的利益。酝酿于伦敦的这一计划完全低估了莫卧尔帝国仍有强大的实力和地理上的路途遥远等有关的困难。远征队在航行中走散了，但1686年秋部分船只到达恒河三角洲，300人乘坐小船遣往胡格利。他们抵达时遭到地方军事首领的袭击，虽然他们击退了进攻，但商站经理乔布·查诺克感到其地位不安全，因此他抓住机会撤向下游。在三角洲多沼泽的岛屿上他与敌人和疾病展开搏斗，坚持生存下来，直到1688年9月一支去攻打吉大港的部队将他解救出来。然而吉大港防守牢固，15只小船和300人的部队不足以将其攻下，英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向马德拉斯退去，他们是在1689年3月到达那里的。印度其他地方的情况同样也是灾难性的。1687年孟买已成为整个西海岸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约翰

- 柴尔德爵士试图切断莫卧尔的航运并将苏拉特的商站撤往孟买，这招致苏拉特商站和位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默苏利帕德姆和维沙卡帕特南两商站都被攻占。同时黑人舰队向孟买发动进攻，当被击退时它又组成一个紧密的包围圈。因此，柴尔德代表公司要求媾和。奥朗则布意识到，尽管英国商站处在他的掌握之中，但英国的舰船仍有能力阻遏印度与西亚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朝圣交通，于是他同意了和平。1690年2月27日他颁布敕令，重新同意英国人在莫卧尔帝国进行贸易，条件是他们会缴付15万卢比（约1.7万英镑）罚金和将柴尔德革职。后一要求没有产生困难，因为2月初柴尔德已在孟买去世。然而，查诺克拒绝从马德拉斯返回孟加拉，直到除了皇帝的敕令之外，他又从“纳瓦布”易卜拉欣汗（他已替代什塔汗）获得保证，特许公司的贸易可以豁免赋税并不纳地方捐税，条件是公司缴纳原先的每年3000卢比。1690年他返回孟加拉，但没有将他的大本营建在胡格利，而是建在1686—1688年他已占领的下游很远的地方，即处在公司舰船可抵达的范围之内。1696年该地建起城堡，名为威廉堡，也就是后来的加尔各答城。

这些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比起荷兰公司来范围要小，也不成功。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它确实从一个纯粹贸易团体发展为一个刚起步的拥有领土的实力集团，具有包括大量当地人口的设防殖民地，具有铸币权、对英国和印度军队的指挥权、缔约与宣战权以及受权拥有主权地位者的其他特征。而且，就它在英国与亚洲间的贸易、派出船的数量以及它在国内红利的规模而言，在1660—1688年它的商业活动与荷兰公司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一时期荷兰人将其利润中远为巨大的一部分用在政治和军事以及固定投资方面，这是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成功的代价。但即使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拿1688年以前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账目作一比较，仍然可以看到后者商业上的成功在不断扩大。然而从1688年起，英国的贸易和船运数量下降，1692—1700年公司已无红利可分。这种衰弱可部分归咎于与莫卧尔的失利的战争所花费的代价和1689—1697年与法国战争期间所遭受的航运损失。但是，它主要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在国内政治地位的变化，这是1688年革命的后果之一。东印度公司与斯图亚特王朝和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反荷亲法政策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与英国政治舆论的主流日益乖隔。光荣革命之后在它面前出现了一个敌对的议会，该议会宽宥侵权者的活动，支持反对公司贸易垄断

言辞刻毒的宣传战，至1694年连它自己也向那种垄断进行挑战。苏格兰人公司（建于1695年）花费钱财企图在达里安地峡建立殖民地，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然而在1698年，根据议会法案，一个敌对的“新”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建立并最终从威廉三世那里获得特许状。新公司在印度挨着其对手的商站建起自己的商站，这之后在伦敦的新老公司之间和在印度的双方职员之间展开了竞争。二者皆无利可获。1709年，竞争最终结束，它们合并为“英国东印度贸易商人公司”，这给英国在亚洲的商业活动再次提供了自17世纪90年代所一直缺乏的那种力量。

到1709年，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和利益在18世纪所行将遵循的主要路线也许可以说已经区分出来。1703—1705年荷兰通过进一步干涉马打蓝内部事务，加强了他们在爪哇的政治优势。他们能够利用这种优势获得大量适销产品的供给，如胡椒和稻米。从18世纪初开始，他们引进植物新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咖啡和甘蔗，它们成了向欧洲出口贸易兴旺的基础。他们在台湾的殖民地早在1662年就失去了，而且与中国的贸易对公司已价值不大，尽管其在巴达维亚的官员从与广州舢板贸易中大可中饱私囊。荷兰在印度和日本的商船仍旧保留，但就其贸易比例而言，重要性已下降，荷兰的兴趣愈来愈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而在该群岛之内则集中在爪哇。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西海岸继续维持自己的商站，但英国人在明古连的机构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大量香料，在那里进行贸易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较有意义的是与中国贸易的发展，为了从中获利，1672—1697年公司坚持斗争，先后在东京、厦门和台湾设立了无甚利益的商站。1699年新公司派遣“麦克尔斯菲尔德”号船前往广州，成功地在那里建立起贸易联络处，从1705年始，这种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联合公司的力量主要投入在印度，驻莫卧尔的使节从法鲁克西耶尔皇帝那里获得对公司贸易特权地位的多次承认，它可以将贸易扩大到其商站周边的行政区域内。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能建立起自己实力地位，当莫卧尔政权瓦解时便能与法国人一争在印度的支配权。

[1] 法国东印度公司（the Compagnie des Indes Crientales）建立于1664年。

[2] 参看本书第八章边码第322页。

[3] 《每周评论》，1708年1月31日。

- [4] 《对凯里先生答复的回答》（1697年）。
- [5] 《女业主的抱怨》（1720年）。
- [6] P. C. 亚历山大：《荷兰人在马拉巴》，第181页。
- [7] 参看约翰·欧文“英国装饰艺术中‘东方风格’的起源”，见《伯林顿杂志》，第97号（1955年4月）。
- [8] 《安汶岛植物志》，7部分（阿姆斯特丹，1741—1755年）。
- [9] 公元4世纪所译，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译者注
- [10] 参看第5章，第99页（原书页码）。
- [11] F. 德·拉·莫特·勒·瓦耶。

第十八章 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1648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交战双方最终放下了武器，一项解决争端的协议随之达成，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它一直存在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时才失效。此前有一个多世纪，德意志的内战连绵不断，缔约后也还是小动乱屡屡发生，但直到1740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蓄意入侵西里西亚而破坏了帝国的和平之前，那种和平局面并未为任何大的内战所扰乱。可是，1648年和约稳定了帝国的局势却未能稳定欧洲的局面。西部反对法国和东部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仍在继续，而且路易十四也发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德意志诸侯中找到盟友，利用他们反对正在与之作战的皇帝。然而在帝国内部，皇帝和诸侯之间、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离心力量和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已经形成。某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已经找到，它因其作用相当持久而具有不无令人满意之处。

实际上，帝国现在由德意志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两部分组成，它的边界缩短了；但瑞士和尼德兰早已不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正式承认这一事实是有利之事而不是一个损失。远为重要得多的是阿尔萨斯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西波美拉尼亚连同斯台丁、维斯马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两公国割让给了瑞典。这不仅意味着领土的丧失，而且还向两大强国提供了无数机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和浑水摸鱼，其中特别是法国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私利。瑞典不仅获得了那些分散的领土从而控制了奥德河、易北河和威悉河三条河流的河口，而且得到了500万盾的战争赔款，这笔赔款不得不由那些业已贫困不堪的邦国来筹措。直到1650年6月，瑞典军队才解散，离开非瑞典的领土；此后又过了三年的时间瑞典军队才从东波美拉尼亚撤走（它落入勃兰登堡之手），其条件是瑞典须获得港口通行税和关税收入的一半。1652年瑞典军队进攻不来梅自由市，该市并未割让给瑞典（与不来梅公国相反），因而拒绝向瑞典效忠。市民们决心进行抵抗，皇帝和毗邻诸侯则试图调解。1654年妥协达成，规定不来梅是否系帝国自由市的问题暂且搁置

起来，但其市民必须对瑞典作有条件的忠诚宣誓。然而在瑞典国王查理十世死后他们又拒绝向查理十一世俯首称臣，相反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帝国议会。于是1666年瑞典军队包围了不来梅，但市民的抵抗和丹麦、联合省以及若干德意志诸侯的干涉迫使瑞典政府缔和，承认不来梅为自由市。可是直到1700年，不来梅才被允许向帝国议会派遣代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有利于外国列强的干涉，这在莱茵表现得尤为明显。1654年年末，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三地大主教、明斯特主教以及诺伊堡宫伯（他也是于利希和贝格公爵）组成莱茵同盟，旨在保护其成员不受攻击并在欧洲政治中起调解作用。由于皇帝斐迪南三世的长子即选定的继承人于同年去世，而其幼子利奥波德仅14岁，这一同盟的重要性增强了。红衣主教马扎然借口利奥波德年幼，提出要支持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王公，即巴伐利亚选侯或诺伊堡宫伯出任帝位候选人。1657年4月斐迪南三世驾崩时继位者并未选定，空位时间延续了15个月，这期间法国人竭尽阴谋、威胁和许愿之能事。然而，1658年年轻的利奥波德被选侯们一致推选为皇帝，他允诺在仍进行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中无论如何不会支持西班牙。四周后许多德意志诸侯签署莱茵同盟条约，参加者有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三地大主教、明斯特主教、诺伊堡宫伯、黑森—卡塞尔伯爵、不伦瑞克和吕讷堡诸公爵以及身兼不来梅公爵和费尔登公爵的瑞典国王，次日还有法国加入。同盟军队的数量达到1万人，其中2400名是法国人。同盟的目标是维护和约、捍卫帝国内各邦的自由和维持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均势。但是，加盟的德意志各邦实力太弱，不足以实行独立的政策或形成第三种力量，事实上同盟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它被数次续订，也陆续有其他德意志诸侯加入，其中包括勃兰登堡选侯。但是1668年它瓦解了。到那时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对德意志自由的威胁不是来自皇帝利奥波德，而是来自路易十四。由于法国和瑞典两国国王被公认为是和约的保证者，而且由于瑞典在帝国议会中占有两席，这两个强国继续在帝国的内部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路易十四统治的结束和瑞典帝国在北方大战中瓦解时为止。

在三十年战争中，为了扩大皇帝的权力，为了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为了镇压新教诸侯以及为了推进反宗教改革的事业，哈布斯堡王朝曾作了顽强的努力，而且它离成功仅一步之遥。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使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但它也破坏了相反的趋势，即加尔文派诸侯企图将帝国转变为一个贵族共和国，将新教的旗帜插进哈布斯堡领地的核心，以及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妥协性条约。帝国的统一得到了维护；只要奥地利王室的男嗣绵延不绝，帝国的皇冠就会仍然留在哈布斯堡家族手里；通过打败波希米亚人和在其世袭领地上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哈布斯堡的权势得到了增强；即使在帝国内，皇帝的权力也绝不可以忽视。皇帝仍旧能对帝国议会的决定施加影响，保卫帝国的边界不受外来侵犯，在诸侯间和诸侯国内发生内部冲突时充当仲裁者。他的世袭领地（很快就要向东南进行扩展）使他成为比其他任何选帝侯要远为强大的君主。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在政治上毫无退缩之意，继续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帝国。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困导致了基督教各派和帝国全境的重新团结，而且这种团结远及帝国的边界之外。在成功地抗击土耳其人的各次战役中，精诚团结之情感一直存在着，而且皇帝依然是此团结之情感的活生生的象征。人们希望在战争结束后他会恢复帝国良好的传统法律和重新树立皇帝的权威，这不完全是某种虔诚的希望：1648年后的一个世纪皇帝的权威得到明显的复兴，尤其在利奥波德的继承者约瑟夫一世和查理六世统治时期是如此。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强权政治中的崛起在整个帝国内部有着明显的影响。

但是，1648年后帝国已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没有自己的统一意志，帝国各邦都在追逐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相互嫉视，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内外实力和削弱皇帝的力量。法国的政策是承认德意志诸侯享有充分的主权，这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确实没能得逞，通过和约条款他们只能被授予*ajus territorii et superioritatis*（领土及其支配权）。然而似乎令人怀疑的是，这在实际上是否能造成很大区别。如果诸侯们被授予在他们之间和与外国结盟的权力，那么这是他们早就一直在行使的权力。如果他们被禁止结盟反对皇帝和帝国，那么这种禁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该时代的政治学家发现给皇帝下一个定义是困难的，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希波利撒·阿·拉皮德否认皇帝是一个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帝国是由诸侯组成的一个贵族国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写作《德意志帝国状况》（1667年）的意图则是调和影响帝国的各种不同的因素，宣称它是一个“*irregulare aliquod corpus et monstro simile*”（异乎寻常的类似怪物的东西）。它确实异乎寻常，尽管可能不是一个怪物而是一个令人惊奇之

物。虽然存在着各种压力和纷争，但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帝国内部边界却基本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仅有法国在西部不断侵略帝国的领土，这一事实也是异乎寻常的。

由冲突的宗教信念所划分的边界甚至更为稳定。新教从哈布斯堡领地、波希米亚和巴拉丁被清除，但世俗化了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并未恢复。1648年以后很少有德意志诸侯行使他们的权力，将那些坚持信奉与其统治者不同宗教的臣民驱逐出境。在他们人烟稀少的地区，老百姓显得重要，而且颇有一些开明君主想方设法吸引移民，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受迫害的新教异端教派和犹太人在勃兰登堡和其他地区找到了立身之地。许多诸侯的实力或宗教狂热还不足以在他们的领土上强制推行其宗教。因此，勃兰登堡的加尔文派选侯和黑森—卡瑟尔伯爵统治着一些路德教封邑，而且没有要将加尔文教定为国教之意^[1]。后来在该世纪中巴拉丁选侯和萨克森选侯都成了罗马天主教徒^[2]，而新教仍然是他们邦国的主要宗教。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宗教热情业已冷却，私利决定着君主们采取更为宽容的方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德意志的宗教分布图就是1648年的那张，并无什么改变。

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或者说要延宕好多年才得到解决。恢复法治和秩序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尽管金钱极其匮乏，雇佣兵的薪饷还是付清的。但是雇佣兵该如何处置，怎样才能使他们过上平民生活？能够吸收他们的常备军在时尚未建立。在战争所导致的混乱时期，许多人为匪为盗，或者学会靠小聪明混日子；成群的老兵在乡间闯荡。帝国中的某些诸侯联手对违法乱纪、破坏秩序者进行了镇压。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继续进行的战争以及1655年瑞典和波兰之间爆发的战争，都吸引了一些对其他行当一窍不通的雇佣兵，后来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也有一批雇佣兵参加。恢复经济面临的困难更为严重，不仅因为如人们所经常强调的那样，所有流经帝国的大河河口都被外国列强所控制，不仅因为贸易萎缩或者为避开动乱地区人们另辟蹊径做生意，而且首先因为诸侯和城市的自私和相互嫉妒，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贸易和生意筑起愈来愈多的壁垒，在每一个诸侯国的边界和沿着所有的河流路线设下无数的税卡，征收新的苛捐杂税，从而在数十年中赶走了生意并延缓了经济恢复。如果说法国令人惊讶地很快从长期内外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话，那么这部分应归功于有一个中央集权

政府并实行了开明政策。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则在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668年约翰·约阿希姆·贝歇尔发表“关于城市、乡村和国家兴衰真正原因的政治论文”，提到荷兰人从海上发财致富：如果他们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恐惧大海，他们就聚敛不到他们的财富。“后果是在德意志几乎所有贸易和生意都不存在，所有商业都被葬送，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贫如洗。”同年，受雇在巴伐利亚厄廷根征收酒税的官员将税务的急剧衰落归咎于以下事实：“在情况较好的去年，甜酒不仅运往全邦，而且也常常运往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布拉格，甚至波兰的克拉科夫。而今年由于战乱频仍、尸骨遍野，结果全邦遭殃，金钱匮乏，销售几乎停止。”奥地利酒的销售也出现同样情形。^[3]在慕尼黑、奥格斯堡、施派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17世纪60年代黑麦的价格比战前水平低13%—34%，燕麦低15%—29%。城镇人口的减少在战后持续了较长时期，导致谷物消费急剧下降，谷物贸易的萎缩和土地价格的严重下跌。在柏林，整个17世纪后半叶黑麦和小麦的价格一直受压。

毋庸置疑，德意志的广大地区不仅因战争及其后果遭受严重浩劫，而且丧失了它的大部分人口。当城市能够较容易地保护自己反对敌对力量时，它们又遭受到瘟疫的更为严重的袭击。奥地利、蒂罗尔、萨尔茨堡和瑞士基本没有卷入战争，它们的人口增长了。德意志西北的大部分，包括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奥尔登堡、威斯特伐利亚和部分莱茵兰，人口数量没有严重下降，甚至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人口数量下降率仅为20%。但是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在勃兰登堡的许多地区，1652年时15%—60%的农户已离乡背井，人口下降平均数约为50%。柏林失去其人口的25%，而波茨坦和施潘道超过40%，勃兰登堡城超过60%。在老马尔克（Old Mark，位于易北河以西）6个小镇中，1567年有2444户，一个世纪后剩下1021户。其中最重要的小镇施滕达尔，在17世纪第一个10年出生了2980名婴儿，到70年代出生婴儿的数量仅为969名，而施滕达尔既未遭征服，又未受劫掠。但人们须记住，勃兰登堡的城市的衰落始于16世纪。在德意志另一端的符腾堡，1652年被毁的房屋和谷仓超过4.1万间，约1/3可耕地荒芜，总数达到309957“摩肯”（约24.1万英亩）。51个地区报告说，它们在战前有市民58865人，但只有19071人活了下来，另外24个

地区只是报告它们丧失了18546名市民。纳戈尔德城仅丧失其人口的8%，但乌拉赫却丧失了75%。在已登的普福尔茨海姆，到1667年仍有许多房屋空无一人，以致该地区侯爵不得不进行干预。慕尼黑的人口从1.8万或更多下降到9000人，在西北地区中，巴拉丁和符腾堡人口下降得最为严重，在东北则是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许多居民迁徙到较为安全的西北地区，那里的汉堡和不来梅日见重要，它们向海外出口谷物，从英国和荷兰进口货物。汉堡的崛起导致其对手马格德堡的衰败。乌尔姆和纽伦堡一方面人口数量下降，另一方面因奥地利新教徒及其随身所携资本的流入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好处。然而在奥格斯堡，1617年有143人各纳税50—100盾，但到1661年只剩下36人，而纳税100盾以上的人口数量从100下降到20，尽管征税更为严格。因此各邦情况不尽相同，但形势是够严峻的了。

乡村人口下降的后果在德意志因地而异。在巴伐利亚，贵族的收入来自农民缴纳的地租，他们日益贫困，依赖放债者过日子，甚至较富裕的人家都负债累累。富裕程度等而下之者的财产常常落入寺院、投机者、军官或者将其资金投入不动产的官员之手。在1669年议会上，贵族们对大量购买贵族财产的情况怨声四起：如果市场上销售什么东西，教会出价最高，它们手中的现款就会让贵族无从问津。只有少数贵族还能按照他们的习惯过日子，将其子女送到国外去“体验贵族生活”。由于谷物价格普遍低廉，庄园农业对地主们失去了吸引力；但这种趋势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另外巴伐利亚的农民从这一形势中得到好处，由于佃户缺乏，地主被迫给予他们较优的待遇。正如1669年一些高级教士所说的，如果他们不想让他们的农庄完全荒芜的话，他们就得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为其荒芜的土地雇用新佃户的话，他们就得改善那些人的法律地位，允许他们若干年中免交应付款，并满足于那些农民所愿意缴纳的地租。

恰恰相反的情况出现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自15世纪以来那里的庄园农业愈来愈重要，而农民的地位则日益恶化。人口下降迫使贵族将多得多的农民抛下的土地自行耕种，因为他们找不到新的佃户。农民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劳役负担，因为他们的数量减少而庄园扩大了。他们的子女被迫在庄园里充当奴仆或劳动力。农民及其整个家庭不仅固着于土地——这在16世纪已经发生——而且许多人

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他们的身体也属于其主人（Leibeigenschaft——农奴制）主人们还控制着其农民的私人生活，连婚嫁也需要他们的同意；许多农民像牲口一样被出卖或进行交换。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更多的农民被驱赶或者买走。17世纪后半叶勃兰登堡贵族庄园的规模扩大了约30%。另一方面这时在下萨克森，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农民阶层出现了，原因是该地区仅仅丧失很少一部分人口，并得益于来自遭受灾难地区的移民。政府深谋远虑的政策鼓励了这种趋势，而在德意志东北地区，政府只是很轻易地屈从于贵族的要求，这些要求旨在使农民完全服从和进一步扩大其农庄。在17世纪中，只是在有着种种出口便利的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波兰和立窝尼亚——贵族大庄园（Gutsherrschaft，依靠农奴劳役为市场生产谷物的贵族大庄园）建立了起来。甚至在萨克森和马格德堡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那里同样具有“殖民地”的特点和沿易北河运送谷物的便利条件。在那里农民耕作仍然是农业的主要形式，农奴制从未像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那样严厉地实行。那里的地方贵族不拥有无限权力，其影响受到城市特别是其集市具有欧洲意义的莱比锡的限制。另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类似于东北地区，尽管两地和该地区之间隔着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波希米亚的贵族也拥有大地产、庄园、牧羊业、酿酒厂和鱼塘，依靠劳役来经营，农民是奴隶，许多人不得不经常来为主人干活，随叫随到，而在奥地利人的土地上，农民的劳役大受限制，通常一年仅12天^[4]。

在庄园农业不太重要、贵族的地产较小且分散的地区——如德意志西部——农奴制实际上已经消亡，劳役常常转换为代役租（quit-rents）。在这些地区30年战争造成的人口下降不会导致采邑制的复兴，而农民的地位继续得到改善。社会发展的这种巨大差异可以用人口密度数字来说明。1700年前后，勃兰登堡每平方英里的居民仅约为30人，普鲁士公国仅28人，波美拉尼亚仅19人；而巴伐利亚每平方英里大约73人，汉诺威63人，马格德堡78人，萨克森93人，符腾堡105人，后几个数字接近尼德兰和法国，并超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应数字。显而易见，人口最少的地方农民的状况最差。人口分布的这种不均衡并非30年战争所造成的；它仅仅是加强了数世纪以来所一直存在的某种趋势。

在德意志东北部，30年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农民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18世纪初在勃兰登堡的新马尔克（NewMark）每周3天的劳役被看成较轻的负担，一般每周4天，常常多达6天，而且是从日出到日落，几乎没有留给农民什么时间耕作自己的土地。可耕地总量的2/3属于贵族，另有1/4属王室领有。在勃兰登堡的贝斯科和斯托科夫地区，1746年有农民429人，而在30年战争以前曾有814人，但佃农的数量却从172人增加到828人。在波美拉尼亚东部，16世纪末处在贵族统治下的农民为6514人，但到1670年前后仅有3419人，到1718年仅有3584人。许多农民逃往波兰去谋求较好的生活。1684年有一位教士描绘了当地农民的情景：

农民的确是人，但比其他人要卑贱和粗野……就他们的举止而言，他们几乎想不到他的帽子和将它脱下……但是如果他脱帽的话，他就像玩纺轮一样去旋转帽子，或者捏在手中并擦它……他们吃东西时不用叉子，而是用五只手指从罐子里抓……当兵的偷窃只是出于迫不得已，但大多数农民这样做是蓄意的……众所周知，那些与牧师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受到其他农民的虐待，这些农民把所有恶名都加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叛徒、马屁精、谄媚小人、乱嚼舌头的……农民就像鳕鱼干一样，只有经过好好拍打才能成为上品。听话的农民也只有当干活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表现良好；他们只有处在在控制之下感到胆怯时才可能保持循规蹈矩……[\[5\]](#)

1710年，一位普鲁士高级官员冯·卢本也向国王报告说：

由于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严格的人身农奴制度并且当地的贵族不仅不想将之废除而且希望对其臣民保留很大的权力，他们用埃及式的沉重劳役、多种粮食税和其他转运赋税、严厉的惩罚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去折磨他们，以致他们仍然一贫如洗；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贡税和其他捐税，要不然他们就会逃跑。但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被抓回，情况就会变得更糟；这些人正在受到惩罚和残酷地对待……他们不能从各地政府、地区法院和当地法院获得公正，因为贵族控制着这些机构，这些贵族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财产和农民，不希望涉及自己的案件会不审而判……地租、劳役、捐税、摊派的营房和贡税常常增加，以致人们几乎无法生存。因此农奴长期贫困，而且变得愈来愈穷，毫无改变之望，最后只有逃亡之一途[\[6\]](#)。

但是，有关德意志东部贵族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恭维。在西里西亚的一则讽刺故事中，一位母亲就她年轻的贵族儿子作了如下描述：

这个浪荡子早已知道自己贵为容克，因此他什么也不想学，宁愿骑马、带着马童转悠……但最终我还得为他买一本识字课本……要是它不值

什么，而且有学问的小伙子也不需要一大堆书，那有多好……我早就听说在其他国家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特有的贵族……[\[7\]](#)

另一位批评贵族的人写道：

如果有人到他家做客，啤酒杯马上摆上了桌；这只杯子总是不分彼此地传个遍，也不管客人渴不渴。……如果客人下午抵达，饮酒也立即开始，所用的几乎与罐子不相上下的中等杯子；接着主人向客人敬酒，干了整杯或半杯，客人也得干。这样天黑前他们都醉了，而在一大早，一些客人又饮普通烈酒，另一些人则饮掺有鸡蛋和生姜的加热啤酒……[\[8\]](#)

其他观察者对酗酒习惯亦有评论。大约1650年依然有人从汉堡报道说，在礼拜天，“当今的人们总是在去教堂前先去买酒”[\[9\]](#)。1686年英国使节乔治·埃瑟里奇爵士从雷蒂斯堡写道：

这个国家的绅士，其享受方式全然不同……他们热衷于扩大其酒窖，而对发展祖业则不甚关心。简言之，饮酒是这个国家祖传的恶习，代表中如有一位饮酒之雄，能一口气地将所有他国的使节全都灌醉，那么此公就会像洛林公爵立下勇退土耳其人的著名功勋一样备受赞赏，甚或有资格要求德意志的任一城镇由公家出资为他竖一座塑像……他们这样毫不客气的强行灌酒，完全不顾我们苏格兰人称之为友谊的东西，以致出席他们的晚宴总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压抑，就像在听十位长老会牧师一个紧接着一个宣讲冗长的连篇废话一样。……[\[10\]](#)

一道鸿沟将贵族与平民分离开来，城市显贵家族同样维护着这种区别。在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和乌尔姆，高贵的家族与市民有着严格的区别。在纽伦堡，他们视经商为不光彩的行当，在法兰克福，老林普格社（Society of Old Limpurg）要求新会员出具八位贵族祖先的证明，并不准参加任何商业活动。除了这些古老的显贵家族，还有许多新的显贵家族，其中有文武官员和商人，他们的家室喜欢炫耀摆阔。他们驾着镀金的马车四处溜达，他们的女眷只穿戴巴黎和威尼斯生产的装饰织品，他们住宅的装潢极尽奢侈。出身于世家望族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不屑一顾。一位18世家的作家约翰·米夏埃尔·冯·莱昂批评性地将德意志贵族的态度与英国贵族的态度作了比较，在英国，“甚至最伟大的贵族的子孙也不会羞于当律师，所以后来他们能成为地方法官并被选进议会”；另外还与西班牙的贵族比较，在那里“古老世家的贵族青年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对德意志贵族的衰落进行评论，说他们一个比一个摆阔，一个比一个铺张，最后不少贵族不得不去从军。“就从军而言，现在倒是绝好的机会，因

为欧洲各国都引进了常备军和雇佣兵制……”^[11]毫无疑问，三十年代战争后的时期贵族们面临着经济困境，这种情况确实说明了为什么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心甘情愿地参加霍亨索伦的军队并成为职业军官。其他某些德意志邦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然而在巴伐利亚，穷困潦倒的贵族显然宁愿去谋求文职，迫切希望在政府和法庭有个一官半职或挂个名。不包括帝国骑士的法庭，在德意志有500个或600个法庭，因此破落的贵族确实有许多机会。

如果说在德意志的许多地方贵族是一个衰落的阶级并不得不去寻求公职和肥缺，那么城市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日趋重要的汉堡和法兰克福，帝国自由市的强盛已成明日黄花。在阿尔萨斯的城市丢失给法国之后，帝国自由市的数量是51个，绝大多数坐落在德意志西南部。它们中大多数仅为弹丸之地，在与周边诸侯国的争斗中不能自保。但即使较重要的帝国自由市，即南部的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雷蒂斯堡和北部的科隆、亚琛、不来梅、吕贝克，发现要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也是困难的。德意志南部的城市因与意大利贸易的衰落和弗格尔、威尔塞两个金融家族的破产而遭受沉重打击。德意志北部城市则因占优势的荷兰人和较少程度上英国人的竞争而受创。外国商人在出口德意志的原材料和农产品，进口殖民地和国外的货物。汉萨同盟的城市在外国和贵族的竞争双重影响下早就衰落下去，它们不再派遣自己的船舶出海，如果能在国外来客与内陆之间起中间人作用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来梅和科隆为维持帝国自由市的地位不得不艰苦奋斗，君主的权力和诸侯国的兴起使得帝国自由市不可能取得持续发展：它们生存的所有方面都受到阻碍，直到1803年《帝国代表最后文件》（*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实施时其数目虽未减少，但它们称雄显赫的日子俱已往矣。即使18世纪的经济恢复也没有导致它们的复兴。

帝国自由市的衰落没有引起坐落在各诸侯国内并受其君主支持的那些城市的不断发展。它们的贸易和工业受到严重损失。例如在慕尼黑，1618—1649年织布工的数量从148人下降到64人，亚麻布织工从161人下降到82人，制帽工从23人下降到9人，裁缝从118人下降到64人。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巴伐利亚选侯做出不懈的努力不仅未复兴巴伐利亚的制布业，而且劳而无功，织布工数量下降得更多。各邦君主的横征暴敛和垄断频频阻碍着贸易和企业的复兴。许多外国货物被

禁止进口，羊毛和皮革这样的原料又不让出口，而国内又尚无任何工业能够吸收这些原料或满足国内的需求。即使某些种类的商品能在当地生产，但外国商品常常更价廉物美。因此许多禁令和垄断不得不取消，只是稍后又重新实施，其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在勃兰登堡大选侯统治时期，原毛出口被禁止过不下10次，但由于贵族不受这种禁令的约束，结果被证明是禁而不止。至于一再颁布的不许进口铁和金属制品的禁令则连政府官员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沿易北河而下的贸易承受着沉重的通行税负担，以致作为“商业之魂”的谷物要由别的水路运送，而由陆路转运，其花费也要小一些。易北河畔伦岑的通行税给人承包了若干年，这给贸易造成恶果，但后来重又由政府官员管理时，情况也未得到改善。大选侯认为这些沉重的通行税完全合理，讨论易北河通行税问题的三次会议均无果而散，因为大选侯不纳枢密院成员的进谏，拒绝作任何让步。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施潘道的军事长官对过往车辆和船只自行征税，其他人也不顾官方的禁令自行对过客征税。由于政府征收新的关税和通行税，进入柯尼斯堡的船只急剧减少。

同样糟糕的是新课货物税的影响，那是17世纪各邦政府喜用的手段。在萨克森，货物税引进于1640年，战争结束后也未取消。因此许多货物绕过萨克森，沿另外的道路转运。丝绸和其他来自意大利的贵重物品通过图林吉亚运往北方，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亚麻布则经由勃兰登堡北运（在征收货物税之前就是如此）。萨克森的三级会议徒劳地抱怨货物税导致国家尤其是织布业和亚麻业的毁灭而使萨克森的邻国渔利。汉萨同盟与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城市也同样徒劳地屡次宣称在这种状况下它们与莱比锡的贸易断难复兴。尽管存在着大量的消极抵抗，但是货物税依然征收，只是对国产商品暂时取消该税，然而到1681年又再度征收。到那时勃兰登堡也征起了货物税，其影响甚至更具负面性，因为该邦并不是全境都征收，而是仅仅限于城市，所以每一个小城镇都被人为的关卡所包围，货物税只得在城门口征收。因此，一方面城市贸易和企业承受着新税的负担，另一方面城墙之外的那些贸易和企业仍然无须纳税，并且贵族的赋税豁免权得到保留。这些意味着城市不得不承受不合比例的赋税负担：它们之迟迟得不到恢复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种做法逐步从勃兰登堡扩大到其他霍亨索伦的领土上。别的诸侯国则较为幸运。1700年下莱茵的于利希和贝格两公国仿效勃兰登堡也实行货物税制，但几年后两公国的三级会议和城

镇取消了它，因为实行此税后，城市企业日益衰落，而生意也都落到了邻邦的手中。

诸侯国内各城市所受到的打击还来自它们的统治者力图将其权力扩展到城市的行径。从1648年起，美因茨大主教约翰·菲利普就企图在图林吉亚的爱尔福特城行使其特权，但该城奋力抵抗他的所有威胁甚至帝国的声讨。1664年菲利普大主教悍然使用武力，在法国和莱茵同盟的支持下包围了爱尔福特。一个月以后该城投降，表示效忠约翰·菲利普，接受了这位君主派出的卫戍部队。同样，两年后大选侯迫使马格德堡就范。以类似的方式，克里斯托弗·伯纳德·冯·加伦主教和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分别使明斯特城和不伦瑞克城俯首称臣。普鲁士公国的首府柯尼斯堡和克勒弗公国的诸城市奋起反抗横征暴敛和军人的劫掠，结果被军队所镇压。18世纪初叶货物税的征收导致这些城镇昔日的繁华消失。仅12年内克勒弗最重要的城市韦瑟尔丧失其居民的1/4以上，而克勒弗所有城镇丧失的居民都在11%以上。

的确，这一时期汉堡的蓬勃景象还在发展，莱比锡的集市成为东、西南三方交换的中心，西里西亚的亚麻业也在继续繁荣，但这些例外仅仅是突出了普遍的停滞局面。常常是政府的行为所引起的德意志许多城市的持续衰落给外国商人和金融家提供了良机。早在三十年战争以前荷兰人就进入莱茵河上游地区并由波罗的海港口深入陆地。战后他们的影响不断增长，并在某些地方占有支配地位。荷兰人以其雄厚资本、贸易联系、诸多船舶和低廉运费，在与德意志小城之小商人的竞争中占尽其利。三十年战争和大金融家族的破产已破坏了所有的信贷，消耗了大部分的资本。缩手缩脚和心胸狭窄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为了海上和殖民地事业，大选侯不得不利用荷兰的专家和水手，荷兰的公司和金融家，因为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和物力，出于同样的理由也欢迎犹太商人，尤其是他们也代表着荷兰利益的话。因此，摩西·雅各布森·德·容格1664年获得一项重要特权，即在犹太人仍被排斥在普鲁士公国以外的时代，他获准居住于梅梅尔。容格很快与波兰、立陶宛、立窝尼亚做起兴旺的生意，几乎垄断了极其重要的食盐贸易并成功地与当地商人进行竞争。1694—1696年他缴纳的关税比梅梅尔其他所有商人所纳的税要多80%。这些商人和普鲁士三级会议自然对这位新来者抱怨不已。在克勒弗，贡帕茨家族在金融事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贷款给政府和三级会议，预缴税款，

提供欠法国的贡纳。1700年卢本·艾利阿斯·贡帕茨被任命为克勒弗和马尔克两邦的主要收税官，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该家族的成员再次被委以官职。由于存在着众多的宫廷和众多的贫困君主，由于他们的虚荣和野心不断膨胀，由于他们不得不维持一支粮械齐备的常备军，数以百计的奉仕于宫廷的犹太人就不得不设法去满足这些君主们总是在增长的需求。

因此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对其社会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舆论看来，它是万恶之源，甚至将中世纪后期村庄的荒废也归咎于瑞典人的破坏或者战争的其他灾难。当然，当时的民间文学容易过分渲染恐怖和形势的绝望。如果说这幅图景过于片面或带着偏见的话，那么近代某些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企图“澄清”三十年战争，把凄惨的情况主要归咎于后来的宣传。据说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次战争只是一场战争而是将其分为若干互不相干的战争。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德意志大战”或“三十年战争”的名称当战争结束就被使用了。当然，德意志在政治上的不统一的确不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而是因它而加剧，同时上述某些负面特征的确也应归咎于政治上的不统一。然而在战争爆发前社会和经济衰落至多是局部的，战争却使这种衰落大大普遍化了，这也依然是事实。同样确实的是早在战争爆发前西欧诸国即已崛起多时，但似乎至少可能的是，如果战争不介入，德意志也会像它们那样勃兴。16世纪的德意志还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它花费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才再次达到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以前它所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如果说17世纪后半叶德意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的是一幅几乎十分灰暗的图景，那么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情况则并不完全那样糟。帝国尽管已衰落和四分五裂，但它的机构仍在起着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好的作用。帝国达到了某种稳定，并持续到18世纪，已经形成的势力均衡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可能是来自法国的持续不断的威胁，在不同的势力之间注入一点黏合剂，另外还有来自土耳其人的压力也是如此，但后者的危险远不及15世纪和16世纪，而围攻维也纳只不过是一场转眼即逝的插曲。路易十四在德意志一直有他的同伙和爪牙，就此而言法国的权势是一个分裂的因素而不是黏合剂。帝国中只有某些部分受到外敌的威胁。然而事实是不仅仅莱茵兰诸邦联合起来反抗法国——相反，路易十四在莱茵兰找到或多或少自愿的“同盟者”——也

不仅仅是东南部诸邦一起与土耳其人作战。如果人们记得帝国中大约有360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这还不包括1500个帝国自由骑士，那么尽管如此严重的不统一，帝国还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就似乎是一个奇迹了。

并不是360个邦国都派代表出席了帝国议会。该议会在雷蒂斯堡召开，讨论有关铸币、节约法令、对付流浪汉和乞丐的措施以及最主要的，即军事和用作防务或其他目的的征税等事宜。因为除了作维持帝国最高法庭之用的征税这唯一例外，没有常征的帝国税，而“罗马月”（Roman Months）则要帝国议会投票批准^[12]。帝国议会的另一弱点是，如果某些邦国不执行帝国议会做出的决定，它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威进行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性是交与帝国最高法庭裁决，而该法庭办事拖拉和制造纠纷是众所周知的。帝国议会由三院组成。第一院是选侯院，1648年其成员增加到8个，但波希米亚选侯（即哈布斯堡皇帝）不行使选侯职权。这样就有4位天主教选侯，即巴伐利亚选侯和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三地大主教；3位新教选侯，即信奉路德教的萨克森选侯和2位信奉加尔文教的勃兰登堡和巴拉丁选侯。然而在巴拉丁，1685年选侯之位由选侯家族中信奉天主教的一支继位，12年后萨克森选侯也成了罗马天主教徒。只是由于汉诺威成为第九个选侯国，这种情况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平衡，这是皇帝自行安排的，事先未与其他选侯或邦君磋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默认。因此，至该世纪末，仅有二位新教选侯对六位天主教选侯（波希米亚选侯除外）。美因茨选侯领导天主教集团，萨克森选侯是新教集团的领袖。但事关宗教争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击败另一方。

第二院是诸侯院，院中分为教会诸侯“席”和世俗诸侯“席”。教会诸侯有37张选票，世俗诸侯席有63张，其中有6张是集体票：士瓦本和莱茵两地的高级教士和四个帝国伯爵集团各有1票。在诸侯院中也是天主教徒占多数，但多得有限。第三院由51个帝国自由市组成，其中13个属天主教，34个属新教，4个是“混合型”。但是它们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1653年帝国议会只是授予它们在前两院之间达成协议以后的表决权，所以，如果前两院未有协议，它们不能对结果施加影响。正如英国使节乔治·埃瑟里奇爵士在1685年所写的那样：“城市代表的作用只是摆摆样子，在其他两院达成协议以前无事可做……”

^[13]结果是城市代表实际上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因为公认的原则是任

何一院都不能被其他院否决。就帝国税而言，自1653年以来同样有一条公认原则，那就是信贷投票要求一致通过的原则，因为如同1652年下萨克森地区的决定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通过他的投票来裁决别人该拿出什么的话，那就完全有悖于天赋的自由……”皇帝斐迪南三世不得不放弃他的在征税问题上把多数人的决定强加给少数人的计划，各等级的自由再次获得胜利，勃兰登堡所领导的诸侯反对派占了上风。

1654年诸侯又取得一项胜利：帝国议会闭幕时所拟定的“议事总结”（Recess）也即第180段规定，帝国内每一等级的臣民均有义务资助其君主或宗主，以便为关键的要塞、地区和卫戍部队配置人员并加以维持。如果说这是给予各地三级会议的打击——在绝大多数诸侯国内它们仍然行使财政权，那么1657年斐迪南三世死后在这方面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年幼的利奥波德被选为皇帝前不得不做出意义深远的让步。勃兰登堡和科隆选侯陷入了与其三级会议的复杂斗争之中，他们要求这些三级会议以其自身资源维持城堡，不经君主召集三级会议禁止召开，也不得向帝国法庭对他进行起诉。另外，巴拉丁、萨克森和特里尔满足于现状，萨克森尤其反对禁止向帝国法庭上诉，因为它从中得不到好处：那时只有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两世家，巴拉丁选侯和美因茨选侯的领地已经享有使它们不受帝国法庭管辖的免于上诉特权；但在霍亨索伦的领土上，这种豁免权仅授予勃兰登堡马尔克，而未扩展到其他领地。然而，如果利奥波德想被选为皇帝，他就得接受选侯们的条件。因此下列规定就做出了：各地三级会议无权拒绝资助“必要的”要塞和卫戍部队，不受召集无权开会，也无权单独征收地方赋税。如果它们向帝国法庭上诉，这些上诉将不予受理。对1654年“议事总结”第180段也不得上诉。如有三级会议拥有与这些规定相抵触的特权，这些特权应予以取消，若干诸侯国内的一些三级会议的联盟或联合也要解散。正是做出这些规定以后，利奥波德才被一致选为皇帝。于是诸侯拥有了合法权利，总能一致来反对他们下属的三级会议。然而，与禁令相反，帝国法庭尤其是宫廷会议[\[14\]](#)继续受理各地三级会议对其统治者的申诉：这是一个行将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因素[\[15\]](#)。

来自土耳其和国内局势的危险使得皇帝召集了新的一届议会。这届议会开幕于1663年年初，经过12个多月的审议同意支持皇帝以一支

约3万人的军队去对付异教徒。但是，只有该数目1/3的军队出现在战场上，而且他们仅仅参加了最后阶段的战斗，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拖延的时间甚至更长，以致没有作“议事总结”：帝国议会变成了常设机构，由诸侯的代表组成，在每一个问题上这些代表都得请示各自的君主。因此它成了外交家的会议，为级别和程序问题争吵不休，正如1687—1688年乔治·埃瑟里奇从雷蒂斯堡所发的信函中描述的那样：

“帝国议会中的大多数事情只是适合于让那些麋集在圣詹姆斯公园大树下的政治小丑感到兴味盎然……”4个月后他又写道：“这么长的时间议会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围绕着支持和反对温蒂斯格拉茨伯爵的权力所展开的结党拉派和耍弄阴谋……”5个月后情况仍然如故：“那些不熟悉这种议会议程的人会感到奇怪，如此众多的代表云集在这里，而且全都花费了他们各自主公的大量金钱，却只干了这么一点点事情，而且就是这么一点点事情也是慢条斯理干出来的……”这位英国使节不喜欢德意志人的斗酒，并发现他们的太太是“如此不可忍受的矜持和贞娴……以致根本不可能与她们发生私情……”，因而他的这种官运并不值得羡慕^[16]。上述体制究竟滑稽可笑到何种程度，可由1701年美因茨选侯代表的行为来表明。当他在帝国代表下榻处走下马车时，要求接待人员带他走一条秘密楼梯，因为他在有关文件中得知这是惯例。当他被告知这条秘密楼梯由于在建筑改建时业已拆掉而不复存在，因此他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时，他却坚持并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要求接见，他得写信给他的主公请求训示。

当1667年移归权战争^[17]爆发时，帝国议会面临一个问题：构成帝国“勃艮第地区”的西属尼德兰是否应该得到保护？法国大使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做出保护的決定，而帝国代表萨尔茨堡大主教则竭力抵消他的影响。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接连征服多座城镇，但帝国议会仍然保持沉默。9月，选侯们宣称赞同调解而不顾西属尼德兰是否构成帝国一部分的问题。萨尔茨堡肯定该地是帝国组成部分的议案在诸侯中仅得到30票，而赞成调解的有41票，另有13位代表未得到训令。在以后数周里，双方继续进行各自的努力：由于法国大使的影响越来越占上风，萨尔茨堡大主教不再坚持，事情也就无声无息地搁置起来了。只是等到1674年新的侵略行动发生后，帝国议会才最终向法国宣战。可是甚至到那时也仅有部分邦国提供宣战決定要求它们提供的部队充实帝国军队，而弗兰科尼亚和士瓦本两地区以及巴伐利亚则反对皇帝的

军队在它们境内扎营。奈梅根和约签署（1679年）以后，不下于六个选侯国——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科隆、美因茨、特里尔和萨克森——站在法国一边，或者是旨在通过与路易十四的联盟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或者是迫于地理位置不得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然而1680年以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新选侯采取了一项较为亲近维也纳的政策，把亲法集团的领导权留给了勃兰登堡大选侯。

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权势处于极盛时期的那些年月里，帝国议会就组建军队以捍卫帝国的问题取得了真正进展。1681年5月制定的一项帝国法令规定了军队的数量为4万人，其中骑兵1.2万，步兵2.8万。该总数接着在帝国十个地区进行分配，奥地利地区应出20%，勃艮第、上下萨克森、士瓦本和威斯特法利亚地区各出10%。在各地区内，各小邦必须提供自己的部队，具体分配事宜由有关地区内各小邦自行处理。这就意味着在当时小邦数量最多的士瓦本地区，部队得由91个不同的小邦，包括31个帝国自由市来提供。同时帝国战时金库建立了起来。皇帝可以亲自指挥帝国军队或委任一名帝国元帅，而帝国议会则任命各路将领。路易十四在莱茵河右岸修筑的要塞——菲利普斯堡，还有1697年后的凯尔——在法国归还后被当作帝国的要塞加以维持和卫戍。1681年规定的兵员数如果需要可以增加，它也确实很快就扩编了50%，达到6万人。根据1702年11月的法令，兵员又增加到12万人，其中8万人常备不懈（*duplum*）。然而问题来了，那些自己已拥有常备军的诸侯国如勃兰登堡不希望向其他地区的军队提供自己的部队。因此实际上，整个组织体系仅仅在受到路易十四直接威胁的帝国西部地区起作用。1697年巴伐利亚、弗兰科尼亚、士瓦本、威斯特伐利亚和两莱茵地区订立了一个联盟，它在1681年法令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6万人的军队，和平时期减至4万人，并对具体的组织结构作了规定。正是这支军队许多年里捍卫了莱茵边界反对法国的侵略，卫戍帝国沿莱茵河的要塞。因此这就证明了三件事：一是并不需要每一个诸侯国都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二是帝国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界；三是划分地区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实际意义。某些地区成功地处理了诸如贸易、关税、货币、筑路、法律和治安、健康和福利等事务。在西南部，它们采取措施在更大的程度上协调司法和经济事务，这对帝国内这个最为四分五裂的地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仍有迹象表明货真价实的另一帝国机构是维也纳的宫廷会议。对于诸侯所辖的臣民和三级会议来说，帝国法庭是他们与帝国之间尚存的联系，因为他们可以向之提出申诉或上诉，即使是控告其君主也可以，除非该君主享有免于上诉的特权，而享有这种特权的又仅有四五位君主，例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君主。宫廷会议（Reichshofrat）的重要性稳定地与日俱增，因为它处理案件比帝国最高法庭更为迅速、更有效率，它的程序规则更为灵活，实施其判决的手段也更为有效。因此，许多当事人宁愿接受它的审理。宫廷会议有权处理诸如封地和特权等问题，并且是帝国内终审上诉法庭。它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任命它的主席、副主席和18位成员，其中6位必须是新教徒。1654年皇帝根据自己的权力颁布有关宫廷会议程序的规定，使帝国三级会议失去一切参与和施加影响的机会。宫廷会议的司法权有助于保护德意志某些诸侯的臣民反对其君主专制的极端暴政，阻止梅克伦堡、符腾堡、于利希和贝格公爵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然而由于免于上诉的特权被授予好几个诸侯世家（有些甚至不属于选侯之列），于是在18世纪宫廷会议的权力范围逐步受到限制。

另一个帝国法庭，即帝国最高法庭（Reichskammergericht）的重要性则在持续下降。1688年之前帝国最高法庭的驻地在施派尔，而在巴拉丁遭受第二次浩劫后又迁移到韦茨拉尔。对于诸侯的臣民来说，它是终审上诉法庭，而对于那些不属于任何诸侯的臣民（例如帝国自由骑士）以及在发生否定司法的案件时它又是初审法庭。皇帝委任法庭的庭长，但它受皇帝的影响很小，而受帝国各邦的影响要大得多。法官中有24名由选侯任命，另有24名由诸大区任命，仅有2名由皇帝任命。然而由于缺乏经费，法官的数目从未超过18人，而且常常还要少得多。帝国最高法庭因其程序拖拉而名声不佳：案件可以拖延数年，有时拖延几个世纪都得出不了结论。巴拉丁遭劫和内部争斗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衰落，这又促进受到皇帝青睐的宫廷会议的崛起。为加快对悬而未决的上诉案的审理曾派出帝国代表，但直到1767年他们才开始工作。除了以上两个帝国法庭之外，还设有一个由副宰相领导的帝国公署（Imperial chancery），它作为管理帝国的秘书处为皇帝服务，以区别于他的世袭领地的管理，后者的管理机构有帝国枢密院、枢密会议和内务府等^[18]。

如果说帝国几乎已经失去一个国家的特征，那么政治生活的重心转向了诸侯国。大诸侯采取专制政府的原则，力图通过牺牲弱小邻邦和自己臣民的利益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们这种兼并和“加强自己地位”的政策势必要导致与那些起制约这种企图作用的机构，尤其是自己的三级会议发生冲突。在大多数诸侯国，三级会议拥有广泛的特权。首先是财政权，这使统治者需依赖它们对征税的投票，无论这些税收是用于不断增长的宫廷开支，还是用于维持其军队或发动战争。其次，在许多诸侯国，各地三级会议在行政方面还拥有强大的影响：通过承担君主愈来愈多的债务，它们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官员和常设委员会，与邦国机构并存或者取而代之。再次，在某些诸侯国，它们还获得定期集会的特权，或者无须经统治者召集就能够开会的权力。诸侯们对这些特权极端反感，他们希望摆脱任何羁绊，一心想着建立自己的行政体制。这种趋势在利奥波德一世被选为皇帝以前就已清晰出现，但许多诸侯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让步，他们希望通过1654年“议事总结”将已取得的权力扩大到他们有关军事的所有方面，并希望看到三级会议的财政权被取消。1670年帝国议会通过一项其内容大致符合诸侯愿望的建议案，但皇帝本人拒绝予以同意。于是，那些特别倾向于专制统治的诸侯们，即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科隆、巴拉丁—诺伊堡等国君主于1671年6月结成同盟，以便在其三级会议以武力抵抗他们，或它们拒绝给予防务或维持要塞所必要的款项或者拒交帝国和地区已经同意的款项时，相互进行支持。德意志诸侯发现，要做到联袂反对他们的三级会议是轻而易举之事，因此勃兰登堡大选侯、巴拉丁伯爵菲利普·威廉（也是于利希和贝格公爵）一起设法拆散便于利希，克勒弗、贝格和马尔克的三级会议联合在一起的传统同盟。

路易十四以他拥有无限权力的榜样鼓舞着许多德意志诸侯。如果说他们无望与法兰西国王的显赫一争高下的话，如果说他们的军队不可与他的军队同日而语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在内卡河或斯普雷河河畔建起小凡尔赛。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二世修筑一座歌剧院。供养了一支拥有1名指挥、2名助理指挥、4名意大利作曲家和46名歌手的乐队。1648年在符腾堡宫廷上演一出名为“快乐的约会”伴有芭蕾舞的歌剧，参观凡尔赛几乎成了德意志诸侯的王孙公子应尽的义务，这很快又为高级贵族所仿效。1671年符腾堡枢密院院长神气十足地向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描述了符腾堡王子盛大的法国之行。

两位王子抵达巴黎后，在他们的下榻处很快受到达官显贵的拜访，并多次在这些人的邸宅受到隆重款待，最后德·蒂雷纳元帅用自己的马车送他们去卢浮宫进行陛见，在那里国王陛下非常友好地接见了他们。觐见之前他们被告知在接见时国王将不戴帽子，而是光着头与他们谈话。就这样在他的私室里国王与他们进行了整整半小时非常礼貌的交谈，这是一种殊荣……[\[19\]](#)

凡尔赛的太阳甚至使很小的星星也闪闪发光。法兰西的风尚和法国的统治方式越过了莱茵河，法国的金钱对许多诸侯的宫廷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1679年以后，法国大使雷伯纳克伯爵在柏林影响巨大，他在大选侯的臣仆中大把大把散发金钱，恰如法国的驻英大使在查理二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的所作所为那样。

在德意志诸侯中，四个世俗诸侯国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但在这一时期，巴拉丁失去了它长期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当1649年选侯查理，路易回到他的备受蹂躏的土地上时，他采取了专制统治的方式，试图恢复贸易控制经济，改善教育和平息宗教纷争。他也建起一支常备军——其数量在战时增加到8000人以上——和包括军事委员会在内的军事管理机构。为了维持它们，他对酒、水果和肉类开征经常税。这位选侯强烈反对所有特权和对国家权力的任何阻碍。在他的严厉统治下，巴拉丁开始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复苏，但1673年可征税的资产估计仅有1618年数字的1/4，在不同区域它是战前数字的1/6—3/5。然而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683年巴拉丁选侯所属的锡门世家无嗣，便由诺伊堡旁支继承选侯之位，而诺伊堡世家同时还统治着于利希和贝格两公国。早在1674年巴拉丁已遭受法国人严重破坏，现在路易十四以其弟的名义又对它提出继承要求，因其弟娶了锡门家最后一位选侯之妹伊丽莎白·夏洛特为妻。战争随之而来，其结果是巴拉丁遭到第二次浩劫，比起上一次，这次更为彻底，也更为蓄意。在许多毁坏一空的城镇和村庄中就有首都海德堡，它的古老的大学和华丽的宫殿也未能幸免。遭到连续打击的巴拉丁从此一蹶不振。此外，新选侯约翰·威廉是一位天主教徒，他很快就开始镇压加尔文教徒，他们中许多人只得逃到国外寻求避难之所。就这样，巴拉丁失去了在德意志诸侯中的领导地位而成了诸多小邦中的一个，甚至到18世纪它也未能恢复其原有的地位。

另一个由维特尔斯巴赫世家统治的选侯国，即巴伐利亚，则从三十年战争中崛起，它的实力大增，尽管也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马克西米连一世是天主教联盟的公认领袖，获得选侯的称号并征服了上巴拉丁，在那里他压制了三级会议并实行反宗教改革的政策。在巴伐利亚他也奉行专制统治的原则。正如去世前不久他在留给他妻子的“遗言”中所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邦国的君主和三级会议之间都有利益冲突，因为各等级总是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特权和自由，逃避承担和交纳君主根据其权利所应享有的赋税，或者至少用尽办法减少这种负担。因此，除非特别重要的原因，召集议会是不明智的，因为各等级只是利用议会发泄不满和要求新的权利。^[20]于是三十年战争之后尽管各等级一再要求，议会却从未召集过，但它们成功地做到使军队解散，只剩下少量的卫戍部队。马克西米连的继承者斐迪南·马利亚（1651—1679年在位）秉承乃父的统治手段。其核心是枢密院，其他负责财政、军事和宗教事务的中央权力部门均从属于枢密院，成为其执行机构。为了监督地方当局和诸如“治安”、农业、贸易、工业、宗教和学校等事务，财政总管（Rentmeister）被用作无远勿届的统治工具，他们的多重职能与法国按察使（intendants）的职能相仿。选侯将全邦当作他的私产一样来管理，并以保护人的姿态来统治其臣民。通过开征新税和审慎地利用垄断权，选侯的收入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这些收入被部分用于鼓励音乐和艺术的发展。为数二三千人的一支常备军建立了起来，但只是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期间才达到较为庞大的规模。经历了若干年并且在等级委员会屡次三番的请愿下，斐迪南·马利亚同意召集一次议会。在中断了57年之后它终于在1669年召开了：这是“旧时代”（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时代——译者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议会。各等级同意在九年内每年提供37.2万盾，并承担选侯的绝大多数债务。它进一步授权其20名代表同意在必要时再征20万盾，如果还不够则召集等级会议。但几天后选侯发布一道敕令，更改了这一条文。敕令授权代表们与他一起决定当务之急的事情，并在发生空缺时可增补新成员。因此，各等级的代表得以继续每年集会数次，通过政府所需要的赋税额，陈诉疾苦，监督各等级的财政及其官员的工作。斐迪南·马利亚的继承者马克斯·埃曼努埃尔（1679—1726年在位）甚至更不关心三级会议的特权：他把它当作一个无用的机构和一个妨碍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的赘疣。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站在路易十四一边，因而遭到帝国的声讨，并在布

兰海姆（Bleuheim）一仗之后被驱逐出巴伐利亚^[21]，1714年他复辟后继续实行专制主义政策，但没有取消各等级代表尚存的权利。

德意志东部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这两个新教诸侯国，其地位在三十年战争后的时期里甚至比天主教的巴伐利亚还要突出。关于勃兰登堡的情况另有专章详加论述^[22]，但在这时的两国中倒是萨克森依然远为发达、富裕和人口众多。作为战争的结果萨克森获得了卢萨蒂亚以及迈森、梅泽堡和瑙姆堡三个业已世俗化的主教区。不久，一个更为重大的目标即波兰在萨克森选侯的政策中居于突出的地位。但攫取波兰的价值，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要在波兰撒出大量金钱，其中一部分要花在贿赂有选举权的贵族身上，正是这个波兰王国耗费了韦廷世家许多精力，因而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来发展自己的邦国——而发展自己的邦国却是霍亨索伦世家所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政策。波兰以及萨克森选侯因波兰而使自己卷入的多次战争——尤其是18世纪初的抗瑞战争，当时萨克森为瑞典军队所占领^[23]——是萨克森衰落的重要原因。从勃兰登堡的角度看来，十分幸运的是大选侯及其想当波兰国王的长子均未能实现其野心。与勃兰登堡和巴伐利亚不同，萨克森的各等级没有丧失其权力，相反选侯所负的沉重债务迫使他们对各等级做出新的让步。1661年各等级的代表获得自行召集会议以讨论重要事务的权利，如果选侯想改变国教即路德教，那么各等级对筹款的表决就会归于无效和作废。宗教问题加强了各等级对专制君主制的抵制，因为1697年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为了获得波兰王位成了罗马天主教徒，这就丧失了他作为萨克森教会最高领袖的权力，（此权力转归枢密院）。腓特烈·奥古斯特不得不出售或抵押出许多土地和特权，但他使首都德累斯顿成了艺术中心，并建立了迈森陶瓷工场，该工场在德意志是第一座，很快出了名。17世纪后期萨克森还组建了一支约1万人的常备军。这支军队在萨克森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起了突出作用，并增加到近2万之众，仅次于勃兰登堡军队的数量。但是常备军的发展并没有摧毁各等级的权力，三级会议继续定期召集，其影响要到18世纪初萨克森仿效勃兰登堡实行普遍货物税之时才下降。对金钱愈来愈大的需求，宗教势力的反对以及陷于波兰问题等因素都使萨克森选侯不能亦步亦趋地仿效霍亨索伦世家的做法，常备军相对来说依然规模较小，萨克森也依然是一个立宪君主国——相对于普鲁士王国而言。

1692年汉诺威成为最年轻的选侯国，由于那种在德意志公侯世家中司空见惯的兄弟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土的分割，它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阻滞。最近的两次分割发生于1641年和1665年，但1683年汉诺威的埃内斯特·奥古斯都在其领土上实行长子继承制，1705年其子乔治·路易选侯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公爵领地，9年后又登上英国王位。17世纪下半叶，汉诺威的约翰·腓特烈和埃内斯特·奥古斯都两位公爵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反对路易十四和土耳其人以及平定匈牙利人叛乱的战争。利奥波德皇帝将埃内斯特·奥古斯都升格为选侯，即系皇帝对他效劳的奖赏。埃内斯特·奥古斯都还曾支持奥兰治威廉的远征。在选侯的控制下，汉诺威的管理由枢密院进行，它设有四院，分别掌管财政、司法、战争和教会事务，宫廷受到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影响^[24]，但统治集团由贵族构成，这就阻止了绝对专制政府的建立。这种趋势在18世纪得到很大加强，因为选侯频繁出国，故而政府掌握在选自本邦贵族的摄政手中。所有重要职务都为少数几个家族所控制，社会等级森严，由贵族所主宰的三级会议实际上统治着国家。传统的分野依然存在，三级会议中分有7个不同的集团，代表着组成该选侯国的一些公国和州郡。恰如萨克森几代选侯陷于波兰事务而妨碍了他们在德意志起领导作用一样，汉诺威几代选侯陷于英国事务而影响了他们集中精力于其德意志的发展和统一。

此外，在汉诺威以北的荷尔斯泰因公国，17世纪后叶三级会议已完全失去其影响。在那里，联合统治者——荷尔斯泰因公爵和丹麦国王——充分利用1654年帝国“议事总结”^[25]所授予的权力，这些权利得到下萨克森地区所做出的一项决定的支持。统治者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有决定要塞和卫戍部队的维持等事宜的权力，可是三级会议却拒绝向他们提供必需的资金。然而，1659年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奇公爵登位后要求每年春季定期征收用于军事目的的赋税：如果三级会议不同意，那就要由政府来征收。当三级会议指出这是它的特权时，政府宣称这种特权仅仅构成某种私法，而帝国和地区的决定则是基本法和公法。当各等级坚持应首先解除其苦楚时，统治者加以拒绝并着手强行征税。1675年最后一届议会被召集，当争论重新发生后就被勒令休会，以后再也没有开过，三级会议也就完全失去其影响。德意志西南的巴登-杜拉赫侯国的发展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它在三十年战争

中遭受严重损失，在路易十四发动的几次战争中损失甚至更惨重。1668年这里也召开了最后一届议会，这届议会在未进行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将财政权和债务管理权移交给了侯爵腓特烈六世。宪法没有废止，但议会不再召集，因为它已没有什么用处了。巴登—杜拉赫侯国的统治方式是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它消除了一切纷争，促进了经济复苏。1771年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明确地指出，三级会议这一名称已被遗忘久矣。

然而在其他一些诸侯国，正如在萨克森那样，三十年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三级会议继续保留了甚至扩大了它的权力。在荷尔斯泰因以东的梅克伦堡公国，公爵也要求不经三级会议同意而征收用于军事目的的赋税的权利。1659—1663年，三级会议向皇帝利奥波德和宫廷会议提出申诉，皇帝和宫廷会议对其特权均予以肯定。由于受到帝国最高当局的支持，1671年它便拒绝支付帝国议会所同意的援助联合省的款项，于是公爵动用武力强行征收。当三级会议再次向宫廷会议提出申辩时，宫廷会议未予受理，但冲突仍在继续。1698年宫廷会议决定，如果赋税是为帝国征收的，三级会议有义务支付。三年后一项协议达成，为军事目的每年将征税12万塔勒，其中贵族、城市和公爵领地各出1/3。协议得到皇帝的同意，可是又为部分贵族所拒绝。在北方大战期间新的冲突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查理·利奥波德公爵站在彼得大帝一方，俄国军队占领了梅克伦堡。^[26]三级会议拒绝批准所要求的大笔款项，公国中唯一重要的城市罗斯托夫又向宫廷会议发出呼吁。但是在1715年该城市不得不投降，接受了公爵的条件。同年经梅克伦堡的三级会议和汉诺威的选侯乔治·路易请愿后，皇帝查理六世颁布了“帝国制裁执行令”以压制查理·利奥波德，并把执行权授予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邦君主。他们的军队在俄国军队撤离后占领了梅克伦堡公国，实际上废黜了查理·利奥波德。根据宫廷会议的决定，1728年该邦统治权授予他的兄弟，在三级会议的帮助下宪政恢复了。到18世纪中叶冲突再起，但得到宫廷会议支持的三级会议再次战胜公爵，它的特权仍然有效。

如果说梅克伦堡的三级会议为贵族所支配的话，那么西南部的符腾堡公国则情况相反：在那里三级会议仅有大约60个城镇和14个世俗化修道院的代表所组成并且是一院制，这是罕见的例外，其原因在于贵族早已是帝国自由骑士。在符腾堡，公爵和三级会议之间的主要争

执也是有关常备军问题。三级会议顽强地拒绝提供和平时期维持军队的资金，而且做到在战争刚一结束时，就使军队减少到只有二三百人。当腓特烈·查理公爵在17世纪90年代将民兵转为正规军时，三级会议宣布这是违宪行为并向宫廷会议上诉，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18世纪冲突依然存在，这期间三级会议先是节节败退，但最终还是成功地重新发挥了其影响，原因在于它得到了宫廷会议与普鲁士和英国两国国王的支持。在符腾堡从1733年起三级会议就在反对罗马天主教，这也加强了它抵制专制统治的力量。

因此，德意志不同地区的宪政发展情况迥异，其影响则持续到20世纪。但是，西南部巴拉丁和巴登的情况和东北部梅克伦堡的情况绝不表明西南部较为宪政化和“自由”而东北部较为专制。不同的发展情况不能拿地理因素来解释，也不能拿社会结构的不同来解释，因为梅克伦堡的三级会议——像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一样——由贵族所控制，而符腾堡的三级会议则由小城镇的市民所支配。只是在萨克森存在着贵族和城市的平衡，在诸城市中莱比锡最为重要。另外，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贵族像在梅克伦堡一样处于支配地位，专制统治取得胜利，所建立的常备军远比其他任何德意志诸侯国的常备军庞大得多。这首先归因于霍亨索伦世家果断的政策：在三十年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的坚韧不拔帮助他们超越了维特尔斯巴赫世家和韦廷世家。个人因素在这方面至关重要。除了普鲁士，其他国家的常备军仍然规模很小，拥有传统自由和宪法权利的三级会议只是在少数诸侯国不复存在。无论哪里，只要三级会议的影响得到维持，只要军队的影响没有遍及全邦，传统就依然具有生命力，它将有利于近代自治和代议制的建立。

[1] 有关详情见前第6章边码第126—127页（原书页码）。

[2] 见边码第452、454页（原书页码）。

[3] 慕尼黑国家档案馆，“旧巴伐利亚地区”全宗，第1993号：呈交1668年11月20日审查酒税征收情况的三级会议代表之报告。

[4] 沃尔夫·黑尔姆哈德·冯·霍贝格，《农事览胜》，第一篇：“贵族土地和田野生活的翔实记述与剖析……”（纽伦堡，1682），第1、46、53、150节，有趣的是，这位奥地利贵族认为波希米亚农民的农奴处境及其无限制的劳役“并不符合德意志土地的习俗”，毫不顾及德意志东北部的状况。详情见边码第20章边码第480—481页。

- [5] “诺因霍蒂根和海姆布赫嫩两地农民的恶行陋习举例”，作者为瓦尔堡的冯·韦罗安德罗。
- [6] 《腓特烈·威廉一世与普鲁士农业工作》，帝国鲁士档案馆出版，第二卷（莱比锡，1878），第213、216—217页；报告日期为1710年10月14日。
- [7] 保罗·温克勒尔：《贵族》，克里斯托夫·里格尔斯出版（纽伦堡，1697）。
- [8] A. 特鲁克：《理性主义溯源》，II，2（柏林，1862），第197—198页。
- [9] A. 特鲁克：《理性主义溯源》，II，1（1861），第121页。
- [10] 西比尔·罗森菲尔德编：《乔治·埃瑟里奇爵士书信集》（伦敦，1928）。
- [11] 约翰·米夏埃尔·冯·莱昂：《贵族论》（乌尔姆，1752），第271，290页。
- [12] “罗马月”的征收最初是为了资助帝国对罗马的远征，16世纪以后变为由帝国议会同意提供的旨在供养帝国军队的补助金，它根据固定份额再分摊给帝国各邦的三级会议。
- [13] 《乔治·埃瑟里奇爵士的书信集》，第61页。
- [14] 宫廷会议（Aulic Council）为神圣罗马帝国时的私人顾问会议，主要享有最高司法权。设于1501年，1806年帝国瓦解时不再存在。
- [15] 见边码第455—456页（原书页码）。
- [16] 均引自《乔治·埃瑟里奇爵士书信集》，第210、270、328、416页。
- [17] 见前第9章第210—212页。
- [18] 关于哈布斯堡的政府机构，见边码第20章第477、485页（原书页码）。
- [19] 斯图亚特国家档案馆，《大事卷》，第71卷，第270宗：1671年2月13日报告。
- [20] 克里斯蒂安·吕普雷希特，“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一世1651年3月13日留给其夫人的‘遗言’”，见《上巴伐利亚祖国史文献》，第59集（1895—1896年），第317页。
- [21] 关于这些事件，见第6卷第8章。
- [22] 见后第23章边码第543页以下多页。
- [23] 见第6卷第20章。
- [24] 关于莱布尼茨，见前第4章边码第82—85页；第5章第114—117页；第6章边码第145—146页（原书页码）。
- [25] 见前边码第445页。
- [26] 关于此事详情，见第6卷第30章。

第十九章 三十年战争后的意大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前，意大利是一张庞大的欧洲利益交汇网络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它是大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并且是西班牙帝国扩张的主要基地之一。西班牙一天主教的政治利益，是与热那亚、米兰、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航运、银行、工业及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广泛的经济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创了西班牙的帝国主义，遏制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作为间接的结果，意大利被挤到欧洲历史的主流之外，并在欧洲列国中仅限于据有一种极为次要的地位。故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意大利历史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虽然其影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显示出来。和约并没有立刻终止使亚平宁半岛及半岛各邦卷入其中的争斗，即法西战争和威尼斯与其之间争夺干地亚的战争；也没有改变意大利的政治地图，这张政治地图的基本结构原是由卡托一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所确定的，并在某些细节上由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凯拉斯科条约（1631年）加以修改的。

西班牙仍然是其传统领地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的主宰。它凭借一系列战略要点，保持着对第勒尼安海——对帝国交通至关重要——及其沿岸诸国的控制。热那亚共和国及其自身的领土利古里亚和科西嘉仍然是西班牙推行其政策的保证，它受到一些战略要塞的监视，这些要塞位于费内尔侯爵领地（在利古里亚海岸，受西班牙直接统治）境内和卢尼吉亚那谷地（该地区处在波河流域与蒂勒尼安海之间，零落分布着马拉斯皮纳家族的封邑，这个家族理论上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封臣，但实际上是西班牙米兰总督的下属）。西班牙人还通过卢尼吉亚那控制着周围一些小邦，如Cybo的马萨公国和卡拉拉公国以及卢卡共和国，并监视着托斯卡纳大公国。此外，通过直接控制隶属那不勒斯总督的要塞和间接控制皮翁比诺公国（该公国自1634起成为卢多维西家族的封邑），西班牙还从南面遏制着托斯卡纳。最后，这些据点保护了从那不勒斯到热那亚的交通线，并间接控制了教皇本身。

与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巨大权势相对抗的是法国的权势，它在领土占有上无足轻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却非常有力量。法国通过凯拉斯科条约取得了皮内卢鲁要塞和毗邻的位于皮埃蒙特境内的阿尔卑斯诸山谷。它由此能够在任何时候派军队进入意大利，控制萨伏依公国及公国领土萨伏依、皮埃蒙特、尼斯和在利古里亚的包括奥内格里亚在内的一块飞地。克里斯蒂娜公爵夫人，也即他们年幼之子萨伏公爵查理·伊曼纽尔二世（1637—1675年在位）的摄政，曾希望凯拉斯科条约的条款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被废除，但没有成功。在此事上，皇帝斐迪南三世屈从了法国的要求，因而皮埃蒙特仍然是占据着都灵城堡的法国人与由米兰总督卡拉赛纳统率、驻扎在维尔塞利的西班牙军队进行厮杀的战场。意大利所有的小邦都围着这场大争斗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或支持法国，或支持西班牙。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意大利各邦推行了一种巩固内部的政策，这种政策往往体现在为大邦吞并邻近的小诸侯国，这些小诸侯国能从中世纪幸存下来，本身就是时代的错误。吞并进程自然引起了一些地区性冲突，它们转而又与法西之间的大争斗联系在一起。在亲西班牙的热那亚与法国的仆从萨伏依世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冷战”；萨伏依世家同时还与统治曼图亚和蒙费拉托的贡扎加—内维尔公爵世家公开敌对，为的是争夺位于伦巴底、皮埃蒙特及利古里亚之间具有战略地位的蒙费拉托领土。法国通过凯拉斯科条约已成了这场争斗的仲裁者并使萨伏依沦为附庸，同时它还想以贡扎加—内维尔世家将阿尔巴和特里诺割让给萨伏依为条件，保证贡扎加—内维尔世家拥有蒙费拉托。但是，西班牙以武力反对这一裁决，而贡扎加—内维尔世家虽然祖上是法国人，却也不愿放弃阿尔巴和特里诺。于是，法国人在1648年驻军于蒙费拉托的最大要塞卡萨尔，而卡拉塞纳则试图把贡扎加—内维尔世家的查理二世（1647—1675年在位）争取过来。与此同时，卡拉塞纳还利用莫德纳公爵费朗西斯一世·埃斯特（1629—1657年在位）对科雷纳奥小诸侯国的野心，竭力争取这位公爵。就法国方面而言，它也支持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拉努齐二世·法尔内塞在拉丁姆的封邑卡斯特罗。

此外，马扎然对托斯卡纳发动了一场征讨以占领皮翁比诺及其要塞的战争。但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的斐迪南二世一面保持审慎的中立，一面继续倾向于西班牙。他这样做是希望继续执行其祖先的传统

政策，即在卢尼吉亚那和马雷马这两个战略地带努力加强边防。美第奇家在马雷马地区已取得了皮提格里亚诺（1604年）和桑塔·费奥拉（1634年）两伯爵领地，而对卢尼吉亚那地区，他们则觊觎彭特莫雷利，该地早先是马拉斯皮纳家族的封邑，是通往西萨关的要冲，因而也是通向整个卢尼吉亚谷地的关键。

罗马教廷也推行兼并政策，在夺取了费拉拉公国（1598年）和乌尔比诺公国（1631年后），它现在又觊觎起卡斯特罗。但英诺森十世·庞菲利（1641—1655年在位）最为关心的是确保天主教国家间的和平，以图一面重建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受到重创的教廷威信，一面对抗正在干地亚（克里特）岛进攻威尼斯人的土耳其。^[1]这样，教廷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尽管以往冲突不断，现在却在政治目标上趋于一致，即两者都希望和平并结成基督教反土耳其阵线。此时威尼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执行一项中立的政策，旨在既利用它与法国的传统友谊，又利用西班牙对土耳其人的传统仇恨，左右逢源。

在黎塞留的心目中，凯拉斯科条约应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征服意大利的野心勃勃的政策，也就是与16世纪法国诸国王所推行过的相似的政策。但在1648年，法国缺乏执行这项政策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法西两国都因三十年战争而精疲力竭。这样，它们在意大利的争斗就变成了一场无关痛痒的拳来脚往。在起初阶段，投石党运动^[2]引起的危机使西班牙人得以把法国人从卡萨尔和皮翁比诺等要害地区逐出并通过满足几位意大利君主的野心使他们归附自己。英诺森十世因此能够从亲法的法尔内塞那里取得了卡斯特罗（1650年），美第奇家的斐迪南二世也免除了法军驻扎皮翁比诺的威胁，并在1650年获取了彭特雷莫利。卡拉塞纳答应让已成为西班牙盟友的弗朗西斯一世·埃斯特吞并科雷吉奥，而贡扎加—内维尔家的查理二世也加入到西班牙一方，并在1652年夺回了卡萨尔。然而，此后不久，马扎然重掌大权（1653年），成功地勾销了西班牙所取得的上述种种成果；但马扎然自己也没能够劝使意大利各邦组成一个足够坚强的联盟来抵抗西班牙人。这主要是由于威尼斯人拒绝参加；他们太专注于干地亚事务了，以致不愿置身其他任何地方的活动。于是，马扎然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求决定性的外交胜利，他转而图谋与克伦威尔的英国结盟。

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大利发生了一个插曲，这个事件本身很小，但由于它对英国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对英法关系颇为重

要。1655年，萨伏依世家在马扎然的默许下派遣一支讨伐军前往皮埃蒙特阿尔卑斯山区的瓦尔登西安诸谷地，讨伐自己属下的新教臣民。这支军队肆意蹂躏诸谷地区，犯下种种暴行，却仍未能彻底扑灭抵抗。“瓦尔登西安复活节”事件激怒了新教国家的公众，弥尔顿在他的一首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中就热情讴歌了该事件的遇难者。克伦威尔威胁要派舰队到意大利海岸实施报复，而马扎然为了获取他的友谊，主动承担他与都灵宫廷间的调解人。结果，瓦尔登西安人得以安居乐业，意大利则第一次得知了英国海军力量的大增。与此同时，马扎然还成功地争取到了莫德纳公爵弗朗西斯一世，公爵娶了马扎然的一个侄女，与卡拉塞纳断绝了来往，甚至率领一支法国军队推进伦巴底，连战皆捷，但1658年他在激战中身亡；而马扎然也没有把他的意大利攻势贯彻到底，倒是在佛兰德斯，他借助与英国的同盟大获全胜。

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恢复了意大利的战前状态。西班牙保住了它的传统领地，法国则占有皮内卢鲁要塞并由此得以对萨伏依公国进行控制。西班牙人撤出了维尔塞利，法国人也早就离开了都灵城堡。但显而易见，西班牙的政治和军事衰败正在加剧，而罗马教廷威望的低落也同样明显：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基吉（1655—1677年在位）竟未获准参与媾和谈判。意大利旧有的西班牙一天主教体制的支柱正悄悄地倒下，却不见形成任何可以替代这个体制的新秩序。尽管西班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继续衰落，法国却也未作任何把西班牙逐出意大利并取代其统治地位的认真尝试。法国甚至丝毫没有把意大利利益与其自身利益有机联结起来的企图。它满足于在皮内卢鲁驻扎军队，时而炫耀一下军事力量来恫吓半岛上的各邦。让意大利保持稳定，不惹什么麻烦，而法国军队则在其他战场获取更重要的目标，这就够了。故而，意大利在1659年到1690年之间度过了一个政治上没有波澜的时期，在此期间，至少从所有的外观上来说，意大利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这种政治上没有波澜的局面由于下列事实而显得更为突出，那就是意大利最强大的自主邦威尼斯一心扑在干地亚战争上，无暇顾及意大利事务达25年之久。与西班牙一味征讨土耳其人的好战政策相反，威尼斯对土耳其人历来采取一种和平的政策，这是出于贸易实利的合理考虑。此外，威尼斯作为西班牙一天主教政策的传统敌对者，明显得益于三十年战争所引起的西班牙和教廷的衰落。然而，威尼斯还没

来得及从中渔利，就突然被迫投入一场大规模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威尼斯历史发生了巨变。

尽管威尼斯谨慎地避免与土耳其人发生任何争吵，却没法阻止土耳其政府在1645年派出一支强大的远征军进攻威尼斯所属的干地亚岛。当时的时机对土耳其人极为有利，因为基督教国家正忙于在三十年战争中相互厮杀，无暇派兵援救干地亚岛，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最强大对手西班牙，此时已遍体鳞伤了。至于威尼斯本身，从军事观点来看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似乎这还不够，拙劣的威尼斯殖民统治早已激怒了干地亚的居民，以致他们对岛上的防务袖手旁观。土耳其人在几周之内（1645年6月至8月）就攻占了坎尼亚城，然后横穿全岛围困该岛的主要据点干地亚城。在以往相似的情况下，西班牙和教廷都曾成功地调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但这次，它们只能派出一支归皮翁比诺亲王尼科洛·卢多维西统率并由那不勒斯、托斯卡纳、教皇国和马耳他等邦船只组成的舰队，这支舰队到达太晚了，没能挽救坎尼亚。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威尼斯人都未得到任何真正有效的支援。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威尼斯外交仍未能有所建树，西班牙和法国继续相互争斗，建立基督教联合阵线一事仍然是难圆之梦。

但是，干地亚是威尼斯最富庶的领地，故而那个共和国是不愿拱手让人的。为了装备一支可观的舰队，威尼斯人决心采取各种应急的财政措施，诸如授予任何捐献大笔资财的人以元老称号等。他们用这支舰队夺回了制海权，切断了围困干地亚的土耳其军队的后路，并且从1647年起把战争推向敌人营垒。他们在1648年攻占了达尔马提亚的克利萨城，并多次击败土耳其舰队。在1656年的赫勒斯滂大战中，他们失去了统帅，但也摧毁了大批敌军战舰，把土耳其人封锁在达达尼尔海峡内。土耳其人打破封锁的企图在1657年遭到了惨败，新任威尼斯统帅拉扎罗·莫塞尼戈甚至还成功地率军冲进了达达尼尔海峡。莫塞尼戈向君士坦查堡的进军最后为土耳其的海岸炮台的炮火所阻，威尼斯舰队的旗舰被击沉，其英勇的统帅阵亡。

然而，经过12年的战争之后，威尼斯共和国精疲力竭了。它没能摧毁土耳其人的坚定信心，他们在穆罕默德·柯普律吕的铁腕政府领导下重新振作了起来，^[3]威尼斯舰队丧失了制海权，起初的那种运动战逐渐变成了一场围绕被困的干地亚城的消耗战，在这种消耗战中，

奥斯曼帝国因拥有较多的人力物力而占据了优势。威尼斯人又以异乎寻常的顽强继续战斗了12年，但干地亚战争之于他们就像尼德兰战争之于西班牙，成了一个无底洞，他们不断地往里面倾注人员、资金和装备，却无济于事。

威尼斯的外交活动也毫无成效。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后西班牙疲惫不堪，而马扎然统治的法国仅派出一小支援军，威尼斯新任统帅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想方设法把这支部队增派给干地亚驻军，但收效甚微（1660年）。土耳其政府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爆发的一场新的战争终于使干地亚的形势有所缓解，因为它引开了大批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但在1664年，威尼斯人又一次孤军奋战了，仅仅从几个意大利邦君处获得一些微不足道的援助，如萨伏依的查理·伊曼纽尔二世等，伊曼纽尔二世希望通过这条途径诱使威尼斯人给予他与国王相同的待遇。稍后，教皇克雷芒九世·罗斯皮里奥西（1667—1669年在位）在意大利和帝国各邦中积极地募集援兵，并努力促成1668年的埃克斯—拉—夏佩尔条约^[4]以结束移归权战争，其意在于希望路易十四最终能把强大的法国军事力量用于基督教事业。但法国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利益对法国来说太重要了，以致它不愿像以前的西班牙那样成为反土耳其人的堡垒。法国的干涉仅限于派遣一小支军队，且在教皇的麾下作战以免与土耳其政府决裂，法国干涉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荣耀，或许更是为了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改善准许法国人经商的条件。几个月后，法国人抛弃了干地亚，光剩下莫罗西尼和区区3000名因残酷战斗和给养殆尽而奄奄一息的幸存者。1669年9月，莫罗西尼终于不得不撤离了被困达23年之久的干地亚，在这场围困中，近10万人死于非命。

威尼斯人无疑作了坚强的防御，当他们投降时，给予他们的条件相当优惠：他们保留了苏达、斯皮纳隆加和卡拉布萨等要塞，还有克利萨城和爱奥尼亚海的赞特岛。然而，仍有人严厉指责那些被认为对失败负有罪责的人，莫罗西尼也在受审之列，但他被判无罪。战争有着比这些表面的不满现象更深刻得多的后果。威尼斯在开战之时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家，也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坚强对手。在战争中，它的地中海东岸贸易几乎全丢给了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而且它还转变成为天主教的支柱和哈布斯堡的盟友。这个转变的标志是，半个世纪前要被赶出威尼斯的耶稣会士竟在1657年被重新接纳，

以示这个城市奉承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之意。同样明显的是威尼斯的资本从航运和商业转向了土地。元老等级不再是一帮敢于冒险的资本家巨头了，而是变成了一群保守的地主贵族。

在这个时期，罗马教皇的精神威望和政治威望下降日益显著。这在1648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教廷的失败。英诺森十世由于他软弱无能，更由于他的那些贪婪无比的亲属，早已成为许多激烈批评和冷嘲热讽的靶子。在罗马路人皆知，只要某人能满足教皇骄横的嫂嫂奥林匹亚·马伊达尔基妮的金钱欲，他就能从教廷得到任何东西。贿赂公行和吏治腐败在教皇国是普遍现象。就在教皇宠爱的建筑师贝尔尼尼继续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创作成果装点圣彼得大教堂的同时，罗马平原上却是因疟疾滋蔓和盗匪横行而贫困不堪。这些情形在以后的几位教皇任内也没得到丝毫改善。

教廷与法国的关系也极不友好，部分原因是巴黎大主教雷斯红衣主教事件，这位大主教因参与投石党运动而受到马扎然的迫害。

为了安抚教皇，马扎然允许让教廷声讨扬森派教义（1653年）^[5]。但扬森派的宣传并未销声匿迹，而法国与教廷关系的难题似有成为对教皇的持续威胁之虞。英诺森十世死后被选为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是西埃尼斯·法比奥·基吉（1655年），他曾是出席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教皇特使；他对耶稣会的支持以及他的意识形态观念促使法国的限制教皇权力论喊得更响。他时常发布训谕斥责扬森派教义，他举行盛大的仪式接待脱离新教而改宗大主教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而且，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他还确保了耶稣会士返回威尼斯，但他与马扎然发生了冲突，马扎然个人对亚历山大七世怀有敌意，也不满罗马为逃离法国的雷斯红衣主教举行的欢迎仪式，更反对亚历山大呼吁法国僧侣支持他促成基督教君主间和平的尝试。这样，教廷在签订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时又遭受了一次道义上的失败，它也没能为威尼斯人提供帮助。在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政后，教廷处境更为恶劣。1682年，^[6]一些教皇的士兵与法国驻教廷大使克雷基的随从之间发生的一场无谓的小斗殴被渲染成采取激烈行动的借口：路易十四占领了阿维农，甚至还威胁要派兵进入意大利。教皇的地位是如此虚弱，以致他在1684年^[7]被迫接受解决这场争吵的极其屈辱的办法，他的兄弟马里奥·基吉被派往法国向路易十四作郑重道歉。

在亚历山大七世死后举行的教皇选举会议上，仍能感受来自路易十四方面的沉重压力，这次会议选出了一位托斯卡纳人朱利奥·罗斯皮里奥西，法名为克雷芒九世（1667年）。克雷芒是最后一位在教皇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来自托斯卡纳的当权者。多亏了他的外交才能和温和性格，克雷芒得以消弭与法国的紧张关系，从而促成签订1668年埃克斯—拉—夏佩尔条约的法西谈判，并保证了扬森教派问题暂时得到解决（1669年的“教会和平”）。但他试图劝说全欧支援威尼斯反对土耳其人的努力却彻底失败了，这一失败对他打击极大，他不久就去世了。在接着召开的教皇选举会议上，法国的压力更为无耻，并致使了一位年老体弱的罗马人阿尔蒂里当选，法名为克雷芒十世（1670—1676年在位）。克雷芒十世竭尽全力取悦“太阳王”，避免再发生争执；但即使是他心甘情愿的谦卑恭顺也不能使他免遭痛苦的屈辱，尤其在与狂妄的法国大使德斯特雷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德斯特雷不止一次地公开侮辱这位年迈的教皇。在克雷芒十世死后举行的教皇选举会议上，法国人坚持任何与克雷芒关系友好的红衣主教都不得当选，这不啻再次表明已故教皇已在路易十四那里失宠了。最后，伦巴底红衣主教奥特斯卡尔奇当选为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在位），他之所以获准当选仅仅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其前任的反对者。

但英诺森十一世与克雷芒十世不同，他具有较大的勇气和较强的决断力来维护教皇的特权。英诺森是一位严守原则、秉性稳重的教皇，他致力于教义方面的重要工作，鞭撻道德决疑法和寂静派的模糊的神秘主义，寂静派是西班牙人米格尔·德·莫利诺斯的门徒，他们在意大利颇有追随者。英诺森十一世更著名的事迹是他与受路易十四保护的教皇权力论的斗争，这突出表现在1682年有关《四条论纲》的争论^[8]中。英诺森也执行了组织联盟反对土耳其人的教廷既定方针，因而当土耳其进攻神圣罗马帝国时，他劝使波兰国王扬·索比斯基成为哈布斯堡的盟友进行干预。^[9]他创立了一个新的节日“玛丽姓名节”来庆祝索比斯基在维也纳城下的胜利（1683年）。1684年，他促成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之间的神圣同盟（关于此事下文还要谈到）。与此同时，他还在教皇国内努力消除裙带关系、打击贪污腐化、减少犯罪率，并着手整顿被几位前任的腐败统治损坏了的财政状况。他凭借着改革热情，不惜与法国大使（拉瓦尔丹）发生又一轮冲

突（1687年），因为拉瓦尔丹过分滥用外交豁免权。当路易十四再次威胁要派兵到意大利时，英诺森十一世毫不退缩。

就这样，一个长达40年的时期就结束了，在这40年中，法国对教廷采取的是一味进行恫吓和使用武力的政策。法国的这种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教廷在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威信，也丝毫无助于把法国的力量与天主教事业联结到一起，这与哈布斯堡王室把西班牙与反宗教改革运动联结起来的做法迥然相异。路易十四尽管摆出一副反新教的天主教卫道士的姿态，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并受到即将来临的对奥格拉斯堡同盟进行战争的威胁。^[10]法国的政策仅仅是消极性的，它有助于旧秩序的衰落，却无益于新秩序的诞生。

英诺森十一世的功绩无法掩盖意大利天主教的缓慢衰落，它似乎已经僵化了，依然停留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上，毫无迹象表明已认识到改革的需要。从表面上看，天主教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除了一些受宗教法庭严密监视着的小型寂静主义者集会以及一些法国扬森派分支外，它在意大利已没有任何对立面了。事实上，在意大利人懒散的迷迷糊糊的循规蹈矩和表面的欢呼雀跃的宗教狂热之底里，是一种完全的空虚，充斥这种空虚的大多是怠惰的怀疑主义而少有新颖的观点，往往还带有一种愚昧型的反教权主义。最能反映后一点的是一名叫格雷戈里奥·莱蒂的冒险家（1630—1701年），他来回于日内瓦、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在几十年里向意大利散发了无数恶意诽谤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虽然毫无价值，却风靡一时。

意大利政治上一潭死水的状况多少也是三十年战争带给它的可怕处境所造成的。亚平宁半岛在1648年时正处于一种经济和学术均趋衰败的状态，而且其人口也在下降。在以后的40年中，这种衰败更由于意大利孤立于欧洲历史的主流之外而愈加严重了。持续的衰落很久才到达最低点并稳定在一种较之以前要低许多的水平上。

战争带来的可怕瘟疫、兵匪的蹂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使意大利的人口锐减。在随后的40年中，人口差额只是缓慢地得到弥补，因为瘟疫的流行至少延续到1660年（虽然严重程度要小些），而其他一些消极因素，如独身教士的不合理增长、下层阶级的普遍贫穷和居住条件的恶劣等，影响得更为长久。1659年后的长时间和平确实

最终带来了某些改善，但城市仍未达到以前的人口水平。在16世纪后期，米兰和威尼斯分别有近25万和20万居民。两市都因17世纪前十年的瘟疫而失去大量人口，虽然后来两市有所恢复，但它们的人口都未超过12.5万和13.5万。这样的人口削减与同时期巴黎和伦敦的人口增长作一比较就更令人震惊了。

城市中心的衰败是更为普遍之现象的一部分。17世纪初，意大利仍是一个商业、工业和银行业都很繁荣的国度，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到该世纪末，意大利几乎成了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它的那些毫无生气的小城镇大多是行政中心或地主们的居住地。意大利的金融除热那亚以外已不再是国际经济的一个要素了。意大利商业主要存在于对往昔的回忆之中了。在当时主要的商业活动即殖民地贸易中，意大利人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的港口完全荒废了。（前面已谈了威尼斯如何失去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后面还将谈到墨西哥被剔除出地中海大港口之列的经过。）由于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一直是帝国传统经济中心之一的热那亚也严重受损。里窝那仍很繁忙，但它主要是外国商船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商船的转运点。工业也衰落了：米兰布厂的数目从17世纪初的70家下降到15家，而佛罗伦萨的丝织工业则完全绝迹了。造成这一惊人衰败的因素有：连累意大利3/4地区的西班牙帝国之崩溃，外国列强特别是英荷两国的竞争，以及法国重商主义的扩张。路易十四对意大利诸邦所采取的暴烈行动，总是伴随着无声的经济战，例如马赛与热那亚进行竞争、法国也生产威尼斯制品最著称的镜子等。这也是路易十四未能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有机纽带的又一例证。

于是农业便成了意大利的主要经济活动，但这基本上是由于农业具有消极保守的性质，只是偶尔某个地方出现改进的尝试。例如，在西西里，有些富豪营建了整座整座新村庄来安置其庄园的佃户。土地产业的日益固定不变也促进了妨碍技术改进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教会之手，而贵族庄园却由于财产托管和限定继承越来越不胜负荷，最后，商人家族越来越多地舍弃其传统经营而逐渐转化为土地贵族的趋势，导致了勤劳俭勉、算计锱铢的经济上创业习惯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饱衣终日、奢侈张扬的经济上寄生于人的贵族习气。17世纪中的意大利贵族把土地的收入当作能使他们不劳而获且保持高消费生活方式的资金；他们宁愿把钱花在修建豪华的别墅上也不太愿意投资于农业的改进。社会风气也显示了地产的重要地位和城镇的衰落。

人们以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来显示他们的时髦高雅，有无能力支付“田园生活”的花费往往被当作划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界限。土地的重要性与其在经济上的利用已没什么关系了。

社会本身在结构上越发变得僵化了。意大利正变成一个由无所用心、和蔼可亲的绅士和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农民组成的国家。除了贵族和教士以外，唯一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一小批各种专业人员组成的阶级，即教师、律师和官吏。另外，长期的和平和通货紧缩的总趋势结束了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混乱以及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盲流遍地的极端惨景。食品价格下跌了。生活是较为稳定的；民众固然忍受着贫穷和困乏。但他们能设法活下来，而且日子还相对安宁。

到17世纪末，这段长时期的和平开始慢慢产生好结果了，在某些地区，资本悄悄地积累了起来，伦巴底地区的情况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土地天然肥沃，加之该地的西班牙统治日趋衰微，已无力造成太大的危害了。在托斯卡纳，行政和学术传统多少幸存了下来，那些已变成土地贵族的佛罗伦萨商人后裔也不全都是无所事事的人。那不勒斯有着一批备受社会尊敬的法律工作者，他们经常表现出相当的学识。这就慢慢地为行将在下个世纪出现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然而，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行政官吏们拥有学识和才干，他们自己却毫无经济实力或政治实权，因此只能指望在国家机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影响。毫不奇怪，他们不久就将投身开明专制的事业，并对之加以热情的支持。

改革和强有力的政治措施仍然遥遥无期。在伽利略、康帕内拉、萨尔皮和博卡利尼等一代伟人逝去之后，意大利再也无力继续光大其长远的学术传统了。威尼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意大利的大学也还能夸耀有几个具有欧洲知名度的教授，如波伦亚大学的马尔塞洛·马尔皮基（1628—1694年），他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试验科学院的建立（1657年）及其成员——其中有阿雷佐医生弗朗切斯特·雷迪（1626—1697年）——的杰出研究，使伽利略精神在托斯卡纳得到了发扬，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但是，欧洲思想和学术的主流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那不勒斯富有的律师阶层和开明贵族们对科学和哲学的强烈兴趣主要是在关心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从当时的观点来看，意大利仍是适于从事艺术和高尚娱乐的伟大

国家。它拥有巴洛克大师贝尔尼尼和博罗米尼，^[11]它的画师和建筑师遍布欧洲，深深影响着当时的风尚，它拥有水平很高的歌手和讨人喜欢的乐师，拥有吕里和斯卡拉蒂，拥有巴洛克风味的罗马城连同其豪华的庆典、教堂和红衣主教们的别墅，拥有威尼斯连同其沿大运河两岸的迷人宫殿及其著名的狂欢，它不再是一个可望在文学上、哲学上或政治上出现指路星辰的国度了。去意大利旅行仍被认为是对年轻贵族和艺术家进行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但这个半岛正在变成旅游地，一座博物馆。

各统治家族及其宫廷在苟且偷安之中沦落了，这种沦落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我们已论述过罗马教廷中曾经相当活跃的托斯卡纳官吏阶层之销声匿迹，也考察过17世纪下半叶历任教皇的致命弱点。到17世纪末，埃斯特、贡扎加和法尔内塞等家族也呈现出一幅笨蛋和恶棍辈出的衰微景象。美第奇家的斐迪南二世虽然胆怯软弱，却娴熟地引导他的小国家度过了三十年战争这场狂风暴雨，因而颇有政治家的美誉。但他的儿子科西摩三世（1670—1723年在位）却是一个心智紊乱的可怜虫，他那病态的宗教狂使自己的臣民饱受苦楚。意大利各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曾制定过国内政策。它们一味通过财政安排从臣民那里刮取钱财；对普通消费品征集间接税加重了穷人的负担，成倍加收关税和通行税则妨碍了各种贸易。这些收入当时都大把大把地用来修建又一座新宫殿或奢华的巴洛克式教堂，用来豢养一小撮廷臣和寄生虫，仅此而已。

唯一例外是在软弱无力的克里斯蒂娜摄政结束后的皮埃蒙特。查理·埃曼努尔二世当政时期的积极进取显然是由于他一心想仿效路易十四：他因此对立法、财政和军事事务进行了一些改革，并推行一套严厉的旨在贬黜贵族阶级的专制主义和一项野心勃勃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实际上，这些雄心壮志显得超出了皮埃蒙特的国力，或者说超出了公爵实际的政治才能。查理·埃曼努尔念念不忘于获取国王头衔，故他派兵远赴干地亚参战并异想天开地筹划征服日内瓦和热那亚。公爵认为夺取热那亚将使萨伏依的重商主义登峰造极，他计划趁路易十四准备1672年对荷战争^[12]的良机采取行动。由于指望西班牙会因那场法荷战争而被束缚住手脚，查理·埃曼努尔于1672年入侵利古里亚，他还试图通过一位冒险家拉法埃莱·德拉·托雷在热那亚内部组织一场叛乱，但颠覆阴谋一下子就败露了，而萨伏依军队也惨败

于热那亚人之手。查理·埃曼努尔二世不得不靠路易十四出面调停尽快地中止了这场倒霉的冒险。重商主义之梦也未能改变皮埃蒙特农业的和过时的经济结构。贵族们虽然暂时被遏制，但仍然是统治阶级。1675年，郁郁寡欢的公爵去世了，随后建立的摄政统治，甚至比前一次的摄政统治更加软弱，更加声誉扫地。

西班牙在那不勒斯、米兰、撒丁和西西里等地互不相属的统治就算还能维持下去，却是更无效率和腐败了。西班牙统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与其说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倒不如说是因为法国对意大利缺乏兴趣。西班牙的官吏们颇为留恋这个半岛，因为它能为他们提供仕途和薪俸，但法国却不然，它的目光盯着其他一些地方。在法荷战争之际，法国一度恢复对意大利的兴趣，但即使在这时，法国的兴趣也只是表现为突如其来、变幻莫测的干涉，而非处心积虑、周密计划的方略。

墨西拿是西属西西里唯一保持一定程度经济繁荣的地方，它的港口仍在忙碌地经营着走俏的丝绸生意，它自古就有的种种特惠使它颇像一个独立的商人共和国。但西班牙政府非常嫉恨这种自治状态，因此它大力鼓励当地的平民党派梅尔利派反对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党派马尔维齐派。1674年，马尔维齐派进行报复，组织了一场墨西拿起义。西班牙军队被赶了出去，马尔维齐派举城投靠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不仅接受输诚，还派军前来协助城防。法国舰队在里巴利岛附近击败了西班牙人（1676年），又在奥古斯塔附近海面战胜了德·勒伊特统帅的荷兰人舰船（1676年）。一时显得法国人很快就要征服整个西西里岛。但英国把这种局势当作对其地中海利益的威胁，为免激起英国的敌意，路易十四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墨西拿人，他在1678年撤走了军队。由于路易十四袖手不顾墨西拿的困境，成千上万的墨西拿市民只得逃离故土。人口锐减的墨西拿受到了西班牙血腥报复的惩罚，并被剥夺了以往的特惠，它彻底丧失了往昔的繁华。

太阳王不去支持那些曾信任过他的人，现在反而利用曼图亚公爵费迪南德·查尔斯（1669—1707年在位），因其放荡无度而加剧的财政困难，重提法国对卡萨尔的要求。1678年，曼图亚公爵答应订立一项协定，割让卡萨尔以换取一笔钱财。为避免其他列强可能采取行动，这项协定对外保密，但公爵的一位大臣马提奥伯爵出卖了这一机密——也是为了钱财。路易十四设计拿获马提奥伯爵并将之囚禁：他可

能就是著名的“铁面人”，之后，路易十四重新与公爵谈判，终于在1681年把卡萨尔弄到了手。

这一胜利使路易十四大受鼓舞，他企图进而获取热那亚。他在热那亚建立了一支亲法的“第五纵队”以图挑起事端，制造武装干涉的借口。当1683年法西两国战火重起之时，路易十四责令热那亚人中止给西班牙的传统支持，另外还提了广泛的要求。然而，即使是一支法国舰队不宣而战开到了热那亚大门口并对该城进行了持续5天（1684年5月17日—22日）的猛烈炮击，热那亚共和国却毫不屈服。路易十四的侵略与热那亚代价惨重的抵抗大大影响了意大利人的舆论，激起了他们对路易十四恃强凌弱作风的义愤。但西班牙的虚弱却使路易十四得以用感人耳目的胜利表象来掩盖其征服计划的真正失败。路易十四在雷蒂斯堡停战协定（1684年）中答应将尊重热那亚的独立，但他却仍有权随意压榨热那亚以满足其虚荣心。1685年5月，热那亚总督被迫前往凡尔赛宫郑重其事地表示屈从，乞求法王宽恕热那亚招惹了他。

此时，国际局势正再次发生变化，英诺森十一世讨伐异教徒的政策，以索比斯基在维也纳的胜利（1683年）和帝国、波兰及威尼斯三方反土耳其神圣同盟的建立（1684年）初步告捷。加强神圣罗马帝国反土耳其人的力量，也暗示着增强哈布斯堡王室对抗波旁王室的能力。神圣同盟不久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在他撤离干地亚的15年之后又重被任命为统帅，他率领一支得到托斯卡纳、马耳他和教皇国战船增援的舰队进攻圣马拉（爱奥尼亚海的一个岛屿）和普雷维萨要塞。阿尔马尼亚和伊庇鲁斯的居民以及埃皮鲁斯人和达尔马提亚的摩尔拉齐人也起而反抗土耳其人。1685年，莫罗西尼的舰队攻占科洛尼，开始了对希腊的进攻。1687年，摩里亚半岛被彻底征服，莫罗西尼获得了“伯罗奔尼撒库斯”的称号。是年岁末，威尼斯人横跨科林斯湾，占领了雅典。1688年新年伊始，正是威尼斯军队及其神圣同盟盟军喜气洋洋之时。

北意大利此时正在酝酿更直接威胁到路易十四的事件。路易十四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能够控制萨伏依，尤其在查理·伊曼纽尔二世死后（1675年），当时法国公主萨伏依—内穆尔的让娜—巴蒂斯特充当了她的年幼之子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1675—1730年在位）的摄政。让娜—巴蒂斯特在儿子成年后仍想掌管权柄，她不让儿子亲政，并依赖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少年老成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善于伪

装，他隐藏起自己对母亲和法国人的感情：他具备作为一位“马基雅维里式”君主的真正政治才能，这种才能是在他那段孤独沉默的生活里慢慢形成的。但是，他的国家仍在内政外交方面继续急遽衰落。在1680年至1682年，蒙多维及其周围农村发生了一场残酷的被称为“食盐战争”的反宫廷税收叛乱，这场叛乱几经血战才镇压下去。1687年，[\[13\]](#)让娜—巴蒂斯特以她自己和她儿子的名义增订了凯拉斯科条约所规定的向法国臣服的条款，包括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在1684年娶一位由路易十四为他选定的法国妻子。年轻的公爵利用婚礼发动了一场政变，剥夺了他母亲的权力，亲自执掌了邦政，但路易十四以大量羞辱性的令人恼火的事情来报复公爵这一有力行动。

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之后，路易十四迫使维克多·阿马戴乌斯迫害他的新教臣民瓦尔登西安人。瓦尔登西安人面临着要么立即改信天主教，要么被逐出皮埃蒙特的选择，但他们在一位名叫恩里科·阿尔诺的牧师领导下进行了抵抗。路易十四于是借口帮助公爵镇压叛乱者派卡蒂纳率军进入皮埃蒙特。瓦尔登西安人的抵抗被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镇压下去了，所有谷地居民，包括妇女儿童，被圈集到一起，然后关押到皮埃蒙特的各个要塞，被囚禁的1.2万人中有2/3死于虐待和疾病（1686年）。但仍有少数游击队继续在阿尔卑斯山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公爵决定释放幸存的囚徒并把他们送往日内瓦，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新教同道的慷慨救济。

此时，奥格斯堡同盟这个欧洲大联盟正在形成，这个同盟在奥兰治威廉入主英国后将进行一场反路易十四的大战争。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开始与法国的敌人秘密接触，他非常谨慎，以免他的行动被人发觉而招来路易十四的报复。经年不息的瓦尔登西安问题又突然重现了，这次是由阿尔诺挑起的，他开始在威廉三世的帮助下组织他的乡亲进行“光荣返回”的壮举，他们现在是在威廉三世的麾下作战。1689年8月，瓦尔登西安人武装在阿尔诺统率下从日内瓦湖出发了；他们以无与伦比的胆略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故土，并在这片谷地重开游击战争。关于这场游击战，流传下来一些看来直接取自历险小说的传说，例如瓦尔登西安人坚守巴尔齐格利亚峰抵抗一支多达1.1万人的法国军队的围攻。1690年6月，正当阿尔诺的勇士们大批战死、他们的事业明显失败之时，萨伏依公爵的一位特使前来提议讲和，条件是他们要加入萨伏依军队对法国国王作战。

路易十四以打击瓦尔登西安人的惯用借口，再次派卡蒂纳率军进入皮埃蒙特。事实上，他正怀疑公爵与其对手达成了协议。卡蒂纳提出一些更为麻烦的要求，最后竟责令萨伏依放弃它的一些主要要塞并派它的军队前往法国以保证其忠诚。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对卡蒂纳的要求虚与委蛇以争取时间，同时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暗中谈判。1690年6月3日，双方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据此，萨伏依加入奥格斯堡同盟，作为回报，它可望立即得到军事援助以对付法国，并在战争结束时夺回皮内卢鲁。几天以后，卡蒂纳要求马上接管都灵城堡，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报之以公开进行敌对行为。由此开始了欧洲历史和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1] 后边码第461—463页。

[2] 见第4卷第16章。

[3]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07—509页。

[4] 见前第9章边码第213页。

[5] 见前第6章边码第133页。

[6] 原文如此，应为1662年。——译者注

[7] 原文如此，应为1664年。——译者注

[8] 见前第6章边码第137页。

[9]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14页。

[10] 见前第9章边码第220—221页。

[11] 见前第7章边码第156—159页。

[12] 见前第9章边码第215页。

[13] 原文如此，疑为1678年之误。——译者注

第二十章 哈布斯堡诸领地

在查理五世于1519年当选为皇帝之后的2年之中，他把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所有世袭领地全交给了其弟斐迪南。1526年，斐迪南一世使自己当选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国的国王，这就使哈布斯堡帝国臻于完整了。他那一支是哈布斯堡的幼支，他的领地远离大西洋海岸线，经济上比较落后，社会矛盾和内部冲突非常激烈，还屡遭土耳其人的蹂躏摧残。除了华伦斯坦的那段短暂的辉煌外，奥地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只扮演了一个配角；而且，战争使它满目疮痍，人口大减，一片凋敝。但至17世纪末，这个哈布斯堡君主国却成为列强之一，它在最后一场，也是唯一一场不断胜利的征讨异教的战争中被奉为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它为海权国家所看重而一味争取它做盟友，并被法国视为一个可怕的对峙。诚然，哈布斯堡王朝是通过摧毁波希米亚人国家并剥夺匈牙利人的自由而登上这一权势地位的，但取得这一成就的途径和人物却使17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诸领地的历史成为欧洲社会的历史上重要的、光彩夺目的一章。

很少有哪个王室像哈布斯堡那样保持纯正的血统。1619—1705年3位相继在位的哈布斯堡君主之统治并未因王室纷争或年幼孱弱而出现中断的现象，他们3人都表现出其世系典型的优缺点；他们诚心诚意，对其自认为是天授的权位之尊贵、权利和职责深信不疑；他们是笃实的天主教徒，他们的私德也毫无瑕疵。在17世纪下半叶大部分时间里执政的利奥波德一世，与他的祖辈和到约瑟夫二世为止的他的后辈一样，是位书籍和绘画的收藏家、音乐的业余爱好者和热衷于下棋的人。虽然他所择定的政策迫使他向臣民猛收捐税，令其陷于贫穷境地，并成千上万地征集他们参加战争，但当他偶尔想到臣民的苦楚时，他并非全无基督徒和常人皆有的同情之心。当1680年波希米亚农民得以直接向他陈情之时，他写信给胡姆布雷赫·切尔宁伯爵说：“在此险恶世道，确需为这些农民们做些事情，并仁慈地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一样的人类。”^[1]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强烈的君权神授信条使他们对几位同时代君主的无限制独断羡慕不已。1665年，利奥波德在他的老师和首席大臣齐瓦尼·波尔齐亚公爵

死后宣布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首相”。^[2]但利奥波德一世却没有大选侯或彼得大帝那样的雄才。他常因苦于无法拿定主意而令旁人恼火，以致教皇特使阿尔比齐忍不住这样评说：“如果允许说几句，那我个人是希望皇帝对上帝的依赖更少一些，这样他就能以稍许多一点的远见应付临近的危险，并在他做出决定后就付诸行动。”^[3]

我们在考察哈布斯堡领地的历史时，最主要一点就是：片刻也不能忘记，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从1556年到1740年一直据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他们自己也从未忘记这一点。这加强了他们的天命意识，并使他们确信，作为整个基督教社会的世俗领袖，他们尤其要对恢复基督教世界的信仰统一和领土完整负责，特别是利奥波德完全意识到他的帝位所带来的权利和责任。他悉心看护着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当1674年他的亲法派大臣洛布科维茨解职以后，他毫不迟疑地将其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臣民的人力物力投入三场旷日持久的对法战争以保卫德意志。另外，他坚信自己作为皇帝和德意志国王有权要求帝国议会向他提供人员资金来支持他进行对土耳其苏丹和对法国国王的战争；而帝国议会虽然此时的能力和资源大大下降，却通常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响应。诚然，皇帝不再能召集德意志诸侯为他服兵役了，但不管怎样，共同的危险感、弗朗索瓦·德·利索拉非凡的外交技艺以及尚存的一点对基督教帝国的责任感等因素加在一起，还是促使了大多数德意志大诸侯在皇帝对法国和对土耳其所进行的战争中与他积极合作。有四位帝国诸侯率军参加了把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的战争，他们是：洛林公爵查理、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埃曼努埃尔；巴登侯爵路易和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其中前三人战功卓著。

当1648年10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时，斐迪南三世年届40。战争的忧虑、政事的操劳和痛风病已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久于世的老人了。在他余后的9年时间里，他主要的关注是在他有生之年保证帝位传给他的某个儿子。^[4]三十年战争使斐迪南的领土有所缩减，因为他父亲曾在1635年以割让卢萨蒂亚换取萨克森脱离新教联盟，但即便如此，斐迪南的辖地仍然数量众多、幅员广阔。作为鲁道夫一世的嫡传子孙，他是上下奥地利的公爵，斯提利亚侯爵，卡林西亚、克恩滕和加尼奥拉的公爵和士瓦本境内各分散领地的世袭领主。他的堂兄弟斐迪南·查理大公以邦君身份统治着提罗尔伯国，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后一块王子封地，当提罗尔支系的最后一位男嗣西吉斯蒙德·弗

朗西斯大公于1665年去世后，这块封地就收归王室了。这样，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领地就全部回归族长之手，完成中央集权试验的条件也因此成熟了。

斐迪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都身兼波希米亚的国王，因而也是圣文采斯拉斯王位所有属地的统治者，这些属地有：波希米亚王国、摩拉维亚侯爵领地和构成上下西里西亚政治混合体的许多小公国。1627年的《领土更属敕令》从法律上规定了1620年波希米亚叛乱在白山溃败后该王国的归属，即使圣文采斯拉斯王位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波希米亚叛乱的彻底失败为17世纪的哈布斯堡君王提供了一个初步实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理想场所。这种统治得以推行靠的是哈布斯堡国王与波希米亚贵族之间达成的默契；许多波希米亚贵族作为雇佣军军官站在奥地利一方参加了三十年战争，他们在后来都得到了姗姗来迟的却又是丰厚的奖赏，奖品是那些因定为叛国者或异端而被处死或流放的捷克地主的庄园。波希米亚的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举行与否要听国王的“尊便”。在传统的显贵院、乡绅院和市镇院三院之外，现在又添了一个由教士组成的第一院。但等级会议已被剥夺了大部分动议权；它们只能任命一些毫无实权的高级职务和下级官吏；它们可以审查由维也纳的御前会议送来的财政预算草案，但除了教士院外，其他各院很少提什么异议，而且即使提了出来也从未有什么效果。这段时期波希米亚等级会议主要关心的是使对农奴的剥削合法化并通过牺牲一点市镇的权利来保证地主经济特权的立法。从1627年起，最后一点市镇自治残余消失了；它们的行政长官由国王或领主来任免，它们一度很广阔的地产被没收，领主们所开办的拥有种种特惠的酒厂、客栈、商店和作坊几乎彻底挤垮了市镇的经济。自1632年开始，一个设在布尔诺的由指定人员组成的法庭，撕去了维护等级会议权利的伪装而对摩拉维亚侯爵领地进行统治。西里西亚没有参与1618年的叛乱，因此它获准保留了两个议会，并且未被施以什么正式的宪制变革。波希米亚本身的治理由设在维也纳的波希米亚总管衙门执行，该衙门由一位总管大臣和几位参事组成，他们有的是波希米亚贵族，有的是奥地利或德意志人，但他们全是由国王任命的。

斐迪南三世忧虑不安的头颅上还戴着一顶既荣耀而又沉重的拥有政教权力的圣斯蒂芬王冠，这顶破损的王冠是哈布斯堡家族从1526年莫哈奇战役所造成的混乱中捞到的。由于这顶王冠，斐迪南成为匈牙

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在尔马提亚等地名义上的国王。事实上，在被苏莱曼一世搞得七零八落的庞大的匈牙利王国中，只有1/4略多一点地方，即西部和北部诸县，是在斐迪南的统治下。大约5/12的地方受特兰西瓦尼亚君主统治，它通常是苏丹的藩属，但不管怎样，在1687年以前始终不受哈布斯堡的控制。剩下的1/3匈牙利成楔形状，它宽宽的底部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之滨，粗粗的顶端则伸到了斯洛伐克南部，这片领土由土耳其人直接统治，分为卡尼萨、布达和台默斯瓦尔诸省，每省设一位统兵总督即帕夏。虽然匈牙利的主要城市布达和塞克什白堡及埃斯泰尔戈姆（格兰）大主教的首主教辖区都在土耳其人手中，但土耳其所夺取的只是这个国家最贫瘠荒芜的部分。斯洛伐克的矿产资源位于国王统治的那部分领土，而西本卑尔根的矿藏则在特兰西瓦尼亚境内。1648年，国王统辖的匈牙利仍享受着它在1606年和1608年从内部不和的哈布斯堡家族争取来的民族自治。它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的一院由政府大员即显贵和高级教士组成，另一院则由各县乡绅推出的代表组成；匈牙利等级会议拥有比削弱了的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级会议要多得多的实权。它选举一位宫伯（称“纳杜尔”），任此职者既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又就社会、经济、法律和宗教等方面事务广泛地制定法令。匈牙利总管衙门固然是设在维也纳，但匈牙利财政院却设在普雷斯堡，而且匈牙利人还极其警戒地保护着这两个机构的独立性。唯一在匈牙利拥有某些权威的帝国国务机构是御前军机处（Hofkriegsrat）和御前会议（Hofkammer），它们有一定的实权，如管理斯洛伐克的矿产等。

斐迪南的克罗地亚王国被照旧当作抗击土耳其人的前哨阵地和基督教君主在巴尔干的最后一个据点。该王国的东部地区在土耳其人手中并被划入他们的西尔缪姆省。克罗地亚西半部和达尔马提亚北部构成了一条由北向南伸展至亚得里亚海的细带状的基督教领土。克罗地亚等级会议仍在萨格勒布聚会，但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军事政府，由国王任命的名称为“班”的大员领导，在1648年时担任“班”的是伟大的匈牙利军人兼诗人米克洛什·兹里尼。

自1538年斐迪南一世与匈牙利国王扬·扎波约瓜分匈牙利王国时起，特兰西瓦尼亚就独立于奥地利之外。在17世纪上半叶的国际风暴中，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博尔·拜特伦和捷尔吉·拉科齐一世保住并加强了这个邦国。捷尔吉·拉科齐一世死于1648年。他的儿子与他同

名，在1642年就被特兰西瓦尼亚等级会议选为邦君。捷尔吉·拉科齐二世1648年开始执政时，年已27岁。他从其父和其母索菲亚·巴索丽双方继承了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东北部的好些庞大家产业，外加与邦君之位俱来的许多领地。他是一个被宠坏的、爱慕虚荣而又鲁莽成性的年轻人，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匈牙利或波兰的国王。他除了特兰西瓦尼亚以外还统治着毗邻的两个大县索特马尔和索博尔奇，这个邦国形式上仍然是由三个“民族”组成的联邦：马扎儿人、东部地区操马扎儿语的塞凯尔人和日耳曼血缘并操德语的城市居民“萨克森人”。

三十年战争后哈布斯堡领地的物质状况颇为恶劣。在皇帝的号令仍能通行的各个部分，尽管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曾成为战场，却都发生了人员、金钱和必需品的巨大损耗。因交战双方军队到达并发生战斗而遭荼毒的地区有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尤以后两个地区为甚。战争始于1618年布拉格的掷出窗外事件，止于1648年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之战。在这两者之间的岁月里，捷克土地进行了6场血流成河和毁灭一空的大战，大多发生在帝国军队和瑞典军队之间。瓦伦斯坦的军队在这片国土上搜刮压榨，而瑞典占领军则更是强取豪夺，尽情破坏。1648年时瑞典人仍在波希米亚，要再过2年等到纽伦堡条约签订并支付了500万盾之后才把他们打发回家。即使到那时他们还把鲁道夫二世收藏在布拉格的艺术珍品以及威克利夫和胡斯的许多手稿当作战利品席卷而去。

后果最严重的战争影响是人口的减少。直接由战争造成的对生命的摧残，如士兵的阵亡病死、近20年里过往于境内的各方军队之征集和劫掠所导致的饿殍馁弃，持续到和平年月的瘟疫，因那么多男人长久出外从军而引起的自然生育率之下降，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促使了人口的锐减。除了这些直接由战争引起的损失外，还要加上由于强制的或自愿的迁徙所造成的损失。当君王和天主教会在奥地利和捷克获胜后，新教徒被迫改宗，否则就得离开。1654年和1655年波希米亚等级会议派出的巡回委员会为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所编制的大税收名册（bernirula），提供了有关波希米亚所遭受的破坏和人口减少程度的具体证据。这一名册在形式、内容和目的各方面都很像末日总查录，[\[5\]](#)记录了地产上的佃户以及他们的土地及牲畜。虽然只公布了大约一半的税收名册，但它已足够证实其他证据所反映的情景了，即自1618

年起发生的生命财产之损毁是极其巨大的，尽管或许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当今的捷克历史学家估计，波希米亚的人口从1618年的约170万下降到了1648年后的90万略多一点。摩拉维亚的下降比例也大致相等。奥地利各地在1626年和1627年起义被镇压后也因宗教原因而出现许多逃亡者。1627年斐迪南二世发布的一项特别敕令命上奥地利的骑士和贵族或者改宗或者离开，1628年下奥地利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1645年，瑞典军队在离开时一路烧杀抢掠了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农村土地。匈牙利的人口下降也许要比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西部领地小一些。但它的损失也是颇为可观的，而且还在继续。在土耳其统治的那部分匈牙利，由于贫瘠的沙土地和沼泽地、落后的耕种技术及地主、收税人和苏丹征粮官的盘剥勒索，基督教居民大批死于赤贫和饥饿，还有许多境地较好的人则逃亡到北匈牙利和西匈牙利。^[6]整个匈牙利未曾遭受三十年战争交战军队的入侵和蹂躏。自1606年吉特瓦托洛克条约以来，皇帝与苏丹之间的官方关系一直保持着和平。但无论是基督教皇帝还是穆斯林皇帝都无法控制远在边境线上的军队指挥官。在名义上保持和平的50年时间里，不断有一些好大喜功和贪得无厌的土耳其帕夏人入侵基督教管辖区域，在那里杀戮劫掠城乡居民，或把他们带回当奴隶。匈牙利边陲的统兵官也经常越过界线不明的边界作防守性或报复性的突袭，但这些突袭对土耳其人的损害往往不如其对基督教居民的损害。17世纪下半叶时有发生的瘟疫荒灾也使匈牙利受害匪浅。

在以农耕和森林业为主要经济的上述所有哈布斯堡领地，由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极为严重，因为这种人口减少正值农村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之时。整个中欧的地主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不仅靠土地解决自己家庭的温饱而且靠土地生产能用以出售的商品，那么他们就能取得一笔金钱收入来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和更为广泛的雄心。农林产品的市场正在扩大；正越来越多地投身商业和制造业的西欧国家需要谷物和木材；维也纳、布拉格和南德意志城市需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皇帝和苏丹所保持的庞大常备军和土耳其边境线上的许多永久性驻军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市场，各地诸侯、显贵和高级教士的宫廷府第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市场均系地主所垄断。这种利用土地经营商品盈利的做法在波兰较为流行，^[7]但这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奥地利也很重要。土地所有者生产并销售谷物、木材、生猪、家

禽、果酒、啤酒和烈酒，他们能够利用在各等级会议中的优势给予自己种种专利和贸易特权。他们建造了边境粮仓和运送谷物的大船。他们把木材结成木排筏运经赫龙河和瓦赫河而进入多瑙河。波希米亚的地主则修挖了许多可获巨利的大鱼塘。这是一种从庄园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转变，它包藏着一场深刻的土地革命。地主不再满足于让佃户们拖家带口住满他的庄园。他需要的不是他们通常所缴纳的往往微不足道的地租，而是他们的劳力。因而他们千方百计地增加地产，也就是不租出去而是留在自己手里用以种植可出售之庄稼的那种土地。地产的增加靠的是严格解释有关的法令和惯例，这些法令和惯例规定没有男性后嗣的农民，其产业应转归地主。那些因战争或瘟疫而空置的农民产业也被并入地主的地产。

这些地产的经营，如要获利，就需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货币的贬值使地主用工资来雇工显得很划算。他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迫使农民在地产上无偿劳动，而由于当时劳动力的减少，从每家农户所征的劳役也就不得不增加了；中欧东欧的农民因而承受了大大增加的劳役数量，这是本时期的特有现象。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情形我们不仅有等级会议的立法为证，还有时人如丁·E. 韦格纳和荷兰裔耶稣会士雅各布·德·埃厄斯的记载作证。在领主地产上的劳役（rovota）、佃租、赋税和什一税要占去农奴劳动的3/5；1/4以上的农奴除去星期天和宗教节日外每天都要为他们的领主劳动。1620年前佃农每年通常只要为其领主干4—12天的轻活；而到1627年以后，他们被迫每星期都去干活，一开始还只是特殊情况，后来竟成了惯例，而且定为每家佃户每周须有3天干田里的活。有些产业较丰的佃户还须支付“脚力劳役”，即除了出人力外还要提供两匹马加一挂马车或一副重犁。地主们通常自己不养脚力牲畜，只养一些供宰杀食用的牲畜；运送货物到市场或码头的事都由农民的无偿劳动来完成。农民们被迫只从他们自己的领主那里购买自用的谷物、果酒、啤酒和烈酒，往往还有自用的奶酪、鱼、牛、家禽和盐等。为使用领主的磨坊和获准离开领主庄园而交付的费用也很高。在哈布斯堡王室所辖的匈牙利，农奴的待遇也同样恶化了，马扎尔、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是如此。

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治优势也是哈布斯堡领地上城镇灾难性衰落的重要因素。1618—1626年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发生叛乱时两地城镇都曾卷入，这就提供了限制城镇市民自由和破坏城镇工商业的机会，它

们被禁止向农民出售各类在领主庄园上也生产的商品。由一些政治家如韦格纳、开明爱国的捷克耶稣会士博胡斯拉夫·巴尔文、P.H. 莫根培勒和F.S. 马利尔斯基等人提出的工商业发展规划被视若无睹。国王直辖城市被债务和税收压得透不过气来，而御前会议也对之不闻不问，因此它们就算有所进步，也是微不足道的。“从属”城市，即作为某些领主或高级教士产业一部分的那些城市（它们的居民人数是国王直辖城市人口的2倍多），恢复得比较快一些，因为那样符合领主的利益。然而，当1650年后工业开始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重新发展之时，这种情况却是主要发生在乡村而非城市。

三十年战争的种种后果、土耳其边境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一开始是非正式的，但从1661年到1699年间则是公开的、大规模的而且几乎从未间断过）、为维持常备军队和各处驻军、利奥波德统治时期与法国的长期战争而造成的人力财力之枯竭，城市生活的败落，所有这些合在一起阻碍了哈布斯堡诸领地上的文化发展。德语或捷克语的作品对诗歌贡献甚微，对戏剧则毫无贡献。只有产生在某些耶稣会学院和学校的拉丁语戏剧、巴尔文的拉丁文著作、一些关于政治和战争艺术的德语和意大利语论著以及最突出的米克洛什·兹里尼的马扎儿语诗歌，还稍稍预示了下个世纪的文化繁荣。在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方面，利奥波德及其领地上的贵族们才刚刚开始接纳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和法国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为布拉格、维也纳和斯洛伐克诸城市的巴洛克风尚奠定了基础。两位17世纪最优秀的捷克画家卡雷卡、斯克列塔和文采斯拉斯·霍拉尔是在他们流亡于德意志、荷兰或英国期间完成他们大多数杰作的，这真是波希米亚哈布斯堡国王们的大错和损失。同样被迫过流亡生活的还有一位更著名的人物，扬·阿莫斯·考门斯基，即以夸美纽斯之名闻名于世的那位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末代主教，即从波兰的莱什诺到伦敦，到斯德哥尔摩，到普鲁士的埃尔宾，到匈牙利的萨罗斯巴塔克，最后到了阿姆斯特丹，1670年他死于该地。在奥地利和捷克的新教徒被驱逐或改宗之后，高等教育由耶稣会士控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有害的。有一个名叫安东宁·科尼阿什的耶稣会士吹嘘他曾焚毁了600册捷克文书籍，但他的年轻同道巴尔文却是这个王国里唯一一位对捷克人的历史和语言感兴趣的人。他的著作《波希米亚优雅的斯洛伐克语论辩》行文华丽流畅，但一直到了成书一个多世纪后的1775年，才有人敢将之出版。在匈牙利

北部，耶稣会教师撰写了有关圣经教义、历史和时兴话题的著作，而且有时还是用斯洛伐克语写的。

到1648年时，“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奥地利和捷克土地上已差不多完成了；也就是说，公开奉行和宣讲新教教义的行为已被以下种种措施制止住了：驱逐信奉新教的牧师和学校教师、处决或监禁所有参与叛乱或异端行动的乡绅和市民、占用或捣毁新教社团的财产、强迫新教徒群众改宗天主教，违者课以罚金和流放。制止新教的任务比较容易，因为捷克和奥地利的新教主要是地主们关心的事；作为教区教会的赞助人，他决定他所任命的牧师的信仰归属，从而也决定了教区教民的礼拜形式和宗教信仰。每当信奉新教的地主被一位天主教徒取代或他本人转变成天主教徒并任用一位主持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神甫，那么教区的教民们接受新情况就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常事了。重新天主教化在奥地利则更为容易，因为那里的新教比波希米亚兴起得晚、影响范围也较小。只有下奥地利的土地所有者获准在自己家里遵奉新教礼拜仪式，但他们不得接纳邻居和佃户加入。到17世纪中期，只剩下42位领主和32位骑士享有此等特权了。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重新天主教化的任务更巨大更困难。这不仅因为绝大多数捷克人从15世纪初起就已成了异端分子和教派分立主义者，而且还因为这里的天主教会已如此的财尽智竭，以致要重建就几乎得从头做起。波希米亚是唯一的新教占绝对优势却被完全拉回到天主教阵营的国家。斐迪南三世笃信他应对误入歧途的臣民负责。他是圣母玛利亚崇拜热的支持者，在他所有的领地内发起这样一股崇拜热潮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最有效手段。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许多城镇和村庄的中心广场上，至今还耸立着“圣母柱”。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不再“拥戴查理”，而是“拥戴斐迪南”，他们每年都要宣誓崇信“圣灵怀胎说”。扫荡胡斯派教徒的最后战役始于波希米亚摄政在1639年9月和1650年2月发布的两道敕令，敕令宣布各色人等必须在3星期内改宗天主教云云。波希米亚出现了一些骚乱，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这种现象促使久患劳力短缺的地主们争取稍稍放宽敕令的严限。布拉格大主教阿达尔贝特·哈拉赫红衣主教和一些比较谨慎的耶稣会士约束狂热分子的仓促行动，并制止一些对坚不顺从者吊打、囚禁的现象。哈拉赫意识到需要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政策，他因而

着手重建并扩展教会机构。1655年，在利托姆涅日策建立了波希米亚的第三个主教区，1664年又在克拉罗夫建立了第四个主教区。

更为困难的是劝说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徒的领主们交出他们的新教徒祖辈从教会没收来的财产以及培养充足的合格天主教教士，因为许多地主仍不愿让其农奴的儿子进入教会学道。在波希米亚像在匈牙利一样，教区执事人员往往不得不由修道士来充任。1651年，斐迪南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地建立了“反宗教改革委员会”，各区的委员均有一位国王指定的世俗人士和一位教会人士，一般是当地的大小修道院的院长，由他们挑选教士推行“训诲”。注册受训的都是非天主教教徒，他们被召集来接受为期6周的训诲，然后由他们选择是改宗天主教还是宁愿被流放。这一指令能否执行通常取决于当地的领主。许多坚决不改宗者千方百计地躲避集训，领主们也往往帮助他们逃匿。尽管如此，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无疑赢得了事实上已失去教俗两方面领袖的广大民众。到1664年，除奥勒山脉中的一些矿区村庄外，捷克各地至少表面上全改宗了天主教。秘密的新教礼拜仪式，如唱赞美诗。祷告会和诵读圣经等仍有继续，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因而这些地区时有逃亡在外的牧师潜伏活动，并能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偷偷运进一些违禁书刊。这种小范围的地下新教活动一直持续到1781年约瑟夫二世发布宽容特令才转入公开，波希米亚国王所属各领地中，只有在西里西亚一地新教是得到官方宽容的，因为萨克森选侯坚持：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应该允许路德教在西里西亚境内的奥尔斯、布里奇、利格尼茨及沃劳各小邦和布雷斯劳、施韦德尼茨、乔埃尔和格洛高等城市存在。布雷斯劳主教、斐迪南的兄弟利奥波德·威廉无暇在西里西亚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他同时还是奥洛穆茨的主教和西属尼德兰的总督。

在1648年以前，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彼得·帕兹马尼红衣主教就已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大力开展了重新天主教化的活动。在耶稣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热情帮助下，他把匈牙利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许多贵族拉入了天主教会，而且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贵族还把他们的佃户和农奴带了进来。但信奉卡尔文教的特兰西瓦尼亚君主加博尔·拜特伦和捷尔吉·拉科齐一世所取得的军事和政治成就阻止了这一进程。根据1645年斐迪南与拉科齐之间签订的林茨条约，哈布斯堡王室所辖匈牙利确保了享受马提亚二世早在1608年加冕时就许诺的一定程度的宽

容：所有贵族血统的人及国王直辖城市都享有信仰自由。在土耳其治下的那部分匈牙利地区，基督教教派之分因穆斯林的一视同仁的宽容而显得无足轻重了。在这里，天主教会处于最坏的境地，因为那些辖区处在土耳其占领区的高级教士早就远走高飞：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逃到了特尔纳瓦，埃格尔、佩奇、纳吉瓦拉德（格罗斯瓦尔代）、久洛堡（卡尔斯堡）和维斯普雷姆等地的主教则逃往西方避难，但巡游的方济各会和其他一些传道使团却使天主教会在土耳其占领150年期间存留了下来。卡尔文教徒设法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保住了一些地方组织，而且因与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教派同道继续保持联系而颇得助益，特兰西瓦尼亚本身在整个17世纪中保持了它独特的彻底的宗教宽容。它的君主是卡尔文教教徒，而且卡尔文教是大多数马扎儿领主和绅士的信仰，因而实际上（虽然不是法律上）它也是他们的农奴的信仰。路德教在“萨克森人”即特兰西瓦尼亚城镇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广有信徒。一个人数大减的少数派别仍然崇信16世纪后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度盛行的索齐尼教派的反三位一体说，这个派别艰难地避免了被新教教会或天主教教会彻底同化。幸存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几乎是岌岌可危的，但尽管教廷委派的高级教士有的逃离有的被赶走，且等级会议和君主也反对耶稣会士渗透进来，特兰西瓦尼亚的天主教社团却继续存留下来，直到17世纪末随着该邦国重新归顺利奥波德一世而恢复了元气。人数不断增加的操罗马尼亚语的特兰西瓦尼亚人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希腊正教教堂、各级教阶和礼拜仪式。特兰西瓦尼亚的这种宗教信仰五花八门的状态应该看作国家虚弱的后果和标志，而不应解释为什么超乎寻常地实现了当时约翰·洛克还正刚刚开始加以阐述的那种宽容理论。

对于前面各页所描述的各片领地、各个民族的情况和各种难题，斐迪南三世和利奥波德一世都试图通过与大土地所有者和高级教士结成非正式联盟加以处置，因为大地主和高级教士连同他们的吏属以及县府和领主法庭起着掌管地方行政和司法的文官机构的作用，至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行政管理，皇帝则借助现存的咨询机构和行政机关来进行。政策系由他与其枢密院商量后制定的，该枢密院由院长（Hofhochineister，他的地位与首相最相像）、宫廷大法官、御前副总管和2—3名枢密官组成。枢密官一般是奥地利的、德意志的、波希米亚的、意大利的，偶尔也有匈牙利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制是御前总管衙门，它自1620年起从帝国总管衙门中分离了出

来。它处理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尤其是奥地利的内部事务。1667—1683年任御前总管的是一位能干勤勉的莱因兰人约翰·保罗·霍歇尔博士，他是弗赖堡一位教授的儿子。中央财政部的职能由宫内省（Hofkammer）执行，它建立于1527年，作为一个财政机构它高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各领地的财政院。宫内省制定并分配财政预算，统管工商业、铸币和金银矿等事务。军事事务由御前军机处（Hofkriegsrat）的掌管，它自1556年起权力范围扩展到所有哈布斯堡领地。军机处除了履行其军事职责外还处理与土耳其政府的外交关系。历任军机大臣都很干练，如洛布科维茨、曼图亚侯爵汉尼拔·贡扎加、雷蒙多·蒙特库科利和巴登侯爵赫尔曼；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是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这也是哈布斯堡政府的一大特色。

1648年刚实现和平时，斐迪南三世的直接关注点是国际事务。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未促进他的家族或君主国的利益。宿敌法国比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危险并且仍在成功地打击斐迪南的西班牙同宗。庆幸的是，除了边境上倒霉的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外，没有来自土耳其苏丹方面的直接威胁。土耳其帝国因1648年易卜拉欣一世被废黜并由其年仅7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四世继位而国势大衰。^[8]特兰西瓦尼亚在一个短时期内也不惹麻烦，因为捷尔吉·拉科齐一世死于1648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捷尔吉·拉科齐二世要过7年才找到机会对王位提出要求。一向热切关注其家族的斐迪南三世在他未老先衰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确保他的长子斐迪南继承他所有的头衔和王冠。他已在1646年不费吹灰之力使此子当上了波希米亚国王，1647年又使他当上了匈牙利国王。但要继承帝位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刚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获胜而得意洋洋的选侯们之自私和贪婪，另一方面是由于马扎尔人不知疲倦地进行活动，一心阻止哈布斯堡家人当选皇帝。选侯们经过半年的讨价还价最后于1653年5月在奥格斯堡选出了小斐迪南并于6月在雷蒂斯堡给他加冕。但1654年7月斐迪南四世的去世却使此前种种苦心孤诣的外交和刮自波希米亚及西班牙农民的钱财都付诸流水了。他的弟弟利奥波德结束了在西班牙的神学研究被带回奥地利，劳民伤财的竞选再度开始了。利奥波德分别于1655年在普雷斯堡和1657年在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但重起的战争妨碍了斐迪南三世在自己死前让利奥波德当选皇帝。

这场始于1655年6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入侵波兰的战争^[9]与奥地利大有关系，不仅因为它有将新教国宗瑞典的霸权伸展到中欧之虞，还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查理十世野心勃勃地想当上波兰和波希米亚两国的君主，在距波希米亚起义还不到40年的当时，这个计划并非痴心妄想，尤其对于查理十世这样一位来自古斯塔夫嫡传的新教尚武国王来说更是如此。战争对斐迪南三世更直接的危险是轻率狂妄的特兰西瓦尼亚君主捷尔吉·拉科齐二世把瑞典国王查理当作可以帮助他实现野心的同盟者。查理十世刚占领华沙，拉科齐就于1655年8月派特使前去觐见查理；双方在1656年12月缔结了一项同盟，据此，拉科齐可望得到波兰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斐迪南对这两个新教国家瓜分波兰领土的前景大为惊恐，他开始与流亡在外且又无子嗣的波兰国王扬·卡西米尔谈判，但行将就木的斐迪南三世很难有所作为了。拉科齐率领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经普热米什尔进到克拉科夫和桑多梅日，并于1657年4月11日在此与战果辉煌的查理十世会师了。斐迪南死于此前9天，他16岁的儿子就面临着与其祖父1619年登基时所面临的同样危急的局势。不到一个月他就作为波兰的盟友对瑞典开战了。幸运降临到了这位新统治者身上。首先，1657年5月丹麦人进攻瑞典领土迫使查理十世为消除这一对其补给线的威胁而抛开了拉科齐；接着，土耳其人也转而反对拉科齐，这是基督教世界获悉的关于土耳其内部已发生巨变的第一个警报。在土耳其，穆罕默德·柯普律吕于1656年当上宰相。他严酷无情地清除了宫廷和军队中的怠惰腐败现象，并在四处寻觅重振和扩展土耳其帝国的机会。^[10]柯普律吕绝不愿听任特兰西瓦尼亚君主自行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因此，当拉科齐废黜摩尔达维亚执政并摆出一副领主架势命摩尔达维亚新执政和瓦拉几亚执政给他派遣辅助军队之时，苏丹命其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汗把特兰西瓦尼亚入侵军赶出了波兰。被瑞典盟友和哥萨克辅助军队抛弃且心挂本土的拉科齐于1657年7月以赔款120万弗罗林的代价与波兰人匆忙缔和，然后急急返回特兰西瓦尼亚。他在波兰留下一部分军队，由骁勇的亚诺什·凯梅尼统率，但这支军队人数太少了，根本没法抵抗鞑靼人的猛攻。在7月31日发生在塔尔诺波尔以南的特伦姆包拉之战中，凯梅尼所部不是战死，就是连同凯梅尼本人一起被送往克里米亚关押起来。

到了这时奥地利军队才首次投入战场。他们协助波兰人收复了克拉科夫并让卡西米尔复位。另一支奥地利军队在波兰人和勃兰登堡人的配合下，在波罗的海沿岸发起一次战役打败了瑞典人。在战役中，奥地利军队指挥官蒙特库科利以他在新明斯特、桑恩和阿尔森岛的辉煌战绩一举成名。

这对利奥波德的统治而言不能说是一个不利的开端，但他自登基之日起就不得不向臣民们提出人力、财力要求却是不祥的预兆。为贿赂选帝诸侯们不受马扎然的诱惑而花去的巨额费用则使税收更为加重。马扎然此时在千方百计影响选举，其意图在即使不能让路易十四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也要某个将成为法国人傀儡的小诸侯登上帝位。利奥波德及其哈布斯堡同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不仅担心哈布斯堡家失去帝位尊号，还害怕法国问鼎帝国的不言而喻的野心。哈布斯堡家抛出的流水般的金银和德意志诸侯对法国侵略的一知半觉的恐惧最终保证了利奥波德于1658年7月当选为皇帝，并于同年8月在法兰克福加冕。[\[11\]](#)

利奥波德朝初期最危险的事态发展是土耳其在其宰相穆罕默德·柯普律吕治下恢复了侵略力量。当土耳其还只威胁到特兰西瓦尼亚之时，维也纳的政府始终安之若素，甚至从哈布斯堡所辖的匈牙利开始送来的告急文书也未使它恐慌。在那里，从1648年起，就不断发生了零星的土耳其人入侵；在1652年，莱瓦和杰尔的边境要塞受到了威胁，只是由于亚当·福尔加奇在纳吉维瑞克斯打败了一支5000人的土耳其劫掠部队，两座要塞才得以保全。在匈牙利西南部的多瑙河中游边境，当地显贵在维也纳未给予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苦战。克罗地亚“班”米克洛什·兹里尼在塔索式诗歌[\[12\]](#)中夸耀了马扎尔人的英勇善战，并在散文诗中悲叹利奥波德的谋臣们的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他写道：“风吹何能干海啸，君王难违谋臣言。”[\[13\]](#)

终于引起维也纳意识到危险的是特兰西瓦尼亚向土耳其人的归顺。在拉科齐灾难性的波兰冒险失败后，特兰西瓦尼亚等级会议为取悦土耳其人而在1657年11月推举了费伦茨·雷代伊为君主。但拉科齐决心保住自己的国家和君位，于是又反过来胁迫等级会议在1658年1月重新承认了他的地位，懦弱的雷代伊宣告退位。5月，拉科齐在利帕迎战土耳其入侵者并打败了他们。但在9月间，从瓦拉几亚率军前来的鞑

鞑汗和从南面率军亲征的土耳其宰相对特兰西瓦尼亚两面夹击，洗劫了卡尔斯堡，并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西部杰诺、卢戈斯和卡兰塞贝斯这三个最坚固的要塞。同月，土耳其宰相宣布阿科什·包尔齐伊为特兰西瓦尼亚的具有土耳其附庸身份的君主，随后怯懦的等级会议于11月承认了他。与此同时，拉科齐在他的匈牙利领地上拼命招募军队，并于1659年挺进特兰西瓦尼亚，赶跑了与他为敌的包尔齐伊并再度被等级会议承认。但在同年，布达帕夏艾哈迈德·西迪率一支土耳其军队横穿从特伦斯瓦尔到托尔达和塞本（赫尔曼施塔特）的东南诸县，所到之处故意洗劫边境要塞。显然，土耳其宰相要坚持实施他的计划，而拉科齐光靠自己单薄的力量是无法挽救特兰西瓦尼亚的。他转而向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国王乞援，利奥波德终于同意帮助他。利奥波德的帝位竞选已经成功；蒙特库科利正在夺取波罗的海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任枢密院院长约翰·阿道夫·冯·施瓦岑贝格也准备对土耳其采取行动。拉科齐以将索特马尔和索博尔奇县交给国王为条件确保了军事援助的承诺。利奥波德的部队占领了索特马尔和卡洛，但他们迟迟不与土耳其人开仗，一直到1660年年初波罗的海地区的奥地利军队因查理十世去世及缔结奥利瓦和约腾出手来之后才开始行动。^[14]但为时已晚矣。是年春，西迪帕夏的军队在匈牙利东北部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远达德布勒森，然后直插特兰西瓦尼亚心脏进至科洛茨瓦尔（克劳森堡）。1660年5月，拉科齐试图在科洛茨瓦尔以西10英里处的费恩斯制止这股破坏狂潮，但被打败，他身负致命重伤逃往纳吉瓦拉德，两星期后他死于该地，享年39岁。艾哈迈德·西迪杀到纳吉瓦拉德，围困了这座特兰西瓦尼亚最大的城市。奥地利将军路易·德·苏谢小心翼翼地率领军队来到邻近的拉卡马茨，从这个城堡的主墙上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军队对纳吉瓦拉德的最后攻击，8月27日，西迪帕夏攻陷了纳吉瓦拉德城。

纳吉瓦拉德的失陷未结束特兰西瓦尼亚覆亡前的痛苦挣扎，凯梅尼已从克里米亚囚禁地返回，1661年元旦，特兰西瓦尼亚等级会议把他选为捷尔吉·拉科齐二世的继续人。凯梅尼谨慎地请求奥地利的帮助，蒙特库科利被任命为援军的统帅。蒙特库科利原倾向于打击埃斯泰尔戈姆和布达的土耳其人，从而把他们从特兰西瓦尼亚吸引出来，但军机处命他会合处境极度狼狈的凯梅尼。特兰西瓦尼亚等级会议已于1661年9月逮捕并处死了凯梅尼的对头包尔齐伊，但土耳其人再也不愿容忍一个不是其奴才的君主了。是年10月，土耳其宰相穆罕默德·

柯普律吕去世，但他的儿子和继位者法泽尔·艾哈迈德·柯普律吕精明强干不亚于乃父，而且同样热衷于彻底征服特兰西瓦尼亚。蒙特库科利已率1万名士兵在蒂萨河上游与凯梅尼会师，但他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土耳其大将军阿里帕夏会同鞑靼汗和瓦拉几亚及摩尔达维亚两邦君主对特兰西瓦尼亚东部的大举进犯，在这次进犯期间，阿里帕夏册立了另一位特兰西瓦尼亚贵米哈伊·阿保菲为该国君主。蒙特库科利所做的只是小心地挺进至科洛斯瓦尔，却发现该城在土耳其人手中，他无法给部下提供给养或军饷，当地的马扎尔人和萨克森人也并不友善。于是，奥地利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一些要塞留了些驻军后就撤退了。1662年，这场悲剧结束了。一支由穆罕默德·库楚克率领的土耳其军队从杰诺出发，于是年1月22日在谢格斯瓦尔（谢斯堡）附近的纳吉楚留斯追上了凯梅尼，打垮并杀死了他。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唯一的100年短暂的伟大时期完结了。它的覆灭震撼了利奥波德皇帝，也震撼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意识到特兰西瓦尼亚曾是一道堤坝，它的坍塌使哈布斯堡王室所辖的匈牙利完全暴露在趾高气扬且锐意进取的土耳其人的倾力攻击面前。土耳其宰相法泽尔·艾哈迈德没有给利奥波德一点时间来寻找盟友或扩充军队。1663年4月他启动了军队。他的计划是逆多瑙河而上直趋普雷斯堡和维也纳。在他的征途上，除了坚固的诺伊豪塞尔（新扎姆基）要塞外，其余都不在话下，诺伊豪塞尔要塞前此已遏制了土耳其人的进犯达一个多世纪，此时该要塞驻守着一支由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军队，指挥官是亚当·福尔加奇。在他的后方，蒙特库科利率一小支部队驻扎在瓦赫河畔。1663年11月，被团团围困的诺伊豪塞尔驻军逼迫福尔加奇投降了；但该要塞的顽强抗御却迫使土耳其人把他们对维也纳的进攻推延到了下一年。

皇帝的使臣们拼尽全力吁请基督教世界各国君主出兵求援奥地利，由于情况危急是如此明显，因而连帝国议会和法国国王都做出了反应。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和其他一些德意志诸侯都纷纷出人出钱。波希米亚在1664年度缴纳了200万盾的税款、路易十四让宝贵的6000名“志愿军”参战。在1664年1月土耳其人重新发起进攻之前，兹里尼攻进了土耳其所属的匈牙利领土以图切断法泽尔·艾哈迈德的补给线。但当是年夏法泽尔·艾哈迈德终于行动起来之时，兹里尼率领的这支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小股武装不得不退却，而土耳其宰相则得以攻占了匈牙利西部的最后

一个大据点泽杯瓦尔。此时已是6月3日，这场南方战役为蒙特库利赢得了时间集结基督教世界各方军队来守卫维也纳以东约50英里的拉布河防线。就在这里，1664年8月1日，当法泽尔·艾哈迈德的大军试图从圣戈特哈德修道院附近强渡拉布河时，蒙特库利打垮了这支大军。[\[15\]](#)

圣戈特哈德战役是基督教军队的一次大胜利。诚然，它并未一劳永逸地消除对维也纳的威胁，而仅仅是将之推延了19年。利奥波德及其谋臣们根本没有企图乘胜追击士气大落的土耳其人直捣布达和特兰西瓦尼亚，却在10天之内缔结了沃什瓦和约。[\[16\]](#)和约规定了为期20年的停战；对于特兰西瓦尼亚土耳其和帝国双方均不予占领，但它仍以土耳其苏丹为宗主；利奥波德须向刚刚被他打得大败的敌人赔偿20万弗罗林；而更为危险的是允许土耳其人继续占领纳吉瓦拉德和泽林瓦尔以及斯洛伐克西部的三个要塞：诺伊豪塞尔、尼特拉和莱瓦，这三个要塞此前一直是通向多瑙河上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方面是奥地利人和德意志人坚持认为，以在1664年可调集起来的薄弱兵力尝试把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是愚不可及的举动，冒这种重蹈莫哈奇覆辙之险将危及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匈牙利人始终把沃什瓦和约看作哈布斯堡朝三暮四习性的集中体现。他们坚称，土耳其人在战败沮丧、狼狈逃窜之际是不可能在此萨瓦河以北及多瑙河下游地区组织任何有效抵抗的，他们谴责维也纳政府不想看到匈牙利获得自由和重新统一；他们还认为，利奥波德之所以匆匆缔结这项于己不利的和约是因为他突然被某种比解放匈牙利或驱逐异教徒更诱人的前景迷惑了。在1664年1月和2月举行的帝国议会会议曾被说动向处在危急关头的利奥波德提供援助，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因茨选侯兼大主教约翰·菲利普·玛·申博恩提请皇帝注意西班牙国王正奄奄一息，命悬旦夕，而且他病魔缠身的年幼独子也有即将夭折的可能。人的动机很少是纯净不掺杂的，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军事上的谨小慎微与王朝的野心两者加在一起促使利奥波德及其谋臣没有去抓住圣戈特哈德战役所提供的机会。

利奥波德对西班牙命运的兴趣是由其主要大臣促成的。1665年他的导师兼首席大臣波尔齐亚公爵死后，枢密院首脑一职起先落到约翰·奥尔斯佩格伯爵头上，而于1669年他下台后又落到文第尔·洛布科维茨公爵头上。这两位政治家一位是刻板谨慎的德意志人，另一位是

聪明多变的捷克贵族，他们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并都相信：在若与路易十四取得协议便可大有所获之时反与他争吵是愚蠢危险的。当没有子嗣的波兰国王扬·卡西米尔于1667年9月宣告退位而出现继承人问题时，哈布斯堡的外交一如既往地支持一位帝国王公即洛林公爵查理四世之子查理竞选而反对法国的候选人小孔代。但当路易十四在菲利普四世死后于1667年5月发动移归权战争以图加速西班牙帝国解体^[17]之时，利奥波德却没有加入三国同盟，反而谋求与他的对手妥协。利奥波德最能干的外交家利索拉伯爵警告他说法国人对西属尼德兰的进攻是“敌人向维也纳城门进军之开端”，^[18]但他置之不理。1668年1月，利奥波德与路易十四订立了一项秘密瓜分条约，该约规定他获得西班牙本土、西属美洲、米兰、撒丁、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法国则获得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泰、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纳瓦尔、菲律宾和西班牙在非洲的据点。

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继承问题的极度关注几乎毁掉了他的匈牙利王冠。沃什瓦和约所表明利奥波德对匈牙利命运的漠不关心使马扎尔显贵们相信，如要挽救王国的残余部分免遭土耳其人的征服，最好还是与土耳其苏丹妥协。甚至像费伦茨·韦谢莱尼宫伯那样迄今一直忠于利奥波德的人现在也转而参与谋反。路易十四很快洞察了法国能从中获取的利益。他已开始策划摧毁联合省，因此他很愿意让皇帝的注意力转向别处。他派驻维也纳的大使雅克·格雷蒙维尔以大放厥词和抛散一点金钱的办法，煽起了匈牙利人的不满情绪。他拉拢克米洛什·兹里尼，但后者拒绝变节。兹里尼在1664年9月被一头遭追猎的野猪撕咬得粉身碎骨，这对他来说或许应该算是幸运的。其他人则都为格雷蒙维尔拉拢过去。最鲁莽的谋反分子是彼得·兹里尼，他继承了其兄长克米洛什的领地和封号，还妄想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匈牙利首席法官费伦茨·纳道什德伊希望继韦谢莱尼为宫伯，也参与了阴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北部的一些主要的新教教士因担心自己的宗教自由，也被说动允诺提供支持。

随着谋反者逐渐明白格雷蒙维尔根本无权促使路易十四做出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的允诺，他们越来越多地指望苏丹的帮助。1666年8月，韦谢莱尼主持了一个心怀不满的领主们所举行的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应与阿保菲合作以争取土耳其政府承诺保卫匈牙利的自由；匈牙利将每年向苏丹政府上交一笔固定的贡赋，以换取匈牙利可自由地选

举国王并在对外事务上保持独立。很少有哪场阴谋酝酿得那么久，而又那么快就被那么多参与者出卖。当1667年春阿保菲派一名特使前往试探土耳其宰相法泽尔·艾哈迈德·柯普律吕时，神圣罗马帝国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的译员风闻这个阴谋并将之汇报给维也纳。1667年4月韦谢莱尼的去世使谋反者群龙无首。但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阴谋勾当仍在继续，只是更加惨淡，更加复杂，告密、争吵不断发生。阴谋者的急功近利和颓废胆怯使这场运动曾有过的一点爱国性质荡然无存了。土耳其人正忙于对干地亚的长期围困和与波兰的战争^[19]，以致不能给予其任何帮助。纳道什德伊、韦谢莱尼的遗孀和彼得·兹里尼相继把阴谋的每一个细节都泄露给了奥地利人。兹里尼表示忏悔，得到了赦免过后却又与土耳其人勾勾搭搭。利奥纳和格雷达蒙维尔向利奥波德揭露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当年轻的费伦茨·费龙盖潘最终起兵试图占领萨格勒布时，这场整个阴谋中唯一的军事举动于1670年4月被一支奥地利军队轻易地镇压了。北部诸县的军事准备开展得太晚了，当他们得知彼得·兹里尼被捕后就打消了起事的念头。1670年仲夏以前，整个运动彻底完了。贻误拖延、昏聩愚昧、合作不力或组织无能、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和背信弃义使匈牙利成为敌人的俎上鱼肉。

洛布科维茨急切地抓住这次机会“将匈牙利纳入治理捷克的模式”。他委任一位匈牙利宿敌、奥地利的御前总管约翰·霍歇尔审理此案。政府无视彼得兹里尼、纳道什德伊和弗龙盖潘所享有的只受匈牙利贵族审判的法定特权，而是将他们交给一个由清一色德意志人组成的法庭，这个法庭在逗弄他们几个月后宣判他们死刑。1671年4月，他们被斩首。一个由埃斯泰戈姆新任大主教捷尔吉·塞莱普琴伊主持的匈牙利人法庭审判了次要的谋反者，他们中3人被判死刑。政府靠没收谋叛者的家产在财政上大得收益。约有2000人逃亡，大部分逃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那里策划复仇。所有这一切使蒙特库科利早就为整治匈牙利定下的办法得以施行，这就是军事占领。1670年5月，奥地利军队渡过瓦赫河，使这个王国沦为一个被占领国。帝国副宰相利奥波德·威廉·柯尼希塞格的话表达了奥地利政府的主旨：“马扎尔人犯上作乱因而丧失了他们的一切特权，从今往后他们必须被当作‘军管臣民’对待了。”^[20]1671年5月国王颁旨令受军管诸县市供养当地驻军。大主教塞莱普琴伊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督，一位臭名昭著的马扎尔人的对头、维也纳新城主教利奥波德·科隆尼奇被任命为匈牙利财政

总监，1673年3月，利奥波德指令在普雷斯堡设立一个执政府，该机构由4名德意志人和4名匈牙利人组成。其主席亦即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是条顿骑士团荣誉总团长约翰·加斯帕·安普林根。该委员会通过军事占领来实施统治，而占领军的贪婪残酷是如此莫之为甚，以致教皇驻维也纳使节弗朗切斯科·布翁维亚也表示他对将会产生的后果极感惊恐。

匈牙利政治自由的被剥夺在天主教高级教士们看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可借以废除这个使徒王国^[21]里日益激愤的新教教会之存在。科隆尼奇从维也纳带来了1.2万名军士协助塞莱普琴伊大主教及其助手们查禁普雷斯堡、肖普朗、森特耶尔日和斯洛伐克矿区城镇的新教教堂和学校。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尾随士兵们前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寺院和学校。但是，制止新教信仰的行动在边境要塞遭到了当地匈牙利裔驻军的强硬抵制，于是1674年维也纳的政府下令停止强行重新天主教化。高级教士们曾诉诸司法程序。从1673年9月到1674年4月间，塞莱普琴伊一直在普雷斯堡主持一个司法委员会审查那些涉嫌参与韦谢莱尼阴谋的新教教士。他们中有200多人被劝使签署一份离开匈牙利并永不回来布道或执教的保证书。有40名牧师坚决拒绝签名，因而被判到那不勒斯船队去当划桨奴。他们所受的折磨激起了联合省、勃兰登堡、萨克森和瑞典等新教国家的强烈抗议，而此刻利奥波德最不愿意与这些国家生隙。这些不幸的囚犯在船上经历了两年多的磨难后被德·勒伊特海军上将救出并送往荷兰避难。

从1671年到1681年间，利奥波德异乎寻常地受到东方事务的困扰。匈牙利已被镇服；土耳其人也不是对奥地利的直接威胁，因为他们正全力同波兰和俄国进行争夺乌克兰的战争^[22]。皇帝因此得以全神贯注地对付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引起的麻烦。利奥波德很难完全抛弃洛布科维茨提出的通过与法国亲善来最顺当地夺取西班牙王位的政策。但路易十四摧毁联合省的明显决心，他在1670年对帝国所属之洛林公国的占领。他与瑞典的结盟以及他在1672年春对荷兰的入侵^[23]，最终使利奥波德意识到帝国受到了威胁。他于是让利索拉放手大干，在1672年、1673年和1674年，皇帝相继与荷兰、西班牙、勃兰登堡、不伦瑞克和萨克森结了盟^[24]。1672年8月，蒙特库科利率1.5万人从埃格尔踏上了征途，在此后的7年中，哈布斯堡诸领地的人力、

物力全倾注于收复阿尔萨斯并阻止蒂雷纳及其后任打开通往维也纳的多瑙河大道的代价高昂且无结果的争夺中。

在上莱茵河地区如此旷日持久地维持一支5万人的军队榨干了利奥波德所有领地，尤其是其波希米亚王国的人力、财力。这个王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波希米亚在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下度过了捷克人称之为“Temno”（黑暗）的岁月。但在1680年，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焰短时间地照亮了这些年代。在1652年、1668年和1673年，当领主对劳力的需求大增之时，乡间的不满曾爆发成一些小规模的地方性骚乱。1679年的饥荒和从巴尔干半岛蔓延到哈布斯堡领地的瘟疫引起了一场更普通的骚动。瘟疫在1678年横扫了匈牙利，1679年蹂躏了奥地利；尽管波希米亚作了一些为时过晚且原始、无效的预防，瘟疫还是在1680年降临到了这里。布拉格有1.5万人，亦即其人口的1/3死于瘟疫，其中3500人是犹太人居住区居民。利奥波德为躲避维也纳的瘟疫逃到了波希米亚，他的到来在一些波希米亚农民看来是一个直接请求他施仁政的良机。1680年年初，波希米亚北部的一群农奴向国王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国王接受了。但当这个国家全境的其他农奴受此事件的鼓舞也纷纷效仿之时，害怕仁慈的利奥波德会被打动而有所恩赐的领主们开始逮捕关押农民们选出的代表，并劝请利奥波德颁布一份特谕，禁止直接向国王请愿，而应把请愿书递交给地区法院长官。随后发布的一项公告又宣布：1618年“罪恶叛乱”之前农奴所享有的一切自由一概废除。

于是，一些更激进的农民领袖开始鼓动公开反叛。在波希米亚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农奴们拒不为领主服田地上的劳役，并对地主及其管家进行武装示威。一支由克里斯托弗·阿朗上校率领的军队立即被派去镇压起义。阿朗上校率部从波希米亚东部经北部开到西部；大多数农民武装都望风解体。有一些小冲突，但由于农奴在法律上是不能拥有武器的，因此大多数仅仅手持钩镰铁枷的农民根本无法抗御训练有素的部队。仅有的两场姑且可算作最小规模的战斗，一场发生在比尔森区的切利夫——两连巡逻兵在火炮支持下驱散了农民；另一场发生在恰斯拉夫区的切斯蒂纳附近。在这两场冲突中有200多名农民被杀死。所有手持任何种类兵器的农民一经俘虏就被吊死。到4月底，起义被镇压了。一个以军队为后盾的罪犯审讯委员会被派往巡视叛乱地区搜寻并审判起义领袖。有几百人被定罪，处以绞刑、斩首、分尸

或刺杀。好几千人被送去强迫劳动，或关进领主及匈牙利的监狱。1680年6月，国王发布了《劳役敕令》，它虽然也表示某些领主有非人道行为，但却又承认自1620年以来的大多数新措施是合乎法律的，敕令规定每家农户每星期所出的劳役最高标准为3天，只有在庄稼收获季节和打捞鱼塘时才能超过这个标准，“但领主须保证农民因此等超额服务而获得一定的报酬”。^[25]在那些劳役每周不满3天的已成定例的庄园，劳役量不应再增加。1680年的这项敕令仅得到了暂时的和不彻底的缓解；在许多地方，敕令还被置之不理。

安普林根和执政府在匈牙利推行的奥地利专制统治，未能安抚这个国家或给予它以和平和秩序。米哈伊·泰莱基伯爵在同他一样笃信卡尔文教的特兰西瓦尼亚君主阿保菲的资助下，把1671年的流亡者组织成一支爱国者军队（著名的“库鲁茨”）^[26]，他们在匈牙利东北部的荒芜区建立了根据地，在那里他们上无片瓦，下无耕地，吵吵嚷嚷，四处劫掠，并一直受着斯潘考将军所部雇佣兵的追剿，但他们坚持了下来。泰莱基试图利用路易十四的反哈布斯堡外交，法国当时正设法鼓励波兰国王扬·索比斯基、阿保菲和匈牙利“流亡者”骚扰利奥波德的后方。于是就有了泰莱基的流亡伙伴伊姆雷·乔凯伊发起的进攻，他是一位精明强干、不知疲倦的年轻贵族，时年22岁。他的出身、教养和财富把许多人吸引到“库鲁茨”的队伍里：他们中有被放逐的地主，也有农民，有斯洛伐克人，也有马扎尔人。1678年，乔凯伊在法国军官和波兰雇佣军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把奥地利人赶出匈牙利北部。这场战争的双方都残酷无情，宗教热情的升温使他们都无所不用其极。塞莱普琴伊大主教处死了18名支持乔凯伊的新教牧师，乔凯伊也在所到之处镇压各种教团，把天主教教堂交由新教徒掌管。天主教教徒方面封闭了普雷肖夫和萨罗斯巴塔克的新教学校，乔凯伊则封闭了乌兹霍罗德和科希策的耶稣会学院。两位奥地利将军，即久经战阵的瓦尔特·莱斯利及其后任埃涅斯·谢尔乌斯·卡普拉拉，都无法阻挡乔凯伊及库鲁茨部队占领斯洛伐克中部的矿区诸城并向北向西分别攻入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到1680年时，乔凯伊已占领了匈牙利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的县。

基督教世界中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危急。已在乌克兰受挫的土耳其人对乔凯伊军队的作战潜能大感兴趣。人们普遍感到安普林根将永远无法驯服匈牙利。首先出面调停利奥波德、

路易十四和匈牙利之间关系的是新任教皇英诺森十一世，英诺森是继庇护二世之后最狂热的反异教之教皇。1677年，他派布翁维西前往维也纳把皇帝争取过来，不出一年，这位使节就促成了匈牙利显贵到维也纳与利奥波德的大员们会谈。当西方在尼曼根签订了和约^[27]之后，利奥波德于1681年5月在肖普龙召开匈牙利等级会议。会上，他以恢复匈牙利王国的自由权利为条件换取了王国领主们的支持。等级会议恢复了选举宫伯的权利；总督衙门和执政府被废除；匈牙利财政院再一次独立；国家各种官职应由匈牙利人担任的原则被确认；等级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最后，新教徒重新取得了1608年时的种种自由，逃亡的牧师获准返回。

这场风水倒转来得正是时候，乔凯伊意识到，利奥波德与等级会议的和解意味着他没有土耳其的帮助就不能主宰匈牙利，而继承法泽尔·艾哈迈德·柯普律吕担任土耳其宰相的卡拉·穆斯塔法此时已准备干预，因为他相信摧毁哈布斯堡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682年夏，布达帕夏举行了盛大典礼欢迎前来的乔凯伊，随后，一支库鲁茨与土耳其联军立即发动了征服匈牙利的战役。它们迅速攻占了东北部的要塞科希策、普雷肖夫和莱沃恰，并以4000名土耳其人阵亡的代价占领了菲迪亚科夫。紧接着，易卜拉欣帕夏向乔凯伊传递了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诏书，宣布乔凯伊为全匈牙利暨克罗地亚国王，但须向苏丹纳贡称臣。上匈牙利的新征服者给这里造成了比奥地利军队的占领更加惨烈的灾难。鞑靼人和塞凯尔人的骑兵焚烧村庄，掳掠居民为奴；土耳其人的骆驼糟蹋花园和葡萄园，边境要塞被夷为平地。1682年年底，利奥波德与乔凯伊订立了一项停战协议，庆幸地争取到了寻找盟友和组建一支军队的时间，但停战协议使赫龙河以东的所有匈牙利领土落入乔凯伊手中。在奥斯曼苏丹及其宰相看来，发动一场他们相信将实现苏莱曼大帝1529年未竟之功的大战已万事俱备了。

利奥波德在注视土耳其人战备的同时仍焦虑地注视着路易十四的“归并会议所”的活动，^[28]倒是教皇，通过他派往各处的使节，在组建由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和帝国议会及波兰组成的基督联盟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与扬·索比斯基之间的关键性同盟一直到1683年3月31日才得以缔结，也正是在这一天，穆罕默德四世和卡拉·穆斯塔法统率他们的庞大军队从亚得里亚堡出发。他们在匈牙利境内会合了阿保菲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乔凯伊重新开始他在斯洛伐克

西部的战争，但他未能夺取普雷斯堡这个要冲。当基督教军总司令洛林的查理公爵获悉敌军已接近杰尔城时，他向西撤退了，这样，匈牙利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而维也纳则要经受一场围困。从7月起，维也纳守军在吕迪格·冯·斯塔勒姆贝格伯爵的指挥下奋勇抗战，一直坚守到9月12日索比斯基的救兵从卡伦山顶旋风般地杀下并击溃了土耳其人，从而使基督教世界永远解除了困扰心头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对穆斯林征服之忧惧。

维也纳的巨大胜利，像勒颁多战役一样，既平息了诸多的恐惧，也激起了诸多的喜悦，而且比勒颁多战役更有理由这样说，因为这场胜利的后果更重大、更持久。它像勒颁多战役一样，是教皇和皇帝的共同胜利。此外，它标志着奥地利登上了大国的地位。现在处在光辉顶峰的是利奥波德，而不是路易十四，而在此后的数年里，当路易十四的强大军队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的困境中杀得昏天黑地且屡屡失利之时，利奥波德的军队却在重新擦得锃亮的圣斯蒂芬王冠照耀下，把异教徒赶回到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以南。解放匈牙利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是高奏凯歌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后成就。正是英诺森十一世于1684年3月在林茨组织了由皇帝、波兰国王和威尼斯参加的神圣联盟；联盟军应同时在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希腊发起进攻也是他的计划。这位教皇为了让每一枚金币都花在战争上几乎使教廷的金库空空如也；哈布斯堡君主的寺院被课以占它们收入1/3的税收。布翁维西红衣主教不光是掌管这些钱财，他还运筹帷幄制定方略并督促优柔寡断的利奥波德予以实施。

把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29]它花费了16年的时间，而且，当1688年法泽尔·艾哈迈德之弟穆斯塔法·柯普律吕当上奥斯曼帝国宰相之时，一时还出现此前6年的所有胜利成果似要毁于一旦之状。但尽管土耳其人有这段回光返照，继他们在维也纳城下惨败后又发生的一些政治性灾难已使土耳其受到了致命伤。^[30]确保把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的是基督教军队的数量规模及其用兵的巧妙。在那场导致1686年9月2日收复布达的残酷战斗中，有4万人参战，其中包括奥地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勃兰登堡人、士瓦本人、弗朗科尼亚人、巴伐利亚人、瑞典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还有少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帝国将领的卓越才干在一些战斗中显现了出来。如1687年洛林的查理在纳吉哈尔塞尼附近几乎是与莫哈奇古战

场同一地点的战斗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这次胜利使被土耳其人统治达150年之久的匈牙利南部回归哈布斯堡王室。

赶走土耳其人对于匈牙利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到1687年，利奥波德已有充分能力主宰整个国家，以致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废除自己在1681年被迫给予匈牙利的种种自由了。1687年10月，他把匈牙利等级会议召集到普雷斯堡开会，迫使各等级宣布匈牙利王位不再由选举产生，而由哈布斯堡王室男性直系世袭。一直弥足珍贵的1222年《黄金诏书》第31节被废除了，这一节曾使匈牙利领主有权反抗任何违背《黄金诏书》的国王。匈牙利等级会议停止集会，匈牙利最终降到了如波希米亚已充当了60年的行省的地位。

特兰西瓦尼亚邦国在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后比匈牙利其他部分的处境要更好一些。当穆斯塔法·柯普律吕当上土耳其帝国宰相并发动1690年大反攻时，他意识到必须确保使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多瑙河下游北部的一个桥头堡。1690年4月阿保菲邦君死后，苏丹册封乔凯伊为特兰西瓦尼亚邦君并拨给他一支军队，这支军队8月间在策尔耶斯特打垮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巴登的路易于是被迫率其主力回师特兰西瓦尼亚，尽管这意味着将让土耳其宰相重占维丁和贝尔格莱德及萨瓦河以南所有刚收复的领土。决定特兰西瓦尼亚命运的战斗于1691年9月19日在蒂萨河交汇处附近的佐伦凯梅进行。路易大获全胜。虽然乔凯伊得以逃脱，但穆斯塔法·柯普律吕和2万名土耳其人却被击毙。1690年10月和1691年12月在维也纳先后发布的两份利奥波德朝文书规定了特兰西瓦尼亚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宪法地位。这个公国未被重新并入匈牙利，而是直接隶属于维也纳，但它也获准享有极少一些自治的权利。它必须向哈布斯堡国王效忠。天主教、卡尔文教、路德教和反三位一体派信仰活动共存的局面得以继续。尽管特兰西瓦尼亚等级会议继续召开并立法，但这个邦国实际上由国王任命的总督及参事会统治。它的这种宪法地位一直保持到1848年。

土耳其人并不轻易地向利奥波德认输。在佐伦凯梅战役后的6年中，他们仍拼命抵抗，而且，在同巴登的路易之无能后任及因西方对法国战争之需求而进一步削减的帝国军队作战时还屡屡获胜。1697年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当选为波兰国王一事决定了土耳其人的命运，因为这导致了萨伏依的欧根接替奥古斯特出任帝国军队统帅。1697年9月4日，欧根在蒂萨河下游的曾塔歼灭了最后一支较有战斗力

的土耳其军队。土耳其苏丹穆斯塔法二世开始通过英国驻土耳其政府大使佩吉特勋爵谈判媾和。海权国家基于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命在旦夕的局势，敦促利奥波德结束其东方战争。在德拉瓦河下游一个名叫卡洛维茨的荒废村庄附近，皇帝、苏丹、波兰、俄国和威尼斯的全权代表签署了和约；据约，土耳其放弃整个匈牙利和特兰瓦尼亚，将之让与利奥波德，只有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名叫巴纳特的地区除外，这块地方位处匈牙利的东南部，卡在马罗斯河、蒂萨河下游、多瑙河和瓦拉几亚边界线之间。贝尔格莱德仍在土耳其人手中，现在，除了巴纳特和卢萨蒂亚以外，利奥波德一世统治着斐迪南一世所建帝国的所有领地，而且，他是以一种斐迪南一世肯定会羡慕不已的专制权力行使着其统治。

[1] 引自V. 诺莱特尼主编《捷克斯洛伐克》，第4卷，“历史”（布拉格，1930年），第531页。

[2] 见《私人信札》1665年2月18日，第1卷，第105页，转引自D. 雷德里希《奥地利史》（哥达1921年版），第6卷，第112页。

[3] 引自雷德里希，前揭书。

[4] 见后第486页。

[5] 指1086年英国国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册。——译者注

[6] H. 伊纳尔切克教授的研究最近表明，土耳其的财政制度对待巴尔干的基督教臣民并不像迄今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酷。不知这种情况是否也适合于土耳其治下的匈牙利。

[7] 见后第24章边码第565页。

[8]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04—505页。

[9] 见后第22章边码第521页和24章边码第566页。

[10]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07—508页。

[11] 见前第18章边码第446页。

[12] 是一种由意大利诗人托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开创的韵律诗。——译者注

[13] Sxekfü在Hóman Bálintes Szekfü Gyula, *Magyar, Történet*（布达佩斯1935年版）第4卷边码第163页中所引。

[14] 见后第24章边码第568页。

[15]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11页。

[16] 见后第21章边码第511页。

[17] 见前第9章边码第210页。

[18] 转引自A. F. 普里勃拉姆《利索拉伯爵弗朗茨·保罗（1613—1674）与当时的政治》（莱比锡1894年版），第311页。

[19]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第21章边码第510、512页。

[20] O. 雷德里希编：《普苏道夫日记》，载于《奥地利历史学会会刊》（1916年），第589页。

[21] 使徒王国（apostolic kingdom）系指奥地利君主所属诸领地，因奥地利君主一向自称为使徒国王，正如法国国王一向自称为最信仰基督的国王一样。——译者注

[22] 见后第24章边码第569页。

[23] 见前第9章边码第215—217页。

[24] 见前第9章边码第217—218页。

[25] 见V. 诺莱特尼主编《捷克斯洛伐克》，第4卷，“历史”（布拉格，1930年），第531页。

[26] 意为“十字军”。——译者注

[27] 见前第9文章，第219页。

[28] 关于这些活动，见前第9章，第219—220页。

[29] 关于土耳其人被逐出匈牙利的详情，见本书第6卷第19章。

[30] 见后第21章，第517—518页。

第二十一章 穆罕默德四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

1648年登基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继承了一个由其先辈用刀剑所征服、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距维也纳仅80英里；在北非，仅摩洛哥不属于它；其版图囊括上埃及并扩展至亚丁；黑海和红海都是土耳其的内湖；在东部，它延伸至里海沿岸和波斯湾。要说出该帝国人口的确切数字是不可能的，但在17世纪其人口有2500万或3000万。土耳其人尽管是统治民族却仅占人口的少数。穆斯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高加索各突厥语民族——可能要多于基督徒——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摩尔多瓦人。这一时期土耳其人中的佼佼者有著名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献学家卡蒂布·特杰莱比（1609—1657年）以及著名的旅行家埃弗里亚·特杰莱比（1611—1678年），后者在其十卷巨著中记叙了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风俗习惯和各民族。帝国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它是帝国军事机构的所在地和商业、文化以及娱乐中心。有50多万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在这里，数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一起，各自遵守自己的习惯。城里有苏丹的皇宫和阿赫默德苏丹、苏莱曼尼耶、巴耶兹德、塞利米耶以及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等宏伟清真寺，还有许多大学、图书馆、公共浴室、医院、客栈和由虔诚信徒的施舍所维持的食物分配中心。帝国的“第二首都”是亚得里亚那堡，历代苏丹常来这里消闲，并作为军队发动进攻基督教国家的基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受到苏丹的特别关注，因为作为哈里发，保护此两地是其职责，每年从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成千上万的朝觐者前来并施与丰厚捐赠。

奥斯曼帝国基本上是一个有着广袤沃土的农业国，土地和农业税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经营农业的方式非常原始，所使用的工具也是落后的。农民的地位相当于农奴，穆斯林农民缴纳农产品什一税并承担许多其他义务，而基督教农民另外还得缴纳使他们免除兵役

的人头税（Dizye），其数额根据农民的地位和收入而各不相同。由于帝国控制了从地中海到东方的主要贸易路线，因而贸易尽管受到许多阻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是与外国通商的中心，而亚得里亚那堡、布鲁萨和塞萨洛尼卡则是著名的国内贸易中心。关税是大宗收入的另一来源。许多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从事商业，因为土耳其人通常认为经商有损其声誉而更愿意担任军事和行政职务。外国商人也非常活跃并享有特权，譬如在缴纳商品进口税方面即是如此。成功地排挤了威尼斯人和法国人的英国利凡特公司占有主导地位，但为上层社会所使用的布匹既从英国也从威尼斯进口，贵重毛皮则从俄国进口；咖啡来自也门，烟草由英国和荷兰商人进口；尽管吸烟受到严厉惩罚，但这种习惯还是迅速得到传播，而且就在此时还开始了烟草种植。

帝国的稳定和安全端赖于其军队，它的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这支军队包括以近卫军（“雅内萨里”）著称的常备军和各省由因服兵役而获得土地所有权的采邑主所供养的封建征募军。每个采邑主根据其收入的数额必须装备一定数量的骑兵并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这种制度提供了一支约有10万之众的骑兵部队，但它逐渐腐败和失去作用。采邑经常被不合法地分配，而且提供兵役的义务被置之脑后，尽管拒绝服役原本要停止采邑主的土地使用期的。近卫军建立于14世纪，其基础为少年征役制（“代弗希尔梅”），即从巴尔干基督教儿童中征兵的制度。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在特殊管理和严格纪律下接受教育和训练：这支十分精良的军队使土耳其人得以进行其伟大的征服。近卫军被划分为150多个不同规模的“奥塔”，它们因其序号以及特别的军旗和徽章而著称。士兵们身穿制服，生活在兵营，根据所服兵役长短领取薪饷，新苏丹登基时还可领到特别赏金。近卫军总人数达到5万人，但其纪律和作战能力均已松弛和下降。控制叛乱的近卫军问题极端重要，因为它的暴乱会动摇帝国的基础。而且，在穆罕默德四世统治时期少年征役制度已经废弛，只有穆斯林，尤其是近卫军的儿子才应召参加近卫军，这是促使其衰落的另一个因素。除了近卫军，常备军还有少量的炮兵、投弹兵、坑道工兵、御手和军械士。

海军也非常重要，海军部在金角湾占据了很大的地区，在那里制造新舰，修理受损的舰只。水手主要从希腊人和以“利文德人”[Levend，为意大利语“利凡特人”（Levantino）之误]著称的人中招

募。但是奥斯曼海军同样腐败，所以威尼斯人不仅在地中海甚至在爱琴海能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其后果对奥斯曼人来说是致命的。在其他领域，他们固有的保守主义也阻碍了他们做出必要的变革和调整。对于欧洲迅速变化的经济状况和技术进步他们视而不见，许多要职任用非人，权柄往往落入巧言令色之徒手中。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盛，那时它拥有堪与其成就相称的发达而有效率的各种机构。但是苏莱曼的继承者除两人以外，缺乏其先辈的才智和热情，不再在公开场合起到显耀的作用，而宁愿身居宫墙之内。早在16世纪后期穆拉德三世统治时，衰落的迹象就已露端倪。政府屈从于苏丹宠妃的阴谋诡计或太后的影响。后宫的总管是一个黑人太监，他常常参与国家要务，而苏丹不再勤于朝政。根据成规，政府由宰相掌管，他拥有重权。但是直到1656年柯普律吕上台，宫廷的阴谋和苏丹宠信的干涉导致宰相权力和整个政府制度的衰落。国务会议（Divan）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由宰相领导，参加者有某些其他高级官员、高级僧侣以及鲁美尼亚和安那托利亚的法官（“卡迪”）。

由于帝国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总法典官（即教长）在政府中举足轻重。他是掌管所有穆斯林法律和宗教机构的领袖，享有特权地位。许多重要决定，譬如宣战、媾和或者苏丹的废黜，均需经他首肯方可实施。与宰相不同，总法典官犯了罪不能处以死刑，只能流放。重要性次于总法典官的是法官，他们另有许多其他的职责。在其辖区内法官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监督市政和食品供应。法官中地位最高者是鲁美尼亚法官，其次为安那托利亚法官，他们是军法官，有关军队的司法事务均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司法制度的基础是伊斯兰法典《谢里阿特》（即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在司法和行政领域工作必须通晓此法典。

帝国被划分为32个行省，其中最重要的有鲁美利亚、安那托利亚以及沿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后者在海军统帅卡普丹帕夏的管辖范围之内，其他重要省份则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总督（Beylerbeyi）所统治，他们领取很高的俸禄并获得作为采邑的大片土地。总督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必须监督完成有关征兵的一定军事义务并作为本省军队统帅参加战斗。在他们所监督的军事义务中还有组建其占有者必须提供封建劳役的军事采邑（“蒂马尔”）。较小的省份由省长（Vali）

统治，他们也由君士坦丁堡任命。省下再分为桑甲克（一个标准军事单位），它们与征募一定数量军队的区域是吻合的。各桑甲克均由中央政府的一名军政代表（Sandjakbeyi）管辖，该代表也占有一大片采邑，他负责在自己管辖区征兵并在战争时期指挥所征军队。因此，这种制度将军事和行政职能的结合发展到超常的程度；它似乎高度集中，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在边远省份维持秩序和控制有权势的省督。无能之辈经常充任各省和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上台后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某些省份，如大马士革、也门、阿比西尼亚和埃及，享有特殊地位和独立的特权。土耳其省份实行的赋税和义务制度，如军事采邑制，不适用于埃及和阿拉伯各省。埃及不仅是帝国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且是帝国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产粮区。维持政府和军队的全部负担几乎都落在土耳其本土各省身上，但是只有穆斯林必须服兵役，非穆斯林则以缴纳人头税替代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基督教公国享有自治地位，其大公由苏丹政府任命，但其臣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两公国也不由土耳其军队卫戍。它们须向奥斯曼军队提供谷物和羊，向苏丹政府纳贡，其他方面则均根据当地习惯进行治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克里米亚汗国，它是一个自治的伊斯兰国家，其汗由苏丹政府任命和废黜。他们受居克法和奥居的奥斯曼总督的监督，如有必要后者即行干涉。鞑靼汗不用纳贡，但必须提供2万—3万骑兵参加土耳其的战斗，他们被用作军队的前卫，还须保卫奥斯曼领土不受第聂伯河和顿河哥萨克的袭击。反过来，鞑靼人几乎每年都袭击波兰和俄国，掠走许多俘虏，将他们从克法或阿扎克（亚速）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和埃及贩卖为奴。埃及以西的北非诸邦——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一直较为松弛，它们或多或少保持独立，拥有自己的军事或行政组织，它们对苏丹政府的义务仅仅是向苏丹进贡一些礼物。

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领域不断涌现时，奥斯曼帝国的机构和社会失去了活力，开始停滞和衰落。东方和西方的差距变得更大了，特别是在技术领域，但是奥斯曼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们仍然将其帝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伊斯兰生活方式是无与伦比的。欧洲列强也没有注意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一直到其兵败维也纳城下才使同时代人的眼睛睁开，其实际形势开始受到了正确估价。

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以中世纪专制主义的形式及与之相应的机构进行统治的，苏丹和宰相的才能至关重要。当精力充沛、颇具才干的苏丹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登基后，奥斯曼的财力和军力有了复兴。前几代苏丹统治时的腐败和无政府状态结束了，丢失给波斯的土地经过血战重又夺回。然而，在穆拉德的兄弟易卜拉欣统治时期（1640—1648年），衰落的征兆更为明显。苏丹昼夜耽于逸乐，其心智迅速失常。治理不善和滥用职权之事遍及各省，导致各地发生起义。除了这些叛乱外，威尼斯人和哥萨克也入侵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很快成功地占领了利姆诺斯和特内多斯诸岛，从而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并威胁君士坦丁堡本身。在这种面对无政府状态蔓延和革命爆发的威胁的形势下，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力劝总法典官和克塞姆苏丹（皇太后）废黜易卜拉欣。1648年8月易卜拉欣被废，其子、时年仅7岁的穆罕默德登基。为防止易卜拉欣重掌权柄并向继承皇位的穆罕默德挑战，11天后他被谋杀了。由于穆拉德杀害了他的三个兄弟，易卜拉欣是幸存者，穆罕默德及其弟确是奥斯曼王朝仅存的男性胤嗣，所以穆罕默德即位的消息很受整个帝国的欢迎，尽管有着某些不祥之兆。

穆罕默德年纪太小，自己不能执掌朝政，皇权就落到相继任职的几位宰相以及穆罕默德的祖母和俄国血统的母亲图尔汉手中。因此，政局不稳仍然存在，各种阴谋在皇宫中层出不穷，这很快反映在各省盗匪盛行和叛乱频仍上。在易卜拉欣统治时期与威尼斯人的战斗中，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要塞已被土耳其人所征服，但现在却需要向克里特岛增兵，打破威尼斯人对达达尼尔海峡所实施的封锁。因此，1649年土耳其舰队从恰纳克起航，但在威尼斯人的打击下只是再一次遭受失败，结果，宰相索富·穆罕默德帕夏被解职并处死。但是穆罕默德的祖母克塞姆和母亲图尔汉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进行。在这场斗争中克塞姆依靠近卫军的支持，谋划通过扶持穆罕默德之弟苏莱曼登位来清除异党。当她的计划几近成功、与近卫军的首领已经达成协议之时，1651年9月她被图尔汉的党羽谋杀了，克塞姆的同谋随后遭到杀戮，所以近卫军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影响，得到宫廷官吏支持的图尔汉则权倾一时。宰相和政府官员根据他们的愿望加以任命，年幼苏丹的教育和训练被全然不顾，他大部分时间与玩具做伴，嬉戏玩耍，很快对成其终生癖好的打猎有了兴趣。这种趋势得到其母后的鼓励，她因此而将国家完全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穆罕默德四世被奥斯曼编年史家称为“猎人”：甚至当他的军队进攻维也纳并折戟于其

城下时他也不能放弃狩猎——这一癖好是他被废黜和囚禁的原因，他从未对文学或统治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1652年6月，图尔汉任命十分诚实的塔尔洪丘·艾哈迈德帕夏为帝国宰相。这时，两年后的收入已经预支，铸币成色下降。新宰相试图整顿帝国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提出一个预算，据该预算，收入约为14503珀斯^[1]（purse）白银，支出约为16400珀斯，留下1900珀斯的少量赤字。但是，实际困难来自未来两年赋税已经征收，因而一时所望获得的收入极少。支出的大部分——约1万珀斯——归于陆军和海军；其中3866珀斯用于当时注册士兵为51647名的近卫军，只有988珀斯用于海军，它拥有50艘多层甲板大帆船和13艘单层甲板帆船。966珀斯分配给御膳房，255珀斯给御厩。鉴于财政形势，名副其实的搜刮金银开始了，因为士兵的薪饷必须按时发放。专横的新税法采用了，即使富人的财产也要没收。严厉的措施被用来剥夺宠幸的特权和总法典官亲信的非法所得，但是，这些做法触犯了许多有权势的人物：他们的阴谋最终获得成功，塔尔洪丘·艾哈迈德帕夏被赶下了台，他的改革政策也随之取消了。他在台上仅9个月就被褫职，而且很快就被处死了。

他的继任者同样不能克服帝国的财政和行政困难。宰相易卜西尔帕夏1655年8月被处死。小亚细亚爆发了起义；税率依然很高；省督们则表现出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威尼斯人的威胁没有消除，其海军统帅拉扎罗·莫塞尼戈对土耳其海军作战大获全胜，而争夺克里特岛的斗争依然没有减弱。由于威尼斯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向君士坦丁堡输送的食物和给养几乎中断，物价飞速上涨。居民十分焦虑和不满，因为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来保卫首都不受来自海峡的攻击。人们对宫廷和有关官员多有抱怨，但宰相穆罕默德帕夏却不能决定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苏丹则忙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斯库塔里打猎。国务会议是召开了，但没有结果。显然政府不能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必须任命一个有才具的人担任首相，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方能适应形势。认识到形势严重性的人士向皇太后图尔汉力陈利害，因为没有她的同意就无法做出任何重要决定。皇宫的总建筑师向她建议，任命像他自己一样也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柯普律吕·穆罕默德帕夏为宰相定能克服困难。此议为图尔汉所接受，相印遂授予时年71岁的柯普律吕。他先前曾在宫廷和财政部担任过不同官职，也曾辅佐过先前的一位宰相，并当过若干省的省督，但自1655年已经退出官场。他缺乏

担任宰相所需要的教育，但他精明、经验丰富，洞悉政府机器及其缺陷。因此，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几个条件：不允许批评宰相，即使有批评也不应予以考虑；不得授权任何大臣反对宰相的所作所为；不得干涉对大小官员的遴选，所有呈交御览的奏章均须经宰相之手。图尔汉为了儿子的利益同意了这些条件，1656年9月柯普律吕走马上任。他是到当时为止仅8年时间内的第11位宰相。他任该职直到1661年去世，在这期间他的地位相当巩固。

上台伊始，柯普律吕对政府官员进行了清洗。因违法乱纪而臭名昭著者被褫职，其中不乏高官显贵，如财政大臣、总法典官以及海军总司令。宫廷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太监总管被流放到埃及。任命了许多新法官和地方官员。然而，柯普律吕不满足开除那些他所不信任的人，他的许多对手和潜在竞争者均一一为他铲除。被认为对利姆诺斯失陷负责的海军将领和因军纪废弛而获罪的近卫军司令被处以死刑。一名受控残害人民的税吏和虐待鞑靼人的锡利斯特里亚省省长得到了同样的下场。东正教大主教帕森尼奥斯三世被绞死，其罪名是煽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大公发动起义。许多帕夏、大臣、大官以及封疆大吏因招惹了宰相而遭到同样的命运。清洗对象总数据说达到5万—6万人。所有不必要的开支都被削减，一场反腐败运动开展了起来，根据1660年的预算，收入估计为14531.5珀斯（几乎不多于1652年），支出为14840珀斯，留下微不足道的赤字。然而，与1652年相比，收入没有预支，所以财政形势有了很大改善。总的说来，柯普律吕并没有什么新招，而是满足于使现存政府机器正常运转以及严格实施现有法律。

反政府的叛乱遭到了严厉镇压，其中阿巴扎·哈桑帕夏所领导的小亚细亚叛乱在1657—1658年对政府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叛乱的中心在布鲁萨，由此蔓延到毗邻省份。许多大臣、帕夏、高级官吏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参与了这场得到人民支持，不仅仅是另一场亡命之徒的运动。阿巴扎·哈桑的目标是在小亚细亚建立自己的政权，因而一个叛乱政府在那儿建立了起来。柯普律吕不得不从特兰西瓦尼亚被召回，他正在该地镇压另一场同样危险的起义。大量的军队被派去对付阿巴扎·哈桑，经过激烈战斗他们成功地粉碎了叛乱。作乱者横遭杀戮或被处决，31颗头颅送往君士坦丁堡示众——其中包括阿巴扎·哈桑、4位帕夏以及2位大臣的头颅。

在对外政策方面，柯普律吕同样取得了成功。他派遣海军进攻仍在威胁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威尼斯人，后者在遭到最初的几次失败之后被迫解除他们所实施的封锁。接着，柯普律吕不失时机地着手收复落入威尼斯人手中的岛屿。他亲自指挥前去攻打特内多斯岛之部队的启程。该岛于1657年8月收复，11月利姆诺斯岛又被占领。这样土耳其获得了重大胜利：不仅达达尼尔海峡免除了威尼斯人的威胁，而且奥斯曼海军重新获得爱琴岛海上的优势从而有可能增援克里特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塞迪尔巴希尔和库卡莱两大城堡建立起来，以保卫海峡防御未来的进攻。

在柯普律吕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争夺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斗争，这两地是通往中欧的咽喉，因而自苏莱曼大帝时代以来就是奥斯曼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必争之地。匈牙利的大部分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邦君经常就其施政寻求苏丹的同意和批准。就维持奥斯曼对匈牙利的统治和获取土耳其对波兰的影响而言，特兰西瓦尼亚至关重要。17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结果是它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变得十分松弛。在穆罕默德四世统治之初的危机年代里，特兰西瓦尼亚邦君捷尔吉·拉科齐二世企图使其国家摆脱土耳其的统治^[2]。在北方战争（1655—1660年）期间，当波兰大部分领土为瑞典所占领时，拉科齐的目标是夺取波兰王位^[3]并干涉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由于这些计划有损于土耳其的利益，柯普律吕决定干涉。他要求废黜拉科齐，另选新君。1657年11月及时选出了费伦茨·雷代伊，但两个月后他被拉科齐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于是柯普律吕决定率远征军进入该公国。在离开君士坦丁堡前，他成功地整肃军纪，他所不信任的许多近卫军士兵被处死。新近接受奥斯曼保护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哥萨克参加了远征军，一支庞大的军队集结了起来。尽管拉科齐进行了抵抗，但土耳其人很快完全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土耳其与新邦君阿科什·包尔齐签订协定，据此年贡从1.5万弗罗林增加到4万弗罗林，若干要塞由土耳其卫戍军占领。拉科齐不得不到哈布斯堡属下领土寻求避难，并向身为匈牙利国王的利奥波德一世呼吁援助；但他只得单独坚持斗争，1660年5月在一次交战中负伤，两周后去世。但是，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持者没有放弃战斗。1661年年初他们选出亚偌什·凯梅尼作为拉科齐的继承者并成功地绑架和杀死了其亲土耳其的对手包尔齐伊。由于1658年柯普律吕不得不返回君士坦丁堡去处理小

亚细亚叛乱，特兰西瓦尼亚有数年未能加以控制。苏丹政府转过来宣布与凯梅尼争夺该邦控制权的米哈伊·阿保菲为特兰西瓦尼亚邦君。1662年在一次遭遇战中凯梅尼被杀，接着阿保菲成功地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从而土耳其的宗主权得以恢复^[4]。

柯普律吕没有活着看到他的特兰西瓦尼亚政策的成功，1661年10月他去世了，享年75岁。他的成就表明，如果任用有能力的人掌权，奥斯曼帝国是能够克服艰巨困难的，但为达到该目的不得不建立恐怖统治。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柯普律吕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后世史学家的论证也是如此。他特别受到批评的是残杀无辜和没收被处决者的财产，其并不是为了帝国的变革而是为了充实国库。但是，不可抹杀的是，他遏制了衰落，帝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苏丹及其母后图尔汉尤其喜欢柯普律吕的总揽朝政，这可以使他们摆脱治理的负担。因此，穆罕默德四世得以完全沉醉于在斯库塔里和亚得里亚那堡的狩猎，时或有人为他在巴尔干地区安排围猎，以致每每当地上万名他的基督教臣民不得不丢下工作以围赶禽兽或用其他方式为皇上助兴。常有来自俄国的大量纯种猎狗和猎鹰供他驱使。根据柯普律吕的建议，他的儿子、时年26岁的柯普律吕·法泽尔·艾哈迈德帕夏继乃父为相，在任时间是从1661年至1676年。

法泽尔·艾哈迈德与其父迥然不同。担任省长时他已获得统治经验。他睿智聪明，是一个卓越的司令官，显然也是当时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作为宰相他没有采取恐怖政策，由于他合理的统治方法和人道行为很快赢得民心，他的谦逊礼让使他受到普遍尊重。他拒绝受贿，通过其表率作用成功地遏制了腐败。他反对宗教狂热，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受到善待和保护，得以免受欺凌。尽管依旧征战频仍，但国库仍颇为充实。由于他的治理才能和对文艺的奖掖，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它的一个黄金时代：他大概是继任职于1565—1579年三朝苏丹统治时期的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之后最成功的宰相。

在对外政策方面，法泽尔·艾哈迈德最大的成就就是征服了自1647年就为土耳其人包围的干地亚。在经历了一场迁延20多年的斗争后，威尼斯人发现不可能抵挡住到达克里特的庞大土耳其军队，从而在1669年放弃了该要塞。征服克里特使东地中海变成了土耳其的内湖，大大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5]。

在陆地上，土耳其军队获得了几乎同样的成功。哈布斯堡王朝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干涉引起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为维持土耳其在那里的影响，法泽尔·艾哈迈德率领军队于1661年春由君士坦丁堡进至贝尔格莱德。奥地利人随即派遣一位使节去贝尔格莱德进行谈判。法泽尔·艾哈迈德要求奥地利人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拆毁他们面对卡尼扎要塞的城堡，释放所有穆斯林俘虏以及中止一切军事行动。当土耳其军队到达德拉瓦河之时，他又另外要求支付苏莱曼大帝时期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支付的年贡3万弗罗林。奥地利人拒绝接受，进军重又开始。1663年夏，宰相率领一支10万人的军队穿过布达，包围了匈牙利西北处于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新扎姆基（即诺伊豪塞尔）要塞。沿途并未遭到什么抵抗。奥地利人仅以摆出一副准备动武的姿态为限——蒙特库科利在普雷斯堡集结了6000多人，但并无一兵一卒派往诺伊豪塞尔。守军顽强地保卫要塞，但当进一步抵抗不再可能时，1663年9月达成了允许守军撤出要塞的协议。此役胜利后法泽尔·艾哈迈德返回贝尔格莱德过冬。

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复兴和欧洲由此而重新遭受威胁有着重大影响。在雷蒂斯堡举行的帝国会议一致投票同意给予哈布斯堡王朝财政和军事援助^[6]。不仅西班牙，甚至路易十四尽管近来与哈布斯堡王朝多有争执，也一反他亲土耳其的名声，承诺提供帮助；一支6000人的法国部队被派往匈牙利，许多德意志诸侯也都派去了部队。在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主持下，一个反对异教徒的神圣同盟建立了起来。由于这种援助，奥地利得以在1660年春季发动攻势。蒙特库科利增援了处在重要前沿位置的拉布（即杰尔）要塞，意在保护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不受土耳其人的进攻。法泽尔·艾哈迈德渡过穆尔河，占领了泽林瓦尔，兵临多瑙河畔的科马罗姆要塞，企图占领所有阻碍他进军维也纳的城堡。这一计划在土耳其人以“红苹果”为代号并成了他们政治抱负的象征。考虑到这种威胁，奥地利人决定媾和。7月底在沃什堡开始谈判。根据协议的条款，奥地利人默认土耳其人占领诺伊豪塞尔和瑙吉瓦劳德（即大瓦代恩）；双方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承认阿保菲为其邦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赠送苏丹20万弗罗林，苏丹也向皇帝赠送适当的礼物。该条约有效期为20年（1660年开始），但在双方批准之前，土耳其人保留行动自由以迫使利奥波德不敢延宕而立即予以同意。当条约文本还在送交皇帝批准途中之时，法泽尔·艾哈迈德渡过拉布河，沿其左岸西进，遂与蒙特库科利的军队相遇；如果这支军队

被摧毁，那么进军维也纳就会恢复，该首都就有可能陷于1664年8月1日，土耳其人以优势兵力在圣哥特哈德进攻蒙特库科利军，但犯下了未将其军队全部渡过拉布河的错误。他们开始在攻击帝国军队的中军时曾取得成功，但最终被击退，被迫退回拉布河。他们损失了5000人和15门大炮，但其对手也遭到了严重损失，蒙特库科利不敢渡河追击土耳其人，接着土耳其人撤退到多瑙河。圣哥特哈德之役显示了奥地利人在军备和战术上的优势，显然土耳其军队不是如所恐惧的那样坚不可摧。随着圣哥特哈德战役的结束，敌对行动也停止了，因为尽管获得胜利，利奥波德10天后还是批准了沃什堡和约，将诺伊豪塞尔和瑙吉瓦劳德给了土耳其，保证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影响。只有匈牙利西部和北部为哈布斯堡所保留，到那时为止并无哈布斯堡势力东扩的征兆，因而法泽尔·艾哈迈德作为凯旋的将军在君士坦丁堡备受欢迎。

这时，土耳其的影响也扩大到了乌克兰。哥萨克头领彼得·多罗森科寻求穆罕默德四世的保护，后者同意维护其不受波兰人和俄国人的进攻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击。在波兰和俄国暂时解决其分歧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多罗森科进一步加强与土耳其的紧密关系，希冀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征服俄属乌克兰，但是所承诺的援助被证明是不够的。然而，1672年一支土耳其大军在克里米亚汗和1.5万哥萨克的支持下挺进波兰，征服了卡门涅克要塞，前进远至利沃夫。但是，规定波兰必须向土耳其政府缴纳年贡的条约未为波兰议会批准，多罗森科的独立也未为波兰承认，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波多利亚地区也未成为土耳其的一个行省。1673年索比斯基在霍廷的胜利——像九年前的圣哥特哈德胜利一样——暴露了土耳其在军事上的虚弱。可是，土耳其人成功地重新占领了霍廷和卡门涅克要塞以及波多利亚，所以他们能够对波兰施加压力及反对俄国夺取乌克兰。奥斯曼的势力在黑海西北建立了起来，但数月后法泽尔·艾哈迈德去世，土耳其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统治仅仅延续了数年。

继法泽尔·艾哈迈德为相的是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时年43岁，与他的前任一起接受教育并娶其妹为妻，因而成为柯普律吕家族的一员。在柯普律吕父子治下，他任过多职，在法泽尔·艾哈迈德出征期间他代理朝政。此人野心勃勃，为人苛刻，有时还卑鄙下流，树敌很多，其中包括太监总管和御厩长。承袭其前任的方式，通过其巨大的

权威，卡拉·穆斯塔法在维持秩序、安定以及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他真正渴望的是通过胜利和征服来获得名声。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权利未能维持，尽管1678年他率军前往，夺得了多罗森科哥萨克的首府奇希林，但土耳其人却留下一片废墟后撤退了。1681年与俄国签订条约，土耳其人不再对乌克兰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该地并无多大价值，而此前为之进行的征战也未给他们带来满意的结果。基辅和第聂伯河左岸留给俄国人，波罗尼亚和第聂伯河右岸（基辅除外）则很快就归属波兰，土耳其人从这块曾经被波土双方争夺的地区撤退了。卡拉·穆斯塔法开始全神贯注的问题是向西进军，攫取“红苹果”，即征服维也纳。

沃什堡条约的有效期到1682年为止，但是争夺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影响的斗争一直存在。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服从奥地利的统治是勉强的，该地区的新教徒则害怕哈布斯堡的天主教——这是土耳其加以利用的因素。由于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匈牙利人被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信奉新教的匈牙利人希望土耳其支持他们反对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匈牙利人的领袖伊姆雷·特克伊遣使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奥斯曼的庇护，可是这一要求起初为卡拉·穆斯塔法所拒绝。但在1682年他又承认特克伊为西匈牙利的国王并承诺在需要时帮助他，实际上确有一支土耳其小部队前去支援。在土耳其的支持下，特克伊攻占了两座奥地利要塞。为消除这一对其领土的新威胁，奥地利人派遣阿尔伯特·卡普拉伯爵作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以续订1682年8月到期的沃什堡条约。然而，他的建议为一心要动武的卡拉·穆斯塔法所拒绝，后者并声称只有奥地利人交出杰尔要塞并补偿土耳其政府的备战开支时，他才愿意遵守该条约的规定。为增强其威胁，他说服穆罕默德四世在亚得里亚那堡与近卫军一起过冬，于是奥地利代表前往该地重开谈判。但土耳其人的态度依然强硬，近卫军司令再次要求交出杰尔，对此奥地利使节答道：“一座城堡可以靠军队的力量来夺得，但绝不可能靠语言的力量来攻取。”战争因而在所难免。苏丹亲自率军进至贝尔格莱德，然后由卡拉·穆斯塔法指挥军队进入匈牙利。土耳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开始了。

卡拉·穆斯塔法的军队的确切数目不详，加上一支15万人的后勤部队估计达到约50万人，但某些编年史家提出是20万人。根据奥斯曼历史学家西拉达尔·穆罕默德·阿迎的说法，仅仅工兵和炮兵部队就

有6万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集结了4万—5万人骑兵部队，但是，所有这些数字必须谨慎对待，实际数量可能要小得多。战斗部队由许多工匠、商人以及大量驮畜伴随，所以军队比实际状况显得更为庞大。根据土耳其史料，计划是征服杰尔和科马罗姆要塞而不是进军维也纳，有些土耳其史家断言，穆罕默德四世对要将战役扩展远至维也纳的意图一无所知。也有人断言，外交大臣穆斯塔法·艾芬迪深知卡拉·穆斯塔法渴求荣誉和声望，正是此人力劝他进行远征。但是，既然那位宰相有如此庞大的可用之兵，事情就绝不可能只夺取两座要塞就能使他满足，更为可能的是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进军维也纳。外交大臣干预的说法可能是事后提出来的，用以证明卡拉·穆斯塔法不是唯一对失败负责的祸首。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利用经过柯普律吕父子治理后重新以一个军事强国而崛起的土耳其的力量。但为了保守其战略计划的秘密，维也纳的名字未被提及，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杰尔和科马罗姆两要塞。的确，在企图攻击维也纳之前减少阻止通往这座首都道路的守备敌军是十分重要的。克里米亚汗穆拉吉雷批评卡拉·穆斯塔法在占领杰尔和科马罗姆要塞之前就去进攻维也纳，但他因此而使自己成了宰相的敌人。年长的布达卫戍司令官易卜拉欣帕夏建议先夺取两要塞，到来年春季再进攻维也纳。然而，卡拉·穆斯塔法被这些建议所激怒，他争辩道，维也纳攻陷后“所有基督徒都将服从奥斯曼人”，并发布了进攻敌人首都的命令。

在土耳其政府宣战前，奥地利人没有料到他们的首都会受到围攻，而是认为卡拉·穆斯塔法会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当战争迫近时，哈布斯堡王朝才呼吁其他欧洲国家的援助。但是欧洲的形势对奥地利人并不有利。路易十四尤其没有隐瞒他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敌视，如果奥地利军队为土耳其人所击败，这就会使他得以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领袖，通过势不可挡的胜利来赢得帝国的皇冠。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的态度同样令人怀疑，他是路易十四紧密的盟友。但是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埃曼努埃尔和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三世承诺提供援助。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作为天主教會的领袖做出不懈的努力以援助奥地利人。他向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发出呼吁，向利奥波德一世送去大量金钱。许多意大利城邦响应他的呼吁给予金钱上的帮助，葡萄牙也是如此。然而，最有效的援助来自波兰的约翰·索比斯基，他在过去曾成功地打击了土耳其人。^[7]1683年3月31日奥地利和波兰签订了攻守同盟，如果奥地利受到进攻，索比斯基答应向它提供4万人

的援军。奥地利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以阻挡土耳其人的入侵，因为尼曼根和约（1679年）之后它仅保留3万人的军队；圣哥特哈德之役的胜利者蒙特卡科利将军已于1681年去世，他的后任、利奥波德一世的妹夫洛林公爵查理缺乏同样的才能。

奥斯曼军队沿多瑙河右岸挺进，到达斯图尔威森堡（即塞克什白堡），从当场架起的十座浮桥上渡过拉布河，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只有一支小部队留下来佯攻杰尔要塞。当土耳其人渡过拉布河时，利奥波德一世带着其家族和宫廷人员离开了维也纳，逃往帕绍，而洛林的查理则率其军队从他打算包围的新扎姆基附近撤往多瑙河上游的林茨。土耳其军队经过一周的跋涉到达维也纳，开始对它进行包围。该城有城墙环绕，按照17世纪的标准它易守难攻。但是，当土耳其人出现时，其防御措施远未完善，维也纳城内仅有1.2万—1.5万名士兵。它的防御交给了卫戍司令吕迪格·冯·斯塔勒姆贝格伯爵，他与市长安德烈亚斯·林贝格在作战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如果土耳其人从杰尔要塞迅速推进，维也纳本会被土耳其人以暴风骤雨之势一鼓夺取；但土军的行动极其缓慢，到7月14日才抵维也纳城下，3天后完成对该城的包围。土耳其人扎营于维也纳以西格林津与申布伦之间的地区；2.5万顶帐篷看上去像一座庞大的城池。帐篷、5万辆车，还有驮畜——骡子、骆驼以及水牛——使得营地拥挤不堪。

7月14日晚，土耳其炮兵部队各就各位，准备次日发动进攻。根据惯例，进攻前一封以突厥语和拉丁语两种文字书写的书信用箭射入城中，要求守军投降并使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如果他们拒绝但同意放弃维也纳，则保证每一个居民安全放行。然而，斯塔勒姆贝格伯爵未予回复。于是土耳其的大炮开火了——这时正是苏莱曼大帝第一次包围维也纳154年之后。苏莱曼大帝时土耳其人没有重型大炮，而1683年他们又重犯了这一错误。根据参加此役的西拉达尔·穆罕默德·阿迦的说法，土耳其人只有19门轻型大炮，一些榴弹炮以及20门中等口径的大炮。但最重型的大炮（Balyemez）没有使用。缺乏重型大炮可能是这次战役的公开目标仅仅是夺取杰尔和科马罗姆要塞所致。另外，维也纳人在大炮的质量和数量上占有优势，这一事实在防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土耳其人企图在地下埋雷炸毁城墙和梭堡从而打开攻击的突破口。他们5年前在奇希林曾有过这种战术的成功经验，但维也纳城墙远为牢固，其守军比哥萨克首府的守军更具有

勇气、决心和严明的纪律。守卫者不仅仅采取稳固防御战术，而且主动出击，致使土耳其人遭受严重损失。久攻不下使土耳其军滋生不满情绪，因为许多人已经捞到足够的掠夺物，他们希望尽早还乡。在围攻期间，克里米亚鞑靼人向西深入克雷姆斯和斯泰因附近以及远至巴伐利亚边界，他们的袭击在老百姓中引起恐慌。如果卡拉·穆斯塔法以其全部力量投入进攻，维也纳本来是可以占领的，但他担心，如果该城的陷落是进攻的结果，那就会由于士兵们的劫掠而只剩下一座空城。然而他最大的错误是忽略了救援维也纳的军队。

自受围之始哈布斯堡王朝的盟邦就加倍努力予以帮助，洛林的查理也在等待着来自波兰和巴伐利亚的增援。他与受到围困的都城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成功地抵御了鞑靼人向西的袭击，也防止了特克伊夺取普雷斯堡。因此，约翰·索比斯基未遇任何抵抗成功地与奥地利军队会合。两位统帅在维也纳以北的霍拉布伦见面，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军队也在那里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尽管索比斯基仅率领2万人参加联盟阵营，由于其国王的身份，总共大约7万人的军队的指挥权落到他的手中。但战略计划由洛林的查理所掌握，而他的将士也不得不承担战斗的主要压力。联军挺进的消息在9月4日传到土耳其大营，防止它渡过多瑙河应该是可能的，据说卡拉·穆斯塔法曾命令克里米亚汗进行阻击，但后者出于敌视宰相而让敌军安全地渡河到右岸。然而，事实上该汗对付拥有大炮的军队不可能有所作为，而卡拉·穆斯塔法铸下的大错是没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并没有为此动用更多的军队和大炮。看来是大败之后土耳其编年史家利用克里米亚汗作为替罪羊。在联军到达以前维也纳度过了几天最严峻的日子，因为9月初土耳其人成功地埋雷炸毁了若干棱堡，在城墙上打开了数处缺口，强行进入城市的内区，所以维也纳危在旦夕。斯塔勒姆贝格伯爵迫切要求援助，他已几乎不能阻挡住任何大举进攻。但在失陷成为事实以前，绝望的维也纳人通过卡伦山坡的篝火得知联军已经到达。9月12日，联军从那里发动了进攻。卡拉·穆斯塔法认为骑兵足以将之击退——克里米亚汗曾建议使用近卫军对联军进行反攻，但未被接受。联军被证明在各个方面均远占优势：他们为其攻势选择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地形，他们的炮兵及其机动性是优良的，他们的士气十分高昂，因为拯救维也纳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战至傍晚土耳其军队被击败，波兰骑兵闯进奥斯曼的营地，接着土耳其军开始向杰尔溃逃，但联军没有穷追不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迅速撤退是个圈套。土耳其人的伤亡达到万人以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督徒的伤亡大约只有5000人或更少些——并丧失了包括财宝和给养在内的全部营地。

土耳其这次惨败的结果是匈牙利为哈布斯堡王朝占领。早在10月中旬，奥地利人就夺取了格兰[即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这是落入他们之手的许多土耳其要塞中的第一座。卡拉·穆斯塔法最终重新集结了他的惊慌失措的军队，但不能阻止奥地利人挺进匈牙利。因此他返回贝尔格莱德，打算在那儿过冬，并在来年春天再发动新的进攻，但是他的严厉施政树立了许多敌人，宦官总管和御厰长怂恿穆罕默德四世允准处死宰相，1683年12月25日他在贝尔格莱德被绞死。但是，他的处决是土耳其的一个损失，因为许多非常不喜欢卡拉·穆斯塔法的帕夏也都承认，只有他才有能力对敌人进行复仇。然而，穆罕默德四世不再能够宽心地去打猎了。他断言卡拉·穆斯塔法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就去围攻维也纳，从而使卡拉·穆斯塔法个人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但是以后的宰相没有一个具有他的才能。

奥斯曼帝国的形势的确是令人惊恐的。奥地利人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匈牙利，威尼斯人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沿岸，甚至占领了摩里亚^[8]。但是穆罕默德四世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议论纷纷，国家吃了败仗而他却从未割舍他的狩猎：如果他不考虑他的臣民，难道他不畏惧真主吗？在此期间，穆罕默德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达武德帕沙打猎时，邀请某个教长在当地清真寺讲经，但这位教长拒绝了，他认为他只能祈祷苏丹应该放弃打猎，亲理朝政。接着宗教界人士开始规劝苏丹，总法典官阿里·埃芬迪亲自带头。穆罕默德因此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任命穆罕默德·埃芬迪继任，但这位新总法典官警告苏丹，如果他不放弃打猎就会发生起义。穆罕默德中止狩猎一个月，但他感到十分痛苦，度过了若干不眠之夜以后，他宣称又想去达武德帕沙附近打猎了。军队指责苏丹要为帝国所遭受的所有失败负责，也加入反对他的行列。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苏丹答应不再打猎，解散了所有狩猎机构，分送他的猎犬，出售他的马匹，并答应将来要厉行节俭。数百名妃子从后宫放出。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哗变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挺进，1687年11月9日苏丹被废黜。他于5年后去世，作为囚犯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他的弟弟苏莱曼二世继位苏丹，他自1651年9月其祖母希望使其登基以替代穆罕默德以来原是一直被囚禁的。

随着穆罕默德统治的结束，土耳其不再是对欧洲的威胁，基督教国家开始采取攻势^[9]。欧洲军队的军事改革和圣哥特哈德战役标志着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对土耳其人来说确实幸运的是，直到维也纳城下土耳其军队的惨败欧洲列强才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由西欧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优势。就科普律吕父子所有成功的统治而言，他们只是使奥斯曼帝国过时的机构有秩序地运转，名副其实地将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转变为一个使人想起苏莱曼大帝时代的强大国家。但是，由于卡拉·穆斯塔法的错误，衰落趋势恢复了：他出征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战利品和声望，而不是消灭威胁奥斯曼帝国安全的力量，但这样做只是重施帝国传统的政策。从乌克兰退出和围攻维也纳这一雄图的受挫使土耳其的衰落完全显露出来，而这种衰落更为显著则是在18世纪初期欧根亲王大获全胜之时。

[1] 一珀斯（kese）白银价值500皮阿斯特。

[2] 见前第20章边码第487—488页（原书页码）。

[3] 见前第20章边码第486页（原书页码）。

[4] 详情见前第20章边码第488—489页（原书页码）。

[5] 详情见前第19章边码第462—463页（原书页码）。

[6] 见前第18章边码第446页（原书页码）。

[7] 见下第24章边码第569页（原书页码）。

[8] 关于这些事件，见第6卷第19章。

[9] 见第6卷第19章。

第二十二章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大大地加强了瑞典在斯堪的那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地位。瑞典的征服地除了先前东方的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之外，又增添了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西波美拉尼亚、不来梅、费尔登以及维斯马，总人口达到约250万，其中一半是瑞典人。然而，和约不仅没有解决瑞典的国内外问题，而且产生了新问题。新占的德意志省份使瑞典成了帝国的一员，它愈来愈深深卷入各邦君主与皇帝之间的明争暗斗之中。而且其他邦国也觊觎新省份。勃兰登堡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它未能获得西波美拉尼亚、丹麦和吕讷堡君主希望得到不来梅和费尔登。在东方，一直存在着对俄国——在“动荡时代”之后——再图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担心。

而且，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胜利没有结束14世纪以来瑞典与丹麦之间争夺北方霸权的斗争。根据布勒姆瑟布鲁和约（1645年），丹麦让予瑞典在松德海峡以及在波罗的海岛屿果特兰和厄塞尔、那姆特兰、海里耶达伦以及哈兰德（后者为30年）的关税豁免权。1648年的所得也意味着瑞典可以从南方进攻丹麦；尽管如此，丹麦仍然对瑞典的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丹麦迫切希望收复失去的省份，由于这一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争夺北方霸权的斗争，它必然将之视作争取生存的战斗。因此，在直至1700年北方大战爆发的整个时期中，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企图通过与彼此在欧洲列强中的敌人结盟的方式来孤立对方。

争夺北方霸权的斗争是与瑞典夺取波罗的海控制权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被认为对瑞典保持大国地位是必要的。瑞典在波罗的海占有海上优势的前提条件是控制波罗的海的港口和通过不允许西方诸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使之变为它的领海。实现这一步有两个途径，一是完全击败丹麦，让瑞典控制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二是与丹麦合作。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还得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英国和荷兰要保持它们的贸易利益，因此它们谁都不会容忍其舰队被关在波罗

的海之外，也不会容忍该海域的控制权落入瑞典或丹麦之手。这在17世纪后半叶波罗的海外交中是一个突出的因素。

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还有着重要的经济内容。与当时的重商主义思想相一致，人们强调，没有商业的控制是“毫无意义而徒耗精力的”。阿克塞尔·奥克森斯蒂纳给1651年新建立的商务部的指示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希望。这位首相设想将沿波罗的海的瑞典港口作为面向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进出口中心。通过对波罗的海向西欧出口谷物和船舰用品的控制，瑞典王室的收入有望通过关税和国内货物税而得到数倍的增加。

控制波罗的海的问题还与长期战争后瑞典所面临的防务和国内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分散的征服地区受到一心要复仇之邻国的威胁，其防务需要一支控制波罗的海的舰队，以及一支时刻枕戈待旦的军队和一些配备足以遏制任何邻国军队最初进攻的戍军之要塞。瑞典王室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如此繁重的防务。奥克森斯蒂纳和瑞典大多数贵族所赞同的解决办法是波罗的海沿岸的新省份要以其数量随贸易发展而增加的关税来承担自身的防务支出。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意算盘，它的实现无论如何需要时间，就贸易而言，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只是一个幻想。从波罗的海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确实约有40%在瑞典港口装货，约35%来自瑞典最直接的竞争者波兰港口，但在17世纪中期通过松德海峡的所有船只中，有65%挂着丹麦旗帜航行，而只有10%挂着瑞典旗帜。

因此，一如既往，瑞典防务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赋税才能得到满足。然而，在长期战争中赋税收入剧减。为征募兵员或权充薪饷，王室土地和来自自耕农的税款均落到了贵族，特别是大贵族之手。这种情形在新征服的省份尤其适用；但甚至在瑞典和芬兰，王室土地的流失也十分严重，如1655年约有2/3的农庄在贵族的手中。由于贵族的特权，他们享受赋税豁免，因而赋税只得由其他1/3的农庄缴纳，所导致的赤字只得由各等级在议会开会期间正式投票同意征收的额外贡赋来弥补。

频繁征收贡赋和要求新征兵员日益在僧侣、市民和农民，也在对大贵族的大地产心怀愤恨的下层贵族中引起不满。当1648年恢复和平之后赋税的压力仍进一步加强时，不满就变得公开化了。针对王室抽

捐纳税的要求，较低等级强烈希望恢复王室土地，减少大封赏和大采邑。人们争辩道，瑞典的胜利成果不能只让几个显贵家族享用而令举国陷于更贫困的境地。早已开始的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在1648—1655年愈益激烈起来。

不同等级间的分歧为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年）所利用。由于皈依天主教她决定退位，因为难以想象一个天主教教徒能坐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王位上。女王想为其表弟查理·古斯塔夫取得继承权，但遭到了以阿克塞尔·奥克森斯蒂纳为首的国务委员的反对，因为大贵族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他们的权力。通过巧妙地利用各等级间的不和，女王成功地使查理·古斯塔夫被宣布为她死后的继承者；接着，在1650年各等级之间的斗争达到顶点的著名议会中，她以批准收回王室土地的要求相威胁迫使国务委员会和贵族们无条件承认了查理·古斯塔夫作为她的王位继承人。1654年她正式放弃王位，离开了瑞典。

查理十世（1654—1660年）来自巴拉丁—茨韦布吕肯家族。他在其短期统治期间主要执行了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这部分是因为他是个军人：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中，他曾担任瑞典军队的总司令。其他因素也迫使瑞典参加新的战争。俄国对波战争的胜利相当彻底以致波兰的解体迫在眉睫^[1]。西普鲁士的港口，尤其是但泽，要为瑞典所控制而不是落入俄国之手，这对瑞典来说生死攸关。最后，解决供养防务所必需的军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向外发动战争，在国外这支军队可以靠敌人的资财来供养。由瑞典从立窝尼亚和波美拉尼亚发动进攻而开始的波兰战争（1655—1667年）最初给查理十世带来了很大的胜利。他与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结盟，在毕沙著名的“三日战斗”中击败了波兰军队；但无论是这场战斗还是穿越波兰领土的长征都被证明不是决定性的。随着战争的发展，查理认识到其他欧洲国家是多么关心该地区适当的势力均衡。勃兰登堡因在波兰战役中合作而要求增加其补偿，并最后转而支持波兰。荷兰人决心不让瑞典取得西普鲁士港口，他们与瑞典的敌人靠得更近了。皇帝利奥波德站在波兰一边进行干预，俄国则从防御转入进攻。1657年夏，丹麦向瑞典宣战，它希望利用当时的形势收复1645年失去的领土。

随后的战争证明，由于瑞典在帝国内的占领地，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它的决定性的变化。瑞典的地位又由于查理与荷尔斯泰因—哥

托普的海德维格·埃莱奥诺拉联姻而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成了注定要延续到18世纪的一个联盟的基础和瑞典对丹麦政策的基石。相反，这一联盟使得丹麦摆脱瑞典和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包围变得至关重要。查理得到丹麦宣战的消息后迅速从波兰强行军到荷尔斯泰因，接着征服了整个日德兰半岛。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因为舰船不能将瑞典军队运到丹麦的岛屿，而查理的敌人则准备从德意志进攻他。斯堪的那维亚军事史上最大胆的业绩之一——整个瑞典军队跨越业已冰冻的大小贝尔特海峡——决定了战局。丹麦人大吃一惊，面临未设防的哥本哈根有遭受进攻之虞，他们很决同意媾和，1658年2月在罗斯基勒签订了和约。

该和约（1660年的哥本哈根和约仅对之稍加修改）对斯堪的纳维亚内外发展来说是决定性的。丹麦的整个东部地区斯堪尼亚、哈兰德和布莱金格，以及挪威的博胡斯伦省永久割让给瑞典。因此，波罗的海的主要进出口松德海峡成了瑞典和丹麦之间的边界，丹麦人不再有权在松德海峡征收通过税。瑞典实现了它古老的梦想，获得了给它北海直接出海口的海岸，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胜利，对瑞典的贸易来说尤其如此。但对丹麦要进行复仇的担心依然存在，对万一丹麦进攻瑞典时前丹麦省份会发生人民起义也有着同样的担心。

对丹麦来说失去东部省份带来的影响不限于经济方面，因为与瑞典的战争导致了宪政的变化。丹麦贵族的地位与他们对政府和行政的影响甚至强于瑞典的情况。他们的权力基础部分在于贵族大地产（约一半的丹麦土地属于150个贵族家族），部分在于他们习惯上控制着地方政府。丹麦贵族依靠其地产享有甚至比瑞典贵族还要大的特权，譬如豁免其佃户赋税的更为广泛的权利。这种情形加上农民无限制的服劳役（霍夫里制）促进了领地农业的发展。优先担任公职的丹麦贵族也控制了整个政府。由最大贵族家族的代表组成的国务委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对各等级（贵族、教士、市民）的利益损害极大。均由贵族充任的各省省长掌握赋税的征收。在贵族很少的挪威，农民仍然维持其传统的独立地位，但这个属国常常处在哥本哈根中央政府相当严厉的统治之下。

1648年克里斯蒂安四世死后，其继承者弗雷德·里克三世（1648—1670年）和国务委员会之间爆发的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作为议会选其为国王的代价，新国王不得不签字同意国务委员会和贵族的广泛

特权，保证他们享有他们没有法律根据就已经逐渐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国王的宣布意味着一个长期的无可争议的贵族政府统治的开始；但签字的墨迹未干，其就不仅在国王和贵族之间，而且在贵族领袖之间发生了摩擦。大司空科尔菲特斯·乌尔费尔特被指控为侵吞公款，在丹瑞战争中勾结查理十世并追随其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整个这一时期丹麦王室的财政困难加深了。王室土地的广泛转让虽能拯救危难于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形势却更为恶化。沉重的赋税引起较低等级的不满，其矛头首先是指向拥有特权的贵族及其对政府的控制。

1657—1658年查理对丹战争的胜利和苛刻的和平条件暴露了丹麦贵族们不能维护和平与安全。另外，弗雷德里克三世和市民们在哥本哈根被围时表现出了英勇气概，从而准备了变革的基础。当1660年秋各等级在哥本哈根开会时，收入已经减少到和平时水平的一个零头，而国债则达到了几乎500万丹麦达勒尔。当国务委员会建议征收某些货物税时，各等级间的敌对公开化了，因为一方面教士和市民拥护平等原则，要求人人都应缴纳新税，而另一方面贵族则要求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他们的某些佃户实行豁免。两个较低等级的决心迫使贵族逐步退让，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譬如改变使省长们过于不受王权控制的行政体制。

当这些改革正在讨论之时，一项要求宣布弗雷德里克三世为丹麦世袭国王的建议被提了出来。尽管有关细节不详，创议者来自宫廷内部则是肯定的，其领袖克里斯托弗·加贝尔起草了采用世袭君主制的匿名建议书，他显然是与教士领袖汉斯·斯瓦纳主教和市民的代言人、哥本哈根市长汉斯·南森磋商过的；国王是旁观者，教士和市民受到鼓动向国务委员会请愿，要求更改宪制。当国务委员会拒不讨论该问题和贵族保持缄默时，弗雷德里克三世宣称他将不顾国务委员会和贵族们的愿望而同意自己被宣布为世袭国王。哥本哈根的城门尽皆关闭，战时民兵奉召出动。这些措施削弱了反对势力，三个等级一致承认了弗雷德里克的世袭统治。这一变化并没有立刻导致君主专制的建立。为便于提出制定新宪法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议会同意归还弗雷德里克在他登基时所赏赐的特权并要求他起草新宪法；于是权力就落到了他的手中。国王进一步让自己被拥戴为“至上的国王”。1665年新宪法制定完成，并被宣布为“国

王之法”。它的思想基础是自然法原则：通过各等级与国王的协议，权力转交给该统治者。

君主专制的建立伴随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急剧变化。改革的推动者是大司空汉尼拔·塞赫斯泰德，他对1634年瑞典采用的分院制管理印象颇深。他将中央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组织为若干个院，各设有院长和一定数量的顾问。随着君主专制和分院制管理的采用，高级贵族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不再起作用，后来在克里斯蒂安五世（1670—1699年）统治初期它又以彼泽·格里芬菲尔德根据法国模式所建立的枢密院这一新形式重新出现。在地方政府方面，1662年旧采邑（Len）区划转变为郡（amt），由郡长（amtmenn）而不是采邑主（lensmenn）来治理，但郡长的权力已被大幅度削减，因为旧省长兼握军政两方面的大权，而郡长则纯粹是文官。即使在民政方面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征收赋税权转交给了另外的官员，即郡秘书。前此所缺乏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现在建立了起来。

上述重组与1660年后塞赫斯泰德所提倡的财政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的问题是减少国债但同时要保留国防所需要的足够的军队。债务主要包括战争期间的贷款、未支付的薪饷以及因战争赊欠军需承包商的款项。塞赫斯泰德重施故技，不过规模空前：他将王室土地割让给受押人和其他债权人，其数量大致等同于所欠国债。王室让出如此大量的土地以致只得另寻财源。大家也都清楚，农民所承受的通常赋税负担过分沉重，而贵族却得以豁免。贵族在现存赋税方面的特权不容更改，因为国王在1660年采取君主专制时已经答应予以维持。为了给新税制提供根据，60年代初全丹麦进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即所谓“马特里库敕令”（matrikulering），1688年又进行了一次新的、颇有改进的普查。据此采用了一种城乡均适用的总的土地税法，这给王室带来了远高于先前来自王室土地的收入。因此，通过土地税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通过由基于自然经济之收入向基于货币经济之收入的变化，丹麦的财政困难基本解决了。

在丹麦采取君主专制的人士也热衷于在其他领域推行改革，新宪法的制定激起了他们对民法的兴趣。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普通法从未有过，不同地区的各种中世纪法律构成了司法制度的基础。1661年，一个特设委员会开始起草新民法，其他几部法典的草拟也随后进行，1683年“丹麦法”终于完成。在经济领域，这些人代表了重商主义思

想。他们致力于放松对贸易和手工业的限制，资助建立工场和作坊。他们的首创性结出了一些果实，尤其是在哥本哈根，到17世纪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万多居民的市镇。但是，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不应被夸大，因为十分重要的谷物和牛的出口减少了，这不是哥本哈根的兴起所能补偿的。贸易的顺差源于对挪威的木材和鱼类出口的增加。

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影响到农村阶级——贵族和农民——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旧贵族尽管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仍然具有重要性。即使采邑变成了郡，新官吏起初主要还是来自旧家族。然而，这些职位不像过去那样有利可图了。某些高级贵族依然留在中央政府，尽管大多数贵族宁愿离开首都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贵族保留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特权，但其经济特权却因基于土地普查的新赋税而成泡影。旧贵族在权势和收入两方面都趋于衰落是显而易见的。

与老贵族并存且部分取代它的是一个新兴贵族阶层，它部分是一些服役贵族（service nobility），部分是一些土地贵族。这些新兴贵族主要由德意志移民组成。就像瑞典的情况一样，采取君主专制并不意味着土地从贵族转移到王室和农民手中。相反，丹麦新贵族通过上述王室土地的转让，也即在损害王室利益下部分成为土地贵族的。到1688年丹麦有5.8万个农庄，其中仅1000多个为自耕农所经营。王室拥有25%的土地，但2/3属于贵族或市民地主，余下的属于大学、教会以及中学。

与这种发展同时进行的是农业方式的变化，因为供出口的牛的养殖比谷物种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为后起的奶牛饲养获利更少。结果，旧农庄和旧村落被遗弃；大庄园出现了，它们相当于40个一般的农庄，作为一个单位进行耕作。农民的状况恶化，自耕农实际上不复存在。王室需要更多的金钱意味着赋税压力的增大，它十分沉重地落在了农民的肩上。佃农在新主人的统治下状况更差。向大庄园农业的转变要求更多的劳力投入领地。新贵族中的日耳曼人将德意志北部习以为常的更为苛刻地对待农民的做法传入丹麦。拥有田产的市民通常是由其管家代行监督，而这些管家出于自身利益更是压榨农民。许多贵族庄园存在着类似状况。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进行改良，但这些改革者根据他们的重商主义原则对改善农民的命运没有兴趣。

这时，在瑞典发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尽管广泛性较小。1660年年初查理十世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安排好摄政期间瑞典的政府事宜，因为其继承者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时年仅4岁，摄政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委托给母后海德维格·埃莱奥诺拉和五位国家高级官员。由于五个官位中有几个早已空缺，查理十世便任命了能指望捍卫王朝利益以对付那些上层贵族的人，他们中有查理十世的兄弟阿道夫·约翰公爵和赫尔曼·弗莱明，后者是支持1655年敕令的主要人物，该敕令规定部分收回王室土地，但因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实施。然而，早在1660年秋，贵族诱使其他等级联合行动，宣布查理十世的遗嘱无效。五位高级官员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顺从贵族的人士。悉由大贵族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增加了其权势，对外政策的控制权交给了首相芒努斯·加布里埃尔·加迪耶。在内政方面，财政大臣古斯塔夫·邦德极力主张厉行节约的计划，但新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贵族的地产。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查理十世所遗留下来的战争。与丹麦—挪威的和约已如前述。根据维持领土现状的原则，1660年瑞典与波兰在奥利瓦签订了和约，波兰王室最终放弃了自西格蒙德·瓦萨时代以来一直坚持的对瑞典王位的要求。1661年在卡尔迪斯，瑞典和俄国签署和约，也未有领土变更。这三个和约标志着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查理十世等人所一直期望的目标，即完全控制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雄图未能实现，瑞典帝国领土的许多部分一直没能连接起来，帝国也是不稳定的。危险依然存在，俄国无论通过打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瑞典的阻遏或者通过波兰都可能获得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不少德意志邦国，特别是生气勃勃的勃兰登堡，迫切希望瑞典在德意志境内的省份摆脱瑞典的统治。但是，丹麦的复仇计划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可是摄政政府认为丹麦不可能对瑞典发动进攻，因为在实行君主制后丹麦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1600年以前，丹麦传统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依赖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兰以及联合省的结盟。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其主要对手瑞典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首要敌人法国一直联结在一起。在塞赫斯泰德掌权时期，大政方针曾有过改变，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瑞典无须担心来自丹麦的威胁。根据节约财政开支的计划，塞赫斯泰德削减了常备军，这一步骤激起了军官团的强烈反对。丹麦对其盟

友在战争中没有提供援助感到失望，而且它因荷兰控制波罗的海的贸易而遭受到的损失也不下于瑞典。因此，塞赫斯特德开始转向法国和英国，这两国在万一发生战争时都能向丹麦提供津贴来增强兵力。在原则上，塞赫斯特德相信两个北方王朝在外交事务上的合作对双方均有利，故他对瑞典称霸北方的企图所包含的危险不敢视而不见，故而他希望，通过与法国和英国的联合，可与瑞典的盟国和潜在的盟国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组合瑞典可能受到遏制，因为它或者变得孤立，或者不得不容忍丹麦成为联盟中的一个平等成员。早在1661年塞赫斯特德与英国签订了一个商约，该约有很长一段时间证明是英瑞达成协议的障碍。1663年他与法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和贸易条约，但这一条约主要有利于路易十四，而塞赫斯特德所指望的津贴并没有得到。该政策最后的失败是在1665年，一个小事件阻碍了丹麦加入它所希望的与英国的同盟，并驱使它站在荷兰一边参加了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海战。即使塞赫斯特德的政治体制在他掌权时代结束之后仍有信徒，丹麦倒向瑞典敌人的传统倾向却愈来愈居于支配地位，尤其在克里斯蒂安五世登基以后。就外交关系而言，在他长期统治期间主要有三重目的：摧毁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家族的独立地位；终止其与瑞典的紧密联盟；收复失去的东部省份，换句话说，通过战争结束瑞典在北方的统治。

丹麦对外政策的目的是孤立瑞典，另外瑞典也努力结成反丹同盟，这种努力导致了与路易十四的敌人进行暂时的合作。由于瑞典在德意志拥有领土，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皇帝，而皇帝这时也愿意收买瑞典的支持以反对法国。瑞典既对荷兰控制波罗的海贸易心怀不满，又对荷兰阻止瑞典商业扩张的政策更为不满，这就预示着瑞典要与联合省的头号敌人英国结成友好关系。瑞典的主动表示受到英国的欢迎，因为它与荷兰的关系特别紧张。1665年两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据约英国保证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克特公爵的独立地位。由于丹麦因为这一英瑞条约而于1666年与联合省结了盟，也由于法国前此刚刚向英国宣战，北方两王国彼此再次参加对立的阵营。然而，瑞典不打算全心全意加入一个势力“集团”以致自己卷入战争。它派往德意志的军队是进行武力示威而不是参加战争。此时正值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北方维持和平，这也有助于瑞典的自行其是。法国防止丹麦进攻瑞典，同时又通过让步劝阻瑞典与哈布斯堡联

合。1666年瑞典宣布在英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在1667年布雷达和平谈判期间作为调解者进行活动。

1667—1672年，瑞典在不断变化的各个同盟中的立场像英国一样朝秦暮楚。影响瑞典进退的因素之一是它的国务委员会中所存在的相反的观点。国务委员在原则上赞同有必要维持和平与欧洲的均势，也赞同需要使丹麦陷于孤立而又避免瑞典的孤立。然而，在瑞典做到何地步才不冒卷入战争的风险，以及在参加这一势力集团或另一势力集团，孰利孰弊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使其决定支持法国的因素有三：一是路易十四在德意志的几次胜利；二是英国从参加三国同盟转变为与法国合作；三是担心瑞典如果对法国的建议仍然保持消极态度则路易十四有可能与丹麦更为接近。1672年法瑞条约签订：法国承诺给予大笔津贴并保证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的地位，瑞典同意派一支军队去德意志。路易十四以不付津贴相要挟，迫使瑞典进攻联合省的盟友勃兰登堡，1675年6月瑞典军队在费尔贝林遭受败绩。瑞典违心地被拖进了大国的争夺之中。

在此期间，尽管丹麦开始与不少国家谈判以防止自己的孤立，它的外交依然是不明朗的。直到瑞典明确与法国结盟之后，而且路易十四在1673—1674年的运气也明显欠佳之时，丹麦才与皇帝结成同盟，丹麦同意在第三国即瑞典进攻荷兰人时向法国宣战。瑞典和法国使丹麦保持中立的努力没有成功。闻悉瑞典在费尔贝林受挫的消息，克里斯蒂安五世就立即逮捕了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强迫他放弃对其领土的主权并将其要塞割让给丹麦。通过这次突然行动，克里斯蒂安使瑞典丧失了它在丹麦后方有价值的基地。

1675—1679年战争的开局对瑞典不利，它遭受到在其强盛时期任何战争的初期阶段从未遇到过的挫折。费尔贝林之战是一场无关大局的武装冲突，但它打破了自三十年战争以来一直笼罩着瑞典军队的实力光环。由于瑞典舰队与受到荷兰分遣舰队增援的丹麦舰队交战时未能占到上风，瑞典的德意志省份遂难逃劫数。波美拉尼亚被勃兰登堡占领，吕讷堡公爵在勃兰登堡和丹麦的帮助下征服了不来梅和费尔登两公爵领地，维斯马在丹麦海陆军的包围和封锁下只得投降。1676年克里斯蒂安五世派遣军队渡过松德海峡以收复1658年失去的省份，于是战火燃烧到瑞典的领土。斯堪尼亚的要塞除一座之外全都落到丹麦国王手中。斯堪尼亚人仍然忠于丹麦，与它进行合作。拯救瑞典危局

的首先是查理十一世的勤政，他在1672年宣布成年，得到很快就取得支配影响的约翰·于伦斯蒂纳的有力支持。1676年暮秋，一支瑞典军队开进斯堪尼亚，在隆德的浴血战斗中击败了丹麦人。克里斯蒂安五世也被迫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了斯堪尼亚的城堡，而老百姓与瑞典军队之间严酷的游击战则持续了若干年。

尽管瑞典在德意志遭到了失败，但1679年的和约只使它失去很少的领土，这部分是由于路易十四巧妙的外交，部分也是因为无论荷兰还是皇帝都不希望瑞典丧失土地这一现实。因此，路易十四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磋商就代表瑞典与它的敌人签订了和约：吕讷堡君主从来梅和费尔登小有所得，勃兰登堡分到东波美拉尼亚的一小块，而丹麦则一无所获。

路易十四未与查理十一世进行磋商一事引起后者的不满。法国也未履行1662年结盟时的承诺，也就是瑞典未获得联合省在通过税方面所作的某些让步之前不与联合省媾和；更有甚者，法国在与荷兰人的和约中还有一项商务协定，该协定对瑞典十分不利以致查理拒不加以批准。因此，1679年的瑞典对法国和联合省均不满意。克里斯蒂安五世同样感到失望，联合省1678年背叛了它单独媾和，而法国则强迫它结束战争而一无所获。因而瑞典和丹麦发现它们自己在反法和反荷方面有共同语言。在瑞典，现在是约翰·于伦斯蒂纳控制对外政策，战前他在国务委员中一直保持警惕，反对与法国结盟，并与国王一样对路易十四对待瑞典的行径感到不满。他也不支持与联合省合作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与丹麦举行和平谈判，根据于伦斯蒂纳的建议，谈判在隆德进行，结果在1674年秋查理十一世和克里斯蒂安五世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的条款与路易十四所确定的条款完全一致，其真正意义在于秘密条款，它规定两个北方王国间进行广泛的合作。缔约的任何一方没有通告和同另一方商诸，不得与其他国家达成任何协议或结成任何同盟。如果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发动攻略战争，它必须通告另一方；如果联合进行战争，战果则必须分享。双方承认，每一方均有其特殊的利益范围，在该范围内进行合作既不重要也不可能，如瑞典与俄国的关系就是如此；但在德意志帝国则双方有义务进行合作。这一联盟因查理十一世与克里斯蒂安的妹妹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的婚约之恢复而得到保证。

自从19世纪70年代上述秘密条款公开以来，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因无情的战争而加深的传统敌对状态一变而为紧密的联盟关系之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抵抗联合省有共同兴趣，但这种兴趣的一致并不新鲜。实际上，该联盟并不如乍看起来那样新奇和令人惊讶，而是曾经有过若干先例。甚至约翰·于伦斯蒂纳在1675年战争前的争论中就强调组成北方联合阵线大有裨益，但是合作的政策在当时——就像后来一样——是与争夺北方的控制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在1679年这种争夺在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清晰，他在和约中被归还了领地，而丹麦则徒劳地争取获得瑞典将来不干涉丹麦与该公爵关系的有约束力的保证，于伦斯蒂纳小心翼翼地规避作任何这样的承诺。的确，就在进行条约谈判的时候，瑞典一再企图撤去公爵身边那些被认为过分亲丹的顾问而代之以瑞典的忠实支持者，荷尔斯泰因—哥托普依然被看作对瑞典十分重要，于伦斯蒂纳的意图是缔结紧密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但在该联盟中瑞典应为居支配地位的成员。因此，他的政策与查理十世试图以武力统一北方的政策没有多大的不同。一旦这种意图昭然若揭，克里斯蒂安五世便不再受隆德条约的束缚，北方两王国间相互孤立对方的行动又恢复了。

更为革命性的，首先是更为持久的战争影响，表现在瑞典国内事态的发展上。恰如1657—1660年的战争推动了丹麦—挪威采用君主专制，1675—1679年的战争导致了瑞典君主专制的实行。查理十一世未成年时期摄政政府的财政窘困也是一个促进因素。在1660年，军队要供养，军官们要犒赏，庞大的防务花费要支付，但大贵族控制着政府，因而非贵族等级和下层贵族所拥护的解决办法，即收回转让出去的王室土地，得不到采纳。诚然，尽管想方设法节省开支，王室土地的出让仍在进行，尤其在那些从丹麦获得的省份。总之，政府企图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特权，反对非贵族阶级的要求；它还进一步希望在国王宣布成年之后延长其对权力的掌握，企图通过要求查理十一世做出事实上削减王室权力的保证来限制王权。这种企图因遭到反对，特别是来自下层贵族的反对而未果，但直到战争爆发，年轻的君主依然依靠大贵族所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尤其依靠芒努斯·加布里埃尔·加迪耶为首的集团。

战争给国王个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1675年秋，他按惯例离开斯德哥尔摩担任全军的统帅。这样，他便摆脱了仍然留在首都的国务委员会，其左右尽为下层贵族和平民。在他的首席顾问于伦斯蒂纳的影响下，国王愈来愈对种种事务在提交国务委员会前就自作决定，以致到战争结束时国务委员会实际上已失去了权力。查理十一世公开坚持认为他并不一定要听国务委员会的意见。当瑞典被拖进这场毫无准备、军备不整的战争时，摄政政府自然受到了责备。在1675年的议会中，各等级已经要求调查摄政政府的施政，并为此组织了一个委员会。1680年调查结果出来，它像乌云一样笼罩着高级官员和国务委员会，并因其治理不善和谋划多误被课以罚金而可能要威胁到摄政官员和国务委员们的经济地位。

战争期间，查理十一世及其顾问决心使瑞典在1675—1676年所陷入的无准备状态不复出现。一般说来，摄政政府对建造新舰和建设海军显示出很大的关注，但战争表明，主要军港斯德哥尔摩尽管适合于在东波罗的海的活动，但不适合于在波罗的海其他地区的活动。在前丹麦省份布莱金格需要一个海军基地是显而易见的，该基地在1680年开始动工修建，并以国王的名字命名为查理斯克隆纳（卡尔斯克隆纳）。在查理十一世和于伦斯蒂纳看来，缺乏训练有素的军队是1676年在斯堪尼亚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常备军的计划便着手进行。战后，查理十一世及其顾问准备进行重大的军事重组，它的实行需要大笔款项，而瑞典的财政形势战前已经不稳定，现在则进一步恶化了。频繁的贡税和征兵不仅打击了非贵族各等级，而且也打击了贵族，所以各等级都要摆脱赋税负担。看似荒谬的是，查理十一世和于伦斯蒂纳在对沉重赋税日益增长的不满中看到了可用来解决王室财政困难的办法。在非贵族等级和下层贵族中再次响起了削减大采邑的呼声。就像国王和他的顾问所认为的那样，这种收回王室土地的办法可为常备军提供财政基础，从而使征收超额贡税的次数能减少一些。国内改革早已开始，但在1680年夏约翰·于伦斯蒂纳去世时，这些改革尚未获得议会的最后批准。

在数月后召开的议会会议上，各等级要求向它们公布调查委员会对摄政政府的调查结果。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一个享有全权的各等级代表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对摄政政府成员进行审判。在随后的几年，他们因犯有治理不善和谋取私利之罪而被责令缴纳大笔款项。首

相芒努斯·加布里埃尔·德拉·加迪耶所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他原是一个最大的地主，如今则实际上丧失了他的所有财产。当各等级对查理十一世所询的他是否应就国事与国务委员会进行磋商这一问题予以否定回答之时，国务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失势就确定无疑了。在议会召开期间，收回王室土地的问题首先在农民等级中提出来进行讨论。在贵族院，改革者成功地争取到下层贵族支持地产归还计划中的各原则。所有公爵和男爵的大采邑都将收回，而被征服的省份则被宣布为“不可转让的地区”，这意味着已经转让的所有采邑都将收回，赠送新的采邑将被禁止。无论何处年收入超过600瑞典达勒尔的采邑都要归还。这些建议在大贵族中引起惊恐，但面对下层贵族的背叛和其他三等级占绝对多数的威胁，他们作了让步。因此，1680年地产归还计划获得了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建立起来以拟定实施细节。

各等级在立法、决定预算以及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权力依然没有受到正式触及。在1682年召开的下一届议会上，国王获得了无限立法权和收回王室土地的权力。使用的方法与1680年反对国务委员会的方法如出一辙：国王提出问题，根据宪法他是否拥有全权在必要时收回被出让的土地，又是否能够不与各等级磋商就可制定法律和条例、规章和敕令。对这两个问题他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对外政策和决定预算方面王权仍有扩大的余地。在查理十一世统治后期召开的议会会议中，他获得了这两个领域的独占的控制权。1686年和1689年的议会是应王室金钱之急需而召开的，与以前的议会相比，其相对短暂的会期反映了各等级的失势。1680年和1682年的议会分别开了两个半月和三个月，1686年议会也开了差不多两个月；但1689年议会仅持续了六周，而1693年议会仅为三周。不再有什么事情好讨论了。在1686年议会上，根据惯例对外事务应予以辩论，但各等级被告知国王不希望对他的演讲有任何反应，将来需要拨款时只以向各等级通报外交形势为限。结果1686年以后，各等级仅限于感谢国王“出色的治理、勤政和关怀”，不再提出自己的任何意见和建议。

通过王室土地的收回和经各等级同意的其他长期性财政措施，王室财政得到相当的改善，以致在1693年议会上查理十一世能发表先前几乎未曾有过的讲话：“并无拨款的必要”，但他要求以后遇到必要时，各等级应全体同意征收赋税和由他们担保的浮动借款。对摄政政府成员课以罚金、收回王室土地以及政府的改组使得国王在和平时期

能够不依赖各等级。所课罚金估计达到400万瑞典达勒尔。根据1697年查理十二登基时提出的数字，收回土地使岁入增加了200万瑞典达勒尔，其中70万来自瑞典—芬兰，其余来自波罗的海彼岸省份。1681年估计为4400万瑞典达勒尔的公债到1697年已减少到1150万。所有转让给贵族的农庄中有80%的农民归还给王室或向王室纳税。在此基础上，通过所谓“印德耳宁”制（indelningsverk），军政管理进行了改组：一定农庄的收入用于一定的官员，军官由所分配的农庄来供养，等等。1693年得到各等级同意的征收赋税和浮动借款权使国王在战争时期也不再依赖各等级；由于各等级同时也同意将有关对外政策的事务全交国王掌管，他们就不再需要被召来开会了。这一发展的完成体现在1693年的《君权宣言》中，它称国王为“绝对的、君临天下和统治四海的至尊国王”，他对自己的行为无须向尘世的任何人负责。

由收回王室土地所确立的经济制度毫无疑问使得瑞典财政有了较大的稳定性。然而，人们无法预言在一场大战的压力下该制度能否发挥作用。收回王室土地和对摄政官员及国务委员课以罚金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贵族个人来说极少造成灭顶之灾，因为通过将出租的庄子割让给王室，保住自营的庄园（sateri）仍是可能的。但以现金缴纳王室所要求的大量罚款和其他款项的困难迫使许多贵族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地产。这为在国家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役贵族提供了一个廉价获得地产的机会。1655年贵族拥有瑞典—芬兰农庄总数的2/3，而到17世纪末新疆界内（即包括从丹麦—挪威所征服的省份）所呈现的比例为：33%的农庄为贵族所有，36%为王室所有，余下的31%为纳税的农民所有。所以，大量不依附贵族的农民或者成为王室的佃户，或者拥有土地而成了王室的纳税者。当18世纪王室的佃农被允许购买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时，自耕农的人数增加了。由于纳税农民摆脱了对贵族的依附，这就意味着保留了瑞典农民阶级作为一个拥有土地并且政治上活跃的等级。通过“印德耳宁”制，农民变得依附于王家政府机关或委员会的主持者而不是依附于贵族，因此情况并未立即有什么改善，农民像以前一样怨声载道。然而，实际上自由农等级是受到保护的，查理十一世的“印德耳宁”制依然是直到20世纪初瑞典军事组织的基础。

如果考察给斯堪的纳维亚两国的统治带来变化的各种因素，其相似性是显著的。在这两国中，国王都能利用下层等级去反对贵族。从

瑞典和丹麦两国的事例可以看出，一场毁灭性战争都曾暴露了统治的弱点，都曾摧毁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以一致在行政方面进行广泛的变革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1658—1659年哥本哈根受围时的弗雷德里克三世和1676—1679年斯堪尼亚战争时的查理十一世，其个人对战争所作的贡献均为王权主义者的宣传所夸大。下层等级寻求王室支持以反对贵族的传统趋势加强了。因此，在决定性的会议——1660年哥本哈根议会和1680年斯德哥尔摩议会上，事态是沿着同样的路线发展的：宫内人士和下层等级的合作迫使贵族退让。但相似处仅以此为限。在丹麦，君主专制是一揽子地采用的，并在1665年“国王之法”中加以法典化。而查理的君主专制则是在80年代的议会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有时看来似乎纯属偶然，一直要到1693年《君权宣言》的发表才告完成。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在推动变革的不同宪政思想中找到。丹麦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自然法，权力通过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转移到国王手中。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完成的，而国王行使其权力要受现存法律的约束。另外，瑞典的君主专制发展对于现存基本法——中世纪土地法进行了重新解释。当它最终在《君权宣言》中获得理论基础时，其依靠的完全是自然法的对立面，即国家的神权政治概论：1680年宣言中的词句，即国王必须“依据法律”进行统治为“依据他的愿望和作为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词句所替代。他不受世俗法律的约束，只对上帝负责。

两个君主专制政府解决其困难所采取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丹麦——挪威，汉尼拔·塞赫斯泰德试图通过裁军来平衡预算；而查理十一世在战争刚结束时就将军队扩充到6.3万人（2.4万人作为戍军在瑞典——芬兰境外服役，约3.8万人根据“印德耳宁”制在瑞典征召）。塞赫斯泰德将大量王室土地转让给王室的债权人，建立以货币为基础的新型税收制度，这是根据重商主义的精神实行的变革；而在瑞典，收回王室土地和“登记”财物供王室之用则似乎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线。在瑞典，采取专制君主制意味着贵族的采邑和许多贵族庄园转移给王室或自耕农。在丹麦，贵族和其他大地产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则在损害王室和农民的情况下有所增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查理的君主专制导致了农民的解放，而丹麦的君主专制则使农民的状况恶化。在这两个国家中君主专制都导致新服役贵族的出现，但在瑞典这种贵族并不像在丹麦那样与旧贵族分离。瑞典旧家族成员继续以各种

方式为国家服务，新家族也很快就被同化了。尽管在瑞典的服役贵族中也有德意志人，但这些人从未像在丹麦那样重要。

瑞典王室与波罗的海省份的关系也还要考察。自从这些省份被征服以来，它们与瑞典合并的程度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应该接受瑞典的法律和特权以及在议会中有其代表，或者它们是否应该根据它们自己的法律和特权生活以及保留它们自己的地方等级会议。瑞典的贵族反对前一种选择，因为其成员在这些省份已经获得地产而贵族在那里又比在瑞典占据更牢固的支配地位，尤其在与农民的关系方面。这种形势不同于从丹麦—挪威手里征服过来的省份，那里的社会结构远较波罗的海及德意志省份近似瑞典的社会结构。查理十世显然想将这些省份与瑞典合并，但在查理十一世未成年期间在这方面几无所成，因而当1675年战争爆发时，老百姓依然抱着亲丹的态度。斯堪尼亚北部和布莱金格两处起义使查理十一世及其顾问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更为激进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战争期间即已决定，一当和平恢复，瑞典的法律和以瑞典语进行的宗教仪式就要采用，战后又做出有意识和耐心的努力促使这些省份的各等级要求与瑞典保持更大的一致性，于是为一场民族性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而这场转变看来几乎比欧洲其他任何同类事件都更令人注目。最有影响的是宗教仪式方面的变化，因为此时教会是国家唯一有效的宣传工具。但隆德主教克尼特·哈恩和南部诸省总督鲁特格尔·冯阿谢伯格赢得当地人民信任的努力也同样重要。

瑞典化的努力不仅限于从丹麦—挪威手里征服过来的省份，而且扩大到了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那里的谷物和木材出口对瑞典来说在经济上十分重要，提供了瑞典—芬兰的1/3的收入。立窝尼亚议会顽强地拒绝承认瑞典收回王室土地的法令对该省的有效性，因为它在批准这项法令的瑞典议会中没有代表。这种态度使查理十一世感到愤怒，对他来说，在瑞典“陛下的议会”已经完全接受了他的绝对权力之时，却有一个省议会阻碍他行使权力，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由于自条顿骑士团时代以来在该省居于突出地位的日耳曼贵族领导了对抗，这就促使瑞典国王要通过与合作来粉碎这种对抗。依靠采用瑞典的体制有望达到这个目的。在1690年，1686年的瑞典教会法为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所采用。同年，多尔帕特学院建立，瑞典教授以瑞典语进行教学，而且国王的敕令宣称，只有那些在该学院学习不少

于两年的人才能在立窝尼亚担任官职。有关当局设法将日耳曼学生排斥在这所学院之外，瑞典和芬兰学生占了大多数。国王进一步颁布敕令，这些学生在担任立窝尼亚教士方面应比日耳曼人具有优先权。1694年查理十一世通过颁布立窝尼亚政府条例，使其在瑞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一直打算使立窝尼亚与瑞典完全合并，但因多次有人警告反对实行如此急进的步骤而放弃了这种打算，立窝尼亚的议会才得以保留下来。然而，它仅存的职能只是在国王要求征收特别税时才开会，所以失去了其重要性，成了“国王税令的登订处”。以此方式君主专制在立窝尼亚实行起来。同时国王决定，瑞典民法应尽可能广泛的运用，官方文书将来应以瑞典语拟写，以使立窝尼亚贵族“愈来愈习惯该语言”。这些措施引起日耳曼贵族的公开决裂。很快，以约翰·赖因哈德·帕特库尔为首的贵族集团开始与瑞典的敌人勾结起来。

直到北方大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查理君主专制国内外政策的特点可以用“巩固”和“捍卫”二词来表明。国家的资源用来维持一支常备军，这在瑞典是史无前例的。这支军队由后来在北方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军官指挥，处于常备不懈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用于侵略的目的。政府似乎从未认真地抱有继续进行扩张以维持瑞典大国地位的想法，也没有考虑完全控制波罗的海的计划。政府的目标是维持现状和团结拥有各种民族的省份。于伦斯蒂纳死后，瑞典的对外政策由首相本特·奥克森斯蒂纳所掌握，他应被看作他那个时代瑞典最有手腕的外交家。但专制的国王也每每使其意志体现于外交事务之中。在某些问题上他有着很顽强的信念，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只是偶尔受顾问们的影响。本特·奥克森斯蒂纳非常熟悉欧洲的政治，尤其是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注意保护瑞典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及利用大国政治组合的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国王的视野自然较为狭窄，他自己的痛苦经历教育他瑞典的主要敌人是丹麦。路易十四兼并查理的世袭公国巴拉丁—茨韦布吕肯以及他对1679年和约耿耿于怀都使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法国。

丹麦的财政已毁于战争，但向君主制的巨大转变要早20年发生，而为改善财政状况在1679年后实行的改革也不太急进。值得注意的是，当查理十一世在瑞典建立由当地士兵组成的常备军时，丹麦决定取消民兵，仅仅依靠外国雇佣军。丹麦做了大量工作发展其舰队，这

是为丹麦商船队的迅速发展所推动的。克里斯蒂安五世决心要结束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的独立地位，并收复丢失给瑞典的省份。丹麦的对外政策在弗雷德里克·阿勒费尔特于1686年去世前一直由这位伟大的首相掌握，尽管他的小心谨慎受到那些要求采取更为积极政策的人士的尖锐反对。1680年以后，丹、瑞两国都清楚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盟不可能实现，每一国都回到了各自寻求盟友以防范对方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700年以前的年代中愈来愈显著。两国所面临的选择都是法国和联合省。

在瑞典希望与丹麦合作反对荷兰在波罗的海贸易特权的要求时，查理十一世拒绝批准1679年与联合省签订的和约；但在荷兰人的强大压力下本特·奥克森斯蒂纳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条件。除了查理十一世对路易十四的怀疑外，反对与法国友好的论据是，在哥托普政策上获得法国支持是不可能的，而瑞典舰队重建之时它又亟须波罗的海方面的海上支援。上次战争的经验已经证明，法国的舰队不敢开进波罗的海，而荷兰则给予丹麦人有效的且对瑞典人来说是致命的援助。因此，在1681年，与联合省的和约得到了批准，随后荷兰所要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商务条约也被批准。1681年秋，海牙条约签署，根据该约，缔约国有义务维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尼曼根和约，如果任何国家的行为违反两条约的条款，缔约国有义务决心调解，如果调解失败，则有义务诉诸武力以捍卫两约；如果任何缔约一方因联盟关系卷入战争，另一方则有义务给予援助。瑞典与联合省的合作有着重要后果。商约意味着瑞典的全面退却：瑞典不得不解散它的特许公司，荷兰享有“最惠国”待遇，1659—1667年战争期间荷兰人在瑞典港口所曾享受的优惠条件重新被给予。瑞典通过对其港口对外贸易课税的形式以进行限制的企图被迫放弃了。

批准与联合省的和约意味着公开废止丹瑞条约，因为根据后者规定，两盟国必须共同进行谈判。瑞典人不仅秘密地与荷兰谈判，而且重订1640年和1645年保证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地位的瑞荷联盟，因而已有瑞典采取有利于丹麦敌人的立场之意。海牙条约进一步暗示瑞典已经转到法国的敌人那一边去了。路易十四利用他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企图阻止这些条约的签署，并十分巧妙地利用联合省和瑞典国内的反对势力，但终未能达到他的目的。因此，为抵消海牙条约的意义，路易十四开始与瑞典的潜在敌人勃兰登堡和丹麦进行谈判。两国

都于1679年丧失了它们从瑞典夺得并希望保持在德意志的征服地。作为给予津贴承诺的回报，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于1682年年初重订了他与法国的同盟。此后不久，路易与丹麦订立联盟，答应给它大笔津贴，同意既不保证北方的诸和约也不阻止丹麦进攻荷尔斯泰因—哥托普。

1682—1684年，勃兰登堡和丹麦都渴望发动进攻，但路易十四制止了它们。他的目的不是在北方重启战端，而是设置一个抗衡荷瑞同盟的砝码。然而，完全为好战集团所左右的克里斯蒂安五世于1682年秋侵入荷尔斯泰因—哥托普。1684年丹麦正式夺去了属于该公爵的那部分石勒苏益格，并宣布它与丹麦永久合并。

瑞典满怀忧虑地注视着这一针对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行动。然而，查理十一世按兵不动，对于公爵援引盟约要求援助的呼吁，其回答是含糊其辞的。瑞典不敢冒其在德意志的领地遭受直接进攻之风险，因为1683年勃兰登堡、丹麦和法国之间进攻性的盟约已经签署，尽管路易十四从未加以批准，但一支法国舰队出现在波罗的海而同时一支荷兰舰队也在北海游弋显示了1683年夏季形势的严重。

在1683年雷蒂斯堡停战谈判中^[2]，瑞典提出的恢复巴拉丁—茨韦布吕肯和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原有地位应包括在条约中的要求未获得支持，同时它提出的将明确保证其占领地包括在停战条款之内的要求也未能得到满足。此后，瑞典继续与其他国家谈判以争取对其要求的支持。与神圣罗马皇帝的谈判导致了瑞典参加1686年奥格斯堡联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勃兰登堡政策变化而产生的外交后果：1686年它与瑞典签订同盟条约，该盟约内容与勃兰登堡选侯已与荷兰和利奥波德一世所签条约的条款相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雷蒂斯堡停战协定应予维持；腓特烈·威廉承诺尽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帮助解决荷尔斯泰因—哥托普问题；缔约双方相互保证各自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领地。

由于勃兰登堡转而加入反法阵营以及它与瑞典结盟，丹麦变得孤立了，而在阿勒费尔特去世后，其政策又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吕讷堡公爵策动的乔治·威廉和汉堡自由市之间的冲突似乎给丹麦提供了一个巩固它在北德意志地位的机会。丹麦着手进攻汉堡，它可以对该城提出法律上的所有权，就像瑞典有权要求拥有不来梅自由市一样

[3]。然而，吕讷堡人和汉堡联合了起来，甚至勃兰登堡也赶紧支援这座城市。由于丹麦似乎决意侵略——它依然占据着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的领地，北德意志诸侯决心阻止丹麦的扩张。仅因查理十一世的谨慎态度和勃兰登堡的反对才防止了公开战争。1687年春，查理十一世与吕讷堡的乔治·威廉和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两公爵缔结了防御同盟。

在北方进行争夺的时候，路易十四准备进攻莱茵的巴拉丁。由于冲突迫在眉睫，法国和皇帝都努力避免卷入北方的斗争。因此，大国的压力迫使各有关方面接受了由利奥波德一世、勃兰登堡和联合省提出的对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冲突进行调解的建议，并在1687年秋举行了阿尔托纳会议。由于克里斯蒂安五世和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克里斯蒂安·阿尔贝特公爵都不愿让步，会议久久不能取得成果，但1689年瑞典和吕讷堡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决定了问题。它们结成一个新同盟，如果在限期内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不能复位就将进攻丹麦。瑞典议会召集了起来，备战开始了。由于无望得到法国的武装援助，同时由于勃兰登堡和联合省都致力于和平解决，克里斯蒂安五世不得不做出让步：克里斯蒂安·阿尔贝特重新获得他的所有领地。然而，也遗留下一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是这位公爵在石勒苏益格设防和保持卫戍部队的问题。瑞典的对外政策在90年代仍然为怀疑丹麦，尤其是怀疑它与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关系所支配。

1689年英荷王室的合并与随后反法力量的加强对斯堪的纳维亚有着重要影响。王室的合并减少了英国与联合省的商业竞争，对此北方两王国是一直能够加以利用的，现在却不能在两者之间挑拨离间了。1689年秋，当这两个海上强国宣布封锁法国港口却又没有使这种封锁行之有效和没有实行“自由船只装载自由货物”的原则时，这在瑞典和丹麦都引起了强烈不满。尽管这时瑞典和法国的直接贸易实际上并不存在，瑞典的政治家和商人却注意到战争所造成的可能性：波罗的海港口对俄国货物贸易的重要性增大了。同时可以正确地认为，战争将给交战双方所需要的货物带来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1691年瑞丹谈判导致了一个武装中立条约的签订，两国一致要求给予被扣商船以补偿，如果不予补偿将实行报复，此外还设置护航队以便相互保护。1693年该条约续订。

九年战争中同盟国的胜利和瑞典亲法集团的压力导致查理十一世在某些问题上缓和了他的反法态度。特别在同盟国战场得势阶段，瑞典就是否应该采取主动形成“第三方”以迫使交战双方媾和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并随即与法国和解。1693—1694年同盟国原则上接受了瑞典的调解，其条件是未来和平应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尼曼根和约。对法国来说，它企图通过在巴拉丁—茨韦布吕肯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从瑞典方面得到好处。就在查理十一世去世前夕，要瑞典充当调解者的正式邀请书到达斯德哥尔摩。因此，里斯维克媾和谈判让瑞典享受了大国地位，尽管调解有名无实。而且，也许可以这样说，瑞典全神贯注于丹麦和丹麦与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关系以及西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注意东波罗的海形势的发展和看到那里正在出现的危险。

[1] 见下第24章边码第566页和第25章边码第574页（原书页码）。

[2] 见前第九章边码第220页。

[3] 见前第十八章边码第430—431页（原书页码）。

第二十三章 勃兰登堡的兴起

17世纪初以前，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其境从老马克（易北河以西）伸展到新马克（奥得河以东）——一直是德意志最大的邦国之一，而且，作为七个选帝侯国之一，它对德意志和帝国事务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它位于神圣罗马帝国最落后的角落，即具有“殖民地”性质的东北部，全境人口稀少，并同海洋和所有重要的商路相隔绝。它的城镇都很小且在衰败，它们业已失去了同汉萨同盟的所有联系，并早在15世纪就被迫附属于霍亨索伦家族选帝侯。这个国家没有自然资源，土地是出了名的贫瘠，其中大部分不是沙地就是水涝地。农民已沦为农奴。就在剥夺农民自由和毁损城镇财富的基础上，贵族阶层建立起了不仅对农民，而且对选侯和城镇的统治。就像在德意志其他地区一样，这种统治是通过控制着选帝侯国的财政管理、对内政策乃至对外政策的等级会议得以实施的。德意志东部的，还有波兰的贵族热衷于经营庄园和出售其产品，尤其是出售谷物和啤酒，因此他们反对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也反对承担任何军事义务。由于他们的贸易利益，他们倾向于同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他们构成了一种只把选侯当作头号地主的地主阶级，就像波兰贵族对待他们的国王一样。在等级会议内，城镇的力量过于薄弱，根本无法对统治贵族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抗，同时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传入，高级教士已不再成为一个等级。像在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改革运动并未导致君主权力的加强。许多被解散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落入贵族之手，而高级教士等级的消失使选侯不再有机会在两个等级之间挑拨离间和任命教士担任国家高级职务。作为选帝侯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选侯同其他地主有着相同的利益，因为他的领地完全像贵族庄园一样依靠农奴的劳役经营，而他的庄园总爱酿造的啤酒也如同贵族庄园出产的啤酒有损于城镇的酿造业。实际上，直到三十年战争后期，选侯的权力一直在削弱。他没有能借以在战争中赢得权势的军队，而他的国家也被对他的权利毫不尊重的外国军队占领着。

有一段时间看来，勃兰登堡似乎注定要走波兰或梅克伦堡的道路，因此，17世纪后期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如此不利的基础上

突然崛起实乃德意志历史上的奇迹之一。的确，在17世纪前半叶，霍亨索伦家族就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他们的政策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一样，是进行王室联姻，从而使他们有可能在其他君主男性世系断绝的情况下继承其领地。这种联姻有可能使本宗族继承其他诸侯领地。1609年统辖于利希、克莱沃、贝格和马克等地的最后一个本地公爵死后，约翰·西吉斯蒙德选侯（1608—1619年在位）通过其妻、普鲁士的安妮公主得以要求拥有这些位于莱茵河下游非常重要的公国；同样，1618年在安妮公主之父死后，他又得以要求拥有普鲁士公国（即后来的东普鲁士）。虽然霍亨索伦对当时还是波兰附庸的普鲁士公国要求继承是无可争辩的，但位于莱茵河下游的诸公国却不得不同另一位要求继承者——诺伊堡宫伯分享：当1614年遗产被初步瓜分时，勃兰登堡只得到了克莱沃公国以及马克郡和拉芬斯堡郡。1666年的最后瓜分确认了1614年的瓜分条款。霍亨索伦家就这样获得了一些具有重要政治和战略意义的邦国：西面的同联合省紧密相连，且在三十年战争爆发后曾被荷兰驻军占领；东面的位于波罗的海之滨，为波兰和瑞典所垂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它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收获。由于法国的支持，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卡明、哈尔伯斯塔特和明顿三个世俗化了的主教区，并渴望获得位于易北河畔富裕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以及最为重要的东波美拉尼亚——但是不包括位于奥得河口的重要港口斯德丁，它连同西波美拉尼亚划归瑞典。这样，继哈布斯堡家族之后，霍亨索伦家族通过三十年战争一跃而为德意志最重要的统治宗族，而这几乎没有经过他们自己的军事努力。

但是，这些大片的领地散布于整个德意志，北部从默兹河至尼门河之间，并未形成一个国家。它们之间的间隔远比领土本身大得多。在中央，勃兰登堡马克连同东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以及哈尔伯斯塔特一起形成了一块相对紧凑的领土。余下的都是一些在战时很难加以防御的边区，而且深受许多欧洲大国的威胁。再者，它们同勃兰登堡之间没有相同之处。诚然，普鲁士公国和东波美拉尼亚的社会结构与勃兰登堡的相同，路德派是占主要地位的宗教。但是，霍亨索伦家族却是加尔文派教徒，这就使这些地区反对勃兰登堡统治的意识更为强烈，在普鲁士公国尤其如此。此外，所有这些小邦都有它们自己的政府和等级会议，有它们自己的传统和联系。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甚少，恰如哈布斯堡领地内，布赖斯高或提罗尔之与波希米亚或西里西亚，或是恰如英格兰之与苏格兰。光是占有更多的领土就有可能成

为其虚弱的原因，就像哈布斯堡家族行将显示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霍亨索伦家族能否成功地把这些参差不齐的土地连接成为一个国家。这一任务落到了在1640年即三十年战争期间即位的年轻选侯腓特烈·威廉身上。他即位时年仅20岁，被后世称为“大选侯”。不过这项任务的最终完成则是在18世纪由他的后人实现的。^[1]当他即位时，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地区为瑞典人所占领，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他的军队由一些领不到饷就走人的难以驾驭的外国雇佣兵组成；国家深受外国占领和士兵掳掠之苦，它看上去好像要彻底解体了。当他在1688年去世后，留下了一支3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他在同等级会议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且为他所有领土的治理创立了第一批中央集权机构。他的统治的重要性不在于对外征服，而在于他的巩固国家和推行中央集权化的对内政策。就这一点而论，他是霍亨索伦君主中最重要的一位。

腓特烈·威廉把他的那么多散布很广的领地看成“身体之部分”（*membra uniuscapitis*），他在1650年就是这么说的。^[2]由于他有领土在莱茵河畔和波罗的海之滨，他就总是要被拖进欧洲大国的冲突之中——不管是法国与荷兰之间的冲突还是波兰与瑞典之间的冲突。自然，他愿意动用他所有领地的人力物力去保卫某一块领地免遭外国入侵。但这一政策必然会同各地等级会议发生冲突，凭什么克莱沃的等级会议要对波美拉尼亚的命运感兴趣？或者说凭什么普鲁士的等级会议要对路易十四的入侵感兴趣？1650年甚至勃兰登堡的等级会议也拒绝为处理瑞典与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边界争端而提供任何资金，他们说得很对：如果他们受到威胁，波美拉尼亚或克莱沃的等级会议也不会帮助他们；那么凭什么他们要卷入外省的争吵中去呢？^[3]如果选侯要保卫他的领地，他就需要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又只有他的等级会议给予他的必要的资金才能招募得起来。因此在1652年年初，他就决定召集一次勃兰登堡的全邦议会，由整个贵族阶层和勃兰登堡马克的全体贵族和所有城镇参加，而通常只召集小规模的代表会议或由等级会议各委员会会议来处理当前事务。选侯向这个大议会提议开征一种普遍的间接税，不论贫富都须缴纳，这就将废除贵族阶层的免税权。这种税很像荷兰的货物税，早在选侯年轻时旅居联合省的那些年里就对货物税有所了解，而且货物税很适合于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的种种状况。拟议中的新税很可能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税收，从而剥夺了等级

会议的财权。诚然，一些勃兰登堡的城镇支持这种货物税，因为它们希望这会减轻它们沉重的纳税负担（通常城镇须缴纳各种税的59%）。然而，来自贵族阶层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致这一建议不得不撤销，随后，等级会议提出，如果他们的不平能得到抚慰，他们将在六年内提供为数达50万银币的一笔相当大的款项。在这一基础上，议会经过八次休会后，终于在1653年5月达成妥协。腓特烈·威廉得到了钱，也就可以招募一支小规模军队了，但他不得不对贵族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在他们控制其农民的权利方面。他还不得不保证在未经等级会议同意的情况下，不开征货物税，也不缔结联盟，并在所有重大事务上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与选侯共同统治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次议会的结果并不是选侯的胜利，它也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变革。

1655年爆发的北方战争才给勃兰登堡以及其他选侯领地带来了真正的变化。^[4]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腓特烈·威廉通过巧妙地变换立场，先是同瑞典结盟，后又同波兰联合，取得了他统治时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唯一收获。在1660年的奥利瓦和约中，瑞典以及波兰都确认了他对普鲁士公国拥有主权，于是该公国不再是波兰的附庸，并为以后成立的新王国提供了名号。但是，北方战争也使选侯及其等级会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要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不必等待等级会议的准许就可以随地募集新兵，征收赋税。在战争的头两年，勃兰登堡就筹集了717766银币，这还不包括实物供应在内。这种负担不断增加，到1659年某一时候每月竟要征收11万银币税款。在克莱沃和马克，战争期间共筹集了150万银币：考虑到两邦的面积狭小，这个负担就更沉重了。普鲁士公国则深受战火、劫掠、焚烧以及瘟疫暴发之苦。可尽管如此，新的通行费和税收还是不顾当地的强烈反对而开征了，以致首府柯尼斯堡的贸易迅速衰退。

战争结束之后，腓特烈·威廉的地位更加强大。军队没有解散，等级会议也没有重新获得他们以前的权势。在勃兰登堡，尽管等级会议从未加以同意，但每月仍要征税2.2万银币，此数是战前的3倍。当等级会议抱怨说选侯并未和他以前所允诺的那样在重大事务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干脆地回答说同一个人数众多的议会讨论机密是不可能的：在经历了1652—1653年的遭遇后，他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在普鲁士公国内，人们强烈反对继续课征重税，也反对承认选侯对普鲁士拥有主权。虽然贵族阶层可以调和，小城镇则更是如此，但柯尼斯

堡——公国唯一的大城镇——却拒绝让步。在柯尼斯堡内部，城市平民在城市官员希耶罗尼姆斯·罗特的领导下，极力坚持他们的同意应在波兰议会一次全体会议上取得，并坚持应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华沙寻求支持。他们最后还向扬·卡西米尔国王呼吁，并进行军事准备以保卫他们的自由，声称他们不能再忍受“暴政的枷锁”了。在他们看来，这场主权的转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事先并未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是，柯尼斯堡的市议员对此却持有异议，他们竭力反对反叛的下层阶级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不团结被证明是致命的。单凭城市平民是抵挡不住勃兰登堡军队的，加之他们的领袖罗特被劫持和关押，这就足以使这场平民反抗偃旗息鼓了。等级会议承认了腓特烈·威廉的主权，并同意他征收大量的税款，但拒绝再做出重大的让步。1663年腓特烈·威廉不得不确认等级会议的所有特权，保证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每三年召开一次等级会议，不经他们的同意不征收任何税款，并把税款的管理交到等级会议手中。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允诺，等级会议还是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脱离波兰从而也丧失波兰的支持，他们已无法抵挡选侯的军队了。

更引人注目的是腓特烈·威廉在克莱沃和马克的成功。两地的等级会议特别强大，这是下列一些因素造成的：最后几代本地公爵的政府软弱不堪；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等级会议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选侯对其共同继承人——于利希和贝格的公爵——的侵略政策遭到所有四个小邦的等级会议的强烈反对。其结果是腓特烈·威廉不得不在1649年和1653年对两地等级会议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让步。他们被准许可自行集会，可以同外国列强进行谈判；未经他们同意，任何部队不得进入两公国；所有官员必须由两公国本地人担任；不经等级会议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税款。然而，在北方战争中，这些特权不断地被破坏，而军事统治的建立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以致政府害怕会爆发全面暴乱。由于荷兰驻军不再支持市民，他们已无力进行任何抵抗。等级会议不再团结一致，因为许多贵族已为选侯效劳或者已从其主上那里得到其他恩惠。这种分裂状况加上腓特烈·威廉自己的武装力量，使他能够放弃同等级会议讨价还价的政策。一项新的条令在柏林拟定，并送往克莱沃签字盖印。接着是向等级会议提出最后通牒，要么他们完全接受这个条令，要么他们的君主率部队前来给予他们应得的处分。这些手法大获成功。大部分人做出了让步，并接受了该条令，一小部分人离开了会议，但很快就被迫就范了。在这一新条令

中，先前的许多特许权被取消了，尤其是那些涉及外国列强和军队进驻的特许权。但是等级会议的财政管理权以及他们自由集会（在适当的知会政府之后）和官职只限于任命公国本地人担任等权利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就像1653年勃兰登堡条令和1663年普鲁士条令那样，这也是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等级会议的共同治理权不再存在，但是他们保留了一些明确的权利。然而，同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不同的是：这些权利在随后的时期里一直有效。由于三级会议拨出大量款项，且不再试图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霍亨索伦家族也就基本上不再管这些遥远的外省了。基于完全不同的问题和传统，柏林的改革热情在莱茵兰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克莱沃和马克仍是霍亨索伦君主国的边区，这是不仅仅就地理意义而言的。

另外，勃兰登堡在大选侯统治的后期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革，这些改革彻底摧毁了等级会议的势力。在1661年和1667年两届等级会议上，选侯又打算引进一种货物税即对财产开征直接税以代替古旧的贡纳，但这再次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贵族阶层拒绝放弃他们的免税权以免自己等同于“庶民”。选侯正在考虑再次退却，但城镇中一场平民运动迫使他采取行动，其结果是又一次的妥协。1667年颁布敕令规定开征货物税，但这只限于君主直辖的城镇，而不包括贵族所辖的城镇。即使是这些“直辖”的城镇也有权选择他们是否接受货物税。直到1680年，这才变成强制性的，并在两年后扩大到先前免除此税的贵族所辖的城镇。就这样，贵族阶层的特权未被侵犯，反而保留到了19世纪。但是，等级会议失去了自身的政治影响。正如贵族阶层所担心的那样，货物税成为一种永久税，从而使等级会议的召开成为不必要了：因为在统治者看来，等级会议存在的理由就是就拨款进行表决。由于货物税是一种永久税，它可以根据选侯的意愿增加，并扩大到更多的商品上去，因此这些城镇也就无须再被召集进行会议了。由国家各区域交纳的土地税可以由贵族阶层的地区议会即所谓的县议会估定并重行分配。

货物税的征收和管理最初由城市当局负责，但很快就移交给由选侯任命监督货物税事宜的官员手中，即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军事和税务委员。一个全新的官僚阶层形成了，他们同等级会议及其利益相脱离，唯君主之命是从。到18世纪，这些新官员成了城镇的全权主宰。城市自治和自主的一点残余都被官僚政治破坏得荡然无存。城镇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仍很衰弱。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能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发展，只有恭顺的市民期望能从上面得到一切，并指望得到国家的保护与鼓励。这种体制从勃兰登堡慢慢地扩大到霍亨索伦属下的其他地方。

在勃兰登堡，各等级对选侯改革政策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因而选侯能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由于贵族的特权得到确认，而且国家对贵族地产的经营和农奴的地位不加干涉，因此贵族阶层也就不吭声了。军队的迅猛发展使得他们以为已不能再为进入教会的幼子们提供出路。勃兰登堡的贵族很穷，他们的地产不可能再无止境地被分割下去。国家的行政部门为他们的经济困难提供解决的办法，尤其是在谷物价格下跌时期。普鲁士公国的贵族虽也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但他们要富有些，而且因传统也较为独立。他们的祖先曾在他们的统治遭到压制时起来反对“条顿骑士团”，而且由于同波兰的联系，他们已习惯于享有相当于波兰贵族的地位。当地对路德教的信奉加强了对外来的信奉加尔文教的君主之反对。甚至在1663年以后，在普鲁士贵族阶层中仍存在着一个亲波兰集团，他们的目标是要恢复同波兰的联系。为了反对他们，大选侯竭尽严酷之能事。1670年，他们的领袖，陆军中校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卡尔克斯泰因，被勃兰登堡的使节从华沙劫持，遭到严刑拷打，并被处死：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也侵犯了贵族的特权。

柯尼斯堡的反抗也同样遭到镇压。当这座城镇拒绝接受选侯所提出的缴税要求时，“军事执行”的命令便在1674年被下达。士兵开进城镇并被分配到市民家中住宿；如果需要，他们就会使用武力以获得欠款。很快，这座城镇就同意不仅支付所有的欠款，而且还包括“军事执行”的费用。它的抵抗被粉碎了，贸易也衰退了。然而贵族的首领们认识到如果他們要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势，并避免持续的重税，各等级之间的团结就必须恢复，因为在普鲁士，贵族并没有像在德意志大多数邦国那样被免除纳税。为了结束那种导致各等级各自通过不同方式筹集税款的分裂现象，贵族阶层步选侯的后尘，建议采用一种普遍货物税。这样，议会就将保留财政管理权，柯尼斯堡也可恢复其同其他等级的和睦关系。但是，到这个时候大选侯已经认识到能保证各等级永远分裂的勃兰登堡制度具有优越性。因此他放弃了改革政策，代之以“分而治之”政策。在17世纪80年代，贵族们虽不断赞成采用

普遍货物税，但都一再被新军事当局强令缴纳通常的土地税，由勃兰登堡的官员领导的军事专员公署，其权力开始取代公国旧机构的权力，并使议会形同虚设。等级会议失去了财政管理权，而且在实际上分裂成四部分：贵族、自由农民、小城镇和柯尼斯堡。反抗只在贵族阶层内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未取得任何成功。渐渐地，他们也到霍亨索伦君主国任职了。

然而，不是在普鲁士公国而是在勃兰登堡马克，首先开征城市货物税，首先出现新的军事当局，等级会议也首先被强有力地制约。在勃兰登堡马克，17世纪初枢密院就已成立，旨在就有关新获得的位于德意志西部和东部的领土之事务向选侯提出建议。实际上，在枢密院成立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它主要处理勃兰登堡的事务，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处理有关霍亨索伦其他领土的事务。但是，慢慢地，它就扩大了它的活动领域。它虽是勃兰登堡马克的政府，但已成为一个凌驾于其他领地政府之上的机构。有关其他领土的事务以及外交政策问题却在枢密院内与一些纯粹是当地的问题一起加以讨论。枢密院没有任何部门，而且在大部分是贵族的枢密院官员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分工。最初，所有国家事务都属于枢密院的权限范围内。但是在给这个国家的历史带来了根本性变化的北方战争期间，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即战争总委员会成立了。它负责与军队相关的财政和税收的所有事务。它要支付部队的薪饷，提供装备和粮秣，很快，它就在各领地拥有人数众多的下属官员，即前面所提到的军事和税务专员。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增设了一个战时财政总署，举凡外国补助金和选侯属下各邦的税款均须交与该署。因而它成为整个国家的中央国库，其地位高于必须向它呈报收支情况的地方财库。由于常备军的存在依赖于税款的支付，因此对税务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为战争总委员会官员最重要的任务。这尤其适用于货物税，所以城市当局被排除在该税的管理之外。由于各地等级会议都不愿意缴纳所要求的重税，这些新的官员很快就同各等级及其代表发生了冲突，他们不同于各地方政府的官员，与各等级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这个新国家的机构，主动、冷酷，热衷于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维护他们的权力并执行君主的命令。他们成了“国家的灵魂”，古老的特权消失了，正如勃兰登堡贵族在1683年所说的那样，“真正自由似乎连影子都不存在了”[\[5\]](#)。

在大选侯统治的最后几年，战争总委员会将其活动范围从税务领域扩大到一般的经济生活领域。对贸易和制造业的监督、对新企业的提供资金，对行会的控制以及对海军和殖民活动的参与和筹措资金都属于它的职能范围。由于如此大量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提供资金或控制而没有民间的积极参与，又由于军队成为整个国家活动的中心，因此战争总委员会也就成为霍亨索伦国家的最重要机构。随着三十年战争人口的减少和强加于人们的沉重负担，上述新机构又被赋予促进外来移民和定居的职责，这也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更多的移居者意味着更多的纳税人、更多的产品、新工业和新技术，也即有更多的钱财。在17世纪最后20年里，有2万多加尔文派教徒从法国和巴拉丁移居到勃兰登堡和马格德堡。纺织业——布料、亚麻织物、棉织品、丝绸、天鹅绒、饰带、编带、袜子、缎带等的生产——尤其受益巨大。蜡烛、肥皂、纸张、镜子、手表、光学物品、纽扣、手套、鞋、帽子、菜抽、烟草、铁、铜和黄铜的生产得到促进。就这样，战争总委员会的官员们就完成了法国各省按察使所要完成的许多任务，但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军事性的。在法国，各省按察使同样附属于军队，并向被占领的国家征收贡纳，而他们勃兰登堡同行则首先要提供给军队所需的一切，并扶植从军队角度看有用的企业。甚至对经济恢复的促进以及移民的安置也从属于这一目的。然而，就国家的财力而言，常备军的发展太快，严重推迟了经济的恢复。

当腓特烈·威廉在1640年继位时，勃兰登堡的军队只有4650人，而且由于缺乏金钱，很快就不得不进一步削减。1648年和约缔结后，士兵所剩无几。1653年在拨给选侯六年款项的勃兰登堡议会散会后，军队的人数也只有1800人。然而，在北方战争中，军队迅速发展到了2.2万人，使选侯在那场战争中得以发挥重要作用。1656年在华沙，它同瑞典一起赢得了对波兰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奥利瓦和约后，军队并没有解散，只是缩减到1.2万人——一支值得重视的兵力。虽然在以后几年中它被进一步消耗，但很快它就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实力。1672年以后的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它又增加到大约4.5万人。尼曼根和约后军队再度缩减，但只缩减到2.5万人——一支比其他任何德意志邦国的军队都大得多的队伍。在大选侯去世的1688年，它的人数已超过3万。这支队伍两次从瑞典手里征服西波美拉尼亚，并于1675年6月在费尔贝林取得了对入侵勃兰登堡之瑞典人的著名胜利。它同样在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屡建战功。这是一支欧洲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军队，它一半

是在荷兰和法国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但90%的军事支出来源于国内。在1688年这一和平年里，大约有100万大选侯的臣民被迫筹集338.2万银币，大约相当于68万英镑：这对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对于占居民大多数的农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支军队的军官主要是本地贵族，他们已开始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了。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驾驭，不守纪律，但一种对选侯忠诚的精神和对君主国强烈的感情开始弥漫于他们的队伍之中。选侯是他们的总司令，而他们是选侯的封臣：因为非常多的军官来自本地贵族阶层，一种封建契约把他们同他们的主人联结在一起。在选侯和贵族阶层之间，一种起作用的联盟关系建立了起来，从而使贵族阶层忘却了它通过等级会议行使的政治特权之丧失。但是，贵族阶层保留了它的社会特权，且仍是统治阶级，尽管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正是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的贵族占据了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18世纪。

如果说军队及其管理大部分要归功于瑞典做出的榜样——腓特烈·威廉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外甥——那他的经济政策则受到西欧思想即科尔培尔和荷兰思想的强烈影响。然而“重商主义”原则当它运用到范围小、空旷且分散的领土上时则不可能有什么效果，而且钱财也不能像腓特烈·威廉所期望的那样留在国内，因为勃兰登堡的必需品依靠进口。但他有一些措施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尤其体现在连接奥得河和施普雷河的运河建造上。这条运河的建造是为了使河口控制在瑞典人手中的奥得河到他的首都柏林的交通改道。尽管位于奥得河畔的城镇——法兰克福、斯德丁、莱比锡等——采取了反对措施，这项工程仍于1660年完工，从而大大不利于萨克森和奥得河沿岸城镇。许多来自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商品以前要经过莱比锡陆上运输，而现在则取道更加便利的路线，通过运河，顺易北河而下。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衰退了，而柏林——一个此前非常不重要的城市——则发展了，这部分是由于所有的货物都必须在那儿转运。如果勃兰登堡不在位于易北河畔的伦岑和韦本征收大量的令人不快的通行费，从而使运输小宗货物的商人宁愿选择陆路的话，那它原可获得更多的利益。选侯国的许多禁令、规章和垄断同样对贸易产生极坏的影响；但就这方面而言，勃兰登堡所采取的政策同它的邻邦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同联合省的密切联系，在德意志各邦君主中只有腓特烈·威廉似已认识到海军和殖民政策的重要性。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计划在他统治早期就已制订。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他雇用了由荷兰商人本亚明·劳拉装备的私掠船袭击瑞典和西班牙船只。在尼曼根和约（1679年）后，第一支探险队在一家由劳拉任总裁的荷兰公司的资助下被派往黄金海岸。1682年，一家非洲公司用5万银币（约1万英镑）的不大一笔资本建立起来，其中劳拉拿出了2.4万银币，而选侯只出了8000银币。次年，该公司的所在地从柯尼斯堡附近的皮劳移到爱旦，这就使它大为有利地坐落在北海之滨，靠近联合省。东弗里西亚的等级会议捐出2.4万银币，科伦选侯也要捐出同样的数目，但缺乏资本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同年，第一个勃兰登堡商站的“大腓特烈城”在黄金海岸建立，很快，其他商站也陆续出现。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岛上的一个贸易站已从丹麦手中买下，因为奴隶贸易是这些活动中最有利可图的。同土著首领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但荷兰西印度公司却充满敌意。1648年，腓特烈·威廉用11万银币从劳拉手中买下9艘军舰，就这样建立起了他自己的海军，用以保卫殖民事业。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又开办了一个东印度公司和一个美洲公司。然而，勃兰登堡太贫困，以致不能维持如此多的企业，也无力筹集到所需的资本。股东们创造不出利润，非洲公司很快就破产了。1717年，要比他祖父现实得多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以微不足道的6000金币把黄金海岸的属地卖给了荷兰西印度公司。这个国家有许多其他的任务要分神去干，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中产阶级的替身。

在对外政策方面，腓特烈·威廉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他统治时期的一大收获——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是在北方战争中得到的；但在1660年后，他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收获。从1672年起，他一直站在联合省一边从事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而他则从联合省获得大量的补助金。因为自己在波罗的海沿岸没有良港，所以选侯施尽自己的浑身解数试图从瑞典手中赢得斯德丁。这座城市在1677年被征服，但在两年后的圣日耳曼和约中它又被归还给瑞典。如果说在此之前腓特烈·威廉一直试图以同联合省结盟反对路易十四的方式来推进其利益，那他现在则戏剧般地改变了政策，成为路易十四的盟国。作为每年收取10万里弗尔即33333银币补助金的回报，选侯允许法国军队穿越自己的领土，并在下一次的帝位选举中投票支持路易十四。然而，他通过法国支持以获得斯德丁的希望终成泡影，与法国同盟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

实质性的好处。在随后的几年，法国和勃兰登堡之间的关系仍十分密切，腓特烈·威廉支持路易十四的属地归并政策，并反对采取针对法国的军事措施。

直到南特敕令废除后选侯才又一次改变他的政策。1685年11月《波茨坦敕令》邀请胡格诺派教徒（选侯的宗教同袍）来勃兰登堡定居——一个注定要引起路易十四不快的步骤。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来到勃兰登堡，并带来了他们本国的技术，柏林从这次人口流入中受益尤其大。1686年3月，选侯同皇帝利奥波德缔结了反对法国的秘密同盟。根据同盟条款，选侯同意保卫西属尼德兰出8000人供皇帝调遣，支持奥地利对西班牙继承权的要求，当帝国的帝位空虚时投票支持利奥波德之子以及在和平时期接受每年6.6666万银币的补助金。这是一项曲折的政策，由勃兰登堡的衰弱以及它对外国补助金的需要所决定。它没有显示出任何德意志爱国动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是在还没有德意志的时候，德意志爱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是一个现实主义政策，目的是要加强他自己的邦国和军队，并根据其邦国利益的需要不时改变立场。如果说领土的获得难倒了他，那只是由于勃兰登堡的虚弱，而绝非任何政策的错误。

在大选侯统治时期，勃兰登堡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由一个军队和一个官僚阶层聚合在一起。腓特烈·威廉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裁统治者，尽管他并没有事先想好这样做的计划。更确切地说，他是被形势所驱使，主要是被等级会议对他那统一和力求“壮大”的政策反对所驱使才走这条道路的。为了贯彻这一政策他需要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需要越来越多的税款，如等级会议表明不愿意提供大量拨款，那这支军队就可以用来强行向他们征收。因此，这支军队和新的官僚机构就成为选侯政策推行时备受青睐的工具。正是这支军队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成为一个大国，并使整个邦国都带上了它的特征。正是大选侯创建了军队和国家，但是他自己却几乎没有把勃兰登堡看作一个国家。这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在他的遗嘱中，他给他第二个妻子，荷尔斯泰因的多罗西娅——他深受她的影响——所生的诸子留出了那些分散的公国。在多罗西娅和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诸子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支配着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然而，在他死后，上述遗嘱被他的继承人腓特烈三世宣布无效。在1688年5月腓特烈·威廉临终

前，“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几个字还挂在他嘴边：他是支持奥兰治的威廉远征英国的德意志君主中的一个。

腓特烈三世继续遵循他父亲的政策，尽管推行时没有那么有力。他支持奥兰治的威廉之远征，并站在皇帝一边参加了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1689年，他指挥军队攻克莱茵河畔的波恩要塞。勃兰登堡的军队继续壮大，在反对法国的多年战争后，在1713年腓特烈三世的统治结束时，这支军队的人数已有大约3.9万人。然而正如前朝那样，站在大同盟一边的军事努力并未带来多大的报偿。在吕斯维克和约（1697年）中，勃兰登堡既没有获得任何领土补偿，也没有得到应分给它的补助金欠款。这一失败再加上汉诺威选侯乔治·路易（即日后的英王乔治一世）的妹妹、索菲亚·夏洛特公主的阴谋，导致腓特烈的权臣埃贝哈德·冯·丹凯尔曼的下台，此人在过去的9年中一直按照大选侯的精神指导国家事务，他很快就被新的亲信科尔贝·冯·瓦腾堡伯爵所代替。丹凯尔曼一直在任到1710年（原文如此，疑为1701年之误。——译者注），他是最体面的方式被免职的，但几天后他就被逮捕，并遭受审判。尽管控告他的证据完全不足，尽管各级法庭部拒绝判他有罪，甚至枢密院也赞同他应被释放，但选侯仍下敕令判处他入狱，并没收他的财产。1707年他重新获得了自由，但他的财产却仍被充公。

然而，瓦腾堡伯爵在谋取大块领土上同样未获成功。从奥兰治威廉三世的巨大遗产中，霍亨索伦家族只获得了西德意志的林根和摩斯两个小伯国、纳沙特尔和以后的部分格尔代尔。但是他却成功地助长了他主上的一往无前的雄心。因为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已经成为波兰国王，也因为汉诺威的乔治·路易看上去将成为英国国王，腓特烈不愿被他的对手远远甩在后面，故而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国王。由于他是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普鲁士公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使自己成为该地的国王。但他不想在没有后者同意的情况下这样做，于是漫长的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了。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看来要一触即发之时，利奥波德终于同意了。1700年11月一份条约签署了，按约恢复了1686年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反法同盟。腓特烈同意在战争期间出8000人的一支部队支持皇帝，而利奥波德则保证他得到10万银币的补助金以及对他的国王尊号的立即承认。两个月后，即1701年1月18日，宏伟壮观的加冕典礼在柯尼斯堡举行。腓特烈为他自

己和妻子加冕，这标志着普鲁士君王将不受皇帝和任何宗教势力的支配。这样，条顿骑士团古旧领地——普鲁士公国使新的王国有了名号：腓特烈是以普鲁士为国名的国王，而不是普鲁士的国王。但是，名号的变换并不意味着公国对整个王国有任何更大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重心从柏林转移到了柯尼斯堡。柏林仍是普鲁士王国的首都，勃兰登堡马克仍是其核心和最重要的省份。1697年勃兰登堡贡献了总税收的32%，普鲁士公国只有16.4%——紧随其后的是小得多的领地马格德堡（15.7%）以及克莱沃和马克（10.2%）。这些数字还表明不同的领土对整个国家的相对重要性。此外，新王国也没有继承一度统治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传统。该团所建立的国家在1525年就已世俗化，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公国真正统治者的等级会议丝毫未受被他们所取代的教团之观点和习俗的影响。他们正统的路德派教义与骑士团的十字军大相径庭；而他们对波兰的同情心又与任何条款精神格格不入。普鲁士的黑鹰代替勃兰登堡的红鹰而成为新君主国的国徽，但这只是把它同“普鲁士精神”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

上升到国王的地位使腓特烈对浮华和显赫的爱好显露出来。在霍亨索伦君主中，他是最受路易十四“豪华”影响的人。宫廷的礼仪变得复杂得多。由安德烈亚斯·施卢特^[6]在柏林建造的一座豪华的宫殿代替了原先那座陈旧、简朴的宫殿。当这座新建筑物完工时，国王立即要求大厅的数量要加倍。其他宫殿和新开辟的宽敞的街道开始装点首都。在首都以外的雷森堡（后以索菲娅·夏洛特的名字重新命名为夏洛特堡），索菲娅·夏洛特命人建造了一座带有一个公园和一个歌剧院的宫殿。宫廷的男女贵胄在那儿演出喜剧，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成了那儿的常客。例如王储即后来的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扮演丘比特的角色，有时他也表演独舞。为了促进绘画、雕刻和建筑学的发展，一所艺术学院按照罗马和巴黎的样式于1696年建成，学院内有荷兰等地的画家授课，而施卢特也因此有用武之地。几年后，根据莱布尼茨的计划，一所科学院也成立了，它同样有着更为实用的功能：管理整个教育制度，促进农业和企业的发展，例如对丝绸的开发。一所新的大大学在哈雷成立，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接受了该大学的职位。这样新君王就成为艺术和科学进步的保护者。缪斯女神看起来已经在柏林，尤其是在王后的宫廷里找到了安身之地，但很快就再次被战争的音调赶跑了。腓特烈·威廉一世本不该扮演丘比特这个角色的。

如果艺术的繁荣是由于王室的支持，那么开支则是飞快地增长。1688—1700年，关于食品和酒的开支几乎翻了一番，而在仆从上的花费则是原先的三倍多。国王曾告诉法国大使他衣服上的珠宝估计值100多万银币。他对珠宝和其他珍贵物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好。他喜欢赠送金银餐具、赠送饰有钻石的宝剑、手杖、戒指和小画像，喜欢用昂贵的饰物和家具装点他的新宫殿。他还喜欢安排豪华的招待会和展览。很快，巨大的赤字出现了，因为勃兰登堡—普鲁士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大国给予的补助金完全不足以填补这一缺口。王室的爱好和宫廷内的派系斗争都是对此起了作用的因素，财政和行政也深受其苦。在腓特烈统治的后期，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即将结束也为军队的大量缩减提供了机会，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王国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也没有能力在宫廷和促进艺术方面花费大量金钱。然而，1713年登上王位的国王早已做出了他的选择：军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在和平时期扩大到4.5万人，而花费在非军用物品的开支则大力削减。战神成为这个新王国所崇拜的神。然而这个王国的第一代国王尽管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但也许应获得一个比普鲁士史学所给予他的好一些的称号。他的爱好总的来说是和平的，带有文化色彩的；他的首都正开始变成一个大都会；由于有将近1.4万在霍亨索伦土地上落户的胡格诺派教徒之努力，工业终于开始发展了。如果腓特烈的后继者显示出相似的兴趣，如果军队未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和中心，那也许会对普鲁士和德意志都要好得多。正是这一特征把18世纪的普鲁士同所有其他德意志邦国区别开来。

[1] 关于18世纪的普鲁士，见第7卷第13章。

[2] 柏林1880年版，《腓特烈·威廉·冯·勃兰登堡选侯生平文献》，第10卷，第194页。

[3] 柏林1880年版，《腓特烈·威廉·冯·勃兰登堡选侯生平文献》，第10卷，第196页。

[4] 关于这场战争，见后第24章边码第566—568页以及第25章第574—575页。

[5] 《腓特烈·威廉·冯·勃兰登堡选侯生平文献》，第10卷，第595、600页。

[6] 见前第7章第172页。

第二十四章 扬·索比斯基去世前的波兰

在17世纪中叶，波兰—立陶宛（即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面积约35万平方英里，它是仅次于莫斯科俄国的欧洲最大的国家。它从瓦尔塔河流域延伸到伏尔加河最西端的支流，大概拥有1000万居民，其中波兰族人不到一半。在波兰的布格河和桑河以东，居住着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别集聚在各自的区域里。在这块东部领土上居住的波兰人主要是城镇居民，但在其他的地区，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地的乡村。东部地区的贵族中许多自称波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7世纪本地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贵族都已波兰化的结果。在其他非波兰民族中，只有犹太人和德意志人在数量上还值得一提。犹太人占当时波兰—立陶宛总人口的5%，主要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而德意志人则主要居住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大波兰和波属普鲁士。17世纪中期，由于来自德意志的移民进一步增多，该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了。各民族人口的比例与各派宗教信徒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除了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以外，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都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则要么信奉东仪天主教^[1]，要么信奉东正教。在德意志人中，路德教拥有许多信徒。

就其社会结构而言，波兰—立陶宛主要是一个农民的国度。许多城市居民也从事农业。西部的城镇居民的百分比要高于东部；根据一些估计，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差不多达到20%。但是，波兰—立陶宛的社会结构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贵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据估计，在17世纪波兰本土居民中，几乎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贵族。在贵族中，少数权贵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们拥有庞大的庄园，占据最重要的官职，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的政策。其余的贵族，“什拉赫塔”（szlachta），一般只拥有中等规模的地产，往往依附于一些大的权贵家族。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其他等级来说，保持着特权的地位。

贵族的领导作用，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以下的事实上：自15世纪后期起就开始存在的议会（sejm），并不是各等级的会议，而是清一色的贵族的议会。议会两院之一的参议院（izbasenatorska）的席位，是留给教会或世俗人士中的位居要津者，即权贵的。议会的另一院，即乡村代表院（izbapostorska）中，议员是“什拉赫塔”的代表。那些少数来自城镇而进入乡村代表院的议员在该院的议事中无足轻重，只有有限的表决权。议会实际上行使着立法职能，它还拥有批准各种税收的权力。这样，从中世纪结束时起，国王的权力就一直由于贵族的利益而大大受到限制。

17世纪下半叶波兰国内演变进程的特征是君权的进一步削弱和立法权力的衰落。君权的削弱与实行自由选王制选举君主的做法有关，这种做法从1572年雅盖隆王朝绝嗣后成为惯例。在一开始，所有的贵族都有权投票，他们坚持如下的原则，即只有统治王朝的王室成员才有资格做波兰王位的候选人。连续几届国王都是从同一王朝（瓦萨王朝）中选出的，在17世纪上半叶，虽然贵族仍墨守选王原则，不过国家并未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发生激剧的动荡。但当波兰瓦萨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扬·卡齐米日（1648—1668年在位）退位后第一次出现王位空悬之时，选王制所固有的危险就变得很清楚了。在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竞选斗争中所出现的党派倾轧和外国干涉有可能使国王成为各个权贵集团和外国工具。1669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勃兰登堡以及莫斯科都企图对波兰国王的选举施加影响。前四个国家虽一致同意支持诺伊堡宫伯菲利普·威廉为候选人。但法国却暗中鼓励孔代觊觎波兰王位，而哈布斯堡王室则支持洛林的查理公爵为候选人。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在什拉赫塔中间，反对选举一个外国人当国王的一派人占了上风。迄今为止始终遵守的只考虑统治王室成员的原则被抛弃，于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权贵米哈伊尔·维什涅维茨基当选为国王（1669—1673年在位）。这种对外来干涉所做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智的，但它却根本没有给波兰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因为，贵族们把一个虽是杰出家族的成员，其本人却并不杰出的人选为君主，这从一开始就妨碍了王权的巩固。而且，外国对国王的影响也并未因这项拥立一位“土贵族”的决定而消除，由于这项决定首先是针对法国的候选人的，其结果是米哈伊尔·维什涅维茨基更加屈从于波兰贵族中亲哈布斯堡派的影响，并最终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家

族成员埃莱奥诺拉女大公。结果，1669年的选举成了维也纳的一场胜利。

1674年为填补波兰王位空缺而展开的斗争仍然主要取决于法国与哈布斯堡的对抗。此外，勃兰登堡选侯所推候选人查理·埃米留斯的竞选，在一开始也起了远非不重要的作用。但与上届选举一样，在这次选举中，那些得到外国公开支持的候选人（洛林的查理、孔代、诺伊堡的约翰·威廉），也都未赢得胜利。相反，王位落入了波兰出生的大贵族扬·索比斯基（1674—1696年在位）之手。索比斯基属于波兰贵族中的亲法派，但在他统治期间，他逐步放弃了对这个派别的忠诚。他与米哈伊尔·维什涅维茨基不同，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应当说他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的波兰诸王中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当选，是国家当时所处的非常状态之结果。土耳其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对这个国家东南地区构成的威胁需要指定一名将军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人能与霍廷战役的胜利者索比斯基匹敌。^[2]但由于选王制的原则，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推选出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结果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君主政体，而这却是加强国家内外地位的基本前提。

立法权力的衰落最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即议会开始接受在做出决议时必须全体一致的原则。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原则在16世纪就已存在，不过并没有被严格遵守过。如果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人数很少，他们通常被多数派置之不理。但是从17世纪中叶起，只要有一名议员表示反对，就会使整个议会的议案告吹（自由否决）。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1652年。在这年3月9日的会议上，一位名叫西青斯基的议员对一项要求把议会辩论通常六周的时限延长一天的动议提出了抗议。最初，其他的议员对于这项抗议没有介意，显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如果对单独一名议员的反对意见也加以考虑的话，必然要耽误议会的工作。但结果，议员们能否延长会期，要取决于西青斯基是否撤回其反对意见。由于他没有撤回，议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就休会了。无疑，要不是这件事被那些反对宫廷的贵族看成开创一个先例的话，西青斯基的否决也不会成功。1652年的这一偶然事件，并没有导致议会的“分裂”，即在为议会辩论正式规定的六周期限期届满之前就休会。直到1669年，“自由否决权”才在常规的期限结束之前

得到了行使。1688年，议会第一次在议程刚开始之时就出现“分裂”，甚至连议长都未选出。这样，“自由否决”原则到此时发展到了其必然的结局。它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会严重破坏议会的活动。在扬·索比斯基统治期间召集的历届议会，已有半数无果而终。国家议会树立的恶劣榜样，迅即被许多地方议会（sejmiki）所效法。

“自由否决权”对议会活动产生的有害影响在财政和军队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方面的事务都取决于立法机构正常通过的决议。由于在当时的波兰没有任何固定的税收，各种税收都是由议会投票决定，为了某些明确的目标和在某个特定的期限内征收的。虽然地方议会在这方面有某些权利，但批准征税和借款主要是国家议会的事务。这些定期批准的款项大致保持在维持一支人数不多的常备军的水平上，这支常备军在17世纪中逐渐取代了老式的贵族总动员的做法。滥用“自由否决权”往往危及重要军事行动的成功。

随着“自由否决”原则的胜利，外国列强得到了对议会活动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而由于其中有些国家在大贵族中间操纵着政治上的追随者，情况就愈演愈烈。就奥地利和法国来说尤其如此，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在当时支配着欧洲的政治格局。这些派别之形成所带来的紧张局势，将会把波兰引向内战的边缘。如在1672年，由亲哈布斯堡派组成的戈瓦布联盟就曾参加了与由军队和亲法派组成的什济布尔泽钦同盟的一触即发的对抗。同样，“大选侯”统治时期，勃兰登堡不仅在大波兰的贵族中，而且在立陶宛大公国各主要权贵家族中都有大批追随者。此外，莫斯科俄国也几次成功地在波兰东部地区取得了远非微弱的支持，这表现在1656—1658年的波—俄谈判期间，后来在1688年扬·卡西米尔退位后又一次显示出来。而最足以说明17世纪下半叶波兰—立陶宛内部局势特点的，莫过于各邻邦愈来愈多地致力于在波兰维持“秩序”——也即维持其内部虚弱——这一事实。1667年，瑞典与勃兰登堡签订了一项条约，旨在保持波兰的国王、参议院和贵族之间的现存关系。167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沙皇的使臣签署了一项条约（虽然该约并未生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反对索比斯基的改革措施，换句话说，也就是反对对贵族享受的特权作任何限制。同样的企图也构成1686年瑞典—勃兰登堡协议和奥地利—勃兰登堡协议的基础。

17世纪下半叶，不乏通过内部改革来加强国家的尝试。扬·卡西米尔在其整个统治时期曾追求这一目标，虽然并未贯彻始终。他的王后，贡萨加—内维尔的路易丝·玛丽亚甚至以更高的热情致力于这个事业。她受法国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被王朝利益的考虑所左右，这对促进改革的努力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宫廷成功地取得了一些权贵对其方案的支持，这些方案主要涉及君主的选举、议会的表决程序以及建立一个由参议院成员和“什拉赫塔”的代表组成的常设性委员会，作为在议会休会期间的咨询机构。关于君主的选举，改革者们仅限于建议在位国王生前就选定继位人（*rege vivente*），这将会使国家避免因王位空缺而产生危机。关于议会的表决程序，则提出废除全体一致原则并实行多数票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的尝试，特别是有关选举王储的建议，最终遭到了大多数权贵首先是“什拉赫塔”的反对。贵族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廷试图指定一个法国人做扬·卡西米尔的继承人。他们担心，一个法国人将会表现出君主专制主义的倾向，从而对他们的特权构成威胁。由于波兰贵族反对法国，奥地利和勃兰登堡便支持他们抵制宫廷提出的选举方案。这样，1661—1662年，扬·卡西米尔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改革计划一开始就遭受了失败。尽管遭到这次挫折，国王仍拒不放弃他的努力，其结果是，在此后数年间，他与贵族中以波兰大元帅耶尔齐·卢博米尔斯基为首的反改革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尽管与莫斯科的战事还未结束，这两派仍不惜诉诸内战，结果，国王再次被迫放弃了他的改革计划。1668年他的退位表明，改革事业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扬·索比斯基再度努力巩固波兰君主的地位，但像扬·卡西米尔一样，他也受阻于权贵和“什拉赫塔”的抵制。这两位国王的改革愿望实质上都很温和。但是波兰—立陶宛的贵族阶层不能容忍哪怕是适中程度的国家现代近代化。这表明，大多数代表，至少是控制着波兰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那个阶级的大多数代表，缺乏正当的责任感。在16世纪，波兰贵族对政治革新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但在17世纪，他们的态度逐渐僵化了。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波兰—立陶宛，出现了好几起重要的权贵人物在政治上叛变的严重事件，如波兰副首相希耶罗内穆斯·拉杰约夫斯基事件，这绝非偶然。拉杰约夫斯基与法律和君主发生冲突，被迫逃亡国外，最后到了瑞典，并于1655年随瑞典入侵军重返波兰。

波兰的文学和科学在17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可资炫耀的著名代表人物。但在另一方面，波兰文化却向东和东南广泛地传播，超越了人种学意义上的波兰地区。宗教状况的特征是新教教堂和新教社团的数目继续减少，以及以东正教为一方与以罗马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为另一方的两军对垒更为尖锐。

新教教堂虽然大减，但它们在德意志族人中还能维持其地位，并能保持一批人数稳定的中坚教徒。但在波兰族人中，新教教堂和社团只拥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支持，而且这些支持在政府和罗马教会的压迫下还在进一步削弱。从1666年起，参议院中已没有一个议员是新教教徒。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镇压阿里乌派的激进集团（索齐尼派）。同瑞典进行的战争造就了拥护这些镇压措施的舆论气氛。在查理十世取得最初的一些巨大胜利之后，*szlachcici*中的阿里乌派教徒与大多数波兰贵族一样都倒向了查理十世一边。许多阿里乌派教徒对这位瑞典国王特别亲近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宽容的待遇。那些在战争之初就离开了扬·卡西米尔的人都因此普遍得到了赦免；但在1658年，议会做出决议，阿里乌派教徒必须在3年时间内离开波兰，只有那些皈依加尔文教的人才能留下。大多数阿里乌派教徒似乎利用了这个皈依的机会，他们的精神领袖们则去了国外。新教教堂和社团被迫完全采取守势，而罗马教会却成功地巩固了其统治和特权地位。1668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天主教徒改信他教将被处以驱逐出境的惩罚。

在瓦迪斯瓦夫四世统治时期，波兰—立陶宛东部地区的东正教会从1596年布列斯特合并的打击中很快恢复过来。17世纪中叶，东正教会有五个主教管区：基辅、里沃尔、卢茨克、普热米什尔和莫吉廖夫。它得到了哥萨克人的大力支持；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3]爆发后，东南省份中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的地位削弱了，其对手东正教则取得了优势。但波兰—立陶宛在《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年）^[4]中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包括东正教徒居住的基辅，这就自动地大大削弱了东正教的力量。东仪天主教因而再度改善了其地位。1691年，普热米什尔的东正教主教皈依了东仪天主教，索比斯基死后数年，里沃夫和卢茨克的主教也向他学习。从17世纪中叶起，沙皇对东正教在波兰—立陶宛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1686年波兰—立陶宛与莫斯科缔结的“永久和约”中，东正教居民被保证有信仰自由，不得为了

使他们皈依东仪天主教或天主教而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从此，波兰—立陶宛东部地区的教会事务就开始在波—俄关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在那些导致波兰被瓜分的事务中，教会事务再一次扮演这一角色。

17世纪中叶以后，波兰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恶劣影响，特别是17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战争，因为这些战争主要是在波兰的国土上进行的。在这20年中，波兰的人口锐减；据估计，减少的人口高达总人口的1/3。经济衰败在乡村和城镇都十分显著。在17世纪40—60年代，该国某些地区的耕地面积大大缩小。收成减少导致谷物出口量大大下降。农业中的这一不利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变化。无地农民的人数剧增，与此同时，地主的庄园（*folwarki*）越来越重要。像从前一样，这些庄园的劳作是由农民的劳役提供的，但除此之外，地主现在可以从贫困的乡村人口中得到劳力了。在波兰的西部地区，人们试图通过吸引新来的农民（主要是来自德意志）来阻止农业的衰败。在波兰农民阶层中，发生了一些地方性的起义，但只有1651年波得赫（*podhale*）地区（在塔特拉山的北麓）的科茨察·纳皮耶尔斯基起义才取得过短暂的胜利。

城镇的衰败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凋敝。小波兰地区的金属工业也同样受到这一总趋向的影响。无疑，许多经济部门从战乱损毁中复原的速度之缓慢主要是由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譬如，“什拉赫塔”对城镇的歧视等。这样，不仅在政体方面，而且在经济发展方面，波兰—立陶宛都落后于它的邻国了。

在17世纪中叶以前，波兰—立陶宛还一直能够在大多数国家中保持其国际地位，在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它甚至还改善了它与莫斯科俄国的相对地位。但在该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由于无休止的战争，波兰—立陶宛丧失了它在东欧的霸权地位。波兰步入了衰落时期，其衰落最主要是由于前述的内部进程。

与第聂伯河哥萨克叛乱者之间的武装冲突开始于1648年，叛乱以哥萨克统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为领袖，参加者是波兰乌克兰地区的农民。由于双方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哥萨克问题就成为一个由邻国加以干涉的国际问题了。哥萨克人与俄国之间最终达成的联盟对波兰—立陶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54年，赫梅利尼茨基与他统率

的军队承认了莫斯科沙皇的宗主权。这不可避免地触发了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争，因为第聂伯河哥萨克人居住的领土（至少名义上）仍属于波兰—立陶宛。

侵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东南地区的莫斯科军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在几个月中就占领了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在北方，他们攻克了明斯克、维尔诺、考纳斯和格罗德诺；在南方，他们在赫梅利尼茨基队伍的配合下，兵临里沃夫城。在中路，莫斯科和哥萨克的军队占领了卢布林，甚至进至维斯杜拉河。波兰在此前与莫斯科的历次战争中，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败绩。自17世纪30年代莫斯科军队进攻斯摩棱斯克遭到失败时起形成的俄波军事实力的平衡，现在明显地变成了波兰的完全劣势。

东欧的重大事件，引来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世的干涉。1655年夏，瑞军分别从波美拉尼亚开入波兰，从立窝尼亚开入立陶宛大公国。在这几个月中，查理十世是波兰大部分地区的主宰。7月25日，大波兰地区投降了，因为当地贵族不想作丝毫抵抗。10月8日，华沙落入瑞典人之手，同月19日，瑞典人踏进了克拉科夫。国王扬·卡齐米尔离开他的国家去了西里西亚避难。大多数波兰省份臣服于查理。在立陶宛大公国，以雅诺茨和波古斯拉夫·拉德茨维尔为首的一帮权贵向瑞典人投诚，与他们缔结了凯台尼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大公国并入了瑞典。故而，在1655年秋，波兰—立陶宛王国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

但是，国土几乎完全被外国军队占领这个事实，并未像100年后那样导致波兰—立陶宛的瓜分。由于邻国之间的激烈对抗迅速使局势变得有利于波兰，对波兰生存的威胁消除了。这种风水倒转开始于1655年年底。自1648年起一直与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人为伍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时转向波兰人，1655年11月，在波兰东南地区作战的莫斯科—哥萨克联军被迫解除对里沃夫的围攻向东后撤。这样，在波兰南部就出现了一大块没有外国军队的地带。1655年12月，扬·卡齐米尔回到了这个地区，并在这里召集起一支波兰军队，重新开始对瑞典人作战。推动这一进程的是，波兰人民开始表现出民族抵抗的热情，最著名的实例（虽然并非第一个实例）是柴斯托柯伐附近的耶茨那·哥拉修道院在1655年年底成功地击退了瑞典人，守住了寺院。

与此同时，哈布斯堡与瑞典之间的敌意也开始对波兰局势发挥有利的作用。皇帝斐迪南三世急于防止瑞典控制波兰，他成功地调解了沙皇与波兰国王之间的矛盾。在皇帝使臣帮助下，俄波举行了谈判，1656年11月两国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但扬·卡西米尔不得不为获取这份友谊做出冒险的妥协：许诺在下届议会上提名沙皇阿列克谢当选波兰国王，即提名让沙皇做他的继承人。但波兰人在此后举行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中审慎地拖延时日，使这些谈判毫无成果。不过对波兰的军事状况来说，这项条约意义巨大，它带来了到1658年夏季为止东方的一个停火期，这大大帮助了波兰人对瑞典人作战。自1656年4月起，沙皇自己也在芬兰和立窝尼亚与瑞典人开战，这样，他自然也希望与波兰停战。如果没有这些情况，那么，光凭哈布斯堡君臣的努力，波兰与莫斯科之间也许很难达成停火。

由于东欧出现了新的政治、军事局势，波兰实际上只需与瑞典及其盟国勃兰登堡作战了，因而也就能够时时战胜因对俄国开战颇觉不支的查理十世。瑞典国王在一些新的同盟者（哥萨克统领赫梅利尼茨基和特兰斯瓦尼亚公爵乔治·拉科齐）帮助下，于1657年年初再度转战于整个波兰，大获全胜；但反波同盟的胜利这时又促使瑞典的两个敌国奥地利和丹麦参加进来。这两个国家的参战，几乎一下子解除了波兰的困境。查理十世转向对付丹麦，仅在几个波兰城市留了一些守备部队。拉科齐向南撤退，在波兰军队的追击下被迫投降。在这种新局面面前，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经奥地利调解，开始与波兰谈判，达成了一项反对瑞典的波一勃同盟。作为报酬，波兰国王取消了他对他的领地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并把比图夫和劳恩堡作为波兰领地赐封给了威廉选侯（威尔劳条约和布朗堡条约）。

在波瑞战争的最后阶段，波兰国土上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战事。1660年年初，经法国调停，波兰、奥地利、勃兰登堡和瑞典在但泽附近的奥利瓦开始了和谈，由于1657年发生的有利于波兰人的外交和军事变化，波兰人得以在和约中保持与瑞典之间的战前状态。根据和约（1660年5月3日），波兰保留了波属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而瑞典则保留了对立窝尼亚的占有，但所谓的“波属立窝尼亚”（立窝尼亚东南部，含代那堡）除外。关于勃兰登堡与波兰的关系，和约确认了威尔劳条约和布朗堡条约。这样，波兰废除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一事就得到了一项国际条约的保证。

在奥利瓦和约签订以后，波兰—立陶宛就能够以巨增的精力专注于对俄国作战了。1658年秋，波兰与莫斯科军队之间重新开始了战斗。由于在哥萨克人中暂时弥漫着一股反莫斯科情绪，波兰得以改善在乌克兰的地位。结果，沙皇保留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领土的主权，而承认了波兰对该河左岸部分的主权。奥利瓦和约使扬·卡齐米尔能够专心进行对莫斯科的战争，故在北方的领土状况也能够得到有利于波兰的改变。1661年，波兰—立陶宛军队克复了格罗德诺、维尔诺、戈麦尔和莫吉廖夫。这场战争以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休战条约为结局结束了。波兰—立陶宛在这个条约中放弃了斯摩棱斯克、斯塔罗多夫、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等领土以及部分乌克兰地区，也就是说，它把它在第聂伯河以东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俄国；条约还规定在第聂伯河西岸的基辅及其周围地区由俄军占领两年，但这块领土再也没有还给波兰。

仅仅根据奥利瓦和安德鲁索沃谈判所达成的领土变更，是不能充分估价1648—1667年历次战争给波兰—立陶宛国际地位造成的影响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丧失了将近1/5的领土，但这些割让的领土主要是边陲地区，波兰或立陶宛从未在那里有过长期延续性的统治，换句话说，这种统治只是以宗主权的形式存在。对波兰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丧失了东欧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均势状态因17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战争而改变了，变得不利于波兰而利于俄国了。但在对瑞典和俄国的战争中，波兰也多次显示出它还远不是不能够维持其实力。

由于以后几十年中发生的土耳其战争，波兰国家没有机会恢复力量。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中叶起经历了一场政治复兴，并最后一次重新推行其领土扩张政策。^[5]在17世纪70年代，它的进攻目标对准了波兰。波兰与土耳其的这场战争，像它与俄国的那场战争一样，起因于波兰国家与哥萨克人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中的哥萨克人，是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仍处在波兰统治下的臣民。土耳其政府在哥萨克统领多罗申科的煽动下介入了这场冲突，并把这块乌克兰领土置于它的保护之下。1672年夏，一支土耳其大军开进波多利亚，占领了只有一小支波军驻守的卡梅内克—波多利斯克，并进逼利沃夫。米哈伊·维希诺维耶茨基国王禁止作任何抵抗，他在1672年与土耳其人签订了布贾克条约。波兰在这项条约中保证向土耳其政府进贡，把波多利亚割

让给土耳其，把第聂伯河左岸的大部分乌克兰领土割让给土耳其的封臣哥萨克统领多罗申科。

但是，以后几年中的事件表明，波兰还未虚弱到像这次未能保护自己免遭土耳其进攻那样的地步。1673年11月，索比斯基在霍廷赢得了一场对土耳其人的辉煌胜利，1676年，他又在加里西亚（Zuravno）附近避开了土耳其军队新一轮冲击波。但在加里西亚签订的条件下，土耳其政府几乎完全保留了它在布贾克和约中取得的利益。波兰国王之所以愿意妥协，多少与他的外交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些计划的目标是反对勃兰登堡。基于这一政策，扬·索比斯基与法国（1675年）和瑞典（1677年）缔结了同盟密约；而与法国的同盟要求他顾及法国不愿让土耳其有任何削弱的态度。

索比斯基最后放弃了这些外交计划，他从1679年起执行一项系统的反土耳其政策。1683年与奥地利缔结的同盟在此后几年中为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依据。由于有一支波兰军队和波兰国王本人参加了1683年9月维也纳城外的那场大败土耳其人的战役^[6]，波兰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里取得了它最后的一次巨大胜利。但不久，波兰又清楚地显示出不再处在可以与其他欧洲国家抗争的地位上了。此后进行这场反土耳其战争的是由皇帝、波兰、威尼斯和教皇在1684年组成的神圣同盟，但那时，波兰只扮演了一个配角，索比斯基再也没能取得什么惊人的胜利。他试图光复那些仍然在土耳其人手中的波兰领土，后来又试图起码征服承认土耳其宗主权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但他向摩尔达维亚的两次进军（1686年和1691年），像试图从土耳其人那里夺取卡梅内克—波多尔斯克要塞的多次努力一样，都失败了。波兰只有在索比斯基死后签订的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中才收回了波多利尼亚和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

从波兰在17世纪最后25年中的军事和外交地位来看，索比斯基无缘实现对奥利瓦条约和安德鲁索沃条约的修正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他因1686年的“永久和约”而被迫永远放弃了1667年割让给莫斯科国家的领土。在17世纪50—60年代，东欧地区的均势已逐渐变成了波兰的劣势，这终究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

^[1] 承认教皇至高无上，但保留希腊的礼拜仪式和惯例（1439年的合并）。

^[2] 关于索比斯基战胜土耳其人的情况，见后边码第569页。

[\[3\]](#)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边码第566—567页。

[\[4\]](#) 见后边码第568—569页。

[\[5\]](#) 见前第十一章，边码第508—510页。

[\[6\]](#) 见前第十一章，边码第516页。

第二十五章 俄国：欧化的开端

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年仅16岁的阿列克塞·米海伊洛维奇是在太平无事的情况下即位的。在国内，王朝的地位业已稳固。在对外关系方面，俄国在阿列克塞统治时期（1645—1676年）的初年保持了由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花费十分高昂的代价买来的和平：1617年莫斯科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让与瑞典；1634年它又把斯摩棱斯克和通往第涅伯河流域的要冲诺夫哥罗德—塞夫斯克两地区割让给了波兰。^[1]而同鞑靼人的宗主奥斯曼帝国的和平则是通过放弃亚速夫（1642年）才获得的。莫斯科尽管努力利用顿河哥萨克作为抵御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屏障，却始终不愿在君士但丁堡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以避免自己的南部边疆遭到严重的侵袭。除了顿河哥萨克居住地区外，俄国的欧洲边界基本上同伊凡四世去世时（1584年）相同。

另外，在西伯利亚，受俄国统治的地区则大大地扩展了：1645年波亚尔科夫到达了黑龙江；1648年在太平洋之滨建立了鄂霍次克，而杰日尼奥夫则进行了环绕亚洲东北角的航行。几个设防的据点足以使俄国保持对人口稀少的游牧居民的统治。在偏僻地区，莫斯科的实际权威当然是微弱的，但这种业已存在的政治机构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中的；从1637年起，西伯利亚就由一个设在莫斯科的专门机构治理。俄国的殖民者并不享有政治上和司法上的自主权，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殖民地位。西伯利亚是被当作一个帝国行省加以对待的，而其政治结构则是逐渐演变而成的。

对西伯利亚的扩张，并没有像西欧所进行的海外殖民扩张那样起到拓宽俄罗斯视野的作用：俄国的殖民者并没有完全脱离他们的祖国，他们也不是面对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再者，他们没有遇到高度发达的文化，而高度发达的文化之力量以及其迥异的性质也许可以刺激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省。从一开始，这个国家的幅员和一致性就通过减缓集中与强化的进程而对俄罗斯历史施加了致命的影响。对西伯利亚的并吞使空间的作用更加提高，因为开放的边疆防止了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紧张关系变得过于尖锐：这一现象只有到了苏联统

治时期才为现代技术所终止。经济上，除了捕猎毛皮动物以及同亚洲国家（1653年后包括中国）的一些转运贸易外，西伯利亚无足轻重。政治上，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伯利亚可以说一直是俄国的后院：是流放者和逃亡者的去处，它同俄国的欧洲外交政策毫无关系。

阿列克塞的第一个外交任务就是解决因丹麦的厄尔代马尔亲王和沙皇御妹伊林娜拟议中的联姻而发生的同丹麦的争执，这一联姻由于信奉新教的亲王拒绝改宗正教而告吹。这就使丹麦同俄国结盟以抗瑞典的希望破灭。波兰抱着与丹麦相同的愿望，因为波兰在东欧的霸权已为瑞典所摧毁。但急于避免与其可怕的邻国发生战争的俄国，再一次置身事外。而在1646年，波兰人也因土耳其人袭击波兰南部而拒绝俄国提出的联合鞑靼人的建议。然而，正是这种来自瑞典和土耳其的威胁给莫斯科和波兰之间带来了和睦，也正因如此，波兰的使节才能在1646年谈及两国的共同之处：两国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斯拉夫血液和相同的斯拉夫语言”——这是俄彼关系上最早诉诸泛斯拉夫主义情绪的场合之一。莫斯科内部的虚弱使它必须采取一项防御政策，而随着乌克兰政治的发展，这一政策也必将被抛弃。

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一直在波兰国家的框架内为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斗争。从1620年君士但丁堡大主教在基辅重新设立了一个东正教主教区（他还在其他地区重建了一些主教区）时起，乌克兰人的斗争就日渐变为东正教反对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2]的斗争。直到17世纪40年代后期，波兰国家才成功地镇压了哥萨克反叛并剥夺了他们享有的自由。但在1648年，哥萨克人联合举行了一场大起义，起义由来自奇吉林的贵族、身任哥萨克军队文书的彼格丹·赫梅尔尼茨基率领。在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地主和官吏的血腥起义的帮助下，哥萨克军队起先是取得胜利的。1649年的扎博洛夫（利沃夫附近）和约导致波兰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注册”的哥萨克人数从0.6万人增至4万人；波兰所有的军队从“小俄罗斯”撤退；从布拉斯拉夫、卡夫和切尔尼奇夫省的东正教“什拉赫塔”（上层人士）选举官员；取消宗教合并，驱逐耶稣会会士和犹太人；接纳基辅大主教为参议院议员。但是，由于波兰方面的教会以及未注册的哥萨克人之反对，这个条约没有履行。从1650年起，战争的形势转而不利于哥萨克：1653年，斯万尼克附近（乔丁附近）对波兰军队的合围为他们不可靠的鞑靼盟友所破坏，而后者显然是不希望哥萨克变得强大的。

在这种持续恶化的形势下，赫梅尔尼茨基加强了自己同莫斯科的联系。从1649年起，哥萨克就忙于进行谈判，希望能从沙皇那儿获得有效的支持。但是，就像对待在亚速夫危机中的顿河哥萨克一样，莫斯科的反应极其谨慎，只局限于有时发送些补给品。负责对外政策的A. L. 奥尔丁—纳施金视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为俄国的主要目标，因此，他极力避免同波兰的关系发生破裂。然而，哥萨克人所遭受的失败增加了他们不是服属于波兰就是服属于土耳其的可能性，这样就会使莫斯科的南部边境洞开。于是，在1653年，全俄缙绅会议决定，为了维护东正教信条，沙皇应该置哥萨克于“他那强大的君主手中”。1654年1月，一个正式的哥萨克大会（拉达）通过了赫梅尔尼茨基同莫斯科联合的建议，“我们将就此合而为一，直到永远”。1月8日，他们郑重宣誓效忠。具体事宜则于3月在莫斯科商定：哥萨克准备选举他们的首领和其他领导；注册的哥萨克人数增至6万；现有的财产和司法权得到确认，正如他们已获得的市政自治等城市权利一样；波兰国王和权贵们的地产以及天主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分给哥萨克的贵族或赠给东正教会；农民的地位得到改善。

1654年的协议并非联盟：哥萨克人寻求沙皇的保护，而沙皇则雇用他们；沙皇向哥萨克保证，他“将友待他们，保护他们，庇护他们免受敌人侵犯”。哥萨克向莫斯科使节要求“沙皇不应让他们的首领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和整个扎波罗哥（Zaporog）集团听由波兰国王摆布，而应支持他们，不破坏他们的自由。任何人，无论迄今为止是贵族，或是哥萨克人，或是市民，或是拥有地位和财产的什么人，一切都应如从前一样。贵君主可屈尊下令，根据他们的财产赐予他们头衔契约”。哥萨克人列出了他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一个集体应享有的权利；他们没有要求制定新法律，也没有考虑成立哥萨克国家。沙皇的使节应邀发誓保留上述种种权利。当沙皇使节拒绝时，哥萨克提醒他们说，“波兰的国王总是对他们的臣民发誓的”，莫斯科的显贵则解释道：“从来没有人要求过君主应对他们的臣民发誓。至于波兰国王过去常常对他们的臣民发誓一事，用来作这先例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波兰国王是异教徒，而且他们也不是专制君主。”这样，莫斯科就明确地拒绝了建立任何条约关系，也即任何平等的伙伴关系。协议只保证了在波兰统治时业已存在的特殊权利，而这种保证是以沙皇支持某些个人和某些社会团体的形式做出的一种恩赐。

哥萨克并不是简单地作为臣民并入俄国的，因为他们的首领获准与其他国家互换公使——虽然他们不能同最重要的国家土耳其和波兰互换，并且所有这些互换都必须向莫斯科报告。这样即使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哥萨克也未拥有真正的主权，人们充其量只能把哥萨克看作在他们的军事性自治权利被确认后并入了俄国。事实上，哥萨克人继续享有广泛的、“实际存在的”自治，因为中央政府只能逐渐地在乌克兰行使自己的权威。

莫斯科首先必须保卫基辅及重新获得的领土免遭波兰侵袭。战争于1654年5月开始。俄国军队攻占了戈麦尔（Gomel）、莫吉列拉夫（Mogilev）和波洛茨克（Polotsk）；9月，斯摩棱斯克投降，11月，维切布斯克（Vitebsk）被攻克。1655年胜利继续接连不断。明斯克和立陶宛首府维尔诺（Wilno）于是年7月被攻克。此时，哥萨克人也已占领了奥斯特罗哥（Ostróy）、罗夫诺（Równo）、图罗夫（Turów）和平斯克（Pinsk），并已抵达了利沃夫（Lwów）城外。波兰还遭到关注俄国在立陶宛扩张的瑞典的进攻。瑞典军队占领了此前俄国人已扎下营寨的德温斯克（Dvinsk），在起初执行了一种相同的政策之后，瑞典和俄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入侵波兰王国的瑞典人强迫波兹南、卡利什和华沙承认了他们的主权。波兰国王离开了他的国家，波兰的势力看上去已被摧毁了。在1656年夏季，俄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继同丹麦缔结了一项反对瑞典的进攻性同盟及同勃兰登堡缔结了一项防御条约之后，俄国开始同波兰进行和谈。虽然这些谈判因为俄国的要价[俄国要求波兰割让立陶宛，并在扬·卡西米尔（John Casimir）去世后接受沙皇为波兰国王]而失败，但它们却在10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所有没解决的问题都暂时搁置了起来，而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则达成了协议。俄军主力从瑞典人手里夺取了德温斯克，随后又占领了多尔帕特（Dorpat），但对里加的围攻（8月到10月）却失败了，因为这座城镇从海上获得了给养。在此期间，波兰赢得了复原的时间：波兰人全体动员了起来，国王得以回国。在1657年至1658年的冬季，波兰和俄国重开了和谈，但没有结果。

在乌克兰，赫梅尔尼茨基的去世（1657年7月）给乌克兰带来了俄国极为不利的混乱局面：在新首领伊万·维戈夫斯基的领导下，哥萨克人倒向了波兰。根据哈吉兹条约（1658年9月），波兰承诺将把卢布林的波兰—立陶宛联盟（1569年）扩大到乌克兰：布拉茨拉夫、基

辅和切尔尼哥夫的诸伯爵领地将作为“俄罗斯大公国”并入波兰；注册的哥萨克人数仍保持在6万人；首领从哥萨克人提名的候选人中挑选产生；哥萨克人代表将在波兰参议院中占有席位；他们将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自己的货币；东正教将享有同其他基督教教派相同的权利。1658年11月，在这一危险的事态逆转的影响下，莫斯科同瑞典签订了一项为期3年的停火协议。尽管哈吉兹条约的款项对哥萨克有利，但哥萨克的普通民众仍忠于俄国；1659年10月，他们推选赫梅尔尼茨基的儿子尤里（一个亲莫斯科分子）为他们的首领。同波兰截然相反的是，莫斯科强加给了哥萨克人一些比1654年条款更加苛刻的条件：哥萨克人首领的任免要得到沙皇的同意；其外交权利被取消；他只有在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后才能处决哥萨克人的头目，哥萨克人被授权直接向沙皇提出申诉；当首领任命他人担任哥萨克行政机构的高级职务时，必须征求普通士兵的意见；沙皇的代理将派驻哥萨克领土内的主要城镇；从此以后沙皇可无所限制地雇用哥萨克军队服役。

然而，即使是尤里·赫梅尔尼茨基担任首领也没有使莫斯科牢牢地控制住乌克兰。每当波兰在奥利瓦和约（1660年）之后集中其所有兵力对抗俄国时，尤里·赫梅尔尼茨基首鼠两端的态度就越发危险了。这便促使莫斯科同瑞典缔结了卡底斯和约（1661年6月）。在该和约中，莫斯科承认先前的俄瑞边界，而瑞典则承诺不再介入俄波战争。虽然俄国现在免除了来自北方进攻的危险，但它仍无法保持住它在波兰的地位。波兰军队压过第聂伯河推进诺夫哥罗德—塞夫斯克。在乌克兰相互竞争的哥萨克人首领之间爆发了争斗。他们中最能干的彼得·多罗森科在1666年10月决定让他自己和他的部属归顺克里米亚汗。在这种形势下，俄波于1666年夏恢复了和谈，并在1667年1月于安德鲁索沃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该协议将持续13年半，在此期间双方将筹备实现一种“永久的和平”；俄国保留斯摩棱斯克；波兰承认莫斯科对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拥有主权，而西乌克兰和白俄国则仍属波兰；基辅和第聂伯河右岸的一些领土割让给俄国两年时间；扎波罗哥的哥萨克人将由波兰和俄国共同管理。

哥萨克人为了在一个强大邻国的保护下巩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体制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以他们内部的分裂而告终了。哥萨克人没能把位于俄罗斯国、波兰和鞑靼人克里米亚之间的边界地区统一成一个国家。除去这一地区性影响外，这场战争还对东欧的总体局

势产生了影响。瑞典保住了它的大国地位，而波兰则丧失了大国地位。波兰国家被它那过时的内部制度拖垮了，这就造成了刺激其邻国欲望的真空。那种灾难性的事态只是由于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冲突才得以避免。俄国已经显示出它无力进行两翼作战：它既无法巩固它在波兰的地位，也无法突入波罗的海，但是俄国的进攻毕竟使它获得了第聂伯河沿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沿领土，以及古老的俄国首府基辅！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俄国人没有撤离基辅，波兰无法实现它的权利，因为即使是在扬·索比斯基卓越的军事领导下，波兰也不能战胜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的向前推进也同样威胁着俄国，尤其是在阿列克塞的继承人费奥多尔·阿列克谢那维奇统治时期（1676—1682年）。1676年以后，在哥萨克士兵的压力下，多罗森科停止抵抗莫斯科，其结果是西乌克兰仍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土耳其人则在两次成功的战役（1677—1678年）中坚持他们对乌克兰的要求。在这两次战役中，土耳其军队抵达了奇吉林。1681年俄国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对第聂伯河以西乌克兰的权利，但基辅不在其内。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没有使波兰从莫斯科获得任何援助，1683年的维也纳大捷^[3]也没有减轻波兰的压力。索比斯基计划同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和罗马教廷结成反土同盟，以便使波兰重新获得它先前作为基督教世界前沿堡垒的强盛地位，但这一计划如要成功就必须把俄国包括在内。索比斯基很不情愿地决定通过把安德鲁索沃停战转化为“永久的和平”来获得俄国对这一同盟的支持。1686年4月，波兰最终放弃了基辅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并同意给予它的东正教臣民以宗教自由。作为赔偿，俄国付给波兰146万金卢布，同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以抗击土耳其人。只有到了在女沙皇索菲娅摄政时期（1682—1689年）缔结的这一条约，阿列克塞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才得到了确保。

力量和领土的获得进而开阔了莫斯科的政治眼界。1645年，阿列克塞只把他的登基一事通知了邻国波兰和瑞典以及俄国的老商业伙伴英国、荷兰和丹麦。1673年，考虑到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莫斯科第一次提出了欧洲联合的观点。由于俄国对西方诸国宫廷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一动议失败了，然而，这却显示出俄国正在怎样地扩大它的外交接触：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国家，现在俄国已注意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萨克森、威尼斯、罗马教廷、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然而，在欧洲事务上，俄国仍宁愿做一个被动的而不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瑞典、丹麦、波兰和荷兰分别从1631年、1672年、1673年和1677

年开始在俄国都设立了常驻代表，而俄国只在波兰派驻了代表（从1673年开始）。不管俄国同其北欧商业伙伴间的贸易有多么重要，但总体来说，俄国仍然处于欧洲政治体系以及它不断变化的同盟结构之外，这一部分是因为距离所致，另一部分是因为俄国的宗教信仰在西方被认为是异教，它的政府形式被认为是专制政体。17世纪更加频繁的西方旅行者对这个国家的描述几乎没有改变这一观念，直到在一个比较理性的时代，当宗教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情形才有所改变。俄国对西方政治局势的了解则更为朦胧。第一位系统收集有关外国资料并扩大同外国联系的人是奥尔丁—纳施金。他于1667—1671年担任大使部（Posol'skiy prikaz）的首脑，奥尔丁—纳施金认为从国外借鉴一些东西很有便利，这样可以避免传统偏见，并寻求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处理同波兰的关系——这一政策的最终目标仍是实现斯拉夫人的统一。

俄国对外政策的性质受其内部衰弱的制约。这个国家还没有从动乱时期（1605—1613年）恢复过来，因此，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必然是防御性的。在国内，自16世纪以来，专制制度就一直在沿用：这个政策是使行政管理集权化，逐步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造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使政府能够控制它们，并使它们为政府效劳。外国的入侵已经证明了有必要成立一支有效的军队以保护俄国扩展的边界。16世纪初的那些动乱还表明了它的邻国的军事优势，证明了俄国有必要按照欧洲的模式使部队现代化，其方法是聘用外国教官和外国雇佣兵，并进口和生产装备及补给等。1632—1680年，俄国现役战斗兵力从3.46万增长到12.93万（1680年的总兵力达17万—19万人）。

俄军中最具贵族性质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已在这些年里由占总兵力的34%减少到了8%——是由宫廷、首都（莫斯科）、外省贵族和鞑靼贵族通过传统招募手段提供的兵员。贵族根据完全的或有条件的占有权拥有地产，并有义务在继承财产后服兵役。戍守部队、弓箭手、炮兵和哥萨克要塞守卫等兵役也是强制性的。这些服役者居住在城镇的特殊地区，靠农业和手工艺为生，享受税款特权。除他们之外，接下来的便是所谓的“datochnye lyudi”，即教会管辖区、宫廷和政府领地派给的士兵。像贵族服役者一样，由这些地方提供的服役者人数最初是由土地的面积所决定的，但后来（最终是从1679年开始）则因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而改为根据家宅的数目而

定。特种服役者包括那些外国雇佣军、由外国军官指挥同时也作为模范部队的俄国士兵以及进行边防警戒的哥萨克人。俄国正朝着创建一支常备军的方向发展：职业军官团体的引进，屯田以及加强军事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步骤。管理服役义务和地产分配的官署属最古老的朝廷官衙。在17世纪中，又增设了其他一些机构来处理各种特殊的军事单位和军事设备。

法制制度在15世纪末的迅速兴起要归功于俄国内部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的社会等级。在服役贵族和官僚的支持下，16世纪中叶俄国就已经在尝试把国家的义务强加给社会。这种基本的发展趋势在17世纪促使了由中央控制的一些服役阶层的产生。每个这样的阶层都有其对国家的特殊义务，但却没有相应的行使政治影响的权利。这种在政府命令下产生的独特的社会团体截然不同于西欧式的自治社会等级。西欧的等级建立在出生、特权和法定的传统之上，并清楚地知道他们古老的政治权利和特殊的地方身份。俄国政府坚持明确划分为它服务的社会等级，这种划分不是考虑到他们的法定地位，而是根据每一等级都应执行它所派给的任务：贵族必须在军队和行政机关服役，农民必须通过提供劳役和缴纳税款使贵族完成他们的服役，而市民则首先必须提供税收。这一制度存在的危险是有些个人可能会通过变成非自由人或依附于其他人而逃避为政府服役的责任。为了避免为国家服役人员的减少，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活动加强个人自由。

在17世纪初的那段动乱期间，一些新的家庭涌进服务贵族阶层，使旧式的官僚任职措施得以刷新。在旧的模式中，一个贵族在被派往一个政府岗位之际，会把这一任命同他的上级、他自己和他的祖先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进行比较，如果他认为这一职务低于他的地位所应拥有的职务，那他可以拒绝上任。在16世纪，这种习惯已经证明了它的危害，在部队作战期间填补军队的指挥职位时尤其如此，但是在贵族阶层里的不断争执却帮助专制政府巩固了它的权力。在17世纪，专制政府得以运用它那无人争夺的权力努力反对旧式官僚任命机制的有害方面：在作战期间，旧式机制愈来愈频繁地被搁置起来，到1682年1月，一项法令使它最终被取消了。全权占有的财产与有条件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因为任何一个财产所有者都必须服役，而且其产业也能继承。除了教堂和寺院外，只有服役的贵族被允许拥有土地和农民。1649年，教会被禁止扩大它的地产。1642年，贫困的贵族就

已经被禁止成为比较富裕的贵族的侍从。1649年，政府还禁止实行“抵押自己”（即同意为债权人工作直到还完贷款），因为这种行为常常会使抵押者及其后代长期处于农奴地位。

为了在经济上使贵族阶层服役成为可能，他们的农民被拴在土地上。没有劳力，土地就一文不值。被大量的税收榨得一贫如洗的自由民试图逃避征税，他们或是逃往边境地区，或是定居到某个能付清他的欠款，并为他提供一个较好环境的地主家庄园，或是通过契约让自己及其家庭为某个主人服务，直到后者去世。后一种做法经常会使他的服务变成世袭，这样，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导致区别日益模糊的另一种原因是地主面对劳力不断缺乏的局势，把非自由人的奴仆作为农民安置到田地里。早在1592年，政府就试图阻止农民逃跑，或阻止他们被地主买下。其方法是确定一个法定限期，在此限期内，农民必须回到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这一在大动乱后重新制定的时限在1649年被取消。从那以后，任何一个地主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保证逃跑的农民返回。这样，农民就被束缚在了他们的主人身上。17世纪20年代调查登记的修订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这次修订确定了农村和城镇的税额：它很自然地就从社区利益的角度阻止纳税人员的离开。所有这些情形一并致使俄国的农民在17世纪中叶时转化成了农奴。政府只试图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却没有把他们降到农奴的地位。故而，从此时起一直到19世纪，国家都克制着不干涉主人和他的附属之间的个人关系，虽然国家本身那套旨在造就一个服役贵族阶层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农奴制的发展负有责任。

城镇居民也同样被转化成了服役阶层。俄国的城镇既小又穷，不拥有西欧城镇所享有的豁免权和特权。它们同村庄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城镇里，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黑地”，即要纳税的地，如果这些地是属于城镇外的某个显贵或寺院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所谓“白地”。城里的一些房屋由于主人成为城外某领主的非自由附庸也就变成“白”的了，但房屋主人却仍继续从事手工业或贸易活动，不向城镇缴纳任何税款，甚至还通过竞争损害城市的经济。同样，居住在城镇近郊的手工业匠人也参与城镇的经济生活，却不用承担该城镇的任何财政义务。在前一个沙皇统治期间，政府就已经在尝试改善这一状况。1649年，政府颁布法令，只有纳税人才住城里并进行贸易；纳税人被禁止离开城镇，不缴纳税款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充入城镇税

库。在俄国，把城镇同农村分离开来并建造城市的不是强大的市民阶层，而是国家——但是国家没有给予它们那种中世纪西欧典型的市政自由权利。在城市人口中，最高一级的部分是“富商”（gosti）。在17世纪中叶，每个城市约有30个富商。他们与其说是私人企业家，还不如说是国家的职能机制。他们处于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代表沙皇管理关税、铁制品贸易、酒类专利品以及西伯利亚黑貂皮买卖的税收。他们享有财政特权，但必须以他们自己的财产来担保任何亏损。在“富商”以及他们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之下是不太富裕的商人社团成员（gostinnaya、sukhonnaya sotnya）。他们也必须为财政部履行职能。这样，只有国家和少数“富商”才能掌握任何大额资本。

由于缺乏社会需求以及占优势的自然经济结构，国内市场总的来说局限在地区范围内且不怎么有利可图。对外贸易可望获得较好的回报，但它主要控制在外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丹麦人）或沙皇的代理人手中。俄罗斯进口各类产品，尤其是金属制品、武器、布料和奢侈品，并出口原材料，如木材、沥青、大麻、亚麻、钾碱、毛皮和兽皮。第一家铁制品和大炮铸造厂以及第一口矿井都是由外国企业家创办的。俄国政府鼓励外商的经营，因为他们的经营能增加俄国国库收入，且能起榜样示范的作用。另外政府还不断寻求从国外招聘技术人员。从17世纪20年代起，俄国的商人就不停地抱怨外国人的竞争，这些外国人组织得更好，并拥有更多的资本。政府对此的反应是采取重商主义措施。1649年，英国人再次被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其中有些特权可追溯到16世纪，他们再一次失去了同亚洲进行过境贸易的权利。1654年的商业法令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国内关税，并保护商人免受地方官员的干扰。1667年的一项“新商业法令”把外国人的贸易限制在一定的边界地点，并对他们征收更高的用外汇支付的关税才允许他们进行国内或过境贸易。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贸易（他们一直钻空子做着这种买卖）的长期禁令现在又通过没收商品等惩罚得到了重申，外国商人之间的免税贸易也被禁止了。

俄罗斯社会中唯一真正的阶层是教士。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法律限定的实体，并在主教管区内拥有自己的代表席位。但是他们也必须为他们世俗的财产纳税，并从中提资供养士兵，他们从属于国家的管辖机制。

俄国的行政体制大致可以被看作中央集权式的，因为决策的最后责任掌握在位于莫斯科的沙皇和最高当局手中，但就这个体制的运作而言，它便很难说是中央集权了。在17世纪，最高当局规模大增并日益分化，但它们并不依据任何理论性计划加以系统化，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官署间也不存在任何明确限定的权力等级或权限分配。假设某个部的事务主要由某个专职的大员掌管，但是沙皇常常会委任一个大员同时掌管几个部的事务，权限的区分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有些部处理某个特定的事务，而另一些部则处理某个特定的地区。一个部常常会关注一些相互间毫无关系的事务，或是一些只在过去有过联系的事务；另外，同一件事务会有几个机构来插手。例如，在17世纪80年代，至少有18个部插手军事事务。几乎所有较重要的部都有自己单独的财政机构，并对它们自己的人员行使司法权。除了负责对外事务、军事和财政事务及司法管理等常设机构外，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或临时的机构，如在战时征集钱粮的机构等。阿列克塞统治时期大约有40个部，但该数目时有变更，因为一些官署会根据需要新建、合并或解散。

1637年为喀山而设立的东西伯利亚事务署在1661—1663年临时合并到总税收署。同样，有关小俄罗斯的事务在1649年后先由大使部处理，只有到了1663年才设立了一个单独的部。1649年，总司法部下属负责教会事务的部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寺院部。这样，除了主教对他自己直辖区的司法权外，教会逐渐积累起来的所有司法特权都被取消了。寺院部最初由教士和俗人共管，但很快它就全由俗人掌管了该部监督教会的财政以及在非宗教事务上的司法权。教会对这种控制不满，1677年终于达到了使该控制中止的目的。在有关军事事务的诸部门分别管辖弓箭手哥萨克人、炮兵和外国服役者的各部门中，1651年增加了一个骑兵署。裁决莫斯科、梁赞、弗拉基米尔和德米特罗夫地区案件的各司法部门于1685年并入了莫斯科司法部。在新建部门中，有成立于1667年、负责财政监督的审计署（Prikaz Schetnykh），以及最高管理机构枢密院。枢密院不仅仅是沙皇的私人办事机构，处理他的个人事务（如通信、狩猎等）并只对他负责；它还负责对行政机关实施控制和监视，这是任何专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枢密院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在“大动乱”时期，个别地区所遭受的隔绝和威胁局势导致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地方军事长官（Voivod）的手中。在17世纪，由军事长官实施行政管理的情况变得很普遍。军事长官一般是服役贵族的成员。他坐镇一个地区的首府地，对该地区行使权力，该地区是中央政府通过特殊指令分派给他，由他负责所有当地行政事宜的。他的短暂任期（从1年到3年）以及从中央政府拿薪俸的事实使他有别于他的前任，即16世纪的“副将”（namestnik），他们是由当地出资供养的——当然即使是在17世纪也还不断有关于军事长官强索“礼物”的抱怨。政府偶尔会注意到这类不满，但却没有对军事长官实施加以控制的持久措施。到17世纪中叶，俄国有250多个地区。大多数军事长官会同一位负责当前事务的文员（d'yak）坐镇官衙管理他们的辖区。在一些较大的地区，会有2—4个军事长官，其中的一个地位要高出其同僚，另外，还有几个文员：政府希望以此来造成相互监督，而这自然不利于友好的合作。

军事长官的统治附加在自16世纪下半叶起就已存在的地方自治政府之上。军事长官被授予对由农民和市民选举出的代表行使权力，这些代表（gubnyestarostry和tseloval'niki）履行着治安和处罚职能，以及总的行政管理职权。原则上来说，军事长官作为中央权力的代理人把地方自治机构转变成了从属的执行机构。这样，地方自治虽仍然存在，却实际上成了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由于自16世纪以来自治已经变得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对国家的一项义务，情形就越发如此了。因此，政府甚至能够暂时不需要军事长官。它在16世纪60年代也确实一度废置了军事长官制度，并在70年代恢复了自治政府体制。

大行政区（razryady）的建立即反映了这种使地方政府体制尽可能标准化，并尽可能使之同中央紧密挂钩的总体趋向。这个进程发端于边界地区。在那儿，军事职能和一般的民政职能之协调尤为重要。16世纪起就已经存在的图拉行政区随着边界的向南推进于1663年改造为别尔哥罗德行政区。行政区很早就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起来，而与波兰和瑞典的战争则促使在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和塞夫斯克（1654年、1655年和1665年）建立了这种机制。在17世纪晚些时候，它们又被引进国家的中心地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塔波夫、梁赞和喀山）。这就划定了一种行政等级体系的轮廓，因为地方军事长官受命

从属于行政区的军事长官（或从属于首要军事长官），但是这一体系仍然缺乏一致性：军事长官要对不同的中央部门负责；行政区也还没有覆盖整个国家；许多军事长官仍直接同中央联络。既加强地方政府，同时又保持中央控制的问题直到最近仍是拥有广阔领土的俄国的一个关键难题。

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靠薪俸供养的行政机构，一支现代化的常备军以及长时间的战争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所不能承受的。核定税额的依据是17世纪20年代重新确定的“苏克哈”（sokha）。它是一种把土地拥有面积或（在城镇的）家宅大小考虑在内的计量单位；税额时有变更，或是根据土地的质量或贸易的状态，或是根据服役的等级。1646年和1678年，全体男性人口都进行了登记——这标志了有别于土地拥有权的人力之重要性。从1679年起，税收不再向可耕地征收，而是向每一户家宅征收。政府提高了税额，采用了间接征税法，颁布了税收法规并动用了军队，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民众的不满。1646年，盐税增加了4倍，可是税收的下降却显示出这已大大超出了民众承受税款的能力。

不出所料，对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对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之专横作风的不满情绪在城镇中激增。1648年6月，莫斯科发生了持续几天的骚乱，在骚乱中，弓箭手加入市民行列中。几个高级官员丢了性命，曾拥有绝对政治影响的权臣、沙皇的姐夫并私人教师V. I. 莫罗佐夫也不得不暂时辞职。反对过重税收及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行径的类似暴乱在许多其他城镇也屡有发生。这些暴乱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而且动乱也都保持在地区范围内，但是1650年2月的波斯科夫起义则体现出对政府的政治威胁。波斯科夫的居民同诺夫哥罗德联系起来，并动员了周围的农村支持他们，他们经受住政府军队的围攻达三个月之久；他们的要求是更大的地方自治。

在波兰战争开始时，政府降低银币成色，并根据强制交换比率铸造铜币，从而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危机。使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官员们不去阻止私铸铜币。铜卢布的价值下跌，尤其是由于政府和外国商人要求用银子支付。在1660年，1个银卢布价值2个铜卢布，而在1663年，则相当于15个铜卢布。1662年7月，传单遍布整个莫斯科，随后便爆发了动乱。公众的愤怒指向皇位周围的最高官员，甚至威胁到沙皇本人。镇压动乱时的暴行表明了政府的无能，也破坏了它的声誉。

民众试图用他们通常的方式来逃避中央政权的压力。他们逃往边界地区，尤其是顿河流域。先前脱离枷锁获得自由的顿河哥萨克正受到土耳其人的围困，土耳其人在亚速夫事件后封锁了顿河河口，于是哥萨克人侵袭了莫斯科公国境内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668年，哥萨克首领斯杰潘·拉辛发动了一场惊人的劫掠运动，深入里海附近的波斯境内。1670年他转而反对莫斯科。在4月，他率领7000人攻取了察里津，6月攻取了城防坚固的城市阿斯特拉罕，7月攻占了萨拉托夫和撒马拉。一些部队投向了拉辛。9月拉辛的攻势在辛比尔斯克前停顿了下来，尽管他的一些分遣队抵达了大诺夫哥罗德地区。随着10月政府军解除了辛比尔斯克之围，拉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1671年4月，他被顿河哥萨克人抓获并被移交到莫斯科，6月被处死。叛乱所表现出的对政府的极大威胁在于拉辛的出现激起了从南部顿涅茨到北部加利奇（沃洛格达附近）的整个俄国欧洲部分东部的类似叛乱。哥萨克人、逃亡的农民、无薪的外国雇佣军、贫穷的贵族，甚至乡村教士和外国流浪者都成群结队地投向拉辛，而当地爆发的起义则是针对可憎的地主和官员。政府不断施加的空前压力触发了一场反抗各种国家权威的斗争。拉辛在他的呼吁中号召人民为了“好沙皇”而同“卖国的”权贵、军事长官及政府官员做斗争。拉辛的政治方案只限于引进原始的哥萨克管理体制，它不包含任何超越现政府原则的东西。这场孤注一掷的起义是与无助的苦难境地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它却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而且同专制制度相比，它也是倒退的。

政府试图通过把法律条文，尤其是司法程序编集成典来限制行政机制的滥用职权。在1648年6月的莫斯科起义之后，一个政府委员会开始编制一部法典。该法典在9月被提交给了一个咨议会，并于1649年1月定稿。委员会的草案和各个不同集团的建议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部首次印刷成册（共印制了2000份）的法典（ulozheniye）马上生效了。法典的25个章节包含了967个条款。它不是根据系统的法律原理起草的，而是汇集了一些精选的司法惯例加上一些因政治权宜而做的革新。自1550年最后一部法典颁布以来，历任沙皇都颁布了大量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ukazy），但只有收藏这些法令的相关部门才知道它们。这些沙皇法令、1550年法典、从拜占庭法那里吸取的主要原则、立陶宛法令以及一大堆包含西方因素的古俄罗斯法律，构成了这部涉及政治和社会秩序及司法程序的新法典的基础。前文已提及了这部新法典的一些最重要条款：服役阶层的区分、取消农民离开和抵押自己

的权利以及建立“寺院部”等。除此之外，该法典的重要性在于其中一些旨在保证公正执法的详细条文。第287项条文即专为此立，此外它还给现存的法律带来了一致性，并使现存法律更加广为人知。它不包含法律概念的定义，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俄罗斯缺乏罗马法传统以及依据这一传统训练出来的律师阶层之现实决定性地阻碍了在立法和行政领域里的法律进展。

尤其是法典里没有关于专制制度本身的定义。“大动乱时期”之后，统治者的传统概念被恢复：他是所有司法、行政和政治决定的制定者，是国家的主人、教会的保护者；他的权力既不受法律也不受拥有自身特权的等级议会之存在的限制。如同在16世纪一样，专制君主依然是国家的化身；然而，现在专制制度却拥有了更明确的制度特征，它使统治者个人的个性更加独立。“大动乱”期间俄罗斯的分裂使沙皇专制权力的传统观念深化为一种希望强有力的国家凌驾于敌对派别之上的愿望，专制制度的巩固使俄国有了一个坚实的中央权威，但在这个权威中，所有的政治主动权都来自国家。沙皇继续在一个咨询和执行机关——显贵委员会（杜马，Duma）的协助下主持政府工作。1668年该委员会有68名全由沙皇任命的终生任职成员。其中，只有26名来自古老的显贵家族；大多数委员则是“新人”，其中有些甚至还不属于服役贵族。在杜马内，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为国家服务逐渐取代了传统和出身成为晋升的标准。

在俄罗斯内部发展中的“复辟主义”专制倾向之特征是“全俄缙绅会议”（zemskysobor）的衰落。在米哈伊尔统治时期，缙绅会议曾相对频繁地召集，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代表俄国社会的政治机制。但在阿列克塞统治时期，它只是偶尔被召集：1648年至1649年讨论“法典”之时、1650年决定采取反对波斯科夫的措施时、1651年和1653年讨论对波兰和乌克兰的政策之时。应沙皇请求所召集的该会议由沙皇、显贵委员会、东正教会以及中小贵族和城镇选举出的代表组成。关于会议的组成或活动没有固定的条规。与会者的人数时有变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1648年，选举产生的代表达290人；农民没有代表权，外省城镇在1650年也没有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讨论有时是共同进行，有时（如1648—1649年的会议）则分成选举产生的成员与“当然”（*ex officio*）成员两部分隔开进行。代表们很显然并没有从他们的选举人那儿带来任何指示，他们的作用是咨询性的，但偶尔

也能表现出某种立法团体的特性，如在制定“法典”和决定吞并乌克兰时那样。决定总是要由沙皇和杜马来做，由于其召集没有定期性，代表选举和会议议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全俄缙绅会议无法经常性地代表各个社会团体的反政府利益，更不要说代表人民的利益了——尤其是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会议的一部分。参与会议讨论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利。1653年后，政府只召集一些具有顾问性质的专家委员会，缙绅会议便日渐衰落了。

在阿列克塞统治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尼康确曾尝试过限制专制制度。尼康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赢得了阿列克塞的青睐扶摇直上，1648年当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4年后，在他47岁时便成为牧首。年轻的易受影响的阿列克塞起初像对待父亲那样尊敬意志坚强、热情似火而又能言善辩的尼康，给了尼康一个类似于菲拉列特在他儿子米哈伊尔统治时所拥有的地位：尼康获得了“大君主”（Velikiy Gosudar）的封号，这通常只有沙皇才能享用；在政府文件上他的名字紧挨着沙皇的名字之后；1654年，当沙皇亲莅波兰战争不在首都时，正是他被授权全面掌管政府工作。由于他那无限的野心，尤其是他想要把牧首职位置于沙皇之上的目标，他招来教士及俗人的一体憎恨。当1658年7月沙皇正式削去尼康的“大君主”封号时，他便退回了莫斯科附近的复活寺。阿列克塞赞成尼康的改革活动，他希望保留他的牧首职位，同时把他的权力限制在纯粹的教会事务内；然而尼康既不承认对他教职的任何世俗性限制，也不辞去牧首一职。这一不明朗的形势从1658年持续到1667年。在此期间，尼康更明确地将他早先关于教权高于俗权、俗权源自教权以及政教分离的观念阐述出来。这就损害了从拜占庭《诺摩法典》（*Nonokanon*）^[4]等继承而来的俄国传统观念，即统治者是教会的保护人，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者。在俄国就像在拜占庭一样，在虔诚与政治领域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不像在西方，现实世界里信仰和行动是相互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法律上，东方教会对教会主宰的领域有多大却没有精确的限定，而西欧在中世纪中则逐渐划定了教会的主宰范围。

因此，尼康被指责为天主教分子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他承认罗马教廷在维护相对于世俗统治者之地位时所取得的成就，并效仿英诺森三世把教会比作太阳，把国家比作月亮，称后者从前者获取光亮。他特别攻击根据“法典”建立“寺院部”一事，该事件的含义是让教

会在非宗教事务上服从于世俗管辖权，并禁止授予教会更多的土地^[5]。早在1660年2月，一个只有俄罗斯高级教士出席的教议会就宣布尼康已失去他的职位，但这一决议没有生效。1666年又举行了一次俄罗斯宗教会议，这次会议为一次全东正教教议会（1666年11—12月）铺平了道路。出席全教议会的有亚力山大和安蒂奥克的牧首、君士但丁堡和耶路撒冷牧首的代表以及塞尔维亚大主教。尼康被郑重地剥夺了他的牧首职位，理由是他无礼地对沙皇及其显贵委员会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未能履行他的职责，并以一种不合教义的方式对待属下的教士。这次教议会同意，沙皇不能改变教会的传统权利和习俗，但教会在所有世俗事务上服从沙皇。这样，俄罗斯教会再次被限制在它传统的精神领域内，而专制君主则确保了他参与决定教会世俗事务的权利。

第二次全东正教教议会（1667年2—6月）确认了尼康的“改革”：这些改革出于受“大动乱”经历刺激的有责任感的教士之愿望，旨在消除宗教仪式中的形式主义，教士的愚昧无知以及在俗人、教士和僧侣中的道德沦丧。此时的局势尤其严重，因为俄罗斯教会正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挑战：在中部地区的挑战者主要是新教，这是俄国同来自北欧的外国人接触的后果，而在西南边陲地区，挑战者则是天主教。这些挑战使东正教徒们产生了疑惑：在俄罗斯教民中有东仪天主教徒，也有分离主义教派教徒，而基辅对君士但丁堡牧首的服从则导致了希腊影响的加强。随着1589年君士但丁堡牧首设立莫斯科主教区，莫斯科的教阶集团再也不能指控希腊教会背叛东正教了。莫斯科作为正统宗教保留地、第三罗马之地位的独特性沦落到只能宣称俄国是唯一主权东正教国家的境地。此时产生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自俄国教会在1448年成为自立教会以来，该教会中业已发展起来的教义和教俗的独特性如何来面对希腊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受传统支配的俄罗斯教会不得不破天荒地运用更坚实的神学基础来阐述并捍卫正统教义以反对其他各派教会。所有改革者都同意需要对宗教和道德持一种更深刻的态度；他们所争论的是如何来实现这一点；是坚持在莫斯科教士传统的框架内实现之，还是通过接纳希腊教会的途径。传统主义者相信可以在旧有的莫斯科信仰内获得一种刷新。亲希腊派则认为必须追溯到他们认为是更古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希腊传统。但传统主义者视希腊模式的任何改变为革新，而亲希腊派则认为维持莫斯科礼拜仪式似乎是一种对全体教会的挑衅行为。这

两个派别都扎根于传统。国家支持向希腊教会传统同化，认为这是保持莫斯科在东正教世界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且对于国家努力提倡的普及俄罗斯教育的目标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阿列克塞周围聚集着一帮亲希腊改革家，他们向外省派遣了一些虔诚信教、严于立身的教士。他们对教士和俗人中普遍存在的风纪懈怠和素质低下状况所持的尖锐批评时常导致了迫害行为。就这些教士的神学素养而言，他们是一些坚持莫斯科传统的单纯之人，因此，他们很快就滑向了莫斯科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亲希腊改革者的对立面。牧首伊奥西夫（1642—1651年）早已有意识地期待接近君士但丁堡，在他的任期内，从当时东正教学术中心基辅调了一些学者到莫斯科来。通过同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丰富文献的论战，乌克兰已具备了宗教和世俗教育的因素，它把这种知识传到莫斯科，促使了一些学院的建立以及诸多教科书、布道集和教义辩护集的编辑，这是乌克兰对17世纪俄国历史的一大贡献。1651年伊奥西夫被迫辞职，因为他反对改革者取消莫斯科礼拜仪式中的多音表述（mnogoglasie）要求。“多音表述”的做法也就是通过同时朗诵不同经文段落来缩短过分冗长的礼拜仪式，虽然伊奥西夫同意在寺院中取消这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但他拒绝在普通教堂里这样做，因为如果全文朗诵的话，礼拜仪式的冗长将会吓跑常去做礼拜的教徒。意味深长的是，改革者寻求东方诸牧首们的支持，伊奥西夫的位置被尼康取代了。

尼康一度是传统主义者，后来是宫廷改革派的成员，此时他接过了亲希腊改革派的领导权。尼康颁布教谕、推行俄国教会同希腊教会同化的专断方法加剧了传统主义者中的对抗；但是，这种顽固的抵抗只能用莫斯科教派虔诚的形式主义特性和它看待仪式的神秘概念才能解释——因为缺乏神学理论便会赋予传统以神圣性。另外，尼康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加深宗教情感，而是如何用希腊仪式来取代莫斯科的仪式，尼康用同样是形式主义的方式对希腊仪式作解释（用3个手指而不是用两个手指来画十字，就像1551年莫斯科议会所规定的那样，改唱两遍“哈利路亚”为3遍，把在大斋期祈祷中的16次屈膝减少为4次，取消了圣饼上的四点形长十字图案，捣毁了用拉丁方式绘制的圣像）。虔诚的教徒大惊失色，不仅是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细微的仪式变化，还因为一些古老的宗教著作（主要是祈祷书）如果同希腊文原著不符便要遭贬斥的事实；1655年引进了一种新的礼拜仪式。尼康的

改革被1666年和1667年的两次关键性教议会批准，其中第二次教议会取消了1551年教议会所做的决定，并将那些坚持旧式莫斯科礼拜的教徒革除了教籍。

教阶集团掀起了一场教会分裂（raskol）。由于仪式的分歧而不是教义的差异，那些后来被称为旧教徒（starovertsy）的人遭到了开除。甚至在尼康被废黜后，他们遭到教会和国家的残酷迫害。一些人并不以为意，接受了加诸其身的惩罚，另一些人逃亡野外或边境，甚至纵火将其祷告场所付之一炬。有关旧教徒的最令人感动的文字纪念是牧师阿瓦库姆的生平，它是俄国文学中的第一部自传，生动地刻画了与自己心灵搏斗的受害者之情感。最为著名的实际抵抗是索罗威茨基修道院的修士们所发动的，他们1668—1676年坚持抗击政府。在许多地方，旧教徒的抗议甚为强烈，赋予社会不满宗教意义。在他们看来，牧首和沙皇好像是反基督派的使者，他们的统治清晰可见地已经开始。末世学的传单广为散布，宣布世界末日的来临。的确，对俄国来说，一个植根于神圣传统的世界将要结束。

这场分裂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冲突。直到17世纪，教会一直是俄国唯一的文化力量，它从拜占庭教会获得了它的纯先验倾向和寺院制度，尽管没有以某种基于古代遗产的世俗文化作为补充。俄国教会一直没有试图在神学的意义上申明其信仰或解释外部世界，既没有创造一种神学也没有设置一种标准来判断现存的历史和政治现实。结果，传统成了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指导原则。随着俄国从孤立中崛起，有必要界定俄国的古老传统和确定它与其他信仰的关系。传统不再是被盲目地和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有关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传统，怎样将它与希腊人的传统相比较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对俄国旧教会的核心即礼拜仪式合理性的怀疑瓦解了传统的僵硬性，即瓦解了旧俄国生活中的保守原则。因此，这场分裂标志着旧俄国的终结。

这一切发生在俄国与西欧的接触愈来愈密切之际，这时的西欧在军事、技术和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俄国与西欧加强接触的基础是对历史的现实予以神学上的承认，并相对而言准备好了去接受它。俄国教会既不准备明智地忍受西方优势的事实，也不打算发展自己相应的力量。因此，政府被迫接受西方的指导者和技师，并很快开始评价建立世俗初等教育的必要性。主要政治人物中受过教育的人相信，西方文化中的成果可以吸取且不会破坏东正教信仰。但是，从17世纪

中期开始，对俄国旧传统的虔信与独立的西方思想之间的不相容可以在下述现象中更为经常地表现出来：个人逃离东正教，甚至亡命国外。然而，大量的群众也抵制得到政府支持的欧洲的影响，拒绝放弃传统的宗教圣殿；在这方面，许多人赞同旧教徒的态度。

教会没有能力将西方提供的价值和方法与本国传统调和起来。在历史演进迫使俄国对自己的与西欧的世俗文化而不仅仅是宗教进行比较时，俄国教会的精神纯洁便暴露出自身的致命弱点。如果要做到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出努力来让俄国在占优势的环境下与西方进行竞争，将不得不依赖西方；另外，如果通过孤立于异教的西方世界来努力维护俄国的传统，由于自身物质的落后，这又有俄国沦为西方扩张的牺牲品之虞。如何做出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选择在俄国社会中缓慢扩大、倾向西方的统治阶级与仍旧忠于其传统的人民大众之间造成了分裂。本章所叙述的这一时期俄国历史之真正核心在于某种宗教不安全感，它源于对传统的挑战和与适应历史发展的西方基督教之首次接触。自我封闭、向后看以及打上教会烙印的旧俄国的生活在来自西方的压力下土崩瓦解：近代俄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俄国与西方持续的交流和压力。

[1] 关于这些事件，见第4卷第19章。

[2] 承认教皇至高无上，但保留希腊的礼拜仪式和惯例（1439年的合并）。

[3] 见上文，第21章边码第516—517页。

[4] 诺摩法典是东方基督教于883年完成的一部教会法规集。——译者注

[5] 见前边码第579、582、585页。

索引

(本索引中数字为原文页码, 印在书中切口一边)

Aachen 亚琛, 帝国直辖市 440

Abaza Hasan Pasha 阿巴札·哈桑帕夏, 小亚细亚的反土耳其叛乱领袖 507—8

Abdulfatah Agung 阿甫杜尔法达·阿根, 爪哇苏丹 423

Absolutism 专制主义

法国的专制主义 5; 另见Louis XIV

在欧洲的扩展 11—12, 97, 122, 379—80

丹麦的专制主义 11, 523—6

瑞典的专制主义 12, 533—6

英国的专制主义 103, 105, 118; 另见Charles II, James II

德意志的专制主义 109—10; 另见Constituent States

普芬道夫阐述的专制主义 113—14

葡萄牙的专制主义 394

另见Divine Right; State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503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皇家科学研究会 45, 49, 68, 468

Acadia, French 法属阿卡迪亚

Accademia del Lincei 林琴科学院 49

Accademia del Cimento 试验科学院 45, 49, 68, 468

Acts of Trade, English 英国《贸易条例》 334, 335; 另见《航海条例》(England条工业与贸易分条内)

Actuarial Science, growth of 保险统计学的成长 179

Addison, Joseph 艾迪生, 约瑟夫, 散文家 399, 410

Adolphus John, duke 阿道夫·约翰公爵, 瑞典国王查理十世的兄弟 526

Afonso VI 阿丰索六世, 葡萄牙国王 129, 395, 396

Aglionby, William 阿格林比, 威廉, 作家

Ágreda, sor Maria de 阿格雷达, 修女玛丽亚·德, 她对西班牙的腓力四世的影响 128, 380

Ahlefeldt, Frederik 阿勒费尔特, 弗雷德里克, 丹麦国务家 538, 540

Aigues-Mortes 艾格莫尔特, 在该地的领事馆 204

Aix-la-Chapelle, Treaty of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213, 214, 463, 465

Albanel, Father 阿尔巴内尔神父, 和法国在赫德森湾的利益相关连的耶稣会教士 360, 363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反土耳其叛乱

Albemarle, Carolina 阿尔伯马尔(卡罗来纳境内) 344, 345, 346

Albemarle, George Monck, duke of 阿尔比马尔公爵, 乔治·蒙克与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恢复 301, 302

封为贵族 306

与处决阿盖尔 308

Alberti, Leon Battista 阿尔贝蒂, 莱翁·巴蒂斯塔, 作家和艺术家 162

Albuquerque, Matias de 阿尔布克尔克，马蒂亚斯·德，葡萄牙陆军将领 394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达朗伯，让·勒朗，数学家和哲学家 95

Aleppo 阿勒颇，在该地的法国领事馆

Alexander VII (Fabio chigi) 亚历山大七世（法比奥·基吉），教皇

平淡无奇的性格 124

遭受路易十四的侮辱 134, 464

建筑艺术的赞助人 150, 158

与修改历法 408

被排除在比利牛斯条约的谈判之外 461, 464

与耶稣会教士之返回威尼斯 463—4

对扬森派教父的态度 464

组织1664年的神圣联盟 490, 511

Alexander VIII (Pietro Ottoboni) 亚历山大八世（彼得罗·奥托波克），教皇 138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在该地的法国领事馆 204, 205

Alexis Michailovich 阿历克谢·米海洛维奇，沙皇

哥萨克对他的效忠 566, 573—4

候选波兰王位 567

即位 571

与俄国—丹麦争端 572

与尼康宗主教 586—7

与俄国教会的改革

Algardi, Alessandro 阿尔加迪, 亚历山德罗, 建筑师和雕塑家
149, 155

Algiers 阿尔及尔 201, 504

Ali Effendi 阿里艾芬迪, 大穆夫提 (首席伊斯兰教教法说明
官) 517

Alsace 阿尔萨斯

与《枫丹白露敕令》 141

法国对阿尔萨斯一部分的兼并 186, 209, 215, 218; 法国对阿
尔萨斯全境的主权 220

与“收复属地” 219, 297

Althusius, Johannes 阿尔特胡修斯, 约翰内斯, 加尔文派的政
治哲学家 118

Amangkurat I 阿莽古拉特一世, 爪哇皇帝 423

Amangkurat II 阿莽古拉特二世, 爪哇皇帝 423

Ambassadors, development of function of 大使职能的发展
198—9

Amelia 阿米莉亚, 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之妻 278

America, North 北美, 与欧洲16—17, 28, 330—68; 另见
Dutch Republic, England, France诸条

Ampringen, Johann Gaspar 阿普林根, 约翰·加斯帕, 条顿骑
士团的名义大团长 493, 495, 496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银行 13, 29

该地的瘟疫 20

该地的谷物价格 20, 284

德耶尔在该地的货栈 29, 30

城市贷款 33

该地的纺织业 41

该地的宗教宽容 142, 143

该地的街道照明 187

该地的繁荣 192

对该地的威胁（1674年） 218

和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的分歧 275

首屈一指的贵金属市场 282, 375

和威廉三世的分歧 297

与北美贸易 331

该地的咖啡馆 399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该地的瘟疫 369

下安达卢西亚，与荷兰的贸易 375；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 379

Andros, Sir Edmund 安德罗斯，埃德蒙爵士

作为纽约殖民地总督 341, 342—3, 352

和卡特里特的争端 341, 352

和教友派的争端 341, 352

作为新英格兰自治领总督 352—3

Andrusovo, Treaty of 安德鲁沃索条约 512, 565, 568—9, 570, 575

Angers 昂热 224

Angola 安哥拉 384, 385, 386, 393, 394

Anguier, Francois and Michel 安圭埃尔兄弟，弗朗索瓦和米歇尔，雕塑家 164

Anne of Austria 安娜（奥地利的），法国王后 132, 222, 234

Anne, princess of England 安妮，英国公主 312

Anne, princess of Prussia 安妮，普鲁士公主 544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法国在那里的领地 354, 379

荷兰在那里的领地 379, 386

那里的走私者据点 379

Antonio, Nicolás 安托尼奥，尼古拉斯，历史学家 383

Antwerp 安特卫普 26

Apafi, Mihály 阿保菲，米哈依，臣属于土耳其人的特兰西瓦尼亚邦君

被封为邦君 489, 509

路易十四外交与阿保菲 496

去世 499

与沃什堡和约条款 511

Aragon 阿拉贡

与驱逐摩里斯科人 370

税收 377

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 379

支持胡安·何塞叛乱 380

Argyll, Archibald Campbell 阿盖尔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第9代伯爵 144, 308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反亚里士多德哲学 47, 77

与真实的性质 73
自然法理论 104
国家起源理论 106
Arlington, Henry Bennet, earl of 阿林顿伯爵, 亨利·贝内特 307, 310
Arminians 阿明尼乌派 142—3, 147—8
Arnaud, Enrico 阿尔诺, 恩里科, 韦尔多派首领 472—3
Arnauld, Antoine 阿尔诺, 安托万, 扬森派首领
发表《论真正的错误思想》 78
与尼科尔合编《逻辑学》(《思维的方法》) 79
与莱布尼茨 82
发表《论常领圣体》 132—3
被开除出巴黎索邦神学院; 得到帕斯卡的辩护 133
英诺森十一对他的敬重 135
被路易十四放逐 136
他的论战技巧 139
Arnauld, Jansenist family 阿尔诺氏, 扬森派家族 132, 135
Asam, Cosmas Damian 阿萨姆, 科斯马斯·达米安, 画家
Ascheberg, Rutger von 阿谢伯格, 鲁特格尔·冯, 瑞典南部诸省总督 536
Ashley, Lord 阿什利勋爵, 见Shaftesbury条
Asia 亚洲
欧洲同亚洲的接触 398—429
英国人和荷兰人造成的亚欧贸易模式的变化 398

棉织品与其他纺织品输出 398, 399—400; 欧洲国家反对此种输出的立法 400—2

胡椒、香料和硝石的输出 398

糖的输出 398

咖啡和茶叶的输出 398—9

欧洲人喜用印度产品的时尚 399—400

与亚洲贸易在欧洲遭到的反对 401—3

在亚洲的传教活动 403—9

欧洲输入和模仿东方产品和东方艺术 409—10

与科学的进步 411—16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在那里的反土耳其叛乱 507—8, 509

Assiniboine Indians 阿西尼本印第安人 363, 364, 365

Atheism 无神论 148

Aubusson 奥比松 141

Auersperg, Count Johann 奥尔斯佩格伯爵, 约翰, 帝国枢密院
议长 491

Augsburg 奥格斯堡, 帝国直辖市

人口的减少 21, 22

贸易的衰落 26, 440

奥格斯堡和约 124

奥格斯堡联盟 220, 466, 472, 473; 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221,
233

该地的谷物价格 434

该地的税收 435

该地的社会分裂 439

Augustinians 奥古斯丁会，其传教活动 403, 407

Augustinus 《奥古斯丁书》 132, 133

Aungier Gerald 昂吉尔，杰拉尔德，在苏拉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 424, 425

Aurangzeb 奥朗则布，莫卧儿帝国皇帝

与耶稣会的传教活动 408

与英国的利益 425, 427

Austria 奥地利

宗教：镇压新教徒 1, 433, 479, 482；“改革委员会” 483—4

法国的唯一劲敌 2, 246

艺术 154, 160, 173, 174

采取中央集权制 195

贵族中的从军时尚 196

幸免于三十年战争的摧残 435

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437, 480

与1657年波兰—瑞典战争 487, 514, 568

援助匈牙利反对土耳其人 488—9

土耳其入侵：（1663年） 489—90, 510, （1683年） 497, 514—17；沃什堡和约 490, 511, 513

瘟疫 494

干涉波兰国王选举（1669年） 560

与勃兰登堡的协定 563

另见Empire, Habsburgs, Leopold I 诸条

Avignon 阿维尼翁，遭路易十四入侵（1662年） 134, （1688年） 138, 221

- Azores 亚速尔群岛, 葡萄牙人在那里的活动 386, 387
- Backhuysen, Ludolf 贝赫伊森, 鲁道夫, 画家 166
- Bacon, Francis, Viscount St Albans 培根, 弗朗西斯, 圣奥尔本斯子爵, 哲学家
- 法国科学家与培根 48
- 与自然的“统治” 73
- 与人犯错误的原因 79
- 皇家学会与培根 86, 89
- 与神学和哲学的分离 88, 90
- Bacon Nathaniel 培根, 纳撒尼尔, 弗吉尼亚的叛乱总督 348
- Baden-Durlach, margraviate of 巴登—杜拉赫侯爵领地
- 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的摧残 11, 455
- 专制主义引进该地区 11, 455
- Bahamas 巴哈马群岛 351
- Bahia 巴伊亚 384, 385, 387, 393
- Baillet, abbé 巴耶, 神父, 笛卡儿传记作者 77
- Balance of power 均势, 均势概念16世纪在意大利产生 198, 200
- Balance of trade, question of 贸易差额问题 333
- Balbin, Bohuslav 巴尔文, 博胡斯拉夫, 耶稣会教师和作家 481, 482
- Dissertatio apologetica pro lingua slavonica praecipue bohemica 482
- Baltic 波罗的海地区
- 该地区的贸易 13, 24, 27, 38
- 该地区的霸权问题 14, 286—7, 519—42

Baltimore, Lord 巴尔的摩勋爵, 见Calvert条

Baltimore 巴尔的摩, 该地的状况 346, 347

Bar duchy of 巴尔, 公爵领地

路易十四对巴尔的权利要求 209, 215, 216

与“收复属地” 219

Barbados 巴巴多斯

与贸易委员会 334

该地的岁入问题 335

从巴巴多斯迁移至卡罗来纳 343—4, 345

“特许权”问题 344

Barbary states 巴巴里诸国

法国与巴巴里诸国 201, 203

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 504

Barcelona 巴塞罗那 204, 374

Barcsay, Ákos 包尔乔伊, 阿科什, 臣属于土耳其人的特兰西瓦尼亚邦君 488, 489, 509

Barelli, Agostino 巴雷利, 阿戈斯蒂诺, 建筑师 172—3

Barnabites 圣巴拿巴会教士, 其传教活动 406

Baroque 巴洛克风格

起源于罗马 149

其原型 151

“巴洛克古典主义” 151, 154, 155, 156

贝尔尼尼——巴洛克风格的最佳阐释者 152

罗马教堂中的装饰 154, 156—60

在奥地利和德意志 154, 160, 172, 173, 174

- “路易十四风格”——巴洛克风格的一种表现 163
- Barreto, Francisco 巴雷托, 弗朗西斯科, 葡萄牙陆军将领
393
- Barrow, Isaac 巴罗, 伊萨克, 哲学家 87
- Basque provinces 巴斯克诸省 379
- Bavaria 巴伐利亚
- 与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 11, 12, 195, 450, 452—3
- 人口 20—1, 437
- 贵族中的从军时尚 196
- 与法国的同盟 217, 447—8
- 该地区的经济萧条 434, 440—1
- 贵族的破落 436, 440
- 农民状况的改善 435—6
- 巴伐利亚选侯与三级会议的关系 452—3
- 另见Ferdinand Maria, Maximilian I, Max Emanuel诸条
- Bayle, Pierre 贝勒, 皮埃尔, 哲学家
- 与宽容思想 10, 416
- 他的怀疑主义 79, 80, 85, 256
- 与神学从哲学的分离 90
- Béarn 贝阿恩, 在该地的不满运动 186
- Beauvillier, duc de 博维利尔公爵 181
- Becher, Johann Joachim 贝歇尔, 约翰·约阿希姆, 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45, 195
- 《关于城镇、乡村和国家兴衰之真实原因的政论》 434
- Bedogni, Lorenzo 贝多尼, 罗伦佐, 建筑师 173

Beeckman, Isaac 比克曼, 伊萨克, 学校教师 48

Bega, Cornelis 贝加, 科内利斯, 画家 166, 167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499

Bellori Giovanni 贝洛, 乔万尼, 《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思想》一书作者 162

Bengal 孟加拉

在该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424, 426, 427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理查德, 哲学家 72

Berckheyde, Gerrit 贝克海德, 赫里特, 画家 166

Berg, Duchy of 贝格, 公爵领地, 见Jülich条

Berkeley, George 伯克利, 乔治, 哲学家 72, 79, 93, 94

Berkeley, Sir John 伯克利, 约翰爵士, 约克公爵詹姆士在新泽西向其授予土地 339, 341

Berkeley, Sir William 伯克利, 威廉爵士, 弗吉尼亚总督 348

Berlin 柏林

在大选侯治下的发展 22, 41, 553, 554

路德派和加尔文派1662年在柏林的会议 126

巴黎的影响 187

该地的黑麦价格 434

与三十年战争 435

作为一个艺术和科学中心 557

Bermuda 百慕大 345, 351

Bernier, Francois 贝尼耶, 弗朗索瓦, 哲学家和旅行家 87, 91, 413, 414, 416

Bernini, Gianlorenzo 贝尔尼尼, 吉安洛伦佐, 雕塑家和建筑师

他的地位和影响 149, 150, 153, 154, 155—7, 158—9, 170

与设计卢浮宫 150—1, 157, 162

巴洛克风格的最佳代表 152, 153, 469

教廷的御用艺术家 153

他的主要建筑任务 557

Bérulle, Pierre de 贝吕勒, 皮埃尔·德, 红衣主教, 法国奥拉托利会的创始者 131, 132

Besancon 贝桑松

被路易十四占领 8, 213

在该地的“收复属地议事所” 219

Bethlen, Gabor 拜特伦, 加博尔, 特兰西瓦尼亚邦君 478, 484

Beyeren, Abraham van 贝耶伦, 亚伯拉罕·范, 画家 166

Bibliothèque Royale 《王家文库》 181

Birmingham 伯明翰, 冶金业中心 325

“Bishops’ Drag-Net”, in Scotland “主教之罗网”, 在苏格兰 145

Blackwell, Captain 布莱克韦尔, 船长, 宾夕法尼亚总督 347

Blake, Robert, admiral 布莱克, 罗伯特, 海军上将 394

Blasius, Gerard 布莱修斯, 杰勒德, 动物学家 67

Blith, William 布利思, 威廉, 农业作家 24

Blondel, Nicolas-Francois 布隆代尔, 尼古拉斯—弗朗索瓦, 建筑师 164

Bobadilla 博瓦迪利亚, 《地方长官及其僚属的政策》一书作者 375

Boccalini, Traiano 博卡利尼, 特拉亚诺, 讽刺散文家 468

Bodin, Jean 博丹, 让, 政治经济学家 96

Bohemia 波希米亚

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20, 478, 479

在该地区的反乞丐措施 42

农民起义 195, 494, 495; 农民的状况 437, 480—1

宗教: 消灭新教 433; 重新天主教化与“改革委员会” 482—3

在白山的失败 476

哈布斯堡王朝在该地区的中央集权专制试验 476—7

该地区的饥馑与瘟疫 494

Boileau-Despreaux, Nicolas 布瓦洛-德普雷奥, 尼古拉斯, 史官、讽刺散文家和翻译家 6

路易十四的颂扬者 245

隐退至奥特伊尔 248, 262

与《灵魂》 253

翻译朗吉努斯的《论崇高》 262

发表《诗艺》 262, 263

发表《经桌》 262, 263

他的文学同伴 266

Boineburg, Johann Christian von 布瓦涅伯格, 约翰·克里斯蒂安·冯, 提供基督教会重新联合 145

Bol, Ferdinand 博尔, 斐迪南, 画家

Bologna 波伦亚

波伦亚教务专约 131

在该地的雕塑学校 156

Bonde, Gustav 邦德, 古斯塔夫, 瑞典财政大臣 527

Bongaya, Treaty of 邦加亚条约 422

Bonn 波恩 218, 555

Boole, George 布尔, 乔治, 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84

Bordeaux 波尔多

波尔多财政区, 重新皈依天主教 141

驻该地的外国领事的任命 204

作为省会 226

该地的骚乱 233

Borelli, Alphonso 博雷利, 阿方索, 自然科学家 55, 67

Borromini, Francesco 博罗米尼, 弗朗切斯科, 建筑师

巴洛克风格大师 149, 469

他的风格的发展 157, 158, 160

地位和影响 158—9, 170

Bos, Abbé du 杜博斯神父, 《诗歌和绘画评论》一书作者 175

Bosse, Abraham 博斯, 亚伯拉罕, 画家 250

Bossuet, Jacques Bénigne 波舒哀, 雅克·贝尼涅, 莫城主
教, 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6

其著述的多样性 99

旨在教导王太子的著述: 《根据经文论政治》 99—102, 106,
261; 《世界史教程》 99, 261, 270, 415

《新教演变史》 99, 260

《悼诔》 99, 261

与霍布斯 100

论君主制的本质 100—1, 261, 318

与莱布尼茨的通信 116, 146

在教士大会开幕式（1681年）上的讲道 136

起草《四条教规》 137

《论天主教信念》 139

与胡格诺派的讨论 140

讲道 *Compelle intrare* 141

信念和同情心 252, 253, 260

语言的使用 255

独特的品质 273—4

Boston 波士顿 339, 350

Boswell, Sir William 鲍斯威尔, 威廉爵士, 外交家 48

Botelho 博特略, 阿格拉学院院长 413

Bothwell Brig, battle of 博思韦尔·布里格战役 145, 315

Bouchier, Pierre 布歇, 皮埃尔, 在加拿大三河城的司令官
355

Bouclier d'Etat et de Justice (de Lisola) 《国家的防卫
与正义》(利佐拉着) 296

Bouillon, duchesse de 德·布永女公爵, 拉封丹的女赞助人
265, 266

Bourbonnais 波旁内, 在该地的不满运动 186

Bourdon, Sebastian 布尔东, 塞巴斯蒂安, 画家 161, 162

Boyle, Robert 波义耳, 罗伯特,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他的著作的拉丁译本 51

他的理论和实验工作 58—60, 65

与梅奥 66

受迦桑狄的影响 87

与洛克 91

Brahe, Tycho 布拉赫, 蒂科, 天文学家 55

Bramante (Donato d' Agnolo) 布拉曼特 (多纳托·达尼奥洛), 建筑师 170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 11, 12, 195—7, 555; 三级会议权力的削弱 546—7, 548—9; 总后勤管理局 550—2; 战争总金库 551; 另见Frederick William, Elector条和诸省各条

人口 20—1, 196, 435, 437

社会结构: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25, 196, 436, 437—8, 543; 贵族 197, 440, 543, 546, 548—9, 552; 16世纪的社会结构 543; 各领地的不同性质 544—5

商业和经济的发展 39, 41, 43, 441—2, 551—2; 贸易公司 553—4

宗教: 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的敌对 126—7, 544, 549; 胡格诺派逃亡者的流入 141, 554, 558; 与加尔文派 554; 宗教改革 543

陆军 176, 196—7, 545—6, 552, 555, 558

与荷兰共和国 215, 541, 552, 554, 555

税收 441—2, 546—7, 548, 550—1, 556

与瑞典: 觊觎瑞典的日耳曼诸省 519; 对瑞典政策的变化 521—2, 540, 546; 在瑞典——波兰战争中 521—2, 563, 567—8; 与瑞典的联盟 (1686年) 540—563; 在大选侯即位时的瑞典占领状况 545

与波兰: 变动不定的对波政策 521—2, 546, 568; 要求从波兰得到普鲁士 544, 568; 华沙战役 552; 试图影响1669年波兰王位选

举 560

与丹麦 539—40

领土范围 544—5；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所获的利益 544

艺术和科学 557

与奥地利：关于波兰的协定 563

与俄国：安全条约 574

与法国，见Frederick, William, Elector条

Brazil 巴西

与葡萄牙和荷兰之间的帝国主义争夺 14, 16, 331, 384—5,
393

荷兰撤出巴西 331, 393, 394

人口 384

糖贸易 385, 386

奴隶贸易 385

烟草贸易 385, 386, 388

进出口 387—8

巴西贸易公司 388—9, 391, 393

Breda 布雷达

布雷达条约：212；关于殖民领地的规定 17, 289, 309, 356；
与海军致敬权利 202；关于布雷达条约的谈判开始举行 289；瑞典
的调停 528

布雷达宣言 303, 305

Breisach 布赖萨赫，在该地的“收复属地议事所” 219

Bremen 不来梅

在17世纪的发展 22, 435

不来梅公爵领地 430, 431, 519, 529
帝国自由市地位, 与瑞典的权利要求 430—1, 440, 540
Breslau 布雷斯劳, 与施普雷—奥德运河 41
Brest 布雷斯特 40
布雷斯特联盟 565
Brinvilliers, Marquise de 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 268—9
Brito, Gregorio de 布里托, 格雷戈里奥, 西班牙陆军将领
392
Brittany 布列塔尼 186
在该地区的起义 233
“国中之国” 237
Brömsebro, Peace of 布勒姆瑟布鲁和约 519
Bruant, Libéral 布吕昂, 利贝拉尔, 建筑师 164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乔尔达诺, 哲学家 54, 79
Brunswick, town of 不伦瑞克镇, 臣服于历代不伦瑞克—吕讷
堡公爵 442
Bučac, Treaty of 布恰奇条约 569
Buckinham, George Villiers 第二代白金汉伯爵, 乔治·维利
尔斯 307, 310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379, 385, 386
Bunyan, John 班扬, 约翰, 作家
Buonvisi, Francesco 布翁维西, 弗朗切斯科, 驻威尼斯的教皇
使节 493, 496, 498
Burke, Edmund 伯克, 埃德蒙, 英国国会议员 121
Burlington 伯灵顿, 教友派移居地 341
Burthogge, Richard 伯索吉, 理查德, 哲学家 79

- Bushnell, John 布什内尔, 约翰, 雕塑家 171
- Busi, Father 布西神父, 稣会传教士 408
- Butler, James 见Ormonde条
- Cadiz 加的斯, 在17世纪的发展 22
- Cairo 开罗, 在该地的法国领事馆 204
- Calderon, Maria 卡尔德隆, 玛丽亚, 女演员 380
- Calderonde la Barca, Pedro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 彼得罗, 剧作家 382
- 《圣礼短剧》, 《人生如梦》, 《扎拉梅亚的镇长》 383
- Calixtus, George 加里斯都, 乔治, 神学家
- Calonne, Charles Alexandre de 卡洛纳, 夏尔·亚历山大·德, 法国国务家 245
- Calvert, Cecilius 卡尔弗特, 塞西利厄斯, 第二代巴尔的摩男爵 348, 349
- Calvert, Charles 卡尔弗特, 查尔斯, 第三代巴尔的摩男爵 349
- Calvinism 加尔文派教义 118, 124, 147, 433, 484, 544, 549
- 路德派教义同加尔文派教义的敌对 122, 126—7
- Cambrai 康布雷, 路易十四和康布雷 139, 211, 212, 296
- Cambridge Platonists 剑桥柏拉图派
- 其主要代表 90
- 其成果, 与沙夫茨伯里的《人的特征》 91
- 和阿明尼乌派的联系 142, 147—8
- Camerarius, Rudolf Jakob 卡梅拉里乌斯, 鲁道尔夫·雅各布, 植物学家 71, 411

- Campanella, Tommaso 康帕内拉, 托马索, 哲学家 468
- Campen, Jacob van 坎彭, 雅各布·范, 建筑师 168
- Canada 加拿大 187; 另见 France, North American colony
诸条
- Canal des Deux Mers 双海运河 4, 41, 244
- Candia, War of 坎迪亚战争 458, 460, 461—4, 508, 510
- Cano, Alonso 卡诺, 阿伦索, 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173,
174
- Cantanhede, count of 坎塔涅迪伯爵, 葡萄牙陆军将领 394
- Cape Verde 佛得角 384, 386
- Cappelle, Jan van de 卡佩尔, 扬·范·德, 画家 166
- Caprara, Aeneas Sylvius 卡普拉拉, 埃涅斯, 奥地利将军
- Caprara, Albert, count of 卡普拉拉伯爵, 阿尔伯特, 出使君
士坦丁堡的奥地利使节 513
- Capucins 嘉布遣会, 其传教活动 403, 404
- Caracena 卡拉塞纳, 米兰总督 459, 460, 461
- Caravaggio, Polidoro da 卡拉瓦乔, 波利多罗·达, 画家
149, 151, 152
- Carcassonne 卡尔卡松, 在该地的荷兰织布工 243
- Carlisle, Charles Howard, earl of 卡莱尔伯爵, 查尔斯·霍
华德, 西印度群岛总督 334
- Carlowitz, Peace of 卡洛维茨和约 499, 570
- Carmelites, Italian 加尔默罗会(意大利的), 其传教活动
405
- Carolina 卡罗来纳

该地的特许领主 344; 在遵守《航海条例》问题上和殖民者的摩擦 345—6

从巴巴多斯移居卡罗来纳问题 344

沙夫茨伯里和洛克起草卡罗来纳基本法 344—5

质询其章程的“责问令状” 351

Carracci, Annibale 卡拉齐, 安尼巴莱, 画家 149, 151, 155

Carrara 卡拉拉, 西班牙对该地的控制 458

Carré, abbé 卡雷神父, 传教士 403

Carreno de Miranda, Juan 卡雷尼奥·德米兰达, 胡安, 画家 173

Carteret, Sir George 卡特里特, 乔治爵士, 约克公爵詹姆士在新泽西向其授予土地 339

Carteret, Philip 卡特里特, 菲利普

作为新泽西总督 340

和安德罗斯的争端 341

作为马里兰总督 349

Cartesianism 笛卡儿主义, 见Descartes, Rene 条

Casale 卡萨莱, 法国兼并该地 297, 459, 460, 471

Cassini, Jean 卡西尼, 让, 天文学家

Castellamonte, A medeo di 卡斯泰拉蒙特, 阿梅代奥·迪, 建筑师 150

Castelo Melhor, count of 卡斯特洛·梅略尔伯爵, 葡萄牙国务家 390

与向阿方索交权 395

签订与法国的盟约 395

日益增长的对他的敌意 396

他的垮台 396, 397

Castello, Valerio 卡斯特洛, 瓦莱里奥, 画家 155

Castiglione, Giovanni Benedetto 卡斯蒂廖内, 乔万尼·贝内代托, 画家 150

Castile 卡斯提尔 22

经济状况 372

萧条对该地商人的影响 373—4

该地工业的危急状况 376

税收 377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该地的领导地位 383

Castillo Saavedra, Antonio del, Painter
卡斯蒂略·萨维德拉, 安东尼奥·德尔, 画家 173

Castro, Americo, historian 卡斯特罗, 阿梅利科, 历史学家
382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农民中的骚动 194

该地特殊地位的恢复 369

胡安·何塞(奥地利的)与加泰罗尼亚 370, 374

人口 370

工资变动 372

该地的经济复兴 374, 375

在该地的对君主的支持 374

税收 377

与西属美洲殖民地 379

该地的起义 380

与比利牛斯条约 381

Cateau-Cambrésis, Peace of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458, 485

Catherine of Braganza 凯瑟琳（布拉干萨的），英国王后 307, 394

Catinat, Nicolas de 卡蒂纳，尼古拉斯·德，法国陆军将领 10, 472, 473

Caulet, Francois de 科莱，弗朗索瓦·德，帕米耶主教 135

Cavallino, Bernardo 卡瓦利诺，贝尔纳多，画家 149

Cayenne 卡宴，法国殖民地 51

Cayuga Indians 卡尤加族印第安人 354

Černin, Count Humprecht 切尔宁伯爵，胡姆普雷赫 474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塞万提斯（萨阿韦德拉），米格尔·德 382, 383

Céspedes del Castillo 塞斯佩德斯·德尔卡斯蒂略，作家 377

Ceylon 锡兰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16, 417, 418, 421

在该岛的天主教 404

“香料之岛” 417

Champagne 香槟，经洛林和巴尔到香槟的战略大道 209, 215

Champaigne, Philippe de 尚帕涅，菲利普·德，画家 160, 250

Chapelain, Jean 沙普兰，让，作家和诗人 262, 266

Chardin, Jean 夏尔丹，让，旅行家 413, 414

Charlemagne 查理曼 131, 140, 261

Charles V 查理五世，皇帝 1, 474

Charles VI 查理六世，皇帝 456

Charles I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 169, 304, 308, 318, 420

世袭君主制的殉难者， 103, 306, 314, 315

Charles II 查理二世，英国国王

与专制政府 11, 12

与财政体制 31, 33

加冕 143, 306

改宗罗马天主教 144, 310

与雷恩 170

与诸自治市 189, 317

与路易十四：津贴 199, 208, 306—7, 311；多佛密约 217,
310, 312—13

与葡萄牙 211

与荷兰共和国 217, 219, 289, 303, 309—10, 311

与三国同盟 289, 310

与《排斥法令》 290

去世 318

另见England 条内政治与宪法发展分条

Charles II 理查二世，西班牙国王

在他统治下西班牙的衰落 26, 173

与宗教改革 128—9

出生 210, 380

他的统治时期 381

与葡萄牙独立 383

Charles X 查理十世，瑞典国王

与瑞典—丹麦战争 286—7
与反对勃兰登堡和波兰的战争 286, 486, 521, 566—7
去世 431, 488, 526
与特兰西瓦尼亚的拉科乔 486, 487
对外政策 521—2
与南部诸省 536
Charles XI 查理十一世, 瑞典国王 7, 12, 526
与不来梅 431
在1675—1679年战争期间掌权 529, 531—2
和路易十四的关系 530, 538—9, 541
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缔约 530
关于常备军和减少王室土地的计划 532—3
逐渐承担绝对权力 533—4
他的军政管理机构 534—5
与南部诸省 536
与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 537
与同吕讷堡公爵的条约 540
去世 542
Charles IV 查理四世, 洛林大公, 与蒙马特尔条约 209—10
Charles 查理, 洛林亲王(后为查理五世, 洛林大公)
与土耳其人对抗的基督教军队司令部 15, 475, 479, 514,
515, 516
与蒙马特尔条约 209, 215
波兰王位候选人 491, 560, 561
Charles Emanuel II 查理·伊曼纽尔二世, 萨伏依公爵

建筑艺术的赞助人 150, 160

他幼年时 459

渴望与帝王同列 463, 469—70

Charles Emilius 查理·埃米利乌斯, 勃兰登堡选侯, 波兰王位候选人 561

Charles Leopold 查理·利奥, 梅克伦堡公爵 456

Charles Louis 查理·路易, 巴拉丁选侯 110, 126, 451

Charles Town 查尔斯敦(卡罗来纳境内) 345, 346

Charnock, Job 查诺克, 乔布, 英国东印度公司胡格利商行首领 426, 427

Charron, Pierre 沙朗, 皮埃尔, 哲学家 87

Château-Renault, Francois Louis Rousselet, Marquis de 沙托—雷诺侯爵, 弗朗索瓦·路易·鲁斯莱, 法国海军将领 202

Cherasco, Treaty of 凯拉斯科条约 458, 459, 460, 472

Cheshire 柴郡 352

Chigi, Mario 基吉, 马里奥 465

Child, Sir Josiah 柴尔德, 乔塞亚爵士,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 398, 402, 426

China 中国 407, 417, 572

中国的茶叶贸易 399, 409

在华意大利传教士 405

与耶稣会士 406, 408, 409, 415—16

中国对欧洲格调、艺术和工艺的影响 409—10

欧洲对中国科学、语言和宗教的研究 414—16

Chmel' nyckyj, Bogdan 赫梅尔尼茨基, 波格丹, 第涅伯河流域哥萨克首领 565

领导反叛波兰统治、 566, 572—3
接受莫斯科的宗主权 566, 573—4
援助瑞典 568
去世 574
Chmel' nyckyj, Yury 赫梅尔尼茨基, 尤里, 哥萨克头领 575
Chotin, battle of 霍廷战役 512, 561, 569
Christian IV 克里斯蒂安四世, 丹麦国王 523
Christian V 克里斯蒂安五世, 丹麦国王
与荷尔斯泰因—哥托普 529, 531, 539—40, 541
反荷情绪 530
与隆德条约 530, 531
Christian Albert 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 荷尔斯泰因公爵
455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 萨伏依女公爵 459, 469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 瑞典女王 74, 162
改宗天主教 464; 退位 521
Churriguera, José Benito 丘里格拉, 何塞·贝尼托, 建筑师
174, 383
Cibber, Caius Gabriel 西伯, 凯厄斯·加布里埃尔, 雕塑家
171
Civil War, in Enland 英国内战 25, 32, 88, 105
Claesz, Pieter 克拉斯, 彼得, 画家 166
Clamecy, See of 克拉姆西主教辖区 184
Clarendon, Edward Hyde 克拉伦登, 爱德华·海德, 第一代伯
爵 143, 303, 307
流亡 306, 308, 332, 339

殖民政策 332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塞缪尔, 玄学作家 84

Classicism, in art 艺术古典主义

“巴洛克” 151, 154, 155, 156

普桑, 艺术古典主义的大师 152

马拉蒂, 艺术古典主义的阐述者 154—5

路易十四风格中艺术古典主义的影响 163—4

17世纪后期对艺术古典主义的反动 174—5

Clauberg, John 克劳贝格, 约翰, 哲学家 76

Claude, Jean 克洛德, 让, 胡格诺派神学家 140

Clement IX (Giulio Rospigliosi) 克雷芒九世 (朱利奥·罗斯皮里奥西), 教皇

温和与正义的维护者 124, 465

与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的婚姻 130

当选教皇 134

他为结束移归权战争的努力 463

Clement X (Emilio Altieri) 克雷芒十世 (埃米利奥·阿尔蒂里), 教皇 124, 407, 465

Cleves, Duchy 克莱沃, 公爵领地 544

在该地的路德派—加尔文派争端 127

大选侯对该地的治理 196—7, 547—8

该地城镇的衰落 442

贡帕茨家族与克莱沃 443

勃兰登堡对该地的权利要求 544

税收 546, 556

Clifford, Thomas 克利福德, 托马斯 (第一代查德利男爵克利福德), 查理二世的幕僚 310

Coastal, or adjacent, waters 沿岸或邻近水域, 有关于此的争执 203

Coburg 科堡, 三十年战争中该地遭受的损失 21

Cochin 科钦 421

Codde, Pieter 科德, 彼得, 画家 166, 167

Coello, Claudio 科埃略, 克劳迪奥, 画家 150, 173

Coffee-houses, institution of 在咖啡馆议论政事和文学的惯例 322—3, 399

Coke, Sir Edward (Lord Coke) 柯克, 爱德华爵士 (柯克勋爵) 320

Colbert, Jean-Baptiste, marquis de Seignelay 科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 塞涅莱侯爵, 路易十四的大臣 234, 374

与海军 3—4, 202

与开凿双海运河 4, 41, 244

与工业的扩展 4, 28—9, 40—1, 242—3, 244

与艺术和科学的集中化 5, 51, 161—2, 175, 180, 181, 249, 412

行政改革 7, 180—1, 185

税制改革 30, 32—3, 34—5, 242

财政政策 34, 35, 241—2

创设贸易公司 36—7, 214, 243—4

用关税作为抵御英国与荷兰的措施 38, 39, 214, 219, 243

社会政策 42, 177; 使用统计学 181

农业政策 43

重商主义理论 45—6, 213—14, 241

与教皇 136

去世 219, 234

作为财政总监 223, 241

出身 226, 234

与加拿大 356, 358, 360, 361

Cologne 科隆

科隆大主教、选侯：他的亲法情绪 211, 213, 215, 217, 218;
签订莱茵同盟 431; 计划对付三级会议的抵抗 450

拟议在该地举行的和会 218

帝国自由市 440

选侯领地 447—8

Colve, Anthony 科尔弗, 安东尼, 荷兰重新占领后的新尼德兰
的总督 340

Comenius (Jan Amos Komensky) 夸美纽斯 (扬·阿莫斯·考门斯基), 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最后一任主教, 教育论著作者 145, 482

Compagnie du Saint-Sacrement 圣礼会, 虔信者团体 132,
139, 257

Condé, Henri-Jules de Bourbon, prince de 孔代亲王 (第
五) 164

Condé, Louis II de Bourbon, Prince de 孔代亲王 (大孔代)
2, 3

在移归权战争中 213

在法荷战争中 217

与路易十四的关系 234

波兰王位候选人 491, 561

Condillac, Étienne Bonnot de 孔狄亚克, 艾蒂安·博诺, 哲学家 94

Confucius, translations of 孔子著述的翻译 409, 415—16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教廷传信部 403, 406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330

背离正统清教 336

宪法 336

特许状 336—7; 质询其特许状的“责问令状” 351; 特许状的恢复 353

与英国议会调查委员会 339

河流 341, 342

与印第安人的战争 350

并入马萨诸塞 351, 352

Constance, Council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 137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罗马皇帝 131, 139, 140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与海军致敬问题

坎迪亚战争中所受的威胁 462, 504, 506

奥斯曼帝国的核心 500

全基督教会会议中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587

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 589

Consulate 领事, 领事制的起源 204—5

“海上领事”, 征收海上关税 204

Conventicle Acts 《信仰划一法》 144, 306

Conversations sur la couleur (de Piles) 《色彩谈论录》
(德皮勒著) 175

Cooper, Anthony Ashley 库珀, 安东尼·阿什利, 见
Shaftesbury条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该市的瘟疫 20

在1657年与瑞典的战争中 286, 522, 533

哥本哈根和约 287, 522

市长, 与授予腓特烈三世世袭王位 524

该市的发展 525

Copernicus, Nicolaus 哥白尼, 尼古拉斯, 天文学家 48,
55, 86

Cordemoy, Geraud de 科德穆瓦, 热罗·德, 笛卡儿主义哲学家
78

Cordoba 科尔多瓦 376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 皮埃尔, 剧作家 262, 273

Cornet, Nicolas 科尔内, 尼古拉斯, 巴黎索邦神学院理事
133

Cornwall 康沃尔, 该地的锡矿 325

Coromandel coast 科罗曼德尔海岸

欧洲对该地货物的需求 399, 402

在该地的传教活动 405

在该地的荷兰商行 418

英荷战争期间在该地的战斗 425

在该地的英国商行 425, 427

Corporation Act 《市镇机关法》 144, 305

Correggio, Antonio Allegri da 柯勒乔, 安东尼奥·阿莱格里·达, 画家 151

Correia de Sa, Salvador 科雷亚·德萨, 萨尔瓦多, 里约热内卢总督 385, 397

Corsican Guard, of Pope Alexander VII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科西嘉卫兵 134

Corte, Josse de 科尔特, 若斯·德, 雕塑家 156

Cortona, Pietro da 科尔托纳, 佩德罗·达, 画家和建筑师 149, 164

他的风格和影响 151, 152, 157—9, 170

设计卢浮宫 158

《关于绘画的论文》 175

Cossacks 哥萨克

第涅伯河流域哥萨克: 接受俄国的宗主权 15, 566, 573—4; 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袭击 504; 多罗森科领导的反波兰起义 512, 569, 575; 在赫梅尔尼茨基领导下反叛波兰统治 566, 572—3; 被克里米亚鞑靼人抛弃 566; 他们当中的反俄情绪 568; 寻求土耳其政府的保护 569; 转而效忠波兰(1658年), 重新投靠莫斯科 575

顿河流域哥萨克: 袭击奥斯曼帝国领土 504; 莫斯科对他们的态度 571, 573; 侵入莫斯科的领土 584—5

Cotton and calico 棉花和白布, 欧洲从东方输入 398, 399—400, 402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在哈布斯堡领土的反宗教改革 11, 16, 124, 432, 482—4

迫害胡格诺派 118

在法国的反宗教改革 123—4, 139

耶稣会士在反宗教改革中的活动 129

在西班牙的影响 382

反宗教改革的工具——传教机构 403

在巴拉丁领地的反宗教改革 452

被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终止 458

在意大利的影响 466

Country Justice, The (Dalton) 《乡村正义》(道尔顿著)
321, 324

Cours d'architecture enseigné à l'Académie royale
(Blondel) 《王家学院建筑学教程》(布隆代尔著) 164

Court of Wards, abolition of 监护院的废除 303, 304

Coysevox, Antoine 柯塞沃克, 安托万, 雕塑家 164, 171,
174

Cracow 克拉科夫, 瑞典人进入该城 567

Cree Indians 克里族印第安人 357, 359, 363, 364

Crequi 克雷基, 法国驻教廷大使 464

Crequi de Blanchefort, François 克雷基·德布朗歇福, 弗朗
索瓦, 法国元帅 220

Crete 克里特岛, 见Candia条

Crimea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汗 487, 488; 克里米亚汗国 504

克里米亚鞑靼人: 袭击乌克兰 512; 向维也纳进军 513; 转而
效忠波兰人 567; 哥萨克人的不可靠的盟友 573

Croatia 克罗地亚 477—8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弗

与禁止出口 39

与科学研究 48, 50

- 他的独裁 103, 105
- 杜利埃和克伦威尔 145
- 改善英俄关系的努力 283—4, 285
- 和马扎然的联盟 381, 460
- 与东印度公司 420
- Crop failures 歉收, 它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后果, 21—2
- Cudworth, Ralph 卡德沃思, 拉尔夫, 剑桥柏拉图派学者 90—
- 1
- Cum occasione 《适逢》, 教皇诏书(1653年) 133
- Cumberland 坎伯兰, 该地的煤矿
- Cuyp, Aelbert 克伊普, 阿尔贝特, 画家 166, 167
- Czestochowa, Jasha Gora 琴斯托霍瓦, 附近的亚斯纳古拉修道院 567
- Dalgarno, George 达尔加诺, 乔治, 哲学家 84
-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在坎迪亚战争中 462, 471, 517
- Dalton, Michael 道尔顿, 迈克尔, 法学著作家 321, 324
- Damascus 大马士革 503
- Dampier, William 丹皮尔, 威廉, 作家和探险家 413
- Danby, earl of 丹比伯爵, 见Leeds, duke of 条
- Danckelman, Eberhard von 丹凯尔曼, 埃贝哈德·冯, 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的大臣 555—6
- Danzig 但泽
- 该地的瘟疫 20
- 谷物贸易 21, 24
- 17世纪期间的衰落 22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封锁，见Candia条内坎迪亚战争

Dauphiné 多菲内

该地新教教堂的毁坏 140

该地的小麦价格 224

Davenant, Charles 戴夫南特，查尔斯，政治经济学家 402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 《赦免宣言》，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布 144, 311, 312

Defoe, Daniel 笛福，丹尼尔，讽刺作家 258, 399

Deism 自然神论 148

De Jure Belli ac Pacis (Grotius) 《战争与和平法》（格劳秀斯著） 201

De la Frequente Communion (Arnauld) 《论常领圣体》（阿尔诺著） 132—3

Delcour, Jean 德尔库，让，雕塑家 168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 86

Demark 丹麦

社会与行政结构：专制政府（和瑞典相比） 11—12, 535—6；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195, 523, 526, 536；新旧土地贵族的政治权力
522—3, 524, 525—6；腓特烈三世宣布为世袭国王 524；新政体
524；行政机构改组 524—5；财政改革 524—5；土地丈量 525；
律制改革 525；1679年后的改革 538

与瑞典：1657年战争 14, 286—7, 487, 522, 568；罗斯基勒和
约 287, 522, 527；布勒姆瑟布鲁和约 519；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后
的关系 519；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 519—20；对外政策方面传
统的反瑞典倾向 527—8, 529；1675—1679年战争 529；政策变化
与隆德和约 530—1, 539；关于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冲突 531,
540—1；武装中立条约（1691和1693年） 541。

与法国：1663年条约 38, 528; 1682年条约 539; 1683年防御同盟 540

农业 43, 526

与荷兰共和国：1649年同盟 286; 荷兰的海军援助 286, 529; 1666年条约 528

在亚洲的传教活动 405

东部诸省：在1658年丧失 522; 在1675—1679年战争中 529

陆军 524, 527, 538

和英国的通商条约（1661年） 527—8

和利奥波德一世的同盟（1673—1674年） 529

海军 538

和勃兰登堡的同盟（1682—1684年） 539—40

与俄国：关于王家婚礼的谈判 572; 进攻性同盟 574

Denonville, marquis de 德农维勒侯爵，法属加拿大总督 365, 366, 367, 368

Derbyshire 德比郡，该地的铅矿 325

Desargues, Gérard 德扎尔格，热拉尔，数学家 48, 160

De Statu Imperii Germanici (Pufendorf) 《论日耳曼帝国状况》（普芬道夫著） 113—14, 433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勒内，科学家和哲学家 18, 48, 73, 95, 153, 160

《哲学原理》 47, 55, 63

理论（“笛卡儿主义”） 52, 53; 其影响和权威 47, 74, 79, 90, 92, 251, 273; 与牛顿体系及其他理论的关系 55—64, 92—4; 其基本前提 57, 73; 其理论中的上帝概念 57, 72, 75—6; 其阐述者 63, 78, 79

他的数学 54, 55, 76—7

- 被指责为鼓吹自然神论 77—8
- 《方法谈》 111, 254
- Des justes pretentions du Roy sur l' empire 《王室关于帝国的公正要求》 216
- Detroit 底特律 365
- Devolution 移归权
- 与西属尼德兰相关的移归权 210—11
- 路易十四论移归权的文章 212
- 移归权战争 212—13, 289, 382, 447
- Devon 德文郡, 该地的海洋捕鱼船队 327
- Dévots 虔信派 131—2
- Deynze 德因泽, 法属战争期间在该地进行的法西会谈 204
- Dezhnev 杰日尼奥夫, 俄国探险家 571
- Dialogue sur le coloris (de piles) 《色彩谈论录》(德皮勒著)
-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法国百科全书派人士 95
- Dientzenhofer, Johann 丁岑霍菲, 约翰, 建筑师 172
- Deipenbeeck, Abraham van 迪彭贝克, 亚伯拉罕·范, 画家 165
- Digby Sir Kenelm 迪格比, 凯内尔姆爵士, 哲学家 90
- Dijon 第戎, 在该地附近的大地产 25, 226
- Divine Right 君权神授 12, 123
- 路易十四的表述 9—10, 96, 97—9, 122
- 波舒哀的表述 100—1
- 在英国查理二世的表述 103, 105, 106, 214; 詹姆士二世的表述 118

在德意志诸邦的相反情况 110

Dnieper, Cossacks of 第涅伯河流域哥萨克, 见Cossacks条

Dole 多尔, 投降路易十四 213

Dollard, Adam 多拉德, 亚当, 蒙特利尔要塞司令官 354

Domenichino (Domenico Zampieri) 多梅尼契诺 (多梅尼科·赞皮耶里), 画家 150

Domestic or putting-out arrangements in industry 工业中的家庭作坊制 29

Dominicans 多明我会

在亚洲的传教活动 403, 406

与解释华夏礼仪和道德 409, 416

Don, Cossacks of 顿河流域哥萨克, 见Cossacks 条

Don Quixote (Cervantes)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著) 382, 383

Dongan, Thomas 唐甘, 托马斯

出任纽约总督 343

敦促将纽约并入新英格兰殖民地联合体 351—2

怀疑法国的意图 351, 366—7

和易洛魁人结盟 366—7

Dormer 多默, 阿拉贡作家 374, 383

Dorošenko, Peter 多罗森科, 彼得, 乌克兰的哥萨克酋长

寻求土耳其政府的保护 512, 569, 575

停止抵抗莫斯科 576

Dort, Synod of 多尔德宗教会议 142

Dou, Gerard 道, 杰拉德, 画家 166, 167

Dover, Treaty of 多佛条约
公众对该条约的猜疑 114, 312—13
英国人据此有义务进攻荷兰人 217, 310
其他条款 310
沙夫茨伯里与该条约 333
Downing, Sir George 唐宁, 乔治爵士, 驻海牙大使 45, 290
Dragonnades 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 1, 10, 141
Drente 德伦特, 领土, 与提名执政 277, 278
Dresden 德累斯顿, 在选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治下
1, 146, 454
Drumclog, battle of 德拉姆克洛格战役 315
Dryden, John 德莱顿, 约翰, 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 255
与传播法国文学影响 272—3
《非凡的年代》《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牝鹿与豹》 273
与威尔斯咖啡馆 323
Du Vair, William 杜维尔, 威廉, 哲学家 81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见Ragusa条
Duchesneau 杜切瑙, 加拿大按察使 363
Dughet, Gaspar 杜盖, 加斯帕, 画家 161
Duguay-Trouin, René 迪盖—特鲁安, 勒内, 海军上将 204
Dujardin, Karel 迪亚丁, 卡雷尔, 画家 166
Dulhut, Daniel Gryolson 迪吕, 达尼埃尔·格莱耶尔松, 在加
拿大的法国开拓者 362—3, 364, 365
Dundee, John Graham of Claverhouse, Viscount 邓迪子爵,
约翰·格雷厄姆(克尔弗尔豪斯的) 315

Dunes, Battle of the 沙丘战役 381

Dunkirk 敦刻尔克, 路易十四兼并该地 208—9

Duquesnoy, François 迪凯努瓦, 弗朗索瓦, 雕塑家 155, 168

Durham 达勒姆, 该地的煤矿 325

Durie, John 迪里耶, 约翰, 为基督教会的重新统一而努力
145

Dusart, Cornelis 迪萨尔特, 科内利斯, 画家 166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与传教活动 403, 404—5

与制图学 412

在爪哇 4, 418, 423—4, 428

在马来亚: 马六甲要塞 417

在摩鹿加群岛 417

在锡兰 417

在好望角 417

在台湾 417, 428

征服葡萄牙人的港口 417, 418, 421

在南印度 418

在科罗曼德尔海岸 418

与莫卧儿帝国的关系 418

与日本的关系 418

结构和权力 419—20

在苏门答腊 422

在西里伯斯 422—3

18世纪的发展 428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社会与行政结构：复杂性 13, 17, 192, 275；资产阶级的“摄政”家族的权势 123, 276；作为强国期间独特的文化、政治特征 192—3, 291—2, 299—300；公职被视作私产 276；联合省议会的构成和职能 277；省议会 277；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职位 277, 291, 298；大议政的职能 277；执政的职能 277, 279, 298；自威廉二世去世（1650年）到德维特去世（1672年）期间的近于完全的共和统治 278—94；“真自由”制度 279；共和国的宗教宽容政策 280；政府交替过程的非暴力性 280；反政府的民众运动 281, 284；奥兰治家族问题的逐渐增长的威胁 281, 282, 284；《排斥法令》 285, 290；各省之间的政治冲突 285—6

对外政策，见Witt, John de 条

经济发展：世纪中叶达到高峰 13, 192—4, 275；德维特当政期间经济扩展停顿 281—2；国债利息的减少 285；金银出口 402

与法国：1672年战争 14, 108, 205—6, 215—19, 292—3, 295—7；1662年条约 38, 211, 287—8；逐渐加剧的经济紧张 38；得自路易十四的津贴 199；海军致敬事件 201—2；互换领事 204；反法宣传 208, 271；关税战 213—15；尼曼根和约 219, 296—7

与葡萄牙：1625—1661年的战争 14, 392—9；在巴西被葡萄牙击败 16, 331, 393, 394；殖民冲突 384—5, 386；1661年和约 394, 395；征服葡萄牙在东印度的港口 417, 418, 421

与丹麦：哥本哈根之解围 14, 286；1649年同盟 286, 1666年同盟 528

与英国：商业敌对 14, 16, 283；布雷达条约 17, 38, 202, 212, 289, 309, 356；1662年条约 38；威斯敏斯特条约（1654年） 208, 285；1665—1667年的战争 211, 288—9；海牙条约 213；三国同盟（包括瑞典） 213, 289, 310；克伦威尔派往海牙的使团（1651年） 283—4；英国《航海条例》（1651年） 284；1652—1654年的战争 284；1672—1674年的战争 303, 311；威斯敏斯特条约（1674年） 311, 340；另见下面北美殖民地分条及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诸条

人口 22—3, 384

工业和贸易：增加海关税（1651年） 31—2；贸易管制 41；远洋商船队的支配地位 213—14, 398；咖啡进口 398—9；东方纺织品进口 400；另见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诸条

宗教和教会：宗教宽容 107, 141, 142—3, 146, 193, 279—80, 297；罗马天主教徒、加尔文派和各小教派的地位 280；政治分歧消散于宗教中的倾向 280；法国占领期间（1672—1674年）的宗教革命 293

艺术 165—9

海战与海军惯例 201

遭明斯特主教入侵 211, 288

与瑞典：埃尔宾条约 286；1679年和约 530, 538—9；海牙条约 539

和勃兰登堡的防御性同盟 297, 554

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攫取伊比利亚国家的领地 331；英国和法国的敌意 331—2, 333；新尼德兰丧失给英国 339—40

在东方的传教活动 403, 404

脱离神圣罗马帝国 430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 16, 331, 392, 393, 553, 554

Egypt 埃及，它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 503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理论物理学家 77

Elbing, Treaty of 埃尔宾条约 286

Eleonore, 埃莱奥诺勒，波兰王后 561

Elizabeth 伊丽莎白，巴拉丁公主 74

Emile (Rousseau) 《爱弥儿》（卢梭著） 269

Empire, the 神圣罗马帝国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规定：关于领土的减少 15, 430—1；关于哈布斯堡家族保留帝位 432；关于诸侯的主权 432—3；关于帝国内部疆界 433；关于宗教疆界 433

三十年战争的社会经济结果：复兴受阻于通行费和消费税 26, 441—2；遣散雇佣军问题 433—4；人口的减少 434—5；庄园农业 436—7；各小邦内农民的状况 436—8；当代人对农民和贵族的描述 438—9；汉萨同盟各城镇、帝国自由市和其他市镇的衰落 440—1；外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的活动 442—3；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历史的影响程度 443—4；另见德意志诸邦各条

与莱茵同盟 216, 431

与瑞典 430—1

与法国 431, 444, 447, 448

与反宗教改革 432, 433

分裂（1648年后） 432—3；在经济领域的后果 26, 434,

帝国议会；其虚弱 444；选侯团，其中的天主教和新教成分 444—5；诸侯院 445；帝国自由城市院 445；与帝国税收问题 445；与选侯和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 445—6, 450；1654年帝国法令的规定 446, 450, 455；与帝国军队问题 446, 448；帝国议会成为常设的 446—7；移归权战争期间的中立 447；对法国宣战 447；与帝国“各阶层” 447, 448—9；与援助维也纳 490

宫廷会议 446, 449, 455, 456

帝国高等法院 449—50

帝国法院 449

Empiricus, Sextus 埃姆皮里库斯，塞克斯图，古代哲学家 87

Encyclopaedists, French 法国百科全书派 88, 95

England 英国

人口 3, 22—3, 207, 246

宗教：天主教徒受害 10, 140, 306；清教 107, 143—4；无主见派教义 123, 147；复辟后圣公会教义的重建 143, 305—6, 317；撇开教士会议 143；反对不从国教派和非国教教徒的措施 143—4, 305—6, 317—8；长老会教义 143—4, 301, 302；《赦免宣言》 144, 311, 312；《宽容法》 147；教友会教义 147；教会和行政 190；对英国出现天主教王朝的恐惧 312—13；《宣誓法》体现的制度 311, 312；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政治体系 318；教会行使的教规控制 321；在东方的传教活动 403, 405

政治与政体发展：“天主教阴谋” 10, 314；《市镇机关法》 144, 305；《宗教集会法》 144, 306；《五英里法》 144, 306；解散长期议会和选举代表议会 301—2；议会中的长老会分子 301；议会授予查理二世终身年金 303—4；监护院被废除 303, 304；复辟解决方案的目的 304—5；《航海条例》，见下面工业和贸易分条；《赔偿法》 305；土地解决问题 305；保皇党议会的构成和成就 305；使国王免受控制的立法 305；《克拉伦登法典》 305—6；议会要求收回《赦免宣言》 311, 312；议会反对派的端倪 311；《防止欺诈法规》 313；党派政治的出现 314；托利（亲斯图亚特）党和辉格（前乡村）党 314—16；《排斥法案》遭拒绝 317, 334；牛津议会解散 317；查理二世统治期间的政治气氛 318；《诉讼时效法规》 319；《人身保护令修正法》 319—20；反对使用东方丝织品和印花布的立法 401；另见Charles II, James II诸条

与荷兰共和国：商业敌对 14, 16, 283；布雷达条约 17, 38, 202, 212, 289, 309, 356；1662年条约 38；1654年威斯敏斯特条约 202, 285；1665—1667年的战争 211, 288—9；海牙条约（1668年） 213；三国同盟（包括瑞典） 213, 289, 310；1678年防御同盟 219, 296；克伦威尔派往海牙的使团 283—4；1652—1654年的战争 284；1672—1674年的战争 303, 311；1674年威斯敏斯特条约 311, 340；另见下面殖民政策分条，并见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诸条

社会组织：中产阶级的兴起 17, 123, 192；封建结构 25, 304, 321；地主 25, 194, 304, 305；为穷人和失业者的立法 42；运用政治算术和调查方法 180, 189, 324；缺乏政府机构造成的困难 188—9；自治城市的自由权 189；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和惰性 189

—90, 197; 地方政府 190—1, 320—1; 商业和专门职业的专门化 191; 教会、律师界和军队的地位 191—2; 公共道德 313; 党派政治意识的出现 318—19; 法律体系 318—19; 陪审制度 319; 普通法 320; 议会下院 320

光荣革命 18, 96, 118; 与洛克的《政府论》 119—20

经济结构: 金融界和经济界的领导 18; 伦敦银行家 29; 直接税 30—1; 炉灶税 31, 303, 328; 包税 32—3, 328—9; 铸币 34; 教士的赋税 143; 战争需要并非经济负担 188; 海关税与国内消费税 303; 监护院废除增设的消费税 304; 土地税 304; 估定 328; 人头税 328; 会计方法的陈旧 329

农业: 歉收季节的谷价 21; 农业著作家 24; 谷物法政策 43, 324; 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农业的扩展 324; 水果种植 324; 庭园开发和布置 325

工业和贸易: 再出口贸易 27, 327—8, 403; 东印度公司, 见单列条; 转口贸易 28, 36; 美洲殖民地 (另见下面殖民政策分条); 冒险商公司 28; 利凡得公司 28, 326、7, 501; 伊斯特兰公司 28; 俄罗斯公司 28; 皇家非洲公司 29, 34, 288, 326—7; 1651年《航海条例》 35—6, 305, 327, 337; 以后的《航海条例》 (1660、1662、1663、1664、1673年) 36, 327, 328, 332, 333, 337, 338, 339, 350—1, 353; 航海法或旧殖民制度 36, 39; 《主要商品法》 (1663年) 36; 贸易院 41; 采矿和冶金 325—6; 纺织业 326—7, 400—1, 402—3; 咖啡与茶叶的进口 399; 亚洲货物的进口 399—400; 反对亚洲贸易的立法 401; 土耳其公司 401; 主张自由贸易的论据 402; 《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 402

与法国: 逐渐加剧的经济紧张关系 (1663—1674年) 38, 39; 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难民大量涌入 141; 法国文学的影响 272—3; 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英法关系 288—9, 528; 另见下面殖民地政分条, 并见 Charles II 条

海战和海军惯例: 海军的扩充 41; 征募新兵 188; 海事法问题 201; 专注于海军致敬问题 201—2

艺术 169—71

三国同盟（与瑞典、荷兰） 213, 289, 310; 与瑞典的条约（1665年） 528

加入奥格斯堡同盟 221

在北美洲的殖民政策：克伦威尔政策 330—1, 332; 国务会议及其下属委员会的管理 331; 英法共同反荷政策（至1675年） 331; 此后的竞争 331—2; 重新颁布有关殖民地产品的《航海条例》 332; 处理贸易和种植院事务的枢密院下属委员会 332; 克拉伦登的政策 332; 沙夫茨伯里的政策 332—3; 贸易大臣查询《贸易法》的实施和遵守情况 333—4, 查询西印度群岛岁入 334—5; 《促进贸易法》 334; 种植园税 334; 夺取、丧失和重新征服新尼德兰 339—40; 旨在各殖民地统一的步骤 351—2; 新英格兰自治领建立 352; 反叛与自治领政府的垮台 353; 赫德森公司的建立 360; 法国扼制英国贸易的计划 364—5; 法国人夺取赫德森湾的据点 366; 赫德森湾之丧失由条约核准 336; 另见诸殖民地各条

与丹麦的商约 527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27, 35, 393

其建立 326—7, 420; 其管理 420—1

与生丝进口 398, 401

该公司在18世纪的政策预兆 399, 428—9

在爪哇：在万丹的商行 418, 424, 426

在马德拉斯 418, 424, 427; 建筑圣乔治堡 418

在苏拉特 419, 424, 425, 427

在马拉巴尔海岸 419, 424

在孟加拉 424; 在胡格利的商行 426, 427; 建立威廉堡（加尔各答） 427

在孟买：从查理二世得到孟买岛 424—5; 该地清教徒和保皇党人的敌对 424—5; 在马拉塔——莫卧儿战争中 425; 遭莫卧儿王朝的雇佣军进攻 427

与莫卧儿帝国的关系 425, 426, 427, 429
在科罗曼德尔海岸 425, 427
在苏门答腊 426
试图夺取吉大港 426—7
衰落（1688年后）以及与“新的”东印度公司混合 427—8
Epicurus 伊壁鸠鲁，古希腊哲学家 86
Erfurt 埃尔福特，被美因茨大主教围困 442
Erlach, Fischer von 埃拉赫，菲舍尔·冯，建筑师 159, 173
Ernest Augustus, duke of Luneburg 埃内斯特·奥古斯都，吕
讷堡公爵，后为汉诺威选侯 127, 454, 540
Espinosa, Jeronimo Jacinto 埃斯皮诺萨，赫罗尼莫·哈辛
托，画家 173
Essen 埃森，该地在17世纪的发展 22
Este, Francis I d' , duke of Modena 埃斯特，弗朗西斯一
世，摩德纳公爵 459, 460
Este, House of 埃斯特家族 469
Estonia 爱沙尼亚，其瑞典化 537
Estrées, duc d' 德斯特公爵，法国驻罗马大使 138, 465
Estrées, Cardinal d' 埃特雷红衣主教 136
Etherege, Sir George 埃瑟里奇，乔治爵士，英国驻雷蒂斯堡
使节 439, 445, 446—7
Euclid 欧几里得，古希腊数学家 89
Eugene 欧根，萨伏依亲王 15, 499
Evelyn, John 伊夫林，约翰，日记作者
与皇家学会 51, 411
论荷兰人在绘画方面的投资 165

他的《森林志》 324

种植园委员会成员 333

Everdingen, Allaert van 埃弗丁根, 阿拉特·范, 画家 166

Exilla die 《自该日》, 教皇诏书 409

Fabricius ab Aquapendente, Hieronymus 法布里齐乌斯·阿布·阿夸彭登泰, 希耶罗尼穆, 解剖学家 67

Fabritius, Carel 法布里蒂厄斯, 卡雷尔, 画家 167

Fanzago, Cosimo 凡扎戈, 科西莫, 雕塑家和建筑师 149

Farnese, House of 法尔内塞家族 469

Farnese, Ranuccio II 法尔内塞, 拉努乔二世, 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 459, 460

Farrukhsiyar 法鲁克西耶尔, 莫卧儿皇帝 429

Faryd' herbe, Luc 法里德赫尔贝, 吕克, 建筑师和雕塑家 168

Fehrbellin, battle of 费尔贝林战役 529, 552

Fen district, reclamation of 开垦沼泽地区 324

Fenelon,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费奈隆, 弗朗索瓦·德沙利戈纳克·德拉莫特, 康布雷大主教, 作家 269—70

《论女子教育》 269

《泰雷马克历险记》 270

与寂静派教义 373

Fenwick, John 芬威克, 约翰, 新泽西的教友会移居者 341

Feodor Alexeievich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沙皇 576

Ferdinand I 斐迪南一世, 皇帝 474, 499

Ferdinand II 斐迪南二世, 皇帝 1, 11, 479

Ferdinand III 斐迪南三世, 皇帝 432, 459, 485

与奥斯纳布吕克条约 124
与继位 431, 486
去世 446, 486
统治范围 476—8
与政府机构 445, 485
与波兰的扬·卡西米尔 486
在俄波谈判中进行调停（1656年） 567
Ferdinand IV 斐迪南四世，国王 486
Ferdinand Charles 斐迪南·查尔斯，曼图亚公爵 471
Ferdinand Charles 斐迪南·查尔斯，提罗尔君主 476
Ferdinand Maria 斐迪南·玛里亚，巴伐利亚选侯 452—3
Fermat, Peirre de 费马，皮埃尔·德，数学家 48
Fernandez de Navarrete 费尔南迪兹·德纳瓦雷特，经济学家
Ferrata, Ercole 费拉塔，埃尔科莱，雕塑家 155—6
Ferrater Mora, Jose 费拉特尔·莫拉，乔斯，哲学家 382
Ferry 费里，反对波舒哀的胡格诺派教士 140
Figuerola, Leonardo de 菲格罗亚，莱昂纳多·德，建筑师
174
Filaret 菲拉雷特，莫斯科总主教 587
Filmer, Sir Robert 菲尔默，罗伯特爵士，他的《族长》——
君权神授论的宣言 105—6
Finland 芬兰，丧失在芬兰的皇家领地 520
Five Mile Act 《五英里法》 144, 306
Flamsteed, John 弗拉姆斯蒂德，约翰，天文学家 53
Flanders 佛兰德

该地区的农业 23, 24

路易十四兼并该地区若干部分 186, 212

Fleetwood, Charles 弗利特伍德, 查尔斯 陆军将官 301

Flémalle, Bertholet 弗莱马勒, 贝尔托莱, 画家 165

Fleming, Herman 弗莱明, 赫尔曼, 瑞典国家官员 526

Florence 佛罗伦萨 22

纺织业的衰落 26, 467

作为艺术和科学中心 49, 156, 468

Foggini, Giovanni Battista 福吉尼, 乔万尼·巴蒂斯塔, 雕塑家 156

Fontainebleau, Edict of 《枫丹白露敕令》 141, 147

Fontana, Carlo 丰塔纳, 卡洛, 建筑师 149, 159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vier de 丰特纳尔, 贝尔纳·勒博维埃·德, 哲学家 53

Forest of Dean 福雷斯特奥夫迪安, 该地的冶金工场 325

Forgách, Ádám 福尔加奇, 亚当, 匈牙利军队指挥官 488, 490

Fort Amstel 阿姆斯特尔堡, 荷兰人在该地的贸易据点 339

Fort Frontenac 弗隆德纳堡, 法国人在该地的军事据点 362, 367

Fort Orange 奥兰治堡, 荷兰人在该地的贸易据点 338, 339, 361

Fouquet, Nicolas, vicomte de Melun et de Vaux 富凯, 尼古拉斯, 默伦和沃子爵, 法国财政大臣

与人头税 30, 33

与外国船税 213

他的府邸 222—3, 249

留下的欠款 241

Fox, George 福克斯, 乔治, 教友会首领 346

France 法国

法国优势地位的开端 2—3; 在路易十四治下达到巅峰 18, 187, 223, 246

陆军: 在勒泰利耶和卢瓦侯爵统率之下 3, 183, 249; 行动方式 10, 14, 452, 472; 征募新兵 177; 在自卫队强制服役 186; 部队的住宿 233, 246

人口 3, 23—3, 177, 207, 246

海军: 海军军籍登记 4, 186—7; 海军中的新教水兵 10

艺术: 在欧洲的影响 4—6, 18, 150—1, 152—3, 174—5, 271, 273—4; 科尔培尔之下的集中化, 见Colbert条; “路易十四风格” 5, 159, 163; 各学院的建立 161, 249, 250, 411, 412; 绘画和雕塑学院规章 161, 174—5, 249, 250; 妇女的影响 253—4, 271

文学: 路易十四统治前半期内的辉煌昌盛 248; 作品检查 248—9; 蒙田、笛卡儿和帕斯卡的影响 251—3; 文学沙龙的影响 253—4; 哲学家 254, 256; 和凡尔赛宫关系密切的莫里哀、拉辛、布瓦洛、波舒哀 256—63; 其他卓越的当代作家 264—9; 费奈隆——转变时期的代表 269—71; 法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272—3; 另见作者个人条

贸易与工业: 科尔培尔扩展贸易与工业, 见Colbert条; 谷物和酒的输出 24; 东印度公司 27, 243—4, 400; 和美洲移居者的贸易 28; 行会组织 33, 228—9; 继续使用中世纪技术 228; 手工业行会 228; 行会外大商人的出现 228—9; 咖啡进口 339; 反对进口东方纺织品的立法 400; 和利凡得地区的贸易 463

社会结构与行政: 社会基本结构未因路易十四的统治而改变 7, 245; 农民的地位 25, 194, 另见农业、土地分条; 资产阶级的社会抱负 25, 185, 226—8; 穿袍贵族 25, 184—5, 199, 226; 关于穷人和失业者的措施 42; 科尔培尔的社会政策, 见Colbert条; 各省按

察使 181, 183, 184, 185, 226, 235—7, 239, 242, 246; 佩剑贵族 183, 199, 225—6, 239; 竞相争取特权和国王宠信的标志 183, 185, 225, 239—40; 社会中的教士成分 184, 225, 239; 行政法院审查官 184; 出卖官职 184—5, 226, 227; 特权者与无权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分裂 186, 225; 穷人当中的不满运动 186, 230; 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隔绝 186—7; 社会等级 224—8; 贵族证书 225, 227; 财政家 226—7, 241; 路易十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 235—7, 244; 最高法院和三级会议的没落 236, 238, 244; 各省省长被剥夺权力 237; 对城镇自治的限制 237, 238, 244; “国中之国” 237, 238, 244

与荷兰共和国: 1672年的战争 14, 108, 205—6, 215—19, 292—3, 295—7; 对荷兰商业优势的挑战 27; 1662年条约 38, 211, 287—8; 日益紧张的经济关系 38; 关于海军致敬的事件 201—2; 互换领事 204; 关于移归权问题的谈判 210—11, 288; 经济战 213—15; 尼曼根和约 219, 296—7

农业: 歉收 21—2, 223, 224, 246; 葡萄种植 25, 229; 小麦价格 223—4, 231—2, 246; 总的价格下降趋势 224; 各地区在生产上的不同 229; 原始耕作方式、低收益和农民的贫困 231—2, 246

土地: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25, 194; 土地收益分成制 25, 230; 教士所有的土地 229; 贵族所有的土地 229; 农民所有的土地 229—30; 农民租赁的土地 230; 无地雇农 230, 232; 农民可支付的封建主务 229, 230, 231—2

经济结构: 科尔培尔的税制改革, 见Colbert条; 人头税 30, 32, 230, 231, 242; 盐税 32, 231; 间接税 32; 公债 33, 34; 免税 183, 184, 185; 农民的赋税负担 231—2; 造反 232—3; 土地对经济的支配 224; 无偿赠予 237—8, 239; 路易十四和科尔培尔未改变根本的经济结构 245; 反对东方贸易的经济论据 401—2

与英国: 日益紧张的经济关系(1663—1674年) 38, 39; 占有敦刻尔克问题 208—9; 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关系 288—9, 528; 另见下面北美殖民地分条。

与瑞典：1663年条约 38；1672年条约 529，530；1679年后的反法情绪 530；关系改善 541

与丹麦：1663年条约 38，528；1682年条约 539；1683年防御同盟 540

科学运动 47，180；又见Descartes条

宗教与教会：主教区的状况 128；对高卢主义的各种解释 130—2，133；关于《四条教规》的争执 130，137，465；教士大会 131，136—7，138；教皇极权主义 131；虔信派 131—2；扬森主义危机 132—6；《奥古斯丁书》的发表 132；对“五项主张”的谴责 133；批准反对扬森派教义的仪式书 133；路易十四对扬森派教义的敌意 134，136；根据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诏书发布敕令 134；1669年“教会和平” 134，465和英诺森十一的冲突 135—9，465—6；法国驻罗马大使豁免权问题 138，464；教会分裂的威胁 138；亚历山大八世和英诺森十二之下的和解与妥协 138—9；从南特敕令颁布到路易亲政期间的胡格诺派教义 139；反新教措施 139—40；说服胡格诺派教徒的尝试 140；设立“改宗基金” 140；迫害胡格诺派教徒 140—1；寂静派教义 147；教会是王室赞助的领域 183—4；科尔培尔减少教会节日数目 243；马扎然治下和教廷的关系 464；克雷芒九世和十世在位期间 465

与意大利：和教皇的关系 138，464—6（另见上面宗教与教会分条）；在意大利的政治、军事权势 458—61，470—3；短暂地干预坎迪亚战争 463；经济战 467

与西班牙：关于海军致敬的事件 202；比利牛斯条约 208，222，381，461；移归权战争 210—13，215，382；西班牙对法荷战争的干预 218；1683年战争 297

与北美殖民地：和印第安人的友好关系 330，354，355，357，359，363；1675年前后和英国人的关系 331—2；和易洛魁人的战争 354，355；百人公司和农民公司 354；来自法国的增援（1665年） 355；法属美洲帝观念 355，356，358；荷兰殖民地沦入英国之手后英法竞争激化 355—6；阿卡迪亚的恢复与背风群岛重归英国 356；弗隆特纳克总督的第一任期 356，358—63；在法国招募移民以增加人口 356；西印度公司的建立 357；毛皮贸易的扩展 357—

8; 探寻去“南海”之路 357—9; 耶稣会与圣稣尔比斯修道会的传教团体 358; 最初无视赫德森湾的英国据点 360; 对该地土地的正式权利要求 360—1; 西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被撤销 361; 关于烈酒贸易的争论 361; 皮货商的违禁贸易 361—2; 易洛魁人的威胁再度出现 362; 路易斯安那建立 362; 弗隆特纳克被召回后的反扩张政策 363; 混血儿童 363; 赫德森湾公司 364, 365; 抑制英国贸易的计划 364—5; 北方公司 365; 对易洛魁人的预防性进攻与请求 365; 夺占赫德森湾的英国据点 366; 对易洛魁人的防御性战争 367—8

在亚洲的传教活动 403, 405—6, 407, 409

Franche Comté 弗朗什孔泰 491

被路易十四夺取 212, 213, 219, 296, 382

与“收复属地” 219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 其传教活动 403, 405, 406

Francke, August Hermann 弗兰克, 奥古斯特·赫尔曼, 虔敬派首领 147, 405

Franconia 法兰克尼亚, 三十年战争中该地区的损失

Frangepán, Ferenc 弗龙盖潘, 费伦茨, 与匈牙利民族密谋 492, 493

Frankfurt 法兰克福, 帝国直辖市 487

该地的瘟疫 20

该地的谷物价格 434

该地的社会差别 439

该地的发展 440

Frankfurt-on-Oder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441, 553

Frederick III 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选侯 555—8

Frederick V 腓特烈五世, 巴拉丁选侯 110, 127

Frederick III 腓特烈三世，丹麦国王

作为军队统帅 7, 535

与采用专制政府 11, 523—4

Fredrick IV 腓特烈四世，丹麦国王 195

Frederick I 腓特烈一世，普鲁士国王 556—8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 430

Frederick VI 腓特烈六世，巴登——杜拉赫侯爵 445

Fredrick Augustus 腓特烈，奥古斯特，萨克森选侯（后为波兰国王）

成为罗马天主教徒 454

反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军队的统帅 475

波兰国王 499, 556

Frederick Charles 腓特烈·查理，符腾堡公爵 456

Frederick Henry 腓特烈·亨利，奥兰治亲王，荷兰共和国陆军统帅、海军统帅

他与荷兰诸省的分歧 277—8, 279, 299

他的去世 278

Frederick William 腓特烈·威廉，勃兰登堡选侯（“大选侯”）和三级会议斗争与采用军事官僚制 11, 32, 196—7, 450, 545—51

经济政策：进口禁令 39, 441；施普雷—奥得运河 41, 553；
总后勤管理局与工业 551—2；重商主义 553

对宗教分歧的态度 126—7, 433

与其陆军 196, 197, 545—6, 552

将法语用作外交语言 206

对外政策：自1672年起的反法倾向 215, 552, 554；和皇帝的军事盟约（1672年） 217；和法国的辅助条约（1682年） 221, 539, 554；南特敕令废除后的反法政策 221, 554；援助维也纳（1664年） 490；和瑞典查理十世的同盟（1655年） 521；和查理十一世的同盟（1686年） 540；获得普鲁士 546, 554；和皇帝的反法密约（1686年） 554；《波茨坦敕令》 554

海军政策与殖民政策 443, 553—4

Frederick William I 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 443, 554, 557, 558

Frege, Friedrich 弗雷泽，弗里德里希，数学家 84

Freiberg 弗赖堡，三十年战争中该地的损失 20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法国东印度公司 27, 243—4, 400

French 法语，取代拉丁语为外交语言 206

Freisland 弗里斯兰省 275

与任命执政 277, 278

和威廉三世的分歧 297

Fronde, the 投石党运动

扬森派与投石党运动 133

对路易十四的观点的影响 214, 237, 249

对民众的影响 246

Frontenac, Louis de Buade comte de 弗隆德纳克伯爵，路易·德布阿德，加拿大总督 356

他的扩张计划得不到支持 358, 359

与阻挠英国贸易的措施 360, 361, 362, 364

与同印第安人的违禁贸易 361

建筑弗隆特纳克堡 361—2

被召回 363

总督第二任期 368

Fürstenberg, Ferdinand von 菲尔斯滕贝格, 费迪南德·冯,
帕德博恩主教 127

Fürstenberg, Villiam von 菲尔斯滕贝格, 威廉·冯, 红衣主
教, 与在科隆的选举 138

Fuller, Isaac 富勒, 伊萨克, 画家 171

Furnes 菲尔讷, 割让给法国

Gabel, Christoffer 加贝尔, 克里斯托弗, 要求在丹麦采用世
袭君主制的匿名建议书的起草者 524

Galen, Christopher Bernard von 加伦, 克里斯托弗·伯纳德
·冯, 明斯特主教 127, 442

和荷兰人的战争 211, 288

在法荷战争中 215, 217, 293

与莱茵同盟 431

Galilei, Galileo 伽利略, 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48, 51,
53, 55, 72, 76, 89

他所处时代的气氛 48—9, 52

与试验科学院 49, 468

与林琴科学院 49

他的天文观察 53

与用数学方法对待原初的质 73, 76

Gardie, Magnus Gabriel de la 加迪耶, 芒努斯·加布里埃尔
·德拉, 瑞典首相 527, 531, 533

Gascony 加斯科涅, 在该地区的不满运动 186

Gassendi, Pierre 伽桑狄, 皮埃尔, 科学家和哲学家

一位原子论者 48, 50, 58
与笛卡儿 74
英国经验主义的先驱 86—8
洛克与伽桑狄 91, 94
Gaulli, Giovan Battista 高利, 焦万·巴蒂斯塔, 画家
149, 150, 154
Geer, Louis de 海尔, 路易·德, 荷兰商人和金融家 29
Geneva 日内瓦
法国在该城的“驻扎官” 199
给韦尔多派逃亡者避难 472
Genoa, republic of 热那亚共和国
作为一个经济中心 29, 467
教廷与该国的争端 129
在该国的艺术与雕塑学校 150, 156, 174
和马赛的竞争 202, 467
遭路易十四进攻 203, 471
与西班牙——天主教政治利益 458
与萨伏依的查理·埃曼努埃尔二世 470
George Louis 乔治·路易, 汉诺威选侯(后为英王乔治一世)
454, 456, 555
George William 乔治·威廉, 吕讷堡公爵 540
Gerbais, Jean 热尔贝, 让, 法国教士大会(1665年)指派作
者的作者 136
Gerhardt, Paul 热拉尔, 保尔, 路德宗讲道牧师和赞美诗作
者 126
Germany 德意志

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20—1, 172, 433—44

农业 22, 23

人口 22, 246

农民和地主的关系 25, 195, 436—8

诸侯国的专制主义 109—10, 113—14, 195—6, 455

宗教: 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的影响 124—6; 宗教疆界的稳定化 124—5, 433; 在统治者改变宗教信仰的地方为臣民作的规定 125; 关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占有土地的规则 125; 对条约的宗教条款的支持 126; 主教区内的贵族统治 128

艺术 154, 160, 172—3, 174

另见 Empire条和诸侯国各条

Geulincx, Arnold 海克林斯, 阿诺德, 笛卡儿主义哲学家 78, 79

Gibbons, Grinling 吉本斯, 格林灵, 英国装饰木雕师 171

Gibbs, James 吉布斯, 詹姆斯, 建筑师 159

Giordano, Luca 焦尔达诺, 卢卡, 画家 149, 155

Girardon, François 吉拉尔东, 弗朗索瓦, 雕塑家 164

Goa 果阿

作为葡萄牙帝国一部分的衰落 384

在该地的起义 397

在该地的传教活动 404, 406—7

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419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该地的封锁 421

Gobelin tapestry works 戈布兰花毯作坊, 其规模与营业 5, 161, 242, 249, 272

Godfrey, Sir Edmund Berry 戈弗雷, 埃德蒙(爵士)·贝里, 地方法官 314

Godolphin, Sidney 戈多尔芬, 西德尼, 第一代戈多尔芬伯爵 187

Goens, Rijkoff van 贡斯, 里伊科弗·范, 荷兰海军将领 421, 423

Goethe, J. W. von 歌德, J. W. 冯, 96

Golconda, Kingdom of 戈尔孔达王国 419, 425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勃兰登堡在该地的商业冒险 553—4

Gomperz family 贡帕茨家族(在克勒弗) 443

Gonzaga, Hannibal, marquis of Mantua 贡扎加, 汉尼拔, 曼图亚侯爵 485

Gonzaga-Nevers 贡扎加—内维尔家族, 该家族的查理二世 459, 460

Gonzaga-Nevers 贡扎加—内维尔, 统治曼图亚和蒙费拉托地区的公爵世家 459, 469

Goyen, Jan van 戈因, 扬·范, 画家 166

Graaf, Regnier de 格拉夫, 勒尼埃·德, 解剖学家 69

Graci3n, Baltasar 格拉西安, 巴尔塔萨, 哲学家, 《爱挑剔的人》一书作者 383

Granada 格拉纳达, 其衰落 376

Graunt, John 格兰特, 约翰, 统计学家 45

Great Elector, the 大选侯, 见Frederick William, 勃兰登堡选侯

Great Island 格雷特岛的港口 353

Greece 希腊, 在坎迪亚战争中 471

Green Riboon club 绿色缎带俱乐部 323

Gremonville, Jacques 格雷蒙维尔, 雅克, 路易十四派驻维也纳的大使 492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 该地的小麦价格 224

Gresham College 格雷欣学院 (在伦敦) 48, 50

Grew, Nehemiah 格鲁, 尼赫迈亚, 生理学家

论宇宙的机制 57, 65

关于植物问题的实验 66, 71

列文虎克与他通信 69

Griffenfeldt, Peder 格里芬菲尔德, 彼泽, 丹麦国务家 524

Grignan, comte de 格里尼昂伯爵, 德维塞涅夫人的女婿 227

Grignan, comtesse de 格里尼昂伯爵夫人, 德维塞涅夫人的女儿 248, 260, 268, 269

Grimaldi, Francesco Maria 格里马尔迪, 弗朗西斯科·马里亚, 物理学家 61

Grisons 格里松州, 在该地区的路易十四的“驻扎官” 199

Groningen 格罗宁根

与提名执政 277, 278

在法荷战争中 293

与威廉三世的分歧 297

Groseilliers, Medard Chouart, Sieur des 格罗塞耶先生, 梅达尔·舒阿尔

援助英国人建立赫德森湾公司 359—60

重新效忠法国 363—4

重新为英国效劳 365

Grotius (Hugo de Groot) 格劳秀斯 (雨果·德格鲁特), 哲学家认为伦理是一门可论证的科学 94

与自然法 111, 112
与和平运动 145
论国际法 200, 201
论海事法 201
论中立 205
Guarda, see of 瓜达, 主教区 129
Guarini, Gurarino 瓜里尼, 古拉里诺, 建筑师 150, 160
Guelderland 格尔代尔兰德
该地的封建习俗 25, 275
与提名奥兰治亲王为执政 277
在路易十四军队的占领下 (1672年) 293
向威廉三世提出给予君主地位 298, 299
Guiana 圭亚耶
荷属圭亚耶 310
法属圭亚耶, 310
Guidi, Domenico, sculptor, 圭迪, 多梅尼科, 雕塑家, 156
Guido Reni, painter 圭多, 雷尼, 画家, 149
Guinea 几内亚
人口 384
与奴隶贸易, 385
与西属美洲殖民地贸易, 386
Guise, Mademoiselle de, 吉斯, 郡主 209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吉斯塔夫, 阿道尔夫, 瑞典国王, 145, 176, 553
Guyenne, admiralty of, 吉耶纳海事法庭, 204

Guyon, Madame de, Quietist writer, 居伊昂夫人, 德, 寂静派
著作家, 147, 373

Gyllenstierna, Johan, chief adviser of Charles XI of
sweden, 于伦斯蒂纳, 约翰, 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的首席幕僚, 529,
530, 531—2

Habsburg lands, 哈布斯堡领地, 474—99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437, 480—1

各领地的重新统一, 476

圣文策斯劳斯皇家领地, 476—477

圣斯蒂芬皇家领地, 477—478

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478—479

农业经济的转变, 479—480

城镇的衰落, 481

知识生活的中止, 481—482

政府与行政, 485

Habsburgs 哈布斯堡家族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同盟, 2, 211, 222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欧洲强权政治中的崛起, 2, 432, 474

与北方战争, 14, 527

与保卫维也纳, 15, 497, 514—16

支配教会财产, 127

和法国历代国王的冲突, 140, 216, 218, 295, 431, 474, 514

与反宗教改革, 432, 433, 466, 482—5

与帝位, 432, 446, 475, 486

和威尼斯的关系, 463

奥地利王朝的特征, 474—5

与波兰王位继承问题, 491, 560, 561

Hadziacz, Treaty of, 哈吉兹条约, 575

Hague, The, 海牙, 180, 186, 277, 278—9

Hahn, Knut 哈恩, 克尼特, 隆德主教 536

Haies, Jacob des 埃厄斯, 雅各布·德, 耶稣会著作家 480

Haji (Abdulkahar) 哈只(阿甫杜尔卡哈尔), 爪哇苏丹 423

Halberstadt 哈尔伯斯塔特, 勃兰登堡的一块占有地

Halifax, George Savile marquis of 哈利法克斯侯爵, 乔治·萨维尔 317

Halle, University of 哈雷大学 195, 557

Halley, Edmond 哈雷, 埃德蒙, 天文学家和统计家 51, 179—80

Hals, Frans 哈尔斯, 弗兰斯, 画家 149, 167

Hamburg 汉堡, 帝国自由市 30, 187, 439, 440

该市的成长 22, 27, 435, 442

丹麦人对该市的进攻 540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伯爵, J., 历史学家 369, 370, 371—2

Hanover 汉诺威 127, 146, 437, 454—5

另见 John Erederick, Ernest Augustus, George Louis dukes of 诸条

Hanseatic towns 汉萨同盟诸城镇 26, 440, 441

Harant, Christopher, Colonel 阿朗上校, 克里斯托弗 495

Hardouin-Mansart, Jules 阿杜安-芒萨尔, 朱尔斯, 建筑师 163, 164, 170

Harlay-Chanvallon, Francois de 阿尔莱-尚瓦隆, 弗朗索瓦·德, 巴黎大主教 136, 138

Haro, Don Luis de 阿罗, 唐路易斯·德,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顾问 380, 381, 394

Harrach, Cardinal Adalbert 哈拉赫红衣主教, 阿达尔贝特, 布拉格大主教 483

Hartlib, Samuel 哈特立伯, 塞缪尔, 农业著作家 24

Harvey, William 哈维, 威廉, 生理学家 18, 48, 66, 69, 72
与“有机体自然创生说” 68

对霍布斯的影响 89

Hauranne, Jean du Vergier de 奥拉纳, 让·迪韦吉耶·德, 圣西朗修道院长 132

Havart, Daniel 哈瓦特, 丹尼尔, 论科罗曼德尔的工匠 410, 413

Hawksmoor, Nicholas 霍克斯穆尔, 尼古拉斯, 建筑师

Heath, Sir Robert 希思, 罗伯特爵士, 授予他卡罗来纳境内土地 343

Heda, Willem 海达, 威廉, 画家, 166

Hedvig Eleonora 海德维格·埃莱奥诺拉, 瑞典王后 522, 526

Heem, Jan de 海姆, 扬·德, 画家 166

Heidelberg 海德堡, 被路易十四毁为废墟 452

Hellespont, battle of 赫勒斯滂战役 462

Helmont, Jean-Baptiste van 海尔蒙特, 让-巴蒂斯塔·范, 化学家 58, 59, 65

Helmstedt, University of 黑尔姆施泰特大学 127

Henrietta Maria 亨丽埃塔·玛丽亚, 英国王后 318

Henry IV 亨利四世，法国国王 249

Henry VIII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 304

Herbert, Edward 赫伯特，爱德华，第一代赫伯特（切尔伯里的）男爵，《论真理》作者 90

Hermann, paul 赫尔曼，保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 411

Hervart, Barthélemy 埃尔瓦，巴泰勒米，为马扎然效力的银行家 29

Hesse 黑森 21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 126

黑森—卡塞尔方伯 431, 433

Hesse-Rheinfels, landgrave of 黑森—莱茵费尔方伯 146

Hessius, Willem, architect 黑西苏斯，威廉，建筑师

Het Interest van Holland (de la Court) 《荷兰的利益》（德·拉·考特著） 45, 402

Hevelius, Johannes 赫维笛，约翰尼斯，天文学家 53

Heyden, Jan van der 海登，扬·范·德，画家 166

Heldebrandt, Johann Lukas von 希尔德布兰特，约翰·卢卡斯·冯，建筑师 173

Hildesheim, diocese of 希尔德斯海姆教区，与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的规定 125

Hobbema, Meindert 霍贝玛，迈恩德特，画家 166, 167

Hobbes, Thomas 霍布斯，托马斯，哲学家 73, 76, 77, 81, 82, 93

与笛卡儿 48, 74, 88—9

科学的概念 88—90, 93, 94

在《利维坦》中表述的主权概念 103—5, 109, 313

在英国内外的声誉 104—5, 120

与斯宾诺莎 106—8

Hocher, Johann Paul 霍歇尔, 约翰·保罗, 画家 485

Hohenzollern rule in Brandenburg 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 544—58

Holbach, paul Henri 霍尔巴赫, 保尔·亨利, 唯物主义哲学家 89

Holland 荷兰省

在荷兰共和国内的支配地位 13, 192, 275

社会结构 17, 275; “摄政家族” 276

农业 23, 43

贸易与工业 24, 43, 282; 关税的使用 39, 43

经济制度: 公债 33; 发放终身年金 179, 80, 276; 税收 277

政治与政体发展: 省议会的构成 277; 奥兰治亲王传统上一直担任执政 277; 省议会与腓特烈·亨利之间在17世纪40年代的紧张关系 277—8; 腓特烈·亨利与威廉二世之死 278; 召集议事大会 278—9; 德维特对共和党的领导 279—84; 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的骚动 284; 排斥法令 285; 德维特巩固其党派 285; 来自其他省份的对他的政权的威胁 285—6; 排斥法令被废除 290; 威廉三世拒绝其祖先的职位 290; 威廉三世由省议会教育 290; 《永恒法令》 291, 294; 法荷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293; 威廉三世立为执政 294; 德维特遇刺给予威廉三世城市行政全权 294—5; 反对他接受君主地位 298, 299

另见Dutch Republic; Witt, Hohn de; William III 诸条

Hollar, Wenceslas 霍拉尔, 文来斯拉斯, 画家 171, 482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5, 11, 435

荷尔斯泰因三级会议 455

Holstein-Gottorp 荷尔斯泰因—哥托普 522, 528, 529, 531, 539—40, 541

Holstein-Gottorp, Christian Albrecht, duke of 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 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克特

瑞典保证其独立的各项条约 528, 539

丹麦的侵略 529, 531, 538, 540

恢复领地 541

Holy League 神圣联盟 130, 465, 471, 498, 514, 570

Holy See 罗马教廷, 见papacy条

Hondecoeter, Melchior d' 洪德库特, 梅尔希奥·德, 画家 166

Hondschoote 翁斯科特, 遭法国人蹂躏 26

Hooch, Pieter de 霍赫, 彼得·德, 画家 166, 167

Hoogstraten, Samuel van 胡格斯特拉滕, 萨缪尔·范, 画家 166, 167

Hooke, Robert 胡克, 罗伯特, 科学家和哲学家

作为机械论哲学家 60, 63

与光和色彩研究 61, 62

作为生物学家 68, 71

Hornigk, von

Horrox, Jeremiah 天文学家 56

Hudde, Johannes 数学家 179

Hudson's Bay Company 赫德森湾公司 359—60, 364, 365—6

Huguenots 胡格诺派教徒

移居外国 4, 10, 17, 141—2, 177, 297, 554, 558

路易十四对他们的迫害 118, 140—1, 184; 他们在流亡中谴责
路易十四 271

南特敕令被废除以前 139

与波舒哀商议 140

与Caisse del Conveuiony 140

Huizinga, J. 历史学家 300

Hume, David 休谟, 大卫, 哲学家 79, 90, 93

Hungary 匈牙利

哈布斯堡统治 2, 11, 15, 477

人口 22

民族反叛 195; 在韦谢莱尼之下 491—2; Kurucok造反 495—

6

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 477

土耳其统治 477, 479; 侵入皇家领地 479, 488

皇家政府 477; 农奴的状况 481

基督教居民所遭的苦难 479

奥地利的占领(1670年) 493

废止政治自由后的反新教运动(1673—1674年) 493—4

政治自由的恢复(1681年) 496

Kurucok和土耳其人的联合战役 497

特伊克自立为王 497

驱逐土耳其人 498, 517

利奥波德一世废除诸项权利和自由 498

Huron Indians 休伦族印第安人 354, 357, 367

Hurtado, Francisco 乌尔塔多, 弗朗西斯科, 建筑师 174

Huygens, Christiaan 惠更斯, 克里斯蒂安, 物理学家 51, 54—5, 62, 63, 64, 179

Hyde, Edward 海德, 爱德华, 见Clarendon 条

Hyde, Thomas 海德, 托马斯, 东方问题专家 414

Ibrahim Khan 易卜拉欣汗, 孟加拉纳瓦布 427

Ibrahim 易卜拉欣, 土耳其帕夏 497

Ibrahim 易卜拉欣, 土耳其苏丹 504—5

Ibshir Pasha 易卜西尔帕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506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在该地区的贸易, 见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和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条

In eminenti 《最高训谕》, 教皇诏书(1643年), 133

Innocent X (Giovanni Battista Pamfili) 英诺森十世(乔瓦尼·巴蒂斯塔·庞菲利), 教皇 124

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125, 460, 464

和葡萄牙的关系 129

与扬森派教义 130

诏书《适逢》 133

Innocent XI (Benedetto Odescalchi) 英诺森十一世(贝内代托·奥特斯卡尔奇), 教皇 124

对扬森派教义的态度 130, 135, 138; 对寂静派教义的态度 465; 对高卢主义的态度 465

和路易十四的冲突 135—8, 142, 465—6

与《四条教规》 137, 465

组织神圣联盟 465, 471, 498, 514

Innocent XII (Antonio Pignatelli) 英诺森十二世(安东尼奥·皮尼亚泰利), 教皇 138

Inns of Court, London 伦敦四法学院 323

Inter Multiplices 《纷繁之间》，教皇公函 138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国际惯例及其形成 200—6

Iosif 约瑟夫，莫斯科宗主教 589

Ireland 爱尔兰 24

叛乱 188, 307—8

复辟时期的解决方案 307—8

与《航海条例》 328

Irene 伊林娜，沙皇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的姐妹 572

Iroquois confederacy 易洛魁联盟 338, 362, 366, 368

和法国人之争的战争 354, 355, 365, 367

Italy 意大利

人口的相对规模 3, 246; 瘟疫、战争和饥荒对意大利的影响 20, 22, 466—7

社会经济状况：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25, 194; 城镇的衰落 467; 农业停滞不前 467; 地产僵化不变 467; 贵族对土地的态度 468; 社会结构 468; 17世纪后期经济恢复缓慢 468; 统治家族的腐朽 469; 意大利各邦缺乏内部政策 469

工商业的衰落 26, 463, 467

艺术和科学 48—9, 149—60; 不能保持传统水平 468—9

教廷和法国的关系 138, 464—6

在亚洲的传教活动 405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 458

西班牙帝国主义与法国帝国主义在意大利对立 458—61, 470—1; 干涉内部冲突 459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458

凯拉斯科条约 458, 459, 460

法国的领土野心 460, 471—3

与比利牛斯条约 461

教皇权力的衰落, 见Papacy条

Jagellon dynasty 亚盖隆王朝 560

Jager, Herbert de 贾格尔, 赫伯特·德, 语言学家 415

Jamaica 牙买加 334—5

James II 詹姆士二世, 英国国王(约克公爵詹姆士) 12, 118

与君权神授 118

与自治市 189, 317

与路易十四 199

圣公会舆论的离异 221

改信罗马天主教 311

第二次婚姻 311—12

公众对他的怀疑 313

与《排斥法案》 316—17

作为查理二世的副手 317

与下院 320

与地方政府 320

与殖民事务 332, 333; 由查理二世授予新尼德兰 338; 关于新泽西的争执 340, 341; 与威廉·佩恩 342; 登基后的殖民政策 343

Janissaries, corps of 禁卫军团 501—2, 506, 507, 509, 513, 516

Jansen, Cornelius, bishop of Ypres 扬森, 科内利乌斯, 伊普尔主教 132

Jansenism 扬森派教义 123, 129, 416
法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中关于扬森派教义的危机 132—6, 464
帕斯卡和扬森派教义 133, 252
Janssens, Pieter 扬森斯, 彼得, 画家 166
Japan 日本 398, 402, 406, 407, 408, 418
Java 爪哇 16, 398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 417, 418, 423—4, 428
Jeanne-Baptiste 让娜—巴蒂斯特, 萨伏依—内穆尔公主 472
Jeffreys, George 杰弗里斯, 乔治, 英国高等法院院长 317
Jeffreys, Herbert 杰弗里斯, 赫伯特, 弗吉尼亚总督 348
Jesuits 耶稣会士
与笛卡儿主义 63
教皇至上主义观点 124, 131
传教与教育活动 129, 413; 在中国 85, 406, 408, 409, 412—43, 414; 在北美 358;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 378; 在巴西 397; 在印度 404, 408—9, 在暹罗 405—6; 在日本 407, 408
和扬森派及其他教派的争端 132, 133, 407—8, 408—9
与“天主教阴谋” 314
与绘制亚洲地图 412, 413
被威尼斯重新接纳 463—4
在哈布斯堡领地的活动 481—2, 483, 493
Jews 犹太人, 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
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自由 143
受到大选侯欢迎 443
John IV 若昂四世, 葡萄牙国王 129, 388, 389, 394—5, 397

John Casimir (Vasa) 扬·卡西米尔(瓦萨), 波兰国王
486, 491, 547, 568

逃亡与返国 487, 567, 574

退位 562, 564

试图改革 563—4

John Frederick 约翰·腓特烈, 汉诺威公爵 127, 145, 454

John George II 约翰·乔治二世, 萨克森选侯 451

John George III 约翰·乔治三世, 萨克森选侯 514

John Philip 约翰·腓力, 美因茨大主教, 选侯 见Schönborn
条

John Sigismund 约翰·西吉斯蒙德, 勃兰登堡选侯 125, 544

John III Sobieski 扬三古·索比斯基, 波兰国王

路易十四外交与扬·索比斯基 208, 496

与解救维也纳 220, 465, 497, 514, 516, 570

和利奥波德一世的全盟 497

霍廷战役得胜 512, 561, 569

作为一个统治者 561, 570, 576

改革的企图 564

1673年后的对外政策 569—70

与波兰和俄国之间的“永久和平” 576

John William 约翰·威廉, 诺伊堡宫伯, 后为巴拉丁选侯
452, 561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塞缪尔作家 262

Jolliet, Louis 若利埃, 路易, 五大湖地区与密西西比河的探
查者 357—8, 358—9, 364

Jones, Inigo 琼斯, 伊尼戈, 建筑师 170

Jonge, Moses Jacobson de 容格, 摩西·雅各布森·德, 大选侯庇护下的犹太商人 443

Jordaens, Jakob 约尔丹斯, 雅各布, 画家 165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皇帝 474, 484

Juan José de Austria 胡安·何塞(奥地利的),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私生子 370, 374, 380, 383

Jülich and Berg, duchies of 于利希和贝格公爵领地 431, 442, 449, 544, 547

Jung, Joachim 容, 约阿希姆, 哲学家 84

Jurieu, Pierre 朱里厄, 皮埃尔, 神学家 102

Juvarra, Filippo 尤瓦拉, 菲利波, 建筑师 159

Kaempfer, Engelbrecht 肯普弗, 恩格尔布雷希特, 医生和旅行家 410, 411

Kalckstein, Christian Ludwig von 卡尔克斯泰因, 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 普鲁士的亲波兰派首领 549

Kalf, Willem 卡尔夫, 威廉, 画家 166

K' ang-hsi 康熙, 中国皇帝 408, 409, 416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纽尔, 哲学家 85, 92

Kapudan Pasha 卡普丹帕夏, 奥斯曼帝国海军统帅 503

Kara Mustafa Pasha 卡拉·穆斯塔法帕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497, 498, 512—17

Kardis, Treaty of 卡尔迪斯条约 527, 575

Kedainiai, Treaty of 凯代尼艾条约 567

Kehl 凯尔 448

Keigwin, Richard 凯格温, 理查德, 在孟买的英军指挥官 425

Kemény, János 凯梅尼, 亚诺什, 特兰西瓦尼亚的司令官
487, 489, 509

Kent 肯特郡, 该郡的工业 324, 325

Kepler, Johann 开普勒, 约翰, 天文学家 324, 325

Keswick 凯西克, 该地的铜矿 53, 54, 55, 56, 73

Keyser, Willem de 凯泽, 威廉·德, 雕塑家 169

Kircher, Athanasius 基歇尔, 阿塔纳修斯, 哲学家 84

《中国图解》 412

Kneller, Sir Godfrey 克内勒, 戈弗雷爵士, 画家 171

Knyff, Leonard 克尼夫, 列昂纳德, 画家 171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441, 442, 556

抵抗腓特烈·威廉的统治 442, 547, 549—50

Königsegg, Leopold Wilhelm 柯尼希塞格, 利奥波德·威廉,
神圣罗马帝国副宰相 493

Köprülü, Fazıl Ahmed Pasha 柯普律吕·法泽尔·艾哈迈德帕
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489, 490, 492, 509, 510, 511, 512

Köprülü, Mehmed Pasha 柯普律吕·穆罕默德帕夏, 奥斯曼帝国
宰相

他的政策和改革 462, 487, 507—8, 509

与拉科齐的各次战役 487, 488—9, 508—9

去世 489, 509

粉碎小亚细亚的叛乱 508

在达达尼尔海峡获胜 508

Köprülü, Mustafa 柯普律吕·穆斯塔法, 奥斯曼帝国宰相
498, 499

Kösem 克塞姆, 易卜拉欣苏丹的母后, 504, 505, 518

Kollonitsch, Leopold 科隆尼奇, 利奥波德, 维也纳新城主教
493—4

Koniáš, Antonín 科尼阿什, 安东宁, 耶稣会士 482

Koninck, Philips 科宁克, 菲利普斯, 画家 166

Korea 朝鲜 412

Kučuk, Mehmed 库楚克, 穆罕默德, 土耳其指挥官 489

Kyzyl Elma 《红苹果》 511, 513

La Barre, Antoine Lefebvre de 拉巴尔, 安托万·勒菲弗尔·
德, 加拿大总督 363, 364—5

La Bruyère, Jean de 拉布里耶尔, 让·德, 著作家和翻译家
91, 253, 254

《品格论》 265

La Chaise, François de 拉雪兹, 弗朗索瓦·德, 路易十四的
忏悔神父 140

La Chesnay, Aubert de 拉舍纳, 奥贝尔·德, 与加拿大的扩展
363—4

La Court, Pieter de 拉库尔特, 彼得·德, 经济学家 45,
279, 402

La Cruz, Sor Junana Inés de 拉克鲁兹, 索尔·胡安娜·伊内
斯·德, 378

La Fayette, Madame de 拉斐德夫人, 与拉罗什富科 264

La Fontaine, Jean de 拉封丹, 让·德, 诗人 5, 245, 248,
265, 273

《寓言诗》 266—8

《普叙赫的爱情》 267

La Forge, Louis de 拉福热, 路易·德, 笛卡儿主义哲学家
78

La Fosse, Charles de 拉福赛, 夏尔·德, 画家 175

Laguerre, Louis 拉盖尔, 路易 画家 171

Lairesse, Gérard 莱勒塞, 热拉尔, 画家 165, 166

Lambert, John 兰伯特, 约翰, 陆军将官 301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拉美特利, 朱利安·奥弗雷·德, 唯物主义哲学家 89

Lanfranchi, Francesco 兰弗朗奇, 弗兰西斯科, 建筑师 150

Lanfranco, Giovanni 兰弗兰科, 乔凡尼, 画家 150, 151, 152

Langetti, Giambattista 兰杰蒂, 詹巴蒂斯塔, 画家 150, 155

Languedoc 朗格多克, 其特权 237

Lapide, Hippolythus a 拉皮德, 希波利撒·阿, 历史学家 433

La Reynie, Nicolas-Gabriel de 拉雷尼, 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德, 警察总督 187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拉罗什富科公爵, 弗朗索瓦, 《格言》作者 6, 91, 264—5

La Rochelle 拉罗舍尔 140, 141

La Salle, Robert Rene de 拉萨尔, 若贝尔·勒内·德, 五大湖地区与密西西比河的探查者 358, 362

Latin 拉丁语

作为国际语言 51, 199

被法语取代 206, 254

Latitudinarianism 无主见派教义 91, 123, 147

LaTour, George de 拉图尔, 乔治·德, 画家 161, 250

Lauderdale, John Maitland, sencond earl of 劳德代尔伯爵
(第二代), 约翰·梅特兰, 苏格兰枢密院大臣 308

Laval-Montmorency, Francois Xavier de 拉伐尔—蒙莫朗西,
弗朗索瓦·沙勿略·德, 在加拿大的法国高级教士 361

Lavardin, H.C.de Beaumanoir 拉瓦尔丹, H.C. 德. 博马努瓦
尔, 路易十四在罗马的大使 138, 465—6

Lavissee, Ernest 拉维斯, 欧内斯特, 历史学家 208

Lebrun, Charles 勒布伦, 夏尔, 画家和建筑师 5, 150,
151, 162, 171, 249

作为戈布兰工场管理人的权力 5, 161

与凡尔赛宫的装饰工程 163, 164, 250

Le Camus, Étienne 勒卡米, 艾蒂安, 格勒诺布尔主教 140,
141, 142

Leeds, Tnomas Osborne, duke of 利兹公爵, 托马斯·奥斯
本, 国务家 315, 329

Leeuwenhoek, Antoni van 列文虎克, 安东尼·范, 动物学家和
显微镜学家 51, 68, 69—70

Leeward Islands 背风群岛 335, 356

Leganés, marquis of 莱加内斯侯爵, 西班牙陆军将领 394

Leghorn 里窝那 22, 26, 467

Legros, P. 格勒罗, P., 雕塑家 156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茨, 戈特弗里德·威廉,
科学家和哲学家 49, 73, 81, 87, 111, 415

对牛顿的批评 72

地位和影响 74, 85—6, 95, 96, 127

哲学理论 77, 78, 83—6

与洛克 87, 92

与培根 88

政治著作的背景 114—16

与和平运动 116—17, 145—6

与波舒哀的通信 116, 146

与汉诺威宫廷 454

与普鲁士宫廷 557

Leiden 莱顿 13, 20, 41, 282

Leipzig 莱比锡 20, 21, 27, 195, 434, 441, 553

莱比锡博览会 437, 442

Lely, Sir Peter 莱利, 彼得爵士, 画家 150, 171

Le Nain, Antoine, Louis, and Matthieu, brothers
勒南兄弟, 安托万, 路易和马蒂厄, 画家 152, 250

Le Nôtre, André 勒诺特尔, 安德烈, 路易十四的王家工程总管
163, 250

Lenzen 伦岑, 该地的税卡 441, 533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皇帝

对帝国地位的态度 140, 432, 475

路易十四在移归权战争前努力确保其中立 211; 秘密条约
213, 215, 491; 路易十四入侵巴拉丁领地后与法国决裂 220—1,
494

与法荷战争 215; 和勃兰登堡选侯的条约 217—18; 加入奥格
斯堡条约 220, 494

与“选举条款” 216, 431, 446

选帝 431, 450, 486, 487

与梅克伦堡三级会议 455

思想情趣 474, 481—2

在普雷斯堡和布拉格加冕 486；在法兰克福加冕 487
援助波兰反对瑞典 486—7, 522
对匈牙利的无效援助 488—9
得到反土耳其的基督教各国援助（1663年） 490, 510—11；
（1683年） 497, 514, 516
缔结沃什堡和约 490, 511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利盖 491
和尼德兰、西班牙、勃兰登堡、不伦瑞克及萨克森缔结同盟 494
与波希米亚的农民 494—5
恢复匈牙利人的自由权 496
和特克伊休战 497
和扬·索比斯基的同盟 497
维也纳获解救后的至高地位 497—8
匈牙利王位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 498
与同土耳其的最终和平 499
从维也纳出逃 515
和丹麦的同盟
和勃兰登堡的密约 554
Leopold William 利奥波德，威廉，皇帝斐迪南三世之弟，布雷
斯劳与奥洛莫乌茨主教，西属尼德兰总督 484
Leslie, Walther 莱斯利，瓦尔特，奥地利将军 496
LeSueur, Eustache 勒絮尔，厄斯塔什，画家 152, 161
Le Tellier, Maurice 勒泰利耶，莫里斯，大主教 136, 137
Le Tellier, Michel 勒泰利耶，米歇尔，法国国务家 136,
183, 215, 222, 234

Leti, Gregorio 莱蒂, 格雷戈里奥, 反教士煽动者 466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益智趣文》, 关于亚洲的百科全书 414

Lettres Provinciales (Pascal) 《致外省人书简》(帕斯卡著) 133, 255—6

Le Vau, Louis 勒沃, 路易, 建筑师 151, 160, 163, 249

Liège 列日, 主教区 206, 215

Lille 里尔, 该地对路易十四入侵的抵抗 212

Limberg, Andreas 林贝格, 安德烈亚斯, 维也纳市长 515

Linnaeus (Karl von Linne) 林奈(卡尔·冯·林耐), 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 71, 411

Linschoten, Jan Huyghen van 林索登, 扬·惠更·范, 旅行家 413

Linz, Treaty of 林茨条约 484

Linonne, Hugues de, marquis de Berny 利奥纳, 于格·德, 德贝尼尔侯爵, 法国国务家 134, 215, 222, 492

Lisbon 里斯本 384, 387

里斯本条约 382

Lisola, François Faul de 利索拉, 弗朗索瓦·德, 奥地利外交家 475, 491, 498

Lithuania 立陶宛, 见Poland条

Livonia 立窝尼亚 436, 521, 537, 566

Lloyd's coffee-house 劳埃德咖啡馆 323, 399

Lobkowitz, Prince Wenzel 洛布科维茨亲王, 文策尔, 帝国宫廷会议主席 475, 485, 491, 493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哲学家 10, 12, 72, 73, 85, 95

马勒伯朗士的批评者 78
与莱布尼茨 86
《政府论》 91—3, 119—21
哲学观点 91—4
与菲尔默的《旅长》 105, 106
阿明尼乌派与洛克 142
宗教宽容理论 147
论法国 223, 230, 233, 238, 243
与卡罗来纳“基本法” 344
Loen, Hohann Michael von 莱昂, 约翰·米夏埃尔·冯, 作家
439
Loire, ehâteaux of 卢瓦尔宫 249
Lombardy 伦巴第 468
London 伦敦
瘟疫在该市的暴发流行 20
人口 23, 246, 323
贸易都市 24, 27, 322
伦敦大火灾 169, 323
雷恩修建的各个教堂 169—70, 323—4
在查理二世治下 322—4
与威斯敏斯特有别 322
咖啡馆 322—3, 399
海上保险与火灾保险中心 323
黄铜器制造业 325
Long Island 长岛 339, 340, 356

- Long, Samuel 朗, 塞缪尔, 牙买加议长 335
- Longhena, Baldassare 隆盖纳, 巴尔达萨雷, 建筑师 149
- Longueville, Madame de 隆格维尔夫人, 扬森派的支持者 135
- Lorraine, Claude Gelée 洛林, 克劳德·热莱, 画家 149, 250
- Lorraine, duchy of 洛林公爵领地, 路易十四提出的该地占有权 209, 215
- 诸洛林公爵, 见Charles IV; Charles, Prince of 诸条
- Loth, Johann Karl 洛特, 约翰·卡尔, 画家 150
- Loudun 卢丹 141
- Louis, Dauphin of France 路易, 法国王太子, 为他作的《训谕》 8—9, 97—9
- Louis XIII 路易十三, 法国国王 47, 207, 222
- Louis XIV 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
- 作为专制君主: 1661年亲政 2, 222, 233—4, 248; 他的国王概念 6—7, 9—10, 97—9, 103; 选择廷臣以及对他们的态度 6, 222—3, 234—5, 244; 《回忆录》 6, 8—9, 97—9, 182, 214; 与国家概念 98, 122, 181—2; 通过成套的礼仪行使权力 183—4, 225, 239—40; 将法国王室推向权力巅峰 187, 244—5; 他那种形式的一人政府的运行, 见France条内社会结构与行政分条
- 与艺术: 5, 248—51, 256, 270—1; “路易十四风格” 5, 159, 161, 163; 邀请贝尔尼尼设计卢浮宫 150—1
- 性格与外貌 6, 9, 208, 233
- 与陆军 7—8, 176
- 外交与对外关系: 其中心目的8—9, 206—8; 侮辱西班牙政府 9, 210; 和萨伏依的关系 10, 469—70, 471—3; 在移归权战争中 14, 211—12, 213, 382, 491; 在法荷战争中 14, 215—19, 292—6; 对保卫维也纳的态度 15, 220, 490, 511; 任命外交代表 198—

9, 208; 在外交中使用金钱 199—200, 208, 211, 310, 554; 忽视宣传 208; 缔结蒙特马尔条约 209; 与德意志各邦 211, 216—17, 218, 221, 431; 对议会制和共和制政权的态度 214; 缔结多佛条约 217, 292, 310; “收复属地政策” 219—20, 554; 同意雷蒂斯堡休战协议 220; 在英荷战争中 309; 和西班牙公主结婚的解决方案 381; 和暹罗互换大使 405—6; 派遣耶稣会科学家去中国 406; 对墨西哥、卡萨莱和热那亚的政策 470—1; 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关系 528, 529, 530, 538, 539—40, 541

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迫害韦尔多派 10, 472—3; 和罗马教廷冲突的基础 130; 对高卢主义的解释 131; 入侵教皇国 (1664年) 134, 120, (1684年) 464; 要求亚历山大七世支持反对扬森派 134, 136; 和英诺森十一世就国王俗权和国王教权的冲突 135—8; 召集1681年教士大会 136; 使教海四条教规成为强制性的 137; 与外交豁免权问题 138, 464; 撤销关于四条教规的命令 138; 反新教措施 140—1; 迫害胡格诺派 140—1, 297; 废除南特敕令 220, 297

作为科学的赞助人 51

海上政策: 打击海盗的措施 201; 专注于海军致敬问题 201—3; 海事法令 203, 205; 《论捐税》 204; Droit de Cloches 204; 互换领事 204—5

对北美殖民的态度 355, 356, 359

Louis XVI 路易十六, 法国国王 246

Louis, margrave of Baden 路易, 巴登侯爵 15, 475, 499

Louis Maria 路易丝·玛丽亚, 波兰王后 563

Louvain, University of 卢万大学 129

Louvois, Francois-Michel Le Tellier, marquis de 卢瓦侯爵, 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利耶, 法国国务家 140, 183, 215, 219, 234, 249, 260

Louvre 卢浮宫 150—1, 157, 158, 249

Lower, Richard 洛厄, 理查德, 医生 18, 65, 66, 67

Lubomirski, George (Jerzy) 卢博米尔斯基, 乔治 (耶日), 波兰大司仪 563

Lucca 卢卡 458

Ludovisi, Niccolò 卢多维西, 尼科洛, 皮翁比诺公爵 462

Lübeck 卢卑克 20, 22, 440

Lüneburg, dukes of 诸吕讷堡公爵 431, 442, 529, 540

Lugo, see of 卢戈, 教区 128

Luisa 路易莎, 葡萄牙太后 395

Lully, Giambattista 吕里, 詹巴蒂斯塔, 路易十四的乐长 264, 272, 469

Lund, Treaty of 隆德条约 530

Lusatia 卢萨蒂亚 453, 476

Lutheranism 路德派教义

加尔文派教义与路德派教义的敌对 122, 126—7

Luxembourg, François-Henri de Montmorency, duc de 卢森堡公爵, 弗朗索瓦—亨利·德蒙莫朗西, 法国元帅 3

Luxemburg 卢森堡 20, 212, 220

Lyon 里昂 139, 204, 246, 282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7, 218, 219

Macao 澳门, 在该地的葡萄牙人居留地 384, 418

Macedo, Sousa de 马塞多, 索萨·德, 葡萄牙国务家 395, 396, 397

Madeira 马德拉 386

Maderno, Carlo 马代尔诺, 卡洛, 建筑师 149

Madrid 马德里 22, 173, 376

Maes, Nicolaes 马斯, 尼古拉斯, 画家 167

Maetsuycker, Johan 马策伊克, 约翰, 荷属东印度总督 422, 423

Magalhães, Pedro de 麦哲伦, 佩德罗·德, 葡萄牙陆军将领 395

Magdeburg 马格德堡

人口 20—1, 435, 437

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436—7

勃兰登堡的一个领地 442, 544

胡格诺派与加尔文派的迁入 551

税收 556

Maidalchini, Olimpia 马伊达尔基妮, 奥林匹亚, 教皇英诺森十世的嫂嫂 464

Maine 缅因 330, 351, 353

Maintenon, Françoise d' Aubigné, Marquise de 曼特农女侯爵, 弗朗索瓦·德奥比涅, 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140, 259, 260

Mainz 美因茨, 选侯领地 431, 448

美因茨大主教、选侯, 见Schönborn, John Philip von条

Maitland, John 梅特兰, 约翰, 见Lauderdale条

Malabar coast 马拉巴尔海岸 398, 404, 419, 424, 425

Malebranche, Nicolas 马勒伯朗士, 尼古拉斯, 笛卡儿主义哲学家 77, 78—9, 80

Malirsky, F. S. 马利尔斯基, F. S. 经济评论家 481

Malpighi, Marcello 马尔皮基, 马尔塞洛, 生理学家 51, 66, 68, 69, 411, 468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该地的棉纺织业 326

Mandeville, Bernard 曼德维尔, 贝尔纳, 哲学家和讽刺散文家
182—3

Manhattan island 曼哈顿岛 338, 339, 356, 357

Mansart, François 芒萨尔, 弗朗索瓦, 建筑师 160

Manuel, Dom Sancho 曼努埃尔, 董·桑绍, 葡萄牙陆军将领
394, 395

Manzano, Ramos del 曼萨诺, 拉莫斯·德尔, 律师 383

Maratti, Carlo 马拉蒂, 卡洛, 画家 149, 154—5, 156

Marca, Pierre de 马卡, 皮埃尔·德, 图卢兹大主教 133

Marcello, Lorenzo 马尔切罗, 洛伦佐, 意大利舰队总司令
462

Mare Clausum (Selden) 《闭海论》(塞尔顿著) 203

Mare Liberum (Grotius) 《公海自由论》(格劳秀斯著)
201, 203

Maria Anna of Austria 玛丽亚·安娜(奥地利的), 西班牙王
后 380

Maria Anna of Neuberg 玛丽亚·安娜(诺伊贝格的) 西班牙
王后 381

Maria Luisa of Orleans 玛丽亚·路易莎(奥尔良的) 西班牙
王后 381

Marialva, marquis of 马利亚尔瓦侯爵, 葡萄牙国务家 396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利莎, 路易十四之妻, 法国王后
132, 381

对西属尼德兰的权利要求 210—12

Marie Françoise 玛丽·弗朗索瓦, 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之
妻, 后为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之妻 129—30, 396

Marillac, René de 马里亚克, 勒内·德, 普瓦图按察使

Mariotte, Edmé 马略特, 厄行梅, 物理学家 62

Mark, county 马克郡

腓特烈·威廉对该郡的治理 196—7, 547—8

税收 546, 566

Marquette, Father Jacques 马奎特神父, 雅克, 耶稣会教士
358

Marseilles 马塞 141, 185, 201, 202, 204, 246, 467

Mary of Modena 玛丽(摩德纳的), 英国王后 311—12

Mary, Princess 玛丽公主, 查理一世之女, 威廉三世之母 278

Mary II 玛丽二世, 英国女王, 威廉三世之妻 170, 219,
296, 312, 317, 410

Maryland 马里兰 330, 339, 346

烟草贸易 327, 349

该殖民地的所有权 348—9

质询其章程的“质问令状” 351

Mascarenhas, Dom Francisco 马什卡雷尼亚什, 董·弗朗西斯
科与柑橘种植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330, 333, 334

对其他殖民地的敌意 336, 337, 338

特许状 337, 350, 351, 353

与议会专门委员会 338, 339

证明令状 350, 351

反叛 353

Mathematics 数学, 其社会应用 179

Matthias II 马提亚二世, 皇帝 484

Maurice of Nassau 莫里斯（拿骚的），奥兰治亲王 275

Max Emanuel 马克斯，埃曼努埃尔，巴伐利亚选侯 15, 475, 514

Maximilian I 马克西米连一世，巴伐利亚选侯 1, 11, 452

May, Hugh 梅，休，建筑师

Mayow, John 梅奥，约翰，医生 60, 66

Mazarin, Jules 马扎然，朱尔，红衣主教 29, 33, 134, 209, 234, 244, 249

与法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 132, 464

与扬森派教义 133—4, 464

与胡格诺派教义 139

与比利牛斯条约 208, 381

路易十四冲龄期间的政策 222, 235, 241

与帝位继承问题 431

与法国对意大利的帝国图谋 459, 460, 461

Mazzoni, Sebastiano 马佐尼，塞巴斯蒂安诺 150, 155

Mecca 麦加 500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449, 544

与三十年战争 21, 435

农民的状况 436

公爵和三级会议之间的关系 455—6

Medici, Cosimo II de' 美第奇，科西莫二世，托斯卡纳大公爵 459, 460, 469

Medici, Ferdinand II de' 美第奇，斐迪南二世，托斯卡纳大公爵 459, 460, 469

Medici, House of 美第奇家族 49, 459—60

Medina 麦地那 500

Medinaceli, duke of 梅迪纳塞利公爵, 西班牙国务家 376, 381

Medway 梅德韦, 荷兰人对该地的袭击 289, 309

Mehmed Effendi 穆罕默德埃芬迪, 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首席说明官) 517

Mehmed Pasha 穆罕默德帕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506

Mehmed IV 穆罕默德四世, 苏丹 497

在位时期 500—18

嗜好狩猎 505, 506, 509, 517—18

与围攻维也纳 497, 513, 517

Meissen 迈森

该地的瓷器制造 410, 454

迈森主教区 453

Melo, Dom Francisxo de 梅洛, 董·弗朗西斯科·德, 西班牙陆军将领 392

Mena, Pedro de 梅纳, 佩德罗·德, 雕塑家 174

Mendicant Orders 托钵修会 124, 131

Mendonça, Luis de 门东萨, 路易斯·德, 葡萄牙在东方的总督 385

Mennonites 门诺派 107, 127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概念 43—5

科尔培尔的重商主义理论 45—6, 213—14, 241

反对欧亚贸易的重商主义论据 401—2

在神圣罗马帝国 434; 在勃兰登堡 553

Merchant Adventurers 冒险商公司 28

Merseburg 梅泽堡, 主教区 453

Mersenne, Père Marin 梅森神父, 马兰, 自然哲学著作家
47, 48, 88

Messina 墨西拿

Metsu, Gabriel 梅齐, 加布里埃尔, 画家 166, 167

Metz 梅斯

梅斯主教区 209

在梅斯镇的“收复属地议事所”

Michael Feodorovich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沙皇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米开朗琪罗 (博纳罗蒂) 151,
165, 170

Mieris, Frans van 米埃里斯, 弗兰斯·范, 画家 167

Mignet, Francois Auguste Marie 米涅,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
· 马里, 历史学家 206

Milan 米兰 22, 26, 129, 458, 467

Milton, John 弥尔顿, 约翰 120, 461

Minanda, see of 米兰达, 教区 129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对该河流的探查 357, 358—9,
362, 363

Mocenigo, Lazaro 莫塞尼戈, 拉扎罗, 意大利舰队总司令
462, 506

Mocha 穆哈 399, 418

Mohawk Indians 莫霍克族印第安人 354, 355, 357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lière (J.B.Poquelin) 莫里哀 (J.B.波克兰), 剧作家
5, 245, 249, 255, 266, 274

《可笑的女才子》 248, 256—7

《伪君子》 256, 257—8

Molinism 莫利那派教义 416

Molinos, Miguel dé 莫利诺斯, 米格尔·德, 寂静派首领
147, 465

他的《灵修指南》 373

Moncada, Sancho de 蒙卡达, 桑乔·德, 经济学家 375, 383

Monck, George 蒙克, 乔治, 见Albemarle条

Monmouth, James Scott, duke of 蒙默思公爵, 詹姆斯·斯科
特

Monnot, P.S. 莫诺, P.S., 雕塑家 156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 米歇尔·德, 哲学家 81, 251,
252

Montbéliard 蒙贝利亚尔, 被路易十四兼并 297

Montchrétien, Antoine de 蒙克雷蒂安, 安托万·德, 剧作家
和经济学家 207

Montecuccoli, Raimondo 蒙特库科利, 雷蒙多, 奥地利将军
485, 494, 510, 514

与圣戈特哈德战役 15, 490, 511

在北方战争中 487, 488

与援助凯梅尼 489

Montespan, Fransois-Athénaïs, Marquise de 蒙特斯庞侯爵夫
人, 弗朗索瓦—阿泰纳依斯, 路易十四的情妇 223, 260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孟德斯鸠, 夏尔·
路易·德塞孔达, 哲学家 270, 416

Montijo, battle of 蒙蒂茹战役 394

Montmor, Habert de 蒙莫, 阿贝尔·德, 与法国科学院 50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141, 204, 238

Montreal 蒙特利尔 354, 356, 361, 362

Mont-Royal, fortress of 蒙罗亚尔要塞 220

Monzambano, Severinus de 蒙扎巴诺, 塞维里努·德, 普芬道夫的笔名

Mora, José de 莫拉, 何塞·德, 雕塑家 174

Moravia 摩拉维亚

与三十年战争 20, 479

农民的状况 437

政府 476—7

重新天主教化 482—3

More, Henry 莫尔, 亨利, 剑桥柏拉图派学者 48, 87, 90, 91

Morgenthau, P.H. 莫根塔勒, P.H., 经济评论家 481

Morosini, Francesco 莫罗西尼, 弗朗西斯科, 意大利舰队司令 463, 471

Moscow, city of 莫斯科城

在该城的起义 584

作为“第三个罗马” 588

其他见Russia条

Moya, Pedro de 莫亚, 佩德罗·德, 画家 173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384, 385, 388

Munster, bishop of 明斯特, 明斯特主教 211, 215, 217, 288, 293, 431, 432

明斯特会议 200, 381

明斯特条约 216, 278

明斯特城 442

Mulgrave, John Sheffield 马尔格雷夫, 约翰·谢菲尔德, 第三代伯爵, 《诗论》作者 273

Munich, town 慕尼黑镇 20, 41, 434, 435, 440—1

Murad III 穆拉德三世, 土耳其苏丹 502

Muralt, Johannes von 穆拉尔特, 约翰内斯·冯, 动物学家 67

Murillo, Blartolomé Esteban 穆利略,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 画家 150, 173—4, 383

Mustafa II 穆斯塔法二世, 土耳其苏丹 499

Nádasdy, Ferenc 纳道什德伊, 费伦茨, 匈牙利首席大法官 492, 493

Nagyszöllös, battle at 瑙吉什泽勒战役 489

Nancy 南锡 209, 215

Nansen, Hans 南森, 汉斯, 哥本哈根市长 524

Nantes, Edict of 南特敕令, 路易十四对它的态度 139

其废除 28, 118; 其他国家中对废除该敕令的反应 10, 220—1, 554; 废除该敕令后出自法国的移民 23, 41, 297; 路易十四废除该敕令的动机 140

Naples 那不勒斯 20, 22, 29

各艺术和雕塑学校 150, 156

知识活动 468, 469

与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权势 129, 458

Narragansett 纳拉甘西特

河流 336

部落 350

分区 351

Natural law 自然法 104, 106, 110, 111—12

Naumburg, bishopric of 瑙姆堡, 主教区 453

Naverre 纳瓦拉 379

Neer, Aert van der 内尔, 阿尔特·范·德尔, 画家 166

Netherlands, Spanish 西属尼德兰 22, 26, 129, 447

艺术 165, 168

与“无害通行” 205—6, 215

与移归权战争 210—13, 447

Netherlands, United Provinces of 尼德兰联合省, 见Dutch Republic条

Netscher, Caspar 内彻, 卡斯珀, 画家 167

Neuburg, Counts Palatine of 诺伊堡宫伯 431, 451, 544, 560, 564

Neuhäusel, fortress of 诺伊豪塞尔要塞 489, 490, 510, 511

Neutrality, institution of 中立制度 205—6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 见New York条

Newcastle 纽卡斯尔, 该地的煤炭外运 325

New Castle 纽卡斯尔(宾夕法尼亚境内) 346, 347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330; 另见Constituent colonies条

Newfoundland 纽芬兰, 与英国的贸易 327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 330, 351

New Haven 纽黑文 330, 337

New Jersey 新泽西 309, 339—41, 351

Newmarket 纽马基特 315

New Netherland 新尼德兰 289, 330

将该地区授预约克公爵詹姆士 338—9

英国征服该地区 339

该地区的丧失和收复 340

此后的政府 340—3

Newport 纽波特, 新英格兰居民点 336

Newton, Sir Isaac 牛顿, 伊萨克爵士, 科学家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53, 56, 57, 63—5

作为一名数学家 54, 55—6, 62

作为一名机械论哲学家 56—7, 60, 64—5

化学实验 59, 60

与光的发散理论 61—2

New York 纽约 (初为新阿姆斯特丹)

其建立 16

被英国占领 16, 309

被荷兰重新夺取, 然后复归英国 17, 340

在斯特伊弗桑特治下 338—9

英国诸总督 342—3

《豁免与自由权章程》 343, 351

与各殖民地的联合 351—2

法国获取该地的希望 367

Nicole, pierre 尼科勒, 皮埃尔, 扬森派首领 79, 139, 252

Nicolls, Richard 尼科尔斯, 理查德, 与新尼德兰的政府
339, 340, 342, 355

Nieuport 尼厄波尔, 割让给法国 211

Nikon 尼康, 莫斯科宗主教 586—9

Nithard, Eberhard 尼塔尔, 埃贝哈德, 耶稣会教士 128, 380

Norris, John 诺里斯, 约翰, 哲学家 78

North Sea herring fishery 北海鲱鱼捕捞业 27

North, War of (1655-60) 北方战争 (1655—60) 14, 546,
554; 另见Brandenburg, Denmark, poland, Sweden诸条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 该地的煤矿 325

Norway 挪威 23, 27, 522, 525, 527

Nové Zámky 新扎姆基, 见Neuhäusel条

Nunes da Cunha, João 努内斯·达库尼亚, 若昂, 葡萄牙驻果
阿总督 406

Nuñez de Castro, Alfonso 努涅斯·德卡斯特罗, 阿方索, 社
会理论家 373

Nuremberg 纽伦堡, 帝国直辖市 22, 26, 435, 439, 440

纽伦堡条约 478

Nymegen, Peace of 尼曼根和约 204, 206, 447, 552, 553

对科尔培尔的政策的影响 38, 243

该和约的规定 219, 296—7, 382

Nys, Ernest 尼斯, 欧内斯特, 国际法史学家 200, 201

Oates, Titus 欧茨, 泰特斯, “天主教阴谋”的捏造者 314,
317, 322

Óbidos, count of 奥比杜斯伯爵, 葡萄牙驻果阿总督 397

Observation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Temple) 《联合省见闻》 (埋普尔著) 142

Ockley, Simon 奥克利, 西蒙, 东方问题专家 414

Oldenbarnevelt, Johan van 奥巴登巴内费尔特, 约翰·范, 荷兰大议政 275

Oldenburg 奥尔登堡 435

Oléron, côutmes d' 奥莱龙岛海关 201, 204

Olier, Jean-Jacques abbé 奥利埃神父, 让-雅克, 圣稣尔比斯会创建人

Oliva, Treaty of 奥利瓦条约 488, 527, 546, 552, 568—9, 570

Olivares Gaspar de Guzmán, count 奥利瓦雷斯伯爵, 加斯珀·德古斯曼, 西班牙国务家 370, 371, 374, 377

Oneida Indians 奥内达族印第安人 354

Onondaga Indians 奥农达加族印第安人 354

Oporto 波尔图 384, 387

Oratorians 奥拉托利会士 404, 407

Oratory, the, in France 法国的奥拉托利会 131, 132

Ordyn-Nashchokin, A.L. 奥丁-纳斯丁, A.L., 莫斯科宫廷大臣 573, 577

Ormonde, James Butler, forst duke of 奥蒙德公爵 (第一代), 詹姆斯·巴特勒, 爱尔兰总督 307

Oropesa, count of 奥罗佩萨伯爵, 西班牙国务家 33, 381

Osnabrück 奥斯纳布吕克

奥斯纳布吕克条约 124—6

奥斯纳布吕克会议 381

Ostade, Adriaen van 奥斯塔德, 阿德里安·范, 画家 166

Ottawa Indians 渥太华印第安人 354, 355, 367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14, 15

体制和社会的衰败 15, 502, 504, 518

和法国的关系 16, 203, 463

坎迪亚战争 130, 461—4, 504, 505, 506, 508, 510

与匈牙利: 在匈牙利的领土 477, 479; 侵入王家领土 488; 支持特克伊 497; 被逐出匈牙利 497, 517; 与特兰西瓦尼亚: 征服该地区 488—90, 508—9; 被逐出该地区 498—9

与奥地利: 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关系 488—9; 向维也纳进军 (1663年) 489—90, 510, (1683年) 497, 514—17; 沃什堡和约 490, 511, 513; 卡洛维茨和约 499

统治范围 500

宗教 500

农业和贸易 500—1

陆军 501—2, 503, 506; 在卡拉·穆斯塔法统率下 513, 515; 兵变 517—18

海军 502

政府与行政 502—3; 废黜易卜拉欣 504—5; 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与祖母之间的权力斗争 505; 宰相塔尔洪丘·艾哈迈德的统治 505—6; 柯普律吕·穆罕默德的统治 506—9; 柯普律吕·法泽尔·艾哈迈德的统治 509—12; 卡拉·穆斯塔法的统治 512—17

与波兰: 在乌克兰打仗 512, 569; 布恰奇条约 569; 霍廷战役 512, 561, 569; 卡洛维茨和约 570

Ottonelli 奥托内利, 达·科尔托纳的合作者 175

Ovens, Jürgen 奥芬斯, 于尔根, 画家 172

Overijssel 奥弗利塞尔 25, 275, 277, 293

Oviedo, see of 奥维耶多教区 128

Oxenstierna, Axel, count 乌克森谢纳伯爵, 阿克塞尔, 瑞典国务家 145, 520, 521

Oxenstierna, Benyt, Swedish statesman 乌克森谢纳, 本特, 瑞典国务家

Oxford, University of 牛津大学 48, 315, 414

Padua 帕多瓦, 帕多瓦哲学学派 89, 251

Paget, William, Lord Paget 佩吉特勋爵, 威廉, 驻土耳其政府大使 499

Palamedesz, Anthonie 帕拉梅德兹, 安东尼, 画家 166, 167

Palatinate 巴拉丁领地

路易十四的侵入14; (1688年) 21, 220—1, 452 (1674年) 21, 452

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损失 21, 435

宗教 125, 126, 433, 445, 452

在选侯查理·路易治下的局部复兴 451

诺伊堡分支继承巴拉丁选侯位 451—2

在天主教选侯约翰·威廉治下 452

palatinate-Neuburg 巴拉丁—诺伊堡 450

Palatinate-Zweibrücken 巴拉丁—茨韦布吕肯 538, 541

Palermo, battle of 巴勒莫战役 296

Palladio, Andrea 帕拉第奥, 安德烈亚, 建筑师 170

Papacy, the 罗马教廷

道义和政治威望的衰落 124, 461, 464—6

和西班牙当局的摩擦 129, 406

和葡萄牙的关系 129, 394, 406—7

任命教廷大使 198

和法国的关系, 见Louis XIV条

兼并政策 460

Paracelsus 帕拉切尔苏斯, 医生和炼金术士 59, 65

Paris 巴黎 21, 50, 223

人口 23, 246

神学界 131

作为一个艺术中心 155, 161, 175

城市规划 164, 187

巴黎最高法院, 与检查制 248

咖啡馆 399

“国王花园” 411

Parkinson, John 帕金森, 约翰, 药剂师和草药医生 70

Parodi, Filippo 帕罗迪, 菲利波, 雕塑家 156

Parthenios III 帕森尼奥斯三世, 东正教会总主教 507

Pascal, Blaise 帕斯卡, 布莱兹, 科学家和数学家 6, 18, 47, 77—8, 90

和扬森派教义的联系 133, 252

《论思维》的影响 252—3

《致外省人书简》 133, 255—6

paternae charitati 《父亲的爱心》, 教皇诏书 137

Patkul, Johann Reinhold 帕特库尔, 约翰·赖因霍尔德, 立窝尼亚贵族 537

Pavillon, Nicolas 帕维隆, 尼古拉斯, 阿莱特主教 135

Pázmány, Péter 帕兹马尼红衣主教, 彼得, 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 484

Pedro, brother of Afonso VI of Portugal 佩德罗, 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之弟, 后为佩德罗二世 129, 395, 396, 397

Peirce, Benjamin 皮尔斯, 本杰明,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84

Pellisson, paul 佩利松, 保罗, “改宗基金”主管官员

Penn, William 佩恩, 威廉, 教友派首领 341—2, 346—7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346—7, 351

Penya, Feliu de la 庞亚, 费利乌·德·拉, 历史学家 374, 383

Pepper, trade in 胡椒贸易 398, 418, 419, 421, 424

Pepys, Samuel 佩皮斯, 塞缪尔, 作家 51, 170, 309, 332

Perier, F. 佩里埃, F., 科学家 47

Permoser, Balthasar 佩尔莫泽尔, 巴尔塔瑟尔, 雕塑家 172, 174

Pernambuco 伯南布哥 385, 387

Perpignan 佩皮尼昂, 在该地的领事 204

Perrault, Claude 佩罗, 克劳德, 医生和建筑师 67, 151, 411

Peter I, the Great 彼得大帝一世, 沙皇, 14, 198, 456, 475

Petiver, James 佩蒂弗, 詹姆斯, 植物学家 411

Petty, Sir William 佩第, 威廉爵士, 医生、发明家和经济学家 45, 180

Phaulkon, Constant 帕夫尔孔, 康斯坦特, 在暹罗的希腊冒险家 405

Philadelphia 费城

Philip 菲利普，万帕诺亚格族印第安人之王 350

Philip IV 菲利普四世，西班牙国王 9, 14, 26, 210, 211, 381

货币政策 34

限制教会财富和权力的措施 128

为守卫维也纳提供的援助 490

Philip William 菲利普·威廉，诺伊堡宫伯，于利希和贝格公爵 211, 431, 449, 450, 560

Philippe II 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 236

Philippines 菲律宾 407

Philippsburg 菲利普斯堡 448

Philosophy 哲学 73—95; 另见individual philosopher

Piedmont 皮埃蒙特

对该国韦尔多派新教徒的讨伐（南特敕令废除后）10, 472,（1665年）460—1; 韦尔多派的“荣归”472—3法国占领 459

在查理·埃曼努埃尔二世治下该国的改革 469—70

Pierce, Edward 皮尔斯，爱德华，雕塑家 171

Pietism 虔敬派教义 123

Piles, Roger de 皮莱，罗歇·德，艺术理论家 175

Pineda, Bernardo Simón de 皮内达，贝尔纳多·西蒙·德，建筑师 174

Pisa, Treaty of 比萨条约 134

Pits, Jacob 皮茨，雅各布，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 422

Plymouth 普利茅斯，新英格兰殖民地 330, 337, 350, 351

Pococke, Edward 波科克，爱德华，研究阿拉伯的学者 414

Pöppelmann, M. Daniel 柏培尔曼，M. 达尼埃尔，建筑师 159

Poitiers 普瓦捷 141

Poitou 普瓦图，该地的新教教堂被毁 140

Poland (-Lithuania) 波兰（—立陶宛）

在三十年战争后 20, 21

与瑞典：战争（1655—1660年） 21, 286, 486—7, 521, 566—8；奥利瓦和约 488, 527, 568—9, 575

人口 22, 559, 565

农业 23, 436, 480, 565—6

社会结构：农民 25, 559, 565—6；不同种族所占的比例 559；贵族所占比重大 559—60；贵族的政治权力 560, 563

与俄国：安德鲁索沃和约 512, 565, 568—9, 575—6；“永久和平” 565, 575, 576；战争 566—7；在乌克兰打仗 568—9

与奥斯曼帝国：在乌克兰打仗 512, 569；布恰奇条约 569；霍廷战役 569；圣戈特哈德战役 570；卡洛维茨和约 570

与勃兰登堡：政策的转变 521—2, 546, 568；割让普鲁士 544, 568；华沙战役 552

君主选举制 560—1, 563—4

政府和行政：议会 560，与“自由否决权” 561—2；表决程序的改革 563—4

文学和科学 564

宗教 564—5；政治—宗教考虑 565, 572

经济衰落 565—6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petty) 《爱尔兰政治解剖》
（佩第著） 180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440, 521, 544, 552

在三十年代战争中的损失 21, 435, 436

一部分割让给瑞典 430, 519

人口 437, 438

农民 438

Pomponazzi, Pietro 蓬波纳齐, 彼得罗, 哲学家 251

Pomponne, Simon Arnaud, marquis de 蓬波内侯爵, 西蒙·阿尔诺, 法国国务家 135, 215

Port-Royal 罗亚尔港(卡罗来纳境内) 344

Port-Royal 波尔罗亚尔, 该地的西多会修道院, 扬森派教义据点 79, 132, 134, 148, 250, 269

反对该据点的措施 134, 136

帕斯卡与波尔罗亚尔 133, 252

拉辛与波尔罗亚尔 258, 259

Port Said 塞得港, 该地的法国领事馆 205

Portsmouth 朴次茅斯(德文郡境内), 查理二世在该地结婚 307

Portugal 葡萄牙

对外关系: 争取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斗争 14, 129; 荷兰人在巴西投降 331, 393, 394; 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并 392; 和荷兰的战争(1625—1661年) 392—3; 和西班牙的战争(1640—1668年) 393—4, 395; 和荷兰的条约(1661年) 394, 395; 和法国的关系 394, 395—6; 在英国内战中的态度 394; 葡英同盟 394

教会与国家: 在若昂(布拉干萨的)与佩德罗二世治下政治争端与宗教争端的结合 129—30; 宗教裁判所 388, 389; 教廷拒绝予以承认 394; 在东方的传教活动 403—4, 406, 408; 在派遣名誉主教问题上和罗马教廷的宗教——政治讨价还价 406—7; “教会赞护” 397;

农奴制的废除 194

自命为印度洋的海军霸主 201

和法国互换领事 204

海外帝国：幅员与人口 384；荷兰人侵占好望角航线384—5；王政复辟对帝国贸易的影响 385—6；荷兰人对非洲领地的压力 386；亚速尔群岛与马德拉群岛 386；帝国贸易 386—8；巴西贸易公司 388—9；“巴西商业集团” 391；“印度院” 391；“海外议会”的影响 397；诸条印度港口落入荷兰人之手 417, 418, 421

政治与政体发展：王政复辟 385；布拉干萨公爵若昂称王 398；议会制定的关于王权的正式信条 389；革命前后议会的作用 389—90；由王家会议与高等法院统治和由国王个人统治相交替 390；国务秘书处的职能 390；王家国务会议 390；国防会议与财政会议 391；“三级会议” 391；殖民会议 391；司法制度 391—2；贵族、教士和法官支配国家机器 392；若昂四世的统治 394—5；母后摄政，与阿丰索六世即位 395；阿丰索六世让位给佩德罗二世 396；王政复辟后政府的性质 396—7

经济、工业与贸易：谷物进口 386；蔬果种植 386—7；盐的输出 387；造船 387；对帝国的出口 387；价格波动 387—8；通货 387；采用贸易公司 388—9；财政委员会 388—91；行会（“20^{1/4}行”） 390, 392；王政复辟的经济方面 392

Porzia, Prince Giovanni 波尔齐亚亲王，乔瓦尼，利奥波德一世的首席大臣 475, 491

Post, Pieter 坡斯特，彼得，建筑师 168

Potsdam 波茨坦 435

《波茨坦敕令》 554

Potter, Paulus 波特，保罗斯，画家 166

Poussin, Nicolas 普桑，尼古拉斯，画家 149, 150

古典主义 151, 152, 153—4, 250

与贝洛里的理论 162

德皮莱与普桑 175

Power, Henry 鲍尔，亨利，动物学家 68

- Poyarkov 波亚尔科夫, 俄国探险家 571
- Pozzo Andrea 波茨措, 安德烈亚, 画家 154
- Prague 布拉格 478, 480, 483, 494
- Pratt, Sir Roger 普拉特, 罗杰爵士, 建筑师 170
- Pressburg 普雷斯堡 486, 498, 510, 516
- Preti, Mattia 普雷蒂, 马蒂亚, 画家 149, 155
- Prisoners 俘虏, 关于交换俘虏的国际协议 203—4
- Probabilism 或然论 148
- Providence, New England Community of 普罗维登斯, 新英格兰居民点
- Prussia, Duchy 普鲁士, 公爵领地
- 勃兰登堡对普鲁士的统治权 14, 196, 544; 对这一统治权的反对 544—5, 547, 549—50
-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25, 436
- 税收 32, 549—50, 556
- 反加尔文派的情绪 126—7, 544—5, 549
- 人口 437
- Prussia, kingdom of 普鲁士王国 454, 556—8另见Frederick I 和Frederick William I, Kings of 诸条
- Ptolemy 托勒密, 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 53, 55
- Pufendorf, Samuel von 普芬道夫, 塞缪尔·冯, 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著作家 109, 110—14
- 《论日耳曼帝国状况》 113—14, 433
- Puget, Pierre 普杰, 皮埃尔, 雕塑家 164
- Pulo-Run 普洛—伦岛, 割让给荷兰共和国 289, 309—10
- Pyrenees 比利牛斯 186

比利牛斯条约 208, 222, 287, 381, 461; 与洛林和巴尔
209; 与玛丽亚·特利莎对西属尼德兰的权利要求 210; 与西属殖民地
381; 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地位 461, 464

Quadruple Alliance 四国同盟 297

Quakers 教支派 147, 341—2, 343, 346—7

Quebec 魁北克 355, 356, 363

Quellin, Artus (the Elder) 奎林(老奎林), 阿尔特斯, 雕
塑家 168

Quesnel, Pasquier 凯斯内尔, 帕基耶, 神学家 252

Quietism 寂静派教义 123, 138, 147, 373, 465, 466

Racine, Jean 拉辛, 让, 剧作家 5, 245, 253, 266, 274

扬森派及其他影响 258—9

《菲德拉》《阿达莉》《爱丝苔尔》《伊菲革涅亚》《贝蕾妮
丝》 259—60

Radisson, Fierre Esprit 拉迪松, 皮埃尔, 埃斯普里, 与英因
赫德森湾公司 359—60, 363—4, 365, 366

Radziejowski, Hieronymus 拉济耶夫斯基, 希耶罗尼姆斯, 波
兰副首相 564

Radziwi, Janusz and Boguslaw 拉济维乌, 雅努什和博古斯拉
夫, 立陶宛显贵 567

Raggi, Antonio 拉吉, 安东尼奥, 雕塑家 155—6

Ragusa 拉古萨 214

Rainaldi, Carlo 拉伊纳尔迪, 卡洛, 建筑师 157, 159—60

Rainaldi, Girolamo 拉伊纳尔迪, 吉罗拉莫, 建筑师 157

Rákóczi, György I 拉科齐, 捷尔吉一世, 特兰西瓦尼亚邦君
478, 484, 486

Rakoczi, Gyorgy II 拉科乔, 捷尔吉二世, 特兰西瓦尼亚邦君
478, 486—7, 508, 509

Rambouillet, Madame de 朗布耶夫人, 及其沙龙 254, 256

Randolph, Edward 伦道夫, 爱德华, 驻新英格兰殖民地特派专
员

Raphael 拉斐尔, 画家 151

Ratisbon 雷蒂斯堡, 帝国直辖市 439, 440

雷蒂斯堡停战协议 220, 221, 297, 540

Raulé, Benjamin 劳勒, 本杰明, 勃兰登堡雇用的荷兰商人
553, 554

Ravensberg 拉芬斯堡 544

Ray, John 雷, 约翰, 博物学家 48, 70—1, 72

Razin, Stepan 拉辛, 斯捷潘, 顿河流域哥萨克领袖 584—5

Realism 现实主义, 艺术中的现实主义 151, 152

Rébenac, comte de 雷伯纳克伯爵, 法国驻柏林大使 451

“Red Apple” (conquest of Vienna) “红苹果” (征服维也
纳) 511, 513

Redei, Ferenc 雷代伊, 费伦茨, 特兰瓦尼亚邦君 488, 508

Redi, Francesco 雷迪, 弗朗切斯科, 动物学家 68, 71, 469

Re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la peinture (du
Bos) 《诗歌与画评论》(杜博斯著) 175

Regiminis apostolici 《传道制度》, 教皇诏书 134

Rembrandt (van Rijn) 伦勃朗(范赖恩), 画家 149, 150,
167, 300

现实主义的主要阐释者 152, 153

Restitution, Edict of 《复原敕令》(1629年) 125

Resoration 王政复辟 29, 32, 42, 102—3, 105, 301—29

Retz, Cardinal de (Jean François Paul de Gondi) 雷斯红衣主教 (让·弗朗索瓦·保罗·德贡迪) 133, 135, 207, 464

Revolution 革命, 法国革命的临近 236

Rheede tot Drakenstein, H. A. van 雷代·托特·德拉肯斯泰因, H. A. 范, 马拉巴尔的荷兰总督, 《马拉巴尔的植物园》作者 411

Rhine, League of 莱茵联盟 126, 216, 431

Rhode Island 罗得岛 330, 336, 338

普罗维登斯殖民地的建立 336

特许状 337; 质问该特许状的“责令状” 351, 353

罗得岛的教友派 346

与印第安人战争 350

Ribera, José 里贝拉, 何塞, 画家 383

Ribera, Pedro de 里贝拉, 佩德罗·德, 建筑师 174

Riccioli, Giovanbattista 里齐利, 焦万巴蒂斯塔, 天文学家 48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黎塞留公爵,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 222, 234, 235, 243, 244, 249

与海军致敬问题 202

他的政策的基础 206, 207

运用宣传 208

与凯拉斯科条约 460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204, 384, 385, 386, 387, 397

Roberval, Gilles Personne 罗贝瓦尔, 吉勒·佩索纳, 数学家 48

Rochefort 罗什福尔 40

Roemer, Olaus 勒默, 奥劳斯, 天文学家 51, 53

Rogers, Abraham 罗杰斯, 亚伯拉罕, 荷兰教士 414

Rohault, Jacques 罗奥尔特, 雅克, 物理学家 63

Romans 罗芒 224

Rome 罗马 136, 138, 149, 150, 161, 162, 464, 469

Rosa, Salvator 罗萨, 萨尔瓦特, 画家 149, 155

Roscommon, earl of 罗斯康芒伯爵, 《论译诗》 273

Roskilde, Peace 罗斯基勒和约 286, 287, 522

Roth, Hieronymus 罗特, 希耶罗尼姆斯, 哥尼斯堡的城市官员
547

Rotterdam 鹿特丹 143

Rottmayr, Johann Michael 罗特迈尔, 约翰·米歇尔, 画家
172

Rouen 鲁昂 141, 400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政治理论家 121,
269, 270

Roussillon 鲁西永(西班牙境内) 369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191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18, 45, 48, 88, 89, 91
起源与早期特征 50—1, 86
收集科学信息 180, 411, 412
“乔治克尔委员会” 324

Rubens, Peter Paul 鲁本斯, 彼得·保罗, 画家 149, 150,
161, 165, 175

Rudolph I 鲁道夫一世, 皇帝 476

Rudolph II 鲁道夫二世, 皇帝 478

Ruisdael, Jacob van 雷斯达尔, 雅各布·范, 画家 166, 167

Ruiz Almansa 鲁伊斯·阿尔曼萨, 统计家 369, 370

Rumphius, G.E. 伦菲乌斯, G.E., 植物学家, 《安汶岛植物志》 411, 413

Rupert, Prince 鲁珀特亲王 332

Rusconi, Camillo 鲁斯科尼, 卡米洛, 雕塑家 156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伯特兰, 哲学家 84, 86

Russell, William (Lord Russell) 罗素勋爵, 威廉, 英国国务家 317

Russia 俄国 14—15

人口 3, 246

对制图学的贡献 413

与瑞典: 卡尔迪斯和约 527, 575

与波兰: 安德鲁索沃和约 512, 565, 568—9, 575—6; “永久和平” 565, 575, 576; 1654年的战争 566—7, 574, 575—6; 在乌克兰打仗 568—9; 俄波接近(1646年) 572

对策涅伯河流域哥萨克的宗主权 566, 573—4

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即位时的对外关系 571

伸入西伯利亚的扩张 571—2

泛斯拉夫主义情绪 572, 577

贸易 572, 580—1

与丹麦: 王家婚姻谈判 572; 针对瑞典的进攻性同盟 574

与勃兰登堡: 安全条约 574

和西欧的接触 576—7, 590—1

要求国家创设的社会各阶级效力的国家服务事项 577; 兵役与组织 557—8; 贵族的服务 578—9; 农民的农奴状态 579—80; 城镇

中的服务阶级 580; 教士 581

行政机器: 衙门 581; 各种官职 581—2; “伏叶伏大”(督军)行使的地方行政 582—3; 吏部的建立 583; 税收 583—4

教会与国家: 修道院司 582, 587; 尼康限制专制的企图 586—7; 国家支持按照希腊模式改革俄国教会 588—9; 宗教分裂 589—90; 宗教分裂的政治影响 590—1

税收和压迫激起的在莫斯科的反叛 584; 拉辛所激励的起义 584—5

沙皇与杜马之间的均势 586

国民大会的衰落 586

Ruvigny, Henri de Massue, marquis de 吕维尼侯爵, 亨利·德马叙, 信奉新教的法国陆军将领 139

Ruyter, Michiel Adriaanzoon de 勒伊特, 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 海军将领 296, 300, 470

Rye House conspiracy 144拉伊农舍密谋

Ryswick, Treaty of 吕斯维克条约 203, 219, 272, 542

Saavedra Fajardo 萨维德拉·法哈多, 法学家 383

Sablière, Madame de 萨布利埃夫人, 与拉封丹 265—6

Sacchi, Andrea 萨基, 安德烈亚, 画家 149, 155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葡萄牙殖民地 379

Sacred Heart of Jesus, cult of 耶稣圣心崇拜 132

Saenredam, Pieter 萨恩勒丹, 彼得, 画家 166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132, 141

Saint-Cyr 圣西尔, 在该地的神学院 259, 260

Saint-Denis, battle of 圣但尼战役 296

Saint-Évremond, Charles de 圣埃夫勒蒙, 夏尔·德 272

St Germain, Peace of 圣日耳曼和约 554

St Gotthard on the Raab, battle of 拉布河畔的圣戈特哈德, 圣戈特哈德战役 15, 490, 511

St Helena 圣赫勒拿岛 425

St Jean Eudes 圣让·厄德 132

St Omer 圣奥梅尔, 割让给法国 211, 296

St Paul' 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 169—70, 323

St Peter' s, piazza of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 157

Saint-Simon, duc de 圣西门公爵, 论路易十四 6, 234

St Simon, Denis de 圣西门, 德尼·德, 声称赫德森湾属于法国 360

Saint-Sulpice, seminary of 圣稣尔比斯神学院 132, 335

St Vincent de Paul 圣樊尚·德·保罗 131—2

Salem 塞勒姆 334, 353

Salvador 萨尔瓦多, 见Bahia条

Salzburg 萨尔茨堡 435

萨尔茨堡大主教 447

Sánchez, Albornoz Claudio 桑切斯, 阿尔沃诺斯·克劳迪奥, 历史学家 382

Sandrart, Joachim 桑德拉特, 约阿希姆, 画家 172

Sao Paulo 圣保罗 384, 397

São Tomé 圣多美 384, 386, 393, 394

Sardinia 撒丁 458

Sarrazin, Jacques 萨拉赞, 雅克, 雕塑家 164

Sarre-Louis 萨尔一路易, 萨尔一路易设防区 219

Savile, George 萨维尔, 乔治, 哈利法克斯侯爵 269

Savoy Conference 萨伏依会议 143

Savoy 萨伏依, 见 Charles Emanuel II, duke of 和 Victor Amadeus, duke of 条

Saxony 萨克森 41

与三十年战争 20, 435, 453

宗教 127, 195, 433, 454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436, 437

货物税 441, 454

与法国 448

与波兰 453, 454

选侯与三级会议的关系 453—4

陆军 454

Scarlatti 斯卡拉蒂, 作曲家 469

Scarron, Paul 斯卡龙, 保罗, 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262

Schalcken, Godfried 斯沙尔肯, 戈德弗里德, 画家 167

Scheldt, river 斯海尔德河 (些耳德河)

Schlüter, Andreas 施鲁, 安德烈亚斯, 雕塑家 172, 174, 557

Schmoller, Gustav 施莫勒, 古斯塔夫, 经济学家 44

Schönborn, John Philip von 申博恩, 约翰·菲利普·冯, 美因茨大主教, 选侯 145, 216—17, 431, 442, 491

Schönfeld, Heinrich 舍恩菲尔德, 海因里希, 画家 172

Schomberg, Armand-Frédéric duc de 绍姆贝格公爵, 阿尔曼德, 弗雷德里克, 为法国效劳的陆军将领 139, 395

Schott, Caspar 肖特, 卡斯帕, 物理现象著作家 49

Schwarzenberg, Johann Adolf von 施瓦岑贝格, 约翰·阿道夫
• 冯, 帝国枢密院院长 488

Science 科学 47—72; 另见科学家个人诸条

Scotland 苏格兰

复辟后对主教制度的抵抗 144—5, 308; 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
的迫害 315, 317—18

在政体上同英国的联合 188—9

司法制度 308—9

难民逃往荷兰 309; 逃往爱尔兰 315

“高地群盗” 315

暗杀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315

德拉姆克洛格战役与博思维尔布里格战役 145, 315

抢牛者 325

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 328

Scott, John 斯科特, 约翰, 负责伸张查理二世在新尼德兰的特
派专员

Scudéri, Mademoiselle de 斯居代里小姐, 小说家 248, 262

Seckendorff, Veit Ludwig von 泽肯多夫, 法伊特·路德维希
• 冯, 德意志国务家和历史学家 196

Segovia 塞哥维亚 376

Sehested, Hannibal 塞赫斯泰德, 汉尼拔, 丹麦国务家 524—
5, 527—8, 535, 536

Seignelay, Jean-Baptiste Colbert (the younger), marquis
de 塞涅莱侯爵, 让-巴蒂斯特·科尔培尔(小科尔培尔), 法国国
务家

Selden, John 塞尔登, 约翰, 法理学家和国际法研究者 203

Seneca Indians 塞内卡族印第安人 354

Seneffe, battle of 瑟内夫战役 218

Sergeant, John 萨金特, 约翰, 哲学家 93

Serlio, Sebastian 塞里奥, 塞巴斯蒂安, 画家和建筑师 170

Severn valley 塞文河谷, 那里的水果种植 324

Sévigné, Marie d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塞维尼侯爵夫人, 玛丽·德拉比坦——尚塔尔, 著作家 6, 248, 273

论农产品价格 224

与社会地位 226, 227

论拉辛的《爱丝苔尔》 260

《书简》 268—9

Sevilla, Juan de 塞维利亚, 胡安·德, 画家 173

Seville 塞维利亚 128, 374, 376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first earl of 沙夫茨伯里, 第一代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91, 147, 306, 314—19

与第二次荷兰战争和多佛条约 310, 311, 333, 339

与“天主教阴谋” 314

流亡 317, 333

与《人身保护状修正法案》 319

在北美的殖民政策 332—3, 334, 344—5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third earl of 沙夫茨伯里, 第三代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91

Shaista Khan 什塔汗, 孟加拉纳瓦布 425—6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77, 274

Sharp, James 夏普, 詹姆斯, 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145, 315

Sheffield 设菲尔德, 冶金业中心 325

Sheldon, Gilbert 谢尔登, 吉尔伯特, 坎特伯雷大主教 143,
144

Siam 暹罗, 在该国的传教活动 405—6

Siberechts, Jan 西贝雷赫特, 扬, 画家 171

Siberia, Russian 西伯利亚 (俄国境内) 413, 571—2

Sicily 西西里 174, 458, 467

Siciński 西奇尼斯基, 波兰议会议员 561—2

Sidi, Ahmed 西迪西奇尼斯基艾哈迈德, 布达帕夏 488, 489

Sidney, Algernon 西德尼, 阿尔杰农, 英国政治家 317

Sigismund Francis, archduke 西吉斯蒙德·弗朗西斯大公, 提
罗尔邦君 476

Sigismund III Vasa 西格蒙三世 (瓦萨王朝), 波兰 (和瑞
典) 国王 527

Silanhdar Mehmed Aga 西兰达尔·穆罕默德·阿迦, 土耳其军
队指挥官 515

Silesia 西里西亚 553

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损失 20, 435

亚麻纺织业 27, 441, 442

农民的状况 437

作为波希米亚王室的部分领地 476, 477

宗教宽容 484

Silk, trade in 丝, 丝贸易 398, 399—400, 401, 418, 441

Silva, Duarte da 席尔瓦, 杜阿尔特·达, 金融家

Silva, Vieira da 席尔瓦, 维埃拉·达, 葡萄牙国务家 390,
392

Sinha 辛哈, 康提国王 417

Sioux Indians 苏族印第安人 357, 359, 362, 364, 365

Sivaji 西瓦吉, 马拉塔首领 425

Skréta, Karel 斯克列塔, 卡雷尔, 画家 482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27, 327, 385, 386, 504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477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经济学家 43, 243

Soame, Bir W. 索姆, W., 布瓦洛著作的译者之一 (和德莱顿合译) 273

Smyrna 士麦那, 在该地的法国领事馆 205

Sobieski, John 索比斯基, 扬, 见John III Sobieski 条

Socinians 索齐尼派 127, 484, 564

Sodofeita, Prior of 索多费塔修道院, 院长 129

Sofu Mehmed Pasha 索富·穆罕默德帕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505

Sokollu Mehmed 索科卢, 穆罕默德帕夏, 奥斯曼帝国宰相 510

Soleure 索勒尔, 法国驻索勒尔大使 199

Solis y Ribadeneira, Antonio de 索利斯一里瓦德内拉, 安东尼奥·德, 历史学家 383

Solórzano Pereira 索洛萨诺, 佩雷拉, 法学家 383

Sophia 索菲娅, 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的女儿 127

Sophia Charlotte 索菲娅, 夏洛特, 普鲁士王后 555, 557

Sorbière, Samuel 索尔比埃雷, 萨米埃尔, 医生和哲学家 87

Sorbonne 索邦 (巴黎大学) 248, 416

Souches, Louis de 苏谢, 路易·德, 奥地利将领 489

Souza, de 索萨, 德, 耶稣会历史学 413—14

Spain 西班牙

与葡萄牙的关系: 葡萄牙争取独立的斗争 14, 129; 被菲利普二世兼并 392; 1640—1668年的战争 393—4, 395

人口: 战争、饥馑和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 20, 22, 369—70; 人口的相对规模 207, 246, 369; 外国侨民 374—5

农业: 歉收 21, 22; 衰落 23, 376; “牧主公会” 23, 376; 大庄园 25; 驱逐摩里斯科人造成的后果 376

社会结构: 农民的地位 25, 194, 375, 376; 特权者与穷人之间的鸿沟 370; 对贵族封号的狂热追求 370, 372—3; 劳动和名誉之间的传统的不相称 370, 372, 373; 财产集中于土地贵族之手 370, 375; 对穷困者的救济 376

工业与贸易: 外国人对国内外贸易的支配 26, 375, 376—7; 普遍萧条 369; 行会与“贸易和货币委员会” 375—6

货币政策: 税收 32, 377; 使用铜币的通货膨胀时期 34, 371; 贵金属输入的减少 370; 彼此交替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371; 工资与物价两者的变动 371—2; 用金银支付进口 402

教会和国家: 教士过多 128, 370; 主教制度 128; 菲利普四世和查理治下的限制措施 128—9, 373; 宗教裁判所 128, 129, 373; 宗教宽容的缓慢出现 372; 在东方的传教活动 403—4; 对教廷传信部与派遣教皇特命代理主教的不满 406; 国王的教职人选推荐权 128, 406

艺术、文学和学问 173—4, 382—3

与法国: 海军致敬事件 202; 移归权战争 210—13; 干涉法荷战争 218; 1683年的战争 297; 比利牛斯条约 381, 461

加入奥格斯堡同盟 221

政治发展: 中央集权倾向受挫 369, 379; 贵族作为行使统治的少数的失败 372—3; 宪制结构未变 380; 在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

起义 380; 奥利瓦雷斯的倒台 380; 菲利普四世之死 380; 玛丽亚·安娜摄政 380—1; 查理二世登基 381

西属美洲: 贸易垄断的丧失与农业的衰落 377—8; 人口和社会结构 377—8; 殖民体系崩溃的原因 379

与意大利: 战略领地 458; 凯拉斯科条约缔结后的地位 459

Spandau 施潘道 435, 441

Spanish Succession, question of 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210, 491

Spankau 斯潘考, 陆军将领, 与匈牙利的“库鲁茨” 匈牙利十字军 496

Spectator 《旁观者》 399

Speelman, Cornelis 斯佩尔曼, 科内利斯, 荷兰海军指挥官 422, 423

Spener, Philipp Jakob 斯彭内尔, 菲利普, 雅各布, 寂静派首领 147

Speyer 斯佩耶尔, 帝国直辖市 434, 449

Spices, trade in 香料贸易 398, 417

Spinola, Cristobal de Rojas y 斯宾诺莎, 克利斯托瓦尔·德罗哈斯, 他争取教会统一的努力 145, 146

Spinoza, Baruch (or Benedict) de 斯宾诺莎, 巴鲁赫(或本尼迪克特)·德

以几何学方式表述伦理体系 79—80, 94, 106—7

一元论和泛神论的实体概念 80—2, 95, 107

与霍布斯 106—8

《论神学政治家》与《论政治家》 107—8

论国家的目的 107—9

与约翰·德维特的接触 108, 279

- 巴拉丁选侯查里·路易授予其大学教授职位 110
- Spree-Oder canal 施普雷—奥得运河 41, 553
- Staffordshire 斯塔福德郡, 该郡的工业 325
- Starhemberg, Count Rudiger von 斯塔勒姆贝格伯爵, 吕迪格·冯, 奥地利军队指挥官 497, 515, 516
- State, concept of 国家, 国家概念
- 路易十四的表述 98, 122
- 波舒哀的表述 100—2
- 霍布斯的表述 103—5, 109
- 菲尔默的表述 105—6
- 斯宾诺莎的表述 107—9
- 普芬道夫的表述 112, 113—4
- 洛克的表述 119—20
- 国家主权 117—18, 122
- 俄国的国家机器 577—86
- Steen, Jan 斯滕, 扬, 画家 166
- Stelluti 斯泰吕蒂, 生物学家 68
- Stendal 施滕达尔 435
- Stensen (or Steno), Niels 斯滕森 (或斯蒂诺), 尼尔斯, 博物学家 71
- Stettin 斯德丁 430, 544, 553, 554
- Stillington, Edward 斯蒂林弗利特, 爱德华, 伍斯特主教
- 93
- Strafford, Thomas Wentworth, first earl of 斯特拉福德伯爵 (第一代), 托马斯·曼特沃思 187
- Stralsund 施特拉尔松 20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帝国直辖市 20, 205

被路易十四兼并 14, 220, 297

Stuyvesant, Peter 斯特伊弗桑特，彼得，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总督 338, 339

Suleiman I (the Magnificent) 苏莱曼一世（大帝），土耳其苏丹 15, 16, 477, 497, 502, 510

Suleiman II 苏莱曼二世，土耳其苏丹 505, 518

Sumatra 苏门答腊 398, 418, 422

Sunderland, Robert Spencer, second earl of 桑德兰伯爵（第二代），罗伯特·斯潘塞，国务大臣 187

Surinam 苏里南，被割让给荷兰共和国 289

Surrey 萨里 326

Sussex 苏塞克斯 325

Svane, Hans 斯瓦纳，汉斯，主教，丹麦教士领袖 524

Swammerdam, Jan 斯瓦姆默丹，扬，动物学家 67, 68, 69

Sweden 瑞典 12

与丹麦：1657年的战争 14, 286—7, 487, 522, 568；罗斯基勒和约 287, 522, 527；布勒姆瑟布鲁和约 519；1675—1679年的战争 529；隆德条约 530—1, 539；就荷尔斯泰因—哥托普的冲突 531, 540—1；武装中立条约 541

在波罗的海地区：旨在称霸 14, 286, 519；在该地区的贸易中只占很小份额 520；在该地区的权势巅峰 527

农业 21, 22, 43

人口 23, 519

社会和政体发展：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25, 194, 534—5, 536；社会低等级的收回王室土地要求 25, 521, 532—4；为穷人和失业者的政策 42；高级贵族及其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 520—1, 530；克

里斯蒂娜女王退位 521；查理十世在位时期 521—2；摄政体制 521；采用专制政体 533—4；与丹麦的专制主义相比较 535—6；波罗的海沿岸诸省 536，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的瑞典化 537

贸易与工业：27；进出口税 39，520；商务院（1651年） 41；同荷兰缔约（1679年）的不利影响 539

经济结构：瑞典银行 30；财政措施 33；铸币 34—5；税收收入的下降 520；1679年后的财政困境 531；以恢复王家领地为基础的经济 532—5

与法国：1663年条约 38；在法荷战争中的调停活动 218；对废除南特敕令的态度 221；1672年条约 529，530；1679年后反法情绪的增长 530；瑞法接近 541

陆军：196，522，532，535—6，537；薪饷田分配制 534，535

与荷兰共和国：在法荷战争中的调停活动 218；埃尔宾条约 286；1679年和约 530，538—9；海牙条约 539

与波兰：1655—1660年的战争 286，486—7，521，566—8；奥利瓦条约 488，527，568—9，575；影响波兰国王选举的企图（1669年）560

针对不来梅的战争行动 430—1

与勃兰登堡：就德意志诸省的竞争 519，527；瑞波战争中的关系 521—2，563，567—8；费尔贝林战役 529，552；占领波美拉尼亚 529，552；1686年同盟 540，563

和俄国缔结的卡尔迪斯条约 527，575

与英国：1665年条约 528；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关系 289，528；在布雷达条约的谈判中 528；包括联合省在内的三国同盟 213，289，310

加入奥格斯堡同盟 540

在吕斯维克和约谈判中的调停活动 541—2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齐纳森，讽刺散文家 77

Switzerland 瑞士 12, 23

胡格诺派难民的涌入 141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195

与路易十四 199, 200

1815年后的永久中立 205

幸免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 435

Sydenham, Thomas 西德纳姆, 托马斯, 医生 91

Sylva (Evelyn) 《森林志》(伊夫林著) 324

Syncretism 信仰同化 123, 127

Szelepcsényi, György 塞莱普琴伊, 捷尔吉, 匈牙利首主教
493, 496

Tacca, Ferdinando 塔卡, 费尔迪南多, 雕塑家 156

Talman, William (the younger) 小托尔曼, 威廉, 建筑师 170

Talon 塔隆, 法国代理检察长 138

Talon 塔隆, 让, 加拿大按察使 356, 357—8

Tangier 丹吉尔 307

Tarhondju Ahmed Pasha 塔尔洪丘·艾哈迈德帕夏, 奥斯曼帝国
宰相 505—6

Tavernier, Jean-Baptiste 塔韦尼耶, 让-巴蒂斯特, 旅行家和
作家 413

Tchelebi, Evliya 特杰莱比, 埃弗尔亚, 旅行家 500

Tchelebi, Kâtib 特杰莱比, 卡蒂布, 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 目
录学家 500

Tea, trade in 茶叶贸易 399

Teleki, Mihaly, count 泰莱基伯爵, 米哈伊, 与“库鲁茨”
(匈牙利十字军)

Temple, Sir William 坦普尔, 威廉爵士, 在海牙的英国侨民
142, 143, 212

Tenedos 特内多斯 504, 508

Teniers, David (the younger) 小特尼尔斯, 戴维, 画家
165

Teodósio 特奥多西奥, 葡萄牙王储 395

Terbórch, Gerard 泰尔博什, 杰拉德, 画家 166, 167

Ternate 特尔纳特, 该地的苏丹 417

Thst Acts 《宣誓法》 144, 305, 311, 312

Thutonic Knights, Order of 条顿骑士团 549, 556—7

Thutsche Academi (Sandrart) 《德意志艺园》(桑德拉特
著) 172

Theatines 塞廷会士, 其传教活动 403, 404, 406

Theódon, G. B. 泰奥东, G. B., 雕塑家 156

Thirty Years War 5, 10, 17, 24, 27, 379, 545 三十年战争
战后专制主义的发展 11

人口与经济方面的后果 20—1, 437, 478—9

战时关于教会领地的争端 125

与神圣罗马帝国 430—44

与意大利 458—9, 466—8

在哈布斯堡领地 474, 476, 478—85

霍亨索伦家族从中的得益 544

Thököly, Imre 乔瑞伊, 伊姆雷, 反奥地利占领的匈牙利造反领
袖 496—7, 499, 516

Thomasius, Christian 托马西乌斯, 克里斯蒂安, 哲学家
114, 195

Thomism 托马斯主义 416

Thulden, Theodor van 蒂尔登, 泰奥多·范, 画家 165

Thuringia 图林根 20, 216, 441, 442

Tibet 西藏 412

Titian (Tiziano Vecelli) 提香 (蒂齐亚诺·韦切利), 画家
151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德, 法国国家
家 187

Toledo 托莱多, 该地的丝纺织业 376

Toleration Act 《宽容法》 147

Tomé, Narciso 托梅, 纳尔奇索, 建筑师 174

Torbay 托贝 246

Torre, Raffaele della 托雷, 拉法埃莱·德拉, 热那冒险家
470

Torrecusa, marquis of 托雷库萨侯爵, 西班牙陆军将领 394

Torricelli, Evangelista 托里拆利, 埃万杰利斯塔, 物理学家
49

Torture, use of 拷打, 其使用 309

Toul 图尔, 主教区 209, 219

Toulon 土伦 40

Toulouse 图卢兹, 图卢兹财政区 141

Tournay 图尔奈 179, 212

Tournefort, Joseph de 图尔纳福尔, 约瑟夫·德, 法国植物学
家 411

Tournon, Charles Maillard de 图尔农, 夏尔·马亚尔·德,
教皇使者 407, 409

Tourville, Anne-Hilarion de Costentin, comte de 图维尔伯爵, 安妮—希拉里翁·德·科斯唐蒂安, 海军将领 202

Tracy, marquis de 特拉西侯爵, 加拿大的法国总督 355

Traite de contributions 《论捐税》, 摊派捐税的权利 205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4, 477

宗教宽容 10, 484—5

屈从于土耳其人 488—90, 508—9

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 498—9

被规定的宪法地位 499

Treatise on Painting (de Cortone and Ottonelli) 《论绘画》(达·科尔托纳和奥托内利著) 175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Locke) 《政府论》(洛克著) 91—3, 119—21

Trembowla, battle of 特雷姆博夫拉战役 487

Trent, Council of 特伦托会议 146

Trier 特里尔 220

特里尔大主教 431, 448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 213, 289, 310

Tromp, Cornelis 特龙普, 科内利斯, 荷兰海军将领 169

Troyes, Chevalier de 特鲁瓦骑士, 与夺取赫德森湾的英国据点 366

Trunajoyo 特鲁纳耶约, 马都拉统治者 423

Tunis 突尼斯 22, 201, 504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ene, vicomte de 蒂雷纳子爵, 亨利·德·拉图尔·德奥维涅, 法国元帅 3, 139, 395

与胡格诺派 140

与入侵西属尼德兰 212
在法荷战争中 218
和路易十四的关系 234
Turhan 图尔汉，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 505, 506, 507,
509
Turin 都灵 150, 160, 459, 473
Tuscany 托斯卡纳 458, 459, 468
罗马教廷史上来自该地区的行政官 465, 469
Tyrol 提罗尔 435
提罗尔邦君 476
Tyson, Edward 泰森，爱德华，动物学家 67
Ukraine 乌克兰 14—15, 496
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 512, 569, 575
第涅伯河流域哥萨克的反波兰起义：在多罗森科领导下 512,
569, 575；在赫梅尔尼茨基的领导下 566, 572—3；斗争中的宗教因
素 572
农民的反波兰起义
在该地区的俄波冲突 568—9
在俄波“永久和平”之下 575—6
另见Cossacks条
Ulfeldt, Korfitz, count 乌尔费尔特伯爵，科尔菲特斯，丹麦
大司仪 523
Ulm 乌尔姆 435, 439, 440
Ulrika Eleonora 乌尔丽卡·埃莱兵诺拉，瑞典克里斯蒂安五世
的姐妹 530
Ultramontaniam 教皇至上主义 124, 131

Uniformity, Act of 《信仰划一法》 143, 306

Unite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见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条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尼德兰联合省, 见 Dutch Republic条

Utrecht 乌得勒支

乌得勒支条约

Valckenier, Gillis 法尔克尼尔, 希利斯 291

Valdés Leal, Juan de 瓦尔德斯, 莱亚尔, 胡安·德, 画家 150, 173, 383

Valence 瓦朗斯 400

Valencia 巴伦西亚 128

与驱逐摩里斯科人 370, 375

工资与物价的跌落 372

贸易的危急状况(1655年) 376

税收 377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 296

Valenzuela, Fernando de 巴伦苏埃拉, 费尔南多·德, 西班牙廷臣和国务家 370, 380—1

Vanbrugh, John 范布鲁约翰, 建筑师 170

Van Dyck, Sir Anthony 范戴克, 安东尼爵士, 画家 150, 165, 171

Vane, Sir Henry 文, 亨利爵士, 英国国务家 305

Vasvár, Peace of 沃什堡和约 490, 491, 511, 513

Vauban, Sebastien Le Prestre, seigneur de 沃邦爵爷,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尔, 法国元帅 181, 183, 218, 219, 416

Vaz, Joseph 瓦兹, 约瑟夫, 传教士 404

Velásquez, Diego 贝拉斯克斯, 迭戈, 画家 149, 150, 173,
383

Velde, Adriaen van de 韦尔德, 阿德里安·范·德, 画家
166

Velde, Willem van de (father and son) 费尔德父子, 威廉
·范·德, 画家 166, 171

Vendôme, Philippe de 旺多姆, 菲利普, 红衣主教 129—30

Venice, republic of 威尼斯共和国 12

人口 22

织布业 26, 41, 501

丧失利凡得地区贸易 26, 463, 467

财政 29, 464

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匠被吸引到法国 40

和罗马教廷的关系 129, 130, 460

与干地亚战争 130, 458, 460, 461—4, 504, 505, 506, 508,
510

各艺术和雕塑学校 150, 156, 174

与均势思想 198

与海战问题 201

和路易十四的关系 214

出版业中心 468

Verbruggen family 费尔布吕根家族, 雕塑世家 168

Verden 费尔登 430, 431, 519, 529

Verdun 凡尔登, 主教区 209, 219

Verhulst, Rombout 费尔许尔斯特, 龙布, 雕塑家 168—9

Vermeer van Delft, Jan 弗梅尔, 范戴尔弗特, 扬, 画家
150, 166, 167, 168, 300

Veronese, Paolo 韦罗内塞, 保罗, 画家 151

Verrio, Antonio 韦里奥, 安东尼奥, 画家 171

Versailles 凡尔赛 4, 5

德意志诸侯模仿凡尔赛宫廷 5, 450—1

宫殿、花园和市镇的规划与建造 163, 164, 170, 240—50

宫廷常驻于此 182

路易十四通过成套的礼仪实施的统治 183, 185, 225, 239—40

对绘画的影响 250

对法语发展的影响 254—6

对文学的影响 256—63, 270—1

Victor Amadeus 维克多, 阿马戴乌斯, 萨伏依公爵 10, 472—
3

Viegas, Pais 维埃加斯, 派斯, 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的秘书
395

Vieira Fernandes 维埃拉·费尔南德斯, 葡萄牙军队指挥官
393

Vienna 维也纳

被围 2, 15, 220, 432, 497, 515—17

人口增长 22

商务院 41, 45

征服维也纳——土耳其政治野心的象征 511, 513

Vingboons, Philips 芬博恩斯, 菲利普斯, 建筑师 168

Virginia 弗吉尼亚 327, 330, 339, 343—4, 346, 348

Visconti, Primi 维斯孔蒂, 普里米, 威尼斯驻法国大使 6

Viseu 维塞乌, 教区 129

Vistula 维斯杜拉河 282, 566

Vivarais 维瓦雷, 在该地的骚动 186, 233

Viviani, Vincenzo 维维亚尼, 维琴佐, 伽利略的学生 49

Voetius, Gisbert 富蒂乌斯, 希斯贝特, 加尔文派神学家 143

Voisin, Madame 瓦赞夫人 269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伏尔泰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哲学家 72, 256, 270

论莱布尼茨 84, 85

论英国人 86, 312

对洛克的态度 93, 94

Vondel, Joost van den 冯德尔, 约斯特, 范登, 剧作家和诗人 300

Vouet, Simon 武埃, 西蒙, 画家 152, 161

Vygovsky, Ivan 维戈夫斯基, 伊瓦, 哥萨克头领 575

Walcheren 瓦尔赫伦岛 310

Waldemar 瓦尔代马尔, 丹麦亲王 572

Waldensians 韦尔多派, 见Piedmont条

Walken, Robert 沃尔克, 罗伯特, 画家 171

Wallachia 瓦拉几亚 487, 499, 503, 507, 508

Wallenstein, Count Albrecht von 华伦斯坦, 阿尔布雷希特·冯, 弗里德兰公爵 474, 478

Wallis, John 沃利斯, 约翰, 数学家 48

War 战争

战争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 20, 176—8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军事革命” 176—8, 194

Narsaw 华沙 486, 521, 549, 552, 567

Wartenberg, Count Colbe von 瓦滕堡伯爵, 科尔贝·冯, 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的大臣 555, 556

Wanwick 沃威克, 新英格兰居民点 336

Webb, John 韦布, 约翰, 建筑师 170

Weenix, Jan 韦尼克斯, 扬, 画家 166

Wegener, J. E. 韦格纳, J. E., 经济评论家 480, 481

Weigel 魏格尔, 数学家和哲学家 111

Wesel 韦瑟尔 442

Wesselényi, Ferenc 韦谢莱尼, 费伦茨, 匈牙利宫廷大臣 491, 492

Westchester County 韦斯特切斯特县 339

Westoe Indians 韦斯托族印第安人 345

Weston, Sir Richard 韦斯顿, 理查德爵士, 农业著作家 24

Westphalia, Peace of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21, 200, 222, 430, 475

标志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结束 1, 458

标志法国优势地位的开始 2

与宗教冲突 85, 122

与德意志诸邦 109

与罗马教廷 150, 460

与勃兰登堡 196, 544

标志西班牙霸权的终结 283, 369, 371, 375, 382, 458

与神圣罗马帝国 432

与意大利 458, 459

与瑞典 519

另见Munster, Treaty of; Osnabruck, Treaty of

Westphalia, district of 威斯特伐利亚区 22, 435, 448

Wettin, House of 韦廷家族 453

Wetzlar 韦茨拉尔 449

Wilkins, John 威尔金斯, 约翰, 切斯特主教, 皇家学会创立者之一 48, 84

William II 威廉二世, 奥兰治亲王 275, 278, 279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荷兰执政, 英国国王 7, 31, 91, 192, 275, 278

与英国公主玛丽 170, 219, 296

在法荷战争中 217, 218—19, 296

出航英国 221, 246, 297—8, 555

受荷兰省议会教育 290

被承认为泽兰省议会成员并进入国务会议 291

当选为陆军统帅 292, 和海军统帅 294

被立为荷兰省和泽兰省执政 294

德维特遇害后的政策 294—5

对尼曼根和约的态度 296—7

1674年后的政策

取得君主地位的企图 298—9

William VI 威廉六世, 里森—卡塞尔方伯 126

Willis, John 威利斯, 约翰, 动物学家 67

Willmann, Michael Leopold 维尔曼, 米歇尔·利奥波德, 画家

Willughby, Francis 威洛比, 弗朗西斯, 博物学家 70

Wiltshire 威尔特郡, 该地的布匹贸易 326

Winthrop, John 温思罗普, 约翰, 在美洲的殖民地总督 337

Wismar 维斯马 430, 519

Wiśniewski, Michael 维斯诺维埃茨基, 米海尔, 波兰国王
560—1

Witt, Cornelis de 德维特, 科内利斯, 荷兰大议政之弟 294

Witt, John de 德维特, 约翰, 荷兰大议政 33, 45, 108,
183, 275, 276, 300

与终身年金的改革 179

提议调停移归权战争 212

法荷战争前提出解决建议 217

国内政策: 在威廉二世去世后领导共和派 279—94; 得到摄政家族小集团的支持 279; 成为大议政 284; 同意《排斥条令》 285; 减少荷兰省债务利息 285; 处理奥兰治问题 290—1; 与《永恒法令》 291; 辞去大议政职务 294

对外政策: 在波罗的海战争中(1658年) 286—7; 荷兰共和国兴起为强国后的治国才能 287—94; 试图与英法结盟 287; 法荷同盟(1662年) 287—8; 在布雷达的谈判 289; 加入三国同盟 289; 此后的消极政策 291; 未能实现同西班牙和瑞典结盟 292; 敦促议会坚持抵抗法国(1672年) 293

个人权力衰落 291

遭奥兰治派袭击负伤 293

被暗杀 294

Witte, Emanuel de 维特, 埃曼努埃尔·德, 画家 166

Wittelsbach, House of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127, 452

Wittenberg, University of 维滕贝格大学 127

Wladyslaw IV 费瓦迪斯瓦夫四世, 波兰国王 565

Wolff, Christian 沃尔弗, 克里斯蒂安, 哲学家和数学家
85, 114

Wolsey, Thomas 沃尔西, 托马斯, 红衣主教 170

Worcestershire 伍斯特郡 325

Worledge, John 沃利奇, 约翰, 农业著作家 24

Wotton, William 沃顿, 威廉, 科学史家 71—2

Wouwermans, Philips 沃弗尔曼, 菲利普斯, 画家 166

Wren, Sir Christopher 雷恩, 克里斯托弗爵士, 建筑师 18,
48, 169—70

Wren 雷恩, 动物学家 67

Württemberg 符腾堡 5, 15, 196, 451

人口 21, 435, 437

宗教 125

符腾堡公爵与宫廷会议 449

公爵和三级会议的关系 456

Yarranton, Andrew 亚兰顿, 安德鲁, 经济论文作者 45

Yemen 也门 503

York, Anne, Duchess of 约克女公爵, 安妮 311

Yorkshire 约克郡, 该地的毛纺织业 326

Zalánkémen, battle of 扎隆凯门战役 499

Zápolyai, John 扎波利亚, 扬, 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的君主 478

Zeeland 泽兰 277, 284, 298, 299

Zelo Domus Dei 《对主殿之忠诚》, 教皇诏书 125

Ziegenbalg 西根巴尔，丹麦传教士

Zrínyi, Miklós 兹里尼，米克洛什，匈牙利军人、诗人 405,
415

Zrínyi, Péter 兹里尼，彼得，与匈牙利民族密谋 492, 493

Zuccalli, Enrico 祖卡利，恩里科，建筑师 172, 173

Zuidpolsbroek, Cornelis de Graeff van 泽伊德波尔布鲁克，
科内利斯·德·格雷夫·范，阿姆斯特丹市首席行政官 276, 291

Zurbaran, Francisco 苏巴朗，弗朗切斯科，画家 173, 383

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 1688—1715/1725年

[英] J.S. 布朗伯利 (J.S. Brom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6: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 1688—1715/1725年

[英] J. S. 布朗伯利 (J. S. Brom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6卷,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 1688-1715/1725年/ (英) J. S. 布朗伯利 (J. S. Brom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6,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ISBN 978-7-5203-2593-6

I. ①新… II. ①J…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688-1725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23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张湑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70.75

字数 1121千字

纸书定价 21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6: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ISBN 978-0521075244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科学运动与科学思想的传播，1688—1751年](#)

[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1. 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趋势](#)

[2. 音乐，1661—1752年](#)

[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第五章 欧洲的国际关系](#)

[第六章 英国革命](#)

[第七章 九年战争，1688—1697年](#)

[第八章 大不列颠作为世界强国出现](#)

[第九章 战时财政，1689—1714年](#)

[第十章 1688—1715年的法国形势](#)

[第十一章 外国压力下的西班牙帝国，1688—1715年](#)

[第十二章 从九年战争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第十三章 欧洲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第十四章 乌得勒支和约](#)

[第十五章 英法在北美，1689—1713年](#)

[第十六章 葡萄牙及其帝国，1680—1720年](#)

[第十七章 地中海](#)

[第十八章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第十九章 土耳其人的退却，1683—1730年](#)

[第二十章（上） 查理十二世及北方战争](#)

[第二十章（下） 波兰的黑暗](#)

[第二十一章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与已经起了变化的东西方关系](#)

[第二十二章 陆军和海军](#)

[1. 陆战艺术](#)

[2. 军人与平民](#)

[3. 海军](#)

[第二十三章 经济活动](#)

[1. 1683—1721年的商业地图](#)

[2. 1688—1715年：欧洲物价、人口和经济活动记录](#)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本卷（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上一卷^[1]）所研究的欧洲历史的这一阶段，在年限上很有伸缩性，而且缺乏那种可据以称为改革时代或革命时代——虽然它含有两者的一些特点——的可辨认的本性。也没有一个人物经历整个阶段。传统的描述集中于法国的衰落，这最多只能说具有部分的真实性，而且只是就西方而言。“老的”《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编者即使把1661年以后标志为“路易十四时代”，他们也知道“漫长而又看来遥远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历史”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缺少“为本书拿破仑卷所有的那种有机的整体性”）；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旦于1699年在卡尔洛维茨解决，“画面的一大部分就为大规模的瑞典或‘北方’战争^[2]所填充”，这次战争于1721年在尼斯塔特正式结束，也就是在“太阳之王”^[3]走进坟墓6年之后、伟大的沙皇彼得逝世3年多之前。

如果我们思考这些年份里的政治地理（第5章），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断变化的东欧地图。到1716年，瑞典已被剥夺掉它在波罗的海对岸的省份，这些省份是它获得强国地位的基础[第20章（1）]，这一地区的贸易和税收长期以来一直是它用以对付丹麦对桑德海峡的控制以及荷兰主宰通过这一海峡的贸易的手段。^[4]瑞典的损失主要使俄国得利，它向黑海和里海方向也扩充了地盘，有一段时间派兵驻扎在丹麦和波兰，还派出商队去北京并在巴尔干煽动起反伊斯兰的情绪。在巴尔干，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使哈布斯堡家族在卡尔洛维茨得到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匈牙利之后，又新添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小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大部。这些发展中，有一些确实只是昙花一现。土耳其人收复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他们保持在欧洲的地位的关键），而俄国人占领克里米亚则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沙皇彼得1711年在普鲁斯河向土耳其军队的不光彩投降，其轰动的程度不亚于1709年他在波尔塔瓦和佩列沃洛钦那歼灭查理十二世的精锐的远征军。但是，“土耳其的威胁”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东方问题”被吵吵嚷嚷地提出来了。不管怎样，它在这一时期中的某些特点是同未来没有什么关联的。卡尔洛维茨结束了上一次战争，那次战争至少在开

始的时候是因1684年的“神圣联盟”而作为一次圣战的。实际上，它也标志着波兰染指罗马尼亚封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贯企图终止了，尽管波兰现已恢复了对相邻的波多里亚的掌握。《帕萨洛维茨和约》同样也限制了威尼斯在爱琴海的野心：在这个共和国占有摩里亚半岛达一代人时间的情况下，他们曾经看来要威胁君士坦丁堡本身了。在这些历史性解决的间歇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查理十二世——他梦想把奥斯曼和波斯的贸易吸引到瑞典控制的波罗的海来，并曾把他自己任命的人放在波兰王位上达5年之久——谋划实行瑞典人和土耳其人、波兰人和哥萨克人的大联合，以反对波尔塔瓦的胜利者，但他一无所成。

查理的丰富想象（特别是当他流亡在土耳其国土上的时候）把波罗的海和黎凡特^[5]事务的许多线索扯在一起了，但他不是唯一能够设想一个同本时期内所形成的东欧完全不同的东欧的统治者。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都在1697年被选上波兰王位（对此事颇有争论）之后不久，就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即建立一个从里加到里海的商业强国，并在奥得河中游使波兰和萨克森的领土连接起来——这样的连接勃兰登堡看来是愿意支持的，条件是在维斯杜拉河三角洲地区给它补偿。萨克森的突入瑞典所属的利沃尼亚，加上同样重要的、丹麦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要求，开始了在北方的20年战争，并把瑞典人卷进了无休止的波兰政治旋涡之中[第20章（2）]。波兰—萨克森同盟对加强华沙的中央政府后来起了灾难性的作用，因为它导致了外国干涉，有的是由怀有二心的贵族因担心丧失因袭的特权而引进来的，有的是由奥古斯都二世自己引进来的，他的最好意愿被怀疑为专制主义，他的萨克森军队的作风也使其受到损害。但是，查理十二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破坏这个同盟——因此而使波兰—立陶宛联邦卷入，造成自己的毁灭^[6]——应该提醒我们，不要回过头去看这个同盟的历史。正如瑞典自己要求保持对波罗的海东部的控制（实际还要扩展到北冰洋），波兰—萨克森同盟的潜在含义是“大北方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从当时的这些打算才能了解这种含义），而不是简单地看作莫斯科扩张的一个阶段。尽管彼得大帝到最后享受了俄国所熟悉的作为“第三方”的特权——至少是作为波兰和立陶宛两方冲突的仲裁者——他统治的最初20年应该被看作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第21章）。第聂伯河边疆本身刚在1686年定下来，即使这一“永久的和

约”（它包含一项条款，在波兰有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保护国）在莫斯科也不能被认为是永远防止波兰要求收回在乌克兰的领土的保证。

1689年莫斯科在西方眼里的卑微价值，在瑞典的年轻战士——国王手上屡次得到证实，直到波尔塔瓦之役戏剧性地复活了曾在1698—1699年存在过的反瑞典同盟，并使奥古斯都二世在波兰复辟。但沙皇彼得其后还要在普鲁斯河受辱之后力求自存，而他的最剧烈的行政改革（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前一直因与瑞典的冲突而退居次要地位）则是他一生中最后10年的事情。但是，在查理二世1715年重返瑞典的时候，“海上列强”英国和荷兰（西方的势力均衡刚刚达成）不安地意识到，它们需要遏制“某种北方土耳其人”（原文第735页^[7]），这种人威胁着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一个俄罗斯湖，就像土耳其人把黑海当作他们的领海一样。当彼得1697年首次访问西方时，他是来获取西方技术的；1717年他重返时则是作为一个征服者和改革者、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在俄国庆祝《尼斯塔特和约》时，他因使他新创建的帝国参与政治国家间相互尊重的礼仪，而受到祝贺。东方和西方确实还是互相很不了解：彼得尽管有他的现实主义，他还是保留着他的东正教教士（他们对西方化政策的厌恶可以同他们的土耳其同行“乌勒玛”^[8]相媲美）的某些骄傲，而且很可能曾经想使“神圣的俄罗斯”在向西方学习数十年之后就背弃它。但当他于1725年去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他的美丽的新都圣彼得堡设立了大使馆，在新都还有德意志的建筑师和荷兰的印刷机（第21章）。

不论怎样，西方列强在它们的旷日持久的1688—1697年和1701—1714年战争中所争逐的，不是俄国的友谊而是瑞典和丹麦的友谊——或者至少是使用它们的军队（第7、13章）。对英国人和荷兰人来说，北方各王室之间老是互不信任是一件使人厌烦的不相干的事情。斯德哥尔摩对于丹麦收复斯堪尼亚的意图感到心神不安，而哥本哈根也害怕瑞典通过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国对它施加压力，这个公国在领土和设防权等方面同丹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领土和设防权混杂不清。这个争端只是由于1689年的《阿尔托纳条约》暂时平息了一下，后来又成为丹麦参加北方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是另外两个新国王即奥古斯都二世和彼得大帝的配合攻击才使查理十二世大吃一惊。西方列强曾经试图解决荷尔施泰因问题，现在也想制止更大规模

的斗争（如果它们能这样做的话），特别是因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9]1700年去世，没有子嗣，从而在西方内部又可能引起另一场兵连祸结的战争。后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始终没有同北方战争合流，尽管奥古斯都二世曾不止一次地在西方交战国之中寻找盟友，而海上列强联军总司令马尔巴勒因为担心瑞典分兵西向而在1707年到查理十二世在阿尔特兰施泰特的营地进行会谈。早在九年战争期间，西方各国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活动要活跃得多，双方在瑞典的权贵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并当他们之间的战事自1693年后进入胶着状态时，都很重视查理十一世的调停，但当时由海上列强雇用的丹麦部队比瑞典人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起更直接的作用。这些年的史实显示，法国的传统的“东方屏障”在瑞典像在波兰一样被突破了。同时，不论是瑞典还是丹麦——法国的影响在丹麦日趋显著，其增长程度同它在斯德哥尔摩的消失程度几乎一致——都不喜欢英国和荷兰控制海洋，这些北方王室为了保卫自己作为中立商人的权利、反对海上列强企图对自己发号施令，是能够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搁置起来的。不论所有西方列强如何竭力为本国攫取政治利益并不让对手均沾，它们在波罗的海经常存在的利益是商业，特别是它们的海上供应以及波兰和德意志北部平原生产的谷物和木材[第23章（1）]。斯德哥尔摩朝廷在“酬金”上比其他绝大多数朝廷索价要高^[10]，但查理十二世拒绝以放弃行动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外国津贴，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情更真实地在这位国王令人迷惑不解的沉默中暴露出他的本性。任何一个君主处在连续不断的极端困难境地中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保持真诚的独立吗？当他在1700年越过松德海峡把丹麦打出反瑞联盟时（这个联盟企图利用他的年轻取利），他是由一支英国舰队保护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英国命运的严峻时刻使英国得不到必需的芬兰焦油，也没有阻止他后来把手下的武装民船派出去对付那些同俄占瑞典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使他极为需要的英国的友谊蒙受被破坏的危险。

北欧的事件发展进程就这样冲击着西方。除了出钱雇用的部队以外，勃兰登堡—普鲁士是被卷入西方冲突的唯一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多瑙河中游和莱茵河上游之间可以看到有一种更加直接的和连续的相互关联。在土耳其人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之后，哈布斯堡军队戏剧性地突入匈牙利并深入巴尔干。但到1692年，这一行动实际上停止了，因为利奥波德一世皇帝越来越需要把他的力量用来保卫西部德意

志，在那里，继1688年巴拉丁领地被摧毁之后，法国人又采取了类似的（也许不是那么系统的）残酷行动。帝国的防卫组织（至少在它的西部防卫圈里）自1681年以后曾缓慢地有所改善，德意志军队在这整个时期内西方所有主要战场上都起着一种值得注目的（尽管是次要的）作用。此外，在巴尔干战斗（自查理五世的时代以来帝国王公们最伟大的共同事业）的严酷锻炼中，许多军官和他们的最优秀领导人——洛林的查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乔治、巴登的刘易斯、萨伏依的尤金——成长起来了。^[11]但是，正像法国政策主持人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样，这场圣战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帝国对反法联盟的贡献。即使如此，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673年仍成为反法联盟的一个主要成员。但维也纳的被围再次引起了在奥地利王室和哈布斯堡作为皇帝之间的先后顺序的争执（第18章）。因此，“向东方挺进”的势头没有为一系列危机所阻止——特别是这一时期内许多王位继承争执中最早的那次，即科隆—列日和不列颠群岛的继承争执——这些危机触发了九年战争；也没有为法国初期的胜利所阻止。（第7章）皇帝的盟国明知他随时可能抛弃它们，却还是要把斗争继续下去。相反，终止巴尔干敌对行动以帮助盟国的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直到1697年土耳其军队在森塔被击溃——这次战役同波尔塔瓦之役一样具有决定性，但只是在哈布斯堡于上一年撤出意大利后才可能取得这一胜利。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这位皇帝再度被指责在盟国需要支援时，按兵不动。这一次是为了不惜代价地企图把他的条件强加在弗朗西斯·拉科齐和匈牙利叛乱分子身上（直到1712年）。皇帝的背信弃义像哈布斯堡的欠债一样，在伦敦和海牙成为笑柄。从英国和荷兰的立场上看，最自私的行动是，由于尤金王子在1706年对都灵的援救，轮到法国人从阿尔卑斯山另侧撤回了，皇帝约瑟夫一世（1705—1711年）就决定去蹂躏意大利。一个奥属米兰和一个奥属那不勒斯可以说成是在马尔巴勒的大战场上尤金赴援的代价。但是，1707年向那不勒斯的进军完全破坏了对土伦的围攻，这次围攻的成功本来是会结束西方的战争的。又过了若干年，英国人才以一种带有诗意的正义行动，让皇帝查理六世和尤金同路易十四和维拉尔元帅在拉施塔特商定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在这次商谈以及1714年在巴登举行的接续谈判中（巴登谈判解决了帝国王公们对法国的要求），首先考虑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而不是在莱茵河设立“屏障”以防止法国再度入侵的主张——这种屏障就像1713年和1715年在另外两个易遭法国入侵的

地区即萨伏依和尼德兰所曾筹划过的一样（第14章）。查理六世因未获得西班牙王位及其海外属地（他强烈地认为这些地方同古老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那样，都是他的合法的家庭继承财产的一部分）深感失望，被劝说在1716年转而恢复在多瑙河上的作战。尤金此刻既无其他负担又有在西方作战的丰富经验，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了猛攻，迫使苏丹在两年之内媾和。

这一事件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土耳其人敏锐地意识到来自莫斯科的新的危险，在1699—1700年已经接受了大片领土的丧失，包括布达和阿扎克（亚速）这样一些神圣的地方。尽管他们具有不断进行战争努力的非凡能力，在卡尔洛维茨他们第一次正式承认失败，第二年同彼得签约，又答应接受俄国使节。后来，在1711年和1714年，他们又先后挑起了同沙皇和威尼斯的新的较量，并都取得胜利；但他们没有对奥地利寻求报复。现在，在1718年，由于贝尔格莱德和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的丧失，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整个前途趋于暗淡，而奥地利王室则显然担起了解放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使命，而不再是仅仅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防御哨所了。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穆斯林的骄傲所受到的打击。它加强了古兰经宣教者和首都骚乱人民的仇外心理。同时，它又引导那些有知识的人去重新考虑伊斯兰同基督教世界的关系，重新考虑他们必须屈尊降贵去向异教徒的技术（最明显的是在外交和军队的现代化方面）学习什么东西。

《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土耳其政府同一个欧洲联盟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显示出希腊和犹太社团中那些了解西方的人士的影响正在增长，正如奥斯曼海军在1700年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曾在北非伊斯兰国家（埃及除外）的海盗船上工作过的叛变的欧洲船长们。在这个“郁金香时代”（郁金香只是1718年后有钱人沉湎于穷奢极侈的享乐主义这一反动潮流的象征），甚至于法国一种华丽建筑式样的流风似乎也传到了金角海口。这一切在1730年君士坦丁堡的可怕骚乱中都结束了。这些骚乱比这个拥挤不堪的城市（当时，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过去发生的骚乱更加惊人地暴露出奥斯曼国家内部的不安全。正如在前半世纪里许多苏丹被推翻、绝大多数总理大臣任期短暂所证明的，暴力在土耳其政治中从来不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民主的敏感性以及他们的深入平民生活就已足够产生经常性的动荡不安了，长期战争中的一系列可耻挫败和巨大的社会代价（反映在十室九空、物价飞涨上）更加剧了这种形势。一

个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在1701年就已能够预言，在这个巨大的帝国里会发生某种奇特的革命。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关于这个帝国衰亡的看法在西方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了（第19章）。

如果说俄国已经返回欧洲，那么同样确定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第18章）现在已不可逆转地（虽然是不那么突然地）置身于东方。在意大利，除了伦巴第，他们所获得的利益都证明是短暂的；在不受喜爱的南部尼德兰，他们不得不忍受荷兰驻军的入侵。但是，不论意大利或南部尼德兰所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同贫困的、经常是荒芜的多瑙河下游地区的问题相比拟。这里迫切要求创立行政和防卫体系，推广真正的信仰并活跃新的经济生活。查理六世为发展同巴尔干人的贸易而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损害了威尼斯而一时又没有促进里雅斯特的的发展。贝尔格莱德在1739年又再度陷落。但向匈牙利平原、特兰西瓦尼亚和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移民——大多是来自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德意志的有组织移民——有力地进行着，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军事殖民地化，同彼得在顿河草原上维持驻军和边境民兵所用的办法十分相似[第22章（2）]。当哈布斯堡家族在1687年于布达接受“圣司蒂芬王权”^[12]时，他们的国策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以后对匈牙利新教和匈牙利自由权利（像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的自由权利一样被不屈不挠地维护着）的镇压，成了这一时期内最猛烈的一次叛乱的背景，尽管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拉科齐和其他叛乱领袖本身也都是大地主，他们要保护巨额财产，反对设在维也纳哈布斯堡府第内的中央集权的国库和兵站总部。

在这一时期，试图把盘踞在“宫城”中的庞杂不堪的部、院、委员会整顿归并的尝试从未完全成功，部分原因是法国式的有效率的行政被认为不如扩展领土和取得对抗新教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团结那样重要。但是有两种趋向是应该指出的：奥地利公共财政中的技术进步（原文第305—313页）和哈布斯堡皇族大理院对帝国高级法院的职能的侵犯（第18章）。在波希米亚以外，内廷总理府正在成为哈布斯堡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工具。这意味着所有重大决定都由统治者根据家族法律作出，即使实际上哈布斯堡官员们（同豪门贵族共同）掌握着诸侯国的行政控制，这些诸侯国由地主们（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常兼皇家官职）居于主宰地位。1720—1722年同君主国所属各领地就“国本诏书”所进行的谈判作为变松散的“王室权力”为“强权国

家”的一步，具有深刻的意义。但这种转变只是以统治者个人权威为基础，而不是粉碎旧有的显赫的机构。在加强罗马教之后，由同一维也纳文化培养出来的各领地贵族之间的社会同情，使得在全欧洲单一君主统治下最复杂的各族居民之间有了最大的凝聚力。即使同俄罗斯和大不列颠的兴起相比，这些居民的增加（和混杂）也应该被看作这一时代的最重大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的兴趣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这终于打开了1756年同法国和解的道路——这一外交上的革命是路易十四在生前就已提议的。但是，哈布斯堡聚敛的胃口是永不餍足的，所以他们不大会把失去的东西永远一笔勾销。即使当西里西亚被一个在那些年代里无足轻重的普鲁士窃夺而去^[13]、创痛犹新的时候，阿尔萨斯也不该被忘却。总的来说，当人们考察在利奥波德一世及其儿辈的时代中维也纳的行止时会注意到某种犹豫不决的情况，同推动瑞典和俄罗斯的勇猛精神恰成对照。

如果查理六世实现了哈布斯堡全部继承卡洛斯二世的要求，这位最具雄才大略的德意志皇帝对于蒙羞受辱的西班牙君主国的多方面的问题，看来也不会提出比成功的波旁王朝指定继承人菲利普五世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作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将会同样地依靠外国商人来维持这个国家的殖民地贸易。他对于行之已久的方式和地方性的特点，一定会显示出更多温情。撇开1711年以后要从维也纳进行遥控的种种后果不说（约瑟夫一世之死会迫使他抛弃忠诚的加泰罗尼亚人），就从查理后来统治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情况来看，他也缺乏改革原有政府机构的坚强意志。与此相对照，菲利普五世把法国的办法逐步引入西班牙（虽然常有争论和受挫），确实为摆脱大公们的政治统治指出一条路子。对这人数少而富有的特权集团而言，哈布斯堡的等级思想比菲利普最亲近的顾问（他们不全是法国人）所采取的对行政惯例的激进改革更适合他们的口味，这是历史事件所显示的（第11章）。确实，尽管最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法国的措施，菲利普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听命于凡尔赛宫（他在任何情况下对西班牙事务总有不同的意见）。^[14]而当1709年欧洲可以以他的逊位为代价而取得和平时（第14章），他对西班牙的忠心证明强于他的法国出身。尽管如此，到1714年，当所有同继承问题有关的列强实际上都已承认他的时候，菲利普是一个在宪法上比几个王国更为单一的西班牙的国王；这几个王国保留了古老的自由权利，在1701年就已经接受了他。

阿拉贡的“管辖权”和加泰罗尼亚的“代表权”都消失了，这些法权都在1716年整个地被中央集权化的卡斯蒂利亚所吸收了，只有纳瓦拉和巴斯克各州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对新政权最不同情的几个王国——的城乡地方政权曾是大公们统治的基础之一。在中央，这一统治的根基是那些旧的参事会，它们正让位于按照法国模式设置的国务秘书。此外，菲利普的顾问们的法国的限制教皇权力的理论同西班牙生活中教士们的寄生主义是敌对的。在卡洛斯二世在位期间，罗马教廷的影响有很大的增长，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红衣主教波尔托卡里洛的作用，他在波旁王朝的继承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哈布斯堡在意大利施加的压力迫使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站在反对菲利普的一边时，一个重新调整教会同国家关系的时机到来了。菲利普在1709年同罗马决裂，并开始了“君主教权主义”的尝试，在1753年订立的君主与教会的契约以及后来驱逐耶稣会会士是这些尝试的高潮。但是，梅尔肖·德·马卡纳兹——1713年起草君主教权主义方案的皇家律师——的受辱，显示出新的君主在面对像宗教裁判所这样一种传统势力时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国王同伊丽莎白·法尼丝结婚后意大利的影响重新进入宫廷的情况下（第11章）。

在新的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位密切关注维也纳的观察家这样写道，维也纳“把西班牙王国看成是一具毫不值得占据的尸骸，除非加上它在意大利的领地，这些领地被认为是它的血肉”^[15]。米兰公国虽然发生了像西班牙一样的工业衰退，但它终究要比西班牙富庶，交通也更便利。还有，哈布斯堡家族一旦在伦巴第平原上立足，他们就能指望左右威尼斯和皮埃蒙特—萨伏依的政策，前者是反对土耳其人的同盟国，后者是对付法国人所不可缺少而又捉摸不定的阿尔卑斯山口守卫者。占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地有人口众多且处于战略地位的港口）之后，皇帝的影响将扩及全意大利，特别是罗马；那不勒斯以其灿烂文化与托斯卡纳大公国及热那亚共和国有密切关系。由于意大利对路易十四也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即使只是作为一批储备国家可用以交换洛林或萨伏依^[16]），波旁—哈布斯堡的敌对行动在意大利北部，也在莱茵兰发生就并不奇怪；萨伏依公爵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第二发现自己处于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旨在支持他的选择自由的国内政要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并不奇怪了（原文第560—562页）。

在其他意大利国家中，真正有分量的只有教皇的统治，尽管它的影响受到意大利境外不止一个罗马天主教统治者的挑战（第4章）。1688年，由于路易十四奉行不妥协的“教皇权力限制主义”，同教廷的关系破裂，但自1693年后恢复了正常。实际上，两者的关系进展到了互助的地步，1713年反对詹森主义的克雷芒通谕（Unigenitus）^[17]的颁布，使法国国王处于不可思议的“拥护教皇权力主义”的地位。上述圣谕的颁布为路易的继承人孕育了麻烦（第10章）。教皇统治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它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影响是有分量的，而且在解决西班牙继承问题中也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有理由相信，到1685年，法国外交的主要努力已由北部欧洲移向南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第5章）。

在1698—1700年的瓜分外交以及继法国国王接受卡洛斯二世的遗嘱（这破坏了瓜分外交）而来的谈判的紧张阶段（第12章）中，西班牙在意大利属地的分配成了主要的障碍。英国有一部分社会势力自然更加关心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机会，特别是关于供应非洲奴隶的官方合同所提供的机会；这种合同贩奴（Asiento）现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目标，法国1701年的合同是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第一批果实之一，而英国人则在10年之后才为此进行谈判。但在1700年，政治家和许多商人的目光却都专注在地中海的前途上（第17章）。这是不是使人惊奇？除了波旁和哈布斯堡两个家族之间的忌妒外，多少应该承认意大利对北方人想象所产生的诱惑力。统治集团的文化仍然很深地浸润着罗马古风和意大利艺术家的风采。这些艺术家不论优劣从17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向阿尔卑斯山之外去寻求大宗交易：“高贵”的整个概念（在那个时期无论何处这都是强大的动力）要求奢华的锦上添花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只有罗马和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意大利人才能最好地使之实现。还有，从意大利和黎凡特运来许多丝绸、酒、果子和尊贵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其他物品。尽管地中海沿岸像波罗的海一样是贵金属的输入者，但它的市场对布匹制造商、捕鳕的渔民和粮食贩子都是重要的。南部欧洲整个说来仍旧比大西洋彼岸的世界吸收更大量的英国和法国的出口货，而对荷兰人来说，南部欧洲（包括法国西部）是他们在波罗的海的基本贸易的必要补充。1680—1720年的欧洲贸易地图[第23章（1）]显示出古老的北—南轴心（从里加和但泽到里窝那和士麦那）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同时，在威廉三世的外交中，经济上的考虑总是退居政治和战略论据之后。当海

上列强的主要舰队1694年被派往地中海并奉命以加的斯为基地过冬时，包围法国本土的宏大战略制定出来了。这个战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即使在支持长期受苦的加泰罗尼亚人和皮埃蒙特人方面也是如此。但这一先例对下一次战争的海上作战历史起了主导作用，造成在美洲海上作战的失利；后来，它又造成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的归属英国国王，而且要为哈布斯堡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业提供不可或缺的保护（第13章），又使英国人对地中海政治的干涉产生更大的效果。

人们都能看到，像哈布斯堡在巴尔干的存在和沙皇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样，英国在南部欧洲的永久性存在是当时最惊人的新事物之一。这三者之中只要少了任何一个，18世纪的外交和战事就会沿着另外一种进程发展。尽管在任何一种进程中英国都并不注定会经常从它作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的新的地位中获益——一部分原因无疑是，仅仅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并不能带来大陆上的优势（第5章）。可以这样论定：到1715年，法国已再度成为在地中海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这遍布古城和有离心倾向的省份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力求按相沿成习的方式谋生，各国海军的冲突并不像当地时常有的干旱、疾病、贫困和多少得到官方特许的海盗行为等灾害使他们感到不安），法国的商业激情无可争辩地是最强有力的（第17章）。法国人有一个由领事官员和有经验的普罗旺斯州的商人组成的联络网，在马耳他和阿尔及尔、在塞维利亚和开罗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处境很适于作为伊斯兰同西方的最有效和最恰当的联系纽带。令人惊奇的只是路易十四对摩洛哥所显示的淡漠，摩洛哥的卓越的统治者穆雷·伊斯美尔使人觉得可与彼得大帝相比（原文第554页）。

另一方面，到1715年可以说地中海作为经济筹划的中心已让位于大西洋了。确实，美洲领土已成为强国争夺的目标，这种争夺在美洲比在任何其他大地区都更加明显地同商业有关。这些大地区甚至包括东方海域，这里当时受欧洲战争的影响要比受莫卧儿帝国的崩溃、阿曼尼阿拉伯人向蒙巴萨的进军、同广州和穆哈的对任何人开放的贸易以及在马达加斯加和红海之间海盗盛行的影响小得多。^[18]这最后一项有美洲和本地的双重因素，引起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亚于对西印度的海盗（从巴拿马地峡延展到南海）的关注。对这个情况需要作新的研讨，但它同下面这些事情显然是有联系的：过去对西班牙人长期进行的私掠，葡萄牙衰落所造成的在印度洋的权力真

空，奴隶贸易以及在热带地区建立欧洲殖民地的惨烈情况，还有在美洲各地的统治不善（第11、15、16章）。轰动一时的基德船长^[19]案件把海盗出没的马拉巴和马达加斯加海岸同纽约和波士顿的高贵阶层联系起来。

一旦殖民国家彼此正式开战，许多无法无天的力量就被用于经过官方批准的私掠活动。这样，在1689—1697年间，圣多明格岛的海盗们能够继续行动，劫掠往来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各殖民地之间的船舶，并且因为知道他们是在为国王效力而心安理得——国王事实上确曾利用他们去进攻卡塔赫纳。在下次战争中，当他们不得不离开英国人和荷兰人生活时，他们把基地移到马提尼克岛，也不改名换姓，并且常常跑到阿凯迪亚的罗亚尔港——同波士顿和纽芬兰联系的最佳北方基地——有时还横渡到西非，两次迫使英国在冈比亚的贸易要塞缴纳赎金。与此相反，牙买加的私掠船在1702—1713年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把西班牙人作为掳掠对象，这同英国对西属克里奥尔进行走私的巨大利益是相违背的（为此走私目的，牙买加的优越地理位置仅次于荷属库拉索群岛）。此外，在两次战争中，英国小型的海军分遣队出动攻击法属产糖的岛屿和捕鳕的渔村，但都只不过造成一些破坏，而且法国人常常无须海军支援就能加倍报复，特别是在纽芬兰海上。在那里，还有在赫德森湾和纽约及马萨诸塞北面边界，到处发生无数次小规模激烈战斗。总的来说，法国人占上风，他们的海盗和“森林狙击手”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游击战士的勇敢和灵巧，常常优于北美海滨的农民和商人。在17世纪90年代的丛莽战争中，弗隆特纳克伯爵使用了加拿大印第安人。这事在新英格兰人心中留下的印记，使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深了对罗马天主教教义的神经质的惧怕。但卡罗来纳人在下一轮北美的战斗中，毫不犹豫地同印第安人谈判结盟，以清除在佛罗里达北部的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

对北美的更大范围的战略问题，最了解、当然也是最有紧迫感的，是美洲人（第15章）。弗隆特纳克可以肯定地算作其中之一，还有建立路易斯安那的勒莫安兄弟。他们认为，把英国人分别从纽约和卡罗来纳赶走，是法国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在查尔斯顿的头脑清楚的人（他们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全靠操纵阿巴拉契亚山脉西南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也不欢迎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有一个竞争对手。“征服”加拿大曾经早就提出来过，但在1666年打消了这个想

法，因为这看来要经历一次途程艰难的陆上行军；但九年战争一起，新英格兰人就自己来进行这一神圣的事业，溯圣劳伦斯河而上；在失败之后还对伦敦保持压力，要求认真对待这一事业。在这一“光荣业绩”中，从欧洲来的援助迟迟不至，加上1711年的不幸结局种下了对英国的诚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染了加拿大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遥远的母国的不信任。实际情况是，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只要在尼德兰、莱茵兰、意大利或西班牙寻求一项军事解决，就无余力在美洲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它们的海军在人力、财力、物资和基地等条件所许可的限度内已充分动用起来，支持在欧洲的作战。这些作战活动不是由于执行侵略计划就是由于害怕被侵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海上贸易通路经常存在的压力。同样确实的是，两国政府都不认为殖民地上发生的摩擦在各国彼此的争端中占有重要位置。1686年，英国和法国政府试图使在欧洲的任何冲突不扩散到北美洲，尽管法国在赫德森湾的侵略以及弗隆特纳克的返回魁北克使这场冲突肯定要扩散到那里。但路易十四完全不同意弗隆特纳克的雄心勃勃的想法，1696年下令放弃新法兰西的西部哨所，从而回复到科尔贝尔的主张，即把殖民地的很少人力集中在圣劳伦斯河谷。这个政策因1699年在密西西比河口附近建立第一个居留地而被否定——这一居留地的建立是在拉萨尔和弗隆特纳克死后取得的胜利，其动机是怕英国人抢先占领。但不能说路易是很轻易地被劝说同意接受在美洲内地这一新增负担的（这也使西班牙人吃惊），也不能说路易斯安那在经过早期的幻想破灭之后还能存在下去，如果不是它引起了他的海军和殖民地大臣、年轻的德·蓬夏特兰的兴趣和后来引起了杰出的实业家（法国维持它的战争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这些实业家）安托万·克罗扎的兴趣的话。威廉三世（荷兰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国王）指导海上列强在1689—1697年的战争努力，但在缔结《里斯威克和约》时并不强调殖民地的问题；在为避免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努力中也没有把殖民地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尽管在西班牙银元几乎成为世界通货的时代，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作为对重商主义政治家的诱惑来说，要优于加勒比的糖和加拿大的海狸皮。

博林布鲁克子爵圣约翰负责英国在1711年占领魁北克的谋划。在1711—1713年的媾和中，他把殖民地权益放在他日程表的重要位置上。这多少表现了他的首创性。那次媾和的结果是英国取得阿凯迪亚和圣克里斯托弗岛全部，且不提经过反复较量把法国捕鳕渔民从他们

在纽芬兰的习用基地赶走，又把“森林狙击手”从赫德森湾沿岸赶走（第14章）。里斯威克与乌得勒支这两个和约之间的明显差异一部分是承认了英国殖民者自己完成了的业绩，一部分是以高度睿智（浸注着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思想）利用了较强的讨价还价地位。1688年詹姆士二世的逃亡已使新英格兰领地的计划受挫，詹姆士本来想用它来使他所有的纽约和两个泽西地区同它们的桀骜不驯的清教徒邻居合并，以便更好地防卫和执行航海法。一位新教的荷兰人在詹姆士的位置上出现（波士顿为此举行了疯狂的庆祝）促使回复到地方自立主义以及在某些海岸殖民地内尖锐的派别斗争（第15章）。一旦对加拿大的征服改善了博林布鲁克同强硬的美洲议会以及有势力的财主们（他们顶住了那些要废除他们的特许状的建议）的关系中的地位，他显然就在设想“把整个北美帝国置于一个统一的治理计划之下”^[20]。还有一点，从《里斯威克和约》到《乌得勒支和约》，正如这样一个敏锐的政客所完全懂得的那样，商业界有组织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已起着更大的作用。

在这些年份里，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人们对传统的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已变得不耐烦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甚至西班牙和奥地利政府，都显示出改善经济管制技术、使经济因素在政策制定中占更大分量的意向。国会在1696年新创立的贸易及种植园事务局主要是靠它所推动的许多新的调研来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而路易十四对于1700年为安抚法国主要港口商界的不安而设立的商务署（有这些港口商界的代表参加）的主要希望只是要它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都是事实。尽管如此，这些机构的活动，像领事馆的增设一样（第5章），反映了官方对于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这个老问题越来越关心。历次战争对国民经济带来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而同时又有新的商业机会在召唤。在贸易平衡方面——英国人自1696年后开始更科学地来进行计算——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糖、烟草及皮革）[第23章（1）]的再出口占很大比重。因此，战时在航运及付款方面的不正常状态，或者市场饱和及价格低落，为之发愁的不只是海外种植园主和商人。但这些人的能量不限于对殖民地总督和督察们施加影响。无论他们彼此的利益是否一致，他们同国内有势力的阶层保持着家庭和业务上的联系，而这些阶层同大臣们及国会多数派的头头们的利害相关不亚于同政府借款部门的关系。施加有组织的政治压力的最好例子是17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都发生的反对海外贸易垄断的运动。“自由贸易”的要求在方向上或

在强烈程度上可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些要求现在通过小册子和请愿书、备忘录和辩论，在更大规模上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商人的观点以及商人本身现在更有分量了。商人的业务不但在国会下院，也在凡尔赛宫内更经常地谈到；在凡尔赛宫，更经常地征求商人的意见，也更经常地授予他们荣誉。法国没有笛福^[21]，但它有不止一个乔赛亚·蔡尔德^[22]。法国的许多商会在“取予”之间完成了一种很必要的作用（这种“取予”关系存在于这个专制国家的外表之下）。自从科尔贝尔1683年去世之后，“科尔贝尔主义”当然在许多论点上受到了攻击。但是，对他的继承人来说，出口的增长和硬币的供应同样重要——只是更不可捉摸。确实，伦敦的商业区没有对威廉三世的外交政策发挥它的全部影响。威廉三世有一个王子的好恶，在同平和的阿姆斯特丹长期争吵中学会了不信任商界人士的政治见解。即使如此，他晚年的外交显示出他更清楚地理解，取得英国国会下院的合作同取得荷兰各省的合作一样，要靠对商业利益采取温和的态度。

世界贸易扩展的潜力[第23章（1）]，从对太平洋两岸不断高涨的期望中最戏剧性地显示出来。南海的狂热——战后英国一个如此使人震惊的特点——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国的威廉·丹皮尔和法国的J.B. 德·热纳是把17世纪80年代的海盗（他们带回来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沿太平洋海岸的宝贵海图）和1695年由爱丁堡的威廉·佩特森、1698年由巴黎的让·儒尔丹及圣马洛的诺埃尔·达尼康所创办的公司之间联系起来的早期链环。佩特森的公司产生在达连地峡一块短命的苏格兰殖民地上；而儒尔丹和达尼康的船长们则表明了在西属美洲护航船队的行动越来越不规则的时候，把合宜的货物直接送往智利和秘鲁将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利润（第11章）。这些法国船舶中，有一些续航到广州，在战争之后，这个地方吸引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这一南海贸易对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很不成功的贩奴贸易来说，是件难堪的事；但到1712年，当法国政策要求把两者都禁止的时候，损失的重大说明做得太过火了。与此同时，英国大臣哈利（博林布鲁克的同事和对手）看不到西属美洲市场的没有弹性的消费，但却从贩奴贸易中预期出现美妙的前景，使英国的海上债务转变为分享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比迄今为止通过已有的暗中渠道更能捞到油水）。他在1711年设立了南海公司。

同博林布鲁克所勾画出来的新殖民政策一样——为英国取得合同期限达到30年的空前长度的奴隶专卖权的也是博林布鲁克——哈利的计划属于对英国利益的这样一种观念，它同1710年托利党在大选中获胜以前决定英国战略和外交的轮廓的观念，是有分歧的。托利党的胜利使英国对欧洲的态度幡然大变，就同它在翻腾的国内政治航程中一样（第8章）。1710年，新的托利党内阁寻求使英国解脱出来的办法。为此目的，部长们必须打破1709年和谈中所出现的僵局。当时，前任部长们坚持不仅西班牙王位应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继承，路易十四自己还必须把他的孙子从西班牙赶走。英国新的决策者同意保持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必要性，从而回复到战争前英国—荷兰事实上所采取的正式立场，并且承认了早就应该承认的同盟国武装力量在严酷的西班牙战场上（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反对盟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自1701年大同盟成立以来（同盟并未保证西班牙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统治），英国就已对里斯本和巴塞罗那以及维也纳和海牙作出了保证，而这些保证是不符合成为《乌得勒支和约》主要基础的英国—法国双边协议的（第14章）。

这一和约是一种英国现实主义的成果（在那么遥远的时代，这种现实主义也许是可赞佩的），但由此而生的恶感对于造成“背信弃义的英国”^[23]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良心不安的英国人可能会指出皇帝在意大利的自私行径，甚至指出荷兰人在南部尼德兰的自私行径——在英国人看来，荷兰人的哨卡是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对1709年协定^[24]（在1713—1715年逐步减少）的报答，英国又坚持要分享这些商业利益，尽管它已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补人那里秘密地勒索到了单方面的好处，还有博林布鲁克用外交手段要从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的在西印度群岛的好处。1703年，约翰·梅休因同葡萄牙议定条约，只是为了购买里斯本的一个海军基地，就使同盟国不顾维也纳和海牙的较好判断而承担了在西班牙作战的义务。正是在这一条约签订之后，又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促使葡萄牙在未来的年代里成为英国的经济附庸；在地中海还进行了海军活动，这些活动并未使荷兰人得到任何实在的收获。此外，在多次战争中，荷兰因在陆上全面奋战使其公共财政不堪负担（原文第294—298页）而肯定地损害了它的海上威望。必须从上述背景来思考荷兰联合省所蒙受的屈辱。同他们17世纪的强大地位和多佛海峡对岸那个世仇的新

力量联系起来看，荷兰人在这些战争中的损失比法国本身还大，特别是他们未能显示出战败国的经济复苏能力。战争同时在北方和西方发生，尤其使他们感到困难，虽然在某些传统的贸易项目上，他们始终是紧抓不放的[第23章（1）]。对葡萄牙国王来说，这一和约也是一次失望，尽管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尽力去帮助实现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胜利——这是它加入“大同盟”反对老盟友路易十四的代价。在经济上，英国作为海上强国的霸主地位（它迫使里斯本在1703年改变外交政策的倾向）现在由这样的事态发展来证实，即葡萄牙的酒类出口集团以牺牲一项旨在反对进口英国布匹的早期工业政策为代价而获得胜利（第16章）。如果博林布鲁克同法国订立的商务条约草案被国会批准，那就轮到葡萄牙地主们有理由去重新考虑他们对伦敦的敬重了。正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情况所显示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的苦难命运（第11章）是对英国托利党人媾和的一个更不愉快的纪念品。但是，说到底，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感到和约的双方比英国同波旁家族初步协议的内容（这是各国在乌得勒支所不得不接受的）更加卑劣。在九年战争中，反法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试图同路易十四单独议和，有的真是这样做了；但是，直到1711—1712年，1701年缔结的“大同盟”还是团结一致以反对路易十四企图瓦解它的一贯努力。

在安妮女王末年，英国外交政策有民族主义的趋势。这是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对威廉三世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英国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荷兰议会议长海因修斯和马尔巴勒公爵的整个欧洲战略一直有人批评。在开始时，“奥兰治的威廉”于1688年冒险侵入英格兰并不是为了从他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岳父统治下拯救英国人的自由或者英国国教的唯我独尊地位，而是为了终止詹姆士二世在奥兰治同波旁的神经战中保持中立（这一神经战是继“归属”及所谓“雷根斯堡停战”[\[25\]](#)之后发生的）。威廉具有的对整个欧洲形势的看法只能同路易十四的看法相比拟。路易十四得益于他那套模范的外交体系，但他鄙视人的本性，又取得了多次侵略的胜利，从而自己有一些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他就为这些指导思想所束缚而不能自拔（第5章）。威廉和他周围小圈子里的近臣逐渐形成一种对于欧洲共同福祉的意识，比起路易关于法国有传播文明的使命的观念来，如果说在某些方面更为老式的话，那么总的来说是更为宽仁的。路易的上述观念在这位“伟大国王”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他身后还遗留下来。但可以理解，这一观

念对路易来说是很难同他个人的荣誉分开的。正是在这一方面，甚至于比他绝不承认失败的坚决性和作为君主的真诚还要突出（第8章），威廉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带头实行“瓜分外交”以探索不使用武力解决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途径是威廉。在认识到路易缺乏诚意之后，又是威廉采取了必要步骤，缔结1701年的“大同盟”并使英、荷两国的思想转而支持这一同盟（第12章）。

在1688年，特别是英国海军，明显地表现为在对法国的公开冲突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国的战线是只能由海上强国协同作战才可打破的。为了巩固威廉在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土地上的控制，大规模的海上作战确实已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了（第7章）；而威廉的海军将领们在1692年巴夫勒尔溃败之后对布列斯特和土伦的分遣舰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如不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另一方面，英国人要路易十四接受1688年的革命（第6章）（路易把它看作既是他战略上的挫折，又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有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再加上同大陆上小国的松散联盟——这种联盟是他们的国王毕生不懈地缔结起来以反对“太阳之王”难以预料的侵略的。由于这些侵略行动都有组织良好、规模空前的陆军支援——在最大限度动员时不下50万人——英国必须在国内和海外征兵，才能以百年战争后从未有过的规模介入大陆战争。如果英国认识到这一点，这不过是在另一首这样的史诗中的第一回合。当时，在哈利这样的人看来，这样做无谓地偏离了这个国家成为海上帝国的真正才能。代替海上称雄的是英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主要承担了一项陆军任务，这一任务集中在尼德兰——在威廉的思想中，只有在尼德兰才能决定性地摧毁法国的力量，但在那个地方一套布局巧妙的堡垒体系使行动受到阻碍。沃邦——从他激烈批评“旧政府”的考验中也显示出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人——的军事工程使这一段最易受攻击的法国边界设置了防御工事，最后阻挡住（虽然很险）甚至是马尔巴勒和尤金的进攻，这两位统帅同查理十二世都比威廉国王或其他荷兰将军更喜欢采用运动战。法国就这样为那种强国哨卡所拯救，而设置这样的哨卡本来是荷兰联合省自己想要实现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在1712—1714年媾和中，其他政府都对哨卡设置如此重视，这确实是很说明问题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防御技术超过了进攻技术，这是事实；还有在某些地理条件下（如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地）防御重于进攻。但这种依赖哨卡的心理从长远来看是

自欺欺人的，正如1940年的马其诺防线一样，而在短期内它也毒害了战略想象力[第22章（1）]。

九年战争在六个战场上激烈而无结果地进行。它本来应该在1693—1694年结束的，当时法国经历了这段时期中两次最严重的歉收中的第一次，加重了战士们的经济困难。这次战争延续到1697年完全是由于法国不愿承认国王威廉，正如下一次战争在1709—1710年（第二次发生粮食和信贷严重危机的年份）以后还延长下去，要归因于在国王菲利普五世的问题上盟国的顽固态度。这两次战争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外，作战的广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在1702年，法国人由必须保卫西班牙属尼德兰而不是试图征服它开始。在每一情况下，早期的胜利都未能产生战略上的决定性结果，尽管法国在1690—1693年由卡蒂纳和卢森堡（“tapissien de.otre-‘圣母院壁毯’ Dame”）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只有在下一斗争的后期与维拉尔在德南所取得的战绩相比。在这斗争中，起初占上风的是盟国，至少在1704—1706年当马尔巴勒和尤金的闪电式进军挽救了维也纳和都灵时是如此。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军队的运动性较大（虽然不如北方战争），军事活动停止的间歇期也较长。正如以布莱海姆和都灵战役为高峰的战局发展所显示，法国人想避免把主要战场局限在尼德兰；这种情况在九年战争中曾使得他们多次把部队从莱茵兰抽走，因而在那里只好使用恫吓、威胁的战术来维持。但是他们的将军们却因受到凡尔赛的遥控而束缚了手脚，正如尤金因为要对奥地利军事参议会负责而受到束缚、马尔巴勒因为他的荷兰同僚们专务防御而受到束缚一样。但是，马尔巴勒最深刻的失望来自尤金进攻土伦的失败，这次进攻本来是可以为1707年向巴黎的进军打开通道的。他使国王威廉具有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见地并且在肖维尔身上看到一位积极的、期望成功的海军上将的罕有表现。

直到英国航运的“流产”导致1708年以后在本国海域内重新部署海军力量之前，地中海的作战比上一次战争更为经常地吸住了英国海军力量。在上一次战争中，尽管在巴夫勒尔之后在法国宫廷中有反对海国主义分子的影响，而法国帆船巡洋舰则越来越集中破坏敌人兴旺的但易受攻击的海上贸易，英国本岛的防卫仍然是它经常优先考虑的事情。除了1708年的“敦刻尔克警报”之外，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唯一的海上主动行动是企图收复直布罗陀，以及随之而来的

1704年在马拉加口外的不分胜负的战斗。另一方面，法国海盗们所以能造成损失、使自己发横财，是由于他们从王家海军工厂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合作。这些工厂帮助装备那些游动的分遣队（它们能够破坏荷兰人在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捕鲸作业或阻止运兵去里斯本），从而给予为数众多的较小的私掠船以背后的支援[第22章（3）]。巴尔和福尔班的敦刻尔克是进行这一事务的主要地方，因此在英国的议和条款中，拆毁那里的堡垒及海港工事成了主要的一条。到1706年时，著名的Malouin Course已经衰落，尽管它的赞助者继续支援迪盖-特鲁安从布雷斯特出发远征，而正是在这时，马赛的资金和土伦的闲着的海上人才的结合体才开始壮大起来。伊贝尔维尔和卡萨尔在1706年和1712年也是从本国港口出发，去进行对安的列斯群岛的掠夺。在同盟国方面，可以同这些多种多样的、冒风险事业相比拟的，只有可怕的米德尔堡和弗洛辛的Commissievaart——即使“海峡群岛的岛民”像瘟疫一样侵害布列塔尼人的沿海航运，而牙买加的私掠船也不时出来骚扰。1708年，英国私掠船所得到的法律上的支持主要相当于用法定的巡航舰和护航船队保护英国本国海上门户不发生惊慌的措施。“航道战争”艺术所要求的是速度和残暴，而不是火力和勇气，这种战争艺术是非常自然地在狭窄海面上形成的。在地中海，一些海上小国老是在同伊斯兰作战，那里就盛行这种战术（第17章）。

多次战争的猛烈程度和旷日持久，对人力和公共财政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如果说，在彼得的俄国，战争所引起的社会骚动是一种例外的情况，那么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瑞典（在1709年以前）却有办法以战养战。因疾病和逃亡，也因敌方行动而造成的人员的损耗，作为一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最终不如国家负债那么重要，但每个冬天补充兵员的问题却使征兵官员伤透脑筋。这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哀叹马尔普莱奎特的重大杀伤（1709年）和斯蒂拉克的3000死者（1692年）的一个理由。而促使指挥官和政府避免全力对阵，也不只是因为野炮的笨重和构筑工事的费事，而是因为广泛使用燧发步枪和装在步枪上的刺刀之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上的变化[第22章（1）]，使得战斗的伤亡更大。

贫穷可以成为兵员的巨大来源[第22章（2）]，但即使在西方，也不排除用半胁迫的手段或以雇佣兵来补充国家军队的必要性——这些雇佣兵是从德意志各诸侯或瑞士地方官那里雇来的。在1702年相当庞

大的荷兰陆军中，大部分成员是领取津贴的士兵，此外还有独立的普鲁士步兵和丹麦骑兵，这两支部队是由海上列强供给的，赢得了马尔巴勒和尤金的赞誉；帝国军队本身在1702年由参议院扩大到12万人（这个数字是从未有过的），但实际上这比莱茵的军队要少得多。路易十四的大军是由说各种语言的人组成的（它常获内线作战之利），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还用来自法国各教区的民兵来填补防线上的空隙。民兵在表面上是由当地地主统率的地方保安部队，它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在法国及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征兵的原则由此产生。最广泛实施这一原则的是沙皇彼得，他还强征民夫，手段之狠远远超过——举例说——法国边境“财政区”的总管。除了这一发展之外（在俄罗斯和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中，这一发展意味着社会同战争的需要越来越多地联结起来），这一时期看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体制的成熟，这种体制就是从指定担负此项任务的农村及产业中募集士兵和军官以及给养。在另一方面，波兰人则继续过分地依赖一种封建的征发制度。因而在所有为宪法和财政改革而作的努力中，建立一支更大的王家军队总是成为一个焦点[第20章（2）]。

在易北河以外及多瑙河下游地方，所有的军队多少都靠就地筹饷维持。相反，在西方，发展的趋势是免除军队逐日依靠平民供养：宿营还是要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负担（作为一条促使人民服从政府的法令，这有它的用处），但私下的掠夺和粗暴的征发减少了。这要归功于西方军队的更为先进的后勤系统——如果不说是由于较好的纪律的话。确实，当交战双方在装备和战术上不相上下的时候，后勤上的微弱优势有时能够决定胜负。马尔巴勒和查理十二世的胜利，像他们激发出部下的忠诚一样，是由于他们亲自关怀饲料和靴履的结果。尤金对十分庞大的奥斯曼野战军的胜利，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同时也是对更有效率的参谋部的奖赏——虽然在那个时代参谋部的组织还是很不完备的[第22章（1）及（2）]。

从被动员的人数看，造船厂和战舰的费用甚至大于堡垒和攻城炮队，并且还需要更加复杂多样的技巧和材料，其中一部分要从波罗的海地区才能大量获得。奥斯曼海军特别幸运，能够依靠本国生产的物资，而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在这方面的处境却极为不利。建造船舶并使它们适于航海，这需要长期的经验、热心的管理人员、优秀的工匠和可靠的承包商。尽管存在许多弊病，所有的海上强国除了西班牙和俄

罗斯之外都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彼得在1697—1698年对赞丹和德特福的访问，除了取得直接经验外，就是为了延揽造船技工，以建设一支新的海军；这是同他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成就——也是最漠视俄国人民才能的一项成就。另一方面，法国尽管有罗什福尔的贝贡这样优秀的海军监督、土伦的布莱斯这样好的造船师、图尔维尔这样伟大的海军统帅，但却缺乏一个对海军力量的信念从不动摇的统治者；荷兰共和国则依靠五所海军学院的勉强合作。而在威廉死后，绝大部分负担落在阿姆斯特丹学院的肩上，结果是荷兰的海军像法国海军一样逐渐缩小。二者的主要原因都在于财政。在西方列强中，只有英国证明是能够把同时在陆地和海上进行战争的巨大负担维持到底的。它能这样做是由于国会愿意使国债增加到吓人的程度，也由于可以使各债权人静候还钱。在这些人中，最受苦的是海员。薪饷拖欠或打折扣；后来又实行一种备受批评的新办法，即把海员从一艘船调到另一艘船，以节约人力和减少逃亡，但由此造成了账目的混乱，并使海员们过分长时间地处于疾病的威胁之下和被剥夺的状态，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待遇恶劣和征召困难形成了恶性循环。正是在九年战争期间，英国那些专写小册子的人开始攻击当时在空前规模上进行的强制征召的罪恶和缺乏实效。他们赞赏科尔贝尔的“海员登记”的十分平易和具有人道精神，虽然它在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分遣队最为发展的年份里，几乎不能满足这些分遣队的兵员需要。国会半信半疑地想仿效这个办法，实行全国总登记，但结果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办法所涉及的全部行政问题被误解或拒绝了。因此，英国虽然有一支大加扩充的海军，但要派遣船舰迅速出海时总是遇到困难。但在这一成长时期（包括在牙买加和梅诺卡，还有普利茅斯和加的斯——后者是临时性的——建立新的基地），英国的海军将军们和海军部，总的来说是足以应付因对法国作战而产生的新问题的。除了人力以外，主要的弱点是海上食品的质量和费用，这些食品的质量低劣危及海员的健康。与此同时，海军军粮官为了抵偿购备这些食品的不敷之款，不得不挪用本来决定作海军其他用途的经费[第22章（3）]。

随着战事的延续，为了满足已比1688年前增大若干倍的国家支出的需要，西方各国被迫更多地也更巧妙地举债（第9章）。值得注意的是，海上列强的预算增长比例大于法国。在开始时法国的经常性税收为英国的5倍，尽管法国的国库远不如英国那样集中统一。英国在1688

—1697年期间，税收增加一倍；在1702—1714年期间又增加近一倍。税收增加主要是使乡间财主们受到损失，他们中不少人最后被迫抛弃了早已大部抵押出去的财产，并且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他们正在养肥那些发战争财的人（第8章）。还有，英国的进口税总水平提高了4倍，这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工业保护制度，尽管这不是增税的原来目的。^[26]硬性措施对荷兰人来讲更为重要，他们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姆斯特丹的借贷市场，这一市场虽然无人匹敌，但终究不是取之不尽的。维也纳也靠荷兰金融家的大量贷款，发展了自己的银行机构，这在奥地利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法国的税收，主要是包税，最后猛烈下降了。1695年和1710年实施的人头税和所得税确立了国王有权向他的全体臣民课税（至少在原则上如此）的主张（第10章）；但在法国，正如在哈布斯堡领地一样（这些地方以使人倾家荡产的高利率借贷度日），负荷税收重担的主要是农民。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居然能靠“现挣现吃”生存那么长时间，这是了不起的。这种情况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特别突出，那时卖官鬻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要不是这样的事太令人厌恶，听来真可发笑；造币厂印制的钞票和连续发出的短期“信用券”在流通中都要打越来越大的折扣，因此国家要靠像勒让德尔和贝尔纳这样一些私人金融家的信贷——国家还要靠他们经理海外汇款业务，所以依赖更深。但是，在这件复杂事务中，对胡格诺新教徒的驱逐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有利条件——这听来近乎奇谈——因为这样一来，扩展了在法国人控制下的国际银行网。法国胡格诺新教徒海外移民的第二代仍然具有很深的法国人的情感，在九年战争中，英国财政部就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中吃了苦头的一个单位，当时汇往欧洲大陆的大量汇款，正如按所需要的规模操纵公共信贷一样，对它是一个新的技术问题（第9章）。

在这两方面，战争造成了英国的一个财政奇迹。在1688年，詹姆士二世没有一个长期借贷的机构；到1714年，即使是寡妇和乡村牧师也会赎点互助储金、年金、国库券和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财政总的来说安排得较好，这主要是由于戈多尔芬（当时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的努力，尽管重大的发明是在前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1702—1713年每年平均支出比九年战争期间又高出一半，而且英国此时供给同盟国津贴的三分之二，但利率降低了。从1689—1715年，英国只改铸过一次货币，而法国的硬通货则贬值40次，因为储备日益减少而政府又想避免破产。还有，法国的总督察处

丝毫没有对陆海军费进行细心的监察，而白厅的财政部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第9章）。

办理军事贷款及和约——光是经手大笔付款和津贴——需要许多企业家的专门知识、关系和资金。这些企业家中有人从办理这些事务中发了大财，其中包括像马尔巴勒和尤金这样的军阀，但也有一位法国多菲内的旅店主巴黎的梅西，一位荷兰书商J.H. 于盖坦。我们看到，Court Jew在德国、“金融资本家”在伦敦以及在鲁昂和阿姆斯特丹及里昂和日内瓦经营的“新教徒银行”都肯定无疑地出现了。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对这些金融家也不得不屈尊降贵，甚至于封他们为贵族，不管剧作家或写小册子的人怎么说。贵族和长官们是从来不轻视做交易的，现在，大地主和城里贵人们纵有维持门面的各种办法，也越来越经常地同商人和银行家（虽然很少同工厂主）合伙和通婚。但还有许多小一些的投机商，是他们给笛福——没有人比他更富有创造性——称之为“计谋的时代”的这一时期定下了调子。正是他们，在仓库和咖啡馆里，开展了不断扩大的同中国和非洲奴隶海岸的贸易、海上和人寿保险的新市场以及投资和兑换的更先进办法。他们是在18世纪初被理想化为人类之友的一些实干家；即使是他们的利己主义，同贵族们在决斗中和赌台上讲究的传统荣誉相对比，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他们也参与了以瓷茶壶和胡桃木椅子为象征的生活方式中的讲求文雅之风；而且，无疑地，他们同科学家在一起，对社会上思想情操的微妙改变作了很多的贡献——这种改变就是在仍然成为这一代人主要精神寄托的宗教中，寻求更多的理性和容忍，也许还要寻求更多的善心。

“理性的时代”不是吹吹打打来到的；如果把本卷所研究的这一历史时期从任何简单的意义上称之为“理性的时代”的前奏，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即使对受教育的人来说，古老的基督教的宇宙只是经历了修正和更新，而不是向一小批怀疑派投降，这些人否认基督神圣，或（更常见地）否认圣慈的恩典。很明显，这些异端邪说并不新鲜，尽管由于在科学家和史学家（他们自己常常是虔诚的信徒）手上，基督教的信仰被除去了许多迷信的装饰，从而使阿里乌和贝拉基教士们^[27]的观点得到了加强。但是，对许多信徒来说，17世纪也一直是一个精神上越来越动荡的世纪，因为正是伽利略，他摧毁了天体的音乐；是笛卡儿，他造出了一个完全是机械性能的宇宙。在1680—

1715年间（有一本杰出的著作^[28]称此为欧洲人思想危机的年代），西蒙（一位被排斥的奥拉托利派教徒）和培尔（一位被流放的胡格诺教徒）的批判性著作削弱了对神的启示和理性这两个方面的信念，而牛顿和洛克的严正推理要求理智本身的更加严格的证明。最主要的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新观念被交给了这样一代人，他们早已十分苦恼地知道了人性的腐败；精神上的悲观主义刻印在布瓦洛以及加尔文教派和詹森教派——的古典主义上。“合理的宗教”或“自然的道德”（不论其原来意图如何有建设性）在一个对人类所作恶行如此敏感的世界里能够完全不受放荡主义的沾染吗？神已经从世界上撤走了吗？资本家有繁荣的责任、奴仆有重生的希望吗？隐遁主义者的自暴自弃是对斯多葛学派的自我克制的回答、虔敬主义教会和慈善学校是对伊壁鸠鲁派（享乐派）的放任的回答、耶稣会号召顺从教皇和国王是对忠实的皮朗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的回答吗？这些是当时进行辩论的一部分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参与辩论的有各种脾气和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思想的深刻、论证的微妙直到今天仍可感到。对于像波舒哀这样一个坚强的传统保守者来说，在罗马天主教组织内部，同外部的各种“花样”的新教教会一样，充满了敌人；而“新英格兰教派”的博学的卫士们则拼命地努力保持他们的圣约神学院不受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教友会的影响，又不受那些愿意把“半信半疑”的成员吸收进“圣餐”的教士们的更为隐蔽的污染。在这一水平上，马勒伯朗士和斯宾塞、培尔和莱布尼兹的时代是一个修正教条的时代，在上帝正义论（Theodicy，一个新词）^[29]方面是大胆的而在论辩术方面是多样的。但是，世俗主义、放任主义和自然神学的混合力量在慢慢地形成“非神秘的基督教义”的宗教气质——在那些能够受得了的各界人士之中——虽然在新科学中有玄秘的成分而且幻术还继续迷惑着甚至一些地位很高的人。^[30]因此，科学家的乐观主义终究散布到神学家和道学家中间，生活走出了一些古老的争论旋涡，如“命运”“绝对服从帝王的神授权力”“Cujus regio ejus religio”（“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争论在17世纪80年代的许多国家达到了剧烈的、危险性的高潮（第4章）。

如果要了解英国1688年革命（第6章）的爆炸性影响，必须把所有上述发展记在心里。它的内在逻辑只是在以后的30年中才逐渐清楚，这30年中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以适应在欧洲的新的地位和国内的新的

权力结构。1688—1689年内事件的迅速演变确实不止是詹姆士二世所执行的（或者归在他名下的）宗教政策的失败，因为它也扭转了在他登位以前就存在的专制主义倾向。在神授王权和契约王权之间的争论到底在1680—1683年间先后出版的菲尔默和洛克的著作中产生了根本性的文件。但是，1689年的律令性合同——政客们在这里达成了最大限度的协议，并为一个新的国王所接受，政客们需要这个国王比国王需要他们更迫切——仍然保留了某些剩余的最高权力，成为以后引起很多愤懑的根子，不论这些权力是由一个使用非传统方法的“战士—国王”来行使，还是由一个虔诚的女王交付给国会中联盟的领袖们（他们在开始被称为“内阁”的一个机关里定期会晤）。过了好几十年之后，经历了多次摩擦，在这受限制的君权和国会下院之间才订出一套和谐的工作关系。国会下院在这些年里，甚至在执行外交政策中也感到了它自己的力量。结果是，用内战以外的办法来解决政党纷争的这种结构的本身，就像含有内在敏感性的战争和宗教问题一样，使人们自然趋向于对各自所属党派的效忠（第8章）。这种情况扩展到国会同宗教会议、上院同下院、选民同当选人、政府同报界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植根于地产、公民自由和政治同意的一种古典的“混合的”宪法。它被长时间地赞誉为同“力量均衡”——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家修养的首要信条——相对应的国内政治的最好信条（第5章）。但是，“最近这次快乐的革命”不会像它所做的那样把魔法施之于辉格党的神话学（在大西洋的两岸）或法国的“英国热”，如果它看来没有像麦考莱所感觉到的那样^[31]，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繁荣和军事荣誉同时增长”：这一“秩序和自由的吉祥结合”被认为最后可用以说明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工业取得首要地位，为什么能有对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们的宽容和新闻自由，为什么会有1707年同苏格兰的联合，为什么有对北美洲和亚洲一个帝国的征服。这一革命的从事者喜欢把它看作重申某些古老的合法自由，但它也释放出经济能量，这些经济能量曾经受到以前的政权的议事会的管理和垄断的束缚。还有，这一革命由于在进行和巩固过程中的国际因素，刺激了对政治信息和评论的需要——反映在有活力、爱争议的报业的发展，这一报业的本身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臭名昭著的英国“派性热”——从而开创了这一民族最长久的特性之一。^[32]与此俱来的是一种自以为在各民族中居于最前列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范布勒为马尔巴勒在伍德斯托克建筑的宫殿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英国的中立一直是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居于“优势”的一项条件，因此英国王位在1689年的继承立即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失败。在同样程度上，他在里斯威克承认威廉三世为“上帝恩宠的”国王，使他在国内大失面子。但是，由于坚持不屈，路易后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斗争中为他的孙子（如果不说是为他自己）在主要问题上赢得了胜利。两次和约中的任何一次都没有使他作出重要的领土让步，尽管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关于纽芬兰和赫德森湾的规定是可观的经济牺牲。最主要的是，他保留了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通向他的王国的战略要地，而法国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习惯地总是处于他一切筹划的中心。这些年内，法国的“衰落”最基本地表现在失去军事和外交方面上升的势头。但是，即使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地位如日中天的时候，路易也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法国边境上十分有限的疆土扩展却换来了全欧洲的永久警觉，而法国边境的安全仍被认为有赖于占领边境外的一些桥头堡，一个特拉巴赫或一个卡塞莱。这样的哨所构成在1688年公开冲突爆发前的神经战中采取侵略性（即使是作为预防措施）军事行动的一个危险的刺激因素（第7章）。这种行动自由为1713—1714年的欧洲势力均衡（划定防御线及发表放弃权利的声明）所取代。但法国很快就成为旨在维持这一势力均衡而建立的英法同盟和四国同盟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到了1735年，红衣主教弗勒里就已恢复了法国在欧洲外交中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路易十五的臣民们也以尊敬的心情回顾在1715年结束（当时无人伤悼）的这一伟大时代。因此，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解释那些“日落”（路易十四自称“太阳之王”——译者）的年份？真正的军事挫折和财政崩溃只是最后10年的特征，当时国王的家庭中的丧亡同人民的痛苦相互回响。这个政权居然能够度过这些可怕的年月，显示出它自“投石党运动”以来已经走了多远。即使在1710年，尽管他不得不容忍财务上所有敲诈勒索行为（但为此金融家们成了替罪羊），路易还是能够激发他的臣民们为反对屈辱的和约条款而作出最大努力。相比起来，詹姆士二世的罪孽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却只能保住王位不到4年时间（在他登基时，这个王位看来达到了不可动摇的主要支配地位），而路易的最大胆的批评者在他统治的危急时刻却这样写道：“国王的事情已经无可抗拒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民族必须自救。”^[33] 尽管有希望幻灭的情况，“太阳之王”已经如此成功地代表了法兰西民族，它不可能使关于对抗的利益或身份的差异的任

何意识转化成为革命。在法国，煽动性暴乱发生得够多的，特别是在歉收之后，但只有Protestant Cévennois的起义在平定时有些困难。殷实的城里人虽然也有许多抱怨，但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贫困的邻居要比害怕王室的政策及其执行者更厉害些。^[34]如果说，在1713年对国王的顺从要比1688年逊色，那是由于国王抛弃了高卢主义（Gallicanism，1682年法国掀起的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译者）（第4章），而不是由于他的制造战争，在行政官吏和教士们——他们比起那些只图权力和享乐的宫廷大臣来，是更加敏感的民意指示器——中间造成了惊慌。即使如此，在路易自己眼里，一次长期的战争标志着外交的失败，而且战争本身对他身边的道德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邪恶。尽管路易对1693年的饥谨已不如在此之前的经济停滞那样要负直接的责任，费奈隆已被驱使去狠狠地抨击国王在欧洲的全部行动和在国内的挥霍；路易的人数很少的内阁成员之一博维利埃谴责他撕毁“分割条约”，言而无信。这样的批评在以后的年月里更为直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取消“内阁专制”和奢侈品工业、恢复各省等级会议出自以回复封建秩序为首要要求的贵族（第10章）。政治自由被等同于高级阶层及历史性省区的特权，而挽救经济则被等同于科尔贝尔主义的终结。^[35]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在充满这些紧张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只不过是一支插曲。他的专制主义在内心里是机会主义的，正面解决这些紧张关系从来不包括在它的行动计划之内。一位德·圣皮埃尔院长（他的早熟的现代性质使我们想起笛福）的方案，对于负担很重的国王和大臣们（他们一般说来是过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来说，似乎是空想的。他们的行动手段虽然按照同时代的多数标准来看是完备的，比起新的普鲁士王室已能得到的那些手段来，还是不如的。^[36]但是，他们的训政工作——它一步步地消除了各种离心力量的抵抗，这些离心力量集中在花样多得使人吃惊的传统机构之中——本来是可能扩展的，只是由于战争而未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等级会议和国会、教会和都市的早期活力又恢复到了足够阻挠18世纪有志改革的君主的程度。

从欧洲其他地区的倾向来看，也可以避免对路易十四的国内遗产作出轻易的责难。虽然官僚体制在增长，政府同社会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而18世纪是欧洲贵族的极盛时期（贵族的定义仍然难下）。即使是瑞典和俄罗斯的军事贵族也同大地主合流，如同在法

国的法袍和佩剑一样。在南部欧洲，这些大地主常常又是城市里的显贵或者同这些显贵沆瀣一气，尽管在热那亚地产与银行业可能相敌对，而在受西班牙影响的地区——在这里早就取消了一个军事阶级，但新的封号极多——谱系间的竞争则十分尖锐。确实，在“世代簪缨”的贵族同新封的贵族之间所产生的社会裂痕（从圣西蒙的回忆录中我们很熟悉），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都能发现，程度最轻的是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地区，而最厉害的则是在普鲁士和瑞典，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那里王朝的治理比维也纳更多地依靠不计地产和门第的委任和晋升官吏。在腓特烈一世的普鲁士，事实上，政府部长常比法国更加突如其来地被封为贵族，法国的“行政贵族”（圣西蒙所说的“可恶的布尔乔亚”）是逐步地从高级官员和“国家法院”中出现的。

^[37]但是，在长期战争的压力下，王室必然要征召为数更多的文武官员，而迹象显示，那些世家高门越来越热衷于做官，以至于后来几乎为它们所包办。把为国服役作为贵族的最新基本条件的观点，即使在俄国也没有永久性地得到贯彻，尽管彼得力求使之成为唯一的基本条件（第21章），同以出身或财富为基本条件泾渭分明。世袭地产这一传统地位仍然还要持续一个很长时期，在有些国家由此而被赋予国家政治权力。在英国和瑞典，同在匈牙利和波兰一样，较小的贵族或乡绅们常在大地主领导下分享这种权力，尽管在朝廷和乡里之间的某种对立长期在英国和匈牙利延续下来（在匈牙利，这种对立因豪门大族的德意志化而加剧）。几乎在各国都有一大批“外省”贵族，他们对国家政治既没有手段也没有修养去参与。他们的境况已不再能同他们因祖先而产生的骄傲心理相称，因此他们坚持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除了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即使是这两个国家的当权派和政客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南方高门大族中典型的奢侈生活方式），18世纪贵族们的欢乐或仅仅是他们的尊贵，都是靠特权来支持的，这些特权给农民群众带来困苦——不论是沃邦所说的“乡村小民”、沙夫茨伯里所说的“可怜农村牲畜”，还是匈牙利人所说的“悲惨的纳税平民”（*misera plebs contribuens*）。从巴尔干到丹麦，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一时期内，上述各地农民都经历了衰败，只有一些当地“土豪”和一些山地社区（在萨伏依和瑞士境外）是例外。不管我们怎样来区别“地产保有农”和雇农的差异或西部打短工的农民和东部农奴的差异，如果说欧洲大陆上总人口的十分之九在1715年的境况要比1690年

差，那是不过分的。在看到显然是因多次战争而出现的入息更多的物价水平时[第23章（2）]，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许多困苦境况，这些困苦不是因战争而来的，但却因战争而加剧了。路易十四在位的后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天时不正的时期。^[38]在欧洲，没有一种经济，更不要说法国的经济，是能够抵挡得住像欧洲在1708—1709年冬季及其后所遭遇的那种大难的，那是为人所知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即使在英国，虽然在威廉和安妮统治下相对较为健全，但死亡和骚乱却有增无减。17世纪90年代的夏季寒冷多雨，从苏格兰到芬兰的春播作物和南方的葡萄园都受到损害。地中海国家从1699—1723年受到频繁的干旱和牲畜病害的打击；1713—1720年，牛瘟从俄国传到尼德兰。家畜或粮食的损失使农村居民受到灾荒的威胁，这些居民的日常食物本来就不过是勉强糊口。老人和幼童特别容易得病——像1693—1694年席卷法国、1696—1699年席卷整个北方的匮乏常常伴随着（如果不是预兆着）疾病。还有，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很快就在工业需求、信贷、就业和工资等方面引起反响，而这些方面同生活费用的变化是直接关联的。

当然，在这个看来在人口统计数上相对稳定的时期，死亡率同物价一样，在各地是有差别的[第23章（2）]；更不必说，战事的发生也是如此。在许多地方，徭役、供应军队食宿和征兵，为数都增加了；在易北河彼岸，农奴制加强了；还有，税收增加，伴之以货币供应不稳定和农村债台高筑。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部尼德兰各国军队来往的直接影响，法国人在巴拉丁领地及俄国人在乌克兰所采取的“焦土”战术，布莱海姆战役后对巴伐利亚、1704年后对葡萄牙边境地区、1706—1707年对萨克森以及在整个北方战争期间对波兰的掠夺——且不说对西印度和爱琴海各岛、新英格兰的移民家宅和佛罗里达传教机构的袭击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内，波兰那些人口稀少的城镇和荒无人烟的村庄将成为瑞典、俄国和萨克森士兵行动的见证。为了满足这些士兵的需求，不管资产阶级还是贵族均难幸免[第20章（2）]。尽管在西方，军事行政已越来越能够限制敌对行动对平民的影响，但如果以为任何交战国会实行克制（除非这样做对它的目的有利），那是错误的。不论怎么样，仅仅由于敌对行动的事实而使和平时期的贸易格局打乱——虽然各国政府力图使二者互相适应，给敌国商人发放特许证或对中立国家供应商加以鼓励（第5章）——就能影响到千千万万个生

产者，特别是当北方大战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同时发生的时候。当里加和里斯本这类重要港口易主或改变同盟关系的时候，当航运被阻滞或打乱的时候，反响所及，远离公海——在日内瓦这样的大陆市场上，在纺毛线、织亚麻布的灯光昏暗的农舍里，在简朴的葡萄园和烟草种植园里，都能感到。从这一观点来看，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第23章），18世纪的最初10年比17世纪的最后10年处于更加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些复杂的压力，以及为了实现宗教信仰和政治效忠上更加严格的一致而采取的其他压力，导致了大量的逃亡农民、战俘、逃兵、欠债人和闹独立的教派分子加入到占总人口很大一部分、习惯性地不断迁徙的人群的行列，这些人有游牧人、羊倌、占地者、小贩、流动各地的泥瓦匠和木匠、车夫、船夫、走江湖的卖艺人、职业冒险家、走私者和匪徒。南部塞尔维亚人向匈牙利出走，大批旧礼仪派教徒逃出沙皇彼得的法网，爱尔兰的詹姆士党人、巴拉丁领地的德意志人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的半自愿的流亡——这些只不过是尚待研究的范围广泛的大迁移的几个重大的例子。它们所显示的迹象表明，移动人数最多的是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黑海草原是为数较多的地区，鞑靼人和哥萨克骑手在这里争夺一块引起摩擦的地带（许多这样的地带为“政治上”的国家的化外之地），就如在东方的河上和商队小道上所特有的匪帮活动一样。正是为反对沙皇和土耳其苏丹，发生了当时最为惨烈的起义——哥萨克和土耳其近卫军的起义。但在欧洲其他部分所发生的袭击和骚乱事件，也是同那些完全抛弃了西方文化的人所干的海盗行径相当。

除了在被围困或占领、发生地震或鼠疫——它在1706—1714年间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广泛流行，使人难忘——的情况下，城镇为保护自身是组织得最好的，甚至在困难时期也能做成有利的买卖。在那种时期，农村贫民往往到城镇门口来希望得到点救济，但经常是落空的。有些城市，如米兰和伯尔尼，经常剥削依赖它们的农村。在发战争横财的人中间，有一些是市政的大亨。法国的社区只从轻认缴国家税收；匈牙利、比利时，甚至一些德意志城市都加强了它们的公民权；在英国，许多市政厅在那些年份里建设起来。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是政治家的一大心事，而伦敦的煤价则能惊动国会。工业长期向城镇以外扩展（在城镇里几乎到处都有限制性的行会组织），

的确为成千上万个农民家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现钱收入。但是实业家的利润大部分还是在城镇里花费掉的，就如农村公社借债所付的利息，以及成为封建主和教会收益极大部分的以地租及各种捐税杂费合成的传统收入，也都花费在城镇里一样。除了俄国（它在彼得去世时只有约300个城镇，平均每个城镇居民数不超过1000人）以及易北河以外的一般地区，资产阶级在继续扩展它对农村的控制。对商业及行政中心附近的农庄、葡萄园和园林地尤其如此，不论是伦敦或维也纳，是威尼斯的terraferma或是勃艮第科多尔省。只要战事在继续，没有什么王公有力量同他们的富有臣民的建筑热作竞争，虽然都灵和杜塞尔多夫、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扩展和美化是由它们的君主主持的，而彼得则是在付出生命和金钱的巨额代价之后才从涅瓦河的沼泽地上变出圣彼得堡来的。

当然，同增加城乡社会差距的贫富悬殊相平行的，还有在世俗居民中文化水平的差异，在文化水平方面还出现一种世界性城市文化的迹象。确实，音乐的培育主要还是要靠宫廷和教会，但公共音乐会正在伦敦、巴黎和汉堡兴起。伦敦人正从汉德尔那里获得对于圣乐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作为歌剧的严肃的代用品）的持久兴味。歌剧继续主宰着音乐的发展[第3章（2）]，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仍然是它的主要城市。德意志亲王们和英国贵族们也还是到贫困不堪的意大利去寻找艺术家，为他们制作那种满是女神和战士的巴洛克艺术装饰^[39]，以最大地满足一种充满活力的妄自尊大心理。^[40]他们不像法国贵族，这些法国贵族正在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向洛可可式^[41]艺术狂想发展，并且在华托（那一时期在阿尔卑斯山北方出生的一位伟大的画家）笔下的许多宁静的幽会场景中，找到了从路易十四后期的严肃作风中解脱出来的某些暗示。与此同时，巴黎的市政官们正在请拉吉利埃用他那挥洒自如的画笔为他们画像；英国新闻记者和海军将领则请才气横溢的内勒作画。尽管格林威治的桑希尔画厅（1708年开始制作）还是大量运用17世纪意大利各学派的寓言材料，就如韦里奥在汉普顿宫廷为威廉三世所做的那样，艺术的潮流正在确定地向着已故荷兰大师们那种更为亲切的、有情节的想象力发展。

在那些更加容易接触到的文艺流派中（这些流派带有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强烈标记），一种有时显得平凡的具体描写手法十分突出[第3章（1）]。笛福和勒萨日的传奇历险小说用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使

小说具有历史回忆录那种逼真的感觉，并且宣扬了聪慧的努力的價值。艾迪生和斯蒂尔赋予他们笔下的精明商人以道义上的尊严，这种尊严是值得欧洲人效法的。即使法国的商人还在追求贵族化，但是在“哲学家”^[42]的影响下，“高贵生活”的方式也在变化——喜欢寻欢作乐、思想自由，但见多识广并且基本上是谦卑的，这是仿效快活长寿的丰特奈尔所设下的模式，他是法国文化从笛卡儿向伏尔泰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法国戏院里老一套的插科打诨可能仍然以暴发户为取笑对象，但是当古在1700年以同情的心理来塑造资产阶级典型，而英国的社会生活喜剧则嘲笑官宦的恶行和愚蠢。在这两个国家里，在戏剧中赋予教育性的寓意和感伤性的结尾的做法取得了进展。费奈隆的《泰勒马克》^[43]（1699年的最畅销书）只不过是一大批反对骄奢放纵的文学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著作。法国的歌曲和“传单”则表现出公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他们在艰苦境况的压力下正在回到对农村与世隔绝生活的梦想中去，常常带着曼依·莱斯戈特色的眼泪，并且也可能是受了许多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的影响。^[44]英国和法国的风尚同样地都正在从古典主义的大而无当的普遍性概括，转向对时事（包括政治新闻和通俗科学）的更热切的吸收。

当现实世界这样恢复了为正统古典主义所轻视的声誉的时候，在马比荣和赫恩、赖默和穆拉托里等人在世时的历史研究中，继续记述一些具体的现象，常常是为了支持当时进行着的论争并运用了新的更为精细的技巧。孤独地在那不勒斯刻苦钻研的维科，是一位特殊的哲学天才，他在这一时期不合于世，到下一时期又复如此（虽然方式不同）。古典学者重视典型的和重复出现的事物——这一点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编史工作中是如此明显——而早在1703年一位伦敦医生的著作中已见端倪，他对政府作历史性的解剖从而阐释文化的差异，但当时注意到他的人很少，洛克是其中之一。^[45]法国古典主义的哲理精神总是同大多数人的文化相对抗的，它只是在拉辛（卒于1699年）之后才达到完全的成熟。关于法国风尚的后来的历史显示，它不是轻易地能从“伟大世纪”的贵族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也不因古典主义者的胜利而有所改变，这些胜利本身使“现代人”可以在同“古代人”的对照中衡量它的要求[第3章（1）]。在路易十四晚年，有一段相对来说精力不足的情况但为时甚短，这同沿袭下来的日落图像有很大关系。但是，法文以及用它来再好不过地加以表达的“礼仪”正在征服

欧洲的统治者。似乎有点奇怪的是，法国新教徒（胡格诺）与国外的聚居点对这一结果作出了及时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它们的牧师们在荷兰创办的、用以散播知识的国际报纸。尤其是培尔的*Republique des Lettres*成了荷兰首长——国王的欧洲联邦的文化上的对手[第3章（1）]。如果说英国文学兴盛时期的作家们表现出在英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自我信任，那么他们的受惠于法国文化自德赖登以后就显而易见了。“观察家先生”确实是主张俭朴生活的，但是他以机智使道德生气勃勃并使学习成为文雅之事，从而请他的读者去仿效法国沙龙的礼仪。随后，艾迪生在欧洲大陆上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法国和英国文艺的交流和相互促进，达到了“共同主宰”欧洲的地步（原文第72页），并对更为广泛的科学运动产生影响（第2章）。英法两国所建立的全国性科学院虽各有不同，但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那些年代里，科学院被认为是装备一个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在荷兰和意大利，重要的工作仍在进行，而德意志人、瑞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然也都作出了重大发现，这种对自然的了解即使在那时也已被认为是一次知识革命。因为参与的研究者的人数和项目很多，把这些重大发现说成单一的运动可能有点困难，但下列事实使它们具有这样的运动的某些性质：一是组织得越来越好的渠道，用以传递（确实还使之通俗化）新知识，即使在战时也仍进行；二是对系统研究的成果抱有共同的信心。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如此之多，使人几乎要把这一时期认为是倾向于经验主义的。事实上，在科学思想中也充满着各种教条（有的还不是很古老的），使许多探索的方向错误，或使接受新的真理迟缓。这种教条主义的突出例子是笛卡儿的宇宙观仍然享有威望。笛卡儿的宇宙观是如此引人入胜的完备，以至于对牛顿的更为朴实的、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数理说明，设置了一道由偏见构成的障碍，在法国尤其如此。牛顿的“吸引”原理比起笛卡儿的完完全全的宿命论体系（或由莱布尼兹修正了的体系）来，留有多得多的余地供自然世界中的万能之神作直接的干预。牛顿的原理初看似乎是向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倒退，因为它模糊了自然和超自然秩序之间的界限。正是这种为神学家所立即指斥的对“自然”的精神化，成为启蒙时代的特征。但是，在英国和荷兰之外，牛顿的学说在约1740年之前并没有取得胜利。10年之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站在实证主义方面反对根据猜测而作的总体阐释，附带地为科学提供了那个明晰

的信念，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一个“运动”或者甚至称之为一次“革命”。

牛顿的理论物理学自此以后没有受到挑战，几乎直到本世纪（20世纪）。还应提到的是，他所采取的工作程序是以度量衡准确性的新标准为基础的，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性区别理论和假设，尽管他所用的方法，同他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大部分是从他的《基本原理》出版前半世纪内实验主义积习中继承下来的，特别是来自数学的戏剧性进展。1687年，科学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是数学和机械学的紧密结合，还有微粒物理学中粗陋的原子学说。在生理学研究中，机械模式长期盛行，把医生放到次要地位；博尔哈夫曾为莱顿医学院赢得声誉，后转而研究化学。这门科学最后通过“燃素”这一想象丰富的错误，开始发现它本身的理论，但在这一时期，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制皂工人和其他工匠的领域。在这方面，玻义耳的经历是特别有启发的。他的文化涉猎之广以及他的乐于同能工巧匠交往，可能是无人匹敌的；但就由于他要统一“新哲学”的愿望，使他加强了化学对物理学的屈从。在另一方面，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还有地质学家，则在奋力从事标本的分类工作，这些标本来自远近各处，越来越多，堆满了他们的陈列室。先是在搜集和分类中的繁复要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生物科学在建立一种独立的理论结构方面很迟缓。从雷氏到林奈，植物分类学发展得比动物学快（后者的材料不如前者那么易于控制），尽管显微镜学家在研究生理功能和最微小的生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还有，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轰动一时的新发现也没有很快地打破物种不可改变的固定性这一“先验的”观念，这一观念因《圣经》上的创世纪以及林奈在1735年提出的“最高自然秩序”而得到了加强。但是，不到10年之后，在莫佩尔蒂和布丰的论文中可以找到查理·达尔文的见解，他们关于遗传的设想也使古老的关于繁殖的理论不再能够复活；整个关于“胎中预存说”的争论显示出新哲学中自吹自擂的经验主义的真正局限性。这样，伟大的《百科全书》不止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史中的一个时代。在之前的半个世纪的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发现的现代性而是它的冲击力。但这既是一种文化观点的成因，又是这种文化观点的后果，而这种文化观点将要改变世界。

当科学正在揭开一个新的宇宙并探索生命起源的时候，有思想的欧洲人也在心里琢磨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意识地 and 更加勇

敢地——由传教士和其他到过亚洲宫廷和美洲森林的旅行者所描述的
有关奇特的国体和信仰的某些事实。在此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记述
旅行的著作，但现在阅读这类著作的公众肯定要比过去扩大，《联
系》《航程》及地图集的出版商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出版物
在思想上造成的冲击，比来自广州和穆哈的货品[第23章（1）]对社交
礼仪的影响或巴西发现金矿对货币市场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即使这些
年真正开拓性的探险——“开拓者”[\[46\]](#)从圣保罗向巴西内地的激动
人心的进程（第16章）以及顽强的耶稣会士沿亚马孙河而下和前往加
利福尼亚的旅程——当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还不如教士们在北京的
功业（第4章）以及外国海船船长们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一些秘密地
点的航行（尽管丹皮尔的成就要更大一些）。从根本上说，我们所面
临的是当代对收集好奇的知识（从萨克森古物到印度尼西亚草药）的
热情的另一种表现，以及——同样重要的——对外国的和原始的事物
的一种从爱好出发的追求。这对于一个“世纪末”的时代来说是相符
的，在这时代里这么多为人所熟悉的、设在世间的通向上帝天国的路
牌都已被废弃了。然而，尽管来自海外的新闻中有许多内容是为了实
用的目的（不论是达里埃湾的地形或印度皇帝奥朗则布战事的细
节），其他还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各个部族、各种文明的面目、食物、
经济、政府、宗教和两性生活的客观叙述。这些对欧洲访客的观念是
一种挑战，并使坦率的读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道德和政治规范[第3章
（1）]。他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大吃一惊。在这一时期中，某些基
基督教派的教理已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对痛苦和罪恶现象的一些外来的
解释，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态度——尽管已经放弃了把它们吸收进欧
洲的史学和宇宙学结构中去的努力。后来，哲学家和重农学家整理了
这些材料（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从中得出了教益。但当时工具雏形
的人类学使得斯宾诺莎和西蒙、培尔和洛克所提出的关于教会和《圣
经》的权威、君权的理论基础、知识本身的性质等方面的问题，增加
了分量。

塔希提岛和尼罗河源头都还是未来的事；即使对欧洲少数高级人
士来说，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当时是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任何
一个上等人的书房里都不能没有一个地球仪——仍然充满了各种秘
密，虽然光的速度在很早以前已能确定下来了。在“鹅妈妈”[\[47\]](#)
《鲁滨孙漂流记》所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看来，世界上还有极为广远的

前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他们对想象中的航程的爱好、在《格列佛游记》的讽刺以及在孟德斯鸠的波斯旅客到巴黎所感到的惊讶中，欧洲人正在这样来表现他们的文明：嘲笑它，并创造更好的文明。

（沈苏儒 译）

[1]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序言”，第V页。因认为有用，下面把对科学、音乐和奥斯曼事务的探讨延伸到18世纪。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1908年），A. W. 沃德、G. W. 普罗思罗等编，“序言”，第V—VII页。

[3] 指路易十四，因为他用太阳做王徽。——译者

[4]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情况，可参阅福克·林德伯格著《波罗的海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编纂》，载《年鉴》（经济、社会、文化）第16年度（1961年），第425—440页。

[5] 历史上指地中海东岸各国。——译者

[6] 但说来也奇怪，查理为了保持联邦的独立，在考虑由哪一个波兰人来填补王位空缺的问题时，倒是想从J. J. 卢梭推荐的主要人选中挑选一个。卢梭的《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虽作于1772年并持谦虚态度，仍然是对这个独特民族的优点和弱点的卓越分析（他承认这个民族的精神活力和独创性）。由于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这个民族热衷于派别纷争的一面，卢梭则把导致自愿联合的立宪办法看作“政治上的杰作”，这一点是有趣的。

[7] 以下括号中的第××页均指原文页码。——译者

[8] Ulema，意为有智慧和学问的人。——译者

[9] 同本书一般做法相反，他和路易十四的名字都没有英语化拼写，因为我们最熟悉的是他们自己称呼的名字。

[10] 见R. 哈顿及J. S. 布朗利编《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1680—1720年马克·汤姆森所写和为他写的论文》（利物浦和多伦多，1968年）一书中R. 哈顿的文章。

[11] 本卷所述时期内帝国的内部事务在第5卷第18章和第23章中叙述，但可参阅本卷第5章和第18章。

[12] 指匈牙利的王权。——译者

[13]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3章。

[14] 即使对细心的观察家来说，这也不是很明显的。为了了解当时的外交，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请参阅Trivié侯爵1711年从巴塞罗那致都灵的在另一方面颇有

见解的报告，载C. Morandi编*Relazioni di ambasciatori sabaudi, genovesi e veneti, 1693—1713*，第1卷（博洛尼亚，1935年），第41页。

[15] 斯特普尼致弗农，1702年4月26日，转引自A. D. 弗朗西斯著《葡萄牙和大同盟》，载《历史研究所公报》第38卷（1965年），第76页。

[16] J. 默夫勒特：《路易十四与意大利》，《17世纪研究学会公报》第46—47号（1960年），第98—102页。

[17] 詹森（Cornelis Jansen, 1585—1639年）为荷兰神学家。1713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圣谕，驳斥著名詹森教派神甫奎斯耐有关新约全书的论著；圣谕的第一个拉丁字是Unigenitus，以后以此命名之。——译者

[18] 这一时期远东的发展已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7章中概述；参见本卷第16、23章（1）。

[19] 基德船长原为苏格兰海员，后成为著名的美洲海盗。——译者

[20] 圣·约翰致总督亨特书，2月6日O. S. 1711，见G. S. 格雷厄姆编《1711年向魁北克的步行远征》（1953年），第278页。

[21] 笛福[Daniel De Foe (Defoe) (1660—1731年)]，英国作家，《鲁滨孙漂流记》作者。——译者

[22] 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 (1630—1699年)]，英国商人，经济学家，曾任东印度公司总督。——译者

[23] 原文为*Perfide Albion*，Albion是英格兰的古名。——译者

[24] 指英国和荷兰之间关于在南部尼德兰戍守哨卡的协定。——译者

[2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219—220页。

[26] R. 戴维斯：《英国保护贸易的兴起，1689—1786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9卷（1966年），第306—317页。

[27] 阿里乌和贝拉基分别是4世纪和5世纪出现的基督教异端传教士，前者否认基督的神性，后者强调人性本善，反对关于原罪的教义。——译者

[28] P. 哈泽德：《欧洲人的思想危机，1680—1715年》（1935年）。

[29] 莱布尼兹所创，意在辩明上帝允许人世间存在自然及道德的罪恶即所以显示伟大的善良。——译者

[30] 参见J. 厄拉尔德著《18世纪上半期法国关于自然的观念》（两卷本）第1卷第1章（1963年）。

[31]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的英格兰历史》第1卷（1848年），第1页。

[32] G. C. 吉布斯在《斯坦厄普和沃波尔时期的报纸、议会和外交政策》一文中很好地论述了“欧洲事件相互关联的感觉”并不限于英国人。该文载*Méanges offerts à G. Jacquemyns*（布鲁塞尔，1968年），第293—315页。

[33] 费奈隆致谢弗勒兹书，1710年8月4日。G. G. 范·德森《西哀士》（纽约，1932年）一书第149页引用。

[34] 请比较J. 加勒特和G. 莱马尔尚德在《现代和当代历史评论》第9卷（1967年）第193—216、244—265页所载的文章。

[35] 参阅L. 罗斯克鲁格著的有趣论文《路易十四的反对派》（普林斯顿，1965年）。

[36]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3章。

[37] H. 罗森堡在《官僚政治、贵族政治和专制政治：普鲁士的经验（1660—1815年）》（剑桥，马萨诸塞，1958年）一书中作了社会学的分析。

[38] E. 勒·鲁瓦·拉迪里埃：《历史与气候》，载《年鉴》（经济、社会、文化）第14年度（1959年），第21页。

[39] 巴洛克为欧洲17世纪一种过分雕琢、奇特的艺术风格。——译者

[40] 见F. 哈斯科尔著《保护者与画家》，第7章（1963年）。

[41] 洛可可（Rococo）为欧洲18世纪一种纤巧浮华的艺术风格。——译者

[42] 根据1694年法国科学院所下的定义，哲学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致力于研究科学，并寻求从原因及规律方面去了解各种效果”。

[43] Télémaque即Telemachus，希腊神话人物。——译者

[44] 见G. 阿特金森著《对自然的情感和向俭朴生活的回归，1690—1740年》，（1960年）。

[45] 见J. A. W. 冈恩著《彼得·帕克斯顿的公民政体，过去和现在》，第40号（1968年），第42—57页。

[46] bandeirantes葡语中此词专指巴西腹地的开拓者。——译者

[47] “鹅妈妈”（mother Goose）是查理·佩罗（Charles Perrault）所写的童话集中讲故事的人，该书最早出版于1697年。——译者

第二章 科学运动与科学思想的传播， 1688—1751年

在《数学原理》一书于1687年出版后的若干年内，欧洲科学运动的性质和精神发生了徐缓渐进但却肯定无疑的变化。牛顿的这一杰作确实表明，这一“新的自然科学”能够解决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这时已经不同于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所处的那种豪勇壮烈的时代，不再需要用实验和数理科学的力量作为论据来说服当时的人。科学的事业本身已经可以为自己发言了。同时，《数学原理》还结束了哥白尼所引起的关于宇宙学说的那场大辩论，把力学树为一切科学的楷模。

[\[1\]](#)由于这种种发展，思想和组织方面冒险犯难的时代，于是让位于系统分类、收集事实和传播科学思想的时代。在一段时间内，科学显然变得较少原始独创精神。1689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年）和年事已高的约翰·沃利斯（1616—1703年）在皇家学会《自然科学学报》上讨论自然科学当前死气沉沉的原因时，感到当代比较年轻的人中间，“如今勤奋观察大自然的人并不太多”

[\[2\]](#)。两年之后，皇家学会理事会在会议记录上表示遗憾，说他们的计划遭到忽视和反对，以致一系列有用的发明创造未能实现。然而，就在这时，科学影响的扩大仍然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行业已经成长起来。具有高超技术水平的科学协会不久就迅速增加，各国政府都向科学投资，期望得到有利的回报。科学报刊日益增加，它们在众多的门外汉中间传播一种新自然科学。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文化教养在起变化。科学和科学方法开始取代传统的形而上学，成为标准的智力规范。与此同时，具有智力影响的地理中心也有转移。英国的思想空前地渗透到欧洲其他地区，而这首先是英国的着重经验的观点取得胜利。

把科学组成一个行业，这个使命已经落在17世纪各种科学协会的肩上。一般来说，大学本身在科学教育和研究方面并未做多少准备工作；而各种科学协会，正如在此以前成立的各种文学协会一样，主要由大学人士建立起来，作为位于保守的大学制度之外的新学问之家。

最早的一批协会建于意大利，但是在1700年之前，这些协会就不再存在了。然而，在另外的地方却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全国性机构，成为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的中心，它们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3]这反映出当时欧洲智力活动的领导，要由英国和法国平分秋色。在德国也有两个较小的科学协会，但是尚未成立全国性的科学院。正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成为欧洲和美洲以后建立的许许多多科学院的典范。但是，它们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典范。英国皇家学会是一个私人团体，完全由自己管理，选举自己的会员，既吸收专业工作者，也吸收业余爱好者；它不接受公家的财政支持和物质供应，不承担为英王政府工作的义务。而法国皇家科学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国家机构。会员全部是专业科学家，由国家任命，薪俸优厚，物质条件优渥，备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作为报偿，国家则期望他们执行政府要求他们执行的任何计划，计划通常都要有某些技术上的实用价值。这两个机构的确都遵循弗兰西斯·培根坚持的意见：科学应当起文明教化的作用，同时也要有实际裨益，两者也都强调科学研究的实验性质。但是，英王政府很快就懂得，让皇家学会不受干扰地自由从事自己的调研，以便改善人类的处境；而法国科学家则以现实精神确定，人类的利益从国内开始，而其筹措经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激起他们国君的兴趣。就发表的作品而论，很不容易确定，哪一种政策在18世纪上半期收效最大，因为还必须把会员个人能力这一无法估量的因素加进来平衡考虑。但是，肯定无疑的是，其他多数国家都追随法国这种建立全国性科学院的范例：由公家支持，不过并不一定由政府控制；法国皇家科学院由于具有专业性质和拥有适当的赠款，因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它在18世纪的后半期完全超过了英国皇家学会。

1688年，英国皇家学会正处在它早期历史中最困难的时期。1686—1695年间，会员平均人数降到115人，只比1666—1675年间会员平均人数的一半略多，而财政则更是窘迫非常。但是，它的命运由于1690年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负责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大臣和业余化学家）当选为主席和1694年汉斯·斯隆博士当选为联合秘书而开始好转。牛顿本人在1703年当选为主席。在他长期任职期间（直到1727年他逝世为止）和他的继任人汉斯·斯隆博士任职期间，学会的会员人数和专业性质两者都在稳健增长。斯隆是当时首要的博物学家和内科医生之一，他在1687—1689年任牙买加总督的医生时开始收集的动植物标本（同他收藏的手稿一起），日后成为不列颠博物馆的核心部

分。他1741年拒绝蝉联主席，当时他已毫不间断地为学会服务了47年之久。在他整个任职期间，学会取得的进展，许多都应归功于他。^[4]

首先使学会博得声誉的是牛顿和其他一些数学物理学家的种种发现，在将近1700年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在学会占有统治地位。然而，学会讨论或发表的作品，却相当充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科学活动。胡克继续提出关于力学、磁学和光学实验的情况，以及利用竖立在格雷欣学院方形场地上的巨大望远镜所观测到的资料。1703年，牛顿在胡克逝世之后向学会提出了他的《光学》一文。他那位博学多能的朋友哈雷，早已把他的兴趣扩展到人口统计学和阿拉伯文，却还继续在天文学的许多部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那部《彗星天文学概要》在1705年发行传播。科林·麦克劳林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数学家，他在牛顿的具有创造精神的事业奄奄一息、难以为继的时候，团结在他的周围，发展了他在数学方面的工作。麦克劳林的论文《流数论》在哈雷去世的那一年（1742年）发表。这篇论文“大概是根据牛顿的定律以最具逻辑性的完美而谨严的方式论述微积分”^[5]的文章。18世纪20年代，亚伯拉罕·棣美弗发展了概率的理论。詹姆斯·布雷德利继哈雷担任皇家天文官，他1728年在皇家学会的《学报》上第一次宣布光行差这一重大的发现。斯蒂芬·黑尔斯研究血压和植物树液上升的工作，也同样真正反映了新物理学的影响。学会会员在电的种种早期发现上也有巨大的贡献。1731年公布的一项实验第一次表明：电可以通过导体传到很远的地方；在后来一次实验中，电流在威斯敏斯特桥传过了泰晤士河。斯隆、雷、伍德沃德和其他一些博物学家，使学会继续关心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列文虎克把他用显微镜进行工作的许多成果送交《学报》发表，并且还把他的一个陈列柜的仪器交给学会，学会还从世界各地得到了一些标本，特别是在印度公司（学会在该公司有股份）的赠品，还有来自北美洲的赠品。北美洲五大湖区最早的一批地图，1688年在学会展出。1725年，学会把一批气压表和湿度表送给海外的通信员，以促进气象学发展。早在1714年，学会就讨论过土耳其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办法，而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则在1718年才创立她那种通用的范例，大大降低天花病的死亡率。然而，学会会员完成这种各不相同的研究，他们的成就大多是个人取得的。正如伏尔泰说过的：牛顿是学会的光荣，但是牛顿并不是学会培养出来的。学会仅仅聘用学会的实验馆长，随后又加上学会秘书作为自己的职员，付以薪金。它的房屋设备一直很简

陋。^[6]学会偶尔对科学考察予以协助，但是从未出钱组织过自己的考察。事实上，学会从未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研究计划，甚至它自己的出版物，它也是一再放弃不管。《学报》最先是由学会第一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作为私人事业创办的，直到1753年才由学会接办。

与此相反，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官方性质，由于它仰赖负责部长的关心而显得突出。从1683年起，卢瓦负责科学院，他不像科尔贝尔那样关心纯科学，决心要使院士负责解决公共事务中的实际问题：拉伊尔和皮卡德解决凡尔赛的测量问题；泰夫诺解决排水管道问题；马里奥特和索弗尔解决尚蒂伊的水力学问题；佩罗、罗默、马里奥特和布隆代尔解决弹道学的问题。在这种制度管理下，科学院衰落凋零。但是到1692年，科学院的事务由一位新的部长路易·菲利波·德·蓬夏特兰负责，他改组了科学院，任命他的外甥阿贝·比尼翁主持。1699年，科学院制定了新章程，会员人数增加，科学院从皇家图书馆旧址迁往罗浮宫内宽敞的新址，并且增设了图书馆、物理和化学实验设备以及生物学标本。科学院在罗浮宫与其他四个学会为邻，成为领导法国科学工作的主要机构，一直到1793年遭到取缔。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科学院的成员和功能。科学院院士们共70人：10名荣誉院士，20名领薪院士，20名联系院士（其中包括外籍8人）和20名实习院士。20名领薪院士包括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解剖学家、化学家和植物学家各3人，加上常任秘书和司库。他们出版了出类拔萃的作品才能当选。开始时每名领薪院士带一名实习院士，但是后来废除了这种等级差别。薪金和其他经费直接从金库支付，金额增加视所出成果而定；领薪成员必须居住在巴黎，对他们的休假也有明文规定。国王任命比尼翁为院长，丰特奈尔（1657—1757年）为终身秘书。院士们共同进行的调查研究宣告失败，因而他们又回头各自进行个人的研究。但是他们必须就他们的计划和成果提出年度报告；在每周举行两次的会议上讲解他们的发现；就他们的研究范围提交出版的各种书籍；就一切新的发明和机器提出报告；同外国学者通信，并且要发表专题报告；每年举行两次公开会议，向公众介绍他们的调研情况。由于出现了新的科学院，科学已经作为现代国家机构的一个部门得到了承认。

于是在法国，科学史实际上就立即成了科学院史。它的领薪院士包括许多学术领域中欧洲的首要人士：几何学家加卢瓦和瓦里尼翁，天文学家拉伊尔和G. D. 卡西尼，解剖学家迪弗内和梅里，化学家莱默里和艾蒂安·若弗鲁瓦，植物学家图尔纳福尔。还有其他一些人，随

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物理学家兼博物学家列奥米尔，植物学家德·朱西厄兄弟，解剖学家兼地质学家多邦东，数学家兼遗传学家莫佩尔蒂，数理物理学家克莱劳。不同学科的专家领受全薪，配有适当设备，会集一堂，这种工作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所未有的。生理学得以紧靠化学和物理学而发展。科学院也可以派出一些重要的国外考察团——1672年派往卡宴（赤道附近）^[7]，1736—1737年派往拉普兰^[8]，1735—1744年派往秘鲁。^[9]在这种专业性质和严格执行的制度下，观察和实验技术的结果和成绩大有改进。为科学仪器制定了新的精密度标准。G.D. 卡西尼（1625—1712年）领导的巴黎天文台成了欧洲设备最好的天文台。在贝尔纳德·德·朱西厄（1699—1777年）领导下，药用植物园这座植物园是路易十三创建的皇家花园教授植物学，同时也教授解剖学和外科学，在生物科学的发展上开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路易十四的命令，从1673年起在那里讲授哈维的血液循环说。

其他国家如何追随英国或法国的榜样，这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所起的作用：创建的科学组织的实际科学活动情况，以及统治者对于增加这种机构来装备一个现代国家所怀有的关切。1700年柏林首先仿效，它根据的是莱布尼兹拟订的计划，规定了纯科学研究和当前应用两方面的理想。然而，普鲁士科学院在开始的那些年头是很艰难的：它缺乏适当的资金，而同莱布尼兹的争吵（这并没给它的那些同事增添光彩）又使它失去了原计划的推动人；一直到1745年它才真正活跃起来，莫佩尔蒂终于在这一年迁居柏林，执行腓特烈二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以牛顿的科学原理为基础，建立一个可以与法国皇家科学院媲美的机构。莱布尼兹本来希望在整个欧洲都建起这种研究机构，但是却只在普鲁士和俄国实现了。他在1711年会见彼得大帝，同他讨论建立一个帝国科学院的计划。这个计划1725年终于在圣彼得堡开始实现，而当时这两个人却都已去世。帝国科学院在历届沙皇的西方化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科学院15名领薪院士督察教育、书籍业和工业中的主要技术活动。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考察俄国的自然资源，因为这批院士在俄国的边界之内进行了广泛的长途旅行。然而，俄国并没有自己先进的科学传统，所以早期的院士大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首要科学家，如达尼埃尔·贝尔诺利（1700—1782年）和莱昂哈德·欧拉（1707—1783年），两人都来自巴塞尔。但是，到了1741年，伟大的化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当选为院

士，俄国人就有了一个具有同等地位的代表了。俄国人忌妒外国院士，再加上经费不足，因此有一段时间情况很困难。但是从1728年起在科学院的《评论》上发表的作品，已可位于那个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作品之列了。其他一些国家和城市继续成立自己的科学协会。例如，早在1697年在塞维利亚，1705年在爱丁堡，1710年在乌普萨拉，1741年在斯德哥尔摩，1743年在哥本哈根，1751年在格丁根先后成立科学协会。美国科学学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推动而于1743年在费城成立。在一些外地城市成立的科学协会，数目也迅速增加：首先是1712年在波尔多成立，到1760年，仅在法国就至少有37个协会。那些较大的协会从事重大的研究，并且出版自己的刊物。还出现了一些为某些特定的科学而设的协会。科学运动广泛传播，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研究和交流情况，科学教育工作则留给大学去承担。直到19世纪，它们才成为同时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正规机构。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两种功能之间甚至还发生过某些对抗。教学倾向于保持传统，而研究，顾名思义，则总是有所创新。在1700年的时候，大学教育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人文课程，使学生在神学、法律和医学方面获得较高的修养。无论是课程或是教授方法——采用讲课和辩论的方式，都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实验科学与数理科学的内容和目的，因为这些科学的着重点不仅在于获得知识，而且要使知识向前发展。达朗伯和狄德罗用大体相同的词汇一再重复培根提出的批评：大学在教学中既没有考虑到科学知识的进展，也没有考虑到技术、工程和医学中各种新专业的实际需要；它们也没有鼓励研究工作。

但是，各个大学的情况当然也并不是完全一样。18世纪初叶，有些大学发生了一些变化，缓和了这种批评。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植物学、地质学和其他专门的科学中逐渐设立新的教授职称，这多少也起了些作用。然而意义更为重大的则是在大学成立天文台、解剖室、植物园，甚至成立物理和化学实验室。担任教席的卓越科学家，通常总是由于他们的科学发现，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学生数目而博得更高的声望，但是他们带进大学的研究工作，最后终于对大学的课程起了影响，最为有利的形势就是大学与科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英国的大学通过一些教授同皇家学会保持了强有力的联系，著名的例子有：剑桥大学的牛顿和罗杰·科茨，或者牛津大学的

沃利斯、哈雷和布雷德利，苏格兰也是如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7世纪接受了笛卡儿的哲学，可是两校到18世纪初叶才讲授牛顿体系；在剑桥实行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是一项重要的措施，虽然这并未鼓励实验科学。^[1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出现了教学与研究脱节最突出的实例。法国各大学未能与法国皇家科学院开展紧密联系；当时法国皇家科学院正取得欧洲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大学却尽可能不承认科学运动。巴黎大学处于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同发展变化中的公众舆论不通音信，它开始接受笛卡儿的物理学的时候，大致也就是法国科学界承认牛顿已经证明它错误的时候；自然科学也列入其内的人文科学，仍然停留在初级状态，而且陈旧过时。尽管在蒙彼利埃讲授某些现代自然科学，然而法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大学校门之外出现的。但是，教授新学科的最先进的尝试，事实上既未发生在英国也未发生在法国，而是发生在莱顿、爱丁堡、格拉斯哥、格丁根和乌普萨拉。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莱顿在医学教育方面的影响，以及格丁根在人文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思想方面的影响，因为在医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科学一直占有传统的地位。自13世纪以来，只有在医学方面才有系统的而且具有先进科学基础的教育；的确，多数科学家在19世纪以前都受过医学训练。在把新科学用于医学方面，莱顿一直是开路先锋，在1709年任命赫尔曼·博尔哈夫（1668—1738年）为教授以后，莱顿医学院就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了。学校的教学计划是两方面的：首先在解剖学、当代机械与化学生理学、化学、物理学各有关分支和植物学方面，彻底打好基础；其次讲授临床医学（医院因此专门保留了若干病床），包括诊断学与治疗学、病理解剖学、外科学以及产科、儿科和其他学科中的特殊训练。在所有这些讲授中，哈维在实验中的发现和西德纳姆的临床诊断方法都用作范例。在荷兰以外，爱丁堡、维也纳和格丁根受到莱顿的最直接的影响。这四所大学大约在1750年在医学教育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它们教学效果好，全都是由于同样的一些特点：让教学开始与研究建立联系，主要是应用现代专业化的原则；设立专业化的教席，在植物园、化学实验室和医院中提供工作便利；提高考试标准。格丁根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种种规定，为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掀起了类似的改革。人文学科的新风格，如看问题以经验为基础，强调教学也同样强调研究，根据自身的权利提供先进的工作，而不是仅仅作为取得传统上更高权力的

晋身之阶，这从根本上说是德国的首创。1694年首先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在哈雷建立新大学开创先例，随后影响扩大，汉诺威选帝侯在1734年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两所大学，特别是格丁根大学，把教育是国家的大事这一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新成立的各大学不再由自己进行管理。与中世纪认为大学是人文学科大师们联合而成的一个独立团体的概念相反，当时的大学没有当选担任职务和掌管自己收入这种自古以来的特权。政府任命教授同任命其他公务员一样，要求他们必须宣誓忠于君主，教学要受到监督，关于讲课和出席情况要向政府提交报告。教授都编入各教授团，他们只有两种密切联系的义务：教课和研究。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课和个人进行研究、展开讨论的制度，就这样成长起来。格丁根大学付给教授优厚的薪金和养老金，付给学生奖学金，此外还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教授可以自由讲课，包括整个自然科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以及农业这种技术性的课题，化学中的一些分支和冶金学，还有各种专门的医学科学。大学的图书馆为欧洲之冠。还有各种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一个天文台，一所植物园，一个解剖室，一座大学附属医院。格丁根的皇家科学学会由教授组成，也成为坚持研究方针的机构，并且通过自己的刊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格丁根大学由于拥有生理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1708—1777年）这样一些人士，因而在文化知识方面达到最高水平，成为新型大学的典范。

除各个科学院和某些大学外，还有另一种机构同它们密切联系，把科学界团结在一起。这就是科学出版界。对科学家本身来说，日益精密的分工使他们必须有正常定期的情况交流。而当时连一般结论的交流也并不充分。观察测量的标准日趋精密，这就要求详细报道所用的方法和结果。因此，出版科学论文成了科学院甚至大学的公认的任务。但是，出版个人调查研究结果，最迅速、最定期的手段则是期刊，而其中《自然科学学报》堪称典范。从1665年起，具有创见的调研成果也在一家与各科学学会有密切关系的独立企业性刊物*Journal des Sçavaus*上找到了发表的园地。这家期刊在1702年由比尼翁交给一个委员会经管，但它从未忽视范围更广泛的公众。在这家起了榜样作用的专业刊物之后，第一批继起者就是医学刊物。它们从1670年起在德国、丹麦、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兴起，刊登与医学有关的一般科学范围的问题，再一次使人们想到医学界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中所占有的特权地位。然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知识杂志》，从1682年起，它

定期以拉丁文在莱比锡出版。它除宣告新书出版外，刊登全欧洲首要学者撰写的关于科学和数学一切分支（也有关于法律和神学）的论文；莱布尼兹就是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他关于微积分的论文。其他专业性刊物还有纽伦堡求知科学院在1670年创办的《求知杂俎》或《杂志》，以及莱布尼兹1710年首创于柏林的那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科学院所办的《杂俎》。而意义远为重要的则是经过改组的法国科学院作出决定，仿照英国皇家学会，定期出版会议与活动记录。在此以前，法国科学院仅仅偶尔出版《研究报告》以及一本由科学院秘书J. B. 杜·阿梅尔用拉丁文写出的《历史》（1697年出版）。丰特奈尔（1699—1741年任法国科学院秘书）首先在1720年，后来又从1732年开始，出版了一系列《历史与备忘录》，记载了法国科学院建立以来的历年情况以及当前的工作状况。除此以外，他在各国大科学家逝世时还为他们撰写了一系列颂词，并且还补写了晚近的其他一些科学家，这些都成为科学专业获得当代感的宝贵源泉。协会和法国科学院所确定的专业标准，成了其他主要科学院出版会议与活动记录的榜样。与此同时，各种期刊相互转载科学消息，相互翻译论文和评述，以及出版科学书籍的外文版，这种种做法使国际联系得以保持。科学期刊取得的成就，反映了这个时期一般期刊的风尚以及科学本身的风尚。甚至《豪侠信使》也刊登科学消息和见解，而其他许多新办的期刊则竞相仿效*Journal des Sçavaus*，同样为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提供消息和情况。意大利从1688年起出版各种《学坛杂志》。在荷兰，皮埃尔·培尔1684年创办《学界新闻》，它在连续几个主编主持下以不同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718年，并为一些后起的刊物所仿效。荷兰出版界还为阅读法文的人出版专门刊物，登载英国和德国著作的译文，其中有《英国书讯》（1717—1728年）、《不列颠书讯》（1733—1747年）和《欧洲学者》（从1718年起出版，刊名屡有改变）。《特雷武杂志》是为答复培尔并且作为避开*Journal des Sçavaus*官方特权的一种手段而由耶稣会主编在法国境内一个小公园出版的，它由1701年出版到1762年（中间有所间断）停刊。这家在科学、神学和政治方面采取保守立场的杂志，成为一个主要的媒介，使那些从不阅读专业期刊的广大公众了解科学方面的情况：从笛卡儿派和牛顿派理论上的大论战到弹道学、电学和磁学方面的实验。

其他许多传播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些年代也有发展。丰特奈尔学识渊博而且才思敏捷，这位堪称楷模的哲学家，是众所公认的大师，

他讲解论述符合时宜，实施执行又光彩夺目。类型相同而方式迥异的其他著名作品包括：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关于昆虫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著作^[11]，穆瓦特雷·德莱蒙的《关于空气和水的实验》（1719年），阿贝·N.A. 普卢契的《大自然奇观》（1732年），阿贝·J.A. 诺莱、威廉·雅各布·格拉夫桑特和彼得·冯·穆申布鲁克关于物理学的著作，以及伏尔泰在《哲学书简》（1734年）中关于英国科学的论述。伏尔泰在奉献他那本《阿尔忌》（1736年）的时候说：梅里安、列奥米尔、莫佩尔蒂等人不仅致力于发展科学，而且“由于使科学成为令人感到惬意的，所以使得科学成为国家所必需的。我敢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诗人必须也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一个女人可能也敢于公开宣告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新的百科全书也是为大致相同的公众服务的。这在英国最初主要是技术方面的，最著名的是约翰·哈里斯的《技术词典》（1704年）和伊弗雷姆·钱伯斯的《百科全书》（1728年）；与此相反，法国的百科全书则追随培尔的《字典》（1697年），把情况介绍同理论与社会批判融合在一起。进一步满足公众求知欲的方式就是向群众讲课和示范。早在18世纪，像牛津的约翰·基尔和J.T. 德萨居里埃以及剑桥的罗杰·科茨和威廉·惠斯顿等杰出科学家，就曾利用实验讲授物理学，德萨居里埃和惠斯顿后来又到伦敦讲学。从1719年开始，曼彻斯特和外地其他中心城市也追随他们的榜样。在荷兰，穆申布鲁克和格拉夫桑特向公众作公开讲演和示范。在巴黎，J.G. 迪弗内（1648—1730年）据说竟使解剖学风行一时，一位小姐居然在自己的闺房中摆上了蜡制的模特儿和尸体，另一位小姐则在马车上带上一具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就像一个人在念书一样。所有这类讲课者中最著名的当推诺莱，1734年，他在法国皇家科学院主持下开设自由听讲的课程，随后在巴黎大学获得教席。他向公众重复物理学最新实验特别成功，以富兰克林在静电方面的种种新发现为基础进行了叹为观止的表演。为了作这种示范表演，他把大量各式各样的仪器收罗在一起成立了物理实验室。其他方面的科学爱好则激起一种风气，成立了自然科学史陈列室。另一种独具特色的机构——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则用以满足一般人和专业人士的兴趣。

科学运动具有大体一致的见解，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一切问题，无论是否与自然哲学有关，都应该仅由观察和推理来决定。因此，洛克根据西德纳姆·玻义耳和牛顿清晰明确的榜

样，对认识论、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学说，提出一种新的从经验引导出来的见解，把它们当作人类“自然发展史”中的一些问题来处理。^[12]伏尔泰把他说成是灵魂的解剖学家，并且以他为榜样成为社会的解剖学家。说得更具体一点，科学越来越看重数量和大小，而不是只给人留下一种模糊观念的推理讨论。各种新的问题进入了数量测量的领域。例如，格雷戈里·金在《自然与政治观察》（1696年）中对英国1688年的人口作出了估计，而沃邦在法国从1686年起就一直进行这种创新的工作。^[13]欧洲第一次官方的人口普查是1703年在冰岛进行的。哈利发展了约翰·格朗特1662年创始的人口统计学和德威特1671年提出的年金计算法，在1693年根据资料为布雷斯劳^[14]制出了一幅预期寿命表。以这些创始为发端，再加上数学概率的发展，现代保险业的计算基础就在18世纪制定出来。人口统计比雄心勃勃的“政治算术”发展得较为健全，这与威廉·佩蒂爵士（1623—1687年）的名字是不可分开的。英国从1696年起设立专管商业统计的检察长，10年以后，在威廉·弗利特伍德的*Chronicon Preciosum*提出了第一部严肃认真的物价史。约翰·阿巴思诺特的《数学知识有用论》（1701年），表达了当时对定量社会科学所怀有的巨大希望，这篇论文甚至把统计学与“真正的政治知识”等量齐观。^[15]

然而，我们所说的科学运动尽管在探讨方法和哲学观点方面具有真正广泛的一致，实际上却是由许多互不相同的活动组成的，它们之间绝不是全都有逻辑的或因果的联系。的确，它们全都是由于那种使许多个人和机构保持密切交往的社会结构而聚集在一起的；但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单独领域的种种问题，主要由于它们本身具有的内在逻辑而引起许多进一步的问题。相互关联的各种科学——例如力学和天文学、化学和生理学——当然相互接触；但是其他一些则并不接触，而且它们的方法也保持互不相同。因此数学并未应用于自然科学史或地质学。有控制的实验未能用于天文学，就是用来对人进行研究也有困难。技术仅仅在某些具体的点上同科学有所接触，最普遍的就是仪器设计。诸如早期的蒸汽机和新的作物轮种制，或者牲畜饲养等方面的发展，同热学、植物与动物营养或者遗传学等科学知识毫无关系。事实上，这种知识当时几乎并不存在。哲学在认识论、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同样是在追寻它自己的一些问题，把科学仅仅当作一种一般的鼓舞，从它导引出披上新装的老问题。所有这些活动，如神学和政治见解、工商业和社会团体中当今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都具有

科学精神的深刻标记。但是它们全都各自有其互不相属的历史，以及它们自己的联系。科学运动自身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一个由许多独立自主的运动组成的联合，它是由在智力上具有广泛一致的人士通过有组织的接触而团结实现的，并不是由于他们单独进行的各种活动之间具有任何逻辑或技术上的密切联系。

在这个时期，科学最引人注目的总的特点是力学和数学的各有关分支取得了巨大进展，而成为鲜明对照的则是在其他多数领域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和计算技术；在这些领域里，收集各种事实并把它们分门别类，比起试图用当时存在的那些不够充分的理论来对这种事实加以解释，通常证明总是具有更加直接的效益。然而这种不足却对观测考察的显著增长起了鼓舞推动的作用。因此，科学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它对理论的态度上，都是越来越以经验为根据。当时有人想利用力学的观念——特别是牛顿引力——作为生物学与化学以及物理学的理论；但是，正是从日益成长的经验论中，即使像达朗伯这样一位数学家和理论家也看出了牛顿精神的真正体现。

1687年以后绵延半个世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牛顿派和笛卡儿派就物理学和宇宙学展开的大辩论。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但却在科学的每一个层次都引起了争论。牛顿和他那些拥护者为了压倒人们广泛承认的笛卡儿体系，不得不用令人信服的办法去证明：他们的力学对已知的事实作了高明得多的说明；而且还要证明：牛顿用于科学解释的方法和概念，总的来说比他们对手的那些方法和概念更加适合。在这些最终的、基本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因此在*Journal des Sçavaus*中一位未署名的评论家根据笛卡儿派的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演绎运算，他承认牛顿的结论来自他的假定，但却宣称：牛顿的这些假定是未经证明的——也就是说，不是从必要的前提推演出来的，因此它们像一道数学运算一样，“只能用做一篇关于纯力学论文的基础”^[16]，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则是一位更加卓越的批评家。他认为，牛顿关于太阳系各天体之间各种引力的假设，由于随之而来的种种正确结论而完全证明有理；他还认为，牛顿粉碎了笛卡儿对行星和彗星运行所作的解释，认为运行是巨大的物质旋涡，是以太阳为中心环流运转的。但是，惠更斯却不能更进一步承认引力是相互作用的，不仅成对的行星和星体，而且实际上每一对粒子，不论多么微小，莫不如此，“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清清

楚楚地看到：这种引力的原因是力学或运动法则的任何原理所绝对无法解释清楚的”^[17]。自然科学家所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已经永远打消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仅有那些解释不了任何事情的空名——的“神秘特性”，并且代之以力学的种种解释，在原则上正如钟表匠对斯特拉斯堡那座大钟如何运行所作的解释一样清楚明白。在惠更斯看来，牛顿已经讲清了太阳系运行的数学模式，但是现在还必须找到起作用的力学上的种种原因。惠更斯认为，这些原因不能与粒子的相互引力联系在一起：牛顿自己的著作已经令人不能相信沿着这种途径而作出的任何解释。无论如何，自从笛卡儿那个时代以来，已经对一度神秘莫测的地球引力作出了种种力学的解释，牛顿肯定不会对这种情况不予理睬而再次把地球引力作为“具体物质的一种固有的特性”。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惠更斯对牛顿的解说是正确的：

有人认为，地球引力对物质来说是与生俱来、本身固有和不可或缺的，因此一个物体可以通过真空对相隔一段距离的另一物体起作用，而不必经过其他任何东西的媒介，它们的作用和力量可以不利用也不通过任何东而从一个物体传送到另一个物体。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真是荒谬无比，所以我认为，任何人只要对自然科学事物具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绝不会陷入这种观点。^[18]

换句话说，对地球引力，一定存在一种解释，它“一定是由某种永远遵照某些法则起作用的因素所引起的，但是这种因素究竟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我则留给我的读者去考虑”^[19]。地球引力可能是因为“由灵敏度互异的许多部分”组成的某种“以太”发生作用而引起^[20]；也可能是由于“上帝赋予一切物质的某种原始的普遍的法则”。我们不应当问物体第一次如何开始移动，同样不应当问物体如何受重力的作用。^[21]不管有什么原因，人们称为地球引力的力量是在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力量不应按亚里士多德的想法，简单地解释为物质所“不可缺少”的。虽然牛顿的立场很容易引起误解，需要一开始就加以明确细心的表达，但是《讲坛》第1版在这个问题上却讲得不够清楚。牛顿针对人们提出的批评，比如说著作“放弃了力学上的原因，建筑在种种奇迹上，并且重新回到神秘特性上去”，在第2版中作了一些修改。^[22]然而，欧洲大陆上许多自然科学家仍然继续认为，牛顿的引力说是复归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牛顿在其他方面也受到莱布尼兹和贝克莱的攻击。^[23]他们都认为，牛顿学说的某些科学理论特点——就是他的时空观点——是和自然宗教对立的。莱布尼兹在同克拉克通信时，特别指责牛顿把上帝说成是一个拙劣的钟表匠，要上帝干预世事，“甚至要他加以修补，就像钟表匠修补自己的产品一样”^[24]。事实上，牛顿与他同时代的多数科学家一样，尽管对基督的神性有所怀疑，但对宗教仍然是非常虔诚的。他认为，他的著作为上帝的天意提供了新的证明，他在《讲坛》第3卷的“概论”中重申：“太阳、行星和彗星这种最美好的体系，仅仅是由于一个聪颖而有力的上帝的忠告和统治才得以继续运行。”^[25]

自然科学家即使接受牛顿那套科学解释的方法与概念，仍然还未能信服：牛顿用力学对事实所作的说明优于笛卡儿派的说明。让他们信服这一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虽然《讲坛》第1版只发行了几百部，第2版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出现；而且即使那些得到了第1版的人，面前摆着的也是极其复杂的一篇严格的数学论文。非数学家如果觉得，用反平方定律取代笛卡儿那个带动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旋涡说并不高明，那是可以谅解的，因此毫不奇怪，惠斯顿1693年到牛顿执教多年的剑桥去，是要学习“特别是数学和笛卡儿的自然科学：只有这才是我们当时的时代潮流”^[26]。在若干年内，牛顿的学说只有寥寥无几的数学家孤立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大学中讲授。牛顿物理学在这些大学的进一步传播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的。笛卡儿派物理学的杰出教科书是罗奥尔特的《物理学论》（1671年）。克拉克认为，只要讲授牛顿学说由于缺乏适当的教科书而受到阻碍，那么继续使用《物理学论》就是有道理的，于是在1697年出版了一个新的译本。为了使《物理学论》符合最新的发展，他加了许多注解——主要是与后来的笛卡儿派佩罗的著作有关，但是还论及玻义耳、胡克、牛顿和皇家学会的其他会员。对牛顿的光谱学著作和彗星学说（笛卡儿体系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终于作了详细论述；但是克拉克有些犹豫，未敢脱离原来文本过远。在第2版（1702年；阿姆斯特丹，1708年）中，注解增加到原书的五分之一。克拉克还特意说明：这些注解取自牛顿的科学理论，注解还对笛卡儿物理学经常展开毫不掩饰的攻击；注解这时成了一本拥护牛顿的著作，而第3版则更是如此（1710年）。这本杰出的笛卡儿学派教科书就这样成了传播介绍牛顿思想的媒介。^[27]在欧洲大陆上，人们长期不接受牛顿的著作，经过这几十年

也得到大家较多的了解。在法国第一次挺身捍卫牛顿，说他有权使用因某种缘由尚未判明的原理的，当归于摩鲁·德·莫佩尔蒂（1698—1759年）。1732年，他对笛卡儿的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同对牛顿引力的攻击一样抱有敌意，但却微妙得多。莫佩尔蒂的一位影响深远的学生是伏尔泰，他在他的《哲学书简》中捍卫牛顿，并在1736年发表《牛顿自然科学的要素》。自此以后，牛顿学说迅速得势，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例如在处理月球运行的复杂分析方面和预言地球的形状和哈雷彗星的复现方面。法国皇家科学院对笛卡儿派著作授以殊荣，最后一次是在1740年。在18世纪其余年代，英国并未出现继续牛顿事业的杰出人士，而在欧洲大陆则出现了一系列继续这一事业的第一流的数学家：克莱劳、欧拉、达朗伯、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

天文学除了是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科学外，还争取在更多更好的观测活动中带头前进。望远镜和测微计加入了现有仪器的行列；望远镜增加得很长，有时竟长达100英尺。准确计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追求准确计时而开展的新活动，激起了重要的资料汇集工作。如弗拉姆斯蒂德的《英国天体史》（1712年），该书的1725年版本列举的星体将近3000颗，带来改善航海之类的实际好处。它还引起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上的发现：具体有哈雷发现的某些“恒”星的自行运动和月球的长期加速度，布雷德利发现的光行差和地球轴的章动。

数学对于物理学的其他领域，显然实用性较少。对种种实验的解释，都由“微粒”学说所独霸。这种学说力图用微粒运动来解释一切现象，几乎不大用质量关系来讨论。发展最大的理论都与光学有关，早在牛顿初期用三棱镜进行光谱实验以前很久，光学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题目。他的《光学论》（1704年）具有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着重用实验来证明，而这是能打动非数学家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牛顿在《讲坛》中“似乎已经穷尽了他的论点，给他的后继者没有留下多少事情可做”^[28]，然而在《光学论》中他写道：“把我所尝试过的告诉大家，并且把余下的留给其他人去作进一步的探寻，这就是我发表这些论文的全部意图。”他甚至还附加了一份“疑问”表，这份表后来随新版本陆续出现而不断扩大，并向后起的研究者指明他曾经有过何种思路。牛顿谈到光的性质时是很谨慎的，虽然他好像赞成与惠更斯的波动说截然相反的微粒说：“光线难道不是从发光体射出的非常微小的物体吗？因为这种物体可以以直线通过均匀的介质，而不弯向影子之内，这就是光线的性质。（疑问29）”另一方

面，某些现象如“牛顿环”之类，似乎从性质上说是带有周期的。于是牛顿提出了介质以太，光在以太中传播，而以太本身振动，因而发生周期性。

声学研究虽然在理论上不那么先进，却提供了广泛的范围来做简单的实验——比如泛音、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和大气条件的效应。老弗朗西斯·霍克斯比（1713年去世）用空气唧筒扩充早期的实验，证明声音在大于大气压力的空气中响度较大；他还研究过声音在水中传播的情况。与此相反，电则神秘莫测而且难以控制。18世纪后半叶以前，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电学。在此期间，各种发现常常是用电学器具偶然实验的结果。最早的实验结果很快被遗忘了，但是在1700年后不久，霍克斯比对“气压计光”——摇动气压计中的水银而产生的神秘亮光作了系统的研究。^[29]20年之后由于斯蒂芬·格雷（1736年去世）和查理·迪费（1698—1739年）的工作，发现的速度加快了。他们两人合作，做了许许多多有些漫无目的的实验，找出了几种重要的现象：导电、感生电荷、导体与非导体和两种相对的电（正负静电），迪费称之为“玻璃电”与“树脂电”。18世纪中期，电力机器有了重大改进。大约在1745年，由于进行两项实验，从后世称为莱顿瓶的器皿中发生强力冲击，取得了偶然而惊人的发现。从此以后，电学开始形成。

17世纪后半叶，玻义耳（1691年去世）采用微粒运动说解释化学实验^[30]，有助于使化学成为自然科学中可观的一部分。但是，尽管有些人似乎认为，化学反应可以像牛顿在他的《光学论》最后一个“疑问”中所提出的那样，用粒子之间的引力来解释。事实上第一个统一的学说却来自德国。它虽然同玻义耳的工作并非全无关联，但确实是从一个远为古老的传统导引得来，这就是帕拉切尔苏斯的硫黄—水银—盐学说。“硫黄”就是“燃烧之物”，因此燃烧就是一个分解的过程，这一学说，加上某些修改，是1669年由约阿希姆·贝歇尔提出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他的学生G. E. 施塔尔（1660—1734年）利用他称为“燃素”说的可燃性原理，解释范围广泛的各种化学现象：因此燃烧和煅烧两者都包括燃素的损失。矿灰是失去了燃素的金属，但是金属常常可以把矿灰和炭放在一起加热而还原，因为炭是具有高度可燃性的，因而含有很大大比例的燃素，其中有些可能与矿灰结合。根据目前理解，燃素说得到成功，一部分是由于人们假定取得的燃

素，常常是与损失的氧相符的。这种学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经历了空气和各种气体的研究而未衰。首先是斯蒂芬·黑尔斯发明了他在《植物静力学》（1727年）中所描述的空气槽，甚至在拉瓦锡^[31]1794年被处死之后，这种学说还得到一些名流的支持。然而，这种学说也起了良好的作用，在整个18世纪前半叶鼓励和指导进行了特别是化学研究，在这个时期，情况极其混乱，某些最有价值的贡献主要也不过是些实验性质的东西，有如若弗鲁瓦等人的亲和力表（标明一对对可以相互反应的物质），等等。

我们早已注意到一些实例，说明科学进展如何与仪器设备的发展相互关联。在许多情况下一—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湿度计、空气唧筒，甚至电力机器——最初的发明创造早出现数十年，而把它们投入使用则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而推迟。例如，最早的温度计对空气压力的变化反应敏感；即使A. del Cimento对此作出改进，但是仍然等到普鲁士人G. D. 华伦海特（1686—1736年）和法国人列奥米尔进行工作^[32]，才发展了为充分使用温度计所必不可少的“绝对”标度法。伽利略所使用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即使在有了优质玻璃所制成的形状合宜的透镜之后，也依然牵涉到机械设计这些重大问题。在1670年以前，这种仪器一直未能大量制造，原因在于直到那时还有待于克服一些严重的困难，如色差引起的困难，牛顿因此开始设计反射望远镜。1729年，切斯特·穆尔·霍耳发明了一种消色差透镜，但是直到下一世纪，这种透镜才在望远镜和显微镜上得到有效利用。18世纪初叶，由于人类掌握的机械技术，如两位霍克斯比的技术，空气唧筒和电力机器都有发展，幸运的是，由于业余爱好者对科学的兴趣迅速增加，以及各项改进的情况迅速传播，推动了各种仪器设备所依赖的必要实用技艺的发展。为了满足需求，仪器制造商的人数增加了，他们还缩小了产品的范围；生产中技艺要求水平降低了，而最重要的机械水平则提高了。

这些发展固然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的重要性能否与大约同一时期所应用的数学工具相提并论，则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就是牛顿在1665—1666年和莱布尼兹在1673—1676年各自独立发明的微积分。牛顿对于公布自己的发明创造一向不大注意，这就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他和莱布尼兹究竟是谁先发明的微积分？争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使牛顿那种略逊一筹的定位法变成国家威望问题，

对英国随后的数学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关于微积分的第二场论争是由贝克莱对这一方法的逻辑基础展开批评而引起的，批评涉及“the ghosts of departed quantities”^[33]。这次论争取得了比较愉快的结果。微积分早已成为数学方法的重要部分，从哲学角度展开的攻击已经无法予以动摇了，可是贝克莱的质疑引起答问，这反而使这种方法更加发展。

生物学与当时的物理学相反，在1700年的时候大体上仍然处于以经验为准的探索阶段。^[34]生物种类繁多，而且生物的生理过程即使就当时的发现来说业已显示出极为复杂，这就阻碍了所取得的精确程度与物理学约略相当的各种理论的形成。然而，如果缺少某些理论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实验，而当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种这样的思想，为生物学奠定了主要的纲领：一种是要找出某种“自然的”分类法，以便把所有不同的生物类型之间的关系确定和显示出来；另一种是认为可以找到和讲清各种生物错综复杂的生理学性质，办法是把它们分解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弄清的比较简单的过程。第一种想法要寻求一种秩序原则，它可以建立某些确定的品种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调整为一种丝毫不变的和谐状态。第二种想法实际上是早从笛卡儿开始的，它要寻求一种内在的机制，使每一种有机体都可以在自身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种想法引起了某些最无用的猜想，同样也引出了某种绝妙的实验生理学。这两种想法都属于牛顿式的标准想法：宇宙是本质上丝毫不变的类似钟表机构那样准确的构造，但是这两种思想又都结合到一种以第三种理论思想为基础的新模式中去了。笛卡儿和牛顿不同，他既关心宇宙的现状，也关心它的起源。这种思想大致是从牛顿在世时开始，后来发展到认为：要解释生物目前的状况，包括生物各种不同品种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寻求它们递嬗的遗传关系。因此在18世纪前半叶可以见到第一批关于有机体进化的论文，其中包括地质变化和一整套机械性地解释遗传和生存情况的大概轮廓，作为代替生物学臆想的指导原则。

分类问题由于16世纪以来日益增加的资料积累而严重起来。到了1700年，博物学家都进到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许多不同地区，并且获得许多不同的有机体类型。西欧主要部分从西西里到拉普兰的植物群都有说明，还附有精美的图片。主要的博物学家如约翰·雷（1627—1705年）和皮顿·德·图尔纳福尔（1656—1708年）都曾广泛旅行，

收集标本。上述这两位博物学家为欧洲植物地理制定了大纲；图尔纳福尔从1683年起担任皇家花园的教授，他把著名的植物标本室的初步设施并入植物园，植物标本室后来发展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学家在海外的旅行，常常是追随本国进行贸易和殖民的路线，有时也带有实际目的，要去发现具有医疗效用的新植物。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植物移植到植物园和大型的私人花园，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这时植物学起了深远的影响。无论他们眼前的目标是什么，后果却是：到了18世纪20年代，博物学家——医药界人士、神甫、专业科学家、海员和丹皮尔这样的探险家——就从美洲、东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从波斯直到暹罗的南亚一带、中国和日本带回了搜集的大批植物和出版说明，这成了18世纪后半叶大规模考察旅行的前奏。^[35]

至于收藏动物标本，由于许多动物标本很快腐烂，无法像植物那样经过简单压制制成标本带回国内，这就使动物学遇到更多困难。然而，博物学家还是把一些经过填充的标本、骨骼和动物躯体的坚硬部分带回国内，提供了有关全球动物的相当广泛的概念；植物园中增加了动物展览室；有系统的解剖成了标准的做法。这由马尔皮基、斯瓦姆默丹和克劳德·佩罗创先，随后大家都效行，于是收集材料对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如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进行比较解剖和生理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法国科学院的一些解剖学家采用比较法，特别是迪弗内解剖了一系列脊椎动物，其中包括一头象、一只豹、一条蝰蛇、一只鸵鸟和一只刺猬，这种方法受到特别注意。在英国，马丁·利斯特（1638—1712年）、内赫缪·格鲁（1641—1712年），尤其是爱德华·泰森（1708年逝世），突出地使用了比较法；泰森在他那些关于解剖海豚和猩猩（实际是一只黑猩猩）的专题论文中，开创了对人和类人猿的比较研究。^[36]动物学的调查研究还涉及动物界的其他种类。即令一台简单的显微镜掌握在一双技艺谙熟的手里，也可以从一滴水中，或者从一片生物组织中取得丰硕的成果，足可同伽利略及其后继者用望远镜环绕天空扫视时所得到的成果相比拟；而新的复合显微镜开辟的种种可能性，还不过是探测的开始。使用显微镜的专家中最伟大的当推安东尼·凡·列文虎克（1632—1723年）^[37]，他比胡克和其他先驱活得更久，一直坚持到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重要发现的辉煌论著，其中包括红血球、肌肉纤维的横纹、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精子以及鱼、蜗牛和牡蛎的精子，还有轮虫、纤毛虫和它们颤动的纤毛及细菌。不管是否有显微镜，对于某些

特定生物的组织、生物学和生活习惯的研究不断增加。特别有趣的是以下几项研究：马赛的一位医生J. A. 皮松纳在1725年发现珊瑚不是植物而是动物，不觉大吃一惊；列奥米尔对昆虫的组织 and 生物学研究；皮埃尔·利奥内研究蛾的幼虫并出版了专著，这是一部解剖精细、图片精美的杰作。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各种单独有机体的研究著作——由于印刷的精密程度的提高，插图都很精美——开始十分准确地展现出脊椎动物各式各样不同的种属。

从这时开始直到瑞典伟大博物学家卡尔·林奈（1707—1778年）发表《自然体系》（1735年）为止，人们整理这些日益丰富的资料，主要努力集中于设计实际易行的分类体系，想使每一种类型都可以得到恰当的安排和命名，而且凭直觉就可以表现出业已掌握的各种不同类型之间的“自然”关系。大量收藏“自然界的奇珍异品”，如果不加以有系统的命名和索引，在科学上就无法有效利用，因为只有这种体系才能使各种标本在各自特定的框格中找到。林奈的第一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一个实际问题解决以前，就难以调查研究比较解剖（许多生物学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种比较解剖）所引起的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说明“自然”或“实际”关系或亲近关系的意义。然而，在任何分类体系提出之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它绝不仅是人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关于自然秩序组成的理论思想，贯穿在所有的主要体系之中，除去林奈公开宣称的那种人为的植物“性系统”之外，首先就贯穿在他的主要体系之中。

分类学的种种问题，首先在植物学中看得一清二楚，雷和图尔纳福尔曾经试图在植物学中进行重要的改革。雷一方面保持某些旧的常规做法，如区分木本和草本，另一方面又在他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植物史》（1686—1704年）中，设法根据花与果的构造和区别制定出1.8万多种植物的合理的分类法。这就使他弄清了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38]之间的基本区别，并使他能举出理由来从直观上区分植物中业已辨认清楚的各自然科属，如伞形花科、粗叶科（即紫草科），等等。他还第一次把古老的逻辑学词汇“种”用于特定的现代生物学的意义上，并且设法使它具有原始物种中种类别的概念而成为一个精确的词汇。图尔纳福尔大体上也是根据花的各部分情况来进行分类，他作了更为精确的——但很难说是更为成功的——尝试，想使他自己的体系客观上看来“自然”，并且采用了把“属”作为有相互关系的各种“种”所构成的一个确定的类别组。他在他那部《植物学基础》

（1694年）和更加著名的《植物体系》（1700年）中对植物分类做得井然有序，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而现代分类学中仍然沿用他所采用的许多“属”和其他“自然”类别。然而在探求自然分类法的过程中，蒙彼利埃植物园主任皮埃尔·马格努尔另外又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在1689年采用“科”作为植物的一个重要类别。

林奈的《自然体系》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从建立一种自然分类法的目标倒退了。他采纳了一种一般的分类法，立足于显然是武断选择的花的特征——雄蕊的数目和排列情况以及雌蕊的数目。这种以“性系统”为准的极端人为的性质，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是林奈以灵巧的方法使用这种体系，并且以极其吸引人的方式用“植物的爱情”这种比喻来加以推广，所以很快它就压倒一切竞争者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他自己眼界开阔；他动手提供各种方式来辨认在任何地方发现的一切有机体。这一成就又导致大家接受他的第二种也是最具持久影响的创新：对物种坚持实行双名命名制，即每一物种用两个名字命名，如卡罗来纳·蔷薇，第二个是与其他同“属”物种的属名，第一个是这一物种专有的种加词。林奈的体系和方法奠定了解释生物学和其他分类科学分类整理的主要方针，正如牛顿的概念对力学和光学的作用同样。林奈试图建立一种自然体系，但是为实用起见，他却不得不采用人为的体系。他的后继者，特别是A. L. 德·朱西厄和米歇尔·亚当森，否定了性系统，同样也想再次使分类成为明确的自然分类，他们立足于在广泛的范围中确定特征，然而依然是在大体上属于林奈的框架中进行工作。

动物学与植物学不同，在1800年以前尚未制定出任何分类法可以处理动物学中更加难以协调一致的资料。主要问题在于探求既能统一又有区别的特征，使之能适用于非常广泛的品种，这一探索工作由于当时对于构成动物界的基本不同的品种范围理解有限而事倍功半。这些困难加在一起力量之大，可以从脊椎动物分类学取得的相对进展同无脊椎动物分类学的毫无进展这两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脊椎动物解剖的合理化，由于有可能以人体作为比较和命名的标准而得到很大的帮助。结果，雷和威洛比就能够不仅根据观察外部特征如毛发、羽毛或鳞片，胎生或卵生等现行办法，而且还根据呼吸系统、心脏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解剖的办法，制定出脊椎动物的分类法。林奈采纳了这种优良的办法，根据主要自然秩序确定多种脊椎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学家想把动物界其余的动物纳入某种合理秩序的时候，由于人体不宜当

作标准，只能作某些一般的模糊对比，而且由于又缺乏其他标准，所以感到一筹莫展。他们当时尚未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掌握包括当时业已知道的一切品种的比较动物学。林奈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提供一种粗糙落后的划分法，把无脊椎动物分为昆虫和蠕虫，就像一个把其他一切部类都收罗在内的破布口袋；在拉马克以前，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改进。

在《自然体系》问世之前，分类学的进展是以物种保持不变这一假定为基础而取得的。这种假定具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在当时生物知识混乱的情况下维持一种正式的结构，这种结构还可以容纳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假定还是奠基——明确说来是由雷和林奈奠基的——在所有有机体都来自相同物种的卵或种子这样一个合理的原则之上的。虽然林奈在设计一种实际可行的分类系统过程中，曾经使用某些人为的生硬标准，但是他还是与几乎所有的同代人一样，完全赞成这种观点：最终目标必须是建成一种“自然”体系，它能真正表现出各种现有生物品种之间的真实关系，构成“至高无上的自然秩序”^[39]。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全都来自对有机世界所持有的一种非进化的观点。第一，林奈本人受到亚里士多德和16世纪博物学家安德列·切撒皮诺的影响，认为各种事物既定的秩序之所以得以保持，是由于亲本的“特质”代代相传而传留给后代。他选用花的性器官作为植物分类的基础，正是因为这种亲密直接的联系。他的第一种意见认为：从创世之日起，这些同样的物种就存在，亲本同后代之间的任何差别、偶尔产生的变异，纯然是偶然和短暂的。他追随雷的看法，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自然”的畸变，而不是由于创建永恒物种的“神意”。1742年，林奈考察了柳穿鱼属植物柳穿鱼（*Liuvavia Vulgaris*）的变种，他把它称为Peloria（变异），认为是一种“突变”（Mutata），是由异花花粉受精而产生，他在此后就开始承认有可能由于突然的变异或杂交而改变物种，因而有可能产生永久性的新的物种。但是这也难以影响他那种体系极其稳定的秩序所展现出来的主要图景。“至高无上秩序”的第二特点也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并且还受到莱布尼兹延续理论^[40]的影响，这一特点是：人们设想各种有机物组成大自然的等级，从人直到和无生命物质几乎无法分辨的低等植物。在林奈那个时代，这一系列等级基本上是直线式的；后来则设想为像一棵树一样具有分支。这种体系提供了要由各种进化理论加以解释的资料。正如泰森在科学方法应用之前在讨论他提出的由一种形态转到另一种形态的

“阶段”设想时所说的：“对这一动物与一只猴子、一只类人猿和一个人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从动物身体的结构和从一种向另一种转变的情况，看出大自然的‘阶段’。”^[41]第三，大自然的秩序存在于一种神定的和谐一致的状态之中。每一种有机体的种种器官——例如一只苍蝇的眼睛结构，牛顿曾对之称赞不已——与它们的功能完全适应，每一个地区的种种有机物与它们的环境完全适应。因而（借用林奈所举的例子）植物以土壤为生，昆虫以植物为生，鸟类以昆虫为生，大鸟以小鸟为生，如此等等；万物共生，完满和谐，从而保持生态的良好平衡。用雷的著作扉页题词的话就是：整个大自然生动地证明了“由造物杰作所表现的上帝的睿智”。

这种关于大自然的秩序万古不变的想法，一直继续到19世纪。但是情况已经开始积累起来，对各种观念的重新思考已经开始出现，受到几种不同层次的评论。笛卡儿早就传播过这样一种观念：地球有自己的历史；它目前的状态是很长一系列地质变化的产物。地球原是一颗星球，像太阳一样，它的这些变化是在它从最初状态冷却时发生的。这种主张由于推测和观测两者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推测的发展中，莱布尼兹的推测特别令人注意。莱布尼兹承担写作汉诺威王室与不伦瑞克公国历史的任务，前往意大利搜集文件资料，在意大利会见了丹麦博物学家、现代地层学奠基人尼尔·斯坦森（斯蒂诺，1686年去世）。斯坦森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承认由海洋沉积而形成的地层构造，在不同地层中保有不同的化石。莱布尼兹迷恋这些想法，于是决定在他那部历史著作开头就把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作为地球史的一部分来阐述；结果他写成了《单子论》（1693年写出概要，1749年全书告成），他在这部著作中设想出一系列地质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球冷却以及由于火、风和水（其中之一是《圣经》所载的洪水）的作用而产生的（当时博物学家已经分辨出火成岩和水成岩）。莱布尼兹在他1765年出版，但在1703年写出的《新论文》中提出了生物种类的性质和变化的一些想法，在随后的一些讨论中一直贯串着他的这些想法。“我们根据年代来给物种确定定义，以使来自或可能来自同一来源或同一种子的类似生物具有相同的种属”，但是“我们经常无法对物种确定界限”：因为“物种全都团聚在一起，仅仅具有不易觉察程度的区别”；“任何物种的性质都是程度不同地逐渐发生变化，没有任何物种是飞跃变化的”^[42]。他最后说：也许物种一直是在逐渐变化，而且还在这样变化。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观测者也在给地球的实际历史提供更多的细节。在英国，爱德华·荷特1699年出版了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对1600种动物和植物的化石加以描述。他和约翰·伍德沃德指出，由于海洋沉积而造成的在不同地层中存在不同化石的情况。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1730年去世）对整个意大利作了全面研究而得出结论说：意大利有很大一部分曾经一度为海水所覆盖。在法国，列奥米尔对内陆存在海洋贝壳的现象作出了卓越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以前洋流沉积的结果，这种解释使丰特奈尔提出了绘制地质图的想法^[43]。在瑞士，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J. J. 朔奇泽（1672—1733年）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编纂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对大量的动物和植物的化石作了描述，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与这些在野外勘察的地质学家同时代的人，有些比较善于推理，他们从这些地质学家的工作中抽引出理论上的含义，却往往使这些地质学家无法与他们并驾齐驱。当时已经开始把这些看法，如化石是洪水受难者的骨骼或者是大自然的“狩猎”，看作不合时宜了；但是设法利用自己的观察来追寻《圣经》所载灾难过程的，朔奇泽并非绝无仅有。本来从根本上说是合乎道理的地质分析，却用于虔敬神明，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虔诚使得伏尔泰陷入了完全否定地质学家这种说法的荒谬境地。无论如何，正是在1710年把朔奇泽的作品提交科学院的时候，丰特奈尔发出了这样一段经典之论：“这里是新品种的奖章，它们出现的时代无与伦比，比起所有希腊和罗马的那些时代来都更加重要，更加肯定。”^[44]使丰特奈尔获得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地质和遗传学的证据，它们表明：生物品种在地球演变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化石都是历史性的文件。显然，到1710年时很多博物学家大概不会认为胡克在1687年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假说过于荒谬了。那时他说：“在以往的时代，曾经有许多其他生物品种是我们目前根本找不到的……现在也可能有好多种新的品种是在开头时所没有的。”^[45]这些意见除了地质学以外还在第二种主要的领域得到支持；这种支持是由于观察到下述情况而得到的：黑人中的白化病（泰森也举过这一情况）、多指症和人类其他的畸变，狗和鸽子的珍奇品种，以及园艺家很感兴趣的观赏和有用植物如郁金香和草莓的变种。^[46]

在1750年以前，这种探讨的方法引起人们对众所公认的林奈关于自然秩序的整个概念进行重新估价，并且使与之对立的一种解释得到发展。其中最为激进的是莫佩尔蒂和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1707—

1788年)所提出的解释。莫佩尔蒂在1741—1751年期间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第一次提出了完全属于进化观点的解释,说明种种现存有机体的整个范围,把它们与共同的亲本分开来。而且他还不顾林奈和莱布尼兹的说法,所谓神意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创建了一种可以自我调节的和谐秩序,他提出一种彻底属于机械论的解释,假定偶然的变异产生了秩序,而这种变异又是由于那些能较好适应环境的个体经过自动选择而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意见与众所公认的关于“大自然至高无上的秩序”的观念相决裂,决裂的程度可以说是无比深刻的。莫佩尔蒂用遗传来考虑整个问题,表明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深入观察进化论所需的形态上的特点,而直到很久以后进化论才发展起来。他所采纳的遗传假说是这样的:生物繁殖的途径是由每一个父本的“生殖分子”所提供的,这些分子结合起来就产生后代。他说:

难道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从两个个体就可以产生出众多千变万化的品种吗?它们首次出现仅仅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基本的粒子没有保持动物上一代身体内所保持的秩序:每一种失误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品种,从这种不断重复的偏差的力量就可以出现我们今天见到的数目无穷互不相同的动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还会继续增加,不过每一个世纪也不过增加一个难以觉察的数量。[\[47\]](#)

他评论得到这样一种说法:在大自然的这些偶然产物中,只有那些具有某种适应特点的产物才能生存下来,而且事实上在所有那些生存下来的产物中都找得到这种特点,他以下述这种新的方式把它归之于神意秩序:

我们可以说,偶然性产生出不计其数的个体;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结构是刚好可以使动物的各种器官能满足它的需要;而另外那些,数量大得不可胜数,既不能适应,又无秩序,所有那些都灭亡了:没有嘴的动物活不下来,没有生殖器官的动物无法繁殖后代。唯一能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具有秩序和适应性的种类,而这些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品种,只是盲目的命运所生产出来的品种中极少的一部分。[\[48\]](#)

布丰对林奈生物学的批评集中在多少与此不同的一些问题上,从而导致颇为不同的结论。莫佩尔蒂并未对林奈的“属”和“种”提出疑问;他的目的仅在于给以不同的解释。布丰在他那部《地球史》(1749年)中虽然写出了第一篇概论,讨论在不同地层中发现的化石形态演替的情况,但他并不接受莫佩尔蒂提出的关于一般进化观点的假设。他那篇关于“驴”的著名论文,载于他的《大自然史》第4卷

（1753年），文章的目的在于攻击林奈关于“科”的整个概念。他认为林奈的这个概念同他的那些命名法的原则，全都是完全没有道理和使人产生误解的。布丰讨论驴和马（或者人和类人猿）属于同一“科”的可能性，目的只是为了要把它连同共同血统的解释一道加以否定，以便使生物学回到它真正的方法上来。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以牛顿为榜样，用仔细观察的办法来探索因果规律。因此，他的结论是：“科”仅仅在想象中存在，而在大自然中，只有属于各种物种的个体，而这些物种是根据遗传连续性而加以严格界定的。但是布丰讨论了自然的“科”是由遗传发生变异而产生的可能性。他的这种因果观点，使他对人为选择、四足动物的地理分布、变异的原因、物种的绝灭和杂种不能生育规律的例外情况等产生兴趣。因此他后来成为拉马克和圣-伊莱尔获取灵感的源泉；达尔文本人也承认布丰是先驱。

发展进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缺乏生物繁殖和遗传基本事实的知识。然而，在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基本生物学问题进行调研的工作中，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办法不仅是通过巧夺天工的实验，而且也通过推想，推想常常远远超出已知的事实范围，然而有时却富有成果。显微镜再加上机械论的假设，提供了基本事实、概念和争论，这些在1700年之前在生殖问题上起了作用。到这个时期，所有动物都用卵进行自身繁殖这样一个概括的论断，就卵生类型如鸟类、两栖类、鱼类和昆虫来说，已经由雷迪、斯瓦姆默丹、马尔皮基、瓦利斯内里等阐述清楚，这种论断后来由于斯坦诺发现板鳃类鱼的卵巢和德·格拉夫发现哺乳动物的卵巢而推广到胎生动物。与此同时，哈索克和列文虎克发现了精子，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它们的功能；格鲁在开花植物中观察到花粉，并且提出花的各部分就是生殖器官的观点。1691年，意大利一个耶稣会会士博南尼出版了附着于不同品种花柱上花粉的图片，但是植物的性功能的第一批实验证明却是德国植物学家R. J. 卡梅拉里乌斯在1694年提供的。

这些重要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成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在整个这段时期，生物学推想具有极端形式主义的特点。当时在三个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新的形式复活了由来已久的三种理论。第一派是所谓“卵派”，声称产生后代的唯有卵而已；第二派是“微动物派”，声称唯有精虫产生后代；第三派（包括莫佩尔蒂和布丰）从遗传的事实出发，主张种子一定是来自父母双方。第二种争论则在“胚胎中预成说派”和“后成说派”之间激烈展开，前者认为

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它的父母双方的卵或精虫中预先形成的（因此一代又一代都是它们本身机械地延续展开的）；而后者则认为是以胚胎的形式实现真正的发展。这一争论达到的荒谬程度，在扯到侏儒的时候就更是登峰造极了。侏儒是一种小矮人，据说可以看出在精虫中就已完全形成，哈索克在一张著名的图画中（1694年）就曾加以描绘。在理论与观察的交流中，这些意见几乎从未提出要进行新的试验；而只不过是照例想方设法使之符合那些过去做过的试验。^[49]主要是在用自然发生^[50]来试验生命起源学说和用杂交来试验新品种起源学说时发生了一些例外。在各种不同的理论中，胚胎中预成说赞成物种固定不变的僵硬概念，反对自然发生论，后成说则赞成自然发生和进化的观点。

当时在解决问题的范围内能精确深入地掌握最富成果的生物学问题的，大概要以R. A. 费肖·德·列奥米尔（1683—1757年）为最好的范例。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他都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列奥米尔最初学习的是法理学和数学，最早从事的工作是工程技术，1706年进入科学院做机械徒工。但是不久他得到每年1.2万利弗尔^[51]薪金，于是定居在法堡·圣安托万，置有一座巨大的园圃、一个实验室，还有他的收藏品。他的卓越贡献在于他认识到，仅仅研究动物的结构和分类是不够的，生物学还必须结合动物同环境的关系来研究有关它们的生理学和行为。他在这方面的重大成就是那套《昆虫志》——6卷巨著，1734—1742年出版，正是在对具体生理过程进行调研时，实际与推想的交替进行产生了最持久的结果。自从哈维那个时代以来，实验生理学在范围和精密度方面不断稳步改善。种种新发现提供了特别富有成果的一系列典型——机械的、化学的，后来还有电学的——这些正是生理学为分析和解释生命过程所一直要求得到的典型；而新的仪器使得对生物学上一些新的常数有可能作出定量分析。并非从事医学的科学家，除了神经系统的研究以外，在实验研究方面更为活跃；医学教授主要是负责理论思想和体系方面的发展和评论。然而，那些伟大的医学生理学家——莱顿的博尔哈夫、哈雷的弗里德里希·霍夫曼（1660—1742年）、格丁根的冯·哈勒——目标全都在于坚定不移地根据实验进行解释，而后两位则把生理学作为身体功能的科学来看待，而不考虑它在医学方面的实用情况。

相互竞争的三大派为生理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大量灵感。第一派是机械派，由笛卡儿和哈维而来，特点在于强调计量。因此有些调研者研究血液的数量、速度和压力如何计量的问题，以及心脏收缩所用的力量和所做的功如何计量的问题。黑尔斯在《植物静力学》中表明：树液并不是以人们广泛承认的同动物类似的那种方式循环。他对植物生理学所作的重大贡献就是测量树液从根部向上流动的压力和它每天的变化，根部吸收和树叶蒸发的水分的数量以及其他一些数量。他在《血液静力学》（1733年）中又把这种技术用于测量动物的血压，他把一匹马、一只狗、一只羊和一只雌兔的颈动脉或腿动脉或颈静脉的血液，导入一根长管进行不同的实验。他证明：不同的动物血压不同，同一动物时间不同血压也不同。几年以后，达尼埃尔·贝尔诺利运用流体动力分析法证明如何正确地测量心脏的工作。哈勒证明心脏的力量可以延伸到毛细血管。于是血液循环成了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定量测量其中生物学常数的第一个生理功能。在研究血液循环的动力学、空气进入肺内的奥妙（哈勒曾作过正确叙述）以及一般的运动和移动的奥妙方面，纯粹采用机械的办法来作生理功能的分析，显然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指南。但是正如化学进展所表明的，仅仅用机械的办法来研究许多生理功能还是不够的，容易发生错误。黑尔斯自己在化学生理学方面有了重大的发现——他设计了一套收集气体的装置，然后用测量的办法证明：把植物罩在水上，植物就把罩内空气的七分之一“固定起来”。但是他也许是对机械解释着了迷，这就常常使他无法理解他所发现的东西。博尔哈夫反对极端机械的观点，于是成了生理解释这第二个伟大泉源的首要拥护者。由于化学方法的启示而进行的实验，主要领域是研究消化。对消化过程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机械和化学解释，而博尔哈夫断言胃液的酸度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化学问题。列奥米尔巧妙地利用鸛鸛吃食反刍的习惯，把食物装在钻了小孔的管子内让它吞下，这样可以保护食物不受机械运动的影响，从而证明消化了的是肉食而不是谷物；他还让鸛鸛吞下小块海绵，然后从海绵中挤出一滴滴的液体，在这只鸟的体外做人工消化的实验，在这只鸟死了以后，他又用一只狗和几只鸭子继续实验。他未能确定胃液的作用，但是他创造了研究动物身上的自然消化和动物体外的人工消化的技术。

机械法和化学法这两种方法如果走到极端都会引出“机械论”的推想：生命现象归根到底全都可以归于物理学和化学。有机论或称

“活力论”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它对生物学家是一个挑战，也是一项请求，要他们制定出自己的解释原则。在18世纪初叶，活力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施塔尔和哈勒。施塔尔以他形而上学的信仰作为着重原则的活力论的基础，而哈勒则恰恰相反，使着重事实的活力论立足于观察得出的意见：有机物的作用与反作用是自成一体的，并不是从其他各种科学借用一些概念就可以立即解释清楚的。这一派在分析神经与肌肉系统时，采用的方法比源出笛卡儿的那些机械性的方案更加注重经验，更加适合，所以成效最大。这一派给生理学家提供了以观察为基础的明确具体的有机概念，如施塔尔关于肌肉的弹性和神经系统的协调作用的概念，又如哈勒关于肌肉具有“激动性”（收缩性）这种特性以及神经具有“敏感性”（传导性）这种特性的一些概念，从而区分“敏感”与感觉的范围。哈勒那些独创的实验特别分析了不随意运动中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各个不同部位之间的关系。有机派也引起人们对托马斯·威利斯关于反射作用的基本概念（1670年）和对脊髓作用的理解有了重新认识，这首先是蒙彼利埃的让·阿斯特律，然后是1751年爱丁堡的罗伯特·怀特有了新的理解。后来，这种对神经病控制水平的分析，由比较解剖学家加以利用，使大自然最后进化的规模有了一个新的面貌。与此同时，纯理论的机械论在生理学的多数重要部门都让位于那些由化学、电学和热学这些新的实证科学所武装起来的学派。

对自然科学的新看法，对于那些从事这种科学的人来说，首先就是实验性的。正如培根所说过的，“大自然在受到艺术折磨的时候比自由自在的时候更易于揭示自己的秘密”^[52]。在科学上，这种积极的态度比较说来（尽管当然并不是就全体来说）是新奇的。但是技术自中世纪以来由于这种看法，已经在不断地而且是在广泛的战线上稳步前进。“实验哲学”的降临表明，技术的精神已经扩大到纯科学，因此许多科学家对实际问题也很感兴趣，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7世纪的两大科学协会决心研究实际问题。然而，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却并不是顷刻之间实现的。

虽然科学家当时已经密切关注技术问题，但是他们的科学知识却常常无法应用。当然存在例外的情况。最重要的（哪怕只是部分的）例外也许是海上航行的问题。纬度的位置可以直接观察天上的极点来找到，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来确定经度的位置。然而在能见度很差或者在长距离航行的时候，一点误差就可能遭到灾难，所以从16世纪

以来，一些航海国家的政府都悬重赏奖励实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的处理办法有三种。第一种办法是在航海图上画上很多条线，沿着这些线上的磁力变数都是常数：量得当地的磁力变数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是在哪一条既定的线上，知道纬度是多少，就可以（在理论上）从它和那条线的交点确知船舶的位置。1698年，哈雷奉命率领海军一艘尖尾船“情人号”去“增加关于经度和罗盘变数的知识”。1701—1702年，他出版磁力倾角图表，对航海员有很大价值，但并未解决主要问题。第二种办法是看月球距离和月球运动的速度。1675年建立格林威治天文台，专门进行这种必要的观测。但是实际障碍和计算上的障碍很多，直到内维尔·马斯基林的《英国航海指南》（1763年）的出版和从1767年开始的《航海天文年鉴》的出版这些障碍才得以解决。第三种办法是把经度的差别看作当地的时差。问题是确定什么时间为标准时间，因为17世纪的钟表尽管由于改用新的钟摆（1660年左右）代替旧的平衡轮而使计时的效率大有改进，但是在海上经过一段时间就不准确了。伽利略曾经提出，海员观察木星的一个卫星的亏蚀情况就可以显示出图表上与标准时间的差异，但是还是无法克服实际的困难。这个问题最后也并不是通过任何理论上的发展得到解决的，而是由于约克郡一个木工的儿子约翰·哈里森（1693—1776年）制作的航海计时技术精湛才得以解决；这种计时钟的第一个是在1736年进行实验的。它体现出两项独特的发明：“网状”钟摆和“蚱蜢式”摆轮，这两项发明使得摩擦力减到最小限度，补偿了温度的变化，因而大大消除了较早的一些计时机械的种种缺点。[\[53\]](#)

由于缺乏指导性理论，一些技术问题，正如科学中那些最原始领域的问题一样，不得不根据经验来解决。最好的例子是所谓新经营法，它在诺福克沙土地带实行的轮流种植苜蓿、小麦、萝卜和大麦的轮种制中又增种饲料作物。这样种植是因为人们注意到，在以前种过苜蓿的地里，小麦似乎长得最好，种过小麦的地里，萝卜长得最好，如此等等。为什么会是这样，在19世纪以前，谁也不能理解。但是对观察价值的绝妙说明是杰思罗·塔尔（1674—1741年）的发现，他观察到，粉碎土壤在某种程度上是代替施肥的令人满意的办法。塔尔的马拉犁和条播机是1669—1758年增加的少数几种主要农具。他研究过1700年以前在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实行的精耕细作经营法，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提到布拉班马[\[54\]](#)拉犁，这是一种步犁，把模板

和犁头结合为单独一块拱起的铁片，它能把犁沟中的土壤完全翻起来，而不需要多大的牵引力。[\[55\]](#)

我们虽然把工业革命算在18世纪末叶，但在这一时期的某些活动却为工业革命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的过程铺平了道路。商船和海军造船的规模日益扩大，虽然它在技术方面并未显示出显著的革新，但它仍然要求把错综复杂的技术组织得井井有条，在海军造船厂还要有大量的劳动力。在法国，17世纪巨大的建筑城堡和开凿运河的计划要求更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仅在1669年就有8000多人参加开凿朗格多克运河的工作，为此而必需的组织方法中含有后来修建公路和铁路以及兴办工业的种种经验教训。然而所有这些同建造圣彼得堡相比，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56\]](#)

在所有技术问题中，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则全都是寻求新能源和发动机，特别是在采矿方面。从1561—1668年，英国发出的发明专利证中有七分之一是与引水灌溉问题有关的，在1660—1700年间，发明专利总数为236项，从田地或矿井中抽干积水的专利不下30项。把马力、风力或水力的旧办法用于很深的铜矿和煤矿，价钱太贵。利用蒸汽的可能性早在古代已经隐约显露出来，而在整个17世纪人们一直设法把活塞和汽缸结合起来，想使蒸汽动力能够用于清除矿井中的积水。托马斯·萨弗里发明的唧筒（1698年）想把蒸汽和大气压力结合起来使用，这种办法费力而且危险。惠更斯提出把这个主意加以修改，其中涉及用火药爆炸。[\[57\]](#)但是，把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第一台有效的机器直到18世纪第一个10年才发明出来：德文郡一个铁匠托马斯·纽科门（1663—1729年）发明的救火机到1720年在英国已经普遍使用（用于矿井、运河船闸和水库），并且开始向国外出口。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地面运输煤炭。早在1600年，英国有两个地方已经使用木轨，满载的煤车依靠自身的重量运下山坡，然后用马把空车拉回井口；18世纪，在铁路上用马把煤车拉运到距离不远的地方，在英国已很普遍。同时，战争的需要促使把煤炭用于金属生产，最先是17世纪90年代在布里斯托尔开展用反射炉炼铜。亚伯拉罕·达比（1717年去世）曾在布里斯托尔当过黄铜翻砂工，1709年左右在科尔布鲁克代尔（在伍尔弗汉普顿附近）建立焦炭炼铁炉从事商业性生产。他的冶炼过程只能生产劣质生铁，但是他的儿子到1750年终于获得成功，精炼出铁棒；

在制造需要比铸铁更不易碎的金属的高质量商品时，这种精炼的铁棒开始同木炭炼出的生铁竞争。

科学到18世纪已经达到观点和活动的一致，系统提出对大自然的期望和实际目标的一致，这就使科学在西方文明中置身于正在发生作用、生气勃勃的影响力量之列。对待大自然和对同它相互关联的社会的态度，是立足于前一世纪的具体成就之上的。但是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的却是作家，他们多数并非科学家，这些作家在组织消息传递和公开宣传方面工作杰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原本属于科学的着重经验的方法和推理的思想，成了一切文明原则的标准，行动的基础。

在1700年以前，科学最新的成就在一场著名的文学辩论中是用来否定人们宣称的希腊和罗马在艺术与科学中的优越地位。^[58]威廉·沃顿和约翰·德莱顿认为，科学的大变革是西方在经历了中世纪几百年的野蛮之后复苏的最重要的部分。丰特奈尔对这一图像添加了更多的想法。他的《悼词》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他阅读笛卡儿而得到的理性的启示，尽管他对笛卡儿过分使用演绎推理法和相信理性肯定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作为补充的一个立题是丰特奈尔对准确观察和注重事实表示推崇。这方面的典范是《光学论》，牛顿的这部立足实验的巨著，早在《数学原理》出现之前就已驰名法国。丰特奈尔认为，科学态度的特点是以合理解释一切问题为目的，但承认实验的方法——虽然具有各种困难和不可确定性——才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道理了。他的这种看法还和比较一般的怀疑论结合在一起，这种怀疑论不是来自科学家，而是来自卢克莱修和蒙田。由此产生的一种对事物的看法，对宗教权威起了破坏作用，然而对存在的种种玄妙奥秘又加以尊崇。

丰特奈尔“科学变革”一般意义的解释，由伏尔泰转化为一种历史观。伏尔泰在他的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年）和《风俗论》（1756年）中，开始为他在《哲学辞典》中撰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范例，这样一种历史分析，可以发现各种文明进步与衰落的原因，像自然科学一样得出种种原则，统观种种结果而得到教益。伏尔泰在这些著作中第一次写出了全面的比较文明史。他在其中还加上了一段简要的科学技术史来进行比较论述。他确定了对历史的态度和如何评价人类的活动，这就使牛顿比亚历山大、恺撒或克伦威尔伟大，因为

牛顿是以自己的领悟力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而那些伟大的军人则是以暴力对人们施加奴役。伏尔泰认为，人类的心灵通过文艺复兴的怀疑哲学而摆脱了“迷信”之后，达到进步的高峰，是伽利略、笛卡儿、培根和牛顿发现了“真正的哲学”。18世纪其他作家——狄德罗、休谟、罗伯逊、吉本、孔多塞——的历史观都着重推崇科学运动。与此同时，各门具体的科学史陆续开始出现。丹尼尔·勒·克莱克所著的医学史早在1696年就已出版，在格丁根还教授这一门课。J. E. 蒙塔克拉发表伟大著作《数学史》（1758年）之后，其他著作相继出现。人们到这时候已经承认科学变革是世界历史中的伟大事件，科学史已经在现代历史编写工作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席之地，而且科学思想的准则已经成为一般推理思维的准则了。

（张扬 译）

[1]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2—58、63—65页。

[2] 《自然科学学报》第255期，第281、273页。

[3] 这两个机构的缘起，请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0—51页。

[4] 亨利·莱昂斯爵士所著《英国皇家学会（1660—1940）》（1944年版）附录二中载有下列统计数字，从中可以了解学会组织史的一些情况：

项 目 年份	会员 总数 (人)	科学专业与非 专业会员之比	代表不同学科的科学专业会员百分比			外籍会 员人数 (人)
			医学内 科与外科	数学与 天文学	实验与观测科学（化 学、植物学、动物学、 地质学、光学等）	
1663	137	1 : 2. 1	55. 1	34. 9	10. 0	0
1698	119	1 : 2. 3	54. 3	20. 0	25. 7	28
1704	301	1 : 2. 04	63. 0	19. 0	18. 0	146

[5] 引自C. D. 布罗德著《艾萨克·牛顿爵士》（英国科学院，1927年）。1712年，英国皇家学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就牛顿与莱布尼兹谁首先发明微积分的争论提出报告。牛顿并不是委员会成员，但委员会支持他是不足为奇的。委员会成员发现，他们在1710年被任命为格林威治天文台视察员时，自己也卷入了与皇家天文官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纠纷。直到1720年哈雷接替脾气不好的弗拉姆斯蒂德后，天文台和视察员之间才建立起良好关系。后续的发展，请参阅A. 阿米塔奇著《埃德蒙·哈雷》（1966年）和E. G. R. 泰勒著《汉诺威统治英格兰时期的数学工作者，1714—1840年》（1966年）。

[6] 学会设在格雷欣学院，直到1710年才迁到弗利特街（人们误译为舰队街——译者）白鹤大院的一幢房屋内。

[7] 卡宴在法属圭亚那。——译者

[8] 拉普兰在瑞典。——译者

[9] 莫佩尔蒂被派往拉普兰，戈丁、布给、拉孔达明和约瑟夫·德·朱西厄被派往秘鲁，主要是考察牛顿关于地球形状的理论，提供更准确的地图，他们后来带回了大量宝贵资料和标本。

[10] 请参阅W. W. R. B. 著《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起源与历史》（剑桥，1880年）。

[11] 她的*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被称为“所有印行的书籍中最好的书籍之一”，她在苏里南进行的工作，可以在独创性方面同乔治·隆菲乌斯的工作媲美。隆菲乌斯的*Amboinse Rarifeifen kamer*也在1705年出版。见C. R. 博克赛著《荷兰海上帝国》（1965年），第181—183页。

[12]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91—94页。

[13] 关于马歇尔·沃邦，请参阅本书原文第329—331、750页。

[14] 布雷斯劳在波兰境内。——译者

[15] 见G. N. 克拉克（爵士）著《牛顿时代的科学与社会福利》第5章（牛津，1937年），其中也论及政治算术以前非科学的事例。

[16] 见该刊1688年8月2日；转引自R. 杜加著《17世纪的力学》，纳沙泰尔，1954年，第455页。关于牛顿的科学原理和影响，请参阅A. 柯瑞著《牛顿研究》（1965年）。

[17] 《光学论》，莱顿，1690年，第159页。关于惠更斯，见第5卷第3章。

[18] 牛顿致本特利信（1693年2月25日），载F. 卡约里编《讲坛》，伯克利，1934年，第634页。

[19] 牛顿致本特利信（1693年2月25日），载F. 卡约里编《讲坛》，伯克利，1934年，第634页。

[20] 牛顿致玻义耳信（1679年2月28日），载F. 卡约里编《讲坛》，伯克利，1934年，第633页。

[21] 塞缪尔·克拉克博士将雅克·罗奥的《物理学》译为英文时，在译文（伦敦第2版，1702年）第82页所写的注释中提出了这一说法。

[22] 科茨致牛顿信（1713年3月18日）告以莱布尼兹的批评，见I. B. 科恩著《富兰克林与牛顿》（费城，1956年）。牛顿所作的修改包括：给第3卷增加“概论”，其中有那著名的段落，明确指出他不愿被迫进行臆测：“迄今我还能从种种现象中发现那些重力特性的原因，我也决不杜撰任何假说。”（见F. 卡约里编《讲坛》第547页。）

[23] 关于莱布尼兹的科学理论，请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4页；关于乔治·贝克莱（1685—1735年），请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110页。

[24] 致克拉克的第一封信（1715年11月），载H. G. 亚历山大编《莱布尼兹—克拉克通信集》，曼彻斯特，1956年，第11—12页。

[25] 卡约里编：《讲坛》，第544页。关于这些争论的全面深刻的分析，请参阅艾瑞德著《18世纪前半叶法国对大自然的看法》第1卷，特别是其中的第3章。

[26] 《回忆录》（1749年），第35—36页。

[27] 这本书不断再版，直到1735年。此时介绍牛顿学说的普及性著作如H. 彭伯顿的《艾萨克·牛顿自然科学概览》业已出现。

[28] 哈雷：《自然科学学报》第186期（1687年），第291页。

[29] 《物理—力学实验》第1节（1709年）。霍克斯比也描述了用他自己的机器做摩擦生电的实验，但是大约30年之久，人们一般都并未过问这种机器的可能效果。

[30]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8—60页。

[31] 拉瓦锡（1743—1794年），法国化学家，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他于1788年证明空气是气体（氧和氮）混合物，从而推翻了燃素说。法国大革命中因被控有反革命活动而于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译者

[32] 华伦海特标度法以冰开始融化为32℃，以沸水开始沸腾为212℃；列奥米尔则把它们分别定为0℃和80℃。自1665年以后，曾经提出以其他各种现象作“定点”。关于佛罗伦萨的A. Caenlo（1657—1667年），请参见本书原文第5卷第49页；关于列奥米尔，参见本书原文第65页。

[33] 参见《分析家》（1734年），载A. A. 鲁斯和T. E. 杰索勒编《作品集》第4卷，1951年，第89页。

[34]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66—71页。

[35] 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公司职员的贡献，请阅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11页。

[36] 《猩猩，或类人猿：或解剖黑猩猩》（1699年）；见M. F. 阿什利·蒙塔古著《爱德华·泰森》（美国费城协会；《回忆录》第20卷，费城，1943年）。

[37]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68—70页。

[38] 单子叶植物为有花植物中种子只有一个叶片的植物；双子叶植物为有花植物中种子具有两个叶片的植物。

[39] 林奈：《自然体系》第13版第1卷，维也纳，1767年，第13页。

[40] “大自然没有任何跳跃飞腾，这是我最大的准则之一，也是得到最完全证实的准则；这个准则我称之为延续法则。”见C. G. 格哈特编辑的《G. W. 莱布尼兹的哲学著作》（7卷集）第5卷，柏林，1875—1890年，第49页。

[41] 《猩猩》序言第7页。

[42] 《新论文》第3卷，第6页；《哲学著作》第5卷，第285—288页。

[43] 堪称地质图的第一张地图是J. E. 盖塔1746年绘制的法国地质图。

[44] 《皇家科学院史》，1710年，第22页。

[45] 《论地震》，见R. 沃勒编选的《遗著》（1705年）第291页。

[46] 法国植物学家让·马尔尚在自己的花园里发现了山靛的两个未为人知的品种，这个例子由于丰特奈尔的引用而变得非常著名；马尔尚在1719年写道：他认为他见到了新品种的诞生，他提出一种在生物“属”的范围内发生部分进化的假设。参见《皇家科学院记录》，1719年，第59—66页；并见丰特奈尔《皇家科学院史》，1719年，第57—58页。

[47] 《自然体系》（1751年），载《作品集》（4卷集）第2卷，里昂，1756年，第148页。

[48] 《宇宙论》（1741年以前写成，1750年出版），载《作品集》第1卷，第11—12页。

[49] 查理·博内（1720—1793年）的一再转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卵派预成说的首要拥护者改变自己的学说，首先是要说明他自己在蚜虫的单性生殖方面的重要发现（1745年），后来是要解决阿伯拉罕·特朗布雷（1700—1784年）在1740年就水螅Hydra和Plumatella所作奇妙试验而产生的困难。特朗布雷表明，他切下这种动物身上的小片，每片都可重新长成一个完整的小水螅，并且用芽接的办法可以发生无性生殖。

[50] 1784年，约翰·尼达姆将煮沸过的肉汤放在据说的不透气的容器中，却在肉汤中发现了微生物。

[51] 利弗尔为法国古代记账货币，1利弗尔相当于1斤银价。——译者

[52] 《新工具论》第1卷，箴言第四十八。

[53] 见R. T. 古尔德著《约翰·哈里森和他的时计》，载《航海镜》第21卷，第115—139页。关于1700年的海上调查技术，请参阅A. H. W. 罗宾森著《英国航海图》，莱斯特，1962年，第40—60页。

[54] 布拉班马为比利时出产的一种挽力特大、性情温和的马。——译者

[55] G. E. 富塞尔：《1500—1900年的农具》，1952年，第218—222页；B. H. 斯利彻·冯·巴思：《低地国家和农业》，载《第10届国际历史学会议文集》第4卷，佛罗伦萨，1955年，第189—191页。

[56] 见本书原文第731—732页。

[57] 但尼斯·帕潘协助惠更斯工作时，曾在萨弗里想出提水机器之前，在1687年就想到这种办法，他在1707年应用这个办法用蹼轮推动一条小船。

[58] 见本书原文第79页及以下各页。

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1. 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在艺术上的建树与其他方面的成就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种种因素既复杂而且也不容易看得清楚。历史上有过文化不发达的强国，而文化发达的强国则不多见。但是，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其文化方面的影响能够和它们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及18世纪的头20年的政治地位十分相称的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力量在1680年以后不久达到了顶峰。随着法国力量的增长，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呈现出一派光辉灿烂的景象。而且，这种景象在法国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衰落和这位“伟大的君主”去世以后很久，仍然照耀着欧洲的舞台。由于莫里哀、拉辛、拉芳丹、拉斐特夫人、拉罗什富科和波舒哀的相继出现，法国文学传统遂臻于完善。这个传统提供了符合贵族趣味的鉴赏标准。这些标准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支配着欧洲上流社会文学。不管崇拜费奈隆和鄙视伏尔泰的两派观点之间看来有多么深的鸿沟，法国文学传统本身所包含的讲究理性、内容明晰和层次分明这些思想精髓，大都来源于启蒙运动。但是，在法国继续处于优势的同时，随着英国的财富和力量的稳步增长，又出现了英国这支新的思想和文学劲旅，其特点是强调对实际事物的观察，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实际上，欧洲思想和文学力量的模式已在这个时期确立，18世纪以后全部的发展情况都是从这种模式产生出来的。

法国文化称霸欧洲，这是主要现象。这一现象最后又发展成为英国、法国文化共同称雄的局面——这种局面本身就包含着具有丰富创造力的许多冲突；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卡尔德隆1681年去世之后，即使在戏剧界，西班牙也没有出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继承人，由此可见西班牙文化的衰落。当西班牙文化终于开始复兴的时候，其方式不过是对新的法国和英国文化的反应而已。西班牙文学界出了个重要接班人费霍（1676—1764年），尽管他牢牢地植根

于西班牙文学传统，但主要还是起了一个传播启蒙运动启示的传信人的作用。

意大利的学术领域依然是一派繁荣景象。卡西尼和马尔皮基的科学成就，法学家兼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维科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1]，都说明伽利略和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传统尚未消失。外国思想界的发展情况也没有被忽视。1700—1709年间，马勒伯朗士的门徒米凯兰杰洛·法尔代拉·达·特拉帕尼在帕多瓦授课时，采用笛卡儿主义“新哲学”取代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727年，佛罗伦萨大公出版社（根据梅迪契家族最后一个统治该地区的焦万·加斯东的指令）出版了加桑迪著作的精致的对开本，看来伊壁鸠鲁的学说在法国复活在这里也引起了重视。然而，文学创作与以往的伟大成就相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相形见绌；而且，由于17世纪风靡一时的巴洛克风格这时终于发展到了泛滥的程度，这或许对文学创作也有妨碍。1690年，罗马创立了一个名为“阿凯迪亚”的诗社，可以看到一点复兴的端倪。创立该诗社之目的是继续举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89年去世前在当地发起组织的一些文学集会。这个团体在其他许多城市吸收了一些成员，发展成为第一个真正的意大利的文学团体，其宗旨是纯洁文学鉴赏情趣，号召反对过去100年里那种过分的矫揉造作，回到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大师们的比较严肃的风格以及古典文学的质朴风格。但实际上诗社培育的田园式质朴文风与它所反对的“粗犷俚俗”同样显得不自然和做作。然而，新古典主义的复活后来在意大利戏剧创作的兴起中却硕果累累：希皮奥内·马费伊（1675—1755年；《梅罗普》，1713年）的悲剧，梅泰斯泰西奥的歌剧^[2]和戈尔多尼（1707—1793年）的新喜剧。

德意志甚至连为人们所怀念的黄金时代也没有。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文化生活一直普遍贫乏，因此，文学创作的推动力势必来自国外。西里西亚派的诗歌（该派的影响左右一切达30年，直至其公认的领袖C. 霍夫曼·冯·霍夫曼斯瓦尔道1679年去世为止）其形式主要模仿意大利诗人如马里诺（1569—1625年）那样的造作诗句，具有华而不实的色彩；同时也模仿上一代法国宫廷和沙龙诗人的华丽辞藻和隽永的语言。后来，布瓦洛倡导的比较朴素的古典规范在普鲁士的F. R. 冯·坎尼茨（1654—1699年）的《讽喻诗》（就反映了布瓦洛的那些规范）和萨克森的J. U. 冯·库宁（1688—1744年）一类的诗人作

品中就引起了某种反应，反对刻意雕琢语言和意大利式的浮夸文风。同样，格里曼尔肖森的《西木卜里奇木斯奇遇记》（1668年），其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3]，虽然是由于它描绘的“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的情景跃然纸上，但其塑造的人物角色却是脱胎于早期西班牙和法国的描写下层生活的惊险小说。

在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安东·乌尔里希公爵（1633—1714年）的长篇说教的英雄故事小说中，在18世纪整个上半叶期间德意志家喻户晓的由H. A. 冯·齐格勒和克里普豪生（1663—1696年）合著的《亚洲的巴尼兹公主》（1689年）这部小说中，路易十三时期法国无连贯主题的散文体小说的影响都依稀可见。由于广泛地接受了法国的模式和规范，终于引起了J. C. 戈特尚特的批评（见《批判诗学试论》，1730年）。不过，对这种批评最终的反应还是健康的，这种反应使得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了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的这个时期里还只能看到一些苗头，比如反对盲目模仿法国文风的讽刺作品颇为盛行；一些极有才智的德意志作家使德意志在艺术和鉴赏力方面持有自己严肃和独立不羁的态度，而且使文化生活比较活跃起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和莱布尼兹。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是普芬道夫^[4]的门徒，他公开声明反对一切偏见和迷信，他是第一个在莱比锡用德意志语教学的教授。而莱布尼兹不仅是当代德意志的而且也是当代欧洲的知识分子天才，人们认为只有牛顿才可与之相媲美。莱布尼兹的经历在某些方面从个人来说并不是成功的，而且他的那些比较宏伟的计划，没有一项是完全实现了的。然而，他毕竟在18世纪上半叶对德意志的文化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的哲学门徒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4—1754年）在大学里的系统讲学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他有力地干预了笛卡儿主义在法国引起的某些哲学上的论争，由于他在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为促进基督教会重新联合的国际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拥有广泛声誉的法理学家和学者，他对欧洲生活产生的影响要比路德之后^[5]的任何一个德意志人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

北尼德兰这一时期在文艺和思想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在于：由于那里获得的信仰自由比较广泛，也由于印刷业高度发达，因而这个国家有点像是欧洲的情报交换站，是来自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宗教界的流亡

者之家，是国际文学和学术汇集和传播的中心。荷兰文学本身也没有摆脱这些外来的影响。1679年，冯德尔这位17世纪的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的去世，标志着荷兰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从其顶峰开始下降。各富有阶级由于国家的繁荣得到了巩固，这时却往往追求贵族的鉴赏情趣。他们的眼界越过了本民族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学传统，而转向巴黎和凡尔赛的贵族艺术形式。在荷兰传播法国古典文学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是1669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有志者无难事”文学会。17世纪70年代，该会在推动翻译和模仿法国古典戏剧方面的影响特别大。这方面最有造诣的实践家是卢卡斯·罗根斯（1654—1710年）和西勃兰·菲塔马（1694—1710年）。同样，小说也受到像《星》（第一部完整的荷兰文译本1671年出版）和斯卡隆的《浪漫喜剧》（译本1678年出版）这些法国模式的巨大影响。而田园诗歌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里也复活了，主要反映在翻译过塔索的《亚明塔》（1715年）的J. B. 韦勒肯（1658—1726年）的著作里。然而，仍有一些人依旧按照旧的民族传统进行创作。年青一代中有模仿莫里哀的，如彼得·兰根迪克（1683—1756年）；托马斯·阿塞里奇（约1620—1701年）的喜剧仍旧成功地保持了早期比较质朴的本民族写作风格（如《简·克拉茨》，1682年）。但是，到了1700年，荷兰的文学创作如同其他的创作活动一样基本上陷于轻松自在的消极状态。这就是直到革命时代大动荡到来之前荷兰生活的特点。

最后提一下俄国。此时的俄国刚刚踏上欧洲文化界的地平线，年轻的彼得大帝首次去西欧旅行跨越了这条地平线，但他建立的联系大体仅仅是技术性和实用性的东西。^[6]后来，世俗教育在新贵族阶层得到了普及，才打通了接受西方国家文化影响，最后创立以西欧特别是法国模式为基础的新上流社会文学的道路。

我们说1680—1720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是久负盛名的法国文化和文学以及发展中的英国文化和文学，并不是说整个情况就这么简单。欧洲文化显然在其中许多新的方面主要表现为16世纪初见端倪，后被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赶入地下（其他地区新教正统派国家的压制稍轻一些）的开拓性工作得到了恢复和继续。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带有贵族和独裁味道的古典主义文化的威望，此外不仅孕育着以理性即所谓启蒙运动全面反对权威的种子，甚至还孕育着后来再次露头的浪漫主义情感和想象的种子。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化因素反映了那个

时期潜在的种种紧张气氛，也同文化生活的组织工作的发展和文化生活范围普遍扩大有关。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这两方面的情况，然后才能考察其表现形式。

尽管我们知道，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被认为是有阅读能力的人只占极小的比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要准确地弄清到底占多大比例肯定是不可能的。像英国或荷兰这样的国家，有阅读能力的人数可能多些。新教的传播必然会推动人们学习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其作用恐怕已超出阅读《圣经》以及赞成《圣经》或持不同观点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出版业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生计所系。然而，欧洲的一般情况似乎是有阅读能力的人正从社会的上层稳步地扩展到包括中产阶级的前所未有的数量。随着文化生活范围的扩大，其他几个方面也有了有助于加速其发展并使之更富有成果的进展。这个世纪早些时候，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国家文学院和科学院。实际上，法国皇家科学院（1635年成立）已很成熟，1694年，它出版了《科学院辞典》，完成了它的第一项宏伟工程；在这以前，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其先驱英国皇家学会早已有过一代人时间的影响。在法国，随着1712年，波尔多学术院的成立，这一态势也普及到了各个省份。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1714年成立的马德里皇家科学院以及其他地方的学术机构^[7]，至少可以证明各国政府是愿意扩大科学、学术和文学的效益的。另外还有一个最终可能具有更大影响的新情况，这就是学术与文学期刊的问世。《学者日报》和《哲学学报》于1665年率先与读者见面。从1668年开始，意大利出现了模仿《学者日报》的形形色色的文学期刊。1710年，具有更多的真正地方特色的《意大利文学期刊》开始在威尼斯出版，德意志第一种这类期刊是莱比锡的《学问家》，于1682年与读者见面。由于胡格诺派教徒的移居，荷兰也出现了类似的刊物，其中以皮埃尔·培尔的《文坛新闻》（1684—1687年）问世最早，名气也最大^[8]。这些刊物用大半的篇幅刊载学术性著作的书评（介绍其内容，不是评论），也刊载（有时详细刊载）刚刚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由欧洲各主要出版中心的记者编写的新书目录，为认真的读者提供崭新的服务。多诺·德·维塞的《风流信使》（1672—1716年）以比较轻松的笔调评论作为宫廷和巴黎社会生活大事一部分的当代文学、戏剧和科学大事。除了上述刺激知识发展的新因素以外，有必要提及一直存在的作为文学活动中心的法国沙龙的活动和日益增加

的知识性讨论，还有刚刚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活动场所——咖啡馆。咖啡馆是比较随便的、社会限制较少的交流思想的地方。

在每个国家，传播知识和观点的机会、作家和公众接触的机会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这一类国际交往也有了相应的增加，其影响最终可能更为深远。知识界由于使用拉丁文而保留了一些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统一，国际上知名学者之间互有通信往来自文艺复兴之后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此时相互的交往在数量和速度上都有明显的增长。培尔、莱布尼兹和惠更斯等人，以及像佛罗伦萨图书馆员安东尼奥·马格里亚比奇这样的二流人物的学术信件数量极大，而且遍及整个欧洲，有时（如莱布尼兹的信件）甚至超越欧洲的界限。看来，这种通信联系的需求的确是很可观的，至少足以使当时第戎的一个名叫阿贝·尼卡伊塞的相对不大有名的学者能自诩为学术函件的私人交换站，并成为欧洲小有名气的“文坛代理人”。培尔的刊物取名《文坛》，绝不是空洞之词。在17世纪稍后的年代，由于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法国吸引了一批文人学者到那里去定居，使这个词又获得了新的含义。首先，为了替首都和宫廷争光，路易十四有意识地采取了种种有力地吸引外国学者到巴黎定居的措施。他的这一政策在科技界获得了巨大成功。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天文学家卡西尼被争取过来定居在巴黎；莱布尼兹本人在巴黎住了3年，只是因为宗教方面的顾虑才没有接受一个永久性的任职。路易的这种办法无疑使巴黎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欧洲智力中心。伦敦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皇家学会的声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知名的外国来访者被吸收为它的会员。法国采取的第二个政策性行动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推进了知识世界主义。废除南特敕令在欧洲新教国家各大城市造成一批又一批欧洲胡格诺派教徒流亡者（其中牧师占很大比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迫以教书和写作维持生计。不仅新教国家因此与法国语言文化发生了新的更直接的联系，在流亡者集中的地方，他们通过写作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中的神学活力（如果不用更粗俗的词汇），同时又设法使有法语阅读能力的人了解他们在侨居国发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这里仅举一例为证：洛克的《教育漫话》（1693年）和《人类理解力论》（1690年）以及牛顿的《光学》就是这样介绍给法语读者的。这几本书经皮埃尔·科斯特翻译分别于1695年、1700年和1720年出版。1717年出版的《英国图书馆》是首先专门向一个国家介绍另一个国家文化生活的刊物，是在英国流亡的一个名叫米歇尔·德·拉·罗奇的

胡格诺派教徒主办的。这些人之中，虽然只有培尔一人在文化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脚印，但也正是因为有与之一起过流亡生活、名声略逊于他的同伴们的共同努力，才能给予18世纪后期那样声势浩大的知识世界主义运动有力的推动。

知识世界主义运动能否实际获得成功取决于有无足够的自由出版和广泛发行书籍的组织工作。这一时期的荷兰出版业大体上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这个国家的出版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免受官方审查的自由，由于它处在欧洲交通的中心位置，与北欧的接触比较容易；而且尽管法国政府极力反对，看来荷兰出版界一直同这个国家秘密地保持着非法翻印图书的贸易，甚至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种秘密贸易也没有完全绝迹。因此，1699年出现以下的情形似乎不足为怪：英国的出版业限于伦敦和牛津，法国限于巴黎和里昂，德意志限于莱比锡，而荷兰出版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却至少有五个——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莱顿及乌得勒支，仅阿姆斯特丹^[9]一地的印刷厂和书商就有400家之多。这样，那些力争更加广泛而自由地传播自己思想的新文化队伍就有了具备良好条件足以满足其需要的城市。

大约1650年以后在法国确立的文学规范至17世纪80年代已成了公认的正统规范。体现这些规范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布瓦洛的《诗的艺术》（1674年，W.索姆斯爵士的英译本1683年出版），虽说是一部为作者赢得“文坛立法者”称号的传奇文学（布瓦洛晚年曾鼓励写传奇文学），本质上也只是重新概括了那些早已为人们接受的观点，而不是一部新的宣言书。知识世界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发展稍晚一些，但两国有着共同的起点——两者都尊重古典主义的成就，创作方法上都追求内容明晰、条理清楚——因此，英国很自然地会接受已在法国形成的基本态度，恭恭敬敬地学习诸如拉潘、布瓦洛以及布瓦尔等人的作品。然而，重要的是，古典主义在两国确立的这个时期也正是文学伦理学家的全盛时代。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群众在某些方面品味古典主义全部价值的能力要差一些，人们常常不大愿意放弃旧习惯或把自己的乐趣仅仅局限于评论家赞成的东西。莫里哀本人曾同那些自诩为行家、希望观众按规范欣赏他的戏剧，甚至“按规范发笑”的人进行过激烈的较量，认为拉辛的悲剧的古朴文风受到了五光十色的机械布景和吕利^[10]歌剧的抗衡。在英国，班扬的作品几乎不能算是文学，和纳撒尼

尔·李的古典悲剧在同一时期问世；塞缪尔·巴特勒的荒诞离奇的《休迪布拉斯》于1678年成书，比德莱顿的《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的发表仅早三年。英国王政复辟以前，文学基本上是不注重规范的。正因为现存的文学传统有活力，接受古典规范受到的阻力要比法国大。在法国，《七星诗社》的诗在1680年以前鲜为人知，也未得到重视；在《熙德》（1637年）之前，没有一个戏剧在舞台上站得住脚。而在英国，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弥尔顿却一直是受重视的。尽管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之中有托马斯·赖默等目光较为短浅的平庸之辈加以诋毁（托马斯·赖默认为《奥赛罗》根本称不上悲剧，“只不过是淡而无味的流血闹剧”^[11]），古代作家的实践仍被看作古典主义正统的基础；前辈作家们虽不遵从规范，但其成就不容否定，实际上，这种成就似乎将成为衡量一批能与古代作家媲美的典范作家的标尺。因为上述情况，自然就会出现一种折中的观点。穆尔格拉夫的伯爵约翰·谢菲尔德规劝人们对莎士比亚和弗莱彻要“学其长，避其短”^[12]，可能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解决办法。其他人，首先是德莱顿，在他的《论戏剧诗》（1668年）里则认为，英国传统文学只要能从法国古典主义作品中学到润色文字和协调布局的本事，同样不失为民族天才的独创形式。德莱顿认为乔叟的诗常常不符合韵律，但仍把他看作英国诗坛的荷马^[13]。

如果法国文学界没有出现能“抗御这场大洪水，洪水也不得不与之就这样妥协的巨人”（德莱顿语），古典主义时期本身的成就也造成一个大体相同的难题。文学古典主义的基础也与文艺复兴的基础大体相仿，一直都是尊重昔日文化成就的。回顾起来，过去的文化成就好似远处的一座高峰，人类现在又在奋力地把它攀登。到了17世纪后期，法国有些人开始感到这个高度不但达到了，而且超过了。笛卡儿主义者已经在哲学上树立了榜样，要求进步的思想到处流传，不无皇家宣传机器支持的民族自信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法国文化特别是法国风格和法国艺术比任何古典作品更雅更美。既然至少从理论上讲艺术创作仍是模仿典范作品进行构思，以当代更完美的艺术作品取代较为粗糙的古典作品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正是这种思潮及其在传统思想较重的人中间引起的对立情绪构成了这一时期英法两国文学上最有名的“古今之争”。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说及争论的详细情况，况且争论也没有得出最后结论。但争论涉及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因为这些问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古典主义观点的根本特征，也揭示了古典主义内部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一旦被揭露，可能成为古典主义创作成就开始衰败的因素，这一点现在看来是很清楚的。

在某些方面，尊重古典文学在某些方面同学术界尊重哲学和神学中的权威是并行的一条原则，因此无疑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一些力量。在理性主义时代，尊重古典主义文学本身被广泛地认为是符合理性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古典名著之所以有权威，其基础终归在于人们能从理性角度欣赏这些作品的精湛艺术。评论家的作用自然是从这些名著中去总结出普遍适用的、作家必须忠实地遵守的“规范”。因此，“理性”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它促成了法国和英国文学作品清晰、协调、简朴的崭新风格。然而，理性在其他方面仍是个模糊的概念，常常无异于普通常识。在美学问题中，普通常识又不过是普通的偏见。这样，仅仅当代趣味就成为普遍通用的标准，由于趣味“符合理性”，它也就成了必须遵守的东西了。比如，对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采取不作历史分析和不运用想象的态度，现代人就很容易认为他们的作品粗糙、没有计划，处处是荒诞不经的情节，特别是那些出现神灵干涉人事的地方。但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产生于17世纪理性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的东西，即喜好假设和抽象，热衷于所谓“人”、“理性”以及“高雅的情趣”，似乎这些东西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近似数学定义那样一成不变的概念。蒲柏在他的《批评论》（1711年）一文中痛惜地提到某些评论家的忘恩负义时这样写道：他们从古代作家那里获得教益，竟然

反过手来，攻击诗人，

真乃是为他们的宗师者尤为他们所恨。[\[14\]](#)

但蒲柏本人也是不要古典的，同一首诗前面有一段就表明了他采取这种态度的思想脉络。经常指导他的必然是一项普遍的原则，他说这是“自然法则”。布瓦洛在《诗的艺术》这首诗里也有类似的一段，他把这普遍的原则说成是“理性”：

首先遵循自然法则，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自然的合理标准至今保持不变，

无误的自然法则之光，仍然神圣灿烂，

明亮永恒的光芒普照，

定会给予万物以生命、力量和美好，
同时有了源泉和目标，
也有了对艺术的检验。[\[15\]](#)

归根结底，这些观点反映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皆有合理布局这一根本的时代信念：异常或极端的（甚至人们不熟悉的）事物都是偏离正常轨道，因而是 unnatural、不合理的，应当避免或纠正。这可能是这一时期人们通常明显地偏爱喜剧，特别是讽刺喜剧的一个因素。古今之争产生的最不朽的作品是斯威夫特描写争论在英国引起反响的滑稽散文体英雄史诗《书的战争》（1704年）。它是一系列著名讽刺作品中的首篇，这批作品中以《格列佛游记》（1726年）成就最高。这个时期的最佳诗文，从德莱顿的《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年），到蒲柏的《夺发记》（1712—1714年），以及后来的《群愚史诗》（1728—1742年），写作动机都是讽刺性的。

因此，古典主义本身的一个矛盾是对古代文学的尊重和进步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对古代文学的尊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一直有这个传统，还有部分原因无疑（对许多人来说）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同情和理解；进步理性主义则企图将自身的知识规范强加于艺术和思想。另外还有古代文学与现代评论家的口味格格不入的问题。无论后者怎样喜欢将当代人的趣味说成是“自然”和“理性”，趣味这东西毕竟是历史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古典法国文学主要为贵族和城市上层即“宫廷和城市”[\[16\]](#)服务，其规范和理论反映这个阶层的人所崇尚的规范和理论。因此，以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为代表的古代不同文学流派的特性被发展成为一种文学等级概念就不足为奇了：史诗和悲剧属于最高等级，喜剧次之，颂歌、挽歌和稍差一点的诗再次之，最后一等是不属于贵族文学的散文体小说和粗俗滑稽剧。人们不欢迎将不同的文学形式不适当地捏合在一起的作品：这个世纪早些时候繁荣一时的悲喜剧就没能保留下来。莫里哀执拗地醉心于写滑稽剧，纯粹派评论家为之痛惜。[\[17\]](#)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文学等级这个概念，产生了认为贵族文学类型的作品描写的一切必须也都是高贵的事物的主张。平凡、琐碎、粗俗的东西应当摒弃，语言应适当优美些，格调必须高雅。结果，“贵族文风”也出来了，这些类型的古典作品都有“贵族文风”的特点，喜欢抽象和笼统的东西，有时过分明显地喜欢旁敲侧

击，因而常常使现代读者恼火，认为纯粹是装腔作势。产生这种“贵族文风”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想创造一种统一格调，确保各种流派保持适度的自身风格，使贵族文学保持优雅、别致，而这种温文尔雅只有在贵族阶层才能找到。低于贵族文学的流派可能觉得描写具体、平庸、粗俗的东西还是有用处的。《奥赛罗》里的手帕被赖默讥为荒唐可笑的东西，而在布瓦洛关于妇女的讽喻诗中倒被恰当地置于令人厌恶的地方：

等着吧，你俏丽的妇人，
秘密的情夫即将来临。
暮色中，你冠以华贵的圆帽，
在盥洗间把粉黛浓施；
手帕有四方，
却弄脏了那印着玫瑰和百合的一块；
便把它送去了洗衣房。^[18]

这种对于某种贵族意识中高雅概念的强调，是有教养的社会阶层意识到自身是基本上仍处于粗俗状态^[19]的社会中新近生长出来的社会上层的反映。古代文学过去总是受上流社会赞赏的，而现在几乎不符合其标准了。面临荷马式的粗犷俚俗的文风，质朴具体的用词，有人可能会认为法语里有“小牛”“母牛”这些词汇有伤大雅，而在希腊语里用这些词就无妨^[20]，因为这些词汇在已经死亡了的语言里不为人们熟知，拉辛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无疑，对古典作品缺乏拉辛那种鉴赏能力的人容易认为荷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少翻译工作者采取变通的办法，即用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语言对古代作品重新解释。但这样势必会引起专门欣赏古代作品的读者不快。本特利对蒲柏的译作《伊利亚特》作了合理的评价——“蒲柏先生，这是一首十分漂亮的诗，但你不能把它说成是荷马的作品。”^[21]

由于全部古典文学概念充满了强烈的理性思想，文学特别是文风才有可能取得可观的成就。无论想象力不够丰富的理论家们犯了什么样的学究式错误，但理性思想至少为文学界的后起之秀牢固地树立了具有真正价值的典范，尽管这种价值有时并不能被理解。尤为重要的是，理性思想鼓励人们根据清晰、质朴、严肃以及和谐这些标准苦心揣摩创作技巧的各种细节，这就导致了英国和法国的创作风格的革

命。理论家总以为成功的作品主要是遵循他们提倡的原则的结果。实际上，那个时代人们总是不大相信灵感，把想象看成欺骗^[22]，把创作热情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激情和神秘主义视为不符合理性的。^[23]布瓦洛在《诗歌艺术》的头20行里告诫有志气的诗人说没有灵感便不可能指望有所作为，而在这篇专题论文的其余部分中，他感到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的必要。当然，古典主义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如同其他任何时期的成就一样，本质上是独创，是个人天才的反映。但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性不适当地鼓励了缺乏创作灵感的简单衍生之作，肯定也是实情。以往的作家虽遵守规范，但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像拉辛的《菲德拉》那样的剧本和德莱顿的《押沙龙》那样的诗篇。但像艾迪生的悲剧《卡托》（1713年）这样的纯学术著作，当时也以其一丝不苟、审慎和严密的风格博得很多赞誉。后来，伏尔泰说《卡托》虽符合规范，但死板，缺乏“粗俗的”莎士比亚^[24]作品中某些章节的感情力量，这番评论令人困惑不解。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古典主义知识结构在某些方面同全部艺术的感情基础是不相容的，或者至少具有埋没这些感情基础的趋势。由于这一时期重要作家们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因为人们普遍接受具有想象力的文学之根本作用是让读者满意，打动读者的心这一观点，这个矛盾的潜在危害实际上有所减少。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所以要有一套规范，原先当然也正是要向诗人提出这项任务，这即是说，文学作品有无吸引力，最终不取决于理论家，而取决于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正如拉辛本人所说：“首要的标准是令读者满意并受到感染。”^[25]就读者自身而言，尽管其趣味这时已经受到古典主义潮流的深刻影响，他们对学究式的卖弄和学术争论已感到厌倦。实际上，读者既没有因此不读那些被自诩为行家的人们认为有缺陷的伟大作品，也没有不支持他们并不理解或者还没有引起注意的艺术形式——大场面剧、喜舞剧、滑稽剧及散文体小说。

这一时期，批判性的科学思想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乍看起来，以明晰、和谐、晓畅为特征的古典主义为这一思想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实际上，两股势力在某些方面势必会携手并进。这里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两者都强烈地意识到清楚准确地使用语言的价值。早在1664—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英语语言质量，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以便使语言能更好地为学会的工

作服务，其目的在于使讲话“严谨、明白、自然”^[26]。这个提法大概是为了强调科学的严肃性。但科学之严肃性所要求的这几个方面对拉罗什富科的散文亦并非全不适用，用于这一时期末孟德斯鸠的散文也恰如其分。但从根本上讲，新科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古典主义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凡在古典主义还保留着一些对古老典籍传统尊重的地方，批判的探求精神则必须摒弃一切不能充分论证的事实，并要求立论要站得住脚。古典主义倾向于对笼统的人性及其经常表现出来的各个侧面进行分析，置具体的东西于不顾，认为具体细节即便写得再好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最坏的则有伤风化。新经验主义则是一见到孤立的、有时属于明显的偶然现象就认为一定可以开始总结概括。因此，新科学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要把人们的思想重新引导到实在的具体的东西，准确地观察外部世界的各个侧面，对公认的信念和结论的事实基础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查。

当然，新科学运动的基础是科学本身刚刚树立起来、日益增长的威信。在法国，笛卡儿主义中符合科学的方面在1670年以前就已引起社会的注意。罗奥的《物理学》1671年出版。作为一个作家和教师，他和其他笛卡儿主义者如杜阿梅尔和雷吉斯的活动在巴黎和各省都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狂热，为莫里哀的讽喻诗《女博士》（1672年）提供了素材。从培根时期开始，英国科学思想一直强调进行实验。尽管科学笛卡儿主义的信徒的作品是以他的推理思想为基础的，实际上也越来越倾向于强调进行实验。各科学院从成立之初就大有进行实验的倾向。许多科学领域取得的革命性进展另有介绍（第2章）。当然，大部分的进展普通群众是无法知晓的，传到国外也很缓慢。那时的学术教材表明^[27]，对当时许多法国人来说，托勒密和哥白尼两种理论体系的争论还未得出结论。笛卡儿主义的威望把对牛顿理论的一般认识一直推迟到18世纪30年代。但科学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大众的新觉醒，提倡普及科学知识的作品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个情况。

有一种普及科学的方式是以宗教为主要动力的。当时，最有名望的人士当中有许多人认为，追求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是通过神的德行来了解神。这个世纪发现了支配自然现象，从理性角度可以理解的规律，这是十分重大的成就，上述认识从中汲取了新的力量。在前几个世纪，自然现象似乎被视为腐朽不堪、

已经塌下来的天体现象，而天体仅仅是超自然的而且主要是邪恶的势力手中的玩物。在一般人没有预想到科学和宗教之间可能存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新知识自然会被用来给予宗教真理以宝贵的支持：《诗篇》的作者宣称的“天赞美神”的口号看来又有了新的、令人信服的意义。因此，博物学家约翰·雷在其《神智》（1691年）一书中不仅用哥白尼的天文秩序论，还用他自己研究揭示出来的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秩序和目标证明神的存在。英国神学家兼科学家威廉·德勒姆出版了《物理神学论》（该书亦称作《从上帝创造世界诸事迹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属性》，1713年）和姊妹篇《天文神学论》（1715年）。这两本书曾多次重印。事实上，当时广为流传的文献——从阿贝·普卢契的《自然景象》到佩利的《物证论》，都说明上述观点在整个18世纪一直是受欢迎的。但在法国，最初普及科学的动力与其说是源于对神学的热情，不如说来自对于科学风靡一时的兴趣。当然，这种情况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28] 丰特奈尔的《关于世界多重性的谈话》（1686年，英译版，1702年）描写了一位哲学家同一位侯爵一系列生动的对话。哲学家与侯爵进行对话，是发人深省的。该书中对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有些有趣的假想，穿插着对当时已经发现的天文事实的清楚介绍（尽管有的细节并不准确^[29]）；该书运用当时流行的笛卡儿学说的核心理论对天体运动作了解释，通篇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传统的豪放风格，语言优雅通俗，符合一般追求时髦的读者的要求。

人民大众对科学家们正在揭示的有秩序的自然界现象愈来愈感兴趣。从长远的观点看，其影响比之我们已经触及的事实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尽管当代神学家在新知识里找到了有价值的护教论资料，但新知识毕竟会带来哲学上棘手的问题，而且于宗教大为不利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首先，人们对于自然宇宙的新理解使宗教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神秘性，甚至产生了一点对宗教的蔑视。人类似乎要从久远以来对自然力的莫名其妙的迷信恐怖中解放出来了。哈雷证实，古时候被人们视为末日来临恶兆的彗星，也像太阳与月亮一样，经常受运动法则的支配。笛卡儿主义哲学强调机械式因果关系，使整个宇宙看上去如同一台机器。虽然自然界奥秘很多，而且五光十色，丰特奈尔只把它比作一个歌剧场，观众可曾知道，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用绳索和滑轮操纵的^[30]；文雅一点说，自然界或者只是一只手表，人可以将整个宇宙握在手心。其次，从以上类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人类降

生以来，这个世界不仅不是腐朽不堪、杂乱无章（托马斯·伯内特的《地球神圣理论》还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被看成作为最高理性的神亲手创造的一个完美物。因此，自然神论者要向完全不需要基督教式的赎罪的自然宗教靠近一步是极为容易的。但罪恶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18世纪上半叶大量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证明了这一点。这批书当中，以莱布尼兹的《关于神政论的论文》（1710年）和另一本较通俗一点的书——蒲柏的《论人》（1733—1734年）影响最大。实际上，这种完全的推理、包罗万象的玄学和伦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哲学思想。17世纪从笛卡儿时期到莱布尼兹时期是系统玄学的黄金时代。但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开始感到这种先验论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众所周知的“自然哲学”已开始分化成现代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两类。牛顿论证地球引力法则时没有用哲学去解释其特征也就心安理得了；笛卡儿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引力是一种不可理解、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是一种带有中古味道的概念。对于这些反对的意见，牛顿仅以如下名言作了回答：“我没有假想。”^[31]洛克的《论人的理解能力》一书处处可以见到同样的不愿超越事实的思想和同样的对于纯假想的怀疑。洛克在书中坚持认为不存在“天生的”思想（笛卡儿主义者则认为有），人脑子里的任何想法是以意识感受为出发点的，感受以外的东西不可能真正为人所知。

对自然实在性的研究带来了知识大幅度扩展并开始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与此同时，史学领域也有类似的动向。文艺复兴时代的传统观念认为，编年学有两个作用：或者概略记述伟大人物活动中有启迪意义的逸事，目的主要在教育，风格浮华，其质量优劣主要以美学标准衡量；或者直截了当地为教派宗旨服务——以圣徒传记形式确定朝代，支持宗派观点，煽动宗教狂热。直到17世纪末，很多历史书还是按以上两种方法编写的，特别是一些教派史名著，如克拉伦登的《造反史》（1702—1704年）（一部对以往的失败进行核查的书，目的在于给未来的政府敲一敲警钟）和波舒哀的《新教教堂变迁史》（1668年）。历史研究中另一个更为典型的特征是从收集和核查遗留的实证资料中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不是因袭传统做法，依赖过去历史学家的著作所提供的资料，至多不过有限地、不加批判地利用早期的编年史。这种兴趣有时是以树立个人和家族的权力与特权为出发点的，莱布尼兹受其雇主选帝侯之托，对汉诺威王室浩繁的

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集体的努力首次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系统的原始资料，历史研究必然会因此得到改造。在英国，卡姆登和其他伊丽莎白时期的古物收藏家已经进行过探索，继达格代尔的《英格兰寺院》（1655—1673年）^[32]之后又出版了亨利·沃顿的编年史《神圣的英格兰》（1691—1695年），博德里安和哈里安收藏的中世纪原稿的重要编目工作是汉弗莱·沃利做的。托马斯·赖默的15卷本《历史传说》（1702—1713年）为研究英格兰外交关系打下了新基础——该书独具匠心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来源于莱布尼兹的同类作品《外交官守则》（1693年）。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圣·莫尔的贝内迪克特教区僧侣让·马比荣（1632—1707年）所著《外交问题》于1681年为外交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伯纳德·蒙福孔1708年出版的《古希腊》写成于1708年。与《圣徒行传》的编撰者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博兰德派那批学者不同，圣日耳曼戴布莱的莫尔会修士在撰写教会史时不只是局限于借鉴宗教史的一部名著。^[33]在意大利，L. A. 穆拉托里（1672—1750年）的浩繁劳动直到1723年才开花结果。^[34]

对范围越来越宽的史实的重视的初步结果是令人很不满意的。用批判的理性标准来衡量，事实不仅常常似乎要毁灭现有的历史信念，而且因为事实本身的相互矛盾使任何一种历史信念看上去都是危险的。怀疑论似乎成了研究过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培尔颇有影响的著作《历史与批判词典》（1697年，第2版，1702年）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培尔的本意只是想在这本书里纠正早些时候莫雷利的一本历史词典中的错误，但他系统地披露了欺骗、轻信和谬误。过去，人们信以为真地把欺骗、轻信、谬误视为构成人类知识的要素。为了纠正莫雷利的错误，他运用了与之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又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一番分析，这样便确立了评介这些史料的正确标准。然而，这样一来，他以为站得住脚，范围极小的历史事实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35]科学界和哲学界看来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牛顿或洛克那样严谨和谦逊的态度了。

对长期以来曾被认为是事实真相的东西进行审核，这一过程只要开了个头，势必会超出学者的专业兴趣。基督教本身是以史实为根据的。声名狼藉的斯宾诺莎在《神学和政治学论》中首开用批判的眼光对《圣经》加注的纪录，引起了普遍的恐慌。法国奥拉托利会神甫理

查德·西蒙接着写下了《旧约圣经批判史》（1678年）。1689—1693年间，又有人对《新约圣经》作了类似的研究。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这些动向为18世纪向基督教事实基础发起正面攻击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的社会和宗教环境尚不利于直接进行这样的理性挑战。^[36]但有些可以被看作宗教外壳的流行观念面临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不堪一击的。这里可以举出两个值得注意的法国例子：顽固的迷信观念认为出现彗星是神灵预告人类即将面临灾难。培尔的《关于彗星的想法种种》（1683年）是对这一观念的质疑。他所以写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因为1680年出现了一颗彗星。培尔毫不费力地证实，上述看法没有历史根据。但他陈述的道理还有更为广泛的含义。这里他不仅攻击了那种认为传统或“一致公认”的看法即为信念的站得住脚的根据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摧毁了所谓上帝直接干预人事、人为宇宙中心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丰特奈尔的《占卜史》（1687年）是根据一位荷兰学者^[37]的一部稍大一点的著作改编成书的，描写的也是由来已久的基督教迷信，这种迷信认为，尽管古代异教神使凶暴无比，本来也不是神，实际上是超自然的物，他们在耶稣降生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同样，这里只要对事实批判地进行分析，就足以说明上述迷信是毫无根据的。丰特奈尔认为，所谓异教神使只是一些狡猾的僧侣为欺骗社会上容易轻信的人故意制造的骗局。很明显，他这样解释是为了提请读者得出基督教徒也上当受骗的结论。由于他揭露了轻信古典的愚昧态度，这位“现代派”著名领袖又一次打击了古典的威信。

正当许多人潜心搜集并批判地分析科学、思想和学术史料的时候，梦幻文学也有了某些发展。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出现了对当时的世界及其外部形式的直观新认识的迹象。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戏剧恢复了活力，新喜剧的风格获得了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手段。新喜剧一方面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经常借鉴传统喜剧，特别是广泛借用法国戏剧的现成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注重表现当时伦敦的各个侧面，尽管有时带有很强的讽刺性，但基本上反映现实。新喜剧里的流氓、浪子、卖弄风情者、诡计多端的主妇、土里土气的乡绅，基本上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之后描绘出来的角色。他们不像莫里哀戏剧里的伟人，莫里哀是通过描写这些伟人以喜剧形式来表现一般人性的。早期提倡这种风格的作家的作品里，纯讽刺的成分表现最为强烈。威彻利的《乡下妻子》（1672年）不仅比后来大多数同类淫乱不

堪的戏剧还要露骨，这部作品之所以会出现，似乎是因为对当时的虚伪深恶痛绝，《正直人》（1674年）也是如此。无疑，在主角即为剧本赞助人的戏剧里表现这种感情的力量是不恰当的。一般来说，从这个世纪来写出此类优秀喜剧的作家比较文雅的作品中，如康格里夫的《以爱还爱》（1695年）、范布勒的《被激怒的妻子》（1697年）以及法夸尔的《忠贞不渝的夫妻》（1699年）中是找不到的。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对社会上的愚蠢和装模作样行为的讽刺基本上比较温和：喜剧重讥诮，年格里夫的感人至深的模拟剧作尤为突出。他的《世道常情》（1700年）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并体现它的精髓。

法国喜剧与莫里哀的作品仍很相近，喜剧艺术的非现实主义传统还有一些影响，但也已经可以看到描写当代生活的类似倾向。社会风俗喜剧在莫里哀自己的作品里尽管只占次要地位，但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其他喜剧作家偶尔也写一点关于现实生活的评论。这个时期虽然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琐事的时事喜剧，但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讽刺剧这一新剧种。上流社会愈来愈多的玩世不恭、富有者和寡廉鲜耻的暴发户日益向上流社会渗透，旧的社会障碍一碰到金钱的新威力便土崩瓦解，所有这些现象为戏剧创作提供了莫里哀不可能得到的喜剧素材来源。17世纪80年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在米歇尔·巴隆（《富有者》，1686年）和弗洛朗·当古（《风流骑士》，1687年）的喜剧里已有反映，J. F. 勤勒尼亚尔以此作背景改写了用剧中角色命名的喜剧《赌徒》（1696年）。尽管勒萨日的《杜卡雷》（1709年）并不比其他被人遗忘的作品高明，但可能仍不失为最为人熟知的这种现实主义新风俗喜剧。该剧无情地揭露了一个富有、粗暴、凶残的金融家以及从仆人到男爵夫人一帮企图利用他的寄生虫。

这种观察当代社会外部的现实主义新本领不只局限于戏剧。法国出现的最有意义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也许是散文体人物描写的发展。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沙龙社团喜欢以简洁深刻的笔调刻画人物作为一种集体消遣的形式，在文学上产生了反响。当时还出版了人物描写专集；小说也日益注重对具体人物的分析，已成为固定的格式。然而，在古典风格中，对具体人的兴趣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心理方面。外形的描写一般来说是肤浅的，在小说里，描写外形只是熟套手法，基本上与主人公个性无关。这种描写明显地被认为与主要写作意图无关。拉·布律耶尔的《品格论》（1688—1694年）则大不一样。

这部著作远不只是格言和人物描写的罗列堆砌。如同一位目光敏锐的道德家从特别有利的位置仔细观察到的一样，该书的副标题“本世纪习俗”正确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全貌。这部著作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栩栩如生，其外形和举止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物的性格。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吉滕红润的面容、肥胖的体形，然后才看到他的狂妄、傲慢，瞧不起别人，但别人还得对他毕恭毕敬；到了最后一句描写拉·布律耶尔才肯定了我们的判断：吉滕有钱。^[38]拉·布律耶尔在描写奥努伏雷^[39]时更为大胆，先从他的床写起。经过描写，这张床成了宗教虚伪的象征：床单是用粗灰哗叽布做的，显得朴素庄重，下面铺的全部是柔软的鸭毛和棉花。观察或想象到的实物能够用艺术手段再现出来，这至少可以说明有初步迹象表明对艺术和想象已经有了与古典用法完全不同的用法。

越来越注重写实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对以后小说创作的发展有重大意义。17世纪后期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和伪造回忆录，反映人们想真正看到一点过去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像克拉伦登这样的历史事件亲身参加者撰写的严肃综合史，到真正的名人回忆录如拉罗什富科（1662年）回忆录、德·雷斯（1717年）撰写的有关弗隆德一家的回忆录，以及虚构但据说富于真实性事件的记载如天才的多产作家库蒂尔茨·德·桑德拉的《M. 德·阿塔南回忆录》，因为培尔^[40]认为是严肃的历史文献，也因为后来为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提供了素材而出名，直到公开承认是虚构的历史小说，一线贯穿，等级分得很细。这时的历史小说很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拉·卡尔普雷内德和斯居代里式的传统长篇英雄小说。这类伪造的回忆录在英国似乎也挺受欢迎。1709年以后，为了不让读者上当受骗，《闲话报》感到很有必要使一切书商和翻译者铭记，法语的“回忆录”即是小说^[41]，只有英国的丹尼尔·笛福才是写这种回忆录的最高明的代表作家。笛福从未承认写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和《摩尔·弗兰德斯》（1722年）是真正的自传体作品，其他如《一个骑士的回忆录》（1702年）有时也被评论家们严肃地认为是自传体作品。笛福的伟大艺术创造是给人以真实感的写作手法，他精心积累了十分详尽的材料，而且十分真实。读者相信，这些素材只可能来源于记忆，不可能出于杜撰。他的记者经历无疑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是这个时期唯一从事实报道转向纯小说创作的作家。这个转变以及社

会上对回忆录和伪造传记的兴趣必将为散文体小说指明新方向。17世纪的所谓散文体史诗（即英雄小说）——有时也被看作没有戏剧性的滑稽剧（即反映下层生活的喜剧），开始作为再现观察到的活生生现实的主要手段，包括过去或现在的、亲眼所见或有过栩栩如生记载的人类经历。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1715—1735年）尽管主要还是反映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但在介绍历史人物和运用自传体创作形式方面已经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后来普雷沃、马里沃、斯摩莱特、菲尔丁和理查逊的作品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小说第一次开始形成现代小说的样子了。

尽管以新怀疑论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方与以正统和传统古典主义势力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但二者也有共同之处：其注意力和所采用的手法主要用来启发人的理性。大部分文学作品是为有文化的公众服务的，主要反映的是贵族的情趣和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在两个领域明显地开始出现反对上述事态的倾向，一个是在哲学领域，另一个从本质上讲是道德和社会领域。

17世纪中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霍布斯曾把物质世界看成纯机械、完全受自然力控制的被动的东西，这一观念摧毁了老一套思考方法的基础。中世纪的思考方法总喜欢赋予自然界精神意义，满足于处处看到符号和象征物。然而，这种观念亦产生了反作用。17世纪后半叶，一批企图调和新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家，即所谓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和自由神学家专门与霍布斯唯物主义唱对台戏，提倡一种新柏拉图宇宙观，即把物质世界看成是超自然现实的符号表现形式，恢复了物质世界的精神意义。这样一来，科学家们正在发现的自然界理性结构便成了神的头脑中的种种理性反映了，就可能用假设存在有机物的创造原则去解释那些用机械因果关系不能解释的现象。卡德沃思把有机物称作“可塑性生命”，归根结底，“可塑性生命”也是神物。即使当时的艺术家尚没有深刻的感受，这些观点仍产生了对艺术不利的影响。艺术家不仅给予符号无边的作用，恢复了艺术象征意义的活力，而且使把神看成乔装打扮的崇高诗人成为可能，通过其诗歌，造物主能把只有用符号才能表达的宇宙万物及自身的形态表现出来。同样，诗也成了真正的造物主，其作用主要不在于像艺术巧匠那样完美地从形式上模仿典型或自然，削足适履地用固定形式去处理材料，目的在于创造出类似自然美的象征意义的美。沙

夫茨伯里的《个性论》（1711年）是发挥这类观念最有影响的著作。在他眼里，真正的诗人“事实上是第二上帝，是朱庇特手下的正义的普罗米修斯”^[42]。人的最高作用是创造性地宣传道德的和形体的美，上帝仍是美的本源。^[43]美与善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受自然美的感染犹如受一件艺术作品的感染一样，即是领略到有序的和谐。艺术家的主观力量——神的主观力量——使无形的原始材料变成和谐有效的作品。因此，强调审美仍然是强调感情：尽管沙夫茨伯里不相信宗教存在的“热情”，但只要是来自对美的遐想，“热情”就是一种高尚的思想状况。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思想状况是受到神的鼓舞的结果（因此也绝不会与理性相悖）。沙夫茨伯里在《道德论者》一书中给至高无上的自然界诸物，甚至给最恐怖、最不受管束的东西都起了名字，这可能是普遍崇尚原始和未开化物的第一步。崇尚原始和未开化物后来成为典型的18世纪情调，对奥西恩的诗的欣赏、对“哥特式”作品的崇拜以及从山景中寻找乐趣，都说明了这一点。狄德罗后来说过：“想要又大又野又蛮的东西。”^[44]

大部分这类思想后来才发生影响，特别是在法国，当时知道沙夫茨伯里的人似乎很少。费奈隆（1651—1715年）的著作中有在艺术创作中更加放手运用灵感的类似主张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他是这一时期法国宗教界最敏感、最有威望的人物，曾经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熏陶。^[45]费奈隆与宗教界到处流行的神秘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在他的启迪性神学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1699年）里也有类似的反映。该小说无疑是一部抒情诗，它描写了诸如卡利普索岛的山洞La Bétique人^[46]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的生活情景。

这一时期的英国，由于出现了一批趣味新鲜、世界观大不一样的读者，对上述思想的反映较为直接而且强烈。随着中产阶级的财富增加和社会地位提高，读者中自然会产生新的有影响的成分，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学中也有所反映。清教乃至整个宗教在这些读者中的影响比在以往为文学欣赏定调子的宫廷读者中的影响大。因此，在他们当中出现一点反犬儒主义，比如反对王政复辟时期著名喜剧的犬儒主义倾向是预料之中的事。杰里米·科利尔的小册子《英国戏剧伤风败俗一瞥》（1698年）在舆论界有些反响，至少对剧作家是颇有影响的。戏剧应有教育意义并能激发感情的主张在科利·西伯的作品中早有反映。他的《爱情的最后手段》（1696年）结尾处描写

了一个浪子受到教育并改邪归正。法夸尔的一些剧作也是如此。道德喜剧和文明喜剧新流派主张有意识地提高格调，与王政复辟时期的文风决裂极有可能是斯蒂尔提出来的（《葬礼》1707年，《有良心的情人》1722年）。然而，宣传这些观点最有影响的媒介当推期刊论文。期刊论文是一种较新的宣传形式。由于斯蒂尔、艾迪生以及一些名望略低于他们的人共同主办了《闲话报》（1708—1711年）和《旁观者》（1711—1714年），这种形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里寓教育于其中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艾迪生在《旁观者》上发表的文章这样写道：“关于道德和人性的论述是我们可以用以提高思想获得自我真知的最佳手段，从而将我们的灵魂从自然地依附于它们的邪恶、无知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我一直在这张报纸上声明我自己是这些宏伟目标的倡导者。”^[47]这些期刊对当代生活的评论比较自由，生动活泼，有批判性，格调诙谐温和，力图寓思想于讥诮，又能以思想使诙谐得到进一步的锤炼^[48]，因而吸引了广泛的读者。这些期刊的作用不仅在社会上新的更广泛的阶层传播了温文尔雅的标准，使社会大众的品行文明化，而且也向文雅本身的概念注入了基督教道德。《旁观者》宣扬的罗杰·德·柯夫雷是一个理想、仁慈的乡绅，是改邪归正的典型，因为他在王政复辟时期是个青年浪子。^[49]

英国的戏剧创作强调社会道德和细腻的情感，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戏剧优雅风格的影响，而且后来到了18世纪它又反转来影响法国，但在此时的法国却没有真正与它类似的强调。戏剧甚至遭到一些法国人的反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波舒哀的《关于喜剧的格言和反省》（1694年）。这种攻击得到了为数不多的虔诚、严格的宗教界人士和贵族阶层的支持，但攻击的矛头并不指向舞台上道德观念薄弱或种种不得体的表现——因为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东西在法国早已绝迹——而是指向戏剧本身，认为戏剧在本质上会对观众从感情上产生有害影响。然而，这里可能存在新感伤主义的初步迹象，新感伤主义后来无疑成了所谓“人是富有感情的”、乐于行善的这一法国信条的一部分。当时出现了一种新鉴赏趣味，喜欢肤浅的、情节剧式的耸人听闻（归根结底，这种耸人听闻也是一种感情的东西），而不喜欢真正的悲剧。老克雷比荣（1675—1762年）的悲剧虽恪守古典传统，似乎也在迎合这种趣味。他的《阿特柔斯与堤厄斯特斯》（1707年）最后一场戏写了堤厄斯特斯差点儿要喝一杯亲生儿子的

血，而在《厄勒克特拉》（1708年）里又将这一古代传说加油添醋地加进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的色情瓜葛以及后者是否真正就是俄瑞斯忒斯的谜。拉·莫特-乌达尔1723年创作的著名悲剧《卡斯特罗的伊娜》最清楚地表明了法国趣味的发展动向。该剧有一个审判场面，当主角唐·佩德罗被判刑的时候，法官们痛哭流涕，戏里对唐·佩德罗作了富有同情心的谴责，当主角的父王看到佩德罗的子女（佩德罗与伊娜秘密结婚后生的孩子）的悲切场面时深受感动，原谅了他的反叛行为。这些作品不仅期望获得尼韦尔·德·拉·肖塞、马里沃和卢梭著作中感伤主义的真谛，而且也期望具有阿贝·普雷沃笔下不幸的主人公动不动就发泄的粗暴感情。

至此，我们已经叙述了西欧文化的发展情况。之所以说它是西欧文化，是因为不管这些发展有什么样的差异，毕竟都属于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人们普遍认识到欧洲人并非生活在地球上的唯一人种，世界更广大的地区可能还有很多不仅令人惊奇，而且令人感到是一种挑战的东西。航海业发达的欧洲与美洲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加之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的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成倍增长，不仅增加了人民大众对不熟悉地区的好奇心，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提供了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手段：本来就相当可观的游记文学又有了明显的增加，学术界对东方语言和文明史的研究也受到了刺激。

人们的注意力最主要地集中在研究东方穆斯林国家，其次是穆斯林以外的地区。伽桑狄哲学的传播者贝尼埃在莫卧儿帝国工作了一些年之后于1675年出版了透彻地介绍1660—1671年间的印度的书（该书1671年译成英语出版）。以后，塔韦尼埃和夏尔丹^[50]的叙述更加注重介绍在土耳其、印度特别是在波斯的旅行、贸易和日常生活的详细情况。他们二人在这些地区居住了很久。到比印度更远地区旅行的人极少，但1686—1687年间法国出版了两本介绍暹罗的书。^[51]人们对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褒贬不一，路易·勒孔泰的《中国现状新回忆录》（1696年）里所描绘的中国很多人都很熟悉，传教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1702年开始定期出版。这些有教益的新奇信件处处称道中国道德和中国政府，并将成为一个哲学信条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法国，孔子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被看成是启蒙运动的圣哲。至1705年，莱布尼兹很希望能同中国进行知识交流，这种交流其实比研究欧

洲古典更为有益。但杰梅利·卡雷里的《世界旅行记》（那不勒斯，1699—1700年）和彼得大帝派往中国的一个瑞典的新教工程师洛伦茨·兰格的《日记》（莱顿，1726年）中有资料说明后来的中国是一副暴政和背信弃义的形象。在广州做生意的商人对中国的印象与在北京的神甫报告的情况大相径庭。[\[52\]](#)

17世纪后期以前，广大群众心目中对美洲原始人类的印象早已形成。当时出版了新的旅行记文集，如坦克雷德·鲁宾逊爵士的《最近的几次远航和在南北美洲的新发现》（1694年）和奥恩沙姆兄弟以及约翰·丘吉尔主编的《航海和旅行文集》（1704年）。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游记作品，这些作品如果说有什么新颖之处，要么是因为持非正统的观点（如拉翁唐的带有强烈反宗教观点的《北美新航行》，1704年）[\[53\]](#)；要么是因为恢复了描写南海探险的魅力，像丹皮尔的《航海》（1687年等）、伍兹·罗杰斯的《1708—1711年的环球航行记述》（1712年）以及再早一点出版的更为著名的《美洲海盗》（167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679年译成德文，1681年译成西班牙文，1684年译成英文，1686年译成法文），该书的作者是A. O. 埃克斯奎梅林。

旅行者从遥远地区可能获得的资料的价值受到了科学界的赞赏。1665年或1666年1月的《哲学学报》上刊载了一些“远航海员指南”，英国皇家学会为了自身的目的并充实其“哲学资料库”[\[54\]](#)，提出搜集记录“有关的合适的”海外见闻。对近东地区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也引起了重视。比如，欧洲各主要大学对阿拉伯地区人文主义传统的研究因为有新的切实的需要得到了加强。在法国，为培养秘书和翻译，科尔贝尔率先采取措施在年轻人当中建立教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的常规制度，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一时期对该地区的历史研究就地理范围而论比较有限。当时因为有了像保罗·里考特爵士[\[55\]](#)作品那样广为人知的著作，这个世纪末一般的读者对土耳其的历史可以说相对地比较熟悉了。但大部分远方国家的历史还不得不留待10年或20年以后的欧洲历史学家去研究。一些东方文学被译成欧洲文字也反映了这些需要。1650年已经有了用欧洲各主要文字出版的《古兰经》，而且经常再版，一些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编年史也被翻译过来。东方童话故事是具有更直接的吸引力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出现在更多的读者中产生了东方文学热。1704年，法文版《天方夜谭》问

世，不久英译本也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大量的故事，其中有些真正是、有些被认为是从某一东方语言翻译过来的。东方故事的大量出现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伏尔泰、狄德罗的著作里面都有，更不用说英法混血血统的优秀作家贝克福特的作品《瓦赛克》了。这些读物之所以有吸引力，其直接的原因自然在于它本身的奇异色彩（它所反映的苏丹和闺秀、大官和太监这个圈子里人们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也在于它所反映的暴力以及它不受欧洲社会传统约束，还在于将魔毯和神怪与世事掺和在一起的幻想意境。这些特点正是正统和古典主义传统所不具备的。

前几十年间以游记文学反映东方世界的形式是一种梦幻文学。它之所以吃香，也清楚地表明欧洲人对其他大陆日益有所认识，反映航海本身的梦幻文学并非没有受到注意。正如虚构的回忆录是由真正的回忆录发展而来一样，虚构的游记也是真实游记的自然发展。至于回忆录文学，其地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1732年出版的勒萨日《德·博歇纳先生奇遇记》即是其中一例。这类体裁的欧洲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尽管一定程度上从游记文学和在航海中殉难的亚历山大·塞尔柯克（1711年与伍兹·罗杰斯船长[\[56\]](#)一同回国时，其探险经历在英国引起了很大注意）的实际经历中汲取了题材，但这部书本身无论如何是富于想象力的伟大创作。笛福在这部书里以其巨大的天才对现实作了细致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孤立无援、与大自然展开搏斗、不向孤独妥协的人。其他写航海的小说就没有借鉴那么多的人生经历。以往的乌托邦文学总是要描写到达乌托邦的旅行，不管写得多么虚无缥缈，游记文学的增加自然会赋予作家以新的表现手法。通过详细地描写航行经过和所去国家的地理位置，他们假想出来的国家容易被人们相信是真正存在的。正如福格纳的《南大陆为人所知的部分》一样，曾经多次重印的丹尼斯·维拉斯的*History of the sevarites or Sevarambi*（英文版，1675年；法文版，1677年）是以澳洲为背景撰写的。不管书中当地居民是怎样被臆造出来的，这部作品旨在验证澳洲即是塔斯曼已经确认的确存在的南部大陆。斯威夫特后来在1726年写《格列佛游记》，实际上运用的也是同一手法，不过用得比较马虎罢了。

从理性角度看，乌托邦文学的作用是鼓励批判地反映欧洲人的宗教、道德或政治情况，注重与写实游记对抗。旅行者关于差别甚大的

各种社会的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反映增加了这个时期欧洲人批判地认识自身、合理地审视一切传统概念的总倾向。正如天文学对地球是宇宙间唯一存在的星球的认识提出质疑一样，旅行者看到的实际情况必然会破坏欧洲人自认为其宗教和文化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信念。这个形势也为那些感到有必要采取某些手法对社会和道德进行讽刺的作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机会。当时也有从其他地区来欧洲旅行的，经过实际观察，他们对欧洲的基本看法在欧洲人本身看来很古怪。通过叙述从遥远的地区来欧洲的外国人眼中的欧洲情况，使作家们有机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欧洲。这方面的一部开创性作品是G. P. 马拉纳的《伟大君主的间谍》（1684年），它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艾迪生在《旁观者》^[57]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简单介绍这一文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批判地介绍了法国的情况，杂以对波斯闺阁生活的描绘，而且从塔韦尼埃和夏尔丹的游记所记述的东方习俗和由伊斯法罕启程的旅途记录大量汲取了素材。

在宗教领域，因为有了同外界的新联系，因为有机会听到不信基督教的人谈论欧洲人自己的信仰，那种认为基督教显然优越于其他宗教的欧洲传统观点被浇了一瓢凉水。本来可以向耶稣会传教士学习的中国当局曾经宣称基督教义是“没有根据、有害、荒谬的”，基督教习俗违背了“全部自然法则，破坏了友谊”，基督教奇迹只不过是骗局。^[58]然而，还有比这些直接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旅行者常常出于基督教良知介绍其他宗教，却被认为有进行颠覆活动之嫌。传教权术的祸害、毛拉、婆罗门、和尚以及巫医在容易上当的不信教的人身上施行的诡计是他们，特别是信仰新教的旅行者经常谈论的题目。看到这些做法恰恰使他们更加确信自己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看法是正确的。为异教所承认的奇迹常常受到严格的审查，这种做法从基督教角度看普遍认为是允许的。贝尼埃在介绍莫卧儿时代的印度时描述了托钵僧和瑜伽据说有超自然力量的技艺，但他非常慎重地坚持认为他自己未曾见过任何足以说明这些技艺不是骗术的东西。^[59]同样，正如发现纽约的红色印第安人神化和复活的传统，日本广泛流传着一个宗教教派的创始人是处女的产儿的信念，相信不只是天启教信徒才会永生的说法——所有这一切在虔诚的教徒看来可能是在不信教的人当中散布基督教真理中被弄得支离破碎的东西。但这一切对于那些勤于思考

的人来说必然是对所谓基督教是无与伦比的说法的不那么有利的解释。

在教义的具体问题上也出现了麻烦。很多未开化的种族不以赤身裸体为羞耻，妇女生孩子也不疼。这能被解释成否认原始罪孽的普遍性吗？或者，这些人种就不是亚当的后代？古代东方人——中国人、印度人、迦勒底人保存下来了与《旧约圣经》相矛盾、与《旧约圣经》编年史差异很大的人类历史记录，这又是怎么回事？问题的确是严重的，连牛顿都十分重视。牛顿去世之后，他的《古代王国编年史修订本》于1728年出版。

游记文学提出的神学问题对于放宽宗教正统对人的束缚显然是起了作用的。这些问题指明了走向自然神论的道路。18世纪许多作家把自然神论看成是所有宗教的最高的共同因素——存在于毫无用处的教条的脆弱外壳里的真理核心。这些问题也说明有必要实行宗教上的宽容，这一点正是18世纪思想家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欧洲人关于欧洲以外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的这种新的认识，不仅在教义上造成了麻烦，道德方面的麻烦也很突出。游记文学描写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残忍、霍屯督人野蛮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传说，确实有力地证明认为欧洲基督教必定比异教优越的广泛看法，但早期的发现也常常说到在未开化人种中有许多美德。到了17世纪末，读者对这种议论都习以为常了。典型的野蛮人，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形象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对敌对的外部部落充满仇恨，但对家里人和本部落的人则充满自发的仁慈和感情，他们性情温和、诚实，容易满足，没有欧洲人那样的妒忌、贪婪和野心勃勃^[60]等不能自拔的恶习。上述观点似乎证实了培尔和沙夫茨伯里认为的道德并非与天启教不可分开、普天下人类都具有天然的“道德感”的看法。他们的这些观点对启蒙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关于原始人类具有天然的美德的描述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不仅许多旅行者注意提醒人们这样的事实，即原始人类比所谓高贵的欧洲人更快活、更知足、更道德，人们还注意到同欧洲人接触往往使未开化人类退化。这样看来，存在于文明之中的恶和存在于简单生活之中的美之间的对比似乎很站得住脚。简单生活的美为人们所尊重，人们把它看成保留下来的相当于熟知的古罗马英雄和早期基督教圣哲的理想。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高尚的未开化人类”的崇拜会有所发展。

最后说说政治方面。对遥远地区国家的新的了解同样提出了欧洲人必须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理由。一方面，原始人因为明显地缺少政治制度，他们生活的地方似乎倒成了令人羡慕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榜样，那里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是为公的精神——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头几页关于类人猿的著名描写把这个理想具体化了。这种情形实际上形成了拉翁唐《新航行》最后一节“与阿达里奥的对话”中主张以革命暴力向法国宗教、政治和社会传统发起攻击的基础。另一方面，东方社会（中国除外）在一般人眼里是最可恶的贪得无厌、极端暴政的典型的同义语，那里残忍的恶霸以令人恐怖的手段统治着实际处于奴隶地位的可怜巴巴的人们。18世纪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两种极端所限制的范围内（二者在游记文学中均有记述）前进的。正如狄德罗的《布甘维尔航行记补篇》中说到原始社会据说有性自由而具有吸引力一样，卢梭在《议论》中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政治自由同样也具有吸引力，但书中表现出来对专制主义的痛恨有将欧洲国家的君主同东方暴君相提并论的某种倾向。政治讽喻家喜欢广泛运用外国背景，因为他们需要为攻击找适当的掩护。这里早有《波斯人信札》的先例。孟德斯鸠以描写东方暴政为契机，向人们暗示他已感到他那个时代法国君主固有的独裁倾向对法国的危险。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到处都有新思想在跃动，新思想同比较传统的观念发生了许多矛盾。现在，对遥远地区国家的了解的增加又是一种新促进。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欧洲人不仅走向新的、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也获得了新的批判地看待自身的眼光、获得分析事实，比较并理解过去认为永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实际只是暂时和局部现象的新的能力的时期。

2. 音乐，1661—1752年

18世纪末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历史循环论的兴起，其成果之一是产生了第一批伟大的音乐史作品。在取得这些初步成果以后，再次出现相应广泛内容的作品则是比较晚的事了。因此，直到距离现在较近的时期，人们才有可能正确地了解路易十四时期音乐的概况。在这种情况下，查尔斯·伯尼和约翰·霍金斯的作品内容异常广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品就显得更为出色了。特别是伯尼，他能完成自己规定的叙述从古希腊直至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整个历史的任务，令人叹为观止。然而，19世纪他那些优秀的接班人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虽然F. J. 费迪收藏的古代作品很全面，A. W. 安布罗斯亦有独到的见解，可惜这些从未被用以分析17世纪和18世纪的历史。像同辈浪漫主义艺术家一样，这些学者过分沉醉于研究较为久远的过去。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现代研究手段，伯尼的著作叙述18世纪过多，忽视了对以前各历史时期的介绍。人们不能完全责怪他热衷于研究汉德尔，因为缺乏有关早期作曲家吕利和斯卡拉蒂等人的资料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就作相应的考虑。直到20世纪初，亨利·哈多主编的《牛津音乐史》^[61]出版，才算有了一部内容广度可与伯尼著作相比的书。此时，撰写综合史的任务再也不是由个人单独完成，而是将历史不同时期各章节分给有关专家写。承担牛津大学一部多卷本历史书中有关17世纪的一卷撰写任务的是休伯特·帕里爵士。同伯尼一样，他既有求知欲望，又懂得大量资料中潜在的相对价值，真是难能可贵。然而，帕里没有比伯尼更多的有关路易十四、查理二世以及安妮女王时期宫廷音乐生活的现成资料。那时的音乐也不是他们的同代人欣赏范围内的东西。但他们两人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作品不仅被列入图书目录，而且成了人们讨论和评价的对象。书中的观点有些偏向也是自然的。路易十四宠爱的作曲家，那个“法国化了的托斯卡纳人”，在欧洲乐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吕利，以及查理二世时期法国化了的英国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去掉偏向的成分，在伯尼和帕里的著作里都可以看到意大利重在声乐部分的歌剧同法国用乐队演奏的歌剧之间、帕莱斯特里纳的对位风格、吕利和斯卡拉蒂的数字低音同海登的旋律风格之间的名副其实的对比，因为这些作品

都再次被命名为“经典”。这些对比揭示了一些时期音乐特有的基本特点，例如，吕利、柯雷里、珀塞尔的作品通篇是数字低音，胡戈·里曼的《音乐史手册》（1901—1913年）的有关卷的标题是“数字低音时代，1600—1700年”，在用这个标题时他是给了他们的作品应有的重视的。这个标题如果没有别的意思，也是好坏意思兼而有之。值得称道的是，他把明显属于音乐风格的部分单列叙述，不像帕里《17世纪的音乐》那种编年史式的标题。因此，为了强调一种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数字低音”这个提法尽管在史学的演变过程中尚处于试验阶段，但这无疑是个必要的阶段。

里曼和帕里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间，历史学家越来越成功地力图打破音乐的纯技术范围，而把它作为一部分归入文化和文化史。20世纪中叶已有三部重要的音乐史书。第一部是1929年出版的罗伯特·哈斯的《巴洛克音乐》，这本书是恩斯特·比克主编的10卷本《音乐科学手册》（波茨坦，1928—1934年）中的一卷。如同全书各卷一样，这一卷的一个新颖之处是作者承认了专业音乐史学家，承认了欧洲人的思想是以迂回的方式在政治和文化史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总的认识来源于狄尔泰等人。他们深信不疑、颇为具体地用它来弄清了音乐史的来龙去脉。人们用“内容广泛”“充实”“富于戏剧特征”等字眼来形容17世纪的作品。有人曾试图估计这些特征能同样适用于文字和观赏艺术的程度。他们特别注重将这些特征应用于观赏艺术，17世纪有关歌剧和音乐会的描述就是证明。此外，通过编辑蒙特凡尔第和格律克的作品，哈斯发现歌剧在路易十四时期处于令人瞩目的中心地位。经过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和艺术大事的一番调查，他决定借用“巴洛克”这个词来形容17世纪和18世纪头几十年音乐的特征。“巴洛克”这个词非常令人信服，后来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学者都沿用了这个词。“巴洛克”被19世纪著名文化史学家伯克哈特看成一个坏字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有，罗伯特·哈斯撰写的有关巴洛克的另外一章被收进了吉多·阿德勒编辑的修订本《音乐史手册》（柏林，1930年）。这部书篇幅不那么大，插图按文化史的一般概念安排。在这本书里，阿德勒比以往更突出音乐风格的演变。还有，美国诺顿出版社1940年组织编写了一套音乐史书，其中有曼弗雷德·布科夫策尔的《巴洛克时代的音乐》（1947年）。从总体看，这套书^[62]标志着恢复了写文化史的主张，而进行技巧分析的篇幅不大。因此，布科夫策尔绝没有把论述范围局限于升降音的讨论。他认为，“自古以

来，音乐并不比其他艺术落后，巴洛克音乐的主要倾向与巴洛克艺术和文学的主要倾向是一致的……”他没有忘记马萨林的意大利风格和科尔贝尔的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法国歌剧的风格，甚至最终会决定它的命运。他不仅细致地探讨了音乐和观赏艺术^[63]相似的创作程序，还探讨了贵族、牧师给予音乐和观赏艺术赞助所产生的影响。

19世纪的趣味和吕利、珀塞尔以及汉德尔时代的趣味的差别是纯音乐不断形成对标题音乐压倒优势的结果。纯音乐以发音手段而不以多余的音乐联想打动人。比如，同纯音乐美和感情享受相反，弗朗索瓦·库普兰（1668—1733年）及法国的羽管键琴家们朴素的描谱似乎是对深厚、神圣的音乐表现力的随意玷污。音乐风格和音乐情趣似乎比文学和绘图趣味更易受社会风尚潮流的影响。再说，音乐这种节奏艺术有个缺陷，它的乐谱只有少数人看得懂，因此很大程度上靠现场演奏发挥。过去，这种演奏数量必定有限，而且通常费用高昂。卡瓦利、斯卡拉蒂、珀塞尔以及汉德尔创作的舞台音乐即是最明显的例子。只是有了录音设备以后，人们才有大量听音乐的机会，因此，音乐史学家的发现受到更广泛的注意。除了这些因素，要想真正了解166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作为欧洲文化主角的作曲家，就必须联系当时的背景，特别是在这种背景会受群众趣味、大众音乐会的问世以及出版中心的活动的活动的影响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

路易十四时期，艺术仍依赖于赞助，但这种制度亦有它的弊端。世俗贵族和高级僧侣分摊着义务，因此艺术趣味也受他们的控制。当时流行的是既可供观赏也有节奏感的歌咏和舞蹈。路易十四喜欢的芭蕾舞和豪华场面很快成了一股国际热潮。固然，奏鸣曲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正在挤占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范围当中还相当时髦。但对一般的观众来说，奏鸣曲不过是令人乏味、用以代替独奏或合奏的乐器发出的“乱糟糟的声音”。丰特奈尔曾不耐烦地大声疾呼：“奏鸣曲，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也表达了广大听众的态度。德国的交响乐到18世纪末才在巴黎和欧洲获得了成功。

交响乐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大众音乐会上。事实上，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之间，交响乐这个新的娱乐形式逐步兴盛起来，使音乐创作和欣赏的许多方面焕然一新。英国是第一个举办大众音乐会的国家。先前为国王演奏的小提琴手约翰·班尼斯特1672年在怀特弗里亚斯剧院发起举办了一系列的音乐会；煤炭商人汤姆斯·布里顿

1678年在克拉肯韦尔也办了一连串的音乐会。人们常说，参加这些音乐会演奏的人来自中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由老班尼斯特发起的第一个音乐会显得很寒酸，他倒是个很好的提琴手和戏剧作曲家。他在一家酒馆开辟了一个很不起眼的房间，放上些桌椅……”^[64]尽管大部分的听众仍然是贵族，音乐会不只是被邀请的人能参加，所有购买门票的人都可参加，这样的音乐会是近代音乐会生活的先声。很多这样的音乐会是在大城市举办的，还有一些是在大学城举办的，如：牛津谢尔多尼安剧场音乐厅（1713年由佩普奇主办）、牛津霍利韦尔音乐厅（1748年威廉·海斯主办）^[65]。无论在牛津还是在伦敦，汉德尔的作品总是占据突出地位。但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威信并不足以对英国音乐会产生像巴黎“圣乐会”那样深远的影响。“圣乐会”音乐季始于1725年，一直延续到1791年。举办音乐季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四旬斋节期间枯燥无味的气氛，因为斋旬期剧院是不能上演歌剧的。实际上，18世纪中叶的许多所谓音乐会如同汉德尔的清唱剧一样，大体就是歌剧的替身。因此，第一批大众音乐会^[66]尽管尚未达到与贵族习惯和趣味决裂的程度（美国和法国革命才预示这种决裂）^[67]，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已经具备新听众和新节目的基础。

同样，这一时期传统音乐的印刷和出版情况与进步音乐的印刷和出版情况大体相当。这并不是因为已经不存在发行手抄本的方式，而是因为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如果要使音乐在国外发生显著影响，乐谱必须是印刷品才行。巴黎和伦敦成为18世纪乐谱出版中心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废除了南特敕令，阿姆斯特丹进一步成了有影响的音乐印刷品供应站。印刷业和出版商的积极性得以保持，不仅有利于出版柯雷里和维瓦尔迪的协奏曲和三重奏鸣曲，也有利于很久以后出版海登和莫扎特的作品。这里仅举出版协奏曲这一新品种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没有新的印刷术，没有荷兰出版的音乐，特别是埃斯廷·罗杰出版的版本，协奏曲这个新品种就不可能在18世纪早期闻名全欧洲。音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还不在于技术。阿姆斯特丹这时已经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那里的人们表现出了高度的音乐鉴别力。另一方面，J. G. I. 布赖特科普夫1755年进行了乐谱制版的重大改革，促使莱比锡终于成了音乐出版业的国际首府。^[68]巴赫在1718—1721年期间的作品《勃兰登堡协奏曲》从反面证实了协奏曲对于传播音乐作品的重大意义。该协奏曲的第五乐章常常被称为是第一部现代钢琴协奏

曲，而且被错误地誉为后来作曲家的楷模。但没有事实可以证明海登、莫扎特或贝多芬了解其中的任何一章，也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些乐章在德国以外的任何大城市演奏过，《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印刷品直到1850年才出现。

17世纪后期，巴黎仍旧是音乐世界的王后。在法国宫廷演奏的壮观场面使欧洲人着了迷，这种情形在路易十四登基后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路易十四的“太阳国王”这个称号实际上来源于1653年演奏的著名《夜舞曲》，这位君主和年轻的作曲家詹巴蒂斯塔·吕利都观看了这次演奏。吕利为丰富巴黎和凡尔赛的文艺生活所作的贡献在戏剧和音乐史上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吕利1632年出生在佛罗伦萨，14岁到巴黎。1653—1657年间，他为邦塞拉德的几个芭蕾舞剧谱了曲，其中之一就是《夜间芭蕾》。更为重要的是他与莫里哀的合作，包括《巴尔赛宫即兴》（1663年）、《贵人迷》（1670年）和《埃斯卡巴格纳斯伯爵夫人》（1671年）。尽管吕利自1661年以来一直是国王的乐长，他取得最高的成就还是后来的事。1672年，他买断了皮埃尔·佩林1669年^[69]从国王那里得到的皇家音乐学院“特权”。这个历经沧桑的音乐学院现在仍在巴黎，叫歌剧院。吕利的抒情悲剧，从1673年4月的《卡德摩斯与赫尔弥俄涅》，到他死后在1687年11月发表的《阿基里与波利希尼》将在这里产生。吕利风格经佩尔姆·汉弗莱（1647—1674年）传到英国，由格奥尔格·穆法特（1645—1704年）带到德国南部地区，约翰·S.库塞（1670—1727年）把它传到了德国北部。1693年，西班牙宫廷演出的第一个歌剧是他的《阿尔密达》。

无论取材于《圣经》还是古人的歌剧，吕利总是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进行一番重新加工。拉辛在确立这种时代精神倾向中的影响的重要作用几乎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歌词作者对他的作品总得加以仔细的研究。事实上，吕利的歌词作者基诺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把拉辛的悲剧改写成非常适合音乐创作的形式。戏剧作为公共娱乐形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戏剧的演出必定需要新乐曲的伴奏。吕利决定全力以赴每年创作供皇家音乐学院上演的抒情悲剧时摆脱了莫里哀的创作轨道而倒向了拉辛。从1673年开始直至1687年去世，他每年创作一部抒情悲剧。新的音乐和音乐风格很快便越过了英吉利海峡。1674年，查理二世在宫廷观看了歌剧《阿里阿尼》（或称《巴克斯的婚礼》）。该剧由1666—1674年间任国王乐长的路易·格拉布作曲，皮埃尔·佩林填词。短命的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演出的首场歌剧即

是这个本子。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是仿照巴黎皇家音乐学院建立起来的，地址在克里斯托弗·雷恩的特鲁里街大剧院内。《阿里阿尼》有个法文本子。十多年之后我们才听说有一个有连贯音乐的英文本子。德莱顿的《阿尔比恩和阿尔巴尼斯》由格拉布配乐，1685年在多尔塞特花园剧场上演，这是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英国歌剧的第一次公演。关于法国戏剧对剧作家和歌剧作家的吸引力，德莱顿的戏剧前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比如，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说拉辛将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从雅典送到巴黎，教他懂得性爱，将其改造成为……希波里特先生。^[70]为使希波里托斯法国化，就需要创造一个阿里希作为他寄托感情的对象——从歌剧角度看，这是神来之笔。拉莫的剧本作家佩利格林1733年将《费德尔》改编成歌剧并取名《希波里特与阿里希》时就充分运用了这个手法。这就是拉辛强加于希腊神话的格局。^[71]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汉德尔的清唱剧《以斯帖》（1732年）和《阿萨利》（1733年）同样取材于同一法国资料。汉德尔作为钱多斯公爵的教堂长老接替德国的佩普奇时，长老的地位更加高贵了。钱多斯圣歌是英语教区熟知的，但人们对汉德尔的假面剧《哈门与穆德赛》特别感兴趣。该剧1720年在公爵宫廷上演，是由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阿巴斯诺特从拉辛的《以斯帖》改编过来的。追根溯源，这个音乐伴奏的大场面剧还是来源于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尽管从现代欧洲意义来说《哈门》当属歌剧之列，但当时称假面剧还是对的。他们的宣叙调《耶和華加冕记》前奏曲（仿吕利风格）就是惊人之作，在犹太人合唱前，这部宣叙调又带有歌剧风格，在音乐史上占有真正的地位。该剧具有清唱剧特色，是为剧院而不是为教堂创作的。由于汉德尔天才的智慧和独具匠心的能力，该剧在英国取代了歌剧。汉德尔在伦敦创作的系列清唱剧由改编钱多斯假面剧入手。1732年在海马克特大剧院上演时有一个通知：“这是‘以斯帖的故事’，是一部英语清唱剧。该剧原系汉德尔先生所编，现在由他本人修改……”^[72]通知还说：“本剧无舞台表演，但剧场将为观众作适当的布置。”聪明的汉德尔懂得，大型音乐节目，即令不要相应的表演动作，也还是需要布景的。伯尼也说过，伦敦主教反对在舞台上表演神话故事。汉德尔的清唱剧是四旬斋期的一种娱乐形式。但从布景和包括受过阉割的著名歌唱家塞尼辛努在内的清唱演员来看，第一次上演的《以斯帖》的歌剧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711年，汉德尔在伦敦作为意大

利歌剧的作曲家就享有盛名。1713年，他为安妮女王作了《生日颂歌》，并为庆祝《乌得勒支和约》作了《赞美诗》，从而一举成了英国作曲家，珀塞尔的接班人。这两部作品都是为英国歌剧配的乐谱，其风格庄重，不追求时髦，为后来的创作指明了道路。乌得勒支《赞美诗》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演出使汉德尔风格事实上成为一种民族风格的开端。

吕利的作品独具特色，曾一度使作为欧洲国家唯一楷模的意大利歌剧黯然失色，由于其风格流传甚广，引起了人们对它的特点的探讨。意大利人的作品人所共知的缺点是它几乎全部依赖独唱。马萨林把他本国人的作品介绍到巴黎时，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这些缺点。从历史记载看，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加注重戏剧的发展趋向。一般情况下，他们更喜欢唱段和宣叙部、乐队和合唱人数平衡的作品。这方面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是珀塞尔在《犹多女王与伊涅亚斯》（1689年）中大量运用舞曲和合唱音乐，没有采用几乎全部运用唱段的手法。这既反映了巴黎的影响，也说明当地英国人喜爱合唱。法国风格之所以被吸收，除了应当考虑上述因素和法国宫廷的崇高的社会威望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人们十分钦佩吕利节奏音乐的豪放。所有伦敦的作曲家都“不遗余力地模仿巴普蒂斯特（吕利）风格……但歌曲总的趋势是更加重视舞步，而不是注重是否悦耳：前奏曲部分随意变化的跳跃是没有人听得出的，接着必须是舞曲……”^[73]莫里哀认为：“旋律即为简短的曲子，风格与其说像歌剧曲调，不如说更像圣诞颂歌和威尼斯叙事曲……越是缺乏艺术的音乐，越便于保留。”^[74]这里所说的圣诞颂歌与舞曲节奏是一致的。以上的一段精辟论断恰如其分地补充说明了当代许多人对法国音乐的评价。

吕利的组织能力同样令人折服。17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抒情悲剧之所以有那么大魅力，是因为他将舞曲同戏剧结构糅合在一起。蒙特凡尔第的学生卡瓦利（1602—1676年）的开拓性歌剧在巴黎上演时，由于法国人热爱舞曲，场间休息时必须插入吕利的舞曲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路易十四1660年结婚时演出卡瓦利的《赛尔斯》和1662年演出他的《恋人爱科尔》时都是这种情况。吕利是个天才，他利用好东西对人们的吸引力进一步对法国理性主义进行了锤炼。他本人和他的接班人科拉斯（他的秘书）、马兰·马雷、J. P. 拉莫的抒情悲剧大量运用了布景。1673年，莫里哀刚一去世，吕利就随剧团搬进皇宫，继

承了贾科莫·托雷利为上演路易吉·罗西的《奥菲欧》（1647年）造价很高的著名舞台机械装置。《奥菲欧》是专为法国首都创作的第一部意大利歌剧。尽管法国歌剧观众极想摆脱意大利音乐，他们对意大利舞台技术还是很欣赏的。1637年启用的欧洲第一家歌剧院威尼斯的圣·卡西阿诺歌剧院已经使用了活动布景。几年之后，贾科莫·托雷利（1608—1678年）创造了用绞车移动布景的方法，在1639年启用的威尼斯圣·乔凡尼和保罗大剧院里使用。移居或跟随事业心很强的作曲家来到巴黎的意大利舞台设计家们带来了神奇的招数，启发了所有欧洲艺术指导们的想象力。后来上演像韦伯的《自由射手》和威尔第的《阿依达》这样的作品时也应用了这个方法。这些革新和创造由托雷利介绍到巴黎后，经加斯帕雷·维加拉尼，最后由维加拉尼的儿子卡洛继续改进，使追求神奇风靡一时，这就触犯了一些法国人的美学观念，导致了禁止高价制作这样的布景。另一方面，拉布律耶尔则强烈地否认“机械装置是小孩子摆弄的玩意儿”。他批评精明的吕利向反意大利情绪让步，并批评为了省钱而减少这些舞台装置：

增加机械装置，丰富诗情画意，在观众中保持优美的遐想，这也是戏剧给人以享受的地方。机械装置还能给人神奇感。在演出《巴雷尼契》（科尔内耶和拉辛作）时无须楼梯、马车或换布景，但在演出歌剧时是必要的。[\[75\]](#)

歌剧基本上是意大利的艺术形式，尽管法国歌剧有很大影响，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自从佩里的《欧利第采》1600年在佛罗伦萨上演以后，意大利人从未长期丧失他们在提供这一新音乐形式的甘美流畅的样板作品中的领先地位。现在，除了作为歌剧范例的法国歌剧以外，又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意大利新星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1687年吕利去世时，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60—1725年）已活跃在那不勒斯地区大约三年：是他辅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吕利教会了欧洲作曲家如何谱写歌剧。由于他超群的音乐才能，直至18世纪的后半叶那不勒斯歌剧一直是首屈一指的楷模。法国歌剧事实上也从未被完全搁置起来：汉德尔的清唱剧和格律克的歌剧雄辩地证明了抒情歌剧的长期影响。老斯卡拉蒂（请不要把他与1685年出生在那不勒斯、赫赫有名的儿子多梅尼科混同起来）的艺术也没有完全与吕利派音乐决裂。很明显，吕利派音乐的两个特点依然存在，即扩大乐队并运用拉辛派的戏剧处理方法。

法国音乐的威望无疑与路易十四时期的大乐队（或称二十四把提琴乐队）有些关系。吕利建立了自己的乐队，称小乐队，最后他也掌握了大乐队。再也没有人鼓励演奏者随意添枝加叶地发挥了。经过严格训练，吕利将意大利音乐家表现力极强的风格和法国音乐的活泼节奏融会贯通。他能很好地运用欧洲最优秀的弦乐，有时颇有见地地运用著名的巴黎双簧管（还有其他管乐器），创造了利用乐队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没有乐队的丰富表现力，他的舞曲、吟诵调及咏叹调便会大为逊色。自然，这种用民族传统加以改进的乐器的演奏技巧在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均有人模仿。在意大利，由于乐队作用增加了，咏叹调的伴奏方法也有了变化。仅仅用拨弦钢琴（低八度低音乐谱线的弦乐低音）为声乐伴奏的老办法越来越少。斯卡拉蒂作为歌剧作曲家在其成长过程中影响了也反映了音乐的发展新趋势（下面的表说明了用拨弦钢琴和乐队伴奏的咏叹调的变化情况）。

	拨弦钢琴伴奏	乐队伴奏
卡瓦利：《雅松》（1649 年）	18	9
切斯蒂：《拉·多丽》（1611 年）	27	7
斯卡拉蒂：《斯塔蒂拉》（1690 年）	25	26
博诺奇尼：《卡米拉》（1696 年）	24	25
汉德尔：《阿格丽平娜》（1709 年）	9	31
斯卡拉蒂：《忒勒玛科》（1718 年）	0	41

斯卡拉蒂很大一部分最佳作品主要是不用古钢琴的弦乐。尽管他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弦乐，有时也能出色地运用法国号，如《忒勒玛科》就是这样处理的；有时为了赋予作品中迦太基人地方特色，他甚至“模仿野蛮民族在作品中加进风笛的呜呜噪音和吧嗒吧嗒的响板声音”，《阿蒂里奥·雷格多》（1719年）用的即是这个办法。在克雷莫纳的斯特拉迪瓦里，制作小提琴的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约1690年），由于当时的发展，弦乐技巧受到进一步的重视。柯雷里确立了优秀表演和作曲的新标准。柯雷里自1681年在罗马开始举办弦乐音乐会，直到1713年才结束，历时30年之久。

如果说科尔内耶和拉辛派剧作家以及后来的基诺和吕利的成就没有影响斯卡拉蒂的剧作或整个18世纪意大利歌剧，那是不可思议的。

把法国戏剧创作原则运用于歌剧创作，应当归功于威尼斯人阿波斯托洛·泽诺，是他为斯卡拉蒂提供了下面几个歌剧的脚本：《格林加尼·费里奇》（1699年）、《奥多阿尔多》（1700年）、《希皮奥内·内勒·斯帕格内》（1714年）以及《格里塞尔达》（1721年）。泽诺对塑造人物的手法以及音乐艺术创作要领的理解都十分精当。因此，他创作的故事情节不仅为18世纪作曲家（波尔波拉、卡尔达拉、汉德尔、哈塞、特拉埃塔、约梅利）甚至为下一个世纪作曲家（津加雷利的《贝雷尼契》，罗马，1811年）所运用。但无论是那不勒斯总督还是罗马红衣主教给予音乐事业的赞助都不能与路易十四给予的赞助相比。1718—1729年，泽诺依附于哈布斯堡宫廷，是查理六世的史学家和诗人。他退休回故里威尼斯时，被允许选择了彼德罗·梅泰斯泰西奥（1698—1782年）接替自己的职务。梅泰斯泰西奥是泽诺的追随者之一，他继续扩大了泽诺的歌剧改革。梅泰斯泰西奥的剧本由格律克、莫扎特、罗西尼和梅耶比尔谱写成音乐，因此，泽诺的影响便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诗人，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以及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规范对他均有影响。但他所以要对戏剧创作进行改革，主要还是因为崇拜拉辛。歌剧应集中表现英雄情感，如果法国古典主义同一性得到遵守，英雄情感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勾画出来。除最后一场习惯上有个欢乐的结尾外，作为大歌剧基调的悲剧被严格地保留下来，终场的欢乐结尾也只能自动让位于大权在握的宫廷——梅泰斯泰西奥有时甚至对上述传统不屑一顾，比如他的《迪多内》和《阿蒂利奥·雷戈洛》即是如此。喜剧成分被大刀阔斧地加以压缩：泽诺作品的喜剧成分一般在一幕戏的结尾处，梅泰斯泰西奥的作品中则全然没有喜剧成分。

泽诺削弱戏剧的喜剧成分看来是因为他与伏尔泰一样一贯持有一种偏见。偏见促使伏尔泰批评莎士比亚违背了古典主义同一性。然而，这位威尼斯人懂得音乐创作的需要。他确立了剧作家和作曲家的分工规则。他提出的这个折中办法支配了从斯卡拉蒂到莫扎特时期的歌剧音乐创作，剧情发展通过钢琴伴奏的快速吟诵调实现，用完全的咏叹调体现高潮和特别明显的情感（或反应）。戏剧的一个明显的要求是必须辅以大量必要的表演动作，因为宣叙调只有平板板的和声。当作曲家突破他们的规则框框时，泽诺和梅泰斯泰西奥便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过多地使用伴奏与声音并重的器乐宣叙调（或 *accompagnati*）势必会过多地使用全谱，戏剧的情节价值会受到影

响。然而，泽诺提倡的法国戏剧方向明显地表现为严格描绘人物并组织剧情，如果说作为其楷模的拉辛悲剧本身与18世纪的戏剧相比显得有些呆板，把话剧改编成歌剧必然会加大这种局限性。泽诺笔下高贵的主角，他塑造的受尽苦难的女主角——一句话，他塑造的人物，是机智的批评家们明显的嘲讽对象；他们不止一次向那不勒斯的喜剧作家提供过素材。当泽诺背离意大利三幕歌剧的传统写法，像拉辛和基诺那样编五幕歌剧时，其古典主义倾向是毋庸置疑的（《梅里德》，维也纳，1722年；《詹奎尔》，维也纳，1724年）。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写了100多部歌剧，大部分为那不勒斯所作。在那不勒斯王室服务，工作必须进行得很快，这就要求作曲敏捷流畅，以利一举成名。因为这些作品数量多，又受欢迎，这就产生了为18世纪歌剧树立一个样板的问题，因为斯卡拉蒂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快板—慢板—快板反复三段体咏叹调。毫无疑问，只有中间部分不同，后一部分返回第一部分的a—b—a格式的三段音乐是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但斯卡拉蒂将偶尔使用的形式改成了通常使用的典型形式。正是斯卡拉蒂的音乐形式——动人的旋律和明快的快—慢—快反复三段体和泽诺对各场结尾的文字处理（各场结尾时歌唱演员即离开舞台）相结合才取得了十分成功的舞台效果。事实上，这种音乐形式对18世纪的创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歌剧严重地削弱了话剧的声望。

17世纪90年代以前，斯卡拉蒂在那不勒斯引起的轰动国外已有所闻，其他国家的作曲家很快学会了模仿其动人心弦的旋律与和音。与那不勒斯宫廷对他的创作要求相反，斯卡拉蒂由威尼斯和罗马接受的任务给他提供了试验新技巧的机会^[76]，他的《米特里达特·欧帕特里》（威尼斯，1707年）受益于G. 弗里吉梅利卡·罗贝蒂（1653—1732年）的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又从泽诺的改革中得到了全部的好处：不用喜剧场面，甚至连爱情场面也没有，只在五幕剧中简单明白、按部就班地表现炽热的、感人至深的情感。斯卡拉蒂的最后几部作品是为在罗马演出而写的，包括《忒勒玛科》和《格里塞尔达》（1721年），后者是仿照泽诺的剧本写的。他的《格里塞尔达》把拉辛歌剧的优缺点都表现出来了。表现女主角长期含辛茹苦的忍耐和折磨她的恶棍的残忍的手法极端呆板，但正是这种对各种人物的理性处理，产生了女主角和恶棍之间强烈的对应音乐效果。^[77]他后来的作品

越来越倾向于间或运用合奏使连贯的咏叹调有些变化。比如，《格里塞尔达》就采用了三重奏和四重奏，泽诺的原稿没有这些。但正歌剧没有像比较幽默的喜歌剧那样为合奏提供发挥余地。斯卡拉蒂创作的唯一喜歌剧《依伦娜的胜利》（罗马，1718年）令莫扎特的《唐璜》情节黯然失色，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莫名其妙”的合奏成为后来作曲家模仿的典范。然而，喜歌剧的真正发展是在佩尔戈莱西的《管家女仆》（1733年）之后，因此也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78]

亨利·珀塞尔出生于1659年，比斯卡拉蒂仅早一年，他只活到36岁，但深受法国、意大利音乐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移植于本国传统音乐，即都铎时代的复调音乐和斯图亚特时期的假面剧。遗憾的是，英国音乐的荣誉与他本人一起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了。从某种欧洲意义来讲，他的祖国应该享有的地位直到埃尔加和沃恩·威廉斯成名之后才得到恢复。珀塞尔死前最后6年奋笔写下的歌剧《狄朵与埃涅阿斯》、小歌剧《迪奥克莱西恩》《阿瑟王》《仙后》和《暴风雨》在他活着的时候欧洲大陆尚不知晓。但究其天才，无论从戏剧还是从音乐角度看，这些作品堪与斯卡拉蒂的作品媲美；而从音乐角度看，这些作品令吕利的作品相形见绌。同一个世纪后的莫扎特一样，珀塞尔是历史的一位伟大学习者。当他潜心于创作1691年出版的《迪奥克莱西恩》乐谱时，他抱怨说，“音乐尚处于未成年的时期”，他认为使之成熟起来的办法是向意大利音乐这个最好的老师学习；再学习一点法国气魄，使之有些生气和风度。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德莱顿的，因为他代表珀塞尔给萨默塞特公爵写了效忠信，但感情是这位作曲家的感情。珀塞尔运用了最近的法国合奏乐和意大利咏叹调的长处。几年内，他似乎兼收并蓄了所有音乐流派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在室内乐方面，他从古老的幻想曲着手，发展到现代三重奏鸣曲；在教会音乐方面，由完整的无伴奏^[79]赞美歌发展到伴有独唱和管弦乐间奏^[80]的新颖独唱赞美诗。查理二世决心让他的24把提琴的乐队学习小乐队的气魄，并把它们放在教堂里，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然而，要看到珀塞尔和他代表的时代的最佳时期，还得回过头来看他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从为内厄姆·塔特的《狄朵与埃涅阿斯》设计布景（1680年），到为德莱顿的《阿瑟王》（1691年）和由沙德韦尔改写的《暴风雨》的场景设计（1695年），珀塞尔对戏剧的发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他为切尔西一所女子学校编写的《狄朵与埃涅阿斯》剧本演出时间仅需一小时。在这短短的一小时内，有欢快的法国舞曲，狄朵临死

前唱的一段有意大利式的升降半音^[81]，还有反复低音独树一帜的英国式处理。大量运用快—慢—快三段体咏叹调的《暴风雨》是一种较新的意大利风格。^[82]珀塞尔借鉴吕利的第一部抒情悲剧《卡德摩斯与赫尔弥俄涅》（1686年在伦敦上演）的前奏曲，为《暴风雨》创作了一组舞曲。莎士比亚采用对白的半歌剧的《暴风雨》和《仙后》（由《仲夏夜之梦》改编而来）在戏剧和音乐之间找到了时代正在求索的折中解决办法。英国杰出的公断家德莱顿在《阿尔比恩与阿尔巴尼厄斯》序言里把咏叹调和吟诵调作了区别。咏叹调的作用“为的是悦耳，并不是为了理解”。吟诵调里是有对白的。但具有普通常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真心接受过这种既有讲话又有声乐的混合物，即所谓吟诵调。

宫廷坚持采用意大利语歌剧决定了英国歌剧必然灭亡的命运。汉德尔被接回英国从事意大利歌剧创作。在《里纳尔多》（1711年）和《戴达米亚》（1741年）两剧上演之间的这段时间，汉德尔为伦敦创作了36部意大利歌剧。但他的风格让英国人感到太陌生了，纵然他有音乐天才，也不能使之兴旺起来。尽管吕利在法国是个外国人，他创作的悲剧是用法文写的。因为他在适应环境和组织能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天才使他从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时期一直肩负着创作法国民族歌剧的责任。然而，伦敦和维也纳却依赖于从意大利引进。这并不是说，从美学方面考虑用意大利语演唱意大利歌剧的主张可有可无。这个主张早在安妮女王时期就有能人提出来了，后来一直发展到成立格莱因德波恩公司，没有人把这个主张说得比伯尼博士更好了：

音乐是意大利的产品……进口它不比进口酒类、茶或遥远地区的任何其他产品不体面……意大利声乐只有用它自己的语言演唱听上去才完美……同样也有足够的理由希望意大利音乐用这种真正的意大利方式来演奏，正如爱画的人总喜欢看到拉斐尔的原作，而不喜欢复制品一样。^[83]

但历史事实证明，追求完美、缺乏群众基础的鉴赏家不是一支强有力的文化队伍。伦敦上演的汉德尔歌剧的情节是众所周知的，即作曲家与歌星之间、骗人的经理和破产之间的矛盾冲突。总体来看，这些剧情说明英国人对意大利歌剧的态度，他们认为意大利歌剧是“一种外来的、不合理性的娱乐方式”^[84]。汉德尔1720年创立的皇家音乐学院与其1674年的前身音乐学院一样，注定会发展到法国原型的成熟时期，又不得不在1728年关门歇业。同年上演的《乞丐的歌剧》（其

民歌曲调由C. J. 佩普奇写，对白由约翰·盖伊创作）十分成功地模仿了严肃、重大的外国作品。汉德尔自己的歌剧还不及有关这些歌剧的议论为人们所熟知，议论之一是这些歌剧缺乏他的清唱剧里的那些出色的合唱。诚然，他的意大利风格的咏叹调里有一些优美段落，但正如著名的徐缓调（原在汉德尔唯一喜歌剧《泽克斯》里用过）一样，它是脱离戏剧内容的一种美。在汉德尔气质最好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鄙视咏叹调作曲，创作了音乐量较大的复杂戏剧：《奥兰多》（1733年）的疯狂场面即为一例；而《阿尔奇纳》（1735年）中则运用了大量法国舞曲，与合唱混在一起。1732年上演的《以斯帖》号称清唱剧，是有布景的，它标志着作曲家将近10年的彷徨和转变的开始。汉德尔两边讨好，在歌剧和清唱剧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741年才不再如此，而为适应观众的要求潜心于清唱剧音乐创作。在以后的10年中，他写出了《弥赛亚》《萨姆森》《犹大·玛卡贝》和《叫夫他》等杰作，在这个世纪后来的时间里受到人们的崇敬。

18世纪30年代以前，三种纯器乐曲创作已在欧洲牢牢地扎下根来：吕利的法国前奏曲、斯卡拉蒂的意大利前奏曲和维瓦尔迪的协奏曲。这些器乐曲从歌剧衍生出来，又不受歌剧舞台的限制。吕利的前奏曲是一种混合物，它产生于多种原型，其中有些是法国原型，大量采用符点节奏；有些是意大利和法国混合型的，如他为弗雷斯科巴尔迪的《用法语演唱的歌》所写的那样的音乐杰作（1645年）即是一例；卡瓦利的威尼斯前奏曲则是纯意大利型的。吕利能把这些成分熔为一炉，显示了他的音乐才干；他幸运地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支持，并且因为路易十四的威望，他成功地创立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形式。对法国浮华音乐风格的逐步改造，从吕利的舞曲《泽尔士》（1660年）的前奏曲到海登伦敦交响乐缓慢序曲，其间还产生了珀塞尔的《狄朵》的前奏曲、汉德尔的《弥赛亚》的前奏曲和J. S. 巴赫的《仿法前奏曲》（1735年）。就技巧而论，前奏曲有其特殊之处，无论是应当十分注意慢速开始的符点节奏，还是慢速和快速部分的泛音的连接都有标记。作曲家熟悉这个格式，他们知道这是法国型的音乐。吕利去世10年以后，斯卡拉蒂创立了自己的前奏曲。虽然斯卡拉蒂的前奏曲从未完全取代老前奏曲，但这种意大利前奏曲最终更受欢迎。其主要特征是开始部分速度快，还有快—慢—快的三部形式。这些特征也反映在协奏曲里，大约在1710年，协奏曲发展成为一种中间部分慢的三部形式。协奏曲的前奏曲在庆祝歌剧诞生的时候就产生

了，而协奏曲，至少在其后来的阶段产生于歌剧演员和乐队（或与合唱，这种情况较少）之间的冲突：因此有人把贝多芬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运用独奏控制乐队与格卢克的《奥菲欧》^[85]里控制复仇女神相比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的基础则见诸更早的G. 托雷利的《协奏曲》（作品六号，1698年；作品八号，1709年）和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威尼斯人A. 维瓦尔迪（1675—1741年）的《协奏曲》（作品三号，阿姆斯特丹，1712—1713年）。这后一部作品的副标题叫《莱斯特罗·阿尔莫尼克》，它使维瓦尔迪名扬欧洲并确立了一种音乐形式。维瓦尔迪是这种新音乐品种的多产作曲家。A. 柯雷里（1653—1713年）的《大协奏曲》在时间和风格上都更早一些。尽管这些作品直到1714年才由A. 罗杰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但我们有穆法特提供的可靠证据说明柯雷里早在1682年^[86]就已在罗马排练过他的协奏曲。一般情况下，柯雷里用慢速起头，然后快慢调交替使用，这也是汉德尔喜欢的一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欧洲作曲家更喜欢开始用快速调，以加强活泼和节奏感。柯雷里曾经教给他的崇拜者意大利新提琴技术和乐队新知识，但还是斯卡拉蒂和维瓦尔迪的正规形式为欧洲协奏曲以及后来的交响乐定了型。

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竟然始终坚持独立于音乐的主流之外，唯一能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只能是他有意拒绝适应他那个时代的模式。如果约翰·瑟巴斯钦·巴赫（1685—1750年）愿意，他是可以写出一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的法国和英国组曲，并用管弦乐组曲和《兄弟分别随想曲》来迎合世人兴趣的。1717年，萨克森的选帝侯安排了一次法国高雅音乐和德国通奏低音音乐对抗赛，结果巴赫取得了胜利，真令人啼笑皆非。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演奏家的才能。不用说，这次比赛的结果在18世纪上半叶并没有损害法国式音乐在欧洲的声望。他的忠实的学生在为他撰写那份著名讣告时，乘机提了一下上述事件，将巴赫的法国对手的实用和优雅的艺术与他的流芳百世的纯音乐作了比较：

巴赫始终乐于承认，马尔尚的演奏优美利落，是值得称道的。据说马尔尚在巴黎出名主要是因为创作演奏了《圣诞节前夜风笛音乐》，但在鉴赏家面前与巴赫的赋格曲相比能否站得住脚，可以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听过他们演奏的人们来作结论。^[87]

创作风琴曲^[88]是巴赫的拿手好戏。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写出很多这样的作品。他生前完全没有想做任何有损欧洲乐坛的事。他住在一个边远地区，从未写过歌剧。他的同胞们认为他的作品风格古老，篇幅过长。著名的48个前奏曲和赋格直到19世纪才出版。创作圣乐和高雅的赋格曲是需要忍受暂时默默无闻，以求流芳百世的精神的。

要理解巴赫当时的态度，必须考虑他自己挑选出版的作品。J. G. 瓦尔特（作曲家的一个亲戚）编撰的音乐词典介绍巴赫的作品时提到的仅仅是他出版过的作品，似乎强调的是印刷技术方面的问题^[89]：

“其优秀的克拉维埃作品中，安诺1726年创作的降B大调组曲已经刻成印刷铜版……”70年以后，J. N. 福克尔在1802年出版的作为复兴巴赫艺术主要推动力^[90]的一本书中指出：“他的第一部作品问世时，他已经40多岁了。在这样成熟的年纪，他认为值得出版的作品当然自认为是不错的。”如果将《赋格曲艺术》算进去，巴赫在世时一共出版了8部作品。尽管《赋格曲艺术》在他去世以后才与读者见面，但作者本人曾指导了该书的印刷工作。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作品全是器乐曲。为什么巴赫没有决定出版宗教清唱剧和圣歌、《圣·马太受难曲》甚至《弥撒B小调》？部分原因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教会音乐绝少传到教会以外，作曲家任职的地方就在教会。既然巴赫同意出版一些风琴圣乐，也可能是因为这位固执的德国人预见到这一艺术未来会有发展，德国作曲家将在这方面独占鳌头。正如17世纪和18世纪歌剧鼎盛时期以前是弥撒和圣歌的光辉时代一样，海登的交响乐在巴黎和伦敦获得成功之后，音乐史就再也不是歌剧占突出地位的历史了。关于巴赫的宗教音乐创作，我们只需提一下他将当时的流行技巧如法国前奏曲和意大利从头重复的咏叹调移植到路德教圣餐音乐主体之上就够了。在其清唱剧和受难曲里，以上这些手法仍然只是辅助性的。但从广泛的意义来讲，他所采用的歌剧手法今天的人听起来可能比较模糊了。

巴赫作品一号的标题和内容都很时髦，1731年出版，书名为《钢琴曲集》（键盘乐练习曲），包括前奏曲、阿勒曼舞曲、库尔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吉格舞曲、小步舞曲以及其他组曲（即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组曲）。如果有人发现他的第二组曲以吕利风格的前奏曲起头并不奇怪。舞曲用法国名更说明是巴赫的作品。第二册的标题含义不言自明：《钢琴曲集第二部分，包括一部意大利风格的协奏曲和一部法国风格的前奏曲》。^[91]第三部分（1739年）总体上是圣乐，即

管乐赞美诗前奏曲。很明显，无论在巴黎、罗马、维也纳还是在德累斯顿，即使存在新教会音乐，几乎也不可能很流行。第四部分1742年出版，包括《戈尔德贝格变奏曲》。这种变奏曲虽说是优秀音乐，但因为太长，现在就不流行了。1747年，巴赫出版了《风格各异的六部赞美诗风琴曲》。这一部分也收进了赞美诗前奏曲，类同第三部分。不同之处在于6首赞美诗主要包括的是适合风琴独奏的声乐。同年，《音乐教程》一书问世，我们有理由推断，巴赫在室内乐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他自己成就的记录。

《赋格曲艺术》（1752年）一书中已经有了关于20世纪弦乐四重奏和其他合奏的乐队安排。我们猜想作曲家本人曾用风琴弹奏过赋格曲。但在1752—1756年间，这本书只售出了30册，足以说明18世纪人们的兴趣！为了弥补印刷费用，巴赫之子C. P. E. 巴赫在1758年不得不将该书的印制铜版当普通金属拍卖。巴赫的代表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在当时是禁书。这是他创作生涯结束时的作品，它既不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作品，也不适合任何时期轻狂、性急或爱挑剔的人们的兴趣。这使我们想起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分，有些段落虽不如其他段落感人，但写得出色的段落只要人们一读起来连神也会受感动的。

（李松林 译）

[1] 关于维科的情况，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94—95页。

[2] 参见本书原文第111页。

[3] 参见W·沃利奇的新译本《笨伯奇遇记》，1962年出版（伦敦，新英语图书馆）。

[4]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110—114页。

[5]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82—85、114—117、145—146页。

[6] 见本书原文第726页及以下各页。

[7] 见本书原文第42页。

[8] 让·勒·克莱克的《万国图书馆纪事》（1686—1693年）知名度稍逊，该书首次将约翰·洛克的名字载入，为其他书所不及。参见R. L. 科利为J. S. 布朗利和E. H. 霍斯曼合编的《英国与荷兰》（1960年）的有关部分。1687年以后，皮埃尔·培尔的书名屡次被他人盗用。参见本书原文第45—46页。

- [9] 参见H. J. 雷森克著《三家最古老的荷兰期刊中的英国和英国文学》。
- [10] 参见本书原文第106—110页。
- [11] 参见J. E. 斯平加恩编《17世纪评论集》（牛津出版社，3卷本，1908—1909页）第2卷中“悲剧短评”一章，第255页。
- [12] 参见斯平加恩编《诗评》，第2卷（1682年），第292页。
- [13] 参见《古代和现代寓言》序（1700年）。
- [14] 参见《批评论》第2章第一部分，第106—107页。
- [15] 参见《批评论》第2章第一部分，第68—73页。
- [16] 参见本书原文第341—342页。
- [17] 包括其崇拜者布瓦洛（《诗的艺术》第2章赞美诗三，第393—400页）。
- [18] 参见《讽喻诗》第二部分第10首，第196—200页。
- [19] 参见本书原文第94页。
- [20] “正如我们的语言没有令人难听的感觉一样，‘小牛’和‘母牛’这样粗俗的词汇在当时的希腊一点也不感到刺耳。”麦斯纳德编，拉辛译：《译荷马的作品〈奥德赛〉》第6卷，第163页。
- [21] S. 约翰逊：《英国诗人生平》第3卷（G. B. 希尔编，1905年），第213页注解2。
- [22] 马勒伯朗士：《诗的研究》（1674年）。
- [23] 沙夫茨伯里：《关于热情的一封信》（1708年）。
- [24] 《哲学通信》（1734年），第18封信。
- [25] 《贝朗尼塞》序言（1671年）。
- [26] T. 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1667年），第113页。
- [27] 培尔1675—1693年在色当和鹿特丹的讲稿《哲学体系》不偏不倚地阐述了两种理论。
- [28] 参见本书原文第46—47页。
- [29] 参见R. 沙克尔顿主编本的导言（牛津出版社1955年版）。
- [30] 丰特奈尔：《对话录》，第一夜对话。
- [31]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参见本书原文第49—50页。
- [32] 该书有相当一部分系罗杰·多兹沃思编。参见D. 道格拉斯编《英国学者，1660—1730年》（1951年修订版），第33—41页。
- [33] 参见《皇家历史学会会报》中M. D. 诺尔斯著《历史巨著》第一、二部分，第5套第8卷（1958年），第147—166页；第9卷（1959年），第169—187页。

[34] 参见本书原文第558—559页。

[35] 参见E. 拉布鲁斯著《皮埃尔·培尔之历史批判方法》[载《哲学国际评论》第11卷（1957年），第450—466页]及《培尔》一书（1965年）。

[36] 见本书第4章。

[37] A. 范·戴尔：《种族占卜》（1683年）。同期攻击迷信的还有另一位荷兰人巴尔塔扎尔·贝克的*De Betoverde Weerld*（1691年），见本书原文第123页。

[38] 《品格论》中“万贯家产”一章，第83页。

[39] 《品格论》中“风尚”一章，第24页。

[40] 《历史词典》，“路易十三”条，注解F、X、V、Z。

[41] 第84期（1709年10月22日）。

[42] 《个性论》第3卷，“对作者的忠告”，第1章第3节。

[43] 《个性论》第5卷，“道德论者”，第3章第2节。

[44] 《诗剧》（1758年）第18章。

[45] 参见J. L. 戈雷《费奈隆的历程》（1957年）。

[46] 参见J. L. 戈雷《费奈隆的历程》（1957年），第1、7卷。关于费奈隆对寂静教的兴趣，参见本书原文第147—149页。

[47] 《旁观者》第215期（1711年11月6日）。

[48] 《旁观者》第10期（1711年3月12日）。

[49] 《旁观者》第2期（1711年3月2日）。

[50] J. B. 塔韦尼埃：《六次远航土耳其、波斯及印度》（1676年第1版；英译版，1678年）；J. 夏尔丹：《旅行日志，波斯和东印度》（1686年第1版；英译版，1686年）。有关1688年去世的弗朗索瓦·贝尼埃的情况，参见本书原文第99页。

[51] G. 塔爱尔德：《佩雷斯·热苏的暹罗之行》（1686年，英译版，1688年；荷兰文译版，1687年）；E. T. 德·舒瓦齐：《1685、1686年暹罗旅行日志》（1687年）。

[52] 路易·德米格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的广州贸易，1719—1833年》（共4卷）第1卷，1964年，第22页及以下各页；参见巴兹尔·盖伊著《伏尔泰前后法国人印象中的中国》，日内瓦，1963年；参见本书原文第130页及第5卷第17章第1节。

[53] 有关拉翁唐的生平，参见他的《北美新旅行》，R. G. 思韦茨主编（共2卷）第1卷，芝加哥，1905年，第51—93页。

[54] 《哲学学报》第1版，第8期，第141页。

[55] 《奥斯曼帝国的现状》（1668年第1版，后再版多次：法译版，1670年；德译版，1694年；波兰语译版，1678年）；《1623—1677年土耳其帝国史》（1680年）。

[56] 参见本书原文第373页。

[57] 《旁观者》第50期（1711年4月27日）。

[58] F. 帕洛著《布道关系纲要》（1668年）和A. 格雷斯顿著《中国历史》（1671年）中G. 阿特金森引用的部分“17世纪航海关系和观念的演变”（1924年），第151—152页。

[59] 《历史……大莫卧儿王朝的情况》第3卷，“M. 爱普兰通信集”，第65—66页。

[60] 阿特金森从前书和R. W. 弗朗茨的《英国旅行者与思想动向》（内布拉斯加大学研究出版社1934年版，第32—33卷）中引用过不少材料。

[61] 伯尼：《音乐通史》（4卷，1776—1789年）；霍金斯：《科学通史与音乐实践》（4卷，1776年）；费迪：《音乐通史》（5卷，1869—1876年）；安布罗斯：《音乐史》（布雷斯劳，5卷，1862—1882年）；《牛津音乐史》（6卷，1901—1905年）。

[62] 这套书也包括C. 帕里什和J. 奥尔合著的《1750年以前的音乐》（1952年）、P. 兰的《西欧文化中的音乐》（1952年）、O. 斯特伦克的《音乐史资料来源》（1942年）。

[63] 参见布科夫策尔著《巴洛克音乐中的比喻》一文，原载《沃伯格学院学报》第3卷（1939—1940年），第1—21页。

[64] R. 诺斯：《音乐语法家》（H. 安德鲁斯编，1925年），第30页。

[65] J. H. 米：《欧洲早期的音乐厅》（1911年）；M. 蒂尔茅斯：《伦敦早期的一些音乐会……1670—1720年》，选自《皇家音乐协会》第84卷（1957—1958年），第13—26页。

[66] 伦敦、巴黎在举办音乐会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汉堡起了辅助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E. 普罗伊斯纳著《音乐文化史》（卡塞尔，第2版，1950年）。

[67] 见M. 布雷奈著《古代法兰西音乐会》（1900年）；参见R. 沙尔著《音乐的历史与现状》（F. 布鲁默编，卡塞尔，第14卷，1949—1968年）中“音乐会”一章，第7卷，第1587—1605页。

[68] 英国约翰·沃尔什1730年将打印器用于雕版印刷，这种乐谱印制法现在还在使用。沃尔什是最早出版汉德尔英文乐谱的人，他还印制了当时最时兴的意大利音乐作品。

[69] 参见普鲁尼雷斯著《音乐季刊》第11卷（1925年），第528—546页。他说得很清楚，是科尔贝尔鼓动吕利把皇家音乐学院抓到手。

[70] 《一切为了爱情》（1678年），序。

[71] 如果要详细比较《费德尔》和《希波里特与阿里希》，参见C. M. 格德尔斯通著《拉莫》，伦敦，1957年。

[72] 《每日议事录》，1732年4月19日。

[73] J. 威尔逊编：《罗杰·诺斯论音乐》，第350页。

[74] 伯尼：《历史》第3卷，第593页。

[75] R. 拉东安特编：《作品》（1925年）中“特征”部分，第81页。

[76] 关于20世纪最后25年威尼斯观众的情况以及威尼斯作为一个大都市社会中心的作用，参见S. 汤尼利·沃索恩著《威尼斯的歌剧》（牛津，1954年；1968年重印），第120页。

[77] 参见E. J. 登特著《A. 斯卡拉蒂》（1905年；修订本，1960年），第165页；A. 谢林著《音乐史例》（莱比锡，1931年），第374页。关于斯卡拉蒂对该歌剧中乐队独具匠心的处理，参见A. T. 戴维森和W. 阿佩尔合著的《历史选集》（1950年）重印前言，第155页。

[78] 关于作为佩尔戈莱西大歌剧《骄傲的囚犯》幕间插入戏的喜歌剧首演情况以及1752年在巴黎演出的巨大成功，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第85页。

[79] 即无伴奏合唱团。

[80] 间奏为纯乐器演奏部分，为声乐起头，在声乐部分和结尾处频繁出现。

[81] 有关从珀塞尔到卡瓦利音乐作品的例子，参见J. A. 威斯特鲁普著《珀塞尔》（修订本），1965年，第122页。

[82] 是否是珀塞尔的作品历来有争议，见《皇家音乐协会议事录》第90卷（1963—1964年），第43—57页。

[83] E. J. 登特：《歌剧》（第二次修订本），企鹅出版社1949年版，第174页。

[84] 伯尼：《历史》第4卷，第221页。

[85] D. 托维：《音乐分析随笔》第3卷，1936年，第81页。

[86] M. 平凯莱：《柯雷里》，巴黎，1954年，第18、169页及以下各页。

[87] A. 皮罗：《巴赫》（B. 恩格尔克译，第2版，1919年），第40页及以下各页。

[88] 风琴曲，一种风笛曲，通常模仿风笛的低音管音，略带舞曲特色。

[89] H. T. 大卫、A. 门德尔：《巴赫审稿人》（纽约，1945年，修订本，1966年），第46页。

[90] 乌贝·约翰：《瑟巴斯钦·巴赫：列本，孔斯特及孔斯特沃克》（1802年），英译本（1820年），译者可能是A. C. F. 考尔曼。

[\[91\]](#) 《钢琴曲集》以外的标题均有翻译。钢琴曲是个统称，适合于任何一种键盘乐器，无论古拨弦钢琴、击弦古钢琴、管风琴还是现代钢琴。

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1678年，罗马教皇并未使朝圣的教徒们诚惶诚恐，但8年之后，新教徒们都不寒而栗了。皇帝把匈牙利信奉加尔文派新教的贵族们交给天主教管辖，登上英国王位的是一名敢作敢为的罗马天主教徒，另一名天主教徒接任了巴拉丁选帝侯，路易十四已经撤销了“南特敕令”并说服萨伏依公爵再次进军沃杜瓦的山谷。有人害怕，分裂不和的新教各派的精神力量会经受不住这一考验。1686年，流放在荷兰的伯内特写道：“如果上帝对宗教改革运动还有好感的话，他还会再次掀起这个运动，然而我认为，承认宗教改革的那些教派死气沉沉，使我感到希望渺茫。”^[1]这种悲观论调很快就令人惶惑不安，而伯内特则继续当一名英国圣公会主教，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依然对教皇制度的业绩心存疑惧。

的确，从1688年到1715年，天主教在法国和波兰取得了不容异议的统治地位。路易十四稍经踌躇之后，于1715年3月的一项声明中重申了他的粗暴政策：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合法地位，新教徒继续居住在法国就被认为“证明他们已经信奉罗马天主教”^[2]。5个月以后，路易十四病危，有9个人（实际上是加尔文派新教牧师团中所剩下的全部人员）在朗格多克的一个采石场聚会，举行了新教被取缔以来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并发起了在“沙漠”上重建教会的艰苦的秘密活动。同法国的声明一样，1717年的波兰法令规定要拆毁新近建立的新教教堂，这不过是确认一个早已达到了目的的排斥异端的措施罢了，因为这时新教的路德派和唯一神教派已经衰落了。只有在立陶宛，加尔文派新教还保留有一支力量。事实证明，这种镇压新教徒（以及正教徒）少数派的做法，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已经有人提出替这些“不信奉国教者”进行外国干涉的设想。^[3]不过当时的俄国和普鲁士对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暂时装聋作哑，因而天主教在波兰的统治地位没有受到干扰。但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普遍代表欧洲的情况。大多数天主教统治者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同他们的新教徒臣民们搞好关系，他们至少承认，改变信仰的宗教狂是不能输出的。1694年，萨伏依公爵同沃杜瓦和解。1705年，尽管英国支持巴拉丁移民，认为他们是受到大

肆迫害的牺牲者，但巴拉丁选帝侯已经体会到容忍是明智的。路易十四本人也感到，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需要宗教上的温和与之相辅相成。在阿尔萨斯，天主教徒们在担任公职方面的职位已超过其份额，在传道方面也享有优越的条件，但允许路德派新教徒享受协议条款文字所保证的各项权利。奥格斯堡联盟组成之后，法国停止怂恿居住在阿纳西的“日内瓦主教”阴谋把加尔文城兼并到他的主教区之内；这样足以使日内瓦孤立和中立起来，防止它让伯尔尼军队进驻或参加赫尔维希亚联邦。1715年5月，路易十四同天主教统治的各州区达成的一项未经批准的秘密协定表明，他本来是乐于在瑞士进行干涉的，但外交政策的约束性束缚了他的手脚，于是，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新教徒的各州区在1712年内战中取得了胜利。^[4]同他在凡尔赛的敌人一样，皇帝发现有必要装出温和的姿态。尽管维也纳尽力从德国南部移进天主教徒移民，但1648年以后，匈牙利并没有走波希米亚的道路。信奉加尔文派新教的贵族们表示，如果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那么他们宁愿选择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半容忍地位，也不愿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失去宗教和自由。他们这种不妥协精神终于赢得了对他们的宗教自由的勉强承认。

1685—1688年的特殊形势过去之后，新教徒们对于自己分出的派别又重新扬扬自得起来。尤其是德国的路德派，眼界狭小，满足于自我内省。大批由豪贵的地方行政官统管的国家教堂，“犹如一连串内陆的池塘，除个别饶有生气者外，都是死水一潭”^[5]。由于要求教徒们绝对忠实于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拜占庭”，路德把他的追随者从基督徒的行列中分裂了出来；在莱比锡的一座教堂中，一名英国游客声称他看到一张撒旦、罗耀拉和加尔文站在一起的画，被称为“基督的三大敌人”^[6]。但是心胸褊狭的路德派的坚硬外壳正在破裂。政治分裂对教士们所产生的影响，证明对大学是有利的，因为教师和学生可以移居到具有最广泛自由的各个（大学）中心去。虔信派教徒们坚决认为，毕生行善是各派基督教徒之间的一种团结力，这种团结力不是教义上的分歧所能瓦解的——维特·冯·塞根道尔夫在他所著《路德教派历史》（1692年）一书中表达了这一忍让的宗教思想，在这本著作中，甚至赞美了改革后的特尼特罗马教派。君主一旦摆脱了偏见，他对教会的控制权并不一定是一种灾难。力求通过替国家效劳的方法使信仰各异的臣民们团结在一起的两代霍亨索伦王朝就采取了

一种宗教忍让政策；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此时正在显示出来，吸引勤奋的胡格诺派教徒难民接受他们的管辖，并成功地获得了若干天主教徒人口占优势的新区。1665年，正是在勃兰登堡，洛克第一次懂得了忍让的价值；为使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共同接受英文祈祷书的一个德文译本从而言归于好而进行那场漫长（而最后没有成功）的谈判，夸美纽斯的孙子、全世界基督教理想的倡导人D.E. 杰布隆斯基到柏林避难并在那里建立了总部。“有治理，才有宗教”（*cujus regio, ejus religio*）这句被作为在政治领域内排斥异端的金科玉律般的古老谚语，它暗喻：一个统治者在他自己的领土上是至高无上的，无道德可言。霍亨索伦王朝的行为表明，推行专制制度的最佳良策莫过于不顾道德。1708年，安妮女王推敲过制定一项总协议的种种建议，这项总协议规定，一位君主改变宗教信仰时，必须不使其臣民们的“信仰或收益”受到损害。^[7]这种统治方法也许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见解偏激的小诸侯（例如符腾堡的埃贝哈德·路德维希，他提出，如果教皇替他解除他那烦人的婚约，他就要把信奉路德派新教的臣民们赶回罗马），但是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安妮女王的这项原则都已得到默认。当萨克森的奥古斯都为取得波兰王位于1697年改奉天主教时，谁也没有要他的臣民们改变宗教信仰；直至19世纪初，萨克森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依然在国内处于无权地位。假如代价已够大的话，那么此刻就成了“有宗教，才有治理”的问题了。

17世纪70年代，一名同荷兰和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的两个堡垒）有接触的观察家也许会猜想，改良教派注定要像路德教派那样变得墨守成规和囿于反省。在荷兰，法国的野蛮入侵犹如洪水席卷，激发了人们的感情，在这股痛苦的洪流之中，正统教士的不容忍看来颇盛，对他们来说，多特教区的宗教会议是宗教改革的顶点。1679年，日内瓦的牧师们出于无奈，决意遵从 *Consensus Ecclesiarum Helveticarum* 准则（瑞士各个经过宗教改革的州区已于4年前遵从这一准则），该准则公开赞扬深受宿命论和《圣经》所启示的各种极端的教义。继之而来的，则是1685—1689年间对各国新教的激烈威胁、大批难民造成的心理影响、英国起而成为欧洲抵御路易十四野心的屏障，以及与当时的知识时尚有接触的新一代神学家的出现。各种形势结合在一起，蕴藏着几股各不相容的力量。日内瓦牧师们在天主教势力的军事力量包围下，痛感自己的孤立；牛津大学出现了一些讽刺他们的诗文，消息传来，迫使他们为自己“非常高尚的情操”向主教派

统治的政府提出委婉的抗议：“我们居住在你们中间，难道就必须在你们的教徒集会中出头露面吗？”^[8]胡格诺派难民（为了逃避法国的报复，许多难民已匆匆迁走）使他们良心上蒙受耻辱，是一场悲剧的见证人，这场悲剧使那些对于教义的精确含义的争论相形失色。这个骄傲的城邦处于新教精神生活的十字路口，它是外国学生和旅游者的胜地，是基督教印刷业的一个中心，在法国的新教的书籍市场垮台以后，这个印刷中心改出神学入门书籍，把市场转向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自由思想找到了捷径，甚至进入了神学院的内部核心，像J. A. 特里坦尼那样的教授们也受到影响。日内瓦废弃准则两年之后，即1708年，特里坦尼同英国教会的另外两位外国成员会晤，为新教的重新联合起草一个计划，这种重新联合是以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和对虔诚的生活必不可少的那些基本信念作为基础的。像柏林的雅布隆斯基一样，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们意识到，英国圣公会就是他们希望所在的拱顶石；像雅布隆斯基那样，而不像与他们一致的那些英国神学家们那样，他们对于政治形势的严酷现实是视而不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成果，因为，像圣餐杯一样古老的观念告诉人们，使人类得到拯救必不可少的基本真理是屈指可数的，这就意味着走向宗教统一，从而更肯定地走向宗教忍让。

在荷兰，宗教自由的思想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在那里，难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理智方面，也表现在情感方面，自由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异教教义、荷兰神学派和笛卡儿思想继续冲击着多尔德宗教会议。实际上，1694年在荷兰各州通过一项决议，劝诫人们要“兄弟般地和睦相处”，并且敦促各大学的教学活动要同多尔德宗教会议的决议一致，而不要“遵循哲学的法则”，然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制伏严格正统的富蒂乌斯派（此时，该派正在要求召开另一个全国性的宗教会议），这一次是为了摧毁《圣经》寓言解释的支持者们——科赫派。威廉三世本人是一位富蒂乌斯派，他坚持对峙的双方都采取温和的态度，弗兰纳克和莱顿两地的神学家们有见识地支持了他的政治态度。抱怀疑态度的教授们寻找身居高位的保护人。北荷兰宗教会议因巴尔塔扎尔·贝克在“De Betoverde Weereld”（1691年）中攻击迷信而把他废黜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官员们继续让他终生领取规定给他的薪俸。已建立起来的加尔文派教会无法制伏虔诚派、在莱茵斯堡依然十分活跃的公圣堂派、通神学派和其他新分裂出来的教派；反对天主教的法律依然未执行。同国教有联系但仍处于半独立

状态和能忍让的瓦隆教派，由于增添了法国难民和上层资产阶级家属的力量而得到了加强。随着欧洲广大读者对培尔、朱里厄、勒·克莱克、伯努瓦和巴斯内奇等人的名字日渐熟悉，情况日益明显：路易十四的迫害加强了荷兰加尔文派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在各个分裂教派的喧闹声中，在印刷机的轧轧声中，商业繁荣了，这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巧合。佩恩写道，荷兰的强大来自宽容：“给王国带来和平的是各种利益的联合，而不是各种意见的联合。”^[9]

在佩恩这样写的时候，就连意见分歧的英国新教各派也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联合起来了。^[10]詹姆士二世一旦去世，国教与不信奉国教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变。在实际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证明有理的迫害，在宗教问题上并不同样有理；合法权利可以支配无关紧要的事务以及各分裂教派点燃了内战的火焰之类的旧的论据现在看来已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人们滥用了合法权利，一场崇高的革命已经发生。现在必须履行主教们在拒绝宣读詹姆士二世的“赦免令”时提出的“给不信奉国教者以适当的仁慈”的承诺。有两条可走的道路：谅解和容忍。起初，似乎长老派教徒会重归国教，条件是：一方承认把建立一个全国性教会的理想只限于国教内部；而另一方则希望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不信奉国教的各重要派别能恢复和好。但是这份谅解的方案并未被提交宗教会议的下院。有一个时期，拒绝效忠于威廉三世的英国国教牧师们“装出自己依然信奉古老的英国国教”^[11]。身居高职的国教教士却不愿冒退让之险。于是，谅解的手段被放弃了，议会只批准了程度有限的容忍。这是一次现实的妥协，但却缺少宽容的气概和想象力。

就这样，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谨慎、政治上的需要以及人们对于教派之间的争论和宗教狂热感到厌烦，英国、荷兰和勃兰登堡都出现了容忍的局面；即使这样，各种对容忍有利的论据也同时在积累着。

“明智的”宗教倾向于“无形教会”的观念，这种无形教会很容易蜕变成洛克所提倡的那种“由一群人根据他们各自对上帝的尊崇观念而联合在一起的自愿社会……”^[12]这是一个并不神秘的宗教俱乐部，它很难引起关于神明或人类的种种恐怖。新教徒们则在最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寻求联合，他们接受并在实际上尊重波舒哀关于“变化”的责备，使自己面对培尔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要禁止索齐尼的想法呢？如果洛克抵制各种固有思想（尽管他并不抵制“自

然的反感”）这件事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教育的结果，这个结论，使强制成为一种符合逻辑的可能，而不是一种仇恨。不言而喻，在被放逐的胡格诺教派人士之间，对容忍问题争吵得最为激烈。皮埃尔·朱里厄为反对路易十四进行了耸人听闻的宣传，但却死抱住真正的宗教权力不放，借以压制错误的学说，可是后来发现，培尔和其他更有自由色彩的难民们却利用朱里厄自己的论点来反对他本人。在一本著名的评论著作中^[13]，培尔坚持认为，没有一项单独的声明能够在福音和自然礼仪面前站得住脚，从而用经文做证打乱了争论的程序。洛克把无神论者排斥在容忍的范围之外，佩恩则为宾夕法尼亚确立了一项道德法规（洛克把这项道德法规看作残暴不仁的），而培尔却同时超过了他们两人（也超过了他的时代），他保卫一切道德异离者的权利（即使无神论者也必须这样做）。当朱里厄提出他认为积极的迫害派也应赞同他的论点时，这场争论就全面展开了。有趣的是，朱里厄在教会理论方面是最有气量的，而培尔恰恰在这一点上对他发动了攻击。大约到了1670年，教会学派已经采纳了这样的观点，即每个基督徒必须从各个已经声明属于真正的教派中间选定一个教派，然而，朱里厄却把教会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各个基督教派可以各自保留最低限度的教义上的同一性，成为一个有形的共同体，它的疆界可以延伸到把信教的父母们所生而未经洗礼的儿童们也包括进去，把一切接受基本真理的人也包括进去，甚至参加分裂教派的人也可包括进去。^[14]培尔则嘲笑这一观点，认为这是把宗教改革当作一场不必要的儿戏。他看到兼容是对容忍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极少数教派被排除在外，那么这些教派就更容易受到迫害。

在另一场使逃亡的胡格诺教派发生分裂的大争论（关于反抗暴政的权利）中，培尔和温和派们依然是法兰西的爱国者，而朱里厄则热情支持英国革命，并希望通过法国的崩溃而使新教胜利。在詹姆士二世对普遍遵循的（虽不甚明确）管辖教民的教义强迫进行修改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遵循罗马《圣经·新约》“致罗马使徒书”中（Xiii I）那句名言：“权力由上帝赐予。”人们承认，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可以是合法的，但其君主却要受上帝的裁判。不过，这些条件往往只是理论上的。波舒哀赞成这些意见，并且在实际上崇敬国王权力的“奇迹”，在路德教派维特·冯·塞根道尔夫所著的《基督国

家》（1685年）一书中如实地反映出了这种君权的保守主义，他认为，对于一个邪恶的统治者，基督教徒们唯一反对的武器就是祈祷。1683年统治牛津大学的是一条“明确无疑、绝对而又绝无例外的”顺从君主的教义，这条教义是英国牧师们在蒙默思被处决的前夕向他说的。其中有一人就是圣阿瑟夫的主教威廉·劳埃德，此人3年以后成为囚禁于伦敦塔中的7名主教之一。“这就是你们英国教会的忠诚吗？”詹姆士二世对马格达林学院的成员们所讲的这句著名的冲动之言实际上没有多少道理。“不反抗”并不排除“不合作”；主教们说，他们要人们“服从，在不能服从的时候要忍受痛苦”。“不反抗”也许仅仅是一名基督教徒对待任何一个既定政府所承担的一种并非出于真心的义务罢了。舍洛克在接受威廉三世授予他圣保罗教长职权时就是用这种论点为自己辩解的，威廉三世的敌人尖刻地说他是“一位凭神意当上的国王，任意支配其主教和教长”^[15]。神权君主制的各种古老准则不必抛弃，不必把这些准则施加在一位世袭的国王身上，反之，稍稍加以修改，即可适用于一位通过神权而选定的国王身上。不同集团的教士们，采用不同的准则各自进行自我辩护，萨谢弗雷尔和上层教士们喜欢用虚构的詹姆士二世退位的传说；斯蒂林菲里特认为违反公众利益的效忠誓言没有约束力；劳埃德则跟随霍布斯拒绝服从不再能保护他们的君主；伯内特与康普顿（他穿着浅黄色皮上衣和长筒靴，带着佩剑和手枪为新教的事业呼吁）站在英国法律的立场上，认为最高权力不属于国王个人而属于国王和议会，法律保证国民的宗教，把它视为国民财产的一部分。英国教士们不需要朱里厄论点的全部理论，即政府是由于人类的原罪而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而这种契约永远也不能把对宗教应尽的义务牺牲掉，而最高权力则属于全体人民。然而朱里厄的抽象概念和对神权理论的修改，这两者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用复杂的方法去求助于简单的常识罢了。政治事件本身连同笛卡儿和洛克正在把人们推向一个“理性”的时代。一位副主教说，利用《圣经》来反对一个民族的自由权利是荒谬的。他说：“自然和理性的基本规律以及政府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救世主来到世上是为了按这些规律行事而不是要破坏它们。”^[16]国王能废黜吗？斯威夫特激动地申述他的意见说：“如果要废黜他，我会以为他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搞了乱伦、强奸了有身份的妇女、搞垮了国会和焚烧了首府。”^[17]可悲的詹姆士！选斯威夫特依然甘愿屈从于“立法机关”的罪恶。另一方面，像贝克莱那样，人们可以坚持

对“最高国民权力”“绝对无限制地不抵制”，条件是在非常情况下，任何声称拥有这种最高国民权力的当局都应接受审查。^[18]不是《圣经》的词句而是理性成为基督教徒在政治中的行为准则。

假如有神批准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的话，这些限制可能会被特地用来保卫教会。但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和基督教地区一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联合总是偏向于世俗权力一边，这种权力在选任高级宗教官员时一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的主教职位与法国不一样，它们主要成为留给贵族的肥缺，这可能是因为这种职位非常少的缘故。但是，在上议院中，26名高级教士在表决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而他们的任命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事。但是，不受君主对宗教的信仰所左右的官职恩赐权具有重要的影响；1707年，安妮女王不得不答应在委任主教时一定要与她的部长们进行磋商。尽管法国的高级教士有权参加五年一次的大会，会议（在王室的监督下）对给政府的捐款进行表决，而在英国，教会交出了它对各级教会征税的权力，因而王国政府中止了宗教会议的召开，这是英国王室在1689年宗教会议未能体现容忍后恢复的一项政策。

虽然这类减少控制的做法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教士们有时仍感到不安。在瑞典，1719年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下级教士们在任命主教的问题上赢得了真正的发言权。1711年，费奈隆幻想法国天主教能交出其财产以重获自由。爱尔兰教会自傲地坚持认为它不是英国教会的附属品而是古凯尔特族教会的继承者，而且凯尔特族教会从未归顺亨利八世。甚至在彼得大帝坚决不允许再有主教的俄国，教廷的代表斯特凡·耶沃尔斯基抱怨说：“基督没有把他的教会托付给皇帝提比略，而把它托付给圣徒保罗。”^[19]然而，在即将举行最重要的，有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的英国，这个问题在1697年《给宗教会议领导人的一封信》的著名宣言中明确地提了出来，并激起了争议。宣言说：“教会是为了超自然的目的建立的团体，因而它必须拥有相应的治理自己的权力以达到其目的。”拒绝效忠于英王的牧师们在主教们由于拒绝对威廉和玛丽宣誓而遭废黜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为此提出异议。他们说：假如政府可以把教会的领导人撤掉，那就可把教会作为与国家截然不同的团体完全推翻，并使教会在受迫害时根本不能继续存在下去。^[20]虽然不效忠于威廉的牧师们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乔治·希克斯把争议延长到下一代人，但是在具体的辩论中

只得到很少几个同情者。但当阿特伯里利用教会在精神上的独立性作为恢复宗教会议的论据时，他在下级教士中引起了反响，并博得了政界虚伪的赞扬。他试图说明，在国会召开会议时宗教会议也必须召开以处理各种事务，这种说法依靠的是错误地援引被韦克否定的先例。然而，阿特伯里的反驳是有力的，他说：“这些事例是令人悲痛的，但（赞美天主）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对我们关系不大。”

[\[21\]](#)从1701年起，争论转到了新的问题上，此时阿特伯里及其支持者们把问题集中在宗教会议下议院的权力上，即“下议院的大主教”问题上。阿特伯里过去的看法又一次被证明是荒谬的，这一次是由吉布森证明的，可是阿特伯里再次根据自然理性反对先例的压力，提出了他最有力的论据。吉布森说阿特伯里要求得到“教会议院的概念”中必然包含的权力，这种要求毫无道理，只不过是“从事物的本质中作了一些不能肯定的推断”[\[22\]](#)。在对他们那些使政府得到加强的教会法令的概念进行重新审查以后，在对君主的忠诚发生的转移进行讨论以后，在设法限制皇室在教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国家事务中已受到限制）以后，以及在给予下级教士相当于辉格党人和开明主教们那样的权益以后，情况说明，教会人士强有力的论点所根据的并不是《圣经》或先例，而是自然的逻辑。人们正在进入一个理性的时代。

把基督教的伦敦的种种强烈争论转移到天主教的首府是件出其不意的事，因为在欧洲的政治和知识界生活中，罗马已成为一个边缘城市。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罗马实际上是世界的中心。基督教强大传教活动的发展还处在开始阶段：1698年基督教知识促进学会成立，3年后福音传播会成立，虔信派教士从哈雷来到特兰克巴尔，以及一些教士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活动仅仅是为下一个世纪大规模传教运动初试锋芒而已。在俄国教会中，托博尔斯克的大主教费路休斯·莱茨津斯基几乎是唯一对在西伯利亚部落中传教感兴趣的人。在天主教以外，需要有一位像莱布尼兹那样的天才使人们看到全世界有着同一种命运，这是罗马耶稣会总部和传道总会一贯的设想。就在詹森派、法国天主教派和寂静派进行激烈争论，几代教皇打发外交使节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封建宗主权进行奔波的同时，基督教却从中国到秘鲁正在向前推进它的疆界。

罗马传道总会看到，就防御新教而言，北方是唯一不可能再向前推进的边界。虽然圣公会和东方各教派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系引起了人们的某些关切，但指望从牺牲东正教和其他较小的东方教派的利益而从中获得新的好处还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1672年耶路撒冷宗教会议否定了加尔文派所供认的对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西里尔·卢卡里的忠诚之后更是如此。在波兰，东正教主教们正在转向希腊正教。当时正在进行磋商，以期最终说服安蒂奥克的一位最高主教来成立拜占庭希腊正教的梅尔卡特分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正在争取景教徒作为迦勒底人与罗马交往。在中世纪时就已效忠于罗马的叙利亚马龙派此刻却成了罗马教廷特别担心的对象。

比这些在边界上与新教和正教的小冲突重要得多的是在美洲和亚洲反对异教的斗争，首当其冲的是一些宗教团体，它们的地位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在欧洲，这些团体已成为玩弄世俗手腕和愚民政策的代名词。在新世界，传道总会理所当然地把西班牙帝国看作扩张权力的中心。事实上，法国和葡萄牙的属地正在变得日益重要：魁北克主教区于1674年成立，巴西当时唯一的主教管区巴伊亚于两年之后便成了一个大大主教管区。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宗教机构并未成为非常成功的传教基地。在新法兰西，英雄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大湖地区以北、以西和以南进行工作，但游牧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和酒类贸易对基督教徒的不断增多作了让步，而伊洛魁部落高度发展的异教信仰和英法两国对这些部落的争夺却继续限制着基督教向这些同盟村庄的渗透。巴西的教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那里的宗教生活是由耶稣会开创的，此刻却受到一位时新的传教士安东尼奥·比埃拉神甫的影响。他是亚马孙河以北地区城镇的创建者，活到高龄，于1697年在巴西去世。在西班牙的各个领地中，同葡萄牙的领地一样，印第安人受到监护，因而在建立当地的教士队伍方面未曾作过不少尝试。然而，宗教团体继续在探索发展的途径。虽然方济各会托钵僧（他们的据点是委内瑞拉）于1689年从达里埃撤出，而且恰帕斯的已成为基督教徒的印第安人于1712—1713年反叛，但方济各会坚韧不拔的精神有时却在美洲中部的其他地区赢得了惊人的、哪怕是暂时的收获。与此同时，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他们在阿帕切人的支持下，传教工作正在向前推进。耶稣会也正在从墨西哥推向加利福尼亚，一路上把游牧的印第安人组织成农业村社。在巴拉那和巴拉圭两河之间，耶稣会使用神权的家长式统治的著名试验，成功地把约1.5万名瓜拉尼印第安人从他们自

身的懒散和欧洲人的剥削中拯救了出来。与此相对比，在亚马孙河上游丛林中，由耶稣会和方济各会在那些不太温顺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印第安人中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居民区，却在18世纪初被异教或葡萄牙的攻击所摧毁了。[\[23\]](#)

在东方，欧洲诸国在东方尚未崩溃的古老文明之邦四周进行贸易，各国传教团体的问题也各不相同。[\[24\]](#)传教士们跟不上军事胜利的形势，大批赢得信徒是不可能的，那里的本地人口众多，与美洲人的部落大不相同，对美洲人部落来说，基督教等于是文明的别名，易于接受。基督教在东方不易立足的通律，只有一个例外，即菲律宾当地的社会太原始，无力抵制西班牙教会，该教会在菲律宾犹如在美洲一样牢固地扎下了根。至于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基督教不得不在没有物质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在与当地已经确立的各种哲学和文化习俗的辩论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罗马传道总会理解这一情况，所以于1658年为远东地区派出了两位名誉主教，指示他们要遵守所在地的法律，并按照耶稣会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得所倡议的政策建立一个名誉主教的网络，以组成一个当地的教士团体，使之能不依靠欧洲的庇护而独立行动。由于正规的教会团体对这一政策持敌对态度（也由于各教会团体之间的相互敌对），以及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东方的天主教传教团体拥有监督权，遂使政策的贯彻产生了种种困难。尽管如此，法国天主教的势力进入暹罗、东京湾和交趾支那；并且建立了其他几个名誉主教教区，以便把中国各地区争夺过来，即接管葡萄牙人建立的有名无实的澳门、北京和南京等主教管辖区。传道总会的目标是把触角推向最远的边疆，就连西藏也要接过手来，理由是葡萄牙的帕德罗阿多传教士已经放弃西藏。这里所指的是，当年有两名方济各会托钵僧历尽艰辛于1708年前往拉萨，还有耶稣会教士德西迪里于1714年告别了斯利那加的皇宫、葡萄和鲜花，踏上通向西藏首府的“黑色山脉”和荒无人烟的道路，而拉萨正是他的同行格吕贝尔在半个世纪前从中国的长城到达过的地方。但最大的收获是取得了幅员辽阔的大清帝国。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团体常驻北京达一个世纪左右。在1669—1722年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这个传教团的影响上升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它的成员成了科学家、艺术家、枪炮制造家、外交人员和行政官员。1688年，担任清朝政府钦天监的比利时神甫南怀仁[\[25\]](#)出殡时，皇帝为他送葬所派的御林军竟然走在圣母怀抱耶稣的圣像之后。1692

年，康熙颁发了一道诏书，允许百姓们到欧洲人的教堂里去做礼拜。此事表明，传教团的目标看来即将实现。然而，远在这位宽容的皇帝尚未驾崩之前，耶稣会的黄金时代就已告终了。中国的一贯国策是尊孔（正如在欧洲学院中尊敬西塞罗一样），士大夫阶级崇书尚礼以及平民百姓奠祭祖先的礼仪是天经地义的事。从17世纪中期以来，耶稣会的地位一直受到这类事务的挑战。1703年，罗马把马亚尔·德·图尔农作为大使级官员派往东印度群岛时，争论发展到了紧急的关头。德·图尔农是根据传道总会的一项秘密决定派去的，1707年，他从各个方面谴责了耶稣会——谴责中国的“礼”，谴责用相应的中国名词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由于皇帝曾宣称过崇尚礼仪纯属中国内政，而如今那些连中国字都不识的外国人竟对此进行干预，皇帝因而勃然大怒，随即下令驱逐一切听命于罗马决定而未曾许诺终身留居中国（有一些是作了这种许诺的）的传教士。这类争议的细节是令人厌恶的，经常是一些琐事；然而终于作出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决定。衡量这项决定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史中所产生的整个影响，目前可能还为时过早。

1682年，英诺森十一世表示愿替路易十四加冕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用以换取针对土耳其人的干预，此时，埃特雷红衣主教曾说过“十字军时代已经结束了”。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们在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时并不听命于罗马，它们的大使在罗马的举止傲慢到在任何其他主要国家的首都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教廷对勃兰登堡选帝侯获得王位一事和对《乌得勒支和约》条款提出的抗议根本没人理会。皇帝有时把罗马当作是同他的敌人站在一边的一个意大利公国；教皇的使节于1705年被逐出维也纳，后来帝国的部队又侵入了教皇的领土。1709年克雷芒十一世改变立场后，就轮到菲利普五世被触怒了，菲利普五世便在他管辖的领地内提倡王权至上的学说。然而，天主教君主们依然期望罗马为他们做好事。梅迪契家族要求在家族内必须有一名红衣主教，即便是托斯卡纳的科西莫大公的兄弟弗朗切斯科·马利亚，一位骄奢淫逸和搞同性恋的家伙，也要当红衣主教；路易十四则非要德福宾·让桑升为红衣主教，他是一名因劝说土耳其人攻击皇帝而臭名昭著的高级教士。在一次教皇的选举中，君主们坚持他们拥有“排斥”权，据说这是在1691年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确立的一项具体权利。^[26]在1700年的第二次秘密会议上，法国的红衣主教们仅在得到了他们大使的授意之后才同意选举阿尔巴尼，此人是

泽兰蒂党的一名候选人（该党主张纯粹按教会的意图办事）。由于得到了这种“排斥”权的支持，君主们把选择教皇一事完全看作一种政治事务，就像选择一名波兰的国王一样，他们往往物色一名不能胜任这一高位但却愿顺从他们的候选人。七八十岁高龄的亚历山大八世（1689—1691年在位）就是如此。他匆忙地把自己的亲属迁出威尼斯，为的是在死神未召唤他之前为这批亲属安排职务。然而，他还不是典型。英诺森十二世（1691—1700年在位）虽年事已高，还是坚定而正直；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在位）和克雷芒十一世（1700—1721年在位）也都是好人并具有伟人的品质。但是要统治一个腐败的意大利公国，蔑视那些利用宗教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天主教君主们，领导一个教会的帝国，并在这一危急的时期在理智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那就需要有希尔德布兰德那样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他们做不到的。

天主教君主们甚至更坚决地禁止罗马干涉他们的内政。如果说1753年罗马教皇与西班牙君主就宗教事务达成的契约中只不过是西班牙王权至上的学说作了完整而严格的书面解释的话，那么这种学说在西属各殖民地都已得到高度发展，那里的教会——被西班牙权贵们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之间的争夺所削弱并受到大庄园主势力的影响——不大愿意对殖民当局的命令表示不满。虽然传道总会声称当局对外国传教机构不予重视，但这些范围宽广和互相隔绝的教区的教务是归东印度群岛的政务会议所管辖的。^[27]在菲利普五世时期，西班牙采用模仿法国的办法来加强其自己的传统。法国的历史在用法律限制教会侵蚀政府势力范围方面为人们提供了种种范例，在这一点上法国胜过任何其他天主教国家。波舒哀的雄辩口才，多明我教派历史学家诺埃尔·亚历山大所进行的各项研究，以及1682年宣言第四条条款^[28]的含义，都加强了把著名的法国天主教“自由”奉为神圣的法律文件。到1688年秋，事实上罗马与法国天主教各自的立场之间不可能再有进一步妥协的可能了。路易十四被秘密地开除出教，法国的教会遂处于分立的边缘。然而5年之后，长期的不和平息了。虽然未对双方的两大争论（即法国有权获得主教空额收入的暂时权利和1682年条款）达成任何结论性的决议，但法国国王到卡诺萨去（更确切地说，派他的主教们去）采取了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即从法国外交政策的利益出发，使意大利保持中立。^[29]法国天主教条款虽未遭到否认，但

却降低到了非官方文件的地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论便转到了一个新的方面，公开的紧张局面不得不转为隐蔽的方式，这一点在重新抬头的詹森派论战中再一次暴露了出来。

路易十四与罗马重新和好，希望教皇帮助他与詹森派和解。^[30]如能明确詹森派并未因公然反对国王获得主教空额收入权而得到教皇极权给予的报酬，路易十四就会感到满意，而且当时法国政府仍为神学阴谋集团的危险阴影所困扰。1704年，热尔曼·维亚尔（阿诺尔德、尼科尔、勒纳伊·德·蒂耶蒙等人作品的并无恶意的编辑）由于他与正在流放中的阿诺尔德的同伴帕斯奎·奎斯内尔在通信中用了几个幼稚的代码字，在巴士底狱中受到不下20次的审问。1705年，在路易的压力之下，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 *Vincam Domini* 法令，禁止人们接受宗教仪式时在思想上有所保留。罗亚尔港有几名修女只答应在不贬低克雷芒九世所颁布的《教会和约》的条件下接受上述法令。圣伯夫说^[31]，22位自称为谦卑的年迈的女士竟然拒绝一项已被教士大会和神学院所接受的，在国会注过册，并由主教们公布的国王法令，那是荒谬的。他又说，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引起我们同情和尊敬的一个事例。这些修女们反抗的结果是著名的1709年10月29日事件。那天，警官带着一帮弓箭手和十余辆马车来到罗亚尔港把她们带走了。随之而来的拆毁队和一批喝得醉醺醺的掘墓人，消灭了人们对詹森派最后的一点印象。

詹森派正在准备一出新戏，戏中会出现一位不同的戏剧性人物，并洋溢出不同的气氛。1713年9月24日，罗马的使者带着《克雷芒通谕》来到法国宫廷。该法令宣判，很久前帕斯奎·奎斯内尔在一本虔诚的手册中所写的101条提议是有罪的。这位被流放的老人和他那篇出过5版的论文为何成了论战的中心，原因不十分清楚。对此，最好的解释可能是，整个事情起源于要使诺阿耶红衣主教丧失名誉的一种策略。他是巴黎的大主教，与耶稣会有纠葛。这一策略失去了控制，以致使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诺阿耶同他那位善于处世和玩世不恭的前任阿尔莱不同，他不是一名趋炎附势之徒，而是一位面对一场复杂得使他深为困惑的争论始终摇摆不定的老实人。1695年他担任夏隆主教时，公开同意了奎斯内尔最新版本的《道德的思考》；他以大主教的名义否定了詹森派阿贝·巴科教士（此人是圣西朗的侄子）的一部作品。一名狂妄的詹森派争论者^[32]不明智地指出，巴科的神学学说与

奎斯内尔没有什么两样，以此来指责诺阿耶自相矛盾。耶稣会就乘机发动攻击，他们表面上指责奎斯内尔，而把矛头间接地指向大主教，引起了长达15年的争论，这一争论在《克雷芒通谕》令中达到了顶点。在两年前发起这场责难的路易十四强迫巴黎议会、索邦和主教管区接受了这一法令。

事实证明，《克雷芒通谕》令成了许多不满分子的众矢之的，它就像阿杜兰山洞，皇室的反对者和教廷的反对者们都可在那里会集。到此时为止，詹森派的非难一直集中在“事实”这个问题上，即认为一部神学作品中包含着某些天主教的提议，就像在一大捆柴里藏着几根刺，人们费了很大工夫也未能把它们找出来，坚持这种看法是否有理呢？^[33]问题是一大堆确实由奎斯内尔提出的、用直率的法语写成的建议。建议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公开接受官方审查的，但人们觉得其余的建议无一例外都是正统观念。关于所有人都必须研究《圣经》的声明能有什么差错呢？或者说，关于害怕被不公正地开除出教会绝不应阻挡我们去做应做的事情的声明又有什么差错呢？在这类事情上要为法令辩护，就必须把宣布建议有罪一事，同把信条强加于持相反意见的人一事区别开来，同时承认（假设奎斯内尔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建议的）这些建议一定在持续的仇恨中经受了非难。^[34]当然，詹森派不愿意以承认这样的可能性来说明该法令是合理的。这份被一代人所赞赏的甚至连耶稣会也使用过的、出于忠诚而写成的手册，竟然在没有作者到场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被只有一名成员能懂得文章所用文字的罗马红衣主教会议骂得一文不值。而宣布奎斯内尔建议的那份文件却充斥了对任何一条建议都毫不相关的控告。以上情况给了詹森派力量。他们要求，法令的内容必须讲清楚，这样好使准备接受它的人们明白他们接受的是什么。为了答复这一要求，苏瓦松的朗盖主教，一位最有能耐的正统论战家强调说，教皇就像牧羊人一样，他没有必要向他的羊群作解释，假如他发现在某块地里有毒草，他只需把毒草扔到别处去就行了。简言之，教廷的权力正处于危急的关头，这就要感谢路易十四和他王位的权力了。詹森派今后在法国的鼓动工作就全靠各议会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和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了。他们乐于寻找一个机会，为国王本人和国王的利益去抵制教皇，为教士统治集团的下级组织去抵制贵族的主教团。教区神甫们已经对教会内的财富和荣誉分配不均和主教团的权力日增的情况感到憎恨。

[35] 这种想法很快变成赞赏教区独立和宗教会议在处理主教区事务中应该发挥作用的看法。由于这类“里奇”式的思想在（二级）教士中的传播，再加上教区神甫与律师的联合，以及他们与詹森派共同反对主教团的专横，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8世纪“政治上的詹森派”的主要历史。[36] 詹森派在神学上的经历此刻已成为一种“联想的神话”，在《克雷芒通谕》令公布以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由它信奉者的敌人们捏造出来的“想象中的异端邪教”。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成了一种想象中的正教，受到一些认为只有它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人所支持。这些人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教会和政府的专断权。

任何关于詹森派的说明都无法符合它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复杂性。按照1688年卡迪纳尔·阿吉雷的说法，当时有少数几个对五项建议的顽固支持者，还有数量更多，但态度不很明朗的潜在同情者的集团，包括对道德要求严格的人和耶稣会的反对者。这只是限于神学界的一种分析。在法国，凡是发生过神学问题的地方，背后总是有着各种政治势力准备介入。而在其他地方，凡是有詹森派不幸意外事件发生的地方，也总是与那里具体的“詹森派教义”有牵连，至于可能出于种种动机说这些情况究竟是否当真存在，那就需要分别加以分析了。在罗马，有些红衣主教、奥古斯都派和托马斯派，他们对于把世界分割为“莫利纳派”[37]和“异教徒”深感遗憾，他们有时被人看作隐蔽的詹森派。在英国占少数的天主教内，把詹森派的主张同否认教皇一贯正确的托马斯·怀特（他是霍布斯的朋友）的追随者们一样看待。17世纪90年代在列日，身为亲王的主教想把他神学院里的詹森派教师辞掉，改用耶稣会会士，引起了大批小册子的出版和长时期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主教受到费奈隆[38]在道义上的支持。但这场狂热的论战与教义的关系不大。詹森派的头面人物坎农·丹尼斯并不想与《克雷芒通谕》法令作难，他的过错是在法国与奥地利中更倾向于奥地利。至于除列日以外还占有4个主教教区的约瑟夫·克雷芒，只要说一说这些教区都是教皇所赐予他而没有受到教会各种组织的障碍就足以了解他的动机了。直到1707年，他在圣职方面加速了升迁，因为其时马尔巴勒的胜利已危及他的职位。他本身的地位和外交政策都迫使他披上正统的外衣。在尼德兰，甚至在《奥古斯都纳斯》发表以前就已存在“詹森派”争论的基础。因为，耶稣会的人要把天主教的

活动置于罗马传道总会的管辖之下，而基层的教士们却希望保留在他们自己的主教教区的管辖之下，这种意见得到热衷于使占少数的天主教徒不受罗马管辖的世俗当局的支持。乌得勒支的尼尔卡斯尔大主教（1686年去世）曾经是阿尔诺德的朋友，他是一位严格的神学家，是耶稣会的敌人。他的继任者彼得·柯德由于拒绝签署法令于1699年被召往罗马，并于1702年停职。副主教们和教区拒绝接受西奥多·德·科克出任名誉副主教，荷兰各州也禁止科克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履行公事。从此，乌得勒支的教会（依然是老的天主教会）独立于罗马而自行其是，爱尔兰和法国那些同情他们的主教为乌得勒支教会委派教士，直到1724年才有机会举行仪式任命一位新的大主教。乌得勒支教会虽然抵制《克雷芒通谕》法令，但在教会的立法问题上却自认为是与罗马决裂的。在乌得勒支，犹如在法国一样，关于詹森派的争论进而涉及教会最高权力的性质。学者们引用《圣经》和圣奥古斯丁的学说，说明基督教教义破坏了人类一切“理性”准则，这些学者发现他们肩负着进行“理性”斗争的使命，既要反对绝对服从教会，也要反对绝对服从政府。如是，虽然詹森派与启蒙派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抗，但奇怪的是，詹森派对“欧洲的良心危机”却间接地作出了贡献。

保罗·哈泽德^[39]的名言概括了17世纪过渡到18世纪期间理性方面的尖锐和紧张情况。科学的进步使整个世界出现了新面貌，但却没有给各种奇迹以显著的地位，因为，“事物总是按着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轨道默默地前进的”^[40]，一场伟大的历史学术运动已经开始；各种传说，包括关于圣人们的传说，已经被推翻；连《圣经》本身都要受到考验。^[41]波舒哀与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德（他发现笛卡儿是基督教辩护派的同盟者）这两个人不同，他感到了危险。他在1687年写道：“一场反对教会的大战已经在笛卡儿哲学的旗帜下展开。”^[42]荷兰是东欧反对三位一体教理的逃亡者的避难之地。从荷兰传来的索齐尼（反对三位一体论的哲学家——译注）所写的书，使人们对三位一体论和圣事的奇迹产生了怀疑。怀疑起初只是对《圣经》字句加以斟酌，但此刻由于提出了纯粹的理性问题而造成了困难的局面。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的“自由论”又被人们阅读起来，这一理论的某些根源，如伊壁鸠鲁哲学和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宗教辩护士们还担心出现新的危险，因为有两位非常独特的

哲学家的著作还未被遗忘：一位是阴险而态度模棱两可的霍布斯，他对《圣经》所作的无懈可击的声明把最严重的灾难施加于人，使神学家们的道路变得暗淡无光；另一位是斯宾诺莎，他的泛神论和宿命论，特别是他对《圣经》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被他的读者们不愿表示震惊和感激所掩盖。由于在洛克的哲学中并无固有的观点，其推论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根据，即可以用人类最初产生信仰的那一段令人困惑的偶然的历史来解释一切宗教。虽然洛克本人证实基督教肯定是与这段历史同时产生的，因而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理性，或者说某些理性的观点却发展成为1696年约翰·托兰所著的《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查尔斯·布朗特已系统地阐述了英国自然神论对启示的主要挑战。他说：“对于我们来世的幸福不可缺少的教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43]与此同时，培尔正在编他的《辞典》，这使读者们想到，他们只有牺牲宗教信仰才能去满足理性。这一信仰即摩尼的二元论对世界善与恶的解释胜于上帝创造世界一说，因为假如上帝预见到人类会犯原罪，他就不是好上帝；假如他未料到人类会犯原罪，上帝就不是无所不知。还有其他的作家，如著名的丰特奈尔，或当时不引人注意的约翰·特伦查德，他于1709年出版的《迷信的自然史》一书中论述了宗教的起源是出之于人类的恐惧感，这一论点则为德·霍尔巴赫所欢迎。当英国与法国的思想融合，理性论与怀疑论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同时与反教权主义相结合并用文学的才能装饰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伏尔泰时代。

但是，伏尔泰仅在1711年8月才离开耶稣会教士办的学校。他的思想打上了耶稣会“宽容”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但却接近于摒弃基督教的信仰。未来依然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回顾起来，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积累了许多为后来的基督教敌手们使用的武器，但如果在事后把这些年总括视之为一场理智阴谋的序曲，那也是过分的。因为直到此时，还没有人认为19世纪宗教与科学是相对立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假如牛顿不相信他的同事们是笃信上帝的话，他就会对自己的发现保密，牛顿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特别注意考虑到那些对人们信仰上帝起作用的原理。^[44]那些著名的历史学者几乎没有一位不是教士，包括那些不效忠于英王的神甫、开明主教、耶稣会教士、通俗说教派和莫利斯派。马勒伯朗士和贝克莱也一样，而像洛克这样的凡俗的哲学家们，则想

为得到宗教方面的赞同寻找合理的根据，而沙夫茨伯里则为了保住英国国教的正派和慈善，免受“可怕的宗教狂”^[45]的影响，就去接受圣事的祝福。英国的索齐尼宣传者们希望能允许把他们留在英国国教内，甚至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而不要去盘问他们。在统治着荷兰文坛的胡格诺教派中，如果说勒·克莱克的神学学说背离了正统的三位一体论，那么在其他方面却是正确的，而且与索齐尼派相距甚远。不顾后果地利用怀疑主义这一双刃剑的培尔，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46]他带着加尔文派的观点来看待人性，对理性感到失望，悲观地认为人们只是利用论点来掩盖他们凭感情行事，而他内心却转向从宗教上寻找启示，这是他唯一可依靠的出路。这是一种微弱的思想苗头，但他的虔诚却使他比自己想象的更接近于自己所蔑视的寂静派。这样，从某种观点来说，“欧洲的良心危机”可以看作伏尔泰时代的序幕，但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实质上它是基督教内部的危机，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整个影响。这些思想很容易地被归纳到“理性”、“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名义之下，用来解释、捍卫和重新说明宗教。再者，面对到处出现的异端邪说和遍布在国外的各种为不可知论者和反对教权者所利用的论点，使这些工作获得成功的措施很容易被忽略掉。用战争这个名词来形容宗教信仰的紧张局面往往是不恰当的。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对基督教的辩护者和反对者都一样，这个时期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始。

在宗教信仰中，理性起什么作用？它的缺点是什么？洛克和蒂洛森的回答是，启示占有独立的地位，然而理性必须对正式称之为启示的事物进行判断，这正是胡克与圣公会神学家们和清教派的传统学说。英国新教不愿对所谓“原罪无可挽回地玷污了人类的思想”这种观点让步，而与米尔顿和剑桥的柏拉图派一样认为人类的原始悲剧是由于自私自利的情感和欲望所致。因此，要在思想上求得启示，就要恢复业已堕落的人性，通过知识和忏悔，使它升华到一种内心的天堂，其幸福大大胜于单纯无知的伊甸园。圣公会与清教派都认为其有责任提出有关基督教的理性证据。辩护派那条更为曲折的道路和起源于怀疑论的论点基本上就留给了天主教辩护派，他们利用人们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使自己的读经师们回到信仰主义去。伯内特愤怒地写道：“教皇至上的信仰者们甚至把争论推向无神论，他们出版了许多书籍，声称除非承认罗马教廷一贯正确的权威就是基督教正确的证

据，否则，基督教的正确性就不再存在什么证据。”^[47]但是理性与怀疑论差不多，也有它的危险。洛克说，对一种没有足够证据的主张给以赞扬，“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倾向性所致，它是对热爱真理的背叛”。洛克已超越了界限^[48]，他想证明上帝存在的企图鼓励了那些只信仰确有实据的那种上帝的人们。正统教徒之间的争论在克拉克的《三位一体论的圣经学说》（1712年）一书中发展到了顶点，这种争论进一步帮了自然神论者的忙，他们把洛克书中最低限度的“理性”基督教扩大到最高限度。然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他们在法国有相当的影响，但在本国却从未获得很大的荣誉，因为在英国的理性时代，人们总是热衷于寻找理性的短处，而不是去神化理性。笛福于1703年写道：“哲学家的任务不是仔细观察自然，到达力量无穷的境地……哲学家到达的终点也即基督教的起点。”^[49]

与“自然的”宗教一起的还有“自然的”道德论，它产生于“理性”基督教。在这之前，沙夫茨伯里就说过，美德应该成为它自身的报偿，卡德沃思驳斥笛卡儿派、加尔文派和霍布斯派，驳斥所有那些声称“善与恶是上帝专断选择的结果而非事物本性所固有”的人们。^[50]这种原始的一神论假设，得到了宗教辩护士们的普遍接受，成为使人们一致赞同的一条纽带，这就使自然道德论得到了加强；耶稣会的宣传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在主要的教义问题上，耶稣会的神学家们很可能同意阿尔诺德的看法，认为宿命论是“原先预料到的好事”，就此而言，耶稣会与詹森派的争吵只不过是一种言辞上的争执而已。但人们问到未受洗礼的婴儿是否应判为有罪，或者问到热爱正义的教外人是否就热爱上帝时，阿尔诺德作了精确的回答，他说：“让人的理性去判断吧。”与此相比较，耶稣会赞扬他们熟知的“高尚的野蛮人”这一虚构作品在詹森派攻击他们的传教方法、攻击殖民地当局和出售白兰地酒的皮毛商人的残酷无情时保护了耶稣会。^[51]总之，他们产生了对中国的幻想。中国是一个未受到基督教洗礼的国家，然而她信仰真正的上帝已达两千年之久，而且发展了一整套可供基督教吸收的礼教习俗和语汇。启示与自然宗教在这一点上互相冲突，对天主教来说是件不幸的事。索邦有个充斥着詹森派的委员会，对勒·孔泰神甫的《关于中国的新回忆录》进行谴责，这种谴责加上1715年罗马教廷的宪法，很可能挡开了对教义完整性的一次威胁。然而对启蒙运动来说，耶稣会对此拒不承认一事却成了典型的不可容忍的愚蠢之

举。与此同时，培尔对自然道德论和自然宗教论的讨论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他认为，道德论不需要与宗教发生任何关系，不论是自然的还是启示的。斯宾诺莎的德行高尚与他的学说邪恶同样出名，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按照感情和欲望在生活，这样就使信仰宗教或不信宗教与道德无关。但在这个理性时代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培尔这种极端的结论。人们宁愿考虑自由思想者斯威夫特所作的比喻。斯威夫特听说关于三位一体论的某篇经文在一份古代的手稿中有异文后，“非常合乎逻辑地说，‘啊！假如事情就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去信奉邪教，随心所欲而根本不去理会教区牧师’”^[52]。

激怒了伯内特的天主教怀疑派，其主要的花招是想暗中破坏新教对《圣经》的依靠。按照斯宾诺莎所指的道路，第一个把批判用到旧约全书第五卷内容上的西蒙是一位天主教的辩士，而不是里南的先驱。耶稣会的作家们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段来削弱新教对教士们^[53]的呼吁。但还有其他对《圣经》中的弱点感兴趣的人，就如托兰，他把《新约》的原作者问题与《国王的形象》的原作者问题相提并论，还有如贵格会教徒，他们欢迎人们去发现那些会毁灭灵魂的错误内容，从而使人们免于受害。试图把人们从《圣经》推向罗马教廷传统的设想，很容易遭到失败，而对宗教狂热派、自然神论者和不信仰宗教的人有利。因此，波舒哀谴责西蒙的文章，法国神学家们赞扬圣公会教士们对耶稣会教士怀疑尼西亚长老们一事所作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公会与法国天主教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比他们共同仇恨那种怀疑宗教教义的手法和共同仇恨耶稣会教士更为有力的关系之上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领袖们由于都尊重无私的学识正在互相靠拢，甚至在他们的争论中也在靠拢。杜姆·马比荣给修道院图书馆推荐了圣公会神学家们的著作；圣公会教士们用奥拉托利会会员让·莫兰的研究成果为该会的正确性辩护；勒·克拉克进入了阿弗朗什主教于埃的辩护人的行列，该主教在希伯来语研究的某一点上惹起了布瓦洛的仇恨；耶稣会博兰派教士丹尼尔·凡·帕本布洛克在对峙双方学者的喝彩声中否定了圣乔治的龙和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丹尼斯的头是可以取下来的。西皮翁·马费伊发现他在1710年写的《行为的科学》一书触犯了克雷芒十一世，但是他不退却：他说，教皇是宗教和道德的裁决人，“但就学识和语文学来说……教皇又一次与其他人一样，暴

露出他是错误的”^[54]。英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们（前者如希克斯和沃顿，后者如斯蒂林弗利特和科利尔），与教皇至上派相反，热衷于证明英国国教是从撒克逊时代延续下来的，而且，不同于不信奉国教派，它一直受一位主教团任命的主教管辖；然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宗教的研究，是为了把他们的精神贯注于争论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就成了他们醉心于学术的宗教上的借口。明知西蒙抱有阴谋的目的，但并没有吓住新教徒们在《圣经》方面追随他的观点。勒·克拉克比西蒙更进一步大胆地对创世纪的原作者问题提出了假设。一位名叫坎佩奇乌斯·维特林加的正统荷兰加尔文派在某些技术方面做了完善工作，使阿斯特律克最后于18世纪中叶得以解开关于旧约全书第5卷的主要疑团；而托马斯·伯内特则由于机智地证明了“摩西的全部福音不过是假设而已”，从而博得了赞扬。波舒哀谴责西蒙，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西蒙的学说会给不信奉基督教的人提供可乘之机而感到遗憾。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欧洲的良心危机”正在创造一个学术界，对于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可以就取得思想一致的先决条件和标准进行辩论而言，此举尤为重要。联系到随后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波舒哀的胜利是暂时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波舒哀抛弃了西蒙的学说和怀疑论的辩护，以一种诚实、明确和暂时有效的方法，运用学识来反对新教派。他所著的《新教各教会的演变史》（1688年）是理性时代一部有永久价值的作品。这部作品是由把历史的嘲弄和复杂性置之度外的一个方法论者所创立的、一种高度符合逻辑的完整学说。其基本原则是，真正的教会的教义永不改变。这是与自然神论的原则具有同等水平的一种理性假设，认为必须同时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获得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事实上，波舒哀和英国自然神论者，是在一个没有发展也不容许承认真理可能是在多方面的抽象世界里创造、演绎、推理。启示的推究和“新哲学”已使新教的辩护者倾向于进步和发展的论点，他们高兴看到观点的分歧，承认教义的演变性，坚持“上帝不能同时把一切恩惠施与人……神的意志显得愈来愈伟大”。他们回避提到自己那种挑剔苛求的诽谤，以此来应付天主教和自然神论的对手。写出以上这些话的作者约翰·爱德华兹^[55]是英国国教的一名加尔文派教士。认为发展是必然的那种观点，并非完全是启蒙运动否认原罪的结果。

启示与关于千禧年的科学幻想之间的关系密切是这一时代的特征。宗教与“新哲学”，虽然它们的方法不一样，但被看作探究整个宇宙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在受到冲突危险的领域内，教士们一般对情况了解得及时，并采取谨慎的态度，例如当培尔对于预言、贝克对于巫术、沙夫茨伯里对于伦敦的法国先知们加以讽刺的时候。人们有节制地使用着从圣迹中得出的证明。由于假定大自然的一般规律是造物主光荣的最好反映，遂使天意与物质的宇宙协调起来。费奈隆心目中的上帝指引着遨游在太空中的星辰，犹如牧羊人照管着他的羊群一样，而约翰·雷则在他文章的开头写道：“主啊！你所创造的万物是如此之丰富多彩！”这些都是宗教辩护派和宗教与科学相协调的主题的典型说法。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使宗教与科学协调发生麻烦的话，那一般都是一些老的而现在又被扩大了的问题。假如地球是偶然产生的，又该怎么办？卢克雷蒂乌斯根据地壳的不规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另一个老问题引起了新的注意，即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可能还有许多世界，那么，说基督教会是独一无二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反对多世界论的争论可追溯到奥古斯丁和阿奎纳斯。他们认为，如果其他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它们就是多余的，假如和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那么它们就是不完整的。《圣经》并未提到过它们的存在；赎罪不能在别的世界重复出现。在神学家和教外思想家中，直到1700年，占统治地位的多世界论是建筑在“宇宙充满物质论”基础上的。此论认为上帝的创造活动必定会憎恶留下广大而无用的空缺，而愿意用品种无穷的物质去填满宇宙，到最后（如以弗所人所说），万物都到基督那里合成一个整体。[\[56\]](#)

重要的是，关于上帝创造活动的这一看法，恰恰就是在对宿命论的极端解释被人们抛弃的时候风行起来的。这种学说风行的时间事实上比唯名论哲学要长。唯名论哲学的结构严密，可以利用这一严密结构为上帝全能的必然结果进行辩护。荷兰的阿明尼乌派和剑桥的柏拉图派，旧英国与新英国的“封建”神学家们，米尔顿与冯德尔（甚至班扬——假如他的“朝圣者的天路历程”的第二部分能为我们作指导的话），巴克斯特和蒂洛森，都同意抛弃那种使神权的运用成为不能用普通理性的论理学来解释的教义。按卡德沃思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盲目、无知和任性的行为”[\[57\]](#)。1693年，在关于托拜厄斯·克里斯普博士（1643年去世）的一部遗作的争论之后，

英国长老派和独立派便分道扬镳了（独立派是一小部分人，他们是极端“反唯名论”长老派的最后追随者）。顽强捍卫加尔文派的钢铁般的传统的人们有两部极为著名的重要作品：《基督应受赞扬，克里斯普博士证明这是正确的》和《基督的光荣已经显露》。他们在捍卫对上帝的赞扬，捍卫上帝的光荣与最高权力。当时大多数人不是从上帝的任意意志与自然规律和人类理性互不相容的事例中去看待上帝的无上权力，而是从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中去看待这种权力。从严格的逻辑观点看，这是两种对现实明显不同的看法，即神所安排的宿命论和一般事物互相交织，这两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但表面上看来却不可调和，即使对法国詹森派那样有辨别能力的笛卡儿宿命论者也一样。他们特别反对马勒伯朗士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七天就休息了，之后就以一般的旨意而不是通过具体干预来管理宇宙的学说。马勒伯朗士的理论有许多附带条件，他对宇宙的看法非常抽象，所有的概念都与上帝以及那一帮天使分不开。尽管这样，阿尔诺德还是指责他，说他的争论已超越了“在崇拜中理性根本不能存在”这一点。

讲理性的人和赞成崇拜神的人同样都有一块不可回避的绊脚石。正如培尔所知，关于罪恶的问题否定了所有的理性主义神义论——到最后它就会否定启蒙运动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两种富于想象力的回答冲破了认为全能是上帝完美无瑕和天意不可缺少的品质的这一假设。勒·克拉克^[58]和雷使用了卡德沃思“能更新换代的大自然”的设想，认为进行物质日常活动的过程对上帝说来是件苦差使。马勒伯朗士同样用牺牲权力的方法来证明善行的正确，强调基督的人性并不具有无穷的能力，因而，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基督，他施与人的圣宠必定是局部的而且是任意的。然而，基督教哲学家们在关于罪恶的讨论中，主要倾向于用比较能被接受的方法把上帝与理性结合起来。在其他的论点中，马勒伯朗士认为罪恶来自上帝的安排，它受普遍法则的管辖；实际上它是对宇宙的高度淳朴所付出的补赎。德里主教威廉·金在他的《邪恶之源》（1702年发表）中强调：只要把创造物与上帝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各种创造物彼此区别开来，那么不可避免的“缺陷”就必定存在。他用宇宙充满物质论的原理说明上帝不得不创造一个充满物质的宇宙，而充满物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冲突。与此相似，莱布尼兹在他的《神义论论文》（1710年发表）中驳斥了培尔，把罪的根源归到永恒的真理之中，使神学成为“合乎理性”的

东西。这样，把整个宇宙（不单是人类的幸福）考虑在内，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存在的许多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从这句话我们就可看到理性注定要离开基督教多远。这不是因为这些话说得过于乐观，而是因为它们会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彻底悲观主义。假如一切局部的罪恶普遍都是好的，那么，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了。

在这一时期人们虽看到了各种向基督教提出挑战的思想，然而神学问题依然是辩论的中心，这也许是因为宗教本身正处于妥协和重新解释教义的境地的缘故。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方面。艺术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浮华和带着世俗色彩的方式被滥用于宗教，使艺术家们本能地意识到，在适合于教会的各种艺术风格与适合于宫廷和剧院的各种艺术风格之间是迥然不同的这种思想上的约束正在瓦解。一个例子是在凡尔赛的皇家教堂内，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风格融为一体，让戏剧的世俗的激情渗入对宗教的虔诚^[59]；在建筑中也可见到类似的倾向。从罗马卡洛·丰塔纳教堂鲜明的巴洛克式古典风格发展到多瑙河畔重建的豪华的贝尔迪克丁修道院。迷人而新式的爱神雕塑，教皇陵墓上雕像的姿势，只用传统的标志来表明死亡的英国式坟墓，菲舍尔·范·埃尔拉赫教堂中闪闪发光的白色和金色涂层装饰的高大祭台，阿萨姆兄弟以惊人的创造力，用甚至对歌剧院来说也过分鲜艳的那种金色和猩红色，把德国教堂装饰得五彩缤纷；这些事例说明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并且暗示在壮观的表面现象背后，不自觉的虔诚正在衰退。正如在本书其他部分中提到的（第3章第2节），从珀塞尔开始到J. S. 巴赫的年代里，出现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音乐作品。雷恩以高度的严肃态度和带着新教徒对布道和对穷苦人能在教堂内有座位的关切，来设计伦敦的教堂；伟大的建筑家们和欧洲大陆的建筑装饰家们的杰作更是大大超过了“戏剧式”。在中世纪，神圣的象征是圣迹；而在17世纪，神圣的象征则是心醉神迷。贝尔尼尼于1680年去世，但如他的“圣特里萨”那样的作品却从此成了艺术灵感的典范，它们用尽幻觉和浓淡的手法把观看者引入神秘的狂喜，引入意境的深渊。罗马的耶稣教堂、圣潘塔莱奥教堂和圣伊尼亚齐奥教堂的布满了天国之神的天花板，既是直观技术的杰作，同时还表示了对无限和对来自宽广无边的宇宙的那种曾经萦绕在帕斯卡尔脑海中的光明灿烂永生的向往。新的耶稣降生图和天使向圣母报喜图缺乏最适合于这类画面的自然和淳朴，不尊重学识和精确性，把马槽外的牛和驴也取消了。尽管如此，它们却生动地表现了神的突然

来到人世，在一道道穿透人世黑暗的耀眼光辉中，使人隐约看到了天国。

当宗教信仰控制了艺术表达方式时，这就成了“基督教最后一个向最高峰发展的伟大时代”^[60]。艺术家们不顾原先想实现“镂空花和起皱纹”的哥特式^[61]这一共同目标的设想，而各自去表达人们对永恒的向往了。然而艺术对宗教的解释必定总是有选择的，并且总是不完全的。意大利的耶稣会教士（他们是光明无限的天国这一学说的创始人高利和波左的庇护人）主张用帷幕遮住骷髅后进行默祷。人们不禁会想到，基督教随后几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来自用不同的方法表现神的超然存在，而它们的基本一致之处却在于他们都无法不注意我们人类本身条件的种种事实。

不言而喻，宗教的目的在于影响这种条件。任何一代人的道德准则总是要把社会环境和思想上预料到的情况考虑在内的，这一点即使不那么明显，但也是确实的。因而，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基督徒品行的体现者，诸如由传教士、诡辩家、虔奉宗教的传记作家和宗教宣传家所树立的那种绅士、买卖人、士兵和教士等理想中的人物。对我们这段时期基督徒生活的这类解释者来说，似乎上等人 and 学问高深的人面临着一种势不可当的诱惑。由于文艺复兴而又流行起来的禁欲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高尚而不充分的道德观，而让福音去管来世的事。基督教道德学家坚持认为，外教人的美德是建立在内心的自尊之上的；必不可少而又合乎自然的感情和欲望应该用意志来约束，而不是用理性去抑制。加图遭打后，他否认他的灵魂受到损害；基督受打后，他宽恕了打他的人。所以，马勒伯朗士总结了文艺复兴的新禁欲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悬殊差别。^[62]雅克·阿巴迪用这种差别生动地描述了欧洲大陆新教徒可尊敬的品行，而蒂莫西·诺斯、卡普顿·艾洛夫，特别是斯蒂尔，则为英国人进行了这种描述。在《基督徒英雄》（1710年）一书中，斯蒂尔特别提醒他的读者们说，他不是“夸夸其谈地讲禁欲主义的人”；人们应该凭良心做好事，不为求名之心所动摇，除非“让你的光照亮他人”这一格言使你做的好事不得不公之于众。^[63]在英国，不久后为虔诚派的影响所控制；在德国，人们称之为清教主义的自传传统补充了基督教的伦理陈规，它对许多宗教行为与清教主义教派距离很远的人们有影响。出于对人们内心灵光的崇敬，贵格会出版了许多杂志（包括乔治·福克斯的杂志——

1694年）和临终遗言集。班扬认为自己肯定会被上帝选中而充满了感激之情。巴克斯特出于对其妻子的爱而写了“应该用我在未成熟时期所犯过的错误和失败”，用使他永远真诚地感到遗憾的偷吃禁果的“故事、寓言以及古老传说来提醒年轻的基督徒”^[64]。对这些作品的作者来说，它们属于新教讲忏悔的一类作品；而对读者来说，它们是取代记载圣徒们生平的作品，但仍然保留了天主教式的虔诚。从这些出版物中所讲的关于遇到和克服的道德困境来看，它们是一种从技术上进行诡辩的取代作品。正如杰里米·泰勒所说，新教徒在这方面很贫乏，而且“在罗马的库房之外，不能充分地得到这种货色；因为虽然……可以看到许多极好的商品，我们却已经发现商人们是骗子”^[65]。英国神学家们从未为“绅士们”出版过一本全面的诡辩术指南。人们想到，这类内容最终将会在艾迪生的作品中发现。

在法国，贵族阶层的基督教陈规比英国人的“基督教英雄”更为微妙。虽然在1685年，方济各会的埃利多尔神甫依然集中火力反对禁欲主义，但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与基督教竞争的时髦倾向。人们正在给“享乐”重新下定义，并使之超俗，以伊壁鸠鲁取代塞内加。另外还存在着由于选择那种为天主教所保留但为新教所抛弃的完全放弃世俗的做法而引起的混乱。假如马勒伯朗士是正确的，所有基督徒的天职是静修，那么人待在世界上就需要有一种职业，而“世上正直可敬的人”却总是走在滑溜的路上。所以他们用祈祷的方法（在这方面巴克斯特认为罗马天主教徒要高明得多）和不断接受善于决疑的听忏悔的神甫的指导来修行。如果公正地对待费奈隆教育论文中所说的“美好、和善和崇高的宗教”，公正地对待愤怒的詹森派称之为莫利诺的虔诚传统，那就必须记住，它是以严格的指导和赎罪的背景作为前提的。这种上流社会习惯性的虔诚的传统，来自圣弗朗索瓦·德·萨尔所写的“导言”（因为读者们做不到他在《论上帝的爱》中所说的）中为人们描绘的那个“正直可敬的人”，此人坦率地接受世俗的荣誉，就像来自秘鲁的冒险家，船上装满了银子，但可以在他的货物上再加上珍奇的猴子和鹦鹉一样。^[66]然而，基督徒的这种温文有礼的概念，即使它是一种真正虔诚的开端，也不免失去宗教的价值。凡尔赛是个道德败坏的地方，当路易十四改邪归正，成为虔诚的教徒时更是如此。1688年，拉·布律耶尔注意到一位典型的朝臣的变化时说：“他是信仰时髦的，他的一切行动都按时兴的去做。”但是除凡尔赛

的道德下降外，在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忏悔所要求的严厉性都值得怀疑时，“正直可敬的”基督徒的典型概念也就注定要破灭了。帕斯卡尔给了决疑派（不管好坏）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制造了一片笼罩不散的怀疑气氛，使罗马于1679年，法国教士大会于1700年宣布它是一种最不严肃的见解。在这段时间里，耶稣会会长蒂尔索·冈萨雷斯于17世纪90年代在他自己的会内进行了斗争并击败了“盖然论”^[67]的支持者。究竟是基督教会从与世俗的妥协中得到了拯救呢，还是教会新的社会条件面前失掉了提供道德指导的手段？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是否都正确，尚有待于争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关于道德标准受到威胁的混乱背景，费奈隆与波舒哀在基督教信仰的性质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冲突。就在拉·布律耶尔对朝臣的信仰作了冷嘲热讽的描绘的那一年，费奈隆遇到了神秘的居荣夫人；1694年，当冈萨雷斯反对盖然论的书使他的耶稣会同人们激怒时，在伊西（巴黎附近）举行的神学家“大会”已经开始。会议试图为居荣夫人的寂静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和解找到可以协商的基本原则。

虽然在1695年3月费奈隆同意了伊西神学家们（波舒哀、夏龙的诺阿耶主教和圣絮尔皮斯修院的院长特隆松）起草的教规，但他们的协议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模棱两可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假如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些分歧，那么随后的无情斗争，包括出版书籍、反击、1697年要求罗马给予裁决和导致公然谴责费奈隆在他《圣者格言》（1699年）中提出的见解等一连串阴谋诡计，就会要求对那些教规作出解释。当时有两种截然对抗的思想状况，一种是坚定不移的资产阶级式的，另一种是敏感的贵族式的；在年高而又迷信的国王心中，正在为夺取权力进行着潜在和隐蔽的斗争，其中把暴力与恐惧、希望，以及曼特农夫人^[68]的不可信任等交织在一起，还有像过早地出版《圣者格言》引起的误解使波舒哀产生疑心而感到恼火。然而对于这一切苦难，只有把一切危急问题归咎于争吵双方的高级教士，才能使人理解。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争论的实质在于当某个人在一件出于纯粹的爱心而做的事情中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时，是否能自觉地把他的永生幸福置之度外。对波舒哀来说，寂静主义用委婉的神秘主义语言宣布了一种日常可用的宗教，这是一种显然为贵族小圈子制定的，灵性、冷漠、无情的宗教，它威胁着基督教的道德观。30年前，波舒哀以大胆痛斥宫廷的罪恶而开始了他的伟大事业，而如今，

道德比任何时候的处境更为危险。在伊西“大会”开会期间，他正在严厉谴责戏剧艺术，并将把诗歌，甚至欢笑都从基督教徒的生活中排除出去的那种可怕的见解写进他个人的手稿中去。假如费奈隆本人的资格及其重新所作的解释被忽视的话，那么，单纯为爱上帝而行善，承认犯罪是羞辱的根源，以及自愿放弃可以得救的希望等教义，只不过是给使米哥埃尔·德·莫利诺斯成为意大利社会的风行一时的听忏悔的神甫的那种掺了香料的灵性的装饰品罢了。尽管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居荣夫人，这个使费奈隆受到鼓励的人物仍被指责为不道德。对一位习惯于管理和与有形的罪恶作斗争的高级教士来说，这位带着现实主义和幻觉，带着外表温顺的固执和貌似谦逊而自以为是的奇女子，是个表面虔诚实则使人讨厌的家伙，是一个给人以神秘的安慰来代替基督徒必守的明确教规的人。

然而，居荣夫人就像一位伟人的精神指导，给了费奈隆一种令人鼓舞的基本原则，使他所追求的一切目标具有连贯性，使他的工作达到新的深度并具有独创性。她一开始的影响恰好符合费奈隆被任命为勃艮第公爵的私人教师这一职务。^[69]处在凡尔赛的虚伪环境之中，如何去指导上层贵族的良知和塑造一位皇族学生的心灵呢？何况此时，“正直而可敬的人”的概念连同作为这一概念潜在前提的决疑法，其信誉是否正在下降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并不复杂。居荣夫人告诫说，应该推翻“内心的状态”即自我的思想现状（这是禁欲主义一向侧目而视的），走向奇妙的圣宠之路；这一告诫使费奈隆极为感动。通过自我抛弃，他那融入神性的泛神论式的渴望，就有可能升华成一种可与基督教神学和谐共存的形式。假如他可以对上帝允许人去犯罪受辱的不可思议的旨意表示崇拜，那也就不必害怕全能的上帝必须对罪恶负责了。同样，这些精神上枯竭的年代，也嘲弄了那种把证实内心的确信无疑也可看作上帝所赐并予以接受的观点。首先，费奈隆为拉罗什富科的幽灵而感到心神不安，也为认识到自爱渗透到人的一切行为（甚至最高尚的行为）之中而心神不安。在这方面他与詹森派和加尔文派是一致的。他的自我抛弃学说与那两派的上帝选拔学说一样，满足了心理上的需要。凡尔赛的复杂性以及拯救灵魂本身的复杂性，都会在对上帝天真纯洁的爱之中消失。费奈隆用这种骗人的幼稚手法以及拐弯抹角和隐晦的论点来作辩解，而波舒哀担心的却是道德受到贬低，“欧洲的良心危机”中有关思想和伦理方面的内容遂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虽然事实上罗马教廷在1699年3月对费奈隆的谴

责极为轻微，波舒哀的胜利就像他的许多次胜利一样，对天主教来说犹如一次失败。据说，唯一获利的是通过审理这一事件扩大了权力的教皇和那些外教人。他们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纯爱德学说竟然为大量不宽厚的作为提供了机会。当然，费奈隆用狡猾的小聪明和间接的手法使自己站在正确的方面，并且高明地使用了“卖弄的谦卑”。更为恶劣的还在于波舒哀的做法，他含沙射影地、不可宽恕地使用机密文件（莫城之鹰）把流言蜚语散布给他的侄子，此人是他在罗马的代理人，犹如一只食腐肉的乌鸦。^[70]就其理智上的影响而言，这一争论对于宗教是一场灾难，按照费奈隆的观点，对生活带着“个人主义”“感情”的态度可以纳入天主教的信仰及其行为的模式中去。假如不受到干扰，他很可能去做一名圣弗朗索瓦·德·萨尔做的事，把神秘主义的做法与一般人信教的各种行动联合起来；他还可能把“感觉”这一概念代替已不被重视的“忠诚老实”移植到基督教的道德陈规中去。波舒哀阻止了这种做法。“感觉”这一概念在18世纪又一度出现，为在坎布雷大主教看来应该革出教门的那些目的服务。大主教在卢梭之前半个世纪就以他自己的直觉发现了感觉的感情力量。

寂静主义不限于一种宗教团体或社会环境。与此不大相同，在费奈隆看来，寂静主义的这种思想态度，可以为一个充满世故和道德上进行妥协的世界提供一种补救办法，因为它与其他一些看法有着简单的近似之处，因而在社会的其他集团中赢得了地位。居荣夫人在她的晚年接待了来自苏格兰的朝圣者，他们抱着极大的热诚和甚至比她本人更偏执的激情到她那里来信仰寂静主义。在德国，费奈隆的学说比较顺利地受到了虔诚派人士的注意。但是在信奉新教的欧洲，唯一深受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宗教团体是公谊会，激励该会的力量来自公谊会本身。罗伯特·巴克利在他为“把蔑视世界的贵格派召来的人们”所写的“辩护”中，想用原罪的概念把福克斯的基本神学与正统观念结合起来，他声称人的堕落是由于本人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意志激起上帝所赐予他的内心灵光所致；因而崇拜上帝实质上是被动地侍奉上帝。这种看法在一段时间里曾为公谊会的一些会议所接受，并在抑制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预言家式的热情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71]

寂静主义在新教各界中的传播受到了另一种更能引起兴趣的学说的限制。在信仰与善行两者之间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稳健派总是认为两者都不可缺少：争论的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假如这样的

话，寂静派是站在信仰这方面的，而在该世纪末，新教教会则决定恢复善行的重要性。如果说理智和正确的行为不是宗教的核心，也至少是宗教的支柱和最明显的证明。虔诚主义满足了这一需要，而且它拥有淳朴、个人主义和感情主义这样一些能给寂静主义增添魅力的特点。虽然这种思想的发展运动在荷兰和德国加尔文派中，以及在巴拉丁领地的让·德·拉巴迪的少数门徒中都有其先驱人物，然而它的主要根源却来自德国，那是出于对枯燥无味，但得到官方承认的路德派教义作出的一种反应，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根源可追溯到路德本人的赞美诗学传统和像耶稣会教士弗里德里希·冯·斯皮那样的一些天主教神秘主义诗人。P. J. 斯彭纳（1635—1705年）所写的《纯洁的愿望》（1675年）成了寂静主义的基本文献，而普鲁士的哈雷大学则成了它的智能中心。斯彭纳用“纯真信仰的象征”的名义使“善行”免遭贬低；再加上祈祷，就成了我们内心“使灵魂得救的灵光”的标志。这种说法能为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他们在教义上有何分歧）所分享。斯彭纳的门徒和哈雷大学的第一名希腊语教授A. H. 弗兰克带头进行实际推断，他创办了“圣经学会”以鼓励各所学校和孤儿院，并推动外国传教团体都来参加。虔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提倡提高个人精神和道德的学说，它没有直接介入当时的思想大辩论，但其本身的前提对“理性的”宗教就是一项重要贡献。斯彭纳是宽宏大量的。洗礼、信仰和善行把所有的基督徒团结到一个无形的组织之中，这就是唯一真正的教会。也就是说，人的权力，不管是教皇的权力还是路德的权力，假如不能证明它的命令是根据“上帝明确的旨意”而来的，那么它们就对谁也没有约束力。教义的本质总是一样的，然而不断地在新情况的压力之下发展着。宽容的人和宇宙神教的信徒们拒绝人的权力，而虔诚主义则包含了某些思想观念，它们以世俗的形式在启蒙运动中获胜。这些带有感情和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还包含着后来反抗启蒙运动的力量。虔诚主义竭力强调个人转变的观点后来传给了韦斯利，其时在德国本国该运动就开始瓦解成个人小圈子的狭隘热情。这种复杂的意向是一种头脑清醒和有见识的手段，它使斯彭纳能同时满足他的宗教界同辈们许多迫切的要求。

虔诚派由衷地关心平民世界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再生者的历史》与《圣人传》这两本书是虔诚派道德教诲的标准来源，其中包含着农民和女仆们的思想经验。弗兰克坚持对儿童和穷苦人进行教育，并获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是在普鲁士，人们不得不承认腓特烈·威廉

一世深知有文化的人在军事上的用途，犹如平民学校在宗教上有价值一样。基督教关心地把受教育的机会扩大到更多一部分人口中去这一做法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是明显的。英国有它自己的慈善学校运动；在法国，J.B. 德·拉·萨尔（1719年去世）创办了“基督教学校兄弟会”，为贫苦和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教数学、航海学、测量学、簿记和手艺。如果说虔诚派重视教育，但在其他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它却很少有所作为，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这方面的组织机构和承担共同的责任，部分原因在于德国当时的生活环境没有遇到新的挑战。只是在政治动荡、社会与经济变化迅速的英国，宗教思想家才要设法解决那些“现代的”实质性问题。

在一个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国家里，政府在保持道德水平中应起什么作用呢？顽固的科西莫三世统治下的托斯卡纳和“改革会议”仍在执行禁止奢侈浪费法律的日内瓦，都是不合时代的幸存者。从理论上，英国当时的法律能制裁亵渎神明、妓院、诅咒和主日不做礼拜，教会法庭于王政复辟时得以恢复，并拥有革出教门的权力，因而道德戒规在英国具有强制的力量。但所有这些偶尔还使用的陈规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一星期7天内也就只有一天遵守罢了。1710年，有一位外国人在伦敦度过了一个阴郁的星期天之后说：“我想，这也许是人们唯一可见到的英国人自称为基督徒的根据了。”^[72]英国人的共同意识表明了这一事实：正是在“光荣革命”时期，不道德的行为甚为猖獗，其时对圣人统治的反抗也得到了发展，罗马教廷的恐吓带着替天惩罚人的口吻；与此同时，戏剧界的放肆行为也引起了公众尖锐的非难。由于公谊会仍在婚姻、贸易、衣着和娱乐（甚至发展到在阿伯丁禁止高尔夫球）方面用会规控制人们行动的那种做法已经过时，因而不能不建议在道德问题方面更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警察力量。由于受到皇室提倡的鼓励，成立了许多组织，其中有些是宣传思想道德教育的私人会议，如韦斯利派参加的牛津会议；其他的还有“礼貌改良学会”，它公开约束人们的行动，利用告密人使已经过时的法律机构发挥作用。像夏普大主教那样的高级教士不赞成使用告密人这种方法来代替真正的教会纪律，而萨谢弗雷尔博士的名望部分是由于他捍卫了饮酒的英国人的权利，反对（告密人）这些“讨厌的马蜂”。在这一场有远大前途的宗教合作和改良运动中，“礼貌改良学会”只是代表了不大吸引人的那一方面。除了艾迪生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光荣”

[\[73\]](#)的慈善学校运动之外，还有托马斯·布雷于1698年和1701年成立的“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及其派生的“福音传播会”。在僧侣统治的同时，新教教会开始建立各种从事教育、传教和宣传工作的强大宗教机构。这些机构起到了天主教宗教团体所起的某些作用。在人们带着惊人的迷恋状态阅读贝尔纳·德·曼德维尔学说（该学说认为爱奢侈是一切进步之本）的时代，这些措施符合了新形势的需要。国家应该“针对罪恶而镇压罪恶”的那种观念正在消失。

英国宗教思想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基督教的原则与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同辈都同意社会必须是由僧侣统治这一设想。蒂洛森说，戴夫斯由于拒绝救济拉扎勒斯而受谴责，不是由于他的餐桌丰盛，衣着豪华，因为这种富有只要本身与他的财产和地位相称，而又不是没有节制的话，那是值得称赞的美德。[\[74\]](#)人们也公认，世人在一个买卖的环境中活动，买卖本身就有它必须做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要付利息的借贷是正当的做法，并且必须当心遭到竞争者的反对。理查·海恩斯因为“贪婪地”为一项发明取得了专利而被浸礼会开除出教是一件不合时代的事。一个人有责任使他从事工作的地方繁荣。按照一种流行的宗教手册所说，“买卖人关心的和应做的事情就是在神对他的感召中侍奉上帝，并做得愈多愈好”[\[75\]](#)。但是，基督教的作家们把一手给予世人的东西，又用另一只手把它都拿走了，因为他们认为必须选择最有助于拯救灵魂和公众利益的感召。在承认一个人的生活符合其地位和身份是无可非议的同时，他们又坚持认为这样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其财富的管理员罢了。正如1691年巴克斯特谴责市侩们时所写的：“他们对自己财产的无神论错误观点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以为可以用他们的财富为所欲为。好像他们不知道除了上帝所做的事是恰当的以外，世上根本不存在绝对恰当的事。”[\[76\]](#)所以，财富带来义务，要赈济一切有困难的人，要亲自关心你所雇用的人们的生活，从特权与义务相平衡这一观念出发，像巴克斯特的《基督徒指南》和斯蒂尔的《商人的感召》这类书籍，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建立了一套详尽的决疑法，即商业决疑法，这是英国教士从未为总的基督徒生活建立过的。在供与求、“公道的价格”、买主的“幻想”、必须和“不熟练”方面，在橱窗布置和高利贷的限度方面，巴克斯特和斯蒂尔是聪明、现实和品格高尚的。可是他们走的道路很窄，它是一条布满与世俗妥协的泥泞的路，

是一种把左右两方面的顾客都引来的宗教之路。当笛福大张旗鼓地宣扬家务和商业的决疑法时，他的做法比较粗糙，并且缺乏他在其他方面，例如在使清教徒的自传世俗化中所显示的才能。^[77]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对宗教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引起的问题可以作出直截了当的答复，也不能拒绝同情像笛福和耶稣会的禁酒主义者那样做得太近乎极端的人。费奈隆在凡尔赛遭到了失败，而伦敦的商人也未必会紧跟巴克斯特。一般的基督徒口头上赞颂圣人而向僧侣统治集团稍下层的僧侣去寻求指导，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妥协办法，包括必需的和不合理的。这就是我们研究宗教史和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内容。为艰辛困扰而不能自拔的斯威夫特以受虐狂者的嘲弄态度概括地观察了他当代的全部妥协办法。他说，他是在捍卫“名义上的”基督教，而不是在捍卫“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宗教在远古时代（假如我们能相信那些时代的作者们的话）曾对人们的信仰和行动有某种影响，而如今，一段时间以来，它已被“公认应该完全抛弃”，因为它与我们目前的财富和权力结构完全不相协调。^[78]

（王恩光 谢琬若 译）

[1] T. E. S. 克拉克、H. C. 福克斯克罗夫特：《吉尔伯特·伯内特传》，剑桥，1907年，第214页。

[2] 参见本书原文第337—338页。

[3] L. R. 卢伊特：《彼得大帝与波兰的不信奉国教者》，《斯拉夫评论》第33卷（1951年），第75—101页。

[4] 1656年，伯尔尼和苏黎世曾在“第一次维尔默尔根战争”中同天主教统治的各州区打过仗；“第二次维尔默尔根战争”开始于1712年，当时由于要从施维茨修建一条“天主教大道”直通奥地利边境以及圣加仑修道院院长的无理行为，激怒了伯尔尼和苏黎世。见E. 邦儒尔、H. S. 奥夫勒和G. R. 波特合著《瑞士简史》，牛津，1952年，第196—197页。

[5] A. L. 德拉蒙德：《路德以来的德国新教》，1951年，第177页。

[6] F. G. 詹姆斯：《北国主教：威廉·尼科尔森传》，耶鲁，1956年，第11页。

[7] W. A. 尼特尔：《18世纪早期的巴拉丁移民》，费城，1936年，第23页。

[8] E. 卡彭特：《新教主教亨利·康普顿，1632—1713年》，1956年，第346—349页。

[9] 原载《对不信奉国教各个教派采取温和态度的劝告》（1686年），由W.C. 布雷思韦特在《贵格会教义的第二个时期》（1919年）一书中转引，见该书第128页。

[10] 参见本书第6章。

[11] 伯内特转引自N. 赛克斯著《从谢尔登到赛克》一书，剑桥，1959年，第88—89页。英国允许外国新教徒参加宗教活动的做法后来成为“和解法令”的基础，见N. 赛克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韦克，1657—1737年》一书（两卷本），剑桥，1957年，第2卷，第20页。又参见本书原文第209—210、212页。

[12] 《关于容忍的信件》（1689年）。

[13] 《关于基督言论的哲学注解》（阿姆斯特丹，1686—1688年）。

[14] 见R. 弗尔茨尔著《17世纪法国新教神学家所认为的真假教会》（1956年），第25—26、32、73、78—79页；G. 蒂尔斯：《天主教辩护派关于改革后教会的注解》，根贝罗，1937年，第167—183页。关于朱里厄，参见本书原文第218页。

[15] 见J. 亨特著《英国的宗教思想》（共3卷，1871年）第2卷，第65页。

[16] 引自K. G. 法伊林著《保守党党史，1640—1714年》，牛津，1924年，第491—492页。

[17] 《一位英国教士对宗教与政府的观点》（1708年），见H. 戴维斯编《散文集》第2卷，牛津，1940年，第22页。

[18] 见A. A. 卢斯著《乔治·贝克莱传》（1949年），第53页。

[19] J. 塞罗赫：《彼得一世时期斯特凡·耶沃尔斯基与理论冲突》，发表于《斯拉夫评论》1951年第30卷第57页。见本书原文第728—729页。

[20] 亨利·多德韦尔引自G. 埃夫里著《高教会党，1688—1718年》（1956年），第71、84页。

[21] 见H. C. 比钦著《弗朗西斯·阿特伯里》（1909年），第58页。

[22] 塞克斯：《埃德蒙·吉布森，伦敦主教 1669—1748年》，牛津，1926年，第37页。

[23] 见本书原文第356—357页。

[24]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03—409页。

[25] 南怀仁（Ferdinand Verhres，1623—1688年），清朝在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受清政府重用，取中文名“南怀仁”。——译者

[26] 见L. 冯·帕斯特著《教皇史》第32卷（E. 格拉夫译，1940年），第565页。

[27] E. 普雷克兰、E. 雅里：《17与18世纪的政治与教义斗争》（共两卷，1955—1956年出版）第1卷，第91—99页。关于西班牙的王权至上主义，见本书原文第363、376、378页。

[28]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135—139页。

[29] 见J. 默尔弗里特著《1691—1693年法国天主教争端和解的政治方面》，载《法国教会史评论》第36卷（1947年），第257—270页。并参照本书原文第161—162页。

[30] 这一争端的早期历史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132页；本书原文第133页注解②。

[31] 见M. 勒鲁瓦编《罗亚尔港》第3卷（1955年），第622页。

[32] 圣范内斯贝尔迪克丁会的唐·莫尼埃写了臭名昭著的《基督教会的问题》一书，但又不对该书的出版负责任。见塔文诺著《洛林的詹森派》（1960年），第156—158页。

[33] 经亚历山大七世批准，由法国教士大会于1657—1661年强制执行的反詹森文件，使签署者们判决科尼利厄斯那本题为《奥古斯蒂纳斯》一书中的“五项建议”有罪，并否认这些建议是圣奥古斯丁的学说。詹森派随后宣称在《奥古斯蒂纳斯》中根本没有这五项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事实问题”。

[34] 见J. E. 托马斯著《关于〈克雷芒通谕〉令的争论》（1950年），第60—61页。托马斯认为，教会无权对作者的主观看法不审而判；另一方面见J. 奥尔奇巴的文章《历史评论》第208卷（1952年），第321页。《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114—115页。

[35] 见原文第333页。

[36]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6、10章。

[37] 指路易斯·德·莫利纳（1535—1600年）学说的追随者。莫利纳强调人类自由合作。耶稣会人曾广泛地采用莫利纳主义。这一名词后来被不很恰当地用作与詹森派相对立的神学名词。它在罗马的地位见E. 阿波利著《詹森派与泽兰蒂之间：18世纪天主教的第三派》（1960年）第28页及以下各页。

[38] 见G. 西姆农著《列日的詹森派》，载《列日教会评论》第15卷第2期（1924年），第87—99页。R. 布雷加德：《费奈隆，约瑟夫·克雷芒·德·巴维埃与列日的詹森派教义》，载《教会史评论》第43卷（1948年），第473—494页。

[39] 见《欧洲的良心危机，1680—1715年》（1935年）。

[40] T. 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载J. I. 科普和H. W. 琼斯合编的《华盛顿大学研究》（1959年），第340页。

[41] 见本书原文第87—88页。

[42] 见米涅编《波舒哀全集》第11卷（1865年），Col. 974。关于怀疑笛卡儿主义导致唯物主义一事，见A. 瓦塔尼安著《狄德罗与笛卡儿：对启蒙运动科学自然主义的研究》，普林斯顿出版社1953年版，第50—73、228页。

- [43] 见《至理名言》（1693年）一文。其摘要见J. M. 克里德与J. S. 博伊斯·史密斯合著《18世纪的宗教思想》，剑桥，1934年，第23页。
- [44] 引自R. C. 杰布著《本特利》（1882年），第26页。
- [45] 见R. L. 布雷特著《沙夫茨伯里的第三位伯爵》（1951年），第46—47页。
- [46] 见A. 巴恩斯著《琼·勒·克莱克与文坛》（1938年）第237页及以下各页；P. 迪邦编：《皮埃尔·培尔，鹿特丹的哲学》（1959年），第7—16页。
- [47] 见《我所处时代的历史》（1839年），第129页。L. I. 布雷沃尔德：《约翰·德莱顿的中心思想》，安阿伯出版社1956年版，第73—91页。
- [48] D. G. 詹姆斯：《理性的生命：霍布斯、洛克、博林布鲁克》（1949年），第101—103页。
- [49] 引自B. 多布勒著《18世纪初的英国文学》，牛津，1959年，第17页。
- [50] 见卡德沃思主要的道德论文《永远和不变的道德》，此手稿保存到1713年。见J. A. 帕斯莫尔著《拉尔夫·卡德沃思》，剑桥，1951年，第40—41页。
- [51] 参见G. R. 希利《法国耶稣会教士与“高尚的野蛮人”概念》一文，载《威廉与玛丽季刊》第3辑第15卷（1958年），第143—166页。
- [52] 见《用以证明在英国废除基督教可能遇到某些不方便的论点……（1708）》，见戴维斯编《散文集》第2卷，第38页。
- [53] H. 弗雷维尔：《从其信件看理查德·西蒙与新教》，载《现代史评论》1931年第6卷第30期；O. 查德威克：《从波舒哀到纽曼：关于发展教义的设想》，剑桥，1957年，第50—58页。
- [54] G. 莫金：《1657—1750年意大利思想演变的研究》（1909年），第110—111页。
- [55] 《宗教……体制史大全》（1699年），见R. S. 克兰著《圣公会辩护派与进展思想，1699—1745年》，《现代语言学》第31卷（1934年），第284页。E. L. 图夫森：《通向乌托邦的千福年》，伯克利—洛杉矶，1949年，第75页及以下各页。
- [56] 见G. 麦科里著《17世纪的多世界学说》，载《科学年报》第1卷（1936年），第385—427页；A. O. 洛夫乔伊著《存在的巨大链环》，哈佛，1936年，第99页；R. S. 韦斯特福尔著《17世纪英国的科学与宗教》，耶鲁，1958年，第82—86页。
- [57] 引自H. J. C. 格里尔森著《17世纪英国文学的逆流》（1929年），第230页；G. R. 克拉格著《从清教主义到理性时代》，剑桥，1950年，第3章。
- [58] 指与培尔的一场争论。R. L. 科里：《灵光与启示》；《关于剑桥柏拉图派和荷兰阿明尼乌派的研究》，剑桥，1957年，第117—129页。

[59] 见N. 迪富克著《“法国岛的宗教声学”的研究》第288卷（1936年），第247—255页；W. 梅勒斯：《弗朗索瓦·库普兰与法国古典传统》，第323—324页。

[60] 见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著《德国的巴洛克艺术》（1927年），第102页。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7章；R. 威特科尔著《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1600—1750年》（1958年），第292—294页。

[61] 约翰·伊夫林（1697年）引自A. O. 洛夫乔伊著《思想史论文集》，巴尔的摩，1948年，第138页。

[62] H. 古耶：《马勒伯朗士的哲学及其宗教经验》（1926年），第397页。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78—79页。

[63] 见R. 布兰查德编（牛津，1932年）。雅克·阿巴迪（1654—1727年），一名被流放的胡格诺派教徒，他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基督教辩护人。他所著的《自知术》于1692年发表（E. T. 1694年）。

[64] J. M. L. I. 托马斯编：《理查德·巴克斯特自传》，1931年，第5页；《玛格丽特……理查德·巴克斯特之妻生平简传》，1681年；参见M. 博特拉尔《人人皆凤凰：17世纪自传研究》，1958年。

[65] 《达克托·杜比坦丁》（1660年）前言，F. R. 博尔顿引自《爱尔兰教会的卡罗琳传统》，1958年，第132页。

[66] J. A. 卡尔韦：《从弗朗索瓦·德·萨尔到费奈隆的宗教文学》，1956年，第14、50页及以下各页。

[67] “盖然论”（Probabilism）指道德神学的一个规定，即可以按照已经坚定地形成的“可能正确的看法”行事，即使与此相反的看法“可能更正确”也无妨。为了反对这一在耶稣会教士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学说，多明我会于17世纪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另一种“盖然论”。冈萨雷斯1694年发表了他的“神学道德论基础”以表示对后一种更为笃信宗教的盖然论的支持。于1665年和1679年受到罗马谴责的“放纵主义”可被看作前一种盖然论的曲解。见F. L. 克罗斯编的《牛津基督教词典》，1957年，第791—792、1108—1109页。

[68] 基本的权威是L. 科尼特，见《神秘主义的衰微：费奈隆与波舒哀之争》，图尔内，1958年。

[69] 见本书原文第327页。

[70] 见罗纳德·诺克斯著名的比喻——《热情》，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46页。

[71] A. 劳埃德：《贵格派的社会史，1669—1738年》（1950年），第123页及以下各页。见G. D. 亨德森著《埃库斯的一次寂静主义运动》，载《比较文学评论》第27卷（1953年），第263—273页。

[72] 见D. W. R. 巴尔曼著《1688年的道德革命》，耶鲁，1957年，第61页。

[73] 见M. G. 琼斯著《慈善学校运动》，剑桥，1938年，第59页。

[74] 引自R. B. 施拉特著《1660—1688年宗教领袖们的社会观念》，1940年，第121—122页。

[75] 理查德·斯蒂尔：《商人的感召》，1684年。

[76] 见F. J. 波威克编《一位穷苦农民的辩护者》，载《约翰·赖兰图书馆通报》第10卷，1926年，第194页。

[77] 见《约翰·赖兰图书馆通报》第10卷，第91页。笛福把罪恶看作不合理而不是不道德。见R. G. 施塔姆著《丹尼尔·笛福：一位具有清教徒传统的艺术家》，载《哲学季刊》第15卷（1936年），第229—232页。

[78] 《一个有待于证实的论点，基督教的废除……》，载戴维斯编《散文集》第2卷，第27—28页。

第五章 欧洲的国际关系

1688—1721年间欧洲政治结构上大多数变化都是由5次战争引起的，即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683—1699年与1714—1718年两次土耳其战争、大北方战争。这些战争一直未合并成一场欧洲冲突，表明欧洲是由三方面组成的：西欧、北欧、东南欧。当然，在这些地区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隔。有些国家属于两个或更多地区，如汉诺威和勃兰登堡属于西欧和北欧，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威尼斯属于西欧和东南欧，俄国和波兰则属于北欧和东南欧。位于一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卷入另一地区事务中的现象是常见的，几乎经常是为了调整地区内力量的平衡或防止认为是有害的改革，例如威廉三世在1689年阿尔托纳和解中的作用，1706—1707年查理十二世在帝国中的作用，哈布斯堡1716年在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的干预等。然而召集另一地区的兵力来积极推翻其他地区的现有制度或打开离本国很近的军事僵局都常常遭到失败。法国势力在瑞典和勃兰登堡、波兰和土耳其的衰退，结果导致17世纪80年代传统的“东部屏障”的崩溃，确实有助于加剧欧洲分为三个部分。在九年战争中，路易十四再也不能号召其北方盟国与之并肩作战，而威廉三世也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几支辅助部队。1700年，威廉在路易的勉强帮助下能在瑞典和丹麦之间达成维持现状的和解，但他们的共同努力在劝诱北方王国政府保证那年第二次西班牙分割条约时却无能为力。在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人有意把北方战争尽量向西引入帝国；相反，他们的敌人却力求把战争分隔开来，从而强调了当时欧洲的划分。虽然提一下查理十二世在1706—1707^[1]年的关键时刻对他们进行帮助是公道的，但在这方面，起码直到1710年他们是成功的。关于土耳其我们能查出同样的事态。同盟外交在使土耳其不干预王位继承战争上起了作用，当时路易应当在帮助拉科齐的追随者反对匈牙利皇帝上感到满足。无论1688—1714年间发生的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后来欧洲分裂成三部分也是难以质疑的。欧洲各国首都包括君士坦丁堡都逐渐成立了不可分割的单一政治结构。法国力量上的优势，中欧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巩固以及英国和俄国的出现都导致大陆上强弱力量的分布。原来只有一个力量上占优势的国家，现在则有5个

一级强国：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君主国、俄国。萨伏依和普鲁士正在兴起。荷兰共和国衰落下去了，威尼斯衰落得更加明显，瑞典的颓势也很迅猛。

1700年左右，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多少有点能力的中央政府，但在1714—1715年及其以后的几年里，许多国家也害了同样的病：在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国、俄国、瑞典、托斯卡纳和帕尔马，继承王位或者有争执或者不肯定，更不用说教皇和波兰的长期继承问题了。结果造成的各主要国家王朝的衰弱，使其中任何国家未能在政治上称霸。大不列颠确实在海上现居统治地位，而且在1688年与1713年间，大不列颠几乎自始至终参加了两次陆上大战，其规模之大是百年战争后所仅见。这对英国和大陆上的列强一样确实是个新体验，但是欧洲政治中这个新因素的重要意义还未能老年政治家们立刻懂得；路易十四花了大约20年时间才了解到这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奥尔良摄政王和杜波依斯僧院长在这方面却是不抱任何幻想。在他们那个时候，很清楚英国要留在欧洲而不只是因为汉诺威人特别喜欢乔治一世的缘故。然而，要说《乌得勒支和约》招来了英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力量优势，而且其优势与先前西班牙和法国的优势一样，那就是骗人的，因为西班牙和法国先前的优势主要是靠大陆上的军事力量优势来维持的。然而英国的卓越力量最终仍以海军为主，如果没有同盟国家，在大陆上施展其力量也不能得心应手。其最有效的外交武器是在远方任意采取行动，有了制海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无须有意识地谋划即可将全欧洲结成一个政治体系。

新体制建立在大国间力量平衡基础之上。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乌得勒支和约》公开宣称的目的在于“通过正直的力量均衡来确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这是彼此保持友谊和各方面持久协调一致的最优越最牢固的基础）”^[2]。和平文件在这个主题内容上变化多端。大国间的一种“平等”和“政治均衡”就是“公共安全的基础”^[3]。几年之内，“欧洲平衡”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外交用语，用来解释并为许多不同的安排作辩护，如荷兰屏障的调整、哈布斯堡各地的国事诏书等。我们无须仔细检查其中声明诚意的真实性，但重要的是这种用语很快就获得咒语般的性质，用来召唤人们同意或至少削弱反对者的精神抵抗。之后还依次让“合法性”和“民族自决”具有同样的威信。这种做法意味着凡关心政治的人都可接受这一原则。知识分子

以牛顿力学的想象把它推进到什么程度就不是本章范围内的问题了，但是18世纪初期确实有完全按照数学方法计算力量的平衡。为此，“政治数学”这门新科学已提供了根据。

这个想法并非来自乌得勒支的奇妙主意。它已有很长的历史。但迄今，除了在相对较小的地区（例如意大利）外，尚未在其地方实行过。关于它的直接的先例以及提出考虑并接受它的方式方法，看来这个最近的版本并非源自凡尔赛。对于路易十四来说，国与国之间“力量均等”几乎好像与他们之间的荣誉均等一样荒谬。有时路易会容许某种共管。1698—1700年，为了用西班牙分割条约维持和平，他谋求与威廉三世密切交往：如果威廉同意，他们能共同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号施令。^[4]1715年路易很明显又容纳了共管这个想法，这次是与皇帝共管来抵抗海上强国，这些海上强国正在侵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上帝们”^[5]。他也真的了解，如果法国与西班牙两国君主联合（他大概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联合）或者奥地利与西班牙两国君主联合，就会引起“妒忌”而导致战争。但是这一切不意味着接受力量均衡原则。对它的一些支持可在费奈隆的著作中找到，但直到路易死后为止，凡尔赛的宫廷对之并未真心接受。更使人惊奇的是在威廉三世致其政治密友——海因修斯、波特兰、瓦尔德克——的信件中找不到清楚说明此原则的详细内容。威廉主要从“欧洲自由”着想，路易十四傲慢的野心威胁了“欧洲自由”，路易的胜利将导致“整个欧洲被奴役”。威廉首先尽力维护众多大小欧洲国家的独立并保护某些古老机构：只有在这样一个欧洲，新教才能确保安全无事。他像路易一样，在交换领土讨论各种“相等的”时常用“均衡”这个词。后来，均衡的总原则确实包括了“相等物”，但是这两种概念要加以区别。因此，分割条约虽然是根据“相等物”这个概念制定的，却未实行欧洲普遍均衡。像查尔斯·达维南特这样的条约支持者声称说，这些条约是违反该原则的最大罪行。由威廉授意制定的大同盟条约未提到“均衡”，但谈到这样一种危险：法国和西班牙冒充“全欧帝国”以便压制“欧洲自由”。同样，1702年荷兰在宣战中只提出对路易十四“世界君主政体”的恐惧^[6]。威廉的英国臣民唱出了新调。1697年12月，下议院感谢他恢复了英国“在掌握欧洲均衡上的……荣誉”^[7]。1702年5月4—15日，安妮女王在宣战中解释说，威廉订立大同盟“以便维护欧洲自由和均衡并制止法国的超级力量”^[8]。英国一些政治作家，尤其是

笛福和达维南特，已经使用这一名词。1713年左右，安妮政府宣布其坚定奉行“这一原则……以维护欧洲均衡”^[9]。在大陆上，几乎所有早期引用“欧洲均衡”的官方文件都相信安妮是“欧洲均衡”的赞助人。因此把18世纪初期传播这一概念看作英国的胜利并将其与当时开始欢迎英国观点的风尚结合在一起是合乎情理的，补充一句说，欧洲均衡从未包括海军力量均衡这一概念，这样说是公平合理的。

实际上，运用均衡原则上意味着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君主国要永远隔开。而且，奥地利王朝脱离西班牙后要满足于取得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与南部荷兰；同时这些地区将组成一个全面屏障来抵御任何法国扩张主义的复兴；这些地区也保证哈布斯堡在西欧继续存在。荷兰从而也可在奥地利—荷兰一线自己的屏障后面固若金汤。

有一阵子，看来好像俄国势力在波罗的海扩张和德国可能要打乱北方的均衡，但在北方战争中彼得追求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要的是一段足以使其国家与西欧安全交往的波罗的海海岸。北部德国对他来说是军事行动舞台但绝非领土扩张。因此，如果在德国成立起各种联盟来阻止他的话，他完全可以限制他在那里的行动来支持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俄国取代瑞典而当上了北方主要强国，但其优势并非绝对，甚至尚未赶上瑞典初期的优势。再者彼得自己相信西欧和北欧的力量均衡，这在后来海上强国与俄国之间取得谅解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北方战争尚在进行当中，他策划了俄国—瑞典联盟；他打算避免对瑞典打击过大，原因和他支持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家族一样，怕的是过分增强丹麦的力量。这样一来，俄国的出现复杂化了，但未破坏北方的均衡。在海上强国旨在维持北方均衡情况下，均衡相当巩固。^[10]

在东南欧，继1683—1718年几次土耳其战争而来的动乱使均衡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奥托曼最末一次向基督教徒发起的猛攻使俄国和波兰抛弃了旧怨而加入了1684年由皇帝和威尼斯参加的神圣联盟。然而，基督教联盟并未从1699年在卡尔洛维茨达成的胜利和平中存活下来。对土耳其来说，最危险的战败后果是威尼斯人占领摩里亚、俄国接近黑海、在北方战争中俄国势力在波兰的扩展。但在1711—1713年，土耳其击退了俄国的威胁并于1715年收复了摩里亚。1718年在帕萨罗维茨被奥地利人打败以及哈布斯堡势力在波兰的扩展造成威胁后，俄国在法国帮助下暂时承受住了这些挫折。1739年，即使维也纳

与圣彼得堡双方合作，土耳其人也能收回他们在帕萨洛维茨的损失。这些事态说明当地的猜忌在维持东南欧的均衡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1]威尼斯、波兰（在较小程度上）、匈牙利和巴尔干斯拉夫族要为这一均衡结清旧账。1689—1699年和1718年海上列强在土耳其与哈布斯堡中间进行调解，1710—1713年他们在土耳其和俄国中间谋求和平，其主要目的是使哈布斯堡或俄国的兵力可到西方或北方。法国一贯支持土耳其和威尼斯：指引奥托曼力量反对哈布斯堡，支持威尼斯在意大利与他们抗衡。西方列强采取的这些干涉并未展现出有意专心于东南欧的均衡，然而其效果对它有利。

最需要支持的新体制在意大利。因为在那里，奥地利王朝于1707年以后在当地取得的优势危害了这个体制。恰如其分地说，萨伏依王朝的巨大收益经受了在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之间搞两面派手法的长期考验，并于1713年被指定为西班牙波旁家族的推定继承人，正式被承认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之间确保“平等”和“均衡”的枢纽。为了支持萨伏依的新任务，调解人把西西里（1720年与撒丁交换）交给了它并承认它的君主皇家称号。它还接收了蒙特菲雷特的大部分，而且法国在尼斯和萨伏依的征服地也归还了它，尽管它把巴塞罗尼特流域输给了法国。从此以后，它与法国长长的边界要从群山的主峰划起。这些领土的调整对萨伏依在意大利的前途有利，并使它对在法国南部创建一个王国的雄心壮志丧失信心。

萨伏依的日趋重要表现为17世纪80年代出现的较大动向：波旁家族与奥地利王朝之间的主要战局已从北方移到南方，从德国移到意大利。一个解释是西班牙君主问题，这是路易十四168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过了几年以后，关于西班牙的问题，路易和皇帝都不再走一贯不让步的路线：有时每个人都牺牲了原则而迁就权宜之计。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所有土地也不是都有同样程度的兴趣。当我们考虑路易在17世纪90年代提出的各种分割方案时，这种情况变得明朗了：在王位继承战争中，当命运抛弃他的时候，他又重新求助于分割方案和意大利对维也纳宫廷的成见。

无论路易走的是什么路线，他都知道，如果法国和西班牙把分歧放在一边，法国皇太子和安茹公爵很有可能在西班牙得到承认。向西班牙求爱这件事既费时又艰巨，因为（像路易以前说过的那样）两个君主国的体制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相互敌视是自然的，对他们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然而路易逐渐认为，如果西班牙把荷兰让给法国来换取鲁西永，可以先达成长期和解然后再结为同盟：“这样一种和解将是我的臣民们为我供奉的最隆重款待。”^[12]为了使方案更加动人，他准备放弃其老同盟者——葡萄牙，甚至资助西班牙向葡萄牙宣战。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费基埃，1685年到马德里为承认法国皇太子的声明准备条件；1688年他死后，由他更精明的儿子雷贝纳克接替。为了支持这一外交手段，大部分法国海军在1688年都在地中海——这是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发生一系列事件时的一桩重要大事。在九年战争中起来一致反对路易的列强中，路易最不愿意同西班牙作战。他曾尽力想和西班牙谈判达成一项中立条约，即使只限于其部分领土。只在这些花招都失败以后，维也纳人的势力在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王后死后才在马德里开始占优势，他才向西班牙宣战。战争即使爆发也未阻止他在意大利和西比利牛斯山脉寻求与西班牙达成局部停火。

即使只是由于地理和战略的缘故，意大利在任何哈布斯堡一波旁家族的争议中也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但是直到九年战争时路易才制定一项全面一贯的意大利政策。1691年两名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士，阿斯费尔男爵和雷贝纳克，被分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经常奔走，阻止同盟国发展。在德国的使命收效不大，但在意大利，雷贝纳克的工作后来使路易能拆散反法联盟。除萨伏依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各邦都有理由害怕半岛上发生战争可能危及他们的独立。那里的皇家部队的分遣队不足以与法国正面作战，但可以吓唬意大利人而有余。机智地利用他们的恐惧心，路易可以建立起一批善意的中立国，如果他自己断然放弃公开侵略意大利的话。1692年雷贝纳克与帕尔马、摩德纳、曼图亚和托斯卡纳议订条约；这些公爵领地同意允许法国军队自由通过；如果皇帝或其同盟者向他们进犯，法国答应给以援助。威尼斯和教皇由于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势力增强一定要蒙受最大损失而同意旁观。为了取得全部利益，路易仍须争取萨伏依公爵。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在九年战争中正在谋求细致而有限的目标：收复被法国窜犯的土地，从卡萨莱把他们赶出去并占领比内罗洛——这是直指都灵的一条狭长地带。^[13]路易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来满足他的夙愿，而且他在别的和平试探手段失败后，也是这样做的。1696年6月29日的都灵条约拆散了反法联盟。

路易正在注视着南方的时候，其北方目标逐渐变得灵活多了。1693年他准备让巴伐利亚的马克斯·伊曼纽尔升任为西属荷兰的君主，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谣传曾惹得他在1685年威胁要进行战争。1693年后，虽然法国在东北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路易却出人意料地轻易放弃了他在17世纪80年代的许多征服地和重新归并之地；他同意让荷兰人拥有其屏障；他放弃了卢森堡并几乎也放弃了斯特拉斯堡。这一新安排为1697年的《里斯威克和约》奠定了基础。

1697年底，路易又恢复了他1685年的威胁，但这次是针对米兰，不是荷兰，因为有任命奥地利大公查尔斯为米兰人总督的谈判。几年来，路易相信皇帝想在意大利扩充他的领地。1698年3月，正当蓬波尼首先提出西班牙继承波特兰这一问题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么一种危险：如果皇帝掌握了西班牙，“他就一定自封为全意大利的主子并（使其权力）在帝国内独裁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都得惧怕他那过分的权力”^[14]。在导致1698年和1700年分割条约的谈判中，对西班牙及其荷兰或殖民地的争论不多，几乎所有讨价还价都针对意大利内的西班牙领土。在那里，法国皇太子有其一份继承权，甚至用其某些部分与洛林或萨伏依与皮埃蒙特交换的方案也要求法国在意大利的坚强地位。1710年，当路易愿在任何条件下求和时，在整个西班牙君主体系中他只企图为菲利普五世保留西西里和撒丁；菲利普不听不是他的错误。也许政治上的考虑因感情因素而强化：起码有一次他说意大利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15]。他还有一个使人非信不可的全神贯注在意大利的原因。由于法国教会意见分歧，再加上教皇拒绝把授职训令送给1682年以来任命的法国主教们，他领土内的内部统一将被破坏。首先，詹森主义运动（在他看来）给路易带来最棘手的问题，没有教皇的帮助，他自己解决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教皇的帮助对于在西班牙建立亲法党派也是合乎需要的。而且在九年战争初期，路易摆出一副天主教信仰的保护人的姿态“来反对为了消灭这种信仰而由新教王子们成立的联盟”^[16]。在此情况下，他再与梵蒂冈争吵就不合算了。他威胁要用武力反对英诺森十一世这个正直的人却徒劳无功，而且在英诺森去世（1689年8月12日）后，他与教皇世系打交道时采取了较温和的方法。在1689年和1691年的秘密会议上，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协助亚历山大八世和英诺森十二世使之获选。这两位教皇愿意与路易达成协议。然而当时梵蒂冈在与法国宫廷谈判中抓住了所有王牌，

而1693年达成的和解只不过是法国国王的毫不掩饰的投降。至少路易知道从他的屈服中如何捞取最多的好处。英诺森十二世成为意大利中立的最重要拥护者并支持了法国的和平建议；后来他把法国皇太子是他的合法继承人的意见告知卡洛斯二世。他不是詹森主义者的朋友，他的接班人克雷芒十一世大体上在王位继承战争中偏袒波旁家族，支持老觊觎王位者并且是詹森主义的死敌。

路易当然不是独自一个往南看的。早在1689年，威廉三世就说过要派一个海军中队前往地中海，主要是保护同盟国的贸易。随着九年战争的进展而且他对在荷兰作出有利的决定丧失信心，通过萨伏依进攻法国越来越使他蠢蠢欲动。这一行动在地中海需要一个联合舰队，也可提防西班牙不认真使劲，抵消法国在意大利外交上的成功，克服萨伏依的摇摆不定并煽动维也纳更积极进行战争。威廉从总体上看战局并看出远在他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陆地和水域的重要意义。这样他就有充分条件进行分割条约的谈判，在谈判中他可以评价像直布罗陀这样的地方并为将来像葡萄牙联盟、加泰罗尼亚行动、夺取米诺卡岛等事业打下基础。威廉的政治追随者们如马尔巴勒和海因修斯，对地中海冒险行动提供最大支持上一向毫不犹豫。使海上强国在商谈大联合中处于优势的正是这个统观全局的远见而并非其经济力量。他们最重要的同盟者是皇帝。1689年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签订条约时，威廉必须答应一战以便恢复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与比利牛斯山脉的和约，敦促选举约瑟夫大公为罗马王，支持奥地利对整个西班牙继承的要求。他毫无热情地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他需要皇帝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经萨伏依进攻法国特别需要皇家部队，而且威廉指望利奥波德遏制梵蒂冈，如果教皇主张意大利中立或其他对法国有利的措施的话。因为海上列强已承认维也纳的要求，所以维也纳就派遣1.2万人到西部作战，然后迅速折回对付土耳其。《卡尔洛维茨和约》直到皇帝觉得谈判分割西班牙君主体制要危及他对西部的要求时才签订。然后他表示给卡洛斯二世以军事援助，助其保卫他在意大利的土地。1701年必须恢复大同盟时，利奥波德一心想得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经多次争吵，海上列强默认了他的要求，很明显是在马尔巴勒建议下默认的。虽然接连不断有危及哈布斯堡领土的心脏的现象来自各方，但利奥波德及其接班人约瑟夫一世（1705—1711年）却把力量集中于意大利战事，根本放弃了查理大公，并把他交给了海上列强。后来1703年列强把他安放在西班牙的王位上。

早在1700年，利奥波德调查了一下意大利国内过去的皇家领主权，约瑟夫一世对这些权力的兴趣比其父更为突出。这些举动得到了克雷芒十一世教廷的附和。克雷芒在其私生活中是虔诚的、稳重的，喜爱追求学问。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他首先是教皇领地一位能干的行政长官。他曾想把意大利国内罗马教皇的古老领主权恢复起来，这些权力在当时与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样早已废弃不用。^[17]从封建历史中追寻帝国权利的举动不能不提醒意大利各邦（它们已被波旁霸权的前景吓坏了），它们的态度很能说明意大利战场上的政治不稳，而在解决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这是至关重要的。

接受卡洛斯二世遗嘱严重挫伤了法国的外交。1700年11月14日以前的外交手段是针对严格执行分割，大部法国使节都接受指示要尽量与其英国和荷兰的同事们在商谈中采取一致行动。从那天以后，这些关系很快松弛下来，而当时生效的大多数条约和各种完成阶段的条约都必须重新谈判。从那以后，法国外交受到路易十四的无限的成功前景的妨碍，后来又受到他显然即将发生的崩溃的妨碍。除口头上保证继续友好外，路易并未设法减轻他的意大利朋友和葡萄牙对波旁霸权的忧虑心情。1701年，恐惧使萨伏依和葡萄牙与法国结成联盟条约，但其对路易十四的价值则是可疑的，因为皇帝可以减轻压在萨伏依头上的恐惧心情而海上列强可使葡萄牙产生更大恐惧。不久路易对萨伏依施加的高压手段于1703年底把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推入对手的行列并威胁到在意大利北部的法军地位。葡萄牙出现了另一种问题：新近在巴西发现了金矿使它对大西洋上的同盟国的舰队支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而且，路易可能已认识到把葡萄牙在加利西亚或埃什特雷马杜拉的边境扩展（如他曾在1692年想要做的那样）而不招致西班牙反抗是不可能的。他无须拿着让葡萄牙中立的提议等到1703年4月，这种中立正是国王彼得二世早已要过的。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因为邮递混乱，路易的提议暴露了；提议错投到马德里，退回巴黎，然后送到里斯本，这正是第一次梅休因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18]

路易十四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方面的错误，使同盟国能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攻击波旁家族。要不是马尔巴勒在1706年5月于拉米伊的胜利和菲利普五世在1705—1706年于西班牙的败北，路易可能在意大利加快军事决定（他很明显是这样打算的）。1707年路易牺牲了意大利后即可帮助菲利普渡过难关，其余由菲利普的西班牙臣民来完成。从意大

利排除法国的压力几乎瓦解了大同盟。荷兰和英国的贸易界要求集中进行伊比利亚战争，而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则被皇家部队占领米兰和蒙特菲雷特所激怒，这是路易十四的附庸曼图亚公爵的领地被萨伏依公爵据为己有造成的。维也纳正一心想很快征服那不勒斯，以后的战事就听之任之了。只在“卡洛斯三世”1711年成为查理六世皇帝时，哈布斯堡允许各州政治上独立的政策才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使同盟中其余各国不禁要问，他们是否在为恢复查理五世君主体制而战。

同时，教皇就剩下孤身一人抵挡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胜利的进展。他甚至比他的前任对巩固其地位的每一步骤都更加敏感。克雷芒十一世自己的政策使其成立意大利联盟的企图失败了。1708年，当教义上的武器失败时，他打算武装反抗，但最后由于害怕德国兵（很多是新教徒）可能像1527年那样夺取罗马而退缩了。1709年初他被迫承认“卡洛斯三世”，几年后当调解者们处理了教皇在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封地而未关照他的时候，他又蒙受了一次耻辱。随后，1714年土耳其与威尼斯二次开战提供了挽救他的政治领导的机会，但是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法尼丝及其大臣艾尔维洛尼（来自帕尔马的一名教士）利用教皇的计划于1717—1718年掩护西班牙进攻撒丁和西西里。这个《第四次十字军东侵》的18世纪版本把教皇的雄心壮志损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意大利最古老的世俗国家威尼斯在无法阻挡哈布斯堡上和教皇一样。1716—1717年，只有尤金在巴尔干的胜利才使共和国逃脱土耳其的报复而只损失了摩里亚。从那以后，她就任凭哈布斯堡的摆布。在曼图亚和米兰，在北方，甚至在达尔马提亚等地哈布斯堡都与她对峙过。更糟的是查理开始发展的里雅斯特港。萨伏依虽然在乌得勒支受益匪浅，但尚不能与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势力抗衡。[\[19\]](#)

《乌得勒支和约》以后，在意大利不能建立有效的均衡和查理六世决心维护其西班牙称号，都有深远的后果。第一，这些因素造成1715年路易十四达成波旁—哈布斯堡联盟计划的失败，大“外交革命”必须等到1756年。第二，虽然意大利各邦多数政治联合以削弱哈布斯堡收效不大，但是意大利却为伊丽莎白·法尼丝改朝换代打下了基础。直到腓特烈大帝在德国上台为止，伊丽莎白·法尼丝一直是欧洲均衡的搅乱者。

根据德国各邦所提供的军队或在阻遏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中具有潜在妨害作用，列强对德国的组成部分都十分感兴趣。在这方面，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对德国各王公和北方各君主都越来越失望，这些王公和君主在为捞取优惠条件而讨价还价时总是过分强调自己的功绩。1685年，年轻的托尔西在德国旅行时给他父亲写信说，在最后的考验中，所有德国列邦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站在皇帝一边，这一预测在九年战争中基本证实。1700年7月8日，路易给塔拉尔写信说，不能武装各国王公，因为“他们极容易变心，他们建立起来的军队常常用来向资助他们建军的人作战”。1700年的一份备忘录（可能是托尔西写的）降低了可能在德国成立联盟的重要性：

帝国的军队不能自己行动；在上次战争中，军队是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调动的；对北方各君主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正如人们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微弱的帮助，而且要用高价收买，所以人们用不着害怕他们反对我们。[\[20\]](#)

1697年路易拒绝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关于单独媾和的要求，诡称已忘记选帝侯曾以不是帝国王公的身份同他作过战。简而言之，路易正在违反黎塞留和马萨林的对德国的政策，在他前半部统治时期是曾遵循此政策办事的。

由于不同原因，威廉三世也依同一方向行动。1689年他不愿保证下撒克逊集团的现行制度是因为怕触犯皇帝；他也反对接纳小邦王公成为大同盟的正式成员，为的是不使将来的调停工作复杂化。1690年他告诉海因修斯说，如果给丹麦和萨伏依津贴，那么“所有德国各邦王公都要同样待遇；如果我们拒绝他们，他们就会转换阵营”。在下次战争中我们能在马尔巴勒的抱怨中发现同样的怀疑态度：

你现在可从任何德国王公得到军队，但要付出昂贵代价……你看德国王公们在派出他们的分遣部队时有多么落后而且总是这样，他们自以为你应当帮助他们……我非常相信，如果你不能制止这种勒索，战争最后将非常费钱，结果你就还不起这笔费用了。[\[21\]](#)

然而西方主要列强的普遍失望并未使他们放弃在德国事务中起积极作用。路易继续追求两个目标：在皇帝及其主要同盟者之间建立战略屏障；给大同盟制造大量的政治麻烦。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他在九年战争中对科隆、明斯特、巴拉丁领地特别感兴趣并在其南方集团的继承人初期支持其中立。至于制造麻烦，在九年战争中因缺少德

国的积极的军事同盟者而受到阻碍，只好满足于支持因某些缘故而不满意皇帝或其同盟者的中立的“第三方”。在威廉的帮助下，皇帝利用满足这些反对派的领袖对新称号和特权的要求，以化解他们的反对。法国人就要设法组织次要的人物。这些活动迫使法国的外交手段沿着王公阶梯下降，一级一级地下，一直降到巴登—杜拉希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的总督级。第9选帝侯领地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过程。1688年汉诺威的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公爵在法国势力中是最重要的一位君主。1692年利奥波德用选帝侯爵位笼络了他；作为回报，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提供了4000兵力，在皇家选举中投票选举哈布斯堡候选人，并协助奥地利王室建立第10个选帝侯领地。路易进而煽动各君主抵制这种新事物。最大的反对来自圭尔夫家族长者一派，即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公爵们，但他们远不如少壮派（汉诺威）强大。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五世的反对与荷尔施泰因公爵一样更为重要，但是 he 也要为租借给同盟的军队收取租金，而威廉计划在1693年派一中队到波罗的海也可能对他有缓和作用。持续大约10年的反对汉诺威选帝侯领地的斗争使新的选帝侯更加依附皇帝。皇帝后来大量采取同样的方法来承认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家称号并支持萨克森对波兰王位的候选人资格。

在路易十四对德国的政策普遍令人难以满意的后果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夕，法国人曾诱使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伊曼纽尔加入他们的阵营，与他一起加入的还有他的兄弟，科隆的约瑟夫·克雷芒。虽然17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90年代路易坚持哈布斯堡的事业，他却从未停止拉拢后者，相信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确实，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是奥地利王室的危险对手，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渴望取代后者作为天主教德国的领袖和皇帝。而且他们的权力中心靠近哈布斯堡的主要土地；他们在蒂罗尔和巴拉丁两地有领土野心。皇帝不能满足马克斯·伊曼纽尔要戴皇冠的愿望或他的任何别的主要要求而不妨害自己的地位；1702年他们的谈判破裂了。马尔巴勒在布伦海姆的胜利对所有德国王公们来说都是一个实例教训，教导他们在与路易十四联合时能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当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喧闹引起许多王公骚动的时候，他们没有投靠路易而是投靠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把他作为可能的皇家高压手段的解救者。

各大强国的政策对皇家结构有明显影响。第一，这些政策有助于抬高皇帝在德国的威望：在里斯威克，他代表各邦的王公进行谈判，在1714年帝国的各成员国只在巴登签署同意皇帝在拉施塔特缔结的和平条约的条件。第二，因为把德国各主要王公放在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这些政策易于在德国的较大与较小的强邦之间加宽鸿沟，从而为拿破仑“吞并”德国打下基础。德国各王公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在帝国外登基也是在此时期。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取得几顶意大利王冠。这一新情况使德国政治不能在18世纪前半期形成地区性的政治而是有助于把德国纳入欧洲系统。

早在此时期以前就出现了“欧洲”这个概念，与更早的中世纪“基督教联邦”这一概念并驾齐驱。到1700年，政治家和国际法专家们常常交替使用“基督教世界”和“欧洲”来表示拥有主权的基督教王国、封邑和共和国，这些国家遵循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然而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还有其他一些考虑和区分。欧洲海外殖民地当然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有时却笼统地包括在“欧洲”以内；但从条约辞令上理解，“欧洲”已逐渐意味着一个地理区域。在奥托曼统治下的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们一般被排除在“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以外。相反，唯一信奉东正基督教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常被纳入“基督教世界”以内但常被排除在“欧洲”以外。只是罗曼诺夫家族开始在18世纪初期与德国高贵家族通婚后，俄国才正式进入欧洲社会：一个欧洲君主必须与其他欧洲君主们联姻已成定例。

统治王室间的亲属关系，在维持欧洲社会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在宗教上的联系开始削弱以后。只要略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威廉三世不只是詹姆士二世的外甥和女婿，也是路易十四的嫡表兄（弟）的儿子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的嫡表兄（弟），而腓特烈又是英国和汉诺威的乔治一世的姐（妹）夫。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一世彼此是嫡表兄弟也是姐（妹）夫和内兄（弟），路易十四和卡洛斯二世也是这样的亲戚，卡洛斯二世的前妻（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是路易的侄女也是威廉的嫡表姐（妹）。萨伏依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是路易十四的嫡表兄（弟）的儿子，他娶了路易的侄女；这个侄女是威廉的嫡表姐（妹）；他也是卡洛斯二世的隔房表兄（弟）和姐（妹）夫、菲利普五世的岳父、路易十五的祖父和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嫡表兄（弟）。马克斯·伊曼纽尔是利奥波德的远亲和

女婿，路易十四嫡表兄（弟）的儿子，法国皇太子的姐（妹）夫，菲利普五世和奥尔良摄政王的伯（叔）父。诺伊堡的菲利普·威廉这位巴拉丁选帝侯的女婿中有利奥波德一世、卡洛斯二世和葡萄牙的彼得二世。一位当地选出的国王，如波兰的约翰·索比斯基，一心想钻进统治者的王室而为其子女策划适当的婚姻：索比斯基的儿子娶了菲利普·威廉选帝侯的一个女儿为妻。作为短暂君主的教皇，在这方面处于一种微妙地位：他可以用提升各王朝资历较低成员为红衣主教来改善处境，许多意大利王室的子孙都接受了红衣主教的头衔。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共和国以及像汉堡这样的自由城市也因脱离与君主的亲戚关系而处于不利地位。在荷兰共和国，这一缺陷则为奥兰治—拿骚王室所抵消。当然，大多数反叛政府都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挣扎。

可以论证的是王朝之间的关系引起的要求只能以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种说法似乎有理，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西班牙的王位继承。只要领导者坚持其原则要求，此法是可行的，如路易和利奥波德经常做的那样。当王公之间的较量主要受国家原因的支配时，“王朝战争”的说法是令人误解的。王朝之间的联系确实没有防止战争，尽管这种联系对战争目标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无论一位君主采取什么阴谋来伤害其亲戚，无论他在战争中多么不礼貌地将其亲戚从他的土地上赶走，他也从未想将其全面毁灭及破坏其国家。战争结束后，多半是肇事者本人或其合法继承人垂头丧气地仍须到场谋求和平。帝国对维特尔斯巴赫兄弟在布莱海姆战役以后发出的禁令无意延长王位继承战争。1708年哈布斯堡保留了曼图亚只是因为查理第四公爵（最后一位贡扎加公爵）死后无子女。即使在战争中，各统治家族仍彼此通知出生、婚嫁和死亡，而且在他们之间有祝贺和吊唁的信息往返。在王位继承战争中凡尔赛向一位奥地利女大公致哀一事无人觉得奇怪。这些礼貌表现并未减轻战争的严重性，但却有助于保持联系渠道的畅通并在战事停止后立即恢复正常关系。

这一心情因考虑正统性而更加强烈；因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一世年事日高，这一情况在各自宫廷中更显得突出。即使威廉三世在心中是一个拥护正统王朝者（他是个加尔文派教徒），他会比大多数天主教君主更愿接受上帝更经常直接干预以改变人间事务的过程。安妮女王及其朋友们拥护正统王朝的思想感情也很强。这种思想感情对国际事务的精确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有些统治者如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或

查理十二世所受影响比别人要少。它虽然阻止了国外的煽动反叛的活动，但权宜之计的诱惑对甚至最脆弱的拥护正统王朝的顾虑都证明是太强：出于必要，使得利奥波德皇帝在1689年承认威廉为大不列颠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接见拉科齐。然而每个宫廷有权势的声音都宣称禁止帮助反叛者，例如，在安妮女王的大臣中，诺丁汉反对马尔巴勒帮助塞文山脉那里的卡米扎人的意图。也许起码部分由拥护正统王朝的思想感情引起一件政治步骤的最有兴趣的事例是路易十四在1701年9月承认老觊觎王位者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三世。路易解释说 he 无权拒绝詹姆士生下来就属于他的称号并引证了先例，但他继续宣称他决心履行《里斯威克和约》，称威廉三世为“英格兰国王”并放弃以“军队、金钱或船只”帮助詹姆士的任何打算。^[22]把这看成一派诡辩而不予理睬就是错误估计了路易坚持神权的原则。

大家一致认为欧洲各邦在地位上不完全平等，虽然从主权的观点看他们可能是平等的。共和国，除公爵们和其他地位低的王公外，愿意承认“头戴王冠的君主们”的优越地位，天主教君主们承认教皇有某些优势。除此之外，在地位先后次序上出现了许多争论，因为争执者们既无划分君主的共同依据，又对每个自报的功绩意见分歧。因此皇帝只能勉强地承认法国国王的“陛下”称号，而路易则企图千方百计证明他要求起码与神圣罗马皇帝相等是合理的：他的领土是个“帝国”，他的王冠在基督教世界里是传代最古的王冠，首先在其国土内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在起草《里斯威克和约》时，路易反对用同样的词句叙述他自己和威廉三世与各自的领土的关系。每个邦，甚至帝国的最低男爵领地，都为地位而争吵。英格兰也与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和其他王国有同样的争执。荷兰共和国与威尼斯都声称其地位在对方之上，双方又与德国的选帝侯们发生冲突。从表面上看，各邦的等级已在他们的国外代表周围的礼仪上、在皇家称号上反映出来。实际上，每个邦都建立了自己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作为外交礼仪指南而编写的巨著，加上档案中为此而交换的大捆的信件，说明这方面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

一般来说，礼仪在17世纪对有效外交所起的妨碍作用与20世纪的宣传几乎一样严重。两国可能同意彼此谈判的方式，但是召开一个有多国参加的和平会议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调解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通信站，各方可通过通信站彼此联系。^[23]议程是如此的拖

拉，以致大会只能在它对真正的谈判起到掩护作用或在别处达成的协议让双方到此登记后才能产生结果。因此，《里斯威克和约》的基础是在1694—1696年路易的使者卡利埃尔和第克维尔特及博雷尔之间秘密会谈后奠定的，这些人受到威廉三世和海因修斯的信任。后来我们在里斯威克各全权大臣中遇到卡利埃尔和第克维尔特。在那里，一旦出现困难，会议便记下时间，同时在西班牙属荷兰在波特兰与布菲勒之间的五次私下会议上消除了这些难题。

只要有可能，列强愿意通过得到信任的个人来处理重要事务而不需要中间人。路易与安妮之间的《乌得勒支和约》清楚地说明该条约是在无中间人的情况下达成的。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尼斯塔特和平条约》就没有中间人参加。1696年都灵密约是法军下级司令官泰塞伯爵和假扮成萨伏依农民的格罗佩洛（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的财政部长）起草的。1709年路易要迅速结束战争时，法国外长托尔西本人前往海牙，装扮成一位私人绅士，与海因修斯、马尔巴勒和尤金协商。《拉施塔特条约》是在尤金和维拉尔之间通过直接谈判安排的，他们是两位总司令又是挚友。平等人物之间礼貌往来的规则，而不是礼仪，在这种谈判中风行一时。当代外交作家推荐使用二级谈判人员，他们不像大使那样受拘束，同时维持这种仪式很少使一位足智多谋的外交官不能处理重大事务。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路易十四的评论，没有人能怀疑他会忽略外交礼节这样的事。1710年他在意大利各邦之间为了促进团结而做的努力，由于威尼斯和托斯卡纳的不和而受到阻碍。威尼斯连续派往佛罗伦萨朝廷两位使节，他们正患有非常严重的痛风病，大公就允许他们在他面前坐下。在大公拒绝把这一特权扩大到他们的完全健康的继任者时，两邦断绝了关系。路易说：“一看便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在防止他们迫在眼前的毁灭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强国，很小一点礼仪上的异议就妨碍了他们的团结。”^[24]

妨碍了联合的是不同的利益而不是外交礼仪。1689年8月，威廉三世为同盟国之间的不和而忧虑，他对上次的战争和宁姆根会议的记忆萦绕心头，提议在海牙召开一次会议。他现在不想让小邦的王公们在“四强”联盟中成为正式伙伴，但需要某种中央协调团体。大会终于在1690年3月16日召开，到1697年仍然存在。无人，甚至威廉也没有关于大会打算达到什么目标的清楚概念。开会前，威廉决定其主要任务是订出下次战役中同盟的战斗序列，而且会期要短。同时已说服皇帝

要有个永久性的代表大会，但是他的代表贝尔卡伯爵对其上级的军事观点没有接到足够的指示而必须凡事都要请示维也纳。海牙代表大会在处理分配冬季营房之类的问题上比较有成绩，而且似乎已经有人在制订1691年的战役计划，但在1692年必须在科隆另开会议来安排保卫莱茵河的措施。某些政治问题，甚至将来和平的条件，也提出来在大会上讨论，但在这么大的集会上是难以解决的。总之，并非所有外交官都受到他们领导的信任。由于一个对立的团体在维也纳成长起来，代表大会进一步受到破坏，在维也纳有几个皇帝内阁成员开始与同盟国外交官们坐在一起讨论军事行动和平计划。维也纳的会议组织得比较松散，比海牙的全体会议更适合搞联合。随着各交战国的利益向南移动，这些会议变得更加重要，更加频繁召开了。1695年底左右，海因修斯抱怨说，在海牙议定的和平措施，到维也纳后就变了。

维也纳与海牙之间的对立经瑞典调解后尖锐了。威廉原则上不反对它，但他认为经斯德哥尔摩传达消息太慢，而且不愿与瑞典使节利里埃鲁特办事，认为他偏向法国。此外，查理十一不愿看到英国—荷兰在海上称霸的前景，尽管他对路易十四也有敌意并准备为皇帝效劳。很明显威廉不完全理解瑞典人采取暧昧态度的原因；他过度认为是法国的黄金和亲法党派在斯德哥尔摩策划的缘故。一直到1696年秋天，同盟国才正式承认瑞典调解，即都灵和平以后。然而从1693年开始，法国的和平建议是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阿沃伯爵提出来的，并经瑞典外长奥克森谢尔纳伯爵转交给利奥波德的大臣，大臣把建议送到维也纳，从那里又转到海牙和马德里。这样一种安排把维也纳放在同盟国一边来控制谈判。威廉然后把希望寄托在第克维尔特—卡利埃尔会谈上，并建议同盟国同意海牙的和平条件。海牙代表大会无力完成这件大事。

在王位继承战争中，马尔巴勒、符拉蒂斯劳和尤金的频繁往来在维持主要同盟国之间的联合上作用很大。在北方战争中，彼得沙皇的出访在团结反瑞典联盟中起到了相同作用。至于反土耳其联盟，好像除例行外交往来外，并未设置协调同盟国行动的机构。

欧洲政治结构的变化对国际法、外交机构组织或谈判方式并未产生直接影响。外交惯例反映欧洲社会和个别国家的社会秩序；由于这不是社会大动乱时代，尚未感到急需对它彻底检查。在俄国那里确实发生了动乱，彼得把西方几国使用的形式综合起来，改革外交机构。

然而，安托万·佩克奎特在1720年左右写的一篇论文中说^[25]，外交现在包括的事务比过去多得多。1720年，荷兰和威尼斯共和国在考虑适合外交注意的贸易事务和公众意见时，不再是孤立的了。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它们产生了兴趣。为了强调外交官的任务的复杂性，当时的一些手册树立起一种“完美大使”的形象，其才能包括懂得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精读了古代和现代历史，尤其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所有条约；懂得一点陆军、海军和贸易事务；旅行广泛；观察及理解力强；作风文雅以及其他许多脑力和体质上的特点。不用说，这样的人物不多，虽然有些像托尔西这样的人已接近这一理想。

关于国际法和外交程序，亚伯拉罕·德·维克福特写的《大使及其任务》（1680年）是标准手册，这本书在18世纪中叶以前深受欢迎。这本散漫的作品包括几百年来外交实例的大量材料；如果它有任何统一主题的话，那就是保卫外交豁免权。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尔的出色的文章《与统治者谈判的方式》（或译《外交实务》）（1716年）很快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但是像他同代人莱布尼兹、卢梭·德·夏穆瓦、佩克奎特的文章一样，它只包括极少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塞缪尔·冯·普芬道夫的《自然和族类法》在1688—1717年间用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出了17版，是自然法概念的历史里程碑，但在国际法上，普芬道夫主要根据格劳秀斯。然而我们应当注意他那明确的声明：只要条约不与其国家利益相冲突，该国君主必须接受条约的束缚，因为他与其臣民们的关系是所有约束中最高至上者。^[26]荷兰律师科内利乌斯·范·宾克肖克（1673—1743年）的早期著作《海权论》（1702年）预示了瓦特尔的领海理论：领海要扩展到从海岸发射武器炮弹所及之处。^[27]

走私与海上中立权利问题和往常一样是很棘手的。在九年战争中，威廉三世想尽力减少中立国商业，这种商业有把北方各国卷入西方的公开的敌对行动的危险。在下次战争中，这些争执在1705年以后就不那么严重了，当时采取措施限制中立国与敌国通商这种思想的普遍幻灭是很明显的。海洋法与惯例各国都不一样。一般说来，荷兰人的意见是战争应尽量少干涉商业；英国人倾向限制商业，敌国和中立国商业都限制；法国人原则上对敌国和中立国都很严格。但在实际上，政策上的考虑常常缓和了处理战利品军事法庭的严厉。荷兰人比

英国人更害怕中立国商业的竞争，泽兰武装民船有时处理得很严厉；但威廉三世只要认为适合他的外交手段，就放宽他自己的措施，海因修斯也是这样做的。法国人非常需要荷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贸易，所以他们便很大方地发给敌船特许航行证；捕获物处理会议和法国议会一样，在考虑法律以外的权力而采取行动时，也比英国高等海事法庭强硬些。这种事态产生了大量诉讼和外交信件。许多摩擦都来自大量双边商务条约中的前后矛盾和不切实际，自1648年以来这些条约已制定了关于船照的规章制度并规定了什么是战时走私。^[28]因为这些协定的条件不仅反映了各方的特殊经济情况而且也反映了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国际法的结果是矛盾的。

中立地位这个概念仍然有点模糊不清，主要因为时代的惯例已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分界线弄得模糊不清了。一个中立国可以避开直接敌对行动，但它可以把辅助军队派往交战国（根据以前订立的条约）而无损其中立地位并可允许交战国军队“无害通过”其领土去攻击敌国。然而，一般都希望它禁止在它的水域中交战。有时很难制止这种交战，结果丹麦人和葡萄牙人只好对交战国的战舰封闭其港口；托斯卡纳的大公有时常抱怨交战国船长们破坏里窝那的中立，虽然这并未使他避免人们责备他偏袒。人们越来越相信中立国应给予双方同样的对待。特殊“中立条约”试图对个别情况下的这种对待加以说明。例如，路易十四在1689年5月与瑞士各州订立了这样一项条约：他答应不派法国军队通过瑞士领土，而瑞士同意不让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假道瑞士。中立这个概念有时用于一个地理区域而非一个国家：各交战国都同意不在此地区内作战。这样，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于1696年10月7日与皇帝和西班牙缔结了《维杰瓦诺公约》，路易十四立即加入，在以后战争中为意大利中立作准备。1691—1693年间为波罗的海的中立，1697年为爱琴海的中立以及1710年为神圣罗马帝国在北方战争中的中立作打算。路易十四愿与西班牙达成地区性的中立和解，促成了1694年巴约纳—拉布德地区与吉普斯夸省之间的《商务与友好往来条约》。^[29]不仅地理区域，而且某些阶级的人，如渔民，也可受到正式保护。

交战国之间的协定是经常的，通常是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邮政、商业交易、安全通行、交换战俘等。另一方面，大多数和平条约，甚至一些联盟条约，都展望将来在缔约国间可能发生战争时，指

定6个月的时间或更长些，许可敌国人民在此时间内处理他们的事务。关于阿贝·戈尔蒂埃（法国大使塔拉尔的牧师）一案没有什么特殊的可谈，他在整个王位继承战争中住在伦敦，最后协助安排秘密会谈而结束了战争。战争状态常因发表声明而引起，在声明中君主陈述其拿起武器的原因，命令其所有的臣民攻击敌人，禁止与敌人的一切交往，违者处死。然而，就像当时的许多法令一样，这个法令不久即被废弃。路易十四在1689年写给西班牙属荷兰总督一封奇怪的信中说，他宣言中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剥夺手无寸铁的人们的生活是不公道的，交战国的王公们一般不惩罚他们而是发给特许护照或根本不干涉他们的事务。^[30]护照和区别对待缓和了战争的严峻性，增加了国库，扩大了政府控制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方法，包括朋友、敌人和中立国的人员和货物。相反，当时的风俗习惯，因为未被指责具有民族主义情感，使战争过渡到和平相当容易并有助于维护欧洲体系。和平条约中的大赦条款照顾那些违反战时命令的人。

虽然实质上所有国家都多少模仿威尼斯的外交作风，但它们彼此相差很远，甚至朝代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官僚主义和选举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身份也未使他们变得冷酷。一个普通政客的癖性也可决定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关于外交机构很难作出全面叙述。

甚至在有长远复杂外交传统的荷兰共和国，威廉三世也能逐渐把外交政策抓在自己手中，主要是靠任命国会议员、国会的秘密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外交官的职位。荷兰的国外代表应与他们所属的各邦通信——外交职位的分配主要由荷兰和泽兰各邦掌握——并通过国会的注册员与国会和秘密事务委员会通信。实际上他们也与荷兰省长、荷兰抚恤金大臣（真正的外交总长）、阿姆斯特丹城的头面人物通信。威廉若无与抚恤金大臣法奇尔和海因修斯的私人友谊，若无阿姆斯特丹的谅解，很难说他能控制荷兰的外交。威廉在英国时，海因修斯是其知心朋友，国王向他畅叙衷肠。在英国，威廉的两位国务秘书只管日常书信；英国与荷兰外交官写信需要威廉作决定的问题都要写给陆军大臣布拉斯威特；威廉旅行时他常陪伴。如果事关机密（这是经常发生的），就吩咐外交官们直接与海因修斯或威廉通信。第一次谈判分割条约时，只有威廉、海因修斯和波特兰在英国—荷兰一边知道什么正在进行。实际上，威廉就是他自己的外交大臣，常独自一人与外国大使谈判，他自己写比较重要的信而无须其内阁参与，有时由于过度

紧急而不能将信件内容扼要记下来为他自己将来参考，这是他后悔承认的。他主张把所有谈判无论其如何重要都集中到海牙或伦敦并不为奇。他的使节收集并传达情报而不进行谈判，只有极少例外。在威廉统治下的英国和荷兰的外交机构只有一个，统一他们的措施并分享他们的情报；有时他们各自的使节相互担任彼此的代表。虽然双方都有怨言，但双方结合工作起来效率日增，扩大了威廉的外交智谋。威廉去世后，双方机构分了家，尤其是在拉米伊战役使海上列强不能构成紧迫的危险以后。解散之所以是逐渐的（起码在早期阶段）而且不是严格的，主要是海因修斯和马尔巴勒的缘故，他们两人紧密工作在一起。然而，尽管海因修斯继续指导荷兰的外交政策，但他不能调动所有忠诚者归附奥兰治这个幻称；起初察觉不到，一些荷兰组织，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开始脱离抚恤金大臣。这就容易使他更加严厉而更加靠近马尔巴勒。马尔巴勒虽非国家大臣，但他所控制的英国外交政策使他能在1707年以自己的权力决定访问查理十二世。他的下台割断了英、荷外交机构的最后一环。

头脑冷静的利奥波德皇帝的办法是个鲜明的对照。有一次，当荷兰使节提出了和平方案后，金斯基伯爵回答说，这件事“太微妙，不能在四目之下提交皇帝”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31]由于相信委员会具有高度的智慧，利奥波德规定遵照其内阁多数的决定行事，即使他与他们不一致也要奉行多数的决定。有些大臣认为他呆，可是别的观察家们包括维拉尔在内认为他比他的顾问们都有头脑。不足为奇的是当时的通信抱怨维也纳的拖延。波兰一立陶宛联邦表现了另一种形式：两位首相和副首相处理日常外交信件，但波兰的大使们向国会负责，国会处理更重大事务。国王利用其“小型私人官邸”为其个人政策服务——常与其国家的政策不同。每个大官都推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所以任何对波兰真感兴趣的國家，都应该布置两位大使和一些小代理人驻扎在那里，如果它能付得起这笔费用的话，路易十四就这样做过。

与已谈过的惯例相比，法国的做法是正规的典范。路易在最高国务会上自由讨论后亲自制定了他的外交政策。最高国务会的秘密，局外人是难以探知的。然后外交大臣与国王在每日商议中拟出细节，国王常改动其大臣的草稿。接见外国使节时外交大臣也在座；极少数几次路易单独接见大使引起许多意见。为了保密和最大限度地自由行

动，路易不愿意让外国使节在他的宫廷露面除非为了粉饰的目的，而主张把重要谈判委托其驻在外国的代表进行。在其统治的后半期，他越来越依靠他们，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他的观点来应付难以预料的情况。他很少让一位大使因诚实而犯错感觉尴尬不安。自始至终，他要求他的大使们给他写信时要十分坦率，派遣像阿沃或塔拉尔这样的人说明至少这些高级外交家听他的话。很清楚，路易的体制对有成就的谈判人员发奖，这个体制也给外交大臣增加了负担。到了1715年，外交大臣有一个由几位一等秘书组成的干练的班子，还有一些翻译和办事员——这些都是他个人的雇员。即使在1710年，在圣普雷斯特领导成立独立档案科之后的人数看来都不超过30人。甚至在王位继承战争之前，有几个宣传员都隶属此部，其部分工作是打击敌对刊物：就像在英国，人们越来越明白舆论是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有关贸易问题，外交大臣也可与其部外专家磋商，但他常与其他大臣发生冲突，尤其是与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冲突。对外贸易属于后者范围，而1698年国王利用限制海军直接与驻西班牙、葡萄牙、君士坦丁堡、埃及以及西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海外外交家和领事们通信来设法给外交大臣更多专属特权控制法国在欧洲的代表。陆军大臣有他自己的通信情报网，也不能阻止他参与对外政策，因此要解决与他的争吵就困难得多。而且，战地陆军司令，如维拉尔，一般也被委以外交使命。

显然，外交需要快速安全的通联手段。大量外交信件用“普通”邮递传送，一般每星期1—2次往返于多数首都之间。只有对非常紧急或绝密的文件才会花钱用“特快”信使传送，信使的费用常需大使自己掏腰包。^[32]没有任何政治家比威廉三世更懂得邮政通信联系手段的好处：不能及时收到消息或与海因修斯的通信受到阻碍就会在谈判中抓不住机会。伦敦、海牙和巴黎之间平常是4天的旅程，但英国的交通要听从风的摆布，甚至特快也要一星期或更长时间才能到达海牙或巴黎。陆路上的信使也常因天气不好而受阻，有时因政治情况不稳，偶尔因真的或假的拦路强盗而受阻。最好的谨慎措施是把一封信的副本分别从不同途径发出。可能发生敌对行动的前景更使交通不定，但因欧洲已陷入战争状态，甚至敌对国家之间也能恢复正常通邮。1703年哈布斯堡和海上列强禁止与法国通邮和其他关系，但此举在荷兰人当中引起强烈抗议，结果一年后这项禁令就取消了。^[33]

在评价使用各种密码的效果时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维克福特说，一向没有什么不能破译的密码，而卡利埃尔认为可以设计一种非经叛徒协助不能破译的密码。一些专家，如数学家约翰·沃利斯，曾被认为能揭开几乎所有密码；1691年在德国北方捕获的一名法国情报人员所携文件被立即送往伦敦请他审查。尤其是在战时，正规外交家和间谍常把情报放在信封里寄给真的或假的商人或银行家；收信人或邮政局长就把它送往适当地点。除为政府信件提供似乎合理掩护外，这一方法的优点是邮政局长们不愿损害商人和银行家的邮件：过多损害其邮件会使他们转投其他寄递渠道，使邮局遭受大量金钱损失。然而，防止拦截邮件或隐蔽任何重要谈判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都灵秘密条约》（1696年6月）的大意，在达成前4天威尼斯就已经知道了，而威廉三世似乎对此事已早有耳闻。

外交代表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它们可简化为主要的三级：大使、公使、驻外政治代表。只有完全主权国家才能由大使代表。即便如此，有些国家也不愿委任他们，或者是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避免排列座次时发生争吵。实际上，在大使与公使之间区别不大。虽然公使受到的礼仪较轻，薪金较低，但是原来是大使而现在降到公使并不丢脸。但是在数量越来越多的公使与越来越少的驻外政治代表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宽，鸿沟的加宽是因为委任为驻外政治代表者多系比较无名家族的成员，有时（例如由德国的小邦王公派出的）是没有任何真正的任务。在法国外交机构中，从驻外政治代表跃升为公使级是非常困难的。英国与荷兰的惯例暂时还不那么严格。

虽然级别不同，各首都的外交家们开始自己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习俗和特权相似者团结在一起，所以一个成员的权利受到侵犯，整个外交使团都感觉到了。经全体同意后，各国的法律使驻外政治代表本人及其家属不受侵犯。但其解释因地而异，对“政府的公使”及其财产的合法管辖权问题困扰着当时一些最好的法律思想家。各国法律不允许大使煽动驻在国的阴谋小集团和叛乱，然而他却能贿赂当地大臣和职员获取情报。外国的外交官可以被驱逐出境，而1717年逮捕瑞典公使于伦鲍格（驻伦敦）和格尔茨（驻海牙）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受伤害一方常采取报复手段：例如，1703年路易十四一听到他的大使在萨伏依实际上被单独关闭，就对萨伏依驻巴黎大使作了同样的处置。

一个外交官通常与外交部长或特别专员口头或书面谈判。没有可靠的情报和关键人物的支持，他不能获得成功。无论他怎么想方设法——说恭维话、贿赂或直接劝说——若不与他们利益分摊并像他们的社会同侪一样与他们交谈，他就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他是他君主的代表。因此必须在外国宫廷上崭露头角。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无论其如何有才干，一定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此大多数外交官都出身军事贵族家庭；有些来自法定的贵族，少数是神职人员。甚至在荷兰机构里，许多大使和公使都是贵族，其余是从“摄政者”中招募来的——来自一些放弃直接经商而从事管理荷兰政务的家庭。威尼斯大使们也都出身贵族。任命一名代表时，无须取得外国宫廷的同意，但最好是考虑一下指望他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例如，卡利埃尔认为到北方宫廷去的大使应能大量饮酒而不醉。身份最高并有大笔财产的贵族对罗马最合适。到德国小宫廷去的使节可能发现熟知错综复杂的法律是有用处的。费基埃的简朴严肃生活使他在西班牙受到赏识。在天主教宫廷中担负高度秘密的外交或情报使命以僧侣最有成效，尤其是西班牙僧侣，因为他们很容易渗透到任何家庭而不为人所注意。但是是一位天主教职位高的人对穆斯林国家与对新教国家一样地不合适。

一位大使或公使要招募他的工作人员。特别重要的是寻找一两位得力的秘书，因为秘书要把文件抄写工整，接触密码，常被任用进行一些次要的外交使命，而且在大使缺席时处理日常往来公文。在英国、西班牙和瑞典的机构中，秘书似应由国王任命并付薪；在法国，大使自己挑选秘书，一般从其食客中挑选并掏自己的腰包付给薪金。此外，大使应有一位牧师、几名随员、厨师、男仆、跟班、侍童、车夫、马夫和其他佣人。宫廷生活比较简朴的地方，如荷兰，三十几人就够了；而罗马、法国和西班牙，大使的随从人员一般有100多名。大使还要为自己准备适当的官邸，起码两辆马车，还有讲究的餐具，丧事、庆典和宫廷的活动都需要额外的花费。自己的邮费一般要自付，有时为国王办点事他还要垫款。被召回或被赋予新的使命会令人厌烦的，因为这意味着他要与当地的债主结账并筹措额外的款项。荷兰驻维也纳公使接到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写道：“他们把我送上艰难、危险、花钱的路程，但是他们不告诉我到哪里去找钱。”^[34]许多外交官们都会说这样的话。总的来看，路易十四的代表们比其他代表的收入要丰厚些。^[35]但是薪金或普通津贴永远不够支付甚至一般费

用。更糟的是发薪很少按时，有长达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办理银行贷款和兑换货币上。有些外交官设法搞些外币兑换投机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如果其地位能提供方便的话再做点证券投机买卖；少数人甚至利用其海关豁免权进行秘密零售贸易。驻君士坦丁堡的西方大使馆的优越条件是他们有大量领事收费来补充他们的薪金，主要靠商人发给他们薪金。否则别无其他可行，只好欠债；许多家里的产业都丧失在外交事业上了。不多的就职津贴、第一次任命时（购置装备）花费的一笔巨款，“特殊情况”津贴可能缓和但并未消除负担。^[36]偶尔对所有机构发下一笔特殊补助，但外交人员却被告知最好在谈判关键时刻争取一份：这样，驻海牙的布里奥尔一听到卡洛斯二世已死立刻通知托尔西说他正处于危急困难之中。有些政府想不时以保留外交官的国内职位的薪金来减轻其困难：薪俸很高的神职人员是出国服务最优越的候补者。然而设想出色的外交成绩得不到奖励未免有点夸张。它经常带来某些荣誉标志、军级或文职的提升，圣职的升级等，虽然外交官们普遍深信国内的朋友们都得到了上选的职业。许多人都把外交工作看作光荣但是毁灭性的流放，主张把它看作暂时职业而不是终身事业。这本身就足以挫败作家们对外交事业所作的努力，他们一致敦促成立正规使团，从幼小时开始训练人才。只有法国成立了一所“外交学院”来训练未来的外交官。1712年，托尔西委托圣普雷斯特教育12名年轻人：其门徒们帮助整理外交部的档案并整理出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性备忘录：不然就成果不大，“学院”也于1720年寿终正寝。各地培养外交人员仍然大都是偶然的，是凭家族关系的。

国外的外交人员的主要工作是从一切可能的来源收集情报。与当地职位高的宗教界和外交界人士进行非正式的私人交往能提供最好的机会。大使应当好客；除其秘书外，厨师是他最有价值的助手。但是要逗引他的同伴们说话，他自己应先给他们透露一点新闻。从他政府来的邮件给他带来了“新闻信札”，其他公使的电讯摘录、新法律和新条例全文、朋友来信等；他也直接与其他驻外国的外交官通信。众所周知的是荷兰代表从其政府那里收到很多情报；他们也与国外的商人们通信。法国人在托尔西的内阁以前在提供当时的情报上似乎很粗心大意；路易以前对来自其宫廷的新闻信札皱过眉头。大多数外交官也有秘密和半秘密的提供情报者。有些办事员和邮局职员为了补充他们微薄且不按时发给的薪金而出售他们经手的文件；各个使馆的秘书也逃脱不了这个诱惑。大概是通过这个渠道马尔巴勒得到了一份路易

十四给德·里科斯的指示，德·里科斯1707年要到查理十二世那里有特殊使命去完成。有魄力的大使，如阿沃，从各阶级人群收集情报，直到船上的木工。一位外国外交人员被吸引到别人的秘密组织，其价值之大显然是不可估计的，尤其是在战时。在德国的小邦王公那里工作的人员是干这种勾当的最可疑的人。在九年战争中，芒斯特的主教在雷根斯堡的代理人把那里的行动全盘告诉了法国人。在以后的战争中，彼特金姆这个驻荷兰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驻外政治代表是个法国间谍，专门提供来自葡萄牙的荷兰电讯和类似文件。此时法国明显雇用了许多丹麦人，并几乎说通了冯·斯托肯这个驻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丹麦公使参加他们的秘密组织；他们在说服瑞典驻维也纳政治代表斯蒂霍克参加上运气要好一些。威廉三世和海因修斯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秘密情报网。外交官通常是通过中间人物与秘密特务接触，一般由他的秘书出面，但有时亲自与他们会面，采取的是间谍活动方式，例如驻葡萄牙的阿梅洛偶尔策划一次与其最佳提供情报者在圣方济会托钵僧院“不期而遇”，供报人是韦尔热夫人，是伊莎贝拉公主的知心朋友。据悉小特务所得报酬极微。身负特别使命者如帕斯特曾被法国于1706年派往维也纳，愿收月薪40银币；间谍明星如彼特金姆可得年薪3000英镑，彼特金姆又因为同盟国服务，可从他们那里领取酬金来补充其年薪。韦尔热夫人不愿收钱，但在1686年为其子在法国申请显赫的圣职；其女在葡萄牙喜爱阿梅洛的马车，这位大使在1688年离开里斯本前把马车送给了她。

发给外国政治家和廷臣的津贴和“奖金”照例不是为了获得情报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党派和左右政策。这些费用甚至不是秘密的。一旦一个大邦王公签订了一项条约，都希望他给对方的大臣们一些贵重礼物。有时小邦王公们猜测其大臣们接受外国的津贴。只要接受津贴不损害大臣忠于其主，君主们也看不出其中有何害处；许多德国王公甚至还鼓励这一做法，因其有助于节约大臣们的薪金。因此许多王公自己也依靠外国的补助，多半是为了补助其军队。用之得当，这些办法帮助了汉诺威的一位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在其邻国面前提高他的姿态及其与大国打交道的地位。在小邦王公当中，只有瑞典的查理十一世公开蔑视这一政治生活事实。对于其他大多数王公来说，问题不是接受不接受财政资助而是接受谁的援助——然而，这是一个通常要根据其政治意义来解决的问题。

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是最慷慨的资助者；荷兰人因吝啬小气而出名并常常拖欠；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只有接受资助的经验；西班牙和皇帝可能答应给他们资助但是给不了；俄国刚刚开始资助索比斯基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切在随后的10年里发生了根本变化。路易仍能发挥大量财政力量，如17世纪90年代在瑞典和丹麦以及后来在西班牙，但不能再向整个欧洲分派其财力。海上列强在威廉和海因修斯的压力下后来能在这—战场上超越了法国人。同时，彼得沙皇成为反瑞典联盟的军需官。路易、威廉、彼得、利奥波德及其多数大臣们都默认，除天意外，金钱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因素，各方面都证明是这样。在1688年与1721年间要找一例补助或津贴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实例似乎都是困难的。补助常使一国君主能够推行他想要推行但缺乏自己的财力去推行的政策。丹麦国王如无资助能否维持其优秀的海军是令人怀疑的，尽管其王国的生存有赖于此；没有俄国的财政援助，波兰的奥古斯都二世在北方战争中很难长期存在。补助或许能推迟，但不能防止其改变有损赠款国的政策，它甚至能使政策改变对受惠国高度有利并使其十分感兴趣。1692年，路易十四每月按时发给汉诺威的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10.9万银镑——从当时阻止其加入同盟国来看，这份补助金使他自己成为如此大的麻烦，作为路易在帝国内的追随者，他设法向皇帝索取了选帝侯的高贵职位。

当时的人们大肆夸张给外国政治家送礼和津贴的成效。这一传统哪儿也不如瑞典那样根深蒂固。从1691年起，路易十四就在那里尽力重建亲法党派以便在帝国内加入中立派的“第三党”^[37]。1692年，瑞典各大臣收到奖金15万银镑，1693年又收到4.3万银镑；法朗科法尔斯议员比尔克是本特·奥克森谢尔纳伯爵的敌人，他也领年俸2万银镑——他两个儿子分了2.4万多银镑——而奥克赛斯蒂尔纳则因同意一项中立的正式条约而被许诺给予5万银镑。然而，瑞典并未参加“第三党”。虽然其援军1692年后不再与同盟国一起战斗，甚至这种不大的效果也可能被说成是查理十一世和乌克森谢纳惧怕英—荷的海上优势。同样，1694年威廉三世给乌克森谢纳的女儿们的津贴对伯爵的中立政策和调解明显无很大作用。他和卡尔·派珀只能是为了他们信任的或其主子决定的措施才能接受礼物。不管怎样，查理十一世和查理十二世都是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不受大臣们的建议所约束。1707年马尔巴勒劝告派珀接受1500英镑的津贴，而大臣赫门林和策德希尔姆每年每人只收500英镑，其目的是把瑞典军队从帝国中调出去

——这是查理已决定要做的事。同时派珀仍不受法国官员的影响：1707年路易愿意给他30万英镑以便在西方战争中瑞典成功地进行调解。

在外交手段中明显有效使用金钱的最好范例是彼得·托尔斯泰和沙菲洛夫，他们是1701—1714年驻君士坦丁堡的两名沙皇的公使。托尔斯泰不但像别人一样贿赂了土耳其宗教职位高的人，而且甚至设法把英国大使萨坦和荷兰驻外政治代表科利杰尔都纳入俄国的工资名单。^[38]毫无疑问，这就增强了1711—1712年俄国与土耳其之间能干的调解人的热心；但在那时，防止俄—土之间发生冲突对海上列强有利，因为查理十二世拒绝为神圣罗马帝国订立中立条约激怒了他们。很难估计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阴谋中俄国行贿的作用。1700—1709年极少数奥托曼政治家愿意卷入北方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去：如果有一个战争党派，它就主要对威尼斯占领摩里亚不满。然而波尔塔瓦以后俄国势力在波兰的威胁比俄国行贿显得更加突出，土耳其人打起来了。彼得在普鲁斯河惨败后不久，1711年，无论他给土耳其首相的贿赂是多还是少，彼得接受了奥托曼的主要要求，虽然俄—土和平直到1713年以后才算可靠，那时看来好像彼得的意图是承认绝大部分条件。直到那时土耳其人才能转向攻击威尼斯人。

从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人们不必推论补助和津贴是完全无用的。补助赠送人扩大了他的政治活动范围——如果受赠的政府已有意按照有利于他的轨道发展的话——同时赠送礼物和津贴可在政治家之间促进更友好的私人情绪，没有这些活动就很难推动即使是最简单的工作。

当然，外交官的主要职责是在两个朝廷之间“保持联系”。还希望他保护其国民，尤其是商人。几乎所有荷兰的、大多数英国的、一些法国的外交官都认真照此指示办事，虽然路易十四的政府怀疑国外的法国商人是否诚实，所以要求在他们交易时要特别小心。领事也保护并发展商人的利益，但其主要职责是审理他们自己的被保护人之间的诉讼；这反映了一种历久犹存的中世纪概念：人无论到任何地方都带着法律一起去。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君主对于在其国内建立外国领事的计划总是斜眼相加；荷兰人也不急于接待他们；法—荷的《里斯威克商务条约》废除了驻法国的荷兰领事和驻荷兰的法国领事。一位领事常常是在驻在国定居的商人，有时甚至归化了该国，而

他为之服务的无论是哪个祖国已不重要。有些在北方的法国领事都是胡格诺派教徒难民。领事并非“政府的公使”，而且不能要求外交豁免权。他们很少领取其政府薪金。然而，随着商务谈判的不断活跃，其地位也逐步提高，为了表示礼貌而开始给以一些外交特权。地中海的领事机构历史比别处长，所以他们早已成为外交代表，这主要是因为与土耳其政府谈判时商务总是主要课题，但也因为苏丹的大臣们，甚至一些省份的帕夏们，在外交关系上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某些在商业上重要的少数民族团体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影响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与他们混在一起的领事不但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参加半官方谈判。

在外交手段中越来越突出商务问题这方面，威尼斯和荷兰已抢在英国和法国之前；随后跟上来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各王国和勃兰登堡，以后是查理六世皇帝、彼得沙皇、西班牙和其他强国。在商务谈判中多数统治者和外交官们仍然发现自己是走在生疏的道路上。因此，在委派塔拉尔与威廉三世谈判分割条约时，他请求派一名商务专家作为他的大使馆随员。威廉自己在这种事务上感觉不安，因为他“不太了解”塔拉尔提出来的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问题，他只提了一下哈瓦那，然后就把商谈往后推迟。^[39]从1696年起商会多少有系统地收集商业情报。有些英国外交官掌握了完整的贸易知识，就像约翰·鲁宾逊博士在斯德哥尔摩、但泽、汉堡所掌握的那样，后来在乌得勒支的经济谈判中就用上了；1711—1713年与法国人进行经济谈判有专长的诗人马修·普里奥是海关专员，曾在商会工作过。包括马尔巴勒在内的许多政治家们都在贸易商行有个人股本。在法国，商务理事会（1700年）里有海军部长、主计长和其他官员，还有法国大城市的代表们，其中有一名叫梅斯纳热的后来作为法国的全权代表与鲁宾逊和荷兰人在乌得勒支谈判。迪松·德·邦雷波的生涯也反映了这个新趋势，他是一位海军监督官，但在商务上很精通，后来成为能干的大使，九年战争中在哥本哈根任职，后来到海牙。一些多才多艺的人如阿沃和阿梅洛都在国内各方面供职，但大多数法国外交官都需要顾问。到处是越来越多的领事公函，但领事们却惯于给政府和大使们提供经济情报消息（偶尔提建议）。1662年，科尔伯特无法确认所有法国领事的名单。50年以后，这样一种困境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

国际经济活动和谈判的高涨并不表示由于经济动机而形成了主要的政治联合或者发生了战争。对一些决定战争与和平结局的或相互联盟的人来说，经济手段是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的。例如，1688年和1701年法国关税率的意图是在荷兰共和国引起政治纷争来威胁它。接近九年战争结束的时候，路易毫不犹豫地牺牲他认为是法国的商务利益来争取荷兰的政治合作。1701年春天，他在丹麦人面前炫耀订立商务条约的前景，这是丹麦人希望的，似乎对法国商业也有利，但是他公开承认的目的是劝诱他们不要把军队派往可能是反法联盟那里去。等到他们一同意派援军支持海上列强时，这个提议就撤销了。

掌握海上列强的威廉三世在处理事务上有比路易还多的复杂问题。经验使他知道一个强大的商业团体在对立中能起多大妨害作用。他在荷兰共和国的领导地位主要靠他与阿姆斯特丹互相谅解；在英国他的支持多来自商业团体，这些团体的利益不一定与荷兰人的利益相一致；为了维持联盟继续有效，他特别需要钱，也无论其为英国钱还是荷兰钱。经验教训是他必须为商业利益提供保护。他愿意用海军分遣队保护贸易，支持荷兰在里斯威克的商业要求，坚持分割条约中保证英国和荷兰在地中海贸易的条款。但威廉还打算在物资缺乏上打击路易。1689年对法国发动的贸易战是打算挫伤法国，并非为了开展同盟国的贸易：对禁止与法国进行一切贸易的措施采取最强反抗的来自荷兰人，来自英国商人的反抗弱一些。为了加强这一措施但也为了减轻英国、荷兰对中立国竞争的恐惧心情，他也想禁止所有中立国与法国通商；当中立国强迫他从这个极端地位撤退时，他坚持压迫所有同盟国不要挂着他们的国旗与敌人交易。人们可能猜测他偏袒武装民船，但当他们不遵照其政策行事时，他就与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有一次他企图撤回发给泽兰人的所有民船捕押外国船只特许证。^[40]这样，实际上，威廉对商业的态度与路易无大区别。其他大多数政治家们也和他们占优势的政治观点一致。

当经济问题日益侵入外交政策中时，宗教也占据了一个不太显眼的地位。在这两种现象之间看不出有明显的关系。宗教与国际政治之间越来越脱离是个怪事，因为在18世纪早期许多政治家的私生活中宗教思想要比30年前的他们或其前任浓厚得多。然而像威廉这样虔诚的人在17世纪80年代却反对把宗教思想注入外交政策，那时如果不加制止，对一个巨大的天主教阴谋的恐惧心情可能酿成宗教战争而使欧洲

的政治结构受到破坏。1697年10月威廉写道：“我总是害怕宗教战争，怕法国和皇帝达成秘密谅解。”^[41]他尽力在革命时期遏制英国的反天主教风气，同时想法说服皇帝不要与天主教战斗。虔诚的哈布斯堡需要新教联盟反对法国和土耳其：在哈布斯堡朝廷里，确实正在大声反对新教联盟，但喊声只在1707—1708年高涨，当时大同盟开始分裂。路易十四提出的九年战争是宗教冲突的说法在西班牙受到蔑视之大，超过任何其他地方。

如果宗教势力常受国家的控制，那么也能用它为政治目的服务。当西班牙政府在1689年建议调动萨伏依的沃杜瓦臣民反对法国的时候，它准备使用新教这个武器；威廉和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为沃杜瓦人辩护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阿马戴乌斯同意恢复他们的特权。^[42]1711年与土耳其开战后，彼得沙皇向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们呼吁，而在别的时候彼得对他们的命运毫不关心。然而，彼得是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对萨克森的奥古斯都就很难说是这样，他只是为了当波兰国王才信天主教的。但无论何时，只要国家利益许可，君主们就对他们的宗教倾向采取放任态度。例如，1692年皇帝能坚持汉诺威和策勒的天主教徒们的自由；1707年查理十二世支持西里西亚的马丁·路德信徒的事业并试图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说情。彼得在其统治末期支持波兰—立陶宛联邦东正教信仰自由。然而这种举动常被一个国家在国内应当是十足的主人这一信念所抑制。因此路易十四一想到它可能引起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说情，就撤销了他对海外天主教徒的保护。

有时宗教信仰在路易的政策中能起明显作用。1688年，路易声称是天主教信仰的保护人，但未给其天主教对手以深刻印象，也许除了巴拉丁选帝侯约翰·威廉。威廉不同意皇帝对法宣战，因为它助长新教的势力。约翰·威廉建议在里斯威克提出规定在法国割让给帝国的土地上天主教会应处于支配地位。路易在利奥波德默许下强把这一规定加进条约。但是利奥波德与路易在这点上的一致并未有助于解决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论。总的看来，在帝国内路易的天主教政策并未收效。在地中海，这一政策为他效了什么劳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如果他不决然采取天主教政策，也许他会失败得很惨。在这方面他的政治旨趣和宗教信仰并未冲突。当两者在别处冲突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即使路易到了晚年也把宗教看作次要的。这位天主教事业

的拥护者向各新教王公们保证他不加害他们的信仰。里斯威克之后，他为巴拉丁的新教徒说情，1712年他尽力缓和瑞士州与州之间的宗教冲突。在王位继承战争中，他对勃艮第和博维利埃的公爵们常把道德和宗教问题拉进政治而表示不满。[\[43\]](#)

因为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对18世纪初出现的欧洲安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都多，我们应当考虑他们某些基本信仰与政策的关系。路易的机会主义并未影响其坚定的外交政策原则和人类行为的信念。他的目的很简单：提高其国家及其家族的威望，从而使他自己作为一位出人头地的“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国王”就不容争议了。这种出人头地要靠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果他未超越这个秩序的范围，其国家利益就与世界的利益一致起来。路易认为世界是个有秩序的地方，受上帝指导，但主要是通过中间人来执行。只在1710—1712年间的灾难中他才严肃地认为人类的事务中有神来参与。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真正的国家准则”，扎根于自然秩序，其最终创始人为上帝。优秀的政治家风度包括照这些准则办事。不知道自己 and 别人的真正的准则，就不可能有好的政策；偶尔成功也是短暂的。只有君主专制才有可能始终如一地照真正准则办事。凡是国王权力受限制的地方，那里的私人利益一定会掩盖真正的国家利益；唯一的例外是威尼斯——自然现象的奇观。在这种情况下，像威廉或海因修斯这样的个别的政治家可能上升到理解真正的准则，但是他的努力最终是注定了的。人们受恐惧和希望所驱使。然而威胁是个危险的武器，因为它可能产生与期望的正相反的结果：路易晚年给他的外交官们的指示中充满了不要采取威胁的告诫。希望是个比较灵活的工具，只要每个人的癖性有野心、贪婪或虚荣之分就能适应每一个人，虽然情况有许多不同——王公们和高级贵族为野心所支配；出身较低的大臣、商人和佣人为贪婪所支配；妇女为虚荣所支配；神职人员则身受三者的支配。要满足外国王公或政治家的野心并不总是能办到的，虚荣得逞的机会有限，但贪婪却能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因此，金钱是路易外交手段的家务总管。

路易对世界的看法，有助于根据不偏不倚地分析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可靠的情报而仔细制订计划，也使他的事业有某种稳定性。同时，他追求尽善尽美常造成优柔寡断，在其所有的盘算中，对意想不到的事没有留多少余地。他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不是由于不知情而是由于教

条主义地理解大好的情报。直到1712年，他才能断言安妮女王必须进行“对其国土毫无用处的”长期战争，因为英国政策不受国家利益支配，而受私人利益支配。^[44]有些对标准的刺激不能作出适当反应的人，如威廉三世，阻碍了他。路易被这种怪现象所触怒，最后从内心把威廉看成一个贪得无厌，确实可怕的野心家——因为他很能干，所以更危险。

威廉在许多方面比路易更复杂。他的目标，甚至他的许多信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多端。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里，他似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生活和思想。最高的一层是他的宗教世界，在那里上帝挑选的人们在指定路线上，听从他们的主的指挥行动。在这里威廉就是上帝选中的工具来控制路易十四的骄傲，而两个人在格斗中短兵相接也在这里。威廉在世时没有得到胜利的保证；但如果他坚持下去，他就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好仆人。在地球上，这个神圣的戏剧性场面反映在意志坚强的政治王国里。在那里，按数学要求计算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留有以国家为前提的政治联盟、压力集团的和解、灵活谈判的余地。虽然似乎很奇怪，但威廉对人类动机的看法与路易的相似。威廉在这个层次上操纵着政治家，同时既小心又大胆。每天的活动在更低一层。这里每天有奇迹，上帝安排每一战役的结果，每一外交活动的成功或失败，还有天气，威廉安全到达洛这个地方。活过了1672年和1688年，威廉完全有理由相信奇迹。但奇迹并非以一种完全是任意的方式发生，除非人们尽了最大努力并照顾每一细节，奇迹才会出现。因此最好是作好准备，其余交给上帝不可测知的智慧来处理。威廉表面冷静、严峻，内心却是一个热情的人，为忧虑和疑问所困扰：他像路易那样是个善于掩饰自己的能手。他一旦估计到即将到来的挫折后果时，如蒙斯的陷落，好像彻底崩溃已迫在眉睫，而且他常常处于绝望的边缘。最不利的情況常常发生，但末日没有降临，威廉坚持下去，信仰天道使他经受住了考验。

1683—1684年，威廉在过早企图帮助西班牙使荷兰共和国濒临毁灭之后，在外交上得到了告诫。然而与路易不同，他有时准备冒很大风险。他早先在战场上的经验可能使他养成这个品质，但真正根源是他相信神助和奇迹。进入1698年分割条约需要很大勇气，因为可能给他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灾难。威廉在这方面表现了一种信念，1698—1700年，他估计路易是一个经受了磨炼和合情合理的人，出现点摩擦

也是两个强国之间的常情。换句话说，威廉的工作已经完成，以后需要的是加以巩固。在理解各国的利益时，威廉并未受任何“真正准则”的约束；在他的世界里有比路易更多的改革余地。然而，从永恒着眼来看他与路易的争夺的这种倾向早已削弱了他的洞察力。他和同时的许多人想把“一个具有统一宗教的统一君主政体”美梦推到路易身上。这个“太阳国王”的扭曲的形象很难消除，可能九年战争中谋求和平增添了困难，尽管威廉早在1692年就渴望和平。同时，从崇高的形而上学的层次看斗争，使他达到全面看战争的水平，后来全面看整个欧洲，并使他成为同盟国的自然领袖。他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领袖。为了英国人而牺牲荷兰人的利益，又为了荷兰人而牺牲英国人的利益；如有必要，他准备为同盟国的利益而牺牲英、荷的利益；到了最后，他宁愿全欧洲得到福利而不顾同盟国的顺利联合。

威廉与其少数几位朋友之间的书信常有这样的词句，如“欧洲的普遍利益”和“公众的好处”等这些并非简单的只言片语。写信的人知道“公众的好处”与国家利益之间有冲突，而他总是站在前者一边。如果路易知道除了存在于被误导者的空想之中以外，还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的话，他也许会用相反的方法解决这个冲突。但路易比威廉更维新些，威廉深受中古世纪理想的灌输，接受了加尔文派教徒的支持。威廉拥护的“欧洲自由”并非卢梭或马志尼的自由，而是一套中古世纪的“自由”，这种自由通过像荷兰共和国那样专制、与不合时宜的国家的试验保证了过去的一切依然继续存在。在威廉的头脑中有中古世纪贵族为保护其权利和特权而反对中央权势侵犯的思想残余。

在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的交锋中，哪一方都未取得全面胜利。路易没有建成据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国家统治集团，威廉的关于公众好处的想法亦很快被人们遗忘。然而，他们两人各自的办法都有助于产生统一的欧洲秩序。虽然欧洲统一秩序维持许多国家独立，但它还是合理的、世界性的、文明的。

（王风林 蒋宗勋 译）

[1] 见本书原文第662—663页。

[2] Anglo-Spanish Treaty of 18 July 1713, in Dumont, *Corps universel du droit des gens*, Vol. VIII, pt. i, p. 394. Cf. below, ch. .

[3] See the Renunciations of Philip V. Orléans, and Berry in H. Vast, *Les Grands traités du règne de Louis* , Vol. III (1899) , pp. 50—54, 68—150.

[4] Portland to William, 26 March 1698, N. Japikse, *Correspondentie van Willem III en... Bentinck* (The Hague, 5 Vols. 1927—1937) , Vol. I, pt. I, pp. 266—268. Cf. below. ch. XII.

[5] See the dispatch of Mandat quoted by E. Lainé, “Une Tentative de 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 sous Louis ” , *Revue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Vol. CLXVII (1933) , p. 183.

[6] Dumont, Vol. VIII, pt. 1, pp. 90, 112.

[7] Cobbett, Parl. Hist. Vol. V, col. 1667.

[8] Dumont, Vol. VIII, pt. 1, p. 115.

[9] G. de Lambert,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u XVIIIe siècle* (The Hague, 14, Vols. 1724—1734) , Vol. VIII, p. 29.

[10] 见本书原文第675页。至于北方的列强，他们愿意看到西方国家之间在海军和商业力量上的均衡，以免过度依靠其中某一强国。瑞典和丹麦一致认为，如果英国与荷兰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而法国海军衰落下去，他们就会丧失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近来彼得似也采取了这种态度。

[11] 见本书第19章；另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407—408页。

[12] To Rébenac, 11 Jan, 1689, A. Legrelle, *La Mission de M. de Rébenac à Madrid* (1894) , pp. 61—64; cf. *ibid*, pp. 51—52.

[13] 关于法国与萨伏依的关系，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71—473页。

[14] Portland to William III, 15, March 1698, in Japikse, *Correspondentie*, Vol. 1, pt. 1, pp. 259—260. on the diplomacy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cf. below, ch. XII.

[15] To Amelot, 4 May 1687, A. T. de Girardot, *Correspondance de Louis avec le marquis d'Amelot... 1685—1688* (Nantes, 1863) , p. 352.

[16] To Rébenac, 6 Dec. 1688, Legrelle, p. 54. On Louis 's breach with the papacy, see Vol. V, pp. 135—139; for Spanish court politics, below, ch. XI.

[17] 见本书原文第595页。

[18] 见本书原文第525—526页。

[19] 关于威尼斯和萨伏依，见本书原文第555—556、559页。

[20] Paris, Arch. du Min.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Corresp. Polit. k Anglctorre, t. CLXXXVI, fo. 192, and t. CLXXXIX, fo. , 273. For the German background, see Vol. v, chs. XVIII and XXIII.

[21] Dijkvelt to Heinsius, 13 Sept. 1689, H. J. van der Heim, *Het archief van...Heinsius*, Vol. 1 (1867) , pp. 166—167; William to Heinsius, 19/29 Sept. 1690, British Museum, Add. MS. 34, 504, fos. 37—38; Marlborough to Heinsius, 21 April 1703, B. van' t Hoff, *The Correspondence of...Marlborough and...Heinsius* (The Hague, 1951) , pp. 61—62.

[22] To Chamilly, 15 Sept. 1701; Arch. du Min. des Aff. Etr. , Corresp. Polit. Danemark, t. LXVI, fos. 393—394.

[23] 虽然英国大使们在卡尔洛维茨和帕萨洛维茨企图以压制双方降低其要求的办法来迅速达成和平, 但调解人很少直接参加谈判实质问题。

[24] To Gergy, 18 Sept. 1710, *Recueil des Instructions données...Florence* (1912) , p. 89.

[25] Discours sur t' art de négocier (first published in 1737 in Paris) .

[26] Book VIII, ch. IX, para. 5. For a bibliography of Pufendorf (1622—1694) see J. B. Scott' s edn. o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 (Oxford, 2 Vols. 1934) , Vol. II, pp. 59a—62a. cf. Vol. V, pp. 109—114.

[27] See J. B. Scott' s edn. , New York, 1923; Bynkershoek' s masterpiece, *Quaestionum juris publici libri duo* (1737) was republished in facsimile at Oxford in 1930, with E. T. by T. Frank and Introduction by J. de Louter in Vol. II.

[28] See P. C. Jessup and F. Deák, *Neutrality: the Origins* (New York, 1935) ; J. S. Bromley, “Les Corsaires zélandais et la navigation scandinave pendant la Guerre de Succession d' Espagne” , M. Mollat (ed.) , *Le. avire et e' Economie Maritime du Nord de e' Europe* (1960) , pp. 93—109.

[29] Dumont, Vol. VII, pt. II, pp. 342—345.

[30] C. G. Picavet, “Etat de paix et état de guerre au temps de Louis ” , *Rev. d' hist, dipl.* Vol. XXXVIII (1924) , pp. 436—437. 有时相互宣言要隔很长时间: 路易十四在1688年11月26日向荷兰宣战, 荷兰向他宣战是1689年3月9日。

[31] Heemskerk to Heinsius, 2 Jan. 1696, G. von Antal and J. C. H. de Pater (eds.) , *Weensche Gezantsohopsberichten*, Vol. I (The Hague,

1929), p. 615. cf. below, p. 572 ff., for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t Vienna.

[32] 一封从巴黎邮寄马德里的普通信一般要10天或11天才能到达, 寄往里斯本(经拉罗什尔)大约要5个星期, 维也纳两个星期, 威尼斯13天, 罗马17天, 柏林11天, 斯德哥尔摩16—17天, 华沙19天。特快8天可达马德里, 威尼斯9—10天, 罗马或华沙11天。海牙至维也纳的邮政距离为11—12天, 至哥本哈根为7—9天, 至斯德哥尔摩为13天, 至莫斯科约为5个星期。从维也纳至马德里邮件一般要4—5个星期才到, 4—6个星期到君士坦丁堡; 信使可于18天内到达马德里, 都灵5天或6天。

[33] 关于1703—1704年的禁令, 见本书原文第303、420页。

[34] Heemskerk to Heinsius, 17 Sept. 1692, von Antal and de Pater, Vol. I, p. 522.

[35] 驻罗马的法国大使一般每年收入7.2万法郎; 驻英国4.8万法郎; 驻海牙、马德里、斯德哥尔摩3.6万法郎; 驻萨伏依3万法郎; 驻葡萄牙和威尼斯2.4万法郎。公使可领1.2万—2.4万法郎, 驻外政治代表领0.6万—1.2万法郎。驻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英国大使每星期可领100英镑, 驻其他首都大使每日10英镑; 特命公使每日5英镑, 驻外政治代表每日3英镑。

[36] 在英国, “特命使节”的正规级别已于1690年1月9—19日由咨询枢密院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所制定, 直至1789年才加以修订。cf. D. B. Horn, *The British Diplomatic Service, 1689—1789* (Oxford, 1961), chs. III—IV.

[37] See R. Hatton, “Gratific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glo French Rivalry in Sweden during the Nine Years War”, R. Hatton and J. S. Bromley (eds.), *William III and Louis* (1968), pp. 68—94.

[38] 1714—1719年, 土耳其拒绝俄国派驻其首都长期代表时, 科利热为沙皇效劳。

[39] To Portland 12 May 1698, Japikse, Vol. K, pt. I, p. 304.

[40] To Heinsius, 16/26 Feb. 1694 (B. M. Add. MS. 34, 504, fos. 139—140). See G. N. Clark, *The Dutch Alliance and the War against French Trade* (Manchester, 1923), ch. v.

[41] *Archives... de la Maison d'orange-. assau*, 3rd ser. (ed. F. J. L. Kramer, Leiden, 3 Vols. 1907—1909), Vol. II, p. 2.

[42] 后来同盟国成立新教志愿军, 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皇家和萨伏依的军队并肩作战。对大多数志愿者和许多其他新教徒一样, 这一战争当然是宗教性的。

[43] Cf. below, pp. 326ff.

[44] C. G. Picavet,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au temps de Louis* (1930), p. 156.

第六章 英国革命^[1]

路易十四在他同西班牙、联合省、皇帝^[2]以及德意志诸侯的冲突中，还必须把英国也作为它们之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来考虑。他同查理二世的关系从公开的敌视到歃血为盟，无所不包。一般来说，查理慷慨大度，坚守中立。但这只是国王的方针。随着国王统治岁月的延伸，英国公众舆论却愈来愈反对法国。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和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宪法上的分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问题。詹姆士二世即位又给英国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争论使双方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针尖对麦芒——即一个罗马天主教国王和一个新教国家之间水火不容的观点。宗教信徒们把宪法争论推进到只能靠武力或是靠卑躬屈膝方能解决问题的地步。争论的结果绝不仅仅对英国是决定性的。因此，解决这场争论，不仅为大陆各国政府所特别关注，而且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其事。由此所得到的，比王位从一个王子传给另一个王子，比欧洲列强一次决定性的重新组合，比大不列颠作为世界政治中一个主要大国出现，或是比欧洲文化一次新的两极分化，都要大得多。解决这场争论，是有效能的立宪政府和下述总原则的永远确立：政府是作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

到1685年2月16日查理二世意外死亡时，王权在国家政权中已经取得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个中原因一部分应归功于查理：他努力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为承担当时那样规模的政府管理工作，他搜罗了一批人才，还建设起一支常备军，足以在各种非常情况下捍卫政府的安全。这些进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期望的，而查理走得还要远。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在他之前的父亲、祖父一样，同历届议会下院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由于议会是由正式法律程序产生的，他对之无可奈何。但如果他能控制选区，他就能使足够数量拥护他的人当选议员。在他统治的最后4年，他强迫许多选邑（因多数议员从这些选邑选出）退回特许状，另提出一批新选邑，国王直接操纵它们提名议员^[3]，从而实现了他对选区的控制。与此同

时，他击败了辉格党中他的主要对手，并严厉制裁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

查理二世为达目的而采用的手段虽不能说完全不合法，也是够激烈的了，以致脱离了温和的舆论，司法官员的频繁更迭就是明显的反映。尽管查理有种种优势，他也不愿意召集议会。他道德沦落，假如议会不开会，他能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补助金。最主要的是他内心清楚，尽管未来的下议院可能忠实于他，但只要路易还在迫害他的新教臣民和夺取邻邦的领土，分歧就必然存在，最终将引起宪法争端。如果召开议会，必然会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也许会迫使查理开战，接着便是查处他的失误和控制财政问题。所幸的是，路易对议会的畏惧也不亚于他，所以尽管路易很不信任查理，还是愿意大力支援他，使他能不仰仗议会的供给。查理高兴地推迟了那令人讨厌的（议会开会）日期，甚至为此不惜违反一项本不起作用的法令。

查理表现出委曲逢迎、反复无常、诡计多端和贪赃枉法，而詹姆士二世则显出刚愎、妄自尊大、专心致志和以自我为中心。他大约在35岁时改宗罗马天主教，此时他怀有人所共知的改宗者的全部热情，并受到王后摩德纳的玛丽的鼓励。他最关心两件大事：给英国天主教提供长久的安全保证和维护宪法中的王权。他可能从来没有把二者区别开来，或对他的目标稍加任何限制，看来他的确是把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同宗教和政治的现实混同了。而且，不管他是怎么说的，他表现出很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他很愚蠢，同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关系很坏，虽然这可能部分地是因为詹姆士追随路易十四，但主要还是由于他派到教皇那里的大使的人选，以及他顽固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不要求大臣们成为他的顾问，只要求是他的代理人；他对法官的要求就是服从。

对查理二世感到厌烦的公众舆论欢迎新国王。詹姆士利用这一点，刚一即位，就向枢密院宣布他将在教会内和国内维护现行宪法，并立即开始更换曾在他哥哥手下供职的大臣。思想开明、说话爽快的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爵士（1633—1695年）在几个月以后被解聘。第一代罗彻斯特伯爵劳伦斯·海德（1641—1711年），詹姆士的表弟，显贵的克拉伦登伯爵的次子，虔诚的英国国教徒，一个阴谋家而非政治家，则晋升为财政大臣。第二代森德兰伯爵罗伯特·斯潘塞（1641—1702年），精通宫廷政治权术，但对公众舆论却颇为生

疏，一个不择手段去追逐成功的赌徒，继续留任国务大臣，且其权力迅速扩大，1686年又升任枢密院长。这两个人很快就同新任大法官杰弗里斯（1648—1689年）勾结到一起了。杰弗里斯生性残暴，缺乏教育，但却是两个国王心甘情愿的奴仆，随时准备使法律服务于他们维护专制主义的权力。这三个人是国王意旨的执行者，国王的顾问则是王后和法国人爱德华·彼得。彼得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缺乏经验，轻率浮躁，可能还野心勃勃。王后不喜欢他，天主教贵族不相信他，但是他和森德兰能通力合作。免遭迫害而感到满意的贵族们奏请詹姆士谨慎从事，而王后和彼得之流却一致催促他向前。

在为罗马天主教和专制主义尽力时，詹姆士指望能得到他的表弟路易十四的赞助和保护，以防范臣民的反对。法国当时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强国，路易控制一切，他的两个敌手都无力伤害他。皇帝正忙于把土耳其入侵者赶出国土；荷兰省和泽兰省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也没有能力唤起联合省去应对他们的危险。但是辉煌的日子在逐渐流逝。路易忙于同教皇的一连串争吵，他对新教臣民的处置引起各地新教徒的恐惧，德意志各邦国国王开始联合起来防范他，勃兰登堡不再同他结盟，利奥波德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日益壮大，阿姆斯特丹市参议员们对威廉的怀疑逐渐消失。尽管到当时为止这些变化还没有造成多大后果，但是路易准备采纳詹姆士向他供奉的一切。他们双方从未建立过正式联盟。詹姆士虽然在登基时接受过路易的一笔资助，但他力避在财政上依赖他。他有时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在北美双方有些局部性分歧。[\[4\]](#)不过，总的说来，共同的利益把两个国王紧密联系起来了。

詹姆士定于5月29日召集议会。为了搞个试点，5月3日他先召集苏格兰议会。苏格兰议会是比英国议会更受王室控制的一个机构。这次议会的确是确认了所有保护新教信仰的现行法律，但同时它也批准给政府一大笔拨款，签署世袭继承原则，并颁布法令严厉惩处那些狂热的长老会派教徒。在英国，议会下院主要由不久前经过改革的选邑选举产生，王室的影响在各郡的选举中挥洒自如。结果，下议院513名议员中，詹姆士不同意的不超过40人。詹姆士认为，只要把话说得露骨些，他就能得到他父亲和祖父曾要求得到的一切。下议院吞下了他那刺耳的言辞，同意拨给他一笔可观的终身收入。议会还未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它的会议就被阿盖尔伯爵在苏格兰的叛乱和查理二世的长

子蒙默思公爵在英国西部的叛乱所中断。两起叛乱的首领都向遭到查理二世镇压的受害者寻求支持，但都没有得到多少反应，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詹姆士的权力则比以前更强大。

詹姆士又征集兵力以应付突然事变。英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很少，可能远不足人口的五十分之一。^[5]他们受到两类法令的束缚。第一类是较古老的刑法，颁布于从伊丽莎白统治起到清除天主教的各个时期，但复辟时期以后都暂停实施了。这一类法律只是在天主教阴谋^[6]的危机时期部分地实施过。第二类是旨在保护人数占多数的新教徒，以反对天主教势力上升的两个宣誓法令。根据1673年第一个《宣誓法》，天主教徒不得在王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任职；1678年第二个法令禁止天主教徒在议会两院占有席位。詹姆士不大考虑去动那些刑法，因为以后不管哪个政府都未必会将之付诸实施；但他决意要废除两个《宣誓法》，因为它们限制了王权。当时正值扩充兵力，他无视第一个《宣誓法》，委任天主教徒以职务。

11月19日议会再次集会，是在路易十四正式废除《南特敕令》的一个月以后。议会已经准备批给詹姆士更多的补助金，并保证天主教军官的安全，因为他们的任职是违反《宣誓法》的。但是议会在詹姆士用常备军取代民军的计划上意见有分歧，对保留天主教军官的委任坚决反对。接到下议院的抗议之后，詹姆士立即宣布议会休会。1686年一桩共谋的诉讼案件——戈登告发黑尔斯^[7]——使詹姆士废除两个《宣誓法》合法化了。从那时起，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废除法律。

查理二世去世时，约有常备军9000人。到1685年，詹姆士把常备军扩大到2万人；到他统治末年，再扩大到约3.4万人。他认为这样能保卫他的安全，使他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臣民。但他忽略了两个因素。他忘记了或者本来就不知道，从克伦威尔时代以来，英国人就害怕军人政府。在蒙默思失败后的3年中，为了给伦敦造成威胁，他在豪恩斯劳—希思建造起许多大营房，但是却激起了对建造营房的政府的仇恨。詹姆士也得不到愿意像他要求的那样为他服务的军队。他的士兵几乎全是新教徒，他们仍旧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他们由之而来的家乡。非法委任天主教徒职务更加剧了已存在的对抗。由于英国没有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补充军队，詹姆士招募了一批爱尔兰新兵。到他统治末期，在军队里存在着对他的普遍不满。

詹姆士作为国王，还是英国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作为教会的一个重要部分，国教会的利益往往就是王室的利益。从1681年以后教会这个部分一直居优势地位，但此刻它就要接受检验了。詹姆士相信国教会作出的驯顺服从的承诺，想随心所欲地加给它某些他认为适宜的任务。与此同时，詹姆士又受一些主教花言巧语的哄骗，认为国教有可能被他争取，赞同他的教义。为了争取支持，他继续迫害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然如果是更严厉的措施也许能给他带来更多收益。他任命两名惯于屈从逢迎的牧师去补两个已空缺的主教职位，而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仍然空着。如果一切顺利，彼得可能受命担任此职。当伦敦的主教亨利·康普顿表示，如果对在传教中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牧师不给以公正的审理，他不会保持沉默时，詹姆士任命了一个牧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任命的一系列牧师委员会中的第一个。在杰弗里斯领导下，该委员会能够使国教会服从国王的意志。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拒绝参加委员会的活动后就更会如此了。委员会解除了康普顿的主教职务，但国教会仍然坚不动摇。当时它集中了许多牧师，他们能够捍卫它的阵地，使其免受各种攻击。而且，尽管报刊受到控制，牧师们相信他们还是能够发表言论的，因为发放出版许可证的人中有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私人牧师。由于这个原因，报刊上登出了一部内容丰富、但引起争论的英国国教会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一类作品很难说服持反对意见者；它们向信徒们指明争论点，使犹疑不决者坚定起来。教士们不能宣讲可能引起争论的论点，但在几乎所有涉及教义主题的讲道中都有可能涉及主要争论的问题。不管詹姆士施展多少引诱，改宗罗马天主教的寥寥无几。新教徒们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信仰。论战也许教育了英国国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去珍惜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路易十四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更鼓励他们去这样做，这一迫害由于1686年为救济避难者而进行的全国性募捐而广为人知。

奥伦治的威廉的处境此刻正在改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85年和联合省建立了联盟，1686年8月他和奥伦治的威廉在克利夫会见。这一年，威廉的妻子玛丽曾经提醒他，如果她作为詹姆士的长女一朝继承了英国王位，威廉就不论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应当是国王。直到这时，他同詹姆士二世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他曾劝告蒙默思参加皇帝的军队反对土耳其人，并试图阻止蒙默思的船只驶往英国。叛乱一

爆发，他就把在荷兰军队中服役的6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军团派往英国。1685年8月，詹姆士延长了1667年以后英国同联合省之间的一切条约。

对英国国教会的攻击，尤其是对康普顿的处理使玛丽不安，康普顿曾是她的家庭教师。约到1686年末，威廉决定派迪克维尔特勋爵埃弗拉德·范·威德为特使去英国，他将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给詹姆士以劝诫；探询关于他本人同路易十四结盟的传说的实情；他还负有观察英国状况的使命，并向英国国教徒、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阐明亲王在宗教争论问题上的观点。但特使去得太晚了，已经不能对詹姆士起什么作用。1687年1月15日，也就是宣布迪克维尔特为特使的同一天，詹姆士免去了罗彻斯特财政大臣的职务，代之以五人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天主教徒。约与此同时，罗彻斯特的哥哥，第二代克拉伦登伯爵亨利的爱尔兰代理总督职务也被一名英格兰—爱尔兰天主教徒蒂康内尔伯爵（后为公爵）理查德·塔尔博特（1630—1691年）接替。3月，克拉伦登当时的掌玺大臣一职也被另一个天主教徒取代。詹姆士的两个姻兄弟，也因为太顽固的国教教徒而不能继续为他效劳。与此同时，詹姆士还亲自询问议员们对《宣誓法》的看法，如果反对他的意志，议员中有职务的官员就可能丢掉他们的官职。2月22日，詹姆士对苏格兰发布了一项《宽容宣言》。3月3日，迪克维尔特第一次觐见国王。詹姆士对他本人和路易结盟的传说感到可笑，他并不重视迪克维尔特的陈述，迪克维尔特于是去执行威廉别的命令去了。他风度翩翩，使人感到愉快，反对詹姆士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们聚集在他的餐桌旁，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并学会互相信任。没有阴谋，一个伟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6月迪克维尔特返回时，带来了各党派领导人给威廉的信件，他们都对亲王表示信任。

4月14日詹姆士发布《宽容宣言》，取消《宣誓法》，准予信仰完全自由。与此同时，他同意维护英国国教会，并声明从前修道院土地的持有者不受干扰。他相信议会会赞同他的观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长期受压，自然感谢这一解脱，他们中许多人发表言论，感激国王的宣言。但是不久，哈利法克斯在8月公布的名为“致不信奉国教者的信”这份异乎寻常的小册子中警告他们，接受《宽容宣言》是愚蠢的。哈利法克斯力促实现所有新教徒的共同目标，而詹姆士却在展示他保护英国国教会的价值。^[8]牛津大学的主教是顺从的塞缪尔·帕克，天主教在这所大学也略有发展。3月，马格达伦学院院长职位出

缺，詹姆士决定为他的英国国教会弄到这个职位。他提出的第一个候选人按照学院的章程不够资格，而且就连詹姆士也认为他名声太坏。最后，一个新的教士委员会指定帕克为院长，并于11月26日开除了不服从的学院管理委员会成员。

春天时已经查明，现存的议会不会废弃《宣誓法》。7月12日，詹姆士解散了议会，并着手筹备一个能有利于推行他的计划的下议院。为了用辉格党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取代托利党和英国国教徒，再次改动关于选邑的章程；为了控制住郡选议员的席位，经办人对各郡代理郡守和治安法官提出各种质询，答复普遍不能让人满意。预期中的候选人于是声明，他们的选票必须依议会的辩论而定。对他们答复带来的结果是，许多代理郡守和治安法官被天主教徒或詹姆士的宠信所取代。^[9]

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他的教会的胜利。1687年1月，在白厅宫举行了一次豪华的礼拜仪式，他的臣民对此只能表示遗憾，却不能提出什么指责。公开接见罗马教皇的使节更是使人无法接受。其实，英诺森教皇授予他的代表以使节待遇也是很很不情愿的。到那时，詹姆士已经公开让天主教贵族和其他顾问们（森德兰本人可能也已经改宗天主教，虽然直到1688年以前他未宣布）围着他转；后来，到11月，他任命彼得为枢密院顾问官，这一举动说明他完全无视法律，无视他臣民的感情，乃至他个人的利益。但那时他有了一个新的、完全的和永久胜利的希望，在11月份谣传他的王后有了身孕，到1688年1月怀孕的消息正式宣布了。

奥伦治的威廉和玛丽陷入窘境。迪克维尔特建立起来的威廉和国王的主要英国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仍由其他代理人维系着，威廉从而了解到，英国的舆论已经何等接近崩溃的边缘。在一个问题上，他和玛丽宣布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赞成迫害，问心无愧；他们主张废除刑律，但坚持保留《宣誓法》。他们能给予国王反对派的道义上的支持就是这些。不管怎样，他们是詹姆士的女婿和女儿，他们如领导一次反对他的起义，将遭人非议。同时，他们还受到亲情的束缚。然而，如果他们听任英国自行其是，就会爆发一场类似世纪中期使英国脱离欧洲事务达10年之久那样的一场内战。或者路易十四出面干涉，变詹姆士为他的附庸；或者詹姆士为转移臣民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联合路易重复1672年对联合省的进攻。欧洲的形势进一步迫使威廉进行干

涉。英国的舆论长期以来就表示出对路易的敌意。英国应倾其全力反对路易，维护和平也好，战争征服也罢，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詹姆士改变他的整个方针，一切都会很好。不过，威廉计划在从迪克维尔特返回荷兰到1687年底之间某个时候进行干涉也是十分可能的。他和三四位朋友及同事看来已经筹划好，从陆上和海上各需要多少武装力量，怎样招募到这些部队，一个完整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了。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东西，没有书记员，绝对保密。法国驻联合省大使达沃克斯送给路易的一切预报都同以前的一样，而且都是立足于对威廉一般的不信任。1688年初，威廉开始积极筹备。被法国对联合省进口货物征收一种新税所激怒，同时又因詹姆士要求他们把在荷兰服役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军团送回英国而惊恐不安的荷兰议会，投票赞成加强防御力量，使之超过他们平素的夏季卫队。虽然这支力量基本上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但他们将来也可能用来远征英国。鉴于阿姆斯特丹的态度犹豫不定（由于法国的关税问题，它的态度也在变化），威廉尽可能使准备工作不引人注意，对达沃克斯也像对詹姆士一样保密。准备工作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到4月底，当詹姆士的主要英国反对派的代理人爱德华·罗素（未来的海军将领）询问威廉，他能为他做些什么时，威廉回答说，假如英国能发来一个适当的邀请，他9月底就能够起航。[\[10\]](#)

1688年5月7日，詹姆士重新颁布他的英国的《宽容宣言》，并于5月14日命令在全国所有大小教堂宣读。5月28日，大主教桑克罗夫特和其他6名主教签署的一份请愿书呈递给国王。他们说，这项宣言所依据的豁免权是非法的，因此请求詹姆士不要坚持让他们去宣读它。正如威廉所预见，情况发展到了极端。大多数牧师不宣读这份宣言，詹姆士决定采取行动。6月18日，这7位主教被带到詹姆士面前，被关进伦敦塔。两天以后，王后生下一个儿子。7月9—10日，这些主教们被审讯，英国高等法院对他们被控进行煽动性诽谤活动宣判无罪。欢呼这一判决的喝彩声从举行审判的威斯敏斯特大厅响遍伦敦和更远的地方。詹姆士正在豪恩斯劳视察兵营，他听到了军队士兵的欢呼声，从而更坚定了他反对英国国教的决心。

这天夜里，1689年托林顿伯爵阿瑟·赫伯特带着反对詹姆士二世的7个反对派首领署名的给威廉的一封信，乔装离开伦敦。这7名首领是有政治经验的、富有的、有威望和有影响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

他们以最坦率的方式告知威廉，“整个王国的人民”每20个人中有19个要求变革，他们列举了立即入侵的有利形势和拖延的危险等因素，并且保证，威廉登陆后，他们将同他合作。[\[11\]](#)

在邀请信中首领们提及陆、海军中的不满情绪。在随后几个月，他们的代理人将不满情绪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詹姆士的军队到时候已作好反水的一切准备。这一使命由于詹姆士把爱尔兰天主教士兵插编入他的英国军团而变得更加容易完成了。威廉是如何为他的远征军筹措资金，至今尚不完全清楚。除议会批给他的军事拨款以外，英国的首领们可能还汇给他一大笔款项。他们还在别的方面帮助他。王后怀孕的事，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天主教徒们预言将生一个儿子，新教徒们则怀疑这是罗马天主教徒们的骗局。出于各种考虑，王后从来不让安妮公主诊察她。孩子意外地早产，王后的产程也很短。安妮是继奥伦治公主之后的又一个继承人，她当时在巴思，依据职权桑克罗夫特大主教是王位继承人诞生的主要见证人，而他当时却被囚禁在伦敦塔。王后生产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是从来不受公众信任的天主教徒，或是已失去公众信任的新教徒。威廉和玛丽已经承认这个孩子是真正的王室血统，但给他的邀请信中说，在英国普遍认为那孩子是个私生子，诞生时的情况同骗局也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威廉和玛丽不相信詹姆士本人会同这类事有任何关系，不过威廉按照邀请信上所说的，中止了在玛丽的小教堂里为这个小王子做祈祷的活动。[\[12\]](#)在英国，詹姆士失去公众尊重的原因与其说是他确实行为不端，不如说是大家相信他搞欺骗。

收到邀请信以后，威廉立即把入侵计划付诸实施。他派到维也纳去的私人代理人将使虔诚的和十分严谨的皇帝相信，他入侵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新教的安全，它不会引起反天主教的圣战。[\[13\]](#)威廉招募了约7000水兵、5000步兵。威廉的挚友1689年波特兰第一代伯爵汉斯·威廉·本廷克到德意志宫廷去征集军队，这支军队在荷兰军队远征英国时负责保卫联合省。勃兰登堡、黑森和不伦瑞克家族的亲王们给他提供了1.3万人。只有汉诺威的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除外，因为不久前他刚同路易十四签订了一项有约束性的条约。[\[14\]](#)这年初，当荷兰省议会的议员们向威廉提醒蒙默思的命运时，威廉就已经向他们打过招呼。此刻，他必须说服联合省各方面的管理机构来支持他的远征。尽管威廉为战备忙得不可开交，但夏末这段时间他仍特别焦躁不安。

他已经经历过一连串的灾难，这次远征，如果开了航，也只有听凭天气和战争摆布。最使威廉担心的是欧洲大陆上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妨碍他开航。

由于路易失算，威廉有了可乘之机。根据苏（Reunions，法国属地）《尼汪条约》^[15]，路易从帝国手中夺得若干领土。他要求承认他对这些领土的绝对君主权，但是他从1684年《雷根斯堡和约》只得到20年的保证。另外，此刻他希望能提供给他一个通过科隆进入德意志的入口。^[16]1687年后期，他曾试图安置一个他的拥护者W.E. 冯·弗斯顿伯格红衣主教作为大主教候选人的副主教。1688年6月3日大主教去世时，继承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巴伐利亚的约瑟夫·克雷芒，他的哥哥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伊曼纽尔当时受皇帝的宠信；另一个就是弗斯顿伯格。选举在7月19日举行，尽管耍弄阴谋，收受贿赂，威胁恫吓，双方都未能取胜，问题交给英诺森十一世决定，他又把这件事委托给一个专门的主教会议。然而，英诺森已经表现出他对弗斯顿伯格的反感，他同路易十四已经有过几次争吵，他认为路易没有理由干涉帝国的事务。利奥波德因此更支持英诺森决心要干的事业。即把土耳其人从基督教世界驱逐出去。他置路易的建议和威胁于不顾，于9月18日宣布约瑟夫·克雷芒当选。路易的方针则早在3个星期以前已经定了。他很不重视达沃克斯的告诫，而他驻英国的大使给他提供的关于英国舆论的情况又很少。威廉春天以前不大可能开航远征；詹姆士有足够的兵力进行防御，加之路易已经答应他，必要时在布列斯特有些船只可以动用。不管怎样，作为盟友，詹姆士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如果他被迫向路易求援，教训将是有益的。再者，在别的地方炫耀法国的武力将是值得的。此刻，詹姆士似乎不会马上遇到危险，而利奥波德又正把土耳其人赶回去。路易不是苏丹的盟友，但是必须鼓励土耳其人继续战斗，以便牵制利奥波德把全部兵力投入西方的冲突。^[17]路易在雷根斯堡和科隆已经遇到外交上的失败，勃兰登堡已经改变立场，如果他不打算同皇帝的全部兵力和德意志一些亲王作斗争，他必须立刻采取行动。9月9日，达沃克斯向议会宣布，法英结有联盟，路易有责任把反对詹姆士的最初示威看成是破坏和平的行为。詹姆士被这种恩赐的庇护所激怒，否认有任何同法国的联盟存在，这种断然拒绝承认更坚定了路易进攻利奥波德的决心。9月24日路易十四发布宣言，威胁着要求国务会议反对英诺森，并且证明他自己对利奥波德的

行动是正确的。3天以后，他的军队围攻在施佩耶尔主教管区内的菲利普斯堡，它与荷兰最近的边界处直线距离约160英里。路易已经失去了一个争夺的目标，勃兰登堡和其他的德意志军队已经占领科隆。

达沃克斯的声明没有吓住荷兰人。由于入侵已没有什么危险，阿姆斯特丹的上院议员、荷兰政府和议会都宣誓支持威廉。10月10日，威廉发布一项声明，历数詹姆士的大臣们的不法行为，并解释玛丽和他关心的问题，他远征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自由和合法的议会，它将保卫新教，并合理解决宗教问题。远征军准备几天以后开航，只等适宜的风向。

刚刚审讯过主教，詹姆士就免除了两名曾为这些主教辩护过的法官的职务，并着手调查宣读他的《宽容宣言》的情况。他还宣布，12月7日将召集议会。直到10月的第一个星期，他才了解到威廉打算入侵英国。他立即撤回议会选举的命令，尽快准备他自身的安全保卫，并力图用取消他自己和前任统治者新颁布的某些不受欢迎的法令以谋求公众的支持；普遍恢复了以伦敦为首的老的选邑的特许状，取消了教会事务委员会，妓女也从良了——这还帮不了他。这些是威廉入侵的第一批成果。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威廉入侵上，而不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注意到，国王依旧把法国人彼得留在身边。在11月1日枢密院一次全体会议上，提供了证明王子诞生的证据。4天以后，森德兰被解职；与此同时，伦敦的暴民破坏了两座天主教小教堂。

威廉的远征由约50艘军舰、200艘运送9000步兵和4000骑兵的运输舰组成，在推迟两个星期于10月29日开航之后，又被风暴吹了回来，所幸没有遭受多大损失。11月11日再次开航，本来可能打算驶向约克郡，在那里，给威廉的邀请信的署名人之一丹比伯爵将动员郡的力量，但是风把远征军的船舰吹向南方，穿过了英吉利海峡。风和海浪使詹姆士的舰队无法离开停泊地，从而使威廉得以避免同当时已充分动员起来的英国舰队交战这一极大危险。按照路易十四许下的承诺，应当是停泊在布列斯特的法国舰只也未能离开地中海。11月15日远征军驶进托尔贝。第二天登陆后，军队开始向伦敦进军。最初几天，他们只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后来小乡绅开始加入进来，很快，在威廉周围聚起了身份高贵的人。詹姆士担心11月27日会发生反天主教的骚乱，因为这一天是伊丽莎白女王即位的日子，是新教徒庆祝的盛大节日，在伦敦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就把军队开出去，本人也于11月29日

到了索尔兹伯里，已经有些人开了小差。当时北方正在发动起来，而詹姆士被长期的鼻出血折腾得软弱无力，已不敢冒险去打仗，12月4日开始撤退。前一天晚上，詹姆士最能干的指挥官、他的亲信丘吉尔男爵约翰（1689年的马尔巴勒伯爵，1702年为公爵）背弃了他；4日晚上，安妮公主的丈夫、丹麦的乔治亲王步其后尘，5日晚上安妮本人、丘吉尔夫人萨拉也背弃詹姆士、丘吉尔离开白厅投奔丹比和北方暴乱者去了。^[18]詹姆士本来很重儿女情长，当他回到伦敦时，他已经颓丧潦倒了。

与此同时，威廉以日益扩大的兵力前进，行军途中只遇到一两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詹姆士去索尔兹伯里时，他曾计划把朴茨茅斯作为一个避难地，并把还是婴儿的王子送到那里。现在他决定出逃了。为赢得时间，他答应1月25日召集议会，并派出哈利法克斯、第二代诺丁汉公爵丹尼尔·芬奇和戈多尔芬男爵西德尼三人委员会去同威廉谈判。12月18日，他们在距伦敦约65英里处的利特尔科特同威廉会见，并于第二天商定条件，提出詹姆士必须辞退全部天主教文职和军职官员；伦敦塔和蒂尔伯里堡应交由伦敦市管理；议会开会时，詹姆士和威廉及他们的卫队都要在伦敦，或是双方离伦敦同等距离，双方军队都撤离到距伦敦40英里处。12月19日那天夜里，在谈判条件的报告送交给詹姆士之前，他已经把王后和儿子送到巴黎避难，并答应她本人于24小时之内也赶来。^[19]詹姆士写了一封告别信，他的总司令费弗沙姆伯爵根据这封信遣散了此刻仍留在他身边的军队。12月21日一早，他烧掉为原答应召开的议会准备的有关文件之后，带着国玺离开了白厅。出于极愚蠢的逻辑推理，他把国玺扔进了泰晤士河。没有盖有国印的命令批准，议会就不能合法召集；而没有他詹姆士国王的批准，也不能刻制新的国印。此刻，没有他，他的敌手什么事都干不了。

就这样，国家没有政府了。詹姆士最亲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宠信们都逃走了。报刊舆论立即活跃起来。整个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抨击性小册子一直是秘密出版的，现在，在12月21—25日间就创办了4种报纸。有两天晚上出现了反对天主教徒的骚动。12月21日，留在伦敦的贵族们在市政厅开会，第二天又在白厅集会，选举哈利法克斯为他们的主席；再后一天，秩序完全恢复了。与此同时，詹姆士于12月21日在费弗沙姆附近的海面上被抓获，26日他返回伦敦^[20]，受到平民

大众的友好接待。经过这几天的焦急不安之后，解决问题的途径好像是打开了。

威廉没有料到詹姆士会出逃。在此事发生以前，他一直是把詹姆士当作国王和国家的主要统治者看待的。到詹姆士回到伦敦时，威廉的态度变了。詹姆士没有安排好部队士兵的生计就遣散了他们，可能是这种失职行为强烈地影响了他。以前推行的是错误的政策；当前詹姆士已经显示他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当詹姆士从前的指挥官把詹姆士的信带给威廉时，这名指挥官被捕了。威廉曾建议詹姆士留在罗彻斯特，但是信件送错了。12月27日，正向伦敦进军的威廉命令詹姆士迁到在泰晤士河上游、离伦敦约10英里的哈姆，而詹姆士宁愿回到罗彻斯特。12月28日，他离开伦敦，威廉则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到达伦敦。贵族们在继续开会。他们同威廉合作，同时也请求詹姆士能准许召集议会。但是1月2日一早詹姆士就从他的住处逃走了，此时正前往法国。没有他的同意，议会不可能合法召开，因此，贵族们建议威廉召集一次代表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请他负责主持政府。1月6日，仍健在的查理二世时期议会下院的议员，会同伦敦市的一些代表也呈给他一封类似的信件。1月7日，威廉同意接着主持政府，直到2月1日代表会议召开。

急需达成和解。11月26日法国已经对联合省宣战；爱尔兰在蒂康内尔领导下维护自己的独立；虽然威廉也被邀请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对苏格兰实施统治，但詹姆士在那里仍有很多支持者。为了保住已赢得的成果，英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个新教政府，一个能够抗击法国的政府。虽然人们关心的首先是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但代表会议的首要任务却是解决詹姆士强加给国家的宪法问题。从理论上说，现存宪法能够提供一个需要的政府，但由此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极大保守性质。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执行权交给可信赖的人，并确信此公是可信赖的。政府面临着四种方案。第一，有条件地让詹姆士再回来。拥护这一方案的人不多，而且詹姆士本人的声明不久就表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詹姆士和他的直接继承人可以保留王位，但他们将被当作婴儿或疯子看待，执行权交给摄政者行使。这个方案对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损害最小，也省得再宣誓效忠了，詹姆士的许多臣民对他都已宣过誓。由此，这一方案对上院议员和牧师也有吸引力，上院议员中

许多人过去曾同詹姆士配合默契。但是，不管詹姆士有多少谬误，他毕竟不是疯子。只要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国王，不管他有多少实权，他的多数臣民都不会去向一个摄政者效忠。特别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只有国王的拥护者才能被免除叛逆罪的惩罚。第三，就是把詹姆士出逃看成是国王逊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女奥伦治公主将按顺序自动继承王位，新诞生的小王子的王位要求可以搁置在一边，理由则是充分得很。丹比支持这个方案，但是玛丽和威廉都不赞成。第四，由于詹姆士出逃，可以认为他已解散政府，这样，代表会议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行使执行权，并制定维护和行使这一权力的规则。这是代表会议的职责所在。这个方案尽管还比较粗略，未经过深思熟虑，但非常符合詹姆士所造成的形势。下议院绝大多数议员都支持这一方案。下议院决议：

鉴于国王詹姆士二世破坏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听从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及其他坏人的误导，蓄意颠覆本王国宪法，已经触犯根本大法，且本人已离开本王国，所以他已经放弃统治，因而王位空缺。[\[21\]](#)

上院议员提出用“被抛弃”代替“放弃”一词，但关键问题是王位算不算空缺。上院议员主张勾销决议中最后一句话，下院议员则坚持保留。最后，威廉介入了。直到那时以前，他一直克制自己不对代表会议进行任何干预，不管是它的选举还是它的议程。直到代表会议召开时，他一直是赞成摄政的方案，但会议辩论说明，实际上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因此，他通知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几位贵族，如果他必须在英国行使权力，他就必须是国王而且是终身国王；如果代表会议作出任何与此不同的处理，他将毫无怨言地返回他自己的国家。[\[22\]](#)议会两院立即取得一致，王位当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继承；在他两人都健在时，威廉一人行使权力；如他两人有一人去世，王位归另一位健在者；他们死后，王位传给玛丽的子女，然后传给安妮及其子女，再后是传给威廉和威廉跟玛丽之外的妻子生的子女。由于天气不好，玛丽在荷兰耽误了时间，她于2月22日到达伦敦，第二天她和威廉接受了王位和随之而产生的《权利宣言》。[\[23\]](#)

在17世纪，宪法一般被看成是某种静态的东西，是同一个特定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多少相联系的人工制品。假定说英国已经有了一部这样性质的宪法，那么就没有必要制定成文法；再者，时间也不允许；在对宪法的解释上意见也不会一致。今后，统治者应当同国民的看法

一致，为保证实现这点，一部分要靠法律，一部分要靠暗含的意思，当然，更多的是靠信任。已经达成一致，不能让一个天主教王子统治新教的英国。《权利宣言》对最近争论的主要问题作了阐述，这个阐述就被认作是法律，或是法律的精髓。新的加冕誓言要求统治者特别要宣誓遵守议会通过的法律；今后议会每年召集一次，这主要靠卡住拨款来实现：除了战争需要钱外，在政府正常开支中也故意让威廉捉襟见肘，钱不够花；议会并通过整肃军队的立法而获得进一步的控制权：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哗变”法》，每个法令的执行时间都很短。

然而，很大一部分是靠统治者同人民之间普遍的契约观念，靠威廉同英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和需要，靠对威廉人品的信赖。革命以前，威廉对英国政体的认识局限在斯图亚特王朝实践的基础之上，他把过多的权力交给枢密院，给议会的权力太少。他希望保持住像他前辈曾经握有的那样大的君权，并四次运用王室的否决权推翻议会的议案。然而下议院早期对他的粗暴态度改变了他的看法，而且对他来说，他同路易十四的矛盾比起君权来是如此的更为重要，致使他很快学会了去同议会搞好关系，以取得它的支持。为了就这些问题寻求答案，他非常感激哈利法克斯，后者在1688年出版的《一个骑墙派的性格》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英国舆论界大量中层人士渴望立宪。他们既非君主主义者，又非共和主义者，他们在危急时期或是日常的争论中，可以站在保王党人一边或议会党人一边，站在辉格党一边或托利党一边，但最终他们还是鲜明地维护他们的共同要求。只要革命形势允许，已经获得王权的威廉决心要当英国国王，而不是一党的首领。他本性温和，这一点足以同哈利法克斯相媲美，他对大臣的选择和对恶意报复的厌恶，使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同样地感到失望，也感到是有了保护。

他的责任感和可信赖性把他和他的新臣民联结起来了。起初双方都互不信任。厌恶王权转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厌恶这种转移，而这一次的厌恶竟落到了威廉头上。因为他最后得到了王位，所以他早先对王位不感兴趣的声明就容易被看成是虚伪的。这种观点影响了许多人。他们并非詹姆士的亲信，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查理二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威廉则态度冷淡，如果还谈不上是难以相处的话。他感到难以加入到普通的交谈中去，他明显地更喜欢他的同胞们，而不是他的新臣属。威廉认为，他们中有些人追逐私利或背信弃

义，罗彻斯特和克拉伦登是无赖，丹比参与了查理二世在法国的阴谋活动，丘吉尔为个人的目的利用安妮，威廉可能还鄙视他背弃了詹姆士二世，而他的一切都是詹姆士恩赐的。在同臣属的关系中，他得到玛丽的帮助，她冲淡了他的冷漠态度造成的影响。她熟悉英国人的性格，作为斯图亚特家族的成员之一，她赋予新制度以连续性的外观。经过一段时间，当威廉和他的臣属们相互熟悉了解之后，形势逐渐缓和下来。和议会有某些不同看法是难免的。议会每年召开一次，不管在哪一个丰收年景，议会集会的时间比革命前8年集会的总时间都多。由此，议会增强了力量，扩大了它的利益；尤其是，由于议员们能够不断听到新的信息，议会的力量就更大了。威廉对事务的处理（但不是他的政策），有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他已经长期习惯于被人反对，并且懂得，在政治生活中，通过争辩达到信服比排斥更为有利。如果他不能自主行事，尽管他私下里语言强硬，他还是会服从的。虽然有时他受到指责，但他永远不会丧失议会的信任。他的品德在博得公众信任上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信任在国债和英格兰银行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为使国家普遍安定，有两件急迫的任务。第一，王权转移后，有必要强制所有官员，包括教会显贵和有俸牧师进行一次新的效忠宣誓。5月份通过一项强制宣誓法，拒绝接受者将处以罚金。拒绝接受的人相对很少，其中有桑克罗夫特大主教、6个主教和约400名牧师。他们以“拒绝宣誓表忠心者”而闻名，他们声称自己是真正的英国国教徒。但是，除了被放逐的国王的拥护者詹姆士党人外，在世俗界他们的追随者很少。这些拒绝宣誓者在政治的和教会的争论中比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第二个任务是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少都明确保证过的：法律上容忍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信仰自由。那是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时代，虽然詹姆士和路易的所作所为近期以来激起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反感，但人们也不会忘记清教徒们以前曾使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们所遭受的真实的或被认为的屈辱。作为国教徒，他们必须维护英国国教的光辉外表及其在国家中的至上地位，同时还要保持它的精神的完美无缺。另一方面，迫害对坚定一个改宗者的信仰显然不起作用。有一种理由说迫害同新约全书的教义是不一致的，人们一般不赞成用这种办法反对自己的同胞，国教会一个重要分支宗教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人反对这种办法；新国王也声明过，他将不参与迫害。新国王采取了两项有利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措施，其一，国教徒的圣餐

仪式根据《理解法案》进行改革，使大多数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对改革后的仪式能真心诚意地接受。这项措施在下议院未获通过，部分原因是很少有国教徒赞成，部分原因是通过了另一项措施，即《容忍法》。这项法令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免除了一切宗教异端分子应当受到的惩罚（根据《宣誓法》被取消资格者除外），给他们的牧师某些特权，允许他们做礼拜。他们中的多数愿意遵守《宣誓法》，在必要时接受国教的圣餐。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教育子女。威廉和宗教自由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他们也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到安妮统治时期^[24]把他们限制在极狭小的容许范围内的图谋夭折了。此后他们的困难与其说是在政治方面，不如说是在社会方面了。《容忍法》也为教友派信徒提供生计，但是天主教徒和一切不信奉三位一体的人被排除在它的恩惠之外。天主教徒仍然受到各种惩罚，并根据刑法和《宣誓法》被剥夺资格。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处境比1685年以前还坏，因为他们几乎必然地是詹姆士党人，因此，他们不忠于威廉和玛丽。另一个法令把他们中间那些没有职业或不是伦敦的长期定居者驱逐出伦敦，并课以相当于通常税率双倍的土地税。但总的来说，他们比1685年以前享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和做礼拜的自由。在这个时期，他们把外国大使在伦敦的小教堂用来作为定期做礼拜的场所。他们的成功最后导致1700年一项极为苛刻的反对他们的法律的出台，但这项法律基本上未生效。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处境今后也不会有大的改进。只要他们还是詹姆士党人，没有哪个政府会愿意去解脱他们。

新统治者比较自由的观点不仅表现在宗教事务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新闻报刊指导上的宽容态度。当时公认的原则是要控制新闻，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联合省是最重要的例外。在那里，很久以来新闻都是自由的。在英国，新闻报刊一般要受到特许法令或其他手段的控制。仅在内战时期和复辟的前一年，在天主教阴谋危机期间和由于詹姆士出逃而造成的王位中断期间，控制曾一度中断。在其他时期，没有自由讨论，除非是由秘密小册子引起的——例如，哈利法克斯《致不信奉国教者的信》（1687年）就没有得到许可——或是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在詹姆士时期的宗教论战。1685年的《特许法》到1689年仍然有效。由于在革命以后它已不适用，1693年作了补充修改。到1695年，当它不适用时，它已如此不受信任，以致不可能再更新修改它了。由于没有可供选用的合适办法，尽管普遍认为必须对新闻界进行监督，新闻还是变得自由了，不过要冒被控犯诽谤罪的风

险。几家办得好的、已出版了很长时间的报纸马上就恢复出版了。与此同时，还有无数的小册子讨论公众感兴趣的各种问题。^[25]

到1689年2月23日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英国革命只能从狭义上说是完成了。首先，路易十四并没有认识到詹姆士二世的灾难的严重性。当詹姆士的王后和儿子到达法国时，路易决定利用他们作为詹姆士今后检点行为的保证。詹姆士第二次出逃表明他失去了英国。威廉几乎不担心会发生内战，以至第二年初他就把参加远征的荷兰军队送回国了，荷兰舰队则早已回国。虽然直到5月17日以前，英国并没有向法国宣战，路易已经预计到英国会与他的敌人联起手来；不管怎样，苏格兰和爱尔兰有可能成功地抵制威廉，甚至帮助詹姆士重新夺回英国，这是可能的。

当时苏格兰约有100万居民，高地和岛屿约占国家的一大半。居民的分野鲜明。高地人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操盖尔语；低地人操苏格兰英语。按当时英国标准，苏格兰人比英国人更贫穷。尽管政治经济制度落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失当，但是，低地区的文明仍全力地向前发展。高地人划分为若干克兰^[26]，每个克兰服从自己的首领，首领掌握所属成员的生杀大权。高地人靠自己的土地艰难度日，同时偷窃低地邻人的牲口以补不足。虽然大多数高地人名义上是苏格兰圣公会^[27]成员，天主教在几个地区仍很盛行，此外，可能还有很多原始迷信。多数低地人是长老会派教徒。斯图亚特几代国王曾试图把圣公会制强加给低地人，但未成功。在宗教感情最强烈的西南地区，镇压和迫害从复辟时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其间仅有几次被起义中断。过激分子，如野外集会者或卡梅隆派分子被詹姆士国王（在苏格兰是詹姆士七世）宣布不受《宽容法》保护。

1688年10月，詹姆士召集他在苏格兰的武装力量保卫英国。在他第一次出逃之前不久，爱丁堡的下层民众袭击了霍利鲁德的天主教小教堂。在西洋旧历圣诞日，西部的长老会派教徒开始驱逐圣公会的牧师。1月，已在伦敦的30名苏格兰贵族和80名绅士请求威廉统治他们的国家，并召集各等级的代表会议。会议于3月24日召开，詹姆士允许他的支持者出席，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否决了。最后，4月21日，代表会议提出一项《权利要求》，宣布由于詹姆士的罪行，他已经失去王位，会议提出把王位奉献给威廉和玛丽。5月21日，他们登上苏格兰王位。在这之前，詹姆士的支持者已经离开代表会议，他们中的邓迪子

爵克拉弗豪斯的詹姆士·格雷厄姆正在发动高地人起义支持国王。8月6日，他在基利克兰基击败政府军，但本人也战死。没有他，高地人就干不成什么了，约3个星期以后，他们被邓克尔德的卡梅隆派的一个团击败。1690年反抗停止，在1691年期间，首领们被迫同意向威廉宣誓效忠。

迄今为止，从王室的利益出发，苏格兰的地方议会受一个常设委员会即苏格兰枢密院管理。1691年这种管理被废除，此后，议会可以立法。威廉主要是出于国教徒的感情，想保留圣公会，但苏格兰的主教们决不妥协，因此，1690年依法建立了长老会派政府。教会在议会里仍然隶属于国王，卡梅隆派不满，就退出了议会。尽管威廉为那些服从新政府时圣公会牧师尽了一切努力，圣公会派牧师们的遭遇仍很不顺利，他们中许多人继续拒绝向威廉宣誓效忠，特别是在阿伯丁郡和沿高地的边境一带。1695年创办了苏格兰银行，并试图建立对外贸易公司，这表明工商业开始发展。但是，只要英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像反对一切外国的竞争那样去反对苏格兰的竞争，后者的工商业就不会有很宽广的发展前途。这样一来，加上别的更普遍的原因，反对英国的民族感情高涨起来，这种感情又因格伦科大屠杀^[28]和苏格兰冒险拓殖达里埃^[29]的失败而加剧。到威廉统治结束之前，已经很清楚，两个王国或者完全分离，或者统一成为一个议会制联盟。

当苏格兰低地人迅速抛弃詹姆士二世并对他关闭国门时，爱尔兰则希望恢复他们失去的王国。它的人口可能约两倍于苏格兰，按民族、宗教和有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成若干部分。土生的爱尔兰人和许多在帕莱的英国移民都是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在香农河以西仍占有大片土地，在别的地方是被剥夺了土地的、贫穷不堪的劳动者。英爱天主教徒则比较富裕。英爱人的后裔和不久前来的英国移民及殖民者属于爱尔兰圣公会，它在教义、管理和礼拜方面和英国国教是一致的。其他的英国殖民者，如以前克伦威尔的士兵，是新教派的成员。在厄尔斯特这个詹姆士一世时期被英国占去的地方，有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的聚居点。^[30]在纠正对土生爱尔兰人的不公正待遇方面，查理二世没有做什么事。但是，作为英国关税保护主义立法的一个不期而然的后果是，爱尔兰自力更生发展了毛纺工业，国家因此享受了20年的繁荣。这也是宗教自由的一个意外收获。

土生居民不以此为满足。蒂康内尔接替克拉伦敦时，他们的天刚破晓。蒂康内尔明确提出，应当把王权移交给新教徒，从而把爱尔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甚至可以以请法国保护为代价。与此同时，他把民事、军事大权从殖民者手中转移到土生白人手中。詹姆士倒台以后，蒂康内尔又同威廉周旋以拖延时间，同时邀请詹姆士到爱尔兰来。他统治爱尔兰整个国家，但厄尔斯特几个地方除外，在那里，殖民分子在伦敦德里和恩尼斯基伦建立了反抗中心。1689年3月22日詹姆士到达，带来了路易提供给他的武器和金钱，同时还有法国军官和作为大使的达沃克斯陪同。^[31]他没有恢复多少活力和精神，他不喜欢爱尔兰，正如以前他把爱尔兰看成是提供天主教士兵的来源，这些士兵们应当服从他的英国臣僚一样，现在他把它看成是收复英国的一个工具。但他担心向爱尔兰让步会使他同英国的看法疏远。在这点上，他同他的两个主要顾问意见有分歧。其一是蒂康内尔，他希望爱尔兰挣脱英国的枷锁；另一个是达沃克斯，他对英国的看法和爱尔兰的苦难漠不关心。从5月17日到7月28日，詹姆士在都柏林召集议会，上议院的4名主教和几名世俗贵族组成了一个明显的新教少数派。在下议院，由于蒂康内尔操纵选举，新教徒极少。230名议员中的多数是英爱血统，只有约60人冠有爱尔兰姓。很少人有议会实践活动经验，多数议员关心的只是维护他们的权利，纠正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但不知道怎样达到目的。1662年的《处理法》废除了，土地回到了1641年以前的土地所有者或他们的代表的手中；同时通过一项范围广泛的《没收财产法》，宣布约2400人犯有严重的叛国罪。尽管这两项措施严重破坏了詹姆士重返英国的前景，他还是赞同了它们。

北方的反抗仍在继续。爱尔兰军队包围了伦敦德里，并利用断绝供应的办法几乎征服了它。威廉虽然宁愿在大陆上同路易的军队打仗，但是英国议会迫使他再次征服爱尔兰。威廉向爱尔兰派出了舰只和军队；1689年8月10日，解除了对伦敦德里的包围；到这年的晚些时候，收复了厄尔斯特大部分地区；1690年威廉进入爱尔兰。7月11日，他的军队同詹姆士的军队在博伊恩交战，并击败了后者。詹姆士几乎是第一个逃出战场，立即返回法国。在这次战役中，威廉未能攻克利默里克，1691年10月13日，利默里克向一支英国军队投降。至此，对爱尔兰的征服完成了。

《利默里克条约》的条款等于是给爱尔兰的参战人员一个总赦免，等于是让爱尔兰恢复原状：回到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状况。谁如果愿意，可以离开爱尔兰到国外去生财致富。到12月份，约有1.2万个人这样做了。留在爱尔兰的新教徒们则要求安全、土地和复仇。条约关于土地的条款似乎是遵守了原状^[32]，但是英国议会的一项法令决定把天主教徒开除出爱尔兰议会。这样，1695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连串新的反对天主教徒的刑法中的第一个法令。虽然威廉反对这样做，他还是被迫批准了其中某些法令，他的后继者颁布的刑法还更严厉。与此同时，英国议会向复兴中的爱尔兰毛纺织业开刀了。尽管这些刑法从来没有全部付诸实施，但革命带来了爱尔兰历史上一个必然使英国人感到羞愧的时期。^[33]

随着这次革命，国王同议会之间的宪法冲突在英国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了，前景未卜。威廉和哈利法克斯都希望他们已经熟知的那些党派能消失掉，但他们错了。很快党派之间将习惯地进行较量。它们接受议会中的国王统治，即接受有限的君主制。虽然这些党派组织松懈，纪律涣散，但很快它们就会使国王认识到他必须通过他们中间一个拥有下议院支持的党来进行统治——在党派基础上成立政府，并为稳定政府而运用这个时期盛行的各种恩赐官职和贿赂手段。1689年，威廉吸收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但他此举受到限制，因为他不喜欢罗彻斯特及其高教会的追随者，辉格党又缺少合适人选。托利党人围绕宗教问题制造麻烦，辉格党人则因1681年以来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一味想报复，这也使他们与国王疏远了。因为他们行动激烈，威廉解散了代表会议，于1690年初召集新的议会。新议会撤了哈利法克斯的职，留下当时的卡马顿侯爵托利党人丹比（1631—1712年）担任政府的主要大臣，威廉和玛丽都不喜欢他。威廉还作了些进一步的调整，总的说是宁要托利党人也不要辉格党人。但是当1690年夏季他去爱尔兰时，他留下辅佐玛丽的枢密顾问官，则不是按党派任命的。

路易十四当时正和皇帝、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及其他德意志国家、西班牙和萨伏依打仗，同时也和联合省、英国以及苏格兰交战。他没有同盟，但由于有土耳其人参加作战，他攻克了菲利普斯堡。尽管敌人强大，他还是坚守住了阵地，开始时在海上也很顺利。^[34]但是路易和他的顾问们没有考虑如何利用他们在比奇角外的胜利。与此同时，玛丽以她的坚定性表明，新政府并不需要完全靠威廉来维持自

己的持久性。在后来的年代里，每当威廉出国，玛丽仍然负责，直到1694年12月她去世。但詹姆士党人接连不断地试图散布不满，并争取那些自以为不受威廉重视的政治家们到詹姆士一边。詹姆士党人一次阴谋的败露，促使威廉于1691年强化了反对拒绝宣誓者的法律。

到1692年，英国对威廉政府的不满更加广泛，许多参加革命的人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无数的牧师和一些世俗人士拒绝对新政府效忠，或只是勉强应付一下。海军中也有一些不满，法国人在捕捉或击毁英国商船，战争赋税负担沉重，战事似乎又没完没了。言过其实的报告交给詹姆士，他就劝说路易，入侵英国的时机到了。法国和爱尔兰的军队在诺曼沿岸结集，詹姆士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但是受命为他们出航英国进行护航的图尔维尔舰队6月初在拉乌盖被击败。^[35]虽然从这时起新政府已很巩固，能够抵御武装颠覆，但1693年路易仍袭击了准备开往士麦拿和勒旺的大型护航队，并一举成功，使伦敦蒙受了重大损失。^[36]再者，1694年联盟军对布列斯特的攻击也带来了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在这些年代，很难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充任政府大臣。直到1693年后期，威廉一直是在两党中分别任命职务；此后，根据已经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聊度残生的森德兰的建议，威廉决定主要指靠辉格党人。1689年以后，托利党人诺丁汉一直是国务大臣，其他的大臣职务则由一系列辉格党人担任。诺丁汉因同海军上将罗素意见分歧，11月份被解职，被辉格党人施鲁斯伯里伯爵查理·塔尔博特取代，他在1689—1690年担任过大臣职务。另一名辉格党人，1692年已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委员的1700年哈利法克斯伯爵（1700年册封）查理·蒙塔古，不久就以一个出色财政大臣的身份露面了。1693年，约翰·萨默斯（1697年册封为萨默斯男爵）被任命为掌玺大臣（1697年为大法官），他也是辉格党人。这3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是真正的新手，记不得使人痛恨的1683年。他们动员国家的资源准备战争。1694年，即他们就任当年的几场战役，第一次以联盟军胜利而非路易取得胜利而告终。^[37]

革命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在法国和英国盛行的或受到官方鼓励的理论是君主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说。如果说威廉和玛丽篡夺詹姆士在英国和苏格兰的王位不只是一次成功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有更多内容的话，那就必须找出这种篡位行为的某些道德根据，并加以阐述。

绝对君主制和君权神授说各有自己独立的、但又互相有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只是最近才臻于完善。在法国，鉴于早年的纷争和路易十四出色的专制政治，绝对专制主义得到广泛采纳。^[38]詹姆士一世把君权神授原则连同其不可侵犯性引进英国。它的主要鼓吹者多数人是牧师，但是一到革命前夕，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就成了它的主要辩护人。在内战前不久，他撰写了自己的主要作品《父权制》。为了鼓励查理二世的支持者反对辉格党人，这部书于1680年首次出版。君权神授说到1683年发展到顶峰，当时牛津大学郑重其事地焚烧了一批宣传同君权神授说不一致或相抵触的原则的书籍。还是有很多反对这种理论的。它的一个主要的自然结论，即由一些牧师所谆谆教诲、为多数牧师所接受的消极顺从说（就是说，因拒绝服从同上帝的旨意相悖的国王的命令而痛苦地忍受惩罚），遭到绝大多数世俗人士的反对，对精力充沛和有事业心的人来说，不抵抗主义简直是荒谬的。他们是立宪主义者，甚至即令他们对君权神授说作某些让步，他们也坚持认为，国王是受国家法律约束的。在这点上，他们得到毋庸置疑的权威理查德·胡克的支持。特别是，他从人类自然的友好交往中发现了对国家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原则，他不认为政府必须是君主制的。前不久，哈利法克斯在他的《一个骑墙派的性格》中已经告诫查理二世要戒除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雄辩地宣告他自己对宪法的高度崇敬。另一些作家更不欣赏君权神授说。霍布斯则使正反双方都不满意。《利维坦》（《极权主义国家》）对君主政治拥护者来说太世俗主义，虽然还不能说是太无神论；而对它的反对者来说又太独裁了。它是在牛津被烧掉的书之一。被烧的书里还有一些是不太出名的，《为反对暴政而呐喊》和乔治·布坎南的《论苏格兰人的王权》，两本书都已译成英文。^[39]

关于君主立宪制的总概念在正统的政治年鉴中有一节表述得很清楚：国王就是要专制独裁，他可以随心所欲。如果他专横地霸占了某一个臣民的财产，他是不会归还的。但他受良心和加冕誓言的约束，受“天理、国法和基督教徒品德的规范”的限制，因而他强迫自己去尽保护人民的义务，去主持公道，维持秩序，并“使他们享受正当的权利和自由”。

特别是有两件事，英国国王通常不得到他臣民的同意是不会去做的，即制定新的法律和征集新的税收，因为这两件事都会触发一定程度的公

愤，其一好像是要限制臣民的自由；另一件则像是要侵犯他们的财产。

[\[40\]](#)

在英国，人们的思想是如此之开放，印出来的论著又如此之多，使有关这次革命的争论问题可以部分地靠再版读物，部分地靠朝生暮死的短命小册子得到诠释。只有一部主要作品是论证这次革命的，而且那部作品原是为别的目的撰写的，而不是仅为满足当前急需而写的。现实的需要是要表明，国民有权抵制国家最高权威，有权界定这种权利。小册子中最有名的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未来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写的《关于屈服于最高权威的限度的调查》。这份调查显然是由伯内特和玛丽公主之间的讨论引起的，它可能是在威廉开航的几个星期之前首先在尼德兰出版的。作为《英国国教会改革史》（1679—1681年）的作者和当代敏锐的观察家，伯内特对自己的题目了如指掌。他详尽地、无可争辩地阐明：市民社会以契约为基础，订约人为了管理社会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和执行这些法律的权力；当执行权脱离立法机关单独行使时，它应当对立法机关负责；要明确有义务服从按此原则确立起来的政府，然后再明确政府权力的局限之处。伯内特接着说到英国。在英国，宪法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且很容易找到一条反抗的权利。

有些事对英国作者来说是很容易的，对法国人则是困难的。胡格诺教徒坚决主张绝对君主制。1685年，伊利·默莱特以坚定的口吻表述了他们的观点：国家起源于人的有罪的本性，为了管束这种本性，上帝创造了君主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了绝对的和无限的了。君主不能左右人们的内心，但是有控制外在形式的权力。那些从内心里不能服从君主的人就必须默默受苦或是逃避。[\[41\]](#)1688年以后，胡格诺教徒必须确立一种精神反抗权利，否则他们就得拒绝承认威廉的君主权。在《为奴隶的法兰西的叹息》[\[42\]](#)中，从实践角度对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抨击；1689年初皮埃尔·朱里厄又从理论上在他3期《田园信札》刊物上进行鞭挞。朱里厄1681年从色当逃跑，其时在鹿特丹任神学教授。他是一个狂热的卡尔文分子。1686—1689年间问世的他的《田园信札》是为安慰仍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而写的。革命迫使他放弃和默莱特类似的观点，采取一种新的立场。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当它们建立起来后，它们就有权要求大家完全顺从。朱里厄主要关心的是绝对君主制，他现在还用旧的方法

去区分绝对权力和无限权力，但订约人不会考虑后者，因为他们并不拥有这种无限权力。他们给他们的统治者以君权，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宗教。当君主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时，他的臣民在一定条件下就有权去抵制他。在实践中，路易十四已经废除了一项终身的、不能改变的敕令，因此他的臣民可以反对他。对朱里厄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反抗的权利，胡格诺教徒培尔和天主教徒波舒哀都同样地反对。这些观点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上升为对政治哲学的贡献。这些观点曾出现在一份秘密刊物上，但很快就看不到了。几个月以后，出现了一份更加充实得多的关于个人权利的著作。

这就是约翰·洛克的著作，他的《政府论》第二篇论文。
[43] 1681年或在此前后，在《父权制》一书中，洛克已着手批驳菲尔默的论点。但是，仅仅否定是不够的，于是他又提出第二篇论文来补充他的批驳。在这篇论文中，他设想出一个完满的政治制度。他的论文可能是在1683年他离开英国之前完成的。当6年以后他决定发表它时，一部分驳斥菲尔默的稿子遗失了，不过1689年的菲尔默尚微不足道。第二篇论文可能修改和补充过，但在概念和总的写法方面，它应和沙夫茨伯里以及1680—1681年的排斥危机归为一类，而不应归入革命或为1688年革命作准备一类。它为立宪君主制提出道义上的论据，反抗的权利是整个论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主要部分。如果不认为朱里厄和洛克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是从一个共同思想基础上平行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很可能是朱里厄来源于洛克，而不是洛克来源于朱里厄。洛克相信国家依靠契约的世俗来源说，在这一点上他同霍布斯相同，但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同霍布斯都不一致。他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有各种权利，但是没有享用这些权利的足够保证，因此，他们赞同联合起来“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我给这些一个总的名称：财产” [44]。为实现联合，每个人都甘愿放弃惩罚侵犯他们财产的人的权利，而保留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的一切权利，市民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国家为个人而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存在。订约人任命一个立法机关。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并可以任命一个执行机关去实施法律，立法机关是受订约人委托的。个人必须服从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府。但如果立法机关或执行机关失去人们的信任，那就得解散。

洛克过多地考虑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宪法来设计他的制度，因而他的制度就不具全球适用性。^[45]论文中诸如政府的契约起源说等章节经常遇到批评，论文中有多处含糊不清。比如，在“政府的立法机关部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一句中，“人民”没有明确定义。洛克可能是指他那个时代已成惯例的议会选民，而不是任何类似成年男子普选权那样的东西。但如果他认为那样是可行的，他也许会赞成更广泛的解释。这本书有价值，是因为它为宪法新的解释找到道义的基础，为支持当时流行的特权和财产观念找到道义依据。它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这到后一个时期可能更为重要。虽然洛克的《政府论》两篇论文在1694年和1698年两次再版，其他的论文在18世纪也有新版，但他并没有为战胜菲尔默而立即欢庆胜利。菲尔默的著作在1696年也重印过，但是对洛克的观点没有提出严厉的批评。到1710年萨谢弗雷尔接受审判时^[46]，洛克的观点在英国已被普遍接受。1691年法国同时出版了《政府论》的法文译本和对它的分析，但此书在法国的传播还要靠后，在1724—1802年间，法文译本共再版过9次。^[47]

革命是由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因，只在很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是由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因引起的。它的目标基本上是保守的，是为维护新近被抨击的一种制度和实践，抨击的论点则是很成问题，或很不恰当。

《权利宣言》号召改进，而不是改革。公认的陋习没有触动，同样也无意改组议会选区。虽然普遍扩大当时的选举权不是所要求的，也不可取，但现存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该扫除了吧。《权利宣言》涉及范围很有限，很可能本来就缺乏诚心，此外主要还由于过分匆忙。由于发现了不足，又颁布了1694年的《三年法》和1701年的《嗣位法》作为补充。在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在宪法性的法律中仅有的大变动就是1707年的《合并法》和1716年的《七年法》，它们主要是巩固1689年的成果。这次革命对当时明显的问题解决得如此圆满，致使人们只是到后来才慢慢地觉察到，革命为新生活提供了条件，而新生活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在革命成果中，必须正视英格兰在18世纪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路易十四的宫廷文化从极盛走向衰落。在他晚年，法国人在其他方面的不满的刺激下觉醒了，他们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文化的缺陷。南特敕令的废除使许多胡格诺教流亡者和其他操法语的新教徒转向英国，视它为新教潜在的救世主。这

些人传播英国思想是极为适宜的，他们中极少有创见性的思想家，却有多得数不清的翻译、摘录员、编辑、刊物评论员。他们的期刊——诸如*Nouvelles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以及通常由书评摘要编成的这一类刊物，取代了老的用拉丁语撰写学术著作的国际学术成就的位置，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学术成就。用一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写成的著作就是通过这些刊物同欧洲读者见面。欧洲的新教徒寻求安全保障，而法国人约在路易十四去世时才开始寻求自由。英国在战争期间动员资源的能力大大优于法国，新政府的稳定和强大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好奇心。约10年期间谁也没有进行什么调查；随着1725年贝蒂-路易·冯·贝亭引的《谈英、法人书简》和1734年伏尔泰《哲学通信》的发表，情况发生了变化。到世纪中叶，法国人也学习英语了。英国文学也引人注意了，有许多译著，很容易被吸收，因为被选来翻译的作品的作者本身曾受到法国的强烈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查理二世的偏爱，也可能是由于同胡格诺教流亡者的接触，他们中许多人还被聘为家庭教师。通过胡格诺教徒，通过法国，有时还通过国外的访问者，英国的以及后来苏格兰的文化和思想传入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在18世纪下半叶的前25年成为欧洲文化中占优势地位的一支。

英国的政治思想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影响最大。1729—1731年，孟德斯鸠在英国，他宁愿同博林布鲁克和托利党人联系，而不同辉格党人联系。但是他到处都发现他设想中的自由所产生的效果和由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成果，尽管他也看到许多腐败现象。在著名的两章中，他描述和分析了宪法，他写这两章得到了洛克《政府论》第二篇论文的帮助。《论法的精神》1748年在日内瓦出版，在最初的18个月可能再版了22次。从“七年战争”时起，他失去了自己的领先地位。孟德斯鸠具有贵族风度，温文尔雅，过着隐居生活。他更多关心的是维护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本身，或者说不是市民的日常政治生活。在大不列颠，新时代意识到了孟德斯鸠所忽略了的问题。社会在数目、财富和复杂性方面已高速发展，而承袭的行政机构几乎原封未动地存在下来，它们就是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已不适用，许多陈规陋习有待改革。早在1689年以前已引起注意的议会选区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在新工业区兴起了大城镇而尤其显得不公平。但是，尽管有种种缺陷，英国政府符合国民的需求，而孟德斯鸠对稍后的政治思想有强烈影响。在政府和人民激烈冲突的法国，孟德斯鸠的观点过分温和；而英国又有许多明显的弊病，不足以效法，卢梭对

人权的热情重申正符合需要。此时这已不完全是新的话题，这一必将激发美国^[48]和法国革命、促成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并抬高它们的地位的人权说早在洛克的著作中就已包含了。没有1688年革命，人权问题几乎不可能超越理论的范围。因此，尽管经常不断地提出新的申述，只偶尔参照老的成果——或参照这些老成果的阐发者洛克和孟德斯鸠——革命过去在持续地、现在仍在继续间接或直接地发挥其强大的、独特的影响。

（程西筠 译）

[1] 作者在这里指的是我们通常说的“1688年政变”。——译者

[2] 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时是利奥波德。——译者

[3] 总数字从未确定过。当时下议院计有513名议员，英格兰40个郡各选议员2人，两所大学各选2人；英格兰204个议会选邑中，除5个选邑各选1人、伦敦市选4人外，其余各选2人；威尔士各郡共选12人，每郡1人，威尔士议会选邑共选12人，每选邑1人；英格兰的议会选邑中有约153个是根据特许状结成团体的，这些根据特许状结合起来的选邑管理团体，即令不能控制议会选举，通常也有很大权力。在1682年2月到1687年3月间，约116个议会选邑被授予新特许状，涉及约229名议员的选举（到1685年5月初，有197个议员名额的100个议会选邑新得到了特许状）。其中有5份，或许还要多些，可能是给这种选邑团体的第一批特许状。另一方面，像伦敦，或者还有别的地方，则没有得到新特许状，以取代被没收了的。其他被特许的议会选邑，有一些明显地处在王室的压力之下，或是受詹姆士的追随者操纵。没有结成团体的议会选邑分布在从威斯敏斯特和索思沃克到布兰巴和老萨鲁姆的范围内，其中绝大多数大概都很小。1688年詹姆士又将约35份特许状授给英格兰选邑，其中有些是恢复、有些是更换前6年的特许状（就上述某些内容，我感谢索尼娅·M. F. 克内克特夫人）。

[4]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66—367页。

[5] 估计天主教徒最多时也只占10%或稍多一点（B. 马吉：《英国不信奉国教的天主教徒》，1938年）。这个数字可能包括“秘密”天主教徒，这个词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一般认为，1685年英国的人口超过500万。天主教徒在贵族中的比例相对大些，有些地区天主教徒很多。但是詹姆士在位的整个时期表明，请求委任圣职或是向国王提供人力的天主教徒不可能有50万人。

[6] 1677年改宗天主教的泰特斯·奥茨为夺取权力而于1678年捏造的天主教徒反对英王查理二世的阴谋。——译者

[7] 天主教徒黑尔斯的仆人戈登于1686年合谋控告黑尔斯违反《宣誓法》掌握军队指挥权。黑尔斯请求英国高等法院豁免了对他的判决。——译者

[8] 参见本书原文第125页。

[9] J. P. 凯尼恩：《森德兰伯爵罗伯特·斯潘塞，1641—1702》，1958年，第171—174、187—190页。

[10] 吉·伯内特：《我同时代的历史》第3卷，1833年，第240—241、276—277页；1688年10月伯内特写的原稿载入H. C. 福克斯克罗夫特编《伯内特写的历史补遗》，牛津，1902年，第288—290页。

[11] 邀请信正文是从J. 达尔林普尔爵士处发现的，参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回忆录》第2卷，1773年，第228—231页。信上签名的有德文希尔、丹比、施鲁斯伯里、拉姆利、康普顿主教、罗素和亨利·西德尼。

[12] 为避免同詹姆士公开决裂，过一段时间后祈祷又恢复了。

[13] 利奥波德已经意识到承认威廉是国王的许多困难，见O. 克洛普《欺图亚特王朝的衰落》（14卷本，维也纳，1875—1888年）第4卷，第424—437页。据说英诺森十一世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次远征，但是引用来证明这一论断的文件通常是伪制品。英诺森不管怎样也不至于同一个新教徒结盟去反对一个天主教王子。当然他对詹姆士将大难临头已不感到意外，但他对此深为悲痛。L. 冯·帕斯特：《天主教皇》第16卷第2节，弗赖堡因布赖斯高，1930年，第1032—1036页。

[14] G. 佩奇斯：《大选帝侯和路易十四》，1905年，第601页。

[15]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219—220页。

[16] 参见本书原文第224—225页。

[17] 马雷查尔·德维勒斯：《回忆录》（德沃格编，6卷本，1884—1904年）第1卷，第99—102页。

[18] A. 布朗宁描述了北方的起义，参见《丹比伯爵和利兹公爵托马斯·奥斯本》（3卷本，1944—1951年）第1卷，第386—418页；英国的抵抗可能是随12月25日卡莱尔要塞投降而停止的。

[19] 1689年1月路易十四把他们安置在离凡尔赛几英里处的圣日耳曼皇家城堡里，玛丽在这里一直住到1718年她去世。

[20] 这里都是新历的日期。按新历计算，英国的圣诞节应是1月4日。

[21] 《议会下院议事录》，1689年，西洋旧历1月28日。

[22] 据N. 加皮克斯估算，威廉确信在1月2日詹姆士二次出逃之后和1月9日同哈利法克斯一次交谈之前的期间，他必定会得到王位。参见《亲王威廉三世》，阿姆斯特丹，两卷本，1933年，第二卷，第271—273页。但威廉给沃尔德克的信中提出一个较晚的日期，在1月3日或4日，他曾担心代表会议将把王位强加给他；沃尔德克在给1月20日一封来信的复信中，希望代表会议指定他摄政；2月24日威廉写道，他对事件作了通盘考虑，他不能回避王位。参见P. L. 马勒著《奥伦治·威廉三世和乔治·弗里德里克·冯·沃尔德克》，海牙，两卷本，1873—1880年，第二卷，第126、130、137页。

[23] 后来被编入法规，一般叫作《权利法案》。

[24] 见本书原文第264、273—274页。

[25] E. S. 德比尔：《从1695年到1702年的英国报纸》，载《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第117—129页。

[26] 克兰（Clan），一种氏族或部族组织。——译者

[27] 基督教安立甘宗在苏格兰的自立教会。——译者

[28] 格伦科的麦克唐纳要求绥靖高地，当时没有宣誓，国王签署一道附有条件的命令，消灭了他的克兰。这一点后来被用来报私仇，导致麦克唐纳家族38人被谋杀。

[29] 见本书原文第360、392页。

[30] See J. C. Beckett, *Protestant Dissent in Ireland, 1687—1780* (1948): the Independents (Congregationalists) we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Ibid., p. 136).

[31] On the Irish campaign, see below, pp. 235—237、240—242.

[32] J. G. 西姆士：《在爱尔兰的威廉式的没收，1690—1703》，1956年，第161页。

[33] 参见本书原文第255—256页。

[34] 关于在大陆和海上作战的过程，见本书第7章。

[35] 见本书原文第244页和脚注。

[36] 见本书原文第246页。

[37] 关于威廉晚年的英国，见本书第8章。

[38] 波舒哀作了最详尽的说明，他的《根据经文论政治》，1677年开始写作，于他死后1709年出版；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99—102页。

[39] 《为反对暴政而呐喊》出版于1680年，布坎南的书出版于1648年，两书都于1689年重印。当时出版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英译本和米尔顿的《论国王官吏的职权》的修改译本。关于契约理论的历史是J. W. 高夫在《社会契约》（牛津，第2版，1957年）中论述的。

[40] E. 张伯伦： *Angliae Notitia*，我相信1689年以前的一切版本，这里引自1679年，第1卷，第92—94页。这一段在1689年以后有改动。亨利·卡尔的《英国的特权：或生而自由的臣民的继承权》（1680年及以后）提出了由大宪章及后来的法令和由议会的“工作和权利”所确定的个人的权利。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许多政治小册子中包含有立宪主义思想，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来；在议会辩论的发言中也是如此。

[41] 《论绝对政权》，见G. H. 道奇著《流散的胡格诺教徒的政治理论》，纽约，1947年，第7—10页。

[42] 15份《备忘录》，阿姆斯特丹，1689—1690年。参见本书原文第317页。

[43] 第一版注明的是1690年，但1689年11月已登出新书预告。最好的是彼得·拉斯勒特的版本，剑桥，1960年。

[44] 第二篇论文，第123节。

[45]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119—121页。

[46] 1709年，辉格党大臣戈多尔芬以煽动叛乱罪把萨谢弗雷尔交付审判，萨谢弗雷尔于1710年3月被判三年之内禁止讲道。但伦敦市民更同情被告。——译者

[47] 洛克还撰写过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著作《关于信仰自由的通信》，1689年出版（英译本也是1689年出版的）。至于萨谢弗雷尔博士，见本书原文第270页。

[48] 关于英国革命在美洲殖民地的直接反响，见本书原文第480页及以下各页；其经济后果在本书第8、第9章和第23章（上）中还在讨论。

第七章 九年战争，1688—1697年

从1688年11月到1697年10月，法国进行了一场战争，因此以“九年战争”称之，名实颇为相符，它比曾经使用过的其他称呼不易引起误解。法国著作家们最先使用的“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这个称呼，似有将责任归咎于1686年成立的奥格斯堡联盟之嫌。这个联盟的成立诚然是导致组织反法联盟的最初阶段之一，但严格地说，它因从未被签字国付诸实施而夭折了。第三个称呼——“威廉国王战争”则可能令人误以为威廉三世应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

1678—1679年《尼梅根条约》签订后的10年中，法国除了在1683—1684年间与西班牙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外，它在法律上与所有欧洲国家处于和平或休战状态。但是，路易十四在此期间攫取了本国疆界以外的许多城市和领土。他的手段多种多样，既利用了“收复”这种合法的借口，又以购买的方式从曼图阿公爵手中得到了卡萨莱；这样到手的贵族领地和收益似乎本应是零零碎碎的，然而其实并非如此。法国从媾和时它的军队所到之处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三个重镇：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卡萨莱。以克尔要塞为后援的斯特拉斯堡控制着莱茵河上通往多瑙河方向的渡口；卢森堡是西属尼德兰防线左翼的一个据点；波河沿岸的卡萨莱位于波河流入西属米兰公国处的上游。法军占领的其他地方也绝非无足轻重。由于拿下了列日主教区的迪南要塞，进击通往卢森堡西部的第二重镇那慕尔的道路已经扫清。法国在下列各地修筑了堡垒：顺莱茵河而下紧靠巴塞尔的休宁根、位于特里尔和科布伦茨之间靠近特拉巴赫要塞（莫塞尔河边）的蒙特鲁亚尔，以及一些友好的德意志诸侯领地上的其他地方。

这些战略推进是战争机器总体活动的一部分。遵照最有名的堡垒大师伏邦的命令，加强了佛兰德、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德等地的堡垒，储备了弹药，做好了36个步兵营投入现役的准备工作，媾和后解甲归田的14万军队中的骨干已整装待发，因而这些部队可以迅速地满编组建起来。^[1]军队的编制有所变化。洛沃瓦组建了“预备军官连”，训练贵族子弟充当军官。不过，有关方面宣布，对贵族后裔身

份的证明不作严格审查。1688年建立了一种新的民团服役制，即地方民团，服役期为两年，由一些财政区中的教区的全体居民提供装备和薪饷。在从乡绅中遴选的领饷军官的带领下，每逢星期日和假日进行操练。这类民团人数达2.5万人，战时充当二线部队；而当正规军进入冬营^[2]时，这类民团便遣散回家。海军也同陆军一样，积极地进行备战活动。1678—1688年间，尽管大战舰仅由116艘增至微不足道的120艘，但是，从义务兵役制中征召的码头勤务兵和海上水兵都提高到了新的效率标准。^[3]法国舰队主要从地中海海战中积累了经验，特别是在1684年的热那亚海战、1685年的黎波里海战和1688年的阿尔及尔海战中使用新发明的双桅炮舰对付海岸炮兵的经验；他们曾同时与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的舰只作战。除了在陆、海军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外，法国人还在与邻国的争执中运用了强大的经济压力。17世纪80年代，法国与英国、荷兰进行了一场三边关税战，在产品输出竞争中，法国是个后来者，它力图以强有力的关税保护争得市场。除了就这点而言外，在这场三边关税战中，法国并不是入侵者。

1688年，由于先后三次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被公开承认了。马克西米利安·亨利是维特尔斯巴赫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家族的一员，他在科隆是一位亲法的大主教兼选帝侯。1688年年初，他的健康状况恶化。选出一位忠于法国利益的继承人的准备工作早已作了安排，斯特拉斯堡主教、红衣主教菲尔斯滕贝格将被任命为亨利大主教的副手。这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确立法国的影响。这个大主教管区伸展在莱茵河左岸，沿河除科隆外，还有三个重镇在它的领土内：波恩、莱茵贝格和凯泽斯韦斯。此外，亨利大主教还是列日的君主兼主教。列日主教区地跨默兹河两岸，本身是战略要道，而且还拥有工业区、煤田和炼铁厂；荷兰军队的大部分军火即从此地而来。另一位可作候选人的是亨利大主教的侄孙、巴伐利亚在位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伊曼纽尔的兄弟约瑟夫·克雷芒，他若当选，法国的影响就会被逐出科隆和列日。这位马克斯·伊曼纽尔虽是法国的一位盟友的继位人，却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皇帝曾于1685年建议把西属尼德兰赐予他作为封地，此时他正率领屡战屡胜的帝国陆军与土耳其人作战。他本人纵然无足轻重，他的兄弟倘若当选，路易十四也定然很不开心。大主教于6月3日死去，接着便是一场你争我夺的选举。教皇拒不给菲尔斯滕贝格以特许，而皇帝则拒不肯定他的选帝侯资格。8月

下旬，1.6万名法军进占波恩、凯泽斯韦斯和毫无屏障的选帝侯区，随着可以跟进的后续部队也有1.6万人。科隆迎来了主要由勃兰登堡选帝侯提供的帝国部队，这位选帝侯的克里夫公国和拉文斯堡地区在莱茵河下游，是科隆的近邻。[\[4\]](#)

法军的推进并非没有后援，向南100英里处，一支大得多的部队向前移动，意在阻挡德意志诸侯们的抵抗。在作了一番准备（意图非常保密）后，法军三个军团约8万人于9月24日越过了实际上并未设防的帝国边界。路易十四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上不是合规格的宣战书），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用各不相同的借口来对付每一个领土遭他侵犯的国家。他的主要目标是夺取菲利普斯堡要塞。菲利普斯堡属特里尔选帝侯，那里驻扎着帝国卫队。菲利普斯堡是马札林进入德意志南部的必由之路，1676年洛林公爵率帝国卫队将它从法国人手中收复。现在法国除占领了它以外，还占领着沃尔姆斯、施佩耶尔、美因兹、巴拉廷奈特境内的海德尔堡要塞和弗兰肯塔尔要塞以及曼海姆。法国人威胁着法兰克福和科布伦茨。科布伦茨是特里尔选帝侯的“府邸”，位于莫塞尔河与莱茵河汇流处。

帝国军队在多瑙河地区的节节胜利是第二批事件。这些事件似乎证实了法国外交上的谋略（法国上述军事行动正是以此谋略为依据）。贝尔格莱德位于土耳其通往其欧洲属地之要冲。9月6日，贝尔格莱德向马克斯·伊曼纽尔投降。[\[5\]](#)过去在皇帝处于逆境时，德意志诸侯们总会帮他一把，这次皇帝获胜了，一般估计他们不会转而反对皇帝，至少是保持中立。然而在第三批事件中，法国人大大失算了。在不宣而战阶段，法国竭力在英国与荷兰之间挑动恶感，有时也在英王与他的国内政敌之间挑动恶感。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政策是他和他的兄弟查理二世1672年试图实施的那个纲领加以修改后的翻版。他再次冒分裂其臣民之风险（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尖锐对立）。他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由2万人增为3.4万人，他拥有37艘前四级[\[6\]](#)的战舰，其中有的已编入现役，有的短期内即可装备完毕，扬帆出海。詹姆士二世虽然接受法国的辅助，但却未让路易十四以1672年的外交政策——与法国结盟反对荷兰——缚束他的手脚。既然一旦战争爆发不能指望他支持法国，那么听任他在国内的地位受到削弱看来是可取的。在路易十四于8月末下定决心向德国出击之前，聪明的外交官们已经猜测到，荷兰正在组建的一支远征军是准备派往英国的，它是用来执行其

统帅——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英国政策。同年夏季，威廉三世的挚友汉斯·威廉·本廷克在北德意志就雇佣军队问题进行交涉。他的论据是：除非威廉用武力插手干预，否则不列颠诸岛就会发生内战，其结局或是由一个忠于法国的君主政权取胜，或是出现一个反对荷兰的共和国。威廉的游说除了在策勒的汉诺威宫廷外均告奏效。派遣远征军一事被荷兰共和国作为正式计划而采纳。法军进击德国之举为自己在心理和地理两方面都廓清了道路。

威廉率领着约50艘战舰，护卫着一支拥有9000步兵和8000骑兵的陆上混编部队（其中部分是荷兰军队，部分是雇佣兵），扬帆出征。前英国海军少将阿瑟·赫伯特爵士担任海军统帅。在埃塞克斯海岸他们与一支拥有32艘战舰且从无败绩的英国舰队作战，威廉分明是在冒险。可是，大风和潮水却使英国舰队动弹不得，威廉未遇抵抗便于11月15日在英格兰西部登陆。年底前，威廉控制了英国的陆军、海军和整个政府机构。在世俗和宗教自由史上，他的革命堪称辉煌，以战争史的观点看，也有与众不同的方面。威廉采用联合作战，获得了路易十四曾多次获得的成功，只是威廉成功的范围更大。在此之前，路易十四的敌人无一敢于效仿他的做法。威廉已占有和平时期一块至关重要的领域。他在左右国内外舆论方面的成功，超过了路易十四以往任何时候所能达到的程度；他既已在英国三个王国达到了目的，便集中三国全部人力和物力投入路易十四11月26日宣布的与荷兰议会为敌的战争。^[7]他虽苦斗多年之后才巩固了他的双重革命，但是，入侵的成功已经大体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结局。因此，这次战争最主要的大事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发生，此后9年平淡无奇。

这是第二场结盟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但英法作为敌国相遇却是第一次，自1629年以来，英国首次与法国进行陆战。英国军队曾多次参加大陆战争，最近的一次在1674年；但是，自从英格兰与苏格兰国王合并以来，英国从未作为主要军事强国干预大陆。对于法国来说，英国的敌对行为是这场战争中唯一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新事。法国与一个欧洲联盟交战并非仅此一次，它已经作为海上强国与联盟打过一仗，它的战舰既在地中海也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作战。它与北欧和东欧盟国有长期合作的经验，对敌人哈布斯堡的后方形成一道弧线。当时有人说，路易十四正在西面进行牵制，以减轻皇帝对多瑙河方面土耳其人的压力。究竟法国主要是考虑在利奥波德皇帝变得不可一世之

前就削弱他，还是考虑当他的军队已陷在东面不能动弹，他对德国的控制面临挑战时对他进行攻击？其实这两种想法对法国来说都是可取的。路易十四竭尽全力重建他的盟国圈，然而，自1681年以后，瑞典与他疏远了，以致1688年威廉希望争取与瑞典和丹麦结盟；倘若这两国的王权更强大而稳固些，彼此又不那么不信任，威廉本来是可以如愿的。事实是，丹麦两面讨好，在整个战争期间向威廉也向皇帝提供了雇佣军；几年之前，瑞典也将它从自己的德意志属地上征集的部队提供给双方。这两个北欧王国保持中立，使交战双方都感到失望。

路易十四能对波兰所做的并不比能对瑞典所做的更多些，因为他无法诱使正在与土耳其作战的波兰单独媾和。利奥波德此刻已暂时平息了匈牙利民族的抵抗，因而即使路易十四向土耳其提供的不只是外交上的鼓励，也不可能诱使土耳其做任何超出其本身利益的事。在路易十四的外围圈上唯一可以修补的是北非。他于1689年修正了对阿尔及尔的政策，缔结了一项和约，这项和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当时正在与皇帝的盟国——俄国和威尼斯作战的土耳其，从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取得了一些海上支援，这就是它从法国的牵制中得到的唯一直接实惠。海上列强与北非的关系极为复杂。的黎波里与法国在1692年名义上一度处于战争状态；1691年摩洛哥与阿尔及尔交战，荷兰和英国的战舰似乎在敌对双方都参战了；然而，从战略上看，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北非并未严重地卷入战争。事实上，土耳其正在东面为法国的利益进行牵制。

正在进行的战争不是一场而是两场，而帝国两场战争都参加了。参战部队时而从一个战场抽调兵力去增援另一个战场，从而使两场战争连成一体。西面的那场战争得到了荷兰的财政援助；1695年，奥地利获得了一笔贷款，是以水银矿产的出口作为抵押的，贷款虽然数额不大，却为奥地利的改革提供了保证。^[8]然而，总的来说，无论哈布斯堡或其他德意志国家，均未对其组织机构作任何改变。奥地利的行政机构依然如故，还是那么臃肿、腐败；军队的后勤工作极差，医疗机构也许是唯一组织得较好的部门。军队中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优秀的军人，其中有许多老兵，骑兵声望很高。但是，高级军官的弊病却很危险，校官们对属下有生杀大权，君主在这方面也不能对他们施加影响。将领们军纪松弛，以个人情绪的好恶和利益厚薄来决定

取舍。在战争期间，奥地利政府似乎将正规军的人数由3万人增为5万人。

荷兰人在1672—1678年间那场战争中险些遭殃，现在他们未对陆军、海军和行政体制作认真改造便又参战了。他们的陆军基本上稳定在1689年的水平，即骑兵1.1万人，龙骑兵2000人，步兵6万人。禁卫军被视为威廉三世的私人卫队，所以由英国出资维持。荷兰军队除英格兰和苏格兰原有的各三个步兵团外，还包括来自帝国境内十几个诸侯国的“津贴部队”，其中由瑞典和勃兰登堡提供的兵员最多。文职官员和军队的关系相处尚好，只是威廉不亲自指挥时，他需采取防范措施，防止荷兰各邦通过其战地代表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在整个战争期间，荷兰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状态。首相安东尼·海因修斯与威廉的另一些忠实的支持者一起，克服了联邦机构的许多超出预料的障碍。然而，尽管共和国不惜付出代价，承受比任何盟国更重的财政负担，却总是不能在规定的日期中做好陆上和海上的准备，有时还缴付不出它应承担的份额。

英国被迫作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努力，走上新的方向，发展其战争实力，这是欧洲的军事和海上实力配比中出现的巨变。这种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在每一个部门都经历了挫折；它并未受到多少重视，因为甚至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仍可能因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或因英国重新被纳入法国羽翼而被一笔勾销。然而，尽管屡遭磨难，潜在的实力毕竟调动起来了。陆军组建完毕，但没有把民团变成有效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并未为此采取任何措施。这支军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名义上有7.4万步兵和6000骑兵。如同在法国和荷兰那样^[9]，这支军队是面临入侵危险时在受到威胁的地方组建的。但是它十分幸运，从未参战。正规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为应付这场战争而征集的兵员绝大多数来自英国。1694年人数最多时共有93635人，其中包括32个外籍团。海军的舰上兵员理论上从1689年的2.2万人增为1695年的4.8万人，但是，只有在下海的舰只最多的夏季，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在岸上，海军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顾主和最大的物资消费者。它的组织极差，资金短缺，但它按新的战略要求完成了巨大的调整工作。1688年，全国最大的码头在查塔姆，而朴次茅斯以西没有任何码头设施。战争结束时，普利茅斯有了设备齐全的码头，朴次茅斯、德特福、查塔姆和伍尔威什都增添了码头设施，并作了改进，从而成为

对法战争所需的基地。一系列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也是崭新的宪法和行政方面的改变，为英国陆军和海军系统的所有这些改进奠定了基础。这些改变均由国王在议会提出倡议并加以控制，议会每年开会，拨款、审计和将领对国王所负的责任都在议会里作出决定。无数次议会辩论和委员会会议，终于使全国在反复摸索中发现，一个包含反对派在内的议会十分有助于增强其对敌实力。

在逐年叙述事件的进程之前，先讨论一下这场战争的某些特点大概比较妥当。第一个问题是，交战各国击溃敌国陆军和舰队的愿望强烈到什么程度？他们又如何由于认识到政治目标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在陆地上可动用的兵力亦有限，从而克制了自己愿望的？就政治目标而言，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领头的四大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和荷兰对它们的目标未作限制。当然，各国都有一些人希望作些限制，但他们不起作用。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洛沃瓦，甚至还有洛沃瓦那些比较缺乏雄心的继任者们，都不遗余力地打击敌国。利奥波德一世和威廉三世都把这场战争看作削弱法国实力的大好时机，力图使之下降到能为其余欧洲国家所容忍的水平。利奥波德本人是个迟钝的守旧人物，但他的毛病却有其可取之处，那就是他倔强固执。威廉在他所做所写或所说的每件事中，都显露出进攻精神。然而在那些小盟国中，情形并非如此。坚定地忠于共同事业的盟国纵然并非一个也没有，但也是寥寥无几，它们却一个个贪婪地盯着各自的利益。其中只有一国为自己的利益而成功地两次改换门庭，而其他各国则经常盘算保持中立至少能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当它们以盟国身份或出借雇佣军的债主的身份继续提供支援时，从不为索取高价而有所犹豫。

各国对自己的作战行动是否有所节制，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
[\[10\]](#) 陆战的某些特点往往妨碍部队运动。河流是攻城炮兵等辎重部队唯一的交通干线，但筑个堡垒便把河流封锁了，这种情况尤以低地国家为甚。堡垒十分坚固，致使攻城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据点太多，驻守据点的人也太多。由于有了贮存库，不必在每个战役开始前筹集粮草，因而可以在早春发动攻势；然而由于依赖粮草贮存库的积习过深，将领们若离开粮草库五天的行程（约60英里），便觉得不大正常。整支部队一起向前推进的话，调度也不方便，数小时才能摆好战斗队形；但在攻击开始之前躲避攻击却很容易。除非双方同意，否则很少进行战斗。追击很难也很少见，所以有时将领们投入战斗时不去

安排与后面进行联络的路线。用一长串野战碉堡保护部队的恶习再次出现在德国和佛兰德。碉堡原来是用以防范敌方小股部队袭击居民、搜索钱财的，却渐渐被当作战略防线，致使将领们按兵不动。

尽管有上述种种情况，但是，看来各方并不是只求赢得有限的目标、土地和碉堡等物质收获，而不去争取战斗胜利。双方一些最优秀的军事著作家都强调指出战斗为重。伏邦认为，碉堡只能暂时起作用，每个碉堡的抵抗时间都有其极限，他甚至提出48天为一般标准，48天后即若投降也可算体面。有一些将领被认为轻率地牺牲了他们的部队，例如巴登的刘易斯总督便是如此。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他将领十分小心地保存自己的部队。路易十四虽以壮观的排场亲临战场，却并未使攻坚战不再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战争总的来说是血淋淋的。据信，兰登之役中的伤亡大于17世纪的任何一次战役，而巴尔弗洛海战则是有记录可查的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海战。疾病夺去了许多士兵的生命，使海上的舰队完全处于无法行动的状态。由于士兵患病，1689年英国舰队被迫退回港口；1690年，胜利的法军不得不撤离英吉利海峡；英国的西印度部队每次出征都因疾病而撤回国内。消极怠战的例子确实不少，例如在德国只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即1692年的施皮尔贝希之战。但是此战的原因应从君主们的政策，而不应从他们的军事科学见解中寻找。

另一个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是，双方在纪律、训练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后果。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在作战和驻防时纪律最佳。众所周知，各国军队的素质不同，一支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与其他部队的素质不同；然而，这些差异的实际重要性似乎比预料的还小。战争的第一年，英军中因政治和欠饷发生过兵变，水兵的薪饷待遇极端恶劣的那些海军部队，长期处在不安定状态，并有士兵逃跑现象。驻扎在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同样苦于这类严重的混乱现象。但是，一支素质低劣的军队对一次重大战役的结局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斯塔法达战役似乎是绝无仅有的战例。在皮埃蒙特、乌菲内和西班牙，正规军受到游击队的骚扰，但在尼德兰和德国并无这种情形，在那里参战的是组织得较好的部队。

与纪律和士气方面的差异相比，装备和训练上的差异所起的作用似乎大得不多，也小得有限。舰只在构造和武器上的差别，在海上无关紧要；在战斗中，舰只的数量远比每条战舰的表现重要。陆上战争

可以反映出一个时期武器的发明和迅速的改进，但是，一支军队的新装备很快就会为另一支军队所仿造，所以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始终占有锐不可当的优势。燧发枪正在逐步取代火绳枪，后膛枪业已出现，刺刀取长矛而代之；伏邦于1687年发明了带刀座的刺刀。^[11]从1690年起，每个法国步兵团都有一个配备来复枪的连队。沃洛瓦把炮兵编入了陆军。卢森堡以驾驭新编大兵团的能力优于任何一位将军而闻名，他逐步采用师建制，即将诸兵种编在一起、能自己解决给养和军火弹药的建制，这种建制后来提高了军队的运动速度。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未使法军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无论在海上或陆上，人数和指挥能力似乎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以上我们作了初步分析，现在来看看1688年夏季欧洲大陆上的形势。此时，法国已侵入德国，荷兰正在准备入侵英国。皇帝不改初衷，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他的土耳其战争境况甚佳。诸侯们也毫不动摇。此时德国境内没有可供使用的帝国军队；10月2日，法国统帅德·布菲勒侯爵攻陷凯泽斯劳滕。但是，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侯与不伦瑞克—吕内堡（汉诺威为其首府）的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公爵、黑森—卡塞尔的兰德格拉弗于10月15日在马格德堡签订了一项协议，共同防卫莱茵河中游和下游，被称为马格德堡协议。他们携起手来便意味着有了一支训练有素、供应充足、兵力可观的武装力量。1688年死去的普鲁士大选帝侯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支3万人的精锐军队，这是四支军队中最强大的一支。四邻的“圈圈”，即那些不拥有军队的僧侣君主和小诸侯，承担明确的义务，提供冬季兵营和捐税。德国结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抗法阵线。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率领8000人开往莱茵河中游地区，萨克森的约翰·乔治跟随其后。马克斯·伊曼纽尔从多瑙河带来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部队。10月底之前，一支2万人的部队已集结在法兰克福附近，布菲勒只得从科布伦茨城下的阵地后撤。后勤供应极差的菲利普斯堡在抵抗4个星期后向法军投降（援救它已为时过晚），但是，德国显然不会屈服。12月11日帝国颁布了第一项宣布法国为敌国的法令，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这样的法令。

直到此时，法国的军事机器尚未完全开动，为使部队满员，后备兵员被征召入伍。此刻，一场欧洲大战的前景已十分清晰。秋季，路易十四曾希望西班牙作为中立国袖手旁观，果真如此，法国就可在卢

森堡和大海之间免遭攻击。然而，西班牙已转而采取反对法国的政策。威廉三世相信，荷兰及其未来的盟国除了在西属尼德兰外，不可能在其他任何战场上打败法军。从1689年年初或早些时候起就已肯定，西班牙将会卷入战争。西班牙人实际上绝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他们的尼德兰。他们的堡垒破败失修，既无粮草库和义务兵役制，又无可以支付军饷的现金；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恶劣。人们相信，除非守住西属尼德兰，否则就无法保卫荷兰共和国的领土。然而，除了荷兰及其盟国，谁也无能力守住西属尼德兰，而西班牙则要得到它们的支持才参战。荷兰装备了一个野战军，交由陆军元帅[\[12\]](#)瓦尔德克-德蒙伯爵乔治·弗雷德里克指挥。法国于1689年4月15日向西班牙宣战。由于双方都只能在低地国家决定胜负，所以莱茵河方向此时退居次要地位。

这意味着法国只得从这个地段撤军，意味着法国无力在它所占领的整条战线上保持积极的作战行动。法国大臣们一致同意将领们提出的一项撤军计划，撤军后又不让德军重新占领法军撤出的阵地。1688—1689年间的冬季，法军开始系统地在巴拉丁及其邻近地区大肆破坏，焚烧城镇，将一切无法搬走的补给品尽数销毁。教堂也未能幸免。海德堡和三个宗教中心：沃尔姆斯、特里尔和施佩耶尔均遭破坏。较之1674年蒂雷纳劫掠巴拉丁，此次损失更加惨重。在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宣传鼓动下，人们同仇敌忾，德国和正在形成的欧洲联盟得到了加强。这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在军事上虽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后来在这个地区确实至少没有发生过重大战斗。群众的抗议对法军或其他军队的行动，也说不上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至少在此后的几年中是这样。1690年，当纽里和都柏林即将易手时，法军将领主张破坏这两座城市；卡蒂纳在皮埃蒙特也是这样干的。这就为北方战争中骇人听闻的破坏活动开了恶劣的先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这种破坏活动也屡见不鲜。

反法诸国在冬季和早春为1689年之役作了准备。第一个大问题是：皇帝是否不再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而与土耳其媾和，并将其全部力量转向西面。威廉三世为促成这个局面的出现而不遗余力。他确信，这样他就能得到从未有过的良机，给路易十四以决定性的打击；他还相信，利奥波德完全能够拿出一个使他本人和他的盟友波兰和威尼斯都满意的条件来。某些历史学家对此看法不敢苟同。且不管

原因究竟是什么，利奥波德未同土耳其媾和。直到西面那场战争结束，再没有出现过这种媾和良机。三个主要盟国之间的问题也有待解决。1689年5月12日，皇帝的全权代表与荷兰缔结盟约，据称，其目的在于恢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比利牛斯条约》中规定的领土和教徒定居点，以便挫败法国的“收复”活动，让洛林的查理恢复他的公爵领地。皇帝请西班牙国王遵守这条约。英国不仅被要求对此表示赞同，而且还被要求同意一项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的秘密条款^[13]。英国，或者说是威廉三世（因为他并不把议会视为可信）于9月9日照此办理。各盟国以笼统的言辞同意全力投入战争，不单独媾和。

在此期间，英国与荷兰确定了在海上和陆上进行合作的原则。在陆军方面只是一个部署军队问题，因为根据宪法，威廉三世已是英荷两国军队的总司令。威廉三世从海上带来的荷兰军队，因国内需要于冬季返国，丹麦的雇佣军则留在原地。1678年3月3日和7月26日的条约规定，英国应派出1万名步兵去大陆支援荷兰，这项条款继续有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严格执行。1678年条款中有关海上的条款被认为对弱方要求过高，于是荷兰和英国应分别提供的舰只数量重新确定为三与五之比，鉴于法国拥有的大战舰估计为80艘，因而荷兰应提供30艘，英国应提供50艘，此外双方还应按此比例提供小型舰只。全部舰只组建成两支舰队，一支拥有50条战舰，部署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另一支拥有30条战舰，部署在地中海。两支舰队均按比例由两国的战舰混合组成。法国舰队虽然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都拥有基地，但这两处的码头设施都不足以维持整个舰队，因此法国的战略便是将其地中海（土伦）和大西洋这两支分舰队连接起来，而它旨在使盟国舰队分裂开来的计划又妨碍它们自己连成一体。盟国在舰队指挥上的困难可想而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威廉三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英国因提供的舰只较多，实际上控制了联合舰队的指挥权，荷兰的高级将领始终充任下级指挥官，结果损伤了荷兰海军的效率。

另一项海军协议表明，战争开始时，海上强国对于凭借施展海上实力所能获得的东西寄予很大希望。与海上强国相比，法国不那么依赖海运贸易，却同样需要进口木材和海军物资。英国规劝荷兰对中立贸易放弃一贯的宽容态度，并与英国共同向盟国和中立国发出通知，英、荷将扣压任何国家驶往法国港口或将货物运往法国属地的所有船只。这种做法擅自扩大了交战国的权力，也可以说废弃了过去为束约

两大强国而签订的条约，正如威廉三世一言所道破：“此乃大炮的权力。”^[14]

在一个方向上，英国拒绝了荷兰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荷、英两国同法国一样，在美洲拥有殖民地。荷兰曾建议派遣远征军去保护这些殖民地并推进两国的利益。英国认为荷兰与英国不同，荷兰此举意在美洲进行新的征服，因而回答说，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不一致。两国只同意以各自的舰只保护对方的西印度人、“种植园、殖民地或其他州”，此外未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战争认真地打起来后，法国处于守势，但并未丢失中央阵地，这就使它可以决定在什么地方打。法国将军队推到国界以外，从尽可能远的被它占领的敌国领土上取得给养，长期以来，这种做法促使它可以不依赖中央供应资金和军需品而去开辟更多的战场。1689年，法国在西属尼德兰未发动攻势。法军由不称职的于米埃尔元帅指挥，他在瓦尔考特骑兵战斗中败在瓦尔德克手下。但是，瓦尔德克尚无打大战的实力。法国在另一个战场上对西班牙施加压力，它在这个第二战场上比在遥远的尼德兰较为自如。如果说这在政治政策上可算颇为大胆的做法，那么它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果然颇有价值，抵消了因分兵造成的损失而有余。加泰罗尼亚被卡斯蒂利亚统治几十年后就不太平了，1687年在其边境地区发生了危险的农民起义，从表面上看虽于1688年得到了解决，但1689年春却又再次爆发。1689年5月，法国将军诺阿耶率兵9000越过边界，直抵卡姆普洛东城下。卡姆普洛东投降后，法军留驻在加泰罗尼亚。

在爱尔兰开辟了第四战场。流亡在法国的国王詹姆士二世成了路易十四手中的一张牌。1689年3月22日，在13艘法国战舰的护送下，他在金赛尔登岸；夏季，他控制了除阿尔斯特以外的整个爱尔兰，但局势并不平静。北爱尔兰省信奉新教的居民自行组成了非正规的抵抗部队，拿下了北爱尔兰的主要港口伦敦德里；可是，这个港口周围都是陆地。威廉三世将爱尔兰当作次要问题，1689年夏季他以少量兵力挫败了他的苏格兰敌手，只是勉强地屈从于英国议会的压力，组建一支军队用于爱尔兰。这支军队号称两万人，由声誉卓著的舍姆伯格公爵统率，这是一位年已74岁、信奉新教的亲王，兼有日耳曼和英国血统，曾任法国元帅。

无论法国或英国，都必须渡海才能进行爱尔兰战役，因此，舰队的大规模调动都与此战役有关。至少就舰队整装待发出海作战而言，法国的海军管理最为有效。这就使土伦舰队能与布列斯特舰队会合。盟国再也不可能进击土伦或阻止法国的地中海贸易了，它们只能退而守护自己的海岸、圣乔治海峡上的航运和本土上的贸易。然而，法国并不试图进行任何大规模作战，双方只进行过一次小分队交火。阿瑟·赫伯特勋爵率领的19艘战舰5月11日在班特里海湾与24艘法国战舰遭遇，英舰火力较法舰强。尽管很难说是一次胜利，但由于英国方面的战果，阿瑟·赫伯特受封为托林顿子爵，成为一名贵族。英法双方军队都在爱尔兰登陆，并无重大伤亡。

然而，现在看来双方均没有充分利用战机，都应受到指责。这事与威廉三世有关，他受到的指责更多，因为他不重视海上力量。史书记载，他把舰队仅仅看作战役中可有可无的因素，而且他内心深处似乎认为，将舰队送到陆军无法到达的地方便是对舰队的最佳使用方法。[\[15\]](#)这次，他至少看到了可以阻止詹姆士二世登陆。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颇有些为难之处，威廉三世还是下达了明确的命令：一旦截获詹姆士，即应送上荷兰领土。在威廉三世的信函中，关于海军只有少量笼统的表示或指示，对此也许可以作如下的解释：他将海军事宜交由水兵们自行处理去了，如同他将攻城筹划交由梅诺·范·克霍尔恩（此人是伏邦的荷兰对手）一手处理那样，即使他本人身临围城前线也是如此。威廉早年在德·勒伊泰尔辅助下担任海陆军上将时，便养成了放手让部下去干的习惯。我们很难说清楚他对海军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或者证明这种想法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登陆后，兵力有4万人，但战斗力不强，他只能将他们部署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四周和包围伦敦德里，如此而已。伦敦德里坚持了105天，打入城内的炮弹多达590发，饿死的人数以千计。经过不必要的历尽磨难的延搁之后，柯克上校于旧历7月13日率领载有给养的一艘大战舰和三条小船从海上解了该城之围，当天夜间，贝维克公爵撤去包围，率军离去。8月23日，舍姆伯格在班戈附近的当郡海岸登陆，他的实际兵力为1.4万人。除外籍兵团外，这支部队训练很差，指挥不力，供应糟得无以复加。舍姆伯格首战告捷，攻下了卡里克弗格斯，接着向邓达尔克挺进，但到了那里后，他便停止前进。

潮湿的天气和疾病使他卧床不起，不过，敌军境况也不佳，甚至比他更无力发动攻势。整个秋冬两季中，两军对峙，按兵不动。

1689年，法军在德国采取守势，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部队特别是新组建的骑兵在素质上也处于劣势。帝国军队共有三支，最小的那支保护斯瓦比亚和弗朗科尼亚，控制着斯特拉斯堡以北自莱茵河至黑森林的斯托尔霍芬防线。这支军队原由马克斯·伊曼纽尔指挥，但在战役正在进行时他被调往三支军队中最大的一支，该军活动在莱茵河中游一带。除了巴伐利亚人和从多瑙河调来的1.3万名奥地利人外，这里还有萨克森人和黑森人，总共5万人，指挥官是帝国最优秀的将领洛林公爵查理。该军扫清了法兰克福方向法国军队的威胁，包围了美因兹。于克赛尔侯爵顽强抵抗52天后，因火药用尽而投降。这是（法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整个战争中盟国在德国赢得的唯一重大胜利。盟国在莱茵河下游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是，统率着自己的军队和汉诺威军队（共约4万人）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举动，对联盟来说却不是好征兆。他毫不费力地夺回了凯泽斯韦特，廓清了科隆选帝侯的领地。一直期望给法国人以痛击的威廉三世要他接着前去会合洛林公爵的军队，但是这位选帝侯却更愿意滞留在莱茵河下游一带他的利益范围之内。他包围了波恩，以猛烈的炮击将它夷为平地。缺乏后援的波恩于10月10日投降。1673年威廉夺回波恩，从而切断驻扎在荷兰的法军的交通联络的战役是一场著名的胜仗；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波恩没有战略价值。波恩之役结束时，法国人依然控制着菲利普斯堡，但盟国部队则控制着从菲利普斯堡到莱茵堡的莱茵河一线。

威廉三世依照他在17世纪70年代的做法，于1689—1690年间的冬季把盟国的首脑或首脑的代表召集到海牙举行“代表大会”，商讨下一年度的措施。在此后的几个冬季中，他继续这种惯例。这种会议虽有助于协调行动和解决军事联盟问题，却也暴露了盟国间的利益分歧，因而在以后的年头中，这种会议变得不那么有用了。^[16]那年冬季的两个主要外交谈判中心不在这个会上。皇帝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于11月在奥格斯堡召集选帝团，并征得选帝团的同意，选出他的长子约瑟夫为罗马人的皇帝，并为之加冕。这样，他就保证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得以延续下去，并使法国在这方面日益衰微的野心得到遏制。然而，他却使诸侯们的和谐处于紧张状态，加剧了他们对哈布斯堡家族政权的疑虑。另一场谈判关系到萨伏依。公爵维克多·

阿马戴乌斯二世娶了路易十四的一个侄女为妻。由于法国在比内罗洛和卡萨莱驻有军队，这位公爵名义上的独立已所剩无几；尽管他极为不满他的母亲对法国政策的谄媚态度，却也遵奉法国的政策，在迫害他的新教徒臣民这一点上尤其如此。^[17]然而，法国并不信任他，并于1689年要他将军队裁减为2000人，作为忠于法国的保证。对此，他也声称遵命照办，但却命令男子必须通过军训，所以他的后备兵员超过了规定的限额。他开始与西班牙和皇帝进行谈判。

对于法国来说，1690年的前景远比1689年为好。皇帝有意将西线交给他的盟友，自己则专心致志于土耳其战争。法国对尼德兰的进攻在即，英国军队仍滞留在爱尔兰。在上一年中，英国在海上损失了许多船只，商人们要求为他们，特别是为地中海贸易提供更多的保护，这样就削弱了国内舰队。6月间出现了危急的局势。6000名法国军队和大量补给物资在爱尔兰登陆，舍姆伯格从他的冬季营地出发，攻下了查尔蒙，但直到6月24日威廉三世才在爱尔兰登陆亲自督战。他率领着一支约4万人的军队，其中步兵的主要组成部分是6个荷兰营、8个丹麦营和3个胡格诺营，与他对阵的军队实力较弱，其中有7个法国营。他以相当大的信心等待着爱尔兰战役，但是，欧洲的局势正在发生不利于他的变化。法国联合舰队正在英吉利海峡游弋，英国担心遭到入侵。托林顿率领的舰队与荷兰人会合了，另一支在海军中将亨利·基利格鲁指挥下由24艘舰船组成的分舰队却远在西部。它在完成护送开往国外的商船的任务后，正从加的斯返回，尚联系不上。在参谋们的一致支持下，托林顿决定，由于自己的实力较弱，因而在与基利格鲁会合之前应避免作战。而远在英格兰的大臣们瞎指挥，断然命令他不得继续后退，要在海况和天气许可时向法国舰队开战。

战役开始时法国在尼德兰有两个军。人数较少的一军驻防在东面默兹河与摩泽尔河之间。该地区的指挥官仍是以前的布菲勒。西面的主帅是法国最能干的将领卢森堡公爵元帅，他是参加过罗克劳伊战役的老兵，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布菲勒的正面没有敌人，卢森堡就将两支军队相向靠拢以便连成一片。另一方的瓦尔德克正等待着勃兰登堡的部队。然而，尽管海牙会议的催促急如星火，这支部队仍不到来。法国的两支军队会合后共有4万人，瓦尔德克仅有3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仍决定迎敌。瓦尔德克率军向前推进，6月30日进入位于弗勒鲁和圣阿尔芒之间的阵地。7月1日激战了

一整天。傍晚时分，他的骑兵不剩一人；他的荷兰步兵因使用长矛而颇受其害，但进行最后冲击的却正是这些步兵。战败但并未溃散的8个团于是向后撤退。据说，法军的损失与盟军大致相等，死伤7000人。这是西班牙军队为保卫西属尼德兰而进行的最后一场阵地战。是役之后，两军重新进入休整状态。勃兰登堡的援军于8月间到达。

弗勒鲁战役的战报在黄昏之后传到英国。关系重大的海战于6月10日在滩头堡外海面展开。^[18]托林顿的56艘战船按他的命令行动。法国人在他的西面，他处在上风位置，因此他本来可以骚扰法国舰队，然后撤往当斯方向而不必进行近战。英国舰只根据这个意图不向敌方靠近，但位于右侧的荷兰舰只却紧靠敌舰。英舰不给荷舰以充分支援，因而荷舰损失惨重，于是整个舰队全部后撤。法国舰队完整无损。盟国舰队锚泊诺尔时，英国人已损失了1艘战舰，而荷兰人则损失了4艘战舰。今天看，这些数字并不足以表明这场败仗的严重性。荷兰人和国王大为恼火，托林顿虽由军事法庭开释，但从此未被再次起用。关于他在这次战斗中的个人责任，至今尚众说不一。更大的战略问题至今同样莫衷一是，这个问题与个人责任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次海战之后法国没有入侵英国。威廉三世在致莫尔巴勒的信中说，他从不相信会有什么入侵危险，因为法国人未带陆军来。法军主帅图尔维尔认为不能攻击驻扎在普利茅斯海湾的基利格鲁，所以他们只焚烧了提格茅斯这个渔村。塞涅莱大臣则说他们法军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因为他们可从地中海调来大帆船（其实这种靠划桨前进的帆船无力对付战列舰的攻击）。但是，常胜将军图尔维尔的船上却有7000名病员，于是退回港口。当一切都已结束后，托林顿写下了一句曾引起许多争论的话：“大多数人担心法国人会入侵，而我始终持另一种看法，因为我一直在说，只要我们拥有目前这样一支舰队，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对这句话至今仍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作者认为，这表明，他错误地依赖装备而不是战斗精神，依赖舰队而不去夺取胜利；另一方面，有些人将这句话理解为：法国人不敢做托林顿本人在1688年做过的事，那时他显然入侵了英国，身后却留下完好的达尔茅斯舰队。^[19]这种看法扼要地道出了纳尔逊在1805年的不同条件下发表过的意见，那就是必须设想，法国的任何一个入侵计划肯定包括击败英国舰队，以此作为控制海面的先决条件，而为了运送陆军又必须控制海面。这种解释可能最接近实际。

如果法国人善于利用这次胜利，无论是否入侵，他们都可以切断驻爱尔兰英军的交通联络。7月11日，这支英军在博依恩河汇流处打了一场胜仗。詹姆士国王在河南岸占有一个良好的防御阵地，修筑了堑壕，距都柏林也只有一天多的路程。威廉三世既从正面进攻，也从左侧包抄。詹姆士的军队伤亡1500人后，秩序井然地西撤香农。詹姆士重演1688年故技，撤下他的军队，独自返回法国。威廉攻克了从都柏林到沃特福德一线的各个港口，但在攻取利默里克时受挫。爱尔兰战争并未结束，英军仍然不能从中脱身，但是形势已有利于英国取胜。到了秋季，莫尔巴勒伯爵约翰·丘吉尔从海上赶来，用强攻拿下科克，以围攻拿下了金赛尔。这时，法国和爱尔兰的军队陷在西面不得动弹，除利默里克和高尔韦之外，再无别的港口可资利用。

在此期间，在萨伏依新开辟了第五战场。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拒绝了法国的最后条件，倒向盟国。盟国除向他提供必不可少的补助金外，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承认萨伏依为主权国家，将卡萨莱归属曼图阿，并由他本人收回比内罗洛。他的加盟之举激起了热望，因为从此就有可能经由乌菲内和普洛旺斯打进法国，而土伦就在普洛旺斯。由于运输线更长，法国为在这些地方维持军队比在尼德兰和德国开支更大。另一方面，法国却可以经由萨伏依和皮埃蒙特攻击米兰公国和更远的皇帝的本土。西班牙在米兰的行政机构软弱无能，总督富恩萨里达麻木不仁，但西班牙扬言要派遣1万名军人。皇帝现在与法国人一样，战线太多，无法一一考虑周全，他打算派出五六千人。率领法军的是尼古拉·加蒂纳，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异乎寻常的人物。例如出身，他就不是将门之后，而是巴黎高等法院一名法官的儿子，他本人也曾以律师为业。他为战役安排的最初部署也许不很有魄力，但战斗打响后，最初的部署的影响就不大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力主在行动迟缓的盟国军队到达之前开战。8月18日，卡蒂纳在比内罗洛南面的斯塔法达修道院打败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20]接着又扩大战果，一举攻克萨卢佐和苏萨。帝国部队事后才赶来。所以，这一年的余下时间中，除了法国人的勒索、劫掠和随之而来的镇压外，没有发生任何重要事件。

对德国皇帝的诸侯来说，1690年最严重的事件是土耳其在多瑙河打了胜仗，10月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和不伦瑞克—吕恩贝格不得不派兵驰援。此事加上其他诸侯拒不听命改变了德国

战争的面貌。洛林公爵年初去世，除巴伐利亚选帝侯，再也找不出更满意的人选来继任总司令。在弗勒鲁战役之后，在皇帝的6000名军队开赴意大利之后，法军兵员增至4万人。无论在莱茵河上游或下游，帝国部队都不可能有何作为，皇帝原希望在今后某年能攻打休宁根，从而在莱茵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发动一次攻势。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在战场上停留两个月后返回老家了，而来自瑞典在德国属地的军队也只在战场上逗留一个月便返回了。

在海上和佛兰德的战斗以及在爱尔兰和萨伏依的规模较小但消耗较大的战斗之后，战争的胜负仍然未决，双方实力对比大体上并未改变；在这一年中，第一场战斗双方都全力以赴，然而结果表明，盟国既不可能轻易取胜，也不可能迅速取胜。瑞典军队的撤离便是一个征兆。海战前景仍不明朗，瑞典和丹麦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海上强国在最初两场海战后便放弃了破坏中立权的尝试；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海上强国在各中立国采取海上联合行动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当然并不十分吓人——面前，有时作出些让步。由于这些协议，各中立国一劳永逸地恢复了同各交战国通过海运进行的贸易，尽管战争进程中情况变化不定。

1691年与1690年一样，不是决定性的年头。爱尔兰战事实际上已经终结。威廉三世把指挥权交给智勇双全的荷兰人戈达尔将军，当时他是范·雷德·京凯尔男爵，后来成为阿思隆伯爵。法国没有完全放过这个机会，最大的一批法军和后勤物资5月份在利默里克登陆，其中兵员1200人，战马800匹，此外还有可装备2.6万人的武器，以及工兵和各类物资。但是，新任法国海军大臣菲利波·德·普夏特兰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京凯尔于5月份从阿思隆渡过香农河，在奥赫里姆打了一场胜仗，击毙了法军司令圣-吕思。高尔韦在被围两天后，接受了极好的条件，弃城投降，这样，除了利默里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需要夺取了。包围利默里克是必需的。8月下半月和整个9月，利默里克久攻不克。骁勇的守城部队指挥官帕特里克·萨斯费尔德即使得不到法国舰队的支援，也能坚守整个冬季。京凯尔不仅提出了体面的军事条款，而且提出了爱尔兰人为之战斗的宗教和土地问题的条件。^[21]这些条件不能说不慷慨；不应责怪军人们言而无信，没有执行这些条件。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那里居然没有出现游击战。

京凯尔在爱尔兰时，威廉三世首次在这场战争中负责指挥驻尼德兰盟军。盟军作出巨大努力，力图除莱茵河的4万人外，再在战场上部署8万人。但是同往常一样，法国人在战场上抢了先机，他们转而攻击克里夫诸公国，撤离勃兰登堡。当卢森堡对蒙斯的大堡垒进行围攻时，威廉仍在布鲁塞尔。4月8日，蒙斯投降。此后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战斗，威廉没能诱使法军参加战斗。6月初，布菲勒攻击列日，但除了对这座城市进行炮轰外，别无其他成就，被炸毁的房屋据说达3000所之多。防守西属尼德兰的任务其时几乎全部由盟军担负，威廉决意搞掉该地的西班牙总督加斯塔南加侯爵。后来证明，他是西班牙籍总督中的最后一位。他的继任者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斯·伊曼纽尔，此人得到西班牙总督的地位后，野心非但不满足，反而更加炽烈。^[22]3年前，他作为选帝侯，地位远远高于威廉，而现在他虽就任新职，却仍屈居威廉之下。他是皇帝的女婿，而且是皇太子的表兄弟。3年来，他一直是一个猜忌和苛求的盟友。事实很快表明，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在这一年中，皇帝在多瑙河、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地艰苦奋战，并非无战果可言，波兰和威尼斯也对土耳其形成压力。莱茵河方面没有重大战斗。在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军队估计有1.8万人，法国没有大的举动，但继续做他们开始就做的事。法军攻下了乌尔夏尔，他们的战船轰击了巴塞罗那，不过这只是显示一下而已，他们并不重视大炮。盟军计划在意大利作出重大努力，萨伏依—卡林南的尤金亲王（1663—1736年）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和声望与日俱增，他是萨伏依的查理·伊曼纽尔公爵的长孙，马札林大主教的侄孙，法国大军事思想家蒂雷纳元帅和巴登的刘易斯^[23]的亲表兄弟，他主张加强意大利战场，否则就应放弃。作出的决定是组成一支4万人的军队，其中除西班牙人外，还包括1.2万巴伐利亚人和5000名奥地利人，再加上一支由海上强国出资维持的胡格诺和瑞士部队；海上强国还应向巴伐利亚和萨伏依支付津贴。这支军队的实力远远超过与之对阵的法军。但是，盟军中将领太多，意大利将军加拉法指挥的奥地利人纪律松弛，加蒂纳是所有这些将领中的佼佼者，虽然他并非每战必胜，但他攻下了尼斯（在海军支援下）、维拉弗兰卡，至迟在9月份又攻克了防御阵地之枢纽蒙梅里安，这些毕竟是有目共睹的战果。

这就是说，法国人在主战场上干得很好，除爱尔兰外，在其他地方也干得不坏。然而，在这一年中，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财源开始告急。国王停止了浩大的宫廷建造工程，卖官鬻爵已扩大到海军，这就意味着庸才也可以获得谋取官职的特权。这一年的收成并不坏，但捐税太重，就连殷实的农户也不得不出卖收获物，而不能留作储备。

虽然海上没有重大事件，然而继法国人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立即扬帆出海，而且数量空前之多。英国还拟订了庞大的造船计划和海军改组计划。洛沃瓦于1691年8月16日去世。尽管出现了这个不吉之兆，法国的武装力量仍在1692年达到顶峰。战争的主要性质在1692年起了变化，这一点不止表现在一个方面。威廉三世在战斗开始前就对媾和条件表明了意见，但他丝毫没有降低原来的条件，而且还声言，盟国应从所有方向发动攻势。

现在双方都企图利用海军侵入敌国。盟国首先筹备就绪，但为了挫败法国的计划，它们取消了自己的计划。法国在科唐坦集中了2.4万名军人，詹姆士参加了这支军队并为它筹集运输工具。普夏特兰命令伟大的法国海军上将图尔维尔于4月25日从布列斯特启碇，如与敌方遭遇，要动用他手下的所有舰船与之作战。路易十四的手谕肯定了这项命令。这位海军上将心里明白，这项命令毫无意义。海军大臣觉察到这一点后，发出了一道相反的命令，但为时已晚，永远没有送到图尔维尔手中。图尔维尔率领44艘战列舰与爱德华·拉塞尔率领的由79艘战舰组成的英荷舰队相遇。战斗于5月29日打响，在巴尔弗洛到拉乌盖的海岸持续进行了6天^[24]。15艘法国战舰被击沉，一大批法军逃往圣马洛，那里的英国和荷兰水兵要向他们攻击；但是英国的大臣们像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无能，在爱尔兰已经不再需要的25个营于5月登船，此刻正是让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起航出海，却毫无用处地到处乱跑，结果除了炮击敦刻尔克外，一事无成。拉塞尔写道：“焚烧一座法国城市之于法国人，犹如骑士桥不慎着火之于我们，后果并不更为严重。”所以，巴尔弗洛之役并不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败仗，与滩头堡之役相比，这场挫折并不更为沉重。可是，法国海军不可能像盟军曾经做到的那样重整旗鼓了，因此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法国没有立即接受教训，依然不放弃舰队整体行动的想法。但从1695年起，法国大幅度削减海军经费，主要目标转为破坏贸易。武装

的民船机智而大胆地从敦刻尔克、圣马洛以及一些较小的港口出发，进行活动。政府经常向它们提供补给品，出借船只以示支持。福尔班伯爵让·巴尔和这些民船中最有名的船长勒内·迪盖·特鲁安不是普通的海上游击队员。他们迫使敌方不得不承担为商船队护航的艰难任务，而且还时常惨遭失败。他们威胁并损害了英国和荷兰的进出口贸易，劫走或捣毁了数百艘船只。^[25]法国在海上的损失也很沉重，仅被英国海军军事法庭判罪的各种大小船只就多达1296艘。

在巴尔弗洛战役这一年，尼德兰也展开了一场变故频繁的战役。西班牙无力再支付勃兰登堡和黑森林军队的费用；皇帝本想把它们部署在莱茵河并在那里发动攻势。但海上强国把它们费用承担下来并把它们带走了，这样就可以建立一支数量超过法国的步兵。当卢森堡围攻那慕尔时，他又成功地顶住了盟国军队的救援。那慕尔于6月失守，于是整条桑布尔河尽入卢森堡手中。8月3日，威廉三世终于迫使法国陆军主力在斯蒂拉克投入战斗。他发现法军阵地很坚固，便突然袭击，夺下了一个控制着法军右翼的制高点。之后苦战4小时，盟军伤亡7000人，法军的伤亡大概也同样惨重。威廉确信胜利在即，最后，他下令撤出战斗，部队秩序井然地退回原来的阵地。英国军官指责他们的盟友，尤其是威廉的亲属索尔姆斯伯爵不向他们提供支援。斯蒂拉克之役是瓦尔德克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他死于当年早些时候，终年72岁。

在莱茵河方面，法军无疑占有优势。春季，由于向尼德兰派遣部队，法军实力变弱，而帝国部队集结太慢，等到6月他们的人数达到4.7万人时，法军已经返回。帝国部队正处于不统一的指挥之下，其中一部分两次渡过莱茵河，向西挺进，但又撤了回来，他们丢失了普福尔茨海姆，未能攻下埃伯莱贝格，符腾堡大公爵被俘。德·洛奇元帅强征暴敛，斯瓦比亚和弗朗科尼亚一片恐怖。

皇帝关注着别处，但并未捞到补偿。终于在萨伏依向法国发动进攻。加蒂纳的实力因分兵尼德兰而受到削弱，但他的步兵（100个营和40个连）强于盟军；盟军总数再次减少一半，装备缺乏，无法围攻比内罗洛，于是留下5000人监视驻扎在比内罗洛和苏沙之间的加蒂纳，拨出另外6000人去封堵卡萨里。主力2.9万人则分兵三路越过阿尔卑斯山，第一路经由库内奥去往小巴塞罗那，第二路经由萨卢佐和卡斯特尔代尔菲诺，第三路经由鲁塞那和奎拉斯。三路大军在多菲的昂布伦

会合。昂布伦于8月16日投降。盟军发现加普已是一座空城，便在大肆劫掠后将城付之一炬。此后厄运接踵而来。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卧病不起；3个主要盟国想要守住昂布伦要塞，但看来此城难保。由于加蒂纳的部队近在咫尺，后勤给养无法保证。军队特别是奥地利将军卡普拉拉的部队大肆劫掠，只有教堂得以幸免。西班牙部队想要撤走，他们答应派船到海岸来支援的诺言完全落空。9月12日决定撤退。昂布伦和吉莱斯特莱的城防工事被摧毁了。此后直至战争结束，法国本土再没有受到蹂躏和污辱。

战争的过度消耗加在法国人身上的重负显现出来了。财政靠出售王家庄园等捉襟见肘的措施聊以支撑，征兵也困难重重。西欧大部分地区收成不佳。^[26]这对盟国也是一个打击，加上其他原因，盟国间的团结日益削弱。春季，皇帝查明肯定能从两个亲属——不伦瑞克—吕恩堡亲王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亲王那里得到正规军6000人，但是，这意味着他与萨克森选帝侯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况且为得到这支部队，付出了将汉诺威升格为第九选帝侯区的代价。1693年年初，德国的诸侯们结盟反对这个新花样。^[27]这对法国无疑是个鼓舞，他们希望利奥波德本人或至少帝国的某些成员脱离大联盟。为推进这个政策，路易十四将他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阿沃伯爵派往斯德哥尔摩。瑞典答应就全面战争进行调停。1692年以后，帝国军队中便不再有瑞典部队了。法国的外交活动未达到孤立威廉三世的目的。但到了1693年5月，威廉终于明白，除了在维持原状和威斯特伐利亚及比利牛斯条约之间取乎其中外，不能抱更大的期望。他的外交变成了守势，大联盟的整个纲领已经放弃。此后直到战争结束，越来越多的外交官和秘密使节为媾和条款问题忙得不可开交。由此而引起的重要后果是激起了盟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促使军事上的团结变得松散。^[28]

对于各盟国来说，1693年是个前景暗淡的年头。虽然法国经济状况很坏，甚至发生了饥荒，但无论在海上或陆上却都打得很好。海上强国再次放过了利用舰队实现任何意图的机会。圣马洛遭到炮轰，但炮弹质量低劣；用一艘装满炸药的船作为爆炸装置冲向防御设施，结果完全失败。6月间发生了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海上损失。在前两年中，土伦舰队一直阻挠着向地中海东部的航行，盟国方面于是决定为400名商人提供一支强大的护航舰队，由11艘英国战船和5艘荷兰战船

组成。海军当局想摸清法国人的行踪后再放这些护航战舰出海，可是，他们的情报工作极差，大臣们命令护航舰队出海。6月27日，护航舰队在拉古斯洋面与拥有70艘战列舰的法国联合舰队遭遇，约80名商人落入法国人手中，商船损失巨大。而法国人毫发无损。

在陆上，盟国支配下的军队共22万人：12万在尼德兰，5.8万在莱茵河上游，4万在皮埃蒙特。法国在尼德兰的兵力略少一些：卢森堡有4.7万名步兵，2.1万名骑兵，集结在埃斯蒂纳到吉凡特要塞一线；驻扎在图尔内附近的布菲勒有步兵3.1万人，骑兵1.7万人。1月初，弗内斯被法军攻克，相邻的迪克斯穆德镇也丢给了法军。西班牙人和马克斯·伊曼纽尔坚持拿下佛兰德，并认为必须顶住布菲勒对列日的攻势，威廉三世于是兵分几路。卢森堡在谋略上胜过了威廉。7月29日，威廉在兰登和内尔温登构筑的工事受到攻击，由于荷兰人第一次将自制的榴弹炮用于实战，所以守方的炮兵占有优势。双方浴血苦战，与斯蒂拉克之役相比，双方的伤亡都更大。盟军防御被击破并被赶出战壕。后撤的道路畅通无阻，威廉遂退往布鲁塞尔。看来卢森堡似乎要向卢万运动，切断威廉的交通，并向梅奇林（马利那）军火库或纽波特和奥斯坦德推进。然而，他只是包围了沙勒罗瓦要塞。经过一场激烈的保卫战，该城于10月13日失守。

法军在其他3个战场上都赢得了优势。在北加泰罗尼亚，诺阿耶包围并攻下了小海港罗萨斯和颇有价值并受到保护的海湾。在莱茵河方面，法军因分兵尼德兰而仅仅暂时受到削弱，尽管诸侯们心怀不满，但还是令人满意地响应了要求他们提供支援的呼吁。巴登的刘易斯避过了法军，当法军处于有利位置时，并未对他进行攻击。但是法军又作了表演，再次洗劫海德尔堡，从而使愤怒的火焰重新燃起。在皮埃蒙特，尤金亲王在头一年的惨败后拟订了一个较好的计划。首先应夺取比内罗洛，然后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或是在西班牙海军或在英一荷海军的支援下沿里维埃拉河而下，入侵法国。但是，由于奥地利人行动迟缓，这个计划终成泡影。直到6月间，军队才在卡里尼亚诺集结。围攻比内罗洛以失败告终。加蒂纳得到及时支援，10月4日在马萨格里亚打了一场胜仗，把敌方打得溃不成军。这场战斗最恶劣的后果并不表现在军事上。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仍然控制着皮埃蒙特东部，他认定与其坚持下去，不如改换门庭更为有利，遂于冬天暗中与法国将军泰塞进行接触。

然而令人十分吃惊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下一年，即1694年竟是盟国自1689年以来最有利的一年。原因在于，经济和财政上的紧张状况对盟国的打击小于法国，法国1693年的收成极糟。就陆战费用而言，双方有时都缺少资金，但在其他用途方面，盟国的资金较多。卢森堡虽然仍拥兵10万，但数量已不及对方，而且没有足够的后勤供应，无法发动进攻。威廉企图由东向西渡过默兹河，在佛莱密什海岸采取行动。卢森堡将他击退，但未能防止于伊城再次陷落。盟军首次在主战场上取得主动。除加泰罗尼亚外，法军在所有战场上都处于守势。

海上出现了两大变化。英国和荷兰试图以攻击法国海军的心脏——布列斯特军火库开始行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过去曾把海军的多次努力搞得一团糟，这次又把发动攻击的日子推迟了。所有秘密泄露无遗。6月间，在一支巡弋于英吉利海峡的主舰队和一个进行战术支援的小分队配合下，一支7000人的部队登船出海，结果发现伏邦已将堡垒加固，法军正严阵以待。部队登上了卡马莱特海湾，但被击退，损失惨重。1691年以来英国海军部一直在策划的入侵法国的计划就此告吹。迪埃普、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均遭炮击，让·巴尔却护送着波罗的海玉米船队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封锁线。

然而，从上一个冬季起，威廉三世对海战战略有了直接兴趣，而且关注起地中海了。在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军队约有1.6万人，而诺阿伊有2.6万人与之对阵，而且当他下到海滨时，还可从海上得到支援。布列斯特舰队出现在巴塞罗那，英一荷的地中海小舰队实在太小，无法迎击。5月17日，诺阿伊在泰尔打赢一仗。同日，来自布列斯特和土伦的两支小舰队在罗萨斯海湾会师。6月7日，诺阿伊猛攻帕拉穆斯，6月19日，他在赫罗纳就任加泰罗尼亚总督，这是对西班牙在这个省的统治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威胁。6月间，英一荷舰队奉命开往地中海。7月10日，这支舰队在直布罗陀海面集结，共有41艘英国战舰、24艘荷兰战舰和10艘西班牙战列舰，每艘舰上的大炮均不少于50门。8月8日，这支舰队出现在巴塞罗那。法国舰队根本没看英一荷舰队一眼便返回港口了。诺阿伊由于得不到海军支援便向后撤退。西班牙人实力太弱，不能攻击设防的城镇，但是，法军遭到了游击队的骚扰。

利翁湾的新主人要影响意大利的事态为时已晚。入侵法国南部已无任何可能。进攻土伦需要陆军，但此事已无指望。威廉三世事实上

对此尚未察觉，他并不知道萨伏依公爵实际上已在为法国效命。帝国部队5月间才在奥尔巴萨诺集结，而维克多·阿马戴乌斯迟至7月才与帝国部队会合。两支部队除将卡萨莱封锁了整整一个冬季外，别无任何其他行动。8月24日，盟国舰队司令拉塞尔（现在已是奥尔福德爵士）理所当然地决定撤回国内。

9月14日，拉塞尔接到国王的命令（这个命令否定了海军部的主张），指示舰队不要返回国内港口过冬，而是驶往盟国的港口加的斯港进行休整，供应船队将派往加的斯。这意味着，由于英国的管理有了全面进步，由于英格兰银行提供了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以上拨给了海军），一种困难的、全新的行政管理将被采用了。这也意味着，海上强国可以利用船只全年对地中海国家施加压力——欧洲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

因此，1695年战役开始时，盟国的前景不错。法国依旧缺粮，收获后才终于消除了饥荒。由于战争打起来了，马赛的地中海贸易第一次出现坏年头。1月间，卢森堡去世，由能力低下的维勒鲁瓦接任，与从前一样，布菲勒的军队仍部署在右翼。法军仍无力在尼德兰发动攻势，而且首次大败。维勒鲁瓦的军队沿伊普尔防线散布在斯凯尔特河到大海之间。威廉三世佯作向海滨推进，来到距海滨25英里的地段内。他威胁着敦刻尔克、伊普尔和图尔内，法国人急忙向这些地方运送给养。接着他掉转方向与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两位选帝侯会合，开始围攻那慕尔。法国人企图在西面进行牵制，炮击马克斯·伊曼纽尔的首府布鲁塞尔，据说被击毁的房屋达3830所。那慕尔被围3个月后投降。盟军左翼遂在1691年的阵地上重建防线，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军事威望已经动摇。

其实，这一年并不是决定性的一年。海上强国对圣马洛、格朗维尔、加来、敦刻尔克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巴拉摩斯无谓地倾泻了大量炮弹。诺阿伊由路易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旺多姆公爵接替。西班牙军队总数依然极少，但奥地利拨出3个德意志团，交给西班牙王后的表兄弟、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乔治亲王指挥。然而，西班牙人放弃了支援海军的企图，盟国舰队大部分于秋天返回国内港口。宏大的地中海计划被放弃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行动消极，盟国完全有理由对他不予信任。

夏季，法国外交官卡利埃尔在马斯特里赫特与第克维尔特和博雷尔（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市长）进行对话，表示在全面媾和后可以无条件地承认威廉三世。威廉三世对这个让步并不满意，他怀疑此举的诚意；然而，卡利埃尔于1696年5月断然拒绝了在全面和谈开始时就承认威廉三世的建议。当和谈条件的讨论日益成为现实时，盟国间的不一致却日趋尖锐。对德国的诸侯们进行了安抚，并为他们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计划。然而，很显然，这种合作十分脆弱，和平业已姗姗而来。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在1696年都不期待任何如前几年的那种规模的战事，也不试图发动任何那种规模的战斗。法军未在尼德兰作出努力，却准备发动一场可以称之为威廉三世1688年远征的翻版那样的战斗。土伦的舰队来到布列斯特。英国很快就要发出信息，不是由一群强有力的政治家，而是由一帮密谋分子传递的。这些密谋分子的计划包括一种陈旧的手法：谋杀威廉。没有任何一支海军部队足以控制海面，因为掩护渡海运输需要20艘战列舰。总数为1.4万人的一支军队（即大体相等于1688年威廉的军队）从主战场调来。詹姆士国王于3月2日在加来加入这支军队。一星期以后，60艘英国和荷兰的舰只在离岸不远的锚泊地占好了位置，这就是有关这次远征的另一件唯一的重大事实。远征就这样不了了之，尽管迟至4月路易十四才取消这次行动。在此期间，20个营从尼德兰调回守卫英国，伏代蒙特亲王的实力因而被削弱。但是，这位在西班牙军队中担任指挥的亲王置此于不顾，于3月中旬派遣克霍尔恩去摧毁吉维的军火库。法国人想要攻击默兹河上的某个堡垒时，只能从这个军火库取得补给。虽然尼德兰战场使驻扎在莱茵河的巴登的刘易斯失去了黑森和蒙斯特两支部队，但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尼德兰没有更多的动静。刘易斯的其余部队姗姗来迟，只有斯瓦比亚和弗朗科尼亚集团因面临危险，表现坚决。刘易斯在兵力上大大处于劣势，他以机动作战进行防御。皇帝对于兵力分散在尼德兰和莱茵河两地感到不满，他还渴望他的盟友去支援西班牙，但是，西班牙人似乎没有作任何努力去保卫加泰罗尼亚，因而威廉不信任他们。

萨伏依的威廉三世久久地盼望着盟国的相助。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却要把比内罗洛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将卡萨莱夷为平地。盟国根本不能满足威廉这些急迫的要求，而奥地利人也完全不支持他关于可能继承米兰的要求。现在他公开主张意大利中立。尤金亲王以及英国

和西班牙的代表认为，盟国在意大利没有他威廉也不会出问题。他于是投奔法国人去了。法国人狡诈地允许他的军队进入卡萨莱。根据8月29日的《都灵条约》（法军于6月29日秘密地表示同意），法军交出了比内罗洛，并缔结和约。现在除了接受意大利中立外，没有其他选择，盟国遂于10月7日在维杰瓦诺表示同意。有3万名将士的精良的法国军队退回法国南部，开往巴塞罗那。由于西班牙人的意图极为可疑，而且运输问题非常困难，奥地利人没有朝同一方向推进，而是来到多瑙河。第二年，尤金在这里的桑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便是土耳其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仗。

在经济和财政方面，英国、荷兰共和国和法国都已枯竭。1696年，英国的财政紧急状况十分严重，使得水兵和陆军士兵屡屡举行兵变，比1689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难以制伏。和谈已进展到几乎只剩一个问题的阶段，这个问题便是：究竟是全面解决还是等更多的萨伏依背叛事件发生后再说？又进行了一次战役。1697年的这次战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让人看到了未来战争的方向。美洲首次成为海战的焦点。

在这9年中，美洲当然也年年打仗。^[29]关于在美洲保持中立的1686年的《英法条约》没有效用，因为法国不承认威廉三世政府。在加勒比海，法国地位十分优越，因为它在马提尼克拥有一个海军基地和指挥全地区的参谋部。但关键在于英法双方都从欧洲向这里派出增援部队。1697年之前，双方派出的船只和兵员均不足，至多只能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或不可靠的胜利。西班牙将铁甲舰队平平安安地撤回国内。^[30]1689年，法国攻下圣基茨，并从加拿大进入赫德森湾，一直深入到斯克内克塔迪。延搁一年以后，一支小舰队载着一个团步兵于1690年到达巴巴多斯，使背风群岛总督大克里斯多弗·科德林顿有了足够的实力，遂将圣基茨夺回。但是，法国重新占领了阿凯迪亚。威廉·菲帕斯爵士进攻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遭到失败。1691年，科德林顿和拉尔夫·雷恩准将攻打瓜德罗普，未能取胜。1693年，弗朗西斯·惠勒爵士率领8艘战列舰和1500名军人进攻马提尼克失利后，奉命开赴纽芬兰，在那里他毫无用武之地。这次失利是伦敦造成的。翌年没有任何英国舰队出海，法国人在各岛之间任意掳掠。1695年，威尔莫特准将会同西班牙舰队在圣多明各获得了大量战利品。^[31]1696年，英国资金匮乏，无法派出任何舰只。接着就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役。德·普安蒂男爵率领10艘战舰和1005名被认为去袭击英国的士兵

横渡大西洋。6艘英国战舰和4艘荷兰战舰在海军上将约翰·内维尔的率领下跟踪而来。普安蒂得到了来自圣多明各的武装民船的增援，4月20日抵达西班牙殖民地中最富庶的港口卡特赫纳，5月4日攻克卡特赫纳。自从1628年皮埃特·海因夺取白银舰队以来，这是西班牙在海外最可怕的一次惨败，不过，此事对战争的结局并无影响。海外还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如赫德森湾的港口几度易手，以及1693年荷兰人夺得本地治里等，但这些战斗对战争结局毫无影响。

战争的最后一个夏季中，法国在尼德兰增大压力，攻下了阿特和阿洛斯特这两座登德河畔的要塞。不愿媾和的人现在是皇帝和西班牙人了。过去在各个战场上无足轻重的海战和陆战中锐不可当的法国人，于8月10日攻克巴塞罗那，从而了结了战事。10月和约达成，皇帝于10月30日在和约上签字，其他国家则早在9月20日已签了字。

和约条款由波特兰和布菲勒这两位老朋友私下解决了主要困难之后，最终在里斯威克确定下来。在路易十四的那些火气很大的廷臣们看来，条款有辱于法国，而且完全没有必要。比内罗洛已归属萨伏依，法国和萨伏依之间新的联盟可能关系重大，可能毫无意义。领土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原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法国应撤出菲利普斯堡、布雷萨赫、弗赖堡因布赖斯高以及法国在克尔的要塞，法国在莱茵河上的所有堡垒——拉皮尔、路易堡、特拉巴赫将被拆除。法国人以此为代价终于赢得了对斯特拉斯堡的合法权利。通过让皇帝同意剥夺斯特拉斯堡新教徒的权利，法国人狡黠地在皇帝和他的信奉新教的盟友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一些德国诸侯也捡了一些坛坛罐罐，洛林公爵恢复了他的领地，虽然这是以他在战略上仍受法国的任意摆布为条件的。但是，过去为自己争地盘都没有出力的西班牙人，现在却得到了他们的盟友未能为他们争得的东西。要塞的名单是长长的一串：卢森堡和奇梅、蒙斯、库特拉、沙勒罗瓦、阿特、巴塞罗那。迪南要塞回归列日。不久就开始传说：路易十四已使西班牙人看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碾得粉碎，而现在他说要跟他们做朋友，眼睛却盯着他们的继承王位问题。

海上强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荷兰得到了一个有利的贸易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恢复1664年法国的关税。英国大使们得到指示，为最终签订一项商约作出安排，英国新的商务部实际上已在起草一个与荷兰条约相似的条约草案。但是，全权代表们没有提出建议，他们

认为：“照目前状况，贸易平衡显然对英国有利。”^[32]让英国与法国的关税战继续下去，英国人是满意的。据估计，法国的商船队已从1688年拥有750条相当规模的船缩减为1698年的533条，而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商船队则比战争开始时还要大。由于缺少战争最初几年中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无法估计这场战争的长久经济影响。战后出现了“复原繁荣”，消除了战争带来的许多暂时性的后果，但是，战争给经济和政治权力合为一体的边疆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与土耳其事实上仍处于交战状态，西班牙沉沦在贫困之中。荷兰在财政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法国，经济学家们为挥霍浪费、不公平的、缺乏效率的财政制度的种种弊端寻找药方，但没有进行改革。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出卖官职的收入高达4000万锂，买到这些官职的人又必不可免地把贸易部门搞得不成体统。工业再也得不到国家补贴或其他照顾。而在英国，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后果表现在海军持续不断的改善上，海军的岸上设施大有改进。战争开始时，英国海军仅有100艘战列舰，到战争结束时已增为130艘，增加的主要是低等级的船只，这类船只用途非常广泛，尤其适用于“护航和巡逻”。

总之，威廉三世完成了他的主要战争目标。他被法国人承认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他的三个王国与荷兰结成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几乎肯定会长盛不衰，支持着对法国的实力平衡。

（许明龙 译）

^[1] 本卷所列陆、海军的兵员数字仅为近似值。若提供精确数字，则需对各种数字的含意作出详尽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非经专门研究不可。但笔者并未进行此类专门研究。

^[2] 参见本书原文第767—768页。

^[3] 参见本书原文第811页关于“军火库”一节，第821页关于“海军在编名册”一节。

^[4] 教皇的决定有利于约瑟夫·克雷芒，他在若干年之后才得到了全部领土。约翰·莱维斯·范埃尔登在列日当选，路易对此大为恼火。1694年范埃尔登死后，约瑟夫·克雷芒终于当选。

^[5] 见本书原文第621页及以下关于这几年中奥斯曼战争的章节。

^[6] 舰只按大小分级，根据英国的计算方法（以炮的数量为准），前四级足以参加第一线战斗。见本书原文第790页及以下各页。

[7] 威廉作为英国的执政者于1月2日与法国断交，但法国的宣战书并不包括英国，因为1697年之前路易十四始终视詹姆士二世为英王，后来威廉成为英王（见本书原文第206页），于5月17日向法国宣战。

[8] 卡尼奥拉的伊德里亚矿是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水银产地。参见本书原文第307—308页。

[9] 此处所说的法军是指可以征召的后备部队；而荷兰军队则指根据“*lócht en wacht*”征召的兵员。参见J. R. 韦斯顿著《十九世纪的英国国民团》（1956年）第三章。

[10] 约翰·福特斯丘勋爵的回答是肯定的，见《英国军队史》第1卷，1899年，第354—357页。关于不大为人所知的否定性回答，见J. 科兰著《拿破仑的军事教育》，1901年，第1—28页；《十八世纪的步兵》，1907年，第2—3、30页；《战争的变迁》，1911年，第162、169—172页。参见本书第22章第1、3节。

[11] 本书将讨论战术引起的变化，见本书原文第748—749页。

[12] 这个头衔不是军阶，而是职务，当时这个职务是大统领威廉三世麾下的副统帅。

[13] 见本书原文第388页。

[14] 见G. N. 克拉克著《荷兰联盟与反对法国贸易之战，1688—1697年》第5章。

[15] J. 艾尔曼：《威廉三世战争中的海军》，1953年，第259页。

[16] 见本书原文第171—172页。

[17]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72—473页。

[18] 法国人称这次战斗为贝维齐埃之战，荷兰人则称为贝维西埃之战。据说这两个不同的称呼都来自“佩文赛”这个词。

[19] 关于这两种对托林顿褒贬各异的评价，见海军上将赫伯特·李奇蒙爵士著《海军：政策的工具》，剑桥，1953年，第213—219页；J. C. M. 沃恩辛克：*Oe Vloot van den Koning—Stadhouder*，阿姆斯特丹，1934年，第101—144页。关于托林顿行为的详情，见艾尔曼前引书，第341—356页。

[20] 这是法国民团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大战。

[21] 见本书原文第214、256页。

[22] 见本书原文第352—353页。

[23] 尤金是奥林帕·曼奇尼和苏瓦松伯爵的儿子，苏瓦松伯爵虽是路易十四的宿敌，但尤金尼奥·冯·萨伏依（这是他本人的签名，即尤金）却在法国宫廷中长大成人，后来他及时离开法国宫廷参加了救援维也纳的战斗。关于他从军与土耳其作战，见本书第19章。

[24] 法国人和一些英国作者称这场海战为拉乌盖海战，大多数英国作者则称之为巴尔弗洛海战，或袭用法国人的旧称，称之为拉奥盖海战。实际上进行了两次战斗：一次在巴尔弗洛外海（拉阿盖海角），另一次在拉乌盖海湾。参见艾尔曼所著前引书，第397页第1节。

[25] 见海军大臣在上院的一次讲话，1707—1708年（科贝特：《议会史》第6卷，第646页）。此处所说英国船只损失“近4000艘”，这个数字不是权威性的，它来自一本无名氏所写的小册子，与其他数字，例如，由法国遣返的被俘人员数字等不相吻合。

[26] 参见本书原文第320页及其以后关于对法国的影响。

[27] 这个名为“一致诸侯联盟”的组织于1月26日在雷根斯堡组成，参加者有丹麦、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萨克森—戈塔、黑森—卡塞尔、蒙斯特；后来又有另外一些诸侯参加。

[28] 从1693年起，法国和荷兰的使节每年举行谈判，威廉三世关于要求法国承认他的国王称号的条件是艰难的谈判中的一个主题。皇帝则在1692—1696年间他与法国人进行的谈判中赞同一个有利于斯图亚特王族的解决方案。见M. A. 汤姆森著《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1689—1697）》，载《英国历史评论》第76卷（1961年），第37—58页；H. 里特尔·冯·斯尔比克：《维也纳与凡尔赛，（1692—1697）》，慕尼黑，1944年。

[29] 关于在北美的战斗，见本书原文第486—490页。

[30] 参见本书原文第354页第一段。

[31] 参见本书原文第355页。

[32] 参见历史抄本委员会《爵位文献》第3卷（1908年），第127页。

第八章 大不列颠作为世界强国出现

1714年夏，当玛沙姆夫人艾比盖尔、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和博林布鲁克勋爵亨利·圣约翰组成女王陛下强有力的政府时，白金汉公爵在被免职之际，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史作了以下概括。

仁慈的上帝！在我生活的时代里，这个可怜的国家是怎样治理的呀！选在查理二世国王统治时期，我们受制于一群法国娼妇；到詹姆士二世时期则受制于一群天主教僧侣；到威廉国王时期又受制于一群荷兰随从；而现在我们正被一个下流女招待、威尔士的代理人 and 既无荣誉又无诚信可言的放荡的卑鄙小人统治着。[\[1\]](#)

这些言论的坦率充分展示出允许实力派们享有而不给予迂腐学子们的自由。回首往事，站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最后一年（1714年）的立场看，博林布鲁克这位观察家对在接连受到王室信任的人中的种族、宗教信仰和职业的多变一定会有深刻印象。确实，从年轻的复辟国王急切、兴奋的即位到奄奄一息的女王悲惨的临终时刻，这54年色彩斑斓的历史时期可能是不多见的。这万花筒般的外观掩盖着一个实际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把1660年孤悬的英国变成了1714年的大不列颠。这不令人惊异吗？

这些变化同1689—1713年间两次大的战争[\[2\]](#)有密切关系。1660年，人口略超过500万的英格兰（还可以加上约100万人口的苏格兰和略超过200万人口的爱尔兰）[\[3\]](#)在不久前同荷兰的第一次海战中虽已崭露头角，但在随后的28年间，在路易十四在陆地和海上、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发动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纷飞战火之中，英格兰仍然未受过考验。路易十四有3倍于英国的人口、训练有素的海陆军将领以及当时世界上最有效能的部长们做后盾。的确，在1689年，当英国被迫接受凡尔赛的挑战时，斗争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它实实在在地没有军队，它的船队成为敌人走私船屡屡掠夺的目标。而且，看来它好像是没有像法国那样有能维持那么长久的财政资源和物质资源。第二次英荷战争耗资总额达500万英镑以上，但这个数额还稍稍低于1689—1713年间打了近20年战争平均每年的费用，这期间仅有5年没有战争。引起观察家惊愕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事情。法国有政府指挥统

一这一优越条件，这使它能要求大多数贫苦居民，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保证集中全力于战争。而在英国，1688年革命已经把议会、连同来自舆论界一切可能的压力都强加给了国王；加之，英国各土地阶层显然比法国农民更不能忍受增加税负。敌人在内线战斗，能有效地压制住国内的不满并摧毁英国的海上资源。敌人的地位同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地位颇为相似，当时看来一切都对他们有利。

还有一些妨碍英国战争努力的其他更深远的因素。最突出的是詹姆士党人的扰乱。对此，这里有必要加以识别。因为，詹姆士·斯图亚特的众多拥护者公开支持这个被放逐的斯图亚特的事业，与此同时，还有更多支持者留在国内，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任职，都决心以背叛、不忠或不作为来破坏新政权。在1689年以后的若干年里，爱国主义的含意就是效忠海峡彼岸的国王；1714年以前的年代，明智之举在于博得汉诺威和圣日耳曼^[4]两个宫廷的恩宠。威廉受到以暗杀或入侵迫其逊位的威胁，安妮女王将由选帝侯或王位觊觎者继承。对所有这些临时补缺的君主，英国人都不会有他们乐于奉献给公认的王室家系的那种忠诚之情的。一个好战的荷兰人和他将被一个粗俗的德意志人继位的前景，就是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复辟的主要资本。

长久以来，在氏族群众对首领的忠诚因封建统治残余的存在而更为加强了。天主教的爱尔兰和苏格兰西部高地，詹姆士主义成为一种带有群众性的事业。此外，这两个邻国同英格兰的关系多少有些不同。当时爱尔兰只在名义上是一个王国，它被当成是一个殖民区，在老帝国内处于从属地位。而苏格兰，直到1707年同英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之前，还是名副其实的王国。这里禁止进行殖民贸易，因此，直到那时之前，严格说来，它完全不是帝国的一部分。这两个国家都保留着自己的立法机构。爱尔兰议会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英国的枢密院；苏格兰议会，从1603年以后，只是在1689—1707年间得以独立存在。两个国家的人种外貌，除苏格兰西南部和北爱尔兰紧密联系在一起外，大体上介于东部撒克逊人和西部凯尔特人之间。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失败以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名义上受到排斥，但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很宽大的。但威斯敏斯特议会禁止它的布匹和牲畜出口，结果，粮食的出口贸易成了爱尔兰唯一的大宗贸易。在《利默里克条约》以后，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态度是一种勉强的服从。厄尔斯特（1689年的《容忍法》不适用于它）的态度则是对圣公会的壟

断行为愤恨。^[5]同样，苏格兰也有自己的不满。它主要出口大马哈鱼、皮革、煤、盐和粗布，它最好的顾主是荷兰。由于被迫参加了三次英荷战争，它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沿东部海岸一带，特别是在福思港湾以及连接福思港湾和克莱德港湾的采矿区，人口和经济都最有活力。这是古老的苏格兰同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法国，而不是同英国商业和文化交往的结果。这个大方向已经在发生变化。因为同美洲殖民地有了大量私下的贸易，而在这方面格拉斯哥比当时主要的海港利思的地位更有利得多。靠近格拉斯哥的克莱德湾依旧很浅，只能停泊最小的船只。尽管如此，商人们还是把他们的货物从陆路运送到格里诺克和格拉斯哥港口，然后再装船运到西方。但是，这补偿不了苏格兰被排除在殖民地贸易之外的损失。所以，苏格兰也和爱尔兰一样对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十分不满。到1702年，形势已经很明朗，不管是威廉还是安妮都不会有继承人了，在法律机构解决继承人问题之前，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即北方的王国可以把王位授予某个不是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中规定的人选。^[6]

在战略上，苏格兰和爱尔兰对英格兰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一个明显的有利方面是战时可以利用它们的港口；但另一方面，这些港口也可以为敌人所利用。东部海岸几乎没有隐蔽的条件，而在西部沿岸，由于有无数的海湾和入海口，所以便于入侵者隐蔽藏身。正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西部沿岸，存在着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们。此后，布列斯特成了离开大陆出发的最好港口，从那里容易进入爱尔兰西南部，在同威廉进行战争的最初年代，法国人和詹姆士党人就曾自由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苏格兰西部高地的小港汉则提供了更多理想的登陆点和民众，这些民众对正在输掉或已经输掉的事业可能抱有同情心。1715年和1745年的叛乱在一开始之所以能够那样成功，原因正在于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08年3月的图谋，这次甚至连机会都没有，原因就在于法国的指挥官从敦刻尔克航行到了福思河口，而苏格兰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以对斯图亚特王朝有普遍感情而著称，还不如说是以同荷兰的频繁贸易而闻名。^[7]路易十四犯了一个通常的错误，他把所有苏格兰人都想象成了高地人。只是由于运气不错，风向有利，加上福尔班的优良航海技术，法国人才得以顺利逃遁。

英格兰主要的自然条件更为温和宜人，更有利于从事各种职业，被地理学家们称之为英格兰平原的地区尤其如此。这个地区北端大体上同泰恩河和彭奈恩河邻接，西与从柴郡向南沿威尔士边界直到多塞特沿岸的海峡一线交界，南面和东面濒海。这个地区土地虽不太肥沃，但较适宜于耕作。因为这里没有山，土壤中含有大量地质上较新的物质，像泥灰岩或黏土，用简单农具即可耕耘。这个地区的河上航运也比北部或西部地区便利。这样，很自然地，集中在这里的人口和工业比在平原地区之外的要多。17世纪末、18世纪初最平常的“改进”之一是河道的加深和加宽。英国在这方面优越于法国，它不仅有良好的河运网络，而且废除了这方面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法国的运输则受到这方面的干扰。总的说来，对英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可以用否定的语气作以下概括，即没有大的或时间很长的高低悬殊的温差；没有大面积的、专用于同类生产或活动的地域。再者，各种金属矿藏很少远离煤的蕴藏地；同时人口集中的地方从不远离有航运条件的河流。看来未必有哪一个同样大小的17世纪的国家，能在这样小的范围内提供如此多样的气候和产品；还可以加上一条，英国有丰富的煤、铁，虽然当时尚未充分开发，很快就被证明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反之，法国主要盛产谷物、酒和纺织品等，这是更古老、更多自给自足特征的经济。最后，还有英格兰和苏格兰很长的、连绵不断的海岸线，可以开发新的港口，以满足新的需要，就像在西海岸一样。这一带的水势通常是有利无害的，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大片的、把一片海同另一片海分割开的陆地，也没有像在波罗的海那样有冰块堵塞的危险。爱尔兰保护着英格兰西部的大部分海岸不受大西洋影响，就好像西部沿海岛屿保护着苏格兰的海岸一样。不列颠肩负着大国重任，对此，应当归功于它自己，也应当归功于海洋。

同等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在农村，占优势的是土地的自由领有农，他们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土地给他们提供了独立的保证，同时也要求他们为地方上尽义务。如可以在郡的副职岗位上或在大陪审团任职，亦可任法官，或民军军官，有时甚至可以当一个庄园主。他们不受阶级偏见的影响，因为农村就只有他这一个阶级，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租金和降低税率。他们主要的不满就是必须承担土地税的最大部分，由此他们厌恶商人和城里人，因为后两者轻而易举地逃掉了这方面的负担。但是，在土地所有者这个广大阶级内部，也经历过许多长时期的变化。[\[8\]](#)在天平的一端，他们中的大多数越来越不依赖农

业；因为他们从经商、地皮租金或公职中得到收入。但是也有资金不断地从城镇流向乡村，主要是流向伦敦周围地区，因为许多通过经商或其他职业发迹的人购买了地产，尤其是1688年以后，拥有土地还有更大的政治价值。在天平的另一端，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则往往沦为佃户或雇佣劳动者。处在这两极之间的是较穷的乡绅和殷实的自耕农，他们是一个逐渐趋向衰败的集团，是艾迪生笔下“一年100镑收入的人”的典型人物。他“靠他的猎物每周节省两到三次正餐”，这样，他们比更穷困的邻居生活得还便宜些，《狩猎法》[\[9\]](#)禁止那些邻居打猎，因打猎消遣的权利已经逐渐被富人垄断。小农还受到谷物降价的损伤，而谷物降价对农场劳动者和城镇的工人有利。与此同时，较大的租佃农场主则逐渐成了地产上的新富。总之，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正在变成更尖锐的突出点。至少有一项有意义的社会变化可能是同这种发展相联系的，那就是仍然残存的但在逐渐减少和消失的庄园的权利。如果对此权益提出强烈要求的话，也许会增加一点收入，但是比较富裕的英国的庄园主们对他们的要求常常置之不理。

如同自由领有农是乡村的基本单位一样，“脱离”自己行会的工匠则是自治城镇的基本单位。在当时，出于费用的考虑，许多工匠和学徒都不重视办理他们的“脱离手续”，从而行会本身越来越成了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的慈善机构。工业的日益专业化使他们已不可能控制他们的行会。不过，学徒制仍然有两点可取之处。第一，它保护工人中的一个阶层不受剥削，如同将老的“正规管理”的工业部门和像运煤那样新的“无正规管理”的行业以及雇用廉价女工的工业部门的条件进行对比时所能见到的那样。第二，学徒制能保证维持严格的工艺标准，这不仅在新老纺织业中、而且在银品制造业、制皮业和机械器件如钟表的制造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制品的声誉极高，以致有许多外国的仿制品。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英国的工艺技术在这个世界上享有盛誉。英国人还以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著称。这是由于战争年代物资缺乏促成的。在人们从前使用进口材料，比如布雷顿的粗帆布的地方，在战时不得不“凑合”使用本地产的原材料；与此同时，战争还鼓励发明家们去设计像原始的“坦克”和登陆装置这样一些装备。[\[10\]](#)更普遍的是，胡格诺教派熟练工艺和资金的传入，和1689年《容忍法》对不信奉国教者的地位以更大的安全保障也

鼓励了进取精神。不信奉国教者，由于仍然被排除在大学、中学和各种职业之外，只能从工商业中去寻找出路，正如同教友派教徒长于制造金属器具、刃具和农具一样。^[11]这样一来，在熟练行业中英国拥有一大批身怀多种技艺的人才，他们以自己产品的品类齐全而自豪。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出口贸易发展得如此迅速。

还有一个被认为是“穷人”的广大阶级。新教改革由于引进了体面和拥有固定住址两种新的善行、美德，它不能容忍贫穷和失业，认定这些不幸必定是道德缺乏所引起的。现在，“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由在社会上没有公认合格地位的人所组成的残余，他们包括除土地自由领有人、有职业者和未“脱离”行会的人之外的所有人，因而，除了靠救济过活的穷人、失业者和流浪者之外，“穷人”这个词还扩大到了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工人和茅舍农，确实是所有领救济金或被认为可能领救济金的人，总之是一个无组织的廉价劳动力的大储存库和潜在债务负担者。每一个人都赞同自己的工资必须削减到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英国只有这样才能使售价低于它的竞争者，这样一来，在国内的轻体力劳动工人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国外的重体力劳动者。对这两种残余都没有多少同情，相反，还有点不合逻辑的反对，认为两者不管谁都不是英国产品的主要主顾。因为西印度群岛上缺吃少穿的奴隶主要地以半腐烂的鳕鱼为生，这种鱼是由有进取精神的新英格兰商人通过交换蜜糖供给的，把这种蜜糖制成朗姆酒，可以买到更多的奴隶。而在国内衣衫褴褛的劳工和穷人身上，几乎没有一盎司英国毛料；他们经常以土豆和水为饮食，这对农场主显然不利，更不用说对地主和他的地租了。^[12]但是，在我们对这样的推理丧失耐心以前，我们应当记起，正是这种冷漠无情使英国得以致富，而且比起当代社会来，它的冷漠无情只不过是巫见大巫罢了。

财政因素是使英国能够不被打败并最终战胜一个更富强得多的国家的诸多原因中的另一个原因。1692年，重新厘定了直接税款中的最大宗土地税，按通常战争年代每镑收4先令的税率，每年征得土地税200万英镑。这个时期最可靠的间接税是货物税。货物税同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密切适应，它的数额不断扩大，因而就有钱支付许多巨额贷款的利息，这些贷款也是为战争目的而不得不举借的。正是这种可靠性增强了公众的信任，这是英国在对法战争中^[13]公共借贷计划得以成

功的基本条件。公共财政的大发展成了革命时期的英国和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位男性君主统治时期的英国之间的鲜明对比之一。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解释这种发展，说它是国家资源的更充分利用也好，或者说它是行政过程的一种逻辑发展也好，它们都离不开17世纪晚期海上冒险事业的发展。威廉统治时期发动的大规模战争，使扩大海上活动变得空前迫切；致力于发展对工商业有利的条件，限制不利条件的国家变得（似乎是）在经济上自觉了。对经济政策的诠释，得到一些时代精英、包括牛顿和洛克的合作，同他们协作的很可能还有诸如格雷戈里·金、乔赛亚·蔡尔德以及查尔斯·达维南特这样一些专家，他们对财富和贫穷的睿智分析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作了许多准备。总之，他们帮助普及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低工资和最大限度地出口，尽可能地将进口限制在原料和国内能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上。最理想的（不过很少实现）是同那些可支付条金的国家进行交易，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海外贸易都是根据它们是带来顺“差”或者逆“差”分类的，这种分类和今天“硬”通货区和“软”通货区之间的区分有点类似。这样，从外贸平衡的角度来看，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逆差”，不过英国从那些国家进口的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对法国的贸易完全是“逆差”，因为从那里进口的货物一般是奢侈品，诸如酒和丝绸，而且没有任何适当的通融能使英国产品进入法国作为补偿，其结果是，这种贸易受到爱国人士的谴责。^[14]博林布鲁克主要负责起草1713年的商业条约。这个条约列有给予法国对英国的出口以“最惠国”地位的条款，这一事实构成了1714年企图弹劾他的部分原因。与此鲜明对照的是，葡萄牙遵循传统重商主义的规则，进口英国的毛纺织品（尽管它努力摆脱对英国毛纺织品的依赖），支付给英国条金和葡萄酒。^[15]条金帮助英国确立金本位制；而作为检验粗壮男子汉阳刚之气的（葡萄牙）葡萄酒则在同法国人、詹姆士党人和托利党人可能饮用的柔和的法国红葡萄酒的比较中获得成功。葡萄牙还有另外一个使英国青睐的地方，因为里斯本对（英国）舰队在地中海及其沿岸作战是有用的，它的海岸也构成了海上贸易干线的侧翼。同绝大多数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贸易被认为是“顺差的”，特别是同西班牙，它甚至需要大量的各种布匹，还有纽芬兰的鳕鱼。西班牙这个富有的（徒有虚名）、封闭的西方帝国尤其吵吵闹闹地要求欧洲的商品和非洲的奴隶。英国和荷兰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反对波旁王朝的人登上西班牙王位。

在这些年代，对对外贸易走向的控制显然是加强了，推进贸易的自由度也更多了。前一种趋势在1696年航海条例诸条款的全面实施和一个月后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设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制定政策而搜集需要的情报，提出建议。其中许多已包括到立法中去了。^[16]另一方面，海外事业的经营有了更多的自由。皇家非洲公司同时还认定，詹姆士二世的外逃意味着以王室特许证为基础的垄断的结束。^[17]1698年，奴隶贸易已对一切向公司支付应付费用的商人开放。赫德森的海湾公司和更不受约束的、“管理正规的”勒旺公司仍然保持它们的特权，但是1694年失去垄断权的“老”东印度公司最终被迫同一个竞争对手“新公司”达成协议，于1709年重新组成一个联合公司。同俄罗斯继续公开交往。许多老的公司，像俄罗斯公司和伊斯特兰（波罗的海）公司已暮气沉沉了。^[18]威廉统治时期最早的法令之一解除了对毛织品出口的限制，从而最终结束了老的商业冒险家们的垄断，这样就更增强了一些出口港口从伦敦得到更大外贸份额的趋势。伦敦在1500—1650年间负责十分之九以上英国合法的海外贸易。

甚至在稍后的大西洋贸易中，伦敦也仍然保留着压倒的优势，西部的港口主要靠这方面的贸易繁荣致富。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伦敦的活力最明显地反映在挤满在河里的茂密的栎树林，其长势在当时只有海运和防火保险市场的发展可与之相比。^[19]由政府资助的大量贷款提供了新的机会，相对传统的土地投资来说，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鼓励成功的商人和其他人留居在市镇，以促使发展一个常驻的贵族阶级，如同伦敦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姆斯特丹的贵族阶级那样。1700年首都的人口已超过40万，在下一个世纪又翻一番，并远远超过了巴黎的人口。^[20]到1689年，伦敦商业区大火之后的重建已接近尾声。1697年12月2日，在为《里斯威克和平条约》而祈祷的日子，圣保罗大教堂的歌唱队对公共礼拜开放了。雷恩的杰作^[21]祭奠了几乎是中世纪的伦敦商业区的消失，其地位被日益扩大的伦敦所取代。它不愧为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帝国的首都。^[22]

在威廉和安妮统治时期，已可隐隐看出国家财富如此扩大的两个明显的社会后果。其一是“新富”集团的出现，他们买得起那些进口的货物和商品，这些货物诸如红木和椴木家具、漆器和瓷器、咖啡和茶，以其品种、式样的繁多打上时代的印记。通常是将瓷器陈列在用

上等木料制成的小柜橱里，用陶瓷容器泡茶，这样就引出了一种“休息室”。在那里，房屋的女主人能够保持一块不大闻得到烟草和啤酒气味的天地。私人休息室不仅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途径，它还是一种机制，特别是当它发展成沙龙以后，它能激励并常常提炼知识界人士发表的见解。和缓的文学表达方式较少学究气，较少专门技术性术语，较通俗易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斯蒂拉和维纳斯式的人物。在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上，还有另外一种微妙变化的迹象。过去，妇女提供了创作十四行诗和抒情诗的灵感；如今，她们通常是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信函的收件人。因为写信的人承认妇女在智力上与男人相像或相等，值得以通信方式与之切磋。迄今为止，她们一直在云层中，或是在厨房里。

财富膨胀的第二个社会后果可以想象得到。在中世纪和内战时期，英格兰北部曾度过一段全国中心的黄金时期，但是某些自然特征保证了内地和南部的优势。现在，由于煤和金属矿藏的开采日益扩大，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提供越来越多的利润，以及战争带来了大批财富，这种优势就显得更突出了。最早受这种形势发展影响的主要是特兰特河和塞汶河以北的地区，但是利润和财富则主要花费在泰晤士河谷和东南部，即英格兰平原的心脏地区，那里是首都、宫廷、立法机关和两所大学的所在地。当然，北部还有不同点。北部人口的密度较小，在议会里的代表名额少；但南北正出现一个更微妙的分野，即当北方的职业和产品是与体力劳动和污垢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南方的职业和产品则是不用弄脏人们的手，真的是常常可以完全不用体力操作。煤、柏油和煤烟已经造成了两个英格兰，一个是合格的，另一个不太合格。在政治领导层中能够进一步看到两者鲜明的反差。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约克郡确实对丹比和哈利法克斯等这样一些（北方）知名人物负责，但是稍后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几乎全都来自南方，直到格雷和皮尔、科布登和格莱斯顿时，兰开郡和北方才又重新扬名。

这些就是诸多重要的自然和人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促使1692年以后英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确定。因为当时有理由假定，至少暂时可以假定，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已经赢得革命的胜利。对革命处理的第一个严重威胁发生在1696年，当时曾有人企图暗杀威廉，还有一次威胁是被英国海上力量挫败了的法国入侵。《里斯威克和约》只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到1697年，许多詹姆士党人已经放弃詹姆士

的事业，因为他们认识到，詹姆士的成功就意味着凡尔赛的统治，尤其是许多英国人已经为革命事业投了资，他们能定期拿到股息，这同斯图亚特王朝投入资金的投机性质形成鲜明对照。穷人的直接负担不像法国那样在增加；中等阶级则从军事贷款和合同中得到好处；富人们则通过许多途径和不正当途径获利。高层的腐败行为比以前有所减少，而物质至上主义和对生活更求实的态度则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但是，最好的文明应当是缺点最少的。继革命之后而来的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政权，它实际上远远超过1689年条例^[23]所规定的限制，这应当成为英国在同路易十四无信仰自由的法国斗争中一支无形的力量。在总数约为25万不信奉国教的人口中，只有约1.4万人在议会选举中有投票权。有许多人，特别是长老会派教徒，有时也愿意通过按国教会仪式接受圣餐以取得在机关团体任职的资格；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辉格党的上院议员们直到1711年才停止阻挠通过镇压“偶尔服从者”的法令。对任何情况下的新教说教而言，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在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都形同虚设。教友派的合法地位这一特别敏感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他们中的较贫苦者因未缴纳什一税和国教会税而被扣押财产，尤其是实物财产，这对他们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扣押不像1688年以前那样经常了。1696年以后，被扣财物价值在10英镑以下者，可以向地方法院告发，而不必找有关税收的民事法庭和教会法庭，这些法庭收费如此之高，无异于迫使许多教友派教徒放弃他们反对什一税的声明。1696年的《确认法会》^[24]用确认取代了绝大部分仍然要求于他们的誓言，这个法令的通过，甚至应当更多地归功于威廉国王个人的干预，而不是已经过早发展的5万教友派教徒的政治组织。^[25]罗马天主教牧师也经常冒被罚款和被关押的风险，而世俗人现在更多的是困扰于无公民资格，而不是直接的迫害。僧侣举行天主教徒结婚仪式尽管可能受到重罚，但当事人双方仍然合法地结婚，其继承人可以继承财产，虽然有某些技术性的困难。它证明强行实施匆忙起草的、旨在摧毁他们作为地主的身份的1700年法令是很困难的。

英国的文明因它摒弃自己的罗马天主教社团而更差些，但与此同时容忍却扎下了根，比欧洲任何其他社会扎得更深。英国和法国的情况不同，体刑在刑事诉讼中已经不为人所知（法国几乎又延续了一个世纪）。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修正案，虽然在短期危机期间如在1689

年和1715年时议会曾使之暂停生效，但它确保被拘留人（叛国罪和重罚犯除外）能够要求保释，没有人会不经审讯就被无限期拘留。1696年以后，被控犯有叛国罪的人有权聘请律师并在开庭审讯之前10天内得到一份起诉书。这是一种人道的措施，它使王室更加难以拿到对付不满者的罪证。考虑到对叛国罪释义的扩大，上述内容就尤为重要。这种扩大的释义是时间的危险引起的，例如，1692年，未经允许出走法国就构成叛国罪；在1706年，以书面形式断言王位继承不能由法令改动也构成叛国罪；对亵渎神明也作为叛国罪对待。在欧洲大陆和苏格兰，对亵渎罪判处死刑；在英格兰，基督教信仰被认为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国家敢于对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给予比亵渎罪轻得多的惩罚。根据1698年的一项法令，亵渎罪只被褫夺公民资格和判3年以下监禁，而且甚至这样的惩罚也很少付诸实施，可能是因为在实践中律师很难完全准确地判定，思想上的异端邪说是何时发展成犯罪的。实际上，英国这个时代是以神学讨论充满活力和勇敢精神著称的。

犹如在法律方面的变化一样，审判人员的地位也发生了甚至更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威廉还是安妮都不去干预法官的行为，这导致威斯敏斯特大厅^[26]恢复了它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丧失了的某些名誉。在这两个国王统治时期的法官中，最著名的是英国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霍尔特爵士。他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锐敏之才智，使他的许多判决构成了英国法学最本质的部分。他维护高等法院的独立性，不是对国王独立，没有这个必要^[27]，而是对上院这个更庞大的机构。在他的多次审判中，特别是在那些由关心地位最卑贱者的地方济贫法当局上诉的案件中，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仁慈。他不仅拒绝审讯有巫术嫌疑的人，而且下令起诉那些试图发起这类审讯的人。在革命前夕的法官中，最著名的是杰弗里斯。

在实践中也和理论上一样，王权仍然是政府中最强大的力量。《权利法案》已经宣布，未经议会同意，行使已被暂停行使的权力是非法的；行使仍在行使中的、曾为詹姆士二世掌握的权力也是非法的。对君权更严厉的限制是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不许外界对议会日程横加干涉。但是国王保留对立法的否决权。事实上，威廉只否决过4项重要的、有关公益事业的法律案，虽然后来还是把它们收入了法令全书，但不是以它们原始的形式长期保留在全书里的。重要的不在于他否决了多少法律，而在于他遵守了多少法律。

掌管对外政策是完全留给国王的另一个古老权力。实施这项权力，牵涉到一些复杂的难题。其中之一是，人们认为威廉比他的任何一个大臣或部长都更熟悉外交事务，因而，一度至少是默许国王行使这一权力。此外，威廉同法国的战争在一定时期被公认为是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后果而被议会两院批准。但对他指挥战争的不满逐渐增加，批评扩散到他对外交政策的掌管，尤其是对他参与《瓜分条约》^[28]的签订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人们痛恨荷兰人波特兰和海因修斯，只有他们得到威廉的信任，而所有的英国大臣都被排除在外，只有萨默斯和森德兰例外。1701年，下议院弹劾萨默斯，还有奥福特和哈利法克斯，莫须有地指控他们对签订《瓜分条约》负有责任，对他们三人“国王不会犯错误”的抗辩充耳不闻。弹劾虽然失败了，但真正胜利的还是下议院，因为它的这一行动清楚地暗示国王，对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重要事务，他必须按他委任的大臣的建议行事；同样，这对大臣们也是一次警告，他们不能再把一切责任推到国王身上，逃避自己的责任。而且，为代替两院之间不愉快的争吵，当时可能是提出了一个正式方案，以确保在国家所有重要事务中，国王只能根据对议会负责的代理人的建议行事。到1701年，威廉本人已经表现出他对形势的这种重要变化的某种理解，因为他向两院递送了他的条约副本，从而他在实际上放弃了亲自掌管对外政策这一古老的特权。至于威廉如何执行他仍拥有的巨大特权，可以断言，他采取了温和的、有见识的行动。在这种品德上还可以加上一个忠诚，它比严格的法律限制更为灵验。他的继承人是个女人，她按照大臣们的建议推行她的对外政策，这个事实保证了议会至上权力的确立。1714年，汉诺威王朝继承了这个事实。王位继承法于1701年6月宣布，新教教徒汉诺威女选侯索菲娅（詹姆斯一世之孙女）为威廉和安妮之后的继承人。这个法令是以法令形式对国王掌管对外政策权力的首次侵犯的标志，因为它规定在上述国王之后，不经议会同意，任何国王不得参与旨在保卫任何外国领土的战争，也不许离开本国。

在其他一些方面，这个被意味深长地冠以“进一步限制王权、更好地保证臣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令”标题的奠基性法令，则是对威廉国王宪政行为的评注。安妮女王一死，这个法令就立即生效，外国人不能担任公职、参加议会或占有王国政府的土地。这项法令明确谴责了威廉对其荷兰亲信的慷慨大度，它在以下附加条款中，从更广的意义上，对他滥用宫廷权势，也暗含着更多的批评。条款禁止王国政府

公职人员和领取养老金者参加下议院，这一规定原则上已用来管理现代文官；而且，如果不是在1706年作过修改的话（即区分开1705年西洋旧历10月25日以前和以后增设的职务），这一规定必将束缚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内阁制度的发展。1701年的议会还裁定，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应当由枢密院办理，其建议应当由提建议者签名以后以书面形式提出。确实，1701年议会以这一职能表明，它对未见诸法律的、小而捉摸不定的内阁这一近代的新事物是很不喜欢的。虽然这个条款因无法操作也于1706年被废除，但它试图确立的大臣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毕竟一劳永逸地通过1701年法令而得到加强。1701年法令规定，对下议院提出的弹劾不得以国王的赦免为由进行抗辩。

在国王的特权中还保留着一些其他未被触动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有解散议会和加封贵族的权力，这些权力在1710年和1712年分别证实了自己真正的政治价值。最重要的是任命和免去大臣职务的权力，在两任国王统治时期，因行使这个权力而引起了许多麻烦和争吵。威廉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他自己的首席大臣的角色；他执政期间由于一半时间是在国外，所以他不得不把一些责任委托给国内的大臣们。他并不偏爱辉格党人，确实，他视他们为共和主义者，荷兰的经验使他厌恶他们。但是，鉴于如此多的托利党人忠于错误的君主，而又如此多的辉格党人尤其是那些担任公职的辉格党人支持战争，因而他不得不对辉格党人表示出某种信任，并且，一般说来，从那些能促进他的事业和能得到下议院大力支持的人中挑选他的大臣。他这样做可能是受到他的密友森德兰的影响。^[29]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统治的后期对戈多尔芬和罗彻斯特委以重任。但是，威廉对之多少表示出一些真正敬意的一个英国国务活动家是萨默斯男爵约翰（1651—1716年），他在1695年以后的3年中是一个秘密的辉格党人小团体“顾问团”（Junto）的非正式负责人，参加这个团体的还有查尔斯·蒙塔古（1700年的哈利法克斯男爵和1714年的哈利法克斯伯爵），海军上将罗素（1697年的奥福德伯爵）和沃顿男爵（1706年的沃顿伯爵和1715年的沃顿侯爵）托马斯。正是这个非正式的大臣会议带领国家走过了战争最后的危机年代。这个组织存在的时期恰巧是辉格党人及其支持者在下议院占多数的时期。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萨默斯掌玺大臣的任命早于1695年大选，这次大选选出如此多的辉格党人，致使萨默斯的任期拖长到1700年，即他的党丧失了在下议院优势后的两年。这个秘密政治集团能够成为法人实体的唯一含义是这样的事实：它

的3名成员因被认为参与《瓜分条约》的签订于1701年受到弹劾。尽管如此，这个秘密政治集团在内阁发展史上仍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它的成员是辉格党人，而且甚至以这个名称自豪；也还因为其中两个人，即分别掌管财政和海军事务“顾问团”的蒙塔古和罗素，是从未有过的新型大臣的代表。他们以国家一个重要部门的所作所为对议会负责，也对国王负责。这同执掌一个部门或担任政务会的职务，只对王室负责的旧型大臣形成对比。诚然，萨默斯担任的职务在过去要求有处理国家事务的卓越才能，但是现在，这种卓越才能已开始同财政部、而不是同大法官的法庭联系在一起了。^[30]沃顿不适于上列任何一个范畴，但他是一个有用的伙伴，一个会拉选票的老手，还是约克郡和白金汉郡一些选邑的所有主。在这些选邑中，秘密政治集团的成员控制着约60个席位，这是安妮统治时期唯一一个最大的集团。到17世纪末，这4个人都进入了上议院，这削弱了他们的集体力量。但是，在1705年，他们的影响再度出现。在1708年，第三代森德兰伯爵查尔斯（1674—1722年）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当时他们已相当强大，足能将森德兰强加给行政当局。那时内阁政府的概念已经确立，它的程序也逐渐正规化了。^[31]

然而，依赖下议院支持的某种内阁的存在，并不能真正影响国王选用和辞退大臣的权力。威廉在临终前刚刚解除安妮公主叔父罗彻斯特的职务，公主一即位，就立即恢复了他的职务。不过，出于慎重考虑，他于1703年辞职了。安妮行使这种特权，表现出一个固执女人的任性，带有强烈的偏见。其结果是，如果她不得不让步，她将“在反击中变得令人生畏”。一个新的麻烦是，在继位问题上她受两个女人的控制：第一个是辉格党人、泼妇马尔巴勒公爵夫人萨拉；第二个是假正经的女士同伴马沙姆夫人艾比盖尔·希尔。只要公爵夫人权势兴隆，女王就甘愿在马尔巴勒协助下进行战争，在财政大臣戈多尔芬协助下治理国家。在1705年以后，女王越来越依赖辉格党人及其支持者，尽管总司令和大臣两人都想当然地被视为托利党人。在这方面，战争局势和为了打赢战争都需要一个好政府，这种需要导致相信他们的人在一段时期内模糊了党派界限。西德尼·戈多尔芬（1645—1712年）在4位国王统治和一次革命期间，从未长期离开过岗位，是当时最能干但最自谦的大臣。他对安妮女王，像以前对查理二世一样，都是“从不阻拦，坚决执行”。只要女王甘愿忍受公爵夫人的脾气，马尔

巴勒的地位就是稳固的。正是这种奇特的合伙关系保证了在布莱海姆战役之后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合伙关系，当财政大臣得到供给并巧妙地吸引议会专注于战争的进行时，总司令则把不列颠的军队训练成在世界政治活动中需要认真对付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戈多尔芬—马尔巴勒—萨拉的稍嫌松散的合伙关系可以说成是一个政府，它从1702年存在到1710年，在1704—1708年间还有哈利作为它的第四个有影响的成员。

这一合伙关系结束的方式，透露出安妮女王是如何行使其选中和罢免大臣的最重要的特权的。到1708年，安妮女王厌烦了萨拉的控制，急切地寻求解放。在这种易于接受的有利心态下，她采纳了马沙姆夫人的建议，后者煽动女王对公爵夫人和政府的不满，并暗示女王，她的堂弟哈利企求尽力协助女王摆脱其压迫者。当时，哈利因被怀疑在其书记员威廉·格雷格叛国的通信中有共谋嫌疑而失宠，政府劝说女王，最终于1708年2月免去了他的国务大臣职务。但女王的同情所向还是那个她已经被迫免除其职务的人，这是因为哈利的继任者年轻的森德兰，脾气暴躁，毫不尊重王权。女王于是更怀念哈利。这个森德兰的任命是政治小集团支持政府的筹码。至于传说的哈利的不忠，难道这不是推荐森德兰任职的真正有利之处？因为安妮对汉诺威家族的继承权是绝没有热情的。哈利本人已经暗示，他所供职的政府只得到辉格党人和不信教分子的支持，国教会处在危险之中，只有靠像他这样“同情女王”的大臣，女王才能达到她渴求的目标——维持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地位。女王伺机行事。但是1710年春天的一个事件，即对萨谢弗雷尔博士的弹劾，可能鼓励了她的勇气。在1709年，向伦敦市长、市政府的布道中，在保卫不抵抗主义原则这一明显的借口下，萨谢弗雷尔暗示，1688年的革命是一次真正的篡权。不明智的是，政府控告了他，并判了他的罪。判决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国家的殉道者。1679年，一个教会的江湖郎中泰特斯·奥茨医生在他周围聚集了辉格主义者和非正规的罗马教教义者的力量。无独有偶，1710年，一个教会的小丑亨利·萨谢弗雷尔博士，成了高托利党人、高教会教士和所有赞成处罚不信奉国教者大规模复活活动的中心。这个全国性的运动在1710年秋季大选中扫除了辉格党人的政权。但是女王已经行动了，8月份她罢了戈多尔芬的官，这使得这个政治家甚为惊讶和厌恶；她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处理马尔巴勒，后者在1712年1月以前一直未被辞退。^[32]远在那之前，哈利就是财政大臣，并且是牛津伯爵，亨

利·圣·约翰（1712年7月被册封为博林布鲁克子爵）是大臣。就是这些大臣抛弃了不列颠的盟国，并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到最后。

[\[33\]](#)

很少见比这更不和谐的政府了。罗伯特·哈利（1661—1724年），辉格党和不信奉国教者的传统的继承人，可能是第一个在下议院持续反对政府的声浪中仍取得声望的政治家。在威廉统治时期，作为“新”乡村党[\[34\]](#)的首领，哈利坚持要求对公共生活实行更严格的净化。他因耍两面派而有“魔术师罗宾”的名声，但这并未妨碍他净化公共生活的运动取得成功。和他的辉格党对手、能干的金融家哈利法克斯一样，他对下议院的情绪及其传统了如指掌，是当时最能驾驭议会的高手之一。像哈利法克斯和萨默斯一样，哈利因资助文学界和明智地搜集书籍和手稿而赢得一定声望。由于哈利自称无党无派，他轻易地就赢得了一些团体和派别的支持，这些派别一旦团结在一个核心人物周围，就能够左右权势。但罗伯特·哈利不诚实，所以得不到那些人长时期的效忠。身为一位非正式首相，他办事推诿、拖拉，特别是当女王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棘手的继承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的时候，罗伯特·哈利却拿不定主意了。他脚踩两只船，但到了关键时刻，却决定不了应该把额外的赌注下到哪一方，以使自己政治上能飞黄腾达。更糟糕的是，他滥用女王的信任，玩忽职守，不修边幅，举止粗鲁；他说的话别人即使能懂了，也不能相信，在女王面前他常常语无伦次。这就是1714年8月7日女王免除他职务的原因。一年以后，哈利被囚禁在伦敦塔，等待审讯他的叛国罪和其他弥天罪行。尽管他的敌人对他怀有积怨，但是直到1717年仍未能证明他犯有上述罪行。此时，他的年轻同事和对手已在法国避难很久了。博林布鲁克是一个比较直爽、更易引人注意的政治家。他放荡不羁，其多疑问、多思考的才智和激情，给人以有卓越智慧的印象，他的能言善辩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和老森德兰一样，他下大赌注进行冒险。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输了之后从不懊悔，从不完全丧失荣誉感。博林布鲁克比牛津更信赖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看来他会想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托利党有可能在女王仙逝时成功地从詹姆士二世的子孙中推出一个王位觊觎者，安妮本人对这个设计也会赞同。在觊觎者放弃自己的信仰以后，正是哈利的拖拉作风及其同辉格党头面人物的酒友关系

成了实现上述设计的主要障碍。两位大臣在女王面前激烈地争吵，更加速了安妮女王的死亡。女王死于1714年8月12日。

女王仙逝的前4天，即财政大臣被解职后的4天，是英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日子。8月9日，当御医宣布女王生命垂危时，博林布鲁克需要当机立断了。由于不再受牛津的控制，他采取措施建立了一个詹姆斯党人的政府，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他宣称在6个星期内就能准备就绪。但他没有得到这么多时间，由于两个人的介入，他突然被剥夺了主动权。这两个人刚被解职，平时在女王的会议上从不出头露面，所以看来很不适于在此关键时刻领导国家。但是萨姆塞特公爵和阿盖尔公爵不仅有权势，有财富，而且两人（一个在英格兰，一个在苏格兰）都一贯主张新教的继承权。还有，作为枢密院成员，他们依法有权向女王提供建议。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另一个大贵族——爱尔兰总督施鲁斯伯里公爵查尔斯·塔尔博特（1660—1718年），他现在效忠于汉诺威家族的事业（尽管起初曾犹豫不决）。这3位大人物8月9日步入枢密院以后，立刻就控制了局势。枢密院从御医处得知女王确已病危，决定任命一位财政大臣，并推荐施鲁斯伯里公爵作为人选。安妮女王最后一次国事活动就是把白色权杖交到公爵手中。这一行为，正如后来形势发展所表明的那样，钦定了博林布鲁克和斯图亚特王朝事业的命运。据说是博林布鲁克首先提出施鲁斯伯里公爵的任命的；如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个姿态只是博林布鲁克的良好体育道德而已，但却结束了他前半生的事业。和马尔巴勒官复军职一样，他的免职是乔治一世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稍后有种说法，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所煽动起来的詹姆斯主义，比托利党政府执政4年间还多。这时一贯以反扑见长的博林布鲁克支持王位觊觎者，从而又一次把心怀不满的英国人弄糊涂了。但是新国王的大臣们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措施表明他们觉察到了一个现实的危险。在英国社会，不同阶层都能明显地感到詹姆斯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这足以说明，当苏格兰高地的部族在帕思慢慢地汇集在马尔伯爵周围时，英格兰本身保持大部分军队以防不测是不无道理的。1715年发生了叛乱。如果指挥有方，行动协调，或者新政府事先警觉稍差一些的话，这场叛乱很可能发展成一场内战。

离开安妮女王在位时期各政党之间经常不断的殊死斗争的大背景，就无法理解冒充的詹姆斯党人的势力，也不能理解安妮女王时期

的政府为什么相对的动荡不定。同样，离开议会机制也无法理解这些现象——主要是议会（当然绝不完全是议会）把他们推上浪尖的。议会两院保护神权，而不保护人权，但不动产例外。上议院议员是国家最大的房地产所有者，他们代表他们自己，令人奇怪的是，下议院议员像上议院议员一样，他们代表的不是投他们票的选民，而是英国所有的房地产主。从现代的标准来看，下议院议员并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这么多的议员是由为数很少的选民选出的。但是，若不以算术观点来论，他们还是有代表性的。许多国家“利益集团”，如土地，各种职业，各商业阶层，武装人员，文职人员等，在下议院都有代言人。总的来看，据估计，在513名议员中，经商和从事各种职业者有200多名。^[35]其余的大多是乡绅、贵族的幼子们、拥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贵族身份的人以及许多因和女继承人联姻，或因其他关系，或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依附于城镇或城镇主人的人。^[36]唯一不包括在内的一大阶级是下层教士，他们在这个时期可被说成是托利党的忠实信徒。这与多数是威廉任命的上议院的主教们形成对照，后者都是辉格党的坚定信徒。还存在一种说法，说是下层教士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会议上是有代表权的，如果他们在下议院也有代表权，这些年的历史就可能大不相同了。

在议会管理上走马灯似的变动中，政党间明晰的界限并不总能清楚确定，因此，不能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威斯敏斯特毕竟不是英国，政治家们并不总是国家精英的代表。事实上，因为他们往往出于私心，行动起来就要小聪明，以致不坚持原则。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原则是存在的。自从出现天主教徒阴谋案和关于排斥法案的争论以后，在对重要公共事务的舆论上就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是对事态发展进程作出的不断反应，因而，分野和舆论的关系，跟人的气质的关系一样密切。托利党人接受别人给自己起的诨名比辉格党人晚，因为他们长期受詹姆士党人君权神授，甚至情愿使国家利益从属于凡尔赛利益的思想影响。随着革命处理的日益巩固，辉格党人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骄傲；而托利党人则宁愿标榜自己为“以品德—原则和财产而著称的绅士”，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对这里的第二点，比对另外两点，更难以作出评价。^[37]从最广泛的角度而论，以上所述就是判明那个时代两党必要条件的基本区别。尽管对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或是对任何一个英国人就某一具体公共事务所采取的行动品头论足是多么不适

当，但这种做法仍然扩散到国家生活的许多领域。因此，辉格党人对新教的态度使他们保证得到不信奉国教者的支持。不信奉国教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教徒，而新教徒一词则不能用来指英国国教徒。在托利党方面，他们在安妮女王时期议会的头3次会议上通过了《偶尔服从法案》，但法案遭到被辉格党人控制的上院的拒绝。1714年，博林布鲁克还操纵议会通过《分裂法案》，其目的在于阻止不信奉国教者以教书谋生。^[38]而托利党人则反对外国人加入英国国籍，不论是胡格诺派教徒，还是帕拉坦^[39]的居民。^[40]这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同不信奉国教者的关系比同英国国教徒的关系更为密切。英国国教与分离派之间的敌意产生了深远的后果。托利党信仰英国国教，这不仅使他们剥夺不信奉国教者进大学的权利，而且他们拒绝修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诸学院的章程。这些章程要求其大部分有学位的人员担任圣职，一种膨胀了的教权主义，这极大地阻碍了两所大学的发展。对比之下，苏格兰不存在这种现象，这使得18世纪北方的4所大学享有很高声誉。

议会至上和君权神授原则之间以往的权力之争酿成一系列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是主张政府负责制、议会有弹劾权的先锋；而托利党人则一直认为，到安妮执政时期仍然认为，由于国王可以自由选择大臣，大臣对国王就应有最起码的忠诚。在其他众多分歧中，还包括战争问题上的分歧。1688年革命已经使英国和路易十四处于完全敌对状态，但是许多人因不满威廉的领导，而认为他领导的战争是辉格党的战争，加之驻扎在国外的军队常常是明显的毫无目的的演习浪费了大笔金钱。托利党人反对这场战争，认为它是靠骗取公众的信任而被煽动起来的，从而是靠“年年典当自身”而维持的一场战争，是一个注定要破产的过程。正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9年之后，斯威夫特尖锐指出的：

毫无疑问，当我们的子孙看到悬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那用上亿英镑的高昂代价换来的几件破旧衣服时，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对此，他们一边替他们的祖辈清偿未了的债款，一边还像乞丐似的吹嘘他们的祖辈多么富有和慷慨。^[41]

在这一点上，财政制度更增强了预示着的对立。大部分土地税的重担压在几乎全是托利党人的小地主和下层教士身上，而几乎没有触及常常是、虽然并不总是辉格党人的市民和商人。^[42]令人难以理解

的是，没有一个托利党政府想要修改土地税法，去征收和土地税一样多的个人财产税。相反，他们却坚持主张英国应只限于参加海战，尽可能避免陷入全面战争。在革命以后的许多年，托利党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他们必然采取许多反对派所特有的手段。当托利党人没有像他们的对手那样从政府官职中捞到好处时，他们自然就要求一种较高的公共道德标准和从下议院排除善于钻营的官吏。因观念陈腐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托利党人不得不向辉格党人借用更时髦的原则，诸如每年一次议会，或至少是间隔时间不要太长的议会等思想。但后世认为，1716年制定的《七年法令》是明智的。这个法令所依据的观点是，频繁的选举是危险的，也是一种浪费，而且保持某种连续性的措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总之，可以说托利党人比较狭隘，或者说，如果允许使用这个词的话，他们不如辉格党“进步”。据说，极端托利党人的“十月俱乐部”^[43]举杯祝酒时经常说：“外国人该死！”生活在广大农村的托利党普通党员中，甚至对那些虽然讲英语但是不定居在英国的人都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正像他们对待苏格兰人的态度一样，大多数苏格兰人是长老会派教徒，就因为这宗教的而不是别的原因而受到托利党人的敌视。相反，戈多尔芬及其辉格党支持者却克服了这种狭隘思想，这是他们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17世纪末，提出了几个与苏格兰实行立法合并的方案，但都不成熟。主要因为英格兰不愿意让苏格兰人从事殖民地贸易，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丧失独立耿耿于怀。同时，随着在苏格兰的革命处理，可以认为苏格兰议会已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国家终于还没有从不容异说中摆脱出来的话，至少是从被迫害中解脱了出来。但是威廉在北方从来不得人心，他因格伦科大屠杀和达里埃大灾难而备受责备。当英格兰政府指使其殖民地总督拒绝帮助苏格兰难民时，苏格兰舆论被激怒了。^[44]后来，随安妮继承王位和高教派教会在英格兰的复活，许多苏格兰人终于认识到，与英格兰合并就意味着他们教会的毁灭。同样严重的还有詹姆士主义势力的复活和由圣日耳曼策划的、一些最杰出人士参与的许多阴谋活动的重新出现。确实，在18世纪的最初年代，苏格兰似乎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立法机构，独立的对外政策和自己的国王。所以，当时一位最有才干的苏格兰独立党人萨尔顿的弗莱彻倡导的一种解决办法认为，苏格兰甚

至能够成为一个共和国，或至少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督的君主国。弗莱彻和贵族贝尔哈文勋爵一起为建立一个不丧失独立的、强大的国家而竭尽全力。苏格兰第一届独立的议会从1690年延续到1703年，1703年大选就显示出了以下变化：许多詹姆士党人和圣公会派教徒宣誓效忠并进入议会，坚决要把老僭位者^[45]扶上苏格兰王位，但不惊动安妮。他们足以形成与宫廷党、乡村党平行存在的第三党。后面提到的乡村党，主要是长老会派教徒，是詹姆士党人的天然敌人。但是这两派出于对英格兰共同的仇恨和不信任，曾经一度联合。长老会派教徒认为教会会陷于危险境地，而詹姆士党人则认为合并将巩固不列颠的革命处理，从而把长老会派永远排除在政权之外。在苏格兰政界的领导层，也存在着类似的复杂情况。自从革命以来，道格拉斯议会的两名代表、苏格兰王国第一贵族、王位可能的候选人第四代汉密尔顿公爵詹姆士（1658—1712年）和苏格兰政界在实现1706年合并中贡献最大的人物、第二代昆斯伯里公爵詹姆士（1662—1711年），为谋取显赫的地位而展开了竞争。反对革命的汉密尔顿因拥有巨大威望和财产而成为一股势力，但是他傲慢自大，令人难以理解，缺乏把一个政党聚合在一起的必要手段；相反，昆斯伯里是革命的拥护者，擅长管理，总能凭借让步和外交手段达到目的。1706年他对合并发挥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苏格兰政治家。他对变幻无常的苏格兰政治的切身体验，也许会使他相信，合并能使其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可靠的保证；他得到了第一代西费尔尔德伯爵詹姆士·奥杰尔维大臣（1664—1730年）的大力协助。伯爵对旧秩序的告别词“美好往昔的结束”所宣泄的，确切些说是遗憾，而不是嘲讽。

1703年5月，苏格兰历史上最后一届议会召开。会议首先通过了“保护真正的新教及长老会派政府”的法令，法令的措辞激怒了英国国教会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继这项法令之后，又通过两项无视英格兰的法令，一项是允许法国进口；另一项的大意是，没有苏格兰议会的批准，安妮的继承人不得把苏格兰拖入战争。1704年的《安全法》则是新民族主义日益强大的证据。法令规定，在安妮去世之后，如果苏格兰的宗教、政府和贸易在当时得不到保护，苏格兰王国将宣布一位非英格兰议会指定的、斯图亚特家族的新教徒为继承人。与此同时，还发布了提高原有的半封建捐税的一系列法令。这使戈多尔芬的处境极为困难，詹姆士党人的威胁必须由军队来对付，而要使军队具有战斗力，它就应由苏格兰出钱雇用，这样，军队的给养就主要靠苏格兰

王国供给了。因此，戈多尔芬劝说安妮同意《安全法》，虽然该法令的各项条款等于是宣布苏格兰独立。当时，许多同时代人都认为，戈多尔芬这样做，是犯了一个以后他自己将被迫请求饶恕的严重错误。但是，不应忘记的是布莱海姆之战^[46]尚未获胜。当时，英格兰立法机构接受了挑战，并通过一项议案，宣布除非1705年年底之前王位继承问题在苏格兰得到解决，否则居住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将被视为外国侨民；并禁止苏格兰的进口贸易。这同一议案还授权女王任命几名委员来实施合并。经过一番活动，在汉密尔顿背叛了詹姆士党人之后，北方王国被诱劝通过了一项专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法令。

1705年末，两国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下开始了谈判。英方的谈判代表是戈多尔芬和萨默斯。他们的迅速取得成功，是理智和克制的明证，但同时双方分裂和仇恨的情绪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代表们在伦敦开会时，首先接受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两国应联合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王位应移交给汉诺威家族。苏格兰的代表们了解自己同胞的情绪，赞成邦联。但是为了防止谈判破裂，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要求，而只提出了保证国内外贸易自由的条件。接受这个条件就引出了第三个基本原则。财政引起了某些困难。一方面，苏格兰的税收收入大大减少，造成这种状况的明显原因是可征税的东西较少，而且也是因为国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苏格兰的国债同英格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如果苏格兰要分担英格兰部分债务时，就应对保险公司的统计进行调整。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减轻苏格兰那部分在英格兰已经征收的税务负担。双方还商定付给苏格兰约39.8万英镑的“相当量”，作为对它分担其英格兰伙伴债款份额的补偿。这39.8万英镑的“相当量”，一部分支付给达林公司的债权人，另一部分偿还个人因兑换货币而蒙受的损失。苏格兰保留本民族的法律体系及法院，因为它的法律体系难以用法令来补充和修正。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灭亡中的法律制度的有趣现象。双方还商定，苏格兰人在大不列颠议会中有61个席位，下院45个，上院16个，推选16名贵族进入上院。合并法令最后25项条款中，还包括对圣公会和长老会两个教派的保证。北方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当1706年11月对《合并法》诸条款进行激烈辩论时，又通过了第二个《安全法》，这次是强调苏格兰教会应像革命时确认的那样永久存在。

无数的请愿和普遍的骚乱证明，即将到来的英苏合并对苏格兰并不能马上赢得人心。尤其不祥的征兆是，那些一直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将联合起来抵制合并。当苏格兰卡梅伦派分子^[47]，极端的誓约派分子^[48]谈起同詹姆士党人联合的论调时，过去结成联盟的各党派明显地分裂了。两个政府很少拿出如此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激烈的反对派。1707年初，经两国立法机关批准，大不列颠第一届议会于10月举行。达成这个协议，个中难免有点贿赂。当时，两国贿赂之风都颇为盛行，至少是从1703年以来，英国国库的资金名义上以“开支”为由流入苏格兰王国议员手中。可是，如果说合并是靠贿赂实现的，那就无异于只责难议会的一项成绩，而有意不触动其他问题，例如，要议会支持威廉发动战争，只有靠封官许愿和酬金才有可能。财政上的违法行为常常得到与其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豁免。在这点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家们的真正区别在于：英格兰政治家们的生活水平较高，因此他们的索价也高得多。不过，早在1715年，西费尔德（现为芬勒特伯爵）就在上议院提议取消合并，理由是合并之后国家被剥夺了枢密院；英国惩治叛国罪的法律已扩大到了苏格兰；苏格兰贵族无资格成为不列颠贵族，苏格兰人要负担英格兰的麦芽酒税等。他的动议仅以67票对71票的4票之差被否决。上述要求取消英苏合并的理由虽无什么重要价值，但是却很值得重视。苏格兰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牺牲是失去了自己的立法机构。苏格兰的这样一种让步，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遇到怎样的阻碍。在合并前18年，这个国家刚摆脱束缚；如今，它的议会与其他机构尤其是与苏格兰教会的最高机构相比，已黯然失色。与王国过去情况相比苏格兰教会的最高机构通过处理宗教以及非宗教事务，更像是国家立法机构了。这就是为什么苏格兰人在合并中强烈要求保护苏格兰长老会派教会的原因。一旦这项要求得到保证，这个如此不同于英格兰议会的、依然是中世纪的王国议会就可能更易于被降服。长期以来，在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45名苏格兰议员在正常情况下对政府措施进行投票时都抱成一团。在美国独立战争问题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严重地脱离了自己的选民。当国民的大多数支持美国的事业时，而他们议会代表则相反。在下议院，率领苏格兰议员团的是一位苏格兰律师老爷，人们想，最主要的是他应当成为一个高个子，以便于他的追随者能看清投哪一方的赞成票。

合并的直接后果是，联合王国建立起一道防御敌人的更巩固的防线。当时存在着一些威胁，像法国一詹姆士党人企图在1708年登陆以及1715年和1745年发生的骚乱，但英苏两国都更加意识到双方互有需要，也意识到他们在几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些带根本性的东西导源于非宗教人士拥护新教精神的本质，导源于他们种族的共同成分。第一点与进取、节俭和正直的品格联系在一起；至于第二点，苏格兰将享受另外的好处，即在世纪中叶平定了人口过多的苏格兰高地以后，凯尔特人的血液稳步地渗透到苏格兰东南部低地，以至今天几乎所有苏格兰的城镇居民都夸口说，他们的祖先中至少有一个是苏格兰高地人。不管正确与否，一般认为，高地人的血统给低地人不大容易激动的特质提供了富于想象力的或至少是富于情感的成分。这种混合，同斯图亚特王朝企图在这两大地区的苏格兰人中激起敌意，也同长期分裂爱尔兰的痛苦隔离形成了鲜明对比。合并后不久，在这方面，苏格兰很快就交了好运。不到一个世纪，苏格兰人就被安置在帝国各地的负责岗位上。这些人并非都出身名门望族，不过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才干。苏格兰的许多大学在欧洲也是一流的，这些大学吸引了英国和美洲许多不信奉国教者，给那些既有实际能力又有理论素养的人提供了接受收费低廉的良好教育的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缺乏音乐。不错，在苏格兰人和盖尔人中都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民歌，但是，音乐被排斥出教堂，这使苏格兰人失去了许多音乐传统和训练，这些传统和训练在别的地方则促进了音乐的协调发展。

苏格兰的文明好像不是遵循一条正常的轨道不断前进的。15世纪的乔叟传统兴盛不衰，是文学的春天，但被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寒流所摧残。随着18世纪的到来，文学又进入枝繁叶茂的秋天，是北方总那么妩媚的时光。英格兰的文明更显现出连续性。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拉丁文学全盛时期被认为是英格兰最伟大的成就，涌现出无数的报纸、小册子、杂志和讽刺作品；天主教阴谋活动产生了对恶棍小说和鬼魂故事的需求。威廉和安妮统治时期的战争，推动了地名词典、地图册以及介绍外国的书籍的大量出版。这些读物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望消遣或得到信息的读者。1695年废止书报检查，也可部分地说明这一发展。这些文学作品对政府的批评虽然仍然构成煽动诽谤罪，但还是出现了对国内外事务进行坦率的并常常是睿智的讨论的局面。明显的例证是英国经过一段比较孤立的状态以后，正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出现。新型的人出现了。有文化的（有别于有学问的）英国人通晓公共

事务，善于进行辩论而不会导致斗殴。诚然，官方的《伦敦公报》限制零星刊登国内外的消息，但是有些报纸却开创了一个新鲜事：发表社论。社论通过分析关键的形势，进行指导并提供信息。这还不是全部。到1698年，出现了平装本，售价仅6便士。此外，还有部头更大的、扼要介绍国家历史的便士丛书。这些报章书刊成了那些历书和葬礼祷词等需要认真应付的竞争对手。这个国家虽然还没有给予公民以政治权利，但通过这些做法，在这方面已越来越成熟了，一个较有素养的公共舆论开始成为英语世界的特征。

1710年，即在安妮统治的转折那年，新闻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这许许多多事件加在一起，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这清楚地反映在那年秋季的大选中。1709年9月，在马尔普莱奎特战役[49]中盟军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国，继这一代价沉重的胜利之后，1710年在西班牙又遭到致命的惨败。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提出的一项有利的和平建议，因盟国坚持要路易把他的孙子逐出西班牙也落了空。路易十四由于拒绝了上述不合理的要求而赢得了国内外的尊敬，而戈多尔芬和马尔巴勒则因为没有抓住时机谋求和平而可能受到追究。但是这些重大事件[50]，即使加上当时出现的“教堂在危险中！”的叫喊也不能说明1710年党派情绪猛烈爆发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下，常常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也许能把周围杂乱无章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马尔巴勒公爵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史籍中以吝啬、自私闻名，因而他的评论家们不可能了解到他个人私下的许多慷慨行为。更严重的是，似乎有理由认为，他的辉煌胜利的日子已经随马尔普莱奎特战役而结束，佛兰德之战又会成为威廉时代那种令人厌倦的围攻战的重演。1710年是公爵生涯中的关键时刻。1709年，他愚蠢地要求任命他为终身总司令，遭拒绝，此事被英国文坛上最放荡不羁的天才之一、在气质上与这位将军截然不同的英籍爱尔兰人、牧师斯威夫特所轻易利用。1710年11月，担负起《检察官报》的主要职责之后，牧师便无情地嘲笑他的受害者。他集中攻击国家授予马尔巴勒公爵的许多有名的纪念性礼品[51]，而且用来同过去授给征服者们的微不足道的奖赏进行比照。这一点有说服力，因为它是事实。但是，含沙射影地攻击这位将军、继续这场战争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是想建立克伦威尔式的独裁统治，这就不真实了。牛津—博林布鲁克政府的建立也抵挡不住政治作品的泛滥。马尔巴勒自然成了不费力气的猎物。控制一般的

战争行为甚至导致战争发生的政策是一次较大的检查。斯威夫特在《盟军的行动》一书中这样做了，这是他写的最有才华的小册子之一。他攻击了3个主要方面：首先，英国应当只作为辅助部队参战，因为路易十四并没有直接威胁英国，他仅仅是承认老僭位者，而承认也可能只是官样文章而已。在西印度群岛对法国及西班牙的领地进行海战，能更有效地维护英国的利益。其次，战争使国家债台高筑，它有朝一日会压倒我们，它已使农村的乡绅倾家荡产，从中获利的是承包商和股票投机商。最后，英国成了大同盟的傀儡。皇帝骗取了我们的土伦，之后又把军队调往匈牙利去镇压起义；荷兰则逃脱自己的责任，指望英国首当其冲，承担费用和人员的牺牲。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记者，斯威夫特向一个厌战的、对外国人怀有疑虑的国家呼吁，并且认为荷兰总是会在交易中占到便宜。

形成对照的是，丹尼尔·笛福的辩论则渗透着早熟的自由主义思想。笛福是一名不信奉国教者，没有正式的公民资格。他好像是站在事件的边缘上，能比直接参与者更公正无私地去观察事件。他在许多小册子和杂志上鞭挞当时那些因普遍得到宽恕而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社会丑恶现象。例如，为了捞取保险金而让不适于航海的船只出海；南部海岸发生的“船只遇难事件”；囚禁债务人；对那些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干小偷小摸的人处以酷刑等。对公共福利事业的深切关注和对“激烈的”党派偏见的愤恨，驱使笛福在他创办的《评论》杂志上撰文评论。^[52]该杂志创办于1704年，当时他因为写了《对付不信奉国教者的捷径》（1702年）一文而被囚禁在狱中。在文中，他以辛辣的嘲讽笔调建议解决不信奉国教者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全都吊死。在《真正的英国人》（1701年）一文中，他嘲笑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呼吁对外国人、包括对苏格兰人要采取明智的态度。的确，在1707年前后，他为在英苏双方创造一种更为友好的感情而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同时代所有的文人中，他最了解北部王国的形势，充分认识与其邻国结成亲密伙伴的迫切必要性。笛福与轻视商业活动的斯威夫特截然不同，他对不列颠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不列颠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被过于贬低了，它有一大批报酬优厚、生活富裕的工人。诚然，他们的性格“欢快，爱炫耀，不完美，还有满天飞的《英国商业计划》”^[53]，但他们“并不习惯于轻松和肤浅的工作”，而且拥有不断改进其他民族发明创造的天才。

但是，这位天才往往比不上较少个性的人更能代表自己的时代。约瑟夫·艾迪生对新的英国作了最好的说明：繁荣、安全、自满。下面是他1711年对《皇家交易所》的赞颂：

在市镇上，没有比皇家交易所更能吸引我常去的地方了，它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满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作为一个英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和外国人频繁聚会，共同商讨全人类人人关心的事务，使伦敦成为全球的某种商业中心……我异常高兴地看到，如此多的人们不仅个人事业兴旺，同时还通过调剂国家的余缺，以促进国家的货物供应。几乎每一不同等级都产生出他们特有的产品。一个国家生产食品，另一个国家则生产调味汁。葡萄牙水果缺乏，巴巴多斯就把水果运去了，把一种印度甘蔗的木髓注入一种中国植物，就会使之变甜……一件高贵夫人的服装常常是上百个不同地带的结晶。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妇女皮手筒和扇子也都集中在这里了……[\[54\]](#)

这之前的45年，德赖顿也曾触及类似的题材，不过，那时拥有世界霸权的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他写道：

只为他们，上苍有了仁慈的热力，
在东方的宝库中流淌着珍贵的甘露；
为了他们，以土买[\[55\]](#)的香脂草榨出汁液，
还有在热带锡兰[\[56\]](#)生长着盛产香料的森林。

太阳仿佛只是为他们的岁月劳作，
每一轮渐圆的月亮用它的蓄水
湿润着潮路，把他们满载的船只
从天涯海角推向比利时岸边。

艾迪生华丽的修辞与德赖顿诗歌有力地提醒人们英国在拉丁文学史上最灿烂时代之一的奥古斯都时期欠缺些什么。但是在这45年间，这个岛国的命运已经改变了。1666年是“奇异的年代”。这一年，经历过流行黑死病和大火考验的英国，仍然能顽强地在海上与其最强劲的对手较量。1711年给英国带来了从欧洲大陆新敌人手里赢得的和平，以及扩大而统一的、即将在世界各国中占有显著地位的不列颠的必然结果。

（程西筠 刘淑敏 译）

（程西筠 校）

[1] 转引自温斯顿·S. 丘吉尔著《马尔巴勒：生平和时代》（两卷集）第2卷，1947年，第1008页。

[2] 指奥格斯堡同盟之战（1689—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译者

[3] K. H. 康内尔：《爱尔兰人口，1750—1845》，牛津，1950年，第25页；人所共知的格雷戈里·金关于英格兰的数字是17世纪最后10年的；D. V. 格拉斯也分析过这些数字，参见《人口研究》第2卷第4部分，1950年，第338—374页。

[4] 王室驻地圣日耳曼城堡位于巴黎以西约10英里处，由路易十四交付给詹姆士二世及其以后的老王位觊觎者（詹姆士二世之子——译者）使用。1718年摩德纳的玛丽在此去世。

[5] J. C. 贝克特：《爱尔兰新教不信奉国教者，1687—1740》，1948年，第41页；参见L. M. 卡伦著《英爱贸易，1660—1800》，曼彻斯特，1968年。

[6] 见本书原文第266—267页；参见T. C. 斯莫特著《合并前夕的苏格兰贸易，1660—1707》，1963年。

[7] 关于这次“来自敦刻尔克的警报”，见本书原文第435页。

[8] 见H. J. 哈巴卡克的论文《英国农民的消失》，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年鉴》第20卷，1965年，第657—663页；《英国的土地所有制，1680—1740》，载《经济史评论》第10卷第1集，1940年，第2—17页；《18世纪英国的土地买卖》，载《不列颠和尼德兰》，J. S. 布朗利、E. H. 科斯曼编，1960年，第154—173页。开拓长期的抵押市场，加上较低的利率，和“严格依法处理授予（妻子）的财产”，有利于17世纪80年代以后土地的出售，以对付战时高土地税的倾向。这种高土地税使许多小乡绅到1730年时丧失了土地。

[9] 《观察家》第122期，1711年7月20日；1670—1671年的《狩猎法》禁止年收入在100英镑以下的地产人使用枪支或猎狗。

[10] 托玛斯·帕克尔的连发枪（机关枪）直到1718年才获得专利，在W. Y. 卡曼著《枪炮史》一书中有插图，1955年，第81页。

[11] 关于他们这时期在冶铁工业中的突出地位，见A. 雷斯特里克著《科学和工业中的教友派教徒》，1950年，第89—160页。

[12] 马丁的论文《论行乞》，载《观察家》第232期，1711年11月26日；在对穷人的态度上更为有利的舆论见查理·威尔逊著《重商主义的另一副面孔》，载《皇家历史协会会刊》第9卷第5辑，1959年，第81—101页。

[13] 关于英国和法国的公共财政，见本书第9章；对啤酒税的讨论见P. 马赛厄斯著《英国的酿酒业，1700—1830》，剑桥，1959年，第10章。

[14] 关于当代对达文南特和其他人这种观点的批评，见W. J. 阿什利著《托利党自由贸易政策的起源》，载《历史和经济概览》，1900年，第268—293页；参见本书第23章第一部分和M. 普里斯特利著《英法贸易和“逆差”论战》，载《经济史评论》第4卷第2辑，1951年，第37—52页。

[15] 见本书原文第523—524、535页。

[16] 见本书原文第490—491页及以下。

[17] K. G. 戴维斯：《皇家非洲公司》，1957年，第123页；参见本书原文第855—856页。

[18] R. W. K. 欣顿：《17世纪伊斯特兰的贸易和公共福利》，剑桥，1959年，第156—161页。

[19] 见本书原文第289、855—856页。

[20] R. 莫尔斯：《欧洲人口发展史导论》（卢万，3卷本，1955—1956年）第2卷，第47页。回忆是很有益的。在1700年日本已经有3个大小差不多的城市：江户、京都和日趋扩大的商业中心大阪。见G. 桑塞姆爵士著《日本史》第3卷，1964年，第113页。

[21] 克里斯托弗·雷恩，建筑师，伦敦大火后的重建有他不可磨灭的功绩。——译者

[22] 对雷恩一系列的设想和困难，见J. 兰著《重建圣保罗》，1956年；参见约翰·萨默森著《乔治的伦敦》，1945年，第3—7章。总的说来，这是建造住宅和其他建筑物的红火年代，此事光是牛津和巴思就可做证，见T. S. 艾什顿著《英国的经济波动，1700—1800年》，1959年，第91—92页。

[23] 见本书原文第209—210页。

[24] 指准许由于信仰方面的原因而不愿宣誓的人用以代替宣誓来保证不作伪证的方式。——译者

[25] N. C. 亨特：《两个早期政治协会》，牛津，1961年，第3—4章。

[26] 威斯敏斯特大厅在1870年斯特兰德法庭建成以前曾是英格兰主要的法庭。——译者

[27] 1701年《嗣位法》最终保证了法官的任期（当王位继承时除外），这一保证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时他们是享受不到的。

[28] 见本书第12章；参见M. A. 汤姆森著《议会和对外政策，1689—1714》，载《历史》新集，第38卷，1953年，第234—243页；《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1689—1697》，载《英国历史评论》第7卷，1961年，第37—58页。

[29] J. P. 凯尼恩：《罗伯特·斯潘塞，森德兰伯爵》，第8—9章。

[30] 参见斯蒂芬·B. 巴克斯特著《财政部的发展，1660—1702》，1957年。

[31] J. H. 普卢姆：《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内阁机构》，载《皇家历史协会会刊》第7卷第5辑，1957年，第137—157页。

[32] 1711年12月31日（西洋旧历），作为总司令，他被第二代奥曼迪公爵詹姆士·巴特勒接替，后者当是1715年詹姆士党人反叛的领导人。参见本书原文第440—441页。

[33] 见本书原文第440页及以下各页。

[34] 乡村党形成于17世纪70年代初，它构成辉格党的大部分。它把广大乡村看作极小的宫廷的对立面，认为自己的斗争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斗争。——译者

[35] 威廉的最后一届议会下院包括58名普通律师、2名海军律师、2名大法官法庭律师、15名“亲信”（主要是巨头们的法律代表）；43名商人、7名银行家、4名酿酒商以及商界其他人士7名；39名陆军军官、9名海军军官；113名在国王手下任职（多属卑职，还有一些闲差）并领有薪俸的人员。R. 沃尔科特：《18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牛津，1956年，第161—177页。在该书第91—93、156—159页中，作者主张用四重结构来分析当时的政党，即按照宫廷党和乡村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进行分析。

[36] 关于地方事务和全国事务之间的相互影响，见J. H. 普鲁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第1卷，1956年，第2章。该章中值得注意的是谈到这一时期选举费用增加，这无疑反映了对议席日益增长的要求，以及自1694年三年法令以后频繁的选举使人们厌烦政治生活方面的作用。

[37] 普卢姆前引书第65页中估计下议院独立的乡村绅士约有200人，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托利党人。普卢姆承认，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各郡，政党精神可能已灌输到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家族对抗中。他比沃尔科特更重视传统政党观念，后者更愿强调派别的影响。见《18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特别是第198—232页。最全面的论述见G. 霍姆斯著《安妮时代的英国政治》，1967年，该书问世时间晚于本章。

[38] 这项不得人心的措施如同1711年《偶尔服从法案》一样，于1719年被废除。

[39] 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地区，昔日为德意志帝国内之一国。——译者

[40] 到1709年7月，来自帕拉坦特低地的约1万难民在布莱克希思和坎伯韦尔扎营，他们并不都是新教徒；饥寒和美洲的诱惑也是他们移居国外的原因。这使英国和荷兰当局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

[41] 《盟军的行动》，1711年版。原文摘自H. 戴维斯编《乔纳森·斯威夫特散文作品选》第6卷，1951年，第55—56页；参见本书原文第442—443页。

[42] W. R. 沃德：《18世纪的土地税》，牛津，1953年，第7、39—41页。一般来说，北部和西部较伦敦附近诸郡纳税较轻，见前引书，第7—10页。

[43] “所谓的因为他们热情，因为在10月酿造出最烈性的啤酒”，1711年3月21日，罗伯索恩成了汉诺威选帝侯。引自丘吉尔《马尔巴勒》第2卷，1947年，第800页。

[44] 历史手稿委员会：《上院手稿》新辑第4卷，第68—69页；参见本书原文第360页。苏格兰人的强烈感情还表现在1704年在福思湾扣留一条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事件上，接着，在西洋旧历1705年4月11日对该船船长和几名船员进行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见R. C. 坦普尔著《关于“伍斯特”神秘悲剧的新线索》，1930年。

[45] 指詹姆士二世之子。——译者

[46]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战役。——译者

[47] 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派中追随卡梅伦要求恪守1638年、1643年两项誓约（保证苏格兰长老会派教会行政和崇拜礼仪不变）各项规定的一批人。——译者

[48] 基督教苏格兰长老会派中的一派，又称圣约派。以拥护1638年、1643年的民族誓约而得名。——译者

[49]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战役。——译者

[50] 参见本书原文第436页及以下各页。

[51] 值得注意的有拨款24万英镑，用以建造布莱海姆宫。见D. 格林著《布莱海姆》，1951年；L. 惠斯勒著：《范布勒及其同类艺术家们的想象》，1954年，第83—123页。

[52] 见W. L. 佩恩编《笛福评论文集锦，选集》，1951年；J. R. 穆尔的《丹涅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芝加哥，1958年）和《丹涅尔·笛福作品一览》（布卢明顿，1960年）两书很好地介绍了笛福兴趣的广泛和新颖。

[53] 《英国商业计划》（1728年），1928年牛津再版，第32、144、224页。

[54] 《旁观者》第69期，1711年5月19日。

[55] 以土买，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在死海的西南。——译者

[56] 即今斯里兰卡。——译者

第九章 战时财政，1689—1714年

“不管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停止”，英国的小册子作者查尔士·达维南特于1695年写道：“这不会是由于双方的仇恨情绪已经消除，也不会是由于没有人参加战斗的缘故，而首先感到财力不支的一方，必然首先偃旗息鼓。”这几乎是1689—1714年战争时期双方的政治家、将军、行政官员及承保商们所持有的一致看法。这一时期内，是一国的财力而不是它的经济力，最终决定战争历时的长短和激烈的程度。因为一个不能诱致或迫使公民把财富输入国库并迅速又巧妙地拿出财政上的新招从而破了产的政府势将被迫求和。敌对双方总是倾向于就劣币的流通、内部的叛乱、到期贷款无力偿付、外汇的逆差、重要金融家的破产或出走等事实而不是从死亡人数及物资的消耗中来估量双方的损失。正如1705年驻都灵的英国公使理查德·希尔在给财政大臣戈多尔芬爵士的信中所说：

法国国王的金库已开始崩溃了。他已亏空了2500万……对于夏米亚尔（战争时期总管理员），爵士阁下，你还是一如既往继续占他的上风一到两年，把其余的事情留给马尔巴勒公爵去做就行了。

然而战争的财政方面，在当时的人看来是这样的迫切，但竟被历史学家们相对地忽视了。重新画出战争的财政面是很困难的，部分地是由于残留下来的档案混乱复杂，部分地是由于它的数量及可用性随着不同国家各有其不同之处。只有英国的财政统计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信，至于其他国家所呈图景则模糊不清。此外，一个经济学家有必要提出的大量关于战时财政真相的问题，如果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资料，最多只能得到不全面的答案，如利用外国贷款或通过减少投资或压缩消费或通过所有三项办法所支付的战费是多少，赤字贷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因政府订约所引起的需求形式的改变如何等。为了实事求是的缘故，也必须把本文论述的范围限于在路易十四后期卷入战争的4个大国。然而对于英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在战争压力下的财政制度进行描述并在主要原则上加以比较，这样一个尝试是值得做的，因为它将显示财政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所起的决定性影响。

1688年刚结束时的英国财政制度，在许多人看来一定不像能支持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英国财政的平时收入只达到法国的五分之一，又没有像法国和荷兰那样可以筹措长期借款以弥补亏空的机构。此外，王室与议会之间在财务上素有对立传统，曾经危害或阻碍过给养的征集，可能仍将如此。但也有若干好的方面可说，如为1660年法令所承认的王室封建课税的废止，一方面消除了王室由于监护、婚姻、购置等特权所引起的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将国库收入置于相对可靠的消费税及关税辅以经议会同意的直接税的基础上。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使1660—1688年间的国库收入增长一倍。查理二世王政复辟后不久，教会自行放弃了征税的权利。1660—1685年间，财政部有效地控制了全部收入的征集。在安妮统治的末期，财政部对于开支也实施了相类似的控制，而担任司库职务的人成为政府中最重要的的人物。这个机构的职权行使于1714年，经永久确立之后，这样的—个倾向得以持续下去，但在1688—1702年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掌权的是财政部，而威廉三世本人对于财政也抓得很紧，致使这个倾向被隐遮了一部分。但在戈多尔芬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时（1702—1710年）则全部明朗化了。戈多尔芬表现出具有杰出的理财才能，且能正确评价国家信贷制度的重要性。他以后的继任人选一个世纪以来总是钦羨不已地回顾他的这些方面。

像戈多尔芬表现的那种天赋才能是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在长期的战争中，英国的财政支出与它的盟国及敌国一样，上升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大革命前，其数额每年不到200万英镑；1689—1702年间，总数达7200万英镑；而在1702—1714年间总数不低于9900万英镑。支出的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给予其他国家的补助，虽然对于维系联合起了作用，但大大少于以后进行战争的年月：17世纪90年代无确数，但1701—1711年间英荷共同承担付给“大同盟”8个成员国约800万英镑。这个数字虽应由两国平均负担，但结果英国却付出总数的三分之二，对此托利党政府于1711年提出过异议。我们从斯威夫特的小册子中知道国内对这些给予外国的补助颇为不满，而当他们了解到英国战时财政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国外这一事实后，不满的情绪更加强烈了。

用以支付战争的额外款项部分来自增税。1688—1697年间，税收增长了1倍；1702—1714年间，增长数又上升了75%。主要的直接税为

土地税，于1692年首次征收，虽然看得出来这种税系源出于旧税（包括共和政体时期月度税），这种税本来是在所有的货币、货物、商号及土地的收益上征收的，但很快改为（像其他国家的同类税一样）仅在土地的收益上征收了，其战时标准税率为每镑4先令。征收额估定值，即收益，很快地变为定型的了，地主阶级对此很有意见，但这种税与法国的同类税、人头税比较起来还是好得多——无论就基本税负公允还是就税金收入（这时期估计刚超过200万英镑）而言。作为这种税的补充，有印花、房、窗等杂税。主要的间接税为关税及消费税，战争终了时约占国家税金收入的一半。两税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由于议会几乎每年都巧立名目，以倡征新税来支付长期借款的利息，又很快放弃了原来把消费税限制于色酒、啤酒、白酒等“奢侈品”上的打算。^[1]到了1714年，很少几种普通的消费品不被征税，而由此产生的消费税及关税税则，其复杂的程度，正如现代的所得税一样，只有专家能理解其梗概。

在正常情况下，无伸缩的收入得以大幅度增加是一项可观的成就，但这只能满足政府一部分的需要，差距只能通过借款来弥补。在这一方面，英国所处的地位很不利，因为1689年它的信贷机构只限于每年能筹集用预期可以到手的税收偿付的借款。重大的资金支付向来必须由出售王室土地及地租才能偿付。然而，由于过于频繁地乞灵于这种办法，竭泽而渔，以致到了1702年来自王室产业的收益变得微乎其微，而其时法令也禁止了继续出售这种产业。大革命后不久，议会被迫考虑一种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权宜办法。早于1692年，由精明强干的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担任主席的下议院中的一个委员会征求用永久性生息基金作保证募款100万英镑的建议。这种建议最初虽然没有奏效，但其后终于导致提出了一个用联合养老保险法^[2]借款100万英镑的方案，利息1分，并于1693年1月经下议院批准。规定征收消费税99年以支付利息。对于认购人及其提名人终身免税，直至提名人人数减到7人为止。^[3]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借不到100万英镑，则余额由发行利息为1分4厘的普通年金券筹集之。谨慎从事的投资人，大多数在伦敦，认为联合养老保险债券过于复杂且不大可靠，致使这项债券只筹集了10.8万英镑，而年金债券则筹集了89.2万英镑。然而，联合养老保险债券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形式上——其后也绝少仿照——而在于

它成为大规模募集长期借款的基石。是长期借款使英国得以应付战争及征服活动的开支，其规模之大“使整个欧洲咋舌”。

继1693年联合养老保险法借款之后，又有1694年、1697年及1704—1714年间的其他长期借款。在17世纪90年代中借款总数约700万英镑，不超过支出的十分之一，而在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借款数字几乎上升到3500万英镑，约为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两个比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距，主要由于议会最初不愿把国家收入的某些部分永久性地作为支付利息的保证。事实证明这是目光短浅的看法，因为它导致了过分依赖短期借款而造成给予短期债券过高的贴现，约700万英镑的短期债券必须由1697—1702年间延期到以后才偿付。

为适应一个试验性和不安定时期的需要，政府的长期债券的形式多样化。其中有1694年、1697年、1711年及1712年募集的有奖借款，这方式以前在英国由私人、在法国和尼德兰由政府采用过^[4]。1697年的有奖债券大部分未认购出去，主要由于当时信用大为下降之故，但其他有奖债券，如公开发售的奖券则很受欢迎，公开发行的奖券直至1826年方被取缔。它们之所以被采用于两次战争结束之时，说明了财政部认为这种形式的借款最适宜于困难时期，其时吃腻了嘴的投资人要求投机性的收益来加以刺激。在较早的时期，大部分款项系通过出售以若干年为期的年金债券筹集之，这又是一种为法国和尼德兰长期以来所悉知的借款方式。在1695—1702年间，1693年的大部分及1694年的终身年金券换为长期年金券，以换取享受年金权利者继续交款。1704—1708年间用长期年金券筹款得800万英镑；1710年又发行了另一笔年金债券。除了后一笔借款（为期32年）外，这些年金券都是为期89—96年间的，因此紧紧地与17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库收入的主要部分相关联的。这些借款的平均利率曾由17世纪90年代的8%以上下跌至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约6.5%，因之也反映了投资人对国家信誉的信心真正增强。“大笔款项”（正如沃波尔1712年所说）“经常提前交付，几乎迫使政府接受，利率为5%—6%”。虽然如此，1714年国债达4000万英镑，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用年金券形式发行的，此券不经持券人同意不能予以偿还或降低利率。这一事实说明战后若干年月政府所处的严重困境。

1694年、1698年、1709年及1711年由各特许公司提供的贷款补充了公众认购由财政部经手的长期借款。1694年，向一伙合股组成的所

谓英格兰银行理事、股东联合会的认购者筹借了120万英镑，8厘起息。1698年，顶着旧东印度公司的严重敌意，特许设立新东印度公司，条件为以200万英镑借给国家，利率亦为8厘。1709年，两公司以联合东印度公司名义联合经营，又以120万英镑输入了国库。1711年，戈多尔芬的继任哈利设法使政府无力立即偿付的900万英镑短期债券持有者们合股组成的英国南海商人股份公司的理事股东联合会，对债券持有者给予同额的南海公司股票，金融市场因此一举由大笔流动债务中解放出来了。虽然短期债券原来的贴现转到新股票上，新股票于1715年才达到票面价值。

这些债券及这时期政府其他债券的认购人表面上好像主要是由贵族、官吏及一系列小额贷款者身居前列，但绝大部分认购者则是伦敦的资产阶级，包括有权势的少数犹太人、不信奉国教者及胡格诺派教徒。政府从国外募得的贷款看来只是小额的长期贷款，一笔最重大的数目是1710年4月募自伯尔尼行政区的15万英镑。^[5]但可能有巨额外国款项以短期借款形式流入。

国家度支的新办法包括给银行及其他股份公司签发特许证，必须看作在伦敦商业区内获得重要的技术进展的背景下发生的。海事保险业发展于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中，海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早期几个项目失败后于1720年开始创办——如皇家交换保险公司及伦敦保险公司。小规模的人寿保险业也在开始，主要在建立于1706年的协和商行内。火险业也在稳步发展，继1681年的巴旁商行之后，又有1683年的友谊商行、1696年的携手并进商行及1710年的太阳火险行。后者很快地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并在国内市场中占了首位。帝制复辟后才兴旺起来的合伙银行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及特许公司的证券市场也成长起来了，活动集中于皇家交易所对面交易巷的加勒汇及乔纳森咖啡馆。这时，出现了金融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其后统治伦敦商业区达200年之久的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

在这些机构中，英格兰银行占首位。它的兴盛使它的敌手深为懊丧。托利党人把1696年落空的土地银行计划并在某种程度上把1711年南海公司的设立看作是对英格兰银行优势地位的反击；有种看法认为，这个总部设在穿针街的英格兰银行，逐渐使财政部仅成为它在伦敦西区的支行了。直至眼下这个世纪仍有为数众多的人拥护这个看法。早期的评论把它看作是一个信用贷款的独占者，且由于同意哈林

顿所说“凡是有一家英格兰银行的地方，十之八九有一个共和政体”，示意它源出于辉格党的倾向，建立一个共和政体。然而，鉴于它对国家财政稳定的贡献及自其成立的那年起对改进公开借款的贡献，很难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其他机构对革命善后的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或更有效地保证了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受的自由。1715年企图接收并把它焚毁的詹姆士派人也显示了对其重要性的高度评价。

1713年以后的30年间，英格兰银行逐渐把长期借款的管理工作从财政部手中接了过去，以它自己代价低效率高的办法代替了财政部的古老成规。然而，在1714年以前，它给予政府的主要帮助在于筹集短期资金。在这一方面，正如在筹集长期借款时一样，1688年后有重大的改革，但也犯了导致1696—1697年危机的重大错误，其严重性竟危及整个战争的进行。这时期所指望的国家收入主要由财政部以某种赋税作为担保筹集借款才实现。国家给予贷款人半根符木^[6]和一纸偿付单，该单可以转让，并在税款到手借款得以偿清以前发付利息。这个办法是相对可靠的，如果所有借款均能用捐税收入按期全部偿清的话，这类捐税通常只征收短短的几年。不幸的是，对于指望获得的税收的估计往往失误，以致若干种捐税在其征收期終了前它们所担保的借款尚未偿清。

此外，符木往往是发给部门的出纳员的，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总预期的某种捐税借出过钱，实际上他们并未借出过什么，但他们可以用这虚构借款的符木进行贴现或干脆直接付给政府的债权人。理论上说，税款征集后，符木的持有者可以把钱取到手，但实际上财政部对于这些由各部贴现的符木总数及它们的贴现率的控制似乎并不十分有效。年成歉收及货币不断贬值更使形势严重化，最后迫使政府于1696年用新硬币全部更换了轻的、旧的，磨损了的钱币——这一步骤虽然使欧洲大陆对于英国维持信用的决心大为赞扬，但在一个短暂而紧张的时期内使通货出现了异常紧缩的现象。由于经济上不尽如人意，税收不足，过多地发放符木，加上新硬币状态不佳等现象的并发，使外汇行情非常不利于英国，信用迅速下降，承包商在得到偿付以前，拒绝履行他们的合同。看上去整个战争机器有陷于停顿的危险。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1696这一年，“对于英国的多方面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一年”。到了1697年春，15种捐税的税收不足，而由这

些捐税所担保的数目在500万英镑以上的借款的符木的贴现率竟高达10%以上。

英格兰银行给予合作后才有了起决定性作用的补救办法。那时候银行已经把在佛兰德尔的部队的汇兑合同接过去了，它同意于1697年4月筹募认购数额无限的新股票，五分之四以符木支付，五分之一以银行现钞支付。认购的数目略超过100万英镑，其中80万英镑是以贬了值的符木认购的。与此同时，议会议决指定到1706年为止以8种关税和消费税偿付全部尚未结清的符木的本息，包括其时银行持有的符木。这些措施，很快随之而来的《里斯威克和约》的签订，使短期信贷有了转机，并使6厘的符木于1700年重新与票面等值。银行的一位董事后来曾不无理由地声称，如果没有银行的协助，要渡过这次危机是不可能的。在下一场战争中，戈多尔芬凭他的才识，对于符木办法的管理更为小心谨慎，出纳员的贴现交易受到了严格监督。有助于走向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银行的年度大额拨款，不是为出纳员将符木贴现，便是以存储符木作为担保。此外，这时候财政部更多地利用筹集短期借款的一种新的手段了，这手段于1763年取代了符木——那就是国库券。

国库券起源于1696—1697年危机时期，当时批准了以券的形式发行债券150万英镑，利息为4.6%，可以向财政部即期兑现^[7]。国库券一部分渊源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所作的筹议，但早期实施的时机不好，计划不周，批准的债券中流通的仅15.8万英镑，大部分于1697年取消了。一年后又发行270万英镑，利息提高到7.6%，可用以付税，且与一伙商人做好安排为它们的兑现提供专款。^[8]这一次发行颇为成功，财政部汲取了1694—1697年时符木的命运教训，谨慎从事，收回国库券，于1710年几乎全部偿清。1697年后直到1707年止没有继续发行过国库券。1707—1713年间则发行了为数不少于560万英镑的国库券，利息略高于3%，并以专门指定的捐税作担保。由于其中有些捐税已有其他负担，于是增发国库券以支付利息直至税款把其他负担了清为止。与此同时，银行承担起使债券得以流通的任务，办法就是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可以兑现债券。1709年银行为其中的170万英镑提供了备付本息的资金。国库券本身无力偿付这一部分债款。银行提供资金的办法是：1707年用一张要求按股额增资50%的通知，1709年通过把资金加倍，1709—1710年用要求增资15%及10%的通知，最后动用“为流通而认缴的年度专款”。到了1710年，这些做法使它名义上的资金

（约相当于国家欠它的数目）增加到550万英镑，直到1722年为止就停留在这个数目上。由于银行的帮助，到安妮统治末期，国库券成为一种短期信贷行之有效的的手段，为投资公众所乐于接受——与它入世初期令人产生怀疑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关于偿付1707—1713年的国库券，没有制定过系统的规定，以致450万英镑国库券到1713年尚未偿付，这是事实。但是以国库券逐渐取代符木、以年度税收预作抵押的道路已经打开了。

由以海军及粮食储备部为主的花钱部门发行的债券在短期借付中是重要的一项，而其发行额的控制是财政部经常遇到的问题。九年战争时，陆军和海军一部分是用信贷来开支的。为了扫清陆军薪饷及服装费欠款发出了凭单（债券），一部分可用以换回1697—1702年间被没收的爱尔兰土地；余数（98.7万英镑）于1711年换成南海公司股票。17世纪90年代曾试图用贬了值的符木支付军团的饷银——一种铤而走险引起过哗变的紧急办法。在以后的战争中，戈多尔芬谨慎地防止了这种风险再度发生，如期以现金发放陆军的饷银。1713年拖欠陆军的债款为数已微不足道了。海军部的承包商的运气要差些，付给他们的是6%登过记的债券，在工程进行中偿付，按照优先次序——这在平时是一种正当可行的办法，但在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变了样，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议会无法核准给予海军以足够的给养，一部分是由于债券偿付的期限——“海军工程进行期限”——持续延长了^[9]。1711年海军及粮食储备部所发行的债券总额为400万英镑，这些债券在工程期限还有3年结束时，贴现率超过30%。它们的持有者大多数为伦敦的商人及银行家，他们为承包商把债券贴现，施加压力使财政部偿债。哈利主要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向议会提出了他的南海公司方案，该方案于1711年6月13日得到王室同意。海军及粮食储备部当时的债务及若干种其他短期票据，其中有的是早自17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总数约900万英镑，均换成了新公司的6厘股票——一种可认为是与银行将符木“移花接木”的办法，那个办法曾在1697年为国家解除了危难。

汇款以支付海外的武装部队的费用往往有很大的困难。例如1709年时必须汇300万英镑至各战场，这个数字可能不少于国家支付的顺差。显然这需要谨慎处理，以防汇率变得不利于英国，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方面，正如财政战线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时期是“吃一堑长一智”的时期，付出高昂学费汲取教训。1689年伦敦没有

经办军事汇款的机构，对于其涉及的问题毫无所知，特别是有关调和战役的季节性需要及贸易上的季节性涨落的困难，这个问题搅乱了多数专门为此目的而签订的汇兑交易。

由于英国的经验不能依靠了，威廉三世先转向荷兰的军需官。但到了1691年，这个不让财政部有所控制的办法在实践上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他又去依靠伦敦银团，后者有时候彼此间相互进行着竞争。到了1695年，由于政府的信用下降，这个办法也难免失败。面对着前线的部队在战场上无法维持的危机，财政部转而向新建立的英格兰银行求援。谈判于1694年9月开始。1695年初时任财政部专员的戈多尔芬与董事们接触谈及要“他们中若干人前往荷兰，在那儿建立信贷，为在佛兰德的部队提供给养，提高汇率（当时汇率很低），并同意在以后一段时期里保持一定的汇率”。英格兰银行在安特卫普设立了一个办事机构（1695—1697年），先承担一个一年为期固定汇率的协议，然后在1696—1697年与私商共同参加了汇兑业务。英格兰银行为提供的帮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估计全部交易损失约13万英镑——但对政府来说，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重铸货币工作的完成，短期信贷的复活，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和平的临近，汇款减少，使外汇于1697年末重又处于有利的地位，使戈多尔芬和他在银行中的两个主要伙伴亨利·弗内斯爵士及西奥多·詹森爵士能去总结经验考虑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在下一次战争初期（1702—1704年），财政部再度利用有竞争性的银团，他们中许多成员，如詹森本人，是胡格诺派教徒，属于同时既经营荷兰又经营法国汇兑业务的家族商行组织。对于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财团活动日益增长的怀疑，例如有关阿姆斯特丹及伦敦商人中流通法国商业票据（据说两者都意在维持法国的信誉并延长战争），对于1703年英国政府胁迫荷兰对法国实施全部商业禁运及断绝通信的决定起主要的作用。1705年逃往英国的法国的汇兑业务经办人让·胡古坦提供的消息证实了戈多尔芬对于英国银团的怀疑，也坚定了他的决心：把一切汇兑业务集中于干员詹森（经办意大利及帝国的汇兑业务）及弗内斯（经办低地国家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汇兑业务）。尽管戈多尔芬于1710年被罢官，但他们的汇兑系统直至战争结束始终保持着完整和效能。

在整个17世纪中“受到欧洲人这样尊敬及亚洲人这样畏惧”的联合省（正如孟德斯鸠1721年所描述的），在商业及经济技术上在欧洲各地居领导地位。外国撰写小册子的作者要找一个真正的重商主义国家的模式，就到有银行及交易所的阿姆斯特丹去找，从荷兰的商法及土地入册制度中去找，从荷兰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倾向中去找。所以当时的观察家可能期望这一个从日常生活开始即惯于用最新的处事方法的欧洲最富有、最都市化及最具有四海一家观念的国家会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征税制度，税收条理清楚、征收及列账简易，完全适合于这个国家的需要，不论是在战时或在平时。事实上不是如此。这个共和国的财政，虽然在管理上大大地优于除英国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但也有其不肯定拖延及不足的特点。他们也不能免除浪费及弄虚作假的毛病，原因主要在于荷兰人的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主宰了荷兰人的生活和政治。一个财政制度的最合理的基础——由中央财政部管理“联邦”的税收——是各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要避免的。^[10]相反，他们顽固地依附于他们自己的财政机器，极为勉强地通过中央政府的预算。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把国家的负担彼此推诿——正如荷兰议会在1721年所沉痛指控的——从而危害共和国的生存。

由于各省各自珍惜自身利益所导致的分化，中央政府的财政机构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设在海牙的中央财政部及其所属的会计室，主要是一个账房，其任务仅在于把荷兰议会所通过的并把各省省库收支的金额登记入册。进入中央金库^[11]的实际收入在战争结束时不过是75万盾左右，且用于支付联邦借款的利息及中央政府包括中央财政部本身的行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监督检查这个机器并定期向议会报告财政事务的中央财政部长及共和国的中央金库长与英国的财政大臣、法国的财政部长或奥地利的宫廷金库长等，其地位不是同等重要的。

联邦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各省的摊派款。下一年内联邦所需款项先由在海牙的国务院作出估计并提交给国会审议，后者一般在经过热烈讨论并与省及县政府交换情况和意见后给予批准。因为每一个省代表团必须同意它自己的摊款数额，事实上必须取得一致同意，而要做到这一点并对紧急案件作出迅速决定几乎不可能了。国务院预算采用的是军事预算的形式，而在战争时期采用的是非常时期额外军事预算的形式。后者需各省自己开列需要征集和维持的部队的细节。军事预算

的规模随着战事的延续而急剧增大。17世纪80年代是和平时期，一般开支约在900万盾。1695年预计数为2340万盾，1703年为2440万盾，1708年为2770万盾，而1712年竟达2900万盾。这些数字与前些年份比较起来是令人吃惊的，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和国的海军开支（像法国那样）在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时下降了。

海军的需要由国务院与以阿姆斯特丹选举团为首的5个海事选举团商讨后作出预算。这些选举团管理着进口税和出口税，这些税名义上是联邦税但实际上是由省控制的。所得收入虽不足以满足海军战时的需要，但也相当可观。1689—1714年间阿姆斯特丹选举团的收入每年约在100万—175万盾。国务院征求各省同意筹集海军需用的增款，一般总是在克服许多阻力和讨价还价后才达成协议。1688—1701年间由各省为海军提供的非常开支数约7800万盾。这是一个战列舰发展到100艘以上的时期。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类似的规模不再有了，故在战争结束时，荷兰可以作战的舰艇减少到30艘。但是很清楚，不断上升的军事预算使各省越来越不愿——如果不是越来越无力的话——为联合舰队的荷兰部分（占八分之三）承担开支了，特别是因为英国的钱包显然是无底的，看上去它已经有把握控制这场海上的战争。

如果在九年战争时期联合省的平均军事预算每年约为2000万盾，在其后一场战争约为2500万盾，则整个战争时期总估计的军费大约在4.5亿盾。这个数字还可加上海军开支（比如说）约1500万盾。由于没有精确的账目，无法说出实际上筹集了多少钱。由于延期和弄虚作假，总数似乎不像被全部筹足。即使如此，为了两次战争共和国肯定耗费了约5亿盾—7亿盾的数目（约合5000万—7000万英镑）。在这个总数中，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公债只占小部分。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总部（中央）负担，从其收入中提供资金筹集的；一类是由各省负担，从它们的收入中提供资金筹集的。1715年时前者的总数为2450万盾，后者总数为5660万盾。此外，允许同盟国在荷兰募集借款，奥地利部分单独考虑。其他国家经允许在九年战争时期总共筹集约100万英镑，在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约125万英镑。最大的借款人为西班牙的卡洛斯二世及查理三世，均记在他们荷兰收入的账上。

荷兰的战争费用大部分是由增加各省摊款开支的，各省经济负担的比例本来早在17世纪初已经确定下来了，虽然后来成为一件争论很大的事情。荷兰是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省，大家都希望它提供比共和

国其他省份大得多的款项。在1689—1714年间，它不得不负担共和国军事支出的57%。1689年，荷兰的平时收入是以荷兰省及西弗赖斯兰议会通过的赋税为基础的，数额约1300万盾。此数中，260万盾来自房屋及财产税，960万盾来自20余种物品的消费税。这些消费税——被看作典型的国课——系许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它们的征收承包给私人组成的辛迪加，私营辛迪加在省的各级税务所配备了国课经收员。包税照例能保证收入到手但没有伸缩性，在农民中造成普遍不满并助长大量弄虚作假的行为，但这个办法直到18世纪中叶才废止。在对法战争时期，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是间接税的收入没有增加却相反下降了。所以17世纪90年代时，每年的国税收入约1025万盾，并于1700—18世纪30年代下降至约950万盾。曾试图增加产业上所征收的直接税以补偿未能在间接税上应增加的收入。在战争时期，财产税的征收扩大了，1689年对骑士及贵族的货物也首次征税了，税也征收到政府证券的收入上（在英国则未征），征收到东、西印度公司的股票、采地、采地上的货物、土地及房屋等的收益上。由于这样的增辟税源，18世纪20年代荷兰省的收入上升至约1900万盾。

然而，这还远远不足以支付战争费用。例如1712年，荷兰省应付的份额超过1600万盾。收入和支出的差距——荷兰省短缺比例大于共和国本身——必须通过借贷才能弥补，数目大小可以从1678年及1720年间省对于长期借款的利息的支付每年从710万盾增至1450万盾看出来。1727年，荷兰省长对荷兰及西弗赖斯兰的国务部说，他估计在1689—1697年间省债增加了2800万盾，而1702—1714年间，增加数不少于1.28亿盾。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考虑不周的政策，因为它使国家的财政陷于这样的困境，以致很多年来省的力量（共和国本身也是如此）严重地受到了损害。“在最后一次战争中”，1728年荷兰省议会的财务委员会埋怨说：

看来人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肯让早年用血肉和金钱换来的利益失去，所以他们竟以这样巨大的任务压在负担已经过重的财政上以致现在挽回这个局面已非常困难。

从相反的观点来看，正如英国的经验所证明的，债务的增加说明一个富国可以利用有限的收入作为“信贷基金”进行借款，借来的钱又产生一笔钱，一笔人民不缴纳税捐便有了的钱。一个像奥地利那样

的穷国就不能这样大张旗鼓地借债了，无论它如何希望这样做，它也不得不为借到的债款付出灾难性的利息。

荷兰省能够前所未有地进行大规模借款，原因在于它拥有以集中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巨大财富，也在于它习惯用信贷进行借款从事贸易活动，而大家乐于把钱借给政府是政府具有信誉的结果。自从16世纪以来，荷兰省就习惯于进行长期借款以解决它需要的一部分。到了17世纪末，它的借贷制度确立了，它的证券与荷英东印度公司及荷属西印度公司的证券一起经常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内进行买卖。包括政府债券在内的股票行情表由经纪人印发出来，证券可买现货，也可以买期货。^[12]1689—1714年间，3种主要的借款形式已为投资界所熟知了。国家有权可以随时赎回的年金券是为人们所熟知也是最为重要的，也有终身年金券和奖券。随着战争的延续，越来越普及的奖券于1711—1714年间每年开奖（如同英国）。鉴于达成协议的是数目很大的借款，毫不奇怪，它们的条件越来越大方了。例如，1711年荷兰省议会要筹一笔400万盾的借款，他们决定提出为期20年的年金券，其条件不是9厘计息免税，便是1分计息免税10年，然后再照征。在阿姆斯特丹，资金很容易到手，1714年时总数约2.5亿盾的贷款，其利息并未过多地超过4%。

贷款的收集工作是分散进行的。出借人的姓名由省分行的经收入记录在登记册上，他们就在那儿缴款取得一张发给他们的由省政府负责还本付息的正式单据。整个过程在海牙的总行监督下进行，并由总行把收入和支出总数登记入账。荷属东印度公司高效率的记账方法是把股票持有者的账记成分类账，并用转账册把股票转户，其做法完全和英格兰银行一样。这方法直到拿破仑时代才被荷兰政府采用——英国政府则在战后就立即采用了。

当科尔贝尔于1661年控制了法国的财政制度后，他发现，这个制度正如他所说，是“财务制度王国里最聪敏的人，埋头钻研长达40年之久，把它搞得如此复杂，以致唯有他们才懂得其中奥妙从而使他们成为搞这项工作不可缺少的人”。不幸得很，虽经他作了重要的改良，这套制度直到1789年前的任何时候都还是老样子。在科尔贝尔及他以后的几任财政部长——勒佩尔蒂埃（Le Pelletier, 1683—1689年在位）、蓬沙特兰（Dhélypeaux de Pontchartrain, 1689—1699年在位）、夏米亚尔（Chamillart, 1699—1708年在位）及科尔贝尔的

侄子德马雷（Desmarets，1705—1715年在位）——的领导下，重建了皇家财务理事会及设置专任日常工作的总管理处，财政控制得以加强。它与地方行政长官及财政系统其他组成部门如王室金库保持亲密的接触。随着业务的发展，它的主管人员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它始终没有获得英国财政部那样组织上的地位；它的力量反映出监督官的个人魅力。是科尔贝尔首先制定包税制（1681年），他还试图取缔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官职，并建立高效率的审计制度。这是第一次对于收入和支出能够有实事求是的了解，弄虚作假的现象减少了，费用降低了。此外，他对许多债权人进行了法律制裁，这个措施能使他把欠他们的债务一笔勾销，理由是这些债务过去不是用正当手段达成的。所以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使预算得到平衡，并使财务管理的程序简化。

但科尔贝尔的政策也有其严重的缺点。这个制度明显地有利于上层阶级，这种有失公允之处，却没有得到纠正。收付分散这个时期在英国已有效地结束了，而法国还在折磨着历届政府直到1789年方才结束。此外，科尔贝尔具有当家人的品德，同时又有当家人的局限性。他谆谆教训政府，也就是国王这个人，必须量入为出。他非但很少认真考虑制定一项能使战时开支顺利增加的信贷制度，还竭力攻击吃债券利息的人，从而与这些人疏远。他维持国家有权拒付这个老办法，结果使国家的命运受到致命的打击。

1689年法国的财政支出约1.3亿利维尔（法镑，约合900万英镑），1698年上升到2.11亿利维尔，1711年上升到2.64亿利维尔，然后于1714年下降到2.13亿利维尔。整个时期的总支出约在50亿利维尔——约合3亿英镑，仅略少于法国的3个主要敌国支出的总和。在九年战争中，陆军用去的占支出的65%，海军略超过9%；在王位继承战争中，陆、海军开支分别占57%和7%。应付债务及行政费用用去了余数的大部分。^[13]1689年收入来源基本上是人头税，约合税款收入的30%，且像其他直接税一样，由一伙总经收入征收。它虽然类似于英国的土地税，但比较起来差得多。因为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几乎一半的法国土地是免征税费的。1695年的按人抽税制及1710年的什一税是对一切阶级的财产征税的尝试，但未能达到目标。这些办法虽然是战时推出的举措，但不得不在1714年以后仍然保留。除了这些主要直接税外，还有由教士及省一级缴付的乐施捐（慈善捐），阶段二部补税

（作为军事增税的人头增税），向有油水的官职征收的额外收入税以及森林税。在这时期王室的产业不再有重大的收益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合成体。

间接税确有几百种，习惯地分为盐税（在食盐上征收）、烟草税（在烟草上征收）、商业税（对国内和国外的商业征收税）、交易成交税（销售成交税及印花税）及注册税（主要是法定文件的登记税）。除单独包出的烟草税外，每一类都是若干种税的合成而不是一种单一征收的税。它们被统称为总包税收入，且几乎全部由总包税人管理。总包税人是一伙资本家，他们经营着一个巴黎总部精心经营的省级代办网。这些税既然大部分征收在商务上，在战争年代，它们的所得由于商务活动的减少而下降了。1689—1791年，政府一年能向包税人根据他们的承包收取6600万利维尔，1703年的数额被迫降低到5000万利维尔以下，1709年承包人不论给予何种代价均拒绝承包新任务了。战争结束时，战时间接税在国家收入中所占数额不超过5%。

面对急剧上升的战争费用，可能认为政府要尽量急剧提高税率了。恰恰相反，政府主要采取了借款的办法和以减让税金作为引诱的出售公职的办法。它的动机是简单的，它年年希望和平的到来，而所采取的这种权宜之计与拧紧已是险象环生的征税制度的螺丝帽相比，它引起的阻力较少且更快地产生成果。然而，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的效果是急剧地增加了费用支出（以利息及工资的形式），以致在战争结束时，这项费用竟吞没了几乎国家的全部正常收入。

1713年大部分在战争期间筹集的长期贷款的金额达13.6亿利维尔（约7500万英镑）。最大部分（12.8亿利维尔）由巴黎城都饭店支配。据福朋内说，在亲王及贵族手里的约占10%，官僚及法庭人员持有29%，教会及公司持有7%，商人及银行持有6%，艺术家及买卖人持有约4%，外国人持有4%。不幸得很，没有持有者地理分布情况的材料，但从后期的迹象来看，他们可能集中于巴黎和巴黎的周围。形成这项债务的债券是多种的。联合养老保险债券发行于1689年、1696年及1708年，有奖债券于1704—1705年发行，但大部分政府的长期债券的形式是可以换成现金的永久年金和终身年金券。1709年这些债券的用途几乎在于支付由城都饭店经手的统一公债的利息的一半。1709—1714年间，由于需要把短期票据换成统一公债，它们的数目又进一步增加了。

以巨大规模出售新的公职补充了从长期借款中得到的资金，而且鉴于国家作为借款人不令人满意的记录，出售公职的做法对于投资人更具有诱惑力。官方往往把一切战争时期财政的权宜措施说成是“非常措施”，现在把出售公职也牢牢地与“非常措施”联系在一起了。站在广大公众的立场来说，这个办法的缺点是公职并非直接出售给投资人而是通过公职经纪人的辛迪加投放到市场上去的，辛迪加给财政部一个固定的价钱后就加上利润将公职出售。估计在1689—1714年间用这种办法筹集的5亿利维尔中，到政府手里的可能不超过三分之二。另一个措施是迫使公职持有人付出一整笔资金以作为预期要增加的工资。这些增加担保金的办法使政府到手另一笔1.2亿利维尔。公职经纪人本身是一伙小而有力的集团，人事上是和包税人、战时承包商、王室公职持有人等重叠在一起的，在向财政部提出方案和在剥削他们的当事人时，他们表现出足智多谋。当时评论对他们的批评很尖锐，说明他们是一伙十分被人憎恨的人。对政府来说，出售公职的办法虽然暂时有些作用，但危害毕竟是很大的。它增添了闲职（往往是无用处的）的负担，减少了税收（因为允许免税），且进一步削弱了资产阶级乐于向公债进行投资的积极性。

除了用捐税、长期借款及出售公职等办法筹集资金外，政府还大量发行短期债券为开支提供资金。随着战争的延续，事实证明它们是混乱的主要根源。债券的主要形式有3种：第一种是期券，记在借贷金库账上的。这是一个押金银行，由科尔贝尔设立于1674年，他去世后被查禁，但1702年又重开了。第二种是以未来收入的抵借款项。第三种是厂单，是造币厂票据。原来是在1701年重铸硬币时作为硬币收据发行的，但后来强制流通，一部分用以赎回金库的失去信誉的票据。

直到1704年，财政部对于各种形式的债券的管理似乎是有效的，但自布莱海姆英奥联军大胜之后却基本上垮了——既由于票券持有人的挤兑，也由于不顾后果地为应付紧急开支超额发行之故。到了1706年，单是厂单一项数额就达1.73亿利维尔，以艰难性的折扣在市面流通，信用实际上已瘫痪了。作为挽救危局的第一步，5000万换成了利息为5%的票据，由总包税人及总经收入人发行，5年后偿还（即5年票据）。这些债券的折扣很快跌到2折。其后又有5100万用公债管理处的即期票据进行兑换或转换债券。1709年，4300万厂单用现金偿付了。余数2900万不是按照这个方式偿付便是于1711—1712年硬性地换成债

券。与此同时，公债管理处的即期票据由1708年的6000万增至1715年的1.47亿。和其他票据一样，它们的市价没有超过面值的20%。由国防部、炮兵和海军发行的总数达6100万的另一批短期债券于1715年换成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为使短期票据能在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上还本付息，1710年又重新设立勒让德尔管理处，但仅获得部分成功，而又于和平实现后不久告垮了。很清楚，在战争结束时用现金偿付及换成公债等办法都仅能减轻由于超额发行债券所造成的混乱。据估计，1715年流通中的票券数额达6亿利维尔（约3300万英镑），而政府到期应付的工资和薪金也有这样一个数目，这是在长期债款约10亿利维尔之外的。德马雷估计，所负长短期债务总数为23.82亿利维尔，相当于30多年的正常收入。正如他所指出，要挽回这个局面需用20年的时间。

由于税收下降、贷款人的态度勉强、超额发行短期票据等造成种种困难，在这些困难之外，政府还必须应付硬币在流通中实际上绝迹的现象。不管这个后果是由于荷兰人因法国降低价格从而把金银抽去了，或由于全世界的硬币普遍短缺（与世界贸易额相比），或由于面对政府的惩罚性的经济政策而进行全面性的囤积造成的，毋庸置疑的是，硬币的储备短缺了。银行家于盖坦估计，法国的硬币1689年总数为5.34亿利维尔，而到了1705年时则只有1.25亿了。这样严重的短缺造成了最严重的困难。最严重的困难又由于1689—1715年间利维尔的40余次重新估值而雪上加霜。其值对于财政部来说是1.4亿，但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后丧失了群众对货币的信心。

对于硬币短缺，一种看法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给在佛兰德、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法军大量汇款造成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毫无疑问，这些汇款极其重要，以致不仅要为它作出许多其他牺牲，而且它还必须继续下去，即使这样做对财政部极有损害。17世纪90年代中，这项汇兑业务大规模地开展着，九年战争结束时，除法国外，主要业务中心是阿姆斯特丹及日内瓦。在阿姆斯特丹主要的法国代理人为荷兰财政家皮埃尔·戈特和荷兰商人安德烈亚斯·佩尔斯——欧洲的最大商人之一——及书商让·亨利·于盖坦。在日内瓦，以卡莱特利尼及法梯奥的国际商行最为重要，虽尚有其他几个人。在法国国内日内瓦银行家与里昂有密切的联系，许多里昂的金融家不是业已变成的胡格诺派教徒便是外国的新教徒。在巴黎萨尔埃尔·贝尔纳已开始

进入这块园地活动了。他行将统治这块园地到1709年，虽然这块园地仅仅是他重商主义王国的一个部分。

到1703年，于盖坦为法国财政部所做的工作如此成功，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把他驱逐出去。他因此迁至日内瓦。在日内瓦，他与卡莱特利尼（Caladrini）、法梯奥（Fatio）、萨拉丁（Saladin）、图尔东（Tourdon）、吉格（Guiguer）等商行及他们的里昂客户和在巴黎的贝尔纳紧密合作——他继续在法国汇兑业务中扮演主要角色。这项业务进出的数目到1704年每年达8000万利维尔，然而这个系统是为了对付1703年6月英荷贸易禁令的临时措施，该项禁令有效地中止了票据在阿姆斯特丹进行转让和兑现。不久后整个财团的金融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贝尔纳给法国财政部长的通信中描绘了一条焦急心理的向上曲线，最高点在1704年的7月和8月，那时他的有些票据以拒付出了名，原因在于财政部延期付款给他，而他却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了。如果他垮了（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指出），其他40人将跟着他垮——国家的信誉也将跟着他一起完。这种局面由于1704年6月1日禁令结束被及时地挽救过来了，财团得以在阿姆斯特丹重开长期债券的商谈。这一胜利部分地抵消了由于8月份布莱海姆英奥联军大胜之后政府短期票据跌价所造成的困难。跌价的直接后果出乎意料地是使于盖坦而不是财政部破了产，从而使汇兑业务集中到贝尔纳的手里。财政部提出用厂单付给于盖坦而对巨大的折扣不给津贴。当于盖坦以停止汇款作威胁进行反击时，政府引诱他到巴黎并迫使他对外国客户开票据，其值达800万利维尔（1704年12月），但他于票据到期前逃出了巴黎并先于追踪他的人到达阿姆斯特丹停止了票据的兑现，向他的法国客户提取了600万或700万利维尔（使若干商行破了产），并把钱装进了钱包。以这样断然的手段对付他老东家反守为攻后，他于1705年4月悄悄地息影英格兰，把他丰富的金融知识提供给英格兰政府使用。[\[14\]](#)

之后，贝尔纳和他的伙伴尼古拉与日内瓦新教徒客户及里昂的金融家合作，实际上控制了全部法国的汇兑业务直到这场战争的晚期。虽然即使在他们的权力鼎盛时期，他们还是不能把奥格家族的后继人排挤在阿尔萨斯合同之外。贝尔纳收取的汇率随着战争的延续而增加，由8%—25%。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公道的：他在国外欠下巨款必须付出10%的利息，同时他也必须承担汇率巨大涨落的风险。

贝尔纳的系统（当其存在时）集中在每季节里昂偿付所中交易大数量票据的洽谈上。票据交易与里昂交易所有历史性联系，里昂交易所自1660年起开始衰落，但票据交易仍然存在，里昂交易所在18世纪初仍为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商业票据最重要的市场。它们起着票据清理所的作用，借贷双方在其中了结彼此间交易上的债务，不是在现场偿付到期的最后差额便是延期至下一次偿付期解决。只要票据量与商业实际交易相适应，这个机制就能发挥作用，为给法国陆军支饷所开出的票据大量增加——这些票据仅被一个破了产的财政部的承诺维持着——这个机制身上的压力就越来越大。1709年初算出来有半数对里昂偿付所所开票据是贝尔纳和尼古拉的票据。但此时贝尔纳的主要合作者日内瓦几家商行已陷得很深，无法退出了。同年后期，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资财都搁死了，不是搁死在这一项业务中便是搁死在英国政府的证券上。由于这些证券的汇率对他们不利，无法出售。

因此之故，这个市场处于极其脆弱、极危险的境地，它在1709年的金融危机中垮了。这个危机的原因有3个——急剧增加又无法偿付的国债总数；使河川冰冻、商业瘫痪的1708—1709年的惊人严冬天气；1709年的谷物及酒类的严重歉收这些使已经露头的崩溃全部垮下来了。死亡率、食品价格及破产率大幅度上升。受到债权人不肯再延期的压力，贝尔纳无法在1709年的偿付所偿付他的票据，于是在法国和瑞士的客户中引起了一连串的破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每年分配给他公债100万利维尔，并对他的部分票据强制延期3年偿付，贝尔纳才幸免垮台，并得以于1711年末清理了他的大多数巨额债务。但是他集中于里昂的系统则完全失去其信用了——与之俱去的是他在法国汇兑事业中的中心地位。虽然他继续为财政部承担合同直到战事结束为止，但他大部分业务已落入他人之手，他的经营规模也不如他极盛时期那样雄心勃勃了。

1708年后，新财政部长德马雷虽然是个精明的理财家，但除了苦苦将这个摇摇欲坠的财政机构支撑住外也不能多有作为了。什一税及勒让德尔管理处缓解了王室的困境，并于1708—1710年危急时期研究了设立国家银行的规划，这些规划虽未即时实施，但对于约翰·劳的财政改革却指出了方向。同时也明确了是法国财政上的弱点妨碍了1709年以后的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与英国、法国及联合省相比，哈布斯堡王朝领地1700年时总的来说是贫穷落后的，它们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政府的结构形式大部分依然是中世纪的。此外，许多地区经常处于内外危机及高度紧张状态中。背景如此，无怪乎这个君主国的财政制度腐败、无能并烦琐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由于已经被土耳其战争搞得极度紧张并在有时间进行改革以前（正如有些批评家所希望的），它又不得不应付对路易十四进行战争的巨额费用，这费用某几次竟几乎使它解体。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在战争时期作过多种改变，财政上实质性的改良大部分被拖延到和平到来时才见实施——在许多重要方面竟直到18世纪40年代。

虽然在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集中的财政控制，是由维也纳的宫廷金库提供的，在这机构之下分别设有宫廷及行政费用支付局，以及军事开支支付局，匈牙利收入单独在普雷斯堡处理。由职业官员任职的省财务署征收宫廷及行政用的收入，这些收入来自王室领地及在酒、啤酒、食盐等上面所征收的税金。主要来自房屋及财产税的军用收入，规定一年一次由省议会投票决定。但在匈牙利，因议会3年开一次会，规定3—4年表决一次。军事预算分3部分：经常预算、非常预算及招募新兵及补充新马的预算。头年指定的支付额在公决金额中给予优先考虑。由每一届议会表决的最低数由宫廷金库规定，但往往争得很厉害。

17世纪末的民间及军事收入数额多少仅能加以猜测。估计每年在1200万—2000万弗罗林之间^[15]，出入的差距（与可以得到的海上国家及法国的较为正确的数字形成鲜明的对照）来自过于分散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每一个王国或者自行征收或支用它所经管的那部分收入，积累及清付它自己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宫廷金库尽管非常吃力地把讨论记录下来，把账目收集起来，但除了作估计和拟拟草案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用途，而这些估计和草案之纰缪百出也是它坦率承认的。

要用这部破烂机器从一群愁眉苦脸的纳税人身上挤出增额收入是很困难的，但是长期的战争迫使国王的大臣们从事这项任务。随着时间的消逝，御前会议所制定的年度军事预算的数字惊人激增。1701年战争爆发前，预算总数为1400万弗罗林，1703年增至2800万弗罗林，到1714年签订和约时止，平均每年总数在2000万弗罗林以上。此外，

每年还要筹集600万—800万弗罗林作为宫廷及行政开支。故仅用于王位继承战争的费用估计在3.5亿弗罗林左右。如果再加上1689—1697年的1.5亿弗罗林，则两场战争估计的费用约为5亿弗罗林（约为5900万英镑）。这些估算被全部筹足是很不可能的。估计数与实际收入的差距可能大于其他任何大国。由国王的谋士们组成的对策与方法委员会年年忧心忡忡地研究这个局面，他们起草了增加旧税和开征新税的建议。房屋、财产及消费税的基本税率提高了，犹太人入境税（1708年）、公职税及人头税均开征了。1710年12月曾试图对赌博赢利征税10%，但其收益使满腔热情的提案人失望。对教会及贵族征税虽还不足，但这些权宜之计确使总收入有所增加。^[16]例如在战争刚结束时，17世纪90年代时仅400万—500万弗罗林的民用收入增加到800万弗罗林了，军用的收入亦以相同的比例上升。虽然如此，这还远远不足以偿付国家的开支。

这种局面可用简单的不予支付的权宜办法使之得到部分缓和，虽然政府答应把廷臣官吏的年俸工资延期到以后再付，并把军队的饷银也延期到有集体开小差的危险时再付，但如果奥地利要继续作为一个大国，这样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也是有其限制的。被占领的敌国的纳贡是第二个权宜办法。这办法自1706年起在巴伐利亚，1707年起在意大利都进行得很顺利。它使每年的收入约增加500万弗罗林。也可以说服海上国家把帝国在萨伏依、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军事任务接过去一部分从而节约大笔收入，但英国及荷兰均不准备超过它们的承诺给予直接补助，正如它们对待大同盟其他成员国一样。

除了这些间接援助之外，还可以说服海上国家用他们积累的资金及先进的信贷制度借出资金。在两个资金市场中，比较更有希望的一个还是荷兰。荷兰早在1669年曾贷款给皇帝，是以朱利安·阿尔卑斯的伊德利亚汞矿的产品作担保的。1695年及1698年，阿姆斯特丹著名银行家让·多伊茨、阿森德尔特为帝国政府又谈成了以此为担保的新贷款。阿森德尔特担任受抵押的汞矿的管理人职务。贷款的偿付由议会担保，利息出自多伊茨在阿姆斯特丹出售矿产所得。在这个基础上，于1702年、1704年及1706年又商谈了其他贷款，虽然谈判费尽了口舌——多伊茨拒绝插手这件事，除非荷兰议会提供担保，而后者在一段时间（1701—1702年）内拒绝提供，理由是瑞典及公侯国巴拉丁也想在荷兰筹集资金。荷兰政府及荷兰投资人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因利息的付给往往被延期^[17]而借款于1724年才偿清。也是由多依茨筹集（1700年、1703年）并以匈牙利铜矿收入作担保的贷款及以公爵的捐款及西利西亚产业作担保的贷款（1713年、1714年）补充了这些以汞作担保的贷款的不足。由阿姆斯特丹的克列福兹经手的最后两笔贷款如期偿付了，铜贷款拖延到1736年才偿清。1689—1714年期间在荷兰市场上为皇帝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似乎在1080万弗罗林左右（约110万英镑），平均利率为5%。

筹自英国的贷款在18世纪中叶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虽然在这时期它们的重要性较逊于筹自荷兰的。1705年有一笔6.6万英镑的小贷款，1706年有一笔5年内偿清、利息为8%的25万英镑较大的贷款在伦敦达成协议，虽然法国人曾嘲笑其承购注定要失败。英格兰银行经手了这笔贷款，丹麦的亲王及马尔巴勒公爵名列承购单的前列。两年之后另一笔告贷25万英镑的打算却中止进行了，这是在帝国大使说明了由于皇帝作为债务人的声誉太差，这项贷款债券虽给以12%的贴现还找不到承购人之后。1710年的一次新的尝试仅获部分成功，提出来的金额是20万英镑，认购的是8.7万英镑。除了这些英荷贷款之外，帝国也曾试图叩开热那亚、德国及瑞士的资金市场的大门，未获很大成就。1689—1714年间从国外借到的总金额约为1200万弗罗林（约150万英镑）。这些数字虽不能认为是确切的，但可以说明这时期只有4%—5%的奥地利战争费用是用外国贷款及补助来支付的。

征税、欠款积累、外国纳贡及外国贷款帮助堵住了奥地利的财政需要和常规收入之间的大裂缝，但它们尚未把裂缝全部堵住。像其他国家一样，奥地利因此似乎越来越依赖国内借款了。1700年左右的帝国信贷机构似乎自从银行家富格尔斯承包查理五世的战争起没有什么变化。正式借款为王室契约所确认，这是一种详列债权人姓名等项的密封文件；正式借款也为国库收据所确认，这在发出时是空白的。第一种用于长期贷款，第二种用于短期贷款。两者一般均由王室金库担保，具体地用特定收入来源担保；两者均由皇帝个人负责偿付。准备承购这种债券的贷款人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其中主要对象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例如哈布斯堡王朝政府中的权贵显要准备将他们巨大财富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借贷。施塔海姆贝格伯爵冈德克作为宫廷金库的副总裁于1698—1701年间共贷出了79万弗罗林；1701年萨拉贝里伯爵应付出的未清债款达31万弗罗林；1704年切尔宁伯爵贷出了120万弗罗林，

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私人贷款。这些举动可能是出于爱国心的激发而不是由于贪婪心理的驱使，因为它们的担保是可疑的，利息一般又低于通行的利率。为补充贵族借出的贷款之不足，尚有按个人官职交付的贷款和强迫俗人及犹太人交付的贷款。

用激发责任感和采取威胁手段筹得的金额还是不能与扶摇直上的战争开支齐步并进，故必须另行设法寻找更大的贷款源泉。采用的另一个补救办法是铤而走险的，且事实证明它的代价很高。王室就像某个再也不能从抵押出去的财产及他极为勉强的朋友身上挤出油水来维持他奢侈生活的古老门第的贫穷贵族一样，只好听任犹太人的摆布，由犹太人来榨尽王室的血汗。据说后来利奥波德一世于1705年去世时，财政制度极为混乱，对新借款所给的利息竟达18%，犹太军事承包商获得的利润竟达30%。这幅图景虽然看着令人吃惊，但描绘得并不过分，奥本海默合股公司中规模巨大的犹太行于17世纪90年代爬上哈布斯堡王朝战争机器的中枢位置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它的首脑人物塞缪尔·奥本海默积累了这时期哈布斯堡王朝承包合同及短期贷款的最大的份额。从他1695—1705年间借出的贷款的账上，可以看到在一笔3070万弗罗林的资金上，他所得的利息是1570万弗罗林（利率大概为50%），故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其承包合同的利润绝不会太低——他可以自由地出售短斤缺两及质量低劣的货物以充好货。当然他要冒承担政府方面违约的风险，所以他的勒索性的条件也是一种保险费。然而他却是用国家的钱发家自肥。此时经允许住在维也纳的其他犹太金融家也是如此，程度上稍微好一点罢了。如扎姆宗·韦特默尔、拉扎勒斯·希施尔及西蒙·梅尔。在这个城市中，反犹太气氛如火如荼。1700年7月，一个米珠薪桂的夏天，群众捣毁了奥本海默的账房，从此便可看出群众对犹太人的愤恨。

奥本海默及类似的商行，他们的行径尽管令人憎恶，但王室少了他们就不行。王室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在1703年5月塞缪尔·奥本海默去世时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深地卷入到这个行业中。”1703年5月，尤金亲王给吉多·施塔汉贝格伯爵的信中说：“竟导致在犹太人事件得到某种程度解决以前，他们拒绝签订任何合同。”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之后，被债权人逼着付款的商行倒闭了，因其资财均搁死在借给政府的贷款中了。当时的一篇评论说：“这是如此致命的一击，以致法国拿不出一个对自己有利而对皇帝有

害的办法来。”在德国及意大利的军队由于领不到饷银已濒于瓦解的边缘。“钱的问题已到危急时期，”巴登的刘易士市长1703年6月15日给皇帝的信中说，“我用我自己的产业作抵押竟连100盾也筹不到。”在意大利的军队因国会抵制而濒于瓦解，向海上国家紧急呼吁贷款40万克朗（约10万英镑），以支撑这支军队。显然，必须有一个新的大胆的办法才能挽回这个绝境。

已往已经作过一次改善政府财政处境的尝试。1706年各省议会同意从他们自己的收入中承担偿付财政部总债务中的1600万，总债估计为2200万弗罗林。但此举没有比治标的方法好多少——它既进一步影响了各省投票同意增税的积极性又损害了群众心目中对财政部的信心。此外，这是一个不允许重复的权宜之计。从这些论点出发，1703年在列支登士顿亲王汉斯·亚当斯领导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公开提出一个较为先进的激进规划，即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建立这种或那种银行的计划在奥地利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老早就被计议过了，总的目标是大量利用信贷制度刺激经济增长。17世纪后期两个主张建立奥地利银行的人，G.G. 贝歇尔（G.G. Becher）及W. 冯·施罗德（W. von Schnoder）提出，信贷及纸币可以减少对黄金的依赖，扩大贸易，发展工业并缓和商业上的紧张局势。施罗德又说，银行只能由私人开设，因为国家的信誉太坏了，但他示意，一旦成为一个发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君主可以把它接过去。这些讨论反映出统治阶层对经济的相对落后一面日益关心，而不断恶化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也的确证明这种计议是有道理的，银行也许既能刺激经济又能使财政摆脱困境。1703年8月，在维也纳建立的帝国汇划银行反映出这一箭双雕的目的。宣布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战争提供给养并遵循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汉堡及纽伦堡等银行的方针发展贸易。[\[18\]](#)

实际上第一个目的超越了第二个目的。但它最初的重点与其说是提供军需，不如说是为政府满足债权人的要求。政府的债权人贷款额记入了银行的账册（总数约600万弗罗林），并给予他们可凭此转让的票据进行转让。一笔来自世袭土地的捐款的收入，每年计为400万弗罗林，放在银行中用以分期偿付这一次及以后各次的债务，利息为4%—6%，为期若干年。很清楚，此举是旨在立即增加原来由银行承担的金额。除了这基本目的之外，也允许银行接受民间储户的捐款，并加上一条要命的规定：所有商业票据必须在银行兑现。这将由帝国顾问团

银行委员会管理，银行委员会由列支登士顿亲王主持。这个首次把现代化做法插进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机构中加以采用的尝试全部失败了。这个尝试现在看来是塞缪尔·奥本海默的债权人通过他们的挡箭牌阿贝·诺比斯蒙骗了政府。这花招是银行委员会设计出来的，而阿贝·诺比斯则是银行委员会的成员。当然，数500万左右的奥本海默的债务是被接过去的总债的主要部分。在它建立的一年内，银行票据的折扣降至3—4折，它几乎仅够支付雇工的工资。当时一位愤怒的维也纳的评论家说，这都是犹太人不好，是犹太人假公济私把票据的价值抑低了，他建议向城内犹太人社团征税以偿付全部债务，修正的宪章（1704年7月）把赠金增至550万弗罗林，但也无法改善银行的处境。新帝约瑟夫一世指定一个由乔治·马丁尼兹伯爵为首的委员会考虑设立另外一个银行。结果成立了维也纳市银行。该银行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在帝国财政事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于1706年4月1日开始营业。

这个银行的主要特点是，像阿姆斯特丹银行一样，由市而不是由政府管理，它正式的领导人是维也纳市长，它的业务在市政厅里进行，它的收入大部分出自在维也纳征收的消费税，计算每年约60万弗罗林（这是国家规定的），由银行控制，为期15年。作为应履行的义务，银行承担偿付这时期内全部国家的债务。它给债权人开出可以转让的票据，在偿付以前，给息5%—6%。还有一点也达成一致意见：以后的政府债务也可由银行承担——如果它的赠金数按比例增加。1703年企图迫使商业社团用银行的纸币来兑现它的兑换券之事未重演。设立了一个部长级银行代表团的宫廷金库常务委员会以保持与银行的联系，此常务委员会由冈德克·施塔海姆贝格担任主席直到玛丽亚·特里萨登基后下台。[\[19\]](#)

这些安排之所以可行是有其若干理由的。第一，它们有信誉好、管理能力强的维也纳商行做后台。一开始公众舆论就凭这一点对它有利。第二，赠金的收入实际上是指定给市政府的，这一事实给予银行一个前所未有的可靠的独立的基础。第三，捐赠基金的数目是相当可靠的。汇划银行（1703—1704年）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这样大的一部分以致实质上不可能全部征足。而市银行比较不太过分的收益则相对地可以如期付给。1705—1709年间，平均数为140万弗罗林。

关于国家的债务，它前前后后是一个备款付息的问题——把短期借款转换为长期债务的作业——与英国于1697年及1711年所做的相似。责成新机构偿付的第一笔开支是欠汇划银行债权人的600万弗罗林，汇划银行的票据几乎立即上涨100%。初步的成功使财政部能把以后的债务及贷款交由银行负起责任来，故1707年财政部欠银行的总金额达1380万弗罗林，其中500万以上是以前以汇划银行票据的形式欠奥本海默商行债权人的债务。1711年欠汇划银行以前的债权人的款项总数减少到320万弗罗林，但加上其他项目又使总数达2390万。增加的数目一部分是由于提供新短期借款的付息基金，一部分是由于直接把款贷给政府以支付工资及部队的饷银，而政府为此增加其拨给的资金。

维也纳市银行是哈布斯堡王朝这个时期最成功的财政实验，且显然为减轻17世纪晚期犹太金融家在贷款和承包合同上进行高利盘剥做出很大贡献。诚然，它是一个国家的信贷机构而不是如贝歇尔或施罗德所希望的那种意义上的银行，故它在扶植18世纪奥地利工商业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它仍不失为走向比从前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存在过的更有条理更集中的财政制度的一步。从它的成功经验出发，1711年施塔海姆贝格建议在所有省的首府应设立另外一些银行。1712年一个专门财政委员会为改良财政及管理起草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规划草案。草案的核心是成立一个既有议会代表也有平民参加的改革委员会。皇帝及其顾问不容分说，拒绝了这个大胆倡议。在玛丽亚·特里萨的时代，帝国财政实际上的改组在较为保守的方针下才能进行。

从1689—1714年，欧洲政府的开支达到了以前战争中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如把这里所列的估计数作一切应作的保留，其总数不会少于5亿—6亿英镑，其中四分之三很可能用于战争。各国用收入偿付这张巨额账单的能力相差很大，没有一国能全部偿付它的账单。1689—1714年间，英国的收入增加了3倍；以荷兰为骨干的联合省及奥地利领地，收入数增加了一半；法国实际上收入减少了。捐税非常复杂，但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总的说来，它们着重仰仗消费税及在房屋和土地产业上的固定税。由于没有行政技巧并缺乏机构，征收所得税变为不可能。对教会及贵族免征直接税，这在法国和奥地利是普遍现象，但在英国和荷兰省则不是如此。间接税的包税制在法国及荷兰省没有经得起战争压力的考验，英国在17世纪80年代放弃了这种制度可能是它财政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收入和开支的差距是通过借债（特别是英格兰）和更好地规划来解决的。借债规模之大，财政规则之好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法国和荷兰省就是用这种方法支付他们的开支的一半到三分之一的，英国支付了约三分之一，最穷的奥地利支付了十分之一。战争结束后，交战国所负债务相当于5—7年的税款收入，债务的清理吸收了净收入的五分之一（奥地利）与三分之二（荷兰省）之间的数目。这就促使各国对于怎样减少债务的重视，从而引向走劳氏密西西比规划及南海泡沫的道路。各国所负债务的庞大是欧洲于1713年后免于重起大的战端达一代之久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

国家举债在付出的代价和效率上相差很大。重要的对比可以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找到。英国在出借长期贷款及国际金融市场中开始时是地地道道的新手，它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制定了一套可行的政府长短期贷款体制，包括一个雏形的股票交易所，使国家发行的债券的利率由17世纪90年代的10%—14%降低到18世纪初期的5%—6%。而法国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国王的信誉由于经常肆无忌惮地失信于民而受到损害，成立一个中央银行的建议遭到摒弃，战后整个的财政机器竟处于这样混乱的状态中以至在1789年以前从未真正恢复过来。联合省的成就几乎可与英国媲美，它在依然是世界主要的资金市场中成功地筹集了巨大的金额。联合省能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它付出的代价是让国内几个富有的金融家（他们在生意与家庭关系上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将整个国家实际上变成一个合股公司，红利在他们自己人当中分配。一个较为强硬的税制（过程则加限制）可能会加速18世纪荷兰经济的增长。在奥地利，虽然1706年成功地建立了维也纳市银行，但经济落后使国家扩大借贷无法办到，然而，战争带来的财政混乱引起了对财政领域进行改良的重视，使它也能够也确实在一系列其他方面作了合理的改良。我们应该注意到各国动员群众贷款的效率下降尺度与其军队战斗力降低是相对应的，也明显地相联系。

政府公债的发行似乎大部分由有关国家的国民认购，而长期资金的转移（通过借款及补助金渠道）数目上是有限的。然而通过里斯本、伦敦、巴黎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的短期资金的流动量是很大的。没有这些短期资金，马尔巴勒、维拉尔及尤金的部队就不能作战。主持运用这个网形系统的财政小集团有国际性质，但他们的起源却带有强烈的胡格诺派教徒及犹太人色彩，虽然也有塞缪尔·贝尔

纳、约瑟夫·赫恩爵士及亨利·弗内斯爵士等重要外界人士。英国及荷兰的宗教自由助长了他们的活动，虽然也可清楚地看出即使在法国和奥地利，财政上的需要迫使它们在和金融阶层打交道的时候缓和一下宗教迫害的官方政策。

这时候战时财政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由于没有统计，不能肯定地予以追溯，但有几点可以提一提。战争初期，由于各有关国家的资源大部分未被充分利用，政府的沉重贷款看来没有从当时的企业中转移大量资金。的确，政府的消费可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因为它能刺激对工业特别是钢铁、纺织、造船等工业的投资，这些工业都是与军事合同有直接关系的。比较贫苦的阶级受到因税负及物资短缺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的影响，但他们可能因战时一般经济活动的增加，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小型的产业拥有者，特别是小地主，在重税及高物价的双重剥削下，看来处境最坏。他们一般无法接近可能有助于他们重振家业的社会和政界圈子。而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大地主、金融家、大承包商、职业官僚——因他们有的是机会，不仅能免于背债而且往往能大发横财。在英国伴随这个形势而来的社会冲突，通过斯威夫特、艾迪生及笛福的作品的描绘，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个形势和它的后果倒是饶有趣味的：不仅见于英国而且遍及欧洲，大地主、大金融家、大商人及官僚政客踩着小地主和小农的肩膀，地位愈加巩固，1715年后更不断扩大他们的势力和范围。

（李培基 译）

[1] 1697年增征麦芽酒税；1710年增征蜡烛税；1711年增征蛇麻子、皮革及耐水煤等税；1712年增征肥皂、纸张、淀粉、印花布、出租靠背椅、纸牌、骰子等税。关于1690年的进口税一般水准提高4倍后的结果，参阅R. 戴维斯所著《1689—1786年英国保护贸易制的出现》一文，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9卷，第306—307页（1966年）。

[2] 联合养老保险金——一种年金的形式。当参加者死亡后加给活着的参加者。首创人为洛伦佐·汤梯，伦敦市政会的顾问之一。这项养老保险金于17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被荷兰的县政府及私商的企业联合组织所采用。1693—1700年，该项借款的利息为10%，以后降至7%。

[3] 英国政府证券上的收益，虽然多方提出要征税，但至1799年仍是免征的。

[4] 1711年有两种有奖债券，1712年也有两种。1713年为了支付女皇皇室的年俸，筹集过一笔小额有奖借款。

[5] 英国政府也在荷兰筹集过短期借款以发放军队的饷银，1695年为22万英镑，1697年为28万英镑。

[6] 符木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清算账目的凭证，此项凭证一直被沿用至19世纪30年代。这是一根刻有凹口的木棒，国库于收进钱币后将其裂分为两半，由付款人保留较大的即主要的一半，由国库保留较小的即作为存根的一半。这时期通用于借贷行为上的有两种符木，较为普通的一种是书中提到的“索尔”（Sol）。

[7] 其发行为设立土地银行的法令所批准，条件是如果认购额无法达到256.4万英镑（发起人曾作过将此数立即借给政府的承诺），不足数可用短期借款筹集之，其中150万英镑可以国库券充数。土地银行认购额全部未付款。

[8] 受托管理发行的人最初为12人，到了1702年减至3人，继续行使其职权至1710年。他们的工作显然仅在为国库所拒付的国库券受款兑现。他们的款项来自年度认购额，认购人给予等额的国库券。

[9] 关于募集1702—1710年的海军债款，综合起来有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议会无法通过全部预算或提供国库券的利息；财政部对于所通过的海军给养的拨款发行不足；海军及粮食储备部的超额花费（赊购）；海军给养品价格普遍上涨。服役的舰艇数逐年略有变动，随着战争的进行有某种下降的趋势。

[10] 1579年乌特勒支联邦征收联邦货物税，但后来又中止了。

[11] 布拉班特、佛兰德及一些其他区域部分地区，居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未享受和七省同样的权利（例如在国会中的代表权）。

[12] 就是说，即期的用现款购买，远期的用信贷购买。

[13] 利维尔（法镑）与英镑间的兑换率波动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利维尔多次重新作价之故。1688—1697年利维尔对英镑的兑换率为1：15.3，1702—1707年为1：17.2，1708—1714年为1：18.3。

[14] 1707年于盖坦回访荷兰途中被法国侦探绑架，但他脱逃。1711年他迁居丹麦。18世纪20年代中法国的侦探仍跟踪着他。

[15] 官价汇率为每6.5奥地利弗罗林折合1英镑，但在这里通行的实际汇率为8.5。

[16] 除了在匈牙利，教会与贵族均须缴直接税，但有许多免征及低估税率的规定。一切阶级均付间接税，这是当然的。

[17] 部分地由于多伊茨在推销伊德利亚矿水银时所经历的困难。例如在1705—170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向阿姆斯特丹出口中国水银以削低其市场价格。

[18] 汇划银行于1584年设立于威尼斯，于1609年设立于阿姆斯特丹，于1619年设立于汉堡，于1621年设立于纽伦堡。在汇划银行内，凡硬币及贵重金属存户的收付均准其记账，但不得有信贷行为。

[19] 一个专门处理涉及银行的诉讼事务的法定银行代表团。

第十章 1688—1715年的法国形势

当我们考察法国这几年中的形势时，若撇开国家机器的运转情况，便无法理解它的任何一面。因此，本章的评述以简述1688年前后君主政府的强弱因素作为开端，也许是得当的。科尔贝尔于1683年9月去世，洛沃瓦死于1691年7月。这两位大臣的去世留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空。国王于1661年亲政，但在头30年中，许多重要的决定，尤其是大多数敕令，实际上都出自他的这位或那位顾问。事实上，从1691年起，路易十四才实实在在成为他自己的首相。然而，即使在那时，对任何涉及战争或外交政策的事务他都有特殊的兴趣。在这两方面，平常他总是事必躬亲，因而驾轻就熟，特别能干。相比之下，司法、财政、贸易等这些他理应过问的问题，在他脑子里占有的地位就小得多了。中央政权组织是与他个人的偏爱相一致的。枢机会议这个范围极窄的内阁，除了处理已被国王变成专务的“外交”事务外，几乎不过问其他事情。其他各会议的实际重要性小得多。作为常规，它们只负责批准别处作出的决定。至于内政，一方面由按地区分工的4位国务秘书分管——每位国务秘书在各自的部门如同往常那样都控制着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由财政总监的那些总是把手伸得很长的各个部门分管。因此，两位首席大臣的去世对内政的影响要超过外交事务。然而，我们首先要在不低估他们所起的作用的前提下，估量一下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留下了从他们的前任手中接过来的那部复杂的国家机器，因为，他们的继任者们需要使自己适应的，正是这个条件。

科尔贝尔和洛沃瓦很快就在法国的历史书籍中被赋予掺有传奇色彩的声望。关于这两人，争议最少的一件事实就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所作出的努力，到1688年已广泛地、决定性地达到了主要目标。如果以为从今以后政府的每一个命令在任何地方都会一丝不苟地得到执行，那确实是够天真的，但是人们现在毕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恭顺多了。从另一个角度还可以说，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虽然总是显露出缺陷和不完善，但它已稳稳地扎下了根。不但如此，这种君主制赖以建立的权力现在已摆脱了任何可以想象的危险。不过，一定要正确地评价

这种结局，不能夸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力图说成因路易十四的大臣们所作的努力而取得的最终后果，无疑与这些大臣们的本意相去甚远。借助更固定而可靠的收入为他们的主人提供金钱，并向他提供归他有效支配的武装力量，这些具体而有限的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一系列琐碎的措施均已达到。如果说这些措施果真形成了一个“体系”，那只是因为要对所应用的各种方法加以一定的协调；倘若这个“体系”顺理成章地发展到它应有的结局，那么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早已到来。但是，无论国王还是他的大臣们，都丝毫无意朝这个方向发展。

到1688年，法国人对于向国王缴纳每一种税已渐渐变得顺从了，谁也不再指望今后能够或应该享用自己的全部收入。相反，纳税的原则已缓慢地但可靠地成了为国家机构筹措资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许多迹象表明，把任何税收都看成充其量只是一个非常手段而且多半是勒索这种陈旧的观念依然残存着。在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出现的最突出的一个实例是《渴望自由的法兰西奴隶的叹息》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在书中为领主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他们的扈从，特别是佃农提供财政保护而表示震惊。^[1]这段文字引人注目地揭示了，许多对路易十四君主制的反抗，其性质是倒退的。更有意义的是，这证明了监察官的管理是有效的。不过我们必须立即补充一句：这当然并非任何真正的革新精神。科尔贝尔及其合作者们孜孜以求的是执行他们任职以前就已拟定并颁布的那些法令。例如在农村地区，通过比以往较为固定的方式向特权人物的农庄经营者征收直接税（即使与他们的纳税能力不成严格的比例），特权的范围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义务反映在租契条文中。由于领主农庄的经营者通常是境况较好的村民即“村里的头面人物”，向前跨出的这一步幅度应该说是很大的。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无须修改现行法律，只需使长期存在的规定行之有效即可。这些统称为“人头税”的税款基本上仍与1661年一样。由于实行比较周密和严格的监督，各种舞弊行为得到了控制，但是，特权原则并未受到直接打击。定税的依据和收税的方法均未改变，因而仍然是一种按地区依照比例确定的税制（分摊税制），而不是按个人收入分成等级的税制（比率税制）。在每一个村社即集体缴纳事先确定的一整笔税款的一群镇民和村民中，纳税者要额外负担无力纳税者的份额。所以，普通农民的“人头税”格外沉重，他们既要为榨不出油来的穷人承担义务，又要替免税者纳

税，而且更是随心所欲的定税法的受害者。由来已久的类似现象在其他方面也可看到。盐税特别不得人心，科尔贝尔在任期间的政府对早已实施的盐税未作任何改革。间接税也同样不得人心，间接税主要是指对葡萄酒和烈性酒征收的销售税。在一个普遍种植葡萄的地区中，这类税不单影响到商人和小酒店老板，而且影响到很大一部分农民，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这方面同样一成不变。科尔贝尔大臣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乍看起来似乎有些新颖的做法。不错，他对由各种代理机构所征收的各种税的混乱状况进行了一些整顿，但谈不上创设任何近代的海关机构。虽然他确实抱有将海关移设到王国的边境并向商品征收单一的进出口税这种想法，但始终没有超出设想阶段。事实上科尔贝尔关心的头一件事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即改善从国王属地上得到的收入，与负责征收间接税的包税机构谈判更有利的契约，以及如此等等。尽管到19世纪成为总包税所这类巨大的行政机构在1688年尚未最终组成，但各种包税所毕竟逐步统一起来了。

实际上可以把1661—1688年间为改组而作出的全部努力看作只是一些实用性的改进，不过这些改进所涉及的不只是财政机构，还有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路易十四的那些重要的敕令本身纵然十分出色，也只不过将现存的法律加以概括使之成文而已，并无重大增补。无论是民法条令或是森林河泊管理条令，过去法规中所没有的条款为数极少。这些条令现在被公认为得到了大为严格的遵守。然而，能说当时有任何一位大臣对国家机构演进中所包含的彻底的、不可避免的变化有任何清晰的见解吗？法国历史学家花了很长时间，力图一步一步地勾画出在17世纪中掌管财政区或省的特派员的发展过程。若干特征使科尔贝尔和洛沃瓦时代的监察官制度有别于黎塞留时代的监察官制度。首先，监察官现在具有固定的官职，而不再是偶尔派出的官员；其次，他们与中央有例行的信函往来；再次，他们的监察越来越有条理。然而，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又出现了保守思想，阻碍了监察官制度的发展。科尔贝尔在临死之前还与那些保留着常任助理（代理监察官）的监察官们争执。这位大臣很愿意让监察官在他们广大的辖区内的小区中得到为他们所信任的那些人的帮助，但他绝不容忍作为这种安排的结果而产生出新的专职官员来。^[2]凡不加约束地使用这类助理官员的监察官都被怀疑为懒于尽职。对政权的另一个重大工具即军队所作的改进，大致也可作这样的评论。^[3]在军队中采取的几乎所有措

施，也同样发轫于路易十三时期，甚至更早些。洛沃瓦继勒泰里埃外柔内刚的做法而实施的粗暴权力，至少确保了指示终于得到尊重。伙食和服装得到了改善的士兵们被置于严格的纪律管束之下，军官们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吃空名的恶习。但是，由于一个连或一个团的指挥职务是用金钱买来的，所以如同司法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官职一样，军职依旧是一种私有财产，军官将他的士兵的薪金领来后按他自己的办法算账，士兵的招募也继续由他负责。军营仍然寥寥无几，军队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无论在驻防或开拔中，通常在当地民居中住宿。这种做法的后果令人沮丧，回忆一下逃避安排部队住宿这个差使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便足以证明，因而这便成了大大有助于一个接一个地出卖次要军职的有利因素。不但如此，安排部队住宿最后在必要时还可作为一种威胁，用来压服违抗命令的下级。

在所有这些方面，国王和大臣们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没有显示出真正的魄力，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国王的宽容大度、炫耀权势、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时而谦恭仁慈，时而粗暴傲慢，这些往往是对小心谨慎的一种掩饰。因为他十分清楚，政权其实已虚弱不堪，极力避免与传统的行为规范发生正面冲突，小心翼翼地维护既得利益。如果握有必要的财政手段，这个君主政权纵使不能采取革命措施，至少本来是可以进行一些重大改革的。不但如此，倘若在扩大国库来源时远不只是承担一些临时性的损失，那么从长远来看，某些改革本来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正是使1661—1683年特别具有戏剧性意义的原因。在一段时间内，科尔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竟然限制了这位年轻的国王的强烈要求，不但抑制了他对奢华的嗜好，更限制了他对武功的追求。科尔贝尔可以自夸通过搞活国家的经济生活减轻纳税者的负担，他实实在在关注着税收财富的增长。但是，为了眼前却不得不很快就牺牲未来。由于1688年战火重燃而且延续为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为眼前而丢失未来这种不可抗拒的因果关系自然更加明显了。在这两场战争中，法国实际上单独与整个欧洲对抗。

数十年中，物价总的来说趋于下降，全国的经济生活一般陷于停滞。其他国家确实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但是，当17世纪80年代国际上呈现明显的复苏时，法国依然如故。^[4]谷物尤其如此，1687年和1688年的价格降到了最低点。与广大农民远非利益一致的大地主、农村地产拥有者和大佃农，哀叹粮食经营获利极微。然而，此后谷物价格的

上涨却随之带来了新的灾难。1689—1691年，法国部分地区的收成不是不佳便是很差。1691年秋，一场名副其实的饥荒已在利穆赞露出端倪，其他各省对此普遍感到恐慌。不过，各地区之间当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当物价在一个地区暴涨时，在别处却仍然很低。王国政府进退维谷：或是禁止某些地区输出玉米，这样就会使缺粮地区得不到宝贵的供应；或是允许输出，这样就会使自给有余的地区玉米大量外流。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作出抉择。由于战争，储存的粮食被运往前线。以18世纪的标准来看，武装人员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向军队集结的地方运送军粮，开辟了新的路线，征用运输工具。因而，国家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流向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贸易则日趋凋敝。本来就相当复杂的法国经济地理，又人为地变得畸形。

此外，货币问题也相当尖锐。全国因资源缺乏，在贵金属供应上依赖外国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过去30年中为改善贸易平衡所作的种种努力，充其量只能说取得了平平的结果。对新教徒的迫害使许多活动遭到了损害或破坏，同时还导致资本大量外流。除此之外，海上贸易从1688年年末开始也由于发生了军事冲突而困难重重，在这场冲突中，英国与荷兰终于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最后，由于赋税加重，全国越发感到缺乏硬通货。对食品和商品的流通所征收的沉重的捐税致使贸易衰退，从而引起货币流通减慢。与此同时，直接税则反过来吸纳了全国各地区余下的现金。在进行再分配时，收入国库的硬通货，常常不利于恰恰最需要硬通货的地区和社会阶级。还应指出，在食品短缺时期，缺乏重量足、成色好的金属货币是特别危险的，尽管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部分地区。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乡下人很少走出邻近地区去购买物品，他们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是通过各种各样延期交付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的。^[5]但是，当他们需要从邻近地区以外去购买粮食时，却只能以现金支付。所以，当玉米匮乏时，缺乏现金的问题必然显得格外严重。这种情形在乡村比在城镇更经常出现。

我们将要叙述的1693年和1694年的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每当歉收时总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是作为1692年和1693年连续两年歉收的结果而发生的这些事件，则因上面提到的种种情况而具有格外黯淡的色彩。一个危急的年头（1692年夏至1693年

夏)过去之后,紧接着便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年头(1693年夏至1694年夏)。就对人口的影响而言,从1693年开始,出生率大大降低,现在的人口学家认为,这与死亡率上升一样,都是这类危机的特征。^[6]不过,死亡率上升现象对当时人们的震动更大。毫无疑问,由于这类灾难屡见不鲜,17世纪人们的感受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感受。但是,无论他们已麻木不仁到何等地步,他们毕竟不会对极度的匮乏毫无反应。出版于1689年的拉布吕耶尔的《品性论》中有一段文字经常被人引用,他是这样写的:“乡间游荡着一些雄性和雌性的野兽……它们赖以存活的只是黑面包、清水和草根,它们使人省去播种、耕作和收获之苦……所以,它们也不应该吃不到自己播种的面包。”^[7]这些话虽然写于1693—1694年危机之前的四五年,但在当时人们读来却似乎是对这次危机入木三分的评论。如果说对于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可以不予置信,那么查阅各个教区的户籍册却是不容怀疑的,户籍册中记载的绝不是所有死亡者的名单,因为许多被迫背井离乡的村民常常在逃荒途中倒毙在路旁或在走进他们陌生的地方之前就倒地不起。所以他们不可能在户籍册中被列入死亡者名单。

直到1700年,玉米价格始终较高,1698—1699年间,甚至接近了危机年头的水平。由于惧怕1693—1694年间的灾难再次出现,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惯用的措施来维持玉米的高价。事实上,情况已大不相同了。战争已于1697年9月结束,另一方面,一场真正的饥馑袭击了巴尔干诸国。阿姆斯特丹的玉米市场往常非常稳定,这回却轮到它经历了几个不正常的月份。^[8]这时法国玉米价格的相对上涨,只不过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而已,除引起局部地区的饥荒外,并未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从长远来看,更为痛苦的是出现于1700年并延续到1707年的价格回跌。在这几年中,再次出现了1690年以前经常引起人们抱怨的那种无利可图的抛售。考虑到经济普遍紧缩,实际上已局部瘫痪,肯定很难说抛售是导致价格处于低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要考虑到实力雄厚的富商们力图压低价格。不错,1701年战争再次爆发后国家的非常开支有利于某些生产部门和某些经纪人,但是,国家的财政困难已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紧缩开支,但这些措施却妨碍了它在其他领域中的活动。本朝最后一次大饥馑也就是最有名的一次,这次灾荒固然是法国本身造成的,更是欧洲造成的,但法国受害最重。1708年的年景很糟,价格行情在秋天上涨了。但是,决定

性的事件出现在1709年1月，这次是天公不作美，一场罕见的严寒突然发生，第二年丰收的一切希望顿时化为泡影。顷刻之间到处一片惊慌。几乎每一个地方的玉米价格都达到或远远超过了1694年春季的最高纪录，一系列同样严酷的后果随之而来，连宫廷里也以劣质面包为食。直到1710年夏季以前，人们始终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1710年的收成对法国至关重要，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幸好，这一年的收成令人满意。

玉米短缺引起的涨价并不比长期的低价趋势对经济有更多的刺激，两者的作用大致相同，而这种作用看起来也许是不合常理的。今天我们已习惯于将低价阶段看作经济困难时期，却往往忘记了过去玉米价格的急剧上涨曾加剧了衰退；这种价格飞涨不仅远未扭转衰退趋势，反而使之变成了波及面极广的萧条。除玉米行业外，价格处于停滞状况，而且随着贸易缩减而在实际上遭到削弱。为应付居民的急需，或出于拿不出足够的储备以应付这种急需的考虑，所有可以到手的玉米储存都被大宗收购。即使在受到较好保护的巴黎，求雇和招聘情况也对这些限制性措施颇为敏感。例如，从痼疾医院的账本可以看出，建筑业在1693年和1694年缩减了，建筑工人的工资降低了。^[9]在法国的北部，纺织厂的产量和好几个省份的纤维生产都大大减产了；图尔的丝厂受到严重损害，以致一蹶不振，里昂也一度出现了同样情形。^[10]在外省的小城和不为外人所知的村庄里，手工匠和农民找不到活干，而此刻生活费用更高。与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相比，得益者的数量微乎其微。玉米储备很快就成倍增长，但比较分散，而且总量往往不多，许多人储存玉米不是为了出售赚钱，而是为了预防万一饥荒延续下去时出现全面短缺。地主及其代理人被迫向农民出借玉米，为的是农民既有口粮又有种子。但是到处都报告说，绝望的佃农们并没有耕种土地。事实上从各方面来看，私人和国家的收入都减少了，所有支付都拖欠下来了。

这就是说，从1688—1715年的法国财政史上有增无减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数不胜数。操持民生的那些人不至于想不到进行改革，我们看到，至少在税收方面他们粗略地考虑了应该做些什么。他们虽然以极大的热情力图做得好上加好，却不得不满足于一些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往往十分天真可笑，而且仅仅在短期内有效，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借款。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主要的困难是最终能向政府提

供贷款的人缺乏信心，他们怀疑政府有严格履行承诺的能力。敢于冒险同政府进行交易的只是那些指望得到间接好处或是力图为自己攫取间接好处的人，这种好处也许只是一种虚浮的荣耀或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而他们更多的是要借此取得相等于高利率的实际利益，其手段便是通过一些用来掩人耳目的精心策划。由于国家债台高筑，全面崩溃看来已不可避免。

1709年8月26日，财政总监向国王报告：“4个月来，每周都发生暴乱，为控制这些暴乱，几乎每个省都需要军队。”^[11]当我们读着这个报告，计算着这类动乱的次数时，不禁为王朝竟然能制伏动乱、安然无恙而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必须将不同类型的动乱加以区别。一类是直接由玉米价格高昂引起的骚乱，应该指出，疾病和死亡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危险，某一个市镇如果顶住了从乡间涌来的贫民，那并不是因为惧怕他们诉诸暴力，而是怕他们把疾病传入城镇。恰恰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那些比别处痛苦少得多的地方的人民运动，最令当局感到不安。在价格高昂时期，巴黎的警察局局长和夏特莱堡垒上的军官们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文字材料和画片有时被没收。然而，在下层虽然常常到处发生事件，但无疑都是些自发的、短暂的突发事件。在面包市场或分发面包的场所，以妇女为主体的暴民因突然暴怒而酿成骚乱。1709年，当王太子乘马车到达歌剧院时，竟然遭到人群的包围。然而，布菲勒元帅急中生智，只凭一句许诺就平息了一场眼看难以收拾、将酿成悲剧的事件。不但如此，闹事者甚至还向他欢呼。在外省，聚众拦阻玉米运走的事件层出不穷，船只和车辆被拦截，开船和赶车的人被迫卖掉船上和车上的货物。有时候，地方当局在不同程度上充当这类行径的同谋。但是，任何一起这类事件都不是由宣传煽起的，更不是有组织的密谋。传统的反应既已复苏，古老的习俗也就随之再现。正如当时所说的那样，确切地说，并不是“骚乱”，而是“激愤”。

总而言之，税收机关及其代理人所激起的闹事及其他越轨行为通常更为严重。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盗税问题。盐的销售组织和盐税的收集制度十分复杂，以致在相邻的省份中，规章和价格的差别很大。盐这个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在某一个省内实际上无须纳税而且价格低廉，而在另一个省则被严格垄断而且价格高出许多，因而舞弊、抗议和无休止的欺诈行为日益增多。同从前一样，一旦风闻将实行盐

税制，穷人和富人就携起手来。1704年发生在奥比松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公众普遍支持甚至提供方便，在很大的范围内走私成风。包税人掌握着有组织的小分队，随时随地稽查私盐贩子。但是，私盐贩子胆子越来越大，纵然一旦被捕就要被送往国王的苦役犯营地做苦工，也依然我行我素。香槟和诺曼底的私盐贩子，60—80人结成一个武装团伙，在乡绅的指挥下携带枪支弹药大摇大摆地到处活动。不过，1706年提供这个情况的监察官谨慎地补充说，这类活动没有任何政治含义。

唯一可能引起内战的动乱来自完全不同的方面。从1688年10月起，政府倾全力解除新近皈依的天主教徒的武装，最狂热、最坚定的新教徒已经逃走，这无论如何毕竟是事实。几乎只在朗格多克的塞文山脉中还有一些不屈服分子。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动用大量军队，并借助维拉尔元帅的外交和军事才干来对付“卡米扎尔”^[12]，原因之一是这些游击队员具有无所畏惧的信念，尽管他们的人数只不过2000；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急于降服这场叛乱，因为它的活动范围虽仅限于新划定的两个郡内，但很容易进一步扩大，尤其可怕的是会导致外国进行干涉，他们也可能与外国干涉者同流合污。从另一方面来看，卡米扎尔闹得最凶的时期是1702—1704年，这就是说，它与缺吃少穿的危机并无十分紧密的联系，甚至与作为这个时期特征的潜在经济危机也没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为了对付城乡反抗盐税的骚乱，政府灵机一动，放出风声要派遣龙骑兵，国王本人的正规部队也可以派来增援打击私盐贩子的突击部队。军队还被派去护送玉米运输队。这样，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就经常动用军队。然而，军队本身往往就是不安定的因素。一部分原因是征兵方法落后。根据法律，贵族阶级需提供兵员，1690年和1693年也这样做了，是最后一次，结果完全归于失败，但是，兵团早在1688年已经建立。^[13]从理论上讲，谁去当这种新型的兵，是在各个教区抽签决定的，但不久就变成当兵的都是穷人和被家庭厌弃的废物，家道殷实的农民则以金钱代子从军。另一方面，大部分士兵依旧是靠拉夫那种办法征集的。从理论上说，新兵应心甘情愿地签字画押；而实际上，负责征兵的官员们采用欺诈手段，以虚假的许诺和吃喝诱使头脑简单的汉子落入圈套。这种办法到处碰壁，于是见人就抓。这种乱抓壮丁的现象甚至在巴黎也可看到。除这种完全“正常”的方法外，贫

困也提供了大量兵源。在这种背景下，开小差的很多，不少游民、走私犯和盗贼都曾当过兵，这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忠诚地留在军队中的士兵，同样为他们驻扎地区的民众所惧怕。提供军粮的负担日益沉重，为维持和训练军队应支付的费用则格外庞大。有时，士兵竟至光脚无靴的地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关键性的那几年中，参谋部与财政总监交换的信函中一再重复：玉米告罄，现金短缺。

到了1693年春末，国务大臣们和枢密会议的常务委员们就总的形势提出了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的开头几行中^[14]，博维里埃大公断言，必须实现和平。然而，他接着又说，国王比任何人更确信这一点。他在论证中还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和平将能使国王和大臣们关心王国的“内部”状况。这位大公虽然曾长期担任皇家财政委员会的首脑，但当时并不领导国家机构中的某一部门。他作为王子们的教养人（自洛沃瓦死后），又是国务大臣和国王寝宫的首席侍从，他因至为虔诚和正直而颇有些影响，他的看法完全受他的基督教道德观念支配。1700年，唯独他一人出于急于求和的心情，不仅主张拒绝卡洛斯二世的愿望，而且主张忠于《分割条约》。当时，他与从兄谢弗勒兹公爵（1646—1712年）同是“最为国王和梅因特侬夫人信任的人”。梅因特侬夫人“每周去博维里埃或谢弗勒兹府上赴宴一次，有时两次，这已成为惯例……桌上放着一个铃，这样他们就不需仆役在身边侍候，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15]。但是，借用圣西门的话说，这时有一位新人被引进了这座“圣殿”，此人便是费奈隆教士（1651—1715年），他的“机智”得到他们的一致赏识。1689年9月他被博维里埃遴选为国王的3个孙子的教师，此后权势日盛。169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694年，他被赐以法国最富庶的修道院之一，1695年他成为坎勃莱伊大主教。由于凡尔赛为他从教皇那里争得了“特许”，他在坎勃莱伊大主教任上岁入10万利维尔左右。

以“致路易十四”著称的那份有名的文件出自费奈隆的手笔^[16]，我们从内证可以确定，这份文件写成于1693年末或1694年初，口气之激烈常常使人吃惊：“整个法国近似一座大医院，破败失修，令人心寒。”很久以后，伏尔泰说得更准确、更公正：“人们在感恩诗的乐声中饿死。”国王无疑未曾读到这个文件，但梅因特侬夫人和博维里埃——文件显然影射他们——有可能读过。文件赞颂他们心地善良，但责怪他们在对国王施加影响这一点上缺乏毅力；费奈隆之所

以写这份文件，大概主要是为了激发他们的热情。即令如此，他对国王的责难如果说值得肯定的话，那么主要也只是因为他以教堂中神甫的口气对国王说：“你不爱上帝。”而这恰恰是费奈隆作为神甫有责任指出的，其余一切无论大胆得让我们如何吃惊，相比之下都软弱无力。他的全部政策只不过是神甫职责的延伸而已，也就是“神师”的政策。使他的那个文件成为伟大的因素同时也限制了其价值，因为费奈隆把王国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国王本人的心理原因。他在历数这些弊病时令人感动，但他提出来的唯一药方却是让国王皈依真实的宗教，而唯一具体的劝告便是立即实现和平。

从1696—1699年，费奈隆生活在“清静寡欲”的风暴^[17]之中。1699年，他的自辩书《圣徒箴言》遭到罗马的谴责，但是他以屈服打消了敌手们的怒气。此后他仍担任坎勃莱伊大主教，对国王最年长的孙子布尔戈尼公爵施以教育，并继续为他出主意。自从那场困境首次令人恐惧时起，梅因特侬夫人（1635—1719年）就站在大多数主教因而也就是国王本人一边。不但如此，她在宫廷中的地位在1697年得到了巩固；在做了大约12年国王的合法妻子之后^[18]，她从1697年起被王族正式承认为王后——尽管从未在正式场合宣布。路易十四不愿受任何人摆布，至少不愿受一个女人摆布，这种孩子气的愿望限制了梅因特侬夫人的作为，何况这位前宫廷侍女本来就本能地处处小心谨慎。1698年，她公开抛开了费奈隆和博维里埃。然而，她虽然只是博维里埃—谢弗勒兹和费奈隆这三驾马车偶尔的同盟者，但却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同盟者，随着布尔戈尼公爵长大成人，这三驾马车的影响事实上与日俱增。当王位继承战争的灾难以更严重的形式重现前几年的苦难时，他们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了。在这个第二阶段中，费奈隆不能再像他在1693—1694年写那封信时那样大胆了，然而，他仍旧热切地主张和平，准备在必要时不惜代价签署和约。当机会来到时，他为他昔日的学生勾画了一幅理想王朝的图画，这是一幅与当朝国王进行强烈对比、富有说服力的图画。通过这种方式，这位以教师身份起家的人终于步入政界。他那本说教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于1699年出版。此次出版虽未经他本人同意，但他曾允许这部作品以抄本形式少量散发。故事的背景虽被置于荷马时代，但忒勒马科斯无疑就是路易十四的孙子，而那位引导王孙的贤哲曼托尔也不难辨认。在老生常谈的道德宣教后面，可以看到对当朝国王的批评，尽管这种批

评是以极普通的言辞为掩饰的。他的另一部作品《对王国义务的良心审议》直到1734年才出版。这部书的风格更加活泼，意图表露得更直接。然而，除了谴责某些令人震惊的弊病外，这个“审议”很难说比《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更有现实意义或更直截了当。

1711年4月，太子死去，这似乎意味着他的儿子即费奈隆的学生将要在不久之后承袭王位。我们这位曼托尔11月间在肖尔纳写下了他的政治思想概述。^[19]他这次写的这份东西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纲领草案，其中包括国家改革的轮廓：每个教区的主教都应主持一个小型议会，其任务是摊派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地方议会所通过的向全省征收的税款。在朗格多克实行的体制应该推广到全法国。税收要供一切民事和军事开支之需，这当然是以大力削减预算并维持和平局面这样的预想为前提的。此外，王国作为一个整体，应每隔3年召开一次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有权延长会期，有权审理有关国家事务的几乎每一个部门。在经济上，自由贸易的原则得到了肯定，并着重指出应接受来自荷兰和英国的商品。以上这些就是费奈隆纲领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他的名字前面有时冠以“先驱”二字而当之无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另外一些主张，这些主张主要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显贵人物的偏见。他所设想的三级会议与最后一次召开于1614年的三级会议相比，更缺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代表性。这个三级会议事实上应由每个教区的主教、一名“古老而高贵的贵族”和一名“重要的”平民组成。这样，前两个等级的代表就被限定为它们最显要的成员，僧侣的合法代表应是主教，而且只能是主教。费奈隆提出了取消卖官鬻爵的主张，其真正的含义也在于他喜欢将官职授予高居于平民之上的贵族，而且不但对军官职务这样做，对司法官员也应尽可能这样做。他主张明令禁止“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限制向功勋卓著的人授以贵族头衔——凡此种种就使得他的全部建议所具有的陈腐的色彩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纵然如此，这位坎勃莱伊大主教的头脑与另外一些大贵族相比，毕竟还是不同于一般的。谢弗勒兹提笔为费奈隆的文稿作补充时，又加上了一条取消监察官，加强军事总督的建议，他主张恢复军事总督的权力。同样，布莱维利埃和圣西门也奉献出各自的学识，为的是重建他们想象中的数百年前的法国。

布瓦吉尔贝（1633—1707年）和伏邦（1646—1714年）的著作则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的著作触及了法国问题的真实核心。彼埃

尔·勒伯桑·德·布瓦吉尔贝是鲁昂大法官裁判所的长官，一位中级司法官员。他是科尔内耶家族的成员，年轻时曾写过文学作品，他所在的城市中的市民因其经济生活的性质而经常与外国打交道，最富有的勒让德尔家族与荷兰的关系甚密。^[20]这个家族的首领托马·勒让德尔新近皈依天主教，并于1685年成为贵族，他的一位当新教牧师的兄弟与巴斯内奇·德·博沃流亡在鹿特丹。我们不应忘记，以商业和制造业闻名的诺曼底，农业基础也很坚实，在这个有着繁茂的牧场和大片耕地的地区，商人和官员都拥有可观的产业。布瓦吉尔贝的思想反映了商界的牵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的主要著作《法兰西详情》出版于1695年。从形式上看，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部分是讽刺，部分是简介。布瓦吉尔贝很像16世纪和17世纪的献计者，主张掌握果断而有效的对策，重建国家财政。他在这部著作中显露的讽刺才能，使通常比较笨拙的文笔呈现一种生气，他的讽刺既有深刻的洞察力，也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处，尤其是他所引用的数字。正因为如此，《详情》中具有一种天才的成分。在布瓦吉尔贝之前，没有一个人解释得这样清晰，在他之后也没有一个人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描绘得这样具体。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阐述了：单独一个社会集团所遭受的损失，如何因购买力受到限制而抑制了另一些集团的销售和收入，进而使每个集团都趋向紧缩。因此，病根就是“不完全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不完全状态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它并非起因于不久前全国的严重匮乏状态，而要上溯到所有食品都以低价出售的1660—1690年期间。那时的不景气才是全国贫困化的真正原因，由于它打击了农夫的热情，所以也是饥荒本身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布瓦吉尔贝就用这种方法论证了他数十年后在《谷物论》中探讨的若干题目。在《谷物论》中，他主张对玉米实行自由贸易。^[21]但是，1695年，他把税收制度作为最主要目标加以猛烈抨击，他认为，间接税妨碍了贸易运动，直接税使生产者破产。布瓦吉尔贝的批评生气勃勃，而且往往很贴切，然而他依据这种批评提出的解决方案却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他唯一的创新仅在于提出了征收烟囱税。他显然不愿意公开提出特权问题。

伏邦此时同样不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早在1694年他就写了《战时非常税计划》，尽管他在书中强调这种计口征收的捐税应该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因为它关系到君主的“荣誉”，但是这部书充分说明他

那时对税收问题已产生兴趣。这位元帅的文笔不如布瓦吉尔贝活泼，但更有条理，更少偏见，他为以后几年税制改革所做的伟大设计已趋成熟。他的长处在于他用心全面，掌握情况。他的漫游生涯使他有机会观察各种各样的事物，不但如此，他还立足于数量和质量的考察。1697年，由博维里埃送交各地监察官的问题单子是按照伏邦的统计著作列出的，回答这张问题单子的那部有名的《回忆录》对他的帮助很大，不过，他另外还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便是他的《费兹雷选举的地理描述（1696年）》。在他去世之前的1707年，他又写了《王家什一税计划》^[22]，在这部著作中，他主张彻底改革税收制度，取消现行的所有捐税，用以取代的不是一种税，而是在尽可能精确地估税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收入严格按比例征收的一系列捐税。这就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定型的改革。从技术上看，这种税制纯属空想，但是，这位元帅的本意却是一种十分善良的信念，他为公众造福之心是纯净无瑕的，况且，由一位伟大的国家公仆来论述整个税制问题，这是头一次，他的道德权威是毋庸置疑的。

路易·菲利波·德·蓬夏特兰在1689—1699年间担任财政总监，并兼任负责海军和宫廷事务的国务秘书。此人的清晰面貌，历史传说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不过，大概由于他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谈吐，使人看不到他那精明的讲求实惠的才智。圣西门在一段意在颂扬他的文字中情不自禁地写道：他“在他所占据的各种职位上大发横财”^[23]。他和他的家族肯定与海上贸易——船主、海盗头子和商人——关系密切。在他任职期间，让廷臣们在财政计划中营私自肥的做法，看来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尽管这种做法毫不新鲜，而是在蓬夏特兰之前就由来已久，而且在他死后依然经久不衰。当他于1699年成为掌玺大臣后，便把国务秘书和掌管海军的职务移交给他的儿子热罗姆，把财政总监让给了米歇尔·夏米亚尔。夏米亚尔同时兼管陆军部，当时人们一致认为他意向良好，不过，只是个二流人物。然而，可以察觉到，他的后面有一位比他强得多的人物。尼古拉·德马雷（1648—1721年）是伟大的科尔贝尔的外甥，在他16岁那年，科尔贝尔让他辍学去官场学艺，29岁时他当上监察官。34岁时他的舅舅去世了，但他并未承袭科尔贝尔的职务。1683年，一桩发行面值为4个苏的硬币舞弊案被揭露，他因受到牵连而被撵出宫廷达20年之久。然而，他作为专家的

威望在他整个流亡时期从未受影响，大臣们和商人们照旧向他求教。夏米亚尔担任大臣后获准起用德马雷。1703年，德马雷东山再起，任财政督导，其实，这个职务使他成了该部的头号人物。5年之后，他成为财政总监。这位身高体壮、头脑顽固的人^[24]，是路易十四在位时期的最后一任财政总监。

在他的指导下，政府没有垮台，而且竭力使国家依赖一些权宜之计维持下去。这些权宜之计就其性质而言，有许多都是由来已久的，然而，有两件新事物可以看作未来事件的预兆，这便是两种新税。一种是1695年的战时非常税（人头税），另一种是1710年的什一税。这两种税的名称令人想起伏邦的计划，但实际上这两种税完全是新增的捐税，并不取代原有的捐税。1695年1月敕令将法国人分为20个等级，同一等级中的所有成员均应缴纳相同的税款，各等级应缴的税款不等，最多的为2000利维尔，最少的为1利维尔。敕令规定^[25]，国王的全体臣民，“不论其身份和地位，无论是修道院外的神甫或修道院内的神甫，无论是贵族、军官或其他什么人，均不得免税”。这个原则性的声明发表后不久，就给予僧侣以例外的特殊优待，只要求他们自愿进献贡礼，不必缴纳税款。但是，所有其他人则都登录在“各等级税率表”上。被列在第一级的有太子、血缘亲王、大臣、国库总监、战时非常费司库、包税人。在此以下，正如《阿姆斯特丹小报》以揶揄的口吻指出的那样：“贵族与平民混在一起，平民中有些人因突然致富而荣列国家第一等级之中。”^[26]不但如此，这种简略的等级划分对税额和收入所定的比例远不是公正的：“法令规定律师和商人应缴相同的税款，这与让每一个残疾人缴纳相同的税款一样，十分荒唐。”^[27]但是，这种批评尽管很符合实际，却无法抑制政府急于立即进款的心情，而要立即获得进款，只有根据人们的表面社会身份确定等级才能不费多大力气。

必须承认，实践证明计口征税（人头税）是令人失望的。法人团体获准采用按年预纳的办法，也就是说由它们自行确定并征收经批准的一年之内应纳的总税款，这就使它们得以事先把税额定得很低。由于一些应纳税款绝非最少的人享受免税的待遇，因而进一步歪曲了纳税的原则，削弱了它的效果。从1695年到1698年，在巴黎财政区中，与人头税负担者所纳的税款相比，贵族缴纳的税款逐年减少。《里斯威克和约》签订后取消了战时非常税，但从1701年起重新征收，从此

以后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捐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为征收人头税而编制的登录册被当作确定应纳战时非常税的主要人员的依据，而不纳人头税的人则完全另外造册。结果，享有特权的人所负担的战时非常税很轻，而其余每个人的负担则更沉重了。税制的第二项革新即1710年的什一税的依据完全不同。每个纳税者被要求详细申报自己的全部收入，而不论其来源是什么。对于这种税额取决于个人申报量的捐税，200年后遭到了种种非议，对此我们颇为熟悉，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在1710年时想用这种办法对全部收入果真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款，完全是空想。不过，无论德马雷或是他的合作者，当时也都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实际上，与特权阶级进行了谈判，结果这些人或多或少地逃了税，而对其他人则再次利用人头税登录册。然而，这两项试验的部分失败并不能抹杀其历史意义，因为当国王推行这两种新税时，毕竟最终宣称他有权向全体臣民征税。

1688—1715年间，国王不得不向各种社会势力让步，若在其他时候，他决不至于如此忍让。

在僧侣们5年一度的集会上，第一等级即大主教和主教享有无可争辩的优越地位。但是通常由这类集会投票通过的普通“无偿馈赠”数额越来越大。此外又进一步增添了非常“无偿馈赠”，其数额在1695年为400万利维尔，到1711年则为800万利维尔。大主教和主教们反而有恃无恐地作出了一些损害下层僧侣的决定。为维持乡村神甫的生活，决定发给他们一笔不少于300利维尔的“本堂神甫薪俸”。许多神甫宁愿全部以现金领取这笔薪俸，因为这样就可免除收取少量什一税的麻烦，什一税虽是他们的传统收入，但数额不大，而且不可靠。1690年6月30日，国王发布谕令，取消这种任意选择的自由，并且还规定，今后任何神甫均不得免纳僧侣作为一个团体向它的成员征收的税。从另一方面来看，主教团则可以加强它对整个法国教会的权力了。1695年4月11日谕令强迫每一个在修道院和不在修道院的神甫，在他宣道或听忏悔之前，必须预先向主教领取一个许可证，而主教则随时可以撤销批准，收回许可证。1698年12月，主教管区的主教获得了不提出理由便可命令该区神甫到神学院去静修3个月的权力。1700年大会决议，第二等级即大多数僧侣的代表在教义和道德辩论中没有发言权。

由于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主教团把自己引上了与某些有势力的舆论界发生冲突的道路。自1693年起，出于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若干原因，凡尔赛不仅尽可能避免与罗马发生任何冲突，而且竭尽全力使教廷与国王的事业联结起来。^[28]1704年博絮阿死后，主教团的法国教会自治论失去了主要鼓吹者，教会和国家在再次爆发的耶稣会和冉森派的争执中也失去了调和的影响。在路易十四看来，神学是专家们的领域，而且教皇在教理问题上的权威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他认为，世俗政权的作用仅在于让教皇的权力得到尊重，由此推论，让已被正式遭到谴责的教义再次抬头就是一种反叛行为。正是基于同一观点，耶稣会教士拉勒芒把詹森派教士奎斯内尔称作“叛乱分子”。当罗马和凡尔赛达成协议时，天主教徒只能服从。但是，这种协议——其具体形式体现在1705年7月教皇谕令中，尤其体现在1713年9月教皇谕令中——却为反对派势力提供了重新集结的时机，而国王与教皇似乎都没有正确地估计这股势力的力量。自此之后，神的恩典究竟是“有效的”还是“足够的”这个纯神学问题普遍被遗忘了。然而，1709年遣散罗亚尔港修道院中修女，1710年毁坏这所修道院，以及1711年挖出修女和隐居者尸体一事，使天主教界认识到，世俗政权的干预何等粗暴。既然对被怀疑为詹森派的神甫使用密札——这是政府专横的监禁命令，看来法国教会已被置于警察统治之下。第二等级僧侣和高等法院的官员起而反对这种恐吓行为。第二等级僧侣不只是由下层僧侣组成的一大批神甫，还包括修道院院长、神学院院长和司铎，他们之中不少人颇有学识，而且往往出身于中产阶级，其中有一些人独立精神很强，注重法律。雅克·布瓦洛（著名作家布瓦洛的兄弟）便是这样一个人。1713年9月教皇谕令发布时，他在索尔邦大学主持神学院工作。大多数高等法院的官员的态度基本上也是明朗的。新冉森派和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法国教会自主论者可以在法院界找到最执拗、最能干的捍卫者。^[29]

在他在位的最初几年中，国王有一切理由不把这些强大的宗教团体放在眼里，并且牢牢地控制它们。然而他不仅对它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且听任它们的地位得到加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随着官职的成倍增加，做官应获的实利被众多的官员分享，而且官职已经供过于求，因而官职的售价下降了。这是造成最重要的官职拥有者——高等法院的官员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给他们以补偿。

于是，根据1689年10月的敕令，自1675年叛乱以来一直流亡在瓦恩的布列塔尼高等法院获准迁回雷恩，这项敕令设立了一个新的院长和6个顾问职务。此外，当上诉提交高等法院时，下级司法官员把高等法院的官员看作当然的上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司法和“治安”紧密相关，以至于在法官看来，干预公共秩序中产生的一切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危机年头干预有关经济规章问题。因此，高等法院的决定书曾控制着玉米贸易，对于由各地方机构组成的治安会议，高等法院也处于支配地位。在1693—1694年和1709—1710年间，这些老规矩又获得了新生命。在那些远离宫廷的大城市中，这些高级法官轻松地保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许多虽有军职但不能发财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这些高等法院的官员不是出生于贵族家庭，而实际上他们确实往往不是贵族出身^[30]，那么他们只因担任官职就可获得贵族称号。一般来说，他们除了投入官职中的资本外，还拥有大量地产，他们比其他贵族更精心经营土地。波尔多和金色海岸的大片富饶的葡萄园，大部分掌握在波尔多和第戎高等法院的官员们手中。他们亲自管理葡萄栽培，巧妙地广为宣传，提高其声誉，因为这些讲究饮食的专家们也是精明的商人。监察官们也往往把高等法院的首席院长变成他们的主要合作者，彼埃尔·卡丁·莱布莱特1690—1704年在普罗旺斯兼任监察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院长，而与他同名的儿子在1710年也兼任双职。当然，最大的司法机构是巴黎高等法院，它掌管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诉讼案，审理最重要的案件。鉴于血统亲王和教会及王族中有爵位的贵族均可在巴黎高等法院中拥有席位——事实上也往往确实如此——这就加强了巴黎高等法院是古老的法庭附属机构这种理论。那些曾使巴黎高等法院成为法兰西王国“根本法”监护者的判例更加没有被遗忘。

凡是依旧保留着省三级会议的地方，它仍然能起某些作用，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在广义的行政方面起作用。客观情况在这里同样使旧机构获得了新的活力。朗格多克的监察官巴斯维尔获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危机年头里与朗格多克的省三级会议发生冲突；过去省三级会议只开几天会，现在开几个星期，有时超过两个月。在布列塔尼，省三级会议控制着财政管理，现在，为争取财政管理自主的斗争取得了一些不容置疑的成功。省三级会议对某些城市也有影响。1692年，当每个城市遵照敕令设立终身市长时，似乎必须消除旧有的市政自由的一切残余，结果各个城市买回了供出售的市长

职务。而照看此事的往往是省三级会议，因此，市政官员实际上变成了省的行政机构的代理人。这种变化在布尔戈尼尤为典型。

那些被称为“征税官和包税人”^[31]“财政界人士”的金融家们是一伙成分非常复杂的人。在那些担任官职的人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司库和税务员。在路易十四末期，应付当时紧急支付所需的大量票据，是由一个12位总税务官组成的联合会保证的。经常与他们合伙的是那些与包税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还有根据合同向陆军和海军供应粮食的军粮商。但是，几乎所有这类生意都要靠资金雄厚的商人贷款支持。行政当局对所有这类人员都给予特殊的优惠和荣誉。例如，托马·勒让德尔（1638—1706年）的祖先曾是16世纪鲁昂的著名商人，他于1700年获得了商业总巡视员的头衔，仅此一项，每年为他带来的收入即达1.2万利维尔，他还照样可以照看自己的生意，而且没有任何公务要做，没有任何责任要负。他死时，半官方的《信使报》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为表彰他为人正直、谨慎，屡次提供贷款”，他被授予贵族身份。^[32]塞缪尔·贝尔纳（1651—1739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位名画家的儿子，虽然这是一个加入了夏朗东新教教会的家庭。我们不了解他是如何成为银行家的，不过，从17世纪90年代起，他在公共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而且在王位继承战争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圣西门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国王亲自陪他游览花园，企图说服他接受德马雷的建议，很显然，他在1709年受到了保护，逃过了债主对他的催逼，这次“缓解”使他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最出色的军粮商莫过于巴里一家人。巴里·梅西（法国皇太子妃的承包商）在多菲内的莫瓦朗开旅馆，1690年经手为阿尔卑斯军队供应军粮，他的几个儿子协助其事，其中以巴里·蒙塔古干得最漂亮。1691年，他设法调集了1000头骡子驮送玉米到格勒诺布尔，使王家部队免除了断炊之虞。^[33]在以后的年头里，这个家族在供粮业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并以雄厚的资本为后盾在王位继承战争中再次露面。在摄政时代，给劳氏体制打气的就是他们。^[34]就发迹的规模而言，这些人是极个别的例子，但很有启发性。在勒让德尔、贝尔纳和巴里家族的那个世界中最新暴富起来的人跟昨天或前天发了大财的人，以及和家财久远的人统统混在一起。

勒让德尔和贝尔纳的故事进而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新皈依者的情况。当我们观察他们的活动时，有一点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们曾帮

了忙，因为他们原来都是胡格诺派教徒，而不是说尽管他们曾是胡格诺派教徒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正是他们利用与过去同派教友的联系所能做到的事。他们在海外那些经常与法国打仗的国家里的联系网，事实上是他们的贸易和金融实力的基础。较小规模的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参照荷兰和法国的档案发现。在那些按理说已经分裂的家庭中，虽然某些成员已皈依天主教并留在法国，而另一些成员则已逃往国外，但个人之间的联系并未割断，他们在感情上有联系，而且彼此在利益上也有关系。王国政府对此非常了解，并且力求加以利用。1698年，《阿姆斯特丹小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新闻：

“鲁昂著名银行家勒让德尔遵照宫廷的命令今天抵达此间（巴黎），以便与在此办理商务的两位三级会议的专员进行接触。”^[35]1700年设立商业理事会后，勒让德尔可以以商业总巡视员的身份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参与商业理事会的工作。在应召参加该理事会与政府的专员共事的各主要商业城市的代表中，有一位尼古拉·勒贝里·梅斯纳热。此人也是鲁昂的商人，生来便是天主教徒，不过偶尔也同勒让德尔合伙。这位梅斯纳热是《乌得勒支和约》的谈判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从鲁昂来的逃亡者、著名的新教神学家雅克·巴斯内奇充当了和约谈判前的对话牵线人。除所有这些外，某些监察官提醒人们注意废除南特赦令在经济上产生的后果，人们担心，对国家有用的重要人物会离开法国。在《里斯威克和约》谈判期间，政府拒不屈从外国的要求，并以武力对付国内的叛乱。然而，政府已打算改变政策而不作公开声明。在1689年12月13日的声明中，尤其在第二年1月的解释性通告中，政府对于严厉弹压新教徒的措施未得到执行的情况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同时却拒不撤销这些措施。此后，这些措施的执行程度则因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当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民意而异。在各个大城市中，特别是在巴黎，新皈依者虽然不能进行过去宗奉的宗教仪式，但至少可以把新皈依的宗教仪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看到这些折中的做法和思想上的保留，内心有所顾虑的人不免感到震惊，但是，流亡对往日的新教徒进行了筛选，留在法国的那部分胡格诺派中产阶级，远没有煽动塞文山脉中农民反叛的那种思想状态。

蓬夏特兰别出心裁，让国王专为一心想捐官的傻瓜设立一种官职，这种做法扩散到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很不起眼的官职上，无疑，这是为了在那些资本有限的人中间找到买主。然而，这却给后来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某些官职虽被取消了，但不可能把所有这类官职都收买

回来，于是乎，那些既领年金又做官，然而既非年金领取员又非文官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级。很显然，设立这类官职的好处大多仅在于捐官者就职之前所付的那笔“资金”，新设这类官职只是为了眼前的实利。例如，1690年3月为巴黎设置的20个“召集人”，以及“宣过誓的讣告宣读官”之类的官职便是如此。于是，一大批只管登录和收税的文官成了法国经济的一个大包袱。然而，这类为了解燃眉之急而采用的办法有时却成了有效改革的一部分。1691年设置了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官，宫廷便可从负责造册的神甫那里得到这些登记册的副本予以妥善保存。这并不是新的规定，但过去一直很少这样做。自此以后，由于登记官可以向教区的神甫们出售豁免证件捞钱，这个老规定便得到了很好的遵守。

于是，新生的官僚便竭力使自己适应于从旧时代承袭下来的制度（旧时代还没有这套官僚机构），适应于在环境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创设的新特权和新垄断。

财政总监、国务秘书、国务顾问和监察官，几乎全都出生于那个产生司法官员和财政官员的阶级，但是在这许多特权人物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集团。他们已经得到贵族的爵位，在那些通常拥有伯爵或侯爵尊号的贵族中间，他们是一些土地和庄园最多的人。他们的兄弟和表兄弟们得到了主教管区或更重要的教堂这类实惠。他们显赫的门第往往可以追溯到两三代以上，或许在一二百年之前，不过，更久远的就很少了，因而在萨里尼亚克·德·拉莫特（费奈隆出生在这个家族）家族或鲁沃列·德·圣西门家族的成员看来，这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他们引以为荣的祖先是中世纪的骑士。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穿袍官员”集团对这些红得发紫的亲戚或多或少地存有妒忌，因为这些人渐渐疏远“穿袍官员”，在是否会捍卫“穿袍官员”利益这一点上，很可怀疑，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与“穿袍官员”的利益不总是一致。

每年享用数千英镑的高级僧侣和除“本堂神甫薪俸”外别无收入的乡村教区神甫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其距离之大犹如腰缠万贯的金融家之于每日仅得5个苏的劳动者一样。一位有名的作家，即令家境只是小康而已，他与一个目不识丁，只会操布列塔尼语或某种南方方言的农民之间的距离也不小在哪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高级僧侣、金融家和诗人、贵族和下层官员，可以以相对平等的资格在

同一个沙龙里，或在某个高雅的社交场合里聚会。各个统治阶级尽管都为争得首位和彼此间其他的忌妒而闹得不可开交，但毕竟组成一个在社交上彼此混杂的集团。一个仅仅有钱的人在理论上无疑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实际上，他可以用自己的贡献去换取头衔，而成为一个人物。他往往只需将女儿嫁给名门望族，就可以确保子孙在社会等级上高升数级。塞缪尔·贝尔纳死时已成了国务顾问和古贝尔伯爵；托马·勒让德尔的一个孙女后来变成科赛·布里萨克公爵夫人。此外，许多司法官员和僧侣在文学上沽名钓誉，写一些往往与司法和宗教毫无干系的作品碰运气。一位走红的作者，出身纵然寒微，毕竟称得起是位作家了。

正是这些兼用威望、权力和财富，自诩促成了艺术、科学和文学进步的数千个人，为美好的社会定下了基调。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奢侈品，使他们得以尽情欢娱的工匠和以技艺为生的人：厨师、假发匠、著名的画师和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在偌大一个国家中，虽然有一些严肃的杰出人物哀叹信念和习俗的堕落，但许多人却急不可耐地在为自己或他们的子女追求他们所垂涎的地位。就此而论，旧王朝统治下轻易地就可以在社会上飞黄腾达这种情形，到路易十四在位的末期已接近尾声。上中等阶级力图跻身于上流社会，在他们之下则存在着许许多多向上爬的人，这些人希望自己的家庭有朝一日能一步一步地爬到那些最走运的人已经到手的地位。在他们之下，那些仆役，那些改头换面的乡巴佬，梦想着吉星高照，更上一层楼。除勒萨日那部著名的喜剧《杜卡莱先生》外，在固尔和杜弗莱尼的剧作中的一些场景也让人们看到，金融界提供的职位激起了人们的贪欲。平民更加期望得到可以用钱买到的职务，然后沿着国家官员的等级像惯常那样节节上升，运气好的话，有时还能爬上社会阶梯的最高一级。从军也是当时发迹的一条途径。不错，通常只有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才能当上元帅，但是，中将或准将这类军衔对于新人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说得更具体些，在路易十四的最后几场战争中，由于特别需要军官，从军当官的大门向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完全打开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禁卫军。路易十四从登基伊始就想让它成为一支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和培养指挥官的摇篮^[36]，晚年时他初衷不改。这些军人像过去一样簇拥在国王

周围，像过去一样享受特权，却被描绘为当时具有“平民气质”^[37]。就此而论，禁卫军与其后来的变化形成至为鲜明的对比。

一个人可以指望凭借机灵和运气，也可以指望依靠个人的才干混得不错，甚至进而挤进一些圈子，这些圈子里的人十分自信，十分冷漠、聪明或有教养，以至于夸口把高贵的出身视若粪土。这种情形在1700年的法国并非前所未有，不过此时已开始具有新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说，当时大城市所起的作用与此有关。寥寥数千人口的小市镇在已失去了效用的城墙废墟后面日益衰败，那里的经济生活渐趋衰落，市政公民权正在崩溃，有的已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大港口则将因国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而得到好处。文学和科学历史在王廷机构——高等法院、最高审计院、最高税务法院——所在的城市中蓬勃发展，那里生活着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例如，审计大师贝尔纳·德·拉莫努瓦耶（1641—1728年）所作的《勃艮第的圣诞节》就是在第戎出版的。让·布伊埃（1673—1746年）19岁时当上了高等法院顾问，30岁当上了院长。1715年前后正当他盛年时期，他多方面的才华达到了顶峰，此时他也在第戎。孟德斯鸠从1711年起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成员。不过，最名副其实的城市，拉布律耶尔用以与宫廷媲美的那个城市，则指的是巴黎。巴黎有一些由情趣相投的人组成的自成一体却又相互往来的圈子，通过可以称之为这些人的共同选择这样一种过程，上流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颇具现代特征的人脱颖而出。前几代人力图把这类人说成不是有教养的人，其实并非如此，但是，业已变化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印记，他们至少有这样两个异常突出的特征：宽容大度的作风和讲究生活的情趣。

很早以前，古斯塔夫·郎松就从出版于路易十四后期的那些著作中去寻找18世纪“哲学思想”的根源；此后，保尔·阿札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看法，而且把问题提到更广阔的领域。他认为，把“欧洲的思想危机”写成产生于1680年前后是妥当的。今天我们也许希望用更确切又不那么绝对的术语来描绘这个时代。就法国而言，人们思想的根本变化可以追溯到笛卡儿和帕斯查理这两位前代仅有的坚强人物。同样，像封德奈尔这样一位作家，若追溯其渊源，也可看到笛卡儿《方法论》中横扫一切的激情和帕斯查理《思想集》中信仰与理性悲剧性的冲突对他的影响。封德奈尔这位熟谙科学的文人和才子，在他的《神灵显迹的历史》（1687年）中，漫不经心地用揶揄的口吻把古

代异教徒的神灵显迹比作基督教的奇迹。但是，他在这样做时用的是毫无激情的冷漠的语调，也就是数年前他在《宇宙万象解说》中使用的语调。此外，还可论证这样一点：充满当时人们头脑的怀疑主义并不一定能摧垮一切基督教信仰。例如，理查·西蒙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信仰与《新约》和《旧约》中合理的注释并不互不相容。从根本上说，危险得多的是新教徒贝尔的著作，他逃亡在荷兰，但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国人。他很快就站在茹里欧的对立面，赞同与凡尔赛进行谈判。^[38]在《历史和评论辞典》这部杰出的博学巨著中，他的哲学观点清楚地表明了他讲求实际的立场。他并不否认信仰的价值和效用，但他把信仰和道德截然分开。早在1686年，他借助“自然宗教之光——最根本的法则和正义的根源”揭示了思想的方向。事实上，这些著作对广大公众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不是抽象的体系，而是对事实的探讨。神学已不再吃香，所以人们对形而上学的兴趣也减少了。人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研读经文，用常识解释经文，在历史和哲学方面，人们则径直走向明晰易懂的解释。所有这一切的教益则是信仰自由。人们对于宗教争执的厌倦，新皈依者的影响以及上流社会对安宁的追求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为个人的信仰而反叛，为强制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而折磨他们，这些看来都是荒谬的。

伴随着这种宽和的哲理，往往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那就是财富和闲暇能为高雅和有教养的社交界带来乐趣。挥金如土的赌博比比皆是，人们醉心于狩猎。不过，这些都是昔日的遗风。在高雅的社交界中，交谈的乐趣越来越受到赏识。朗贝尔侯爵夫人从1698年起，在她的奈韦尔新府邸中，为新世纪的社交界女主妇们作出了榜样。在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和《女博士》时代开始的社交生活教育，现在又增添了国王让他的献媚者们经常保持的风度和举止。上一代佩剑贵族身上常见的古怪的粗鲁举止和粗俗的戏谑悄悄地消失了。人们转向善于处世的僧侣阿贝·热东教士在1718年关于“温文尔雅”的论述中力图阐明的那种理想。

人们热切地希望和平，唯有和平能让人享受生活的全部欢乐。某种世界主义也在逐渐发展。荷兰与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战争也难于削弱这种关系。在荷兰出版的法国人的著作中，有一些作者生活在法国，他们为逃避书刊检查而情愿在荷兰出版自己的著作。对东欧和亚洲异国情调的向往虽停留在肤浅的外表，但私人藏书家手中的外国文

学作品和游记却日益增多。面对这些，法国人觉得，他们国家政治上的显赫应该辅以或甚至继以文化上的灿烂。1688年由佩劳特挑起的古今两派之争以普遍接受以下事实告终：路易十四时代产生了堪与奥古斯都时代媲美的一些伟大作家。在那些接受了巴黎时髦并雇用了一些法国艺术家的国家里，在新教徒流亡者找到了安身之处并因他们的侨居而使法语得到了推广的那些国家里，人们对于上述这个事实也深信不疑。在法国国内，这种自信心后来被提高到民族信条的地位。

（许明龙 译）

-
- [1] 《渴望自由的法兰西奴隶的叹息》第2卷，阿姆斯特丹，1689年，第27页。
- [2] 《科尔贝尔1682年6月15日致各地监察官的通知》，载P. 克莱芒《科尔贝尔书信、指示和回忆录》第7卷，第315页。
- [3] 见本书原文第744页及以下各页。
- [4] J. 默弗雷：《1661—1715年间的物价变动及其反响》，载《巴黎统计学会会刊》第85卷（1944年），第109—118页。参见本书第23章（2）。
- [5] J. 默弗雷：《法国17世纪的交换流通和农村劳动》，载《纪念阿玛多·萨波里文集》（2卷本）第2卷，米兰，1957年，第1127页。
- [6] J. 鲁韦：《人口危机：经济问题抑或道德危机？——旧制度时代的列日地区》，载《人口》第9卷（1954年），第451页。
- [7] 拉布吕耶尔：《品性论》（Henri Van Lann译，1929年），第318页。
- [8] 见J. G. 范·狄伦著*Mensen en Achteigzonden*，格罗宁根，1964年，第193—226页。
- [9] 巴黎，公共援助档案馆，痼疾患者收容所资料，会计凭证。
- [10] M. 范·哈克：《里尔的哗叭厂》（2卷本）第2卷，里尔，1910年，第203页；《图尔监察官米罗梅斯尼尔信函集，1697年3—4月》，载A. 布瓦里斯尔著《财政总监书简集》第1卷第1614号；《里昂总慈善院院长1693年12月22日信》，载A. 布瓦里斯尔著《财政总监书简集》第1卷第1259号。
- [11] A. 布瓦里斯尔：《财政总监书简集》第3卷附录，第603页。
- [12] 游击队员因身着白色短衫而被称为“卡米扎尔”。
- [13] 见本书原文第224、767—768页。
- [14] 备忘录写于1693年6月16日，见G. 李兹朗《博维里埃大公，1648—1714年》，1933年，第577—585页。
- [15] 圣西门：《回忆录》第2卷，A. 德·布瓦里斯尔版，第342页。

[16] 初版于1825年，附有手迹复制件；新版于1961年，纽莎泰尔，P. 吉耶曼版。

[17] 见本书原文第147页及以下各页。

[18] L. 阿蒂埃：《路易十四与梅因特侬夫人》（1957年）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接受此书作者关于结婚日期的说法。

[19] 费奈隆：《政治杂著和书简》，乌尔班，1920年，第97—124页。

[20] J. 默弗雷：《17世纪的一个大商人家族：鲁昂的勒让德尔》，载《现代史学会通报》第49卷（1950年6—7月），第7—9页。

[21] 《论谷物的性质、栽培、商业和利益》和《法兰西详情》由E. 代尔重印，收入《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1851年，第323—371、163—247页。

[22] E. Coornaert版（1933年），第274—295页。

[23] 圣西门：《关于掌玺大臣》（巴黎，外交部档案馆，回忆录和文件，法国200），布瓦利斯克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刊印在他编的圣西门的《回忆录》中，第6卷，附录第14页。

[24] 参见圣西门的《回忆录》第7卷，第129、394页。

[25] 布瓦利斯克：《财政总监书简集》第1卷，附录第10页。

[26] 转引自圣西门的《回忆录》第2卷，布瓦利斯克版，第464页。

[27] 布瓦吉尔贝：《法国呈文》，鲁昂，1706年；E. 代尔重印，收入《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1851年，第248—322页。

[28] 见本书原文第131—132、161—162页。

[29] 见本卷原文第132—134；第7卷原文334页及以下各页。

[30] J. F. 布吕胥：《18世纪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出身》，1956年。

[31] 见本书原文第301页。

[32] 1651年11月28日洗礼册（巴黎，法国新教历史协会图书馆）。

[33] 《巴里·蒙塔古训子录》，巴黎，兵工厂图书馆，手抄本4494号，第5—6页。

[34]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223—224页。

[35] 《1月17日巴黎通讯》1698年1月7日、23日。

[36] 关于王室的军事部门的表述，见本书原文第780—781页。

[37] A. 科维齐埃：《17世纪路易十四的将领及其社会出身》，载《17世纪研究会通报》第42—43期（1959年），第25—53页；《路易十四的禁卫军》，载《17世纪研究会通报》第45期（1959年），第265—291页。

[\[38\]](#) 参见本书原文第218页。

第十一章 外国压力下的西班牙帝国，1688—1715年^[1]

在1688年，一位八九十岁的西班牙人也许还会记得，西班牙曾是欧洲的第一强国。在这位老人的年轻时代，西班牙王室的财政虽然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那时没有哪位西班牙人有理由为它的前途担忧。但是这位老人却得在灾难中度其余生了。从1620年到《雷根斯堡和约》签订的65年间，西班牙不是和一个国家就是和好几个国家开战，打了58年之久。到了1684年，西班牙已经丧失了在欧洲拥有的要害地区，还丧失了美洲的它声言是它的大部分地区。达尼河一役，西班牙的海军声名丧尽，而在罗克劳伊战役蒙辱以后，它的陆军也一蹶不振了。其时它的经济破产了，只有它的文化还能够保存一点往昔的朝气。1693年，马德里画派的最后一位伟大画家克洛迪奥·柯罗快要死了，他对那不勒斯人卢卡·其尔达诺获得宫廷的青睐，深感失望；不过本土的建筑艺术，从丘里盖赖家族的装饰工艺看到它的繁荣景象。^[2]在17世纪的最后几个10年中，除了1695年死去的墨西哥女诗人修女胡安娜·伊内斯的作品之外，没有几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值得出版的，这个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政治讽刺小品，生动地显示了西班牙人的才华。从1685—1693年，佛兰西斯科·班塞斯·坎达莫写了许多宫廷政治剧，力图恢复自1681年查理德隆死后便已衰落的戏剧艺术（他是这样认为的）。最伟大的西班牙书志学家尼古拉·安东尼奥死于1684年，他的《西班牙古书志》在他死后才于1696年发表。大学的衰微是显著的，虽然这时也产生了像对牛顿有影响的几何学家奥默利克，获得波舒哀欣赏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卡迪纳尔·阿吉雷以及在今天还享有国际盛名的古典学和古代学家曼纽尔·马蒂。如果从总的方面来看，西班牙确实是赶不上科学和技术的潮流，这一股潮流正在越过比利牛斯山汹涌而来。17世纪末，在塞维利亚设立皇家医学科学院，1714年设立西班牙皇家科学院，这才标志出西班牙文化的富于创业精神的新时代的开始。

关于西班牙的衰微，如果考虑到某些主观因素，从较高的角度去考察，那就可以看出它已是普遍的现象了。一般谈西班牙的衰微主要是指卡斯蒂尔，而美洲和加泰罗尼亚则属例外。大家都谈到的人口减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人口迁移而造成的，人们从农村和艰苦的卡斯蒂尔高原迁居到沿海城市。此外，西班牙人的记述，很多是与过去的黄金时代作比较，可从来就没有过黄金时代，或者有过而没有存在多久。^[3]对17世纪后期的情况的抱怨，事实上就是对16世纪后期或17世纪初期的怀念，那时还未显示出“衰微”的迹象。整个17世纪，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们对他们国家的弊端所作的剖析，指出的多半是一些征候，而不是基本的病因。他们一般只主张加强现行的法规，同时有点像奥斯曼评论家对待土耳其的混乱现象那样，请求罪犯们不要再去犯罪。关于社会现象的描述，大多也是取材于外国的外交家们的信札，或根据旅行家和法国传记家（通常这些人一开始就是反西班牙的）的记述，或来自西班牙当时人的猜测，而当时人则由于各自的性格或动机不同，他们的猜测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即使是那些卷帙浩繁的论述，结果判明多是人们怨懣之词，或贬低自己的纳税能力，或对有能力的竞争者愤恨，或希望得到皇家的援助；财政资料含混不清，看不出指的是健全的通货单位还是贬值的铜币。从西班牙赶不上北欧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得出“衰微”的结论。虽然如此，我们既不能怀疑17世纪西班牙人民的生活和国家实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也不可以把这种衰落现象理解为16世纪所奉行的政策的副产品。西班牙的经济政策的确看不出它与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有何区别，只是它为争当世界帝国而搞得过于劳累了；美洲的财富用来支付战争和驻外宫廷的津贴，而不能用来促进国内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在拥有特权的牧羊主协会的支配下，农业屈从于出口羊毛的生产；牺牲健全的经济和思想自由以提高宗教的地位；通过堂表兄弟姐妹联姻以扩大领土和巩固王位。这种近亲联姻可能不是一个小小的弱点。17世纪哈布斯堡王室的孩子们死亡率特高。西班牙王室的绝嗣君主卡洛斯二世的母亲是她丈夫的侄女，因此是她儿子的堂姐。1665年他长期的统治开始时，西班牙的财政已相当枯竭了。在此后的这些年间，为政不善加速了西班牙物质和精神的破产。3次出使西班牙的头脑冷静的维拉尔侯爵，对西班牙宫廷知之颇详，他在第三次出使西班牙后曾经这样写道：

15年前，人们在政府中还可以看到具有声望的部长；国王的财政以及他的子民的商务贸易还有充足的银币，使人感到这是在一个好政府的统治下印度群岛给他们的富裕。但此时（1671—1673年间）……我在这里无论在公和私方面都看不出往昔西班牙的形影了。[\[4\]](#)

17世纪的一些作家，看到西班牙仿佛正处于最低潮的时候——或者，西班牙人兴许已沉落到无望的深渊下，已无路可走了，只能往上拱。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卡洛斯王朝的最后那些年间，政府的情性当然会形成一个财政金融的停滞时期，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和紧缩的循环之后，终于在1686年把银币贬值了。随着这个法令之后的是非农业价格的稳定上升，直至1715年[\[5\]](#)，而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为波旁王朝的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这个灾难于1683—1685年高潮来临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次倒退[\[6\]](#)，在世纪中叶商业周期低潮时期，人口似乎慢慢地增长起来。1688年西班牙半岛人口约六七百万人，虽然比1600年少了200万[\[7\]](#)，但与1500年的人口数字比较可能没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些人口是从原先的家庭和工作中驱赶出来的，因为他们生活新的经济格局下，在新的人口中心未能充分就业。穷困和堕落极其普遍。许多工人都是外国人，商业、金融和名贵的奢侈品工业的管理人员多半是法国人、热那亚人和佛拉芒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如英国和荷兰，等等。1680年，据维拉尔的估计，法国工匠、小贩和务农的人口近6.5万人；他们来自法国西南部各地，往往在工作一段时期之后回法国去。[\[8\]](#)在加的斯的外国大殖民地，法国商人特别显著。热那亚银行家常承包二手税，他们能够定时交纳包税金，这就维持了西班牙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军队，甚至有一些财务人员是非法入籍的犹太人，他们谎报自己是基督教徒，这样就可获准去赚钱，然后便榨取他们。

皇家岁收的大部分来自卡斯蒂尔和美洲，但从来不入国库，部分原因是有多项赋税已经提前好几年征收了，被指定作偿还金融家贷款之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发放政府年金，造成国债涌涨。来自印度群岛的皇家收入，除支付美洲和菲律宾的巨大开销外，平均每年为100万—200万比索。根据官方计划，1683年以后全年总开支为800万埃斯库多，其中一半用来支付公共债务还感不足。[\[9\]](#)西班牙的外交官无钱购买秘密情报已成为话柄；王室的御从甚至贵人过得就像平民百

姓那样缺这少那；国王每夏例幸阿兰胡埃斯亦因经费不济而不时或辍。在西班牙和印度群岛开始是出卖税收，最后索性出卖公职，以至于印度群岛几乎等于放弃控制。^[10]最后是王国政府穷了，人民百姓的负担重了：没有哪项改革能比裁减官员更重要。长年的财政拮据迫使王国政府出卖管辖权，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地。像包税和出卖官职这类办法，只能是侵蚀王国政府的世袭财产，国家的权力也是一样，已被许许多多的特许所限制了。通过提供财政“效劳”，可得到梦寐以求带着骑士余威的贵族身份。

教会获得多种豁免，收入比王国政府多得多。因此它能够吸引那些但求一宿一饱的无业男人。有些主教区和教职人员比大贵族还要富有，事实上贵族们多已举债，他们也像一般人一样，总是抱怨这种处于燃眉之急的困境。城市里教士数目膨胀，而且多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尤不恪守教规，这是批评所集中之点。据说，1683年巴利阿多里德城有53所女修道院，却只有17个教区。^[11]反对宗教法庭的情绪强烈，不是因为它不时焚烧一两位犹太人，而是因为它有权越过国家法律没收他人财产，而且经常这样干，间接地使第三等级的人遭受损害。另一方面，耶稣会掌握大量外汇，为许多商人所信赖（也是所有与菲律宾有贸易关系的人所必需），因此没有人指望教会破产。这些年出现了信贷银行不断的需要，教会发挥银行作用，这的确值得研究。大量土地变为教会永久管业，小农家庭也实行土地永久继承法，这当然会影响市场收缩，并妨碍农业的改良。

半数以上的城镇和乡村都属世俗的和教会的领地，前一种领地可能几倍于后者。西班牙的领地制度在近代有发展的趋势，这点与法国不同。但就我们对它的后期历史的有限知识所知，它从未发展到如法国封建法学家们所确定的那种程度；的确有许多无法权根据的领地，这在卡斯蒂尔尤其普遍；最通常的情况是地产与法庭混合，但即使是这种情况，许多古代的专利权和特殊的服务项目都没有实行。领主与农民和睦友善；事实上，当王权衰微之时，地方长官的庇护会吸引许多移居者。^[12]领主一般仍然占有森林和牧场，耕地则变为佃租关系。像在葡萄牙一样^[13]，领主的收入得自各种捐税、让渡什一税以及磨坊、面包房、酿酒坊和旅店等专利以及其他事项，至于出售土地和房产的强索和其他中古时代封建法的残留就更不在话下了。过去的货币混乱使交租和支付产生麻烦（常常用实物代金，不像法国现在那

样用现金支付)。在正常的情况下,领主要求其下属缴纳生产所得的十二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但在巴伦西亚却高达三分之一。各王国执行这种制度差别很大。在比斯开和吉普斯夸,领主拥有领地较少,而在加利西亚,这里虽然是“正统的修道院领地”^[14],但王室领地很是普遍,这两种情况均与巴伦西亚有所不同,巴伦西亚是世俗领主的天下,这里的世俗领主恶名昭著。安达卢西亚的条件可能也很苛刻,这里有最大的庄园,但科尔多瓦的条件似乎比塞维利亚更苛刻些;旧卡斯蒂尔有些乡村里的佃农会突然被赶走,他们比其他地方更无保障。1716年以前,阿拉贡的领主是唯一对下属拥有生杀权的,起码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加泰罗尼亚的领主比较地说不太苛刻,虽然这里的世俗贵族获得特别大份额的什一税。西班牙的领主统治不限于农村,因为大部分的自治市镇是由贵族或其委任的人管理。在这种富含利益和权力的混合体中,似乎有一个很突出的普遍特征:据说贵族们犯的真正的经济罪就是“希望不要妨碍他们管理自己的庄园”^[15]。无疑,此时更尖锐的问题乃是大部分领主包括教士和法官都对少数的最高贵族阶层表示屈从,这一阶层的政治野心的死灭,对了解本章所叙述的时期的混乱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卡斯蒂尔,王室的权力是绝对的,起码理论上是如此,对国王权力唯一的限制是在他登基时所作的誓言,保证维持王国的根本法律。1700年时西班牙议会还有6个,但均无政治权力:卡斯蒂尔议会自1665年以后直到1700年就没有召开过;加泰罗尼亚最后一次召开议会是在1640年,巴伦西亚在1645年,阿拉贡在1686年。在另一方面,阿拉贡王国和纳瓦拉王国,加泰罗尼亚公国和巴斯克公国则有另外的代议机构,仍然很活跃。这些王国或公国拥有割据的自由和一定的税收权力。仍然是卡斯蒂尔照应全国的政策,是国王及其议会的永久所在地,负担也较重。在王权薄弱之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权力真空,被最高级贵族和教士所策划的混乱所填充。17世纪80年代期间,出现了由卡洛斯二世的母亲奥地利人玛丽安娜(1634—1696年)与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皇后轮番策划的阴谋。后者年轻,又没有多大主见,甚至在1679年嫁到马德里之前就被灌输了对其未来婆婆不信任的思想^[16],成了她的侍从女官满怀心计的特拉诺瓦公爵夫人的感情俘虏。作为侍从女官,公爵夫人在背地里争权夺势,比王室的忏悔牧师的权势还大。宫廷里的流言蜚语,或对虚荣心的中伤,或是别有用心的诽

谤，最经常提到的就是王位继承的问题。卡洛斯4岁登基，生命无保证，也无治国能力。他是个可人儿，很孝顺，隐隐约约地想当个好国王，偶尔在识别人方面也表现出一点精明，但他毕竟是优柔寡断的，迷信的，受他母亲控制的，所受教育也极其肤浅。他身体不好，时发羊痫风，几乎肯定是阳痿，可能是营养不良所致，这是由于哈布斯堡王室成员遗传的牙床变形，食物不嚼而咽造成长期消化不良而引起的。他难得消遣或有什么兴趣，偶或打猎，仿佛这是国王的职责所在，长年浑浑噩噩，无精打采，除了虔诚参加宗教礼拜，或参加大臣们简短的令人厌烦的会议外，几乎不理朝政。

西班牙海外属地的情况稍觉开朗^[17]，菲律宾和新近皈依的马里亚纳群岛（拉德隆群岛）过去的确并不有利可图，只有在1696年至大约1736年间菲律宾才第一次显出稍有富余。^[18]加那利群岛与美洲有一定的合法贸易，但更多的是与欧洲贸易，事实上这都是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海外走私贸易，这些贸易通过各种手段发展规模很大，由于安达卢西亚商人的成功，加那利群岛与美洲的贸易受到限制。单是这个原因，在安的列斯群岛出现了几个其他国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也对（西班牙）美洲大陆上一些边境造成威胁。在这些地区，原来由官方派出的传道团和驻军就足以控制当地的印第安人，现在要对付欧洲的入侵者，显然就不够用了。西班牙自己对美洲的贸易已经衰落：开往维拉克鲁斯的商船队（跟主要开往卡塔赫纳的船很不一样）每年运载的货物曾达到8000吨，现在每两年才运载3000吨。然而有大量贸易躲开了西班牙海上交通法规的控制，所以这种贸易下降并不表明西班牙对美洲经济活动的减少。美洲的通货很硬，美洲政府能够支付各项账目。另外，海盗活动总是追着走私贸易而来，这两种灾祸根源现在成了相互为敌的了。因此，到了1688年，英法两国政府不再鼓励各自在牙买加和圣多明各的海盗活动。但是混合组成的海盗船或武装私掠船仍然在海上游弋，西班牙乃于1674年启用私人出资建立的海岸防卫队，扑灭出没于这个地区最可怕的危险。西班牙经多年踌躇之后才承认，这种本性就是为了获得战利品的物质刺激而建立的私人海岸防卫队的。

许多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仍然是欧洲外交交涉中的突出问题，但没有哪一个问题能比供应非洲奴隶契约更突出了——长期以来供应非洲奴隶契约成了一桩罪恶，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西班牙除了能从摩

尔人囚徒中拉走一些变为奴隶之外，在非洲没有其他可抓奴隶的领地，但它可以通过供应非洲奴隶契约买到奴隶，这种契约在西属美洲就是一种短期的垄断奴隶贸易契约。王室当然不会允许让别的主要大国参加，尤其不愿让非天主教国家参加，因为它们对西班牙的垄断和正统的宗教都会产生危险。葡萄牙是传统的奴隶供应者，但它碰上诸多困难不能恢复自己的奴隶贸易^[19]，而热那亚和西班牙的契约签订者们，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就感到奴隶不足，他们从荷兰人、丹麦人手中或从英属西印度群岛买到奴隶。问题的核心是，奴隶贸易必须要有岸上设施，必须要让外国人合法地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接触，而此一经实行，其他商品的非法贸易就很难阻止了。到1685年，西班牙认为与其让荷兰人偷偷摸摸地干，不如让他们当合法供应非洲奴隶的合同商人，这样危险要少一些。于是加的斯的一位荷兰商人巴尔撒泽·科曼斯获准当了供应非洲奴隶合同商西班牙人尼古拉·波尔西奥的破产产业监理人。荷兰代理商在加勒比的港口开业了，荷兰船开赴那里，直到合同结束，虽然在1689年下半年波尔西奥已部分恢复管理，但尼德兰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偿付科曼斯后代提出的债务要求。^[20]这样，供应非洲奴隶契约成了国家间关系的要素之一。

直到1688年，西班牙在它积极进行殖民的“新世界”里——主要是牙买加和西伊斯帕尼奥拉（圣多明各）——没有损失多少领土，但在加勒比沿岸有广大的孤立地区，一任外国商人、海盗和洋苏木斫伐者随意活动。库拉索岛的荷兰人经营委内瑞拉的烟草和可可，他们从圭亚那通过加勒比的盟友接的线，与这些偏僻地区进行贸易，从坎佩切湾把桃花心木、杉木和染料木运往尼加拉瓜的莫斯基托海岸，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西印度群岛的海盗和北美的船主们，在沙洲和珊瑚礁的后面，在清除了杂木的小河两岸，一小股一小股的伐木者们，俨然就是永久的殖民，他们得到牙买加总督的保护。1680年初，有一股英国的冒险家，在洗劫了波托贝洛之后，穿过伊斯莫斯的达里埃地峡，开展了南海海盗活动的新阶段。他们占山为王，肆无忌惮，长期结伙打劫，在后来许多年间，包括法国海盗在内的其他海盗群起效尤。西班牙对他们采取的反击措施，总的来说是颇为有效的，但不能完全防止孤悬海上的船只遭受损失，也不能避免沿海小城被袭击。如果说这些南海海盗活动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严重的话，但海盗活动是发生在西班牙帝国遥远而辽阔的前沿地区受到威胁的时候。1680年1月1

日，葡萄牙在巴西南界推进，直达普莱特河，建立萨克拉门托殖民地，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转向智利和秘鲁。在北美洲，卡罗来纳的英国人已在骚扰佛罗里达的北界，而加拿大的法国人已于1682年4月进至墨西哥湾。

1689年2月12日，玛丽·路易丝皇后去世。她曾明白告知路易十四，西班牙国王无嗣是因为他肾功能不全，但一位新后对某个要求继承王位的人仍然具有权力。卡洛斯在被逼之下不情愿地在可能的配偶中进行选择，他顺从地于6月15日与女王的妹妹、法尔茨·纽贝格选侯的女儿玛丽亚·安娜完婚。新后贪婪成性，结党营私，她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不和很快便爆发了。

国王结婚后不久，西班牙即卷入九年战争之中（见第7章）。要记住这场战争，因为它集中了西班牙的国力，并把它消耗殆尽。特别是1689年5月法国入侵加泰罗尼亚，法国人虽然没有马上长驱直入，但由于卡斯蒂尔的几个总督集结军队，征物征人，这就重新撩起了1687年爆发的那场农民骚动。加泰罗尼亚人有他们的法律，这就是他们所珍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起码他们是部分地恪守的，但这些年来公国境内的劫盗和其他犯罪活动频繁，人们携带武器已习以为常。

奥雷佩沙伯爵（1642—1707年）（“Don”是西班牙对贵族的尊称）曼纽尔·乔基自1685年便任首相，从当时已被贬低的标准来看，他算是一位能干而诚实的人物，有“奥地利派”的倾向。他诚实侍君，国王支持他，但他谨慎地谢绝“宠臣”这个称呼，因为在卡洛斯朝初年尼撒德和巴伦苏埃拉两人的做法使人恶心。^[21]他调整币值，取缔了一些杂税、年金津贴和虚职。整顿严厉执行，收入大部分保证偿还公债。破产商人、受损失的债权人、被革除的官员和被取消年金津贴者联合起来攻击他。战时物价上涨和物资匮乏也使人们怨声载道。一批贵族大臣阴谋结党，强迫身患痼疾、优柔寡断的国王革除奥雷佩沙，王后、母后以及宫廷忏悔神父都加入他们一党，国王乃于1691年6月24日极不情愿地解除奥雷佩沙的首相职务。此时王后的权力成了至高无上的了，至少有关宫廷任免事情确是如此。奥地利派仍然占着优势。顾问和贵族们继续图谋权势。他们策划各种阴谋诡计，如果不看它的问题所在，那就更像是一出滑稽歌剧。例如皱领问题，奥地利派戴皱领，但对手们则喜欢穿着法国宫廷的服饰。这样就引起一场真正的冲突。竞争者当中最赫赫有名的是卡斯蒂尔的舰队司令

[\[22\]](#)，一位非常熟识意大利事务的亲法野心家；另一位是快要退休的蒙塔尔托公爵，是一位国王经常私下与之相议的人物。卡洛斯再不敢倚仗宠臣，时或亲自理政。1692年，出于一时的独立决定，起用圣约翰教团大使曼努埃尔·阿里亚斯，一位能干可靠的人物，掌握实权直到1704年。但国王政府缺乏有效领导达7年之久。驻马德里的大使们都抱怨办事拖拉，评论国务委员的尺度是看他们能否平易近人，或根本无法接触。国王下达的命令通过办公厅转发，办公厅由能干而诚实的阿隆索·卡内罗主持，他在政府各部之间起一定的协调作用，但如果国王的命令与内阁不符，就会有麻烦。随着国王病体日衰，意志益发消沉，不接见任何人，以致最终罢理朝政。此时国务工作如何进行，如何对外作战，如何指导海外事务，这一切通通由政务会议决定执行。政务会议既繁复又拖拉，但政务会议由一批富有经验的官僚主持工作，至少也能办理一些日常工作。

的确，即使在奥雷佩沙下台后，也进行了许多使人惊异的改革。继续攻击津贴金和奢侈的生活成了笑柄，事实确实如此。一方面是孤儿寡妇被取消了津贴金，而另一方面，根据1690—1699年英国驻马德里公使斯坦厄普的记述，西班牙最富有的人物奥森纳公爵每年新得6000比索的年金。另外的一些行政措施则比较有效。1691年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削减政务会议成员和军官，设置省一级的督监以保证岁收。12月25日，商务议事会重新恢复工作，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1692年12月颁行一项法令，扩大1682年的关于允许贵族从事工商业的法令，法令规定对贵族从事工商业不应有任何限制。当时及以后，不同的集团都主张设立对东西印度群岛的特许贸易公司。除地中海地区之外，还有这两个地区也包括在佛兰芒体系之内，这个体系的计划早在约翰·劳之前便把商业与国债管理合并起来，恢复工业，甚至维持海军。成立这样一个西班牙贸易总公司的计划，据说为荷兰人所否定，而控制塞维利亚领事馆的比斯开商人也加以反对。这是西班牙尼德兰总督巴伐利亚选侯的许多失败之一。

长期以来就考虑立皇帝的女婿、卡洛斯二世的外甥伊曼纽尔为西班牙尼德兰的世袭统治者。1685年当他与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安东尼娅结婚时大体上已获同意，而玛丽亚·安东尼娅之子则有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到1691年5月，威廉三世敦促实现这一决定，因为他看到一个拥有重权的世袭总督有助于保卫低地国家，可以克服每3年一换总

督以及由于马德里在任命总督时的延宕所出现的空虚。政务会议有些成员对任命一名同血统的王公代价更大表示痛惜，并怀疑选侯夫人一死，选侯会不会把尼德兰省还给西班牙。卡洛斯于1691年12月12日作出任命，但选侯既未获得自治权也未获世袭权。1692年12月24日，玛丽亚·安东尼娅去世，在确定约瑟夫·费迪南德为可能的继承人之后，他的行为就常常受到西班牙的干涉，他不能保证能否继续他的职位。虽然如此，在1701年3月之前，他还是比其前任能够行使更大的职权。[\[23\]](#)

1692—1694年，国王的命令对国防事务能起一定的作用。1693年2月16日恢复菲利普二世的民兵制度，这主要是考虑到海疆和边境的防务。1693—1694年地方政务会对改进行政管理和巩固防务表现出奋发图强之意，虽然做得并不彻底。地方政务会是一个由最有权力的大臣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这是1692年出现了甚至首都的安全问题时，皇帝的大使洛勃科维茨提出要成立的一个机构。1693年9月蒙塔尔托说服国王划分3个管辖区。蒙塔尔托本人管辖纳瓦拉、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他的两个主要对手卡斯蒂尔的总管和海军上将分别管辖余下的两个区，前者管辖加里西亚和南北卡斯蒂尔，后者管辖安达路西亚和加那利群岛。他们的权力为总管地方法庭、议会和总督，这样一来就全部破坏了各王国的传统和“特权”。最主要的后果是混乱。但政务会发布的法令之一就是中止1694年的年金，扣回各官员工资的三分之一，并要求官员按自己的身份拿出“捐赠”。

当然，即使是最好的改革，也只是说多做少。他们怎么也不能克服这样普遍的困难。而有些改革也的确使困难加深。强征特别税和征兵普遍引起逃亡，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很快便成了逃亡流浪汉。1696年的筹款或付款事实上是放弃了。但1696年这一年却抓了一个基本的宪法问题，这个问题与战争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关于过去两朝宗教法庭滥用民法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卡洛斯治下的权力划分使宗教法庭更加胆大妄为。有人鼓起勇气提出控诉，卡洛斯便组成一个由五大政务会各选派两人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声称宗教法庭滥用职权扩及殖民地，所以委员会受理事务包括印度群岛。1696年5月21日，委员会控告宗教法庭的权力伸到本属国王法庭审理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把与宗教人员无关的民事刑事案件调到宗教法庭，并指出宗教法庭执行处罚既无定则又重罚无度。委员会建议限制宗教法

庭的管辖权限，凡与宗教无关的案件，被告人应受普通法庭裁定。但这一切都是光议不练。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如此软弱又如此迷信，即使是这类僭越司法权限的大事，又有谁不敢大胆去干呢？

如果说苦命的奴隶和某些印第安人的遭遇一如既往，而地方逃亡流浪汉照旧受苦，那么很难说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出现了国内那样的困难局面。1697年以前，法国人一直没有理会西班牙的殖民地，地方的动乱是小规模的，虽然加勒比地区经常由于战争而出现普遍的紧张局势（一贯如此），袭击频繁，边远地区遭受破坏要经过多年才能修复。每年计划开往维拉克鲁斯和卡塔赫纳的护航队比过去更经常了[24]，群岛间的贸易和交通常受干扰，海盗袭击使沿海城市总是感到很不安全。一些法国的海盗，在1687—1688年间一直在加利福尼亚海外劫掠跑马尼拉的大帆船，到1690年时，向南转移骚扰秘鲁沿海。晚至1693年12月仍有一股余匪出没于太平洋上。有关他们活动的报道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却是鼓励法国海军上校J. B. 德热纳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J. B. 德热纳是一位法国海军军官，1695—1696年率领6艘在拉罗什尔装备的战船，企图进入南海进行私掠，但后来却返回了麦哲伦海峡。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清剿非法殖民颇为成功，补偿了在太平洋方面的损失。1689年把200名非法殖民者驱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克拉勃岛，1695—1696年几次征讨坎佩切和伯利兹地区的伐木者。

在伊斯帕尼奥拉，法、西两国的殖民者长期以来就为一条未定边界不停地发生冲突。散居在圣多明各海岸的法国人包括1500名士兵和海盗，但他们宁愿搞点私掠活动而不愿打正规仗。1690年夏天以前，居西总督由于缺乏供应和兵员，很难防止西班牙人抢掠新生的种植园，也不能出击与他的辖地邻近的地区。[25]是年7月8—9日，他的军队在焚烧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莱罗斯之后而遭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次年正月，西班牙海军陆战队同墨西哥总督派出的向风舰队一起重创法军，并洗劫了北海岸的法兰西角。1695年，一队英、西联编的远征队袭击了这个殖民地。其时英国人名义上是由牙买加代理总督比斯顿指挥的，他曾要求他们集结保护，但命令措辞含混不清，指挥官们都不理他。罗伯特·威尔莫特海军上校和卢克·利林斯顿陆军上校谒见国王威廉三世后统率5艘炮舰和2000名士兵从英格兰出发开往加勒比地区。国王威廉三世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对这支抢掠队给予详细的指示。[26]这支队伍与西班牙的“向风舰队”和从墨西哥及伊斯帕尼奥

拉征调来的1600名士兵合在一处。法国人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但他们富有经验的新总督让·迪卡瑟的军队只有2000人，而且南北分散驻扎在4个小镇上。5月，这支联编的舰队出现在法兰西角海外，法兰西角的居民都逃跑了。总督住在太平港西边40英里处，太平港的守军抵抗了半个月之久，联军是在7月中离去的，抢掠了价值20万英镑的战利品，另外还抢走了140支枪、1000名奴隶和900名俘虏。这个港口是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最早的基地，1701年拉巴特神父在这里的海岸巡游时，看到的只有20间土屋和一所木质结构的教堂。^[27]小镇却被烧毁了，联军没有继续抢掠。英军有许多伤员，联军互不信任。西班牙总督获得警告，唯恐英军只为自己而不为西班牙；一心想发财的威尔莫特不能善待利林斯顿，同西班牙人的关系也很坏。圣多明各北部的两个中心对古巴岛进行威胁，而南部的两个中心则威胁牙买加。1694年迪卡瑟曾使这里遭受价值50万英镑的损失（包括破坏50处甘蔗榨坊，拐走1800名奴隶）。在这次战争期间，法国海盗抢掠的大量西班牙硬币流入圣多明各，圣多明各迅速发展成为热带作物生产地是从这些年代开始的。^[28]

疾病和意见分歧，成了1697年法国占领卡塔赫那的预兆。攻占卡塔赫那是由路易十四拥有股份的一家私掠公司计划的，法国海军提供10艘装备有30—90门大炮的战舰，还配备小船，由男爵让德波伊蒂率领。迪卡瑟率领的1000名海盗加入了这支舰队，彼此看不起对方。但卡塔赫那城防薄弱，法军攻城半月之后，该城总督降服。5月4日法军入城。波伊蒂掠夺大批战利品，但部属病号甚众，乃于6月初离开卡塔赫那。在圣多明各时，波伊蒂同意私掠队员与海军官兵平等分享战利品，但没有透露在分给公司商人和国王的份额之后，留给海军官兵的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海盗们获悉他们受骗之后，便重新洗劫卡塔赫那。

战争没有改变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进程，虽然墨西哥城于1692年发生严重的饥荒暴动。走私贸易一仍旧贯，甚至与敌人做买卖。在一些地区，如坎佩切，仓促修建了许多碉堡，并且时不时在墨西哥湾沿海进行搜索，以防法、英的侵扰。1686年，针对拉萨尔的活动而进入得克萨斯东部，由于看到彭萨科拉湾（佛罗里达西部）的条件更好，乃于1693年放弃得克萨斯东部的活动，但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除1694年作出决定在奥里诺科河设防外，在彭萨科拉一带的活动并无更多的建

树。但另一方面，蒙克洛伐伯爵（1689—1705年，秘鲁总督）却能够继续他的前任的努力，在太平洋沿岸各海港设防，并在瓜亚基尔建造战舰，加强南海舰队。在边境地区，时有印第安人叛乱。1692年重新说服智利南部的阿劳坎人接受传教士的布道，但8年后又放弃了这种努力。1692—1696年，新墨西哥总督瓦尔加斯重新征服1680年叛乱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并使他们安居下来。1695—1697年，在国王的鼓励下组成尤卡坦和危地马拉两地的联军，征服佩腾湖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墨西哥）索诺拉北部战争发动之前不久，一位坚强果敢的蒂罗尔人耶稣会士尤西别奥·弗朗西斯科·金诺神父（1645？—1711年）直入加利福尼亚湾进行传教活动，直达亚利桑那。1697年，胡安·玛丽亚·德萨尔瓦铁拉神父不顾一切地渡过海湾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南部，10月在洛雷托建立第一个教堂。1686—1689年，弗里茨（1654—1724年）在亚马孙河上游与纳波河交汇处的奥马瓜斯与朱里马瓜印第安人地区建立第一所教堂^[29]，但在1700—1711年间被葡萄牙的远征队消灭。在这期间，基多地区听讲道的人不得不拒绝捐献，继续支持马拉尼翁传教团，虽然耶稣会仍然维持拉古纳的教堂，这是位于今天厄瓜多尔的瓜利亚加河下游的较早的一个教堂。这些年间，耶稣会为了阻止入侵，开辟一条河道公路，把玻利维亚东部和巴拉圭河流域的亚松森地区之间的奇基托斯各教区连接起来。1717年西班牙政府关闭奇基托斯公路，这就放弃了对传教前哨体系的防卫。按照正常情况，在图库曼及其他地方，西班牙政府承认有责任支持传教前哨体系。但由于非传教殖民对耶稣会控制经济及保护印第安人劳动表示愤懑^[30]，西班牙政府转而赞同非传教殖民一方。在墨西哥北部牧区，为水利权而展开的殖民竞争，进一步暗示天主教会在西班牙人中间有着许多强有力的敌人，非教团教士也不例外。

加那利群岛无战事，仅1690年有过一次海盗骚扰。菲律宾常处于混乱状态，各宗教团体互相诽谤，大主教和总督也互相攻讦，但自从一位专制的主教死后，恰于此时又来了一位好总督，所以菲律宾的情况比较好了。新来的总督支持多明我会向柬埔寨扩展传教事业（1693年），并支持耶稣会试图在帕劳群岛布道（1692年），1708—1712年再继续进行，但没有成功。

在西班牙国内，最直接受到九年战争影响的是加泰罗尼亚。自1690年以后，加泰罗尼亚每年都有战事，法国在其他战场上采取守

势，而在这里则缓慢地但不断地向前推进。像后来的王位继承战争一样，这次战争也是以围攻巴塞罗那而告终。巴塞罗那有马德里三分之一的人口^[31]，拥有一支能作战的手工艺工人民兵，并有一座符合西班牙标准的城堡。1697年8月10日，巴塞罗那向旺多姆攻城部队（2.6万人）投降。确定最后贡金之后，法军才于1698年1月4日撤离。加泰隆人虽然长期与法国人友善，而且厌恶卡斯蒂尔出面干涉，但在法国入侵期间却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他们欢迎西军回来，表现出真诚的欢乐。他们反对拟议中派来的总督，卡洛斯国王接受他们的意见，改派黑森一达姆斯塔特的君主乔治，于是他们对卡洛斯的忠心增加了。乔治是王后的表兄弟，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物，他在后来的加泰罗尼亚战争中率领5000帝国军人作战，表现出色。乔治亲王于2月9日在巴塞罗那宣誓。这对未来事件的发展意义重大。

从性质上看，1697—1701年西班牙的政治历史渲染了王位继承问题（第12章）的国际斗争。帝国、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都参与西班牙朝廷的政治活动，仿佛就是自己的事务一样。亨利·阿尔古侯爵的手腕最为灵活而狡诈。奥地利派理政不善，战祸连年，结果，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各王国，认为由法国人继承王位的意见，即使仍在与法国作战期间，也颇得人心。这个情况对阿尔古侯爵很有利。玛丽亚·安娜皇后本人亲自领导奥地利派。国王长期以来偏向于由巴伐利亚人继承王位，而不是奥地利人或法国人，奥地利派反对。他们也反对托莱多主教路易斯·费尔南德斯·波托卡雷罗（1635—1709年）私下向国王进献的意见。萨伏依使臣对这位主教评价不高，认为他是“一个仅有良好意向但无多大影响的人”^[32]。1696年5月，支持国王和人数不多的巴伐利亚派的西班牙王国母后去世，王后的一个主要障碍消除了。事情发生了。同年9月，国王的精神疲靡状态有所康复，经波托卡雷罗的劝说，承认巴伐利亚的约瑟夫·费迪南德亲王（1692—1699年）为继承人。此外，他还重新起用法国派的劲敌奥雷佩沙。但这两项行动都是在王后患重病期间执行的。及至王后康复，大约一个月后，奥雷佩沙再被免职，国王的遗嘱亦被取消。1697年秋，皇帝请求她设法让奥雷佩沙复职，以便有一位奥地利派的支持者身处高位。但王后不喜欢他，对皇帝的请求采取拖延办法。波托卡雷罗此刻已是红衣主教，并转而成了法国派，于1698年3月2日促成撤换皇家忏悔牧师，改由一位同情法国的神职人员担任，王后这时才着了慌，急忙恳求国王召回奥

雷佩沙，国王同意召回，但这时波托卡雷罗已有了一位让国王的良心听话而拥护自己的人了。10月9日，在朝觐前，此时王后正在教堂，波托卡雷罗、教皇的使节，还有其他大臣联合觐见国王，极力说服国王注意马德里的常驻军实属危害公共和平，因为他们是在加泰隆人战争期间由黑森—达姆施塔特招募来的德国骑兵团，他们的存在破坏了传统的民政制度。他们的真正目的当然是害怕王后党会利用这些常驻军来阻挠法国派的活动。王后回来后，卡洛斯建议说，为了顾全德国人的面子，可由王后提出由他请求把骑兵团调驻巴塞罗那。王后听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国王只好让步。但她的支持者警告她，将来如再这样，会刺激国王致死，而她也就危险了，故当波托卡雷罗命令骑兵团转驻托莱多，她便没有表示认真的反对，这样就只剩下三营兼职的皇家卫队驻守马德里了。

然而法国派的胜利仍然不是肯定的，因为奥雷佩沙支持约瑟夫·费迪南德。当国王得知第一次分割条约签订消息后（10月11日签订），奥雷佩沙说服国王复立约瑟夫·费迪南德为唯一的继承人。1699年2月6日费迪南德去世，人们认为奥雷佩沙会把卡洛斯推向哈布斯堡大公查理。西班牙人民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马德里的居民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德里的公共秩序混乱不堪，卡洛斯难得离开王宫到群众中去。有时去了，“据跟随他的随从说，曼萨纳雷斯河边的洗衣妇们和那些小孩子们会跟在他后边喊叫‘变童’（同性恋者）……而最难听的辱骂则是对王后喊的。她马车旁的警卫没有一个去斥责辱骂者”^[33]。帝国大使哈拉希伯爵的日记记载说，1698年8月，街上有弹吉他者唱双行诗，攻击王后和奥雷佩沙。对“奥地利”王后不敬，早就公开了，甚至在她入嫁西班牙之前，暴民们即在王宫窗前高呼：“国王万岁，虐政见鬼去吧！”^[34]目前到处饥荒，朝政紊乱，卡洛斯长期因病幽居，马德里的确出现了危机。饥荒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粮商的操纵，可能是市政官员的默许，有谣言说奥雷佩沙是罪魁祸首。1699年4月28日，一件小事引起一场暴乱，人们袭击大臣的官邸，在王宫前举行示威。政府立刻任命波托卡雷罗一派的弗朗西斯科·龙奎略为新的警察长，并承诺进行另外一些改革，这场暴乱才平息下来。国王再次无可奈何地罢免奥雷佩沙和其他反法国派的成员。自此以后，波托卡雷罗权力独专。

海外发生的事件同样反映出外国已认识到西班牙的软弱。摩洛哥的苏丹攫取了北非的几处堡垒，不断袭击休达，但没有攻下。^[35]在印度群岛，外国人的贸易愈发公开了。佛兰芒人在他们巴伐利亚人总督的庇护下，恢复从前的计划，而且还组织新的贸易活动，打进印度群岛和几内亚，其中一些活动不得不使马德里加以认真考虑，但结论是他们比外国人的无执照贸易的危害略轻一些。加勒比到处又出现了荷兰商人，他们运载的货物常有汉堡商人的投资。1698年的夏天，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南海公司向法国政府注册立案，获得30年的特许权，在没有欧洲人势力的太平洋沿岸及海岛地区进行贸易。南海公司的主事们有身居海军要职的行政和财政官员，其中有刚刚创办中国公司的巴黎的让·儒尔丹，还有圣马洛的诺埃尔·达尼康。南海公司成立后，1698—1701年古安·德博歇斯纳成功地组织了对智利和秘鲁的贸易远征。^[36]九年战争之后，法国也恢复了他对墨西哥湾的关注。伊贝尔维尔对路易斯安那的窥伺，西班牙早已注意到了，墨西哥总督率军进入彭萨克拉湾，于1698年11月建立圣卡洛斯德奥地利堡。两个月后，伊贝尔维尔终于来了，在此关键时刻，西班牙的友谊对路易来说是重要的。伊贝尔维尔继续进军，在彭萨克拉和莫比尔西边的比洛克西湾建筑了一个小堡。^[37]

同时，苏格兰人侵入达连。1695年由苏格兰议会发给执照的“达里埃公司”开始行动，这是一家伦敦和苏格兰合资经营的公司，由威廉·佩特森领导。在苏格兰当局的指示下，该公司希望设法谋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因此掀起轩然大波，对此有利害关系的人制止了大部分英格兰的支持者，并对英王威廉施加了影响，佩特森乃转谋中美地峡。1698年7月，1200人分乘5艘战船第一次驶往阿克拉湾（今名喀里多尼亚湾，西班牙文称苏格兰湾）的黄金岛。11月初，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新爱丁堡”殖民地开始进行贸易，并与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关系。但威廉三世不想无缘无故地去触犯西班牙。1699年1月2日，他命令各英格兰殖民地抵制苏格兰殖民者。西班牙方面很快便组成一支军队，反对苏格兰的殖民。2月间，发生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苏格兰殖民者由于内部互相猜疑、饥饿、疾病和贸易不顺利，加上西班牙人遣兵调将的消息频传，殖民者大为惊惧，许多人逃跑了。6月20日只剩下400人。8月和9月，苏格兰开来了一支接济队伍，但1700年2—3

月间，12艘西班牙战船和1000名兵员前来对苏格兰殖民者施加威胁。经过谈判体面投降之后，苏格兰人于4月8日登船开走了。[\[38\]](#)

至此，西班牙国内已临近收场时候：国王差不多卧病不起，所服猛药，简直可以把一个茁壮的人致死。围绕他周围的是各派各系的压力，没完没了的求索，像一处驱魔捉妖的道场，使他的精神完全垮台了。《第二次分割条约》把他激怒了，法国派通过忏悔牧师向他进行良心劝诫，无情地戳伤了他的感情。[\[39\]](#)10月2日他签署了一项遗嘱，把一切传给昂儒的菲利普（1683—1746年），条件是法、西两国王权永远不能合并于一人之手；3天后又公布一项遗嘱附录，表示希望他的继承人完成他毕生的希望，即把西班牙王国置于圣特里萨保护之下。10月29日，他指定了一个摄政会议，王后任主席（表决权有限制），其余的有波托卡雷罗、阿里亚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塞哥维亚主教巴尔塔萨·德门多萨）和另外3位成员。1700年11月1日，这位消耗殆尽、39岁的国王死了。

宣读遗嘱，帝国大使显出讥讽的态度，一位信使被派出急告路易十四。摄政会议内部马上发生争吵，但在未得凡尔赛宫的任何表示之前，只是空吵一场而已。除了这点谨慎之外，11月16日还命令墨西哥舰队在未接到另外的指令之前，仍然驻防维拉克鲁斯或哈瓦那港。路易决定接受遗嘱。[\[40\]](#)11月16日凡尔赛宫以他特有的新方式介绍他的孙儿。他一面为菲利普作好未来即位的准备，一面直接指示西班牙摄政会议的工作。他给他驻马德里的临时代办布莱康特的第一道指令于11月21日送达马德里，指令说法国派出的陆、海军防卫西班牙的全部领土。11月24日于马德里正式宣布菲利普将启程前来西班牙，他于12月4日离开凡尔赛宫，1701年2月8日抵达马德里，在边界线上他明智地遣回所有法国随从。

此时路易接手管理西班牙事务，由阿尔古传达他的指示。阿尔古是一位能干而又有经验的大使，很得西班牙的显要贵族的信任，又能管束马德里的法国同胞。[\[41\]](#)在菲利普抵达马德里之前，纽贝格的玛丽亚·安娜已迁往托莱多，奥雷佩沙已被放逐，宗教法庭大法官返回塞哥维亚住所，没有明确表示忠心的大臣已开始被撤换。就在菲利普抵达马德里前后，撤销了原来的摄政会议，成立新的内阁会议。新国王年轻胆怯，仅17岁，一切行事就像卡洛斯王朝最后5年时一样。国王

日常发布的旨谕，都是私下交给内阁会议秘书处，这是很不得当的做法。因此新内阁处理事务，每天早上波托卡雷罗和阿里亚斯都得参与国王与内阁秘书的私人会晤，自1701年9月以后，法国大使也参加这种会晤。与此同时，王宫里也进行一些改革，国王迁往隐乐宫（布恩里蒂罗宫）。

卡斯蒂尔人曾经表示赞同菲利普，这是有道理的。西班牙人一般都不喜欢法国人，但故王的遗嘱却写得明明白白，而菲利普就任后表现良好，他的登基驱散了分割西班牙领土的阴影；至于显要的贵族们，可能还有地位较高的贵族的大部分，大都倾向于赞同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因为他们了解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处境，路易十四在法国正是利用这种情况而削弱旧贵族的势力的。许多人则害怕对奥地利派实行报复，有些人已经抱怨波托卡雷罗剥除了他们的职位或对他们作难。尽管如此，卡斯蒂尔的贵族或表示赞同，或保持沉默。阿拉贡王国比较明显倾向哈布斯堡王室，但即使这样，意见仍然是不一致的。总之，阿拉贡王国的倾向有多少出于对传统的特权和感情的忠心[\[42\]](#)，无从确定。

巴塞罗那于1700年11月8日获悉卡洛斯死讯，按照习惯，暂停法政，召开百人议会。会上立刻出现分歧。皇家法庭内部大部分的人和那些其职位依靠国王或被国王看中的人忠于波旁。议会成员和巴塞罗那市政官员大多是自由特权的坚定的保卫者，他们认为在哈布斯堡之下比较安全。但是没有职权的人则盼望来一次大叛乱。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农民、牧民和半游牧的山民的情绪显得最为极端。11月30日，巴塞罗那接到议会的指示，要求给宣布的新国王举行庆典，巴塞罗那市明确地提醒总督，认为这是违反惯例的，按惯例新国王应亲自前来宣誓就任，然后才举行庆典。后来1701年1月9日皇家法庭承认菲利普的地位时，巴塞罗那市表示抗议。1701年1月，菲利普免除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总督职务，如果考虑到德国亲王的贵族关系，还有他对加泰罗尼亚的抗议表现出的宽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很得人心，而由一个还没有在加泰罗尼亚宣誓的君主执行任免，是违反当地的特许权的。2月2日宣读菲利普的谕旨，换来了一片愤怒声。2月24日，菲利普威胁地明白表示对特许权的意见，但答应将履行正式仪式。28日，议会在抗议下决定接纳宣誓就职，因为这是有先例的。新总督帕尔马乃于3月2日就职。

西班牙现在有了一位国家领导人。即使在这时，控制权最后还是在凡尔赛宫，但凡尔赛力量较量的结果还得取决于马德里各派对立势力的影响，其中有些人明哲保身，持谨慎态度。从一开始就相信年轻的国王是决策中的消极因素。他有才智、温文尔雅、好心肠，但也容易激动、天真，喜欢别人奉承。他很快就显出忧郁和懒散，虽然后来证明他很固执，但不是那种病弱的人经常所表现的反常的顽固。就他的国王身份的任何方面而言，他就像一位最傲慢的显要贵族一样地敏感和固执己见。他欠他臣民不少情，特别是在他起来反对他的祖父的斗争中。他很快就反对他爷爷了。

在这个落后而情况复杂的国家，充满着仇恨，许多可怕的问题都迎着他来了。数年里这些问题一直是法国外交函件中讨论的主题。最急迫的当然是公共秩序、财政和国防问题，但另外两个问题尤其引起法国注意。第一个是教会问题，教皇通过他的使节和法庭干预西班牙的政治和司法，教皇开征捐税，控制任免、让授、赦免和出卖免罪状；此外还有关于国王认可权的争论，即国王对教皇新颁的训令、敕书、通谕等先行认可。诸如此类的问题，曾使16世纪哈布斯堡王室担心，现在同样使波旁王室担心。宗教法庭摆出一副陌生的面孔，公开议论一个躲避斗争的国王，使新立的国王感到震惊。其次是拖沓的立宪政体，必然不随波旁君主专制的心意。“西班牙”是几个独立自主的管辖区域的集合体，每个管辖区域都有自己的司法和政府，对王国的关系，各自的地位不同，仅仅是一种菲利普主盟下的个人联盟。问题与其说是各地法律千差万别——法国法律更是五花八门——不如说地方的对抗机构太多，国王无法控制。事实是这样，巴斯克各省以及纳瓦拉王国，根据法律虽然是独立的，但长期以来却满足于受控制的地位，就像是隶属于卡斯蒂尔一样，而它们的宪法地位则从来不受侵害。1701年菲利普确认纳瓦拉的特许权，此后又曾两次确认吉普斯夸的特许权（1702年、1704年）。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对捐税，对西班牙王国的捐献，对军队和驻扎“外国军队”等仍然具有很大的控制权，并有自己的司法；加泰罗尼亚对这些方面则具有几乎完全的控制权，也有自己的司法。至于公共职务和其他方面，阿拉贡人的独有权是在卡洛斯二世时获得的。在卡斯蒂尔本身，法国人不喜欢臃肿的各级议会，它们办事拖沓，又回避责任，对改革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群错综复杂的堡垒，保守的卡斯蒂尔人在其间可以大耍花招，击败国王的旨意。

傲慢和敏感的西班牙人即使是对最得体的干预，也会感到愤懑，但新来的法国顾问们几乎没有谁去迎合西班牙人的脾气。这些年来，法国政策不灵活，就要怪这些法国人。路易十四接受阿尔古、夏米亚尔和他们的女监护人德·梅因特侬夫人的意见，认识到必须对西班牙人的敏感性忍耐一二。例如，1701年2月他派遣了一支由德·科特洛贡侯爵率领的舰队前往美洲，在阿尔古的建议下，他就指示科特洛贡要尊重西班牙指挥官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纳瓦莱特，服从纳瓦莱特的指挥；后来，路易十四要提升科特洛贡，级别超过纳瓦莱特，他特意给科多派了10艘军舰，并擢升他为中将，以便他指挥而不使纳瓦莱特生气。

菲利普即位的前几个月间做的事情不多，做的事也是与美洲有关。西班牙的官员们抗议1月5日的命令，该命令同意法国军舰前往美洲港口，有权用现金购买必需品。路易厚着脸皮向西班牙保证说，他将严厉惩治那些敢于在西班牙港口进行贸易的官员，但他的船需要对船上的东西进行调整，卖掉“无足轻重”的东西，买回供应物品，就像他们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所做的那样。军政会议接受路易的保证，3月28日发布一项命令，把这消息告知美洲官员。贸易法因之无法实行。由于西班牙官员不能在法国战舰或私掠船上搜查或设置警哨，而这些法国船舰在后来运载大量商品前往美洲并公开出售。1702年由达尼康武装的两艘马穆安船抵达太平洋海岸，马德里一再提出抗议，最后于1717年派出一支惩罚性远征舰队，而在此之前，据认为至少有150艘船望帆而至。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3艘由一名指挥官率领的法国船领有执照。^[43]1707—1708年，法国政府承诺停止这些航行，但它需要硬币支付军费，所以就经常破坏外交承诺。1711年，尽管此时的贸易已显出商业性的迹象，西班牙颁行了更严厉的禁令，但证明与过去的禁令同样无效，大部分回航的船只，有时（1708年以后）经由太平洋而到达中国。南海的贸易一向不许法国非洲奴隶供应公司参加，该公司的利益因而受到一定的损害。1701年法国几内亚公司接管葡萄牙卡其奥非洲奴隶供应公司，为期10年，该公司于1696年7月不顾印度群岛会议的反对，签订了为期6年的合同。^[44]法国人在公司已经拥有大量股本：在改组后的法国公司中，法国和西班牙国王各占四分之一的股份。合同包括一项新的规定，允许使用所有大西洋港口，这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向合法奴隶贸易开放，公司的船只，可能都是法国军

舰，可以在法国港口卸货。这两点都是不顾印度群岛会议的反对而被认可的，虽然留有很大余地可进行详细解释，但问题的解决总是不能对公司有利。事实上，路易十四在西印度群岛只有3个大目标没有达到：占领彭萨科拉；分割伊斯帕尼奥拉；在美洲合法护航。^[45]早在1701年3月23日，路易十四声称法国必须占领彭萨科拉，至少也得暂时占领，不能让英国人挤进来。7月，他强调西班牙人无力防守彭萨科拉。西班牙议会承认有此危险性，但回答中对法国是否有权染指卡宴表示怀疑。早在1702年，路易即在莫比尔湾比洛克西和彭萨科拉之间设防，这是法国最大可能做到的一步。西班牙仅仅提出抗议。路易在伊斯帕尼奥拉和护航问题上也没有获得多少成功，虽然进行了多年的谈判，有时也允许对个别的船队进行护航。

1701年6月，一场欧洲战争的威胁逼近了，路易发布的信函早已使用命令形式，派遣的使者也是传达他的命令。他开始对付尼德兰的新总督贝德马尔侯爵，将佛兰德议会撇在一边。1702年，他命令废止了佛兰德议会。1701年6月18日，他强迫西班牙极不情愿地与葡萄牙结盟，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对普拉特河以北地区的主权。^[46]此外，遵照路易十四的旨意，法国的公爵贵族在西班牙取得与西班牙最高贵族同等的身份。路易坚持，凡有关西班牙教会和国家最重要职位的任命，都要经他复审，这激起西班牙高级贵族极大的愤慨。愤慨归愤慨，他们又不得不请凡尔赛宫给他们施恩。路易的确没有为那些涌到马德里来求职位的法国人负责，但他对那些引起他注意的事往往插上一手，他这就得为那些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事承受责备。据菲利普的密友、博维利埃的提名人洛维尔侯爵认为，法国人创就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他们任职的人数不多，而且检点慎言。^[47]阿尔古告病于11月回法国，他已经没有了影响，但最重要的是路易没有任命德马雷为顾问官，而是选中了刚愎自用的财政专家让·奥里（1652—1719年）。这个任命于6月22日公布。让·奥里之被选中，也是波托卡雷罗与洛维尔提出的。红衣主教使法国人误解了西班牙人的顺从性，洛维尔的信函充满了对卡斯蒂尔人的轻蔑。在凡尔赛宫，托塞和博维利埃受了急躁的洛维尔的鼓励，推行过急的政策。^[48]

奥里的紧急任务是准备一份备忘录，说明王国的税收需要改进，但在路易批准之前没有向西班牙大臣们提出任何建议。他的报告于1702年年底已经拟就，他的建议简直就是把法国的一套行政办法照搬

过来。他坚持认为一个有效政府的主要障碍在于它的政务会议制度本身；当政务会还是贯彻执行国王政策的主要工具的时候，在卡洛斯二世时却已经由高级贵族接过去了，并成了反对改革的积极机构。奥里判定，直接侵犯他们的权力对新王朝太过危险，不如建议大大增加政务会议的人数，这样可以引荐忠于国王的新官员，并且仍然起着幕帷的作用，在它的遮掩下，可以进行其他需要的改革。同时，在现存的国务秘书处体系的内部，应该成立以法国国务院为模式的内阁，以取代作为行政机构的政务会议。对于国务秘书处，路易十四强烈劝告他的孙儿一定要保留政策决定权。这无疑是后期波旁王朝行政的生长点，虽然当时奥里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现存的行政机器稍稍润滑一下。他比较迅速地设立起诉讼程序，重新获得多年来国王无从过问或被偷窃的千百项租让和其他财政权益。卡洛斯曾于1674年和1695年两度命令设立这种诉讼程序，但均无结果。1707年菲利普设立联合会议，这个机构行事达10年之久，但它没敢触动废除领地这个真正困难的问题。^[49] 菲利普还建立包税制，1706年的烟草包税收入5倍于昔。对盐和印花征税与对羊毛出口征税同。卡斯蒂尔的执照税加倍征收（这是奥立伐尔斯希望予以废除的可恨的“百万税”）^[50]，又实行捐献办法（名义上自愿，实际上按纳税能力摊分），或停止发放年金（可节省大笔钱财），从而获得巨大收入。此外还采取许多古老的敛财之术，如出卖美洲殖民地官职和贵族头衔等。也像法国一样，凡属征捐收税之事，执行起来自有许多偏私不公，这都是免不了的了。但是，仅在几年之间，由于财政上了轨道，西班牙有了一支真正的军队，编制、军容、武备和训练均按法国模式。

在西班牙，像安达卢西亚人、埃什特雷马杜拉人、加利西亚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等，虽然具有军人气质，但在1700年间，从前那种第一流军团的气势已荡然无存。从佛兰德撤回的最好的步兵团，1704—1705年间在收复直布罗陀战争中打得非常英勇，但损失惨重。拖欠军饷和缺乏训练是军队缺乏战斗力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任用军官凭个人偏好，而被任用的军官往往不屑于进行必需的基础训练。在一个把社会声望看得过重的国家，当兵已被人轻视，菲利普成功地大大纠正了这种情况，虽然他不可能提供具有激情的军官，也不可能把他的步兵提高到配备有优秀军官和具有进取精神的骑兵的水平。他的骑兵强烈要求获得下级贵族的身份。菲利普于1704年11月8日发布的一项政

令中提出他的基本革新，规定凡20—50岁的男人必须服军役，可同时又开列了一长串豁免名单：教师、拥地较多的农民、公证人以及宗教法庭的某些成员，但不包括贵族。因为按照传统习惯，他们要供应“兵器和马”。这是后期波旁王朝军队的基础，虽然目前使人失望。

^[51]晚至1711年，一位萨伏依的评论家^[52]指出步兵中一些仓促成军的情况，此时步兵已有116营，但有略少于四分之一的兵员系外籍军人；他还指出骑兵团和龙骑兵的2万匹安达卢西亚良种战马每年置换约半数，实属浪费。菲利普还向法国非洲奴隶供应公司筹措资金，以维持一支皇家卫队。事实上他要求该公司能提供大笔资金以支付王室的各种开销，包括法国部长和顾问们的年金。^[53]但即使在1706年，法国公司本身如果不借债就不能履行满足西班牙财政要求的责任，可法国政府的压力是不能抗拒的，就像过去那些年月一样，得把现金送去让菲利普发军饷。

路易十四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决定要菲利普娶勃艮第公爵夫人之妹萨伏依的玛丽亚·路易莎为后。其时，玛丽亚·路易莎年仅13岁，但很快便显出她的早慧的个性：机智、勇敢、果断。路易希望她摆脱她的机智而狡猾的父亲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以及波托卡雷罗和其他西班牙高级贵族的影响，乃选定年长的于尔森公主，即特雷莫伊尔的安娜-玛丽（1635？—1722年）做她的宫廷主管。公主可能是当时欧洲社交界最有才能的女人，在罗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54]，很快便获得王后的倾爱，后来也赢得菲利普的爱慕。她尽力把欢乐引入沉闷单调的西班牙宫廷，演出法国戏剧，1703年第一次邀请意大利歌剧访问马德里，花钱不多修饰了王宫，并布置了隐乐宫的花园。但是她也像王后一样，她的兴趣完全在政治上面。这两位女人使菲利普获得了他所缺乏的坚定和活力。最重要的是她们虽然都不注重西班牙的呆板的礼节，但都忠于西班牙。公主有着为法国利益服务的愿望，但绝不能以牺牲西班牙为代价——她就是这样看的。

菲利普一直推迟访问阿拉贡诸王国，它们开始怀疑他不考虑遵从它们的习惯。加泰罗尼亚人特别震惊，因为菲利普已经通知于1701年8月16日前往访问，但他又通知于9日召开议会，在他未曾亲自宣誓接受为巴塞罗那伯爵之前，他召开议会是不合法的。同时，除非国王亲自主持议会开幕，否则议会也不具合法职能。加泰罗尼亚人因此准备接待菲利普，但推延召开议会。菲利普可能是对惯例不清楚，而不是不

考虑他们的惯例。9月17日他在萨拉戈萨举行宣誓，但在返回之前，没有召开议会。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以及于10月2日抵达之时，他遵守一切习惯。现在他是合法的国王了。菲利普遵从一切习惯，是针对一场那不勒斯人的阴谋而这样做的。他派出了军队，但进一步的行动要等他是否能使议会满意而决定。经过长时间的热烈交换意见，菲利普同意了他们提出的几乎是全部要求，特别是他放弃了要在他们的王国驻扎军队。他还封给他们头衔，给巴塞罗那具有自由港成分，有权每年派遣两艘战舰前往美洲，“只要不损害塞维利亚城的权益”。巴塞罗那同意在6年期内交纳600万里亚尔。

菲利普转往那不勒斯，自查理五世退位以来，没有一个西班牙国王访问过那不勒斯王国。西班牙人讨厌他们的君主走出半岛以外，但菲利普希望亲自处理那不勒斯的动乱。压抑和敏感的那不勒斯人曾于1701年9月举行暴动，响应马克切亚亲王和他的同谋的呼吁。他们的叛乱是由罗马策划的，并得到维也纳的谅解，那不勒斯仍然怀抱着对奥地利的同情，这在1707年欢迎帝国军队的到来时充分表现了出来。当菲利普在那不勒斯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策划第二次阴谋，这次阴谋的目标是要菲利普的命。^[55]他访问那不勒斯，凡尔赛和马德里本来都是强烈反对的，洛维尔前往凡尔赛说服持反对意见的阿尔古，路易最后同意菲利普的访问，但王后不可陪同前往。4月8日，菲利普登上法国战舰前往那不勒斯访问。据认为菲利普不信任法国政府始自这次风波。^[56]

新后玛丽亚·路易莎仍然在萨拉戈萨，4月27日，在宣誓维持原来的法律和特权之后，她主持了阿拉贡议会的开幕典礼。她看出阿拉贡议会的情况相当紧张，就像加泰罗尼亚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她接到菲利普的指示，要她火速前往马德里，因为那里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了。这时议会的辩论仍在进行中，她因此在议会通过10万比索的补助金之后，着令议会休会两年。就她自己而言，她是满意的，但法国人一想到议会在讨论通过补助金时的不满，还是心有余悸。从此再没有召开阿拉贡议会了。1702年6月30日，玛丽亚·路易莎到达马德里，显得与众不同，她没让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由于她的坦率的友好表现，很快便赢得马德里人的心。举例来说，她可以在王宫的阳台上向民众宣读她丈夫发来的急件。当然，她不能消除民众对波托卡雷罗的憎恨，民众特别恨他秘密地和法国打交道；她也不能缓和在高级贵族

中间对波托卡雷罗的不满。7月间，英、荷联合进攻加的斯，其时安达卢西亚的军队和财政都已转向了那不勒斯，她几乎是单独集结卡斯蒂尔的力量进行抵抗。这是西班牙人在波旁王室统治下第一次严肃地显示出民族感情。[\[57\]](#)

王位继承战争（第13章）占了西班牙历史10年的篇章，它在国内留下了内战的伤疤。但在1704年6月以前，半岛上的战事规模不大。菲利普于1703年1月从意大利回抵马德里之前视察了米兰前线。另一方面，西班牙贵族的抱怨和对反抗的消极态度以及原来的官僚主义均有增无减，而且变得积习难改了。洛维尔的毫无策略的蛮劲，加深了西班牙人对法国人的做法和压力的愤懑情绪，何况洛维尔还与宫廷女侍、公爵夫人交恶。路易在选派使臣方面也没交好运，每次派出的使臣都想利用他们在国务秘书处中的席位当上实实在在的首相，所以他们与竞争对手奥里和他的女保护人于尔森夫人总是协调不起来。于尔森夫人于1703年与专横跋扈的埃特雷红衣主教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争吵，并把洛维尔挤走了。埃特雷正式由他的侄儿接替，但新红衣主教并不像公爵夫人希望的那样，同样不尊重公爵夫人。路易十四对马德里的法国人之间的争吵丑闻感到厌烦，又受玛丽亚·路易莎的父亲的行为所刺激[\[58\]](#)，乃于1704年3月召回公爵夫人，6个月后又召回奥里。西班牙这时亟须法国的军事援助，这使得路易可以随意行事，而玛丽亚·路易莎则仍然是感到沮丧。泰塞元帅是在贝威克公爵与王后发生不和之后从后者手中接管西班牙军队的指挥大权的，他看到公爵夫人获得凡尔赛梅因特侬夫人的有力支持[\[59\]](#)，他就很有分寸地对王后的态度提了一下。1705年4月路易十四终于让步，在凡尔赛宫召见公爵夫人给予新的指示，同意她在将来选择西班牙大臣时可以自行决定，除非是路易亲自举荐，否则可以不考虑法国朝廷的意见。路易向来不信赖妇女影响朝政，这次是对公爵夫人的政治才能超常地肯定。8月，公爵夫人返回马德里。这时不仅早在5月间返回马德里的奥里在她麾下，就连头脑冷静的、足智多谋的新任大使米歇尔·阿梅洛（连任直到1709年）都隶属于她。波托卡雷罗已于3月间被迫离去，返回托莱多重当主教。入阁的新人物都是她所属意的。1705年7月11日，设第二个国务秘书职，负责国防和财政，由何塞·格里马尔多担任，这是实行奥里改组中央行政计划的第一步。同年委任陆军监察和军政监督，卡斯蒂尔舰队司令亡故，该职仍然空缺。不久，其他的高级贵族都被

贬黜，新政权开始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结果。然而在1706年间，菲利普不得不撤出马德里并把他的珠宝送到法国筹款，新政权的运气到了最低点。

1705年以前，尽管有帝国谍报人员活动，尽管在1700年因迫害被定为奥地利派的人引起了地方上强烈的愤怒，但菲利普已牢固地掌握了东部各王国，甚至在1704年5月黑森—达姆施塔特率领一支英荷陆战队于巴塞罗那附近登陆，也未能把加泰罗尼亚人发动起来举事。然而，1705年8月22日，当查理大公在同一地点登陆时^[60]，却煽起了一场农民叛乱。9月和10月间，巴塞罗那抗击英国和帝国的联合进攻时，边远的加泰罗尼亚城市却宣布拥护查理，领导他们的是巴塞罗那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区小贵族。资产阶级分子们指望英国海上国家给他们的好处会多于法国与他们竞争的商人。小贵族们则能够团结农民、牧民、僧侣和低级的教士。这样，无论在加泰罗尼亚或在巴伦西亚，支持菲利普的是比较少数，他们是高级教士、为数不多的大贵族以及高级官员。在巴伦西亚，仅在不久以前，即1693年已爆发了罢租事件，因而王位继承战争已更多地具有社会斗争的色彩。但到了12月16日，当巴伦西亚城宣布拥护查理三世时，竟有一些显贵们参加。阿拉贡的情绪没有这样激昂，但拥护查理的革命也在当地发展起来了。1706年在萨拉戈萨宣布查理为国王，这是拉米伊战役之后不到一个月的事，这无异于宣布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也加入大同盟。同年稍后，阿利坎特、卡塔赫那、伊比扎和马略尔卡岛向英国舰队投降。1708年8—9月以前，英国没有为查理三世占领撒丁岛和米诺卡岛，但在1706年，议会在巴塞罗那重申撒丁岛、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自来就属于阿拉贡王国。1688年以后发达起来的加泰罗尼亚商人，他们的视野已越过了地中海，他们开设公司与直布罗陀进行贸易，逐渐破坏加的斯的地位。总之，加泰罗尼亚人的目的在于把他们的要求和旨意强加于整个西班牙，而不再是1640—1652年那时要求脱离西班牙了。^[61]

年轻的大公于1705年10月23日进入巴塞罗那，议会已正式向人民宣布，他建立了旧制新人的政府，这是一个威尼斯式的富丽堂皇的小朝廷，封赐了20个爵衔，三番五次地显示慷慨的赏赐，这是与他的财政力量不相称的，而有时竟与他发布的最高敕令相矛盾，如后来在撒丁岛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62]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一批人名声很坏，人们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们老是埋怨这里的气候不好，辱

骂西班牙人，抱怨盟国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援助，没有让他们只消打一场仗就能征服整个西班牙。起码巴塞罗那的有眼力的观察家能够看出这一点，即查理不能很好地运用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对他的好意。此外，加泰罗尼亚游击队，这些比利牛斯山贼虽然很少会接受哪一家兵法，但德国人的指挥方法对他们毕竟是不适合的。[\[63\]](#)

卡斯蒂尔人仍然忠于菲利普，这是报答他们所敬慕的王后，因为1706年6月葡萄牙人在高尔韦率领下暂时占领马德里、托莱多和其他地区时，王后振臂一呼，显示出保卫西班牙的高傲决心。[\[64\]](#)与此相反，许多贵族在与法国人接触之后更加倾向于哈布斯堡，他们对高尔韦都公开表示高兴，如果他们还没有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遥远的庄园去的话。波托卡雷罗在托莱多为奥地利唱起了赞美诗，在诺伊贝格的玛丽亚·安娜一反迩来的悲伤状态。后来，当收服卡斯蒂尔中部之后，于尔森夫人和阿梅洛建议严惩他们。菲利普接受他祖父的劝告避免这样做，他饶恕了一些已经受到惩戒的贵族，并原谅了其他许多人。他对波托卡雷罗是宽大的，承认他是一位曾经恪尽职守的老臣。他把查理的未亡人贬发到巴荣纳去，但继续发给年金。他只剥夺了少数比较著名的领袖，但他抓住这个机会剔除卡斯蒂尔议会和军政会议的不忠分子，并取消了两个国务会议职务中的一个。1706年11月21日的法令扩及奥里的关于恢复高级贵族采邑所有权让与方案。奥里本人于是年夏天回凡尔赛，直到1713年没有让他返回西班牙。阿梅洛建议说，西班牙对他的无情措施反应强烈，若使他推行法国事业，未免负担过大。贝威克从败将泰塞手中接回兵权，并于8月间重新占领马德里，他对奥里也不信任。

关于海外领地，大体上说未受战争的严重影响。盟国开始时怀着过高希望去说服土生白人宣布拥护查理三世，但又担心这足以使印度群岛议会容许法国的武装船只驻留南海，因为1706—1707年法国针对不满情况特地派出数艘战舰以加强殖民当局的力量。1706年，遵照路易十四的谕旨，委任卡斯特尔-多斯-里奥斯侯爵为秘鲁总督，明确显示出波旁的影响。干扰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是战争的主要特点。1702年的维戈事件[\[65\]](#)，西班牙的货船被劫，所幸大部分的金银块已运上岸。法国实行进一步护航，使海运财宝能够断断续续地运抵加的斯。1703年迪卡塞率领西班牙的大帆船回航（这是1702年在圣玛丽亚海外与本豪率领的舰队作战后的事），墨西哥舰队（捕获相当的英船只）

也于1708年返航。但也是在这一年，韦杰舰队击毁了好几艘从卡塔赫那驶出的海峡大帆船，而在1711年，利特尔顿舰队驶往维拉克鲁斯，另一支驶往卡塔赫那，通常都是由法国护航，有时，如1708年这一次，主要由法国舰艇组成。[\[66\]](#)

海外战争表现为小规模冲击，但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生。在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袭击古巴的特立尼达。1702—1712年间，坎佩切的伐木人5次遭受袭击。1706年11月，由詹宁斯上将指挥在加那利群岛击退了一次小规模进攻。下年8月，法西联合袭击南卡罗来纳。更严重的一次发生于1702—1704年间，加罗来纳人进入佛罗里达，占领了圣奥古斯丁（但没有拿下城堡），并破坏了各处的传教村。[\[67\]](#)1702年，西班牙已撤走沿海以北诸岛的传教团，英国开始控制萨凡纳河以南有争议的地区。但在1703年，一支法西混合舰队突然在巴哈马群岛的新普罗维登斯出现，随后袭击该岛，迫使英国人放弃在那里维持一处殖民地的第一次努力。[\[68\]](#)但在此时，葡萄牙转向，加入英国同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派遣军队袭击萨克拉门托的科洛尼亚，围攻城堡3个月之久，迫令守军于1704年3月14日撤出。1704年初，丹皮尔沿太平洋美洲海岸北上进行私掠，企图劫夺满载财货的马尼拉大帆船“念珠号”，没有得手。他于1707年返回英国，翌年担任由伍兹·罗杰斯船长指挥的布里斯托尔私掠船队的领航。他们开往南海，在加那利要求供应——这是必需的和平访问，是当地英国酒商的要求，认为加那利与欧洲战事并无牵连——于1709年沿太平洋海岸北上巡游，抢占瓜亚基尔，大肆劫掠。12月22日，抵达下加利福尼亚海外，罗杰斯劫夺了从马尼拉开来的炮舰“化身号”，但后来它的较大的僚舰把罗杰斯率领的3艘战船击退了。罗杰斯随后横渡太平洋前往巴达维亚，在关岛下舰。此地17世纪60年代已有西班牙耶稣会士传教。这是英国劫夺最丰的一次掠夺活动[\[69\]](#)，也是西属美洲战争最后的一次插曲。

1707年，国内出现了转折点。路易十四于3月间决定退出意大利北部，又不同哈布斯堡争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这样就触伤了菲利普。但贝威克于4月25日在阿尔曼萨打了胜仗[\[70\]](#)，这就大大扭转了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事业的逆势。11月14日，莱里达的卫戍军在该城已被摧毁的情况下投降了。到此，菲利普大体上已收复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并有可能改制阿拉贡宪法。菲利普自然怀有某些报复的动机，这在他

的一些做法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羞辱阿拉贡的最高法官兼地方特权总监，撤销拒不归服的贾蒂瓦城的建制，甚至取消该城的名字，还有他颁布新法令中使用的语言，对所有城镇强行征税所提出的理由，以及要求在各城镇驻扎军队，征集兵员虽传教士亦不豁免，等等。报复也好，按法国模式施政也好，似乎都不会是针对地方立法特权而采取的步骤。菲利普知道为首的叛乱者已逃入加泰罗尼亚，对阿拉贡人采取过分惩罚措施会有危险。宪法改革主要由阿梅洛和于尔森夫人负责，此外还有贝威克。在半岛战争危机期间，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职位实际上都由贝威克的军官充任。^[71]在马德里有另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其中有卡斯蒂尔议会的议长弗朗西斯科·龙奎略（前法官）和一位有才能的给国王办事的穆尔西亚人梅尔肖·德马卡纳兹（1670—1760年）^[72]，他们显然要抓着机会来结束宪法地位的不平等，卡斯蒂尔人长期以来就对这种不平等地位表示怨恨，虽然菲利普亲近的贵人们大部分都反对他们。1707年6月29日菲利普发布命令取消“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王国的一切特权、法律、习俗和惯例”，包括阿拉贡议会，并规定该两王国的一切事务都按卡斯蒂尔宪法行事。命令的明白语言甚至包括私法，而实际上国王是不管私法的。然而，菲利普了解了更多的事实之后，承认大多数的城市，事实上也是各阶层大多数的僧俗人等，都是当时形势的牺牲者，他们由于忠诚而受罪。7月29日，菲利普申明他的旨意，确认他们享有原来的各种私法特权，但不扩及上述王国的政府体制、法律和特权……因为过去的动乱许多是由于政府体制不同而引起的……^[73]

巴伦西亚人上书反对这个对旧宪法的解释。阿梅洛愤怒地认为他们上书是非法的，放逐了两名上书起草人，另委派更严厉的总督。自此以后，凡是菲利普统治下的地方，有关刑法、税权、军务等，均按卡斯蒂尔法律处理。1711年4月3日颁行新计划，阿拉贡王国各领域委派一名督军和一名按卡斯蒂尔体制的最高法官。

1707年以后的西班牙国内事务，也像过去一样，如果不与对外关系联系起来考虑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事实确实如此，菲利普不像较早的时候那样了，此时可以暂时不太需要路易十四的援助了，而法国军队在别的战场上正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然而，早在1706年，路易已开始准备牺牲西班牙设法谋求和平。自这以后不到一年，菲利普或西班牙已有了安全感，不会作为某种欧洲安排（第14章）的牺牲品了。

1709年3—5月的会谈^[74]，标明了两个朝廷间的公开破裂。4月，路易告诉阿梅洛说他决定让西班牙自行其是，而菲利普则指示伯杰克^[75]向荷兰说明他的解决办法不同于法国。法国的大臣们对6月签署的预备和约非常反感，表示反对，他们指望菲利普自动退位，乃从加泰罗尼亚撤走法国军队，以期促成此举。两国的商人和军队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到了秋天，两国军队处于一触即发之势。阿梅洛此时已是事实上的首相，由于局势不稳，9月被召回法国，国务秘书处则转手于西班牙贵族，由梅迪纳塞利公爵主持。菲利普力图保留20营步兵没有成功，乃把大部分法国军官遣送回国，并亲赴加泰罗尼亚前线。但是，西班牙人至少认为，他手里攥着大部分的牌，他的这些牌是在法国人的影响下打出来的。

新的国务秘书处行使它那少到几乎没有的一点权力，政绩很差，财政和行政又开始恶化了，比较有能力西班牙人背离菲利普的更多了。1710年4月，梅迪纳塞利本人以使人奇怪的叛国罪被捕。这就使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进一步相信菲利普的在西班牙的事业毫无希望。他们现在一方面仍然拒绝同盟国要求他们用法国人的武装无条件地把菲利普赶走，而另一方面又愿意出钱出兵，去给菲利普另找一个王国。格特洛伊顿堡夏季会谈^[76]失败后，路易真的同意派遣旺多姆元帅前往西班牙，以补充西班牙将领之不足，法国军队又开始涌入纳瓦拉，不得不继续卫戍各个城堡。然而随着大公收复阿拉贡，西班牙朝廷又被迫退出马德里，回到巴利阿多里德后，路易作出努力说服菲利普放弃西班牙，转就西西里和撒丁岛。受命执行这个微妙使命的是鲁西永和朗格多克的军事总督诺阿耶公爵，他从西班牙回来反而捎回菲利普的恳求，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此外还有一份由32名大贵族签署的庄严请愿书。他们最害怕的是法国的外交计划会成功地分解西班牙，所以大贵族们宁可接受一个自己的波旁国王，乃重新团结在他的政府周围。在布里韦加战役以及12月比利亚维西奥萨战役之后，诺阿耶预言潮水会转方向，不久，他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旺多姆军事指挥及法西两国武装大获全胜。^[77]此外，法国国王终于亲自答应他的孙儿的请求，从鲁西荣方面进攻加泰罗尼亚，1711年1月24日，在诺阿耶率领下的一支2万人的法国军队猛攻赫罗纳。同年秋天，大公同意接受（菲利普的）帝号，这样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国际问题便转变了，只有加泰罗尼亚战争对菲利普统治半岛挑战。

即使在困难的早期阶段，菲利普和他的顾问们也没有太明确表示法、西两国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忙于对付法国人渗入他们的美洲贸易体系，西班牙人要求停止法国人已经进行的那些合法的或非法的活动。1705年成立的复兴贸易委员会于1707年5月15日正式成为贸易、金融、矿务委员会，这是1691年的商务会议的翻版，规模较大，但并不显得更有成效。委员会虽然成立，但不能认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的目标在1707年以后比之以前有很大的进展。麦劳印商船和其他船继续去智利和秘鲁做生意，但法国的外交官们不是总能够获得奴隶供应公司所要求的那些方便。奥里本人就不喜欢这样做。只有到了1704—1705年公司才获得建立自己的货栈和出售从波托贝洛运来的昂贵商品的权利，也只有到了1708年才允许法国船只前来载运除奴隶外的发回的货物，而这些发回的货物中实际上是不会有奴隶的。所有这些让步，扩大了走私的可能性，也引起了不满情绪。但是法国的压力仍然不能说服西班牙政府对公司开放有利可图的烟草和可可贸易，因为这两种商品都牵涉到包税问题。它的代理商也遇到西印度群岛的官员们的诸多刁难，有时竟受到暴民的冲击。他们当然不能提出控诉，公司的头头们更是不敢：他们走私赚钱，而董事们只得向菲利普解开自己的钱袋。^[78]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的尝试虽然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但是竞争特别艰苦，因为它要绕过控制利马和巴拿马以控制南美贸易这一格局。所有这一切，在1709—1710年间由于两个盟友交恶而更难处理了。

同时，国家与教会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菲利普的母语是法语，他在说西班牙语时的法语语风受奥里和阿梅洛的影响更加浓重了，而奥里和阿梅洛对教士们的财政豁免权抱敌视态度。1705年，菲利普强令塞哥维亚主教门多萨辞去宗教法庭庭长职务，获得法庭的支持。此后宗教法庭炫示它是支持菲利普的，但是无论是这一点还是在阿尔曼萨的威力下得以向传教士索求巨大的借款，都不能使菲利普和他的顾问们的意见缓和一点。这样与罗马之间的破裂早就发展了。正式破裂是在1709年1月15日克雷芒十一世在哈布斯堡的压力下被迫承认查理大公为天主教国王，虽然没有用西班牙国王名义。^[79]路易没有给菲利普任何忠告，而被激怒了的菲利普乃与一个神学委员会商量，4月22日驱逐罗马教皇使节，关闭了他的议事庭，断绝给罗马的经费，没收传教士的岁收，命令教士向国王政府官员交出罗马发来的简报、

敕书或函件，不让它们发生起码的作用。这样，从理论上讲就恢复了派驻罗马教皇使团从前的局势。

在《乌特勒支和约》（第14章）逐步具体化的那些谈判中，菲利普一般都让路易十四代表他讲话，但他反对法国人同意将来新的奥皇继续使用西班牙国王称号，即使这只是一个空衔也不行；同时他也一贯拒绝对加泰罗尼亚宽大，拒绝以此为代价去换取皇帝对他的承认。特别是他拒绝与荷兰媾和使他的祖父为难，他的目的是要使荷兰人保证于尔森公主的封邑。1714年5月，只因他需要法国军队攻取巴塞罗那，^[80]他只好让步了。菲利普希望当自己领土的主人，对此路易是同情的，但同时又常常批评他的态度，认为菲利普不仅忘恩，而且笨拙。^[81]脾气粗暴的奥里于1713年返回西班牙任全权代表，受监察总长衔，但路易对奥里的影响再次表示遗憾。这一次菲利普和于尔森夫人顶住法国召回奥里的一切努力，他们还贬黜了几个对菲利普对待谋求和平的顽固政策的反对者，其中有龙奎略将军，他被提升为卡斯蒂尔议会的议长早就使人大为惊愕，因为他不是贵族。

当新计划在阿拉贡领土推行的同时，卡斯蒂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712年11月马德里议会召开会议通过修正的《舍拉法典》，它的意图是使将来波旁的公主几乎不能与萨伏依或奥地利王室的子孙结婚。新法于1713年5月10日作为国事诏令公布。但是国务会议和卡斯蒂尔议会对这个法典只是勉强同意，因为新法一反多少世纪以来的旧规，从而是对16世纪哈布斯堡继承王位的程序的指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菲利普继承王位的指责。议会因此出现了反对派，提出理由要注意它们的改革。1713年11月颁布一项法令，1702年奥里的建议开始生效，卡斯蒂尔议会、印度群岛会议、财政会议、军事制度会议和宗教法庭等实行改组，各机构的成员大大增加了。1714年4月23日颁布了改组军务会议的法令。随着伊丽莎白·法内塞的到来和奥里的免职，改革出现逆转。到了1715年夏天，这些改革事实上都撤销了，不过它们破坏议会力量，使之不能妨碍国王的旨意，这个效果却是永久的。它们标志着西班牙政府旧制度的结束。

1714年2月11日，玛丽亚·路易莎王后因长期患病亡故，这使菲利普五世几乎丧失理智，他比过去更加依赖于尔森公主，此时公主与奥里比以前更加积极推行改革。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1714年11月的法令，把国务秘书处分为四部，即军政部，海事和印度群岛部，司法、

警察和外交部以及财政部，各部长独立进行工作，这样终于把奥里要建立的国务秘书处的体制付诸实现。这个改革也像议会提出的改革一样，按奥里原来制定的体制实行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西班牙未来的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预言要控制教会事务，而且要全面控制，但无效果。1712年路易十四在西班牙国王与教皇之间进行斡旋，1713年12月19日，以走笔如神和拥护特权而闻名的梅尔肖德·马卡纳兹写了一篇有85个标题的记事录，被认为是“18世纪王权至上论的最伟大的声明，提出王权在各方面都高于教权之上”^[82]。此外还提出限制罗马在西班牙的财政权，限制宗教法庭对世俗事务的司法权。他的记事录如此激进，使卡斯蒂尔议会的许多本来会接受它的基本意图的议员也感到震惊。议会此时已由马卡纳兹担任检查总长，乃赶忙把记事录呈交菲利普。阿梅洛、奥里、公主以及皇家忏悔官（有一定保留）全都支持马卡纳兹，结果菲利普把备忘录退回议会，要求每个议员提出书面意见。这一次似乎都同意了。但有人偷偷地把记事录交给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红衣主教朱迪斯，他即转给宗教法庭。菲利普赶忙派他为大使前往法国，以消除他的影响，但他于1714年7月31日发表了一篇宗教法庭庭长通告，宣布记事录有罪，要在马利进行终审。朱迪斯立刻被召回西班牙，菲利普愤怒地指示卡斯蒂尔议会提出意见。11月5日，议会建议彻底撤除西班牙宗教法庭。显然，只有与分解加泰罗尼亚有关的问题，和随后菲利普与伊丽莎白·法内塞的婚姻带来的变化，才使宗教法庭在1714年免于撤除。事实是撤除法令没有签署，1715年3月菲利普被迫公开否认有过要撤除这个机构的“恶毒意见”。2月，成了现在支配法庭的意大利派的牺牲者的马卡纳兹被放逐了。^[83]

1714年9月11日，巴塞罗那在可怕的围城之后被贝威克攻陷了。4天后，元帅写道：

我缴了居民的武器，并命令废除代表团和旧政府之后……即设立新政府……命令未来警政应遵照卡斯蒂尔法制行事。^[84]

贝威克建立新的皇家行政和司法会议，后者还是临时高级法庭。著名人物有约瑟·帕丁努（1667—1736年）^[85]，他是米兰出生的加里西亚人，爬到次于阿梅洛的重要高位。此外还有好几位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在1701年时支持菲利普，后来则被迫害。他们中最重要的是

弗兰塞斯·阿梅列尔，曾任加泰罗尼亚法庭检察官，被放逐期间则成了卡斯蒂尔议会成员之一。9月16日，贝威克解散百人议会，换了16名地方“行政主管”，并命令旧议会的政府官员扒掉所有徽章，交出钥匙，停止执行职务。10月2日，（后来他记述说）他想到3000名伤亡人员，乃实行对那些支持大公的圣职人员报复，“我还把阿尔巴拉金的主教和200名神父和僧侣运往热那亚，命令他们永远不得踏上天主教国王陛下的国土，违者处死”^[86]。贝威克旋即返回马德里：在加泰罗尼亚禁止携带武器，监禁、没收、褫夺公职，拆除城市和城堡的防御设施以及其他惩罚等一直进行了许多年。1715—1718年，在巴塞罗那的海岸区建筑一座城堡，作为一个威胁和侮辱的标志，4000人被逐出家园。^[87]大约与此同时，菲利普查禁了加泰罗尼亚6所老大学，1717年改设塞尔维拉大学。马略尔卡在围城之初曾供应过巴塞罗那，而在1715年7月2日几乎不战而降，也被置于与加泰罗尼亚同样的控制之下。

1717年以前，加泰罗尼亚政府体制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1715年遵照国王的命令，卡斯蒂尔议会请帕丁努和阿梅列尔提出书面意见，后者据说对执行最后指令能起缓和作用。最后命令明显是按照帕丁努的意见拟订的。他对加泰罗尼亚人的品性的判断是苛刻的：“他们现在尊敬国王的和司法的命令了，不是因为对国王和司法的爱戴，而是因为看到了比他们优越的军事力量。”^[88]虽然如此，他还是比较温和的。他认为与王国政府无直接关系的领域，不要改变加泰罗尼亚原来的法律，他并建议法庭的决定不必向卡斯蒂尔议会申诉。他自行其是。1715年10月9日巴塞罗那法庭成立，它的判决就是最后判决。根据1716年1月16日的命令，实行全部新计划，政权仍归法庭，由总督兼理，皇家的地方长官取代先前设置的监督；行事悉如卡斯蒂尔；只有国王有权铸造钱币，市政机构基本改组。但从整个计划可以看出，在不损害国王利益之处，保持了原来的法律。国王说：“至于其他方面，应遵守加泰罗尼亚原来的法制，视同本法令所新定，具有同样的效力。”^[89]因此，关于刑事和民事，加泰罗尼亚的私法，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大部分被沿袭下来了。

1714年年终之时，菲利普与伊丽莎白·法内塞的婚姻^[90]结束了这个时代，她把于尔森夫人和奥里逐出西班牙，她雄心勃勃，要生儿

育女继承王位，她信赖一位新的宠臣艾尔维洛尼，西班牙的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轨道。

（黎国彬 译）

[1] 赫西教授死前没有写完这一章。编者感谢布赖恩·路德先生和邓肯·莫伊尔先生对完成本章的帮助。

[2] 见《新编剑桥世界史》第5卷，原文第174页。

[3] 18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卡普尼-蒙特帕劳对这一点就提出了强有力的怀疑。参考J. H. 埃利奥特著《西班牙的衰落》，载《过去与现在》第20卷，1961年，第52—73页。

[4] 《西班牙宫廷回忆录……1678—1682》，伦敦，1861年，第4页。

[5] 见厄尔·J. 汉密尔顿著《1651—1800西班牙的战争与和平》，载《哈佛经济研究》（1947年），第31页。

[6] H. 卡门提到这一点，见《卡斯蒂尔的没落：最后危机》，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7卷（1964—1965年），第70—74页。

[7] 所有的估计都是不十分确实的。关于1500年时的人口估计为500万—700万，参考R. B. 梅里曼著《西班牙王国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兴起》（纽约，共4卷，1918—1934年）第2卷，第93页注3。又见T. 冈萨雷斯著《16世纪卡斯蒂尔……人口调查》（马德里，1929年）；A. 贾德著《西班牙人口数字》，载《近代、现代史评论》第3卷（1928年）第420—436页，第4卷（1928年）第3—7页；J. R. 阿尔门萨著《1500—1945加利西亚的人口》（马德里，1948年）；J. 维桑斯·比维斯著《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经济史》（共5卷，巴塞罗那，1957年）第3卷，第251—271页；J. 诺德尔与E. 吉拉尔特著《1553—1717加泰罗尼亚的人口》（1960年）。

[8] 见普瓦特里诺著《奥弗涅……移民情况》，载《近代、现代史评论》第9卷，1962年，第5页及以下各页。

[9] （银）比索，西班牙银币，即比塞塔，值8里亚尔，此时与英镑比值，各地不同，从4先令5便士至6便士不等。1686年以后，含银量26.5—27.2克。足重（金）埃斯库多，在1686年贬值前的30年间，值16里亚尔，但可兑20里亚尔。见汉密尔顿著《战争与和平》，第24页及以下各页，又见第514页。

[10] J. H. 帕里：《哈布斯堡王朝西属印度群岛的公职买卖》，伯克莱—洛杉矶，1953年，第73页。

[11] 卡门，引自J. H. 帕里著《哈布斯堡王朝西属印度群岛的公职买卖》一书，第70页。

[12] 多明格斯·奥尔蒂斯：《18世纪西班牙社会》，马德里，1955年，第327页。

[13] 见本书原文第537页及以下各页。

[14] 多明格斯·奥尔蒂斯：《18世纪西班牙社会》，马德里，1955年，第335页。这里有一种似非而是的情况，即比斯开和吉普斯夸两省的人口中贵族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区都高。1797年这两个省区连同安图里亚一起，下级贵族占西班牙全部下级贵族半数以上，但有一点必须考虑的是，吉普斯夸省每一个人都声称他是贵胄。

[15] R. 查理：《18世纪欧洲的贵族》，A. 古德温编，1953年，第53页。参考R. 哈尔著《18世纪西班牙革命》第4章，普林斯顿，1958年。

[16] 比利亚尔斯：《回忆录》，第40页及以下各页。比利亚尔斯对母后表示同情，并对王后表示相当失望。

[17]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21章（1）。

[18] P. 肖尼：《菲律宾与西班牙太平洋诸岛（16、17、18世纪）》，1960年，第132—133、261—262页。

[19] 见本书原文第514—515页。

[20] G. 塞莱：《卡斯蒂尔印度群岛的贩运黑奴贸易》（两卷本）第1卷，1906年，第641—693页。

[21]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380—381页。

[22] 麦迪那德里奥塞科大公让·恩里奎斯德卡勃莱拉，1691年继其父任最后一任卡斯蒂尔的海军上将，1705年亡故。1696年韦诺纳伯爵给都灵的报告中对这位舰队司令及政务会议的其他人物有风趣的评述，见C. 莫朗迪编《萨瓦、热那亚、威尼斯使节报告集，1693—1713》，洛波尼亚，1935年，第33页及以下各页。热那亚使节有关宫廷的叙述，见同书第143—148页。

[23] 1692年3月26日选侯庄严进入布鲁塞尔。见F. 范·查理肯著《西班牙统治尼德兰的终结，1693—1713》，布鲁塞尔，1907年，第1章。

[24] 弗洛塔船队于1688年、1689年、1692年、1695年、1696年、1698年、1699年、1701年、1703年、1706年、1708年、1711年、1712年、1715年驶比拉克鲁斯航线，加莱奥内船队于1690年、1695年也驶比拉克鲁斯航线，后由法国护航，但航次不多。见R. 安图内斯-阿塞维多著《西属西印度群岛司法和商务史》，马德里，1797年，附录7，第26—27、33页。

[25] 本岛东部即西班牙区的人口，1717年估计为18410人，包括3705名驻军，这个估计可能过多。见D. L. 罗帕著《法国占领前夜圣多明各的殖民地社会》，载《法国海外史评论》第46卷（1959年），第62—63页。据官方统计，1687年圣多米尼克的黑人和白人居民共8000人，30年后可能超过圣多明各的人口。

[26] N. H. 摩西：《英国海军与加勒比海，1689—1697》，载《海员明镜》第52卷（1966年），第33页。

[27] 《美洲新纪行》（共两卷）海牙，1724年，第5部分第5章。

[28] 西海岸莱奥加纳附近的肥沃平原，殖民活动最为活跃，此地甘蔗种植园开始显出对蓝靛、可可、烟草等现行作物的优势，见G. 德比昂著《莱奥加纳和居尔—德—萨克地区几种种植园的起源》，载《海地史评论》第18卷（1947年），第11页及以下各页。

[29] 弗里茨的亚马孙河流图（1691年）是最早的相当“准确的亚马孙主流及其支流示意图”，见G. 埃德蒙森编《1686—1723塞缪尔·弗里茨神父在亚马孙河游历和工作日志》（黑克柳特学会，1922年），见本书原文第531页。

[30] E. M. L. 洛博：《1690—1718年保护传教的奇基托斯公路》，圣保罗，1960年，第51—56页。

[31] 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人口的估计，见本书原文第542页。

[32] 参见《韦诺纳伯爵纪事》，1696年2月17日（莫朗迪，第1卷第36页）。1693年（同上书第146页）热那亚公使对波托卡雷罗的印象：和蔼可亲，但颇炫耀自负，光说不练。

[33] 《私人回忆录……菲利普五世宫内侍从路维勒侯爵信件摘录》（共两卷）第1卷，1818年，第72页。

[34] 比利亚尔：《回忆录》，第154页。

[35] 关于地中海西班牙海船不断遭受在防务较差的海岸出沒的巴贝里（埃及除外的北非沿岸）私掠船的抢劫情况，见本书原文第554页。

[36] E. W. 达尔加朗详细阐述了这次活动的复杂背景，见达氏著《法国与太平洋沿岸海运与商务关系》第1卷，1909年，第115页及以下各页。

[37] 见本书原文第500页。

[38] 参见G. P. 艾困什编《苏格兰公司与非洲和印度群岛贸易的海船与航班文件集，1696—1707》，爱丁堡，1924年。

[39] 波托卡雷罗指责“奥地利派”魅惑国王，乃任命弗罗伊兰·迪亚斯为忏悔官，后者乞灵于一些相信幻觉的修女，宗教法庭指控弗罗伊兰·迪亚斯施行妖术，乃将之收监。

[40] 见本书原文第397页。

[41] A. 博德里亚尔：《菲利普五世与法国宫廷，1700—1715》（共两卷，1889—1890年）第1卷，第55页。

[42] 写西班牙历史，大多数是以卡斯蒂尔人的观点写的。本章论述阿拉贡王国的历史则取阿拉贡人的观点。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J. 卡雷拉·普哈尔：《加泰罗尼亚政治和经济史》（共4卷，巴塞罗那，1946—1947年）；F. 杜兰-坎亚梅

雷：《在波旁王朝专制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法律评论》第9卷，巴塞罗那，1940年，第195—231、283—366页）；J. 梅尔卡多·里瓦：《菲利普五世对加泰罗尼亚的控制》（《伊斯帕尼亚》第9卷，马德里，1951年，第257—366页）；J. 梅尔卡多·里瓦：《十八世纪陆军之帅》（巴塞罗那，1957年）；J. 雷格拉·坎皮斯托尔：《加泰罗尼亚的总督》（巴塞罗那，1956年）；F. 巴尔斯-塔维内尔与F. 索尔德维拉：《加泰罗尼亚史》（两卷本，马德里-巴塞罗那，1955—1957年）；P. 博莱斯·博：《奥地利查理大公加泰罗尼亚国王》（巴塞罗那，1953年）；《菲利普五世与阿拉贡王国的法律》（《政治学研究评论》第4卷，马德里，1955年，第97—120页）；P. 比拉尔：《西班牙近代史中的加泰罗尼亚》（第1卷，巴黎，1962年，第638—704页）。

[43] E. W. 达尔格伦论布甘维勒以前法国航海家到南海的航行，见《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刊》第14卷（1907年），第423—568页。达尔格伦在《海运与商务》中有详细的全面论述。比较简明扼要的论述可参考C. 邓莫尔的《法国的太平洋探险家》第1卷，1965年，第7—25页。

[44] 见本书原文第515页。

[45] 为了使塞维利亚的法国商人不受法国商馆人员对法国货船的勒索，科尔贝尔在1680—1682年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法国商人用西班牙船运货的明确权利。船上的西班牙人则作为代理商，一旦出事，就可指控西班牙人捣鬼。一向强征本国商船运回的银币的西班牙政府，懂得法律上承认了外国商人在印度群岛从事贸易，外国政府就可以代表他们的商人要求赔偿损失。1667年以后，对法国商人的经济处罚和指责他们侵害西班牙主权造成了许多摩擦，并导致1686年强大的法国海军在加的斯示威。

[46] 见本书原文第525页。

[47] 《私人回忆录》第1卷，第iii页。

[48] 博德里亚尔书第1卷，第82、131页。关于托塞建议西班牙应让出尼德兰作为法国出力的报酬，参考《私人回忆录》第1卷，第90页。

[49] 见多明格斯·奥尔蒂斯书，第339页。

[50] J. H. 埃利奥特：《1469—1716的西班牙帝国》，1963年，第323—324页。本书对1665年以后着笔不多，但对此前的财政问题有全面的论述。

[51] 见多明格斯·奥尔蒂斯书，第371—373页。

[52] 特里维埃侯爵，见莫朗迪前书第1卷，第73—75页。

[53] 见塞莱书第2卷，第428页及以下各页。

[54] 她的第二个丈夫是布拉恰诺公爵弗拉维奥·乌尔西尼亲王，她通过波托卡雷罗对西班牙王位继承可能有一些影响。参考A. 热弗鲁瓦编《于尔森公主未发表的书信集》，1859年，第19页及以下各页。

[55] P. 博莱斯·博：《塞达尼亚和那不勒斯在奥地利唐·查理大公统治期间的历史》，载《近代史研究》第1卷（1951年），第94页。在这批策划这个真正的改革运动的贵族中，马克切亚亲王只是一个挂名的领袖，他们希望有一个本地的统治者，公职和教职限于授给那不勒斯人，压制宗教法庭，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关于这个激烈运动及其背景的新的评论，可参考R. 科拉皮耶特拉著《那不勒斯总督辖区的政治地位和公共生活，1656—1734》，罗马，1961年。书中第3章论述尤详。

[56] G. 利泽朗：《博维利埃公爵》，第229页。

[57] 见N. 罗多利科著《有关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加夫列拉·迪萨瓦的一些资料》，载《近代史研究》第1卷，第33—46页。

[58] 1703年11月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加入同盟，见本书原文第417页。

[59] 她们年轻时就友好，1708年以后变得紧张，因为这时梅因特侬夫人不惜代价要求和平（参考博德里亚尔书第1卷，第378—382页）。

[60] 见本书原文第425页。

[61] 比拉尔书第1卷，第670—673页；参见同著者的《直布罗陀“新公司手册”，1709—1723》，1962年。

[62] 博尔特斯·博：《塞达尼亚和那不勒斯的历史》，第72—73页；有关加泰罗尼亚的税务、债务、发行新铸币（最早的比塞塔）以及1708—1712年涨价等问题，参见比拉尔著《加泰罗尼亚》第1卷，第685页及以下各页。

[63] 特里维埃侯爵事迹（1711年），见莫朗迪书第43页及以下各页，又见第75页及以下各页。

[64] 见本书原文第429页。

[65] 见本书原文第418页。

[66] R. 迪卡瑟：《迪卡瑟海军上将，1645—1719》，1876年，第250页及以下各页，又第343页及以下各页；R. 伯恩：《安娜王后的西印度群岛海军》，纽黑文，1934年，第5章；C. H. 哈林：《美洲的西班牙王国》，牛津，1947年，第335页。

[67] 见本书原文第503—504页。

[68] 本岛在伍兹·罗杰斯出任总督（1718—1721年）之前为海盗出没的主要据点。

[69] 关于这次活动，论说不一，B. 利特尔在他的《克鲁索号船长》（1960年）中引用西班牙的资料。

[70] 见本书原文第433页。

[71] 奥尔良公爵在阿尔曼萨战役开始时加入军队，他也指望获得西班牙王位，通过各种许诺在战败者中广交朋友，这使马德里大为困扰（博德里亚尔书第1卷第291页及以下第390页）。

[72] 6月20日马卡纳兹被派往巴伦西亚进行行政改革和执行各项没收，他从中收受大量财产转让。关于他替国王办事以及对他的事业的评价，参考H. 卡门著《梅尔肖·德马卡纳兹与西班牙波旁权力的建立》，载《英国历史评论》第80卷，1965年，第699—716页。1711年2月11日马卡纳兹就任阿拉贡的第一任总监。

[73] J. 奥尔蒂斯、J. 桑斯著：《西班牙编年史纲》第10卷，马德里，1801年，第129—132页收录了这些法令。

[74] 见本书原文第450页及以下各页。

[75] 有关伯杰克伯爵的叙述见本书原文第390、413页。

[76] 见本书原文第456页。

[77] 见本书原文第440页。

[78] 见塞利书第2卷，第339—450页。

[79] 见本书原文第595页。

[80] 库西侯爵：《乌得勒支和约后的西班牙，1713—1715》，1891年，第201页。

[81] 库西侯爵：《乌得勒支和约后的西班牙，1713—1715》，1891年，第198、205页。

[82] 卡门上引书第707页。

[83] 他在流亡期间，主要在法国，表现为强烈反对詹森教派分子，并于1734年着手撰写《宗教法庭彻底批判》，本书后于1788年发表。1748—1760年在西班牙入狱，被释后不久死去。上引卡门书第711—715页对他的卷帙浩繁的全部著作作了一览表式的介绍。他留下来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手稿，却是当时创建的皇家图书馆即今天的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主要藏书，这是颇具讽刺意义的。

[84] 《回忆录》（两卷本）第2卷，伦敦，1779年，第178页。代表团原本是议会中一个小委员会，负责征收议会通过的各项费用，但曾经是加泰罗尼亚地方特权的最有力、最警觉的保卫者。

[85]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278—280页。

[86] 《回忆录》（两卷本）第2卷，1779年，第179—180页。

[87] 关于战争对此时人口不足40万的加泰罗尼亚的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参见比拉尔书第1卷第679页及以下各页。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在1712年以前，由于英、葡硬币的流入，大公的货币政策以及他的朝廷和军队的开支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商人们都因此而赚了钱。

[88] 引自J. 梅尔卡多·里瓦著《菲利普五世对加泰罗尼亚颁行的法令：新计划》，载《西班牙》第11卷，1951年，第257—366页。

[89] 引自上引书第272页。

[\[90\]](#) 9月16日，他们由代表举行婚礼，但新后在12月23日才到达西班牙。参见E. 阿姆斯特朗著《伊丽莎白·法内塞》，1892年，第11页及以下各页论述了这次婚姻谈判的情况。

第十二章 从九年战争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里斯威克签订的各条约中，有关正式结束战争的条款的措辞是有差别的。在法国与荷兰之间的和平，将是一个美好的、巩固的、得益良多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和平；在路易十四与上帝恩赐的大不列颠国王威廉三世之间的和平，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得到虔诚而严格遵守的、全面而永恒的和平；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建立的和平则将是美好的、巩固的和持久的；法国与奥皇的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和平则是全面的和永恒的。不管这些措辞上的差别具有何种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对和平的看法有任何保留。当时的领导人物中没有任何人说条约的正式措辞是虚伪的或是过于乐观的；也没有人认为这种出于无奈的和平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至少在文字中或有据可查的谈话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可是，曾几何时，不到4年，法国人就同奥地利人在伦巴第交战；1702年春天，奥地利皇帝、英国安妮女王和荷兰议会就向法国宣战了。这是两个方面事态发展的结果。第一方面，也是较为难以探究的一个方面，就是各国在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恢复了元气，使它们能够重新投入战争。这种复原是与和平俱来的正常现象。这种复原的速度总是比和平刚刚实现时所预测的可能速度要快一些，而政治家们在估计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恢复到何种程度时，总是容易判断错误。第二方面的事态发展是敌对情绪的积累，有些是根深蒂固的夙怨，有些则是新仇。

在里斯威克协议中有一项主要条款，其规定是不足以实现原定的目的的。这项条款规定的是法国人向西班牙交出他们在尼德兰的占领地。这项规定不能满足荷兰人建立一条安全的南部边界的需要。战争再度彻底证明西班牙人是不能够保卫他们的尼德兰的。尼德兰总督、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伊曼纽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诸侯，他想利用他的几个省扩大自己势力。对他来说，明显的方针就是同西班牙人及其新盟友大不列颠及联合省这两个海上强国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同荷兰人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同意荷兰在8个屏障要塞

派驻卫戍部队，总数共25个营。这8个屏障要塞是：纽波特、库特拉、奥登纳德、阿特、蒙斯、沙勒罗瓦、那慕尔和卢森堡。这其实并不能构成一个坚固的屏障。法国人占据着所有河流的上游，而且，西班牙人在斯凯尔特河和利斯河沿岸并没有要塞。法国军队以前曾经夺占过8个要塞中的6个。在向海的侧翼，敦刻尔克依然完整无损，能够对英国和荷兰的航运造成损害。不过，这些屏障要塞有了荷兰的卫戍部队，如果发生新的入侵，就能够抵挡第一轮冲击。

西班牙人默认上述协议，可是，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行动上，他们似乎认为和平真的是永恒的。他们并不掩饰他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他们在半岛上的边界。加泰罗尼亚的总督黑森-达姆斯塔特公爵乔治亲王仍拥有3个团的德意志部队，不过，在那里几乎没有西班牙的部队。西班牙没有足够的马匹可以组成任何骑兵部队，皇家近卫部队是一些非专职的部队，并无军事价值。所谓海军，不过是指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2艘和意大利港口的13艘战舰，其中7艘还是从热那亚租赁的。

荷兰除了派出他们的卫戍部队驻扎在那些屏障要塞之外，同样也没有对最终会发生一场陆上战争有所准备。他们由于财政困难，需要获得一个喘息的时间；威廉三世作为联合省的执政，并不反对按照和平时期的编制裁减军队，正如他在1684年所做的那样。这种编制虽然标准太低，但看来暂时还可以满足需要。1688年以来招募的军队余下的4.1万多名步兵和4100名骑兵，几乎已经全部付饷遣散。然而，由于威廉提出强烈的抗议，舰队却得到了加强。在战争中损失的战舰已予补充，大战舰虽然已经搁置起来了，但新建了18艘主力舰，1701年又增加了12艘。

英国，同荷兰一样拮据，必须限制开支，限制征税；它也同荷兰一样希望恢复和平的商业活动；而且，英国存在着反对威廉的各方面政策尤其是反对他维持一支强大军队的政策的各种杂乱思潮。过去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代价太昂贵了，而且有时是不光彩的。反对大陆战争的偏见还得到另一种论点的支持，即认为大陆战争并不如海上战争和殖民地战争那样能够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根据1689年的《权利宣言》，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备军是非法的。现在，和平已经到来，相当多的关心政治的英国人担心这样一支军队会被利用作为专制制度的工具。这种担心是真诚的，可能也是愚蠢的。这种疑虑的产生，部

分地应该归咎于国王本人。这位国王不但对议会而且对他的大多数英国大臣封锁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秘密。在实现和平之前的几个月，他授予森德兰伯爵很高的官职，这位伯爵是他专制伯父的前朝老臣，是最不得人心的人。这种种原因促使下院于1697年决定大大削减军队，遣散所有自1680年9月29日以来招募的陆上部队。这将使军队的人数减少到只有约1万人，而且其中不再保留外籍军队。1698年12月，议会复会的时候，发现上述决议并未执行。经过争论，国王不得不同意：在英格兰的军队除了留下其中生来就是英国臣民的7000人之外，其余全部于1699年3月26日之前遣散。在爱尔兰的所有外籍军团均予以遣散，超过1.2万人以外的其他军队亦予以遣散。

两个大国仍然没有裁军。皇帝仍然在同土耳其人作战；荷兰人尽管自己手头拮据，仍于1698年向他提供一小笔贷款。皇帝的努力现在正集中在这场战争上；尤金亲王在1697年9月11日的曾塔战役告捷之后，战争已决定性地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1]这样一来，军事形势就与1688年路易十四开始他的军事行动时的形势有些相同之处。但是，皇帝的财政状况极为不妙，1698年开始进行的财政改革所采取的某些有限措施收效甚微。把汉诺威提升到选帝侯的地位损害了皇帝在德意志的威望。信仰新教的诸侯因为《里斯威克和约》中有关宗教的条款而责怪他。^[2]他没有海军，因此，他在地中海不能有任何作为。他完全没有可能在西线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可是，法国也仍然没有裁军。威廉三世在和平开始实现的头几个星期就不相信法国人的诚意，他担心法国人不愿意交出在和约中已经同意让出的领土。法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确实也实行了某种裁减；他们的军队的数目是步兵15万人，骑兵3万人。每个连队减去5个人，裁减的比率这么小，总的影响就算不上什么了，而且原有的编制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各民兵团已经解散，但是，这是一些第二线部队，作为野战军的预备队，是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的。1698年3月14日，威廉告诉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奥尔斯贝格伯爵说，法国人的行为已同缔结《尼姆根和平条约》后的行为相仿了。两星期之后，在海牙，海因修斯告诉斯特拉特曼伯爵说，法国的军队几乎已经采用与上次战争时一样的编制了。^[3]这种比较是正确的，不过，这是同上次战争的后一阶段那几年作比较，而不是同早期阶段那几年作比较。法国人还没有作好准备以重新装备一支战斗舰队。^[4]

法国人不仅缩减海上开支，约束他们的海上雄心，他们也没有打算恢复向各方面普遍施加压力——这种做法才是大联合时期的特征。此次显示力量乃与一项特定的政治目的有关。1698年3月，海上强国的政治家们就清楚地看到这项政治目的何在了。到6月16日，路易就明白地说出来了。他说：“很明显，只有在西班牙国王逝世的情况下，和平才会遭到破坏。”^[5]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判断是真诚的，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近代欧洲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为数甚多的与人民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的结局要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如果西班牙国王终于逝世，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世系就将与他一起寿终；不管继承他所统辖的全部领土或部分领土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但这个继承人却不是西班牙人。他的已经式微的帝国，仍然是最富庶的帝国，而且一直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的人对任何欧洲君主都是忠顺的，它的统治阶级还以他们历史上的辉煌而自豪。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有肯定性影响的第一个因素是（至少在西班牙本国是如此），西班牙人出于他们的自尊心和保守主义，将赞成保持这个庞大帝国的完整一致并且要使它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他们在整个民族的支持下，将挫败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打算委派一位总督来统治西班牙的任何企图。同所有的保守主义者一样，这些保守主义者的力量不仅来自他们的自尊和感情，而且来自他们的既得物质利益。

在欧洲的其他强国中，利益与感情总是不稳定地纠缠在一起。对荷兰来说，选定西属尼德兰的新主人是一件关系他们政治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需要有一个缓冲国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法国人的攻击；而且，他们已经付出很大的力气来使这个缓冲国能够保护自己；但是，如果这个缓冲国变得强大起来，足可以为自己谋求福祉，那么，它就会令安特卫普这个休眠多时的港口复苏，从而破坏荷兰自己作为欧洲贸易最大的进出口岸的地位。^[6]西班牙的殖民地吸收了荷兰海外商业中的出口货物并提供白银，也同样吸收英国的出口货物并提供白银，而这两个新教贸易国一度是西班牙历史上的敌人，现在不但同它和解，不再两军对峙，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它的松散的帝国主义统治继续不受扰乱而维持下去。这两个国家同西班牙殖民地进行数额巨大的贸易，但名义上却是非法的。没有任何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默然容忍如此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越过徒有其名的垄断壁垒而大行其

道。在这里又可再次看到，海上两大强国的利益在于只需要保存这个西班牙帝国，却并不希望看到它再度强盛起来而且能够自主。另有一种不同的保守主义统治着维也纳。这里的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一分支，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分离出来的，他们同该家族的较老的分支通婚，因而造成一种局面：除了生老病死等不确定因素之外，这一分支的人继承该家族的任何空缺乃是当然之事。这一分支与西班牙的关系纯然是政治上的，而且一向是友好的。他们之间也曾存在过意见上的分歧，特别是在关于何时、如何以及是否对法国人的进攻进行抵抗这类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由于领土野心而发生冲突，也没有由于经济矛盾而互相抵牾。

法国同西班牙是近邻，两面接壤；如果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先前掠夺了西班牙的领土，那么，法国人却是在新近才夺走了西班牙的领土的，而且掠夺了更靠近这个帝国的中心部位的领土。在九年战争期间，法国人几乎同时控制了尼德兰和加泰罗尼亚。法国人不断扩张的海外贸易侵入了西班牙帝国的许多地方。他们不像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直接同西班牙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但他们借西班牙的名义在加的斯进行的贸易同样是私自进行的，其最终的目的地也是相同的。他们可能占有加的斯的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路易十四用强有力的手段来保护这里的贸易。在西班牙各地，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除了一些多少带点流动性的法国劳动者之外，都有法国商人和店主的侨居区。不过，当时流行的经济思潮认为，最可取的贸易是同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因此，法国政府正在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南美洲。1695—1696年，6艘法国船试图绕过霍恩角但没有成功。新成立的南洋公司又于1698年派出去3艘船和1艘炮舰，这支船队于1701年8月从太平洋回来了。这种冒险与对西班牙帝国前途所作的推测也许没有什么联系，但对西班牙帝国前途的推测却与马赛的马赛的贸易大有联系。这里是法国海上商业最大的一翼。英国和较小程度上的荷兰也是这里的竞争者，而且，它们于1695年派出一支舰队来支持这里的竞争。但是，法国如果能够控制西属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控制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在北部非洲的海港，前景就会大不相同。这样得到的经济实惠，其吸引力不亚于法国控制西班牙本土从而控制它的大西洋及地中海沿岸以及直布罗陀海峡而获得的战略优势。一个幸运的偶然机会，使法国的国王及其大臣们认为，他们对上述所有地区的控制进而对西班牙所

统辖的其余地区的控制，岂止属于他们的合法愿望的范围之内，而且属于无可非议的权利范围之内。

在缔结《里斯威克和约》的时候，国王卡洛斯二世已近36岁。他的身体历来虚弱，现在更加不济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指望有任何儿女。由于他的死期在望，首先就引起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谁有资格继承他的王位？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仅仅属于法律上的问题，那么解决起来应该不算太困难。西班牙的王位可以按照女方的世系传下去，这是有充足的适宜的近例可援的。卡洛斯有两个姐姐。在他出生之前，大姐玛利亚·特里萨就已经嫁给路易十四，并同路易生了一个儿子，即路易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比卡洛斯年长5天。1666年，当时皇太子与西班牙国王都是5岁，二姐玛格丽特·特里萨成了皇帝利奥波德的第一个妻子。如果仅仅是一个继承问题，则皇太子从出生时起就已经是西班牙王朝的假定继承人了。

然而，除了继承问题之外，还有其他法律上的问题，而且，对这些法律问题可以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有些法律学家认为，一位国王，尤其是西班牙国王，他的国王的权力只与其生命共存，他不能改变王位从这个国王传给另一个国王的传递规则。然而，在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和法国之外，较为普遍的共同看法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是能够改变这种法制方面的规则的，正如他能改变其他方面的规则一样。

[\[7\]](#) 菲利普四世于1665年逝世时留下的遗嘱规定，如果他死后无嗣，他就把他的西班牙全部领土的继承权传给他的小女儿（即奥地利皇后）。根据这项遗嘱，皇后的孙子，巴伐利亚的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儿子就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一位国王有权订立遗嘱来安排王位的继承，那么有权继承的世系中任何一个人也有同等的权利宣布放弃继承权，虽然也许不能宣布放弃他的子孙后代的继承权，但至少可以放弃本人的继承权。菲利普的两个女儿在她们成婚时实际上就行使了她们这种权利。这两个人的弃权是有区别的。小女儿即奥地利皇后的弃权是绝对的，其有效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法国王后的放弃继承权则是作为婚约的一个部分，而婚约中还包括一些其他条件。然而，婚约中规定的一些其他条件并没有得到履行，例如，西班牙国王就没有按照婚约的规定承担义务付给嫁资，因此，法国的律师们有充足的理由坚持认为整个婚约包括其中的放弃继承权的条款在内都是无效的。此外，至少有一部分权威人士认为，放弃继承权应该得到西班牙议会的

同意，才能认为是有效的。但是，没有人就这件事向议会提出，征求同意。在皇帝方面，他并不承认菲利普四世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作为菲利普三世的孙子，要求独得整个继承权。

除了遗嘱和放弃继承权的问题之外，还牵涉到其他法律方面的问题。西班牙有一些领地如米兰公国和弗纳尔侯国（该国是从热那亚湾进入米兰的通道），都是神圣罗马皇帝的采邑。皇帝有权指定这些地方继承人，如果找不到继承人，他就提供一位。因为如果米兰落入法国人之手，将使法国实际上与奥地利接壤，这对奥地利来说，是极为危险的。那样，就只能由一个军事力量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共和国把法国人同蒂罗尔、卡林西亚（克恩滕）以及加尼奥拉等地隔开而已。除非皇帝力不从心，否则，他是不会不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早在1667年就有迹象表明，奥地利必须提防法国人。那一年，路易十四侵入西属尼德兰，要求为他的王后取得属于菲利普四世遗产的这块地方，借口根据遗产移交权，这块地方是属于这位王后的。^[8]这种侵略的借口潜伏着进一步的危险。路易一直在作周密的准备，随时为皇太子要求得到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利奥波德当时还没有儿子，他只有一个女儿，尚是婴儿。他自己辖下的版图的前途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而到了18世纪，这一问题竟真的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路易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西属尼德兰。1668年1月19日，利奥波德为西班牙做了一件好事，并为自己将来免于麻烦而同路易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这项条约一直保持秘密达一代人之久。这项条约规定最终要瓜分西班牙帝国——如果卡洛斯二世死后无嗣，皇帝本人将继承西班牙本土（除了与法国作一些边界调整之外），继承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加纳利群岛，还有米兰、弗纳尔和意大利的要塞区（帕拉西迪）^[9]以及整个西属美洲；法国则占有尼德兰、弗朗谢-孔泰，以及西属纳瓦拉及其属地，还有罗萨斯的卡塔兰港，北部非洲沿岸的要塞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还有遥远的菲律宾。要是试行把这项条约付诸实施，在许多敏感的地区就会有引起地区性冲突的危险；这种尝试要是获得成功，则会酿成更大的危险。法国将仍然是坚固严整的，不过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强大而居于西地中海霸主的重要地位了。奥地利—西班牙帝国将向外大大扩张，达到查理五世时期的规模，只是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没有适当的战略交通联系而已。很难想象这两个庞大的混合体能够长久地相安无事以及海上两大

强国会轻易同意这项计划。早在6个月之前，它们之间就签订了《布雷达条约》（1667年7月31日），从而结束了它们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如果认为这项条约能够大大消除它们之间对抗的根源，那还为时太早；不过，此时它们之间的争执停止了，而且，在西属尼德兰的问题上正采取共同的行动，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和贸易。很明显，它们的强大舰队将会联合起来以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当时的情况表明，这两个强国在海上是无敌的，而且，在1668年这一年的外交活动中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们能够在大陆的各国中找到同盟者。

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在签订1668年的瓜分条约的时候，对上述种种情况是洞若观火的。他们明白，这是第一次尝试，企图在秘密的、从假想的前提出发的外交活动中处置西班牙帝国，如果不作出巨大努力进行调解或进行战斗，或者双管齐下，这种尝试是不能付诸实施的。事情的发展结果是，这项方案对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很快就失去吸引力。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由于进行了两次战争而加剧，这种敌对情况所造成的分裂是欧洲各强国之间最为根深蒂固的分裂之一。在1689年的《大同盟条约》中，两个海上强国和它们的大陆盟国重申：它们支持皇帝根据菲利普四世的遗嘱而提出的全部要求；虽然这项条款在1695年重新组成同盟的时候没有予以重述，但却也没有撤回。

到了缔结《里斯威克和约》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通常估计的一代人之久，哈布斯堡家族及其亲属不但从其与欧洲的关系来看而且从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都已完全改变了——法国皇太子娶了巴伐利亚的马克斯·伊曼纽尔的一个姐妹为妻，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路易·布尔戈尼公爵，当时15岁；另一个是菲利普昂儒公爵，差不多14岁。皇帝的女儿玛利亚·安东尼亚嫁给上述那位巴伐利亚选帝侯为妻，婚后极不愉快。她于1692年在布鲁塞尔死于生育一个儿子（即选帝侯约瑟夫·费迪南德）。她的丈夫，如我们所知，是西属尼德兰的总督。皇帝本人现在有两个儿子，是他的第3个妻子所生，一个是约瑟夫，21岁；另一个男孩子名叫查理，到1697年10月1日才满12岁。这样一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在维也纳、布鲁塞尔和凡尔赛都有着年轻的男性后裔。在马德里，却没有继承人，而西班牙国王的健康状况则每况愈下。

在九年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路易力图分裂同盟，他的使节暗示要恢复《瓜分政策》，试图以此引诱奥地利人，不过，那是毫无成功

的希望。但是，和平的到来使有关的国家再次易于为法国在正常的外交条件下所做的游说而动容。当里斯威克的和平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法国的全权代表法朗索瓦·卡利埃尔（一篇论述外交技巧的著名论文的作者）曾经发回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看来，好像是荷兰的两位代表雅各布·博雷尔和第克维尔特公爵艾弗拉德凡·韦德他们本人是赞成瓜分的。博雷尔是阿姆斯特丹的代言人，而第克维尔特则是威廉三世的心腹。所以，很明显，诱使两个海上强国接受瓜分的原则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巧妙地把哈布斯堡家族纳入里斯威克的和约之中的联合行动将进行下去并策划上述的进一步瓜分计划。

签订了和约之后，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交易。这些交易有点像是布弗勒元帅与威廉最亲密的朋友波特兰伯爵汉斯·威廉·本廷克之间的秘密会谈（这种会谈曾经实际上解决了媾和的条件）。波特兰作为大使于1698年初到达巴黎，他奉有密谕要开展关于西班牙问题的谈判，布弗勒元帅事实上是他的第一批来访者之一。他的整个使命执行得不好，手法笨拙，他并没有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不过，蓬波尼和他的女婿托尔西在3月间同他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一次初步会谈，这是另一位军人塔拉尔伯爵卡米耶·德奥斯顿动身前往伦敦同国王本人讨论之前的一天举行的。法国人既没有同英国人磋商，也没有同（威廉亲信圈之外的）荷兰人磋商，也没有同西班牙人磋商；西班牙人同海上两个强国的外交关系由于一次个人事件而破裂了；也没有同奥地利人磋商，而奥地利人要全部更新1689年协议的意图则被威廉于11月有礼貌地但是断然地拒绝了。威廉不承认《大同盟条约》中关于西班牙的条款仍然是有效的，可是，奥地利人却建议作出安排强行实施这项条款而不通知西班牙，如果因此而重新引起对法国的战争也在所不计。他们建议派遣8000—10000人的军队到加泰罗尼亚去，为了运送这批军队，他们需要得到两个海上强国的帮助。

奥地利人虽然认为西班牙人不是知己，但是仍然力图充分利用他们从王朝的传统和外交的压力方面可能得到的对西班牙宫廷的任何影响力。^[10]他们要求让皇帝的小儿子查理大公得到米兰公国，皇帝有意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将是瓜分的前奏。在西班牙，重要的事就是国王另立一个新的遗嘱罢了，遗嘱中表明他愿意这位或那位要求继承的人。路易十四派遣一位能干的外交家阿尔古侯爵亨利衔命前往马德里（这位侯爵后来就是法国的公爵及元帅），向西班牙提出法

国的要求，并使西班牙人相信路易的善意。此外，路易还使用了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办法来炫耀他的力量。1698年3月18日，他通知阿尔古说，他的30个步兵营和3000骑兵已经准备好，将立即集中并向西班牙边界进军。如果有必要，他还可以增加他的军队。在加泰罗尼亚方面，它的军火库充实之至；在纳瓦拉方面，如果情况表明有必要，那里的军火库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短时间内予以充实。在任何其他的前来争夺法国皇太子的继承权的军队到达之前，法国军队能够早得多地进入西班牙。为了反对皇帝的觊觎，将以武力来维护继承权；这不但因为皇帝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而且因为如果西班牙和奥地利两国的领土合并，那是违反整个欧洲的利益的。路易说，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他的王朝和西班牙王朝实行合并，也同样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忌妒，因此，他提议，究竟将法国皇太子对西班牙的继承权授予他的两个儿子中的哪一个，应该由西班牙议会选定，并对继承权加以限制，即法国王朝同西班牙王朝永远不得合并。

在西班牙宫廷中有许多反对法国的人士，这些人很有权势，他们并不只是一些忠于长期沿袭下来的国策的西班牙人，其中有许多是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人，而为首的则是王后，诺伊堡的玛利亚·安娜，她是有王权的选帝侯的姐妹，也是皇后的姐妹。但是，法国人声威夺人，况且他们的建议又富有吸引力。到1698年的春天，法国人在西班牙的处境转佳。5月，他们提出建议，利用他们的舰队协助攻击正在进攻休达和奥兰的摩尔人。这项建议虽然被拒绝了，但从7月到9月，法国海军中将埃特雷巡视了西班牙的西南海岸，进入加的斯以及其他地方，表面上是为了剿除沙利海盗。^[11]从罗什福尔和马赛出发的舰队，访问了西班牙沿海的港口，也访问了意大利的港口，远至那不勒斯。7月底，除了在鲁西永的30个步兵营和50个骑兵中队之外（他们后面的多菲内有20个步兵营和20个骑兵中队的预备队），在法国的纳瓦拉还有30个步兵营和30个骑兵中队。只有葡萄牙作出在军事上采取反措施的姿态，葡萄牙征召一些新兵；在法国人看来，这种举动不过是一个笑柄而已。8月，黑森-达姆斯塔特公爵乔治（加泰罗尼亚总督），成为法国一场外交战的对象，这场外交战的结果使他信誉扫地。^[12]

两个海上强国除了要考虑法国、西班牙的以及皇帝的政策之外，还必须考虑一些其他事项。首先，要考虑马克斯·伊曼纽尔的态度。

此人对于自己只不过是一名西班牙官员而已这种处境并不满意，他更愿意得到一个世袭的总督职位，或者至少是一个牢靠的终身职位，这将成为走向主权国家道路的一个阶梯。不过，他的主子们对他这种抱负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把他的实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无权任命主要要塞的司令官，而且，在有违于他的愿望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位卢森堡总督。马德里政府对一位精明能干的尼德兰行政官伯杰克伯爵深怀疑虑，他是一位财务总监。^[13]马德里政府拒绝支持早些时候关于在尼德兰设立一个西印度公司的计划，但是，伯杰克和马克斯·伊曼纽尔通过1698年6月7日的公告，迫使马德里政府表态，并创设对几内亚和东印度自由地区经营批发业务的低地国皇家公司，总部设在奥斯坦德。卡洛斯二世对此表示同意，但是，这个公司并无充足的资本，荷兰人又帮助把这个公司扼杀于襁褓之中。伯杰克于1696—1698年间装备5艘船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贸易，并在圣多明各获得立足点。他还计划建造两条运河，把奥斯坦德与安特卫普以及桑布尔河与默兹河连接起来，这引起了荷兰人的忌妒。凡此种种，都是伊曼纽尔招致疑忌的根源，而他在王朝中的地位还不算在内。他在王朝的地位是颇为暧昧的。他自己的儿子选帝侯约瑟夫·费迪南德公爵，并不真正有权要求继承西班牙的王位。他是法国皇太子的姨母的孙子。这位姨母在结婚时就宣布放弃她的继承权了，而且，由于她对她的丈夫的不忠极为恼怒，她在弥留时又重申放弃她的继承权。即使如此，马克斯·伊曼纽尔也希望能够为他的儿子提出某种要求。任何一方都乐于同他结盟，恰恰是因为他是不能信赖的，易变的。

1698年4月初，威廉三世决定，除非外交行动能够阻止波旁家族也能够阻止哈布斯堡家族获得整个西班牙的继承权，从而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否则，他就不惜诉诸战争。他已经作好准备同路易进行谈判，并逼迫皇帝及马克斯·伊曼纽尔接受瓜分的原则。他所持的立场并不是一个居间调停人的立场。他既然身负英国的重责，又身负荷兰的重责，他就必须看到这两个国家的直接利益得到保护。在谈判的早期阶段，他提出3点要求：荷兰在尼德兰的屏障应予扩大；为了商业活动，他必须得到西地中海一些地方，或是马洪港，或是整个马略尔卡岛，还要得到非洲海岸的一些地方；他必须获得西印度某个港口——这就是，在美洲。^[14]所有这些要求都不是什么新东西。第一项要求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第二项要求则是从最近一次战争得到的经验而来

的。自从1684年撤出丹吉尔之后，英国就不再拥有供他们在地中海进行活动的基地了，荷兰则从来没有任何这样的基地。在战争中，这两个国家虽然曾经很方便地使用了它们的盟国西班牙的海港，但是在前途难卜的情况下，它们自然不想老是依赖西班牙。要求获得一个美洲港口，这是由于与西班牙进行的贸易的特殊性而引起的，因为不可能指望有一位继承人能够像西班牙人那样慷慨地纵容他们的走私活动，所以他们需要得到一个可靠的进行贸易的口岸。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的第二、三项要求不是防御性的，而是重温英国由来已久的商业扩张政策和海外兼并政策。要在地中海取得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观点，在查理二世的大臣中就已经多次讨论过，他们曾经提到过马略尔卡岛和撒丁岛。1670年，托马斯·阿林爵士的舰队在同阿尔及利亚人作战时就使用过马洪港。在九年战争中，奥尔福德的舰队保护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业活动，但其作用远不止如此，它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战略与政治的力量；不乏迹象表明，英国的殖民野心此时比1689年的时候更加膨胀了。那时，英国曾经拒绝同荷兰共同组织对西印度的远征。在战争期间，苏格兰议会于1693—1695年间创设了苏格兰公司，以开展对非洲和西印度的贸易。英国的资本支持这个企业。不顾与西班牙的同盟关系，1698年7月，第一次向达里埃地峡派出的远征队起航了。到了第二年，苏格兰人与西班牙人之间才发生了武装冲突。^[15]不过，在整个冒险性的事业中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有人坚持认为，在这里同在地中海一样，威廉三世利用了西班牙王位继承危机作为推进英国野心的一次大好时机，如果他有诚意希望欧洲获得和平的话，这种野心本应该加以收敛的。甚至有迹象暗示，他正在准备一次掠夺殖民地的战争。

就有关达里埃公司的情况而言，上述说法是与事实相悖的。在第一阶段，该公司大大威胁了英国最巨大的商业利益即对东印度的贸易。英国国王罢黜了那些请求他同意成立这家公司的大臣，而且，英国的股票持有人退出了这家公司。第二阶段，由于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抗议，国王于1699年1月向英国各殖民地的总督发出通令，命令他们不要支援或赞助苏格兰殖民者。达里埃公司并不是威廉的政策的表现，而是他的政策的绊脚石。1698年另一件勉强值得一提的事是英国派了一营人到牙买加去。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威廉对海因修斯就此事所作的解释：他这次行动的目的纯然是为了防御。另外，并不像有些人

坚持认为的那样，威廉不让英格兰参加瓜分问题的讨论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只把荷兰的利益放在心上。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塔拉尔在同威廉的一次交谈中提出一种经济上的论据，以此反对向英国和荷兰提供一个美洲港口。威廉回答说，他是在荷兰长大的，因此，他深知荷兰的商业利益所在，但是，他对英国的商业利益何在则所知不深，他将“为此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认为，英国极其愿意得到哈瓦那，不过他没有提出什么肯定的说法。^[16]对于威廉的居心确实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责难，其中最可笑的也许就是他的一位前大臣诺丁汉伯爵的责难。这位伯爵因为在战争时期作为国务大臣表现得庸碌无能而被黜免，不过，从某几点来说，他倒还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在里斯威克的谈判和有关瓜分的谈判中，威廉总是听信路易的话，而这位路易又总是欺骗他，也欺骗了世界。于是诺丁汉伯爵把威廉比拟为卑怯地自我陶醉的希夕基，这位希夕基说：“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享有和平，难道不是很好？”^[17]威廉其实并不掩饰他盼望在他尚可享有的一段短暂的生命中能够获得和平，而且他完全透彻地了解谈判是反复无常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但是，他的决心是维持他无比珍视的欧洲各国的自由。

经过6个月的艰苦的讨价还价，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国的军队和战舰已经行动起来，这才于1698年10月11日签订了《瓜分条约》。这项《瓜分条约》与30年前那项《瓜分条约》不同，并没有把西班牙帝国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划给法国一份和划给奥地利一份从而使这两个国家各自比其余的任何欧洲其他国家都强大得无与伦比。从任何普遍的欧洲观点看来，这项条约都是称心如意的，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把西班牙的宗主国部分和它的属地中最富庶的部分交给没有从属于某一个大国的继承人巴伐利亚选帝侯、童年时代的约瑟夫·费迪南德。他将得到西班牙、尼德兰、西印度和撒丁岛。余下的领土尚多，足够其他有权要求继承的人大为扩张其版图。法国皇太子将取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吉普思夸的巴斯克省以及菲纳尔和托斯卡纳要塞区。皇帝的次子查理大公将取得米兰公国。

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瓜分方案比这项条约更适合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了。法国和奥地利王朝各自得到了相当的领土，他们可以占有这些领土而不致立即互相激起不堪忍耐的嫉妒或惊惧。海上两个强国的屏障也操于有足够军事能力的马克斯·伊曼纽尔之手。他的巴伐利亚选帝

侯领地，加上他的兄弟——拥有列日和科隆的大主教选帝侯约瑟夫·克雷芒的力量，使他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并抵御法国人的侵犯而保持自己的独立。这种解决办法使海上两个强国的战略要害之处获得了安全，于是他们就放弃了本来希望获得的在地中海航行的保证，因为此种航行保证将使法国得到那么多的意大利海岸，从而使它将来有可能既扩大其在东地中海的势力，同时又扩大其在西地中海的势力。没有人必须交出任何实际的领土，每个有权继承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人）都将增加自己的实力。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拟订一项公平的瓜分方案，而在于能否说服各国同意实行任何瓜分。条约规定，在签字之后，海上两个强国就应该立即把条约的内容通知皇帝和巴伐利亚选帝侯。如果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就要求该两国接受这项条约。如果他们或其他任何人拒绝接受，各签字国最后将不惜诉诸战争以强制执行之。可是，在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之前，路易十四就把上述方案改变了。在条约没有得到批准之前，关于条约的谣言就已经从法国传开，既然条约要提交荷兰议会批准，也就无人希望能够继续严格保守秘密，但是路易劝说威廉推迟到1699年1月方正式通知皇帝。当时认为西班牙国王是活不到这个日子的。于是，皇帝被孤立了，而他本人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就成为他与海上两个强国之间重新形成诚挚关系的障碍。威廉不但很赞成这么做，而且他也不愿意帮助皇帝同马克斯·伊曼纽尔达成任何谅解。选帝侯相当痛快地接受了这些建议，而且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不可能指望西班牙本身能够容忍这项条约。西班牙政府提出了抗议。西班牙国王采取了唯一能够阻止瓜分的步骤：他于12月1日订立了一项遗嘱。西班牙人对制定上述瓜分条约的人所怀的愤懑使国王转而拒绝法国皇太子的继承要求；看来，皇帝也不可能从一种会遭到法国和海上两个强国都反对的遗产赠予办法中得益。因此，遗嘱规定把整个大笔遗产授予巴伐利亚选帝侯公爵而不管4个大国如何。从法理上说，这项遗嘱同菲利普四世的遗嘱一样，是存在很多可以挑剔之处的。如果路易和威廉联合起来，坚持要求实施《瓜分条约》，则他们仍然能够说服皇帝而置西班牙人的抗命行为于不顾的。不过，他们的决定永远不能加以试验了。童年的约瑟夫·费迪南德卧病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于1699年2月6日亡故。

欧洲的政治家们根据他们各自的特质对这意外的惊人事件作出反应。在西班牙，有些人认为，一项奇迹的出现使帝国得以保持其完整性。马克斯·伊曼纽尔在隔了一些日子之后提出一项意见说，他的儿子是皇帝策划毒死的。路易十四履行了正式的致哀仪式，但在噩耗传到凡尔赛的当天，就派出信使到马德里和伦敦去，以便控制局势。先前并没有就这位公爵逝世这种意外事件作出规定。根据《瓜分条约》中一项秘密条款的规定，马克斯·伊曼纽尔将被作为他的儿子的假定继承人来看待，现在，把这种安排付诸实施可以使威廉三世得到满足。但路易十分正确地指出，原来规定的是，选帝侯只能继承他的儿子应得的那一部分遗产，并不能满足他的尚未实现的各种愿望。对法国来说，除了能够提出上述合法的异议之外，新出现的情况比原来的情况更为危险了。但是，这种新情况却可以为大智大勇的人提供大笔的奖赏。现在，同1668年一样，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只是在法国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而没有第三者问鼎。与皇帝取得直接和解是不可能的，从1689年以来他就要求有权继承整个遗产，寸步不让。现在，他终于能够在西方放手地运用他的权力了，这是近11年来他未能做到的。选帝侯公爵的死讯传到海牙的当天，皇帝在卡尔洛维茨与波兰、威尼斯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条约，并留有时间等待俄国加入。^[18]要是在一年之前，威廉可以不必同路易纠缠于谈判。但现在已经为时太晚。虽然威廉的自我控制和克制态度依然完整无损，但为了重新进行瓜分，只得投身于谈判之中。

耗去一年多的时间才达成协议，在这期间，西班牙国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没有其他诸如葡萄牙国王的名字可以被接受来代替选帝侯公爵的地位。把西班牙帝国分成两个部分（各自的幕后主人是法国和奥地利），应该从唯一的一项原则出发：此种分割应使双方势均力敌，以免此一方情不自禁地要进攻另一方。波特兰于1699年3月对塔拉尔用了“平衡”这个词，不过，他的意思是指两个实体之间的平衡，而不是欧洲的全面平衡，不是把每一方可能得到的同盟者都计算在内的平衡。^[19]在这次谈判中，两个海上强国并没有重新提出他们过去提出并讨论过而被第一个《瓜分条约》排除了的领土要求。但是，他们确实坚持要求对尼德兰屏障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从一开始威廉就说，由任何一位法国王子继承尼德兰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也不愿意让皇帝得到尼德兰。即使皇帝是荷兰的坚定盟友，而且满足于不为

对外贸易开放斯凯尔特河，尼德兰仍然会被卷入皇帝同法国之间最终会发生的任何冲突之中，因而两个海上强国也就会如同过去那样再次被卷进去。仍然存在着对尼德兰另作其他安排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把尼德兰交给马克斯·伊曼纽尔，不过，他的运气已经消失了。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一方所欢迎。伯杰克的保护主义措施招致荷兰和英国的报复和外交抗议，并受到各行会的抵抗，而各行会是得到西班牙当局的支持的。伯杰克被黜免了，而马克斯·伊曼纽尔由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计划遭到挫折转而接近法国人，虽然从根本上说，法国人甚至比西班牙人更不赞成他那些政治经济计划。路易通过塔拉尔提出一项意见说，他并不反对尼德兰落入西班牙王后之手，要是这样能够解决全部分歧的话。对此，威廉立即说道：“如果不是碍于我的宗教信仰，我就会自己要求得到尼德兰。”^[20]塔拉尔在报告这件事的时候，过分强调这句话的严重性。后来，这句话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是把尼德兰交给一位奥地利王子了。

第二个《瓜分条约》并不如第一个《瓜分条约》那样构思缜密。这项条约规定把尼德兰加上原来准备划给选帝侯公爵那份遗产的其余部分——即西班牙和西印度——交给皇帝的幼子查理大公。同第一次的条约一样，对法国同西班牙之间的边界作了一些调整。法国皇太子将得到原来要给他的两个西西里王国之外，又加上菲纳尔和意大利的要塞区。但是，米兰公国则交给皇帝的外甥洛林公爵，作为交换，把他的洛林公国交给法国皇太子。自从缔结《里斯威克和约》以来，洛林已经解除武装。这里不准构筑要塞，而法国军队则有权穿越这个公国的领土。只等时机成熟，这个公国就会立即被吞并。

同以前一样，问题不在于条约的规定如何，而在于这项条约是否能够被接受。这一次没有保守秘密，即使能够保守秘密也不免造成猜疑。两个海上强国再次担任向皇帝通报的任务。这次，他们要向皇帝提议让法国占有米兰公国的领地。有经验的荷兰外交家雅各布·霍普衔命前往，并要取得皇帝的首肯，但是，他碰壁了。不过，两个海上强国并不对皇帝迫之过甚。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皇帝可能已经知道或可能已经猜测或者推断到他是有时间甚至在卡洛斯二世终于逝世之后才来加入这项条约的。如果在卡洛斯二世逝世之前他就降低自己的要求，对他何益之有？而且，即使在卡洛斯二世死后，他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要求。条约于1700年3月15日签订，利奥波德不但不同

意，而且研究打算要采取的措施，一如并不存在什么瓜分问题似的。1700年夏天，他同意增派两个团前往加泰罗尼亚，并准备随时派出3万人去保卫意大利。海上两个强国在维也纳提出了抗议。西班牙王后大约于此时成功地暂时停付一部分作为年金的经费，以便为保卫加泰罗尼亚而提供经费。但是，王后的权威时断时续，这次所得的权力也只是暂时性的。她有许多敌手，这些敌手能够把西班牙的政策拨回原位。这些敌手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托莱多大主教、红衣主教波托克雷罗，此人认为，除了法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保护这个君主国使它免致被瓜分。摄政的政务会[\[21\]](#)提出建议：法国皇太子的次子昂儒公爵菲利普应该是唯一的继承人。接着，与年迈的教皇英诺森十二世进行了磋商（如果只是因为两西西里王国是教皇的采邑，这种磋商还是应该进行的）。向教皇请教的是，国王应该订立何种遗嘱才符合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君主国的利益。教皇向一个由3位红衣主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咨询，于是作出了正合乎波托克雷罗心意的答复。[\[22\]](#)法国人知道罗马正在进行何种活动，也知道卡洛斯将不久于人世。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是否仍然相信有机会同皇帝就取得任何解决办法达成协议。10月4日[\[23\]](#)，他们开始扩充军队，他们还不知道国王于两天之前已经订完了他的遗嘱，遗嘱的内容正如教皇和红衣主教所建议的一样。整个遗产都交给昂儒公爵。如果他或他的弟弟不接受，这笔遗产就应交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国王于万圣节[\[24\]](#)逝世。

法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并不操之过急，他们考虑了这场危机的各个方面，而且他们之间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他们以应有的礼貌把他们的决定照会各国。他们的决定就是接受国王的遗嘱。伟人科尔贝尔的侄子托尔西侯爵继他的岳父蓬波尼出任外交大臣，11月，他就作出此项决定一事以备忘录婉转地照会威廉国王。人人都渴望获得的一个怡人的安静局面，现在可以保证获得了。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王国多年来一直是各自分开的，现在也还是各自分开的。整个欧洲都渴望得到的稳定的平衡，现在可以完美无缺地建立起来了，这要比《瓜分条约》所能做到的好得多，《瓜分条约》考虑的只是给法国自己增添力量而已。

各个不同地区发生的事件是对上述这样的思维路线作出的评论。1698年任命的米兰总督是沃代蒙特公爵查理·亨利。此人乃威廉的一位老战友，是洛林的神圣罗马总监查理五世的私生子。按照《瓜分条

约》，米兰公国最终将落入他的王室之手。11月还没有过去，沃代蒙特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为米兰公爵。西班牙各地的总督中最重要的总督马克斯·伊曼纽尔肯定是要竭尽全力争取实现他的个人抱负的，但是，他却承认菲利普五世是他的新主人。12月，在布鲁塞尔的圣·居迪勒教堂又唱起了感恩圣歌。并没有公开保证让其他国家的商人可以享有在西班牙的统辖区内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也没有保证可以自由地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或西西里海峡。这两个海峡实际上将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法国甚至没有向世界其他各国声明保证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朝永远不得合并。为了排除他自己的家族中其他支系对法国的继承权，路易明白地宣布，他保留西班牙昂儒王室在法国王位继承人出缺时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这种做法本身就使敌意的宣传得到口实，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一种阴险的计划。

路易十四在1701年的头两个月不无理由地设想：他在执行遗嘱规定的政策时是不会引起一场全面战争的；除非皇帝坚持要保有意大利，否则也不会遇到武装抵抗的。不过，如果不把法国和奥地利同时都采取的军事措施考虑进去，则1701年的头两个月（实际上是1701年全年）的外交活动就令人难以理解。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国王逝世之前路易就开始扩充他的军队了，法国的每个步兵连都增加10人之多。1701年1月，重新建立民兵。这次为了使民兵发挥更多的作用，把每个民兵小队都配置在各个正规营里。到了2月，补充步兵的工作已经完成。11月，停止批准退役。1702年1月之前，正规军的人数已经达到22万多人，比1688年的人数还多。路易一方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以谋求孤立皇帝，一方面同时动员军队，准备投入战斗，或者进行恫吓，就像1688年所做的一样。看来，他也想紧跟上次的先例行动了。他的行动好像表明法国已经从1697年的困境中恢复过来，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还存在很多困难，而且财力不足。此外，欧洲的局势也不像先前那样有利于他而使他能够取得德意志、意大利、北欧和东欧各国的支持。他把宿敌们的暂时困难看得过重。

尼德兰的西班牙人的老朽政府现在站在路易一边。路易的军队现在部署在边界上，这些军队只要开进去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制伏荷兰在屏障要塞中的卫戍部队，或者切断他们的补给。屏障要塞的情况实在很不妙，工兵不足，谈不上有什么军需品的储备，不同口径的火炮是法国制造的；这里的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军队大体上数目相等，加

在一起总共不过是1万名步兵，另有1500名西班牙骑兵，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坐骑。这些军队纪律废弛，薪饷不继。很快就得到了法国的金钱，于是，用这些钱来改善这种状况。2月4日，威廉三世作为总司令命令荷兰军队撤退，但他授权当地的司令官自行选定撤退的时间，而命令的到达也为之过迟了。2月6日，西班牙的司令官开放全境，接纳优势的法国军队进入各地。这时，荷兰的军队处于难堪的尴尬局面之中，不知所措，一直等到法国人已经充实了尼德兰北部的边境之后才允许他们撤回本国。当这些军队于3月撤退完毕时，许多地方如安特卫普，列赫要塞和其他要塞都已经整顿就绪了。不过，马克斯·伊曼纽尔已经不在那里了。1701年3月9日，他同法国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法国保证西班牙欠他的债务将予以清偿，法国并答应支持他作为皇帝的候选人；但是，法国人使他要是在尼德兰取得伟大成功的希望成为泡影。伯杰克在恢复财政总监的职务之后，就得同法国人一道工作，就如西班牙的军事司令官比德玛尔侯爵得同布菲勒一道工作一样。马克斯·伊曼纽尔被送回他的德国领地去。他回到那里之后，要保持中立，但他应该征募8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几个星期之后，又达成协议，把这支军队增加到1.5万人。

同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协议似乎是犹豫不决的，因为这涉及法国的外交网中最敏感之点。路易重施他一向惯用的伎俩：在和平时期猝然攫取一块领土。这一次，他不但获得西属尼德兰的众多人口及其资源、港口、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取得的），而且他把他的疆界向前推进，以致荷兰在自己的领土之外再也没有前进的基地了；两个海上强国还被夺去了安特卫普。这巨大的收益并不意味着他有着与1688年同样的战略问题，也不意味着他处于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收益的地位。不同之点在于那时他不得不在德意志境内作战，并且要阻止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去。可是，现在由于皇帝所持的态度，使他不得不在意大利境内作战，而且，同样急切地要阻止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去。目前，他的德国支持者能够给他最好的帮助莫过于保持中立，并同时进行武装，以阻止皇帝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面采取行动。对于这些德国的支持者来说，这些任务并不算什么大难事。与马克斯·米伦有紧密联系的他的兄弟约瑟夫·克雷芒甚至更为恭顺。这位约瑟夫·克雷芒作为雷根斯堡的主教，在南面是颇有作用的；作为列日的主教，他在尼德兰的那个方向则有较大的作用；而作为科隆大主教，他拥有荷兰边界各要塞上游的莱茵河，他还拥有河上的一些

桥梁，而法国人可以使用这些桥梁同巴伐利亚以及北方的策应同盟诸侯携手。[\[25\]](#)

然而，应该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位约瑟夫·克雷芒，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而是因为他这方面如果采取公开的行动将使德国的局势爆炸开来。他的要塞还亟待修葺。有王权的选帝侯垂涎凯泽斯韦斯，而勃兰登堡选帝侯则垂涎莱茵贝格。1701年春天，这位大主教同法国人订立协定：他将得到一笔补助金并雇用4000人和1000匹马，在当年晚些时候，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订立了协定之后，他立即动手招募军队，而且，他鲁莽地重新挑起与科隆的牧师会旧日的争端，结果，当年8月，在牧师会的领导下，各等级拒绝投票支持继续向他提供经费。于是，他宣布，他将使用武力征收赋税。牧师会向皇帝申诉。皇帝愿意支持牧师会，而且，为了率先防止危机扩大，占领了选帝侯各要塞，但是，两个海上强国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荷兰边界上的守卫工作，如贝尔根—奥普松姆一线并未部署就绪。法国人离科隆很近，他们若有所图，不难及时得手；而且，他们正在装备那慕尔、旺洛和盖尔特斯，使之成为可供进攻时使用的军火库。15个法国步兵营和16个骑兵中队被派到西属格尔德兰，而在这里，荷兰人占据着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地方在名义上是西班牙欠他们的债务的抵押品。当时看来，在默兹河边的这个要塞和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一片领土是法国企图攫取的目标。

到了1701年的3月底，在尼德兰和下莱茵区，事态的发展明显可以看出似乎法国人已经决定发动一次进攻性的战争。当然，法国人仍然在同海上两个强国进行谈判；直至此时，谈判双方都好像把这些谈判看作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而不是看作为争取时间进行军事准备而玩弄的伎俩。法国接受卡洛斯二世遗嘱的消息对威廉三世不啻当头一棒。他被法国人的诺言欺骗了；《瓜分条约》已成为一张废纸；他同皇帝之间又并无协议，也不可能断定皇帝不至于认为与其同两个海上强国站在一起不如同法国站在一起。西属尼德兰乃欧洲的战略要冲，现在已置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尤其糟糕的是，法国人关于全面接受遗嘱的理由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产生颇为有力的影响。该两地许多有权势的人物甚至大多数有权势的人物都认为，除了可能发生的战争，否则，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会威胁到地中海和西属各殖民地等处的贸易。在英格兰，那种漠然的态度比之在荷兰的更为顽固。

1700年10月19—29日的最后一次议会会议是威廉历来所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一次宗派成见极深的会议。他于11月写信给海因修斯说，他认为，英国人对其自身在大陆的利益视而不见，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但他也这么写道：

我深为羞愧，在这项重大的问题上我未能以应有的魄力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做出勇往直前的良好榜样；但这在共和国是一定会出现的，我希望谨慎从事，从容地引导这里的人民群众而不使他们察觉。[\[26\]](#)

事情已经明白，不可能同马克斯·伊曼纽尔进行任何磋商了。另一种有待验证的可能性是，也许法国人会允许西班牙人交出一些城镇——诸如把奥斯坦德和纽波特交给英国，把那慕尔、卢森堡和蒙斯交给荷兰等——作为西属尼德兰独立的抵押品。为了平息它们本国内关于商业利益的意见，同时为了联合进行谈判并表明站在同一的阵线上，这两个国家——荷兰（于2月）英国（于4月）——冒着开罪皇帝的危险，在一项重大问题上作了让步：承认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塔拉尔当时在伦敦，知名的阿沃伯爵在海牙；信使往返奔驰，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威廉的新议会似乎与旧议会同样执拗。乡村来的议员痛斥已成废纸的《瓜分条约》，猛烈抨击已卸任的大臣们，并纠缠于党派之间的夙怨。不过，国王冷静地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并给予新的信任。国王心安理得地放弃他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只是把1677年以来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当前所得到的有关各项事件的详细情报提交给他们。他让议员们自己去判断需要采取何种行动。国内同时存在两个系列互相甚少联系的辩论在平行地进行着，其中一个系列的论点是反对威廉的，而另一个系列的辩论则在议会方面，其论点正在向威廉的观点靠拢。平民中有一股自发的或非自发的激烈情绪，要求采取措施对付法国人，虽然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损下院的自尊，但却正是威廉从11月以来就开始谋求的。2月，他告诉海因修斯说，全国的意见正在发生变化。下院决定，要支持英格兰的利益和安全，支持新教，支持欧洲的和平。三天之后，下院要求国王根据1678年条约的规定，就派遣援军前往荷兰一事开展谈判。翌日，塔拉尔写信报告说，他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路易则回答说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下院在6月14—25日的会议闭幕之前，授予国王全权以寻求他的盟友；国会投票赞成增加拨款，其数额之大为迄今在和平时期的拨款所仅见，他们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塔拉尔在伦

敦又待了一个星期，而阿沃则在海牙停留得更久一些，不过，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所事事。

存在着一个反法的共同事业，但尚不能明确知道除了两个海上强国参加这个事业之外，还将有何人参加进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加进来。首先的问题是皇帝。当西班牙国王逝世的时候，皇帝有一支数目为7.5万人的步兵部队，而且他可以随意扩充这支部队。维也纳的宫廷素来行动蹒跚。维也纳宫廷的财力已为对土耳其的战争所耗竭，即使1701年采取了某些措施使情况得以改善，但两年之后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27]皇帝愿意两个海上强国同法国人作战，他极希望他们首先同法国人开战。但两个海上强国则认为，应该由要求取得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皇帝发起战争，而不是由他们这些倡议瓜分而遭到失败的人来发起战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怂恿皇帝漫天索价，如果皇帝的要求只局限于神圣罗马皇帝的采邑米兰和菲纳尔，他是能够夺取这些地方而得到满足的。甚至或者路易把这些地方奉送给他而把他收买过去，然后把力量集中使用于别的地方。为了打破“法国力量过分强大”，有必要使皇帝率领其所能征集到的全部同盟者全力投入战争。能够使皇帝这样做的最佳推动力莫过于他过去提出的对整个西班牙继承权的全面要求了。至于威廉，他自己表示，1689年的大同盟条约中包含皇帝这项要求的条款是否仍然有约束力是很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就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及各方应得的份额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是极为必要的。但是，皇帝的决定则取决于德意志及意大利的事态。

双方都可能在这两个国家中有一些同盟者，或者其中有一些保持中立。西班牙在德意志没有属地。法国可能重新制订一项称霸和掠夺领土的计划，和巴伐利亚达成的新的谅解则将成为打进德意志南部的一枚楔子。不过，巴伐利亚同法国人之间在地理上被符腾堡和巴登隔断，马克斯·伊曼纽尔还没有宣布他已经易帜，因此，路易着意避免出现任何进攻态势的迹象。4个国家中，德意志的问题比起意大利、尼德兰和西班牙的问题来是次要的，但却不能掉以轻心。

《里斯威克和约》缔结之后的头两年，皇帝在德意志的处境是极为窘困的，但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地位加强了。对于两位世俗的选帝侯他是尽可放心的，一位是他的姻兄弟、领有巴拉丁选帝侯的约翰·威廉，一位是萨克森的奥古斯都，后者在他的帮助下于1697年登上波兰的王位。最强大的选帝侯是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这也

是一位最为贪婪的人，但于1700年11月签订了第二个《瓜分条约》之后，皇帝同意了他的索价，承认他是普鲁士国王，以换取他的一支8000人的援军。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在柯尼斯堡把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然而，黑森各邦和瓦尔德克是无条件地拥护皇帝的。另一方面，各策应同盟诸侯继续制造麻烦，其中为首的是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利希，还有戈塔公爵。1700年8月5日，一伙策应同盟诸侯甚至向路易十四求援。1697年联合起来的另一伙诸侯则依然阻挠皇帝实践其意图。莱茵河这边的6个希特邦已经联合起来了，1701年，巴登和符腾堡就努力劝说他们共同组织一支军队。1700年11月弗朗科尼亚和斯瓦比集团同马克斯·伊曼纽尔达成一项协议。12月，路易给莱茵河沿岸各选帝侯发出通报：如果他们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纠葛，他就认为这是和平的破裂。不过，到了这时，皇帝已经能够表明自己在德意志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了。

1699年与土耳其媾和使皇帝得以从战争的重负下解脱出来。一年之后，北方战争爆发。九年战争期间，瑞典与丹麦之间的对抗使两国无法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现在，他们之间又在互相厮杀。他们发生争执的第一个原因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现状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把德意志西北部的诸侯卷进来。此外，丹麦人参加了一个联盟，而该联盟的目的是摧毁瑞典在德意志及波罗的海诸国的势力，因而这与丹麦、波兰和俄国的前途密切相关。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打败了丹麦人，强迫他们承认荷尔施泰因公爵的完全自主权。但是，两个海上强国派出一支舰队来制止他，不容许他进一步侵夺丹麦。在签署了《特拉凡德尔条约》（1700年8月18日）之后，北方战争就不再威胁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了。^[28]这一年晚些时候，查理成功地解除了萨克森和俄罗斯军队所造成的危险，12月，他向法国人保证，他将以武力保证卡洛斯二世的遗嘱付诸实施。

瑞典的胜利在维也纳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很自然地猜测（虽然并无根据），查理十二世同古斯塔夫·阿道夫一样，正在和法国人采取一致的行动。匈牙利原有的不满情绪又再度出现，而路易十四已经派出官员去同弗朗西斯·拉科齐一道工作。^[29]然而，奥皇利奥波德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此时已经著名的尤金王子坚定地顶住了他们顾问中的主和派。1700年12月宣布，巴登的刘易斯将指挥莱茵区的军队，皇帝将在匈牙利征集人员，并把宫廷选帝侯的8个团收归自己调遣。新闻

报道断言他准备在春天把军队的人数增加到10万人。路易在尼德兰的举动与他同维特尔斯贝巴赫的勾结，使皇帝在德意志获得了支持。1701年3月，路易欲召集策应同盟各诸侯在一起开会，但未成功。以后他只好同各诸侯逐个地进行谈判，而且只有两位诸侯答应征集军队——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8000人，萨克森—戈塔6000人。但法国人无意在下莱茵区挑起战争。他们加强了在更往南的地区的防御工事。瑞典国王越过波罗的海从俄国人手中拯救了英格里亚而没有惊动德国人，他于1700年11月30日在纳尔瓦取得了胜利。各种同时出现的事件都表明，意大利将成为法国人同奥地利人厮杀的舞台。

法国人在意大利获得沃代蒙特的支持而取得了初步的优势。泰塞于1700年12月到达那里，并很快发现他们在整个意大利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米兰总督。在开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力图不要惊扰意大利其他各邦，所以他只要求派去一支数目不大的法国军队，计24个步兵营，3个骑兵中队和3队龙骑兵。12月底和1月初，这批军队从摩纳哥、昂蒂布和土伦登船，而在弗纳尔、阿拉西奥及瓦多上岸。他们的身份是西班牙人的辅佐部队，也就是说他们的到来并不就意味着法国同皇帝之间的战争。到1701年2月，皇帝的种种准备活动使沃代蒙特和泰塞确信，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军队，他们要求得到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其总数为40个步兵营和50个骑兵中队。3月，米兰多拉公主把她的城市献给法国人；曼图亚公爵这位更加诚挚的支持者也接纳了法国军队。萨伏依公爵——泰塞恰切地称他为“这个难以理解的诸侯”——则同双方进行紧张的讨价还价。他终于同法国达成了协议，允许法国军队通过他的领土，并且提供1万人，而他则得到一个名义上的总司令之职位，他的一个女儿将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托斯卡纳在各强国中，选择了皇帝。威尼斯由于受到条约的约束，不得不允许奥地利的军队穿越自己的领土，它也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允许法军这样做，而其他各邦则赞成教皇的计划，对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保持中立。春天，卡蒂纳元帅来到米兰。此时尚不能确定皇帝是把自己的努力局限于意大利的北部呢，还是也准备从的里雅斯特出发于海上进攻那不勒斯。

上述事态发展到1701年4月初（通常是一年作战季节开始的时候），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只是尚未公开宣布而已。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国王，以巴伐利亚和科隆的选帝侯和萨伏依公爵作为他们的同盟

者，在低地国，在下莱茵区以及意大利集结了军队，而皇帝及两个海上强国则进行其反准备。没有人放一枪；仍然没有成立正式的反法同盟。但是，任何一方都觉得没有把握肯定对方在夏天到来之时不会在上次交战的任何一个处所（除了现在位于两个友好的国家之间的加泰罗尼亚之外）采取行动。上莱茵区和中莱茵区可能免于战祸。各强国总认为各地的备战工作进行得太慢，有负所望。

夏天，双方都公开地忙于集结军队，忙于给此种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支持和外交支持。在英格兰，议会投票批准为90艘军舰和“新征集”的4万名海军提供款项。荷兰从增加他们现有各分队有实战能力的人数入手，着手使他们的军队达到7.5万人。他们的50艘战舰正在准备入海。5日，他们从黑森—卡塞尔雇来了两个团，并同意向梅克伦堡—什未林雇请军队。7月，这些军队加上来自勃兰登堡、不伦瑞克—吕内堡、宫廷选帝侯国和安斯巴赫的军队，荷兰的陆上部队达到约10万人。这些军队主要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附近以及尼尔斯河边的戈赫（宁姆根附近），一支军队驻扎在盖尔德斯要塞附近，以抵抗法国对该地带的任何进攻。布菲勒把他的司令部设于迪斯特，而塔拉尔则在莫泽尔集结了一支独立的军队。不过，法国在尼德兰的备战活动从战略上看有着地区性和防御性的特征，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有意采取进攻性的行动。法国的宫廷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同意西班牙的建议，建造几条长长的土木工事防线。一道防线从安特卫普到那慕尔，另一道防线则从根特的旧布尔到布鲁日的法兰克，可以防卫整个威伊地区。到8月底，布菲勒和塔拉尔已经一共有147个步兵营和225个骑兵中队。从海岸到默兹的防线已接近于完成。8月，马尔巴勒断定法国人已经放弃了本年内在佛兰德展开战斗的任何打算。他们实际上很快就要安排冬季宿营地，而且决定以三分之一的军队留驻尼德兰而另外的三分之二的军队则撤回法国的佛兰德。9月22日，路易决定本年之内不在尼德兰开战。

可以断定，德意志在1701年的相同的时期内也要进行休整。皇帝于春天同贝罗伊特订立了条约，取得了一个团，另外在黑森—达姆斯塔特得到一个团，后者也给奥斯纳布吕克提供援兵。维尔茨堡主教提供了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8月，德意志南部各邦，弗兰科尼亚，斯瓦比和上莱茵区，莱茵选帝侯国和巴伐利亚等，终于宣布将保持中立，并协议共同组织一支联合部队。这是法国外交的胜利。但是，这

项胜利并未使其他任何胜利接踵而来，而且也不预示着法国会发动一场进攻。许多人竭力要求皇帝在莱茵河沿岸驻军以保卫德意志，但这里并不存在来自法国或其朋友的直接威胁；反之，如果不采取措施拯救米兰公国，那么，这个公国就将不保。

1700年12月，尤金就任一支军队的指挥官，这支军队从2月起从奥地利各公国出发，在进军途中不断补充人员。5月下旬，这支军队进入威尼斯的领土，6月初进抵阿迪杰河。此时，这支军队已拥有32个步兵营和26个骑兵中队，另外还有5个骑兵团正在前来参加的途中。皇帝决定从莱茵区调出1万人来增强这支军队的实力。卡蒂纳要求增援。援军姗姗来迟，当这些援军终于真的到达时，却只不过有1个西班牙骑兵团和3个步兵营，外加1队龙骑兵而已。6月19日，在阿迪杰河隔岸交火。意大利之战开始了，法国人虽然到场参战，但却没有作好准备。他们使自己的军队在得不到应有的军需品供应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他们的漫长交通线要通过一个不友好的国家，那里的农民是颇不惮于向落伍的士兵放冷枪的。卡蒂纳对于能否在战争中取胜并无把握，因此，他把主动权完全交给尤金。后果是骇人的。尤金的军队是一支比较小的军队，没有军火库，他并不认真重视他的敌手的科学的、正确的军事部署，他渡过4条河而未遇到抵抗。7月9日，他取得了卡毕战役的胜利。在这个月的月中之前，法国人的前方已经没有任何河流可作为屏障了。8月，维勒鲁瓦元帅自尼德兰抵达，取代卡蒂纳为司令官，并带来明确的作战命令。他把卡蒂纳暂时留下，同他一道工作，而他自己则投身于恢复法国军队的士气与纪律的工作之中。9月1日，在崎岖的山村查理，法军的右翼发生战斗，随即发展成为一场大战，法军投入20个步兵营举行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伤亡数以千计。国王路易取消了作战命令。

这一年夏天的军事行动没有给法国的外交活动带来任何补益，也不能阻止反法同盟的建立。尤金在意大利的胜利却有助于这个同盟的建立。这时，发生了一项重大的人事更替。威廉国王从他的医生们那里得知，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他除了留下明白无误的志向和不许违抗的遗嘱之外，所余的力量已经很有限了。1698年，他对马尔巴勒伯爵完全恢复了好感；这位伯爵不但是假定继承人安妮公主的宠儿，而且是一位颇有手腕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事统帅。威廉现在提拔马尔巴勒到能够代行国王本人权力的各种职位上——只要

凡是一位英国人有资格担任的职位。这些职位就是英国派往荷兰的军事力量总司令以及派驻荷兰共和国的特使。7月，马尔巴勒被派驻马里修斯，此时国王作为荷兰联合省执政官到这里作夏季巡视。国王回英国之后，他就留了下来，而在完成同盟条约这项工作中他的表现说明他具有当时所需要的个人才干。这项重要的协议（大同盟条约）于1701年9月1日签署。这项条约表面上并没有为无疑即将爆发的战争作出安排。条约规定，从批准之日起以两个月的时间同法国国王进行友好谈判，以努力实现同盟的宗旨，至于同盟的宗旨为何物，则并无确切的界说。瓜分的原则已得到承认。皇帝对西班牙继承权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条约特别指明他将得到那不勒斯、西西里，还有米兰。另一方面，皇帝不得不同意，如果两个海上强国能够夺取西属西印度的任何属地，就允许他们保有这些属地。南尼德兰应该作为荷兰的屏障，该地的主权谁属，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皇帝并没有想要取得这个地方的主权。对于西班牙的前途，条约未置一词。虽然这件事还需费力处理，但现在同盟已经有了坚固的内核。

普鲁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王已经加入同盟，成为同盟国。他除了将于第二年提供6000人的部队加入帝国的军队之外，还将保持一支主力部队，他原本可以使用这支主力部队干预北方战争。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使用。萨克森和波兰的强主奥古斯都已经深深卷入了北方战争，他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可能实现很大的野心。当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处于严重关头的时候，奥古斯都对法国来说其吸引力在于：如果法国人能够成功地调解北方战争，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同盟者。1701年5月，他应允如果调解成功，他将派遣3万人向皇帝进攻。然而，法国的调解毫无结果。1702年，法波谈判破裂，选帝侯国王同皇帝签订了一项攻守同盟条约。黑森—卡塞尔几乎要与各策应同盟诸侯采取共同行动了，但却于1701年答应向两个海上强国提供两个步兵团（每团1000人）；到了夏天，举行了进一步的谈判，结果达成了协议，他参加同盟，并提供9000人的兵力；这支队伍三分之二的人员完全由两个海上强国付饷并供给装备，其余的三分之一的人，则在实战时由两个海上强国提供给养费用及军火。

法国曾经应允向波兰和巴伐利亚提供大量补助金，数额之巨，使它自己不胜负担，难以支付；又由于资金短缺，妨碍了它与德意志各小诸侯进行商洽。法国的外交官除了请求各小诸侯加入法国一方以维

护其自身利益之外，就无计可施了。各项事态的发展进程及海上两个强国的丰厚财力，使各小诸侯认定皇帝更为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在德意志有一股转向赞同皇帝的舆论。美茵茨选帝侯（也是班贝格君主兼主教）和他的邻居特里尔选帝侯就被1701年10月的补助金条约收买了。1702年3月，整个联合邦除了巴伐利亚之外都同奥地利达成了协议，加入了大同盟。5月，特里尔加入大同盟，答应守卫自己的地方，并允许同盟的军队自由通过它的领土。但是，帝国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正式宣战，组织一支帝国军队的计划也是到了1702年的秋天才付诸实施的。不过，在春季，德意志各邦的态度已经确定了。同路易站在一边的，除了他的两个主要盟友科隆和巴伐利亚之外，还有其他3个邦。一个是荷尔施泰因—戈托普。这个邦于1701年10月签署了一项补助金条约，但一年之后，这个邦的公爵逝世，这个邦又易帜了。另外两个邦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和萨克森—戈塔。这是策应同盟诸侯中仅余的两个邦了。这两个邦对他却毫无用处。1702年2月，从汉诺威和策勒出发的军队，对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希实行“帝国的讨伐”^[30]，萨克森—戈塔公爵发现法国人并不能帮助他，懊悔不已，于是，他把军队撤回转而受雇于同盟。

法国方面于1701年取得的一项颇足称道的外交成就是关于葡萄牙方面的。葡萄牙与大不列颠素为盟友，但这个古老传统关系并非十分可靠，也不能认为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的多年夙怨是坚不可解的；然而，两个海上强国能够对葡萄牙的海港及商业活动施加压力，而且，同盟国只有在葡萄牙才能找到入侵西班牙的陆上基地，只有在葡萄牙才能找到进入地中海的航海基地。由于葡萄牙国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曾经戏谑地要提出分取一杯羹的要求，1701年6月葡萄牙却同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同盟条约》（更确切地说是友好条约），这就令人不胜惊异了。^[31]

法国人于1701年夏天及秋天所做的准备表明他们将要采用的战略的轮廓是什么样子。8月，他们在布列斯特装备了19艘战舰，在加的斯装备了24艘；11月，他们护送西班牙的船队回国；也是在11月，他们在萨斯凡根特的对面建造了一个要塞；12月，荷兰人在这个地方向他们开火。法国人秋天的这三项决定性的行动表明，这个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其结局除了展开真正的战争之外，别无其他出路了。《大同盟条约》签署之后（而路易还不知道此事）9天，国王詹姆士二世于9月

16日逝世于圣·日耳曼斯。不管《里斯威克和约》对他如何，他还是同其他一些被流放的君主一样，获准使用他原有的各种尊号。如果路易十四于此时竟然拒绝给这位“虚假的威尔士亲王”这种荣誉，那就是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怠慢了。要是给了他这种荣誉，路易就可以取得好几个方面包括梵蒂冈的信任。他作了简短的思考之后，承认他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名义上的国王。路易这种慷慨的姿态，在英国被认为是意味着赞助詹姆士党人^[32]的事业，因为路易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所以英国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种做法使英国的可能有的全部愤恨情绪都集中于反对法国。同一个月，西班牙仿效法国于前几天作出的先例，禁止英国的制造品进口，因而鲁莽地挑起英国在商业方面的愤懑情绪。

路易对于同西班牙进行的交往，一直特别小心谨慎，避免引起反对菲利普的不满情绪，因为菲利普的地位现在仍然是不稳的；可是，现在令人惊骇的是，路易竟赞同一项从上述观点看来是十分危险的建议。10月30日，托尔西写信给马辛伯爵（伯爵是一位佛兰芒人血统的战士，他接任了阿尔古在马德里的职务），指示伯爵要求西班牙把西属尼德兰割让给法国，这样做将使战争更易于进行，也不会使和平更难于安排。而且，这样便可以补偿法国已经造成的和将继续造成的损失。马辛回答说，这样的要求将激怒西班牙人，这是对他们的帝国的完整性的一个严重打击，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路易收回成命，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瓜分的想法，他现在又回过头来认为瓜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条件了。这就很明白，甚至从路易的公开行为的表现看来，他实际上是把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国王视为他的臣仆。

1701—1702年这个冬季，各方面的备战工作持续进行，尚未中断；也没有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外交活动来扭转这种局势。11月，科隆的约瑟夫·克雷芒看到荷兰军队出现在宫廷选帝侯国而大吃一惊，立即请求法国人派军队到他的要塞（包括列日）来。以此作为借口，法国人作为援军开到布尔戈尼邦。威廉三世还没有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也没有怂恿皇帝进行干预。但是他很希望皇帝能把自己的军队悉数派往上莱茵区，以便把他那些德意志的支持者^[33]巩固地团结在一起，而在《大同盟条约》中他已应允把他的军队全部提供出来。皇帝总是想把军队转派到意大利去，那里的尤金王子的军队比较弱，而且补给不良。2月1日，尤金在奇袭波河岸边的克雷英纳的战役中侥幸取

得了胜利，并捕获维勒鲁瓦元帅作为俘虏；但他的胜利中有某种无法理解的因素，因为即使春天他的援军到了，在人数上他依然处于劣势。皇帝总是想分遣一支部队给那不勒斯，并且要海上两个强国派一支舰队去地中海^[34]，这两种想法都为时过早。尽管威廉提出忠告，并且表示愿意提供新的东西，但是，看来法国人将再一次看到德国人像上一次战争那样姗姗来迟，不能及时负起分配给他们的作战任务。数目相当大的一支4万人的队伍，从各邦集结到上莱茵区，同奥地利人和宫廷选帝侯国的人在一起，归巴登的刘易斯指挥。

威廉于3月逝世时，意大利已经再度爆发了战斗。布菲勒停止集结军队，等待命令。当时在海牙任秘书之职的法国外交官巴拉被匆匆地任命为“代表”，要求荷兰议会执政同法国人单独进行新的谈判。他对阿姆斯特丹那些被认为对法国怀有好意的当政人士解释法国的和解诚意。4月8日，议会拒绝法国人的友好表示。荷兰人态度坚定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马尔巴勒、海因修斯和皇帝的大使戈斯伯爵进行了最后的准备。4月16日，荷兰共和国、普鲁士和宫廷选帝侯国的军队包围了凯泽斯韦斯。由于还存在一线希望，还有可能延长同帝国在名义上的和平，驻扎在朱里希的布菲勒奉命不得越过莱茵河。5月15日，奥地利、大不列颠和联合省同时对法国宣战。

（谭之清 译）

[1] 见本书原文第626页。

[2] 见本书原文第473—474页。

[3] 见O. 克洛普著《斯图亚特家族的陨落》第8卷，1879年，第56—57页。

[4] 1700年，他们的主力舰总数是107艘，但这个数字包括一些没有编入现役的舰只，其中一些也许已不适于一般的服役了。见J. H. 欧文（Owen）著《安妮女王时期的海战》，1938年，第279页。

[5] 对维拉尔出使维也纳的指示，据拉格里（A. degrelle）《法国外交与西班牙王位继承》第2卷（1889年）第514页所引。拉格里书中所收的信件极其重要，但他对法国政策的论述不如已故的M. A. 汤姆森（Thomson）所作的精辟的、博学的论述令人满意。汤姆森的论文见《皇家历史学会会刊》第5集第4卷（1954年），第111—134页。

[6] 关于约瑟夫二世试图重新开放斯凯尔特河的意图，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本书原文第272—273页。

[7] 据J. A. 马拉佛（Maraval）《西班牙17世纪的政治哲学》，第152页。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唯一西班牙作家是德兰西纳（Rodríguez De Lancina），他于169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表述了这种观点；他的这种观点是当时环境影响的产物。

[8]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210页。

[9] 要塞区为菲利普二世于1557年所建，包括爱尔科尔港、奥尔贝特洛、特莱蒙尼、蒙特根塔罗、圣斯蒂芬诺港、隆戈尼港及皮昂比诺。这些地方都在蒂勒尼安海的沿岸。同样的意大利方式也可能应用于北非北部的设防港口（西班牙语称为帕拉西迪）——休达、梅利利亚及奥兰。

[10] 宫廷的派系情况，见本书原文第357页及以下各页。

[11] 当时在摩洛哥活动的海盗，见本书原文第554页。

[12] 关于本年早些时候反对他驻在马德里的一个团的运动，见本书原文第362页。8月，有谣言说他准备调派更多的军队到马德里来并且要绑架波托卡雷罗。因此，他被迫辞职。

[13] 他以后进行的改革，见本书原文第413页。

[14] 《致波特兰》，1698年4月7日，载《威廉第三通讯集……本特克》第1卷，第1部分，第278页。信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两个强国中哪一个要得到哪几处地方，不过，只有英国希望得到一个地中海的基地。

[15] 见本书原文第360页。

[16] 见拉格里（Legrelle）第2卷（1889年），第320页。

[17] W. A. 爱特根（Aitken）编：《诺丁汉伯爵言行录》，1941年，第137页。关于希夕基的事，见《旧约·列王纪（下）》第20章第10节；又见《旧约·以赛亚书》第39章第8节。

[18] 见本书原文第626页。

[19] 关于欧洲的平衡这个概念的出现，见本书原文第155页及以下各页。

[20] 见拉格里（Legrelle）所著书第3卷，第37页。

[21] 见本书原文第360—361页。

[22] 教皇英诺森十二世于9月27日逝世，他的继承人克雷芒十一世否认法国关于此事的报告真实性。虽然西班牙的请求及教皇的答复的原件一直没有找到，而且有关此事的史实确有模糊之处，但主要的内容并无严重的可疑之处。见L. 冯·巴斯特（Pastor）《教皇史》第33卷，1940年，第686—688页。

[23] 关于这个有意义的日子，见G. 吉拉尔德（Girard）《募兵与民兵，1701—1713》，1921年，第4—5页。

[24] 万圣节是11月1日。——译者

[25] 见本书原文第246页注1。

[26] 《奥伦治·拿骚家族档案》第3集第3卷，1909年，第206、249页。

[27] 见本书原文第310页及以下各页。

[28] 有关事件见本书原文第652页及以下各页。

[29] 见本书原文第584页。

[30] 这是指实施一项帝国决定的行动，这里所指的是皇帝根据威廉三世的请求而作出的一项决定。

[31] 关于葡萄牙的外交政策，参见本书原文第524页及以下各页。

[32] 为詹姆士二世及其后嗣进行复辟活动的斯图亚特家族的拥护者。——译者

[33] 见本书原文第410—411页。

[34] 见A. D. 法郎士（Francis）著《黑森—达姆斯塔特公爵乔治和1702年远征加的斯计划》，载《历史研究所通报》卷42，1969年，第58—75页，表明维也纳认为（见本书原文第418页）在英国海军部的反对下，夺取加的斯是对同一年的地中海攻势的补充。

第十三章 欧洲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8世纪初发生的两次大战（指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译者）总体来看可说是一场真正的世界战争。然而这两次大战在发展过程中根本互不影响。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在1707年，欧洲的这两个风暴的中心才几乎汇合在一起。在反对瑞典的战争中，王位继承战争的交战国保持中立；同样，在反对法国的战争中，波罗的海的交战国也是保持中立，虽然丹麦向“海上强国”提供了辅助部队。普鲁士参加了西欧的战争，虽然“北方战争”对它确实重要得多。

奥地利、英国和联合省（亦称荷兰共和国——译者）于1701年9月7日结成“大同盟”，主要是这3个国家对路易十四的霸权发动了最后一次的也是决定性的战争。从原则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认为整个西班牙的继承权应归哈布斯堡王室。他没有等条约签署完毕，甚至没有宣战，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意大利北部，企图占领米兰。在他看来，米兰是帝国的采邑，卡洛斯二世死后它理所当然应归属神圣罗马帝国；在伦巴第的法国军队只是充当菲利普五世的辅助部队而已^[1]。然而，“海上强国”在1701年却并非准备为哈布斯堡王朝纯正统观念的要求而战。它们承诺帮助哈布斯堡王朝只是为了在意大利、西属地中海岛屿以及西属尼德兰得到“公正而合理的报偿”，而且进一步规定西属尼德兰应成为“联合省隔离和抵御法国的一道堤坝、壁垒和屏障”。因此，很清楚，威廉三世晚年精心策划的这个“大同盟”的前提就是要瓜分西班牙君主国。而且只有在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室绝不合二为一的条件下才容许菲利普五世统治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即便如此，“海上强国”在英国的触动下仍决定：除保持它们在卡洛斯二世时期在西班牙各领地享有的一切商业特权外，还将保持它们在西印度群岛任何可能掠取的权益。^[2]

1701—1702年冬，德意志有很多邦通过单独签订条约或根据所谓“加盟法”参加了“大同盟”，它们是：勃兰登堡—普鲁士、汉诺威、巴拉丁、明斯特、黑森—卡塞尔、巴登以及一些更小的邦。勃兰

登堡的选帝侯以承认他的新称号“普鲁士国王”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支持帝国皇帝；而汉诺威的选帝侯只是由于希望登上英国王位才加入“大同盟”。这些诸侯很少是不折不扣的同盟者，“海上强国”雇用他们的军队只是作为辅助部队，只有普鲁士除这类帮助外对战争作了直接的贡献。“海上强国”由于财力雄厚，在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在德意志拥有取之不尽的兵源，而法国在那里的兵源储备却日渐枯竭。帝国内部的舆论主要是反对法国的，这是因为《尼姆根条约》和《里斯威克和约》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愤恨难平，还因为他们惧怕法国进一步侵略。^[3]但巴伐利亚和科隆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却站在法国一方，而萨克森完全投入“北方战争”，其余的诸侯则主张中立。当整个帝国于1702年9月终于对“昂儒的菲利普”宣战时，各诸侯国提供的军队没有多大战斗力。

在所有的盟国中，荷兰共和国对陆上的战争准备得最充分。威廉三世创建的军队状态极佳，1702年迅速扩充到10万人。英国的备战工作要差一些，但在1702年它向大陆派去一支4万人的远征军。在战争过程中，荷兰共和国的军队增加到13.7万人，英军增加到7万人。两国的军队如此庞大，只能靠征募德意志和丹麦的雇佣军才能做到，它们本国的军队还不到半数。尽管如此，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这个小小共和国对陆地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西属尼德兰这个主战场上，荷兰人一直承受最沉重的负担。他们负责多次攻坚战的费用并提供重炮，英军带有野战炮但没有攻城大炮。从战争一开始，荷兰共和国就被迫以高利息借债来支付战争的费用；英国的财政状况较为稳定，税收所得很大一部分用于战争。在海上，情况则完全不同。像上次战争一样，两国商定，联合海军的费用八分之五由英国负责，但荷兰对应承担的八分之三实际上已越来越无力提供。英国舰队的状况相当良好，而荷兰舰队的状况则迅速恶化。^[4]这主要是因为，荷兰共和国把主要力量投入南部边界的战争，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的利益。当时英国有一部分人仍怀有相当强烈的反荷偏见，荷兰海军的弱点使这种情绪愈加强烈；英荷海军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总是友好的。^[5]奥地利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它没有舰队，只参加陆地的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在数量上与荷兰的军队大致相当，但组织较为涣散，供应也较差，承担在意大利战场作战以及德意志南部战线的许多战斗。这时皇帝与土耳其人和平相处，对他当然是有利的。然而，他必须认识到匈

牙利方面的不满情绪，因为在1703年，匈牙利在拉科西·弗朗西斯二世领导下爆发了公开的叛乱。^[6]“海上强国”曾敦促利奥波德及其继承人约瑟夫一世对匈牙利人作出让步，但未奏效，因而好多年那里的骚扰事件牵制着哈布斯堡的大量兵力。不过，皇帝虽在军事上和财政上虚弱，他却拥有萨伏依的尤金这位极为宝贵的军事天才，此人在1701年由于在伦巴第的辉煌战绩而享有盛名。

波旁王朝如何与“大同盟”相抗衡呢？西班牙王国已经衰落，它的陆海军已没有多大战斗力，但法国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几乎等于整个联盟的力量。1705年，法军总数估计为25万人。^[7]法国的地理位置居中，交通线比对方短，军事指挥权集中于一人——这些都是有利的方面。从表面上看，法国只要保持原有的阵地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它在海上的劣势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法国在海上的力量起初只在地中海占优势，而且早在1704年就丧失了这个局部的优势。结果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受到敌方的严重扼制，而且西班牙由于海岸线长、防御力量薄弱，也屡次受到攻击。最重要的是，英荷舰队的主力可任意行动，不受约束，一旦据有必要的前进基地，就可有扩大盟国陆军突击力量的战机，而且仍有余力派出小舰队巡视海峡水域及北海上的主要交通线。虽然如此，像九年战争一样，法国仍有强大的力量对敌人的贸易予以有力的打击。英荷商人所惧怕的武装民船在沿海许多地方出没，敦刻尔克、圣马洛以及1706年以后的奥斯坦德只是其中几个最可怕的武装民船的巢穴。直到1708年，法国武装民船的活动才有所削弱，但在战争最后的一年又恢复了活动。

法国最亲密的伙伴是西属尼德兰。菲利普五世登基后第一批敕令之一就是任命他的祖父为这些边远省份的摄政，因此，那里的要塞为法军据有——卡洛斯二世晚年的总督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合作也是一个因素。路易十四任用精明干练的伯杰克伯爵（即“比利时的科尔贝尔”）为大臣，由他推行中央集权政策。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建立的3个平行的院——政务院、枢密院、财政院^[8]——由单一的国务会议（Conseil Royal）所代替，两个财政部门也归并为一。伯杰克扩充军队，并按照法国的模式重新组建。由于志愿兵制不能满足兵员的需要，改以抽签的办法从平民中征兵。由于推行包税制，中央政府由贵族领地、邮政和进出口关税得到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伯杰克还试图在省和地方推行包税制，他在佛兰德取得成功，但在布拉邦特遭到

挫折。省和地方的法院受到中央更严格的监督。在宗教事务方面，仿照法国的做法，大力抵制詹森教派，其主要领袖根据“逮捕密令”予以放逐。这种追随法国专制主义而不顾法律程序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低地国家的意愿。这些新政策很难为当地居民所赏识，他们虽无明显的民族意识，却非常热爱他们的公民（特别是市民）自由的伟大传统；在行会和公司、司法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以及上层贵族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也还有不小的势力。然而，主要还是战争的爆发使伯杰克的这些措施未能实现其恢复经济的渴望，虽然这些措施对于进行战争本身是有用的。在西属尼德兰建起著名的布拉邦特防线，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这条防线是由安特卫普附近的斯凯尔特河延伸到那慕尔附近的默兹河，由河流和梭堡构成的一个宽阔的弧形防御体系。布拉邦特防线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后来证明集中强大的兵力是能够突破的。但在1705年以前，这条防线阻止了同盟国突袭部队的入侵，并保持这个国家不致被他们占有作为赎买的条件。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路易十四仅有的两个盟国都属于维特尔斯贝希家族。作为西属尼德兰的总督，马克斯·伊曼纽尔曾站在威廉三世和皇帝一边，可是现在他指望凡尔赛来实现他日益膨胀的梦想——国王的称号，也许还想当南尼德兰的君主。巴伐利亚本身就可以作为法国在帝国境内严重威胁奥地利的前哨基地，在法国的资助下这里很快建立了一支2.1万人的精锐部队。选侯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兄弟约瑟夫·克雷芒不仅是列日的主教，也是科隆的大主教和选侯，他也已倒戈，并请来法军占领沿莱茵河和默兹河一线的许多据点，其中重要的有波恩、凯泽斯韦斯、莱茵堡、列日本土和于伊。不过他的亲法政策在科隆和列日遭到拥护帝国的人的抵制，这些人在宗教界和城市资产阶级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法国在意大利的地位确实非常牢固。萨伏依公爵亦即菲利普五世的岳父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位于法国和这时属于波旁王朝的伦巴第之间，比以前更加依赖法国：法军准备穿过皮埃蒙特，他就于1701年2月向他们敞开阿尔卑斯山隘口。曼图亚公爵则允许法国驻军，并把波河流域拱手让给法国卡蒂纳元帅。此外，1700年当选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比其前任更不信任哈布斯堡王朝，这对于法国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重大胜利。教皇承认菲利普五世是西班牙国王和米兰公爵，出资帮助建立一支反对英国的法国远征军，而且直到1709年，他总是奉行一种偏袒法国的中立政策。另一方面，好斗的“纯正基督教王”的天主教派举行“卡米扎”叛乱^[9]，在国内给路

易十四造成不小的难堪，只是同盟国未能利用这次叛乱，未使叛乱与自己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

1702年3月19日，当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大同盟”的核心人物威廉三世卒于汉普顿宫。与法国的期望相反，威廉三世的死并未减弱英国或荷兰的斗争精神。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政治和商业的利益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对它们太重要了，绝不能泰然处之。根据本届议会1696年的一项法案，安妮公主顺利地继承了威廉的王位。就在她登基的那个星期天，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忠于王室的誓言，表示要竭尽全力进行一场战争。长期为安妮女王所信任的马尔巴勒伯爵（不久后晋封为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1722年）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和驻海牙的特命全权大使。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和外交家，虽然出生于托利党家族并且同情该党，却始终坚定地拥护威廉三世的大陆政策。以财政大臣戈多尔芬勋爵为首、由温和的托利党人组成的新政府全力支持他。这时大多数托利党人赞成这场战争，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要向海外扩张，但也反映出他们对于路易十四在1701年9月宣布大主教的“觊觎王位者”（Catholic Pretender，指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儿子和孙子——译者）为詹姆士三世感到愤慨，即使他们当中坚决反对荷兰的人也不例外。这虽然不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但路易十四的这一貌似果敢实则轻率的承认之举却使这场冲突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带有王朝和宗教战争的色彩。即便如此，英国起初还是就参战方式展开激烈辩论，即英国是否只应作为辅助者参战，而把力量集中于公海和美洲？

在荷兰共和国，威廉的去世曾产生重大的影响。几乎在联邦的所有省份，反对奥伦治家族、主张共和、一向热爱和平的党重新掌权，虽然他们在泽兰和格尔德兰恢复政权曾遇到地方上的骚乱。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省任命新的行政长官，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因为弗里斯兰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纳索的约翰·威廉·弗里索（威廉三世的堂弟）这时尚未成年。^[10]不过，这种政权变动只影响国内政策。同法国最初的期望相反，荷兰新的统治者都毫不犹豫地赞同威廉三世的对外政策。表面看来这是矛盾的，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解释清楚：大家普遍认为法国控制西属尼德兰后，共和国的生存就直接受到威胁。半个世纪以来，建立一道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屏障实际上已成为全民族的目标——这种思想绝不是由于与布拉邦特和佛兰德讲荷兰语的居民感情上

一致而产生的，虽然这种感情的影响的确拯救了比利时的荷兰文明。执政者和商人们——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执政者和商人——非常重视的经济利益被视为民族基本安全。菲利普五世将贩卖非洲奴隶的特权让给法国一家公司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耿耿于怀。沙丁鱼和鲸鱼出口是荷兰特别敏感的问题，荷兰的贸易因法国重新限制进口沙丁鱼和鲸鱼产品而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共和国进行战争虽无热情，但举国上下意见是一致的。威廉晚年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还在职掌权，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市长安东尼·海因修斯，荷兰政治的千头万绪都在他的股掌之中。他和马尔巴勒私交甚好，这就保证了荷兰同英国能在战争初期进行密切合作。

威廉死后，英荷两个“海上强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联军最高统帅的人选问题。按照常理，谁的军队强大谁就应该被提名担任最高统帅，但优良的荷兰军队有一个缺陷：它虽然拥有很多经验丰富而且很有才能的将军，却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个人声望和政治权威可以担任总司令。他们只好采取一种变通的处理办法：1702年6月30日，他们任命马尔巴勒为总司令，条件是当荷军在与英军彼此有结合部的战场上作战时归他指挥。这也就是说，当荷军独立行动时，应由荷兰将领指挥。^[11]从1704年起，荷军统帅是纳索-鄂奥文柯克；从1708年起是蒂利。蒂利出生于楚克拉斯的一个有名的比利时军人世家。即使在马尔巴勒有权指挥荷军时，这种权力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他所指挥的所有战役中都有荷兰议会派出的政治专员即所谓战地代表伴随，他们可以否决他的命令。这种有限的统一指挥权对于奥军来说更加有限，他们几乎是独立作战。^[12]另一方面，马尔巴勒的任命使英军以更大的力量陷入大陆战争，这也是很多托利党人所不喜欢的，他们注重纯粹的海上战略。

三大盟国于1702年5月15日对法国宣战。已经承认菲利普五世的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时也对西班牙宣战；皇帝向昂儒（指菲利普五世——译者）及其追随者下了战书。在两年时间里，主要战场是尼德兰、莱茵河下游地区、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莱茵河一线的战斗在宣战前不久即已开始。在此战区英荷联军占有局部优势。他们第一个目标是夺取约瑟夫·克雷芒已经让给法国的那些莱茵河和默兹河上的外围据点。这个目标在1702年大部分实现了，在4月和10月间，凯泽斯韦斯、旺洛、鲁尔蒙特、斯蒂文斯韦尔特和列日相继攻克，1703年

又占领了莱茵堡、波恩、于伊和位于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的两个要塞——林堡和盖尔特斯。至此，这一战略目标完全实现。两处领土都被夺走的约瑟夫·克雷芒逃往法国避难。这样一来，法国丧失了一些优越的前进阵地，而联合省共和国则解除了法国入侵的直接威胁。但是占领安特卫普的计划未能实现，由于1703年6月的埃克伦战役胜负未分，当时在斯莱根贝格将军指挥下的荷兰军队是与双倍兵力的敌人作战。

至此为止，战争还是按照过去那种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的——如同一场围城战。战争初期还在指挥作战的沃邦及其荷兰对手克霍尔恩（1634—1704年）都擅长于这种战争。马尔巴勒主张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机动战略战术。他认为在野战中取得一次胜利“对于整个战争来说远比攻占20个城镇有利得多”^[13]，同时他对自己的军队的旺盛士气也充满信心，因此他宁愿抓住每一个战机进行战斗。这种很有魄力的思想引起荷兰人的怀疑和忧虑是理所当然的。荷兰的将军们对于马尔巴勒的军事才能还缺乏了解和信任，而且一场败仗所产生的后果对于共和国来说比对英国更加危险。反对马尔巴勒的最初的迹象出现于1703年。当时他想突破布拉邦特防线，迫使法军作战，但战地代表在荷兰将军们的怂恿下否决了他的决定。他极为失望。

在战争最初几年，莱茵河上游和德意志南部战场局势的发展对同盟国非常不利。帝国军队总司令、巴登的省长刘易斯侯爵在莱茵河布防，他在克尔桥头堡东北约20英里处筑起斯托尔霍芬防线，阻止法军从黑森林和莱茵河之间向北挺进。但在1702年9月，一直与皇帝进行谈判的马克斯·伊曼纽尔突然摊牌，诱骗帝国的乌尔姆市投降；在下一战役开始之前维拉尔即夺取了克尔要塞，然后大胆进军，通过黑森林隘口，于1703年5月与巴伐利亚人会师。这一迅速而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绕过了斯托尔赫芬防线，致使蒂罗尔受到两面夹攻——北面受到马克斯·伊曼纽尔的攻击，伦巴第方向受到旺多姆的攻击。选侯马克斯·伊曼纽尔攻到因斯布鲁克，旺多姆攻到特兰特（蒂罗尔）。但蒂罗尔农民游击队的猛烈进攻迫使敌军于7月份从他们所在的山区迅速撤退。然而选侯还是在巴伐利亚站住了脚，于9月份在霍恰斯塔特附近挫败来自莱茵河方向的帝国军队，并于1704年1月攻克奥地利边界上的帕绍。至此，从战局发展看来对哈布斯堡王朝十分不利，特别是当时匈牙利叛军正从另一个方向向维也纳逼近。维拉尔早在1703年夏就曾想

进攻维也纳，但当时选侯却试图控制布伦内罗隘口，这标志着他们之间摩擦的开始。在新的紧急情况下，皇帝从意大利召回尤金担任宫廷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重新组织奥地利的军队。

此后不久，萨伏依公爵终于回到同盟国一边——1690—1696年，他曾与这些国家一起战斗过。那时他曾经几乎不断地与法国进行谈判，而此时，作为法国的盟国，他从1701年以来一直与维也纳保持接触，因为路易十四未能满足他对米兰人提出的那些要求。法国在1702年8月胜负未分的卢日拉战役以后（这次战役阻止了尤金的胜利进军，直到1706年才发生转机），已有力量加强对米兰的控制，并能在1702—1703年间阻挠尤金来自的里雅斯特的海上供应。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对于法国人对其本人及下属的傲慢态度越来越愤慨；1703年9月在旺多姆企图与马克斯·伊曼纽尔在蒂罗尔会师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路易十四下令袭击在桑托·班尼得托的皮埃蒙特的部队。11月8日，在海上强国的保证下，奥地利与萨伏依达成协议。海上强国答应每月向萨伏依公爵提供津贴，皇帝则牺牲伦巴第，让出蒙特菲雷特·亚历山大里亚、瓦尔塞西亚·瓦伦察和维杰瓦诺。^[14]这一决定使萨伏依公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泰塞很快夺走了萨伏依，瑞士未能对它起保护作用。皮埃蒙特的一部分地区也被占领，它的很多部队被解除武装。在利奥波德于1705年逝世之前，维也纳没有尽多大力量来解除这种压力，还是马尔巴勒通过谈判调来8000人的普鲁士军队才于1706年拯救了这位公爵。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也不能指望同盟国舰队的支援，因为长时期以来盟国舰队主要用在新开辟的西班牙战场，在地中海的行动居于次要地位。

英荷联合舰队于1702年对西班牙的远征并无辉煌战绩。威廉三世为这次远征所确定的目标是收复一个海军基地，从该基地出发即使在冬季也能进入地中海。舰队司令乔治·鲁克爵士对完成战斗任务毫无信心。在奥蒙德公爵的统率下，由1.6万步兵和水兵组成的强大的远征军在加的斯附近登陆，但未认真试图夺取该城，因该城防务近期已经加强，且居民毫无同情的迹象；原希望西班牙人在将来会更加倾向于支持同盟国，但由于他们在海湾对面的圣玛丽港大肆掳掠，甚至连教堂也不能幸免，这种希望也全部破灭了。不过，在10月份，舰队在归航途中深入维戈湾大胆攻击西班牙的一支商船队，并摧毁了法国海军

中将夏托朗诺尔率领的一支护航小舰队，使其声誉有所恢复。对法国舰队的这次打击还掳夺了许多财物，在都灵和里斯本引起震动。

葡萄牙名义上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盟国。它虽不是交战国，但根据1701年6月的条约，它的海港是对法西两国的敌人关闭的。然而，海上强国一旦明显地显示出自己的海军优势因而有能力切断海上贸易和粮食供应之后，它们就不难诱使葡萄牙国王彼得二世参加大同盟。但彼得不只是要求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他还要求割让西班牙的领土，并坚持要同盟国把皇帝的幼子查理送到里斯本作为保证，据说他的到来可以抵得上两万大军。英国的约翰·梅休因认识到如若在地中海采取有效的行动就必须在海峡附近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因而竭力陈说葡萄牙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而且主要是他促成了1703年5月16日的两个同盟条约（葡萄牙在颇费踌躇后签字）。^[15]英国人还期望由于帮助未来的西班牙国王登上王位而得到商业上的利益。荷兰人对商业上的利益虽然也感兴趣，但惧怕在半岛上作战费用浩大，因而摇摆不定。皇帝是勉强同意的。他想为他心爱的幼子得到一个王国，但他主要还是对意大利感兴趣，而不是对西班牙；而且在他的长子约瑟夫对整个西班牙拥有继承权的要求得到承认之前坚决反对瓜分西班牙的任何方案。因此，葡萄牙要求割让的领土是由海上强国负责同意的，而且只是写在秘密条款中。即便如此，当一切都谈妥之后，在要求皇帝签署的弃权声明书上签字时，他是经过一番犹豫才签字的，而且仍然极不愿让查理大公亲自冒经海路去葡萄牙的风险，也不愿冒参加半岛战争的风险。^[16]

葡萄牙加入同盟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把海港交给海上强国使用，实际上是交给英帝国主义使用。从里斯本出发，强大的英国舰队可以直接对直布罗陀、巴塞罗那、米诺卡岛和土伦发动进攻。从经济上说，这个新盟国也向英国提供了很多便利。12月27日签订的“第二个”（严格说是第3个）《梅休因条约》规定，葡萄牙和巴西的市场向英国的布匹开放，同时葡萄牙的酒也可进入英国市场。^[17]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同盟来说，葡萄牙的承诺却是一场灾难。大量的同盟军被调往遥远的新战场。更糟的是，大同盟的整个目的根本改变了。原来的方针是分割西班牙君主国，现已为“没有西班牙就没有和平”这一很不现实的口号所代替。正是这一方略使这场战争在实现1701年条约所确定的目标之后又拖延了很长时间。

对葡萄牙问题的处理表明英国在两年之内已在大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荷兰共和国只是跟随英国亦步亦趋，但并非情愿。在1703年，在另一个问题上，荷兰也屈从于英国的要求。战争初起时，英国政府曾禁止其庶民与西班牙和法国通商（虽然走私商人逃避这项政府禁令，苏格兰也未接受）。另一方面，荷兰全靠贸易的收入来支付大量的战争费用，因此，虽然英格兰和奥地利对它提出强烈抗议，它仍继续与敌人进行贸易；阿姆斯特丹与法国的记账贸易也从未中断。^[18]但在1703年初，英格兰议会作出决定，愿增加远征军1万人，条件是禁止与波旁王朝国家以现货或记账形式的一切贸易。荷兰议会屈服于这一压力，但只同意以一年为期，而且皇帝必须对汉萨同盟（德意志北部商业城镇的同盟——译者）诸港口实施同样的禁令。到第二年6月一年期满，荷兰议会坚决拒绝延长这项禁令，部分理由是中立国正在利用这项禁令造成的机会进行贸易。^[19]瑞典和丹麦的这种企图的确使英国和泽兰省的武装民船多了一个借口来逮捕它们的商船，从而非但在海上强国与北欧诸王国之间造成极深的恶感，而且也在泽兰省和海牙之间造成恶感。为了挽救同盟，马尔巴勒曾亲自出马反对他的政府续订这一禁令。^[20]

1704年初的军事形势决定主战场只能是在南德意志。当时维也纳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威胁之中，皇帝财源枯竭，奥地利军队混乱。海上强国如不采取有力行动，利奥波德皇帝确有被迫单独媾和的危险。符拉蒂斯劳作了不懈的努力使马尔巴勒认识这一形势——因为唯有他具有远见卓识能认清大同盟的整体利益。马尔巴勒想从大本营出发进行一次大胆的远途奔袭，战胜巴伐利亚，解救维也纳，同时也想摆脱曾在1703年多次破坏他的作战计划的荷兰代表。^[21]虽然荷兰议会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离开尼德兰，但在海因修斯的说服下，还是派遣强大的荷兰军队供马尔巴勒调遣——表面上是为了在摩泽尔河上游进行一场战役——军中有忠于马尔巴勒的将军，但没有总司令，也没有政治专员。天气很坏，但马尔巴勒充满信心，从尼德兰沿莱茵河到海德尔堡，然后又到多瑙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长途行军，在进军中部队增加到大约4万人——虽少于前几年，但有得力的英国军队作为坚强的核心，这支英军可供他任意调遣。由于以前进行的两次战役，可利用莱茵河水路把辎重一直运到曼海姆。在巴登的刘易斯怀有戒心的合作下，马尔巴勒的第一个胜利是经过血战于7月2日攻克了施伦贝格，这

是一座防守坚固的山头，由此可以控制多瑙瓦茨城。马尔巴勒选定此城作为前进基地，用来征集来自德意志中部的军需物资。关于这个问题，如同组织进军本身一样，都是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同样依靠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的银行家的大量财政支援。

而后，盟军侵入巴伐利亚。大军过处，田园、村舍化为废墟。之所以采取这种残酷办法是希望说服那位选侯改变立场，投向自己一边，这也正是他的臣民和谋士们长期以来所希望的；同时也希望削弱法军——这时法军已由军阶较低但很机敏的马辛接替维拉尔任司令，与选侯一起驻在奥格斯堡附近。选侯自己的精锐部队大部分分散于其他各地，路易十四遂下令塔拉尔元帅从斯特拉斯堡增援。马尔巴勒迷惑敌人，使法军误认为他将在摩泽尔河上游然后在阿尔萨斯—洛林发动进攻。塔拉尔会同急忙从尼德兰赶来的（先到摩泽尔河，再到莱茵河上游）维勒鲁瓦的部队的一部分，终于及时集中了3.5万人于8月10日在迪林根渡过多瑙河，抵达北岸与马辛和选侯会师。他们统率的兵力加起来共约6万之众，在炮兵方面强于马尔巴勒和市长海因修斯分别指挥的5.3万人的军队。不过，在法军渡河之前，尤金已从莱茵河上游带来1.8万名士兵，先抵达多瑙河北岸的霍恰斯达特；他原在那里防守斯托尔霍芬防线，现在这条防线则有可能被维勒鲁瓦突破——这是他和马尔巴勒预先周密计划、故意采取的一次冒险行动。马尔巴勒和尤金不愿和过分自负、情绪暴躁的侯爵共同指挥战斗，宁可减少兵力1.8万人助他去完成自己心爱的作战计划——围攻他们后方20英里的因戈尔斯塔特。因此，8月13日在多瑙河上布莱海姆（布莱德湾）附近的这场战斗中，盟军在数量上稍处于劣势。塔拉尔部队占据的阵地长4英里，地形对作战有利，在多瑙河和一些丛林覆盖的山丘之间有尼贝尔河的一片沼泽地护卫，塔拉尔估计敌人不敢向他发起进攻。他所有的步兵后备队因首先遭到进攻而被封锁在他右侧的布莱海姆村。尤金对奥波格劳村西面的反复进攻牵制住马辛和选侯的部队，与此同时马尔巴勒在尼贝尔河上逐渐展开队形，以步兵和骑兵的生力军对塔拉尔只有9个新建的步兵营支援的骑兵队发起毁灭性的攻击。法军半数以上被消灭或生俘，包括塔拉尔本人在内；盟军伤亡约1.2万人。不过，马辛和选侯幸免于难，他们渡莱茵河撤走——选侯逃到布鲁塞尔，在那里又当上了有利可图的西属尼德兰的总督。盟军继而于9月份攻占乌尔姆。奥地利人占领巴伐利亚，并统治该地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莱茵河

以西的兰道、特里尔和特拉巴赫诸要塞于10月份相继攻陷。这年冬季，特里尔成为主要的据点。

布莱海姆战役是这场战争的军事转折点。它救了维也纳，并使法国失去在德意志的最后一个盟友巴伐利亚。德意志南部的战事几乎结束了。占领特里尔和特拉巴赫使同盟国取得了沿摩泽尔河入侵法国所必需的基地——这是马尔巴勒早已设想的一个计划。事实上，正是他从布莱海姆战役中收获最大。他的光辉的战斗风格有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天才。他在盟军中的军事威望至此已确立无疑，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大大加强。如果说布莱海姆战役使大陆战争在英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这绝非言过其实。这年冬季马尔巴勒在大同盟各国首都进行外交活动的成就也提高了他的威信。

尼德兰战线在1704年只居于次要地位；陆军元帅奥文柯克在那里仅限于防御。在意大利，法军的优势只是由于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在阿尔卑斯山和都灵的持续抵抗而削弱——这就足以阻止旺多姆在布莱海姆战役之前关键性的几个月调兵攻打维也纳，但在伊比利亚半岛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3月间，英荷联合舰队载着年方20岁的查理大公和一支辅助部队抵达塔古斯港。盟军于5月份沿葡萄牙边界发起进攻，其部队包括约4000英国人、2000荷兰人和2万葡萄牙人（其中大部分由海上强国出钱）[\[22\]](#)，这是一场失败的战役。没有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没有一个地方的西班牙人愿意站在哈布斯堡王朝觊觎王位者的一边。然而却发生了一个震动世界的大事件。海上强国再次利用它们海军的优势和西班牙沿海防御的弱点。8月3日，鲁克和克兰伯格轻取直布罗陀。当时直布罗陀没有设防，城内只有几百名卫戍部队。盟军是代表“查理三世”将其占领，但当地居民都纷纷离去。防守直布罗陀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曾在失利的加的斯远征中代表奥地利的利益、时任帝国陆军元帅的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诸侯乔治，守军则几乎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直布罗陀的特殊重要性，马德里和凡尔赛是很清楚的。法国舰队司令图卢兹伯爵不久前刚把驻布列斯特的分遣舰队调到土伦，这时正在巴塞罗那，当即出动全部舰队去收复直布罗陀。8月24日，双方主力舰队在马拉加海面打响，这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一场双方主力舰队对阵的海战。法国舰队有战舰50艘，联合舰队有战舰53艘，但在轰击直布罗陀后缺乏弹药。也许是幸运，法国舰队在交火一天之后[\[23\]](#)即决定停止

战斗，撤向土伦；战术上的平局遂变为战略上的胜利。从此以后，法国舰队的主力再没有出现过。西地中海在1702年实际上还是法国的内湖，这时法国舰队的存在本身对盟军的行动虽仍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已逐渐为英荷联合舰队所控制——由于荷兰海军日趋衰落，实际上是日益为英国舰队所控制。这场海战之后不久，10月间，泰塞麾下的法西联军在法国加的斯分遣舰队的不时支援下，企图完成法国舰队所未能完成的作战目标。整个冬天，直布罗陀守军由于有来自里斯本的战舰给予必不可少的支援，英勇地顶住了组织严密的危险的围攻。直布罗陀海峡从此载入世界史册。

同盟国在1705年的前景看来比过去的一年要好得多——即使1705年5月5日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逝世，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约瑟夫一世更加积极地执行他父亲反波旁王朝的政策。诚然，巴伐利亚的农民由于对奥地利人的占领非常不满，爆发了一场迅猛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宁做巴伐利亚鬼，不做帝国主义奴。”^[24]但这次起义在12月份即遭到镇压。这时两位维特尔斯贝希家族的统治者马克斯·伊曼纽尔和约瑟夫·克雷芒已被皇帝放逐，其采邑亦被剥夺，选帝侯家族的权力也被取消。此外，在宗教事务方面，新皇帝比其父较为宽容；同时他倾向于在帝国结构上做些让步来安抚匈牙利人。在取得兹西波隘口的胜利之后，他于1705年11月克复特兰西瓦尼亚，并开始与起义军谈判，但他拒绝恢复匈牙利君主的候选资格，这意味着继续进行在匈牙利的战争。^[25]

马尔巴勒试图用英荷联军大部分精锐之师沿摩泽尔河入侵法国。同盟国军方人士也都赞成他的看法，即认为沿这条路进入法国腹地要比通过层层设防的法国北部边界地区容易些；然而战争的进程并没有证实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还期望解除法国为迫使洛林公爵保持中立而施加的压力，以此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结果却适得其反。马尔巴勒沿摩泽尔河的进军不久即中止，很难说取得胜利。法军司令维拉尔的将才与之相当，不给他进攻的机会。而巴登的刘易斯的部队又相当糟糕，配合不力。及至6月份，马尔巴勒感到一筹莫展，就将其主力部队撤回尼德兰，从此再没有回到摩泽尔河。特里尔再度被法军占领。

另一方面，马尔巴勒在尼德兰的初战中是很成功的。7月18日，他发动奇袭，在天楠东南方的海利森附近突破了布拉邦特防线。但在这

一重大胜利之后未能按照他的设想立即向卢万和布鲁塞尔进军。关于这次失掉战机，他归咎于荷军将领和战地代表。这次战役以同盟国的激烈争吵而告结束。8月18日，战地代表根据荷军将领的意见阻止马尔巴勒在布鲁塞尔东南的上艾塞尔附近进行一场战斗，盟国关系紧张达到顶点。总司令马尔巴勒认为，由于在滑铁卢附近的这场战斗未能进行，使法军逃脱了一场惨败。因此，占优势的盟军在这一战役中取得的战果有限，只不过夺取了祖特利尤和部分地摧毁了布拉邦特防线，而该防线在1705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这一回，布莱海姆战役的胜利者非常愤慨，公开向荷兰议会提出抗议，特别是对反对他的首要人物斯莱根贝格将军不满。荷兰的舆论站在马尔巴勒一边，海牙的市政当局也支持他。但另一方面，荷兰议会却无意放弃对军队中这一强有力的工具的控制。他们以前所有的司令官，从摩里亚斯到威廉三世，都派有政治代表在他们身边。不过荷兰议会还是委派了马尔巴勒所喜欢的代表，斯莱根贝格退出现役。从此以后，马尔巴勒和荷兰人之间在军事指挥方面就不再发生尖锐的分歧。

在1705年，只有意大利战场在力量对比方面显然仍有利于法国。法军首先包围了都灵。尤金返回意大利之后才挽回了败局，使帝国军队在这年夏季未被旺多姆赶过阿尔卑斯山。但当尤金强行进军试图与陷于困境的萨伏依公爵会师时，也于8月在卡萨诺附近被法军击退，他的普鲁士军队受到重创。萨伏依的败北和奥军被逐出意大利看来已无可避免。心情急躁的彼得巴勒伯爵受命率领一支强大的部队从海上前去挽救危局，查理大公亦随船同行。部队的将领虽在会议中意见分歧，却都宁愿取悦于大公去援助加泰罗尼亚人——这只是他们使命中的次要目标——而不是在尼斯登陆。尼斯是当时萨伏依与海上联系的仅存的几个要道之一。

然而，查理大公如要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获得成功，那也只能是在地中海沿岸，而地中海沿岸的加泰罗尼亚对卡斯蒂尔的中央集权政策正满怀怨恨，决心保持它的传统特权。盟军在那里很快获得成功。由克劳德斯利·肖维尔爵士和彼得巴勒伯爵指挥的英荷联合舰队运来兵力7000人。9月14日彼得巴勒和黑森-达姆施塔特^[26]对巴塞罗那的护城要塞蒙久克堡垒发动猛攻；10月14日该城停止抵抗，盟军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不久，加泰罗尼亚的所有城镇都臣服于查理三世，巴塞罗那成为他的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爆发了

内战。这时，葡萄牙的军队（由于有高尔韦伯爵胡格诺教徒鲁维努麾下的5000英荷联军投入而加强）在西部边界进犯（尽管半心半意），在马德里的菲利普五世似乎受到两面夹攻的威胁。虽然同盟国据有直布罗陀和里斯本，控制了海上的交通线，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居于中间，这对他是有利的。

在加泰罗尼亚获得的迅速成功使同盟国认为西班牙的命运已完全操于他们手中。伦敦和维也纳也确实坚持以整个西班牙归属查理三世为条件，而这时路易十四刚刚开始同意分割西班牙的土地，因在1705年秋季路易才首次提出秘密的和平建议。他的和平建议是向荷兰人提出的，希望能把荷兰从大同盟中分离出来。^[27]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人拜斯的领导下，一个“主和派”也的确在形成。拜斯比海因修斯看得更清楚，他认为大量的国债已达到危险的地步。路易十四提出把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转让给查理三世。该建议如再把米兰包括进去，那对于荷兰共和国将会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这对于它的边界提供了某种保证。但葡萄牙条约始终是这类解决方案的障碍。英国仍顽固坚持定要征服西班牙，而荷兰的政治家也不能认真考虑舍弃英国的可能性——与英国决裂将会危及他们的海上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单独媾和的。^[28]所以拜斯想把西班牙留给菲利普五世的和平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战争只能继续下去。

在1706年，虽然年初由于法国元帅贝威克公爵攻克尼斯对同盟国不利，但整个看来是它们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甚至在西班牙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在西属尼德兰，战役一开始，马尔巴勒在荷兰代表的完全同意下就打了他的第二场大战。5月23日，在拉米伊附近（那慕尔以北）他击败维勒鲁瓦和马克斯·伊曼纽尔指挥的6万法比联军。他再次使用曾经在布莱海姆用过的声东击西的战术。这次战线也是4英里长，他以强大的佯攻诱敌集中于战线的一端，而以后备兵力在敌人虚弱处给以最后打击。丹麦的骑兵队在这次战斗中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胜利同上次一样也具有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法国军团溃不成军，先是向西撤退，后又向南撤至里尔。法军狼狈溃逃在西属尼德兰的两个主要省份布拉邦特和佛兰德，引起一场革命。那里的亲奥地利派从未听命于法国的专制政府，这时在古老的但具有民主思想的城市行会的支持下，兴高采烈地欢迎查理三世的同盟军。卢万、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

特均不战而破；6月5日和6日布拉邦特和佛兰德议会正式承认查理三世是他们的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军队放弃他们占领的城镇，成群结伙地投向盟军。比利时在两周之内未经流血即完成了相当于1688年的英国革命的革命。这“也使马尔巴勒的征服带有温和色彩，同时也加速了征服的步伐”^[29]。但这个革命只限于北部讲法兰德语的省份；那些讲华隆语的省份——埃诺、那慕尔、卢森堡仍效忠于菲利普五世，承认他为国王，路易十四为摄政。比利时总督马克斯·伊曼纽尔在伯杰克的陪同下将官邸迁到蒙斯。法国守军仍暂时控制着两个讲法兰德语的比利时城镇——奥斯坦德和登德蒙特，但盟军稍一围攻即被攻克。奥斯坦德原是法国武装民船出没之所，7月6日该城被攻占，这不仅使英国和荷兰的海上航行免受滋扰，而且缩短了英格兰至前线的交通线——这一点在1708年的战争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也使英国的产品有可能向一个重新开放的市场出口，荷兰商品也通过安特卫普向这个市场倾销。

英国和荷兰没有把西属尼德兰作为被征服的敌国对待，而是作为被收复的盟国领土来对待。但在该地未来的政府这个问题上，同盟国之间立即发生了争论。原来的大同盟的条款故意订得含糊，现在则必须加上明确的解释。1701年的条约曾把西属尼德兰划归哈布斯堡王朝，但同时声明它必须用做保障荷兰共和国安全的“屏障”。此刻查理三世远在西班牙，而且实际上并未掌权，他不可能亲自来主持政务。因此，他的兄长约瑟夫一世根据条约规定坚持摄政一职由奥地利人担任。但荷兰共和国在安全确有保障之前不愿放弃这样一个得来不易的良好“屏障”，何况奥地利对征服该地一点也没有出力。须知，获得这个“屏障”是荷兰进行这场战争的高于一切的根本目的。然而，一个良好的“屏障”不仅意味着有权占领南部边界上的主要要塞，而且意味着新君主要有财政来源支付守卫部队和维修要塞的费用。荷兰当前的目标是尽量加强他们的地位，以便在战争结束时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接受一项他们极不情愿的安排。因此，荷兰要求在战争期间南尼德兰的现政府特别是财政权归他们掌管。英国采取中间立场。起初马尔巴勒的观点同荷兰的观点没有多大分歧，但后来维也纳看到奥地利人已不可能任摄政，便突然改变策略，挑拨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关系。约瑟夫一世代表他在巴塞罗那的兄弟任命马尔巴勒为总督。这位大权在握、声名显赫的公爵^[30]也很想接受这一职位。荷兰

的政治家对此大为震惊，力促他谢绝这一任命。马尔巴勒暂时应允了，希望将来出现一个更好的机会，但他和荷兰同事之间的融洽关系从此就受到伤害。这段插曲在一方面播下了愤怒的种子，在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亲维也纳倾向的怀疑。

最后达成了妥协：同意荷兰的主要要求，同时也不排除英国参加南尼德兰的治理。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两个小国也允许参加制订这一解决方案。从1706年起，西属尼德兰在战争期间成为英荷两国的共管区，原则上仍承认查理三世的君权，但由比利时人组成的一个政务院在海上强国的监管下行使政府的职权。为了监督政务院，英荷两国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联合会”，各派两名全权代表参加。英国以马尔巴勒为共管区的代表，从1707年起由他的军需总监和情报局长威廉·卡多根为助手，此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公爵的心腹。但荷兰的全权代表约翰·凡·登·伯格在布鲁塞尔有极大的势力，他自始至终任共管区的全权代表。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以后还有1709年被征服的埃诺）就这样遵奉海上强国的指令被统治了10年之久。现在不能说南尼德兰喜欢这种体制，但当时战争本身需要这样做。这个国家继续承受着边界地区的一切苦难，也许这时较人道的交战方法使苦难有所缓和——例如将直接抢劫变为缴纳赋税，把该地作为存放军需物资的仓库。两个强国还利用它们的权力按照荷兰和英国出口贸易的要求重新规定关税税率。但总的来说在共管区施行某种程度的仁政、尊重当地的特权以及彻底否定伯杰克和法国统治空白期的专制倾向是其特点。长期受压抑的新教社团自动恢复了更多的权力，政务院也能利用英荷全权代表在“联合会”中的紧张关系。尽管有亲法少数派在活动，但在共管区存在的10年里却没有发生严重的动乱，即使在危急的1708年也是如此。直到战争结束，西属尼德兰一直在为同盟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尼德兰发生的事件对别处的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706年5月维拉尔就已开始对莱茵河上游发动进攻，击败了病中的巴登的刘易斯，并把他赶过了莱茵河。南德意志再次受到法军入侵的威胁。这次攻势也打破了马尔巴勒想同尤金在意大利会师进行1706年战役的希望。维拉尔突然停止了进攻，在拉米伊战役惨败之后，他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到佛兰德前线。

在意大利北部，法国集中了创纪录的8万人。早在3月间，战幕即已拉开，旺多姆首战告捷，在查理锡那托击败奥地利的雷文特洛将军，结果奥地利人被赶到特伦蒂诺流域。5月，拉弗雅德对都灵展开有组织的围攻。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公爵据守的要塞式首都在强大的压力下岌岌可危，公爵本人为免被俘，带领6000名骑兵躲进阿尔卑斯山麓的丘陵地带。法军声势浩大，看来即将结束在意大利的战争，但由于两个事态的发展，战局发生逆转。首先，拉米伊的惨败迫使路易十四召回骁勇善战的旺多姆去防守正在受到威胁的北部边界。其次，在7月份，接替他的马辛和奥尔良公爵菲利普^[31]由于尤金成功地绕过阿迪杰河、明西欧河、奥利奥河的防线从侧翼进攻，不得不从伦巴第撤退。尤金为解都灵之围，6月底出其不意地从特伦蒂诺进军，迅速越过威尼斯的领土沿波河南岸前进。他的军队在前一年曾因缺乏经费和装备濒于瓦解，这时由于有海上强国出钱雇用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辅助部队的支援而得到加强，当然并不是毫无困难。他这时统率近3000人，与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会师后，9月7日在都灵大败法军，法军统帅马辛受重伤。这次大捷堪与拉米伊大捷相比。其结果不仅是拯救了都灵，还使法国野战军的残兵败将越过阿尔卑斯山退走，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驻守部队也被切断。同盟国实际上已赢得在意大利的战争，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力量很快居于优势。^[32]旺多姆曾预言：“失去意大利就会失去一切。”^[33]此言是否有误还需拭目以待。

同盟国在西班牙一度似乎胜利在望。由于加泰罗尼亚游击队的活动，由于盟国战舰可利用里斯本进行冬季整修，也由于海军少将利克没有执行彼得巴勒要他在巴伦西亚登陆的错误命令，法军在5月企图收复巴塞罗那的巨大努力化为泡影；泰塞弃围城辎重撤至佩皮尼昂，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撤到土伦。敌对双方的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会战：查理三世在他的临时首都坐镇，菲利普五世则在攻城部队中。与此同时，高尔韦和米纳斯侯爵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从西向东推进。6月27日他们占领了马德里，贝威克的小部队撤走，但他们未能及时得到巴塞罗那的增援，此刻那里的司令部由于争吵而分裂，而彼得巴勒这个有争议的人物也一筹莫展，于事无补。在卡斯蒂尔这个西班牙最富民族自尊心的小王国里，敌视奥地利人国王的情绪骤然爆发，在他们看来这位国王是由异教的外国人、由他们所鄙视的葡萄牙人以及爱捣乱的加泰罗尼亚人支持的。事实上，除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外，整个西

班牙都开始把菲利普五世视为民族独立的象征，而把查理三世看作外国征服的象征。这时西班牙西部和中部游击战争四起，高尔韦和米纳斯在马德里已无法立足。虽然来自东部海岸的约4000盟军终于在8月初在瓜达拉哈拉与他们会师，但这只是在他们把首都本身放弃之后才发生的，贝威克率25000人占领马德里。同葡萄牙的联络已被切断，盟军后来全部撤到巴伦西亚，菲利普五世则得意扬扬地重返马德里。对未来形势发展的一个良好转机是由高尔韦接替彼得巴勒担任司令官。即使在西班牙东部查理三世的处境也并不美妙。但是盟军还迟迟不能从所发生的事情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到1706年底，威廉三世在《大同盟条约》中制定的有限纲领的要点已经实现。路易十四的霸权已被打破，欧洲的力量均势已经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关于西班牙在米兰和南尼德兰有继承权的要求已得到满足；共和国在其本土和法国之间已得到一个缓冲国；英国在低地国家已获得安全保障，在地中海获得霸权。简言之，根据1701年的条约，同盟国已能从敌人手中争得体面的和平。在荷兰进行的秘密谈判中，法国再次提议瓜分西班牙君主国。^[34]在1706年夏，当菲利普五世看来即将丧失西班牙的危急时刻，路易十四甚至准备只满足于保持在意大利占有的土地。但英国和奥地利皇帝都不愿意讲和。马尔巴勒和戈多尔芬坚持“没有西班牙就没有和平”的既定方针，这在当时意味着整个西班牙君主国归属奥地利皇帝的弟弟查理三世。对这一政策的支持首先来自通过1705年的大选地位得到加强的辉格党。马尔巴勒—戈多尔芬政府自1702年以来即已发展成为温和的托利党内阁，1704年改组时哈利和圣约翰也参加了内阁——这时越来越依靠辉格党。1706年秋，当时议会尚待通过合并苏格兰条约，而辉格党的力量就已强大到足以迫使女王以桑德兰伯爵代替负责南欧事务的托利党大臣查理·赫奇斯爵士。另一方面，荷兰共和国仍认为瓜分西班牙君主国是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荷兰人认识到放弃西班牙就会与英国关系破裂，这是不可取的，遂力促其英国盟邦在意大利给菲利普五世以某些补偿；英国认为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现一个法国的附庸国对于它在东地中海的贸易是一个威胁。不过，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这种争论这时还是在幕后进行，因为路易十四虽然在1707年和1708年几次向共和国提出和平建议，但总是坚持以菲利普五世保有西班牙为前提。

荷兰人渴望得到有保证的和平，因而在“屏障”问题上力求得到英国绝对必要的支持。他们并不想吞并南尼德兰，领土扩张自然不符合荷兰资产阶级崇尚贸易的精神，而且海牙当局始终很清楚，英国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荷兰人甚至不想让南尼德兰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只想让南尼德兰同一个能防卫他们的强国建立联系。荷兰人的全部要求只是驻守法国边界上一系列要塞的权利以及驻军的经济来源。^[35]这种安全体系他们早在他们的东部边界施行，不过规模小一些。根据《大同盟条约》哈布斯堡王朝原则上已经接受“屏障”的提法，不过他们希望对于他们在西属尼德兰的君权的这种限制越小越好。因此，荷兰外交活动的目的是要得到英国的保证，要它在最后和平解决时帮助共和国同查理三世签订一个满意的“屏障”条约。在1706年期间，荷兰人初次尝试与伦敦达成一项协议，共和国保证“新教徒继承权”（Protestant Succession），英国则保证支持一个措辞明确的“屏障”的范围。谈判由于英国（还有马尔巴勒）的坚决反对而破裂。英国拒绝把奥斯坦德（它是同欧洲大陆贸易的进口港）或登德蒙特（通往根特和斯凯尔特河上游的门户）划入“屏障”之内。伦敦认为荷兰要求这些城镇与其说是基于军事上的理由不如说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英国也不忙于恢复谈判，它认为荷兰人一旦在“屏障”问题上得到满足，他们进行战争的热情定会冷却。1707年5月1日英格兰要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王国，改称大不列颠，英国拖延达成协议就更容易了；而且这时也不急于要荷兰对汉诺威家族的继承问题（Hanoverian Succession）作出保证。因此，荷兰在没有获得保证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战争，而且还需要进行6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完成已经开始的谈判。在这6年里，荷兰共和国在盟国中的地位被其他盟国超越了。

1707年，北方战争接近西欧。查理十二世在征服波兰和侵入帝国的领土后又于1706年秋侵入萨克森。^[36]他在阿尔特兰施泰特的营地成了进行频繁外交活动的舞台。路易十四试图劝说这位瑞典国王去攻打奥地利。此外，惊恐不安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有可能从反法战争中撤出它的辅助军。同盟国面临这种局势忧心忡忡。于是马尔巴勒于4月亲自赶到阿尔特兰施泰特。他在那里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以新教的捍卫者自居的查理十二世从本身考虑在西方战争中不站在路易十四一边。他对于皇帝作出的有利于西里西亚新教徒的让步感到满意，正是

为了他们他才兴兵犯境。在夏季，查理十二世拔营出发去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上碰碰运气。^[37]海上强国则继续使用普鲁士军队。

西部的战役足以证明法国的抵抗力量并未摧毁，实际上法国甚至还有能力发动攻势。在西属尼德兰，路易十四集中了10万大军，他命令旺多姆避免进行决战的错误（他本人曾鼓励维勒鲁瓦在拉米伊战役中犯过这样的错误）。马尔巴勒的野战军力量较弱，而且防守西属尼德兰大城镇、特别是布鲁塞尔的任务很重，妨碍了他的部队的机动性。因此，尼德兰战役只不过是毫无意义地调动军队，并没有进行决战。但在莱茵河上游，维拉尔再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以巧妙的伪装实行奇袭，一举突破了斯多尔赫芬防线——这一战绩使他得以席卷南德意志，从斯瓦比亚和弗兰康尼亚的广大地区勒索贡赋。巴登的刘易斯也许能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但他已于1月去世，继他担任帝国总司令的贝罗伊特侯爵则是无能之辈。

在地中海战场，马尔巴勒早就想海陆并进，对土伦进行一次迅速但冒险的打击，这样不仅可以使那里的法国舰队瘫痪，而且还可从南线侵入法国，并迫使它从西班牙撤军。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完全赞同这一设想，但皇帝认为先占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土更为重要。他不与同盟国商量就批准了3月13日在米兰签订的一个条约，该条约使意大利在有关法国的事务上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就使法国在米兰已被切断的驻军至少有1.2万人可以去支援在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军队。此外，与马尔巴勒的伟大战略意图相反，道恩统率一支奥地利军队南下，通过教皇的领地轻而易举地驱逐了西班牙在那不勒斯的少数驻军，那不勒斯城不攻自破，加埃塔则是一攻即破。查理三世正式宣布自己是那不勒斯国王。于是荷兰想在意大利给菲利普五世留一个王国的愿望实际上已成为空想。

哈布斯堡王朝对那不勒斯的入侵首先是阻滞继而又减弱了向土伦发动的进攻，使这次进攻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沿里维埃拉河将部队调动和后勤供应同步进行、需要经过周密计划的复杂军事行动而已。尤金和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统率的3.5万奥地利和萨伏依联军，虽然在肖维尔的战舰和运输船队的必要的密切合作下终于抵达土伦城下，但这场围攻战却不得不于8月22日放弃。尤金本无意于这一战役计划，因而迟迟按兵不动，遂使法军统帅泰塞西得以从多菲内和萨伏依迅速调来大量兵力，组成强大防御。这次进攻的真正倡导者肖维尔既不能先期组

织围攻也不能继续延长围攻。但法军眼看自己的舰队有遭到毁灭的危险，便把部分舰只自己凿沉。^[38]由于他们的造船厂缺乏经费，一时不能打捞和修复这些战舰，这一行动终于使地中海成为英国海军耀武扬威的天下。维克多·阿马戴乌斯除在1708年的战役中攻克法国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些要塞外，在以后的战争中没有再起什么作用。^[39]

同盟国在西班牙战场的遭遇更糟。在西班牙，高尔韦试图以一支很小的部队从巴伦西亚向卡斯蒂尔进军。这时贝威克由于得到来自意大利的法军的增援，兵力已加强。4月25日高尔韦的部队在阿尔曼萨城外遭到贝威克的拦截而被冲散。高尔韦的情报有误，使他低估了敌人的实力。他除在总的数量上居于劣势外，骑兵也特别薄弱；而葡萄牙的骑兵，由于身居高位的米纳斯的坚持被置于右翼，这又使他吃了大亏。后来，这位优秀的军人克服了很大困难才把被冲散的联军重新聚集起来，而这时贝威克却不得不把一部分部队撤走去保卫土伦。阿尔曼萨战役是同盟国在西班牙所遭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挫折。由于这次惨败，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的反卡斯蒂尔一派的希望破灭了。尽管如此，当查理三世还有加泰罗尼亚时，他仍然不想放弃西班牙的王位。

英国人同查理一样也无意放弃西班牙。那时他们认为西班牙是比尼德兰更为关键的战场。英国在1708年确实取得了一些辉煌的胜利。同盟国是依靠约翰·利克爵士的舰队才在8月份代替查理三世攻克了撒丁岛。一个月之后，詹姆士·斯坦厄普中将又攻克米诺卡岛及岛上严加保护的宽阔的深水港马翁港。此港可供军舰过冬，而直布罗陀的开阔的海湾却不宜于过冬之用。取得这个新的前进基地是马尔巴勒对那些过分谨慎的海军将领们的回答，它使英国成为地中海的真正的霸主。奇怪的是，英国以前却未曾试图夺取这个岛屿（奥地利人在1704年曾主张占领它）。用斯坦厄普的话说，占领米诺卡岛就可以“在战争和平时时期对整个地中海发号施令”^[40]。这时的国王查理三世实际上不过是英国的傀儡。他背着荷兰人同英国达成的秘密协议充分说明他的卑躬屈膝达到何种地步。1708年1月，他屈从英国的要求，同英国签订英国久已垂涎的供应非洲奴隶的秘密协定。此后，他又重申马尔巴勒任南尼德兰总督的许诺。斯坦厄普提出要签订条约，把米诺卡岛割让给英国^[41]，他也无力拒绝。荷兰人得知这些秘密交易之后极为愤慨。^[42]向英国供应非洲奴隶的协定实际上是单方面破坏《大同

盟条约》，因该条约保证海上强国在西属印度群岛享有同等的商业利益。

哈布斯堡王朝尽管蒙受了这些屈辱，但它在1708年的战绩还是比前几年要好一些。匈牙利的叛乱虽然一直持续到1711年，但其主力已于1708年8月3日在特伦钦被粉碎。在意大利，战争已胜利结束。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最后还是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劝说，于1709年1月承认查理三世为“天主教国王”^[43]。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奥皇终于能够给他在西班牙的兄弟以有力的支援。从1708年起，奥地利军队开始被派往加泰罗尼亚，这时那里的盟军已由新任总司令吉多·冯·斯塔汉姆贝格伯爵指挥。援军的到来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查理三世减轻了对英国的依赖。但他们来得太迟了，在那个孤处一隅艰难荒凉的战场上即使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也不能长期扭转战局了。

在莱茵河上游，这时汉诺威选帝侯和英王继承人乔治接任了帝国军队的指挥权，他的对手是马克斯·伊曼纽尔，此公也在为皇室头衔而奋斗。在摩泽尔河，尤金率领奥地利的一支小部队对付贝威克。但在这两条战线上都没有发生重要战事。1708年的主战场是南尼德兰，马尔巴勒统率英荷主力部队制订了在这里发动一场新攻势的作战计划。

1707年的经历使马尔巴勒确信，绝不容许他的调动军队的主动权再次由于保护布拉邦特的大城镇而被削弱，因此他打算撤离布鲁塞尔而在安特卫普建立西属尼德兰政府。法国人打乱了这个计划。因为法国人被1707年战役的相对胜利所鼓舞，并且依赖某些比利时人的友好倾向，也在计划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先是，由于苏格兰问题的牵制，英国从尼德兰调去了一部分军队。一支海军在佛宾伯爵指挥下偕同老王位觊觎者詹姆士·爱德华·斯图尔特3月从敦刻尔克出发开赴苏格兰东南部的福斯湾。这位伯爵的航海技术较好，而判断力较差。舰队停泊在福斯湾海面，但不能登陆，只好零散地返回敦刻尔克。^[44]派往英格兰北部泰因茅斯港的英军在尼德兰的战役开始之前已调回奥斯坦德。战幕揭开了，这是整个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起初，法国掌握主动。旺多姆和年轻的布尔戈尼公爵^[45]置重兵于蒙斯以北。与此同时，与根特城有秘密联系的伯杰克暗中布置该城于7月5日投降，而该城是控制佛兰德所有水路的关键。完全出乎马尔巴勒的意料，旺多姆疾速进军占领了这个新投降的城市，一次突击就打到了西

属尼德兰的中心地带。这时已不存在撤离布鲁塞尔的问题，因为它已成为与荷兰保持联系的唯一可靠的据点。但马尔巴勒很快恢复了镇定。尤金率领几队骑兵迅速从摩泽尔向他增援。这一行动又使贝威克的一支更强大的部队从莱茵河驰援旺多姆。当法军离开根特附近的阵地去攻占斯凯尔特河上游的桥头堡奥德纳德镇时，同盟军以惊人的速度抢在贝威克到达之前，于7月11日截击法军。两军展开激战直至夜幕降临。战斗不是在预设阵地上进行，而是在奥德纳德周围的田野和园林里进行，而且随着部队的不断到来，这条临时战线也在扩大。与布莱海姆和拉米伊战役相比，这纯粹是一场步兵遭遇战，一场混战。法军几乎被包围，同盟军没有追击，他们得以退至连接根特和布鲁日的一条运河对面的一个坚固的阵地；这之前布鲁日也投降了伯杰克。

这时法国北部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马尔巴勒想立即向巴黎进军。但荷兰的将军们比较谨慎，他们在尤金的支持下拒绝绕过法国最坚固的要塞里尔——这个要塞是伏邦精心设计的杰作，供应充足，并有布菲勒麾下的大量法军防守。于是围攻里尔的一场血战开始了。由于佛兰德的水路被根特封锁，攻城大炮和给养不得不由河上从荷兰运到布鲁塞尔，再从那里由一支庞大的护送队沿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陆上运输线运到里尔前线。法军竭其全力防止这一重镇失守。旺多姆占领了从根特到图尔内的斯凯尔特河上所有的渡口，从而切断了布鲁塞尔和同盟军之间的运输，这样，迫使同盟军依赖一条通往奥斯坦德的供应线，由海路到荷兰和英格兰。但是这条路线也处于危险之中。在布鲁日和纽波特的法军进入乡村，打开水闸，挖毁堤坝，淹没了奥斯坦德周围的大片地区。一场英武豪壮的斗争在西佛德兰被淹没的低地上突然爆发。一支英荷护送队沿着从奥斯坦德到里尔的几乎难以通行的道路前进，遭到法军的攻击，于9月28日在索豪特附近的韦伊宁代尔展开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由韦布和纳索-沃屯伯格指挥的英荷军队以高昂的士气击败了双倍于己的法军。但到最后，同盟军只能靠平底船队来维持运输。布菲勒于10月22日放弃里尔城后，仍坚守要塞，法军作最后的努力企图解救他。马克斯·伊曼纽尔从莱茵河回军围攻他以前的首都布鲁塞尔，该城的平民奋起参加防御。马尔巴勒突破旺多姆的斯凯尔特防线及时增援，于11月28日解该城之围。法军在这场戏剧性战斗中败北。布菲勒于12月9日放弃里尔要塞。法国的野战军由根特退回到法国境内，留在根特和布鲁日的守军于1709年1月投降。

法国局势严重。军队在瓦解，财政经济濒于崩溃，而这年冬季严寒为欧洲所罕见，使局势更加严重。^[46]饥荒遍及全国，英国海军阻止谷物进口，甚至荷兰也禁止谷物向法国出口。里尔陷落后，路易十四准备几乎以任何代价媾和。1709年春他派外交大臣托西微服去了海牙。同盟国赢得战争，但却无可奈何地找不到媾和办法。对此，几乎可由英、奥、荷三国同等负责。使三国意见分歧的是西班牙问题。三国在西班牙的战争失利，此时菲利普五世已不仅是法国人提出来的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而且是西班牙全国的国王了。因经过五年战争之后，查理三世只有在加泰罗尼亚才能立足。但同盟国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英国和奥地利仍坚持整个西班牙归属查理三世。诚然，这时托利党人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但他们已不再掌权；1708年选举后是辉格党人控制戈多尔芬内阁。荷兰共和国比它的两个主要盟国更倾向于媾和，1708年的战争消耗巨大，已动摇其信誉，早已存在的厌战情绪日益增长。而且重要的是荷兰的政治家已习惯于把和平谈判说成是“伟大的工作”。他们过去同意查理三世为西班牙国王只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与英国决裂，可是他们仍想在意大利为菲利普五世谋求某些补偿。在另一方面，荷兰人却比他们的盟国更为苛刻。不久真相大白，托西的目的是法国单独媾和，但荷兰人最怕的是，同法国签订协议使它得到喘息的机会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在西班牙进行一场战争。这时主要是他们，当然还有英国的辉格党政府，坚持全面媾和，而且要法国保证把西班牙王国让给查理三世。结果，3个盟国只能以各自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为基础达成一致意见。根据这些要求形成《海牙初步条款》，于1709年5月作为最后通牒提交托西。凡尔赛的国王忍受屈辱，几乎接受了全部条件：从西班牙撤军，放弃他在位期间引以为荣征服的土地（甚至包括里尔和斯特拉斯堡），拆除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割让纽芬兰。不幸的是，第4条和第37条实际上规定：除非在两个月内交出整个西班牙王国，否则就要重新开战。他认为这一点太过分了，宣称无法照办。准确说来，对海因修斯而言，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47]

使欧洲感到惊异的是和谈没有成功。路易十四拒绝签署“初步条款”，并于1709年6月向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呼吁，再次倾全力准备战争。但这时战争的目的已经不同了，起初他野心勃勃，锐意扩张帝国领土，企图称霸欧洲，现在却已变为一场保卫他本国的领土和荣誉的

民族战争了。法国很快组成了一支新军——法国人为饥饿所驱使而投军，饥饿实际上起到了募兵的作用。与马尔巴勒将才相当的维拉尔终于被任命为北部边境的司令官。维拉尔从埃尔到杜埃构筑一条拉巴塞防线，阻止从里尔向巴黎进军。马尔巴勒虽然得到尤金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的增援，始终未能将维拉尔逐出这一阵地，向巴黎进军的设想未能实现。同盟国不采纳马尔巴勒从海上迂回包围，在皮卡第登陆的主张，而只限于夺取堡垒城市，从9月3日起开始攻击设防坚固的图尔内城。随后移军攻击蒙斯时，遭到维拉尔的截击。接着于9月11日在马尔普拉奎特展开一场血战。同盟国付出极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但荷兰步兵的精锐部队在此役中丧失殆尽。只有蒙斯的命运算是确定了：马克斯·伊曼纽尔第三次失掉自己的首都。他转移到那慕尔，后于1711年因忠于波旁王朝而得到报偿，被授权统治那慕尔和卢森堡两省，其目的在于加强他在最后谈判中的地位。

1709年，同盟国在其他各条战线上无不失利。奥军企图从南德意志入侵弗朗—谢孔泰，结果以失败告终。在西班牙，同盟国于4月份失掉阿利坎特；奥地利副首相斯塔汉姆贝格全年处于守势；弗龙泰拉侯爵协同病中的高尔韦从葡萄牙向埃什特雷马杜拉进军，为法国统帅亚历山大·贝侯爵指挥下的1.5万西班牙军所阻止。[\[48\]](#)

在荷兰共和国，英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关于整个西班牙归属查理三世的要求仍然受到众多批评。马尔普拉奎特一战，摄政家族多人丧生，使荷兰人更加期望和平。而斯坦厄普与查理三世在西班牙秘密谈判的消息此时已有所泄露，使他们极为愤慨。但这时共和国已无法摆脱它的强大的盟友，就连拜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主和派也认识到不可能与法国单独媾和。虽然如此，但荷兰的政治家仍能利用局势对英国施加强大的压力，使英国为他们提出的屏障问题提供保证。辉格党内阁怕把荷兰诸邦推入法国的怀抱，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荷兰人的交换条件是保证新教徒的继承权，不仅在尼德兰方面，还在地中海和美洲方面，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因新教徒的继承权问题对于偏激的辉格党政府来说比1706年的政府要重要得多。10月29日在海牙签订《继承和屏障条约》。根据条约，共和国同意在紧急时给予武装援助以取得汉诺威家族的继承权，而英国则答应支持共和国获得占领一系列坚固堡垒作为屏障的权利（包括里尔、图尔内、瓦朗西安、康德和莫伯日，但不包括英国视为掌上明珠的奥斯坦德）和兼并上盖尔特兰，这

块领土早先原属荷兰的格尔兰德省，但据《明斯特和约》分割出去。此外，据第15条英国答应它所取得的西班牙王国任何地方的一切权益都与共和国共享，这就是说英国放弃了斯坦厄普与查理三世关于供应非洲奴隶和米诺卡岛的协议。尽管如此，共和国仍断然拒绝作出保证征服整个西班牙王国。代表英国签署这个条约的是辉格党的大使汤森。马尔巴勒置身事外，未参与谈判，他另有看法。

1709年的屏障条约看起来像是海因修斯的政策胜利，但实际上是一个笨拙而倒霉的协定。首先它引起皇帝的不满，他对于查理三世在南尼德兰的主权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感到愤怒；其次是普鲁士国王，他声称上盖尔特兰应归他所有；最后是南尼德兰人自己，他们害怕这个条约将确立荷兰的经济霸权。但最不幸的倒不是条约把共和国与英国拴在一起——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是与辉格党的战争政策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一开始，托利党就认为这个条约损害英国的利益。

法国在1709年的抵抗力量虽已证明出乎意料地强大，但它仍然迫切需要和平。北方战争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再次向西发展，但没有减轻对法国的压力，因根据《海牙协定》，北德意志于1710年宣告中立。^[49]同月，法国派遣于克塞勒和戴·波利格纳克神父两人为专使去荷兰重新进行谈判。他们未被允许去海牙，因3个盟国正在海牙开会。但他们在格特洛伊敦堡受到鼓舞，接到拜斯和范·戴尔·杜森带来的盟国的提议，这两位代表仍然渴望和平。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履行“初步条款”第37条的变通办法。路易十四愿在尼德兰提供警戒城市，甚至愿意为同盟国在西班牙仍需进行的战争提供补助战费。荷兰人尽最大努力为菲利普五世在西西里和撒丁岛争取一个王国，条件是法国要保证他离开西班牙。英国除西西里外不愿放弃任何地方。奥地利坚决不同意分割西班牙，主张与法国单独媾和，而马尔巴勒则明确表示，他甘冒西班牙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之风险，准备放弃第37条。然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对路易十四的诚意极不信任，荷兰人坚持和平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观点。这样，他们过分的胆怯反而使他们走向轻率。海因修斯认为法国的财政经济已陷入窘境，路易十四最后必定答应全部的要求。但法国国王坚定地拒绝迫使他的孙子离开西班牙，也不以在意大利得到一个王国而满足。由于上述原因，格特洛伊

登堡的谈判注定要失败。1710年7月谈判破裂。对此，法国没有必要感到遗憾。这时辉格党内阁已摇摇欲坠了。

1710年，维拉尔在尼德兰和法国北部的行动很谨慎。相对说，他的部队人数较少，他不能冒险再让这支部队投入战斗，甚至撤离拉·巴塞防线，因这条防线易被攻破。马尔巴勒发动的战役，以高昂的代价进行围困，结果只夺取了法国领土的4个要塞——杜埃、贝顿、圣维纳特和埃尔，但法国的抵抗并未出现预计的瓦解。进军巴黎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主要是维拉尔构筑的新防线，即以阿拉斯和包钦为依托的所谓“不可逾越的防线”。

1709—1710年冬季，除纳瓦拉的驻军外，全部法军都从西班牙调回。这期间，皇帝约瑟夫一世在匈牙利的地位已经巩固，并已控制了意大利，遂派遣大军支援在加泰罗尼亚的他的兄弟和斯塔海姆贝格。同盟国的兵力加强，乃重新发动攻势，7月在阿尔梅纳拉、8月在萨拉戈萨附近相继击败菲利普。进军马德里的道路再次打通，9月21日重新占领马德里。马德里原是查理三世心目中的首都，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占有该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查理三世提出绕过卡斯蒂尔占领纳瓦拉和通往法国的交通线，这一聪明的行动方案遭到他的幕僚的反对。^[50]但旺多姆已经离开巴黎于9月17日在巴利拉多里德与菲利普会合；卡斯蒂尔的居民仍矢忠于菲利普；同盟军粮秣供应遇到困难。旺多姆匆忙调集一支法军返回西班牙，终于迫使同盟军于11月撤离马德里。斯坦厄普在返回阿拉贡途中在布里韦加被法国人俘获。斯塔海姆贝格虽在第二天（12月10日）在比利亚维西奥萨打败了旺多姆，仍被迫退到巴塞罗那。至此，该对西班牙做个了断了。局势的发展证明同盟国的政策是错误的。

在西班牙的溃败肯定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新方针。新方针是由于英国政府性质的巨变而引起的。1710年夏，戈多尔芬政府的内外政策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由于连续两年歉收，粮价飞涨，民不聊生；为偿付公债利息，征收高额土地税，乡绅怨声载道。早在3月，人们对萨谢弗雷尔博士普遍表示欢迎，这件事已说明辉格党失去了公众舆论的支持。马尔巴勒的夫人萨拉与女王不睦已有数年之久，4月被逐出宫廷。这时安妮已感到地位巩固，乃逐步解除大臣的职务。8月8—19日，戈多尔芬本人也被免职。哈利出任托利党新内阁的首相，圣约翰任首席

国务大臣。10月，比宪法规定的日期提前举行大选，托利党在下议院取得压倒多数的席位。但这时马尔巴勒还没有受到攻击。

托利党人从来不赞成马尔巴勒进行的大陆战争。他们认为荷兰人是他们在商业上依然强大的对手，而不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因而认为汤森签订的屏障条约有损英国的利益。这些新当权派也需要和平。他们一上台就通过托西的秘密代理人单独与法国进行秘密谈判。他们宣称愿意把西班牙让给菲利普五世。同年底在西班牙战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们这种态度更加坚决了，而1711年4月17日皇帝约瑟夫突然逝世后他们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当查理三世继承了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并于1711年10月12日当选为皇帝时，西班牙问题的全局就发生了变化：徒有其名的国王查理三世变成了皇帝查理六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战争已使他拥有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如果他得到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欧洲的均势——这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将再次被打破，不过是变了一个方向而已。新的局势促使托利党政府按既定的方针去做。不过，不是由稳健的哈利而是由鲁莽而不讲信义的圣约翰操纵1711年夏与托西的双边秘密谈判。圣约翰不仅仅是想要和平，他要牺牲盟国去求得和平，要把英国的意志强加于欧洲。

当这些情况正在发展时，战争并未停止，而是在不同的气氛中进行。托利党人早就对忽视殖民战争不满，这时发动了蓄意已久的远征去夺取魁北克——这次远征准备不足，执行不力，1711年8月彻底失败。^[51]在西班牙没有发生战斗。国王查理于1711年秋离开西班牙去继承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和王位，把他的夫人留在巴塞罗那管理这个国家——到这时候他还不愿放弃西班牙。由于即将举行帝国选举，他把尤金从尼德兰召回莱茵，致使马尔巴勒单独对抗维拉尔。然而这时马尔巴勒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已不再是大同盟公认的领袖，只不过是英荷联军的司令罢了。马尔巴勒最后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是在8月，他不损一兵一卒突然进军穿过维拉尔重兵防守的“不可逾越的防线”，围攻布卡因。但夺取这个小城镇之后并未立即入侵法国，因通向巴黎的道路上仍有法军驻守的层层要塞。他返回英国，托利党内阁感到自己势力强大，就连他也加以攻击了。

1711年夏，圣约翰与托西之间的谈判很快取得具体结果。^[52]法国全部同意英国的要求：直布罗陀、米诺卡岛、供应非洲奴隶的契约、在西班牙享有最惠国待遇、拆除敦刻尔克的港口设施和防御工

事、割让阿凯迪亚和纽芬兰。这些让步都载入10月8日的《伦敦初步条款》。至于这些条款公然违反过去的条约特别是屏障条约，托利党人则全然不顾。英国政府以这些初步条款为基础，向它的盟国提议在1712年初召开全面和平会议。海牙和维也纳群情激奋，连同各小盟国都一致表示反对，因为所有关于它们的利益的条款都订得含糊其词，唯独有关英国利益的条款却详尽具体。特别是荷兰人大为不满。这不是因为《伦敦初步条款》把西班牙留给菲利普五世——荷兰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赞成“没有西班牙就没有和平”的方案，更不愿意看到为了查理六世恢复查理五世的帝国。甚至“屏障”问题现在看起来也大不相同了，因为南尼德兰看来不会落入衰弱的西班牙王国之手，而是会落入大陆上第二个军事强国奥地利之手。但各国并不想简单地把《汤森条约》束之高阁，因为那个条约曾允许它们获得与英国同等的经济利益。推翻《汤森条约》的愿望把荷兰人推到另一个国家一边，即愿意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奥地利一边。这两个国家只是很勉强地同意召开和平会议。

英国政府成功地利用小册子和报纸掀起公众对同盟国特别是对过去的对手荷兰的敌对情绪。一代人积累下来的怨恨和猜疑这时重新抬头。1711年11月底（旧历）斯威夫特著名的小册子《同盟国的行径》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没有哪个国家如此长久又如此可恨地受到国内敌人的愚昧、轻率、腐化和野心的糟蹋；或者受到外国盟友如此傲慢、不公正和忘恩负义的对
待。[\[53\]](#)

这个小册子影响很大。第二年约翰·阿巴思诺特博士的小册子《约翰牛的历史》影响几乎同样大。反对派的小册子也不少，但这时托利党声望正隆，反对派的声音被淹没了。马尔巴勒是反对派的中心，上议院是反对派的堡垒。这个堡垒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位公爵被指控贪污，同年底在辱骂声中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这位伟大的人物自愿流放国外。[\[54\]](#)他被解职的第二天，政府增补了12名托利党的贵族议员，从而打破了上议院的反对。至此，牛津和圣约翰完全控制了局势。1712年1月，尤金访问伦敦，毫无效果。2月4—15日，下议院通过一系列决议指责荷兰人在整个战争中未能按定额提供兵员、舰只和战费。这种指责一部分是事实，但不公平。就这个国家的人力和财力来说，它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荷兰为欧洲服务国力已消耗殆尽。

列强代表会议于1712年1月29日在乌德勒支召开。^[55]路易十四既已与英国达成协议，便向其他敌国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奥地利、荷兰及其他小盟国（特别是汉诺威）拒绝接受英法两国安排的和平条件。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它们继续进行战争。除此，圣约翰明知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之举，亦毫不踌躇。马尔巴勒解职后，英军在尼德兰的司令由奥蒙德继任。1712年的战役还没有开始，他于5月21日就接到了臭名昭著的“约束令”，禁止他参加任何围攻或主动出战。这些命令是对同盟国保密的，但圣约翰却把内容告诉了法国人。不过事情的真相还是很快传扬开了。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奥蒙德和全部英国本国军队于7月16日撤离战场。马尔巴勒的老战士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英国占领了根特和布鲁日，法国于7月19日把敦刻尔克移交英国，作为拆毁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的保证。

荷兰议会在海因修斯的劝说下（此公力主打个分晓），被英国的背叛激怒了，决定采取一项绝望的政策。他们甘冒财力不济的危险，自己承担原由英国支付的外国雇佣军的费用，并同奥地利协作继续进行斗争。尤金被任命为尼德兰的司令。在英国军队撤走之前，同盟国已经占领了勒魁斯诺伊，但当尤金围攻兰德里西斯时，维拉尔于7月24日在德南附近给荷兰的掩护部队以沉重打击，荷军惨败危及同盟国的交通线。这一年的下半年，法军士气重振，收复了勒魁斯诺伊、布卡因和杜埃。荷兰人懂得了，没有英国他们就没有希望继续打下去。他们的国家财政崩溃了。失望和屈辱使他们甘愿屈服了——这正是圣约翰用的字眼。

荷兰共和国只好听任英国背弃《汤森条约》，而于1713年1月30日另行签订继承和屏障条约。这时已谈不上在西班牙的领土上享有同等的贸易利益，也无所谓兼并上盖尔德兰了——英国已决定把这块领土划归正在兴起和扩大疆土的普鲁士王国。“屏障”问题原则上仍保留，但英国原来答应帮助荷兰共和国获得驻军防守的城市却减少了一半。1713年3月和4月，英国、荷兰共和国、普鲁士、萨伏依和葡萄牙分别与法国签订和约，6月和7月，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在诸小盟国中，托利党特别垂青的普鲁士和萨伏依获益最大。

只有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还有待于默认这必不可免的命运。还必须进行另一次战役才能迫使奥地利查理六世屈服。这时法国已能把全部军队调集莱茵河地区，尤金无力对敌。1713年期间，维拉尔开始

谈判，1714年3月6日奥地利与法国签订《拉施塔特和约》，但查理六世仍认为他与菲利普五世处于战争状态。9月7日，罗马帝国在瑞士的巴登签署了这个和约。^[56]

无论如何这一切总还是大同盟对抗路易十四的无可否认的胜利。法国最后得到的条件虽比1709年可能得到的条件好得多，但西班牙君主国的被分割可以说是欧洲均势思想的胜利——而这正是1701年大同盟的主导思想。只有两个问题仍待解决，一个需靠武力解决，另一个则要靠外交谈判解决。

战争的结局对被遗弃的加泰隆人来说是悲惨的。驻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英军绝大部分已于1712年撤退到马翁港和直布罗陀。在对西班牙的和约中只字未提加泰罗尼亚的利益；博林布鲁克宣称，维护加泰隆人特权的事与英国无关。但加泰隆人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当英国一支舰队封锁加泰罗尼亚港口时^[57]，法国和西班牙的炮兵把半个城市夷为平地。经过4个月的围攻和6000人丧生之后，1714年9月11日该城投降。没有屠城，但加泰隆人被剥夺了政治权益并受到百般侮辱。

最后，还有一个外交问题有待解决：共和国与南尼德兰的新主子查理六世还要对“屏障”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英国与共和国激烈争吵期间，布鲁塞尔英荷协商会议的权力已微不足道。共和国政务院拒不执行协商会议的指示，并开始迫切要求立即把各省割让给它们合法的君主。1713年的屏障条约签订后，英荷两国的团结有所恢复，荷兰人才得以在布鲁塞尔协商会议上重新坚持自己的权利：这时1706年的政务院已由愿意接受两国监护的新的政务院所取代。《拉施塔特和约》签订后才有可能与奥地利谈判最后解决“屏障”问题。辉格党此时重新执政。在英国帮助下，荷兰于1715年11月15日在安特卫普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才勉强从奥地利人处得到它梦寐以求的“屏障”。既没有要求比利时居民批准，比利时居民也没有接受。至此，“共管区”结束。1716年2月，协商会议的最后一名成员范登堡把政权移交奥地利人。西属尼德兰变成了奥属尼德兰。

（申立 译）

^[1] 关于“大同盟”的组成及其在1701年的行动，参阅本书第405页及以下各页；关于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利益，参阅本书原文第590页及以下各页。

- [2] 关于在美洲的战争，参阅本书原文第372—373页和第501页及以下各页。
- [3] 见H. 吉洛特著《路易十四时期及德意志国家舆论》，1914年。
- [4] 参阅本书第22章（3）。
- [5] 参阅D. 库姆斯著《荷兰的行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英国舆论和荷兰同盟》，1958年，第37页。
- [6] 参阅本书原文第584—585页。
- [7] 参阅J. W. 威金著*Het Staatsche Leger*第8卷第一部分，海牙，1956年，第539页。
- [8]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卷，原文第445页；关于伯杰克参阅第390页和R. de施里瓦著*Jan van Brouehoven, Graaf vom Bergeyckle*, 1644—1725，布鲁塞尔，1965年。他于1700年离职。
- [9] 见本书原文第325页。参阅D. 利根著“*Forêts, garrignes et maquis olans la guerre des Camisards*”，*Aates clu Calloque sur La Forèt*[Cahlersd Emdes Comtoises, 12. (1967)]，第129—139页。（“卡米扎”是18世纪初造法王路易十四反的新教徒，改退避山中继续斗争。——译者）
- [10] 他后来成为一位将军并在战斗中赢得许多荣誉，但就在他有可能对共和主义者构成威胁之际，他于1711年猝然去世。
- [11] 见J. W. 威金著作第8卷，第一部分，第697页。
- [12] 除了马尔巴勒自1704年6月起同尤金有私交外，双方的联系只限于外交活动，在外交活动中，马尔巴勒和拉蒂斯劳伯爵（哈布斯堡王朝1701年1月8日至1703年5月9日和1703年12月30日至1704年4月16日期间驻伦敦的能干的特命全权公使）的良好理解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1704年。参见本书原文第420页注4。
- [13] W. C. 考克斯：《忆马尔巴勒》第1卷，1820年第2版，第250页。
- [14] 参见本书原文第466、595—596页。
- [15] 和《四国防御条约》不同，《永久防御条约》不包括哈布斯堡王朝；在该条约中，英荷对葡萄牙作出抵御法国和西班牙进攻的永久性保证。
- [16] 参见本书原文第591页。葡萄牙人估计，查理大公的出现是西班牙人起义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作为一种保证，即一旦他们失掉波旁王朝的友谊，同盟国不致丢开他们不管。因此，在第一个《梅休因条约》中以查理大公作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就成为葡萄牙要求列入的一个条件。虽然如此，在遭到维也纳的反对之前，海上强国一直认为查理三世的宣告是理所当然的，并有时使用他的名字，虽然他们在加的斯只提奥地利王朝。黑森—达姆斯塔特的诸侯乔治就可能入侵问题一直与西班牙人保持接触，他也许在1702年4月在伦敦提到过查理的名字。但帝国驻里斯本大使沃尔德斯坦总认为葡萄牙这个盟国是可以廉价买到的，因而迟至1702年11月还拒绝表明态度。结果是，长时期内查理本人是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

牙这场战争的唯一贡献，至于皇帝应承担的同盟国的那份军费和部队，还得由英国来补足[参见A. D. 弗朗西斯著《约翰·梅休因和1703年的英葡条约》，载《历史杂志》第3卷（1960年），第103—124页；《葡萄牙和大同盟》，载《历史研究》第38期（1965年），第71—93页；《梅休因与葡萄牙（1691—1708）》（剑桥，1966年）]。

[17] 参见本书原文第520、524页及以下各页。

[18] 参见本书原文第303页。

[19] （例如）波尔多的海军部档案记载表明：荷兰的担心是有些根据的，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在1703年和1704年间海运离港次数总和还不及荷兰从1705年到1708年中任何一年的航行次数多。此外，由于法国的限制，在战争第一年里只有很少的荷兰船只在法国的西部港口停泊。在1705年春，法国的船只通行许可证才开始大量发给荷兰船只。1710年以后它们大部分（但不是全部）被禁止了[J. S. 布朗利著 *Le Commerc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et la guerre maritime, 1702—1712*, Annales de Mioli, t. 第65卷（1953年），第49—66页]。

[20] 参阅G. 范·登·豪特著 *Les Relations anglo-hollandaises au XVIII^e siècle*, 卢万, 1932年, 第255页及以下各页。

[21]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布兰亨宫发表的个人研究论文证实了G. M. 特里维廉的怀疑（参见《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第1卷, 1930年, 第325—326页）。他怀疑那种认为这次战略计划是来自尤金的传统观点：如果马尔巴勒的看法是起因于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符拉蒂斯劳，他是这种看法的忠实倡导者；1704年春他还陪同马尔巴勒到了欧洲大陆（参见《马尔巴勒：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卷, 1947年, 第721—722、727页）。

[22] 关于在葡萄牙境内的战争，参见本书原文第526—527页。

[23] J. H. 欧文：《安妮女王时期的海上战争，1702—1708》，剑桥，1938年，第93页。该内容说明了火力难以严格比较的原因。

[24] “Lieber bayrisch sterben als Kaisereich verlerben.”

[25] 参见本书原文第585—586页。

[26] 他死于这次战斗，其他围攻直布罗陀的老将也战功卓著。

[27] J. G. 斯托克-彭宁著： *Het Grote Werk: Vredesonderhandelingen gedurende de Spaanse Successie-oorlog, 1705—1710*, 格罗宁根, 1958年, 第24—71页。

[28] J. G. 斯托克-彭宁著： *Het Grote Werk: Vredesonderhandelingen gedurende de Spaanse Successie-oorlog, 1705—1710*, 格罗宁根, 1958年, 第64页。

[29] G. M. 特里维廉：《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第2卷, 1932年, 第123页。

[30] 除他的新称号外，女王还授予伍德斯托克皇家采邑；议会大量拨款为他在那里修建住宅；皇帝勉强赠予明德汉姆小公国——从马克斯·伊曼纽尔没收来的，1714年又还给本人。

[31] 奥尔良（未来的摄政）并没有真正的权力，旺多姆曾建议马辛（他不赞成他的任命）应该由一位有皇族血统的诸侯陪伴来使那些意大利诸侯信服。

[32] 参见本书原文第593页及以下各页。

[33] 引自丘吉尔著作，第2卷，第165页。

[34] 参见本书原文第446—447页。

[35] 关于以前同马克斯·伊曼纽尔的协议，参见本书原文第381—382页。

[36] 见本书原文第663页。

[37] 参见本书原文第664页及以下各页。在盟军攻打土伦失利前他没有行动，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有人断言，他曾向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施加压力使此次战斗失败，他认为这次成功会使法国被迫接受和平（请参阅R. M. 哈顿著《瑞典的查理十二世》，1968年，第232页）。

[38] 对法国南方地区入侵所引起的损失估计超过650万利维尔。参见A. 皮雷特著《法国南方的森林问题，法国南方地区历史》第16卷，1966年，第48页。

[39] 流放他乡者也想要一个屏障。参见本书原文第467页。

[40] 引自亨利·里奇蒙爵士著《政治家和海权》，牛津，1946年，第92页。

[41] 自1706年1月起，斯坦厄普一直担任驻查理国王身边的英国大使，这时他又担负着领导英国代表团的双重任务。

[42] 事实上，至少在1709年8月以前是这样对待米诺卡岛的，而且很可能也是这样对待供应非洲奴隶契约的。参见R. 盖基与I. A. 蒙可马利的《1705—1719年的荷兰边界》一书，剑桥，1930年，第151—153页。根据B. 威廉斯的《斯坦厄普》一书（牛津，1932年，第61页）记载，法国人获取了条约的一个副本，并把它告知给荷兰人。

[43] 关于1709年10月才公开地承认查理三世为“天主教国王”之前所发生的“罗马教皇奥地利战争”，见本书原文第595页。

[44] J. H. 欧文：《安妮王后领导的海上战争，1702—1708年》，第260—261页。

[45] 他们关系不佳。的确，他们之间频繁的争吵，影响了这次战役所必须全面运筹的战略计划。

[46] 见本书原文第322—323页；关于信用危机，参见本书原文第305页。

[47] 见斯托克·潘宁著作，第280—313页。关于谈判情况见本书原文第415页及以下各页。

[48] 5月7日卡亚河畔的一场战斗是葡萄牙军队卷入的最后一次战斗。1710年10月，高尔韦返回了英格兰。

[49] 参见本书原文第670页。

[50] 参阅A. 帕奈尔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905年，第284—285页。

[51] 参见本书原文第505—506页。

[52] 参见本书原文第459—460页。

[53] H. 戴维斯编：《政治论文集，1711—1713年》，第15页。

[54] 1714年夏，安妮尚在世时，马尔巴勒就打算回国，但直到安妮突然逝世后，他才回到国内。

[55] 参见本书原文第461页及以下各页。

[56] 参见本书原文第474页。

[57] 参阅特里维里安著《女王安妮》第3卷，1934年，第257页注266。

第十四章 乌得勒支和约

《乌得勒支和约》一系列漫长的谈判，既没有明显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日期。乌得勒支会议及其后续的拉斯塔德会议和巴登会议，除了公开表明媾和意图外，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交易场所，用来批准经过异常曲折的过程达成的种种决议罢了。妨碍走向和平之路的许多困难，各同盟国之间在如何确保大同盟各项不甚明确的目标方面存在的分歧，致使各同盟国之间的谈判，如同对敌谈判一样，往往是艰苦和旷日持久的。只有经过一致同意才能媾和，但这并不妨碍同盟国中任何一国直接同一个敌国讨论各种建议，实际上，从1706年起，这样那样的谈判就一直在继续着。

走向和平的首次重大行动是法国和西班牙各自向荷兰人和英国人进行了双重接触^[1]，时为1706年7月，即在拉米伊^[2]解除了对荷兰人的直接威胁，并暴露出同盟国在管辖南尼德兰方面的分歧意见以后两个月，如果能够瓦解反法联盟，路易十四就准备瓜分西班牙的继承权。伯杰克同古达省议长布鲁诺·范·杜森接触^[3]，建议把西班牙和西属印度^[4]划归查理三世，把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属地划归菲利普五世。西属尼德兰应划归荷兰。就在海因修斯向马尔巴勒进行这些试探的同时，马尔巴勒本人也间接同马克斯·伊曼纽尔和以西属尼德兰总督身份派到他那里的法国使节皮埃尔·鲁耶进行接触，探讨着不同的领土划分方案：尼德兰划归查理三世，埃诺省划归那个被剥夺了领土的选帝侯。法国和西班牙分头向各怀心计的同盟国进行初步认真试探一事，是与同盟国所坚持的共同主张相违背的，即任何和解必须满足一切有关国家的利益，然后才能开始具体的谈判。到1706年底，已经进行过的意见交换仅仅表明，要取得和解竟是如此之难。各同盟国仍然认为菲利普五世必须交出他的全部西班牙领地，但英国拒绝荷兰提出的建议：把像那不勒斯或西西里那么一块对英国贸易至关重要的地区补偿给菲利普。更有甚者，在意大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与法国的奢望发生冲突，法国人希望把菲利普手中的意大利领土最后归属法国。同时，屏障条约^[5]已表明它要在防止轻易走向和平过渡方面发挥作用。维也纳建议从法国西北部取得的领土中打主意，这样一来，

荷兰驻军与本土的陆上联系被切断了。伦敦尽管对荷兰比较同情，但又不愿意把登德蒙特（荷法接壤处施凯尔特河交通线上的一个中心城镇）或英国人所觊觎的纽波特和奥斯坦德包括在内，因为其中任何一地都会给荷兰人带来十分明显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皇帝约瑟夫一世迫使米兰公爵将采邑划归奥地利，这就表现出他对自己的兄弟查理完整无缺地获得西班牙领地这一目标是何等不重视。法国这一分裂同盟国的初步尝试，产生了一个只对萨伏依有利的后果：法国提出把米兰公爵领地交给萨伏依，吓得皇帝推迟到1707年才履行他对《都灵条约》所承担的把蒙特菲雷特封赠给公爵的那项义务。^[6]阿尔曼萨战役使法国企图继续利用各同盟国之间的分歧的希望愈来愈小，因为此时路易十四已不太愿意考虑把西班牙交给那位大公了。1708年1月，来自鲁昂的商务参赞尼古拉·梅斯纳热在鹿特丹同范·杜森谈判以后，他能向海因修斯提供的，仅仅是较宽厚的对法贸易条件；他无权讨论任何有关西班牙继承权的划分问题。这些谈判在3月间中断了。英荷之间在拟议中的屏障条约（该条约包括有关保证汉诺威继承权的条款）方面所产生的困难并不足以引诱海因修斯再来参加一轮毫无把握的分头谈判。

这类和平试探并不表明法国有明确的政策。认真的谈判是在奥德纳德战役（1708年7月）以后才开始的。同年10月，里尔的失守又加速了这一进程，此时，通过彼得全姆（此人是荷尔施泰因-哥托普派驻海牙的公使，自1707年起就一直是法国的代理）与海因修斯重开谈判。法国此时已愿意公开提出把交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路易十四这一含蓄的表白，说明他发动战争的整个政策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又恢复了《瓜分条约》的想法。但是，当法国放弃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原则时，同盟国却采纳了这一原则。此外，托西刚刚表明他打算根据同盟国之间达成协议的条约草案进行谈判，大同盟内部就矛盾重重，使本可按此做法制定出一份能为法国接受的草案的希望成为泡影。

1708年英国大选，辉格党获胜。辉格党决心要荷兰保证由一位新教徒继承皇位，并决心迫使联合省服从一项不妥协的媾和计划。其代价是与荷兰签订一项稳固的屏障条约，不管皇帝是否赞成。事实上，执政党比马尔巴勒更希望搞得快些，而马尔巴勒则是大联盟中最关心从军事上彻底毁灭法国的一个人，他认为现在离此目的为期不远，无

须再对荷兰作出让步。反之，假如荷兰首先与英国签订了一项有利的条约，那么他们就可以此条约提出要价，那么，他们试图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与此相反，辉格党却担心如果不首先答应同荷兰签订一项稳固的边界条约，荷兰就会单独媾和。事实上，军事形势减少了以瓜分为基础进行媾和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减少了荷兰背信弃义的可能性。英国占领直布罗陀以后，又占领了马翁港，从而使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愿意接受菲利普五世保留西班牙的做法，这是因为，若此，则可预料，菲利普五世就会要求收回米诺卡岛。另一方面，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扩张，使荷兰把意大利半岛补偿给菲利普的建议失去了意义，同时也间接减少了把西班牙让给哈布斯堡王朝的可能性。虽然教皇被迫放弃了“教廷绝对中立”的姿态，并于1709年1月秘密承认查理大公为天主教国王，被迫在菲利普五世与教皇的权力之间作出选择的西班牙人则一面追随其国王，同时又谴责他（于4月）在可恨的哈布斯堡问题上与罗马毁约的行为。

由于英国与奥地利均无意参与瓜分，因此荷兰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接受一切对他们有利的方案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荷兰为签订屏障条约不得不求助于英国，结果他们不得不接受伦敦和维也纳提出的媾和条件的一切要求。辉格党对于彻底获胜的可能性确信无疑，但又不知如何去获得这一胜利，于是便怂恿荷兰（直至此时大同盟内部一直认为荷兰是坚决支持瓜分的）^[7]同奥地利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军事上无能，谈判中各执己见，就只能用成功的联合外交手段来加以补救。同盟军在佛兰德未能办到的事，就要由法国国王在西班牙替他们办到：他必须把自己的孙子驱逐出西班牙。

决定命运的那份1709年5月的“条约草案”的产生过程是极端令人痛苦的。海因修斯不愿脱离英国去冒险媾和，而英国离开奥地利又不能媾和（除非英国牺牲直布罗陀、米诺卡岛，以及1708年1月与查理三世^[8]签订的那份商业条约中尚未公开的“供应非洲奴隶”条款）。由于皇帝为哈布斯堡王朝获取整个西班牙继承权的打算从未有过动摇，于是首先是英国，然后通过英国使联合省和一些更小的国家，特别是普鲁士和萨伏依相继接受了这个同盟国协调一致对敌谈判的唯一基础。一旦他们在“条约草案”中找到了避免进一步讨论他们之间分歧的办法，就把他们在西班牙进行战争的责任推给了路易十四，他们就联合起来了。然而，路易十四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同盟国想要得到的东

西穿针引线。到1709年6月，事情陷入僵局。战争不能获得全胜，唯一可能的结果必然是降低同盟国的目标，或者同盟宣告破裂。同盟国只有强调基本共同利益，才能抑制彻底崩溃，维持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就是共同利益所在。

1709年初，各大国内部对于未来的看法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威廉国王的想法是问题要均衡解决。辉格党人无视国王意图，确信马尔巴勒的观点，认为法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深信法国会在外交上屈服，从而可在西班牙获得全面胜利。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这种信心毫无根据，那就只能增加英国的不满，因为前景可能是一场新的战争。辉格党人就在这些最高目标不再能实现的时候作出他们无法实现的许诺，抱着这些目标上台的，他们只得依靠大众的支持才能维持其权力，而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媾和的良好前景。海因修斯要说服荷兰各省也非易事，他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听从奥地利和英国的一切要求，只要他们甘冒战争的危险同英国站在一起去反对菲利普五世，那么就能替这场特殊战争的目的获得更多的好处，即签订一项完美无缺的屏障条约——而此时法国却保持中立，成为共和国的威胁。

在维也纳，由于缺乏政治敏锐性，未能制定出一项把王朝的野心与军事和外交现实结合在一起的相应政策。约瑟夫皇帝曲解他的兄弟查理三世提出的要巩固维也纳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利益的要求，适合了英国的利益，也可能会适合荷兰的利益。但是查理三世随之对西班牙的支持（此举对奥地利的利益无关紧要）却对荷兰无益，并且在军事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者，此举对一些较小的日耳曼国家的利益也不相干。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是对莱茵河上游的直接军事威胁，布莱海姆战役并未能阻止对莱茵河对岸帝国领土的进一步侵犯，帝国也未在这一地区获得更多的领土，否则可以此为筹码，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以收复半个世纪以来被法国侵占的失地。1648年以来，维也纳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而现在这件事却必须服从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意大利尼德兰和西班牙的利益。由于当时需要为1709年条约草案确定德国和奥地利的要求，所以维也纳召开秘密会议^[9]（2月间举行），帝国集团主要国家也召开会议（5月在海尔布隆举行），但因意见分歧而宣告失败。在帝国集团内部对他们目标取得一致意见之前，同法国的谈判就破裂了。在维也纳，只有符拉蒂斯劳一人对政策有一

些清楚的概念，但由于他拒绝与尤金一起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出席5月在海牙举行的极为重要的谈判^[10]，后又因重病，他便退到政治舞台的边缘，他的影响就大为减弱了。符拉蒂斯劳比他的君主更明智地关注着形势，他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奥地利权力（而非王朝要求），他认为获取意大利和德国南部，也许是萨伏依和巴伐利亚，就可达到目的。由于他清楚了解到约瑟夫皇帝没有儿子，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部继承权很快就会落到查理三世手中，因而早在1706年，他就对要求获得西班牙全部继承权的实际作用表示怀疑。这样做会产生一种为沿海诸国所不能接受的局面，使奥地利受到孤立。从他自己的意大利政策出发，即便接受英国和尼德兰的屏障条约，他也渴望与他们合作。他预见到（这是作为君主的皇帝所不能预见到的），假如查理三世成了国王，在奥地利手中的尼德兰就会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得到扩大，却不需要作出任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补偿。符拉蒂斯劳同样关注的问题是，解决德国问题中，利益和责任要平衡。法国在边界上作出任何对奥地利有利而不是对帝国有利的后撤，都不会得到日耳曼君主们的积极支持；而任何能扩大奥地利责任但又缺乏有效支持措施的和解办法对奥地利没有多大意义。奥地利的最终决定是要求获得斯特拉斯堡，并在1648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制法国在阿尔萨斯的权利。各方同意，任何屏障条约必须由联合省与奥地利直接谈判。由于德意志帝国的诸侯们未能派自己的全权大使去参加1709年的谈判，而只派他们的个人代表出席，不起作用，遂将德国谈判大权扔给皇帝的代理人尤金和辛岑道夫，这两人需要时就说帝国有必要协商，拿出统一的意见，以此来推卸他们自己的责任。

1709年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17日到4月21日），谈判在默迪克和弗尔登举行。谈判是在法国的鲁耶同阿姆斯特丹议长拜斯和古达省议长范·杜森之间进行的。随后（5月6—28日）又在海牙举行。谈判一方是托西，另一方是同盟国的海因修斯、马尔巴勒和尤金。

在最初的几次谈判中，除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以外，鲁耶受命有权对整个西班牙继承权问题作出让步；有权同意将盖尔德兰北部（有争议的奥伦治继承权的一部分）划归荷兰；有权对荷兰和古达省作商业上的让步并为签订一项屏障条约进行谈判。如果能对这些基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就可把英国和德国的全部问题提交大会处理。在

大会上，荷兰出于自身的利益将支持法国。鲁耶还奉命去探听荷兰打算如何对待皇帝撤离那不勒斯的问题。讨论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设想：与当前的敌人联合起来，用武力去对付一个难以驯服的同盟国，也即法荷海军联合远征，让菲利普五世尾随荷兰军队之后进入那不勒斯。这是同盟国要求路易十四将菲利普逐出西班牙的前奏。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打算均未成功；然而，这一原先出于法国的建议却证实法国抱有的义愤是真实的，法国对同盟国随后提出的建议均报以满腔怒火。荷兰逐步为它自己及其盟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即使荷兰单独与法国就谈判草案取得一致意见，荷兰也没有希望从中得到好处，除非其结果是一项适合于所有盟国的全面媾和。在签订屏障条约方面，它们对伊普尔、梅嫩、弗内斯、图尔内、康德和莫伯日，以及里尔或列日、于伊、波恩等东部要塞提出了过分的要求；鲁耶不肯让出里尔或图尔内。荷兰还替普鲁士索要瑞士的内沙特尔和瓦朗金，因为拟议中的盖尔德兰和解办法违背了霍恩佐伦的条款，其中包括：奥伦治继承权问题；摧毁敦刻尔克；承认汉诺威继承权；以及通过萨伏依的军事胜利取得阿尔卑斯山的要塞埃克西尔和费内斯特里尔。在这几次单独谈判的整个过程中，由于马尔巴勒和尤金的出席，海因修斯变得强硬了。4月10日，马尔巴勒宣称，英国坚持要求对方全面投降，于是，荷兰便撤销了原先对法国的承诺，即允许法国在目睹菲利普五世进入那不勒斯时可发挥调解人的影响。海因修斯把法国希望立即停战一事看作路易十四软弱的表现，进而坚定了荷兰与同盟国的合作，认为这个最大的赌注是完全正确的。海因修斯准备提出同盟国的全部要求，这是他签订一个他不可能单独与法国谈成的屏障条约的最好办法，这时，拜斯和范·杜森见状也就放弃了采取比较温和的解决办法，特别是让英国撤出意大利的希望。海因修斯绝不与其盟国英国分开，他这个做法同博林布鲁克在1710年后轻易地背弃这个共和国的做法相比，就形成明显的对照了。

4月28—29日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宫廷会议，对荷兰要求的全部内容进行了辩论，会议结果暴露了法国的窘态。这次会议使谈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法国把诸同盟国当作一个整体与之谈判，不再企图分裂它们。为了在一场新战役之前赶紧结束谈判，托西表示他愿意前往联合省。路易十四含着泪表示了同意。除了不把所征服的领土让给萨伏依之外，托西受命有权对双方有争议的一切细小问题作出让步。此刻的屏障条约甚至有可能包括里尔和图尔内。敦刻尔克必须消灭；承认安

妮皇后和汉诺威的继承权；把觊觎王位者从法国土地上赶出去；斯特拉斯堡投降；把巴伐利亚选帝侯的复位问题提交全体大会。但托西依然希望从他的敌手们之间在南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中得到好处。他立即警告海因修斯说即使路易十四愿意，他也“无法迫使西班牙国王放弃他的全部领土”^[11]（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比路易喜欢看到的更确实），但海因修斯不再继续受他的引诱了。马尔巴勒在5月中旬参加谈判时，托西又作了一次努力，表示愿意摧毁敦刻尔克并给公爵一笔贿赂，企图以此引诱英国，结果徒劳。此刻，汤森也来支持马尔巴勒。最后，他们明确地告诉托西，同盟国不会给菲利普五世任何补偿；如果要为菲利普五世建立一个王国的话，这个王国必须由路易十四提供。他们建议把王国设在布尔戈尼自由郡。5月19日，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被提上了议程。如果路易要获得法国迫切需要的媾和，唯一的办法是用菲利普去换；托西最后得到的指示甚至容许他把那不勒斯交出去，“交出与否由他决定，让他尽力而为”^[12]。因而，此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法国是否答应同盟国的要求，而在于法国能不能履行其协议。从托西放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之时起，路易十四与他孙子的关系就成了媾和的关键。早些时候，法国坚持，凡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国家，都须拿出履行这一方案的手段，来证实本国的善意，而此刻这一主张正好使路易自食其果。同盟国半个世纪以来对法国一直不信任，现在对法国的不信任又加深了，觉得法国只是为了从战争的灾难中得到恢复和度过严冬而拖延时间。托西催促订立休战协定，但各同盟国决定只有在法国履行已同意的条件之后才能媾和而不是在这之前。如果法国确有诚意，它就会让菲利普平安地撤离西班牙；同盟国很明智，不愿贸然给法国以和平，然后自己却不得不同西班牙打一场只能通过海运得到给养的战争。5月23日，同盟国提出立即占领3个法国城市和3个西班牙城市的要求作为路易诚意的信物。法国拒绝了这一要求。5月24日，托西抱着扩大同盟国之间分歧的侥幸心理要求同盟国提出它们的全部具体要求。

刚刚前来与尤金协同工作的帝国大臣辛岑道夫伯爵决定在同法国完成谈判之前，先排除奥地利与荷兰之间的一切分歧。然而，自从4月间荷兰人与鲁耶决裂之后，他们就把签订屏障条约的希望寄托于共同媾和。如果同盟国的争论拖延下去，这种希望就会落空。因此海因修斯决定回过头来讨论大家已取得一致的中心问题，即西班牙问题。5月

25日，他把他制定的作为最后达成和约的“四十条”提交给同盟国的代表们。两天之后，又把这些条款草案作为他们的共同要求交给托西。“四十条”中只有两条是关键：第四条要求，如果菲利普五世不能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履行媾和条款，路易就必须与同盟国一起制定措施来履行这些条款；第三十七条规定，只有在媾和条款执行之后，法国与同盟国之间停战协定的有效性方可超过两个月。这就是说，一旦条款中所提出的那些城市已告投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被占领，以及莱茵河的要塞已按其他各项条款要求予以摧毁，那时是否重新开战，法国就任凭同盟国摆布了。

在5月2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托西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些条款草案，路易十四也不能接受。到了1709年5月，法国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西班牙新运到几批白银，向国外购买谷物、补充作战物资和为部队供应衣服和靴子就有了现金；初春的艰苦日子对征兵很有帮助。6月2日会议上对条款草案进行辩论的情况虽然不为人们所知，但托西却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路易可能由于受到托西和皇太子的支持，决定拒绝条款草案。拒绝之后，他就向全国发出了公告，号召人民作出最后一次的伟大牺牲，与污辱法国尊严的媾和条款作斗争；与污辱法国尊严的条款作斗争，而不是为了同情西班牙的波旁国王就成了号召的基调。

由于法国拒绝令人反感的第四条和第三十七条，致使谈判破裂，从而使同盟国内部就提出这些条款的意图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由于同盟国未能在法国最虚弱的时刻，在同盟国的要求实际上能获得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媾和，英国的反应是加快反对本国的执政党，人们认为执政党是为了继续战争而唆使荷兰提出不可能为法国接受的条款的。现在看来事实真相很可能更复杂些。英国那时对于什么是取得媾和的最好办法是有分歧意见的。马尔巴勒走得比他的同事们更远，他认为彻底打败法国是大家求之不得的，是可行的，而且马上就可实现的——而且同盟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菲利普五世驱逐出去。实际上，条款草案的背后也都隐藏着与此相同的观点：如果法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它此刻就必须接受这些条件。现在我们不能肯定的是同盟国是否设想过菲利普五世本人可能会拒绝这些条款。如果路易真的像鲁耶5月11日重申过的那样，真正拥有控制他孙子的权力，那么第四条和第三十七条就会成为像同盟国可能设想过的那样——只不过是法

国的一种诚恳而善意的表示罢了，用以向菲利普表示：他此刻必须作出让步。然而海因修斯在5月6日与托西首次会晤时就接到暗示，说明路易可能并不完全像同盟国所想象的是菲利普的主子。现在同样不能肯定的是，路易答应抛弃菲利普时是否真心诚意。之所以在条款草案中提出几条令人反感的条款，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考虑到路易可能没有诚意。但是在里尔失守之后，现在我们很难相信路易不是在真心寻求和平。菲利普拒绝服从授予他皇位的祖父，这件事本身就有损于法国在波旁同盟中的至高权力。西班牙人不易对付，这实际上使菲利普从他盟国中间赢得的独立性比奥地利或联合省从英国赢得的独立性还多。因而，由于双方考虑不周，制定了一项双方无法履行的提议，从而造成外交上的僵局。如果路易能早一些认识到不可能与西班牙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那么托西就不至于同意同盟国对西班牙的要求了。不过那项使法国对菲利普五世行为检点负全部责任的全面要求是在下一年的格特洛伊顿堡谈判中才逐步形成的。由于法国特使们对于路易能说服菲利普迁往意大利的能力信心十足，所以最初几次谈判中从未考虑到这个问题。托西仍坚持认为，法国会拒绝承认菲利普对西班牙任何部分的继承权，并撤销法国的援助。同盟国之所以提出更多的要求，不是出于不信任路易的能力，而是出于不信任他的诺言。如果路易能用抵押城市或承诺对菲利普采取军事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那么只需宣布一下这些措施，就足以把菲利普赶走，第四条和第三十七条也就永远不会付诸实施。同盟国并不了解路易无法控制菲利普，因而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必须强行实施那两项条款。没有一个同盟国当真怀疑路易会不屈从他们的条件。其他的条款比法国设想的要温和得多，主张恢复到一个由法国、英国和（得到西班牙一位哈布斯堡王朝后裔支持的）奥地利作为仲裁国的，保持均势的欧洲体系。对于尼德兰、莱茵河和萨伏依边境的3个屏障条约，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看来这3个条约不至于阻碍全面媾和。奥地利对西班牙继承权的奢望妨碍它再次坚持帝国在法国边界上的权力。布尔戈尼自由郡和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依旧归属于法国。

诸同盟国的代表们只是达成了一个暂时而不稳定的协议。维也纳从未完全接受条款草案。秘密会议的争论认为，尤金与辛岑道夫为迎合荷兰已经走得太远了，但对于莱茵河的要求却又做得很不够。在法国拒绝“四十条”很久以后，大会还继续就“四十条”争论不休。皇帝不承认他的特使们的签字，符拉蒂斯劳、尤金和辛岑道夫等人警告

说，这样做会带来大同盟的反击，皇帝对此不屑一顾。极端的苛求使任何协议和瓜分的希望都化为泡影，而约瑟夫一世在同盟国为支持他的主要目的而制定相应政策的时刻，却对他们采取了一意孤行的做法，使同盟国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再也不愿对奥地利承担任何义务了。此时，辛岑道夫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提出更广泛的要求，而尤金则认为，那些令人反感的条款已超过了必要的程度。马尔巴勒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如果我处于法国国王的地位，我宁可亡国也不愿同打我孙子的人同流合污。”^[13]只有巴塞罗那的查理三世对条款草案感到完全满意。

同盟国对“四十条”失败的责任进行了辩论。在海牙，谈判代表们责怪海因修斯，因为他是条款的起草人。他们责怪他未能为第三十七条找到一种可以取代的条款，不过他们自己也未曾对此提出过任何高见。诚然，海因修斯未能取得和平，但他却大大加强了他本国讨价还价的力量。1709年10月29日，英国依旧完全按照条款草案签订了一项他不能再予拒绝的屏障条约^[14]，不顾这样做会影响英奥关系，也不顾英国政府显贵们的严重分歧（马尔巴勒依然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由于荷兰的坚持，条约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没有西班牙就不休战”的内容。英国同意为荷兰从马德里取得与英国相同的商业方面的让步，荷兰人还得到保证，他们将拥有他们期望能有的最广泛的屏障条约，包括诸如登德蒙特等要地。登德蒙特的重要性显然是商业上的。除此之外，该条约还是英国外交上的一项胜利。条约包括对汉诺威继承权的保证，而且要荷兰答应，未经法国认可就不能媾和。条约还使联合省继续参战。然而在政治上，条约对荷兰和辉格党双方都预示着是一场灾难。海因修斯认为，由英国为这一扩大的屏障条约担保比法国担保更可靠。但他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捉摸不定的基础之上的，即辉格党能支撑到媾和的时刻。最后，因为条约所提出的巨大让步不得人心，使英国于1711年同意将它废除。无疑，这一条约含有若干对英国来说自相矛盾的内容，因为辉格党已从查理三世处获得单方面的利益，所以它坚持要满足查理三世的全部要求不无道理。但是为了使查理取得完全的胜利，辉格党此刻愿意让荷兰分享斯坦厄普已取得的各种独占利益，这样英国说树立查理三世是英国最大利益所在就有点理亏。论点有所削弱。

条款草案遭到拒绝之后，彼得全姆再次成为交换意见的渠道。为了寻找取代第四条和第三十七条令人满意的条款，同盟国作了长时期的努力。1709年计划的惨败甚至使托西也产生了瓜分的打算，只要瓜分时能够把那不勒斯或西西里划归菲利普五世就好。在这种想法尚未完全打消之前，谈判于1710年3月在马杜克重新开始，接着又在格特洛伊顿堡继续进行。谈判的进展不大，同盟国把第三十七条作为讨论如何给菲利普补偿的条件，毫不妥协。在以后的几个阶段中，荷兰透露，只要法国一签署条约草案，同盟国将会进一步提出更多的要求。条约草案要法国交出更多的领土，这就使法国在敌方再次侵犯时处于无力抵御的境地。有鉴于此，路易十四就会非常明智地不签这个条约草案。他公开向他的全权大臣们表明，他管不了菲利普五世，菲利普不会自愿离开他的王国。他的内阁意见分歧，维拉尔在同盟国4月份包围杜埃以后就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媾和，只是由于路易坚决反对方才决定不投降，不过后来路易态度有所缓和，允许讨论敌人提出的要他对西班牙与他们一起作出共同安排的建议。6月5日，他最后同意，只要首先明确给菲利普另建一个什么样的王国，他将在西班牙给同盟国提供军队和给养。荷兰在了解这些指示之前已提出，要法国承担驱逐菲利普的全部费用。到了6月22日，同盟国已远远超越三十七条的规定，要求法国对所需的全部人员和费用负全部责任。正如托西所写的，“他们打算对祖父和孙子之间的一场战争袖手旁观”^[15]。法国代表们于7月24日离开格特洛伊顿堡。与马尔巴勒所期望的相反，荷兰虽然认为他们的条件过于苛刻，但依然完全忠于自己的盟国。再者，他们对伦敦如此唯命是从，以致坐失一个签订有利的和平条约的最后时机。法国再也不认真尝试利用共和国叛变的可能性作为达成全面媾和的手段了。当联合省最后打算媾和时，他们就只能从大同盟的毁灭中分得一点他们的同盟者事先替他们索取的残羹剩饭。

戈多尔芬内阁的垮台是一个转折点。该内阁关于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达成领土和解的诺言，由于法国屈服几乎已经实现了（实现这项诺言后能使地中海地区免于商业上的竞争，并使在西属美洲单方面作出让步的谈判得以进行）。但在格特洛伊顿堡谈判的最后阶段，法国已掌握确凿的证据，说明英国已开始表示不愿再恢复同法国的敌对行动了。

很难说明英国是何时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的。政界人士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而且大体上是稳定的。对荷兰发动的“小册子论战”^[16]尚未开始。事实上，保守党的领袖们对条款草案根本不抱幻想。圣约翰对他早在1708年11月给哈利信中所表示的观点并未发生动摇，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离开西班牙吧。”^[17]保守党的政客们害怕在公众中失去信誉，害怕会吓坏在战争中对待西班牙问题始终同他们观点非常一致的荷兰人，以免他们单独媾和，因而没有流露出不满。直到1709年3月，上议院和下议院才通过了一致决议，声称“没有西班牙就没有和平”。然而，对陷得不太深的政界人士来说，1709年5月谈判的失败削弱了辉格党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施鲁斯伯里认为“全国大多数人”要和平，圣约翰则说“此刻和平是最合乎公众和私人利益需要的”^[18]。可是，对政府日益不满的最明显的迹象却来自与战争显然无关的国内问题。1710年3月对萨谢弗雷尔的审判恰好发生在重新开战的季节和法—荷谈判的同时；随着对萨谢弗雷尔名义上的判决而带来的狂热欢庆——这是保守党崛起的时刻已经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施鲁斯伯里于4月14—25日被委任为宫廷大臣，反映了安妮女王对辉格党的深恶痛绝。它暗示着一种有着深远意义的政治变化。在路易十四同意讨论对西班牙使用武力后不久，森德兰即于6月14—25日被撤职，这就更加证实了这一政治变化。这种迹象为荷兰人所深刻理解。森德兰的下台使他们十分惊慌，在辉格党的劝说下，他们就去警告安妮女王不要解散议会。安妮女王著名的回答是：“这是对英格兰君主前所未有的最大侮辱。”^[19]她的回答显示，人们对她的行动所作的批评只能使她深信自己的行动正确无误。东印度公司股票跌价、银行的警告和皇帝的抗议都未能使她惊恐。与此同时，哈利出色地分裂着辉格党的大臣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如何在职位上平安度过风暴，而不是以辞职来表明他们的团结。9月间，哈利已牢牢掌握了局势。1710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以二比一的多数获胜，此事证明他精明地估计到国家的局面已不再为辉格党和豪富们所左右了。

圣约翰作为北方大臣加入了内阁，并且逐步地从哈利手中夺取了权力。他比哈利更狡猾而不如他坚决。1711年2月，他们就魁北克远征一事发生争吵。3月份发生了吉斯卡德企图谋害哈利的事件。到了夏季，圣约翰已把英国的政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哈利建议在一种体面

而稳妥的媾和中把英国的同盟者控制住，并对保守党上层在政府中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的理由采取中间路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辉格党适当的支持。哈利本来打算在媾和中与荷兰进行真诚的合作，而圣约翰则从一开始就准备给同盟国来一个既成事实。大同盟保证要忠于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四十条”，而且还要忠于其具体条款尚未为议会所知的那个屏障条约，这是哈利同共和国打交道时的一块绊脚石；他了解英国，同样也了解辉格党，知道他们都会拒绝对英国贸易利益所施加的限制。于是，内阁立即煽动起反荷情绪。就在8月间，在戈多尔芬下台的同一个星期，《检查者》创刊号出版了。事后证明，此刊在圣约翰的指导下，是唤起英国人原来就蕴藏在心头的，对荷宿怨的有力工具。圣约翰不得不指挥一场有两条战线的战争：一条是对付大同盟的英国支持者，他要逐步地约束这批支持者，使他们按他的意图抛弃大同盟；另一条战线是对付荷兰人，使他们既要同法国隔绝，又要同皇帝隔绝。他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一面假装对荷兰表示坦率，为英国的特殊利益进行呼吁，一面又表示愿意从1709—1710年所提出的高要求退回到大同盟原先的目标。这样，圣约翰就能进行一项高明的外交计划。这项计划使欧洲获得了和平，这种和平虽不如1709年可能获得的那么显眼，但却更为明智。与此同时，他为英国获得了那些单方面的利益。而辉格党早先正是因为企图在既不背弃同盟国又想偷偷瞒过同盟国取得这些单方面利益而遭到失败的。圣约翰的残酷无情主要是由于前届政府弄巧成拙的结果，他蔑视荷兰（因为荷兰未能履行1711年所承担的海军人员定额），他还愿意同敌方进行谈判。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布里韦加（1710年12月）希望的破灭，使5月媾和条款草案终于成为一纸空文。此事再一次肯定，战争不得不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有一方愿意改变媾和条件为止。哈利和圣约翰都认为，查理三世征服西班牙的行动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圣约翰对奥地利深为怀疑，他说：“奥地利是附在英国身上的恶魔，我一想起他们的作为，就必然会联想到就像有个人正在编着草绳，而他的驴子却正在另一端把草绳一口口地吃掉。”^[20]此时，被荷兰的要求所激怒的法国便迅速利用了英国政策变化中明显表露出来的那种厌战情绪。

托西与伦敦打交道的中间人是戈尔蒂埃牧师。此人原是塔拉尔家的成员，他于1701年留居英国，并已成为奥地利大使加拉斯的随从牧师。格特洛伊顿堡的谈判一中断，托西就立即建议戈尔蒂埃与英国政府中的新成员，特别是施鲁斯伯里取得联系。戈尔蒂埃经友人泽西伯

爵（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拥戴者）的暗助，于1710年8月同英国建立了联系。在直接谈判期间，泽西伯爵充当施鲁斯伯里和哈利的代理人，这给法国在下述两个问题上造成了危险的错误印象：新政府在媾和以及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方面打算做到某种程度。直到1711年5月，圣约翰才弄清真相，法国也才意识到政府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英国愿意放弃新教徒的继承权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但是圣约翰确实接受了泽西伯爵曾提及可望作出的最重要的一项让步，即查理三世放弃西班牙王位。这是阻碍前几年和谈进展的唯一要求，现在放弃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1711年4月17日，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即由查理三世继承。不出3天，死亡（正如克雷芒十一世所说“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夺去了法国王太子的生命，使菲利普五世成为法国王位的第四位继承人。同月，戈尔蒂埃提议召开和平大会，英政府认为召开大会要看事先能否就新的谈判条件草案达成协议。圣约翰机敏地坚持己见，说提出这些条件是法国为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他并让大家知道，查理三世对西班牙和西属印度群岛的要求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随之产生的4月22日提议，实际上是英国所提的要求，表面上却是法国的建议。圣约翰向海因修斯说，这些提议是法国试探媾和的气球，英国则愿与共和国一起来进行探讨。海因修斯对圣约翰的意图抱有怀疑。但他与拜斯之间有分歧，使荷兰反应冷淡，并毫无猜疑地愿意让英国单独行事。此时，两国均无大使派驻对方（一位已去世，另一位休假去了）。在这次接触后，荷兰只是在5月间粗略地看过一次这些提议，后来就未再得到任何有关谈判的消息。直到10月，荷兰才得知伦敦和凡尔赛之间的条约已谈妥。

四月提议将作为全面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保障英国利益的同时，也适当照顾英国的各个同盟国，从而不使它们对协议不感兴趣，拒不参加。英国将获得同西班牙、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实际保障，并同意与荷兰签订一项条约，给荷兰以贸易自由。英国的各个同盟国将通过“一切合理的办法”得到满足，西班牙问题将在“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另外，还要召开一次全权大使级的会议来探讨媾和的问题。7月间，英国派一位名叫马修·普里奥的使节带着更明确和广泛的要求与戈尔蒂埃一起同往凡尔赛。马修是一位微不足道的人物，如果双边谈判失败，英国就可以不认账。托西同意在沿莱茵河地区与奥地利确定比较实际的边界（但不放弃阿尔萨斯），给萨伏依赔款割地，并让菲利普五世放弃在法国继承王位的权利。8

月，普里奥由梅斯纳热陪同回到伦敦。在英国自身的要求尚未得到比较细致的解决以前，先把涉及荷兰利益和奥地利利益的困难问题搁置一边。经过同圣约翰、哈利、达特默思和施鲁斯伯里长时间的会议讨论之后（其间英国的地位由于马尔巴勒重创位于布卡因的“内普卢超越边界线”而得到了加强），10月8日签订了称为《梅斯纳热协定》的七项秘密条款。梅斯纳热协定是最后达成《乌得勒支和约》的基础。安妮与汉诺威的继承权将得到承认，奥地利和荷兰将确定其边界，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将被拆除，媾和大会将讨论使各同盟国得到“合理的满足”的问题，同时将采取措施防止法国与西班牙王室合二为一，这样就使西班牙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双方同意，只有在两国认为合适的时候才把这些条件告诉各同盟国。英国的各项利益写在另一项单独的文件中，很明显，它将获得巨利。英国曾为使查理三世留在西班牙而进行过战斗，英国为此应获得酬报。此时，它的酬报将从菲利普五世手中获得，这些酬报包括：把直布罗陀与米诺卡割让给英国，与英国签订30年的供应非洲奴隶的契约，同意英国使用普莱特河上的贸易站。英国在纽芬兰和赫德森湾的殖民地将得到恢复。条款的详细内容有待进一步确定，但从此以后，圣约翰就直接与托西往来了。

秘密不久就被揭露了。加拉斯（这次谈判就是在他家里开始的）向一家辉格党杂志透露了条件内容。大家对条件的反应使英国政府大为震惊。为了稳定公共舆论的情绪，英政府公布了有关英国的条款。这是赤裸裸的背弃同盟国的行径，英国政府的威信为此大为下降，并危及英国的安全，直到斯威夫特的《同盟国的行为》一文打赢了这场笔战，才改变了这种困境。此时，荷兰因拜斯到伦敦去进行实地调查受到冷遇而更加不安。他到达之时恰巧是条件内容被披露之际。很明显，英国此时不想在与西班牙贸易中寻求单方面的利益，所以根本不重视屏障条约。拜斯试图弄清楚屏障条约最近达成了什么协议，他只得到了含糊的答复。圣约翰则依靠他派往海牙的一位新大使斯特拉福特勋爵，以单独媾和作为威胁，逼迫荷兰国王接受《梅斯纳热协定》。到11月底，联合省眼看已无法再行力争，于是只得同意就他们自己的国土问题召开一次会议。

英国的大臣们终于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参加议会了。在荷兰举棋不定之时，英国议会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休会。托西和圣约翰之间联系密切，荷兰提前行动的可能性就减少了；托西实际上拒绝了惊慌的共和

国同他接触。荷兰认识到，它不论是同法国谈判还是同奥地利谈判屏障条约，都不能没有英国帮忙；此刻若与英国对抗，那就什么屏障条约也谈不成。保守党的多数派于12月7日使条款在下议院通过。在上议院，高教会派的保守党人与反对媾和的辉格党人之间在“信奉国教”问题上达成策略性的妥协，结果产生了一项动议，即任何和平条约都不能将西班牙交给菲利普五世。同月，女王晋封了12位可成为上议院议员的新贵族，于是，世袭议院对于公众寻求和平的阻拦就被打破了。马尔巴勒于12月31日被撤职，他欺骗荷兰的主张此刻已不再是必要之举；随之而产生的强烈抗议，很可能出于对他的撤职过于粗暴，而不是对此事的政策不满。到1712年初，圣约翰和哈利（此时已是牛津伯爵）已在国内斗争中获胜。这证明英政府和公众情绪的联合力量已相当强大，足以使政府在1711年最末3个月中度过那场由善辩和愤怒的辉格党对它发动的攻击风暴了。媾和斗争的第二阶段于1712年1月29日在乌得勒支的市政大厅开始。

乌得勒支长达15个月的谈判结果，是英法之间的稳固和解。英法双方还互相支持一项广泛的和解。除奥地利外，所有国家都同意接受这项和解。1713年4月和4月以后订立的一系列条约是英法两国的胜利，他们在这—非报复性的媾和中获利最多。英国自始至终是主动的。它利用3个最强国家对法国施加压力，同时又使三国之间相互牵制，借以保持平衡，终于使英国在欧洲以外获得了殖民地利益和商业利益。要使各同盟国认识到，政治上的愿望，最终必须用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予以落实，这一任务却更为困难。圣约翰的主张是建立与大同盟条件相适应的权力平衡，而不是单独媾和，否则会使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而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一情况。1712年，他整年都在寻求全面和解的办法。在他给各国全权大使、给法国的普里奥和托西本人的信件中都充满了这一内容。实际上，全面和解意味着解决西班牙继承权问题，意味着迫使主要的同盟国之一的荷兰同法国和好——这就需同荷兰进行艰苦的谈判，并与皇帝疏远。荷兰不愿签约，是因为对英国的单方面利益有意见。荷兰长期以来就主张瓜分西班牙的领地，这是奥地利始终抵制的。圣约翰则简直对战争武器与外交武器不加区分，敌友也不分。法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谈判会议每星期进行两次，上午10时开始。直到3月中旬，谈判进行得很有成效。在1712年剩下的9个月内，谈判在各大国首都之间通过无数的渠道进行着，但最终的协议总是要靠伦敦和凡尔赛的同意才能达成。

大会开始时，英国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备受责难的地位。英国本身的贸易要求和领土要求只是笼统地提一下。《梅斯纳热协定》并未为西班牙王位的安排和边界地理位置作出具体规定。英国的全权大使斯特拉福特和鲁宾逊奉命同荷兰一起进行工作，以求解决此事。然而，大会在认真的谈判开始之前中断了会议。当时，拜斯（荷兰的全权大使）要求对《梅斯纳热协定》作出解释。他从波利格纳克和于克赛勒处得到的“解释”是，该协定在承认英国的各项要求之余，把法国给予所有其他国家的让步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苛刻的协议激怒了荷兰，也使圣约翰大为震惊。这样，法国看来在英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插进一个分裂他们的楔子。3月5日，各同盟国分别向大会递交了一份“特定要求”。英国只是重申了法国已说过的话，称盟国要求会得到“公正与合理的满足”，非常笼统，也留下机动的余地。荷兰同样把全力放在自身的利益上，即恢复有利的1664年的法国税率，对尼德兰境内和法国北部的一系列要塞拥有完全的主权，另外还要求在于伊、列日和波恩有驻军权，此举只能被理解为强化防御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在这些要求中回避了西班牙这个中心问题，奥地利对此未作任何让步。

此时，辛岑道夫作为全权大使，带着取得整个西班牙继承权和只在1709年的“四十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使命出席了会议。自大会通知开会以来，奥地利的政策一直处于激烈辩论的瘫痪状态。加拉斯由于处事不慎被驱逐出伦敦。1712年1月尤金到伦敦访问也未能改善英—奥关系；他过迟地表示愿意增派部队去西班牙，只能表明伦敦与维也纳之间的隔阂已经很深。这时，维也纳的王室利益就得看查理三世和查理六世了。如果说约瑟夫一世根据自己的权衡可能最终放弃西班牙的话，新皇帝却绝不会作出让步。奥地利的“特定要求”是毫不妥协的。辛岑道夫与尤金力劝维也纳与荷兰或英国联络，以求取得某些一致的观点，但帝国政务会不同意同任何一国合作。甚至在一般性会议休会后，荷、英两国向奥地利私下示意时，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依然不变。4月初，哈利考虑把西班牙交给萨伏依，符拉蒂斯劳看到这是签订某种协议，使奥地利根据协议取得萨伏依和巩固其意大利领地的一个机会，但是他遭到奥皇愤怒的拒绝，因为这一政策可能要冒西班牙继承权被瓜分的风险。各日耳曼国家提出一系列相互冲突的“特定要求”，其中以普鲁士为首，它要求获得奥伦治继承权，这些要求都对大会起着阻碍的作用。对奥地利来说，这一情况引起了它重新开战

的希望。但英、法却幸灾乐祸地看着大会陷入僵局，因为这样就提供了重新进行私人外交的机会。由于法国全权大使最后拒绝对“特定要求”作出书面答复，一般性会议于4月9日正式休会。

在一般性会议期间，正常渠道活动的速度和复杂性丝毫没有降低。在1712年上半年同法国的私下谈判中，英国差一点达到了它1709年的伟大目标，把波旁皇族赶出西班牙。但它又一次受骗了。这次骗它的是菲利普五世。在皇太子去世10个月之后，其子布尔戈尼公爵去世，不到3个星期之后，布尔戈尼公爵之子布列塔尼公爵在1712年3月8日随之进入了坟墓。布列塔尼的弟弟安茹公爵便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从外表看来他比死去的哥哥更为虚弱。^[21]“假如上帝没有保佑这盏眼看就要熄灭的灯”，菲利普五世就会成为路易十四的继承人。此时，死亡还可能来得及为法国获得战争得不到的东西，即两个王室的合并。然而路易十四由于害怕各同盟国反对，不敢坚持保留菲利普的（继承）地位，因而，菲利普必须离开西班牙，否则就放弃他对法国王位的继承要求。英国原先于3月提出要菲利普放弃法国的要求，法国则发表一项强硬的声明。声明说，据法国的基本法律，“按继承顺序，挨王位最近的亲王，是王位的当然继承人”，这样英国的要求就是废话了。需要时菲利普可以选择王位。圣约翰看到这是办不到的，他也没有耐心再纠缠神学原则了，坚持要求菲利普现在就答应放弃一个王位，并付诸行动。如果菲利普选择法国，他必须立即离开西班牙。为了引诱他离开西班牙（两国都认为他会这么做），圣约翰就提出荷兰早些时候一再提出的建议，即那不勒斯、西西里和萨伏依的领地都归菲利普五世。这样就向菲利普展示一种诱人的前景：如果他继承法国王位，萨伏依也一同归属于他。这项建议足以赢得路易的同意，并命令菲利普服从。路易十四对菲利普说：“如果你对臣民们怀有热爱和感激之情，使你要跟他们捆在一起，那么我可以对你说，你对我，对自己家庭和自己祖国的感情都会胜过你对西班牙的感情。”^[22]然而，菲利普在西班牙进行战争并不是为了使自己作为一名王家血统的亲王居住在法国或萨伏依。他希望按照他应有的权利继承法国王位，同时不放弃西班牙而把它留给自己的儿子。5月29日，他在接受圣礼之后，他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他说：

通过这一步骤，我给法国带来了安宁。我为法国取得了君主国的联盟，否则这个联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和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使它遭

殃；同时我接受这个看来是最光荣和最符合臣民福利的决定。臣民们的热诚和爱戴是使我成为君主的强大力量。^[23]

菲利普对最后应该如何决定西班牙继承权问题作了安排，同时还确认奥地利此时参加媾和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很小。路易看来虽然感到失望，但并不觉得惊奇。但圣约翰对曾于1709—1710年使辉格党受骗的法王的无限权力却抱有同样的信心。在等待菲利普作出决定的日子里，他曾把萨伏依驻乌得勒支的使节马费伊叫到伦敦去，心想他会说，他的君主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然而圣约翰肯定得接受菲利普的选择，并于6月6—17日把全面媾和条件递交议会。议会接受这些条件后就宣告休会，直到1713年4月复会，那时条约已签署完毕。这样，缔造和平的特权使政府在全部工作完成之前免受国内对此事的质问。

在这6个月期间，英荷关系恶化。2月间，部长们把1709年边界条约内容公开时，关于在西印度群岛和尼德兰贸易权平等的争吵发展到了顶点。议会愤怒拒绝该条约，汤森由于签署了在商业上让步的条约，议会表决他为国敌。议会中对一时占多数的议员们所播下的深信荷兰的种子，此时收割了。荷兰打算接近奥地利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辛岑道夫仍对尤金的伦敦之行抱着希望。荷兰此刻在各大国中没有支持者，便只得任凭英国摆布，把他们的要求降到和供应非洲奴隶契约一样低。^[24]5月21日，限制奥蒙德的法令有效地结束了英法的敌对状态。圣约翰写信给哈利说：“荷兰郑重其事地争论英国是否应该享有供应非洲奴隶契约中敌人给我们的利益。当您听到这消息时，难道不把你吓得浑身冰凉吗？”^[25]7月8日，荷兰收到通知，英法之间休战两个月。英法休战使屏障条约的规定大为缩小，并从1664年关税条约的总收入中取消了羊毛制品、鲸鱼骨与鲸油、鱼类和精糖等商品的收益。按1664年关税条约规定，应准许荷兰货物进入法国。7月17日停战协定最终签订，停战协定对根特、布鲁日和敦刻尔克进行占领，作为荷兰就范的抵押。由于菲利普五世的意外选择，荷兰又一次陷入孤立的处境，于是决定试图再次与奥地利恢复友好关系。尽管辛岑道夫作了种种努力，但并未奏效，主要是因为维拉尔在德南的胜利打垮了荷兰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博林布鲁克子爵（此刻与圣约翰一样）担心荷兰由于绝望而在英国为解决北美问题制定出详细办法之前去求助于法国。鉴于必须抓紧时机，他于8月中旬亲自赶往枫丹白露，并在那里一直待到9月。英法休战延长了4个月。萨伏依公爵在西

班牙问题上深感失望。为作安慰，在西班牙恢复原状后，他在媾和时可获得西西里王国。博林布鲁克还同意把撒丁岛给马克斯·伊曼纽尔，并同意他称王。然而他抵制了法国企图说服英国去强迫其同盟国媾和的做法。正如路易十四在1709—1710年曾做过的那样。10月，英国由于害怕荷兰把南尼德兰归还给马克斯·伊曼纽尔，并为此正进行谈判，英国突然对屏障条约采取了强硬态度，坚持该条约必须把图尔内包括在内。11月2日，路易让步了，3天之后，菲利普五世在马德里国会上声明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博林布鲁克于12月8日把包括保留图尔内在内的这些最后条件交给荷兰。^[26]荷兰坚持要求有3个星期的考虑时间，嗣后所有各联合省（格罗宁根除外）均同意接受上述条件。

荷兰宁可接受英国那些使人不愉快的条件，而不愿接受法国后来的条件，这一情况标志着双方的小国都在各奔前程。其中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依三国在媾和中是可以争取的，因为这三国的问题与无法解决的奥地利问题可以分开处理。除了通过皇帝或法国国王才能与大会会有联系的日耳曼小国外，其余日耳曼小国，在乌得勒支没有代表，它们肯定会产生更大的麻烦，特别是路易的维特尔斯贝希的几个同盟国。但是，如果要全面媾和，那就必须替同盟国的各种要求作好安排。最棘手的是早些时候为争取荷兰，有些要求已被撂在一旁。

普鲁士想在王室名分上得到法国的承认（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困难），并获得西班牙的盖尔德兰。普鲁士从1703年以来就以各同盟国的名义在盖尔德兰驻军，但英国曾在屏障条约中答应把该地划归荷兰。普鲁士对媾和的态度要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普鲁士还要求与荷兰的纳索-弗里斯兰亲王分享法国境内奥伦治领地。1709年，英国曾答应把布尔戈尼自由郡、弗朗谢-孔泰和普罗旺斯等地划给普鲁士作为对西班牙盖尔德兰的补偿。英国此刻一心想讨好荷兰，同时又不致疏远法国，对普鲁士是否继续参战就不再关心了，因而不支持普鲁士对奥伦治的要求了。此事重新引起普鲁士对上盖尔德兰感到不安。如果法国不能满足普鲁士的要求，共和国就必须予以满足。1712年，当安哈尔特的利奥波德占领了克里夫斯的封地默尔斯后，普鲁士便接着向法国提出对盖尔德兰的要求。英国对普鲁士的要求表示接受，荷兰只能表示反对；奥地利人在获得鲁尔蒙德（由意荷共同驻军）以后，同尼德兰的交通联系就有了保证，于是也表示赞成。按照这项协议，

1713年3月，荷兰获得了史蒂芬斯韦尔特、圣迈克尔要塞、文洛，并且可在默兹河上自由通航。普鲁士最后也获得了内沙特尔公国及其所属的瓦朗金省。

葡萄牙是愿意媾和的。彼得国王于1703年5月加入大同盟，葡萄牙为了从这个大同盟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它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就在这个条约里，首先整个西班牙明确划归查理大公，然而又答应把西班牙一批边境城镇划归葡萄牙，这就破坏了这个条约的原则。如果同盟国战败或背信弃义，葡萄牙就缺乏保护措施了。当路易十四承认葡萄牙在“四十条”中提出的各项要求时，葡萄牙就感到大有希望。1710年后，大同盟分裂，它只能从残局中捡些破烂罢了。法国于1711年9月23日占领里约热内卢，同盟国在西班牙战败的危险性增加了。在乌得勒支，葡萄牙的“特定要求”是履行1703年条约，并用法国对卡宴的和解来调整有争议的巴西边界。英法的双边磋商不顾第一个《梅休因条约》的规定，同意在半岛内相互归还领地，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美洲边界上。到11月7日，法国的让步使葡萄牙同意休战。休战一直延长到1713年3月签订和约时为止。法国为了保留“旧世界”（指欧洲——译者）西班牙的完整性，就在“新世界”（指美洲——译者）作出了让步。这样，菲利普五世就通过战争取得了查理三世那些可能会被大同盟牺牲掉的东西。

要赢得萨伏依就更为复杂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是按照对他非常有利的条件参加同盟国的。条件是，如果奥地利王室的香火断了，他便是西班牙的继承人，蒙特菲雷特和米兰尼斯河的一部分^[27]也将归他所有。在乌得勒支和会上，萨伏依是唯一算得上意大利国家，它的损失比其他小国要少。法国企图恢复原状（分成萨伏依和尼斯），暗示萨伏依扩大到米兰尼斯河，拥有伦巴第国王称号，并在奥地利接壤处建立一条边界。由于萨伏依外交官的能力，由于博林布鲁克想把边界建立在意大利与法国之间，也由于安妮女王的柔软心肠，想建一个王朝（根据和解法令免去了皇族的英国继承权），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菲利普五世1712年5月底作出的决定排除了公爵立即继承西班牙的可能性。虽然英国不支持萨伏依要取得摩纳哥要塞，或取得日内瓦山以南的领土、迪朗斯以及（托西称为“法国的大门”）伊泽尔河上的巴劳要塞的要求，但是博林布鲁克还是坚持把西西里划归萨伏依作为换取西班牙的补偿。他说，“这样调整还可以使一个重要战

略岛屿掌握在友好国家手中”。当博林布鲁克同意把撒丁岛划归马克斯·伊曼纽尔时，法国让步了。支持萨伏依获取西西里而不延长阿尔派恩屏障，其原因在于英国决定与法国修好。这种修好实际上排除了对法国提出种种要求的压力，但并不把属于英国各同盟国的领土拱手出让。奥地利曾要求西西里划归于它，因而它注意到，英国正在利用牺牲一个大国利益的办法收买小国同意媾和，以便逐步孤立奥地利。1月间，皇帝勉强同意让出西西里。接着，1713年3月的意大利休战协定使萨伏依免于参加战争。最终的决定是把萨伏依—皮德蒙特与多菲内之间的山顶确定为边界线，法国交出乌尔克斯山谷地带、塞扎纳、巴多纳谢和夏托一道芬（并加上埃克西尔和费内斯特雷尔）；萨伏依放弃巴塞罗那特山谷，以及边界线上在法国一侧的要塞小城镇，并确定，假如波旁家系绝后，西班牙便划归萨伏依。

1713年初春，联合省、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依都参加了一项全面和解协议。然而协议的条件更难使皇帝签字。就荷兰与萨伏依来说，协议的条件是与维也纳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1712年下半年，奥地利的政策曾提出实际的让步，以求把大同盟团结在一起，但却没有毫不含糊地表示将放弃对西班牙（哪怕是一部分西班牙）的要求。参加秘密会议的各日耳曼成员国是真心愿意放弃西班牙的。早在德南对取得荷兰支持一事的希望有所减小之前，符拉蒂斯劳和塞勒恩已说服皇帝采取瓜分的办法，或者（作为最后的手段）坚持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以此作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事业的报答。与英国重开谈判的要求未立即遭到拒绝。博林布鲁克希望与维也纳的和谐来往能减少奥地利抛弃联合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与法国之间已经休战了4个月，驻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已无用武之地，依靠英国海军支持的皇帝同西班牙之间的联系也割断了。11月，法国同意把图尔内包括在屏障条约之内，这一做法是荷兰决定接受条件的转折点。荷兰不再支持奥地利对斯特拉斯堡的要求，不再反对马克斯·伊曼纽尔继续待在尼德兰。这一背叛行为使皇帝完全陷于孤立，于是法国便开始抬高要价。英国由于自己的事尚未安排妥当，便接受法国的意见，坚持要马克斯·伊曼纽尔待在卢森堡和那慕尔直到他获得撒丁并且有了国王的尊号。在意大利和巴伐利亚问题上毫不动摇的维也纳，此刻过迟地表示了它对西班牙问题上的灵活性，其实，秘密会议早在4个月前就向它建议过这一点了。11月间，在伦敦进行谈判的霍夫曼表示，皇帝此刻会同意放弃西班牙，并接受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其独

立应得到各国的保证。英国人知道这个主意一定会延误媾和，只是建议让加泰罗尼亚人听凭菲利普的处理。英国人更实际，表示愿意为奥地利与其在意大利的敌人签订一项休战协定进行谈判，并为奥军撤出西班牙作出安排。这是一项双刃剑的建议，因为查理六世一方面担心他妻子在巴塞罗那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他在意大利的有利地位。其时，皇帝也正在想方设法与马克斯·伊曼纽尔私下和解。但他的一切办法都不能阻挡几个小国宁愿得到英国对凡尔赛影响的保护。维也纳于1713年1月同意放弃西西里后，3月份，通过在海牙同英使节的几次谈判，达成了从西班牙撤军和在意大利实行休战的协议。加泰罗尼亚人在晚些时候才受到这一打击的影响，因为英国不愿遣返帝国军队从而在莱茵河与法国重新开战。

1713年2月，全面和解的建议被送往伦敦，这是奥地利最接近签署全面媾和条约的时候，只是关于巴伐利亚的建议遭到了法国的拒绝。皇帝虽然同意马克斯·伊曼纽尔迁往撒丁，但坚持他必须从其领地撤出，并且不能把上巴拉丁归还给巴伐利亚。就在这时，法国知道博林布鲁克急于去对付议会，急于要巩固他作为全面媾和发起人的地位，同时相信英国必然会支持法国，所以再次提高他们对奥地利的要求，虽然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的让步已达到了最大限度。法国为了把曼图亚、米兰多拉和科马基奥从奥地利分割出来，决定支持被博林布鲁克称之为“一群懒惰和无所作为的诸侯”的意大利小国的利益。^[28]意大利那些小诸侯的利益对法国无关紧要，而且法国的军事地位也不能再对他们承担责任。这些举动，加上新提出的要查理六世承认菲利普五世的要求（这使自己在西班牙的要求也化为乌有）只能被理解为是企图羞辱被孤立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在乌得勒支的全权大使们原先收到的指令清楚得很，不要为意大利的诸侯们去争取任何利益，他们的不幸应归咎于其自身的胆怯。迟至3月22日，辛岑道夫还表示，如果放弃最后的那些要求，他便同意参加媾和，但此时法国已经没有可能为自己留下后路：这是由于法国过高估计了英国对法国的支持的缘故（事实上博林布鲁克并未给过任何支持），或是由于法国过低估计了奥地利的自尊心的缘故。法国的全权大使们公开承认说：“如果我们早知皇帝会如此固执，我们就不会把弦绷得这么紧了。”^[29]随后，法国拒绝了奥地利的反建议（奥地利反建议只是重申了它已经同意过的东西），这是重新开战的信号。

在这次谈判中，博林布鲁克起着主要的作用。他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调解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争论上。只是到了由各种协议凑成媾和条约最后成形的阶段，他才去完成他自己最重要的那部分工作。他有选择时机的杰出才能，从而把英法问题的详细解决办法尽可能拖到最后的时刻。路易承认詹姆士二世的儿子本来是引起这场战争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已被《梅斯纳热协定》解决了，然而路易不很愿意把这位觊觎王位者逐出法国。英国的政客们自己也小心翼翼。没有迹象能表明詹姆士二世的儿子对王位没有野心。背弃奥地利也会引起汉诺威的叛离。汉诺威是皇帝最坚定可靠的同盟者之一，它认为安妮女王去世后保守党的前景对它凶多吉少。虽然哈利直到1713年初还在考虑安妮女王死后他应支持谁，但王位的继承问题并未使媾和谈判受到严重的干扰。路易十四最终于1713年2月把詹姆士二世的儿子迁到了洛林。余下的两个突出问题是：北美问题和一个商务条约。英国在获得恢复英法贸易条件之前，可以拒绝在美洲作出法国迫切需要的各种让步。博林布鲁克寻求的是今后英法关系会比较友好，这种关系会通过商业互惠而得到加强，从而避免一代人的关税之战。商务条约是在普里奥初次访问法国期间创议的，1712年3月由英国主动提出而正式起草成交。原来设想这是一项最优惠国的条约，是一种回到1664年关税条约的做法。不幸的是，等到普里奥为此进行详细谈判之时，英国已在这之前同意在法国准备给荷兰的减税项目中取消羊毛制品和其他三类商品。托西为了给荷兰保留最优惠国待遇，坚持给予英国的条件必须受到同样的限制。结果，（英国）经过一场激烈的笔战，和以托马斯·汉默爵士为首的保守党牧羊主们的反对之后，议会于1713年6月完全否决了“商务条约”，使博林布鲁克抱着很大希望的这一条约成了他一次真正的失败。然而，此时法国与英国在经济上与其说是相互补充，不如说是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商务条约未必能促进两国更密切的政治关系。1716年的联盟主要是两国王室短时期虚弱的产物。^[30]这些谈判所取得的成果都只是为了维持两国在美洲求同存异的局面。^[31]在美洲，圣约翰要求保留阿凯迪亚，恢复赫德森湾要塞，并占有全部纽芬兰和圣基茨。托西则要求法国捕鲸船能使用协议规定的那部分纽芬兰海岸作为晒鱼场。魁北克远征的失败（正当《梅斯纳热协定》签订时为英国所悉）以及想在与同盟国接洽之前两国便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使圣约翰置贸易部于不顾。贸易部担心法国在渔业中与英国竞争，并且了解托西对普里奥的谈话的真实含义，即纽芬兰对于法

国水手和英国水手来说，同样是他们的养鱼场。就连到了1712年12月这些问题将要得到最终解决时，普里奥和施鲁斯伯里还在法国就达成有关渔业协议的问题拖延时间，继续坚决要求得到阿凯迪亚和瓜分勃兰登角岛，以此作为争取更有利的商务条约的手段。结果，条约允许法国使用从博纳维斯塔北部西至里奇角的纽芬兰海岸，保留圣劳伦斯湾岛屿的全部所有权。英国则收复了赫德森湾的要塞，拥有整个纽芬兰，同时保留阿凯迪亚（新斯科舍）和圣基茨。

博林布鲁克发现战争季节已临近而尚未做好准备，又被议会的继续休会弄得心神不定，便于1713年2月28日发出最后通牒，从而停止了商务条约草案中更改关税率的期限的争论。3月15日，他通知托西，他已准备签署条约。4月11日在乌得勒支，英国、萨伏依、葡萄牙、普鲁士的大使们，以及联合省的大使（在午夜之后）同法国签订了和约。大会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但全面媾和尚未有待于探索。奥地利和日耳曼的诸侯们还未与法国媾和。也没有一个国家与西班牙媾和。西班牙的全权大使只是在法国签订诸条约之时才获得护照赶到乌得勒支。

英法条约使英国得以实现其主要的战争目的：承认安妮女王和承认新教徒的继承权，通过把菲利普五世排除出法国皇族家系以恢复权力平衡。博林布鲁克无情地对待同盟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指责。然而，他明晰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效力也获得了同等的赞扬。随着战争的继续，各同盟国的目的发生了分歧。荷兰首先认识到“没有西班牙就没有和平”的主张没有充分考虑到军事上的实际可能性和它政治上的含义。当查理大公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领地之后，只有奥地利才有兴趣把战争进行到底了。英国和荷兰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奥地利对西班牙的野心，即便它们原来打算满足它也是枉然。当威廉三世的朋友们在英荷两国继续掌权时，英荷关系是亲密的，但当它们都不再害怕法国之时，两国的根本利益便发生冲突。

由于3个主要同盟国的目的分歧，不可能在媾和的时间问题上达成协议。愿意媾和的两国中，只有英国能采取主动。荷兰不能抛弃英国，因为它如果继续打仗，如果其边界不能得到同盟国的保证，它将处于任凭法国摆布的境地。然而，英国除了控制其边境的海军以外，它的边界不需要别人来保证。作为最后一招，英国没有荷兰也能媾和，而荷兰没有英国却不能安全地媾和。于是，博林布鲁克便利用这一行动上的自由，不进行单独媾和，而求欧洲问题的长久解决，并为

英国取得一系列独有的利益。对此，所有的同盟国都关心自己所能取得的利益。皇帝把他的要求定得无法实现。1709—1710年，英国政府为使荷兰执行一项不可能实现的政策而向荷兰作出过分慷慨的许诺，荷兰深信不疑，结果吃了苦头。英国以后的政府将目标变成一种可以实现的计划，并利用缺了英国就不行这一优势，迫使其同盟国遵照它的计划行事，使英国得到好处。

4月11日的各项条约签署之后几个小时，辛岑道夫便离开了乌得勒支，而他的同事基尔赫纳却在那里又待了5个星期。皇帝此刻不再受到符拉蒂斯劳（他于1712年12月21日去世）温和姿态的牵制，但却受到西班牙顾问们的影响，他既不承认西班牙的波旁国王，也不同意给这位被剥夺权利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另外的好处。由于皇后从巴塞罗那回国，作出继续战争的决定就更容易了。这一决定得到拉蒂斯堡国会的支持。该国会在7月宣称，法国的建议会“玷污这个日耳曼国家的荣誉”，并答应为一场新战争提供给养，从而使皇帝可以向阿姆斯特丹借款。但是这些姿态并不能掩盖皇帝与帝国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除查理六世以外，所有国家都想把战争限制在莱茵河地区，关于这个问题，皇帝只与法国达成了协议，而日耳曼诸侯们最想推翻的正是这个协议。他们将会成功，但结果对他们自己不利。皇帝要的是意大利的领土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安全。有些（日耳曼）国家要掠夺德国北部正在崩溃中的瑞典帝国，因为这样做比继续与法国作战报偿更高。但这样做的结果却造成它们之间更多的误解。当时，汉诺威已经占领凡尔登（1712年8月），普鲁士的新国王弗列德里克威廉一世已于1713年6月制订了夺取什切青的计划。

这场新战争的结果不久就有分晓了。维拉尔于8月17日占领兰道之后谈判便恢复了。同月末，维拉尔的谈判得到了充分的条件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所有方案都有一条：给意大利小诸侯们以赔偿和恢复马克斯·伊曼纽尔的领地，至少是恢复他在大因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土地（事实上它是路易十四在德国南部的宝贵前哨基地）。11月间，布赖堡因弗赖斯高沦陷。政界人士在法兰克福开会宣布他们不能再继续这场战争，此时，皇帝便委托尤金全权处理此事。于是，两位将军便于11月26日在拉斯塔德的巴登侯爵官邸会晤。

谈判并不困难。两位全权大使是老相识，虽然维拉尔住在官邸左侧，尤金住在右侧，他们却在一起用餐，并合用他们的接待室。两人

都想要媾和。但是，尽管维拉尔军队处于有利地位，但他还是给了尤金优惠条件；尤金则不光彩地利用维拉尔的神经脆弱，谈判遇到困难后便威胁说他就要停止谈判。维拉尔渴望人们能把他看作欧洲的调解人，就毫不犹豫地责怪他的宿敌马克斯·伊曼纽尔拖延了媾和。然而，争论集中在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问题上。法国逐步地放弃了要把哈布斯堡王朝赶出意大利的要求，但保留让菲利普五世任意摆布加泰罗尼亚人的权利。1714年1月，维拉尔和尤金把他们的建议分别送交各自的政府。对意大利诸侯们的要求只是简单地许诺要公平处理，“但不能阻碍媾和”^[32]。维拉尔还同意尤金的建议，允许奥地利人继续对加泰罗尼亚人进行军事援助。尽管托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维拉尔却认为他已经赢得了他所谓的“我最后的一个战役”^[33]。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后，他高兴地接受了尤金的意见，让奥地利人将一份最后通牒送往凡尔赛。战争季节在望，因而维拉尔夸大了重新开战的可能性。正在备战的尤金却对战争不抱什么希望。最后通牒送出之后，全权大使们于2月6日分手，维拉尔前往斯特拉斯堡，尤金前往施图加特，这样，表面上是谈判破裂，实际上双方仍保持着联系。

维拉尔答应过，他将接受或拒绝那份最后通牒。也许恰好是幸运，谈判不再由维拉尔负责进行。

在看来法国不会拒绝的情况下，说服尤金修改最后通牒的棘手任务就交给了维拉尔的一位朋友——陆军少将孔塔德侯爵。在施图加特的谈判中，孔塔德使路易对最后通牒的反对意见有所缓和后，同意让皇帝使用西班牙国王的称号（加上一条解释条款，说明这一称号不拥有法权），并保留在意大利当时和原先属于奥地利的领地。尤金同意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对有关菲利普五世的事不作正式的拒绝，保持沉默。3月6日，路易十四宣布接受最后的条件。当天，条约即在拉施塔特由尤金和维拉尔签署。

日耳曼问题的解决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宁姆根条约》和《里斯威克和约》为基础的。法国保留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但交出了莱茵河右岸的全部领地——布雷萨赫、克尔、弗赖堡，并同意拆毁河中岛屿上的防御工事。法国保留了兰道及其附属地区。这些地区名义上是《里斯威克和约》规定给它的，而事实上是法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唯一真正收获。查理六世承担了使帝国同意投降的工作。巴伐利亚和科隆的维特尔斯贝希选帝侯们完全恢复原状（只保留帝国战

时在波恩驻军的权利）。这一做法表明了双方的退让。法国撤销了为马克斯·伊曼纽尔取得撒丁国王尊号的要求，皇帝便径直占有了西属尼德兰（这是马克斯·伊曼纽尔的选择方案，也是他愿意接受的方案）。巴伐罗与尼德兰进行互换的直接危险既已排除，法国便同意今后不再反对这种安排。因而，荷兰把南尼德兰交给查理六世。南尼德兰比它让与普鲁士的领土要小一些，而且在随后的奥荷边界条约中是必须同意的。皇帝保留了那不勒斯、撒丁和托斯卡纳要塞。各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使皇帝“有效而迅速地公正对待”瓜斯塔拉、米兰多拉和卡斯蒂利的诸侯的要求的义务成了一句空话。曼图亚、米兰多拉和罗马教廷的科马基奥将仍属于奥地利。维也纳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作为帝国封地的要求（教皇对此有异议）在沉默中通过了。后来，在《拉施塔特条约》签订之后6个月，菲利普五世与无子女的帕尔马公爵的侄女伊丽莎白·法内斯结婚时，维也纳这一要求即成为与西班牙冲突再起的起点。

尤金怕耽误，就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为帝国签署了条约，并承担在随后的一次大会上使条约得到批准的义务。皇帝请求国会选定参加新大会的代表团，就像1709年国会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一切权力交给他本人。国会中不同的宗教派系对此意见分歧。新教的各州坚决拒绝把皇帝与法国在里斯威克所订的条约作为和解的基础。该条约的第四条规定，在法国要交出的阿尔萨斯外侧的留尼汪地区中，“天主教保持其目前的状态不变”，这样一来，整个地区（特别是巴拉丁，该处是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有时仅仅因为法军经过该处的缘故）就全部保留为天主教了。这一情况显然是违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英国与普鲁士在乌得勒支对此表示反对，但只得到了一项回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模棱两可的诺言，这是《拉施塔特条约》所忽略的。此时，只有议会才能拯救新教徒。然而，3月24日，天主教居多数的各州要求皇帝为整个日耳曼签字，而新教徒各州只能在一份抗议书的附录中保留自己的权利。一些较大的新教国家，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在北部危机中的活动的视线（查理六世此刻也很想插手），希望把媾和拖延下去，因而含糊地表示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皇帝虽受到诱惑，但未受骗。事实上，法国坚持保留第四条的做法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34]如果他现在要靠信奉新教的汉诺威或普鲁士的支持，他只能看到哈布斯堡王朝在日耳曼的势力更进一步衰落。

帝国与法国之间签订和约的最后一次大会于1714年在瑞士阿尔高的巴登开幕。会议除了把在拉施塔特用法文写的条约改成拉丁文以外，没有多少事情要做。来自意大利、洛林、巴伐利亚和科隆甚至西班牙的部长们满腹牢骚，但也只是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维拉尔和尤金又一次充当他们政府的代表。他们想使维也纳和马德里签订一项和约，但也只是浅尝辄止；奥地利人在加泰罗尼亚人未获得自由之前^[35]，拒绝考虑给在尼德兰的于森公主以领土，因而阻碍了会议的进展。由于8月12日安妮女王逝世、北部危机，以及土耳其的形势^[36]，路易十四和查理六世都渴望结束会议。《巴登条约》遂于9月7日签署，10月15日皇帝代表帝国国会批准。

乌得勒支会议以后，皇帝决定把战争打下去，此举带来了很有价值的报偿。他仅仅丢失了兰道一地，却保住了撒丁（不久后，撒丁就成了获得西西里的资本），取得了尼德兰，并赢得了放手处理意大利事务的权力。如果两位维特尔斯贝希选帝侯的复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骄傲是一种屈辱的话，那么其他办法也不一定有利。然而，在日耳曼，媾和达到的效果不如其他地方稳定。只要法国的利益还继续集中在欧洲，只要奥地利（像法国一样）还不觉得有必要保护其后方，集中其精力来对付一个更加危险的对手普鲁士，那么，波旁皇族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敌对状态就不可避免，因为隔开它们的是一条政治派系五花八门、不断引起外来干涉的边界。日耳曼的和解充其量也就是不会使凡尔赛和维也纳之间的关系恶化而已。奥地利担心，一旦波旁皇族的成员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就会使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国。这种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因为菲利普五世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出于她自身的利益会充分注意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利益。

把西班牙排除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外是符合英法两国利益的，它们愿意它们两国自己解决西班牙的问题。法国同意英国在印度群岛的商业利益，但这种利益必须与英国对印度群岛的领土要求分开。在梅斯纳热会议之前一个月，哈利所建立的南海公司是保守党为媾和争取商业界人士支持的一个筹码。法国拒绝英国对供应非洲奴隶契约的要求，由于英国在北美以提高要价相威胁，法国便妥协了。法国同意英国上述要求后，英国便把纽芬兰的渔场让给了法国。

1712年10月，英国开始直接与马德里谈判。菲利普五世对于让他有机会摆脱法国监护一事并不感到遗憾。西班牙几位全权大使不很活

跃，其中一位名叫蒙特里昂的全权大使被派往伦敦，而莱克辛顿勋爵和一位在早先的供应非洲奴隶条约中已参加谈判的商业代理人曼纽尔·马纳塞·希利根则派往马德里去与格里马尔多和贝德马尔会谈。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菲利普重申了他放弃的项目，重申把西西里划归萨伏依之外^[37]，萨伏依将拥有菲利普五世的王位继承权。西班牙承认新教徒的继承权以及英国保留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然而，英国挽救加泰罗尼亚的各项自由权的企图却未奏效。博林布鲁克不愿因为他们的缘故而拖延媾和。但是，商业谈判的曲折过程依然推迟了政治条约的签订。英国要求通过加的斯转口到印度群岛去的货物减收15%的关税，但遭到了否定，因为西班牙坚持英国和法国、联合省必须一视同仁。英国采用一种聪明而同样有效的方法，获得了每年派一艘500吨位的“特许船”去该处履行一般性贸易的权利。这是最后条约所不容许的一种违反殖民地垄断权的行为，然而却把它当作给予西班牙的一种特别恩惠来看待，以免其他国家也要求获得这种只给英国的权利。供应非洲奴隶契约要求，最低限度每年把4800名奴隶送往印度群岛（连续30年），并答应在普莱特河边给以木屋住所（可受西班牙的检查）。供应非洲奴隶契约于1713年3月26日在马德里签订，初步和约于3月27日签订，最终的英一西和约于7月13日在乌得勒支签妥。同日，一个附有西班牙答复的，以英国备忘录形式写成的商业条约草案也达成了协议，该条约草案旨在与宗主国西班牙重开贸易。条约作出了许多承诺，但能付诸实施的却很少，博林布鲁克称它是一个“盲目的畸形怪物”。条约延长了（对英国）有利的1667年条约，但由于无知，把新的统一关税率定得高于其他任何港口，而却把英国商人选出一名照看他们利益的“特别官员”的重要权利放弃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为纠正写进这一协议的不能接受的条文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吵。

由于不愿同意英国在印度群岛的单方面利益，荷兰和西班牙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对此，博林布鲁克是毫不动摇的。荷兰不愿为边界条约承担风险，但最终于1712年5月承认了英国的供应非洲奴隶契约。起初，荷兰以为该契约不包含一般性贸易权（在当时的阶段并不包括）。然而，条约的签订又拖延了一些日子，因为西班牙要求给于森公主在尼德兰划分一块封地。菲利普五世无可奈何地作了让步，是因为法国由于安妮女王的病情和英法可能再次交战而感到恐慌，撤回了支持，并在媾和实现之前按兵不动，不去征服加泰罗尼亚了。1713年6月26日，西班牙与联合省签订了和约，条约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多

大改变。荷兰在贸易上享有最惠国待遇，但联合省却放弃了与西属印度群岛贸易的要求，西班牙则同意：在不损害供应非洲奴隶契约的情况下，任何国家不得与西班牙的殖民地进行贸易。

由于葡萄牙坚持要获得1703年所许诺的西班牙城镇，也由于西班牙企图向葡萄牙施加压力，以便利用葡萄牙与奥皇斡旋，遂使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和约（1715年2月签订），亦即《乌得勒支和约》的最后部分延期签订。条约肯定了法、葡之间已解决的、在半岛上的领土相互归还问题。在美洲，西班牙虽然担心那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贯穿整个普莱特河的葡萄牙殖民地可能变成一个英国商埠，但还是放弃了萨克拉门托。这就成了巴西最南端的界线，就像亚马孙河和奥亚波克之间的地带为北部法国租界一样。英国在这些安排中进行了调解工作，此刻它又对此作了保证——这事暗示英国对其葡萄牙同盟国的重视。

最后的问题是屏障条约。1709年的条约于1712年被否定。直到同年12月，英国才为引诱荷兰参加全面媾和而提出新的条件。1713年的屏障条约于1月30日签订。位于登德蒙特、里尔和哈尔内线的要塞被排除在外（1709年条约对这些主要在商业上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作过许诺的），同时被排除在外的还有里尔、康德、瓦朗西亚、纽波特，以及法国边境上的莫伯日。在东面，列日和于伊已经丧失。抵消这些损失的只是获得了蒙斯。1713年边界条约并不如1709年条约受人欢迎，但是在里斯威克问题上有很大改进。这一条约许诺荷兰获得弗内斯、克诺克要塞、伊普尔、梅嫩、图尔内、蒙斯、沙勒罗瓦、那慕尔和根特，还有佩尔、菲利普以及达姆等要塞，并可望由南尼德兰本身提供足够的收入以妥善维持这一屏障。1713年2月开始的荷法直接谈判中，荷兰不得不放弃位于图尔内和伊普尔周围的领土，而它们对上盖尔特兰的要求又因普鲁士的坚持不同意而告失败。经英国调解，荷兰放弃达姆要塞，换得了联合驻防鲁尔蒙特、斯蒂文斯韦尔特、圣迈克尔要塞和旺洛的权利。除上述各项调整之外，法荷和约中的边界条约依然是英国原先设计的内容。条约也没有忽视英国和荷兰在开发南尼德兰中的利益。条约规定：荷兰不再提出任何会产生单方面利益的新要求；英国在贸易及其他利益未得到满足之前将继续在原地驻扎部队；尚未制定的贸易规定应对两国提供同等待遇。

剩下的棘手问题就是取得奥地利的同意。由于屏障条约明显减少了尼德兰对维也纳的用处，谈判是长期而复杂的，其中还夹杂着英、荷的忌妒。英国一心想阻止奥皇在同法国媾和时破坏地中海的和解，因而希望荷兰支持萨伏依在西西里的王权，而荷兰则在屏障条约未被维也纳接受之前不愿与维也纳疏远。如今，战争已经结束，而拉斯塔德和巴登尚不承认萨伏依的王位。英国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对拉施塔特和巴登施加影响，再加上7月14日安妮女王去世，英国的窘境就更突出了。乔治一世的政府在屏障条约问题上决定支持维也纳而不支持海牙，部分原因是因为汉诺威要保住不来梅和费尔顿，新国王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奥地利的支持。这一新的友好行为挡住了尤金放弃尼德兰的压力，并且阻止了在维也纳的西班牙一方想立即占领尼德兰的企图。这两个做法都会损害英国和荷兰的利益。10月间，安特卫普的奥—荷谈判宣告失败，使英国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谈判。12月，斯坦厄普为缔结联盟进行谈判而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他支持奥地利拒绝荷兰的建议（荷兰乐观地想回到1709年屏障条约）。作为报答，哈布斯堡王朝同意不疏远尼德兰。然而，只是在荷兰使出了狡猾的一招之后才最后打开了僵局。1713年屏障条约的第二条要求荷兰保证维护汉诺威的继承权。1715年8月，英国政府请求荷兰派出部队，荷兰立即表示同意。因此，英国在屏障条约的争论中对荷兰的意见表示了较为同情的态度。实际上，荷兰此时已再次打消了获得于伊、列日及登德蒙特的“商业性”屏障的想法。于是奥地利与联合省之间的屏障条约遂于11月15日签订。16日，6000人的荷兰部队便乘船开往英国。

荷兰丧失了 in 蒙斯、根特和沙勒罗瓦的驻军权，但保留了在1713年屏障条约中所规定的在其他城镇的驻军权（如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所修改的那样），同时也在登德蒙特派驻军队。在东部，奥皇将让出旺洛、圣迈克尔要塞和斯蒂文斯韦尔特。在守卫尼德兰的35000名军人中，他将提供五分之三的兵力，并每年提供津贴50万克朗作为荷兰部队的军饷。在商业方面，荷兰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这丝毫也不是因为英国同它站在一起，不让奥地利在荷兰的新省份获得任何利益是正中英国下怀。在一项两国始终纠缠未决的新贸易条约签订之前，沿海国家运进奥属尼德兰的货物将按照现行的税率交纳关税——这是1680年12月规定的非常优惠的关税率。有关奥地利津贴问题的争吵以及其他各种细节拖延了这一包括英国保证在内的条约的最后批准时间，直到1719年5月条约才获通过。

此时，英国再次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奥地利与荷兰之间已达成职责上的平衡。这种局面显然会确保安全，不会使任何一方占绝对优势，而使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事后证明，该条约实际上把奥地利所获得的利益降低到了危险的程度。原先，哈布斯堡王朝坚持要获得尼德兰，原因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这一利益在英—荷继续关闭斯凯尔特河和有效地对抗奥斯坦特公司（它是奥皇1722年为发挥尼德兰的经济潜力而采取的措施）的压力面前却逐步地消失了。屏障条约1745年未能阻止法国，吓得英国去劝维也纳在守卫尼德兰的事务中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但玛利亚·特里萨因正全神贯注于普鲁士的问题，拒绝了这一要求。从1748年以后，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该地区就不再是一个国际抗衡的场所了。

一系列的条约在乌得勒支签订以后，一枚刻有“*Spes Felicitatis Orbis, Pax Ultrajuctensis*”^[38]口号的纪念章也就铸成了。这一口号并非没有道理。先是法国，后来又是奥地利的野心受到了战争的挑战，受到了和约的遏制。正如大同盟所设想的那样，

《乌得勒支和约》的成就是消极的。它防止了欧洲权力平衡的破坏，同时又恢复了机动灵活的原则。和约保证，新的问题和新的强国一旦产生，它们的要求将由各种新同盟和新联盟来加以解决，这些新同盟和新联盟将自由形成而不受任何一国过分自信的力量所阻碍。

（王恩光 谢琬若 译）

[1] 关于1705年秋路易十四单独对荷兰的秘密交易，以及关于阿姆斯特丹执政长官威廉·拜斯的媾和观点，请见本书原文第425—426页。对于1706年2月的荷兰政治形势，请参见法国代表埃尔韦絮斯的回忆录，载荷兰《历史协会文献与情报》第80卷，1966年，第159—194页。

[2] 拉米伊（Ramillies）是那慕尔（今比利时境内）附近的一个小村。1706年，同盟国军队与法军激战于此。同盟军获胜，遂迫使路易十四求和，但同盟国军队在取胜后内部发生战略分歧，英国同荷兰互不协调，各行其是，致使法国有可乘之机。——译者

[3] 据埃尔韦絮斯称（出处参见法国代表埃尔韦絮斯的回忆录，载荷兰《历史协会文献与情报》第80卷，1966年，见第166—167页），他是一个倔强而傲慢的共和主义者，工作刻苦，消息灵通，他显然是海因修斯的继承人，但他对法国的诚意和英国的野心均极表怀疑：“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如果要同所有的国家进行谈判，尤其要谨慎对待此人。”关于伯杰克，见本书原文第413页。

[4] 此处西属印度系指南美洲西班牙属地。（见1701年9月17日签订的《大同盟条约》第6条。）——译者

[5] 屏障条约（Barrier Treaties），统指1709—1715年间谈判的3个边界条约。条约允许尼德兰联合省有权在西属尼德兰南部边疆上派驻军队并管辖某些城镇，以防御法国的进攻。3个条约分别于1709年10月29日、1713年1月29日和1715年11月15日通过。第一个条约原来得到《乌得勒支和约》的正式承认。这里指的是拟议中的边界条约条文，因为当时第一个边界条约尚未通过。——译者

[6] 当蒙特菲雷特侯爵领地所归属的曼图亚同法国联合时，该领地于1701年被奥地利人所占领。见本书原文第417—418页。

[7] 见J. C. 斯托克-彭宁所著*Het Grole Werk*第459页。

[8] 见本书原文第434页。

[9] 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央机构，见本书原文第573—575页。

[10] 符拉蒂斯劳担心他不在时他对政策的控制权会被萨姆篡夺。萨姆是阴险而愚蠢的宫廷高级官员，他不愿与英国合作，或与寻求签订屏障条约的荷兰合作。

[11] 托西：《回忆录》（共两卷）第1卷，伦敦，1757年，第254页。

[12] W. 里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决定性年代围绕着和平与安全的斗争，1708—1709年》，慕尼黑，1933年，第222页。

[13] 见1709年7月10日“给海因修斯的信”，引自吉基与I. A. 蒙哥马利著《荷兰屏障条约1705—1719年》，第131页。

[14] 见吉基与I. A. 蒙哥马利著《荷兰屏障条约1705—1719年》，第438—439页。

[15] 《回忆录》第2卷，第86页。

[16] 小册子是16世纪英、法、德诸国出现宗教争论时产生的一种宣传工具，后扩大到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直至18世纪末仍是主要的舆论工具。嗣后才逐渐为报纸所取代。

[17] 见D. 库姆著《荷兰人的行动》，第181页。

[18] 见D. 库姆著《荷兰人的行动》，第209页。

[19] 见D. 库姆著《荷兰人的行动》，第224页。

[20] 见《致德拉蒙德函》（1月5日，西洋旧历1710年11月），原载G. 帕克编《博林布鲁克通信集》（4卷本，1798年）第1卷，第59页。

[21] 见托西著《回忆录》第2卷，第282页。

[22] 引自布德里亚著《菲利普五世与法国之心》（共5卷，1890—1910年）第2版第1卷，第491页。

[23] 见布德里亚书，第1卷，第499页。

[24] 荷兰表示同意，因为它明白，法国没有得到的好处，英国也不会得到，例如西班牙未给英国什么贸易上的让步（见盖蒙与蒙哥马利书第271页）。意思是英国故意在这一点上欺骗了荷兰。事实上，供应非洲奴隶契约的详细内容和把每年一次的“特许船”一项包括在该契约之内的意见，直到莱克辛敦和希利根于1712年10月到达马德里后才进行了讨论（见G. 塞勒《卡斯蒂尔在印度的贩奴活动》第2卷，第541页），见本书原文第475—476页。

[25] 见《博林布鲁克书信集》第2卷，第324页。信的日期是5月10日。

[26] 1713年1月边界条约。见本书原文第476—478页。

[27] 指从亚历山大里亚一直到瓦伦察，包括洛梅利那和瓦尔塞西亚。

[28] 引自O. 韦伯1713年2月20日、3月3日给英国全权大使信，原文载*Der Friedevon Utrecht* (Gotha, 1891)，第376页。

[29] 引自希姆斯的报告，1913年5月30日，原文载*Der Friedevon Utrecht* (Gotha, 1891)，第390页（希姆斯是驻海牙的奥地利使节）。有关意大利的《拉斯塔德和约》见本书原文第473页。

[30]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194—195页。

[31] 关于阿西恩托条约，见本书原文第475—476页。

[32] 库西侯爵：《1701年反法联盟》（共2卷）第2卷，1886年，第191页。

[33] 1714年1月28日托西致博林布鲁克的信：“我们那位司令官与其说是搜集橄榄枝，不如说更习惯于搜集桂冠，他认为军事家很少懂得如何隐瞒真情，于是对尤金亲王的信任就如我对博林布鲁克勋爵一样。”见《博林布鲁克书信集》第4卷，第632页。

[34] 在1712年10月19日的信中，他怂恿教皇逼路易十四在乌得勒支会议上坚持在日耳曼保护天主教的主张。皮埃蒂使路易放弃对权力的考虑。因为在日耳曼，天主教徒对皇帝的支持比新教徒更有力量。

[35] 见本书原文第376页。

[36] 见本书原文第637—638页。

[37] 西班牙与萨伏依于1713年7月媾和。西班牙承认萨伏依公爵获得西西里而该岛的继承权则划归西班牙。11月14日，他在教皇与奥皇不承认的情况下，由英国海军上将詹宁斯送往巴勒莫，并加冕为巴勒莫国王。这一有战略意义的小岛反常地被如此弱小的国家占领（此举只对英国有利，因为英国可以控制它）了8年。

[38] “《乌得勒支和约》是全世界幸福的希望”。

第十五章 英法在北美，1689—1713年

在奥伦治的威廉登陆以后的几个月里，英国的殖民政策主要是由伦敦无法控制的情况来决定，而较少取决于目标的改变。贸易参议会——英国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现在仍然存在。它自1675年以来曾一直对帝国的政治组织机构提出建设性意见，贡献比查理二世或詹姆士二世都多。但它由于詹姆士的干预而锐气丧失，从未完全恢复。国王初期曾为帝国的中央集权创造了有利的气氛，但他无意中又做了比任何其他他人更多的永远破坏这一气氛的事。此外，由于他的逃亡，英国枢密院肩负起重大使命：确保威廉和玛利的即位不会带来殖民地更加激进的革命。但战争迅即开始，政府的注意力更加分散了。因此，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谈判处于不利的位置，更不必说要强使他人接受其意志了。特别是，战争要求帝国必须步调一致，而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如果明显地追随分歧的路线，那么帝国统一就无从谈起了。

“光荣革命”为新英格兰提供了推翻令人憎恶的政权的机会：随着新英格兰自治领总督安德罗斯和北美总检察长爱德华·伦道夫的下狱，短命的新英格兰自治领瓦解了^[1]，与它有关联的、身上帝国情操依稀可见的人们名誉蒙辱。在纽约、在马里兰都有革命骚动。新教的歇斯底里是他们大家所共有的特征，但歇斯底里还不足以说明骚乱的原因。新教歇斯底里的背后是对印第安人入侵的恐惧——每想起70年代中期菲利普国王的战争和在弗吉尼亚的大屠杀，这恐惧又再度出现。^[2]此外，每个省都有各自的严重困难、派系倾轧和个人争权的特殊情况，而且大家都曾目击过或担忧过詹姆士国王的总督体制定继承人省政府的结局。由于他从不掩饰对法国殖民地政府政体的赞赏，因此殖民地开拓者们很自然地将中央集权和巩固的计划与法国天主教教义对他们自由的外来威胁联系在一起。最后，被作为政论工具的波士顿领导角色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因素。下个世纪的一个基本现实已从1689年的殖民地革命浪潮中露出端倪，对此要予以理解而不是反对，即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有两个政治首都——波士顿和伦敦。两

者都是积极从事反法和反天主教战斗的。它们虽然大小不同，但在决定北美东海岸政治生活的竞争中却旗鼓相当。波士顿凭借其清教徒的传统势力而显赫，伦敦官方将以力量不很强的英国国教作为它在美洲的代表。1689年，伦敦发起一场改革，而波士顿仅仅利用了这次改革。但是，保证地方自治在帝国中绝不消失的却是波士顿，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波士顿本身具备的地方自治的机能。

马萨诸塞率先在特拉华河以北恢复地方政府。安德罗斯的暴虐政策导致地方上的权力转移。温和的一派感到惶惑，而“宗派主义者”或神权主义者已恢复对地方的控制。温和的一派包括怀特温思罗普、西蒙布雷兹特里特和其他人，他们是很有势力的选民，除了对清教徒教会的清规外都感兴趣。神权主义者那时在伦敦的代表是干练的英克里斯·马瑟（1639—1723年）。马瑟是“圣约派”传统中最能言善辩的发言人之一。新政府面临的难题不容低估。政府成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享有上一代人这样的信任——马萨诸塞不经英格兰批准便能够行动。因为内部倾轧会帮助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所以，革命派的领袖们不得不暂时收起殖民地独立的要求。反革命的活动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安全会议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抑制暴民，因为暴民几个月来已威胁其权威。实际上每个负责任的派别现在把合法政府视为某种需要伦敦赞同的东西。如果承认这一点，则共和政体的意向会被放置一边；代替这些意向的是全体英格兰人的公民权被强调。而且默认立宪君主政体应该得到热情支持：威廉和玛丽被高呼为从天主教引渡来的精神上的和神圣的领袖。因此，波士顿的革命便巧妙地被说成为爱国者的无私行动和新教徒为打击那些替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效劳的、打着天主教徒烙印的那些人的阴谋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行为。伦敦新上任的一些行政官面临这一棘手问题，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谴责波士顿而不否定他们自己的光荣革命的主要原则。这也不是轻易地否认所提出的确认臣从义务的时机，这一承认已信守半个世纪，半个世纪里马萨诸塞的意志仅在长久的努力之后才改变的。

在纽约，变革是一样的错综复杂。殖民地混乱状态的起因很多。最初，这里原是一个荷兰贸易站，很快便发展到英王特许独占殖民地领主的地位，然后又进而发展到皇家殖民地的地位，面临并入英国殖民地体系的前景，英国行政和法定课税便要强加在它身上。此外，它还受到一次经济萧条的打击。这就大大降低了资产的价值。这些情况

发生之前，普遍认为有个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参与的罗马天主教的阴谋计划，而且这种看法日益强烈，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调整问题。但是，突出的顽症也许是阻碍（有些人的）升级，这个阻碍晋级是由于废除议会政体和把殖民地纳入新英格兰自治领总体内引起的。被排除在政府活动外面的人中间有公认为具有才干的人，例如亚伯拉罕·德佩斯特和雅各布·莱斯勒以及那些社会影响仅仅比真正参加者^[3]稍微小一点的人。代理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获悉英格兰遭侵略的消息即邀集市参议会和军事领袖讨论如何避免国内的不和。他有选择余地，他可置本人于人民领袖的地位，亦可把有产分子纠集起来以保护法律和秩序。而安德罗斯却没有这样的选择余地。但是民众由于受到波士顿和伦敦事件的鼓励，反应不同，否认他为领袖，这样就为一个出身德国的生意兴隆的商人莱斯勒开拓了道路。莱斯勒维持权力不到两年。他热衷于增长战时收益，败坏了他的地位。由于从陆上进攻加拿大的计划并未兑现，纽约于是在1691年欢迎由英格兰挑选一位皇家总督。亨利·斯劳特上校同情被非法剥夺权力的一些议员，他确信纽约是掌握在一群暴民手中。他把莱斯勒就地正法，这使莱斯勒死后的声望比生前所享有的更加深远而且受到下层社会的一致拥戴。

在马里兰，革命动乱也许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同样，对罗马天主教的害怕，不论是真怕或是佯装的，根源在于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害怕，而且也在于对罗马天主教徒巴尔的摩勋爵独裁政府的不满。如在纽约，在不能获得最高行政官职的有才能的人中间存在着不满。可是在圣玛丽及其邻近的郡那边，暴动很少得到支持。而起初一个由两派组成的团体竭力缓和强烈情感和反击指控阴谋的罪名。革命领袖约翰·科德统治的政府比莱斯勒较少公开。1689年8月他把权力正式交给代议会议。该会特别将罗马天主教排除在外。在召开第二次会议以后，国王正式承认新教徒会。不久莱昂内尔·科普利作为王室总督抵任。虽然骚动仍在继续，但是，由于这一革命后的政府和平行使职权，马里兰从而避免了纽约由于莱斯勒的殉道而长期遭受的苦难。

另一些殖民地避免了革命，但是并没有全部免除在别处发生的事件的政治影响。在弗吉尼亚，曾经任命某些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埃芬厄姆的霍华德勋爵放弃了总督之职。令人惊讶的是，在听到詹姆士国王退位的消息后，东泽西仍是最平静的几个省份之一，尽管它包括在新英格兰自治领里，尽管它的新英格兰移民的比例很大，以及平民骚

动的记录很长。更远的北方，一些小殖民地满怀希望地倚仗马萨诸塞有力的外交手腕，利用了混乱形势并恢复了特许政府。

在英格兰，马萨诸塞的代理人寻求承认最大限度的州自治权。英克里斯·马瑟希望恢复在以前两个朝代期间作废的殖民地时代的特许。威廉国王的处境是困难的，因为他以前曾公开谴责过对特许的突然袭击，说这是专横的。事实上的政府和新英格兰殖民地开拓者的行为，继续遭到回国后的伦道夫的批评，而且显然东部沿海地区重新统一会提供军事优势，对此马萨诸塞是反对的。但是，如果修复政治上的分裂仅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代议政府的原则便是毫不犹豫地得到拥护。马萨诸塞的成果是1691年的特许。马瑟是不太满意的，有时他的行为好像他是来自自动参加联邦帝国的一个州的全权大使。在伦敦的另一代理人、殖民地内的农民党领袖伊莱沙·库克认为基本的自由被牺牲了。可是让步绝不是单方面的。英格兰获得了委任总督的权力。但是，总督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力是有限的，没有得到将官会议的同意他不得把军队调到州外去执行任务。法律可被国王否决。但是，由选举产生的上议院避免了外来干涉，而一个委任的王室会议则摆脱不了干扰。即使新罕布什尔被给予州的地位，缅因和新普利默斯仍然处于马萨诸塞的管辖下。康涅狄格和罗得岛的政府继续分开，即使前者的军事力量由纽约的总督统率，后者的军队由马萨诸塞新敕定的总督威廉·菲普斯爵士指挥。

新英格兰的外边发生了类似的妥协。在1690年，起先得到国王认可的马里兰的革命论者，随后不是隶属巴尔的摩勋爵，而是隶属敕定的总督和强化了立法机构。第一次提名进入立法机构的，包含新教徒协会的代表和安妮·阿伦德尔的清教徒的代表，而且还有巴尔的摩勋爵提名的两个人。他们保留土地所有权。纽约也作出了规定，要建立代表会议机制和由总督领导提名产生的上议院。由于佩恩与詹姆士二世纠缠在一起，从而引起了怀疑，宾夕法尼亚被置于纽约总督的行政监督之下。到1692年，前一时代开始的动乱结束了，现存的一套政府管理体系结束了。这套体系是英格兰正式批准的，即使只有其中一部分是由英格兰决定的。

魁北克、蒙特利尔和三河城的法国人的小村落以及沿着圣劳伦斯和黎塞留河流的他们远离村落的农场，既不像英格兰租界那样在政治上能将自己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也不掌握能够有效地把他们的愿望

传达给本国政府的工具。如果法国想要让步，则需要通过君主委派的领袖们表达意见，而不是通过人民的代表。^[4]除了战争本身的开始以外，1689年的重大事件是67岁的弗隆特纳克伯爵回来继承德农维尔重新开始当第二任总督。重要性次于总督的是魁北克的主教圣瓦利埃被他主观武断的前任赖伐尔选中担当此任，他很富有，出身高贵，开始时深受路易十四的尊重。而赖伐尔和弗隆特纳克个性不同目的迥异，常发生冲突，德农维尔和圣瓦利埃却比较容易合作。但是，在1689年以后，教会和新法兰西的政界领袖的关系又严重恶化。赖伐尔不顾科尔贝尔的不悦，坚决确立起教会绝对权威的原则，控制毛皮贸易^[5]，这就违背了帝国第一边疆的使命。他的意向在两个王室法令和州的布告中获胜，仅被殖民地内部的力量所打破，因为殖民地要的是自由的西部。圣瓦利埃基本上继续赖伐尔政策。在魁北克的会议上他联合尚皮涅（1686—1702年任州长），对抗扩展贸易，主张巩固农业和崇尚罗马天主教德行。^[6]虽然圣瓦利埃在气魄方面可以和赖伐尔相媲美，但是他毫无机智，迅速使他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人清醒过来而且限制了他的感化力。他长期不在殖民地，是赖伐尔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咨询，直到他1709年去世。从弗隆特纳克的第二任施政开始，神权政治的势力逐渐衰败。科尔贝尔在1668年曾预言其将衰微。当时人口应该增加，但是长期的战争情况对教会势力下降起了很大作用。教会曾对建立新法兰西文明生活方式帮助很大，但岁入不足和教区牧师短缺使教会受到严重阻碍，甚至在1700年不到70个牧师要为大约14000人服务，而长住教区内的牧师很少。教会势力，作为州的政治权力，取决于王室支持。

在凡尔赛长距离的遥控下，政府运转很不方便。全部高级官员一年一度接到国王的需要执行的总政策声明，并附有先前12个月遍及法国殖民地世界遵照决定行动的精确、详细的情况说明。这种国王备忘录是行政指示的主要工具。然而，备忘录赖以实施的官方组织机构并非对称完美。原则上，新法兰西的总督的管辖权扩大到“法国北方”的全部地区，但是实际上，阿凯迪亚、纽芬兰和（1698年以后）路易斯安那的总督们很少与魁北克有直接联系。总督和州长由包括主教和其他7人在内的最高会议协助。最高会议自1703年起称为高级会议，到1713年实质上成为上诉法院；在高级会议中，主教的权力限于管辖神职和宗教问题。在国内，从事帝国行政管理的官僚机构很庞大，而且

还在膨胀。在1699年以前，没有专职部长负责殖民地的商务、内政和防务；但是在该年9月，当小普夏特兰继任海军部长时，海军对于这些事务的控制是扩大了，虽然某些殖民地问题依然由总监督长和外事秘书负责。普夏特兰是一位厚道、勤政的组织者，一直保持控制至1715年，只是大政方针和高级官员的任命可能仍由国王决断。尽管路易十四非常勤勉并且十分注意细节，但由于通联不畅，不论是和平时或战时，这就使一切依赖个人判断的缺点更加突出，并促使封建专制制度的失败。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比英国殖民地无政府主义的集体协商做法显得更加有效得多。尤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国王的权威受到日益严重的混乱秩序的[\[7\]](#)挑战。

加拿大的人口数量与英国殖民地前进省的纽约都不能相比，而且是散布在沿圣劳伦斯和黎塞留河两岸长达300英里的地方。难以估定移民的品质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弥补人数的悬殊。如果这小小的领主阶级被贬之为懒惰、挥霍和穷困潦倒，那么居民的主体却在拉翁唐所著《航海》（1703年）中被描写为有进取心和不知疲倦的人；德农维尔说他们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然而，他们也被说成是生活奢侈、神经过敏、不诚实、有酗酒赌博恶癖、满脑子妄自尊大的人。年轻人则被认为格外游手好闲，由于森林和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魅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安居的地方。白兰地酒的交易毫无疑问是万恶之源。交易中心蒙特利尔以其酒色淫乱闻名于全美洲甚至西欧；夜晚，成群结队的青年人使市民恐怖。1694年，一场因酒醉发生的放荡引起的火灾烧毁了山岳派的萨尔皮辛本部。不受“不限量酒馆”影响的社区是很少的。在三河城有25户人家，其中大多数是出售酒类的；在魁北克和维尔玛里，比例也几乎是一样高。拼命喝酒、生活浪漫、无精打采——男人不到40岁身体就垮了。德农维尔断言，在20年内，酒精将造成居住在法国殖民地的基督教化的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支）中95%的人死亡。然而，尽管这一问题已很严重，但是白兰地酒和毛皮交易造成的人口消散更加触目惊心。[\[8\]](#)

在1687年，德农维尔曾请求严惩易洛魁人的五部落之一塞内卡，他们的野心威胁这一交易。他的努力的结果导致1689年的拉辛大屠杀。这是“在殖民地历史中无与伦比的惨事”[\[9\]](#)。这一惨案动摇了法国的信心并导致印第安盟友的背叛，这也使渥太华人受到最严重的损害，而圣劳伦斯北部的毛皮交易取决于渥太华人的忠顺。弗隆特纳克9

月带来路易十四宣战的消息，的确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新的精神。弗朗西斯·帕克曼声称，他也很快恢复了与印第安结成的联盟体系，但是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证明，他希望安抚易洛魁人，但结果却妨碍了联盟的恢复并且严重地危及法国在西部的地位。[\[10\]](#)

地方长官（总督）手中的兵力很少：大约1500名海军和稍多于2000的民兵。仅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人几乎就有这么多。尚皮涅极力主张集中力量对付阿尔巴尼，他相信摧毁了阿尔巴尼就为打垮五种族创造了条件，就可利用纽约的无政府状态（革命已经使纽约陷入无政府状态），因为阿尔巴尼被反莱斯勒的部队固守，弗隆特纳克提出海军和陆军联合攻击纽约港。然而，他缺乏来自欧洲的必要帮助，因此转而连续凌厉地袭击英国居留地的北部边境：进攻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缅因和新罕布什尔交界处的萨蒙瀑布，洛亚尔堡（波特兰）和在卡斯科湾的居留地。从法国人的印第安伙伴的眼光看来，法国人恢复了威信；但是，平稳的印第安人易洛魁族是否也信服了，颇值得怀疑。

英国人作出反应，1690年5月在纽约召集了一个殖民地联席会议。只有马萨诸塞、新普利茅斯和康涅狄格的代表们跟纽约的代表们一同与会。尽管马萨诸塞热切希望保护其渔业和对帝国显示忠诚[\[11\]](#)，但它已经采取措施使自己摆脱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对东北部的威胁：在阿凯迪亚一支约700人的远征队在威廉·菲普斯爵士统率下在1690年5月从守备不良的驻军手中夺取了罗亚尔港。这一成功所花士兵和金钱的代价是低廉的，但是此城镇不久又被收复。然而，对英国人来说，夺取罗亚尔港仅是向征服加拿大迈出的第一步。殖民地联席会议制订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仍由菲普斯率领的海军远征队完全摧毁魁北克。这一计划实施得很糟。纽约和康涅狄格的部队集结起来，作为牵制行动，他们从陆路进攻蒙特利尔，但他们不能越过乔治湖。他们撤退的消息促使弗隆特纳克决定去加强迄今实际上没有弹药的薄弱的魁北克守军。对圣劳伦斯发动的进攻被推迟了，后又被有力地击退。这年秋天的气候异乎寻常的寒冷，这使英国人的士气更进一步低沉。一场风暴打散了舰队，沉没了3艘舰船，预计的成功成为可耻的失败。虽然菲普斯不负主要罪责[\[12\]](#)，但他的领导能力想必已大大降低。英克里斯颇具学者风范的长子科顿·马瑟（1663—1728年）毕生致力于解释上帝的新英格兰计划，他认为这次大失败是神的旨意的明证。他在《忠

于祖国的悲壮一幕》（一本为菲普斯树碑立传的书）中指出，这些可怕的后果是耗尽新英格兰精英后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是马萨诸塞的物质与精神状态的真实描写的话，那么它应庆幸自己的首都没有遭到报复行动。事实上，法国的私掠船不断袭扰它的海岸线，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对它陆上的袭击连续不断：1692年进犯纽约，1694年进犯奥伊斯特河，1696年进犯卡斯科，1697年进犯哈佛希尔和兰开斯特，甚至新建的防备森严的威廉亨利港（在佩马奎）也被攻克。而新英格兰仍然保持完整。两次与阿贝纳基的印第安人休战：一次在1691年冬；另一次时期较长，在1693年，在康弗斯上尉和一支有350名突击队员的部队成功地保卫缅因边疆之后。

在阿尔巴尼前线，纽约无法独自承受整个负担。1692年，除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外，谁也不给予财政帮助。新任地方长官本杰明·弗莱彻感到，以他掌握的那么一点财力和物力是不可能发动攻势的。1693年2月，彼得斯凯勒少校带着550名欧洲和印第安混合军重创了向Mohawk镇进攻、比他们稍大一点的加拿大队伍，同时弗莱彻积极活动把军队从纽约调往斯克内克塔迪。来自新泽西的援助既有人又有钱，到了夏末，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共同献出900英镑来保卫前线省。之后两年比较平静。在此期间，双方无一有力量采取激烈行动。法国困难的严重性并不比英国少许多。如果1691年新英格兰因上气不接下气而萎靡不振，新法兰西也因资源微弱而同样不景气。那年春天，人口因来自纽芬兰渔场的难民而膨胀，食品和弹药如此稀少，以致军队和民兵都不能离开堡垒对敌作战。现在，来自法国的增援既已无望，弗隆特纳克觉得只好把小规模战斗转变为一种强击。他按照易洛魁人的方法制定出一种既费兵力又费装备的战术，但却适合加拿大人的天才和军事困境。在此基础上，皮埃尔·勒穆瓦·伊贝尔维尔，一位有天才家族的成员和卓越的战术家，更是独具匠心。但对弗隆特纳克来说，恐怖战仍居第二位。其原始命令的目标是把纽约的居民迁至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来毁灭纽约。他认为波士顿也应毁灭并把赫德森河牢固据为法国所有。1690年以来他曾争辩说，达到这些目标即可获得最好或唯一办法来结束战争并使易洛魁人屈服。他至少有4次敦促路易重新考虑其以前的计划，其目的是把毛皮贸易和渔场置于无可争议的控制之下。新法兰西自己缺乏力量执行这一雄伟规划，这件事确实需要使用海上力量，但在巴尔弗洛海战^[13]以后，法国海军对使用这样的海上

力量还没有概念。双方母国都不想为在北美一拳将对方打倒而削弱自己在欧洲的地位。

法国最大的胜利是在纽芬兰和赫德森湾向英国渔场^[14]和贸易站进攻时取得的。根据1687年的人口调查，法国在纽芬兰的人口非常少：在普拉森夏（普莱桑斯）、韦特角、福琼岛、内格雷角和勒赫密泰奇等地只有687名殖民地居民。英国的移住民比法国多一半，分住于11个社团。1690年来自费里兰的一队骑兵突然开进普拉森夏，英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经过小小流血就攻占了城镇和口岸，但未能长期占据。两年以后，在威廉斯海军准将指挥下用3只装有60条枪的船和两只小船进行的第二次进攻失败了。在惠勒海军上将指挥下进行的又一次更可怕的强攻也因天气恶劣而搁置未举，只抢劫了一下圣皮埃尔岛。双方在当地都无力长期保持其掠夺。弗隆特纳克的对策是把法国的武装民兵派往普拉森夏，以掠夺英国的殖民地。费里兰于1694年之所以免遭涂炭多亏了威廉霍尔曼上尉的坚决抵抗，但在1695年8只武装民船毁坏了许多地方的船只和设施。1696年，费里兰终于落入来自圣马洛的武装民船远征队之手。同时指挥者伊贝尔维尔派特遣舰队沿东海岸焚烧各前哨基地。出于妒忌竞赛，普拉森夏的总督布鲁朗猛攻了南海岸的几个驻地。这两个人相互协作已于1696年11月30日把英国主要基地圣约翰取到手。英国的处境严峻了。到1697年，英国只占有特里尼蒂和康塞普西翁湾，除博纳维斯塔和卡博尼亚外，英国在东海岸的殖民地都遭到了歼灭。这一崩溃引起的恐惧心情产生了一支有1500名士兵的队伍以及在约翰·诺里斯海军准将指挥下为了收复圣约翰而建立的一支大中队。英国远征军重建并巩固了这个遭到蹂躏的口岸，其巩固程度足使在内斯蒙特侯爵指挥下更加强大的中队不敢再次进攻，尽管在他焚烧卡博尼亚之后他们想和波伊蒂男爵达成协议的机会已经错过。波伊蒂男爵当时已满载卡塔赫纳的战利品。^[15]

争夺赫德森湾并间接控制海狸贸易都集中在约克堡垒附近。^[16]虽然英国人在1693年收复了阿尔巴尼堡垒，但是约克垂头丧气的警卫队却于第二年向到处都是的伊贝尔维尔投了降。此地保持了3年之后，终于在1697年被伊贝尔维尔夺回。英国人就这样在防卫小地方不够认真上付出了代价。这种事情说明英明率领的宗主国军队的干预是如何根本影响地区势力平衡的。《里斯威克和平条约》使新法兰西、新英格兰和纽约的边区和前哨基地大体保持不变，但在纽芬兰和哈得孙湾

这两处发生过决定性战斗的地方，法国势力占上风。威廉三世因维护海湾公司利益而酿成战争，为了公司追寻的目标，他不准备因实现和平而危害其欧洲政策。

在纽芬兰，法国犯的错误是认为英国殖民地的消灭已成定局。法国对易洛魁人联盟的胜利证明更持久些。印第安人头领非常抱怨英国人未能把有力的援助调到纽约。到了1694年，因损失而精神沮丧，再加上新法兰西明显有能力利用欧洲看不见的资源，于是他们想寻找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只在全面通知弗莱彻总督说他们正处于困境而且是在军援尚未送到之后他们才与法国接触的。此时，对英国联盟的忠诚还未产生怀疑。弗隆特纳克号召全面印第安和平应包括渥太华人、迈阿密人和其他部族，但这个呼吁只受到加尤加人^[17]实质上的支持。安伦达加族、安奈达族和摩和克族否决了这个号召。然后他决定打垮这个联盟，1696年用2000名加拿大人、常备军和印第安人进攻安伦达加族和安奈达族。这个惩罚的结果是有限的。法国强迫安奈达族讲和，两个部族都逃脱了法国人希望看到的全面毁灭。另一方面，除了为了防止冬季饥馑而送去的玉米外，英国人的援助寥寥无几。《里斯威克和平条约》并未使法国承认英国对联盟行使主权的要求。弗隆特纳克反对纽约总督贝洛蒙伯爵让印第安人参加全面欧洲和平，虽然贝洛蒙控制着新英格兰和纽约的资源，这两个地方在他总督麾下重新联合起来。在此情况下，易洛魁人不得不另与魁北克单独进行谈判，因为他们的士兵数目已减到1300名，力量不大，又担心法英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1698年11月28日弗隆特纳克死后，这个拖延时日的讨论圆满达成协议。这个任务就落在他的接班人（1699—1703年）卡利尔的肩上。此人自1684年以来一直任蒙特利尔总督。1701年签订了条约，印第安全面和平终于实现。易洛魁人同意将来在任何英法战争中永远保持中立。在力图从法国人那里接过控制西方毛皮贸易的权力上他们承认失败。

九年战争结束前，英国人在治理其帝国问题上采取了两种措施：制定1696年的《航海法》和成立商务部。革命后不久的几年里英国商业扩展了，但在5年内人们认为商业在衰退，前途难测。^[18]不景气的最主要原因有二：对《航海法》的有组织违抗和苏格兰无执照营业者的活动。1695年以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已向议会请愿，要求支持合法贸易。1694年海关宣布非法贸易已使税收损失5万镑。伦道夫曾希

望这些困难会促进他自己的帝国政治改组方案的实现。他终于下了改革旧殖民体系以使其更有成效的决心，伦道夫对此是有贡献的，但他又不负主要责任。1696年1月，海关专员们曾责备独占和共同殖民地在体系上有许多缺点，现在承认已制定了一项议案来加强1660年、1663年和1673年的法令。枢密院一个委员会与海关专员们一样否决了伦道夫要改组独占和共同殖民地的提案，认为他的议案太激进。1696年4月法令的价值主要是澄清了早期立法的意图，建立了行政规章制度和违反章程的惩罚办法并进一步强调总督在执行上的责任。此外，在美洲实施弗劳德法规使殖民地海关组织走向系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具有海军中将职权的法庭，执行《航海法》中规定刑罚条例的裁判权。为了奉行王国政府额外增添的权力并对贸易大臣的工作效率下降做好补偿工作，又成立了商务部这个新机构。通过这个新机构的人事任命，商务部的连续性得以保持。第一任大臣为布里奇沃特，另一位成员为威廉·布拉斯威特，他是贸易殖民委员会前国务部长。伦道夫的影响仍然存在。商务部是个顾问机构，涉及面很广，用处大。但与其前身不同之处是商务部没有执行权力。除最早几年外，商务部接受以戈多尔芬为首的财政部和国务大臣们的领导。

殖民地领主的权力持续存在，这是伦道夫未能让英王向各殖民地委派检察总长以后才会这样。他还建议礼仪应由国王管理，但其维护王权的努力并无成效。1697年向罗德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等发出了函件，威胁要没收特许状和专利权。然而大家都知道，各特许殖民地政府不能随意侵占除非议会下令或通过一定法律手续。撤销某些或一切殖民地特许状，旨在把各殖民地“置于更平等基础上”^[19]的提案，在《乌得勒支和约》前就向下院提交了5次。1701年是最早的一次，几乎通过。这次受到国内英国圣公会教徒（普通群众和神职人员）以及殖民地头面人物如尼科尔森总督和罗伯特·奎利（后者是一位海关总检察官）等人的支持。但为特许殖民地所作的辩护十分巧妙，包括巴思伯爵为南北卡罗来纳作的辩护，亨利·艾休尔斯特（他是一位商业巨头，又是威斯敏斯特的不信奉国教者领袖）为康涅狄格、罗德岛和马萨诸塞作的辩护，佩恩家族为宾夕法尼亚所作的辩护。威廉·佩恩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关键性的，尽管艾休尔斯特屡次声称他在大臣中很有影响。那些力求废除各独立政府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也不完全毫无用处。佩恩放弃了他所有的政治权利，新泽西的领主们也放弃了他们的权利，而马里兰则在安妮女王死前仍在君主手中。这

是中央集权的可怜替代物，也是王政复辟时期商务大臣们想象到的。但是起码皇家政府已成为大陆上的普遍现象而非例外情况。

和约签字后新英格兰还不断受到袭击，一直到它整个历史最受考验的几十年结束之后才停止。印第安人的恐怖带来的不只是人们精神上对直接受到攻击和酷刑造成的紧张，它还影响了1691—1692年弥漫于马萨诸塞省塞勒姆全村的魔法诅咒。这个遗臭万年的歇斯底里被看作新英格兰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当前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众所周知的歇斯底里使人们怀疑清教徒的神权政治。^[20]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几个年轻姑娘指责社区里几位长者把她们变成女巫。随后她们就供认与魔鬼交配和其他无法无天的行为。结果有20个人和两只狗被吊死。殖民地的领导人对此未加干涉，不敢否定横加给无辜人们的罪名，害怕这将会使他们也遭受指责，削弱他们的权威。对这种审判要负责任的是领导无能，而不是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本质。我们也不应当忘记马萨诸塞省刚从政治斗争中挣扎出来，这次斗争使它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而现在正进行一场军事斗争，其严重性并不比政治斗争轻多少。虽然畏惧巫婆本来是西方世界的共同现象，但在这里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这里据说尽是一些不信宗教而崇拜魔鬼的部落。正是这些情况加在一起，便将新英格兰人正常情况下都有的稳定的、切合实际的判断力给破坏了。

贵格会教徒也厌恶这种严重情况。他们不断为改变边区状况而作出努力，曾取得一些成就，但他们的做法却使新英格兰失去外围防御。“一位糊涂而拙劣的作家”^[21]进一步激起了众怒。他叫汤姆·莫尔，想为印第安人在战争中的暴行辩护。但在贵格会教徒思想受到抵制的沿海地区，清教徒骚扰贵格会教徒的事情，革命后不久就停止了。1691年公谊会教友在波士顿用砖盖了第一所会议厅；15年后他们的成员数目增加，需要盖第二所。另外一个内部敌人就是安德鲁斯虚弱无力扶植起来的英国国教，但安德鲁斯政权被推翻后，英国国教也受到恶意攻击。1690年只在波士顿还有一些英国国教会众。之后，经过比较充分的成长，许多北方城镇的成分受到影响，主要是得到1701年成立“国外宣传福音会”的帮助，其主要目标是把牧师们派到各殖民地，在“真正宗教的原理”上指导殖民地开拓者。虽然国外宣传福音会是为了考验美洲殖民地英国国教的骨干并曾在基督教会的面子下被说成是代表英国帝国主义^[22]，但其成就不大，且零散。尽管如

此，新英格兰的正统教长们仍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已处于危险之中。用1691年颁发的财产特权许可证来取代一个凭宗教并允许宗教自由原则的许可证，为不信奉国教宗派的增长和神权政治统治的结束铺平了道路。清教会似又受到另一种威胁，因其内部产生了进步运动。1699年，一些进步思想家在波士顿成立了布拉特尔大街教会。马瑟派及其他教长们的反击导致1705年提出按长老会路线进行改组的建议。在所罗门斯托达德和塞布鲁克宗教会议影响下，康涅狄格于1708年采取了“协议会”原则；但在马萨诸塞，“塞布鲁克政纲”中的中央集权方式则受挫于约翰怀斯领导的民主分子，也受英国政府的反对，因为英国政府害怕神权政治复活有损皇家利益。

在新英格兰以外的一些地方，在殖民地中，自王政复辟以来一直坚持信仰自由。信仰自由的实践效果有时不太好。有一阵子，纽约各教派所受限制比新英格兰各镇要多。他们在查尔斯顿的斗争是艰苦的。马里兰往南的这一片大陆殖民地，英国国教到1692年已经巩固，但除弗吉尼亚外，它还不是大多数人信奉的教。即使在弗吉尼亚，教区会的控制已经限制牧师的权力。在马里兰，激进的教派占优势；在北卡罗来纳与东西（新）泽西一样，贵格会教义是重要信仰。而且，新型移民使宗教信仰更加多样化。在1689年以前的殖民地生活中，宗教已经是五花八门的了。最重要的还是胡格诺派教徒。有些定居于纽约地区的中部，其他沿南卡罗来纳的桑蒂河定居，他们大部去发展中的市区如查尔斯顿、纽约、新罗谢尔、萨勒姆、波士顿和牛津。他们在这些地方与英国圣公会教徒有了交往。德国宗派在弗朗西斯·丹尼尔·派斯托卢斯领导下于1683年开始其历史性进入。在以后20年中从莱茵兰又来了许多人如贵格会教徒、孟诺派人、浸礼会友、里弗兄弟会、耶克尔斯、新蒙纳斯和荒野妇女会会员。他们主要向宾夕法尼亚移民，然后从那里又向特拉华和马里兰迁移。之后，莱茵河西岸地区的德国人也来了。虽然有些人经短期在英格兰当难民后被运往纽约以便为双重帝国目的服务，但大多数是从费城去的。这个双重目的是：生产海军军需品和巩固阿尔巴尼边防。由德格拉芬里德男爵率领的瑞士殖民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形成了。

宗教在大多数殖民地中如果不再是生活中的中心因素也一定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不能期望它全面反击长期战争中对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到1690年犯罪已成为主要问题，每个殖民地村庄都为夜间安全

采取措施。城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最坏影响。危险来自四面八方。1707年以后，纽波特的私掠船员们是动乱主要因素。查尔斯顿的守卫受到水手、有时是海军水手的袭击。费城也蒙受航海者的犯罪行为。在纽约，破门行抢教堂是公开的丑闻，暴力行为和骚乱日见其多。波士顿被认为是英国殖民地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但到1720年也享有暴乱盛行的名声，在暴乱中男女都参加了。酗酒是个普遍罪恶，虽有众多律条为之定罪，但也无济于事。沿海地区发生的动乱主要是酗酒造成的，老百姓愿意与海盗做交易，并从监狱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也是造成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年青一代所受的影响或许比其他阶层的人更严重。1699年，不正当的通奸关系是普遍的。西班牙继承战争进行期间，殖民地居民第一次与欧洲士兵和水手广泛接触以后，通奸与私生事件显著增加。新英格兰1692年的严守安息日法规公开被人嘲笑，这就不足为怪了。私人组织与“罪恶的有害影响”进行斗争，但收效甚微。[\[23\]](#)

战争对教育的影响更难确定。安德鲁斯推翻新英格兰的教育系统以及威胁要把哈佛大学改变为英国圣公会神学院这两件事对大多数新英格兰人来说都是1689年以前一部分令人吃惊的事件。但是到1680年，有证据说哈佛大学在校学生的生活质量上有了下降。[\[24\]](#)17世纪90年代期间，人们经常关心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主义，但这与英国直接干预无关。另一要关心的是对“道德败坏的”波士顿大学有何影响。斯托达德是康涅狄格谷地的“教皇”，对马瑟派持批评态度，但他本人是哈佛大学毕业，1703年他宣扬反对高等教育中心的言论，说这些中心看不到它们的任务是培养担任公职的人才。也许清教徒“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者”有意夸大了这个下降。无论如何，哈佛大学只能从成立第二所新英格兰大学中获得激奋。这是清教徒针对领袖们进行的良心上自我反省分析准则所作的建设性回答。创办耶鲁大学是哈佛大学毕业提出来的，哈佛大学祈祷这所新大学的成功。新英格兰教育传统的腐败已发生在低级教育部门。在17世纪最后20年里几乎整个成年人群都有文化，但在乌得勒支和会以后不久，马萨诸塞的议会哀叹说有些城镇宁愿受罚也不办中等学校。在这方面，边区城镇特别失职。

弗吉尼亚的传统不利于对教育政策提出批评。1671年伯克利总督批评免费上学和免费学习是违法乱纪、信奉异教的根源。他的这番讲

话表达了许多殖民者的意见，他们认为教育是个人的责任。相反，新英格兰则认为保护新英格兰本身独特品质的最佳方法是创造条件让各阶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弗吉尼亚缺乏这个自信心，而且还不得不去创造它最有效的贵族领导传统。威廉与玛丽大学确实是1693年由省政府赠地两万英亩并拿出一年的毛皮出口税收入而创立的。但是大部分由附近教区的教长们组成的教职员，缺乏哈佛大学那样的卓越才干。可以想见，南卡罗来纳有组织的教育更不发达，但1710年的立法提出在查尔斯顿创办免费学校并任命校长。纽约和费城承认教育是教会和国家共同关心的事业，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它们为使教育茁壮成长所提供的土壤比殖民地经济性质所能提供的要多。

传播英国文化和下达政治命令的资源到1700年稳步上升，尤其是北方。从1639年起就有印刷业的波士顿，到1690年已成为全帝国第二大印刷和书业中心。1685年以后印刷业在费城发展迅速。新英格兰企业试图在1690年9月办起一份月报，“旨在反驳假报道”。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第二期未能发行，一直到1704年才发行定期刊物《波士顿新闻信札》。刊物监督仍由总督政务会负责。南方到殖民阶段末期才有报纸，但开明的殖民者已在收集大量图书：威廉·伯德二世藏书4000卷，与科顿·马瑟所藏数目相同；托马斯布雷大夫（教会代表，国外传播福音会奠基人）在马里兰30个教区里几乎都成立了图书馆。在这里，尤其是切萨皮克湾地区，一种殖民者贵族统治正在兴起，这个统治阶层认为发财致富和富有成效地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文化消遣是美好生活的补充目标。科罗托曼的罗伯特·卡特（一位精明的弗吉尼亚商人）公开宣称其最得意的职位是威廉与玛丽大学校长。

这样就在文化设施与英国大陆殖民地目标之间有了巨大差距。无论怎样，夸大社会结构的区别是可能的。无论在哪里，甚至在新英格兰，占有土地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地主贵族相当于英国绅士。地主贵族下面是仆人、佃户、工匠和自耕农。新英格兰的商业已由第二代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人阶级；纽约战争提供了财富增加的机会，如罗伯特·利文斯顿抓住的机会。这些财富包括土地和货物。战争也加速了城市意识的增长。新港的人口确实未变，而波士顿的人口却从1690年的7000人降到1700年的6700人，尽管从边区有难民流入，到1710年只达9000人。但是查尔斯顿和纽约的人口稳定增长。处理社会和行政难题的新想法几乎全来自英国，然而各个社区都改善了

他们的效能，路面铺得好多了，警察布岗也周密了。尤其是在5个主要海港，很明显地有一种新的公民自尊心和身份感，表明它们不再是殖民地村庄，而是一些与欧洲城镇性质差不多的城镇。[\[25\]](#)

新法兰西没有发生这样的城市发展。整个殖民地支持了还不到波士顿两倍人口的白人；魁北克本身的人口到1713年才有1800多人。而且，自1678年以来能比得上新英格兰各城镇自治程度的不多。早先的市政官是由魁北克、蒙特利尔和三河城三地居民选举的，但他们在弗隆特纳克的第一总督任期结束后也就完了。然而在社会服务方面他们有理由自豪，在长期战争中社会服务一直在坚持。1688年在这3个主要社区里成立了济贫所来分发救济品并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每个教区都有权成立类似的济贫所。4年以后让·弗朗索瓦·夏隆在蒙特利尔创办年老、体弱者收养院，1693年魁北克总医院也有同样设施。1702年乌尔苏拉恩斯在三河城开办了一处医院。文化生活要受诸多条件制约，如气候、土壤条件、是否不断处于遭受攻击的恐惧之中、河边教区的一系列建筑是否沿干道发展等。殖民地教育多亏了耶稣会、萨尔皮辛、雷克莱特和乌尔苏拉恩斯的热心，再加上赖伐尔和圣瓦利埃的支持。魁北克有了自己的初级教育设施，而周围农村的需求则由圣乔基姆扩大了的学校来满足。在莱维斯角、锡莱里、圣福伊和圣法米尔还有其他学校。蒙特利尔有两所学校。在弗隆特纳克堡、拉普埃伊、拉辛、特朗布尔角和布切维尔也有学校。王国政府代表如雅克·劳道特、沃德勒伊和贝贡等的证言指出农村教育因缺乏校长而受阻，但有些证据与这一观点相冲突。在此期间，加拿大妇女所受教育总比男人好，这多亏了魁北克和三河城两地的乌尔苏拉恩斯社团和蒙特利尔及其所属地区内教堂修女们的功劳。在阿凯迪亚这个地方约有5000人，几个总督对他们的统治尚属宽厚，但总督不为凡尔赛所重视。这里罗耶尔港的神学院在九年战争中遭受过火灾和抢劫，但在拉赫丹和罗耶尔港早就有了男女混合学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一直贯彻着法国做法。魁北克的耶稣学院是唯一全面组织起来的中学，据估计该校在1699年有130—140名学者。在魁北克还有许多拉丁学校，赖伐尔的初级神学院和工艺学校。圣乔基姆一度曾教授水文地理学、数学、木刻，大概还有绘画。蒙特利尔也教航海和筑垒。战争没有限制机会向阿凯迪亚以外的青年开放。尽管发生了战争，但学习机会还是向外发展了。

总而言之，法国殖民地的文化生活不如英国大陆殖民地丰富。他们没有一个可与新英格兰的爱德华·泰勒相媲美的诗人。自从圣瓦利埃与弗隆特纳克因演出《塔尔杜菲》发生口角以后，舞台表演停止了。私人图书馆与同时代的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水文地理学家让·德夏伊的私人图书馆在1706年藏书40卷，当时算是出类拔萃的了。除了基督教会团体的图书馆外没有一家是名副其实的，农民们根本没有任何书籍。法文的加拿大文学在1759年征服以后才开始出版，描写国家及其扩展的巨著如勒克拉克写的《新法兰西的第一所信仰机构》（1690年）和路易斯·埃纳平神父写的《新发现》（1697年）也曾引起过公众兴趣。尽管这种情况一部分反映了缺乏印刷厂，但也并不是不足以说明对印刷语言的漠不关心。不管是为了乐趣还是为了求知，人们认为读书是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书籍在人们的手中来往传去。加拿大人是出色的木石雕刻家。在这方面，诺埃尔和皮埃尔·勒瓦瑟两人都是杰出的；而在魁北克，尼古拉·贝林（或布莱）因精于雕刻铅和铜装饰品而享有盛名。

教会的势力不限于圣劳伦斯和沿海地区，但其最远地区传教团的力量却在毫无结果的争吵中损失了一部分。法国对印第安人的渗透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军事和商业力量。1696年，路易十四确实下令放弃除圣路易斯堡以外的所有西部军事驻地，并实际上结束了西部皮毛贸易。但弗隆特纳克及受其支持的商人们却能像在科尔贝尔时代一样，争取到特许，并在弗隆特纳克器重的一位有才干的加斯科尼贵族拉莫特·卡迪拉的劝说下，决定在底特律河构筑碉堡保护贸易。卡利埃的眼力也看出法国从伊利诺伊和俄亥俄脱身不久会使西部各族纳入英国势力范围，而且有加拿大不满政治现状者协助。然而从外表看，边区仍是教会性质，以弧形从缅因最北部的西面延伸到伊利诺伊地区然后向南发展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盆地，接着向墨西哥湾的比洛克西和莫比尔两处正在奋斗的殖民地伸展。

1688年，法国只在缅因保留了一块立足地，在彭塔各沃特（卡斯丁）所设的碉堡早已废弃。迪农维尔已经预见到如果荒野的阿贝纳基族落在英国影响范围内，对加拿大会有严重威胁，因而力主沿肯尼贝克和圣约翰河一带成立布道团，并有力支持耶稣会会士，使之成为唯一能控制印第安人思想的团体。耶稣会会士与萨尔皮辛不同，他们认为使印第安人信奉耶稣教这项任务最好在远离白人殖民地的场所完

成，并将阿贝纳基人集中于锡莱里。后来他们在夏迪创立了圣弗朗西教会，并于1688年恢复了他们的缅因教会。通过耶稣会会士的努力，肯尼贝克人、埃切明人和皮诺布斯科特人都成了天主教部族。彭塔各沃特一地的教区从官方说仍在魁北克神学院之手，但也对阿凯迪亚地方的印第安人执行牧师职务。1699年神学院交给了耶稣会会士。马萨诸塞被自称是在自己领土上改变宗教信仰的罗马人扰得心神不安，曾两次派遣委员团诱导印第安人解散传教士，但失败了。战争恢复之后，有一支远征军劫掠了这个村庄，另一支远征军则侵入塞巴斯蒂恩·拉斯利神父的教会（在纳拉错克）并烧了那里的教堂。往西，在纽约境内，活动正在消沉。1689年，在易洛魁人中间唯一的天主教徒们就是那几位改变宗教信仰的人，还有皮埃尔·米莱特神父这位独一无二的牧师。他是欧奈达人的囚犯但是仍有影响。1702年，各行政区出于自己的意愿要求传教士回来，资深的雅克·朗贝维尔神父当选。他的传教活动恢复了，直到斯凯勒上校于1709年摧毁了教堂和耶稣会权力以后才停止。

罗马天主教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盆地。1713年前后，文森斯已在沃巴什建立，这是为迈阿密人和波塔瓦托米人在圣约瑟夫建立的传教点，另一传教点在皮奥里亚，第3个点设在卡斯基亚人中间。围绕着这些传教点，法国人慢慢定居下来，有些人娶了信教的印第安人做妻子。他们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在伊利诺伊农业地区。1689年，雅克·格雷维埃神父接替资深的阿卢茨任各教会总监；1690年圣瓦利埃委任他为总代理主教。雅克·格雷维埃计划将传教团设到伊利诺伊的两个边区卡霍基亚和塔马罗伊，以及欧塞奇和密苏里。1696年以后，他到更远的部族去传道。曾发生过一次纠纷。当时在主教支持下的魁北克神学院（巴黎“国外教会”的一个分支，在巴黎也很有影响）决定参加向西部的部族宣传福音。他们把塔马罗伊人看作与较远部族联络的必要环节，于是首先在他们当中建立了一个传教团。尽管耶稣会会士们事先已有要求，在托尼卡人当中派个常驻的传教士，又在坦萨人中派个常驻的传教士，把神学院的影响带到翁斯皮克人、雅祖人和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纳切斯人中去，但是那里的耶稣会活动也有成就。1700年，保罗·杜鲁神父从比洛克西堡沿密西西比河北上，他在那里的工作就由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来的两位神父所接管。这两位神父是雅克·格雷维埃和约瑟夫·德利蒙奇，他们在乌马人当中盖了一所小教堂。现在耶稣会会士们分头恳求圣瓦利埃和国王

让他们独自指挥路易斯安那各教会。但是法国法院和圣瓦利埃一同袒护神学院并授以总代理主教权力，统管全密西西比盆地。虽然这个决定正式保留了魁北克的权力，但却剥夺了弱小的路易斯安那居民区的高度热情和耶稣会会员的组织能力。^[26]另一方面，虽然法国不断给予支持，但神学院的工作没有起色。它的传教士圣科斯姆1706年遭到谋杀；另一个叫拉旺特的人因与路易斯安那官方的关系不好，1707年回到法国时已经是要死的人了。敌人的行动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托尼卡教会1708年撤到莫比尔，因为受到参战的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1709年由拉维涅·瓦赞在道芬盖起的教堂，第二年就被拆毁了。塔马罗伊人（卡霍基亚人）现在是唯一能取得永久性成果的有指望的神学院教会传道所的人了。到1715年，当地约有47家法国人。

1702年，法国人最后被赶出圣基茨。如将这事排除在外，那么新生的路易斯安那财产受战争的影响要比新世界的任何殖民地都大。拉萨尔被谋杀后以及1684年他的殖民企图失败后，法国人对密西西比的要求得到皮毛商人的维护和传教士断言的维护。传教士们说那里住有法国人如米歇尔·阿查理特、埃纳平的伙伴，在伊利诺伊人当中生活、嫁娶。1689年，尼古拉·佩罗特以国王的名义占据了密执安湖与密西西比之间的土地，并随后在其上游地区以及帕平姆湖修筑了临时堡垒。拉萨尔曾于1684年警告塞涅莱说，如果外国人在密西西比流域走到了法国前头，那就一定会导致新法兰西的陷落。在法国政府内部，路易斯·德·普夏特兰及其子表示愿意实现法国对该河下游地区的要求。考虑这些要求和必须保证新法兰西与墨西哥湾之间的交通是否会大大影响在里斯威克进行的谈判是难以预料的。相反，1696年法国的政策似又恢复到科尔贝尔的主张，即除圣劳伦斯河外不承担任何义务。国王也未采取彻底的新方针，直到乌得勒支发表了埃纳平的“新发现”并请威廉三世接管这个广大领土。雷蒙维尔是拉萨尔的老朋友又是海盗，对这个地方了解得最清楚。他在有影响的朋友如国会律师阿尔戈的协助下，寻求援助以成立联合股票公司承办开拓殖民地事务。他们提请人们注意英国日益扩展力量的威胁和迫切需要防卫俄亥俄的高度易受攻击的谷地的重要性。法国国内对此问题的兴趣扩展到几个神学校的成员。最有价值的是迪博神父的研究成果，他是法国周游最广、地理知识最丰富的人之一。接到阿尔戈建议两个月以后，普夏特兰为筹办远征军采取的第一步是选伊贝尔维尔为领袖：英国丹

尼尔科克斯大夫^[27]正在敦促法国新教徒在墨西哥湾建立殖民地这个消息使他快马加鞭。创业者排除了这个危险，西班牙人担心佛罗里达通路和新西班牙北部各省的安全，于1698年在彭萨科拉湾派驻了警卫部队。

从一开始，路易斯安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合适的殖民地开拓者。1699—1700年，起初只有一小队人（120人）在密西西比东面的口岸试探性地占据了几个地点，其中加拿大人居多数。许多人经不住湿热的气候，外勤人员简直受不了这个惩罚。人口分散曾是新法兰西日趋衰弱的重大威胁，伊贝尔维尔希望能防止这一现象发生，于是在几个点把各殖民地聚拢起来，并禁止与印第安人做皮毛交易。为了尽快增加人口，他在法国贫民和警卫部队家属中移民。在阿尔戈和沃邦的激发鼓励下，普夏特兰和金融家安托万·克罗扎起草了招募计划。克罗扎的利益扩展到法国大多数海外贸易公司。一直到摄政时期法国才打算强迫流放。伊贝尔维尔把边区军事哨所远设到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目的是把这小小殖民地的边境稳定下来。但是在欧洲重新开战的阴影下，法国商人不愿冒投资和船只的危险。在莫比尔河不远处建立两个大基金会的计划搁置起来了。1702年放弃第一个比洛克西殖民地以后，稀疏分布于莫比尔和密西西比两个碉堡之间的路易斯安那人口才有140人。伊贝尔维尔像以前的沃邦一样哀叹法国殖民地开拓精神之贫乏，然而这只是路易斯安那发展很慢的一部分原因。该地区自然条件的诱惑力被夸大了，每个殖民地企业都这样，过低估计气候恶劣情况又是个严重错误。食物是主要的使人忧虑的事：牲畜不足，蔬菜收成也因太热而受损，其他作物则因雨量过大而受灾。许多移民不会引进适应当地情况的技术，结果失望地离去。缺乏技术工人使种植甘蔗和香蕉的计划受挫。多亏了伊贝尔维尔的有力领导才取得一定成就，但1702年以后，他的精力因战争的需要和诱惑而分散，不能像他原来打算的那样使殖民地富裕起来。1705年他在圣多明各去世，年轻的路易斯安那也继之失去了鼓舞人心的源泉（以前只对英国的背风群岛发动过一次有收获的私掠巡航远征）。

1706年春天以后的两年间，路易斯安那失去了法国的援助而完全衰退。1708年2月以后，它再次依靠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和彭萨科拉的船货有3年之久。即使船只真的来了，面粉和其他必需品也经常没有，因为是用更赚钱的物品顶替了面粉，或是船在到达路易斯安那以前卖给

急需的西印度群岛了。1707年该殖民地失去了有力领导，伊贝尔维尔的弟弟勒·穆瓦纳·德·比安维尔被弃而不用，改用德梅先生，一位来自新法兰西的官员。但只有领导才能还不能保证成长，伊贝尔维尔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成功首先要看国王的态度。路易因为无力提供所需的物质支援使殖民事业站稳脚跟，就历数殖民地开拓者的缺点。在整个战争期间确实一直存在放弃殖民地的威胁，尽管年轻的普夏特兰坚决顶住，因为他认为眼前要关注的是殖民地的战略意义而非其有问题的经济价值。后来，路易同意让殖民地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普夏特兰不得不依靠私人的财力，舍此别无他途。利用1712年9月14日的特许证书，他轻易地把殖民地贸易专利权连同任何土地或矿山产业都交给了克罗扎，经营期15年，国王只保留任命总督权力。这个危急的补救办法对克罗扎来说只不过是又作一次投机，但执行起来比较受压而好处不大。1717年克罗扎全部卖给国王，并建议使路易斯安那成为劳氏公司在西部的核心。[\[28\]](#)

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易洛魁人的中立使纽约免遭入侵，但在新英格兰，以前的冲突模式又重复了。缅因社团1703年8月受侵，冬港1707年9月受侵。在马萨诸塞边界上，迪尔菲尔德于1704年遭到严重摧残。阿贝纳基人住在萨科河、肯尼贝克河、佩诺布斯科特河和其他北方河流上的各村庄，位置很好，有利于法国各政治目标的实现。法国打算用下述方法摆脱对英国武器和器具的依赖：责成印第安人发动猛烈攻击，从而使新法兰西最不怕受攻击的地方招致报复。这样易洛魁人即可高枕无忧了。

1703年，沃德勒伊侯爵任魁北克总督。他是一名有成就的军人。他有三位总督统治这块殖民地的经验，因而与教会建立起亲密关系，与政界领导人物团结一致，这些都是圣劳伦斯殖民地从未有过的。针对他的进攻方式保卫英国各殖民地所费不赀。1703—1704年冬天，600人巡查了北新英格兰的森林，但未捉到一名印第安人：来年夏天2000人守卫着200英里的边境。这个毫无效能的防卫系统与雄心勃勃的高涨情绪相悖，不仅极其不得人心，而且杀人的费用也高得十分荒唐。然而当地出生的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还控制着汉普郡，因此，在全局上也不能说都是失败。1704年冬季，一队队的巡逻骑兵肃清了印第安人边区，只有一次进攻康涅狄格城镇很快被人击退。为了减轻其财政负担，达德利也准备考虑订立中立条约。沃德勒伊虽然担心易

洛魁人可能打破绥靖局面，但他还是把条件提得太高——为了不让英国人在圣劳伦斯湾和阿凯迪亚海打鱼，他向新英格兰人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达德利的措施在波士顿本身就受到了攻击。像塞缪尔休厄尔和马瑟派，这些人对他们自己那一角落是忠心耿耿的，而现在主张不要按照沃德勒伊提出的价格再坚持新英格兰独立了，他们指责达德利像从前安德鲁斯一样怀有亲法计划。无论如何，沃德勒伊的策略证明是太成功了，因为向他的印第安同盟者进行工蜂式袭击已引起向比较暴露的法国殖民地进行恶意报复，因此妥协的想法无人感兴趣。

报复虽然也是为了破坏阿贝纳基人的攻击力量，但这种报复在军事上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在1704年夏天，本杰明·丘奇少校率领550名马萨诸塞人攻击了卡斯丁（阿凯迪亚），并烧毁了芬迪湾的波莱港。罗耶尔港是主要目标。这地方只有8名军官，185名士兵，但是丘奇却认为它过于强大而推迟了进攻，等待外援。但外援迟迟未到。然而到了1707年，部队增加到1000多人，其中包括从新汉普郡和罗德岛开来的一些小分队，这样马萨诸塞就准备再试试。这支军队是从农村民兵中抽调上来的，等于阿凯迪亚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在罗耶尔港惨败了。有些人早就主张从国内选拔称职的军事指挥员，罗耶尔港的惨败加强了这些人的影响。

在纽芬兰战区，命运变化很快，但全局对法国有利。1702年6月，约翰利基上尉，这位圣约翰的主官统率着一小部分人马守卫此岛，立即取得胜利，但为时不长。他打击了法国人在特雷帕塞和圣玛丽两地的航运和建立殖民地的活动。由于格雷顿海军上将拒绝派遣部队主要是为保护西印度群岛而冒风险，所以1703年攻击普拉森夏本身的战机便失去了。这种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对英国代价很高。1706年，一部分法籍加拿大人、海盗和阿贝纳基人在阿凯迪亚的总督奥格·德·苏伯卡斯率领下，离开普拉森夏，攻打圣约翰。这是以前伊贝尔维尔计划要统治纽芬兰的重演。城内受难居民坚守了5个星期的围困，但是法国人进而摧毁费里兰，并向北蹂躏博纳维斯塔。之后的不断进攻使英国认识到让法国为所欲为的严重后果，但直到1708年夏天才派人去夺取普拉森夏并最终控制纽芬兰。由于管理不善和天气恶劣，该计划破产。另一方面，以普拉森夏王家中尉、圣奥维德为首的私掠巡航远征队摧毁了圣约翰的堡垒并于1709年捉住了圣约翰总督，但法国人来年夏天又撤退。1710年以普拉森夏总督帕斯托·德·科斯特贝尔为首向

卡博尼亚发起海陆进攻，但收获不大。法国一再掌握主动，但无当地力量巩固胜利。对这种战争，运用私掠巡航战术较海军为妙。只要英国与法国共占纽芬兰，海军就不能确保英国渔场。英国在这里遭受的惩罚证明需要宣传北美战争的重要性，也清楚说明了博林布鲁克的强硬外交主张，在和平会议上定要坚持独占纽芬兰。

为控制密西西比而发生的冲突第一次明显地发生在南方边区。在那里，伊贝尔维尔的眼光已从目前路易斯安那的安全看到卡罗来纳沿海一带。弗吉尼亚、马里兰，最后纽约恐怕都要陷落，因为这是南北夹击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大陆计划中，第一步要走的是建立法国—西班牙海陆联合远征军攻打查尔斯顿，之后卡罗来纳的英国人要遣返，其胡格诺派教徒要改变宗教信仰。詹姆士·穆尔总督预见到法国和西班牙目标的某些中心内容之后，准备立即进攻圣奥古斯丁（佛罗里达）的市区和碉堡，深恐从那里突然袭击南卡罗来纳。1702年秋天，一支由500名卡罗来纳人和300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队伍扫除了北方的西班牙教会并企图以饥饿围困圣奥古斯丁。8个星期以后，被围困者的士气下降了，穆尔也焚城后撤退。穆尔现在被免去总督职务。他的攻势作风与新英格兰原来采取的守势战略迥然不同，但是这个做法的经济负担落在一个不大富裕的社会的肩头上，同样是很沉重的。即使如此，查尔斯顿议会仍同意建立一支能带来比其他殖民地战争更实实在在成果的军队。穆尔个人备款成立了一支有1000名印第安人和500名白人的军队，并于1704年使西佛罗里达西班牙教会的村庄荒芜下去，因为那里的阿帕拉奇印第安人可能被用来攻打下克里克人，从而将卡罗来纳的防守同盟摧毁。许多被俘的阿帕拉奇人被调到苦苦挣扎的边区城镇萨凡纳去增援，此地是卡罗来纳内地贸易中心。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往东，在阿帕拉奇和圣奥古斯丁之间的蒂穆夸教会都被消灭了。到1709年，西南佛罗里达的托科巴加印第安人都被打垮了。

政治头脑清醒的卡罗来纳商人们这时也警惕着来自密西西比方向的袭击，在这里，莫比尔地方的勒·穆内兄弟们直到1706年才有效地调解了由英国武装的强有力的奇查索人与法国盟友乔克托人之间的长期不和。亚拉巴马印第安人已于1703年抛弃了法国，而下克里克人则在阿帕拉奇人被征服后更倒向英国，伊贝尔维尔的边区政策基础动摇了。因为来自法国的援助极少或根本没有，保卫路易斯安那就靠比安维尔巧妙操纵残余的同盟者了。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进攻只限于1706

年进攻查尔斯顿，而且也流产了，这促使卡罗来纳建立一套侦察系统来改进其海路安全，并派遣军官到切罗基人和克里克人中去征召士兵，以扩大其军事资源。1707年，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一路烧抢到彭萨科拉的城墙边，针对莫比尔的行动也在考虑中。莫比尔是通往密西西比下游的要隘。托马斯威尔奇是个商人兼探险家，托马斯·奈恩是卡罗来纳印第安人的代理。这两人企图争取乔克托人、雅祖人、纳切斯人和其他住在河边的莫比尔同盟者。他们有先见之明的战略眼光早就看到，如果英国所有殖民地不愿长期局限于大西洋海边的话，他们就需要统一采取行动。要是没有查尔斯顿的长年政治斗争和奈恩船长的免职，卡罗来纳人此时也许独自就把路易斯安那消灭了。事实上，他们采取的唯一较大的行动是在战争收尾部分组织庞大的克里克人和奇查索人远征军在1712年彻底毁灭乔克托民族。在这场危机中，比安维尔的森林外交挽救了法国体系，使之免遭崩溃。^[29]森林外交甚至顺利地恢复了老亚拉巴马各同盟者。

具有帝国远大目光的并非只有穆尔总督和奈恩船长。纽约的科恩伯里总督采纳其各位前任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把法国人从美洲大陆赶出去。1708年底商务部确信，为确保西印第安人的食品来源，此事就必须办，尤其是幸亏有了塞缪尔·维奇的明确提倡。他是达里埃灾难的生还者，其征服概念已超过西班牙加勒比海到加拿大，这是他在贸易航行中了解到的。殖民地热心“光辉事业”稳步增长。北方的总督们保证支持，新英格兰人发出了事关紧急的口气，唯恐和平谈判要把加拿大、新斯科舍，甚至纽芬兰都交给法国。后来根据戈多尔芬透露，使英国在1709年撤销其援助的原因是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及原来打算去魁北克的海军中队现在转移到葡萄牙了。1710年马尔巴勒反对此事。^[30]受委屈的殖民地开拓者应为1710年10月获得了（安纳波利斯）罗耶尔港而感到心满意足。此港是由新英格兰民兵和尼科尔森上校（安德鲁斯的前副官）指挥的英国海军组成的大远征队取得的。尼科尔森上校让维奇负责一小支警卫队去体验有敌意的阿凯迪亚严冬的种种困难。

虽然攻克“北美敦刻尔克”后感到有些轻松，新英格兰人却把它看成是征服加拿大的前奏。英国的新托利党大臣们也认为这一次特大胜利是声名大震的事，是会议桌上抵消不利因素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圣约翰特别支持征服加拿大的举动，并从马尔巴勒的军队中抽出

几个团支持这个行动。负责监督这个有点匆忙的准备工作的正是他本人。波士顿专为军队筹办伙食的人和其他人要完成的准备工作太多了，远征军的领袖们也不幸运。新英格兰分队的主官是精力充沛的维奇上校，他隶属杰克·希尔将军指挥。这位将军是陆军总司令，是艾比盖尔的弟弟，军功并不出色。海军包括9艘军舰，另有60艘运输舰和其他船只，接受霍文顿·沃克爵士指挥。沃克爵士曾在地中海服过役。希尔和沃克有同等指挥权。早在远征军望见圣劳伦斯以前英国人就已经与新英格兰人冲突起来。沃克和希尔不了解执掌一支英—美军队的复杂政治含义。军需部长也一样糊涂，他甚至在评论人们的“乖张冷酷”和马萨诸塞政府“懒惰冷漠”时更是十分坦率。^[31]马萨诸塞令人伤心的错误就是不能提供得力的领航员。事实上，除为从陆上攻打蒙特利尔而为阿尔巴尼的尼科尔森2300人军队出了许多人外，殖民地还比它所答应得多征募了10%的人充当这次大胆行动的海军先头部队。也许波士顿和伦敦之间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相近的利害关系。预计会获胜的，结果却是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失败。在旧历8月20日晚上，在圣劳伦斯港湾靠近奥夫岛的地方，由于导航严重错误，造成在下风岸岩石上7艘运输舰和800生命的损失。^[32]沃克和希尔在所有海军舰长的支持下，认为这个灾难是决定性的，而维奇力争返回的后果很严重。在一片责备领航员和埋怨物资缺乏的声音中，远征军解散返回了。在英国，马萨诸塞变成了替罪羊。商务部原先在殖民地行政管理中充当的是平衡轮角色，宣传帝国各个部分的利益并设法调停它们的冲突，这次也避免了质问。尼科尔森、维奇和杰里迈亚·达默（马萨诸塞驻伦敦代表）都不能使英国公众相信灾祸的真正原因。纽约、马萨诸塞和新汉普郡企图再次发动远征，然而它们所作的努力也同样失败。普夏特兰正确作出判断，新法兰西的危险已成过去。直接的后果是恢复对新英格兰边境的攻击。

英国殖民地开拓者，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渴望和平的心情更有了韧性，因为恐怕他们的利益要牺牲给欧洲的英国人。继承战争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强调战略利益，而在加拿大问题上裹足不前、半心半意。另一方面，如果战争没有带来帝国合作决定性价值的明确范例的话，与1689年相比，怀疑下面这个问题的殖民地开拓者就更少了：待在一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的侵略国家以内要比待在以外好些。起码在表面上有一个帝国，不热衷于君主制度却强调新教，乐意把追求财富

看作基本目标。高级行政人员自己不安地看到殖民地开拓者全神贯注于地方问题或最大到省一级问题。虽然他们看到帝国分裂的种子，但他们又没有拿出办法来避免分裂。尽管革命和战争已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对他们来说，新英格兰统治权的崩溃已是必然的了。老一代行政官员如伦道夫、布拉特韦特和德高望重的波维都已故去，统治了17世纪最末25年以后，他们的中央集权想法也消亡了。将来的行政官员都比不上他们的影响力，也未出现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北大西洋帝国的根本问题提出相同分量的想法。因此，在英国，帝国思想很少超过赤裸裸的经济目标。它经常按照固定公式考虑政治关系，碰到政治问题，如果要处理的话，都在省一级而不是帝国一级进行。凡能从帝国角度提出有建设意义想法的人，大部分都长期或暂时住在北美，如威廉·伯德二世、维奇和奈恩以及一些总督们如约瑟夫·达德利、弗朗西斯·尼科尔森和罗伯特·亨特。他们的一贯目标是创造好的沟通条件，以便欧洲的英国人能较好地了解其海外同胞们的问题和态度。在他们心中，他们也希望帝国重心的中心点能从大西洋东岸开始向西移动。北美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展也使人看到它的重要性。经四分之一世纪战争尚能生存下来，说明英国殖民地确有前途。

1688年以来的事态发展给帝国带来一份显著的收获。新英格兰似乎不再与母国严重不和，虽然马萨诸塞对其州议会的权力仍保留着高傲的看法和某些独立的观点。战争环境提高了其他地方议会的权力，特别是纽约的议会权力，已受强有力的总督们的控制。达默对和平谈判进展情况的消息很灵通，但谁也没有要求另派代表去乌得勒支。其实，很少新英格兰人像达德利一样在研究了和平条约的条件之前就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和平”^[33]，他们更像是休厄尔。而休厄尔要求的亦只不过是承认他的州对胜利所作的贡献而已。马萨诸塞官方人士——这个新的（相对的）驯顺的出现，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州内部有了严重问题。新英格兰边境损失严重。在缅因，1675年与1713年间没有建立一个城镇；100多英里海岸缺少居民。新汉普郡实际上没有殖民地，康涅狄格只建立了少数几个镇。为此，20年中损失了5000—6000名年轻人。还有一点颇有意义：迁移不定的新英格兰人现在打算到别处定居。因此，科顿·马瑟大肆颂扬和平，他相信他这样做是得到大西洋两岸有思想的人支持的。然而他又不安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与许多人意见相左，这些人深信这是背叛行为。纽芬兰总督尼科尔森斥责“叛变、搞宗派、居心不良、尽力向海外人民散毒的小册子”，号召

写出忠诚的作品进行反击。^[34]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经济不振给和平带来的欢欣鼓舞投下了阴影；威廉·伯德二世对和平谈判的召开表示冷淡。纽约人对沿北美五大湖和密西西比的法国殖民计划仍怀戒心。

敌对行动结束了，法国社团害怕被抛弃的心情也消失了。路易斯安那仍为生存奋斗，法国人在发展内湖河流的堡垒处于有利地位。魁北克由于运气不错没有被人征服，但《乌得勒支和约》规定割让阿凯迪亚和纽芬兰两地，又使魁北克进一步暴露。然而新法兰西的简易外围工事并未被全部摧毁。阿凯迪亚的边界要留给两个大国的委员会来决定，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40年内不会开会，同时罗耶尔岛（布列塔尼角）仍被保留，这里的防御工事在普拉森夏交割之后立即动工。对新英格兰来说，它能进出新斯科舍，又于皇家安纳波利斯驻扎了英国警卫队，因而它的缅因边境进一步获得了保护，岸上渔民们也同样获得了进一步保护。在里斯威克和会上忽略了赫德森湾，博林布鲁克的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坚持其全部获得物作为和平先决条件。总的来说，法国威胁英国的能力，在四分之一世纪战争之后，已显示比以前更加危险。

在陆战中，英法的伤亡都比较轻，其印第安人辅助部队则较重。17世纪90年代，与法国结盟的部族只损失了100名战士，而1000多名易洛魁人则因打仗和疾病而丧生；在下一次战争中有800图斯卡罗拉人死于激战。在九年战争中，650名英裔美洲人据估计被杀或死于监禁。^[35]凡是人口显著下降的地方，如阿尔巴尼下降了四分之一，因害怕敌人而移居外国是下降的原因，并非死于杀戮。西班牙继承战争的伤亡数字更低：新英格兰损失了200名士兵，卡罗来纳损失了150人，法国死亡不到50人，而上一次战争只死亡300名。这个微不足道的损失对法国来说，高出生率能轻易弥补而有余；英国则靠外来移民弥补。^[36]长期冲突后，两个帝国的人口比率未变，在各次战争中人口规模翻了一番，新法兰西达1.9万人，英国大陆殖民地达40万人。重大变化在于英国的优势在压倒一切地绝对增长。

（王风林 蒋宗勋 译）

^[1]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51—353页。

^[2]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50页。

- [3] 《美国的光荣革命》（M. 霍尔等编，查佩尔·希尔，1964年），第54—55页。
- [4] 探究“领主政体”的封建含义，见C. 加拉尼和E. 拉沃伊编《从16到20世纪法国和法国的加拿大》中的M. F. Ouellet，魁北克，1966年，第159—160页。
- [5]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61页。
- [6] 在《法国和法国的加拿大》第84—85页中，J. 哈梅林和F. Ouellet论及农业制度的发展与其说是作为帝国经济目的的基础，不如说是社会体系的基础。
- [7] J. C. 鲁尔：《美国的旧政体：评论法国在美国的最近说明》，载《威廉和玛丽》期刊第3辑第19章（1962年），第580页。在这里，作者指出支持这一见解的论证来源。
- [8] 关于这些年里的毛皮交易，见本书原文第850—851页。
- [9] D. G. 克赖顿：《北方的自治领》，波士顿，1944年，第97页。
- [10] W. J. 埃克尔斯：《弗隆特纳克的军事政策，1689—1698：再评价》，《加拿大的历史评论》37（1956年），第201—224页；比较同作者《在路易十四之下的加拿大，1663—1701》（1964年），第170页。
- [11] P. 米勒：《新英格兰精神：从殖民地到州》，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3年，第160页。
- [12] 参见G. S. 格雷厄姆著《北大西洋帝国》，1958年，第69页。
- [13] 见本书原文第244页。
- [14] 关于法英鳕鱼渔场问题，见本书原文第848页。
- [15] 见本书原文第355—356页。
- [16]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66页。E. E. 里奇的《赫德森湾公司的历史，1670—1870》（2卷集，1958年）卷1提供了这次和其他战争的外交手腕和战斗的细节。
- [17] 易洛魁人的一支。——译者
- [18] 英美贸易后文讨论，见本书第23章（1）。
- [19] 1701年第473号政府殖民地档案一览表。
- [20] 见S. E. 摩里亚森著《英领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生活》，纽约，1956年，第255—265页；米勒，第13章。
- [21] 科顿·马瑟，Decennium Luctuosum：《印第安人的战争的故事，1675—1699》（C. H. 林肯编纂，纽约，1959年），第278页。
- [22] 见C. 布里登博著《主教冠和王笏》，牛津，1962年，第57页。
- [23] 见C. 布里登博著《荒野中的城市》，纽约，1960年，第228页。

[24] B. B. 詹姆斯和J. F. 詹姆斯编：《贾斯珀·丹克沃茨的日记（1679—1680）》，纽约，1959年，第266—268页。丹克沃茨是荷兰在北美的一个代理人。

[25] 见C. 布里登博著《城市》，第138页左右两面。

[26] 见吉罗《法属路安那史》第1卷（1953年），第217—223页。

[27] 其大规模殖民地计划见V. W. 克兰《南方边疆，1670—1732》（安·阿博再版1956年），第48页左右两面。

[28] 见Gizaud，第2卷，1958年，第6章。

[29] 有关这些事件，见克兰，第4章。

[30] 见G. M. 沃勒，塞缪尔·维奇（查佩尔·希尔，1960年），第156、177页。对照同一书第114页左右两面“援助桑德兰和苏格兰贵族”。

[31] 见《沃尔克远征到魁北克，1711》（G. S. 格雷厄姆编，Navy Rec. Soc. 1953），第25页。

[32] 见格雷厄姆：《沃尔克远征》，第33页左右两面。

[33] 见《休厄尔日记》第6卷，第356页。“影响北美的和平条款”，第470页。

[34] 见*Cal. S. P. Col.*，1712—1714，第523、731号。

[35] 见H. H. 佩克姆《殖民地战争，1689—1762》，芝加哥，1964年，第53页。

[36] 1680年以后移居新法兰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其人口年增长率在西班牙继承战争第二阶段只下降不到2%；17世纪60年代有一段时间高达5%。W. A. 里德尔所著《在魁北克教会控制的兴起》（纽约，1916年）第35页提供的人口调查数字如下：1681年：9677；1688年：10303；1692年：11075；1695年：12786；1698年：13815；1706年：16417；1712年：18440；1716年：20531。

第十六章 葡萄牙及其帝国，1680—1720年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在17世纪是以蔗糖、烟草和食盐为中心，到了18世纪，逐渐转向以黄金、皮革和酒类为基础，但并未完全放弃原有的主要产品。它以巨大的货物集散地里斯本为轴心，地位处于英荷资本主义和殖民经济之间。英荷资本主义部分控制着葡萄牙；其殖民经济本身则促使一个新的民族实体——巴西的形成，巴西也正从葡萄牙的殖民经济中缓慢地诞生。如果我们从价格变动^[1]的过程入手，就能很快地掌握促成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构上的变化的原动力，并把变化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在1668年与西班牙讲和以前，葡萄牙的物价一直在迅速上涨，而其他国家的物价则保持稳定。逐渐上涨的小麦价格在埃武拉从1667—1693年，在亚速尔群岛从1670—1693年，趋于稳定，在维亚纳杜卡斯特卢，情况也相同，不过那里黑麦和玉米的价格在1680—1693年间稍有下降。1693年以后，这3个市场和布拉干萨（位于最北端，进口商品达到山脉的那一边）的物价都在上涨，1710—1711年间达到高峰，本地生产的谷物的价格超过了进口谷物的价格。接着是一次周期性的下降，到1718年，布拉干萨在3年以后达到最低点，长时期稍有下跌或保持稳定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740年。大米（几乎全部从巴伦西亚、热那亚和威尼斯进口）的价格在1680—1690年间下跌，1709年又上涨到一个高峰，然后继续下跌，直到1728年以后。葡萄牙宗主国的主要出口商品^[2]的情况如何呢？在里斯本，橄榄油的价格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以后，于1670—1692年间下跌，然后又稳步上升，于1712年达到高峰（除了1708年左右的一次周期性的萧条以外，这种涨落也影响到各类作物，尽管时间比较短暂）；1712年后，直到1728年，出现了真正引人注目的萧条趋势。1649—1690年间，主要出口商品食盐以不变的价格卖给荷兰，离岸价格为每默德^[3]1480里斯，已缴税（660—700里斯）。^[4]1693年的饥荒使盐价猛然上涨一倍，到170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价，1默德卖6000—7000里斯。此后，狂涨开始下降；1713

年，11默德卖2650里斯，1714年为3650里斯。因此，国内物价的趋势可以概括为，1669—1692年下跌；1693—1715年间普遍回升；以后的20年间则是新的下跌或保持不变。

殖民地再输出商品的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了惊人的暴跌。1668—1688年间，丁香的价格下跌了72%，烟草下跌65%，而蔗糖——从1660年就开始跌价的一种更为重要的商品——下跌了41%。^[5]1672年和1675年，来自巴西的大批运糖船队的到达，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因为仓库里已经积压了大批存货。在巴西本土，甘蔗的种植减少了，到1686年，沿塔古斯河寻找货物的船只由于找不到巴西蔗糖而空船返回。实际上，所有的葡萄牙港口都渐渐地趋于衰落。和1654—1668年的平均水平相比，1669—1683年进入法鲁的船只减少了20%。船只载货不足，运费降到了无利可赚的程度。根据烟草部（政务会）1682年的报告，早在1680年以前，奥波尔托和里斯本海关货栈里的烟草尚未完税就成卷成卷的霉烂了。及至1683年，法国领事对里斯本交易所的全面崩溃，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那里不再有钱去买货物，也不再有人去购买货物，结果只能把货卖给很可能会破产或被宗教法庭抓住的人。”^[6]事实上，早在1675年，一连串的破产事件就震撼了里斯本。这次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并不仅仅发生在葡萄牙。在威尼斯^[7]肯定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西班牙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但是在葡萄牙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状况呢？

1666年，一场空前严重的天花流行病几乎扫荡了整个巴西，尤其是东北部蔗糖产区，人力损失严重，受害最甚。由此开始了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生产危机。此外，巴西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外国的竞争^[8]，这种竞争又由于有计划的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奴隶市场上的变化而更加严重。先是英国，接着是科尔贝尔，相继设置壁垒抵制外国的殖民地产品；在里斯本和奥波尔托，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船只仍在装运蔗糖和烟草，但主要是为了运往国外市场上出售，它们本国的市场大体已被葡萄牙的商品占领。在几内亚湾，荷兰人驱逐葡萄牙的奴隶贩子，使形势更趋恶化；在安哥拉，沿海地区人迹灭绝，黑奴的价格随着对逃亡者的追捕延伸到内陆而上涨。由于爆发独立战争和筹办布拉干萨的卡德琳的嫁妆，巴西大种植园的税率被提高了。事实上，自166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甘蔗种植园主被较高的工业利润率所吸引，转向生产酒类，向碾磨厂和饲养用于这些糖厂的牛马所需要的

牧场增加投资。因此，在糖厂增多，它们之间的竞争加剧的同时，可供压榨的甘蔗却在减少；而奴隶（工厂比种植园甚至更需要奴隶）、木材和其他用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就烟草来说，1678年前后，种植烟草的土地已明显地显露出地力耗尽的迹象。一个一个的困难迫使种植园主和糖厂厂主不仅向外贷款，而且（早在1668年就已开始）以三分之一的折扣向放债人预售产品。总之，一把钳子卡住了巴西的利润，这把钳子由市场价格下跌、生产成本上扬构成：由于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竞争，引起市场价格下跌；而各国对奴隶的争夺激烈，市场有限，生产厂家又过多，从而造成成本失去弹性甚至不断上升。

加的斯和西班牙美洲间的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1675年，驶往卡塔赫纳的西班牙船队一支也没有回来；1676年，由于在印度群岛“商品没有销路”，返航的船只几乎是空囊而归。更多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运到阿卡普尔科，致使欧洲货物的价格暴跌。同样地，在1682年、1684年、1686年和1690年，由于贸易不足，也就没有必要设立墨西哥船队；新西班牙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货物。^[9]进入加的斯的白银价格继续下跌。加上荷兰贸易本身自1668年以来遇到的种种困难，使得在葡萄牙流通的货币日趋枯竭，1669—1670年，造币厂收到的货币创造了下降数目最高的纪录，尽管从西班牙购买蔗糖、烟草、亚麻布和黑奴的交易中收回了少量货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白银从葡萄牙的各个港口流往欧洲北部；而现在，回收的货币减少，外国人带走的现金却越来越多。1665年以后，在货币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种“钱财外流”的现象更为严重。10年以后，全国三分之一的进口货物不得不以硬币支付。

社会和政治环境使得这种形势更加严重。^[10]长期以来，一直有一股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一种普遍存在的对商业思想本身的敌意，这表现在攻击那些被宗教法庭怀疑为信奉犹太教的公司和商业团体。当然，这股反动势力自是有其盛衰浮沉，而它对政府的影响也绝不是固定不变的。然而，17世纪70年代宗教法庭再次发难。法国领事德格朗热——这位公正的观察家，在1683年断然指责宗教法庭造成里斯本市场全面崩溃。但是也许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颠倒过来。不正是商业萧条刺激了反商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助长了宗教法庭不断地向商业团体施加压力吗？从1668年到1693年左右，帝国的经济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主要表现为蔗糖、烟草、白银和奴隶贸易危机的萧条时期。

最终促使经济恢复的那些力量是什么呢？1671年7月27日，法国驻里斯本大使圣罗曼写道：

我最近得悉，葡萄牙人因为我们增收糖税十分生气，他们正在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考虑兴建工厂，在葡萄牙本土生产缎带和大量其他商品。杜亚尔特·里贝罗已奉命为各行各业物色并输送尽可能多的工人。[\[11\]](#)

葡萄牙经济思想的一部主要著作，《关于王国技术的谈话简介》（1675年）竟会由一位驻法大使杜尔亚特·里贝罗·德·马塞多（1618—1680年）来写，这件事绝非偶然。他所处的地位使他受到科尔贝尔的思想影响。贸易危机导致一部阐述详尽的经济学说的问世。事实上，既然向法国、英国、荷兰出口的主要是蔗糖、烟草、西班牙羊毛及巴西木材，既然这些国家拒绝购买大部分货物，而葡萄牙既不能得到足够的外汇又不能继续无限期地以白银支付丝绸、毛织品、粗毛呢、缎带、烈酒、鲑鱼及其他进口货物，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在国内生产迄至当时为止依靠进口的那些商品。

1670—1671年，工业投资项目是掌握在国内外商人和工厂主手里的，国家受到两位财政大臣影响采取发展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大臣是托尔伯爵（后来的弗隆泰拉侯爵）和埃里塞伊拉伯爵——他正式接受了王国工厂作坊最高主管的头衔。这项政策吸引了法国、英国和威尼斯的能工巧匠，他们带着织机、框架、工具和图纸赶到葡萄牙，来兴建第一批工厂，培训出一支熟练的本地劳动大军。在巴黎，里贝罗·德·马塞多亲自负责征募工作，并想出不少办法使征募工作得以完成。在都灵，一位已经变成葡萄牙代理人的法国天主教教士布吕托也在从事这一工作。1670年年底，两位葡萄牙企业家在里斯本建造了一座熔炉，用威尼斯方式生产水晶玻璃、板玻璃和玻璃制品。威尼斯的技术能手们安装起熔炉，并管理生产；国家提供场地、给予贷款，在10年当中对进口设备和物资免征进口税及免征其他税款；工厂主、工匠和其他职员享有各种个人优惠政策，企业则在整个王国和大西洋诸岛享有垄断权。埃斯特雷莫兹有充裕的水源和橄榄油，从西班牙进口羊毛又很方便，1671年，一位精明的布商和8个女工带着生产哗叽、作筛眼用的麻布或丝织品及其他松软毛织品的织机，从鲁昂来到这里。1672年，这座国家创办的工厂转为私人企业。那一年，从巴黎又来了4

名能干的制帽工人，但是由于海狸毛皮不得不依靠进口，葡萄牙染料的质量又极差，致使投产推迟。1672年和1675年当法国使者设法把两名制帽工人送回国时，生产也就停止了。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生产情况比较顺利。1676—1678年，布吕托在埃里塞伊拉的怂恿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养蚕的措施。1677年，在里斯本，丝绸制造业的各种权利是掌握在罗纳尔·杜克洛手中的，他很快就有50部英国织机投入生产，还拥有一座大型精纺工厂；大多数工人是外籍人，但仅在里斯本就有300多名葡萄牙工人从事纺丝工作。1683—1684年，伯努瓦·杜克洛搞到一台抛光生丝用的法国式轧光机和一些加工塔夫绸和亚麻布用的法国式或威尼斯式的机器，安装了10部织机，请来了一些外国染色技师。1671—1681年的10年间，库维良和芬道周围的毛织业成倍增长。1680年，库维良的3个葡萄牙人在曼特加建造了一座有10台织机的生产台面呢和哔叽的工厂；同年，埃里塞伊拉已拥有5座已经在生产台面呢的大工厂，第六座正在托马尔兴建。1682年，由于采取新的管理方法和一些保护性措施，促进了西班牙式床罩的生产。在圣米格尔岛（亚速尔群岛），服装业也开始出现，到了1686年就定期向巴西出售产品了。最后，出现了冶铁业。在1654年以前，由于独立战争之故，难以从比斯开得到铁，于是国家重开托马尔和菲格罗·多斯·比努斯的锻造厂和铸造厂，这项工作是在一位法国官员迪富尔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儿子从法国找来了4名熟练的锻铸工人。1687年和1692年，国家改组了这两个生产中心；为铸造军械而设立的第3个中心，已在阿尔热河和泽济雷河交汇处的阿雷加建成。铁钉和熟铁制品，于1680年在里斯本的里贝拉港开始生产。

实行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进口，为了保护这一工业化的进程，颁布了节约法令，这是对进口货物的直接打击，但并不是针对奢华服装的。大臣们原曾打算提高关税率，但那样做就会违反国际条约，于是换了个做法。例如，1677年2月的诏书规定禁止在国内使用和出售法国帽子、缎带、高级花边、意大利织锦和更加昂贵的英国和荷兰衣料，但占进口货物相当分量的“新纺织品”（台面呢和哔叽）以及英国长筒袜并未受到影响。1688年8月，颁布了一个类似1677年2月诏书的法令，禁止进口一切羊毛织物，这项法令开始执行得非常严格，以致葡萄牙人的穿着变得式样单调、色彩暗淡了。

然而，工业政策和商业政策与货币有着密切关系。当葡萄牙硬币由于贸易逆差而日趋枯竭时，从西班牙购买硬币和块金也就越来越困

难。应该回顾一下1640—1686年间，在卡斯蒂尔发生的普遍的金融混乱^[12]，在铜币不断贬值的浪潮冲击下，白银的价格一直在面值以上，价格体系垮了，一片混乱。1686年10月，西班牙为了制止白银外流，将货币的表面价值提高了25%。同时相应地降低了新铸硬币的重量。这样，金银之比就成了1：16.48（英国是1：15.39）。这一贬值必然在葡萄牙引起同样的变化。埃里塞伊拉不仅指望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还想维持货币稳定。1685年10月，政府禁止低于法定重量的旧币流通的企图失败，1686年5月和8月，又强行在旧币上压齿边和打印记。1688年，政府决计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整夜的激烈讨论，并采取了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于7月4日颁布了贬值的命令。在收集旧硬币和在旧币上压印记期间，旧硬币按重量承兑。在公众的压力下，王室承担了一部分损失，但据统计，三分之二的损失是由市民承担的。这次大规模的改铸货币，使流通货币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商人们进行反击。他们把旧币运往荷兰压齿边和打印记，再运回葡萄牙，重量则低于法定标准。为了对付这种骗局，同时在西班牙货币贬值的压力下，政府于8月4日发布了一道命令，提高所有金币和银币的表面价值。其主要效果是给予葡萄牙一种可靠的货币，这种货币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稳定。埃里塞伊拉解释说，这次升值将会“鼓励（西班牙硬币）‘帕塔卡’和‘达布伦’从卡斯蒂尔输进来，没有这些硬币，王国的日常贸易看来将不可能维持”^[13]。早在1690年，货币已十分明显地充足起来。1691年4月，一艘葡萄牙商船从阿利坎特和卡的斯为里斯本的商人们运来4万“披索”^[14]；8月，一艘热那亚商船又从卡的斯运来8万披索。如果海关允许超过两万，1693年这艘热那亚商船还会从那里运16万披索到里斯本来。8月间，另一艘热那亚商船运来5万—6万披索，要不是害怕一支法国海军中队，数量还会大些。1695年1月，一艘托斯卡纳的商船从卡的斯运入大约10万披索。1697年8月，一艘热那亚商船只运来1.2万—1.5万披索，而一个月后另外两只船什么也没有运来。这时里斯本抱怨说，“如果西班牙船队不很快到达”卡的斯^[15]，它的商业将受到损失。

葡萄牙奴隶贸易的复兴，也有助于它经济的恢复。在30年战争期间，由于荷兰的进攻，葡萄牙遭到沉重损失。1640年后，长时期的独立战争切断了葡萄牙向卡斯蒂尔所属印度群岛供应奴隶的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一俟和平实现，奴隶贸易成为可能，政府和私人商行就发动猛烈的反击，夺回几内亚的部分贸易，把当时向西班牙美洲供应奴

隶占主导地位的荷兰人赶走。1678—1680年圣多美岛总督弗莱雷·德·安德拉德奉命在达荷美海岸——圣若昂巴普蒂斯塔德阿杰达（怀达）修造一个要塞，由于这个要塞，若干年后得以在几内亚海湾沿岸以东设立一连串的贸易工厂。与此同时，“几内亚河流及海岸卡谢奥公司”由国王（占资金的三分之一）、4个里斯本资本家（其中一人为法籍）和一个亚速尔人组成。资金为15万克鲁扎多，需要时由王室担保以4%的利息借与20万贷款。该公司依靠普林西比岛作为主要货物集散地，活动扩展到整个西非（包括安哥拉，虽然它在那里并没有垄断企业），到1690年这种状况已开始明显起来。1692年，它与国王签订向巴西西北部马兰豪辖区供应奴隶的契约，1693年初，与西班牙经营非洲奴隶生意的马林·德·古斯曼签订契约，每年供应印度群岛4000奴隶，价钱从5.5万至7万里斯^[16]，在非洲购买黑奴的价格（8000里斯）由葡萄牙国王给予担保。国王批准公司每年捕捉1500名安哥拉奴隶——限制在这个数字，是为了保证给巴西保留奴隶，另外1500名取自佛得角，还有1000名取自卡谢奥^[17]和黄金海岸。估计总营业额为160万帕塔卡。和西班牙签订的供应非洲奴隶的契约于1696年获得批准，公司的资金增加到46.8万克鲁扎多。这一成功是由于它的一条商船1698年从卡塔赫纳和哈瓦拉载了40万银镑到达里斯本；1699年4—5月，两只商船驶入塔古斯河，载有12万披索（还有运往卡的斯的皮革、洋红颜料和可可等货物）；11月间第三条商船在亚速尔（因为害怕阿尔及利亚的海盗船）卸下了2万披索和2000公担做染料用的洋苏木。法国和英国自然是全力以赴地分享这些意外之财——办法是给公司定期供应货物，租赁船只给它或者甚至出资入股。1697—1698年，英国驻里斯本大使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进入西印度群岛，英国甚至准备以伦敦商人的名义，签订一项对它不利的协定。^[18]

卡谢奥公司赚得的部分帕塔卡设法流入了果阿^[19]，因而有助于通过好望角恢复葡萄牙的贸易。葡萄牙人在他们的大西洋经济大萧条期间，又开始对此发生兴趣，不仅想重新夺回他们在东方贸易方面原有的份额，而且想把莫诺莫塔帕^[20]的黄金转移到大西洋，使莫桑比克成为向巴西供应奴隶的源泉，从而弥补几内亚奴隶来源的不足。巴西与印度洋之间的公开贸易在1671年即已提出，但是直到1680年3月，才由一项“阿尔瓦拉”（法令）批准，而当时期望中的东非黄金尚未流入。与此同时，对开拓东南非殖民地作出了新的努力。1677年10月，

有4艘船载着600—700男人和50个家庭离开里斯本驶往莫桑比克；1679年4月，另外两艘船载运着150名士兵和30个家庭驶往莫桑比克；1680年4月，一艘快艇载着男人和妇女出发。鉴于疾病在移民中造成的混乱，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政府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以至调回驻果阿的总督路易斯·德·门多萨，以便他能在基利马尼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立。

里斯本、果阿和澳门之间，贸易衰退已达几十年。1672年，确实有3艘从事印度贸易的大商船载运价值400余万克鲁扎多的胡椒、白布、地毯、丝织床罩和钻石从中国归来。但是在1673年，当里斯本白银短缺时，派往海外去的商船不得不减少。1675年原打算派5艘商船出航，但是只有一艘起航，尽管从果阿回来的3艘“载货十分丰富”。但是1680年返航的两艘从事印度贸易的商船却装货不足，1689年的两艘装货更少，以至不得不在巴伊亚装运食糖。1690年从事印度贸易的商船，若不是英国和荷兰因战争使他们自己的航运遭到危险而给它装了货，势必会空船驶回。但即便如此，也还需要在巴西游装运食糖和烟草。1692年从事印度贸易的商船也是这样做的。大约1675年，葡萄牙考虑了两种相反的解决办法。里贝罗·德·马塞多在安托尼奥·维埃拉神父的支持下，提出从东方运肉桂、丁香、胡椒及其他调料和药材到巴西，作为破坏荷兰在该地贸易的最好办法。其他人考虑更多的是仿效荷兰的办法，建立一家东印度公司。前任总督阿尔博尔伯爵1689年自果阿回国后，赞成这个想法，并得到总理福洛斯·佩雷拉的支持。但是当时国王允诺的援助，不足以掀起商人们的热情支持。不过这样一家公司还是在1693年建立了，资金为50万克鲁扎多，全部由私人认缴，公司董事为8名葡萄牙人和4名热那亚人。热那亚人提供了大量资金，国王提供船只，规定运费只付给公司，因为他在公司拥有股份。全部希望都集中于烟草在东方的销售情况。在经济上，时机是有利的，因为荷兰的东方贸易正日渐萧条^[21]，而且在战争时期，荷兰和英国一样，都倾向于使用葡萄牙货船。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走得更远，为了挤垮荷兰，他们正设法参加葡萄牙的公司。另一家公司资金为60万克鲁扎多，1695年创建于果阿，在东方范围内进行贸易。起初没有让宗主国葡萄牙参与，不过1698年国王强迫其参加，并于1700年安排将两家公司合并。合并后的资金为70万克鲁扎多，三分之二属于果阿人；认缴额还来自一位有影响的普罗旺斯人皮埃尔·德奥利奥利斯和两位富有的意大利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直到1690年或更晚一些——当衰退停止而复苏开始时——才开始营业，而且国王本人对它们很感兴趣。1698年驶往果阿的3只商船带出去50多万“帕塔卡”硬币（占货物总值的60%）和价值20多万“帕塔卡”的珊瑚（占25%）；1699年从事印度贸易的商船载有30多万帕塔卡硬币和大宗货物。当时人们认为东方贸易是繁荣的。商品贸易净获利35%，用帕塔卡货币进行的贸易获净利30%—40%。向海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硬币和烟草（由公司或国王付部分款）、珊瑚、意大利纸张、荷兰毛织品。最贵重的进口货物是未经琢磨的钻石，还有金线织物和银线织物、锦缎和其他丝织品，运往安哥拉进行奴隶贸易的色彩鲜艳的布匹，以及被褥、白棉布、瓷器、橱柜和箱子、硝石、胡椒、靛青、麝香和龙涎香。

然而这种繁荣是脆弱的。在葡萄牙人稀少的东非斯瓦希里海岸，穆斯林积怨已久。17世纪60年代，驶往印度的护航船队曾遭到海上强国帕特（帕塔）的骚扰，帕特苏丹在17世纪70年代围攻莫桑比克时，曾得到阿拉伯的支援。^[22]1698年，阿曼的阿拉伯人在占领帕特和桑给巴尔后，经过3年的围攻，又占领了蒙巴萨^[23]——这是对象牙贸易的一个沉重打击。再往南，葡萄牙对赞比亚的黄金和奴隶贸易的垄断仍然是牢固的，尽管发生疟疾、部落战争，有时出现其他欧洲商船，主要是英国商船。赞比亚三角洲出产稻米、小麦和食糖；其西南边出产棉花和木材，葡萄牙的种植园将苏法拉同色那连在一起，色那是政府所在地和最富有的奴隶主的家园。在这些地方的葡萄牙人，尽管一般都租种王国政府的土地，但大都独行其是。1694年驻果阿总督写道：“在赞比亚西河人人都想管理。”^[24]当时葡萄牙在卡兰加兰的贸易站正受到罗兹维的土匪首领钱加米尔的侵扰，他成功地使莫诺莫塔帕本人不再效忠葡萄牙，太特这个贸易和传教的前哨站，仅仅由于钱加米尔1695年逝世才幸免于难。在17世纪末，莫桑比克的首领发生内讧，并反对葡萄牙国王，它那些担任首领的承包商，即使在拥有总督的权限时，也因任职时间太短而不能降服它那些欧亚混血的封建领主们和他们的私人军队。尽管据说发现了新的黄金资源，它那一度极其繁荣的局面，犹如它的传教士们的传道热忱一样，看来已成为过去。这种停滞的局面，影响到与它有贸易往来的葡属印度各城市，实际上影响到葡萄牙在整个印度洋的势力。

在1700年以前，葡萄牙在印度还保留着的城市——在古吉拉特和孔坎——已成废墟。第乌和乔尔已经毁于与之竞争的欧洲人在苏拉特港和孟买港的开发；达曼和巴塞因的地产（他们现在唯一的收益来源）正日益遭到马拉塔族人的进攻；果阿的居民已无力维修他们雄伟的住宅，以保持其良好，到1687年，这个城市就“基本上被抛弃了”^[25]。此时，整个殖民地居民中男性白人和欧亚混血儿大约还不到3000人。几年中，来自葡萄牙本土的人已减少到150人^[26]，甚至城市上层阶级的居民也大部分是“葡萄牙化的”印度基督教徒。大群大群的印裔葡萄牙人在财产遭受损失和穷困潦倒的情况下，或为环境所逼，移居到外国人控制的地区。许多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定居——在特兰克巴尔和丹麦人住在一起，在本地治里和法国人住在一起，特别是在马德拉斯和英国人住在一起，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从17世纪70年代的大约3000人，增加到18世纪初的9000人。在孟加拉湾，同一时期操葡萄牙语的人估计在2万—3.4万，其中大约8000人在当今加尔各答的前身胡格利定居，至少有2000人在吉大港定居。总共有几千人继续住在马六甲、科隆坡、内加帕塔姆和这时已被荷兰占领的马拉巴尔等港口地区。这些移居国外的人地位差别很大。有些在各土著公国担任受尊敬的职务，如技术专家，特别是炮兵，他们在这方面的才干被认为是杰出的——18世纪初期在吉大港莫卧儿部队里的葡萄牙雇佣兵被描述为是当地“最盛气凌人的老爷”；其他人成为著名的商人，如在巴塔维亚和马德拉斯，该地的英国议会于1680年报告说：“我们最大的收益来自和他们贸易征收的关税。”^[27]相形之下，在胡格利，大多数人陷于贫困，沦为小旅店老板、小官吏和下等手艺人；在马拉巴尔和锡兰的人，情况也大抵相似。从种族上讲，这些印裔葡萄牙人是少数民族，通过与土著或外来的欧洲人通婚而逐渐被同化，他们的肤色差别很大“从漆黑的变成淡棕色的”^[28]。但是，在文化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共同的特点，甚至影响着他们所加入的团体。在荷兰人当中，情况更是如此，在殖民地养育的孩子几乎不会说他们的本国话，而宁愿说一种洋泾浜的葡萄牙语。事实上，葡萄牙语是葡萄牙的光荣最持久的象征，整个18世纪，它一直被作为西印度群岛沿海地区国际贸易、外交和传教活动的语言。^[29]

1692年以后出现的普遍的经济复苏，并不是由于东印度公司，更主要的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九年战争”一爆发，葡萄牙就利用

租船人一般都是外国人，不愿租用挂着交战国国旗的船只运货这个有利时机，立即把船队派往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港口，运去盐、糖、烟草、橘子、巴西木材和羊毛。1689年8月间，里斯本连一捆烟草也没有留下，价格上涨了30%以上。不久就出现了一个由新教徒^[30]和富商组成的有限公司，把烟草连好带坏全部买了下来，控制了整个市场。1689年年底，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为了鼓励销售而降低糖税。1690年巴西（护航）船队的抵达并未引起糖价下跌，而当法国对卸在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葡萄牙食糖立即增税15%时，财政大臣亚莱格莱特侯爵解释说，只有法国会吃亏，因为意大利人会把它全部买下。但这个时候，整个北欧都急需盐、油、酒和羊毛。因此，葡萄牙明显的经济复苏不单单是依靠出口其殖民地的产品，而且也有赖于出口葡萄牙宗主国的商品和再输出从西班牙（以及西班牙所属美洲）进口的商品——法鲁、锡图巴尔和里斯本成为这条运输线上的货物集散地。法国的敌人的护航船队整队地来到葡萄牙的各个港口，满载货物而去。1693年英国除购买大量白银外，购买的葡萄牙产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瑞典人和丹麦人也在武装护航下派来了更多的商船。葡萄牙的海运业仍然继续获利。1694年，粮食出口的平均价格为战前的4倍。法国观察家羡慕地说，从那以后，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变得非常富有了。这种繁荣兴旺的景象，大大刺激了巴西的生产，及至1698年初，葡萄牙再次发生食糖供应过剩，价格暴跌，尽管1699年糖和烟草价格高涨。事实上，西班牙、意大利、汉堡、荷兰和英国仍然什么都买。不仅如此，还打开了新的销路。例如，加泰罗尼亚开始购买葡萄牙的咸鱼；大约是在1700年，巴西烟草成了加泰隆人的一项大宗贸易的商品。此外，1700年汉堡各制糖厂使用的是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粗糖，而提供最大份额的是巴西。尽管也有间断的时候，但这种普遍繁荣一直持续到1714年。当时法国领事仍然写道：“贸易量每天都在增加。”^[31]1708—1713年间，仅从英国、荷兰和汉堡进口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就达1600万克鲁扎多。

至于葡萄牙的农业产品，在这次普遍复苏中主要是依靠橄榄油和酒类。独立战争曾经毁坏了阿连特茹省的橄榄园，并造成下贝拉省的橄榄种植业发展减缓。但在1668年以后，由于受到国外和波罗的海地区市场需要的刺激，在南方省重新开始种植橄榄，而且在该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间逐渐扩展到北方。1691年，仅仅里斯本运往欧洲北部[远至但泽（今格但斯克——译者）]的橄榄油就达1万大桶，奥波尔托运

出5000大桶——分别占两个港口出口总量的六分之一和七分之一。各地的榨油机成倍的增加，特别是在可以利用水力的沿河地区增加得更多。著名的有圣塔伦（该地有200多台榨油机），以后是沿塔古斯河、泽济里河和纳宝河向北和向东北，直到科英布拉，而在维科萨镇和阿尔卡塞杜萨尔附近，还有其他的榨油机集中点。

更为重要的是在葡萄牙大陆的几个地区和一些岛屿上，葡萄园和酿酒业的扩大。1715年左右，在亚速尔群岛的皮科岛和法亚尔岛，每年收集2.5万大桶普通葡萄酒和5000桶白兰地，这里酒的产量在40年中增加了5倍，销往巴西、小安的列斯、新英格兰，甚至销往欧洲北部（起初是在战争时期，但后来就定期运往北欧销售了）。随着波罗的海地区销路的扩大，葡萄的栽培也扩展到了圣米格尔，大约1725年那里生产了约4000大桶葡萄酒，但是，如果说亚速尔群岛的产量超过了马德拉群岛，马德拉群岛的产值却大于亚速尔群岛。接近1718年时，马德拉群岛每年生产约2万大桶浓烈的白葡萄甜酒和800桶白兰地——比1650年增长10倍——主要销往美洲。英国人和荷兰人一向是马德拉岛白葡萄酒最好的主顾：1690年约有50艘英国商船满载这种酒运往巴巴多斯或英格兰，1693年有60艘英国船和荷兰船前来购买白葡萄酒。18世纪，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每年平均大约消费9000大桶白葡萄酒，荷属安的列斯消费400—500大桶，用英国的制造品或荷兰和北美的粮食偿付。正如亚当·斯密后来所说，“马德拉的酒并不是一种欧洲商品，可以直接运进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而不至于违反《航海法》。^[32]1700年的葡萄牙地图上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葡萄园。我们甚至在内地的高地上也发现了葡萄园，当然这些园子后来是要放弃的。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期间，葡萄种植业一直在继续扩展，塔梅加河附近巴斯托乡村著名的日光浴室——有钱地主的乡间住宅的建造，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王国复兴以前，那地方原来十分贫穷，人口稀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建筑物；现在则随着产量相当可观的各种新酒的名声开始传播，人口也增加了。当然，自从中世纪以来，杜罗河流域就一直在栽培葡萄，而且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在征服两岸的坡地。然而只是在1600年以后，才酿制出后来被称为葡萄酒的芬芳甘美的酒，特别是在1688年以后，这里大量栽培葡萄，并做出最大努力来提高葡萄酒的质量。科尔贝尔1667年的《关税法》和1672年的战争，使得荷兰酒商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在波多黎采购^[33]，而是转向马六甲、阿利坎特、赫雷斯、加那利群岛、锡图巴尔和里斯本。英国人

也步他们的后尘，九年战争更促使他们优先选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34]1690年，仅仅从波尔图驶往英国的葡萄牙商船就至少有24艘，他们一共买进约1.4万大桶；1692年英国进口了12953大桶葡萄牙酒，从西班牙进口的是14178大桶，然而几年以前进口的葡萄牙酒还不到西班牙酒的一半。1692—1712年，英国进口的葡萄牙酒为法国酒的10倍，西班牙酒的3倍。荷兰、汉堡和波罗的海沿海地区销路仍然不畅。上杜罗河流域的葡萄园产量提高到了5.5万—6万大桶，一半出口，一半供宗主国和海外的葡萄牙人消费。

这一意义深远的农业运动得益于贸易复苏，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的复苏。由于这个运动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登上了舞台。工业化的政策突然崩溃了。工业化政策的幕后策动者埃里塞伊拉于1692年自杀了。诚然，这位弗隆特拉侯爵严格说来是将造船和办工厂协调起来发展的最早倡导者，他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还能担任财政大臣，但是他的影响已经减弱，或者不如说因为他拥有葡萄园，他的政策已经改变。别的人接过了舵，把它转到了不同的方向。由于发展制造业的政策是对贸易不景气的回答，因而随着繁荣的到来，这项政策似乎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工业家们”让位给葡萄和橄榄的大种植园主。对葡萄园特别感兴趣的大地主阿莱格莱特侯爵，现在成了财政大臣，而司法大臣卡达瓦尔公爵，也是一个种植葡萄的大酿酒商。虽然这位公爵从1658年起直到1727年去世，在政界断断续续地身居要职，但也曾几次失势，其中一次恰恰与埃里塞伊拉的统治相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17世纪甚至18世纪初期，葡萄牙的酿酒家和商人发现，他们在竞争中的某些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人们认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和白兰地质量更好。事实上甚至在葡萄牙和巴西也喝这些酒^[35]，主要购自波尔多和加泰罗尼亚。1685年曾废除传统的自由进口而实行进口限制，特别是对西班牙的产品，严格地强制实行了几年。不过在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初有所放松。在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从法国的进口停止了，葡萄牙宗主国和亚速尔群岛的生产在法国专家指导下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葡萄牙的酒和白兰地时价过高，又引起从加泰罗尼亚、马略尔卡和卡斯蒂尔的进口量增加。面对这种情况，1708年重新实行进口限制。这一次是全面限制，并于1710年8月正式恢复执行。引人注目的是，前几次强制实行进口限制时间都不长，而这次尽管外国

提出强烈抗议，葡萄牙的政策却执行得卓有成效——这证明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在起作用。事实上，这时的关税政策是由卡达瓦尔、阿莱格莱特和弗隆泰拉代表大地主制定的，目的在于使大地主们能够以比从前高得多的价钱和大得多的规模出售他们的葡萄酒。1709年之后，人们抱怨说葡萄园正在取代耕地，结果增加了谷物进口。但是，当时整个葡萄牙的贵族都热衷葡萄酒的大量出口，特别是对英国的出口。

因此，1692年以后，整个工业化政策被放弃了；节约法令受到漠视；1687—1688年对陶器、砖瓦和玻璃制品等工业品的限制，以及对海狸皮帽子和黑布等的限制，均被撤销。诚然，1698年11月的一项新法令对进口男服的式样作出了规定，并第一次禁止进口染色布和粗毛地毯；而另一方面却允许薄绸、毛织品、帽子、缎带和布雷顿亚麻布自由进口，这样就打击了英国人，而过去的种种限制原是针对法国人的。但是这些规定一公布，人们马上就普遍认为它们不会比过去的规定执行得更有效。从1692年以后，大权掌握在种葡萄酿酒的人、生产油的人和大商人手中。制造业的兴起，被证明仅仅是葡萄牙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中界限分明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插曲，这两个阶段是进口巴西的食糖和烟草、图巴尔的盐和卡的斯的白银的“循环”，以及葡萄酒、马德拉葡萄酒和巴西黄金的“循环”。

1692—1697年英国对法国酒类的征税提高^[36]之后，葡萄牙所缴的税款不及他们的主要竞争者进入英国市场所缴的一半——这种优惠一直继续到整个18世纪。1688年，卖给英国的葡萄酒开始从前10年的每年平均572大桶增加到后10年的每年平均6668大桶^[37]——增长11倍以上。以后直到1718年才再有一次这样的猛增。1668—1669年和1699—1700年间，葡萄牙对英国的出口总计增长了3倍，从英国的进口增长了1倍（新式布匹和服装增长2倍）。这些进口货物的总值1699年上升到25万英镑，1701年上升到277190英镑，1702年上升到460465英镑，1703年上升到714241英镑。这样，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不仅远远没有被1698年的法令制止住，1699—1703年还几乎增加了两倍：1705年达到818995英镑的高峰。

一位英国布商的兄弟约翰·梅休因，担任威廉三世的驻葡萄牙公使直到1697年，他目睹了工业化政策的崩溃，并亲眼看见与他关系密切的葡萄园种植园主们对经济的控制。他的儿子保罗又继承他的衣钵当了公使，但在1702—1703年，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可能失去葡

葡萄牙这块阵地的时候，约翰·梅休因亲自回到里斯本，即使不算收买，也是要对葡萄牙的政治家们进行引诱。1703年12月27日签订的经济条约作了两项简单的规定。葡萄牙方面批准进口过去或多或少是偷偷摸摸进口的全部英国布匹。作为回报，英国方面给予葡萄牙酒超过法国酒的优惠，法国酒的进口税要比葡萄牙所付的税至少高出三分之一。但是这种优惠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这两套税率之间的实际比例，因为葡萄牙当时所付的税款并没有（也绝不会）超过一半。因此，这项以梅休因命名的商业条约，只不过是给一种处于既成事实的贸易地位的双方打上合法印记而已。与其说是它本身有任何变革，不如说这是葡萄牙1692年在政治上180度大转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说从某种观点看来，这项条约是战争的副产品，那么必须承认是战争本身推迟了条约所支持的酒和布匹贸易的发展。^[38]此外，荷兰也从中得到好处，因为1705年8月财政委员会不顾过去的法令，下令免除荷兰布匹的税。1706年2月王室又下令正式撤销以前实施的各种限制，理由是英国已享有这样的豁免权。这是促使英荷竞争的一个聪明的行动。

葡萄牙在17世纪时总是仰赖着法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对立，是它保持独立的一个支柱。悬在葡萄牙头上的威胁，纯粹是领土问题，因此它必须依赖大陆上一个大国的支持。在法国方面，有一把匕首永远对准西班牙的侧翼，它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也有其他利害关系促使他们支持葡萄牙，特别是在1664年以后。因此，随着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兼并葡萄牙在印度的一家工厂和与葡萄牙的东方各港口自由贸易。后一个目标除澳门外，在1669—1670年得到部分实现。但是在1670年，当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第一次变得尖锐时，法国提出一项分配办法，想要获得比戈或马扎干（在摩洛哥），或在印度得到一个立脚点，这时葡萄牙除了王后（她本人是法国人）和两名大贵族外，没有人对这次讨价还价的机会发生兴趣。葡萄牙宁愿坚持奉行一条严格的防御政策。1668年葡萄牙对得以避免自己的王位继承战争^[39]已经深感满意，1687年它的王朝的未来由于彼得二世的第二次婚姻而得到了保全。

在1689年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的一位公主与卡洛斯二世结婚的种种计划，和11年后彼得二世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的计划一样，都成了泡影。但是有两个既是政治策略又带有经济性质的动机，促使葡萄牙干预西班牙的事务。首先是巴西南部边界的划定，葡萄牙自1679

年起就主张以普拉特河为界（那里有它的新殖民地萨克拉门托，盛产皮革），由于这条河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图库曼，又可作为取得它垂涎已久的白银的一条渠道。其次葡萄牙本身的边界，只有依靠把阿尔坎塔拉、瓦伦西亚德阿尔坎塔拉和巴达霍斯这样一些要塞转让给它，才能得到保障。这些地方还可以带来已经供应葡萄牙粮食的有用的麦田。显然，葡萄牙也不会甘心看到西班牙的王位落到一个敌对的王朝手中而不加以反对。但是两次协商划分边界的条约它都未能参加，法国事后要它接受这两项条约，这至少使葡萄牙得以提出他们的要求，但也只能立即遭到威廉三世的拒绝。不过路易十四至少是表示赞同地倾听了他们的要求。即使这样，最后里斯本还是不得不同意这两项条约而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补偿（1700年10月15日）。当卡洛斯二世的遗嘱将这整个问题重新提出时，法国和葡萄牙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

因此，葡萄牙的对外政策的传统趋势，促使它站在法国一边，法国是在任何情况下关心给予它所要求的领土保证的唯一大国，而荷兰和英国则继续要求清偿旧债。这些要求被认为是太过分了。另一方面，正当巴西的黄金开始流入时，英国和荷兰的海军却威胁要控制海洋。政府夹在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当中不知所措，直到1701年4月威廉三世承认菲利普五世为止。然后驻凡尔赛大使库尼亚·布罗查多建议它也照此办理，并接受法国的建议。由此产生的1701年6月18日同西班牙和法国缔结的条约，对葡萄牙都相当有利。这些条约明确承认它对萨克拉门托的权利，支持它对英国和荷兰提出的债务要求的态度，支持它本身恢复对马希姆岛（该岛曾被英国占领）的主权要求，以及在发生战争时从荷兰收回利钦和卡纳诺的要求。但是，如果战争发生，葡萄牙必须承担对英国和荷兰封锁它的港口的义务。

这种立场看来最符合葡萄牙的利益，但实际上不久就证明行不通。因为它的整个经济和政府财源都依靠海上贸易，而法国几乎不可能保护与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以及它本身生命攸关的海上要道。1702年，由一支法国中队护航的载运金银财宝的船队，返航途中在维戈遭到袭击。虽然英一荷舰队正忙于运送部队登陆，未能拿走已经被卸下的大量贵重金属，但却烧毁或击沉了20艘法国船和4艘西班牙大帆船，俘获9艘其他大帆船和8艘商船。由维莱特率领的一个中队共8艘舰船，自1701年7月起就一直停泊在塔古斯河上。当他们前去与加利西亚的中队会合时，与英一荷舰队遭遇，于是这支孤立的中队就轻而易举

地被摧毁了。这些胜利和强大的英军在葡萄牙沿海的经常出现，都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依据：里斯本担心会遭到炮击。约翰·梅休因和一位荷兰使节从5月间就在里斯本，这位英国人十分懂得怎样利用种植葡萄的酿酒商的势力。公共舆论指责王室忏悔神父，国务大臣（罗克·蒙特罗）、财政大臣（阿莱格莱特），甚至卡达瓦尔接受大量馈赠。自1688年即担任总理的门多·德·福洛斯·佩雷拉于1702年被撤职，驻凡尔赛大使库尼亚·布罗查多被贬黜。如果说海军力量对比在当时发生的外交转变中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应该记住葡萄牙和法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特别是当葡萄种植园主在里斯本掌权的时候，这种竞争超过了葡萄牙和英一荷之间在经济上的抗衡。然而，要使葡萄牙改变它的中立立场而站在大同盟一边，还需要整整一个冬天的协商。尽管在适当时机一支海军中队的出现，就足以破坏它对国王菲利普所作的保证，但还不足以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葡萄牙的战略地位确实给了它一些王牌。由于1703年5月16日的两个条约^[40]，它确实是参战了，并承认了它欠荷兰的债务，后来荷兰只同意把债务从100万克鲁扎多减为85万克鲁扎多。但葡萄牙也得到了半岛的最高指挥权，包括辅助部队、武器和在该地作战的津贴（第一年150万克鲁扎多，此后每年100万克鲁扎多），除此之外，葡萄牙还根据秘密条款得到两点重要好处。第一，西班牙必须放弃它对普拉特河北岸的权利要求^[41]，而且不仅交出埃什特雷马杜拉的各个屏障要塞——巴达霍斯、阿尔伯尔基和巴伦西亚、德阿尔坎塔拉，还要交出加利西亚的图伊、瓜尔迪亚、贝奥纳和比戈等城镇。第二，也是主要的，在大公到达里斯本之前，国王彼得应断然拒绝参战或承认“查理三世”。

又过了一年，才在西班牙开辟了新的战线。从1704年到1708年夏季，葡萄牙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很重负担，咬牙坚持到1712年年底。开头5年，除了在它最暴露的省份阿连特如、贝拉和米纽派驻防御部队以外，它保持着一支拥有2万步兵和5000骑兵的突击部队。在葡萄牙土地上约有1万名英国和荷兰的步兵以及2000骑兵给它以支援。它的人力资源如何呢？与大得多的邻国相比，它的人口情况好多了，从1640年的不足200万人增加到了1732年的2143668人。如果我们设想1703年的人口至少也是这个数字，这是很有把握的，很可能还超过此数，因为众所周知，由于西班牙战争和巴西的淘金热，相当数量的城镇和大村子缩小了，有时缩小得相当厉害。只有波尔图在那段时期以后有所扩大，人口从14909人（11岁以上）增加到1732年的30737人。

与独立战争一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毁坏了阿连特如和贝拉的广大地区。1704年5月和6月，这些省份遭到贝威克公爵的侵犯，随后又遭到米纳斯侯爵在北方领导的反击和加尔维亚斯伯爵在南方领导的反击。其间，萨尔瓦特拉、伊凡尼亚、佩尼亚、加尔西亚、蒙桑托、卡斯特洛布兰卡、波塔莱格雷和卡斯特洛德维德都曾一再易手。这意味着盛产橄榄、葡萄和水果的地区以及重要的纺织中心都受到了影响。从1707年春到1708年春，轮到塞尔帕、莫拉和诺达尔遭受侵略，以后又被收复，麦田、葡萄园、果园和橄榄园都遭到损失，特别是橄榄园，西班牙人撤退时有意把它们砍掉。从1712年9月28日到10月29日，马约尔营遭到围攻，承受巨大痛苦。事实上，这个盛产谷物的富饶的边疆地区，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战场。然而在1704年之后获得在葡萄牙土地上的主要战场这个可怕荣誉的却是阿连特如，因为它的谷物、牲畜、酒和油有利于为军队提供给养。

这场战争在经济上还造成了另一个非常不幸的后果。由于葡萄牙一部分固定的谷物供应通常是来自西班牙的埃什特雷马杜拉，所以面包师的烤炉不得不放慢速度了。在1694—1695年的大饥谨时期，里斯本的小麦价格上涨到每阿尔克雷500—600里斯^[42]，而在正常年景是200—230里斯；1708年12月上涨到700里斯，阿连特如有四分之一的马匹饿死；1709年2月上涨到1000里斯，4月初高达1200里斯。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人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运载成袋谷物和成桶鲟鱼干、奶酪和黄油的大同盟庞大的护航船队的到来。1709年4月底，由于一支英国护航船队的来到，小麦价格跌到960里斯，随后又跌到720里斯。一支更大的荷兰护航船队到达后，小麦价格本来可以固定在这个水平，但是，到了11月，这些供应品耗尽了，饥谨又开始蔓延，而且由于雨水毁坏了玉米收成而更加严重。因此，葡萄牙人急于休战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在这不幸的一年的年初，双方总司令之间商定的局部停战^[43]，保证了阿连特如的农民和他们在阿连特如的牧场的安全，确实使他们多少松了一口气。到了1709年接近年终时，关于和平的谣言四起，卡斯蒂尔的谷物通过阿连特如河运入，所有的内陆港口都恢复了正常贸易。1712年秋，这个地区烽火又起，不过到这时整个战局已呈僵持状态。

葡萄牙的金融市场对美洲白银的依赖，前面已经强调指出。在17世纪的最后20年中，卡塔赫纳的船队每5年才返航一次，墨西哥的船队

大约每3年返航一次，平均载回1900万—2000万帕塔卡银币和价值600万—700万的货物。^[44]这种已经缩小了的贸易，又因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敌方控制了大西洋航线，贸易逐渐完全依赖于法国的海军护航，因而进一步受到阻碍。1703年的商船队是当时已知的最富有的一支，它终于安全到达卡的斯，但是英国和荷兰享有了最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商船一抛锚，法国人就坚持要求采取有效行动，以阻止白银流入葡萄牙。在这些年代中，葡萄牙尽管和西班牙人多多少少进行着私下贸易，但市场上白银仍然奇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舰队甚至单独的船只，几乎总是自由地行驶于葡萄牙和巴西的各港口之间，这是对它们决心站在海上强国方面的报偿。但是，尽管帝国的交通要道能够由此得到保障，一些海外领地却并未逃脱法国的注意。1709年，圣多美岛遭到洗劫，1711年9月，里约热内卢被私掠船船长迪盖·特鲁安劫持以勒索赎金。

王位继承战争的结局在许多方面充满矛盾，它的结果对葡萄牙来说也是矛盾的。法国和西班牙被局部打败了，葡萄牙获得的报酬是：西班牙放弃对普拉特北岸的权利要求，法国声明放弃亚马孙河以北远至法属圭亚那的奥亚波克领土。然而，菲利普五世还占据着西班牙的王位，葡萄牙因此就不可能获得本可以从查理三世手中拿到的埃什特雷马杜拉各个设防要塞和加利西亚了。此外，葡萄牙像法国一样，不得不将有利可图的阿西恩托（指贩卖奴隶契约——译者）拱手让给新的海上统治者，以支付取得海上胜利的费用。

16世纪，在普拉特河与秘鲁之间已开辟了一条商船的航线。葡萄牙人很快就利用这条航路，把黑人贩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供给波托西矿，由此得到白银；在17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葡萄牙人。这项贸易因独立战争而中断，但是在1670年前后，当17世纪中期的危机造成持久的萧条时，巴西人重新靠贩运黑人牟利。来自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的商人，还有总督，将快艇派往普拉特河，他们相信就连当地最高当局也会顺从他们，不过来自塞维利亚的获得特许登记证的商船企图阻止这一竞争。1671年葡萄牙国王正式下令开放巴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贸易，从而打破了总督想为自己垄断这条航线的企图。利害关系是明显的，索萨·弗莱雷自巴伊亚写道，“这个国家由于缺钱正濒临绝境，但是如果我们设法进入他们的港口，卡斯蒂尔人就会给我们的船装满钱。”^[45]

17世纪70年代，葡萄牙终于着手实现科雷亚·德萨的将巴西延伸到普拉特河的旧梦，因而情况有所改善。1668年他们在拉戈亚·多斯帕托斯和拉古纳附近建立了居留地，1676年国王将普拉特河以北的土地租给萨尔瓦多·德萨的子孙。就在这一年，当罗马建立起里奥主教辖区，将管辖范围扩大到普拉特河时，里奥市议会请求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对这些领土的权力。1679年，受封为南部巴西辖区总管^[46]的多姆·曼努埃尔·洛博，奉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面建立一支200人的边防驻军。于是1680年1月建立了萨克拉门托殖民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在巴拉圭耶稣会会士的帮助下，摧毁了这第一个殖民地，但是根据1681年5月7日的条约，西班牙同意由葡萄牙人临时占领该地。殖民和开发，特别是饲养牲畜的工作，迅速而坚决地进行到1704年。新殖民地的前景必须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起来考虑，1687年5月从那里来的两艘商船，装运了150万皮阿斯特和价值35万皮阿斯特的6万张皮革抵达加的斯，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但是1691年4月，一艘载有5万皮阿斯特和皮革（食糖除外）的商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奥来到里斯本；9月7日又有其他船只载来5500张皮革和大约20万皮阿斯特——这是“葡萄牙人有时通过他们在圣加布里埃尔岛的要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贩卖奴隶的结果”^[47]。据认为，这项贸易可以增加至每年100万皮阿斯特（即8万英镑）。我们每年都发现一船船的皮革，1699年，我们听说这些皮革大部分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里奥护航队所承运的绝对数字表明，这些皮革不仅仅是和西班牙地区进行走私的货物——这就是说，葡萄牙人自己在饲养牲畜，他们的牧人在捕猎内地迅速繁殖野生牛群。1704年，西班牙总督巴尔德斯依靠从耶稣会教士为传教和教育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建立的“小村庄”派出的大量印第安人分遣队，重新占领了刚刚在乌得勒支和会上收复的萨克拉门托；但是1713年以后，葡萄牙人重新恢复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不过这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本身的贸易所受限制已大大减少，因为1723年有一只英国南海公司的商船将皮革运到那里转运里斯本。事实上，葡萄牙的首都这时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皮革市场。此外，秘鲁和普拉特河之间的白银贸易仍在继续进行，因为（正如1697年的一份备忘录^[48]中所说），从利马用骡子，沿安第斯山路下行，穿过南美大草原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比经卡亚俄和巴拿马到波托贝洛这条官方路线更快些。

另一方面，亚马孙河从未成为连接大西洋和矿藏丰富的高原之间的桥梁。1637—1639年，佩德罗·特谢拉曾经成功地从亚马孙河口到达基多并返回，葡萄牙人不顾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多次做过这样的旅行，而利用特谢拉这次旅行，提出对远至上亚马孙河的主权要求。要想开发并垄断这一大片地方，必须在亚马孙三角洲和圣罗克角之间的地带殖民定居。大约1640年，在马拉尼翁和帕拉辖区约有1500名葡萄牙人和4万名效忠的印第安人，他们将捕获的印第安人贩往伯南布哥，他们栽培烟叶和糖料作物，也有希望种植棉花和香料。锡兰和马拉巴尔丧失给荷兰以后，里斯本不得不从别处寻找某些香料和药材。1669年，在亚马孙河的支流图康廷斯一带果然发现了丁香和肉桂。大萧条又进一步促进了这项工作。1671年，国王对马拉尼翁和帕拉的总督作出让步，条件是要促进靛蓝的生产，贝伦市议会必须鼓励香草和可可的生产。从锡兰和印度移植各种香料和药材，以便通过好望角破坏竞争对手的贸易，这个主张也重新提了出来。从东方引进的树木、植物和种子，1680年首先在巴伊亚，以后又在伯南布哥和马拉尼翁种植或播种；1683年请来了坎纳拉^[49]的技术专家。胡椒试种失败，但是肉桂获得成功。1690年马拉尼翁和格脑·帕拉开始在大西洋经济中发挥作用，因而对经济的全面复苏作出了贡献。这一年，他们派出了一只载有7000阿罗巴^[50]丁香、一些靛蓝、可可、菝葜和烟草的商船到里斯本，虽然香料的质地很低劣。不久，每年驶往葡萄牙的就不仅是一艘船，而是一支有3—5艘船的小船队了。丁香主要在意大利市场销售，部分转销德意志；可可质量仍不如加拉加斯出品的，但已较法国安的列斯出产的为好，香草则较西班牙美洲的品种低劣。

所有这一切皆以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充裕为条件的。1675年有60个家庭从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移居马拉尼翁，自1682年起，连续20年，卡谢奥公司不得不每年供应500名黑人。1685年以后，私人也参加了这项贩卖黑人的活动，但是仍然供不应求，因而黑人价格昂贵。耶稣会会士主张进口非洲人，以便最低限度地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因为他们想要利用印第安人在北方建立一个新的巴拉圭。由于这个原因，在1661年和1684—1685年的当地叛乱中，神父们数次遭到移民们的驱逐。耶稣会的国际性地位，使它受到怀疑。但毕竟是耶稣会会士在弗里茨神甫^[51]的领导下，于1685年从安第斯山下来，将葡萄牙人从他们无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而正在兼并的领土上赶走。当时在上亚马孙河已发现葡萄牙人，1691年一支武装分遣队在远至里奥·纳波的地方建

立了葡萄牙的统治权，对此，西班牙政府在1707年以前未作出任何反应。葡萄牙政府宁愿把耶稣会传教士留在亚马孙河以南，而让它所信任的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沿里奥内格罗流域传入亚马孙河以北，这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1709年，伊纳西奥·科雷亚将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从亚马孙赶走，来自基多的一支西班牙武装远征队遭到来自马拉尼翁的反击，马拉尼翁胜。

早在1637年，葡萄牙人在亚马孙河以北，远至奥亚波克的“荒芜的海岸”建立了统治权，以后卡宴的法国人对奥亚波克提出了主权要求。1687年，葡萄牙人在三角洲北岸修筑了马卡帕要塞，10年后，法国人曾短期占领这个要塞。根据1701年6月18日的条约，葡萄牙将这片领土割让给法国，但是遇上王位继承战争的好运，它又趁机在乌得勒支和会上收复了这片领土。里斯本想要停止圭亚那和马拉尼翁之间的全部贸易，因为法国人在马拉尼翁为他们的糖厂购买马匹。

和这种在北方广泛渗入亚马孙，在南方向普拉特河大力推进的同时，牲畜饲养人正缓慢地从富于糖类作物和烟草种植园、木薯和玉米田的沿海狭长地带转移到内地。当时欧洲对皮革的消费量正不断增加，而巴西沿海地带自身的牲口是工农业必不可少的动力，也是运输，首先是经营榨糖厂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在人口稠密的沿海狭长地带，由于生活过于安定，不大适于饲养牲口。此外，在半游牧的放牧活动中，比在要求严格训练的农业和工业中更容易雇用印第安劳动力。小群小群的养牛人并未对当地农村构成威胁，因而他们得以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畜牧者带着他们的牲口从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攀登陡坡，沿着圣弗朗西斯科河逆流而上，直到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高原。他们在这里和来自圣文森特和圣保罗的、占据南方库里蒂巴高原的放牧人及其牲口会合。在最北端，养牛业于18世纪初被引进马拉若岛，该岛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饲养中心。再早些时，来自马拉尼翁的放牧人占据了帕纳西巴山谷，和来自圣弗朗西斯科河的放牧人会合。这样，整个对皮革感兴趣的社会就从亚马孙河延伸到普拉特河，给落后的边远地区带来了好处，并开辟了深入内地的道路。不久，在这些道路两旁就涌现了农场和饮食店。此外，养牛业的发展又促使人们寻找盐场，在圣弗朗西斯科流域和其他地方开采了盐，盐又促使皮革的制作得到改进。

一些大家族在内地拥有大得难以想象的领地，并把这些土地划分开来，饲养大牲畜，他们自己留下一部分，大部分租给侍从，这些侍从各自拥有200—1000头牲口，一个大家族自身拥有的牲口可达2万头。到1710年左右，牲畜肯定超过了150万头。1691年，来自里奥、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三支巴西护航船队，在葡萄牙卸下了10万张皮革，不过这是一个少有的好年景；1695年它们分别运来了5000张、8000—10000张和7000—8000张皮革，但这是一个少有的坏年景。1715年仅里斯本就收到6万张皮革。从此以后，里奥、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每年各自定期送来2万张皮革，往往还要多一两倍，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革出口量已达10万张。

在畜牧地区以外，圣保罗地区居民大张旗鼓的旅行活动，逐渐把近代巴西的边境划到从巴拉那和普拉特河直至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脚下。从圣保罗高原成扇形展开的这一活动，通常简单地表现为由粗鲁的葡萄牙人和贪得无厌而又极其残酷的欧亚混血儿领导的一连串寻找印第安奴隶的探险。这就是耶稣会会士创建和培植的“黑图”，是巴西探险队“旗手”的敌人。已故的雅伊梅·科尔特绍提供的值得注意的档案证据^[52]表明，这整个活动还要复杂得多，其目标也随时间而异。对圣保罗高原的占领，开始是少数抛弃文明而采取印第安生活方式的葡萄牙人的自发行动，以后成为官方的政策，其目的和最初的拓荒者相同，在于寻找贵重金属。他们之间私人和官方努力的结果，导致巴西探险队“旗手”的组成，这是一种半军事性的组织，由700—2000名身强力壮的葡萄牙移民、冷酷无情的殖民者、欧亚混血儿和印第安奴隶组成，他们沿着可通航的水路和各种印第安人的小路探险。不久，巴西“旗手”探险队开始围捕印第安人，把他们作为种植园的劳力，但是在16世纪后期，当非洲奴隶贸易开始发展，埃尔米纳的黄金开始减少时，寻找贵重金属和宝石的活动便扩大了（虽然围捕印第安奴隶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当荷兰占领了安哥拉和圣多美（1641—1648年）时，情况更是如此。有时巴西探险队也谋求政治目的。他们力图破坏耶稣会会士在巴拉圭的独立的神权政治国家，并通过越过托尔德西拉斯分界线，为国王将巴西的边境往前推移。这最后一个目标是佩德罗·特谢拉那次旅行的主要动机，也是1648—1651年安东尼奥·拉波佐·塔瓦雷斯多次不平凡的旅行的主要目标，路线是越过查科到安第斯山脉的丘陵地带，然后沿马莫雷河下到马德拉，再到亚马孙，最后到贝伦。1670年里斯本发出加紧寻找黄金的紧急号

召，当时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为1：16而不是王国复兴以前的1：11，换句话说，黄金升值了。提出这个呼吁正是时候，因为食糖的下跌减少了对奴隶的需要，因而搜捕印第安人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53\]](#)

1674年，开始对内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布拉斯·罗德里格斯·阿拉赞奉总督之命勘探伊瓜佩河（桑托斯以南），但成绩有限。派斯·莱梅率领一支巴西探险队离开圣保罗，沿着维尔德、格朗德、伊比特鲁纳和帕拉奥佩巴（圣弗朗西斯科的支流）等河顺流而下，在圣安娜（在未来的奥罗·普雷托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居留地，之后又沿维尼亚斯河顺流而下，在圣若昂（未来的萨巴拉附近）建立了第二个居留地。正是在这里，莱梅的女婿博尔巴·加托在1694年发现了一些最富的金矿，而布埃诺·塞凯拉和米格尔·加西亚也沿着莱梅的足迹，在圣安娜找到了黄金。1682年巴托洛梅乌·布埃诺溯流而上，到达帕纳西巴后，越过戈亚斯地区的阿拉瓜亚河，在那里的高原上发现了黄金，然后继续前进到阿马索尼亚，再原路返回。但是，大约在40年后，戈亚斯的矿藏才开始采掘。直到这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这个由于这一事实而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总矿）的地区。1693年，安东尼奥·阿尔佐从陶巴特出发，在多西河的支流卡斯卡找到了黄金。因此，从1674年到17世纪末，该地进行了狂热的勘探活动，大部分是秘密进行的。

但是，还存在着一层障碍。蕴藏黄金的地区距离海岸有几百英里，而沿岸山脉又被密林挡住。水路很长，难于航行，被一条条坚硬干旱的地区隔断。只能得到最原始的食物——主要是块根植物和野果，少许野味，甚至爬虫。最初，黄金和食物都是由奴隶顶在头上运输，这显然是一种很有限的运输方式。1697年，圣保罗地区的居民打通了第一条通过森林的道路，每隔一定距离播种了玉米，种植了可可树和果树。次年，道路开始正式通行。但是这些道路在干旱季节对马损伤较大，在雨季则无法通行，因此很长时间仍然继续使用黑人搬运。直到1701年，里约热内卢和矿山之间才有了一条直通的道路。不久，通过圣弗朗西斯科河，秘密地但是继续不停地，将巴伊亚和伯南布哥这两座城市与这些矿连接了起来。

沿着这些道路，开始出现了耕地，每隔一定的距离开设了出售食物、饮料和衣服的商店。圣保罗及其高原上的乡村中，人们几乎都已走光，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宗主国葡萄牙涌来，黑非洲则提供了一支庞

大的奴隶大军。及至1715年，有8万多黑人和大约2万白人被雇来从事开矿和辅助性工作。仅在1715—1718年，就有8个采掘场发展成为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镇”。在南里奥格兰德地区也开始殖民定居，因为那里饲养了采矿运输所需要的骡子。另一方面，在18世纪的最初15年或20年期间，有些沿海地区人口外流。从1693年起就出现了饥谨，许多农田几乎一下子变成了荒地，大批工厂被抛弃；接着又发生了糖料作物和烟草的严重歉收，于是1697年在东北部和东部发生了危机。而且这次危机恰恰与对许多糖厂主进行的一次新的宗教迫害同时发生。巴西的经济中心南移，里约热内卢在牺牲巴伊亚的情况下得到好处。

巴西的黄金是什么时候登上国际舞台的呢？确切的时间很难说。甚至在巴西探险队开采的黄金大批涌入里斯本之前，有时也有少量的金条运进里斯本：1691年，除了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量白银外，里奥船队载来了32磅金粉，但这一定是在圣保罗以南的巴拉那瓜、库里蒂巴和伊瓜佩等地区淘洗金沙的结果。只是在1699年，里斯本才从新发现的金矿得到第一批值得注意的黄金：登记在册的是514公斤，如果把走私的考虑在内，将超过734公斤。这无疑是同1698年在圣保罗和金矿之间建立正式交通运输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1701年这个数字达到1909公斤，1709年大大超过4406公斤，1712年达到14500公斤的第一次高峰。次年下降50%，1714年又上升到大约9000公斤，1715年上升到12400公斤。此后的两年分别下降到3000公斤和1000公斤。1718—1719年又再次恢复到7500—8000公斤——这些数字在1720年又大大超过，出现了2.5万公斤的新高峰。1721年和1722年的年进口量保持在1.1万公斤这个可观的水平，但是此后两年又一次下降。不过在1731年以后，进口量只有两次低于1.1万公斤，1740—1755年只有两次低于1.4万公斤。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忘记了走私，当然是愚蠢的，因为走私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数量难以估计。比如，1699年登记的黄金是35阿罗巴，但走私进来的就超过15阿罗巴。英国军舰一般是和巴西船队同时驶抵里斯本，并常常停泊在巴西船队中间。到了夜间，大量未经申报的黄金就被转移到英国军舰上。其他行驶在印度群岛航线上的英国和法国的船只，也多次在巴西港口停靠，尽管有各种控制，但它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弄到几公斤黄金。外国和巴西之间也进行直接贸易，容许这种贸易的总督不久即被撤职。后来，所有的外国商行都被驱逐出境。

这个新的黄金来源的重要性如何呢？相当早的时候，当然不迟于1703年，它所生产的黄金实际上就比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任何年份从几内亚和印度群岛得到的黄金总数加在一起还要多。在10—15年中，从巴西进口的黄金相当于塞维利亚直到1660年从美洲得到的黄金。但是巴西黄金是由海路从里斯本运往伦敦、阿姆斯特丹和热那亚的。在1689—1700年间，仅伦敦造币厂就铸造了价值2277251英镑的金币，在1701—1712年间，铸造了价值2384803英镑的金币^[54]；1713—1724年，铸造了价值8884477英镑的金币。这些数字说明，巴西的黄金经过大约13年的时间才找到大量进入北方的道路。在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前，相当大一部分黄金运往热那亚，再运往巴塞罗那，用以支付葡萄牙在西班牙进行干预的费用。但是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金额可观的葡萄牙铸币已进入上面提到的3个主要市场。此外，由于黄金的流入和法葡之间贸易的中止，1705—1714年间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对制造品的需要迅速增长，从而刺激了在英国、荷兰、热那亚、都灵、佛罗伦萨、卢卡和那不勒斯的制造业的发展。在英国和荷兰的法国技工，向他们传授原来法国向葡萄牙出口的奢侈品的制作方法。如此大量的欧洲货物运进巴西，到1715年市场已经饱和，价格跌到了欧洲的水平之下。

在宗主国葡萄牙，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初看起来似乎与从1712—1714年开始、直到1730年后为止的新的价格下跌相矛盾。但是这种现象正是贸易萧条的反映，产生萧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而在巴西，淘金热又加速了食糖和烟草的衰落。为了对付贸易萧条，企图重新发展工业。虽然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亚麻布难以进口时，织布业几乎增长了一倍，但毛织品生产却衰退了。重新发展工业的努力，主要归功于弗隆特拉侯爵和里贝拉伯爵。1716—1717年，里贝拉伯爵让许多精于制作各种丝绸和呢绒制品以及皮帽的法国家庭在圣米格尔岛安家落户。1716年他还打算借助于法国的工匠和资金，在里斯本开办一家玻璃工厂，但是法国当局进行阻挠，直到1724年才得到成功。然而要想建立起任何重要的工业部门，葡萄牙都得长期等待。

在18世纪的最初20年间，巴西的黄金不仅重新确定了巴西的地理形势，并把它印记留在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经济上，它也为葡萄牙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活动手段。这个国家自从15世纪起

就主要依赖海上贸易，具有商业国的性质。对1716年政府收入的分析[55]（见表16-1），说明了它的财政基础。

表16-1 1716年政府收入

单位：百万里斯

项 目	金 额	百分比（%）
海上贸易的关税（包括领事馆的费用）	1260	31.9
烟草承包税收	760	19.2
巴西护航队和巴西木垄断企业	200	5
五分之一的黄金矿区使用费	345	8.7
铸币厂	200	5
国内贸易（各项税款）	667	16.9
经由陆路贸易所征之关税	40	1
生产税和其他国内收益税	470	11.9
总 计	3942	99.6

1716年全年收入总计相当于8789.85公斤黄金，以后停留在4410.59—6065.56公斤，直到1760年。1681年“五分之一金矿使用费”的收入没有了，海运贸易关税收入仅683康托[56]（比1716年低84%），铸币厂收入4.76康托（相差4077%），烟草承包348康托（减少121%），经由陆路贸易的关税为28.84康托（减少38%）。

葡萄牙是一个商业王国，不仅因为国家的主要岁入来自贸易，也因为王室本身积极参与贸易，虽然它的一些垄断企业是承包出去的。国王保留进口称为巴西木的红色染料木材的垄断权，以及向印度出口烟草的垄断权，并在卡谢奥公司的资本中拥有三分之一的股权。此外，1663年巴西贸易公司被改成商业政务会，这是一种王室贸易仲裁所，也是一种商船队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除王室商船直接赚得的运费以外，“护航船队”的货物对国家是多么重要。如我们所知，国王在东印度公司的组成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既提供资金，又提供船只。

地产仍旧掌握在教会和贵族手中。葡萄牙的200万居民中有2.5万多人是担任不同宗教职务的神职人员，3万多人是牧师——这就是说，

大约每36个居民中就有1名（西班牙是每33个居民中有1名）。修道院的数目从1600年的396个增加到1628—1652年间的452个，到1739年增加到477个。据估计，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教会，教会也对全部农产品征收什一税。海外的教会影响甚至更大。耶稣会不仅想要建立一个神权政治的区域性帝国，而且想要建立一个巨大的商业联盟，足以控制全世界的主要贸易，从中国的丝绸到巴拉圭的茶叶。这就是它既和政府又和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圣保罗、桑托斯、里奥、马拉尼翁和帕拉掀起反对它的暴乱——这些暴乱是“庞巴尔”^[57]最终将它驱逐出境的那次运动的最初迹象。另一方面，国王是3个宗教军事组织的首脑，这些组织为他提供了相当大的收益。但是它们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任命骑士团首领，这些职位全部保留给贵族：基督修道会（大约也有1000骑士）有400名，圣地亚哥修道会（最富有的）有36名，阿维斯修道会有60名。骑士团首领职位依靠皇家恩宠授予，通常沿袭两代人，收入在200—20000克鲁扎多之间。这些修道会的岁入主要来自什一税，但它们还有其他进账。这样，基督修道会拥有托马尔和苏拉的土地，圣地亚哥修道会拥有锡图巴尔和阿尔卡塞的港口，阿维斯修道会拥有贝纳文特的土地。我们可以拿克拉托小修道院作为一个兼有教会和世俗成分的贵族领地的很好的例子。克拉托跨越塔古斯河，宽9里格^[58]，长18里格，包括10个“镇”和29个教区，约有3万年龄在11岁以上的居民。它的岁入包括从全部土地上征收的什一税、全部出产的四分之一、终身免役税、谷仓和榨油机的收入，以及磨坊和渡船的收益。全部收入为3.5万克鲁扎多。

贵族财产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皮尼希岛，阿托圭亚伯爵征收十分之一的鱼和出口货物，每年给他带来约5000克鲁扎多，此外还有市政厅供给的全年“伙食”；在雷东多（位于阿连特如），每播种60阿尔克雷，他从中收入36阿尔克雷，还有八分之一的酒，每年并征收进入“镇”的通行税5万里斯。卡斯塔涅拉伯爵从他的农民那里收入四分之一的小麦，八分之一的酒，和卡达瓦尔公爵一样。瓜尔达领主获得全部水果的八分之一，他还作为长期租赁契约的承租人，从租出的42个地产取得固定租金和赠品。这样，贵族阶层不仅是他们自己领地上酒类、油类和面粉的大生产者，而且还是将作为付给领主份额而收入的产品用于出口的货栈经理人。此外，他们还垄断了国内外公共行政机构的最高职位，因而能够通过直接参加贸易，或至少是通过发放许可证和给予特权而进一步为自己谋取利益。1718年，巴西矿区

的总裁带着他在该地经商聚敛的90万克鲁扎多回到里斯本。许多菲达尔戈（出身高贵的人）也年复一年地从东方获得大量的收益。

在经济上，贵族阶层主要是依靠海上贸易，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利可图地从事海上贸易，正是由于他们的地主身份。对土地の利用，是由3种惯例形成的：骑士团、受封者^[59]和长子继承权。这最后一种，在17世纪成为固定的形式，其结果是将年幼的儿子送去做神职人员。更有甚者，相当多的地产甚至动产，被迫负担作追思弥撒的捐献，因而这些地产和动产的所有者，实际上成为财产受托管理人，只得到收入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里，简略地谈谈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产、对土地及其出产的权利是值得的，需记住，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土仍然是荒芜的。首先是王室的庄园，佃户向国王缴纳土地出产物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更多一些，以及转租的罚金。其次是国王的更加重要得多的财产，它实际上是形形色色的征税权，大部分让与受封者。骑士团辖区的收入同样由税收构成，包括什一税，由首领和他的骑士团分享。广大的私有土地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免税地产，属于教会（通常为永久管业）或贵族；一类是纳税地产，属于平民。免税地产和纳税地产同样可由所有者开垦或出租——按租佃、长期租赁契约或免役税出租。前一种和后一种不付转租罚金，也不承担改良土壤的义务。按长期租赁契约租种的土地，作为租金，每年所付的年金一般比高额租金低六分之一。从法律上讲，按照这种租约，20年所付的年金总计相当于地产的基本价值，每年缴纳的超过全年半数的出产（播种所需除外）还未计算在内。实际上，这要么是相当于扣除什一税后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可用实物或现金支付的产品（谷物、酒、亚麻等）；要么是固定数量的出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不得用现金折算。有永久性的长期租赁契约，也有10年或10年以上的租约，最多的是长达三代人的租约。免役税于16世纪前传入葡萄牙，通常表现为地产所有者按他所保留的土地（虽然有时也出租甚至转让给第三者）上的出产，永久地或可赎回地出售年金。一般是业主因急需现金，提出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免役税，买方有权首先对土地的出产提出要求，以保障他的年金得到偿付，但是他无权占有土地。与此相反的一种合同形式，是卖方出售地产，但自己保留全年的租金，这种合同几乎总是转变成为一种长期租赁契约。

农民虽然处处享有残存的普通权利，但需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领主缴纳他应得的实物，还需缴纳各种捐税和租金，因而他们仅仅得

到土地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其余都用来养肥教士和贵族这个趾高气扬的阶级了。然而农民缺乏反抗精神。无怪乎移居海外的可能性和从海外得到的收入，以及农产品出口的迅速发展，足以使他们保持安分守己。教会和贵族阶层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并且牢固地掌握着国家工具。但是国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60]。1679—1680年以后，葡萄牙议会仅仅在1697—1698年间召开过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财政上，国王几乎完全不依靠贵族或土地，而是依靠能给予大量好处的大海和商业资产阶级，每当经济萧条的时候，他就以工业化的政策和发给成立特惠公司的特许证来支持这个阶级。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它自己的商业活动，同私营商业竞争，而仍然拥有权力的宗教法庭，一有机会就以种种借口对私营商业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样就阻碍了葡萄牙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对立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面对极其贫穷的农民阶级，展现在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面前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的机会。在文化领域里，存在着类似的对立情况。在这个领域里，艺术和文学仍然是巴洛克风格的，而一群居住在国外、对现代文化和经济的诞生已有所了解的人们，在努力突破官方说教的腐朽外壳，使葡萄牙能够了解正在欧洲激荡着的新潮流。

（宋蜀碧 译）

[1] 关于欧洲总的价格运动，见本书第23章（2）。

[2]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86—387页。

[3] 默德（Muid）为荷兰容量单位，用于南非，约相当于3蒲式耳。1蒲式耳在英国等于36.368升。——译者

[4] 在锡图巴尔的医院里，盐的出售价为978里斯，至少在1660—1690年是如此。在里斯本和阿威罗售价较便宜：离岸价格为1250里斯。里斯本一默德盐约合23蒲式耳；400里斯合1银币，约值英镑2先令6便士。

[5] 在葡萄牙的主要市场阿姆斯特丹，17世纪50年代的价格在每磅0.69荷兰盾上下浮动，1660—1670年价格在0.32—0.40盾间；1671—1682年则在0.27—0.32盾间；1686—1688年达到0.23盾的最低点。

[6] 德格朗热，里斯本，1683年6月7日（巴黎，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46）。

[7] 西波拉教授提供的资料；关于威尼斯，参阅本书原文第555—556页。

[8] 关于食糖和烟草的竞争情况，参阅本书原文第851页及以下各页。

- [9] A. 皮卡多-多来斯编：《雷蒙多·德兰特里的回忆录，在卡的斯的印第安商人》，1949年，第134、162、205、267页。
- [10] 关于1640年以后的政府改组，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6章。
- [11] 巴黎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44。
- [12]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71—372页。
- [13] 帕塔卡（Pataca）严格说来是葡萄牙银元，但这个名称也随意用来表示西班牙披索或价值8元的硬币。一个金达布伦相当于两个埃斯库多的西班牙币。
- [14] 披索——西班牙、墨西哥的货币。——译者
- [15] 巴黎，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50。
- [16] 西班牙人需为每一个年龄在15—25岁、体格合乎标准的健康黑奴付150披索（加上运费、食物和20%的保险费），一半在库马纳付，一半在卡的斯付。参见G. 塞尔著《黑奴贸易》第2卷，第23—31页。
- [17] 这一居留地是葡萄牙人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原“佛得角几内亚”）之间实际行使权力的中心。
- [18] 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50，鲁耶的信件，里斯本，1698年6月10日和24日。
- [19] 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50，1698年4月5日。关于法国与西班牙所签有关供应非洲奴隶的契约，见本书原文第364页。
- [20] 给予班图、马卡兰加邦联的最高首领及其“帝国”（虽然已经瓦解）的王朝名称，据悉在今罗得西亚的产金地区。
- [21] 参见本书原文第856页及以下各页。
- [22] E. 阿克塞尔森：《葡萄牙在东南非，1600—1700》，约翰内斯堡，1960年，第141—143页。
- [23] 见C. R. 博谢尔和C. 德·阿泽维多著《耶稣要塞和蒙巴萨的葡萄牙人》，1960年，第58—73页。
- [24] 阿克塞尔森引语，第184页。
- [25] J. H. 库尼亚·里瓦拉编：《蒂苏阿里的地志编年史家》（4卷本，1865—1866年）第1卷，第229页。
- [26] 印度官方图书馆，里斯本副本，《印度见闻》（英译本手稿）第1卷，第389页。
- [27] W. 赫德尔森编：《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政府档案注释和摘要，1670—1681》（4卷本，1871—1874年）第4卷，第14页。
- [28] 丹皮尔：《航海与发现》（N. M. 彭泽和C. 威尔金森编），1931年，第111页。

[29] 本段由K. J. 克劳瑟撰写，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7章。

[30] 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或）犹太教的秘密成员。参见西班牙《秘密信奉犹太教的人》。

[31] 维冈涅戈，1714年1月30日（巴黎，国家档案，外交档案，政治通信，葡萄牙46，fo.18）。

[32] 参见E. 坎南编《各国财富》（2卷本，1904年）第2卷，第4页。

[33] 法国西南部出产葡萄酒的地区。——译者

[34] 参见本书原文第845—846页。一大桶为126加仑酒，正好是半大罇（酒的容量单位，相当于252加仑），不过今天通常只合105加仑。

[35] 啤酒在不久前由外国人引进，并开始在这个王国酿造，到17世纪80年代时也已经引起种植葡萄的酿酒家和商人们的惊恐。

[36] 与战争期间禁止进口法国酒截然不同。

[37] 每年平均数如下：1688—1697年，6668桶；1698—1707年，7188桶；1708—1717年，9644桶；1718—1727年，17692桶。1704—1712年间，葡萄酒占英国自葡萄牙进口的酒类的一半。见A. 格拉·滕雷罗著《杜罗经济史概况》（《葡萄酒研究所年鉴》，波尔图，1944年），第105—108页，该文依据C. 格内尔《上杜罗葡萄种植业总公司成立情况剖析》（里斯本，1920年）。——编者

[38] 1704年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比1703年多9%；达到高峰的1705年，比1704年高出约5%。但是1703年曾经比1702年增长53%；而1702年又比1701年增长65%。从1706年起，进口衰退，直到1714年才又恢复。但到了1719年，才仅仅设法恢复到了1705年的水平。1700—1703年运往英国的酒平均每年为16252桶，1704—1707年仅增加到17198桶，而1710年对英输出的总数还低于1700年。参见A. D. 弗朗西斯著《梅休因家族与葡萄牙》附录3（其中1703年的进口数字应为19906桶——编者）。

[39]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95—396页。

[40] 见本书原文第419页及注。

[41] 巴西和卡宴的边界也需要调整。参见本书原文第531页。

[42] 在里斯本，1阿尔克雷相当于13.8升；60阿尔克雷等于1默德。

[43] 苏亚雷斯·达席尔瓦：《书简格式杂志，1701—1716》，里斯本，1933年，第186页。

[44] 巴黎，国家档案，海军档案B7，No. 225（《使王国富强之路》，1701年）和外交档案B1，No. 649（里斯本，1694年12月22日）。关于自1688年船队的航行情况，见本书原文第354页注①。

[45] 里斯本，海外史档案，巴伊亚，1670年6月11日。

[46] 见D. 奥尔登著《王国政府在巴西殖民地》，伯克利—洛杉矶，1968年，第36页以下和第68页。

[47] 德·莱斯科列，1691年9月18日和10月2日（国家档案，外交档案B1，No. 648）。

[48] 巴黎，国家档案，海军档案B7，No. 221。

[49] 印度西海岸从曼加洛尔至果阿。

[50] 1阿罗巴（arroba）等于32磅或14.688公斤。

[51] 见本书原文第356页。

[52] 《安热利斯选集手稿：耶稣会会士与巴西探险队》（2卷本），里约热内卢，1951—1952年；参见同上，《巴西探险队史概述》（2卷本，里斯本，1964年）。

[53] A. 小埃利斯：《黄金与圣保罗探险队》，圣保罗，1948年。

[54] 1701年的1249520英镑这个数目完全是个例外，其后的年份显然又降低了。

[55] 维斯康特·德桑塔雷姆：《葡萄牙与……关系概况》第5卷，第248—249页。

[56] 为便于比较，使用1688年的货币[康托（conto）为巴西及葡萄牙的钱款数目，从前等于100万里斯，目前在巴西等于1000克鲁赛罗，在葡萄牙等于1000埃斯康多。——译者]。

[57] “庞巴尔”巴西的城镇，其参议院拥有比葡萄牙本土的市议会更多的权力，但城里也更加动荡不安，虽然有16.5万居民的里斯本也可能发生骚乱。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6章；关于庞巴尔和耶稣会，见本书第7卷，原文第123—125页。

[58] 葡萄牙1里格相当于6公里或3.75英里。

[59] 国王将土地“收益权”封给贵族，于是贵族成为领主，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一般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葡萄牙本土，受封者对他的辖区并不行使司法权。

[60]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389—392页。

第十七章 地中海

在欧洲的海洋中，地中海是独一无二的。它地处欧、亚、非三块大陆的交会处，骤然会聚又骤然分离，不仅是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要地，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其某些特点长时期存在，另一些特点则只在某些关键时期才出现。^[1]如果要了解这个地区是如何影响土耳其，又如何受土耳其和1683—1718年欧洲战争影响的话，这两点都应牢记。这里气候变化不大。海洋、天空、陆地和谐地融为一体，曾使荷马大为欢喜。但农业资源缺乏，人们不得不靠海为生。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和文化政治的多元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作为沿岸各种文明国家中心的悠久历史中，各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地中海和反对路易十四战争舞台的西地中海之间，战争的主角由一个新崛起的非地中海民族的海上强国扮演。

大多数海域此时仍是海上荒漠。偶尔有远航的船只经过，因担心海盗而一路孤帆疾驶。此时天文航海还没有普遍采用。船只主要依靠指南针和平面海图，或是依靠地面标志简单的交叉定位法航行。所以船员仍喜欢靠陆地行驶。空旷的海面和沿岸拥挤的交通形成极大的反差。这里有重要的商道，如从那不勒斯到巴伦西亚，经由莱戈恩（即里窝那）、热那亚和马赛；北非沿岸交通略为冷清；爱琴海交通网密集。这里是著名的爱琴海群岛，似乎海洋的作用只是将一个个岛屿连接起来。在各种海峡和狭长的水域里，航运十分活跃，成为海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直布罗陀和墨西拿海峡、西西里和马耳他之间的航道、托斯和厄尔巴岛之间的皮翁比诺海峡、奥特朗托扼守的亚得里亚的入海口、威尼斯的切里哥岛（Cerigo）控制的克里特岛和摩里亚岛之间的通道、古代的基斯里亚（Kythera）。战时这些交通要道非常危险，即使是平时时期，由于冬季经常有暴风雨，风大浪高，水手们宁愿在夏季航行。即使船在港口和锚地也不一定安全，因为一般港口和锚地很难抵挡汹涌的海浪。在众多的海难中，有些船骸惨不忍睹，如：1694年一支英荷海军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损失了11艘船，1000

多人丧生；1703—1704年冬，英国损失8艘船；1715年在巴塞罗那港，暴风雨毁坏了17艘船。

地中海沿岸的嶙峋巨石也为恶劣的气候助虐。雨水常常沿着峭壁飞泻而下。尤为突出的有：利吉里亚河沿岸、达尔马提亚海岸、摩里亚海岸、潘菲利亚、西里西亚的安纳托利亚省和阿尔及尔东部的卡比利亚等地区。沿岸的平原由于疟疾和海盗频繁成为野兽乐园。高山和森林则成了人畜的避难所。虽然高山地区土地贫瘠、松脆，常常过于干燥。但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人民已在较低矮山坡的凸石上和山顶上建起了村子瞭望塔。即使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没有让地中海人民放弃世代生息的家园到未开垦的平原去落户。在被海水严重侵蚀的海岸，形成了无数个港口。居民们借助它可以抵挡敌人的侵袭，以弥补土地贫瘠的缺憾。有些港口成为重要的城市。广泛的贸易和精美的建筑，使他们成为各种文化荟萃交融之地。几乎所有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中心都是港口。当时陆路运输既昂贵又危险，而令航运不安全的只是海盗和战争，所以人们一般尽可能用航运。有些城镇，如阿勒颇，更像是车马港口。而主要陆路运输的终点通常也都是港口。^[2]另外，由于内地农村手工业和城市手工工场提供了大量用于交换的产品，所以大港口并未完全和内地分离。尽管如此，港口和内地的经济仍是有区别的。这主要反映在食品供应的差异上。内地农村主要是生产，而港口一般更多的是从事商业活动。早在罗马时期就有一种叫安诺马（Annoma）的组织，它的职能是保证向城镇供应谷物。有关档案资料证明，城镇所报人口往往比实际人口多。这样，由于要向城镇供应大量谷物，谷物在农村反倒比城镇更紧张了。

一些地中海城市居欧洲最拥挤城市之首。君士坦丁堡（加上郊区）有居民80万，伦敦和巴黎均不及它的一半。^[3]开罗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20万。士麦那（伊兹密尔）和阿勒颇（加上亚历山大勒塔）各有10万人。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人口相对少些。最大的基督教城市无疑是那不勒斯，在1656年大瘟疫前人口超过30万，到1700年再次超过20万，比阿姆斯特丹或维也纳的人口还要多。墨西哥和马勒莫减少至不超过原来的一半。威尼斯至少有15万，仅居其次。随后是罗马约13.5万。热那亚在1688年约8万人口，渐渐从1656年损失一半人口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米兰到1688年逐渐恢复到12.5万，但到1710年又减少到11万，是1630年大瘟疫前的人口的一半多。博洛

尼亚，教皇国的第二大城市超过7万人，比佛罗伦萨和都灵人口还要多，尽管皮耶迪蒙特首都人口增加迅速。在伊比利亚半岛，唯一和米兰相同或超过它的城市是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均为16.5万人左右。马德里约14万人。伊比利亚城市总体上人口减少，尤其是（意大利亦如此）工业城市。塞哥维亚和托莱多在一个世纪里减少了一半。最后，马赛只是一个拥有7万—8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比巴塞罗那（4万—5万人）规模大，和阿尔及尔规模相当。

这些人口数字并不能和经济发展画等号。譬如，加的斯和莱戈恩是两个最繁忙的港口，虽然它们仅有2万多人口。然而，加的斯不仅影响着地中海，而且影响着整个欧洲的贸易。它作为西班牙到美洲航线的终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英荷航线的基本航道，每一至两年都被用作从北海到东地中海的必经航道。此外，热那亚和马赛也到加的斯寻找银子。在这条海峡中最具世界性的市场是莱戈恩，与马赛及西班牙的港口不同的是，它的宗教法庭（Inquisition）非常强大。它承认犹太人和东地中海人。事实上犹太殖民地在莱戈恩最有势力。凭借着其家族在马格里布的影响，它控制了与北非海岸的多数贸易。托斯卡纳的大公们在16世纪后期开发了莱戈恩，在此发家，并决心使其成为一个在和平时和战时都向外开放的自由港。

战争虽然对热那亚及其他中立港有利，但在里昂海湾，虽然它可以用特有的小巧的单桅三角帆船运输谷物和其他商品，可惜仍未能阻止其贸易下降。除昂贵丝织品外，其工业亦渐衰落。它作为银行家的角色仍然是全球性的。威尼斯的吉罗（Giro）银行^[4]，当时也许可以和圣乔治银行相比。当塞缪尔·伯纳德将西班牙货币比塞塔从西班牙汇往佛兰德前线时，他要经过热那亚和日内瓦才能实现。热那亚和西班牙的经济及战略关系十分密切，以致1684年路易十四下令对它进行猛烈轰炸。有些热那亚贵族甚至在那不勒斯拥有大量财产。相比之下，法国马赛是东地中海贸易最重要的标志。它的贸易包括从北非伊斯兰教各国进口谷物和皮革及羊毛等原材料，从西班牙进口白银：马赛总是把西班牙作为特殊的屏障，1730年把它作为“停靠处”（echelles）——这个词标志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地方，把贸易视为最重要的活动，主要是在东地中海地区。另一方面，它需要科尔贝尔的热情和耐心劝说以使其加入西印度贸易。在1669年，莱戈恩早已成为

自由港后，马赛也取得了自由港的特权，并且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地中海贸易在两个方面与传统相连。首先，海洋被视为保护欧洲免受东方不断流行的瘟疫侵袭的屏障。自从16世纪实行严格的港口检疫制度之后，任何被怀疑携带病毒的船只都被拒绝进港，必要时甚至用大炮进行封锁，每个港口当局坚持看到所有登陆人员的健康证明才放行。像马赛和马耳他这样的港口，在检疫期间给船员们提供各种娱乐设施以吸引各国船只。事实上，瘟疫确曾流行过，有几次是灾难性的。如1630—1631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过瘟疫，1656年在意大利，1691—1692年在北非伊斯兰教各国海岸，1720年在马赛，都曾爆发过灾难性的瘟疫。但使人惊异的是瘟疫并非经常流行。其次，劫掠船横行。在大西洋，除了摩洛哥的萨利（Sallee）基地外（靠近拉巴特），劫掠船只在大战期间肆虐，而沿北非伊斯兰各国（除埃及外）海岸的海盗活动比摩洛哥更猖獗，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摄政们”更是以抢劫为生；“阿尔及尔人”必不可少的总是要和至少一个船只被抢的国家交战。在基督教港口中也有反穆斯林的劫掠中心，而马耳他和（相对较轻）马约卡岛的巴利阿里群岛和伊维萨岛都是专门从事劫掠活动的。劫掠常用的借口是：查禁非法和无国籍的船只。^[5]尤其是那些土地不足的地方：这样，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及岛屿劫掠猖獗。赞特和圣毛拉（Leukas）也是海盗横行。直到1684年这些地方被威尼斯人重新征服。有时爱琴海群岛本身亦如此。长期战争后的几年里，海盗现象十分严重。就像西印度一样，战争制造了一群以四处抢劫为生的人。如果走运的话这些人会满载而归，但他们很快将战利品挥霍掉。战争结束后，奢侈成性的海盗头们不愿意恢复原来的艰苦生活，就会寻找有战事的国家，并打着该国的国旗，继续从事劫掠活动。许多抢劫穆斯林的基督徒海盗是从反对当时的敌人——英国、荷兰、法国或西班牙中学会海盗营生的，1680—1720年间最著名的例子是来自马约卡岛的普兰奈尔，英国人普罗曼和一个在马耳他服役的热那亚人曼尼塔。也有许多失业的基督徒海盗背离初衷，在北非回教地区进行私掠活动。

17世纪初，由于北非回教地区劫掠活动受到摩尔难民新的刺激，劫掠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基督教船只。当时阿尔及尔人拥有100艘战船，其中多数是小船；到1700年虽然仅剩四分之一，但都是高效

的挂帆快速船。而整个18世纪，阿尔及尔人仅拥有25艘船，而来往于的黎波里和土耳其之间的战船不及其半数。大约在1650年，海盗活动达到巅峰时期，阿尔及尔几乎与所有的海上强国开战。由于其帆船的速度和灵活性都占有优势，所以总能逃脱追击。因为这种船吃水浅，可以尽可能划近岸边，这使所有大船都鞭长莫及。阿尔及尔式的帆船和战略成为欧洲海盗的榜样。人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对付他们的办法，尤其是他们的船长有丰富的海上经验，在他们成为海盗前，一般都是基督徒船只。在阿尔及尔，“海盗船长公司”（Reis）拥有大量财富因而野心勃勃，也想染指政治。其中多数人是叛教者，除了劫掠船只外，各种海上业务与他们无缘。如果在基督教水域进行贸易，就如同把自己交给宗教法庭。因此，基督徒商人通过犹太人做中介，也和阿尔及尔人用战利品进行贸易。托斯卡纳的大公们传统上就精于商贸，他们不仅允许反穆斯林的海盗船打着他们的旗号并在莱戈恩进行装备，而且还给阿尔及尔人提供储藏在他们国内无法处理的战利品的场所。这是海盗们把战利品变成现金的一种途径，许多人根本不需要中介。一般袭击海岸后，他们会打出一面特别的旗子——“释放旗”，表明如果交赎金即可释放被俘的健康奴隶。但他们很少用这种方法出售被劫掠的船，因为这样需要的时间长，捕得奴隶的海盗就会将自己交由追踪他们的人来宰割了。同时，海盗港口，尤其是阿尔及尔人的港口，是奴隶和各种海上战利品的仓库和集散地。以拍卖的形式将奴隶卖给个人，不仅是为了将被俘者变成苦力或船上的奴隶，或女眷，而是希望得到赎金。即使被俘者本身无法达到主人希望得到的赎金数，也有希望获得释放。一般可以通过基督教牧师尤其是通过信仰三位一体的人募集的资金成批地得到释放。传说在阿尔及尔同时有3万奴隶^[6]；由于赎金缴纳频繁，实际奴隶数近1万名。

与有劫掠船国家签订的和平协议一般都有相互交换战俘的条款，除非战俘已在敌国军队中服役。这样，一个被带上马耳他海盗船的海员，或一个来自西班牙要塞的士兵，不论他们原籍如何都要留在北非穆斯林地区充当奴隶。自从17世纪末法英跟摄政休战以来，来自北非海岸国家的奴隶不多。多数奴隶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列强除了希望保护他们的贸易免受这些具有半传奇色彩“海盗”的袭击外，认为战时请求他们的帮助也是值得的。九年战争爆发时，法国一直煽动阿尔及尔向英国和荷兰宣战，并许诺在英吉利海峡法国将以军火支持他们。这些条款一直持续到1692年。事实上，圣多明各总督迪卡塞和法

国男爵波伊蒂战争期间在西印度使用海盗，并不是两国间政府协议的结果。

有关基督徒海盗的资料很少，但指挥袭击穆斯林船只的基督徒海盗和柏柏尔人一样可怕，从长远来看其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大约在1670年，有土耳其人问：“法国和马耳他一样强大吗？”1704年后，圣约翰骑士定期组织三四艘帆船，加上（一如既往）6艘大船，分成两个舰队，袭击回教君主的战船和商人。有时他们也和其他基督教海军联合，而且多数是和威尼斯人联合。每年都有几十艘海盗船带着操各国语言的水手，打着圣约翰的旗子（有时是不合法的），或托斯卡纳（Tuscang）、波兰、摩纳哥、布兰登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旗子出没。于北非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海岸对阿尔及尔的劫掠不如对往来于亚历山大和士麦那之间的富商的劫掠多。因此，到17世纪末商人数量明显减少。沙丁讲述了到1670年爱琴海群岛如何遭到40名基督海盗的劫掠——“非常残酷”，以及萨摩斯岛是如何被受惊吓的居民遗弃。

[\[7\]](#)然而，不能过分夸大这些袭击对奥斯曼商船队毁灭性的影响。1718年及1750年政府试图通过武装船队（一种轻快帆船）来恢复海上贸易。严格地讲，土耳其更多是在岸上进行贸易。土耳其商人也在基督徒船上进行贸易。更有意义的是希腊的运输者自1720年后因马耳他人退出东地中海而受益，因为希腊人知道耶稣和教皇要求罗马战利品是有区别的。希腊人于1770年在俄罗斯的保护下发展起来。[\[8\]](#)1700年他们还无法确定能否依靠土耳其皇帝的巡洋舰——一个冒险的临时的办法——或是置于法国的保护下，如果法国的敌人在海上强大就会很危险。

不论是基督徒海盗还是柏柏尔人，海盗们靠的是速度或者武器，或者是二者兼有。战争刚刚爆发，一些轻便的小型劫掠船，便集中在靠近海岸的主要航线，如伊维萨岛、奥涅格里亚、伊拉布和埃尔科尔港附近，想通过突然袭击获得战利品。任何轻型或中等吨位的船都可以参加，因为这些船比较容易改装。如果市场条件具备时，也很容易满足一般贸易的需要。这些船中最常见的是平底船。因其底平、吃水浅，在逃避追击时可以靠近海岸，有海上“飞毛腿”之称。战争开始几个月以后，才出现装备较好的大船。当有大猎物的消息传来时，他们会成群结伙地行动。这些船有的由普通商船改装，有的是特制的轻便小帆船，泽兰人（和阿尔及尔人）就把他们的胜利归功于这种小帆

船甚至还有海上战舰。这样的行动需要较大的投入，自然也希望有较大的回报。

战争爆发后，因为有海盗，海上航运几乎绝迹。原因之一是商人担心遭受损失。一些商船的船长，如热那亚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用坚固的全副武装的船及大量水手来防止海盗登船。有些人用轻便船在较大的水域活动，像当时英国的大划船。^[9]仍有一些人要求海军保护，在一些海域用反海盗的海军舰队、巡逻舰或护航的形式进行保护。其中第一种最有效，因为巡逻舰不能满足商人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护卫舰原则上是安全的，但它速度慢，有时会造成商业上的灾难。战争期间，贸易公司有时也把货物分散给承租人和保险公司。另外，如果打着交战国旗帜进行贸易太危险，可以依靠中立国旗帜或容易使用的国旗。所以，战时中立贸易总是增加，无论怎样改变旗子，贸易量并未减少。虽然这不是国际准则，却是一般通行的原则，即敌国的货物在中立国的旗帜下应受到保护。当然这一点有时可能会遭到破坏，海盗行为本身就是粗暴、不守规则的。海盗就是为寻找不义之财。中立，意味着要遵守某些承诺的义务，这样任何交战国的商船离开中立港都有24小时的时间，之后港口当局才允许敌国的船起锚追击；理论上，任何国家不许在中立港武装海盗船。另外，海上的惯例要求，水手如果在第一次发出命令时投降，应免遭虐待，所以多数商船遭遇海盗会投降以防被袭击。

强大的海军舰队出现后，几乎清除了航道上的所有船只。得知他们到来的消息后，较大的船逃进海港，小船躲进尽可能狭窄的航道。海军舰队太大，所到之处不可能不被发现，由于能获得舰队活动情况的消息，船主们因而可以轻易逃避追击。但只有在海军舰队行动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海军大致是在4月至10月活动，此时也只是海军活动的地区受到影响。躲避海军比躲避无所不在的、更危险的海盗要容易得多。当他们和商船、海盗遭遇时，一切都取决于商船船长和海盗的速度、机警、航海技术和勇气了，商船和海盗的命运就密切相关了。

由于有见机行事的余地，因而贸易即使在战时亦很流行。地中海世界绝不是一个小的自给自足地区的聚合。从远古时期开始，其经济形式已经确立，主要依靠酒、橄榄和玉米。流动的牧业（季节性放牧）和海运是其经济的补充。这里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有关，如陶瓷、纺织和制革业等。尤其是城镇，主要靠对外贸易来弥补粮食的不

足。干燥的气候有利于储存粮食。由于可耕地少，人口多，所以每年产粮区的剩余产品都要拿到粮食短缺的地区。在穆斯林国家常见的储存财宝的现象，即是为了防止恶劣天气而兴起的。这种形式保持下来，年复一年。例如，西班牙和普罗旺斯，几乎总是进口粮食，而朗格多克、北非、东地中海是玉米出口地区。酒、橄榄油在地中海地区的国内贸易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传统的制皂业就需要大量航运，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橄榄油和钾。早在16世纪末以前，当地中海国家开始进入北部海上强国的贸易轨道时，它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也得到加强。15世纪90年代，商品出现短缺，它甚至从波罗的海进口玉米，其他进口商品有：从北海或纽芬兰进口的木材、腌制或熏制的鱼，还有加工或未加工的金属制品、武器和零件。同样，地中海也有其商业魅力。它提供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外国商品，如酒、水果、葡萄干、橄榄油、皮革、毛皮、药材、香料、明矾、硫黄、铜硫酸盐、盐等。总之，在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天平上，对地中海有利，财源滚滚。这和地中海商人长期具有丰富的商贸经验和高超技艺是分不开的。

穆斯林主要对陆路贸易感兴趣，其中许多贸易没有基督徒的竞争。除了定期使用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外，重要的商线把阿勒颇—巴格达—伊斯法罕、的黎波里—费赞—达尔富尔高原、摩洛哥—的黎波里—塔尼亚—埃及、马拉喀什—苏丹等线路联系在一起，还不算每年从陆路和水路集中到麦加朝觐的香客。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海盜不知疲倦地藏匿在爱琴海群岛、北非地区和东地中海的海岸^[10]，凡拿财产在地中海冒险的奥斯曼商人，一般会求助欧洲人的货船，尤其是马赛商人的船，法国政府从“旧制度”中保存下来大量“廉价的船只”，为其进行极为有利的贸易。当战争阻碍法国商业发展时，敌国商人便趁机扩大贸易。很难统计穆斯林使用外国船运输本国商品所带来的损失，但一定是相当可观的。

奥斯曼帝国的出现促进了地中海东部及沿岸诸国的贸易，贸易的特点是商业组织的发展优于海上技术的发展。自16世纪以来，到直布罗陀往返仍需要三四个月，时间上变化不大。当时拉古萨大船仍是最大的船，但小船因其灵活性更有优势。法国首先和土耳其苏丹谈判，达成政治框架；从1579年开始著名的“投降书”在1673—1681年里一再延长、澄清和扩展，使其对法国、英国和荷兰有利，尽管中间时常

中止。^[11]土耳其贸易上歧视威尼斯，克利特战争和1684—1699年的长期冲突中贸易更受最大打击。当时只有4个海上强国——其中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进行战争，实际只有3个——在17世纪和18世纪可以在东地中海安全航行，其他国家的商人和商船不得不寻求其中一国的保护，通常求助于法国。“投降书”承诺贸易自由（由于要支付固定的受限制的赔款）和土耳其地方官积极配合，允许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及沿岸国家保留领事权——法国人的所谓“停靠处”。领事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外交豁免权。穆斯林国家常常被欧洲国家代理人的不明智所激怒，这时就难免有人遇害，而受害人往往不是清白无辜的。当地的领事可以比常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处理事务更快更有效。法国成功的聪明绝伦的领事制度后又被塞纳莱改进，成为后来其他领事机构的样板。然而，与“停靠处”相比——当一个地方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由“国家”组织建立常驻领事和欧洲商人殖民地；开放的道路也使欧洲的船只频繁往来，因为他们不用付税，商品可以通过水路输入一些禁止出口的商品，如玉米、水稻等。由于这些走私品有被没收的危险，多数商人用贿赂土耳其官员方法来达到目的。

法国的贸易主要在西顿（黎巴嫩）和阿勒颇，而英国和荷兰则控制了士麦那的交通，为东地中海的贸易“护航”。君士坦丁堡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比他们出口的商品要多。因为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消费中心，信托可以抵销在其他“停靠处”的债务。1701年英国在开罗拥有和法国同样权利的第一个英国领事馆，当时开罗经济正在恢复，像亚历山大港和达米埃塔一样，成为玉米（尤其是1709年欧洲短缺时期）和棉花的出口地，特别是阿拉伯优质咖啡。^[12]荷兰从1613年在阿勒颇，1628年在士麦那开始拥有自己的领事馆，在英国或法国的保护下在埃及进行贸易。由于战争，他们在地中海甚至在莱戈恩的贸易遭受沉重打击。尤其是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们在直布罗陀海峡没有一艘自己的护卫舰^[13]。1692—1702年，他们也与北非回教地区开战，1716—1726年又与阿尔及尔人开火；1716年大多数从阿姆斯特丹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运输船都是英国和法国的。更危险的是，荷兰的羊毛被英国挤出市场。^[14]泽兰海盗在地中海的成功也无法弥补这种损失。马赛流行个人主义，即使在战争期间，商人也经常是单枪匹马在东地中海进行贸易。而英国和荷兰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习惯以护卫舰的形式航行，这样能更好地防止劫掠。繁重的护卫制度不仅要冒

运输过程中货物贬值的危险，而且，大批货物顷刻投放市场必然会导致降价，而购买返程货物时，因为需求量过大，价钱又会上涨。然而，英国和荷兰能够通过改进商业组织克服这个困难。一般他们在东地中海出货之前先进货，所以每一次航行都有赢利；他们的商人有足够的资金周转，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买卖，这样可以降低因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1635年和1654年间他们已牢固确立自己的地位。到1680年，虽然航路遥远，他们仍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占得上风。他们的成功应归功于贸易公司的存在^[15]，当法国贸易处于低潮时，科尔贝尔于1670年创建了东地公司，1685年又建立地中海公司。法国原来的巴斯逊和凯普尼尔公司运气比较好，其主要功能是安排运送玉米的船从北非到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这些公司垄断了法国和北非的贸易（包括突尼斯的珊瑚渔业），1693年合并，1705年破产，1706年更名为北非公司。

从总购买力和交换形式两个方面来看，东西方贸易并不是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一边倒，而是你来我往的双边贸易，直到19世纪才出现典型的“殖民”形式，即用欧洲工业品和中东及北非的原材料交换。事实上，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正相反，塞哥维亚的洋红和精纺羊毛是突尼斯人织帽所需的最基本的原材料，传遍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在重要的东地中海城镇中，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有许多传统手工业品大量出口欧洲，如叙利亚传统的蓝棉织物，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普遍流行。18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国家的工业才开始出现萧条，到蒸汽时代彻底衰落。仅就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东地中海出口的有限的资料，很难评价出东—西贸易的实际比例。有些商人在波斯和印度找到了出路。有一部分船在返航时不经过地中海，而是绕过好望角，和地中海形成周期性的竞争，尤其是贵重货物，如里海的丝绸，经常从印度洋转运。^[16]

信贷业务在地中海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到1700年发展了信贷机构的意大利城镇不再繁荣。而18世纪地中海最大的商业中心马赛仍对东地中海金融废都的贸易抱有希望，科尔贝尔总是为此深感烦恼，他把它归因于马赛人处理不当。事实上，这是土耳其海关规定的必然结果，即免除对其他商品征收5%的进口关税。土耳其每天使用的硬币是塞维利亚和墨西哥的比塞塔（皮阿斯特）。这样，马赛人把比塞塔（皮阿斯特）视为商品，既容易控制又可获得至少5%的利润。这种利

润有可能大幅度增加：荷兰通过铸造比塞塔进行硬币交易，获利20%，因其铸有狮子，取名狮子。而东地中海人则把狮子看作了狗。虽然“狗”是由低质合金制成，但因为它精美的外观和高质量的手工，“狗”在东地中海找到了市场。法国曾经也想仿制。^[17]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支付形式是船长向租船人放短期高利“抵押”贷款，实际上只有当有现金支付时才能用这种方式。人们可能认为1630年以后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相对减少，对基督西方和穆斯林的东方之间的贸易会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银子供应减少却促进了用工业品进行支付的贸易。在这方面英国和荷兰是发明者。到17世纪后期，它们的呢绒出口总数按科尔贝尔的统计，仅英国公司一年就达4万匹——实际数字要高一倍。^[18]法国政府想用贷款、出口津贴和荷兰工匠的帮助，来支持朗格多克的工业，与英国竞争。在这方面的确取得一定的成果。1680年法国一年出口的呢绒仅有5000匹（英国是2万匹），1685年这个数字稳步上升，尤其是1708年以后，1713—1714年超过3万匹。如果说后几年是例外，是恢复和平后的反映，那么到1715—1720年，法国在东地中海的贸易和英国持平，甚至超过英国。^[19]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成为东地中海贸易强国中的霸主。

地中海的两端是西班牙和土耳其帝国，它们是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古老斗争的幸存者。虽然它们都不完全属于地中海，但在地中海世界中都有自己的重要地位。中心区亚得里亚海是其分界线。它们统治的方法惊人地相似。西班牙总督在许多方面和土耳其的省长相似，都是用有限的手段达到有利统治的最佳效果，基本都不改变传统。双方政府都依靠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在希腊是东正教的牧师，在西西里是贵族，允许外国商人从本地衰弱的商业中获利，可能西班牙帝国比土耳其更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入侵，两国经济萧条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大量军费开支的影响，如建瞭望塔、城堡、炮台和军路，表现了辉煌，但是这种浮夸的作风长期阻碍了资本的发展。卡斯蒂利亚雇佣兵和安那托利亚士兵都出身卑贱，忠于军队。生活只是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更遥远的要塞。因为两个帝国对海上联系都非常重视，以至于沿海都有大的要塞，比如在爱琴海群岛的土耳其的小港口，或者在从那不勒斯到热那亚的托斯卡纳的小港口都有要塞。总体上，因为统治较温和，各地能够忍受，但是地方的排他主义与奥斯曼“笔杆子”^[20]集权原则不相容，与卡斯蒂利亚或波旁贵族官僚主义制度也是不相容

的。加泰罗尼亚曾在1640年寻求外国的援助，1705年为自由而战时再一次请求外国帮助，被打败后，政府在巴塞罗那修建了一个大的要塞，以防他们再次起义。相比之下，北非摄政在卡洛维茨和约签订后，利用奥斯曼的弱点加强了自治权力。^[21]选举产生的土耳其军团的首领——在阿尔及尔的省长、突尼斯的省长和的黎波里的省长——禁止土耳其政府派的官员来行使官员的职能。1710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世袭王朝。每个统治者（的黎波里统治者）或省长，为了提高他本人的威信，仍要求土耳其苏丹在其就职时，赐其穿土耳其式长衫并佩戴帕夏的徽章。突尼斯的省长自1704年、阿尔及尔的省长从1711年开始定期接受恩赐。这标志土耳其苏丹和摄政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实际关系已被削弱。总而言之，被统治人民对统治仍然忠诚，即使在遥远的外国。如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居民对卡洛斯二世和菲利普五世的忠诚可以和东正教的希腊对土耳其苏丹的忠诚相媲美。^[22]土耳其海军的水手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蔑视威尼斯人为“拉丁人”，所以同其勇猛作战。

摩洛哥，位于马格里布的西部，受海洋潮汛的侵蚀，很难说它是否也属于地中海国家，但在穆雷·伊斯美尔苏丹统治时（1672—1727年）它在地中海事务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土耳其苏丹爱好奢华的建筑。比如在梅克内斯，他的统治使人回忆起路易十四，但他的残暴和极权欲又让人想起彼得大帝。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才能，而不是它的私掠船，使摩洛哥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摩洛哥的海上私掠船在萨利很多，更有意义的是土耳其苏丹想把它们全部控制起来，并享有其战利品。有一些基督教哨卡防守不住投降，一个个撤离：1684年英国撤离丹吉尔港，西班牙分别撤离马莫拉（1681年）、拉拉什（1689年）和阿兹拉（1691年）。其他如马扎干、梅利利亚和贝莱斯（Velez）的石堡被严密封锁，休达长期被围攻，虽然没有成功（1694—1720年）。穆雷·伊斯美尔的黑军进攻谢利夫峡谷时于1701年4月28日被阿尔及尔军队击垮，他对特莱姆森的计划便无法实施。他在改进组织机构，尤其是商业机构方面的努力更有成绩，此时商业机构对国家经济比在阿尔及尔甚至突尼斯都更重要。土耳其苏丹与此直接利害攸关，非斯成为“整个北非地区的一个总仓库”^[23]。对外贸易主要由犹太人和基督教商人垄断。仅非斯约有5000犹太人，基督教商人最初主要是法国人，多数是胡格诺避难者，他们总想讨好英国人和荷兰人。穆

雷·伊斯美尔本人也渴望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1682年缔结和约，摩洛哥大使1698年开始凡尔赛和谈。但路易十四在对摩洛哥的态度上缺乏机智和远见，到他统治结束时，法国在这个地区的贸易和影响彻底崩溃。^[24]直到1727年穆雷·伊斯美尔去世后，摩洛哥才蜷缩本土。

菲南德·布劳德尔将国家分成“范围狭小的”和“纵深很宽的”国家，分成只拥有狭长海岸的国家和拥有内陆资源的国家。这种分法对地中海历史十分重要，也许是因为远离海岸的国家可以招募更多的军人，而拥有狭长海岸的国家主要依靠雇佣兵。^[25]这个时期的发展主要依靠前者的优势。和其他欧洲地区一样，地中海在1720年以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通货紧缩的时期。地中海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贸易经验和大量财富，它的财富足以使它抵御困难时期的危机。然而，事实证明条件并不好的北欧国家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而古老的地中海国家很快出现了不可救药的衰落。

为什么它是不可救药的？一般观点认为是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的結果。虽然在1620年以前还没有，^[26]然而，威尼斯在克里特战争中（1645—1669年）耗尽了财力，随后又与土耳其交战（1684—1699年、1714—1718年），结果北方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阻碍了它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但这对莱戈恩和马赛十分有利）。另外，因其浅水礁湖阻塞的困扰，只能用浮坞来帮助进港的船只减轻重量。这些都是一般的解释，听起来理由充分，但一定还有补救的措施吧？为什么威尼斯没有保住它作为德国和中欧南部窗口的地位呢？到1700年威尼斯的贸易仅限于弗留利、卡多（Cadore）、帕多瓦、特拉维索、罗维戈和波洛尼亚等地。^[27]曾一度繁荣的德国工厂处于半停产状况。这说明大部分德国的贸易（如伦巴第的）都被威尼斯丢掉了。这对安科纳、塞尼加利亚、的里雅斯特甚至热那亚等地的发展却十分有利。莱戈恩的繁荣证明了自由关税政策在吸引贸易并维持其长期繁荣方面的好处。但是傲慢的Serenissima尊贵的共和国（专指威尼斯）视这种政策为软弱的急于找个立身之处的新手采用的手段，不屑一顾。1661年表面上虽然放宽了关税政策，也只维持了20年，到17世纪20年代才重新实施。这种过分夸大的传统主义，只是寡头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对外国的影响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从1709年起贵族出国旅行也需十人会议批准。

同样有害的是所有的手工业行会都集中在威尼斯及行会对特权的维护和对所有改革的敌视。威尼斯内陆总体上交通不便，没有为在城市中处于窘境的工业提供发展的机会。科尔贝尔在劳动力低廉、地方势力薄弱、原材料充足的地区发展了新工业，无形中破坏了威尼斯的传统工业。所有这些条件威尼斯内陆都具备，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相对只是对某些地区的工业实施保护，如斯基奥的羊毛制品。总之，威尼斯的纺织业衰落很快：17世纪初出口呢绒约3万匹，到17世纪末降为2000匹；出口的丝织品在同一时期，也从1万匹降至6000匹，1660年前后急降至2300匹。五金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相对较好，即使这样也在与德国和法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中损失惨重。玻璃制造业成为威尼斯经济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内陆和首都相比正在发展，希望弥补国外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殖民地的损失，以及后来当安科纳得到教皇的支持，特拉维索得到哈布斯堡支持时，它失去了在亚得里亚海，即“威尼斯湾”的主宰地位所带来的损失。^[28]威尼斯贵族在海洋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主要用于投资土地，这样就使威尼斯不仅满足本身对大量食品的需求，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主要出口小麦和生丝。

曾一度称霸东地中海的威尼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的港口。1720年以后英国和荷兰的船只不再到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港口也很少能看到威尼斯的船只。内陆代替了殖民帝国。或许是由于长时期形成的狂欢节庆祝活动，使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快乐的城市，长期吸引了大量奢侈的游客和被放逐的人，掩盖了这个最尊贵共和国的衰败。而且它是文化史上陈腐的讽刺之一：在帝国巨大雄伟的废墟上，尽管有塞巴斯蒂亚诺·里奇（1659—1734年）和皮亚齐塔（1683—1734年），威尼斯仅仅站在绘画第二个春天的门口。^[29]伟大的蒂耶波洛1696年出生，卡纳莱托生于1697年，瓜尔迪生于1712年。他们都是意大利最后的大师。

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占领区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仍是一个大国。它包括西西里、撒丁和米兰，几乎占了半岛的一半，是一个具有“纵深”特点的地区。另外，它能够依赖西班牙和热那亚。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使奥地利人代替了西班牙人在这个地区（除西西里以外的所有地区）的统治，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西西里一度由萨伏依公爵统治。在许多方面曾是一伟大帝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

了。西班牙在16世纪曾经保护意大利免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侵吞，并从此维护了该地区的法律和秩序。与此同时，它显示了其政策的极大灵活性：这样在西西里贵族成为主要力量，有权管理岛内事务。而在那不勒斯王国贵族的所有政治权力皆被剥夺。那不勒斯特权阶级在1642年实际被取消。贵族旺盛的精力只能宣泄在一些优先权的小吵小闹上——这是由仪式性的政府养成的风气——或者是为哈布斯堡的对外战争效劳，或者是赞助艺术家。他们多数是大地产大庄园的主人，如同西班牙的显贵一样。但是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墨西拿等繁华都市有它们自己的贵族阶层、有教养的律师和政府官员。市民也循规蹈矩。西班牙人对城市市民很是温良恭让，因为有钱人也害怕市民出气不顺。自1678年墨西拿人起义失败后，市民总的来说是驯服的。马克切亚王子造反（1701年9月）诚然是为争取一个独立的王室而发动的，但它的失败意义更深远；一般说来，对西班牙的忠诚人格化地体现在蒙特萨尔基奥亲王身上，而这位君主曾领导1647年的起义。^[30] 菲利普五世1702年在那不勒斯受到热烈欢迎，虽然他辜负那不勒斯人民的希望，加速了1707年奥地利对那不勒斯的征服。在米兰有关西班牙统治的黑色传奇应归功于曼佐尼和其他人的浪漫主义所激发起来的忘恩负义。这些人把两个世纪后的19世纪民族情感挪了过来。公国用一个像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军团一样光荣的伦巴第军团武装了西班牙军队，遗憾的是他们只搞了一些被动的抵抗，没有形成起义。这里的农民也比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农民更贫穷、更可怜。城市无产者（如罗马和威尼斯）满足于慈善救济。贵族，除了不断地密谋外，开始模仿西班牙人的方式。而西班牙对违法者毫不留情，不论是贵族还是无产者。但他们满足于遥控政治：允许地方法院和管理机构继续执政，每一个继任的管理者在到任时，都要宣誓，重申自1541年查理五世新宪法所规定的全西班牙的管理原则。任何政府集权的倾向都被爵位泛滥及从形式上提高像参议院等职能下降的机构的地位所弥补。政府采用的方式是鼓励贵族中进行有关血统等无害话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西班牙在成功地维持了国内秩序的同时，它以欧洲为重的对外政策却把米兰变成了战争舞台，或成了邻国觊觎的目标。九年战争期间意大利战场虽然只在皮埃蒙特，但是伦巴第东部边界线却是1701—1705年旺多姆和尤金交战的战场，1707年，蒙特菲雷特、亚历山大里亚和罗姆里那为萨伏依参加同盟国而付出了代价，似乎没有人想到（甚至在米兰）就是米兰的独立。伏德蒙（Voudemont），西班牙

牙最后一个总督，在1706年尤金胜利后撤离该城，他的儿子已经在为帝国服役。经济上，公国为卷入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1680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荡然无存。它比西班牙的保护主义政策更有力地说明了它失去贸易中心这个重要历史地位的原因。然而，在农村，贵族和教士拥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而他们又不在农村，从而使中间经纪人能够实施更有效的管理。中间经纪人人数自1670年以来成几何级数增长。另外，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如科摩，工业增长部分弥补了米兰工业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尽管战争和瘟疫仍在肆虐，米兰仍是欧洲城市中最突出的城市之一。50年后可以半开玩笑地说，奥地利利用两个世纪来摧毁这个地区的决心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是这个地区的自然财富。

西班牙统治后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没有扼杀意大利人的创造天赋。那不勒斯的最后两位总督甚至还支持它。宗教裁判所也没有推行在整个西班牙文化生活中所实施的审查制度。那不勒斯成为意大利的文化之都，我们能追忆起的名人有：皮特·吉阿诺（1676—1748年），他是一名律师，因为《那不勒斯王国国内史》（1723年）一书而被开除教籍，这本书受到孟德斯鸠的推崇；奥雷西奥的多米尼科（1639—1717年），他是法官、古代史学家、文学权威、哲学家、考古学家、医学家——文艺复兴最后一位巨匠；G. A. 波莱利（1608—1678年）可与笛卡儿和哈维并列为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查理洛·梅洛（1665—1738年），一部大教堂教规的典范和笛卡儿派哲学家的先驱之一（那不勒斯诞生了许多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姆巴斯蒂塔·维克（1668—1744年），他的《国家通理新说》（1725年）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原则，他是近代最有创见的思想家——虽然他的思想在两代人以后才产生重要影响。A. L. 穆拉特利（1672—1750年）的成就不同，他是意大利北部的著名学者，长期把自己埋在摩德纳大公图书馆的手稿和古籍中，过着宁静的研究生活。他出生在摩德纳，使他能撰写出大量丰富的作品，以其博学和高产而著称，也许是最高产的学者。他的《意大利手稿再版》（1723—1725年）或者他的《意大利中世纪的古物》都是无可替代的作品。全书共有34卷，1738—1742年在米兰印刷，堪称个人成果的典范。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音乐剧和喜剧艺术在那不勒斯也得到发展。18世纪那不勒斯的音乐学校影响了整个欧洲。在它的4个剧院和3个音乐厅里（威尼斯人当时称有5个）孕育了天才斯卡拉蒂、吉姆巴蒂斯塔

• 佩尔戈莱西（1710—1736年）和多米尼科·西马罗萨父子（1749—1801年）。著名的画家有卢卡·吉奥达诺（他1705年死于马德里）和弗兰西斯克·索利梅纳（1657—1747年），他们是意大利唯一可与威尼斯人抗衡的学派，是一个17世纪与辉煌的罗马分离后具有欧洲影响的学派。索利门那学院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其中包括菲迪南多·桑菲利斯（1675—1750年），他以其大胆的楼梯设计而闻名。这一时期最具天才的建筑师是来自墨西拿的菲利波·尤瓦拉（1678—1736年），他在都灵找到了发展的机会。[\[31\]](#)

对意大利未来最具深远影响的是萨伏依—皮埃蒙特公国地位的巨大转变。[\[32\]](#)它转变成撒丁王国，是在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统治时期（1675—1730年）。1690年，一位优秀法官把这个小国视为传统的法国同盟，当时还不如瑞士的一个郡。到1713年它已经在欧洲赢得了一定的地位。相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漠然，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用欧洲力量均衡的优势，在1696年将法国势力赶出了皮内罗洛和卡萨莱，后来又得到伦巴第的一些省和西西里王国。18世纪萨伏依的强大反映在其王朝神奇的连续性上。但它在意大利的孤立地位和奥地利在伦巴第的出现，有效地遏制了它企图长期扩张的野心。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经常改变立场导致不信任，也暴露了他虚弱的本质。到1720年他不得不接受用撒丁交换西西里的条件。

两次大战清楚地暴露了公国的资源与统治者野心之间的差距。萨伏依本身和尼斯逐渐落入法国的手中；皮埃蒙特从16世纪中期逐渐形成的核心地位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加重地理上的劣势：根据1685年的统计，仅有九分之一的土地付税。1702年国家年收入总计为950万里拉，公债已经达到2600万，年息需要150万；在王位继承战中，军队总共耗费了8100万里拉，其中4100万来自盟友的津贴。[\[33\]](#)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从1650年以来缓慢发展，平均收入比多数意大利地方要好。人口逐渐增加：像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保守的技术、不完备的交通工具、政策禁令，尤其是贵族和教會的财产所占比例不当（又不断受到继承权和永远转给教會的经营权的束缚）[\[34\]](#)，阻碍了经济发展。工商业虽然得到查理·伊曼纽尔二世（1637—1675年）和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的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但受到资金短缺、行会的限制，以及政策不清的阻碍。只有丝绸工业和（有时是）毛纺生产可与伦巴第工业相媲美。尽管尼斯和比利亚弗兰卡港得到支

持，也无法与马赛、热那亚或莱戈恩对抗。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北部邦国中唯一不围着特权严重的首都转的邦国。都灵在17世纪意大利扩张的城市中比较独特，在1713年仅仅有5.6万居民。^[35]

财政和军队状况迫切需要改进，这也是维克多·阿马戴乌斯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王权在两位摄政王统治时受到严重削弱（1637—1661年、1675—1684年）。为了加强王权，扩大王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革也是必要的。蒙德维反对盐税的起义（1680—1686年、1699年）是潜在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早在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十几岁时，他就起草了一份私人备忘录规划了他未来的改革。1688年，他又命令重新调查土地。但是他的多数改革都拖至战争结束以后。早期改革的尝试由于有大量内在的困难及顽固派的反对，几乎都没有成功。从1717年开始，他重新整顿管理机构，均衡分配中央和议会之间的权力，统一货币，在各省建立地方行政长官，规定官员的工资，镇压贪污受贿者。这样，除了保留旧“封建”贵族对外交和军队的垄断权以外，几乎剥夺了他们所有管理职位。1713—1740年间，约有90%的管理职务由非贵族出身的人掌握。^[36]以盐税和土地税（tasso）为基础的税收，长期以来受贵族和教会特权及长期税务混乱的破坏，改革后简化了。1731年土地查勘完成，两个特权阶层免税的土地大量减少，封建特权受到冲击。都灵大学重建和建立一些国家学校后，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反对教会司法权以及对教会财产的斗争，到1727年罗马教皇与政府间达成协议后才最终完成。和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与罗马的政治关系阻碍了教会改革。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的反封建措施不顾其限制，在1720年没收了172个非法割让的采邑，也表明了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改革的决心。同时，严格规定封建司法权，并试图改革封建财政，限制地方封建势力，向非贵族的官僚、律师、金融家、工场主大量卖官鬻爵，使其更好地服从王权。在外交官中也可以找到非贵族出身的人，而中产阶级的工程师对大炮的贡献，破坏了贵族对军队的垄断。驯服地方行政长官和颁布皇家宪法（1723年、1729年），部分取消了地方的自由，进一步加强了王权的最高统治。

管理有序了，金融平衡了，外交得力了，军队强大了（18世纪30年代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被军队消耗），这些都是改革的成果。但是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大。中产阶级仍占少数，很容易被贵族同

化。他们在土地投资、公债、国家和私人的赋税上，甚至在工业方面，无不证明约3000家族的巨大重要性。在农村，贵族仍最有势力，特别是取得公地和农民债务后，势力更大。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的彻底改革，使其继承者只能对其补充完善，无法实施更激进的改革。另外，贵族、军队和改革的实质明显地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使都灵无法与米兰、那不勒斯、摩德纳或佛罗伦萨的辉煌文化相比。拉迪克提伯爵（1698—1737年）是自由的思想家，17世纪20年代出逃，^[37]拉格朗日、丹尼那、巴拉提和阿尔菲尔等著名人物也都纷纷步其后尘。

在地中海，海军建设总是一个尖锐的大问题。在地中海以外，海军可以在木材充足或进口木材相对便宜的地方造船，地中海国家能享受此待遇的却不多。奥斯曼帝国是个例外，它可以在其势力范围内找到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能引起法国妒忌的优质木材。用于船体和桅杆的木材（也用于建造君士坦丁堡）被运到位于多瑙河口和锡诺普之间的黑海沿岸。^[38]从波斯普鲁斯海峡到远东的特拉勃森都生长大麻，因为沿岸装载木材太危险；整个爱琴海地区都织造帆布，因为纺织品很轻，可以航运到很多地区，但要依靠风力；最好的铁来自萨罗尼卡（希腊东北部一港埠），有些（如油脂）来自黑海和克里米亚；阿尔巴尼亚提供最好的沥青和焦油；安那托利亚供应大量用于造炮的盐箱和铜。然而土耳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由于忽视和无能，或更主要是由于急于想要新船，他们使用不合季节的木材，使所造船只很快腐烂。他们的船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料。尤其在威尼斯，他们的资源（主要是达尔马提亚的）较少，不能像法国——1690年在罗什福尔为地中海舰队建造了15艘大船，威尼斯人无法进入大西洋造船厂——也不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在美洲用坚韧和高价的硬木造船。但是它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结果和奥斯曼不相上下。它的舰队虽小，但它的人员配置、管理和建造都比较好。后来威尼斯的船有时造了20年甚至50年。这倒反而更好，尽管这表明造船技术停滞不前，海军力量下降。

地中海海军人力资源也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双重问题，因为既要为大划船找桨手，也要为帆船找水手。征召水手不比其他地方更难。在相对自治的地中海世界里，水手们惯于扎堆，又是一个流动社团。海军雇用的水手都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战时，这一点比大西洋更为突出。而划船上的奴隶却难寻找。虽然海军拥有的大划船数量比16世纪要少，但西地中海仍拥有近100艘大划船。法国大划船

军团在科尔贝尔治下发展迅速。1690年有近50艘船，比西班牙或威尼斯的规模都大。另外还有6艘船分别由热那亚、托斯卡尼、马耳他和教皇国控制。到1716年国王控制的大划船需要6000名桨手。^[39]土耳其苏丹拥有的海军相当于全部基督教国家海军的总和。每艘大划船可载250—300名桨手（除士兵和少量水手外），其中奴隶占三分之一，因为奴隶损失很大，所以对他们需求也特别强烈。威尼斯和土耳其用战犯充当奴隶来满足需要，有时也把战犯出售给其他买主。1790—1792年间，法国缴获大量巴尔干半岛的战犯。九年战争期间，路易十四想向艾哈迈德二世借12艘大划船及桨手。艾哈迈德可能是因为宗教原因没有借给他。虽然“土耳其人”比其他国家的奴隶价格高，1702年平均每艘法国大划船上都有50名土耳其人。^[40]法国领事都有“为陛下海军的大划船寻找奴隶”的任务，与莱戈恩的法兰切斯基这样的专业经纪人订约。他是一个反穆斯林私掠船的爱好者，他为法国国王运送了近千名奴隶，据说价值200万（ecus）。^[41]16世纪80年代奴隶的主要供应地莱戈恩和马耳他的奴隶数量减少。与阿尔及尔的和平协议又要求返还俘虏，法国开始尝试用塞内加尔黑奴，甚至易洛魁人。这是一个沮丧的失败。现在是刑事法庭为国王的大划船提供大量的人力，其中有走私的盐贩和军队的逃兵，也有少量的胡格诺派教徒，如果可能的话也从城市中的社会渣滓和贫困的农村中征召有偿的自愿桨手。但在长期的战争中很难找到自愿当水手的人。

这种用人做的交易源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技术，它只能和种植园奴隶贸易，或者和雇佣兵贸易相比。尽管这种大划船在某些地方偶尔仍用作辅助战船，在波罗的海则刚刚开始用于作战。^[42]这基本表明了地中海的状况，即从古代它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7世纪便有可与曾在勒班陀作战过的舰队相比的大划船舰队，不仅如此，而且大划船的军事价值越来越值得怀疑。它之所以保留下来应感谢贵族的传统，官员的团结和威望，他们视海军如同陆军中的骑兵一样。政府本身面对不可避免的事不得不默许，这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运河的创造者，科尔贝尔和里魁特看到这个宏大的工程可让大划船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快速转移，作为调整地区海上势力平衡的一种手段。然而，到“地中海运河”1681年结束时，迪凯纳（法国名将）在西西里附近的胜利表明大划船作为战船的日子已经结束。另外，大划船空余的甲板很少，不适合在海浪较大的冬季作长途航行，只能搁置，能用的季

节每年从5月开始，最晚到9月初，除非是体积大而且坚固的马耳他大划船。现在大划船在海军中虽仍有存身之处，但趋势是（至少在地中海西部）用作为拖船进离港口（或远离战场）、作海岸警卫队和发送船，或运送贵重货物等辅助任务。^[43]这样，大划船给沿北非和托斯卡纳沿岸的西班牙要塞提供给养，也将西西里的丝绸运到热那亚或莱戈恩。大划船能在风平浪静和逆风中行驶，因而镇压私掠船仍有其战术价值，在沿岸水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奥斯曼和威尼斯舰队中他们仍被当作战船使用的原因。在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仍用于军事，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法国在下一代人中也没有完全抛弃它们。西班牙1749年又恢复使用大划船，1794年建造最后一艘大划船。^[44]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小邦国到18世纪末仍在使用的划船。大约在1730年他们以新的形式出现——地中海沿岸的三桅帆船——一种小船，可以安装桨，装备更好，比大划船更坚固。长期以来，地中海人民钟情于这些细长、精美的船只，这些船也成为他们历史的一部分。

这30年构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分水岭，3个方面的发展改变了地中海海军势力的格局：一方面西班牙海上势力崩溃，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兴起，还有英国势力的侵入。

路易十四曾给西班牙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使其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恢复。1676年迪凯纳在西西里附近与西班牙和荷兰舰队作战中，不仅击毙德鲁特，并使西班牙受到重创；在巴勒莫战役之后西班牙海军成为其自身的一具幽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当指挥整个海军的重担都落在法国身上时，路易品尝到削弱西班牙的苦果。1714年以后帕尔马最关注的是重建海军，尽快恢复西班牙过去在地中海的帝国政策。他的工作因以下事件而没有完成：1718年英国攻击帕萨洛角；1719年法国攻击帕萨赫和桑托尼亚造船厂，有6艘船被焚毁。

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奥斯曼海军这些年所进行的长期战争黯然失色。基督教在海上进攻的主力主要由威尼斯人承担，有时得到圣约翰骑士的帮助，偶尔得到托斯卡尼教皇海军的支持，1715年以后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援助。总之这场斗争复杂而又枯燥。^[45]双方人员在人员上都遭受惨重损失，船只或大划船的损失并不多。双方遭遇后的优柔寡断令人吃惊（如果他们不是战斗次数不多的话）。实际上，这时在

地中海东半部也像西部一样，实施海上控制收获不大。即使威尼斯人掌握了控制权，他们也因缺乏资源难以系统地加以利用。在有限的距离内他们能保证军队登陆，如1684—1687年和1714年在摩里亚，1716年在科孚岛；但是他们唯一长远的计划——1694年在巧斯岛登陆却惨遭失败。尽管有挫折，土耳其舰队每年都出海保卫他们的基本需要：最重要是达达尼尔海峡；在爱琴海自由行动；保持和埃及的联系。甚至在一群基督教劫掠船的帮助下，威尼斯人都无法长期破坏土耳其人的交通线。安东尼奥·佐诺——威尼斯人的司令官在巧斯岛被击败，他无法与其显赫的前辈莫罗西尼相比，而他的对手土耳其舰队总司令梅祖莫托（1640—1701年）是一名伟大的水手。从1692年起，他在与圣马克雄狮的所有战斗中大获全胜。有两次，1695年和1697年，威尼斯海军舰队勉强逃脱全军覆灭危险。梅祖莫托重新造就了奥斯曼海军，并决心以牺牲曾辉煌过的大划船为代价，定期增加帆船的数量；他指挥的船只最少都有30条。^[46]他出生和成长在北非回教地区海岸，最先看到了帆船的好处。威尼斯人则不同：他们更喜欢大划船队，而不是帆船舰队，很久以后才出现这种舰队。到1715年奥斯曼海上势力的复兴似乎十分稳固。事实上，当重新和威尼斯开战时，它再次征服了摩里亚。土耳其的侵略扩张引起南意大利和马耳他的担忧。为了抵抗土耳其，他们急忙请求法国援助，对巧斯岛的进攻是想抑制君士坦丁堡。20年后土耳其恢复得如此惊人，爱琴海再次成为土耳其一家独有的海，直至俄罗斯人到来（以1770年切斯马战役为代表）再次改变了东地中海势力的平衡。

从海军上讲，地中海不再仅仅是其周边国家关心的焦点。九年战争及其以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永远确立了英国在地中海海上强国之一的地位。英国在海峡内没必要保留一个常驻海军舰队，它可以迅速从加的斯或里斯本派船到那里，而且高效安全。1704年和1708年它得到了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虽然他们的海上干涉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英国人认识到它的势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侵入地中海还是逐步才有的。1683—1684年威廉三世放弃丹吉尔的决定被英国高兴地接受了^[47]，但劝说舰长们和大臣们同意1694—1695年在加的斯停泊一支冬季舰队却颇费威廉三世一番周折的。后来直布罗陀的战略作用没有像马翁港那样受到重视；直布罗陀海峡太宽，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从岸上对它实行全面控制，所以，没有出现

像为争夺丹麦狭长的松德海峡所进行的长期的斗争。许多年来，如果直布罗陀海峡不是昂贵的标志，乔治一世和斯坦厄普不会费力于1721年让它重归西班牙；各种反对的呼声主要是感情用事或出于商业考虑。^[48]和约签订之后，虽然由于财政原因法国海军要慢慢弥补其损失，但它却成为欧洲在地中海唯一屯集大量海军的国家。然而，任何战争英国都会参与，在思考地中海的新势力平衡时，必须考虑这种因素。地中海国家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

在一个海上运输的使用率超过其沿岸国家的海洋里，破坏敌人的水上交通是最重要的海军战略原则。第二个战略原则在法国与英国和荷兰同时开战时便清楚地表现出来。由于法国的两个主要基地布雷斯特和土伦都没有长期停泊整个舰队的设施，冬季来临时它不得不把舰队分开，当春季来临，战斗开始时，再重新集结。3月底或4月初各分区必须尽快装备，以防止敌人在他们分开时，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至少在九年战争期间，每一次战役之前法国几乎总是努力实现各分区的联合。而同盟国则极力阻止其集结。这样即使当主要战场不在地中海时，地中海也影响其战略。1689年3月托维尔想使土伦分区的20条船通过海峡到布雷斯特。1690年沙托亨诺特用17条船再次成功穿越海峡——虽然帕帕齐诺、齐利格鲁和冯·阿尔蒙德率领的舰队试图阻止他们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及时和托维尔一起参加了著名的滩头堡战役。1691年，法国舰队没有集结。其中一个中队帮助征服塞达那（塞达格恩）和尼斯国，而法国海军主力实力太弱无法和同盟国主力舰队决战。在托维尔指挥下沿桑丁斯海峡迂回式航行，避免交战。1692年集结舰队的努力未果，尽管厄斯忒斯极力想在3月底离开土伦，尽快和托维尔在布雷斯特会合，但由于海峡中不断的逆风阻止了他的行动。土伦分区没有参加拉乌格战役，结果法国惨败。在九年战争的最初4年里，双方的主要舰队都集中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路易十四希望在此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直到1693年6月双方在地中海仍不分胜负。春天，厄斯忒斯带领一支拥有20艘船的舰队突然出现在巴亚港（那不勒斯以西17公里，波佐利附近），西班牙舰队正在这里维修，但他错过了这次歼灭它的机会。6月，法国在拉格斯附近大败英荷士麦拿舰队后，法国在地中海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舰队，总计150艘船（包括一线舰队中的90艘）5600门炮和7万人。但是这支海军舰队似乎更倾向于破坏敌人的贸易，而不是取得战略胜利。当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

成功地将英荷的船只赶出地中海。但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极易打击的交通要道却安然无恙。

1694年6月，英荷主力舰队由罗素指挥。他是第一位英国地中海主力舰队的总司令。他的命令很简单：支持西班牙人，（西班牙当时在加泰罗尼亚遭法国的猛攻，面临毁灭的危险）并防止萨伏依背弃大同盟。8月，罗素迫使法国放弃包围巴塞罗那。托维尔以仅有的50艘船对抗罗素的75艘船，他只能全力开往土伦。国王威廉这时完全改变了英国的干涉方式，命令罗素把所有舰队停在加的斯过冬，在此之前的看法一直认为这样在秋分和春分之间任何大小的舰队无法过比斯开湾。现在英国的主力舰队在加的斯过冬，实际上法国驻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舰队便不能合二为一。威廉认识到他的做法有可能会把布雷斯特舰队引出英吉利海峡。地中海战事一年将持续七八个月，而不是三四个月。由于威廉的举措，法国本身的发展才成为可能。1695年罗素积极参加围攻帕拉莫斯，但在得到法国舰队逼近的假情报后，轻率地撤退到加的斯。必须承认，1694—1695年的战役让同盟军大失所望，1696年的战役收获更少。春天法国军队在布雷斯特集结阻止同盟军派舰队开赴加的斯。卢克在上年10月接替了罗素，年初返回，因为英国面临入侵威胁，他在国内指挥，在加的斯只留了一个小舰队由麦克尔和伊芙森指挥。

这样地中海再一次留给了法国海军，它可以再一次毫无干扰地支持地面行动。海陆军联合行动在意大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696年8月都灵协议最终使萨伏依从联盟中分离出来。10月在维杰瓦诺的会议上，通过了奥地利军队从意大利撤出的决议，这样奥地利就完全中立。路易十四给予萨伏依特使的特殊荣誉说明了他对这次成功何等重视。法国现在可以随意在尼德兰集结。同盟决定性的分裂出现，可能加速谈判实现里斯威克和平。巴塞罗那在1697年8月10日被围困两个月后向旺多姆和埃特富投降。西班牙和皇帝让步，战争结束。然而，两年后英国调停《卡尔洛维茨和约》成功，它遂又向人们发出警告：英国是地中海大国。

由于卡洛斯二世逝世引起的危机，使地中海的未来成为政府和国民关心的首要问题。“在当代人的眼中，它仍是商贸主战场。”
[\[49\]](#)50年来各海上列强与法国竞争后确立了微妙的平衡，任何威胁推翻这种平衡的事件都会引起有关商人直接和强烈的反对。这样在1700

年春，有关法国可以得到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的建议似乎构成了对莱戈恩的威胁。莱戈恩是“梅迪契的奇迹”，也是英国地中海贸易的交通枢纽。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它却导致后来英国和托斯卡纳商业界不妥协和直接的对抗。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以1701年春天尤金进攻北意大利开始的。一支由伏宾带领的法国舰队攻击来自威尼斯湾的里雅斯特的供给以阻止尤金的进攻。当时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海上联系仍很安全。为了破坏这些路线，威廉三世想在1702年派出英荷主力舰队。这次西班牙不再是同盟，基地成为直接和尖锐的问题。直到1703年5月第一个梅休恩条约才使里斯本代替加的斯变为现实。1704年3月，友托朗诺尔的力量太弱，无力拦截英荷舰队，它正运送部队到塔格斯，并由此揭开半岛战争的序幕。

1704年，地中海战争进入了一个更积极的阶段。直布罗陀海峡被占；在马拉加进行了一次非决定性战役；交战中双方开火7个小时没有变换队形。双方都错过了破坏对方战线、孤立其先锋的机会。战场的控制权虽然给了法国，但法军缺乏弹药，无法追击。路易十四政府没有果断地使用舰队出击，便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同盟军可以在地中海自由地航行，用泰塞著名的话说，“就像天鹅在尚蒂伊水中嬉戏一样”。马尔巴勒按照威廉制定的伟大战略，争取1704—1708年间在地中海取得决定性胜利。也许他记起了1667年德鲁特在梅德韦火烧英国舰队，或1635年西班牙从莱林群岛封锁土伦，他想在1707年对法国在地中海的中心——土伦，实施决定性的打击。这是1695年威廉酝酿已久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对方防御十分有效，他们为了保护战船，便将船半沉在海港里。而进攻又组织得十分糟糕。这次失败使菲利普五世有时间重组他在西班牙的军队。同盟军舰队则放弃任何攻击法国外围阵地的尝试。马尔巴勒对这次挫折十分不满，他在1711年声称攻击土伦的尝试是“从这次战争的开始……便成为结束战争最有效的手段之一”^[50]。事实是海上和陆地努力的结果只是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虽然西班牙在和平条约上失去了在地中海的所有海外领地，但只有米诺卡岛和撒丁岛的丢失可归因于海上力量薄弱。1708年两岛皆由英国人占领。除直布罗陀外，其他损失是由于被帝国军队打败而造成。由于尤金1706年在都灵的胜利，把法国赶出了意大利，1707年8月

打开了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51]甚至在1709—1710年冬天，当路易从西班牙撤军，仅留下菲利普五世和他的西班牙军队时，同盟军仍无法在那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个西班牙都团结在菲利普周围，只有巴塞罗那在贝威克指挥的全面围攻中于1714年7—9月投降。

虽然同盟军拥有海上优势这一点很少引起争议，但围攻土伦是同盟军唯一认真进行的努力，以控制地中海，掌握更大的战略灵活性。如果先占领米诺卡岛这个目标可能实现得更快。奥地利人早在1704年就有此建议，至少可以在占领马约卡岛和伊维萨岛的同时占领米诺卡岛，而不是在两年以后。事实证明只要有好的指挥，占领这两个岛就像占领直布罗陀一样容易。更令人吃惊的是，没人留意让·卡瓦利埃-卡米萨德叛乱领袖的建议。他从1702年起，在离朗格多克海岸不远处，牵制了法国宝贵的几个军团，长达数年之久。叛军力量渐渐削弱。最终，1710年，当一支仅有700人组成的部队在一名胡格诺派教徒德西桑领导下进攻阿格德和塞特港时，起义至此灰飞烟灭。虽然同盟军也曾打算使用胡格诺教徒，但是不是他们把前线划在帮助臣民反抗国王的起义了？如果答案是同盟军舰队没有有效的登陆部队的话，那么，这就是陆军比海军更重要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同盟国在商业上也没有取得重大成就。法国非但没有枯竭，对东地中海的出口反而迅速上升。在战争正酣时，法国正在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寻找新市场（虽然没有具体实现）。同盟军舰队对法国海岸的这种“封锁”，极易受到破坏。而且在继承战争前期，同盟军集结了在地中海的海上先头部队，然而却失去了在美洲瓦解西班牙帝国的机会。

这些年的战争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陆地战挽救了菲利普五世的王位宝座，使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里的人成为意大利诸邦的君主；陆地战使萨伏依成为王国，并成为唯一和其他大国获得平等待遇的意大利国家，加强了它未来称霸海上的野心。陆战耗资巨大，使联合省在1713年以前已经成为地中海国家中的二流国家。最后，威尼斯的海军在巴尔干半岛将大部分商业要地输给了哈布斯堡家族；而陆上力量在迫使奥斯曼从欧洲撤出的第一个阶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715年，法国成了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大国，甚至商业强国，而不是逐渐恢复的西班牙或遥远的英格兰。两次战争结果自相矛盾，法国这一结局又何尝不是，须知它海上战绩平平。大不列颠用武力干涉南欧，使其政治分量大大增强，从当时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看出。但斯坦

厄普本人也清楚，没有法国的合作它不可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路易十四去世标志着地中海作为世界贸易和势力角逐的中心已经成为过去。随着世纪的交替，17世纪让位于18世纪，列强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大西洋和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的线路上，至少在一个时期里列强们不再把地中海看作主要的未来。

[1] 读者可与《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16章进行比较。

[2] 阿勒颇由一条骆驼小路在亚历山大拉塔（伊斯肯德伦或斯坎德伦）和大海相连，这条小路因常有强盗出没而闻名。见G. 阿姆布鲁斯著《阿勒颇的英国商人（1658—1756）》，载《经济史评论》卷3，1931年，第246—267页。

[3] 曼特兰：《17世纪下半叶的伊斯坦布尔》（1962年），第44—47页欧洲城镇的数字主要依据莫尔斯《欧洲城市人口统计史简介》（卢万，3卷，Vols. 1955—1956）Vol. ii，第47、504—508页。

[4] 威尼斯的吉罗银行（1666年重组），不仅有储蓄业务，而且提供信贷、清理和对换业务，发行自己的货币Partita，银行储备至少50%为其货币担保，直到1714年土耳其战争重新爆发前一直保持偿付能力。参考G. 卢扎托著《16—18世纪威尼斯公共银行》威尼斯历史研究（帕多瓦，1954年），第225—258页；威尼斯的衰落，见第555—556页。

[5]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海盗和真正的私掠船的区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在黑旗和正式授权领事的劫掠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普通的海盗如果被捕，将在院子里被吊死，而劫掠船的船员最严重的惩罚也只是被送上大划船。

[6] 明显是夸大，此说法来自A. C. 台伊（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尔的统治者）1691年7月23日给路易十四的一封信，见E. 普兰特编《台伊与法国宫廷通信集1579—1833》（两卷本，1889年）第1卷，第310页。

[7] 《沙丁骑士到波斯及东方各地旅行记》（阿姆斯特丹，3卷本，1711年）第1卷，第2页。斯法克斯镇在这些年因为保留6艘平底船而被免税，他们随时准备追击基督徒海盗。

[8] 卡瓦里埃罗：《最后的十字军》，1960年，第83—85页。

[9] 它的主人是这样定义的：“一个大划船是用桨航行的，船体比其载重量重一倍，形状宽且尖，比普通带护卫的船载重多一倍，并且可以载多一倍的水手……武装14支到16支枪……”（Hist. MSS. Comm., *House of Lords MSS.*, new ser, 第7卷第182页。）地中海的水手们仍对三角帆给予很高的评价，它可以使船经受风浪的冲击，这是海盗必须做的。

[10] 甚至在红海（红海大体上是穆斯林的保护地），穆斯林也受到马达加斯加海盗的劫掠，他们在亚丁湾捕猎来往于穆哈和吉达（麦加的港口）的印度公司的船只；由于缺水，约翰·阿芙利船长1695年在丕林岛才没能建立基地。

[11] “投降书”是热那亚于1666年和1674年获得的，事实上它是一个虚假的开端：有关地中海东部及沿岸国家的贸易下降和拉古萨的贸易下降，见曼特兰著《伊斯坦布尔》，第519—522页。

[12] 以下第858—859页，自1669年一位奥斯曼大使到巴黎和1683年解救维也纳获得大批咖啡后，欧洲开始流行喝咖啡。参见J. 赖克朗著《巴黎的咖啡和咖啡馆》Cf. J. Leclant, *Le Cafe et les cafes a Paris, 1644—1693*, *Annales* (E. S. C.), 6e annee (1951), pp. 1—14。

[13] 据Levantse Handel的董事所说，海运保险费在1711年很贵，高达货物价值的50%，而那时英国和法国只付14%：K. Heeringa (编)，*Bronnentoe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Levantschen Handel*，第2卷（海牙，1917年），第6—7页。此书第112页上有荷兰船只1697—1715年间驶离海峡的数目。英格兰海运直到1708年损失惨重。

[14] 据1702年英国计算，在过去20年里，荷兰出口到北非的布匹减少了一半。伍德：《东地公司史》，牛津，1935年，第100页。

[15] 英国东地公司，1661年重建，只是一个管理机构，既不负责销售，也不负责进货，只负责组织护航，护航一般包括30艘船，比荷兰同行更安全。

[16] 丝绸之路本身也是问题，到1620年，莱戈恩开始取代威尼斯和陆上路线，1669年英国人的原丝主要来自波斯、土耳其（25万磅）、意大利（11万磅）；1700年44万磅，其中28万磅来自波斯和土耳其，11万磅来自意大利，5万磅来自孟加拉。见R. 戴维斯著《英国对17世纪威尼斯衰落的影响》，载《民间威尼斯研究》第9卷（1961年），第207—208页；本书原文第859—860页。

[17] 整个18世纪小规模私下铸币十分兴盛。如摩纳哥非法行为在整个地中海贸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从西班牙走私比塞塔，政府一般不干涉，而是大量征收附加税，以此获利，作为正常贸易费用。西班牙分别通过比利牛斯条约和1667年的商业条约，放弃了搜查法国和英国船只的权利。

[18] 如此大批货物的唯一护航队于1693年在拉哥斯被捕获。它带了4.7万匹布，但这是3年的全部出口量。英国的毛织品有两种：一种是东地中海大量需要的质地厚且温暖的呢绒，因为地中海内地冬天十分寒冷；另一种是德文郡和英国东部生产的较轻的呢绒，这种毛料在奥斯曼帝国没有多少市场（亚历山大除外，因为那里不冷），这种呢绒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较为畅销。

[19] 曼特兰，第556—559页；R. 罗曼诺：《18世纪马赛的小麦价格与贸易》（1956年），p. 29n.；cf. below, ch. xxiii (i)。

[20] 见本书原文第616页。

[21] 见本书原文第626页。

[22] 作为一个原则，土耳其苏丹的母亲不是土耳其人，常常是索卡西亚人，穆斯塔法二世和艾哈迈德三世的母亲是克里特人。

- [23] Picou de Saint-Olon, *Estat Présent de l' Empire du Maroc* (1694), p. 145.
- [24] 见J. 凯勒著《让-巴普蒂斯·埃斯提尔领事谈法国17世纪在摩洛哥的贸易》，《法国历史评论》第16卷（1959年），第7—48页。
- [25] Cf. F. Braudel et al.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Civiltà Veneziana Studi*, Vol. ix (1961), pp. 81—83.
- [26] G. Luzzatto, *Per una storia economica d' Italia* (1957), p. 68. 大约从1620年起威尼斯就把一些以前由它垄断的东方产品列为西方的产品——这便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 [27] 《威尼斯的对外贸易》，《威尼斯档案》第19卷（1936年），第145—183页。
- [28] 1732年在安科纳成为自由港（得到哈布斯堡的支持）之前，有关威尼斯人对安科纳的妒忌，见A. 卡拉西奥罗著《安科纳自由港》，1965年，第33页。
- [29] 见M. 勒威著《18世纪威尼斯的绘画艺术》（1959年）；F. 哈斯科尔：《赞助人与画家》（1963年，pt. iii）。
- [30] 1647年马萨尼埃罗的起义直接针对那不勒斯恶劣的市政管理。详见P. Voltes Bou的文章《奥地利唐卡罗斯亲王统治期间那不勒斯塞尔达涅的反叛史》，载《近代史研究》（*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第1卷（1951年），第49—128页。
- [31] 参见R. Wittkower著《意大利的建筑与艺术，1600—1750》（1958年），第258—282、305—308、301—302页。他是那不勒斯制作圣诞小屋的天才，是18世纪最杰出的民间艺术之一，在慕尼黑的拜恩国家博物馆展出。
- [32] 关于萨伏依—皮埃蒙特这一段由斯图亚特J. 胡夫博士提供。
- [33] L. Einaudi, La: 《18世纪初萨伏依财政》（都灵，1908年），第176—184、277—319、392—439页。得到伦巴第省和撒丁，表明财政状况有所改进。蒙特菲雷特、亚历山大里诺、洛梅林纳、瓦伦察以及瓦尔赛西亚产值约160万里拉，1715年在全国总收入约1200万里拉；撒丁（估计资本总价值800万里拉，相比之下西西里为6250万里拉）1730年为1500万里拉，年总收入中仅支付40万里拉。
- [34] 在萨伏依—皮埃蒙特贵族和牧师（1700年约占总人口100万中的3.5%）却拥有全部可耕地的25%多，占全部土地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伦巴第，1700年前后这两个阶层拥有土地的67%。继承权就相当于不可动摇永远继承一样，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非个别特殊情况。参见S. J. 沃尔夫著《绝对王政时代皮埃蒙特贵族研究》（都灵，1963年）。

[35] G. 普拉妥：《16、17、18世纪皮埃蒙特人口调查与人口》，《意大利社会杂志》第10卷（1906年），第349—355页。

[36] 参见《18世纪上半叶皮埃蒙特的改革》（莫德纳，1957年），第91—95页。

[37] see F. Venturi, *Alberto Radicati di Passerano* (Turin, 1954)。

[38] 不使用达尔马提亚的木材，是因为威尼斯战争和离土耳其海军船坞太远。埃及造船完全依靠进口木材。传统上是从黎巴嫩，有时也从潘菲利亚的安塔利亚造船厂进口。见吉哈丹伯爵《回忆录》1686年8月14日，巴黎，Arch. Nat., Aff. Etr. BI, No. 379. fos. 433ff。

[39] 巴黎的国家古代博物馆，海军，B5，3号，托施公爵自己有7条大划船，至少出租30年，一般由他本人指挥，开始租给西班牙，然后是法国。他有西班牙贵族的头衔。这个头衔得自位于塔兰托海峡的一个公国。家族属于热那亚贵族。1715年他成为法国海军大帆船的中将指挥官。

[40] 保罗·班姆福德：《1665—1700年法国海军大船上的奴隶》，载J. 帕克编《商人与学者》，明尼阿波利斯（1965年），第173—191页；P. 马森：《法国的大划船》（1938年），pp. 275 ff.；J. 马泰利：《大划船上的奴隶》（ed. K. 芬威克编，福利奥Soc. 1957），第45页。

[41] 国家档案馆，Arch. at., Aff. Etr. BI, No. 699, Livourne, 27 Aug. 1688.

[42] 托维尔希望1690年在比希·赫德以前拥有15艘大划船；敦刻尔克通过王位继承战争拥有了一支小的海军舰队。至于波罗的海，参见本书原文第806页。

[43] 1704年在马拉加，它们把法国战士从占上风的英国战舰贴风行驶中救出。

[44] G. Desdèvises du Dezert：《古代西班牙》第2卷（1899年），第394页。

[45] 见R. C. 安德森著《东地中海1559—1853年海战》（利物浦，1952年），第6章和第8章，参见第19章。

[46] 在地中海航行的第一个海军战队是1617年Osuna公爵的，阿尔及尔在地中海的航行比西班牙人多。马耳他决定建造4艘有50—60门大炮的战船，两艘在土伦，1700年被歼灭。见卡瓦利埃罗，第106页。

[47] 丹吉尔在1662年从得到它时起就是一个经济负担，它的海上价值不大。查理二世为保护贸易，（1669—1671年）在地中海拥有的常备舰队使用的是马翁港；见约翰·巴尔撒普《海峡航行》的引言（J. S. 布朗利编，Luttrell Soc. 转载，第20期，牛津，1959年）。

[48] D. 冈麦茨·莫尔达：《直布罗陀：菲利普五世在位期间的一件外交活动》（马德里，1953年），F. 蒙克：《英国在西地中海》（1953年），第44、70页；B. 拉尔森：《直布罗陀史》（1955年），第44—61页。

[49] J. Meuvret: 《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法国的经济利益》，载《现代史学会会刊》第12系列，56^e（专号，1957年11月）。

[50] 引自丘吉尔著《马尔巴勒》（1947 edn）第2卷，第789页。

[51] 见本书原文第429、593—594页，阿尔及尔利用西班牙的困难1707年占领奥兰，早在1694年围攻巴勒莫时就有此企图，但最终失败。西班牙1732年收复此地。

第十八章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1683年9月，土耳其人逃离维也纳，1684年8月，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重返该城，他的宫廷和政府那套复杂的机构又恢复了其传统的体制。在其后的35年间很多方面极少改变。皇帝、皇后、皇太后或皇子这些皇室，各有一批官吏，通常不得不同住在霍夫堡局促的宫室内。在他的私人宫室里，这位统治者商讨机密大事，这里是最高权力来源的地方。在许多接待厅里，他公开举行宴会，召集国务会议，封地受爵，接见宾客，这里则是正式行使这种权力的地方。靠近霍夫堡是一个由参差不齐的古老房屋和庭院组成的建筑群，大多数大臣的官署和各种委员会均设在这里。随着这些机构记录下大量的判决，记录下大量的下达到帝国各地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世袭领地、下达到匈牙利和（1700年后）意大利以至下达到派驻外国朝廷的大使们那里的训令，它们的案卷与日俱增，只是18世纪初以后，“宫廷”和“政府”的职责才逐渐明确地分开。此外，不久后，在1723年，查理六世开始重建帝国大厦，使之富丽堂皇而宽阔。

距霍夫堡稍远一些，则是下奥地利公国政府的行政总部的所在地和邦议会议员们的集会地点。这座由城垣和棱堡紧紧围绕着的城市的其他地方，则归维也纳市政当局管辖。但正像普通的市民长期以来已将他们的权力丧失给由寡头政治集团少数人把持的市政会议一样，维也纳的市议会也是在宫廷的监视下选举自己的成员。维也纳作为一个城市并没有政治影响。可以说明这一情况的一个例子是：皇帝的主要宫廷重臣之一宫廷典礼官，有权在该城市给所有与宫廷有关的人分配住房。贵族及其他人要求豁免因征用许多住房而形成的负担，而市民们则不得不承受这种负担，因而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但无济于事。另一方面，缴纳的房租和宫廷的开支，通常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收入来源。像贵族的做法那样，他们大规模地重建他们的住宅。1683年以后，在军事当局坚持保留的城堡周围的开阔地带之外，城郊也扩大了。一些名门显族开始在那里修建华丽的乡村住宅。1720年，这样的人家有200户。尤金亲王新建的观景楼可俯视他在一英里以外新建的城

市住宅。这座城市没有工业也没有它自己的影响，它成了宫廷和政府的附属物。

这座城市的历史，似乎反映了专制制度的稳步发展。行政制度的发展可以在某些方面证实这一点。1705年约瑟夫一世即位后，中央国库（皇家财务委员会）终于不顾地方上的强烈反对，剥夺了在格拉茨的内奥地利邦国库和在因斯布鲁克的蒂罗尔邦国库向来享有的独立地位。宫廷本身进行了各种尝试来改善财政管理。利奥波德一世死后，他的国库顾问官超编的人员被裁减。“重大决定必须经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这一规定被取消。由少数高级官员组成的各种小型委员会被赋予较大的职责。1717年，有一个委员会，即财政委员会被指定来监督帝国的一切财政机构。在奥地利宫廷首相府，维也纳的各个部门在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已经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同时它们往往过于热心于保护地方的利益，于是这时成立了另一个特别委员会，设法协调它们的工作。帝国首相府虽是在维也纳行使职权，但让人感到，与其说它是皇帝的一个机构，不如说它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机构，在宫廷首相府和帝国首相府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机构逐步侵占了其对手的领域。1705年以后的10年，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斗，一方是宫廷首相菲利普·辛岑多夫，一方是帝国副首相弗里德里希·查理·舍恩博恩，后者是帝国首相——美因兹选帝侯和大主教的侄子，已被提名为首相候选人。辛岑多夫获胜，因为在宫廷中，力量对比的优势在宫廷支持的政治家们一边，对这些人来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高于帝国的利益。舍恩博恩被排挤出国家的各核心委员会。另一项变更也出现在1705年，即任命了一位第二宫廷总管。这在不久以后就导致了司法和政治事务的分离。政治首先包括外交活动。

[\[1\]](#)事实上，宫廷首相府是一部强大的政府机器，较以前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即使它未能渗透进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希米亚领土。皇帝与他们的波希米亚王国之间最关键的纽带，依然是设在维也纳的自成一体的波希米亚首相府。

但是，反对中央集权以及类似的行政改革的力量极为强大。各公国的控制权，在各地的首府由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们和享有特权的各阶层组成的邦议会分别掌握着，即使在波希米亚也是如此。利奥波德一世任命的代理总督本人通常代表着地方的利益。邦议会定期举行会议，设有各种常设委员会，有自己的官员。它们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虽已被剥夺，但基于历史权利和历史疆界，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地域性的自豪感^[2]，它们在行政方面仍然享有最高的地位。邦议会投票赞成的税收由邦议会征收。某一个奥地利公国内部的政府军费，各项贷款的费用和在这个公国预筹的款项，或者转给它的债务，常常是首先从这些税收中扣除。由于会计工作管理不善、浪费和拖延，又进一步减少了上缴到哈布斯堡王室国库的数目。总之，邦议会以地主的身份，统治着农村地区。大多数地方税的征收依靠邦议会财务管理人员的信誉和手法。这些财务管理人员还协助执法。贵族常常在波希米亚地区和摩拉维亚担任官吏，他们的土地就在这些地方。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与其说是哈布斯堡王室各王公们的臣民，不如说是这些地方贵族的臣民，因为前者的法令很难达到遥远的地区和没有文化的农民。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的历史中常讲到的那种官僚——与地方上没有瓜葛的官吏并不存在。

历届皇帝本人都无法使中央政府各机构有效地连成一个整体。对专制君主来说，所有这些金库、首相府和委员会在理论上只不过是咨询机构，但他也极少能够解决由于这些机构之间传统的敌对局面所形成的这些普遍流行的争端。外国使节们不断谈到哈布斯堡宫廷的混乱局面。在这方面，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晚年时格外软弱无能。他喜欢征求意见，没完没了地听取各种互相矛盾的建议，但对任何问题都作不出果断的决定。到17世纪90年代，且不说一大批仅仅是名义上的顾问，在他周围就有由一些积极活动的顾问组成的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委员会，但缺乏一个小规模的有效的决策机构。从1697年开始，试行从各主要部门的官吏中派出新的“专门代表”，处理战时财政^[3]和征兵等根本性问题，但无济于事。很明显，约瑟夫一世在位期间（1705—1711年）实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但由那些平行的委员会提供咨询的制度仍然未变。最后，在1709年，这些委员会归属于一个拥有较大权威的小型常任内阁“国务会议”^[4]。172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了这样一个最高咨询机构的职能。在以前的30年中，政府无疑是有效能的，这其实是依靠了个人的才干：1683—1699年间，依靠的是波希米亚的首相乌尔里希·金斯基；在1703年大危机时，依靠的是分别掌管皇家财务委员会和皇家军事委员会的冈德克·施塔海姆贝格和欧根亲王；1705—1713年，依靠的是宫廷首相之一的约翰·塞勒；1701—1712年，则是依靠在“大同盟”的外交活动中与海因修斯

和马尔巴勒共事的约翰·符拉蒂斯劳。这些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少数辛勤工作的高级官员出力。事实依然是，由于彼此重叠和互相竞争的官僚机构造成的行政体制混乱，因而削弱了政府的力量。在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以及在约瑟夫一世骤然开始进行改革的时期，几乎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个弱点。查理六世（1711—1740年）表现出较大的活力；但由于他要求拥有西班牙的帝位——其结果是任命了一些西班牙的顾问委员会——而且他愚蠢地（如果不可否认是由于热情）改组财政，因而使维也纳宫廷更加混乱。

在思想深处，这些统治者不认为这样的缺点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他们所受的教育注定他们所强调的是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其中首要的是坚持宗教仪式。利奥波德一世及其次子查理不知疲倦地参加宫廷教堂的礼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教堂的音乐有专门的兴趣。这两位君主热情地前往玛丽亚策尔这样的圣地朝觐，认为以这种方式表明哈布斯堡王室与天主教会之间结下的深厚感情，乃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尊重这种团结，将之奉为政权的一大支柱。他们直接树起两个当时最强有力的天主教崇拜对象，即圣灵怀胎说和对捷克殉教者奈波穆克约翰的崇拜。长子约瑟夫聘用了较少教权偏见的家庭教师，他的气质比较接近于世俗。至于娱乐活动，所有这3位君主都不待在霍夫堡或该城城边的法沃里塔，而是去20英里以外的拉克森堡，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在这里，他们狩猎——约瑟夫特别热衷于此——或多或少将政务抛诸脑后。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认为政权是通过他们祖先世代相传的美德和地位而由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万世不移。这种自信是他们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的一部分。

对权力的要求首要的是“我们的王室”——“奥地利显赫的家族”的要求。这个王室的政体和利益，还有它的继承法，决定着每个家族成员的命运。由于约瑟夫没有直系男嗣，根据继承权，权力的要求依顺序把奥地利各公国的土地以及南德意志的前哨基地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前哨基地给予利奥波德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使他们拥有了波希米亚国王的领土，包括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拥有了匈牙利的圣斯蒂芬王冠及匈牙利全部历史属国，这在中世纪时曾越过喀尔巴阡山而深入巴尔干半岛；另外拥有了卡洛斯二世死后西班牙诸国王在全世界的领地；此外还给了他们一种信念，即在哈布斯堡家族长期以来世代被选为罗马国王或皇帝以后，按照惯例，帝国的王权是属于他们的。

一方面，藏书家利奥波德所雇用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把他的家系同不计其数的皇帝、圣者和英雄联系在一起，一直追溯到诺亚。另一方面，维也纳的宫廷首相府和帝国首相府的法律学者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法律工具来为哈布斯堡家族或者作为皇帝的哈布斯堡王室进行辩护，来反对敌对的王朝。不仅像方济各会的托钵僧马尔科·德阿维亚诺那样的宗教顾问，而且像符拉蒂斯劳那样的精明而冷静的政治家都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在他们与皇帝的通信中被授予的格外多的世袭特权。前者在整个土耳其战争期间曾写了一系列的信安慰并激励利奥波德一世，后者则经常从维也纳写信给在西班牙作战（1704—1711年）的年轻的查理六世。事实上，这3位哈布斯堡统治者体现了在各邦之间关系的消长变化中对权力的追求，这是这时期主要政治因素之一。它直接影响到东南欧、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和荷兰。

同时，他们和他们的顾问们深知，他们声称对各个地区有世袭的权利，而在分布如此广泛的地域里追求世袭的权利难度极大。最明显的是在1688年，直至1718年，哈布斯堡王朝需要决定将其有限的军事资源用在东面（对付土耳其——译者注）还是西面（对付法国——译者注）。另一件事是西班牙——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利害冲突；或者对给予他支持的帝国负有传统责任的皇帝与在其他地方的属地日益增加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之间的利害冲突。此外，还存在着如何把传统的权力要求同一些不缺少的盟国的要求调和一致的问题：18世纪的奥属尼德兰是查理六世决心保持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拥有的地盘的一种纪念，尽管1715年的屏障条约只容许他拥有有限主权，而且这些地方远离哈布斯堡王朝政权的中心。哈布斯堡王室在欧洲的影响，具有世袭王朝的特征，这就使它不可能建立一个在地理上紧密相连的帝国。当前的目标是积累，而不是增加有效的权力。

17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再次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面和南面发动进攻。土耳其人虽在维也纳被打败，但最初他们在匈牙利依然强大。这两种情况都加强了试图重新征服匈牙利的理由，并且帮助了那些想要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救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居民的政治家和教会人士。这种旧的主张是英诺森十一世从1676年起就坚持要求各基督教国家宫廷实行的。但直至1683年，利奥波德一世的顾问们更多地注目于在帝国内抵抗路易十四，而不是阻止土耳其人。这时，他们改变了

观点。维也纳通过紧张的外交活动，设法在德国问题上同路易十四达成停战协定并巩固同波兰和威尼斯（并间接地同俄国）的进攻性联盟，从而努力把它的军事矛头集中指向东方。1685—1688年间，17世纪欧洲的大里程碑之一——土耳其人对匈牙利的占领——倾坍了。^[5]穆罕默德四世指定的匈牙利“国王”伊姆雷·特克利被逐出了他在斯洛伐克的据点。米夏尔·阿佩费君主和特兰西瓦尼亚邦议会根据1685—1687年越来越苛刻的条约，被迫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进入。1686年9月2日布达陷落，1687年8月12日在瑙杰哈沙尼的胜利，封锁了土耳其军队的退路，使之无法返回多瑙河右岸支流德拉瓦河以北的平原。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军队从克罗地亚推进到波斯尼亚，被召唤到普雷斯堡的匈牙利邦议会，无法抵挡哈布斯堡政府对它所扫清的地区第一次主要的政治攻势：1687年12月9日，利奥波德一世的儿子约瑟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这正式结束了确立男系称号世袭性质的谈判，废除了在以前的一些国王“当选”时所拟定的特许状中奉为神圣的某些特许权，并且在加冕誓言中包括一条准则，暗示赋予这位统治者一些保留权力，使他得以无视宪法。这种做法深深激怒了马扎尔人，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被重新征服的领土临时由维也纳政府的各机构——驻军司令、皇家军事委员会、皇家财务委员会和军需总署——来治理时，更加怒火中烧。皇家财务委员会很快就任命了地区官员进行工作，中心设在布达、科希莱^[6]（卡萨）和查科韦茨。

这就是1688年9月4日贝尔格莱德陷落后哈布斯堡权力在匈牙利东山再起的前景。虽然土耳其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和萨蒂河之间，特别是在泰梅什堡仍占有重要的据点，但此时令人振奋的消息从更远的战场上传来。穆罕默德四世被废黜，奥斯曼帝国的营垒中发生了混乱。^[7]保加利亚的天主教徒起而发动叛乱，尼科波利斯主教到维也纳求援。在像乔治·勃兰科维奇^[8]那样的冒险分子和他的兄弟特兰西瓦尼亚东正教大主教萨瓦的鼓动下，塞尔维亚人骚动不安。萨瓦自称是中世纪塞尔维亚专制君主的后裔。更加鼓动人心的是，费特拉尼将军在返回特兰西瓦尼亚的驻地前，竟调动他的军队通过巴纳特河和小瓦拉几亚而绕一个大弧形，以此对瓦拉几亚君主塞班·坎达苏泽施加压力。坎达苏泽派出使团到维也纳，承认利奥波德一世的宗主权。与此同时，波兰在摩尔多瓦的战役受挫，因此，哈布斯堡王朝得以提出历代匈牙利国王所提出过的、适合当时情况需要（但很古以来就提出过）的、

对这个地区的权利要求。远在南面，在漫长的战线的另一端，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正在占领沿萨瓦河一线的格拉迪什卡和布罗德等据点。在所有这些地区，东正教对有势力的天主教盟友心存疑虑，并同莫斯科进行试探性谈判，但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从未这样强大过。到1688年底，在战争和政治方面的一个大好机会的轮廓已可清楚地看出：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推进，越过喀尔巴阡山，越过贝尔格莱德以南多瑙河向东的路线，并越过萨瓦河和乌纳河，进入东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奥斯曼帝国的使节已经起程缓行北上准备进行谈判，他们接受了什么指示，则仍未透露。

此时，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西欧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也开始表现出来。尽管马尔科·阿维亚诺可能在大谈其继续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但是曾经在1673年促成皇帝与荷兰结成联盟的所有论点，这时形成了甚至更重的压力。路易十四知道，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方的军事胜利，影响到西方的政治舞台，并知道土耳其人建议举行谈判，目的是加速巩固法国直至莱茵河的影响。如果他获得成功的话，就可能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哈布斯堡家族和皇帝深为关心。其中有洛林的命运问题（利奥波德一世的姻兄弟、驻匈牙利陆军的军事长官洛林的查理五世，坚决不接受法国并吞他的公国）和奥尔良女公爵要求分享选帝侯之领地的复杂问题。能够向利奥波德一世施加个人影响的人，莫过于他的岳父、新当选的有王权的选帝侯领主法尔茨—纽贝格的菲利普·威廉，此人坚持不懈地通过皇后进行活动，同时他原来的大臣施特拉特曼在维也纳担任宫廷首相之职。此外，还有科隆主教选举的危机。^[9]如果路易十四硬要将他所提名的候选人菲尔斯滕贝格强加于人，那么首先牺牲的将会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个家族拥有该主教职位——往往还兼任其他主教职位，包括战略据点列日在内——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而贝尔格莱德的胜利者、皇帝的女婿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成员，并且是经过小心的努力才诱使他摆脱了他父亲同法国的联系而成为盟友的。而且，通过维也纳的斡旋，马克西米连已获得允诺掌管西属尼德兰的政权；而法国在那里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将会使这一允诺的价值越来越小。西班牙人自己吵吵闹闹地要求支持，而且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给他们在维也纳提供了一个达到目的的有效工具。最后，帝国的各邦肯定都希望联合抵抗法国的武力和外交，这样，皇帝若拒绝支持他们则是失策的。他必须记住，他在匈牙利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邦的资

源。总之，在这时候，他本人不能允许斯特拉斯堡永久与帝国疏远，也不能允许布雷斯高永久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离心离德。他也不能失掉这个使萨伏依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从法国分离出来的机会，而只有他自己提供帮助，这个机会才有可能出现。

就这样，在西方出现的危机和在东方取得的胜利，造成了一种几乎平衡的均势，这种均势决定了直到签订《里斯威克和约》和《卡尔洛维茨和约》时的奥地利历史的进程。利奥波德一世附和金斯基和在匈牙利领导军需总署的安东尼奥·卡拉法将军的主张，最初也认为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会是很困难的”。然而，不论西线处于多么严重的危急关头，哈布斯堡家族也几乎不可能放弃沿多瑙河取得的胜利果实。正在维也纳同土耳其的两位使节们讨价还价^[10]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臣们这时一步步降低原来的一些要求，但仍然坚持要求土耳其完全交出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并拆除瓦拉几亚的土耳其防御工事。土耳其使节们未被授权接受这样的条件。此外，维也纳对于如何指挥在匈牙利的下一次战役而向巴登的刘易斯下达的指示太不明确。这些指示要求采取防御战略，但又允许将军们充分自由行事，因此，刘易斯与他的下属皮科洛米尼和费特拉尼于1689年向摩拉瓦河流域发动猛攻，深入到巴尔干半岛。他们的这次进攻意味着利奥波德一世失去了退出土耳其战争的一切机会。温和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他只好接受两条战线作战，批准同海上列强缔结新的同盟并使同土耳其人的谈判最后破裂。萨伏依的年轻的尤金和一些新教政治家们把巴尔干战争的继续归咎于教士们在宫廷的影响，这对利奥波德本人是不太公平的。

起初，媾和的失败似乎很幸运地造成了深入南方获得更多好处的机会。皮科洛米尼从尼什推进到于斯屈勃（斯科普里），到1689年11月推进至普里兹伦，他以优惠的条件胜过了在此以前已经同这个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接触的威尼斯人。他劝告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享有很大官方权威的佩奇主教阿塞纽斯三世宣誓效忠皇帝。1690年4月6日，利奥波德一世发表宣言，呼吁巴尔干各民族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君主，并允诺在合法统治者匈牙利新国王的领导下享有自由。同年冬天（1689—1690年度），巴登的刘易斯率领的军队的另一半渡过摩拉瓦河，在铁门以下的一个据点到达多瑙河，驻扎在小瓦拉几亚，同时其所属军队也从特兰西瓦尼亚推进到布加勒斯特。海斯特

将军同摩尔多瓦的贵族统治集团缔结了协定，规定纳贡、供应粮食并维护宗教自由。

这些业绩是哈布斯堡王朝前进的极限。土耳其人重整旗鼓，1690年成为帝国军队败退的一年——从各公国退回到特兰西瓦尼亚，从巴尔干半岛退回到匈牙利。瓦拉几亚的新统治者康斯坦丁·布兰科范恢复了他运用多种策略的自由权，不偏不倚地同时与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举行谈判。塞尔维亚重属土耳其。原先允诺的“塞尔维亚人的解放”未能实现，相反，他们的主教不得不率领该族人向北迁徙——这种迁徙虽然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在贝尔格莱德，在该城市尚未被土耳其人收复以前，东正教教士们刚刚代表该教会所有成员向皇帝陈述了要求。阿尔塞纽斯在德拉瓦河畔的卡尔洛维茨建立了他的主教区。利奥波德一世批准了在他统治下的东正教的权利。后来有一种具有一定影响的奇怪说法，错误地硬说塞尔维亚人是应皇帝的邀请离开他们的家园，并在他的恩赐下定居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的。事实上，他们是由于皇帝失败的结果才来到北方的。

随之而来的是军事上的相持阶段。土耳其人于1691年8月在扎莱凯曼遭到严重挫败后，未能越过多瑙河右岸的德拉瓦河前进。他们丧失了毛罗什河以北所有的在匈牙利的据点，这条河从东流入蒂萨河。就他们来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司令官们既不能攻克毛罗什河以南的泰梅什堡，也未能收复贝尔格莱德。土耳其人占据的贝尔格莱德和哈布斯堡王朝占据的彼得华亭（彼得瓦拉德）的防御工事在1692年都有所加强，在以后的几年，他们之间在这个地区发生了大量的未分胜负的战斗。渡河与渡过大片沼泽地带（德拉瓦河、蒂萨河和特梅斯河接近多瑙河之处的大片沼泽地带。当时在这个地带，贝加河缓慢地经泰梅什堡流入蒂萨河）在交通上的困难，使当时在波河流域或在佛兰德的交战这种暂时的问题，比较起来，可谓无关紧要。1692年后在这里进行的战役付出了很大代价，却未能决定胜负。维也纳从汉堡和荷兰招募了航海船长和水手，改进了它在多瑙河上的军舰，但收效甚微。

当然，形成这种僵局的原因是由于帝国参加了九年战争。沿多瑙河一带缺乏优秀的指挥官和足够的军队。最后，促使利奥波德一世减少他在意大利和帝国承担的军事义务，是由于在西线的战争进行得对他不利，而不是由于他主动改变了政策。由于接受了路易十四和维克

多·阿马戴乌斯的最后通牒，在意大利的战争于1696年结束^[11]，这时他才得以将更多个团的军队和像萨伏依的尤金这样的第一流将领转移到东线。1697年9月11日，尤金在土耳其军队试图在曾塔渡过蒂萨河之际将其击溃。最后，土耳其人才开始认真对待和平。威廉三世的大使们为和谈铺平了道路，最后在卡尔洛维茨举行了列强会议^[12]，维也纳强使波兰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俄国之外，交战各方最后同意保持他们当时占领的地方，只有一点是例外：为了在他们之间形成一条防御边界，主要的双方要放弃各自仍然占领的在对方统治的领土上的孤立据点。因此，哈布斯堡家族未能得到泰梅什堡、贝尔格莱德或在瓦拉几亚的立足点。他们保住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这两个地区之间往南至毛罗什河的地区，以及直至萨瓦河的几乎整个地区。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帝国，即使西方的学者或政治家对它的广大区域也所知无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承担划定这个尚未绘成地图的国家的边界这个困难任务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路易吉·马西格里伯爵（1658—1736年）于1726年在他所著 *Danubius Panonico*——*mysicus* 一书中首次发表了关于整个多瑙河区域的充分的记述。^[13]

沿着这条新边界，18世纪初存在着许许多多互相对立的机构和居民。哈布斯堡政府扩大了1683年以前保卫过内奥地利和克罗地亚区域的防御体系，又建立了新的军事区，其中修建了许多由小的边防哨所组成的防御地带和较大的要塞。在这些地方，派了少数正规士兵以加强当地的移民，这些移民本身也是战斗人员，由土地所有者支付他们服军役的报酬，这些移民多半是塞尔维亚人或其他移居来的斯拉夫民族的成员。事实上，有很多家庭和个人被歉收、传染病、人口过剩或他们定居的地方沉重的税收所驱使，被别处有较好土地的传闻所吸引，接连不断地到处迁徙。如1715年，有特别多的人从西克罗地亚移居多瑙河平原。与此同时，皇家财务委员会不断设法缩小军事委员会管辖的区域。马扎尔人居住的郡县要求控制毛罗什河沿岸的居民，但军事移民表示抗议，不愿像匈牙利农民那样纳税。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地区邦议会，以军事长官为首，坚持他们在佩特里尼亚附近的一部分边界的权利。天主教教士攻击最近给予东正教的特许权，这些特许权是在马扎尔人后一次叛乱期间由约瑟夫明智地批准的。总之，在哈布斯堡王朝新统治地区的南部地区无统一可言。1718年，由于获得了泰梅什堡和巴纳特，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及瓦拉几亚的狭

长地带，因而出现了明显的更加巩固的局面。《帕萨洛维茨和约》以后，移民比在《卡尔洛维茨和约》以后动荡的时期增加得快。

利奥波德一世在多瑙河流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他在西欧也大体上保持着原来的权利。维也纳虽仍然同土耳其人作战，但它是各王朝中最后卷入九年战争、接受《里斯威克和约》的一个，这表现了他模棱两可而又坚定不移的政治家的风度。

在前线不断推进的同时，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后面继续以军事压力巩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战果。当地邦议会希望采用这样的解决方案：该公国继续存在，该国君主（当时阿佩费尚未成年的儿子）和邦议会则仅仅承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宗主国权力，以换取维也纳对特许权的宽宏大量的保障。而马扎尔人则认为该公国是匈牙利王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但是，利奥波德（尤其是在卡拉法的劝告下）却想在特兰西瓦尼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便同匈牙利的邦议会抗衡。利奥波德所采取的政策果断而狡诈。他先将米夏尔·阿佩费的王位问题搁置一旁；保证了路德教、加尔文派、唯一神派和天主教这四个教派的特许权；制定了平时和战时的年度税收限额；并规定了当地文官政府和哈布斯堡王朝军事长官各自的权限；最后，使特兰西瓦尼亚人惊讶的是，他在长期支吾搪塞之后，竟拒不承认年幼的阿佩费有权继承其父的王位。于是，一个新的特兰西瓦尼亚首相府和财政部开始在维也纳办公，这又使马扎尔人惊讶和愤怒。实际上，驻当地的哈布斯堡王朝军事长官们仍旧发挥着左右一切的作用。1697年4月，阿佩费终于正式放弃了他的继承权。至此，奥地利这段时期对外扩张的一个阶段便告完成。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曾是奥斯曼帝国统治平原地区的得力助手，也是使上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得以成功的重要援军。从此以后，它终于销声匿迹了。

匈牙利本身造成的问题与此大不相同。为了制定详尽的永久性解决方案，成立了以红衣主教科洛尼希^[14]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应付眼前的难题，诸如军事占领造成的各种弊病、土耳其人长期以来提出的含糊不清或引起争议的领土要求、劳动力的缺乏等。另一方面，他们还讨论了独裁政体和宪法权利等根本问题。鉴于匈牙利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科洛尼希打算搬用旧马扎尔政体的基本行政区划“科米塔特”（Komitat，郡）。他还企图为哈布斯堡政府、军队和税务部门在当地的权利寻求保障。保罗·埃斯特豪佐王权伯爵

（匈牙利宪法确认，王权伯爵为国王以下最高职位）等马扎尔人由于当时在军人政权下自尊心受到损害，腰包遭到搜刮，强烈要求尽量恢复他们的世袭权利。卡拉法希望再次试行独裁政体（1681年以前的10年中曾作过这种试验，但未获成功）^[15]，因而同红衣主教科洛尼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红衣主教虽然对新教势力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试图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因此，委员会商讨后所确定的计划，即著名的“解决匈牙利问题备忘录”同时遭到马扎尔人和哈布斯堡王朝文武官员的反对。前者称其为独裁的蓝图，后者则认为它对马扎尔人陈旧而不守法的自由观念过于容忍。该计划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采纳。其中，土地所有权之争的解决进行得十分缓慢，以致无主土地的出卖直到1696年才开始。原计划草案中有关移民的措施是一个重点，但很久以后才得到实施，而且首先采取行动的是地主个人而不是政府。军需总署继续恣意横征暴敛，并动用军队强化税收。由于正在进行土耳其战争，军人对政府的控制丝毫没有削弱。同土耳其的讲和以及随之发生的西班牙继承权战争（驻匈牙利的一些部队被派去参加这场战争）为新的骚动提供了条件。

真正能够改善当地状况的唯一的一次尝试却使局面进一步恶化。1697年，利奥波德试图解决直接税收这个根本性问题。其实，他的胃口之大是当地人民所难以满足的。但是，为了减轻把农民压得透不过气的税务负担（早期马扎尔法典把农民称为“纳捐的贱民”），利奥波德决定也向大贵族和绅士们收税。他不愿下令召开帝国议会会议，但后来却屈从于抗议之声，大大减少了向大贵族们征收的款额，并同意暂不向小贵族征税。结果，农民仍旧遭受压榨。于是，成群结伙的散兵游勇开始四处袭扰。哈布斯堡王朝驻军据守着各个城堡，只能靠零星袭击来控制乡村地区。由于农民抗拒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市场上不断发生骚乱。到了1700年，地主和政府双重盘剥所触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已可见于匈牙利大部地区。这些暴动成了后来一次重大政治叛乱的温床。

一般来说，面临农民暴动的主总要和政府联合起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条规律却不适用于匈牙利。首先，匈牙利贵族所珍视的政治传统不仅允许造国王的反，而且允许向外国（波兰、法国以及土耳其苏丹）要求武装支援。其次，他们曾在很多问题上同哈布斯堡王朝军官发生争执。此外，他们惧怕政府的税收计划，在皇帝始终不

召开帝国议会会议的情况下，他们就更是怕得要命。最后，利奥波德拒不召唤匈牙利代表参加卡尔洛维茨会议，又一次蔑视了他们的传统权利。于是，由于两位重要人物的介入，危机终于爆发了。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二世拉科西^[16]（1675—1735年）。虽然他在朝廷圈子和一所耶稣会神学院里度过了循规蹈矩的青年时期，但马扎尔人却忘不了他祖父、曾祖父（两人都曾为特兰西瓦尼亚君主）以及继父特克利（Thököly）的称号所赋予他的声望。于是，他轻而易举地成了匈牙利东北部势力最大的大贵族（法语作grand seigneur），拥有一望无际的庄园和数百个村庄，其葡萄园和盐矿之多更是无人可比。另一位人物是尼古拉·伯采伊。此人门第不如前者显赫，个性却强得多，并且控制着拉科西。一位奥地利谋臣曾称伯采伊为“匈牙利的新克伦威尔”^[17]。这两位大贵族同外国势力取得了联系后被发现，伯采伊逃往波兰，拉科西越狱后也随之而去。两人于1703年返回匈牙利发动了叛乱，担任首领。当地要人们立即参加进去，因为他们有的仇视政府，有的则认为与其受叛乱者的威胁，不如做他们的头目。此后几年中最为突出的叛乱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卡洛林。此人也是东北部的大地主，在叛乱前不久曾担任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高级军官。新教徒大都追随这些信奉天主教的首领，而天主教教士们却避免与其发生关系。也有一帮马扎尔人支持利奥波德，特别是大贵族埃斯特豪佐以及约翰和尼古拉·佩尔菲兄弟等。此外，利奥波德还有可以从西欧调来的一支人数甚少的军队。

到1704年为止，拉科西的势力发展很快，此后两年有所减慢，再往后便开始衰落了。这一发展过程不是偶然的，因为后来布莱海姆大捷和都灵大捷对匈牙利的局势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到1704年为止，拉科西的对手们已经丧失了整个北部地区。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势力范围已经缩得很小，以致一次贵族大会宣布拉科西为该国大公。拉科西的将领们占领了多瑙河以西的全部匈牙利国土，并向摩拉维亚、下奥地利（远至维也纳森林）和施蒂里亚发动纵深袭击。这时，叛乱首领们逐步制定了一套解决匈牙利问题的谈判条件。此后，在不断进行的谈判中，他们始终坚持这些条件。其中一条是，匈牙利问题的解决必须得到外国的保证。为此，拉科西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同路易十四、波兰的奥古斯都及沙皇的秘密外交。但这些都只是口头上答应给予支持，而无实际行动。此外，叛乱首领们还坚持要求维也纳承认

拉科西为特兰西瓦尼亚君主。他们最为重要的一条要求体现在1704年2月发表的一项公告中。该公告宣布：1687年对匈牙利问题的解决无效。因此，约瑟夫作为匈牙利世袭君主的权利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叛乱者们还提出，必须解除新教徒的痛苦。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起初并不一致，但最终还是统一了看法。后来，叛乱者们在两次会议上又重申了上述的大部分条件。第一次会议于1701年4月在马罗斯—瓦萨凯里（Moros-Vasárkely）召开。会上，特兰西瓦尼亚人宣誓效忠拉科西。另一次会议于1707年5月和6月在奥诺德附近举行，这是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会上，马扎尔人通过宣布空位期而废黜了约瑟夫。

对叛乱者来说不幸的是，拉科西既无法控制他的朋友们，也无法使自己的战士遵守纪律。当新教徒在奥诺德会议上对以前的诺言被忽略一事提出抱怨时，两位信奉新教的首领被残暴地杀害了。特权阶层像以前一样拒不放弃他们免交捐税的权利。为了填补这项缺额，掌握着匈牙利北部矿业城镇的拉科西发行了铜质货币，随后又使其贬值。结果，物价高涨加深了该国人民的苦难。与此同时，拉科西的敌手们却逐渐强大起来。1703年与1704年之间的冬季，尤金对东部前线作了长途视察。使他几乎感到绝望的是：由于缺乏兵源，特别是缺乏经费，防御系统已陷于瘫痪状态。布莱海姆大捷之后，他才得以将部分骑兵团从巴伐利亚调往匈牙利。1705年秋，赫伯维尔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取得了一次赫赫战功后，他们从普雷斯堡以南的营地跨过大平原，攻入了特兰西瓦尼亚。拉科西亲自率兵堵截，但于11月11日在兹西波（Zsibó）遭到惨败。当地原有一支拉布丁率领的哈布斯堡王朝部队，曾长期孤立无援。这支部队参加到赫伯维尔的部队中来，重新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并逐步消除了叛军在该国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于1707年底终于占领米兰和那不勒斯。此后，更多的正规部队被派往匈牙利。在老将军海斯特尔的严酷统率下，他们于1708年8月在特伦钦取得重大胜利，并在喀尔巴阡山脉不断推进。随后，他们又占领了多瑙河右岸。这时，被克罗地亚革出国门的约翰·佩尔菲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1710年9月起担任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总司令，后来又参与了私下进行的谈判。卡罗林及其朋友们开始认真考虑改换门庭的主意，而拉科西却正无谓地游说于国外，在迷宫里越走越远。1716年2月，他越过边境进入波兰，以便为争取外援作最后的努力。当1716年土耳其人邀请他去君士坦丁堡时，他是从巴黎前往的。

媾和条件在索特马尔谈妥，并由1712—1715年的一届帝国议会批准（几乎未加修改）。哈布斯堡家族赢得了两个根本性的胜利。第一，马扎尔人承认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王位的继承权，条件是该王朝必须已有男性继承人。由于这一条，在约瑟夫于1711年死去之后，查理自动继任匈牙利王位。对此，马扎尔人没有提出异议。第二，匈牙利人历来声称，特兰西瓦尼亚、军事边界以及克罗地亚等边缘地区属于匈牙利宪法的实施范围。对此，和约未予认可。媾和之后，只有克罗地亚贵族集团保住了自己的权利，并同过去一样听命于维也纳而不是普雷斯堡。其他地区则继续由维也纳直接管理。从马扎尔人这方面来讲，首先，叛乱的失败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削弱他们的特许权，这是个极大的收获；其次，维也纳最终放弃了由卡拉法等人提出的专制计划，再次承认了新教徒的权利、地主的特权以及帝国议会和传统国家机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对那些在叛乱期间追随皇帝反对拉科西的马扎尔保皇派贵族的合理报酬。此外，查理六世于1712年夏从维也纳来到普雷斯堡接受加冕时，还曾强调必须实行和解政策。

巴尔干人并未被制伏，马扎尔人也并不完全俯首称臣。但这段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举东进受到了限制，为后来实现“双重君主制”[\[18\]](#)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早在1688年，路易十四对莱茵兰的入侵就曾迫使维也纳将视线转向西方。维也纳一如既往地认为，捍卫帝国是根本要旨。然而，1688年以后25年的政治状况清楚地表明，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的权力范围已经达到了极限，无法再扩大了。那些比较重实效的谋臣们情愿将精力集中于匈牙利和对西班牙领地的主权要求上。因此，整个“奥地利”政策都以帝国以外的事务为重点。如今回顾起来，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局势的一些政治家曾对这种偏向表示遗憾，但他们的观点却未能占上风。

1679—1688年，法国不仅在莱茵兰，而且在威斯特伐利亚和施瓦比直接威胁着德意志大公们。大公们大多数向哈布斯堡君主，即他们的皇帝求援。因此，对于皇帝的权力，即1648年和以后一些协议规定的有限权力，他们暂时还难以提出非难。表明这个时期特征的一个迹象是，约瑟夫于1690年迅速而轻易地被选为罗马皇帝，这同1658年利奥波德当选之前的长期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1711年约瑟夫去世后，其弟查理在选举中遇到了法国设置的重重障碍，但这些障碍

很快就被克服了。从1688年到1714年，维也纳在德意志的势力比稍前和稍后的几十年间都要强大。虽然施瓦比（斯瓦比亚）和弗朗科尼亚的一大批小国在九年战争和继承权战争中（通过帝国西部集团的联盟^[19]）在招募、供给和部署军队以保卫国家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但是，他们的联合力量一直不够强大，因而必须求助于维也纳。1693年，维也纳也的确帮助他们，将处于其本人名望和权力高峰的巴登的刘易斯从匈牙利调往德意志南部担任统帅。与此同时，利奥波德还向靠北一些的反法联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692年，他在同汉诺威达成的协议中授予恩斯特·奥古斯都选帝侯称号。^[20]他还于1700年同勃兰登堡达成协议（即《王位协定》），承认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王权。^[21]利奥波德的这两个行动有助于将更多的汉诺威和普鲁士部队派往战场对付路易十四，并将这些部队保留在那里。这些交易表明，皇帝在帝国内有着特殊的影响，其权力是不可否认的。正因为如此，维也纳有一派人主张首先加强哈布斯堡王朝在“帝国内”的权力。他们认为，这样做既符合宪法又能满足实际需要。他们敌视朝廷中的波希米亚籍、意大利籍和西班牙籍官员，甚至敌视一些奥地利籍的官员，认为他们动辄便以哈布斯堡王朝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为前提牺牲帝国和皇帝在德意志的利益。当时几任帝国副首相都是这派人的靠山。科尼蜚格于1694年去世之前是他们特别依仗的对象，1705年以后则是舍恩博恩。在这些年中，这个集团的主要劝说对象是先为国王、后为皇帝的约瑟夫。约瑟夫的私人教师和大臣萨尔姆亲王是这些人中最有影响的发言人。但萨尔姆于1709年失势。随之而起的是萨伏依的尤金、波希米亚的符拉蒂斯劳和奥地利的施塔海姆贝格。另外，舍恩博恩也逐渐被排挤出国务顾问的核心圈子。这几件事构成了宫廷派别之争的新时期。原来得势的那派人的政策也被撇到了一边，但这一点不大为人所注意。总之，虽然帝国各种条约和宪章为皇帝与各邦规定的宪法关系使维也纳在德意志具有影响，但没有给它足够的直接权力。

维也纳在德意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哈布斯堡王朝授予官职的权力。朝廷为来自帝国各邦的人才提供了一条仕途。塞勒以及（后来的）巴腾施泰因都是出身比较寒微的德意志人，也有一些大臣来自大户人家。这些家族的友好合作对皇帝来说是有价值的。科尼蜚格的父亲是一位施瓦比伯爵，而舍恩博恩及其亲戚则在弗兰克尼亚和莱茵

兰的许多宗教牧师会中具有影响。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中没有代表的帝国各骑士家族往往致力于谋求大教堂牧师和主教的职位，而皇帝的支持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各骑士家族通常也是皇帝的同盟军和附庸。萨尔姆亲王也与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显赫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皇帝对德意志西部和中部的许多势力都曾大力支持，而这些势力也仰仗他的庇护。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对这些势力却不那么重视。例如，1692年签订的《汉诺威条约》以及1696年达成的意大利停战协议都被利用来将更多的部队首先投入匈牙利战场，而不是德意志战场。又如，在九年战争的后期阶段，维也纳对弗朗科尼亚和施瓦比联盟理事会的态度日益冷淡。利奥波德当时最有势力的大臣金斯基对德意志各邦和海上强国都怀有敌意。虽然维也纳通过《里斯威克和约》收复了弗赖堡、布赖斯高和莱茵河左岸的一些帝国领土，但这绝不是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这些地区微不足道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未能收复斯特拉斯堡，也是由于它并不想把收回这座帝国城市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在金斯基及其同僚们看来，皇帝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他在德意志的实际权威同他显赫的称号历来毫不相称。因为他不经帝国议会的同意便不能立法，也无力强制不愿意执法的邦政府执行所立之法。1689年，帝国议会同意向法国宣战，赞成征收战争税，并授权利奥波德把不募集兵员的邦征收的税款分配给募集兵员的邦。议会还授权利奥波德监督亲王之间对冬季营房的分配。但“有军队”的德意志各邦仍保持着对本邦军队的实际控制。它们贡献的部队和金钱仍然很少，而宁愿出借军队以换取补助金。1697—1698年，朝廷提出在和平时期保留一支8万人的常备帝国军队，战时增至12万人，但帝国议会始终未予同意。在后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现役“帝国”士兵也许从未超过4万人，而且从未作为一支联合部队采取过行动。除此之外，利奥波德作出的承认汉诺威的公爵为选帝侯的决定使一些选帝侯和几乎所有王公都极为愤怒。帝国议会被他们搅得混乱不堪，因而从1693—1700年未能行使其职权。在这一点上，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诸侯们的观点是一致的。1697年，由于利奥波德接受了法奥《里斯威克和约》的第四条^[22]，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700年年末，西班牙继承权之争爆发时，许多德意志人都希望保持中立。维也纳采取的反措施是分别同一些王公达成单独协议。在多方利诱之下，他们答应给予支持。不久，帝国同海上强国结成了新的同盟，这对那些犹豫不定的王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科隆选帝侯不为所动。然而，帝国议会虽然已经宣战，并赞成采取与1689年相似的措施，却无意有效地加以执行，因为在雷根斯堡的议会代表们惧怕1703年8月至1704年7月占领着该城的马克斯·伊曼纽尔。由于宪法的制约使皇帝与帝国王公之间的同盟陷于瘫痪，因此，皇帝与帝国无法抗拒巴伐利亚与法国串通一气所施展的计谋。然而，布莱海姆大捷使维也纳一举获得了德意志南部的霸权。此后10年间，尽管绝望的农民于1706年举行起义，并被镇压下去，维也纳还是从巴伐利亚农村榨取了不少人力、财力和物力。约瑟夫将征得的一部分税款送给了邻近的乌尔姆和奥斯堡等自由城邦，并将他的主要大臣辛岑多夫、兰贝格、塞勒、施塔海姆贝格等人封为巴伐利亚贵族，以便让他们升至帝国王公的显要地位。后来，维也纳于1713年同马克斯·伊曼纽尔进行了谈判，提出以尼德兰南部（或其他领土）向他换取巴伐利亚的主权。^[23]这是因为，个别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家从战略和地理的角度提出，插在波希米亚和蒂罗尔之间的巴伐利亚十分碍手，必须收归己有。但查理皇帝却反对这一主张，宁愿尊重巴伐利亚选帝侯的世袭权利，旧西属领地的主权保持原状不变。

哈布斯堡家族同法尔茨—诺伊贝格—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亲戚关系，也使维也纳的政策受到深刻的影响。利奥波德曾于1685年支持菲利普·威廉继任法尔茨选帝侯，1690年以后，又成为其子约翰·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历代法尔茨选帝侯对“三十年战争”时期巴伐利亚剥夺其领地和封号一直怀恨在心。因此，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同巴伐利亚的同盟关系，他们难以产生好感。尽管如此，在科隆贵族会议1688年的选举中，法尔茨—纽贝格的王公们还是参加了反对法国候选人，支持约瑟夫·克雷芒（巴伐利亚选帝侯伊曼纽尔之弟）的斗争。后来，奥地利同巴伐利亚维特尔斯雷芒家族的同盟产生了裂痕。原因之一是，玛丽亚·安东妮娅^[24]于1692年去世。另外，利奥波德又愚蠢地试图阻挠约瑟夫·克雷芒谋取列日主教职位的努力，他想让一位法尔茨—诺伊贝格人当选，但未能成功。马克斯·埃马努埃尔染指马德里的意图也遭到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的姐姐、西班牙王后玛丽

亚·安娜的反对。由于上述原因，马克斯·伊曼纽尔和约瑟夫·克雷芒逐渐向法国靠拢，而约翰·威廉则使自己成为利奥波德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首先设法谋取尼德兰总督的职位，因为尼德兰与他的领地于利希和贝尔格是近邻。1700年以后，他还千方百计强化哈布斯堡朝廷在帝国的地位，使其变得强硬起来。他极力反对通过让步来争取伊曼纽尔，因此在1702—1703年与这位巴伐利亚选帝侯进行和谈时，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政策，这同约翰·威廉的作用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次谈判的破裂导致了南德意志战争的爆发。约翰·威廉是布莱海姆大捷的主要受益者，到1708年，他已获取了原来伊曼纽尔享有的选帝侯称号。这一称号在世俗选帝侯中居第一位。此外，他还被授予上法尔茨领地。1711年查理当选罗马皇帝时，约翰·威廉所投的赞成票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时已对马克斯·伊曼纽尔和约瑟夫·克雷芒颁布了“帝国取缔令”。然而，查理却于1714年让那两位废君回到拉施塔特，并归还了他们的王位和领地，从而出卖了约翰·威廉。尽管查理于1716年又让一位法尔茨—纽贝格人成为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帝侯，但查理同马克斯·伊曼纽尔已经握手言和。在1716—1718年的土耳其战争中，巴伐利亚部队起了助一臂之力的作用。

在北德意志，哈布斯堡家族对他们的头号劲敌勃兰登堡—普鲁士冷漠无情。^[25]皇家对比自己野心更大的腓特烈一世总是严加管束，既不准他为养本邦的军队而垄断“无军队”邦的税款，也不准他扩大其部队在弗朗科尼亚和（布莱海姆大捷之后）在上巴拉丁的驻扎范围。皇帝的法庭还拒不承认普鲁士霍恩佐伦王朝对德意志一些小领地的主权要求。最严重的是，《王位条约》中以及后来一些协议中的财政条款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摩擦。1705年，腓特烈一怒之下撤回了在上莱茵兰战场的部队。维也纳仅仅靠了海上强国的资助，才把普鲁士部队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与普鲁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也纳对汉诺威的态度十分友好。约瑟夫和查理分别于1699年和1708年娶不伦瑞克王朝的两位公主为妻，正式确认了这一友好关系。汉诺威的乔治于1706年被授权统率帝国军队。正像他的英国顾问们于1714年以后所发觉的那样，他在德意志之所以有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皇帝的支持。大战结束后商定有关尼德兰和意大利前途的屏障条约时，查理六世得以利用这种依赖关系作为对英国的政策施加影响的手段。

所有这些交易都表明，维也纳相当成功地左右了北德意志的力量均势。就南德意志来说，1704年之后，维也纳要想永久吞并巴伐利亚是完全可能的，但哈布斯堡家族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一计划。他们也不想坚持在莱茵兰和阿尔萨斯收复更多的领土，或者在该地区建立一座“屏障”，从而损害法国的利益。哈布斯堡王朝宁愿在别处提出领土要求，甚至宁愿在意大利而不愿在德意志更多地利用皇家的统治地位。较大的几个德意志邦毕竟早已变得强大起来，足以用帝国宪法的条文和惯例在帝国束缚皇帝的手脚。

因此，1700年西班牙继承权的最后危机爆发在即，维也纳在意大利采取了攻势政策，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利奥波德的谋臣们在马德里的外交工作十分薄弱，内政也混乱不堪。但是他们充分认识到，皇帝在意大利的利益远远大于在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利益。作为近邻，奥地利在意大利享有实际影响。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在世时，西班牙人曾再三拒绝任命查理大公爵为米兰总督的建议。即使如此，维也纳仍能左右意大利的局势。过去的“九年战争”曾表明，由于维也纳在意大利驻有军队，它可以利用皇帝的权力从被认为是“皇家的”领地征税，并在外交谈判中充分利用他的权力拒绝向某人正式封授某块领地，或者授予萨伏依公爵和托斯卡纳大公等诸侯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奥地利还得到米兰和那不勒斯一些小派别支持。^[26]

早在1700年7月，利奥波德的大臣们便劝他将军队集中于蒂罗尔和内奥地利。利奥波德于11月18日（即他听到查理二世死讯的当天）写道：“派往意大利之部队……必须火速挺进。”^[27]法国人先其一步抵达伦巴第。但是，尤金对意大利北部的袭击却是在西方进行的这场新战争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哈布斯堡王朝这一行动对“大同盟”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交战双方于1701年9月7日签订的和约，波旁王朝仅仅要立即让出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大多数奥地利政治家都对这条规定感到满意，因为对他们来说，“王位继承战争”的关键就在于意大利半岛。他们以这个首要目标为理由，对英国要在西班牙采取行动而施加的压力一再进行抵制。1703年，维也纳极不情愿地加入了葡萄牙同盟，因为在此之前的半个月来，符拉蒂斯劳曾多次提出，必须先征服意大利然后征服西班牙。但是，由于敌方开始加强对中欧的强大攻势，海上强国迫使利奥波德放弃这个主张。他之所以冒此风险，无疑还有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次要因素。例如，仍然活跃于

维也纳政坛的西班牙驻维也纳前任大使莫莱斯也主张进军西班牙。九年战争中驻加泰罗尼亚德意志部队统帅、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Carlos II）任命的巴塞罗那总督、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国君乔治于1702年去美国之前也曾于维也纳露面。另外，查理六世这位年轻大公周围的朝臣们不愿总是比其兄约瑟夫的大臣矮三分，而且他本人不久也显示出他有着自己的意图。实际上，利奥波德于1703年7月终于批准的条约是他对盟国作出的不幸的让步。尽管这些条款还是保密的，但他既然同意最终将埃什特雷马杜拉、加里西亚和南美洲境内的一些地方割让给葡萄牙，那么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班牙王位的处境就不会有利。[\[28\]](#)

对于条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维也纳有着清醒的认识。整个交易意味着，首先，利奥波德和作为长子的约瑟夫必须将自己对西班牙的继承权移交给查理，并确认其为所有西班牙领地的合法继承人。其次，作为所有奥地利领土假定继承人的查理（因约瑟夫无子嗣）不久可能成为变幻莫测的盟国手中的人质，成为反对奥地利以维护西班牙利益的人，或者成为反对约瑟夫家族以维护查理自己家族利益的人。因此，为了保障整个奥地利王朝的前程，确定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头等大事了。于是，父子三人于1703年9月签署了一系列著名的协议。9月12日，利奥波德和约瑟夫公开宣布放弃对西属领地的继承权，因而这项权利由查理获得。但他们保留了帝国对西班牙国王管辖的皇家封地的主权以及哈布斯堡王位继承方面的既定程序。查理对此表示接受。但查理已于7天前暗中同意这一法律观点：封地证书的原有条款规定，一俟查理二世去世，米兰和菲纳尔应由皇帝收回。利奥波德这时决定将两地授给约瑟夫及其继承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从西班牙手中收回了一些想要留给自己的领地时，坦率地提出了用途、距离和费用等方面的理由。最后，9月12日的公开敕令颁布之后，当天又签署了一份秘密文件，以解决西奥两国王位继承问题。西班牙法律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君主无子，王位应由其长女继承。然而，秘密文件却将查理之女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利留给了约瑟夫及其男性继承人，说到底就是留给了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系的任何男性继承人。同样，在继承奥地利和约瑟夫属下其他领地时，查理及其儿子也将优先于约瑟夫的女儿。这种坚持让所有哈布斯堡王子优先于所有哈布斯堡公主的做法能够“限制”王位的继承，从而捍卫整个家族的团结。这个典型奥地利式的分治协定必须向西班牙人保密。但是，在1713年

查理六世将其公布之前，维也纳某些朝臣对此想必早有所闻了。查理公布这个秘密协议是为了解决其女儿（原文误作Sister——译注）和侄女谁可优先的问题。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716年，但随即夭折。女儿玛丽亚·西丽莎生于1717年。[\[29\]](#)

查理秘密答应放弃米兰，本来就有难言的苦衷。更使他尴尬的是，利奥波德和约瑟夫不久又将其让给他人。像查理一样，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701年后期，他们开始同萨伏依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谈判，以便争取他加入同盟国。阿马戴乌斯于1703年11月表示同意。作为代价，哈布斯堡王朝将一些地方给了他，其中包括伦巴第西部一些地区。这样一来，维也纳的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双重骗局：西班牙人在某个时期将失去整个米兰公爵领地，而米兰公民们则将失去米兰十分重要而肥沃的一部分。

1704—1711年间，奥地利的扩张史走了一段曲折复杂的道路。它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却在意大利获得成功。1705年10月，查理在巴塞罗那受到热情的欢迎，并从此在那里确立了稳固的统治。然而，尽管同盟国不断加紧参与西班牙的战事，但查理的前途却日渐暗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军事上的胜利都属于盟国而不属于查理，因为他的全部资金和增援部队都来自海上强国。甚至查理将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部队（以及他的王后）运送到西班牙，以及同马略尔卡岛和撒丁岛的高级官员取得联系也都是借助于盟友。查理因时常同约瑟夫发生矛盾而削弱了他的地位，因而他怀疑这位皇帝不愿援助他，还在那不勒斯和米兰篡夺他的权力。虽然文官听从巴塞罗那的旨意，奥地利武将却服从维也纳的命令。驻加泰罗尼亚部队的统帅吉多·施塔海姆贝格有时也不太听从查理的指挥。1708年，尤金拒绝前往西班牙，因此施塔海姆贝格代任其职。此人能征善战，但与尤金相比就差远了。西班牙的整个政局使这位挂名君主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查理坚信自己是西班牙及其所有属地的合法国王。他对利奥波德为他选择的顾问不再言听计从，而转向听从一班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出谋划策。这些人包括摩拉维亚贵族米歇尔·阿尔瑟汉、那不勒斯的罗科·斯蒂拉伯爵（这位军人在战场上运气特佳）以及一群西班牙人和加泰隆人。其中最能干的是被查理封为里亚尔（Rialp）侯爵的拉蒙·代·维拉纳·珀拉斯律师。这种情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11年约瑟夫意外地早亡之后，查理回到了维也纳。他带回了一批亲信朝臣，

而且还念念不忘他在西班牙的王权。这两个因素在此后几年中深深地影响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另外，由于大批流亡者接踵而至，因而加强了那班亲信朝臣的实力，这些朝臣极端效忠于查理的事业，因而不可能同接管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睦相处。

奥地利向意大利的进军却一直比较顺利。起初，奥地利政府曾感到很难以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实现它所采取的攻势政策。1701年，奥地利计划在阿尔卑斯山以南采取的干涉行动曾推迟了6个月。这令1700年11月奉命率军进攻意大利的尤金十分懊恼。行动迟缓的原因是，宫廷军事委员会的混乱状况妨碍了兵力的迅速动员。该委员会副主席及主席（吕迪格·施塔海姆贝格，曾于1683年捍卫过维也纳）于1701年上半年相继去世，而受到利奥波德之命继任施塔海姆贝格职务的曼斯菲尔德亲王又很不称职。此外，利奥波德还犯了一个错误，让另一个低能儿萨拉伯格主管宫廷财政委员会。1701年，尤金的部队突然穿越中立领土威尼斯，皇帝则断然下令废黜采取敌对态度的曼图亚公爵，随即发生了一系列战役，双方在这些战役中不分胜负。1703年，维也纳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国家银行暂时垮台又加深了这场危机。^[30]因此，政府被迫从意大利调回大批部队，但未将部队全部撤回。这次危机迫使利奥波德任命尤金为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然后又任命贡达查理·施塔海姆贝格为宫廷财政委员会主席。此举使战争指挥权和财政管理权终于掌握在有才干的人手中。^[31]由于取得了布莱海姆大捷，加上约瑟夫一世即位后加强了政府机构，政治家们又将注意力转向意大利。1706年9月，尤金在都灵大获胜利。从此，不管盟国如何劝阻，奥地利人还是坚定不移地向那不勒斯推进，并于1707年7月将其占领。加埃塔要塞守军也于9月30日投降。可以说，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一天已经实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目标，而海上强国直到很久以后才做到这一点。为了一旦割让米兰领土之后能够保证该地的安全，维也纳最后还吞并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曼图亚。此外，哈布斯堡政府还于1708年废黜了另一块古老的帝国领土卡斯蒂利奥内的君主。早在挺进那不勒斯的途中，道恩伯爵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便采用双管齐下的手段，以军事压力和有关皇家旧有领地的一整套法律规定向意大利的一些侯国索取了军费。1707年，托斯卡纳、热那亚、帕尔马、卢卡等领地为供养哈布斯堡军队交纳了200万弗罗林的现金和实物。^[32]这些领地以后为这场战争所作的捐献虽然有所变动，但金额一直很大。

1706年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获得了压倒一切的优势。这在本来就有分歧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和维也纳之间又增添了新的争议点。其实，罗马与维也纳之间钩心斗角由来已久，构成了下述整个时期的特点。纠纷始于亚历山大八世在位期间（1689—1691年），在英诺森十二世任内则愈演愈烈，因为他同路易十四逐步改善了关系。维也纳同克雷芒发生争执的首要原因是，克雷芒拒不承认查理对西属领地的统治权，因而使西班牙、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地通常由国王支配的大笔教会税收有断绝之虞。哈布斯堡王朝则采取反击措施，于1708年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两地发布敕令，严禁将教会税款交给罗马。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在德意志各大学一些法理学家的支持下）断然否认教皇有权转授和管理并分取其收入，并宣布各领地从来就属于帝国，约瑟夫登基时（1705年），没有按照惯例向教皇提交服从书，他的顾问们也把作为最高宗教权威的罗马与作为意大利境内一个国家的罗马截然分开。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语言最犀利、最使罗马震怒的要算利奥波德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1696—1699年担任此职）格奥尔格·阿达姆·马提尼茨。当时他便全面提出了意大利境内哈布斯堡王朝封地的问题。1706年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再度爆发。例如，如果说帕尔马不是教皇领地，任何一位教皇都无法同意。然而，在1708年6月26日的一项庄严的公开宣言中，约瑟夫宣布帕尔马为帝国采邑。这场斗争原先是为了解决战争税和冬季营房这两个实际问题，但它不久便同意大利境内教皇势力与反教会势力由来已久的争执搅在一起。

不管其他方面在这场争斗中目的何在，奥地利军事统帅部决心获得沿教皇几个属国的北部地区驻军的好处（这个好处在1706年以前是由法国人享有的）。碰巧的是，莫德纳公爵里纳尔多本想当米兰总督，但由于该职授予了尤金，他的计划落空了，于是，他凭着同维也纳权势人物的关系（加上历史学家穆拉托里连篇累牍为他叫屈），便觊觎教皇属国弗拉拉和科马基奥（后者是虑据波河河口的小城）。尽管尤金和符拉蒂斯劳并不愿意，但在萨尔姆的支持下，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于1708年5月24日占领了科马基奥，并且宣布，约瑟夫皇帝对该地拥有世袭所有权。这一事件终于将克雷芒激怒，使他发动了战争。他的军队势孤力单，没有其他意大利公侯的援助便无望取胜。由于向公侯们提出的结盟建议立即遭到回绝，克雷芒于一年半以后停止了这场绝望的战斗，并承认查理为天主教国王。约瑟夫则撤销了1708年的宣

言，并将其他争端搁置起来，但这些绥靖措施并没有使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受到影响。

哈布斯堡王朝逐渐认识到，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对其权力的真正威胁将来自一个新的方面。使都灵解围和对米兰的征服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们给维也纳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维克多·阿马戴乌斯和海上强国立即要求协助经由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法国。为了使他们满意，约瑟夫的顾问们违心愿地派尤金率1.6万人进入普罗旺斯，但仍保留了8000人，以便进军那不勒斯。1708年，他们拒绝将尤金派往西班牙作战（此事也使查理不快）。与此同时，阿马戴乌斯还要求立即割让1703年允诺的伦巴第领土。1708年初，约瑟夫和查理交出了部分而不是全部有争议的地区。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家们都确信，阿马戴乌斯对伦巴第大部地区抱有不良企图。萨伏依的尤金对此尤其深信不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阿马戴乌斯不仅一味要求维也纳以其无法接受的解释方法来兑现1703年的条约，而且提出，维也纳应从米兰公国再割让一些土地，以抵偿他从1704—1706年向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部队提供的财政援助。此后5年中，尽管奥地利在别的地区无疑要投入大批兵力，尤金仍然强调，一定要将一支庞大的队伍留在伦巴第，以便遏制他的表弟。事实上，在意大利北部抵抗皮埃蒙特人的压力这时已成为奥地利政策中一个一成不变的内容。除伦巴第之外，阿马戴乌斯还另有所图，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早在1700年以前，他就根据自己在西班牙继承问题上的权利提出，西西里（或是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应当归他所有。在1709—1710年先后多次召开的和会及后来在乌得勒支和会上，阿马戴乌斯指示他的代表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于是，1713年签订的几个条约将西西里划给了他。对此，维也纳提出了强烈抗议（1707年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曾试图从那不勒斯攻占西西里，但未获成功）。然而，维也纳的对手不止阿马戴乌斯一个。1710年以后，它的对手还有英国，因为英国越来越急于在意大利寻找到一股势力，以便同哈布斯堡王朝抗衡，并进一步遏制法国。如果说1711年4月17日约瑟夫之死似乎为复兴查理五世的帝国带来了希望（或者说造成威胁），那么，查理六世不久便认识到，英国的海上力量使这种前景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地中海的交通离不开英国的舰队。

约瑟夫之死讯传到西班牙时，由于查理和妻子尚无后嗣，甚至连女儿都没有，巴塞罗那的朝廷焦急地讨论了对策。6个月之后，大臣们商定将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留在西班牙做人质（英国人也一再提出这种要求），由其丈夫前往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接收整个帝国以及奥地利本土。查理还下定决心尽量保持他所继承的西班牙主权。他认为，他的世系、他最近8年的事业以及他的盟友都使他有义务维护这一权利。维也纳的大臣们为查理没有及早返回故里感到十分惊慌，符拉蒂斯劳尤为担心。因此，他们更愿意考虑放弃西班牙。但是，此后几年决定外交方针和步骤的是新皇帝本人，而不是那些大臣们。查理同英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英国不想让他继续统治西班牙，后来英国又企图将他的意大利领地用做解决全欧问题的筹码。但是，英国用海军阻碍他的王后返国，孤立他在加泰罗尼亚的部队，并迫使其撤出，这种压力是他所招架不住的。尽管如此，查理仍然拒不承认菲利普和阿马戴乌斯分别为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合法统治者，并且拒不放弃曼图亚、米兰多拉和科马基奥。1713年，他将良港菲纳尔领地卖给了热那亚，给阿马戴乌斯以强有力的打击。虽然奥地利在西班牙遭到全面挫折，而且皮埃蒙特—萨伏依的势力有所增强，但查理六世（在匈牙利，他又是国王查理三世）却保住了大部分他想要保住的意大利领地。1720年，他还以撒丁换取了西西里。

查理声称，他对意大利领地的统治权不是靠征服得来的，而是继承来的。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西班牙先王们早先所承认的宪法结构和社会结构。^[33]1714年以后，奥地利仍旧通过“意大利事务委员会”（Consego D' Italia）管理这些领地，该机构那时已搬进了维也纳舒适的建筑物中，但机构中仍有一些西班牙和意大利籍官员，以便代表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在那不勒斯，贵族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维持他们的特权。新统治者只拒绝了以提比里奥·卡拉法为首的一小派人所提出的过分要求。卡拉法指望驱逐西班牙任命的总督之后建立一个自由自在的贵族政权。在这一点上，卡拉法的思想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和凡尔赛和会上的圣西蒙如出一辙。像往日一样，常有律师升入贵族的行列，贵族也继续把持着各省和那不勒斯市政府。意大利政府的资金来源依旧十分紧张，因为其中最主要的财产税仍是依据1667—1669年对财产的估价征收的。1720年，为了从西班牙人手中重新夺取西西里，政府花去一笔并不太多的额外费用，便将手头的资金消耗殆尽。在米兰，早在1706年主权易手之前，便出现过令市民反感

的政治改革迹象。当时，波旁王朝任命的总督沃代蒙特曾试图搬用法国的行政管理方法。1706年以后，奥地利人为了战争的目的也想提高米兰政府的效率，并计划进行一次新的税收普查。^[34]他们还于1711年在伦巴第降低了原料的进口税，以刺激该地的工业。然而，这种一时的冲动很快就低落下去。米兰市和米兰公国那数不清的行政区、议会和法庭丝毫未受损伤，仍旧充当着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可靠鹰犬。这些集团成功地削弱了总督们的权威。哈布斯堡王朝驻曼图亚的总督曾真切希望改善那个贫穷公国的行政管理，但他的打算也由于这类集团的抗拒而落了空。

总之，在进驻意大利的过程中，奥地利官员们并未过分更改原有的西班牙式统治结构，但政府的工作效率稍有提高。尽管在维也纳的那些西班牙官员从伦巴第和那不勒斯获取丰厚的收入，但哈布斯堡王朝总督们在任内并无中饱私囊之举。作为回报，新政权协助维也纳朝廷以及哈布斯堡贵族个人保持了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搜罗才士的旧有权力。例如，查理六世曾聘请意大利学者掌管帝国图书馆，并请意大利音乐家担任宫廷乐队指挥。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哈布斯堡朝廷在许多方面继续保持了“意大利化”的特点。

在奥属尼德兰，主权的易手就像在原西属意大利一样，并未引起太大的风波。1715年的屏障条约签订之后，查理连连向荷兰人发动顽强的进攻，将敌手搞得筋疲力尽，直到他收回佛兰德北部为止。这使驻荷兰部队给奥地利带来的财政负担稍有减轻。在那里，无人企图继续执行伯杰克的改革方案。缺席总督萨伏依的尤金委任的全权代表德·普里埃^[35]尽管讨厌古代流传下来的自主权，但还是加以承认。只有曾归入法国并以法国方式治理的伊普雷等地区例外。原西班牙“低地国家事务委员会”也在维也纳的新居中获得了新生。不过，它对奥地利国务委员会（Hofkanzlei）的依赖比“意大利事务委员会”稍甚。

查理六世对敌国和盟友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之后，在西欧获取了一大批新的领地，其范围之广并不亚于他父亲以前在匈牙利获取的领地。起初，这些地区的事情是他在外交方面注意的中心。后来，在尤金（此时其正处于政治家生涯中又一段辉煌时期）和克雷芒十一世极力引导下的教会势力两方面劝说下，查理于1716年开始协助威尼斯抗击土耳其人。查理为了捍卫他在西方的利益，仍在进行大量外交活

动，主要依靠英国的支持。但是，有些大臣仍然希望打击阿马戴乌斯以加强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打击荷兰人以加强哈布斯堡王朝在尼德兰的地位。因此，他们对政策的改变大为失望。就在此时，尤金卓越的将才使奥地利在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会上又获取了新的领土。^[36]回顾1683年7月，穆罕默德四世开始炮击霍夫堡宫，对于当时的奥地利人来说，塞尔维亚、尼德兰和西西里似乎统统还是遥不可及的。

一位第一流的奥地利历史学家曾写过一部有关这段时期的著作，书名为“一个大国的崛起：1700—1740年的奥地利”^[37]。这个书名精辟地概括了这段对外扩张的过程。然而，扩张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对战争和外交全神贯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臣们很少愿意审查一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旧有各领地的状况，以消除衰弱的迹象。我们对那些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之所以至今知之甚少，同当时政治家们对这些领地的情况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38]

在这40年当中，农田、牧场、森林、葡萄园这些财富和生存手段的主要来源，支撑着几乎不变的社会结构。在包括蒂罗尔、内奥地利各公国、上奥地利（“恩斯河以上”）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地区以及在西里西亚，乡村社会结构通常分为这样几个等级：实力雄厚的大贵族集团、从上一世纪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的教会、其人数和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的骑士小贵族集团，以及不屈不挠的农民。在他们以下，是分为许多阶层的小农、房产主、流动牧牛者、马匹商人、小商贩以及也时常在流动的众多赤贫者。贵族和教会的收入来自五花八门的租金和税款。农民在交付各种款项之后，一般仍能保有代代相传的出租田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旧匈牙利王国的农村社会等级与此相同，下奥地利（“恩斯河以下”）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但稍有不同的是，这个大区域内的领主较多地采用直接剥削的方法。所谓“直接剥削”，就是迫使农民义务地提供人力和畜力，并由一班不可缺少的管家和工头加以监督。此外，在上述这两个大区域内，领主一般还享有很多额外的权利。他们既是国家税收人又行使公共和私人司法权，可以自己出价向属民买卖货物，并在属民使用他们开设的酒馆、磨坊和市场时仍由他自行出价而从中渔利。由于整个经济结构有利于领主，因此人民的购买力和交税能力总是低得可怜。这种状况在波希米亚中部和摩拉维亚最为明显。相比之下，奥地利各山区领地尽管土地

比较贫瘠，却不乏殷实的农户。上奥地利偶尔也发生骚乱，主要是由于农民对现状不满，而不是绝望，但蒂罗尔的农民一直比较富裕。

维也纳政府对总的状况听之任之，并未显示出有所担心的迹象。它对波希米亚的1627年宪法作了重大修订，并于1679年在下奥地利颁布了《无形结论》，将隶属及特权制度写进了宪法。一些邦政府还颁布了法令，试图永远禁止农民离开其住地。这种法令曾于1699年出现于波希米亚，1687年、1699年和1712年出现于摩拉维亚，1699年、1709年、1714年和1720年出现于西里西亚。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每当匈牙利境内出现执行安抚政策的迹象，似乎总是吸引上述与匈牙利邻近各邦的人们离乡前往。另外，这些邦的政府还同波兰和萨克森签订了引渡条约。更为重要的是，各种法规还使波希米亚农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了。1679—1680年，波希米亚一些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农民骚动。1716年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每次危机平息之后，政府都颁布法令（1680年两项，1717年一项），就地主和农民各自的义务作出规定。这些法令禁止压迫行为，并允许提出上诉，但有关上诉的规定却有着严重的弊病。例如，1717年的法令规定，上诉必须首先向地主本人提出。1680年的两项法令还宣布剥夺农民“在可恶的叛乱以前”所拥有的权利。地主可以将所谓“可恶的叛乱”解释为1620年的叛乱，从而取消很久以来农民所享有的权利。这些法令还规定，地主每周最多可以要求农民提供3天的义务劳役，而且这个限额还逐渐变成了常例。它大大高于奥地利境内各领地的标准。1680年的法令曾反对地主强迫农民远离家乡服过重的劳役。但是，1717年的法令却宣布，劳力必须是可以流动的，而且要由地主而不是农民来决定。1717年以前的40年中，完全由农户占有的土地已明显减少，但1717年的法令只保留了政府对地主所吞并的土地的征税权，却没有禁止地主继续剥夺农民的土地。

连年浩繁的军费开支也使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情形每况愈下。农民的贫困状况于18世纪前半叶达到了最低点。在这一点上，高额战争税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领主对地租和劳力的横征暴敛。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使这两重负担不合理地压在一部分人身上。尽管政府大幅度提高了贸易税和人头税，但是，向每一庄园征收的全部“普通”直接税却要按照税收花名册上该庄园农民土地的数量计算。而地主的土地（包括出租给农民的土地）则免税。如果地主将一部分农民土地

占为己有，他们往往不顾1717年法令的规定，强迫农民继续为这部分土地纳税，由农民其余部分的土地分担。此外，理论上向领主土地征收的“附加”税也按花名册上农民土地的数量计算，并由农民交纳其中的一部分。领主官员既是税务官又是收租人，而下层社会和政府对此却无可奈何。事实上，征税之后庄园主还能得利。在上奥地利，这种盈余常常是领主买卖庄园时估算庄园价值的一个方面。横征暴敛还使农民负债累累。相比之下，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有产阶级的产业却很少触动。饥寒交迫的人民与捉襟见肘的政府无法彼此接触，因为它们中间隔着一个腰缠万贯的贵族阶级。尽管人民挨饿，政府向英国人和荷兰人乞讨，但贵族却把钱借给皇帝，收取利息，而不按其财富的多少纳税。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他们总是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新宫室。从1687—1710年，列支敦士登家族的首领——“富翁”汉斯·亚当向政府贷出的款额至少达90.5万弗罗林，但这还不及同一时期他在塞尔维亚、埃尔茨山脉和匈牙利购置财产时所花的钱。当时，名声赫赫的菲舍尔·冯·埃拉赫（1696年被封为贵族）身兼哈布斯堡宫廷的“工程总监”和总建筑师二职。他曾打算仿照凡尔赛宫在申布龙建造一座更华丽的宫殿，并把霍夫堡修建得更加宏伟。但战争迫使他将这些计划束之高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首相施特拉曼以及列支敦士登家族和迪特里希施泰因家族委托菲舍尔建造的宫殿却未受拖延，很快便造了起来。同这些宫殿相比，格拉茨和布拉格的宫殿在耗资巨大、设计雄伟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地区，许多较为俭朴的16世纪建筑都被大加改造。通向凯旋厅和教堂的旧楼梯被改成了宏大的双排楼梯。仆人住房和马厩也增大了许多。有些领主还将老房子分配给仆人和行政机构，自己住进新近耸起的宫室。

在成就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们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调整贵族体系。他们利用授封贵族的特权为贵族阶层引进了新的人才和新鲜血液。其中最突出的是曾先后担任首相的霍赫尔、施特拉曼和塞勒。这些人都出生于帝国内的市民家庭。通过提升贵族们的等级，哈布斯堡君主不仅可以满足该时代人们的一个最强烈的愿望，而且使自己的宫廷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晋升之源。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君主们便已迫使贵族集团承认并接纳了初受封于各公国和王国的外来人。因此，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的贵族与后来加封的文武官员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地之间的界线

已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君主们还作出了另一项有益的贡献。对于较大的家族来说，各成员如何分配幅员广大的领地是一件令人大伤脑筋的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很可能导致家族的解体。哈布斯堡君主批准的限定继承权制度（Fideikonuniss）为防止世袭领地提供了可靠保证。哈布斯堡家族通过相互继承协定保障了本家族的团结，于是让自己的贵族属民也有权享受同样的好处。

在捍卫特权地位方面，教会同贵族一样寸步不让，而且其地位似乎同贵族一样巩固。17世纪初以来，教会通过遗产赠送和购买而积累起来的大量教会财产，除补上了以前的损失以外还超过以前的总数。不仅旧有教派和教区重新兴旺起来，而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教派教徒网，其中包括方济各会的托钵僧（Capuchin）、奥古斯丁派教徒（Augustinian）、巴拿布会教徒（Barnabite）、厄修拉会教徒（Ursuline）、加尔默罗会教徒（Carmelite）、庇尔会教徒（Piarist），特别是耶稣会会士。政府也偶尔采取措施阻止世俗人将产业卖给教会，但未见多大成效。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将永久管业权转让给教会（1684年、1688年、1704年、1716年及1720年），然而却无人予以理会。哈布斯堡政府的大臣们从来没有忘记，世代相传的大量理论根据都说明教会应由世俗君主来统治。但是，1720年以前，这些理论根据基本上不起作用。宫廷和各大家族的无数成员对宗教十分虔诚。他们可以通过充任牧师和主教而得到。此外，耶稣会士在大学中占有公认的优势，并拥有行为检察官的权利。这一切都阻碍着反教会努力的发展。仅有一点反教会努力总是抓住同教皇的争执死死不放。他们在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为反对教皇而大声喧嚷，但并未使天主教会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有所减弱。远在阿尔卑斯山高地河谷和波希米亚北部的幸存新教势力也未能做到这一点^[39]。即使在新教受到法律允许和国际条约保护的西里西亚^[40]，天主教各教派也权势甚大，极其富有。实际上，高级神职人员在奥地利每个领地都属特权集团之列。因此，哈布斯堡君主对教会财产征税一向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不偿失。当时，除下层神职人员仍较贫穷以外，教会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位大建筑家雅各布·普兰德陶尔的蔚为壮观的业绩为此提供了佐证。他分别于1702—1711年、1708年以后和1918年以后在多瑙河谷的梅尔克、圣弗洛里安（其量更大）和戈特魏格重建了本笃会修道院教堂，其规模十分宏伟。^[41]然而，各教派的学术活动同当

时的大学一样，不那么令人钦佩。但不管怎样，1700年以后教会的确比过去活跃了。

这段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这是由于它的内陆型经济本来就不利于发展，而上层贵族和上层教会势力在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皆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无疑也是其原因之一。经济发展的阻滞首先使市民深受其害。有产阶级从西欧购买所需的奢侈品。奥地利往往将生铁和亚麻等原料出口到帝国各邦，由它们制成商品，再由奥地利人重金购回。然而，普通人的购买力却十分低下。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市镇工业垄断者和行会对工业生产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中世纪的城镇曾经顽强地保护过自己垄断工业生产的权利，但是150年来，尽管行会和垄断者极力抵抗地主势力，但地主势力还是不断侵蚀着这种垄断权。大地主们喜欢直接同来自帝国各邦的外商打交道，或者喜欢与行商打交道。他们在城镇获取越来越多的财产，而且市政府还逐步免除了对这些财产的税收。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等地区的市镇，大地主们还建立了自己的酿酒场，因而使当地市民大为不满。大庄园除了生产粮食和木材以外，还建立了国内制造业，其生产规模远远超过自由市民及其雇佣手艺人的作坊。市民和小贵族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一起走上了下坡路。

面对这种情况，自由市民死死抱住一个极为有限的市场和市场内不太稳定的垄断地位。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在严密的行会组织中的世袭权利，并且对技术革新深怀敌意。对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政府并没有坚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诚然，一些政治家却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在彼此之间的贸易中和与邻邦的贸易中的逆差，减少了国家的财源，而且生意越兴隆的市民要缴纳的税款越多。虽然几代哈布斯堡君主都宣布要审查所有的行会规则（新皇帝即位时尤其要这样做），但他们在这段时期从未冒险修改过行会规则的基本内容。帮工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代价高昂的杰作（“招收限额”）和其他一些条件却一直不准帮工成为行会师傅。^[42]直到18世纪20年代，奥地利才第一次出现了政府认真干预的迹象，其目的在于改善受行会欺压的未经批准的手艺人的法律地位。在此以前，皇帝仅仅满足于让宫廷伙食供应商不受行会条例的约束。利奥波德一世的宫廷大约有500名这类“免受限制的臣仆”（Hofbefreite），但他们大都是外国人。例如，维也纳的一批外国进口批发商也享有一些永久性

特权。此外，德意志许多君主对他们所依赖的“宫廷犹太人”也给予这种特殊待遇。[\[43\]](#)

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工匠把新技术和新行业引入国内，利奥波德及其儿子们也逐步将专有权授予了这些人。1672年在林茨成立的毛织品厂、1702—1703年在维也纳新城和维也纳建立的各种工场都曾得到专有权。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17年，一位萨克森境内迈森城的匠人带来了制造瓷器的秘密；翌年，同军需总署保持正式关系的一个企业获得了瓷器制造专利，从此开创了维也纳瓷器制造的光辉时代。于是，哈布斯堡各领地开始越来越多地制造本国所需的奢侈品。但是新行业的范围还很小，它并未影响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小城镇，只有个别勇于创新的开明地主提倡本地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

政府通过宫廷财政委员会对矿产资源施加的控制是比较有效的。施蒂里亚和奥地利的炼铁工业是哈布斯堡帝国主要财富之一。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便可以了解政府的控制所取得的成果。当时，艾森纳茨的矿场和矿工以及恩斯河谷的熔炼工、铸造工和商人几乎全部联合成了一个公司，称为“因内贝格矿业联合公司”，由一位政府官员任总监。该公司利用其广泛的权利制定了一套复杂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公司将特定的林区分配给各个矿场，并从特定的农业区购得食品，再以规定价格出售给工人。公司全盘控制生产，将生铁运往享有销售生铁特权的城市，并办理外贸业务。采取上述措施就是为了对炼铁业加以保护。奥地利的炼铁业曾于17世纪初破产，40年后又曾濒临破产。但是，到17世纪末，因内贝格矿业联合公司仍感到困难重重，不得不过分依赖德意志资本的支持。政府非但不在这方面助一臂之力，反而在战时向炼铁业提前征税，从而剥夺了它的一部分资源。生产成本上升了，其部分原因是1693年以后公司被迫为食品付更高的价钱，但又不能从工人身上补回来。此外，它的技术也比国外落后。林茨的贵族集团曾一致认为，聘请英国专家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但又害怕这些新教徒对领地农民产生同情。尽管1690年奥地利生产的铁矿石比一个世纪以前还少，但以后30年中，产量逐步上升。增产的矿石可能大都供给了国内制造业，而没有用于增加出口。[\[44\]](#)

在土耳其战争以前，奥地利同东南欧的贸易正在恢复，并面临着良好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土耳其战争以及随后匈牙利发生的长期动乱所断送。1667年成立的维也纳东方公司于17世纪80年代破产。1698

—1699年间，尽管少数官员和个别外商为对外贸易出过不少力，但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取得实际进展。1718年，奥地利同土耳其人达成了有利于奥地利同巴尔干人开展贸易的协议。直到这时，外贸停滞不前的状况才告结束，协议达成后不久，新的维也纳东方公司宣告成立。1719年，查理六世成功地迫使威尼斯放弃了其对亚得里亚海航行权的世袭垄断权，并宣布的里雅斯特和阜姆为自由港（而他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查理还改善了从维也纳和维也纳新城经塞梅林山口通向海岸的陆上交通，后来修筑了横跨克罗地亚的“卡罗利那大道”，使匈牙利有了到达海岸的道路。《帕萨洛维茨条约》迎来了通过这个朝南的方向有实现经济繁荣希望的时期。尽管如此，贸易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的里雅斯特的光辉前程几乎还见不到影子。政府曾打算进一步将南方的贸易同奥属尼德兰的海外贸易联系起来，但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另外，奥地利还曾希望利用亚得里亚海航行权避开威尼斯的港口使用税，并促进意大利与奥地利本土的交流，但它在这方面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第一流的贸易顾问安泽尔门·弗莱施曼为查理出了不少主意。在君士坦丁堡、帕萨洛维茨和意大利等地举行的谈判中，弗莱施曼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这段时期整个帝国的首要贸易中心也许仍旧是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尽管布雷斯劳同匈牙利的贸易在此前已经衰落了，但这时又兴旺起来了。布雷斯劳有条宽阔的道路通向特斯切，并越过杰布隆卡山口（Jablangka Pass）进入上匈牙利。然而17世纪后半叶，特斯切的通行税上升到了空前高度。普雷肖夫各城镇和科希策实行的主要商品权力法又阻碍了货物的流通。除了托克利和拉科西等势力较大的扰乱治安者，一般拦路匪盗也令商人们感到不安。值得庆幸的是，同波兰和西方的贸易对西里西亚来说要重要得多。有关这段时期的史料都表明，西里西亚同荷兰人进行着巨额贸易。“大选侯”开凿的易北—奥得运河开辟了一条通向汉堡的希望之路。由于这里的通行税低于奥得河下游，西里西亚亚麻布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45]，因而至少有一个哈布斯堡王朝领地 from 欧洲的海外大扩张中得到了好处。17世纪末，莱比锡逐渐成为布雷斯劳和西里西亚其他主要城镇的主要贸易对象。

在从西里西亚到波希米亚北部这条宽阔的弧形地带，来自荷兰和德意志的商人还从农民（他们种植亚麻并用其纺线织布）及其地主手中直接购买亚麻布。这一地区的亚麻布生产对奥地利本土产生了影

响。由于地方上乱收通行税，奥地利本土的亚麻布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不仅北部领地的亚麻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市场上的竞争力超过了奥地利产品，而且就连亚麻布贸易的路线也日益避开多瑙河中游流域，从另一条路通过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到达帝国各邦。还有资料说明，瑞士格里松斯对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货物所收的税比哈布斯堡王朝领地蒂罗尔收的少。当然，贸易路线在国内的改道并不一定有损于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只要各邦产品能找到一个市场即可，而政府的确实保证了这一点。另外，萨尔茨卡默古特的食盐也占领了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市场，甚至还进入了西里西亚。其中一个原因是，利奥波德对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食盐的进口课以重税。但是将食盐从萨尔茨卡默古特向德意志出口却不那么容易，因为那里有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挡路。这一情况为18世纪一场尖锐的关税战摆下了战场。这场斗争迫使维也纳为开放奥地利各公国和波希米亚之间的贸易采取最初几个步骤。至于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贸易，这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政治考虑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哈布斯堡政府确实曾考虑过许多经济改革建议，但是时断时续，并且往往不了了之。这种消极态度同当时政治家们的特点无疑是有关系的。这些人不是大臣或神职人员，就是法学家或军事统帅。他们整天想的只是战争、宗教和法律问题。这种占优势的偏见所要造成的局面使经济改革看来的确不现实。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事当然是几乎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的战争。1683年以后，奥地利在匈牙利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役。结果，贝歇尔和施罗德等重商主义理论家和“规划者”在战前提出的财政和商业建议便被悄悄地束之高阁。1688年，东西和解似乎已成定局。这时，利奥波德终于下令对全国经济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以便为制定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打下基础。皇帝的短期目标是加强货币流通，以供政府征用。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等地当局进行了多方面详尽的调查之后，向利奥波德提交了报告。他们强调了下列问题：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混乱；道路破损；需要开放易北河和伏尔塔瓦河供航运；各领地内和边界的官方关税混乱，私人乱收通行税；过境货物估价方法过时。于是，皇帝建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制定和实施经济改革措施。然而，委员会成员基本上只是重复已知的事实和第一代奥地利“财政主义者”^[46]多年前便已阐明过的老论点。即使这些人有所创新也于事无补了，因为，几乎与此同时，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爆发了。除1703年和1706年实行的金融改革

之外^[47]，经济改革仍像1683年以前一样一事无成。1714年和约签订后，某些经济改革终于开始了。1716年后，货币兑换制度有了改善，度量衡制度也得到进一步统一。政府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内奥地利设立了区域贸易委员会，以促进贸易。这些委员会对收通行税者、行会和市镇垄断者等既得利益集团开始逐步采取措施。这样做常常遭到地方上的强硬反抗。宫廷财政委员会也提出了抗议，因为它害怕失去税收来源。除上述问题外，任何人都不敢审查税收与农民的状况这两个根本问题，中央政府对此更是视若畏途。

总而言之，直到这段时期的末尾，政府才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但态度仍不坚决。特别不幸的是，1720年以后，查理六世本人对国内改革的热情冷了下来，并且未能兑现其统治的头10年许下的诺言。在查理六世及其父在位期间，奥地利王朝征服了四面八方的大片领土，然而，有效地治理国家仍然是这个王朝力所不及的。

（陈养正 译）

[1] 不过，直到1720年为止与莫斯科、1742年为止与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书信来往仍由军事委员会（Hofkriegsrat）负责。从1705年起，这个机构还试图对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的军事当局实行严密的控制。与此同时，军需总督（General Kriegskommissariat）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对皇家财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依靠”越来越少。

[2] 在伦敦皇家学会外籍会员J. W. 冯·瓦尔瓦索所著*Die Ehre des Herzogtums Krain*（纽伦堡，1689年）一书中关于地方历史和地志的卓越研究，足以使人们回想起这种观点。

[3] 参见本书原文第305页及以下各页。

[4] 一个由那些最重要的大臣组成的负有责任的小型委员会（Geheim Konferenz），从1669年起曾成功地行使职权数年时间，到1700年，该机构依然存在，但控制不了这许多委员会。

[5]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95—499页；第6卷，第619页及以下各页。

[6] 威廉·施罗德（1640—1688年）在他所著《各君主的国库》一书中，提倡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实行开朗的专制制度。他曾于1686年在匈牙利北部接受了皇家财务委员会的任命，他在马扎尔人中极端不得人心。

[7] 见本书原文第620页。

[8] 乔治·勃兰科维奇（1645—1711年）后来被奥地利人所捕，被放逐到波希米亚，最后死在该地。他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塞尔维亚历史的著作，在18世纪对他的同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9] 见本书原文第224—225页。

[10] 见本书原文第621页。

[11] 见本书原文第250页。

[12] 见本书原文第626—627页。

[13] 《海牙和阿姆斯特丹》（6卷集）这部伟大作品的写作计划到1700年完成。

[14] 利奥波德伯爵，即红衣主教科洛尼希（1631—1707年）于1650年在马耳他皈依圣乔治会。他曾在地中海地区服过一段军役，此后终生在各哈布斯堡王朝领地担任高级职务。从1692—1694年，他主管皇家财务委员会，1695年以后担任匈牙利大主教。他无疑是17世纪后期好斗的天主教会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15]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92—496页。

[16] 与他同时期的英国人将“Rákóczi”拼作“Ragotski”。

[17] A. 冯·阿尔内特：《欧根·冯·萨伏依王子》第1卷，维也纳，1853年，第354页。

[18] 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达成协议，宣布两国为自治国家，由哈布斯堡君主作为两国的共同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君主制”。——译者

[19] 关于西部集团，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47—449页。

[20] 见本书原文第166页。

[21]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56—557页。

[22] 该条保障了天主教会在帝国从路易十四手中收复的领土上的权利和特权。参见本书原文第473—474页。

[23] 参见本书原文第465、473页。

[24] 利奥波德第一个妻子所生之女，于1685年嫁给马克斯·埃马努埃尔。

[25]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3章。

[26] 1700年，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中的那不勒斯军官通过利奥波德派驻罗马教廷的代表同那不勒斯反对派进行了接触。翌年，皇帝的代理人支持马奇亚（Macchia）亲王密谋反叛，但很快被镇压下去。

[27] 《尤金·冯·萨伏依亲王的远征》第3卷（1876年），第406页。参见本书原文第405页。

[28] 参见本书原文第418—419页和第526页中有关第一批梅休因（Methuen）条约的部分。

[29] 当时，查理六世让女儿优先于侄女。这一合乎自然的决定是否符合原始《无言物继承协定》，目前仍有争议。由于他的《国本诏书》并无牢靠的法律根据，因此常常招致非议。参见《档案报》第60卷（1931年）第65—119页和《查理六世国本诏书的产生》（巴塞尔，1939年）中G. 图尔巴与W. 米歇尔的对立观点。关于《国本诏书》，请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特别是第393—394页。

[30] 见本书原文第310页。

[31] 这场危机清楚地表明，利奥波德的忏悔神父们偶尔也能左右政局的变化。尤金和施塔海姆贝格之所以能在这场宫廷派系之争中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他们劝诱耶稣会士恩格尔贝特·比朔夫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了好话。参见M. 布劳巴赫所著《尤金·冯·萨伏依亲王》第1卷，慕尼黑，1963年，第354—368页。

[32] 1707年，为了就约瑟夫一世向英国所借之贷款计算利息（见本书原文第308页），曾确定八又三分之二弗罗林等于一英镑。

[33] 见本书原文第557—558页。

[34] 1718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即税收调查委员会（Giunta Censuaria）]来全面审查直接税收的整个制度。此外，还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以估价从前免税的大量地产。但是，这一计划的实际执行被推迟了30年。参见S. 普列塞所著《18世纪前半叶伦巴第的财政经济状况》，都灵，1924年，第310—313页。

[35] 厄尔科莱·迪·图里内托，即德·普里埃伯爵（1658—1726年），1701年以前任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的驻维也纳代表。1704年，他在说服利奥波德批准这两个朝廷于1703年签订的条约一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此后，他转而为皇帝效劳，协助管理米兰，并于1709年同克雷芒十一世谈判，签订了条约。在几代皇帝手下，都有一些意大利人爬至高位。德·普里埃是其中的佼佼者。

[36] 见本书原文第641—642页。

[37] 奥·雷德里希：《一个大国的崛起：1700—1740年的奥地利》，维也纳，1938年。

[38] 关于“三十年战争”后这里的情况，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78—485页。

[39] 汉堡的贝思哈德·劳帕赫于1717年开始收集材料，准备撰写关于奥地利新教的历史巨著《奥地利的新教》（汉堡，1732年）。该书1740年的一句献辞是赠给奥地利路德教会的：“感谢全能上帝，将路德教堂奇迹般地，半公开、半隐蔽地保持到今日。”

[40]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84页；第6卷，原文第431页。

[41] 但是，一些保守派牧师曾反对为建造修道院而大兴土木，因为这样做会使教会债台高筑。

[42] 这就使女继承人在狭小的自由民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她可以将父亲的特权地位转让给丈夫，而其丈夫在别种情形下可能无法获取这一地位。

[\[43\]](#) 参见本书原文第788页。

[\[44\]](#) 奥地利最出色的工业品之一长柄大镰刀在东欧许多地方销路很好，但是，为了军事上的原因，宫廷军事委员会不同意将其售给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人。

[\[45\]](#) 见本书原文第866—867页。

[\[46\]](#) 这些写政治经济学的著者（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5、195页；第7卷，原文第158页），都是从帝国各地来到利奥波德宫廷的，他们都死于1690年前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奥地利国土上没有直系继承者；这个科目在德意志讲授很长时间以后才被奥地利大学所采用。

[\[47\]](#) 参见本书原文第310页及以下各页。

第十九章 土耳其人的退却，1683— 1730年^[1]

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是1672年攻克波多里亚的卡梅涅兹要塞（卡门尼·扎顿要塞）之后，它把伊斯兰世界的疆域一直扩展到德涅斯特河的中游。在这段边界的西南，位于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进贡的公国，这里是由土耳其苏丹指定的宫廷官吏进行治理的两块富庶低地。在这两块低地另一边，隔着喀尔巴阡山，特兰西瓦尼亚王也和奥斯曼帝国宫廷保持着同样的依附关系。匈牙利大部分（只有约五分之一是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被分为几个直辖省——位于东部的泰梅什堡；位于西部的新扎姆基、卡尼扎和最西部的瓦拉日丁；在北部有埃格尔，特别是还有布达。整个帝国有近40个省，划为若干个行政区，各行政区都是按照大致相同的管理办法进行设置的，但规模大小差别很大。在这些行政区里，一般由一位常驻当地的帕夏作为土耳其苏丹的代表，分别称为省长和行政区长官。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以南地区，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省份鲁梅利亚，它的范围包括现在被称为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的全部，保加利亚、塞萨利、南斯拉夫大部以及阿尔巴尼亚；不过波斯尼亚和摩里亚河流域（the Morea）各设单独的政府，而克罗地亚大部归维也纳统治，达尔马提亚沿海岸部分地区归威尼斯统治；拉古萨（Ragusa）共和国则像萨洛尼卡（Salonica）一样，作为巴尔干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仅向苏丹进贡。希腊群岛和爱琴海的加利波利等某些沿海地区以及摩里亚河流域和利班图行政区，直接归帝国海军的海军帕夏（Kaptan Pasha）管辖；克里特岛是在前不久的1670年才从威尼斯手里并入这个地区的。在地中海彼岸的北非伊斯兰各国的“摄政”，尽管土耳其驻军的统治尚未深入那里的山区或沙漠，但他们也承认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2]它们不用进贡，但接受赠送来的火药并积极参与苏丹在海上进行的战争。

在亚洲，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自1612年以来就已缩小。《祖哈布和约》（*The Peace of Zuhab*, 1639年）割让了波斯的6个省以及格鲁吉

亚。在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效能变动不定，取决于巴格达帕夏镇压沙漠地带阿拉伯人是否成功，这些阿拉伯人是整个红海地区甚至叙利亚日益增长的动乱的不安定因素；1694年，他们与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联合占领了巴士拉（Basra），只是在波斯干预之后，巴士拉才归还到土耳其苏丹手里。游牧的阿拉伯人或土库曼的牧民，还有处于半游牧状态的库尔德人经常袭扰阿勒颇（Aleppo）至巴格达之间的商路，因此贸易往来只好改道向北经特拉布松（Trebizond）和埃尔佐勒姆（Erzurum）进入波斯。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虽比较大，但也因一年一度改换总督而遭到严重的损害。总督不得不在无法依赖驻军的情况下与根深蒂固的地方派别进行斗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从这些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属于王室体系的帕夏，才为这一地区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希望。土耳其政府对黎巴嫩山区的动乱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不过要求西顿（Sidon）和大马士革的总督们要保证税收来源不断。结果，这些总督就卷进了复杂的部落和宗教的派别之争。从1711年起，这个山区大体上是由谢哈布族（Shihab）进行统治，该族允许基督教的影响不断扩大。^[3]

在阿拉伯人的省份中，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较之其他省份受到了最为彻底的控制，这两个省承担着比其他任何省份都大得多的帝国捐税负担。尽管1695—1696年进行了改革，埃及向奥斯曼国库最多只贡献它估计盈余额的三分之二，而且经常少于三分之二。^[4]自1586年以来，在开罗的总督曾经不得不镇压多起军事叛乱，但他们的处境由于从制度上保存了马穆鲁克（Mamluk，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军事统治阶层的成员）辖区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原来只有一小批主要是由瑟尔卡西亚人组成的军事显贵，现在却包括来自波斯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埃米尔^[5]。人人皆知这些贵族曾经废黜土耳其苏丹的代表并在君士坦丁堡阴谋策划过反对土耳其苏丹本人，但在他们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在1711年发生的“大暴动”中，有6个其他军团在开罗攻击近卫军，从而引起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屠杀。在那次大暴动之后，埃及的权力之争又像1631—1660年那样集中在卡西米叶（Kasimiyye）和菲卡里叶（Fikariyye）两大家族之间的殊死的争斗上。双方都在早先分派的基础上，在工匠、农民以至游牧者中间造就一批追随者，这种活动一直延伸到上埃及这个菲卡里叶家族势力比较强大的交界地区。总督只能依靠这两个势力范围很广的家族集中的那个（1714—1730年成功

地依靠了卡西米叶家族）实行统治，尽管这些家族内部孕育着分裂为小派别的趋向。然而，1692—1711年间，开罗经常发生骚乱，主要是由于近卫军士兵无组织无纪律并由此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而且埃及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食品价格昂贵（再加上各种特权和搜刮勒索）也是形成这种动荡不定局面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有待调查研究。

到了1700年，虽然远至马萨瓦（现埃塞俄比亚港口）和昆菲哈（Kunfidha）的红海所有港口都还有土耳其的地方长官和驻军，但赫贾兹（Hejaz）的统治者——麦加行政司法长官已经公然反抗土耳其苏丹。同样，在波斯边境至黑海之间的山区^[6]，中央政府也已放松对一些世袭库尔德酋长的武装控制。尽管如此，在黑海的北部，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克里米亚的统治者仍然掌握着牢固的宗主权，而这些统治者又支配着瑟尔卡西亚（Circassia）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根据这一状况，黑海比红海更有理由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海”。然而，土耳其人并未忘却，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海军忙于进行克里坦（Cretan）战争之时，哥萨克的“海鸥”曾经袭击过他们的沿海地区，也未忘记顿河哥萨克是怎样于1637年占领了阿扎克（Azak）并把它奉献给俄国沙皇。南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区政治上的不稳定，如同高加索一样，是造成奥斯曼帝国和其邻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因素。这些邻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分界线，与其说是用众所周知的疆土范围进行划分，不如说是由他们保护或试图利用的处于半游牧状态的好战部落所占据的变化不定的地盘来确定的。鞑靼人是奥斯曼帝国奴隶市场货源的主要供应者。

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大都采取纵深防御，由无数要塞以及一定规模的常驻军队来守卫，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以及多瑙河沿岸体现得尤为明显。多瑙河下游由维丁（Vidin）要塞控制着，而在其上游则有布达和贝尔格莱德要塞。贝尔格莱德要塞是土耳其最杰出的要塞，它显示出土耳其人精于建造堡垒的艺术，它在萨瓦河流入多瑙河之处，有一座坚固的三面具有围墙的城堡。这座“战争之圣宅”通过一条途经尼什（Nish）、菲律普波波利斯（Philippopolis）和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的军用公路与首府连接起来，但多瑙河本身却更多地用来给欧洲战役运送补给，而贝尔格莱德则是这次欧洲战役的最大补给基地，特别是在战马的补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由坚不可

摧的防御工事以及黑海北部的一系列要塞进行保卫。如分别位于德涅斯特河附近及其中游的卡梅涅兹（Kamenets）和乔汀（Chotin）；位于德涅斯特河下游的本德（Bender）；在布格河（Bug）河口附近的大津（Ozû）；以及位于第聂伯河三角洲南面的基尔布伦（Kilburun）（库普鲁卢家族里的第一位宰相就曾用这些工事来保卫达达尼尔海峡）。再往东，对奥斯曼帝国至关紧要的亚速海要害部位则由阿扎克和刻赤控制着。

在远离帝国同族人居住的地区之间，交通往来主要依靠小船和运货的牲口。凡有公路的地方（主要在巴尔干半岛），这些公路也像河流或商路一样经常遭到土匪的抢劫，或被负责保养这些公路的村庄或慈善团体弄得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有信使、士兵、朝圣者、游牧的人以及迁移的农民，这些人流显然多于商品运输，而对外贸易又比国内贸易多。官僚机构对分配性商业煞费苦心地进行控制（这些商业适合于供应军队以及较大的人口中心生活用品），再加上各种间接税收，挫伤了有经商头脑的希腊和犹太这些少数民族的事业心，实际上这些少数民族经商的事业心主要是靠与西方的贸易往来推动的。在帝国内部，各条交通要道都以陆路或水路的形式在首都会合，但那些著名的历史港口如特拉布松（Trebizond）、士麦拿和亚历山大港等仍然是地中海、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之间大批货物来往运输的重要港口，同时还有相当大量的小商品经由许多穆斯林朝圣通道进入麦加。从西方流入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的大量的各国货币^[7]也都流入波斯和印度，势必也会影响土耳其帝国货币的不稳定。

自1584年预算出现赤字以来，外国投机买卖和美洲白银也是造成奥斯曼帝国硬币“阿斯普里”^[8]（Aspre）不断贬值的原因。铜币很快也遭到贬值，而土耳其“皮阿斯特”则贬得较慢，这两种货币的贬值都是在1687—1688年间开始的。由于多数人的薪金固定不变，这种通货膨胀不得不主要归咎于官吏和军人贪得无厌的掠夺，他们中间有些人每办一件事都要报酬。与某些其他国家的经历恰恰相反，在土耳其价格政策似乎没有促使任何值得注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因为在土耳其，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条件多用来作为发财的手段，而不是用以解决贸易上的全面萧条。^[9]按照笛福（Defoe）这样一个进步的西方人士的观点来看，土耳其人他们自己就“反对商业……少得可怜的商业！”^[10]他们的外贸不是由欧洲人来经营，法国和英国人在土耳

其经营外贸的越来越少，外贸大部分落到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黎巴嫩人手中。在主要港口，犹太的中间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可少的，但与波斯和东方各国经由陆路来往的贸易，在土耳其也和俄国的情况一样，大量控制在亚美尼亚人手里。在里窝那（Leghorn）和马赛都有亚美尼亚和犹太的侨民。希腊船主已经控制了黑海和谷物的贸易，而且前途无量。1702年罗马教廷支持希腊船主反对马耳他人处理战利品的海上军事法庭之后，希腊船主在地中海得到了更大的行动自由。截至1700年^[11]，希腊人的各个商业机构，以正在发展着的马其顿萨洛尼卡港为基地，在意大利以及整个奥斯曼帝国建立起一个商业网。银行业看来主要为犹太人所独占，但实际上也为、而且日益为善于钻营的亚美尼亚人所控制；他们作为短期的贷方，对当地的帕夏影响很大。在君士坦丁堡迷宫般的小巷里居住的犹太人数居欧洲首位，他们除中间商外，还有手艺人。

另一方面，土耳其传统的产业行业范围之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行业均受管理市场的一批高级警察管辖，同时也从属于一个综合性的行会系统，这个行会系统不惜牺牲竞争条件来保证质量。在主要城镇，参加穆斯林行会的人也大量被征入享有特权的近卫军军团，因而这些人具有两个组织机构可以申诉他们的不满；实际上他们还有第三种身份，即他们中间多数人还属于伊斯兰教贝克塔希（Bektashi）托钵僧派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对活跃在伊斯兰教下层教徒中的许多异教团体影响最大。以上三者联合起来组成联系大城市的枢纽，并为这个时期对内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一个主要依靠，因为当时土耳其苏丹对首都的一场暴乱较之整个省的叛乱更为害怕。

城乡差别在奥斯曼帝国比在基督教统治的地区更为明显得多。这些城镇除了具有众多的行会和一些居民稠密区（这些居民区常以相同的信仰或同一种族为其特征）^[12]，并具有一些在对立的宗教或种族之间进行活动的现成组织外，城镇还是宗教讲学以及个人和公共消费的活跃中心。只有在那些普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城镇附近地区，耕种者的生产看来才能有所剩余，他们的劳动成果没有全部被迫以低价出售或用以支付代偿金、纳税、偿还欠款以及发放赏金所吞没，这些负担长期累积下来，不仅是由于贪官污吏，而且也是由于行政官员的经常调换造成的。农村的这种剩余一般也越来越为税款承包人所侵吞。税款承包制代替了古老的军事封地，泽迈特（Zimmet）和泰马尔

(Timar) ^[13]这些税款承包逐步合法或非法地落入朝臣或其他投机商之手，有的还把弄到的税款承包范围连成面积更大的一片。这些承包人中有的还把他们的世袭的权力逐步运用到他们的税款承包地上去，并开始形成地方显要中的新贵族。但有许多人并不亲自经营土地；他们的代理人如同以前的或别处的代理人一样，可能会比居住在当地的原军人（Sipahi）阶层更为苛刻而且更加缺乏远见。那些税款承包人自然要努力去填补他们的支出（承包税款如同多数公职的价格一样是由于竞争性出价的结果），而不考虑耕种者恢复体力问题。虽然说1692年开始实行对劳动强度作出某种限制的终生契约，但这一事实正是最为雄辩地说明了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其开支的日益增长。

虔奉宗教的基金会（这是穆斯林宗教组织和许多公用事业的经济基础）的行政官员和收税人声名狼藉地剥削当地的农民。那些不信奉穆斯林的人也必须缴纳人头税，而东正教的基督教徒则要受到某些希腊教士的敲诈勒索。总之，农业的主要情况是，若不是处于收缩期的话，至少也是处于萧条、不景气的状态，其经营方式极大地受到农村习俗影响，而且是以家庭形式为主。这种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给，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饲养牲口和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巴尔干的城镇很少不是这样的中心，而匈牙利低地的城镇则早就变成来自荒废的森林、沼泽地或广阔平原的人和牲畜的避难所。科秋·贝（Kochu Bey）早在1630年就已经注意到被人们遗弃的村庄的数量，而且18世纪早期一位土耳其评论家^[14]后来也着重指出农民迁移造成的灾难，这种迁移正是土耳其苏丹传统的政策所一贯禁止的。

这些情况对士兵的来源是不利的。首先，战争勤务和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鲁迈拉和安纳托利亚两省的肩上。这种“封地”组织是欧洲土耳其和小亚细亚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造成军队中最大的单一成分，包括省帕夏和他下级招募来的骑兵也都来源于这个组织，这是18世纪后期私人雇佣军队的核心。但骑兵（Sipahi）领主的数量在减少，而且常常无法承担长期战争的重担，因为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收入下降情况终究是要表现在他们的财力上。况且，那些能如期支付封地义务的人正是那些能够通过行贿而免除义务的人，而其他的人则担心对战争不出力会招致竞争者要求收回他们的封地从而夺走他们的收入。^[15]因此，所有的帕夏都日益被迫更多地用承包税款的收入来维持地方性军队。另一方面，雇佣职业兵的大量增加早已反映出16世纪

战争艺术的变化。在这种正规军中，诚然，常备的骑兵因接受了煽动的影响，曾被第一位库普鲁卢大量裁减。^[16]而近卫军的特点主要骨干是世袭的。尽管如此，它的战斗力也削弱了，因为谁出钱即可免服兵役，而且未经训练的士兵数量太多。“他们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士兵，也从未有过这么少量的部队”，一位1701年在安纳托利亚旅行、眼光敏锐的植物学家皮顿·德·图尔纳福尔（Pitton de Tournefort）评论时这样写道：“军官们……要士兵去为他们从事家务劳动，并把那些应服兵役的人交来的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个庞大帝国感染上了贪污腐败风，腐败风似乎也正以某种莫名的动乱威胁着这个帝国。”^[17]许多近卫军士兵从事民间的行业，因此军团也变成了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在埃尔祖鲁姆等那些偏僻的地方，平民老百姓为了免受驻在邻近地区的近卫军士兵的欺侮而花钱买个兵当。^[18]这些由当地人参加的辅助军队和职业军队之间的争斗，如同军团首领之间以及各军团连队或“家族”之间的忌妒一样，可能成为错综复杂的城镇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宗教信仰和对战利品的喜爱可能驱使近卫军士兵去勇敢作战（所以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和平才能完全毁坏他们的战斗力），但他们作为士兵已经比不上欧洲土耳其的守卫部队，这支守卫部队（尽管有无故缺勤）由于拥有奥斯曼军队最强悍的士兵，即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士兵而英勇善战。几乎可以这样说，土耳其近卫军只服从他们自己的苏丹，就连战争时统率三军的宰相本人，即使在宰相权力达到全盛时期也不敢在没有军官的配合下任意惩罚违反纪律的士兵。他们中间具有更大破坏性的，严格地说是那些军械士、运输兵和炮兵军团的士兵。炮兵由于武器数量众多，在攻城时仍然很有威力，他们的野炮与攻城用的大炮相比只不过是口径大小不同而已。^[19]土耳其军队的工兵早在博纳瓦尔（Bonneval）改革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身上得到好处；英国和荷兰的坑道工兵在攻克坎迪亚（Candia）时出了力，而且1705年刻赤和本德城堡的构筑就委托给一位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人（Modenese）。^[20]

17世纪90年代，如同恐欧心理在人们心目中扎根一样，欧洲的影响也发展得相当大。当时土耳其应用国外技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海军采用的大帆船。这种帆船首次在克里坦（Cretan）战争中出现，并且是在伟大的海军帕夏梅祖莫托（Mezzomorto）倡议推动下

使用的。梅祖莫托的革新是16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海军所经历的最为彻底的一次革新。不过，这支海军虽令人羡慕的是不靠外国供应，而且能使敌人生畏，但它仍有严重的不足之处。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早在1681—1682年就改组了海军司令部，而且在安塔利亚、加利波利、锡诺普、苏伊士，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都设有最好的海军武器库，但海军帕夏主要依靠基督教徒人头税收入的本省资源不再能满足海军无论是金钱或其他方面的需要。结果采取的一个补救办法是通过出卖任职令来收买那些指挥埃及以西北非伊斯兰教地区各国快速帆船上变节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和荷兰籍船长，这些人转变过来就是对土耳其苏丹舰队实力的最有效的加强。从海军帕夏到他属下各级军官都设法通过为政府物资储存和供应进行运输来赚钱以支付自己的开销。奥斯曼帝国也和地中海其他国家一样，找不到足够的奴隶满足军舰划桨的需要，当时这种用人力划桨的军舰仍然有多种用途。在17世纪90年代，他们有时能够编成一支拥有成百艘用人力划桨的军舰组成的舰队，但爱琴海那些国家的舰队，名义上一年到头常备不懈，实际上兵力很少满员，同时他们的船长收入不如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夏季舰队的船长，因此极力设法避免作战的伤亡和损失。使用大帆船，包括那些有大量武器装备的商船，需要的海员和炮手数量大得多。船上需要的这些人没有固定的来源，只有在夏季还可从希腊沿海及岛屿上招募来一些兵力。这些人被称为“雇佣军”（levends）[\[21\]](#)，他们也和军舰上的士兵一样难以用纪律进行约束。土耳其人虽是划桨能手，但不是好水手，而希腊人又绝非有科学头脑的舵手，似乎是只有那些投靠过来的欧洲人才是可以胜任的炮手。

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起源于一个抵御外敌的边防组织（frontier organization），它主要是为了同异教徒作战而组织起来的，就连它的内部事务评论家也都极力主张传教士要宣传“圣战的好处”。军队通常由宰相亲自指挥，并由地方帕夏率领封地征来的士兵。土耳其苏丹本人有时也亲自出征，但皇位继承人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既无军事指挥能力，又无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帝国的主要负担落到土耳其政府宰相及其庞大的办事机构秘书处肩上。现在领导整个帝国的正是这些能干而又忠诚的“伊芬迪”（efendis，意即先生、绅士）或被称为“耍笔杆子的人”，其中有些人是在宫廷学校而不是在寺院里培养起来的。行政职位上的提升越来越多地通过这条官僚机构的渠道，而不是依据财富的多寡来定，

同时政府里的首席文书官（Reis Efendi）拥有被任命到省级政府任职的良好机会，有的人如穆罕默德·拉米（Mehmed Rami）甚至于1703年就被任命为政府的宰相。[\[22\]](#)

只要能得到土耳其苏丹的信赖，宰相的权力就非常之大，他仅仅受到三种势力的约束：其一是阴谋诡计，所有事务都是在钩心斗角中进行的；其二是近卫军，必须讨好他们；其三是包括司法和教士在内的穆斯林宗教组织的干预，这个宗教组织可对各级民事和军事机构造成影响。主管法律和教育的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高级学者对各种重大的政治决策仍然拥有否决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这不过是一个顾问性质的团体）和地区性的帕夏会议；而且，虽说近卫军有时可以推翻一位土耳其苏丹，但这些学者可以控制穆斯林舆论天天对土耳其苏丹施以压力。他们的主要发言人，伊斯坦布尔的释典官，尽管形式上土耳其苏丹有权罢免他，但他不是宰相必不可少的朋友就是宰相的死敌。然而，释典官和宰相都最害怕穿黑衣服的太监头目，因为这位内宫太监总管（Kizlar Agasi）不仅作为皇家清真寺主持人[\[23\]](#)握有无限大的圣职授予权，而且作为后宫的总管成为整个皇家内宫的太上皇。在这个皇室内，女人和太监结成的邪恶联盟组成了各种宫廷阴谋活动的中心。这些活动始终都以每个官职和各种财源为中心在不停地转动着，为了获得一官半职或某一肥缺还有一个确定了的礼品规格单。幸好许多“伊芬迪”（笔杆子）能够免于受害，然而他们不拒绝贿赂。包括省级帕夏在内的所有高级官员也无法进行抵制，宰相本人则境况更为糟糕。只有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宰相这一官职。没有几个人能够长期保住宰相这一官职的，从1683年到1702年，宰相就更换了12人之多。几乎连手腕最强硬的人也不得不在慷慨解囊和安稳地进行勒索这两件事上要手段。他们的追随者中间，许多人知道自己任职的时间不会比上司更长，自然要抓紧一切时机捞取油水（当太阳好的时候就把草晒干），至于他们为谋取一个职位或一个包税地是否必须付出高于该职位或包税地的代价，或者他们本人是否称职，他们都认为无关紧要。放弃“戴夫舍尔姆”（devshirme）制度（指从基督教徒的后代中招募奴仆的制度）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对此是有争议的，其最坏结果与其说是造成生来自由的已婚穆斯林近卫军士兵的堕落，不如说是让那些有可能十分成功地进行钻营的人去攫取国家民事部门的职位，而那些职位往往为出价

最高的人所得。不管怎么样，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讲，奥斯曼帝国的政体确实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发迹的机会”。

库普鲁卢父子在1651—1675年曾把帝国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拯救出来，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要对帝国制度在结构上进行任何改革。那些对弊病（这些弊病比通常人们所认识到的要多得多，而且其存在的广泛性也远未被人们所认识）进行鞭挞的人寻求救国之道。如果他们不是对西方有所了解的穆斯林信徒的话能拿出的办法就只好是在据说能预见到全部需要的圣法的指引下恢复道德，和对违法者进行严惩。由于确信伊斯兰教的优越性而且顽固地无视他们帝国以外的世界，奥斯曼人赏识的只是西方的战争技术，直到法国革命爆发之后伊斯兰教徒才对西方思想有深刻的认识。^[24]长期缺乏的是用归纳法进行推理的再创造能力。穆斯林学者（他们事实上垄断着高级教育和学术研究）对他们所理解的异教徒的“推理”科学完全持敌视态度，并且运用他们的巨大势力禁止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了解基督教徒使用的各种语言。甚至在比较先进的医学研究方面，尽管在土耳其有精于医术的犹太和法兰克的医生，穆斯林学者在18世纪才开始重视欧洲人在16世纪医学方面的发现。^[25]重用亲戚和贪污受贿也给宗教统治集团在已经确立的制度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他们的财产与土耳其苏丹世俗仆从（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还是他的“奴隶”）的财产截然不同，既可继承，又不会被没收。这个“学术界”的规模正在不断地扩大。

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弱点也还可以归咎于数量很大的希腊东正教教士中的许多人身上。当时，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正在恢复。该教对新的思想意识视若仇敌，而且对其信奉者也进行无情的勒索：主教若在财政上不能按规定进行奉献，则他的教区就要被“判”给能出高价的人。^[26]一般来说，东正教的进贡者与傲慢而宽容的穆斯林教徒的关系较之处于少数地位的天主教徒的关系更好一些，这些天主教徒在各处都是心神不安地与东正教徒住在一起，他们这种状况也同样存在于建立了法国方济各会布道团的土耳其克罗地亚（Croatia）和希腊的一些岛屿。后来，迫使塞巴斯特的男修道院院长梅克希泰尔（Mekhitar）（他于1700年创建了一个天主教教会，对亚美尼亚文化的复活起了主要作用）搬迁的是东正教而不是穆斯林。

斯拉夫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中间的部分基督教徒之所以没有在奥斯曼统治下被同化，无疑地至少是由于山地部族的强悍精神和对穆斯林宗教的憎恶心情，这两者所起的作用也不相上下。但这基本上是一种制造混乱的精神，丝毫无助于进步。他们想到的改良也是简单的改良，不是基督教徒所急需的那种改良，即勒索少一些和公正多一些。虽然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由于政权不断易手而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但出现像斯拉夫民族意识一类的骚动还为时尚早。如果说1690年“雷希察”（Rascian）塞尔维亚人大规模迁至匈牙利南部是东正教教士组织的，那也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和需要扩大牧场的缘故。这次搬迁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可称为是个奇迹。穆斯林教徒也和基督教徒一样，他们的村庄大都是自给自足，互不往来。就连造反精神很强的门的内哥罗（又称黑山）人虽不乏领袖人物，但也从未响应彼得大帝^[27]的号召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进行斗争。虽然土耳其人很快就怀疑基督教徒同情敌对的基督教国家，结果如17世纪30年代那样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但经济上的困境在当时仍比思想上的分裂更容易在基督教徒中间引起骚乱。至于犹太人，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希腊的翻译迅速成为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正式中间人，但外国大使发现，犹太医生是比希腊翻译更容易向高级伊斯兰学者，有时甚至是向土耳其苏丹本人传话的途径。

在帝国政府机构成员中间，只有有本事的“耍笔杆子的人”才能在接受教育方面比得上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担任教职的人士。他们的影响正在扩大，特别是伊斯兰教学者，这种人对广大国民思想的控制是任何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因此，即使宿命论者确定发生变革的期限会比人们预料的时间提前，但也难以期待下层会发生任何带有进步意义的，或者是持久性的暴动。近卫军一再发生的叛乱，尽管他们也许会去支持穷人，或者对为数众多的保守行会中的一个表示不满，但严格地说这也不过是一些兵变或者是使用暴力进行的罢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人们拭目以待的倒是奥斯曼政体能否通过外来的征服而有所改变。

1683—1730年间，奥斯曼人享受了不到20年的和平生活。而单单是那场从围攻维也纳^[28]开始的战争就整整延续了几乎与和平生活同样长的时间，应对发动那场战争负责并对战争失利负责的是过分自信。战争也严酷地考验了这种自信。1683年9月，卡拉·穆斯塔法

（Kara Mustafa）庞大的军队溃败之后，又在帕卡尼（Párkány）附近横渡多瑙河时遭到更为惨重的伤亡，接着又放弃了匈牙利北部（Upper Hungary）的格兰（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n）以及其他要塞。12月25日，宰相在贝尔格莱德被绞死。1684年3月5日在林茨组成的“神圣联盟”意味着利奥波德（Leopold）皇帝屈从于他的将军和教士的主张，退出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而支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十字军远征去统一德国舆论。事实确实如此，利奥波德由于怀疑（波兰国王）约翰·索比斯基（Sobieski）对匈牙利的图谋，早已对维也纳的这位救世主持冷淡态度，并于1683年拒绝全面追随土耳其人。在其后数年里，尽管他期望收复波多利尼亚并实现他兼并罗马尼亚各公国的野心，但内部困难使这位波兰国王无力动员足够的军队来实现这些愿望。^[29]另一方面，通过与威尼斯和马耳他海上国家参加的神圣联盟，以及由威尼斯人控制的希腊海岛上的武装商船合作，他可以严重地骚扰奥斯曼的贸易，并可牵制多瑙河方面的军队压力。威尼斯人可以在波斯尼亚和希腊的基督教徒中间挑起动乱。因此，1684年土耳其人发现他们自己要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即匈牙利、波属乌克兰和亚得里亚海，此外还必须保卫爱琴海上的重要通道。同年10月，强悍的克里米亚鞑靼骑兵发动了波兰人对乔汀的一次新的进攻，地点就在1673年索比斯基打了胜仗的地方。但威尼斯人夺取了爱奥尼亚海（Ionian）上的圣毛拉岛（Santa Maura），而帝国军队司令洛林的查理五世公爵则在匈牙利北部迅速地占领了更多的要塞。

土耳其人在他们自1526年以来一直占领着的匈牙利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支援1678年以来的匈牙利起义领袖、对奥斯曼帝国称臣的伊姆里·特克利（Imre Thököly）国王。1685年，洛林的查理公爵征服了新扎姆基要塞，3000多名守军中只有200人幸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军队主力的指挥官伊卜拉辛（Ibrahim）帕夏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打击之重，从而开始了全面的和平谈判。这位指挥官因未得到新上任宰相的批准就采取这一行动而被处决，但这位宰相本人不久也被免了职。如此频繁地更换宰相和总司令使得奥斯曼帝国及其军队更为混乱。令人费解的是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本人的行为，因为他面临着这么多的灾难，却仍一味固执地沉湎于寻欢作乐，特别是他更为喜爱的打猎活动。有关他对日益发展的危机持一种明显的漠不关心态度的怨言已经开始传播。这种怨言四起的情况随着1686年被称为“伊斯兰盾牌”的奥斯曼匈牙利重要中心布达的陷落更加严重。布达的阿布迪

（Abdi）帕夏至今仍为土耳其人铭记在心，他曾英勇地抵抗一支4万人大军的进攻达78天之久。9月2日该城经过激烈战斗之后陷落时，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均被杀掉，首先处死的是阿布迪帕夏。结果整个匈牙利的抵抗被镇压下去，特克利不得不放弃他的其余城镇，听任驻在埃佩（Eperjes）的卡拉发（Caraffa）将军监督下的司法恐怖进行蹂躏。[\[30\]](#)

正当土耳其军队主力忙于在多瑙河作战的时候，弗朗西斯科·莫洛悉尼（Morosini）利用他对海上的控制，不仅威胁奥斯曼帝国国库主要收入来源的那些来自埃及的船队，而且于1685年占领了摩里亚沿岸的许多据点。莫洛悉尼军队拥有1.1万人，其中半数是由德国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组成，由柯尼希马克（Königsmark）伯爵统率。这支军队严重感染上热病，且对莫洛悉尼的严格纪律不满。他唯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战绩是1686年占领那波利（Nauplia），该地后来成为他的海军前进基地。可是次年土耳其人由于失去对希腊科林思（Corinth）湾入口处的控制而被赶出了摩里亚[但马尔伐西亚（Malvasia）一直坚守到1690年]，然后雅典本身[\[31\]](#)也被威尼斯人占领。威尼斯人的一颗炸弹基本上摧毁了当时被作为一座火药库用的雅典巴台农神庙。

1687年不仅在军事上多次失利，这一年还出现了严重干旱，粮价也随之高涨。索比斯基率领他的军队深入土耳其领土直达摩尔达维亚首府雅西（Jassy），不过他的实力与英勇善战的克里米亚可汗塞利姆-吉莱伊（Selim-Girei）统率的、机动灵活的骑兵相比又一次居下风。塞利姆-吉莱伊曾4次在克里米亚称汗。[\[32\]](#)土耳其人自己首先在多瑙河采取行动，宰相苏利曼（Suleyman）帕夏期望此举能收复布达。但与他的愿望相反，他打了一场败仗，损失约2万人，而皇帝一方只有轻微伤亡。这一仗发生在8月12日，就在匈牙利的莫哈奇（Mohács）附近的瑙杰哈萨尼（Nagyharsány）。这则消息是由一位年轻而又相当沉默寡言的骑兵军官萨伏依（Savoy）的尤金传到了维也纳，这位军官就是在这些战斗中接受了一支归他指挥的军队的。12月9日，奥地利王子约瑟夫在布达接受了圣斯蒂芬皇冠。

在经受这些挫折之后，奥斯曼军队主力起来造了反。军队推选赛耶沃西（Siyavush）帕夏作为将军并要求土耳其苏丹任命他为宰相。军队从贝尔格莱德撤到亚德里亚堡的同时，要求处决苏利曼帕夏。穆

罕默德四世没有拒绝，但他接受赛耶沃西帕夏为宰相仍不足以拯救他自己。他玩忽国事使人们的不满达到顶点，1687年11月8—9日，伊斯兰教学者和军队一起废黜了他。^[33]这位“猎人”穆罕默德就这样最后被他的异母兄弟苏利曼二世（Süleyman II）取代，后来历史证明苏利曼二世（1687—1691年）是一位比较有才能的统治者。他登基后首先碰到的阻力是来自当时在首都暂时处于主宰地位的近卫军，他们组织的独断专行的政府延续了4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任命高级官员，抢劫皇宫并像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胡作非为。在安纳托利亚、克里特以及贝尔格莱德也都发生过骚乱。然而，这些暴行正如土耳其政治上富于戏剧性改革的特色一样，至少是暂时起到了乱而后治的作用。新就任的土耳其苏丹政府依靠受到欺压凌辱的民众的帮助，设法把骚乱镇压下去，惩罚了近卫军士兵并把他们的一部分军官处以极刑。

在这些骚乱发生期间，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成功地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向前推进。1687年12月占领了北面的埃格尔。在南面，皇帝的拥护者在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伊曼纽尔（Max Emmanuel）的指挥下于1688年春天占领了要塞彼得华亭（Peterwardein）。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大门就这样敞开了。本来预计贝尔格莱德自己就可以长期坚守，但它只坚守了3个星期，于9月6日投降了，也许是被出卖了。由于它的陷落威胁着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及各个公国（所有这些地区内部都有人与维也纳进行接触^[34]），土耳其政府这时也认真地试图进行和平谈判。土耳其政府派出一位名叫朱尔菲查理（Zulfikar）的高级官员和很有影响的首席翻译官亚历山大·马弗洛科达托（Mavrocordato）到维也纳去，表面上是去宣告苏利曼二世继任王位，实际上是去试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奥地利皇帝的条件是要吞并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因而这是土耳其政府完全无法接受的。为了迫使哈布斯堡同意达成一个更为合情合理的和平协议，土耳其人遂于1689年夏末发动了一场新的战斗。他们希望土耳其苏丹本人亲征会鼓舞部队士气一举收复贝尔格莱德。结果事与愿违，9月24日巴登的刘易斯侯爵（Margrave Lewis）占领了往南150英里处的土耳其人重镇尼什，而且不久又占领了他们的维丁。这样一来，敌人更接近土耳其苏丹的夏季行宫亚德里亚堡。尽管塞利姆-吉莱伊（Selim-Girei）汗带领大批鞑靼人赶到，拯救了保加利亚和色雷斯，

但巴登的部分军队还是在那个冬天突入瓦拉几亚直到布加勒斯特。

[\[35\]](#)

整个军事形势当时是如此严峻，君士坦丁堡的公众舆论在伊斯兰教学者支持下，要求选拔一位极有个性的人担任宰相（通常不为宫廷食客所欢迎），这时的情况和1656年完全一样，那时库普鲁卢·穆罕默德帕夏被授予不受任何约束的无上权力。1689年10月25日，土耳其苏丹任命库普鲁卢·穆罕默德最小的儿子费齐尔·穆斯塔法（Fazil Mustafa）帕夏为宰相。这位领“费齐尔”头衔（意思是“公正的”）的穆斯塔法帕夏是一位一致公认的最能干的宰相，后来任职不到两年时间就战死在沙场上，但他在任时成功地整顿了公务和军队松散的纪律；对办事机构进行压缩并实行减薪，就连皇宫里也都一律照办，当时埃斯普里（土耳其14世纪开始使用的一种硬币）也贬值三分之一。这时皇帝的地位因爆发九年战争而变得复杂化了，因而土耳其人期待这位宰相把敌人赶出巴尔干也是有道理的。正如路易十四所设想的那样，法国于1688年向莱茵兰推进，牵制了奥地利的主要部队，不然奥地利早就把这些兵力用于东线了，但在巴尔干打一场十年战争对奥地利人不会有什么持久性的收益。此外，匈牙利人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也是不安于现状的：原来由土耳其人任命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米歇尔·阿佩费（Michael Apafi）亲王已经屈服于皇帝，但特克利（Thököly）仍然继续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斗争。在1688年，当威尼斯人撤出了阿蒂卡（Attica），且在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又遭失利时，希腊战局已有转机，到了1690年又大体上从通常由威尼斯军队逃兵中的阿尔巴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组成的匪徒手里夺回对希腊北部的控制。同年，费齐尔·穆斯塔法在巴尔干半岛获得又一显要的胜利，于9月9日收复了尼什，一个月后又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和部分波斯尼亚又重新回到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也就在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历史出现了一段最有名的插曲。在塞尔维亚东正教圣地佩奇（Peé）地区主教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人（有的说总数达到20万）迁移到匈牙利南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去，希望从新的封建领主那里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36\]](#)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费齐尔·穆斯塔法下令禁止对他们的不忠行为进行惩罚，允许建筑新的东正教堂和对旧的教堂进行整修，停止进行随心所欲的压迫，并采取他所能办到的其他

措施来改善由于军队过境以及由于战争对正常生活的破坏而势必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民的生活。

苏利曼二世死于1691年，他的王位由同父异母兄弟艾哈迈德二世（Ahmed II）继承（1691—1695年）。1648—1730年间，前后接任王位的土耳其苏丹共有5人，只有他们两人没有被废黜。土耳其苏丹更换了，但费齐尔·穆斯塔法仍然担任宰相的职务。他亲自率兵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却不幸于1691年8月19日在扎莱凯曼（Zalán-Kemén）附近的一次残杀中英勇战死。^[37]土耳其人退到巴纳特，然后在大约一年时间里双方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军事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在又一次新的战斗打响之前，英国和荷兰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佩吉特（Paquet）勋爵和雅各布·科利杰尔（Jacobus Colijer）^[38]表示愿意出面进行调解。不列颠和联合省自然急于要他们的帝国盟友不采取威廉三世提出的从更为重要的对法作战方向上抽调急需部队的主张。然而，由于土耳其要价过高，调解未能成功。1693年再次进行调解，但这次调解也和1688—1689年的调解一样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奥地利的条件过于苛刻。因此两个大国虽都有和平的愿望，但敌对状态仍然延续下去。奥地利于1693年9月试图再次夺占贝尔格莱德，仍未获成功，同样，1694年土耳其也未能攻下彼得华亭。这两地之间的河流和沼泽地带实际上使双方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威尼斯人以为奥斯曼海上力量薄弱，遂于1694年9月派舰队横渡爱琴海在希俄斯（Chios）登陆，上岸的部队约8000人，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希俄斯。这一占领使土耳其丧失一个富饶的海岛，这个海岛是从亚历山大港到君士坦丁堡的船队经常中途停泊的一个很有用的海军船坞。此外，这一占领还意味着可能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威胁，这个海峡在克里特战争时就曾几次被封锁过。对土耳其苏丹说来，这一占领可能意味着要被废黜或者比废黜更为糟糕。像往常一样，土耳其人能够在极端危险的时刻和地点集中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们当时除用奴隶划的军舰外，还拥有约20艘速度快、作战能力强的大型帆船^[39]；此外，还有16艘北非的武装商船可以进行增援。另一方面，掌握威尼斯军队指挥权的莫洛悉尼（Morosini）于1693年死后，他的继承人安东尼奥·泽诺（Antonio Zeno）既缺人又缺钱。大肆抢劫使他与希俄斯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他自己手下指挥官之间关系也不好。他的马耳他人辅助舰队也撤离了。还有传说谈到土耳其人要在摩

里亚的阿戈斯（Argos）进行反攻。事实上，泽诺发现自己正处于莫洛悉尼临死前告诫他的同胞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的困境，即远离自己的补给线而且分散了有限的兵力，结果不仅没能把土耳其人赶出内格罗蓬特以保卫摩里亚，反而危及威尼斯人对摩里亚的继续控制。他把共和国精心积蓄起来的战争资源全部浪费在只有土耳其人自动放弃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的胜仗上。^[40]1695年2月，威尼斯人撤出了希俄斯。

在新就位而且精力充沛的土耳其苏丹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再次发动军事上的攻势，但时间不长。1695年6月他坚持要亲征，并从奥地利人手里夺得了几个小地方，因而国内民众欢呼拥立穆斯塔法为“盖兹”（Gazi），即战胜异教徒的英雄。

鉴于在军事上多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又丧失了这么一大片土地，土耳其人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战斗精神是非同寻常的。在每次惨败之后，土耳其政府于次年春天都要补充一批新的部队、火炮和战舰。但这是在付出许多代价，如造成经济上严重混乱和社会弊病加剧之后才换来的。国家的开支，或者说部分开支是依靠提高税收，特别是提高对咖啡、烟草、公务员薪金所征的税金以及没收倒台官员的财产来解决的。1669—1697年，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次大胆的尝试，通过铸造一种新的皮阿斯特和一种价值300个阿斯普里的新金币来提高币值。这几年财政部比17世纪或18世纪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难以维持其收支的平衡。1691年国家财政支出（其中约四分之三用于军事）超过收入约四分之一。^[41]确实，按照土耳其人的习惯做法，军事上许多勤务的实施，以及事实上所有市政工程的兴建和维护全靠慈善机构来负担。奥斯曼帝国的宗教虔诚感使接受这种捐赠资助的不仅有寺院、医院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有所谓的“战无不胜边防线”上的公路、船只和堡垒。但这些慈善机构的经营却成为有权有势的人激烈争夺的目标，而且大部分捐赠收入都挪作他用，有时还纳入私人腰包。^[42]类似的情况还有，如边境的一支驻军也许会发现他们的薪金被营私舞弊的政府代理人骗走了，这些代理人负责管理政府指定用来支持驻军生活需要的一批地产。这批地产经常由于缺乏资金无法耕种，或者由于耕种土地的人早已逃离而无人耕种，同时那些领不到薪金的驻军也都开了小差。

正如后来一位财政大臣指出的那样，财政部门是虐待农民的最终受害者，因为“国家依靠他们而生存，而且财富也是他们创造的”[\[43\]](#)。由于财政部门需要依靠“数量众多的臣民”，因而用下列辱骂性文字来谴责近卫军就不单单是出自一种对农民的怜悯心情：

说是“我们在战斗”，实际上他们什么丑事都干……他们土匪一般行事：他们并不满足于从路过的村庄得到免费和无偿的战马饲料，也不满足于能填饱自己的肚皮。他们还要掠夺基督教徒的马衣和破烂衣裳，要是他们能够抢到粮仓，他们才高兴呢！[\[44\]](#)

许多本来是平静的地区，现在遭到了强盗般逃兵的蹂躏，在其他地区[例如塞萨利（Thessaly）]地方性的抢劫则不断增多。许多农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去当土匪，或者甚至设法钻进像那些“自称近卫军”的精锐军队中去，用不着从君士坦丁堡走出很远的路程就可以有收入。[\[45\]](#)这些冒险家的闯入，有时还会以军官的身份安插进去指挥老兵，这无疑只会使近卫军的纪律更为松懈。而且，这样一支人数臃肿的常备军队，还常以兵变的威胁进行敲诈，不仅要求补发拖欠的薪俸，而且还要求增加，结果每个季度开支的总金额（约占军事预算的一半）成为国库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同时，日益贫困的状况也反映在“封地”部队的实力上，使帝国不得不依靠那些纪律较差的志愿者的力量来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

正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北方出现了一种没有预料到的危险。土耳其人过去常以倨傲的态度对待俄国。一般来说直接和俄国打交道的不是土耳其政府而是克里米亚的汗；俄国人遭到鞑靼骑兵的袭扰，在人员、牲畜以及赎金方面的损失确实是与日俱增，尤其是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刚定居不久而且自卫能力很差的斯洛博达地方的乌克兰人（Slobodskaya Ukraine）遭到的损失更为严重。俄国军事力量软弱这一点还表现在1687年和1689年V.V. 戈里钦（Golitsyn）王子两次出征彼列科普（Perekop）地峡的失利上。尽管索比斯基（Sobieski）曾经于1686年说服莫斯科人参加神圣联盟（Holy League）（以波兰人永远割让基辅作为交换条件[\[46\]](#)），但那个地区在1695年以前从未出现过严重危机。这时，俄国人没有直接对克里米亚采取攻势，而是转过身来进攻亚速（Azov）。年轻的沙皇彼得在俄土关系上同时也在俄罗斯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除了波兰和奥地利要求援助外，彼得也有充分理由要迫使鞑靼人停止袭扰。他也接受了巴尔干东正教、塞尔

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希腊说客的劝说，这些人现在都已完全醒悟过来，唯恐他们从穆斯林主子那里得到的解放还要再从拉丁语系的“斯瓦比亚人”处去争取（斯瓦比亚为昔时德境内之一公国，现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内。——译者）：正如一位驻莫斯科的瓦拉几亚（Wallachian）使节后来于1698年所写的那样：“世俗的战争还可能有结束的一天，而与耶稣教徒进行的战争则永远不会结束。”^[47]但是，沙皇的主要动机无疑是渴望取得“暖洋”。

由于亚速得到来自海上的增援，彼得对亚速发动的首次进攻失败了。他于1695—1696年的冬天下令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日（Voronezh）建造军舰。由瑞士人弗朗索瓦·勒福尔（Francols Lefort）指挥的这支小舰队由17艘用奴隶划桨的军舰，6艘轻型帆船和火攻船，以及大约40艘哥萨克小艇组成。^[48]土耳其人遭到突然袭击，他们前一年损坏的军舰还未进行修补。亚速于7月被攻占了。这是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作战的首次胜利，而且这次胜利具有深远意义。向俄罗斯人一直尽一切可能小心谨慎对待的这么一个强国显示一下优势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海岸边，虽然这还不是黑海沿岸。彼得在亚速西北、越过水面仅距20英里的塔甘罗格（Taganrog）建了一个海军造船厂，到1699年该厂已造了战舰14艘。然而，他的军队在其他方向上作战并不顺利。1695年，俄国元帅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谢里曼捷也夫（Sheremeteyev）在第聂伯河下游攻占了4个小的据点，从而威胁鞑靼人与西方来往的交通线，但他向黑海门户刻赤海峡的进军却遭到挫折。这就是彼得竭力反对和平谈判的原因。当时由于签订了维杰瓦诺协定（Convention of Vigevano）^[49]，尤金亲王（Prince Eugene）刚从皇帝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就出人意料地采取果断措施对土耳其作战，并赢得首次令人振奋的巨大胜利，这次胜利本来是能够促成和平谈判的。

穆斯塔法二世于1697年再次坚持要亲自率领军队主动发起攻势以收复匈牙利。然而，土耳其总指挥部没有任何既定的计划，而且内部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宰相艾尔玛斯·穆罕默德帕夏主张越过巴纳特北进，而其他人却要朝彼得华亭方向西征。结果宰相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土耳其军队穿过蒂萨河下游难以通行的沼泽地区，根本不去监视敌人的行动。尤金本来估计土耳其人会进攻彼得华亭，因此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强行军。就在土耳其骑兵大部分渡过蒂萨河东进而步

兵尚在右岸时，尤金与土耳其人交上了火。这次交火是9月11日接近黄昏时在曾塔（Zenta）附近发生的。土耳其人对尤金的出现并果断立即发动攻势毫无准备，结果战死约2万人，可能还淹死了1万人，而帝国损失微乎其微。穆斯塔法二世隔岸目睹了这次杀戮，临阵逃掉。这次“可怕的血洗”（尤金本人是这样称呼这次交战的）再加上近卫军兵变使局面变得更为严峻，近卫军在绝望中杀死了宰相和其他许多高级官员。到了10月底，尤金已经深入波斯尼亚腹地，放火烧毁了重要的贸易城镇萨拉热窝（Sarajevo），并把它洗劫一空。

土耳其苏丹任命第四个库普鲁胡赛因（Hüseyn）帕夏为宰相，希望他会有办法使这场灾难停止发展下去。这时正是英国和荷兰再次进行调解的恰当时机，特别是卡洛斯二世（Carlos II）已是奄奄一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西方可能会出现新的复杂局面。双方同意在保持各自占领地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样一来，俄罗斯人想通过外交活动赢得刻赤海峡的希望就成了泡影。1698年俄国沙皇访问了维也纳，企图进一步加强在一年前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同反对土耳其的第一个奥俄联盟，但未获成功。结果，在彼得华亭附近的小镇卡尔洛维茨（Carlowitz），土耳其政府全权代表穆罕默德·雷米（Mehmed Rami）文书官（后来担任宰相）和经验丰富的亚历山大·马弗洛科尔达托（Mavrocordato）经过72天谈判之后，于1699年1月26日与除了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国家达成了和平协议。土耳其与俄罗斯人签订了停战两年的协议，紧接着在1700年爆发了“北方战争”。彼得把与土耳其达成和平协议看成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因此俄土签订了一个10年的和平协议。彼得永远不会原谅哈布斯堡人，因为他们在卡尔洛维茨谈判时把俄罗斯人抛在一边。

卡尔洛维茨的和平协议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土耳其人与欧洲国家联盟之间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是土耳其人第一次接受中立国家进行调停的结果，也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战败国。它丧失了大片领土：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不过人烟稀少的泰梅什堡境内的巴纳特不包括在内）归属于皇帝[\[50\]](#)；达尔马提亚和卡塔洛（Cattaro）的重要港口黑山（Montenegro）、圣毛拉（Santa Maura）、摩里亚和埃吉纳岛（Aegina）归属于威尼斯；波多利尼亚以及卡梅涅茨划归波兰。而且，按照1700年君士坦丁堡协议规定，土耳其人割让亚速地区并第一次接受俄国派来一个常驻外交使团，这样一个

权利（1711年丧失了，但1720年又重新恢复）使俄国能和法国、不列颠、罗马帝国、荷兰和威尼斯一样享有研究和利用土耳其政界内幕的机会。此外，土耳其人拒绝接受克里米亚汗提出每年进贡一次的要求，俄国沙皇对此也极为反感。自1683年以后，进贡停止了，到1700年累积欠款额可能达到彼得大帝当年收入的十二分之一。^[51]彼得方面则同意摧毁位于第聂伯河下游他自己一直坚决要保留的4座堡垒，土耳其人也没有再去修复。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希望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任意朝拜圣地的要求也得到认可。总之，所有这些条文规定标志着土耳其人开始撤出欧洲大陆。此后，土耳其人有时确也挽回了部分损失，例如收复亚速（1711年）、摩里亚和埃吉纳岛（1715年）等地。他们也曾一度使他们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边境处于稳定状态，而且甚至扩大了他们在高加索占有的土地。俄罗斯人直到1774年才获得在黑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以及有权保护在土耳其所属巴尔干地区内和俄国人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教徒，而这两条彼得早在卡尔洛维茨谈判时就坚决主张得到的。同样，直到1783年俄罗斯也才兼并了克里米亚。然而，尽管与奥斯曼帝国仍然统治着的辽阔地域相比，1699—1700年丧失的土地微不足道，但这些土地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却具有重大意义。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损失严重地损伤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威信。“土耳其人的威胁”显然已经成为历史。

帝国的生存在某些方面也已受到危害。从西部进入爱琴海的通道已经掌握在威尼斯人手中，而且威尼斯的舰队可以再次威胁达达尼尔海峡。在北面，亚速海已经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亚速海以东，库班河下游以及高加索北部部分地区正在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在西部，第聂伯河左岸新建的卡门尼·扎顿（Kamenny Zaton）要塞使人想起最近鞑靼人放牧和打猎场所遭到的威胁。克里米亚、第聂伯河河口以及黑海本身现在都处于俄国沙皇的庇护下。先前一直不准与君士坦丁堡有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使用的黑海入海口可能很快就会向俄国开放，他们并不隐讳他们的这一野心；人们把乌克兰因采夫（Ukraintsev）于1700年乘一艘在塔甘罗格装备的带有52门大炮的战舰来博斯普鲁斯（Bosporus）参加谈判看作不祥之兆。“北方战争”并未使彼得在塔甘罗格以及亚速进行的设防和造船这两个活动停止下来，为此动用了一支由1.8万多人组成的劳动大军直到1709年。^[52]然而，重要边境要塞丢失的意义和莫斯科人力量的任何有效加强都同样

在君士坦丁堡引起巨大的不安。彼得在俄国南方的成就与他在北方的所得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他在南方的所作所为比起取得的成就来说意义要重大得多。亚速和第聂伯要塞的丧失对每个奥斯曼帝国虔诚的国民都是一次强烈的震惊。从此以后，土耳其人对有关俄罗斯人行动的每一个传说都特别敏感。

此外，被战争打乱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调整过来。安纳托利亚和其他省份许多铤而走险的农民已经离开家园成为流浪者，有的去当土匪或者到首都去谋生。在某些地区粮价达到饥荒时的水平，而且有些地区政府已经无法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宰相胡赛因帕夏从1697年起就竭尽全力来整顿经济和行政管理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取消了因战争需要而强制缴纳的多种款项，特别是他通过取消战争及其他方面的欠款来缓和信奉基督教的农民的悲惨境遇，这些农民不仅因大批地方政府垮台而遭殃，而且由于在巴尔干进行的战争而吃尽了苦头。^[53]胡赛因甚至大胆地抨击了军事采邑的滥用，因为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实际上许多并未担任军事职务的人也以战争名义征用了大批采邑。然而，在短时间内要收回成千上万个这种非法占有者的采邑是不可能的。他还设法改组近卫军，裁减数量，为国库节省了大批开支。许多兵营进行了重建，要塞也得到修复。也正是在这几年来，海军的效能迈出的步子最大。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舰队司令梅祖莫托（Mezzomorto），他整顿了海军指挥体系，增建了横帆船。图尔纳福尔（Tournefort）对君士坦丁堡造船厂的组织工作印象很好，1701年他在该厂看到了装备60—100门火炮的28艘很好的船只。^[54]常备陆军和海军的实力加起来估计为196227人，每年开销近700万皮阿斯特。财政大臣萨里·穆罕默德帕夏在1703—1704年写文章时提到，仅是常备的陆军就达96727人，未计在内的还有边境驻军和领抚恤金的7万人以及“2.35万念祈祷文的人”^[55]。

要不是从那个富有而又野心勃勃的伊斯兰教释典官费佐拉（Feyzullah）那里遇到强大阻力的话，胡赛因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费佐拉原是穆斯塔法二世的老师，他的权势很大，他把许多儿子都安插在有利可图的岗位上并且经常干预政府的事务。君士坦丁堡的释典官是伊斯兰教内的最高权威，因而也是法律上的最高权威，负责对包括决定战争与和平在内的神圣的法律条款进行裁决，因而比宰相还要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与宰相两人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就会给政府

高级部门的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费佐拉是一位有学问的法律学家，他在提高宗教教规和教义讲授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56]，他代表了伊斯兰教学者对改革的强烈反对。宰相身体垮了，并于1702年9月5日提出辞呈，不久就死去了。他的继承者达尔塔班·穆斯塔法（Daltaban Mustafa）帕夏是费佐拉手下的一个粗暴而且专横的家伙，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继续前任的工作，尽管他统管的正是他前任任职期间经过改进了的基金会（evkaf）的行政管理工作。

土耳其苏丹穆斯塔法二世是一个有学问、心地善良但又爱好寻欢作乐的人，这时他一直待在亚德里亚堡，因而人们纷纷传说他要把首都迁到那里去。他不在君士坦丁堡，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学院式寺院、咖啡馆、工场作坊以及皇宫内部舆论的压力。有一件对他不利的事，即近卫军总头目主管着首都的治安。^[57]1703年8月，火枪手被长期欠发军饷激怒，带头举行军事叛乱，这就是“亚德里亚堡事件”，目的是迫使土耳其苏丹返回君士坦丁堡。陆军则逼迫穆斯塔法二世把王位让给他的兄弟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703—1730年），军队还唆使伊斯兰教学者赞成这一行动。正如所预料到的那样，用没收被撤了职的政府官员封地的收入^[58]足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从未向军队提供过的这样大一笔开支。那位贪得无厌的费佐拉由于权势大减被他的继任者马弗洛科达托交到愤怒的暴徒手中。马弗洛科达托原是费佐拉的亲信，这时他避而不露面。

新就任的土耳其苏丹当时年仅30岁，以前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仍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他虽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和花卉画家，喜欢女人和诗句，但他并不完全沉浸于宫廷之乐。至少在他即位后的第一阶段，1703—1714年，他在政府事务方面表现出既明智又关心，并在司法和铸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幸的是，他那乖僻、摇摆不定和野心勃勃的性格使他容易接受亲信的影响，不过他早已下决心不对任何人过分信任，而且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阴谋反对他的人。数千名被怀疑搞阴谋的人在他的命令或默许下被处死刑。他无疑会给国库增加收入，但同时也使帝国丧失了一批最为英勇善战的军人。他尽管和他的许多臣民一样深切地盼望见到帝国的伟大形象得以恢复，但还是深刻地理解到他的帝国现状使他不可能执行任何有作为的对外政策。首先要增加国家收入和提高武装力量的效能。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艾哈迈德不断地更换他的宰相，直到他物色到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的来自柯尔罗（Chorlu）的阿里（Ali）帕夏为止。阿里帕夏自1706—1710年担任宰相，是一位坚定而又聪明的政治家，他在叙利亚曾做了大量工作来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各省的首脑不久就体会到他是一位很厉害的人。他把近卫军军团内部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清除出去。他加强了关键地段，特别是刻赤海峡的海岸防御，同时继续扩大海军舰队使其达到足以使地中海沿海其他国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地步。然而，由于他的唯一愿望是和平，所以 he 不想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北方战争”来从中牟利，因而抵制了来自法国大使费里奥尔（Ferriol）对他不断施加的压力。法国大使这样做的目的是离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的关系，且于1707年后又转而离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沙皇的关系。如果说柯尔罗的阿里顽固地恪守中立于1708—1709年间拯救了俄国使之免遭灭顶之祸^[59]，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曾经3次出任克里米亚汗^[60]的德夫莱-吉莱伊二世（Devlet-Girei II）是一个极端的仇俄分子，他对来自沙皇的收入枯竭极为不满。1709年7月，在他想要参加瑞典人和马赞拉（Mazepa）率领的哥萨克的部队攻打俄国的时候，接到土耳其政府命令，要他不得擅自行动——这是一个能体现出土耳其人仍能牢固地控制其臣民的很好事例。这一禁令有助于沙皇彼得在波尔塔瓦赢得彻底的胜利，查理十二（Charles XII）和马赞拉逃到奥恰科夫（Ochakov），后不久就被转移到德涅斯特河上一个比萨拉比亚人（Bessarabidn）的要塞本德（Bender）中去。

波尔塔瓦一仗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欧政治力量的对比。俄国现在无可争辩地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很快也感受到这个事实。在君士坦丁堡，新任俄国公使馆人员在托尔斯泰（Tolstoy）率领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地策划阴谋和进行收买，同时在亚速和塔甘罗格，人们总是担心着俄国在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首先令人感到惊恐的是波兰的现状，在那里到处都是俄国的军队，这些军队在追击逃跑的瑞典国王时毫不犹豫地侵犯了土耳其的领土。瑞典国王留在土耳其，这在当时已成为俄土关系中至关紧要的一件大事。土耳其苏丹花巨资款待了查理十二，拒绝沙皇提出的引渡查理的要求。按照土耳其人的传统，避难所要对所有寻求避难的人开放，但这一次却变成对彼得施加压力和迫使他修改1700年条约的一个大好机会。彼得因忙于波罗的海战争，只好同意按土耳其人的要求进行修改，拆毁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小堡垒。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政府允诺尽快把查理

十二经过波兰或俄国遣送回去，但土耳其派出的护送人员只能有500人以免惊动各国。这一次柯尔罗的阿里打错了算盘。这位瑞典“铁头”拒绝离开。他正确地判断出他想利用奥斯曼军队对付彼得的主要障碍是土耳其政府的宰相阿里，因此他策划阴谋来反对这位宰相。

瑞典国王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几近实现。他的计划得到德夫列特·吉莱伊和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将军的全力支持，前者是出席土耳其政府国务会议的又一个著名阴谋家，而后者则是流亡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的追随者。波尼亚托夫斯基曾陪同查理到达本德，而且是一个能够通过土耳其苏丹的母亲和医生冯赛察（Fonseca）对苏丹本人施加影响的人。这一群“北方人”又得到马赞拉的后继者菲利普·奥列克（Philip Orlik）的有力支持。菲利普·奥列克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但他的波兰合作者和他的敌人俄国都同样不喜欢这一主张。这些惹是生非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在土耳其人身上加深反俄情绪。在亚速和塔甘罗格以及沿第聂伯河下游的备战迹象在政府人士中引起的紧张不安情绪有助于顺利实现他们的艰巨任务（当时俄国人在第聂伯河下游修建了一些新的堡垒，使人重新产生对克里米亚的担心）。彼得的军队当时还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与瑞典人作战，因此他实际上也不想在这个时刻与奥斯曼决一胜负，但是当在君士坦丁堡并非仅仅是近卫军急切地要洗刷亚速的耻辱时，立即实现他那侵犯土耳其的最终目的也并非难事。尽管土耳其首都的气氛并不主张再次对俄开战，但伊斯兰教学者中的领袖人物对德夫列特-吉莱伊的宣传十分敏感，而且他们在一片小心谨慎和优柔寡断中能按自己主张作出决策，也说明他们的政治势力日益增长。温和派的宰相地位很快就被削弱了。他那恪守中立的外交政策此时被说成是亲俄的，而且他被指责为对他的君主表现出一种过分不听话的态度。他曾明显地采取令人大为吃惊的行动企图把后宫里的黑人太监全部清除掉，而这些黑人太监的头目正是沟通宰相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渠道。1710年7月，柯尔罗的阿里在一次由宫廷发动的阴谋活动中倒了台，他虽幸免一死，但财产全部被没收了。

他的继任者是个有教养的库普鲁卢·纽曼（Numen）帕夏，是扎莱凯曼（Zalankemén）战役英雄的儿子。和他家族以前的几位宰相一样，他也是一个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并且努力做到主持公道，尤其是在财政事务方面。但他缺乏第一个库普鲁卢那种冷酷无情，而他的

正直处事又遭到土耳其苏丹本人的反对。他担任宰相仅63天就被免了职。由于他的家族仍享有盛名，因此他被有礼貌地降为内格罗蓬特的省长。1710年9月26日接任宰相的巴尔塔吉（Baltaji）·穆罕默德帕夏与库普鲁卢·纽曼截然不同，他的外号叫“劈柴者”，是在土耳其皇宫里加强体育训练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外来”的家伙[\[61\]](#)，这等于说，他学到更多的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去指挥别人，但不管怎么说他前不久曾经担任过阿勒颇（Aleppo）省的省长。

土耳其政府尽管要对付拖了很长时间尚未平定下来的埃及人的叛乱[\[62\]](#)，但最后还是决定于11月20日正式宣战，并向各省的帕夏发出命令，要他们于1711年春前来参加主力军队。彼得在得悉这个消息后曾两次设法劝说土耳其政府取消它的决定。但在他搞清楚土耳其政府确实要与俄国开战后就立即下令出兵。此外，他还仿效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的榜样，故意让这场战争带有宗教的色彩。像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1年在米尔维安大桥（Milvian Bridge）作战时的做法一样[\[63\]](#)，他在卫队旗帜上印以十字架，并写上“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无往不胜”。他声称他的目标是把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从“异教徒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是俄国第一次呼吁基督教徒起来反对他们的穆斯林主子。

这个预示前景的历史性声明看来是由化名为拉古金斯基（Raguzinsky）的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Sava Vladislavich）起草的。他是来自拉古萨（Ragusa）的一位塞尔维亚人，曾在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中间担任过俄国的代理人。这些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实际上成为推行沙皇政策的新的力量。彼得对奥地利人在卡尔洛维茨的背信弃义行径感到懊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巴尔干的打算遭到挫折所引起的，而且他对哈布斯堡人新产生的不信任感可能使他更加乐意去倾听东正教对基督教的抱怨。早在1687年，斯科普里（Skopje）的大主教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并谴责了东正教的主教在匈牙利受到的虐待；1698年彼得在维也纳停留期间，当地塞尔维亚人的高级主教也进行一次类似的呼吁；后来1702年耶路撒冷的高级主教多西休斯（Dositheus）也给他写信把利奥波德一世和迪奥克利特人（Diocletian）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1704—1710年间，至少有4位正在作战的塞尔维亚人的首领前往莫斯科“代表他们东正教的沙皇”表示愿为俄国效劳并请求给以金钱上的支援。[\[64\]](#)在盗匪活动难以镇压

下去的门的内哥罗的黑山和南部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1702年穆斯林对基督教徒进行大屠杀之后已经发生了一种分散性的游击战。游击战的首领是担任主教的亲王丹尼尔·彼得罗维奇（Daniel Petrovich）。1711年里塞哥维那地区的土匪头子米歇尔·米罗拉多维奇（Michael Miloradovich）加入他的队伍。虽然他们装备很差，但还是把远至东部尼什地区的土耳其人打败了。他们的命运与俄国拴在一起了，然而他们与俄国军队联系不上。

彼得本人在很多方面是不赞成东正教的教义和习惯做法的，但莫斯科却与希腊基督教的传教士保持着长久而亲密的关系。圣物、朝圣以及学术上的交往在17世纪就已增多：希腊大主教与莫斯科在改革宗教仪式方面进行了合作，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赖于俄国财政上的援助。^[65]基辅学院这时已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中心。如果说当时基辅学院所传播的“拉丁”文化曾削弱了希腊基督教神学对莫斯科人的影响的话，那么1691年对君士坦丁堡主教西里尔·卢卡里（Cyril Lukaris）“加尔文派”教义的最后判决又一次使这两个宗教集团团结起来了。此外，奥地利人和威尼斯人的胜利也加深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情况就如同路易十四依靠奥斯曼帝国许多地方的耶稣会和方济各会教士保护暗中成立的新的尤尼艾特（Uniate）教派时使用外交手腕产生的后果一样。1690年出现了一场特别令人感到痛心的打击，当时法国有影响的人物为天主教徒购买了耶稣圣墓的拱顶石，从而使穆斯林当局放弃了通常对东正教的偏爱。归还拱顶石这件事被正式列入俄国人1692年的议事日程，而耶路撒冷大主教的愤慨心情对彼得的情报部门是无价之宝。然而，俄国有足够的理由要小心谨慎，不能过分信赖希腊的传教士。尽管罗马尼亚部分大地主内部派系横行，但他们对此态度却相当的不同。半个世纪以来，莫斯科人与各公国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发展着。在波尔塔瓦大捷之后，摩尔达维亚的季米特里斯·坎梯米尔（Demetis Cantemir）（1673—1723年）为了报答在俄国人的保护下担任摩尔达维亚的世袭君主，承诺一旦俄土发生战争时他将和俄国人站在一起。他答应为入侵的军队准备好粮草。这些诺言得到1711年4月条约的认可，这个条约保证，一旦坎梯米尔战败，他可以到俄国去避难。坎梯米尔的死对头瓦拉几亚的王子康士坦丁·布兰科范（Constantine Brancovan）近几年来一直在向俄国

靠拢，但他也谨慎地决定要等战争有了眉目之后再背弃土耳其苏丹。

[\[66\]](#)

一支训练有素的俄国军队，计有步兵4万人和骑兵1.4万人，以在波尔塔瓦胜仗所产生的信念通过波兰领土开赴摩尔达维亚。和这支俄国军队在一起的有俄国沙皇和皇后叶·卡杰琳娜，许多将军夫人以及忙得不亦乐乎的拉古金斯基。沙皇御驾亲征能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妨碍年老的总司令谢里曼捷也夫（sheremeteyev）的指挥。骑兵由罗尼（Rönne）将军率领，步兵师分别由恩斯伯格（Ensberg）、雅努希（Janusch）、哈拉特（Hallart）、布鲁斯（Bruce）以及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俄国人雷普宁（Repnin）指挥。他们尚未到达德涅斯特河就开始感受到缺粮和缺水之苦，同时还多次遭到鞑靼人的突然袭击，但他们还是没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摩尔达维亚，这是他们在第10世纪后第一次进入摩尔达维亚，并于6月抵达雅西（Jassy）。坎梯米尔立即宣称他接受俄国的保护，并号召他的人民帮助沙皇。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俄国人的粮草供给仍然不足，这是由于干旱和蝗虫灾害造成的。这是俄国遇到的第一个严重挫折。第二个严重挫折是突然出现的土耳其的全部军队。

彼得已经下令要抢在土耳其人过河之前到达多瑙河。根据他的情报，土耳其人怕他，而且不愿渡过多瑙河，据估计土耳其的主力可能距河尚有60英里远。在俄国方面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巴尔塔吉·穆罕默德帕夏已经接近俄国军队，而当时俄国军队早已被迫分成3个部分，以缓和供应上的紧张。土耳其人得到大批鞑靼人的增援，再加上来自本德的哥萨克和波兰人，他们沿着普罗斯河支流的右岸北上，渡过了河并于7月20日对俄国人发动攻势。俄国军队费劲地后退，鞑靼人则在他们的背后切断了从雅西南下的路。俄国人在离斯坦尼列斯蒂（Stanilesti）不远处停了下来，这里是一片狭窄的平原，后面是河，一侧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他们被包围了。土耳其人的阵地位于可以俯视他们的山上，因此土耳其人可轻而易举地用炮火扫射他们和他们背后的河面，就这样沙皇完全处于任人摆布的困境。1711年7月21日，巴尔塔吉·穆罕默德正要签署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命令时，俄国人举起了白旗。他们由于饥饿、疾病和疲劳，几乎无法抵抗至少比他们多一倍的敌人，他们必须乞求和平，否则只好被歼灭掉。处于沮丧状态的彼得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卡杰琳娜

使他冷静下来并说服他去求和，她的主张得到副首相彼得·巴甫洛维奇·沙菲洛夫（Shafirov）的支持。看来查理十二世的猜测似乎是正确的，因为这时沙皇会被迫把从瑞典人手里得到的绝大部分东西吐出来，尽管他愿意拿出来的东西会少得多。然而，缺乏自信 and 没有远见的巴尔塔吉·穆罕默德却过分轻易地满足于俄国人的求和条件。他匆匆忙忙地批准的条件是：归还亚速；将塔甘罗格、卡曼尼扎顿和第聂伯河的新要塞全部拆毁；沙皇不得再干涉波兰的事务，俄国也不再派人到高贵的土耳其政府任大使；释放全部土耳其俘虏，并让瑞典国王安全地离开。巴尔塔吉·穆罕默德给俄国人提供粮食，并且私下答应把查理十二世驱逐出境。沙皇把谢里曼捷也夫元帅的孙子和给沙皇帮过大忙的副首相彼得·沙菲洛夫送到土耳其作为人质。

普罗斯河的结局“理所当然可以被看成是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使人感到意外和最为离奇的事件之一”，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萨顿（Sutton）（1701—1716年）是这样写的。^[67]他把这场胜仗看成是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彼得和他新俄国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土耳其宰相手中，如果后者采用更为冷酷无情的决策也许会改变东欧历史的发展方向。巴尔塔吉·穆罕默德看来早已被自己未曾预料到的成就冲昏了头脑，然而公正地说一句，近卫军几乎没有兴趣在这个国家作战，而且贫穷的骑兵（Sipahis）也根本不愿意承担长期战争的费用。此外，宰相对整个本德集团（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及其属下。——译者）不信任，这也许促使他抢在查理十二世出场之前达成协议。^[68]在君士坦丁堡，除摇摆不定的土耳其苏丹以外，当然都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议，而土耳其苏丹不久就把巴尔塔吉投入监狱。这场胜利被看成是为上次战争雪耻：狡诈的土耳其人现在事实上可以认为，俄国的威胁是能轻易地摆脱掉的。彼得海军的拙劣表现也给这种假象以某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据说在强大的土耳其舰队出现在离亚速不远的地方时，他们拥有3.5万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几个月后，彼得的南方舰队剩下的有价值东西，包括在塔甘罗格的补给品在内全部卖给了土耳其人。首先，这充分显示了俄国和巴尔干的基督教徒还不能有力地团结在一起。尽管门的内哥罗一直坚守到1714年，但沙皇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与此同时各个公国对沙皇的援助也少得可怜。

从1716年开始，各个公国政府就被委托给马弗洛科达托的人和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法纳尔（Phanar）区（基督教的大主教也住在该区）

的其他一些富裕的希腊家族管理。法纳尔人出任地方长官以及其为数众多的办事人员，由于要付出很高代价才能换得一个职位，而且还要经常冒着被免职的危险，因而他们对罗马尼亚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这里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来说明希腊人和奥斯曼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要把欧洲土耳其建成一个“希土政权”^[69]，并且已经把大主教的职位本身变为土耳其政府的财政和警察方面的代理人。许多受过教育的希腊人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而反对沙皇的“第三罗马帝国”计划，但这一愿望的实现要靠通过改善他们在整个奥斯曼政府中的地位。而在奥斯曼政府内，法纳尔人是享有担任首席译员和舰队译员的得天独厚的特权的。这样一来圣职授予权为其自身获得大量的财富和政治上的影响。此外，像驻土耳其的各国大使一样，土耳其政府由于变得日益有赖于通过外交途径来保持帝国的统一，反对各国之间经常发生的争执，因而也越来越需要那些较为西方化的希腊贵族的技能。尽管是在大约100年以后奥斯曼帝国才在西方国家设常驻大使，但据说在某种程度上把西方的外交思想引进土耳其的是驻卡尔洛维茨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机智的亚历山大·马弗洛科达托担任大使的那几年尤为活跃。^[70]

根据普罗斯条约，俄国已经把1700年得到的东西全部交了出来，但这个内容不很具体的条约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较量方才得以实施。双方都想对这些条款进行一些修改但又怀疑对方的诚意。沙皇首先进行了拖延，结果事实上导致1711年10月2日谈判中断，以及任用更为好战的尤素福（Yüsuf）帕夏来替换巴尔塔吉·穆罕默德。沙菲洛夫和托尔斯泰仰仗荷兰和英国代表的必要支持，努力设法达成反对瑞典的协议，而瑞典则在法国和威尼斯人支持下阻止达成这一协议。哥萨克人有的支持土，有的支持俄；需要费点事来弄清哪些哥萨克人支持哪一方；同时，黑海大平原和南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哥萨克和鞑靼人之间时有袭击和报复事件发生，对此如若不能加以制止，也至少要弄清责任。彼得这时正式退到德涅斯特河一线。但他迟迟不从波兰撤回他的军队。在1712年4月已经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之后，土耳其苏丹还在法国怂恿之下对俄国继续驻军波兰一事提出威胁，要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动。这件事是与查理十二世通过波兰或俄国领土返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双方都担心他返回时若带一支足以保证他的安全的卫队将会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边境的报告使奥斯曼人确信彼得是没有诚意的，

因此11月3日土耳其皇宫门前再次挂上马尾作为要打仗的象征。后来到1713年3月，土耳其苏丹在摆脱了对这位令人为难的客人负有任何意义上的责任之后，就用强制手段把查理送到亚德里亚堡，并把德夫莱-吉莱伊也放逐到希俄斯。尽管土耳其人于4月30日再次对俄宣战[这是1710年以来第四次宣战，这次宣战是在瑞典人前一年12月在加德布施（Gadebusch）打了胜仗的鼓舞下提出的]，但这些措施实际上排除了俄土之间进行和解的主要障碍。6月5日，土耳其人和彼得在亚德里亚堡缔结了一个25年的和平协议。彼得的南部边界现在一直向北后撤（尽管没有明讲，但这却是事实）到奥勒尔河（Orel），而且他准备按照协议规定在两个月内撤出波兰。另外，1714年4月，土耳其苏丹还进一步表示承认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为波属乌克兰的统治者。9月，查理十二世、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斯基以及菲利普·奥列克离开土耳其国土到别处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

奥斯曼对外关系中的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可以从与威尼斯再次进行实力较量的准备工作已有进展这一事实中得到解答。由于摩里亚还在威尼斯人控制之下，而且威尼斯的一支舰队就在爱琴海，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就不能高枕无忧。《卡尔洛维茨和约》最难以忍受的牺牲就是摩里亚的丢失；即使在热爱和平的柯尔罗罗·阿里担任宰相期间也都在谈论着要进行报复。而当时引起1711年战争的原因不是为摩里亚丧失进行报复，而是由于瑞典国王在土耳其避难和俄国人的威胁。对多数土耳其政治家以及近卫军来说，为摩里亚而战要比在多瑙河下游那边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近卫军不喜欢在远离家乡荒无人烟的地方过冬，据某些外国观察家的看法^[71]，他们烦躁不安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迫使政府当局要给他们找点儿事干的地步。在俄国的危险已经减少和波兰问题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之后，土耳其政府决定要收复摩里亚。主战派的首领是赛拉赫达尔（silahdar）帕夏，他是土耳其苏丹的女婿和心腹，他个人又与摩里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且一个时期以来他就已经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政治家。正是他这个人，在伊斯兰教释典官和后宫太监总管这两位总是和宰相作对的人的帮助下策划并撤掉柯尔罗罗·阿里和巴尔塔吉·穆罕默德的职务。1713年4月，他自己就任宰相。

他的政策与法纳尔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因为威尼斯的元老院已经剥夺了大主教来自摩里亚的收入，而且把摩里亚尚存的外贸也转向威

尼斯。威尼斯人的政府尽管形象不错^[72]，但它在摩里亚没有打下牢固的基础，只能依靠一个建立在特权和地位的脆弱基础上的党派来进行统治。土生土长的希腊主教、商人、地方官以及威尼斯贵族都以政府的名义干坏事，他们所干的坏事足以抵消威尼斯人作为一个集体所做的好事，如恢复社会秩序、重新调整土地以及把国家出租地改为完全由个人保有的地产。教育的改善也没能消除大批意大利教士涌入所造成的影响。1708年，威尼斯人省长把摩里亚人描绘为诡计多端、报复心极强的人。^[73]所以，当奥斯曼人回来时，他们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特别是他们还付钱购买粮食和饲料。威尼斯的驻军只有8000人，加上平民对政府的如此不满，而土耳其方面陆军超过7万人，还有实力大得多的海上力量做后盾。在北非伊斯兰教各国以及埃及的增援下，海军帕夏霍加（Hoja）指挥58艘帆船与威尼斯人的19艘船和支援他的4艘马耳他船作战。

1715年1月11日正式宣战，借口是所谓威尼斯代理人对门的内哥罗叛乱分子的支持以及威尼斯银行拒绝交出已于1714年被处决的瓦拉几亚君主康士坦丁·布兰科范存在该银行里的财产。6月，土耳其舰队轻而易举地夺占了埃吉纳岛和提诺斯岛（Tinos）（威尼斯人曾在该岛抗击敌人进攻达5个世纪之久），而当时宰相还扎营在底比斯（Thebes）平原。赛拉赫达尔·阿里在进军途中严格执行纪律因而博得希腊农民的好感，而且他的军队也没有因为缺粮而无法前进。不久，在7月7日他就占领了科林（Corinth）要塞，然后奥斯曼人又继续占领摩里亚人的下述据点：阿戈斯（Argos）、那波利（Nauplia）、科隆（Koron）、纳瓦里诺（Navarino）以及梅托尼（Methoni）。如果威尼斯舰队与海军帕夏打一仗的话，这个梅托尼有可能会守得住，威尼斯军队抵抗力所以不强是由于它所控制的近海水域过长之故。双方陆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整个战役完全采取包围战的形式。经过整整100天才完成包围。1716年7月，土耳其的地面和海上军队进而对科孚岛（Corfu）本身发起进攻。科孚岛是威尼斯舰队经常集结的地方，当时由舒伦伯格元帅（Marshal Schulenberg）进行严密防守，他是一个萨克森人，曾在马尔普莱奎特（Malplaquet）战役中与尤金并肩作战。当奥地利人派兵援救时，威尼斯似乎正处于行将覆灭的局面。

尽管路易十四极力敦促维也纳对土宣战（一反他往常一贯怂恿土耳其打维也纳的态度），但奥地利皇帝在开始时曾设法进行调解。甚

至在1715年，查理六世还忙于处理西班牙王位之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无暇准备以威尼斯作为他的唯一盟国情况下重新发起巴尔干战争；而他的跟随者西班牙则极力主张与奥斯曼和好以反对尤金。尤金运用他的影响要集中帝国全部力量对付土耳其，反对西方任何国家分散它的力量。^[74]正是因为达尔马提亚受到了威胁（可以理解为也是针对克罗地亚和施蒂里亚的威胁）导致了1716年4月13日与威尼斯签订了防御联盟。奥地利皇帝要求赔偿威尼斯共和国的全部损失。对他这份最后通牒与君士坦丁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国务会议部分成员认为它的通牒是认真的，至少要归还摩里亚，尽管土耳其已经统治摩里亚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另外一些成员则认为只要交出威尼斯的领地提诺斯岛（Tinos）和基西拉岛（Kythera），奥地利皇帝就会满意。与维也纳接到的报告的结论正相反^[75]，土耳其方面许多大臣确实反对与奥地利皇帝再次进行战争。他们在处理查理十二世问题时，一直关切的是避免与奥地利作战，为此他们甚至拒绝拉科西的残兵败将提出的避难要求；而且与威尼斯作战也是在相信哈布斯堡会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才下定决心的。然而，赛拉赫达尔·阿里在和威尼斯人作战轻易地获胜之后，早就把要对奥地利皇帝持审慎态度这一点丢到九霄云外。他把奥地利帝国的干预看作违背了《卡尔洛维茨和约》（但更确切地说是奥斯曼建立起新的力量破坏双方力量对比，从而破坏和约而引起的），因而说服国务会议断绝一切来往并对维也纳宣战。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通过立弗朗西斯二世拉科西（Francis II Rákóczi）为匈牙利王以制造事端：它派出一位使者去巴黎邀请他来组织这场斗争，这样，弗朗西斯二世拉科西也来到了土耳其。

1716年夏，土耳其一支充其量只有12万人的军队从贝尔格莱德发起进攻。按照赛拉赫达尔·阿里的意愿，军事会议决定攻打彼得华亭。8月5日，这里打了一场大仗。尤金有7万人，其中有187支骑兵中队。在尤金下令用骑兵进攻时，赛拉赫达尔·阿里对出现这一危急时刻要采取应急措施的劝告置之不理，而后来等到他率领军官骑马冲进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时已为时过晚。他中弹受伤，并在送回贝尔格莱德的途中死去。在这场战斗中死亡的还有安纳托利亚和阿达纳（Adana）的省长图克·艾哈迈德（Türk Ahmed）帕夏和侯赛因（Hüseyn）帕夏。这几位领导人一死，接着发生了一场溃败。土耳其人的整个营地就像1683年在维也纳一样落入敌人之手，其中包括宰相

宏伟华丽的帐篷，114门大炮，150面军旗和5条马尾。^[76]土耳其伤亡数字被过分夸大了，但可能比帝国多一倍，估计死伤近5000人。^[77]鉴于土耳其近卫军猛烈抵抗，尤金没有对退往贝尔格莱德的败兵穷追不舍；相反，他下令向号称为“胜利”的要塞泰梅什堡进军。泰梅什堡控制着巴纳特，而且坚持抵抗了164年没有被敌人攻下过。这个要塞驻军有1万—1.5万人，他们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派去增援的部队被打退回来，结果这个要塞于10月12日在体面的条件下投了降。由于害怕引起骚乱，这个要塞陷落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没有立即向公众宣布。尤金把巴纳特划归他的密友默西伯爵（Count Mercy）管辖，默西派出一支小部队去袭击自1698年以来一直作为瓦拉几亚首都的布加勒斯特。在攻下彼得华亭之后，科孚也已解围，当时土耳其军队还从大陆上的布特林托（Butrinto）和更为南面的圣毛拉（Santa Maura）撤走。

赛拉赫达尔·阿里之死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的过分自信使他完全能够担当起恢复帝国被玷污的声誉和进行必要改革的重任。他的继任者哈里尔（Halil）帕夏1717年7月接到解救贝尔格莱德的命令，尤金和默西已经动用估计有8万人的实力包围了贝尔格莱德的要地。奥地利人在多瑙河和萨瓦河之间挖战壕以沟通这两条河，贝尔格莱德驻军约3万人此时也在穆斯塔法帕夏指挥下做进行抵抗的准备。由于哈里尔帕夏既不果断又无能，结果导致他坐失良机。尤金当时被夹在前有强大守军，后有两倍于己的军队之间，处境非常危险。哈里尔帕夏不但没有立即采取攻势，反而下令军队进入战壕进行防御并从高地上进行炮击。尤金利用了哈里尔帕夏的犹豫不决，乘偶然碰上的一次大雾机会于8月16日清晨对土耳其军队进行突然袭击。接着出现了许多混战场面，其间奥地利的中心部位还出现过一个缺口，直到8点钟左右大雾消失，奥地利人才能攻打土耳其的炮兵阵地。就在这个时候，对战争进展实况一无所知的宰相却下了一道撤退的命令。这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在彼得华亭那一仗更为惨重，大约伤、亡各1万人。奥地利帝国伤亡仅5000人，却缴获150门大炮和60面军旗，此外还有大量弹药和粮食。8月18日，这个遭到猛烈炮击的堡垒自己投了降，幸存下来的三分之二驻军在4天后也主动撤离。贝尔格莱德失陷之后，土耳其人撤离了萨瓦河防线上的其余前哨基地，但兹沃尔尼克[Zvornik，在德里纳（Drina）河上]、比哈奇（Bihach）和诺维[Novi，在乌尼（Una）

河上]的驻军坚决顶住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波斯尼亚没有像曾塔（Zenta）陷落后那样遭到入侵军队的蹂躏。而这时奥地利帝国军队内已经出现了疟疾，在其后两年之内，疟疾夺走了帝国千万个优秀士兵的生命。

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在6艘装备优良的葡萄牙战舰以及马耳他和罗马天主教徒的辅助舰只支援之下，重新占领他们在亚得里亚丢掉的地盘并再次进行海上攻击。1717年7月在马塔潘角（Matapan Cape）打了一仗，这一仗比一年后在切里哥（Cerigo）附近连打3天的那场战斗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要小一些。在切里哥附近的那场战斗，处于优势地位的土耳其舰队进攻基督教徒由26艘帆船组成的战斗队形（他们虽有大的军舰增援，但始终未能保持住战斗队形），并造成后者近2000人的伤亡。维也纳对他盟友的表现感到失望，因而不再坚持要收复摩里亚，威尼斯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去保住这个地方。

国务会议许多成员过去就反对与皇帝关系破裂，这是有目共睹的。当时不列颠和荷兰驻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也都竭尽全力来阻止这种破裂。1717年底，不列颠新任驻土耳其大使（亲土派）爱德华·沃特莱·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与科利杰尔一起再次设法进行调解。维也纳认为直接谈判可以谈出更好的结果来。两国之间的谈判被拖了下来，主要原因是土耳其政府要先收复泰梅什堡，然后再收复贝尔格莱德两地（奥地利进行战争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这两地），同时也由于一位外国政治家从中活动的结果，这个人是西班牙政治家艾尔维洛尼（Alberoni），他想使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之间保持不和的状况，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移。^[78]已经在撒丁岛登陆的西班牙军队，现在严重地威胁着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地位。因为这个缘故，正准备再次出征巴尔干的奥地利皇帝，此时也急于解决与土耳其的争端，愿意接受不列颠大使从中进行的调解，英国人自己也为乌得勒支解决方案的稳定性感到担忧。6月初，在斯梅德雷沃（Smederevo）附近一个小镇帕萨洛维茨（Passarowitz），萨顿又一次着手进行艰巨的调解工作，亚伯拉罕·斯坦尼安（Abraham Stanyan）和科利杰尔也在暗中进行协助。^[79]这次调解再次以保持占领地现状的原则为基础，虽然奥地利人一再企图超越这一原则，在威尼斯问题上他们居然也成功了，因为土耳其根本不想和威尼斯人打交道。7月21日的条约规定要割让泰梅什堡、斯梅德雷沃以及贝尔格莱德

等地，并规定一条沿萨瓦河和德里纳河的新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就由此向东正好从尼什北面通过，再往北延伸到奥尔肖瓦（Orsova）。因此，匈牙利的领土在1699年被割掉的基础上，又丧失了巴纳特、小瓦拉几亚[Little Wal-lachia，一直到阿卢塔（Aluta）]，以及塞尔维亚最肥沃的地区。弗朗西斯二世拉科西以及其他土耳其政府曾经支持过的匈牙利人不得在新的边界线附近居住。奥地利政府在恢复巴纳特的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根据尤金的建议，许多德国居民，特别是退伍士兵迁入巴纳特。但在塞尔维亚，奥地利政府除了加固贝尔格莱德的要塞以外，再也没干什么，后来1739年奥地利又丢掉了贝尔格莱德。还与奥地利皇帝签订了一个商业条约。1719年，奥地利皇帝在他新到手的里雅斯特（Trieste）“自由港”特许成立一个东方公司，野心勃勃地计划发展与巴尔干的贸易往来。^[80]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威尼斯人的利益，威尼斯是《帕萨洛维茨和约》的又一个受害者。尽管威尼斯依然保持住在达尔马提亚、圣毛拉和阿尔塔海湾（Gulf of Arta）所取得的胜利并收复了切里哥（Cerigo），但由于财库荡然，它默默地同意把摩里亚连同提诺斯岛和埃伊纳岛一起交了出去。切里哥岛则以其刚勇的武装商船著称，依然是介于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威尼斯前沿基地，但威尼斯没有再和土耳其交战过。

《帕萨洛维茨和约》实际上宣布了土耳其在军事上不再成为对邻国的一种威胁。土耳其在彼得华亭和贝尔格莱德的败仗表明，一支数量虽少得多但指挥得当的军队，在头脑清醒的尤金统率下是能够打败在指挥和装备都差得远的土耳其军队的。然而它能说明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过去土耳其人一再炫耀他们渴望战争和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而且可以聚集巨大数量的战争物资。他们总的来说是没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因为他们在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侦察，巧妙地运用骑兵和野炮以及组织一个高级指挥机构等方面都远远不如他人。战术上他们过多地使用人海战术和肉搏战，在海上作战时他们又宁愿用军舰舰艏去猛撞对方战舰并强行登上对方军舰而不喜欢炮战。他们的炮手享有盛名是因为他们常使用大量火炮进行围攻。他们还没有真正跟上可移动的野炮引起战术革命的前进步伐，对带燧发枪机的步枪带来的巨变更是一无所知^[81]。他们军队的行进方式和作战纪律都不如德国人。他们这样一支庞大的野战部队无疑会加剧巴尔干

作战时的后勤供应问题。虽然他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供应体制，但他们携带的辎重和随军人员还是过多。诚然，他们携带大批财富是有其实际用途的（这些财富是后来从缴获宰相的帐篷里发现的），但那些拥有很多房间的丝制帐篷以及其他帕夏的帐篷是需要很多人手来扎营和布置的。最明显的事例是攻下曾塔时战利品中竟有大车9000辆和骆驼6万匹。

土耳其人这时对占领匈牙利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他们若能保住他们在鲁梅利亚迈拉的剩余地盘就算不错了。事实上，土耳其人对丧失贝尔格莱德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但大规模出征的日子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各个阶层都渴望有一个持久的和平。新任命的宰相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内夫谢希尔（Nevsehir）的伊卜拉辛（Ibrahim）帕夏，土耳其能够接受条件苛刻的条约主要应该归功于他。他完全是要满足那种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也要迎合自“猎人”穆罕默德以来所有土耳其苏丹对在乡村过隐居生活的爱好。伊卜拉辛是在土耳其皇宫里长大的，曾给过着隐居生活（这是奥斯曼人防止王位继承人被人伤害而采用的方法）的艾哈迈德王子当过侍从，而且他们两人又是对弈的棋友。艾哈迈德继任苏丹后不久，就指定伊卜拉辛做他的秘书，并在赛拉赫达尔·阿里去世时任命他为宰相。他当时拒绝接受这个任命，以后看到哈里尔帕夏不能胜任时他才同意出任宰相。他作为一名绝对顺从的朝臣，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生存于宫廷阴谋诡计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被淹没又保持苏丹对自己的信赖。他担任宰相的时间特别长（1718—1730年），这个时期人们称为“郁金香时代”，因为当时“郁金香迷”成为宫廷和君士坦丁堡有钱阶层的独特爱好。据说在土耳其也已培植了1200种以上的郁金香花^[82]，通常都是从荷兰或波斯引进的，其中有些非常珍贵并成为竞相争艳的花种。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出售一个花蕾也会受到流放的处罚。在4月的月夜，土耳其苏丹和帝国所有高层人士常在舞蹈演员和乐师陪同下在郁金香花园里举行优雅奢华的喜庆集会。花园里挂满了灯笼和鸣禽，还有最美的郁金香花插在威尼斯人制作的玻璃花瓶里。在冬天举行的集会上，他们可能会演出中国的皮影戏或讨论哲学，还不时地分发糖果、各种宝石和官服；在夏天则举行精心安排的海战表演或施放烟火。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内丁姆（Nedim）曾写诗赞颂过“永乐宫”的美。他们当时把位于金角湾（Golden Horn）北侧的卡厄兹塔尼（Kagithane）^[83]称之为

“永乐宫”，该处建有中国或法国式最为华丽的游亭。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曾对洛可可式建筑（欧洲18世纪一种建筑风格）感到厌恶，但他们的统治者似乎是决心在这种童话般的欢乐中忘记他们在军事上遭受到的耻辱，并且标榜他们早已彻底转变为和平的爱好者了。

除上述有组织的寻欢作乐外，伊卜拉辛帕夏还发展了有持久价值的各种文化活动。乐师、歌手、诗人以及装饰艺术家在新的气氛中得到了广阔的活动余地。尽管在圣索非亚（Hagia Sophia）附近著名的艾哈迈德三世的喷泉是当时受外国影响的一个标志，但土生土长的奥斯曼文化仍然远未达到枯竭的地步。朝气蓬勃的编史工作并不因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耐玛（Naima）于1716年去世而中断。在他死后不久，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从事阿拉伯和波斯的重要著作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历史著作的翻译工作。正如早些时候西班牙所经历过的一样，帝国的衰落促进了自我批判。在这方面，当时的奥斯曼历史学者起了带头的作用。5所国立图书馆的开放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工作。1721年，土耳其驻巴黎一个使节接到国内指示：“对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方法进行一次透彻研究，并对适合于土耳其的方法提出报告。”他的儿子赛义德·切利比（Said Chelebi）回国后积极从事出版工作。

^[84]这段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伊卜拉辛·默特弗里卡（Ibrahim Muterferrika，1674—1745年）于1727年在土耳其创办的第一家穆斯林的出版社。伊卜拉辛·默特弗里卡在血统上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对奥斯曼帝国许多领域处于落后状态持批评态度，他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排字工人和印刷机^[85]，选编并出版了大约30本书，这是土耳其人印刷的最早一批书籍。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全靠宰相的支持，使他得以战胜大批以抄写为生的抄写员和来自伊斯兰教学者的反对，但这些学者却成功地阻止印刷宗教书籍，并于1742年停止了整个印刷业。

艾哈迈德三世对享乐的追求和对艺术的喜爱完全可以和他的前任媲美。他对宰相非常满意，这位宰相后来因成为他的女婿而被称为“达迈德”（意为女婿）。但达迈德·伊卜拉辛也只有在迎合他主子的贪婪和掩盖帝国真相情况下才能自由行事。在那几年里，威尼斯的常驻官员报告称，土耳其硬币奇缺，大量失业，而且一年一度的流行病严重。巴尔干最大的城镇萨洛尼卡由于虫害严重，1719年人口减少

了三分之二。^[86]粮价非同寻常地高昂，1719年黑海地区农作物歉收，政府一贯首要关切的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重担只好改由别的地区负担。有理由相信，这个帝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周期。^[87]1711年因圣墓问题发生过暴动的开罗^[88]，1721年又爆发了严重的骚乱。

在波斯发生的因阿富汗入侵迅速导致萨菲（Safavi）王朝覆灭这个轰动一时的革命，促使土耳其苏丹也开始逐渐对现实有所认识。侯赛因国王1720年底就请求援助，但直到1722年他被迫出走时土耳其政府才不得已采取行动。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要不是俄国沙皇在这一年夏天把军队开进阿斯特拉罕，土耳其政府也许还不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彼得大帝在没有任何求援呼吁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他迅速占领了达尔班德，并进一步封锁了土耳其通往里海的通路。1723年，塔赫马斯普国王（Shah Tahmasp）把西、南两面靠近里海的所有省份都奉献给他。但达吉斯坦、希尔凡以及部分阿塞拜疆在1612年以前就在奥斯曼统治之下：俄国人在高加索山那边向前推进之举实则是对土耳其那些仍为《帕萨洛维茨和约》的耻辱感到痛苦的领土收复主义者有利。因此，当1723年俄国人占领巴库时，土耳其人就夺占了第比利斯。从这一年开始的以后10年间，土耳其对外政策一直受到波斯革命和俄国对里海威胁的支配。

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力量增长的担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曾经不得不一再要求俄国从波兰撤军；直至1768年爆发俄土战争时为止，保持波兰领土完整就一直成为它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而1768年那场战争也主要是由于俄国干预波兰引起来的。众所周知，彼得一直在试图选派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徒扮演原先由门的内哥罗人在欧洲土耳其部分扮演的角色。1721年，有消息说俄国人在捷列克（Terek）谷地修建堡垒，另外在里海沿岸有一支俄国的测量队在活动。^[89]加之，在帕萨洛维茨谈判中就曾力图重新挑起俄土不和的不列颠政府，这时又在努力培植土耳其政府对彼得的不信任。^[90]斯坦尼安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曾被授权以不惜花费1万个皮阿斯特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起对斯坦尼安的活动巧妙地予以回击。他们俩终于使土耳其政府在1724年6月接受彼得关于瓜分波斯各省的颇为新奇的建议。土耳其政府承认俄国占领高加索山以及里海南岸地区，而俄国则承认土耳其对格鲁吉亚、希尔凡、阿达比勒、大不里士、哈

马丹和基尔曼沙（Kirmanshah）等地的占领。这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致同意瓜分一个邻国，一个穆斯林国家，不过它是唯一的一个自称忠于伊斯兰什叶派（Shi'a）的国家。这次瓜分对受益的双方来说都好景不长。随着纳迪尔（Nadir）国王的出现，他们双方所得到的好处很快就荡然无存了。^[91]就在1730年夏初，这位国王迫使土耳其人撤出了哈马丹、基尔曼沙和大不里士。

在生活费用如此昂贵之时发生的上述种种挫折，再加上为备战而招募军队并提高税收之后又有谣传说和谈早已开始^[92]等各种因素，促使土耳其发生历史上最为残酷野蛮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是1730年9月28日由少数近卫军在首都举行兵变开始的，当时整个宫廷都在河对岸的斯库台附近。佩特洛纳·哈利尔（Patrona Halil）当时是一名近卫军兼服装商人，他原来是阿尔巴尼亚水手，后曾在巴亚泽特广场（Bayazid）附近的公共浴室当过侍者。他为朋友举行了一次聚会，并告诉大家他是怎样想到要推翻土耳其苏丹大臣们的暴政的。他的行动是由部分伊斯兰教学者秘密筹划的，但近卫军的主要军官均未参加。面对政府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对策^[93]，而且由于近卫军兵变组织得隐蔽而且巧妙，叛乱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军队。两天之后，叛乱分子控制了军火库并切断了对土耳其皇宫的粮食和用水供应。土耳其苏丹试图平息这场叛乱，下令绞死他的毕生好友和女婿，并将他的尸体连同副宰相和海军帕夏的尸体一起交给了群众。叛乱分子对没有把这些大臣活着交给他们不满，要求土耳其苏丹退位。10月1日夜晩，艾哈迈德三世把他的王位让给他的侄子穆罕默德一世，这个人自他父亲于1703年退位后一直被关在皇宫里。伊斯兰教总释典官被流放，首席文书官躲起来了。

新就位的土耳其苏丹答应发给的奖赏并不能平息叛乱分子的不满，他们纵火焚烧了金角湾的夏宫并抢劫了君士坦丁堡城里被没收的那些官员住宅。有迹象表明，叛乱分子首领曾设法制止随心所欲的暴力行为。^[94]加拉塔（Galata）地区在没有区长的情况下，部分犹太人的房屋和希腊人的教堂被洗劫一空，而叛乱分子又自封为反抗压迫的宗教界少数派勇士。尽管如此，那位曾经担任宰相整整12年、任职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达迈德”伊卜拉辛帕夏（他在任职期间权力无限之大，而且手里集中了大批财富^[95]）尸体被肢解这个事实严重地提醒着人们，在首都还总是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的，所有的

精心警戒全无济于事。首都狭窄的街道到处都是无业移民。然而，佩特洛纳的叛乱也发自深埋在土耳其人本性中的力量，即对异教徒的仇恨和习惯于对有权有势者的讽刺挖苦。这种内在力量立即迸发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以及对奥斯曼高级权贵奢侈和贪婪的反抗。造反者不仅要求对俄作战，而且要求进行内政改革，诸如废除终身租约等。他们佩戴的穆斯林红色头巾看来是具有预示性质的。他们声称他们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和荣誉，但光凭恐怖主义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大量的追随者，即使是不稳定的追随者也不会有很多。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仍然穿一身破旧的衣服的佩特洛纳·哈利尔和他的伙伴，一个擅长雄辩的年轻水果小贩手中。这个水果小贩在近卫军中与佩特洛纳·哈利尔共过事，名叫默斯卢贝希（Muslubeshe）。他们两人住在被罢免的大臣住宅里，高兴时可以任意进出皇宫。他们否决了那些高级官员的任命，并且剥夺了许多法官的公权。他们设法把近卫军中拥护他们的人从4万扩大到7万，并且毫不吝惜地使用他们抢来的钱使他们提出的人选被任命为军官。然而，早在10月13日，新的土耳其苏丹就下令商店重新开门营业时，有些近卫军就退出了叛乱活动，其中部分人是在伊斯兰教学者影响下退出的。后来在11月5日，佩特洛纳也承认，他那1.2万名阿尔巴尼亚人是他可以依靠的最后一支力量，其中有的人已被委任管理监狱。就连他的同伙也对他的贪婪表示不满。他为自己的情妇要了一座宫殿，把海军帕夏的大办公室据为己用，并把摩尔达维亚交给曾经支援过叛乱分子的希腊一个卖肉的人去管辖。大概这位狂妄自大的人具有一种以死亡为主题的幽默感，因为佩特洛纳似乎早已预感到他的好运是长久不了的。^[96]由于詹努姆·霍加（Jennum Hoja）回来担任海军帕夏，以及由于卡普兰-吉莱伊（Kaplan-Girei）新近上任为克里米亚的汗，宫廷的反抗活动也加强了。卡普兰-吉莱伊巧妙地提出一些可能会激怒近卫军的让步。最后收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佩特洛纳和他的同事被召进皇宫；所用的借口是到国务会议共商国是，诡称要就他们提出的战争要求进行辩论。11月25日就在皇宫里，他们被处决了，当时土耳其苏丹也亲临现场。据报告称，他们的7000名同犯也在3天之内被处决了，并称，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连几个星期都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随同欢腾的风浪飘荡着。^[97]

这场镇压恐怖的活动持续进行了一年以上，造成许多无辜的死亡并促成于1731年3月爆发的又一次近卫军的小规模反叛。达迈德·伊卜拉辛帕夏的遗孀被怀疑对这次反叛起了兴风作浪的作用。6个月后又发现另一起阴谋活动。在伊斯兰教寺院里发现谴责土耳其苏丹依靠亲信的传单。警察一再关闭了公共浴室、旅馆和咖啡店。^[98]在几年的时间里，据说君士坦丁堡由于死亡和放逐，人口减少了5万。巴亚泽特广场附近的公共浴室仍然与佩特洛纳·哈利尔的名字和在他统治下那种动荡不安的日子联系在一起。

（刘帼贞 译）

^[1] 感谢V. J. 帕里博士、纳明·斯特里特夫人和H. S. 戴汤神甫为本章某些地方给予指点。

^[2] 参阅本书原文第553—554页。关于土耳其人将当地居民分而治之的办法，参阅M. 埃梅里著《十九世纪上半叶阿尔及利亚的特权部族》，载《年鉴》（*E. S. C.*）第21期（1966年），第44—58页。

^[3] 德鲁兹（Druze）和马罗尼特（Maronite）社会的古宗教地区分布状态也开始崩溃，见P. M. 霍尔特著《埃及和富饶的新月，1516—1922》（1966年），第122页。

^[4] S. J. 肖：《财政和行政机构与奥斯曼埃及的发展，1517—1798年》，普林斯顿，1962年，第6、297、304—305、316、400页。埃及人进贡时多采用来自阿比西尼亚的黄金，参见R. 曼特兰著《17世纪下半叶的伊斯坦布尔》（1962年），第234—235页。

^[5] 见前引霍尔特的著作，第73页。

^[6] W. 福斯特爵士编：《17世纪末的红海及临近国家……》（1949年），第18页。论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和格鲁吉亚的混乱局势，见H. A. R. 吉布和H. 鲍恩合著《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第1卷（18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第1部分（1950年），第162—165页。

^[7] 参阅本书原文第552页。

^[8] 这种小银币的重量只有1570年含银量较高的硬币的四分之一，仅作为一种计算货币单位保存下来。1687年，一个银质的土耳其“皮阿斯特”值160个“阿斯普里”。有关奥斯曼帝国货币见前引曼特兰所著的书第233页及以下各页。

^[9] B. 刘易斯：《对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某些见解》，载《伊斯兰研究》第9卷，1958年，第111—127页。

^[10] 《英国贸易的一个计划》（1728年，牛津1928年重版），第10—11页。

[11] R. E. 卡瓦里约罗 (Cavaliero): 《18世纪马耳他人的衰落》, 载《马耳他历史》第2卷, 1959年, 第224—238页; 前引曼特兰 (Mantran) 著作, 第56页; N. G. 斯沃罗诺: 《18世纪萨洛尼卡的贸易》, 1956年, 第195页及以下各页。

[12] 关于奥斯曼帝国人口的一些城镇情况参阅本书原文第542页; 前引曼特兰所著的书第37页及以下各页分析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 (有附图)。

[13] 一块泽迈特年收入为2万—10万阿斯普里, 数量更多的泰马尔年收入略少于2万阿斯普里; 一块年收入多于10万阿斯普里的封地叫作赫斯 (hass)。1668年史学家保尔·里考特爵士 (Paul Rycout) 调查了每个区长拥有的泽迈特和泰马尔数量 [见《奥斯曼帝国现状史》 (1682年) 第5版, 第332页及其后各页], 同时也估算了他们所征士兵的人数。

[14] 财政部长迈赫迈德帕夏有关奥斯曼帝国治国术的著作由W. L. 赖特翻译成英文, 书名为《大臣 (Vezirs) 和省长参考手册》, 普林斯顿, 1935年。注意第119页。据M. 佩西 (Pécsi) 和B. 萨福尔维 (Safalvi) 《匈牙利地理》一书第167页称, 匈牙利村庄在土耳其占领期间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参看H. 安东尼阿迪斯-比比科: 《希腊被遗弃的村庄》, 载R. 罗马诺和P. 库尔宾合编《11世纪和18世纪被遗弃的村庄和经济史》, 1965年, 第379页及以下各页。

[15] 前引吉布和鲍恩合著的书, 第1卷第1部分, 第190页。“封建”和“封地”两个词的词义是相近的。

[16] 前引吉布和鲍恩合著的书, 第1卷第1部分, 第185页注中指出, 估计1687—1703年间此数为1.5万—2.6万间。参见A. N. 库拉特编《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罗伯特·萨顿 (Sutton) 爵士1710—1714年的信件》, 载《坎登社》 (Canden Soc.) 第3集第78卷 (1953年), 第32页。关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般组成, 参见本书原文第743页。

[17] 皮顿·德·图尔纳福尔: 《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去旅行》 (两卷集) 第2卷, J. 奥捷尔译, 伦敦, 1718年, 第35页。

[18] 皮顿·德·图尔纳福尔, J. 奥捷尔译: 《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去旅行》 (两卷集) 第2卷, 第195页, 大量民间工匠仍然被行会征集去随军远征, 见O. L. 巴坎《16世纪伊斯坦布尔一个大清真寺工地上的劳动组织》, 载《年鉴》 (E. S. C.) 第17期 (1962年), 第1097—1098页。

[19] 见C. M. 西波拉 (Cipola) 《炮与帆……1400—1700》 (1965年), 第93页注。土耳其炮手和造炮手在印度仍然受到尊敬 (见《炮与帆……1400—1700》, 第128页注)。

[20] B. H. 萨姆纳: 《彼得大帝和奥斯曼帝国》, 牛津, 1949年, 第24页。

[21] 参见前引图尔纳福尔所著的书第1卷, 第352页。1720年引进了一支西方式的救火队。

[22] A. 豪拉尼 (Hourani): 《18世纪富饶的土耳其苏丹面貌的变迁》, 载《伊斯兰研究》第8卷 (1957年), 第89—122页; N. 伊兹考维茨 (Itzkowitz):

《18世纪奥斯曼的现实》，《伊斯兰研究》第16卷（1962年），第73—94页。里考特（Rycaut）估计宰相的“办事机构”大约拥有2000名官员和仆从，每天发出命令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等等（载《现状》第5版，第81、103页）。

[23] 据前引图尔纳福尔所著的书（第1卷，第363—364页）称，这些清真寺以及依靠它们的教育和慈善组织每年消耗了土地税的三分之一；这是一笔可以作为保卫宗教因而也是可供战争使用的经费。

[24] 见B.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出现》（1961年），第53页及其后。

[25] 学会某些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土耳其可以绘制他们自己沿海地区的地图。

[26] 前引图尔纳福尔所著的书，第1卷，第79页。

[27] 见本书原文第632页。

[28]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13—517页。

[29] 见本书原文第683—684页。

[30]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98—499页，哈布斯堡一直进行到1691年。再参见本书原文第576页及其后。匈牙利历史学者认为，外国军队解放匈牙利国土并未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拥护。参看O. 贾斯吉（O. Jaszi）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消亡》，芝加哥，1961年再版，第41页；H. 马查理（H. Marczali）著，H. 坦普里译：《18世纪的匈牙利》，剑桥，1910年，第2页。

[31] 雅典人口当时估为1.7万人，自1580年后已有减少。O. L. 巴坎：《对奥斯曼帝国15、16世纪人口统计的尝试》，载《经济与社会杂志·东方史》第1卷（1957年），第27页。

[32] 1671—1678年、1684—1691年、1692—1699年以及1702—1704年。

[33]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18页。

[34] 见本书原文第577—578页。

[35] 见本书原文第579—580页。

[36] V. L. 特比艾（Tapié）：《1661—1715年法国与中欧的关系》（巴黎大学教材，两卷集，1958年）第2卷第187页还重点突出后来从各公国向特兰西瓦尼亚的移民现象。1670年哈布斯堡对匈牙利新教徒进行迫害之后出现过移民倒流的现象。参见本书原文第580页。

[37]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99页）以及第6卷（原文第580页）所述这次特兰西瓦尼亚战斗的后果。

[38] 科利杰尔在父亲手下工作获得经验后，于1684年接任其父常驻使节的职务，并在君士坦丁堡一直待到1725年。其间他大部分时间还兼任俄国的非正式的代理人。

[39] 这种大帆船与用奴隶划的军舰不同，在俄国入侵亚速海时地中海还有这种大帆船。1696年以后，每年都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海上作战，威尼斯人在数量上略居优势。参见R. C. 安德森著《东地中海的海上战斗》，利物浦，1952年，第223页及以下各页；另见本书原文第565—566页。

[40] P. 阿津梯编：《1694年威尼斯人占领希俄斯》（1953年），第41页及以下各页。

[41] 前引曼特兰所著的书，第236、240、257—259页。

[42] 许多家族把他们的地产（尤其是在城镇或靠近城镇的地产）改名为慈善机构所有以免被没收。穆罕默德二世土耳其苏丹在1826年击败近卫军之后进行一次巨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对这些慈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把这些机关的收入据为己有。参见刘易斯著《现代土耳其》，第91—94页。

[43] 见前引怀特所著的书，第118页。

[44] 见前引怀特所著的书，第126页。

[45] 见前引怀特所著的书，第111页。

[46] 参见本书原文第683页。

[47] 引自萨姆纳所著的书，第34页。

[48] 为在第聂伯河下游以及在黑海沿岸（直到阿查理曼）作战，俄罗斯人在比沃罗涅日距黑海更远的杰斯纳河沿岸勃良斯克建造大批小船。见安德逊著《海上战斗》，第239—240页。

[49] 见本书原文第250页。不过，在维也纳过多地希望从1697年战争中得到金钱和物资供应，但实际所得却少得可怜。这个战争实际上开始较晚，而且就连尤金也把防御看成是这次战争的目的。M. 布劳巴赫：《尤金·封·萨伏依亲王》第1卷，慕尼黑，1963年，第248页及以下各页。

[50] 见本书原文第581页及以下各页。

[51] 前引萨姆纳所著的书，第77页注。奥斯曼国库也丧失了某些贡物。

[52] 哥萨克于1706—1708年叛乱时（见本书原文第732页），已经低于此数的数字又减到了几百人。顿河以及支流的造船厂仍在继续造船。

[53] 安卡拉，土耳其国家档案馆的《宰相府大事记》（Mühimme Defteri）第145卷，第485页。前引吉布和鲍恩合著的书，第1卷第2部分（1957年）特别指出，保加利亚人由于军队经常通过不得不离开首都迁到多瑙河。参见前引斯沃罗诺斯所著的书，第122页，关于萨洛尼卡对巴尔干贸易的瓦解。

[54] 《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去旅行》第1卷，第374页。一位威尼斯人于1716年对奥斯曼舰队实力作了以下统计：拥有112门火炮的战舰1艘，88门火炮的战舰2艘，72门火炮的战舰1艘，50—64门火炮的战舰25艘，28—48门火炮的战舰6艘，还未计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一支战舰编队（前引安德逊所著的书，第248页）。1682年开始试建的3层甲板战舰数量在这几年里得到迅速增长。

[55] 前引赖特所著的书，第104—105页。

[56] J. 封·汉默：《奥斯曼帝国史》（18卷集，1835—1846年）第13卷，J. J. 海勒特译，第68页。

[57] 曼特兰对这个问题有详尽的论述，见前引其著作，第148页及以下各页。

[58] 计3688个珀斯（purse）或1537666个皮阿斯特。其余的钱靠卖官和出售包税权。另外还给边境驻军用可向政府提款的汇票形式支付了1000个珀斯。见前引赖特所著的书，第6页。

[59] 瑞典入侵俄罗斯，见本书原文第664页及以下各页。

[60] 在1699—1702年、1707—1713年以及1716年。他是塞林姆·吉莱伊（Selim-Girei）5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从1705—1736年，汗的统治权由塞林姆·吉莱伊的几个儿子轮流掌握。1707年，他接替了他的兄弟盖兹-吉莱伊（Gazi-Girei），因为盖兹-吉莱伊无法抵御来自库班河对岸的诺盖（Noghai）鞑靼人的入侵。各位汗的名单参见前引萨姆纳所著的书，第13页注。

[61] 区别“外来”与“内部”家伙，参见吉布和鲍恩所著的书，第1卷第1部分，第56—57页，以及前引图尔纳福尔所著的书，第2卷，第8—14页。

[62] 前引霍尔特所著的书，第88—90页。

[63] 见本书原文第579—580页。

[64] 前引萨姆纳所著的书第45页和马查理所著的书第202—203页。

[65]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86—589页。

[66] 关于在这以前瓦拉几亚人暗中与维也纳来往的事，见本书原文第578、580页。

[67] 文电第60页。和科利耶尔（Colijer）一样，他也是一个极端亲俄分子。

[68] 前引萨姆纳所著书就是持这种看法的（第40—41页），他对后来指责宰相大量受贿表示怀疑。土耳其舆论对这种说法进行大量解释不是没有道理的。

[69] D. 达金（Dakin）：《1821—1833年英国和美国对希腊感兴趣的人》，萨洛尼卡，1955年，第10页。

[70] 前引封·汉默（Hammer）所著的书，第8卷，第8—9页。希奥特（Chiote）一个丝绸商人的儿子马弗洛科达托（1636—1709年）曾在普吐阿（Pudua）学医，并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学院行医。他的地位提升也许是与保护人伊斯兰教释典官费佐拉有关。他的发迹说明医生和会讲基督教徒语言的人在宫廷里享有特殊的机会。富裕的法纳尔人子弟到普吐阿接受教育是习以为常的。

[71] 《欧洲现状》第25卷（1714年），第483页：12月8日来自土耳其的意见。

[72] 农业方面的恢复比较明显，人口翻了两番，达到25万已足以说明问题（H. 安东尼阿迪斯-比比库，loc. cit. 第391页）。

[73] G. 芬莱（Finlay）：《希腊历史》（7卷集）第5卷，1877年，第208页。参见图尔涅福特对爱琴海希腊人的印象（第1卷第97页）：“他们之间的家庭纠纷不可能总是因为钱引起的。”

[74] 布劳贝奇：《尤金亲王》第3卷（1964年），第309—310页。

[75] 奥地利驻土耳其代表弗莱施曼（Fleischmann）报告称威纳·霍夫（Wiener Hof）已下定决心要打仗。他深信土耳其人为了进行报复而有意与奥地利皇帝一战。

[76] 旗杆上悬挂着一个表示职位很高的标志，旗杆顶上有一个金球。普通的区长有权挂1条马尾，省长挂2条，一般大臣挂3条，宰相挂5条。

[77] 前引布劳贝奇所著的书，第3卷，第320页。

[78] 参见《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197页。

[79] D. B. 霍恩编：《1689—1789年不列颠的外交代表》第3集第46卷，坎顿社，1932年，第152页。斯坦尼安（当时在维也纳）曾通知森德兰（Sunderland）说，皇帝无论如何要在没有调解人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而不会再找他，于是伦敦在1717年9月决定召回沃特莱。萨顿3月乘船离开君士坦丁堡，赶往维也纳。他告诉艾迪生说，汉诺威大臣圣萨福林（st Saphorin）曾鼓励斯坦尼安设法出任土耳其大使。10月，在未像往常那样事先与东方公司（该公司向大使发工资）进行商议的情况下任命斯坦尼安为驻土耳其大使。见R. 霍尔西班牙德（Halsband）著《玛丽·沃特莱·蒙塔古夫人传记》，牛津，1956年，第77—79页；W. 米歇尔著：《乔治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第1卷，1936年，第362—368页；前引布劳贝奇所著的书，第3卷，第371页。

[80] 查理的一些谋士曾极力主张获取诸公国以及黑海的一个海岸而不要塞尔维亚。见J. W. 斯托伊（Stoye）著《查理六世国王：即位的最初年月》，皇家历史协会译本，第5集第12卷（1962年），第80—84页；参见本书原文第604页。该商业条约规定奥地利人除了拥有实际征收关税权和领事特权外，还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全境自由地进行贸易活动。

[81] 见本书原文第746页及以下各页。

[82] B. 米勒：《在土耳其政府崇高形象的背后：斯坦布尔的大宫殿》，耶鲁，1931年，第124页。关于艾哈迈德三世新设宫廷花卉长官的权力，见上书第223—224页。

[83] 见A. D. 奥尔达逊（Alderson）《奥斯曼王朝的构成》（牛津，1956年），第78页的“伊斯坦布尔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图。君士坦丁堡各行会及公司惯常在这里的草地上举行宗教的列队行进仪式。卡辛姆（Kasim）帕夏的大型海军兵工厂就在东面不远的地方（前引曼特兰所著的书，第68、365页）。

[84]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第45—46页。

[85] 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印刷所早就在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城市盛行。见刘易斯著《现代土耳其》，第47、50—51页。

[86] M. L. 赛依（shay）：《威尼斯官员公文信件中披露的1720—1734年的奥斯曼帝国》（厄巴纳，111，1944年），第20—24页；参见前引斯沃罗诺斯所著的书，第135—136页。

[87] 见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86—87页；见前引曼特兰所著的书，第279页。关于供应首都的复杂机构情况，见曼特兰所著的书，第185页及以下各页。

[88] 埃及虔诚教徒的多种多样宗教仪式给外国旅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参见E. W. 莱恩（E. W. Lane）著《关于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的介绍》（第3版，1842年）。

[89] L. 洛克哈特：《萨菲王朝的覆灭与阿富汗入侵波斯》，剑桥，1958年，第217页。索伊蒙诺夫和封·维尔定（Verden）绘制地图活动参见上书，第239页及以下各页。

[90] 前引迈克尔所著的书，第1卷，第364页。不列颠主要关心的是转移彼得对北欧的注意，但不列颠也害怕俄国人对波斯的贸易居于支配的地位。参阅I. 雅各布著《1718—1727年英俄和英土关系》（巴塞尔，1945年），特别是参阅第7章。

[91] L. 洛克哈特：《纳迪尔国王》（1938年），第24—106页。巴格达省真正独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参阅本书原文第739页。

[92] 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27页。1722年斯坦尼安曾经报告称，土耳其老百姓恨波斯人，因为他们迫害森尼（Sunni）地区的穆斯林（洛克哈特：《萨菲王朝》，第215页）。根据“在君士坦丁堡起草的最初备忘录”编写、后来用法文在海牙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称，与波斯再次发生总是令人讨厌并经常给土耳其人带来不幸的战争是引起这次叛乱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卫军关闭了商店并为一次出征（这次出征到斯库台就停下来）而花了许多钱，叛乱分子首领把积攒的钱都用来买了武器和服装，本准备在战斗过程中再卖出去。见《对1730和1721年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两次叛乱的详细叙述》，伦敦，1737年，第2—5页。

[93] 在兵变发生时，大多数负责官员都在城外，或像近卫军统帅那样迅速从城里逃了出去，这位统帅自己的卫队也拒绝对叛乱分子采取行动。宫廷人员一回到皇宫里就产生意见分歧，而且互相指责。

[94] 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8、15、38—41等页。

[95] 据说叛乱分子找到了宰相和副宰相收藏财宝的地方，仅现金就分别相当于135万和187.5万英镑（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26—27页）。

[96] 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53页。

[97] 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79页。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bailo）声称，1730年有1万名近卫军丧生（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32页）。

[\[98\]](#) 前引赛依所著的书，第36—37页。

第二十章（上） 查理十二世及北方战争

在北方战争中，瑞典及其年轻的专制国王查理十二世不得不面对一场瑞典政治家早已预料到，但迄今由于命运之神的青睐，也由于他们处置得当而避免了的挑战，这就是瑞典帝国的东西邻国联合起来同时向它发动进攻。瑞典自中世纪后期从斯堪的纳维亚联盟中分离出来以后便向外扩张，似乎势不可当，在邻国中引起刻骨仇恨。对此，斯德哥尔摩从来抱不抱虚假的乐观情绪。瑞典走上扩张道路是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出于王朝和宗教方面的考虑，但建立帝国的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既是瑞典主动发起的，也是波罗的海和欧洲政治关系紧张、波罗的海地区势力真空的总的形势所决定的，内外因素的比重不相上下。丹麦扼守瑞典西去的通道。自解放战争以来，瑞典朝思暮想的是砸掉丹麦卡在它脖子上的这道枷锁，并把丹麦赶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此情况相似的是边境形势动荡，致使瑞典在其芬兰领地上与莫斯科人产生摩擦，促使瑞典在东北寻求一个固若金汤的边境线。然而将瑞典猛然拖进芬兰湾以南旋涡的，首先是它想拯救其衰败的国运——丹麦、俄国及波兰都在觊觎它的领土——而一桩波兰婚姻的意外事件又使它卷入波兰事务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纷争。

一旦在三条战线上扩张成功，就使人重视其帝国理论了。瑞典东征，在波罗的海东岸占领若干地方是有道理的，这些地方被视为瑞典大国地位的堡垒，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俄国和波兰的出口贸易物资，许多是通过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和瑞属利沃尼亚的港口运出的，瑞典希望吸引或迫使更多物资不得不通过这里去往欧洲，从过境费和应征收的款项中收取钱财，充实瑞典东部几省的财政。尤其是俄国，它被看作内地，与欧洲的贸易得由瑞典的波罗的海港口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瑞典很早就有计划将阿尔汉格尔压下去的道理。^[1]同样，掌握波兰几个西普鲁士港口和库尔兰公爵领地也是垂涎欲滴的事，因为波兰的贸易也是通过瑞典控制的纳尔瓦、雷伐尔和里加的河口外运。除了控制波兰和俄国贸易物资外运的野心之外，瑞典还有一

个美梦：将通往土耳其、伊朗甚至远东的交通线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此时波罗的海就可成为瑞典的内湖。东波罗的海在瑞典思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此时丹麦已失去哥得兰和厄赛尔岛，因而在此沿海地区的政治事务中已不值一提；此时俄国和波兰似乎也默认瑞典在这一带的主权——瑞典占领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目的与此截然不同，主要是捍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宗教（因而也是王朝）问题解决的方案，1648年和约使它在帝国议会中获有席位，拥有和约保证人的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是发挥欧洲影响的据点。由于瑞典在帝国驻有重兵，瑞典海军又有能力保证驻军的后勤给养，瑞典便能够对勃兰登堡施加压力，就能操纵下萨克森集团几个诸侯之间的平衡，就能使大国更感受到瑞典影响力的存在。此外，它在德国西部扼有不来梅、凡尔登和维斯马。这些地方是瑞典对付丹麦的重要的安全控制点，因为丹麦一直瞪大眼睛看着，伺机收回被瑞典夺去的丹麦和挪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领土。瑞典与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公爵结成王朝和政治联盟，从而将遏制丹麦—挪威的意图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瑞典结盟的目的是将公爵事实上变成受保护者，只要公爵不与丹麦妥协，瑞典就可通过荷尔施泰因—哥托普领土从后门打进日德兰半岛，因为荷尔施泰因—哥托普领土与丹麦国王所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爵领地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这种一刻不停的入侵威胁是防止丹麦进攻瑞典半岛的最佳防御，对消除丹麦驻在松德海峡和西波罗的海相当大的海军力量也有很大帮助。

瑞典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建立帝国的活动由于俄国和波兰在关键时刻国力虚弱，也由于大国直接和间接的合作而变得轻而易举（这些大国跟瑞典一样不喜欢丹麦控制松德海峡的南北两侧，或者它们就是反哈布斯堡斗争中的盟国）。但瑞典成了波罗的海大国、超过了丹麦之后，情况自然就大不相同了。查理十世发动的战争，如果开始是防御性的话，后来就演变成侵略性的了。到了战争快结束时，荷兰感到，为了北欧力量均衡，它不得不代表丹麦出面反对瑞典了。法国跟瑞典的结盟关系要长一些，因为法瑞同盟是法国“东线屏障”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个同盟关系有可能将瑞典拖进法国的强权政治斗争中去，与瑞典切身利益相悖。1675年，当瑞典卷入冲突，与勃兰登堡发生战争时，丹麦抓住机会进攻瑞典半岛的南部数省。

由于1675—1679年的经验教训，瑞典重新审视了它整个大国地位的基础，这也多亏了瑞典贵族——瑞典土生土长和生于国外的贵族——老贵族和新册封的贵族。他们得到国王的馈赠和赐予的特权，数量大得惊人，以致到了1680年国王发现他已手无寸土，而贵族拥有的特权又造成僧侣、市民和农民三个非贵族等级同贵族的矛盾。贵族一直垄断政治大权，尤其是1632年和1660年之后长时期的摄政期间。贵族认为，接受外国津贴是维持军队和帝国行政开支必不可少的。而就是这个政策现在遭到了否定，因为正是这些与外国签订的津贴条约将瑞典拖进与瑞典真正利益背道而驰的战争。瑞典对外国幻想破灭，不能再与大国纠缠在一起了，决心寻找一条使瑞典强大，能独立保护其占领地的途径。因而有了查理十一世，他成为改革时代的有目共睹的焦点人物，在战争中也显示出非凡的指挥才能。只是他日益增长的专制权力使他完成了“恢复祖训”的伟业（他的专制权力获得非贵族等级的谅解甚至怂恿，以及贵族院一些势力强大的贵族的同情），从而使他预算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他加强了陆军，这支军队牢牢扎根于瑞军传统的模式之上，但按欧洲模式进行训练，也进行演习和动员，使这支军队无愧于常备军的称号；海军从斯德哥尔摩转移到新建的卡尔斯克鲁纳海港，以便保卫帝国的南部和西部；对官僚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好陆、海军两个部门。^[2]查理十二世多亏了这个总的改革，也多亏他父亲当政期间发展起来的、将欧洲发明与瑞典情况结合起来的军事战术。当然，北方战争的经验又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改进。

父亲统治期间留下的遗产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两者不相上下。查理十二世是1697年即位的，即位时消极因素的后果还没有显示出来。瑞典希望中立，不仅仅能使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且还要保持其“平衡力量”的角色，瑞典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外交政策已深深打上这个角色的烙印。瑞典憎恨法国路易十四的优越感，1688年两个海上大国缔结“王朝”联盟时瑞典便心存疑虑。在国王及其大臣们看来，瑞典此时扮演的恰当角色应是置身于大国纷争的九年战争之外，保存瑞典的力量，使瑞典能被交战国接受进行调停；或者如果有利可图时，它能在战争最后阶段，在决定性时刻参战，与此同时又利用机会增加商船队，将通常是荷兰和英国进行的贸易尽可能地拦过来。表面看来，可以说查理十一世这个政策是成功的，贸易和海运量猛增：达到750艘船，是瑞典“大国时代”的最高纪录。而且，整个战

争期间所有国家都向它讨好，1697年4月查理十一世死前瑞典被聘为里斯威克和会的仲裁人。然而对瑞典不信任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它拒绝参与任何一方，因而它被认为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不值得给予酬报，它的调停遂也成为一种形式的、空洞的荣誉，远不像预料的那样开展有力的平衡。路易十四对瑞典今后能否提供积极支持抱悲观态度，因此开始将其注意力转向丹麦。海上大国对瑞典拒不参加“共同的事业”，且野心勃勃地要成为与它们竞争的贸易大国而感到愤怒，遂附和它们的外交官提出的“无信无义的瑞典人”的说法，并预言：一个不与其真正朋友合作的国家是要毁灭的。如果英国和荷兰撤走对瑞典的支持，那么这个瑞典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荷兰外交官沃尔拉文·范·希克伦在他对瑞典人十分恼怒的时刻描绘了一幅瑞典图景以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个破败的、再次龟缩在“岩石、丛林和深山之中”^[3]的瑞典。由于不信任，大国便预先做好安排，另找一个盟国来取代性格内向的瑞典。

另一方面，数年和平的岁月给斯德哥尔摩带来了信心。连年丰收，人口明显增加，卡罗琳松树林的四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阔，经济、陆军和海军方面的改革迅速进行，保护性关税有矿业、炼铁、炼钢、炼铜和炼焦油方面积极措施的支持。1697年查理十一世去世的那个冬天有短暂的停顿，1696年遇灾，颗粒无收，河上结冰，进口物资不能大量或及早到达，无法把大批穷人从苦难和死亡中拯救出来。1697年出现好几次不祥之兆——查理十一世的遗体还未从王宫移出安葬，王宫便起火了；查理十二世在加冕仪式上骑马游街，王冠却从头上掉了下来——使迷信的人吓得发抖。更有甚者，14岁的国王登基有可能使贵族再次向专制王权提出挑战。不过那些想从这种形势中渔利的人看到这位娃娃国王11月里获得多数支持时便惊慌失措了。^[4]以国王及其顾问即老国王的遗臣们，主要是瓦勒斯泰德和派帕为首的拥护专制王权的人，牢牢地掌握大权，希望停止“恢复祖训”的人大失所望了。

在国外，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1698年夏，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公爵娶了查理十二的姐姐赫德维格·索菲亚，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境内自己的辖区构筑堡垒，丹麦则说他无此权利，因而再次发生争执，查理国王准备捍卫姐夫的利益和瑞典的利益。^[5]丹麦人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他们应趁此机会测试一下

他们能将自己的计划推行到多远。丹麦人的想法是可理解的。他们相信一些夸大的情报：瑞典贵族马上要起来造反。斯德哥尔摩担心丹麦人正在与俄国人谈判，请俄国人在这场争端中支持丹麦（虽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但对来自另一方面的危险却判断错误。斯德哥尔摩不知道，丹麦和萨克森—波兰的奥古斯都（波兰国王索比斯基的继承人）之间的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1697年波兰选举国王时瑞典采取中立态度^[6]，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成功当选，瑞典根本没有想到瑞典与他会有什么过节。1698年，丹麦、萨克森和俄国在巧妙的伪装掩盖下缔结了反瑞联盟。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匆匆忙忙地提出与查理十二联姻，遭查理拒绝，这就显然说明瑞典不准备牺牲与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联盟关系，克里斯蒂安五世便与萨克森—波兰的奥古斯都和沙皇进行谈判，其子腓特烈四世（1699—1730年）即位后更快马加鞭继续谈判，要在瑞典新统治者立足未稳时从三个方向对瑞典发起进攻，丹麦进军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将这位公爵赶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沙皇彼得则向瑞典波罗的海省份挺进，奥古斯都向瑞属利沃尼亚进军——利沃尼亚这个省一旦落入奥古斯都个人手中，他就可利用这个省使波兰人接受萨克森国王为他们的世袭国王。波兰有两派，一派赞成奥古斯都为波兰国王，一派认为选举他当国王是非法的，而瑞属利沃尼亚划归波兰后，两派中有许多人的态度将受影响。利沃尼亚的贵族对瑞典将专制王权强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爱国感情和权力受到伤害极为不满，便在丹麦、萨克森—波兰和俄国之间穿针引线，努力劝说瑞典的每个潜在敌人相信，进攻利沃尼亚就是利沃尼亚贵族起义支持奥古斯都的信号，而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利用奥古斯都获得真正的独立。

利沃尼亚有个贵族叫帕特库尔，他在德累斯顿和华沙的活动使大家认真注意到奥古斯都在谈判中的主动态度。毫无疑问，奥古斯都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不像沙皇彼得是瑞典坚定不移的敌人，因为沙皇决心要为俄国扩张寻找出海口。然而从根本上看，丹麦国王是反瑞同盟的真正动力，先是克里斯蒂安五世，然后腓特烈四世也毫不逊色，他们敦促抓住查理十一世去世的机会，刻不容缓地结成反瑞同盟。对丹麦国王而言，进攻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只是拉开序幕而已，一旦瑞典忙于保卫其东波罗的海沿岸诸省，丹麦便进攻斯堪尼亚。撇开帕特库尔的阴谋诡计不谈，瑞典许多战备活动也都是用来对付奥古斯都的，这架势使当代人也认为他成了（瑞典）主要敌人。法国元帅费基

埃称得上是精明的观察家了，直到1706年他还把奥古斯都看成是查理十二世的大敌，将沙皇说成是他的盟友。^[7] 只有在一个方面，奥古斯都可以说对瑞典特别危险：这就是他巧妙的外交将瑞典蒙在鼓里，使瑞典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帕特库尔在三个反瑞同盟国的统治者之间传递消息，但他的作用也被误解了。帕特库尔是瑞典臣民，自1694年便被判犯有叛国罪，死刑，后来瑞典大使馆人员却发现他在莫斯科，俄国对此作了解释，瑞典政府则被德累斯顿和华沙活动真相的欺骗性情报所蒙蔽，居然从字面上接受了俄国的解释。不过即使瑞典发现反瑞同盟计划后，除了奥古斯都的欺骗对瑞典造成的痛苦有所减轻之外，也很难看出瑞典会得出什么根本不同的结论。要瓦解反瑞同盟，只有对丹麦作出让步，没有一个瑞典政治家（不管他态度如何温和）是能够容忍这样的让步的。荷尔施泰因—哥托普修筑堡垒问题又使当代人，甚至瑞典人对形势进一步感到扑朔迷离。有些持批评态度的人由于对反瑞同盟谈判情况一无所知，也指责查理十二世对公爵的支持，如1699年借军队给他重新修建几个倒塌的堡垒，无非是出于王朝的考虑，或者甚至是心血来潮，因而说丹麦受到挑衅才参加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海上大国发生了新的情况，又使问题更加复杂。1700年1月13日，《海牙条约》规定海上大国在荷尔施泰因—哥托普问题上要给予帮助，希望把查理十二世从这个有限的战场上解脱出来，加入反法大同盟一边（根据同一条约），因为一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隐隐出现。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对希望出现的局面没有实现而深感失望，以致他们忘了瑞典正在东面为其生存而战，即使丹麦的威胁暂时消失。

1700年2月奥古斯都正式表态，率军攻打利沃尼亚，瑞典所有侍奉过查理十一世的人马上把握了军事问题的分量。这些人在塑造查理十二世成为军事统帅方面都有一份功劳，他们是：达尔贝格、利沃尼亚总督，虽年迈，但精力充沛；伦斯舍尔德、霍恩、御林军军官们（他们在国王军事训练期间所有模拟战斗中的表现十分突出）以及斯图尔特（此人教授国王构筑工事的技术）。他们始终估计到有两面作战的可能（即丹麦和俄国联手），他们也衡量了这样的假设：波兰同时与瑞典为敌。现在奥古斯都声称他是以萨克森选帝侯的身份攻打利沃尼亚的，这形势需要再作考虑，这就是说从波兰出兵攻打利沃尼亚的是萨克森军队，不是波兰军队。波兰—立陶宛联邦（大波兰）对他们国王以选帝侯身份采取的政策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派，但大波兰正式说

来是中立的。进攻的消息3月初到达斯德哥尔摩，几天后又得知丹麦派军队进入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尽管莫斯科说了好话，但斯德哥尔摩断定沙皇彼得迟早要与腓特烈和奥古斯都联起手来。瑞典和查理十二世对掷战争骰子进行赌博的诱惑力是无法拒绝的。虽然他是在厌恶战争的教育中长大的，但他还受到以保护帝国为己任的教育，他也急切希望以瑞典传统精神来衡量自己——国王亲自带兵打仗。

瑞典防御敌人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就是全力攻击其中较近的、对瑞典心脏更具危险的敌人。动员按详尽的条令条例进行，准确得像时钟一样，而且和平时期已演练得滚瓜烂熟。海军38条战船已准备于6月与海上大国为解决荷尔施泰因—哥托普争端而派来的几个海军中队聚齐。有了海上大国的帮助，卡尔可获海上优势，有这个优势在手，瑞典就能消灭丹麦由40艘战船组成的强大的舰队，就能控制波罗的海。为迅速与英—荷海军中队会合，查理冒风险派瑞典舰队通过水很浅的弗林特拉南岛，他的海军建造者瓦赫特迈斯特上将选择这条航线连声哀叹，但由于风和气候条件有利，丹麦舰队又不愿冒此风险一战，结果查理成功了。转而向有联合舰队掩护的泽兰发起攻击，目的是要捕获或摧毁丹麦躲在哥本哈根港口里的舰队，但由于腓特烈四世很明智地向英、荷和吕讷堡的外交斡旋作了让步（他们也急切希望北欧平静下来），进攻中止了。进行干预的国家对丹麦向奥古斯都和彼得承担了多少义务知之甚少，认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武力调停。瑞典劝说调停国同意在《特拉凡德尔和平条约》里加上要丹麦不再向瑞典采取敌对行动的条款，就连这还遇到某些困难（《特拉凡德尔和平条约》已于1700年8月恢复了公爵“以前的地位”）。这一条是泽兰战斗的真正收获，这次战斗计划是由斯图尔特和伦斯舍尔德制订和实施的。由于《特拉凡德尔和平条约》有调停国担保，瑞典西侧和南翼就有了保护，它就可去打奥古斯都。瑞典未能歼灭丹麦舰队，但这也算是便宜的交换了。

1700年后，瑞典内部就迫使萨克森选帝侯接受和平的最佳方案进行辩论。有些人，包括查理本人（他已在泽兰战斗中接受了战火的洗礼，而且显示出对激烈的解决方案情有独钟，他那些比较谨慎的谋臣们后来对此深感绝望）赞成直接向选帝侯发起进攻。威廉三世和海因修斯担心德意志境内的战争会对路易十四遵守第二次分割条约以及对

他们在德意志招兵都会产生影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可能爆发，他们那时要在德意志招兵），于是紧急向瑞典呼吁，瑞典遂放弃这个进攻计划。瑞典对英一荷舰队感激涕零，而对法国在荷尔施泰因一哥托普争端上的暧昧态度深感失望：路易作壁上观，不愿得罪腓特烈四世，对北欧卷入战争旋涡感到满意。瑞典既感激海上强国，又怕其行动违背海上强国联合力量的愿望，因而非常聪敏地放弃直接进攻萨克森，另择他途——尽管很勉强。到10月中旬，为避免港口冻结而使计划受挫，瑞典陆军（对泽兰的战斗还余兴未尽）便匆匆忙忙开到利沃尼亚，到萨克森人进攻瑞典帝国的地方去迎战奥古斯都的1.8万人的军队。萨克森人以为瑞军主力还要被丹麦人牵制相当一段时间，一听到瑞军到达的消息后，就渡过德维纳河，撤到河的对岸去了；由于俄国此时业已宣战，并进入因格里亚，包围了纳尔瓦，因而最迫切的任务是对付彼得的挑战。瑞典人决定改变方向，立即开始强行军，向纳尔瓦挺进。途中有时实在是又冷又饿，因为当时没有时间来周密安排粮草供应问题，而哥萨克军队又把他们一路上的所有东西都抢光烧光。但瑞典人及时赶到纳尔瓦，11月30日大获全胜。瑞军8000人，俄军有2.3万人，全由外国军官指挥，但军官无法使未经训练的、抽壮丁拉来的俄国新兵顶住瑞军的进攻。此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瑞军士气。获胜的原因是气候恶劣，进攻突然；战斗行动像演练场上那么流畅；战术的精确以及伦斯舍尔德作战方案的高明。在这场战斗中（他们第一场大战，由霍恩指挥），查理显示出他对地形有双慧眼，对决战时刻有种本能感觉，这预示他今后将率领他的军队，在战争艺术上不再依赖他的老师们了：他父亲和祖父都是杰出的军人，他这份军事天赋显然是与生俱来的。斯德哥尔摩欢庆胜利时也松了口气，外国外交官们的反应也相同，只是谈到“我们的小英雄”时有点以恩人自居的味道。

纳尔瓦一仗使瑞典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摆脱了来自俄国方面的眼前威胁，但有许多理由说明应迅速向莫斯科进军，先将彼得打倒，然后再处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军队训练有素，驰名欧洲）。斯图尔特制订了一个冬季攻打莫斯科的计划，然而粮草供应、装备以及征兵（新兵在春季之前到不了部队）方面的困难，尤其是经过这短短的但十分艰苦的战斗季节之后，伤病士兵增多，迫使瑞典人进驻冬营。如果春天部队实力能补充到满员，可对俄国和萨克森两条战线作战，就最理想了。但即使到了那时，实力还是不够强大。和平时期瑞典机动部队有3万人，各地守备部队和边防部队共1.5万人。后来部队最多时增加

到11万人，既有国内新征的兵，也有少量外国雇佣军。此外，还用补贴办法从瑞属芬兰、波罗的海沿岸省份以及德意志招了相当一部分，1702—1706年他们在主力作战部队中有3万人；1707—1709年间达4万人（不含留守在瑞属芬兰、瑞属波美拉尼亚和波兰的部队）；1718年达到6.5万人。但主力部队如果两面作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则会削弱瑞军的攻势，太危险了。所以1701年春天一过，瑞典人便决定先打奥古斯都。这倒不是他们低估了俄国的危险，他们深知彼得是他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但这样做的理由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北方诸省可由当地强大的守备部队防护，主力打萨克森人。希望有场决战，国王然后可转到俄国战线上来。

7月19日，瑞军渡过德维纳河。这次行动是伦斯舍尔德和国王指挥的，达尔贝格和斯图尔特进行声势浩大的佯攻，因而突然性很大，取得无法估量的效果，是声东击西战术的胜利。然而还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战略性胜利，因为萨克森军队缩进了庇护所：他们先到波兰，然后到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而瑞典人仅占领库兰。在打败奥古斯都之前不能向俄罗斯进军，而奥古斯都只要躲在瑞典人到不了的地方，瑞典人同样不能向他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查理不可避免地卷进波兰和东欧的政治。

侵犯神圣罗马帝国就要冒开罪海上大国之风险，有个妙计就在手边：把奥古斯都从波兰王位上拉下来，使他再无机将萨克森军队派到大波兰来（他在大波兰还有支持者的默许），这样就解决了瑞典的难题。这个想法起源于波兰的几个派别，他们既不同意奥古斯都在国内扩大其权力的计划，也不赞成他与俄罗斯结盟；立陶宛势力极大的萨比埃哈家族也敦促废黜奥古斯都，其他人也想把奥古斯都赶下台（1697年选举国王时这些人投了法国支持的候选人的票，奥古斯都上台分封官爵时这些人遭到冷遇）。推出一位波兰人当国王的要求便被提出，这既可对国外执行波兰自己的国家政策，对国内也能使地方实力派少受些威胁。也许索比斯基兄弟中的老大詹姆士是合适人选，他在1697年选举中几乎没有得到支持。所以，很明显，只要给反萨克森的波兰人以道义、金钱和军事上的支持，他们就很可能将奥古斯都推翻。^[8]1700—1701年冬，瑞典人跟詹姆士·索比斯基进行谈判，跟波兰其他领导人讨论了非常广泛的计划：波兰瑞典结盟，波瑞共同攻打俄国（波兰亦可借此收复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两省的失地）以遏制俄

国，鼓动土耳其向彼得宣战。在波兰所能获得的报酬，除东南欧以外，可能还为瑞典取得库兰（波兰在此享有主权），甚至西普鲁士港口，以及波兰对整个瑞俄边界的支持，这样瑞典边界的防御能力不仅提高，而且还将阿尔汉格尔也划在瑞典一边。反对俄国、反对萨克森的萨比埃哈家族是瑞典在波兰境内直接的军事盟友，他们自1697年起就一直坚持反对奥古斯都的战争，目的是最终成立一个由萨比埃哈王朝统治的独立的立陶宛。不过查理十二世还与波兰王家军队总司令杰布隆诺斯基及其女婿拉斐尔·莱茨津斯基进行了更有政治意义的接触。莱茨津斯基是位经验丰富的高官和外交家，特别是在土耳其政府里影响很大。查理与拉齐乔斯基大主教也进行了接触。拉齐乔斯基对波兰未来有远见卓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竞选王位和加官晋爵。然而1702年末和1703年1月杰布隆诺斯基和莱茨津斯基突然相继去世，使瑞典希望遭重大挫折。领导波兰爱国者的责任现在要落在大主教身上了。大主教这个人没有收复被俄国抢去的省份的雄心壮志，而更希望让有关各方去争斗，不用波兰积极参加就把收复失地的问题解决了。大主教的地位因奥古斯都一个聪明但很无耻的反击行动而进一步获得加强：1704年2月，他在帝国领土上将索比斯基三兄弟中的两个逮捕了。人们对查理十世过去征战波兰的情况记忆犹新，又叫喊“波兰联邦内部事务受到了外国的、异教徒的干涉”，但奥古斯都不会从查理的话中捞到什么资本的（1702年1月查理结束在库兰冬营的休整时说他将允许在波兰领土上追击萨克森敌人），查理这个要求的措辞是：瑞典人在波兰内战中支持反奥古斯都各派。但1701年末，查理曾说，波兰人应该废黜奥古斯都——这话能被奥古斯都利用，他确实利用了。

瑞典随军政府的大多数官员对国王在波兰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莽撞感到遗憾。他们希望他们的国王待在幕后，由波兰人自己去解决他们的分歧，促使西欧舆论表现出更加息事宁人的态度，并希望对数不清的调停呼吁和愿意媾和的表示作出相应反应（奥古斯都将这些呼吁散布得很广）。有些官员，特别是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像老臣班特·奥克森谢尔纳，主张跟奥古斯都和彼得讲和，不管和平如何短暂，瑞典也能参加正在形成的反法大同盟的共同事业，这样瑞典既瞄准将来在帝国境内获得的利益——尤其是不来梅——同时也因为傲视群雄的法国的威胁比九年战争期间更加真切。就“大同盟”方面而言，一旦与路易十四世的战争开始后，他们就迫切需要得到胜利之师的瑞典军

队助他们一臂之力，因而它们毛遂自荐，愿在奥古斯都和查理之间进行调停。无论它们是何等真诚，谈判情况却说明奥古斯都一切和平姿态皆是空的。接近查理统帅部的瑞典人不仅说东战场是第一位的（在东战场，不牺牲瑞典领土是不可能达成停战协议的），而且还说需要执行查理的波兰政策，即全力支持一个除奥古斯都之外的国王。

詹姆士·索比斯基和康士坦丁·索比斯基被俘后，查理未能说服他们的兄弟亚历山大·索比斯基出来担任过渡国王（直到詹姆士获释之后）。要在索比斯基家族之外物色一个能同时被反萨克森的波兰各派和瑞典接受的国王人选又何等困难。查理仍然坚持要一个波兰人当国王（反对由外国人来当），使波兰联邦获得新生，同时坚持要有一个活跃的、亲瑞的波兰联邦。而波兰大家族的野心和拉齐乔斯基大主教的故意拖延——其本身并未触及个人或家族的野心——对谈判起到了瘫痪的作用。为打破僵局，查理提出一个瑞典人选，强迫反萨克森的波兰人接受。于是有了1704年选举，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当了国王，但主教未予祝福。^[9]瑞典的军事力量进而使整个波兰接受他为国王：瑞典军队横扫一切，目标对准萨克森军队以及奥古斯都请来的辅助部队，目的是获得各地区和所有重要家族的波兰人的支持，必要时就以威胁相要挟。到1705年年末，瑞典施加的压力已经够了，足以使斯坦尼斯拉斯登基，并在华沙签署一项波兰和瑞典的条约，从而结束了这场实实在在的战争，一场在虚构的和平生活下面进行的战争。条约说明了波兰联邦在查理宏伟的东欧计划中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这条约又因签订了几个贸易条约而更强化，贸易条约还特别要波兰人承担一项义务：承认里加垄断俄国向西方出口的过境地位。

^[10]

对查理十二世在波兰的征战有各种不同的评判。一般都承认他需要先打败奥古斯都，然后才能去打彼得，即使让俄国在波罗的海暂时得逞也在所不惜。也有人说关于瑞典安全还有一条更好的途径：如果查理与普鲁士言好，腓特烈一世就能制约住奥古斯都；还有一个办法，卡尔跟奥古斯都和腓特烈做笔交易，使这两人感到足够满意，他就可放手去攻打俄国而无后顾之忧。^[11]但这两种办法都要分裂波兰领土，这与瑞典的东欧计划相悖，也与查理本人有违，因为这就背弃了波兰的“自由”，而查理进入波兰就要捍卫波兰人的事业。还有，最耐心的谈判表明，普鲁士向东扩张后能拿出交换的东西就很少了：

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军事同盟，一个（从瑞典人看来）能与牺牲波兰领土相当的军事同盟（波兰则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事实上查理试验了这些途径，找不出一个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只有坚持他的想法：扶植一个亲瑞的波兰人国王，此人心甘情愿地跟瑞典合作一起去攻打俄国，让波兰成为发动进攻的基地——或至少是个缓冲地带，一个能把奥古斯都拦在局外的缓冲地带。

在波兰的3年使查理成熟了，成了自己能独力决断的军事领导人、政治家和外交家。与他政府里的顾问相比，他更多疑，但更现实。他讨厌卖弄技巧的外交手腕，对不是自己当前关心的机遇不想浪费精力去进行探讨，但他也不是西方许多人描述的鄙视文墨和会议桌的人。对这些西方人来说，他似乎痛恨外交，因为他不愿超过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把东西两个战场交织在一起，他要为瑞典在东战场保持行动的自由，在西战场也留有余地，一旦需要以及机会正好出现，瑞典也可采取主动。对他兴趣范围之内的事，他鼓励发出外交触角。波兰与乌克兰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接触就得到他的赞许，因为他们与打俄国人有关。事实上，自1702年起波兰为了瑞典利益而进行这些接触的方式，就是后来查理为反击反瑞典联盟的发展而进行的全欧外交的先兆。他也不是不知道宣传的价值，“貂”（他的拉丁文笔杆子）用技巧性很强的公开声明和散发小册子积极争取波兰追随者。^[12]当然，呈现在欧洲各国首都的一位从事正义战争、只希望收回被别人夺走的东西的国王的宣传形象并不是事实全部。他的宏伟的但也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吞并库兰和波属利沃尼亚来解决瑞典东部问题；在他的帝国和俄国之间设一缓冲国波兰，波兰要割得俄国一些领土而扩大，波兰要由亲瑞的国王来统治，波兰国王对宗教事务要能容忍，并让东方的贸易通过瑞典的波罗的海港口——这些理想都有意地掩盖起来了，这些理想是查理的象征，也是他荣誉感和正义感的象征。

国王有许许多多机会来证实自己是个武士。第一场大战是1702年的克里斯祖战役，这是他担任统帅后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伦斯舍尔德与他分担责任。他的指挥才能显示在他对战术形势的突然变化能立即作出反应，大大地帮助了1.2万名瑞典人打败了奥古斯都的1.6万名萨克森人和6000名波兰人。1703年的托伦包围战从技术上看虽不是他指挥的——他有一次说，“我从来没有多少包围战的经验”^[13]，暗含他也不太喜欢包围战——却充分表明他把握了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

斗：打败一支大的萨克森驻军，影响了普鲁士的政策，与瑞典本土有了迅速、安全的联系路线，取代已被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诸省的活动所破坏的联络路线。1704—1706年，进一步显示他战略天才和如何经济地部署军队的天才成熟了。当他需要腾出手来到波兰为斯坦尼斯拉斯获得当选，便把奥古斯都的军队遏制在帝国境内。后来在波兰东西两翼同时开战，以减轻对波罗的海沿岸诸省的压力，并阻止俄—萨在波兰协同作战的计划成熟。瑞典的举措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希望抓住奥古斯都在克里斯祖战役和托伦包围战失败后又组建起来的最新和最后一支军队，或抓住彼得派来帮他盟友的奥杰尔维军队。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侦察（都是在经验这所严厉的“学校”里学会的），终于在1706年初取得了胜利。为俄国人在格罗德诺设了陷阱，但俄国人逃脱了，不过他们还是被迫撤出波兰；伦斯舍尔德2月13日在波兹南尼亚的弗劳斯塔特大获全胜，实际上宣告奥古斯都对瑞典大波兰计划的抵制结束了。

在波兰的岁月不是没有挫折。波兰这个国家的天性以及查理在波兰的危险处境，就说明其不会轻易取胜，尽管德萨克斯元帅已“为每个在波兰打仗的人”^[14]在纸上计划好了胜利。挫折也铸造了国王的性格，在这方面丝毫不亚于胜利对他的影响，因为挫折增强了他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深化了他的宗教信仰。他很温柔，但有时也会跳出不和谐的、因痛苦而咬牙切齿的音符，那是在瑞典士兵成了游击战的牺牲品倒下时，他给伦斯舍尔德和马格奴斯·斯坦博克的信中出现的。^[15]由于大多数波兰人朝秦暮楚，且一再跳槽——他真的不懂他们“叛变”的动机——而且由于无法与波兰各个派别建立起稳定的盟友关系，查理便横下心来自己单干。在一个非正规战的国家里打仗，保守军事计划的机密是高于一切的，这使他下达命令时沉默寡言，不说明目的，以致他的军官们一次或两次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允许他的随军政府对他提出许许多多坦率的批评，但最后还是由他拍板。一旦决定作出后，他就非常固执，这是他的本性。但是，如果派帕、赫梅林和策德希尔姆（随军政府中三个最高官员）施加了很大压力，而且有充分理由，他有时也会收回成命。他十分勤奋，侦察和骑马巡视是他唯一的休息，他也会看望一下驻在一定距离之外的老朋友。社交活动——一位受尊敬军官的婚礼、欢迎一位贵宾的招待会等——他只是出于礼貌，或想听听国内的消息而参加一下。他很深情，但只有在他

给自己姐妹写信谈及他对有些自愿参军的年轻人，主要是对符腾堡的马克西米连（他13岁就把自己交给了查理）表示关心时，他会让自己的感情宣泄一下，他说，“我跟军队结婚了，至少是在战争期间”，这就是他对自己单身独处光棍汉的解释。当代人和后代人曾对他不近女色感到迷惑不解，现在从国王遵守教会的教导和他需要为手下人树立榜样中获得了一些解释。非常了解国王的人说国王对女人绝不是无动于衷：一方面他持有年轻人浪漫的恋爱观，因而不会乱搞男女关系；另一方面他想他是统帅，如果仍是独身，他的精力就能全部集中在他的职责上。我们掌握的证据又进一步指出他是在控制人的天性爱好，而不是他性功能失常。他告诫自己要少吃点，少睡点，不要喝浓度高于低度啤酒的饮料，提醒自己在外界要很自然地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情，以至每天看到他的军官也猜不出他的情绪。他研究如何将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自我控制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注入军队，使军队坚强，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有进攻精神。“与军队结婚了”，这句话虽然一半是俏皮话，但含义很深。查理对士兵物质和精神生活很明显地关心，对他自己和对士兵的职业信誉的自豪感，那些精辟的语言（它们变成长了翅膀的语言）以及将自己意志刻在军队身上的奇妙办法——所有这些都是相互依赖、相互爱慕的外在表现。作为军人，他是完美的，凡在国王帐下效命过的人对他都说不出一个不好的批评字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军队之外为瑞典效劳的人却经常批评指责他，这个事实也部分说明为什么会对他有“杰出的将军，拙劣的政治家”的肤浅的总结。从规律上看，当情况不妙时，这些批评就会出现在私人通信和官方备忘录里，以发泄他们沮丧的情绪，或是他们想到自己前程难保——因为国王可能战死，他们不想为国王的政策承担责任。同样还是这些人，当国王政策成功了，他们调子也立即变了。这些批评注定是短命的，为士兵代写家书的人自然会感到愤慨，这些暂且不谈，但这些批评产生了经久不衰的摩擦因素。查理太聪明了，不会进行过火的冒险，毫不动摇地坚持其激进的解决办法，决不妥协，决不搞暂时解决，死抱住他原来的关于瑞典未来的大版图的想法不放。甚至在胜利的时刻，政府里那些跟国王一样爱国的官员也担心国王“弓拉得太满了”^[16]。

跟波兰签订条约和弗劳斯塔特大捷之后，一切焦虑不安都消除了，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跟波兰的条约，无论对实现瑞典计划多么有利，还是毫无价值，除非迫使奥古斯都公开表示同意让

位。迫使他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打进他的老巢。北方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达到这样的阶段，即大同盟国家对瑞军进入神圣罗马帝国即使不欢迎，至少也不会积极反对。查理说当反法战争进展对盟国不利时，他没有去骚扰帝国，但布莱海姆战役和拉米伊战役之后，他就没有必要再约束自己了。所以1706年秋初，他越过西里西亚领土，进入萨克森，萨克森的新教徒向他苦苦哀求，请他将他们的苦衷告诉奥皇，他们的教堂也被关闭了，这是违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瑞军的到来造成一片恐慌。他们刚到选帝侯边境，萨克森人就急忙与瑞军达成协议：奥古斯都放弃波兰王位，承认斯坦尼斯拉斯是波兰国王，交出帕特库尔，允许瑞军冬天待在萨克森休整、等候新兵到来，以及更换破旧服装和装备。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9月24日签订的《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17]中。

条约保密了一段时间，欧洲对查理的意图很不摸底。西线交战双方都在寻求他的帮助。1707年马尔巴勒来到阿尔特兰施泰特，部分原因是想抢先一步，阻止法国人来做有影响的瑞典人的工作，把他们变成“法国派”；部分原因是缓和查理与奥皇之间的摩擦，缓和瑞典与那些向“大同盟”提供士兵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关于这次来访有个公开的解释：马尔巴勒希望会晤一位像他一样的王室要人。这话也是真的。从瑞典角度来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706—1707年会维持下去；双方看来势均力敌，没有立即和平的前景。^[18]这意味着瑞典在东线采取主动就有了宝贵的机动余地。

消息灵通人士对查理十二世下一步行动从无多少疑问。在萨克森停留期间，他就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对进军俄国做准备。彼得斩钉截铁地宣称，他宁愿冒险再打10年也不会放弃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因格里亚，他1704—1705年征服的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领土无论丢失多少也在所不惜。虽然奥古斯都批准了和约，甚至几次相当友好地会见了查理，但查理还是要等自己想出他去俄国后如何还能控制奥古斯都行动自由的办法后再离开萨克森。查理由于未能获得普鲁士的帮助（请他们出辅助部队，驻扎在波兰，由瑞典指挥），他就寻求海上大国对斯坦尼斯拉斯的承认（最好是以保证波兰与萨克森和平相处的形式），这就给奥古斯都重返波兰设置了一道障碍。马尔巴勒保证去搞到这份保证。荷兰人则不愿在俄国打响之前作此承诺；他们发现俄国对待他们的货船非常慷慨，至少在他们暂时控制的瑞典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是

如此；他们还觉得东波罗的海有俄国来与瑞典竞争比瑞典一家垄断要好。这些理由对英国商人也产生了某些作用。但对白厅来说，查理给马尔巴勒许下的一个保证（为获英国的保证而许下的）分量更重。他证实瑞典要保持中立，保证瑞典军队一旦能够做到，就马上去支持同盟国。查理越快去处理彼得，他就越早能拿出军队来帮助同盟国。至少英国于1708年承认了斯坦尼斯拉斯。^[19]荷兰人既不承认斯坦尼斯拉斯，也不为1706年的萨克森的和平担保。因此在打俄国之前，瑞典在保护其后方安全中便存在一大隐患。我们知道这在瑞典统帅部引起深深的忧虑。^[20]

进攻俄国的精心准备工作已就绪。从瑞典来的新兵已经抵达；德国志愿兵已组成他们自己的龙骑兵团；开始向俄国进军的陆军总数约4万人。^[21]突击方向是绝对保密的。通过波兰中间人一直与乌克兰哥萨克的头目马赞拉、克里米亚的大汗德夫莱-吉莱伊，以及他的主子苏丹保持联系，一旦国王查理认为必要，他就可与他们进行更密切的接触。网撒得这样开是瑞典准备工作的典例，也是查理十二世“在情况更明朗之前”绝不会死抱住一个方案不放的典例。现在我们知道，查理不可更改的最终目标（即迫使彼得放弃占领瑞典的几个省，接受对瑞典和波兰有利的新边界）受到了变化了的手段的限制。虽然今天讨论查理在俄国的作战方法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据从确实发生的事情中推演出来的结论，但材料依然很少，随军政府的大多数文件已在1709年7月10—11日按国王的命令销毁了。^[22]

战斗开始时战绩喜人。查理一直使俄国人猜不透会从哪个方向打进来，最终他选择了一条从来没有大队人马走过的路线——马歇里安沼泽地和丛林地区，从而一枪未发就迫使俄军撤出波兰。想当年（1706年）瑞典人进入萨克森时，俄国人立即蜂拥而来，打入波兰，希望把波兰变成查理和彼得较量的战场，就像它曾是奥古斯都和查理较量的战场一样，并努力使俄国为波兰挑选的国王拉科西（匈牙利的诸侯^[23]）获得支持。留在波兰的瑞典军队有5000人，由克拉索指挥，任务是帮助斯坦尼斯拉斯维持国内秩序，并担当预备队的核心。斯坦尼斯拉斯本人则随同查理大军一直走到拉多齐科维采。直到1708年夏初，俄国人还不知道瑞典的拳头是要砸在波罗的海诸省还是莫斯科本身。这几个省打了几年后业已精疲力竭，有些地方已无人烟，因为彼得已把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运走了。查理决定向俄国进军也是希

望老百姓免遭更多的苦难。但主要原因是他的东欧计划的实现有赖于决定性地战胜沙皇，而这个决定性的胜利只有在俄国领土上才能取得。莫斯科受到的威胁就像1700年攻打泽兰以后哥本哈根受到的威胁，1706年进攻萨克森后德累斯顿受到的威胁一样。[\[24\]](#)

去莫斯科有4条路：第一条是从波罗的海诸省出发，经由纳尔瓦和诺夫哥罗德；第二条是从波兰和立陶宛出发，经维尔纳、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第三条是再向南，穿过塞维里亚和乌克兰（经基辅和卡卢加）；第四条是从鞑靼和土耳其出发，通过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和他们在贝埃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图拉的据点。莫斯科有几条大河作天然屏障：别列辛纳河、第聂伯河、杰斯纳河以及它们许许多多支流——要进莫斯科必须先过河，不论你选择哪一条路线。查理使防守一方捉摸不定，迫使彼得对两条北方路线都作防御；现有证据说明，驻在波兰的瑞军不仅仅是作为预备队，同时也是一支次要方向的军队，沿着南方（即第三条）路线打进去——1708—1709年又使哥萨克和鞑靼人沿着第四条路线打进去——或至少作为佯攻，以便瑞军主力通过斯摩棱斯克向前挺进。渡河时可能会发生战斗，查理的计划是将俄国人调开，避免在维斯杜拉河发生战斗，当瑞军接近俄国边境时，要诱使俄军按兵不动。

瑞军一路前进，顺利至极，开始渡过几条河未费吹灰之力，不是绕过了俄军，便是用佯攻把俄军引开了，被誉为指挥艺术的典范。但俄国士兵再也不是纳尔瓦战役时一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了，他们已是经历波罗的海之战，组织得非常好的老兵了，经常有在波兰的辅助军队的经验。尤其是，彼得和他们的将军们已有考虑周全的防御方案了。由于事关存亡，由于圣彼得堡已经建立起来，他们会进行英勇抵抗的。他们像瑞典人一样决心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在佐尔基也夫开了个会，决定保存军队实力进行决战：俄国人往后撤，只有在情况最为有利时才打，把庄稼和村庄烧毁，断绝瑞典人的给养——不仅是在立陶宛和波兰领土上，而且在俄国境内也是如此。[\[25\]](#)俄军在霍洛维茨（在瓦别奇河畔，1708年7月14日）第一次进行了认真的规模很大的阻截，不让查理取得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大路。瑞典人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但代价很大，伤亡惨重，特别是军官，而且他们又不能利用这次胜利，因为俄国撤到了新的有坚固防御的阵地。查理对前面任务的艰

巨性从未低估。瑞典人从沉重代价中知道，他们越接近俄国边防，防御就越比进攻占有优势。

到了夏末，查理还有一个不利之处：要等候由莱文哈普特率领的从波罗的海省份开来的援军（由于彼得已撤出因格里亚以南地区，守卫波罗的海诸省的他们就可来增援）。援军除1.2万军人外，实是一个巨大的活动供应仓库，带来粮食、弹药和装备。原定7月底会合，但莱文哈普特迟到了，主要由于这年夏季气候极不正常，雨水太多，路很难走。查理焦急地等了几个星期，整天忙于行军和反方向行军，不让俄国人闲着，但他受了不正确的报告误导，把莱文哈普特跟他的距离判断错了，决定部队转向南，去塞维里亚。此时，人缺粮食马缺草。侦察结果表明，俄国实行焦土政策，边境内“太阳一天又一天被烟遮没”^[26]，因此这个秋天根本不可能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打下去。在此情况下，向南是很有道理的，让莱文哈普特到塞维里亚与瑞军主力会合，而且也可试试能否以更快的速度突破俄国防御。这里还可利用马赞拉的力量。马赞拉一直在挑拨俄国与瑞典和波兰的关系以争取时间，众所周知他要乌克兰自治。9月25日，查理在苏境内数英里处掉头向南了，而莱文哈普特此刻却在第聂伯河的那一侧——俄国人派出了数不清的侦察分队，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弄清楚了。彼得决定，在莱文哈普特与瑞军主力会师之前，便以自己主力将他阻截。至此，供应列车除了被查封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命运了。10月9日发生莱斯纳贾战役。虽然这场战役从技术上看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但瑞典装运粮草弹药的大车全部丢下了。由于决定用南线取代进攻俄国的北线，这点损失连暂时的挫折都算不上——塞维里亚和乌克兰两个基地盛产粮食——但是，甚至在查理听说莱文哈普特被困在浓密的丛林地带，他的部队又不可能及时渡过河去救他们时，又有更严重的灾难降落到查理头上：俄国军队先瑞军先头部队一步，抢占了塞维里亚通道和据点。这样瑞军主力被迫走上一条路程更长、更加艰险的路去乌克兰——克里索尔丛林。就像希腊悲剧一样，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马赞拉还不准备接待瑞典人，在瑞典与彼得的斗争有分晓之前，他对查理的强制命令只说声“见鬼去吧”。所以俄军拿下哥萨克的首府巴图林，将城里宝贵的供应物资都装袋运走，为所有支持马赞拉事业的人做个榜样，杀一儆百。

俄国人一直企图切断查理的邮件往来——也取得相当大的暂时成功——查理与波兰和瑞典只剩下最宝贵的联系了，但他仍准备重新开战。钱不是问题：瑞典人带了钱票，各地都会接受。供应也能搞到，与鞑靼和土耳其也联系上了，春天调来了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的辅助部队，如有必要再从瑞典调来援军。1708—1709年乌克兰的冬天像西欧和北欧一样严酷，破坏力比打仗伤亡还大。1月3日到4日夜^[27]，许多瑞典人，特别是躺在车上的伤病员挤在哈德雅奇小镇的城门下，缩成一团。他们冻得要死，或是身受重伤，因为他们找不到一间房屋，虽然他们比俄国人先一步赶到这里。1月17日攻打小城维普里克，结果失败，主要原因是城墙成了坚硬的冰块；多少杰出的年轻军官在维普里克丧生。夜幕降临很久后守城部队投降，即使如此也不足以抚平全军将士的悲哀。毫无意义的损失再次促使查理滋长残酷无情的弱点，就像在波兰一样。经过紧张频繁的袭扰之后，卡尔抄袭了俄国人的焦土战术，将军营四周变成荒土地带，尽管对百姓生命有点仁慈之心。安全的冬营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709年春，瑞军虽然少了5000—8000人，但更坚定了，包围了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小城波尔塔瓦（此城在沃尔斯卡拉河畔，这条河是第聂伯河下游的一条支流），与鞑靼人、土耳其人进行了谈判，与瑞典本土和波兰恢复了联系。查理十二世事实上控制了沃尔斯卡拉河以西地带，彼得将其军队带到河的东面。不可否认，查理军事行动的节奏慢了下来。由于1708年没有惊人的战绩，波兰境内反斯坦尼斯拉斯势力又复活了^[28]，特别是俄军回来后，他们希望波兰内战重新开火，他们成功地牵制了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与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谈判有了结果，同意4月份进行配合，但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在估量出查理成功的前景之前不愿作出任何保证，就像1708年的马赞拉一样。随军政府里的派帕和其他人建议暂时撤回波兰基地，这是最安全的方针，因为和平触角已经放出去了。结果彼得像1706—1707年一样坚定，决不放弃圣彼得堡。另一方面，查理正在寻求一场长面子的胜利，以便争取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如能适时攻克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波尔塔瓦，或使俄国军队按他的选择跟他打一仗就好了。然后向前推进的时刻就到了。俄国人此时也在寻求决定性的胜利；但他们小心翼翼，对查理仍有点畏惧，同时他们还在外交上采取主动，企图使卡尔得不到

土耳其—鞑靼的帮助（克里米亚汗德夫莱-吉莱伊正在为获得这种帮助而向土耳其政府做工作）。

一件意外事件帮助解决了问题。彼此为考验对方的阵地便不断地隔河射击，一颗流弹击中了查理的脚步。国王显然不能亲自率领军队了。在此情况下，彼得决定冒险一战，但不是向瑞典人发起进攻，而是命令整个大军渡过沃尔斯卡拉河，挖起战壕，让瑞典人来攻打他们的设防阵地。到了7月8日，一切部署就绪，瑞典人被迫先攻。好几个不幸事件又同时发生，打乱了查理的计划。俄国人在头天夜里修筑了两个多面碉堡，瑞典侦察兵居然没有发现，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步兵一支精锐部队到了那儿后前进受阻，与主力隔开，士兵被打得往后跑，被俄国人一个个杀了。主攻方向仍在坚持，瑞军痴心希望失踪的步兵能赶上来，重新加入进攻；查理的副官一个个都倒下了，命令发不出去了；最后，俄国人干出一桩使瑞典人太感意外的事——冲出阵地，在瑞军战斗队形恢复之前主动向他们发起攻击。^[29]瑞典将军们相互埋怨指责。年纪大的军官毫无疑问累坏了，不愿承担战场上的最后责任（这一直是国王的责任）。然而今天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人：是7月8日一颗子弹把国王与军队隔开了；也许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人的战术和士气有了极大提高。今天历史通常都说“兵败”波尔塔瓦，但当时瑞典有个提法：一次对既设阵地半途而废的进攻。此提法也颇有道理^[30]，尽管瑞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1万以上。将这次不成功的进攻变为失败的是7月11日1.5万瑞军（瑞军残存部队的大多数）在佩列沃洛钦纳缴械投降。

查理指挥撤退。^[31]他先是建议在瑞军搜集了行囊和大炮的地方再打一仗，后来还是同意向南走，这样与鞑靼人以及与波兰进行联系更方便。渡过第聂伯河不容易，没有渡河工具，因为5月份俄军袭击扎波罗热的据点，几乎把所有的船都烧光了。大家敦促国王先走，去奥恰科夫，与鞑靼汗和土耳其苏丹进行谈判，把部队带回波兰；国王要尽早与波兰和瑞典重新取得联系——总而言之，用现有一切手段把波尔塔瓦闹剧的后果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也消除国王被俘的危险，因为得知彼得已派出部队来抓他。军队则来到一个只有几个陪伴瑞军的鞑靼人才知道的渡口，能否渡过沃尔斯卡尔河只能听天由命了。渡河以后就去克里米亚，与国王会合。这应该是办得到的，但是无理性的因素猖獗起来。高级军官们，莱文哈普特和克鲁茨-伦斯舍尔

德在波尔塔瓦被俘，随军政府的主要官员也被俘——精疲力竭，几乎毫无斗志了；他们对鞑靼人怕得要命，却不怕被俄国人逮去，因为俄军军官主要是德国人。许多瑞典人没精打采，或只想保命，特别是国王带领1500人——包括马赞拉和哥萨克人——走后。彼得肯定要向马赞拉报仇的。查理十二世永远不能原谅佩列沃洛钦纳的投降。他认为，莱文哈普特的责任不是让各团团长决定是降是打，更不是压他们表态，而是确保部队突围，或跟追上瑞典人的俄国骑兵打一仗，俄国骑兵分队人数相对不多。这话毫无疑问是真诚的^[32]，但缺乏对人的动机的了解，这也许是国王作为将军和政治家最突出的弱点。他不能，也不会去捕捉波尔塔瓦和佩列沃洛钦纳之间的联系。

瑞典国王从土耳其土地上努力弥补波尔塔瓦战役造成的损失。在他的帮助下，许多有影响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要立即去跟俄国人算账；查理在等待他留在俄国和波兰的部队的消息，并指示瑞典将他损失的一切补齐，但他没有想到还要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关系作为今后合作的基础。他的目的是以波兰为基地，用克拉索-斯坦尼斯拉夫的军队，加上他自己的残部和从瑞典来的新军，继续跟彼得打。查理在他的脚伤治愈之前不可能考虑离开土耳其，但他相信，既然苏丹答应护送他，他在冬天降临之前能够与波兰的克拉索部队会合。查理在企盼中在土耳其度过了4年。^[33]由于敌人积极抓住许多机会，使他无法动弹。俄军立即洪水般地扑回波兰和波罗的海诸省；瑞军在佩列沃洛钦纳投降一事不予追究了（俄国答应瑞典降军军官：他们立下誓言后即可获释回国）；奥古斯都又回到波兰当了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不得不退回瑞属波美拉尼亚；反对奥古斯都的几股波兰部队在路上跑了很长时间，要经匈牙利去土耳其边城本德；聚集在本德的瑞典人、哥萨克人和波兰人最终达到4000人；由于瘟疫，1709—1714年土耳其和哈布斯堡的边界封锁。法国和海上大国提议用船将查理送回瑞典，查理不喜欢把自己完全交到西线敌对一方手中，以致限制他今后的行动自由，便断然拒绝。他要从波兰回国，并死抱住这个希望不放，但这就要新派一支瑞典军队在帝国登陆。与此同时，他继续做土耳其人工作，让他们重新占领亚速，向俄国人宣战。

在斯德哥尔摩，参政会完全忙于丹麦问题。腓特烈四世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重新参战。1709年年底，丹麦和挪威从两个方向向瑞典进犯。与此同时，由卡尔·腓特烈公爵的亲叔叔代他治理的荷尔施泰因

一哥托普被敌方占领（卡尔·腓特烈1700年生于瑞典，在瑞典长大）。^[34]被长期战争打得有气无力的《特拉凡德尔和平条约》的保证国觉得它们已无力阻止，并认为查理十二世应倾听和平的声音，而非考虑再与彼得开战。在1710年3月和12月的海牙和平协议中，海上大国保证瑞典占有的帝国领土的中立，这是保持德意志和平安宁和让丹麦、萨克森军队去打法国的唯一办法。这项保证原是对瑞典有利的，如今却完全破坏了卡尔的计划：利用瑞属波美拉尼亚作为基地，从瑞典来的增援部队便可从此基地到达波兰和他自己身边。他反对这条和平协议，与海上大国关系由此产生裂痕，而且从未愈合。查理和参政会对海上大国持不同态度（参政会认为海上大国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35]，这一分歧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误解。国王和参政会相距太远，无法很好地一起工作。国王希望参政会有了阿尔维克·霍恩及马格奴斯·斯坦布克等军人的加强后，给他送去一支新军去攻打俄国，以支持他更大的战争努力，实现他这一首要目标。参政会只见眼前危险，对瑞典面临的形势太悲观，从而给国王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最喜欢的姐姐的死使查理受到沉重打击，也只是从个人爱好（现在有时间恢复这些爱好了，如给特辛写信谈建筑、赞助瑞典人从土耳其到圣地远游等）中才慢慢恢复精神平衡，因此查理对参政会的大多数人失去耐心，捡起一个新的话题：加快动员瑞典丰富资源以进行战争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的改革。查理买了许多书，与本德随行人员中最有学问的人，主要是卡斯腾·费伊夫进行讨论。费伊夫是随军政府官员，对当时的财政和重商主义理论很感兴趣。查理开始给瑞典国内一些人写信（这些人后来成为改革家），费伊夫充当国王的秘书。这样查理1714年后改革活动的基础就在土耳其打下了。与此同时，他在本德期间与参政会和瑞典行政机构打交道（即在累进税的征收问题上）的经验说明，这些机制以后不可能成为执行他意志的机制。他也只是在削除参政会对陆军的所有责任，并将陆军的全部责任交给参政会一个委员，即马格奴斯·斯坦博克手里以后，他的德国登陆计划才获得生命（陆军后来在大陆上支持他）。

1710年拯救瑞典的是斯坦博克，是他将丹麦人从斯康尼亚赶走。到1712年他已将1.6万人运到瑞属波美拉尼亚这个小小的狭长地带（这地方经受了1711年敌人的进攻，现仍控制在瑞典手中。敌人进攻的借口是查理十二拒绝接受海牙和平协议关于这些地方坚守中立的条款，

海牙和平协议的保证国对此进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斯坦博克登陆后不久，他的供应船队被丹麦人完全摧毁了。现在看来这是战争所有挫折中最最致命的一个。这迫使斯坦博克离海岸近些，希望国内送来供应品——这真是希望天上掉馅饼，而他自己不去搞钱、搞船。因此虽然1712年12月他在加德布施战役中打败丹麦和萨克森联军，却不能充分利用这次胜利。斯坦博克由于未能按计划突入波兰，便攻打日德兰半岛，以迫使丹麦退出战争。但1713年1月他被占极大优势的萨克森、丹麦和俄国军队团团围在荷尔施泰因的一个碉堡（托宁）里面，5月他只能投降。

在获得加德布施战役及以后战事的消息之前，查理在土耳其的地位已很危险。他已看到奥斯曼三次向俄国宣战——三次宣战皆因瑞典对土耳其政府外交艺术发挥作用——从瑞典利益的观点来看，三次宣战都浪费了，主要是因为瑞典在军事上太弱，也未能与奥古斯都结成反俄同盟（奥古斯都对俄国在波兰太上皇作风真正感到厌倦了），又未能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结成反俄同盟，尽管腓特烈对俄国的亲近也感到十分震惊。现在，查理愿意牺牲波兰，如果这能促成一个稳固的反俄联盟的话。但是无法按特定的条件达成协议，障碍还是原先的障碍，即查理坚持要用具体的军事义务作“保证”，而奥古斯都和腓特烈——从1713年2月起便是接他位的腓特烈·威廉一世——脑子里想的是风险少得多的安排：他们要瑞典作出让步，自己又不投桃报李，保证进行军事合作。本德和斯德哥尔摩都认识到，普鲁士失望后很可能会加入瑞典敌人的阵营，对汉诺威的意图也无把握——但也不太紧张，因为两者有传统的友谊——这位选帝侯担心丹麦征服不来梅和凡尔登，便计划自己去占领瑞典这两块属地。

不过1712—1713年冬天里最迫切的问题是查理作客的土耳其主人的态度。他待的时间太长，不受欢迎了。他对土耳其邻国的敌对态度跟他虚弱的军事力量很不协调，甚至起初支持他的（土耳其）人也开始跟奥古斯都的特使进行谈判将他赶走。土耳其派人护送他回国的的问题终于落实，但瑞典截获的信件透露：原来土耳其和鞑靼人有个阴谋，将查理交给奥古斯都或俄国人处理，办法简单而便捷——到达波兰边境时土耳其护送人员立即消失。因此有查理的困兽之斗，即1713年2月在本德发生的一场喧闹：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收到命令，要把查理赶出土耳其，“如果必要就用武力”，查理则故意顶住。查理成功地

揭露了奥古斯都外交官与土耳其官员之间的阴谋。^[36] 他也曾一度再次点燃在平等基础上与土耳其苏丹进行合作的希望之火，那是在他听到加德布施战役胜利的消息和接踵而至的土耳其向俄国宣战的时候，只是斯坦博克在托宁投降后，这个火最终熄灭了。很明显，查理按自己意志回归瑞典的时候已经到了，目的是使饱受长期战争和瘟疫之苦而垂头丧气的瑞典镇静下来，咬紧牙关挺过去；对国内威胁专制政府的人进行反击；去动员国内经济资源，并寻找新的方法去对付瑞典的敌人。查理经过1700—1701年从和平向战争过渡的初步困难后，整个1701—1709年期间他做到了“以战养战”（let the war pay for the war）；但他和他的顾问们如今深信，为迫使有钱人作出牺牲，为对国家经济进行改革使王室能拿到钱和信贷去进行战争，当前国王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进行战争而且要面对波罗的海省份和大多数德国属地业已丢失的事实，尽管相信这些损失是暂时的）。

经由波兰回国的路线不再有何实际意义了，因为土耳其政府决心与威尼斯交战^[37]，跟彼得和奥古斯都两人都签了条约。讨论查理十二世经帝国领土回国的问题终于开始了，卡尔六世同意让查理和他的一支小部队和宫廷人员进入德国。为了政治上大肆渲染哈布斯堡在北方大战中的调停作用，皇帝试图为瑞典国王安排一个正式的欢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查理越过土耳其边界后，便坚持要在其余瑞典人前面先走，不动声色地微服潜行。他先是坐驿递马车，后又索性骑马，一路快马加鞭，仅两个星期便赶到斯特拉尔松德，到城门口时是1714年11月20日深夜或21日凌晨。此城和维斯马是瑞典在德国仅剩的港口了。1712—1714年，汉诺威把凡尔登拿走，普鲁士把什切青拿走了。

查理在土耳其给他妹妹乌尔里卡·埃里奥诺拉写信时已梗概地把今后政策勾画出来（他不在国内期间就把妹妹视为摄政）。在这些信中他最坦率地用笔将他的意图写了下来，要重新组建一支军队。与此同时要通过秘密外交将敌人分离开来，一是为了争取时间，二是试探一下能否与它们中的一个缔结单独的但必须是合理的和平条约。他不会缔结一个思想上有保留、不准备遵守的和平条约，必须是持久的和平。他遭受挫折以后，愿意考虑交出瑞典领土，但在获得瑞典领土的国家帮助下换回相等的领土；他并愿考虑暂时割让瑞典的港口和土地（加上它们的收入），他反对军事援助，但不反对单纯的贷款。军事

形势尽管很严重，但不是不可扭转的。奥古斯都不再称得上是重要的敌人，他已深陷波兰纷争的泥潭。波兰在事实上被俄国占领几年后，反俄情绪很强烈，同时亲瑞派在听到查理回国的消息后力量又恢复了。丹麦经济不支，不能单独发动对瑞典的进攻。危险更大的是普鲁士和汉诺威，它们的敌意一半伪装起来，但都热切希望继续抓住那些从瑞典帝国领土上以友好的名义分割出去的地方不放。一旦汉诺威的选帝侯变成英国乔治一世国王后，它就是更危险的潜在敌人。俄国虽然也像瑞典一样，打得精疲力竭，但也跟瑞典一样决心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来，所以俄国仍然是瑞典最可怕的手。芬兰经过这么多年战争之后已被（俄国）征服，瑞典本身也受到了俄国战船的袭击，瑞典还不能与俄国战船较量，尽管查理早就下令建造一个中队的战船。[\[38\]](#)

国王回来后，一段活动紧张的时期开始了。乌尔里卡·埃利奥诺拉出嫁黑森之事已谈了很久，现在已成为事实了。黑森的腓特烈是伯爵嗣子和继承人，野心勃勃，总想效仿德国几位到帝国以外国家去当国王的诸侯，但查理却认为他是一个亲信，认为他比1702年在克里索战役中丧生的另一位姐夫[\[39\]](#)更有打仗的经验。由于瑞典前景改善，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行政长官又参加进来了，将他官员中能干的G. H. 冯·戈尔兹借调给查理。他是理财天才，愿意帮助在国外筹款。现在看，戈尔兹对查理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部分原因是他后来成为国王在国内采取的所有不得人心措施的替罪羊所致。事实上查理是政策大纲的始作俑者，政策通常是他跟所有信得过的顾问，瑞典顾问和外国顾问商量后定下来的，戈尔兹只是他许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而已，虽然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工具，因为他能力很强，对工作十分投入。他在1709—1714年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谈判中，努力保护失去瑞典支持的荷尔施泰因—哥托普的利益，结识了反瑞同盟中一些有价值的人。正因为认识这些人，他在外交中日益显得突出。

查理决心守住斯特拉尔松德和维斯马，只要血肉之躯能办得到的话，目的不仅是把战火推到远离瑞典大陆以外的地方，以及争取时间让黑森的腓特烈在瑞典东海岸组织起对付俄国的防御来，而且也是为了把佩列沃洛钦纳忘得一干二净，并恢复瑞典军队的光彩，即使通过英勇壮烈的失败来做到这点也在所不惜——现在智斗刚刚开始，在智斗的战场上军队的光彩是一笔实实在在的财富。汉诺威和普鲁士正式加入瑞典敌人一方[\[40\]](#)，而且及时得很，分别赶上参加包围瑞典最后

两个在德国的属地的战斗。正是在保卫斯特拉尔松德的一年中，在他从本德回来以后，查理第一次发下诏谕，要更加紧张地动员瑞典全国资源。查理在斯特拉尔松德投降前最后一刻才离开这个小城，于1715年12月13—14日到达瑞典南方。维斯马也继斯特拉尔松德之后于1716年4月沦陷。

国王在土耳其期间计划好的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现在付诸实施了：成立了6个探险队，每个探险队有位大臣领导，他们与国王保持密切联系。6个探险队与旧的、管的面很窄的政府分开，旧政府成了专管外交的专业部门。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压缩，但已相对无权，无力对抗改革，因为又成立了新的管理全国经济生活的官僚部门，管理手段是空前的（也是遭人痛恨的）。按国王意志设置的新部门中最重要的是“**税务署**”（Kontributionsränteriet）和“**借贷署**”（Upphandingsdeputationen）。税务署执行国王激进的累进税政策；借贷署负责安排国债和向国外贷款，以及将短期贷款转为有固定利息的长期贷款。^[41]这是第二次宣布强制将铁卖给国家（以便高利润转卖到国外）等不得人心的措施，并限定瑞典境内商品的最高物价。到1718年后，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也已完成（这项改革是为了鼓励各省在经济领域里的主动精神）。瑞典铁的垄断地位是用来哄抬铁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然而其他国家对铁的需求竟是这样迫切，甚至英国1717年2月禁止与瑞典贸易也未达到目的。英国希望以破坏查理私人海盗船战争来反击（查理用海盗船打击与俄占瑞典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同时打击查理勾结英国退位国王詹姆士二世拥护者的詹姆士党人的阴谋，但英国人还是要从中介商处买铁，花钱更多^[42]，而查理仍坚持其私人海盗船活动和与詹姆士党人相勾结的阴谋。与詹姆士党人的谈判，通过法国途径已经开始了并在继续，部分原因是戈尔兹看到，谈判是为瑞典取得钱和船的一种手段——虽然查理还钱的条件是詹姆士党人对计划承担真正的义务——部分原因是卡尔希望使乔治一世对瑞典计划有所顾忌，以及使他不能把英国海军完全部署在波罗的海对付瑞典。

由于瑞典新的陆军和海军还在组建之中，查理的军事主动当然受到制约。从1715年的冬天到1716年春天，一场攻打挪威的战争计划很快拼凑而成，但6月份便放弃了。打挪威有几个诱人之处：挪威与瑞典在其他地方损失的领地面积相当，或至少使瑞典获得一个战略上非常

有利的边界——查理脑子里想的是格洛门河——可防止将来敌人从挪威进犯瑞典。仅仅这个前景足以使瑞典参政会从1709—1714年处于瘫痪；佯攻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方面，使某些敌人捉摸不定，因为丹麦的腓特烈四世和汉诺威—英国的乔治都会受到挪威方向的威胁——对选帝侯的乔治而言，可从挪威南部进攻汉诺威，也可从瑞典经日德兰半岛进攻汉诺威；对英国国王乔治而言，可从特龙里姆地区进攻苏格兰。在欧洲方面，为分袭反瑞同盟，谈判正在进行。^[43]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乔治和彼得，受到的奉承最多，通过黑森和荷尔施泰因渠道做乔治的工作，通过戈尔兹和波兰中间人做彼得的工作。也许是主动向彼得作出和平表示的原因，反瑞同盟原定在1716年秋天进攻斯康尼亚的计划便放弃了。为了这次进攻，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已进驻丹麦；英国海军为了汉诺威的利益也找到了与这次进攻进行配合的方式方法，而此刻彼得坚持推迟进攻一年。对此的解释是，经侦察沙皇深信瑞典防御足以使这次进攻付出惨重代价。也有些迹象说明瑞典发出单独媾和触角发生了某些作用。推迟进攻斯康尼亚实际上就意味着放弃，因为丹麦的腓特烈表示来年春天他再也不能命令丹麦商人来搞运输。尽管乔治一世努力调和盟国关系，但彼得的决定在丹麦人和俄国人之间造成了永久的不信任。由于害怕沙皇在德意志的野心日益膨胀，反瑞同盟又进一步削弱：沙皇坚持，从丹麦撤回的俄国军队1716—1717年冬季要驻在德意志，这便与汉诺威的乔治发生矛盾。瑞典外交充分利用这些分歧，也没有因戈尔兹暂时被捕而受到严重影响（1717年荷兰议会在乔治一世要求下以参与“于伦鲍格阴谋”逮捕了他）。很快两套谈判并行进行：一个是查理十二世与乔治一世的谈判，通过一人组成的秘密代表团进行，往返于黑森、汉诺威、英格兰和瑞典之间；另一套谈判更为公开，但真正的讨论是隐藏起来了，地点在瑞俄之间奥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由俄国和瑞典官方谈判代表参加，瑞方谈判官员中戈尔兹是国王的首席代言人，他与国王保持通信联系，信只能由国王亲自拆阅，看毕便焚毁。两套谈判都是为了在瑞典统治者还没有做好亲自在战场上发起进攻的准备时，使瑞典敌人的联盟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尽管有故意夸大和有意误导的“官方”信件编织成的极难破解的谜团，但这些谈判就认真探查对双方满意的条件和“等同物”而言，是真诚的和平谈判。两个谈判都没有在查理十二世有生之年谈完。提出的条件对一个正在完善他统率过的最庞大军队的国王是

不能接受的。彼得拒不交出维堡以南的任何波罗的海港口；乔治对暂时拥有不来梅和凡尔登不能满意；任何一方还没有疲惫到不能再诉诸武力的时候；王位继承问题使形势变化难测；不论是乔治还是彼得，他们的王位并不安全可靠。查理跟詹姆士·斯图尔特和在流放的沙皇彼得之子亚力克赛谈判。亚力克赛死了之后^[44]，前景仍是这样：彼得要死了，俄国条件会更宽。已有谣言传出，彼得病得很重。

瑞典也存在抢夺王位的斗争。如果查理无后嗣而死，戈尔兹和荷尔施泰因派主张由荷尔施泰因一哥托普的卡尔·腓特烈，即查理十一世大女儿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而不是由小女儿乌尔里卡·埃里奥诺拉来继承，因为她已跟一个加尔文教派的人结婚，而且她是黑森推举出来的人。国王本人既喜欢他的小外甥（国王正在培养他，就像他曾经照料过符腾堡的马克斯一样），又同样喜欢他的妹妹，亲爱的“乌拉”，他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个继承问题的存在。他不停地放出暗示，一旦和平实现，他就结婚，自己生个继承人。戈尔兹是真心实意忠于国王，年幼的公爵也太无经验，一心扑在舅舅身上，不允许在查理活着的时候出现一个实实在在的荷尔施泰因派。然而黑森的腓特烈开始跟被1715年以后改革触犯过和激怒过的人勾结起来了，他们组成一个反对专制的核心力量，尽管腓特烈本人希望把专制制度尽量多保留些。

到1718年秋，重新开始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东面不需要多少军队，因为岛上的谈判还在进行。新军（组成几个独立的、适合进行合同作战的军团）转移到西面。一支7500人的分队调到特龙黑姆，主力3.6万人到达挪威的东南方。约有1.4万人部署在瑞典南方充当预备队。在边境上，弹药十分充足。军队里有包围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主要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服过役的法国人。炮兵机动能力更强了，发射速度自1709年后也按克朗斯泰德的新原理提高了。^[45]马和船都已备好了，可投入使用，当然不是用在山峦重叠的挪威，而是为了战役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将会是怎样，谁也没有把握说得清楚。1718年11月30日夜在包围弗雷德里克斯登要塞时，也就是在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查理十二世被一颗流弹打死了。^[46]

他肯定设想有一天会率领他的军队来到欧洲大陆，横扫丹麦；在瑞典本土以外找个战场仍是至关重要的，也只有在德国和波兰他才能有指望与其敌人决一雌雄。一旦查理接近丹麦和汉诺威领土时，可以

有理由期待他们向查理求和。对俄国，不能渡过波罗的海进行正面攻击，因为俄国在海上和陆上都做了很好的准备，但可以再次把它拖到波兰或立陶宛来打，甚至在俄罗斯打。然而非常可能的是查理对德意志考虑得更多些。俄国影响的扩大使帝国皇帝非常惶恐，许多诸侯也有同感，一旦查理把大军拉到德意志来，他就有了一块肥沃的外交领域。就在他死的一天前，或两天前的夜晚他曾对他的一个将军说——一半严肃半开玩笑——“我们曾打过一场30年战争，我们可能还得打一场40年战争。”^[47]但国王死前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只需几天弗雷德里克斯登要塞就会攻克的。横渡格洛门河的进攻战已经开始，国王只是将他动身的时间推迟了几天，要在前线的那一段等候戈尔兹从奥兰岛和该代表会议上带来新的消息。

查理十二世和批评他的人之间的分歧很容易被夸大。指责查理十二世好战的瑞典外交家和顾问们又何尝不跟他一样死死抱住瑞典的大国立场不放？黑森的腓特烈为集中精力争夺王位，停止参加挪威战役。他以放弃专制政权为代价为他妻子（即查理的妹妹——译者）赢得继承王位的斗争，1720年他自己登基当上国王，却继续查理的政策，在汉诺威和沙俄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他继承查理的原则：在获得实实在在的保证之前，决不牺牲任何东西。他让英国—汉诺威的外交手段胜过自己^[48]，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他希望在瑞典建立一个黑森王朝（通过汉诺威鼎力相助让他弟弟继承他的王位，如果他死后无嗣的话）。乔治和他的顾问们真心实意要瑞典与沙俄达成一个合理的和约，使瑞典成为英国在波罗的海东海岸的立足点，他也同样急于组成一个联盟，把俄国从德意志和波兰吓走。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抢在瑞典前面搞个交换：将不来梅和凡尔登交给汉诺威，什切青交给俄国，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在石勒苏益格境内的土地都给丹麦，以及瑞典放弃被丹麦占领的维斯马周围地方以后的经济补偿。这些安排反映了反瑞同盟国家相关分量，都体现在《斯德哥尔摩条约》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条约》里，这两个条约是乔治一世1719—1720年在法国外交支持下谈成的，萨克森的奥古斯都未包括在内。^[49]后来在《尼斯塔特条约》中俄国人强加了一条：在“奥古斯都国王和共和国”问题上给俄国进行调停的地位，但直至1731年瑞典没有和波兰达成和平协议。^[50]

如何获得未来盟邦军事援助的真正保证是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查理十二世对此一直看得非常清楚。当腓特烈和瑞典人为获得（未来盟国）承诺而签字画押让出自己领地时，这个难题就使他们上当了。他们勇敢地努力使乔治一世兑现他庄严的保证：提供海军支持，但瞬息万变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不可能再逼迫他为了瑞典臣民而与彼得开战。南海泡沫^[51]事件后，英国无力采取主动。奥皇被南方的问题缠住，反俄也不太起劲了。自从腓特烈在和平谈判中向乔治作出承诺以来，瑞典就一直与俄国人短兵相接打个不停，俄国舰队有时深入到斯德哥尔摩旁边的岛屿。所以，到1721年瑞典不得不求和。根据9月10—11日夜在尼斯塔特签订的条约，瑞典收回了芬兰，芬兰东南面的重要边境地区凯克斯霍尔姆和卡里利亚的一部分则除外；因格里亚、爱沙尼亚和瑞属利沃尼亚全部丧失了。

瑞典的大国地位现在结束了。它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还留有一些立足点，1719—1720年谈判结果使维斯马、斯特拉尔松德和波美拉尼亚的格莱夫斯瓦尔德区又还给瑞典，但这还不足以支持它的大国地位。有些瑞典人希望跟俄国重新开战，机会一旦出现就打，也许是在彼得死的时候。也有人希望通过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卡尔·腓特烈的帮助，用更加和平的方式收回丢失的省份（这位公爵在瑞典王位继承斗争中输给乌尔里卡后便去俄国避难，娶了彼得的一个女儿为妻），假如他当上瑞典国王，俄国会不会把那些波罗的海省份当作俄国出生的瑞典王后的嫁妆还给瑞典呢？但是多数瑞典人觉得为了大国地位已经打得太久，打得太苦，现在摆脱大国地位和摆脱因争大国地位而造成的“大动乱”也不失为一身轻松。

丧失瑞典庞大帝国的原因，自1721年以来就争论不休。这是不是查理十二世的过错呢，因为他在鸿运高照的几年里一直拒绝和平？但奥古斯都、丹麦的腓特烈或彼得到1709年会不会因为瑞典小小的让步就满足，这点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也崇尚正义的事业，并下定决心让战争骰子按上帝意志来为问题作个了结。相反，可以争论一下的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希望是不是随着查理十二世死亡而死亡了？由于失去了他个人的激情和军事天才，由于国内各种问题的再现，战绩就得受损，至少暂时是这样。已故国王大胆的冒险行动绝不是两个在他死后争夺王位的人所敢为的（至少在几个问题解决之前）。除了有争议的王位继承问题外，对专制政府还是立宪政府问题上也有分歧，贵族和

非贵族等级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紧张，大家为争夺官职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在这样的背景下，1718年打仗的冲动就没有了，陆军被召回国内，战争经费被分了，以获得更多（军人）的支持。一个偶然事故使查理十二世死在彼得前面（很有把握预料彼得是要死的了），不过从长远看，这个意外事故若与新俄国的压力相比，其影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俄国全国统一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人口至少有1000万，技术知识在增长，它已是瑞典的劲敌。一个组织精良，但人口不足300万，又是分散得很的帝国的瑞典经验证明，它如不利用关系和作出牺牲，在大国中找到一个盟友，并利用结盟的优势，那么瑞典是不能抵御它的天敌的。

（张晓华 译）

[1] 阿尔汉格尔为沙皇俄国当时唯一的对外港口，但自然条件很差，半年冰封，不能通航。——译者

[2] 最近研究成果请见M. 罗伯兹著《历史》第50卷“查理十一世”（1965年），第160—192页；参阅第5卷，第531—538页；以及《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原文第771—772、808页。

[3] 《给海因修斯的信》，斯德哥尔摩，1696年2月22日，《海因修斯档案》第3卷（1880年），第182—183页。

[4] 关于国王是否到了法定年龄的不同意见及其动机请见T. 胡吉尔的《卡洛林斯卡总会年鉴》（1942年），G. 约翰松的《查理十二世和他的顾问》（乌普萨拉，1960年）第48—74页，以及T. 胡吉尔、G. 约斯塔德和G. 约翰松之间的来往信札，载《历史杂志》，1961—1963年。

[5] 对争执的一种解释，见P. 托恩托夫著《威廉三世和丹麦—挪威，1697—1702》，载《英国历史评论》第81卷（1966年），第1—25页。

[6] 见本书原文第686—687页。

[7] 费基埃（有时写成“Feuquieie”）：《历史和军事回忆录》第1卷（1736年），第63页。关于俄国的动机，请参见S. 斯凡松著《沙皇彼得针对瑞典的动机》，载《历史杂志》（1931年）；R. 惠特拉姆著：《沙皇彼得一世》第1卷，格丁根，1964年，第191页。

[8] 参看本书原文第693—694页。

[9] 见本书原文第697页。斯坦尼斯拉斯曾向亚历山大·索比斯基保证，奥古斯都将詹姆士·索比斯基释放后，他就退位，让詹姆士当国王。见V. D. 科罗卢比著《北方战争中的大波兰》；J. 卡利契和J. 吉罗基编写的《为了获得波兰王位》，柏林，1962年，第134页。

[10] K. G. 希尔德布兰德：《波兰1704—1709年》，KFÅ（1936年）；《瑞典扩张的经济目的》（1949年），参见本书原文第699页。

[11] O. 海因茨：《查理十二世国王》第1卷（修订版，1958年，柏林），第167—168页。

[12] S. 乌尔松：《奥洛夫·貂，一个战士、温文尔雅的绅士和政治家》，隆德，1953年，第235页。

[13] F. 阿德勒和S. 邦涅松编：《阿克塞尔·冯·罗文斯回忆录》，KFÅ（1929年），第48—49页。

[14] E. T. 伦敦：《幻想曲》，1757年，第97页。本书原文第700页。

[15] E. 卡尔松编：《查理十二世国王信札》，斯德哥尔摩，1892年；德文翻译本，柏林，1894年。

[16] N. 路透霍尔姆致J. 克朗斯塔特信，1707年2月16日。

[17] 参见本书原文第701页。

[18] 诚然，一旦一方遭受挫折，那么调停和力量平衡的长期目标将在瑞典总部里培植一个“法国派”或“同盟派”，那时瑞典将更加认真讨论干涉的问题。

[19] 不过英国对《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没有作出担保。跟皇帝签订的条约（肯定西里西亚新教徒的权利）是在1707年9月1日签的，几乎是跟奥古斯都签约一年之后了。见K. G. 希布德布兰德著《英国和瑞典，1707年》，KFÅ（1937年）。

[20] R. M. 哈顿编：《詹姆士·杰弗里上尉写自瑞典陆军的信函，1707—1709年》，斯德哥尔摩，1954年，第44—45页。

[21] S. 沃勒著的《1707年瑞典军队总部》中说，瑞典陆军战斗人员共3.3万人，外加军官、士官、文职人员、赶大车的车夫和勤杂人员。

[22] 见E. 塔尔著Severnaya voyna i shvedskoye nashestvye Rossiye（莫斯科，1958年），使用了落在俄国人手里的所有资料，还有大段的引文等。然而很明显，这个材料不很重要。参见K. G. 希尔德布兰德著《与马赞拉的关系，1707年》，KFÅ（1935年）。

[23] 参见本书原文第701页；另见G. Kiss著《拉科西、彼得和格洛塞在1717年》。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1966年），第344—360页。

[24] 可以肯定的是，查理从芬兰这一边打进，攻克圣彼得堡。见H. 鲁林《对吕贝克指挥的裁决》，KFÅ（1934年）。

[25] 沿1500公里长边界、纵深达200公里的地区内，一切都要毁掉，人都迁走，使瑞典人“找不到饲料也找不到粮食”。见V. E. 苏泰著的《对付查理十二世的人民战争，1700—1709年》（莫斯科，1958年）。

[26] P. 昂格达尔援引目击者，见《查理十二世》，KFÅ（1930年），第212页。

[27] 按瑞历这是圣诞之夜。E. 卡尔松在他《克兰诺库茨克—戈洛德诺尹—科洛马克》[KFÅ（1947年）]中批驳了这样的观点：这次冬季攻势是为了打开一条通道，沿第四条路线去莫斯科。

[28] 参见本书原文第702—703页。

[29] G. 彼得里：《波尔塔瓦战役》，KFÅ（1958年），总结了瑞典的研究成果，有关俄国研究成果，参见W. 克兰贝格、J. 赫德贝格和G. 梅德魏杰夫作品，同上书（1961年）。

[30] C. 霍伦道夫编：《查理十二世在乌克兰，情况介绍》，斯德哥尔摩，1915年。

[31] E. 卡尔松：《查理十二世和佩列沃洛钦纳投降》，KFÅ（1940年）。

[32] L. 斯达凡诺提出不同看法，参见HT（1910年）；E. 塔雷：《查理十二世和波尔塔瓦》，瑞文翻译本，1951年。

[33] 参见本书原文第630—631、636—637页。

[34] 他的父母来斯德哥尔摩避难，因为丹麦人摧毁了腓特烈公爵领土上的碉堡。1702年，公爵死于克利斯祖战役，赫德维格·索菲亚死于1708年12月21日。瑞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前已获知其死讯，但国王是在抵达土耳其后才知道的。

[35] J. 罗生：《英国提出和平解决，1713年》，隆德，1946年，第7—95页。

[36] S. 鲍涅生：《扬·萨比埃哈，在本德喧嚣之前皆受礼遇》，KFÅ（1945年）；I. 斯达夫辛：《本德喧嚣》（1960年）。

[37] 见本书原文第637页。

[38] 参见本书原文第806—807页。

[39] * 指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见前文。——译者

[40] 普鲁士1715年4月宣战，汉诺威10月宣战。腓特烈·乔治一世与彼得和汉诺威的乔治签订了反瑞条约，汉诺威的乔治在1714年夏天跟丹麦也签订了相似的条约。

[41] G. 林德贝格：《查理十二世瑞典的战争财政和战争勤俭节约》，斯德哥尔摩，1946年。

[42] G. 林德贝格：《格尔茨卡时代的瑞典经济政治》，隆德，1941年。

[43] S. 约格尔舍尔德：《瑞典和欧洲，1716—1718年》，艾肯纳斯，1937年。

[44] 见本书原文第733页。

[45] T. 雅各布松：《查理十二世时代的炮兵》（斯德哥尔摩，1943年）。

[46] 究竟查理十二世是被自己方面的人、某个受黑森的腓特烈指使的人杀死的，还是被敌人射来的子弹打死的，瑞典历史学家仍在激烈争论。参见A. 桑德克莱夫

主编《查理十二世之死》（1940年）、N. 安隆德编《关于查理十二世之死的真相和故事》以及从那时起的KFÅ的文章。L. 坦纳尔在《查理十二世死后瑞典的革命》（乌普萨拉，1953年）中坚定认为黑森的腓特烈有罪。《腓特烈一世》（1953年）和《乌尔里卡·埃里奥诺拉》（1956年）的作者W. 何尔斯特则认为没有证据。笔者的看法是查理十二世是被（也许查理本人也会说）“一个真正敌人的子弹”打死的。见《瑞典查理十二世》第495页以下内容。

[47] 见T. 韦斯特林著《查理十二的最后计划》，HT（1895年），第341—342页。

[48] 见E. 卡尔松著《尼斯塔特和平条约》（1932年），第23—28、297—330页；O. 雷恩纽斯：《瑞典的国际地位，1720—1721年》，KFÅ（1915年）。

[49]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350—352页。

[50] 见N. 安隆德著《瑞典与波兰的最终和平》，KFÅ（1915年）。

[51] 指1720年由于南海公司倒闭而引发的英国的一次财政危机。——译者

第二十章（下） 波兰的黑暗

“波兰的黑暗时期”是当时一位主要的政治家、立陶宛副首相斯坦尼斯拉斯·隆佐卡用以描述18世纪初波兰共和国形势的一种说法。一个在欧洲各星座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仍然受到一些本身面临国内巨大变革的强国讨好的国家，本来很难说它已陷入“黑暗时期”。波兰虽被强邻所严密控制，但还没有到了孤立无援地在政治上任他人摆布的时期。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已经妨碍着波兰共和国利用出现在它身上的各种政治机会。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直到不久前还很强大的国家暂时处于阴暗之中。如果说到1721年，欧洲这一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成过去。那么，该地区各国之间以前的均势同样也已成为过去。哈布斯堡王朝由于控制了匈牙利，并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取得了王位继承权而大大加强。俄国在彼得大帝进行改革和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之后，已成为北欧主要的强国。在普鲁士，实行严厉统治的政府正在为军国主义奠定基础。同时，瑞典已不再起什么作用，土耳其则只能偶尔执行主动的政策。波兰在外交方面活动的余地有限，而且在居于支配地位的邻邦的干预下处境极为不利，陷入了所谓的萨克森时代的最黑暗的阴影之中。

这是一系列复杂过程的结果，它可回溯到16世纪初期。与社会地位低下的农奴和自由民相比，贵族享有罕见的特权地位，而地方长官们则实际上掌握着大权。他们之间的角逐破坏了国家的团结。正当欧洲大多数国家趋向专制主义的时候，波兰王权实际上由于实行自由选王制和随之而加于国王的誓约而削弱，这件事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议会本来或许能够弥补王权之不足，但它又被一种严重的病症，即自由否决权所困扰。自从1652年以来，这种制度允许个人否决提交议会的任何法案，而使改革方面的一切努力都陷于瘫痪，任何系统的财政和军事政策均归于失败。主要从教会和王室财产征收的固定税，仅仅可以勉强维持1.2万名军人的供给（自1678年末和平时期的军队一直是这个数字）。即使是战时用于征召必要的部队的“特别”税，也只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征收到；如果战争拖延下去，共和国就只有一支发不出军饷和随时会哗变的军队。此外，波兰的经济潜力每况愈

下。波兰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17世纪时期价格的下跌，使农业受到不利的影响。贵族力求以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来补偿其庄园收益的减少，结果只能是促使农业的效率和生产力下降。即使说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能够鼓励发展，但国家在决策方面的瘫痪状态也不可能使之实现。总之，这个世纪中叶遭受的巨大战争破坏，给整个经济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尽管有这一切，但仍不足以充分说明为什么真正的崩溃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此之前，这些基本的弊病即已存在，但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危机。到那时为止，总有一些可以阻止形势逆转的对策。在皮劳斯战役之后又有别列斯特兹科战役；1655年波兰在瑞典入侵时期投降后，接着又为了保卫独立而实行社会的总动员；为了对抗俄国的胜利，1660年进行了库特脑战役（1660年）和波隆卡战役；继布贾克条约（1672年）之后，又进行了乔汀（乔希姆）战役和维也纳战役；卢伯米尔斯基的反动叛乱已由于1673—1678年进行了试验性的改革而得到补救。但是，新的一代人在暴力的潮流中成长起来。他们继承了前辈的一切起破坏作用的恶习，却又缺少前辈人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在拼命捍卫“黄金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私利支配着一切，对全面改进的可能性也没有多大信心。斯坦尼斯拉斯·赫拉克留斯·卢伯米尔斯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无益的讨论》（1699年）对这一代人的观点作了最确切的描述。该书说道，国家的每个机构，不论组织得多么好，不久就堕落成为罪恶的工具；结果，任何变革都无法带来持久的利益。另外一些目光没有那么深远的人，则寄希望于“萨尔马特主义”^[1]——这是一种自负而保守的哲学，它吹捧波兰贵族高于地球上一切民族。索比斯基在维也纳取得的胜利^[2]，如维斯帕西安·科霍夫斯基的赞美诗中所描述的，对他们来说，成为他们在基督教世界占首要领导地位的具体象征。他们把波兰宪法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鄙夷其他民族，认为他们是十足的奴隶。

在这种环境下，某一个人的努力，无论他是约翰三世也好，或者奥古斯都二世也好，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即使是具有传统萨尔马特人气质的君主索比斯基也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政治方针的广泛支持。他具有军事才干，在他身上有着法国文化的魅力，再加上在他的服饰上和在他的维拉瑙的新宫中表现出的那些土耳其和鞑靼风格的花饰，充分体现了东西方特征的融合，使他具有感染人的魅力——但这些优点

在政治方面却丝毫不起作用。他的一切主动行动都遭到大多数地方长官以及追随这些长官的贵族们的反对。奥古斯都·韦廷是第一个占据波兰王位的日耳曼人，他的情况与这没有什么两样。他继承了萨克森的王位，又被选为波兰国王，他在促使萨克森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时有个有利条件——广泛的政治经验。同时，波兰人本可通过与勤劳节俭的萨克森人紧密联系得到好处。^[3]然而不然，这里出现的同样是那种有时十分可悲的图景：占少数的开明（的萨克森）人同顽固维护现状的波兰权贵们进行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形势像波兰社会的一般状况一样，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个国家卷入了两次超出国力的战争，即神圣联盟战争的北方战争。在25年军事负担之后，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来恢复稳定。在与哥萨克人、俄国人、瑞典人和土耳其人作战中付出的旷日持久的军事努力和财政耗费，已削弱了社会结构，再进行战争势必会带来致命的危险。然而，在1676年《索拉劳和约》签订仅仅7年之后，为了救援维也纳，波兰又投入另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旷日持久和耗费巨大的战争。

神圣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沦于土耳其人的领土。约翰三世则希望收复波多利尼亚，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并永远结束鞑靼人在共和国东南地区惨无人道的蹂躏。他的远征并没有取得持久的结局：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4]并未能收复，摩尔达维亚也仅仅获得两个边境要塞。土耳其人显示了出乎意料的抵抗力，而贵族却辩解说，教皇和帝国的补助金已能满足他们的军队的需要，因此拒绝投票赞同征收必要的捐税。波兰已无力集中更大的力量进行战争。在此情况下，宫廷当局决定在东部作重大的撤退。约翰三世屈从了1686年在莫斯科达成的条件，即俄国与波兰结盟并保持永久和平。这样不仅防止了俄国站在反对他的一边，而且在与奥斯曼的战争中得到了俄国的帮助。俄国答应进一步帮助他们反对鞑靼人，作为交换条件，波兰最终放弃了斯摩棱斯克、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基辅和扎波罗热。波兰还承认了沙皇对共和国东正教徒的保护地位。就这样，1686年的协定预示着在接着而来的年代里，俄国在与波兰的关系中将取得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好在这时，波兰文化在莫斯科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17世纪60年代，大批画家和雕塑家到达莫斯科，给俄国的

艺术留下他们的影响；波兰的语言以及从沙皇宫廷里流传出来的波兰服装，同样也十分流行。

起初，同盟在军事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俄国王子戈利钦向黑海草原的远征全部遭到失败，直到1696年彼得大帝才得以占领亚速。1686年，索比斯基费了很大的力气，把4万人投入战斗。他推进到多瑙河三角洲，但未能守住征服的地方。得到好处的是奥地利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征服了布达。以后波兰的几次远征，包括1691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内，都同样没有收获，他们仅仅得到乔汀和摩尔达维亚的几个次要的要塞。更坏的是鞑靼人袭击了波兰领土，一直到达利沃夫。同时，土耳其人仍然与其在卡梅涅茨的强大驻军保持着联系。索比斯基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贵族的支持。在1685—1695年间召开的7次议会，只有两次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投票通过的税收与军队的需要相比杯水车薪。1697年军队的需要就短缺2600万克朗。这几乎等于岁入的10倍。多年来，军队往往领不到军饷。士兵领不到饷，就不好好打仗，人员不断减少。17世纪90年代，军队几乎召集不到3万人。只是由于国王个人的权威才防止了军队结成“联盟”去获得他们应得的利益。^[5]形势要求尽快与土耳其和解，这并非是不可能的。经鞑靼人的调解，土耳其人宣布愿意撤出卡梅涅茨和波多利亚。从法国也有希望得到支持，因为九年战争的爆发，增强了路易十四想把波兰从奥地利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愿望。主要的反对将来自波兰的同盟者，只要土耳其不承认这些同盟者的征服地，它们甚至拒绝考虑与土耳其媾和。

约翰三世像他以前的许多当选国王一样，也竭力操纵他的继任者的选举，希望他的王朝得以同王位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可采取的一个有利的步骤是将边境以外的公国之一置于索比斯基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国将会通过统治者个人与共和国联系起来。约翰三世掌权之初，曾想重新得到普鲁士公国，1683年后，又想利用摩尔达维亚。这些打算无疑促使他不断出征巴尔干。国王特别喜欢他的长子詹姆士（雅各布）。国王带领他参加常务院的会议并给他指挥军队的权力；在接见大使时，他们同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为了实现维护王朝的计划，他们在法国和奥地利寻求外援。路易十四比较快地表示愿意给予支持，但在最后对奥皇给予援助的希望超过了其他的考虑。于是决定让詹姆士与利奥波德的妻妹、诺伊堡的伊丽莎白结婚。詹姆士原来争

取与路德维卡·卡罗琳娜·拉齐维尔结婚，她是在立陶宛有大宗财产的继承人，但她的监护人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唯恐索比斯基家族的势力加强，因此最初把她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后来，又许给了诺伊堡王子、詹姆士·索比斯基后来的妻子的兄弟查理·菲利普。与纽贝格公主结婚，使詹姆士得到西里西亚富庶的奥劳（奥瓦瓦），并得到许诺，在下届波兰选举中，帝国将支持他。另一方面，这次婚姻导致索比斯基家族内部的不和。约翰三世的妻子法国阿尔奎·玛丽的势力，由于国王患病而日益增长。她不愿看到一旦丈夫去世后自己失去对政策的控制，开始进行活动，或者使仍依赖她的年幼的儿子之一当选，或者能选一个将来敢娶她的候选人。她与凡尔赛紧密结合，1692年与路易十四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并向法国提供了一大宗急需的谷物，从而挫败了詹姆士。王族不和一直延续到约翰三世逝世，并实际上决定了其王朝计划的命运；而由于在波兰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反对索比斯基家族继续占据王位，情况就更加如此。

反对派的中心在立陶宛，实际上就是萨皮埃哈家族。约翰三世统治初期，他曾支持萨皮埃哈家族，希望以此抑制强大的巴部落，而由于王室的保护，萨皮埃哈家族把所有有用的立陶宛军官都集中到他们自己手中。卡西米尔·萨皮埃哈成为最高司令官^[6]，本尼迪克特·萨皮埃哈则任立陶宛财政大臣。他们同时控制了军队和财政，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地方议会活动，并左右一年一度地方议会上选举的法官的人选。萨皮埃哈家族梦想取得王位，如果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要坚持立陶宛退出王国。他们不断鼓励反对波兰国王保持家天下的做法，在这方面还赢得了王国的大多数权贵的支持。他们的影响甚至远及柏林和维也纳，因为霍恩佐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对波兰王室力量的加强同样感到不安。1686年，勃兰登堡即与瑞典和奥地利签订条约，保证波兰宪法的不可侵犯性和自由选王制的原则。在这样的条件下，反对派扰乱议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不断严重的混乱状态是如何地会削弱国王的地位。在地方长官中，追随王室的只是很少几个。国王本可能有希望求助于中层贵族，但是，在1689年的议会里，由于常务院成员对国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议员们要求成立一个“马背议会”（在这个议会中，贵族都可参加，以便与地方长官们对抗），而这时约翰三世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7]国王本人缺乏决心，而且也许绝对不可能使他与他出身的那个圈子的人

们进行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总之，进行这样的斗争，就像贵族们关于王室权力的实际愿望一样，其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这次机会是错过了，这个问题在约翰三世统治期间也始终再没有如此尖锐地显露出来。

索比斯基晚年毫无生气，随之而来的是1696—1697年波兰历史上最长的王位空缺期。这是由于詹姆士·索比斯基和他母亲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扼杀了使索比斯基家族的另一人当选的任何机会。王后甚至毫不犹豫地突然中止正在召集的议会——即由大主教作为空位期摄政王主持的，为在王位空缺期保卫国家并准备确定下次选举的时间和地点，以全国性联盟形式召开的特别议会。领不到饷的军人们劫掠农村，特别是王后的庄园，以此作为索取欠饷的手段，这就更增加了混乱；只是在选举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这些军人作出一些安排，平息了骚乱。这些动乱自然为外国干涉波兰大开方便之门。波兰的盟国，特别是俄国，反对法国提出的任何候选人，因为这些候选人很可能与土耳其单独签署和约。彼得大帝开始在立陶宛边境集结强大的兵力，以防止上述情况发生。但与此同时，某些贵族宣布支持凡尔赛的候选人孔蒂亲王，而法国大使梅尔基奥尔·德·波利格纳克主教则向所有各方都任意提供金钱和承诺。6月27日在沃拉的选举中，大多数贵族选择了孔蒂。萨皮埃哈家族支持他；而红衣大主教迈克尔·拉齐乔斯基（1645—1705年）则自立为国王。然而，在孔蒂的支持者离开选举现场之后，选举大会的很多成员，由于俄国的威吓或者由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宣传，请求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韦廷继承王位。

在这次有争议的双重选举之后，许多事情取决于两个竞争者所采取的行动的速度。韦廷表现出更大的力量。到1697年7月22日，他率领萨克森军队到达波兰边境塔尔诺夫斯基山。在那里，他受到由鲁瑟尼亚总督、王国最高司令官之子约翰·斯坦尼斯拉斯·杰布隆诺斯基率领的一个代表团的欢迎。奥古斯都匆忙离开宴会来到克拉科夫，在皮埃卡莱大教堂第一次公开做弥撒。他在这里还保证把立陶宛贵族享受的宪法权利同样赋予王国的贵族。8月初，他进入克拉科夫，那里已开始筹备加冕典礼。斯蒂芬·休米斯基的反对派联盟由于未能控制军队，无法阻止这一行动。1697年9月15日，在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山大教堂奥古斯都加冕为波兰国王。这样，在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波

兰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波兰通过一个人与萨克森联合在一起的时代。

这种联合为两国都提供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很大可能性。在经济上，萨克森的工业和波兰的原料、木材及农产品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和贸易。萨克森的商业活动得到了波罗的海的港口和穿越波兰的商路，也可大大恢复波兰的城镇的繁荣。奥古斯都二世从即位的最初几个月起，就打算创办一个波罗的海贸易公司，重建波拉加港（亦称波兰根，在梅梅尔以北），认为其结果将使波兰和萨克森海上力量得到发展。由于1686年条约给波兰以通过俄国领土与波斯进行贸易的权利，上述措施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人们只有考虑到奥古斯都二世的这些波罗的海计划——比他以后企图收复整个利沃尼亚的计划更加影响深远——才能理解查理十二世为什么要坚决破坏波兰—萨克森联盟，因为它造成严重威胁，会改变北欧和中欧的权力结构。显然，如果波兰和萨克森有共同边界的话，人们一定会容易理解这些经济原则；而与此不无关系的是，把波兰和萨克森分隔开来的那些地区——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和普鲁士的奥得河各省——一度曾属于波兰。在波兰，收复这些地区的愿望又出现了，而在萨克森，则是希望利用这个联盟，以便在德意志政治中起更大作用，并遏制正在增长的勃兰登堡的势力。在北方战争期间，这些愿望都破灭了，这次大战致命地削弱了波兰共和国。事实上，即使在这次战争以前，联盟的弱点已是很明显了。除了相互对立的宗教——萨克森害怕天主教的传播，波兰则不相信新教——另外，新政权的种种迹象也令人不安。奥古斯都曾在萨克森削弱议会，一度取得成功；贵族们惧怕波兰共和国也实行同样的政策。^[8]

急迫的问题是防止孔蒂夺取王位。孔蒂在1697年6月25日逼近格但斯克（但泽），这是一个牢固设防的城市，它支持奥古斯都而拒绝让法国的海军靠岸。孔蒂设法在附近的奥利伐上岸，但力量过于薄弱，无法与11月9日进攻奥利伐的萨克森军队抗衡。于是他起航返法。他的支持者——休米斯基、亚当·尼古拉·西恩尼斯基、拉齐乔斯基、萨皮埃哈家族、卢伯米尔斯基家族——同意与奥古斯都谈判，并于1698年5月5日结束了休米斯基的联盟。

这时，已有可能继续进行奥斯曼战争了。由索比斯基统率大军进行的这次战争，既没有攻克卡梅涅茨，也没有在摩尔达维亚或瓦拉几

亚取得重大战果，而这里同样是奥地利和俄国的野心之所在。日益坚强的波兰骑兵，加上萨克森步兵和炮兵，预示在这里进行一次战役会更有利。正好，这次战役由于休米斯基联盟而推迟之后，又由于萨皮埃哈家族与立陶宛贵族之间的冲突而受到阻碍。然而，随着孔蒂的退出，萨皮埃哈家族欣然转到萨克森一边，他们重新得到国王的宠爱，就消除了立陶宛贵族的不满：1698年7月22日匆匆忙忙拼凑了一个协定。这一年，进行远距离作战，为时已经太晚，因此军事行动仅限于再次试图夺取卡梅涅茨。更加令人失望的是，哈布斯堡这时决定根据占领地保有的原则与土耳其人媾和。^[9]这样做虽然符合他们的需要，但对波兰则是灾祸，因为，这样一来将要把卡梅涅茨留在波兰国境之外。因此，在缔结和约前，急切需要取得一些积极的军事成果。如同索比斯基一样，奥古斯都为了他的王朝缘故，需要多瑙河诸公国。在他接位后不久，就着手准备一次远征。他在海牙的使者博斯收集武器并征募能胜任攻城作业的地雷工兵和工程人员。饲料和粮食在波兰征集；经验丰富的特劳特曼斯道夫将军受命制订一个作战计划。1698年9月，军队在利沃夫周围集结，在奥地利前线参战的萨克森团队也已到达。然而，适宜作战的时间所剩无几，道路将变成不能通行的泥潭，能否取得胜利是非常值得怀疑的。9月8日，军队终于向卡梅涅茨推进，并与鞑靼骑兵在波德哈杰斯附近进行了小规模战斗，获得胜利；但9月17日常务院的一次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远征。气候是在立陶宛遇到的新困难，以及和谈开始，说明了为何作出这个决定。一部分波兰军队奉命留下来包围卡梅涅茨；一些萨克森军队则被派驻守在“三位一体堑壕”中，以保卫波兰免受鞑靼人的袭击。其余的萨克森人被派到立陶宛。

9月22日举行的一次盛大阅兵标志着这次战役的结束。阅兵过程中发生了一次争吵，几乎在波兰和萨克森军队间引起一场武装冲突。这次事件的起因是由于王国野战司令官之子、克拉斯诺斯塔夫地方长官米歇尔·波托斯基殴打了受国王信任的拥护者、马尔博克（马林堡）总督普泽本多夫斯基。普泽本多夫斯基被打了几狼牙棒倒地后，仍然设法逃跑了。波托斯基后来请求军队驱逐萨克森人。由于两个曾与国王一起在立陶宛扎营的司令官立刻返回，所有上述想法迅即被制止了。但是，由于奥古斯都命令成立临时军事法庭，审判这起严重违法行为的肇事者，形势仍然紧张。一批骑兵立刻发生骚动，指责王国最高司令官把德意志国王和他的军队引进了波兰。奥古斯都遂决定以武

力镇压叛乱者，命令两位司令官即使不准备给予实际的援助，至少也要保持中立。最高司令官杰布隆诺斯基和其他一些权贵们保证要惩办波托茨基，但宣布，如果萨克森人攻击波兰兵营，他们就要拿起武器反对国王。这样，奥古斯都就遭受到双倍的挫折。他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一事无成，并且最强烈地感到，作为当选的波兰国王，他的权力受到种种限制。

在远征巴尔干过程中，传来了勃兰登堡选帝侯企图夺取埃尔布隆格（埃尔平）的消息。1698年10月，普鲁士军队曾试图突然袭击这个维斯杜拉河三角洲的古城；11月，他们扬言要炮轰它。霍恩佐伦王朝有力地提请注意1657年比得哥什条约的一个条件，即波兰已答应，或者割让这个当时已大部淤塞的港口，或者以40万塔勒^[10]将之赎回。这个条件一直没有履行，但勃兰登堡却单单选择在1698年提出履行它。事实上，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只是在6月与奥古斯都在詹斯堡秘密会谈后才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他们会谈的问题还有，商讨以曼斯菲尔德交换克罗森（克罗斯诺）公国，因后者从劳齐茨延伸到波兰的边境，这样就会使波兰和萨克森有一个共同的边界。作为对这次交换许诺以及总数达25万塔勒的现金报酬（其中10万塔勒在占领时交付，15万塔勒在下次议会开会时交付）的回报，奥古斯都割让埃尔布隆格。此后，他就设法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日期占领该地。在他得知对摩尔达维亚的远征取消后，就立即决定在1698年10月占领。看来他似乎是想在普鲁士作战期间能够自由行动，不过对埃尔布隆格事件的文献尚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们不知道在结束土耳其战役后，奥古斯都的做法是不是有意设法利用波兰与普鲁士的争执，以便履行在詹斯堡商谈的领土交换。总之，他以很大的决心采取行动，并提议召开普鲁士公国的议会，与选帝侯开战。^[11]他提出让他自己的军队参加，并在波兰普遍征兵。^[12]常务院拒绝了这些建议：“红衣主教拉齐乔斯基，军队首领及其手下的军官们和常务院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容许这些建议，不愿让共和国在经历了50年的战争之后，再卷入一次战争。”^[13]常务院的成员是受了普鲁士塔勒的影响。舆论马上作出了反应，各种印刷宣传品要求霍恩佐伦王朝撤出普鲁士公爵领地。波兰军队在埃尔布隆格附近的缓慢集结，促使腓特烈三世在彼得大帝向他施加压力时，举行谈判。彼得大帝不愿让争端破坏他计划建立的反瑞典联盟，这个联盟将同时包括腓特烈三世和奥古斯都。于是，腓特烈同意

以40万塔勒为代价来收复埃尔布隆格。波兰国库没有这么多的钱，但奥古斯都仍然要拿出这笔钱，因为这将给他以用萨克森军队占领埃尔布隆格的权力。常务院认为这是国王危险地顽固坚持他提出要采取的行动，因此加以拒绝。最后，经过一年的协商，才同意把王室的珍宝作为债务抵押。1700年2月，腓特烈三世把埃尔布隆格交给了波兰特派官员斯坦尼斯拉斯·萨佐卡和安德鲁·扎鲁斯基。

在国王集中精力对巴尔干远征和埃尔布隆格事件的几个月期间，在立陶宛与萨皮埃哈家族的角逐再次达到重要关头。1698年7月的协议只是表面文章，不久内战就爆发了。萨皮埃哈家族取得了最初的胜利。最高司令官之子、立陶宛侍卫长卡西米尔·萨皮埃哈搞垮了哥萨克首领奥金斯基在约堡附近召集的贵族会议。贵族们绝望地求助于国王。1698年8月，他们成立了一个联盟以反抗萨皮埃哈家族。他们的目的是解散常备军。但他们也清楚，不经战斗，萨皮埃哈家族是绝不会接受这一点的，于是号召总动员，10月15日在格罗德诺集中。在最高司令官和部队从土耳其战争中回到立陶宛后，冲突达到危急阶段，国王由于埃尔布隆格危机，不能亲自到立陶宛，但他派去了由J.H. 弗勒明将军率领的他的军队。立陶宛贵族总动员，集中在格罗德诺，宣誓只要立陶宛的军队不解散，他们也不解散。奥古斯都命令双方接受他的仲裁，避免了一场冲突。同时，他命令弗勒明，如萨皮埃哈家族进攻，就保护贵族。卡西米尔无法依靠弗勒明会保持中立，只好放下武器。12月20日签订了一项新协定，规定解散立陶宛的3000名骑兵，只留下1140名龙骑兵和2960名步兵。这次胜利后，奥古斯都的影响力加强了，但贵族对他的意图仍心存疑虑，不久就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立陶宛。这样，萨皮埃哈家族虽被剥夺了军事力量，但仍保持着国家职务，他们的经济势力也未受到影响。该家族对敌视奥古斯都的人们中间一批有实力的追随者仍然具有吸引力。因此，虽然奥古斯都在这个大公国的地位比索比斯基过去的地位要强大得多，但当时的一些政治文章把立陶宛描绘成一个“绝对的领地”则是没有根据的。

1699年召开了一次议会，目的在于使国家安定，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休米斯基联盟的影响。除了与《卡尔洛维茨和约》有关的事务（该和约使波兰收复了卡梅涅茨要塞）之外，国王还请求讨论埃尔布隆格问题、立陶宛的形势、军队的薪饷和萨克森军队在波兰的前途等问题。向地方议会，则提出在司法方面和币制方面的改革。贵族们甚至

拒绝对现存的法律进行微小的修改。他们最强调的是萨克森武装力量问题。他们的大部分决议开始时是感谢国王与土耳其签订了有利的和约，但是到最后却要求萨克森军队无条件撤出波兰。有些省份的贵族指示他们的代表，如果国王企图保留萨克森人，他们甚至不讨论问题就解散议会。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由于萨克森军队的行为激起的，萨克森军队对居民蛮横无理，并要求把供应波兰军队的给养供给他们。萨克森军队犯下暴行而未受惩罚，贵族们义愤填膺，并担心国王很可能会利用他的萨克森军队破坏波兰“黄金般的自由”。这反过来又使宫廷发生惊恐，唯恐有些与国王为敌的联盟图谋叛乱，特别是由于杰布隆诺斯基确曾打算把王国军队开到华沙，只是国王的紧急告诫才制止了他这样做。6月16日召开的议会，使局势更加紧张，因为代表海乌姆的议员马上就宣布，除非萨克森军队撤离，否则他不会继续进行议长的选举。其他许多议员也采取同样立场，议会似乎将要中止。斯坦尼斯拉斯·萨佐卡的一番话挽回了局势，他说，在萨克森军队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仍然坚持撤退萨克森军队，一方面开始辩论。这个问题直到7月31日会议结束为止，一直给整个会议投下了阴影。最后，国王签署了一份誓约，同意撤出萨克森军队。由于作出这一让步，奥古斯都加强了他在波兰的地位，并采取一些措施以弥合由双重选举而造成的裂隙。不过，萨克森军队撤到了利沃尼亚方向的波拉加附近，其意义不容忽视。

奥古斯都本希望与土耳其的战争会以胜利告终，现在是落空了，但他又参加在1697—1699年期间已奠定了基础的反瑞典联盟。丹麦人在组建联盟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早在1697年，丹麦驻莫斯科大使海因茨就曾寻求与俄国建立一个反瑞典的联盟。由于彼得一世专注于土耳其，这次使命没有取得结果，但1698年提出倡议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局势从而改观。彼得和奥古斯都都认为，要是没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帮助，他们都无力与土耳其进行战争，但他们看到一条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北方的办法。1698年8月8日，在拉瓦—鲁斯卡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商定了计划。同月，奥古斯都通过利沃尼亚贵族的代表、坚决加入波兰的莱因霍尔德·帕特库尔与这些贵族达成协议，一项秘密条款答应利沃尼亚归奥古斯都个人统治，以示与波兰共和国其他地方不同。奥古斯都作为萨克森的选帝侯，已经在3月26日成为丹麦人的同盟者。8月24日，俄国与丹麦的会谈在莫斯科结束；11月，俄国与萨克森结盟。彼得希望把勃兰登堡选帝侯也吸收进来，但一贯谨慎的腓

特烈三世拒绝正式加盟。不过，当时普遍认为勃兰登堡将会参加这次战争，波兰也会一样。一旦《卡尔洛维茨和约》得到批准，就可确定对瑞典发动进攻的日期。

1700年2月战争在利沃尼亚爆发后，奥古斯都指望他的萨克森军队会借助居民对瑞典统治的不满而迅速控制这一省份。^[14]作为利沃尼亚的统治者，韦廷家族很可能不仅加强它的权威，而且甚至永久占有波兰的王位；同时，可得到俄国与立陶宛通过里加进行贸易而征收的巨额税收。另一方面，战争的任何扩大，都会使这位国王在共和国的处境更加复杂，加剧宫廷和持异议的地方长官之间的紧张关系。奥古斯都采取这一冒险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1675—1679年瑞典与勃兰登堡之间的战争来看，这似乎并不过分；但他企图突然袭击并包围里加却未能得逞。根据消息，丹麦人在特拉凡德尔求和，同时，萨克森军队尽管是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还是撤过德维纳河，奥古斯都也开始急切要求法国和勃兰登堡作为调停人，代表他与瑞典谈和。由于俄国在纳尔瓦战役中惨败，谈判加速了，奥古斯都的政策来了个大转变。他的驻巴黎大使乔丹将军与路易十四订立联盟，规定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战争，萨克森军队将帮助法国，以换取一笔优厚的补助金。奥古斯都希望路易十四将由此而促进与瑞典媾和。1701年2月，在比尔扎他恢复了与俄国的联盟，这仅仅是为了保证他免受即将降临的瑞典的进攻。他拒绝把这一协定扩大到共和国，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他想把与瑞典的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然而，查理十二世并不打算与奥古斯都和解。瑞典人明白，萨克森—波兰合并将会同时威胁他们在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的地位。他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破坏萨波合并。查理十二世看到波兰掌握实权的地方长官反对奥古斯都国王，便计划以保护波兰的自由为理由，由一个较弱的统治者替代奥古斯都，把波兰共和国置于瑞典势力范围之内。查理十二世甚至期望牺牲俄国的利益，将库兰让给波兰，从而恢复波兰的东部边界，波属利沃尼亚则转让给瑞典。实际上，这个计划意味着波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变成瑞典的附庸。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波兰会不会反抗瑞典的压力。究竟是贵族的自由更重要呢，还是国家的独立更重要？这个根本的难题当时还不明显。更确切地说，很多波兰人的思想还被以下观念所左右，即保卫他们的国王势必会使波兰的利益从属于萨克森；地方长官中不少人夸大其词地标榜“黄金

般的自由”，以致其他人即使有相反方面的怀疑，也被驱散得无影无踪。在17世纪是如此，一直到共和国的结束仍然如此。一个亲瑞典的小集团很快就形成了，随时准备以不同的方式与查理十二世进行合作。

1700年初，在利沃尼亚前线的侧翼，立陶宛的内战重新爆发。“共和派”贵族要求废除大公国和王国之间在宪法上的差别，特别是限制立陶宛财政大臣和最高司令官的权力。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得到奥金斯基家族和其他大家族的同情，因为这些家族的地位被萨皮埃哈家族削弱了。在立陶宛地方权贵米歇尔·威斯尼奥夫斯基领导下，共和派在维尔纳附近的奥尔基尼基打败了萨皮埃哈家族，宣布剥夺萨皮埃哈家族的官职和领地。然后，他们寻求奥古斯都的保护，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奥古斯都去打瑞典人。但奥古斯都如果在立陶宛不担当仲裁者的角色，他一定会得不偿失。他与萨皮埃哈家族的关系毕竟已改善，该家族还派出军队在利沃尼亚作战。对比之下，共和派的军队主要是普遍征召来的人，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无法与训练有素的瑞典职业军队作战。不久就可以看出，单靠立陶宛是无力阻挡查理十二世军队的前进的。大公国被迫寻求俄国的援助，后来，在1702—1703年与彼得大帝签署了单独的协定。根据协定，沙皇允诺增援并给予补助，交换条件是立陶宛继续抵抗瑞典人。这些单独协定动摇了波兰—立陶宛合并的基础并严重地钳制了波兰共和国的外交。奥尔基尼基战役另外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延长了立陶宛的分裂。它导致被俘的米歇尔·萨皮埃哈遭杀害，萨皮埃哈家族的庄园被彻底摧毁。奥古斯都本人或他的常务院成员们企图进行调解，但徒劳无用。萨皮埃哈家族从查理十二世那里寻求保护，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他，并建立起一个瑞典派，他们任该派的领袖。废黜奥古斯都的想法，大概就产生于这些人中间，因为他们把奥古斯都看成是他们的一切不幸的幕后策划者。

在王国本身还没有这样公开的分裂。大波兰最大的权贵人物、财政大臣拉斐尔·莱茨津斯基和大主教拉齐乔斯基一样，可能倾向于查理十二世。但他们都不是盲目追随瑞典的人。拉齐乔斯基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就是担任首席大臣，不过不支持废黜奥古斯都。他认为只需要剥夺国王现在仍掌握的实际权力就行。他准备接受由瑞典和普鲁士作为这样的安排的保证人。这样，他作为大主教就能控制国王的主动作用，并左右与贵族和保证人的一切必要的磋商。这个反对派认为普

鲁士的支持特别重要，因为就在这一年即1701年，腓特烈一世加冕为普鲁士国王。波兰在该地区影响的继续削弱，实际上为普鲁士展示了新的前景：挺进埃尔布隆格这条“皇家通道”——一条将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割开的地带，并确保由与霍恩佐伦王朝有密切家族关系的凯特勒家族继承库兰的统治权。但未能使普鲁士卷入北方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1703年普鲁士与瑞典的防御协定起了约束作用。

对奥古斯都的最严重威胁来自于与查理十二世关系密切的詹姆士·索比斯基。当时居住在西里西亚的这位年轻的索比斯基，看到他重新追求王位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为了自己发迹，不惜以割让领土给瑞典（例如割让库兰）为代价。他开始纠集党羽并劝告瑞典国王：“应该对波兰人说些好话，信守这条格言。”

1701年召开议会，讨论防止瑞典进犯问题。议会期间，反对派的活动有了显著的进展。贵族们坚决认为波兰必须摆脱奥古斯都的政策而保持中立。议员们再次表示，在国王把他的萨克森军队撤出前，他们拒绝进行议会的辩论。他们准备在年终时再次开会。这时，查理十二世在德维纳河进攻萨克森军队，打败了他们。此后，他侵占了库兰，瑞典骑兵则长驱直入立陶宛。查理拒绝了由波兰常务院提出的调停的建议，而提出以奥古斯都逊位为解决争端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条件。当议会终于重新召开时，不顾形势的危急，否决了增加税收和增加军队的要求。这次议会会议由于萨皮埃哈集团的活动而被迫中止。就在这样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波兰开始着手抵御瑞典的入侵。

奥古斯都促和的努力仍然无效。他对法国的调停已丧失希望，便拒绝批准与路易十四的联盟，并改变了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态度。这时他希望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在海上强国的协助下，会打开与查理十二世达成谅解的道路。瑞典的反应是否定的。奥古斯都派遣到瑞典营地的两个使节奥若拉·柯尼希马克女伯爵和弗里德里希·冯·埃克施泰特·菲茨图姆的活动毫无结果。联盟关系变化的唯一结果是法国的外交这时转而反对奥古斯都。这就促使查理十二世进攻萨克森并把奥古斯都赶下波兰王位。无疑，凡尔赛希望得到一个同盟者，以进行西班牙战争。然而，出于同一目的，利奥波德一世和海上强国则阻挠波罗的海国家的争端获得解决。

失去外援而且自己的臣民又靠不住，在这样的困境中，1702年奥古斯都面临一次将要决定瑞典在波兰地位的战役。瑞典人占领了维尔纳和华沙，在克利斯祖击败奥古斯都并控制了克拉科夫。波兰很多地区的居民反抗入侵者，特别是在立陶宛、波德莱西亚和马佐维娅；城里自由民和农民与贵族们一起，成群结队，并肩作战。但全民性的群众反抗始终没有发生。王国军队新任总司令官是希洛奈穆斯·卢伯米爾斯基，任命他是为了缓和他对国王的不满。王国军队在他率领下避免在克利斯祖作战，从而促成了瑞典的胜利。共和国普遍征召来的军队保持严格的中立，奥古斯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另一方面，查理十二世也缺乏进行决定性打击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波兰民众的支持。萨克森没有设防，要不是反法联盟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发出外交上的警告的话，瑞典人很可能转而进军萨克森了。在波兰，大部分贵族拥护奥古斯都。在克拉科夫失守后，小波兰的贵族们立即在桑多米埃什集会，为保卫自己而成立了一个联盟。随后，大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的一些成员也都这样做了。虽然这些联盟并没有给共和国增加很多的武装力量，但它们表明大多数贵族依然把奥古斯都当作合法的君主，决不准备屈服于外国的压力。

瑞典的胜利足以使奥古斯都仍然抱有巩固其权力的任何希望化为泡影。贵族们支持他的一个条件是：国王放弃对宪法的任何修改，并庄严保证国家的各项自由。即使如此，奥古斯都在贵族们的指责下并没有退缩，因为1702年8月，在第聂伯乌克兰爆发了哥萨克起义，即西曼·佩莱伊起义。在索比斯基与土耳其进行战争期间，第聂伯河右岸的土地被占用，交给了哥萨克，因为当时需要他们的军事援助；但随着1699年的媾和，议会已下令解散哥萨克民团。权贵们希望大大增加农奴的数目，以便用于在奥斯曼边界附近遭战争蹂躏的庄园。哥萨克当然拒绝接受这样的前景，强制他们接受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由于到1700年已经采取了遏制乌克兰分裂主义的最初一些步骤，因此局势更加紧张。1696年，禁止使用罗塞尼亚语作为官方语言。大力采取措施消灭东正教会，并接纳其主教进入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因此，当哥萨克的指挥官西曼·佩莱伊和伊凡·萨繆斯转而反对贵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他们受到乌克兰城乡人民的普遍支持。哥萨克人占领了比亚瓦切尔考城堡，并试图鼓动他们在第聂伯河左岸的同族起而反抗。骚扰扩展到白俄罗斯、波德莱西亚和波多利亚，大有重新回到克梅尔罗斯科时代之势。[\[15\]](#)最初，贵族无法控制起义，普征的义务兵一听到

哥萨克人即将来到就四下逃散。只是到了皇家和私人的军队都集中在约瑟夫·波托茨基和亚当·西恩尼斯基指挥下以后，才把起义限制在一些群众情绪严重不满的地区。实际上，战斗一直延续到1704年才停止，当时俄国进行干涉，才消灭了起义运动的残部。这次代表波兰大地主的干涉，促使在波兰形成了一个亲沙皇的派别。

为了对哥萨克作战，不得不同时从主战场抽调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波兰反抗瑞典的努力。尽管萨克森军队连遭失败，但它仍然是抵抗的主力。1703年春，瑞典人在普尔托斯克击溃萨克森骑兵；秋季，经过艰苦的围攻，他们占领了由萨克森步兵重兵守卫的托伦。瑞典军队和萨克森军队一样，都是靠损害波兰共和国的利益，强征贡赋来维持自己的，因此战争的重担就落在了波兰人民身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兰人也丝毫未能捐弃他们的分歧，以便击败入侵者。1703年卢布林议会显示出他们真的支持奥古斯都：议会投票赞成维持4.8万人的常备军，并征收必要的税。但这些措施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当时瑞典人还占领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此外，卢布林议会还排斥了来自大波兰的反对派成员，而且不理睬大主教拉齐乔斯基的建议，这两件事情的发展清楚说明了一个更加坚定的亲瑞典派的形成。

大波兰的贵族在希罗达的地方议会开会，建立了一个反萨克森联盟。该联盟受到拉齐乔斯基和查理十二世的赞助，查理允诺帮助保持贵族们从前享有的权利和特权。1704年1月14日，在拉齐乔斯基亲自主持下，在华沙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一个总联盟，废黜奥古斯都二世并举行一次新的选举。由于波兰领土落入瑞典人之手的数量与日俱增，使这次会议进行的速度加快了。诚然，华沙联盟各成员，特别是拉齐乔斯基，把该联盟看作与瑞典进行谈判和使瑞典撤军的一个过渡性措施。但另一方面，查理十二世却在进行一种永久性的安排。他所要求的是，保证在波兰的王位上有一个（对瑞典）俯首帖耳的国王。

他原选定的人詹姆士·索比斯基去波兰的途中在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附近被俘。当时被囚禁在萨克森一座监狱中。于是，查理十二世又亲自物色了一个新的候选人，即不久前去世的财政大臣之子，27岁的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在以后的年代里，斯坦尼斯拉斯成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当时在家族野心的支配下，为获得这

一王位，他只得屈从于这个瑞典人和蒙受巨大的个人耻辱。卡尔选择的国王没有得到其他权贵的赞同。此后，拉齐乔斯基与奥古斯都二世又寻求到新的谅解。最初也是华沙联盟成员的总司令官卢伯米尔斯基也已与瑞典人分道扬镳。在大波兰以外几乎得不到支持的整个联盟运动，事实上正在分崩离析。1704年7月12日，在瑞典军队戒备森严的华沙举行的选举中，莱茨津斯基当选国王，情景至为可悲。在那里集会的一小撮贵族各有各的打算；波德莱西亚与会的贵族提出强烈的抗议。然而，波兰历史上第一次在外国军队的强制下，国王被废黜，另选了一个新的国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1733年，这样的事又一次发生，而同一个莱茨津斯基却作为民族英雄而卷入其中。

选举斯坦尼斯拉斯很快就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对瑞典人来说，他是一个负担。新国王没有一点权威，也没有军队，实际上完全依靠瑞典人，以及依靠像萨皮埃哈家族之类的瑞典人的朋友，因此，瑞典人在设法让人承认这位新国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对波兰来讲，这是一个致命的步骤。这个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绝大多数贵族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的合法性，而莱茨津斯基又太软弱，无法控制局势。对奥古斯都和比较强有力的政府来说，前景也非常不妙。

如果说大多数贵族是反对华沙联盟的，那么奥古斯都也暂时放弃了他的专制君主目的。甚至在萨克森，他迫于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也将邦议会恢复了。在萨克森，1703年大臣拜歇林的垮台是一个转折点。拜歇林一直到垮台为止，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大臣，他想把萨克森更快地引向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道路。奥古斯都这时的处境较好，能够利用贵族的忠诚。发生在军队里的一件事，对这一点作了考验。当卢伯米尔斯基倒向瑞典人一边时，王国军队有三分之二转而反对他，在奥帕托成立一个军事联盟，为首的是一些宣誓效忠于奥古斯都的军官。1704年5月20日在桑多米埃什召集了一次新的会议，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常务院成员和贵族。在皇家捧剑官斯坦尼斯拉斯·德霍夫领导下，宣布建立一个总联盟，参加者均保证捍卫奥古斯都二世的合法地位而与瑞典作战。华沙联盟成员均被斥之为卖国贼，华沙的选举被认为无效；要求教皇开除拉齐乔斯基的教籍并革去其圣职；卢布林议会关于财政和军队的决议继续有效。奥古斯都再次保证他维护贵族的一切权利和特权，遵守誓约，恢复议会。战争结束后从共和国撤退全部外国军队。这时，他获得了机会，与桑多米埃什总联盟合作来统治

国家。该联盟采用多数票原则，并授予其领导人德霍夫以广泛的权力。波兰共和国就是在它的自由选王制的大部分基本权利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最后向瑞典宣战的。

当波兰采取这一步骤时，它就与沙皇结成同盟，因为沙皇自1700年以来就一直与瑞典进行着搏斗。1701年俄国就曾向波兰提出过缔结这样的同盟，但那时波兰人只有在基辅和斯摩棱斯克归还给他们的条件下才能参加反瑞典的阵营。彼得一世拒绝按这些条件进行讨价还价。1702—1703年间，他的外交成功了，与立陶宛贵族达成协议，这些贵族由于痛恨瑞典人支持萨皮埃哈家族，因而他们参战了。在波兰方面，只是到莱茨津斯基当选之后，才恢复（与俄国的）谈判。共和国这时急切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在合作的条件上已不再能提出高价，于是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于1704年8月30日在纳尔瓦缔结了同盟。

[\[16\]](#)波兰代表为首的是海乌姆诺总督托马斯·吉亚林斯基，俄国的首席代表是F. A. 戈洛温；在吉亚林斯基要求下，维尔纳的教士、立陶宛驻沙皇宫廷代表（当时从属于那里的波兰大使）克里斯托夫·比亚洛佐尔也参加了谈判，吉亚林斯基毫不犹豫地指责俄国人签订的前述立陶宛协定的一些部分是不正当的，因此，《纳尔瓦条约》最后是一个妥协的方案。俄国人拒绝确认1686年的永久和平，但他们也没有怂恿波兰人缔结一个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公开联盟以反对一切敌人（很显然他们心中指的是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至于波兰人，则未能得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经济开发权，根据1686年条约，这一地区的人口应当减少。俄国得到的是一个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将牵制瑞典军队的大部分力量，从而使俄国能放手改善其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位。波兰人除得到军事和财政援助外，还得以废除俄国—立陶宛协定，并且说服俄国人镇压哥萨克起义。这是吉亚林斯基提出的结盟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种压力下，俄国命令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军事首领和佩莱吉的敌人伊凡·马赞拉去捉拿那位反叛的哥萨克人。佩莱吉遭到伏击并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后来，马赞拉被抛弃，沙皇又让佩莱吉回到乌克兰，使他能及时赶上参加波尔塔瓦战役。第聂伯河右岸的要塞也曾落入马赞拉之手，驻上了俄国和哥萨克军队，波兰人只是在1711年、在彼得一世普罗斯河战役失败后，才返回该地区。

正当奥古斯都不断遭受新的挫折的时候，《纳尔瓦条约》对他的命运有所帮助。查理十二世蹂躏了利沃夫，拒绝让奥古斯都进入华

沙，并于1705年11月28日在华沙迫使波兰人签署了在政治和经济上从属于瑞典的条约。瑞典宣布它自己可在波兰的土地上征兵，可驻军于波兰要塞。波兰共和国必须废除未经瑞典国王批准的一切条约。瑞典商人豁免波兰的大部分关税和其他义务，有权在波兰全国各地定居和经商。波拉加港将被封闭，其贸易转而通过瑞典的利沃尼亚的各港口进行。最后，这个条约将列入誓约，所有波兰国王候选人均须庄严地加以接受。尽管如此，《华沙条约》也还没有包括瑞典的全部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还包括库兰和波属利沃尼亚。在斯德哥尔摩，曾提出占领格但斯克的要求，只是由于海上强国采取了积极行动，才阻止了对这个斯坦博克在1704年就打算夺取的港口的进攻。不过，就条约来说，它表明莱茨津斯基派是完全依赖查理十二世的。《华沙条约》阻止了以后在斯坦尼斯拉斯和桑多米埃什总联盟之间和解的企图。

这时，在莫斯科和德累斯顿作出决定，由俄国、萨克森、波兰联合向查理十二世的军队发动攻势。1705年2月，4万俄军从波洛茨克向维尔纳进军。这支军队不得不与莱文哈普特旅多次进行战斗，因此未能阻止莱茨津斯基于10月4日在华沙加冕。佩吉考尔将军也曾设法阻挠这次加冕典礼，但是他率领的萨克森、波兰和立陶宛的骑兵，7月31日在首都郊区被打败。因此，粉碎查理十二世的计划一直拖延到了次年。不过，查理当时的处境也并不轻松。在东面他面对着3.5万人的俄国正规军，在西面是舒伦堡率领的2万萨克森军队。在沃尔西尼亚和卢布林省，有2万多人的哥萨克部队随时准备与萨克森人会合。波兰王军已集中在南部各省，立陶宛的旗帜飘扬在布格河上。这样，就有10万多军队反对查理，而他掌握的军队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其中还有1.2万人是莱茨津斯基的追随者所招募的。由于害怕上述盟军联合在一起，查理像往常一样以进攻来保全自己。他派遣伦斯舍尔德军团1.2万人前往西里西亚前线，与他的其余部队一起向格罗德诺进军，俄国人在该城凭借防御工事固守。查理十二世不是设法强攻俄军阵地，而是决定切断连接格罗德诺到俄军前线的交通联系，从而与在利沃尼亚的瑞军连接在一起，并威胁斯摩棱斯克。奥古斯都满以为格罗德诺万无一失，率骑兵离开该地前往华沙，目的是与舒伦堡一起组织一支能够击败伦斯舍尔德的军队。但是舒伦堡已在沃斯乔瓦（弗劳斯塔德）孤军作战，因为那里的萨克森军队已被击溃。于是沙皇命令他的军队撤往基辅。由于涅沙维茨、比尔扎和拉舒维斯各地的顽强保卫，瑞军追

击受阻，一无所得，而俄军则设法与彼得一世在第聂伯河一线聚集的其他军队会师。

瑞典人兵力太少，无法控制整个农村地区，忙于破坏占领的要塞和烧毁奥古斯都的追随者的庄园。一些权贵人物如立陶宛首相查尔斯·拉齐维尔，莱茨津斯基的叔父、罗塞尼西总督约翰·斯坦尼斯拉斯·杰布隆诺斯基，因他们的财产遭到破坏，而不得不承认莱茨津斯基。但总的来说，瑞典人几乎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像看守俘虏一样看守他们征募来的士兵，防止这些人倒向奥古斯都。最后，被夺的土地都由忠于奥古斯都的米歇尔·威斯尼奥威基和立陶宛总司令格雷戈里·奥金斯基的军队归还给了原主。查理十二世发现俄军前线防卫坚强，乃决定：破坏波兰—萨克森统一并使莱茨津斯基的统治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最好办法是踏平萨克森。因此，从1706年8月开始，瑞军开始从沃尔西尼亚西进，所过之地，烧杀抢掠一空；9月初，与伦斯舍尔德会师后，横越西里西亚进入萨克森。萨克森已无军队可言，无力进行抵抗。要塞不经一战就投降，城镇向入侵者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俄国人与波兰的一支军队一起渡过维斯杜拉河，10月29日在卡利什击败守卫大波兰的瑞军马第菲尔德的部队。这样，几乎整个共和国均回到奥古斯都手中。但他不能忘怀他的仍被瑞军占领的萨克森。事实上，在瑞军进入萨克森后，奥古斯都马上就与查理十二世接触；在卡利什战役改变局势之前（那里只有最高司令官坚持才进行一次战斗），他的密使已接受了和平条件。1706年9月24日签订了《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奥古斯都的波兰王位被剥夺，他被迫与沙皇决裂，不仅要令萨克森军队中的俄国部队投降，而且要把彼得驻德累斯顿的大使帕特库利交给瑞典。奥古斯都必须承认莱茨津斯基并付给巨额现金赔款。当事实证明他的俄国盟友不愿为继续与瑞典对抗而进入萨克森，哈布斯堡的干涉以及奥地利与瑞典发生冲突的希望又化为泡影之后，奥古斯都彻底离开了波兰。离开前，他向波兰常务院的成员和俄国驻波兰大使道尔高鲁基保证，待敌人撤出萨克森后，他将重返波兰。

桑多米埃什总联盟的领导人虽失去了他们的国王，但并未因此而考虑放弃斗争。他们选择了詹姆士·索比斯基来代替奥古斯都。这位维也纳的救星之子这时已从被囚禁的萨克森监狱中出来，他那具有魔力的名字使他博得贵族的支持；如果莱茨津斯基的当选无效，他很可

能把波兰两个联盟联合起来。这个计划提交给俄国沙皇请求帮助，他答应支持。索比斯基与联盟的成员们进行谈判，但他慑于查理十二世明确表示的敌意而未敢宣布登上王位。^[17]于是，联盟成员们向沙皇彼得提出其他候选人：萨伏依的尤金或者弗兰茨·拉科西二世。提出尤金是由于这很可能引起奥地利与瑞典之间的战争；而提出另一个人选拉科西则是由于预料到路易十四会居间调停，使俄、波与瑞典媾和。这样可以在两个可能的好处中得到一个：或者结交一个新的强大的同盟者继续作战，或者与瑞典媾和并与匈牙利联系起来。然而，沙皇唯恐一旦预料中的瑞典东进攻打俄国成为事实，波兰联盟成员们最终会倒向莱茨津斯基，所以彼得一世念念不忘的是迅速将莱茨津斯基取而代之。于是他提出当时任王国最高司令官、凭借本身的力量成为首要权贵人物的西恩尼斯基为国王人选。西恩尼斯基与沙皇讨论了这一建议，但没有接受它，因为还不希望关闭与莱茨津斯基或与奥古斯都谅解的大门。在詹姆士·索比斯基退出竞选后，联盟成员们又倾向于选举奥古斯都。因此，就沙皇来说，联盟分子没有郑重其事地提出可以替代莱茨津斯基的人选，除非是能够使奥古斯都重返波兰。同时，他们强烈反对沙皇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和立陶宛（俄国占领了贝乔和莫希莱夫）的兼并活动。

1707年瑞军返回波兰后，俄国与波兰之间的互相指责平息下来。举行新的选举被推迟，俄波结盟关系由于得到军事上新的效忠诺言而加强了。此外，查理十二世准备东进，迫使彼得在瑞典的侧翼寻求同盟者。显然，他只有选择丹麦和由于蒙受《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之辱而仍然痛苦万分的萨克森的奥古斯都。与奥古斯都的谈判由塞姆贝克家族的两个亲俄分子——新任大主教斯坦尼斯拉斯和副首相约翰——以及库亚韦主教康斯坦丁·萨尼奥斯基进行；萨克森方面则由弗莱明进行。塞姆贝克家族的上述两个成员不顾沙皇彼得的不满，于1707年底前往西里西亚，以便与德累斯顿保持更好的接触。然而，奥古斯都尽管一再许愿，却未能重返波兰。彼得因而也就对他重返波兰不抱希望了：“我们没有得到奥古斯都离开萨克森的消息，我们对此也不再抱任何热切的希望。”^[18]如若波兰联盟分子能够保证莱茨津斯基在俄国与瑞典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话，他甚至会准备让桑多米埃什总联盟的成员们承认莱茨津斯基的。

俄国与瑞典之间的冲突这时急转直下。1708年初，查理十二世渡过维斯杜拉河。在斯摩尔戈努和拉多齐科维采稍事停留后，于6月17日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进军，在霍洛维茨附近突破了俄军防线。以后，由于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受到顽强抵抗，加之缺乏粮秣，迫使他南进乌克兰，那里，从1705年起就与莱茨津斯基保持联系的马赞拉已决定支持瑞典人。

但是，莱茨津斯基的军队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因为，6月16日斯坦尼斯拉斯从拉多齐科维采撤退到共和国的中心地带，集中力量加强他自己的阵地，由于桑多米埃什联盟派这时已控制了大部分波兰，要做到这一点已非易事。最高司令官西恩尼斯基在利沃夫设立了总司令部，这样，王军就控制了整个小波兰和部分大波兰以及马佐维亚。萨尼奥斯基主教住在克拉科夫，作为莫斯科、德累斯顿和利沃夫之间，以及西恩尼斯基和塞姆贝克家族两成员之间的联络。德霍夫竭力拉拢克拉科夫和桑多米埃什两省的贵族，使他们忠实于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派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为奥古斯都的逊位感到痛惜。

[\[19\]](#) 莱茨津斯基和他的军队从拉多齐科维采的到来使他们陷入困境。奥古斯都这时若率领他的萨克森军队出现，会使事态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但他即始终踌躇不决。沙皇在瑞军面前节节败退无法给予帮助。不过，联盟派能够抵抗住莱茨津斯基，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军队，而且可利用莱茨津斯基阵营内部的不和。在查理前往俄国之前，他曾禁止他的波兰仆从们召开议会或与反对派和解。然而，在莱茨津斯基的合作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赞同他与俄国作战的计划。大多数人赞成保持中立并与桑多米埃什联盟达成谅解。[\[20\]](#) 莱茨津斯基任命基辅总督、主战派领袖约瑟夫·波托斯基替代西恩尼斯基为王国最高司令官，波托斯基把西恩尼斯基看成是妨碍他充分行使权力的对手，于是迫使双方在军事上摊牌。战事于1708年11月21日在柯尼克波尔发生，海乌姆诺地方官西吉斯蒙特·鲁宾斯基和立陶宛财政大臣刘易斯·波契杰在该地打败了波托斯基。与此同时，西恩尼斯基向莱茨津斯基提出不可能接受的强硬条件：保持与俄国的联盟，宣布全面和平，举行自由选举。而莱茨津斯基由于完全听命于查理十二世的意志，因此削弱了他与奥古斯都的支持者进行谈判的权力。西恩尼斯基拖延时间，期望沙皇或者会获胜，或者会帮助联盟派。1709年元旦，一个使者带情报给西恩尼斯基，说奥古斯都准备随时在莱比锡与俄国使节接触，

缔结一个条约后，他将会重返波兰。继这个消息之后又传来消息说，3个俄军正规团在英弗莱特将军率领下正向波兰靠近，这大大提高了联盟派的士气。西恩尼斯基向前推进与俄军会师；而德霍夫则推进到西里西亚，以帮助塞姆贝克家族加速让奥古斯都返回波兰。西恩尼斯基的军队和英弗莱特的俄军在查尔纳奥斯特洛格附近的陆军元帅戈尔茨的军团的增援下，寻索莱茨津斯基一战。莱茨津斯基被查理十二世召去支援瑞典军队，不敢冒险与西恩尼斯基和戈尔茨交战，遂撤过维斯杜拉河。总之，由于莱文哈普特在莱斯那贾的失败而已经削弱的瑞典军队，在1709年7月8日波尔塔瓦战役达到顶点以前关键的几周时间，没有从波兰得到任何援助。

当查理战败逃跑的消息传到萨克森后，奥古斯都终于下决心重返波兰。俄军从乌克兰推进；西恩尼斯基和戈尔茨打退了莱茨津斯基的军队；莱茨津斯基本人逃到瑞典属的波美拉尼亚。8月中旬，萨克森军队越过波兰边界。奥古斯都不仅受到桑多米埃什联盟分子的欢迎，同样受到莱茨津斯基以前的追随者的欢迎，连忙重新登上他3年前放弃的王位。波尔塔瓦战役使《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失去了效力。桑多米埃什联盟在这次胜利中起了作用：它阻止了莱茨津斯基为了瑞典的事业而统一波兰，而且当他设法去救援瑞典人时，联盟又牵制了他的军队。波兰这时摆脱了《华沙条约》的桎梏。[\[21\]](#)

然而，由于瑞典的失败，结果使俄国的力量增强了。波尔塔瓦战役改变了俄波关系。由于共同反对瑞典的斗争而迫使他们紧密合作的阶段已告结束。相反，奥古斯都二世一旦重登王位，就尽力争取自由地掌握自己的政策。而随着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俄国拒绝从乌克兰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要塞撤退它的驻军，俄国派遣军队深入波兰领土，并开始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1710年春，桑多米埃什联盟派的总委员会在华沙开会，取消了奥古斯都二世的退位令，投票通过给军队提供必要的供应，并考虑采取措施遏制俄国的影响。如果奥古斯都的独立政策真的得到共和国其他集团的一贯支持的话，沙皇的干涉很可能会受到抑制。但是，由于“黄金般的自由”与“王权”之间的冲突又起，结果随之而来的反而是这种干涉变本加厉了。

瑞典的失败和奥古斯都的复辟，开始了一个对波兰的命运来说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它使波兰的最后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

事。在17世纪50年代的战争时期，曾经拟定过一个计划，本来可以使该国免受邻国军事专制主义的欺凌而生存下去。50年后，它的政治独立已经受到损伤，因此产生了对内进行改革对外争取解放的愿望。但遇到的问题千头万绪，以致找不到任何可以一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国家面临的一切难以克服的政治困难带来的只有筋疲力尽。

波兰确实是尝够了优柔寡断造成的一切苦果。连年战祸，无尽无休地安顿和支应来往过境的军队，已使全国各地满目疮痍。萨克森本身由于瑞典的占领已饱受创伤；而在波兰，俄国的、瑞典的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样都是横行无阻，无情搜刮城乡钱粮，靠这块土地养活。据估计，以这种方式搜刮的财物达6000万塔勒，比整个北方战争期间共和国总收入的3倍还要多。就连唯一没有向外国军队投降的城市格但斯克，也“缴纳”了数十万塔勒。最严厉的报复是惩罚政治上的对手。例如，1706年，瑞典人在沃尔西尼亚破坏了140个支持奥古斯都的村庄；次年，俄国在大波兰采取同样的行动；1716年，萨克森军队烧毁了国王的反对者的庄园。这些破坏大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人考察过，破坏以后接踵而至的是瘟疫和饥谨。1706年到1713年，黑死病在全国各地猖獗流行，人口锐减，有些城镇，如沃斯乔瓦、塞拉茨、莱祖卡，实际上断绝了人烟。歉收之年，饿殍遍野——尤其是1707—1710年在立陶宛，1714—1715年在小波兰。共和国人口在1650年曾达到约1000万，这时下降到不足600万。难怪整个整个的村庄甚至城镇空无一人。1710—1715年进行的王室产业调查，不断报道人口锐减，房屋毁坏，耕地荒芜，庄园仓廩空虚，连种子也没有。在某些地区，例如立陶宛的格罗德诺地区和克拉科夫附近利布斯地区，90%以上的耕地荒芜。

这些倒退并没有改变贵族和农权的关系。以前那种高度的强制劳役仍保持着，对农民的人身限制没有缓和。在这种形势下，重建庄园，或者即使是恢复最起码的繁荣也是很困难的。农村摆脱这样的大灾难，只能等下一代人了。城市的情况更加悲惨。它们遭受了半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兵燹。以前，庄园经济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城镇至少可以设法维持下去，而新的灾祸则带来了毁灭。在当时的欧洲，大概没有地方像波兰这些城镇那样悲惨的了。遭受抢掠，人口锐减，神职人员和权贵们诛求无厌，管理王家城镇的宫廷官吏或私有城镇（占总数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横征暴敛，使

城镇根本没有财力、物力来重建，更不要说发展了。城市手工业由于受到贵族支持的农村手工业的竞争，产量已减少到最低限度。商业停滞，只有格但斯克例外，那里更重要的买卖都在边界外——如布雷斯劳、莱比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里加——进行。许多城镇变成了农村，其居民大部分不再从事城市商业而是去务农，沦为同服徭役的农奴一样。本来就已经软弱的中产阶级，已变得完全无力在波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任何重要作用，而要让他们在国家现代化的任务方面起作用就更加困难了。

战祸也打击了贵族，不论是中等贵族还是大贵族。军队根本不尊重贵族的豁免权；贵族的庄园一旦遭蹂躏，再也不能提供像过去那样的收入。大贵族们往往有很多庄园散布在几个省，他们可以比较容易逃跑，但中等贵族就完全遭殃了。他们向更有权势的邻居处寻求避难，带着大批随从。这样，官员和贵族之间的倾轧不再是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它已由争权夺利的大官及其追随者们之间更加经常出现的对垒所代替。他们中有人一贯反对结成爱国人士所要求的保王派——至于贵族，经过如此众多的严酷教训后，他们有些人对改革，哪怕是部分改革，确实产生了兴趣。

18世纪最初10年，这个国家逐渐分崩离析。议会仅仅在1701年和1703年开过会；1704年以后，只有各联盟的委员会曾经开过会。由于外国逼国王退位，后来又要求重新选举国王，使王权加倍地削弱。斯坦尼斯拉斯任命了一些官员，替代奥古斯都已经任命的人，结果使行政机构紊乱。与此相反，军事首领们的权力却达到空前的程度；他们除了指挥军队外，还控制了财政，并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国家岁入减少，无法招募足够的兵员；甚至连修理装备的钱都没有。地方议会的权力由于填补中央权力留下的真空而扩大了，它们在税收、征兵、内外政策的方针等方面各行其是。由于可自行规定休会期限，它们无须再按惯例得到国王的命令就可以开会。他们的很多决议，取决于当时哪个集团占统治地位，以及外国和波兰的军队的压力。能够代替王权的唯有两个总联盟的权力，但是华沙联盟和桑多米埃什联盟之间的分裂，再加上外国保护者的干预，大大削弱了它们领导国家事务的能力。

由于政府的分裂，随之而产生了贵族的道德败坏和政治的混乱。甚至一些位居要津的人也贪污腐化。政客们反复无常，今天追随这一

派，明天追随那一派，后天又回到这一派，有时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有时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在政治上能贯彻始终的人，实属凤毛麟角。然而，说来奇怪的是，正是在一些保持着为公众利益着想的精神的贵族中，出现了一个阻挠军事和财政改革的运动。因为这些改革要靠加强王权才能进行，而这些人却宁愿加强议会的权力。

改革中的共和派的代表人物是立陶宛副首相斯坦尼斯拉斯·萨佐卡和桑多米埃什地方长官斯坦尼斯拉斯·杜宁·卡尔威斯基。前者与马佐维亚的贵族有联系，后者是一个加尔文派教徒、一个有经验的会议员。萨佐卡的主张以“坎迪德·维罗宁西斯”为笔名发表在《波兰的黑暗时期：展现的情景》（1709年）一书中。卡尔威斯基的著作《共和国的治理》没有出版，但有许许多多的手抄本，说明它受到广泛欢迎。两位作者都提出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作为军队的经费，并为此而专门动用王国的岁入；萨佐卡也提出动用教会财产，不过只是一种假想，而且没有真正的说服力。他们还要求削减军事首领的权力，这些官职应通过选举产生；他们还一致认为必须改组军队，萨佐卡认为军队应为3.6万人，卡尔威斯基则认为应更少一些。萨佐卡十分强调使大贵族了解政治，例如，他设想建立邮政服务，传递消息。卡尔威斯基建议成立年度常设议会，可随时闭会和恢复辩论，而无须更换议员——这在波兰是一种新的做法。他还设想应严格限制解散议会的机会，但他没有抨击自由否决权的原则。改革后的议会将受国王的庇护。最后，卡尔威斯基建议改变选举国王的办法，即由各省进行投票，他们的很多主张后来曾由一些杰出的政治著作家，如莱茨津斯基本人和斯坦尼斯拉斯·科纳尔斯基所讨论。

奥古斯都二世的复辟，改善了进行基本宪政改革的前景。事实上，这并没有超出宫廷本身的利益范围。虽然国王本人的方案要走得更远些。1710年华沙联盟总委员会的辩论，也有着同样的倾向：它投票赞成建立一支3.6万人的常备军，并拨给它很大一部分岁入，包括关税和货物税，由财政大臣支给。这些决议“标志着两个萨克森国王时期改革的最高阶段”^[22]。然而，在共和国，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到把决议付诸实施相距何止千里——贵族们受莱茨津斯基的追随者们的宣传鼓动，拒绝按总委员会的决议行事；教士们的态度取决于罗马；地方议会则按它们自己的如意打算操纵立法。

莱茨津斯基的追随者们对俄土战争寄予很大希望^[23]，当战争结束时，虽然结局对彼得一世很糟，但对波兰王室并没有什么影响。在瑞属波美拉尼亚进行的牵制战已结束，萨克森军队开进该地，为奥古斯都夺得了什切青和斯特拉尔松。1712年召开的议会在改革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它拒绝接受国王提出的以固定税收维持军队的建议，但它通过宣布休会而避免了本身的解体。依靠这种办法，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都可以保留下来，否则的话，议会若提前解散，这些决议就统统无效了。这种程序上的新做法，使人们担心“会引进英国式的议会”，就是说，建立起一个更加容易被国王控制的议会。^[24]最后，这个议会在限制军事首领的权力这个重大问题上解体了。议员们在祝贺解散时记载道：“国王陛下在这些议会中把否决权归还给我们了。”就这样，改革的第一次冲击无结果而告终。虽然争论本身始终没有离开财政和军事改革的范围，但究其根本原因，分裂是由于莱茨津斯基派的反对，也由于人们担心萨克森势力的增强和俄国的继续干涉。

波尔塔瓦战役后，俄国军队遍布波兰共和国，沙皇操纵着它的政治。沙皇试图把他的大部分军事费用强加给他的同盟者，以节省他自己已筋疲力尽的国家开支。随着赋税的重担落到城镇和乡村，加之莱茨津斯基的追随者遭到放逐，亲俄派的优势完全得到保证。在王国，最高司令官西恩尼斯基在沙皇的帮助下保持了他牢固的地位，就像立陶宛司令波契杰也保持了其地位一样，在这点上，奥古斯都顺应了沙皇的意愿。每个军事首领都结成一个与贵族特权结合在一起的保守派系。归根到底，奥古斯都把自己的复辟归功于俄国的胜利，归功于沙皇决定废除波尔塔瓦战役前在德累斯顿达成的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奥古斯都的儿子应仿照西吉斯蒙特一世朝的先例，在其父亲在世时就被选为国王。由于受到支持康斯坦丁·索比斯基的运动的威胁，奥古斯都后来于1709年10月20日在托伦与彼得签订了另一个协定，答应站在俄国一边继续进行对瑞典的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接受了限制他的外交自由的条件。这样，波兰的一切主要权力核心都依附于彼得一世。此外，彼得不顾对共和国和对奥古斯都承担的义务的约束，继而又征服了利沃尼亚，禁止波兰人进入里加。另一方面，他坚决拒绝普鲁士瓜分波兰的建议。一个软弱的波兰，既是一个令人

放心的邻居，又是俄国对德意志采取行动时方便的桥梁。彼得一世利用国王与军事首领之间的对立，得以永久保持他的支配地位。

然而，沙皇的政策在波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贵族们欢迎赶走瑞典人，也准备把沙皇作为他们权利的保护人，但这时转而反对沙皇的辅助部队，并且逐渐反对奥古斯都本人，他们把他看成是沙皇的工具。这就是莱茨津斯基派重新抬头的背景。这一派成员中的很多著名人物已移居国外，有些人与斯坦尼斯拉斯本人一起住在什切青，其他人则在（土耳其）本德投靠了查理十二。但是，在波兰国内，鲁塞尼亚总督和莱茨津斯基的前首相斯坦尼斯拉斯·杰布隆诺斯基策划了一起阴谋。1711年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波兰宫廷迟迟不参加俄国一边；6月9日在亚罗斯拉夫，奥古斯都只同意在波美拉尼亚采取牵制行动。《普鲁斯条约》又一次改变了彼得一世与波兰的关系。这时，他答应撤出共和国。因为对土耳其人来讲，共和国的完整是最重要的。^[25]但这些允诺到两年后方兑现。那时保证从奥斯曼帝国政策中获得的是奥古斯都而不是莱茨津斯基或瑞典人，从而使奥古斯都的解放政策又获得了新生。

奥古斯都的解放政策交织着他加强王权，特别是保证波兰王位由他的儿子来继承的意图。这样的话，卡尔威斯基和其他人关于共和改革的计划就是对宫廷的专制主义计划有利的事，这些计划的主要拟定者是萨克森的大臣们，特别是弗莱明。在波兰最重要的人物中间，支持强有力的君主政体的主张并不强烈，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王国财政大臣普尔泽本道斯基，库亚韦主教萨尼奥斯基和海乌姆诺总督西吉斯蒙特·鲁宾斯基有时似乎赞同这种主张。总之，在波兰推行彻底的专制主义是不可能的。奥古斯都本人就明确表示，他所能期望的，最多不过是限制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权力。在萨克森，他同样无法指望推翻固有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据说是计划通过武装政变来彻底改变政府整个制度的所谓弗莱明计划，肯定是不足凭信的。撇开普鲁士计划（即废除贵族权力，同时有限度地瓜分波兰）不谈——1715年6月曾与弗莱明商讨过这个计划，但由于其中的领土条款，被弗莱明拒绝。宫廷的计划可概括为四点：扩大王权以确保奥古斯都·韦廷王朝的继承权；废除自由否决权，并设立议会各委员会，与国王协力行事；设立各秘密委员会，以决定分配官职和鼓励成立宫廷党；最后，波兰与萨克森之间更密切地联合，办法是缩减波兰军队，把一部

分可靠的萨克森军队转由共和国供养；通过征服西里西亚领土来开辟共同的边界；允许萨克森贵族在波兰获得土地和官职。[\[26\]](#)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在波兰得到广泛的支持，而在萨克森，由于奥古斯都推行天主教教义，更加使这些计划没有被接受的可能。[\[27\]](#)在波兰，人们把这些计划看成是朝臣们用以讨好德意志人的手段，“而德意志人总是想让我们共和国保持从属地位，永远不想让它处于繁荣地位”。更有甚者，奥古斯都就是打算通过利用萨克森军队或通过乞求外国的援助而达到他的目的，必要时付出把领土割让给邻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1713年，由于土耳其扬言要使莱茨津斯基复辟，从而使萨克森军队有可能重新进入共和国。由此，国王又有新的借口来放逐莱茨津斯基派成员：杰布隆诺斯基被囚禁在萨克森的柯尼施泰因的萨克森城堡中。奥古斯都借口继续存在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而把萨克森人留了下来。但是，萨克森人强征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从而在波兰全境引起了抗议的浪潮。国王对此置之不理。一方面，他开始寻求外国的支持。在波兰的邻国中，奥地利和俄国一样，拒绝接受加强波兰王室的主张，即使以领土作为交换条件也如此。相反，俄国继续待在利沃尼亚，因为它知道，归还该地区将会使之用来保证韦廷家族的继承权。只有普鲁士也许曾赞同波兰宫廷的计划，不过要以得到东波美拉尼亚和库兰作为代价。这一牺牲将会切断波兰的出海口。因此，宫廷不得不去寻找距离更远的同盟者，因为对这样的同盟者来说，波兰王室的强大与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与英国关系的恶化——在英国，安妮女王集团里的人曾竭力阻挠奥古斯都的儿子皈依罗马天主教会——表明，法国是最有可能被选为盟友的国家。华沙宫廷估计凡尔赛可在安排解决北方问题中作为调停者，而凡尔赛无疑想利用奥古斯都作为在西方促进和平的工具。在瑞典的势力衰落后，法国不得不或者在北方寻找一个强大的新盟友，或者重新建立一个由较弱小国家，如瑞典、波兰、萨克森，也许还有普鲁士，组成一个亲法集团。这就是1714年8月20日在雷齐纳签订友好条约的背景，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以后达成协议，让奥古斯都之子与法国联姻，并保证在下次选举国王时法国给予支持。

奥古斯都的计划最后由于查理十二世的固执而归于失败，因为他拒绝接受奥古斯都和斯坦尼斯拉斯1712年在梅克伦堡达成的谅解。他

从本德回来后，即在施特拉尔松准备继续进行战争。奥古斯都惧怕瑞典再次入侵，与丹麦和普鲁士一起重新开始了反对查理十二世的军事行动。法国的调停并未出现，路易十四实际上站在查理十二世一边。查理十二世的顽固立场，给奥古斯都的计划敲响了丧钟，因为他这时发现共和国环绕着他爆发了危险风暴，而他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查理十二世的极端政策是要把波兰，同样也把瑞典推入深渊。

奥古斯都与法国恢复友好关系的企图，在波兰及奥古斯都的盟友中引起了猜疑。它使俄国人惊恐，害怕奥古斯都退出北方联盟，甚至顺从瑞典的意愿，拿起武器反对彼得。这种恐惧虽然是错怪了人，但彼得还是利用波兰人对奥古斯都的不满而决心使他的倡议落空。波兰人对奥古斯都的不满，导因于萨克森的征敛，正好又碰上连年歉收，由于他又逐步靠近凡尔赛，并且这同专制主义分子搞的一次阴谋不谋而合，因而使这种不满更加强烈。尤其是军队首领们，当他们发现国王计划削弱他们的权力，甚至想清除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后，感觉到岌岌可危。1714年秋，西恩尼斯基和波契伊鼓动贵族起来反对萨克森人，答应在军事上给予援助。宫廷虽暂时设法粉碎了这一反抗，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支持贵族权利原则的还有彼得一世，他要求萨克森人离开波兰。沙皇驻华沙代表达什科夫不仅向军队首领们，而且向莱茨津斯基派首领，克拉科夫总督贾纽茨·威斯尼奥威耶茨基作出许诺，俄国支持他们反对奥古斯都。于是共和国又一次处于内战边缘。

第一次行动始于立陶宛。司令官波契伊担心被免职，召集贵族于1715年夏在维尔纳开会。会上一致同意拒绝向萨克森纳贡并把萨克森军队逐出国境。俄军出现在立陶宛，向施特拉尔松推进，救援丹麦和普鲁士军队。这时形势对波兰宫廷来说，似乎确实十分严重。但是不久就显然可以看出，俄国人并不打算给波契伊以军事援助。结果，这位司令官于9月22日与维森费尔斯将军妥协，允许萨克森人在立陶宛驻扎过冬。但是，在其他地方，萨克森人继续征敛，9月间引起了骚动。在克拉科夫省南部各县，贵族与派去征敛贡赋的萨克森分遣部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在其他省和在军队里进行的鼓动，导致王军中的一部分人于10月1日在戈齐斯组成一个新的联盟。不久以后，桑多米埃什省的一个萨克森团在拉多各斯采被打败。于是，使那里的贵族受到鼓舞，他们在弗莱明反攻前，也着手组织一个联盟。整个小波兰燃

起了熊熊斗争烈火：城市平民和农民对萨克森人的野蛮破坏行径忍无可忍，与贵族并肩战斗。1715年11月26日，在一个小城镇塔尔诺格勒成立了一个总联盟。以前要想从这些贵族那里为王军榨取金钱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他们却自发地自己征税，高举联盟的旗帜。甚至连那些过去对瑞典战争不闻不问的人，现在也参加到共同的事业中来了。

但是，萨克森的军事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弗莱明得以将塔尔诺格勒联盟分子赶向东南，进入沃尔希尼亚；背叛分子交出了重要的城堡扎莫希奇。西恩尼斯基和与他接近的一些常务院成员进行了调停，在拉瓦一鲁斯卡匆忙拼凑了一个条约，规定向萨克森人提供一种单一的贡赋，并规定他们在一定的日期撤离，但这个日期没有确定是哪一天；但是这些安排被联盟的领导人拒绝了。他们指望立陶宛的增援和俄国的外交干预。最初，俄国虽保持中立，其实他们的军队停止向波美拉尼亚推进，从而积极地为萨克森军队的集中提供了方便。事实上他们力图在“王权和自由”两者之间的争执中进行仲裁，彼得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摆出一副捍卫“黄金自由”的战士的姿态，以反对波兰国王势力的任何增强。保持现行的宪法，可保证俄国占有17世纪获得的波兰领土，不使波兰采取任何收复失地的行动。它还使俄国有时间来消化它新征服的波罗的海沿岸领土，并取消波兰在利沃尼亚的领土要求。奥古斯都完全明白沙皇的调停将会妨碍他的制宪计划，于是他试图与联盟分子直接谈判。而联盟分子却上了当，以为彼得不会向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并且想充当调停人：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希望彼得能使他们实现废黜奥古斯都，让康斯坦丁·索比斯基与彼得的侄女联姻，拥他登上王位的打算。在这种形势下，奥古斯都表示同意调停，并安排在格但斯克与彼得会晤。此时，内战仍在继续。联盟分子向大波兰（在那里宣布成立了另一个联盟）逼近，并攻克了波兹南。这时，立陶宛支持他们。不过，最后还是决定与奥古斯都谈判。和谈从6月拖到11月，先是在卢布林，后来又在下卡齐米日和华沙。在这里，1716年11月4日，即塔尔诺格勒联盟成立将近一年之后，签订了一个条约。

条约是在笼罩着俄国军队阴影的情况下签订的。原来十分友好的彼得与联盟分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因为他看到联盟分子的领导人、克尔泽明涅茨地方长官斯坦尼斯拉斯·莱图乔斯基一心要奉行独立的政策。莱图乔斯基曾建议从维也纳，甚至从土耳其或鞑靼人那里

寻求援助。1716年的奥土战争使这些希望化为泡影。相反，俄国军队却在奥古斯都请求下进入波兰王国。11月14日的条约以及以后在没有俄国大使格列戈里·道尔高鲁基斡旋下，在华沙达成的一些协议，由所谓的“沉默议会”所批准。这次议会在1717年2月1日召开，没有进行讨论就宣告解散。但与历史学家一再重复的看法相反，不论是《华沙条约》，还是“沉默议会”的决议，都不是道尔高鲁基强加的，一般说来，他仅仅限于起主席的作用。尽管彼得一世明确表示希望要有一个俄国人在当中充当保证人，但他没有如愿，因为奥古斯都和联盟分子都对此持敌对态度。^[28]因此，俄国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标，因它本来是为了这个目标才同意从中进行调停的。

这个条约确实排除了奥古斯都在萨克森军队的支持下实行专制的任何可能性。条约命令萨克森人离开共和国，只允许奥古斯都留下他的1200名萨克森近卫队。萨克森官员也被赶走，只有萨克森办事处的6名成员除外，但明确禁止他们干预波兰事务；这样，波兰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萨克森。但是，另一些条款则明显地提高了国王在国家中的地位，其提高的程度竟使得普鲁士大使勒赫费尔深感不安地禀告腓特烈·威廉一世说，“已经为专制统治奠定了极好的基础”。确实，联盟分子中有一派人在莱图乔斯基的领导下，与奥古斯都一起，想利用谈判作为手段，实行某些改革。地方议会的权限削弱了，禁止成立联盟。最重要的是常备军的数目限制在2.4万人，并且第一次以固定的税收来供养，包括从贵族的财产中征收的税。国家岁入达到每年1000万兹罗提，这对军事需要来说数额是太小了，这是受到国家的经济崩溃的限制。为确保这笔钱用于军队，规定直接发给各个团，而不通过财政部，这一决定对这次具体的改革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军队首领的权力受到了遏制，其他高级官员的职责也作了明确规定。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被控与国王和共和国的敌人相勾结的人。最后，国王说服军队首领们把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包括步兵和重骑兵，都交由弗莱明掌管。

宫廷的追随者们深信，已经向根本性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华沙条约》和“沉默议会”决议的起草人之一萨尼奥斯基主教推心置腹地告诉勒霍费尔说：如果能恢复世袭制，将会对波兰更好些；并且说自由否决权是荒谬的：“英国实行多数表决制，就治理得很好。”^[29]在1718年的下次议会上，宫廷提议扩大军事改革，向炮兵和维修城堡

提供经费；并且考虑扩大军队的规模。同时，国家着手制定一个重商主义的纲领，规定鼓励城市发展，取消私人关税，保护矿藏，禁止出口羊毛，管理维斯杜拉河航运，改革币制，以及其他革新。另外还建议调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增加教会财产的税收额，限制向教会赠送遗产，没收教会违反1635年宪法而占有的庄园，减少教会征收的各项费用，削减教会法庭的权限。然而，尽管奥古斯都不久前在权威方面有所增进，但未能使这些进一步的改革获得通过。又一次仅仅靠赶快休会才使议会免于彻底瓦解。

国王的根本麻烦是军队首领们又与彼得大帝勾结起来。在1717年的“沉默议会”后，俄国军队继续留在波兰，帮助组织一个反对宫廷的派别。道尔高鲁基甚至鼓吹建立一个旨在推翻奥古斯都的大贵族联盟的主张。^[30]虽然由于贵族的抗议，在1719年实现了俄国人的撤军，但是当眼前俄国的威胁暂时缓和后，过去对国王的猜疑又重新出现。宣布奥古斯都之子皈依罗马天主教以及他与哈布斯堡公主结婚，给人的印象是国王仍计划向自由选王制开刀。结果，1720年的议会被解散，此后又有三届议会被解散。军队首领们的反对，使所有进一步的改革性主动行动均遭破坏。此外，1720年彼得一世在波茨坦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达成协议，确认波兰宪法和自由选王制的原则不可更改。在现有的均势下，这意味着没有外国的允许，波兰任何改革均无法实行。波兰就这样陷入了一个立法机构死气沉沉的局面，并一直延续到1764年为止。“沉默议会”决议仍然只实现了一半，它成了这个苦难年代中比较明智的愿望的一个标志，每当共和国在军事上的软弱更加显示出不祥之兆的时候，往往会唤起人们的这种愿望。

就这样，波兰继瑞典之后，成为北方战争的第二个主要牺牲品。军事上连遭失败，农村惨遭蹂躏，政治上四分五裂，使得约翰·索比斯基在位最后几年已经显露出来的混乱状态更加恶化。通过国王个人关系将波兰一立陶宛与萨克森联合起来，本是给波兰一立陶宛国家提供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被白白糟蹋了。一部分罪责应归咎于贵族和权贵人物，因为他们拒绝放弃他们的特权，并且惧怕萨克森称霸；一部分罪责则应归咎于奥古斯都本人和他的顾问们，他们有时野心过大，又未能杜绝往往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重重困难。查理十二世不切实际的狂想对这场大灾难也应负很大责任。他那些想当然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把他的傀儡莱茨津斯基扶上王位，造成了波兰的分裂，并且在

任何时候都决不与奥古斯都二世和解。瑞典的态度反过来又为俄国称霸开辟了道路。这些情况断送了改革的前途，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改革对共和国的安全是性命攸关的。同样，这也妨碍了解决人们已开始充分认识到的“王权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桎梏了波兰的自治权的两次战争的过程中，波兰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欧洲的笑柄。波兰接连两次在战争中名义上跻身于胜利者之列，但实际上是崩溃了，沦为一个二等国家。

（杨丽华 译）

[1] 萨尔马特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生活在俄国（欧洲部分）南部地区至巴尔干东部地区一带的民族。——译者

[2] 索比斯基即波兰国王约翰三世。1683年率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联军，击败土耳其军，解维也纳之围。——译者

[3] W. 科诺普琴斯基：《早期的萨克森时代（1697—1733年）》，《剑桥波兰史》第2卷，1941年，第3页。

[4] 波多利地区的首府。——译者

[5] 在波兰，结成各种“联盟”，类似17世纪在苏格兰的“国民契约”。贵族成立了各种武装团体，宣誓为清除威胁他们各种权利的任何危险而共同斗争，有时也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家。通常只是地方上的一些集团，但有时也宣布结成包括波兰一切贵族在内的“总联盟”。参加联盟的人任命一个领袖，实行多数票制（与议会的自由否决权明显不同），并服从军事纪律。这一做法并不是非法的或是叛乱性的。结盟的权利是公认的宪法权利，国王不能合法地加以拒绝。

[6] 在波兰，最高级军官的称号是Hetman，总共有4个：波兰王国最高司令官（Wielki Hetman Koronny）和波兰王国野战司令（Hetman Polny Koronny）；立陶宛最高司令官（Wielki Hetman Litewski）和立陶宛野战司令官（Hetman Polny Litewski）。他们指挥常备军，而不负责普遍征兵；野战司令官级别较低（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中，“Hetman”的意思是“领袖”或“首领”）。

“Koronny”意为国王，例如称王国最高司令官，意指波兰王国的国家军官，以区别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军官。波兰—立陶宛二元共和国有两个独立的行政机关，一个是王国的，另一个是大公国的。在萨克森联盟时期，在萨克森又保持了第三个行政机关，有自己的军官。关于波兰的整个体制，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16章。

[7] K. 皮瓦爾斯基：《法奥关系——约翰·索比斯基三世政治史（1687—1690年）》，见《历史—哲学讲座》第2辑，第44卷，第1号（克拉科夫，1933年），第96—100页。

[8] 与早期德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R. 弗尔贝格尔在《关于萨克森—波兰联盟经济的评价》中，注意到在早期对联盟的经济潜力已有所认识。见J. 吉尔罗夫斯基编《论波兰王国的斗争》，柏林，1962年，第209页；参阅J. 卡利施著《17世纪末萨克森—波兰建立海上贸易同盟的计划》，见《论波兰王国的斗争》，第45页。

[9] 关于在卡尔洛维茨达成的和平协议，参见本书原文第626—627页。

[10] 旧时德国的一种银币。——译者

[11] 关于反对勃兰登堡在波兰的这块封地上享有主权的情况，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44—549页。

[12] 贵族们在国王号召保卫边界时，都有义务亲自参加。

[13] 约翰·斯坦尼斯拉斯·杰布隆诺斯基：《回忆录》，利沃夫，1862年，第17页。

[14] 关于17世纪90年代利沃尼亚的“瑞典化”，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37页。

[15]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565—566、572—574页。

[16] 参见（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波兰文献》第79辑，1704年第27号，第62—80页；吉亚林斯基—戈洛温谈判。戈洛温领导俄国外交事务衙门，直到1706年9月他去世为止。继任者是G. I. 戈洛夫金伯爵，此人在1709年获得首相的职位。

[17] 1707年2月3日道尔高鲁基致戈洛夫金信，参见（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波兰文献》1707年第25号，第5页；1707年6月14日波托茨卡致道尔高鲁基信，同上书，第89号，第27—28页。

[18] 1708年7月27日戈洛夫金致乌克兰佐夫信，参见（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波兰文献》1708年第16号，第48页。

[19] 有关这些发展情况的主要资料，收藏在克拉科夫的查尔托雷斯基图书馆（西恩尼斯基通信，第5786、5790、5791、5792、5798、5925、5943、5962号；塞姆贝克档案第450、451、452卷）以及华沙旧文献总档案馆（拉吉维尔档案，第VI—II—79号，第4、10、95、124、142、281、288、306卷）。

[20] J. 盖罗夫斯基：《从拉多齐科维采到奥帕托夫：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阵营瓦解的历史》，载《波兰在斯德哥尔摩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华沙，1960年，第217—237页。

[21] 对桑多米埃什联盟派的作用的不同评价，见J. 费尔德曼著《北方战争时期的波兰》（克拉科夫，1924年）。费尔德曼对他们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不过他没有了解到俄国的资料或波兰收藏的各种资料，例如西恩尼斯基的通信。

[22] M. 尼茨：《沉默议会财政改革之由来》（波兹南科学之友协会，历史委员会文献，第13卷，No I. 波兹南，1938年），第180页。

[23] 见本书原文第631页及以下各页。

[24] J. 盖罗夫斯基：《萨克森专制主义与黄金自由——1712—1715年共和国国内史》，弗罗茨瓦夫，1959年，第159页。

[25] 见本书原文第645页。

[26] 这些建议的绝大部分包括在1715年10月14日肯定是由弗莱明写的一个备忘录中，这个备忘录是在得到波兰王军与萨克森人之间爆发战斗的消息后写的。德累斯顿，州档案馆，loc3492，V，第51—54页。

[27] 关于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与萨克森议会的关系，见F. L. 卡尔斯坦著《德意志诸侯和议会》，牛津，1959年，第242页以下。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453—454页。

[28] 1716年11月20日，道尔高鲁基致戈洛夫金信，参见（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波兰文献》1716年第11号，第470—471页。

[29] 1717年2月23日勒霍费尔备忘录；梅泽堡，德意志中央档案馆，共和国卷第9卷，第27号，第1页，K. 2。

[30] 1718年11月30日道尔高鲁基致戈洛夫金信，参见（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波兰文献》1718年第8号，第244—245页。

第二十一章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 与已经起了变化的东西方关系

俄国皇太子彼得生于1672年，10年后便与他人一起统治俄国。这时俄国贫穷落后、人口稀少，既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也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经济生活是以生产木材、皮毛、盐和效益不大的农业为基础。广大的地区没有开发，实际上是荒无人烟。地理上唯一直接通向西方的出口是阿尔汉格尔港，但一年有半年结冰。俄国与波罗的海的联系却被瑞典隔开了，因为瑞典占有芬兰、因格利亚、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它的边界此时距离黑海还有几百英里之遥，克里米亚还是一个向奥斯曼帝国进贡的国家，那里的鞑靼人的骚扰仍然严重地威胁着俄国南部和乌克兰的安全。然而，从15世纪后半叶起，来自欧洲西部的军人、医生以及各种能工巧匠已经活跃在俄国，西方的思想和技术逐渐地在俄国扎下根来。在17世纪，这一过程加快起来。^[1]但是，即便是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从任何实际意义来说，俄国都远不是欧洲的一个部分。它被隔离开来，不仅是由于地理上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它那独特的和在许多方面都不幸的历史，由于它的民族自豪感如此强烈而且傲慢，以至于招来几乎所有外来客人的议论，特别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的差异。俄国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机构是东正教会，它从拜占庭那里继承了一种高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深刻的优越感。而且，一般来说，它是最强烈排外的。在西方观察家们看来，俄国人看上去是亚洲人，沙皇的专制独裁可以与伊斯兰国家的苏丹或伊朗国王的专制主义相比拟，而不能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的专制主义同日而语。除了一些原料以外，这个国家对于欧洲的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无几；而对于欧洲的政治生活来说，它也很难说有何重要性。

彼得的母亲——他的父亲阿列克塞于1676年去世——为他安排的正式教育与过去为统治家族成员安排的毫无二致，主要有阅读、算术、礼拜仪式和东正教祈祷书知识，但是没有正式教授外语。彼得从来不爱读书，他把书籍只是看作有用材料的来源。实际上，他一贯轻视文学，认为文学“只是一些浪费时间的无聊故事”。直到死时，他

的拼写仍然杂乱而无章法。另一方面，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工具和机器以及一切需要技能的体力劳动。他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不是来自他母亲为他挑选的老师，而是来自手工艺工人，首先是莫斯科城郊“德国人住区”中的那些外国人。1682年射击军叛乱^[2]后，彼得和他的母亲遭到冷落。索菲娅女沙皇摄政期间（1682—1689年），彼得的全部实权均被剥夺。这种境况使他跳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困囿，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从而能够接受这种空前广泛而又实际的教育。他早年就表现出精力充沛，对待一切问题采取实利主义态度，对待一些抽象的空论如果说不是完全地反对，也是不屑一顾的。这些特色在他一生中一直保持不变。他更喜欢跟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人相处，从他和妻子及儿子的关系中就可看出。到了17世纪80年代后期，他表现出一种兴趣，这对他的一生都起了支配的作用。他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把供他使唤的大批仆从建成了相当可观的有组织的队伍——“游戏军团”，用莫斯科军火库中的武器，甚至大炮装备起来，举行演习，进行模拟战斗和假包围。也许完全出于无意识，但他却组织了一支现代化陆军的核心部分。建立一支海军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中进行酝酿，尽管他还没有看见过海，也不知道一支俄国舰队究竟能够或者应当用在哪里，又为了什么目的。相形之下，他对他的母亲1689年为他安排的与富有但很愚蠢的叶芙道契娅·鲁鲍希娜的婚礼却抱无所谓态度。9年之后，他迫使她进了女修道院。虽然她一直活到1731年，但是她却从未具有任何政治意义。1707年，他却置传统于不顾，娶了一个外国人（而且过去是女佣）即未来的叶卡杰琳娜一世为第二个妻子。1724年，他将她立为皇后。

彼得一世意志果断，精力充沛。当他接近成年时，显然对索菲娅的权力越来越是一种威胁。从1682年的变革以后，她就一直掌握政府的大权。彼得的同父异母兄弟伊凡曾于1682年与他同时被拥立为沙皇，1696年去世。伊凡的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孱弱，因此，他在政局中从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在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中，索菲娅得到他的情夫、首相华西里·华西里也维奇·戈里钦亲王和射击军的支持。彼得则获得他母亲娘家纳雷什金家族的忠实追随者的支持。1689年，斗争已到严重关头。8月底，彼得得到错误的报告说射击军正在前来抓他，他吓得躲进了莫斯科附近的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避难。消息是假的，但是他的行动已使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许多外国军官主动站出来支持彼得，其中著名的有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没过几

天，戈里钦被流放到俄国北部的荒原去；索菲娅被监禁在一所女修道院中，15年后死在那里。但是，彼得及其支持者的成功绝不是进步力量的胜利。戈里钦这时已深刻地意识到，俄国生活中的几乎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需要有一支常备军；与外国建立永久的外交关系；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儿童去国外受教育。他的倒台使他不能够为下一代的改革作出贡献，因此使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性人物之一。与此相反，在以后的6年中以彼得的名义统治俄国的人物是被流放的戈里钦的堂兄弟和反对者鲍里斯·戈里钦亲王，以及特权贵族列昂·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和蒂洪·尼基提奇·斯特莱斯涅夫等，他们不过是当时上层官僚机构的一些典型代表而已。彼得的母亲在1694年去世前，一直对他很有影响，而她在许多方面却是极端守旧的。再者，这位年轻的沙皇一连好几年热衷于训练他的“游戏军团”，学习造船的技术，以及同郊区日耳曼人的酒友豪饮，对于日常的行政管理问题不感兴趣。在此期间，他与比他年长得多的帕特里克·戈登结下忘年之交，特别是与日内瓦的冒险家弗朗索瓦·莱福尔结下的友谊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两个人都于1699年去世，并且他们的位置都被新的顾问和宠臣，特别是虽然腐败但却能干的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缅希科夫（他于1705年被授予公爵称号）所取代，但是，彼得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两人的教益。

1695年，24岁的彼得开始亲政。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进攻土耳其占有的扼顿河咽喉的亚速要塞。攻占这个要塞将表明，俄国有能力在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早已向奥斯曼帝国发动的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洗刷1687年和1689年戈里钦两次进攻克里米亚的徒劳无功的耻辱，而最重要的是能使彼得获得一个通向黑海的出海口，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一支海军。俄国第一次进攻亚速要塞时遭到失败。彼得这时还没有舰队可以阻止土耳其人从海上向亚速镇上派出增援部队；没有能胜任进行这种围攻战的工兵；俄国的部队也没有真正统一的指挥。1696年，彼得再次向这个要塞发起进攻。这一次，俄军配备了大批在顿河沃罗涅日附近建造的吃水浅的小船队和一支作战舰队，并在利奥波德皇帝派来的工兵的援助下，于7月18日攻占了该镇。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胜利游行，彼得亲自参加。如果俄国能够夺取刻赤海峡（刻赤海峡是控制亚速海进入黑海的通道），就会为建立一支常备黑海舰队打开道路，或许就会使奥斯曼让出更多的好处。但是，沙皇的这些雄心计划受到了阻碍。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威尼斯

人由于种种原因，都急于同土耳其人尽快媾和。1699年，在卡尔洛维茨签订和约时，彼得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俄国的利益，正如他深深埋怨的那样，“完全无人理睬”。1700年，波罗的海的事态也迫使他不得不同奥斯曼帝国议和。俄国的力量已经得到充分的显示，但是直到此时，俄国还没有取得通向黑海的可靠通道。

几个月以后，彼得断然采取了全新的做法，这便是他出使西欧的“伟大之举”。表面上，这支庞大的出使队伍是由莱福尔、费·亚·戈洛温和普·勃·沃兹尼钦率领的，其中包括仆从、警卫和翻译，于1697年3月浩浩荡荡地离开俄国。这位沙皇取了一个很容易被人识破的化名“彼得·米哈依洛夫”，一同前往。彼得途经瑞典的利沃尼亚和库兰公爵领地、东普鲁士以及勃兰登堡，于8月到达尼德兰。他在赞丹和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段时间的修船木工后，于1698年1月跨海来到英国，在那里停留了4个月。然后，又取道尼德兰、哈雷、莱比锡、德累斯顿、布拉格，于6月到达维也纳，在维也纳停留了5个星期。这次不同寻常的、在俄国皇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旅行，是出于下面两个目的：第一，或许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为了获得各种技术知识，首先是关于造船和航海方面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彼得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普鲁士，他能够学到射击术，在尼德兰和英国学习造船和其他手艺。他对他所访问的国家的技术成就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如此，沙皇这次旅行的直接结果是，俄国获得了近千名外国专家为它效劳，这些专家包括海员、炮手、造船木工、数学家、外科医生、工程师和各个方面的熟练工人，以及他们随身带来的书籍和工具。彼得还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西方化的新制度，他在西方倍加赞赏的财富和效率就无法移植到俄国来。但是，他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想要建立一个反土耳其的新同盟，事实证明这是不实际的。（英国）威廉三世、荷兰执政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策全都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所左右，而这个问题现在显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了。

射击军发动新的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彼得便匆忙地从维也纳赶回莫斯科。射击军的一些团队对于彼得对待外国人以及外国思想持偏爱的态度感到吃惊；对于他对射击军不信任而将他们调往亚速和波兰边界的做法感到愤怒。因此，他们于1698年6月发动了叛乱，并且打算向首都进军。这次叛乱由于缺乏真正像样的领导，因此，在彼得回国

以前即已被有效地粉碎，这主要是由于戈登采取了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是，彼得决心要彻底摆脱这支动辄骚乱、纪律荡然、以“古罗马禁卫军”自诩的卫队。通过严刑拷打、处以死刑（据说，也许并不可靠，有些是他亲自动手的）等手段，射击军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被彻底地摧毁。虽然亚德里亚大主教作出努力，为他们求情，但彼得置之不理。

因此，到了1698年年底，彼得就能够实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了，这些改革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些变革在实施时往往没有计划，不成系统，只是到了他在位的晚年才成型。特别是1700年由于爆发了同瑞典的一场大战，使这场变革变得面目全非了。然而，它们却是俄国历史，实际上也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其中，最紧迫、最突出并且在某些方面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陆军的改组和海军的建立。这二者在行政管理上、心理上以及在社会上（程度较小）都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给外国的观察家以深刻的印象；而俄国若要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一个真正的因素，这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俄国陆军的素质和组织结构，早在彼得即位之前即已有所改进。从17世纪30年代起，俄国陆军中封建色彩一直在减少，人数越来越多，外国的影响和模式日益增多。但是，它仍然缺乏战斗力，而且陈旧过时，否则，北方大战的初期，瑞典人就不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国军队了。无论是射击军，还是保存下来的封建士兵，都算不上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战斗力；炮兵业已过时；而最重要的是非常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3]彼得青少年时代对于军事就有浓厚兴趣，去欧洲考察后此兴趣又有进一步的加深，如今最终导致了整个军队结构的彻底改组。1699年底，建立了29个新的步兵团队和两个龙骑兵团队。这些团队是由部分志愿兵和部分义务兵组成的。不过3个多月的时间，一支比较具有战斗力的为数3.2万人的军队便建立起来。同时，又着手改进军队的中央组织机构，设立了一系列新的职位。新设立的职位有：主要监督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总督察长，掌管供给事务的军需总监，以及负责指挥炮兵部队的炮兵总监。1700—1701年间，已经有了9个龙骑兵团队，这主要是针对1700年的惨败而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成立了俄国的第一个炮兵团。由于乌拉尔地区生铁生产的发展，铸造枪炮的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公使的秘书福克罗特是个消息灵通人士，据他估计，到1713年，俄国已拥有1.3万

门铜炮和铁炮。1705年，进一步扩大并加强了征兵制：按每20个农户出1人的比例征募。1705—1709年，即北方大战最关键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征兵制，征召了16.8万名士兵。从1705年起，占陆军主体的步兵和龙骑兵团队开始按旅、师单位编制，尽管这些并不是永久性的。同时，还作出不懈的努力，减少俄国对外国的依赖，特别是小型武器要依赖荷兰的状况。结果，1712年之后，便停止了这些武器的进口。

事实证明，要解决有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问题，就困难得多了。最初，彼得主要从外国人首先是德意志人那里获得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1699年组成的若干新团队就主要出自德国人魏德将军之手，其中甚至没有一个团长是由俄国人担任的。但是，彼得从来没有打算将这种依赖关系永远维持下去：几乎从一开始，他就竭力为培训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俄国军官而努力。俄国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即著名的普列奥勃拉赞斯基近卫军军事学校，于17世纪末建立。从草创开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的训练机构。这些训练机构即使在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在理论上来说，却是冠冕堂皇的。1701年、1712年和1721年又相继建立了几所炮兵学校；1709年和1719年又成立了工程兵学校；1707年成立了一所军医学校。从许多方面来看，比较重要的是近卫军的成立。因为，大批的俄国步兵军官，就是在近卫军中当兵受训的。彼得曾进行不懈的努力，以期做到：地主阶级中的青年若不曾在近卫军中服役，或者经过其他适当形式的训练，就没有接受军官军衔的资格。这样，他就能逐步地以受过训练的俄国人取代不能令人满意的或不需要的外国军官。1709年以后，当战争危机显然已经过去时，这一过程便加快起来。

但是，同其他任何活动相比，彼得在他整个执政期间更感兴趣的是建立一支舰队。他本人就是一个造船的木工巧匠。他认为自己甚至有干预海军组织和管理这些技术性非常强的事务。例如，早在1694年，他就制定出一个供当时只不过是几个小船队使用的信号系统（这几艘小船后来便发展成他的整个舰队）；后来，他派往西欧和南欧学习航海技术的许多俄国青年学成回国后，他又经常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有关外国海军的情报总是为他所欢迎，而且在他的指示下，俄国又把外国的海军条例汇编成一巨册。在西欧之行以后，彼得要建立一支强大舰队的愿望，只是建立一支游弋在黑海的舰队，因为俄国那时还没有其他出海口。1696年11月，彼得又决定强迫地主阶级为建

造新的船只做出捐献。为此，他于1697年命令他的那些比较富有的臣民组成若干组，每组捐献一艘或数艘船。所以，到1698年春季，已经有了50多艘舰只。其中许多船只设计低劣，匆匆建成，事实证明是无法使用的。但是，建造这些舰只却是一个重大创新。因为，其目的是要为俄国提供一支相对来说由作战人员数量较多的战舰组成的常备舰队，它要远远超过1695—1696年匆匆拼凑起来的那支舰队。在波罗的海夺取了一个据点后，就为海军扩展打开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新地区。早在1702年，彼得就下令在塞亚斯河上建造一些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这条河流入拉多加湖的南端。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一艘战舰是在1703年8月下水的，一年之后，又有了由6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和相当数量划艇组成的一支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发展很快，甚至可以说是惊人的：到1710年为10艘，1714年则为17艘，到了1724年已有32艘。根据这种情况，需要有相应的新的行政管理、后勤供应和训练的机构。1700年，成立了专职的海军部；1712年，成立了海事法庭。最后，于1718年又成立了一所海洋学院。1701年，已经在莫斯科设立了一所航海学校；1715年，一个更为重要、更持久的机构——海军学院开始在圣彼得堡培训军官。首次专门征集海军新兵是在1705年，至此，舰舰上的大部分人员都是从陆军士兵中调来的。1710年，为舰队起草了一套规章条例；1720—1722年，又起草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条例。然而，事实证明，这支新建立的海军比现代化的军队脆弱得多，而要深深地扎下根来步伐还太慢。1711年普鲁斯战役惨败后，亚速镇交给了土耳其，黑海舰队解散，这支新的海军受到削弱。^[4]再者，这支新海军由彼得亲自缔造，几乎成为他的个人玩物，在全国人民中间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在外国的军官和专家们在军队中的职位多少已被贬低了很长时间以后，他们依然继续左右着俄国的海军。^[5]海军舰队的不得人心还意味着，作为一个有效的战争工具，它的寿命很难超过它的缔造者。彼得一死，它即刻受到冷遇，一直到叶卡杰琳娜二世即位后才又抬头，彼得最得意的缔造物也是最短命的。

这些强大的战斗部队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由于俄国经济生活有了相应的发展。如果认为这一发展只是同瑞典交战的结果，或者认为彼得在交战前完全漠视经济问题，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然而，军队对武器、火药、军装、造船木材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需求大大地刺激了彼得统治时期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国家的财政

和税收几乎完全为战争的负担所支配。1702—1703年，战争开支占政府全部支出的76%—77%；而在1705年这个对俄国人至关重要的一年中，几乎占96%。在这些非常艰难的年月里，战争的费用只有靠降低硬币成色和广泛地征收沉重的间接税；而降低硬币成色的做法在1700—1703年间的收益就相当可观。不过，上述措施，再加上没收寺院财产、征收关税以及实行国家专利，尤其是1718年开始征收人头税，使彼得统治末期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实状况。^[6]如果除去卢布购买力的变动不算，政府在1724年的收入可能是1680年的3倍，是1701年的两倍多。

难道说彼得是一个普遍讲的“重商主义者”吗（重商主义本身含义不清）？无疑，他在经济方面具有大多数西方国家所特有的见解和偏见；而且，也不难发现，他所实行的政策的一些方面带有重商主义的色彩。彼得在位期间问世的I. T. 波索希科夫写的《贫穷与财富论》是一本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7]该书阐述了许多同西方当代著作相似的论点，其中许多论点公开流露出排外的心理。另一方面，政府大量干涉国民经济生活的做法，早在彼得之前，甚至在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欧臻于完善之前，就已经在俄国盛行，彼得不过是利用了这种做法而已。不仅如此，在许多重要方面，例如相对来说不大强调扩大出口、相当重视农业等，这位沙皇的业绩并不是轻易地套用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模式。但是，从他对工商业重视的程度以及他试图发展工商业所采取的手段来看，他似乎在许多方面倒像是一个东欧的科尔贝尔。^[8]

工业发展得以促进，首先是由于开办了一些国营工厂，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铁器和铜器、小型武器和炮、羊毛织品和帆布、硫黄、火药以及纸张。彼得在位期间，已有86家这样的工厂建立起来，这个数字几乎占了当时俄国新建的全部工业企业的半数。诚然，许多工厂，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最后都租给或卖给了个人或公司。然而，俄国政府对俄国的工业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对其本国工业生活的影响都大。甚至实业家开办的私人工厂，通常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政府批准的免税和专利，靠政府提供廉价的强征劳动力，以及政府对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的需求。^[9]各项新工业的劳力来源不同。有的是雇用的自由人；有的是罪犯和逃亡农民；甚至军队的新兵也被派到工厂去干活，这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做法非常相似。特别是在政府所有的工厂里，有数量可观的国家农民为工厂劳动，或“划归”这些

工厂。据一个统计资料说，1719年用这种方式划拨了3.1万多人，到1725年则达5.4万人以上。最后，1721年颁布的一条指令，允许工厂主，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均可购买村庄，并可在其企业内使用通过上述方式被他们控制的农民劳动力。这些强制性的或半强制性的措施保证了有充分的非熟练工人可以流入，但是许多种类的熟练工人仍然十分缺乏。尽管为了培训俄国的手工匠人和从国外招募工匠——例如，德国的矿工和意大利的丝织工人等——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熟练工人的短缺仍然是彼得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俄国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弱点。事实证明，彼得的许多工业规划本身条件就不成熟，基础不牢，其结果也必然是短命的。尽管1724年实施了保护关税，但生产纺织品、纸张、化工品、皮革和消费品的工厂，由于管理不善、缺乏熟练工人，以及由于战争造成的人为需求的下降，仍然摆脱不了迅猛垮台的命运。然而，一个重要部门，即铁的冶炼和制品工业，主要由于乌拉尔南部地区巨大的高质矿藏的首次开发，在这一时期却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725年，俄国已经成为向西欧出口铁的主要国家，其中对英国的出口占显著地位。[\[10\]](#)

彼得在发展商船业从而使俄国人能够与外部世界积极进行贸易往来所做的努力，几乎遭到彻底的失败。在他派出“巨大使团”期间，他就已怀有这种抱负。但一直到同瑞典的战争危机过后，他才能有所作为，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然而，他的措施不当不久就暴露出来。同外国签订商业协定，建立贸易公司，以及对私人建造商船队者给予特权等，所有这些措施对于问题的解决都无济于事。从他处理商业问题的做法中可以充分地看出，他不能根据真正的经济观点来考虑问题，他依赖（并非一概不对）纯行政的，甚至是强制性的措施以期产生长远的经济效果。他采用歧视性关税以及其他的措施努力把阿尔汉格尔的对外贸易[\[11\]](#)转移到新首都圣彼得堡一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农业方面，这位沙皇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他曾经努力试图改进畜牧业，鼓励发展蚕丝、亚麻和大麻，推广以长柄大镰取代效率较低的小镰刀。可以肯定地说，耕种面积有了相当大的扩展，边境地区和俄国中南部未开发的土地上有了人烟。但是，俄国的农业始终未能改观，仍然墨守着传统的耕种制度（主要是三田轮作制），收效较低。

因此，彼得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归于失败。这些政策呈现出一幅政府活动频繁的图景，不过，这幅图景却杂乱无章，完全是应付眼前的需要，是特定的即席之作，至少到彼得在位的晚年是这种状况。

在陆军、海军和经济方面采取这些首创精神的同时，彼得也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行政变革。彼得所承袭的政府结构，乃是历代随意发展的结果。^[12]中央机构有贵族杜马（这是上层贵族代表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四十多个部（衙门，这些部门的职能的重要程度和管辖地区的大小各不相同，权限往往相互交错，极不合理）。地方行政管理系由省督，即军事长官掌管。彼得在位期间，曾为彻底改变这种体制并将其改造为有效率的机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便把俄国的资源置于他的掌握之中。

第一步由人数比较少而又不拘形式的枢密院和大臣会议取代贵族杜马，作为能够比较有效和灵活的中央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对部一级的组织，特别是在1699—1701年间，也作了一系列的变动。有的机构被撤销或被废置不用，另外设立其他的一些专门对沙皇新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部门；如海事部，就是为了掌管新舰队的建设工作而设立的。最重要的是保安部，专管侦查和镇压一切反政府的行为。一个更为激进的举措是于1699年设立了外贸部这一新的行政机构，用来发展贸易和工业，控制城镇（这样可以使之摆脱省长的管辖），征收间接税并行使中央政府财政部的职责。虽然外贸部并没有做到尽如人意，但是在此后的10年中，它却是俄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中央集权方面，首先在金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彼得统治的前半期，政府机构基本上一直是一种权宜措施，其目的是为战争筹集兵力和金钱，是沙皇的意志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延伸。只有在战胜了瑞典之后，彼得才能够腾出手来比较从容地、系统地进行改革，从而大规模地带来了永久性的变革。首先，于1711年建立了新的中央管理机构（枢密院），9名成员中没有1名是彼得最重要的部下，其中1名还是文盲，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在许多方面成为中央政府的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后来，从1718年起，已经过时的各部体制便被9个行政院所取代。其中3个专管财政方面的各种事务，其他几个则负责商业、矿业、制造业、对外事务、陆军、海军和司法。如同彼得晚年的其他改革一样，这些院的建立是经过了长期的谋划和讨论的结果。它们主要仿照瑞典的模式，由1名院长、1名副院长和若干助理组成。无论从它们的人数

有限方面，还是从它们之间职能的合理划分来看，都与原先的各部有所不同，而且，每个部门管辖全俄国。

彼得统治期间，特别是在其统治的晚期，地方行政的改革^[13]趋势是逐步地通过把地方官员置于枢密院的隶属下，后来则隶属于9个院的做法来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其结果不仅仅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这些官员的职责，而且，又设置了大量负有专职的新的政府代理人，如王室土地监督，保护林地的护林官。换句话说，地方行政管理上已经大大地官僚主义化。至少根据统计数字来判断，在20年稍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俄国就拥有了一个更加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进行这种广泛的重大制度改革的同时，还作出了要扩大俄国人的知识面并提高其知识水平的努力。彼得的欧洲之行使他深深地感到，俄国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他的种种改革措施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这种需要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日益增大。早在1699年10月，在同亚德里亚主教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沙皇就曾坦率地表示他对俄国教育的落后状况不满，并设想了一些改进这种状况的办法。但是，与瑞典的战争使他在许多年间，只能将其精力和国家物力集中在一些可能立即收效的方案上。例如，建立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成立目的在于为外交部门培养翻译人才的语言学校（1701年），以及矿业学校（1716年）。直到1714年，才投入一定的力量通过发展初等教育的办法为这些院校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年，彼得下令每省设立一所“算术学校”，主要用来教本地的地方和官员们的子弟学习算术和一点几何知识。彼得在位期间一共建立了40多所这类学校。然而，收效甚微：成立这些学校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而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受教育，学生能够完成其学业的寥寥无几。在彼得死后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幸存下来的学校在校生几乎不到500名。虽然也另外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不过其范围毕竟有限，而且同样没有收到什么效果。1721年，又下令在每个主教管区为教士子弟开办一所学校。无论是教区学校，还是对军人子弟施以初等教育的驻军学校，都谈不上是为俄国增添了一种教育体制。

相比之下，书籍的出版日益增多以及进口书籍日见扩大却更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文化生活的发展。翻译适合国内需要的外国书籍，首先是翻译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受到政府的鼓励，尽管当时这种著作在俄国市场上销售量甚微，只能达到相当低的水平。语法书、辞

典、年鉴和教科书的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学生们获得的基本学习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足。1703年，人们常说的俄国最早的报纸《新闻报》问世。它纯属是政府办的报纸，彼得用它来为改革申辩和宣扬成绩。这份报纸不定期出版，发行数量很少，但它却是俄国生活日趋现代化的另一表征。剧院在俄国也取得了立足点，虽然还不牢固，这主要是由于王室成员的支持。也许外国文化的影响在俄国制度上产生最大效果的是科学院的成立。彼得生前曾计划建立科学院，但直到他去世数月后这一计划才得以实现。一种比较间接的但往往都是强有力的推动因素（至少对俄国的上层社会来说是这样）是来自一系列次要的改革：1700年，采用儒略历，系统地运用阿拉伯数字；1699—1700年，立法规定除农民和教士外，所有俄国人一律要剃去胡须，穿欧洲的服装。彼得晚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集会厅”，男男女女可以在这里按照法国的方式进行文明社交，其间或许还要穿插着波兰和德国的舞蹈。当然，彼得革除俄国妇女历来不得参与社会活动这一陋习是有深远意义的。

的确，彼得本人在他最后的10年中，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他感觉到国家的实力比以前强大了，而且国家也比以前安定了，他对事物的看法也不那么实利主义了，而是更愿意向西方借鉴，这不仅表现在对待西方的陆军、海军和工业技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待西方的艺术、建筑和文学等方面。因此，1716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大量购买西方的绘画，又派遣俄国的青年前往佛罗伦萨的迪塞格诺学院学习；1718年他在罗马又弄到了一批雕刻和绘画，并设法聘请意大利的美术家和雕塑家到俄国工作。18世纪初期，西欧的建筑师已开始为他服务，新首都的彼得和保罗要塞就是按照一位沃邦派建筑师的设计建造的。到他在位的晚期，其数量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圣彼得堡主要是按照波罗的海巴洛克建筑艺术的日耳曼—荷兰风格的设计建成的。这个城市的建造工作先后在卢加诺的多梅尼科·特雷齐尼（特雷西尼），柏林的安德烈亚斯·施吕特、G. J. 马太诺维（另一位德国人）以及巴塞尔的N. F. 哈尔贝尔的指导下进行。[\[14\]](#)

文化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东正教会。彼得本人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这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国外之行中对宗教问题颇感兴趣；他的信件和讲话中有大量的《圣经》引喻和引

文；他对奥斯曼帝国所持的明显敌视态度以及鼓励在俄国的非基督教徒中开展布道活动等。但是，改革一开始，彼得就不得不把俄国的东正教当作敌人看待。主要原因是因为东正教及其领袖是俄国的仍然十分强大的排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唯一能够挫败彼得计划的强大势力，虽然（1666年）莫斯科大主教尼康要求教会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15]1690年，彼得竞当莫斯科教长的候选人失败，对此他既感到恼火，或许也感到吃惊，这可能就促进了“醉友会”的成立（可能在1692年）。这是由沙皇的一伙酒友组织的一个团体，他们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何在，至今仍有争议，不过他们直至彼得去世时，一直对宗教仪式进行亵渎，并嘲弄不已。彼得对东正教也感到厌恶，因为它们把本来可以用于更为有益方面的钱财白白地花费掉了，而且其中的僧侣和教士既懒散又无知。因此，为了削弱教士的权力和独立性又要重新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一过程始于1696年，1700年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亚德里亚主教去世后，没有再委任继承人。这就使得东正教会没有正式的领袖，从而为国家更直接地影响社会的事务打开了道路。1701年成立了寺院部，对教会的财产进行监督。教会的大部分收入不久即被充作对瑞典作战不断增大的费用。同时又开展一项运动，要求削减僧侣人数，迫使他们劳动，实行苦行僧生活，并且还禁止建立新的寺院。最后，教长职务本身终于于1721年被废除，代之以由10名教士组成的“至圣指导会议”。这个教会组织是彼得建立的，其地位高于其他任何院署。彼得从1716年起便接受了伊拉斯塔斯学说的信徒、后任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大胆的“哲学”神学家费奥凡·波罗科波维奇的建议，最后采取了这一步骤，费奥凡曾在瑞士居住，并在基辅将科学纳入他的教学中。虽然“至圣指导会议”在形式上是一个院署组织，但实际上它在管理宗教事务方面却相当于管理世俗事务的枢密院。^[16]在理论上，它行使教长的全部职权，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沙皇的从属工具而已。东正教会长期以来享有的自治权从此被摧毁，它的政治权力也受到决定性的破坏——这是一种对整个俄国的未来有着深远意义的革新。

在所有这些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些发展的结果，俄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这是彼得所不曾设想的，其全部意义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这些变化仍不失之为彼得留下的最具重大意义的遗产之一。^[17]这些变化首先影响到农民和地主。

无论农民或者地主都不是自我一体或在法律上权利一致的社会阶级，而是包括形形色色截然不同的集团，各自具有其明确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因此，俄国的社会便呈现出一幅显然复杂而又十分差异的景象。农民中，一端是农奴，实际上就是奴隶（尽管在俄国社会中只是相当次要的成分）；中间是各种农奴和小自由农集团；另一端是地主——俄国中部或南部地区半军事性的殖民者阶层，有时被看作贵族的最底层，根本不是农民。地主和农奴主包括一群大特权显贵家族在内，其中一些可以说比罗曼诺夫家族本身还要古老。在这些大家族之下，其他的家族等级极其复杂，这种等级制度是以“官职名次录”划分的，一直沿袭到1682年。这种“名次录”是官方正式承认的习惯做法，它决定各个贵族家庭的先后名次。地主也是根据俄国现行的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加以划分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做的。但是，世袭领地大地主和领地地主之间的区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实际上所有的财产都已经可以继承了。[\[18\]](#)

彼得的改革结果是将这种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改变为在法律上同属一体的两大阶级：纳税农民（私人庄园上的农民和国家农民均在内）和享有特权的地主。就一直存在到1724年的农民阶级来说，主要是由于系统地大量征兵以及1718年以后强征人丁税所造成的。在征兵不厌其多、征税不厌其重这种不断的压力下，这两项负担逐渐地落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结果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大众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原有的区别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种逐渐消除差别并且合二为一的过程可以从地主地位的逐渐下降中看得一清二楚：地主下降到只是一群国家农民；亦可以从另一方面，从1723年具有法定地位的奴隶制度的消失中清楚地看出。同样，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正在出现一个同属一体而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地主阶级（新贵族），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压在所有地主集团身上的负担日益增加的结果。彼得不懈地迫使所有地主在陆军、海军或行政管理部门为国家服务；一切想要逃避为国家服务的企图将予禁止并且受到惩罚。因此，1714年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然而却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法令，其目的是要驱使地主阶级中的青年为国家服务。该法令规定，地主的财产今后只能由其所有者的一个子女继承，不得像以往那样在子女中分配。这一措施所获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判断一个俄国地主或贵族是否显要的标准是官阶，而不是门庭或财富。上层阶级因而逐渐地开始认识到俄国社会已成为一个官僚等级社会。1722年颁布了“官阶表”就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根据该表，

陆军和海军的军官被划分为14个等级，并规定每个等级相当于文官的级别，同官僚机构中相应的最高八级官衔一样，这14个等级都授予世袭贵族。因此，到了1724年，“贵族”便迅速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的亲戚在官僚机构中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某些方面同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普鲁士的作为相似。

所有这些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彼得的统治是当时在西欧和北欧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并且行之有效的君主专制政体在俄国的翻版。当然，在彼得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的关于政府形式和行政管理方法的思想在他身边的人中间可以自由地传播，而且外国人提出的建议对他也有影响，其中著名的有荷尔施泰因人菲克和萨克森人卢伯拉斯。毫无疑问，有几项革新——首先是建立了行政管理的各院和海军以及对陆军进行改组——也都受到外国做法的启发。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外国影响都局限在方式和方法的问题上。彼得实行的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壮大军事力量，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取得出海口——是俄国过去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并不是外国顾问向他提出的，也不是他从旅行国外的体验中受到启迪的。^[19]实际上，彼得进行的所有变革除去彻底废除教长职位外，都可以从他的前任沙皇的统治中找到某些先例。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改革中最突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是建立俄国海军，这项工作在17世纪6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彼得在位期间，俄国在一个专制甚至是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以几乎无法承受的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紧张为代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然而，俄国经历的过程却是一场强制的演进，而不是真正的革命。

彼得的改革得到了一小批西方化了的俄国青年的热情支持，但在进行中却遇到了广大臣民们由于不理解而产生的敌意。其中有的只是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由于信教而思想保守，看到剃胡须、着西服、抽烟和使用新历法等表面现象就感到外国影响的增长，因而从本能上反感。但是在这种情绪的背后，隐藏着更深且久的怨恨。人们普遍感到最大的负担是政府压在农民身上有时是难以忍受的物力和财力的负担，最明显的是沉重的赋税和大量的征兵，但是更加沉重的也许是经常要农民为公共工程，例如，造船、建筑港口、防御工事和开凿运河出钱出力——往往还要另行征收其他大量的苛捐杂税。众所周知，建

造圣彼得堡就动用了大量的农民劳力。从1703年奠基到1718年，被征召的劳工中有的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这些被征召的劳工在涅瓦河口的沼泽地中挣扎、受苦难而且死在那里。这座城市就是在无数的劳工和大量的饿死、病死的情况下缓慢地建立起来的。甚至1718年以后，圣彼得堡省的农民还在继续不断地为建设这座城市而提供劳力。其他方面也没有废除强迫的做法，只是改为给以现金作为报酬。不只一首民歌中记载了人们在建造这座新首都中所遭受的苦难。除上述种种的负担外，还要为新建厂提供工人，为军队提供食品、草料以及名目繁多的运输义务等。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彼得的统治何以招致怨声载道，如此不得人心了。据估计，彼得统治期间，平均每户农民被迫在不同的时间内向国家提供的贡献，包括现金和劳务等，每年相当于125—187天的劳动。甚至连彼得的妹妹玛利亚也不得不抱怨兵连祸洗，民穷财尽。除此之外，再加上1704—1706年间和1722—1723年间年景歉收，粮食短缺，农民更是无法忍受了，他们唯一有效的反抗就是逃亡，逃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逃到哥萨克人那里去，或者逃到像巴什基尔这样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地区去。早在1707年，彼得就曾对大批人逃到顿河哥萨克人那里去避难一事啧有烦言。当他的统治行将结束时，这一现象就更为普遍。1719—1727年，根据官方的记载，像这样的逃亡事例将近有20万。沙皇在其晚年曾一再努力要制止这种危险的趋势。

哥萨克人除了成为那些心怀不满和走投无路的农民的避难所外，有时还爆发了更为积极的反抗行动。^[20]1706—1708年，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在康特拉特·布拉文的率领下举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叛乱，反对据信是以沙皇为代表的外国势力，特别是反对彼得日益加紧的在亚速海、陶甘罗格和沃罗涅日船坞中的强迫劳役。这次起义正是在瑞典人对俄国的西部边境的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发生的，这是沙皇统治期间出现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1708年夏天，彼得对起义进行了野蛮的镇压，但是并没有消除南部边境不满分子给他带来的困难。扎波罗热的哥萨克是一伙定居在第聂伯河两岸难于驾驭的强盗，他们于1709年加入了查理十二世和乌克兰的造反头目马赞拉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军事价值不大，他们在第聂伯河中游建有防御工事的集聚点，几乎在一个世纪里一直是他们的总部所在地。这个集聚地一旦被摧毁，他们便立即受到惩罚。然而，多少年以后，马赞拉的继承人菲利普·奥立克领导的波尔塔瓦哥萨克难民还在继续对沙皇进行骚扰，使他感到不安，

尽管他本身势单力薄，构不成什么严重的威胁，但是，他们有时对君士坦丁堡所施加的影响却使他们成为俄土一直紧张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彼得在国内不得不面对来自宗教方面的强大对抗，这种对抗可能采取极其危险的形式。沙皇及其抱负是对神圣的俄罗斯传统甚至对东正教教义的本身都是一种危险；这种恐惧情绪曾经对1698年的射击军的叛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叛乱的被镇压、大教长职位的废除以及彼得公开采纳外国的方法和思想的做法等，都使这种恐惧感油然而生。而这种恐惧感往往又表现为对彼得的某些奇特念头，如说什么现在的这个彼得实际上是一个名叫勒福尔的外国人的儿子冒名顶替的，真沙皇在国外旅行时即被杀害。或者甚至说，彼得本人就是一个“假基督”，他的统治预示了世界的末日。这些说法很普遍，特别是在普遍开展的不信奉国教运动的成员中间更盛。不信奉国教运动发轫于17世纪60年代反对尼康的“仿希腊式”改革俄国的宗教仪式。^[21]尽管彼得对于这个运动的态度比较宽容，但他们却依旧不信任他。宗教情绪是推动1705—1706年的阿斯特拉罕大起义的重要因素，一年后对于布拉文的起义也有影响。这种反抗在彼得的儿子阿列克塞悲剧性的经历中最为显著。阿列克塞是彼得同叶芙道契娅·鲁鲍希娜短命婚姻的产儿，他为人诚恳、勤奋、虔诚而又懦弱，与他所惧怕而又憎恨的严峻的父亲毫无共同之处。他和他的父亲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个人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间无法克服的对立情绪更加明显。彼得的愤怒和失望，就像阿列克塞的惧怕和憎恨一样，不断地加剧。这位皇太子生来对神学和宗教仪式感兴趣。他在保守的顾问们的影响下，得出结论，认为他父亲的政策将使俄国招致毁灭。正如他后来承认说，他打算在他即位后就取消舰队，仍然以莫斯科为首都，并且不进行侵略战争。1716年夏天，父子间的对立终于爆发，阿列克塞逃往国外，先去哈布斯堡，然后前往那不勒斯。1718年2月，阿列克塞在得到保证其人身安全的许诺后，回到了俄国。他的许多所谓支持者被逮捕并被判刑，他本人也遭到审讯和折磨，于7月间死去。这是这个世纪中最著名的悲剧之一。导致阿列克塞死亡的真正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彼得对此负有责任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捍卫他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改革措施，他宁愿采取这些极端的手段。这一点就明显地证明了彼得对俄国怀有责任感，也说明了他的性格上的残暴。4年之后，即1722年，彼得取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但是，他对这个权力却一直没有运用

过。1725年1月，彼得弥留之际已经虚弱不堪，无力说出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遗嘱，因此，继承问题只有留待近卫军和一小撮大臣们来决定。

毫无疑问，波尔塔瓦战役是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早在查理十二世在乌克兰遭到惨败前，彼得和俄国在西方政治家们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

的确，俄国加入北方战争后，它同其他各国的政治接触比较以前密切了。海上大国急于要结束这场战争以便在即将来临的与法国的作战中使用瑞典军队，因此于1700年在彼得和查理之间进行斡旋。在以后的几年里曾不止一次地进行斡旋，虽然彼得对此一直表示愿意接受；但是瑞典国王由于胜利喜形于色，而且由于一心想要对那些对他进行过攻击的国家进行理所当然的报复，因而始终加以拒绝。然而，查理的顽固态度却使反对法国的国家不得不对北方事态的发展加以关注。例如，1702年，普鲁士驻莫斯科的代表凯泽林就曾建议，彼得应该与普皇以及海上大国结成联盟。1707年的5月和6月，俄国驻海牙公使、精明干练的A. A. 马特维耶夫在伦敦就俄国可能加入“大同盟”的问题进行谈判，直到1708年秋，谈判才最后终止。与此同时，法国也希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利用瑞典军队。1701年初，当彼得和奥古斯都二世在比尔扎会晤时，法国驻波兰大使杜埃隆就曾建议与查理十二议和；然后，俄国、波兰、瑞典和土耳其应与法国一道结成大联合来反对普鲁士皇帝和海上大国。一年后，曾为建立1699—1700年^[22]的反瑞典同盟出了大力的利沃尼亚贵族帕特库尔又建议法国与俄国、丹麦以及“其他北方国家”结成联盟。1707年春天，彼得由于瑞典在波兰取得的胜利以及俄国国内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身受巨大压力，被迫提出向路易十四提供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以换取路易十四为结束北方大战出面调解。路易十四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查理十二世要求归还瑞典从前的全部领土，而彼得则以同样强硬的态度拒绝放弃新建立的圣彼得堡，这就是说，建立和平的真正可能性尚不具备。但是，对于英国或法国的有关的政治家们来说，这些谈判似乎并不具有任何真正重大的意义。他们之中谁也不重视俄国的支持。因此，1706年2月，俄国表示只要法国归还在敦刻尔克被掠去的两艘俄国船只就可与法国保持友好。但是，托尔西却不肯出此区区代价，竟然加以拒绝了。8月底，他又拒绝了与俄国缔结一项通商条约的建议，理由是

战争已经排除了两国间任何贸易发展的可能。同样，在英国，戈多尔芬于1707年争辩说，北方战争“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影响不大，除非莫斯科和波兰不对土耳其人进行牵制，土耳其人因而可以趁机进攻普皇和威尼斯人”^[23]。

波尔塔瓦战役使查理十二世从一个征服者变成一个逃亡者。这次战役彻底改变了整个形势，这就使1699—1700年反瑞典的联盟可能复活，从而迫使英国和尼德兰召回它们从丹麦和萨克森雇用来的援军。这次战役摧毁了斯坦尼斯拉斯·莱茨津斯基的地位，使俄国的影响在波兰有举足轻重之势，也为俄国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大部分地区甚至占领北德意志开辟了前景。因此，除了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而赋予彼得的威望之外，凡此种种也大大增加了他在西欧的影响。俄国驻维也纳公使乌尔别赫在1709年8月给莱布尼兹的信中写道：“人们现在开始就像从前惧怕瑞典那样而惧怕这位沙皇了。”这位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人们普遍地说，沙皇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将是难以对付的；他将成为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几周后，他劝告他的雇主汉诺威选帝侯要尽力同彼得保持友好的关系。^[24]1710年，托尔西在格特洛伊登堡与英法两国谈判期间，曾建议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应由俄国出面调停而使之结束。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希望利用彼得为法国效劳就像黎塞留曾经利用古斯塔夫·阿道夫那样。因此，波尔塔瓦战役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立即承认了俄国在欧洲事务中的新地位。这次战役还表明，北欧其他国家现在与其说对俄国感到恐惧，不如说是对瑞典帝国的崩溃感到恐惧。1711年，一位普鲁士的外交官建议说，丹麦、普鲁士和萨克森—波兰的奥古斯都二世应该结成一个联盟，查理十二世以后再参加进去，以便遏制这时已形成威胁的俄国力量的扩张。这只不过是俄国胜利以后所提出的许多类似建议中的一个而已。

然而，在1713年前后，西方的几个主要大国要想积极地干预北方的事务是不可能的。英国政府确实非常不安地注视着对利沃尼亚的征服，俄军侵入德意志，俄国海军力量在波罗的海的增大以及彼得可能很快就要垄断若干海军物资的供应等。但是，英国在和法国媾和之前，它的手脚是被束缚着的。博林布鲁克于1713年2月写道：“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北方事态的发展，但是，正如同人们注视着海上的风暴一样，我们看到眼前的情景只能感到恐惧，对那些遇难者只能表示同

情，但却毫无希望能够至少不能立即前去拯救他们。”^[25]1714年，随着一个国王的继位（他同汉诺威的选帝侯一样，已经是反瑞典联盟的一个成员），英国遏制俄国扩张的前景就更为遥远了。^[26]而联合省，由于阿姆斯特丹有许多商人希望保持并且扩大同俄国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因此，也不会真的反对俄国的。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尽管受到了在法国仍然势力强大的亲瑞典的传统的重大影响，但也曾一度希望利用俄国来对付获胜的反法联盟。特别是他们相信，他们会说服彼得前去支持拉科西领导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反对普鲁士皇帝。因此，在波尔塔瓦战役后，当丹麦、汉诺威和普鲁士将瑞典人从所有德意志属地中赶走时，彼得就可以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完成对利沃尼亚的征服。

彼得采取的在他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和最危险的冒险行动，即1711年的土耳其战役，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土耳其于1710年11月宣战，并不是彼得所需要的，因为这时他正忙于巩固他对波罗的海的征服以及同瑞典媾和，腾不出手来。1711年的俄土战争是查理十二世、波尼亚托夫斯基以及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代理人等一手策划的，而首先是克里米亚汗一手挑起的。^[27]彼得本来是愿意接受一个大国的调停的，以避免在南部边境发生冲突而牵扯其精力。因此，直到1711年3月，莫斯科才正式地公开宣战。然而，一旦宣战，彼得就奋力推进战争。这时，沙皇梦想着可以在巴尔干基督教徒反抗穆斯林统治普遍举行起义的支持下，胜利地向多瑙河推进。然而，进攻遭到惨败。俄国在黑海得来不易的新据点丢掉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这次战役的结局并不像曾经看上去时的那样糟糕。彼得的军队没有因此垮掉，彼得的手脚也没有被捆住，而是让他腾出手来彻底消灭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势力。即便是查理十二世直到1714年才迟迟从土耳其流放地返回瑞典，也未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由于1716年维斯马陷落，瑞典就失去了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到了这年的夏天，俄国—丹麦军队在英国和荷兰舰队的支持下，即将在瑞典南部登陆。

接踵而来的危机——沙皇突然决定放弃这次入侵；1716—1717年的冬天，大部分准备入侵瑞典的俄国军队已在梅克伦堡驻扎了；俄国的盟友感到吃惊，结果反瑞典同盟瓦解了——这是俄国所曾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外交纠纷。^[28]1716年的事件在英国、丹麦和汉诺威引起了强烈的反俄情绪。这些事件清楚地（也许甚至要比波尔塔瓦战役

更清楚地)表明了,这时俄国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部分了。一度对于俄国彻底囊括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北部的恐慌,渐渐地平息下来。彼得似乎想要以利沃尼亚或者牺牲汉诺威,来补偿专制的梅克伦堡公爵的损失,这位公爵已被他统治下的各个等级在一支汉诺威军队的支持下赶了出去。1722年,人们担心,沙皇可能出于自己的打算而攫取梅克伦堡和但泽。在他统治的晚年,他的女婿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卡尔·腓特烈大有在俄国的支持下被扶持为瑞典国王的可能,这又加深了西欧各国政府的怀疑。尽管人们对俄国感到讨厌、惧怕,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示蔑视,但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尽管俄罗斯的民族生活中有许多奇特和野蛮之处,俄罗斯语言也不易懂,其宗教多属东正教,但有一事实却无法掩盖,即俄国在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中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彼得不久即以清清楚楚的行动向人们着重地表明了这一点。1717年,他第二次去西方旅行,访问了汉堡和阿姆斯特丹,最后一站是巴黎。在巴黎,戈贝林工厂和“皇家公园”对他有特殊的魅力,这一点毫不奇怪。但是,他这一次却不再是以一个为寻求新思想、新技术匿名旅行的学生,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和军事征服者出现;在许多人看来,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从直接的政治利益来看,这次旅行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彼得希望同法国结盟,这一思想直到他去世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左右着他的对外政策。他对奉命同他进行谈判的泰塞元帅说:“我前来是要亲自向法国建议,我要法国取瑞典地位而代之。”^[29]这样典型的开诚布公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得到结果。这时,法国政府由于1717年的三国同盟而与英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同俄国敌对,并且仍然坚定不移地忠于法国传统的盟友瑞典。摄政奥尔良既不能向彼得提供什么津贴,也不能给予彼得他所要求的对其征服地的保证。这位沙皇只能从8月间在阿姆斯特丹同法国和普鲁士签订的一个条约中得到一丝满足。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同意就波罗的海问题进行调解,并且不签订有损于俄国利益的新协定。这个条约实际上并没有生效,但是,它却进一步构成了对俄国在欧洲的新地位的承认。

在其他方面,俄国的这种新地位也得到了承认。这时,俄国同欧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持久,而且是按部就班的。到了彼得的统治结束时,各大国的代表都在俄国常驻,进行谈判和提

出报告极为方便，这在17世纪是不曾有过的。在彼得方面，他为了加速这种关系的发展尽了很大努力。1699年，他派遣A. A. 马特维也夫出使海牙，从而设立了一个现代式的俄国外交机构。俄国驻西方各国的大使馆不再是短命的了，那已经是前两个世纪特有的现象了。不仅如此，从1707年起，俄国就开始在西欧建立了一个领事代表机构体系。到了1725年，俄国拥有的外交机构可以同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拟。许多统治家族愿意考虑同罗曼诺夫家族联姻，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从此也可以看出俄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早在1701年，利奥波德皇帝就曾经暗示，他的儿子可能会与彼得的妹妹纳塔利娅，或者是与彼得的一个侄女联姻，尽管这个计划维也纳并没有认真地加以考虑。1710年，沙皇的侄女安娜同库兰公爵的联姻倒是具有实际意义。安娜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嫁给一个外国人的俄国公主。6年之后，彼得的另一个侄女叶卡杰林娜又成为梅克伦堡公爵夫人。皇太子阿列克塞于1711年娶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夏洛特为妻。彼得在他的晚年，曾不止一次地认真提出，要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法国的皇室；此时，菲利普五世似乎已考虑要让他儿子娶一位俄国公主为妻。这件事充分地显示出罗曼诺夫家族的地位有了多么大的改善。1721年俄国同瑞典缔结一项胜利和约时，彼得采用了“大帝”的称号，这是适当地维护他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的一种举动，使得西方政治家们为之震惊。

尼斯塔特战役使得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地位最后终于得到确定。彼得晚年主要寻求在亚洲进行扩张。从1698年起，俄国就已组织了从莫斯科至北京的定期商队贸易。但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宣称满族人对阿穆尔河流域拥有权利后，俄国就没有打算重新占领这个流域，尽管事实证明该流域具有这样的价值，即它是西伯利亚各条河流上的俄国殖民地的粮仓。当俄国的资源在欧洲紧张时，就不可能把这些资源投入到这个地区来，虽然彼得对在西伯利亚的传教活动给予相当大的支持，而且也十分注意制止西伯利亚的地方行政官员的铺张浪费行为，这对他的财政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国库仍然要从国营皮毛贸易的利润中提取一笔有用的收入。[\[30\]](#)从1714年起，曾先后向中亚的各汗国派出一系列的使团，有的是军事性的，有的是科学性的。1717年同波斯签订了一项商业条约。1721年，继尼斯塔特战役之后，眼看萨菲王朝行将垮台，彼得开始有计划地攻取里海附近的波斯各省，这里盛产丝绸，并且显然容易被攻占。但是由于疾病流行、交通

不便，从格鲁吉亚的基督教徒那里又得不到帮助，而且还有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威胁，凡此种种，都使得这次战争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所费不赀。然而，俄国军队于1722年攻克了达尔班德和雷什特；1723年又占领了巴库。因此，到了1724年，经过许多复杂的外交活动以后，俄国终于在里海西岸和南岸拥有一条狭长地带。^[31]但是，事实证明，这一块彼得最后的征服地，既无价值，也难以维持长久。驻扎在这块被征服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从未被有效地占领过）上的俄国军队，由于疾病，人员损失严重。1732年，在安娜女王的统治下，这块被占领不到10年的领土，便被放弃了。

俄国的崛起自然会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在国外产生反响。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蔑视俄国的思想需要彻底加以改变。甚至早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彼得的活动即使没有得到西方观察家的赞许，也已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伟大的莱布尼兹对俄国产生兴趣是把俄国作为从事科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并把俄国作为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进行探讨，但他对俄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给它的这位统治者带来的良机也已有着深刻的印象。不过，俄国首先引起西方注意的，却是它对瑞典的军事上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彼得统治的后半期里，有关俄国的书籍的出版日益增多，西方报刊上关于俄国问题的介绍文章不断增加。彼得本人深知得到国外报刊好评的重要意义。早在1703年，他就在巴黎安排了一个代理人，其责任就是散播他取得胜利和进行改革的消息。而当时德意志的一家重要政治杂志*Europäische Fama*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于他的作为给予好评。但是，对于俄国及其沙皇的了解，即使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在某些方面仍然非常有限。就是到了1717年彼得去巴黎访问时，当地市民成群结队前去观看他，其中有许多人甚至对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头衔，还弄不清楚。到他的统治结束时，甚至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俄国生活中许多极为重要的方面，例如，农奴制的巩固和扩大的问题，官僚制度腐败无能的问题，以及教派对立问题等，对于西欧来说几乎是一个谜。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作家成功地向西方描绘出俄国社会的真正平衡的、现实的情景。然而，人们普遍感觉到，曾经一度是愚昧的、半野蛮的莫斯科，现在正在开始成为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欧洲的一员。1716年，法国出版的《皇家年鉴》中第一次把俄国列在欧洲强国的名单之内，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这种对俄国日益增长的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其统治者个人的赞美，有时甚至达到阿谀奉承的地步。甚至在路易十四去世前，许多观察家就认为彼得是活着的君主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的精力充沛、他的虚怀若谷、他对知识的尊重（至少对一些种类的知识是如此），以及他在振兴民族事业中的自我牺牲，所有这些品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一个聪明睿智的、热心为公的独裁统治者的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好处。彼得几乎是不可抗拒地迎合了启蒙时代对创业的统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这种统治者愿意听命于理性和自然。圣彼得堡的一家英国工厂里的一位牧师写道：“从他改造本国人民风俗的崇高的尝试中，可以看出他的虔诚；从他迫使人民改邪归正，消除他们有生以来就已持有的谬误和迷信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果断。”^[32]在彼得去世时，大量的评论和悼文洋溢着赞美之词，至少其中的由丰塔纳尔向法国科学院发表的颂辞演说，对未来西方对彼得的统治的评价有着深刻的影响。二三十年以后，伏尔泰在他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帝俄史》（1759—1763年）一书中以更具有影响的方式表示了这种有些不加批判的赞美。无论彼得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把俄国看作一个欧洲国家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但到了他的晚年时，他们都会同意他是一位伟人。尽管他性情残暴、过于自信、有过失算和偶尔的惨败——但是，他在“创造历史”的伟人祠中的席位那时即已确定。

（王丽芝 译）

[1]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5章。

[2] 射击军是陆军的一个部分，主要驻守在莫斯科，担负宫廷警卫任务，很有政治影响。1682年，他们发动叛乱，杀死了许多贵族要人，立彼得的异母姐姐索菲娅摄政。

[3]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77—578页；第6卷，原文第777页。

[4] 见本书原文第634—636页。

[5] 参见M. S. 安德逊著《不列颠与18世纪俄国海军的发展》，载《航海明镜》第42卷，1956年，第132—146页。

[6]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原文第320页。

[7] 《贫穷与财富论》（1724年）的作者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一个王室领地的农民家庭，原来是当地兵工厂中的银匠，从事硬币的铸造，最后终于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制造商，拥有房产甚至一些村庄。

[8] 科尔贝尔 (Colbert, 1619—1683年), 法国的政治家和财政家。——译者

[9] 关于俄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讨论, 其中许多方面仍不明确, 参见拉·波塔尔的《18世纪俄国的制造商和社会的阶级》一文, 载《历史评论》第16卷, 1949年, 第160—185页; 第17卷, 1949年, 第1—23页。

[10]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 原文第318—319页; 拉·波塔尔:《18世纪的乌拉尔》, 1951年, 第1—3章。

[11] 见本书原文第842—844页。

[12]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 原文第581—586页。

[13]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 原文第324页。

[14] 参见C. 马斯登著《北方的巴尔米拉: 圣彼得堡的初建》, 1942年, 第2章; R. 维特拉姆著《沙皇彼得一世和德国皇帝》(两卷本) 第2卷, 哥廷根, 1964年, 第57—79页。

[15] 关于尼康的要求和改革所引起的冲突问题,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 原文第586—591页。西蒙娜·布朗的文章《“启蒙时代”初期的俄国教堂》, 载《年鉴》(E. S. C) 第20期, 1965年, 第442—464页, 重新研究了西方影响, 特别是通过基辅学校带来的西方影响问题。

[16]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 原文第325页。

[17] 俄国历史学家对于这些社会变化多有讨论。英文本中阐述这些变化的最优秀的著作是V. 克抑切夫斯基的《彼得大帝》(1959年), 译自他的俄文版《俄国历史教程》(莫斯科, 5卷本, 1904—1921年) 一书的一部分。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 原文第320—322页。

[18]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 原文第578—579页。

[19] 彼得改革受到外国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讨论中值得提到的是W. 莱昂蒂也夫的《彼得大帝: 他的经济政策及所谓重商主义》一文, 载《东欧历史年鉴》第2卷, 1937年, 第234—271页; P. 米留科夫的《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的俄国国民经济》, 圣彼得堡, 1905年; W. 欣兹的《彼得大帝对其所处时代科学和艺术文化的贡献》一文, 载《斯拉夫文化历史年鉴》新编第8卷, 1932年, 第349—447页; B. I. 塞罗米亚特尼科夫的《彼得大帝的正规国家及其思想》第1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3年。

[20] 关于这些反抗在俄罗斯人与其邻人的关系中有何重要意义的问题,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 原文第566—568、584—585页。参见D. 埃科特著《17至19世纪俄国的强盗: 神话与现实》一文, 载《近现代史评论》第12卷(1965年), 第161—202页, 论彼得千方百计未能捣毁的边境地区和沿着商路一带的犯罪活动的背景。

[21]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 第589—590页。

[22] 参见本书原文第652—653页。

[23] “历史手稿注解”，见《巴思手稿》第1卷，第184页。

[24] V. I. 古耶尔：《莱布尼兹的关于俄国和彼得大帝的杂论、书信集》，圣彼得堡，1873年，第115、120、139页。

[25] 1713年2月3日给驻萨克森—波兰公使斯科特的信（伦敦档案局，S. P.，第104—123页）。

[26] 见本书原文第673、675—676页。

[27] 见本书原文第631页。

[28] 参见本书原文第675—677页。参见J. J. 默里著《斯堪尼亚和北方同盟的终结》一文，载《近代史杂志》第16卷，1944年，第81—92页；W. 迈迪格著《俄国通向欧洲的道路》，不伦瑞克，1952年，第32—35页。

[29] 《帝俄历史协会文集》第34卷，1881年，第198页。

[30] 维特拉姆，第2卷，第480—482页；G. V. 兰特泽弗：《17世纪的西伯利亚：殖民统治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书刊，第30卷，1943年），第151—154页；关于西伯利亚及其问题的总评价，参见R. 波塔尔著《17世纪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一文，载《近现代历史评论》第5卷，1958年，第5—38页。

[31] 见上引书，第644—645页。

[32] T. 康塞特：《目前俄国教堂的状况与管理》，1729年，第14页。

第二十二章 陆军和海军

1. 陆战艺术

到了17世纪最后10年，欧洲有影响的舆论对战争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同奥斯曼帝国有接触的地区外，那种不能容忍异教邪说而打得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大体上已经消失，战争的规模虽然日益扩大，导致投入了更多的国家资源，但只有1708年以后法国所做的极大的战争努力以及瑞典在与俄国进行长期斗争中所蒙受的巨大牺牲才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这种爱国主义激情从1793年以后导致了全民动员和“总体战”的产生。从宗教战争到民族战争时代，战争行为逐渐变得有了“限度”^[1]，这并不是说战争的目的局限于王朝之间的和商业上的争夺，而是说战斗本身日益被认为是一种受到确认的惯例所约束的绅士行为。由于交通不便，战争对欧洲平民的影响仍然受到限制，落后的交通通常将战争引向某些历来的征战之地。战争引起的经济后果虽很广泛，但战争直接造成的灾难程度则各有不同。北方大战因其残酷而出名。在东南面，土耳其因其暴行常遭到奥地利的报复；在西面，法军于1674年和1688年对巴拉丁两次洗劫以及盟军于1704年对巴伐利亚的蹂躏，常被引证为恐怖的战例。当时对这种暴行真是千夫所指，说明那个时代的良心都受到震撼。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某些国家的军队逐步壮大，虽则大多数国家的武装部队的规模仍然很小。在公认的1643年的巨大的战役即洛可瓦战役中，2.3万名法军击败了大约2.7万名西班牙军；66年后，8万名法军同11万名盟军血战于马尔普莱奎特。这反映出由于各国政府对其经济、行政体制进行了改进，普遍增加了兵员。据估计，法国在1691—1693年间拥有兵力约44万人。但在战时，兵员的总数起伏较大，此种起伏视国家的财力而定。1705年，法国的兵力缩减到25万人，但尔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即使在和平时期，法军的作战部队的编制都很少在15万人以下。仅有250万人口的瑞典帝国在其顶峰时期拥有一支11万人的部队。彼得大帝建立了一支不包括哥萨克

军在内的、大于此数一倍的军队。奥地利和帝国的部队人数在10万—14万。奥斯曼帝国兵员如果不超过此数，至少也与其旗鼓相当。英国则继续维持一支兵员数目不定的军队，其兵力在不同时期多寡不一。英军人数在1698年最低，当时议会将在英国本土的兵力限制在7000人，在爱尔兰及海外的兵力限制在17万人，但在王位继承战争的高峰时期本国籍的军队却达到了7.5万人。联合省共和国的兵员也达到此数。[\[2\]](#)

这些规模较大的军队，其兵员并不都来自本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雇佣兵组成的。1677年，法军的八分之一是由瑞士、苏格兰、爱尔兰和其他外国雇佣兵组成的；荷兰雇用了丹麦人、勃兰登堡人以及英国的汉诺威人和黑森人；奥地利除由克罗地亚人和边疆居民提供非正规的步兵和骑兵外，其大部分兵员是由帝国各邦依据合同提供的。许多国家的军队之所以具有“国际性”的面貌，其部分原因要归结于这些军队中冒险分子的职业态度。爱尔兰人彼得·德雷克在同一次战争中既在盟军中服务过又在法军中服务过，全然不为此感到尴尬；佛兰德骑兵将领默罗特-韦斯特卢伯爵先在法国—西班牙军中，后又转主哈布斯堡军中服役，并且在两军中都晋升到很高的职位。职业军人为社会所不齿，被视为流浪汉，他们只要有利可图便可投奔对方而毫无内疚之意。但这并不妨碍个别部队培养高度的集体精神。在这方面，英国和瑞典的近卫军便是突出的范例。杰出的将领常能激发部属对其个人高度忠诚，在战阵上英勇豪侠的事迹屡见不鲜。

由于各国军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就给从军的冒险分子转换部队提供了方便。转换部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许多长远的和当前的影响使得这种人能在战术上、装备上和战争理论上得到发展的机会。在整个17世纪的后半期中，法国的影响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的军队最为庞大，在布莱海姆之役以前其组织也最为优良并且在欧洲显然是最有成就的军队。法文的军事用语或其派生词，例如，营和排，均为其他许多语言所采用。查理二世派出过青年军官向蒂雷纳学习，约翰·丘吉尔便是其中一个，他后来当了第一代马尔巴勒公爵，成了他的法军中老同事的灾星。在奥伦治威廉的促使下，联合省共和国依照法国的制式缓慢地改革了它的军队。彼得大帝一向仰赖德国人充当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3\]](#)在蒙特科考里和查理十一的领导下，奥地利和瑞典较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军事体制，但大体上还

是依照了标准的法国制式。法国的影响在德国较为显著，而勃兰登堡—普鲁士则搬用瑞典的制式。^[4]

奥斯曼帝国是这一时期战争的主要参加国，仍采用老得多的军事组织形式和方法。奥斯曼帝国在炮神艾哈迈德帕夏克洛德·亚历山大（1675—1747年，又名博纳瓦尔，于1729年投入苏丹军中服役）时代以前，并未认真实行陆军现代化，然而其海军则已开始采用某些西方技术。^[5]土耳其人所依仗的仍然是兵员的数量，在欧洲拥有最大的野战部队。马西格里公爵于1678—1679年和1690—1691年间，曾在土耳其，对情况十分熟悉。他估计土耳其各省的帕夏所征集的第二线步兵和工兵——统称为“色拉苦力”（意为边疆的奴隶）——的人数共为10万，此外，尚有兵员，最多时为5.4万人，组成3个军团的“雅内萨里”（近卫军步兵）。雅内萨里连同其他正规兵种——少年近卫步兵、炮兵、军械兵、水上运输兵等——一道统称为“克匹苦力”（意为土耳其帝国政府之奴隶）。克匹苦力的常备骑兵共有高、低级骑兵1.5万多人，再加上各省为完成纳贡义务和因持有官爵、纳赋田亩和土地而产生的各种义务所征集的约5万名骑兵。纳贡骑兵由当时尚未被征服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诸侯国和克里米亚提供，克里米亚鞑靼族骑兵在土耳其人的征战中起了显著作用。根据“扎马特”和“梯马尔”等采邑制度建立的老式“封建”骑兵，其重要性已开始让位于色拉苦力各类骑兵，其中包括重骑兵、轻骑兵和侦察骑兵。色拉苦力骑兵原是为了防守边疆而建立的，但此时各省长官利用纳赋田亩的收入和强行征召的办法不断扩大兵员。^[6]

新型的法国军事机器的许多特点并非法国所原有，而是众多的杰出法军将领和行政官员采纳了外来的思想加以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使法国军事机器的特点最终为欧洲各国军队所吸收。继拿骚的莫里斯（死于1625年）在战术上的创新后，最显著的便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所带来的影响。阿道夫的改革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此种战争的基础在于采用经过改进、火力更大的转轮滑膛枪，增大滑膛枪兵对长矛兵的比率以及细致地实行火炮口径标准化，将火炮口径主要分为三类，即攻城炮、野战炮和团编制使用之火炮。古斯塔夫·阿道夫是第一个认识到改进了的炮兵所包含的全部意义的人，并且围绕着复杂的火炮发射计划形成了自己的战术。此外，他的组织严密、兵力约为400—500人的新式战术部队也增加了机动性。许多国家仿效他的改革。克

伦威尔和鲁珀特采用“冷兵器”骑兵冲锋；蒙特科考里以六列队形的营取代了行动不灵活的哈布斯堡步兵团。最有意义的是黎塞留把萨克斯—魏马的贝尔纳的全部军队吸收到法国部队中来，并派遣有前途的军官在古斯塔夫的其他老同志手下工作。瑞典的军事制度由于被蒂雷纳、孔蒂和卢森堡所采用，从而给法国取得军事优势提供了基础。然而就法国而言，不幸的是法军将领误用了瑞典的军事原则，古斯塔夫的原则直到马尔巴勒、萨伏依的尤金和查理十二之时才重新得到发展。因此，瑞典所兴起的“军事革命”在古斯塔夫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才给各国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7]

法国最大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乃是改组军事管理。这一军事管理改组的过程也是由黎塞留所开创，他建立了一个陆军部，用以协调军队的供给和组织。黎塞留的工作后来由勒泰利埃（1603—1685年）和他的儿子洛沃瓦继续进行。黎塞留父子在他们这一代人之间将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改造成为欧洲的一支最精锐的常备军，他们的改革被各国广泛仿效。他们在各级实施了严格的政府监督，但实际情况和条令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经过重新厘定的军法审判制度严厉制裁无纪律和明显的贪污行为。他们取缔了非正式的部队编制，并努力制止在招募兵员中存在的经济投机活动。由于对经费实行了细致的配给和监督，从而消灭了许多弊病。虽然如此，部队的薪饷仍有拖欠数月之久的现象。^[8]监察长官定期到团视察；演练制式、训练和装备都尽量使之标准化；具有特点的制服也于1672—1700年间逐渐开始采用。各团包括的营数、骑兵中队的兵力以及其他各点均有明确规定。卢瓦着力于改组军需供应机构，他建立了军需部来管理包括火炮、弹药、军粮、马匹、交通、野战医院等在内的各种后勤部门。文职的监督官的任务乃是尽量减轻战地司令官的后勤负担并独立地向凡尔赛汇报执行的情况。边界后面建立了一系列综合兵站为辎重车队进行补给。这一切大大地减少了对于农村的仰赖。靠农村要给养这一做法被当时舆论所谴责，而且派出去征集粮秣的士兵逃亡率甚高，效果很低。类似的改革也改善了欧洲其他国家军队的后勤工作，早在1650年，奥地利便设有军粮供应部门^[9]，但军需部负责战地的详细的具体补给。在英国，古老的军械局供应除火炮以外的许多军用物资，1703年，则辅之以军队及财务主计官办事处用以保证对士兵发给良好的装备以及定时发给口粮代金；具有历史意义的1707年颁发的“皇家授权

书”规定了配给每一士兵的适当的被服和装备标准。马尔巴勒认为这些改进甚为重要，同时也是由于他的影响才取得了这种改进。

法国的指挥结构经过了彻底的修改。1675年第一次颁布的军阶表详尽地调整了军队中的等级，明确规定了每级的特权及晋升的要求。过去战场上级别相同的将军隔日轮流行使指挥权这个古老的传统最终被根据资历深浅的原则，即授予该军阶时间迟早的原则所取代，而且最高指挥权由王室授予并须受到不断的考察。^[10]从此，法国军官原有的社会地位在理论上就变得不如其军阶那样重要了。重要性含混不清的老的职务名称，其中包括“指挥官”这一名称，便不再使用了，而代之以新的名称，其中最重要的新的名称是准将。虽然德国和俄国受奥地利的影响，但与法国类似的军阶结构则已在欧洲普遍出现。中下级军阶仍可鬻买。沃洛瓦虽然曾试行选拔考试制度并为有志从军的贵族设立训练人员，但是，特别在1715年以后，中下级军阶在法国仍属贵族之特权。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沃洛瓦的做法。^[11]

根据这种做法，勒特里埃父子及其效法者建立了精干的常备军。同时，一种过于拘泥于规章制度的倾向加重了正确执行规章制度的困难，从而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在17世纪初受到损害。许多野战部队因贪得无厌的承包商和发战争财的人而继续受到巨大的苦难。

步兵武器的一些进展也改变了战争的艺术。燧发枪和有插座的刺刀很快地替代了老式的火绳枪和长矛。新式的燧发枪经过了多方面的改进。这武器依然偏重^[12]，但比火绳枪轻，士兵不需用支架托住枪管。第二个改进是口径减小，枪弹由每磅12发增至16发，法国的一种型号的燧发枪的枪弹甚至增至每磅24发；每一士兵通常携带枪弹25发。击发装置也更便于使用，火药由燧石撞击钢铁产生的火花点燃。虽然仍有不发火的现象，但这种装置较之以手工在火门上装上引信并常因潮湿而不易点燃要方便得多。燧发枪的射程并没有明显地增大到超过75—100码，但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纸制弹药筒，子弹射击数量却增加了一倍，一名好射手可在一分钟之内发射数枚子弹。燧发枪的缺点是：装药棒仍是木制的，此种木制装药棒在战斗紧张时易于折断。然而燧发枪却代表了武器技术中相当大的一个进步。普赛居（1655—1743年）写道：“现在决定战斗的是火器而不是冷兵器。”^[13]燧发枪很快地就被用做标准的步兵武器。在1685年的塞奇莫尔战

役中，费弗沙姆的一部分军队已使用了燧发枪；到了1700年，英国、荷兰和法国的部队几乎全部配备了燧发枪，但法国的第二线部队直到1703年还在使用火绳枪。瑞典政府于1692年批准了一种燧发枪的图样并于1696年颁发至其部队，但许多瑞典部队长期保留使用老式的、有着奇特的“复式枪机”的滑膛枪，这种滑膛枪具有燧发枪和火绳枪的特点。这种武器在奥地利的军队中也被广泛使用，但在18世纪初则被燧发枪所替代。火绳枪只是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军队中作为大多数枪手的标准武器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装备得极不平衡，近卫军配备有良好的枪支，地方部队则仍以标枪、弓箭和矛作战。

从长矛过渡到作为个人防身用的武器——刺刀，为时更为缓慢，因为这一“武器之王”仍受到许多人的青睐。例如，达尔塔南就强烈反对沃邦完全以滑膛枪装备法军步兵的打算。直至17世纪末，各国部队仍将长矛兵和滑膛枪兵的比例保留在一比五或一比六。但长矛的缺点逐渐地被大家所公认。长矛重而且长（14—18英尺），使用不便，严重束缚了部队的机动性，滑膛枪专家则希望获得在军队中被长矛所占用的人力。在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之前，皇帝甚至于1659年下令以野猪矛代替长矛来同土耳其人作战。^[14]在1690年弗勒鲁战役以后，长矛作为自卫性武器的价值也引起了怀疑，当时广泛地谈道，某些完全以滑膛枪装备的德国部队比按常规配有一定比例的长矛兵的部队更有效地击退了法国骑兵的进攻；同年，法国元帅卡蒂纳攻打萨伏依的阿尔卑斯山之战以前便废弃了长矛。然而发展一项取代长矛的较理想的武器进展甚为缓慢。野猪矛仍然笨重，需要特殊车辆运载。在滑膛枪上安装刺刀的尝试最初并不很成功。早在1663年，英国便在部队中使用插座刺刀，其后20年中，这种刺刀被配给一些法国部队和皇家部队使用。这一武器的缺点是刺刀装在枪口上妨碍射击。1689年在基利克兰基战役中遭到失败的英国将军休·麦凯指出：“苏格兰高地人动作神速，如果一营枪兵待敌接近，再开始射击，以便有把握地将其杀伤时，高地人早已冲至跟前，而我方士兵已来不及进行第二道防御，即将刺刀插入枪口。”^[15]这一缺点由于采用环形插座刺刀，使之能固定于枪口外面而终于得到解决。专家将这一发明归功于麦凯和沃邦，其结果便是在战场上不再使用长矛了。瑞典近卫军于1700年装配了这种刺刀，在此以后的3年中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均已完全改用了这种

刺刀，但法国1703年颁发的条例仍提及“长矛配合滑膛枪作战”。各国军队制造的刺刀形式各有不同，但战术意义则相同。奥地利刺刀原是仿照法国模式制成，但比法国刺刀短而厚实。老式威武的长矛于是便在欧洲各国军队中消失了，但其小兄弟——短矛和戟——作为下级军官的随身武器又继续被使用了一个多世纪，并且证明在整肃部队时所发挥的作用甚大。

武器的改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场上，步兵的重要性大大地提高了，而骑兵的作用则相应地变得不那么重要。为了尽量地利用这种增强了的火力，新的编队逐步地建立起来了。步兵的横列加长以增宽部队的正面，但营的规模却缩小了。在1658年的达尼河战役中，法军每营为1200人，排成纵队8列；40年后，法军每营则为700人，排成纵队4—5列。1702年，英军每营为500人，仅排成纵队3列，以便取得正前方最大的射击面。瑞典军队每营通常为600人，排成纵队4列，散开队形时，长为185米，深为6米。奥地利的部队仍以团为基本单位，为了适应战术需要，团又分为若干营；团的大小各个时期不同，1695年一团分为四营，共2300人，但1711年尤金进行改革后，一团缩减为三营共五连，每连名义上的兵力为140人。

这些改变促使能懂得其含义的指挥员更加放手利用步兵兵种。与此同时，战术仍很呆板。为了取得射击和重新装填弹药的最大效率，发展了一套详尽的演练动作。这显然是要求保持行列的队形和肩并肩演练。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都主张勤加演练，以发挥火力步调统一的威力。许多英国部队都接受了以排为单位分三次射击的训练，而不是采用法军及其盟军继续使用的那种以单列、连甚至营为单位的齐射。英军的这一革新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注意，但马尔巴勒却认识到了它在战术上的重要性。以排为单位的射击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将射击指挥权授给下级军官，从而使射击更能持久和更准确；由于英军每营总有三分之一士兵进行射击，英军以排为单位所发射的一浪接一浪的火力便使敌军毫无喘息之机；就防御而言，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三分之一营的兵力总保持枪支填充了弹药，随时可以击退意外的突袭。歼敌骑兵时，英军则排成中空的四方阵形，一个营一分为四，实行四面合围。英军步兵接受了移动和立定射击的训练，从而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火力与运动的原则。英军在70码开外以排为单位对敌射击，待敌军受到消耗后，英军各营则以迟发的齐射杀伤敌军，继以刺刀冲入

溃乱的敌阵。法国人在使用步兵火力方面想象力不如英国人那样丰富。法国对其步兵要求的主要是让它提供一块固定的基地，以便骑兵在冲锋之后得以在步兵后方重新编队。保持长矛时代4—5人纵深的队形则浪费了火炮的潜力并且妨碍快速重新部署；然而卢瓦缺少想象力，一味鼓吹这种陈旧观念，直到维拉掌管军队时才部分地采用了盟国的优良技术。瑞典在使用步兵方面较之俄国更为有效。1680年，查理十一世在训练上进行了许多革新；他的儿子则在这方面无所创新，但于1701年、1708年两次修改了操典。进攻的重要性一贯受到重视。瑞典步兵一旦接到敌军前来进攻的报告后，立即举行反击：在距敌40步时，后面两列士兵开枪齐射，前面两列士兵则在烟幕掩护下挺进，直到“刺刀可以触及敌人”^[16]之时方开枪射击。俄国兵几乎无法抵挡。

线式阵形与巨大的火力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伤亡率普遍提高。1692年的斯蒂拉克战役，双方大体上仍使用长矛和火绳枪，此役当时被认为是空前激烈的一次步兵战斗，参加战斗之兵员共15万人，阵亡者双方各为4000人，负伤者亦与此数相当，盟国步兵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武器更新后，盟军18万人在布莱海姆之役中伤亡超过了3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被俘人员。在马尔普莱奎特之役中，盟军每4人便有1人伤亡。在波尔塔瓦之战中，瑞典约1.3万人参加战斗，伤亡几乎达4000人。如此大规模的伤亡引起了一片惊呼，因此，许多指挥官宁愿打机动战也就不足为怪了。攻城战的代价极为巨大，例如，盟国为夺取里尔，至少付出了1.2万人的代价。

到了17世纪最后25年，防御工程技术早已胜过了笨重、射程不远的大炮的威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沃邦从来没有打算使自己的堡垒成为战斗活动的中心，而是用来保存部队以便在其他前沿阵地上发动攻击。然而，法国和联合省共和国都醉心于搞筑垒设防以及与堡垒相关的军事活动，这就必然引起了防卫思想的产生和对有限战争的偏重。沃邦制定的“边防城镇条例”（1678—1698年）实施的结果是在法国边境附近建立了33个新堡垒和整修了数百个旧堡垒。他的荷兰对手克霍尔恩工程师也筑了一条令人生畏的堡垒屏障。帝国皇帝除了整顿铁门一带（新老奥尔肖瓦、梅哈蒂亚）的堡垒以防备土耳其人外，还企图修整多瑙河上游（菲林根、乌尔姆）以及意大利北部（米兰、曼图亚）等地的防御工事以防法国入侵，但不怎么成功。土耳其人原

以攻城战最为出名，其声誉仅次于法国人；但1683年维也纳城下之败降低了他们的声望^[17]，同时尤金于1717年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又使他们的坚不可摧的防御盛名遭到无可弥补的损害。沃邦的影响在战争的攻、防两方面实际上都占据了支配地位。

沃邦的“三道”防御工事使堡垒难以攻破，这就迫使将领们集中力量去研究攻城战以及研究加强攻城和解围的打法。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沃邦的体系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利用纵射炮火、纵深防御以及守军利用隐蔽的出击口实行突击。沃邦完善了佩根（1604—1665年）的棱堡体系；增筑外缘工事和半月堡以加强易受攻击的突角，并根据自然地形构筑堡垒。沃邦利用夜袭和埋设地雷阻延敌军攻城，因此，除非弹尽粮绝、士气低沉，其防御总占上风。沃邦还改进了攻城技术，将“攻”（contravallation）和“守”（circumvallation）的工事建筑技术加以系统化。^[18]当时流传有这样的说法：“沃邦守城城在，攻城城破。”他认为他亲自指挥的53次攻城战情况各自不同，但整个欧洲都仿效他的原理。攻方在仔细择定了营地并通过充分的侦察在敌方的防卫中确定了其最薄弱的环节后，即挖掘三道“平行壕”接敌，一直挖至敌方堡垒的缓坡边缘为止。平行壕是一种复杂的土构工事，由间接的交通壕连接，用以藏兵驻守，最终发起攻击。小型火炮进行直接射击或跳弹射击，在敌方胸墙上有选择地打开一个缺口，以支援掘进部队；迫击炮则扫除敌方防御。这种攻城战一旦开始，其进度几乎可用数学方法算出；一阶段接一阶段向前推进，直至守军将领陷入欧几米德的几何形的罗网之中，面临要么光荣投降，要么冒全城军民被屠之险由缺口出击突围。由于伤亡太大，这种出击实际上甚为少见。根据惯例，守军可按条件于48日内投降，否则即要遭受立即攻击；但攻城战要求充分的物质准备，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因而延缓战争的进程。

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常设堡垒有时有永久的防线加强其防御。1703年建立的控制莱茵河与黑森林之间10英里地带的斯托尔霍芬防线便是这种防线中构造较为复杂的一例。较简单的防卫包括决堤放水、利用天然障碍和修筑哨堡以延缓而不是阻止敌军前进。由于18世纪时部队调动较困难，无法绕开对方防御阵地，同时又由于当时火炮预先轰击火力不足，因而正面攻击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马尔巴勒以其完善的战争艺术于1705年击破了70英里长的布拉邦特防线并于6年后又击

破了极限线防线。同时，维拉尔于1707年利用奇袭击破了斯托尔霍芬防线。虽然如此，筑堡防线仍然对防御战起了鼓励作用，并证明笛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在各有5万人的交战双方常在能见到的距离内相对峙，在整个战役期间彼此回避，或用当时雅致一些的话来说，彼此观察，最后拔营回去过冬。”^[19]

在这种情况下，装备、武器和战术思想通常相同的部队是胜、是负或是相持，则完全取决于为将者的指挥才能以及兵员之多寡。指挥官勇敢者少，谨慎者多，因而偏重于防御战的趋向便得以发展。而且他们的政府也常常强令他们实行防御战。路易十四在蒂雷纳死后受到卢瓦及其助手夏姆莱的影响，自1676年以后一直十分偏重于防御战。他们作为行政长官发动战争，调动军队犹如在棋盘上移动兵卒。每次征战都定期发下详细指令；经常向前线发送指示，提醒不得冒险。法王在指示中写道：“务望谨慎行事，切勿有损害我军声誉。”陆军部长也一再指示说：“不幸招致失败将给国王带来何等痛苦，这一点毋庸多言。”^[20]陆军部长的继任巴布齐允和夏米亚尔也经常提出类似的警告。就是著名的将领卢森堡也在九年战争中打了多次卓越的规避战，因而一再挫败了身患疾病的威廉三世强行决战的企图。因此，名气较小的后辈将领如塔拉尔和旺多姆不敢勇于交兵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凡尔赛批准了作战行动，法王的指令也束缚着将领的主动性。1706年，路易命令维勒卢瓦：“对会遭受英军第一次打击的那一部分防线加以特别的注意。”^[21]这一指令实际上造成了拉米伊之战的失败。小心谨慎的盟国政府可能用类似的条条框框牵制了自己的将领。荷兰议会通过其代表经常妨碍马尔巴勒的作战计划。托利党将马尔普莱奎特之役咒骂成“屠夫的账单”，掀起了一片喧嚣，也起到了束缚主帅手脚的作用。^[22]值得赞扬的是哈布斯堡军事会议^[23]一向不给战地统帅规定作战方针，但某些将领如斯蒂伦以及后来的贝罗伊特都倾向于打攻城战。瑞典军队由于受军事家的国王亲自统率，自然在打运动战方面比较自由，而且查理十二也喜爱运动战。

真正的伟大军事家并不偏重打有限战争。像当时最有胆略的军事家查理十二一样，马尔巴勒、尤金和维拉尔常能避开当时逐渐失去活力的战争惯例，而恢复他们以前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蒂雷纳所熟悉的机动和快速的精神。蒂雷纳告诫孔代说：“少围城，多交战；一旦掌握了广大乡村，城市便唾手可得。”^[24]一般而言，土耳其人同样

具有此种求战之积极性。马尔巴勒所取得的4次伟大胜利，表明了他对重大战斗所具有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即使这种重大战斗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奥德纳德之役中，盟军冒了被分割和逐一被消灭之险贴近法军渡过斯凯尔特河。此役之后，马尔巴勒写道：“我认为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推动女王的事业顺利前进了，因此，我下定决心打一仗。这一理由促使我于昨天冒了一场战斗风险，否则便会让敌方大得好处。”^[25] 尤金也同样力主交战。尤金尽管于1707年在土伦遭到失败，并且在马尔巴勒被罢黜之后的年代中缺乏制伏维拉尔的能力，但由于他多次战胜土耳其，且于1706年都灵之役击败马辛，并且他善于同其英国同事合作，因此，仍然声名昭著。在法国方面，维拉尔所表现的非凡之处就是将马尔巴勒和尤金在马尔普莱奎特所取得的胜利限于技术性的胜利：维拉尔重新集合士气低落的法军，使法国得以继续战斗，从而在德南战役中取得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胜利后，为法国赢得了并非不利的和平。

在各个时代中，地形和气候对于决定各种战场上所使用的战斗方式均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绿色饲料短缺和冬季道路不良，战斗一般限于夏季进行，又由于欧洲农业产量一般较低，大部队行军之远近完全视其所能携带的粮草之多寡而定。气候炎热时，军中则痢疾肆虐；冬季寒冷之时营中则有冻伤、饥饿和疾病。

在西欧，历来的征战之地主要有4个。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古战场”。这一古战场是由安特卫普、敦刻尔克、那慕尔和马斯特里赫特环绕而成的四方地带，主要由默兹河和斯凯尔特河盆地构成。这一地带土地较为肥美，河流纵横，既便于攻又利于守，大部分城镇又甚富足，因此，尼德兰南部便成了极佳的用兵之地。此外，它还处在拱卫进入巴黎和莱茵河的通道的战略要地。这一地带堡垒众多，因此，指挥官在这一地区的重要任务便是保护交通要道。卢森堡和摩泽尔要塞以外为上莱茵河，即第二个战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大部分战斗在这里进行，在古斯塔夫和蒂雷纳时代，情况也是如此。阿尔塞斯和洛林的丰腴的田地由左岸的设在斯特拉斯堡和兰道的堡垒防护，斯托尔霍芬防线则保卫通向上多瑙河和下莱茵河之孔道；黑森林地区为不毛之山区，部队进入法朗科尼亚平原之前必须通过崎岖的小道输送补给。意大利北部为第三个战场。它在路易十四进行的后两次战争中

均赫赫有名。波河河谷土地肥美，城市、河流众多，与尼德兰颇为相像。在这里所进行的战斗常常是为了控制河谷以北的、有曼图亚、维罗纳、佩斯奇拉和伦格那诺4座堡垒防卫的“四方地带。”其北部和西部为阿尔卑斯山所包围，自法国进入这一地带之通道必须通过狭窄而易受海上攻击的利古里亚海滨；同法国利害攸关的还有几条狭道：

“自热那亚和博尔米达河、斯图拉河河谷以及坦达自然村向北伸延的博切特狭道。布伦内罗和塞梅林同是联结意大利和南奥地利的狭道。”除山地外，夏季气候炎热，冬季气候温和。但西班牙战场却大不相同。将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分为二的干旱山地使1704年后在半岛西部进行军事行动受到严重的限制；大部分战斗均在东部、加泰罗尼亚（例如九年战争）以及巴伦西亚进行。就是在这些地方，由于大部分村野十分荒凉以及夏季酷热，也难以开展有效的军事行动。

北方大战的范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越过第聂伯河直达乌克兰平原。1701—1707年的战争中心地带是波兰，当时瑞典人沿涅曼河和维斯杜拉河同萨克森选帝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一地带，特别是普利皮亚特河一带，主要为沼泽地区，春夏两季便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这就导致了查理十二一反常规地进行了多次冬季战斗。查理十二入侵俄国除了必须克服一系列巨大河流形成的障碍外，尚须穿过广阔的森林和起伏的平原，后来在俄国的“焦土”政策逼迫下取道南方条件较好的乌克兰地区并在这一地区挨过了1709年初凛冽的严冬之后遭到全军覆灭。土耳其人发动的战争浪潮波及了巴尔干半岛6个以上地区。特别值得加以区别的是沿多瑙河的3个地区。多瑙河中部地区于1683年经历过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匈牙利平原则在20年后有过马扎尔人的叛乱。这一地区及多瑙河北岸均有肥沃的土地，但其南面的地区则甚为贫瘠。沿河而下，多瑙河和萨瓦河之汇合处形成了第二个战场，1691年的扎莱凯曼之战以及连续多次对贝尔格莱德这一主要城堡之争夺均发生于此。这一战场沿河下游是直抵铁门要塞的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干旱的山丘；东南则是穿越尼什附近空旷的原野、直达安德里安诺普尔的大道。许多战斗，其中包括1677年的曾塔之战，均发生于贝尔格莱德以北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地区^[26]，这一地区是多瑙河连接特兰西瓦尼亚以及连接瓦拉几亚主要隘道——沃尔肯和红塔的枢纽。

下面要述及的是野战的一般特点，其中包括各国部队显露特色的战术和行政管理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本身虽小，但常影响在其他方面基本相同的交战双方之间的战斗命运。各军之间，甚至各团之间的训练细则和次要的战术均有相当大的差别。

一般集结在城堡附近作战的军队均在前一年冬季仔细地储备弹药和补给。从事这类准备是瞒不过敌军的侦探的；一支军队的大体意图可由其侦察的地区以及对城堡补充的情况推断出来。因此，指挥人员为了攻敌不备必须用诈。1703年和1704年之交的冬季，盟军为了瞒过凡尔赛，使其相信盟军主攻方向是在莫泽尔河上游或阿尔萨斯，而不是多瑙河，于是在科布伦茨和菲利普斯堡竭力进行准备；1707年，维拉尔为了麻痹贝罗伊特边境侯，令其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于是当法军暗中在斯托尔霍芬集结时，他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舞会。选作集合地的地点由一名高级军官在各兵种的代表陪同下进行勘察；建立警戒线并对这一地点详细划分，集合地的安排通常反映出战斗序列。侧翼通常划归骑兵，每一骑兵中队正面距离为50步，中队之间保持相同的距离。步兵则安置在双排临时兵营中，每个营有100码宽的辖区，各营的间距相同。大炮一般安放在主阵地的前面或后面，由特种卫队保卫；军需车辆停在易于出入的地方，每四日散发一次给养。下级军官则在大部队到达前在规定的地区内安排好团的营地。部队到达指定的地点后，即在其所在地前方中央竖起军旗，作为集结点的标志。随后部队解散，埋锅造饭。为了防避风雨，士兵要寻找材料修筑简陋的掩蔽所，但自1700年以后，军用帐篷的供应不断增多。主要的警卫和巡逻部队均备有马匹，步兵和骑兵的主力警卫都配置在营地以外1英里左右的警戒哨所。他们由营地指挥官统辖。营地指挥官系依勤务名册逐日指派，在安全和军纪方面对司令官负责。如营地系永久性质，则在外围增筑栅围和土构工事。增筑工事的营地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1704年7月，马尔巴勒和巴登就无法攻破巴伐利亚选帝侯设在乌尔姆外围的堑壕工事；1709年，彼得大帝在其筑堡防线保卫的大营附近——波尔塔尔击败了瑞典人。[\[27\]](#)

这都是部队每次结束一日行军安营扎寨所要遵行的复杂程序。营地勘察小队最少要在大部队动身前半日乘马前去寻找有水源、侧翼可以防守的营地，他们同敌军狭路相逢之事屡见不鲜。1706年，威廉·卡多根发现维勒鲁瓦的部队早已在盟军想要选用的拉美伊附近的营地

上安营。次日的行军计划由值日将官和营地指挥官共同拟定后交由司令官核准。附近若发现敌军，部队则常依战斗序列行军，队形常依敌军的方位而定：如敌军在前，则分两翼行进；如敌军在一侧，则成横队前进。^[28]后备队、大炮和装载给养的车队通常位于中央，他们在车队指挥官及其特遣队或弩弓队的指挥下沿尽可能好的道路行进。其他部队以龙骑兵为先导取车行之小道或越野前进，龙骑兵携带木排和草把以便在溪流上搭桥和填铺沼泽，工兵则奋力修缮道路。各营以排为单位成几路纵队前进，必要时为了缩减队伍的宽度可将几个纵队坠后，但一有可能即前挪坠后的排恢复原有队形，组成战斗序列。

部队行军每天很少超过10英里。在向多瑙河进军时，马尔巴勒的部队用了5个多星期才行走了250英里，于朗谢姆与巴登会合。部队行军主要是受到了笨重的野战炮的限制；当时采用两匹马前后排成纵列拉车并由民间承包运输和驾驭车马，但由于欧洲道路泥泞，部队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改进。部队长途行军顺利与否取决于军中后勤管理工作的质量。大多数部队的后勤管理工作亟待改进，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法军和英军在1704年的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差别。法国元帅塔拉尔在增援巴伐利亚的第一次进军中，由于士兵开小差和在黑森林迷途，损失了兵力三分之一；在7月进行的第二次战斗之前，塔拉尔的骑兵的马匹因发生疫病而受到隔离检查。对比之下，盟军从尼德兰进军多瑙河路途更远，但效率却大得多；盟军事先做了准备，其中包括在海德尔堡给步兵每人发放一双新鞋，以及准备了第二套交通运输办法。这一套办法使马尔巴勒敢于挺军直驱优势敌军之侧翼，部队抵达多瑙河时状况良好，从而赢得了夺取施伦贝格高地的一场恶战；英国骑兵在经过了长途行军后状况极佳，尤金为此赢得了极大的赞誉。细致的管理以及对士兵和马匹无微不至的爱护是英军士气高昂的两个秘诀，英国士兵称呼马尔巴勒为“约翰伍长”，这一美誉表明马尔巴勒能令士兵吃苦耐劳，而这一点却是很少将领所能做到的。查理十二在其士兵中也同样深孚众望，但他的管理才能并不甚高；1708年10月，莱文哈普特在莱斯那贾损失了全部的运输车队，使整个入侵俄国的行动遭到了失败。但是，认为英军的装备总是很好的也是错误的。在西班牙，最初由彼得巴勒后由高尔韦指挥的英军由于管理不善，给养严重缺乏，大大地影响了战斗力，从而致使英军在阿尔曼萨遭到了失败。

大多数将领均在日出行军，日落安营。但马尔巴勒则是夜间行军，用以掩蔽部队的行动并使士卒免受暑热，这是马尔巴勒成功的另一秘诀。帕克上尉在述及向多瑙河进军的情况时写道：“我们一般在凌晨3时开始行军，日行军为4—4个半里格（每里格约合3英里——译者），9时到达宿营地。”^[29]在战术行动中，这种夜行军的策略也常加利用。巴登曾利用夜行军在尼什袭击土耳其阵地的后方，马尔巴勒采用类似的办法先后在布莱海姆和奥德纳德迫使敌军勉强应战。在马尔巴勒的后来一次行动中，当旺多姆听到盟军在斯凯尔特河展开的报告后，他的反应是：“他们能到达斯凯尔特河，除非有鬼神相助。行军如此迅速是不可能的！”^[30]为了便利战术部署，部队进入战斗时均排列成几个纵队。最多使用的是五路纵队；但马尔巴勒向布莱海姆进军时却使用九路纵队，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之役中令伦斯舍尔德和莱文哈普特分别率领六路骑兵纵队和四路步兵纵队前进。指挥官将其部队在正面尽量部署得很宽以包围敌之两翼；但要避免正面部署过宽，以免部队遭到分割和各个被歼的危险。拉美伊战役中，马尔巴勒充分利用内线对付维勒鲁瓦的伸延过长的阵地，他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利用反斜面^[31]掩蔽英军自右翼调至中央。善于识别地形是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属性，许多战斗的关键在于正确利用阵地上所能有的天然有利条件和气候条件。在1700年的纳尔瓦之役中，瑞典人利用暴风雪为掩护进攻了人数众多的俄国部队。

战术朝着一定的程式发展大大地限制了战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密的战斗序列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准备。除非遭遇突袭，双方均可拒绝交战，因为都有时间将部队撤至对方难以到达的阵地。双方一旦交战，指挥官的首要任务便是保持部队战斗序列的完整，因为陆战和海战一样，保持一条完整的战斗序列甚为重要。但由于极微小的地形变化均能使经过周密安排的营甚至整个部队产生混乱，因此，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当时最大的编制单位为旅，这使战斗中如何部署和掌管部队变得更为复杂。1718年，查理十二世将其一部分军队组成一切供应自理的独立军团，但这不过是一种独特的试验而已。18世纪末，各国军队都还没有师的组织。

战斗之前，部队组成两道或两道以上并行的战斗队形，彼此相距300—600码，这样能相互支援，背后也不至于不适当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将领按预先确定的次序和军阶的高低进入岗位，最高的岗

位在第一道战线的右翼；在战场上，军阶较低的将领则指挥第二道战线的左翼。旅长在其本部效命，但所有较高的指挥岗位均按职位之高低而定。在其他方面，关于战斗编队的原则，各国均有不同。17世纪的标准编队是步骑相间编队，这一做法一直由帝国军队所袭用，帝国军队将长方形的战斗编队排列在防御骑兵的防栅之后，这对付号令不甚严明的土耳其的密集进攻甚为有效。法国则将骑兵置于两翼，在整个战斗中都使用骑兵。对比之下，马尔巴勒和查理十二则开始就让步兵在少量的骑兵支援下去冲锋陷阵，而将大部分骑兵留作预备队，在紧要关头或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他们投入战斗。土耳其人同样也保存骑兵以便对敌实行致命的打击。18世纪的专家认为，精密筹划的战斗编队是当时制胜的一个重要秘诀。例如，蒂尔潘·德克里塞写道：“夺取胜利不是靠兵员众多，而是靠如何把部队组织起来，靠部队的队形和纪律。”^[32]

部队一经编队，即依战斗序列奔赴前线，但要不时停下来整顿队形。行动过于仓促则易招致毁灭性的失败。因此，兵家总是“宁愿缓慢但有把握”。当时普遍认为，先开火的一方由于来不及重新装填弹药常被击败。因此，后来步兵便受到持枪不发直到切实可靠的最后时刻方才开火的训练。在布莱海姆之役中，英国将军命其所部之旅进逼至距敌栅围仅一军刀之远处才射出第一轮子弹，严格保持这种战斗序列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我们在谈到武器变革时论述了英国、法国和瑞典步兵在战斗中的战术部署。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在这方面也大体相同，但各有特点。帝国的部队缺乏划一的训练，但主要采用常规战术，“射击”仍以营为基础进行。但哈布斯堡王朝的步兵走在时代前列的唯一的方面乃是用克罗地亚人为轻装步兵，置于最前面，作为主要战斗编队的屏障。蒂雷纳曾试验使用各自为战的散兵，但这一做法暂时弃之未用，因为散兵妨碍以营为单位的排射射界。帝国步兵的铁板般的纪律同其对手土耳其军的作战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奥斯曼的指挥官凭借密集的冲击来夺取步兵战斗的胜利。他们通常使用大批的非正规军，从而无法采用精密的战术。在这一时期，只要帝国的部队保持战斗序列，不为敌军所诱，不急于掳掠敌军高级军官富丽的营寨而过早追击，土耳其军在野战中就很难取胜。

虽然欧洲的步兵是一个能克敌制胜的军种，其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大，但欧洲的骑兵仍保持住了其古老的声誉以及它在部队中的规模，

骑兵通常构成整个部队兵力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马尔普莱奎特之战中，投入战斗的骑兵共6万人，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骑兵战。团仍是标准的行政单位，但进行战斗时骑兵则分为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中队，每一中队下辖3连，每连由50名骑兵组成。骑兵主要分为两类。带甲骑兵配有军刀和手枪，身着胸甲和背甲，有时头戴钢盔——这些都是实用盔甲的最后残迹。龙骑兵则依情况需要可以进行步战或马战并额外配有一支马枪。奥地利的部队还有第三类骑兵，即轻骑兵。起源于马扎尔人的轻骑兵曾使用过几百年，但正规的骑兵团首创于1688年。这种轻骑兵不编在战阵的列队之中，而是与土耳其人使用领地的骑兵相仿，用于突袭、搜集粮秣和进行侦察。^[33]轻骑兵并没有受到普遍的称道。德拉科洛尼上校说：“正确地讲，轻骑兵不过是骑马进行非正规战的一帮匪徒而已。”^[34]瑞典人采用了一种波兰人的轻骑兵，俄国人则大量地使用哥萨克骑兵。

各国部队使用骑兵时在战术上颇不相同。虽然蒂雷纳和孔蒂都信赖以骑兵实行猛烈冲锋的威力，但法国人在使用骑兵上仍有些夸大，将其当作特殊火力的工具。法国骑兵所接受的训练，即按连为序以手枪或骑枪进行立定射击，使法国骑兵易被英国骑兵中队的连续冲锋所击破。马尔巴勒坚持利用骑兵作为突击力量，冷兵器为骑兵的规定武器，战时只发给骑兵3发子弹，用做搜集粮秣时防身之用。与此相同，查理十二也只许骑兵用马刀进攻。瑞典在战术上进行了创新，即采用楔形或镞形队形，每队3列，前后相随。土耳其人常置领地征来的骑兵于步兵之前，用以进行配合松散的进攻。克里米亚鞑靼族善于骑马，能在奔马上准确射击，但敌不过训练有素的奥地利骑兵。奥地利的骑兵在巴登和尤金的统率下形成了帝国部队的一个精锐的兵种。

大炮的口径甚多，但就其类型和射程而言，各国军队之间的差别并不大。部队通常使用的野战炮和团编制使用火炮包括3磅炮、6磅炮、8磅炮，以及发射16磅炮弹和24磅炮弹的较大的大炮。根据火炮类型的不同，火炮的有效射程在450—600码间，部队每1000人配备一至两门火炮。攻城时则使用发射36—60磅炮弹的重炮并辅之以臼炮和攻进爆破装置，奥斯曼帝国拥有一种发射120磅石质炮弹的大炮，但此种大炮十分罕见。火炮辎重队虽因战斗不同其大小有所不同，但其组织庞大而又复杂，其中包括机械官、工兵、供应勤务和炮手。重炮编在独立的攻城辎重队之中，这种重炮不跟随部队行动，而是根据战斗进

程独立地由一处堡垒移至另一处堡垒，防守大炮的任务则交由战斗部队专门派遣的步兵连队负责。大炮由于庞大笨重，对战争之进行影响甚大。虽然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用双轮尾架使大炮移动略见便利，但部队终因大炮行动不便，行军甚为缓慢，无法实行迅速或果敢的行动。

总而言之，炮兵这一兵种进展甚微。有些国家的军队忽视职业炮手，视职业炮手为下等社会阶级，炮兵黯然失色的最重要原因乃是负责供应火炮和操作火炮的组织通常不是正规部队领导的组成部分。英国军械局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单位；奥地利受过训练的炮兵将自己视为同业公会会员而不视为士兵。卢瓦对法国的炮兵组织作了一些改进，于1679年将大炮的口径种类减为6种，但是尽管杜梅茨作了极大的努力，真正的炮兵部队尚不存在。各个敌对的炮兵部队的区别不是装备的种类和性能有所不同，而是对炮兵的正确使用。在王位继承战中，英国的炮兵后勤工作在欧洲最好，其中部分原因是马尔巴勒集战地长官和军械首长两职于一身，十分注意火炮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战斗中，例如在布莱海姆和马尔普莱奎特战役中，马尔巴勒常亲自确定大炮之位置，坚持使用经过处理的火药，采用一种启动良好的车辆使补给和弹药运输更为便捷。最重要的是马尔巴勒培养了炮手和机械官对其职业的爱好并保证他们能公平合理地获得晋升和荣誉。英国为每一步兵营配给两门轻炮，用来进行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一做法首创于瑞典，战术意义甚为重要。荷兰人和奥地利人立即效法，尤金给帝国骑兵配备了轻野炮。土耳其人曾试行在骆驼上发射小型火炮，但就人畜而言效果均不理想。法国人在战场上使用火炮效果较差，他们将火炮编组，大体每组为4门、8门或10门。但法国隐蔽巧妙的炮兵在马尔普莱奎特之役中却给了荷兰近卫军重大的杀伤。总的来看，炮兵造成的局限性大于其优越性。炮兵由于机动性很小，常妨碍巧妙用兵。

由于实际上没有参谋机构，因此，在作战中要有效地指挥各个兵种就更感困难。宁姆根之役后，卢瓦曾试图建立一套初步的参谋体系，但没有发展起来。大多数指挥官以其亲属或善于逢迎之徒充斥于参谋部门。马尔巴勒依靠少数心腹的帮助制订和实施其宏大的作战计划。他的心腹包括秘书卡登纳尔、军需官卡多根、财务署代理官亨利·达文南特。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予了这位公爵技术性的协助。马尔巴勒在精心培养副官方面也十分出众。副官的任务是对当地的战局作出估计并向上报告，以及在战斗的硝烟中传递信息。查理十二依靠

像斯图尔特、伦斯舍尔德和足智多谋的于伦克鲁克这样有才能的人全盘筹办供给、绘制地图和路线。总司令以下没有设立军或师这一级的指挥机构，只有少量的下级将领分管战地各个防区，因此总司令担负了作出所有决定的责任。命令是通过口信下达给校级军官的，由于浓烈的硝烟顷刻便能淹没战斗的景象，因此总司令要恰当地观察整个战斗的进展情况是极其困难的。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指挥官就要有克服当时各种局限的能力，特别是协调部队的作用，充分发挥经过改良了的火力优势。

伟大的军事家所作的努力引起了当时撰写随笔和日记的作家的相当大的注意。除了像笛福或荷兰军官高斯林加等少数人持公开的批评态度外，大多数编年记事的撰写人本人便是军人，都懂得他们的领导所遇到的问题。默罗特-韦斯特卢伯爵给我们留下了在法军中服役的饶有兴味的记述，这一记述可说是对陆军上尉帕克所撰写的跟随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征战回忆录的一个补充。^[35]苏格兰步兵团的布莱卡德上校在日记中流露出他作为长老会教徒的良心与荣誉之间的冲突。他的长老会教徒的良心谴责他的许多同事说话随便，行为放浪，然而他们对他们所取得的战功却又引以为荣。^[36]上尉德雷克、列兵迪恩，下士毕晓普和军士米尔纳主要是马尔巴勒的基层官兵的代言人。^[37]马西格里伯爵全面概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老兵”德拉科洛尼对巴伐利亚和帝国部队的生活有过生动的记载。詹姆士·杰弗里斯上尉在紧要时期详细报道了查理十二的作战行动。^[38]理查德·凯恩撰写了《英王威廉及女王安妮时期之征战》一书（1745年），这一书奠定了深入研究军事艺术的基础。沃邦关于军事工程的著作和普赛居的《战争艺术》迄今仍为军事著作中的经典。这些著述表明，17世纪最后数十年和18世纪初期，在军事艺术上是一个过渡时期，除少数军事天才使得这一时期稍见活跃外，一般而言这一时期较为平庸。但这一时期却明显地预示了在装备上及战术上将要取得的重大进展并且证明军人职业是较高尚和令人尊敬的职业。

2. 军人与平民

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战争和政治的季节节奏很少被打乱。部队每年都要等待冰雪消融，大地长出了新草料之后，才开始行动。绝大多数战斗和围城战均在夏秋两季进行。在7月酷热的西班牙，战斗曾暂时停止过，瑞典指挥官曾调动部队神速地越过波兰冬季白皑皑的平原，但在大多数地区战斗仍按通常的时间表刻板地进行。每到11月下旬，部队都回营过冬。此时政治季节便开始了，为下一次作战行动进行外交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在英国，下一年的陆海军的详细预算于11月或12月提交给下议院审核，这是从1690年开始的新的做法。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内，12个地方议会于当年12月至次年3月间例行对战争赋税讨价还价。同时，在难易不同的情况下，解决主要交战国向小国雇佣兵员数额的问题。许多法国军官则返回巴黎，军需大臣夏姆莱侯爵在巴黎着手制订波旁王朝次年征战的年度计划。

冬季也是主要的招兵买马的季节。遍布各地的部队，甚至各团的每一骑兵连和步兵连均有一两名军官回家招收兵员；他们定于春季准时带领新兵返回部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到了春季，苏格兰的新兵则已加入了荷兰雇佣的苏格兰旅，勃兰登堡的新兵则已到达了腓特烈一世驻佛兰德或意大利的部队，更多的英格兰新兵可望抵达西班牙。送往驻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附属国和波兰的部队的新兵是从瑞典北部沿着精心安排的路线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卡尔斯克罗纳，然后渡海，以及从芬兰输送的。1683—1699年中，有几个冬季奥斯曼帝国的主力部队并没有按这一步骤增添新兵，而是从小亚细亚和埃及调来新军加强其力量。1700年以后，这种每年一度将新兵输送至远方战场上的做法在西欧和北欧均有改进，办法是从国内的部队中大量征调兵员补充在国外服役的部队；但国内的部队由此而产生的缺额大多数仍在冬季加以填补。

毫无疑问，这种季节性征兵的时机是由作战条件所决定的。部队无法行动而不能进行战斗时，就必须抓住这种时机补充人员、马匹和装备。但是这一季节也是由民间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所决定的。贫苦阶层的生活一向十分艰难，由于在冬季农业和其他许多行业减少雇

工，其艰难程度便愈益加深。繁忙的收获季节之后接着便是一年中最坏的季节，到处一片闲散和贫苦。欧洲南部的将领们认为，精明的做法莫过于在来年春天葡萄园雇工之前进行招兵。1709年1月，马尔巴勒在谈到急于回英国的军官时说：“……在这样生活困难的冬季，他们很可能在一天内招来的兵比过此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招来的兵还要多。”^[39]由于平民生活贫困，因此，大多数军队仍然依靠招募志愿兵来充实队伍。由于有重赋收入，招兵的军官便能出钱出衣招募到所需要的兵员。如果还要多招，政府一般提高给予应募人员的赏格。政府对于那些越来越多地利用违法手段强行招兵补充部队的连级军官和军士也很宽大。如果兵员名额仍然不足，政府则依法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征兵制。对贫苦的平民而言，强制性征兵有时也比穷困还要强一些。贫困的男子汉必然会考虑选择当兵这一惯常的出路。除了有现钱，有吃喝穿着的指望外，还有碰上奇遇和得到战利品的直接诱惑。因一时的冲动而入伍当兵往往决定其一生的前途。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只要统治者不解散部队，一旦入伍便终生当兵。当兵虽然艰苦，但也有解脱之法，那就是开小差。

上述的生活窘迫和当兵的诱惑对出生于法国农民或德国富裕农民以及英国境况较好的自耕农的青年说来并无什么影响，他们家里有合法的地产并有足够的牲畜。手工出众的工匠师傅的子弟也是如此，他们在严密的地方行会组织中有一席继承之地。但大多数农民和工匠都生活在经济阶梯的底层，他们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镇充当临时工，然后，特别当收入低微，物价、房租和赋税提高时，又从大城镇流出来。17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在各地均常常发生。在法国，许多地区因地方经济全面萎缩而受到影响，人口下降。莱茵河地区虽然开始恢复在30年战争中所损失的人口，但却没有出现支持这一人口增长所必需的全面经济上升。此外，在这一漫长的萧条时期中，17世纪90年代遭受了特别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天的损害。在以农业为主而耕作方法又未改进的社会中，连续两次歉收即可造成巨大的灾难。先进的农业地区，例如斯凯尔特河以南的佩德韦则是例外。1692年和1693年，法国连续两年歉收。苏格兰于1695—1701年遭到了7年饥荒。芬兰在1696—1697年的灾荒中损失人口三分之一，瑞典政府由于面临类似的情况感到甚为惊恐，于是在1695—1699年，将其从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出口至西欧的粮食削减到最低限度。英国大大地提高了济贫税，根据格雷戈里·金估计，在英国，处于基本生活线以下的家庭为数甚多。威廉·

佩恩1693年发表的“穷人要么当兵，要么做贼，要么挨饿”^[40]的讲话，事实上公正地反映了当时各地平民普遍贫困的状况。同一时期华托的版画《新兵》也反映了这一情况，这幅画表现了几个衣衫褴褛的壮丁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一片荒野，似乎从绝望的过去走向捉摸不定的未来。

这种境况显然不仅仅限于交战国的边区。大规模的战争毫无例外地要依靠所有人的力量。中立地区的贫民同样穷困，有着到外国军队中服役传统的中立地区的贫民，同样认识到当兵是一条出路。荷兰议会的军队中有从德国雇来的团；在荷兰团中也有许多德国北方人。法国军队中既有瑞士州政府招募的瑞士团，还有不通过州政府而招募的瑞士队伍。

瑞士的州提供了研究山区经济怎样会影响欧洲大国军队的成分的典型案例。类似瑞士各邦的状况在萨伏依—皮埃蒙特、比利牛斯山区和苏格兰也出现过。瑞士的山区矿产稀少，养牛方法和林业经济以及耕作方法均甚陈旧，不足以养活其人口。例如，在伯尔尼政府治理下的某些谷地中虽有较多的农民仍然发达兴旺，但自本世纪中期农业上升后，缺地缺牛，甚至无地无牛的农民人口不断增加。他们企图占用森林和公用草场，但遭到反对；他们离乡背井在外漂泊，到头来只是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济贫法（1676年、1678年、1690年）的折磨，这种济贫法使各地村庄更不愿接纳外乡人。乡下人发现到瑞士的城镇中找出路也很难，那里对劳动力需求不大，既得利益团体又不吸收外来人。这样便造成了大批乞丐到处游荡，这些人同当时爱尔兰的“强要饭”极为相似。瑞士要摆脱困境只有3条路。第一条路是向外移民。1650年以后，许多家庭迁往德国南部和阿尔萨斯，少数自瑞士的格里松斯迁往威尼斯；瑞士人移民北美始于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第二条路是在国内发展工业。到了17世纪末期，瑞士北部的纺织业逐渐扩大起来了，此时有着这样的说法：由于工匠十分缺乏，苏黎世政府不愿招兵到国外服役。但是工业发达的苏黎世遇到过严重的饥谨和失业危机。一位荷兰使者生动地记述了1692年冬季百物腾贵、饿殍载道的境况，并记述了就募兵问题同英国协商失败所引起的失望，以及尔后不久他本人便顺利地招募到了一营新兵的情况。^[41]摆在瑞士人面前的第三条路，也是显而易行的路，便是当兵。瑞士许多邦同法国和西班牙有着长期的联系，在1689—1714年的战争时期又为荷兰服务，这对

信奉新教的瑞士诸邦在良心上是一个安慰。交战国的需要保证了诱人的价钱。外国的钱钞通过各邦统治者之手流到急于求职和牟利的军官手中，这些军官则去招募新兵。每年招兵遇到困难的情况甚是少见。

[\[42\]](#)在这一战争期间，主要在法国和荷兰军队中服役的瑞士部队以及受雇于西班牙、威尼斯和皮埃蒙特的少量瑞士部队的人数，多年来均超过3万人。1698年，法国和荷兰开始将其部队的兵员和薪饷裁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时，瑞士各邦产生了深刻不安的情绪。

贫困和失业以及根深蒂固的当兵的传统并促进募兵的效果，使之能维持当时所需要的日益庞大的部队。从1688—1689年战争危机时期，到1713—1714年媾和时期，各国政府所实行的强制征兵制度在西欧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一征兵制是建立于在理论上不同而在实际上常混合在一起的两种概念之上的。其中一个概念要求强制征集生活败坏和游手好闲之徒入伍。例如，自1704年以后，英国立法允许将无合法职业或无明显谋生之道的丁壮强行征集入伍。另一概念主张采取征兵制用以保卫本乡本土。当时地方民兵虽远不及职业军队重要，但在欧洲各地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民兵定期集合和训练可能并不受到重视，但与自择当兵为职业者相较，当民兵在理论上乃是加诸某些阶层国民或公民的一项义务。在某些地方，民兵保护法律和财产，使之不因当地的动乱而受到损害，但一旦遇有来自外部入侵的危险，政府则将民兵当作常规军的补充队伍。民兵和常规军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年代中成了最大的行政问题之一。

皮埃蒙特在这一时期多次成为战场，它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皮埃蒙特的统治者强迫臣民实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农民民兵”被合并到公爵的部队之中，这些部队原是从国内和从瑞士招募而来的。由于敌人已打到了国境的大门。从1690年起，皮埃蒙特便实行了彻底的征兵制，定期命令各地城镇提供规定的兵员份额。皮埃蒙特各地区的官员和显贵为了私人利益不受损害，利用抓阄和强迫捉人等一切手段征募。受害者常于征兵前或被征后不久而逃亡，一个地区可以因此种逃亡而人口锐减，也可以由另一地区来到的逃亡者而人口剧增。[\[43\]](#)但是，维克多·阿马德二世的行政管理甚是有效，在后来的25年中，其办法逐渐趋于精密和公平。[\[44\]](#)

然而这些办法与法国的办法相比，其重要性便大为逊色。1688年以后，能使路易十四的陆军出类拔萃的重大改革是实行了征兵制。法

国政府对原有的民兵保留未动，而是征募了新的民兵团，并从1693年以后也像加泰罗尼亚、皮埃蒙特和佛兰德那样使用其中一些民兵团。夏姆莱于1688年就曾建议采取进一步的办法使民兵与正规军相结合，他之所以赞成征兵制，其目的也在于此。但他的这一建议直到1701年才获得实行，原因是维勒鲁瓦的部队当时在意大利北部遭到毁灭性失败，从而使其论点更加具有说服力——遭受失败后，法国立即命令征召来的民兵越过阿尔卑斯山加入野战部队。由此而增加的兵员解决了远离法国的战区对于兵员的需要，这与旧式的招募制度相比较，能更好地从法国的遥远的战地输送源源不断的兵员。从此以后直到1712年为止，法王每年均颁布动员令。征召的人数每年不一，1701年为3.3万人，1708年为9800人。各地区的人数分配也不平均。1688年的法令要求依多数票推举一名未婚的民兵；1691年12月则采用抽签的办法；1703年后，已婚的男丁也要应征。[\[45\]](#)

与此同时，旧式的募兵制度仍继续使用，但是军官及其代理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欺压平民，结果在平民中造成不安。早在1690年，主计官便说，农民畏其强暴，不敢集市贸易，消费品的税收从而减少。由于平民对这两种征募制度进行抵制，非法贸易因而增加；各类逃兵壮大了贩卖私盐的帮伙。沃邦主张薪饷应优厚，服役期应缩短，以便使军人职业具有诱惑力。他对上述混乱现象甚为震惊，对征兵表示憎恶。其他的职业军官也是如此，但他们特别感到不满的是那种收买志愿兵去替代应征士兵的普遍做法，因为这种志愿兵通常就是向招募兵员的军官主动应募的那些人。最初是较大城市中的一些个人，其后便是整个教区的居民，都要为不幸而被征召的兵员付出费用，这样便逐渐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要为收买顶替的志愿兵付出费用。这两种相互重叠的征募办法的矛盾表明，征兵制虽然有助于法国扩大其部队，但并没有改变部队的社会基础。法定免服兵役者的名单甚长，这一长串的名单说明了同样的结论，各类官职均能豁免兵役，买到一项官职便能免服兵役，免服兵役几乎同免向部队提供住宿以及免交租税一样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特权，但是随着小官员的数量大增，较贫穷的没有特权的户主所受到的压力也就加大。更易受害者莫过于各色各样的乞丐和流浪汉，他们常和轻罪犯一道被地方官吏送去当兵。

在帝国的一些邦中，情况也极为相似。汉诺威的奥古斯都于1689年首次实行征兵，合格的农村青年和流浪汉都在征召之列。勃兰登堡

—普鲁士的腓特烈批准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后来又由1693年11月24日颁布的条例加以扩大。勃兰登堡—普鲁士政府获悉部队的需要后，规定各省应征召的数额；各省将所征召的兵员送交邻近的驻地，最后从邻近的驻地转送前线作战部队。后来，将征兵名额摊派到各地的村庄和城镇中的各种行业或行会便成了惯例。农村如拖欠兵员，除须交纳一般税负外，还要交纳沉重的罚金；柏林等地的工匠则宁愿纳税雇人顶替以免除服役的义务。各省负责征兵的官员使用强迫办法征集到一定数量的兵员还不普遍，在其后20年中这种办法便花样一再翻新。在霍恩佐伦领地也同在法国一样，征兵制同旧式的募兵制相互重叠，相互干扰。政府时而采用征兵制，时而采用募兵制，有时两种制度同时采用。

欧洲这一地区的情况揭示出了军官厌恶征兵制的又一原因。他们觉得塞给他们的都是不合格的新兵，因为老百姓要留下能干的劳力种地和做买卖，要清除罪犯、流浪汉以及不能受雇做工之辈。说来奇怪，征兵制可以被当作一块抵挡征兵压力的盾牌，这是因为负责征兵的人较之募兵军官更能认识到“有户籍”的自由民和农民要求不受干扰，地主则渴望保留佃户，对他们这种要求和希望要作让步。平民利益集团还可采用其他形式对征兵进行抵制。萨克森选帝侯于1702—1711年颁发过多次征兵令，但都受到错综复杂的免役职业细则的阻碍；特别是他的采矿工人也包括在保留的职业的名单之中。在信奉教会的公国中，主教常被迫承认教士团体关于不在其所有的土地上征召新兵的要求。在勃兰登堡，1703年曾颁布命令征召18—40岁的未婚丁壮参加民兵。此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将本土防御交给民兵承担，从而增加派往国外的兵员的数量^[46]，然而丁壮一旦被征加入民兵便被认定免除各类兵役。腓特烈一世想用退役军官率领民兵部队，但不久这种职务便被文官和市镇长官所取代。皇储腓特烈·威廉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激励，后半生一直热衷于军事。一支精锐的军队需要精壮高大的兵员，对这一需要的种种限制他都厌恶。因此，在1713年后，他排除了各种限制。他的军队从国外回来后，一些地区便开始了一个短时期的准军事统治，在这些地区中由于募兵军官竞相使用暴力征募兵员，在老百姓中造成了一片恐慌。^[47]

在德国，即使在最小的侯国中都存在着密如蜂窝的特权结构，较小的统治者得要征募军队租借给诸如萨克森、汉诺威和丹麦这样较大

的邦国和帝国的皇帝；或允许大国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征募兵员。在自由市中，自由民政府廉价地把从市内临时移民中招募兵员的权力卖给军事大国。在科隆发现的文件透露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协定，根据这种协定，来自丹麦和威尼斯的募兵军官都被允准挑选志愿兵员。[\[48\]](#)

在英格兰，对征兵的抵制更为有效。1688—1689年的危机并没有毁掉詹姆士二世所建立的常规军。威廉三世利用在荷兰部队中服役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团、英格兰贵族在革命时期招募的部队、在埃尼斯凯伦和伦敦德里招募的用来对抗泰尔康内尔的团和在苏格兰的其他部队来加强常规军。他还保持了一部分1688年跟随他的荷兰部队，这些部队由英格兰出钱雇用，英格兰政府还在佛兰德雇用了德国和丹麦部队。1689年，在英格兰又再次征募了一些团。在国内征募的兵员数字较大，但不过分。威廉统治期间，经济状况动荡不定。在这一时期老式的“击鼓”募兵的办法行之甚为有效。事实上，在九年战争时期，军队在人员上的重大变化则是完全排除天主教徒，吸收一些极端的新教分子如较温和的改革长老会会友，以及吸收一些北爱尔兰军官和增加法国新教徒军官。在王位继承战中，1700—1708年是一个繁荣时期，笛福觉察到当时是“缺人而不缺就业人员”[\[49\]](#)。只是在这一时期，国会才批准市长、法官和警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每年征召游民之辈当兵。这种人以及在押的欠债人和为了征兵而释放出狱的重罪犯均有助于填补一些空缺。但是，当谷物价格下跌，农民叫苦时，穷人的日子便好多了，也就不易为“每周3先令6便士所引诱而去卖命了”[\[50\]](#)。当稳定的一般工作容易找到时，3先令6便士便比不上普通的工资。笛福无疑是低估了当时广为议论的根深蒂固的“穷人”问题，投入军队中的新兵仍然源源不断。后来，由于真正缺少兵力，这便迫使马尔巴勒及其政府考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马尔巴勒出任统帅期间，正常的消耗和部队的扩充要求在英国每年征募步兵1.2万人。[\[51\]](#)与威廉三世时代的征战相较，英国在西班牙半岛所做的巨大的军事努力和遭受到的损失使问题更加恶化。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人提出采用法国的办法，即将新征集来的民兵并入常规军。英国的民兵是属于特权利益的，征调至海外服役不适于民兵。由各郡和各教区摊派征兵名额的这种变通办法也于1708年初停止实行，因为这种办法涉及议会利益集团决不愿放走的佃农和雇工，同时，在战争不甚频繁的

时期，这种做法也就失去了其意义。代之而行的办法则是英王宣布将付给立即前来应募的志愿兵的津贴由2镑增至4镑。这一规定被写进了1709年颁布的征兵法之中，并且增添了一条重要的新办法，即付给教区一项津贴用做应募士兵的安家费用。负责执行新征兵法的土地税收长官在寻找新兵方面颇为顺利。1709年，食物价格上涨，1710年的食物价格依然很高，1711年的食物价格仍高于1704—1707年的水平，此种情况对土地税收长官执行新征兵法十分有利。

在英格兰以及在西欧其他地方，征募骑兵和龙骑兵的工作困难却小得多。骑兵的薪饷较高；征兵法不适用于骑兵；志愿参加骑兵的人员甚多。他们或他们的家庭都有一些现金和存款，他们像汉诺威和奥登堡某些地方的农家子弟一样都骑坐本地饲养的马匹。出生于殷实的地主家庭的子弟想出来见世面，热衷在行伍中显赫扬名。这种家庭极易对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亲友和较为富裕的佃农产生影响。1688年，英格兰士绅在招募军队时便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当时环境特殊，很多志愿从军的人员只是在爱尔兰和佛兰德服役。1701年后，在米德兰地区招募龙骑兵便成了简而易行之事，因为在1697年以后的和平年代中，这一地区曾驻扎过龙骑兵部队。英格兰募兵军官最倒霉的事也不过是在一个好地区被人捷足先登把最好的骑兵先挑走了而已。

与此相较，招募足够数量的步兵却是各国遇到的十分重要的行政问题之一。由于平民谋生十分艰难，募兵工作因而较为顺利。但在1688年后的数年当中和在1701年以后，由于需要更多的兵员，募兵任务甚是紧张。募兵工作可能在两次战争的末期又变得较为容易，因为战争的重负加深了贫困，造成了兵源大于税负财源之势。1714年后的30年中，经济较为活跃，这便给想招募大批军队的政治家提出了新问题。

北欧长期以来便实行强制性的征兵制度，其部分原因显然是普遍缺乏人力和财力。到1700年为止，瑞典（包括芬兰）和丹麦（包括挪威）本国的部队赖以建立的基础仍是分配给部队的特定土地和维持部队生活的土地收入，以及若干农民土地所有者共同提供一名步兵及其装备所承担的义务。战争的重负和军事上的失败引起了哥本哈根的1660年宪制改革和斯德哥尔摩的1680年宪制改革。这两次改革均赋予君主以更大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从而能加强其军事体制。[\[52\]](#)

1675—1679年战争时期，瑞典征集步兵引起了大部分农民的不满，因为贵族的仆人和佃户常被免除兵役。1680年后，查理十一世不允许他们免除兵役。他赞成瑞典某些地方过去的办法，即一个地区的居民自行组建一个团，这一做法同他想在和平时保留一支常备部队的要求正相吻合，“旧”瑞典的各省也仿效这一办法。^[53]通过斯德哥尔摩与地方政府达成的一系列详细协议，国王在全国普遍征兵的权力有了实质上的修改，即每一地区向国王保证维护一个整团的部队（通常为1200人）。过去由农民负责提供一名步兵的做法作了修改，用以维持官兵费用的配给土地进行了详细登记。这与过去的做法并无截然的不同，政府没有放弃在紧要时期实行大规模征兵的权力；但普通的农民却感到协议的条款固定了他们的义务，并希望他们的义务会因此而有一定的限度。关于征集骑兵的类似制度也制定出来了。征募骑兵并不困难，然而装备和维持一支常备骑兵部队却严重地损耗了本已贫困的农村；一些原来拨出维持骑兵的土地已不再用于这项用途了。同时，由于王家土地和此种土地的税收大量转移，政府的军用来源便相应减少。查理十一世扭转了这种趋势。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行，查理十一将一些土地和土地收入分给骑兵和步兵（即“印德耳宁斯维尔克”制）。分给军官们的数量依其军阶等级而定，用于维持骑兵的土地以及耕种这种土地的农民则不必为本省的步兵效劳。从此以后直到1697年查理十一统治末年，那种过去为特权家族增添收入的资源和人力便被转用于维持瑞典部队了；但较小的贵族，特别是曾在1680年支持过国王的第三等贵族和因“改革”结果土地被王室收回而变得贫困的上层贵族可以通过从军获得经过改进了的赠予制度所提供的生计。贵族为国王服务的义务仍未改变，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却愿像法国的雷耶尔苏德瓦团的军官或在荷兰部队中瑞典团的军官那样到国外服役。

在丹麦，征募贫苦人民服役早已为人所熟知。1676—1679年的战争时期，各省征募了步兵团，但这种团包括用通常的办法和赏金招来的新兵，其中许多是外国人。在以后的20年中，这些团除在名义上外已和克里斯蒂安五世的其他常备军毫无差别了。直到克里斯蒂安五世于1699年8月逝世之时，地方政府虽受到鼓励招收乞丐和表现不好的劳工，但“丹麦”的11个团（包括近卫军和海军）以及3支混杂的部队，绝大多数均为志愿兵组成。在1.6万人的编制中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和荷尔施泰因人。政府还在帝国范围之内招募人数不固定的兵员，

但此种兵员常租借给外国君主。丹麦在招募和维持步兵方面跟随法国和德国的做法比瑞典还要跟随得紧。另一方面，丹麦发展了自己的“骑兵土地”制度，这种制度以农民供养驻在这种土地上的兵员代替了农民出捐税和劳役的办法。由于政府要扩大分给骑兵的土地，丹麦也同瑞典一样制止了1680—1720年间王室土地早期转移的现象，但不如瑞典果断。王室土地转移现象到1717年达到高峰，其后便逐渐消退下来：交付给军队的实物税和其他劳役后来改用现金付给。丹麦国王从不像查理十一和查理十二那样严重地依赖把平民的实物税和劳役直接交付给军队的做法。

北欧的君主控制了许多其他部队。挪威农民——他们与丹麦农民不同，一般均有地产——仍定期以抓阄的方式被征去组成6个省的步兵团；骑兵则分给土地。瑞典在芬兰也保持了军队，在芬兰，“改革”政策为建立一套新的军政官员提供了土地基础。此种新的军政官员乃是其家庭统治了芬兰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公职”贵族。其他部队在“北方战争”前夕驻在波罗的海对岸。^[54]在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军事制度要求对地产进行严格的估价：当地的地主无可奈何地代替政府收取现金和谷物形式的重税，这种税负的一部分用于军队。此外，波罗的海的贵族家庭长期以来便在瑞典军队中起重要作用，其重要程度犹如投入丹麦军队中的梅克伦堡人和其他德意志北方人。“改革”政策首先在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实行，使不在当地的瑞典权贵受到损失。实行这一政策是以激发当地土著地主的希望而开始的。当这些土著地主也被迫交出大量的土地时，查理十一便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直到帕特库尔成为土著地主在里加的代言人之前（帕特库尔从此成为反对瑞典统治的旗帜。——译者），查理十一此举是否会影响土著地主对瑞典国王的忠诚仍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土著地主仍坚持支持查理十二，1700年以后，查理十二的波罗的海军官中有四分之一死于战阵之中。在里加和雷伐尔相继于1710年失陷后，一个新的时期便开始了。彼得承认了该地区各阶层的特权，机敏地放松了收回土地的“改革”政策：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失去了旧有的获得体面职业的势力范围，而在长期战争蹂躏后他们又迫切地需要这一势力范围，因此他们便转而为俄国服务。虽然沙皇君主权力向西扩张必然会促成这类转变，但这一转变在当时却是十分重要的。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在沙皇新疆界以外的库尔兰的贵族都倾向于加入普鲁士军队，而不加入俄国军队。

但是，波罗的海诸国的不满却是瑞典防务中的一个小裂缝。在长期紧急状态下，瑞典的整个军事组织虽未遭到彻底破坏，但已有了改变。在局势紧张的第一年，查理十二一方面为在海外作战进行准备，另一方面在国内又需要一支后备军。此时征募兵员已经超越了“合约”的范围：过去每3组要为部队提供1名士兵，现在却要多提供1名士兵。在芬兰，这种义务增加了一倍。查理一卷入波兰之后，这些新兵便要调走。因此，在1701年，为了增建新的团，查理要求每4组或5组提供第四名新兵，其后又要求提供第五名新兵。同时，老的团中每连所损失的兵员须依原有的协议加以补充。军官们渡过波罗的海监督接收新兵事宜，这样就使各团同其在国内本省的实际基地和军需官保持联系。瑞典负担十分沉重，1708年，由于收成颇好，价格有所上升，这种负担有了缓和。波尔塔瓦之战后，情况恶化。除了查理十一的制度外又加上了彻底征兵制；在波罗的海整个地区1707—1712年再次发生了瘟疫，死亡率甚高。正当此时，由于抽去了人力，经济受到了损害。在早期，瑞典在它管辖的国外土地上实行重征重赋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费用。1706—1707年间从萨克森所榨取的财物和征召的兵员与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期在巴伐利亚或意大利的某些公国中的横征暴敛不相上下。另一方面，由于查理十二世拒绝支持西方的一些国家，因而不能从它们那里得到资助，同时又把向国外的借款减到最低的程度。他用在招募外国志愿兵的费用比古斯塔夫·阿道夫要少。瑞典军队的补充能力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团与其本省有效地挂了钩以及瑞典在易北河和德维纳河之间广阔的地带所进行的战争费用不大。

丹麦国王也不亚于查理十二世，虽然在程度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腓特烈四世于1699—1700年在荷尔施泰因受到屈辱之后，在处理波罗的海的事务中特别谨慎，他宁愿将1.2万名士兵租借给荷兰和英国政府以换取这两国政府在紧急时期给他以海军支持的允诺。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虽非交战之一方，但当时却面临着使瑞典、法国和勃兰登堡发愁的同样的困难：他的军队已外出，而他又需要保卫本土。1701年2月24日，他下令重新恢复民兵制度，其原因与在勃兰登堡组织一支民兵部队一样。丹麦的办法是责成除“骑兵土地”外的一切土地都要出一定数额的农民。自由农场或类似这种农场可获得豁免，地主可以找人替换应征的佃农。这是一支真正的民兵，他们定期接受训练，随时可以保卫国家。民兵在强制服役的6年中不得离开其家乡地区。由于

政府不给民兵以迁徙的自由同地主要将雇工束缚于土地上的利益相一致，因此，禁止民兵离开家乡地区便对丹麦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地主在危急时刻也受到了损害。1710年，丹麦企图收复斯康尼亚遭到失败后，常规部队便径自用民兵加以补充。但在和平时时期，法定限制民兵的迁徙自由主要是为另一个不同的目的服务，这一限制最终导致了1733年颁布的将14—36岁的役龄农民限制在本乡本土的“斯达芬斯班德法令”^[55]。

这种公私利益相巧合的现象在彼得一世的莫斯科并不显著，但在他死后，当俄国地主从他所建立的军事机构中部分地恢复了对农村的控制之时，类似的情况才存在。相反，彼得一世在1700年以后实行了人力的动员，打乱了下层社会的传统秩序。^[56]除了沙皇直接控制的农民外，彼得一世残暴地夺取了地主的农奴，夺取了一一般为教会管理和种植土地的人员，特别是夺取了不附属于地主的广大农民，从而使其数量锐减。过去附属于贵族或教会的人今则全都成了沙皇的臣民^[57]，并长期有义务在沙皇军队中服役。为了登记人口，普遍征收人头税（1718—1724年）以支付庞大的常规军的费用，俄国最后被划分为许多“团区”。部队各团驻扎在这些团区之内，其军官——通常为外地人——则掌握当地的行政。他们如认为必要，便可征用兵员、劳役、宿地和税负。对许多俄国人而言，北方战争的结束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国家被新的俄军所占领。

在一条广阔的边疆地带，情况则稍有不同。在俄国已经夺取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古老的伊斯兰教喀山汗国中，彼得突然将其臣民由纳贡者的地位降至要服兵役而又要交人头税的地位；有地位的鞑靼族家庭也有服劳役的义务。在阿斯特拉罕以北和顿河以西一带，边防军和边区民兵仍依靠分拨给他们的土地为生。但在乌克兰，由于内部的压力，哥萨克团的原有组织则在解体。在哥萨克占据的地区内，哥萨克团的校官们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地位较低的家庭则越来越贫困。在同西方国家军队作战中，彼得对哥萨克部队的评价并不高，同时，在马赞拉叛逃后，他对大多数哥萨克首领产生了怀疑。1709年后，彼得在乌克兰大量征发劳役至其他地区服务，因而加速了哥萨克这一古老的军事社会的衰败。新的哥萨克首领斯科洛帕斯基认为把大片土地送给莫斯科的将军和政客的做法是有远见的。彼得还摧毁了第聂伯河一带的独立的哥萨克人的堡垒。在分配土地给士兵的基础上建立的东

欧军事屯田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58]这种屯田区有助于保卫基督教世界的边疆免受俄国南面和巴尔干内的伊斯兰世界的侵犯。这种屯田区在亚得里亚海滨和多瑙河中游之间形成了一个世纪后马尔蒙元帅所称的现代政体杰作的“军事边疆”的基础。

在沿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匈牙利的这条弧线上，国家对当地居民倾向于使用高压政策。但在这条弧线以内，尽管有着建立一支庞大军事力量的资源，波兰选择君主政体却正在消失之中。1686年索比斯基入侵摩尔达维亚遭到惨败后，由于国王的总司令和利沃尼亚的总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波兰军队遭到削弱。波兰军队真实地反映了波兰政体的瘫痪。在拥有王权的伯爵的领地中，将对土地所拥有的势力和封爵的权力融为一体的伯爵可以征募到数量可观的重骑兵、轻骑兵、龙骑兵和步兵，在波兰西部和马佐维亚征募到的以步兵居多，在桑多米埃什中部一带以及南部所征募到的则是以骑兵居多。但他们对国王和彼此之间都怀有恐惧之心，其程度超过了他们对俄国、瑞典或鞑靼人的恐惧。因此，战争税便感不足，或是没有征收；1696—1697年选举新王时，在立陶宛和波兰欠下的军饷有助于说明军政领导的贪污腐败。其后，波兰便成了一个波兰军队只起辅助作用的战场。如果说1717年解决的办法在书面上建立了一支常规军（军官数目太多），极不相称并规定了支付军官和士兵的税收的话^[59]，那也不过是1677年依照议会和索比斯基所制定的和平时期的军队的低劣的翻版而已。在这一时期，波兰的社会结构似乎没有改变；虽然国家本身由于外国力量彼消此长仍然得以维持，但已是临近崩溃了。

在这一时期，迫使地主阶级从军的形式甚多：其中有国家征召、经济动机、军官专家以及从军的道德传统。统治者于1725年以前的俄国和1713年以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都大力迫使他们服役。

彼得的要务是迅速扩大军事力量。从国外招募有经验的军官很快便证明是办不到的事；彼得在德国大张旗鼓地招募军官并允许军官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却无法支付前来应募者的薪饷。因此，他就依这种设想行事，即在他统治下的土地所有者永远负有服役的义务；土地多寡不影响个人的义务。其结果便是，在这一类人中即使有很多人逃往俄国的穷乡僻壤，但与彼得以前和以后的统治者的治理时代相比较，一般还是有较多的人被迫从军服役。直到1720年以后，俄国军队和各类拥有土地的家庭还有直接的和紧密的联系。这也许是彼得统治

时代所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改变，这一改变对东欧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彼得却必须使旧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服从于与其不大相同的军队中的等级制度。由于要造就纪律严明的军官就必须给予系统训练，因此，即使出生于王侯家庭的子弟也必须从低级军衔逐渐获得擢升。同时，出身微贱的士卒也可以得到提拔。沙皇独裁政权反对朝中及乡村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目的还是迫使地主阶级在其军队中或在他处服务，而不是降低他们的地位。彼得虽然打开了极端的僧侣社会的壁垒，但这种壁垒随后又被关拢起来保护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虽然这种走回头路的情况在彼得死后已是不可阻挡，但早在1725年前就出现了这种兆示，即当时的贵族仍将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名字登录在每冬均要察看的详尽的名册上的合适家庭的子弟必须先 在普利奥勃拉赞斯基近卫军或西蒙诺夫斯基近卫军中当兵，而后才能得到委任到其他团中充任军官。近卫团一度曾是彼得孩童时代的“玩具团”，如今已经日益成为排他性的部队；1719年成立第三个近卫团时，该团获准仅接纳名门望族的子弟。

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后，这一有力的独裁政权便开始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强迫当地的地主阶级入伍当兵。腓特烈·威廉一世也有各省合适当兵者的名册并且使名册及时更新。在柏林他还创立了“士官队”的机构，通过这一机构有效地对容克地主实行了有效的训练和监督。士官营过去隶属于参加过九年战争的一些团，士官营最初改为国内训练机构，后于1720年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机构。^[60]1688年，霍恩佐伦的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均来自霍恩佐伦的贵族；但是在勃兰登堡，尤其是在东普鲁士，保守倾向最初阻碍了许多可以充当军官的人的晋升之机。贵族并不都承认这位选帝侯加强了权威。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其他方面抱着旧有的思想习惯不放；他们待在乡村，生活常感贫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同波兰某些地方一生都在将很小的家产进行分割、再分割中度过的没落贵族，以及同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债台高筑的特权地主阶级一样，没有多大区别。少数一些家庭则由于家道殷实，真正觉得可以不依赖于人。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从军，则大都宁愿为国外的王侯服役。但求职的愿望在勃兰登堡如同在别处一样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量，因此选帝侯的军队也就十分庞大。人们很容易地注意到，选帝侯的最有成就的将领都得到了大量土地的奖赏，上尉及其以上军阶的军官的生活都有保障；上尉除了薪饷和补助外，还可以从自己管辖的连里捞到好处，即在政府付给他们的费用和用于招

兵、装备以及支付士兵薪饷的差额中捞到好处；上校同样领取薪饷和补助，同时还因主持一个团的工作而得到各种好处，此外还可截留本团所属连队所得到的利益；将官则常截留所属各团各连所获得的好处。这种诱惑在1688—1713年间大为增强。德国北部诸国的军事费用当时是以荷兰和英国的补助、占领区的捐献以及国内的重赋来支付的。薪饷虽有拖欠，但军官的战时薪饷比许多德国贵族微薄的收入却强得多。

此外，一些家庭的牢固的从军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三十年战争。^[61]1683年后，德国北方许多青年士绅赶赴南方参加土耳其战争，同时还有主要来自梅克伦堡和荷尔施泰因两地的大批的人加入丹麦部队。出于同样的动机，勃兰登堡人则必然参加他们自己的选帝侯的部队。大选帝侯对他们加以收用，但无意坚持要他们服役，也不让他们垄断军队。他欢迎外国士兵，并擢升本国行伍的平民。他还招收胡格诺派教徒入伍：1688年，在他的军队的1030名军官中，胡格诺派教徒至少有300人。但1700年以后，腓特烈一世的军队中的军官虽非全部但大部分都是由本国的贵族充任的，包括汉诺威君侯在内的不伦瑞克诸王招募的军队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必须记住，在帝国的新教各邦中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有地位的人以在教会中供职作为替换职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但这种情况在信天主教的欧洲却很普遍。然而在南部，在巴伐利亚的伊曼纽尔军中服役的、非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诸邦的贵族比例^[62]，以及在皇帝军中服役的非哈布斯堡的臣民的比例相当大。

另一方面，战争的重压也有助于在勃兰登堡和其他地方敞开入伍当军官的大门。各国的军队都已扩大。在较好的部队中，军事训练越来越细致。^[63]军事组织日趋复杂：在国内外驻守时，部队的团都下分二分之一为营，作战时又集合起来组成旅。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需要更多的军官。中校、少校、中尉和少尉已经成了普遍委任的军阶。这种情况便迫使德国政府去鼓励有才能的平民了。1704年，腓特烈一世正式许诺在他的近卫军中平民出身的人可以享有与其特权家庭出身的同事平等的晋升机会；此外，他和他的继任人不同，他大量地将平民封为贵族。因此，德国的部队仍为有才能的人提供职业而合理地敞开了大门。然而1713年以后，非贵族军官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在技术性较强的兵种中这种缩减非常缓慢。在另一方面，甚至在战争年代中情

况就有了改变。勃兰登堡、汉诺威、荷兰和英国军队中的胡格诺派教徒军官很快就融合于德国、荷兰、英格兰和英—爱社会之中，坚信路德教的萨克森则不容纳他们。在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前，腓特烈·威廉表示了用德国军官替代胡格诺派教徒军官的愿望。1714年，在他解除的军官中，平民出身的军官比贵族出身的军官要多得多。但贵族普遍地进入军队的情况却早已发生在他实行这一政策之前。征召年轻的贵族进入士官生队就是要加强传统的社会结构，由于国王仅接收本国的贵族进入士官队，从而增强了进入士官队的严格限制。由柏林送到部队充当上等兵——军士接受下一步训练的士官生不再会同社会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混淆不清，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升至少尉以上的机会越来越少。1700年，有一些贵族仍然长期充当列兵和军士，不能升迁，而平民出身者却得到提拔。在以后的20年或30年中，军队中的社会关系有了调整。这种关系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本身。

在西面，皇家的强迫与寻求职业紧密相连的类似情况和类似的许多机构也重新出现了。1695年，一位英国人在考虑他儿子的前途时写道：“……他有资格做任何文职工作，但是在这样一位英王的统治下，青年人要想在适当的时候获得自己的前程，唯一的途径便是在年轻时从军……”^[64]威廉三世由于这位未来的斯坦厄普伯爵于1695年在那慕尔之战中表现英勇，果然允许他在近卫军中充当军官。威廉同彼得大帝、查理十二、阿马戴乌斯二世、汉诺威王乔治甚至萨克森王奥古斯都一样，深信统治者的职业以及他所信赖的臣民的职业就是打仗。这些国王的左右都是享有特权的王室亲族和近卫军。1691年后，在英格兰，近卫军军官即使是中尉军官也罢，都比其他团里的军官高一级，有时还高两级；后来这类军官在其军事生涯中出现了垄断英军中头等职务的趋势。但是威廉的近卫军却不能像在俄国那样被统治者用做实行剧烈社会变革的工具，同时在英格兰也没有出现像普士士官队那样勃然兴起的情势。

路易十四庞大的近卫军，1690年共有8500人，相对而言是一支更为重要的部队。受到宠信的那部分法国贵族，一般都有门第和财产上的优越条件，他们在国王的同意下不断地离开近卫军转入部队，对部队进行控制；路易十四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这种办法来监督和限制贵族对军队的垄断。例如，圣西门就对强制像他那一类的人在皇家滑膛枪队中服役一段时期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一个贵族有权从军作

战，有权自荐和通过亲友获得军官职务而不受到政府的积极干预。他还对根据等级条例所规定的依资历提升的办法不满，认为这是阻碍提拔良家出身的有作为者的规定。这一做法当然是用来加强国王对军队的控制的，但国王对这一规定也作出过例外，而且在王位继承战中，这一规定执行得也不如以前那样严格。国王还在他的4个警卫连中废除了上尉以下军职的鬻买，并允许警卫连收纳非贵族士兵。^[65]1701—1714年之间，就整个法军而言，授给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军官职务显然增加了。其原因是在紧急时期合适的人员十分缺乏。战后，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被大量解职，其数量比被解职的贵族军官要多得多。另一方面，不久被封为贵族的家庭（其中有一些在政界和司法界甚为兴旺发达）的子弟此时正在进入老一代贵族军人的行列；这一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了在军队中身居高位的人。^[66]据其母系，于克赛勒元帅乃是出生于长袍贵族，卡蒂纳元帅则出生于不高于中等声望的议员家庭。沃邦曾作出过这样激进的建议^[67]：士兵应在国王军队中长期服役，通过逐步晋升而有资格取得贵族的地位。但他这一建议从来没有获得采纳的希望；即使是1693年设立的包括各种奖励的圣路易军事授勋规定也不授予贵族地位。社会等级虽然可能改变，但不会按照军队中的等级而重新改建；军队中的军阶也不像战时财政和兴盛的司法那样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

此外，在西欧各地这种信念仍很牢固，从军包含着两个相互有关的目标：取得贵族的纹章和军权。1688年以前，在路易十四鼎盛的年代中，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将对国家履行军事义务的责任感同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到了1700年，一种固定的模式便深深地进入了千千万万法国家庭的家史中去了。这种模式是：士绅家的儿子有一个或几个在路易军中服役，另外还有一个或几个在教会中供职。此时，国王的压力已同顽强的习俗难于分辨清楚了。其中潜在的原因是十分明白的。在收入方面主要依靠收租而不是依靠自耕不出租的土地，加上在朝廷做官便可不在本地任职，这意味着悠闲自在和有迁移的自由。在许多地区，长子继承权和保存祖传遗产也意味着悠闲自在和有迁移的自由，但这却常延误较年幼的儿子的婚姻。佩剑贵族本身的含义就不许他们参与其他的活动，对丧失贵族资格的行为的制裁有助于把贵族的职业限定于从军方面。如果贵族家庭的经济来源一落千丈，自甘或必须“堕落”的诱惑便越来越强。1670—18世纪初期，在

昂儒、布里昂松和多菲内等地均有贵族家庭衰落到如此地步^[68]；贫穷的贵族立下遗嘱允许其子弟学一门生意和丧失贵族地位。但在商业或其他行业中谋求一个职位常常很困难，同时习惯力量也使大多数贵族忠于其从军的传统。假如可能，他们就购买军职。较为拮据的乡村贵族则诉诸戚友，或求助已在国王的部队中获得好处的庇护人。政府予以协助，其做法是将需要从前任手中购买（有国王的许可）和不需要从前任手中购买的军职区分开来。少尉、中尉、准校、少校和中校都属于后一类。路易的补助偶尔也能帮助最下级的优秀士兵往上爬。另一方面，战功和资历往往比不上有钱有势，而过了中年的中校以下军官的经常性支出则难以靠薪俸维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地方行政官的报告表明，有地产的家庭一般以其多余收入接济在外服现役的亲戚。没有这些额外收入或不交好运的话，他们简直活不下去。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个军官的前程是以其薪金和家庭入息为其经济基础的。财产越丰厚，晋升越容易。如晋升到一定程度，他的军阶就有利可图。

在法国以外也有许多这类特点，当然不是一概如此。不允许废除和约是导致1700年萨伏依贵族贫困化的部分原因^[69]，但在法律上允许可以选择其他职业的皮埃蒙特，当地贵族通常是在教会或军伍这两种传统的抉择选其一。在意大利别的地方和西班牙，所缺少的则是专制压力。意大利贵族有时会参加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族的部队，而伟大的蒙特科考里的后代也有成为优秀的皇家指挥官的。但意大利社会已不再包含一种确定的军事阶级。^[70]有些贵族为了谋叛而扶植亲信，但建立军事组织的迹象甚少。维也纳收复摩里亚主要是靠德国雇佣军。在1701—1706年的伦巴第战斗中，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民兵不过是旁观者。在西班牙有些特权人物并不摒弃武装，但摒弃军队。他们是从吉普斯夸到莱昂等北部地方为数众多的中落士绅或埃布罗河和杜罗河以南出身望族的大人物和有封号的贵族。他们喜欢在行政机构和法庭任职，而不屑为皇室服兵役。这种想法和1660年后西班牙力量日渐衰微有关，而在1704年后的长期内战危机中有所转变。慑于菲利普五世的独裁统治，很多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上层贵族为查理大公而战。腓力1704年12月8日的敕令也是力图恢复在他控制下的卡斯蒂尔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它表达了国王通过训练士官生使他的部队成为“训

练王国贵族学校”的愿望。它还把低级军阶向“过贵族生活”的人和商人子弟开放，它规定几乎所有阶级都必须服兵役。[\[71\]](#)

一种新的英格兰律例——“严格的财产授予法”——使有可能把家产中本来全部留给长子的额定现金收入授予幼子。这些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有某些收入，但为数不多。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后期诸王日渐兴盛的军事力量吸引了这些寻求高官厚禄者中颇大一部分人。郡民兵由地方贵族担任指挥，常备军的指挥官——中尉和上尉水平的——则由外地贵族担任。很明显，这些人对这个国家不太关心，但其态度仍是肯定的：在这方面军队和民兵的区别并不如政治家所宣称的那样明显。1692年，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军官都是有产者，他们的任务是克敌而不是把战争作为职业”[\[72\]](#)。与此同时，苏格兰贵族历史性地开始参加英军。他们和英格兰人一样都可以进行贸易或参加其他职业。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国家太穷养不起他们。这样，这些年轻的冒险家就不替外国军队服务而自然地参加在国外服役的英国部队。除了参加大小地主以他们的佃户建立起来的苏格兰团以外，英国团中的苏格兰军官人数迅速增加。1714—1763年，英国军队中有四分之一的团级军官是苏格兰人。[\[73\]](#)

在英格兰也有一些明显迹象说明有种趋势在发展，这种趋势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重要：部队的现役军官自视为一种伟大的永久性“行业”，他们保卫许多较小的私有行业，从而涉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服现役的有产者是其中的一方面，受半薪者则是另一方面。由于加入新建的团并不难，战时服役是很吃香的。但一旦委任了军职，这职务就取得了一种现金价值，再想晋升也就非钱不成了。这对较老的团说来尤其如此。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团保存下来的机会较大。团的资历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威廉于1693年对团的资历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当某某人晋升为少尉、中尉或上尉以至更高的职位时，他需要支付的款项，和他在前任任期的收入之间的差数是影响到这个时期很多军人的事业的一个因素。买一个军职可能需要毕生的积蓄，而把它卖掉又可为遗孀取得一笔收入。这种制度有明显的缺点，1711年有人试图改革，但马尔巴勒竭力维护。事实上，在战争最后几年，就有很多不必购买就能晋升的机会。有着更为独裁传统的乔治一世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办法限制了国王决定提升的权力，并压抑人才。但1720年的规定说明他除了对各级军职确定需要缴纳的最大限度税率

外，无权再做别的，虽然他可以坚持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尉以前必须有一段较长的服役时间。

“半薪”是解散编外军官时发给他们的解雇费，有不少政府在九年战争结束时实施。它间或作为一种老年和残废军人的抚恤金。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和平时期的真正使很多军官感到为难的是它的发放无定期并长期拖欠。即使这样广大军士也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当解散一个团或裁员时，只发给数周生活费就把士兵解雇了。一般来说，失业或临时雇用的老兵在下一轮战争开始时也可能愿意应征入伍，但他们并不构成随现役部队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军事“利益”的一部分。某些国家拨出款来照顾在战争中负伤退伍的军人收入只帮助了个别士兵。

[\[74\]](#)

正如一个政府的军事工作远远超过招募和训练大批士兵和军官一样，老百姓所做的也不只限于（为部队）提供这些人。伟大战争的进程最终靠人民经受战争的全面压力，并在和平时期为驻国内庞大永久性部队提供给养的能力。在此时期，有迹象说明政府的办事能力有所改善，并作为缩小战争破坏以减少压力的准备，也有迹象说明某些社会集团不仅较易适应战争而且从中发财。

从法国边境省的行政官中可以看出一流司政能力的重要性。若说里尔的行政官是国王威廉和马尔巴勒的最可怕对手是毫不夸张的。在他的助手战争委员（加上1700年后资历较高的拨款审核委员）的协助下，他供应东北部法军的主要用品。他和所有地方当局协商有关官兵的住宿事宜（驻野外的除外），并决定扣除税款外在这方面可以提取多少开支。征用土地、建筑军事工程和堡垒时他估算补偿费。为了部队招雇木工石匠，他可以禁止私人盖房。他和各种包买商打交道——建筑商、医院管理员、粮草供应商。他规定随军小贩索要的价钱，他给乡镇长规定任务：他们出办法，靠增加地方税或直接征用以完成和约，但他有最后决定权。省行政官也是军需官，这在部队也是重要的职务，他有责任为部队筹措饷银。他中间也给上级送去有关个别将军的秘密报告。对比之下，海军有它自己的军需官。

与佛兰德和阿图瓦一样，阿尔萨斯也力图开发富庶边境的资源，但不竭泽而渔。在这方面地方行政官有责任制定出居民和军事机构可以共存的细节。责任是重大的。除了驻防1681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修

筑的漫长的新堡垒以外，还必须补给一支野战军以对抗德国西南部的帝国部队，这对该省的影响是复杂而矛盾的。即使有1702年后不再从边远省份抽调民兵的决定，但强制征兵和征用车马也极度匮乏了农民家庭。驻在当地过冬的部队和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哄抬物价，这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当然也适合了个别的人。有些斯特拉斯自由民和地主从和约中发了财，这些自由民在城市附近抢购物业。实物地租为仓库提供更多食物。^[75]政府用调整物价，在适当时机征用、储存和发放储备等办法节制因极度需求所产生的效果。居民为了得到工资和供应，扣缴部分应纳的税款。为了建筑堡垒和围攻战的工事，村社要提供劳力并发给他们工资，不过这也为不少临时工提供了一种生计。1701年纳布里扎克工事完成后，某些人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总的来说，这种有控制性的压力使邻近主要战区的富庶区域不致降低到内地某些地区的贫困水平。^[76]

在尼德兰南部情况就更为复杂。在这里，同时在较少的程度上也在德国西部，一系列加固的据点和防线使野战军难于活动。队伍不能像在东欧那样随意游动，就食乡间。另一方面，没有连绵不断的堡垒以防止大批游击队或龙骑兵越过敌人部队袭击他们背后的农村然后回师。同样，供应在他们前线后方作战的部队也是极端困难的。水运虽然发达，但不能弥补残破的道路。在1672—1677年的战争期间，地方行政官们议定了一些与他们关系至切的“贡物条约”：他们同意承认交战的任何一方有从一方未能完全征服但另一方也不能有效防卫的地区征收贡物的权利。这种现金或实物由条约规定的地方政府征收，以避免强制作用。1694年前，在九年战争期间，没有签订过这种条约。和战场上的激战以及围城战的曲折过程比较起来，交战双方在斯凯尔特河口和阿图瓦，以及默河和莱茵河之间这两个主要地区进行的野蛮袭击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带有强烈破坏性的战争是1688—1689年冬天法国蓄意进行的，旨在蹂躏符腾堡、巴拉丁和下莱茵某些地区，其目的是战略性的，对平民说来，其后果是骇人听闻的。在欧洲这部分地区，王位继承战争对非战斗人员造成的困难较少。尼德兰对贡物条约的安排说明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掠取敌国的额外资源和避免破坏引起的浪费，这种破坏会使征服敌国所得的利益减半。这种想法正符合农村宁愿和敌人妥协也不把财产交给军方“处理”的自然愿望。其结果是，在佩德韦、列日教区和法属阿图瓦形成的大三角地区内，

有些地方政府、城市和庄园在战争中保持完整，为数不多的官员和包税商——官员规定税率，由包税商征收税款——既满足了敌对军队的要求也中饱了私囊。交战双方的君主在征服新领土时很少不承认城市、贵族和教士的历史性特权；而城市、贵族和教士也毫不迟疑地承认王权的转移。城市当局也常常要求围困该城的部队指挥官不要把他們和守城的卫戍部队混在一起。在这方面战争是带朝代性的。至少在尼德兰、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其目的总是打败敌国的君主而不破坏这个政权所依靠的社会秩序。1689—1691年，爱尔兰之战和20年后加泰罗尼亚之战是这一般规律的重要例外。

从这方面说，西方的战争负担是很小的了。同样重要的是，当战争结束后，常备军的管理有了改进，这样就不至于太不容于国人。征税和包买逐渐取代了直接军事统治和强迫征用。官兵从百姓那里获得实物享用的老规矩逐渐被按官方税率缴纳的现金所代替，其后这种现金缴纳又为一种新税所代替，从而把这种义务公平地分摊给更广大地区、更多的家庭。城市筹资建造兵营以避免在私人房舍和马厩驻扎的弊病，虽然在大多数州里骑兵仍驻在农村。有时由于缺乏任何居室，如1700年前的爱尔兰和1715年后的苏格兰，政府不得不建造兵营。

除了利用军事活动致富的小团体外也有人在远离战区的地方发了财。最走运的是荷兰和英格兰政府的债权人。在法国，职位的出售使更多家庭多少能够逃避一个走投无路但很强大的政府最沉重的征赋，虽然他们不得不一再出钱赎买这些权利。这些官员中有很多和供应军事物资的组织有联系。这些士兵和民兵与城市寡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野，这些人指挥他们自己的民兵，保卫通过他们市镇的新兵；他们和供应地方仓库的包买商有共同利益。另外，在这些次要的特权人物和那些大包买商、金融家和行政官员之间也存在分野。在这最后一种人中，所有欧洲最特殊的例子也许要数安妮皇后的海外部队军需官詹姆士·布里奇斯。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困的贵族，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商人的女儿。从1705—1713年，他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办公室里把他经手的公款余额有利可图地利用起来，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的收入。通过操纵货币和股票投机，他的收入扶摇直上。就像战争出钱营造了尤金在维也纳漂亮的建筑和巴登的刘易斯在拉施塔特的王宫一样，战争也为这个市民捞足钱买了房子和他的艺术收藏。

商人们开始轻而易举地为战争签订和约，筹措资金，甚至参加军事管理。柏林的承包商约翰·安德烈亚斯·克劳特一直经营奢侈织物，于1688年后加入大选侯专署，并连任霍恩佐伦的战时财政部主管达25年之久。他被正式批准可以合并使用他商行的和官方的物资。税款和盟方的补助都由他经手，后来他又组织了为部队缝制服装的作坊。一批胡格诺移民采取了同样的道路。从里昂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于盖坦兄弟们在17世纪90年代还在卖书度日，但从1701年起，他们就以英法部队的汇款代理出现。1703年后，日内瓦的让·亨利·于盖坦把一般用于商业的资金作为借款转拨给法国政府^[77]，他在日内瓦的一些对手也从经营丝绸、盐和玉米转到银行业，这就加重了当地贫困居民的负担。他们把法国资金转往意大利，把盟方资金运往皮埃蒙特。1704年开始，在一再设法利用大量黄金储备刺激国内工业后，伯尔尼政府发现贷款给荷兰人是较为有利可图的。伯尔尼的马拉克里达私人银行也起而效尤。于是，瑞士对荷兰和英格兰长期投资的历史开始了。同时，德国巨商中的“法庭犹太人”，他们通常以供应奢侈品起家，而终于成为他们武装部队的金融家和包买商。1690年，汉诺威的勒夫曼贝伦斯经营路易十四给埃内斯特·奥古斯都的大量补助和后来盟方给明斯特主教的补助。1701年后，在选举铁腕人物奥古斯都起关键作用的哈尔贝尔施塔德的贝伦德莱曼为驻波兰的撒克森部队供应靴子和服装。更为重要的是塞缪尔·奥本海默，他在17世纪70年代是哈布斯堡部队的包买商，到1700年已成为这支部队的不可或缺的银行家。在巴黎，由于法国在遥远战区开支的增加，他同时代的大人物塞缪尔·伯纳德的生意也大大地扩展了。所有这些都靠他们利用各方面合伙人和投资者的手腕来筹措各国政府所急需的贷款，他们有时在不利的条件下竭力维持现金和信用的来源，这样他们可以从税款和补助中得到偿还，这样做是缓慢的，但有利可图。

这种买卖是否基本规矩常常受到猜疑。在法国的摄政期，裁判公所的调查结果没收了某些人发的战争财。不少别的投机商为了对狂热的项目投资借款太多而大吃苦头。1703年，奥本海默去世，哈布斯堡政府由于他的后人的暂时挫折，轻率地想把他们撇开而受到震撼。1705年，于盖坦背弃了他的贷款人，1709年，伯纳德无力偿还里昂金融市场的巨额债务。不过奥本海默家族和他们的亲戚韦特默尔家族的财产根基巩固，使他们在18世纪获得了巨额财富。伯纳德一世获享巨富直至老年。他们这种职业并不因和平来临而结束，因为军队已成为

一种永久性的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柏林的军火承包商施普利格尔伯和他的多姆公司（1713年），该公司建立了波茨坦和施潘道的工厂，连续几代供应普鲁士军队军火。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武装部队反映了社会的一般结构，它们由皇室成员指挥，由不同级别的贵族代表统领。除了炮兵和技术兵种外，1714年后，未经委任参军的贵族和晋升为高级军官的非贵族人数都迅速减少。部队职位绝大部分都由平民担任，他们可以升任下士或中士——但不能超过这个限度。这种部队和文明社会的共同基础并非在一切时期都如此。在东欧，一种极端的不同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因为土耳其的近卫军和俄罗斯的近卫军在任何时候都不代表农村阶级。相反，和奥斯曼帝国的做法一样，部队和文明社会有时可以在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1693年路易十四最后一次征召有食邑的贵族从军，而1717年普鲁士国王也终于以纳税的形式代替这种陈旧的义务。即使这样，从西方的封建过去仍保存一项重要的遗产，即佩剑贵族是由于参军的义务才取得他们的身份的想法。这种身份使他们在新的常备军中取得优越的地位。

尽管这样，人们依然愈来愈感觉到军事组织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区别。划分这两者的是更为严格的军法、军纪和训练，以及更大规模的军事组织。一种公认的政府职能是调解军民关系，使双方都不至于过分吃亏而使国家受到损失。为此目的，政府制定出不同的行政管理方法，取得不同的效果。在某些方面，军民都能获益，因为他们之间互相依赖是众所周知的。但在经济比东方更加发达和更敏感的西欧，平民的利益是更易于理解的。在东欧，至少在俄国，在较少的程度上也在1713年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初期由国家专制权力建立起来的社会的新的军事基础。在别的地方，政府是无法改变武装力量的社会基础的。在这个好战的、对手林立的世界中，为了获得足够的军备，他们较有节制地设法调整他们的重点。

3. 海军

1688年，欧洲最强大的舰队属于法国、英格兰和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实力在17世纪变得异常衰微。虽然奥斯曼、北非沿岸伊斯兰国家、威尼斯和马耳他舰队已不限于帆船，但它们在地中海以外的海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们都不足以控制地中海。除了法国以外，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舰队比任何地中海国家的舰队都更强大更有效率，但这二者也无法取得波罗的海的霸权或排除外来舰队的干预。1721年开始了决定性的转变。丹麦和瑞典的海军削弱了，而俄国的舰队则首次在波罗的海航行（见第21章）。在土耳其舰队司令梅祖莫托上将领导下，奥斯曼舰队进行了改造（见第19章）。安东尼奥·德·加斯塔南加海军上将和约瑟·帕丁努恢复了伟大的西班牙海军造舰传统。从1718年的帕隆洛角海战中可以看出，英格兰有决心也有能力推迟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收复。在这里，西班牙的战舰和帆船在17世纪90年代给法国带来了无可诘言的麻烦。英格兰对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的控制表明它作为欧洲主要海军力量的地位。1689年荷兰曾与英格兰争夺联合海军中的领导地位，但1714年它们为拼凑8艘战舰为国王乔治一世护航而感到力不从心：1702—1710年，它们对同盟国战斗阵线的贡献从第三位降至第五位，而从1710年开始，它们就再也无力承担一支北海中队。^[78]相反，由于得到一个十分有效的政府的支持，从1721年开始，法国用较新式而又灵活的海军更新了20年的陈旧设备。1716年或稍晚一些对它的舰队的调查结果表明共有69艘额定的舰只，其中9艘是捕获船，其余的五分之三是1702年建造的。在这一年，从135艘仍能服役的战舰中修复了84艘。^[79]英格兰舰队不同于上述国家的海军。直到1709年，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海战开始减弱的时候，英格兰前线的战舰仍然和1689年或1702年一样强大。^[80]它由100艘战舰组成，力量超过所有波罗的海舰队的总和。

“战船队形”一词始于17世纪90年代。当时从成本、木料和冬航等方面考虑都不适于建造1690年就开始营建的三层艨艟巨舰。纵队队形是从17世纪偏重炮战而摒弃老式的横队、近距离肉搏战发展而来的；在英、荷联合作战中，这种战斗队形变得更为完善，成了一种经

典形式，从而有1691年的《英格兰战斗训令》（这可能是托林顿起草的），数学家保罗·霍斯特的《海军战斗艺术》（1697年）也是间接根据英格兰的实践而写成的一书。^[81]这种队形所依仗的是短程武器和船舰的坚固结构，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远胜别的国家，以至为此它宁愿牺牲航速。和同等火力相比，法国和西班牙的舰艇规模较大。^[82]对各交战国来说，队列要求相同的性能，这对火炮的统一和部署，战舰的火力分级，“主力舰”和其他舰艇的区别都有重大影响。主力舰要有足够的威力能坐镇队列，以别于各种常规任务——主要是商船护航和侦察——这些任务在任何一个滨海国家都是由许多护卫舰、单桅小帆船、快艇和其他船只担任的。英格兰或荷兰的主力舰至少配备50门火炮，法国（装有更强大的火炮）则不少于40门。另一方面，17世纪中叶以前，武装商船可以在战斗中服役，故政府只需为数不多的正规舰队。在英荷联合作战中，租赁或征用商船——除了作为完成一次战斗的火攻船以外——的缺陷终于暴露出来，此后商船就被派充辅助性任务，如输送兵员和给养，要不就作为私人武装船，既攻击敌方商船队也进行贸易。值得注意的是，1679年后租赁船从瑞典海军中消失了。

到了1688年，职业常备海军不仅分级更为细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大。1670—1675年，英格兰海军建造的船舰吨位比以往任何一个5年都多。1677年，当英格兰舰队首次全面分级时，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税，以便“迅速营建30艘主力舰”——这在“1691年法案”出台以前是一个后无来者的计划，是对图尔维尔率领70艘巨舰在滩头堡出现所引起惊讶的反应。^[83]40年前法国海军还不足20艘战舰，除了3艘以外其余的装备都不足50门火炮，由黎塞留传下来的舰队中，1648年幸存下来的最强大的舰只也只配备52门，^[84]从这里可以约略看出科尔贝尔和塞涅莱的成就。在行政官的影响下，联合省于1684年决定营建一个包括96艘船舰的舰队，这足可与英法匹敌。到1688年底，即使把配置40—50门火炮的舰只也计算在内，仍不足30艘。但是，1682—1688年间，他们船厂营建的27艘主力舰中不少于7艘是属于90门火炮级的，这就远远超过了荷兰沿岸浅海所允许的火力装备。这产量可以与1665—1667年荷兰建造的60余艘主力舰对照。在九年战争中，他们和英法一样证明能营造一定数量的船舰。从下表可以看出1689—1698年间这些国家新营建的主力舰情况。^[85]

单位：艘

类别 \ 国别	荷兰	英国	法国
76 门火炮以上	8	4	25
76—60 门火炮	31	23	14
60—36 门火炮	39	42	35
合 计	78	69	74

从这些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出，当时对路易十四战争机器表示敬重是不无原因的，虽然路易十四后来未能有效地利用而易被忽视。但这些统计掩盖了1693年后法国海军营建迅速下降的事实。从1695—1698年，英格兰有44艘，荷兰有24艘新舰下水，而法国只生产了19艘——两艘一级，9艘三级，8艘四级。很明显，现在所有国家都喜欢建造低级别的舰只，在九年战争期间，法国造舰从未像1707年后那样完全停止过。

到1650年，各国军舰的营建只在局部上略有差异，虽然这些差异的重要性仍足以引起时人的研究，特别在法国。英格兰战舰的艏材比荷兰较短，但吃水较深。荷兰最重的军舰在一般潮涨时出海有困难。他们的军舰船底略平，船体较宽，是所有舰队中速度最慢的。一般说来，在17世纪末，法国军舰以其鲜明的轮廓和宽敞的炮位享有最优舰只的声誉。这不是科尔贝尔1671年的意见，当时他在布雷斯特的、土伦和罗什福尔的3所大型兵工厂都设立了造船委员会^[86]，从此以后，荷兰造船变得十分保守，而科尔贝尔则坚持探索一种建船理论，他不是靠应用新科学于实践，而是通过船舶的性能得出看法一致的理论原则。高明的木匠对他们的手艺保守秘密，而且不愿改变他们的方法。只有等那个被称为布莱斯的精明的那不勒斯人比阿吉·庞加洛来到罗什福尔，并在图尔维尔和海军部长的支持下，才动摇了布雷斯特的埃蒂安·于贝克的统治地位。于贝克造船是置宽度于长度之上，科尔贝尔迫使他们辩论，并听取海军军官的意见，而这些军官又需要听取更有发言权的船工讲课和观看他们的实地表演。从这不断的讨论得出1689年法令规定的新船比例，沿用了一个世纪，好几个朝代的木匠们仍保留了多方面的“秘密”。相形之下，由于荷兰匠师抵制理论上的东西，极珍惜时间的学徒工沙皇彼得就觉得泽丹不如德特福^[87]。霍斯特神甫在他1697年所著《建船理论》一书——这是对提高法国船舶产

量最脍炙人口的贡献——承认最好的船往往出自未受过教育的船匠之手，这无疑是因为建船科学仍然考虑比例太多而忽视其他动力学的因素，如船体轮廓，有经验的匠师有时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所有国家中，设计师都同样受到材料和工具的限制。对外国船的模仿促进了实践的共同性。荷兰曾经设法仿造敦刻尔克1695年开始生产的新的带桨快速护航舰。^[88]1670年前，法国人借鉴过荷兰人和丹麦人。从布莱斯的例子可以看出船匠们常常可以把技术出卖给外国。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能找到工作，虽然1727年以后，荷兰海军部才采纳鹿特丹1695年就提出的把他们的造船厂交英格兰经理管理的建议。^[89]借鉴外国技术最著名的人物自然要数彼得大帝。

使各国海军均衡发展的另一因素是当代海军技术。假如数量上劣势不太明显，在精干的司令官指挥下，一支列队以待的舰队可以挫败锐意进攻的敌人寻找决战的努力。在18世纪，法国人曾多次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队形以达到此目的，但这主要不是防御性的。多数战术家都强调严格保持队形，对个别舰长表现的主动性不予支持。不过只要不影响舰队司令的指挥，则仍然强调中队去分割和牵制部分敌人舰队的独立行动的价值。一支强大的舰队可以迂回敌人的队列，但在势均力敌时最好不要去冲敌人的队形——这是从英荷联合作战中得出的教训。假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了无决定性战役的时代，这不能完全归因于队列的运用。军舰既笨重，又容易偏离航道滑到下风处，射击不准确，信号系统不足。因此，海军无法歼灭敌人的舰队。只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打破技术上的平等。英国海军上将肖维尔写道：“经验告诉我，当水手的战斗经验和素养相等时，除非出现奇迹，决定胜利的是数量。”^[90]1689—1715年间有3次公海上的战斗以战败的舰队仓皇溃退而结束：一次在滩头堡，一次在拉乌盖，还有一次是1715年在科尔贝海面，这次瑞典舰队被丹麦打得大败。每次战胜者都在数量上占了明显的优势。集结的战斗力量越大，胜利越有把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建造大量最大型和装备最重火炮的舰只而不考虑除了规模和数量以外的别的因素。

海军机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于政府对海军对国家利益所起作用的估价，意想中敌手的实力，以及技术人才和各种材料的来源。奥斯曼、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唯一能在木材和海军给养方面自给的国家。在战争压力下，对需要的初步估计必然会因事态发展而修改，

这不仅包括海战本身或开辟新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战场，还包括日见短缺的人员和物资，特别是对公共信用的处理，在这方面，由于需要不断修理船只和供养以数千计的人员，其负担之重为任何其他行政部门所不及。因此，不管海军是否随时间的迁移而没落，它们的力量是不稳定的。不管怎样，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较易理解，一旦考验到来如何使用它就不那么容易。每年冬天，政治家的海军领导——可以理解后者比前者更为谨慎——必须在各种不同要求中决定作战范围和方向——士兵和船主、外国王室和殖民当局的希望总是相互矛盾的。经常需要支援陆上作战，需要安排护航，需要满足盟国或中立国的要求，甚至要引诱敌军叛变。怎样把能利用的舰艇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要不要组织一支主力舰队，这意味着盟国之间的协同动作，对法国来说，则是勒旺和波南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参见第7章）。除了保障陆军的调动，唯一明显的任务只是加强和平时期的工作以防止外侮和保卫商业，除非敌方已形成战斗队列，这两种任务却不要求组织战斗队列。在这方面，17世纪后期的海军竞赛为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一种浪费金钱和精力而长年累月很少收到戏剧性效果的捉迷藏游戏。比如说，即使布列斯特港驻有一个敌人中队，也很难夸大这个中队对英格兰的主动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有意义的是，就在威廉三世希望增加英荷在地中海的兵力时，戈尔多芬草拟了派舰队在英伦海峡游弋封锁布列斯特港口的原则。^[91]在凡尔赛早就不相信它有什么进攻潜力的时候，一支法国“备用舰队”是这个时代战斗的一个重要因素。凡尔赛的漠然态度也不能归咎于拉乌盖一战的失利，因为这次失利可以推诿于天时和地利，战斗到达高潮时方露败迹，其初级阶段（巴尔弗洛阶段）可以说是图尔维尔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在某些法国人看来，更有教育意义的是，即使获重大胜利，到头来仍是一场空。1690年图尔维尔控制海峡时，他曾想把力量集中于地中海，但让·巴尔（他于1667年和德鲁特共事过）则建议封锁泰晤士河。滩头堡一役，由于船上病员增多，图尔维尔只好轰击提格茅斯。^[92]当敌人掌握了主动时，什么是当务之急是较易决定的。

无论一个独裁政府怎样使用它的海军，它也不能无视商界舆论的压力。其结果是，由于把海军转用于消灭敌人的商船，路易十四就置他个人的利益于他的臣民利益之上。在更多地依赖远洋贸易的英国和尼德兰，舰队的用场是从未被怀疑过的。即使荷兰的小城镇也感到有必要追查一下某一场海战失败的原因，至于将级军官的擢升则更需要

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审慎考虑。即使各省没有战事，但只要波罗的海一旦发生政治纠纷或地中海出现海盗船时，海军问题也经常提到他们的议事日程上（见第17章）。武装护航到“海峡尽头”是英国对勒旺贸易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斯图尔特王朝末期，很多绅士、村民、商人和工厂主对此是休戚与共。当哈利法克斯爵士宣称“英国人的头条政治信条是他相信海洋”^[93]时，他正代表了他的国人，除了作为唯一的防止侵略的有效手段外，海军对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至关重要。1693年，“士麦拿船队”被袭击引起舆论哗然，这就说明海军的举足轻重，舰队司令被召到下院对他的行为加以解释。1694年，在立法上已采取措施制定1708年的护航法（这也是对“海上失职”的反应），要求“除了参加海战和远洋护航的舰队外，为保障商船出入在适当位置上至少配备43艘巡航舰艇”。事实上，这是对只在地中海布置海军而置英吉利海峡的安全于不顾的严厉批评。因为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就宣布了它对英吉利海峡的主权，这在18世纪已深入英格兰人心。英格兰人一致认为一支强大的舰队是绝不可少的，但对它的用法意见却极不一致。

主张“美洲战略优于欧洲战略”是英格兰18世纪的经典看法，它形成于17世纪90年代。当时认为英格兰应将它的兵力部署在海上，目的是消灭法国的贸易及其海外殖民地，这本身就足以削弱路易十四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在路易接受了卡洛斯二世遗愿以后，把班鲍派往加勒比海——那里一支相当规模的英格兰舰队中队将要驻防数年之久——搜索西班牙商船队一事表明利用西班牙不劳而获的根深蒂固的神话很快就会死灰复燃。这种想法对一个渴望扩大其银储备及为其国内商业开辟新市场的日益扩张的商业社会，以及对从牙买加到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激进分子都有吸引力（参见第15章）。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的政敌和反对者也是“海洋”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这政策符合保守党的利益。鲁克由于运气不错而在维戈湾猎获一支西班牙商船队，他们对此大加吹捧，并认为进攻加拿大较之在法兰德进行一场战争更符合民族利益。事实上，正如本书前数章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最高战略目标几乎全都在于取得欧洲大陆的控制权。海军对此所能发挥的影响从波罗的海或地中海东部的相对地域性含义中看起来。它对西方各交战国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威廉三世从海上包围法国的最后决定是最有趣味的回答。不管他开始时如何犹豫——这主要和爱尔兰之战和行政困难有关——这位国王兼行政官早在1692年就已接

近于解决英格兰的防卫和他个人关于战争必须最后在大陆上决定的看法的矛盾。他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洞见不同战区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的结果。这从英格兰和爱尔兰以及低地国家的联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威廉和其后的马尔巴勒也认识到，在地中海部署一支舰队控制从法国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航线，协同陆军威胁法国南部并加强盟方对犹豫不决的意大利各省的外交攻势，就可以直接影响欧战。如事与愿违，仍可认为英荷对地中海西部的控制，除了取得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并便于盟方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干预外，还限制了法国对英荷更为重要的地区的进攻潜力。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波及全部海战。除了1704年救援直布罗陀外，1694年后法国海军唯一的一次大规模行动是掩护1708年詹姆士二世党人对苏格兰的进攻——这在海军史上为法国军舰能摆脱它的追踪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范例。总的来说，必须承认在这个时期的战略上欧洲海军比起陆军是明显地居于次要地位，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认为必须在陆上打败法国是对的。1683—1713年，英国需要学会对付一个没有陆军支援难以单靠海军击败的敌人的最好办法。对它大陆战略的批评虽然是皮毛的，但仍反映了一个海上强国的窘境，它的对手是一个陆上强国，即使海战受挫仍可进行战争。

和威尼斯以至马耳他骑士一样，海上强国必须依靠陆军进行防御这条规律对英格兰也不适用。不过现在却适用于英格兰的海上盟国。荷兰的确比英格兰更需要依赖他们经常受到敌人袭击的远洋贸易和渔业。他们需要进口大量食品和工业（包括供应出口的各种加工工业）所必需的原料。这些工业的生存有赖于安全的航线，因而他们的民族英雄也多是海员。可是，在勉强接受担任欧洲政治主角的同时，皮特·海因的崇拜者特罗普及德鲁特从1672年以来就痛感到他们边境的脆弱性。^[94]为了取得一种“屏障”和欧洲的“均势”，荷兰必须全面参加一场对路易十四的陆战。战争结果表明，荷兰无法保持1689年英荷协议（参见第7章）中规定荷兰所承担的即使是次要的海军实力，因此，1678年防御条约规定的荷英主力舰对比从3：4下降为3：5。每年秋天海上大国都要审议定额的绝对数字，漫长地讨论下一年的战略。在海上国家增加护航队的份额这一点上存在误解。即使乐观的估计，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荷兰舰队每年平均低于定额20艘左右（或者说少了一多半）^[95]，而等这些舰艇装备起来后也常常为时太晚。这种延误使英格兰坐失1702年对西属印度洋群岛凭空一击的良机，而1703年6月，荷兰的地中海舰队在计划攻占那不勒斯一役也出发太晚。海因

修斯和威廉三世一样对征服美洲不感兴趣；阿姆斯特丹人对在维戈被歼的护银舰队则是利害攸关的。不过在地中海荷兰的商业利益和威廉的战略是如此一致，1694—1695年，英格兰舰队在那里过冬的决定也主要是受阿姆斯特丹海军分区及其历练的部长乔布德怀尔德（1637—1704年）^[96]建议的影响。即使在1710—1711年间，当荷兰人已无法承担一支国内舰队并早已取消了勒旺岛的护航以后，荷兰国会仍在地中海保留了十几艘战舰。

1712年，保守党控制的下院表达了英格兰人对荷兰海军缺憾累积的不满：

因此国王陛下不得不以更多的舰艇补充这些欠缺，并在一年中最不当令的时刻继续把更多的军舰部署在远海，使舰队蒙受严重损失。这也影响到商业护航。由于缺少巡航舰，海岸得不到保障，而陛下亦无法干预敌人和西印度群岛进行的极有利的贸易，他们从这里获得大量财富，非此他们就无法支付战争的庞大开销。^[97]

正如它左右了斯坦厄普和查理大公于1708年签订的单方面的商务条约一样，这种批评无疑为波林布鲁克在外交上出卖盟国扫清道路。^[98]可是真正感到荷兰人把海洋置诸脑后——“海洋是我们的前线，而我们却为他们设置屏障而弄得精疲力竭”的波林布鲁克是很明白个中原因的：“不管谁主持，荷兰政府变穷了。”^[99]到1707年末，海因修斯在给马尔巴勒的信中已丧气地提到战争的“可怕支出”^[100]。1710年，荷兰的远洋贸易将经历北方战争的全面影响，它承受王位继承战的压力不如九年战争（至少到1695年）那样成功。有理由相信它的护航系统不那么有效。护航舰比巡航舰队需要投入更激烈的战斗，损失后得不到新舰补充。^[101]

对荷兰来说，1689—1697年和1702—1713年，这两次战争的另一区别是，后者是在没有行政官提供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进行的。威廉是陆海军总司令；桀骜不驯的省，特别是泽兰省，也表示了对奥兰治皇室的效忠，这是荷兰市政大臣所未如愿以偿的，即使海因修斯和经常出海的约翰·德·威特一样对海军方面的问题表示同样的职业性兴趣。行政官腓特烈·亨利曾想取消1597年制定的那部累赘而又支离破碎的宪法，这部宪法把区域安全和联邦海军委托给5个独立的海军部，每个部都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选举海军部成员的各州镇的利益。那个“完美的荷兰人”德·威特和经常和阿姆斯特丹闹矛盾的威廉三

世也就只能通过个人领导、谈判和影响来推行这个不确定的文件。

[\[102\]](#)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一定程度的集中：3个海军军区——马斯、阿姆斯特丹北方区和西弗里斯兰——仰赖于荷兰州并负担三分之二的海军开支，而泽兰和弗赖伊斯坦（格罗宁根）只各负担六分之一：在这些份额中内陆省需要负担总额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过半泽兰之数——但却常常迟于缴纳。当需要装备一支舰队的时候，所有选举团体都派代表到海牙与国会代表讨论各自的份额。国会代表是一个只能听命于各选举团体并国会在财政和政治上所加影响而行使的咨询机构。海军总司令由国会提名并接受其指示。国会会员有权遴选各舰舰长。不过各选举团体“属下”的海军上将、中将和少将则由选举团委任，他们可以听取或不听取外部意见，鹿特丹的高级委员会可循例授权总司令和荷兰州，在总指挥权一旦失落时——过去通常是战斗阵亡的结果——提出候补人。如行政官不在，则市政大臣行使其有限权力，主要通过他是荷兰州议会及该州之海事委员会成员来行使。这些机构介于3个海军军区 and 国会之间，相当于英格兰的海军总监（1690年后是海军专员）及法国兼管海军工作的国务委员。英格兰大使不惜耗费时日与各省讨论指挥和募兵细节，这是不无原因的。

尼德兰各选举团奉行串同制度，这种做法一向耗费时间和财力。因此，一旦该国的财政不堪重负时它就崩溃了。特别是泽兰省，它强调海员利益，又喋喋不休申诉贫困和强调本身权利，国王兼行政官死后它就自行其是。米德尔堡的海军军区有责任保护它的海岸和内河不受附近敦刻尔克、奥斯坦德和纽波特海盗船的窥伺。它对它的“委员会航海者”之长久不替也表示关注，在法国人看来，这些航海者之可怕就如敦刻尔克人之于滨海国家——但不只在一个海洋，因为1695年后，泽兰人开始远涉地中海。1688—1715年间，在米德尔堡及弗洛辛出售虏获品获利几及2000万盾[\[103\]](#)——足够支付海军3年的全部开销。在这个数目上还需加上在国外出售虏获品所得的巨款和国会为捕获或击沉敌舰发放的奖金。这些款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Les Flessinguois”海盗有别于其他海盗享有能征善战的美誉，虽然荷兰船员的勇敢同样获得他们的盟友和敌人的钦敬。1705年7月，由于把这些款项提高了一倍，泽兰各州被说服同意较严格的虏获品处理程序。在此以前他们支持海军军区谴责中立国或友好国家船只与敌人进行贸易的行径——泽兰厌恶这种陈旧的荷兰做法——从而使国会陷入与斯堪的纳维亚和盟国政府的外交纠纷。[\[104\]](#)武装船占用海军人员也促进

了和海军的摩擦。这一年和1702年一样，泽兰收获很大，为舰队提供了3000人。当有可能和1703年年终一样，以1000门火炮装备40艘战舰，武装船这门行业就需要5000多人，因为一艘配备32门火炮的护卫舰需要180名船员是很寻常的。掠夺敌方商船常带风险，而各地能投放的人力也有限度，但由30多个家族控制的米德尔堡和弗洛辛的海军委员会在这些战争中却干得不错，成为泽兰爱国热忱的真正代表。只有从省的狭隘观点出发，以战养战仍是正确途径。

所有滨海国家——连只有奥涅格里亚作为唯一港口的萨伏依也算在内——都把武装船编入现役，其目的是对敌方的近海船进行打了就跑式的袭击，这样做可以减轻地方的贫困。在九年战争期间，泽兰船长克里多和英格兰船长普洛曼轰动了地中海，但是促使马赛保险率上涨的原因主要还是马略卡岛上的人。在查理十二2月19日的武装船令公布前几个月，英国政府就抗议瑞典的掠夺。这一法令的公布使斯德哥尔摩派出30艘“私掠船”服役，哥德堡派出20艘，维斯马和施特拉尔松也各有派遣。^[105]1689—1697年，伦敦海事法庭公布了420份捕押许可证，并在1702—1712年间接受了1540份保证书。^[106]1702年6月至1713年12月间，凡尔赛捕获船委员会除了批准2000份赎金以外还谴责把4000艘捕获船押送欧洲港的做法，如把在殖民地海域击沉的、非法处理的和捕获的船只算起来，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前半段约损失3600艘商船的说法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1708年，法国的海军实力已越过高峰，而圣马略则已把精力转到更为有利可图的南海贸易。对主要在英吉利海峡游弋的麦劳印私掠船来说，1694—1697年是最好的年景——即使举行了使他们失望的和平谈判也仍然取得246艘船的装备。除了由让·巴尔（1650—1702年）指挥的皇家中队外，从1693—1695年的28个月内，敦刻尔克武装了同样数量的私掠船，主要用于北海。让·巴尔是佛兰德人中最优秀的海员。佛兰德人用荷兰人从德鲁特那里学来的战术回敬他们。由于盟国舰队无法防止敦刻尔克的迂回接近，敦刻尔克在下次战争捕获的船增加了25%，因而在和平条约中获得了它的席位。^[107]它对干预英格兰集中在泰晤士河的贸易和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或通过松德海峡回航的荷兰船队是再合适不过了，更不必提长期落寂的北海渔业。从布列斯特开始活动范围更加扩大，这个基地从1702年就为勒内·迪盖-特鲁安（1673—1736年）所使用，不过他仍仰赖他的同乡圣马洛筹措军饷和人员。不过他和让·巴尔，以及南特的雅克卡萨尔（1672—1740年）和傲慢的骑士，福赛的克劳德

（1656—1733年）也只是这个时期许多舰长中最为人牢记的人物，这些人把法国武装船这一行业变为一种传统，一种有其自身战略原则的国家机制。

和路易十四晚期的法国别的新想法一样，为武装船战争进行经典性辩护的是对敦刻尔克十分了解并对装备部分船只起过作用的沃邦元帅。他在1695年11月30日所写的著名的《私掠船备忘录》^[108]中提出两种主要设想：英荷的作战能力根植于庞大但易受袭击的商业。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除非这支舰队能主宰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于坚定地而又机智地扩大一场“捉摸不定的海战”，迫使敌人在为保卫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商船队的财政压力下崩溃。私人资本将负担进攻的大部分费用，只要国王的低级舰只和护卫舰——这也要有私人投资者参加——能组成中队进攻主要目标，并在解决俘获船讼争方面能迅捷些，减少包买商对俘获品销售的阻力，提高武装船员的士气。这些船员由于出航前往往预先领取并花光了他们的工资或俘获品所得的大部分，所以很容易开小差或临阵脱逃。国王的法律未能防止预支造成的这种弊病，雇主之间的竞争更助长了这种弊端，而沃邦别的追求又未能实现。16年后，消息灵通的法国舰队司令秘书及俘获船裁决委员会秘书特鲁赛德瓦林库尔谴责了武装船武装部司库的欺诈行为，律师的诡计和对被捕船只的洗劫——所有这些都是构成武装船衰亡的原因。^[109]不过沃邦的部分纲领实现了，主要是通过把国王的船只租给私人辛迪加，这些团体由于有失业军官参加而发展了；另一方面，国王为他的远征队寻找支持，这和他早在1693年把他的大使派往丹麦和瑞典去争取支持一样。所有这些安排是他在美洲殖民地地方长官所主张的结果，不能说部长必然都会同意，不过结果却是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取得紧密结合，这方面欧洲无出其右者。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法国武装船比别的地方武装船业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特别因为部长和廷臣有时也会对它投资。1689年初，法国海军部长塞涅莱已在武装4艘护卫舰，其中1艘是和法国作战部长洛沃瓦合作的。国王本人提倡这种做法，并决定于1695年减少海军经费。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不过稍微修改了科尔贝尔的目标，为此塞涅莱和主张海军第一的人就为什么需要建立一支舰队曾与洛沃瓦、麦米亚尔以及梅因特侬夫人辩论：那就是从滨海国家手中夺取国际贸易。^[110]但黎塞留和科尔贝尔却认为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是商业和殖民发展的条件。海军部长继续主持商业和殖民地。虽然圣多明各和马提尼克岛的

小型武装船仍不时活跃，但这些岛屿的总督的行政官都希望得到五六艘国王的巡洋舰。在沃邦的“回忆录”里也直率地承认有“一个时期”法国忘了它的海外商业。他错误估算了法国小型武装船的能力（虽然它对法国动机的反应能力比海军更为深刻）和敌方对损失的适应能力，这二者有时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神经战。法国人既然要进行商业战争，他们就必须承认海军优势对此是必需的。

在取得这种优势以前，经济战这种想法在英格兰已经存在。这可以从英国一再设法防止1703—1704年荷兰和法国的贸易，特别是威廉三世防止北方中立国1689—1690年的贸易的努力中看出来。1693年，法国缺少玉米的时候，威廉单方面把它列入战争禁运物资——这在17世纪后期成为许多条约的内容（见第5章）。他被迫撤销了这个决定，但1703—1705年，又再次没收了好几批玉米，这就重新激起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的抗议。问题出自中立国船只携带的证件有缺点，有些无疑是伪造的以便藏匿盟国人员携带的禁止和敌方进行贸易的物资。所有交战国对货物都进行“渲染”，使中立国货船的活动受到多种条例的约束。和护照一样，这些条例提供了许多没收的口实并卖弄法律。牵涉到中立国船只时在海上能否登上它们的船进行搜查，违禁品的定义是什么，以及交战国俘获品法庭是否有资格对它们进行裁决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所有这一切促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怨愤，并使武装船这一行业在18世纪人道主义者面前变得声名狼藉，这些人愿意赦免一切非交战国人员，甚至交战国的人民。各个国家都提到一些原则来支持他们的要求；但如要达成协议必须依据各种互惠而又矛盾的条约。一个国家的态度受它的中立国抑或交战国地位的影响，假如是交战国^[111]，则要看它推行其愿望的能力，或对立国运兵船的依赖性。荷兰和瑞典虽然互相敌对，但在1691—1693年都结成“武装中立”。他们对所受损失获得某些经济赔偿。但在北方战争中中立国的权利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英荷事实上已达成武装中立的协定。1710年和1715年，丹麦和瑞典的俘获品条例和九年战争中英荷王室的政策有分歧，而英荷联合反对瑞典禁止和俄国占领的海港进行贸易的做法是和1689年英荷伦敦公约所规定的交战国权利不一致的。

很明显，中立有它的风险但也有它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北欧王室都部署了少量的舰队，主要是彼此防范，而且又都局限在波罗的海之内。双方都有值得骄傲的航海传统和勤劳而又习于航海的人民，特别是丹麦，它最优秀的海员都来自挪威。它们也富于造船材

料，其中挪威的桅、荷兰的焦油和瑞典的钢铁都出口西方。不过这两个国家都尚未具备一支坚实的商船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瑞典外贸是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虽然它的钢铁出口量正在急剧增加，但哥德堡仍是一个小地方。瑞典和丹麦国王早就通过大量减免关税鼓励私人营建防御性船舶，不过这已由海军新的大规模造舰所代替，而查理十二事实上废除了这种制度。这一方面，英格兰的航海法刺激了斯堪的纳维亚吨位的上升，使荷兰受损。17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建船业十分兴旺。虽然必须把寻求中立国保护的外国商船也计算在内，但是当时瑞典的商船队（共750艘）比它整个18世纪时的都要强大。丹麦的商船队较小，但在17世纪90年代，丹麦的海军造舰活动则显然活跃得多。1692年，克里斯蒂安五世已有9艘配备76门或更多火炮的战舰，另外还有20艘配备34—70门火炮；1692—1699年，又有8艘参加前线战舰行列，包括弗里德里库斯·考都斯号。即使这样，它在数量和质量上仍不能和瑞典相比，瑞典接近40艘舰艇。1703年，这两支舰队各有大约50艘战舰，但瑞典共配备了2872门火炮，而丹麦只有2414门。[\[112\]](#)

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海上交通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瑞典王国事实上是一个海上王国，它的领土完整有赖于在瑞典、芬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德国北部之间自由运送兵员和物资。丹麦通往挪威之海道也易于受到袭击。1700年，丹麦由于未能控制松德海峡而被暂时排除出北方战争之外。当时瑞典在英国海军上将鲁克指挥的英荷联合舰队支持下控制了松德海峡，虽然这一行动也表明在哥本哈根以南和以北浅海处大型舰艇活动非常困难，特别是由于撤除了所有航标以后。[\[113\]](#)1700—1709年，瑞典海军可以在波罗的海自由活动，支持他们国王的征战。1709年后情况改变了。瑞典在波尔塔瓦的失败使丹麦重整旗鼓再次参战，而俄国也开始在波罗的海作为一种新的海军力量出现。到了1710年，卡累利阿、因格里亚、爱沙尼亚以及利沃尼亚都被彼得大帝征服。瑞典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和彼得的舰队交战需要有与丹麦人在波罗的海交战不同类型的战舰和战斗技巧。沿芬兰海岸都是岛屿。在这些岛屿四周的海面以及往西延伸到瑞典，俄国人使用的是1704年首次下水的用桨驱动的浅水帆船。战斗的帆船在地中海正在丧失它的历史性地地位，但在波罗的海却开始了它整个世纪的新影响，这是由于芬兰在俄瑞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以及可以不需要控制波罗的海就可以沿着它的海岸行驶帆船。1709年，瑞典有37艘主

力舰和21艘护卫舰，但只有5艘帆船。1714年，在汉高特（甘古特）进行的首次帆船战斗中，彼得有100艘帆船参加。^[114]1719—1721年，他用这些帆船骚扰瑞典沿岸，从极北的皮特欧到斯德哥尔摩南部以远的诺彻平。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瑞典未能控制波罗的海，而不是由于瑞典未能控制波罗的海才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埃里克十四和他的继承人曾经想占领芬兰湾，以切断俄国和波罗的海的联系。彼得对海湾南岸的征服作为一种军事上的胜利必然使俄国海军在波罗的海打下基础。相对来说，以瑞典波美拉尼亚湾失陷告终的德国战役主要是受海战影响。由于瑞典海军无力在两个战场进行战争，俄国和丹麦就取得了主动权。1712—1716年间，由于瑞典海军甚至不能取得对丹麦地区上的优势，结果使瑞典在德国的驻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最终导致他们的投降。其后，当瑞典本土的海岸被袭击时，俄国人几乎深入到斯德哥尔摩。俄国入侵之所以未能实现，可能是由于俄国和丹麦缺乏合作和英国在必要时决心使用武力以保持北欧的均势。另一方面，查理十二想征服挪威以挽回损失的企图由于丹麦控制了瑞典和挪威之间的交通而未能实现。

北方战争的历史主要是陆战（参见第20章），但也有在芬兰、瑞典、德国和挪威沿岸为支援陆军而进行的简短尖锐的海战，特别在其后一阶段。主力舰队一般是作为预备队，只有在为达到某些值得为之冒险和花费的特殊目标时才使用。就在北欧国家海军力量日渐衰微的时候，俄国的海上力量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虽然俄国用松木建造的舰只寿命不长，俄国人本身也不喜欢在海军服役，因而海军要靠沙皇的意志来支持，但是这种新的事态发展肯定导致了瑞典大国地位的下降。

除了战斗损失外，战舰的寿命必然受自然界压力对战舰本身及其船员的影响。航行中船体破裂、桅杆折断、索具残破以致巨缆分离等是常见的事。虽然也完成过诸如海上急救（互救）等奇迹，但船舶一般负重过多，无法再装载大量的备用品如中桅、帆、桁、索具和其他用具。舷和船底必须用木加固，特别要按时偏滩以便清洗和捻缝。水桶以及粮食、弹药、燃料等要经常添补。因此，作战效率就和能否在战区附近修配和取得补给有直接关系。无可避免的是，并不是在战略需要的时候都能找到合适的港口。一支舰队需要地盘和一定的水深，不受敌人袭击和避免最坏天气所加之影响。

在丹麦和瑞典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丹麦在基地上比瑞典略胜一筹。除了加固了的哥本哈根港外，丹麦人在格吕克施塔特和克里斯蒂安桑设有船坞——后者为维修在卡特加特保卫商业和挪威海岸的小型舰队服务。哥本哈根一支舰队一般可以控制松德海峡和南波罗的海，1680年后，哥本哈根港为容纳大型船舰做了不少工作。丹麦人也热衷于在波罗的海的波恩霍尔姆岛建立基地。这个岛没有合适的港口，但在它的东北面，在称为埃尔寿洛美的两个岩石小岛之间有可能修筑一个。天气不好时，游弋到波罗的海的战舰可以在那里躲避。由于靠近波罗的海贸易航线中心，它们可以成为一个武装船据点。只要丹麦人占据了南方省斯科纳和布莱金格，在松德海峡设置一个瑞典基地就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在1658年后，在布莱金格海岸却建立了一个基地，名为卡尔斯克鲁纳。以卡尔斯克鲁纳代替斯德哥尔摩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卡尔斯克鲁纳的位置较适合于驾驭丹麦人和保护瑞典和它在德国数省之间的交通。不过在北方战争期间它有负众望。它远离芬兰湾和利沃尼亚海岸，在俄国将其兵工厂设置于喀琅斯塔得的情况下，它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了。1710年后，斯德哥尔摩重新获得某些早期的重要性，不过，由于1682年以来的弃置，使它眼下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活动的瑞典军舰的基地在哥德堡。

虽然英格兰和荷兰的舰队经常开到波罗的海，但是舰队在那里都没有基地，在那里舰队一般是为了护航，但也不常如此。波罗的海距本土近，那里适合战斗的季节也较短，因此舰队可以在秋后回航而不至于严重影响他们所保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两个国家在地中海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在1708年占领米诺卡岛以前，由于缺少合适的基地，联合舰队受到限制。在九年战争期间和1707年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港提供某些方便，至于英格兰的战舰则早已习惯从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港口取得木料和水、新鲜食物和酒。不过就基地而言，法国的土伦是无与伦比的。1694—1695年冬天和以后的某些日子里，每年有过半的时间土伦几乎全面控制了地中海的海战。当威廉三世下令拉塞尔的舰队在地中海过冬时，拉塞尔最好的办法就是借用卡迪斯的设备；卡迪斯是查理二世时常设的海峡船队的终点站；这支船队也利用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不再是盟友以后，有优越停泊之便的塔古斯便成为最佳的替补港；它是梅休因父子运用外交手腕取得的，他们利用了维戈岛战役胜利给里斯本造成的良好印象，但这并不发生在盟国部队未

能占领卡迪斯以前（参见第13章）。和在卡迪斯一样，英格兰人在里斯本委派代理以取得给养，照顾海员、俘虏和伤病员。特别在卡迪斯，这种活动规模之大，所需工具和管理之浩繁，加上对信用和汇款的特别安排——这就创造了当时最卓越的行政管理奇迹之一了：“一个在外国领土上、远离英格兰1100英里的英国船坞核心事实上在临时通知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了。”^[115]有必要请私人商号作为代理采购当地的物产——虽然荷兰籍舰长常常以个人信用做担保——也有必要请大使来消除地方上的过敏情感。可是受半岛政治变化影响的卡迪斯和里斯本，他们的价值由于远离土伦和加泰罗尼亚战区而下降。海峡的天气导致拖延，有时造成船舶失事。1704年占领了直布罗陀停泊所以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保卫和安置作用。只有在盟方能自由地修建马洪港时他们才取得一个没有这些缺点而且在地理上十分适合巡防地中海的港口。

米诺卡岛并非英格兰第一个海外海军基地。在近代，这第一的名次如不属于马德拉斯就属于丹吉尔和孟买。作为一个不适于重型军舰碇泊的避风港并且由于经常受到大批摩洛哥骑兵的袭击，由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丹吉尔于1684年被放弃了。^[116]至于东印度人，英格兰希望他们放弃圣赫勒拿岛或好望角以远的海上防卫；好望角作为“两个海洋的旅馆”，在那里外国船只比在巴塔维亚或其他荷属东印度交通中枢更受欢迎。另一方面，英格兰的美洲船队在其全部航程中都有护送，在某些殖民地并派有护卫舰——为了保卫夏天渔船作业，在法国海盗船垂涎的纽芬兰最多时曾派出过6艘。野心更大，更使敌人沮丧的是在牙买加的金斯敦长驻一支同样数量的舰队（见第15章）。海盗们很清楚，这个基地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有一个宽阔的港湾和良好的天然防御，它是除了卡塔赫纳和哈瓦那——这两个基地和维拉克鲁兹一起构成西班牙舰队的基点——以外这个时期在加勒比海最优越的港口。金斯敦——也可以说在其入口处设有炮台的罗亚尔港——的另一优点是它处于西班牙贸易路线上的先遣位置。作为这样一个基地，它在海军方面的重要性始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这次战争中，它多次派出远征队拦截从卡塔赫纳出发的西班牙战船。虽然这些船都比不上1701年拥有22艘战舰的班鲍舰队。同样，在这时期唯一从法国到达加勒比海的舰队是波伊蒂子爵的远征队，他们于1697年占领了卡塔赫纳（见第11章）。

不过这个地区的所有政府的主要任务却是保卫他们的船队（这对1700年后的法国来说还包括给西班牙船队护航），特别是所有的岛屿，那里的居民经常害怕他们的庄园和奴隶受到袭击，而奴隶本身也是不安定之源。出没无常的小股牙买加、圣多明各和马提尼克海盗并不限于海上掠夺，在遭受台风、地震、饥谨和瘟疫所造成的灾害以后，这些海盗的不时大规模袭击更加深了当地居民的苦难。1689年法国占领了英格兰在圣基茨岛（圣克里斯托弗岛）部分，1690—1702年，英格兰倒转了那里的形势。的确，英格兰人1691年或1701年在瓜德罗普岛和他们1693年在马提尼克的罗亚尔岛（行政中心）一样都未能成功。事实上，西印度群岛的人民既不愿意把竞争性很强的产糖岛屿并入他们的国家版图，也不热衷于攻击它们。至于劫掠，那是另一回事。1694年，迪卡塞在牙买加停驻6周期间造成了极大破坏；1706年，赫德森湾和路易斯安那的英雄勒莫伊纳的贝尔维尔置尼维斯岛和圣基茨岛于他的股掌之中；此外，1712年，卡萨尔破坏了背风群岛中的蒙特塞拉特和安提瓜岛，然后又劫掠了苏里南、圣尼斯坦提斯和库拉索岛的荷兰人勒索赎金。这对迪卡塞的海盗以及后来的拉罗什尔和马赛—土伦的武装船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得意之作，但法国海军所起的作用只带偶然性。^[117]除非由于船舶装货的需要，法国巡航舰在加勒比海不多逗留，避免秋天台风的到来或船蛆的破坏。1690年，小型英格兰舰队开始在那里过冬，但在西班牙还是盟方时，英在牙买加没有常驻中队。不管17世纪60年代以来总督和议会施加多大压力，安妮皇后的历届政府只能抽调1—2艘护卫舰进驻后来的背风群岛站。当从牙买加逆着信风行驶到安提瓜需要数周的时候，总督和议会是很难感觉安全的^[118]。作为海军基地，即使在1739年，罗亚尔港也还是草创的，虽然当时它已有倾斜码头和仓库。在托马斯·汉达赛德准将时代（1702—1711年，他是牙买加能干的总督），设备只限于清洗船体，而贮存则常感不足。^[119]加重这些缺憾的是加勒比的航行条件，生病和开小差者多，殖民当局不断向海军提高要价，以及市民代表之柔弱无能。^[120]

在牙买加待过了15个月以后，战舰都十分残破。有些在出发时就不灵便。由于修理不善，舰长和船厂干事互相责难。毫无疑问，双方都有玩忽之处，但巡航舰职务繁忙没有时间很好整修，而国内船厂的任务又过于吃重。海军的效率即使在海外战区也主要仰赖于这些船厂的效率。到1689年，很明显，英格兰的能力跟不上舰队的发展，只有

朴次茅斯的地理位置才适合与法国作战。1698年，它增加了一个干船坞和两个船坞，虽然查塔姆仍保持优势而希尔内斯也重新被起用。德特福和伍尔维奇则式微了。主要的革新是1690年决定在普利茅斯建造一个统一规划的船厂，到1693年，这个船厂的先进程度足以打消在法尔默斯建造同样一个厂的想法。^[121]1694年向金赛尔派一海军专员，这也反映了在西部建立基地之需要，金赛尔和科克一样当时已经是食品供应港，但防卫较好并配备修理业务，可以为能在半潮时通过浅滩的船舰服务。英吉利海峡常刮西风，而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适处布列斯特的下风，战略上很不利。不过同是这个风，也使船只难以驶离布列斯特，因而这个不利条件也就忽略不计了。否则它们就要停泊在乌森口外，等候起风再上驶英伦海峡。假如刮东风，英格兰舰队就不能很快到达大西洋或爱尔兰。这情况妨碍了海峡的贸易防卫，特别因为封锁布列斯特这种带风险和消耗很大的战术要再过一个世纪才能得到完善。还有，随着海战焦点从北海转移，除了迎接北来的船队和封锁敦刻尔克外，在英格兰参加的几次战争期间，一般处于敌人下风的荷兰基地的位置就变得更为不利。在此期间，在斯凯尔特河口附近的弗洛辛得到一个新船厂。

英伦海峡缺少一个深水港使锐意经营勒阿弗尔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深感忧虑。假如塞纳河口的主要基地设有一个合格的停泊所，它会有很多优点，并且也许可以使法国政府对海洋的重视会像英国大臣对泰晤士河一样。和其他次要的法国港口一样，勒阿弗尔主要为海军建造和修理低级舰只。从1678年起就以防卫军需总监身份系统地视察海岸的沃邦建议，以“海峡旅馆”瑟堡代替它作为护卫舰基地；为此起草了计划，但花在这上面或其附近拉乌盖的钱甚少，拉乌盖是负责重建布列斯特的总工程师薛瓦利埃·德·克莱维尔所选中的另一基地。沃邦的杰作是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和海港工程，包括一条为荷兰人艳羡的大堤，虽然船坞（以及通往船坞的贝根运河）需要经常疏浚。它可以接待配备60门火炮的战舰，但却挤满了私掠船和他们俘获的船只。1706年，敦刻尔克的居民比麦朗德还少，而麦朗德下游是沼泽地，疟疾肆虐，存活的人口本不多，那里从1666年开始，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花费了巨大代价修建了罗什福尔的全新船厂。^[122]布列斯特和土伦由科尔贝尔全部改建为兵工厂，但罗什福尔则被视为一个宏伟的模型。它为每条船都配备一个仓库，并有它自己的铸炮厂、法国的第一个干船坞和由布隆代尔设计的巨大走道。迪凯纳对它的危险入口不放

心，此外，它又获得发货迟慢之名，这是因为当地的石头房子都建在木桩上，在这种地面修建码头需要很长时间。另外，它的船舶需要在梅曼河下游20英里的泊场完成装备。^[123]不过在它的总建筑师和重建布列斯特出了大力的波南海军总管特隆的科尔贝尔（1618—1684年）看来，罗什福尔最大的优点是，船只如无当地领港员带领就无法进入这个港口，而且它靠近粮食富足的地区。这在当时由于内乱日亟导致海岸不安，兼之歉收频繁的法国是两个极为有利的因素（见第10章）。罗什福尔还通过内河运输取得佩里各特和安戈莫的木材和铁。由于接近卢瓦尔和纪龙德之间的拉罗什尔，罗什福尔经常为开往安的列斯群岛的船队护航（东印度公司在洛里昂有自己的基地），又因为它位于巴荣纳和布列斯特之间，它是朗德的焦油和比利牛斯桅的收集点，同时它也收集南特的优质布雷顿篷布和麻。^[124]

由于内地贫瘠，布列斯特的给养主要来自海上；又由于敌方的私掠船不断光顾布雷顿海岸，布列斯特的兵工厂仰赖于船队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本身又受天气无常的影响和船队常有的延误。兵工厂的力量主要看它雇用海员之多寡和素养，最好的海员来自圣马罗“基地”，而假如1689年不从波南借人的话，土伦则无法武装20艘主力舰。可是作为勒旺分队基地的土伦却可以较易地得到许多军需品。它只要保证在阿尔的罗纳河运输就可以得到从勃艮第，弗朗谢-孔泰、尼维尔内、福雷和多菲内，森林和锻炉生产的煤、铁，小型武器和大部分木材，虽然从勃艮第和多菲内麻的收集可以由于冬季道路不良或和别的地方一样由于商业竞争而受到破坏。从朗格多克可以得到葡萄酒、豆子、腌猪肉和牛肉，从多菲内和朗格多克可以得到牛羊，从勃艮第或瑞士可以取得乳酪，从普罗旺斯可以得到米和葡萄酒。和南部法国其他地方一样，土伦仰赖勒旺、突尼斯或南意大利的玉米；它的任务之一是保护这些物品进口。在这方面，和武装船业及反武装船业一样，它和马赛密切合作。马赛有高度发达的造船业，是一个资本市场，它接近土伦是一个有利条件；相反，布列斯特并没有得到麦劳印资本家什么好处，而南特也尚未富起来。在土伦修建船舶也并不如在西部船坞那样经常为暴雨所阻。不过在另一方面，它自己出产的木材供应已感短缺。1702年，它就不得不从皮德蒙特—萨伏依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取得檣桅，并从罗马尼河和托斯卡纳取得橡木。^[125]1689年前囤积起来的北部檣桅在土伦一直用到1696年，但这些东西不能像在中立的热那亚和里窝那采购的波罗的海焦油那样易于添置。要从西班牙和比利

牛斯山取得橦桅或木料就必须控制埃布罗河及其出口^[126]，法国从1705年开始就未能做到这一点。西班牙人偏爱比北方有较坚实、弯道较大的各种意大利橡木，但在法国，由于管理不善和选择失当，这种木材的使用尚成问题。

海战规模的扩大，使英格兰和法国1660年后采取积极措施，以保存和扩大它们的木材资源。科尔贝尔1669年的森林法由零星的立法补充，于1700年用法令固定下来。它赋予海军在海滨和河流附近的私人森林调查和先买权。1668年和1669年的英格兰法令，只限于皇家森林的圈地和复种，比法国皇室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少。更有价值，并作为矫正百年滥伐弊端的长期措施则是约翰·伊夫林的经典著作《森林志》（1664年）一书所提倡的私人植树。因此英格兰地主得以凭借其更有力的地位随便要价或拒绝出售，特别因为海军还需要和其他众多的采购者竞争。不过法国保留私人林场的贵重林木又时以极有争议的价格强行采伐旧材林的做法使林场主失望，而与此同时，贪污不法的林业部门在皇家森林滥伐以后又未予补植。这是一个由律师控制的繁杂的官僚机构，它和海军监督有矛盾，而这二者又和地主之侵占和农民之推诿有矛盾。海军的要求经常变化，因而遵循科尔贝尔森林法的日少，在拿破仑帝国成立前法国林业一直未能学会莱茵河国家的优越技术。^[127]不过，到了1700年，从德国获得大部分橡木和少量松木的荷兰人已经把势力伸到孚日。从1686年开始，英格兰进口东方国家的橡木修建战舰的船体和甲板，不过他们仍能利用国产橡木（或榆木）制造曲线（罗经木料）或直线板以建筑框架。从1652年开始，他们从殖民地得到更多的主桅，艄斜桁和沉重的横桁，虽然材料主要仍来自波罗的海和挪威。^[128]1691年的马萨诸塞宪法把直径24英寸的树都保留给国王，不过新英格兰的锯木场如此狼吞虎咽，1722年，所有从新泽西到新斯科舍的白皮松都被置于“巨齿”之下。这种防止“木材浪费”的做法更有甚于科尔贝尔有选择地在私有林木上打戳的办法，是为英格兰地主所不容的。

由于除了皇家森林以外在国内没有其他储备，假如英格兰商船吨位1689年后继续扩大或不能从新英格兰建成的新舰或俘获船中得到补偿，威廉三世和安妮皇后的舰队就更不好过了。事实上，17世纪90年代的海军造舰计划，部分是求助于私人船厂，特别在索斯安普敦水道，那里的价钱比泰晤士河便宜些。此后，虽然海军偏向于自身的设

备，私人船厂仍有余力为小型军舰放样。^[129]相反，荷兰的船厂在1707年工作仍很紧张，当时扎恩区的船台上同时停泊了307艘船，达到了最高纪录：这种拥挤情况足以促使（海军）马斯高价船厂的复苏。荷兰海军部一向乐于为修建船舶订合约，英格兰海军部则不太愿意冒这种风险，不过这是因为选举团可以实行现场监督，而荷兰的建船大师则比多数英格兰船商拥有更多的资本和人力。^[130]在英格兰，这种合同和大仓库的年度合同一样都集中于伦敦，因而驻船厂监督（虽然是海军部成员）比荷兰的海军监督或海军委员会在工作上享有的自由要少得多。还有提供各种不同服务的“长期”合约，如垂直度检查，木桶装修，或各种制成品如滑车、铁制品和罗径等。这些工作多半在船厂进行，但由海军部安排，如1686年后和伊萨克·洛德所订关于锚的合约：他制造的锚泊索具在1703年12月“大风浪”的考验下可悲地失败了，不过看来不能归咎于“洛德先生敢于承担为整个海军制造锚具这样一件伟大的工作”，而主要是由于当时焊接方法不良之故。^[131]1716年前，在英格兰制造帆布（虽然不常是帆）也由中央订和约——船长们对此已经常提出愤怒的抗议，他们的船在缺乏可靠的布列塔尼帆布情况之下比在荷兰战争时期要行驶更多里程（更多纵向帆）。连布列斯特在1687年也建立起它的工厂，不过新生的英格兰工业在1713年还是刚起步，在国家津贴下用他们的产品和汉堡帆布、荷兰帆布抗衡。

法国的海军行政部门也需要依靠包买商的才干、信用和耐心（法国主要的船厂都配备了自己的锻工车间、炉子和工场），那里政府提供资本和给予优惠——如科尔贝尔鼓励由达利埃兄弟在尼维尔内和多菲内建立的工厂生产武器和铁器——或成立专利，如1664年和银行家法朗索瓦·贝特洛谈判成立的火药场。政府还可以支持包买商和第三方面抗衡，如矿场主或为数众多的木材采伐和运输行业，并保护他们不受债权人的侵犯。另一方面，工业要受检查，海军派代理进驻私人铸炮厂和火药厂，而手臂伸得很长的海军监督有时会求助于省行政官：米歇尔·贝贡甚至从1694年起就把罗什福尔管区（1688—1710年）和拉罗什尔新财政区合并起来。强制征用不太普遍，但在1689年的军备热潮时由塞涅莱下令占领了贝特洛的私人弹药库。^[132]就在这一年，船舶监督员特洛的科尔贝尔1674年的规定发布后，海军法令严格地规定了合同程序。和在英格兰一样，法令规定在每隔很短一段时间公开招标，并对送交船厂的货物数量和质量彻底检查，那里的港务

监督、检查员、仓库管理员和仓库代表以及木匠师傅和其他直接有关人员有责任协助行政官。行政官向海军大臣汇报一切“港务细节”，并在采取特殊措施之前征得他的同意。虽然他们签订除了粮食以外的一切合同——粮食由巴黎的粮食供应承包商代表处理——海军事务之难办就如英格兰海军部一样，后者的优点是它处于英国商业中心，在招标以前可以较容易地了解市场动态。

假如因为他们需要在长期财政匮乏的情况并在严格的会计程序下工作，无论哪一种采购当局都无力进行贿赂。包买商可以比国家机构直接出面买得便宜些。不过一切要看他能否按时提交质量合格的货物。实际上对许多供应品来说这意味公开投标是不合适的，虽然一般都避免垄断。很明显，在东方国家，资金、关系和经验对大批木材、麻绳和焦油谈判是必不可少的。1689—1697年，和海军局签订供应国内木材合同的有34名商人，而签订供应波罗的海木料和桅的只有15人，其中3人同时供应麻绳和焦油。^[133]法国兵工厂很少大量购买外国货，不过他们也趋向于逐年地依靠他们最信赖的供应商，和在英格兰一样，这些商人对何时付款可以等候，他们喜欢硬通货，并懂得怎样把海军的账单变成现款，或者他们有足够的信用可以游说别人同样做。不过当金融商场拮据的时候，如在威廉三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大部分期间的法国，想做生意的包买商就更难找到。在17世纪90年代初期，当现金短缺而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关系又吃紧的时候，海军局就难以说服东方国家的商人投标，合同签订也晚了好几个月——一般都喜欢在2月签订。^[134]1707年春，布列斯特脆弱的经济已破败到如此程度：它不得不要求财政大臣为所有的供应寻找包买商。即使合同期限较长，价格也较高，当地商人也不愿意接受要延期数月才付款（有时还要提抗议才付款）的巴黎支票，而持有过期8个月票据的洛克罗纳和普卢达尼埃尔的帆布供应商，在债权人的催迫下，买不起麻线和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一般认为这种工厂将一蹶不振，而拉尼翁和特雷吉埃地区的农民也将停止种麻。布列斯特的经验是个极端的例子，那里很多小供应商经常无法完成他们承包的任务。但早在1702年，土伦的行政官就已经告诉他的部长不能用证券买麻，在包买商亏损时，海军就要受损失。^[135]

这种压力对给国内外和海上的舰队提供大量的食品和饮料的生产者、包买商和有业务往来之行号的影响更大。当时食品贮存技术只限

于盐渍和腌制，夏天酿的啤酒易发酸，农场和牛群都很小，粮食收成特别不稳，现金短缺。需要进口一些物品，而一些储备，如法国和英国的焦油和麻则有时下降；不过只要小心管理这些物品就不会腐败，也不需要很多港口存放，或在困难时期占用市民的供应。假定口粮减少到三分之二——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不足量分配”，为此补付船员们现金和因缺乏维生素C引起败血症的可能，船只可以得到不超过5个月的粮食供应。实际上虽然没有强调酸橙汁，但已开始强调鲜肉的重要性；要储存所有英格兰水手3个月内自由饮用的烈性啤酒是不可能的。即使官方对腐败食物的统计也达到五分之一。因此，除为适应气候情况而在饮食上作些改变——如在地中海改食大米、葡萄干、橄榄油、牛板油和喝酒等以外，在国外驻军靠当地补给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正如舰队司令诺里斯和乔治·宾1715—1721年在哥本哈根所发现的那样，在一个新的粮食基地大规模补给的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直布罗陀当时已成为主要粮食基地，但经验丰富的驻直布罗陀代办也只能部分克服丹麦的官僚作风和生产费用。[\[136\]](#)

英格兰的粮食代办通常只驻在海军基地，但这两种功能不一定重叠：停泊在当斯——这和斯皮特黑德一样是一个常用的集合点——的船只由多佛供应粮食，在其他“次要港口”可以从常驻的包买商的库存中取得粮食或由指定的行商在当地市场洽谈购买。法国海军不需要太多的国外交货站，不过在地中海有一个常设的领事机构则能帮不少忙。荷兰也十分依靠他们在里斯本、里窝那和别的地方的领事，虽然他们海军部给他们的舰长带来很多债务，长年不得偿还。[\[137\]](#)粮食的增加给会计带来问题，在此时期未能很好地解决，虽然英国议会和海军部对此十分敏感，并从1702年至1713年作了某些改进。可是英格兰粮食专员的最大困难在于对他们购买、加工和分配粮食的要求太大和时间太紧。虽然比一般贮备范围较狭，一个海军年度的粮食需求必须在前年冬天——这是适合盐渍的季节但不宜于采购乳制品——就准备好，并要防止腐败、过量订购和市场价格的波动。为此目的，粮食部比驻巴黎的军火商的优越性在于伦敦已控制了国内市场并更接近船厂；普利茅斯是个例外，它在依赖地方资源方面像一个法国兵工厂。

尽管雇用海岸供应船和办理他们到船厂的通行证并不十分迅速也不是没有损失，英格兰粮食的大部分不仅可以买到，还可以由中央直接加工。1684年前英格兰海军和一个商人集团签订了供应一切食品的

合同，法国政府此时仍然是这样做。1670年成立了海军军火部门的科尔贝尔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舰长们发横财，只要可能舰长们都会自己采购。从1689—1713年，这种合同制度是如何实行的至今仍不太清楚，只不过到1708年，和政府管理机构本身一样，它由于缺少现金而完全失掉信用。^[138]可以看到，早在此以前，当国王把船租给武装船部时，他只提供火炮而不提供粮食，海军经常要自己采购俘获船粮食。从原则上说，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英国制度可以对供应商实行更严密的控制并使交货快捷，同时可使国家免受物价突然波动的影响。粮食供应商以合同形式通过很少的几个商品行家在国内采购一定数量的粮食，并由当地船厂安排补给有限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海军部认为很可能产生贪污行为。^[139]粮食债务之所以如此难以控制——它对现金的不断要求压缩了其他部门的开支——并非这种办法本身不当，而是由于食品价格的高涨，民间的竞争和船队对辅助性食物的临时要求，这有时会在难以预见的地点发生。会计工作之不当和船上事务长之欺诈行为概括了其余的一切，他们这样做肯定是出于船长和商人的纵容。

这一切供应和服务意味着对半工厂半仓库式的船厂进行十分细致的分工和大量投资，并且要有各种技术，由大量栈单、垫款单、薪水册和凭单所支配的存货单。无论是战争或和平时期都有一批由行政和技术干部组成的核心常驻在这里，他们知道有必要储备劳力和物资以应付紧急状态。对科尔贝尔来说，一个兵工厂要有足够的储备以装备两倍附属于它的船舶的数目。事实上，当战争使工作白热化的时候就只能容忍一些临时张罗或劣拙的工艺。比如说，1689—1690年，图尔维拉的庞大舰队就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1687年以后，兵工厂就已耗竭殆尽，以致1688年有三分之一的舰队不能出海——这是1694年裁减舰队的前奏。把劳动力扩大到战备基础对一个邻近人口较密的中心的船厂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如1689年的查塔姆，但朴次茅斯却不是这样。特别的是，1688年只有400名劳动力的朴次茅斯，到1696年就业人数就超过了查塔姆，这两个城市当时的就业人数都超过了1200人。到了1711年，当查塔姆降到了这个水平以下而普利茅斯则上升到700人的时候，朴次茅斯的人数则达到了2000人。1689年，英格兰的全部船厂劳动力还不太高于这个数目；到1697年，它已差不多倍于此数；而到了1711年，H. M. 船厂记录在案的“技工”是6369人，其中半数是船匠、木工和锯木工。^[140]

如此规模的上升不会是毫无摩擦的，这涉及某些工种许可证的使用，特别是从报废船只的海员中招聘的索具工。法国海员一直受聘装备船只和卸除信管，而英格兰海员除非贿以双倍工资——这是海军部不同意的做法——则连把贮存从船上运到岸上也十分勉强。1708年曾作过试验，选择有资历的舰长作为船厂“监督”，他们有权惩办港口工人，这是1712年前驻厂专员所未能享有的权利，而海军行政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以国王御封的信吓唬工人。哥本哈根船厂的工作在和平时期由3000名海员（由罪犯补充）组成的后备力量担任，他们由国王出资供食宿，但1709年后，财政困乏，雇用劳力和采购物资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瑞典，同样的问题由于卡尔斯克鲁纳发生瘟疫而每况愈下。各地船厂当局需要对付工人们的烦躁情绪，他们干活仍按老办法，因为他们的工资被拖欠了一年多，这本身就意味着营养不良和生产下降。虽然每周有粮食补助，拖欠仍然导致哥本哈根的海员哗变，即使工资按时发放，英格兰专员仍然面临怠工、侵吞工款和因超时而吵架等问题。一般来说，设有船厂的市镇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全部依靠一个像海军那样不稳定的雇主。1704年，在布列斯特，只要拖欠工资5个月就足以迫使工人家庭出卖或抵押他们的财产；而1706年，迟付两个月就会招致罢工。即使工人们老实，他们的妻子也不会像他们老实了。由于军队强占和房客无力交付现金，他们的困难加重了。早在1709年的大饥谨以前，面包商就拒绝供应由于缩减海军开支而被裁的兵工厂雇工的家庭。1706年，在罗什福尔，潜在性动乱变成纵火。到了1710年，人们相信作为兵工厂秩序最后保证的海军警察的叛变指日可待。[\[141\]](#)

所有舰队的海员都十分憎恨不定期发放工资、不卫生的饮食和海上的严酷纪律。这种工资常常只是一纸借据，由职业票据收买者以很大折扣用现金收买，或转让给旅店主人和海军服装收购者。他们享受的某些好处，诸如对俘获品出售所得可能享受的微小份额，短期内免于因未能还债而坐牢之苦，对残疾鳏寡的少量福利。战时竞争激烈，为了招聘有经验的海员（“有能力”的或“年轻力壮的”），以及愿意出海的新手，多数商船都把工资提高一倍到两倍，海员在此情况下对海军就更不满。在某些地方参加武装船是一种更强有力的反引力，以致英格兰海军部1697年就想取消这一行业。法国则想把私掠战和长途贸易航行一样加以限制，办法是规定一个回航日期。有时候他们禁止所有船只从某些港口出航，英格兰就常常这样做，在半个月左

右禁止从一切港口出航，在荷兰港口这种办法显然能使海军船只完成船上定员，原则上他们从商船或渔船中每5人抽1人，主要从北海渔船队抽取。在17世纪末，这支船队雇用了1.4万人。^[142]在英格兰，由于春季封港加强了被称为“热压”的不分皂白的搜索，使1702年商船失掉三分之二的船员，并使其他船员躲藏起来，这种办法肯定是失败了。对法国来说，这不过是克服海军军籍登记地方性缺点的“万灵药”，军籍登记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政革新。

于1668—1673年提出并于1689年巩固的这种“分级制度”，其目的是给海军迅速配备人员，公平地分摊服役义务，并防止“强征”引起的暴乱。它根植于对一切海员和渔民的强制登记和分级，每人每4年应召1次——对罗什福尔和土伦来说则是每3年1次——船长和领港由于要培训新海员可以得到豁免。正如科尔贝尔所想象的，这也是一种福利制度，它特别规定在海员离开家时要发给他们家属一部分工资——这一点，1792年前英格兰实际并不承认，直至海员的妻儿们即使不至于沦落到求乞也到了十分穷困的境地。行政官发出的公布说明，只要有钱政府还是设法执行这种规定。^[143]不幸的是，1683年后备海员的半薪停止了，因此，某人如在服役期内不受征召就会受到很大打击。另一缺点，特别是对罗什福尔来说，则是新教徒的外迁。总的注册数字从1677年的2.9万人上升到1686年的59494人，到1690年则下降至55790人。^[144]除了受到豁免和在海上或国外服役的以外，这个数字不能满足1690年战斗要求的23175人之数——此数字比那年夏天英格兰的全部要求少1万人，但约略相当于荷兰九年战争期间的最大数字——即1.6万至2.4万人。把护航队、海岸警卫队和帆船队都计算在内的话，法国1690年的需求会大一点，虽然在帆船队服役的主要是囚犯和奴隶（见第17章）。另一方面，1690年是法国海军建设的高潮年，而英格兰海军从1694年到1696年有4.8万人，1702年后偶尔还会多一点——肯定超过这个国家本土海员的半数。^[145]

对1690年海军军籍登记缺点的补救办法法国是组织80个“海军独立连”，每连100人。同年威廉三世恢复了詹姆士二世的“海军团”。9年以后荷兰恢复了德威特的海军陆战队，不过英荷联合海军比法国较少使用陆战队；法国舰队有三分之一由陆上士兵组成。这些陆上士兵由他们的少校招募并供给服装，他们有别于海军警察和海岸民兵。他们需要在船上或船厂执行某些任务，从而组成一个“海员培训所”，

尽管他们的特长是作为经过训练的射手，这对私掠船特别有用。英格兰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前桅工。他们住在船厂附近，有少数补充船的定员，甚至取代商船回航中被强征的船员。[\[146\]](#)

对海军军籍登记如何起作用所知甚少。作为级别监督（1692—1710年）巡视海港的皮埃尔·阿尔诺在对这一规定作了某些删节以后，声称这个制度培养出比1693年需要的海员还要多；不过他要求负责各部门——有些地处内陆以便在内河船工中招雇新手——的专员之间以及他们在各区、各乡村教区或大型城镇的各部分的代办之间更多地合作。[\[147\]](#)在这方面，主要看一个总管对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和隐藏所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应付地方权贵、士绅和船主的能力，这些人往往和大部分英格兰商人和法官一样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有些总管由于懂得“管理海员的办法”而获得信任。由于战争导致死亡和失散，有些人的船舶登记紊乱。这些官员必须由他们兵工厂的同事帮助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在兵工厂里兵器局人员核对船上人员名册（全体船员），这和财务干事在英国船厂所做的一样，不过还要校勘一个总的名册。无论这位总管是否受贿，他总是工作过度，对检查每艘进出港口的小驳船疲于奔命。有些抵抗中心如马丁奇和圣特罗佩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据说出了不少庸碌水手的瑟堡（和朗格多克全部）。战时很多人逃到国外，如意大利或爱琴海，1706—1708年，对这些“船厂逃亡者”人数的估计高达3万人。[\[148\]](#)相反，在法国外国海员受到欢迎，但人数不如荷兰之众。在外国寄航港十分普遍的开小差也可能在陆路转赴兵工厂的小队中发生。土伦和布列斯特之能够通过陆路大批交换人员而损失不大是较为特殊的。总的来说，不管压力多大，兵工厂还是按时得到新海员并把他们按来源和素质在各条船之间进行分配，虽然也有自残者，但不合格的人数显然比英格兰征兵队在此时期搜罗到的人数要少。

法国征募引起的劫乱比在英格兰要少些，英格兰陆上的拉夫头子必须谨慎从事，以免人家控告他非法入侵。最重要的还是法国水兵有更大的自由。他不像英格兰水手那样在发工资前经常从一条船转到另一条船，他在离家前一般先领到两个月的预付工资——只要有钱这是优先得到照顾的，因为这比任何东西更影响到海员们是否心甘情愿地工作。即使在荷兰也和别的地方一样，由于工资拖欠越来越长，很难找到应募人员，特别由于发放办法出现明显的偏颇——不幸的是，这

在英格兰是十分普遍的。1699年，英格兰海员向议会请愿，反对把他们的伤病员作为逃兵对待；病号难免遭此待遇，除非他们运气好，病愈后又重返他们以前的船上服役。由于受薪专员于1704年转变为公职人员以及由于后来的风化问题，相对而言军籍登记的效率降低了。在战争的压力下，没有人期望各个阶级会轮流服役，虽然在封闭边界港和其他强制措施下极力设法奖励值得奖励的人员，使疲惫的船员得到休养生息，并分摊各部门的负担。各种恶习受到谴责，有时并受到惩处。不过只要海员名册和船舶登记发生紊乱，这种制度就失掉它作为一种有控制的征兵制度的主要优点。

不管法国的征兵制度有什么缺点，英格兰的征兵方法更为杂乱并公然带有煽动性，然而当代评论家却认为英格兰征兵法是一种有效率的、细致的人员配备的典范。即使“奖金”比垫付给所有法国新兵的工资还多，一个和平时期1万人的组织也不可能只靠志愿者就扩大到4倍，即使薪俸和工作条件都更有吸引力。雇用二三百名助手的招募团在海上或陆上展开大规模的工作，毫不懈怠，然而，保守的海员从1692年起就不喜欢整个冬天都把他们留在大船上，即使给他们发饷也不喜欢。这种革新本来的目的是要减轻春天招募的费用并将假期“错开”，但最终却成为一系列防止因强征而导致的擅离职守的措施。冬天巡弋也增加了“转船”的人数，因而造成发放工资的混乱并拖延了发薪日期。这种“产生更大苦难的苦难”^[149]及其因辞退海员补发的工资及票据买卖带来的恶果比强迫征募本身引起更大的道义上的愤慨，受到笛福等人的批评，这主要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如除了工资高涨外，由于把海员吓离港口对贸易的间接影响及商船上人员不足等。海军当局并非视而不见也不是漠不关心，主张船舶登记的人包括船厂专员圣洛和海军部大臣伯切特。1696年，议会设立了义务船舶登记处。1710年，它被承认失败而撤销了。后备人数从1698年的3万人降至1702年的1.7万人，其中很多无固定居处。由于保护其持有人不受强征的登记证可以金钱获致，这种办法失去了信用。只有强迫登记，否则予以处罚的办法才能杜绝这种买卖，不过即使有海关帮忙核对海员名单，英格兰海军机构仍然太小，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这符合他们十分不同的社会机构，英格兰人比法国人更加依赖民政官员的通力合作，但在这方面这种合作却有很多不足之处。

假如英格兰和荷兰可以不择手段地最终征召其相对地说较为充裕的航海力量，丹麦和瑞典则必须靠预见来节俭地使用它们的人力。和

法国人一样，丹麦人设法通过编纂船舶登记册来保证随时能找到服役的人员，虽然他们不同之处是把登记放在自愿的基础上。丹麦、挪威和外国海员都可以登记。他们可以免除一切义务劳动，船主奉命优先雇用姓名在册的海员。这种始于1679年并于1700年修改过的海员登记虽然不能满足海军的全部要求，却提供了一些核心人员，并在实践中证明是行得通的。瑞典人则不那么有成效。他们的核心海员由海员户和海员登记提供。海员户始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滨海专区可以在征兵和缴纳某些赋税上得到豁免，条件是提供对一定数目人员的给养，这些人在必要时要参加舰队。由查理十一世于卡尔斯克鲁纳附近首先建立起来的海员登记意味着有些人被派到一些小农庄，由于有国王的补贴，这些农庄足以养活他们。他们定期进行训练，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不需太多花费被迅速送到在卡尔斯克鲁纳的他们的船上。瑞典制度的缺点是它根植于陆地。它利用志愿者，包括外国人，不过瑞典军舰人员配备不足，因为大多数船员缺乏航海经验。

大家对去海军服役都谈虎色变——当代人将它比作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恐怖——人员不够的难题根源即在于此，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特别说明了这个难题。非战斗减员远远超过战斗造成的伤亡，有时并影响到一次战役的结果。1701年，班鲍在西印度群岛由于死亡和开小差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员，开小差的人特别多，但使英格兰舰队1693年在马提尼克岛损失了1000人的却是“疾病”，这和1706年一个月內西班牙装甲舰队损失的人数相同。在温暖水域滋生的败血症其酷烈程度仅次于热带的热病和痢疾。在甲板上拥挤不堪、空气难以流通的情况下，性病和肺病，中暑和关节炎也是造成大量“在船上熏蒸致死”[\[150\]](#)的原因。伤寒是由陆上淫猥污秽的士兵和征募人员带来的，[\[151\]](#)酗酒也引起很多意外事故。为了应付这种日常危害，多数船只都配备一名外科医生，但常常缺乏助手，于是，1691年英格兰模仿瑞典的做法增加了一名内科医生。在这方面和其他有关方面，荷兰的做法由约翰·德·威特予以改进，德·威特是詹姆士二世以外唯一的随作战舰队出海的主要政治家。但最高的标准却是早些时候由西班牙人确立的，他们最早使用医院船。图尔维尔在滩头堡有好几艘极为需要的医院船。到1703年，当英格兰人更好地理解某些伤病护理细则以后，他们雇用了5艘医院船。在陆上建立海军医院方面西班牙和法国遥遥领先。荷兰人依靠优良的民办医院，而英格兰海军部则利用权力在勉强迁就的伦敦医院征用床位。普利茅斯是唯一有自己医院的英格兰船

厂。在不设医院的船厂，伤病员就只好到由伤病委员监督的住户那里养病，这些委员在大多数港口都有代表。为纪念威廉的王后而建立的格林威治皇家医院是为领养老金的残废军人服务的医院，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中开始服役；而“负伤津贴”也可以从更古老的，由捕获船款项、军官的捐献和工资扣除额组成的查塔姆金库领取。由对进口商品和私掠品所课税款组成为残废军人提供半薪和为遗孀提供养老金的科尔贝尔伤病员公款保管处作出更慷慨的安排，特别是因为它对所有的登记人员开放。另一方面，靠教堂募捐和其他捐赠的哥本哈根海军医院从1682年就只为海军伤病员服务。对成立救济院和友好社团十分大方的英国人道主义对改善海员条件则不如为海军培养年轻人那样积极。1701年在纽卡斯尔成立的基尔门医院是实行互助的罕见例子。不过从1702年到1713年，英格兰对战俘的照顾比以前好些。另外有迹象说明，直接有关的官员对伤病员的需要也比较了解，但由于款项短缺、医生无能和海军专员事绪纷繁，困难仍很难得到解决。[\[152\]](#)

就像托马斯特·罗特医生1804年所说的一样，的确，“一艘管理完善的船很快就能平息一切不满情绪”[\[153\]](#)。一般海员可能出言不逊，工作无精打采，易于发脾气，但他一样能服从领导。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船长、领航、水手长和其他负责船上日常工作和掌管航行的官员的性格。除了战争和在外国港口停泊时需要执行的特殊任务外，一名船长有在他的巅峰状态下能了解他辖下每一名船员的任务。他早期在商船上或作为海员指挥官和亲信接受基本训练，很有可能年满二十就被委任为海军上尉。在海军上将德鲁特时代，荷兰舰队中有些舰长年龄不大，其中有他的儿子，不过这种情况在私掠船和商船船长中较为普遍。1660年以后，各国政府都不太愿意全部依靠传统的见习方式，它助长裙带关系而不保证效率。早在1663年，丹麦就成立了一个训练团，它的团员被派参加外国海军或随商船出航。瑞典商船的士官生接受同样训练。1701年，由于海军士官生连的成立，丹麦引进了一套较有条理的教育方法，除了航海经验以外，士官生还在哥本哈根的不来梅霍尔姆岛上一所学校里接受正规的航海和军事科目的训练。这是否和塞涅莱的得力助手、1692年派驻丹麦大使的迪乌松·德波里巴有关？不管怎样，1669年由科尔贝尔成立的训练团进行的训练是最系统的海军训练。为此目的，在其后几年成立了几所专门学院教授航海和士绅之道。1696年，从这些学院毕业的人数达到634人，他们从国家对科学的实际运用的兴趣中获益，特别是现代化海图的制

作。^[154]英格兰和尼德兰虽然在海洋测量方面领先，但仍然没有设立对行政军官的正式训练^[155]；基础训练是“船上”服务。1677年，在反对浅尝辄止的长期斗争中，海军部长佩皮斯设立实用航海术测验作为委派海军上尉的条件。相反，1717年，当一所海军学校在加的斯成立时，由于贵族的偏见，没有设入学考试。

不管怎样片面，这种安排宣布了作为永久性舰队产物的正式海军军官的诞生。永久性舰队不仅提供更持久的职业，而且由于战争爆发时需要增加现役舰只和后备军官而临时成立一部分未受雇用海员的半薪制。1694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扩大了这个1668—1675年为高级官员设立的原则，这项法令还把假公家之便侍奉海军司令和舰长的“仆人”数目减少了。1700年，当半薪被限于50名船长、100名海军上尉和30名工长的时候，就有必要成立一个资历表。就这样，虽然是缓慢的，但全职官阶的现代概念开始取代兼职职位。并不是担任每个指挥岗位的都比前任资历高。在挂海军中将旗号后，一名英格兰海军军官可能降为海军少将，虽然不至于降至海军上校。这种微妙的变化由于红、白、蓝中队的传统级别而变得更为复杂，这和尼德兰的海军军衔由于鹿特丹海军部资历而变化一样——当一名海军中将和德鲁特一样想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156]1689年，荷兰人同意英荷联合舰队由在场的英国高级军官指挥。这是很大的让步，它对荷兰士气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虽然偶有摩擦，其所以行得通，主要是由于荷兰指挥官，特别是威廉三世十分赞赏的范·阿尔蒙德之机智。^[157]到1702年，英格兰的海军军官数目已超过它的9个现役职位所能容纳的数量，由此产生了“潜服役”俾未受雇的海军将领得以领取半薪。1689年，法国有11名将级军官，包括1名波南海军中将和另一名勒旺中将，但不包括法国海军司令。法国海军司令是终身职务。1704年，他虽然名义上指挥了参加马拉加海战的舰队，但这个职位对海军的重要性已被黎塞留剥夺了。到了1712年，3名陆军中将已增加到5名，并有12名舰队司令。他们所取得的最高职位属于陆军方面，这就是法国陆军元帅；在社会上陆军级别较高，并从那里产生了一批海军军官。法国海军中一些最显赫的人物，特别是它知名的帆船队，都有骑士称号。图尔维尔开始是马耳他骑士，最终成为法国元帅。

随着一种职业性的团体精神的发扬，海军吸引了更多“名门望族”的子弟，特别是由于1689—1713年的战争可以从缴获敌方船只的财产中致富。查理二世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招募“绅士”，迫使舰长接受海军部提出的人选——所谓的“志愿者”。科尔贝尔有同样的偏爱，他认为传统的军事阶级比海员们更易掌握航海术。一名法国军官没有国王的许可就不能结婚。这也意味着对收买的考虑，因为没有私人财产的军官被认为易于接受为私人贸易服务、劫掠或非法处理俘获品、伪造名册和其他不法活动的引诱。这种违法行为不断发生。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财政压力下，法国海军风纪衰微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海外殖民大臣小蓬夏特兰严厉地谴责军官的野蛮和欺诈行为。^[158]英国军事法庭记录说明，野蛮行为受到包容，而怯懦则遭严厉惩处。这二者在西印度群岛都是常见的，在那里指挥官经常和老百姓发生龃龉，他们“咆哮威胁总督，纵横整个海岛，每个指挥官都好像一个土皇帝”^[159]。对贸易部的不断申诉，海军部只提醒他们注意要求军官和总督合作的训令，虽然它肯定了解船长的怪脾气给船厂专员们带来的麻烦。假如他们谦虚一点，就能协助船厂发现他们船的毛病。1697年裁减军备的时候，查塔姆专员就辛辣地建议，为了替他们找工作，能雇“所有像我这样的老古董，以便为这些时髦的花花公子参加新型海军扫清道路，并竖立起他们自己的通天塔”^[160]。

这是“绅士”和水手之间由来已久的互相猜忌的回响。到了1702年，这些猜忌仍如此强烈从而导致了一场反对班鲍的叛乱，有意义的是，即使靠了社会关系也未能使这次事件的元凶避免处决。从1703年到1712年，海军局证明303名前商船船员胜任海军上尉——比志愿者只少30名。这些人的比例逐渐上升，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充任舰长。^[161]

“水兵”有可能取得低级军官的职位或纵火艇、运输舰等的指挥。和敦刻尔克海盗巴尔一样，法国“蓝服军官”很少能打破主要是东南部和西北部贵族“红服军官”的垄断，特别是由于海军军职不像陆军那样从来不能购买。很明显，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尉级以上军官的空缺是很多的。1689年，皇家海军日记只开列589名军官，但1696年则开列1138名，到1702年降为952名，但到1712年又升到1068名——其中包括153名舰长、54名护卫舰长和6名载弹舰舰长、41名纵火艇艇长和18名补给运输船船长。^[162]但在这个时期给尉级以上和准尉军官之间作硬性划分是错误的。即使工长无法晋升为高级军官，一名英格兰一级舰

的工长的工资也等于六级舰舰长的工资，而一名海军上尉的工资则比任何船上水手长的工资高不了多少。一艘船的活动工长、领水和水手长比所有的上尉和很多船长都更为重要。假如船长掌握生杀大权，事务长则有他自身的独立权力。这些军官们有时共谋不轨，有时互相倾轧。但是他们互相为用的职务使他们搅成一团超过不同薪俸或社会地位对他们之分隔。真正的分界线存在于他们和他们拉杂的船员之间——如水兵有别于内河船员。

另一条线横跨在海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之间，文官决心要驾驭海军军官。海军军官肯定不是不能参加行政职务。他们之中很多是英格兰的船厂专员，法国则选择现役军官担任10个港口长，他们被法国海外殖民大臣蓬夏特兰称为港口的“灵魂”。在九年战争期间，拉塞尔同时兼任总指挥、海军部成员和海军司库。瑞典海军能干的海军上将汉斯·瓦赫特迈斯特作为海军学院院长和负责海军财政的海军总署事务部部长，从1689年到1713年有很大权力。不过，即使他充沛的精力也不能使他不愈来愈依赖文职官僚，他们在他退休以后就自己管理海军。到了1721年，那种由数名职员和一名因海上得意而获声誉的重要人物管理整个海军事务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行政人员获得了自身的权力，虽然他们之间有些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日渐扩大的责任不相称，英格兰的船厂专员就是这样，不过海军监督们并非如此。

专业知识很难，因此，政客也难以和专家抗衡。这可以说明在安妮皇后时期海军部的每周会议为什么形成一种形式，而路易十四亦从未能理解海军事务。技术官僚又因在职年限长而更胜一筹。贝贡在罗什福尔当行政长官长达20年之久，但是德沃弗尔统治土伦时间之长又远远超过他（1680—1715年）。佩皮斯在职年限超过30年，1660—1673年任法案官，1673—1679年和1684—1690年任海军部大臣。查尔斯·塞吉森，1675年以船厂办事员身份参加海军局，1690—1719年是法案官。至于1694年由拉塞尔提名的乔赛亚·伯切特，1742年前一直单独或和别人合任海军大臣。库尔贝尔·塞涅莱学习了几十年“海军细则”，1683年继承乃父衣钵任海军大臣。而蓬麦特兰（热罗姆·菲利波）1699年接任海军大臣前则和他父亲共过事。老蓬麦特兰1690年任职时的确缺乏这样的背景：塞涅莱的合理继承人被认为是迪乌松，他是法国海军基本法规《1689年法令》的作者之一，但他出不起购买职位的钱。有意义的是，其结果是提高了蓬麦特兰属下总管的影响力——这使海军官员和大部分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法国海军历史学家生

气。由于这些贵族对路易十四的大臣们独断专行持有偏见，因而他们对波南和勒旺局领导拉图什和萨拉贝里（1688—1709年）之类人物的蔑视不可全信。没有别的国家在划分文官和武官责任方面比法国做得更多。蓬麦特兰家族肯定支持科尔贝尔定下的文职人员的主宰地位，并以此教育他们的部属。但是他们的影响由于1695年国王的私生子图卢兹成年而下降，图卢兹年仅两岁时就成为法国海军元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削弱武装力量总代表的权力。他还领导港口的海军总署，以及该署对俘获品的裁判权和商船管理权：这些官员和海军官僚彼此仇视。另一打击是，1699年夏米亚尔升任总管理员，他是梅因特侬夫人的亲信，5年前梅因特侬夫人指示他起草一个经过削减的海军预算。在总管理员的压力下，从1702年到1704年，有200名海军军需官需出钱购买他们的职位，否则就要离任。尽管只是少数，海军因此丧失了有经验的人才。

在政治影响越来越耗竭法国和荷兰的海军经费的时候——那里的海军部对内陆各省未能履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给予他们财政补助的“承诺”十分恼火——英格兰海军信用却终于从1688—1689年的动乱中获益，尽管党派政治在官员之间制造了摩擦并提高了后台对他们事业的影响。大约占用国家战时支出四分之一的英格兰舰队^[163]的优越性首先表现为多戈尔芬财政的优越性。如本书别处（第9章）所提到的，在这方面，九年战争比其后的战争更为艰巨，这场战争开始时海军就欠下一笔非长期债务，其数目之巨足以支付1702年的海军开支。这笔债务于1704年还清，但是到了1711年累积的债务又达到差不多400万镑，食品供应商的票据价值下降三分之一——和1697年的长期债务一样高。9年之内，食物供应超过议会预算260万镑，因而迫使其他部门资金短缺。议会的决定并不等于现款，因为供应冻结在尚未收到而习惯地过高估价的税款上。法国海军收入取之于农场产品、人口税和造币厂利润等，它总是大大少于海军每年被核定的全部经费。^[164]延期收据则由海军司库私人借款抵付，他们3人中每年轮流外出一筹款——这和由一个商号主持的陆军“特殊战争”不一样，据说这种“战争”很少受个体金融家信用不实的影响。^[165]路易·德·卢贝尔是3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现在已是1705年3月，而我还需要为1704年支付1200万镑。人们都认为是我扣发了主要军官的工资和海员的薪饷。”^[166]在安排把现款从法国某地汇到另一地方时这些国库替罪羊的日子并不难过——在金融极度混乱的时刻处理这种工作本身

是需要相当技巧的。英格兰较为统一的金融市场和它的国债一样有很大的优点。有一次监督官沃弗尔有必要亲自去里昂一次，回土伦时带着许多金币，他在车上彻夜不眠；幸运的是，他和贝贡一样与银行界都有家庭联系。

荷兰海军部的财政困难可以从马斯省的情况看出一斑。这个省的选举团比米德尔堡制造的障碍要少些。1701—1712年，鹿特丹的军费共13035763费罗令，但到1713年只筹到半数——其中荷兰省6317915费罗令，至于几个“免装备”省则只有245274费罗令。这些省还欠140万费罗令，而荷兰省则欠510万，这说明乌得勒支和内陆省的短缺，虽然对其他省影响不好，但不是最主要的。^[167]从地方上征收的税捐——主要从“护航”和“执照”征收——只是支付日常防务费用。鹿特丹因此需要借它战费的一半——“额外费用”——这不是英格兰人想看到的费用。1709年1月，荷兰借款利息已高达9%，而阿姆斯特丹银行存款则比战争的任何时候都要少。^[168]即使由于阿姆斯特丹的贷款便利和有较高的税，尼德兰仍不可能同时在海上和陆上连续进行两场战争（第9、13章）。瑞典和丹麦则更不可能长期维持他们即使规模较小的舰队。瑞典皇室的收入主要来自皇族地产的实物收入。皇族地产是由查理十一世恢复的[第20章（1）]，但外国借款越来越难取得，而外汇储备则由于铜的生产减少而减缩。海员也不能和1709年前的瑞典陆军一样就食被占领国。丹麦比较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收入迫使它竭力从国外寻求借款。丹麦和金融家伊萨克莱布曼进行了长期但无结果的谈判，只要伊萨克莱布曼肯贷款80万丹麦克朗，他就获得丹麦境内一切军用物资采购的合同。给俄国不定期的财政补助又靠不住。

只要描绘一下海军行政官员是在什么样的财政限制之下工作，以及他们经过改进但仍十分不完备的会计和档案制度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弊端”是他们思想中之主流。创新往往是为了防止弊端。那个时代的海军函件充满了责难，尽管从后人看来，写这些信的人的手也不见得从来就是那么干净的。法国海军部长特别好责备人，好像期望他们的多面手能完成一切无法完成的工作。最后，很明显，中央政府坚持要了解一切情况。英格兰海军部和海军局可能会就一艘游艇的航行质量或一名捻缝工的病情书面通报对方。每周给部长写好几封信的海军行政官既不放过私掠船的货物，也不忽视一名军官妻子的怪癖。泽兰海军部有时也忙于反驳大使们的申诉，而马斯省为了一名士兵忘了给

舰长敬礼也要向国会汇报。即使在权力分散的尼德兰省，海军最终依靠的是政治家的意志和智慧。

即使他们对海军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决定最后优先权谁属的是政治家。他们特别需要决定他们能否把为其他军事部门所必需的钱花费在这样一个耗费巨大的军种上。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能对有影响的集团的抗议和要求置之不理。因此，只有在一个经济主要由海上贸易组成而其安全则完全仰赖于海军实力的社会，海军才有可能充分发展。这两个条件由于英格兰1650年后社会的性质及其1688年后的政治结构而绝对得到满足。英格兰的海军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必须，而一支常备陆军则被认为有害自由。欧洲大陆国家的海军政策，即使是尼德兰的政策，也必须更多地迎合别的兵种和多方面的需要。

（崔思淦 译）

[1] 参见本书原文第229—231、784页。

[2] 有关陆军的招募及社会成分参见本书第22章（2）。

[3] 参见本书原文第720—721页，以及原文第777页，彼得的军事改革。

[4]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552页。

[5] 工兵也许例外。在1664—1669年的克里特岛战争中，工兵从英格兰和荷兰的条令中受益匪浅（吉布与鲍恩：《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第1卷，第1部分，第187页），像博纳瓦尔的新式炮兵一样，他们许多人来自希腊和波斯尼亚。

[6] 马西格里：《奥斯曼帝国军队之壮大与衰败》，第一部分，阿姆斯特丹，1732年，第61—143页；吉布和鲍恩，第1卷，第一部分，第192—193、314—328页。

[7] M. 罗伯茨著：《军事革命，1560—1660》（贝尔法斯特，1956年）。关于查理十二世的革新，见R. M. 哈顿的《瑞典查理十二世》，第465页及以下各页，以及第525—526页。

[8] 法国普通士兵一天得5个苏，龙骑兵11个苏，炮兵15个苏。英格兰步兵生活费每天6便士，以及不在计算之内的2便士（减去几项扣除后）。在荷兰军队里，步兵每月发12.5盾，骑兵28盾。

[9] 参见本书原文第573页。

[10] 下面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挥系统里大体相互对应的军阶：

法国	英格兰	奥地利
法兰西大元帅	上 将	陆军元帅
后勤总长	军需主任	监 军
中 将	中 将	中 将
兵营主官	少 将	少 将
旅 长	旅级将官	(无对应军阶)
上 校	上 校	上 校
中 校	中 校	中 校
少 校	少 校	少 校
尉 官	尉官 (包括中、少尉、海军上尉)	尉 官
旗手 (步兵 Ensigne, 骑兵 Cornette)	(无对应军阶)	旗 手
中 士	中士, 骑兵班长	士 官
下 士	下 士	下 士
昂斯拜萨德	上等兵 (老兵)	上 等 兵

这张表不完整，将官里还有一些军阶未列入。军需主任经常行使非正式参谋长的职责——那时尚未设参设长——他的军阶可能低些。

[11] 参见本书原文第780—782页。

[12] 英式标准燧发枪，不带刺刀重10磅左右；瑞典式重5公斤；火绳枪重15磅多。

[13] 《兵法：原理和规则》（1748年），G. B. 特纳在他的《西方社会军事史》（1953年）第23页引用此语，普赛居1690年任军需主任，1734年晋升为上将。

[14] 这也是瑞典发明的，它比长矛短，通常插在士兵面前的地上，也可与撒在丛林里的尖铁障碍物结合起来使用——是大陆国家军队广泛使用的装置。

[15] 《回忆录、信札及短篇纪实》（爱丁堡，班纳坦俱乐部，1833年），第52页。

[16] M. 斯坦博克将军的“指示”（舍维克，1710年1月24日），引自《总参谋部战史》第3卷第521页上的引文（斯德哥尔摩，1919年）。

[17] 从技术上看，这次土耳其人的围城战是很出色的，但花的时间太长，卡拉·穆斯塔法围城时又未能作好防备敌人增援的部署。见J. W. 斯托伊著《包围维也纳》（1964年），特别是第150—173页和第235—264页。

[18] “攻”（contravallation）是对被围城市而修建的堑壕；“守”的工事则是为保护围城部队防备援军可能的进攻而修建的工事。

[19] H. 莫利摘自《笛福的早年生活与作品》（1889年），第135页。

- [20] 引自H. 韦安特著《法国陆军史》（1938年），第155页。
- [21] 引自F. E. 德沃尔特和J. G. 皮莱特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军事关系回忆录》（11卷及图，1835—1864年）第6卷，第11页。
- [22] 见G. M. 杜维廉的评论，《安妮治下的英格兰》第3卷（1934年），第19—20页。
- [23] 1675年的指令宣布它是皇帝与将军们之间的主要介体。军事会议设在格拉茨的独立分支机构，直到1705年尤金把它解散以前一直在处理土耳其前线的问题，此后所有军事活动皆由军事会议掌管。
- [24] 引自韦安特著《法国陆军史》，第155页。
- [25] 马尔巴勒1708年7月12日写给戈多尔芬的信，参见W. 考克斯《马尔巴勒公爵回忆录》（第3版，1847年）第2卷，第265页。
- [26] 关于蒂萨河一带附属国的复杂地形及水草地带，见本书原文第580页。关于土耳其在多瑙河的防御体系，参见本书原文第610页。
- [27] 与欧洲人相比，奥斯曼的营盘杂乱无章，臭名远扬。乱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营盘里的非战斗人员太多，有时超过战斗人员4倍之多，两者成4与1之比。据说每300人就配备一名刽子手。
- [28] 行军队形成“双翼齐飞”时，右翼的骑兵组成一个纵队；左翼的骑兵组成第二个纵队，步兵和枪炮手则置于他们中间，成第三纵队；部队成横队行进时，每个纵队都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战斗队形，骑兵位于纵队的首尾，步兵居中。
- [29] 罗伯特·帕克：《回忆录……1683—1718年，在爱尔兰和佛兰德》（都柏林，1746年），第80页。
- [30] 丘吉尔引自《马尔巴勒》（1947年）第2卷，第360页。
- [31] 反斜面即非面对敌军之斜面，特指不易被敌军观察到、不易遭敌军火力威胁的山坡之类。——译者
- [32] 《论战争艺术》（1754年），特纳书中引语，第24页。
- [33] L. F. 马西格里，第一部分，第99页。
- [34] 德拉科洛尼：《一场已往战役纪事，1692—1717年》（W. C. 霍斯利翻译，1904年），第159页。
- [35] 默罗特-韦斯特卢和帕克的《回忆录选集》，1968年出版（D. G. 钱德勒编）。序言对帕克回忆录的真实性进行过审阅，帕克的回忆录首次于1746年在都柏林出版；默罗特-韦斯特卢的回忆录1840年首次在布鲁塞尔出版。
- [36] A. 克赖顿编：《J. 布莱卡德中校的生活和日记》（1824年）。
- [37] 伯里尔编：《友好的叛徒：彼得·德雷克上尉回忆录》（1960年）；J. M. 迪恩：《佛兰德战役日记》（1846年私人出版）；C. T. 阿特金森：《马尔巴勒的心腹

之一：马修·毕晓普》，载《J. 陆军史研究》第23卷（1945年），第157页；J. 米尔纳：《所有行军、著名战斗、包围等简述》（1733年）。

[38] R. 哈顿编：《瑞典陆军信札，1707—1709年》（斯德哥尔摩，1954年）。

[39] 默里爵士编：《马尔巴勒……的信札和文稿》（5卷本，1845年）第4卷，第397页。

[40] 《创建现在及未来欧洲和平论文集》，第1章。

[41] 贺宁根-胡纳：《瑞士—荷兰关系史论文集》（柏林，1899年），第71—82页。

[42] 威尼士1692年在瑞士招兵的情况也是如此。招来的新兵是送到摩里亚去的，这是所有战场中最不诱人的战场。

[43] E. 莫斯卡：《1703、1706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的阿尔巴省》，载《萨丁王国历史文献》第55卷，1957年，第67—101页。

[44] 参见本书原文第560—561页。

[45] 关于由柯尔贝尔提出的海军军籍登记制度，请见本书原文第821页及以下各页。

[46] 陆军编制人数为43756人。到1709年其中2.3万普鲁士兵在佛兰德，8000名在意大利。C. 约尼：《普鲁士皇家军队史》（4卷本，柏林，1928—1933年）第1卷，第503页。

[47] 1720年后情况改善。有关这方面改革，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295—296页。

[48] 参阅T. 霍埃尔《1700—1750年科隆直辖市的征兵》（波恩，1911年）。

[49] 《别对兵器发慈悲》，载《地道的英格兰人作家作品集》第2卷（1705年），第426页。

[50] 《别对兵器发慈悲》，载《地道的英格兰人作家作品集》第2卷（1705年），第445页；参阅笛福著《评论》，1705年3月31日和1706年1月31日以及《英格兰一项商贸计划》（1728年），第69—74页。关于英格兰穷人，参阅本书原文第259—260页。

[51] I. F. 伯顿：《为半岛战争提供步兵，1703—1707年》，载《历史研究学报》第28卷，第35—62页。

[52]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2章。

[53] 就步兵团而言，瑞典通过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从丹麦手中得来的南方诸省不在这次改革之列。1675—1709年的战争说明那里百姓的忠诚是很不肯定的。

[54] 瑞典陆军总兵力在正常情况下是：在瑞典和芬兰有178个步兵连（25217人）和95个骑兵连（11459人）。这些部队是按“协议”制度征集的，国家给应征入伍的人以土地。在瑞典和在国外单个入伍的人多数驻扎在瑞典南方和海外，名义上有

骑兵8444人，步兵21992人。但实际兵力大大少于这个数字。见C. O. 诺登思凡的《瑞典陆军1700—1709年》，载《卡罗林斯卡年鉴》（1916年），第171页及以下各页。1699年8月25日有个估计数字：在丹麦的部队有23000人，在挪威有10500人。见《大北方战争史统计数字》（丹麦总参谋部，10卷，1899—1934年）第1卷，第88页及以下各页。

[55]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342—343页。实际上，这个法令完全改变了1702年的法令，1702年法令是允许农民迁徙自由的（在他6年服兵役期间除外）。

[56] 见本书原文第729页及以下各页。

[57] 同样，为了提供足够的武器，1697年后大举发展矿业和冶金业，此举成败取决于对沙皇的农民、贵族及女修道院属下人群进行工业征兵的情况。

[58] 1711年后，彼得一世也邀请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军官”在第聂伯河右岸建一军事屯田区；1726年哈布斯堡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也来到这里。参见B. 诺尔德《俄罗斯帝国之组成》（两卷本，1952—1953年）第2卷，第32—33页。

[59] 参见本书原文第713—714页。意味深长的是，像奥尔登堡的慕尼黑这样能干而富有的人也觉得他在波兰军中的职务使他无法忍受，于1721年投奔了彼得一世。

[60] 早在1704年3月就有人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为“全国所有贵族青年”参加“士官队”一事作好安排。建议很可能是太子提出的。参见C. 欣里克斯《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青年时代》（汉堡，1941年），第98页。

[61] 1699年，有410名德意志人（丹麦人是136名）在丹麦总共27个团的22个团里充当军官。参见《大北方战争史统计数字》第1卷，第108—109页。

[62] 在伊曼纽尔军中的430名军官中，直到1705年11月10日，有131名是巴伐利亚人，61名日耳曼人，23名奥地利人，3名瑞士人，34名法国人，16名洛林人，42名瓦龙人或佛兰芒人，31名意大利人，35名爱尔兰人。参见K. 施道汀格《马克斯·伊曼纽尔二世统率下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国陆军史，1680—1726年》（慕尼黑，两卷本，1904—1905年）第2卷，附录第6页。这里所列的尚不全。

[63] 普鲁士步兵操练的严格和刻板可追溯到大选侯（第二任妻子所生的）长子腓力·威廉（1669—1711年）。他训练出他的姻兄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和侄儿腓特烈·威廉。根据军事会议1702年的命令，他团里使用的操典便印发给普鲁士所有步兵团，供他们学习和使用。

[64] 参见B. 威廉斯著《斯坦厄普》（牛津，1932年）第7页上引语。

[65] 参阅本书原文第340页。士官队是卢瓦创建的（见本书原文第223—224页），1691年后士官队的招募工作便停了，在近卫军或滑膛枪团里服役的经历有助于取他们而代之。

[66] 路易十四任命的276位中将中有164位的社会出身已查明，其中43位出身于16、17世纪封为贵族的家庭，114位出生于更古老的贵族家庭，只有4位可以说是出

生于非贵族家庭。见A. 科尔维西耶《路易十四的将军们及其社会出身》，载《17世纪》第42—43卷（1959年），第41页。

[67] 《以服务获取显贵身份的若干手段》，参见罗沙·戴戈隆主编《沃邦的家庭和著作》（2卷本，1910年）第1卷，第642—646页。

[68] 《17世纪的家庭和人口》，载《17世纪》第15卷（1952年），第454页。

[69] M. 布鲁歇：《维克托·阿梅代二世1721年关于萨瓦公爵领地政府的训示》，载《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历史和哲学学报1900年》，1901年，第286页。

[70] R. Filamondo, JL Genlo Pellicoso di Napoli.

[71] （1694年）书中收进大约50位那不勒斯军官的简历，这大概是对一个古老军事传统在文学上的取得反响之一。

[72] A. 格雷编：《1667—1694年众议院辩论集》第10卷，1769年，第263页。

[73] 海斯：《英国陆军中的苏格兰军官，1714—1763年》，载《苏格兰历史评论》第37卷（1958年），第25—27页。

[74] 在安妮女王统治期间，负责伤员病号的专员在军事通信中占突出地位。他们的部分开支从扣发的薪饷中出；伤兵很少领到退伍金、养老金。普鲁士1705年为伤残人员单独设了一个基金，到1709年受到基金帮助的约有2000人；172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开始建立庞大的波茨坦军队孤儿院。在巴黎，“皇家禁军院”里据说收容的官兵多达7000人。然而路易十四后来的战争表明它还不能满足需要。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将能够担负卫戍勤务的伤残人员组织成连队。

[75] 能与之比肩的是尚贝里家族（后成为一方显贵），他们为去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提供一路上的给养。见F. 韦尔梅尔《17世纪对农民进行的军事训练》（1911年），第64页。

[76] 战争对那里的粮食和货币供应的影响，见本书原文第320—321页。

[77] 参见本书原文第303—304页。

[78] J. H. 欧文：《安妮女王统治时的海战》，附录C，第277页。

[79] 巴黎，国家档案馆，海事类B5，No. 3，以及G13，第11、24—31页。1689年法国人只有113艘舰船，其中包括35艘三等和28艘四等舰船（同上，G9，第23页），而1702年有54艘三等的（60—46门炮），仅有17艘是四等的（44—36门炮）。这些数据不含大帆船。1716年大帆船还有25艘。参阅本书原文第563页。他们的一等和二等舰大体和英格兰的一、二、三等舰相当，而英格兰四等舰大体相当于法国三等舰。所有大国都不时修改等级，然而法国确切分等级时间始于1689年4月15日的“皇令”。

[80] 见欧文的书，第273—277页；J. 埃尔曼的《威廉三世战争中的海军》，第4页。

[81] J. S. 科贝特编：《战斗训令，1530—1816年（海军）》（1905年），第175—194页。关于这个世纪里舰船、大炮及队形相互影响的演变情况，见埃尔曼的书第1章及F. L. 罗伯通的《海军武器装备的演进》（1921年）第15页及以下各页。队形对当时粗糙的弹道是合适的（甚至敌人也承认这点），不过调动时需要强调纪律和战术控制，以及全面的密码信号——由于詹姆士二世叛逃，法国在这一点上据说获益不少（L. E. 霍兰：《国家船舶及海运业的镜子》第39卷，1953年，第5页及以下各页）。队形战术中的形式主义与当时陆上战斗的趋势相仿（上文第22章），M. 刘易斯在《英国海军》（1948年）第455页及以下各页中谈了这个问题。

[82] 罗伯逊在他书的第41页上提到英格兰建造的“彭布罗克号”战舰。该舰从法国人手上夺回时，舰上只有50门炮，而不是原来的64门。

[83] 埃尔曼，第372、430—432页；以及J. C. M. Warnsinck的*De Vloot van den Koning Stadhouder*，1689—1690（阿姆斯特丹，1934年），第13—14章。图尔维尔率7艘（每艘有80门或者更多炮）军舰，其中包括“皇太子号”（110）和“太阳号”（98）。

[84] 参见R. 梅曼著《路易十四王朝的海军装备》；参阅航海研究学会的不定期刊物第5期第2部分《法国舰船，1648—1700年》（P. 勒孔蒂汇编，剑桥，1935年）。

[85] 参阅航海研究学会的不定期刊物第5期第4部分《尼德兰联合省的海军，1648—1702年》（A. Vreugdenhil汇编，1938年），埃尔曼著作的附录2，及P. 勒孔蒂的上述引文中。J. C. de Jonge的*Hel Nederlandsche Zeewezen*（第3版，5卷本，1858—1869年）第3卷，附录7的表上可见，荷兰在这几年建造了55艘舰，舰上的炮从52门到90门不等。

[86] 梅曼著作第664—666页。

[87] S. C. 范坎彭，*De Retterdamse particuliere scheepbouw in de tijd van de Republiek*（阿森，1953年），第65页。

[88] J. J. 巴克尔·德克斯：《分布在各海域的荷兰海军》（海牙，两卷本，1890年）第1卷，第810页。关于17世纪70年代英格兰受益于法国和托斯卡纳，见J. R. 坦纳编《附有说明的未付印的海军手稿分类目录》第1卷（N. R. S. 1903年），佩皮斯图书馆，第255页及以下各页。

[89] 冯·坎佩，第65—66页。

[90] 欧文引文，第74页。

[91] 这个原则没有立即执行，却比爱德华·弗农提出的要早多了，而人们通常将此归功于他，见A. N. 瑞安的《威廉三世及布列斯特舰队》，载R. 哈顿与J. S. 布朗利编辑的《威廉三世及路易十四》，第49—67页。

[92] 沃辛克，第85页。关于法国对巴尔弗洛海战的看法，参阅J. de la Vaernd著《图尔维尔元帅》（1943年），第220页。

[93] H. C. 福克斯克罗夫特：《见风使舵者的特性》（剑桥，1946年），第26页。

[94] J. W. 史密特撰文探讨他们的犹豫不决。该文载J. S. 布朗利和E. H. 柯斯曼编辑的《英国与荷兰在欧洲和亚洲》（1968年）第13—36页。

[95] De Jonge, Vol. IV, pp. 87—88; F. 斯纳珀, *Ourlogsinvloeden on de overzee handel van Holland, 1551—1719* (阿姆斯特丹, 1959年), 第268—270页。

[96] De Jonge, Vol. IV, pp. 87—88; F. 斯纳珀, *Ourlogsinvloeden on de overzee handel van Holland, 1551—1719* (阿姆斯特丹, 1959年), 第194页及以下各页。

[97] A. T. 马汉在《海上大国对历史的影响》（第5版, 1950年）第218页上援引。

[98] 见本书原文第430页; 参阅斯纳珀, 第231页。

[99] 致汤森和德拉蒙德的两封信, 1711年2月6日和3月30日, 引自上书第338、264页。

[100] B. Van' t霍夫编: 《马尔巴勒与海因修斯通信集》, 第354页。

[101] 见斯纳珀, 第203、231、242、244页。

[102] J. K. 奥登迪克: 《约翰·维特和海军》（阿姆斯特丹, 1944年）, 尤其是第7页。

[103] 九年战争中出售战利品的总收入情况参见G. N. 克拉克的《荷兰结盟与反法贸易战》第148页, 此后几年的收入情况也以同一资料来源为基础。感谢泽兰省藏书目录馆的M. P. 德布鲁因先生提供的资料。不含贝尔（Veere）和齐里克泽两个小港, 并且不考虑某些细小因素的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年份	弗洛辛 (佛兰芒镑, 1 镑 = 6 荷兰盾)	米德尔堡	总计	年均 (战时)
1689—1698	840897	665719	1506616	167402
1698/9—1702	78076	35094	113170	—
1703—1707	510148	645657	1155805	231161
1708—1712	261337	259259	520596	104019
1713—15/17	1895	21108	23003	—
合计	1692353	1626837	3319190	

可以看出, 1703—1712年的年均收入虽然比1689—1698年的略高些, 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下半阶段里, 收入不及上半阶段的一半。1702—1713年发了300多次佣金, 见J. S. 布朗利著《1707年雅各布·索京给所罗门·雷德斯下达的某些泽兰私掠船的命令》, 载《威廉三世与路易十四》, 第165页。

[104] 九年战争中出售战利品的总收入情况参见G. N. 克拉克的《荷兰结盟与反法贸易战》，第169—174页；同前《海盗船、泽兰人与斯堪的纳维亚海运业》，载M. 莫拉《轮船与北欧海上经济》（1960年），第93—109页。

[105] 见J. F. 钱斯《乔治一世和北方战争》（1909年），第46—48、65—68页。

[106] 见克拉克著《荷兰结盟》，第150—151页；伦敦公共档案馆H. C. A. 26/13—21。这些佣金以武装商船最多。增加的数量也确实惊人。一部分原因是1696年废除了1689年公布的禁止进口任何法国商品（包括战利品、赠品）的法案。

[107]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圣·马诺的贸易和私掠船》，第17卷，第5部分（1964年），第631—647页，以及《法国私掠船战争，1702—1713年》，载H. E. 贝尔、R. L. 奥拉德合编的《1600—1750年的历史文献，呈献大卫·奥格》（1963年），第213—216、229页；参阅A. 莫雷尔的《1681—1715圣马洛的战争》，第132—173页；H. 马洛：《敦刻尔克的海盗和让·巴尔》（两卷本，1913—1914年）第2卷，第418页，以及《敦刻尔克，英雄的城市》（1918年），第75—76页。

[108] 《沃邦的家庭和著作：“赋闲”与书信》第1卷，罗沙·戴戈隆版，第454—461页。沃邦的想法早些年已经考虑成熟，参阅马洛的《让·巴尔》，第2卷，第327—328页。

[109] M. 德瓦林科的回忆录（1711年），国家档案馆，船舶，G144。

[110] L. 罗思克鲁：《反对路易十四》（普林斯顿，1905年），第377—385页。

[111] 见克拉克著《盟邦荷兰》第5章及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中立国贸易》，《英国国际法年鉴》（1928年），第69—83页；C. J. 库尔斯拉德著《1780年前的海上中立》（波士顿，1936年），第123页及以下；P. C. 杰塞普和F. 迪克著《中立》第1卷，书中随处可见。如要研究英格兰和法国文件者，请参阅R. G. 马斯顿著《海事法及海关》第2卷（N. R. S. 1916年）；R. J. 风林著《新评1681年海军训令》（罗歇尔，两卷本，1776年）第2卷，第213页及以下各页；勒博著《新逮捕法令》第1卷[共和七年（1799年）]。

[112] E. F. 霍克斯谢尔：《瑞典经济史》（剑桥，1954年），第97、111—114页；[R. 莫尔斯沃思]《丹麦情况介绍：1692年的丹麦》（第4版，1738年），第88—89页。G. de 兰珀蒂著《18世纪历史回顾》第12卷（海牙，1734年），第134—137页。参见J. H. P. 巴富特著*Danmark-Norges Handelsflåde, 1650—1700*（克龙贝格，1967年）。

[113] O. 布郎宁编：《乔治·鲁克爵士的航海日记》（N. R. S. 1902年），第11页及以下各页。

[114] R. C. 安德生：《1725年地中海里的帆船舰队，水手的镜子》第42卷（1958年），第179页。参阅同一本书，《波罗的海中的海战》（1910年），第8章。

[115] 引自埃尔曼，第526页。

[116] E. 查佩尔编：《塞缪尔·佩皮斯官方文件》（N. R. S. 1935年），第20—29页。

[117] 神父拉巴特说，1694年迪卡塞（后任圣多明各总督——译者）率4艘皇家舰船和1500或1600个海盗来到圣·多明克海岸[见《通往美洲岛屿的新航线》（海牙，2卷本，1724年）第2卷，第213页]。海盗第一次来到马丁尼克就准备做弥撒，与教会分享他们的财富，拉巴特神父对此印象甚佳，称赞海盗的虔诚和他们的情意（第1卷，第72—76页）。这与海盗重情重义的作风是一致的，他们分配掠来之物（à compagnon bon lot）时讲究情义，“租船合同”里也明文规定对受伤人员要作赔偿。但殖民官员却夸张地把他们说成是不可救药的“浪子”。迪卡塞有时袒护他们，为自己政府镇压他们感到遗憾，但迪卡塞也觉得他们无法无天，不听调遣，主要是因为他们用选票的多数来控制当选的代表，（政府）急召他们从海上返回守卫疆土时，他们又拒不服从。他们并引诱合同未满的佣人、工匠以及商船水手等加入他们的行列。国家档案局，“殖民地”C9A/2，第52、465—466页，以及C8A/16（密尔顿先生交还的诸岛现况备忘录，1706年5月10日）。

[118] A. P. 桑顿：《王政恢复下的西印度政策》（牛津，1956年），第239—244页。

[119] D. A. 鲍：《沃波尔时代的英国海军部》（普林斯顿，1965年），第353页；R. 伯恩：《安妮女王的海军在西印度》（纽黑文，1939年），第72—74页。

[120] 许多摩擦是因为对海军的票据应打多少折扣看法不一而造成的。关于波士顿“乡下钱”价值的类似矛盾请见G. S. 格雷厄姆编《沃克的魁北克远征，1711年》第319页及以下各页，第336页。

[121] 埃尔曼，第416页及以下各页。

[122] P. 傅尔高尼埃在《图解敦刻尔克史》第2卷（布鲁日，1730年）第130页上援引1706年4月的一份统计材料（不含船上的海员和寄宿者）：2682名家长、3098名已婚妇女和丧偶的寡妇、937名12岁以上的姑娘、5847个孩子、742个仆佣和277位牧师——总共14274人，住在1639间屋子里。罗什福尔1690年人口不超过3万人，住在木质的“cagennes”里勉强应付，直到贝贡控制了罗什福尔后这里才变成秩序井然的城镇。见梅曼的书，第33、164页及以下各页；参见Y. 毕扎尔《路易十四治下的航海及殖民地官员：贝贡》（1932年）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123] 梅曼，第65、967页及以下各页。

[124] 国家档案馆，船舶、海运类B3/59，页码25。

[125] P. W. 班福德：《森林与法国海上力量，1660—1789年》（多伦多，1956年），第95页及以下各页。

[126] 国家档案馆，船舶B3/95，第145页；船舶B3/118，第333页。北方的桅杆可用30年，而多菲内的桅杆只能用6年。埃布罗三角洲盛产焦油和大麻，1724年Geronymo de Uztari (t) z力主在这里修建一座新船厂。他的著作英译本《贸易及海事的理论与实践》（两卷本，1751年），尤见第72章。

[127] R. G. 阿尔比恩：《森林与海上力量》（剑桥，1926年）第3章；班福德，第23页及以下各页，第82页及以下各页；A. Peyrisqt：《普罗旺斯的森林难题》，载《历史上的普罗旺斯》第15卷（1965年），第229—244页，以及第16卷（1966年）第42—71页。参阅M. 德维兹《森林问题讨论会记录》（1967年），尤其是第141页及以下各页，以及第219页及以下各页。

[128] 挪威的栎木被丹麦订购一空，英格兰就收买杆材和其他已锯开了的木材，数量不断增加。这些产品不像原木，丹麦人对它们不感兴趣。H. S. K. 肯特：《18世纪英格兰与挪威的木材贸易》，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连载部分，第8卷，第65—67页。英格兰主桅杆的标准直径是：1英寸（桅长）1英尺。最高的桅杆有38英尺，约18吨重，其价格则比一个28英尺长的高出若干倍。弹性、耐用和匀称是要求它必备的品质。参见J. J. 马隆著《松树与政治：在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海军储备和森林政策，1691—1775年》（1964年），第4—5章及以下各页，第839页及以下各页。

[129] R. 戴维斯：《英格兰造船工业的腾飞》（1962年），第25页及以下，第66页及以下；B. 普尔：《海军部合同，1660—1832年》（1966年），第49—61页；埃尔曼第433—439页；参阅A. J. 霍兰著《水手的镜子》第49卷（1953年），第21—27、275—287页。

[130] 除阿姆斯特丹和北方地区外，对其他所有造船厂而言，位置靠近好处多（包括有利于技术和质量监督），其优点超过赞丹的低价位，见范·坎珀，第91页及以下各页，第113页及以下各页。英格兰海军部（内设4位负责供应的专员）出于同样原因，青睐泰晤士河的造船商。

[131] R. D. 梅里曼编：《安妮女王的海军》（N. R. S. 1961年），第141、155页及以下各页。

[132] 见梅曼，第881页及以下各页，第898页。

[133] 见埃尔曼，第59页及以下各页。桅杆主要签约人约翰·泰勒也从新英格兰进口。

[134] 见普尔，第66—68页。

[135] 布列斯特，海港档案馆，IE458，第412—413、750—751页以及IE460，第41、879—881页；国家档案馆，船舶B3/118，第495、502页。

[136] 丹麦啤酒少得出奇，1720—1721年用法国白兰地补充；在此之前，唯有朗姆酒是获准的烈性酒——在去热带的航程中用。见D. D. 阿尔德里奇的《1715—1729年间英国海军远征波罗的海的粮食基地》，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12卷（1964年），第1—25页。

[137] 1710年6月2日泽兰因未结清1705年以来的账单而亏欠诺塞船长1500镑，亏欠其他几位船长37490镑。海牙，Algemeen档案馆，海事2536。

[138] 1704年4月，布列斯特的行政长官已经被迫用自己银行存款作抵押，以使该市肉铺老板手里有点钱，与此同时，运酒从波尔多来的三桅帆船的小船主们又恳求付给他们运费。布列斯特港档案IE452，页码383、419。

[139] 托马斯·里奇是朴次茅斯的一个大酿啤酒商人、议员，1710年2月被下院取消议员资格，原因是他跟船上事务长一起搞卖空生意，没有交货而开具发票，钱却两人分了。哈里奇、查塔姆、罗彻斯特和迪尔的酿酒商也被议会下院委员会查明犯有欺诈行为，而多佛和朴次茅斯的粮食代理出具交货证明时很不严肃。参见P. 马赛纪斯的《英格兰的酿酒业，1700—1830年》，第197页及以下各页。

[140] 见埃尔曼，第636—637页；梅里曼，第373页。就业情况冬季最好。然而这种季节性波动在1702—1703年不似以前那么厉害，也许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船在夏天从国外回来了，更多的船从事贸易保护活动了。

[141] 布列斯特港档案馆IE453，第253、721、821页；IE457，第154—156、220、536页；IE458，第3页及以下，第173、859页。参阅M. 吉罗著《码头上的水手和工人》，引自《扇子的历史》第2卷（1953年），第343—352页。

[142] C. R. 博克塞：《荷兰共和国里需要久坐的工人和靠航海为生的海员》，载《不列颠与荷兰》第2卷（J. S. 布朗利和E. H. 科斯曼编，格罗宁根，1964年），第149页。开到格陵兰的船，从1680年到1689年，平均每年为198艘，而从1690年到1699年下降到平均每年只有94艘。G. van Santel编： *Alphab. Naam-Lyst van alle de Green landsche en Straat-Davissche Commandeurs...*（哈勒姆，1770年），第26—27页。参阅本书原文第848页。

[143] 见（例如）国家档案馆，船舶B3/131，第317页（土伦，1705年8月30日）。

[144] 根据1687年考察，各地注册人数如下（国家档案馆，船舶09，第81—82页）：

敦刻尔克到迪埃普	3818	巴斯克港
1831		
勒阿弗尔到格朗维尔	5501	朗格多克 2092
布列塔尼	14991	阿尔到昂蒂布 12068
普瓦图到吉耶纳	10178	总共（除去7388个免税人）
50479	参阅R. 梅曼《国家军舰上的水手与士兵，1661—1690》（1937年），第209页。	

[145] E. L. 阿谢尔：《抵制海员分级》第66卷，加利福尼亚历史出版社1960年版，第91页；C. R. 博克塞，loc. cit，第153页；埃尔曼，第110页。

[146] 英格兰的海军陆战队1699年解散，1702年重建，共6个团，不超过8000人（见梅里曼，第47、177—179、207页及以下各页）。荷兰1665年建立了陆战团，1679年又解散了（见乌登代克，第142—144页）。然而当议会把威廉三世的3个近卫团解散后，国王反对海军选举团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又组织了3个团。海军选举团在“九年战争”中真的是小事聪敏大事糊涂，因为敌方的滑膛枪手常把他们的海员赶到甲板下面去，所以就有机会强行登船。见J. R. J. P. 坎比埃尔的《荷兰陆战队，1665—1900年》（赫尔德，1899年）；参阅H. W. 里奇蒙的《1739到1748年战争中的海军》（3卷，剑桥，1920年）第1卷，第267—275页。

[147] 因而马赛一分为四（还有第5个部分，就在与马赛相邻的乡下）；杜克洛是多年负责马赛的专员，他说他从不诉诸武力，这是因为他对马赛大街小巷的情况十分熟悉。国家档案馆，船舶，海运B3/71，第706—709页。阿诺尔德1693年的报告，参阅同上资料来源B3/78。

[148] 国家档案馆，G7/1830（1708年12月10日克雷塞尔给总监的报告）。

[149] [威廉·霍奇斯]《大不列颠的呻吟》或《英格兰皇家海员遭迫害、崩溃和破坏……的情况报告》（1695年），第2页。关于工资取消（由于海员在发放“总的解雇金”时人不在而未发的工资）以及通常的工资难题请看梅里曼的书第173—175页。海员一旦名声不好，他们就拿不到一分欠款。

[150] 《大不列颠的呻吟》，第11页。

[151] 乔治·圣洛：《英格兰的利益》（1694年），第43页。参阅J. J. 基维尔的《医药与海军，1200—1900年》第2卷（1958年），第245、264页，并参阅C. 劳埃德编《海员的健康》（N. R. S. 1965年），第28页及以下各页。

[152] 基维尔，第235页及以下各页。参阅O. 安德森《将战俘派遣到远海对舰队带来的影响，1689—1783年》，载《水手的镜子》第45卷（1959年），第243—249页。

[153] 《航海医学》，重印于劳埃德的《海员的健康》上，第267页。

[154] 总共706人（如果军官包括在内），分驻三地——罗什福尔、布列斯特和土伦。到1712年人数降到467人，其中413人是卫兵（国家档案馆，船舶，G11/19）。

[155] 见A. H. W. 罗宾逊《英国的海洋制图学》（莱斯特，1962年），第3章。

[156] G. 布兰特：《米歇尔·德鲁特的一生》（阿姆斯特丹，1698年），第336—337页。1665年年轻的特朗普拒绝在德鲁特麾下效命，后来舰队增设三位文职副手才把这问题解决，三人中有一人便是德威特（荷兰政治家——译者）（资料来源同上，第290页及以下各页）。

[157] 威廉三世的英格兰同事们知道，打通“范·阿尔蒙德到国王的一条线”比再三恳求国王管用；A. L. 范·谢尔文： *Philips van Almonde, Admiraal in de gecombineerde vloot, 1644—1711*（阿姆斯特丹，1947年），第135页。

[158] M. 吉罗：《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民心危机和政权危机》，载《年鉴》（*E. S. C.*）第7册（1952年），第172—190页和《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人道主义倾向》，载《历史评论》第260卷（1953年），第217—237页。

[159] 牙买加商人的请愿书，1696年，鲍纳援引，第214页。参阅上书第287页。

[160] R. D. 梅里曼编：《塞吉森文件》（N. R. S. 1950年），第272页，同前，第131—136页。

[161] 鲍，第98页。

[162] 国家档案馆，船舶G9—G19。在殖民地执勤的军官一度约有50名，包括在本地治里的一对夫妇。

[163] 对各年情况进行粗略估算，1696年到1697年舰队开支占国家战时开支的34%，1710年到1711年降为15%。见D. C. 科尔曼的《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海军码头》，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6卷（1953—1954年），第136页。

[164] 国家档案馆，G7/1830。从1708年到1713年，国家批准的经费介于1400万里尔到1600万里尔间，而从农场产品等征收的税款只在400万里尔到1200万里尔间。这些年大帆船的开支变化不大，每年近300万。

[165] 海军司令1704年1月8日给海军财务总监的信，资料来源同上，1828年。

[166] 资料来源同上，1829年。到11月11日财务总监吕贝尔死，欠债近700万，一个基金（fouds）也未搞到。到1711年他的几个继任者手里还有100多万债务转让证书没有偿还（资料来源同上，1838年）。1704年不仅是开支极大的一年，而且这年还得在已获批准的1800万里再减少500万，以偿还以前几个司库欠下的债，而吕贝尔本人1702年就接下250多万的债务。布列斯特兵工厂1704年拖欠的工资，一半被转让到布列塔尼出售海岸警卫队队长官职的收入上，因为麦米亚尔告诉普麦特兰，减下来的500万必须从卖官中填补（资料来源同上，1829年，吕贝尔给麦米亚尔的信，1706年9月6日）。

[167] （Algemeen）档案馆，海军X X X V II 37/37，第145页。

[168] 见本书原文第896页。

第二十三章 经济活动

1. 1683—1721年的商业地图

对一个大陆在一个短时期内的经济史所进行的任何综合，势必多少带有武断性的一家之言，这样的综合要为这位史学家（必然是他个人）的评价所左右。也就是说，要为他本人对各种变化——局部的变化、较短期与较长期间的变化、壮观的与不太显著的变化——它们各自所具的重要性作出的评价所左右。本文无法对科尔贝尔死后到北方战争结束这一期间，即便是在欧洲的产、购、消费各方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论述。这里要集中叙述的是欧洲的生产、交换在国际方面的情况，至于那些仅仅是地方性的情况^[1]，就要相对地省略。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前者是无可比拟地更为重要，而是因为根据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知识，难以用大陆的尺度来解释后者。另一方面，既然首要的是要提出经济时代中一个相对短暂时期内的显著特征，那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更为现实、令人瞩目的现象上面，特别是把注意力放在战争的影响和商业循环上面，那就只能舍弃经济生活中那些变动较为缓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基本的因素，诸如人口、消费的模式、技术和一般的经济体制。^[2]

在大规模的战争期间，人们和别的时候一样要生活下去。在远离光荣场面的地方，有时也离得不太远，庄稼要收割，熔炉要上料，账目要收清，而交通运输这一巨大的纺织机则在不停地运转，纺出欧洲经济生活这一织品。即便仅就人们每天食用的面包价格而言，很少人不受战事的影响。就在政治家们将贸易变成战争之际，企业家们却在战争中找到了买卖：巨额的政府贷款要筹措，军火和海上补给的合同有待签订，部队要穿、要吃、要发饷，在那私掠船与商船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战中间，完全有机可乘；这种交战年复一年，它牵涉进去的船只、人员、枪炮比所有海军交战中牵涉进去的这方面的总和还要多。不过，对大多数的商人来说，战争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况，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所承担的风险分散，能保险的就保上险，对不正常的

价格和需求水平尽量留有余地，并且首先是为和平重新来到做好两手准备。

在这种时代，经济政策几乎不大可能成为生活惯例中一项较为静止的要素。然而就在它所有这些难以预测的变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辨认这一时代的经济政策。重商主义，就政府为了国家政权的利益而进行的经济调节这一意义而论，它在西欧，在168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已经达到它的最高点。虽然政府调节在欧陆不太先进的地区如彼得治下的俄罗斯还不过是一股新兴力量，虽然它在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还要维持它那巨大的活力达一个世纪之久，它在西方却显然已在衰败。荷兰人对那特许成立的、垄断性公司的兴趣日益减少，他们正在对一些新的组织形式进行试验，用它们来调节对外贸易如那些和俄罗斯或波罗的海进行贸易的、带有强迫性质、由国家进行监督但又是可以自由参加的商人会社；旧的规章，就如那鲱鱼捕捞的规章，早已陈旧得不再适用，迟迟没有废除，新增添的条例也不多。在法国，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在科尔贝尔死后取得上风，这是事实，他们订出一条又一条的规章，他们缺乏批判性的自我估价或创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争最后动摇了这整个的结构才告结束。虽然在国内科尔贝尔遗下的政策大体上经受了战争和饥荒的考验，他在国外的贸易公司却都垮了。至于这些公司在约翰·劳手中得到东山再起，此事不属于国际贸易史的范围，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是应该写进财政史中去的。1701年提交重新恢复起来的商务理事会的一份份请愿书全都具有批评性的意见，这一点充分显示出那历时40年的科尔贝尔主义在推动法国上层资产阶级反对国家控制的路上已经走得有多远了。在英国，在整个17世纪中，有人不赞成对一些地区进行垄断，这样，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总算中止了非洲、俄罗斯和“商人冒险家公司”的有效特权，昔日的东印度公司曾一度受到无照营业者们的挑战，不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身利益诱使新旧公司在1702年合并它们的买卖，并于1709年在名义上也合二为一。正是地理上和军事上的因素，加上它的贸易极为有限，才算保住了赫德森湾公司的特权。在国内，革命在摧毁政务会政府最后剩下来的一些法律支柱的过程中彻底破坏了唯一的一些可使工业的内部调节在英国统一生效的控制手段。自此以后，在需要继续立法或需要新的立法的时候，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在议会而不是在会议室中进行的。

前面（第9章）已经探讨过一些交战国的财政史。私人信贷的基础结构并无明显的变动。英国也许是个例外，英格兰银行的创建最终要使伦敦的货币市场大大胜过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银行基本上是个吸收存款和进行票据兑换的银行，它的最最宝贵的功用大概是在于促进整个欧洲商人之间的货币汇划，而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放款业务则标志着趋向现代商业银行和现代中央银行这两者所有的功用迈出了尝试性的一大步。经历了在英国斥资创办英格兰银行、新东印度和南海诸公司、在法国创立劳氏各公司的这一代人显然非常爱好进行实验，他们在金融技能方面比在商业技能方面显得更具有创造性。特别是在英国，在1688年以后的岁月中，人们斥资筹建了好几百家经营外贸、采矿、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公司，直到最后1720年的《泡沫法》明令取消组织合股公司，他们才偃旗息鼓。自此以后，只剩下三大家拥有公债的金融公司，一些经营火灾和人寿保险的股份公司，还有少数几家别的公司，它们成为1720年以前那别出心裁进行钻营的岁月中留下来的纪念品。不过就在那进行实验的洪流中，首先在荷兰发展起来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技能却很快地在英国得到适应。一般的金融方面的交易确实愈益具有国际性：瑞士货币活跃在法国和荷兰，而荷兰的货币则活跃在法国、英国、东欧与北欧。

就在货币和信贷的国际性交流背后，物资和商品通过水陆两路，首先是通过海运在流动，这种交易是一切经济现象中最先出现在当代政策制定人和商界领袖头脑中的现象。在战争的冲击下，欧洲几乎每一个重要地区之间的交易，在贸易量和货物流向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即便不常是永久性的变革，而且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大陆所进行的交易中，其贸易量和流向也常常发生这种变革。大多数政府现在感到有必要在它们的进出口贸易中发生上下波动的时候，对此加以监视，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对这些波动进行估量。它们的统计自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如果能够谨慎小心地加以利用，那么这些统计数字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现成的线索，不仅提供关于各国经济中各工业部门情况的线索，还有关于欧洲和欧洲在海外的经济中的那些生气勃勃的要素的线索，而这种要素是最能够说明这一个时期的特征的。欧洲的经济性质将十分明显地和它的一般的历史有关，因此，如果我们着手绘制主要地区之间的货物交易图，就特别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几个方面：这些交易中有哪些新的东西、有哪些东西是正在

消失或暂时湮没的。这样做，还有可能提示这一时期发生的战争对消费、生产、销售模式的变化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如把早期的现代经济和中世纪鼎盛时期经济两相比较，前者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大量的粮食在地区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重要的地位。主要的生产—输出国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它的大大小的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粮食（通常是私人经营的）经过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运往但泽（格但斯克）和柯尼斯堡，而但泽在这方面比柯尼斯堡要加倍活跃，约略有一半经过松德海峡运来的粮食在此集散。从俄国本土运抵波罗的海的粮食还不多，而从德国的波罗的海口岸运出的数量比起波兰的货运量来是很少的。里加在粮食买卖中占可怜的第三位，谷类在该地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在1685—1699年间，它占里加出口额的14.2%，在1700—1718年间为4.2%。这些谷物几乎完全来自利沃尼亚南部、库兰和内陆陶宛。^[3]黑麦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波罗的海地区总是居支配地位的，不过小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因为在伏尔希尼亚和波兰的东南直到乌克兰的发展中的省份里，为了出口而种植的小麦有所增加。但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好，在1670—1730年间输送出的小麦占从波罗的海出口的小麦的70%，但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即便是在但泽，小麦的重要性仍只及黑麦的一半，而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甚至一半也不到。相形之下，里加、雷伐尔，还有其他一些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口岸，它们的位置实在太偏北，以致它们能经手的小麦量是微乎其微的；在17世纪80年代，大麦、燕麦和豌豆跟在黑麦后面上市，但在90年代，这些买卖就逐渐衰退了。17世纪的前一半是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仅在但泽一地谷类出口每年达10万拉斯特。^[4]发生在这一世纪中叶的几次战争几乎毁了这一买卖；即使恢复和平以后，但泽的出口量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中，平均仅勉强恢复到3.6万拉斯特。在北方大战期间，出口量再次下跌。在1700—1719年间，平均仅每年2万拉斯特（在1720—1762年间，仅恢复到平均每年3.1万拉斯特）；里加和雷伐尔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很大，这两个地方的粮食出口在1700—1720年间少得可怜。柯尼斯堡受战争的影响相对小些，有些年头通过松德海峡运出的黑麦甚至超过了但泽。不过在恢复和平以后，但泽对柯尼斯堡和其他口岸的相对优势实际上要比战前更大。

除了很少的一些粮食是从瑞典所属的波罗的海各省运往母国的之外，几乎所有在波罗的海各口岸装上的粮食是运到联合省去的，其中大约有五分之四是用荷兰船装运的。17世纪中运到那巨大的阿姆斯特丹市场的粮食，平均有43.5%是再出口的。为了防止本地粮食匮乏，欧洲各国几乎全都对粮食买卖进行节制，但只是在1698闹灾荒这一年，才由议会出面在短期内禁止谷物出口。碰上当地缺粮的时候，粮食可以从阿姆斯特丹运往西欧的任何一个角落——间或大量运往法国，更为经常的是运往伊比利亚和意大利。不过，唯一的经常性的市场是在联合省和莱茵河的上游。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尼德兰是欧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段，也因为那里能种上谷物的地面比较少。那里的许多土地只能用来放牧和收草料，当时荷兰庞大的养牛催肥业本身增加了对进口饲料、进口牛的需要。同时，余下适宜种植食用粮的土地，不少早就被人垂涎，用来种植荷兰工业需要的进益更好的作物——大麦、蛇麻草、烟草、大麻、亚麻、茜草、黄木樨草和菰蓝——或者被用来培种花卉供应日益城市化的人口。就这样，荷兰人饮用的白酒和啤酒，食用的面包和肉类，都是波兰大平原上的剩余产品。

其他一些主要谷物出口地区的重要性就差一些。这里包括北非和叙利亚，突尼斯的谷物有时甚至在北欧出现；不过地中海地区整个说来则是进口谷物的。另一方面，英国正在迅速改变它在国际谷物市场中的地位。1674年以前，它的谷物出口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国内市场组织得很差，大约到1688年，伦敦还常常不得不进口谷物，虽然这个国家整个来说是自给有余的。到1700年的时候，这一大都市消费的面包、饮料、饲料和船上补给品一年几乎达150万夸脱尔，超过波罗的海地区的全部出口量。但在1688年以后，即使是伦敦也停止了进口，因为英国已从一个偶尔进口国变成一个相当可观的出口国。1674年和1689年的临时性的出口补贴造成了短暂的出口热，而更为牢靠和广泛的出口贸易则在1700年才开展起来。从1697—1731年，英格兰每年平均出口35.3353万夸脱尔的谷物（1720年后比但泽的出口稍多一些），主要是出口到伊比利亚和地中海，也有视当地情况需要，运往爱尔兰、挪威和美洲的。不过英格兰谷类出口的组成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出口组成不尽相同。黑麦，甚至小麦总是没有大麦和麦芽那样重要。从1710年开始，麦芽的出口量常常相当于其他粮食出口量的总和，麦芽和大麦加在一起约占全部出口量的三分之二。苏格兰的谷物出口大约只及英格兰的五分之一，麦芽和大麦在那里也占支配地位。[\[5\]](#)

欧洲最大的谷物出产国是法国，它也是欧洲最大的市场。法国和德国、西班牙甚至英国一样，与其说它是一个粮食市场，还不如说它是一些重叠在一起的销售地区的复合体。这些地区有的相当大，如巴黎的市场大量吸收塞纳河上游和奥杰赛两个盆地的粮食^[6]；有的相当小——一个集镇及其领邑，也就是它四周围的势力区，由于道路蹙脚，这种集镇倒不受外界供求波动惯常所引起的影响。只是在价格奇高的年头，运输费相形之下算不得什么，这些偏僻的内地市场才突然失去它不受一般世界价格波动影响的孤立状态。相比之下，沿海地区从未有过这样的孤立（除非是人为地强加的）。在整个地中海、大西洋沿岸地区，粮价总是在上下波动着。1688—1713年间，又是战争，又是饥荒，日子难过。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的市场情况，下面还要概括叙述（见本章第2节），这里要先指出，这些年来农业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可以看到普罗旺斯的农业在整个17世纪是在走下坡路，一个一度出口的地区这个时候被迫经常从朗格多克进口；而在西南部，粮食（特别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在扩大，总的来说，在17世纪的前半期，就已在进口粮食，远到从但泽进口。但是经过大量投资，把波尔多周围的沼泽地和加龙河中游一带容易泛滥的低洼地的积水排走之后，这个地区就变得自给有足了。不过在内地进一步扩展粮食生产是受到阻碍的，因为畜牧业在那里更加有利可图。法国的牛、羊、马、骡在西班牙能卖好价钱；这项牲口买卖，归根到底还是为全法国赚进了白银，但是由于比利牛斯山两侧都歉收，这一买卖曾经受到打击，1694年法国商人被驱逐出西班牙，这一买卖也就停顿了。在这以后，在整个西南部，谷物种植曾有一次很大的扩展。这里的小麦和原来的牲口那样成为十拿九稳的商品作物，原因之一是军队需要积聚给养。农民为了省下他们的小麦去换现钱，自己情愿吃玉米和小米。1713年后，一些地区如奎尔西下游继续专门生产小麦，因为当时波尔多需要优质面粉供应西印度群岛。^[7]

在地区贸易中比谷类更为重要、在战时则比谷类更为棘手的大体积商品要算那几乎全部是水运的林产品和海军补给品这宗买卖。总的来说，欧洲在1700年比随后的任何年头都更为郁郁葱葱、森林茂密。树木不管锯成什么样子搬运起来总是比较费钱，在最终售出的时候，它的运输费用往往数倍于它的主要成本，所以大多数欧洲人总是就近取材，为自己提供建筑用的木材和烧火（家用和工业用）用的劈柴。但是船舶建造业木材的类型、外形和质量是有非常特殊的要求的。在

战争时期，定期的供应有可能中断，商船和海军对储备木材的需求会达到高峰，这时候，木材确实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8]

1692年，英国六所皇家船坞使用了19船椈木、48船山毛榉、705船枞木、1129船榆木，还有6780船栎木。这栎木几乎全部取自英格兰的森林，主要是取自汉普郡、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森林。新英格兰栎木，虽曾试用，却被认为太脆弱、太易腐烂，不合海军船只之用。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栎木质量好些。相当谨慎、小心的英国海军从不用它做肋骨，只把它用来做船壳板和裁成板材^[9]，但是英国的制造商船的厂家都广泛地使用这种木料。规模相当大的荷兰商船从德国取得它所需的栎木（以及大部分的松木），还有较小一部分则取自南波罗的海口岸，远至柯尼斯堡。荷兰商人不仅在主要的河上集市（埃姆顿、不来梅、汉堡）收购，还深入内地，买下还未砍伐的林木，按照订单的规定格式把它们锯开。不过荷兰人和英国人不一样，他们并不坚持他们的商船的船体必须使用栎木。荷兰有名的平底船（在北海上来往的载重量大的船只），每年下水的有好几百艘，一般都是用软木材造的，这些船是不够坚实，可是造价便宜，易于操纵，也就弥补了这一缺点。荷兰人需要的各种软木材部分仰仗于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挪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和这个国家的买卖。1686年，英国人船用木材需要量的六分之五要靠进口，也是依赖挪威，来自这个国家的达80%。^[10]木材集散地的规模是比不上谷物集散地的规模的，主要因为装卸储存的费用大。虽然在赞丹的巨大造船中心经常总有大量的木材堆存备用，严格地说这一地区并不是个木材市场。虽然木材仍然是荷兰主要的再出口物资，对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尤其是这样，即便它在和挪威、德国这一边的贸易的支配地位并未改变，但在波罗的海地区这一地位看来是在下降：到1721年，从这一地区（主要是纳尔瓦和芬兰）出去的木材，其中仅40%是装上荷兰的货船或前往在荷兰的目的地。直接运往英国、法国的愈益经常化，偶或也有运到西班牙、葡萄牙去的，不过去法、西、葡这3个目的地的木材几乎从来不是由各该进口国的船只来装运的。

在地区之间的贸易中，这大宗的木材制品都是普通的船用木材，有木板和船壳板，还有形形色色的桶板。制造桅杆需要巨大、挺直的针叶树木，最理想的是枞木，云杉木可制造较小型的桅杆，这是一个问题。在整个北部，可以弄到不同质量、不同数量的桅杆。最好的来

自里加，但尺寸大小和数量都有限，而且在北方战争中这一来源几乎枯竭，因为当时里加和内陆森林的联系被切断了。普通尺寸的挪威产桅杆倒是不少，但质量不是那么好。要找最大的桅杆木，已有必要去北美，不过法国人对他们从加拿大运来的桅杆木的质量并不满意。由于桅杆木是如此之稀少而又如此之需要，对它的保持和管制已成为国家的事务。在挪威，最大号的桅杆木的出口是受到管制的，沙皇彼得颁给荷兰辛迪加的桅木（还有柏油）专利，只许运往荷兰，这就引起英国方面经常抗议。英国第一任驻俄国的使节惠特沃思（1705—1712年）也曾努力设法让彼得准许把运往英国的桅木从德维纳河顺流而下，通过俄国的运输公司，运到里加，他的努力仅仅取得部分的成功。在新英格兰，从1685年起政府努力设法先行买下可能到手的桅木供海军使用，但这一努力总不是那么有效。法国政府促使比利牛斯山区居民树立保持林木的思想也不太成功。从1705年开始，英国人试图发放奖金以便取得群体的桅木和海军补给品，但一直到1718—1723年，他们才从他们自己的林场取得40%他们需要的大桅杆木，而在1708—1713年间，才12%。他们的中小号桅木仍然大量地仰仗挪威，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们得以从阿尔汉格尔和里加取得不定期的大桅木供应，而在1707—1714年又从瑞典取得供应^[11]，作为对挪威和新英格兰主要供应的补充。

一支海军如果没有亚麻做帆篷布，没有大麻做缆索，没有树脂、沥青、松脂和松木油，则无以开动操作。在一条普通船只的使用寿命期间，花在这些补给品上的费用要超过原来的肋骨和替换桅杆、原木等的费用。^[12]树脂和沥青几乎一直是为瑞典人所垄断的。瑞典政府利用欧洲海上国家依赖波罗尼亚和芬兰森林产品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国库岁收方面，有时是在政治上寻求好处。从1648年开始，一系列持有执照的公司不顾海上强国的反对，垄断了瑞典的沥青贸易；尽管这一系列公司中的第三家于1682年因英荷两国的联合外交压力和国会表示的不满而被取消，又一家新公司于1689年重又取得垄断权。政府规定它不得把价格抬得过高以致刺激竞争。然而这家公司却通过垄断对荷兰的出口贸易、同时只通过它自己的代理客商在荷兰销售货品，还是硬把在荷兰的价格抬高了，以致产生某些对抗活动。荷兰是树脂和沥青的主要集市和消费中心，1703年的一次估计把欧洲所消费的三分之二归诸荷兰市场及其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地中海的再出口——英国人占六分之一，法德口岸各十二分之一。^[13]17世纪的90年代，荷兰人

在挪威、库尔兰特别是在俄罗斯开发新的来源，瑞典的垄断者们不久降低他们的价格来保卫他们自己，然而这些新的渠道未被堵住。俄国沥青是沃洛格达和维亚特加“政府”的产品，在德维纳河上顺流而下数百英里到阿尔汉格尔，质量好，价格便宜。仅阿姆斯特丹一地进口的阿尔汉格尔沥青在1698年就达1.8万吨，1713年达6万吨，1714年通过松德海峡来的仅为6100吨。^[14]从波罗的海来的沥青有80%以上仍然出自瑞典或芬兰，但是阿尔汉格尔已经从此永远打破了瑞典对沥青的垄断。

英国商人根据《航海法》的规定，一般要直接从产地进口沥青，不通过荷兰。英（国）瑞（典）关系常常取决于这一不太高雅的商品。由于英国到1700年基本上仍然要仰仗瑞典，北方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同时发生导致了一次危机。一方面英国的需要在飞跃上升，另一方面俄国人入侵芬兰破坏了供应来源。瑞典垄断者们的反应是提高价格、嗣后又拒绝在瑞典出售沥青，只通过他们在国外的代理商来销售。正当英国海军在这方面的需要在1702—1703年间十分紧迫的时候，瑞典公司甚至在向法国运送的同时，完全切断了对英国的沥青供应。当时曾纠正了这一做法，但是从1705年起，随着英瑞关系的恶化，瑞典运往英国的沥青数量不断下降。挪威运来的沥青数量虽然略有增加，但这并不能弥补其不足；在东波罗的海地区也弄不到多少；阿尔汉格尔有大量沥青供应，但是，在一些辛迪加的垄断之下，只运往荷兰；通过外交上的压力也只能为英国偶或争来少得可怜的份额。1705年的《补助金法》大大地刺激了新英格兰和南北卡罗来纳对英国的沥青供应，到1718—1725年期间，英国所需沥青的五分之四是这几个地方取得的。瑞典在查理十二死后放弃了这一垄断，然而它的柏油贸易要等到美国革命才出现又一阵子真正的繁荣。

法国和它的邻国一样，它所需要的沥青和柏油大部分要仰仗荷兰；不过法国人自己在波尔多南边朗德的松树林中拥有欧洲松脂和松香的主要资源，连英国人和荷兰人也要依赖于它。英国人当时正在新英格兰开发又一个松脂资源，在战时能为它提供足够松脂，但是松香却比较困难，在它从西班牙取得的供应被切断之后就更觉困难。17世纪90年代，荷兰人在俄罗斯开发了几个新的资源，而英国人则多靠新英格兰、俄罗斯，靠俘获敌船，靠走私（通过海峡群岛），零零星星弄到一点过日子，后来设法到受大公管辖的西班牙一些地方去弄，而

在1701—1702年，^[15]主要是靠投机性的进口。最终，法国人要步瑞典后尘，失去他们对这些货品的支配能力，其部分原因是小朗德的树木在1709年冬大都被冻死了。

来自北欧的最有价值的海军供应品是亚麻、大麻及其制品。在1689年以前，布列塔尼生产的篷布最受人称道。海上诸强好不容易才算用英国、荷兰和北德的较新产品取代。^[16]大麻比起亚麻来，更是一项具有专一用途的海军补给品，它从法国西南到俄罗斯北部到处都有种植，尤其是在东波罗的海盆地，那里的里加大麻被尊为最上品，售价要高出纳尔瓦和柯尼格斯堡的大麻。1700年以前，从波罗的海地区发运的大麻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来自里加。那里的大麻、亚麻在1655—1699年间占出口量的61%，在1700—1718年间为69%；大麻子和亚麻子在这个时期分别占出口量的14.7%和17.7%。90年代，里加的买卖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但随着北方大战而下降，在1704年以后下降更多。1699年，里加大麻足足有75%来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白俄罗斯或其极东部的地段——这个地段正好是最易受到外国入侵的地区，在里加本身于1710年失陷之前，这些地区实际上正处于俄国国境线的后面。

制作绳索少不了大麻，它是海上强国不可或缺的。荷兰人在自己的“内陆”有少量大麻供应，但是，他们的绳索制造厂所使用的大量大麻则是波罗的海大麻。英国人尽管发放补助金，却一直未能在国内或在美洲生产出多少大麻。所以，大麻就成为英国从北方进口的最为有用的商品，其重要性只有铁能与之比拟。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一方面的竞争比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其他任何部门都要来得顺利一些，这大概纯粹是需要使然。他们还在阿尔汉格尔开发了又一个主要资源。迟至1698年，已经奄奄一息的莫斯科公司每年有6艘船到达这个地方，但与荷兰每年要开来大约30艘相比，就未免相形失色。莫斯科公司在1699年留下的空白，加上随后的北方战争，大大刺激了在阿尔汉格尔的贸易：到达该地的船只总数从1698年的54艘上升到1702年的149艘；而在1703年，仅英国人就派出约70艘。大麻是这一贸易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也表现在它的价值上面，它很快就占英国从俄国进口货物的一半。从1704年起，英国大麻进口量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是由俄国提供的。不过1721年以后，由于沙皇彼得（大帝）歧视阿尔汉格尔，这一贸易又转回里加，同时圣彼得堡则成为波罗的海第二个大麻口岸和对英贸易的中心。

虽然珍珠灰通常总是来自德国，只有北欧的无穷无尽的森林才能提供西欧肥皂制造商所需的巨量更为普通的灰和钾碱。^[17]荷兰人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出口中灰的这宗买卖（以但泽和柯尼格斯堡为中心），但是大约从1699年开始，英国人买下了绝大部分的钾碱。英荷两国是阿尔汉格尔这些商品的大买主。荷兰人还为他们的肥皂制造商从波罗的海地区买进大量的牛脂——质量低于他们自己的或德国人的牛脂——为他们的蜡烛制造商，也为了向天主教欧洲出口数量较少的蜂蜡，这种蜂蜡“主要是波兰和莫斯科的产品，蜜蜂似乎已经选定这两个国家作为它们主要的栖息之处”^[18]。

除了金属^[19]以及一些奢侈品如鱼子酱、大黄和琥珀这些北欧在地区贸易中的主要产品之外——一般来说，说它们是主要产品，是指对它们的需要而言，而不是指它产品的价值——北方则惯常运进同样笨重的商品：盐、酒和鱼。

波罗的海国家盐的主要来源是法国西海岸，锡图巴尔和加的斯湾（主要是在圣卢卡尔）。还有来自瓦伦西亚海岸和卡泰罗尼亚的盐矿的。撒丁和西西里盐在18世纪早期也开始进入大西洋地区的商务范围。在朗格多克的蒸发厂供应法国的南部，萨伏依—皮埃蒙特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在维耶利奇卡和鲍赫尼亚（邻近克拉科夫）的盐矿满足了波兰国内大部分的需要；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也有重要的盐矿山。隆内堡的一些老厂家在衰败，但是1699年在哈雷新开的厂家却减少了征用东部对海外供应的依赖。苏格兰西部的蒸发厂除出口之外，还略有剩余，而1670年开张的柴郡盐矿不久就使英格兰市场不再依赖外国的供应，而且还为新生的港口利物浦提供外运的压舱物。柴郡有一些盐行销在北美的殖民地，可是那些地方的渔业界却愿意要加勒比海或葡萄牙的盐，因为这些盐的咸度高。

荷兰人在北欧盐的贸易中占支配地位是因为他们的渔业要消费大量食盐，因为他们有庞大的提炼厂，也因为他们的船只在装运波罗的海进口盐中所占的份额——1681—1690年是74%，1691—1700年跌到42%，1701—1720年又回升到58%，但在1721—1740年^[20]中，又跌到45%。他们的波罗的海盐业买卖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国内集散地或制作业的基础之上，他们直接从法国和葡萄牙把盐运走。有时有人断言，历次战争迫使荷兰人和英国人转向葡萄牙买盐，从而搞垮了法国对盐业的垄断。事实上，葡萄牙盐虽然曾在那激烈波动的战争岁月里在数量

上超过法国，可在1702年，就如在1683年那样，法国盐的数量在松德海峡却超过了葡萄牙，在2：1以上，只是在1720年以后法国才败下阵来。

有些行业永遭战争之害，那古老的酒业是比较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栽培葡萄的地区相当辽阔，从葡萄牙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位于最最北面的大型葡萄园靠近莱茵河和摩泽尔河，大量的酒就在经过这两条河流往荷兰供一般的消费和出口之用。不过，由于这些酒在国际上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也由于葡萄牙人还没有把酒的市场打得更开，17世纪70年代，欧洲酒的贸易就由西班牙，尤其是法国产品所支配。

勃艮第红酒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是颇享盛名的，但是，直到新的渠道在1720年后开放为止，这种酒即使进入巴黎这样的市场也还是受到限制的，而且这种酒在世界市场上也没有多高的地位，因为在世界市场上，所谓法国酒，人们仍然只知道波尔多葡萄酒。^[21]1700年后，罗纳河和米迪的酒运销到地中海以外的地区，但最初只是少量而已。在波尔多，今日的规模在17世纪中叶尚有待开发。当时的出口品几乎只有这个城镇附近所生产的非陈年普通酒。由于荷兰人不像英国人那样需要这种“红酒”，酒商们就舍波尔多往北沿着海岸进入内地，寻找当时还未曾出口过但是却迎合荷兰人口味的当地各种酒类：白葡萄酒、甜酒、强度较高的酒、加糖的酒、麝香葡萄酒、盖拉克和卡奥尔的葡萄酒、圣托奇、昂尼和佩里各特产的白葡萄酒，还有专为迎合荷兰人口味而发展的新品种索特尔白葡萄酒。相当数量的商业性生产的酒精也首次问世，荷兰人需用这种酒精来提高他们的酒的度数。就这样，1672年，法国西南部的葡萄栽培因荷兰人来订货并预付货款而成为出口型的相当繁荣的一个行业。它在世界市场上唯一真正的对手是英国人所喜欢的加那利和杰雷斯酿造的酒以及荷兰人普遍喜爱的阿利坎特和马拉加出产的酒。在17世纪80年代之后，西班牙的葡萄园并没有显著的扩大。相形之下，葡萄牙葡萄园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在马德拉岛和亚速岛的葡萄园，却是欣欣向荣。到那个时候为止，葡萄牙酒和一些西班牙酒一样一直被看成是地方酒类。荷兰人于1675年从奥波尔托进口第一批掺了酒精的酒；美国人在1678年也开始进口这种酒。从此人们要对上杜罗河的产品另眼相看，因为国外对它有高度人为的需求，而它在国内又受到一个听命于葡萄园主的政府的鼓励。

可是那北欧市场掌握在法国人手里，以上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可以轻而易举地动摇法国人的这一地位。英国在1675—1678的“正常”年景中，仅伦敦（它代表着五分之四的英国市场）每年就要从法国进口平均8535桶，进口5008桶西班牙酒，进口莱茵河酒才不到1000桶，葡萄牙和佛罗伦萨酒每种都在100桶以下。但是，从1679年开始一直到1685年，英国禁止进口一切法国酒，而葡萄牙乘虚而入，英国进口的葡萄牙酒从几乎等于零跃升到1683年高峰的16772桶。不过，“正常”的市场一经恢复，法国的优势却比以往更甚。1685—1689年间，伦敦进口的法国酒平均为13402桶，葡萄牙酒仅434桶，而西班牙酒的进口量则低于它70年代的水平，仅3915桶。1689—1713年的战争使波尔多在英国市场上蒙受的损失更甚于1679—1689年的抵制活动给它带来的损失。在九年战争期间，伦敦全部停止进口法国酒，又一次为西班牙（约有70%来自卡那利）和葡萄牙酒所取代。^[22]这些变化要比早先的抵制运动期间的变化更为持久。由于奥波尔托的产品质量在提高，英国人的口味有改变，更主要的是因为对法国酒仍然要课以重税，所以波尔多在和平以后未能恢复它的市场；在官方统计表上，法国酒甚至居意大利之后。1702—1713年战争造成奥波尔托的最后胜利。^[23]由于西班牙到1704年为止一直是处在菲利普五世的权力统治之下，因此，西班牙酒和法国酒一样受到有力的排斥；虽然西班牙的局势以及英国人对对敌贸易的态度随后很快有所改变，葡萄牙仍然保住了它1703—1704年间在英国市场上的支配地位。1697年后，葡萄牙（还有西班牙）在酒上的税比法国酒上的税要少一半还多，所以葡萄牙得以很好地保住它的支配地位。在1711年到1750年间，英国进口的葡萄牙酒大约是西班牙酒的一倍^[24]，是法国酒的10倍。

不过除了英国之外，另外还有个比它大得多的荷兰市场。如果说1672年以前的阿姆斯特丹进口的西班牙酒少于伦敦所进口的，那么，它所进口的法国酒却要比伦敦多出好几倍。到1721年，虽然波尔多的总出口量只及它60年代总出口量的一半，但是运往荷兰各地的有34138桶——这几乎是运往英格兰、苏格兰和（特别是）爱尔兰的数量的6倍——其中大部分是供尼德兰及其邻近地区饮用的，虽然也有相当一个尾数是再出口的，主要是再向北方出口。1688年前，南方酒在那里的市场相对来说一直是小的，而且在历次战争中又有缩减，但是到1714年，这个市场却达到了一倍于17世纪80年代的水平。它在1714—1725年间又再次扩大了一倍。这对波尔多来说是特别走运，因为北方

正在吃进比1678年前伦敦大市场的黄金时代所吃进的还多；在1714—1725年这段时间里，通过杜德海峡运往北方的酒至少有四分之三是直接来自法国，可能还有一些不是直接从法国运去的还不算在内。1721年后，丹麦和瑞典船在这一行业中变得十分活跃：1725年，通过松德海峡出关的南方酒大约只有18%是用荷兰船运送的，而在1714年，有40%是由荷兰船装运的。

在战争年代里，酒业普遍不景气，法国西南部的葡萄园特别困难。有许多地方，都暂时转变到那种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为了保存大量的卖不出去的酒，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将它们酿成白兰地酒；军队也为贮存这些酒提供了一个暂时性的市场，不过后来法国西南部被迫走上一条更为艰辛的自救道路。从此酒酿藏时间不长、不分等第的年代已成过去；饮用名葡萄酒已经成为时尚。普通的红葡萄酒无法在英国完纳13倍于它在法国的成本价格的税。因此，就在荷兰人以在波尔多每桶100镑的价格购进廉价酒的时候，这些酒随后运到英国，在1717年平均每桶价格是180镑，到1724年，其平均价格上升到600镑。1713年成立的马坦尔酒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是西南法国白兰地提炼业同样经过质量专业化这一过程的象征。远至里加的人几乎就只喜爱法国酒，因此，我们看到进口法国白兰地的数量在80年代就稳步上升。法国白兰地在1689年前的最大市场一直是荷兰和英国；可是现在它在英国，地位已被当地自己的提炼业所取代。英格兰烈性酒的生产80年代中一直稳定在每年50万加仑以上，但在1691年，产量开始迅速增加，到1700年已超出100万加仑，1710年达200万加仑，1722年为300万加仑。1727年是400万加仑，这就开创了地地道道的“杜松子酒热”[\[25\]](#)。

荷兰人的鲱鱼船队拥有1000多艘帆船，好几万名水手，在英国的海岸附近夺走帝国的财富，据说它仅在荷兰一处就直接或间接地养活了大约45万人。据说荷兰人为在17世纪90年代每年捕捞约30万吨鱼，每吨价值约20镑，这样一年有600万镑的买卖，很容易成为欧洲商业中最大的部门。这些鲱鱼大部分是在国内和马斯河（默兹河）、莱茵河流经的一些国家消费掉的。其他大量的去处是法国和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是西班牙，这些鲱鱼在汉堡、不来梅和在波罗的海地区也有重要的然而第二位的市场，在17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进口的鲱鱼，荷兰人的要占四分之三，在1697—1702年的和平时期，几乎同样也是这一比例。不过在几次战争中，荷兰人的捕鱼船队和运鱼船

遭到敦刻尔克武装民船的掠夺——这对苏格兰人是有部分好处的，他们运进波罗的海地区的鲱鱼数量在当时和战后的几年中超过了荷兰人运走的数量。荷兰人在1722年后，虽然在一个缩小了的波罗的海市场上重又领先，英国方面在1713年后施加政治压力为苏格兰人的鲱鱼打开了原来一直是荷兰人所占有的在汉堡和不来梅的市场。外来的竞争、鱼的回游、两次战争的蹂躏，还有荷兰集散地定下的规章缺乏灵活性，这一切凑在一起，到1750年就把历史上称雄一时的荷兰鲱鱼业的规模缩小到它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尽管政府不断作出努力，英格兰的鲱鱼业到17世纪末比起该世纪初来还是每况愈下。为了打破荷兰人对格陵兰捕鲸业的控制而作出的各种努力——这最后一次的努力是在1692年颁发执照成立一个专业垄断公司——也同样是令人失望的。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的高峰年，荷兰每年有240艘或更多的船出海，捕杀1400多条鲸鱼，可带回达6万吨鲸油。在九年战争期间，由于保险费用和人力方面的开支增长，荷兰议会又暂时禁止捕鲸，出海的船只减少到战前平均数的一半还不到，阿姆斯特丹的鲸鱼制品的价格上下波动得厉害。不过在随后发生的一次战争中，尽管议会再次进行限制，出海的船只却比上一次战争时要多，然而捕获量有时低，得益跟着也有极大的波动。不过在每次战争之后，荷兰人总能重新确立他们的绝对地位，大约相当于80年代的水平，不过和派出的船只数目相比，捕捞量却在减少。等到18世纪20年代，荷兰人正在转而把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放在新开发的戴维斯海峡的渔场上去。1721年，在开往格陵兰和戴维斯海峡进行捕捉鲸鱼作业的355艘船只中，有251艘是荷兰船，余下的有来自汉堡（55艘）、不来梅（24艘）、卑尔根（5艘）、比斯开湾各口岸（20艘）。鲸油的主要用途是制造便宜的灯油和肥皂。

在北大西洋，荷兰人在苏格兰和冰岛之间进行的鳕鱼捕捞业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在17世纪90年代动用了350艘帆船。不过丹麦人和挪威人在这方面也很活跃，到18世纪的20年代，挪威人已经取代荷兰人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鳕鱼供应者；事实上，荷兰人在战后通过松德海峡运进的只有鲱鱼。到1750年，他们的鳕鱼作业已缩小到只及上一世纪90年代规模的五分之一。就在荷兰人的渔业仍然兴旺发达的当口，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集中力量经营那远一些的北美鳕鱼渔场。“英格兰西域”渔业一开始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到1680年就已衰落，它所拥有的船舶还不到100艘，衰败的部分原因是法国人的竞争，同时也由于当

地先是在新英格兰，随后是在纽芬兰渔业发展的缘故。生气勃勃的新英格兰渔业不但在缅因湾扩展，也在新斯科舍和纽芬兰沿岸近海扩展。到1700年，它的船队已大大超过“西域”的规模。在冬季加工的新英格兰鱼，大的大部分运往毕尔巴鄂，小一些的品种则运往里斯本的奥波尔托，较次的运往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牙买加，“处理鱼”则运到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给奴隶当食品。在欧洲赚来的这一进益大部分以钱币或汇票的形式流到英国用来购买新英格兰从欧洲输入的各种欧洲工业制品，当时新英格兰正在扩大这种进口。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支付渔业需用而购进的伊比利亚盐和新英格兰自己直接进口的白兰地、其他酒和水果。运往西印度群岛去的鱼（还有新英格兰的木材、食品等）换来了糖、糖蜜和盐；但其中有些进益最终又以货物或汇票的形式流往英国用来购买更多的工业制品。沿海渔区对盐、朗姆酒、食物、捕鱼用具和其他货品的需要量很大，新英格兰人这就能够在纽芬兰开展他们纯粹的商务活动。“西域”的船只把它们大部分在纽芬兰打来的鱼装往西班牙、葡萄牙，再把盐、酒、水果、橄榄油或羊毛带回它们在英国的基地。

面对荷兰人的竞争，盛极一时的法国鲱鱼业衰退了。迟至1700年，法国人从荷兰进口的咸鲱鱼几乎比他们自产的还多一半。法国政府曾试图制止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个向荷兰人施加压力的最最现成的办法，那就是提高进口荷兰鲱鱼的关税，可是实行关税本身引起农人协会在进口事业方面的相反的兴趣；在一些贸易城镇如鲁昂和一些渔业港口（特别是迪埃普）之间也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可是国会采取的行动挽救不了法国的渔业，因为法荷在乌得勒支签订的条约不准许搞禁止性的措施，并且把进口税降到1664年的水平。随着鲱鱼业的衰落，在迪埃普以西的一些港口就以更多的精力来经营鳕鱼业。在1678—1688年间曾出现一个高峰，法国在纽芬兰的渔业在某一个典型的年头使用了300艘船、人员2万——大大超过了英国人。然而这样的规模本身使它极易受到战争的影响，不说别的，单说海军抢着要这些渔民服役这一项就够了。1702年，从圣马洛和格朗维尔出航的有100艘，但是在1703—1712年间每年很少有达到30艘的；在九年战争期间，1688年出海113艘，在这之后平均出航船只只有18艘。^[26]法国渔业生产组织要比英国的简单得多。它在战时基本上是个“不搞加工”的作业，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少需要使用当地岸上的码头晒台和村落。而且，想在法国和普拉森夏、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之间开展多边贸易的打算

也没有多大指望。所以法国的鳕鱼业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也不能算是什么缔造帝国的力量，而英国的鳕鱼业却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的重要性不在此而在于它是地中海上一种运输业的基础，在地中海特别是马赛和圣马洛有密切的联系。法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丧失了普拉森夏以及对纽芬兰的领土主权要求；他们可以在海岸沿线一些指定的地段登陆晒他们捕捞来的鱼，但不得在那里修建永久性的建筑或在那里过冬；在勃兰登角岛上的路易斯堡代替了普拉森夏在防卫体系中的位置，但渔船很少使用这个地方。尽管如此，法国的鳕鱼业在战后恢复得很快。1719年，它使用的船有300艘，并继续扩大，到1740年，它每年的总收入达到惊人的数字，相当于100万英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讲扎根在旧有的北欧经济中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在规模或价值方面都有其重要性。当我们放眼海外的时候，我们会碰上各类商品，它们的价值大于它们的规模，而且在欧洲经济中具有非常新的重要性。虽然鳕鱼一直是首先吸引英国人、法国人定期去北美的商品，可是它现在却只代表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关系的一小部分，而北美贸易中的其他重要部门如果和欧洲有什么关系的话，也仅仅是间接的关系：在这一情况之下，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在迅速发展中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向西印度群岛出口食品和木材。不过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有的是裘皮、烟草，更多的是糖，有力量在欧洲采购它们需要的东西。

裘皮可以分成奢侈品裘皮和原材料裘皮（海狸、麝鼠皮、兔毛皮、野兔皮）；前者用来做衣服的皮板，后者供制帽人和制毡人使用。奢侈品裘皮当时的主要来源是西伯利亚，主要的消费中心是东（中）欧。原材料裘皮在西欧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那里几乎人人都要戴一顶帽子，而奢侈品裘皮则渐渐不再时兴。廉价的毡可以用当地或进口的兔皮和野兔皮制造，但是最好的毡要用海狸；18世纪早期，英国进口的裘皮有65%是原材料裘皮，仅海狸就占50%。到这个时候，在英国的殖民地中，只有纽约由于它和内地的水路交通极好，那里的裘皮业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买卖。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河流系统中和赫德森湾的海狸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皮裘一直是加拿大唯一的大宗出口货品。由于北美出产的海狸和兔皮多到不是英国或法国所能使用得了的，有一大部分——英国是70%——是再出口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巨大裘皮市场去的。而且在这些年中，在赫德森湾发生的战事把大批作为战利品的皮张推到市场上去。许多这样的海狸皮——用印第安人

的血汗使之不致软化的裘皮——最终进入俄国，那里的手艺师傅通过一个秘密的操作过程把裘皮的长粗毛下面的细软绒毛梳掉，只留下皮张上面的护卫长毛。这些梳过的皮张常常再运回汉堡做衣服，海狸上的绒毛则经常运回荷兰、法国供制毡商人使用。不过，从短期来看，运往俄国的皮张能够稳定西方的裘皮市场。^[27]法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圣劳伦斯河通往内地的河道使法国人在海狸皮的进口方面对英国人占有永久性的优势。不过，英国人也有某些有利条件。印第安人一般来说比较喜欢英国的制品。“赫德森湾公司”不需要花钱维持一个殖民政府；等到英国根据乌得勒支条约收复这个海湾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历尽艰辛，脱颖而出，供应高质量裘皮不成问题。到1713年，由于西方梳理皮毛的技术有改进，已无必要把那些不易处理的海狸皮张送往俄国加工。胡格诺制毡人向英国移民，这给伦敦制帽业带来了高超的技术。这样一来，英国在1700—1725年间得以把出口量增加两倍——其中约有70%是销往欧洲大陆的（主要是行销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余的行销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这是一项一流的转口贸易，到1725年，帽子出口值几乎相当于裘皮进口值的6倍。

比裘皮重要好几倍的是烟草。到17世纪80年代，为了欧洲市场而进行的大规模商业性的种植主要是包给巴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在西印度群岛，烟草正让位于获利更多的作物，而“凡利纳斯”的产量似乎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印第安人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小片土地上种植这种烟叶，每磅的价值要高出较为普通的巴西或切萨皮克烟叶好几倍；其中大部分由荷兰人暗中获得。17世纪晚期，欧洲烟草业中更为先进的那一部分曾有最为蓬勃的发展。如果说西班牙人经营的烟草业因价格高昂而停滞不前，那么巴西的烟草业是因价格下跌而受到严重损害，而切萨皮克的烟草业却继续保持繁荣，尽管它也受到价格疲软的伤害。伦敦的进口量从1662—1663年中的737万磅上升到1696—1697年、1700—1701年的那些过剩岁月中的2500万磅。英国的总进口量在1670—1700年间翻了一番还多（达3780万磅）。烟草和裘皮一样是项近乎理想的殖民地商品，因为随着进口量的上升，剩余的烟草和裘皮也日益增长，可供再出口，从而支撑了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整个来说，英国的再出口发展趋向比进口要快得多：1668—1669年，再出口是进口水平的一半多一些，而大约到1700年，则几乎达到进口水平的三分之二。葡萄牙进口的烟草中大概再出口的比例也几乎有那么高。

荷兰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烟草的巨大再出口市场。即便在1697—1701年间，英国烟草销荷兰的百分比在一度下降之后接近40%。阿姆斯特丹是欧洲的烟草制造和烟草贸易中心。荷兰的烟草制造商把各殖民地来的昂贵烟叶和荷、比、卢还有德国出产的便宜烟叶掺混在一起，生产出各种价格中等、切成细片、经过碾压的混合烟草，其他地方都比不上它。荷兰制造商向德国的许多地方和整个北欧提供这种产品，这使英国的制造商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它们只使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叶，发现在整个北方他们在价格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荷兰烟草的种植集中在阿麦斯福特，东及格尔德兰，上埃塞尔和克里夫的霍恩佐伦公爵领地。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还广泛地种植一种次等烟叶，有些分散在阿尔萨斯和匈牙利之间内陆的一些地方。但是最发达的烟草生产要首推荷兰。1689—1713年间的历次战争对荷兰烟叶生产的刺激最大，当时殖民地交货没有定期，弗吉尼亚烟叶的价格在阿姆斯特丹上涨至少50%；“阿麦斯福特”或“内地”烟叶价格上的优势，早先极为微弱，现在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生产飞跃上升。于是，到“王位继承战争”的中期，英国的烟草再出口（每年1500万到2000万磅）在欧洲大陆上不得和那里生产的烟叶进行竞争：联合省以及克里夫至少生产1500万磅的烟草，加上勃兰登堡一波美拉尼亚也许有1300万磅，法国有600—800万磅，而阿尔萨斯到匈牙利之间生产的2000万磅“内地”产品和来自巴西的约六七百万磅还未计算在内。英国一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算重新达到（并且事实上还超过）1697—1701年间的出口水平。

烟草的消费在一个世纪内一直在逐渐普及，从城市中悠闲的小圈子扩大到所有的居民。俄国是最后一个有待征服的地区，因为那里的教会禁止外国人之外所有的人吸烟。1697年，基于国库岁入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彼得批准认可并把烟草进口列为国家专营的行业。在沙皇访问伦敦之后，这一买卖就包给了一个英国商人的联合组织，他们有意向整个俄国提供弗吉尼亚烟草。两年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合同，因为当时俄国政府不肯或无法制止从哥萨克地区走私进入俄国本土的不完税的烟草。^[28]一个规模更大的外国烟草市场行将在法国形成。尽管科尔贝尔的远见卓识看到法国可以自给自足并且向北欧出口，但他还是禁不住烟叶高额进口税的诱惑，把法国境内的烟草种植限制在几个小小的地区之内，主要是在加龙河中游沿岸，因为征收进口烟叶税坐享其成来得更为省心。约翰·劳按照苏格兰人更为严峻的

逻辑，在1719—1720年干脆取缔了这些种植园。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烟草的生产在1700年的时候几乎已经停顿，这停产的部分原因是法国随后的垄断者们不愿意出高的价格收购，而法国即便在战时也愈益依赖阿姆斯特丹供应的外国烟草。不过在1697—1702年，法国的垄断者们开始直接在英国进行大宗的采购。1713年后，法国成为不列颠烟草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市场；1730年后，成为第一个重要市场。

如果烟草被推崇为一项转口商品，糖就更加珍贵，被视为帝国的缔造者，因为糖业动用的船只要多几百条，动用的资金也更多。还有，烟草在西欧的消费到1700年已经开始停滞不前，而糖的消费则仍然快速增加。这是当时殖民地成就的一个显著标志，英国殖民地在食糖生产上一马当先，葡萄牙、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紧随其后。产糖历史较久的巴西的产量从1670年的27200吨跌到1710年的21800吨^[29]。这比法属西印度的产量要高些，估计那里的产量已从1682年的1800万磅上升到1701年的3000万磅。荷兰人的种植规模要小得多，但在大力发展，特别是在苏里南，然而英法两国糖的销售脱离了他们的直接控制。

到1701年，英属西印度除了向北美出口外，向英国国内输送5200万磅。英国进口糖的价值比烟草多一倍多。17世纪的最后30多年中，生产翻了一番多。接着它以一种更有节制的速度——这种速度实际上低于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增长，就这样，原来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贸易类型给歪曲了。在1688年以前，英国糖经常运往库拉索或圣厄斯坦提斯，从这些岛屿直接运往荷兰，但在1713年后，法国和荷兰糖被偷偷运进这些英国岛屿，作为英国糖运出，运到越来越吸引人的英国市场上。尤其重要的是，再出口量在1698—1700年间仍然还占进口量的37.5%，可是在1733—1737年间却跌到4.2%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百分比。有人说英国糖在价格上无法在外国市场上（主要是荷兰和德国市场）同法国、荷兰相竞争；更确切一些，就应该这样说，英国的趋向是消费大于生产，这样，它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可供出口的剩余量就要减少，它的国内市场因此也就不那么依赖于向欧洲大陆出售食糖，其结果是英国的价格显著地高于大陆的水平。这和英国的制造成本毫不相干，因为几乎所有再出口糖（去爱尔兰的除外）都是未经加工的。^[30]

制糖业在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及圣克里斯托弗岛上发展迅速，但在圣多明各最初发展并不快，在那里，发展持续较长的是烟草和靛青。从17世纪90年代起，奴隶的人数有所增加，这对糖业是进一步的推动，在圣多明各尤其是这样，它在1713年后成为法国的主要食糖产地。未来是属于法国人的：仅在南特一地，尽管有战争带来的起落^[31]，糖的进口量在1714年大约高出1698年水平的150%，到1733年还要4倍于此。所以说，1697年以后法国的食糖生产在加快，而就在这个时候，不列颠的增长率却在开始放慢，葡萄牙的糖业已完全衰落。法国的这一增长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盈余可供再出口，它在17世纪90年代只有约500万磅可供再出口，而英国当时再出口量近2000万磅。就在1714年，在南特的再出口量仅为进口量的14%。但是，到1730年，在产量增加7倍以后，再出口量竟占70%以上。这些货主要是运往荷兰，法国人没有能为他们的殖民地生产的食糖在德国和北欧开辟更有把握的直接市场，这就是迟至1721—1726年，法国殖民地生产的食糖，足足有63%是从荷兰运出，经松德海峡到达北欧的，而且，法国这一最大的转口贸易有这一天还多亏法国消费者作出的自我克制。在17世纪的90年代，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大概是法国的三分之一，但他们糖的消费量至少都比法国多出三分之一；在随后的30年中，他们的消费还要增加至少166%，而法国人的消费状况，由于征税重，看来一直是相对静止的。

对其他美洲产品可以很快地作一概括的论述。在90年代，稻米的种植已在南卡罗来纳安家落户（种子来自马达加斯加），而且很快提供了一项有用的再出口品，从1709年开始，英国进口的大米约有四分之三来自南卡罗来纳，但主要是去荷兰和德国^[32]，但是大部分庄稼是供当地食用或运到西印度群岛去的。美洲更为重要的产品是欧洲纺织业所不可或缺的染料。胭脂虫几乎是西（班牙）属印度诸岛的独家产物。野生在犹卡坦半岛和南边邻近的海岸的洋苏木弥足珍贵，西班牙人因地理关系，自然就能进行垄断，不过英国的伐木人早已打入坎佩切、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砍伐业，满足了英国的需要，并降低了早先因西班牙的垄断而造成的高价。西班牙推行了一项更加有效的限制性措施，它把伐木人从坎佩切赶走，但是，这反而使这些人更加频繁地活跃于洪都拉斯湾的伯利兹四周和尼加拉瓜的摩斯基多海滩。北方的殖民国家一直在顺利发展它们自己的靛青货源以便达到自给：荷兰

人是在爪哇和苏里南经营，法国人在圣多明各、英国人在牙买加。不过1713年后，英国的工业愈益仰仗于法国的供应。

几乎美洲贸易的每一部门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益扩大的非洲奴隶买卖为基础的。种植、收割和榨糖这些沉重的劳动首先是由一伙非洲人干的，而且干得最为出色，他们还逐渐从白种移民的手中接过大部分需要熟练技巧的工作。西班牙殖民者继续依靠从英、荷殖民地（特别是库拉索）非法进口的奴隶、也依靠领有执照的外国贩卖奴隶的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33]。在整个时期，相当可观的葡萄牙人的奴隶贩卖和荷兰人规模更大的贩卖一直在继续着，各自运来比自己的殖民地需要的人数更多的非洲人，这就造成了有余额可以卖给西班牙人的法国人（法国人是从荷兰人那里买的）。在丹麦和勃兰登堡领到执照的公司也稍稍参与奴隶贩卖；这些公司都利用丹麦的圣托马斯岛，该地在历次战争中也许是安的列斯群岛中最为活跃的秘密交易中心，交战国之间进行的买卖在这里也相当活跃。英国的奴隶贩卖业后来居上。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到1689年一直相当有效地垄断这一行业，但是，革命剥夺了这家公司的权利，不准它抓无照经营这种买卖的人，使它对大量出现的“自由经营者”束手无策。议会承认有必要保持设在西非海岸的贸易站要塞，并根据1698年的一项法令，责成自由经营者在那些地方出口货物要付给该公司10%的捐税。1712年，这一规定满期，在这以后这家公司除了在20年代曾昙花一现地稍有起色之外，在商业上已经奄奄一息。它的失败要归因于那些无照营业者和受到伦敦垄断业排斥的小港口两方面施加的政治影响；要归因于五金业和其他制造商对一个享受特权的买主的敌视态度；还要归因于那些小岛上和在北美的殖民者，他们声言他们的利益受到忽视而愤愤不平。这一失败还起因于公司在国内的财务管理不善、在非洲的开支多而又不加节制、无法向购买这些奴隶的种植园主迅速收回欠款。在1680—1688的9年中，公司每年平均运交西印度群岛5155名奴隶；1690—1698年，每年仅约1400名；1698年以后的10年中，约每年1800名，而那些所谓“单干户”却有7500名。于是英国人着手要把所有的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在大约1698—1707年间^[34]，仅伦敦一地每年就平均派出50艘船去非洲（37艘是自由经营者的，13艘是公司的），而荷兰人只派出12艘或14艘。英国人在这战争的10年中每年运交的奴隶人数有9000多名，而法国人即使在1716—1718年的年运送数估计也只有1800名至2000名——这个

数字仅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一处就嫌少，那里经常抱怨劳动力不足。于是，法国的种植园主也不得不仰仗荷兰人和英国人，和他们进行秘密交易。到1716年，荷兰人已经退出不干了，只有英国人每年为法国人提供1500多名奴隶。不过法国的奴隶贩卖业正处在大规模开展的前夕。1713年，在失去贩卖奴隶契约之后，这一买卖卓有成效地开放，到1723—1730年，运交的奴隶人数每年平均达7200人以上。^[35]

17世纪中，有些贸易是因为它需要船运才被重视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战略商品而被重视的；又有一些是因为它们在本国使许多人就业而得到重视的；再有一些是因为它们在账面上造成贸易顺差才受重视的。规模宏大的对东印度的贸易却并没有提供以上所说人所渴求的好处中的任何一种。由于东印度来的货品体积不大和该地贸易需要使用的船只不多，那里除硝石之外并没有向欧洲提供任何战略商品。东印度虽然运去生丝要在欧洲加工，它同时也运去丝棉织品和西方工业进行大力的竞争。最后，和东印度的商品贸易有逆差，这就使欧洲的硬币和金条以空前的规模，经常不断地外流。虽然如此，和东印度的贸易却是资本雄厚、政治上强大、获利优厚（即便是间歇性的），是一个缔造帝国的主要因素。

荷兰人曾经支配了对东印度贸易的各个部门。^[36]虽然缺少精确的数据，1683—1721年间的迹象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把在印度本土的优势拱手让给英国的同时，在整个东印度贸易方面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即便是微弱的领先。1720—1723年，他们每年平均派出39艘船，英国人是20艘。^[37]而且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709—1719年的10年间，每年售货进益平均达132.6万镑，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708—1717年的售货进益是99.9万镑。但在这以后荷兰人的领先地位削弱了，平均销售额是157.1万镑（1719—1729年），而英国是147万镑（1718—1727年）。法国在东印度的贸易在18世纪20年代之前规模不大。科尔贝尔的国营企业从来就不很顺利，它在九年战争中因失去本地治里和许多船只，损失严重。即使在1698—1702年这个繁荣的间歇，法国公司每年派出的船只平均也不到5艘（英国的两家公司派出了21艘），而回到法国的东印度商船当时平均不到4艘——荷兰是19艘。早先在随后的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对法国公司是不胜负担的，它在1703年后不再出船，而是把买卖委托给持有执照的私营商人——从1709年起是委托给麦劳印一家。在它仍然拥有特权的最后几年里（1715—1719年），扬帆去东方

的法国船每年不到一二艘^[38]；当时的出口估计每年不到20万镑（英国是50万镑以上），进口估计是40万镑（荷兰是大约120万镑）。法国和东印度的买卖和它商业中的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在“摄政时期”得到改造。1719年新建立的“印度公司”在躲过了劳氏换算方案造成的混乱以后，立刻就大展宏图，颇有生气。

来自东方的商品很多，各式各样，一般来说，都较为值钱但不是什么大件头。只有少数初级商品和距本国较近的一些地区生产有竞争。英国和荷兰都已大量减少进口印度靛青，前者转而依靠西印度，那里正在盛行种植这种产生靛蓝的植物，后者在爪哇取得了一个新的来源。糖在从孟加拉到台湾之间的地区广泛种植；搞种植和制糖的中国人已在爪哇开拓了商业上具有重要性的种植园。1688年以前，糖在阿姆斯特丹的价格常常太低，低到不值得把这一产品大量运回国去；荷兰人于是把它在日本卖掉和中国糖进行竞争，也在印度的西北和波斯抛售和孟加拉糖相抗衡。不过在几次战争中和战后，欧洲的价格升高了一些，货源又不断增加，这就鼓励他们向国内运进更多的爪哇糖，先是做压舱货，而在1715年后成为一项商品性的货物，虽然这和美洲运来的数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亚洲特有的商品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最为闻名的是麻拉巴尔胡椒。这是荷兰人开发出来的，但是，荷兰人在苏门答腊、爪哇（尤其是在班坦）发展起来的胡椒供应此时把麻拉巴尔胡椒比下去了。不过荷兰人的垄断并不能席卷整个国际市场。他们并没有采取一种贱买贵卖的局限性的政策，却宁愿买进超过自己需要的数量，然后在欧洲和东方大量抛出，用这样的办法来使外国的竞争对手却步不前。英国人在失掉班坦之后，在南苏门答腊的班库伦开发了另一个新的供应基地，并紧紧抓住他们在麻拉巴尔的立足点，此时他们所有的胡椒有三分之二是从这些地方获得的。然而，荷兰人在全然是承包性质的贸易中却加强了他们的领先地位，在1715—1720年间，这一领先地位是2：1。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荷兰那样向欧洲提供更多的胡椒，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法国和奥斯坦德的公司崛起才告结束。荷兰人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对印度尼西亚东部“香料群岛”上的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和桂皮进行垄断。虽然有时候对所熟知的荷兰的东方贸易的形象是有夸张之处，但是，这一垄断地位对他们公司的利润来说是重要的：1698—1700年，尽管各种香料只占从东方运回去的货品发票价值的11.7%，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售货收入中份额却有25%，

而且这一比例一直令人注目地保持稳定不变，不像胡椒那样，它所占的份额正在缩小。1683—1721年，荷兰公司通常能够依仗它大量的后备存货在国内维持香料的固定价格，让欧洲的需求根据这一价格对自身进行调节。在亚洲，公司通常以稍低于欧洲的价格出售的办法来鼓励消费，但也不使价格过低以免有人觉得合算会在亚洲的公开市场上买下香料运到欧洲去。维持这一政策并非易事。该公司经常受到东方生产过剩的威胁，不时采取把树和作物毁掉的办法；它在欧洲的储备有时也变得过多，在1713年和平到来之后，许多贮藏过久的存货被焚毁。总之，荷兰的固定价格政策在17世纪后半期确立之后，欧洲的消费明显下降。尽管公司的董事们也懂得需求的弹性，但他们并没有调低价格以此作为一项试验，看看这个办法能否利用来提高消费水平从而取得更大的毛利。

欧亚贸易中这个时期的最新商品是茶和咖啡。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只是在17世纪90年代才开始。到1698—1700年，二者占阿姆斯特丹销售额的4.1%；在1738—1740年间，几乎占25%。至少在1720年以前，咖啡和茶与香料有别，它们是荷兰人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竞争性的买和卖的商品。

咖啡的主要出产地是也门的山里，还有一种质量较次的则产自红海那一边的埃塞俄比亚。也门的口岸穆哈是个大集市，咖啡从这里通过船只和商队销往整个饮用咖啡的地方：从印度的西北部和波斯一直延伸到西方。主要的运行路线是红海，经过陆路到埃及的各地中海口岸，然后遍及地中海各地。就在17世纪90年代欧洲开始盛行喝咖啡的时候，法国人显得特别有办法，他们通过勒旺岛的贸易，向西欧提供大量的咖啡；荷兰人近至18世纪刚开始的那几年，他们有好多咖啡仍然是在里窝那和热那亚买的。不过在1700年以后，上述路线受到越来越多的障碍，诸如私掠船、阿拉伯人的骚动、埃及和红海上高级官吏帕夏们的勒索。这些障碍，再加上欧洲对咖啡的需求越来越大，迫使人们在欧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英国人和荷兰人已经从专门设立在穆哈的工厂买进咖啡。从印度发运；在这一新世纪中，英国、法国、荷兰的购货人从穆哈出发，深入内地到也门的山区距离产地更近一些的地方进行采购。大约到1710年，这三个国家都在派专船去穆哈把咖啡运到欧洲，不用再在印度或锡兰换船。穆哈咖啡在下一个10年中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英国人领先，他们的进口额从1685—1688年间的每年21.3444万磅上升到1699—1701年间的

55.2235万磅（其中大约有一半直接来自东方），到1713—1715年间，又上升到135.0689万磅（大约有四分之三是直接运进的）^[39]。荷兰人很快就跟上。到1717—1721的高峰年，他们从穆哈发运的数量高出英国一倍以上，这时英国的数量却稍有下跌。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一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需求量在扩大，咖啡种植不仅被引进波旁岛（留尼汪）和爪哇，而且还被引进巴西、苏里南和安的列斯群岛（在有些地方则是得到振兴）。这些地方的种植园一开始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直到1721年，荷属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咖啡有90%还是从穆哈来的，只有10%来自爪哇。这一比例在5年之内却颠倒过来了。这一出色的新出产使这家公司得以压低咖啡的价格，并且把在穆哈的难弄的生意留给英国及法国、阿拉伯的商队去做。在18世纪30年代，法属西印度生产的咖啡大举进入，使得欧洲市场更加复杂化。不过到这个时候，人们的喜爱已经转向茶了。

17世纪80年代，中国茶在欧洲仍然是一种富有异国情调、十分昂贵的商品——对许多人来说，茶只是一种药物，在宫廷权贵的圈子里它是一种时髦的饮料。这样的消费量不算多，不用和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在亚洲随便什么地方就可以弄到手。英国人在这个80年代进入厦门；到1700年，英国人、法国人被允许进入广州。在这新世纪中，由于直接来源有了保证，这一贸易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不过开展得没有咖啡那样快。英国的平均进口量（1685—1700年间为1.6万磅）在1711—1717年间增长到19.7万磅，然后在下一个10年里又增加两倍——到该世纪中叶又增加5倍。在1728年以前，荷兰人并不直接到广州去做交易，而是仰仗于中国帆船运到巴塔维亚的供应。这有一大好处，可以避免白银进一步流到中国，但也意味着荷兰人购买的茶叶数量有限，而且价格也相对地高。

然而，最初把英国人吸引到广州厦门去的并不是茶叶而是丝绸。中国生丝久已闻名欧洲，它在那里和意大利产品，还有通过陆路从伊斯法罕运到由阿勒颇或士麦那的波斯大量出产的丝绸相竞争。丝绸业在波斯是由皇室垄断的，只要政治形势对头——一般来说，在波斯和土耳其交恶的时候——欧洲各家公司就想方设法改变丝绸的运输方向，把它引到波斯湾在那里装运，他们获得成功，但仅仅是非常短暂的。17世纪晚期，东西双方贸易一个新的、日趋重要的发祥地在孟加拉成长起来。1678—1685年，议会禁止从法国进口任何东西，这一禁令刺激了英国丝织业，就在这个时候，英属东印度公司通过从孟加拉

大量订购生丝取代了“地中海东部公司”成为主要的进口商；1685年后，“地中海东部公司”再执牛耳。其时荷兰人已经在扎扎实实地做孟加拉丝的生意，其基础是在日本和荷兰的良好市场。1698—1700年，他们进口的孟加拉丝约相当于英国的两倍半，英国人买的丝大部分仍然由土耳其进口，他们从意大利进口的丝比他们从孟加拉进口的要多一倍，而荷兰人这时进口的丝有75%来自孟加拉，16%来自波斯，9%来自中国。在1713年以后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波斯—土耳其贸易仍然是英国的最大生丝供应者（就如意大利是它最大的捻丝供应者一样），不过在英国的贸易力量延伸到孟加拉以后，从孟加拉来的生丝也就随之逐渐增加。

虽然纺织群（指原料和成品）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额的比例从大约1700年时的43%跌到1738—1740年的28%，但它仍然是荷兰从东方取得的最重要的进益，在这方面生丝起的作用不大，起作用的是成匹的丝绸和棉布。荷兰人一直重视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贸易，因为那里出纺织品，特别是棉制品，他们可以用这些物资在印度尼西亚交换胡椒和香料（这样可以节省货币），同时也把这些纺织品和中国的以及其他印度丝织品运回国去。这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是最为重要的，直到17世纪80年代欧洲人的爱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止。稀奇古怪的印花棉布和丝绸突然成为男男女女的热门风尚。棉布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额几乎增加两倍。英国人从东方取得进益的困难较大，已开始苏拉特大力采购纺织品，苏拉特是艾哈迈达巴德周围工业区的沿海国际通道。当地的棉花和波斯生丝就在这个工业区进行加工。即使在这一世纪末发生的政治动乱迫使英国人把他们的主要基地移到巴德拉斯的时候，他们很大一部分匹头布仍然是从苏拉特来的。英国人进口的匹头布确实仍然是相当均匀地由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三处分别供应的，而荷兰的匹头布进口却有剧烈的变动：55%来自孟加拉，26%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有少量来自苏拉特。不过英国的贸易在这新世纪中将发展得更快。

在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货品中，唯一能和欧洲本地的工业相竞争的只有精工制作的丝绸和棉织品，这一竞争非常激烈，因为英荷两家公司派出了艺匠、送去式样，指导印度工人的生产，并且取消了中间人的渔利，从而保证那里的产品能适销欧洲市场。印度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在17世纪80年代“印度”热之后一代人的时间中达到了危机性的水平——先是在法国，那里的纺织工

业发生的一切困难（这是1686年的国际危机和胡格诺人向外移民造成的）都因情况的需要归咎于远东丝绸和色布的输入。1686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一直到1689年才完全生效）禁止进口东方的丝绸、金银线织品和色布。1700年，一项内容众多的法规最后连白布也禁止输入，只有“法国公司”和马赛商人进口的是例外，但是输入的目的也只能是再出口。这项白布禁令一直持续到1759年，但是，在一个时装仍然需用印花布、时装又是高于一切的国家里，执行这一禁令是非常困难的。西班牙和勃兰登堡也采取了类似的禁令。可是白布印花在荷兰和瑞士盛极一时——大部分是法国胡格诺移民搞的——主要是满足出口走私的需要。在英国，这一斗争持续时间相当长，但是议会在1700年最终禁止使用印度、波斯或中国造的丝绸，禁止使用“在那里上色、染色、印花或着色的”布。英国的公司像法国的公司那样仍然可以在贴了封条的仓库里大量贮存这些织品供再出口之用，这对荷兰人是难堪的。这种仓库贸易十分可观，即使在法案实施之前，输入英国的白布有一半是再出口的。而且英国的法案和法国1700年的立法不同，它允许输入白布，这使英国印纺工业在1721年的法案也禁止使用白布之前得到巨大的推动力。英国这一禁令像法国的禁令那样也难以执行。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这两个国家的毛纺工业能从这些禁令中得到好处是令人怀疑的；丝绸业也许得到的好处多一些，但是主要的受益人却是那些走私者。

东印度贸易对常规的商业政策造成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向海外装运什么货的问题。在东方，没有一个地方对欧洲产品的需要足以使欧洲人能支付他们从那里要买的一切货品。除了输出钱币和金条，没有真正别的选择，虽然人们对这个办法的偏见是几乎普遍存在的。事实上，硬币占英国对东方出口量的80%（1708—1730年）^[40]，荷兰多半是90%（1714—1728年），法国外运的货物比英荷要少得多，可在1716年甚至也占76%。一般而论，每一个公司只能进一步运出硬币才能扩展它的贸易。各种防止这一外流的办法都已试过。为避免花费现金，印度尼西亚的胡椒可以拿来卖给中国人，印度布匹卖给印度尼西亚人，如此等等。最有希望的贸易是去日本，能在那里弄到现金。荷兰人独家进入日本是他们在贸易上占支配地位的关键，有些年头，他们从日本得来的硬币多于从荷兰运出去的。在日本人于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以后，黄金在荷兰人装运的货品中替代了白银的位置。日本后来数度降低他们钱币中的黄金含量，使得这一贸易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

1696年降低硬币成色以后，从日本输出金币不再有利可图。可是荷兰人还是接着干，准备在兑换中吃些亏也要得到这些硬币，因为买印度纺织品需要硬币，而这些纺织品又可以换到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他们得以庆幸的是，在白银不许出口、黄金成色降低的情况之下，日本的铜却是可以大量弄到手的。这个决定性的贸易在1681—1682年达到它的顶峰，当时日本每年有300万磅以上的铜被荷兰人弄走。之后这一行业慢慢衰落了，一是由于日本方面的限制，再是由于1690年后在日本出售丝绸越来越困难，因为日本人在发展他们自己的丝绸制作业。大部分铜，和金银一样，最终流到印度，但有一年剩余的铜作为香料船的压舱物被运回国去，这使荷兰人在欧洲摆脱了完全依赖瑞典铜的境地，并且起了节制欧洲铜价的作用。

勒旺贸易^[41]被看成是东方贸易的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欧洲参与勒旺贸易的国家，特别是法国，也遭到硬币的大量流失。不过欧洲人在和勒旺岛贸易中花在购买穆哈咖啡和波斯丝绸这类商品上的金银，有许多被商队的人往东往南带到这些商品的原产地。因此，荷兰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凡是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一带的口岸进行贸易的，得以开发这个“摩尔人的”巨大金银之源，当地人在和欧洲进行贸易时把这些金银带回国去。因此，在硬币从西方大量流到东方的同时，还存在着反方向的涡流。

由于白银（比起黄金来）在东方比在欧洲要值钱一些，英国人只运出白银；荷兰人主要运出白银，也运出少量黄金。英国人和荷兰人主要靠在加的斯及其附近进行的贸易取得白银，荷兰人在这个地方传统上占很大优势，法国人越过比利牛斯山经营的贸易从中也取得不少白银。许多西班牙白银通过热那亚也进入中欧。1660年后，虽然原来所有的白银分配机制仍然发挥着它们的功用，进入欧洲的西班牙白银供应量却只及过去的一个零头。信贷紧俏、物价下跌——这一般是在和平岁月中随后两代人时间中的特点。另一方面，巴西金矿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改变了欧洲1700年以后的货币情况。^[42]英国是和葡萄牙有主要商业联系的北方国家，它得以把这些黄金中的绝大部分吸引过来；有些则转而再流到荷兰或法国^[43]，但是留在英国的黄金多到足以在商务交易中到处代替白银使用（白银贬值并且供应不足）。

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让硬币流到东方。英国人在这一方面比法国人的处境要好一些。1698—1710年，羊毛织物在英国运到东方的出

口商品中占58%，1710—1730年上升到70%——铁和铅是白银之外仅有的重要货品——但是由于气候的关系，羊毛织物对往东的汇款所能作出的贡献有限。在地中海东部，英国羊毛织物和其他货品有它们的市场，没有必要运硬币去。相比之下，马赛商人要运出大量硬币来维持他们在这个地区规模大得多的贸易。只是在1708年以后货币短缺的年头，马赛才真正有大量的布往外运；战后他们的货运量实际上超出了英国的。[\[44\]](#)

法国向勒旺岛扩大布匹出口缓慢，部分原因是在科尔贝尔以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毛纺业情况普遍萧条。由于香槟、贝里、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羊毛不够法国制造业用，这个工业要依靠进口材料，特别是在军事需要量增加的时候更是如此。最好的羊毛是卡斯蒂尔的，是从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进口的，从巴约纳经过海上转到埃尔伯夫、阿布维尔和色当的制造厂商那里去。把阿拉贡的不够精细的羊毛，还有纳瓦拉的粗羊毛也算在内，法国在1700年进口的西班牙羊毛，每年约值900万或1000万镑。法国的工业因此特别容易受到战时西班牙供应中断的影响；勒旺岛和非洲的粗羊毛只用于农民的比较粗糙的手工制品，不允许用于制作军服，波罗的海所供应的，或者由“夜间走私船”从英格兰、爱尔兰偷运出来的在法国的需要量中则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虽然独立的、手工业制造者在塞文山和比利牛斯山里依旧存在未被淘汰，法国这一行工业的大部分和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是在把活计交出去做这种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诺曼底（依赖鲁昂的商人——制造者）、皮卡迪和法属佛兰德尤其是这样。1700年，在里尔附近，一个布商就可以让3000名把活带回去做的工人忙于生产——这种高质量的工业只是在1708年受围困和被敌人占领时期才暂时受到损伤。皮卡迪的制造业以亚眠为中心利用许多不同种类的羊毛织造各式各样的料子，一般来说，战争对它的影响要小些。更为重要的是那巨大的诺曼底制造业。埃尔伯夫周围的制造业雇用了8000多名工人把塞哥维亚羊毛织成和英国、荷兰产品相仿的精美织物，这个制造业到17世纪90年代确实已经盛极而衰落。但是，在诺曼底的几个规模较小的中心，它们或模仿埃尔伯夫式样但搞便宜一些的制品，或纺制哔叽和大众化制品，倒能更好地应付过去。后起之秀的香槟制造业，它就做不到，此时已远远落在诺曼底的后面：因为胡格诺老师傅们往外移民，色当受到的打击特别大，城里有2000名手艺人失业；在兰斯和雷

伐尔，由于羊毛缺货和移民的缘故，作坊在1686—1699年间减少了一半。其他中心损失更大，不过在夏龙和朗格勒，新质量的布的生产缓和了恶劣商业气候和老一些行当一蹶不振所带来的影响。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分散的制造业多半是为当地市场生产的，然而有时却也相当重要。奥尔良内的罗莫朗坦，专做军服料，贝里的夏托鲁雇用1万多人。在普罗旺斯、多菲内特别是在朗格多克，也有重要的制造业，为勒旺岛、北非和安的列斯群岛生产廉价布。国家鼓励一种比较集中的、为了特殊用途的生产形式。朗格多克境内的卡尔卡松、康奎、塞普特斯以及其他地方，享受优惠的皇室御制造商每家都雇用好几百名工人。较为著名的有在阿布维尔的范罗巴伊业务所，1700年时，它雇用工人1500名。当时，只有精炼、切割和漂洗是在公司厂房里进行的。但是在1708—1714年间，这家公司把从纺纱开始的全部操作过程都固定在它自己扩充了的厂房里面。工人们对这一新的纪律进行抵制，迫使政府在1716年采取打破罢工的干预。这样庞大的一个企业，在18世纪20年代雇用3000名到5000名工人，然而在当时的纺织业中，它不过是个异想天开的怪物而已。把活送出去的制度仍然有其巨大的生命力。它确实在整个欧洲发展着。

一般来说，法国的毛纺业到1708—1710年已经走到南特赦令撤销以后漫长的不景气的尽头：大约在1715年尽管还曾出现过生产过剩的迹象，整体来说它在继续发展。相形之下，荷兰人仍然处于衰退之中。他们在莱顿的工业规模宏大，在1661—1671年间，曾年产12.9万件布，而在1699—1701年间，平均仅生产8.3万件；在接着发生的战争中度过了非常艰难的光阴，于1717—1726年间也只恢复到每年7.25万件。莱顿在战时经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西班牙和别的进口羊毛。更为永久性的伤害是在原先像法国、普鲁士那样的市场，高度保护性的制造业在发展。1713年后，莱顿在奥斯曼帝国的公开市场又丢失给法国人了。在德意志南方和哈布斯堡的国土上，荷、英布的销售都因高昂的运输费用、河上关卡和保护性的关税而受到阻挠。^[45]而且在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的地方制造业在发展，利用西里西亚的优质生羊毛满足了当地和南德意志需要的一大部分，另外在1715年前后每年还运往波兰和俄国数千件。虽然有些世家自称卖出的衣料和英国、西里西亚的毛纺品、精纺毛织品、纬起毛织物等不相上下，实际上却常常是最普通的等级。在德国能买到一种较好的，是亚琛（即埃克斯拉夏佩勒）附近生产的。

比德国的规模要大得多，在产值上，甚至10倍于莱顿的是英国的广大衣料工业——可能是欧洲任何种类工业中的最大的工业。虽然它经常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它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却在慢慢上升。英格兰、威尔士制造业需用的羊毛从1695年前后的4000万磅增加到1741年前后的5700万磅。本地羊毛本身是国家的一项巨大资产；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纺织业使用了价值200万磅的生羊毛，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九是英格兰和威尔士自己出产的，余者主要来自爱尔兰，其次是来自西班牙的。^[46]“西域”公司——从处于停滞状态中的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到正在兴起的德文，它是把活儿交出去这一制度的标准老家——制造出最好的料子，有可能用的是西班牙羊毛，而且总的来说，它比起其他生产料子的地区来，更是以出口为方向的。战争保护它不受外国时装变化的影响，只是到18世纪20年代，它生产的哔叽才感到诺福克出的料子和它竞争的十足劲头^[47]，据说诺福克仅在诺里奇的附近就雇用了12万人（付出的工资较低）。不过潜在的最有生气的地区还是约克郡的西里丁，那里虽然也存在着规模有限的把活儿交出去的体制，却是规模较小，搞独立经营的小业主的发祥地，这些小业主就雇用几个学徒和短工。英国北方在传统上生产较为粗糙的料子，主要是一种手织粗呢，主要是供应国内市场的；大约在170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布雷德福周围的精纺业重新抬头，最终成为诺福克最严重的对手。在这面目一新的精纺业中，企业家们都比较殷实，广泛实施把活儿交出去这一体制。

大约在1700年，英国全部羊毛织品和精纺制品的五分之二或更多一些是出口的，约占英国本国制品出口额的六分之五，为它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三，不过后来，这一百分比到1750年将要减少到只剩三分之一。毛织品出口值从上一世纪60年代起到1700年只增加约三分之一（1700年时估计是300万镑），并开始到1750年之前又增加三分之一。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这一行业因新的外国竞争对手、外国的敌视性关税遭到极大的困难，但到1688年得到恢复。历次战争在海外造成军事上和投机性的需求量，但同时也破坏了外国市场，既带来非常不利的时期（例如，1696—1697年），也带来很好的时期（例如，1708—1710年）。《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一些年头情况反复无常，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的中期。荷兰和德国仍然是英国极为主要的市场地区，不过它们在英国的外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从1699—1701年的44%降到1716年的36%；这些市场地区主要是为一

些远离贸易中的输出港服务的，这些港口与勒旺和东方公司都没有贸易往来。其次是南欧，特别是那富有黄金的葡萄牙（1716年占英国国外市场的17%）和西班牙（11%）、奥斯曼帝国、北欧国家和美洲的种植园（二者都在5%）和佛兰德；东印度群岛给人增添种种麻烦，是个比较小的市场，法国只买走私羊毛。^[48]汉堡公司（原先的“商人冒险家们”）和其他一些领有执照的公司垄断组织妨碍羊毛织物的出口，但是，1689年的一项法案取消了一切限制，只保留了勒旺、非洲、俄罗斯和伊斯特兰公司（1579年，英国成为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贸易的机构——译注）诸公司的特权；及至1699年，这三家的营生实际上已对所有的人开放。自此以后，荷兰和德国商人越来越多地通过代理人在伦敦和料子口岸购买，不再由“商人冒险家们”向海外贸易中心城镇出口料子。^[49]这些代理商，起初都是英国人，后来逐渐为外国采购员所取代，这些人，如不来梅的巴林一家人（驻埃塞克特），都是为此目的专门派出来的。英国卖主和外国采购员打交道的贸易中心集镇有一部分于是就移到英国，不过伦敦的大商人仍然自己搞出口，特别是对南欧的出口。

亚麻布这一行业在北欧比毛织品行业分布得更为均匀。到处都有种亚麻的，要取得必要的技艺也并不难。一般来说，其质量和价格从西往东，渐次低下，最好最贵的亚麻布来自法国，俄国的最粗最便宜。不过由于亚麻布的价钱不算贵，人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更是如此，亚麻工业在这一时期内的潜在活力是向东转移，寻求更加便宜的原料和劳动力。

法国的亚麻布业实力雄厚，它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属美洲都有市场，产品种类繁多，从粗帆布、毛撮和不列塔尼、诺曼底的粗亚麻布一直到皮卡迪、阿图瓦、法属佛兰德的麻纱，一应俱全。1686—1688年，英国人每年大概要从法国进口价值70万镑的亚麻制品，仅加的斯一地每年就买下45万镑以上的货，供应印度群岛。可是法国在英国、印度群岛这两个市场的地位甚至在17世纪80年代就受到了挑战，向它挑战的有荷兰和布拉邦特新兴的仿造业以及比这更新的设在撒克逊和德国其他地方的仿造业。德国亚麻制品在历次战争中在西班牙和美洲市场上取得大而永久性的份额，德国仿造的毛撮、粗麻布和“法国”帆布在英国销路很好。因英国临时性的禁令和对法国人征收永久性、歧视性的关税之便，撒克逊和荷兰亚麻制品在那里永远

取代了法国的制品。在1713年后的10年里，英国除了向德国购买比较便宜的亚麻制品之外，它所需要的上等细麻布几乎全部是从荷兰进口的，麻纱则主要购自荷兰和佛兰德。这一行业在法国境外是集中在荷兰。那里有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已经形成，把尼德兰南部、威斯特伐里亚和现在的下撒克逊生产的褐色（未完工的）亚麻品运到哈勒姆的漂白作坊去——其中有大部分是由阿姆斯特丹再出口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去的。迨及1700年，这一联合体把上撒克逊、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亚麻产区都包罗在内。不过哈勒姆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因为漂白作坊正在威斯特伐里亚建立起来，并深入到德意志。在17世纪80年代，英国的“商人冒险公司”就直接从汉堡进口为数可观的威斯特伐里亚产的亚麻制品；在这家公司的特权被取消之后，不来梅成为威斯特伐里亚的亚麻品和亚麻纱直接运往英国的出口口岸，但是汉堡仍然是西班牙的主要供应者。[\[50\]](#)

再往东，供出口用的亚麻制造业正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乡村中展开。荷兰代理人在这些农民中间传播了经过改进的技术，于是原来在17世纪70年代从阿尔汉格尔少量出口的俄国制品到彼得在位的年头里数量大增。从波罗的海出口的亚麻布数量在1680—1700年间增长了3倍。这一新兴工业在北方大战时期受到严重影响，但在18世纪20年代却超越了它1700年的水平。在1700年以前，但泽几乎垄断了这一行业，柯尼斯堡远远跟在后面；就在这个时候，这一手艺已从波兰传入俄国，引起这一贸易结构的激烈变化。1721—1725年，从波罗的海口岸出去的亚麻，有71%来自圣彼得堡，只有29%来自但泽。在18世纪20年代，如前一世纪的80年代，整整有四分之三是出口到英国去的。于是乎这一工业的一个新的独立于荷兰集散中心的部门成长起来了。

另外一个新的部门行将在不列颠诸岛发展起来。企图在英格兰建立起亚麻工业的尝试整个说来是失败了。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劳动力成本高，不过在制造船篷布方面却是相当顺利的。爱尔兰是个不发达国家，劳动力便宜，有纺织业方面的经验。由于1699年以后官方的政策限制爱尔兰羊毛织品的出口，亚麻制造业就为就业提供了另一个方便的机会。还有，1685年后，从圣康坦迁来的胡格诺难民已把法国最好的亚麻技术传了进来。从1696年起，英格兰免税进口爱尔兰亚麻和亚麻纱。为鼓励生产，爱尔兰政府于1711年成立亚麻委员会。在它的扶助下，出口量在1711—1721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到1734年还要再

翻一番。苏格兰的亚麻工业，特别是在它和英格兰合并之后，也发展迅速。

丝业早在意大利北部、瑞士、阿维亚诺的罗马教皇领土和贡姆他维纳河（The Comtat Venaissin）流域，还在巴黎、图尔和罗纳河流域建立，但在欧洲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制造业。法国这一工业所需的原料主要依靠意大利，但是从士麦那来的波斯丝所作出的贡献渐次扩大。意大利为里昂制造业提供的丝是已经捻过的（即捻成线的形式）；阿维亚诺是加工勒旺产生丝的中心，供其他各地纺织之用。不过根据1687年的一项法令，进入法国的外国丝，无论是通过马赛来的生丝或是从阿维亚诺来的丝线，都必须通过在里昂的贸易中心市镇，并在那里缴纳通行税。尼姆四周朗格多克丝业对把货物往罗纳河上游运，然后再往它下游运这一规定感到是一种特殊负担。1721—1722年间发生鼠疫，工人们散往里昂和尼姆，从而大大促进了法国本土的捻丝工艺。然而在这之前，阿维亚诺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捻丝中心。路易十四末年，人们再次作出努力，在南方特别是在多菲内和尼姆的周围营造桑树林。迨及18世纪20年代，随着这一新的生丝生产的顺利发展，捻丝和纺织在整个农村更加广泛地扩散。科尔贝尔曾大力发展法国的丝织工业，尤其是在尼姆，当时对外国织品的一项禁令曾鼓励了职工从附近的阿维亚诺移居进来。不过这一行业在里昂是由严密的行会组成的，只接纳天主教徒，而在尼姆，控制没有那么严，许多师傅是新教徒，以至于反胡格诺措施在那里显得特别松劲儿。老师傅们的外徙造成为数可观的失业：有些工人跟着他们跑，其余的人回返阿维亚诺。洛桑的丝绸工业全部都是由尼姆来的手工业艺人组成的，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这样，不过规模没有这样大。

英国为法国的丝织品和亚麻制品同样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尽管在1679—1685年间曾实行过抵制，英国纺织业的进展仍然有限，一直到后来法国这一行业在英国的业务因战时中断，它才在技术熟练的移民中得到新的活力。在1689—1713年间，英国开创了一个受到周密保护、稳扎稳打的丝纺工业，它强劲有力，足以有效地参加博林布鲁克的1713年英法商务条约。它所需要的捻丝靠意大利，生丝靠波斯—土耳其的贸易（后来靠孟加拉）。英国人在把生丝变成具有一定强度作为经线之用的丝线这一过程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个问题一直到1716年隆勃兄弟掌握了皮埃蒙特捻丝机技术才算得到解决。这一技术在他们厂子里（设在德比郡）是保密的，外界对此不无妒意。

在当时，无论是在资金、劳动力和产量方面，纺织业都是首屈一指的工业。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工业”，尽管它的产品在战时极为重要，当时却没有纺织工业那样举足轻重。英国出口为数可观的锡和铅——输往法国，这主要是在和平时时期，而在战时，则输往荷兰。但是英国的主要矿产是煤，英国又是欧洲的主要产煤国，有人曾提出怀疑^[51]：“（欧洲）大陆（大约在1700年）（煤的）全部年产量是否抵得上大不列颠年产量的六分之一多一点。”英国在17世纪80年代的煤产量，估计约每年300万吨，稳步上升，这在纽科门工程师的抽吸机问世以后，尤其如此。这些煤，约有16%产自苏格兰，41%产自诺森伯兰和达勒姆，29%产自英国中部。凡是在可以航行的河道邻近挖掘出来的煤，以诺森伯兰和达勒姆为例，可以长途远运；其余的只能在离矿井口15英里之内的地方使用——这个距离是用车拉的最大经济限度。伦敦是水运煤块的主要消费者，不过那里的煤价从来也没有低于矿井口价格的4倍或5倍。泰晤士河流域每年约消耗46万吨，出口16万吨，其中五分之三出口到荷兰，运往法国和德国各十分之一左右。法国即使在科尔贝尔的领导之下，1715年煤的总产量还比不上一个泰恩赛德采地的产量。它的主要矿区在福雷兹（在圣埃铁恩纳一带），当时从那里可以把煤经卢瓦尔河外运，和位于莱昂内斯附近的德吉尔河，从那里经过水路运到莱昂，顺着罗纳河而下。1700年，德国规模较大的煤炭生产集中在亚森和萨克森附近，但主要产地是在鲁尔。只是在列日到蒙斯这一地带，采掘的规模有点像英国人的；然而比利时总的产量是否超过达勒姆—诺森伯兰产量的三分之一还是值得怀疑的。话虽如此，比利时煤的生产确实是支援了它那欣欣向荣的冶金工业，并且经由水路向法国和荷兰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出口物资。

铁矿砂和木炭的供应充足，在大多数国家中能够维持一个正好满足国内需要的铁工业，法国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仅有列日的主教管区那样少数地方其自身的资源足以支援供出口的铁器制造业。主要英格兰和瑞典是例外——英格兰是唯一大的进口国，瑞典则是大的出口国。常常有这种说法，认为英格兰的炼铁工业在1660—1760年间由于林源“枯竭”而停滞不前，这是不正确的。这一工业，特别是在发生战事的年头，它平稳地持续发展。在英格兰，森林是十分珍贵的，不能把木材劈成柴烧，木炭实际上是取自不到20年树龄的灌木或是林场上间苗拔除下来的树木。经过周密的计划，利用这些树木来维持炼铁工业的生产，而又不给它迅速发展的机会。^[52]英格兰的人工昂贵（这

在木炭的价格和炼铁加工的成本上面得到反映）这也许是这个工业未能迅速发展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因此，随着它的一些使用铁的行业的进展大大快于它的制铁行业，英格兰愈益依赖进口铁。在1699—1701年间，约有五分之四的铁是从瑞典进口的；1720年，从波罗的海口岸运出的铁，约有三分之二是输往英格兰的。在波罗的海地区之内，瑞典执牛耳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它这一工业在欧洲、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它还使用一种纯得异乎寻常的矿砂，丰富的森林又靠近它的锻炉，那里的劳动力又十分便宜（因为常常是临时工）。瑞典政府把制造条形铁的锻造车间迁到远离生铁高炉的地区，企图以此来保持森林的原始成长，然而，这一企图只能预示瑞典炼铁业具有的有利条件中的第二项并不能持久地存在。^[53]瑞典这一工业在18世纪的发展比在上一世纪要缓慢得多，生产在1697—1747年间才增长27%。它的出口额（至少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在1740年以后不再上升。其时，俄国的出口额却开始显出它的分量，而它在1721—1725年间才占波罗的海口岸运出量的2%。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行业都加在一起，并且弄清各个行业、国家和年份在欧洲经济活动中的一份作用，那么，就能够更加直截了当地理解这些行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可是我们能够用来进行哪怕完全是尝试性的全面计算和比较的只有英法两国的对外贸易。在这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中，英格兰更为活跃，特别是在再出口方面——这在1699—1701年间为200万镑，法国在1716年才120万镑。^[54]两国出口的工业品都远比它们所进口的要多，而且两国进口的工业原料都比它们所出口的要多——这是“工业化”国家所应具备的正常条件，也是重商主义计划制订人所大力追求的目标。在这两个国家中，工业制品中占支配地位的也都是纺织品。这些货物占英国进出口的87%，占法国出口货物的69%。

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两个尼德兰。意大利、西班牙两家共吸收法国在欧洲这一范围之内出口制品的四分之三，前者主要用丝、后者用白银来偿还。相形之下，联合省作为法国产品的最大贸易中心就几乎没有买进什么法国的工业制品。法国贸易的一些次要伙伴依次是德意志、法属美洲和大不列颠。英国贸易的重点方向是德意志（1699—1701年占46%）、两个尼德兰和法国，其出口额超过了进口额，二者之间的比例为15：7。有一半以上的进口

货是亚麻制品；出口货以羊毛织品为主（45%），其次是白布、糖和烟草的再出口。它和荷兰的贸易在这一地区最为重要，但在1700—1725年间，对荷贸易相对地处于静止状态。和德意志的贸易要活跃得多，尤其是在1720年之后，当时英国直接向德意志出口相对来说已经经常化。其次是英国对南欧的贸易（1699—1701年为23%），主要进口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丝；主要出口羊毛织品。正是丝使意大利得以在1715年取代西班牙成为英国从南方进口的主要来源；1705年，葡萄牙也已取代西班牙成为英国出口货去南方的主要目的地。英国殖民地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占第三位（1699—1701年为16%），进口货以糖和烟草为主，出口货大部分是工业制品，既有英国的（主要是羊毛制品），也有外国的（主要是亚麻制品）。东印度只占英国对外贸易的7%，荷兰和东印度的贸易则接近10%。

就整个欧洲各种交易来看，我们感到突出的是，这一中世纪后期的“商业地图”有它的持续性，其主要动脉起自波罗的海地区，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低地国家，延伸到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海岸。重要的环节把这条动脉和挪威、英国各岛以及地中海连在一起。在16世纪又加上更远一些的联系：北俄罗斯、南北美洲和远东，但是波罗的海一加的斯这条路线仍然是船运的最大使用者。联合省在海上持续的支配地位的基础即在于此。下面的表格[\[55\]](#)说明在战争前后两个10年中，每年船只通过海湾的平均数字。

表23-1

国 籍	1681—1690 年 船只通过平均数	1721—1730 年 船只通过平均数
联合省	1902（47%）	1612（42%）
英格兰和苏格兰	592（15%）	791（20%）
丹麦—挪威	538（13%）	489（13%）
瑞典	470（12%）	390（10%）
总计	3502	3282

实际上，荷兰人在波罗的海超越英国的领先地位要比以上这些数字所显示得更为明显，不过这一领先地位的削弱也比表格中所显示的更为迅速。荷兰在这里的一般船只仍然要大一些，但是，荷兰船正在

变小，而英国船却在变大。1688年在但泽，通常的荷兰船几乎比通常的英格兰、苏格兰船大4倍；到1729年，它只比英格兰、苏格兰船大1倍。^[56]荷兰人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正在缩小这一事实却不过是他们一些较小的烦恼之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总的贸易联合体是否健全很成问题，这个联合体的许多部门正在收缩，如加的斯白银、波尔多酒、但泽的粮食，以这些部门为后盾的荷兰制造业、荷兰的转口贸易一般也随之收缩。

不过，荷兰人在他们传统的一些贸易往来中仍然强劲有力，让我们来计算一下他们1740年的船运情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包括沿海航行船只和捕鱼船，也不包括东印度公司的船队）^[57]：

表23-2

单位：拉斯特（重量单位）

贸易往来	船只数	船运量
波罗的海和挪威	870	130500
阿尔汉格尔	33	7590
格陵兰渔业	146	—
英吉利和海峡	81	2196
法国和比斯开区	248	17360
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	216	24840
几内亚和西印度	80	8000

这一计算早一个世纪进行也就是这样，各项比例是如此之面熟，似曾相识。1670年的一次类似的计算（不包括格陵兰渔业），说明荷兰在欧洲和地中海两处的贸易并在一起并不少。当时的比例是：船1160艘，1740年是1448艘；总重量是16.4万拉斯特，1740年是18.2486万拉斯特。^[58]再看看它和几内亚以及西印度的贸易往来，可以得出更为惊人的结论，估计荷兰在1670年，与几内亚和西印度的贸易往来中使用了100艘船，总重量达2万拉斯特；而在1740年，船是80艘，重量只有8000拉斯特。即使这种估计（把平均吨位量减半的估计）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整个航运经济来说，荷兰作为一个上升的部分，正面临着不祥的衰落征兆。

让我们把荷兰和英格兰两家在这方面的数据比较一下^[59]，这种利害关系的固定性就更为明显。1686年，整个欧洲和地中海贸易使用了仅英格兰商船吨位的56%，而1670年，这一地区的贸易使用了约荷兰商船吨位的77%，在1740年的百分比还要更大些。另一方面，荷兰船远在与非洲—美洲的贸易交往中已经衰落（1670年为10%，1740年约4%），而在这地区所使用的英格兰吨位于1686年就有38%之多，而且百分比还在上升。事实是，荷兰的地位正在下降，而英格兰的地位则属于国际船运经济中的上升部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地位上如此明显的差别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

由于扩张的方向不同，英格兰、荷兰和法国总吨位的全面发展也就不相同，这不足为奇。1670年一些主要国家的总船运量（包括渔船队）估计^[60]如下：

表23-3

单位：拉斯特（重量单位）

国 别	船运量
联合省	284000（56.8万吨）
英格兰 47000 } 苏格兰 5000 }	52000（10.4万吨）
法国	40000（8万吨）

荷兰领先的幅度那么大，不难理解他们在1720年仍然领先，甚至迟至1750年，他们大概仍然处在领先地位。不过，他们的发展模式不同于他们的竞争对手们的发展模式。尽管发生了九年战争，荷兰的船运业在这一世纪的最后10年继续扩展，大约在1700年达到高峰：仅阿姆斯特丹一地的吨位在1694—1702年间比在1667—1671年间高出50%。不过，随着北方战争和西班牙战事同时发生（荷兰人的贸易模式对此特别敏感），荷兰船运业，至少阿姆斯特丹的船运业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收缩。^[61]它在18世纪20年代，也未能恢复到1700年的水平。另一方面，英格兰的船运活动，在1688年前一代人的时间中增长很快，在战时曾停滞不前，1713年后，重又开始发展，速度虽然比过去慢得多，可是仍然令人瞩目。同样，法国的商船业在战时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随后也重新开始发展：1730年，它拥有1657艘在公海上航行的船

只，另外有3703艘三桅船（沿海船队和渔船队所用）；而在1686年，它只有757艘在公海航行的船只，3226艘三桅船。^[62]即使在1730年，法国商船队的规模仍然只及英国商船队的五分之二，英国商船队在那时候比在1670年处于更为领先的地位。话虽如此，法国和英格兰一样，在日益发达的世界贸易中，比荷兰人更有分量。

在这几十个年头里，在贸易的每一部门，战争都是至为明显的支配性因素，但绝不是个独一无二的支配性因素。国际贸易周期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战争与和平两者之交替。总的来说，1678年法荷媾和之后，国际贸易量一直很高，但到1682年，这一战后的繁荣随着竞争之增多已经消逝：各行贸易经受的困难可以概括在1686年的国际危机之中，80年代的后期只取得部分的恢复，而这一恢复还是借助于1685年英法贸易的恢复这样一种环境而实现的。九年战争最初几个年头，情况多变，国际贸易量一般是低落的，只有荷兰在1693年恢复了元气，且保持繁荣昌盛到1700年。英国的贸易一直比较呆滞，只是在和平之后才重又上升——它停滞的一部分原因大概是英国的航运业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威胁较大。1696—1697年，相当普遍的金融困难似乎对一般正在复苏中的贸易（英国的羊毛制品除外）影响不大。在一次战争与另一次战争的间隔年间，贸易量一直是高的，但是“北方大战”的爆发对荷兰人则意味着暂时的挫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北方大战不同。初起时，国际贸易量仍然相当的高，至少英格兰以及荷兰是如此。这和它以前一场战争的情况不同。1704年后，贸易比前呆滞，这一情况一直继续到1711年《和平初步条款》签订后才告结束。最糟糕的年头是1705—1707年，只是在荷兰与法国、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恢复了贸易，情况才见好转。1708年，贸易稍有起色，给个别行业如英格兰的羊毛制品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高度的投机活动，最终出现了1710—1711年的一次国际危机。这主要是一次金融危机，它因人们对西方交战各国受到战争破坏的财政失去信心而加剧。它是一系列这类危机中的第一次，这些危机在1711—1715年困难的年头里波及欧洲各部。不过从1711年开始，实际贸易量在法、英两国增加得相当快，只是在1720—1721年发生金融困难时期才暂时地稍稍受到挫折。另一方面，荷兰和北方没有能躬逢其盛，因为“北方战争”的第二个10年比第一个10年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冲突更为激烈，许多港口陷于混乱之中。

所以总体来说，历次战争曾经刺激了欧洲国际经济的某些部门，暂时地消灭了另一些部门，破坏或更改了又一些部门。不过18世纪20年代的商业总图实质上仍然保持17世纪80年代的状况。在北方，最为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俄国中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相形之下瑞典作为一个出口国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对地呆滞；大麻，尤其是亚麻，成为主要出口物资，显得重要起来，而谷类之出口却在衰落。在西方，荷兰航运业在吨位上仍然首屈一指，然而没有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它的渔业则完全衰败，前景不妙。英格兰的商业在几十个战争的年头里取得的进展比它后来在全面和平之后的第一代人的时间里要快得多。不过，这张商业图上最为突出的新的要素要算是法国企业中若干冷门在战争过去之后正在快速发展的进度。

2. 1688—1715年：欧洲物价、人口和经济活动记录

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进行直接的钻研，首先需要取得生产、销售、消费方面的指数。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指数，很早以前甚至17世纪晚期的指数存者不多，我们于是不得不求诸间接探索的方法，即对一套套的物价进行分析。这一套套的物价，尽管不够完备，相对地说，却相当的多，并且具有连续性和精确性。

这里所要观察的阶段为时甚短，但它首先必须是在一个逐年记录更为广阔的范围里面的一个阶段。为此目的，可以利用已故的N. W. 波兹休默斯所编造的表格，它依据阿姆斯特丹商品交易所报的一笔笔交易，记下各种物价的加权指数。^[63]根据所能获得的1680—1689年之数据，下面的表格（表23-4）用一个新的基数（100）来代替波氏的基数：

表23-4

年 份	农产品	其他产品
1680—1684	99	100
1685—1689	101	100
1690—1694	152	119
1695—1699	—	—
1700—1704	133	118
1705—1709	131	100
1710—1714	167	104
1715—1719	114	119
1720—1724	100	108

这些指数汇集了范围颇广、各式品种的货物价格，每一件都用含银量不变的货币单位标明。必须承认，这些指数是既有波动幅度极大

的价格又有非常刻板的价格两者加在一起的结果，因此，就在人们对每一套价格依次一套一套地过目之时，会出现一些危险，即有可能冲淡或甚至丢掉那主要一套价格所能给人造成的具体印象。另一个不利方面是：固定以5年为一个时期来进行分类，这就无法标明活动方向中变化发生的确切日期，更不要提在1695—1699年这5年中间的持续性被令人遗憾地打断这一事实了。除了这些不足之处外，涉及一个相当大的国际地带的某些主要事实却是十分醒目的。第一个事实是：和这里所要观察的时期大致相同的1690—1714年间，它整个阶段的特征，是与它以前和以后的年头相比，较高的价格水平一直占支配地位。1690—1714年间的农产品平均价格指数达到146，而1680—1689年这10年当中其平均指数是100；这同一指数在1715—1724年这10年当中跌到107。1690—1714年间其他产品的平均价格，总的来说，上升未超过110，而在1714年以后几乎停留在同一水平上面（113.5）。从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这一独特的观察哨所能看到的就是这样：1690—1714年间出现的总的情况和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17世纪特征的情况形成了对比，这里所说的特征是指价格下降这一总的趋势和经济活动的呆滞。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一对比解释为一切恢复正常、商业复苏呢？只有进行一次详尽的估计才能证实这样具有肯定性的一个结论，而要作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有别的证据，我们只有对一套套个别价格加以审查，才有希望能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谷物在当时日常饮食中的地位，尤其是黑麦的地位，首先值得我们注意。让我们从这一项目下在手边所有的数量相当可观的一套套价格中，把阿姆斯特丹、里昂和卡彭特拉这几个市场挑出来研究一下。这3个中心的黑麦价格，在把它们根据收割的年份归类、折成银子的重量用指数来表达之后^[64]，再次以1680—1689年这个10年为基数（100），可以作出和波兹休默斯所作出的计算相类似的计算（参见表23-5）。这样，在阿姆斯特丹得出黑麦在整个1690—1714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指数是154，这就证实了早就看到的食品价格总的来说是在上涨。在里昂，相应的指数是176，这种情况再次出现，而且更为突出。相反，卡彭特拉的指数仅为122。这些结果本身值得注意。它们实际上说明存在着具有差异性的地理价格，这在谷物方面得到非常明显的反映。^[65]

而且，如果通过短短几个年头、从短期或中期的情况来看，不仅有地理上的差异，在同一套价格指数中的上下波动也显得更加重要。譬如，如果我们先取出1690—1714年间某一套指数中的10项每年最高价格的平均数，再取出10项最低价格的平均数，以后者为新的基数（100），并把前者与之相比而表示出来一个指数，我们就能够勉强地衡量出那些波动的平均幅度。按照这样的尺度，阿姆斯特丹黑麦10项最高价格的平均数字就变成173，里昂是259，在卡彭特拉是157。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年最高价和年最低价之间的直接抗衡。从这一角度出发，再回到以1680—1689年为基数（100）的指数上去，把在阿姆斯特丹收割年1698—1699年的最高数（316）与1691—1692年的最低数（105）相比[或者如果再回溯到1688—1689年与最低数（95）相比]，在1709—1710年间，这一指数就达263，虽然只是在3年以前，在1706—1707年间，它已经又跌到了95。但是里昂黑麦波动情况又如何呢？在1693—1694年，这个指数爬到400的高度。而在1688—1689年，它只有83，在1695—1696年间又要落到103；不过在1708—1709年间，又达到457这一纪录数字，而在两年前，同样的这一商品在同样的市场上，还仅仅是87，只及1708—1709年间划定价格的五分之一。相形之下，在卡彭特拉所看到的最大波动就显得平常：1691—1692年是151，在1692—1693年间也是如此，在1689—1690年间是58，在1690—1691年间是91；甚至在1709—1710的收获年，是年冬天严寒，在卡彭特拉的指数也只达到214，而在1701—1702年和1711—1712年的收割年则分别是81和93。当然，这些典型的例子，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已被从邻近地区收集来的数据所证实。

不过，这种波动幅度的对比和方才提到的一套套价格在短期运动中明显出现的时间滞差一样，无须把它们的一般形态和某种程度上的时间上的一致性（至少大致上是一致的）掩盖起来。而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远至中欧、在萨克森和奥地利^[66]都是适用的。乍一看，巴塞罗那^[67]的经验似乎可能产生和价格上升这一普遍特征相反的情况（价格上升似乎已被我们掌握的指数所证实），那里的谷物市场的平静趋向——这是地中海地区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和价格长时期内波动程度不大这一事实是一起存在着的。不过，我们如果不是孤立地去考虑谷物的价格，而是去算算其他农业商品如橄榄油和酒的这些单账，这个困难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从既有的、大量的谷物数据中找出结论是个诱人的做法，可是，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单从这些谷物价格中重新找出长远的价格运动，那么就应该抵制这一诱人的做法，因为从中重新找出长远价格运动归根到底是需要进行大量学术上的研究修改的。毫无疑问，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只要办得到，就应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其他的农产品。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油和酒能够帮助我们纠正光从谷物一项引申出来的关于农产品价格的一般景象，或者它们会证实这一景象。酒在像法国那样的国家里曾经具有一种天之骄子的地位。显然，酒类和各种谷物一样，有时甚至比谷物更加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造成价格上的强烈震荡。勃艮第葡萄酒，以前的葡萄园，它们的价格年年都要向两个极端摆动。^[68]更加值得注意的是，30年来，这种酒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下降，从1686年起，它们非常清楚地提供了一项运动记录，把它们所有的价格抬到一个高度，其间虽有短暂的反复，但这个高度一直维持到1715年以后。在阿姆斯特丹^[69]出售的波尔多酒的行情虽然要平静一些，也证实了这个总的运动情况。

如果国际贸易中还有一项非凡的商品，那么就舍香料莫属。胡椒价格的前前后后在香料中最有代表性，令人信服。事实上，一旦把它换算成相等的白银的重量，它的这些价格在广大分散的地区同样也提供了相同的共同性质。在巴伐利亚和新卡斯蒂尔，我们又发现，大约在1689年和1690年，继1680年和随后几个年头中的低水平之后，出现了一次几乎完全相同、时间也相同的向上摆动，而且持续甚久^[70]，按照上面对1690—1714年所使用过的程序来衡量这种价格的上升，得出新卡斯蒂尔的指数是133，维尔茨堡的指数是137。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发表的一系列数据中有一些脱节的地方，所以把中间数字进行比较要比比较平均数字更为妥当一些：如果以此来计算黑胡椒的价格，我们得到的中间水平是131，所以，非常接近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平均水平。在另一方面，英格兰粮食部白胡椒进货提供的指数^[71]和上面的数字是相一致的，不过上升得还高一些，达到166。但是，如果我们从每年的详细报价，甚或从短期几年的平均价格中去寻求这种不同市场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协调根本就不大可能再出现。举个例说，英格兰政府在1695—1697年购买胡椒的价格水平异乎寻常的高，在马德里或维尔茨堡就没有这样的水平；同一政府在1702—1708年间报价低了许多，这一情况可以解释为它符合这些年来从德国南部买来的价格，但

并不符合西班牙的行情，甚或阿姆斯特丹的行情（在数据虽有明显的脱节，但尚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

迄今为止所提及的商品价格——谷物、酒类、胡椒——显示每年都有强烈或者非常强烈的变化，造成非常明显的曲线，或长或短。但是，非食用货品和劳力的价格所提供的情况通常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原料的价格更主要的是各种工业制品的价格，即便有些上下浮动，变动也很小。工资是一种范围有限的例子，它的特点就是僵硬难变。在所有这些栏目中，同一个数字几年重复出现，有时一连几十年也是如此，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价格不变的例子并不难找，即便在较具弹性的纺织界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优质布是对经济气候非常敏感的典型产品，米兰公布的材料中除有关优质布的情况介绍之外，还为粗布编制了一份表格，这种粗布从1688年起至1707年^[72]完全没有任何价格上的变化。索洛尔德·罗杰斯在他经典性的研究工作中载有毛巾布的价格，这些价格在1691—1701年间^[73]是相同的。在查理·弗林丹所主持的研究工作汇编里面，亚麻在佐梯根（佛兰德）的价格从1692年开始记录的一套价格到1788年一直没有变化。^[74]这个例子特别富有意义，因为它的来源是无可指摘的，而由于杀价和拍卖的关系，人们在使用公家机构的记载时，其来源性质就不是那样无可指摘的。佐梯根的没有变动的价格，总结了对一个地方市场所进行的各种观察。那里的亚麻价格一直稳定，这同一起来源事实上还显示出了小麦、小麦和黑麦的混合品、大麦、燕麦、麦秆、阉鸡、雏鹅、油、黄油价格的相当敏感的变化。

建筑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关这一部门的数据在研究价格史的时候是经常要用到的；在这个部门，各种价格同样也是没有什么伸缩性的。我们手头掌握了不少负责营造或修建单位的记载，里面经常都有大量关于材料、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介绍。但是，总是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泥水匠的酬劳和砖块的价格一成不变^[75]。在其他许多例子中，物价的摆动，有时在一个年头中颇为活跃，但很可能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含义，这种摆动完全可能是因东西质量不同而引起的，而这种质量上的差异在文件中又是不可能找到的。

除此之外，利用一套套物价来研究这一个时期的经济气候还有一个主要的障碍。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许多欧洲国家流通的金属货币的面值发生变化。克服这一困难所要采取的办法一直是人们提出的问

题，也就是说，把账目上表示出来的钱的价值，换算成贵金属的重量。如图尔的货币里尔（livre tournois）。^[76]如果是在处理一些商品价格，它的具体价值变化大于货币市场的变化，这样的换算方法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如果碰上一些内在变化很狭窄的产品，显然采取这样一种调节货币价值的办法是有其武断性的：如果货币价值的变化——这是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压倒了“天然”的价格运动的重要性，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我们所进行的计算工作最终将粗糙地把纯然是货币的变化转移到价格数字上去。反过来，表面上的价格对货币价值的变化能及时作出反应，致使这种货币价值在一套套价格中立刻变成账目上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一次再换算，我们就再次发现一种被货币现象掩盖起来的价格惰性现象。海军行政当局在土伦^[77]买进的船篷布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适当的例子。这些篷布的价格，用苏（sous tournois）^[78]计算，根据数年一次签订的供货合同是固定的，在把这些价格画成图表之后，它们变得十分曲折，有如一级级的楼梯。在1689—1694年间，篷布的这些价格出现第一次向上曲线，1701年又出现一次，在1708—1709年间，再出现一次，这一次更为急剧。但是，这些价格的上升在锂的价值改变之中自身就作出了解释，锂的价值变化的程度和价格上升的程度是相同的。要不是因为两者变化的程度相同，设想订约人竟会同意自始至终几乎以同样的价格来成交，未免过于莽撞了。

剩下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可以认为其通货在1688—1715年间是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衡量价值的标准单位，这样的国家不多。这里，鉴于波兹休默斯的研究工作中有一些极大的脱节之处，我们不得不满足于纺织品价格的那么一张表格（参见表23-6），利用两套英格兰的，一套米兰的。当然，豪顿当时对英格兰不同地区羊毛价格的调查^[79]只限于1691—1702年，而米兰的那套优质布的价格到1706年就断了^[80]；只有英国海军部购买的大麻价格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整个阶段是齐全的。^[81]豪顿的羊毛价格，在用每年平均价格的指数来表示时，表明在1691—1695年间有一次真正的上涨，随后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直到1702年，即他最后的一套价格为止。这些指数必须依据1691—1702年的价格所提供的基础来计算；但是根据这一个条件，这些指数和已经检验过的其他指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即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不完全如此。其他两套价格可以在同一个基础（1680—1689年）之上和波兹

休默斯所建立的一般指数直接进行比较。这些指数都一直是在100以上，这就证实了价格总的上升这一现象，这是很清楚的。关于英格兰大麻采购的指数，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两个10年之间的上升，比我们的一般指数的上升要明显得多，表明把这一部分的调查研究工作扩大到其他各套里去是有困难的。关于价格史的出版物显然是多得如汗牛充栋，但也不应对此寄予奢望。

讲了那么多，其中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事实还是从谷物价格和非食用货品价格在同样地区、同样的年份，以同样的货币体系进行对照之后取得的事实。在一般的情况下，非食用货品价格的相对坚定性和谷类价格同时发生，有时又是与十分激烈的摆动相对比，前者说明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都没有能互相结合起来。没有弹性的工资，还有许多工业制品没有变化的成本，肯定在这些年头，如1688—1689年或1706—1707年，当时谷物是在亏本出售^[82]，给主要的农业品生产者的处境带来难堪。可是食品价格的飞涨却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其他方面的价格不动，仅此一端，高昂的食品本身就意味着手工艺工匠和挣工资度日的人的日子不好过。而在涨价超过一定的水平以后，甚至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在消费紧缩最多、因此也是活动紧缩最多的部门，价格本身会出现下跌。对这些尖锐的危机进行研究，确实能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完全可以称之为回顾性经济地理的这一门学问。不少历史学家，由于他们观察的范围太窄，总是低估这些事态真正的苛刻性。

1692—1694年的危机对整个法国是个悲剧（第10章），其他地方也曾波及，但没有那么严重。即使在法兰西王国内部，这一危机在它的西方和地中海沿岸也大大地减弱。1709—1710年那次危机的范围更波及全欧，其严重程度在各地也不尽相同。另一次危机，其严重性无疑与前一次不相上下，在1696—1698年间危及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在1698—1699年危及苏格兰）。^[83]这次危机在阿姆斯特丹引起反响，甚至法国的市场也受到它的影响，不过它在西欧产生的影响远没有在北欧那么严重。

为说明以上所说，两项事例足以胜任。第一例举自卡斯特尔脑丹莱各项生羊毛价格，这个地方在法国南部，但离地中海还很远。^[84]在这个地方，谷物指数在1693—1694年上升到214，在1709—1710年上升到302——在这个地区算是异乎寻常的高了，但比起我所看到的里昂和

其他地方记录在案的最高指数还差得远。未经处理的羊毛（laine brute），它除了是一种卓越的农村产品之外，还进入半是农业性质的一项工业，我们从别的资料来源中，知道它受到谷物大幅度上涨之后造成的农业价格低落之害。因此，在这里我们能够把谷物价格和在同一文件材料中记录下来的一种原料的各种价格进行对照。比较的结果非常明确。对照表明，谷物最高指数在1694年（除了有一次为时不超过几个月的落后之外）竟然和生羊毛跌到的最低点（指数76）相合；而在1709—1710年间，那就更能说明问题，竟和仅仅为61的生羊毛指数（参见表23-7）相合。这些重合肯定不是偶然的。羊毛和谷物的这种变化多端的价格不仅表明制造商们由于市上没有什么需求，不去充实他们的羊毛存货，而且也表明农民们是在压力之下出售羊毛的。

我们的第二个事例，是由死去之人的产业清单中提到的锡罐器皿提供的。在这些清单中，这些器皿是用重价来计算它们的价值的，其质量惯常就简单地分成“一般”或“优质”，以便分类。在正常的年头，这些器皿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严重危机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显而易见地跌价了。原因是锡罐食具在不那么殷实的人家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银器在富有人家所起的作用。在正经的金属钱币十分稀罕并总是被囤积贮藏起来的岁月，锡罐变成一种积蓄储备的手段，可以出售，一个人在需要现钱或借款的时候，还成为较受欢迎的抵押品。但是在一个严酷的带有普遍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这样做而又要不蒙受损失是不可能的，于是像在1693—1694年发生的那种具有结论性的症状在巴黎地区的锡罐定价告垮之中出现了：其指数从1693年的83跌到1694年的80——而就在这个时候，巴黎的mercuriale（物价流）把小麦的指数抬高到306（参见表23-8）^[85]。随后，锡罐的指数又上去了，原因很简单，它具有货币的功用，正因如此，对它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且非常活跃。据此，当小麦在1709年上升到509这个指数的时候，锡罐跌到99，而在这前后的几年中，它的指数一直是123。

已经引起大家对工资的“僵滞”性的注意，还应再次强调。由弗尔泼斯·布朗和霍普金斯^[86]确定的南英格兰建筑业工资的多种长期指数的主要依据是由索洛尔德·罗杰斯所收集的数字材料。从他们制作的图表中一看就能发现工资是如何像连续的垂直梯级那样上升的，每升一次就要好几年不变。实际工资的曲线——把货币工资用一个人人为的生活费用指数来除所得来的结果——再次产生（远期的则倒过来）

生活费用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关于在此与我们相关的时期，索洛尔德算出木工和泥水匠在1689—1690年间每天的最高工资额是2先令6便士，1697—1699年、1701—1702年和1702—1703年亦是这个数。^[87]有好几年大量有关工资的未经发表的材料可在巴黎疑杂病症医院档案中看到。^[88]在去掉季节性的偏差以及其他因种种职业、资历引起的偏差之后，我们最多只能看到在主要项目下工资有一次增长，它从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一开始的15—17苏上升到这个时期最后（1715年前后）的17—18苏。这还抵不上同时发生的账目上的货币贬值。

17世纪末留存下来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弥补缺少综合性定期人口调查的作用。从行政当局那里弄到的细目和估计是有限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了财政上的目的而编制的，因此，从中可以了解的是纳税人的数目而不是居民的数目。教会的档案，由于主教的巡视，提供了领圣餐的人数，这个数字在法国和成年人口数字几乎相等。但是所有这一切材料还需要分类，也还有值得批评之处——总之，还需要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工作是很不够的。在当代一些估计之中，格雷戈里·金有名的统计工作在那个时代是出色的，它使我们有可能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695年左右的人口总数是550万人。^[89]1697年由法国各省省长负责发动在以后的3年中进行的调查远没有产生可靠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一个相当粗糙的近似数。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过研究的沃邦认为整个法国的人口是1900万。^[90]但是，这种性质的材料仍然是静态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一国人口的动向和它的年龄结构，还有按照社会类别和地区作出的人口组成。原则上，在相当多的地方，这些问题可以从记录洗礼、婚丧的教区牧师所保存的登记册中找到答案。^[91]事实上，在17世纪末，这些登记册的数目确实有大量的增加，在质量上也确实有所改进，并且传到今天。不过，对它们的调查工作还刚开始，大多数历史学家，总是集中力量试图确定人口在长时期内演变的一个轮廓。即便他们研究出来的材料是正确的，他们也不可能真正辨别在一个相对短暂的阶段中人口的特征。他们这些专著还不多见，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精确的、在以年代顺序的范围之内来考虑这个问题。

人口统计方面的事实从各个方面澄清了历史，有些事实是短暂而又激烈的危机的结果，有的是缓慢然而前进的演变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这第二类的事实引起了我们最大的注意。这里还有两个方

面：一是出生率、死亡率和结婚率的系数产生持续演变的时期，二是这些演变对人口总数的多少所产生的影响，或者不如说它们对人口中正在活跃中的这一部分人的多少产生影响。而在这个系数产生的时期和这种影响时间却有一定的时间滞差。另一方面，同价格问题一样，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可能以同一的节奏同时生活。由于这些原因，任何企图从少数几个特殊的人口统计级数中作出一般性的论断必然是非常鲁莽从事的。

不过，如果有人仍要这样试一试，那么说一下1688—1715年这些年，从这个时期人口消长率相对低这个角度来看，比较而言，并就其消极意义而言，似乎还是可以的。换言之，这个时期在人口统计方面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变化。人们对于18世纪英格兰人口的估计虽然还有争议，专家们对其发展的大致的轮廓是意见一致的。就我们而言，我们同意这种看法：本世纪初人口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很有限。对1700—1720年间人口的增长，有3种不同的估计：一说增长13.6万，一说17.5万，再一说21.2万。就为数550万到600万这样的总人口而论，20年中这一规模的增长——即每年增长1.75%左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3种估计对1740年的人口数字看法一致，1720—1740年间出现倒退现象，所以这1740年的数字和1700年的数字十分接近，同时，这3种估计都认为，在1740—1760年间人口有增长，分别定为56.7万、62.2万和65.7万。即使这3个不同数字中的最低一个也要比1700—1720年间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多出一倍半以上，即56.7万：21.2万。然而这1740—1760年间人口的增长数，比起计算出来的所谓工业革命刚开始的1750—1801年间的人口增长数字来，算是平平而已。^[92]

威尼斯在整个17世纪人口下降惊人，而在18世纪还要继续明显下降。不过，在这两个灾难性的阶段之间，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一段岁月倒可以算做一个高地。丹尼埃勒·贝尔特拉米对这座城市中两个10年（1690—1699年和1700—1709年）内的人口出生和死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在第一个10年中有逆差（负372），但是，这在第二个10年中因出生超过死亡（正257）而得到部分的补偿。^[93]威尼斯陆上（terraferma）的人口数字在1680—1719年间实际上是稳定的。早先K. J. 贝洛克进行的研究工作虽然是包括整个意大利的，但也给人这种印象。他对西西里人口的假设性估计表明，在1681—1713年

间有一次小小的下降（从117.1万减到114.3万），但是，这要部分归因于一次非常特殊的事件，即1693年发生的地震。[\[94\]](#)

这一相对静止的情况似乎是这一时期总的人口面貌的特征，短期的摆动就不去管它了。这样，慕尼黑在1680年的人口算是2.3万，1690年是2.5万，1700年是2.4万；奥格斯堡的人口在1681—1690年是2.6万，1691—1700年是2.7万，1701—1710年是2.6万，1711—1720年是2.7万。[\[95\]](#)在同样的这些年中，苏黎世大约有11000人，1762年这个数字几乎完全相同地再次出现。[\[96\]](#)加泰罗尼亚在1630—1670年间出生人数大量下降，到1686—1690年间才恢复过来；在1691—1695年和1696—1700年这两个5年内没有任何大的变化。[\[97\]](#)在瑞典中部，纳克省出生率在1691—1715年期间每5年都有波动，波动幅度在28.5%—35.4%之间：出生与死亡的平衡时而亏时而盈，两相交替。[\[98\]](#)

总的印象是人口情况相对稳定，这和专家根据教区登记册研究出来的英格兰和法国两国情况并不矛盾。对诺丁汉郡在1670—1800年间作出的调查确实表明，在18世纪下半期，领洗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有高涨，领洗人数更是大幅度地多于死亡人数。但是在威廉和安妮在位年间，所能看到的领洗人数增加的优势很小很小，人口的曲线是个不甚明显的斜坡。在“农业”村子里，丧葬人数稍有减少，领洗人数维持“停滞”的状态；在“工业”村里，丧葬人数也稍有减少，但是领洗人数有上升的小小趋势。[\[99\]](#)再看法国，如果带有将那特别剧烈的摆动当作一个插曲，暂且不去管它，那么，皮埃·古白尔关于法国北部的总的结果也导致这同一的结论。[\[100\]](#)在诺曼底的克鲁莱，1681—1690年间，领洗人的平均数是每年36.7人，在随后的25年中[\[101\]](#)则是37人。朗格多克乡间人口减少的趋势从1680年开始，并无情地继续下去，这是事实，但是就在这个省份，城镇却在扩大。[\[102\]](#)

虽然如此，重要的是不能过于相信对总的情况得出的这一印象。关于前已总结出来的这种现象的机制，它确实还能够让我们作出一些很不一样的假设。非常可能，这些现象里也许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活跃力量；也有可能是一些强有力的运动在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互相抵消了。无论如何，应该稍稍检查一下那些可能决定这一时期人口运动的因素。首先，要辨别哪些是可能发展或限制生育力的原因，哪些是促进死亡率的原因。有一种想法至今仍然广

为流传的，必须立即加以否定。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假设出生率在18世纪末之前是不受控制的，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原因，也可能是个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结婚的年龄是个因素，完全有理由强调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它肯定和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和社会的类型一起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人类，尽管是生活在很早以前的，在他们希望节制生育力的时候竟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那就未免太天真了。^[103]有一种假设认定有各式各样由个人或集体作出的反应，在死亡的各种原因面前，设法去维持某种平衡；这种假设看来是非常可信的。

由于战争造成的死亡虽然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因素，但是对这一时期的人口也只带来一般的有害影响而已。17世纪中叶以来，军队是比以前扩大了，但和18世纪晚期以及随后的军队规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招募入征的人数仅仅触动了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尽管法国以其他地方新的民兵队伍正在兴起，但系统的征兵制还是后话。打仗是要死人的，但也不是天天打仗的，有时候，部队吃的苦头更多的是疾病。

各种疾病，即使是在保健设施最好的国家里面，它仍是造成大量死亡的永久性的原因，在婴儿中间尤其如此。“地方”病和“流行”病的界限，尽管当时的医生们有很多议论，是难以捉摸的。^[104]但是巨大的流行病，由于传播广、性质严重，是可以辨别的。在这方面，至少在西欧，一种可怕的灾祸，淋巴腺鼠疫（pest）在17世纪的过程中大部分消失了。它西欧最后一次猖獗流行是在1665—1666年的英格兰。这次发生的鼠疫接着在法国停留了几年，但是，除1676—1685年在西班牙发生过，1720—1722年^[105]在马赛和普罗旺斯发生过，那算是最后一次。西欧以外，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鼠疫还未消灭。^[106]这些地区还不像法国那样已经具有消灭鼠疫的高效率机构，由于政府当局采取了有力措施，法国在1668年得以保卫自己：在各个港口，检疫的条例愈益受到尊重并且很有效率。比这困难得多的是如何堵塞其他疾病传播的渠道，那些病一开始不是那么令人担心，但是暗中却在蔓延，而且人们对它们也了解不多。^[107]这一时代医药上使用的一些字眼，历史学家们只能猜测其意思。即便等到这些字眼的意思变得更为具体，并且和我们认识得到的临床观察相一致的时候，它和大多数非专业性目击者所使用的语言是否相同，还有待分晓。譬如

说，“紫色”热（pourpre，当时许多信件中都提到过）究竟是否就是医生们自己会同意我们所说的斑疹伤寒？^[108]根据当时的用法，这一字眼总是给人以印象是用来指出疹性的疾病，如天花或猩红热。“痢疾”这个词，依此类推，可能指任何一种肠病。这种无法确定的字眼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颇为恼人的，因为如果知道疾病是如何传播的，这种知识就可以说明集体的心理，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当时的城镇一直是生活在“碰上传染物”这种梦呓之中，而这是城里人对农村来的穷苦难民持严酷态度的根本原因，怀疑这些人身上带着疾病。

在英格兰，疾病之发生及其后果在很久以前就是早作研究的对象。18世纪一位名叫托马斯·肖特的医生立志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区登记簿，主要是约克、诺丁汉、德比和肯特一些县份。^[109]肖特以150—160个农村教区（另外还有几个城镇）为依据，逐年计算他认为是“有碍健康”的数字，理由是在那些地方丧葬人数超过了领洗人数。他把发病的教区中入葬和领洗的总数加在一起。^[110]（他调查的一些结果，参见表23-9）这个表格提出的第一条评语认为，1688—1715年是健康相对好的年份。其中没有一年有病的教区达到20%这一数字，而这个百分比正是1680—1689年的平均比数，更不用提1680年达到的25%这个数字。第二条评语是这18%或19%的最高数字一点也不是和英格兰谷物腾贵的年头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记录的疾病和昂贵的食品不是一起发生的。^[111]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但并不能推论到别的国家，更不能推论到法国，它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仍然处于食物匮乏已极的时期。让我们来认清问题之所在。我们目前不去考虑那持续多年食物匮乏对一部分下层阶级疾苦所引起的影响，也不是去考虑它对这些阶级中人生活上长远的腐蚀。这是另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上面讲到的物价普遍上涨——从25—30年为一个阶段来看，上涨程度还算是相当温和的——另一方面，还有上面提到的同一时期内人口变动情况性质稳定，二者都不能为对这个题目作出决定性判断提供依据，只有朗格多克是个例外。^[112]然而我们也无法避开这样的结论：曾经出现名副其实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戏剧性场面，时间虽短，却十分剧烈，这和食物价格同样是剧烈地上升是相吻合的^[113]——这个结论从5年内和理由更加充分的10年内的平均数所表现出来的变化情况

来看常常是至为明显的。要探测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肯定需要足够多和具有持续性的论据，以便让我们能够严格按照逐年的详细情况，同时注意谷物的价格变化过程和出生、死亡的变化。以日历年为范围来进行这样的分析有一大障碍：在许多情况下，1月1日开始12月31日为止的日历年从一开始就缩小了这些现象的范围，如果以一次收获和下一次收获之间的时间作为分析的时间单位，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些现象的性质。^[114]还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食物贵得出奇的年头死亡率不正常，这就带来了一些复杂的征象。有可能食物匮乏的影响是附带的，疾病的影响与前者无关。譬如说，严寒的冬天本身可能会引起死亡，同时还把地里的种子冻坏了。事实上，如果一次自发的疾病出现在饥荒之先，它就很可能把这掩盖起了：它在粮食危机之前就先猖獗起来，夺去了人口中一些人的生命，留下那些抵抗力最强的。这在1708—1709年的英格兰，也许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更为经常的是饥馑与疾病是连在一起的。也有一种死亡是跟着饥荒来的，不管这两者之间或的联系是什么。还有，我们必须考虑到乞丐向城镇的流徙，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济。在那些悲惨的年代里，城市的死亡人数有一部分确实就是这些难民进得城去，死在城里的，也有一部分是城市居民，得了外面带进来的病而死去的。

死亡率有剧烈的危机，出生率也有；出生人数减少，这和饥荒的时候死亡人数增加都是很明显的事实。正是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产生了表格23-10，从中可以看到灾难的百分比（参见表23-10）。编制这张表格就是要表明1693—1694年饥荒在法国不同地区内的一些地方的人口变化的影响。^[115]对出生的运动进行比这里更为实际的观察表明，它在死亡率上升后几个月下降。这一下降被归因于孕妇受到疾病或死亡的影响。但是，怀孕的人数比例突然下降，用另一种假设——家庭节育——似乎更加说得通些。此外，就是其他一些情况，如在灾难过去后怀孕人数迅即恢复，同时死亡人数也下降，勾画出了这些戏剧性但又是昙花一现的事态特征的轮廓。尽管为时短暂，这些事件在历史上还是有它们的意义的。

然而，在表23-10中，就在法国境内，粮食匮乏的影响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地理上的差别，十分引人注目。首先，在地中海，挑出来的一些不受影响的地方：怀孕的人在塔拉斯空和恰西占优势。邻省朗格多克的状况分得更为精细：在洛代夫，甚至近乎平衡；离开洛代夫不远

的拉图苏图贝，死亡人数比怀孕人数多出一倍以上（22.3%），而在弗隆蒂南，更加令人惊异，死亡人数竟3倍于怀孕人数。事实是，关于最后两种情况，要把从山区来的贫苦难民考虑进去。最为突出的大概要算罗纳流域的瓦朗斯和普罗旺斯的塔拉斯空的数字之间的对比。一般来说，法国中部地区的死亡率已达到高峰，从此往前向东地推移，危机的严酷性逐渐有所缓和。从巴黎地区或诺曼底向西推移，情况也跟着缓和。所有这些人口地理方面的事实，都已被物价地理所澄清。

在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出现像这样的情况，至少没有与此规模相仿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地理也可能受到粮食匮乏的影响，不过不到这样的程度而已。要注意到那些不那么明显的现象自然是更加难一些。都灵在1695年^[116]的物价流出现了一次最高纪录，虽然还是比较一般性的高峰。如果口粮危机在那里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应该能看到它在晚些时候也会产生比前温和一些的影响，然而在多菲内和皮埃蒙特交界之处所作的调查表明，1693年死亡人数稍有超过，这在1694年和1695年又消失了。^[117]即使是在伦敦，可以看到和1687—1700年整个阶段有关的死亡率高峰在1694年发生；这其实算不上是个什么高峰——24109人，而1696年^[118]的低谷也达18638人。这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吗？可以把法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危机作一更为认真的比较：在芬兰的一个地区，在1695—1697年间，人口缩小了39%之多。^[119]

英、法之间在人口消长节奏方面的对比，实际上是两个欧洲之间的对比，两个所在的自然条件不同，商业发展阶段不同的欧洲之间进行的对比。

要确定这个时期不同国家内不同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岁入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最近在法国已对向教会完纳的农产品税进行有条理的研究。^[120]这种税是按照收获的固定比例征收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估计收获的大小。同样，我们可以设法利用根据梅他维奇（Métayage）制度出租的庄园所提供的数字，根据这个制度，收获的庄稼由庄园主和以实物交租的佃户（méfayer）来分。遗憾的是，那些残存的账目来自最大的农产品收税者和地主，而且总是经过中间出租人之手，这种人的任务是向佃户收租，作为酬劳，取得一份事先按照约略的收获预计定下来的租金。决定性的证据上能从直接开垦土地的人记下来的详细账目中取得。有些地主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自己种

植：从他们的家庭日志里面可以取得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所记项目零零碎碎，很少有个成套的统计性数字。自然很少有种地的农民会作出这一类记录，这些记录对他们来说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虽然如此，这里有个事例，它的准确程度是罕见的。不幸的是它所说明的是个完全反常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田园的情况，它从巴黎北面的朋柳（banlien）^[121]一直延伸到圣丹尼斯以远的大平原上。那里的土壤肥沃，巴黎这一市场近在咫尺，使它的粮食营生颇为昌盛。在那田园上耕种的那个庄稼人付给所有人一大笔货币租金，他自己拥有干活的设备和牲口；换句话说，他是个承包者，具有这个字眼的现代意义的承包者。而我们现在正好弄到了他把谷物送往市场的账目，上面记着运出去的数字，从1690年秋到1695年夏，每次出售的价格——因此也包括1693—1694年那次危机在内（参见表23-11）。

^[122]这里要提出来议论的第一件事是：最多的一次收入正好发生在闹饥荒的1693—1694年。这笔收入超过2.2万锂。在另一头，在所提到的整个4个收获年中，1691—1692年，最少的收益仅8883锂（此数字与表中不符，疑原书误）。而这一年售出的数量却累计745赛抵安（setiers），而1693—1694年只是585赛抵安。其间相差160赛抵安，相对地说，是还算温和的（21.5%）。在扣除播种、农产品税并把这个庄稼人自己的消费都考虑进去之后，1693—1694年与1691—1692年相比，其出售量的减少暗示收获量最多降低了10%—15%。但是在此期间，价格几乎加了4倍。可以说这一上涨对非常大的种植者是有利的；但是也不用说，这些数据作为了解对一般种植人的情况的指南，会严重地把人引入歧途的。甚至那些定期脱手的人，即使脱手的余粮数字不大（这里所掌握的差额，不常常有10%—15%那么多），在收成实在不好的年头，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卖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谷物生产者所能取得的财务上的最大的好处和最小的好处，中间有极大的差别，这可以从一个相反的意义上来解释。如果闹饥荒的那个年头竟是对这种特殊类型的生产者相对有利，那么价格低落的年头正是销售（mevente）情况不妙的年头，而现在的事例则表明了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对田园所有人每年要付租6000镑。直接税（faillie）是1600镑——仅两项债务就几乎相当于我们所看到的1691年的总收入。这位庄稼人还有另外一些收入来源，这是事实，但是，他还得用现金来偿付其他开支。而且，他的账目是在1690年开始的，这一事实，非常明显，是由于他的几个前人，在1688年和1689年弄得很不顺利，谷

物当时只卖8镑一赛抵安，有时还更少，就在这一年他们把租地交回的。[\[123\]](#)

但是，如果低落的价格对最大的生产者打击很大，对中小生产者就只能留下一个很坏的余地。在巴黎地区，由于就近有巨大的消费，价格多少还能维持。在边远省份，产品特大丰收，价格跌得很低，甚至难以处理掉。[\[124\]](#)这里所提到的各个表格应用这一观点来解释。1680—1689年的基数是个低价格阶段，这样，接下来的指数在100左右（更有充分理由认为低于100），这在事实上和销售年份不好的年头是相符合的。在这方面，也许应特别看看1702—1707年，当时法国当局收到从各方面来的大量的不满申诉，提到几次特大丰收累积起来的危害。[\[125\]](#)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价格变动的幅度十分肯定地比法国要窄，但比它后来的变动幅度还是要宽得多。因此，格里戈雷·金会作出他关于几何级数或价格缩小的定律并非偶然，虽然这正好发生在这一个时期，当时生产量的变化是用简单的算术尺度来衡量的。[\[126\]](#)

那时候工业生产和农业世界是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原料不仅是要收割或提炼，还是修剪和整理过程中的对象，直至成为半成品的阶段，这为农村提供了收入的重要来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来源当面包昂贵、减少工业需要的时候就缩小了。但是，即便是成品也是在农村环境中加工的。就这样，在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叫作温格斯敦的村子，它有一部分人是手工业工人，像这样的人同时在大陆上许多地方也有。除了它有16%的居民被说成是“贫苦的”，W.G. 霍斯金斯发现有“30%的居民从事各种手工艺和行业，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依靠农业；有17%靠编结东西……”[\[127\]](#)在编结之外的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中，甚至并没有出现新的工具，村民们在自己家里从事多种多样的制造业，以补充旧有的城市手工艺，并且与之竞争。

为了测量一下旧有城市手工艺的活动，有时可以得到一些直接的迹象。譬如，我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学徒工的人数，这可以通过耐心查找公证人记录进行估计，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实际使用的工具数。但是，这一类材料常常是不完全的，而且只对某一类型的工业或仅仅一个地区有用。要从中找出任何几个国家或几个工业共同的趋向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自己是在贸易和制造业模型这个万花筒面前。[\[128\]](#)早在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以前，17世纪

就已目睹技术革新之降临，它的总的目的至少是看得出来的。有人无疑会情不自禁地去注意那样一些事实，例如，第一个亚伯拉罕·达比鼓风炉中焦炭冶炼过早地出现，虽然还应该懂得我们还不是在讲批量生产；由于木头越来越少，需要解决的就只是要找到焦煤的廉价代替品。在纺织方面，有一种与之平行的趋向特别明显，但这是又一次一种质量上的变革，它意味着产量没有跃进。这一新的组织取代了旧的，从而搞垮了不再能改造得应付变化的那些制造业——这里所说的变化，如果仅仅指外表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注意到使用人的收入，那就未免有点简单化了。莱登古老的纺织工业在1664年繁荣昌盛，令人瞩目，这一年售出各式各样的布足有14.4万件，1700年，不到8.5万件。^[129]一种传统上高质量的制造业可能遭到的恶果是式微衰落。在不沃凡，哗叽的生产和绒面呢的生产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两项生产均无起色，随后记录有一段时期中断，1695年后，二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重新出现：制造哗叽用的织机数目和老师傅的人数明显地都有回升，东山再起，而绒面呢却最后垮台了。^[130]这一对比说明“客户的购买降低了……转而着眼于比较便宜的衣料”^[131]。

丹麦在波罗的海口上设立的松德海湾通行税足以指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部门所采用的途径[第23章（1）]，不过这些已发表的珍贵的数量数字的表格，已经引起了人们相当强烈的批评^[132]，同时，到1750年为止，瑞典一直享受免税通行的特权，这就使这些统计数字为我们服务的价值受到了限制。无论如何，这些统计表中船只运输的大致总数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一方面，1661—1679年船只总数跌得很低，每年平均约2500艘，然后在1680—1689年又回升到4000以上，1690—1699年算出来的平均数是3700，仍然不失为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700—1701年，下跌数字就较可观：从1701年的3193艘这个最高数字变为1710年只有1413艘这个最低数字。^[133]

荷兰人在这一行业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就可以让我们把松德船只进出阿姆斯特丹港口征收的税款提供的数字和松德海湾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134]这里，1661—1679年间年平均税收达9.66亿弗罗林，1680—1689年为10.95亿，1690—1699年接近12亿。最后，1700—1710年，这一税收上下波动得非常厉害，年平均数仍然在10亿左右。荷兰的贸易当然在许多地带有活动。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销售额在这

些年中经久不衰。克列斯托夫·格拉门对该公司账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1679—1688年，它的销售额累计约有1.02亿弗罗林；1689—1698年是1.24亿；1699—1708年^[135]为1.37亿。

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在17世纪的下半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热带作物以及再出口的物资在它的对外贸易中占有更大的地位。^[136]从不列颠的全部海运来看（这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在1699—1701年的这些年头，西北欧（从汉堡到法国西部）以价值计算，占46%，南欧和地中海地区占23%。但它和北美、西印度群岛的关系显得日益重要，糖占英格兰进口总值的23%，烟草占15%；虽然如此，酒类（主要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名列前茅，占24%^[137]。与此相似的是，葡萄牙的经济（关于它的发展已在上面第16章中约略介绍过）是和英格兰——大西洋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格兰在地中海地区继续和荷兰人分享里窝那这一自由港的好处以及和勒旺岛进行交易所取得利润：把海洋大国的经济和它们自己的经济联结在一起这一想法对都灵的朝廷一直是具有吸引力的。^[138]英格兰在经济上的成长已经和它的海外商务联结起来了。我们掌握有1697年以后它出口合计的官方估计。在1697年，这些出口加在一起达225.7万镑。1708年则达506.9万英镑。^[139]

在这些战争之前，法国的对外贸易以完全相同的方向显示上升的趋势，这可以从南特开往安的列斯去的船只的惊人的进度来取得佐证：1674年开出的船有35艘，累计不到3000吨，然而在1687年就增加到73艘，或7675吨。九年战争的影响可从1696年跌到1485吨这一事实中反映出来，而在1697年又恢复到5365吨。^[140]不过，即使在海上贸易条件处于不利情况下的法国，它那最为大胆、总的来说最为有效的能动性也是针对海上贸易的。和平一到来，船只的活动趋向活跃。即使在战时，也有不止是一个方面的创新：主要是在南海方面的贸易，但和中国的贸易也在兴起。到1701年，价格较为低廉的中国丝正在刺激鲁昂生产新的纺织品，引起莱昂^[141]方面的抗议。进口物资尽管在战争中也可能会继续增加，在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明矾：从契维塔韦基亚运往马赛平均年出口额在1683—1689年间是2856肯塔（重量单位，地中海国家使用较多，1肯塔约等于100磅，1埃及肯塔为99磅，1土耳其肯塔为124.5磅。——译者），它在1689—1695年间上升到7357肯塔，在1695—1707年间又上升到8039肯塔。^[142]

另一方面，远离海洋的一些大陆中心点所遭受的灾难似乎更多一些，它们不仅遭受前已叙述的剧烈危机，还遭受那贯穿整个时代的潜伏着的危机。大约从1680年起，日内瓦人的贸易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繁荣。1689年春天，显然只有困难。在随后的几个年头里出现了危机——一开始是生活上的危机，最后是一次长时间的普遍性危机，日内瓦人的贸易在这次危机中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一小小的共和国的四周被一些国家的包围，这些国家或限制或禁止交易，这就使它成为对欧洲任何一个角落的衰退都十分敏感的地区之一。^[143]

在这一段时间中，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我们总听说银根紧，这是否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呢？在1689年和1715年间，这种“拮据”的情况似乎和许多货物价格的不断上涨是有矛盾的。这种价格上涨的情况出现在一些巨大的国际市场如阿姆斯特丹。这种价格上升的情况，比起谷物价格出奇坚挺的情况来，不算过分，但是，如果支付手段疲软，又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式各样的通货膨胀可能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们没有根据认为在巴西发现的金矿在1715年前对欧洲的贵金属的储存有任何显著的增加。^[144]但是，如果货币流通趋于活跃，这是否可能满足对货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呢？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容许许多国家在战时能有异乎寻常的开支，这些战事仅在西方就曾持续9年和11年之久。

我们已不止一次注意到海洋国与大陆国之间存在的鲜明反差。这里我们要再次看看它们的反差。在法国，什么是国家和个人所能依赖的信用资财呢？它采取的形式很多，但都未臻完善。拥有牢靠财产的人们继续广泛利用私人贷款合同，他们的这种财产可以用作保证，从而取得他们所需的款项，利息比较适中。大量的这类合同是在公证人面前安排的，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合同未作充分的考察。下面提供的有限的实例（参见表23-12）不过是从更为系统的研究工作中所能取得的成果的约略的迹象，如此而已。这一实例取自在诺曼底的鲁昂^[145]，这个省的法定利率在5.5%以上（au denier 18），即每贷18个denier至少要付一个denier的利息^[146]，高出这个王国其他各处（au denier 20=5%），对靠得住的投资的利率低，这并不是经济扩展的征候。当营业不能博取优厚的利润，或者赢利的前景十分富有风险，小心谨慎的人情愿以他们所能办得到的最为保险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存款，即使收入低一些也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看到的贷款合同

的利率往往低于法定的利率——当然，在严重的危急时刻，通过这种正常的、监督严密的途径借款有困难，就不在此例。在这种场合，盛行的只是短期的现金信贷，利率上升到高利贷的水平。几乎在所有的借款合同里，利率在拉向法定的最高额，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危机，更能反映这一危机的是这类合同日益减少这一情况。

经营商务的人现在已经完全熟悉使用汇票，但这种结算方法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的惠塞尔银行（Wisselbank）有一个只此一家的国际中心。一个实施背书的系统已有发展，在这一系统里面，一大部分最为重要的国际票据最后在这家交换银行收兑，这家银行在保证支付这类取兑方面和在提供维持平衡的最大保证方面组织得特别良好。因此，复制下面（参见表23-13）一些取自这家著名银行档案的数据看来是有用处的。^[147]从中可以看到在1688—1697年间，账户的数目表明比战前有所增加。银行的结存总数也有增加，并在3年和平时期（1698—1700年）继续成倍地增长。随后，这个总数稍有下降，到1708年和1709年，下降变得更为显著。不过这一制度一直到漫长的“西班牙继承战争”的结尾始终很好地维持下来。金属储存在理论上应为这家银行所拥有结存构成百分之百的保证，而且在实际上，储备也是非常强大的。在1712年，储备跌落到保证的最低点66%（为680.1万弗洛林，而结存总数则为1028.4万弗洛林）；但从1713年起，保证金回升到44%，到1715年，超过93%。像这样的坚实保证并不仅仅是私人的成就。它包含着遍及全国的一种真正的有信心的精神。

英格兰的货币在某种举棋不定的情况之后，于1696年固定在它传统的比价上面。所以，要不是政府当局得以从公众那里取得一大注信贷，它就无法弥补它日益增长的开支。在这一问题上，开展国债（参见表23-14）成为国家财政的现代形式之先驱。^[148]法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也是同样的处境，别无良策，也只能退而求诸权宜之计。在所有的权宜之计中，以货币这一对策最为轻而易举。增加金属通货的面值，比用货币账单来衡量物价上升尺度更易于为人们接受。

总体来说，在短期内，这一时代的经济气候在许多国家中不可避免地盖上大起大落的烙印。从长时期来看，从国际范围来看，物价有节制地、比较正常地上升（这可在阿姆斯特丹那样的市场上看到），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和全面下降趋向相矛盾的现象，那种下降趋向至少可从17世纪中叶看到，而且这个趋向还一直延续到18世纪。我们的相

对高物价的10年阶段仅仅标志着一个持续的长期运动中的短暂的间歇。它首先是一种紧张状态的后果，这种紧张状态主要起源于战争，并且也许和这些战争是完全能够等同起来的。[\[149\]](#)

表23-5 黑麦价格指数（1688—1716年）

年份	阿姆斯特丹	里昂	卡彭特拉	年份	阿姆斯特丹	里昂	卡彭特拉
1688—1689	95	83	76	1702—1703	100	93	93
1689—1690	115	108	58	1703—1704	118	103	102
1690—1691	115	178	91	1704—1705	103	100	98
1691—1692	105	132	151	1705—1706	103	91	118
1692—1693	170	230	151	1706—1707	95	87	112
1693—1694	186	400	135	1707—1708	97	105	102
1694—1695	155	151	135	1708—1709	200	457	214
1695—1696	141	103	145	1709—1710	263	288	174
1696—1697	159	115	112	1710—1711	178	120	93
1697—1698	200	159	148	1711—1712	129	123	93
1698—1699	316	316	141	1712—1713	129	209	129
1699—1700	214	224	112	1713—1714	159	237	112
1700—1701	145	123	102	1714—1715	151	126	112
1701—1702	118	135	81	1715—1716	138	89	68

表23-6 纺织品价格指数

年份	大麻 (英国海 军部)	英国羊毛 (休顿)	细布 (米兰)	年份	大麻 (英国海 军部)	英国羊毛 (休顿)	细布 (米兰)
1680—1689	100	—	100				
1691—1720		100					
1688—1689	127	—	102	1702—1703	159	101	115
1689—1690	132	—	104	1703—1704	159	—	115
1690—1691	130	—	131	1704—1705	133	—	110
1691—1692	123	75	131	1705—1706	108	—	111
1692—1693	127	80	103	1706—1707	141	—	107
1693—1694	128	79	135	1707—1708	141	—	—
1694—1695	132	89	111	1708—1709	153	—	—
1695—1696	153	119	113	1709—1710	168	—	—
1696—1697	169	112	116	1710—1711	188	—	—
1697—1698	147	112	114	1711—1712	176	—	—
1698—1699	128	106	121	1712—1713	147	—	—
1699—1700	141	106	122	1713—1714	136	—	—
1700—1701	159	101	127	1714—1715	126	—	—
1701—1702	158	102	124	1715—1716	131	—	—

表23-7 玉米及生羊毛在卡斯特尔脑丹莱的价格指数（以利维尔计）

年份	玉米	生羊毛	年份	玉米	生羊毛
1682—1688	100	100			
1688—1689	66	101	1702—1703	124	94
1689—1690	62	—	1703—1704	115	108
1690—1691	113	96	1704—1705	135	93
1691—1692	142	112	1705—1706	108	108
1692—1693	135	129	1706—1707	110	108
1693—1694	214	139	1707—1708	113	89
1694—1695	118	76	1708—1709	209	109
1695—1696	113	106	1709—1710	302	61
1696—1697	132	121	1710—1711	121	161
1697—1698	152	135	1711—1712	148	85
1698—1699	139	153	1712—1713	270	84
1699—1700	155	129	1712—1714	148	81
1700—1701	163	171	1714—1715	115	118
1701—1702	121	118	1715—1716	115	103

表23-8 巴黎小麦价格及巴黎地区白镏价格指数（以利维尔计）

年份	小麦	白蠟	年份	小麦	白蠟
1680—1688	100	100			
1688—1689	66	111	1700—1701	137	123
1689—1690	87	111	1701—1702	115	143
1690—1691	78	111	1702—1703	94	136
1691—1692	104	99	1703—1704	94	136
1692—1693	156	86	1704—1705	86	111
1693—1694	306	83	1705—1706	74	143
1694—1695	134	80	1706—1707	65	123
1695—1696	121	86	1707—1708	70	123
1696—1697	129	80	1708—1709	141	123
1697—1698	154	80	1709—1710	509	99
1698—1699	206	111	1710—1711	155	123
1699—1700	113	123	1711—1712	164	123

表23-9 英格兰人口发病率（取自T. 肖特《新观察》）

年份	死亡多的教区 所占百分比 (%)	同一教区葬礼 与洗礼数相比 的百分比 (%)	年份	死亡多的教区 所占百分比 (%)	同一教区葬礼 与洗礼数相比 的百分比 (%)
1680—1689	20	144			
1688	8	122	1702	8	110
1689	19	120	1703	9	123
1690	12	164	1704	4	128
1691	11	187	1705	8	115
1692	7	147	1706	16	135
1693	18	153	1707	10	135
1694	12	134	1708	10	136
1695	15	132	1709	6	125
1696	13	145	1710	10	117
1697	14	137	1711	10	169
1698	8	137	1712	13	149
1699	13	136	1713	10	120
1700	18	122	1714	15	118
1701	18	133	1715	9	133

表23-10 1693—1694年法国的饥谨情况：死亡与怀孕数的百分比

地 点	地 区	百分比（%）
鲁昂	诺曼底	407
克鲁莱	诺曼底	431
迪涅	佩尔什地区	357
迪南	布里塔尼	110
朗布依埃	巴黎西南	478
吉昂	奥尔良内	457
维莱	索洛涅	421
贝拉布里	普瓦图	491
圣·麦隆	阿尔玛尼亚克	251
拉图尔—絮尔—奥尔布	朗格多克	223
弗隆蒂南	朗格多克	282
洛代夫	朗格多克	93
罗曼	多菲内	161
瓦朗斯	罗纳谷地	307
塔拉斯康	地中海的普罗旺斯	46
卡西	地中海的普罗旺斯	50
伊苏登	贝里	736
奥弗尔—絮尔—瓦兹	巴黎北面	518

表23-11 1691—1695年巴黎北面一大农场售出的玉米

时间	数量（赛抵安）	平均价格（利维尔）	收进款（利维尔）
1691 年 2—7 月	451	9.47	4271
1691 年 8 月—1692 年 2 月	227	10.37	2346
1692 年 2—7 月	518	12.56	6507
1692 年 8 月—1693 年 1 月	314	18.56	5821
1693 年 2—7 月	583	22.06	12859
1693 年 8 月—1694 年 1 月	339	37.13	12587
1694 年 2—7 月	246	40.05	9851
1694 年 8 月—1695 年 1 月	232	18.83	4369
1695 年 2—7 月	930	12.98	12069
收获年			
1691—1692 年	745	11.88	8853
1692—1693 年	897	20.82	18680
1693—1694 年	585	38.36	22448
1694—1695 年	1162	14.66	16438

表23-12 贷款利率（鲁昂公证）

3 年流动平均数	5% 以下利率的百分比	合同数指数	3 年流动平均数	5% 以下利率的百分比	合同数指数
1687—1689	64	100	1701—1703	63	98
1688—1690	64	150	1702—1704	75	91
1689—1691	56	164	1703—1705	76	77
1690—1692	68	160	1704—1706	74	59
1691—1693	79	110	1705—1707	76	43
1692—1694	84	78	1706—1708	80	34
1693—1695	86	62	1707—1709	100	28
1694—1696	72	48	1708—1710	100	36
1695—1697	78	55	1709—1711	84	48
1696—1698	82	66	1710—1712	60	43
1697—1699	81	74	1711—1713	55	57
1698—1700	63	90	1712—1714	48	47
1699—1701	47	91	1713—1715	63	47
1700—1702	71	102	1714—1716	50	38

表23-13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活动

每年账户数 (平均)	年 份	总结存 (1000 弗洛林) (每年平均数)	金属储备 (1000 弗洛林)
2034	1681—1690	9360	8309
	1688	10752	9947
	1689	12715	11831
	1690	12604	11742
2510	1691	13557	12708
	1692	13181	12322
	1693	13525	12602
	1694	11479	10377
	1695	12013	10405
2640	1696	10207	8649
	1697	10263	9110
	1698	15234	12384
	1699	16751	13716
	1700	16285	13365

续表

每年账户数 (平均)	年 份	总结存 (1000 弗洛林) (每年平均数)	金属储备 (1000 弗洛林)
2698	1701	14830	12038
	1702	14783	11542
	1703	12578	10006
	1704	10964	9477
	1705	12524	9054
2755	1706	11299	10106
	1707	10059	8733
	1708	9316	8177
	1709	8182	7058
	1710	11386	9385
2475	1711	10006	7857
	1712	10284	6801
	1713	11772	10090
	1714	10666	8544
	1715	12991	12113
2656	1716—1720		

表23-14 英格兰国债（长期与非长期）

单位：百万英镑

年 份	总 数	年 份	总 数
1691	3.1	1703	12.3
1692	3.3	1704	12.4
1693	5.9	1705	12.1
1694	6.7	1706	12.4
1695	8.4	1707	15.2
1696	11.6	1708	15.5
1697	14.5	1709	18.9
1698	15.4	1710	21.3
1699	13.8	1711	22.4
1700	12.6	1712	34.9
1701	12.6	1713	34.7
1702	12.8	1714	36.2

（任家桢 译）

[1] 一些民族的、地方性的因素，前已论及，见本书第8—11、16—19章和第21章。

[2]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章及本章第2节。

[3] E. 邓思多夫思：《17世纪的里加粮食贸易》，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第3卷，1937年，第27—28、32、35页。

[4] 一拉斯特为两吨或10夸脱尔。

[5] 伦敦，政府记录所，T.64/274/66。

[6] J. 默弗雷：《巴黎谷物和面粉贸易与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商人》，载《近代现代史》（修订本）第3卷（1956年），第169—203页。

[7] 就在这些年中，通过和爱尔兰的贸易还向法国西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咸牛肉、黄油等，这些物资又向它的列斯群岛再出口。

[8] 参见本书原文，第813—814页。

[9] 英国这种板材宽7英寸，长6英尺，厚不超过3英寸；美加两国：宽11英寸，长12英尺，厚2英寸。——译者

[10] 国家档案局，C. O. 390/8/G, H, I。

[11] 国家档案局，C. O. 388/6/A7, 390/6，第225—242页。参阅D. W. 巴姆福特著《1660—1789年间的林业与法国海军力量》，多伦多，1956年；J. J. 马隆著《松

树与政治：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海军补给和林业政策，1691—1775》（1964年）。

[12] 1703—1706年（包括1706年）期间，英国海军仅在大麻和帆布上的费用就超过了木材和桅木。政府记录所，Adm. 20/77，80，83，86，89。

[13] 政府记录所，SP 9/206/10 fos. 324—325估计欧洲在1674年使用的树脂及沥青一年达8100拉斯特，其中荷兰国内的消费达3000拉斯特，英国是1800拉斯特。

[14] 参阅政府记录所，C. O. 388/6/A. 7；A. J阿拉能。参见《18世纪芬兰的外贸与海运》（《芬兰科学院年鉴》，*ser. B, tom*103，赫尔辛基，1957年），第97—98、105—106页。

[15] 政府记录所，C. O. 390/6，第223—242页。

[16] 关于亚麻贸易，见本书原文第866—867页。

[17] 参见政府记录所，C. O. 390/5 53页以下。

[18] 比埃尔·但尼尔·胡爱：《荷兰贸易回忆录》……译自法文，伦敦，1719年第2版，第56页。

[19] 见本书原文第869—870页。

[20] 17世纪90年代荷兰人的份额低（42%）不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当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参加“海湾（比斯开）贸易”的丹麦、瑞典、吕贝克以及其他北德意志船是属于不公开出面的荷兰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船只，部分同样也是隐瞒身份的，这在这个年代在英国贸易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21] H. 昂贾尔贝尔：《名葡萄酒是怎样诞生的：波尔多、奥波尔托、科涅克》；《17世纪波尔多的商业和阿坤淀盆地的经济生活》（1950年）；参见R. 迪昂著《法国史》（1959年）。

[22] 政府记录所，C. O. 388/6/B. 49；T. 64/274/111，115。

[23] 见本书原文第523—524页。

[24] 西班牙酒一般来说似乎是在丧失它在欧洲北部的支配地位，虽然在《乌得勒支和约》以后的岁月中，苏格兰的饮用酒几乎全部是由西班牙供应的；政府记录所，T. 64/274/113；T. 36/13。

[25] 在北欧，比一般的酒更为重要的一项工业产品和消费品是啤酒；以英国的啤酒消费为例，一般每年每人不超过一桶（政府记录所，C. O. 390/3 fo. 16）。但在区间贸易中，它的重要性不大，且在减少，因为运送大麦比运送啤酒要方便得多。

[26] 雷恩市伊尔—维莱纳省档案馆档案卢茂安：《海军P9B，402—7页；J. 德吕慕著：17世纪末圣马洛港的运动》，雷恩，1966年，第272—273页。这些船只回归欧洲的运动十分复杂，时间拖得长，在《17世纪末圣马洛在纽芬兰的鳕鱼捕捞船队》编年史（E. S. C.）一书中得到分析，共16年（1961年），第665—685页。

[27] E. E. 里奇：《俄罗斯和殖民地裘皮业》，“经济史”重订第二套丛书第7卷（1954—1955年）第307—328页；H. G. 劳逊：《裘皮：不列颠重商主义之研究，1700—1775》（1943年）；参见R. H. 费歇著《俄罗斯裘皮贸易，1550—1700》，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丛刊第31卷，1943年。

[28] J. M. 普雷斯：《烟草打进俄国》（译文，美洲费拉德尔菲亚学会、新版丛书，第51卷第1部分，费拉德尔菲亚，1961年）。

[29] 见本书原文第510、534页。

[30] 糖在马提尼克岛、瓜特罗佩和圣克里斯托弗、政府记录所C. O.

[31] 1702—1712年从南特、波尔多和拉罗什尔出发去法属岛屿的船只班次在《米迪年刊》中已列成表格，见t. 65（1953年），第66页，这上面1705年和1711年拉罗什尔的数字应分别改正为38和34。——编者

[32] 政府记录所，J64/276B/320。

[33] 见本书原文第364、375—376、514—515页。

[34] 政府记录所，C. O. 388/10/H. 108和388/I. 8；T. 70/1205/A. 43. 参见K. G. 戴维斯《皇家非洲公司》（1957年），第310—312、361—363页。

[35] 巴黎研究所图书，MS. 2387, fo. 243, 参见加斯东·马丁《18世纪之南特：黑人的买卖，1714—1774》1931年。

[36] 这里和下面几段取自K. 格拉门著《荷兰—亚细亚贸易，1620—1740》，哥本哈根，1958年。关于葡萄牙人的情况，见本书原文第516页等。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7章（ii）及L. 德明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中和广州的贸易》（1965年，4卷集）第1卷，第1部分。

[37] 参见政府记录所，C. O. 390/6，第183—195页。

[38] P. 开泼林：《东印度公司和弗朗斯华·马丁》（1908年）附录，第657—661页；B. 克列希那：《印度英国商务关系，1601—1757》（1920年），第289—290、323—324页。

[39] 伦敦档案局，转接下页390/5, fo. 59及Finch MSS, 第16卷（F. T. 3）。

[40] 政府记录所，C. O. 390/6，第183—195页，在1698—1719年，英国输出的贵重金属有70%是运到东印度群岛去的。

[41] 参见本书第17章和原文第551—552页。

[42] 参见本书原文第534—535页。

[43] 政府记录所，T. 64/276B/391。

[44] 参见本书原文第552页。法国从地中海东部取得的进益主要是纺织原料：大约在1700—1702年，丝占24.3%，棉占15.3%。在随后10年中，丝的货运量停滞不动。到18世纪20年代，它们被棉花货运量所压倒，后者持续而且迅速增加。见R. 巴

烈斯著《从1660到1789：勒旺岛贸易》，载G. 雷勃脱编《马赛商业史》第5卷，1957年，第505—511页。

[45] 关于哈布斯堡的商业政策和哈布斯堡的经济见本书原文第602页及以下各页。

[46] T. 64/275/147.

[47] W. G. 霍斯金斯：《埃克塞特之工业、商业和人，1688—1800》，曼彻斯特，1935年，第74—77页。

[48] 政府记录所，C. O. 388/15/20；390/5，fo. 37；390/7/36；390/12，第2页及以下各页；参见T. 64/275/146。

[49] 政府记录所，C. O. 388/11/76。

[50] 政府记录所，C. O. 388/7，fo. 14及388/11/76；参见T. 64/275/164。

[51] J. U. 纳夫：《不列颠煤炭工业之兴起》（两卷集）第1卷，1932年，第129页。

[52] 亚伯拉罗·道比于1709年在科尔布鲁克代尔开始用焦炭炼铁，不过他的冶炼过程长时间内一直是保密的。

[53] E. F. 赫克舍：《瑞典经济史》（哈佛版，1954年），第97—98页。

[54] 法国在1710年以后出口的增长，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英镑在1709—1726年间的大幅度贬值，当时英镑被稳定在低于它1693—1700年间价值的三分之一的水平。参见阿尔弗来德·福维尔著《法国在1716年前的对外贸易》，《统计与比较立法公报》第13卷，1893年，第48—51页。

[55] 这些以及其他海湾船只往来资料取自V. E. 班格和K. 克斯特的《通过松德海峡货船统计表，1661—1783年》（第2卷第4册，哥本哈根—莱比锡，1930—1953年）。参见本书原文第893页。

[56] W. 伏格尔：《17、18世纪德国海运统计文献》（II），《汉萨历史汇编（1932—1937年）》，第78—151页。

[57] 阿姆斯特丹，荷兰档案馆：Archief Bungmeester，第137号。参见M. 吉第翁赛著《18世纪荷兰之波罗的海贸易》，载《哈佛论文集》，1932年，第45页。

[58] W. 伏格尔：《中世纪和近代史的研究与起因：迪特里希·戈歇尔》（耶拿，1951年），第319页。

[59] R. 戴维斯：《17世纪后期经济中的商船业》，载《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9卷（1956—1957年），第70页。

[60] 参见W. 伏格尔书，第331页。

[61] 17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因中立而得到好处，当时仅瑞典人就拥有船只750艘之多；但是这些好处在“北方战争”中丧失殆尽。荷兰的北方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阿姆斯特丹人的手里。鹿特丹，虽然在17世纪相对来说不太重要，可是在18世纪却比阿姆斯特丹活跃得多：它在海湾和伊比利亚贸易中处于重要

地位，并且从18世纪20年代起，在英格兰烟草业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根据阿姆斯特丹的数据作出的判断需要有所调整。

[62] P. J. 夏里埃脱：《三个世纪中的法国海上经济》（1931年），第32、35—36、42—44、52—53页。

[63] *Nederlandsche Prijsgeschiedenis*, 莱顿, 1943年, 第106页。这些数字可以和E. H. 费尔波斯·勃朗与希拉·V. 勃朗所确立的英国生活费用指数相对照。这两人编列的指数见所著《七个世纪以来消费商品的价格和建筑工人工资数字的比较》，载《经济》第2部，第23卷（1956年），第296—314页。以1681—1689年作为基数（100），1690—1699年的指数为112，1700—1709年为101，1710—1715为121。葡萄牙的一些价格运动情况见本书原文第509—510页。

[64] 波兹休默斯，第574页；里昂社团档案，BB及HH组；卡彭特拉，社团档案。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指数即在下面，见第898—902页。

[65] 粮食价格在地理上出现的差异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混成指数解释起来失去其可靠性，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是如此。弗里奇氏在《小麦与收获循环》[见《经济报》卷31（1921年）]中开列的指数在当时是有用处的；厄谢尔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2卷（1930年）中开列的法国小麦指数完全是引起争议没有最后定论的。

[66] O. 狄脱曼：《莱比锡城的谷物价格》（莱比锡，1889年）；M. J. 埃尔萨斯：《德国价格和工资简史》第2卷A（莱顿，1940年），第517页；A. F. 普列勃拉姆：《关于奥地利价格和工资的资料》第1卷（维也纳，1938年），第529页。

[67] P. 维拉：《现代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3卷本）第1卷，1962年，第642页。

[68] 参见博纳和社团档案；在汝拉的阿尔布瓦也有类似的情况。

[69] 参见波兹休默斯所著书，第226页。

[70] 参见埃尔·萨斯所著书，卷1（1936年），第659页；E. J. 汉密尔顿：《西班牙的战争和物价，1651—1800》，1947年，第241、246页。

[71] W. H. 贝弗里奇等：《英国的物价和工资情况》（第1版，1939年），1965年重印，第430页。

[72] A. 德玛大勒那：《17世纪中米兰的价格和商业情况》，米兰，1950年，第175页。

[73] 《英格兰农业及价格史》（7卷本）第6卷，牛津，1866—1902年，第547页。

[74] 《布拉邦特州的价格和工资简史》第2卷（勃罗格版，1965年）第495—497页。

[75] 这种一成不变达到完全同一的例子在埃尔萨斯所著 *Um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一书中有许多。英国紫红布的价格根据慕尼黑的记载从1671—1710年一直不变（《布拉邦特州的价格和工资简史》第2卷（勃

罗格版，1965年）第1卷，第552—553页）；砖在1665—1713年间同样也没有变动。奥格斯堡泥水匠帮手的工资从1693—1712年也没有涨落，熟练的泥水匠的工资在1672—1712年间（同上书，第1卷，第728、731页）和其他建筑工人工资也没有变化。

[76] 里尔，法国古币，是结账用的工具，其值相当于古代一市斤银子的价值。
——译者

[77] 土伦，港口档案，I_L，第253—306页。

[78] 法国古币单位，全称“图尔苏”，相当于5生丁，20个苏等于1法郎。这种辅币开始是图尔市铸造出来的，后被皇家采用，成为全国流通货币。——译者

[79] 由索洛尔德·罗杰斯汇集，第5卷，第416页；关于皇家学会会员约翰·豪顿（死于1705年）的资料，见《全国传记字典》卷27，第422页。

[80] 见玛大勒那所著书，第173—174页。

[81] 见贝弗里奇所著书，第676页。

[82] 关于温彻斯特在1688年收割之后的小麦最低价格，以及1705年和1706年丰收年在那里的低价格水平，见贝弗里奇所著书，第81—82页。在法国的价格流中有许多这类下跌的例子。

[83] E. 裘铁卡拉：《芬兰大饥荒，1695—1697》，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3卷，1955年，第48—63页。在爱沙尼亚，黑麦价格的上涨到1698年秋达到其顶点，O. 列伊夫：《17世纪初爱沙尼亚地区的经济形势》第1卷（他度版，1935年），第281—294页。关于在若干苏格兰集中燕麦片的价格，参看R. 密契逊著《17至18世纪中苏格兰谷物价格之运动情况》，载《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18卷（1965年），第278页及以下各页。

[84] 卡斯特尔脑丹莱（奥德），社团档案，HH2和3。

[85] 公证人记录稿中锡镞的价格：巴黎，国家档案，案卷ZZ，凡尔赛，瓦兹（塞纳河畔）的省档案。关于到1698年为止的小麦价格，见M. 包伦和J. 墨弗兰著《摘自巴黎市场行情表的粮食价格，法国价格史研究与文献》第2卷（1952年），第135页；关于1699—1715年的价格，见H. 豪瑟著《法国物价史之研究及有关文件》（1936年）。

[86] 布朗和霍普金斯的《七个世纪的建筑业工资》，载《经济》期刊第22卷（1955年），第195—206页。

[87] 《农业和价格的历史》第5卷，第671页。

[88] 巴黎，“政府援助档案”，Fonds des Incurables Pièces comptables。

[89] D. V. 格拉斯和D. E. C. 埃弗斯赖（编辑）：《历史上的人口》，1965年，第159—220页。

[90] 沃邦：《国王什一税计划》（E. 可脑宪特编辑，1933年），第159页。

- [91] 格拉斯和埃弗斯赖收集的一些文字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 [92] J. D. 张伯斯：《潮流的痕迹，1670—1800》，载《经济史评论》增刊1957年第3期，第23页。
- [93] 《16世纪末共和国倾覆时期的威尼斯人口史》（帕多瓦，1954年）。
- [94] 《意大利居民史》。
- [95] 埃尔萨斯，第1卷，第79页。
- [96] W. 毕克尔：《瑞士居民及居民政策》，苏黎世，1947年，第42页。
- [97] J. 那达尔著《西班牙人口》，巴塞罗那，1966年，第60页；关于西班牙总的情况，见本书原文第345页。
- [98] G. 乌透斯脱洛姆：《1660—1750年左右瑞典一些人口变化的概况》，载《历史上的人口》，第538—548页。关于波兰人口的锐减，见本书原文第705页。
- [99] 张伯斯，第34—35页。
- [100] 《西班牙人口、博韦与博韦西斯》第2卷《地图与图表》，1960年，第50—51页。
- [101] E. 戈蒂埃、L. 亨利：《诺曼底教区克鲁莱的人口》，1958年，第243页。
- [102] E. 勒华·拉度里：《朗格道克的农民》（两卷集）卷1，1966年，第541—547页。
- [103] E. A. 理格雷：《工业化以前英国的生育限制》，载《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19卷，1966年，第82—109页。
- [104] 见C. 克兰顿著《流行病史》（两卷集，剑桥，1891—1894年）第1卷。
- [105] C. F. 穆来：《淋巴腺鼠疫和英格兰》，列克星登，1956年，第266页；C. 卡里哀、M. 古度里以及F. 雷巴发合著：《死城马赛，1720年的鼠疫》（新版，1968年）。
- [106] 穆来著：《淋巴腺鼠疫和英格兰》，第262—264页，提到1707年华沙出现鼠疫，1709年在但泽出现，1711年在哥本哈根出现，同年鼠疫在勃兰登堡很猖獗（死亡人数为21.5万）。奥地利死亡30万人。1709—1712年，英格兰采取一整套措施对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船只进行检疫。在哈布斯堡，为感谢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译者）把人从鼠疫中拯救出来而竖立的纪念碑上记述1691—1692年和1711—1714年共6年中发生时疫。A. 格伦堡：《奥地利之鼠疫》，维也纳，1690年。
- [107] 许多当年的文字有些表现出那些最灵敏的头脑对疾病的起源也感到惶惑，读者要知道这方面的材料，请看罗伯特·波义耳的论文《空气合乎卫生和不合乎卫生的原因》，登载在《哲学著作》上面，彼得·萧编（3卷本，1725年），第3卷，第521—544页，参见J. P. 彼得著《十八世纪末的病人与疾病》，载《年鉴》（E. S. C.）第22期（1967年），第711—751页。

[108] P. 哈辛和E. 黑林合编：《死亡率问题：方法、来源与图书目录……》，载《国际历史人口研讨会会刊》（列日，1965年），第26—27页。

[109] 《城市、小镇和农村死亡证……的新观察》（伦敦，1750年）。

[110] 《城市、小镇和农村死亡证……的新观察》（伦敦，1750年），第85页，表格4。

[111] 参见贝弗里奇一书中温彻斯特的小麦价格，第81—82页。

[112] 参见洛哀·拉度里书中各处。

[113] 关于这一类型的危机，参见古贝尔，第1卷，第45页。

[114] 关于方法的所有问题，参见J. 默安弗兰著《法国旧制度下的生存危机与人口》（人口，1946年），第643页。

[115] 据鲁昂（圣戈大、圣麦克劳和圣帕特里丝几个教区）以及其他列出的地方教区登记册，克鲁莱除外（参看高狄爱和亨利合著《克鲁莱的人口》），圣曼若也除外，关于这个教区，见C. 布其哀著《勒克丢鲁瓦一隅的饥谨与瘟疫》（奥克，1929年）。这些登记册都和各该地社团档案核对过（维格兰由维勒梅林补充），有几个例外：塔拉斯空和恰西（在马赛，罗纳河口省档案）、奥弗苏瓦兹（以及它的两个邻近的教区）、雷姆波意兰（以及它的6个邻近教区），因为这些地方登记册的对等档案都存放在凡尔赛·塞纳瓦兹档案馆。

[116] 都灵社团档案。

[117] 西萨尔和波宋（苏塞流域）教区登记册，情况由达维可小姐慷慨提供。

[118] 克兰顿，第2卷，第43页。

[119] 裘铁卡拉，第51页。

[120] 洛哀·拉度里，第1卷，第227—235页。

[121] 从巴黎四周向外延伸的行政圈，方圆25—30英里。

[122] 塞纳瓦兹省档案，J67：旭埃西—佩安夫地方农民夏蒂安所记载。赛抵安（setier）是计量用的容器，在巴黎约相当于12蒲式耳的谷物。

[123] 包朗和默安弗兰，第2卷，第40页。

[124]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奇怪的文件来自1688年的昂儒。农民不愿意以一天的工作来换取一蒲式耳的谷物。他们说：“面包和酒算不了什么，而他们情愿要8—10苏的钱，也不要一蒲式耳的谷物。”参见雷纳·勒霍路著《昂热教堂的礼仪》，F. 勒勃隆编（1967年）第186页。

[125] 请看诸如省长和主计长之间的通信，国家档案，序号G7。

[126] 金并没有发表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著作，我们是通过查理·但夫南的著作《在贸易平衡中让一个民族赚钱……的论文》（1699年，第83页）而知道的。

[127] 《中部地区农民》（1957年版，1965年重印），第212页。

[128] 见C. 威尔逊的《17世纪的布匹生产和国际竞争》，载《经济史评论》第13卷（1960—1961年），第221页。

[129] N. W. 波菲休默斯（编）：*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Leidsche textielnijverheid*，第5卷（海牙，1918年），第8页。

[130] 古贝尔：《地图与图表》，第117页。

[131] 古贝尔：《地图与图表》，第588页。

[132] N. E. 庞、K. 柯斯脱合著：《通过松德海峡货船统计表》。参见皮埃·让宁著《根据松德海峡账目建立的欧洲经济活动总指数》。《历史评论》第231卷（1964年4—6月），第55—102、307—340页。

[133] 庞及柯斯脱合著，第2卷，第1页。参见本书原文第871页。

[134] J. C. 惠斯脱曼著“Statistische gegevens over den handel van Amsterdam in de Zeventiende eeuw”，*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61 eg.（1948年）。

[135] 《荷兰亚细亚贸易，1620—1740》，哥本哈根，1958年，第16页，表格3。

[136] 雷尔甫·戴维斯：《英格兰的对外贸易，1660—1700》，载《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2卷（1954—1955年），第150—166页。

[137] 雷尔甫·戴维斯：《17世纪后期经济中的商船运输业》，载《经济史评论》第2套第9卷（1956—1957年），第59—73页。

[138] F. 文吐里：《18世纪初皮埃蒙特与英国外交官的交往》，皮埃蒙特历史文献通报，第54卷，1956年，第2章。

[139] D. 狄恩以及W. A. 柯尔：《英国在1668—1959年间的经济成长》，剑桥，1962年，第319页；参见G. N. 克拉克著《英国商业统计指南，1696—1782》（1938年）。

[140] J. 特鲁曼：《17世纪法国对外贸易》，17世纪，第70—71（1966年）、81页；参见《圣马洛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活动，1681—1720》，根西乌学会，第17卷（1964年），第631—647页。

[141] 国家档案G7。

[142] J. Delumeau: *L'Alun de Rome*（1962年），第274页，表28。1肯塔在罗马约等于50公斤。

[143] M. Piug: 《17世纪日内瓦贸易的研究》（1964年），第382页。

[144] 资料来源M. Piug: 《17世纪日内瓦贸易的研究》（1964年），第534—555页。

[145] 鲁昂档案馆。

[146] denier是法国古代的辅币，相当于1/12苏。泛指“钱”。

[147] 根据J. G. van Dillén的*Brennen tot de Geschie der Wisselbanken*, 第2卷（海牙，1925年），第985页。

[148] A. 布朗宁著：《英格兰历史文献1660—1714年》（1953年），第355—356页。援引《大不列颠净公共收入与支出情况》第2卷（1869年），第298页。参阅前文第4章及P. G. M. 迪克森的《英格兰的金融革命，1688—1756年》（1967年）第39页及第41页及以下各页。

[149] 有关表，请看本书原文第1193—1198页。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achen, 亚琛, 亚琛毛织品, 865; 亚琛的煤, 869

Aargau, 阿尔高, 474

Abbadie, Jacques, 阿巴迪, 雅克, 胡格诺神学家, 145

Abbeville, 阿布维尔

 阿布维尔毛织品, 863—864

Abdi Pasha, 阿布迪帕夏, 土耳其司令员, 619

Aberdeen, 阿伯丁

 阿伯丁的高尔夫球, 151—152

Academie Française, 法国科学院, 76

 法国音乐科学院, 106

 法国科学院, 38, 40—41, 43, 65, 76

Acadia, 阿凯迪亚, 12—13, 251, 442, 470, 485, 487, 497—498, 502, 508; 另见新斯科舍

Acapulco, 阿卡普尔科

 中国与阿卡普尔科的贸易, 511

Accault, Michel, of Illinois, 伊利诺伊的阿卡尔特, 米歇尔, 499

Adanson, Michel, 亚当森, 米歇尔, 法国植物学家, 59

Addison, Joseph, 艾迪生, 约瑟夫, 作家, 32—33, 146, 282, 315

 《卡托》, 83

《旁观者》，94，282

Adige, the, 阿迪杰河，405，429

Adler, Guido, 阿德勒，吉多，音乐研究家，103

Adrian, 亚德里亚，俄国的大主教，720，726，729

Adrianople, 亚德里亚堡，610，621，754

 亚德里亚堡事件，629

 亚德里亚堡和约，636—637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564，619，776

 和威尼斯，604

Aegean (the Archipelago), 爱琴海，2，540，544，546，548，608，615，627，823

 爱琴海海船制帆篷的布，562

Affirmation Act (1696), 批准法令 (1696)，264

Afghanistan, 阿富汗，与波斯，644—645

Africa, 非洲

 东非，516—518

 北非，277，385，551，564，838，864

 西非，12，261，515，855

 另见Barbary Coast

African Company, Royal, 皇家非洲公司，261，855

Afrique, Compagnie d', 非洲公司，551

Agde, 阿格德，571

Aguirre, Cardinal Jose Saenz de, 阿吉雷，卡迪纳尔；何塞·萨恩斯·德，西班牙历史学家，134，343

Ahmed II, 艾哈迈德二世，苏丹（国王），563，622

Ahmed III, 艾哈迈德三世, 苏丹 (国王), 629, 642—644
艾哈迈德三世退位, 646
Ahmedabad, 艾哈迈达巴德, 860
Aire, 埃尔, 1710年为英国人所占领的埃尔要塞, 437, 440
Aland Islands, congress (1717—1719), 阿兰德岛代表大会 (1717—1719), 676—678
Alassio, 阿拉西奥, 403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544, 562, 608, 622, 646—647
Albany (New York), 阿尔巴尼 (纽约), 486—487, 489, 494
Albarazin, bishop of, 阿尔巴拉金主教, 379
Alberoni, Cardinal Giulio, of Parma, 帕尔马的艾尔维洛尼, 卡迪纳尔·朱利奥, 西班牙政治家, 164, 380, 565, 641
Albuquerque, fortress, 阿尔伯克基要塞, 526
Alcácer do Sal, 阿尔卡塞杜萨尔, 520, 537
Alcantara, fortress, 阿尔坎塔拉要塞, 525
Alegrete, Manuel Teles da Silva, 亚莱格莱特, 曼纽尔, 特尔达·西尔瓦, 侯爵, 葡萄牙财政大臣, 519, 522, 526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达朗伯, 让·勒·隆德, 法国数学家, 43, 52
Alentejo, province, 阿连特如省, 520, 526—528, 538
Aleppo, caravan route, 阿勒颇商队路线, 541, 548, 550—551, 859
人口, 542
Aless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418, 466n., 558, 560n.
Alexander VIII (Pietro Ottoboni), 亚历山大八世 (彼得罗·奥托博尼), 教皇, 131, 161, 594

Alexandre de Rhodes, S. J., 亚历山大·德·罗得, 远东的传教士, 129

Alexandre, Noël, 亚历山大, 诺埃尔, 多明我教会的历史学家, 132

Alexandretta, 亚历山大勒达, 542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546, 550, 611, 623

Alexis, tsar, 阿历克赛, 沙皇, 716

Alexis, tsarevich, 阿历克赛, 沙皇之子, 彼得大帝之子, 676, 733, 738

Alfieri, Count Vittorio, 阿尔菲耶里, 伯爵, 维托利奥, 意大利诗人, 562

Algiers, 阿尔及尔

人口, 542

海盗, 227, 391, 515, 543—546

与荷兰的战争, 550

奥斯曼帝国官员在阿尔及尔的权力, 553—554

被俘的人, 563

另见Barbary Coast

Alhucemas, fortress, 阿卢塞马斯要塞, 554

Alicante, 阿利坎特, 370, 438, 514

阿利坎特的葡萄酒, 521, 845

Allin, Sir Thomas, 阿林, 爵士, 托马斯, 英国海军上将, 391

Allouez (Alloues), Claude Jean, S. J., 阿卢茨 (阿卢斯), 克洛德·让, S. J., 传教士, 498

Almanza, 阿尔曼萨

1707年阿尔曼萨战役, 373, 433, 438, 447, 757

Almenara, 阿尔梅纳拉

1710年阿尔梅纳拉战役, 440

Alost, 阿洛斯特, 要塞, 252

Alsace, 阿尔萨斯, 8, 223, 765, 852

宗教, 120

战争, 304, 421, 753, 755, 785

与乌得勒支, 454, 473, 590

Althann, Count Michael Johann, 阿尔瑟, 公爵, 米歇尔, 查理四世的顾问, 593

Altona, Treaty of (1689), 阿尔托纳条约 (1689), 3, 154

Altranstädt, 阿尔特兰施泰特, 4, 432, 633

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 (1706), 431, 701

Alvor, Franeisco de Tavora, 阿尔博尔, 弗朗西斯科·德·埃沃拉, 第一代公爵, 果阿总督, 516

Vietar Amadeus II, 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

Amazonia, 亚马孙河流域

传教团, 129, 356, 531

Ambros, August Wilhelm, 安布罗斯, 奥古斯特·威廉, 德国音乐研究家, 101

Ameller, Francesc, 阿梅列尔, 弗兰塞斯, 加泰罗尼亚的检察官, 379

Amelot, Michel Jean, 阿梅洛, 米歇尔·让, 法国外交家, 183, 186—187, 370—371, 373—374, 376—379

America, North, 北美

北美与欧洲, 11—13, 56, 95, 128, 195—196, 506—508

北美哲学社团, 42

九年战争，251—252，486—490

王位继承战争，441，501—506

乌得勒支，13—14，469—470，507

北美贸易，256，490—491，840，842，850—853，855，866，
871，894

北美移民，493—494，765

另见New France和separate colonies American Indians，美洲的印第安人，13，96，99—100，128—129，486，492

阿本纳克（加拿大），487，498，502—503

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504

阿帕拉契（佛罗里达），504

阿拉干（智利），356

卡霍基亚（伊利诺伊），499

卡尤加（伊罗夸伊），490

奇卡沙（路易斯安那），504

乔陶（路易斯安那），504

克里克（佛罗里达），504

埃特坎敏（加拿大），498

朱里马瓜（亚马孙），356

卡斯卡斯基亚（伊利诺伊），498

肯尼班科（阿凯迪亚），498

佩滕湖（墨西哥），356

迈阿密（伊利诺伊），490，498

莫哈·克（伊罗夸斯伊），490

纳齐兹（路易斯安那），499，501，504

奥马瓜（亚马孙），356

奥奈达（伊罗夸伊），490，498

奥诺达加（伊罗夸伊），490

奥萨奇（伊利诺伊），499

渥太华（加拿大），486，490

翁斯比克（路易斯安那），499

佩诺勃斯考特（阿凯迪亚），498，502

波塔瓦托米（伊利诺伊），498

普韦布洛（新墨西哥），356

塞内卡（伊罗夸伊），486

塔恩萨（路易斯安那），499

塔马路伊（伊斯诺斯），499

蒂姆夸（佛罗里达），504

托科巴加（佛罗里达），504

托尼加（路易斯安那），499

托斯卡洛拉（伊罗夸伊），508

亚祖（路易斯安那），499，504

Amersfoort, 阿麦斯福特，烟草，852

Amiens, 亚眠，毛织品，863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15，51，75，105，176—177，187，195，200，262，727，737，796

财政和战争，23，297—298，303—304，307，314，420，471，895—896；见Banks

海军部，21，295，800

人口，542

贸易, 295, 535, 550, 736, 846, 851—852, 857, 860, 873, 875, 877, 893

谷物市场, 322, 837, 876—878, 898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541, 553, 567, 609, 621, 628, 639, 642; 另见Turkey

Ancona, 安科纳贸易, 555—556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349, 353, 366—367, 369, 375

Andes, 安第斯, 531—532

Andrade, Freire de, governor of São Tomé, 安德拉德, 弗莱雷·德, 圣多美总督, 515

Andros, Sir Edmund, governor of Dominion of New England, 安德鲁斯爵士, 埃德蒙, 新英格兰自治领的总督, 480, 492, 494, 505

Angola, slaves, 安哥拉, 奴隶, 515, 533

Angoumois, iron, 安戈莫, 铁, 812

Anna, duchess of Courland, 安娜, 库兰特的公爵夫人, 738—739

Ann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安妮, 大不列颠女王, 17, 29, 102, 108, 121, 169—170, 190, 255, 268—269, 381

作为公主, 201, 204—205, 207—209

和托利党, 270

登基, 414

和萨伏依, 466

和奥古斯都二世, 710

逝世, 474, 477

Ansbach, troops, 安斯巴赫, 军队, 404

Antalya, 安塔利亚, 土耳其海军基地, 615

Antigua, 安提瓜, 810

Antilles, 安的列斯

见West Indies, flibustiers, and separate islands

Anton Ulrich, duke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 安东·乌尔里希,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 74, 166, 202, 246, 402, 407

Antonio, Nicolás, 安东尼奥, 尼古拉斯, 西班牙目录学家, 343

Antwerp, 安特卫普, 87, 390, 398—399, 416, 426—427, 435, 445, 477, 753

英格兰银行的营业所, 293

安特卫普的防卫, 404, 413

Apafi, Michael, 阿佩费, 米夏尔, 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子, 577, 582, 608, 622

Aragon, 阿拉贡, 9, 347, 348, 353, 363, 368, 373—374, 375

内战, 370, 373, 425, 433, 783

羊毛, 863

Arbuthnot, Dr John, 阿巴思诺特博士, 约翰, 苏格兰的学者, 48, 107

《约翰·布尔》, 443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 657, 716

贸易, 648, 725, 841—844, 867

Ardabil, 阿达比勒, 为土耳其占领, 645

Arega, 阿雷加, 513

Argos, 阿戈斯, 为土耳其人重新夺取, 638

Argoud, sieur, 阿尔戈, 先生, 路易斯安那的创办人, 500

Argyle, Archibald Campbell, 阿盖尔,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 第九代伯爵, 196

Argyle, John Campbell, 2nd duke, 阿盖尔, 约翰·坎贝尔, 第二代公爵, 271

Arias, Manuel de, 阿里亚斯, 曼努埃尔·德, 西班牙大臣, 352, 361

Arizona, 亚利桑那, 356

Arles, 阿尔, 813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186, 618, 642, 645, 811

Arminianism, 荷兰神学派, 122, 142

Arnould, Antoine, 阿尔诺德, 安托万, 詹森教派教徒, 132, 135, 139

Arnoul, Pierre, 阿尔努, 皮埃尔, 各社会等级的管理, 822

Arras, 阿拉斯, 要塞, 440

Arsenius III, 阿塞纽斯三世, 佩奇的大主教, 579—580

Artagnan, Pierre de Montesquiou d', 阿尔塔昂, 皮埃尔·德·孟德斯鸠, 法国元帅, 747

Artois, 阿图瓦, 亚麻布制品, 866

Arundel, Anne, of Maryland, 马里兰的阿伦德尔, 安妮, 483

Arzão, António, Brazilian explorer, 阿尔萨, 安东尼奥, 巴西探险家, 533

Arzila, 阿兹拉, 要塞, 554

Asam, Cosmos Damian and Egid Quirin, 阿萨姆, 科斯莫斯·达米亚和埃吉德·克维林, 巴伐利亚的建筑师装饰家, 144

Asfeld, Jacques Vincent, barond', 阿斯费尔, 雅克·樊尚, 男爵, 法国外交家, 160

Ashurst, Sir Henry, 艾休尔斯特爵士, 亨利, 殖民地的代理人, 491

Asiento, the, 西班牙与外国政府或商人签订有关供应非洲奴隶的契约, 349—350, 367, 376

与法国, 10, 15, 364, 367, 376, 415, 856

与英国, 434, 439, 442, 448, 460, 464, 475—476, 528

与葡萄牙, 364, 515

另见slaves

Asselijn, Thomas, 阿塞里奇, 托马斯, 荷兰剧作家, 75

Assendelft, Jean Deutz Van, 阿森德尔特, 让·多伊茨·凡, 荷兰银行家, 307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644, 733, 775

Astruc, Jean, 阿斯特律克, 让, 法国学者, 67, 141

Asuncion, 亚松森, 357

Ath, 阿特, 要塞, 252, 381

Athens, 雅典, 为威尼斯人炮击(1687), 620

Atouguia, Jeronimo Casimiro de Atáide, 阿托吉亚, 赫罗尼莫: 卡西米罗·德·阿塔伊德, 第九代伯爵, 537

Atterbury, Francis, bishop of Rochester, 阿特伯里, 弗朗西斯, 罗彻斯特主教, 127

Attica, 阿蒂长, 622

Aubusson, 奥比松, 325

Auersperg, Count Leopold von, imperial ambassador to Britain, 奥尔斯贝格伯爵, 利奥波德·冯, 奥地利帝国驻英大使, 383

Aughrim, battle of (1691), 奥赫里姆战役(1691), 242

Augsburg, 奥格斯堡, 238, 421, 589

奥格斯堡联盟, 120, 223

人口, 884

Augustus II, 奥古斯都二世, 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 2—3, 116, 184, 402, 406, 584

宗教皈依罗马, 121, 188, 687, 709—710

被选为国王 (1697), 652, 686—687

交出王冠 (退位) (1706), 663, 701

宣告退位无效 (1710), 704

专制主义者的目的, 2, 697—698, 707, 709, 713

波兰的改革, 687, 691, 707—708, 713—714

在波兰的反对, 654, 657—659, 686—689, 697, 711—712, 714

波兰人的支持, 654, 695—696, 698, 700, 702—703

与土耳其, 637, 672—673, 688—689, 692

与立陶宛, 690—691, 693—694, 711

与科兰, 694

与利沃尼亚, 2, 652—653, 655, 687, 692, 712

与卡尔十二世, 652ff., 662—663, 671—673, 678, 692ff.

与俄国, 184, 636, 654—656, 660—661, 678, 692—693, 698—699, 701—702, 704, 708—715, 734—735

与勃兰登堡—普鲁士, 2, 689—690, 694, 708—710, 735

与法国, 406—407, 692, 695, 710—711

与海上霸权, 655, 670, 695, 699

与哈布斯堡, 695, 710

军队, 237, 241, 768

Aulisio, Domenico d' , 奥利西奥, 德梅尼科德, 那不勒斯的法官, 558

Aunio, wines, 昂尼, 葡萄酒, 845

Aurangzeb, Mughal emperor of India, 奥朗则布, 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 35

Austria, duchies of, 奥地利公爵, 572—573, 591, 599ff.

Austria, house of,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利益的冲突, 4—6, 157, 162, 228, 238, 412, 576, 578—579, 586, 621—622

与罗马教皇, 131, 434, 448, 594—595

与土耳其, 162, 195, 225—227, 232—234, 238—242, 253, 383, 402, 572, 576ff., 618ff., 625ff., 638ff.

与西班牙王位继承, 8, 157, 351—352, 357—359, 384ff., 393ff., 448—450, 454—455, 462—463, 468, 471ff., 590ff.

家族法规, 575—576, 592, 597

另见Habsburg monarchy, Vienna

Avaux, Jean Antoine de Mesmes, Coute d' , 梅斯梅斯的阿沃, 让·安托万, 公爵, 172, 178, 186, 200, 203, 246, 400—401

在爱尔兰, 213

Aviano, Marco d' , 阿维亚诺, 马尔科德, 奥地利方济各会的托钵僧, 576, 578

Avignon, 阿维亚诺, 丝织品, 867—868

Aylofffe, Captain William, 艾洛夫, 卡普顿·威廉船长, 145

Azak, 阿扎克, 610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645

Azores, the, 亚速尔群岛, 509, 513, 520, 531, 849

Azov (Azak), 亚速 (阿扎克), 要塞, 6, 610, 625—628, 631, 634—635, 684, 718—722, 732

Bach, Carl Philipp Emanuel, 巴赫, 卡尔·菲利普, 埃马努埃尔, 音乐家, 118

Bach, Johann Sebastian, 巴赫, 约翰瑟巴斯钦, 音乐家, 105, 115—118, 144

Bacon, Francis, 培根, 弗兰西斯, 哲学家, 37—38, 43, 71, 84

Badajoz, 巴达霍斯, 要塞, 525—526

Baden, 巴登, 5, 167, 402, 477

大同盟, 411

条约 (1714), 446, 474

另见Lewis, margrave of Baden

Baden-Durlach, 巴登—杜拉希, 侯爵, 166

Baghdad, 巴格达, 548, 608—609

人口, 542

Bahamas, 巴哈巴群岛, 372

Bahia, 巴伊亚, 128, 516, 529, 531—532, 534

Baia, 巴亚, 海战 (1693), 568

Baiona (Galicia), 巴伊奥拿 (加利西亚), 526

Baku, 巴库, 为俄国占领 (1723), 645, 739

Balance of power, concept of, 均势的思想, 155—157, 395

Balkans, the, 巴尔干, 1, 7, 29, 563, 571

巴尔干战争, 5, 30, 579—580, 628, 684, 689, 754

基督教, 167, 576, 625, 632, 754, 776

另见Turkey and separate territoris

Baltaji Mehmed Pasha, 巴尔塔吉·穆罕默德帕夏首相, 632, 634—637

Baltimore, Charles Calvert, 3rd baron, 巴尔的摩, 查尔斯·卡尔弗特, 第三代男爵, 482—483

Bamberg, 班贝格, 主教, 407

Bangor (Ireland), 班戈(爱尔兰), 237

Banister, John, 班尼斯特, 约翰, 英国音乐家, 104

Banks, 银行

阿姆斯特丹, 银行, 832, 835, 896, 902

英国银行, 23, 249, 288—293, 314, 457, 835

热那亚, 吉罗银行, 543

巴黎(1674, 1702), 信贷银行, 302

鲁昂, 勒让德尔银行, 302, 305

威尼斯, 吉罗银行, 543

维也纳, 吉罗银行(1703), 311—312, 606; 城市银行(1706), 311—312, 314, 606

另见Berne, Geneva, Lyons

Bantam, 班坦, 胡椒, 857

Bantry Bay, 班特里湾战役(1689), 236

Baptist Brethren, 浸礼教兄弟会, 493

Barbados, 巴巴多斯, 251, 521, 849

Barbary Coast,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的海岸, 178, 543—546, 548, 550, 553—554, 566, 608, 615, 638

海盗, 6, 224, 357, 543ff., 615, 623

另见Algiers, Morocco, Tripoli, Tunis

Barbezieux, Louis François Marie le Tellier, 巴布齐尼, 路易·弗朗索瓦·玛丽·勒·泰利埃, 侯爵, 法国国防大臣, 752

Barcelona, 巴塞罗那, 16, 252, 362, 368, 441, 444, 541, 553, 591

法国在该地的海军, 243, 248

人口, 357, 542

围攻 (1697), 358, 423, 568—569; (1705), 419, 455, 429; (1714), 377—378, 444—445, 467, 570

谷物市场, 877

Barcelonette valley, 巴塞罗尼特流域, 159, 245, 467

Barclay, Robert, 巴克利, 罗伯特, 教友会辩护士, 150

Barcos, Abbé Martin de, 巴科, 阿贝·马丹·德, 詹森派教徒, 133

Baretti, Giuseppe, 巴雷蒂, 米塞佩, 意大利评论家, 562

Barfleur, 巴尔弗洛, 海战, 见La Hougue

Baring, John, 巴林, 约翰, 布商, 866

Baron, Michel, 巴隆, 米歇尔, 法国剧作家, 90

Barrier, Dutch, 荷兰海关关卡, 16, 384, 391, 395, 400, 406, 427, 431

英荷条约 (1709), 438—439, 441—442, 447—452, 455, 460, 462—467, 471, 750; (1713), 444, 476—477

奥地利—荷兰 (1715), 445, 473, 478, 576, 598

Bart, Jean, 巴尔, 让, 敦刻尔克海盗, 19, 244, 248, 795, 802, 829

Bartenstein, Johann Christoph von, 巴滕施泰因, 约翰·克里斯托夫·冯, 男爵, 587

Bashkirs, 巴什基尔, 732

Basle, 巴塞尔, 223

Basnage, Jacques, 巴斯内奇, 雅克, 胡格诺派作家, 123, 337

Basra, 巴士拉, 609

Bassein (Baçaim), 巴塞因 (巴塞因)

马赫拉特的进攻, 518

Basto, 巴士托, 521

Basville, Nicolas de Lamoignon, 巴斯维尔, 尼古拉·德·拉穆瓦农, 侯爵, 朗格多克的地方行政长官, 335

Batavia, 巴塔维亚, 519, 809, 859

Bath, John Grenvill, 巴思, 约翰·格伦维尔男爵, 491

Baturin, cossack headquarters, 巴图林, 哥萨克司令部, 667

Bavaria, 巴伐利亚

与奥地利, 237, 241, 243, 450, 468, 589—590

与法国, 167, 203, 215, 402, 404, 407, 411, 588, 756

布莱海姆之后, 30, 422—423, 589, 741

乌得勒支, 473—474

物价水平, 877

另见Maximilian Emmanuel

Baxter, Richard, 巴克斯特, 理查德, 长老会教派牧师, 142, 146, 153

Bay, Alexandre Maitre, marquis de, 贝·亚历山大·梅特尔, 侯爵, 法国官员, 438

Bayle, Pierre, 培尔, 皮埃尔, 哲学家, 24—25, 36, 77—78, 91, 123—124, 139, 142—143, 218

《共和国通信》, 33, 46, 76

《辞典》, 47, 88, 136—137, 341

Bayonne, 巴约纳, 175, 812, 863

Bayreuth, 贝罗伊特, 402

侯爵, 432, 752, 755

Beachy Head, 滩头堡, 战役, 215, 239, 567, 792, 794—795,
825

Beauchesne, Gouin de, 博歇斯纳, 古安德, 法国船长, 359

Beauvais, 博韦, 纺织品, 893

Beauval, Basnsge de, 博沃, 巴斯内奇·德, 胡格诺派牧师,
329

Beauvillier, Paul de Saint-Aignan, duc de, 圣埃格纳的博维
利埃, 保罗, 大公爵, 国家大臣, 189, 326—328, 365

Becher, Johann Joachim, 贝歇尔, 约翰, 约阿希姆, 奥地利经
济学家, 54, 310, 313, 606

Beckford, William, 贝克福特, 威廉, 英国作家, 97

Bedmar, I. J. J. Domingo de la Cueva de Benavides, 贝德马
尔, 多明戈·德·拉·奎瓦·德·贝纳文德斯, 侯爵, 西班牙属地尼
德兰的总督, 365, 398, 475

Beeston, Sir William, 比斯顿爵士, 威廉, 牙买加总督, 355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凡, 105, 116

Bégon, Michel, intendant of Rochefort, 贝贡, 米歇尔, 罗什
福尔的地方行政长官, 21, 815—816, 830, 832

Bégon, Michel, 贝贡, 米歇尔, 前者之子, 加拿大地方行政长
官, 496

Behrens, Leffmann, 贝伦斯, 勒夫曼, 汉诺威银行家, 788

Beichling, Wolf Dietrich von, 拜歇林, 沃尔夫·迪特里布·
冯, 萨克森大臣, 698

Beira Baixs, 下贝拉省, 520, 527

Bekker, Balthassar, 贝克, 巴尔塔扎尔, 荷兰学者, 123, 142

Belém, 贝莱姆, 见Pará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6, 7, 610, 754

为奥地利人夺取 (1688), 225, 577—578, 621; (1717), 582, 640—642, 750

为土耳其人占领 (1690), 241, 580—581, 619—620, 622—623; (1739), 627

Belhaven, John Hamilton, 贝尔哈文, 约翰·汉密尔顿, 第二代男爵, 苏格兰独立派, 276

Belize, 伯利兹, 354

Bellin (Blain), Nicolas, French-Canadian engraver, 贝林 (布莱), 尼古拉, 法属加拿大雕刻家, 497

Bellomont, Rihard Coote, 贝洛蒙, 理查德·库特, 第二代伯爵, 纽约总督, 490

Benbow, John, 班鲍, 约翰, 英国海军中将, 372, 796, 825, 829

Bender, 本德, 要塞, 610, 615

卡尔十二世本德要塞, 630, 634—635, 669—670, 673—674, 708

Benevente, 贝尼文特, 537

Bengal, 孟加拉, 518, 857, 854—860

Benkulen, 班库仑, 857

Benoist, Elie, 伯努瓦, 埃利, 胡格诺派牧师, 123

Benserade, Isaac de, 邦塞拉德, 伊萨克·德, 法国音乐家, 106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理查德, 英国学者, 82

Berczényi, Count Nicholas, 伯采伊公爵, 尼古拉, 匈牙利起义领袖, 584

Beresteczko, 别列斯特兹科, 战役 (1651), 682

Berg, 贝尔格, 公爵领地, 589

Bergen, 卑尔根捕鲸者, 848

Bergeyck, Count Jan van Brouhoven, 伯杰克公爵, 简凡·布罗乔文, 西属尼德兰的改革家, 374, 390, 395, 398, 413, 426, 428, 435, 446, 598

Bergen-op-Zoom, 贝尔根—奥普—松姆, 399

Bergh, Johan van den, 伯格, 约翰·凡顿, 荷兰驻布鲁塞尔的外交使节 (1706—1716), 428, 445

Bergues canal, 贝根运河 (敦刻尔克), 812

Berka, Franciscus Antonius, 贝尔卡, 弗兰西斯克斯·安托纽斯, 哈沃拉公爵, 奥匈帝国在海牙的使节, 171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 乔治, 克洛因主教, 哲学家, 50, 55, 126

Berkeley, Sir William, 贝克莱爵士, 威廉, 弗吉尼克的总督, 495

Berlin, 柏林, 31, 768

柏林科学院, 42, 45, 76

Bernard, Samuel, 贝尔纳, 萨米埃尔, 法国银行家, 23, 303—305, 314, 336—337, 339, 543, 788—789

Berne, 伯尔尼, 31, 288

马拉克里达银行, 788

Bernier, François, 贝尼埃, 弗朗索瓦, 法国旅行家, 95, 99

Bernini, Giovanni Lorenzo, 贝尔尼尼, 乔瓦尼·洛伦佐, 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师, 144

Bernoulli, Daniel, 贝尔诺利, 达尼埃尔, 瑞士科学家, 42, 66

Berry, 贝里, 羊毛, 863

Berthelot, François, 贝特洛, 弗朗索瓦, 法国财政金融家以及战争条约签订人, 815—816

Berwick, James Fitz-James, 贝威克, 雅姆·菲茨·雅姆, 第一代大公, 法国元帅

在爱尔兰 (1689), 237

在尼斯 (1704), 426

对葡萄牙的侵犯 (1704), 527

马德里 (1706), 372, 429—430

摩泽尔 (1708), 434

巴塞罗那 (1714), 378—379, 570

另见Almanza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630

Béthune, 贝顿, 为英国夺取的要塞 (1710), 440

Biała Cerkiew, 比亚瓦切尔考要塞, 696

Białłozor, Christopher, 比亚洛佐, 克里斯托夫, 维尔纽斯的天主教徒, 698

Bielke, Count Nils, 比尔克公爵, 尼尔斯, 瑞典的上议员, 184

Bienville, Jean-Baptiste Le Moyne, sieur de, 比安维尔, 让·巴蒂斯特·勒·穆瓦, 501, 504

Bignon, Abbé Jérôme, 比尼翁, 阿贝·热罗姆, 40—41, 45

Bihach, 比哈奇, 土耳其驻军, 640

Bilbao, 毕尔巴鄂, 849

Biloxi, 比洛克西, 360, 365, 498—500

Birze (Birzha), 比尔扎, 693, 700, 734

Bishop, Corporal Matthew, 毕晓普, 科普拉尔·马修, 英国官方, 762

Blackadder, Colonel John, 布莱卡德, 上校, 约翰, 762

Black Forest, 黑森林, 237, 417, 753, 756

Black Sea, 黑海, 1, 3, 31, 562—564, 611, 627, 644, 716, 736

Blaise (Biaggio Pangalo), 布莱斯 (比阿吉·庞加洛, 法国造船商), 21, 793

Blasphemy Act (1698), 亵渎神明法令 (1698), 265

Blathwayt, William, 布拉斯威特, 威廉, 陆军大臣和商务大臣, 176, 491, 506

Blécourt, Jean Denis, marquis de, 布莱康特, 让·德尼, 侯爵, 法国外交家, 361

Blekinge, 布莱金格, 808

Blenheim, 布莱海姆, 战役 (1704), 269, 277, 421—422, 449, 756—757, 758

战役结果, 167, 169, 302, 304, 449, 584, 589—590, 594, 662

伤亡人员, 749

Blondel, Nicolas François, 布隆代尔, 尼古拉·弗朗索瓦, 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 40, 812

Bluteau, Fr, 布吕托, 兄弟, 法国人, 为葡萄牙代理人, 512—513

Bochette, 博坎特, 阿尔卑斯山的通道, 754

Bochnia, 博赫尼亚, 盐矿, 844

Boerhaave, Herman, 博尔哈夫, 赫尔曼, 荷兰哲学家, 34, 44, 65—66

Bohemia, 波希米亚

宗教, 120, 602

它的建立, 573—575, 599

地主和农民, 599—600

经济, 605—606

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布瓦洛—德普罗, 尼古拉, 法国评论家和诗人, 24, 73, 81, 83

Boisguilbert, Pierre le Pesant de, 布瓦吉尔贝, 皮埃尔·勒佩桑·德, 法国经济学家, 329—330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博林布鲁克, 亨利·圣约翰, 221, 430, 735, 799

殖民政策, 13—14, 16, 503, 505, 508

与法国的贸易条约, 17, 261, 469—470, 868

掌握, 254, 270, 281, 441

教会分立法令, 273—274

乌得勒支协商, 442—443, 457—471

Bolivia, 玻利维亚, 357

Bologna, 波洛尼亚, 10, 555

人口, 542

Bombay, 孟买, 518, 809

Bonn, 波恩, 要塞, 225, 237, 413, 451, 462, 473

为同盟军所夺取 (1703), 416

Bonnet, Charles, 博内, 夏尔, 瑞士博物学家, 64n.

Bonneval, Claude Alexandre (Ahmed Pasha, “the Bombardier”), 博纳瓦尔, 克洛德, 亚历山大 (艾哈迈德帕夏, “投弹手”), 614, 743

Bonrepaus, François d' Usson de, 邦雷波, 弗朗索瓦, 迪松·德, 法国海军管理人和外交家, 186, 830

Bordeaux, 波尔多, 42, 335, 341, 522, 839, 842, 846

葡萄酒, 845, 871, 877

Boreel, Jacob, 博雷尔, 雅各布, 阿姆斯特丹的市长, 170, 249, 388

Borelli, Gian Alfonso, 博雷利, 吉安·阿方索, 那不勒斯科学家, 558

Bornholm, 波恩霍尔姆, 岛, 807

Bose, Christoph Dietrich, 博斯, 克里斯托夫·迪特里希, 萨克森驻海牙特使, 688

Bosnia, 波斯尼亚, 1, 577, 608—609, 619, 626

Bosporus, the, 博斯普鲁斯海峡, 562

Bossuet, Jacques Bénigne, 波舒哀, 雅克·贝尼涅, 莫城主教, 25, 72, 87, 94, 124—125, 136, 216n., 218, 343

主张限制教皇权力, 132, 334

与理查德, 西蒙, 140—141

与居荣夫人, 147—148

逝世, 334

Boston (Mass.), 波士顿 (马萨诸塞州), 12, 14, 480—481, 488, 492—496

王位继承战争, 502, 505—506, 810n.

Bouchain, 布卡因要塞, 440, 444

Boucherville (New France), 布坎维尔 (新法兰西), 496

Boufflers, Louis François, duc de, 布菲勒, 路易·弗朗索瓦, 大公, 法国元帅, 324, 398

在里斯威克, 170, 252, 388

九年战争, 232, 239, 242, 247, 249

王位继承战争, 404, 409, 436

Bouhier, Jean, 布伊埃, 让, 第戎行政长官, 340

Bouhours, Dominique, S. J., 布霍乌尔, 多米尼克, 评论家,
78

Boulainvilliers, Henri, 布莱维利埃, 亨利, 法国历史学家,
329

Bounty Act (1705), 邦蒂法令 (1705), 842

Boyle, Robert, 玻义耳, 罗伯特, 英国科学家, 34, 47, 51, 53

Boyne, 博伊恩战役 (1690), 214, 240

Brabant, 布拉邦特, 415; 布拉邦特各州, 426, 428

 布拉邦特线, 413, 417, 424, 751

Bradford, 布雷特福, 毛织物, 865

Bradley, James, 布雷德利, 詹姆士, 皇家天文学家, 40, 43,
52

Bradstreet, Simon, 马萨诸塞州的布雷兹特里特, 西蒙, 481

Braganza, 布拉干萨的谷物价格, 509

Brancovan, Constantine, 布兰科范, 康斯坦丁, 瓦拉几亚的王子,
580, 633, 638

Brancovich, George, 勃兰柯维奇, 乔治, 塞尔维亚历史学家,
577

Brancovich, Sava, 勃兰柯维奇, 萨瓦, 德兰西瓦尼亚东正教的大主教, 前者的兄弟, 577—578

Brandenburg-Culmbach, 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总督, 166

Brandenburg-Prussia, 勃兰登堡—普鲁士, 2, 154, 241, 719

胡格诺派人的欢迎, 121, 779

军队, 20—21, 202—203, 228, 232, 239, 244, 404, 742—743, 768, 777, 779

九年战争, 195, 215, 225, 232, 239

大同盟, 404, 406, 410, 425, 432

乌得勒支, 465—466, 477

和哈布斯堡, 587, 590

和奥古斯都二世, 689—690, 694, 708—710

瘟疫, 886n.

另见Frederick III, Frederick William, Great Northern War
Bray, Thomas, 布雷, 托马斯, 福音传播会的创建人, 152

Brazil, 巴西

传教团在巴西, 128—129, 356, 531, 537

黄金的发现, 163, 533—535, 862, 895

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 350, 528—530

发生危机, 510—511, 534

糖, 510—511, 516, 519—520, 530—531, 534, 853

烟草, 510—511, 516, 520, 530, 534, 851—852

牛, 531—532

使徒保罗传道会, 532—533

贸易公司, 536—537

另见Cayenne, Maranhao, Para, Sacramento, Slavery
Breda, 布雷达条约 (1667), 387

Breisach, 布雷沙赫, 252, 473

Breisgau, 布雷斯高, 579, 588

Breitkopf, J. G. I., 布赖特科普夫, J. G. I., 莱比锡乐谱印刷商, 105

Bremen, 不来梅, 477, 649, 658, 672, 678, 840

贸易, 847—848, 866—867

Brenner Pass, 布伦内罗通道, 417, 754

Breslau (Wroclaw), 布雷斯劳 (弗罗茨瓦夫), 605, 697, 705

Brest, 布列斯特, 军火库, 20, 256, 793, 811, 812—813, 820, 823

骑兵中队, 18, 22, 203—204, 236, 250, 408, 423, 567—568, 795

同盟的进攻 (1694), 215, 248

Bridgewater, John Egerton, 布里奇沃特, 约翰·埃杰顿, 第三代伯爵, 外贸大臣, 491

Brihuega, 布里韦加战役 (1710), 375, 440, 458

Briord, Gabriel, 布里奥尔, 加布里埃尔, 公爵, 法国外交家, 181

Bristol, 布里斯托尔, 70, 490

Brittany, Louis of France, 布列塔尼, 法国的路易, 大公, 463

Brittany, 布列塔尼, 335, 519, 523, 829

制帆篷等的布, 812, 815, 843, 866

Britton, Thomas, 布里顿, 托马斯, 音乐会的创办人, 104

Brochado, Cunha, 布罗查多, 库尼亚, 葡萄牙驻法国公使, 525—526

Brouillan, Jacques François de, 布鲁朗, 雅克·弗朗索瓦·德, 普拉森夏总督, 489

Bruce, James Daniel, 勃鲁斯, 詹姆士·丹尼尔, 俄国将军, 634

Bruges, 布鲁日, 436, 443, 464

Brunswick-Lüneburg, 不伦瑞克—鲁内伯格, 61, 404; 见Ernest Augustus

Brunswick-Wolfenbüttel,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 见Anton Ulrich of and Charlotte of

Brussels, 布鲁塞尔, 242, 247, 249, 388, 397, 424, 426, 428, 436

Brydges, James, 布里奇斯, 詹姆士, 昌杜斯的第一代公爵, 国外武装的军需官, 107, 787—788

Bubble Act (1719), 虚设(幻想)法令(1719), 836

Bučač, Treaty of (1672), 布贾克条约(1672), 682

Buccaneers, 海盗, 见flibustiers

Buchanan, George, 布坎南, 乔治, 苏格兰学者, 217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580, 639

Buckingham, John Sheffield, 白金汉, 约翰·谢菲尔德, 第一代大公, 79, 254

Buda, 布达, 6—7, 608, 610

为奥地利夺取(1686), 577, 618—620, 684

Bücken, Ernst, 比克, 恩斯特, 德意志音乐研究家, 102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372, 476

贸易, 350, 364, 376, 525, 528—529, 534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布丰,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 法国博物学家, 35, 62—64

Bug, the, 布格, 610, 700

Bukofzer, Manfred, 布科夫策尔, 曼弗雷德, 音乐研究家, 103

Bulavin, Kondrat, 布拉文, 康特拉特, 顿河哥萨克的领导人 (1706—1708), 732

Bulgaria, 保加利亚, 608, 610, 621

Bunyan, John, 班扬, 约翰, 79, 146

Buonanni, Filippo, S. J., 博南尼, 菲利波, 意大利植物学家, 64

Buononcini, Giovanni Battista, 博诺奇尼, 乔瓦尼·巴蒂斯
塔, 意大利音乐家, 110

Burchett, Josiah, 伯坎特, 乔塞亚, 英国海军大臣, 824, 830

Burckhardt, Jakob, 伯克哈特, 雅各布, 瑞士历史学家, 103

Burgundy, Louis of France, 法国的勃艮第, 路易, 公爵, 路易
十四之孙, 148, 189, 327—328, 435

逝世, 463

Burnet, Gilbert, 伯内特, 吉尔伯特, 索尔兹伯里主教, 119,
125, 138, 140, 201n., 217—218

Burnet, Thomas, 伯内特, 托马斯, 牧师, 86, 141

Burney, Dr Charles, 伯尼博士, 查尔斯, 音乐研究家, 101,
107

Burtler, Samuel, 巴特勒, 塞缪尔, 英国讽刺作家, 79

Butrinto, 布特林托, 639

Buys, Willem, 拜斯, 威廉, 阿姆斯特丹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
425—426, 438—439

和平协商 (1709—1711), 450—451, 459—462

Bychów, 贝乔, 为俄国所占领, 701

Bydgoszcz, 比德哥什条约 (1657), 689

Byng, George, 宾, 乔治, 后为托林顿子爵, 英国海军上将, 817

Bynkershock, Cornelius van, 宾克肖克, 科内利乌斯·范, 荷兰法官, 173

Byrd II, William, 伯德二世, 威廉, 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 495, 507

Cacheo Company (Guinea), 卡其奥公司(几内亚), 364, 515—516, 531, 536

Cadaval, Nuno Alvares Pereira de Melo, 卡达瓦尔, 努尼奥·阿尔瓦雷斯·佩雷拉达梅洛, 第一代公爵, 葡萄牙大臣, 522, 526, 528

Cadillac, Antoine de la Mothe de, 卡狄拉, 安东尼·德拉蒙德戴, 法国在加拿大的海军舰长, 498

Cadiz, 加的斯, 345, 408

海军基地, 11, 22, 238, 249, 566—569, 808—809

联盟的进攻(1702), 369, 418, 423

贸易, 371—372, 385, 475, 511, 514, 528—529, 844, 866, 871

人口, 542

海军学校, 827

Cadogan, William, 卡多根, 威廉, 陆军军需司令, 428, 756, 761

Cadore, 卡多尔, 威尼斯的贸易, 555

Cahors, 卡奥尔, 葡萄酒, 845

Cairo, 开罗, 11, 609, 632, 644

人口, 542

英国领事, 550

Cakovec, 查科韦茨, 577

Calais, 加莱, 炮击加莱 (1695), 249

Calandrini family, 卡莱特列尼家庭, 日内瓦银行家, 303

Calcinato, 卡尔锡那托, 战役 (1706), 429

Caldara, Antonio, 卡尔达拉, 安东尼奥, 威尼斯音乐家, 111

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 佩特罗, 西班牙剧作家, 72, 343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传教团, 35, 129, 354, 356, 373

Calixtus, Georg, 卡里克萨图斯, 格奥尔奥, 路德教神学家, 122

Callao, 卡亚俄 (卡廖), 530

Callenburgh, Gerald, 卡伦伯格, 杰拉尔德, 荷兰海军中将, 423

Callières, François de, 卡利埃尔, 弗朗索瓦·德, 法国外交家, 170, 172—173, 179—180, 249, 388

Callières, Louis Hector, chevalier de, 卡利尔, 路易斯·赫克托, 低级贵族成员, 蒙特利尔总督, 490, 498

Calvinism, 加尔文派, 24, 119—123, 149, 150, 218, 582

Camaret Bay (Brest), 卡马莱特湾 (布雷斯特), 248

Cambodia, 柬埔寨, 多明我会传教团, 357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43

柏拉图主义者, 92, 138, 142

持异议者, 274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威廉, 英国文物工作者, 87

Camerarius, R. J., 卡梅拉里乌斯, R. J., 德国植物学家, 64

Cameronians, 卡梅伦教派人, 278

Camisards, 卡米扎 (农民起义), 169, 325, 414, 571

Campeche, 坎佩切, 350, 354—356, 372, 515, 854

Campo Maior, 马约尔营, 围攻 (1712), 527

Camprodon, 卡姆普洛东, 投降 (1689), 235

Canada, 加拿大, 见新法兰西

Canaletto (Antonio Canale), 卡纳莱托 (安东尼奥·卡纳莱), 威尼斯画家, 556

Cananor, 卡纳诺, 525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 349, 353, 372—373, 387, 521
贸易, 845, 849

Candamo, Francisco Bances, 坎达莫, 弗朗西斯科·班塞斯, 西班牙剧作家, 343

Candia, 坎迪亚, 615

Canitz, F.R. von, 坎尼茨, F.R. 冯, 普鲁士诗人, 73

Cantacuzene, Serban, 坎达苏泽, 塞班, 瓦拉几亚王子, 578

Cantemir, Demetrius, 坎特米尔, 德米特留斯, 摩尔达维亲王, 633—634

Canton, 广州, 11, 15, 35, 96

Cap Français (St-Domingue), 弗兰西斯角 (圣多明尼克), 355

Cap Nègre (Newfoundland), 内格雷角 (纽芬兰), 488

Cape Breton Isle, 勃兰登角岛, 470, 508, 850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809

Cape Matapan, 瓦塔潘角, 640

Cape Passaro, 帕萨洛角海战 (1718), 565, 790

Cape São Roque, 圣罗克角, 530

Cape Verde, 佛得角奴隶, 515

Capitulations, the Ottoman, 奥斯曼帝国的投降, 549

Caprara, Aeneas, 卡普拉拉, 埃尼斯, 奥地利将军, 245

Capuchins, 方济会的托钵僧, 129, 146, 576, 617

Caracas, 加拉加斯, 可可, 530

Caraffa, Antonio, 卡拉法, 安东尼奥, 奥匈帝国将军, 245
在匈牙利, 579, 582—583, 586, 597, 619

Carlonear (Newfoundland), 卡博尼亚 (纽芬兰), 503

Carcassonne, 卡尔卡松, 毛织品, 864

Cardonnel, Adam, 卡登纳尔·亚当, 驻马尔博罗的秘书, 761

Careri, Gemelli, 卡雷里, 杰梅利, 去中国的旅行家, 96

Caribbean, 加勒比海, 见Cartagena, 维拉克鲁兹, 西印度群岛及分散的岛屿

Carignano, 卡里格那诺, 247

Carinthia, 克恩滕 (卡林西亚), 386

Carlos II, 卡洛斯二世, 西班牙国王, 8, 9, 162, 168, 296, 344, 352—353, 358, 391, 591, 626
意志, 10, 163, 360—361, 394, 400, 796
性格, 348—349
婚姻, 348, 351, 525
继承王位, 385—388, 410
逝世, 4, 181, 361—362, 569, 576
另见Partition Treaties, Spain

Carlowitz, Peace of (1699), 卡尔洛维茨和约 (1699), 1—2, 6, 158, 162, 394, 553, 581, 632, 637, 639, 719
英国的调停, 569, 580

条款, 518—522, 626—627, 691—692

匈牙利与和约, 584

Carmelites, 卡尔梅里茨, 531

Carnero, Alonso, 卡内罗, 阿隆索, 西班牙大臣, 352

Carniola, 卡尼奥拉, 386

Carolinas, 卡罗来纳(美), 491, 493

南卡罗来纳, 12, 350, 372, 495

大米, 854

Carpentras, 卡彭特拉, 黑麦的价格, 876

Carpi, battle of (1700), 卡毕战役(1700), 405

Carrickfergus, captured (1689), 被占领的卡里克弗格斯(1689), 237

Cartagena (Indies), 卡塔赫纳(西印度群岛), 12, 251, 349, 354, 372, 511, 515, 528, 809

为法国占领(1696), 355, 489

Cartagena (Spain), 卡塔赫纳(西班牙), 370

Carter, Robert, 卡特, 罗伯特, 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 495

Cartesianism, 笛卡儿主义, 43, 46, 49—51, 73, 84—86, 122, 136

Casale, 卡萨莱, 27, 160, 223, 238, 240, 248, 250, 559

Casca river, 卡斯卡河, 黄金, 533

Casco Bay, 卡斯科湾, 486—487

Caspian Sea, 里海, 1, 2, 551, 644—645, 739

Cassano, battle of (1705), 卡萨诺战役(1705), 425

Cassard, Jacques, 卡萨尔, 雅克, 法国海盗, 20, 810

Cassini, Giovanni Domenico, 卡西尼, 乔瓦尼·多梅尼科, 天文学家, 41, 73, 77

Castanheira, counts of, 卡斯塔瓦拉伯爵, 538

Castel Branco, 卡什特洛布兰科, 527

Castel doo Rios (Castelldosrius), Manuel de Oms y de Santa Pau, Ist marquis of, viceroy of Peru, 卡斯特尔多斯里奥斯 (卡里特尔多斯留斯), 曼努埃尔德·奥姆斯德·圣保, 第一代侯爵, 秘鲁总督, 372

Castelnaudary, 卡斯特尔脑丹莱, 谷物和羊毛的价格, 881, 899

Castiglione, prince of, 卡斯蒂略内王子, 473, 594

Castile, 卡斯蒂尔, 343—344, 783

政府, 9, 348, 353, 371, 374, 377—378, 425, 553

财政, 346, 366, 514

向菲利普五世效忠, 369, 371, 430

贸易, 522, 528, 877—878

Castine (Acadia), 卡斯丁 (阿凯迪亚), 502, 见Pentagoët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7, 11, 30, 343, 396, 430, 553, 787

与查理大公, 8, 370—371, 425, 430, 437, 593, 596

法国在加泰罗尼亚, 235, 242—243, 247—250, 351, 357, 374, 389—390, 444, 767

政府, 347—348, 357, 362, 368, 378—380, 382, 390, 425, 445

游击队, 371, 429

乌得勒支, 444, 467—468, 472

拉施塔特, 472, 474

贸易, 370, 379n., 520, 522, 813, 844

人口, 884—885

Catherine I, 叶卡杰林娜一世, 俄国女皇, 617, 634

Catherine II, 叶卡杰林娜二世, 俄国女皇, 722

Catherine, duchess of Mecklenburg, 卡德琳, 梅克伦堡女公爵, 738

Catholics 天主教, 8, 10, 25, 149, 474

公理会的宣传, 128—130

在亚洲, 129—130

在联合省, 135

在德国, 120—121, 188, 252, 473—474, 588

在不列颠王国, 135, 194ff., 201, 264; 见詹姆士二世

与英国的殖民地, 480ff., 492

在特兰西瓦尼亚, 582

另见Jansenism, mission, papacy, Quietist controversy

Catinat, Nicolas de, 卡蒂纳, 尼古拉·德, 法国元帅, 19, 747, 781

在意大利, 233, 241, 243, 245, 404—405, 414

Cattaro (Kotor), 卡塔洛(科托尔), 627

Caucasus, 高加索, 610, 627, 645

Cavalier, Jeam, Camisard leader, 卡瓦利埃, 让, 卡米扎(农民起义)领导人, 570—571

Cavalli, Pietro Francesco, 卡瓦利, 彼得罗·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音乐家, 104

Cayenne, 卡宴, 41, 466, 531

Cederhielm, Josias, 策德希尔姆, 约西亚斯, 瑞典法院官员, 184, 661

Celle, duchy of, 策勒公爵, 188, 226, 407

Cerdaña (Cerdagne), 赛达那 (赛达格恩), 567

Cerigo, Venetian base, 切里哥, 威尼斯基地, 540, 638, 640, 642

Cervera, university, 塞尔维拉大学, 379

Cesti, Marc' Antonio, 切斯蒂, 马尔卡·安东尼奥, 托斯卡音乐家, 110

Ceuta, 休达, 摩尔人的进攻, 359, 390, 554

Cévennes, 塞文山脉, 325, 338, 863

Ceylon, 锡兰, 519, 530, 858

Châlons, 夏龙, 毛织品, 864

Chambers, Ephraim, 钱伯斯, 伊弗雷姆, 百科全书派, 47

Chamillart, Michel, 夏米亚尔, 米歇尔, 战争时期总管理员和秘书, 284, 298, 331, 363, 752, 803, 831

Chamlay, Jules Louis Bolé, 夏姆莱, 米尔·路易·博莱, 侯爵, 陆军军需司令, 751, 763, 767

Chamoy, Rousseau de, 夏穆瓦, 卢梭·德, 法国外交家, 173

Champagne, 香槟, 毛纺织厂, 863—864

Champigny, Bochart de, 尚皮涅, 博夏·德, 新法兰西的行政长官, 484, 486

Changamire, Rozvi chieftain, 钱加米尔, 罗兹维的土匪首领, 518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 20, 842

Chantilly, 尚蒂伊, 40, 570

Chardin, Sir John, 夏尔丹爵士, 约翰, 旅行者, 95, 98, 546

Charente, the, 夏朗德, 812

Charlemont, fortress, 夏尔蒙特要塞, 为舍姆伯特所占领 (1690), 238

Charleroi, fortress, 沙勒罗瓦, 要塞, 248, 252, 381, 477—478

Charles, archduke of Austria, 查理, 奥地利大公, 继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和查理四世之后为皇帝, 提名为米兰公爵 (1697), 161, 393, 426, 591

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 164—165, 358, 388, 418—419, 433, 437, 446ff., 592, 596—597

王位继承战, 296, 370—371, 422—423, 425, 429—430, 440, 444, 575, 593

斯坦霍普条约 (1708), 434, 439, 464, 799

与克里孟特第十一, 164, 376, 434

皇帝, 164, 441—442, 459, 462, 593

匈牙利国王 (1711), 585

与土耳其, 638—642

哈布斯堡政府, 597—607

Charles II, king of Great Britain, 查理二世, 英国国王, 102, 106, 183, 193, 221, 254, 269, 480, 742, 808

与下议院, 193—194

性格, 193—194, 209

对外政策, 193, 225

财政, 285, 291

陆军, 197; 海军, 792ff., 828

查理五世、洛林公爵, 225, 234, 237, 396, 578

在匈牙利, 619

逝世, 241

Charles VI, duke of Lorraine, 查理六世, 洛林公爵, 5, 252, 397, 424

Charles V, emperor, 查理五世, 皇帝, 5, 308, 368, 387, 557

Charles VI, emperor, 查理六世, 皇帝, 见Charles, archduke of Austria, 查理, 奥地利大公

Charles X,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世, 瑞典国王, 649

Charles XI,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一世, 瑞典国王, 172, 183—184, 650, 743, 749, 771, 773, 825, 832

逝世, 651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二世, 瑞典国王, 2—4, 154, 167, 169, 182, 184, 188, 402—403

就任, 650—651

军队质量, 655—656, 660, 744, 749, 752, 757—758, 760, 761

性格, 659—660, 661—662, 714

波兰政策, 631, 656—659, 693ff., 714—715

进犯俄国, 663—668, 702

流亡在土耳其, 630—631, 635—636, 669—672

回到波罗的海 (1714), 673, 710

后期的政策, 673—677

逝世, 677

另见Augustus II, Russia, Sweden

Charles Emmanuel II, duke of Savoy, 查理·伊曼纽尔第二, 萨伏依公爵, 243, 560

Charles Frederick, duke of Holstein Gottorp, 卡尔·腓特烈, 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 670, 677, 679, 737

Charles Philip, prince of Pfalz-Neu-berg, 查理·菲利普, 法尔茨·纽伯格王子, 685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12, 493—496, 503—504

Charlotte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夏洛特, 738

Charron, Jean François, 夏隆, 让·弗朗索瓦, 蒙特里尔的慈善事业家, 496

Chateaurenault, François Louis Rousselet de, 夏特朗诺尔, 弗朗索瓦, 路易·鲁斯莱德, 海军中将和法国元帅, 418, 567, 569

Châteauroux, woollens, 夏托鲁毛织品, 864

Chatham dockyard, 查塔姆海军船坞, 229, 811, 819

Chest, 切斯特, 826

Chaucer, Geoffrey, 昌塞, 杰弗里, 诗人, 79

Chaudière, the, 夏迪, 传教团, 498

Chaul, decay of, 昌尔的衰落, 518

Chaussée, Nivelle de la, 肖塞, 尼韦尔·德·拉, 剧作家, 95

Chelm, 海乌姆, 691

Chelmno (Culm), 海乌姆努 (克尔姆), 698, 703

Cherbourg, 瑟堡, 811, 823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495, 851

Cheshire, 柴郡, 盐矿, 844

Chevereuse, Charles Honoré d' Albert, 谢弗勒兹, 夏尔奥诺雷, 德阿尔贝, 法国国务大臣, 326—329

Chiari, battle of (1700), 夏里战役 (1700), 405

Child, Sir Josiah, 蔡尔德爵士, 乔塞亚, 商人, 15, 260

Chile, 智利, 15, 350, 359, 376

Chimay, fortress, 奇梅要塞, 252

China, 中国, 26

 贸易, 24, 139, 511, 516, 537, 856—860, 894

 传教团, 96, 130

Chios, 希俄斯, 565—566, 623

Chiquitos missions, 奇基托传教团, 356—357

Chittagong, Indo-Portuguese, 吉大港, 葡属印度, 519

Chmel' nyċkyj, Bogdan, 克梅尔努斯科, 博格丹, 哥萨克首领,
696

Chorlulu Ali Pasha, 柯尔罗罗·阿里帕夏, 首相, 630—632,
637

Chotin (Chocim), 乔汀 (乔辛姆), 610, 619, 682, 684

Christian V, king of Denmark, 克里斯蒂安五世, 丹麦国王,
166, 652—653, 772, 805

Christiansand, dockyard, 克里斯蒂安桑, 海军船坞, 807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克里斯蒂娜, 瑞典女王, 73

Church, Major Benjamin, of Massachusetts, 丘奇, 梅杰·本
杰旺, 马萨诸塞州, 502

Churchill, John, 丘吉尔, 约翰, 见Marlborough, 马尔巴罗

Cibber, Colley, 西伯, 科利, 剧作家, 94

Cilicia, 西里西亚, 541

Cimarosa, Domenico, 奇马罗萨, 多梅尼科, 那不勒斯音乐家,
559

Circassia, 瑟尔卡西亚, 609—610

Civita Vecchia, 契维塔韦基亚, 明矾, 895

Clairaut, Alexis Claude, 克莱劳, 亚历克西·克洛德, 法国数学家, 41, 52

Clarendon, Edward Hyde, 1st earl of, 克拉伦登, 爱德华·海德, 第一代伯爵, 87, 91

Clarendon, Henry Hyde, 2nd earl, 克拉伦登, 亨利·海德, 第二代伯爵, 198, 209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塞缪尔, 玄学家, 51, 138

Claverhouse, James Graham of, 1st Viscount Dundee, 克拉弗豪斯, 詹姆士·格雷厄姆, 邓迪第一代子爵, 212

Clement IX (Giulio Rospigliosi), 克雷芒九世 (米利奥罗斯皮格里奥雪), 教皇, 132

Clement XI (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 克雷芒十一世 (乔万尼·弗朗西斯科·阿尔巴尼), 教皇, 9, 131, 140, 163, 598

詹姆士派教徒, 131—132, 162

查理大公的承认, 164, 376, 434, 448

菲利普第五的承认, 414

与维也纳的争论, 594—595

Clerville, Louis Nicolas, chevalier de, 克莱维尔, 路易·尼古拉, 骑士, 法国军事工程师, 811

Cleves, 克里夫, 225, 242, 466, 852

Clyde, the, 克莱德, 256

Coalbrookdale, 科尔布鲁克代尔, 铁, 70, 869n.

Coblentz, 科布伦茨, 223, 225, 232, 755

Codde, Peter, 柯德, 彼得, 乌得勒支主教, 135

Codrington, Christopher, 科德林顿, 克里斯托夫, 背风群岛总督, 251

Coehoorn, Menno van, 克霍尔恩, 梅努·凡, 男爵, 荷兰军事工程师, 236, 250, 416, 750

Coello, Claudio, 柯罗, 克洛迪奥, 西班牙画家, 343

Coëtlogon, Alain Emmanuel, marquis de, 科特洛贡, 阿兰·埃马纽埃尔, 侯爵, 法国海军中将, 363—364

Coimbra, 科英布拉, 520

Colasse, Pascal, secretary to Lully, 科拉斯, 帕斯卡尔, 吕利的秘书, 108

Colbert, Jean-Baptiste (‘le grand’), 科尔贝尔, 让·巴蒂斯特(大), 塞格尼莱侯爵, 40, 96—97, 103, 826

海军, 13, 22, 563—564, 792—793, 803—804, 812, 818—821, 827—828

经济, 28, 510, 521, 543, 551, 835, 852, 856

财政, 298—299, 302, 317—320

殖民地, 484, 497, 500

工业, 556, 723, 813—815, 863, 868—869

逝世, 15, 316

Colbert de Terron, 特隆的柯尔柏, 船舶的监督员, 812, 816

Colijer, Jacobus, 科利杰尔, 雅各布, 荷兰在君士坦丁堡的驻外代表, 185, 622, 641

Collegiants, 联合教会, 123

Colle di Tenda, 科尔第坦达, 阿尔卑斯山通道, 754

Collier, Jeremy, 科利尔, 杰里米, 94, 140

Cologne, 科隆, 161, 171, 237, 399

选举权的争论, 5, 202—203, 224—225, 393, 398, 578, 588

王位继承战, 407, 411—414, 473—474

Colombo, Indo-Portuguese, 科伦坡, 葡属印度, 518

Colonia do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的科洛尼亚, 见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Colonie, Colonel Jean Martin de la, officer, 科洛尼上校, 让·马丹·德拉, 官员, 759, 762

Comacchio, 科马基奥, 468, 473; 科马基奥战争, 595—597

Comenius, Jan Amos, 夸美纽斯, 简·阿莫斯, 波希米亚教育家, 121

Compton, Henry, 康普顿, 亨利, 伦敦主教, 125, 197—198

Condé, 康德, 要塞, 438, 451, 477

Condé, Louis II, de Bourbon, 波旁的, 孔代, 路易二世, 王子, 744, 752, 760

Condominium, 共管政府, 见Spanish Netherlands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多塞, 侯爵, 哲学家, 71

Confederacies, 联盟, 在波兰—立陶宛

限定, 684n.; 罗梭的赞美, 2n.

萨皮哈斯, 685—686, 690—691

立陶宛人反对萨皮哈斯, 657, 690—691, 693, 695

(1696—1697), 召集国民议会, 686

洛维茨(亲法, 1697—1698), 见Humiecki

桑多米埃什(1702), 695, 697; (1704—1710), 698, 701—704; 另见奥古斯都二世, 华沙(1704), 697—698, 701

戈尔佐斯(反萨克森, 1715), 711

塔尔诺格洛特(反萨克森, 1715), 711—712

Confucius, 孔子, 96, 130

Congreve, William, 康格里夫, 威廉, 剧作家, 89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483, 487, 507

Conques, 康奎, 毛织品, 864

Conscription Act (1709), 征兵法令 (1709), 770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632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2, 130, 178, 181, 185, 549, 566, 578, 602, 623, 628—629, 732

 人口, 542

 贸易, 550, 611—612, 623, 644

 默夫蒂, 616, 629, 646

 君士坦丁条约 (1700), 627

 骚乱 (1730—1731), 645—647

Contades, Georges Gaspard, 孔塔德, 乔治·加斯帕尔, 侯爵, 法国陆军少将, 473

Conti, François Louis de Bourbon, 波旁王室的孔蒂, 弗朗索瓦·路易波旁王室, 王子, 与波兰, 686, 688

Converse, Captain James, 康弗斯舰长, 詹姆士, 缅因的, 487

Coode, John, 科德, 约翰, 马里兰的领袖, 482

Cooke, Elisha, 库克, 埃莱沙, 马萨诸塞州的代理人, 483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3, 42, 654, 804—807, 817

 船坞, 820

 海员医院, 826

 海军学校学员, 826—827

 瘟疫, 886n.

Copernicus, Nicolaus, 哥白尼, 尼古拉, 天文学家, 84—85

Copley, Lionel, 科普利, 莱昂内尔, 马里兰总督, 482

Corelli, Archangelo, 柯雷里, 阿尔凯杰洛, 音乐家, 102, 105, 116

Corfu, 科孚, 被围 (1716), 565, 638—639

Cork, 科克, 240

Cornbury, Henry Hyde, 科恩伯里, 亨利·海德, 第一代子爵, 纽约州的总督, 505

Corneille, Pierre, 科尔内耶, 皮埃尔, 剧作家, 110, 329

Coromandel coast, 科罗曼德尔海岸, 518, 860

Corresponding Princes, 联合一致的亲王联盟, 246, 399, 402, 406—407

Corsairs, 海盗, 见Privateering

Cosimo III, 科西莫三世, 托斯卡纳大公, 131, 151

Cossacks, 哥萨克, 31, 610, 630, 634, 636, 665—670, 683, 732, 759, 775—776

与波兰人, 696, 699, 759

与彼得大帝, 732, 775—776

另见Bulavin, Don, Mazepa, Orlik, Palej, Samuś, Ukraine

Coste, Pierre, 科斯特, 皮埃尔, 牛顿的译员, 78

Costebelle, Pastour de, 科斯特贝尔, 帕斯托德, 在普拉森夏的总督, 503

Côte d' or (Burgundy), 科多尔 (勃艮第), 31, 335

Cotentin, the, 科唐坦, 243

Cotes, Roger, 科茨, 罗杰, 英国数学家, 43, 47

Couperin, François, 库普兰, 弗朗索瓦, 音乐家, 103

Courland, 库兰, 656—657, 660, 693—694, 699, 710, 719, 773

与奥古斯都二世，694

贸易，648—649，837

Courtilz de Sandras, Gatien de, 库蒂尔茨·德·桑德拉，加坦德，法国作家，91

Courtrai, fortress, 库特拉要塞，252，381

Covilhã, 库维良，毛织厂，513

Coxe, Dr Daniel, 考克斯博士，但尼尔，殖民宣传家，500

Coymans, Balthassar, 科曼斯，巴尔撒泽，荷兰提供奴隶的商人，350

Crab Island, 克拉勃岛（加勒比），354

Cracow, 克拉科夫，695，702，705

Crato, priory of, 克雷托修道院，537

Crébillon, Prosper, Jolyot, 克雷比荣，普罗斯佩·若利奥先生，法国剧作家，95

Credo, Willem, 克雷多，威廉，泽兰海盗，801

Cremona, fortress, 克雷莫纳，要塞，409

Creutz, Karl Gustaf, 克鲁茨，卡尔·古斯塔夫，瑞典将军，669

Crimea, 克里米亚，562，610，619—620，625，647，664，669，716，718，736

Crisp, Tobias, 克里斯普，托拜厄斯，142

Crissé, Turpin de, 克里塞，蒂尔潘·德，法国军事作家，758

Croatia, 克罗地亚，7，242，577，581，586，604，608，617，638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奥立弗，197，744

Cronstedt, Karl, 克朗斯泰德特, 卡尔, 瑞典精通炮术的人, 677, 808

Crozat, Antoine, 克罗扎, 安托万, 法国理财家, 13, 500—501

Cruizers, and Gonvoys Act (1708), 巡洋舰和护航法令 (1708), 796

Crulai, 克鲁莱, 人口, 885, 900

Cruz, Sor Juana Inés de la, 克鲁兹, 索·胡安娜·英尼斯·德拉, 343

Cuba, 古巴, 355, 372

Cudnow, battle of (1660), 库特脑战役 (1660), 682

Cudworth, Ralph, 卡德沃思, 拉尔夫, 柏拉图主义者, 93, 139, 142—143

Curaçao, 库拉索, 12, 350

Curitiba, 库里蒂巴, 淘金地, 534

Cussy, Pierre Paul Tarin, 居西, 皮埃尔·保罗·塔林, 圣多明各总督, 633

Czarny, Ostróg, 查尔纳, 奥斯特洛格, 703

Daghestan, 达吉斯坦, 644—645

Dahlberg, Count Erik, 达尔伯格伯爵, 埃里克, 利沃尼亚总督, 654, 656

Dahomey, 达荷美, 515

Dalliez, the brothers (de la Tour and de Réalville), 达利埃兄弟 (德拉图尔和雷阿尔维尔), 法国制铁商, 815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541, 544, 608, 627, 638, 642

Daltaban, Mustafa Pasha, 达尔塔班, 穆斯塔法帕夏, 首相, 629

Damascus, 大马士革, 551, 609

人口, 542

Damietta, 达米埃塔, 550

Dampier, William, 丹皮尔, 威廉, 探险者, 海盗, 15, 35, 56, 96, 372

Danby, Thomas Osborne, 丹拜, 托马斯·奥斯本, 第一代伯爵, 204—205, 207, 209, 215, 264

Dancourt, Florent Carton (sieur d' Ancourt), 当古, 弗洛朗·卡尔东(达库尔先生), 法国剧作家, 32, 90, 340

Danube, the, 多瑙河, 4—5, 7, 223, 241—242, 422, 562, 564, 577, 605, 610, 640, 753—755, 776

Danycan, Noël, 达尼康, 诺埃尔, 圣马洛的商人和公司的创办人, 15, 359, 364

Danzig (Gdańsk), 但泽(格但斯克), 10, 186, 520, 688, 699, 704—705, 712, 737

贸易, 836—837, 843, 867, 871

Darband, 达尔班德, 为俄国占领(1722), 644, 739

Darby, Abraham, 达比, 亚伯拉罕, 制铁局, 70, 869n., 892

Dardanelles, the, 达达尼尔海峡, 565, 610, 623

Dar Fur, 达尔福尔, 548

Darien, Isthmus of, 达里埃地峡, 35, 350

公司, 15, 212, 275, 277, 360, 392, 505

Dartmouth, William Legge, 达特默思, 威廉·莱格, 第一代伯爵, 460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理, 64

Dashkov, Aleksei Ivanovich, 达什柯夫, 亚历克赛·伊凡诺维奇, 俄国驻华沙大使, 711

Das Minas, 达斯来纳斯, 见Minas

Daubenton, Louis Jean Marie, 多邦东, 路易斯·琼·玛丽, 科学家, 41

Daun, Count Lorenz Wierich von, 道恩伯爵, 洛伦茨, 派里希·冯, 奥地利将军, 433, 594

Dauphiné, 多菲内, 231, 240, 245, 336, 390, 433, 467, 781, 813, 815, 864, 889

丝织品, 868

Davenant, Charles, 达维南特, 查尔斯, 经济学家, 157, 260, 284

Davenant, Henry, 达维南特, 亨利, 马尔巴勒的财经代理人, 761

Davis Strait, 戴维斯海峡, 捕鲸区, 848

Deane, Private J.M., 迪恩, 普赖文特, 美国军官, 762

Declaration of Rights (1689), 权利法案 (1689), 208, 220, 382

Deerfield (Mass), 迪尔菲尔德 (马萨诸塞州), 502

Defoe, Daniel, 笛福, 丹尼尔, 15, 24, 32, 36, 153, 157, 281—282, 315, 611, 751, 762, 769—770, 824

《鲁滨孙漂流记》, 91, 97

《异教捷径》, 281

《地道的英国佬》, 281—282

Deists, 自然神论者, 86, 99, 136—139

Delaware, 特拉华, 493

Denain, battle of (1712), 德南战役 (1712), 19, 444, 467, 753

Dendermonde, 登德蒙特, 426, 431, 447, 455, 477—478

Denhoff, Stanislas, 德霍夫, 斯坦尼斯拉, leader of Sandomierz Cofederacy, 桑多美茨联盟领袖, 698, 702—703

Denmark, 丹麦

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 3—4, 402, 652—655, 678, 774

军队, 3—4, 227, 237, 410, 426, 742, 772—773, 774—775

与俄国, 1, 158, 652—654, 676, 692, 736, 806, 832

与法国, 3—4, 183, 187, 651, 827

与威廉三世, 3—4, 227, 246n.; 另见联合一致的亲王联盟, 中立权利

贸易, 174, 234—235, 420, 520, 804; 奴隶贸易, 855

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 350

印度(特兰克巴尔), 128, 518

挪威, 648, 649, 670, 675—677, 773, 806, 824

在波罗的海东部, 649

海军, 184, 654, 671, 805—808, 820, 824—825, 826—827, 831

另见克里斯图五世, 腓特烈四世, 北方大战, 瑞典, 特兰凡特尔

Denonville, Jacques René de Brisay, 德农维尔, 雅克·勒内·布里塞, 新法兰西总督, 484, 486, 498

Denys, Pierre, 德尼, 皮埃尔, 宗教法规, 詹森派教徒, 135

Deptford, 德特福, 船坞, 21, 229, 793, 811

Derby shire, 德比郡, 人口, 887

Derham, William, 德勒姆, 威廉, 英国牧师, 85

De Ruyter, Michiel Adrianszoon, 德鲁特, 米基尔·艾德里安松, 海军上将, 236, 565, 570, 795, 798, 802, 826—827

Desaguliers, John Theophilus, 德萨居里埃, 约翰·泰奥菲鲁, 胡格诺派科学家, 47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 勒内, 24, 32, 34, 37, 55, 61, 65, 67, 70—71, 79, 92, 126, 139, 558

Des Granges, Louis, 德格朗热, 路易, 法国驻葡萄牙领事, 511

Deshayes, Jean, 德夏伊, 让, 法国水文地理学家, 497

Desideri, Hippolyte, S. J., 德西迪里, 希普里特, 传教团, 130

Desmarets (Desmaretz), Nicolas, 德马雷 (德斯马莱茨), 尼古拉, 总管理员, 298, 302, 305, 331, 336, 365

Devlet-Girei II, 德夫莱-吉莱伊二世, 克里米亚汗, 630—631, 636, 664, 668, 736

De Witt, Johan, 德威特, 约翰, 荷兰政治家, 48, 799, 822, 825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丹尼斯, 43, 71, 93, 97, 100

《百科全书》, 34—35

Dieppe, bombarded (1695), 迪埃普边境 (1695), 249

Dijkvelt, Everard van Weede, 第克维尔特, 埃弗拉德·凡·韦德, 荷兰去英国的使者, 170, 172, 198, 200, 249, 388

Dijon, 第戎, 335, 340

Dinant, fortress, 迪南, 要塞, 223, 252

Dissenters (Nonconformists), 异教徒 (不信奉国教者), 英国, 123, 198ff., 259, 264, 270, 273—274, 281, 288

应时信奉国教法令 (1711), 273, 274n., 461; 教会分立法令 (1714), 273—274

Diu, decay of, 第岛的没落, 518

Dixmude, 迪克斯穆特, 向法国投降 (1693), 247

Dnieper, the, 第聂伯河, 3, 564, 627—628, 631, 665—666, 699, 732, 754, 776

Dniester, the, 德涅斯特河, 610

Dolgoruki, Count Gregory Feodorovich, 道尔高罗基伯爵, 格里戈里·菲奥道罗维奇, 俄国驻波兰大使, 701, 712—713

Don Steppe, 顿河大草原, 7

河流, 625, 718

哥萨克, 610, 636, 732

Donauwörth, 多瑙瓦茨, 421

Dort (Dordrecht), Synod of, 多特, 宗教会议, 121—122

Dositheus, 德西塞斯

耶路撒冷主教, 632

Douai, fortress, 杜埃, 要塞, 英国占领 (1710), 437, 440, 444

Douro, the, 杜罗河, 521, 782

葡萄酒, 845

Drake, Captain Peter, 德雷克上尉, 彼得, 兵痞, 742, 762

Drava, the, 德拉瓦河, 577, 580, 608

Dresden, 德累斯顿, 31, 652—653, 701—702, 719

Drina, the, 德里纳河, 641

Dryden, John, 德莱顿, 约翰, 33, 70, 79, 81, 83, 106, 113—114, 282—283

Dublin, 都柏林, 240

Dubos, Abbé Jean-Bptiste, 迪博, 阿贝·让-巴蒂斯特, 旅行家, 500

Ducassee, Jean-Baptiste, 迪卡塞, 让-巴蒂斯特, 圣多明各总督, 355—356, 372, 545, 810

Duclos, Benoit and Roland, 杜克洛, 伯努瓦和罗纳尔, 葡萄牙丝织厂, 513

Dudley, Joseph, 达德利, 约瑟夫, 马萨诸塞州总督, 502, 507

Düsseldorf (Lower Palatinate), 迪塞尔多夫 (帕拉汀内下游), 31

Dufay, Charles, 迪费, 夏尔, 法国电学家, 53

Dufour, 迪富尔, 法国在葡萄牙的制铁商, 513

Dufresny, Charles Rivière, 迪弗雷尼, 夏尔·里维埃, 剧作家, 340

Dugdale, Sir William, 达格代尔爵士, 威廉, 古物收藏家, 87

Duguay-Trouin, René, 迪盖-特鲁安, 勒内, 圣马洛海盗, 后为船长, 19, 244, 528, 802

Du Hamel, Jean-Baptiste, 杜·阿梅尔, 让-巴蒂斯特, 笛卡儿主义者, 84

Dumas, Alexandre, 大仲马, 亚历山大, 小说家, 91

Dummer, Jeremiah, 达默, 杰里迈亚, 马萨诸塞州的代理人, 506—507

Dundalk, 敦达尔克, 237

Dunes, battle of the (1658), 达尼河战役 (1658), 343

Dunin-Karwicki, 多宁-卡尔维奇, 见Karwicki, 卡尔维奇

Dunkers, 邓克尔斯, 493

Dunkirk, 敦刻尔克, 19, 244, 248—249, 257, 435, 442—443, 451, 452, 460, 753, 794, 803, 811—812

私掠船, 734, 800, 802, 812, 848

Duquesne, Abraham, 迪凯纳, 亚伯拉罕, 侯爵和海军上将, 564—565, 812

Durham, 达勒姆, 煤, 869

Du Ru, Paul, S. J., 杜鲁, 保罗, 法国传教士, 499

Dussen, Bruno van der, 范·布鲁诺·杜森, 古达省议长, 439, 446—447, 450—451

Dutch, 荷兰, 见联合省

Duverney, Joseph, 迪弗内, 约瑟夫, 解剖学家, 41, 47, 56

Dvina, the, 德维纳河, 655—656, 692, 694, 841—842

Dzialyński, Thomas, 吉亚林斯基, 托马斯, 波兰外交家, 698—699

East India Companies, 东印度公司

英属东印度公司, 40, 262, 288, 360, 392, 457, 517, 835, 856ff.

荷属东印度公司, 298, 516, 856—862, 893

葡属东印度公司, 516—517

法属东印度公司, 517, 524, 812, 856—857, 861

丹麦东印度公司, 518

奥斯坦德, 东印度公司, 352, 390, 478, 857

Eberenburg, 埃伯莱贝格, 245

Eberhard Ludwig, 埃贝哈德·路德维希, 符腾堡公爵, 121

Ebro, the, 埃布罗河, 海军补给品地, 813

Ecuador, 厄瓜多尔, 356

Edinburgh, 爱丁堡, 42, 67

Edwards, John, 爱德华兹, 约翰, 加尔文教牧师, 141

Eger (Erlau), fortress, 埃格尔(埃尔芬), 要塞, 608, 621

Egypt, 埃及, 548, 565, 609—610, 620, 632, 638

Eisenerz, 艾森纳茨, 铁矿, 604

Ekeren, battle of (1703), 埃克伦战役 (1703), 416

Elba, 厄尔巴岛, 540, 546

Elbe, the, 易北河, 605—606

Elbeuf, 埃尔伯夫, 毛织品, 863

Elblag (Elbing), 埃尔布隆格 (埃尔平), 689—690, 694

Element, Moitrel d', 德莱蒙, 穆瓦特雷, 法国科学家, 46

Elizabeth Christina,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 查理六世之妻, 596

Elizabeth Farnese, 伊丽莎白·法尼丝, 西班牙皇后, 9, 377—378, 380, 473

Elizabeth of Pfalz-Neuberg, 法尔茨—纽贝格的伊丽莎白, 685

Elmas Mehmed Pasha, 艾尔玛·穆罕默德帕夏, 首相, 626

Embrun, fortress, 昂布伦, 要塞, 245

Emden, 埃姆登, 木材市场, 840

Empire, the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国

 军事组织, 5, 20, 411, 588, 742, 764, 768—769, 777—778

 与皇帝, 8, 166—167, 225, 402, 450, 471—472, 578—579, 586ff.

 宗教, 120—121, 189, 252, 383, 473—474, 588

 雇佣军, 165—166, 404—405, 411, 742, 769, 772, 778

 与外交政策, 165—167, 203, 227, 399, 401—407, 414—415, 586

 九年战争, 225, 228, 232ff., 586—587

 里斯威克, 252, 381, 383, 473—474, 588

1701年的大同盟, 407, 410—411, 588

王位继承战, 416ff.

巴登条约(1714), 444, 474—475

与瑞典, 154, 184—185, 431—432, 649, 656, 658, 660, 662—663, 670, 673ff.

联合一致的亲王联盟, 246, 399, 402, 406, 407

马格德堡协议会, 232

集团, 165—166, 250, 402, 405, 407, 409, 586, 588

帝国的采邑, 见Italy, 意大利

另见Leopold I, Joseph I, Charles VI

England, 英格兰

海上力量, 4, 11—13, 18—19, 21—22, 155, 204, 215, 229, 234ff., 292, 355, 370, 382, 387, 391—392, 404, 407, 411ff., 488—489, 503, 505—506, 525—526, 566ff., 654, 790ff.

贸易, 10, 14—17, 19, 185—188, 238, 244, 246, 252—253, 257, 261—262, 282, 382, 387, 391—392, 395, 412, 414, 418—420, 428, 431, 434, 438—439, 441—442, 459, 460, 469—470, 475—476, 490—491, 510, 513, 519ff., 535, 549—553, 611, 675, 796—797, 802, 805, 809, 816—819, 833, 835ff., 870—874, 894

与美洲, 12ff., 35, 56, 95ff., 128, 195—196, 251—252, 255, 261, 349, 354, 372—373, 385, 391—392, 410, 434, 441, 459ff., 480ff., 535—536, 796—797, 809—811, 814, 848ff., 849;

另见Asiento, 阿山多,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对外政策, 15ff., 26—27, 155ff., 193, 266—267, 432, 622, 641, 645, 654, 658, 663—664, 670, 675—676, 735; 见

Barrier, Bolingbroke, Grand Alliance, Portugal, William III

军队, 18—21, 196—197, 198, 201, 204—205, 208, 228ff., 293, 382—383, 411ff., 505, 742ff., 763—764, 766, 769—771, 783—784

财政, 22—23, 26, 208, 209, 251, 255, 260, 274, 277, 285—294, 299, 313—315, 382, 401, 440, 535, 787, 816—819, 831—832, 836, 896, 902

宗教, 25—26, 85—87, 92—93, 99, 123ff., 136—139, 140, 149ff., 197ff., 209—210, 212, 215, 264, 270, 285; 另见 Dissenters, James II

机构, 25—26, 193ff., 206—211, 216ff., 253, 255, 264—275; 另见 Scotland, 苏格兰

社会团体, 29, 31—33, 89, 93—94, 151—153, 219—221, 258—260, 262—263, 279—282, 769—771, 783—784, 823ff.

音乐, 32, 104, 107—108, 110, 113—115

文学, 32—33, 72, 78ff., 263, 280—282

科学, 33—35, 37ff., 84—85

工艺, 68—70, 259, 719, 747—749, 815, 867, 868, 892

工业, 69—70, 259, 814, 819, 865ff.

人口, 883ff., 885—887, 889, 900

农业, 68—69, 257—258, 763, 813, 818—819, 865

Enlightenment, the, 启蒙运动, 70, 72, 96, 150, 740

Enniskillen, 埃尼斯凯伦, 213, 769

Eperjes (Prešov), 埃佩奇 (普雷肖夫), 605, 619

Epicurus, 伊壁鸠鲁, 24, 146

Eric IV, 埃里克四世, 瑞典国王, 806

Ericeira, Luis de Meneses, 埃里塞伊拉, 路易斯·德·梅内塞斯, 葡萄牙财政大臣, 第三代伯爵, 514, 522

Erlach, Johann Reinhold Fischer von, 埃拉赫, 约翰·赖因霍尔德·菲舍尔·冯, 奥地利建筑师, 144, 601

Ernest Augustus, 埃内斯特·奥古斯塔斯, 不伦瑞克—吕内伯格公爵, 166, 183—184, 202, 241, 232, 246, 735

汉诺威选帝侯, 587—588, 768

Ertholomene, Baltic islets, 埃尔泰洛美, 波罗的海小岛, 807

Erzurum, 埃尔佐勒姆, 609, 614

Esterházy, Count Paul, 埃斯特豪佐公爵, 保罗, 匈牙利宫廷官吏, 583—584

Estonia, 爱沙尼亚, 648, 663, 679, 773, 806

贸易, 648, 837ff.

Estrées, César d' , 埃特雷, 塞扎尔·德, 红衣主教, 369

Estrées, Jean d' , Abbé, 埃特雷, 让·德, 阿贝, 前者之侄, 369

Estrées, Victor Marie, 埃特雷, 维克托·玛丽, 伯爵, 海军中将, 法国元帅, 390, 567—569

Estremadura, 埃什特雷马杜拉, 163, 366, 438, 526—528, 591

Estremoz, 埃斯特雷莫兹, 512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571, 858

Eugene, 尤金, Prince of Savoy-Carignan, 萨伏依—卡里格南王子

在拉施塔特的协议, 5, 171, 444, 472—473

作为士兵, 18, 744, 752—753, 760—761

布莱海姆, 19, 421—422

土耳其, 21, 164, 251, 383, 581, 598, 626, 638—642

战争利润, 23, 572—573, 788

意大利, 243, 247, 250, 405—406, 409, 412, 417, 425,
428—429, 558, 570, 593—596

土伦, 5, 433

奥德纳德, 434—436

马尔普莱奎特, 438

伦敦代表团, 443, 462, 464

乌得勒支协议, 450

匈牙利, 579, 585, 620

Euler, Leonhard, 欧拉, 莱昂哈德, 瑞士科学家, 42, 52

Evdokia, Lopukhina, 叶芙道契娅, 鲁鲍希娜, 女沙皇, 717,
733

Evellyn, John, 伊夫林, 约翰, 《森林志》, 813

Evertsen, Cornelis, 埃弗森, 科内利斯, 泽兰的海军中将, 568

Evora, 埃武拉, 小麦价格, 509

Exeter, 埃克塞特, 出售服装, 866

Exquemelin, Alexandre Olivier, 埃克斯奎梅林, 亚历山大·奥
利维尔（即约翰·埃斯奎梅林）, 海盗, 96

Fagel, Gaspar, 法奇尔, 加斯帕, 176

Fahrenheit, Gabriel Daniel, 华伦海特, 加布里尔·丹尼尔,
普鲁士物理学家, 54

Falmouth, 法尔默思, 811

Faro, 法鲁, 510, 519

Farquhar, George, 法夸尔, 乔治, 英国剧作家, 89

Fatio family, 法梯奥家族, 日内瓦银行家, 303

Fayal (Azores), 法亚尔(亚速尔), 葡萄酒和白兰地, 520

Feif, Casten, 费伊夫, 卡斯腾, 查理十二的秘书, 671

Feijóo y Montenegro, Benito Jerónimo, 费霍·蒙特内格罗, 贝尼托·赫罗尼莫, 西班牙祝福评论, 72

Feitama, Sybrand, 菲塔马, 西勃兰, 荷兰剧作家, 75

Fénelon, François Salignac de la Mothe de, 费奈隆, 弗朗索瓦·萨利格纳·德·拉莫特·德, 坎勃莱伊主教, 27, 72, 126, 135, 142, 146, 153, 156, 339

与盖荣夫人, 147—149

致路易十四和马克西姆的信, 327

Fenestrelle, 费内斯特雷尔, Alpine fortress, 阿尔卑斯山要塞, 467

Ferrara, 弗拉拉, 595

Ferriot, Charles de, 费里奥尔, 夏尔·德, 阿尔让塔的男爵, 法国驻土耳其大使, 630

Ferryland (Newfoundland), 费里兰(纽芬兰), 488—489, 503

Fétis, François Joseph, 费迪, 弗朗索瓦·约瑟夫, 音乐研究家, 101

Feuquiére (s), Issac du Pas, 费基埃, 伊萨克·杜·帕, 侯爵, 法国外交家, 160, 180

Feuquiére (s), Antoine du Pas, 费基埃, 安托万·杜·帕, 侯爵, 法国元帅, 653

Feversham, Louis Duras, 费弗沙姆, 路易·迪拉斯, 第二代伯爵, 747

Feyzullah, 费佐拉, 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629

Fez, 非斯,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的货物集散地, 548

Fezzan, 费赞, 548

Fick, Heinrich, 荷尔施泰因的菲克, 海因里奇, 731

Fikaiyye, 菲卡里叶, 埃及政治小集团, 609

Filmer, Sir Robert, 菲尔默爵士, 罗勃特, 政治作家, 25, 216, 219—220

Finale, 弗纳尔, 侯爵领地, 帝国采邑, 386—387, 395, 401, 403, 592, 597

Finland, 芬兰, 4, 656, 673, 716, 773—774, 806, 808

饥荒, 764

人口, 889—890

Fiume, 阜姆, 自由港口, 604

Flamsteed, John, 弗拉姆斯蒂德, 约翰, 第一位皇家天文学家, 52

Flanders, 佛兰德, 属西班牙的, 见西属尼德兰

法国的佛兰德, 543, 785, 866

佛兰德各州, 426, 428

Fleetwood, William, 弗利特伍德, 威廉, 主教和古钱学家, 48

Fleischmann, Anselm, 弗莱施曼, 安泽尔门, 奥地利经济学家, 605

Flemming, Count Jakob Heinrich von, 弗勒明公爵, 雅各布·海因里奇·冯伯爵, 萨克森陆军元帅, 690—691, 702, 709, 711—713

Fletcher of Saltoun, Andrew, 萨尔顿的弗莱彻, 安德鲁, 苏格兰的独立党人, 276

Fletcher, Benjamin, 弗莱彻, 本杰明, 纽约总督, 487

Fletcher, John, 弗莱彻, 约翰, 英国剧作家, 79

Fleurus, battle of (1690), 弗勒鲁战役 (1690), 239, 241, 747

Fleury, Cardinal André Hercule de, 弗勒里, 安德烈·埃居尔·德, 红衣主教, 27

Flibustiers, 海盗行为, 12, 15, 349, 350, 354, 356, 809—810

Florence, 佛罗伦萨, 106, 109, 535, 562

人口, 542

Florida, 佛罗里达, 129, 350, 500

继承战争, 503—504

Flushing, 弗洛辛, 20, 800—801, 811

Foigny, Gabriel, 福格纳, 加布里埃尔, Franciscan,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小说家, 98

Fontana, Carlo, 丰塔纳, 卡洛, 意大利建筑师, 144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vier, sieur de, 丰特奈尔, 贝尔纳拉·布维埃, 先生, 哲学家, 32, 41, 61—62, 70, 88, 104, 137, 740

Forbin, Claude, 福尔班, 克劳德, 骑士, 骑兵中队司令官, 19, 244, 257, 435, 569, 802

Forez, 福雷和生产, 813, 869

Forkel, J.N., 福克尔, J.N., 音乐家, 117

Fort Frontenac, 隆特纳克堡, 496

Fort Knocke, 克诺克堡, 477

Fort Louis (Rhine), 路易斯堡 (莱茵), 252

Fort Loyal (Portland), 洛亚尔堡 (波特兰), 486

Fort Royal (Martinique), 罗亚尔堡 (马提尼克岛), 810

Fort St Louis (New France), 圣路易斯堡 (新法兰西), 497

Fort St Michael, 圣米歇尔堡, 477—478

Fort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港, 487

Forth, Firth of, 福思湾, 256

Fortune (New foundland), 福琼岛 (纽芬兰), 488

Fox, George, 福克斯, 乔治, Qnaker, 贵格会教徒, 150

France: general survey, 法国总的概况, 316—342

宗教, 10, 85, 93, 98—99, 119—120, 131ff., 147—149, 189, 333—334; 另见胡格诺派教徒

贸易, 10, 14—15, 185—187, 320—321, 329—330, 359, 385, 549—553, 571, 839ff., 894;

渔业, 13—14, 470, 488—489, 503, 849—850; 葡萄园, 335, 521, 845—847, 877; 工业, 69, 323, 329, 512—513, 536, 552, 737, 793—794, 812, 815, 843, 850, 860—861, 863ff., 879, 881, 893, 894

海军, 19, 21—22, 224, 234ff., 283—284, 412, 550—551, 568—571, 790ff.

陆军, 20, 223—224, 232ff., 319, 325—326, 340, 373—375, 412ff., 741ff., 763—767, 780—782, 785—789

对外政策, 见路易十四; 优势, 26—27, 74—75, 154ff., 230, 254—255

粮食危机, 29—30, 320ff., 764, 838—839, 875ff., 898—899

文化, 32—33, 72ff., 220—221, 340—342

科学, 33—35, 38ff., 84—85, 88—89

社会团体, 28—32, 89—91, 94—95, 332ff., 338—342, 780—781, 785—786, 829

财政, 298—305, 317—318, 321, 323—324, 325—326, 330—333, 335—338, 788, 831—832

人口, 883ff., 900

另见Colbert, Louis, Paris

Franceschi, 弗兰切斯基, 里窝那的贩卖奴隶商, 563

Franche-Comté, 弗朗谢—孔泰, 223, 387, 438, 452, 454, 465, 813

Francke, August Hermann, 弗兰克, 奥克斯特·赫尔曼, 德意志神学家, 150—151

François de Sales, Saint, 圣弗朗索瓦·德·萨尔, 146, 149

Franconia, 弗朗科尼亚, 237, 245, 250, 402, 405, 432, 586—588, 590, 752

Frankenthal, fortress, 弗兰肯塔尔, 要塞, 225

Frankfurt-am-Mai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25, 232, 237, 421, 596

Frankfurt-am-Oder,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705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42

Frauds, statute of (1677), 弗劳特法会 (1677), 491

Fraustadt, battle of (1706), 弗劳斯塔特战役 (1706), 661—662, 700, 705

Frederick Augustus I, 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 萨克森选帝侯, 见Augustus II

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 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大帝, 42

Frederick III, elector of Brandenburg-Prussia, 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 1701年腓特烈一世开始做普鲁士皇帝, 28, 44, 130, 168, 225, 232, 237, 249, 402

大联盟, 406, 411, 439, 583, 659, 671, 689—690, 692, 694, 763, 768—769

Frederick IV, king of Denmark, 腓特烈四世, 丹麦国王, 652—653, 655, 670, 676, 679, 774

Frederick of Hesse, 黑森的腓特烈, 673, 677

瑞典国王, 678—679

Frederick Henry, 腓特烈·亨利, 奥兰治王子, 799

Frederick William of Brandenburg-Prussia, the Great Elector,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 158, 198, 232, 685, 778—779

Frederick William I, king in Prussia, 腓特烈·威廉一世, 普鲁士国王, 151, 471, 672, 713—714, 730, 769

Frederiksborg, Treaty of (1720), 弗雷德里克斯堡条约 (1720), 678

Frederikssten fortress, 弗雷德里克斯登要塞, 677—678

Freiburg-in-Breisgau, 弗赖堡因布赖斯高, 252, 472—473, 588

Freire, Sousa, 弗莱雷, 索萨, 巴西领地总督, 529

Frescobaldi, Girolamo, 弗雷斯科巴尔迪, 奇洛拉姆, 意大利音乐家, 115

Friesland, 弗赖伊西兰, 800

Fritz, Samuel, S. J., 弗里茨, 塞缪尔, 亚马索尼亚传教士, 356, 531

Friuli, Venetian trade, 弗留利, 威尼斯贸易, 555

Fronteira, Fernando Mascarenhas, 2nd marquis of, 弗龙泰拉, 费尔南多·马斯卡莱纳斯, 第二代侯爵, 438, 512, 522, 536

Frontenac, Louis de Buade, comte de, 弗隆特纳克, 路易·德·比阿德, 伯爵, 新法兰西总督, 12, 13, 484, 486, 488, 490, 497

Fuensalida, Antonio de Velasco, count of, 富思萨利达, 安东尼奥·德·韦拉斯科, 伯爵, 米兰总督, 241

Fürstenberg, Cardinal Wilhelm Egon von, 菲尔斯滕贝格, 红衣主教, 威廉·埃贡·冯, 斯特拉斯堡主教, 202, 224, 578

Fuggers, 富格尔斯, 帝国银行家, 308

Fundão, 芬道, 毛织品, 513

Fundy, Bay of, 芬迪湾, 502

Furnes, fortress, 弗内斯, 要塞, 247, 451, 477

Furnese, Sir Henry, 弗内斯, 爵士, 亨利, 银行家, 293, 314

Gadesbusch, battle of (1712), 加德布施战役 (1712), 636, 671—672

Gaeta, 加埃塔, 433, 594

Gaillac, 盖拉克, 葡萄酒, 845

Galicia, 加利西亚, 163, 366, 526, 528, 591

Galileo, 伽利略, 天文学家, 24, 37, 57, 68, 73

Gallas, Count Johann Wenzel Avon, 加拉斯伯爵, 约翰·文策尔·阿丰, 帝国驻英大使, 458, 460, 462

Gallicanism, 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 131—134, 334, 376

Gallois, Abbé Jean, 加卢瓦, 阿贝·让, 法国几何学家, 41

Galveias, Dinis de Melo e Castro, 加尔维尼亚, 迪尼斯·德梅洛埃·卡斯特罗, 第一代伯爵, 葡萄牙将军, 527

Galway, 高尔韦, 242

Galway, Henri de Massue de Ruigny, 高尔韦, 亨利·德·马修·德·鲁维努, 第一代伯爵

在西班牙, 371, 425, 429—430

在阿尔曼萨, 373, 433, 438, 447, 757

Game Act (1670), 游戏公约 (1670), 258

Gap, 加普, 245

Garcia, Miguel, 加西亚, 米格尔, 巴西探险者, 533

Garonne, the, 加龙河, 烟草的生长, 853

Gassendi, Pierre, 伽桑狄, 皮埃尔, 哲学家, 95

Gastañaga, Francisco Antonio Agurto, 加斯塔南加,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阿古尔托侯爵, 西班牙属地尼德兰总督, 242

Gato, Borbo, 加托, 博尔沃, 巴西探险者, 533

Gaulli, Giovan Battista, 高利, 希奥凡·巴蒂斯塔, 画家, 145

Gaultier, Abbé François de, 戈尔蒂埃, 阿贝·弗朗索瓦·德, 法国驻伦敦使馆的牧师, 175, 458—459

Gdańsk, 格但斯克, 见Danzig

Gedoyne, Abbé Nicolas, 热东, 阿贝·尼古拉, 法国作家, 342

Geertruidenberg, negotiations (1710), 格特洛伊登堡协定 (1710), 375, 439—440, 454—458, 596, 735

Gelderland, 格尔德兰, 荷兰的省份, 439, 852

Geneva, 日内瓦, 120, 121

宗教, 121—122, 151

银行家, 23, 303—304, 314, 543, 788

Gennes, J.-B. de, 热纳, J.-B. 德, 法国海军上校, 15

Genoa, republic of, 热那亚共和国, 9, 28, 168, 224, 379, 509, 556, 594, 597, 754

银行家, 23, 345, 543

人口, 542

军舰, 563

贸易, 509, 535, 540, 547, 555, 564, 813, 858, 862

Geoffroy, Etienne, 若弗鲁瓦, 艾蒂安, 法国化学家, 41

George I, 乔治一世, 英国国王, 155, 272, 434, 676, 784

他的社会关系, 168

就任, 477, 790

与瑞典王国关系, 673—676

George, prince of Denmark, 乔治, 丹麦王子, 204

George, prince of Hesse-Darmstadt, 乔治, 黑森—达姆施塔特王子, 5, 249, 370, 390, 423

加泰罗尼亚总督, 357—358, 362, 382, 390, 591

Georgia, 格鲁吉亚, 基督教徒在格鲁吉亚, 645, 739

土耳其人的占领, 645

Germany, 德意志

科学, 42—45, 53—54, 61, 65—67

文化, 31—32, 73—74, 87, 172, 728

音乐, 101—103, 105, 110—111, 114—118

另见Empire and separate states

Gerona, 赫罗纳, 248

Ghent, 根特, 404, 408

与法国, 431, 435—436

与英国, 443, 464

与荷兰, 477—478

Giannone, Pietro, 詹诺内, 彼特罗, 那不勒斯律师, 558

Gibraltar, 直布罗陀, 162, 371, 397, 442, 540, 549, 817

为英国所占领，11，248，419，444，448，460，475，566—570，809

法国和西班牙企图重新获得，19，366，423，797

Gibson, Edmund, 吉布森，埃德蒙，伦敦主教，127

Gilligan, Manuel Manasses, 希利根，曼努埃·马纳塞，西班牙商业代理人，475

Ginkel, Godert de, 金克尔，戈德特·德，阿思隆的第一代伯爵，242

Giordano, Luca, 其尔达诺，卢卡，那不勒斯画家，343，559

Giovan, Gastone, 焦万，加斯东，托斯卡纳公爵，73

Gironde, the, 纪龙德，812

Giudice, Cardinal Francisco del, 朱迪斯，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代尔，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378

Givet, fortress, 吉凡特，要塞，247，250

Glasgow, 格拉斯哥，256

Glencoe, massacre of (1689), 格伦科屠杀 (1689), 212

Glommen, 格洛门河，在挪威境内，675，678

Gloucester, 格洛斯特，毛织品，865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格律克，克里斯朵夫·威利巴尔德，音乐家，103，111，116

Glückstadt, 格吕克施塔特，船坞，807

Goa, 果阿，516—517

Godolphin, Sidney, 戈多尔芬，西德尼，第一代伯爵，财政大臣，17，23，256，267，269，284—285，291—294，414，430，437，795

与奥兰治的威廉，205

被免职, 270, 294, 441

与苏格兰, 275—277

与和平, 280

与北方大战, 734

Görtz, Georg Heinrich, 格尔茨, 格奥尔格·海因里奇, 男爵, 瑞典在海牙的使者, 180, 674, 676—677

Goeo, Count Johann Peter, 格斯, 伯爵, 约翰·彼得, 帝国新海牙的大使, 409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118

Göttingen, university, 格丁根大学, 42, 44—45, 65, 71

Göttweig, monastery, 哥特威格修道院, 602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515

Golden Horn, 舍角湾, 643

Goldoni, Carlo, 戈尔多尼, 卡洛, 意大利剧作家, 73

Golitsyn, Prince Boris, 戈里钦, 博里斯王子, 俄国政治家, 718

Golitsyn, Prince Vasily Vasilyevich, 戈里钦, 华西里·华西里也维奇王子, 俄国政治家, 625, 684, 717—718

Golovin, Feodor Alexeyvich, 戈洛温, 费奥道·亚历克赛维奇, 俄国大臣, 698, 719

Golovkin, G. I., 戈洛夫金, G. I., 俄国总理大臣, 698n.

Goltz, Heinrich von der, 戈尔茨, 海因里奇·冯·德, 俄国元帅, 703

González, Tirso, 冈萨雷斯, 蒂尔索, 耶稣会会长, 147

Gordon, Patrick, 戈登, 帕特里克, 沙皇彼得的朋友, 720

Gorzyce, confederacy (1715), 戈齐斯同盟 (1715), 711

Gothenburg, 哥德堡, 802, 808

 贸易, 805

Gotland, 哥得兰, 649

Gott, Pierre, 戈特, 彼埃尔, 荷兰财政家, 303

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戈特尚特, 约翰·克里斯朵夫, 德意志评论家, 74

Gouda, 古达, 446

Goyaz, 戈亚斯, 532—533

Graaf, Regnier de, 格拉夫, 雷涅·德, 荷兰古物学家, 64

Grabu, Louis, 格拉布, 路易, 法国音乐家, 106—107

Gradiska, 格拉迪什卡, 578

Gran (Esztergom), 格兰 (埃斯泰尔戈姆), 要塞, 618

Grand Alliance, 大同盟, 157, 162, 165, 188, 388—389, 419, 446, 449ff., 591, 658

 条约 (1701), 406, 410, 427, 431, 591

 乌得勒支, 442ff., 461ff.

Grand Pré (Bay of Fundy), 波莱港 (芬迪湾), 502

Granville, bombarded (1695), 炮轰格朗维尔 (1695), 249, 捕鳕鱼渔民, 849

Graunt, John, 格朗特, 约翰, 统计学家, 48

Gravesande, Willeam Jakob van' s, 格拉夫桑特, 威廉·雅各布·凡, 荷兰科学家, 46

Gravier, Jacques, S. J., 格雷维埃, 雅克, S. J., 伊利诺伊州中的传教士, 489—489

Gray, Stephen, 格雷, 斯蒂芬, 英国科学家, 53

Graydon, John, 格雷顿, 约翰, 海军中将, 503

Graz, 格拉茨, 573, 601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见英格兰, 爱尔兰, 苏格兰

Great Northern War, 北方大战

性质, 2—3, 19, 21, 154, 157—158, 648, 714—715, 742—743, 754, 807

导火线, 649—654, 687, 692—693

与丹麦, 652—655, 670—671, 673, 676, 677—678, 679, 692, 735, 736, 774—775

与萨克森—波兰, 见Angustus II

与俄国, 652ff., 663ff., 673ff., 692ff., 698ff., 708ff., 722—723, 733—735

与勃兰登堡—普鲁士, 671—674, 678, 710

与汉诺威, 673, 674, 675—676, 677—678

与土耳其, 630—632, 635—637, 645, 669—673, 710

与西方, 154, 402—403, 410, 431—432, 654—655, 656, 662, 670

在波罗的海省, 653—656, 673, 674, 676, 692, 708—709, 736, 773, 806

在波兰, 656—663, 669—670, 670—671, 673, 695ff., 704ff.

在萨克森, 662—663, 701, 704

在乌克兰, 466—469, 702—703

在瑞典, 670—671, 774, 806—807

在丹麦, 654—655, 671

在挪威, 675, 677—678

海军方面, 654, 671, 673, 679, 721—722, 806—807

经济效果, 672, 673—675, 704—706, 714, 722ff., 772ff., 832, 837ff., 873

致力和平, 154, 158, 676, 678—679, 692—693, 694, 710—711, 735—737

另见 Charles XII, Holstein-Gottorp, Peter I, Polish-Lithuania, Poltava

Greeks, 希腊

作为商人, 186, 546, 611—612

作为海员, 544, 554, 615, 619

东正教堂, 见土耳其

另见 Aegean, Corfu, Morea

Greenland, 格陵兰, 鲸鱼业, 848, 872

Greenock, 格里诺克, 256

Greenwich, Banqueting Hall, 格林威治宴会厅, 32

格林威治天文台, 68

格林威治医院, 826

Greg, William, 格雷威廉, Harley's clerk, 哈莱的牧师, 269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 336

Gresham College, 格雷欣学院, 39

Grew, Nehemiah, 格鲁, 内赫米亚, 英国博物学家, 56, 64

Grimaldo, José de, 格里马尔多, 何塞·德, 西班牙德斯帕柯大学的, 370, 475

Grimmelshausen, Johann Jakob Christoffel von, 格里曼尔肖森, 约翰·雅各布·克里斯托费尔·冯, 德国小说家, 73

Grodno, 格罗德诺, 661, 690, 700, 705

Groningen, 格罗宁根, 465, 800

Gropello, Giambattista, 格罗佩洛, 詹巴蒂斯塔, 博尔贡伯爵, 萨伏依财政大臣

Grotius, Hugo, 格劳秀斯, 休戈, 荷兰法官, 173

Grüber, Johann, S. J., 格吕贝尔, 约翰, S. J., 传教士, 130

Guadalajara, 瓜达拉哈拉, 430

Guadeloupe, 瓜德罗普岛, 251, 810, 853

Guardão, lord of, 瓜尔达领主, 总收入, 538

Guardi, Francesco, 瓜尔迪, 弗朗切斯科, 威尼斯画家, 556

Guastalla, duchy of, 瓜斯塔拉公爵领地, 473

Guatemala, 危地马拉, 356

Guayaquil, 瓜亚基尔, 356, 373

Guelderland, Upper (Spanish), 上盖尔德兰 (西班牙的), 乌得勒支, 439, 444, 451, 465—466, 477

Guelders, fortress, 盖尔特斯, 要塞, 399, 404, 416

Guiana, 圭亚那, 350, 528, 531; see Cayenne, Surinam, 见卡宴, 苏里南

Guiguer Family, 吉格家族, 日内瓦银行家, 303

Guillestre, fortress, 吉莱斯特莱, 要塞, 245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湾, 与葡萄牙, 510, 515

 法属几内亚公司, 364

 荷兰贸易, 510, 872

Guipúzcoa, 吉普斯夸, 175, 363, 393

Guiscard, Antoine, 吉斯卡, 安东尼, 伯爵, 457

Gustavus Adolphus, 古斯塔夫·阿道夫, 瑞典国王, 735, 743—744, 752—753

Guyon, Jeanne Marie Bouvier, 居荣, 让娜·玛丽·布维埃, 拉莫特夫人, 法国神秘主义者, 147—149

Guzman, Marin de, 古斯曼, 马林·德, 西班牙与外商签订供应非洲奴隶的商人, 515

Gyllenborg, Count Karl, 于伦鲍格, 伯爵, 卡尔, 瑞典外交家和作家, 180, 676

Gyllenkrook, Axel, 于伦克鲁克, 阿克赛尔, 瑞典将军, 761

Haarlem, 哈勒姆, linen-bleaching, 亚麻布漂白, 867

Haas, Robert, 哈斯, 罗伯特, 音乐研究家, 102—103

Habeas Corpus Amendment Act (1679), 人身保护法修正案(1679), 265

Habsburg monarchy, 哈布斯堡王朝

政府组织, 7—8, 155, 177, 228, 449—450, 572—576, 598ff., 752

财政, 22, 305—314, 383

军队, 228, 642, 742, 745, 747—748, 752, 759, 761, 782

与意大利, 5, 9, 163—164, 368, 386—387, 405—406, 409, 412, 428, 432—433, 557—558, 569—571, 576, 581, 590ff.

与尼德兰南郡, 444—445, 472—473, 477—478, 576, 579, 598

与威尼斯, 577, 638ff.

与波兰, 581, 683—685, 695, 701, 710

与巴伐利亚, 588—590

与萨伏依, 159, 241, 250—251, 417—418, 462, 466—467, 559, 595—596

哈布斯堡国土的经济, 599ff.

社会机构, 599ff.

建筑物, 601—602

教堂, 601—602

城镇, 602—603, 605

灾祸, 670, 886n.

另见 Austria, Bohemia, Bosnia, Croatia, Empire, Hungary, Silesia, Transylvania, Turkey

Hadow, Sir Henry, 哈多, 爵士, 亨利, 音乐家

Härbel, Nikolaus Friedrich, 哈尔贝尔, 尼古劳斯·弗里德里希, 瑞士建筑师, 728

Hague, the, 海牙, 420, 734, 738, 800

代表大会, 171—172, 237

条约 (1700), 653

全国性大会 (1710), 439, 670—671

和平协议 (1709), 450

Hainault, province, 埃诺省, 426, 446

Haines, Richard, 海恩斯, 理查德, 发明家, 152

Hainz (Heins), Paul, 海因茨 (海因斯), 保罗, 丹麦驻俄国大使, 692

Hales, Stephen, 黑尔斯, 史蒂芬, 生理学家, 40, 54, 65—66

Halifax, Charles Montagu, 哈里法克斯, 查理·蒙塔古, 第一代伯爵, 216, 266, 270

财政大臣, 286

Halifax, Sir George Saville, 哈里法克斯爵士, 乔治·萨维尔, 侯爵, 195, 199, 205, 214—217, 263

政治上的骑墙派, 208

持异议的人, 211

Halil Pasha, 哈里尔帕夏, 首相, 640, 643

Hall, Chester Moor, 霍耳, 切斯特·穆尔, 发明家, 54

Hallart, Ludwig Nikolaus von, 哈拉特, 路德维格·尼古劳斯·冯, 俄国将军, 634

Halle, 哈雷, 719

大学, 44, 65, 150

盐场, 844

虔信派教徒, 128

Haller, Albrecht von, 哈勒, 阿尔布雷希特·冯, 生理学家, 45, 65—67

Halley, Edmund, 哈雷, 埃德蒙, 皇家天文学家, 39, 40, 52, 68

Hamadan, 哈马丹, 为土耳其占领, 645

Hamburg, 汉堡, 168, 186, 605, 737

贸易, 520—521, 847—848, 894

海员, 580

制帆篷等的布, 815

毛皮市场, 851

公司, 866

Hamilton, James Douglas, 汉密尔顿, 詹姆士·道格拉斯, 第四代大公, 276

Handasyd, Thomas, 汉达赛德, 托马斯, 牙买加的代理总督, 810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汉德尔, 乔治·弗雷德里克, 音乐家, 32, 101—107, 114—115

Hangö Udd (Gangut), battle of (1714), 汉高特(甘古特)战役(1714), 806

Hanmer, Sir Thomas, 汉默, 爵士, 托马斯, 下议院议长, 469

Hanover, 汉诺威, 44, 61, 87, 154—155, 469, 737

天主教徒, 188

外国雇佣兵, 237, 742, 769—770

选帝侯 (1692), 246, 383, 587—588

王位继承战, 402, 407, 410, 472

乌得勒支, 477

北方大战, 672—674

法国补助金, 788

Harcourt, Henri, duc d', 阿尔古, 亨利, 公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357, 361, 363, 365, 368, 389

Harlay de Champvallon, François de, 阿尔莱·德·尚瓦隆, 弗朗索瓦·德, 巴黎大主教, 133

Harley, Robert, 哈利, 罗伯特, 牛津第一代伯爵, 18, 430

南海公司, 15—16, 288, 475

财政大臣, 269—270, 281, 441, 443, 460

遇刺脱险, 457

与继承, 469

Harrach, Count Ferdinand Bonaventura von, 哈拉希, 伯爵, 费迪南德·博纳文狄拉·冯, 帝国驻西班牙大使, 359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 詹姆士, 政治理论家, 289

Harris, John, 哈里斯, 约翰, 科学著作家, 47

Harrison, John, 哈里森, 约翰, 钟表匠, 68

Hartsoeker, Nicolas, 哈索克, 尼古拉斯, 显微镜学家, 64

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 494

Harvey, William, 哈维, 威廉, 医生, 44, 65, 558

Hasse, Johann, 哈塞, 约翰, 德国音乐家, 111

Havana, 哈瓦那, 186, 361, 392, 515, 809

Haverhill (Mass), 哈佛希尔 (马州), 487

Hawkins, Sir John, 霍金斯, 爵士, 约翰, 音乐研究家, 101

Hawksbee, Francis, 霍克斯比, 弗朗西斯, 英国科学家, 53

Haydn, Franz Joseph, 海登, 弗朗兹·约瑟夫, 102, 105, 117

Hayes, William, 海斯, 威廉, 音乐教授, 104

Hearne, Thomas, 赫恩, 托马斯, 文物工作者, 33

Hedges, Sir Charles, 赫奇斯, 爵士, 查理, 国务大臣, 430

Hedvig Sofia, 赫德维格·索菲亚, duchess of Holstein-Gottorp and elder sister of Charles VII, 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夫人, 以及查理十二的姐姐, 652, 670n.

Heeckeren, Walraven van, 希克伦, 沃尔拉文·凡, 荷兰外交家, 651

Heidelberg, fortress, 海德尔堡, 要塞, 225, 756

劫掠, 233, 247

Hein, Piet, 海因, 皮特, 荷兰海员, 252, 798

Heinsius, Anthonie, 海因修斯, 安东尼, 17, 171—172, 183, 283, 425, 443

与马尔巴勒, 17, 162, 176—177, 409, 415, 421, 446, 575

与威廉三世, 156, 162, 165, 170, 178, 183, 228, 266, 392, 400—401, 655, 798

与中立国贸易, 174

海关关卡, 439, 449

预备性条款 (1709), 437, 448, 451ff.

乌得勒支, 459

Heister, Count Sigbert von, 海斯特尔, 伯爵, 西格贝特·冯, 奥地利陆军元帅, 580, 585

Hejaz, 赫贾兹, 610

Héliodore, Fr, 埃利多尔, 教士, 法国方济各会的托钵僧, 146

Hennepin, Fr Louis, 埃纳平, 教士路易, Récollet historian, 史料整理专家, 497, 500

Herbeville, Count Ludwig von, 赫伯维尔, 伯爵, 路德维路·冯, 奥地利将军, 585

Hermelin, Olof, 赫门林, 奥洛夫, 瑞典法官, 184, 660—661

Herne, Sir Joseph, 赫恩, 爵士, 约瑟夫, 财政家, 314

Héron, Charles de Caradas, 埃隆, 夏尔·德·卡拉达, 侯爵, 法国驻波兰大使, 634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 202, 232, 237, 244, 250, 402, 404, 406, 410, 675—676, 742

另见Frederick of Hesse

Hesse-Darmstadt, 黑森—达姆施塔特, 见George, prince of troops, 402, 405, 742

Hickes, George, 希克斯, 乔治, nonjuror, scholar, 127, 140

Hill, Abigail, 希尔, 艾比格尔, Lady Masham, 马谢姆夫人, 254, 269, 505

Hill, Colonel John, 希尔, 约翰上校, 将军, 505—506

Hill, Richard, 希尔, 理查德, 英国在图林的使者, 284

Hirschl, Lazarus, 希施尔, 拉扎勒斯, 维也纳的财政家, 309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 350, 364—365; 另见Santo-Domingo and Saint-Domingue, 圣多明各和圣多明尼克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托马斯, 92, 135—136, 139, 219

Hocher, Johann Paul von, 霍歇, 约翰·保罗·冯, 奥地利首相, 601

Höchstädt, 霍恰斯达特, 见Blenheim, 布莱海姆

Hoffman, Friedrich, 霍夫曼, 弗里德里希, 生理学家, 65

Hoffman, Johann Philipp von, 霍夫曼, 约翰·菲利普, 奥地利在伦敦使者, 468

Hofmannswaldau, C. Hofmann von, 霍夫曼斯瓦尔道, C. 霍夫曼·冯, 西里西亚诗人, 73

Hogguer family, 奥格家族, 法国军火承包商, 304

Holbach, baron d, 霍尔巴赫, 男爵, 大百科全书编纂者, 137

Holland, 荷兰, 见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

Holman, Captain William, of Ferry-land, 霍尔曼, 威廉船长, 费里兰的, 489

Holowczyn, battle of (1708), 霍洛维茨战役 (1708), 666, 702

Holstein, duchy of, 荷尔施泰因公爵领地, 166, 702, 772

Holstein-Gottorp, duchy of, 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爵领地, 3, 158, 182, 407, 447, 737, 774

与瑞典, 649, 653—654, 670, 674, 677

Holt, Sir John, 霍尔特, 爵士, 约翰, 首席法官或审判长, 265

Holy League (1684), 神圣联盟 (1684), 2, 158, 203, 577, 619, 625, 683

Honduras, 洪都拉斯, 洋苏木, 854

Hooke, Robert, 胡克, 罗伯特, 科学家, 39, 51, 57, 62

Hooker, Richard, 胡克, 理查德, 神学家, 138, 217

Hop, Jacob, 霍普, 雅各布, 荷兰外交家, 396

Horn, Count Arvid, 霍恩, 阿尔维特公爵, 瑞典将军, 654—655, 670

Hoste, Fr Paul, 霍斯特, 教士, 保罗, 数学家和海军理论家, 791, 793

Howard, of Effingham, Francis, baron, 埃芬厄姆的霍华德, 弗朗西斯, 男爵, 弗吉尼亚的总督, 482—483

Hubac, Etienne, 于贝克, 艾蒂安, 法国造船师, 793

Hudson, 赫德森河, 251, 488

Hudson' s Bay, 赫德森湾, 12—14, 26, 252, 460, 470, 488—489, 508, 810, 850

赫德森湾公司, 261—262, 489, 835, 851

贸易, 850

Hünigen, fortress, 胡宁根, 要塞, 223, 241

Huet, Pierre Daniel, 于埃, 皮埃尔·达尼埃尔, bishop of Avranches, 阿弗朗什主教, 140

Hugli, Indo-Portuguese, 胡格里, 葡属印度, 519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 124—125, 186, 188, 195, 198, 218, 274, 288, 337—338, 821

银行家, 23, 293, 303—305, 336—337

移民, 33, 220—221, 860

传播法国的文化, 76—77, 137

有技艺的移民, 121—122, 259, 293, 788, 851, 861, 863—864, 867

在联盟军中, 238, 243, 769, 778—779; 另见Galway, 高尔韦, Schomberg, 斯康柏柯

在北美, 493, 503

在摩洛哥, 554

另见Camisards, 卡米沙特, Nantes, 南特

Huguetan, Jean Henri, 于盖坦, 让·亨利, 财政家, 23, 293, 303, 788

逃至英国, 304, 789

Humfrey, Pelham, 汉弗莱, 佩勒姆, 音乐家, 106

Humiecki, Stephen, 休米斯基, 斯蒂芬, 波兰爱国者, 687—688, 691

Humières, Louis de Crevant, duc d', 于米埃尔, 路易·德·克里凡, 公爵, 法国元帅, 235

Hungary, 匈牙利, 圣·斯蒂芬的皇冠, 7, 576, 585

叛乱, 5, 7, 154, 412, 434, 583—585, 754

宗教, 120, 582—583, 586

税收, 306, 583

与土耳其人, 576—581, 608, 610, 618—623, 642

哈布斯堡的改组, 581—586, 599

卡洛威茨, 584, 626—627

Hunter, Robert, 亨特, 罗伯特, 纽约州的总督, 507

Husein, shah of Persia, 侯塞因, 伊朗国王, 644

Hüseyn Pasha, 侯塞因帕夏, 首相, 见köprülü

Huxelles, Nicolas de Laye du Blé, 于克赛勒, 尼克拉·德·莱耶·杜布莱, 侯爵, 法国元帅, 237, 439, 462, 781

Huy, fortress于伊, 要塞, 248, 413, 451, 478

为同盟国所占领(1703), 416

Huygens, Christiaan, 惠更斯, 克里斯蒂安, 荷兰物理学家, 49—50, 53, 69, 77

Hyde, 海德, 见Clarendon和Rochester

Iberville, Pierre le Moyne, sieur d' , 伊贝尔维尔, 皮埃尔
• 勒穆瓦, 先生, 12, 20, 360, 500—501, 503—504, 810

Ibiza, 伊比扎, 370, 387, 543, 546, 570

Ibrahim Pasha, grand vizier, 伊卜拉辛帕夏, 首相, 619, 642
—643

被杀, 656—657

Idanha, 伊丹哈, 527

Idria, 伊德里亚, mercury mines, 水银矿, 228n. , 307

Iguapé, 伊瓜普, 淘金, 533—534

Ile Dauphine (Louisiana), 道芬岛 (路易斯安那), 499

Iles de Lérins, 莱林群岛, 570

India, 印度, 95, 524, 551, 611

葡属印度, 518—519

另见East India Companies

Indulgence, Declarations of (1687), 宣布免罪 (1687),
198—199, 201, 204

Inflant, Nikolaus, 英弗莱特, 尼古拉斯, 俄国将军, 703

Ingolstadt, fortress, 因戈尔施塔特, 要塞, 421

Ingria, 因格里亚, 648, 655, 663, 679, 716, 806

Innocent XI (Benedetto Odescalchi), 英诺森十一世 (贝尼德
托·奥德斯卡尔奇), 教皇, 130—131

与詹姆士二世, 194—195, 199

与路易十四, 161, 203, 225

与土耳其人, 130, 576—577, 619

Innocent XII (Antonio Pignatelli), 英诺森十二世 (安东尼奥
• 皮格纳蒂里), 教皇, 131, 161—162, 396, 594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417, 573

Inquisition, the, 宗教法庭, 346, 353—354, 363, 376, 378, 511, 534, 544

Insurance companies, in England, 保险公司, 在英国, 289, 836

Iraq, 伊拉克, 608

Ireland, 爱尔兰

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 30, 255, 257

宗教, 126, 213—214, 256

詹姆士二世与爱尔兰, 197, 201, 206

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 213—214, 235—236, 238, 240—242

利默里克条约 (1691), 214, 242

雇佣兵, 742

经济, 256, 846, 867, 894

Iroquois confederacy, 伊洛魁同盟, 见American Indians

Isabella, infanta of Portugal, 伊莎贝拉, 葡萄牙的公主, 183

Ispahan, 伊斯法罕, 548, 859

Istanbul, mufti of, 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616, 629, 646

Italy, 意大利

哈布斯堡的利益, 见Habsburg monarchy

法国的利益, 见Casale, Louis , Pinerolo

意大利各国, 9—10, 另见分散各国

西班牙的利益, 见西班牙文化, 10, 32, 46, 72—73, 144, 556, 558—559

音乐, 108, 109—114

要塞区, 387n., 393, 395, 473, 帝国的采邑, 163, 386, 473, 594—595

贸易, 520, 530, 597; 另见Leghorn and separate states

教皇国, 见Innocent XI, Alexander VIII, Innocent XII, Clement XI

九年战争, 240—241, 243, 245, 247, 250—251, 558

王位继承战, 405—406, 409, 417—418, 422, 425, 428—429, 432—433, 558, 569, 570, 594

科马基奥战争, 595

四个边塞, 753; 另见Mantua, Po, 波河

Ivan V, co-tsar with Peter the Great, 伊凡五世, 与彼得大帝为沙皇, 717

Jablonowski, John Stanislas, 杰布隆诺斯基, 约翰·斯坦尼斯拉斯, 莱查斯基的大臣, 687, 700, 708, 710

Jablonowski, Stanislas, 杰布隆诺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 波兰皇室军事指挥官, 前者之父, 657, 689, 691

Jablonski, Daniel Ernst, 杰布隆斯基, 丹尼尔·厄恩斯特, 宗教领袖, 121—122

Jacobites, 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 209—210, 215, 255, 257, 261, 264, 273, 275—276, 278, 289, 408, 675, 797

起义 (1715), 257, 272, 279

Jamaica, 牙买加, 12, 20, 22, 349—350, 355, 392, 797, 809—811

贸易, 849, 855

James I, 詹姆士一世, 英国国王, 266

James II, 詹姆士二世, 英国国王, 17, 27, 168, 183, 480

宗教, 25, 123, 125, 194—201, 225, 265

性格, 194—195

与路易十四, 195, 200, 203, 205, 213, 243, 250

逝世, 408

另见爱尔兰

James Stuart, 詹姆士·斯图亚特, the Old Pretender, 老觊觎王位者, 162, 271

诞生, 201—202

路易十四承认, 169, 281, 408, 414

远征的失败 (1707), 435

离开法国, 452, 460

卡尔十二与他, 675—676

Janissaries, 土耳其的近卫军

军纪, 6—7, 614, 624, 630, 637, 639, 642

组织, 553, 612, 628, 743, 789

叛乱, 31, 618; (1687), 620—621; (1703), 629; (1730—1731), 646—647; (开罗, 1711), 609, 632

Jannum Hoja, 詹纳姆·霍耶, Turkish kaptan pasha, 土耳其·卡普顿·帕夏, 647

Jansborg, 詹斯堡, 689—690

Jansenism, 詹森派教义, 10, 24, 128, 132—136, 146, 149, 161—162

教皇发布谴责詹森派教义的训令, 132—134, 135, 334

在西班牙的尼德兰, 413

Janson, Toussaint de Forbin, Cardinal, 让桑, 图森·德福宾, 红衣主教, 131

Janssen, Sir Theodore, 詹森, 爵士, 西奥多, 财政家, 243

Janusch von Eberstedt, Lebrecht Gottfried, 雅努希·冯·埃贝施塔特, 勒布雷希特·戈特弗里德, 俄国将军, 634

Japan, 日本, 荷兰与之贸易, 859, 861—862

Jassy (Moldavia), 雅西 (摩尔达维亚), 620, 634

Jativa, 贾蒂瓦, 被毁, 373

Java, 爪哇, 贸易, 854, 857, 859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Saint, 拉萨莱的圣·让-巴蒂斯特, 151

Jeffereyes, Captain James, 杰弗里斯, 詹姆士上尉, 762

Jeffreys, George, 杰弗里斯, 乔治, 第一代男爵, 总理大臣, 195, 197, 265

Jennings, Sir John, 詹宁斯, 爵士, 约翰, 海军中将, 372

Jerez, 杰雷斯, 521, 845

Jersey, Edward Villiers, 杰西, 爱德华·维利埃斯, 第一代伯爵, 459

Jersey, East and West, 泽西东部和西部, 14, 483, 488, 491, 493, 814

Jerusalem, 耶路撒冷, 632

Jesuits, 耶稣会, 25, 35, 128, 133, 134, 139, 145, 147, 153, 625

 博兰德会, 87, 140

 在中国, 96, 98

 在美洲, 128—129, 496, 498, 529—533

 与世界商业, 346, 537

 与尤尼艾特教派, 633

Jews, 犹太人

在土耳其, 186, 611—612, 617—618

财政家, 309—312, 602, 788

在西班牙, 345, 511

在摩洛哥, 554

John of Nepomuk, Saint, 尼普姆克的圣约翰, 捷克的殉教者,
576

John III, 约翰三世, 波兰国王, 见Sobieski

John George III, 约翰·乔治三世, 萨克森选帝侯, 232, 246,
756

John William, of Pfalz-Neuburg, 法尔茨—诺伊贝格的约翰·
威廉, 巴拉丁选帝侯, 189, 402, 589

Jommelli, Niccolò, 约梅利, 尼科洛, 那不勒斯音乐家, 111

Jordan (s), General, 乔丹, 将军, 波兰驻法国大使, 692

Joseph I, 约瑟夫一世, 皇帝, 5, 167, 412, 587, 589—590

大公, 388, 575

匈牙利国王 (1687), 577, 585

罗马国王 (1690), 162, 238, 586—587

婚姻 (1699), 590

选举皇帝 (1705), 423, 573

与意大利, 163, 440, 447, 449, 592—595

与尼德兰, 440

与西班牙, 419, 440

改革, 311, 574—575

逝世, 7, 441, 585—586, 593, 596

Joseph Clement of Wittelsbach, 维特尔斯巴赫的约瑟夫·克雷芒, 列日的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选举人, 135, 167, 169, 203, 224, 393, 408, 413, 416

被帝国禁止, 423, 589—590

Joseph Ferdinand, 约瑟夫·费迪南德, 巴伐利亚选举的王子, 353, 358, 390, 393

逝世, 394

Jourdan, Jean, 儒尔丹, 让, 法国财政家, 15, 359

Jülich, duchy of, 于利希的公爵领地, 409, 589

Junto, the whig, 辉格党的秘密政治集团, 267—269

Jurieu, Pierre, 朱里厄, 皮埃尔, 胡格诺派雄辩家, 123—125, 218—219, 341

Jussieu, Antoine Laurent de, 朱西厄, 安托万·格朗德, 植物学家, 59

Jussieu, Bernard de, 朱西厄, 贝尔纳德, 生物学家, 59

Jutland, peninsula, 日德兰半岛, 649, 675

Juvarra, Filippo, 尤瓦拉, 菲利波, 都灵建筑师, 559

Kabylia, 卡比利亚, 541

Kaiserslautern, 凯泽斯劳滕, 为法国占领 (1688), 232

Kaiserswerth, fortress, 凯泽斯韦斯, 要塞, 224—225, 237, 399, 409, 413

同盟国占领 (1702), 416

Kalisz, battle of (1706), 卡利什战役 (1706), 700—701

Kamenny Zaton, fortress, 卡门尼, 扎顿, 要塞, 627, 634

Kamieniec Podolski (Kamenets), 卡明尼斯·波道尔斯基 (卡梅涅兹), 608, 610, 629, 684, 688—689, 691

Kane, Richard, 凯恩, 理查德, 军事作家, 762

K' ang-hsi, 康熙, Manchu emperor, 清朝皇帝, 130

Kaniza, 卡尼扎, Turkish vilayet, 土耳其的省, 608

Kannara, spice-growers, 坎那拉, 香料种植者, 530

Kaplan-Girei, 卡普兰-吉莱伊, 克里米亚可汗(国王), 647

Kara Mustafa, 卡拉·穆斯塔发, 首相, 615

 维也纳被围困, 618—619

Karangaland, 卡朗加兰, 518

Karlskrona, 卡尔斯克鲁纳, 海军船坞, 650, 763, 808, 825

 瘟疫, 820

Karolyi, Count Alexander, 卡洛林, 伯爵, 亚历山大, 584—585

Karwicki, Stanislas Dunin, 卡尔威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杜宁, 波兰爱国者, 706—707, 709

Kasimierz Dolny, 卡西米尔兹·道尔尼, 712

Kasimiyye, 卡西米叶, 埃及政治小集团, 609

Kassa, 卡萨, see Košice, 577, 605

Kazan, 哈桑, khanate, 775

Kehl, fortress, 克尔, 要塞, 223, 252, 417, 473

Keill, 基尔, 约翰, Oxford scientist, 牛津科学家, 47

Kennebec, the, 肯尼贝克, 498, 502

Kent, 肯特, 人口, 887

Kerch, Straits of, 刻赤海峡, 610, 615, 625—626, 630, 719

Kettler family, 凯特勒家族, of Courland, 库兰西, 694

Kexholm, 凯克思霍尔姆, 679

Keyserlingk, Johann Georg von, 凯泽林, 约翰·格奥尔格·冯, 普鲁士在莫斯科的使者, 734

Kharkov, 哈尔科夫, 625

Kidd, Captain William, 基德·威廉船长, 12

Kiev, 基辅, 625, 633, 657, 683, 698, 700, 729

Kilburun, fortress, 基尔本伦, 要塞, 610

Killiecrankie, battle of (1698), 基利克兰基战役 (1698), 212, 747

Killigrew, Henry, 基利格鲁·亨利, 英国海军上将, 238, 567

King, Gregory, 金, 格雷戈里, 统计学家, 47, 260, 764, 883

King, William, 金, 威廉, (伦敦) 德里主教, 143

Kino, Eusebio Francisco, S.J., 金诺, 尤西别奥·弗朗西斯科, 传教士, 356

Kinsale, 金赛尔, 235, 240, 811

Kinsky, Count Franz Ulrich von, 金斯基伯爵, 弗朗茨·乌尔里希·冯, 波希米亚大臣, 177, 575, 579, 588

Kirchner, Michael Achaz von, 基尔赫讷, 米歇尔·阿卡茨·冯, 男爵, 奥地利外交家, 471

Kirke, Percy, 柯克, 珀西, 英国上校, 237

Kirmanshah, 基尔曼沙赫, 土耳其人占领, 645

Kliszów, battle of (1702), 克利斯祖战役 (1702), 660, 674, 695

Kneller, Sir Godfrey, 内勒, 戈弗雷爵士, 英国画家, 32

Kochowski, Vespasian, 柯乔斯基, 维斯帕辛, 波兰唱赞美诗作者, 682

Kochu Bey, 库丘贝伊, 土耳其作家, 613

König, J. U. von, 库宁, J. U. 冯, 萨克森诗人, 73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402

贸易, 836—837, 840, 843, 867

Königsegg, Count Leopold Wilhelm von, 柯尼希格伯爵, 利奥波德·威廉·冯, 帝国副首相, 587

Königsmark, Countess Aurora von, 柯尼希马克女伯爵, 奥若拉·冯, 695

Königsmark, Count Otto Wilhelm von, 柯尼希马克伯爵, 奥托·威廉·冯, 瑞典的兵痞, 620

Köprülü, 库普鲁卢, 土耳其的大家族, 610, 617

Köprülü, Fazıl Mustafa Pasha, 库普鲁卢, 法齐尔·穆斯塔法帕夏, 首相, 621—622

Köprülü, Hüseyin Pasha, 库普鲁卢, 胡赛因帕夏, 首相, 626, 628, 629

Köprülü, Mehmed Pasha, 库普鲁卢, 穆罕默德帕夏, 首相, 621

Köprülü, Numan Pasha, 库普鲁卢, 努曼帕夏, 首相, 632

Kolberg, naval battle of (1715), 科尔伯格, 海战(1715), 794

Kollonich, Count Leopold, 科洛尼希, 伯爵, 利奥波德, 匈牙利红衣大主教, 582—583

Konarshi, Stanislas, 柯纳尔斯基, 斯坦尼斯拉, 波兰政治作家, 707

Konieczpol, battle of (1708), 柯尼克波尔战役(1708), 703

Koron, 科隆, 为土耳其重新占领, 638

Košice (kassa), 科希策(卡萨), 577, 605

Krassow, Ernst Detlow von, 克拉索, 厄恩斯特·德特罗·冯, 瑞典将军, 667, 669—670

Kraut, Johann Andreas, 克兰特, 约翰·安德烈亚斯, 承包商与霍亨索伦战争财政官员, 788

Kronstadt, 喀琅斯塔得, 俄国的兵工厂, 808

Krossen (Krosno), 克罗森 (克罗斯诺), 公爵领地, 689

Kuban, the, 库班, 627

Kunfidha, 昆菲哈, 610

Kusser, Johann, 库塞, 约翰, 德意志音乐家, 106

Labadie, Jean de, 拉巴迪·让·德, 宗教领袖, 150

La Bassée, Lines of, 拉巴赛线, 437—438, 440

Labat, Fr. Jean-Baptiste, 拉巴, 让-巴蒂斯特教士, 传教士, 355

La Bruyère, Jean de, 拉布律耶尔, 让·德, 90, 109, 147, 322, 341

La Calprenède, Gauthier de Costes de, 拉卡尔普雷内德, 戈蒂埃·德·科斯特·德, 剧作家与小说家, 91

Lachine (New France), 拉辛 (新法兰西), 486, 496

Lachowice, 拉舒维斯, 700

La Fayette, Marie Madeleine, 拉斐特, 玛丽·马德莱娜, 小说家, 72

La Feuillade, Louis d' Aubusson, 拉弗雅德, 路易多比松, 伯爵, 法国元帅, 429

La Fontaine, Jean de, 拉芳丹, 让·德, 诗人和寓言家, 72

Lagoa dos Patoo, 拉戈阿多斯帕多斯, 529

Lagos (Portugal), 拉古什 (葡萄牙), 246, 568

Lagrange, Joseph Louis, 拉格朗日, 约瑟夫·路易斯, 数学家, 52, 562

La Guardia (Galicia) , 拉瓜迪亚 (加里西亚) , 526

Laguna, 拉古纳, 529

La Hève (Acadia) , 拉赫丹 (阿卡迪亚) , 497

La Hire, Philippe de, 拉伊尔, 菲利普·德, 天文学家, 40—41

Lahontan, Louis Armand, 拉翁唐, 路易斯·阿曼德, 男爵, 加拿大旅行家, 100, 485

La Hougue, naval battle (1692) , 拉乌盖海战 (1692) , 18—19, 215, 231, 243—244, 567, 794—795, 811

Lake George, 乔治湖, 487

Lake Ladoga, 拉多加湖, 722

La Laguna, 拉拉古纳, 传教团, 356

Lallemant, Jacques Philippe, S. J. , 拉勒芒, 雅克·普利普, S. J. , 334

La Mamora, fortress, 拉马莫拉, 要塞, 554

Lamarck, Jean-Baptiste de Monet, 拉马克, 让—巴蒂斯特·德·莫内, 法国科学家, 64

Lamberg, Count Johann Philipp von, 兰伯格伯爵, 约翰·菲利普·冯公爵, 帕维主教和奥地利议员, 589

Lambert, Anne Thérèse, 郎贝尔, 安娜·泰雷兹, 侯爵, 法国社交界的女主持人, 342

Lamberville, Fr Jacques de, 朗贝维尔, 雅克·德教士, 法国传教士, 498

La Monnoye, Bernard de, 拉莫努瓦耶, 贝尔纳·德, 第戎的, 340

La Mothe-Cadillac, 拉莫特—卡迪拉, 见Cadillac

La Motte-Houdar (d) , Antoine, 拉莫特—乌达尔, 安东尼, 剧作家, 95

Lancaster (New England) , 兰开斯特 (新英格兰) , 487

Landan, fortress, 兰道, 要塞, 422, 472—474, 753

Landen, battle of (1693) , 兰登战役 (1693) , 231, 247

Landrecies, siege of (1712) , 包围兰特里·西斯 (1712) , 443

Lange, Lorenz, 兰格, 洛伦茨, Swiss engineer, 瑞典工程师, 96

Langendijk, Pieter, 兰根迪克, 彼得, 荷兰剧作家, 75

Langres, 朗格勒, 毛织物, 864

Languedoc, 朗格多克, 119, 325, 328, 335, 375, 552, 570, 813, 823

谷物, 548, 839; 另见卡斯特尔脑丹莱

盐, 844

毛织物, 552, 863—864; 见卡斯特尔脑丹莱

丝织品, 868

人口, 885, 889, 900

Languet de Gergy, Jean Joseph, 朗盖·德·盖格, 让·约瑟夫, bishop of Soissons, 苏瓦松主教, 134

Lannion, 拉尼翁, 大麻, 817

La Pile, 拉皮尔, Rhine fortress, 莱茵河要塞, 252

Laplace, Pierre Simon, 拉普拉斯, 皮埃尔·西蒙, 侯爵, 数学家, 52

Lapland, 拉普兰, 41

La Prairie (New France) , 拉普埃伊 (新法兰西) , 496

Larache, fortress, 拉腊歇, 要塞, 554

Largillière, Nicolas de, 拉吉利埃, 尼古拉·德, 法国画家,
32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拉罗什富科, 弗朗索瓦,
公爵, 道德家, 72, 84, 91, 149

La Rochelle, 拉罗什尔, 354, 810

La Solle, Robert Cavelier, sieur de, 拉萨尔, 罗贝尔·卡韦
利埃, 先生, 法国探险家, 13, 356, 499

La Touche, 拉图什, 法国海军行政官员, 830

La Tour sur Orbe, 拉图苏图贝, 人口, 889, 900

Lausanne, 洛桑, 丝织工业, 868

Laval, François Xavier de Montmorency, 赖伐尔, 弗朗索瓦斯
·格扎维埃, 蒙特莫兰西的, 魁北克主教, 484, 496—497

La Vente, Fr Henry Roulleaux de, 拉旺特, 亨利·鲁洛德, 教
士, 499

Lavoisier, Antoine Laurent, 拉瓦锡, 安托万·洛朗, 化学
家, 54

Law, John, 劳, 约翰, 财政家和政治家, 305, 337, 352, 501,
835—836, 853, 857

Laxenburg, 卢森堡, 575

Lazarites, 拉扎里茨, 545

Leake, Sir John, 利克, 约翰爵士, 英国海军上将, 429

占领撒丁, 434

在圣约翰斯任总督, 503

Lebanon, 黎巴嫩, 609, 611

Lebret, Pierre, Cardin, 莱布莱特, 皮埃尔, 卡丁, 父与子,
省地方行政长官, 335

Le Clerc, Daniel, 勒·克莱克, 丹尼尔, 法国历史学家, 71

Le Clerc, Jean, 勒·克莱克, 让, 胡格诺派学者和时事评论员, 76n., 123, 137, 140—141, 143

Le Clerq, Fr Chrétien, 勒·克拉克, 克莱蒂安教士, 加拿大历史学家, 497

Le Comte, Louis, S.J., 勒·孔泰, 路易, 在中国, 96, 139

Leczya, 莱祖卡, 705

Leduchowski, Stanislas, 莱图乔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 波兰政治家, 712

Lee, Nathaniel, 李, 纳撒尼尔, 英国剧作家, 79

Leeuwenhoek, Anthonie van, 列文虎克, 安东尼·凡, 显微镜学家, 57, 64

Leeward Islands, 背风群岛, 251, 501, 810, 849

Lefort, François, 勒福尔, 弗朗索瓦, 沙皇彼得的朋友, 625, 718—719

Legendre, Thomas, 勒让德尔, 托马, 法国财政家, 23, 329, 336—337, 339

Leghorn, 里窝那, 10, 174, 540, 542—544, 550, 555, 563—564, 569, 611, 813, 818, 858, 894

人口, 542

Legnano, fortress, 伦格那诺, 要塞, 753

Le Havre, 勒·阿弗尔, 248, 811

Lehmann, Behrend, 莱曼, 贝伦特, 哈尔伯施塔特财政家, 788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兹, 戈特弗里德·威廉, 24, 34, 37, 42, 45, 50, 60—62, 74, 77, 86, 96, 128, 143, 173, 735, 739

微积分学, 55

汉诺威史, 87

Leiden, 莱顿, 44, 122

织物, 864, 893

Leipzig, 莱比锡, 45, 74, 76, 105, 605, 703, 719

Leisler, Jacob, of New York, 纽约的莱斯勒, 雅各布, 482, 486

Leme, Pais, 勒姆, 佩斯, 巴西探险家, 533

Lémery, Nicolas, 莱默里, 尼古拉, 法国化学家, 41

León, 莱昂, 782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皇帝, 5, 119—120, 162, 166—167, 203

政府的措施, 8—9, 177, 572ff.

亲属关系, 168—169, 224, 388, 578, 685

性格, 177, 574—575

逝世, 309, 423

西班牙王位继承, 159, 386—388, 393—396, 399, 401ff., 410, 417, 419, 420, 591—593

另见Austria, Empire, Habsburg monarchy, Nine Years War, Turkey

Leopold of Anhalt, 安霍特的利奥波德, 466

Lepanto, 利班图, 608

海战 (1571), 564

Le Pelletier, Claude, 勒佩尔蒂埃, 克洛德, 总管理员, 298

Le Quesnoy, fortress, 勒魁斯诺, 要塞, 443—444

Lérída, surrender of (1707), 莱里达的投降 (1707), 373

Lesage, Alain René, 勒萨日, 阿兰·勒内, 法国作家, 32, 90, 92, 97, 340

Lesnaja, battle of (1708), 莱斯那贾战役 (1708), 666, 703, 757

Leszczyński, Philotheus, 莱茨津斯基, 费路休斯, 托博尔斯克大主教, 128

Leszczyński, Rafał, 莱茨津斯基, 拉斐尔, 波兰财政大臣, 657, 694, 697

Leszczyński, Stanislas, 莱茨津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 拉斐尔王子, 波兰的傀儡国王 (1704), 658, 663—664, 667, 697—699

波尔塔瓦战役之后, 669—670, 700

退隐, 703, 707—710, 714, 735

Le Tellier, Michel, 勒·泰利埃, 米歇尔, 法国政治家, 744, 746

Levant, the, 勒旺岛, 215, 246

贸易, 236, 249, 262, 385, 549—553, 611, 862—863, 866

法国人在勒旺岛, 549—553, 858, 864

另见Marseilles, Smyrna, Turkey

Levasseur, Noël and Pierre, 勒瓦瑟, 诺埃尔和皮埃尔, 新法兰西的木雕刻师, 497

Lewenhaupt, Count Adam Ludwig, 莱文哈普特, 亚当·路德维格伯爵, 瑞典司令员, 666, 669, 699, 757

Lewis, 刘易斯, margrave of Baden, 巴登总督, 在巴尔干, 5, 579, 621

帝国反抗法国的司令员, 403, 409, 417, 421, 755, 757

逝世, 432

拉施塔特宫殿, 788

Lexington, Robert Sutton, 莱克辛登, 罗伯特·萨顿, 第二代男爵, 英国派往西班牙的使节, 475

Lhasa, mission to, 派往拉萨的传教团, 130

L' Hermitage (Newfoundland), 勒赫密泰奇 (纽芬兰), 488

Lhuyd, Edward, 荷特, 爱德华, 英国地质学家, 61

Licensing Act (1685), 特许法令 (1685), 停止 (1695),

Liebmann, Isaac, 利布曼, 艾萨克, 财政家, 832

Liechtenstein, Hans Adam, 汉斯·亚当, 列文敦士登的王子, 310—311, 601

Liège, Bishopric of, 列日的主教管区, 223—224, 242, 252, 393, 408, 413, 414, 451, 462, 477—478, 578, 786

武器的生产, 224, 869

同盟占领要塞 (1702), 416

Lierre, fortress, 列赫, 要塞, 398

Liguria, 利古里亚, 541, 754

Lille, 里尔, 426, 438, 451, 477

同盟占领 (1708), 436

里尔的地方行政长官, 785

工业, 863

Lillieroot, Count Nils, 利里埃鲁特, 奈尔斯伯爵, 瑞典在海牙的代表, 172

Lillingston, Colonel Luke, 利林斯顿, 卢克上校, 355

Lima, 利马, 376, 530

Limburg, fortress, 林堡, 要塞, 416

Limerick, 利默里克, 240, 242

条约 (1691), 214, 256

Limoges, Joseph de, S. J., 利蒙奇, 约瑟夫·德, S. J., 传教士, 499

Linnaeus, Carl, 林奈, 卡尔, 瑞典植物学家, 35, 57—60, 62—63

Linz, 林茨, 603—604, 619

Lions, Gulf of, 利翁湾, 248, 542

Lisbon, 里斯本, 16—19, 30, 261, 418
 同盟的基地, 418—419, 526, 566, 569, 808—809, 818
 人口, 542
 贸易, 509—510, 513ff., 527, 529, 535—536, 849
Lister, Martin, 利斯特, 马丁, 英国动物学家, 56
Lithuania, grand duchy of, 立陶宛大公, 2, 3, 665, 678, 695, 700, 703, 705, 776, 837
 反对索比斯基, 685—686
 内战, 657, 690—691, 693—694
 俄罗斯人与立陶宛, 693—694, 698—699, 708, 711
 另见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Radziwill, Sapieha
Littlecote, 立得尔科特, 205
Littleton, James, 利特尔顿, 詹姆士, 海军准将, 372
Liverpool, 利物浦, 490
Livingston, Robert, of New York, 纽约的利文斯顿, 罗伯特, 496
Livonia, Polish, 波兰的利沃尼亚, 660, 699
Livonia, Swedish, 瑞典的利沃尼亚, 2, 687, 716, 806, 808
 奥古斯都的入侵, 652—655, 692
 与俄国, 403, 663, 708, 710, 712, 735—737
 尼斯特兹条约, 679
 贸易, 648, 699, 837ff.
Lloyd, William, 劳埃德, 威廉, 圣阿萨大主教, 125
Loader, Issac, 洛德, 伊萨克, 英国制锚工匠, 815

Lobkowitz, Wenzel Eusebius, prince of, 温泽尔·尤西皮斯, 洛勃科维茨王子, 帝国派往西班牙的大使, 353

Lobo, Dom Manuel, 洛博, 杜姆·曼纽尔, 巴西总督, 529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哲学家, 24—25, 36, 47, 88, 121, 126, 136—138, 260

《人类的理解力论》, 78, 96

《宽容》, 124

《政府》, 219—222

Locronan, sailcloth, 洛克罗纳, 制帆篷的布, 817

Lodève, 洛代夫, 人口, 889, 900

Löhlhoffel, Georg Friedrich von, 勒霍弗尔, 乔治·弗里德里克·冯, 普鲁士驻华沙大使, 713

Loire, the, 卢瓦尔, 812, 869

Lombardy, 伦巴第, 7, 410, 557, 593, 597, 782

法国人在伦巴第, 591

维克多·阿马德的要求, 595—596

Lombe brothers, John and Thomas, 隆勃兄弟, 约翰和托马斯, 丝织品, 868

Lomellina, 洛梅林纳, 466n., 558, 560n.

Lomonosov, Mikhail, 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 俄国化学家, 42

London, 伦敦

英格兰银行, 23, 249, 288—293, 314, 835

音乐会, 32, 104—107, 114—115

剧院, 89, 94

圣保罗大教堂, 108, 125, 262

宗教, 128, 144, 270

报纸, 26, 211, 280

1688—1689年革命, 205—206

城市各种机构, 262, 289, 835—836

造币厂, 290, 535, 896

海军部, 22, 292, 815, 816, 826, 830, 833, 880, 898

供应部, 292, 818—819

人口, 262, 541, 889

进口煤, 31, 869; 进口酒类, 846

谷物贸易和船用补造品, 838

与波士顿相比, 481

Londonderry, siege of (1689), 包围伦敦德里 (1689), 213—214, 235—237

部队, 769

Loreto, 洛雷托, 加利福尼亚传教团, 356

Lorge, Guy de Durfort, due de, 洛奇, 盖伊·德·德福特, 公爵, 法国元帅, 245

Lorient, 洛里昂, 812

Lorraine, 洛林, 9, 161, 252, 474, 578, 753; 另见Charles V and VI, dukes of Lorraine

Louis, dauphin of France, 路易, 法国皇太子, 385

Louis XI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三, 法国国王, 41, 84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

人生观, 17, 147, 156, 169—170, 189—190

权力, 26—28, 216—218, 221, 316—318, 333—338

专制主义的批评, 32—33, 156, 218, 326ff.

赞助人的信件, 77

芭蕾舞和音乐, 104, 106, 108, 110, 114

宗教政策, 10, 119—120, 130—134, 161—162, 333—334,
337—338

军事事件, 316, 340, 751—752, 780—782, 789

外交政策的指导, 169—171, 175ff., 316

皇朝的联系, 168, 385, 388

与英国革命, 18, 26; 另见詹姆士二世

与意大利, 9, 159—161, 164—165, 223, 468, 569; 另见分
散的国家

与雷科奇, 154, 169, 701

与哈布斯堡君主制度, 8, 157—158, 160, 165—167, 387; 另
见Partition Treaties

与西班牙, 10, 15, 159—161, 163—164, 215, 235, 350—
351, 357—359, 381—382, 384, 397ff., 408, 451—456, 570; 另
见Orry, 奥里, Philip V, 菲利普五世

与葡萄牙, 159—160, 163—164, 407, 524—525

与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 224, 545, 554

与北美洲, 13, 485, 500—501

与波兰, 4, 686, 692—693, 695, 710—711

与俄国, 158, 734—735

九年战争, 154, 160ff., 202—203, 215, 223ff.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26, 360ff., 397ff., 412ff., 446ff.

逝世, 27

另见France, Paris, William III

Louis X 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五, 法国国王, 27, 168, 463

Louisbourg, fortress, 路易斯堡, 要塞, 850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12, 485, 499—501

Louvain, 卢万, 247, 424, 426

Louville, Charles Auguste d' Allonville, 洛维尔, 查理·奥古斯特·达朗维尔, 侯爵, 菲利普五世顾问, 365, 368

Louvois, 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 洛沃瓦, 弗朗索斯·米歇尔·勒特里, 侯爵, 法国作战大臣, 40, 230, 803

逝世, 243, 316

军队, 223—224, 319, 744—751, 761

Luberas, Ludwig, 卢伯拉斯, 路德维格, 彼得大帝的萨克森顾问, 731

Lubert, Louis de, 吕贝尔, 路易德, 法国海军财务主管, 831

Lubomirski, Hieronymus, 卢伯米尔斯基, 希洛奈穆斯, 波兰王室军事指挥官, 688, 695, 697—698

Lucca, republic of, 卢卡共和国, 535, 594

Lukaris, Cyril, 卢卡里, 西里尔, 君士坦丁堡主教, 128, 633

Lully, Jean-Baptiste, 吕利, 让-巴普蒂斯特, 音乐家, 79, 106—110, 113—115, 118, 131—133

Lusatia, 卢萨蒂亚, 毛织品, 864

Lutheranism, 路德教教义, 119—120, 150, 188, 582; 另见 Silesia

Luxembourg, François Henri de Montmorency-Bouteville, duc de, 卢森堡, 弗朗索斯·亨利·德·蒙特莫伦赛-布特维尔, 公爵, 法国元帅, 19, 232, 239, 242, 244, 247—248, 744, 752

逝世, 249

Luxemburg, ducky and fortress, 卢森堡大公和要塞, 161, 223, 232, 252, 381, 400, 426, 438, 467, 753

Luzzara, battle of (1702), 卢日拉战役 (1702), 417

Lwów, 利沃夫, 684, 688, 699, 702

Lyonet, Pierre, 利奥内·皮埃尔, 法国动物学家, 57

Lyonnais, coal, 莱昂内斯, 煤, 869

Lyons, 莱昂斯, 财政家, 23, 303, 789

莱昂的支付, 304—305

丝, 868, 894

谷物价格, 876, 898

Lys, the, 利斯河, 381

Maas, the, admiralty of, 马斯, 海军, 800, 815, 832—833, 847

Maastricht, fortress, 马斯特里赫特, 要塞, 249, 400, 404, 753

Mabillon, Dom Jean, 马比荣, 多姆·让, 历史学家, 33, 87, 140

Macanaz, Rafael Melchor de, 马卡纳兹, 拉斐尔·梅尔肖·德, 西班牙法学家, 9, 373—374

Macao, 澳门, 130, 516, 524

Macapá, Guyanese fort, 马卡帕, 圭亚那人的要塞, 531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麦考莱, 托马斯·巴宾顿, 26

Macchia, Gaetano Gambacorta, 马克切亚, 盖塔诺·甘伯考塔, 王子, 368n., 557

Mackay, Hugh, 麦凯, 休, 美国将军, 747

Maclaurin, Colin, 麦克劳林, 科林, 英国数学家, 39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11—12, 854

Madeira, 马德拉（群岛）, 520—521, 531, 849; 马德拉河, 533

Madras, 马德拉斯, 518—519, 809, 860

Madrid, 马德里, 343, 348, 352, 359, 361, 365, 367, 369, 373, 377, 389, 408, 423, 475—476

真正的学术界, 76, 343

人口, 357, 542

菲利普五世在马德里, 361, 369, 372, 425, 430

高尔韦在马德里（1706）, 371, 429

查理三世在马德里（1710）, 375, 440

Maffei, Count Annibale di, 马费伊, 安尼巴尔·迪伯爵, 萨伏依在乌得勒支的全权代表, 464

Maffei, Scipione, 马费伊, 希皮奥内, 意大利剧作家, 73, 140

Magdeburg Concert（1688）, 马格德堡音乐会（1688）, 232

Magliabecchi, Antonio, 马格里亚比奇, 安东尼奥, 佛罗伦萨的学者, 77

Magnol, Pierre, 马格努尔, 皮埃尔, 蒙彼利埃植物学家, 58

Mahim, island, 马希姆岛, 525

Mahmud I, 穆罕默德一世, 苏丹（国王）, 646

Mahrattas, 马赫拉达, 518

Maiello, Carlo, 梅洛, 卡尔洛, 那不勒斯哲学家, 558

Maine, 缅因, 483, 486—487, 498

王位继承战, 502, 507—508

Maintenon, Françoise d' Aubigné, 梅因特侬, 弗朗索斯·德·奥比, 女侯爵, 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326—327, 363, 369,

803, 831

Mainz, 美因兹, 225, 237

大主教选举团成员, 洛德·弗朗茨·冯·肖邦, 407, 573

Majorca, 马略尔卡岛, 370, 379, 387, 391, 522, 543—544, 570, 593, 801

Malabar ports, 马拉巴尔港, 518—519, 857

Malacca, Indo-Portuguese, 马六甲, 印度、葡萄牙, 518

Malaga, 马拉加

海战 (1704), 423, 569

贸易, 521, 845

Malebranche, Nicolas, Oratorian philosopher, 马勒伯朗士, 尼古拉, 雄辩哲学家, 25, 73, 136—137, 143, 145—146

Malopolska, 马洛普尔斯卡, 695, 702, 711—712

Malpighi, Marcello, 马尔皮基, 马开洛, 生物学家, 56, 64, 73

Malplaquet, 马尔普莱奎特, 战役 (1709), 20, 280, 438, 741, 753, 759, 761

伤亡人员, 749, 752

Malta, 马耳他, 11, 540, 566, 838

检疫, 543

捉拿商船或海盗船, 545—546, 563—564, 619

与希腊人, 546, 611—612

和威尼斯, 640

Malvasia, 马尔伐西亚, 为威尼斯人所占领 (1690), 620

Mamluks, 马木路克, 609

Mandeville, Bernard de, 曼德维尔, 贝尔纳·德, 道德操行者, 152

Manetta, 马尼塔, 热那亚的海盗, 544

Manila, galleon, 马尼拉, 大帆船, 373; 见Acapulco, 阿卡普尔科

Mannheim, 曼海姆(上帕拉丁内), 225, 421

Mansfeld, Count Heinrich von, 曼斯菲尔德, 海因里克·冯伯爵, 奥地利政治家, 593

Manteigas, 曼特加, 毛织品, 513

Mantua, duchy and fortress, 曼图亚, 公爵领地和要塞, 160, 240, 468, 473, 594, 596—597, 750, 753

Mantua, Charles IV Gonzaga, duke of, 曼图亚, 贡萨加的查理四世, 大公, 164, 169, 223, 403, 414, 594

Manzoni, Alessandro, 曼佐尼, 亚历山德罗, 小说家, 557

Mar, John Erskine, 马尔, 约翰·厄斯舍, 拥护英王詹姆士二世的领导者, 272

Marais, Marin, 马雷, 马兰, 法国音乐家, 108

Maranhão, 马兰豪, 巴西舰长, 530—531, 537

Marchand, Jean Louis, 马尔尚, 让·路易, 法国音乐家, 116

Mardefeld, Arvid Axel, 马第菲尔德, 阿维德·阿克赛尔, 瑞典将军, 700

Mardyck, peace negotiations (1719), 马杜克和平协定(1719), 456

Margaret Theresa, 马格丽特·西丽莎, 利奥波德一世的第一个妻子, 386

Maria, 玛丽亚, 彼得大帝的姐妹, 732

Maria Anna of Pfalz-Neuberg, 法尔茨—诺伊贝格的玛丽亚·安娜, 卡洛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 351, 358, 361, 371, 390

Maria Antonia, 玛丽亚·安东尼亚, 奥地利女大公和巴伐利亚女选举人, 353, 388

逝世, 589

Maria Luisa of Savoy, 萨伏依的玛丽亚·路易莎, 菲利普五世的第一个妻子, 367—370, 377

Maria Theresa, 玛丽亚·西丽莎, 法国皇后, 385

Maria Theresa, 玛丽亚·西丽莎, 女皇, 312—313, 478, 592

Mariana of Austria, 奥地利的玛丽安娜, 卡洛斯二世之母, 348

Marianas (Ladrone Is.), 马里安那(莱特隆岛), 传教团, 349

Mariazell, 马利亚策尔, 圣地, 575

Marie d' Arquien, 阿尔奎·玛丽, 约翰三世之妻, 685

Marie Louise d' Orléans, 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 卡洛斯二世的第一个妻子, 160, 348, 350

Marine regiments, 马林军团, 822

Marino, Giambattista, 马里诺, 吉亚姆巴蒂斯塔, 意大利诗人, 73

Mariotte, Edmé, 马里奥特, 埃德姆, 法国科学家, 40

Marivaux, Pierre de, 马里沃, 皮埃尔·德, 法国作家, 92, 95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马尔巴勒, 约翰·丘吉尔, 第一代公爵

与瑞典, 4, 184, 432, 633

与尤金, 5, 19, 421—422, 435, 438, 443

与海因修斯, 17, 176—177, 415

任司令, 18—19, 21, 169, 742, 748, 751—753, 756—758,
760—761, 763, 770, 784

战争获利, 23, 186, 280, 427

背弃詹姆士二世, 204, 209

在爱尔兰, 240

总司令, 406, 415

被免职 (1711), 270, 443, 461

恢复职务 (1714), 272

斯威夫斯的攻击, 280—281

与和平条款, 439, 449, 451, 455, 456

战役, 416ff., 见各分散的战役

Marlborough, Sarah, 马尔巴勒, 萨拉, 女公爵, 204, 269, 441

Maronites, 马鲁尼茨, 128

Maros, the, 毛罗什河, 580—581

Maros-Vasárkely, 马罗斯—瓦萨凯里, 585

Marrakesh, 马拉喀什, 548

Marsaglia, battle of (1693), 马萨格里亚战役 (1693), 247

Marseilles, Levant trade, 马赛, 与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
的贸易, 249, 385, 540, 543, 549—552, 560, 611, 801, 862—
863, 868

军团, 390, 563, 790n.

与土伦, 20, 813

人口, 542

检疫, 543

瘟疫, 543, 886

糖的进口, 519; 鳕鱼, 850; 明矾, 895

Marsigli, Count Luigi, 马西格里, 卢奇伯爵, 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学者, 581, 743, 762

Marsin (Marcin), Ferdinand, comte de, 马辛, 菲迪南, 伯爵, 法国元帅, 408, 421—422, 429

Martell brandy, 马坦尔白兰地, 847

Marti, Manuel, 马蒂, 曼纽尔, 西班牙学者, 343

Martigues, 马丁奇, 海员, 823

Martinitz, 乔治·亚当·冯伯爵, 奥地利政治家, 311

Martinique, 马提尼克岛, 12, 251, 804, 809—810, 825

贸易, 853—854

Mary II, queen of Great Britain, 玛丽第二, 英国的皇后, 198

登上王位, 207—209

当威廉国王不在国内时, 215

为公主, 217

Mary Beatrice of Modena, 摩德纳的玛丽·比阿特里斯, 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个妻子, 194, 255n.

Maryland, 马里兰州, 480, 482—483, 487—488, 493, 507—508

王位继承战争, 503

贸易, 851—852

Maskelyne, Neville, 马斯基林, 内维尔, 皇家天文学家, 68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12, 487, 502, 506, 814

与光荣革命, 481, 814

1691年的特许状, 483, 491, 493

宗教和文化, 492—496, 498

Massawa, 马萨瓦, 610

Mather, Cotton, 马瑟, 科顿, 新英格兰的牧师, 487, 493—495, 502, 507

Mather, Increase, 马瑟, 英克里斯, 前者之父, 481, 483, 493—494, 502

Mato Grosso, plateau, 马托格罗索高原, 532

Mattarnovy, Georg Johann, 马太诺维, 乔治·约翰, 德意志建筑师, 728

Matveev, Andrey Artamonovich, 马特维也夫, 安德烈·阿塔莫诺维奇, 俄国驻海牙公使, 734, 738

Maubeuge, fortress, 莫伯日, 要塞, 438, 451, 477

Maule, Tom, 莫尔, 汤姆, 美国作家, 492

Maupertuis, Pierre Louis Moreau de, 莫佩尔蒂, 皮埃尔, 路易·摩勒·德, 数学家, 35, 41—42, 47, 52, 62, 64

Maurice of Nassau, 拿骚的莫里斯, 王子, 743

Mavrocordato, Alexander, 马弗洛科达托, 亚历山大, 土耳其政府的第一个译员, 621, 626, 629, 635—636

Maximilian Emmanuel, 马克西米连·伊曼纽尔, 法国的巴伐利亚同盟者的选帝侯, 167, 407, 413, 417

亲属, 168, 386, 390—391

西属尼德兰的总督, 242, 352—353, 395, 397—398, 400, 412—413, 422, 436, 578—579

西班牙的王位继承, 352, 381, 386—388, 390—391, 393, 394, 397, 402

布连汉姆, 422, 588—589

皇帝的谴责, 423, 590

拉米里, 426

马尔普拉奎, 438

与马尔博罗, 446

乌得勒支, 472—473

在匈牙利, 621

Maximilian Henry, of Wittelsbach, 马克西米连·亨利, 维特
斯巴赫的, 科隆大主教的选举人, 224

Mazagan, fortress, 马扎干, 要塞, 524—554

Mazarin, Cardinal, 马萨林, 大主教, 103, 108, 165, 225,
243

Mazepa, Ivan Stepanovich, 马赞拉, 伊万·斯契潘诺维奇, 乌
克兰哥萨克的首领, 630, 664, 666—669, 699, 702, 732, 776

Mazovia, 马佐维亚, 695, 702, 706, 776

Mecca, 麦加, 548, 610—611

Mechlin (Malines), 梅奇林 (马利斯), 247

Mecklenburg, duchy of, 梅克伦堡公爵领地, 404, 710, 736—
737, 773, 778

Medici, Cosimo III de, 梅迪契, 科西摩三世, 托斯卡纳大公,
131, 151

Medici, Francesco Maria de, 梅迪契, 弗朗西斯科·马利亚,
大主教, 131

Medici, Giovan Gastone, 梅迪契, 奇奥凡·加斯通, 托斯卡纳
大公, 73

Medina de Rioseco, 麦迪那·德·里奥塞科, 让·恩里奎斯·德
·卡勃莱拉, 大公, 卡斯蒂尔的海军上将, 351, 353, 370

Medinaceli, Luis Francisco de la Cerda, 梅迪纳赛里, 路易
士·弗朗西斯科·德·拉·塞达, 公爵, 374—375

Mehadia, fortress, 梅哈迪亚, 要塞, 750

Mehmed IV, sultan, 穆罕默德四世, 苏丹, 577, 598, 619—620

Mehmed Rami Efendi, 穆罕默德·拉米·伊芬迪, 首相, 616,
626

Meichl, Simon, 梅契尔, 西蒙, 威尼斯财政家, 309—310

Meissen, 迈森, 瓷器, 603

Mekhitar of sebastia, 塞巴斯特的梅克希泰尔, 修道院院长,
617—618

Meknes, 梅克内斯, 554

Melilla, fortress, 梅利利亚, 要塞, 554

Melk, Benedictine monastery, 梅勒克, 贝内迪克汀修道院,
602

Melkites, 梅尔卡特派, 128

Mendonça, Luis de, 门多萨, 路易斯德, 果阿总督, 516

Mendoza, Balthazar, 门多萨, 巴尔瑟扎, 塞哥维亚主教, 361,
376

Menin, fortress, 梅嫩, 要塞, 451, 477

Mennonites, 门诺尼特, 493

Menshikov, Prince Alexander Danilo- vich, 缅希科夫, 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王子, 彼得大帝的顾问, 718

Merchant Adventurers, (冒险) 投机商, 262, 866—867

Mercy, Claude Florimond, 默西, 克劳德·弗洛里蒙德, 公爵,
帝国将军, 639

Merian, Maria Sibylla, 梅里安, 玛丽亚·西比拉, 昆虫学家,
46

Merlat, Elie, 默拉特, 伊利, Huguenot writer, 胡格诺派作家,
218

Mérode-Westerloo, Eugène Jean Phi- lippe, 默罗特-韦斯特
卢, 尤金·让·菲利普, 公爵, 军事冒险家, 742, 762

Méry, Jean, 梅里, 让, 法国解剖学家, 41

Mesnager, Nicolas le Baillif, 梅斯纳热, 尼古拉·勒·贝
利, 186, 337, 447, 462, 469—470, 475

Messina, 墨西拿, 540, 557, 559

人口, 542

Metastasio, Pietro, 梅泰斯泰西奥, 佩特罗, 歌词作者, 73,
111

Methoni (Modon), 梅托尼 (莫东), 638

Methuen, John, 梅休因, 约翰

与葡萄牙签订条约 (1703), 16, 163—164, 418—419, 466,
523—526, 569, 591, 808

Methuen, Paul, 梅休因, 保尔, 前者之子, 523, 808

Metz, Claude du, 梅茨, 克劳德·德, 法国大炮专家, 761

Meuse, the, 默兹, 224, 248, 400, 404, 413, 753; 另见
Maas, 马斯

Mexico, 墨西哥, 13, 129, 350, 355—361, 511

墨西哥湾, 498, 500

商船队, 349, 354n., 511, 528

Mezzomorto, Pasha, 梅祖莫托帕夏, 土耳其舰队司令, 565—
566, 615, 628, 790

Middelburg, 米德尔堡, 私掠船员, 20, 800—801

Milan, duchy and city of, 米兰大公领地和城市, 9, 31,
223, 240, 562, 594—595

在奥地利统治之下, 5, 9, 447, 585, 595, 597, 750

竞争的要求, 164, 250, 389, 401, 426, 446—447, 466, 591—593, 594, 596

瓜分, 386, 393, 396

王位继承战, 369, 404, 414, 417, 429

条约 (1707), 432

城市人口, 542

在西班牙统治之下, 557—558

Milet pierre, S. J., 迈尔特, 皮埃尔, S. J., 传教士, 498

Millner, sergeant J., 米尔纳, 萨金特, J., 英国军人, 762

Miloradovich, Michael, 米洛拉道维奇, 米歇尔, 黑塞哥维那首领, 633

Milton, John, 米尔顿, 约翰, 79, 138, 142

Minas, António, Luís de Sousa, 米纳斯, 安东尼奥, 路易斯·德·苏萨, 第二代侯爵, 葡萄牙将军, 429, 433, 527

Minho, province, 米纽省, 526

Minorca, 梅诺卡, 11, 22, 162, 387, 391, 419, 439, 442

为英国人占领, 370, 434, 444, 448, 566, 570, 808—809

乌得勒支, 448, 460, 475

Mirandola, duchy of, 米兰多拉公爵领地, 403, 468, 473, 596

Missions, 传教机构

新教, 128, 152, 492—493, 495; 另见Pietism, 虔信教

东正教, 128, 738

公理会宣传, 128—130

新法兰西, 128—129, 497—499

南美, 129, 356, 503—504, 531, 533, 537

远东, 96, 129—130, 139, 537

菲律宾, 129, 357

马里安纳, 349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

海岸, 545

Mississippi, the, 密西西比河, 13, 498—499, 500—501, 503—504

米切尔, 大卫爵士, 海军中将, 568

Mobile (Louisiana), 莫比尔（路易斯安那）, 360, 365, 498—501, 504

Mocha, 穆哈, 咖啡, 11, 35, 550, 858—859, 862

Modena, 摩德纳, 160, 559, 562

Modena, Rinaldo d' Este, 莫德纳, 里那尔多台斯特, 公爵, 595

Mohilev, 莫希莱夫, 为俄国人占领, 701

Moivre, Abraham de, 莫伊夫, 亚伯拉罕·德, 胡格诺数学家, 39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2, 578, 608, 619—620, 633—636, 647, 683—684, 689, 776

Molière, 莫里哀, 72, 75, 79, 81, 84, 89, 90, 106—108

Molina, Luis de, 莫利纳, 路易斯·德, 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 135n.

Molinos, Miguel le, 莫利诺斯, 米哥埃尔·德,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 146

Mombasa, 蒙巴萨, 为奥马尼所占领, 11, 517

Monaco, 摩纳哥, 403, 466

海盗, 546

Monclova, Melchor Portocarrero Lasso de la Vega, 蒙克洛伐, 迈尔科·波托卡里洛·拉苏·德拉维加, 公爵, 秘鲁总督, 356

Mondovi, rebellions, 蒙多维, 起义, 560

Monmouth, James Scott, 蒙默思, 詹姆士·斯科特, 公爵, 125, 196—198, 202

Monomotapa, the, 莫诺莫塔帕, 516

Mons, fortress, 蒙斯, 要塞, 242, 252, 381, 400, 426, 438, 477—478

煤, 869

Monsanto, 蒙桑托, 527

Montagu, Edward Wortley, 蒙塔古, 爱德华·沃特利, 英国外交家, 641

Montagu, Lady Mary, 蒙塔古, 玛丽夫人, 前者之妻, 40

Montaigne, Michel, 蒙田, 米歇尔, 70

Montalto, Ferdinand de Moncada d' Aragon, 蒙塔尔托, 菲迪南·德·蒙卡达·阿拉冈, 公爵, 351, 353

Montecuccoli, Raimondo, 蒙特科考里, 雷蒙多, 奥地利将军, 743—744, 782

Monteiro, Roque, 蒙梯洛, 洛奎, 葡萄牙政治家, 526

Monteleon, Isidoro Cassado de Azevedo, 蒙特里昂, 艾西多洛·卡萨多·德·阿泽维多, 侯爵, 475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黑山), 618, 632, 635

Montesarchio, prince of, 蒙特萨奇奥王子, 557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孟德斯鸠, 查尔斯·路易·德·塞康达特, 男爵, 33, 100—101, 221—222, 294, 341, 558

Monteverdi, Claudio, 蒙特凡尔第, 克劳迪奥, 音乐家, 103, 108

Montfaucon, Dom Bernard de, 蒙福孔, 多姆·伯纳德·代, 学者, 87

Montferrat, the, 蒙特菲雷特, 159, 164, 418, 466, 558, 560n.

公爵, 447

Montmélian, 蒙梅里安, 243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58, 67

Montreal, 蒙特利尔, 251, 484, 486—487, 496—497

Mont-Royal, 罗亚尔峰

Montserrat, 蒙特塞拉特（岛）, 810

Montucla, J.E., 蒙塔克拉, J.E., 历史学家和数学家, 71

Moore, James, 穆尔, 詹姆士, 卡罗米纳总督, 503—505

Morava, the, 摩拉瓦河, 579—580

Moravia, 摩拉维亚, 7, 575, 584, 599, 605

Morea, the, 摩里亚, 164, 540

在威尼斯人统治之下, 2, 158, 565, 620, 623, 627, 782

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 566, 608, 637—638

威尼斯人割让, 640, 642

Moreri, Louis, 莫雷利, 路易, 词典编辑者, 88

Morin, Jean, 莫兰, 让, 演说家, 140

Morocco, 摩洛哥, 359, 548, 554

Morosini, Francesco, 莫洛悉尼, 弗朗西斯科, 威尼斯指挥官, 560, 620

逝世, 623

Moscow, 莫斯科, 576, 632—633, 654, 665, 702, 718, 738

Moselle, the, 摩泽尔, 223, 225, 404, 755

葡萄酒, 845

Moura, 莫拉, 527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516

Mozart, W.A., 莫扎特, W.A., 105, 111, 113, 116

Müteferrika, Ibrahim, 穆斯菲里卡, 伊布拉欣, 土耳其印刷工, 644

Münster, bishop of, 蒙斯特主教, 166, 182, 250, 410

蒙斯特和约 (1648), 439

Muffat, Georg, 穆法特, 格奥尔格, 德国音乐家, 106, 116

Mughals, 莫卧儿, 11

Muley Ismael, 穆雷·伊斯美尔, 摩洛哥苏丹, 11, 554

Munich, 慕尼黑, 人口, 884

Muralt, Beat Ludwig von, 穆拉特, 比特·路德维特·冯, 瑞士作家, 221

Muratori, Ludovico Antonio, 穆拉托里, 卢多维科·安东尼奥, 历史学家, 33, 87, 559, 595

Muscovy Company, 莫斯科公司, 262, 843

Muslebeshe, 穆斯鲁伯希, 土耳其起义者, 647

Muslims, 伊斯兰教徒, 6, 20, 517, 614, 633, 775—776

陆上贸易, 548—549

贝克塔什教派, 612

信奉什叶派, 645

可兰经, 6, 97, 617

Musschenbrock, Pieter van, 穆申布鲁克, 彼得·冯, 物理学家, 46—47

Mustafa II, 穆斯塔法二世, 苏丹, 623, 626, 629

Mustafa Pasha, 穆斯塔法·帕夏, 首相, 640

Mutiny Act (1689), 反抗法令 (1689), 208

Muy, sieur de, 梅, 先生, 加拿大官员, 501

Nadir Shah, 纳迪尔·沙赫, 波斯征服者, 645

Nagyharsány, battle of (1687), 瑙杰哈沙尼战役 (1687), 577, 620

Naima, 纳伊玛, 土耳其历史学家, 643

Nairne, Captain Thomas, 奈恩, 托马斯船长, 印度代理人, 504—505, 507

Namur, 那慕尔, 要塞和省份, 223, 400, 404, 426, 753

被围 (1691, 1695), 244, 249

栅栏, 381, 399, 413, 477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 438, 467

Nanking, 南京, Portuguese diocese, 葡萄牙主教管区, 130

Nantes, 南特

撤销南特敕令 (1685), 77, 105, 119, 196, 220, 337; 另见胡格诺教

贸易, 812—813, 894

Naples, 那不勒斯, 王国和城市

奥地利与该地, 5, 9, 433, 570, 585, 591—597, 808

文化, 32—33, 558—559, 562

西班牙与该地, 164, 368, 370, 557

菲利普五世在 (那不勒斯), 368, 557

法国与, 387, 393, 395—396, 426

乌得勒支, 447, 451—453, 463, 473

贸易, 535, 540

Narantsouac, mission, 纳拉错克, 传教团, 498

Närke, 纳克, 人口, 885

Narva, battle of (1700), 纳尔瓦战役 (1700), 403, 649, 655—656, 692, 698

Naryshkin, Leo Kirilovich, 纳雷什金, 列昂·基里洛维奇, 俄国的特权贵族, 717—718

Nassau, Johan Willem Friso, 纳索, 约翰·威廉·弗里索, 王子, 弗里斯兰省的行政长官, 415, 465

Nataliya, 纳塔利亚, 彼得大帝之姐妹, 738

Nauplia (Napoli di Romania), 那波利 (罗马尼亚的那波利), 620, 638

Navarino, 纳瓦里诺, 638

Navarre, 纳瓦拉, 9, 353, 363, 375, 387, 389, 440, 862

Navarrete, Pedro Fernández de, 纳瓦莱特, 佩特罗·费尔南德斯·德, 西班牙海军司令官, 364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 805, 842; (1696), 261, 490—491

Nedim, 尼丁, 土耳其诗人, 643

Neerwinden, 内温登, 见兰登

Negapatam, 内加帕丹, 葡属印度, 518

Negroponte, 内格罗蓬特, 622—623, 632

Ne plus Ultra Lines, 极限线, 440, 460, 751

Nerchinsk, Treaty of (1689), 尼布楚条约 (1689), 738

Nesmond, Andre, 内斯蒙特, 安德烈, 侯爵, 法国骑兵中队指挥官, 489

Nestorians, 景教徒, 128

Netherlands, 尼德兰, 见西班牙尼德兰, 联合省

Neuchâtel, 内沙特尔, 尼塞, 451

Neuhäusel, 诺伊豪赛, 见奈维扎姆科

Neutral Rights, 中立权利, 4, 174—175, 187, 234—235, 804—805

Neville, John, 内维尔, 约翰, 英国海军中将, 251

Nevis, 尼维斯岛, 810

Newcastle, 纽卡斯尔, 基尔门的医院, 826

Newcomen, Thomas, 纽科门, 托马斯, 工程师, 69, 869

New Edinburgh, 新爱丁堡, 360; 另见达里安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13, 483, 492—496, 506—508

自治领, 14, 480

九年战争, 12—13, 30, 486—488, 492

王位继承战, 12—13, 30, 501—503, 505—507

贸易, 814, 842, 849

另见康涅狄格州, 马萨诸塞州, 新罕布什尔州, 缅因州, 罗德
岛

Newfoundland, 纽芬兰

鳕鱼场, 14, 261, 548, 809, 849—850

九年战争, 251, 488—489

王位继承战, 503

乌得勒支, 442, 460, 470, 505, 508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12—13ff., 251, 484ff., 496ff.

贸易, 488, 840, 850—851

人口, 485, 496, 508

另见美洲, 传教团, 魁北克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 483, 488, 491, 493, 814

New Jersey, 新泽西, 14, 483, 488, 491, 493, 814

New Mooners, 新蒙纳斯, 493

New Plymouth, 新普利茅斯, 483, 487

Newport (Rhode Island), 新港 (罗德岛), 495—496

New Rochelle (New York province), 新罗歇尔 (纽约省),
493

Newry, 纽里, 233

New Spain, 新西班牙, 500, 511; 另见墨西哥

Newton, Sir Isaac, 牛顿, 艾萨克爵士, 24, 37—40, 49ff.,
86, 88, 156, 260, 343

牛顿定律, 34, 37, 50—53, 70, 137

《光学》, 39, 52—53, 70, 78

微积分, 55

年表, 99

New York, 纽约, 12, 14, 480—490, 493—495, 498, 501

Nicaise Abbé Claude, 尼卡伊塞, 阿贝·克劳德, 法国学者, 77

Nicaragua, 尼加拉瓜, 洋苏木树, 350, 854

Nice, county of, 尼斯郡, 243, 425, 426, 560, 567

Nicholson, Sir Francis, of New England, 尼科尔森, 弗朗西斯爵士, 新英格兰的, 491, 505—507

Nicolas, Jean, 尼古拉, 让, 法国银行家, 304

Nicole, Pierre, 尼科尔, 皮埃尔, 詹森教徒, 132

Nieswicz, 涅沙维茨, 700

Nieuwpoort, 纽波特, 381, 400, 436, 447, 477, 800

Nikon, patriarch of Moscow, 尼康, 莫斯科大主教, 728, 733

Nimes, 尼姆, 丝织厂, 868

Nine Years War, 九年战争, 5, 182, 586—587; 原因, 202—206, 224—226

性质, 11—13, 18, 154, 160, 174—175, 184, 227—232, 741ff., 766ff., 790ff.

战役, 19, 213—216, 232ff., 354—357, 486—489, 558, 566—569, 795—798

经济影响, 174, 244, 314—315, 320, 327, 354n., 814, 839ff., 849, 856, 873, 875, 894, 897

Nish (Niš), 尼什, 579, 610, 621—622, 633, 641, 754, 757

Nithard, Eberhard, 尼撒特, 埃伯哈德, 西班牙耶稣会会士, 351

Nivernais, 尼维尔内, 813, 815

Noailles, Anne-Jules, duc de, 诺阿耶, 安娜—米尔, 公爵, 法国元帅, 235, 248—249

Noailles, Adrien Maurice, 诺阿耶, 安德里安·莫里斯, 公爵, 前者之子, 375

Noailles, Louis Antoine, 诺阿耶, 路易·安东尼, 巴黎红衣主教, 133, 147

Nollet, Abbé Jean Antoine, 诺莱, 阿贝·让·安东尼, 科学家, 46—47

Nonjurors, 1689年革命后拒绝对威廉三世和玛丽宣誓效忠的英国国教牧师, 123, 127, 209, 212, 215

Norbis, Abbé, of Vienna, 诺比斯, 阿贝, 维也纳的, 311

Norfolk, serges, 诺福克, 哗叽, 865

Normandy, 诺曼底, 325, 329, 863, 866, 900

Norris, Sir John, 诺里斯, 约翰爵士, 海军中将, 489, 817

Norrköping, 诺尔彻平, 806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 煤, 869

Norway, 挪威, 见Denmark

Nottingham, Daniel Finch, 诺丁汉, 丹尼尔·芬奇, 第二代男爵, 169, 205, 216, 392

Notting hamshire, 诺丁汉郡, 人口, 885, 887

Noudar, 诺达, 527

Nourse, Timothy, 诺斯, 蒂莫西, 英国道德家, 145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 505, 814; 见Acadia, 阿凯迪亚

Nové Zamky, 新扎姆基(土耳其的)省和要塞, 608, 619

Novi, 诺维, 土耳其警卫队, 640

Nuremberg, 纽伦堡, 45, 421

Nymegen, Treaties of (1678—1679), 宁姆根条约(1678—1679), 171, 223, 383, 411, 473, 761

Nystad, Peace of (1721), 尼斯塔特和约(1721), 1, 3, 171, 678—679, 738—739

Oates, Titus, 奥茨, 泰特斯, 英国的阴谋家, 270

Occasional Conformity Act (1711), 法令(1711), 273, 461

Ochakov, fortress, 奥恰科夫, 要塞, 610, 630

Oder, the, 奥得河, 2, 605

Ösel, island, 厄塞尔岛, 649

Ogilvy, George, 奥杰尔维, 乔治, 俄国将军, 660

Ogiński family, of Lithuania, 立陶宛的奥金斯基家族, 690, 693

Ogiński, Gregory, 奥金斯基, 格雷戈里, 哥萨克首领, 700

Ohio, protection of valley, 俄亥俄, 山谷的警戒, 500

Old Pretender, 老觊觎王位者, 见詹姆士·斯图亚特

Oldenburg, Henry, 奥尔登伯格, 亨利, 科学评论家, 40

Oleolis, Pierre d', 奥利奥里, 皮埃尔·德, 法国商人, 517

Oliva, battle of (1697), 奥立伐战役 (1697), 688

Olivares, Gasper de Guzmán, 奥立伐尔斯, 加斯珀·德·格斯曼, 公爵, 西班牙政治家, 366

Olkienniki, Battls of (1700), 奥尔基尼基战役 (1700), 693—694

Omani Arabs, 阿曼尼阿拉伯人, 11, 517

Omerique, Antonio Hugo de, 奥默利克, 安东尼奥·休戈·德, 西班牙几何学家, 343

Oneglia, privateers, 奥涅格里亚, 私掠船船员, 546, 801

Onod, rebel Magyar assembly (1707), 奥诺特, 马扎尔人反抗集会 (1707), 585

Opatów, military confederacy, 奥帕托, 军事同盟, 698

Oporto, 奥波尔托, 510, 520—521, 849

葡萄酒港口, 521, 523, 845—846

Oppenheimer, Samuel, 奥本海默, 塞缪尔, 维也纳银行家, 309, 311—312, 788—789

Oran, Moorish attacks, 奥兰, 摩尔人的进攻, 390

Order of Aviz, 阿维斯修道会, 537

Order of Christ, 基督会, 537

Order of Mercy, 仁济会, 545

Order, of Santiago, 圣地亚哥会, 537

Orel, the, 奥勒尔, 作为俄国的边境, 637

Orinoco, the, 奥里诺科河, 356

Orléans, 奥尔良, 菲利普公爵, 与玛丽·路易斯

Orlik, Philip, 奥立克, 菲利普, 哥萨克首领, 633, 637, 732

Ormonde, James Butler, 奥蒙德, 詹姆士·巴特勒, 第二代公爵, 418

1712年的限制法令, 443, 464

Oropesa, Manuel Joaquin, 奥雷佩沙, 曼纽尔·乔基, 公爵, 西班牙政治家, 351, 358—359, 361

Orry, Jean, 奥里, 让, 法国在西班牙的财政顾问, 365—366, 369—372, 376, 377, 378

召回凡尔赛 (1704), 369; (1706), 371

回到西班牙 (1713), 377

被免职 (1714), 380

Orsova, 奥尔肖瓦, 641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 128, 188

在希腊, 553, 554, 633, 637

在塞尔维亚, 580, 632

在鲁瑟尼亚, 696

在君士坦丁堡, 617, 635

另见Russia, Turkey

Osnabrück, bishop of, 奥斯纳布吕克主教, 405

Ossian (James Macpherson), 奥西恩 (詹姆士·麦克弗森), 伪装的盖尔人的唱诗人, 93

Ostend, 奥斯坦德, 248, 390, 400, 436, 439, 447

为同盟国所占领 (1706), 426—427

公司, 390, 478, 857

海盗, 800

Osuna, F.M. de P. Acuña Pachecoy Tellez-Giron, duke of, F.M. 和 P. 亚森那·佩切科·泰莱茨—吉隆, 奥森纳公爵, 352

Otranto, strategic position of, 奥特朗托的战略地位, 540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见 Turkey

Oudenarde, fortress, 奥德纳德, 要塞, 381

战役 (1707), 435, 752, 757

Oulx valley, 奥尔克斯山谷, 467

Ouro Preto, 乌罗·比勒托, 533

Ouwerkerk, Hendrik, 奥文柯克, 亨德里克, 拿骚公爵, 荷兰陆军元帅, 415, 422

Overijssel, 上艾塞尔, 烟草栽培, 852

Oxenstierna, Bengt, 奥克森谢尔纳, 本特, 瑞典人, 172, 184, 658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 大学, 43, 78, 125, 152, 216, 262

牛津大学图书馆收集的手稿, 87

马格达莱大学, 125, 199

持异议者, 274

Oxford, earl of, 牛津伯爵, 见 Harley, 哈利

Oyapok, the, 奥耶波克河, 528, 531

Oyster River (New England), 奥伊斯特河 (新英格兰), 487

Ozü, 大津, 见Ochakov, 奥恰科夫

Pac, 巴, 立陶宛的部族, 685

Padua, 帕多瓦, 555, 636n.

Pagan, Blaise François de, 佩根, 布莱斯·德, 梅维尔公爵, 法国军事工程师, 750

Paget, William, 佩吉特, 威廉, 第六代男爵, 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特使, 622

Pajkul, Otto Arnold von, 佩吉考尔, 奥托·阿诺德·冯, 利沃尼亚官员, 699

Palamos, sieges of (1694—1695), 包围帕拉穆斯 (1694—1695), 248, 568

Palatinate, the, 巴拉丁领地, 5, 30, 120, 166—167, 189, 578, 589—590

劫掠 (1688), 233, 741, 786

难民 (帕拉坦), 274, 493—494

部队, 404

王位继承战, 408, 410

乌得勒支, 468

另见法尔茨—诺伊贝格的约翰·威廉和菲利普·威廉

Palej, Semen, 佩莱吉, 西曼, 哥萨克领袖, 696, 699

Palermo, 巴勒莫, 557

人口, 542

海战 (1676), 565

Palestrina, G. P. da, 帕莱斯特里纳, G. P., 音乐家, 102

Paley, William, 佩利, 威廉, 英国神学家, 85

Pálffy, Counts John and Nicholas, 佩尔菲, 约翰和尼古拉公爵, 匈牙利权贵

Palma, Luis António Tomas, 帕尔马, 卢伊斯·安东尼奥·托马斯, 公爵, 卡泰罗尼亚总督, 362

Pamphylia, 潘菲里亚, 541

Panama, 巴拿马, 376, 530

Papachino, Victorio, 帕普契努, 维克多利奥, 西班牙海盗, 567

Papacy, 教皇, 见英诺森十一世, 亚历山大八世, 英诺森十二世, 克雷芒十一世

Papenbroeck, Daniel van, 帕本布洛克, 丹尼尔·凡, 约翰·博兰信徒, 编纂圣徒传, 140

Pará (Belém), 帕拉(贝伦), 530, 537

Paracelsus (T.B. von Hohenheim), 帕拉切尔苏斯(T.B. 冯·霍亨海姆), 16世纪科学家, 54

Paraguay, 巴拉圭, 耶稣会传教团, 129, 357, 529, 533, 537

Paranaguá, 巴拉那瓜, 淘金, 534

Paris, 巴黎

罗浮宫, 40—41

天文台, 41

王家花园, 41—42, 56

科学, 47, 84; 另见科学院

法国科学院, 76

出版业, 78, 105

宫廷与市镇, 81, 341

内维尔府第, 342
剧院, 32, 89—90, 106, 109
音乐, 32, 104—109, 324
罗亚尔港, 132, 334
大理院, 132, 335
大学, 43, 47, 132
圣日耳曼德普雷, 87
大主教, 133, 147
伊西, 神学家会议, 147—148
夏朗东, 耶稣教会, 336
人口, 541
食物供应, 31, 323, 882, 890—891, 899, 901
农场主集团, 300
市政府, 301
建筑业从业人员, 323, 882
警察, 324
征召新兵, 326
税收, 332
外国的传教团, 499
彼得大帝在巴黎, 737
法国珍贵的织锦, 737
丝织厂, 867
贸易, 867, 890
白蠟的定价, 882, 899

Paris la Masse, 巴黎的梅西, 法国皇太子妃的承包商, 336

Paris la Montagne, 巴黎的蒙塔古, 前者之子, 336

Párkány, 帕卡尼, 618

Parker, Captain Robert, 帕克, 罗伯特, 陆军上尉, 英国军人, 757, 762

Parker, Samuel, 帕克, 塞缪尔, 牛津主教, 199

Parma, duchy of, 帕尔马大公, 160, 164, 473, 594—595

Parry, Sir Hubert, 帕里, 休伯特爵士, 英国音乐家, 102

Partition Treaties, 分割条约, 154, 156—157, 161—163, 186—187, 191, 266, 268, 447, 525

第一次 (1698), 176, 358, 393—394

第二次 (1700), 154, 360, 395—396, 400, 402, 655

秘密瓜分 (1668), 387

Pasajes, 帕萨赫, 西班牙造船所, 565

Pascal, Blaise, 帕斯卡尔, 布莱斯, 144, 147, 341

Passarowitz, Peace of (1718), 帕萨罗维茨和约 (1718), 1—2, 158, 581, 604, 641—642, 645

Passau, 帕绍, 为巴伐利亚人所占 (1703), 417

Pastorius, Francis Daniel, 帕斯托卢斯, 弗朗西斯·丹尼尔, 德意志移民领导人, 493

Pata (patta), 帕塔, 为阿曼人所占领, 517

Paterson, William, 佩特森, 威廉, 苏格兰的理财家, 15, 360

Patiño, José, 帕丁努, 约瑟, 西班牙政治家, 379

Patkul, Johann Reinhold von, 帕特库尔, 约翰·莱因霍尔特·冯, 利沃尼亚的贵族, 652—653, 663, 701, 734, 773, 775

Patrona Halil, 佩特洛纳·哈里尔, 土耳其近卫军首领, 646—647

Paxton, Peter, 帕克斯顿, 彼得, 医生和历史学家, 33

Pecquet, Antoine, 佩克奎特, 安托万, 政治理论家, 173

Peking, 北京, 1, 35, 96, 130, 738

Pelew Islands (Palaos), 帛琉群岛 (帕拉奥斯), 357

Pellegrin, Abbé Simon Joseph, 佩利格林, 阿贝·西蒙·约瑟夫, 歌剧作者, 107

Pels, Andreas, 佩尔斯, 安德烈亚斯, 荷兰商人, 303

Peniche, 皮尼希 (岛), 537

Penn, William, 佩恩, 威廉, 教友派信徒, 123—124, 483, 491, 764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483—484, 488, 491, 493

Pensacola, bay of, 彭萨科拉湾, 356, 360, 364—365, 500—504

Pentagoët, fort and mission, 彭塔各沃特, 要塞和传教地区, 498; 见卡斯丁

Pepusch, John Christopher, 佩普奇, 约翰·克利斯托夫, 音乐教授, 104, 107

Pepys, Samuel, 佩皮斯, 塞缪尔, 海军部长, 827, 830

Pereira, Mendo de Folos, 佩雷拉, 门多·德·福洛斯, 葡萄牙总理, 516, 526

Perekop, isthmus of, 彼列科普地峡, 625

Perevolochna, battle of (1709), 佩列沃洛钦那战役 (1709), 1, 668—670, 674

Pergolesi, Giovanni Battista, 佩尔戈莱西, 乔凡尼·巴蒂斯塔, 那不勒斯音乐家, 113, 559

Peri, Jacopo, 佩里, 雅各普, 佛罗伦萨音乐家, 109

Périgord, iron, 佩里各特, 铁, 812

葡萄酒, 845

Perle, fortress, 佩尔, 要塞, 477

Pernambuco, 伯南布哥, 530—532, 534

Perrault, Charles, 佩劳特, 查尔斯, 诗人和评论家, 342

Perrault, Claude, 佩罗, 克劳德, 建筑师和医生, 40, 51, 56

Perrin, Pierre, 佩林, 皮埃尔, 法国歌剧作家, 106

Perrot, Nicolas, 佩罗特, 尼古拉斯, 加拿大探险家, 499

Persia, 波斯, 95, 551, 571, 608—609, 611, 649, 687

阿富汗入侵, 644

俄土瓜分, 645, 739

贸易, 551n., 857, 859—862, 868

Peru, 秘鲁, 13, 15, 41, 350, 354, 359, 376, 528, 530

Peschiera, fortress, 佩斯奇拉, 要塞, 753

Peter I, the Great, 彼得一世, 大帝, 俄国沙皇

性格和教养, 188, 633, 716—718

武装力量, 718—719, 720—723, 775—777

旅游, 21, 75, 172, 719, 737

公务, 29, 730, 775, 777

经济政策, 723—725

行政改革, 725—727

教育与文化, 726—727

改变教会, 728—729

反对者，719—720，731—733

逝世，733

另见北方大战，波尔塔瓦，普鲁斯，俄国，圣彼得堡

Peter II，彼得二世，葡萄牙国王，168，395

大同盟，163—164，418，466，525

Peterborough, Charles Mordaunt，彼得巴勒，查尔斯·莫道特，第三代伯爵，在西班牙，425，430，757

Peterwardein, fortress，彼得华亭，要塞，580，621，623，626

战役（1716），639—640，642

Petkum, Hermann，彼特金姆，赫尔曼，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在海牙的居民，182—183，447，456

Petre, Edward，彼得，爱德华，耶稣会教徒向詹姆士二世忏悔者，195，197，200，204

Petrinje，佩特里尼亚，581

Petrovich, Daniel，彼得洛维奇，丹尼尔，塞尔维亚主教，633

Petty, Sir William，佩蒂，威廉爵士，经济学家，48

Peyssonel, J.A.，皮松纳，J.A.，法国博物学家，57

Peyster, Abraham de, of New York，纽约的佩斯特，亚伯拉罕·德，482

Pforzheim，普福尔茨海姆，为法国占领（1692），245

Philadelphia，费城，42，493—494

Philip William, of Pfalz-Neuburg，法尔茨—纽贝格的菲利普·威廉，有选举王权的伯爵，168，578，589

Philip III，菲利普三世，西班牙国王，386

Philip IV，菲利普四世，西班牙国王，384，388

Philip V, 菲利普五世, 西班牙国王, 安茹公爵, 8, 9, 19, 369, 372, 425, 430, 440

亲属, 168, 388

继承卡洛斯二世, 360—361, 396—397

到达西班牙, 361—362

性格, 362—363

与路易十四, 16, 161, 164, 361—364, 373—377, 446, 451—456

在那不勒斯, 368, 557

婚姻, 367, 380, 404

被承认, 397, 400, 414, 441, 448, 451—452, 459, 463—464, 470, 475—476

see also Orry, Partition Treaties, Spain

Philip, duke of Orléans, 菲利普, 奥尔良公爵, 429, 737

Philippines, the, 菲律宾, 129, 346, 349, 357, 387

Philippopolis, 菲利波波利, 610

Philippsburg, fortress, 菲利普斯堡, 要塞, 203, 215, 225, 755

为法国所占领 (1688—1697), 232, 237, 252

Phip (p) s, Sir William, 菲普斯, 威廉爵士, 马萨诸塞州总督, 251, 483, 487

Piacenza, 皮亚琴察, 帝国的封地, 473, 595

Piazzetta, Giovanni Battista, 皮亚齐塔, 乔尼·巴蒂斯塔, 威尼斯画家, 556

Picard, Jean, 皮卡德, 让, 法国天文学家, 40

Picardy, 皮卡迪, 438, 863, 866

Piccolomini, Count Aeneas Silvius, 皮科洛米尼, 爱尼亚·西尔维厄斯伯爵, 帝国将军, 579

Pico (Azores), 皮科岛 (亚速尔群岛), 葡萄酒和白兰地, 520

Piedmont, 皮埃蒙特, 见 Savoy-Piedmont, 萨伏依—皮埃蒙特

Piekary, 皮埃卡莱, 修道院, 687

Pietism, 虔信派, 24, 120, 125, 128, 146, 149—151

Pilawce, battle of (1648), 皮劳斯战役 (1648), 682

Pinerolo, 比内罗洛, 要塞, 160, 238—241, 245—252, 559

Piombino, channel of, 皮昂比诺海峡, 540

Piper, Count Carl, 派珀, 卡尔伯爵, 瑞典的大法官, 184, 652, 661, 667

Piracy, 海盗行为, 11—12, 31, 349, 541, 544

Pitea, 皮特欧, 806

Placentia (Plaisance), 普拉森夏 (普莱桑斯), 488—489, 503, 850

Plague, visitations of, 瘟疫, 视察

意大利 (1630—1631), 542, 543; (1656), 542, 543

西班牙 (1630—1631), 543; (1676—1685), 345, 886

伦敦 (1665—1666), 283, 886

法国 (1666), 886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 (埃及除外) 海岸 (1691—1692), 543

哈布斯堡领地 (1691—1692, 1709—1714), 670, 886n.

波兰 (1706—1713), 705, 886n.

波罗的海地区 (1709—1712), 774

勃兰登堡 (1711), 886n.

哥本哈根（1711），886n.

瑞典（1710—1712），672；卡尔斯克鲁纳，820

萨洛尼卡（1719），644

马塞，普罗旺斯（1720—1723），868，886

Plate, the (Rio Plata)，普莱特河（里奥普莱塔），350，365，476，525—532

Ploudaniel，普卢达尼埃尔，制帆篷的布，817

Plowman, William，普洛曼，威廉，海盗，544，801

Pluche, Abbé Noël Antoine，普卢契，阿贝·诺埃尔·安托万，科学普及知识的推广者，85

Plymouth，普利茅斯，军舰修造所，22，229，811，818

海军医院，825

Po, the，波河，223，595，753

Pociej, Lewis，波契杰，刘易斯，立陶宛的财政大臣，后为哥萨克的首领，703，708，711

Podhajce，波特哈杰斯，小规模的战斗（1698），688

Podlesia，波特莱西亚，695—696

Podolia，波多里亚，2，608，619，627，683—684，696

Pointe-aux-Trembles (New France)，特朗布尔角（新法兰西），496

Pointe Levis (New France)，莱维斯角（新法兰西），496

Pointe-Verte (Newfoundland)，韦特角（纽芬兰），488

Pointis, Bernard Louis Desjean，波伊蒂，伯纳德·路易·德西让，男爵，法国骑兵中队指挥官，251，355，489，545，809

Polaga (Polangen)，波拉加（波兰根），687，692，699

Polignac, Abbé Melchior de, 波利格纳克, 阿贝·梅尔基奥尔·德, 法国驻波兰大使, 439, 462, 686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Rzeczpospolita), 波兰—立陶宛联邦 (热茨波斯波利塔)

人口, 705

宗教, 119, 128, 188, 714

分裂, 2, 681—683, 704—706, 714—715

与萨克森联合, 2, 683, 687—688, 689, 693, 700, 709—710, 713—714

萨克森部队在联邦, 689, 691, 694, 696, 704—705, 710—713

王家军队, 21, 696, 707, 709—710, 713, 776

控制王室, 656—659, 663, 684—688, 697, 699, 701—704, 707, 709

卡尔十二和联邦, 2, 631, 656ff., 661, 693ff., 698—700, 704—705, 714

和哈布斯堡, 581, 683—685, 695, 701, 710

和土耳其, 619—620, 627, 631, 634, 636—637, 645, 672, 683—684, 688—689, 692, 709—710

和哥萨克, 696, 699, 759

经济, 682, 704—705, 714, 836ff.

财政, 184, 690, 704, 706, 713—714

王权, 177, 681, 691—692, 698, 709

哥萨克首领的权力, 685n., 706, 708, 711, 713—714

瘟疫, 705, 886n.

国民议会, 177, 681, 686, 691—692, 694—695, 698, 703, 707—709, 712—714

国民会议议员, 685, 691, 709, 713

“黄金自由”, 682—683, 691, 693, 706, 711—712

奥古斯都第二, 联盟, 莱斯佑斯基, 立陶宛, 索毕斯基

Polonka, battle of (1660), 洛隆卡战役 (1660), 682

Poltava, battle of (1709), 波尔塔瓦战役 (1709), 1—5, 185, 439, 630, 667—669, 699, 703, 708, 732, 755

转折点, 733—739, 755, 757, 744, 806

伤亡人数, 749

Pomerania, Eastern (Polish), 东波美拉尼亚 (波兰的), 710

Pomerania, Swedish, 波美拉尼亚, 瑞典的, 631, 656, 670—671, 679, 703, 707, 712, 806, 852

Pomponne, Simon Arnaud, 蓬波尼, 西蒙·阿尔诺, 侯爵, 法国外交大臣, 161, 389, 397

Ponant, the (French oceanic Ports), 波纳特 (法国海港), 234, 812

Pondicherry, 本地治里, 252, 518, 856

Poniatowski, Count Stanislas, 波尼亚托斯基, 斯坦尼斯拉斯伯爵, 波兰官员, 卡尔十二的追随者, 631, 637, 736

Pontchartrain, Jérôme Phélypeaux de, 蓬夏特兰, 热罗姆·菲利波·德, 法国海外殖民大臣, 13, 499—501, 506, 828, 829, 830

Pontchartrain, Louis Phélypeaux de, 蓬夏特兰, 路易·菲利波·德, 前者之父, 总管理员和海外殖民大臣, 40, 242—243, 298, 331, 485, 499, 830

Pope, Alexander, 蒲柏, 亚历山大, 诗人, 80—82, 86, 107

Popish Plot (1678), 教皇的密谋 (1678), 196, 211, 273, 279

Porcio, Nicolás, 波尔西奥, 尼古拉, 西班牙奴隶贩卖者, 350

Porpora, Nicola Antonio, 波尔波拉, 尼古拉·安东尼奥, 那不勒斯音乐家, 111

Portalegre, 波塔莱格雷, 527

Portland, Hans Willem Bentinck, 波特兰, 汉斯·威廉·本廷克, 第一代男爵, 156, 161, 170, 202, 226, 266, 388—389, 395

赖斯威克, 252, 388

Port Mohon, 马翁港, 见Minorca, 米诺卡

Portobello, 波托贝洛, 350, 376, 530

Portocarrero, Luis Emmanuel Fernández Boccanegra, 波尔托卡里洛, 路易斯·伊曼纽尔·费尔南德斯·博卡内格拉, 托莱多红衣主教, 9, 358, 361, 365, 367, 371, 396

Porto Ercole, 埃尔科尔港, 387n., 546

Port-Paix, 帕克斯港, 355

Port-Royal, 罗亚尔港, 女修道院, 132, 334

Port Royal (Annapolis), 罗亚尔港(安纳波利斯), 12, 487, 497, 502, 505, 508

Port Royal (Jamaica), 罗亚尔港(牙买加), 810

Port St Mary, 圣玛丽港, 418

Portsmouth, 朴次茅斯, 船坞, 229, 811, 819

Portugal, 葡萄牙

与英国, 16—17, 163—164, 261, 418—420, 466, 512ff., 521ff., 535, 569, 808

与西班牙, 365, 466, 476, 511, 514, 519, 524ff.

与法国, 163—164, 183, 364, 365, 407, 466, 512—513, 519—520, 522ff., 528, 531, 535

财政, 347, 511, 514, 517, 526, 536

酒的出口, 261, 419, 520ff., 538, 845—846

王位继承战, 418—419, 422, 465, 429—430, 433, 438, 808

价格的变化情况, 509ff., 519—520, 527, 535

农业, 509, 520ff., 527—528, 537—539

食盐, 509, 519, 532, 844—845

宗教, 511, 531, 532—533, 537—539

工业, 512—513, 523, 524, 535—536

银, 511, 514, 517, 520, 528, 529, 533

黄金, 261, 533—535

食糖, 510, 517, 519—520, 531, 534

皮革, 529—530, 532

东非, 516—518

社会结构, 522—523, 537—539

另见Angola, Azores, Brazil, India, Macao, Madeira,
Peter II, slavery

Pososhkov, I. T., 波索希科夫, I. T., 俄国经济学家, 723

Potocki, Joseph, 波托斯基, 约瑟夫, 国王斯坦尼斯拉斯的军事
总指挥官(波兰), 696, 703

Potocki, Michael, 波托斯基, 米歇尔, 前者之子, 689

Potosi, 波托西, 银矿, 528

Povey, Thomas, 波凡, 托马斯, 伦敦商人和殖民地顾问, 506

Poznań (Posen), 波兹南(波森), 712

Pozzo, Andrea, 波佐, 安德烈亚, 意大利画家, 145

Pragmatic Sanction (1713), 国事诏书(1713), 7, 156, 592

Prague, 布拉格, 601, 719

Prandtauer, Jakob, 普兰德陶尔, 雅各布, 德意志建筑师, 602

Preobrazhensky Guards, 普利奥勃拉赞斯基近卫军, 俄国, 721, 777

Presidii, Stato dei, 见Tuscany, 托斯卡纳

Prešov, 普雷肖夫, 见Eperjes, 埃佩奇

Pressburg, 普雷斯堡, 306, 577, 585—586

Prévost, Abbé Antoine François, 普雷沃, 阿贝·安托万·弗朗索瓦, 法国小说家, 32, 92, 95

Prié, Ercole di Turinetti, 普里埃, 厄尔科莱·迪·图里内托, 侯爵, 萨伏依驻维也纳使者, 598

Principe island, 普林西比岛, 进口奴隶的港口, 515

Prior, Matthew, 普里奥, 马修, 英国诗人和外交家, 186, 459—461, 469—470

Privateering, 私掠巡航, 6, 12, 19—20, 174, 187, 349, 354, 792, 801—804, 809, 820, 834

泽兰的, 20, 174, 187, 420, 427, 546—547, 500, 800—801

法国的, 487, 489, 503, 528, 802—804

地中海, 357, 390, 515, 543, 544—548, 558, 619; 另见Barbary Coast,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沿岸

敦刻尔克, 734, 800, 802, 812, 848

加勒比地区, 见flibustiers

波罗的海, 4, 675, 802, 808

Probabilism, 盖然说, 147, 153

Prokopovich, Feofan, 波罗科波维奇, 费奥凡, 俄国主教, 729

Protestantism, 新教教会, 7, 14, 25, 76—77, 119ff., 138, 141ff., 188—189, 193ff., 259, 273, 506, 604

波兰, 119, 687

萨伏依, 238

里斯威克, 189, 252, 383, 473—474, 588

波希米亚, 602; 匈牙利, 583, 586

另见Calvinism, 加尔文派, Dissenters, 不信奉国教者(英国), Huguenots, 胡格诺派, Lutheranism, 路德教派, Pietism, 虔信教派

Provence, 普罗旺斯, 240, 465, 829, 889

农业, 548, 839; 谷物供应, 548, 813

工业, 863—864

人口, 889, 900

Prussia, 普鲁士, 见Brandenburg Prussia, 勃兰登堡—普鲁士

Pruth, the, 普鲁斯, Russian surrender at (1711), 俄国人包围该地(1711), 1, 185, 634—635, 736

条约(1711), 636, 709

Przebendowski, Jan Jerzy, 普尔泽本道斯基, 简·杰佐, 波兰财政大臣, 689, 709

Pufendorf, Samuel von, 普芬道夫, 塞缪尔·冯, 德意志法官, 74, 173

Pultusk, battle of (1703), 普尔托斯克, 战役(1703), 696

Purcell, Henry, 珀塞尔, 亨利, 102—104, 107—108, 113—114, 144

Puységur, Jacques François de Chastenot, 普赛居, 雅克·弗朗索斯·德·夏斯坦内, 侯爵, 法国元帅, 746, 762

Pyrenees, Treaty of the (1659), 比利牛斯条约(1659), 234, 246

Quadruple Alliance (1718), 瓜特罗普尔联盟(1718), 27

Quakers, 教友派教徒, 25, 140, 146, 149—151, 210, 259, 264

在北美洲, 492—493

Quary, Robert, 夸里, 罗伯特, 在北美的总检查官, 491

Quebec, 魁北克

反对远征, 13; (1690), 251, 487; (1711), 441, 457, 470, 505—506, 508

主教管区, 128, 484—485, 497, 499

地方议会, 484—485

人口, 496

学校, 496—497

国外布道团的神学院, 499

Queensberry, James Douglas, 昆斯伯里, 詹姆士·道格拉斯, 第二代大公, 276

Quercy, Lower, 奎尔西下游, 小麦, 839

Quesnel, Pasquier, 奎斯内尔, 帕斯奎尔, 詹森派教徒, 132—133, 334

Quietist controversy, 寂静教徒的论战, 24, 128, 137, 147—150, 327

Quinault, Philippe, 基诺, 菲利普, 法国歌剧的歌词作者, 110, 112

Quito, 基多, 356, 530—531

Rabutin[-Bussy], Count Ludwig von, 拉布丁[布西], 路德维格·冯伯爵, 帝国将军, 585

Racine, Jean, 拉辛·让, 33, 72, 82—83, 106—108, 110—112

Radicati, Count Alberto, 拉迪卡蒂, 阿尔贝托伯爵, 自由思想家, 562

Radogoszcz, battle of (1715), 拉多各斯采战役 (1715), 711

Radosczkowice, 拉多齐科威采, 665, 702

Radziejowski, Michael, 拉齐乔斯基, 迈克尔, 波兰红衣大主教, 657—658, 686, 688, 690, 694—698

Radziwill, Charles, 拉齐维尔, 查尔斯, 立陶宛大臣, 700

Radziwill, Ludwika Karolina, 拉齐维尔, 路德维卡·卡洛琳娜, 立陶宛女继承人, 685

Ragusa (Dubrovnik), 拉古萨 (杜布罗夫尼克), 549, 608, 632

Raguzinsky, 拉古金斯基, 见Vladislavich, 符拉迪斯拉维奇

Rákóczi, Count Francis Leopold, 拉科齐, 弗朗西斯·利奥波尔德伯爵, 匈牙利起义者, 5, 7, 154, 169, 412, 584—586, 605, 639

与波兰, 585, 664, 701

Rameau, Jean Philippe, 拉莫, 让·菲利普, 音乐家, 107—108

Ramillies, battle of (1706), 拉米伊战役 (1706), 164, 176, 370, 426—429, 446, 752, 756—757

影响, 662

Randolph, Edward, 伦道夫, 爱德华, 北美总检查官, 480, 483, 490, 506

Rapin, René, S. J., 拉潘, 勒内, S. J., 法国评论家, 78

Rasle, Sébastien, S. J., 拉斯尔, 塞巴斯蒂安, S. J., 传教士, 498

Rastatt, Peace of (1714), 拉施塔特和约 (1714), 5, 167, 171

协商, 444, 446, 472—474

Ratisbon (Regensburg), Truce of (1684), 雷根斯堡 (雷根斯堡) 休战协定 (1684), 17, 182, 202—203, 343, 588

议会 (1713), 182, 471, 473—474, 587—588

Rattista, 特拉蒂斯塔特, 590

Raudot, Jacques, 劳道特, 雅克, 新法兰西的地方行政长官, 496

Ravensberg, county of, 拉文斯堡州, 225

Rawa Ruska, treaties of (1698, 1716), 拉瓦—鲁斯卡, 条约 (1698, 1716), 692, 712

Ray, John, 雷, 约翰, English naturalist, 英国博物学家, 35, 40, 56, 58—60, 85, 142—143

Réaumur, René Antoine Ferchault de, 列奥米尔, 勒内·安托万·费尔肖·德, 法国科学家, 41, 47, 54, 57, 61, 65—67

Rébenac, François de Pas, 雷贝纳克, 弗朗索瓦·德·帕斯, 伯爵, 法国外交家, 160

Red Sea, 红海, 11, 610—611

Redi, Francesco, 雷迪, 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医生, 64

Redondo, 雷东多, 538

Regensburg, bishop of, 雷根斯堡的主教, 399; 见Ratisbon, 雷根斯堡

Régis, Pierre Sylvain, 雷吉斯, 皮埃尔·西尔万, 笛卡儿主义者, 84

Regnard, Jean François, 勒尼亚尔, 让·弗朗索瓦, 剧作家, 90

Rehnskiöld, Count Karl Gustaf, 伦斯舍尔德, 卡尔·古斯塔夫伯爵, 瑞士元帅, 654—656, 660—661, 700, 757, 761

在波尔塔瓦被俘，669

Rémonville, 雷蒙维尔，路易斯安那州的，500

Rennes, 雷恩，军事谈判，335

Repnin, Prince Nikita Ivanovich, 雷普宁，尼基塔·伊凡诺维奇亲王，俄国元帅，634

Resht, 雷什特，为俄国人所占领（1722），739

Rethel, 雷伐尔，羊毛织品，864

Retz, Jean François Paul de Gondi, 雷斯，让·弗朗索瓦·保尔·德·贡蒂，红衣主教，回忆录，91

Reval, 雷伐尔，贸易，649, 773, 837

Reventlan, Count Christian Ditlev von, 雷文特洛伯爵，克里斯蒂安·迪特莱夫·冯，奥地利将军，429

Rheims, 兰斯，羊毛织品，864

Rheinberg, 莱茵堡，要塞，224, 237, 413, 416

Rhine, the, 莱茵河，4, 6, 9, 17, 223—224, 245, 405, 417, 753, 845—847

Rhode Island, 罗德岛，483, 491, 502

Rhône, the, 罗纳河，813, 889

贸易，845, 867—868

Rialp, Ramón de Vilana Perlas, 里亚尔，拉蒙·代·维拉纳·珀拉斯，侯爵，西班牙法学家，593

Ribeira, Luis Manoel da Camara, 里贝拉，路易斯·马诺埃尔·达·卡玛拉，第三代伯爵，亚速尔岛的工业家，536

Ribeiro de Macedo, Duarte, 里贝洛·代·马塞多，杜阿尔特，葡萄牙驻法国大使，512, 516

Ricci, Sebastiano, 里奇，塞巴斯蒂亚诺，威尼斯画家，556

Richelieu, 黎塞留, 大主教, 165, 735, 744

与海军, 792, 804, 822

Richerism, 里奇派, 134

Ricous, Louis Gaspard de, 里科斯, 路易斯·加斯帕德·德, 外交家, 182

Riga, 里加, 2, 10, 30, 649, 659, 692, 708, 773

海军补给基地, 840—843

其他贸易, 837, 847

Rights, Bill of (1689), 权利法案 (1689), 265

Rio Grande do Sul, 南里奥格兰德, 534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466, 528—529, 532, 534, 537

Rio Napo, 里奥纳普, 耶稣会传教地区, 356, 531

Rio Negro, 里奥内格罗, 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教地区, 531

Riquet, Pierre Paul, 里奎特, 皮埃尔·保尔, 运河营造者, 564

River Brethren, 里弗兄弟会, 493

Roberti, G. Frigimelica, 罗贝蒂, G. 弗里吉梅利卡, 歌剧的歌词作者, 112

Robinson, Dr. John, 鲁宾逊博士, 约翰, 温泽教长 (1707) 和布里斯托尔主教 (1710), 外交家, 186, 462

Robinson, Sir Tancred, 鲁宾逊爵士, 坦克雷德, 博物学家, 96

Roche, Michel de la, 罗奇, 米歇尔·德·拉, 胡格诺教宣传员, 78

Rochefort, 罗什福尔, 军火库, 22, 390, 562, 793, 812, 815, 820—821

Rochester, Laurence Hyde, 罗彻斯特, 劳伦斯·海德, 第一代伯爵, 195, 198, 209, 215, 267—268

Rocroi, battle of (1643), 罗克劳伊战役 (1643), 239, 343, 744

Roemer, Olaus, 罗默, 奥劳斯, 丹麦天文学家, 40

Roermond, 鲁尔蒙特, 要塞, 416, 477

Roger, Estienne, 罗杰, 埃斯廷, 荷兰印刷商, 105, 116

Rogers, Captain Woodes, 罗杰斯船长, 伍兹, 海盗和环球航行者, 96—97, 373

Rohault, Jacques, 罗奥, 雅克, 笛卡儿主义者, 51, 84

Romagna, 罗马尼河, 橡木, 813

Romorantin, 罗莫朗坦, 军队制服, 864

Ronquillo, Francisco, 龙奎洛, 弗朗西斯科, 西班牙政治家, 359, 373, 377

Rooke, Sir George, 鲁克爵士, 乔治, 英国海军上将, 418, 423, 569, 797, 806

Rosas, 罗萨斯, 法国占领 (1693), 247

Rossi, Luigi, 罗西, 路易吉, 意大利音乐家, 109

Rotgans, Lucas, 罗根斯, 卢卡斯, 荷兰剧作家, 75

Rotterdam, 鹿特丹, 218, 329, 794, 800, 832

Rouen, 鲁昂, 23, 336—337, 512, 895, 900—901

纺织品, 863, 894

Rouillé, Pierre, 鲁耶, 皮埃尔, 法国外交家, 446

1709年谈判, 450—451, 453—456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2n., 95, 100, 221

Rousseau de Chamoy, 卢梭, 德·夏穆瓦, 173

Roussillon, 鲁西永, 375, 390

Rovigo, 罗维戈, 威尼斯的贸易, 555

Rowe, Charles, 罗, 查尔斯, 英国将军, 758

Royal Society, the, 皇家学会, 37—40, 43, 45, 51, 76—77, 84, 96

Ruhr, the, 鲁尔, 煤, 869

Rumania, 罗马尼亚, 见Moldavia, Wallachia

Rumelia, 鲁梅利亚, 608—609, 642; 另见Turkey

Russell, Edward, 拉塞尔, 爱德华, 牛津的伯爵, 海军上将, 200, 216, 244, 248, 391, 568, 808, 829

Russia, 俄罗斯

与西方, 3, 154, 157—158, 676, 678, 716ff., 727—728, 733—740

与土耳其人, 1, 6, 31, 158, 185, 227, 394, 566, 625—628, 630—637, 644—645, 669—670, 671—672, 718—719, 722, 736

与哥萨克, 31, 610, 630—631, 634, 636, 665—668, 669—670, 685n., 696, 699, 732, 759, 775—776

与鞑靼人, 31, 610, 625, 627, 634, 636, 667—668, 672, 683—684, 688, 760, 775

与波兰, 见Augustus II

与瑞典, 1—3, 158, 402—403, 630—631, 634—635, 636, 648—649, 652ff., 663ff., 679—680, 692ff., 716, 720—722, 733ff.

与丹麦, 见Denmark

与波斯, 644—645, 739

宗教, 3, 128, 716, 728—729, 732—733, 738

文化, 42, 726—729, 739

政府, 718—719, 725—726, 730—731

经济, 716, 723—725, 836—844; 另见Archangel, Riga

财政, 723, 726, 730—732

社会变化, 729—732, 775, 777

另见Peter I, St Petersburg, Siberia

Ruthenia, 鲁瑟尼亚, 687, 696, 708

Ruvigny, 鲁维努, 胡格诺派将军, 见Galway

Rybiński, Sigismund James, 鲁宾斯基, 西吉斯蒙特·詹姆士, 波兰统治者, 703, 709

Rycaut, Sir Paul, 里考特爵士, 保罗, 土耳其历史学家, 97

Rydzyna, Treaty of (1714), 雷齐纳条约 (1714), 710

Rymer, Thomas, 赖默, 托马斯, 历史学家, 33, 79, 82, 87

Ryswick, Peace of (1697), 里斯威克和约 (1697), 26, 161, 167, 169—170, 252, 262—263, 291, 332, 337, 381—385, 388, 392, 411, 477, 569, 579, 582

北美, 13—14, 489—490, 500, 508

瑞典, 172, 246, 651

宗教第四条款, 189, 252, 383, 473—474, 588

荷兰贸易, 185—186, 187, 252

Rzeczpospolita Polska, 热茨波斯波利塔·普尔斯卡, 见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Sabará, 萨巴拉, 黄金, 533

Sacheverell, Dr Henry, 萨谢弗雷尔, 博士, 亨利, 英国牧师, 125, 152, 220, 270, 441, 457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350, 372, 476, 525, 529—530

Safavi dynasty of Persia, 波斯萨非王朝, 644

Said Chelebi, 赛义德·切莱比, 和土耳其的印刷业, 644

St Augustine (Florida), 圣奥古斯丁(佛罗里达), 372, 503

Saint-Cosme, Fr Jean François Buisson de, 圣一科斯姆兄弟, 让·弗朗索瓦·比松·德, 法国传教士, 499

Saint-Cyran, Jean du Vergier de Hauranne, 圣一西朗, 让·德·弗吉尔, 戴·奥兰, 教士, 詹森派, 133

Santo-Domingo, 圣多明各, 354—355, 390

Saint-Domingue, 圣多明各, 350, 501

私掠船, 12, 251, 349, 356, 804, 810

发动进攻(1691, 1695), 251, 355

糖, 854

St Eustatius, 圣厄斯坦提斯, 810, 853

St Florian, 圣弗洛里安, 奥地利修道院, 602

St Germain, 圣日尔曼, 255, 275

St Helena, 圣赫勒拿岛, 809

Saint-Hilaire, Geoffroy, 圣伊莱尔, 若弗鲁瓦, 法国生物学家, 64

St Joachim (New France), 圣若阿基姆(新法兰西), 496—497

St John, 圣约翰, 骑士, 545—546, 828; 见Malta

St John, Henry, 圣约翰, 亨利, 见Bolingbroke

St John's (Newfoundland), 圣约翰斯(纽芬兰), 489, 498, 503

St Kitt's (St Christophe), 圣基茨(圣克里斯托弗)

法国在该地, 251, 499, 809—810

英国在该地, 13, 470, 809

St Lawrence, the, 圣劳伦斯, 13, 470, 500, 502, 506

毛皮贸易, 850—851

St Lo, Captain George, 圣洛船长, 乔治, 英国海军船坞专员和小册子作者, 824

St Malo, 圣马洛, 246, 249, 812

私掠船, 19, 489, 802

贸易, 15, 364, 375—376, 849—850, 856—857

St Mary' s, 圣玛丽斯, 捕鳕鱼基地, 503

Saint-Ovide, 圣奥维特, 先生, 法国官员, 503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3, 42, 663, 665, 668, 734

建设中, 31, 725, 728, 871

贸易, 867

Saint-Prest, Jean Yves de, 圣普雷斯特, 让·伊夫·德, 档案保管员, 178, 182

St Quentin, 圣康坦, 胡格诺教徒流亡, 867

Saint-Romain, Melchior de Harod de Senevas, 圣罗曼, 梅尔基奥尔·德·哈罗德·德·塞内瓦, 法国驻里斯本使者, 512

St Ruth (Ruhe, Rhue), Charles Chalmot de, 圣吕思(鲁, 拉), 夏尔·夏尔莫·德, 法国将军, 242

Saint-Simon, Louis de Rouvroy, 圣西蒙, 路易·德·鲁沃列, 28, 327, 329, 339, 597, 780

St Stephen, 圣斯蒂芬, 王冠, 见Hungary

St Tropez, 圣特罗佩, 海员, 823

Saint-Vallier, Jean Baptiste de, 圣瓦利埃, 让·巴普蒂斯, 特, 魁北克主教, 484, 496—497, 499

St Venant, 圣威纳特, 为英国夺取的要塞 (1710), 440

Sainte-Famille (New France), 圣法米尔 (新法兰西), 496

Sainte-Foy (New France), 圣福伊 (新法兰西), 496

Saintonge, 圣托奇, 葡萄酒, 845

Salaberry, 萨拉贝里, 法国海军行政官员, 830

Salaburg, Count Gotthard Heinrich von, 萨拉伯格伯爵, 戈特哈德·海因里奇·冯, 奥地利大臣, 309

Saladin family, 萨拉丁家族, 日内瓦银行家, 303

Salem (Mass.), 塞勒姆 (马萨诸塞州), 巫术的审判, 492

Sallee, 萨利, 海盗, 390, 554

Salm, Karl Theodor Otto, 萨尔姆, 卡尔·西奥多·奥托, 亲王, 奥地利大臣, 450n., 487

Salmon Falls, 萨蒙福尔斯, 486

Salonica, 萨洛尼卡, 562, 608, 612, 644

Saluzzo, 萨卢佐, 241, 245

Salvaterra, 萨尔瓦特拉, 527

Salvatierra, Juan Maria de, S.J., 萨尔瓦铁拉, 胡安·玛丽亚·德, S.J., 353

Salzkammergut, 萨尔茨卡默古特, 食盐出口, 605

Samuś, Ivan, 塞缪斯, 伊凡, 哥萨克首领, 696

Sancroft, William, 桑克劳夫特,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197, 201, 209

Sandomierz Confederates, 桑多米埃什同盟, 见Confederacies

Sanfelice, Ferdinando, 圣费利切, 费尔迪南多, 内亚波利斯的建筑师, 559

Santa Ana (Brazil), 圣安娜 (巴西), 553

Santa Maura, 圣玛拉, 544, 619, 627, 639, 642

Santarém, 圣塔伦, 油类的迫切需要, 520

Santiago de los Caballeros, 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莱洛斯, 355

Santona, 桑托那, 西班牙海军船坞, 565

Santos, 桑托斯, 537

São Francisco valley (Brazil), 圣弗朗西斯科谷地 (巴西), 牛群, 532—534

São Miguel (Azores), 圣米古尔 (亚速尔群岛), 酒类, 520

São Paulo, 圣保罗, 532—534, 537

São Tomé, 圣多美岛, 515, 528, 533

São Vicente, 圣文森特, 532

Sapieha family, 萨皮埃哈家族, 立陶宛, 657, 685, 688, 690, 693—695, 697—698

Sapieha, Benedict, 萨皮埃哈, 本尼迪克特, 立陶宛财政大臣, 685, 688

Sapieha, John Casimir, 萨皮埃哈, 约翰·卡西米尔, 立陶宛哥萨克的主要首领, 685, 688, 690—691

Sapieha, Michael, 萨皮埃哈, 迈克尔, 前者之子, 694

Saptés, 萨普特斯, 毛织品, 864

Saragossa, 萨拉戈萨, 368, 370, 440

Sarajevo, 萨拉热窝, 626

Sardinia, 撒丁, 159, 161, 164, 375, 387, 439, 556, 570, 593, 597, 641

为同盟国所夺取 (1708), 370, 433—434

乌得勒支, 467, 473

维克托·阿马迪厄斯与撒丁，559

盐，844

Sari Mehmed Pasha，沙里·穆罕默德帕夏，土耳其财政大官，
629

Sarsfield, Patrick，萨斯菲尔德，帕特里克，爱尔兰军官，242

Sas van Ghent，萨斯凡根特，408

Sauveur, Joseph，索弗尔，约瑟夫，法国科学家，40

Sava, the，萨瓦河，578，581，610，640—641

Savannah, the，萨凡纳河，504

Savery, Thomas，萨弗里，托马斯，英国工程师，69

Savoy-Piedmont，萨伏依—皮埃蒙特，大公国，6，9，11，18，
29，159，161，163—164，591，596，747，788

宗教，119—120，188，560—562

九年战争，231—233，240—241，243，245—247，250—251，
558

王位继承战，417—418，422，425，428—429

乌得勒支，159，164，444，447，463—467，571

军队，238，560—561，766—767

财政，560—561

经济，560，844

人口，889

另见Turin, Victor Amadeus II

Saxe, Maurice，萨克斯，莫里斯，公爵，法国元帅，661

Saxe-Gotha，萨克斯—戈特，大公，246n.，402，407

Saxony，萨克森，2，232，246

九年战争, 237, 241
北方大战, 411, 431, 652ff., 754
查理十二在萨克森, 431, 654, 662—663, 700—701, 704,
774
经济, 605, 867, 869
社会阶层, 687—688, 697—698
与波兰的联合, 2, 683, 687—689, 691—693, 697, 700, 709
—710, 713—714
另见Altranstädt, Augustus II, Empire
Saybrook (Conn.), 塞布鲁克(康涅狄格), 493
Scania, 斯堪尼亚, 3, 653, 671, 775, 808
Scarlatti, Alessandro, 斯卡拉蒂, 亚历山德罗, 尼亚波利斯音
乐家, 101—102, 104, 109—113, 115—116, 559
Scarlatti, Domenico, 斯卡拉蒂, 多梅尼科, 前者之子, 109,
559
Scarron, Paul, 斯卡隆, 保尔, 法国作家, 75
Scheldt, the, 斯凯尔特河, 249, 381, 395, 413, 436, 447,
478, 752—753, 757, 764, 786, 811
Schellenberg, the, 施伦贝格, 多瑙沃斯的要塞, 421, 757
Schenectady, 斯克内克塔迪, 251, 486
Scheuchzer, J. J., 朔奇泽, J. J., 瑞士地质学家, 61—62
Schio, 斯基奥, 毛织品, 556
Schism Act (1714), 教会分立法令(1714), 273—274
Schlüter, Andreas, 施吕特, 安德烈亚斯, 德国建筑师, 728
Schönborn, Count Friedrich Karl von, 舍恩博恩伯爵, 弗里德
里克·卡尔·冯, 帝国副首相, 573, 587

Schomberg, Frederick Herman, 舍姆伯格, 弗雷德里克·赫尔曼, 第一代公爵, 元帅, 236—239

Schröder, Wilhelm von, 施罗德, 威廉·冯, 奥地利经济学家, 310, 313, 606

Schulenberg, Johann Matthias von der, 舒伦伯格, 约翰·马塞厄斯·冯·德, 萨克森元帅, 638, 700

Schuyler, Colonel Peter, 斯凯勒上校, 彼得, 纽约, 488, 498

Scotland, 苏格兰

联合 (1706—1707), 26, 220, 275—279, 431

大学, 43, 279

宗教, 123, 149, 198, 211—212, 276—278

人口, 211, 254

威廉三世, 211—213, 275—276, 769

经济, 211—212, 255—256, 392, 420, 765, 844, 846, 869, 881, 894

与卡尔十二, 675

外国雇佣兵制, 742; 军团, 769, 783

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 255, 257, 272, 275—276, 279, 797

Scudéry, Madeleine de, 斯居代里, 马德莱娜·德, 法国小说家, 91

Seafield, James Ogilvy, 西菲尔德, 詹姆士·奥格尔维, 第一代伯爵, 苏格兰首相, 276—278

Seckendorff, Veit von, 塞根道尔夫, 维特·冯, 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 121

Security, Scottish Act of (1704), 苏格兰安全法令 (1704), 276—277

Sedan, 色当, 毛织品, 863

Sedgemoor, battle of (1685), 塞奇莫尔战役 (1685), 747

Segovia, 塞哥维亚, 542, 551, 863

Seignelay, Jean-Baptiste Colbert, 塞涅莱, 让-巴普蒂斯塔
• 库尔贝尔, 侯爵, 法国海军部长, 239, 499, 549, 792, 803, 830

Seilern, Johann Friedrich Edler von, 塞勒, 约翰 • 弗里德里希 • 艾德勒 • 冯, 奥地利总理, 467, 575, 587, 689, 601

Selim-Girei, 塞利姆-吉莱伊, 克里米亚可汗, 620—621

Selkirk, Alexander, 塞尔柯克, 亚历山大, 船舶失事, 97

Semendria (Smederevo), 塞门德里亚 (斯梅德雷沃), 641

Semmering Pass, 塞梅林通道, 604, 754

Semonovsky Guards, 西蒙诺夫斯基卫队, 俄国, 777

Sena, 色那, 518

Senegal, 塞内加尔, 563

Senesino [Francesco Bernardi], 塞尼辛努 (弗朗西斯科 • 伯纳迪), 男中音, 107

Senigallia, 塞尼加利亚, 555

Septennial Act (1716), 七年法令 (1716), 220, 275

Sequeira, Bueno de, 塞凯拉, 布埃诺 • 达, 巴西探险家, 533

Serbia, 塞尔维亚, 1, 7, 577, 621, 625, 754

土耳其, 580, 598, 618

奥地利, 30, 582

东正教, 580, 632—633

Sergison, Charles, 塞吉森, 查尔斯, 海军部的, 830

Serpa, 塞尔帕, 527

Sète (Cette), 塞特 (塞特), 571

Settlement, Act of (Irish, 1662), 嗣位法令 (爱尔兰, 1662), 214

(1701), 220, 254n., 266, 466

Setúbal, 锡图巴尔, 519, 521, 537, 844

Severia, 塞文里亚, 666

Seville, 塞维利亚, 11, 42, 343, 368

人口, 542

Sewall, Samuel, 休厄尔, 塞缪尔, 马萨诺塞州法官, 502, 507

Sezane valley, 塞赞谷地, 467

Shadwell, Thomas, 沙德韦尔, 托马斯, 英国戏剧家, 113

Shafirov, Peter Pavlovich, 沙菲洛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 男爵, 俄国政治家, 185, 634—636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沙夫茨伯里,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第三代伯爵, 29, 93, 127—128, 142, 219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79, 111, 114

Sharp, James, 夏普, 詹姆士, 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152

Sheerness, 希尔内斯, 造船厂, 811

Sheffield, John, 谢菲尔德, 约翰, 马尔格雷夫第三代伯爵, 79

Sheremeteyev, Count Boris Petrovitch, 谢里曼特也夫伯爵,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 俄国元帅, 634—635, 655

Sherlock, William, 舍洛克, 威廉, 圣保罗教长, 125

Shirvan, 希尔凡, 为土耳其人占领, 644—645

Short, Dr Thomas, 肖特博士, 托马斯, 统计学家, 887, 900

Shovell, Sir Cloudesley, 肖维尔爵士, 克劳德斯利, 英国海军上将, 19, 425, 433, 794

Shrewsbury, Charles Talbot, 施鲁斯伯里, 查尔斯·塔尔博特, 大公, 216, 271—272, 457—460

Siam, 暹罗, 95, 130

Siberia, 西伯利亚, 128, 731, 738

Sicily, 西西里

与奥地利, 9, 406, 426—427, 596—597

与萨伏依, 159, 465, 467, 477, 559

与法国, 385, 387, 395

与西班牙, 164, 370, 556—557

与菲利普五世, 161, 375, 439, 447, 451—452, 463

贵族, 553, 557

盐, 844

地震和人口, 884

Sidon (Saida), 西顿 (赛伊达), 550, 609

Sieniawski, Adam Nicholas, 西恩尼斯基, 亚当·尼古拉, 波兰王国的军事指挥官, 688, 696, 701—703, 708, 711—712

Sieradz, 塞拉茨, 705

Silahdar Ali Pasha, 赛拉赫达尔·阿里帕夏, 首相, 637—640, 643

Silent Sejm (1717), the, 国民议会 (1717), 712—713

Silesia, 西里西亚, 8, 432, 575, 599, 605—606, 662, 685, 687, 703

路德教徒, 188, 432, 602

贸易, 605—606, 864, 867

Sillery (New France), 锡莱里 (新法兰西), 传教团, 496, 498

Simon, Richard, 西蒙, 理查德, 雄辩家, 24, 36, 88, 140—141, 341

Sinop (e), 锡诺普, 562, 615

Sinzendorf, Count Philip Ludwig von, 辛岑道夫伯爵, 菲利普·路德维格·冯, 帝国首相, 450, 452, 454—455, 464—465, 468, 471, 573, 589

S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妇女会会众, 497

Siyavush Pasha, 赛耶沃西帕夏, 首相, 620

Skopje (Üskub), 斯科普里 (于斯屈勃), 632

Skoropadsky, Ivan, 斯科洛帕德斯基, 伊凡, 乌克兰军事指挥官, 776

Slangenburg, Frederik Johan von Baer, 斯莱根伯格, 弗里德里克·约翰·冯·贝尔, 男爵, 荷兰将军, 416, 424

Slavery and slave-trade, 奴役和奴隶贸易, 12, 24, 533—534

葡萄牙, 349—350, 514—517, 529, 531, 533, 855

巴西, 510, 515, 531—534

赞比西, 518

阿尔及尔, 545

地中海大帆船, 563—564, 615, 822

丹麦和普鲁士的, 855

法国的, 855—856

英国的, 260—261, 855—856

荷兰, 855—856, 872

另见Asiento

S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2—3, 652, 654, 678

丹麦的入侵（1700），654

Sloane, Sir Hans, 斯隆爵士，汉斯，英国博物学家，38—40

Sloughter, Colonel Henry, 斯劳特上校，亨利，纽约的总督，
482

Slovakia, 斯洛伐克，7，577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657，665—666，683，698，700

Smorgony, 斯摩尔戈努，702

Smyrna, 土麦拿

 人口，542

 护航（1693），215，246，550，568，796

 贸易，10，546，611，859，868

Soames, Sir William, 索姆斯爵士，威廉，翻译家，78

Sobieski, Alexander, 索比斯基，亚历山大，658

Sobieski, Constantine, 索比斯基，康士坦丁，657—658，
708，712

Sobieski, James, 索比斯基，詹姆士，667，684—686，694，
701

 为奥古斯都二世所俘，657—658，697

Sobieski, John III, 索比斯基三世，约翰，波兰国王，前三者之
父，168，183，619—620，625，682—686，696，714，776

 维也纳的救援，619—620，696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rn Knowledge, 传播基督教知
识的社团，128，152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福音传播会，128，
152，492—493，495

Socinianism, 索齐尼教义，136—137；另见Unitarians

Sofala, 苏法拉, 518

Solimena, Francesco, 索利梅纳, 弗兰西斯科, 内亚波利斯画家, 559

Solms[-Braunfels], Count Hendrik Trajectinus van, 索尔姆斯[-布朗菲尔]伯爵, 亨德里克·特拉杰克廷纳斯·范, 荷兰将军, 245

Somers, John, baron, 萨默斯, 约翰, 男爵, 大法官, 216, 266—267, 270, 277

Somerset, Charles Seymour, 萨默塞特, 查尔斯·西摩, 第六代大公, 271

Sophia, 索菲娅, 汉诺威选帝侯, 266

Sophia, 索菲娅, 女沙皇, 717—718

Sound, the, 松德海峡, 4

Soura, 苏拉, 537

Southampton Water, 索斯安普敦水道, 814

South Sea, Company, 南海公司, 15, 288—289, 291, 475, 530, 679, 835

法国在该公司, 15, 359, 364, 385

Southwell, Sir Robert, 索思韦尔爵士, 罗伯特, 38

Spain, 西班牙

政府, 8—9, 348—349, 351—352, 353, 357—359, 361ff.; 另见Castile, Orry

贵族阶层, 8—9, 347—348, 352, 361—362, 365, 370, 371, 375

宗教, 9, 131, 346—347, 363, 376; 另见Inquisition

在意大利, 9, 159ff., 368, 370, 385ff., 397, 409, 419, 425, 428—429, 432—433, 439, 447, 451ff., 556—559, 590—594

海外, 12, 13, 128—129, 349—350, 354—357, 359—360, 364—365, 372—373, 375—376, 385ff., 395, 406, 410, 511, 528ff., 798, 809

文化, 72, 343

军队, 20, 231, 353, 363, 366—367, 374, 782—783

海军, 21, 565, 567—568, 790, 813

王位继承问题, 159, 161—163, 168, 172, 178, 270, 348, 350—351, 357—359, 360—361, 370ff., 384—398, 418—419, 437—439, 447ff., 590ff.

衰落问题, 343—345

财政, 345, 346, 351, 353, 366, 370, 376

经济, 251, 345ff., 352, 511, 514, 520, 548, 863

九年战争, 235, 247—249, 251—252, 354—357

王位继承战, 369—375, 418—419, 422—423, 425, 429—430, 432—434, 438, 440—441, 444—445

人口, 345, 542

乌得勒支, 376—377, 453—454, 461—463, 467—468, 476

另见Asiento, Carlos II, Catalonia, Louis , Philip V, Portugal

Spanish (southern) Netherlands, 西班牙的(南部)尼德兰, 398—400, 408, 445, 473

战略因素, 18—19, 231, 750—751, 753, 786—787

与法国, 161, 385, 397—399, 400, 404—405, 412—413

与荷兰, 见Barrier

与西班牙, 352—353, 366, 398; 另见Bergeyck, Maximilian Emmanuel

九年战争, 232—233, 239, 241, 242, 244ff.

里斯威克, 252, 381—382

分割, 384, 387, 391, 393—395, 398, 400, 406, 427

王位继承战, 411, 416—417, 422, 424, 426—427, 432, 435—436, 438, 440, 752

与马尔博罗, 427, 435

共管, 428, 445

奥地利, 427, 441, 445, 598

乌得勒支, 见Barrier

经济, 293—294, 352, 390, 413

Spanish Succession War,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5, 19, 154, 169, 172, 287ff., 369ff., 591ff., 663, 763, 769, 842, 852, 873—874, 896

战役, 370ff., 405, 409, 416ff., 501ff., 527, 569—571, 593—594, 741ff., 770, 782—783, 794ff.

致力和平 (1705), 425—426, 446n.; (1706), 374, 430, 446—447; (1708), 431, 447—448; (1709), 374—375, 436—437, 450ff.; (1710), 161, 439—440, 458; (1711—1714), 270, 376—377, 441ff., 459ff., 528

Spee, Friedrich von, S. J., 斯皮, 弗里德里希·冯·S. J., 诗人, 150

Speirbach, battle of (1692), 施皮尔贝希战役 (1692), 231

Spener, Philipp Jakob, 斯彭纳, 菲利浦·耶科夫, 德国虔信派教徒, 25, 150

Spenser, Edmund, 斯宾塞, 埃德蒙, 英国诗人, 79

Speyer, 斯派尔, 大主教, 203, 225, 233

Spice Islands, 斯皮斯岛, 857

Spinoza, Benedictus de, 斯宾诺莎, 贝尼迪克托斯·德, 36, 88, 136, 139—140

Spitzbergen, 斯匹茨卑尔根岛, 捕鲸场, 19

Splitgerber, Daum, and Company, 施普利格尔伯公司, 柏林军火承包商, 789

Staffarda, battle of (1690), 斯塔法达战役 (1690), 231, 241

Stahl, Georg Ernst, 施塔尔, 乔治·恩斯特, 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54, 65—66

Stanhope, Hon, Alexander, 斯坦厄普阁下, 亚历山大, 外交家, 352

Stanhope, James, 斯坦厄普, 詹姆士, 第一代伯爵, 前者之子, 434, 440, 477, 567, 571

商务条约 (1708), 434, 439, 799

Stanislas I, king of Poland, 斯坦尼斯拉斯一世, 波兰国王, 见Leszczynski

Stanyan, Abraham, 斯坦尼安, 亚伯拉罕, 英国外交家, 645

Starhemberg, Count Guido von, 施塔海姆贝格, 吉多·冯伯爵, 奥地利将军, 310, 434, 438, 440, 593

Starhemberg, Count Gundaker von, 施塔海姆贝格, 冈德克·冯伯爵, 奥地利内阁副总理, 309, 312—313, 575, 587, 589, 594

Starhemberg, Count Ernst Rüdiger von, 施塔海姆贝格, 恩斯特·吕迪格尔·冯伯爵, 维也纳的保卫者, 593

Stavnsband ordinance (Denmark), 法令 (丹麦), 775

Steele, Richard, 斯蒂尔, 理查德, 新教牧师, 153

Steele, Sir Richard, 斯蒂尔, 理查德爵士, 政治家和小品文作者, 32, 94, 145

Steenkerk, battle of (1692), 斯蒂扣克战役 (1692), 20, 245, 247

Stella, Count Rocco, of Naples, 那不勒斯的斯蒂拉, 罗科伯爵, 593

Stenbock, Count Magnus, 斯坦博克, 马格奴斯伯爵, 瑞典将军, 661, 670—671, 699

Steno (Stensen), Niels, 斯坦诺 (斯坦森), 尼尔, 丹麦博物学家, 61, 64

Stettin, 什切青, 673, 678, 707

Stevensweert, fortress, 斯蒂文斯韦尔特, 要塞, 416, 477—478

Stiernhörk, Olaf, 斯蒂霍克, 奥拉夫, 瑞典在维也纳使者, 183

Stillingfleet, Edward, 斯蒂林菲利特, 爱德华, 英国牧师, 125, 140

Stöcken, Johann Heinrich von, 斯托肯, 约翰·海因里希·冯, 丹麦使者, 182—183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4, 42, 186, 650—653, 658, 670, 672, 679, 763, 802, 806, 808

条约 (1719), 678

贸易, 804—805

Stoddard, Solomon, of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的斯托达特, 所罗门, 493—494

Stollhofen, Lines of, 斯托尔霍前线, 237, 417, 421, 432, 751, 753, 755

Strafford, Thomas Wentworth, 斯特拉福特, 托马斯·温特沃思, 第三代伯爵, 460, 462

Stralsund, 施特拉尔松, 673—674, 679, 707, 710—711, 802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237, 467, 579, 753, 755, 785

为法国所占领, 26, 161, 223—224, 252, 421, 473, 588

Stratmann, Count Theodor Heinrich von, 斯特拉特曼, 伯爵, 西奥多·海因里希·冯, 奥地利总理, 383, 578, 601

Streshnev, Tihone Nikitich, 斯特莱斯涅夫, 蒂洪·尼基提奇, 俄国特权贵族的一员, 718

Stuart, Karl Magnus, 斯图尔特, 卡尔·马格纳斯, 瑞典将军, 654—656, 761

Styria, 施蒂里亚, 584, 604, 638

Styrum, Frederick Willem, 斯蒂伦, 弗里德里克·威廉, 林堡—斯蒂伦伯爵, 帝国将军, 752

Subercase, Auger de, 苏伯卡斯, 奥格·德, 阿卡迪亚总督, 503

Sudan, 苏丹, 548

Suez, 苏伊士, 615

Süleyman II, 苏里曼二世, 苏丹(国王), 620—621

逝世, 622

Süleyman Pasha, 苏里曼·帕夏, 首相, 620

Sulpicians, 萨尔皮辛, 496, 498

Sumatra, 苏门答腊, 胡椒, 857

Sunderland, Charles Spencer, 森德兰, 查尔斯·斯潘塞, 第三代伯爵, 268—269, 430, 547

Sunderland, Robert Spencer, 森德兰, 罗伯特·斯潘塞, 第二代伯爵, 195, 199, 204, 216, 266—267, 271, 382

Surat, 苏拉特, 518, 860

Surinam, 苏里南, 810, 854, 859

Susa, 苏沙, 241, 245

Sutton, Sir Robert, 萨顿爵士, 罗伯特, 英国驻君士坦丁堡港大使, 185, 635

Swabia, 斯瓦比, 237, 245, 402, 405, 432, 587—588, 601

法国的威胁, 586

Sweden, 瑞典

帝国, 1—2, 648—649, 679—680

与丹麦, 1—4, 402, 648—649, 652—655, 670, 673, 676—679, 692, 774—775

军队, 20, 228, 650, 655ff., 661—669, 677, 743, 744, 747—748, 757—758, 760—761, 771—774, 780

贵族, 28—29; 减少, 650, 772—773

宗教, 126

与路易十四, 154, 158, 182—185, 277, 246, 402—403, 734

与威廉三世, 154, 172, 174, 184, 227

政府, 650—651, 661—662, 674—675, 677

贸易, 174, 234—235, 251, 420, 520, 648—649, 651, 659, 675, 699, 840—842

海军, 654, 671, 805—808, 824—825, 830, 831

灾害, 672, 774

另见 Augustus II, Charles XII, Empire, Great Northern War, Holstein-Gottorp, Russia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 乔纳森, 36, 81, 98, 126, 139, 153, 286, 315

《同盟国的行动》, 274, 281, 442—443, 460

Switzerland, 瑞士

雇佣兵, 20, 243, 742, 765—766

宗教, 120—122, 189

维尔默根战争 (1712), 120

中立, 174—175

经济, 605, 765, 813, 844, 895

另见Berne, Geneva, Zürich

Sydenham, Thomas, 西德纳姆, 托马斯, 英国医师, 47

Syria, 叙利亚, 128, 609, 630

贸易, 551, 838

Szaniawski, Constantine Felix, 萨尼奥斯基, 康斯坦丁·费利克斯, 库亚韦主教, 702, 709, 713

Szatmár, peace of (1711), 索特马尔的和平 (1711), 585

Szczuka, Stanislas, 萨佐卡, 斯坦尼斯拉斯, 立陶宛副总理, 681, 690—691, 706—707

Szembek, John, 塞姆贝克, 约翰, 波兰副总理, 702—703

Szembek, Stanislas, 塞姆贝克, 斯坦尼斯拉斯, 波兰大主教, 702, 703

Tabriz, 大不里士, 为土耳其占领, 645

Taganrog, 塔甘罗格, 造船厂, 625, 628—629, 634—635, 732

Tahmasp II, Shah of Persia, 塔赫马斯普二世, 波斯国王, 644

Taiwan (Formosa), 台湾 (福摩萨), 糖, 857

Tallard, Camille d' Hostun, 塔拉尔, 卡米耶·德奥斯顿, 伯爵, 法国元帅, 165, 175, 178, 186, 389, 395, 752, 400—401

王位继承战, 404, 421—422, 458

布伦海姆, 756

Tamarois, mission to, 传教团到塔马罗伊, 499

Tangier, 丹吉尔, 391, 554, 566, 809

Tarascon, 塔拉斯康, 人口, 889, 900

Tarnogród confederacy (1715), 塔尔诺格勒同盟 (1715), 711—712

Tasso, Torquato, 塔索, 托尔夸托, 意大利诗人, 75

Tatars, 塔塔尔族人或鞑靼人, 见Crimea, Kazan, Russia

Tate, Nahum, 塔特, 内厄姆, 爱尔兰诗人, 113

Tavares, António Raposo, 塔巴雷斯, 安东尼奥·拉波索, 巴西探险家, 533

Tavernier, Jean-Baptiste, 塔韦尼埃, 让-巴蒂斯特, 法国旅行家, 95, 98

Taylor, Edward, 泰勒, 爱德华, 新英格兰诗人, 497

Taylor, Jeremy, 泰勒, 杰里米, 英国牧师, 146

Tchesma, battle of (1770), 切斯马战役 (1770), 566

Teignmouth, 提格茅斯, 239, 796

Teixeira, Pedro, 特海拉, 佩特罗, 亚马孙河探险家, 530, 533

Temesvár, Banat of, 泰梅什堡 (蒂米什瓦拉) 的巴纳特, 6, 7, 581—582, 608, 622, 626—627, 639, 641, 754

要塞, 577, 580, 639

Ter, the, battle of (1694), 泰尔战役 (1694), 248

Terek valley, 捷列克谷地, 645

Terranova, Juana d' Aragon Cortés, 特拉诺瓦, 胡安娜·达拉贡·科尔特斯, 公爵夫人, 市长, 348

Teschen (Creszyn), 特斯切 (克雷松), 605

Tessé, René de Froullay, 泰塞, 勒内·德·弗鲁莱, 公爵, 法国外交家和元帅, 171, 247, 369, 372, 403

萨伏依, 418, 433

直布罗陀, 423, 570

与彼得大帝, 737

Tessin, Count Nicodemus, 特辛公爵, 尼科迪默斯, 瑞典建筑师, 671

Test Acts (1673, 1678), 信仰法令, 196—200, 210

Tele, 太特, 518

Texas, 得克萨斯, 129, 356

Thessaly, 塞萨利, 608, 624

Thévenot, Melchisedec, 泰夫诺, 梅基塞德克, 法国科学家, 40

Thököly, Count Imre, 特克利公爵, 伊姆雷, 匈牙利起义者, 577, 584, 605, 619, 622

Thomasius, Christian, 托马西乌斯, 克里斯蒂安, 莱比锡教授, 74

Thornhill, Sir James, 桑希尔爵士, 詹姆士, 英国画家, 32

Tibet, Jesuit mission, 西藏, 耶稣会传教团, 130

Tiepolo, Giambattista, 蒂耶波洛, 詹巴蒂斯塔, 威尼斯画家, 556

Tiflis, 第比利斯, 土耳其占领, 645

Tilbury, 蒂尔伯里, 要塞, 205

Tillemont, Le Nian de, 蒂耶蒙, 勒纳伊·德, 詹森派教徒, 132

Tillotson, John, 蒂洛森, 约翰, 坎特伯雷大主教, 138, 142, 152

Tilly, Claude Tserclaes, 蒂利, 克劳德·楚克拉斯, 公爵, 在荷兰服役的将军, 416

Tine (Tinos), 提恩 (提诺斯), 威尼斯基地, 638, 642

Tisza, the, 蒂萨河, 577, 580—581, 626

Tlemcen, battle for (1701), 对特莱姆森战役 (1701), 554

Tonning, fortress, 托宁, 要塞, 671—672

Toland, John, 托兰, 约翰, 自然神论者, 136, 140

Toledo, 托莱多, 371, 542

Toleration Act (1689), 信仰自由法令 (1689), 210, 256, 259, 264

Tolstoy, Count Peter Andreyevich, 托尔斯泰伯爵, 彼得·安德烈维奇, 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使节, 185, 636

Tomar, 托马尔, 513, 537

Tonking, 东京 (越南), 130

Torbay, 托尔巴, 204

Torcy, Jean-Baptiste Colbert, 托尔西,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 侯爵, 法国外交大臣, 165, 182, 365, 389, 397, 408

 和平协商 (1709—1712), 436—437, 441—442, 450—454, 459—461, 469—470, 472

 与俄国, 734—735

Tordesillas, Treaty of (1494), 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1494), 531, 533

Torelli, Giacomo, 托雷利, 贾科莫, 舞台设计师, 109, 116

Tories, 托利党, 201, 208, 261, 267—268, 273—275

 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 273

 英国国教, 215, 270, 273—274, 280

 十月俱乐部, 275

 反对党地位, 216, 275, 281, 437, 439

 执政, 16—17, 215, 270ff., 441, 457ff.

另见Bolingbroke, Harley, Nottingham

Torre, Count da, 托尔公爵, 见Fronteira

Torrington, Arthur Herbert, 托林顿, 阿瑟·赫伯特, 伯爵, 英国海军上将, 201, 226, 236—239, 791

Toruñ (Thorn), 托伦, 660

Tonlon, 土伦

同盟的进攻(1707), 5, 19, 432—433, 570

法国海军基地, 20—22, 236, 240, 403, 419, 567—568, 793, 808—813, 817, 832, 879

海军中队, 234, 246, 248, 250, 423

海员, 821, 823

Toulouse, Louis Alexandre de Bourbon, 图卢兹公爵, 波旁的路易·亚历山大, 法国海军上将, 423, 830—831

Tournai, 图尔内, 要塞, 249, 436—438, 451, 465—467, 477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图尔纳福尔, 约瑟夫·皮顿·德, 植物学家和旅行家, 41, 56, 58, 614, 628

Tournon,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图尔农, 夏尔·托马·马亚尔·德, 东印度群岛的罗马教皇的使者, 130

Tours, 图尔, 丝织品, 323, 867

Tourton family, 图尔东家族, 日内瓦银行家, 303

Tourville, Anne Hilarion de Cotentin, 图尔维尔公爵, 科唐坦的安娜·伊莱里翁, 法国海军上将, 21, 568, 793, 819

滩头堡, 239, 795—796

拉乌盖, 215, 243—244, 567, 792, 795, 828

Townshend, Charles, 汤森, 查尔斯, 第二代子爵, 海关关卡条约(1709), 439—442, 464

Traetta, Tommaso, 特拉埃塔, 托马索, 意大利音乐家, 111

Tranquebar, 特兰克巴尔, 丹麦工厂, 128, 518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 7, 242, 424, 577—582, 584—586, 608, 621—622, 627, 754

Transylvania, prince of, 特兰西瓦尼亚亲王, 见 Apafi, Michael

Trapani, Michelangelo Fardella de, 特拉帕尼, 米凯兰杰洛·法尔代拉·德, 帕多瓦的哲学家, 73

Trarbach, 特拉巴赫, 要塞, 27, 223, 252, 422

Trautmansdorf, Johann Sigismund, 特劳特曼斯多夫, 约翰·西吉斯蒙德, 萨克森的将军, 688

Travendal, Treaty of (1700), 特拉凡德尔条约 (1700), 402, 654—655, 670, 692

Treason, English Statutes, 叛国罪, 英国法令, 265

Trebizond, 特拉布松, 562, 609, 611

Tréguier, 特雷吉埃, 大麻, 817

Trembley, Abraham, 特伦布莱, 亚伯拉罕, 显微镜学家, 64n.

Trenchard, John, 特伦查德, 约翰, 宗教辩论家, 137

Trenčín, battle of (1708), 特伦钦战役 (1708), 434, 585

Trent (Tyrol), 特兰特 (蒂罗尔), 417

Trepassey, 特雷帕塞, 鳕鱼基地, 503

Treviso, 特雷维索, 威尼斯的贸易, 555

Trezzini, Domenico, 特雷齐尼, 多梅尼科, 意大利建筑师, 728

Triennial Act (1694), 三年法令 (1694), 220

Trier, city of, 特里尔城, 223, 225, 233, 422, 424

大主教的选举人, 225, 407, 590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7, 164, 404, 417, 555—556, 569
自由港, 604
东方公司, 641

Trinidad, 特立尼达 (古巴), 372

Triple Alliance (1717), 三国同盟, 737

Tripoli (Barbary), 的黎波里 (北非伊斯兰各国, 埃及除外), 224, 227, 543—544, 548, 553

Trois Rivières, 三河城, 484, 486, 496—497

Troitskaya, 特罗伊茨卡耶, 修道院, 718

Tromp, Maarten Harpetszoon, 特罗普, 马顿·哈普茨松, 海军上将, 798

Trondhjem, 特龙黑姆, 675, 677

Trotter, Thomas, 特罗特, 托马斯, 海军军医, 826

Trouin, René, 特鲁安, 勒内, Guay 的先生, 见Duguay-Trouin

Tschernin (Czernin), Count Jacob von, 切尔宁 (切尔宁) 伯爵, 雅各布·冯, 309

Tucumán, 图库曼, 525

Türk Ahmed Pasha, 图克·艾哈迈德帕夏, 安那托利亚总督, 639

Tull, Jethro, 塔尔, 杰思罗, 英国农业家, 68—69

Tunis, 突尼斯, 227, 543—544, 551, 553, 813, 838
另见Barbary Coast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ne, 蒂雷纳, 亨利, 图尔特奥弗涅的, 子爵, 法国元帅, 233, 243
军事思想, 742, 744, 751—753, 760

Turin, 都灵, 31, 284, 418, 422, 425, 512, 535, 559—562, 568, 584, 894

都灵条约（1696），160，171—172，175，179，250—251，
447

为尤金所攻取（1706），5，429，570，594，753

人口，542，560

大学，561

谷物价格，889

Turkey，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1—2，6，608—610；另见Carlowitz，
Passarowitz

乌列木（学者），616—617，620，629，631，644，646

东正教，3，128，554，578—579，613，617—618，625，
627，632—633，635—636，637，736

与俄国，见Russia

与西方，6，614—615，617—618，635—637，644

外国的观点，7，95，97，611，614

大臣，6，614ff.，629

军队，21，553，612—615，642，741，743，752，759，761，
789；另见Janissaries

海军，21，554，562—566，615，623，628，630，790；另见
Barbary Coast

与英诺森十一世，见Holy League

与威尼斯，2，6，154，227，555，562，565，619—623，
627，637—642

哈布斯堡王朝战争，195，223—224，225—227，232，238，
241，242—243，251，253，383，402，572，576ff.，618ff.，638—
642

与匈牙利，576—581，618—623，626—627；另见 Transylvania

与卡尔十二，2，630—631，635—636，669—670，673，703

与阿拉伯各省，608ff.；见Egypt

与鞑靼人，见Crimea, Russia

与波斯，609，643—645

与哥萨克，31，610，625，630—631，634，636

经济，546，549—552，611—612，623—625，628，644

财政，552，611—612，613，623—624，628—629

政府，553—554，608ff.，615—618，628，630，635—636，643ff.

图利普年代，643—646

Turretini, J.A.，特里坦尼，J.A.，日内瓦神学家，122

Tuscany, 托斯卡纳，9，151，160，174，404，473，540—544，591，813

与威尼斯绝交，171

驻地，387，393，395，473

私掠船，546；军舰，563

Tuy (Galicia)，图伊（加利西亚），526

Tyrconnel, Richard Talbot, 泰尔康内尔，理查德·塔尔博特，伯爵，198，206，213，769

Tyrol, 蒂罗尔，167，386，417，591，599，605

Tyson, Edward, 泰森，爱德华，英国解剖学者，56，60，62

Ukraine, 乌克兰

在乌克兰的战争，30，619，666—669，754

土耳其人，619，631，636

分裂, 631, 664, 696, 732

卡尔十二, 631, 660, 666—669

波兰, 683, 696, 699

俄国, 683, 696, 699, 732, 775—776

另见Mazepa, Orlik, Palej, Samuś, Zaporozhian Cossacks

Ukrintsev, Emelán Ignat' evich, 乌克兰采夫, 伊米兰·伊格纳特维奇, 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使者, 628

Ulm, 乌尔姆, 422, 589, 750, 755

Ulrika Eleonora, 乌尔里卡, 埃莉奥诺拉, 黑森的女大公和瑞典皇后 (1718), 673, 677, 679

Ulster, 北爱尔兰, 213, 235—237, 256

Uniat Church, 希腊正教, 128, 633

Uniformity, Act of (1622), 统一法令 (1662), 264

Unigenitus, papal bull, 谴责詹逊派教义的, 教皇的训令, 见Jansenism

Unitarians, 唯一神教派, 582; 另见Socinianism

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

海军, 3—4, 16, 21, 234, 295, 382, 790, 798—800, 808—809, 811, 814—815, 821—822, 825—828, 832

军队, 20, 202, 228, 382, 404, 411, 415ff., 742, 747, 750

联合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176, 195, 415, 799

经济, 29, 69, 385, 390—391, 415, 510, 520—521, 523, 535, 549—550, 799, 835ff., 893

文化, 32, 34—35; 宗教, 122—123, 135

与美国, 235, 350, 359, 406, 410, 434, 464, 515

战争资金, 294—298, 314, 411, 799—801, 831—832, 896

与马尔博罗, 406, 416—417, 420—421, 424, 427, 435—436; 见Heinsius

乌得勒支, 442—444, 448—451, 460ff.

另见 Amsterdam, Barrier, East India, Heinsius, Privateering, Slavery, William III

Uppsala, 乌普萨拉, 科学院, 42

Urals, 乌拉尔, 工业, 724

Urbich, Johann Chriatoph von, 乌尔别赫, 约翰·克里斯托夫·冯, 男爵, 俄国在维也纳的外交使节, 735

Urgal, 乌尔戛尔, 为法国夺取 (1691), 243

Ursins, Anne Marie de la Trémoille-Noirmoutier, 乌尔森, 特雷莫伊尔—努瓦慕蒂埃的安娜·玛丽, 公主

市长, 367, 371—373, 377—379, 380, 474, 476

Ursulines, 乌尔苏拉恩斯, 在加拿大, 496—497

Ushant, 乌森, 811

Utrecht, Peace of (1713), 乌得勒支和约 (1713), 6, 14, 16, 17, 26, 108, 131, 155, 164—165, 170, 186, 337, 376—377, 443—444, 461—467, 491, 507, 528, 557, 641, 832, 849—850

代表大会, 186, 337, 443, 446, 461ff., 507, 596

另见Spanish Succession War (Peace efforts)

Vairsse (Veiras), Denis, 维尔斯 (维拉斯), 丹尼斯, 小说家, 98

Valence, 瓦朗斯, 人口, 889, 900

Valencia, 巴伦西亚, 9, 347, 754

内战, 370—371, 373, 425, 429—430

政府, 9, 348, 353, 363, 373—374

贸易, 509, 540, 844

Valencia de Alcántara, 瓦伦西亚德阿尔坎塔拉, 要塞, 525—526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 要塞, 438, 477

Valenza, 瓦伦察, 418, 466n., 560n.

Valenzuela, Fernando de, 巴伦苏埃拉, 费尔南多·迪, 西班牙大臣, 351

Valincour, J.-B. Henri du Troussel de, 特鲁塞的瓦兰库, J.-B. 亨利, 法国海军上将的秘书, 803

Valladolid, 巴利阿多里德, 346, 375, 440

Vallisneri, Antonio, 瓦利斯内里, 安东尼奥, 意大利科学家, 61, 64

Valsesia, 瓦尔赛西亚, 418, 466n., 560n.

Vanbrugh, Sir John, 范布勒爵士, 约翰, 英国戏剧家和建筑师, 26, 89, 281n.

Von Robais, 范罗巴伊, 阿布维尔的家族, 864

Varasdin, 瓦拉日丁, 土耳其的省, 608

Vargas, 瓦尔加斯, 新墨西哥的总督, 356

Varignon, Pierre, 瓦里尼翁, 皮埃尔, 法国几何学家, 41

Vattel, Emmerich de, 瓦特尔, 埃默里奇·德, 法官, 173

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沃邦, 塞巴斯蒂安·拉·普雷斯特,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和统计学家, 29, 728, 762

设置要素, 18, 223, 230—231, 248, 750, 812

人口研究, 47, 330, 883

关于税收, 329—331, 332

攻城技术, 416, 750—751

关于殖民地的开拓, 500—501

关于军队, 747—748, 767, 781

关于私掠巡航, 803—804

港湾工程, 811—812

Vaudemont, Charles Henri de Lorraine, 洛林的沃代蒙特, 查尔斯·亨利, 米兰的总督, 250, 397, 403, 558, 597

Vaudois, 沃杜瓦, 119—120, 188

Vaudreuil, Philippe Rigaud, 沃德勒伊, 菲利普·里戈, 骑士, 魁北克总督, 496, 502

Vauvré, Louis Girardin de, 沃弗雷, 路易·吉拉尔丹·德, 土伦的地方行政长官, 830, 832

Velez, 贝莱斯, 要塞, 554

Vendôme, Louis Joseph, 旺多姆, 路易·约瑟夫, 公爵, 法国元帅

在西班牙, 249, 357, 375, 440, 569

在意大利北部, 417, 425, 429, 558

在蒂罗尔, 417, 422

在尼德兰, 432, 435, 757

奥德纳德, 小镇, 435—436

谨慎小心, 752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29, 350, 851; 另见Caracas

Venice, republic of, 威尼斯共和国, 131, 155, 168, 173, 180, 186, 386, 394, 594, 604, 608

土耳其的战争, 见Turkey

文化, 10, 32, 76, 109, 556

与莫里, 2, 158, 164, 184, 565—566, 620, 623, 627, 637—638, 640, 642, 782

与托斯卡纳的绝交, 171

经济, 509, 510, 543, 549, 555—556, 571, 604—605

人口, 542, 884

海军, 546, 562, 565, 620, 623, 638

克雷顿战争, 549, 555

内格罗蓬特, 622—623

另见Carlowitz, Passarowitz

Venlo, 旺洛, 要塞, 399, 466, 478

为同盟国夺取 (1702), 416

Veprik, 维普贝克, 为瑞典人夺取要塞 (1709), 667

Vera, Cruz, 维拉, 克鲁兹, 349, 354, 361, 372; 另见Mexico (*flotas*, 商船队)

Verbiest, Ferdinand, S. J., 韦尔比埃斯特, 菲迪南, S. J., 在中国, 130

Verden, 凡尔登, 472, 477, 649, 673, 678

Verger, Dame du, 韦尔热夫人, 法国在葡萄牙的代理人, 183

Verona, 维罗纳, 要塞, 753

Verrio, Antonio, 韦里奥, 安东尼奥, 画家, 32

Vetch, Samuel, 维奇, 塞缪尔, 新英格兰陆军上校, 505—507

Veterani, Count Friedrich von, 费特拉尼, 伯公爵, 弗里德里希·冯, 帝国的将军, 578—579

Via Carolina, 维亚卡罗莱纳, 604

Viana do Castelo, 维亚纳杜卡斯特卢, 谷物价格, 509

Viborg, 维堡, 676

Vico, Giambattista, 维科, 詹巴蒂斯塔, 哲学家, 33, 73, 558

Victor Amadeus II of Savoy, 萨伏依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第二, 9, 169, 188, 238, 432, 598

与法国, 160—163, 215, 238, 243, 247, 250, 403—404, 414, 579, 581

大同盟, 163, 240—241, 245, 248—249, 417—418, 422, 425, 429, 433, 592—593

以撒丁交换西西里 (1720), 159, 559, 597

他的改革, 560—562, 766—767

要求到伦巴第, 418, 466n., 560n., 595—597

Vidin, 维丁, 土耳其要塞, 610, 621

Vieira, António, S.J., 比埃拉, 安东尼奥, 巴西的教士, 129, 516

Vienna, 维也纳

被围 (1683), 5, 572, 618, 683

受威胁 (1704), 19, 417, 420; 另见Blenheim

建筑物的发展, 31, 572—573, 601

同盟协商会议, 172

市政当局, 311—312, 572

国家银行, 311—313, 314, 606

人口, 542

霍夫堡, 572, 573—575, 601

特兰斯瓦尼亚的办事处, 582

意大利王室顾问委员会, 597

工业, 603

下末格, 603

彼得大帝在维也纳，626，719

Vigarani, Carlo and Gaspare, 维加拉尼，卡洛和加斯帕雷，意大利的舞台设计题，109

Vigevano, 维杰瓦诺，418，466n.，560n.

全国性大会（1696），175，250，568，626

Vigo, 维戈，372，418，525—526，797—798，808

Vila Viçosa, 维科萨镇，520

Villafranca, 比利亚弗兰卡，243，560

Villa Viciosa, battle of（1710），比利亚维西奥萨战役（1710），375，440

Villars, Claude Louis Hector, 维拉尔，克洛德·路易·埃克托尔，公爵，法国元帅，177—178，314，428，456

在拉施塔特，5，171，444，472—473

卡米扎（起义者），325

王位继承战争，19，417，421，424，428，432，437—438，440—441，443—444，472

作为军官，432，437，749，751—753，755

Villemarie, 维尔玛里，486

Villeroi, François de Neufville, 维勒鲁瓦，弗朗索瓦·德·维夫维尔，公爵，法国元帅

尼德兰，249，421

意大利，405，409，767

拉米利斯，426，432，532，752，756

Villette, Philippe de Valois, 维莱特，菲利普·德·瓦卢瓦，侯爵，法国骑兵中队指挥官，526

Villmergen, war of（1712），维尔梅根战争（1712），120

Vilna, 维尔那, 693, 695, 699

Vincennes (Wabash), 文森斯 (沃巴什), 498

Vinhos, Figueró dos, 比努斯, 菲格罗·多斯, 制铁所在地,
513

Virginia, 弗吉尼亚, 480, 487—488

 威廉和玛丽学院, 495

 王位继承战争, 503, 507—508

 烟草, 851—852

Visé, Donneau de, 维塞, 多诺·德, 法国记者, 76

Vistula, the, 维斯杜拉河, 2, 665, 700—703, 754

Vitringa, Campegius, 维特林加, 坎佩奇乌斯, 荷兰加尔文派教徒, 141

Vitzthum, Friedrich von Eckstädt, 菲茨图姆, 弗里德里希·冯·埃克施泰特, 萨克森外交家, 695

Vivaldi, Antonio, 维瓦尔迪, 安东尼奥, 音乐家, 105, 115—116

Vladislavich, Sava (*alias*, Raguzinsky), 符拉迪斯拉维奇, 萨瓦 (拉哥舍斯基), 632, 634

Voetians, 富蒂乌斯派, 122

Voisin, Lavigne, 瓦赞, 拉维涅, 法国传教士, 499

Volhynia, 沃尔希尼亚, 700, 705, 712, 837

Vologda, 沃洛格达, 柏油, 841

Voltaire, 伏尔泰, 32—33, 40, 46, 62, 83, 97, 108, 111,
137

 《哲学通信》, 52, 221

 《路易十四》, 70—71; 《俄罗斯帝国》, 740

Vondel, Joost van den, 冯德尔, 乔斯特·凡登, 荷兰诗人, 74, 142

Voronezh, 沃罗涅日, 海军船场, 625, 718

Vorskla, the, 沃尔斯克拉河, 667; 另见Poltava

Vosges, 孚日, 木材, 814

Voznitsyn, Prokofy, 沃兹尼钦, 普罗科菲, 彼得大帝的同伴, 719

Vuillart, Germain, 维亚尔, 热尔曼, 詹森派, 132

Vyatka, 维亚特加, 柏油, 841

Wachtmeister, Count Hans, 瓦赫特迈斯特伯爵, 汉斯, 瑞典海军上将, 654, 830

Wager, Sir Charles, 韦杰爵士, 查尔斯, 海军准将, 372

Wake, William, 韦克,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127

Walcourt, 瓦尔考特, 骑兵交战(1689), 235

Waldeck, Georg, Friedrich, 瓦尔德克,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克, 亲王, 外交家和将军, 156, 207n., 235

弗勒勒斯, 239; 斯蒂刻克, 245

Walker, Sir Hovenden, 沃克爵士, 霍文顿, 海军少将, 505—506

Wallachia, 瓦拉几亚, 1—2, 578—582, 608, 619, 621, 625, 633, 635, 639, 641, 683, 688, 754

Wallachia, Little, 小瓦拉几亚, 1, 578, 580, 641

Wallerstedt, Count Lars, 瓦勒施泰德伯爵, 拉斯, 瑞典政治家, 652

Wallis, John, 沃利斯, 约翰, 数学家, 37, 42, 179

Walther, J.G., 瓦尔特, J.G., 德国音乐研究家, 117

Wanley, Humfrey, 沃利, 汉弗莱, 英国文物工作者, 87

Wars, 战争, 见 Algiers, Comacchio, Cossacks, Great Northern War, Holy League, Hungary, Malta, Morea, Morocco. Nine Years War, Omani, Persia, Pruth, Sacramento, Spanish Succession War, Villmergen; 与 for Habsburg-Ottoman Wars, 见 Turkey 题下

Warsaw, 华沙, 2, 652—653, 691, 695—697

华沙同盟 (1704), 697—698, 701

波兰—瑞典条约 (1705), 659, 699

俄波条约 (1716), 712—713

Waterford, 沃特福德, 240

Watteau, Antoine, 华托, 安托万, 法国画家, 32, 765

Webb, John Richmond, 韦布, 约翰·里奇蒙, 英国将军, 436

Weide, Adam Adamovich, 魏德, 亚当·阿达莫维奇, 德国在俄国的将军, 721

Welch, Thomas, 韦尔奇, 托马斯, 美国探险家, 504

Wellekens, J.B., 韦勒肯, J.B., 荷兰翻译家, 75

Wertheimer, Samson, 韦特默尔, 扎姆宗, 战争财政家, 309, 739

Wesley, John, 韦斯利, 约翰, 宗教领袖, 151—152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11, 20, 231, 392, 501, 812

海盜, 见 flibustiers

九年战争, 251, 355, 809—810, 825

王位继承战争, 372, 503, 505, 809—810, 825

贸易, 839, 849—851, 853—857, 859, 864, 866, 872, 894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586—587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162，234，246，473，649，662
亚麻布，867
- Wharton, Henry, 沃顿，亨利，神学家和学者，87，140
- Wharton, Thomas, 沃顿，托马斯，第一代侯爵，268
- Wheler, Sir Francis, 惠勒爵士，弗朗西斯，英国海军上将，
251，489
- Whigs, 辉格党，201，208，273—275
执政，216，267—269，437，439，448—449
下台，215，270，440—441
- Whiston, William, 惠斯顿，威廉，剑桥神学家和科学家，47，
51
- White, Thomas, 怀特，托马斯，英国哲学家，135
- Whitworth, Charles, 惠特沃思，查尔斯，男爵，英国赴俄国特
使，840—841
- Whydah (S. João Baptista de Ajudá)，怀达（圣·若昂·巴普
蒂斯塔·德·阿杰达），进口奴隶港，515
- Whytt, Robert, 怀特，罗伯特，苏格兰哲学家，67
- Wicquefort, Abraham de, 维克福特，亚伯拉罕·德，历史学
家，173，179
- Wieliczka, 维耶利奇卡，盐矿，844
- Wielkopolska, 维耶尔科波尔斯卡，695—697，700—702，705，
712
- Wigston, 维格斯顿，占领该地，892
- Wijnendaal, battle of (1708)，韦伊宁代尔战役（1708），
436
- Wilanów, 维拉瑙，华沙附近王宫，682

Wildt, Job de, 维尔特, 约布·德, 阿姆斯特丹海军大臣, 798

William III, of Orange, 奥兰治的威廉三世, 英国国王

性格, 17, 190—192, 208, 232

与欧洲共同的福利, 17, 156—157, 192

宗教, 122, 169, 188, 190—191, 210, 395

知己密友, 156, 170, 176, 192, 388

王朝联系, 168

与路易十四, 18, 156, 189—190, 195, 392, 400

与詹姆士二世, 198—199, 211ff., 250

入侵英格兰, 200—206, 226—227

对王位的态度, 169—170, 206—208, 249

特权, 208, 215, 265—268

与苏格兰, 212—213, 275—276, 392, 769, 783

与爱尔兰, 213—214, 235ff., 240, 242

战争目的, 162, 246, 249, 253

九年战争, 223, 242ff., 247, 249

海牙会议, 171—172, 237—238, 239

里斯威克, 26, 169—170, 187, 252, 381

西班牙王位继承, 191, 388ff., 400—401, 406; 见Partition
Treaties

与马克斯·伊曼纽尔, 353, 390, 393—394, 395

与德意志各邦, 165—166, 226, 237, 404, 408—409

与波罗的海列强, 154, 165, 172, 174, 184

中立贸易, 174, 187, 235

与萨伏依, 238, 250—251

与土耳其, 233

关于贸易和殖民地, 13, 15, 186, 187

外交政策的行动, 176, 187, 191, 266—267, 415

作为战略家, 11, 17—18

海之霸权, 11, 18—19, 162, 236, 239, 248—249, 391—392, 568—569, 797

与军队, 748, 769—770, 784

逝世, 409, 414

Willughby, Francis, 威洛比, 弗朗西斯, 英国博物学家, 59

Wilmot, Robert, 威尔莫特, 罗伯特, 英国海军上校, 251, 355

Wiltshire, 威尔特郡, 毛织品, 865

Winter Harbour (Maine), 温特港(缅因), 502

Winthrop, Wait Still, 温思罗普, 韦特·斯蒂尔, 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 481

Wismar, 维斯马, 649, 673—674, 678—679, 736

Wiśniewski, Janusz, 威斯尼奥威斯基, 贾纽茨, 克拉科夫总督, 711

Wiśniewski, Michael, 威斯尼奥威斯基, 米歇尔, 立陶宛权贵, 693, 700

Wittelsbach, house of,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167, 169, 244, 578, 589

另见 Joseph Clement, Maximilian Emmanuel

Wolff, Christian, 沃尔夫, 克里斯蒂安, 德国哲学家, 74

Woodward, John, 伍德沃德, 约翰, 英国地质学家, 40, 61

Woolwich, 伍尔维奇, 船舶修造所, 229, 811

Worms, 沃尔姆斯, 法国在该地(1688—1689), 225, 233

Wotton, William, 沃顿, 威廉, 英国学者, 70

Woudenberg, Cornelis, 沃屯伯格, 科尼利斯, 拿骚伯爵, 荷兰将军, 436

Wratislaw, Count Johann Wenzel von, 符拉蒂斯劳伯爵, 约翰·文策尔·冯, 帝国驻英国大使, 575, 587, 591

与马尔博罗, 420

乌得勒支, 450, 455, 462, 467

与查尔斯大公, 576, 591, 596

与尤金, 587, 595

逝世, 471

Wren, Sir Christopher, 雷恩爵士, 克里斯托弗, 建筑师, 106, 262

Wrenn, Ralph, 雷恩, 拉尔夫, 英国海军上校, 251

Wachowa, 沃斯乔瓦, 见Fraustadt

Württemberg, duke of, 符腾堡大公, 121, 245, 402

被劫掠(1688—1689), 786

Würzburg, bishop of, 维尔茨堡主教, 405

代价, 878

Wycherley, William, 威彻利, 威廉, 英国戏剧家, 89

Yale, 耶鲁, 大学的创办(1701), 494—495

Yavorsky, Stefan, 耶沃尔斯基, 斯特凡, 俄国教士, 127

Yemen, 也门, 咖啡, 858

Yorkshire, 约克郡, 人口, 887

Ypres, 伊普雷, 要塞, 249, 451, 477

Yucatan, 尤卡坦, 356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608

Yüsuf Pasha, 优素福·帕夏, 首相, 636

Zaandam (Saardam), 赞丹, 21, 719, 793, 814, 840

Zagreb, 萨格勒布, 581

Zalánkemén, battle of (1691), 扎莱凯曼战役 (1691), 580, 622, 631, 754

Zaluski, Andrew Chrysostom, 扎鲁斯基, 安德鲁·克里索斯托姆, 埃尔梅兰主教, 波兰首相, 690

Zambesi, the, 赞比西河, 517

Zamość, 扎莫希奇, 要塞, 712

Zante, 赞特, 海盗, 544

Zanzibar, 桑给巴尔, 为阿曼人所占领, 517

Zaporozhian Cossacks, 扎波罗热的哥萨克, 665—669, 683, 696, 699, 732, 775—776

Zeeland, 泽兰, 174, 187, 546, 655, 833

私掠船, 20, 174, 187, 420, 550, 799—801

Zeno, Antonio, 泽诺, 安东尼奥, 威尼斯海军上将, 565, 623

Zeno, Apostolo, 泽诺, 阿波斯托洛, 威尼斯歌剧歌词作者, 110—111

Zenta, battle of (1697), 森塔战役 (1697), 5, 383, 581, 626, 754

Ziegler, H. A. von, 齐格勒, H. A. 冯, 德国小说家, 74

Zinzendorf, 青岑道夫, 见Sinzendorf

Zolkiev, 佐尔基也夫, 665

Zórawno, Peace of (1676), 索拉努和约 (1676), 683

Zottegem, 佐梯根, 价格, 878

Zoutleeuw, 祖特利尤, 424

Zsibó, battle of (1705), 兹西波战役 (1705), 424, 585

Zürich, 苏黎世, 人口, 765, 884

Zuhab, Peace of (1639), 祖哈布和约 (1639), 608

Zulfikar, 朱尔菲卡尔, 土耳其官员, 621

Zvornik, 兹沃尔尼克, 土耳其驻地, 640

7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旧制度 1713—1763年

[英] J.O.林赛 (J.O.Lindsa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7: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7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旧制度 1713—1763年

[英] J. O. 林赛 (J. O. Lindsa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7卷, 旧制度：1713-1763年/（英）J. O. 林赛（J. O. Lindsay）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书名原文：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7,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ISBN 978-7-5203-2592-9

I. ①新… II. ①J…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713-1763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2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45

字数 716千字

纸书定价 1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7: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ISBN 978-052104545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海外贸易的增长和欧洲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章 社会阶级与国家基础](#)

[第四章 直观艺术和想象文学](#)

[第五章 启蒙运动](#)

[第六章 宗教](#)

[第七章 君主制与行政机构](#)

[第八章 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

[第九章 国际关系](#)

[第十章 法国君权神授君主制的没落](#)

[第十一章 英国](#)

[第十二章 西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

[第十三章 普鲁士的组成与崛起](#)

[第十四章 俄国](#)

[第十五章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第十六章 萨克森人国王统治下的波兰](#)

[第十七章 哈布斯堡领地](#)

[第十八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第十九章 外交大变动](#)

[第二十章 七年战争](#)

[第二十一章 美洲殖民社会的发展](#)

[1. 拉丁美洲](#)

[2. 北美洲](#)

[第二十二章 在美洲的竞争](#)

[1. 加勒比海](#)

[2. 北美洲大陆](#)

[第二十三章 在印度的角逐](#)

[第二十四章 在非洲和远东的经济关系](#)

[1. 非洲](#)

[2. 亚洲](#)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对“旧制度”的研究在时间上可以往前追溯到1648年，往后延伸至1789年。这里之所以选择1713年和1763年作为这个时期的上、下限，则是出于军事、外交和政治诸方面的考虑，突出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本卷除了说明当时的国际外交活动和国内政治状况（表现在普鲁士和俄国在中欧的崛起以及英法在西欧和公海上日趋激烈的竞争）之外，还企图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机构、社会结构以及主要思潮等，对旧制度作进一步阐述，虽然这些方面的情况可能在1713年以前就已有所发展，并且在1763年以后仍然继续存在。

在176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国际贸易量取得了可谓革命性的增长。同时，各主要贸易国家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第2章）。贸易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但是18世纪前半叶国际贸易量之所以有惊人的增长，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欧洲各国与美洲、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之间贸易的迅猛扩大。殖民地产品的再出口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大西洋的贸易，尤其是与加勒比群岛的贸易，在18世纪上半叶受到了欧洲各国的极大重视，因而自然地就成为在这个地区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四大强国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的原因。其他的一些从事非常重要的贸易活动的地区是印度，东南亚又次之。18世纪初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荷兰已不能保持其卓越的地位；法国和英国此时已赶上荷兰而成为贸易强国。18世纪后期国际贸易的又一特点是，法国和英国为争夺商业和殖民的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美洲和亚洲发生，而且也在地中海以及北欧和中欧地区的贸易中展开。对北欧和中欧的贸易当时在法英两国的出口货物中，仍占很大的数量；1713年以后，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与德国的贸易比之他们原先十分重视的与“旧西班牙”的贸易更为重要。18世纪初，法国由于其人口比英国多，而且生产的奢侈品也比英国的精美，因而在英国观察家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但是，法国的地位存在着某些很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缺陷对于当时的观察家们来说，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既没有看到法

国海军的薄弱，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的贸易平衡没有建立在制造大批价廉物美商品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而英国的繁荣却是以五金和布匹为基础的。当时人们只看到法国出口和再出口的商品在价值上超过了进口货物，因此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意味着繁荣。

欧洲18世纪前半叶的社会状况（第3章）表明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如何缓慢地改变着宗教战争结束时的那种社会。18世纪的欧洲社会仍然是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尽管贵族的地位在各国有很大的不同，如波兰、瑞典、匈牙利和英国的贵族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而法国、丹麦或西班牙的贵族在政治上就很软弱。在普鲁士，贵族必须为国家效力，或在军队里服役，或在政府中供职。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也曾试图要求贵族同样为国效力。欧洲人口中的主体仍然是农民。他们的境况在各国的也大不相同，从英国、瑞典和法国某些地区的自由村民到中欧、东欧和南欧各地的农奴，差异颇大。18世纪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城市中产阶级人数增多，影响扩大。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商人们，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商人人数和财富俱增，而在中欧和东欧，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被委以公职，中产阶级的队伍也膨胀起来了。

观赏艺术和想象文学反映了18世纪社会的状况以及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第4章）。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化似乎受奥古斯都罗马艺术的影响，但18世纪初期的文人艺术家们对于自己的文艺才能完全充满信心，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已经发展了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形式，因此他们能够产生出全然独创和异常优美的城市建筑和散文文学的样板作品。早在1730年，对中世纪建筑产生浪漫主义的兴趣的迹象就已经在英国出现；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哥特式风格的兴趣，一直是与对古典主义风格的赞赏并行不悖的。随着1741年《帕美勒》一书的问世，浪漫主义的倾向也开始出现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能够读书识字的人数日益增多的西欧，变得十分流行。但是，这个时期虽然在文学和建筑方面对浪漫主义的爱好初露端倪，然而在文学和市镇建筑方面更具有特色的却是那些带有一定程度的古典主义色彩但主要富有独创精神的产物。如像《旁观者》一类的刊物就具有伦敦、巴黎等这样一些繁华中心城市的社会特色。这种城市生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18世纪初的另一个具有

时代特色的成就，就是城镇的房屋与广场和街巷作为总体设计的一部分一并考虑，这在英国尤为明显。英国对城镇进行规划并统筹建造与之最合适的房屋的思想为各国广泛采纳，但是许多贵族（如法国的贵族）却喜欢住在周围有花园的住宅里；而在中欧、东欧，即使到18世纪末，发展较大的城市，也寥寥无几。

至于在18世纪早期散文文学中有所表现的思想，即后来称为“启蒙运动”（第5章），它们是以极力颂扬人类理智为基础的。人类理智到17世纪末已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然而，18世纪的怀疑论者和唯理论者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宁可向培根，而不向牛顿寻觅灵感。在这个时期，人们倾向于摒弃数学，注重自然科学，所以牛顿开创的世纪在布丰身上表现得最充分。这个世纪是科学思想大普及的世纪，例如伏尔泰在他的《哲学书简》中使牛顿的天文学大为普及。这个世纪也是收藏家和分类学家的世纪，其中最伟大的可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不能抽象思维的弱点，使化学得不到发展，人们普遍相信错误的燃素说，使这一学科停滞不前。在18世纪的上半叶，历史学的重要性被认为仅次于科学，但是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维科却并没有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因此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影响甚小。18世纪思想发展最重要的两门学科也许要算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据洛克的感觉心理学，人的性格是一张任意由经验书写的白纸。人们希望理性能够指导对后代的教育，从而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与人类智慧在识破天文奥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在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就要小些。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次大失败。这个时代还没有为社会科学上的牛顿做好准备。总的来说，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是相当肤浅的。怀疑论者和唯理论者的批评都是针对许多国家中的酷刑、野蛮惩罚等法制混乱现象的。他们鼓吹自由是“天赋的”。有些批评家，突出的如马布利和爱尔维修，极力主张平等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是重要的，但是就整个来说，批评家们在讨论政府形式时却是非常谨慎的。在法国，批评家们将进步的反教权主义的思想与保守政治结合起来。这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一般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保守的。

18世纪上半叶，西欧和中欧的有组织的宗教的地位并不是很强大（第6章）。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教皇的宝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一些并不杰出的人物所占据。在法国，天主教会由于詹森派和教皇

支持者（特别是耶稣会会士们）之间对凯斯内尔在他的《新约全书法文版附关于道德问题的思想》一书中所表述的意见是否异端邪说进一步展开争论，而告四分五裂。《克雷芒通谕》谴责凯斯内尔的101条神学论点，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后来成为带有一定政治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在18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削弱了法国国王（他是支持教皇通谕的）力量，也使罗马天主教教会声誉扫地。在整个欧洲，王公贵族中有一种脱离教皇控制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世俗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表现，而且在诸如范·埃斯本·詹农和霍恩斯泰因等作家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现。教廷感觉到不得不做出一些实际的让步，如1727年对撒丁的让步，1737年和1750年与西班牙达成的政教协定，以及1740年对葡萄牙以及对那不勒斯的让步。18世纪也出现了教皇最有力的老盟友耶稣会会士们在许多国家中丢脸并被逐出的事件，这个运动最后终于在1773年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教皇本人竟然出面镇压耶稣会。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有组织的宗教的权力也并不比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强大。在讲德语的地区，数量众多的地方教会的存在增强了大学的权威，教授们拿启蒙运动的思想来影响宗教政治。许多小教会的存在也往往削弱教会权威的观念。把哈雷作为强大据点的虔敬主义，与启蒙运动一样，是反对教权的。在英国，18世纪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在观点上也带有世俗的倾向。一个牧师能否从一个贫穷的教区调任或提升到一个富裕的教区去工作，这有赖于辉格党的正确原则，因此主教们对于政治的兴趣往往甚于对精神事物的兴趣。失去那些拒绝宣誓服从国教的教士，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国教。乔治一世即位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便得救，不再遭到迫害，因此他们的人数在18世纪初虽然略有减少，他们的宗教热情也被当时盛行的唯理主义倾向所冲淡，但是他们在英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却起着重大的作用。而真正的宗教热情却要到摩拉维亚弟兄会、卫斯理的追随者以及英国本土教会福音派的信仰复兴者教友身上去寻找。

18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正常的政体形式是某种君主专制政体（第7章）。君主政体的一个辉煌的例子是法国，路易十四的传统仍然使王位大为增色，但是在18世纪的观察家看来，法国的国王由于受到宪法条文的约束，并不像西班牙、丹麦或普鲁士国王那么专制。反过来，西班牙等国的国王，看起来又不像全俄沙皇那么独裁了。对于18世纪的观察家来说，全俄沙皇只可与土耳其的皇帝相比拟。即使国王的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如在英国或瑞典要受到宪法的限制，在葡

葡萄牙要受到教会的限制，在神圣罗马帝国要受到其领地性质迥异的限制，国王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例如瑞典1772年发生的政变。甚至波兰的王位也能用来激励一下这个不幸的国家，使之活跃起来，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的情况便是如此。尽管欧洲各国的政体形式仍然同前两个世纪一样，极为普遍的是君主专制政体，但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半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才比以往有点效率。中央政府中，朝着日益专业化方向发展，各省则采取措施使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但是，许多国家的司法行政机构仍然十分混乱，与古老的习俗和地方特权纠缠在一起。除普鲁士之外，征收王家岁入的方法收效甚微，因此战争总是使许多国家受到巨大赤字的威胁。甚至普鲁士国王、罗马帝国皇帝一直不得不依靠外国的津贴。法国国王统治着欧洲中人数最多，也是最富裕的人口，但是他在18世纪末同样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结果导致了王朝的垮台。英国国王非常幸运，他以很低的利率轻而易举地借到了钱。

武装力量和18世纪战争的性质，清楚地反映了政府的特点和社会的结构（第8章）。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都是按一定的方式和常规进行的。它们和16、17世纪的“正义和道义战争”大不相同（第165页），也不同于19世纪常见的那种民族或意识形态狂热的战争。在18世纪，许多战争都是王朝战争，其中三次分别称为西班牙、波兰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战争总是为了要获得某种特定的东西而进行的，最后以交换疆土和重新划定边界而告结束。这些战争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称不上总体战争。流血和破坏的程度都因遵从战争规则而有所限制。战斗尽可能局限在人数少的职业军队中进行，而各次战役也主要是一些围攻或意在迫使敌方撤退的迂回运动。战术则是因循守旧，传统的老一套。而且在18世纪期间，武器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只是木质的推弹杆在1740年为铁质的所代替而已。部队的行动缓慢而拘谨，因为没有一支军队敢于远离其弹药库和粮库。冬季战役由于道路状况恶劣几乎无法进行。军队是由社会上的非生产性人口组成，贵族提供军官，而流浪汉、罪犯则构成士兵的主体。人们认为雇佣外国军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因为这样可以不耗费国家现有的人力。这种军队对于他们所从事的战争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热情。他们服役是为了挣军饷，为了掠夺财物。开小差的情况总是十分严重，因此部队只准驻扎在乡村，但要在军官监督下配给口粮。纪律是严明的，士兵必须害怕自己的军官甚于害怕敌人，这

是必要的。后来逐渐发现靠招募，甚至靠拉丁的办法都不能够补充足够的兵员。在普鲁士和俄国，曾经试验了某种征兵形式，但是在18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出现彻底的全国征兵制的形式，资产阶级的分子便逐渐地跻身军官的行列，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18世纪上半叶的陆军和海军都是国王们精心豢养的玩物，它们保守、守旧，费用浩大；而且，如有可能，利用这些玩物不经过战斗就可取得结果，因为打仗花费很大，18世纪的统治者发现要征敛到额外的赋税实是困难。

国王们不愿打一场“总体战”，或者说，实际上不愿打任何战争，除非这场战争的目的有严格的限制而且一般是为王朝的目的而战。这种情况对于英法之间商业上的竞争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而英法之间的竞争在18世纪已日趋明显地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种力量（第9章）。在18世纪初，这种竞争是隐蔽的，因为从1716年到1733年前后两者的统治者都暂时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因此彼此结盟。除了英法商业竞争的缘故以外而有可能引起冲突的两个地区是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在地中海，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使奄奄一息的西班牙恢复了生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波罗的海，瑞典的衰落为俄罗斯和普鲁士这两个新的大国的崛起让开了道路。乌得勒支的和平解决办法标志着法国的部分失败，也为英国赢得了某些好处。但是，如果把18世纪的后半叶称为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优势的时期^[1]，则低估了法国的重要意义。当欧洲的和平在1717年、1718年和1725年屡次受到西班牙侵略的威胁时，英法的联合行动证明两国的力量足以制止敌对行动大规模的发展，而且英法也能够说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终对意大利的西班牙女王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在波罗的海，漫长的北方战争于1721年结束了，一方面是由于查理十二于1718年逝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法外交的胜利。和平在这个地区持续到1733年，而1725年彼得大帝的逝世使维持和平的任务大为容易。在彼得大帝逝世后的大约10年间，俄国在北欧事务中不再起着重大的作用了；不过，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俄罗斯和普鲁士作为重要的大国出现，乃是18世纪重大的发展之一。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俄国的一支军队第一次深入西欧，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则是普鲁士侵略行为的直接结果。1739—1748年的战争是复杂的，因为这场战争与英、西、法之间的殖民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到了1739年，1716年时曾经可以促使英法两国国王结成同盟的国内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1739—1748年的战争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它明显地标志着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

普鲁士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能力以及俄国在外交上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都是1755—1756年“外交大变动”的重要原因。七年战争，就像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一样，所以打起来的部分原因是要解决由普鲁士的野心所引起的争端，但它也是英法在印度和美洲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舞台。

从路易十四逝世到七年战争结束的这段历史，实际上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比较漫长时期的一个部分，它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衰亡和失败（第10章）。路易十四的统治结束时，被人称为“旧制度”的专制主义的形式仍然是一种有效治理的新模式，它把现代的专制主义和古老的中世纪的君权神授的思想结合起来了。这种新型的君主政体，黎塞留和马萨林使它臻于完善，它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比较，非常有效率，因此即令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遭到了部分失败，法国政府在18世纪初还是走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前面。法国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口约有1900万，而神圣罗马帝国为2000万人，西班牙和英国各为600万人。因此，法国在1713年仍然不失为欧洲的一个实力最雄厚的大国。由于路易十四在他统治的结束时奉行了一个招致整个欧洲团结起来一致反对他的政策，因而遭受了一部分失败。法国在18世纪初却实施了一种被广泛仿效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虽然威望很大，但是这种新专制主义中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点。甚至到18世纪末，法国也未完全统一，在其疆界内有些地区行政、司法、赋税、军事组织以及宗教事务等交叉重叠，十分混乱。甚至财政制度也不统一，国家不是单一的关税区。虽然地方自治机构在很多地区都已取消，但是许多地方特权依然存在，严重地妨碍了王室政府的统治。地方长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因为他们管辖的地区太大，手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他们的职责繁重。王室政府的效率更是低下，因为地方长官时常拒绝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18世纪法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被少数大臣所掌握的。虽然当时至少有4个政务会来处理外交、内政、财政、贸易和宗教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大臣形成了任何统一的内阁。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才有某个人拥有首席大臣的头衔。政府的实际首脑是国王。因此，这个首脑人物应具有出众的才能，并且准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国家的事务中，这一点对于法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路易十四曾经把本来可以分担国王的行政职责的一切机构都削弱了，但是他却给教士、贵族和议会留下了起干扰作用的充分的权力。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后，摄政掌握了大

权，他企图弥补他所继承的那个政府体制中的某些缺陷；但是他的改革失败了，这就表明这个由红衣主教和路易十四苦心经营的制度是多么根深蒂固。摄政也试图解决一下国王钱财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对约翰·劳十分信赖，但是“劳氏制度”只是昙花一现，在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之后，也于1720年宣告失败。这次试验确实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贸易，但是它也造成了财富的再分配，其结果是使阶级界限大为混乱，从而进一步破坏了从路易十四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体制。健全的财政对于一个稳定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而和平的外交政策对于健全的财政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弗勒里认识到这一点，因此继续奉行由摄政倡议的与英国结盟的政策。弗勒里在这个联盟的有力支持下，才恢复了法国在北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法国根据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签订的维也纳条约，终于收回了巴尔和洛林。1743年，弗勒里去世后，对于事务的控制权重又归于路易十五，但是他不能胜任这个任务。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指导政策，法国宫廷内各派斗争激烈。贝尔岛是1740年主张对奥地利作战一派的中心人物；阿尔让松于1743年位列群臣之首，但他并无能力推行有力的政策，因此在1748年到1756年之间，很难说究竟是谁在指导法国的政策。蓬巴杜夫人赞同贝尼斯的主张，贝尼斯于1756年与奥地利缔结了十分惊人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同盟。蓬巴杜夫人还帮助舒瓦瑟尔在1758年上台。舒瓦瑟尔是一位很能干的大臣，但是到他上台时，法国在国外信誉已大为扫地，在国内王权也被削弱，一部分原因是宗教斗争，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马肖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企图征收二什一税以恢复经济而引起的反对所造成的。

18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崩溃的时候，英国的君主政体却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稳步前进，走向繁荣和强大（第11章）。在1713年，英国与法国相比，看起来并不十分煊赫。它的人口只有法国人口的1/3左右，国内的交通状况非常恶劣。但是有些方面英国要比法国强些。英国的地方行政机构可能是松懈的，甚至是腐败的，但是它有着郡、自治市的一套系统，因此英国虽然有着一整套不同的行政区划，但并没有显得杂乱无章。英国也是一个单一的关税区，所以沃波尔在1721年能够实行一个全面的关税改革计划，一百多种货物免收出口税，并降低许多原料的进口税。与法国的地方长官相比，英国非职业性的、志愿的治安官似乎工作效率不高，但是实际上英国的郡与法国财政区一样被管理得井井有条。英国的税收制度比法国的有效得多。

公众坚定地信任政府，尤其在政府建立了偿还国债的偿还基金后，许多人开始购买政府的证券。因为贸易兴旺发达，税收中拨款用于偿还基金的部分比人们期望的还要多。因此虽然沃波尔为了避免征收额外的税收，于1727年和1733年曾两次压低偿债基金，但是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18世纪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容易地和用这样低的利率借到钱。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已是1688年的80倍，但是政府支付的利率在1717年降至5%，1727年降至4%，而到1749年竟降至3%。英国政府的制度也证明比法国的有效得多，虽然在一些方面两国的政府制度彼此十分相似。与法国相似，英国真正掌握政策的是少数几位大臣；与法国不同的是，这些大臣不正式开会议事，而且是撇开国王商讨决策。在这个由大臣们组成的小圈子里，通常有一个为其他大臣公认的首脑人物。他通常负责把大臣们的决策报告国王，并力图说服国王采纳他们的决策。这位首脑人物所拥有的绝不像现代的“首相”所拥有的权力。“首相”这个头衔往往是他的政敌给取的，而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英国的实际情况仍然如此，与法国不同，英国的大臣们往往自行商讨，自行决策。与法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英国的大臣通常并不就是宫廷里的宠臣。18世纪英国的下院中3/4的议员是由自治市选举产生的，选举权是受到奇特的限制的，或者甚至是由口袋选区选举产生的，但是议会至少为构成英国社会的各阶层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代议制。那些在议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通常是讲究实际的。1715年詹姆斯党人起事的失败就表明英国政府制度的稳定和基础的健全。英国政府十分健全，甚至还经受住了英王和威尔士亲王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辉格党内部的派别之争。

1720年“南海骗局”发生时，沃波尔及时地重掌政权，挽救了英国。此后直至1742年，他一直在指导政策。沃波尔与弗勒里一样，认识到一个和平的政策最切合英国的需要，而他所领导的不冒险的政府，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时代。然而，到1733年时，沃波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了。他提出的税务计划引起了一场纷争，一些辉格党的贵族起来反对他，结果自1715年以来辉格党人第一次有足够的人数来组成一个可供选择的政府。在1735年的大选中，沃波尔的支持者在那些舆论仍然很重要的选区未能获胜。1736年，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莱斯特宫另立一个对立的朝廷，成为反对派的核心。曾经是沃波尔最忠诚的朋友卡罗琳王后又于1737年去世了。1738年，法国根据维也纳条约，

似乎在欧洲胜过英国一筹并取得了优势。1739年，沃波尔被迫与西班牙宣战。1742年，他辞职。他的引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年来，沃波尔一直在压制社会上的种种抱负。而这种抱负却是一个面临商业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的社会所必然会产生的。”^[2]18世纪下半叶，在查塔姆指导外交政策时，这些雄心壮志获得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得益不太大，但是七年战争却使它在印度和美洲赢得了一个帝国。英国在海外引人注目的征服，它的繁荣较为稳定，使它威信倍增。因此，观察家们很容易相信，英国的宪法保证了维护自由和获取巨大的财富。

1716年的英法联盟很难在其中保持和平的一个地区是西地中海（第12章）。在那里，经济上和政治上均已衰落的西班牙，由于一位得到法国经济专家支持的波旁亲王的到来又复活了。在那里，西班牙的新王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把西班牙新获得的国力用来支持她为儿子们对意大利领土提出的要求。西班牙的经济状况在1700年腓力五世即位时十分惨淡。国家的社会成分没有为改革措施提供多少支持的前景。教会十分强大，而且它的势力完全站在传统和保守主义一边。贵族人数众多，拥有大量的土地，极端粗野，没有政治头脑。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各阶层则人数很少。最初三个波旁王朝的国王都不是改革者，因此不能称之开明的君主，但是他们并不奢侈，而且他们手下有一批能干的顾问。他们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注意经济问题并且讲究效率。他们想方设法增加王室的岁入，建立海军，恢复与印度的贸易，并且改进西班牙的一般状况。意大利从1700年到1748年一直是西班牙野心的主要目标。它在18世纪中呈现出的景象却不尽相同。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宛如一座大花园，精致的城市林立，城市里的艺术生活蓬勃发展。但是南部却是全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各教皇国这个时期在政治上依然如故，但是米兰和托斯卡纳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下却得到了迄今少见的良好治理。帕尔马和那不勒斯在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子孙们的统治下也是如此。葡萄牙由于孜孜于宗教问题，又从巴西源源不断地得到黄金的供应，因此在1750年蓬巴尔的出现之前未进行任何改革。

如果说，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对殖民地的争夺是推动1733年后西欧发展的关键，那么在北欧和东欧，对于未来极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普鲁士和俄罗斯作为两个能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主动的大国的出现。

在这两个国家里，最引人感兴趣的事件是它们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它们取得的新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的强大（第13章）的某些基础是由大选侯奠定的，但是即便是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普鲁士在地理上仍然是四分五裂，在经济上是落后的，而且人力不足。当时普鲁士的人口只有200多万，土质是沙土，而且耕作方法又十分原始。尽管大选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普鲁士的制造业依然处在萌芽阶段，贸易也存在逆差。腓特烈·威廉一世最关心的事物之一是陆军，但是要维持和发展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他必须聚敛更多钱财。他努力地从他的王室领地或通过征收间接税筹集每一笔可能聚敛到的钱财，这就要引起对国家行政管理的一次全面改革。1710年，王室领地占全部土地的1/3和全部农民土地的1/4。王室领地短期租赁给国王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对土地实行了非常有效的管理，因此从领地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几乎相当于从全部税收所得到的收入。主要的税有两种：一种是贡赋，有时占一个人收入的40%，除了王室领地上的农民外，其他的农民都要纳贡；另一种是货物税，这是对城镇居民征收的税，腓特烈·威廉一世把这种税扩大到王国里所有的城镇。为了保证各个城镇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由国家任命的拿薪水的官员替代了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务会。为了增加城镇的财富，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调整了工商业。行会的章程也受到国家监督。但是，即便如此，贸易仍然入超。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简化了税收手续，精简了国家的行政机构，把原来分别负责王室领地和征收战争赋税和货物税的两个部门合并成一个“战争赋税、财务及王室领地管理总署”。这个机构采取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按多数票做出决定。这个机构下属各省的地方委员会。每个城镇、王室庄园或其他乡村地区都受到地方委员会具体而有效的监督。腓特烈一世试图用各种方式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他欢迎从法国和萨尔茨堡逃亡出来的新教徒；他从国外招募士兵数量之多，竟占他军队总数的2/3；他在国内强迫农民入伍；从1733年起，他采用由县补充军队中阵亡士兵的制度。他还要贵族为国家服务，坚持贵族的子弟们应到军队中服役，担任“士官生”或“尉官”。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时，他发现国库充实，并有一支7.2万人的精锐军队，而当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是普鲁士的3倍，而正规军的人数只有8万至10万。腓特烈利用他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同一年奥匈帝国皇帝去世的时机入侵西里西亚。1763年，腓特烈发动的战事结束

时，普鲁士的疆域大大扩大了。1772年，腓特烈策划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并取得了西普鲁士时，普鲁士的领土又进一步增大。1756年以后，腓特烈二世在国内把注意力集中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上。他还对腓特烈一世所忽视的司法机构进行了改革。腓特烈二世又尝试提高从他先父那里继承过来的行政管理机器的工作效率。凡此种种说明，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设法克服了一个贫穷小国的弱点，但他并没有创立一个健全政府形式。

俄国的发展（第14章）可与普鲁士的发展相媲美，但是俄国却没有一位可与这位大选侯相比的统治者；虽然彼得大帝创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国家机器，但是他没有一个有才能的直接继承者来充当腓特烈二世这一角色，运用国家的实力去赢得胜利并取得疆土。18世纪初，俄国像普鲁士一样，经济落后。农业产量之低，交通状况之恶劣，因而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经济的主要来源不是农业，更不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工业，而是靠圣彼得堡至喀山一线以北的大森林中出产的木材、皮毛和盐。彼得大帝的改革是1709年俄国在波尔塔瓦战胜查理十二世之后开始的，是在增加俄国军事力量的决心促使下进行的。为此，彼得大帝发展了俄国的铸铁工业，因此他在制造军火方面，铁可自给自足。他还增加布匹的产量，然而即使在这时他也不能生产足够的布匹满足军队的需要，于是他大量增建纺织厂。他还鼓励建立其他的工厂，所以，到他的统治结束时，已经有两百多家工厂开工了。给矿山、工厂提供劳动力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是熟练的工匠非常少。尽管彼得大帝做了种种努力要吸引外国人来俄国工作，并训练本国的工人，但是情况仍然如此。然而，要找非熟练工人却是易事。在城镇，私人雇主可以利用当地的穷人，而国家则可征集孤儿、盗贼、醉汉以及其他社会上的闲散人等。彼得大帝还抽调了成千上万王室领地里的农民去到那些远离城镇的企业中充当非熟练的劳动力。要取得任何成就最首要的是要改善国内的交通状况。彼得大帝曾考虑用石块铺路，但是成本过高，耗资巨大，因而他决定开凿运河。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是交通状况仍然很糟。因此，运输费用，再加上国内的关税壁垒，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彼得大帝能成功地发展起来的一项贸易是通过圣彼得堡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到1725年，俄国的出口货物价值相当于进口货物的两倍，虽然其中包括有来自中东和亚洲的一些货物，而俄国在这些地方却没有东西可以出售。彼得大帝在筹集足够的岁入以支付军费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于

是他于1718年修改了直接税制度，用人头税代替对一家一户征税的方式。他彻底改组了军队，改为常备军。常备军由从每20家农户中抽调的一名男子组成。为了保证税收的正常进行，彼得大帝也彻底改组了中央政府，用联合组织来替代政府机构重叠的混乱现象。但是，他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收效甚微，他曾做过两次努力，但均告失败，结果省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掌握在驻扎各地的团队指挥官的手中。彼得大帝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一样，没有改善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不过他确实颁布了一部刑事法规，规定证人和被告人必须亲自出庭受讯问。他废除了教长的职权，并于1721年用宗教会议来继续管理教会。他企图对上层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子弟施以教育，但没有成功。他也试图给黎民百姓提供书籍，但同样没有成功。彼得大帝的政策对于俄国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718年的财政改革使农民的人数增加了，占总人口的90%。西伯利亚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13%。彼得大帝强迫这部分农民每年交纳40戈比的额外税款，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从不交纳封建捐税的。可称为贵族的占人口的2%，这部分人受彼得大帝改革的影响最大。他在17世纪宣布一切贵族的庄园为世袭财产，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发生的变革给予了法律的承认。同时，他坚持贵族的所有成员必须为国效力，而且他1714年的“限嗣继承地产权法”背离莫斯科古老的习俗，该法强令地主只能把地产传给一个继承人。这样，他就制造出一批没有土地的贵族，必须靠为国家效力来谋取收入。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后，俄国出现了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俄国深受其害，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国内，贵族能够从沙皇那里强求让步，一直到他们完全摆脱了彼得大帝强迫要求他们应提供的服务。叶卡捷琳娜一世建立了最高枢密院，贵族们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务。彼得二世时期，首都迁至莫斯科，以多尔戈鲁基家族为代表的贵族掌权。1730年，安娜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法”。1731年，她又减少了贵族服役的数量。安娜女皇去世，宫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乱，直至1744年彼得大帝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女儿叶利托维塔在普利奥布拉岑斯基团队的帮助下掌权后才告结束。人们认为俄国已很强大，与英法两国都有着真正的利害关系；法国在1742年和英国在1756年都曾试图与俄国结盟，但都没有成功。总的来说，在彼得大帝死后，直至1762年叶利扎维塔去世，由腓特烈大帝的忠实崇拜者彼得三世继位为止，俄国的政策一直倾向于与奥地利结盟。彼得三世结束了对普鲁士的战争，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

时，他留给给她的是这样一副局势：俄国最终能够奉行一种独立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让俄国充分利用彼得大帝的改革所积聚起来而尚未耗尽的力量。

普鲁士和俄国作为大国最初明显出现的地区之一是波罗的海（第15章）。1721年北方大战的结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两个大国——丹麦（当时包括挪威在内）和瑞典（当时统治着芬兰）——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但是这也使它们退居为二等大国的地位。北方战争结束时，丹麦和瑞典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各公爵都对瑞典的王位以及丹麦统治者所觊觎的领土提出权利要求。丹麦1721年到1773年的政策方针是要使丹麦对整个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部分的权利要求最后得到普遍的承认。这个问题弄得很棘手，因为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各公爵有时可以依靠俄国强有力的支持，有时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获得瑞典的王位从而加强他们的力量。1718年，查理十二世去世时没有男嗣，一位可能要求继位的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他是查理姐姐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女婿。查理·腓特烈未能取得瑞典的王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提出的权力要求已不再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了。1723年，议会里的荷尔斯泰因派的势力很大，它可以为查理·腓特烈弄到一大笔钱以及“殿下”的称号。这就表明他并没有被排除王位的继承。1723—1726年，丹麦的政治家们害怕彼得大帝对丹麦国王怀恨在心，他会在查理·腓特烈重新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属地的战争中支持他；而且，瑞典的荷尔斯泰因派的势力可能仍然相当强大，可以迫使人们承认查理·腓特烈为有确定继承权的继承人。这场危险过去了。1726年，瑞典的荷尔斯泰因派分裂了，而且1727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紧接其丈夫也归了天。俄国也就不再支持查理·腓特烈了。一直到1738年，霍恩伯爵及其一派（这一派人因为奉行一种浑浑噩噩、毫无进取精神的政策，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睡帽党”）仍然控制着瑞典，而且波罗的海地区也是相对比较平静。但是，1738年霍恩却为好战的“礼帽党”所替代。这些“礼帽党”人与法国结成同盟，投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反对俄国，他们希望收复瑞典在1721年所丧失的属地。瑞典在战争中惨败，“礼帽党”通过把国内的注意力转移到王位继承问题上，才使自己免于在1742—1743年失去权力。一位强有力的王位候选人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彼得·乌尔里希。他是查理十二世的侄孙，新上台的女沙皇伊丽莎白的侄子。“礼

帽党”希望通过支持这位年轻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权利要求来取悦于他的姑母，以诱使她对瑞典做出有利的让步。查理·彼得·乌尔里希作为候选人在瑞典颇得民心，但是在瑞典人正式邀请他去成为法定继承人之前，女沙皇伊丽莎白已经承认他是她自己在俄国的继承人，因为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俄国在最近一次灾难性的战役中征服了芬兰。女沙皇伊丽莎白遂强迫瑞典人承认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阿道夫·腓特烈为法定继承人，以此作为恢复芬兰的代价。他是查理·彼得·乌尔里希的继承人，查理·彼得·乌尔里希当时没有子女。俄国曾派遣了一支1.2万人的军队一度占领了瑞典以支持阿道夫·腓特烈；俄国的舰船也附属于瑞典的海军，表面上是为了要阻止丹麦对王位继承问题的安排做任何干扰，因为丹麦对于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家族日益增长的势力感到惶恐不安。1762年，查理·彼得·乌尔里希成为俄国沙皇。他立即与普鲁士媾和以便把军队转过来对付丹麦，但是在他还没有真正来得及发起与丹麦的敌对行动之前，他就被废黜了。继位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她的丈夫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权力要求不感兴趣。因此，她准备在她儿子保罗成年之后，由他来向丹麦国王提出这些要求。1743年以后，俄国在瑞典的势力也减弱了，因为阿道夫·腓特烈娶了腓特烈大帝的妹妹，从而逐渐与俄国疏远了。在七年战争中，瑞典人在向普鲁士人发起的一次进攻中失败了，从而促成了“礼帽党”人在1764—1765年间的垮台。战争使瑞典的力量大大削弱，为俄国和其他外国势力所左右。1768年，看来几个强大的邻国几乎要把它瓜分掉了。到1772年，瑞典和丹麦已明显地降为二等国家了。

波兰（第16章），俄国和普鲁士在18世纪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甚至更为明显，其后果也更为悲惨。从1679年至1763年，波兰一直受韦廷家族的萨克森国王们的统治。在这个时期的头20年里，奥古斯特二世一直跟积极拥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为国王的一帮为数甚众的臣民相对立。奥古斯特只是在俄国的帮助下才于1709年回到了波兰。当时俄国的威望因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胜了查理十二世而大大提高。1717年还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他又与叛乱的臣民达成了一项协定。作为报答，俄国人在库尔兰公爵家族濒于灭绝时，占领了库尔兰，并且拒绝交出利沃尼亚。这位波兰国王竭力想摆脱对俄国的屈从地位，甚至在1719年与奥匈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迫使俄国从梅克伦堡撤出。但是波兰的贵族拒绝支持这个政

策，因为他们害怕卷入一场对俄国的战争。俄国宫廷则坚持执行不让波兰强盛起来的政策。1720年，俄国和普鲁士一致同意保护波兰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竭力阻止任何可能使波兰恢复实力的国内改革。这个协议在1726年、1729年、1730年、1732年、1740年、1743年和1762年一再重新签订。1726年俄国又和奥匈帝国皇帝结盟，以阻止韦廷家族掌控波兰的王位。但是当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候选人地位再次得到法国的支持时，俄国又充当了它在1709年和1717年担当过的角色，扶植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登上了王位。在他统治期间，15届议会只有一届没有闹得不欢而散。波兰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出两个最大家族竞相谋求国外支持的丑剧：波托茨基家族指望得到法国和普鲁士的支持，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支持。在七年战争期间，波兰的国土不断为外国军队所侵占。普鲁士和俄国对于这个不知所从的共和国的国土虎视眈眈。波兰的唯一希望就是在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1762年普鲁士与俄国的结盟以及1763年奥古斯特三世的逝世，给波兰带来了厄运，波兰在各任萨克森人国王的统治下，保持着虚假的繁荣（至少对于贵族来说是这样），领导昏聩无能，知识界停滞不前，政治上一片混乱。

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对其具有较大影响的第三个地区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地（第17章）。在这个地区，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影响，尤其是普鲁士的影响，使哈布斯堡帝国开始解体。哈布斯堡领地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日益强大的邻国的影响，因为在18世纪上半叶帝国的皇帝没有男嗣。到1720年以前，查理六世皇帝面对着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引起国际大混战之后，一直孜孜不倦地为巩固自己在领地内的地位而忙碌。1712年，这位皇帝根据索特马尔和约，又可以在匈牙利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力；1718年，他根据帕萨罗维茨和约，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了不少领土，包括巴纳特和贝尔格莱德本身在内。到了1720年，这场旷日持久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终于结束了。1720年之后，查理六世的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要确保他所占有的领地都要传给他的女儿。女人是不能够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的，但是查理六世却有权决定由谁来继承他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世袭领地。而且，虽然哈布斯堡的男嗣已告断绝，匈牙利却有权选出一个新的统治者，但是匈牙利议会却首先宣布准备选举奥地利的女大公为匈牙利的女王，应该由她继承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世袭领地。此后，查理六世费尽心力地说服大多数的欧洲大国承认他的女儿是他的

继承人。1733年，奥匈帝国又卷入了波兰的王位继承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查理的候选人战胜了，但是，这次战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意大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意大利，查理不得不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割让给西班牙，虽然他收回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并为他的女婿取得了托斯卡纳，可是他的女婿又把他在洛林的世袭领地转让给法国以作为回报。查理的地位到其晚年一直不断地被削弱，先是由于他的唯一真正有才干的将军欧提亲王在1736年去世；继而是对土耳其人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739年结束时，使奥地利几乎失去了它在1718年所赢得的一切，只有巴纳特除外。次年，查理六世去世。巴伐利亚立即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她父亲领地的权利提出了挑战。普鲁士提出要帮助她抵抗巴伐利亚，但是要求取得西里西亚作为报答。1740年开始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确认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权利要求，但是让玛丽亚·特蕾西亚拥有她父亲的其他领地。从1748年缔结和约起到1756年间，她在国内奉行改革的方针，这是出于害怕普鲁士会卷土重来。她对军队实行改革，增加赋税收入，改进行政制度。这些改革的意图全都是为了要有能力更有效地反对普鲁士。许多改革的本身就是仿效普鲁士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外交政策也是针对要收复西里西亚这一目标的。正是为了要使她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她改变了原来与海上大国结盟的老一套做法，1756年与法国结成了联盟。

欧洲18世纪的历史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事件：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第18章）、外交大变动（第19章）以及七年战争（第20章）。这些事件涉及了为数众多的国家。因此，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充分地说明这些事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事件非常复杂，需要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而在国际关系中加以概述是不可能的。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大国是不愿意作战的，除非是为了有限的目标；或者说都不愿意交战，除非是迂回战和围城战。这些事件还表明俄国和普鲁士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越来越大地影响着欧洲的外交活动。而且，这些事件也表明，随着18世纪后半叶的到来，英法之间在殖民地和商业上的竞争日趋尖锐。从1740年持续到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实际上是一系列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战争。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对奥地利作战，是要取得西里西亚这样一块特定的领土。他两次出卖了自己的盟国，最后在1742年得到了这些土地的绝对主权后就停止了敌对行动。他只是在1744—1745年间又重新开始敌对行动，因为奥地利在对付其他敌人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威胁着他对西里西亚的控制。巴伐

利亚的选侯与奥地利交战则是为了取得他的皇帝地位，因为在1742年已投的全部选票都推举他继承这一尊严。他也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而打仗，因为皇帝的统治要有实效，就必须有自己强大的人力、物力。法国曾一度支持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但是只是作为援军，它在1744年以前并没有对奥地利宣战。同样，英国也只是援军，只是在1744年法国对奥地利宣战后，英国才成为一个主力。汉诺威在1744年之前，一直保持中立。当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在中欧为它们的有限目标作战时，西班牙在地中海与奥地利开战了，是为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们在意大利获得更多的领地。而且，从1739年起英国与西班牙一直为了两国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野心发生冲突而交战。腓特烈二世1745年的胜利为他赢得了“大帝”的称号。174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和平解决，允许他保持西里西亚，虽然玛丽亚·特蕾西亚保持了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其他部分，而且她的丈夫被承认为皇帝。西班牙为唐·菲利普获得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而唐·卡洛斯则已经取得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这是作为对西班牙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给予支援的报答。法国没有凭借和约取得任何领土，但是在1748年法国的统治者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普鲁士的胜利削弱了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荷兰和英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十分紧张。英国的政治家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忧虑。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竞争越来越尖锐。1716年至1731年间存在的英法联盟已经彻底垮台。事实证明，英国的老盟国荷兰只是一个十分不热心的支持者，而奥地利则一心忙于处理西里西亚问题，对于其他任何方面的问题几乎不闻不问。

国际间第二个涉及如此众多国家而其本身就必须加以阐述的事件，就是1755—1756年的外交大变动。这一事件再次说明了具有18世纪特点的某些发展情况。普鲁士的崛起意味着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可以替代奥地利的反法盟友。它也意味着奥地利的头号敌人已不再是法国，而是普鲁士。俄国的崛起意味着这个大国的外交活动可以破坏现有的联盟的平衡。1755年的形势表明，法国和英国已越来越陷入商业和殖民的斗争之中。而1748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法国在一个软弱无力的国王和意见分歧的内阁领导下，它的政策越来越无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普鲁士对于法国宫廷的软弱无能十分厌恶，彻底变更原来联盟关系的道路已经铺平。法国由于普鲁士认为柏林可与凡尔赛旗鼓相当，感到十分恼火。英国对奥地利一直不满，而奥地利则对英国一心只顾殖民地的事务也心怀不满。早在1749年，考

尼茨曾要求发展与法国的友谊。虽然1750年他出使巴黎，未能使两国宫廷之间达成谅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与法国友好的思想。1754年年末，当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企图要求奥地利做出保证在德意志给予有效的军事援助。奥地利提出了英国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1755年，考尼茨提出重新与法国结盟的企图。于是在巴黎与贝尼斯红衣主教开始了谈判，但是进展缓慢。推动法奥谈判的动力是英国在北方的外交活动的结果。1755年9月，英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津贴条约。它实际上仅仅是1742年英俄谅解的延续。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此大加鼓吹，认为它可能加强1746年的奥俄协定，但是它对当时存在的联盟体系却起着瓦解作用。当腓特烈二世听到英俄条约签订时，他便在1756年1月与英国签订了威斯敏斯特条约。他希望借助这一条约可以使德意志保持中立；他还希望他的盟友法国不会认为他与英国签订的协定是与他已经与法国的协议相违背的。腓特烈在这一点上做了错误的估计。法国宫廷勃然大怒，因于1756年5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在看到联盟体系发生变化时，却仍然对奥地利忠诚不渝，而没有继续与英国结盟，尽管是英俄条约触发了这一场大变动。欧洲局势中有一个事实显然是由于外交大变动所产生的，就是东部与西部几乎截然分开了。两对基本竞争对手是，英国与法国之间（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为争夺西里西亚和最后为争夺东欧的霸权）。这些就是1755年之前的竞争的对手，外交大变动之后仍然是这些竞争对手。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两个对手可以在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中交换盟国，这就说明西欧国家的利益和中欧国家的利益是多么独立。

七年战争似乎是外交大变动的直接后果。它成了18世纪中叶超越各个国家的本国历史范围的第三个重大国际事件。1756年腓特烈二世入侵萨克森，揭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他声称，这仅仅是为了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反对他的侵略行动，但结果却恰恰使反对他的联盟加强了。奥地利和法国于1757年5月又进一步缔约。18天之后，奥地利和俄国又签订了另一项条约。1757年10月，萨克森的军队投降了。奥地利乞求法国和俄国给予条约所承诺的援助。于是，一支法国军队进攻了汉诺威，迫使坎伯兰公爵于1757年9月在克洛斯特塞文投降。俄国人侵入东普鲁士，但是风闻女沙皇去世，惊惶不安，遂又撤兵。瑞典人在波美拉尼亚向腓特烈发起进攻。腓特烈在科林战役中败给了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占领了柏林。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之前，腓特烈在罗斯巴

赫打败了法国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并在洛易顿打败了奥地利人，由于这个胜利，他收复了西里西亚。在1757—1758年的冬天，腓特烈把瑞典人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赶了出去。1758年，观察部队增加了，英国给这支部队的津贴也更多了，使它能够牵制住法国的军队，因而七年战争的后来几年，大陆上的几次主要战役都是在普鲁士和它在东欧的两个主要对手——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的。1758年，腓特烈在措恩多夫顶住并打败了俄国人，但是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却未能和奥地利人打出个结局。到1759年，普鲁士开始感到战争的重压。腓特烈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只有10万人，因此无力采取攻势。奥地利人未能利用这个形势，但是，俄国人却拿下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并在库纳斯多夫打败了腓特烈，虽然他们也未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舒瓦瑟尔于1759年在法国掌权，他决定集中力量进行与英国的战争。他把法国给奥地利的津贴减少了一半，但是他精心策划的入侵英国的计划却由于英国海军在拉各斯和基贝龙湾取得了胜利而垮台了。即便是腓特烈大帝仍然能够在1760年招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可是主动权却仍然掌握在他的敌人手里。奥地利人侵入了西里西亚，并于1760年6月赢得了兰茨胡特战役的胜利；8月，他们在利格尼茨又被打败了。10月，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柏林，但是腓特烈在托尔高的胜利却表明他虽在战略上陷于僵局，但在战术上仍处于优势。在海外，法国成功地说服了西班牙从1762年1月开始积极投入战争，结果使西班牙丧失给英国大块大块的领土。1762年1月，俄国的女沙皇伊丽莎白的去世拯救了腓特烈，因为她的继承人一反她的政策，不仅中止了反对腓特烈的敌对行动，而且还寻求与他结成联盟。1762年11月，英法缔结了初步和约；1763年2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效法英法的做法。在欧洲，和约的条款也反映了军事僵局，因为这些条款把局势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事实上，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腓特烈的失败达到了什么程度，甚至为了要恢复欧洲大陆的战前状态，普鲁士的盟国英国不得不放弃它征服的许多殖民地。英国确实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取得可以实际上削弱法国的和平。七年战争使争夺统治地位的决斗仍将在英法之间展开。

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英法在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斗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个斗争在七年战争期间只是变得更为突出了。

18世纪头50年的标志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在稳步地发展（第21章第二部分）。虽然在这一时期从1713年到1755年，英国只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佐治亚，所占区域扩大了1倍，而人口从1715年至1750年增加到原来的3倍。大约有6.1万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22.2万德意志人在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而最初殖民者的后裔则向腹地推进。1730年以后，南卡罗来那人就向腹地进发去寻觅更多的土地种植稻米。1742年靛蓝的引进有助于佐治亚的扩展。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种植园主发现他们的土地渐渐变得贫瘠，于是也向腹地推进。殖民地向偏僻地区的扩展，就使比较边远的地区和比较早期建立的沿海地区之间发生冲突。人们抱怨沿海地区的商人垄断了贸易。内地的农民由于货币和信贷困难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他们认为1751年的货币法是不公正的。边远地区的移民在各个殖民地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权。随着18世纪的向前发展，社会也逐步成长起来，人们对于来自老殖民地的或英国的控制，已感到不能忍受。法国的殖民地看起来比之英国的殖民地缺少活力。因此，1744年，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者约有10万人，而法国为数只有5万人。但是，尽管法国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可是这些殖民地却是按照英明的战略眼光计划的。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从圣劳伦斯河起经过大湖区和俄亥俄河到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湾的一系列法国殖民地似乎有可能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进一步向西扩张，而且甚至有可能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西班牙的广大帝国（第21章，第一部分）由于防备力量薄弱，经济发展不健全，而且，尽管波旁王朝的国王们进行了改革，但行政管理仍然很糟；因此这个大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直远离18世纪的殖民斗争。但在边疆地区则有所扩展，这主要是通过像耶稣会会士、方济各会的托钵僧和方济各会修道士等的传教活动进行的。这个时期新开发的矿山和新建立的城镇比16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是，正如在英国的殖民地中一样，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了。克里奥尔商人逐渐产生不满。巴西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蓬巴尔成功地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

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的实际冲突（第22章，第二部分）有一个时期避免了，一则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的殖民地之间横亘着广袤的荒野，尤其是在南方；二则是因为在北方的6个印第安部落保持中立，而且法国人和纽约人都不愿中断皮毛贸易。甚至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北美洲不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1745年为英

国殖民主义所夺取，但是1748年的和约，把它归还用来换取马德拉斯。英法冲突在1754年变得真正尖锐的地方是在俄亥俄河上。而英国决定从英国本土派军队前去支持弗吉尼亚人，这一事实表明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这时已经被认为对于整个殖民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夺取加拿大的战役摧毁了北美洲的法兰西帝国。

与西班牙在殖民地方面的冲突集中在加勒比海地区（第22章，第一部分）。这个冲突一部分是在西班牙与所有其他企图染指西班牙帝国贸易的大国之间展开的。在这方面，英国在1713年以后有着一种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好处，因为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向西班牙帝国提供奴隶的特权。这个冲突一部分则是在各个海上强国之间进行的，是要决定哪一个强国应从西班牙的软弱中得到便宜。这个冲突演变成为英法之间的一场决斗，但是尽管英法战争在1744年扩展到了西印度群岛，但是两国的主力部队却在其他地方作战。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仅仅是七年战争的一次预演。174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并没有解决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重大的争端。七年战争期间，斗争的第三个方面变得明显了，当时英国不仅分别在1759年和1762年征服了法属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1762年占领了西属哈瓦那，而且还竭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多地占领西印度群岛中归属未定的岛屿。然而，到1763年签订和约时，比特已接替皮特。他希望尽快地缔结和约，因此决定把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岛归还，从而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英国不甚重视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意义，对英国在那里的属地也不甚关心。

在印度（第23章），从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去世到1764年他的有名无实的继承者被英国人击败为止的这个时期，是以莫卧儿帝国的解体为标志的。帝国的解体为英法两国权力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两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争斗以英国获胜而告终。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由于没有继续执行阿克巴的政策而使帝国的国力受到了损伤。阿克巴主张信教自由，减轻赋税。此外，交通状况恶劣，宫廷中贵族派系之间钩心斗角以及对王位继承缺乏确定的法规等也都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在奥朗则布1707年去世后的两年内，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争吵不休。在1712年至1719年期间，先后有5个傀儡皇帝在德里进行统治。很自然，各省的总督纷纷宣告独立。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软弱无力，也给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人的兴起提供了机会。马拉塔人的势力

席卷了印度的中部地区，西起他们的首府萨达拉（位于孟买以南约100英里），东到加尔各答周围200英里处。1742年至1747年，马拉塔人不断骚扰孟加拉省，1751年该省总督不得不同意向他们纳贡。1740年，马拉塔人向东南进击，攻打卡纳蒂克。英国和法国在那里据有像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这样一些重要的贸易站。正当印度的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和马拉塔人的威胁日益加重之际，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于1744年听到它们各自代表的两国已交战。但在印度，1744—1748年的战争并没有多大意义。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使英法两国在印度的相对实力没有发生变化。1748年之后，当英法两国所属的公司插手支持德干高原相互对立的候选人，它们之间遂展开了一场非正式的战争。在卡纳蒂克因支持对立的权利要求者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在德干，比西成功地把法国方面的权利要求者扶上了王位。伦敦的英国当局提出要与马拉塔人结成同盟来驱走比西，但是孟买的英国地方官员拒绝支持这个计划。所以，当1756年新的纳瓦布西拉吉-乌德-多拉攻击加尔各答的英国人集居地并把那些还活着的人囚禁在“黑洞”时，克莱武便在孟加拉放手地发动袭击。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的胜利使英国人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中的一个——孟加拉省，并且也给英国人提供了资源，有助于他们在东南沿海地区打败法国人。在此期间，马拉塔人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了西北地区，但是阿富汗的领袖阿哈马德沙·杜兰尼逐渐把他们赶回南方去。他在1747年到1769年间，曾不下10次侵入印度，1757年攻克了德里，1761年又在潘帕特打败了马拉塔人。阿富汗人没有乘胜前进，但这却给英国人以时间可以在孟加拉巩固力量。莫卧儿皇帝和他的奥德的纳瓦布-瓦齐尔曾企图推翻英国人在孟加拉的统治，但是这个企图于1764年被决定性地粉碎了。从此以后，英国人成了孟加拉无可争辩的统治者。

非洲（第24章，第一部分）在18世纪初与欧洲相去如此遥远，所以甚至连英法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在那里也不大为人所感觉。两国在商业上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同享有特许权的国营公司和无执照营业的私商之间的竞争相比之下也是次要的。18世纪非洲主要的商业活动地区在西海岸，从北部的塞内加尔到南部的安哥拉，绵延大约3500英里。美洲殖民地的发展使奴隶贸易的重要作用增加了。由于西印度群岛糖价在1740年到1770年间上涨，西非的奴隶贸易也就兴旺起来。即使在好的年头，奴隶贸易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从投入的资本中取得利润的周期很长，所以几乎所有从事奴隶贸易的

国家都把奴隶商人组织在享有特许权的公司里。这些公司在西非不得不修筑设防的贸易站。在18世纪，这些公司让位于私人奴隶贩子或无照营业的私商，他们无须花钱去修筑堡垒；他们可以试验、探索，他们认为哪种办法最好，就那么干。在西非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各国中，勃兰登堡人的买卖很小，因此他们于1717年就卖空了。丹麦人也时常遇到困难，部分原因是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市场受到很大的限制。葡萄牙人倒能够进行相当大的贸易，同时随着巴西矿业的发展，对奴隶的需求也增大了。即便如此，葡萄牙人也由于资金匮乏而受到妨碍。法国的奴隶贸易既不能满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巴黎政府的需求。有时公司一年只输出500个奴隶，因此在18世纪20年代，法国为了维持塞内加尔便年年亏损。乔治王之战与七年战争彻底摧垮了法国的私商的贸易，但是在和平时期，私人贸易还是很繁荣的。荷兰人的地位要比葡萄牙人或法国人的强得多。荷兰人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厄斯坦修斯岛和库拉索岛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货栈，他们准备从那里出售奴隶。他们有资金，也有使贸易欣欣向荣的商业经验，但是即便如此，到1750年荷兰人的奴隶贸易也被英国人接管过去。皇家非洲公司是英国在1750年以前一直从事奴隶买卖的一个官方机构。但是它曾在1698年失去过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的私商所经营的奴隶要比公司经营的多得多。甚至南海公司也在西印度群岛收买奴隶，这就对私商大为有利。1750年之后，英国与非洲的贸易兴旺起来。兰开夏的棉织品压倒了印度的产品；1750年到1775年间，英国向非洲的出口货物增加了400%。私商能够用新的市场做试验，从那里可以廉价买到奴隶，因此到1771年，英国出口的奴隶有半数是来自贝宁和比菲亚的小海湾。但是，尽管与西非有了如此可观的贸易，欧洲人并没有试图渗入内地，原因之一是商人们感兴趣的是贸易，而那里的气候并不能吸引人们在那里定居。另一方面是由于像达荷美和阿散蒂等强大的部落的兴起，阻止了欧洲人向内地渗透。荷兰人在好望角的一块小小的殖民地离西南海岸很远，这里的贸易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布尔人1779年与豪萨人发生接触以前，荷兰的商业贸易向内地已有相当大的扩展。在东非，当葡萄牙人的大部分东印度的贸易输给荷兰人之后，他们在莫桑比克的基地也就失去了意义。与阿拉伯人还有一些贸易往来，但法国人在1768年吞并了马达加斯加。

远东（第24章，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地区在18世纪与欧洲相比也是远不可及的，商业上的竞争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只有菲律宾

还可依稀地感到英西冲突的气息，因为在“詹金斯的耳朵战争”期间，安森俘获了一艘往来于马尼拉与墨西哥之间装运茶叶、柚木材、香料、生丝和其他远东物品的大帆船。1762年，英国人实际上征服了马尼拉，而且占领它直到战争结束。在另一方面，18世纪菲律宾的历史也是一部与西班牙争论的历史，争论的问题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是否应把中国制造的丝绸运往墨西哥，因为这样就要耗尽各个西班牙殖民地的白银。另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应付在菲律宾的大量中国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赶出去，甚至是大屠杀。荷属东印度群岛在1740年就屠杀了岛上大约1万中国人。18世纪也是荷属东印度公司从1724年至1725年开始亏损经营的时期，尽管它每年还支付18%的红利。然而，咖啡的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从而东印度群岛的繁荣得到了挽救。1711年第一次收获的咖啡产量只有100磅，到了1723年，咖啡产量已达1200万磅。最初，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样巨大的收获。他们做出努力限制咖啡生产，但是最终咖啡作为一种纳贡的形式被接受了，它对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开发起到了很有益的作用。在18世纪尔后的时期中，咖啡成了印度群岛繁荣的基础。欧洲在18世纪企图发展与中国贸易联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欧洲人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以及诸如扇子、屏风之类的奢侈品，但是中国只要白银，不要其他东西来做交换。1699年，英国人在广州取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到1720年，英国的贸易已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当局认为应征收4%的税才合算，后来又增加到16%。对外国的贸易所做的这种限制，结果在1734年只有一艘英国船只驶进广州，一艘进入厦门。1736年，只有10艘欧洲船只到广州做买卖。英国人竭力想打开与厦门和宁波的贸易，但是在1757年，清朝皇帝下了一道圣旨，限制一切外国人与广州通商。在18世纪，中国几乎与日本一样，完全置身于欧洲的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外。在英国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发生的紧张活动，人们感觉其影响越来越微弱了，而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非洲的内陆，近东的许多地区以及中华大帝国那里，其影响已细微到无人可以觉察了。到18世纪中叶，世界还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

（姚乃强 译）

[1] P. 米勒在其所著《英国的优势》（1937年）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

[2] J. H. 普卢姆：《18世纪的英国》（1950年），第73页。

第二章 海外贸易的增长和欧洲制造业的发展

乌得勒支条约缔结之前的半个世纪，是世界贸易史上的一个形成和决定性的时期。如果对17世纪中叶海上贸易的结构做一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贸易在性质上主要是欧洲式的，同时荷兰人控制了大部分海上贸易。阿姆斯特丹的繁荣主要依靠把北欧出产的大宗货物木材、松脂和谷物，与南欧、西欧的产品：比斯开湾的盐、西班牙的羊毛和白银、荷兰渔民在不列颠海岸捕获的青鱼以及地中海地区生产的酒和纺织品进行交换。荷兰人在从事这些大宗贸易的稳固基础上，依靠一支商船队建立起巨大的转口贸易。据当时的一份材料估计，这支商船队比英国的商船队大1倍，比法国的大8倍。^[1]其他的商品（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布匹）以及源源不绝而来的殖民地货物如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东方输入的香料，加勒比海地区的烟草、蔗糖和染料，也被吸引到这个贸易集散地来。在整个18世纪，逐渐建立起一个经济组织来经营规模空前和种类繁多的转口贸易。证券交易所、中央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一起组成了转口贸易的金融机构。商人们根据他们经营的性质自己划分为几大类。所谓的“二道”商人专门从事于进口货物的买卖。他们在这些进口货物出售之前，先把货物储存起来，挑选分档，或由当地工业加工精制。第二类是进口商人，第三类商人是负责把这些货物分发到最终的市场上去。第四类商人是经纪人，为外国人代销货物，有些货物直接从采购地运到销售地，甚至不经过阿姆斯特丹。1700年，整个这种组织原封未动，虽然已经有了以金融活动——贴现、银行业、票据信贷，以及对外贷款——来补充乃至代替实际贸易的明显趋势。本来就极不稳定的荷兰经济，不断受到来自欧洲的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竞争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1660年以来，正是这些不断增大的压力，使欧洲经济史上18世纪的前半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因为越来越明显，经济扩张的真正方向是西方，而英国和法国从1660年到1763年的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新的殖民地贸易中取得尽可能大的份额。海运和保护海运的能力对这些政策至关重要，这点也很明显。17世纪后期的战争暴露出荷兰地位的严重战略弱点。荷兰比任

何其他欧洲强国更依赖海外贸易。荷兰的大工业——织布、酿酒、炼糖、造船和榨油——都依赖进口的原料，人们的生活也依赖进口粮食。然而，荷兰通向波罗的海和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上通道都容易遭到来自英国海军基地的攻击，而它在陆上的边界又容易受法国军队的攻击。所有这些情况，加上人口相对较少，决定了荷兰采取谨慎的政策。联合省^[2]的主要问题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体现在海洋国际法的主张中，并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船只来往自由，货物运送自由”的政策，即一个中立国在战时可以自由地为交战国运送货物的原则，如果说不能掩盖，至少能够减轻战略和海军方面的弱点。^[3]荷兰企图利用这种策略来保证它在世界海运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在18世纪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中，荷兰已无力保持优势了。

贸易的快速发展，尤其殖民地贸易的迅猛发展，以及英法争夺领先地位的斗争，是从乌得勒支条约到巴黎条约期间的主题。尽管这个时期的所谓“贸易统计”很不完善，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贸易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记载，英国的出口额在1720年约为800万英镑；到1763年达到了约1500万英镑。同期离开英国港口的货船吨位也从大约45万吨上升至大约65万吨。到1763年，这个吨位数中英国已占有很大的比例，约50万吨，或者说比100年前增长了大约5倍。英国可能拥有全欧洲货船吨位数的1/3左右。法国商船队的发展虽然远不及英国那么快，但法国海外贸易的扩大也是同样显著的。据记载，法国的出口额在1714年约为12000万里弗尔^[4]；到1789年则超过了5亿里弗尔，其中殖民地的再出口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早在通常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深刻变化发生之前，世界贸易和海运业显然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贸易的增长促进了新的贸易和工业中心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的商业阶级的出现。同时，它给社会带来了新商品，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流量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均势。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把这些变化和后来称为“重商主义”——有意识地从事商业（与农业截然不同）——的政策联系起来，作为国家致富的一个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外贸易首先受到重视。在实践中，目标是扩大出口，缩减除生活和就业必需品之外的一切进口货物。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可以吸引黄金净流入的贸易部门更是受到高度重视。因此，贸易平衡受到密切注意，因为这是贸易兴旺或衰退的证据。从1696年起，英国为

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由进出口总监监督的机构。从1726年起，法国也起而效尤，但是在1756年之前，并未将各项数字制成总表，直到1781年，内克尔才创立了一个相称的机构来监督总的贸易平衡工作。

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增大，这多少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到1750年，在英国取得的工业专利的数目上升了，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技术改进的兴趣有了很大提高。在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各种促进工业改进的协会纷纷成立。巴黎和汉堡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但是，并非所有的发明在工业生产都具有实际作用，而有实际作用的发明又往往要花费时间进行改进，才能在商业规模上加以应用。譬如，煤在工业中的应用，若用晚些时候的标准来衡量，比较不重要，但它却应用得十分广泛，从而使煤的增产十分重要。1708年纽科曼发明的气压机，至少在英国消除了限制煤炭生产的障碍之一。气压机开始在中部的煤田里使用，后来扩展到北方的煤田。到1765年，在泰恩地区就有约100部气压机在工作。它使采掘深层的煤有了可能，过去泰恩地区因地下水泛滥而无法采掘。煤产量的增加对炼铁工业特别重要，因为从1709年起，希罗普郡的公谊会教徒炼铁匠就逐渐用焦炭冶炼法生产铸铁了。不过这个新方法推广得很慢，但是就在这些年份里炼铁炉逐渐由森林移向煤田。然而，矿物燃料在生产铁器、制造工具、器具、铁链、铁锁和铁钉方面，比之生产生铁本身更为重要。首先，在七年战争期间，对军火的需求鼓励铁厂厂主们扩大工场，约翰·罗伯克1760年1月在卡罗恩开办的工场被称为“新型企业的先驱”。^[5]

将现有技术知识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从少数的实业家和工匠那里传播到更多的实业家和工匠那里，其直接重要性远胜于单纯的新发明。在18世纪的前半期，有大量这样的技术传播，工业方面发生的许多变化都可以追溯到这一进程。欧洲纺织工业仍然建立在“家庭式”的基础上，但是产品的品种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受到比较复杂化的城市市场需求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由于热带地区市场需求的刺激，纺织工业把重点转向生产更新颖、更轻的产品。必要的技术知识是从那些已经掌握了技术的人那里借用来的。在英国的织布工业中，光滑的精纺毛织品趋向于取代比较粗糙和厚实的毛织品，生产也越来越集中在约克郡。在这个过程中，从诺里奇借了工匠能手来帮忙。另外，在1700年至1750年之间，英国的制造商终于在染色和整布工艺方

面超过了荷兰。英国人仍然保持向荷兰出口“白胚布”的传统做法，但是控制市场关键的最后几道工序越来越转入英国人的手中。英国的学徒不再把去荷兰作为他们公认的训练计划的一部分。在其他纺织工业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把宝贵的技艺带给了斯皮特菲尔德的丝绸织造业、白金汉和赫特福德郡的花边工业，也带给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麻纺业（以及中部地区的玻璃和金属工业和汉普郡的造纸工业）。反过来，兰开夏的移民在法国也很活跃。飞梭的发明者约翰·凯可能由于英国公众对他的发明抱有偏见，横渡英吉利海峡逃走，而约翰·霍尔克在法国棉纺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在1754年被特律代纳任命为对外制造业监督。意大利的捻丝方法慢慢地传到了法国，大约在1716年，伦巴第人又把这种方法传入英国。这些仅仅是欧洲技术交流的几个事例。还有一些技术传播得更远，其中突出的是纺织印染法。仿造印度擦光印花布，在白布或亚麻布上印花的技术，几乎同时传入法国、荷兰和英国。到1744年，英国的棉布印花工的技术已纯熟到足以威胁印度印花布的再出口贸易。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都受到东方的强烈影响。法国棉纺业最先进的中心鲁昂专门生产称为“暹罗布”的条纹布；荷兰生产了“尼康布”和其他仿效印度条纹布的产品；兰开夏到1720年时拥有巨额受印度的样式影响的棉麻方格花布贸易，而格拉斯哥的织工在18世纪40年代生产了“孟加拉布”。陶瓷业几乎与棉纺业一样，图案都是东方式的。这个时期北欧陶瓷业最重要的中心代尔夫特首先仿造中国的青花瓷器，随后英国的鲍、切尔西和伍斯特的制造商以及法国的内韦尔与其他地方的瓷器业也纷纷生产青花瓷器。欧洲各地的消费者很赞赏东方和西方的古老文明。

这些革新本身并不意味着在工业组织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虽然新的设计和新的样式作为占领市场的一个因素，其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有关的大多数工业继续按传统的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或者按“家庭式”作坊而方式上略作变化。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德比，伦巴第人开办的动力传动的捻丝厂就雇用数百名工人。马修·博尔顿在伯明翰附近索霍的铁工厂雇用了700人，还拥有相当数量的机械设备。韦奇伍德的伯斯莱姆工厂建于1759年。在阿布维尔的范·罗巴斯工厂已具有现代工厂的许多特点。所谓的大工业控制了法国棉纺工业有限的领域。但是这些还只是普遍情况中的例外；各地典型的工业单位仍然是很小的。法国的官方规定和荷兰的财政政策都反

对发展大的生产单位。甚至在英国出现了工匠们坚决抵制引进新机器的情况，因为引进机器预示着增加生产和节省劳力。因此，各地的工业改革是缓慢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

根据现有的证据，很难精确地说明获得发展工业的资本的来源。有一位作家曾论及“黑奴和贩卖奴隶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6]。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种植园主本人往往因缺少资金而窘困的大量证据。佩雷斯教授告诉人们，蔗糖和烟草种植园主常常受惠于他的英国代理商。另外，由于英国本身总的说来仍然是一个资本输入国，种植园主有时不得不求助荷兰的放债人。因此，殖民地商人自己需要资金，他们还能剩下多少资本来支援工业，就值得怀疑了。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进出口商人给制造商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信贷，然后按星期交付他们的产品。兰开夏的许多早期的工业企业就是用这种办法，即通过资金由商业流向工业而筹集资金。同样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就是成功的企业用自己的利润来提供所需的资金。在其他一些地方，银行和私人放债者也通过借贷和抵押来帮助工业家，其资金则常常是从土地和农业的利润中取得的。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之前，必须这样说：工业发展的资金来自多种渠道，种植园主或大财主的钱袋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来源。

在1713年至1763年这个时期里，英国对外贸易的全面扩大与重商主义的调整政策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政策是以1660年、1662年和1663年的法并以1673年和1696年的法作为补充所建立的航海法为基础的。这些法都是专门针对殖民地贸易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在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沟通贸易，把购买殖民地的有价值的产品的权力留给英国的买主，同时把殖民地的市场留给英国的制造商。总而言之，通过努力为英国建立具有类似荷兰明显地通过有组织地发展而取得的那种商业地位。这些法令与随之而来的发展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是一件可疑的事。我们对事实的了解太不全面，也不很可靠，不允许武断地做出结论。那些专门限制外国船只参与英国贸易的法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对欧洲贸易的利益来获取对殖民地贸易的利益。然而，事情很清楚，在注重实际的人中间，普遍相信它们的功效，只是在18世纪40年代，有人对此开始提出根本性的批评之后，这种信念才有所动摇。可是，很明显，在解释英国的经济扩张时，除立法因素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其他的主要因素必须考虑。一是工业扩张发生在重大发明时代之

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航海法无关，虽然与世袭的资助、津贴和保护关税的政策密切相关。譬如，煤炭工业的产量在17世纪已在迅速发展。1700年至1760年，产量超过了1倍，从年产约300万吨增加到约600万吨。金属工业虽然外国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充满了希望。金属制品（尤其是铁钉）、纸张和陶器经常在出口货物中占重要地位。也有一些丝、麻新产品出口，虽然数量不多。大约从1700年起，兰开夏的棉纺业在出口货中，尤其是销往非洲和殖民地的货物中，增加了分量。与此同时，自王朝复辟以来受到外国竞争的重大压力的羊毛和精纺呢绒的出口货物，在172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了。最显著的是殖民地货物再出口贸易的增长。为英国买主保留的“表列项目”商品——蔗糖、烟草、棉花和西印度群岛的染料——连同印度的香料和纺织品、中国的茶以及莫卡的咖啡，是再出口贸易的基础。1724年，400多万磅烟草被运到了克莱德湾，而其中3/4以上都再出口了。实际上，从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这些西海岸港口的发展中，就可以看出英国的海外贸易的重点在改变。在这个阶段，这些港口的人口都迅速增长，大船主、炼糖厂厂主、烟草商人以及奴隶贩子都很快发了财。英国在对欧洲贸易中，以布匹作为主要出口货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新兴的大西洋贸易对航运业提出了在17世纪闻所未闻的巨大的要求。英国到1750年不仅与它的荷兰对手相抗衡，而且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它。英国的繁荣和实力是牢固地建立在日益多样化的地方制造业的基础上的，在这一点上荷兰人领先时从未做到过。不应该让新兴的殖民地贸易完全抹杀欧洲内部各区域间贸易的继续存在着的重要性，但是殖民地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到1763年，英国与美洲之间的贸易很可能使用了英国从事海外贸易船只总数的1/3。

国内工业的发展和有意识的立法活动方面还必须补充第三个因素。西方的通道相对比较安全，而且对英国的大西洋贸易是敞开的。因此，英国拥有一个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只有法国西部的港口才分享到，但是贸易是不可分的。在加勒比海，需要一支海军力量去保护英国殖民地的航运，而英国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再出口市场也不断受到威胁。因此，为了保护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个完整的海军基地系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些，航海法就只是一纸空文，殖民地就始终有遭受攻击的危险。

法国的海外贸易在同一时期的空前发展，似乎同样是对经济调整 and 重商主义政策功效的一个明证，因为在1660年至1763年这个时期，法国的贸易和工业甚至是比在英国更严格地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进行组建的。摆脱荷兰的帮助，很自然地成为法国重商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柯尔贝尔采用高关税和成立专有的贸易公司这个双重武器来攻击荷兰，起到了与英国航海法相同的作用。柯尔贝尔主义并没有立即或完全破坏荷兰对法国贸易的介入——1726年，法国的商人还在愤愤不平地抱怨荷兰的竞争，法国对外贸易的1/4左右仍控制在荷兰人的手里。——但是这种介入常常遭到令人恼火的和无法预料的干扰。

柯尔贝尔的公司——北方公司、黎凡特公司、塞内加尔公司，以及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在促进法国对外贸易方面似乎并未做出什么成绩。路易十四发动的几次战争使这些公司濒于破产。但是在乌得勒支条约签订之后的几年里，这些公司明显地恢复了元气。在印度公司的监督下重新组织这些公司，是约翰·劳整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劳的公司在他的“体系”遭到惨重失败之后也破产了，但在1722—1723年又重新组建起来。毫无疑问，这次重建对于法国对外贸易是一个促进因素，使它能够克服乌得勒支条约的条款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根据该条约，法国把直布罗陀、梅诺卡，以及新斯科舍与纽芬兰让给了英国。贸易的复苏一直延续到1740年前后，法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阶段。

与英国的海外贸易一样，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对外贸易建立在国内工业的增长上。在这个阶段，法国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如哥白林双面挂毯、家具、袜子、缎带、花边、丝绸、细线、镜子和瓷器等，都得到政府的津贴，并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生产。法国的棉布生产同样得到官方的支持，特别是那些为出口生产的工厂（如黎凡特工厂）。然而，法国的毛纺品总的来说仍然次于英国的产品。事实上，没有享受特权的棉布厂商在出口贸易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政府不予重视的工业竟发生了最惊人的发展，如铸铁业、煤炭业、诺曼底的廉价布匹和棉纺织业以及金属和玻璃制品制造业等。这些就是供给大西洋彼岸的出口贸易的货源。

在表面上，法国18世纪贸易的结构与它的竞争对手——英国的贸易结构很相似。虽然当时对欧洲、对地中海沿岸诸国以及对东方的贸易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与大西洋彼岸的贸易却占头

等重要的地位。到18世纪中叶，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殖民地可能占其海外贸易总值的1/4。从圣马洛来的渔民经常到1713年留下的拉布拉多渔场去捕鱼。拉罗谢尔是皮毛贸易的输入中心，但是在18世纪，波尔多和南特繁荣的基础首先是路易斯安那的烟草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咖啡和靛青（1750年以后）贸易。1787年，亚瑟·扬访问这些港口时，那里的商业、富裕和豪华都“大大地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说，一定不能让利物浦“与波尔多竞争”。在1722年到1782年之间，波尔多的商船队由120艘船上升至300艘船。波尔多的对外贸易（主要对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占法国海上贸易总额的1/4，成为酿酒、制糖以及造船等各种地方工业的基础。城里有荷兰、德国和爱尔兰商人的侨居区，是当时法国最国际化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仅次于波尔多的是南特，它与西班牙和殖民地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但是，与安的列斯群岛贸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西部的港口。马赛这个与黎凡特和地中海地区贸易的主要中心，受到了向这些地区再出口西印度群岛的产品（特别是蔗糖和咖啡）的极大刺激。

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测，在巴黎和约签订之后很久，法国的某些大工业，特别是棉布业和铸铁业，才超过了英国同行业的产量。实际上，由于法国的人口比英国多两三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倒要使人感到诧异了。可是在整个对外贸易领域内，法国看来并没有达到贸易平衡，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正是英国贸易的特点。贸易的数字（虽然其统计价值很有限）表明，英国在1713年至1763年，出口一直大于进口，而法国则恰好相反。如果没有有力的证据，仅从海关的数字得出肯定的结论，那就过于草率了，但是，其他的事实证明，法国的经济在辉煌的外表下面并非一切都很顺利。有证据表明法国无力提供出口货物和船只或必要的信贷系统，而这些正是法国和其他殖民地之间要顺利地、毫不间断地开展贸易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生产蔗糖的殖民地要求提供奴隶、制造业和粮食，但法国在这些方面的供应能力都不及英国、荷兰或者北美洲殖民地。由于法国无力提供足够的信贷，殖民地进口法国产品的能力便越来越衰弱了。法国海运能力的不足使大量的蔗糖和靛蓝积压在西印度群岛，而另一方面驶离南特港的船只因缺少货物只好装上沙石来压舱。这些困难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表现得特别严重，但是这些困难也许正是法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痼疾的症候。法国经济的这种病态一直助长走私者（尤其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也使无处不在的荷兰船业主在战时

乘虚而入。法国在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长期缺乏奴隶，在法国殖民地经济的不平衡中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法国的真正弱点——海上力量薄弱——在战争期间最为明显。海军力量的不足在法国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在长期的王朝斗争中，重点一直是在陆战，同时由于法国大部分地区是相对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海军问题也就漠不关心。这种对海军的忽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762年舒瓦瑟尔曾力争保留那些可以支持海运业的殖民地和贸易，并获得成功。但是，18世纪末阿贝雷纳尔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他认为法国海军屡遭失败的长期历史并没有使政府变得明智起来。唯一的补救办法是鼓励发展“海军的商业支队”。这个办法，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人们习惯恶劣的气候、艰苦的劳动和风暴的威胁”。适合英国的航海法不一定对法国合适，但是它促使法国制订自己的条例，以便让本国的臣民能够分享“瑞典人、丹麦人和荷兰人跑来，甚至在法国人自己的港口夺走那些利益”[\[7\]](#)。

英国人对荷兰竞争的长时间的忧虑，很快从他们心头消失了，因为他们怀疑法国人已经从路易十四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军事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而且其速度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当他们了解到弗勒里和平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法国的工商业稳步恢复和扩大时，这种怀疑到了18世纪40年代竟像着了魔似的无法摆脱掉。因此，按照英国制造商的利益禁止爱尔兰的棉布出口，实际上是把爱尔兰的羊毛推入了法国市场，从而给法国生产廉价的、畅销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原料，“法国的增多了，英国的就减少了”，由于这一揭示，一位作家也就认识到经济计划的复杂性。也因此，那些看到法国海军力量薄弱的人，都纷纷提出建议，认为要阻止法国恢复的最好办法（或许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战争。《常识》（1738年）的作者认为：“蒸蒸日上的贸易可以被战争破坏殆尽，而停滞衰落的贸易有可能通过战争复苏起来。”而1745年，另一位作者争辩道：“……一般说来，我们的商业在强有力的、组织良好的海战条件下，比之在和平条件下会更繁荣兴旺，海战时还应允许跟那两个国家（即法国和西班牙）公开交往。”

在世界贸易的主要地区，英法之间的角逐是这个时期压倒一切的主题。两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竞争比在其他任何地区更为持久。西印度群岛是这个时期大西洋贸易系统的中心（这个系统也包括从西属美洲

到北方的纽芬兰在内的大陆各殖民地），它从事贩卖西非奴隶的贸易，成了从南方的卡的斯到北方的格拉斯哥的西欧各港口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大西洋这个区域内，大部分贸易也许是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直达航线进行的，但是还有一部分贸易是通过三角形和四边形的航线，实际上是形形色色的往返线路进行的。一艘从利物浦直达牙买加的“班”船，遇上好运气，一年可以跑上两个来回。但是，如果是一艘贩运奴隶的船，先在西非靠岸，出售廉价的纺织品以换取奴隶，然后开往西印度群岛卖掉奴隶，买进蔗糖、烟草、靛蓝和少量的棉花，可能一年就只能完成一次航行。另外一些船，相当于现代的“不定期货船”，哪里能找到货物和利润就开往哪里，可能要几年时间离开自己的母港，不管它是波尔多、阿姆斯特丹，还是格拉斯哥。在大西洋航行的多数是中等船只（三四百吨位），介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型商船和通常航行于英法间海峡的150吨位的小船之间。

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在18世纪上半叶似乎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大西洋贸易的巨大价值以及西印度群岛贸易在该贸易中具有特殊吸引力。他们对于人口正在迅速增长的北美殖民地所蕴藏的巨大商业潜力认识得很慢。西印度群岛的产品，如蔗糖、烟草、棉花、靛蓝和染料木，在航海条例中被“列为”第一类商品；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者与从属于他们的奴隶，在18世纪中叶之前对英国货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种认为“在巴巴多斯或牙买加的每一个英国人为国内四个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思想十分顽固。^[8]相反，北部和中部的殖民地却远不适应这个古老的殖民体系。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居民使用海运的船只少，消费英国制造的产品少，生产令人满意的产品也少。他们与英国的贸易还不及与地中海、亚速尔群岛以及英属的或其他国家所属的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他们向这些地方出售木材、食品、牛马和鱼。的确，用这些贸易的收益，北方殖民地的居民是有能力购买英国制造的产品，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消除英国的疑虑，害怕这些殖民地是生来就与它竞争的。因此，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以限制北美工业的倾向性。但是，北方殖民者最令人不满意的一点是，他们顽固地偏爱与其他国家所属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进行贸易。乌得勒支条约除了夺取法国人的圣克里斯托弗岛的一半以外，倒还允许他们保留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圣多明戈岛都能生产比之巴巴多斯或牙买加更便宜的蔗糖。同样，在库拉索岛和圣尤斯塔西乌斯岛上的荷兰人也提供货物（他们自己的和从法国人那里走私来

的），价格要比英国的低。一场民族冲突的火焰燃烧起来了，而且不断受到在西印度群岛有着利害关系的强大势力的煽动，这些势力是得到议会的有力支持的。对付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对输入大陆殖民地的外国蔗糖、糖浆和朗姆酒征收重税，借以阻挠殖民地居民与非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1733年的糖浆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颁布的，但是事实证明要实施高税率是不可能的，这对殖民地居民倒是幸运的。另一个对策是鼓励北美殖民地生产可直接卖给英国的产品。如果这个方法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就恰好符合重商主义理论关于殖民地作用的论点。譬如，众所周知，波罗的海诸国供给英国发展造船工业和小军火工业所不可缺少的，因而对英国的国防也是至关重要的松脂、木材和瑞典的铸铁，这种供应不仅极易受到攻击，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使国家财源枯竭。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贸易的收支差额情况一直对英国不利。因此，很有必要提出一项政策，用从美洲进口的货物来补充，乃至替代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的货物。但是，这个进程十分缓慢，令人失望。到1721年，相当数量的焦油和沥青是从美洲来的，相应地减轻了英国与波罗的海国家贸易上的逆差，但是新英格兰人还是顽固地宁愿把各种木材、厚板、桶板、横梁以及隔板等卖给西印度群岛。英国勘测员雇来为海军伐木的合同工被当地的伐木工赶走或投入河里。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生产的铁仍然只能是从瑞典和俄国进口的铁的一小部分。虽然这些失败使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很不满意，但是或许并不比殖民地居民在七年战争中“恶劣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更可憎，当时北美租给英国运送交换战俘的船竟在停战旗子的掩护下，把大量的食品运进饥饿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倾销。

这样，大西洋彼岸殖民地所提供的各种来源的财富和利润，就成为欧洲四个在加勒比海有利害关系的主要国家之间长期发生摩擦的根源。老西班牙拼命抱住原来帝国的残余不放，指望新西班牙生产金条，以使用它们来支付在欧洲采购的东西。然而西班牙的船队总是很小，西班牙帝国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就不断吸引了走私者，特别是英国和荷兰走私者的注意。确实，英国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取得了合法贸易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向西班牙帝国提供奴隶和每年向贝洛港^[9]派遣一艘船只。然而，这些让步微不足道，不能满足英国商人的野心。合法的贸易就由不合法的贸易来补充，而1739年对英战争的起因，表面上就是因为西班牙干扰了英国的走私者。

再者，虽然英法之间的摩擦牵涉很广泛的政治问题，但是在西印度群岛的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种摩擦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终于导致英法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两国在蔗糖生产上都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英国在1744年的战争中看到了一个破坏法国生产蔗糖的殖民地以及消灭它们在欧洲市场上跟它竞争的好机会。同样，在西印度群岛的法国势力也看到了摧毁对手以及扩大法国在西班牙殖民地市场上销售其工业品的机会。在七年战争中，这两个国家在制定各自的政策时都有类似的考虑，虽然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尤其是加拿大问题，日益掩盖了西印度群岛的问题。到18世纪中叶时，英国对不同的殖民地区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西印度群岛的情况终究有点令人失望，因为疾病使得白人的人口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长，而往北的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人口的增长有希望为英国的出口商品提供宝贵的市场。原来与北方殖民地的贸易，母国无利可图，但在18世纪中叶以后，据说还出现了顺差。因此，1763年最终实现平时，法国被允许保留它在西印度群岛生产蔗糖的岛屿，虽然，从西印度群岛的战争记录来看，法国在强大的英国海军手下屡遭失败，它在那里的贸易也给完全破坏了。南特和波尔多的贸易完全停顿了。不错，法国的经济作为总体来说也许能经受住封锁的打击，但是18世纪的战争不是“总体”战争；相当多的法国人的钱袋和奢侈品的消费因殖民地被封锁还是受到了影响，从而使英国人在1763年的讨价还价中占了很大的便宜。

海军力量在贸易方面的价值，在1757年和1758年同荷属西印度群岛作战中初步显露了出来。像英国人一样，荷兰人通过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中心把大批货物走私偷运进西班牙的殖民地，牟取了大量利润。在战争期间，法属岛屿由于英国人的封锁和法国船只的短缺，因此供应不足而挨饿，所以荷兰人的帮助是必需的。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截断中立国家对其交战国的援助同样是极端重要的。在两年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俘获了大批荷兰船只。西印度群岛的教训实际上是说明：在18世纪，如同在17世纪一样，贸易和海上力量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

第二个贸易区和贸易战的大战场是印度和东南亚。在加勒比海地区侵入西班牙帝国的那三个国家，夺取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正在瓦解的世袭权益。17世纪，在争夺亚洲贸易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

展。荷兰人把英国人赶出了香料岛。^[10]英国的最后一个立足点——波勒罗恩在第二次荷兰战争中丧失；在万丹的争端又迫使他们在1682年撤退到本科兰。这样，英国的贸易公司就集中在大陆上，设在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一些工厂周围。后面的三个管辖区都各有附属于它们的地区，由此把贸易扩展到广大内地。1709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持续繁荣的时期。它的进出口价值增加了1倍，它的船队从这个时期开初的一年11艘船增加到18世纪中叶的20艘船，而且每艘船都大多了。由于生产香料的一大部分地区给夺走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在18世纪从印度来的货物中，印度纺织品的比例越来越大。它的竞争大大搅乱了英国国内的羊毛行业。从中国进口的茶与从红海港口运来的咖啡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而不断增加进口的硝石却具有战略的和经济的价值。实际上，东方提供了许多欧洲需要的商品。贸易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一个支付问题，因为印度不是欧洲出口货物的良好市场。在整个17世纪，一直有人激烈反对（虽然毫无结果）出口白银，它是东印度公司用来偿付它在印度的债务的办法。在18世纪，向印度出口货物中白银的比例继续上升。对白银的这种持续需求使得这样一种看法又活跃了起来：经济政策（有时也是战略政策）的目的应该是获取贵金属。直到19世纪兰开夏的廉价棉纺织品大量问世，才给支付问题找到了经济上的解决办法。同时，英国干涉的性质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一个贸易的垄断组织，而且是一种政治和司法权力的代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比它的竞争对手要更早地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国家在印度的唯一坚实的基础是海军和军事实力。

荷兰的势力中心是在以巴塔维亚为行政中心的群岛上。原来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是船主和商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商行。它通过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和在波斯、印度和日本的竞争性贸易来获取利润。巴塔维亚被认为是东方的一个货物集散地。从印度出口的货物就是靠从亚洲当地贸易所取得的利润来解决部分支付问题的。在大陆上，荷兰人接替了葡萄牙人在马拉巴尔沿岸和锡兰的位置。在苏拉特和孟加拉都有荷兰的工厂。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大力发展当地的纺织工业。所有这些地区的产品，加上在日本购买的铜以及从中国买进的茶叶和纺织品，都送往印度尼西亚群岛，以换取香料。在18世纪，荷兰在东方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企业转变成一个农业企业，新的农作物在岛上涌现出来。蔗糖在1700年以前只是船上的

压舱货物，此时在欧洲市场上获得盈利，但是与从西印度群岛运去的蔗糖相比，数量仍然很小。到了18世纪中叶，咖啡开始与香料竞争。这里还种植了棉花和靛蓝。然而，到1750年时已经很明显，荷兰的企业并不都很顺利。由于同荷兰竞争的那些国家开始把权力伸展到印度的土邦中去，荷兰与大陆的贸易缩小了。尽管荷兰在行政管理和防御工事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在印度的势力却衰落了，其海军力量也衰弱了。荷兰人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在1759年远征胡格利，这最后一次殊死的努力只是暴露了他们虚弱的本质。

由于荷兰实际上已经被限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在印度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就成了英法之间的决斗了。法国在印度是后来者。柯尔贝尔公司进展甚微，甚至取得本地治里作为基地也只带来短暂的复苏。法国势力的真正增长要追溯到1719年约翰·劳对原法国印度公司领导下的殖民地贸易的改组。新公司拥有从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到红海、印度洋各岛屿、印度本土以及远东等地的独有的贸易特权。在勒努瓦（担任总督至1735年）和迪马（担任总督至1742年）的领导下，进展迅速，每年由一支30艘船组成的船队把印度的纺织品、中国的茶叶和莫卡的咖啡运往法国供应市场。到这时为止，法国政策的目的是似乎纯粹是商业性的。所修筑的要塞是为了保护贸易。后来，到了迪普莱克斯时，出现了新的概念和政策——攫取领土作为贸易和帝国的基础，在实际做法中，是利用本地治理作为基地，建立法国对整个印度南部的权力。主要由于没有充分认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迪普莱克斯又一次败于克莱武和库特的手下。1761年，法国人只落得“在印度无立足之地”。^[11]他们无力与英国抗衡，从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通过其日益扩大的贸易和岁入开始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

然而，在第三个地区——地中海和黎凡特——竞争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黎凡特的贸易在许多方面比印度的贸易争议要小些。它给欧洲的棉布出口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市场，而进口的生丝和棉花是发展国内工业的日益重要的原料。法国的棉纺业似乎对黎凡特产品的依赖尤为严重，虽然那里生产的棉花往往很脏，还结成块团，比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生产的上等品要低劣得多。荷兰人在17世纪时曾在黎凡特贸易中占领先地位，可是到了18世纪中叶，似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了出去。在英法战争期间，荷兰与黎凡特必然停止了贸易来往，在1713年之后也未能重新恢复起来，主要是因为荷兰的毛织品不

能与法国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生产的廉价棉布竞争。法国在地理上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从马赛可以控制黎凡特，而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也使法国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和土麦那享有特权。这些优越条件还得到其他形式的帮助和补充。领事馆的政治费用由法国政府负担，而不由公司承担；政府给马赛的出口商大量贷款，以弥补他们的船只离开马赛港去黎凡特与他们最后为出口商品交付货款之间的差额。这样的一些优越条件使法国在与黎凡特和北非海岸的贸易中一直保持首位。

在欧洲还有一个中央的区间贸易网，情况更为复杂。在把它同比较壮观的殖民地贸易放在一起相比时，就容易对这个贸易网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然而，压倒一切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欧洲的：在18世纪的区间贸易仍然主要是交换欧洲的货物——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木材，英国的布匹和金属器具，法国的棉布、白兰地和葡萄酒，西班牙的羊毛和葡萄牙的酒。以殖民地货物进行的新贸易刺激了西欧港口对船运的要求，创造了很有价值的再出口商业。但是，在18世纪上半叶，这些新的贸易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看来很可能是对旧贸易的“潜在的影响”。它通过变换购销的商品来缓和国际支付问题。^[12]在17世纪，荷兰人控制了贸易和船运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在18世纪，荷兰人还顽强地保住自己的地位。阿姆斯特丹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谷物贸易数量仍然很大，虽然到了1750年贸易额比100年前要小些。在波罗的海，荷兰的船只减少了，而英国、瑞典、丹麦、但泽以及吕贝克的船只多了。荷兰的弱点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荷兰缺乏能使它建立地方工业的自然资源，幸存下来的一些工业（如莱顿的织布业）又没有得到关税政策的帮助。当时的关税政策把保护地方工业置于商品的自由流通之下，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目的。1751年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本来应该导致降低国库税收，提高有效的保护性关税，但是商人和工业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使之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第二，荷兰作为“欧洲的掮客和贩运人”，特别容易受到当时欧洲重商主义政策的损害。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要减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输入。法国和英国的关税、英国的航海法，以及像瑞典这样一些较小的国家所采取的类似措施，都打击了荷兰作为欧洲中间人的地位。因此，到1730年时，英国西部的商人直接从汉堡买进打包用的麻布，而以前他们是通过阿姆斯特丹买进的。另外一些英国商人原先通过荷兰的商行推销他们出口的布匹，现在则直接把货运往德国和西班牙。到了18世纪中叶，德国北部

的一些港口，如不莱梅、阿尔托纳，特别是汉堡，已经证明它们是阿姆斯特丹的强有力的竞争者。1750年，据报道从法国运往汉堡的蔗糖、咖啡和靛蓝比运往阿姆斯特丹的多两倍。伦敦的一家商行在1762年做过这样的描述：最近它把从西印度群岛买进的货物投放到“汉堡和不莱梅的市场”上去出售作为它业务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也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许多贸易开始以走直接的路线来代替长期以来通过荷兰的旧路线。这些倾向由于制造商船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飞船”已不再为荷兰人所垄断。到18世纪中叶时，就运费的贵贱而言，在英、法、荷商船中很难做出选择。第三，荷兰已没有能力保持它在大西洋贸易中真正的优势。虽然他们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还保持了一个立脚点（圣尤斯诺西乌斯是西印度群岛的走私中心），但他们在改变从英国殖民地源源不断涌来的产品的去向方面几乎毫无成效，这些殖民地产品几乎都集中到了英国。蔗糖的精加工、烟草的切割包装是在利物浦或格拉斯哥进行的；原棉的清理、纺纱和织布是在兰开夏进行的；靛蓝和洋苏木则是在约克郡的羊毛业中消耗的。这样，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加剧了欧洲贸易中心市场从荷兰向西转向英国的趋势。但是，荷兰的贸易并未全部丧失。散装货主要是煤和谷物，继续由东海岸的各港口运往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而且在这整个期间，荷兰一直是英国布匹最大的市场。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产品继续运往阿姆斯特丹。荷兰公司提供的蔗糖、咖啡、烟草和棉花数量仍然很大。但是荷兰在英国和欧洲全部外贸中所占的份额，总的来说到1763年时已经明显地缩小了。

虽然荷兰在欧洲18世纪的流通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比17世纪缩小了，但是毫无疑问，世界贸易中的大部分资金仍然是由荷兰提供的。在这个外贸的实验期间，欧洲商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支付问题。其困难部分在于可供出口的商品数量有限。英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和印度的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地区都不能够大量吸收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棉布，来支付英国需要购买的，也是想得到的商品（波罗的海国家的商品又是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因而英国不得不拿黄金来支付，而黄金又必须从出现贸易逆差的地区取得。这个问题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7世纪的理论家特别强调黄金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在18世纪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这个问题在18世纪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大量涌来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在不能出售棉布的地方可以出售蔗糖和烟草。但是，这样做还不能全部或立即解决问题，这个时

期日益使用给阿姆斯特丹开具票据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问题。习惯于向外国卖主预付现金的荷兰商人这时很容易改为采用打折扣和承兑票据来做交易。欧洲各地的商人习惯于同阿姆斯特丹的商号商讨由其承兑和支付卖给他们货物的其他外国商人开具的票证。阿姆斯特丹的票证之于18世纪，相当于伦敦的票证之于19世纪。荷兰人由票证业务发展向国外贷款的业务。一个世纪流通贸易和船运业务所产生的差额、金融活动较容易获得的利润，以及流通贸易遇到的越来越多的困难，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荷兰的经济活动增添了金融上的复杂性。到1763年，荷兰已经向瑞典、法国、波兰、普鲁士、丹麦、巴伐利亚、西班牙和其他许多国家贷款。自17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借钱给英国。173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吸引荷兰投资者——有多余资金的机构、海军将领、律师、寡妇、孤儿以及大批职业投机家——的注意力的主要是英国的公债。尤其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三年，荷兰在英国的资本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763年时，他们的资本在英国国债总数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个现象似乎表明英国贸易的顺差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国家的种种开支（比如，现有外债的利息，驻外使馆的费用，在欧洲大陆上游学的费用，尤其是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和陆军的开支）已把可见贸易上可能存在的顺差报销了，使英国成为一个债务国，特别是荷兰的债务国。此外，阿姆斯特丹仍然是欧洲海上保险业务的中心。虽然伦敦在信守期限和诚实无欺方面，已在这一行业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英国保险公司仍然担心，唯恐稍一放松警惕，保险业务就必然会落入荷兰人的手中。

对外贸易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各国多有不同。诚然，一般来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农业。但荷兰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那里，劳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和资本家的财富，都依赖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原料。甚至全国的粮食也大多是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的。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8世纪荷兰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如此谨小慎微。由于人口少，资源贫乏，交通线又容易遭受攻击，荷兰的政治家们不能推行冒险的政策。在另外一些国家，外贸并未如此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然而促进和保护对外贸易仍是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极为关心的问题，取得贸易上的顺差则成了政策上的主要目标。对于这种看来似是而非的论点的解释，必然在于政府与在外贸上有着既得利益的强有力集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人集团与政府本身的财政利益就有着密切的关

系。更有甚者，在某些特定地区，贸易的中止会造成失业，甚至危及社会秩序，乃至威胁国家安全。在英国，兰开夏的棉纺工业越来越多地使用牙买加的棉花。西印度群岛的染料对于约克郡和西部地区在印染深颜色的布匹时是不可缺少的。瑞典的钢铁对于伯明翰制造剑和枪的工匠是必要的。从士麦拿和莱戈恩来的生丝对于英国中部地区的缫丝工人和斯皮特菲尔德的纺织工人是必需的。尤其是进口的木材，建造商船，特别是建造海军舰船都需要它。市场也必须考虑进去：美洲各殖民地是中部地区生产的铁钉的市场；德国则是约克郡的呢绒市场；西部地区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贸易同样十分重要，因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修女都用黑绒布和长厄尔斯布做头巾。^[13]这种考虑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如此关注海军，以及繁荣和实力两者之间继续存在着的联系。在波罗的海，瑞典和俄国都可以威胁英国的木材供应，所以海军的任务就是要确保“波罗的海不得被人控制”。在地中海，黎凡特的贸易可能受到西班牙和来自西西里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如在1725年），法国从土伦和马赛袭来的威胁，以及北非沿海一带柏柏里海盗的骚扰。因此，像直布罗陀和米诺卡这样一些“位置比较方便，可以给他们造成‘骚扰’”的海军基地就十分重要了。^[14]很难谴责英国政治家们过高地估计了海军的保护作用。他们有时过高地估计了海军的进攻力量倒是可以争论的。当时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只要阻止西班牙从其美洲殖民地运送财宝的船队，就可能迫使它屈服。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过于乐观了。最近一位历史学家公开宣称，七年战争表明“用封锁和征服殖民地来挫伤法国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15]。在巴黎和约签订之后的短短几年中，波尔多的殖民地贸易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然而，在更广泛的计划中，消灭法国的海上力量与减少其殖民地和贸易却起到了作用。尽管敌人在大陆上取得多次胜利，却也给法国的巨大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而使英国能在1763年拼命地讨价还价。

就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而言，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的记载中没有发现什么偏离传统的重商主义立场。在政治家的心目中，外贸和海运仍旧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也是富国强民的源泉。“我们的贸易取决于我们正当地运用海上力量：贸易和海上力量是互相依存的。……财富，这个国家真正的资源，靠商业。”这就是我们称为“皮特系统”的实质。1760年皮特的思想与100多年前乔治·唐宁爵士和航海法制定

者的思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要决定一个国家的兴旺，人们就像在100年前一样，指望的是贸易的差额。更有甚者，他们往往引用前一个世纪的作家们的那些随意收集的关于进出口的数字，仿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要说明为什么经济思想如此停滞不前并非易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有所考虑的，那就是对于重商主义作家来说很根本的一种看法，认为可供大家分享的贸易总额本身是不变的。马修·德克尔是一位英国化了的荷兰人，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商业经验的作家，他的观点常常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思想的源泉。他在《论对外贸易衰退的原因》一书中写道：“因此，如果英国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外国人就必须用金银财富来支付差额，国家就富了。但是如果英国的进口超过了出口，我们就必须付给外国人金银财富，那么国家就穷了。”这些话实际上是对托马斯·曼的话的解释。在德克尔之后50年，内克尔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使他能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法国的贸易状况。西班牙的财政制度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对进口的原料和出口的工业品课以重税，鼓励工业品的进口和原料的出口。正是在这个时期，两位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家乌略亚和乌斯塔里斯开始根据正统的重商主义者的方式强调工业和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各地讲究实际的人士对殖民地的态度在本质上并未改变。正如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在1717年说的那样，殖民地的作用是“拿走我们的产品和产物，给我们提供在这里进行加工或再出口的商品，或者说，不用其他地方的同类产品供应我们的国内消费，雇用我们的穷人并促进我们的航海事业”^[16]。

然而，即使在讲究实际的人士中，对现行的贸易制度的某些方面也不乏不满意的迹象。因此，虽然德克尔论文的主题是对外贸易的衰退，他也得瞻前顾后。因为如果他接受关于贸易顺差重要性的观点，他就反对了重商主义者通常用以谋求达到贸易顺差的管理方法。他不仅攻击关税制度、国债和“不合时宜的法律”，而且攻击整个垄断制度和航海法。对航海法的这种攻击没有立即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意见得到群众多大程度的拥护也是值得怀疑的。甚至精力充沛的迪安·塔克，在1765年关于印花税法的争论之前，也一直没有改变对殖民地价值的正统观点。许多人目睹一年几百艘船满载着纺织品离开西海岸的港口，又满载着殖民地的货物回来；他们还目睹利物浦（对法国人来说，是波尔多）变得越来越富足。要这些观察家们否认这些事实与一整套的宽容的商业管理方法有因果关系，这确实很困难。然而，在另

一方面，德克尔和其他人的攻击或许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被选为攻击目标的第一批垄断组织是有“专营特许状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和土耳其公司”。这些公司“阻碍了我们的工业品在国外不断扩大销路”。德克尔认为，这些公司的专营特许状阻止了英国人在“已知世界的3/4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们的政策导致有意限制海运力量的增长。“仅出入莱戈恩自由港的贸易船只的吨位数就比这三家特许公司使用的船只吨位数大。”^[17]德克尔在这一点上是讲得比较得人心的。英国进行对外贸易的公司制度在18世纪中叶有所放松也许是很有意义的。这时比一个世纪之前，有更多的资本家拥有足够的财力独自开辟航线。对外贸易的风险虽然仍旧很大，但是由于外交机构的广泛建立、皇家海军效率的提高和力量的增强，以及海上保险的发展，风险已比过去减少。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都使对特许公司的需求减少了，至少在许多的贸易地区是这样。在庞大的联合股份公司中，东印度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幸存了下来，主要是因为终于认识到这些贸易需要保护，而这种保护只有一个拥有永久和集体财源的公司才能提供。第三个公司是非洲公司，它在1750年结业，变成一个由全体与非洲进行贸易的商人所组成的受政府控制的公司。其他受政府控制的公司——东方与莫斯科公司和冒险商公司——是在1688年革命以后开业的。后来在1753年，通过了一个法案，开放黎凡特公司，使之符合新的时尚。甚至在法国，自18世纪初以来，在商会内不时发生对垄断和商业限制的攻击。1750年后，商会的考虑日益表现出自由的倾向。1759年，允许进口印度棉花的决定就表现了这种新精神。与此同时，樊尚·德古尔内（1712—1759年）的追随者推为宣传“自由贸易，自由通行”的主张。这样，50年代就是从垄断贸易到自由贸易的过渡阶段，但是海外贸易必须“接受旨令”的想法仍然存在。

这样一些变化是可以觉察到的，但是很小。它们不足以表明重商主义的大厦即将倒塌：实际上，它一直保留了整个世纪。但是，恰好是在这个时期，理论家们在准备对重商主义制度的基础进行攻击，到时候就会将它摧毁。在英国，一系列思想家，如洛克、诺思和休谟；在法国，里夏尔·坎特龙和重农主义者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都在对重商主义制度有系统地提出理论上的抨击。他们批判的方法不同于德卡尔一类作家，相对地不受讲求实际的成见的影响。倒不如说他们的批判是由于在思想上对重商主义者不能令人满意的分析注释上感到不满。他们的成就是形成一种比较普遍（即使常常不甚实用）的经济

理论和分析的概念。坎特龙的《论文》（1755年）包含对价值、工资和价格，以及对外贸易、外汇率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等主要问题的充分论述，胜过了以前的任何作家的论述。休谟虽然独创性略显不足，但对于后来的思想留下了他的印记，而且完全不是靠对重商主义者建立在货币数量理论基础上的贸易平衡概念的攻击。这些思想有些在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著作中重现，对他们来说，商业在经济中只起辅助作用，即分配的作用。在把重点从交换作用（重商主义者所说的）转移到生产作用方面，他们表明了当时最先进的理论所达到的极限。正是在生产领域里，他们发现了创造财富的力量和可能用于积累的盈余。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它起码转移了人们对商业的注意力，可能破坏了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精心建立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的结构。然而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在当时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1752年，休谟可能宣称：“我，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英国的臣民，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商业繁荣祈祷。”但是，要经过很久以后，许多人才同意了他的信念。仅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全面地综述这种新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含义，尚有待《国富论》的发表。皮特的“系统”说比之休谟的经济哲学或塔克的反帝国主义理论更符合当时的舆论。

旧制度的统治者大多往后看，而思想家则多少向前看，这是旧制度后期的特点。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新旧混杂的。欧洲社会的基础仍然是农业和重商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局部的，而且不平衡。一些比较老的工业部门，如荷兰莱顿的织布业，英国德文郡的哗叽业在衰退；而新兴工业，如法国南部生产廉价纺织品的纺织业、约克郡的呢绒业，以及英国北部和中部的丝绸和棉纺业则欣欣向荣。在工业技术上，特别在冶金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就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还没有迹象表明生产组织本身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工业界在政治上已经充分地组织起来，足以及在影响到他们利益的问题上向政府挑战。在法国和英国，他们在反对进口有竞争力的印度纺织品问题上获得了胜利。然而，有意义的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与商人的利益一样，是在保护和限制措施方面，而不在经济自由的措施方面。那些扩大经济自由的措施是来自商业和工业之间正在发生变化的关系，而不是来自生产组织内部的变化。1763年与1713年相比，有更多的人受到其他国家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雇主和雇员关心从国外取得的原材料与开辟国外和殖民地市场的情况。因此，他们也越来越

怀疑那些看来一成不变的管理经济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往往缺乏灵活性，有时还与常识和公平交易的原则相违背，并且日益阻碍了贸易和就业。

（姚乃强 译）

[1] C. E. 费伊尔在《世界船运业简史》的第175页，引用了威廉·佩蒂爵士的这一估计。这个数字不过是个猜测，但是费伊尔说，佩蒂的估算不会相差太远。

[2] 联合省系指低地国家的北方七省，158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取得独立，现为荷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3] 虽然这个原则在17世纪并没有实现，但在所谓的《德维特箴言录》（1662年）中对和平与中立的政策作了有力的申辩。

[4] 法国19世纪前货币名，原相当于一磅银子，后为法郎所代替。——译者注

[5] T. S. 艾什顿：《工业革命》，1948年，第65页。

[6] 埃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年，第7章。

[7] G. T. F. 雷纳尔：《欧洲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伦敦1798年，第4卷，第466页。

[8] 乔赛亚·蔡尔德：《贸易新论》（1698年），转引自R. 帕雷斯《帝国历史上的经济因素》，载《经济史评论》1937年5月号，第125页。

[9] 贝洛港（Porfobello）：巴拿马加勒比海沿岸的一小海港，系1502年哥伦布发现和命名的。——译者注

[10] 香料岛，指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译者注

[11] 《剑桥不列颠帝国史》（1929年），第4卷，《英属印度》，第164页。

[12] 见本卷第44页。

[13] 笛福：《英国的商业计划》（1728年），第185页。

[14] 托马斯·肖：《旅行札记》（牛津，1738年），第318页。

[15] 帕雷斯：《西印度群岛的战争和贸易》（1936年），第392页。

[16] J. F. 里斯：《剑桥英帝国史》（1929年），第1卷，第20章，第566页，引自约翰·卡里《试论调整贸易和雇佣英国本国穷人》（1717年）。

[17] 德克尔：《论对外贸易衰退的原因》，第43—47页。

第三章 社会阶级与国家基础

18世纪初的社会，正如在圣西门和哈维勋爵的著作，罗素或温德姆家族的文件以及贝里克公爵或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通信中所反映的那样，主要是一个贵族的和法兰西式的社会。这种印象从瑞典的城堡，维也纳城内及其周围的宫殿，以及英国和俄国的肖像画、图书馆和珍藏的瓷器都可以得到佐证。但是，如果人们考虑的是舰队街、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而不是圣詹姆斯宫、韦尔贝克和伍本；是雷恩和马赛，而不是凡尔赛；是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不是波茨坦、卡尔斯鲁厄和曼海姆，那么所得到的印象就有所不同了。甚至在18世纪上半叶，经济力量就已经在起作用了，往往使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多，力量不断增强；而且法兰西的思想和风尚已经受到来自英国、德意志各城市，甚至来自非欧洲世界的挑战。

但是，贵族的声望在18世纪初无疑是很大的。在大多数国家，军队、法院和外交部门的高级职位全部为贵族阶级的成员所占据。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贵族有权标志纹章以显示他们与第三等级不同。例如，有的画在他们马车的车门上；或者，像在西班牙，则把它赫然地雕刻在城里宅邸门廊的上方。在大多数国家，所有贵族的后裔仍然沿用贵族的头衔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然而英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有些特殊。要取得这一头衔的权利，通常要由国王封为贵族，而国王要把平民封为贵族的这个权力，则要受到密切的注视和严格的限制。譬如，1720年的瑞典宪法就作了限制，然而实际上瑞典在1719年至1792年间就约有624个家族被封为贵族；而英国在1702年至1783年期间却只有144家受封。贵族很大一部分的权力是以财富为基础的。而且18世纪上半叶，这种财富大都是以土地的形式出现。在西班牙，一些大贵族，如因凡坦多、梅迪纳·西多尼亚和奥苏纳，都拥有庞大的产业，因此这些家族的首脑成了政治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即使他们的才能可能只是平庸而已。有几个国家的贵族已经制定出大体上相类似的办法，把大地产保持完整。不管是西班牙的长子继承制，或者奥地利的限定继承法，或者英国严格的限嗣继承地产权制，土地都完整地由父亲传给长子。英国《闲谈者》杂志曾谴责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1\]](#)

但却照常实行。甚至有的贵族并没有什么财富，不得不用家里的花毯来做衣服（如像德卢瓦先生那样），但是他们仍然享有很多的特权。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地方，贵族只凭他们的地位就可免除纳税，就可对他们的佃户行使司法权，仍然有权征收封建的赋税，往往还要征用劳役。不管是像《旁观者》杂志文章中所描述的罗杰·德·柯夫雷爵士那样的英国小乡绅的天地，或者像吕伊纳和圣西门这样大贵族的天地；不管是从一个像黎塞留公爵那样的贵族的观察，或者从来自下层的博马舍和盖依的观察，18世纪的社会似乎是被高雅的绅士所统治的。农民是他的佃农，有时是他的农奴。城市工匠为他绣制背心，镶嵌家具。甚至像雷诺兹和盖恩斯巴勒这样有才华的画家也乐于接受他的画像委托，而像蒲柏这样独立不羁的文人则是例外，不领受贵族的保护。

一眼就可看出，18世纪初的社会主要是贵族的这一性质，由于罗马天主教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威望而进一步加强了，因为虽然教区教士有时是从农民和城市工匠队伍中招收来的，但是教会中的高级职位几乎都由贵族成员担任。教会的高级职位向出身低微的人开放的一个国家是西班牙，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通常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教士、宗教组织的成员以及吃教会饭的人约占总人口的2%。在葡萄牙，所占比例似乎还要大得多。绝大部分的一般赋税，教士均免于交纳。他们享受什一税和多种收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教育。在政治上，他们的势力通常是站在国王和保守的一边。耶稣教的教士，无论在斯堪的纳维亚、北德意志、荷兰或不列颠诸岛，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罗马天主教的许多牧师的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势力也是坚定地站在已经确立的制度的一边。只有卫理公会的教士对穷人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太关心去改善穷人的社会或经济状况，或者鼓励穷人去争取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他们深切地关心要拯救穷人的灵魂免遭毁灭。

然而，如果说18世纪初是“贵族的”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个时期都是一式一样的。尽管各国的贵族有着许多相当大的类似之处，但相互间还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俄国的乡村贵族（第14章）就和法国的宫廷贵族大不相同（第10章）。普鲁士的（第13章）和瑞典的（第15章）官僚式军事贵族与西班牙悠闲的地主（第12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普鲁士，一定程度上也在匈牙利（第17章）

和瑞典，许多贵族是讲究实际的农场主，他们为了谋利耕种着他们的种植园。在英国，绝大部分的土地租给了佃户，但是英国的地主有一个传统，通过其代理人 与乡间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西班牙、丹麦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许多贵族几乎一直住在宫廷里，很少前去看看他们的庄园，对于农事也无多大兴趣，只要农民按时向他们缴纳封建的赋税即行。贵族不仅与他们庄园之间的关系一个地区与另一地区大不相同，而且对农民实施的权力也差别很大。在波兰和匈牙利，贵族在其庄园中拥有极大的权力；而在瑞典和英国，他们的权力则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小。

贵族和耕种其土地的农民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差别，生动地说明了欧洲地区之间的差别。18世纪英国的地主除了经营家庭部分的田园外，绝大部分土地一般不自己耕作。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靠收取地租生活。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合算的，因为在17世纪，英国的农业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只是由于内战暂时中断了一下），地租提高得很快。在18世纪，大佃农也富庶起来。如果一个大佃农碰上好运气，租种的农场租期长，有时就能从他对农场投资的资本中取得14%—18%的利润。他日子可以过得很舒适，甚至很阔绰。他甚至可以讲究窗明几净，妻子和女儿也不必去干重活。但是，在大地主和大佃农富裕起来的同时，而在17世纪末已占人口的1/7左右独立的小自耕农，却慢慢地衰落了。他缺少与有钱的邻舍竞争的资本，也无力仿效他们改进耕作技术，甚至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狩猎的权利。济贫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750年以后，圈地运动又兴起时，自耕农的地位更糟。谷物价格开始波动，他不能像资本主义农场主那样把谷物贮存起来，等待好价格再出卖。自耕农民沦落了，加入到靠挣工资生活的队伍中去。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中靠挣工资生活的人还是相当富足的。他们的餐桌上白面包代替了黑面包，他们几乎天天能吃上乳酪，往往还吃肉。他们喝啤酒，有时甚至还喝茶。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情况开始恶化。官方在评定工资时总是压得很低。用济贫税补贴已结婚的男子收入的制度，间接地破坏了全部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工业集中在北方和中部的城镇，这就减少了农民收入的一个来源，而18世纪后期公地被圈走对于靠挣工资过活的人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最初，经过改良的耕作方法给靠工资为生的人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时，农业的耕作方法有了长足的改进，以至有可能节省劳动力了。有些大地主宁可把本村的村民赶走，雇用附近村子里

的人做劳动力。到了18世纪末，英国农业工人开始了一个严峻的时期，虽然对他们的压力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不是政治方面，甚至也不是社会方面。

在法国，农民家庭约占人口的80%。农民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不到1/20，佃农占1/4弱，分成农也许占1/2。分成农必须把土地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无地农民也占1/4弱，还有约1/20是农奴。到18世纪末，法国的地主对农民的欺压并不特别厉害，但是农民要交纳各种金钱，负担十分沉重。他们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家交平民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什一税、人口税以及盐税，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封建赋税。一个农民，如果他不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那么他还得因使用地主的磨坊、葡萄榨汁机和烤炉等付出代价。他不得不每周去给地主干几天活，或直接用交纳钱款的办法来偿还。

在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农民是非自由农，虽然即使在这些地区，各处情况也很不相同。在匈牙利，土地基本上是由不自由的农民耕作，虽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比其他的人富裕。1514年，一个农民应向地主缴纳的封建赋税定为：一年一个金福林，一周劳役一天，一月一只鸡，一年两只鹅。此外，10个农民一年交一头肥猪。再者，地主有权取得农民收获的庄稼和葡萄总产量的1/9，教会则取得1/10。1548年，农民被迫在收割庄稼、打干草和采摘葡萄的季节里每周为地主劳动两天。1557年，农民除向地主缴纳各种封建赋税外，国家又开始向农民征税。这些税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愈收愈多。到了18世纪，匈牙利的农民还一直向地主交付这些封建赋税，每周替地主服劳役，把收获的一部分交给地主，并且负担国家税收的重担。由于匈牙利农民完全是在封建地主的管辖之下，不可能充当指控贵族的证人，所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这时出现了一种趋势，要求减少每个农民所欠地主赋税的数额。据说，匈牙利农民的经济境况比哈布斯堡王朝其他领地上的农民、德意志各邦的一些农民，甚至比法国的一些地区的农民都要好。匈牙利农民最不利的地方是他们的赋税比率被认为是最低的。1767年，玛丽亚·特蕾西亚颁布“土地法”时，对封建赋税和一个农民可以为其地主服劳役的天数都做了调整。她把普遍接受的数字规定为可以强征的最高额。据维也纳国务会议的报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等地农民的状况比匈牙利农民的状况更糟，

而与丹麦农民的状况相同。丹麦的情况与东德意志的一般情况类似，而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方则不相同。在普鲁士，在易北河以东的其他德意志地区，以及在巴伐利亚，农民占人口的3/4，那里农奴的状况也很坏。在东普鲁士，一个农民每星期至少要替他的地主干3天活，有的时候竟要干5天或6天。有些农民只得在晚上或夜间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在易北河以东的大多数地区，地主把司法权和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这样使他们自己在与农民的关系中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只“让”农民占有了一点土地，租用期又含混不清，所以尽管农民未经地主允许不得离开庄园，但他仍可能从他的住家中和土地上被赶走，而得不到任何赔偿。相反，在西德意志，农民的地位比较像法国的那些压迫农民较轻的地方。农民常常交付货币地租，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他拥有的土地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所以他的儿子完全有理由继承。地主只是在一些不重要的案件上才对他施行司法权。若要征用实际劳役时，有时一年少到只有14天。在波兰（第14章），七八百万农奴的状况是十分悲惨的。1717年以前的55年的战争造成了惊人的毁坏。人口减少，增加农奴每周劳动的天数并不能解决困难。在18世纪上半叶，每周要求服劳役的天数是3天。农民的其他赋税也增加了，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受地主的管辖，在1768年之前，地主掌握着生死之权。在俄国（第14章），农奴的地位可与波兰的农奴相比。全部农民中大约有60%是私人庄园里的农奴。他们或者一星期为地主干两三天活，或者每年向地主纳税，税款由50戈比到2卢布不等。数额是由地主确定，并且可以任意提高。地主可以连同或不连同土地出卖农奴，甚至拆散其家庭。地主也负责征收其农奴的人头税。据说，靠教会土地生活的农民中有15%的人比租种世俗地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还要困苦。“国家农民”[\[2\]](#)比其他农民的生活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缴纳的货币地租很轻，只有40戈比。一般来说，凡是国家要求贵族提供劳务的地方，贵族对于他们的农奴的要求就重，普鲁士和俄国就是这样。凡是贵族享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如在波兰和匈牙利那样，那么他们强加于农奴的负担也就繁重。

贵族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如同他们对农民行使的权力一样，因国而异。在某些国家中，虽然某些贵族个人通常担任国家的要职，指挥武装部队或出任大使，但是就整个贵族来说，政治上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也许仅4000个贵族家庭实际上参与了宫廷生活，有一些人在宫廷里供职并领取年金。但是，法国的

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未召开过会议，而且那里的地方政府的事务主要掌握在国王的领取薪金的官员手中。在西班牙，贵族占人口的5%左右，情况与法国大致相同。西班牙议会虽然常常开会，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与法国一样，许多西班牙贵族都离开了自己的庄园，在宫廷里当食客。丹麦的贵族也往往离开他们的庄园，密集在哥本哈根；德意志的小邦中，许多贵族也是这样。在德意志小公国的宫廷里，贵族拥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很小，但是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在德意志，贵族身世比较重要，这是进入宫廷社会的先决条件，法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甚至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出身的歌德必须精心策划出一套手法，才能受到接待而与年轻的威玛公爵夫人玩牌戏。再者，在讲究繁文缛节的德意志小公国的宫廷里，领取薪金的官员却是数不胜数。在1733年萨克森公国的历书里，官职表就有53页。在大多数宫廷里，贵族们根据公爵及其夫人的兴趣，为他们提供各种娱乐，如狩猎、歌剧、招待会、舞会等。他们赌博、饮酒，寻欢作乐，谈情说爱，挑拨离间以及玩弄小小的政治诡计，这里大有机会。法国、西班牙、两个西西里、丹麦以及德意志的小朝廷的许多贵族参加宫廷活动，过着奢华的，有时也是颇有教养的生活，但在政治上却碌碌无为。

与这种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宫廷贵族形成鲜明的对照，普鲁士和俄国的贵族则终身为国效劳。在普鲁士，许多贵族很穷，以致不得不出来谋求工作，或在军队里当军官，或在政府部门担任文官。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坚持认为，普鲁士贵族成员应为国效劳。因此在贵族中便形成了一个传统，认为担任公务是一个贵族的天职，是一种荣誉。正是贵族必须为国效劳的这种理想，激励彼得大帝从事改革，但是，事实证明俄国人不如普鲁士人那么讲究合作。1714年，彼得大帝宣布一切产业都是世袭的，同时他改变了俄国古老的继承制度，代之以限嗣继承地产权制，即只有长子继承土地，其他的儿子必须去谋求工作。1722年，彼得大帝把军队和政府部门的全部职位分成14等，并且宣布即便是贵族都得从最低的一级往上晋升。彼得大帝死后，这些激烈的社会改革被修改了。1730年，限嗣继承地产权法被废除，年轻的贵族允许先在为贵族开办的特殊的士官生军团中开始为国服役。1736年，贵族为国家效力的期限减至25年。虽然由于土耳其战争这个规定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但在1742年经过批准实行。甚至在18世纪30年代，俄国的贵族就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手法逃避为国家效力

的严格义务，譬如把婴儿的名字注在近卫军的花名册上，这样孩子到了25岁时，从法律上说他已完成了义务役的期限。1762年，贵族们获得彼得三世的准许，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役。

在匈牙利，贵族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甚至政治权力；这虽然不能与普鲁士和俄国的贵族必须为国效力的情况相比，也不能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贵族在宫廷里碌碌无为的情况相提并论，但是可与瑞典和英国的情况相比。在匈牙利，即使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之后，贵族和乡绅也处于一种特殊强大的地位。匈牙利社会是一个贵族的社会。贵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英国和法国的大得多。1787年，据估计，匈牙利人口只有法国人口的1/4，而贵族家庭的数目却是法国的3倍左右。1741年，由匈牙利贵族组成的军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柱。在一个很长时期，匈牙利的国王是由外国的王公来担任的，城镇里大部分的居民也是外国人，而教会又被异教所动摇；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贵族却最真实地表现了匈牙利民族的团结。在匈牙利，不是贵族是不能拥有土地的，因而匈牙利的贵族拥有巨大的产业。从土耳其手中夺回的领土被分封后，贵族的产业又扩大了。有些匈牙利贵族，如加博尔伯爵、埃斯泰尔哈吉公爵、格拉索科维奇家族、帕菲以及其他贵族都是豪门巨富。1741年又规定，匈牙利贵族无须纳税。匈牙利的贵族就像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占据了国家的要职，而且还像法国的贵族一样，也占据了教会的重要职位。他们全都是国民议会的议员，而且据有匈牙利各省的最高行政职位。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期间，大贵族的权力开始逐渐衰落，但是一直到18世纪末，这些权力仍然相当大，而且即便是那些住在各省、基本上还没有接触过法国的风尚和习俗的比较贫穷的贵族与乡绅，也有力地掌管着司法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自己地区的习俗和权利。在波兰，18世纪是地地道道的贵族时代，所以当时的波兰宪法被人称为“贵族的民主”。其实叫作“贵族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更为恰当。虽然这种无政府状态是以波兰的灭亡而告中止的，但是在1772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波兰的贵族还是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据估计，18世纪波兰缙绅阶级的人数在150万左右，其中只有20人到30人才是真正的大权贵。波兰的贵族出席议会，控制着王国的政策。他们统治着各省，挑选收税官，并且实际上管理着各个地区，因为领取薪金的公务人员很少，而且那些在职的官员也无多大权力。同波兰贵族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相比，瑞典的贵族，即使是在国王的独断专行受到1720年的宪法的

遏制之后，似乎也进一步受到限制。然而在50多年中，他们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1720年到1772年期间，瑞典的政策掌握在四个等级的手中，构成第一等级的贵族，则起决定性的作用。据估计，在18世纪上半叶，瑞典和芬兰约有2000个贵族家族。各个贵族家族的族长，或者挑选出来充当那些本人不能出席议会者的代表，都不必谋求议会的每层会议的当选，只需定期出席会议而已。在权力极大的各等级的秘密委员会中，贵族占50个席位，教士和自由民各占25席。只是在特殊重大的情况下，才有25名农民应邀参加委员会，所以通常贵族占委员会的一半席位。枢密院的席位则完全由贵族垄断。虽然贵族在18世纪期间逐渐放弃了一些特权，但是一直到1809年政府的官职才向所有三个等级的成员开放。而且，一直到1762年，贵族还拒绝承认任何一个虽封为贵族但未得到第一等级同意的家族。1723年，贵族同意不同等级之间的成员可以通婚，承认非贵族有权拥有贵族的土地，也允许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一些次要的职位。这是因为瑞典当时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贵族还是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相当大的赋税豁免权。在英国，贵族和缙绅1688年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使国王蒙受的屈辱还没有达到瑞典贵族1720年的胜利使国王所蒙受的屈辱的那种程度，但英国的贵族和缙绅到1832年（或许还要更晚一些）一直支配着政治、行政和社会的生活。贵族组成了立法机构的一个院，而另一个院则主要由缙绅构成。国家和军队的一些重要职位通常都由贵族担任。在乡间各地区，贵族和缙绅掌管司法，他们作为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又管理郡和教区的事务。虽然英国贵族掌握的政治、司法和行政权所表现的某些特点，可与匈牙利乃至波兰的贵族所拥有的权力相比拟，但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渗透的程度使英国的社会状况看起来要比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状况先进150年。

国与国之间不仅社会状况大不相同，即使在一国之内，经济与国民方面的变化也在形成许许多多的社会集团，一直到社会的结构变得几乎是无限的复杂，已远不是贵族主宰一切那样的简单了（第10章）。

经过18世纪初社会性质的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变化，欧洲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西欧，特别是在荷兰、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贸易发达的国家，代表重商主义的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势力也越

来越大。在中欧和东欧日益收到效果的独裁统治的国家中，特别是在普鲁士和哈布斯堡领地内，出现了一个由文职官员组成的中产阶级。18世纪欧洲各地都出现了一个扎根于陆军、海军、教会和法律这样一些专业部门的上层中产阶级，但是一个日益居于重要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在英国最令人瞩目。

或许由于英国到18世纪中叶前，还没有发展一支像在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那样大规模的常备军，所以英国社会没有出现同军队等级有关的那种等级森严的区分的迹象。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一样，英国保留了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地产权；但是在英国，只有长子才能承袭其父的爵位，因此在几代人期间，即使公爵的后裔也没有任何爵衔。这种一个阶级为另一个阶级和平渗透的结果，产生了一种利害相同的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相同的情况由于这一事实又得到加强，即在下议院中，缙绅阶级和城镇的代表（即使他们不是缙绅）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早在1726年，笛福就已指出：绅士从商并不有伤体面，商人跻身于贵族行列也毫无失当之处：

简言之，英国的贸易造就了绅士，使这个国家绅士济济。因为商人的子孙（或者至少是孙辈）渐渐成了高雅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院成员、法官、主教和贵族，他们与那些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家族的绅士们毫无二致。[\[3\]](#)

于是商人杰克·安维尔摇身一变，成了约翰·恩维尔爵士。《旁观者》杂志把他描绘成这种经过自我奋斗、“倾全力缔造一个家族”的范例。一位郡议员，也是一位男爵，他的祖先在14世纪曾在议会里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却可以同一个城里的铁器制造商的女儿结婚。酿酒发了财的人可以买庄园，在哈福德郡就有许多这样的人；西部的羊毛制造商和中部的铁器制造商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英国的采矿业和工业就已十分兴旺。南特敕令的取消，使许多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逃到英国去避难。他们在英国大大地促进了玻璃、造纸、制帽和丝绸等工业的发展。普鲁士作家博内特的作品就向人们证明，18世纪英国的生活是十分富裕和安适的，在那里肉已成了主食，面包和蔬菜仅仅是佐餐物品。英国国内长期的和平促进了这种繁荣的发展。从贸易和制造业中获得的财富的大部分则用来购置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贵族地位的高低仍然以拥有土地的多寡为基础。但是，在英国，由于“国王的臣民拥有土地不予禁止”，因此拥有土地的贵族中便慢慢包括了

那些先发财，然后再购置土地的人。不仅富有的制造商人购买地产，而且有些贵族也以强烈的商业意识用他们的地产来经营农场。已经指出，只有在英国地产才是按其租金收入而描述的。杰思罗·塔尔是伯克郡的一名乡绅农场主，1733年出版了一本论述马拉犁的书。1733年至1738年间，汤森勋爵证实，经过改进的耕作方法是有利可图的。从1760年起，莱斯特郡的罗伯特·贝克韦尔就表明，饲养牲畜可以获取多大的利润。18世纪末，诺福克科克，甚至国王乔治三世本人，都表明贵族从事有利可图的畜牧业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在这之前，上层中产阶级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小的城镇社会中，已经发展起来。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都有了这一阶级。瑞士的城市也有了这一阶级。德意志比较富裕的城市，如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都供养着高傲的贵族阶级，而这个阶级在17世纪曾是尼德兰联合省的支柱。荷兰的显贵是商人。他们表情严肃的画像都被画成一些形象很不突出的行政长官或行会的领袖。他们把流经阿姆斯特丹的海伦运河称为行会河，并沿河修建了许多雄伟的宅第，里面挂有埃伦格尔、德利乌斯或穆舍龙的绘画，并饰有罗马式的精致的拉毛粉饰，还有富丽堂皇的楼梯，宽敞的房间，避暑的花园和亭榭。在瑞士的城镇和德意志自由的城市里，也很早出现了商业贵族。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17世纪苏黎世有一半人口能读能写，而且博览世界，因此莱比锡被称作“小巴黎”。巴塞尔有能力维持一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的流亡者在苏黎世的贵族中占很大的比例。当汉堡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而且也是流亡的新教徒和犹太人的避难所的时候，巴塞尔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歌剧之乡，有着第一家德意志的咖啡馆和模仿《旁观者》杂志的第一家周刊。在莱比锡，每年要举行三次博览会，成千上万的商人汇集在那里，成交量可达几十万镑。莱比锡也是最先举办为中产阶级欣赏而不是专为王公及其贵族宾客娱乐的音乐会的地方之一。虽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部分金融业务已丧失给了阿姆斯特丹，它的许多图书贸易转到了莱比锡，但是在那里还有着许多显贵的家族，如贝特曼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并且成为从奥格斯堡、乌尔姆和尼恩贝格流亡来的犹太人之家。在法兰克福形成所谓林佩格尔和弗劳恩斯坦纳的上流社会的那些显贵们，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和皇家贵族平起平坐。这种自傲是建立在“继承的财产”、文官的传统、法定特权以及高贵的生活水准等基础之上的。^[4]在德意志和荷兰城镇中的这些城市贵族中，有

一个重要部分曾经是犹太人。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都有特殊繁荣和有影响的犹太人的居住区。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住区里大约有300名犹太人；新来者需要有1000金币的资财并能付70金币以上的费用，才会被接纳。一个犹太人每3年必须付12个半金币，才能更新他居住在法兰克福犹太街的许可证。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一旦发了财，都急切地希望能被准许加入贵族的行列。但是，一切学术性的职业在18世纪中叶并不像200年之后在英国那样受到社会的尊重。教士有时可能是贵族和乡绅家庭中年轻的子弟，但也可能是贫寒家庭出身的聪明人。乡间教区牧师或家庭牧师常常会受到像仆人那样的对待。律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代理人则被绅士们看作社会上的下等人。医生们的地位并不很高。尽管作家和文人在英国的地位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比法国的要好得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高的，除非他们本来就出身高贵，来自豪门巨富，或者声名斐然。法国的情况颇为类似。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富裕的成员，有的是收税官和金融家。律师也许不甚富有，但是社会声望颇高。医生较为富裕，但是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不高。药商、书商和印刷商等这些职业人员都比较有钱。卖布的或贩酒的商人有时很富有，但是他们发现在法国比在英国更不易摆脱乡绅的地位。在德意志各邦，与自由的帝国城市截然不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比之在法国的大得多。中产阶级成员的称呼方式与适用于贵族的称呼方式是不同的。虽然冯·洛恩在1752年抱怨说，布雷斯劳卖鲱鱼的年轻妇女竟被称作“小姐”；迟至1816年，有一家德意志报纸报道说，德意志北部一个小镇上的邮局奉命对于凡信封上把中产阶级的女子称为“小姐”的信件，一律不予投递。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喜欢在旧式的住宅里过简朴的生活，爱穿黑色或棕色的、经久耐穿的服装。他们对家属子女和学徒们管教极严，要求他们毕恭毕敬的程度，就像商人对待贵族那样。在18世纪，德意志的大多数城镇仍然经受着三十年战争和香料贸易的重要性已降低的影响。香料贸易重要性的降低使德意志南部的一些城镇，如乌尔姆、尼恩贝格和奥格斯堡丧失了它们在中世纪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有些城市，如汉堡、莱比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都相对地繁荣了。但是，在大多数德意志的各邦里，城镇还处于沉睡的状态。休姆因此在1748年评论说：如果尼恩贝格的一个市民住得比苏格兰的国王要好的话，那么这位国王的住处一定是很寒酸的。一般来说，德意志的商人阶级比之英国的商人阶级，不但人数少，而且势力小，那么有知识的各职业

中的成员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应地比他们的英国同行们要低。甚至在数以百计的独立的领地或半独立的郡中以及皇室庄园里就业的那些经过训练的律师们，也很少受到他们主人的尊重和青睐。有些律师的报酬微薄，他们所挣的钱并不比熟练工匠挣得多。医生的收入可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在18世纪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外科医生还列在熟练工匠一类里。教师们的工资通常十分微薄，在社会上也没有地位。耶稣教的牧师往往出身贫贱。然而，德意志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相当多，而且精力充沛，使城镇成为18世纪末德意志文艺复兴的摇篮。另外，在匈牙利，城镇不是财富的中心，从事需要有学问的职业的人主要来自贵族。匈牙利商人，如特佐·亨奇尔和哈勒等家族，他们一旦发了财，便立即设法获取贵族的地位。在匈牙利，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全都是贵族。匈牙利人当医生的很少，因而1747年约瑟夫·埃斯泰尔哈吉伯爵患病时不得不送往波兹南（即今波兰的波兹南——译者注），因为佩斯没有好医生。佩斯的城市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正统的希腊人组成的，他们不仅没有希望取得贵族地位，甚至也不能在他们做生意的城里购置房产，也不能参与市议会。在许多城镇，商人是德意志人。他们愿意与哈布斯堡家族通力合作，削弱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但是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力量在匈牙利的历史上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到18世纪末，匈牙利的城市中产阶级只有30万人左右。在波兰，城镇的状况比匈牙利还要可怜。华沙1772年的人口才过了10万，但是其他居民超过2万的仅有4个城市。地方的缙绅阶级不公平的竞争破坏了城镇的经济生活。虽然他们不一定从事贸易，但他们不缴纳出口税，而且还可以免税进口他们自己消费的货物。除去“大波兰”城镇中的羊毛制造业外，工商业都很可怜，手工匠人只好去从事农业，把小生意留给犹太人去干，因此波兰本土的中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贫困。在俄国，商人约占总人口的3%，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死抱住传统的习俗不放，并且从内心深处厌恶彼得大帝推行的改革和革新，但这是事实：彼得竭尽全力地发展工业和贸易并提高商人的地位；在彼得之前，商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被社会排斥的人。

在东欧，上层中产阶级尽管在18世纪就出现了，但是它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文职官员的人数增加，而不是由于有了兴旺的商人或制造商人。这种官僚中最出名的数普鲁士国王的官员，虽然到了腓特烈二世时，他们在450名人口中只有1名。这些人的任命并不像在英国、汉诺

威或萨克森等地方靠恩赐，也不像法国那样可用金钱购买。这些官员的晋升是靠资历，薪俸低得出奇。虽然普鲁士的官僚是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很少有发挥自己主动性的余地。但是，在18世纪，构成17个省的政府部门的那些官僚，实际上管理着普鲁士。虽然做出决定必须要根据多数票，但是每个省的政府部门的主席却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决定有时要比之他在首都的那些同僚的意见更有分量。即使在厉害的、大权独揽的腓特烈二世统治的末期，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就已经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普鲁士可以被认为正处在向“文官政府”发展的过程中。官僚的普鲁士邦1740年以后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使哈布斯堡各领地内专职文官出现的速度加快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鲁士文官制度的鼓舞，便在她自己的各省里建立了地区官署。到了利奥波德二世时，奥地利的省一级的行政官员都有权根据其服务时间的长短领取等级不同的年金。如果一名官员服务40年，他的年金就相当于他的全薪俸。遗孀给予抚恤金，而且每个未独立的子女都另发给补助金。1776年，一名想要在奥地利的省的机构中谋求官职的人，必须在大学里学过法理学。这个职业渐渐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其特殊条件要求的职业。在1813年以前，奥地利的文职官员在与军官和不担任文职官员的皇室贵族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调整，但是在那个时候，哈布斯堡领地内的文职官员，同在普鲁士一样，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人才，而在西欧这些人才则是由富有的商人和制造商提供的。无论在英国、法国、普鲁士或哈布斯堡领地里，这种上层中产阶级的成长是18世纪初的一个特点，它对于未来政治的发展，比之宫廷和贵族对社会的表面上的统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18世纪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自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对欧洲的艺术、建筑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18世纪也仍然如此（第4章）。在17世纪，意大利的影响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影响的挑战。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政治威望以及其宫廷的社会声望使法国的时装和礼节非常流行。法语之高雅和纯洁，以及拉辛、高乃依、拉封丹和莫里哀时代文学之优美，竟使德语在大多数德意志的宫廷里已不称其为上流社会的语言了。但是，恰好在18世纪初，当法国文明的影响似乎达到了顶峰时，欧洲社会此时至少有两种新势力变得日益强大。一个是英国的科学和文学的影响（第4章），另一个是德意志的音乐。自16世纪

以来，意大利人在音乐世界里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在18世纪，克雷莫纳继续制作着欧洲最好的小提琴。意大利人被认为是属于一些最好的演奏家和歌唱家。意大利人在许多德意志的宫廷里掌管着音乐。意大利是把歌剧首先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是首先学习爱好意大利式的歌剧，但是到了18世纪，其他国家的音乐开始向意大利的音乐挑战了。17世纪末，法国最杰出的作曲家是出生于意大利的吕里，但是1715年喜歌剧在法国奠定了基础；1723年，J.-P. 拉莫出现了，不久他就成为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作曲家；1725年确立了“宗教音乐会”，保证了一年有24天的音乐演出，由于宗教的原因，那时歌剧演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德意志各邦和神圣罗马帝国，音乐的发展更为突出。几乎每一个德意志的王公都有一支私人的管弦乐队。皇帝查理六世一年花在音乐上的费用达2万金币。伯尼博士在他的1772年的游记中谈到在奥地利的领地里，甚至一些儿童的演出都是高水平的。许多王公本人在宫廷的音乐会上都可以演奏一种室内乐的乐器。信义宗教会高度发展的音乐传统，加上许多小宫廷的赞助，遂产生了大批音乐作品，其中有的质量非常高。在宗教音乐方面，像合唱圣歌、大合唱、耶稣受难曲以及圣乐等形式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巴赫和韩德尔这两位同时代的音乐大师的推动下，发展更是迅速。他们两人都生于1685年，而且都是在18世纪最初几年里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在世俗音乐方面，随着管弦乐的发展和提高，以及如风琴一类键盘乐器、竖琴和翼琴等技术方面的发展，赋格曲在巴赫手下就有可能臻于完美的境地，可与韩德尔的翼琴达到完美的境地相媲美。歌剧虽然由于过分雕琢的做法而显得死气沉沉，直至18世纪下半叶格鲁克才把它解脱了出来，但是歌剧早已家喻户晓了。维也纳是歌剧在其间得以确立的第一批德意志城镇中的一个。从1716年起，当卡尔达拉成为富克斯的助手时，维也纳的歌剧表演开始赢得了欧洲的声誉，而这种声誉并不依赖于皇室成员有时参加了创作。在柏林，歌剧由于1703年至1705年间得到王后的赞助而流行起来；在腓特烈大帝时期重又流行起来，出现了一个异常光辉的时期。在德累斯顿，意大利歌剧似乎在1717年前后被介绍进来。1772年，伯尼认为德累斯顿胜过柏林，是德意志各邦中最繁荣的音乐中心。在慕尼黑，歌剧是在1689年被引进，受到了公爵的热情鼓励；他采用对玩纸牌征税的办法来支付巨大的费用。所有各王公首府的音乐生活中所共有的一个特点是：音乐会与歌剧演出都是王公招待宾客的私人娱乐活动。当时有人非常惊异地注意到，在英

国，沃克斯霍尔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任何人只要买门票，就可参加。在德意志的城市里，除去能出入宫廷的贵族之外，一般人唯一能听到的音乐就是在教堂里演奏的音乐。但是，1743年，在莱比锡，一个由16名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混合团体创建了一个称为“大音乐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很活跃，虽然因七年战争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在1763年又恢复了活动，成为“布商公会音乐会”^[5]的先声。汉堡也许是音乐不是专门为贵族享受的另一个德国城市，甚至可以称为德意志歌剧的摇篮，因为1678年在那里产生了第一部用德意志语言演唱的歌剧；而且在18世纪初，韩德尔有一个时期曾在那里担任伴奏，马特森也在那里歌唱、演奏、写作并且和人争论，所以汉堡便成了最著名的德意志音乐中心之一。埃尔富特、魏玛、斯图加特和萨尔茨堡在18世纪上半叶都产生过著名的作曲家；但是，曼海姆作为一个音乐流派的故乡也许值得特别提一下。这个流派在18世纪初就已经隐约地预示了在该世纪末成为驰名国际的维也纳流派的一些特点。斯塔米茨（到1757年为止）和霍尔茨鲍尔（从1753年起）都曾在曼海姆工作过。他们通过强调指挥的重要作用达到了迄今未实现过的对作品的不同表现。同时，他们把管弦乐的演奏发展到这样一种高度，因此伯尼在1772年曾经说曼海姆的选侯乐队是一支“由将军组成的军队”。到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代，德意志作曲家对于欧洲文明的贡献，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了。

欧洲也受到来自海外其他国家的种种影响。不仅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印度的薄纱和薄棉布，殖民地产的巧克力、大米、蔗糖和烟草使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像孟德斯鸠、伏尔泰或笛福这样一些作家还利用波斯人、中国人或野蛮人来着重批评欧洲的状况，这就说明其他地方的文明如何在影响着欧洲人的思想方法。同殖民地和亚洲进行的贸易，对于欧洲的商人和制造商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同时也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变化铺平道路起了不少作用。

（姚乃强 译）

^[1] 《闲谈者》，第223期，1710年9月12日。

^[2] 即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译者注

^[3] D. 笛福：《完满的英国商人》（1726年），第376—377页。

[4] W. H. 布拉福德：《18世纪的德意志》（1935年），第195页。

[5] 莱比锡的布商公会会址在1781年至1884年期间，经常被借用来举行音乐会，“布商公会音乐会”由此得名。——译者注

第四章 直观艺术和想象文学

在艺术鉴赏方面，1715年至1763年这个时期只是一个更长时期的一个阶段而已。这个更长时期开始于17世纪末叶，以18世纪浪漫主义精神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整个时期里，人们对自己能欣赏奥古斯都罗马的古典艺术而引以为自豪。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充满了自信，并创造了一种具有特点的社会形式（尤其在英国和法国），因此，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赞美古典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却在城市建筑、散文和小说方面都树立了新颖独创和富于魅力的样板。

在18世纪前半叶，欧洲在建筑方面主要受到罗马古典式的影响，这种罗马古典式建筑风格就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们重新阐述的风格。但是，在法国和英国，以及在北欧普遍来说，这种影响所传播的形式与在意大利和南欧或天主教欧洲所传播的形式相当不同。在意大利，18世纪前半叶流行的风格是17世纪初在罗马发展起来的巴洛克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马代尔诺（1629年卒）、贝尔尼尼（1680年卒）、普罗密尼（1667年卒）和科尔托纳（1669年卒）这样一些建筑师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例子也许是由卡洛·马代尔诺设计、由普罗密尼和贝尔尼尼建造的巴尔贝里尼府邸，普罗密尼设计的圣·卡罗·夸特罗·丰塔内教堂（他在临终前建造了教堂的正面），1665年贝尔尼尼设计的梵蒂冈的雷吉亚厅，以及1646年贝尔尼尼设计的罗马维多利亚圣母堂中的圣铁利撒小教堂等。这种建筑艺术回到了米开朗基罗，并通过他回到了古代的古典风格，但是它的性质很不同于和罗马古典建筑密切相关的那种庄重性格。巴洛克派建筑师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活力。它豪放奢华，精雕细刻，放纵不羁，达到了骄奢淫逸的地步。建筑物的正面处于一种动态；建筑物的内部往往用椭圆形来代替比较呆板和静止的圆形，给人一种有节奏地摆动与跳跃的印象。这种建筑激发起宗教感情的强烈表现，如托梅于1732年在托莱多大教堂中做成的透明厅。1733年至1750年根据阿萨姆兄弟的设计在慕尼黑建造的圣约翰·内波穆克教堂，或者1743年至1772年诺伊曼建造的菲尔策恩海利根教堂。这些教堂的建筑效果极富戏剧性。如托莱多大教堂那样，有时候采光完全剧场化了。与真人等身的塑像，如圣乔治跃马飞

出祭坛的银像和高处的天使浮雕像，以及运用鲜艳的颜色，如菲尔策恩海利根教堂采用的白色、金黄色和粉红色所产生的效果都能大大加强这种宗教情感。当这些效果与大胆自由的设计和对空间的奇妙运用结合起来时，真能使人为之陶醉。在多瑙河上的克洛斯特新堡、圣弗洛里安和梅尔克，在柏培尔曼为王宫设计了大回廊的德累斯顿；在维尔茨堡和以巴洛克式楼梯闻名的布鲁克瑟尔等地，许多建筑都显示了这种所谓“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大活力和感情力量。这种风格激起人们强烈的，甚至是狂放的感情。它不合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口味，于是到了18世纪初巴黎就成了欧洲艺术的重要的中心。虽然法国的建筑师同意大利的建筑师一样，从罗马古典主义的作品中觅取灵感，但结果却不同。法国建筑师不是表现出巴洛克式的奔放有力，而是表现出一种含蓄的优美，如佩罗于1665年设计的罗浮宫的正面，以及其同时代人勒沃设计的沃克斯勒孔特乡村宫殿。法国式古典主义风格的典型建筑是凡尔赛宫，它原来是勒沃设计的一座猎舍，经过扩建，最后由阿杜安-芒萨尔把它改造为路易十四的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为17世纪后期欧洲最伟大的国王建造的纪念碑，象征他的权力、豪华的威严。宫殿的规模极大：从北到南，绵延1/4英里。著名的镜厅长240英尺，高43英尺。它气势磅礴、端庄匀称，巍巍然令人不敢仰视。宫苑的外表给人一种单调划一的印象。甚至宫殿建筑物在以天空为背景映现出的轮廓也是单调的直线，因为屋顶被装饰着的一排栏杆遮住了。这座巨大的宫殿周围有一座座极宽阔的花园，它们是由勒诺特尔设计布置的，于1688年完工。这些花园豁达开阔，一览无余，使那些意大利的花园如艾斯泰别墅花园或卡普拉罗拉花园的宽长和庄严的景色都黯然失色。法国的巴洛克风格可能比意大利或奥地利的巴洛克风格要收敛一些，但是它具有夸耀其政治上胜利的豪华气派。

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的建筑风格有了一些改变，不那么注重匀称，而更讲究优美。路易十五时代的各种风格流派，不管是华托、罗卡尔还是蓬巴杜，都是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翻版。这些风格比法国早期的古典主义建筑受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受普罗密尼、尤瓦拉和瓜里尼等人的影响。这种以曲线为主的风格是从内部装饰开始的，它力求明快优美。意大利人梅索尼埃和塞尔万多尼的工作对形成法国的这种趣味起了重要的作用。梅索尼埃的设计包括房间的装饰，金银盘碟和瓷器的图案。他给建筑物正面图所做的设计里，曲线是十分显著的。他设计的建筑物，其不对称的组成部分往往

显得非常均衡。平面图也做了修改，除了圆形的和椭圆形的客厅之外，还有曲线的或棱角形的客厅，曲线形的客厅对布置一个茶话晚会尤为方便。华托设计的某些装饰性镶板，特别是那些充满幻想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风格的魅力。虽然在内部装饰和图案方面做了许多生动的试验，但是以前的古典主义建筑家所采用的方法，尤其他们在设计公共和私人建筑物时爱用的正面图，仍然为人们所重视。18世纪法国式设计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布弗朗和埃瑞的设计。在南希，埃瑞完成了这个新城的布局规划，其中包括周围围有铸铁栏杆的政府广场。在18世纪，法国的建筑师越来越倾向于建筑物的正面要严谨，而装饰要更自由。到1760年，这种倾向产生了一种与古典主义严谨的风格相类似的风格，而英国在整个18世纪一直实践着这种风格。古典主义精神在建筑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帮助形成了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到18世纪末便在全欧洲盛行。

18世纪英国的建筑师从罗马的古典主义寻找灵感，但他们是通过帕拉弟奥（1580年卒）的建筑风格，而不是从18世纪在罗马工作的建筑师所表现的那种夸张的巴洛克风格中吸取灵感。在17世纪初，英尼戈·琼斯在设计格林威治的女王宫（1616年）和白厅的宴会大厅（1619—1622年）时，就已经从帕拉弟奥那里吸取了灵感。他曾描述自己设计的建筑物为“坚实、匀称、雄伟、大方”。这种严谨的风格有一个时期不为人们喜爱。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1723年卒）在设计圣保罗大教堂西面的两座塔楼时，曾从普罗密尼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那里得到不少借鉴。范布勒（1726年卒）在设计规模宏大的布兰希姆府邸和霍华德堡巍峨的大圆屋顶时，也表现出对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倾向；尼古拉·霍克斯穆尔（1736年卒）也有这种倾向。但是在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去世后，英国的建筑再一次受到帕拉弟奥严谨与朴实风格的影响。据说早在1715年伯灵顿勋爵就已经把莱奥尼带到英国，聘请他主编帕拉弟奥的作品，该书于1717年出版。1730年，莱奥尼又发表了关于帕拉弟奥恢复古代建筑的著作。这些附有插图的书对许多英国建筑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拉弟奥的样式成了许多乡村宅邸和公共建筑的风格。以这种风格建造的教堂包括格林威治的圣阿尔费奇教堂、布卢姆斯伯里的圣乔治教堂、斯皮托菲尔德的基督教堂、东部圣乔治教堂、莱姆豪斯的圣安妮教堂以及伍尔诺斯的圣玛丽教堂等。这些教堂都是由霍克斯穆尔设计的。詹姆斯·吉布斯设计了圣马丁教堂和圣马利-勒-斯特兰德教堂；约翰·詹姆斯设计了汉诺威广场

的圣乔治教堂；老乔治·丹斯设计了肖拉迪奇教堂。牛津和剑桥的新建筑也是按帕拉第奥的式样建造的。詹姆斯·吉布斯设计了牛津的拉德克利夫财政学院和剑桥的评议会堂。英国风格的特点之一是取消了一切多余的细节，甚至正面的雕塑也全废除了。随着英国建筑师们越来越熟悉这种风格，他们也就能够摒弃16世纪意大利建筑大师们那种严谨的结构和精确的细节。到1760年，英国古典主义的式样日趋成熟。1756年罗伯特·泰勒爵士设计的伦敦林肯法律协会石楼的正面，或者1748年和1750年弗利特克罗夫特和韦尔设计的沃本公园和罗瑟姆公园的大门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威廉·钱伯斯爵士（1795年卒）早期设计的建筑中，或者后来约克郡的约翰·卡尔（1807年卒）设计的建筑物中，都有这种风格的明显迹象。这种风格很自然地导致与亚当（1792年卒）的名字相关联的新古典主义，但是即使早在18世纪40年代当罗马和希腊的影响似乎还在英国占优势时，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对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兴趣又在恢复。

1715年，勃朗·威利斯写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郡、市、区史》一书，此时人们在建筑上追求浪漫主义的中世纪情趣的倾向变得十分明显。1731年创办的《绅士杂志》发展了这种倾向，因为从此乡绅和文物家有了一本刊登有关中世纪历史资料的期刊。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建筑师，包括伊萨克·韦尔和巴蒂·兰利，都在他们的设计中引进了哥特式建筑的特点。两本阐述法国文物家贝尔纳·蒙福松搜集的关于法国王室和教会文物资料的书籍被译成英文于1750年在伦敦出版，书中附有许多插图。从这部精美的著作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它很可能影响到英国的收藏家。到霍勒斯·沃波尔在斯特劳伯里山建造的小别墅上垒筑起有雉碟的胸墙后，公众对哥特式建筑的兴趣就更为增加了。

在18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对哥特式建筑的兴趣和对古典主义品质的欣赏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就英国和法国建筑对北欧趣味的影响而言，那么它是完全倾向于古典主义。1745年根据诺贝尔斯多夫的设计在波茨坦建造的平房式的莫愁宫，明显地受到法国洛可可建筑风格的启发，而内部则仿效布弗朗的手法。在奥地利，菲舍尔·冯·埃拉赫（1738年卒）把法国式的图案和根据意大利巴洛克风格而形成的其他各种图案糅合在一起。在德国，保罗·德克尔（1713年卒）被人称为是德国的勒波特^[1]，他的伟大的“民用建筑”使法国的

设计风靡一时。1710年以后，德国盛行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主要归功于德克尔。在这种巴洛克风格的翻版方面，最成功的一例可能就是乔治·巴赫尔在1726年至1734年间设计的德累斯顿的弗劳恩基希。法国的洛可可风格传播到了波兰，华沙的精美的瓦津基宫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例子。在俄国，法国的影响和意大利的影响交替着对彼得大帝以后所建造的广大宫殿和公共建筑物起着作用；在彼得统治时期，泽姆佐夫（1720年卒）和勒布隆（1714年卒）的设计都表现出法国的影响。在叶利扎维塔女皇统治时期，意大利的影响占优势，“皇村”就是1752年由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拉斯特雷利（1770年卒）设计的，他在1754年建造冬宫，因而成为艺术学院的教授。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许多伟大的建筑物都表现出受到法国风尚的影响，甚至还受到英国风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由苏格兰人卡梅伦（1812年卒）设计的那些建筑物。

西北欧，特别是英国，18世纪在建筑方面的独特成就之一，是把一组组房屋布置成广场、街道、里弄和新月形的街区，这种布局赋予伦敦和巴斯这样一些城市一种特殊的魅力。英尼戈·琼斯在17世纪初就把房屋作为城市整体中的一部分来设计。琼斯在巴黎的皇家广场或孚日广场设计的启发下（1604年），设计了科文特加登广场，后来便成了伦敦一般广场的模式。随着伦敦在18世纪向北和向西的发展，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一座座个别的住宅组成了整齐街道和广场。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贵族或有产者也住在这样的街坊房屋里，而法国的贵族却住得宽敞得多，他们住在独门独户的大宅第里，那里有花园，还有与街道隔离的大庭园，楼梯宽大豪华，宅第有一套套房间。英法城市房屋的不同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英国的贵族到城里来只是作短暂的逗留，如出席议会、处理事务或让妻子和女儿到宫廷参加社交活动，而法国的贵族却把巴黎（如果不是凡尔赛本身的话）作为他们长久居住之地。社会习惯的不同反映在住宅建筑上的不同，英国在18世纪兴建或改建的乡间住宅十分宏伟豪华，而法国在这个时期建造邸宅的数量就微不足道了。

正如18世纪新建的广场和街坊给西欧的建筑提供了极为独特和成功的范例一样，城市生活，尤其是伦敦和巴黎的生活，也提供了一种气氛，鼓励当时的文学产生具有最独特风格的作品。1657年，伦敦的

第一家咖啡馆被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但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已发展到3000多家咖啡馆。1732年伯克利对这些咖啡馆在社会上的作用，作了一番冷嘲热讽的描述：

我敢说，一个按现代方式教养起来的14岁的孩子，在任何社交场合，要比长期待在学校或大学里的24岁的小伙子，更露头角、受人尊重。他的谈吐比较文雅，举止比较端庄，也一定会更为鉴赏行家所喜欢。“那么他在哪里得到这些教养的呢？”“他是在我们严肃的祖先绝对不会去寻觅的地方得来的，是在客厅、咖啡馆、茶室、酒菜馆或小酒店里得到的。在这些或其他类似的时髦的消闲场所，温文尔雅的人惯常对于宗教、道德和政治等一切问题自由自在地发表议论。”[\[2\]](#)

据蒲柏说，艾迪生每天在巴顿的小酒店里消磨五六个小时，而蒲柏自己在少年时代经常去威尔斯小酒店瞧一瞧德莱顿。1764年，约翰逊和雷诺兹创建的“俱乐部”就在这样的一家小酒店里集会。

到了18世纪初，以咖啡馆为象征的那个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读者大众，正是这些读者大众使文学有可能在世界上取得空前的、独特的发展。1695年，英国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在此之前15年的政治争论在伦敦的中产阶级读者中养成了一种阅读小册子的习惯。1688年至1694年间出现了三十多种新的报纸杂志；随着检查制度最后的取消，报纸也大批涌现。早在1691年，邓顿曾试办一种只刊登非政治性题材文章的报纸，他把这份报纸叫作《雅典人报》。1704年，笛福仿效邓顿，办了一份包含文学专栏的《评论》周刊。在《评论》出版了9个月的时候，一位诺里奇的绅士这样写道：“我在诺里奇的一家主要咖啡馆里向几位绅士念了这份报纸……在那里，常常报纸一出版我们就把它拿到手，大家认为这是供我们消遣的最高雅的一份报纸。开始我很难说服店老板接受这份报纸，现在他发现我对他的劝说是对的，因为找不到比它更受欢迎的报纸了。”[\[3\]](#)1707年以来一直担任官方的《伦敦公报》编辑的理查德·斯梯尔在1708年创办了《闲谈者》，这份期刊比之《评论》周刊更少注意政治新闻。出了83期之后，《闲谈者》完全不涉及政治。1711年，原先与斯梯尔合办《闲谈者》的艾迪生这时又和他办起了更为雄心勃勃的《旁观者》。这份周报后来成为一份日报。日报编辑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明确宣布该报将不涉及任何政治。“正如本报不登载一则新闻，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和党派之见一样，它也不论及时髦的无信仰思想，不使用淫猥的字眼，不讽刺神职、婚姻以及其他常为人们取笑的话题，不报道隐私丑闻或任何有损

于个人、家庭或社团声名的事。”^[4]艾迪生的大胆试验本可能遭到惨败，但是事实上它却证明是18世纪文坛上最成功的创举之一，因为他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以往的作家们未予重视的读者大众。艾迪生在宫廷贵族、党魁政客、神职人员以及名流学者之外，在英国各地的许多不同社会阶层中找到了广大的读者。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这可以从那个据说为《旁观者》撰稿的著名俱乐部的成员情况中猜想而知。^[5]罗杰·德·科弗利爵士是该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他是伍斯特郡人，有时来伦敦。另一名成员是一位律师，但他对戏剧的兴趣甚过于法律。安德鲁·弗里波特爵士对商业和贸易十分感兴趣。森特里上尉则是一名退休的陆军军官。代表教会的是一名“学识渊博、生活圣洁和有非常良好教养”的牧师。威尔·霍尼库姆一直追求时髦风雅，他撰写的稿子可想而知特别吸引贵妇淑女。艾迪生想方设法来吸引这些女子的兴趣，他宣称他要尽一切努力使更多的人生活更高雅，谈吐更脱凡，要使妇女活动的场所不只是梳妆室，她们的主要事业也不只是梳理自己的头发。

这种新的新闻业的突出优点是在处理当代生活时十分自然。对当代社会及众所熟悉的人物进行机智和深入的观察是40年前在法国产生的那个伟大文学的奥秘所在。1665年首次出版的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德塞维涅夫人的信札、拉封丹的《寓言》、1659年以后莫里哀写的喜剧，乃至1664年至1691年间拉辛写的几出伟大的悲剧，尽管是采用古典历史或圣经历史来处理主题，但所描写的人物，其思想和语言却与罗浮宫、圣日耳曼宫和凡尔赛宫所表达的思想和语言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法国和英国，没有作家充分意识到他们描述当代生活的这一突出优点。正如建筑师们努力模仿罗马古典主义的成就一样，文学家们也像他们在16世纪那样，对荷马·维吉尔和其他希腊和罗马作家的杰作赞叹不已。1674年，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一书中表达了这种对古代的崇敬。他把荷马、维吉尔和贺拉斯树为文体大师，并断言他们最完美地表达了永恒的真理，堪称后世的楷模。

众所周知，这种文学观点早在1687年就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当时，佩罗在他的诗作《路易大帝的世纪》中就声称17世纪的一些艺术作品无愧于佩里克利斯时代或奥古斯都时代。褒贬古今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像丰特奈尔和费奈隆这样一些人拥护现代新文学，但实际上古典文学却是绅士们的教育根基，不管他们是在伊顿公学还是在路易

大帝学院求学。1694年，法兰西学院编纂的词典就偏爱传统的古典语言。卢梭等诗人写的颂歌就是按布瓦洛确立的古典主义原则创作的。到1725年时，蒲柏因翻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发了财。即令如此，绝不要误认为18世纪初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仅仅在于模仿古希腊的文学。蒲柏描写的阿伽门农戴的是底部张开的假发，表达的也是一个受到理智和自然思想熏陶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很可能在威尔斯的咖啡馆里或特威克纳姆露天饮食店中听到。

绅士们也许会订购一本《荷马史诗》的新译本，但是其他种类的诗歌却为人们更热心地阅读着。无论在英国或法国，18世纪上半叶写的诗篇，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诵读和研讨这些诗歌的社会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英国，朗诵新作品的最通常的场合是咖啡馆或俱乐部，而这些地方的气氛与田园诗歌是格格不入的。在法国，聚会通常是在沙龙里举行的，而那里同样不适宜于诵读田园诗。在英国和法国，最受人推崇的诗是讽刺诗。蒲柏的《夺发记》和《群愚史诗》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当时的社会喜欢读妙语横生、辞藻精巧的诗。在法国，伏尔泰的讽刺短诗同样受到人们的欣赏。

对讽刺诗的喜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英国和法国许多嘲笑和揭露社会时弊的散文作品如此脍炙人口。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对当时的法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正如1726年出版的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批评了当时的英国社会那样。18世纪初文学上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放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伏尔泰的《扎伊尔》，就发生在伊斯兰国土上，而《阿尔济勒》则是以秘鲁为背景。1704年加兰德翻译了《天方夜谭》，土耳其人、中国人、波斯人，甚至成吉思汗都在法国书店里露了面。英国的笛福因1719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而闻名遐迩。有人认为读者之所以欢迎这些有关世界遥远的异国他乡的书是出于对海外扩张的兴趣。当时在伦敦和英国其他一些港口处处可以感觉到这种向外扩张的兴趣。

当然，当时人们对于当时的世界以及对圣詹姆斯宫或圣奥诺雷街所表现的称为人性的东西也有着极大的兴趣。这里非常强调遵循常规。有人问《旁观者》杂志：一个人应具备哪些品质才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回答是：他必须有良好的教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格言被广泛地接受；但是，要遵循的常规主要是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的常规，而不是佩里克利斯时代的雅典或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的常规。读

者大众的思想态度在蒲柏的《人论》或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中表达得很清楚。虽然他们很珍视才智和对世界的学识，但是他们认为最基本的是人对自己理智的信心。这个时代的文学使人联想起自信。自然甚至高于古典文学，被人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标准。蒲柏认为诗人的工作是揭示自然，但是“自然是井然有序的”。蒲柏和他的同代人用这句话来说明，作家的工作就是尽力优美地、机智地反映18世纪的那种正常生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某些新的文学体裁。小品文本身即已表现出它是一种十分灵便和讨人喜欢的文学体裁，但是在艾迪生之后，小品文的不少清新特色失去了。诗歌虽然在蒲柏的笔下可以用来进行简练而锋利的讽刺，但它过于矫揉造作。戏剧在其他时代可以用作讽刺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当时的英国舞台毫无生气。在王政复辟时期之后，英国的喜剧往往非常低级下流，虽然有时颇为风趣俏皮。诚如雷文斯科夫特所说：“一个淫秽的剧本绝不会被认为枯燥无味。”^[6]另一人则说笑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听年轻的娘儿们说诨打诨，乱吐秽语”^[7]。事实上，这些剧本早已如此声名狼藉，1698年，一个反对向国王宣誓效忠的牧师杰里米·柯里尔遂写了一本书，题为《略论英国舞台上的不道德和亵渎》。这本书资料翔实、批驳中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因为这个批评来自一个极端的英国国教派的托利党人，对待他的意见，就不能像对待辉格党人或清教徒的意见那样，可以置之不理。剧作家们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柯里尔一一予以驳斥。在以后的10年里他发表了许多小册子，不断进行抨击，直至18世纪初剧作家们自愿地开始改革自己的写作。正如范布勒在《假朋友》一剧的序幕中说的那样：

为了博得你们的欢心，

我们服从你们的规章，

今天请你们观赏一出道德剧：

这般清白无邪，

我们怕反倒会糟蹋了剧本。^[8]

范布勒的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舞台变得比较规矩了，但失去了它的一些活力和魅力。到18世纪末谢里丹出现之前，英国的喜剧一直萎靡不振。尽管艾迪生做了很大努力，悲剧仍死气沉沉，刻

板僵化，拘泥于形式，被亚里士多德和布瓦洛铸造的锁链所束缚。法国的情况与此极为相似。在那里，戏剧与严肃的诗歌一样在社会上不甚受人欢迎，因为法国社会相信费奈隆的主张，认为艺术必须既真实又实用。当时在哲学和数学方面出现了种种新发现，而以牛顿的发现为顶峰。对这些发现怀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认为诗歌是儿戏并对悲剧百般挑剔，因为它“证明”不了任何事物。

巴黎社会的一部分人喜欢阅读散文作品，如伏尔泰的关于查理十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历史著作，或者像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那样严肃的书籍。但是在迅速扩大的读者中，有许多人，特别是英国的读者，并不同意费奈隆对文学的那种功利主义观点。这些读者要求从书中得到娱乐，同时又希望受到比《旁观者》或《绅士》等杂志上那些小品文更多的启示和更实在的东西。这部分读者大众的要求在1741年得到了满足。当时一个年过半百、普通的伦敦中产阶级印刷商塞缪尔·理查森写出了一本名叫《帕美勒》的小说。他写作的动机是向人们劝善，结果创作了一部艺术作品，震动了英国和法国的读者大众。1747年至1748年，理查森又出版了《克拉丽莎》，这是一部刻画人物的杰作。1753年至1754年，他写了《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当时正处于发展阶段。亨利·菲尔丁走上了理查森指明的道路。早在1742年，他就出版了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接着写了3卷《杂集》。1749年，他的《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问世了。这本小说至今被公认为英国第一部具有艺术三一律的小说。斯摩莱特的小说《蓝登传》在1748年出版。这是一部按笛福的创作方法写的冒险小说，但是斯摩莱特赋予了这种形式以新的活力和一致性。1751年出版了他的《皮克尔传》。所有斯摩莱特的小说都是对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亨佛利·克林克》表明他是一位成熟的幽默家。18世纪中叶英国小说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尤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对下层阶级生活的日益浓厚的兴趣，而正是这种兴趣促使贺加斯从伦敦的人行道上吸取了许多题材，而且也引导约翰·盖依在他的《乞丐的歌剧》的脚本中描述的都是些强盗、窃贼、狱卒和妓女等下层人物。对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描绘和考察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小说为这种活动提供了最好的表现手段。

小说在法国也得到了发展。英国小说家们所取得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法国的这种趋势，因为当时法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不仅法国的作家唯英国作家们的马首是瞻，而且英国的科学和政治制度也在法国备受推崇。然而，在理查森、菲尔丁和斯摩莱特取得成功之前，在法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小说。1698年，费奈隆出版了他的哲理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勒萨日早在1709年就写过叫作《杜卡莱先生》的剧本，讲述一个靠个人奋斗而发迹的人。到了1735年，他写了一部流浪汉的历险小说《吉尔·布拉斯》，虽然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实际上显然描绘的是巴黎的现实。在1736年至1741年期间，马里沃转向写自然主义的和当代的题材，创作了《玛丽安娜的生活》，以其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著称，而作者是以模仿荷马的诗文开始文学生涯的。1731年，普雷沃写了《曼侬·莱斯科》。这本小说在不少地方与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很相似，而且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德国、丹麦和荷兰的小说发展产生了影响。普雷沃还翻译了《克拉丽莎》，扩大了英国小说在法国的影响。据说《克拉丽莎》启发了让·雅克·卢梭，他在1756年写了《新爱洛依丝》。虽然卢梭1762年才访问英国，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像笛福和理查森这样一些英国作家的天才。在勒萨日、普雷沃、马里沃和卢梭等人取得成功之后，许多作家纷纷仿效这些公认的大师，结果虚构小说倍增。

假如将理查森、普雷沃和卢梭的小说与《旁观者》杂志上的文章或者蒲柏的讽刺诗，甚至伏尔泰的故事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说更富有情感。甚至当孟德斯鸠在1721年写《波斯人信札》以表明有可能把严肃的观察和机智结合起来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感情的重要性。在一个有教养的人身上“情感”很快变得跟理智一样重要。那些以富于哲学精神而自豪的才子淑女读到小说中动人情景时，也因为感情激动而动辄昏厥过去。英国在18世纪中叶之前就已经有迹象显示出对感情的强调。1726年，也就是在《群愚史诗》发表前两年，汤姆逊出版了他的诗作《冬天》。虽然这首诗里有不少说教的言辞。但汤姆逊相信诗不应该只靠道义，还应该用崇高的思想感情去激励读者。他关于崇高的观念以及崇高与恐惧的关系同伯克在《探索》（1756年）中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汤姆逊出生于苏格兰南部，而那里后来成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发源地，产生了阿伦·拉姆齐、詹姆斯·霍格以及华尔特·司各特爵士等诗人。对大自然的温情和崇敬是北方地区民歌传统的一部分，这个特点甚至在汤姆逊的早

期作品里已有了明显的表现。在《冬天》发表4年之后，汤姆逊发表了《四季》；紧接着之后，申斯通在1737年出版了第一部描写乡村生活的田园诗《女教师》。申斯通在诗中有意着力模仿斯宾塞，尤其是那种“特殊的温柔感情”，依他看来这正是斯宾塞一切作品的特点。巴特教授曾指出申斯通处理这座乡村女子学校的基调与40年后乔治·莫兰在绘画中描写农村景色的基调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9]在申斯通和汤姆逊写作的时候，韦斯利在1738年刚开始从事宗教改革。1742年，扬的《夜思》继续表现出摆脱讽刺和理智的倾向，朝着注重崇高和以情动人的方向发展，尽管他的诗有时过于简洁，甚至显得有些枯燥。1746年，沃顿出版了一卷颂诗。他在序言中说，“用诗来进行说教的做法早已过头了”，并正确地宣称诗人的主要才能应是“创造”和“想象”；1747年，柯林斯也出版了一卷颂诗。他的诗同样是对曾经满足了公众要求的“说教诗歌”和“道德文章”的一种背叛。这些作品清楚地表现了对于感情的兴趣日益增长，而感情恰好是小说家们作品的特点。1765年珀西编纂的《英诗辑古》的出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珀西在这本集子出版之前写信给沃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读者“要求产生诗歌的新品种来刺激一下感到腻烦了的胃口”。正如以《新爱洛依丝》为杰出代表的小说被哈兹里特视为浪漫主义感情的精华一样，华兹华斯认为珀西细心搜集的民谣“确确实实拯救了”英国的诗歌。现在很清楚，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早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在英国和法国发生影响了。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也明显地有了与其他艺术领域相类似的发展，那就是对古典主义的崇拜，并逐步创造出一些完全是当代的和自然的作品，这些又转化为浪漫主义。正如在其他艺术领域里一样，绘画和雕塑也继承了希腊和罗马的传统。18世纪初的许多画家仍记得尼古拉·普桑（1594—1665年）的“学院派”风格和克劳德·洛林（1600—1682年）梦境一般的优美的风景画。他们依然赞赏卡拉齐兄弟一直追求的那种“古典美”，准备绘制像鲁宾斯（1577—1640年）吸取灵感的那些神话中的景象，但是它们都带有一种学院式的、传统的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使人想起雷尼（1575—1642年）。

在绘画方面，从这种相当拘泥于形式的古典主义发展起来的一个变化是趋向巴洛克式的狂放与激情。意大利的高利（1639—1709年）在天花板上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圣徒和天使，给观众一种仰首遥望苍

穹上的天堂的感觉。这样的天花板在欧洲各地的许多宫殿和贵族的宅邸里到处可见。不仅天花板用神话组画来装饰，而且在巨大的墙壁上也画满了大幅的图画，把大厅和宴会厅的墙壁变成吸引观众的华丽辉煌的画展。一直到1757年威尼斯人提埃坡罗（1696—1770年）还在画像《克娄巴特拉的宴会》这样的装饰性壁画。

在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对画家们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产生了一些具有巨大魅力的作品。这种新风格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勒布伦（1619—1690年）逝世的年代，当时艺术家和他们的保护人都发生了变化。以神话寓言为主题的做法被更优雅并较少受传统束缚的大胆构思所取代。在这种画里，那些穿戴入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物活动在色彩柔和的画面上，而其背景多数是以法国的山水为根据的风光景色。华托（1684—1721年）是这种新流派的先导，他是一个幻想家。他在处理神话故事时，尽可能采用轻松的手法。在装饰性的画面上，他有时画上穿着人的服装的猴子。尽管他把乡村生活理想化，把他的“欢乐节日”变成幻想，他对自然的观察却非常仔细。他的牧羊人和牧羊女可以穿起缎子衣服，整日无所事事，只是跳小步舞，但是他画的缎子衣服却十分逼真，同时人物充满了生机，与勒布朗作品中那种因循守旧的气味截然不同。朗克雷（1690—1743年）和帕泰尔（1695—1736年）紧随华托。虽然夸佩尔、安托万、诺埃尔和尼古拉的作品表明勒布朗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时期绘画的突出特点是细致、欢快乃至有些浮华。布歇（1702—1770年）准确地抓住了公众的趣味。他的神话组画缺乏严肃性，他画的乡村景色只是为那些穿着异样的服装的人物提供一个欢快的背景。他的风格是妖娆妩媚，色彩绚丽。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的肖像画也反映了这种华而不实、追求高雅的特点。尼古拉·德·拉日利埃热衷于让他的模特儿穿上演员的服装。纳蒂埃（1766年卒）把法国的昂里埃特画成神话中的花神，给予托克（1772年卒）和让·巴蒂斯特·范·洛（1745年卒）不少启示。康坦·德拉图尔（1778年卒）再次使法国对优美轻快的彩粉画发生了兴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喜欢描绘伦理道德题材的画，而反对优雅的风光画。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格勒兹（1725—1805年）创作的，但是他的画仍然很高雅，而且有点理想化，与弗拉戈纳尔（1732—1806年）的画很相似。弗拉戈纳尔把这个时期洛可可式的高雅与后一个时期轻浮纵欲的情感联结在一起。

法国的雕塑比之绘画或其他装饰艺术更尊重学术传统。布沙东1739年在格勒内尔街塑造的著名喷泉是当时在雕塑方面流行的那种质朴风格的典范。法尔康涅（1766年卒）为圣彼得堡塑造的彼得大帝铜像也表明了古典主义的复活。虽然法尔康涅在塑造其他一些半身像时竭力雕塑得逼真些，但是在雕塑上的倾向是向回归古典主义的简朴方向发展。

在英国，绘画方面的传统却不像在法国或意大利那么注重形式和崇尚古典主义。范·戴克（1599—1641年）、彼得·莱利爵士（1680年卒）以及戈弗雷·内勒爵士（1723年卒）所画的人像都表明了荷兰派的影响。这一派在表现不同材料方面发展了艺术的鉴赏力。范·戴克曾是鲁宾斯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描绘出丝绸、呢绒、花边或人的皮肉等的质地或肌理，以及在英国一直持有的对技巧高超、格调优雅的肖像画的兴趣。有教养的英国人十分欣赏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杰作。克劳德的绘画诱使许多英国人把他们的公园改造成为景色宜人的园林。乔舒亚·雷诺兹爵士（1723—1792年）曾去过意大利，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努力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们的素描和着色的技艺。雷诺兹虽然持有这种理论，但他自己的画却画得异常清新和自然，盖恩斯巴勒（1727—1788年）的作品甚至更为自然，毫无学院气。他对直接描绘大自然的兴趣以及他不愿把他看到的现实加以理想化或按习俗格式化的态度，使人想起17世纪初的卡拉瓦乔、17世纪荷兰画家弗美尔和弗朗士·哈尔斯，或许还有17世纪的委拉斯开兹。

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作画，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情景，这一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三个人的作品中。他们是英国的贺加斯（1697—1764年），法国的夏尔丹（1699—1779年）和荷兰的科内利斯·特罗斯特（1697—1750年）。贺加斯突破了典雅的、贵族式肖像画的传统，而运用画来叙述一个故事，并通常表达一个道德寓意。这些旨在宣扬罪恶结果的画引起了那些要求艺术应有所用的英国公众的兴趣。他的版画特别受人欢迎，但是贺加斯远非只是一个道德学家。他也画伦敦的街头景色，画各式各样的人物，从冷漠无情地观看伦敦疯人院里疯子的贵妇人到醉倒在伦敦小酒店胡同里的可怜的妓女。他的肖像画《捞虾的女孩》和《法官韦尔奇先生》同普桑派或提埃坡罗派的那些典雅的、学究式的肖像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贺加斯一样，夏尔丹致力

于画日常的生活景像和普通人物。他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受益于雅·斯滕，或许从弗美尔那里得益尤甚。科内利斯·特罗斯特把华托的某些幻想和贺加斯敏锐的观察力与坚定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一些画像贺加斯的作品一样，也是组画。譬如有这么一组画，描述的是在一个欢乐的傍晚所发生的一系列活动。开始是描写一伙表情沉静的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凯岑河或者赫伦河畔的一座贵族府邸里，在烛光下抽着陶瓷烟斗，旁边的仆人正在打开一瓶瓶酒。这幅画的标题是“Nemo loquebatur”，而最后一幅画的标题是“Ibant qui poterant, qui non potuerunt cedere”。这些画可与贺加斯的《时髦婚姻》相媲美。他根据荷兰喜剧中的一些场景画的插图是对荷兰的风土人情、服饰、家具和人物极好的记录。

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为数不多的艺术评论家们未能领会他们时代的独特之处。跟他们相关的问题，如同跟18世纪初建筑家和艺术家相关的问题一样，不是去探索美的哲学本质，而是去改善和提高审美力。他们的成就表现在宫廷中，也表现在县城和省城建筑物的外表上，在贵族的舞厅和客厅里可以看到，也可以在上层和中层资产阶级的小型宅邸里见到。每个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都竭力要表达为公众所接受的、也是与流行的式样相一致的美的原则。如果民族倾向确定某些形式，如果习俗要求保留这些形式，那么艺术家只能设法与之取得一致，别无其他选择。得到统治阶级信任的艺术家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鉴赏力的问题。1713年艾迪生在《旁观者》杂志上发表了11篇论“想象的乐趣”的文章。其中第四篇文章对大自然的作品与艺术作品进行了比较；第五篇文章论述建筑；第六篇论述塑像、绘画和音乐。英国画家理查森企图对绘画进行分析，阐述构思与构图的理论。他的观点受到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重视。1753年贺加斯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的分析》，但是把它同弗雷斯诺或罗歇·德皮尔论绘画的著作相比，就显得很单薄。1757年，达朗贝尔在科学院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谈谈哲学在与审美有关事物的应用和滥用”，这篇演说是18世纪美学态度的一个实例。他在演说中说：“审美力虽非一般占有之物，但是它也绝不是一个任意的东西。”他还对审美力下了一个定义，称它为“鉴别艺术作品的的能力，即用以在能感受细致思想感情的心灵中激起欢乐或憎厌的种种品质”。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亚历山大·杰勒德也都对审美力做过论述，但都没有多大价值。

总的来说，当时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出版得不多，反之，当时倾向于出版一些带有简短解释性文字的画册。这些涉及建筑、装饰和绘画的画册对于形成审美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1686年出版了《绅士的闲情逸致》。1710年出版了新的版本，分成三部分并配以插图，该书成了乡村绅士的参考书。一般来说，对古典主义的东西有偏好，但也有一些关于当代作品的介绍。菲舍尔·冯·埃拉赫为维也纳宫殿所做的设计以及德国的保罗·德卡尔的设计对于英国的审美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710年，丹尼尔·马罗出版了一卷有260张装饰设计的集子。德卡尔的设计与马罗的图案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基本上是法国式的，来源于凡尔赛流派。它们对于伯灵顿勋爵的追随者，尤其对威廉·肯特、亨利·弗利克劳夫特以及艾萨克·韦尔有相当大的影响。德卡尔的《民用建筑》一书对于罗伯特·沃波尔的审美观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当时沃波尔正在修建诺福克的霍顿大会堂。

从1700年起对附有插图的建筑书籍的要求不断增大。英国开始把法国的书翻译过来，还出版了一些袖珍指南。例如，格林威治的约翰·詹姆士翻译了一本关于园艺的书，附有范德古特的插图。然而当时最精美的建筑书是1728年詹姆士·吉布斯出版的。这本书里的插图决定了美洲殖民地许多建筑物的特色。1701年，J. 基普出版的《不列颠插图集》显示了英国乡村大庄园建筑的雄伟豪华。1724年基普还出版了《大布列塔尼的新剧院》。这些图画使人们看到了以英格兰和苏格兰景色为背景的城市、王宫、海港和大教堂。法国的建筑师们第一次了解到英国建筑的华丽雄伟的风格。与此同时，供建筑工匠们使用的手册继续大量出版。科林·坎贝尔的《不列颠的维特鲁维乌斯》提供了许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的图样。后来，约翰·沃尔夫和詹姆士·甘顿把它编辑成丛书。最多产的建筑师作家是艾萨克·韦尔。他的主要作品是1755年以对开本形式出版的《建筑大全》。更重要的著作是1759年威廉·钱伯斯爵士写的《论民用建筑》。在此之前，钱伯斯曾在1757年出版过一本介绍中国建筑、家具、服装等样式的书。看来钱伯斯并没有打算要人们重视他的关于中国艺术的论文。至于他论述民用建筑的论文。显然钱伯斯企图把古典建筑的基本原则与文艺复兴后的思想一致起来。他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伦敦萨默塞特大厦完美的构图和细节中。从1710年到1760年，英国出版的关于建筑方面的书涉及了帕拉第奥形式的各种模样。帕拉第奥形式被认为是英国审美观的一部分。这个时期不仅是一个建立在传统之上的充满理想的时期，而且人

们看出古典的古老风格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就导致建筑师们对罗马遗址以后又对雅典遗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与英国相比，法国出版关于装饰艺术的画册数量要更多。其目的是想扩大设计者的视野，改变现存的风格。插图成了有关建筑、装饰、手工艺等方面权威性著作的主要部分。在艺术领域中，没有比在巴黎大量出版了提供建筑物的实际构图和细节的书籍这件事更为吸引人或鼓舞人的了。这些书不仅非常精美，而且内中的雕版质量极高。在戎巴尔出版的那一套插图里，作者运用了这样一种方法来说明建筑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建筑师和工匠们很容易模仿这些设计。房屋和公寓住宅的设计以及由于社会变化而采用的较为轻巧的装饰形式成了1720年至1760年期间法国出版的全部重要的建筑学书籍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后建筑风格的代表人物是雅克-弗朗索瓦·布隆代尔（1705—1779年）。他在早年曾跟随其叔父让-弗朗索瓦·布隆代尔从事雕刻。他把让·马罗未写完的题为《法国的建筑》一书完成了，全书共8卷。另一部重要著作是1738年出版、达维勒编辑的《家庭》，书里有布隆代尔雕刻的许多图画。布隆代尔最伟大的著作，也是对文艺复兴后的建筑具有持久影响的作品，是在1771年至1777年期间在巴黎出版的。布隆代尔的说明仅限于描述插图上的每座建筑物。

朱塞佩·比比恩纳^[10]和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标新立异的意大利建筑图案的出版，正好符合了社会上对建筑图案的要求。这两位艺术家都具有创造性的技能，他们创作的一系列雕刻画和蚀刻画就显示了这种才能。以往在17世纪，风景画家克洛德·洛兰和尼古拉·普桑在画中描绘了古代庙宇的遗址，使这些景色流传于世。但是正是克洛德风景画的影响决定了英国风景画的性质。此后，吉勒索尔菲和潘尼尼在克洛德构图的启发下，继承了这种绘画艺术的形式。它又导致意大利的制图人在设计中表现出与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成分相结合的古典式的绘画特色，从而产生了文艺复兴后这一时期的那个富有生命力的系统。在比比恩纳和尤瓦拉的构图中保存了固有的形式，它们又引起新的主题。文艺复兴后建筑在各个方面的扩张是十分迅猛的。皮拉内西作为一个古典主义构图家的杰出才能可以归因于鼓励标新立异的精神。皮拉内西更为重要的版画是在1748年至1765年期间出版的，其中包括《建筑艺术精品选集》和《古罗马人》两幅版画。皮拉内西的蚀刻画在建筑师、装饰师及家具设计师中有广泛的影响。在

威廉·钱伯斯、罗伯特·亚当、罗伯特·迈尔恩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中都能看到这种影响。也可以在当时大理石壁炉的设计以及在奇彭代尔设计和制作的某些家具中找见这种影响。皮拉内西这位意大利制图家的多才多艺、鉴赏力以及作为一个图案装配者的娴熟技能都是十分杰出的，而他的工作效率和承受繁重工作的能力也是令人钦佩的。正是从他这里许多欧洲的建筑师获得了他们的古典主义艺术要素的思想，而他们把这些要素应用于当代的设计。

法国路易十五时代那种色彩艳丽、格调优雅的绘画之所以受到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像格拉夫洛、埃森和莫罗·勒让这样一些雕刻师，他们复制了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埃森因他的装饰设计而闻名遐迩，他尤其擅长于处理洛可可框边和月桂树叶花边。一种装饰风格向许多方向发展，它既适用于家具和银餐具，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如装饰整个建筑物。各种手工艺匠人、铁匠以及雕刻工都采用了这个在恰当的时机发展起来的新风格。这种风格的内在情趣表现出其品质具有魅力，这是典型的法国品质。这种风格在英国和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各地风靡一时，它活泼可爱的魅力，如同它的纤巧细腻一样，吸引了条顿人和斯拉夫人。

插图终于解决了古典主义设计中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得以普遍理解。然而，在建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样有力地运用到绘画和雕塑上去。参观画展比之阅读书本上的说明或观摩插图更为重要。出外游览参观不仅对于艺术家的保护人，而且对于艺术家们本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在18世纪，作为进一步调查研究的最初步骤，自然先要去罗马参观。意大利与古典主义古代作品的影响在欧洲各地的王宫和贵族的府邸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英国的圣詹姆士宫、汉普顿宫和肯辛顿宫都成了重要的艺术中心，那里有意大利艺术家们的许多作品。法国的凡尔赛宫也是如此。西班牙的皇家玻璃厂，荷兰的埃特洛古堡，德国的夏洛滕堡、波茨坦和宁芬堡以及奥地利的申布伦府邸都是这种情况。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宫和德罗特宁霍姆宫，波兰的瓦津基宫，俄国的彼得霍夫宫、沙皇村和巴甫洛夫宫也都表现出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影响。在意大利，晚至1752年至1774年间建造的雄伟的卡塞塔宫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但是，在18世纪，不仅到处可看到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各种巨大建筑物，同时具有独特样式的城市广场和街巷也不断出现。广场和新月状

街巷，贺加斯、夏尔丹和特鲁斯特的现实主义绘画，《旁观者》的新闻写作，以及理查森和普雷沃的小说，这种种都是18世纪特有的天才创作。它们告诉人们，城市中产阶级已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姚乃强 译）

[1] 勒波特为17世纪的法国建筑师，以富有想象力而又切实可行的建筑设计著称。——译者注

[2] 乔治·伯克利：《阿尔奇弗龙，或渺小的哲学家》（1732年）。引自A. A. 卢斯和T. E. 杰塞普编《乔治·伯克利文集》（1950年），第3卷，第48页。

[3] 引自A. 贝尔杰姆《18世纪的文人和英国公众》（1948年），第259页注。

[4] 《旁观者》，第262期。关于报纸和文学期刊的出现经过，参阅A. 贝尔杰姆《18世纪的文人和英国公众》（1948年）。

[5] 《旁观者》第2期中介绍了俱乐部成员的情况。

[6] E. 雷文斯科夫特：《“多布森太太”序》（1684年）。

[7] 引自《一个被剧作家们拒绝的粗劣的序幕》（1682年），据说系T. 沙德韦尔所作。年轻的姑娘常常被要求引人注目地朗诵一些下流的收场白。

[8] J. 范布勒：《假朋友》（1702年）。

[9] J. 巴特：《奥古斯都时代》（1950年），第101页。

[10] 对开本设计卷题名为《建筑学与透视法》（维也纳，1740年）。

第五章 启蒙运动

18世纪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时代，不过在17世纪结束之前，启蒙运动武库中的各般武器，其原型都已发明并且试验过了。保罗·哈泽德在谈到17世纪的新思想时曾这样写道：“这种新思想几乎在整个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做了全面、紧迫、充分的准备。”

[\[1\]](#)这个伟大的思想斗争在1715年以前，甚至在1700年以前就已经在进行。

宗教是正统思想的主要堡垒。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在1715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对宗教发起进攻的宏伟战略。少数极端分子，如安东尼·柯林斯等人，走得比自然神论更远，对宗教持全盘否定态度；但是英国教会中担任神职的开明之士则表示愿意接受理性的宗教，因而在英国关于自然神论的争论，由于没有对立面，便悄然偃旗息鼓。与此同时，英国自然神论与自由思想的著作开始传入法国，并在那里获得了新生。尽管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作家在处理宗教主题时持谨慎态度，然而在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都隐藏着比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作家更为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自然神论随着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著作的问世而在法国公开出现。它跟神学已断绝联系，而成为一种松散的公式，只是作为一种为维护政治和道义的约束力，以及对无神论的攻击的一种辩护而保存下来。自然神论提供了一种手段，把社会对宗教的需要与理性的要求两者的共识协调起来。自然神论在英法两国取得胜利后，很快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知识阶层中去。不久，又由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美洲的公众中广泛地传播开来。尽管自然神论传播开来了，可是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它在18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和意义。在英国它成了一汪死水；在欧洲，法国除外，它在正统的泥沼里只是一支涓涓细流，逐渐消失；在法国，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注入法国怀疑论主流中的一个支流。它把水搅浑了，但是并没有扭转不信仰宗教的潮流。这个潮流在17世纪已经开凿出了一条虽然比较狭窄但却比较深邃的渠道。

狄德罗说过：我们的同时代人是生活在路易十四的时代的；而这些早期的怀疑论的鼻祖的影响，已经总结在贝尔的著作中。在他的18世纪的追随者中，首先自然要提到被莫尔内称为“幕后策士”的那些人。^[2]他们的著作在当时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多达102篇不同的论著。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本堂神父梅斯里尔的《圣约书》。该书避开自然神论反对造物主本身的论点，而着力揭露造物主容忍的人世间的罪恶。在被公认的和出版的著作中，没有一位作者超过孟德斯鸠笔下那些到法国来的波斯人的敏锐观察，也没有超过布拉维利尔在《穆罕默德传》一书中表达的那种纯朴无邪的惊奇。《穆罕默德传》是在作者死后于1730年出版的。在书中，作者对一个虚假的宗教竟然能产生如此了不起的结果，感到震惊不已。

18世纪中叶标志着这个准备阶段的结束。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和《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图森的《道德论》，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布丰的《自然史》等著作对正统思想提出了公开的或稍加掩饰的挑战。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问世。其中在直接论述宗教问题的条目中，对正统思想还虚与委蛇，而狄德罗在《斯泰基的羔羊》或《悬音报警》这样一些平淡无味的标题下隐藏了无宗教信仰的思想。教会对于跟詹森派的争论比之对于来自无宗教信仰的危险更为关注，因而一开始对于这些著作并不感到惊慌。他们对无宗教信仰思想发展的认识是突如其来的，1751年普拉德神父向巴黎大学的索邦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主考人一致接受了它。这篇论文对感觉心理学和自然宗教的理论做了一个简明的阐述，同时彻底否定了《新约》中关于奇迹的意义。于是，教会和大学对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发起了攻击；普拉德受到了审查，同时对他论文的赞同也被撤销了。这一事件暴露了异端思想已经悄悄渗透到宗教思想中来了，而且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一事件也促使人们要采取为时已晚的更加严厉的审查制度。在压制的浪潮还未取得较大的进展之前，马尔塞布成为新闻出版总监。由于他的宽容厚道，加之蓬巴杜夫人的赞助，启蒙哲学家的宣传活动又恢复了，并且受到了非官方的、有时甚至官方的保护。在随之而来的10年中，爱尔维修、狄德罗、伏尔泰和霍尔巴赫等对基督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一些次要的作家也不断对之发射冷枪暗箭。在反对教权主义的强大浪潮支持下，这次进攻的火力特别集中在耶稣会会士身上，而且进攻的动机是出于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考虑。这次进攻的最崇高动机是出于

对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的残忍行为的愤恨。它明确的信条是信仰自由。同时，宗教的反对者们并没有想到要让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完全各行其是。人们，至少开明人士，开始认为宗教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是法国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传统是如此之强大，以致每一次大的思想革命都不把教会看成是巩固国家的力量。伏尔泰就说过：什么“民治和教治”纯属无稽之谈；应该说民治和教规，“民权不应该把任何一条这样的教规作为例外”。^[3]

类似的国家全能主义思想在英国也盛极一时。霍德利是英国教会中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鼓吹者。他是教会的一名主教。他批评教会提出的神权归圣职人员的要求，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而根据沃伯顿《联盟约》的基本篇章是“教会应运用其全部影响为国家效力；国家应支持和保护教会”^[4]。在德意志，反对教会的权利要求的主要来自兼任高级教士的各公国君主本身。他们迫切地要求摆脱罗马教会。在18世纪后期，特里尔大主教的副主教约翰·尼古拉·霍恩泰因用弗布朗尼乌斯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泄了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各公国对罗马教廷的不满，并把这个运动命名为弗布朗尼乌斯主义。这样，虽然全欧洲的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势力在节节败退，但是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可以注意到，自由思想的胜利只有在政治当局的帮助下才可取得；而且，伴随教会势力衰落而来的则是国家权力要求的扩大。

再者，宗教也没有为哲学所替代。18世纪大量发表的怀疑论著作，其中绝大部分只具有辉煌宣传的思想价值。所谓的“启蒙哲学家”是迄今存在的思想家中最不形而上学的一个学派。斯宾诺莎被公认为是他们中最富有魅力的人物。但是，这些启蒙哲学家并不企图挽救斯宾诺莎哲学的名声。斯宾诺莎因攻击正统思想而声名狼藉，而斯宾诺莎主义就成了批判《圣经》的同义词。伏尔泰尤为讲究实际，他不能容忍不从经验的事实出发并且由此得出对实际行动具有直接影响的结论的一切思想。他毫不同情那些撰写他称之为“心灵小说”的作家。孔狄亚克在其1749年出版的《体系论》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为《无用的抽象体系》，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攻击实为诉诸公众的常识，诉诸作为哲学真理标准的良知。它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代表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旧冲突的一个新阶段。跟以前的思想对照，所谓的“理性时代”诉诸自然，而自然的意思就是经验

的事实。它创立物理学以对抗形而上学，因为它相信每一个值得提问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现恰当的事实给予回答。宗教和形而上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成了新的福音。

科学史当然不是始于18世纪，科学思想取得最伟大进展的时代并不与启蒙运动的时代相一致。18世纪的成就之一与其说是取得了重要的新发现，还不如说是把已经发现的知识扩散到比以前更大的范围。那时，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而无须专家，就能弄懂科学技术，听懂对它们的解释。当然，数学领域中的一些比较高级的学科则是例外。在时髦的沙龙里就可以举行实验表演或听懂科学理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与科学家们交往密切。像伏尔泰这样的文人与像迪夏特莱夫人这样的社交界妇女都拥有私人的科学实验室，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做认真的贡献。文学报刊腾出越来越多的篇幅发表对科学著作的评论。布丰证明一本科学著作也可以是一本成功的文学作品。克里斯蒂安·沃尔弗把科学介绍给了德意志人民，第一次用科学家自己的语言来撰写科学题材的书。甚至大学也受到了当时思想运动的影响。在1702年至1750年之间，剑桥大学设立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几何学以及实验哲学的教授职位。当然，稀奇古怪的事物仍然存在；什么美人鱼、蛇怪以及种种奇迹在那些僭称的科学论文中津津乐道，招揽读者。但是即令出于神学的动机，它们还是有助于科学的普及。“大自然的奇迹证实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也是许多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的尝试中最成功的主题。普吕歇神父的《自然奇观》至少出了18版，被译成英、意、西、德等多种文字。

这些通俗读物或许只配称为科学典籍的经外书。新天道的先知是艾萨克·牛顿，他的天才使科学改观，使它从显然凭借随意的实验来解释事物的朦胧状态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可以理解的法则的理性学科。在英国，牛顿思想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另外，在法国，它却遭到了强大的抵抗。笛卡儿写的《旋风》刚刚征服了知识界，这就阻碍了人们迅速接受牛顿的思想。虽然牛顿的物理学提供了一个显然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证据，这是对自然神论的一种支持，也有助于使牛顿的思想为人所接受。丰特奈尔在路易十四统治之前就开始了反对迷信的斗争，到这时仅进行了一半，几乎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中叶，但他至死是一名坚定的笛卡儿哲学的信奉者。然而，莫佩尔蒂的影响，如同伏尔泰的影响，对牛顿的原理是十分有利的。到18世纪中叶，牛

顿的原理实际上已在法国取得完全的胜利。1737年，阿尔让在《良知哲学》的第一版里只是简单地提及牛顿，但是，1746年该书再版时，则说牛顿“掀起了一股引力狂澜”。牛顿的科学从英国和法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各地。安东尼奥·孔蒂在巴黎住了好多年，并到英国访问过牛顿。他把模拟牛顿实验的一些仪器带回了威尼斯和帕多瓦。1744年，经教皇准许，伽利略的《对话录》出版了，这标志着意大利科学精神的进步，尽管出版该书的条件是，把宗教法庭的判决书和伽利略的收回声明放在书前作为序言。1757年，宗教法庭决定不再禁止出版讲述地球运动的书籍。确实，牛顿大大推进了科学思想，需要有100年的时间来消化与吸收他的那些思想。在英国对牛顿的崇拜甚至可以说已经妨碍了数学思想的进展，致使在19世纪之前一直停滞不前，虽然皇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和詹姆斯·布拉德雷曾补充了重要的发现。在欧洲大陆，巴塞尔的伯努利家族和莱奥纳昂·欧拉，都灵的拉格朗日，以及法国的达朗贝尔等这样一些数学家对牛顿的原理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上的发展。

牛顿说明了自然的一致性，推动人们探索自然的规律，但是数学的抽象和理论的形式——不说其困难——就严格限制了可以在牛顿探索过的那个思想海洋中航行者的人数。18世纪真正的倾向是经验主义。伏尔泰越过牛顿把培根作为经验主义的创始人。因此，有一种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的倾向。布丰翻译了英国人黑尔斯写的《植物静力学》，在前言中宣布需要“不断地搜集实际的证据，并尽可能避免力求系统化的精神”。1749年，他在《自然史》一书的引言中说，数学的真理是定义的真理，因而是抽象的，而物理的真理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法国的科学家完全接受荷兰科学家P. 冯·穆申布鲁克的教导：观察和实验是物理学的唯一基础。布丰本人不完全执行经验主义的教条，因为他企图用一个纯理论的大系统来理解整个自然世界。1734年至1742年，列奥米尔对昆虫进行细致观察后写的著作出版了。该书更真实地体现了科学方法的应用。然而，布丰本人做出了献身科学事业的一个榜样。他从《自然史》的巨大成功中赢得的威望（即使更多地要归功于他的文学技巧而不是他的科学才干），给自然科学增添了光彩。甚至那些批评过他的方法的人也从该书中受益匪浅。他给那个将成为发现的新时代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科学家、文物收藏家和上流社会开始疯狂地进行搜集工作，布丰亲自主持了植物园和皇家收藏室。随收藏家而来的是分类学家，可以作为分类学家典范的是瑞典的植物

学家林奈。他付出的巨大劳动把植物学家从大堆的新材料中拯救出来，免遭灭顶之灾，而他自己为取得这些新材料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付出的代价是在一段时间里，分类本身成了目的，而且相当肤浅的综合归纳往往替代了科学实验。

事实上，理论总是阻止实验科学的发展，但是科学家和启蒙哲学家共同怀有的对实践的兴趣促进了实验科学的发展。在植物学的研究领域里，兴趣集中在农业上，尤其在园艺上。在传授花粉和杂交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同样，对像蒸馏等这样的工业过程的兴趣也影响了早期化学家的实验，特别是对加热效果的实验。然而，化学这门科学的发展仍然受到包围着它的神秘气氛的阻碍。18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化学家是施塔尔。他是哈雷大学的一名教授，后来又在柏林任教。他以燃素理论而闻名于世，虽然这个理论仅仅是他创立的许多化学理论之一。他以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易燃物的燃烧和金属煅烧之间的类似之处。他把这种类似归因于存在着一个可燃原理。他把这一原理称为燃素。燃素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来，消失在空气之中，而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煅烧的金属，其重量是增加了。这一事实与其理论恰好是不相容的。不过直到二三十年之后，燃素理论被摒弃之前，没有找到其他的解释。荷兰化学家布尔哈夫写的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论文《化学分子》（1732年）也表明了缺乏新的化学主张；虽然苏格兰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在1755年发现了凝固气体，使化学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但是化学在拉瓦锡之前并没有本学科的牛顿。电和磁则处在一个更为初级的状态。除了对简单的电现象引起的兴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值得一提，但即令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也没有提出严肃的假设。在医学方面，虽然在莱顿和后来的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建立起门诊传统来帮助改进医学的实践，但是把实践兴趣看成高于一切的思想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实际的需要往往促进了比较精密的科学仪器的发展。这个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启蒙运动不仅与思想上的革命相关联，而且与物质条件方面的革命也有关联。理性的时代也是发明的时代。

前面所概述的科学发展大部分都没有与传统的思想方式发生公开的冲突。地质上的推测倒更容易引起宗教方面的反抗，因为甚至岩石构成的初步研究，往往对地球的历史提出一些与《创世记》里的提法很难调和的思想。天文学的研究早就使科学家们怀疑，地球可能比

《圣经》所记载的要早4000年就存在了。布丰小心翼翼地指出，形成目前岩石层需要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为了说明岩石层，也是为了说明化石层，显然必须对海洋淹没陆地的年代提出假设，以替代跟挪亚方舟联系在一起的短促而富有戏剧性的圣经故事。划分科学理论与奇思怪想两者之间那根细窄的界限，可以用对海洋的形成所做的假设与引出的结论予以说明。对海洋的假说是德马耶在他的《海洋的假设》一书中提出的。该书于1748年出版，但是手抄稿在此之前就已经流传开了。他认为陆地上的生命形式很可能是以海洋为栖息地的生命演变而来的。从这个假说出发，他进而得出这样的主张：鱼人和鱼美人显然就是提供了生命从海洋到陆地的联系（但他对它们的结局则表现出某种科学的怀疑主义）；这些鱼人在极地的某个地方离开了它们水中的家，而成为人类的祖先。即使这样一种奇怪思想对18世纪的思想方法也有所启迪。它是古代的“生物链”思想的变异，即在一个完整的等级制度中，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从最低级到最高级，从哲学到生物学领域，都有其连续性的原则。要想在18世纪就发现进化论的端倪以外的东西，尚为时过早，但是进化论思想已经处于萌芽状态，寻找进化链条中缺少的环节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狄德罗在《对自然的解释》一书中对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是否存在着壁垒提出疑问，认为1748年尼达姆做的著名实验，已经表明了从无机物能自发地产生生命。1760年，那不勒斯的斯帕兰扎尼神父论证这个实验是荒诞的。1743年贝克和1744年日内瓦人亚伯拉罕·特朗布雷在对水螅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水螅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连接环节。虽然在生物学以及实际上在其他各个科学领域里都有这样的设想，但是18世纪仍然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和对新的领域进行试验性探索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取得重要进步的时期。它是牛顿时代和拉瓦锡时代之间的一个间隔时期。

18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新发展是把科学分析运用到人本身，首先运用于个人心理学，然后运用到社会生活。用休谟的话来说，启蒙运动认为对人的研究能够而且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并认为正如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实验”这一条目中所说的那样，对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研究，包括对人的道德和历史的研究，是实验哲学的一个恰当的课题。实践证明18世纪建立在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前提基础上的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成就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社会科学方面进行系统性论述的一种重要著作。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而不是心理学。即令如此，从这个观点来

看，这篇论文必须看作一个大失败。孟德斯鸠企图略过200年来在科学法理学、经济学、人文地理以及人类学方面的工作。产生社会科学中的牛顿，时机尚未成熟，如果说有这么一天的话，孟德斯鸠追求的目的比他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他力图分析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法则，将政治、道德、宗教、经济通过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综合社会学，把人的社会行为用科学名词表示出来，而且据他说，对人的社会行为不作评判。这个任务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可能性。再者，不管他怎么持异议，孟德斯鸠除了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之外，还是一个道德学家。他觉察到若科学家对道德漠不关心，就很难当一个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社会科学进退维谷的困境，第一次清楚地出现在孟德斯鸠身上。他对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词——“自然”的使用，就是一个例证。因此，他说，奴隶制是违背自然的，但是在某些国家中，又有自然的理由为奴隶制辩护。显然，自然在这里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是事物的本性，即事物活动的方法，但它也是事物应该如何活动的方式。在他使用“权利”和“义务”两个词时同样含糊不清。权利是建立在永恒的法则之上的，但是它又与每一个特定社会的条件相关联。义务是应该做的事，但它又是必须做的事。结果是经验的证据与伦理的假设奇怪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的一个特点。

在社会科学方面，18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准备时期，而不是取得积极成果的时期。贝克莱和休谟的经济学著作为后来的英国的经济学家铺平了道路，正如梅隆、迪托、福博内的著作为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铺平了道路。乌略亚和乌兹塔利兹在西班牙提出了新的重商主义思想。维科的那不勒斯信徒加利亚尼神父根据洛克的理论，对价值理论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分析。爱尔兰出生的法裔英国银行家理查德·坎特龙是一篇论述商业论文的作者。他的论文使某些具有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亚当·斯密前辈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学这门新的科学，也受到与法国的重农派和德国财政学家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影响，但是重农主义和新财政主义经济思想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才出现的。

在18世纪，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仍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一切事实或假想的事实，都在搜集之列。在启蒙运动的思想等级结构中，历史仅次于科学。17世纪学者开始的对历史进行记载的这一伟大

工作继续了下来。越来越多的外行人注意起历史这门学问，拉莫特·勒瓦耶和培尔的历史怀疑主义为学术批判准备了条件。因此，历史不仅仅是对人类生活和命运做出解释，而且用朗格莱·迪弗雷内的话来说，是“依据亲眼见到的证据，确凿无疑的文件与可以信任的旁人提供的证据写出的对历史事件确切与忠实的叙述”^[5]。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尤其在像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这样一些伟大作家的历史著作中有迹象表明，在历史学家和写历史的文学家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吉本的著作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弥合的。吉本把贝内迪克蒂的博学与伏尔泰对历史的阐述结合在一起，把思想和学识用优美的和有意识的文字表达出来。

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当时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预想之上。由于许多事物用这些术语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有时历史学家似乎把历史分解成一系列活动的事件而已。对事实直率的叙述，证明这种方法不仅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反而把这些偏见认为理所当然。此外，历史成了反对宗教的一件武器。宗教的辩护士们自己接受了对历史证明的挑战，并把历史证明作为他们自己的论辩基础。更为巧妙的是，法国的耶稣会会士让·阿杜安企图用历史怀疑之矛来攻击怀疑论者之盾，断然否认一切注明为14世纪之前的文献，拉丁文《圣经》和数量有限的经典经文除外。结果，教会传统成了唯一的上诉法院。另一名法国的耶稣会会士伊萨克·贝律里埃用当代的文体重写《圣经》，希望产生一部既能教诲人，而又能使人欣然同意的作品。^[6]英国的卫道士们更为冷静，企图用历史证据来证实神的启示。因此，舍洛克在他写的《见证人的审判》（1729年）中对奇迹的证据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当然得出的结论比之休谟在《论奇迹》这篇著名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更为人们所赞同。

宗教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同18世纪的思潮是难以调和的。启蒙哲学家们也许受到莱布尼兹的宇宙连续性概念的影响，以历史与科学为理由反对那种认为控制人类命运的宇宙法则起作用就会产生灾难性破坏的理论。他们坚持先验论的信念，认为历史发展是单线的。虽然他们决心把希伯来人从在神圣历史中所占的中心位置上赶下去，但是他们仍不自觉地保持圣经的思想方式，坚持人类进步的起点只有一个。这个起点不是巴勒斯坦，尽管它与《圣经》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他们认为，人类历史的摇篮是埃及。文明从埃及发展到希腊和罗马，但是

由于现代人在与古代人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也就失去了把古典世界作为人类成就巅峰的诱惑力。中世纪宗教思想的令人遗憾的统治，确实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持续、稳定进步的图景。只有对中世纪技术发展感兴趣的杜尔哥敢于出来说话，缓和对中世纪的普遍谴责。但是在哥特人的黑暗的世纪之后，人的思想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炬，而且燃烧得比以往更光亮，最后迎来了光彩夺目的启蒙时代。

除了杜尔哥之外，百科全书派的历史观并没有多大发展，只是对一些含混不清的一般概念做了相当初步的收集而已；直到18世纪末，最后才出现了孔多塞的宇宙发展论。然而，有一位远见卓识的历史哲学家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不勒斯学派给18世纪提供了一系列著名的思想家，并且产生了所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詹巴蒂斯塔·维科。他写的《新科学原理》第一版于1725年出版。维科是这样一些思想家中的一位，即他的伟大之处不可能用几句话加以概括。此外，把他说成属于18世纪，也是一个纪事上的谬误。那不勒斯法理学家格拉维纳（1718年卒）在对法理学进行历史性的处理方面，可以被认为是维科的先驱者，维科也受到格劳秀斯关于万民法梦想的影响，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树一帜。如果想要找到他的祖先，那么乃是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跟洛克和休谟一样，他从反对笛卡儿出发，但是又与他们背道而驰。他提出的问题正是他那一代人要求解答的问题。《新科学》是一种思想论，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但是他的回答很难说与他同时代人做出的回答有什么较大的不同。虽然有人企图把维科描述成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思想家，虽然他自称是教会的卫士，但是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与正统思想相悖的，因为他的上帝是存在于人中间，是通过自然的因素发挥作用，而不是超越物质的尤物。他的《新科学》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观，而不是在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哲学。用克罗齐的话说，维科是“不折不扣属于即将来临的19世纪”^[7]。没有证据表明，在他那一代中有任何人，而且在他所在的那个世纪如果有人，也是寥寥无几的人，对他的思想有超过一鳞半爪的理解。

因此，18世纪是科学和历史的世纪，是经验事实胜利的世纪。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个涉及人的思想的胜利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即令这个胜利是战胜人自己的理论天才后取得的。现在各个领域里的人都在从事观察，而不是想象。但是，人的思想是不能只靠事实生存下去的。

如果研究一下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著作，就会很快发现，在抓住客观事实并把论点只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表面上的决心后面，还存在着理论上的假设。当然，它们不是哲学的或宗教的设想。我们是在人性这个概念中，找到了隐藏在经验论核心中的先验论因素。要了解18世纪的思想基础，有必要看一看这些思想的心理学理论。启蒙哲学家们是不会承认他们的心理学理论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个人心理学的法则也是在文明进步中起作用的那些法则，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写的“前言”，正是建立在这个命题之上的；而且，这些法则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已经有所揭示。洛克认为，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是感情的产物。这种观点完全统治着18世纪的心理学理论，正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论完全控制了那个时代的物理学一样。这方面最有权威的论文是孔狄亚克神父的《感觉论》（1754年）。文章对一尊雕像做了著名的类比，雕像内部有人一样的器官，但是外面包了一层大理石，雕像逐渐被赋予知觉而发展其思维能力。这个情感心理学的原理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是相信“人的一切都可以化作感觉”^[8]。这种见解甚至超过了洛克，因为他把一种意义不甚清楚的思考能力归属于思想，而在18世纪他的追随者们用联想的自动过程来解释一切复杂的思想是如何从简单的思想发展过来的。

从情感心理学到完整的唯物主义理论，只是跨了短促的一步。跨出这一步的可能性在洛克同斯蒂林弗利特关于物质东西会不会思考的讨论中已经初见端倪了。这个讨论在尔后克拉克与莱布尼兹之间的辩论中继续了下去。伏尔泰在他的《哲学书简》中谨慎地提出，思维可能是物质的一种功能。后来，他在写《哲学词典》中“灵魂”（Ame）这个条目时，用诙谐的笔调说，他至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物质性的问题。这个争论涉及“动物有无灵魂”的问题。笛卡儿曾声称，动物是没有感情的自动机而已。18世纪的怀疑主义者攻击与之对立的思想——动物像人一样有灵魂，或者至少有思想；并把它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动物有灵魂之说是证明物质能够获得思维功能的一个证据”，阿尔让把这句话作为他书中某一章的标题。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说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说灵魂不是由神创造后附在没有意识的天地万物上的一个独立体，那么，笛卡儿的二元论就被彻底推翻了。这种二元论已为18世纪的耶稣会会士所接受，而且作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基础。到了18世纪中叶，继本堂神父梅斯利尔和阿尔让侯爵之后，更为大胆的思想出现了，宣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英国

的宿命论和世界大同主义的鼓吹者戴维·哈特利在他1749年写的《对人的观察》一书中，把唯物论和自然神论调和起来，提出上帝赋予物质以思维的能力。戴维·哈特利是以他对心理学联想理论的发展而闻名的。拉美特利则认为没有必要把上帝牵涉进这场争论中去。他说，形式和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它本身有感觉的能力，因而也有思想的能力。

感情心理学在法国取得了迅速的进步，不管它是否被公开推向了唯物主义的极端。1758年爱尔维修的《论精神》是对情感心理学的一个系统阐述。在它发表时，狄德罗有理由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在10年前倒是十分新颖的。但是在今天，哲学思想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因而在书中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了。”^[9]启蒙哲学家们企图把人的思想只说是感觉与印象的一种安排。这使我们感到既原始，甚至又是不科学的。休谟的思想比较深刻，洞察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淳朴的教条。他说：“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只是一堆或一系列不同的概念而已，它们通过某种关系联合在一起，并虚伪地假设赋予了一种尽善尽美的简朴和统一。”^[10]但是，休谟的论文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出版时就已是死胎”。18世纪的教条主义思想家对于怀疑论思想的这样令人不安的扩张一无准备。他们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科学价值，而在于其社会 and 习俗方面所引出的实际结论。

在这方面，洛克也走到了启蒙哲学家的前面去了。他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苦与乐的分析，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再加之对唯物主义的偏见，使享乐主义思想向高一层次发展成为可能。自爱成为主要的美德。从基督教时代开始一直受到牧师和神学家们谴责的奢侈得到了赞扬，就如伏尔泰在《纨绔子弟》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爱奢侈，甚至于纵欲无度，
所有的欢乐，各种各样的艺术，
财富、美味、装饰，
所有正直的人都有这种情操。^[11]

自然甚至使我们的罪过归正从善了。用蒲柏的话来说，自然可以“在贫困之上，在思想的缺陷之上，建造起欢乐、和平和人类的荣耀”^[12]。深受赞扬的《蜜蜂寓言》的副标题就这样宣称：“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13]在这个寓言里，作者曼德维尔像伏尔泰、

蒲柏、圣朗贝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把享乐主义的道德变成诗歌。英国的政治家索姆·詹宁斯对当时流行的高级形式的享乐主义做过这样的概括：

说实在的，幸福是唯一存在着的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财富、权力、智慧、学问、健康、美貌、美德、宗教，甚至生活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却都有助于产生幸福。这一切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幸福是唯一的伟大目的，因此只有它们能促进幸福时，才是可取的。[\[14\]](#)

最后，必须强调，享乐主义范围里的欢乐主要是物质的。图森和杜克洛这两位为人们承认并深孚众望的道德学家，以温和的语言表达了拉美特利和莫雷利用粗俗的语言提出的观点，指出服从感情是道德的基础。

享乐主义心理学在道德思想方面产生了一个激烈的转变。它使一切天启教失去了跟道德真理的任何关系。它还通过否认一切固有的思想，从而打开质问传统道德的大门。狄德罗公开声称：“道德思想不是固有的。善与恶的知识，像其他一切知识一样，都来自我们身体的各种官能。”[\[15\]](#)18世纪主张把幸福、幸运或实用性作为道德的准则的著作唾手可得，可装满整整一个图书馆。实用主义不仅是道德学家的科学，而且也是立法者的科学。爱尔维修声称，一切法律必须与对公众有用这个唯一的原理相关联，“这是一个包括所有道德和立法内容的原理”[\[16\]](#)。

然而，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只是代表了18世纪道德理论的一方面，它并不回答每个问题。尤其它没有解决个人享乐主义与社会利益调和的问题。这个难题在《论人》和《蜜蜂寓言》等论著中，用假设其不存在而回避了过去。这个难题也可以用假定它存在于人性精神的人类思想里给予更严肃的处理。所谓人性精神也可以用圣·皮埃尔发明的“善行”（bienfaisance）一词来替代。人性论中最自私的学说以这种方式成了仁爱和人道主义的养母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不道德名声的时代来说，18世纪表现了对伦理问题极大的兴趣。英国艾迪生和斯蒂尔文章中那种说教的语气和对资产阶级德行的美化，后来扩散到了法国。甚至吉尔·布拉斯和汤姆·琼斯都决定以中产阶级道德立身，尽管他们都是到了各自的故事的结尾才做出这类决定的。人们发现保护自己贞操的帕梅拉比之其他丧失贞操的女主人公更吸引人。这种实用主义的社会和道德形式的来源尤可在沙夫茨伯里

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1711年）一书中找到。他用一个假定的道德意识把利益和德行调和起来，并达到普遍的协调。对于沙夫茨伯里来说，这种道德意识是一种理性功能，但是休谟在这个论点，同他在其他论点上一样，比他的同时代人走在前面好长一段路。“可以十分肯定，道德品质的认可不是来自于理性，或者思想的比较，”休谟写道，“而是完全从道德的鉴赏力出发的”。^[17]弗朗西斯·哈奇森在《道德哲学体系》（1755年）中企图把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意识跟对公众的实用性的客观标准的确定两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亚当·斯密在1759年写了《道德情操论》一书，把内在的道德意识（他称之为同情心）本身作为道德标准，从而把实用性降到一个附属的位置，相当于用唤醒人的天生的善行来解决社会伦理问题。这种对人天生善行的信念在卢梭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道德论的一个相反的倾向主要是从培尔那里发展起来的，虽然这并不是说矛盾的存在被普遍领会了；因为对于培尔来说，道德是理智的法规，因而与感情是对立的。他的观点与蒲柏的观点很相似。蒲柏说：“在人性中，有两个原则占统治地位：即自爱和理智。前者激励人，后者克制人。”^[18]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很清楚，要加强理智就必须要有社会秩序和公共的法律，这就提出了寻求社会实施的合适的道德法规的问题。由于启蒙哲学家们曾反对过神学的教诲和内在的道德思想，他们只可能希望在人性及其环境中发现道德法规的基础。既然制度被认为是由人而不是神所产生的，那么就必然需要有一门实验的和归纳的道德科学。前面已经提到过孟德斯鸠曾企图建立称之为社会道德。他声明：“统治世界的不是命运，此乃为罗马人的历史所证明……起作用的有普遍的原因，或是道义的，或是物质的。……简而言之，主导的倾向带来了一切个别的事件。”^[19]他的声明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伏尔泰看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一连串细微的原因，而孟德斯鸠却看得更深远，看到了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巨大的力量。他企图用普遍的原因或法则来理解这些力量。但是，他的科学分析和他对客观的社会道德的探索，与其说是互相促进，还不如说引起了相互冲突。他的思想的最后倾向是试图证明任何国家存在的制度都是正当的。“要人们回想起古代的格言，通常是为了让人们回归美德。”^[20]启蒙运动的人物常常得出相反的结论，但是在他们追求人性的法则和道德基础的过程中，很难说他们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然而，由于他们的兴趣首先在实践方面，因而说他们努力的果实就生长在实践之树上，这是适当的。在他们耕耘的土壤上产生了人道主义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法律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改革。

启蒙运动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兴趣要甚于对特定的政治问题的兴趣。确实，在政治思想方面，18世纪上半叶是介于霍布斯、格劳秀斯和洛克的时代与卢梭和伯克时代之间的一个间隔时期。这期间没有出现可与上述思想家相媲美的伟大思想家。要概述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很不容易，因为各国都遵循自己的传统。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洛克的传统，德国是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传统，在法国则是君主专制政治和投石党运动相对抗的传统。

英国和法国的政治思想在政府问题上向着更积极、更实用的思想发展时，德国自然法则派的思想却继续很盛行。在普芬道夫和莱布尼兹的继承人中最多产和最受尊敬的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他企图把一切知识变成一个体系。他在18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要出版一本以上的书。沃尔弗不是一位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从莱布尼兹和17世纪的英法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他的思想是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与置于自然法则框架中的实证主义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在政治上，他同样前后不一致，把人民主权的进步思想跟主张人民应完全顺从统治者的落后思想糅在一起。他的思想说明启蒙运动进入德国的方式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清除一切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成分。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年）是普芬道夫的另一名追随者，也是在同一个这时还相当暗淡的银河系中的另一个光点。

在德国之外，自然法则学家派的代表人物是那不勒斯人詹温琴佐·格拉维纳，丹麦人马丁·许布纳，法国的巴尔贝拉克和A. Y. 戈凯，日内瓦人J. J. 布拉马基。巴尔贝拉克和布拉马基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超越了17世纪自然法则法学家的思想。巴尔贝拉克通常被认为只是翻译了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著作，但是他的笔记表明他是洛克的一个信徒，是英国宪法的崇拜者。他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思想相对立，主张人们有权利根据道德而不服从君主，而且王权是不可分割的。布拉马基的模式就是他自己的故乡日内瓦市的宪法——一个混合组成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贵族制度受到了民主制度的限制，权力由于基本法的存在以及由于被分立而受到限制。巴尔贝拉克、布拉马基以及国际律师瓦泰勒等主要受到

洛克的影响而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专制主义决裂。对于他们来说，君主只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统治时才握有权力；但是，如果这种权力被滥用，那么人民就有权进行反抗。自然法则派发展中的这个最后阶段，代表了反对君权神授说和专制主义论这一对孪生学说的理论斗争的高峰。也许这场斗争本身并没有这么大的意义，但是它却为18世纪后期生长发展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土壤。这些作家也是卢梭的政治理论的直接先行者。依据他们的著作，卢梭的政治理论似乎更是自然法则派的逻辑发展，而不是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崭新的创造。

然而，这个新的政治思潮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同时实用主义也在德国之外破坏着自然法则法学家的控制。他们的思想只是在他们回到在17世纪与格劳秀斯一起取得最伟大胜利的那个领域时，才重新获得了现实的意义。在国际法的发展方面，这个时期的伟大人物是瑞士人瓦泰勒。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竭力把他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除了他之外，自然法则派则跟现实失去了联系。德意志的法学家在实际政治问题上的结论，与财政学家的结论很相似。财政学家的著作有助于在理论上证明仁慈的专制主义是正确的。18世纪初，德意志某些公国中仍然存在着关于三个等级的权利和人民权利的旧宪政思想。但是此时实际的发展和法律上对权力瓜分的谴责诋毁了这些旧宪政思想。

在英国和法国，舆论正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英国的政治思想确实没有超过洛克的思想，虽然自然法则和契约的结构慢慢地丢弃了。弗朗西斯·哈奇森坚持传统思想，但休谟放弃了契约论。他认为我们服从政府，并不是因为任何假设的契约上的许诺，而是因为不这样社会就无法继续存在。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理论上值得提及的另一个理论发展是托利党人摒弃君权神授的原则。博林布鲁克宣称：“用君权神授来治理邪恶是极为荒谬可笑的。”^[21]休谟完全赞同这个断言。

法国君主专制政体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A. M. 拉姆齐是雅各宾党人，也是费奈隆的信徒。他的《论民治》（1719年）表明他是君权神授说著名的反对者之一。在“大君主”统治的最后阶段，贵族的反对已经开始。这种反抗与费奈隆、布兰维里耶和圣·西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启蒙哲学家们想不出替代君主政体的制度；事

实上他们也没有真正地要求替代君主制度。先进的反教权思想和中庸的甚至是保守的政治思想相结合是启蒙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整体而言，百科全书派对政治不感兴趣。18世纪法国真正具有政治头脑的是由国民会议派组成的，虽然人数很少，但却是强有力的社团；他们继承了投石党运动的传统，并且宣扬由国家的中间团体（即他们自己）拥护的基本法理论。

18世纪法国政治气氛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不是有意识的政治理论化的结果，而是对政府结构发生作用的许多不同的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这个政府结构与新的要求不相符合。18世纪初，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英国的榜样。1688年革命的成功给英国带来的威信、路易十四的败北以及科学上的进步，使法国人的眼光转向英吉利海峡彼岸。像拉潘-托伊拉斯和阿贝尔·布瓦耶这样的胡格诺派的流亡者为伏尔泰的《哲学书简》和孟德斯鸠准备了条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作为社会学的论著已经在前面论述过。它也是18世纪上半叶一本伟大的政治经典著作。孟德斯鸠的成就是在欧洲思想发展的紧要阶段总结了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威限制权威的传统。这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过去的传统，但是在开明的专制时代，这个传统需要予以重新阐明。把自由和法律的基本思想放在一本书里阐述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论法的精神》并非是一本尽善尽美的书。它后面几章只是搜集了一些学究式的无关宏旨的材料。但是孟德斯鸠在重要之处都说得很精辟透彻。他的简练如碑铭的文体，使这本书成为表达伟大政治真谛的合适媒介，其形式尤值得注意。作者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时刻意识到不可过激，而宜中庸。“政治自由只能在温和的政府中求得。”^[22]“甚至过分的理智也并不是总是可取的。”^[23]他是一位主张系统化的人，但他又不是自己系统的牺牲品，他是一位知道理论局限性的理论家。

18世纪下半叶，英国模式在法国已大大地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仅仅一些贵族阶层还对它有兴趣。而具有持久影响的是古典著作。它们在文学上激起了人们对于模糊不清的共和理想的崇拜。许多人卖弄文字撰文论述罗马和斯巴达共和政体的德政，抨击罗马皇帝的劣迹，这已是平常的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塔西佗的眼睛来观察的。孟德斯鸠的一些思想来源于经典著作，特别是他关于“美德”的定义便取自于经典著作。这个定义本身后来也成了经典。“我所说的共和中

的‘美德’，就是对祖国的热爱，也就是说，对平等的热爱。”^[24]这样一个定义是对现存制度含蓄的批评，至少是在理论上为共和主义做了辩护。然而共和主义是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而不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正如德若古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样，“在专制主义桎梏下，没有祖国可言”。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当时在法国实行的那种君主制和专制主义加以区别，但是对专制主义的谴责以及对社会宗教基础的破坏，就对所谓君权神授的君主制造成危险。甚至像德阿尔让松这样原先担任大臣的人，在1747年也会这样写道：

谁敢提出向共和政府方向前进的建议？我看不到人民中间有这种倾向。贵族、大臣和大法官们习惯于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从来没有朝共和这个方面想过，也没有这类意愿。然而，这些思想仍然不断袭来，并在法国人中间很快形成了一种习惯。^[25]

但是，只有在国民会议和国王之间发生矛盾时，才出现严重的权力冲突。除了法国之外，很难在欧洲找到对政治秩序理论上的质疑，不用说明确的质疑，就是含蓄的质疑都不易找到。

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思想倾向同样是很温和而谨慎的，其倾向是越来越强调私人财产权。对于高利贷合法性的长期争论，表明在法国经济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的一个分支。而在英国对这个问题考虑就更少。他们用一般的为财产制度辩护的理由来解释洛克的理论，尽管弗朗西斯·哈奇森和罗伯特·华莱士建议做一些细微的修改。哈奇森认为，“财产（主要是土地）是权力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虽然它没有给权力任何正当的权利”^[26]。罗伯特·华莱士看到敛聚财产的过程不仅是那些灾难的“一个巨大的根源，而且是那些罪恶的渊藪。这一点不仅为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而且在每个时代中都受到如此众多的谴责”^[27]。另外，托马斯·拉瑟福德在他所著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1754年）一书中对洛克关于一切财产权起源于劳动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十分强调权利是由于长期使用或占有而获得的。而休谟是把哈林顿和洛克跟伯克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他通过反对理性主义者的解释，进一步加强财产权的概念。他写道：“要是最初的所有权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往往变得含糊不清的话，要是由此而引起的许多纷争无法解决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使用或占有所获得的权利很自然取而代之，某人则可以充分地享有此财产。”^[28]

法国在经济问题上的考虑更富有冒险性，虽然在18世纪初叶，平均主义思想只是以乌托邦的想象形式表现出来的，如费奈隆的《泰雷马克历险记》、孟德斯鸠的关于洞穴人的历史，或者幻想航行的记述等。真正的旅行者或传教士所做的关于在南海或其他遥远的乐土上的风土人情的叙述，助长了这种追求乌托邦社会的倾向。有时，有些乌托邦的原始状态，如盖伊的《波莉》，是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有时，它却表现为天然地不属于道德的，如狄德罗1772年写的《德布干维尔航行的补记》；而有时就像卢梭的著作那样，把没有受到大城市腐败影响的乡村的简朴生活理想化。但是，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回归自然”永远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它跟单纯的原始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不能如此看待卢梭的作品。

甚至在18世纪初期，就有一两位法国作家超出了这种在文学中对自然的崇拜。梅斯利神父的《旧约》不仅对宗教进行了抨击，而且对社会和政治秩序做了尖锐的批评。它作为唯一一部手稿，在18世纪前半叶的秘密文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755年，莫雷利的《自然法则》阐明了财产公有化的理想。尽管他无疑地是在郑重其事地讲述他的观点，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任何其他的人认真地对待他的观点。18世纪人们习惯于表达经典著作中类似的思想。柏拉图理想国的优点，还有梭伦、利库尔戈斯和格拉古兄弟的优点都成了文学的老生常谈，甚至比对经典著作中的共和主义的学舌还不如。卢梭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他运用他的文学才能把道义上愤慨的感情力量隐藏在长期以来只是作为文学形式或不正常心态表现的背后。同时，有人夸大其词，把写作时超出文学影响的东西都归因于卢梭的《不平等论》。

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思想中蕴含了某些对社会和政治的批评，但它们并没有对启蒙运动占优势的乐观主义产生多大影响。金大主教所证明的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必然存在邪恶的观点，实际上无非是为了说明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合理的。这种乐观情绪在蒲柏的著名诗篇中广为散布。各国正统的宗教作家未能成功地批驳《人论》中所提出和表达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原则和诗意。年轻的伏尔泰是蒲柏的乐观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在论及帕斯卡的一个片断中这样写道：“我敢于站在人性这一边，反对这个崇高的厌世者。”^[29]当然，伏尔泰认为帕斯卡还值得予以批驳，倒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实。1795年里斯本的地震和紧接着的“七年战争”的流血大大震动了伏尔泰，使他与乐观主

义已经十分脆弱的联结断裂了。次年，他写了《里斯本的灾难》一诗。1759年，他在《老实人》中，通过庞格洛斯医生对莱布尼兹和他的信徒克里斯蒂安·沃尔弗提出的“可能的尽善尽美的世界”的理论倾注了他的满腔痛苦和失望。“什么是乐观主义？”卡康博问道。

“唉，”《老实人》回答道，“它是一种狂热病，在一切都出了毛病时还假惺惺地说一切都很好。”伏尔泰开始相信，人大多是邪恶的、愚蠢的。对于人世间的一切邪恶的唯一合理的判决是我们不了解其原因，而且最好也不要去了解。在伏尔泰的那个时代，几乎只有他独自一人洞察人世间悲剧性的深处。不过，他也许还不是独自一人，因为在约翰逊博士写的《拉塞拉斯》中，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和他的旅伴们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原先抱有的种种愿望没有一个是能够实现的”——他们最后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方。这一切给人们的教训，跟《老实人》在最后给人们的教训并无多大的不同，虽然拉塞拉斯和他的旅伴们的冒险是属于肉体上的而不是思想上的，故事本身是用一种更为优雅、发人深思的文体写的。伏尔泰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绝不是卡莱尔愚蠢的讽刺文中的那种爱嘲笑人的冷漠的人。他看到，在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义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对邪恶无言的辩护；他的悲观主义的结论不是退缩屈从，而是需要集中力量对付具体的和特殊的罪恶，以便逐步消灭普遍的邪恶。他相信实际改造是有可能的，因而他仍不失为一个他那个时代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人。

改革者时代的先驱和典型人物是圣皮埃尔神父。他是“夹层俱乐部”的成员、自然神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认为社会的罪恶是由于无知或偏见的结果。因此只要逐步消灭无知和偏见，人类就会朝着日益幸福不断前进。他提出的无数的计划，从著名的建立持久和平的计划，到改进教育、镇压野蛮的海盗，使书籍和布道集子更为有用，改良拼音，减少诉讼案，建造冬季也可使用的道路，以及他最得意的关于改进型安乐椅的设计等计划。它们看来是一些可怜的幻想，尽管其中不少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正是通过圣皮埃尔（虽然他受到人们的嘲笑），18世纪向边沁走去。边沁的主张法国准备在理论上承认，尽管英国人比较乐意在实际上予以应用。这样，我们达到了启蒙运动乐观主义正式表达的人类的进步思想。福尔梅写道：完美无缺是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受到自然和“在我们心中

书写的法律”所引导。^[30]人类进步思想，其尽善尽美的最终形式，只有当康道赛站在断头台下时才能充分实现。

有一个重要问题本章到此还没有讨论。欧洲对启蒙运动思想的发展，其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启蒙运动思想是以什么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开来的呢？在很多方面最初的冲击力是来自英国。17世纪末英国虽然已经处于运动的普及阶段了，但是启蒙运动的真正故乡是法国。许多组织在法国传播了这些新思想。首先是通过口头形式在沙龙里传播，如朗贝尔夫人、唐森夫人、德芳夫人、若弗兰夫人和埃斯皮纳斯女士等的沙龙。也在一些集会上传播，如夹层俱乐部。1731年弗勒里封闭了这个俱乐部，因为在那里举行的一些讨论名声不佳。另一个讨论中心是以布兰维里耶伯爵为中心的一伙怀疑论者。他们时常在阿尔让松或诺阿耶公爵家中聚会，有时也在碑文学院举行，其中一位名叫米拉博的成员是该学院的一名常务秘书。这是秘密文学的来源之一，而秘密文学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前已经开始流传了，在1710年至1740年达到了高潮。1740年以后由于检查制度放松，开始衰落。1750年以后，随着出版物检查制度实际取消，秘密文学便中止了。虽然巴黎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但是在法国的外省，文学研究院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1748年之前，约有20所，到1770年达到40多所。它们的成员开始完全来自特权阶层。在18世纪初期，他们鼓励的活动主要是文学方面，而在倾向性上则是严格的正统。然而，从18世纪中叶起，科学兴趣日增，资产阶级加入了这个行列。1725年至1730年，逃亡的詹姆斯党人在法国创立了第一批互济会的分会。互济会在贵族中深得人心，因而轻而易举地在教会和政府不甚严厉的镇压中幸存下来。虽然他们的活动是社会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但是各互济分会为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然神论和自然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以生长的环境。

新思想的传播，也可以追踪到报纸杂志。这个阶段出版的报纸杂志数量大增，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德方丹1721年创办的《新文学》杂志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评论。它通过动态报道的形式使读者了解在文学和思想方面的最新发展。历史较久的《法兰西水星》杂志以及耶稣会的《德特雷武杂志》则更为谨慎小心地沿着新的路线前进。在这方面，如同在各个领域里一样，重大的变化是在1750年前后出现的。在此之后出版了许多新的杂志，正统思想的偏见

在它们那里要少得多。传播思想的另一个媒介是科学词典和一般性的百科全书。甚至在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出版之前，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出版了百科全书。在普拉德神父获得盛名之后，法国的《百科全书》被看作记载新思想的概要和纲领，撰稿人正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成了新信仰的宣传者。

新思想渐渐由法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方。这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巴黎是国际文化中心中最伟大的一个。外国人，尤其是来自讲德语国家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荷兰规模宏大的大学里来学习。J. 勒克莱尔的《荷兰时报》把学术界的消息传至欧洲各地，戈特舍德被人描述为是使莱比锡成为“小巴黎”的人。汉堡成为英国思想直接进入德国的渠道。在意大利，许多城市存在着这种或那种文学社团。希皮奥内·马费伊在他创办的《文学报》（1710—1737年）上发表仿效法国人的评论，后来《文学观察报》（1737—1740年）继续了这种做法，但它的主要兴趣在科学方面。在柏林（1701年），圣彼得堡（1724年），乌普萨拉（1710年），斯德哥尔摩（1739年），以及哥本哈根（1743年），相继出现了类似英国的伦敦皇家学会的组织。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从西方把科学家和文学家招聘入宫。在费迪南德六世和查理三世的大臣们的鼓动下，西班牙出现了科学活动。启蒙运动从欧洲扩展到美洲的英属殖民地。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一个信奉者。当然，巴黎仍然是各国启蒙哲学家的麦加。报道法国文化界消息的手抄信稿从1753年起通过德意志的格林男爵的工作而广泛流传。法国失去的政治霸权由思想霸权来继承，法语替代拉丁语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和外交活动的语言。腓特烈二世在1743年下令柏林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必须用法语出版，其理由为法语是各国通用语。

外国的访问者源源不绝涌向巴黎。巴黎的沙龙成为欧洲的大学，上流社会提供了传播理智时代思想的手段。至少在18世纪初期，中小学和大学仍然与旧的思想方法相关联。作为洛克信徒的启蒙哲学家们充分意识到教育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影响对于传统的教育产生的作用十分缓慢。1734年，在格丁根一座新的大学成立了。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弗的影响下，教学改革在哈雷首先开始，尔后在莱比锡也展开了。1747年和1755年又分别成立了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这一切都代表新精神的胜利。在大西洋彼岸，一批重要的学院宣告成立，

显示了科学已经牢固地在新世界扎下了根。然而，一些旧大学正在慢慢后退。在耶稣会的影响下，卢万变得毫无生机；巴黎大学没有产生重要的东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学大多数都衰落了；18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难称得上是思想活动的中心。

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地区的学校曾企图把当地的语言作为法国教育的主要媒体，但是在路易十四的迫害下以失败告终。1726年，罗林谨慎地建议：每天或者每隔一天有半个小时用于学习本族语言。但是，即使在18世纪末，法语在正式教育中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1730年前后，法国耶稣会学院在教学中讲授了笛卡儿主义，跟经院哲学一起，两者成了引进启蒙运动的思想方法的巨大障碍。在巴黎大学前校长罗林的《研究论文》（1726—1728年）和耶稣会神父约瑟夫·德儒旺西的《教学之道》（1711年）中，17世纪教育的全部传统保存了下来。确实，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但是正如我们现阶段的实际教育实践属于前一个阶段一样，新的精神要在下一代中开始产生积极效果时，才会被人们拿去学习与研究。1762年之前，耶稣会会士统治了法国的中小学教育，神学家们控制了大学。如果说法国的情况是如此，欧洲其他地方更是如此，只是在那些耶稣会会士的同等的传统势力超过神学院传统势力的地方才是例外。在英国，许多反对国教的高等学校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不必非受英国圣公会控制的传统教育不可，但是这些高等学校在18世纪下半叶才成为具有影响的因素。牛津和剑桥设立了实验科学和历史学的讲座，证明了这种新精神的影响，但是它们对于公立学校和大学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停滞不前的状态，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上层阶级通常喜欢聘请家庭教师来教育其子女。同样，在法国聘请家庭教师的做法也十分流行。

为了对当时知识界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如前面对教育制度做概略的介绍时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看到在一个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环境里所发生的那些重大的、激动人心的，而又十分危险的新的的发展。宗教对大多数人的思想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宗教著作在各国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如果把英国的读者大众描写为热心于阅读休谟的哲学论文，或者把法国的出版情况描写成被启蒙哲学家所垄断，那就完全错了。伏尔泰和其他启蒙哲学家的作品也许流传的时间长些，但是《德特雷武杂志》，伏尔泰的对手弗奈隆的《文

学年报》以及像帕利索这样一些作家写的反哲学的作品，在当时的地位并不像现在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所说的那么低下。在法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正统思想更占上风。当然，宗教的卫道士显然越来越处于守势。英国的巴勒特主教在他的《宗教比论》（1736年）一书中企图证明宗教不同于个人的道德实践。他也许是自然神论的批评家中最成功的一位。在法国，耶稣会修士会在17世纪一直是教会的堡垒，现在表明它在对付不信教者的进攻时，比之对付基督教新教徒更是束手无策。《德特雷武回忆录》并没有透露出他们已意识到不信教论在18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取得了危险的进展。的确，耶稣会的教义强调赎罪，而对原罪则轻描淡写。这便在思想上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使乐观的、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耶稣会接受的笛卡儿的二元论帮助他们在自然法则（或理性）与超自然的真理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这样就有可能把许多新思想作为自然界的真理而接受下来，同时保持了一个并行不悖而又完全独立的神的世界。问题是自然界的范围在不断扩张，排斥着神的世界。耶稣会的弱点是他们认为有可能在理性时代精神和宗教思想之间实行妥协。如果卫道士们能把这场争论拉回到他们自己的阵地上进行，他们的辩解也许会更有力，然而尽管出版了大量祈祷书，可是在法国教会中，神秘主义的倾向仍不受重视。费奈隆的《思想文集》在1716年至1752年再版了15次，却没有什么追随者。在詹森主义者中存在着更为不妥协的态度，可是他们并没有给予正在没落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日益败落的教义以永恒的意义。18世纪法国的詹森主义，与其说是深刻的宗教思想的源泉，还不如说是群众热情和政治激情的源泉，虽然在意大利开展的规模不大的詹森主义运动采取了一种更为纯粹的宗教形式。

在新教国家中，神秘主义的倾向更为强烈。威廉·劳的《严肃的号召》（1728年）驳斥了理性的要求，宣称宇宙是由一个神秘的上帝统治的。上帝不是通过人世间的宗教传统，而是通过人的内心直觉来说教的。韦斯利所宣传的宗教概念，具有更普遍的感情和主观色彩。韦斯利本人受着德国神秘主义的影响。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始人尼古劳斯·路德维希·冯亲岑道夫伯爵奉行了17世纪德国的虔信主义。约翰·乔治·哈曼以及克洛卜斯托克的诗篇则代表了一种虔诚的宗教情绪。伊曼纽尔·斯维登堡在经历了1754年的改宗之后成了一个拥有不少忠诚信徒的新的启示宗教的预言者。乔纳森·爱德华在北美洲恢复了严厉而神秘的加尔文主义。这些运动中没有一个对人类思想史有过

较大的贡献，事实上它们也没有这种企图。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即令在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唯理智论这块高地也不可能为人类思想提供一个永恒的安息之地。

启蒙运动没有满足——当然也无意满足——宗教感情。同样，它也没有使形而上学家们感到满意。杜克洛写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仅仅依靠理智、依靠推理的哲学家”。^[31]在英国，流行的哲学是哈奇森和里德的常识教育。确实，在启蒙运动前夕，属于另一类别的两位哲学家——莱布尼兹和伯克利一直在著书立说。对于莱布尼兹，理智与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是迥然不同的东西。伯克利在力图回避机械论世界中严格的必然论时，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思维是唯一的现实。他写道：“组成世界巨大结构的一切物体，如果没有思维的话，就没有实体。它们的存在是人们看出或知觉的结果。”^[32]美国人塞缪尔·约翰逊是伯克利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追随者，虽然乔纳森·爱德华本人也提出了一个与伯克利的观点相平行的唯心主义理论。

伯克利的哲学道路是背离洛克的，但是这条道路又分成了两支岔道，朝不同的方向延伸：一支通向康德，另一支径直通向休谟。休谟从情感心理学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能知道事物的外表；我们把看到的现象联结在一起的因果纽带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活动的一种状况，是无法在哲学上论证的。但是，这里不是对这个时期的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总结的地方，而且也无此必要，因为伯克利和休谟的思想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不勒斯人维科在19世纪以前甚至并不为一些小的团体所知晓。在德国，哲学只被看作一种抽象的法学思想。在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中，也许我们可以挑选出孔狄亚克作为具有真正哲学见解的人。在某些意义上，狄德罗也可算作一个，因为他的《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1749年）在本质上与休谟的分析一样是危及启蒙哲学家的实证主义的；但是在当时对狄德罗的相对论以及他对未来的一些远见卓识并没有引起反响。他的大多数手稿只是在他死了很久以后才发表的。

像神秘主义作家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思想家至少表明启蒙运动的胜利并没有完全抹杀其他的思想方法。在想象文学领域内有更明显的迹象说明理性时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理性主义最盛行的年代

里，理智与情感之间就发生过冲突。这个冲突是按对自然不断变化的思想来表现的。自然是了解18世纪思想的钥匙。但是这个钥匙打开的不止一扇门。渐渐地，随着人性所引起的社会形态多样化和明显的不合理性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自然也开始不再那么明显地与理智等同起来。对东方文明的了解引起了对异国情调的崇拜。《一千零一夜》在18世纪初已译成法文。埃及向希腊和罗马的名声提出了挑战。中国则更是使启蒙运动浮想联翩。18世纪的旅行家们，如同17世纪的传教士一样，带回来了许多关于未受到文明损害的原始民族安乐生活的报告，使人们对原始主义的崇拜更为强烈。有时，某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异想天开地把一些原始人作为样板带回来，描写这些淳朴忠厚的自然人对充满腐化堕落、尔虞我诈的文明的反应。“回到自然”这个口号的含义此时已跟本章开始时说的意义有所不同。它甚至征服了正统的神学家，因为奥古斯丁会的詹森主义者强烈反对的耶稣会的莫林纳主义神学就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卢梭攻击社会腐败的两篇论文中表达的某些思想就取于这里。赞美野蛮是他写论文之前已为人们接受的思想。他的思想中并无承前启后的那种独创因素，但是这一点正是他强有力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梭通过其天才的文笔横扫了理性的18世纪，把它驱赶进了新的、无底的汪洋之中。汹涌的波涛淹没了理性的干旱土地。但是，我们跟着他也跨越了启蒙运动，迎来了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启蒙运动的情景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由于启蒙时代之光并没有立刻照遍全世界，甚至还没有照遍整个西方世界，启蒙运动给人的印象就更不深刻了。无论在哪个国家，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受到了它的影响。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柯尼斯堡，在它的光芒照射到的中心，周围有一个半明半暗区。在这个区域外面则是一片漆黑。在意大利，甚至在西班牙，新思想只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很不稳固的立足之地。“文明”（Aufklärung）真的变成德国的了吗？刚刚从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什么样的乱箭能穿透它们拜占庭式的梦？至于启蒙运动传布方面的局限性，无疑有其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以及有关知识领域里的解释。启蒙运动的思想只是在占有相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中产阶级中，只是在控制思想的政治和宗教机构已经崩溃或正在崩溃的地方传播和生根，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种社会条件和思想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高度推测性的问题，甚至这种关系的存在在当时也几乎不受怀疑。对理性的崇高信念使18世纪的人们对于他们胜利的范围是有限的，性质是有条件的这一点熟视无睹。他们没有注意到，甚至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可以感受到的有限的地区内，同时出现了宗教复苏的初步迹象，以及前浪漫主义早期作品中的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尽管启蒙运动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弱点，受其影响的范围也很有限，同时不屈从于其理性概念或不承认其普遍规律的世界向它提出了日益兴起的挑战，这个运动还是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它的影响怎样估计都很难说是过高。它在理论方面的不足，由它在实际方面的力量所弥补。后者不是本章的主题。如果要把其力量作为主题，那么就得论及经验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胜利，论及伦理方面的巨大进步和以前从未为人们了解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论及进步力量如何开始消灭有组织的残酷制度。那些自诩为维护法律和宗教的文明之士，曾为了永远保存野蛮的迫害和迷信而与启蒙运动的进步力量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到了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于获得的这些积极的成果很可以感到欣慰。他们同样可以对在知识方面的胜利感到欣慰。1760年，伏尔泰写给爱尔维修的信上这样写道：“本世纪开始看到了理性的胜利。”^[33]他指的是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但是他说得过早了。启蒙运动还须赢得两个最伟大的胜利：两个世纪之后，它的工作仍然没有完成。但是启蒙运动没有猜想到的力量已经在它中间崛起，向它的信仰提出了挑战，而且使它的最终胜利看上去像是一次失败。

（姚乃强 译）

^[1] P. 哈泽德：《欧洲意识的危机》（1935年）。

^[2] D.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根源》（1933年），第27—28页。

^[3] 伏尔泰：《共和思想》（1762年）（《伏尔泰全集》，1877—1885年，第24卷，第415页）。

^[4] 沃伯顿：《教会与政府联盟》（1736年），第68页；法译本，1742年。

^[5] P. N. 朗格莱·迪弗雷内：《与小说相反的有根据的历史》（1735年），第24页；比较其《研究历史的方法》（1713年）。

^[6] 《上帝子民史》（1728—1758年），第1卷，第27页；比较拉博梅·德斯杜萨特的《克里斯蒂亚德》（1753年）。

- [7] 格罗齐：《詹巴蒂斯塔·维科的哲学》，转摘自科林伍德译本（1910年），第20章。
- [8] 爱尔维修：《论精神》（1758年），《对话录》第1部分，第1章（见《全集》，1795年，第1卷，第135页）。
- [9] 狄德罗：《对M. 爱尔维修〈论精神〉一书看法》（《狄德罗全集》，1875—1877年，第2卷，第273页）。
- [10] 《人性论》，第1册，第4部分，第2节。
- [11] 伏尔泰：《纨绔子弟》（1736年），《伏尔泰全集》，第10卷，第83—84页。
- [12] 蒲柏：《论人》，第2部分。
- [13] 曼德维尔：《怨声喧腾的蜂房：或无赖变诚实》（1705年）；《蜜蜂寓言：或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第1部分（1714年），以后经多次修改和增补。
- [14] 索姆·詹宁斯：《对本性和罪恶根源的自由探究》（1757年），第46页。
- [15] 狄德罗：《普拉代神父辩护书的续篇》（1752年），（《文集》，第1卷，第470页）。
- [16] 《论精神》，《对话录》第2部分，第17章（《文集》，第2卷，第323页）。
- [17] 《人性论》，第3册，第3部分，第1节。
- [18] 《论人》，第2部分。
- [19]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第18章（《全集》，1822年，第2卷，第307—308页）。
- [2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7卷（《全集》，第2卷，第228页）。
- [21] 博林布鲁克：《论一个爱国者国王的思想》（1738年）（《选集》，1841年，第2卷，第379页）。
- [22] 《论法的精神》，XI，4（《全集》，第3卷，第6页）。
- [23] 《论法的精神》，XI，6（《全集》，第3卷，第28页）。
- [24] 《卷头语》，1749年版（《全集》，第2卷，第3页），德若古给《百科全书》写的“共和国”条目几乎完全取自孟德斯鸠的思想。
- [25] 德阿尔让松：《日记》，拉蒂莱编，1747年12月27日（第5卷，第142页）和1754年6月（第8卷，第315页）。
- [26] F. 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1755年），第2卷，第245页。
- [27] R. 华莱士：《人类、自然、天命的面面观》（1761年），第109页，他用人口压力效应的观点给自己的论点提供了一个答案，而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尔萨斯所

采用（R. 华莱士：《人类、自然、天命的面面观》（1761年），第114—125页）。

[28] 休谟：《人性论》，第3卷，第2部分，第3节。

[29] 《对帕斯卡思想的评论》（1728年）（《全集》，第22卷，第28页）。甚至在《查第格》（1747—1748年）中，伏尔泰把人看成是“在一小堆泥土上互相吞噬的昆虫”，但他的结论还不是真正悲观主义的。

[30] J. H. S. 福尔梅：《论完美无缺》，载《哲学论文集》（1754年），第2卷，第105—106页。

[31] C. P. 杜克洛：《本世纪风俗论》（1750年），F. C. 格林编（1939年），第49页。

[32] 伯克利：《视觉新论》（1709年）。

[33] 《伏尔泰全集》，第41卷，第41页。

第六章 宗教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1713年的和约表明罗马教皇在欧洲共同的政治利害关系中已变得多么微不足道。在西西里和撒丁尼亚，教皇们长期以来称是他们封地的土地未经罗马的同意便被处理掉了。乌得勒支条约大大提高了新教派首领——英国的权力。普鲁士势力的每一增长都给新教派增添了力量。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其政治后果对罗马教廷殊为不利。那些被称为天主教国王、基督教国王、神圣罗马皇帝，以及在1748年才被授予最虔诚的国王称号的葡萄牙国王，对他们的教会似乎也是假情假义的。他们都只关心不要让过于独立不羁或者受敌对势力影响的人来当教皇。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另一个格列高利七世，或者另一个英诺森三世。克雷芒十一世（1700—1721年）是一个“胆怯懦弱、优柔寡断”的人。^[1]英诺森十三世（1721—1724年）被选为教皇部分是由于他的高龄，因为诸侯们决定不再让一个年轻人担任教皇，以免重复克雷芒十一世任期过长的情况。英诺森十三世年迈体弱，又难以接近，与13世纪跟他同名的那个教皇迥然不同，他只拥有一定程度的外交权限。虔诚的奥尔西尼、多明我会的本尼狄克十三世（1724—1730年）是一个对宗教礼仪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人，但是在行政管理方面无能并易受骗上当。克雷芒十二世（1730—1740年）出身科尔西尼家族，是经验丰富的罗马教廷行政官员，擅长理财。他在当红衣主教时就坚决反对本尼狄克十三世，因此他担任教皇后，首先摒弃本尼狄克十三世的所作所为或者反纵容那些腐败的亲信所干的一切。红衣主教科西亚就是他的亲信之一，做了不少坏事，并为自己的劣迹付出了代价，被监禁在圣安杰洛堡内直至下一次教皇选举会，长达7年之久。不幸的是在克雷芒十二世统治的大多数年代里，他双目失明，卧床不起。普罗斯佩罗·兰贝蒂尼即本尼狄克十四世（1740—1758年），是一位精力充沛，才华横溢、明智豁达、学识渊博、颇得人心的教皇，并受新教徒的崇敬，但许多人认为他对于当时的时髦思想退让过多。原名叫卡洛·雷佐尼科的克雷芒十三世（1758—1769年）是威尼斯人。用吉朋的话说，他“既无他的前任兰贝蒂尼的才智，又无他的继

承人甘加内利的美德”^[2]。跟他敌对的科尔达拉认为他缺乏自信，并因放纵过度而萎靡不振。科尔达拉是一位被克雷芒十四世勉强压制下去的耶稣会历史学家。

这些教皇都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启蒙运动支持世俗的君主制，但反对教会的君主制。教皇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中各派所施加的巨大压力：泽兰特派是些死抱住宗教权利不放的人；王权至上论者是诸侯的代理人；还有一派则主张根据詹森主义路线实行改革。英国的亨利八世不可能完全被忘却。因此，教皇们不大可能超出罗马教廷传统所允许的范围采取开明措施，或者拒绝向诸侯做出让步。他们所能做的是尽力避免损害教廷的权利，而不管他们在实际政治中要做出何种让步。

路易十四在1693年放弃了1682年确立的限制教皇权力的原则，从而打开了与罗马教皇结成联盟的通道。这个联盟的成果之一是《克雷芒通谕》，它是国王强迫软弱无能的克雷芒十一世颁布的。其内容是依照国王的耶稣会忏悔教勒泰利耶所同意的条件起草的，于1713年9月8日正式颁布。它的颁布开始了詹森主义大争论的第二阶段。《克雷芒通谕》批驳了取自帕斯基·凯斯内尔（1634—1719年）所著的《新约全书法文版附关于道德问题的思想》一书中的一百零一个命题。使用的版本是1699年在巴黎出版的，行文经诺阿耶修饰过。诺阿耶当时是夏龙的主教，后任巴黎大主教。此书在法国广泛流传，在英国也颇负盛名。克雷芒十一世在1708年就已经谴责了该书，但是法国不接受其谴责，因为它涉及无法接受的宗教法庭。

受到谴责的错误主要是关于天恩和自然、自由意志和道德纪律，以及宗教权威。凯斯内尔被指责为提出了早已被伊普雷主教詹森（1585—1638年）在《奥古斯丁论》中批驳过的那些错误。他坚持认为天恩是不可抗拒的、异常灵验的，同时认为每个人上天堂或下地狱都是事先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因而它完全排斥人的意志真诚的合作，贬低人的天然美德和天然理性，用一个严厉得令人望而生畏的赎罪纪律把人束缚住，这个纪律使福音的枷锁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凯斯内尔的书读来使人觉得教会是由只有上帝才知道的那些命里注定可以得到拯救的人组成的。这些话可用来摧毁现世的教会，并使牧师的权威显得微不足道。教会权力首先属于全体人员以及必须经过一致同意后才能行使权力（尤其在开除教籍方面）的思想使人想起了

让·热尔松的调和主义。据17世纪时热尔松著作的校刊者、巴黎市政官埃德蒙·里歇的阐明，这种思想是用来维护长老会在政府中的咨询权，以及不受教皇权威控制的在本教派内的裁判权。被谴责的第91个命题触及了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老问题，认为对不公正地开除教籍的担心不应该阻碍人们去履行义务。其目的似乎是想把教会的纪律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为诸侯的利益服务。凯斯内尔的书把阅读用本国语写的圣经，以及作为祈祷者跟神父一起参加公共的礼拜活动都看作一般俗人必须做到的事情，这就似乎对当时的习俗和权威提出了责难。这本书由于是用圣经和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术语写的，激起了耶稣会士的不满。他们是经院神学的卫护者，也是教皇不谬性、广泛的管辖权以及在彼得教区拥有间接权力等的卫护者。

虽然教皇的通谕措辞十分谨慎，以避免惹怒主张限制教皇权力派，但是巴黎的最高法院还是对它持保留态度。法国的教士会议接受它则附有条件，要求主教们与罗马教廷共同担任宗教法官，这就保护了多明我会和托马教派的相类似的关于天恩的教义（属奥古斯丁教义，但允许有真正的意志自由），这也使对第91命题的批驳尽可能不损害臣民对君主的服从。诺阿耶和其他8名主教都承认主教的权力。

“我们只是要求不要让罗马教廷有机会认为我们仅仅是它的命令的執行者而已。”^[3]在教皇和主教们之间，詹森一直是主张教皇极权的。

《克雷芒通谕》的反对者都不是这样想的。1718年卡昂的神学院把教皇不谬论斥之为“无稽之谈”。^[4]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他的死使放宽政策有了希望。有意义的是，雅克·贝尼涅·波舒哀（“小波舒哀”），莫城伟大主教的内子被提名为特鲁瓦主教。多年来耶稣会的势力一直把他拒之于主教团之外。当克雷芒十一世企图阻拦他和其他数人担任圣职，以此强迫他们依从通谕时，摄政在詹森派顾问的影响下发出了带有分裂气味的威胁。更有甚者，1717年3月，桑兹、蒙佩里埃、布朗涅和米尔普瓦的主教们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向一个宗教大会印发了他们反对《克雷芒通谕》的呼吁书。次年，诺阿耶又发表了他的抗议书。这样，法国的教士就分成了“反谕派”和“拥谕派”。“反谕派”得到了巴黎最高法院的支持，并在神学院中拥有强大的势力。“拥谕派”一般得到宫廷的支持，大多数主教站在他们一边。特别是在1718年克雷芒十一世在《牧师的告诫》中谴责了“反谕派”之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韦

克认为找到了一个好机会，使法国教会，或者至少其大部分不对罗马教皇俯首帖耳。他主要与一个名叫路易·迪潘的“詹森派”大学者进行通信联系，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巴黎大主教十分胆怯，而且宫廷对此也比较冷淡。再者，韦克不喜欢迪潘在他的《教会作家作品新编》中对三十九条款发表的意见。摄政调解无效，遂于1720年8月发表宣言，禁止上诉，这个宣言只登在《御临法院》上。1725年，尽管本尼狄克十三世属于多明我会，但罗巴教法会议还是确认《克雷芒通谕》为宗教法规。反对派声称这句话是教法会议的一个书记根据耶稣会的指示用不正当的手段硬塞进去的。1726年，路易十五突然用弗雷儒斯主教弗勒里接替波旁公爵担任首相。波旁公爵是同情“反谕派”的，而弗勒里则敌视一切非国教教徒。次年，在昂布伦举行了一次全国教法会议。这次会议由当地的大主教、本尼狄克十四世的挚友唐森主持，会上一个非贵族的“反谕派”主教——桑兹的苏尔涅主教被贬职去准备圣餐，并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一座萧瑟颓败的谢思-迪厄修道院去。1740年他老死在那里。这次教法会议还谴责了对英国国教教规的辩护，这个辩护是在韦克的帮助下由巴黎圣热纳维埃夫修道院的勒库雷尔拟定的，这是韦克实现英法教会重新联合的一个努力。1728年，诺阿耶屈服了。1729年5月他便去世。到1729年年底，只剩下3个“反谕派”主教。他们死后，都被忠实的“拥谕派”人所接替。

由于法国的主教职位很快都被“拥谕派”占据，也由于弗勒里在教士和神学院中进行了清洗，教士们对《一圣通谕》的反对看上去就更像是一些不顺从的教士反对他们的主教似的。他们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詹森派，还不如说是“里歇派”。他们的思想观点受到长老会思潮著作的影响，发展了里歇的主旨，认为主教的职位不过是某种显贵与尊严，但与一般的教士职位无甚大异。他们的思想由《新教士》广为传播，当局未能将其查禁。据称在罗马教会执事帕里斯的墓地出现了圣迹。按约翰·卫斯理的意见，如果这些圣迹是真的，那么它们“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因为与著名的《克雷芒通谕》直接相违背”。巴黎大主教文蒂米尔，在一个后来成为巴黎最高法院官员的教士为他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谴责了帕里斯的圣迹。这个教士是限制教皇权力论者，但是拥护《克雷芒通谕》。这一派人^[5]神经过敏，轻举妄动，使他们自己名誉扫地，内部分裂。

最后的大冲突开始了。这时的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1746—1781年）采取了诺阿耶曾经用来对付耶稣会会士的办法，命令教士必须从临死的教徒那里索取一份《忏悔书》，这样就使得求助于“拥谕派”教士成为得到最后圣礼的一个条件。这使教士们进退两难。如果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就会受到他们的主教的谴责；如果同意这样做，又会受到巴黎最高法院的迫害，或被监禁，或被流放，或丧失财物。

由于法国的主教们与宫廷勾结得十分紧密，服从宫廷的政策被作为提升的一个先决条件；再者，由于路易十四的继承者们提名的主教人选全部是贵族，因此下层教士的反对活动只能在各地最高法院中的反宫廷的世俗势力中找到支持。许多律师都受过奥拉托利会^[6]的教育，而奥拉托利会是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对手。他们被怀疑为詹森派。他们也不满意贵族担任高级教士职务，这种不满情绪在满腹怨恨的教士中就表现为里歇的教会政治思想。在许多场合，如在反对主教中，巴黎最高法院中的反对派坚持认为，作为形式上的主教的国王有责任在他们的建议下发挥教士的精神作用，以确保社会安定和法国国教的自由。在法国，跟其他地方一样，君主的意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本尼狄克十四世急于中止这场争论。1756年，他发布了一个简短的训令，其措辞是由法国宫廷建议并得到罗马教廷中詹森主义者的赞同，训令既没有把《克雷芒通谕》明确地称为信仰法规，也没有赞同近来惯行的拒绝施行圣事。尽管巴黎最高法院不喜欢这个训令，但实际上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它使《克雷芒通谕》失去了效用。

《克雷芒通谕》的失效在法国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跟其他多数宫廷相比，法国宫廷同罗马的关系要和谐得多。《克雷芒通谕》并不仅仅谴责某个具体教义，而是反对整个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在思想倾向上反对罗马教廷，在道义上极为谨慎，其基础是呼吁尊重圣经和先辈。这个呼吁具有历史性，主张复古，反对传统和现时的应用。某些耶稣会作家根据奥拉托利会会员理查德·西蒙（1638—1712年）的精神，以历史证据不确切为理由，要求一切都要依据教会的传统。他们用宗教现代主义的方式把信仰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对立起来。耶稣会会士贝鲁耶在一本受到罗马教廷谴责的书中写道：“轻率的改良派们连篇累牍的文章和故弄玄虚的旁征博引不足以对付传统势力。基督的信仰必须在罗马教会的教义和它现时的教义中找到。”^[7]另外，詹

森派的宗教宿命论正与霍尔巴赫那样的世俗宿命论相对应。他们诋毁自然理性，同时不合潮流地拒绝承认自然宗教。与之相并存的是对感情的美化，这在百科全书派中很时兴。他们只信奉自然的或“非宗教”的宗教。詹森主义关于人的意志在不可抗拒的神的恩典面前是被动的思想，与情感主义哲学家在认识方面的心智被动说是相符的。因此，保卫理性和道德自由，使之免受宗教和世俗的攻击的任务，就落在像伯杰尔这样的耶稣会会士和其他信奉正统宗教者的身上。詹森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都一致蔑视中世纪。“轻率的改革家们”主张维护君主的权力，因而与启蒙思想家的国家至上论的思想倾向十分吻合。

复古的要求是整个学术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中的大多数伟大作品都不是詹森主义的。从伟大的马比荣（1632—1707年）时代起，圣莫尔教区的本尼狄克教团的僧侣就把他们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寺院和大图书馆变成学者的圣地。爱德华·吉本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回忆道：“牛津大学马格达连学院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来自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本尼狄克教团的大部头著作、神父们编写的书籍以及中世纪的各种册集。”在巴黎的奥拉托利会和圣热纳维也有勤奋博学的人。在巴黎的耶稣会会士中，阿杜安对圣经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校订。莫尔派的蒙特福松（1655—1741年）的希腊文古抄本给研究新约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基本工具。这时出现了打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界限的学术交流。理查德·本特利、J. J. 韦茨施泰因、西奥多·屈斯特尔以及其他新教徒学者在学术交流中得到了友好的帮助。莫尔派的马特恩和杜兰二人，虽然前者拥护《克雷芒通谕》而后者则反对，但为了搜集古代礼拜仪式的资料，他们共同登程寻找。理查德·本特利把从英国得到的资料送给了奥拉托利会的礼拜仪式研究者皮埃·勒布伦。詹森主义者L. E. 迪潘（1657—1719年）和限制教皇权力派的克洛德·弗勒里（1640—1719年）的历史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学者中迅速产生了影响。

这些研究都强烈地要求简化祈祷书和弥撒书。红衣主教托马西（1649—1713年）像杰出的穆拉托里（1672—1750年）一样，完全用经文撰写出供个人用的祈祷书，甚至为短祷写了主祷文。^[8]本尼狄克十四世本来想把托马西封为圣徒，而穆拉托里则被称为“吉本的导师和意大利史泰斗”，他受到本尼狄克十四世的保护，但他绝不是一个教皇至上主义者。1743年，本尼狄克十四世本人，根据伊拉斯谟和奎

格农的精神，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要求用经文和古时神父的语言对祈祷书进行彻底的改革，因为历史方面的批评使得许多前辈们一直认为无可怀疑的东西都变得不可信了。尤其是法国的主教们（当然不仅仅是他们）把主教职区的祈祷书增加了许多，“这些书虽然有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也往往因使用了假古典主义的拉丁语法而显得荒诞可笑”^[9]。特鲁瓦的波舒哀写的弥撒书删去了大量中世纪的宗教仪式。万特米尔不是一个詹森主义者，但是他在他的巴黎祈祷书（1738年）中使用了受到罗马教廷谴责的一本教义问答集的作者梅森居的话，还把查尔斯·科芬的作品用为赞美诗，而科芬在1749年临终时被拒绝施最后的圣礼，因为他顽固地拒不承认《克雷芒通谕》。个别的主教，如阿尼埃尔的朱贝完全采用自己的仪礼和可听懂的教规。到1791年，在法国的130个主教职区中，就有80个放弃了罗马祈祷书而采用了本地确定的礼仪教规。有时这些礼仪教规体现了《克雷芒通谕》所反对的公共礼拜的原则。它们也可以被视为主教们表现出主教职区对罗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主教虽然因与詹森派发生纠葛而被迫与罗马教皇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主张教皇享有绝对权力。他们坚持限制教皇的权力，而本尼狄克十四世则认为限制教皇权力主义是教会软弱的根源，企图用他的《主教职区会议》（1748年，1755年）一书来克服它。在这本书中，他把“反谕派”赞成的用以分散宗教贵族权力的手段变成了对罗马实行集中专制统治的支持。

主教们要求摆脱罗马教皇获得独立，以及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在当地教会中享有的权利是有争议的两个老问题，它们在14世纪时便密切相连，到了18世纪仍是如此。由于教皇软弱无力，君主们在做出触犯教皇的事情时，不需要启蒙运动来相助，但是他们发现这个运动对他们有用。世俗的影响在一些细小但却重要的方面扩大了。尊崇贝拉明为圣徒一事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本尼狄克十四世也不得不默许法国实际上取消庆祝圣格列高利七世的节日，因为这一节日的礼仪所使用的言语令人不悦地带有希尔德布兰特的味道。此外，很有才华的著作也对君主的事业起了作用，其中的论点并不明显地出自新的哲学思想，而大多数来自传统的宗教思想。1722年，保罗·萨尔皮（1552—1623年）的一篇论文在海牙出版，并且很快出了英文版。在这篇论文中，萨尔皮为了威尼斯共和国而支持“君主权利”，反对教皇不正当地驱逐出教或停止教职。齐格斯·范·埃斯本（1646—1728年）是卢万的一位伟大的圣典学者、阿德里安六世学院的教授，有时被称为

“新”教堂法之父。他竭力为乌特勒支背叛的教士会辩护，他们要求把挑选主教的权力交给当地的教士会，并拒绝承认教皇任意开革主教职位的权力（耶稣会士在那里维护这种权力）。他在《宗教共同法》一书中，不承认教皇是全人类的大主教，批评目前教皇的一些权力是建立在伪造的教令的可疑基础之上，他只承认教皇在某些方面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君主的“许可”对于实施教会的法规应具有权威性。他坚持教士有权对教会上级领导的专横行径向世俗的统治者提出申诉。这个观念适用于范·埃斯本本人，直至奥属尼德兰政府发生变动，一个坚决拥护《克雷芒通谕》的摄政上台，他遂于1727年逃往荷兰，次年死在那里。

那不勒斯的律师彼得罗·詹农（1676—1748年）写的《那不勒斯王国民间史》（1723年）是一部专供世俗人阅读的著作。这部著作受到了穆拉托里的赞赏。吉本称它为一本“对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的形成有过间接贡献”的著作。^[10]一个领半薪的船长J. 奥格尔维在1729年至1731年间把它译成英文（这是该书第一次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它对于反对教皇政治是一件有用的武器，说明了“一个精神王国的怪物、一个帝国的帝王是怎样孕育、诞生和哺养成人的”^[11]。詹农写此书是出于一个世俗人对教士权力的不满，也出于一个那不勒斯爱国者对于外国宗教统治者干涉的愤懑。中世纪的教权主义在那不勒斯异常活跃，主张实行教皇宗主权又进一步加强了教权思想，而1713年的和约对此明显地加以忽略。詹农只是那不勒斯反对罗马教廷派中最重要的人物，反对罗马教廷与一般的思想运动不同，他们对于圣职人员充斥本国，并且拥有大量财富以及种种特权十分恼怒。他们具有意大利反对教皇和反对教权的论战的长期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詹农把他的书送给法国皇帝，但遗憾的是，由于误认他是那不勒斯的亲奥地利派，他失去了波旁王朝的保护。

作为律师，詹农首先关心的是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应当各自坚守自己的活动范围。他批评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和巴黎的约翰给世俗当局的权力过大，把正当地属于教会的裁判权给予世俗当局。他认为像英国那样把统治教会的权力交给国王或女王是违背常识的。另外，他在提及罗马教廷时言辞常常带有敬意。这一切都使人以为他是正统派，而且是一名教士。事实上，他引用当时的学术著作（因引用过多而被指责为剽窃）和改革派中权威人士的言论，利用要求复古的呼声

为君主和俗人的利益服务。他怀念中世纪的大人物高级教士之前的年代，那时只有君主行使具有强制性的裁判权，而僧人则从未行使过。他完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解释罗马教廷的权威。对于那不勒斯人的他来说，教皇握有对那不勒斯的宗主权是极大地超越了正当的界限，这是通过阴谋诡计取得的一种授职权。他呼吁教会人士只应关心精神世界的事，这实际上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不只是意大利）反教权人士的共同呼声。这样，他提高了世俗统治者的地位，就可让君主来严密监督宗教法规。他在1731年于维也纳出版的《信仰的表白》中，以尖刻的反语，佯称让罗马教皇主宰世界。在他死后出版的《三重冠》一书中，他赞扬早期福音主义的简朴。那时由长老会的一个领导人实施监督，而尚未出现主教的统治；那时异教哲学和异端仪礼还没有把基督教变为一种异教；那时罗马教皇也还没有通过他的教堂法把宗教作为扩展势力的工具。詹农作为囚徒死在都灵的城堡里。据那里的罗马天主教的教长说，他的死发人深省。他饱含泪水，悔恨自己攻击过教会和教士。

特里尔副主教尼古拉·冯·霍恩泰因（1701—1790年）的出发点与詹农的迥然不同。他的《论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权力》一书是1763年用尤斯蒂努斯·弗布朗尼乌斯的化名出版的。根据这本书的书名，作者写作的目的是“要使意见分歧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团结起来”。为此，他预料会被谴责为又一个萨尔皮、德多米尼斯或里歇。他仿效巴塞尔公会议的方式，向君主、主教和大学里的学者发出呼吁。他相信，罗马教皇至上的权威是神授的，是团结的中心，但是他认为把新教徒们赶出教会的不是罗马教皇至上权威的本身，而是滥用这种权威的结果。为了把新教徒们召回来，必须把教皇的至上权威限制在最初实行的范围之内，即只实行教皇至上的权威，而不是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把被教皇们所窃取的权力归还给君主和主教（这是一再重弹的老调）。他认为教皇只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职位。在这一点上，他与范·埃斯本一致，而且正是在后者的影响下他来到卢万。他的观点更倾向于英国国教而不是天主教，认为圣经和传统只具有相对的权威性。再者，他与路德一样，十分讨厌经院主义。在他看来，在教会的整个机构中只存在有限的不谬性。这样，霍恩泰因加强了公会议高于教皇的议事原则。他常常援引热尔松，而且喜欢艾尼思·西尔维乌斯甚于庇护二世。他坚持认为君主在任命当地教会的教士方面比主教更为有权。他嘲笑贝拉明，认为他对直接权力和间接权力的区分

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他甚至认为一个天主教君主暂时撤回对教皇的服从是合理的，这仅限于社会法规方面而不是在神的法规方面，社会法规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严重不满，而且别无其他手段来解决。这种撤回不是不服从罗马教廷，而只是不服从窃居其位者。这确实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原则，它肯定给并非不平常的做法找到了理由。他几乎为君主们过去用来使教皇们感到恼火的各种手段，包括英国的“教皇尊信罪”都做了辩解。他十分憎恨罗马教廷，呼吁君主们团结起来，一起限制教廷的权利。因此，不到一年工夫，这本书就被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的影响迅速遍及欧洲。

弗布朗尼乌斯与詹农并不是孤立的。弗布朗尼乌斯完成了在德国久有影响的改革派改革神圣人员的工作。他的教堂法符合奥地利大臣考尼茨的反教士、反耶稣会的政策。在那不勒斯，詹农拥有一批有影响的信徒。在西班牙的压力下，克雷芒十二世把那不勒斯的授职权让给了波旁王朝的查理三世。三年之后，本尼狄克十四同意与国王签订协议，其条件似乎受到詹农的原则的启发，而这些原则由詹农的崇拜者塔努西付诸实施。协议甚至同意成立一个教会的最高上诉法院，兼管宗教和世俗事务。但是这个协议并未带来和平，所以塔努西只得继续与教廷做斗争，尽管塔努西其人十分虔诚并深受圣阿方索·利古奥里的敬重。在其他一些地方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而詹农的影响在那些地方并不很大，而且是在“弗布朗尼乌斯”写出那本书之前签订的。1727年，本尼狄克十三世向撒丁尼亚做出很大让步，因而到1731年克雷芒十二世撤回了这些让步。然而，十年之后，本尼狄克十四世做出的让步更大，甚至授予国王罗马教廷主教的头衔，同时把一切有圣俸的神职人员的提名权也给了国王。1740年，葡萄牙国王接受了对全部教区和寺院的圣职授予权。1737年和1753年，罗马教皇与西班牙国王先后两次签订的协议，授予国王巨大的权力，国王力图握有对伊比利亚半岛上教会的全部控制权，正如他在殖民地所握有的全部控制权那样。根据1753年的协议，罗马教皇原先享有的一切重要权力实际上都转到国王手里。

弗布朗尼乌斯与詹农不同，后者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写作，而前者则从广大教士的立场著书立说，鼓吹限制教皇权力的思想。据说，约瑟夫二世是他最好的学生。很自然，这位君主更喜欢弗布朗尼乌斯派的教士，而不喜欢教皇权力至上主义派的教士，但是他

受世俗的影响要大于受教会的影响，并且比之特里尔的副主教更不关心主教的权力。这位副主教1778年受到皇帝的召见后深受感动，决定放弃他的弗布朗尼乌斯主义，1788年经过一番犹豫以后再次宣布放弃。于是，约瑟夫二世抓住时机，使那位罗马教廷不知疲倦的争论者、耶稣会会士扎加利，在1779年把那些博学的天主教徒改变信仰的表白汇集成册。这方面有不少先例，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有里歇、迪潘、诺阿耶、詹农、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等。他未能把伏尔泰收入进去。德多米尼斯的表白只放在附录里，因为他不够真心实意，后来又出现了反复。霍恩泰因对于这些表白不像耶稣会会士那么高兴。部分由于詹森主义在罗马的影响，扎加利在1791年之前未能出版该书。

范·埃斯本、詹农、弗布朗尼乌斯以及其他一些持他们观点的人，夸大了耶稣会会士的权力、影响、智谋和财富。随着欧洲政治逐渐世俗化，耶稣会会士作为欧洲宫廷忏悔师享受的重要政治地位自17世纪中叶已逐渐下降。他们已无力阻止他们的王室忏悔者去推行那些比之新教徒的活动更使教皇震惊的政策。如同在法国，《克雷芒通谕》被认为是他们的过错，是造成不安定的焦点，甚至是1757年弑君图谋的焦点。在罗马本身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如果没有这支力量，反对耶稣会会士的运动也许不会以他们的毁灭而告终。尤其是针对欧洲君主们的敌意，若得不到君主们的支持，耶稣会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

在《克雷芒通谕》发布之前，耶稣会已经遭受过一次挫折。1704年，克雷芒十一世曾希望通过谴责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中所执行的政策来结束无休止的争论。1715年，他再次对之进行了谴责。1742年，本尼狄克十四世明确地肯定了这个谴责。在中国，耶稣会允许他们的皈依者用某些中国的措辞称呼上帝，其中有些措辞根据这些规定是不允许的。耶稣会还允许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礼仪，允许崇拜祖先与孔子（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教皇也禁止这样做。本尼狄克十四世用“十戒中的第一戒”来证明这项禁令是正当的，但是中国的皇帝（他喜欢耶稣会）庄严宣布这些仪礼都只不过是民间的习俗。图尔农和梅札巴尔巴这两位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只是惹怒了皇帝。不管教皇的政策正确与否（莱布尼兹认为是错误的），它表明耶稣会企图使中国统治阶级皈依的努力失败了。接踵而来的迫害使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锐减，只剩下一些穷人和文盲。除了涉及中国的宗教仪礼这样

微妙的神学问题之外，这场反对耶稣会的斗争还无疑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即教区教士和其他教团（尤其是多明我会和圣芳济会）的竞争和詹森派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仪礼斥之为偶像崇拜）以及葡萄牙人的影响（他们不喜欢触及他们教会领袖的独立的宗教活动）等。耶稣会对马拉巴尔改宗者做出类似的让步，也同样遭到了谴责。

耶稣会会士也不甚谙熟世故，他们未能避开与他们的死敌卡瓦略发生对抗。卡瓦略是葡萄牙新国王约瑟夫一世（1750—1776年）的大臣，后来叫作蓬巴尔（1689—1782年）更为出名。根据175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的边界条约，原来在西班牙统治下的一大片巴拉圭土地划归葡萄牙管辖，这个条约牵涉耶稣会，因为他们在那片土地上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传教团。传教士把当地的改宗者集中在一些村子里，称为巴拉圭的“皈依区”。那里的改宗者受到教士的保护，不跟殖民者接触，他们生产商品，通过出售这些商品资助传教团的工作。当耶稣会会士坚决抵制把这些村子强行迁走时，有人就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当地居民的暴乱也被指责为他们的阴谋。传教团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马拉格里达（1689—1761年）煽动地宣传里斯本大地震是因为上帝不赞成葡萄牙的新政府。蓬巴尔在《简述》（1758年）中对所有这些罪行做了解释，此书很快被译成其他文字，在欧洲广泛流传。书中把耶稣会会士描写成一个强大的共和国的主人，把土著的印第安人当作奴隶进行剥削，并企图统治全世界。巴拉圭的“皈依区”可以很容易地使启蒙运动和“新”教会法派的人士产生反感，因为它既是国中之国，又赋予教士以世俗权力，甚至军事权力。再者，他们还控制了其他人渴望获得的大量劳动力的供应。虽然《简述》被西班牙的执法官焚烧了，但它是一篇娓娓动听的宣传品，西班牙的反对使蓬巴尔更加相信耶稣会在西班牙阴谋反对他的殖民政策。1758年，本尼迪克十四世发出了一条简令，授权蓬巴尔的亲戚里斯本大主教萨尔丹达检查与改造葡萄牙耶稣会。作为大主教的萨尔丹达不喜欢耶稣会独立于一般的管辖之外，主张把主教对土著人的管理由教会转交给世俗的政策。通过这些手段，耶稣会的“非法”贸易被禁止了。在一块8年之前他们才控制了政府的土地上，几乎在转瞬之间就把他们的种种特权剥夺得一干二净。

1758年9月3日发生了一起似乎图谋暗杀约瑟夫一世的事件。这一事件使蓬巴尔不仅有可能把叛逆罪加在敌对的贵族身上，而且也可裁

在马拉格里达和其他耶稣会会士身上，这些人至少在政治上是一直不谨慎的。蓬巴尔要求罗马同意对这些教士应跟一般俗人嫌疑犯一样，交由一个新的国家道德法庭审判，而不是交给宗教法庭审判。他进一步要求今后任何犯有叛逆罪的教士应该交给这个新的法庭。克雷芒十二世对于这样明显地侵犯教士豁免权很不以为然，于是1759年8月他在《向我们解释》中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同意当前可以这样办，但下不为例。

根据1759年9月3日的法令（故意挑选的日期），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葡萄牙。1760年6月罗马教皇的使节阿卡尤奥利陷入困境，也被赶了出去。葡萄牙撤回对教皇的服从达10年之久，正如葡萄牙的圣典学者菲古雷多解释的那样，“这是天主教君主用来表示憎恨罗马教廷伤害和轻视他们的惯用方法（当然不冒犯宗教或彼得教皇的最高权力）”^[12]。葡萄牙政府发表的《决定本政府行为的事实和动机的说明》出自蓬巴尔的手笔。他以严峻、愤慨的言辞坚持君主的权利，这些权利尤为教皇的使节所践踏，因为他认为马拉格里达和与他同谋的教士们应该由一个专门的、教皇委派的委员会来审判。“难道能想象……在这个王国中既无君主政体，又无在世俗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君主……没有大臣，没有法庭？”^[13]1761年，马拉格里达受到了葡萄牙宗教法庭的审判，并被野蛮地处决了。当时这个法庭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1770年，科莫布拉主教团谴责“弗布朗尼乌斯”和其他一些著作而遭到囚禁。1766年和1769年，菲古雷多两次为葡萄牙大主教辩护，认为大主教享有批准和授予由国王提名的主教圣职的权力，而不必征得教皇的同意，其论点与弗布朗尼乌斯的论点一样都来自公教会议派。1767年经国王许可，在里斯本出版了西布拉·德席尔瓦的《编年演绎》一书。其中某些章节可能是蓬巴尔写的。此书是对耶稣会的一个全面控告，也是18世纪反教皇主义的一个概述，带有詹农的教会史观点。它是一个宣传品，目的是彻底摧垮耶稣会。1767年当克雷芒十三世企图与葡萄牙和解时，他被告知他不可能求得和解，除非他把耶稣会完全镇压下去。这时，各国波旁王朝的宫廷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葡萄牙政府这种耸人听闻的做法鼓舞了耶稣会在各地的敌人，尤其是它在法国的敌人。这批敌人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耶稣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不够坚定。1757年，达米安企图杀死路易十五。这一事件在

巴黎最高法院中激起了一个反对耶稣会的怒潮，迫使巴黎耶稣会会士不得不放弃杀害暴君与间接权力，接受限制教皇权力的规定。此外，巴黎最高法院把自己树为基督教真理的卫道士。他们首先攻击也受到耶稣会谴责的普拉代神父的现代主义，然后猛烈批评耶稣会会士阿杜安和贝律埃写的《上帝子民的历史》，以此来揭露耶稣会怎样把自己置于教会权威之上。耶稣会最终的灾祸则是由拉瓦莱特过于庞大的财政计划引起的，他是耶稣会在马提尼克岛上布道团的团长。他的债主们因无法收回他所欠的债款，便企图向法国的耶稣会讨取，法国耶稣会竟愚蠢地诉诸巴黎最高法院的律师，而巴黎最高法院正好是詹森主义反对派势力在世俗界的集合点。1761年，根据德舒瓦瑟尔神父的动议，最高法院要求耶稣会交出其章程，以便对之进行审查。最高法院审查后做出的裁决是：耶稣会在法国的存在是不合法的，至多只能容忍其存在；就目前情况而言，他们的章程是与法国的准则不相符合，也与任何保持良好秩序的政体的准则不相符合。法国的大多数主教都公开表明他们赞扬耶稣会，但是“代价是做出了种种有损于罗马教廷尊严的承认和宣言”^[14]。尽管法国的耶稣会接受了限制教皇权力的原则，但是他们却未能取得罗马耶稣会会长里奇的让步，那就是会长在那个国家的权力允许由住在该国的副会长来行使。这是一个强大的教士团体被指控俯首帖耳地服从王国外面一个权威时进行辩护的唯一办法。因此，如果法国的耶稣会取得了里奇的这个让步，他们也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这位会长并不是一个奸诈的耶稣会会士，他没有采用“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来做掩饰。1764年12月1日，巴黎最高法院宣读了国王的一道敕令，终于把法国的耶稣会镇压了下去。尽管克雷芒十三世在1765年1月7日的《教皇通谕》中称赞耶稣会章程优异卓著，但是它并没有能够阻止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耶稣会于1776年遭到镇压。帕尔马的耶稣会于1768年遭受镇压，以及1773年不幸的克雷芒十四世这位波旁王朝淫威的无可奈何的牺牲品最后解散了耶稣会。

镇压耶稣会与其说是宗教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治国策略的胜利。耶稣会的敌人的宗教思想并没有扎下根，而像忠于“圣心”之类的大众信仰却深入人心，站住了脚跟。耶稣会鼓励这种信仰，而他们的批评者则加以谴责。罗马新的传教团体以及新成立的修道会，如基督教兄弟会（1680年）、蒙难会（1727年）、超度会（1732年）等都是效忠于教皇的。对耶稣会的镇压也是对国外布道团的一个严重打击。另外，或许可以根据他们的思想倾向，即从他们与哲学上的敌人爱在某

些共同点上发生争论来看，他们在法国至少是一伙“很可能找到某种办法把传统的权威和18世纪信仰协调起来的人”^[15]。毫无疑问，他们这时为他们早先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胜利。他们由于支持教皇的权威并且主张教士干涉政治而失败了。他们的敌人一般不是不信仰宗教、一心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无神论或普及科学知识的人，而恰恰是一些基督教徒，只是过于重视基督教君主在精神事物方面的权威。他们这样做是对那些认为宗教豁免权和宗教特权对于宗教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人（本尼狄克十四世似乎不属于这类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动。宗教豁免权和特权符合中世纪的统治，而不符合近代国家。

时髦的高教会派牧师罗伯特·索斯博士曾这样说过：“使新教在基督教世界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唯一教会是英国国教。”^[16]大陆上的新教徒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敬重似乎超过了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对教皇的尊敬。像教皇们一样，坎特伯雷大主教们，这些教皇的替身，都是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人。1716年至1737年，威廉·韦克（1657—1737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这位具有欧洲眼界的宗教政治家使教区大为增色。用一位日内瓦观察家的话说，他是“无愧于使徒时代的高级传教士”^[17]。尽管如此，英国国教保留着一个古老的组织形式和一个中世纪的法院系统，而且，虽然在富裕的兼圣俸者和贫困的副牧师之间存在着隔阂，韦克从不怀疑英国的教会是世界上组织得最完善的教会。正如在他写的《罗马教皇神父的使徒书真迹》（1693年）一书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原始教会的方式方法“与英国国教目前的教义和纪律完全协调一致，像是用法律确定下来似的，因此承认一方是正当的，就没有理由把另一方作为例外加以反对”。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主教的地位信心十足。他有着拥有大主教权力的威严感。他成为主教之前，在1703年曾这样写道：“维护主教的神权吧！它是我们的先辈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虔诚努力维护的。”^[18]另外，韦克不喜欢牧师会和普通的高教派英国国教徒，厌恶天主教，并竭力维护基督教君主在教会中的权力。他全心全意地接受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英国国教与外国的新教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信仰”。他（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随时准备帮助遭到迫害的新教徒，正如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受到迫害时那样。他努力促进新教徒内部的团结，并与他们加紧团结，以加强反对罗马的共同事业。

韦克的继承人约翰·波特（1737—1747年）也非常满意英国国教，认为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它像在它之前的其他的古老教会一样，既保持了自己固有的权利，又取得了行政长官的合法特权”^[19]。托马斯·赫林在波特去世后从约克调至坎特伯雷。赫林为人宽厚、正直、谦恭、善辩，又不拘泥于教义。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忠实的辉格党人（1745年时在约克郡当一名辉格党人是十分有用的）。他被某些人认为具有自然神论的倾向。用霍勒斯·沃波尔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和善的好人，倾向于中庸之道，对于宗教上华而不实的那一套毫无热情”^[20]。跟前任的两位坎特伯雷主教相比，他更完全属于18世纪，很少关注教会行政制度。在马修·赫顿担任一年首席大主教（1757—1758年）以后（他也是从约克调来的），原牛津主教托马斯·塞克接任坎特伯雷主教，直至1768年。乔治三世的即位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在“处理任何事情或对任何人的品行问题”都故意避而不与他商量。^[21]

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教相比，英国的主教跟世俗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主教是由王室提名的，而且把那些表现良好的主教从贫困的教区调至富裕的教区作为一种奖赏。通常，政府可以在上院中获得20票，因为在那里主教们“抱成一团，支持任何带有宫廷气味的提案”。^[22]另外，他们的顺从是有限度的。学识渊博的沃波尔的“沃尔西”、“吉布森教皇”、伦敦主教就为了永远管业权和教友会的什一税的立法问题与政府发生过争吵，因为这些法律是按辉格党反对教权主义的精神来制定的，而这种精神对教会是致命的。1717年公教会的停开，使英国国教不因主教和教士之间的长期冲突弄得无所适从。这种冲突是几十年来法国教会生活中的祸根，在英国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741年，沃波尔同意举行公教会，下院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反对上院的权威。韦克本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在安娜女王统治时期反对党的长老派主张，以及他们的类似里歇取自热尔松的立场。

英国接受汉诺威继承王位，以此来防御天主教势力的扩展。这样就及时地拯救了英国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免遭激烈的托利党人针对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教会分立法和临时遵奉国教法的毁灭性打击。不信奉国教者人数不多，但是不可轻视。他们的势力在汉诺威王朝统治的最初几年里似乎有点下降，其原因或许如大主教韦克说的那样，正因为他们受到容忍，或许因为他们过去支持的加尔文主义似乎过时了，也

可能因为他们的宗教热情为理性主义所削弱了。他们在发展当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大大超出了他们在人数上所占的比重。由于英国的大学是英国国教的专有领域，因此不信奉国教者就在北安普敦、沃林顿、哈克尼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创办他们的高等学府。他们开设的课程比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更多，包括近代史、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比传统的基础教育更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课程。这些学院拥有一批博学多才的学者，如讨人喜欢的、折中学派的菲利普·多德里奇，待人诚恳的艾萨克·瓦茨，业余的统计学家理查德·普赖斯，以及博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等。这些学院也许对这样一些个人依赖过多。他们一直举棋不定，把学院办成教士的讲习所，还是办成世俗的研究院，因而也受到一些损失。它们造就了一些当时最重要的英国圣公会教士，如达勒姆主教约瑟夫·巴特勒、坎特伯雷大主教塞克、老塞缪尔·卫斯理以及T. R. 马尔萨斯。不信奉国教者对英国的宗教做出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用方言唱圣歌，为卫理公会教徒用方言唱圣歌开创了先例。

虽然英国的不信奉国教者并没有遭受到像法国、巴拉丁领地、匈牙利和萨尔茨堡等地新教徒所经受过的种种迫害，但是他们还是遇到了令人烦恼的限制和侵扰。1727年，伦敦及其周围的长老会、独立会和浸礼会等教会的教长们自行组成了“不信奉国教的三教派新教牧师总会”。5年后，又出现了一个与之平行的普通教徒的组织——“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代表会”。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及其附近（最初是离伦敦10英里之内，后为12英里之内）的三个教派的每个教区每年推选的两名代表组成。这些代表非常缜密、机智地保护着全国各地受压迫的同宗信徒，使他们免受大大小小的对民权的侵犯。不信奉国教者自然希望辉格党政府废除查理二世颁发的宗教考查法和社团法，但是他们实际上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于1718年废除了临时遵奉国教法和教会分立法（此时韦克大主教也反对这些法令）；1723年起王室给牧师遗孀的抚恤金；1718年安定社团法；以及从1727年起几乎年年颁发的赦免法。政府害怕损害教会的利益，因而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1739年只能对钱德勒博士说废除宗教考查的时刻将永远不会到来。代表会赢得的最大胜利表现在伦敦司法长官的任命上，事情的起因是伦敦社团任命富裕的不信奉国教者担任司法官员，但他们拒绝按照临时遵奉国教法来取得资格，于是就因他们拒绝任职而罚缴重金。1767年，不信奉国教者向上院申诉，他们拒绝付罚款的行为得到了支持。

在英国，像在欧洲大陆一样，政教关系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国家至上论。1734年，哈德威克勋爵作为大法官在“米德尔顿对克罗夫特案件”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决：教会法规只有经议会批准才适用于俗人。关于教士在国家中的地位，其论点与韦克大主教曾使用过的论点完全一致。韦克在年轻时曾用这些论点来反对弗朗西斯·阿特伯里提出召开公教会的要求，依他的论点，公教会似乎完全不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立法机构，而“只不过是一个基督教会组织……在有关教会的问题上向国王提供建议和帮助”[\[23\]](#)。1753年哈德威克制定的婚姻法尽管使英国的教士成了婚姻的垄断者（而且排除了不信奉国教的牧师），它实际上是世俗的权力侵犯了传统上属于教会的领域，然而主教们对这个婚姻法采取了霍勒斯·沃波尔称为漠然置之的态度。

不信奉国教者组织起来，在法律上又得到了宽容，这就有必要对英国国教的理论做某些背离都铎原则的改变。以不矢志派的名义，查尔斯·莱斯利（1650—1722年）在他的《国王和教皇之争》（1700年）一书中嘲弄了当时的英国国教把贵族绅士变成自然神论者，把平民百姓变成马格莱顿派。莱斯利是国家至上论、自然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论的著名对手，而所谓不矢志派就是在1689年拒绝效忠于奥兰治的威廉以及在1702年拒绝公开弃绝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觊觎者的那些饱学之士。莱斯利坚决主张教会在精神上的独立。与莱斯利完全相对的是当时任班戈主教的本杰明·霍德利（1676—1761年）。他在1716年发表了《对付不矢志派的原则和实践的有效办法》一书之后，在1717年又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强调指出基督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因此，现存的教会、教士、教义和圣事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主教的使徒权威也应完全解体。这些意见大大地触怒了下层教士，以至于1717年的公教会就因为他们反班戈的喧闹而中止了。格洛斯特主教威廉·沃伯顿（1710—1779年）在他的《政教联盟》（1736年）中，对英国国教提出了一个更能被普遍接受的中间观点。这个观点与其说迎合了理查德·胡克关于教会的严格教义，还不如说更投合了约翰·洛克的政治论点。沃伯顿既不对眼前的教会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也不谴责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而是把教会和国家放在一起结成一个由两个社会组成的联盟，各有其目的，“国家的目的……功利；教会的目的……真理”；教会通过一种宗教考查法得到国家的保护。沃伯顿虽身为主教，却赞成在苏格兰建立一个长老会的团体，如同在英格兰建

立一个主教派的团体一样，其理由是“如果在非常议会时期，英国有一个以上这样的宗教团体，国家就会跟这些团体中最大的一个结成联盟”。^[24]

德国的学者必须针对许多地方教会不同背景来考虑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当地的君主在他自己所确定的“国教”中行使“总主教”的权利。再者，在地方教会中有着两种显然不同的宗教派别——路德派和改革派。“臣民随着领主选定宗教信仰”的老原则至今被彻底打破，结果在普鲁士的领土上，一个改革派传统的家族统治着两个宗派的臣民，而在勃兰登堡又统治着绝大多数人信仰路德派的臣民。在18世纪，萨克森、符腾堡和黑森等新教公国归罗马天主教统治者统治。1740年以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掌握了信仰天主教的西里西亚。巴拉丁领地的新教徒在整个18世纪一直备受迫害。1728年当兼任主教的萨尔茨堡公国的君主把新教徒臣民驱逐出境时，英国的教士利用“普及基督知识会”（S. P. C. K.）这一机构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受迫害的“巴拉丁人”移居到奥格尔索普将军在乔治亚新建立的殖民地去。大批地方教会出现的结果之一是大学的影响扩大了。大学中的法律教授们异常活跃，积极传布启蒙运动思想来影响教会政体的问题。在德国存在如此多的小“国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关于教会的教义以及关于教会权威的观念比之英国大主教吉布森、威克、波特和沃伯顿等人著作中所阐明的要更为软弱和不坚定。普芬道夫提出的关于绝不能把教会作为一种政府机构来对待的原则（实际上为弗布朗尼斯所利用）表达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看法。哈雷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教授（1655—1728年）就否定教会治国的思想，认为它与君主的权力是不相容的。蒂宾根大学的虔信派校长C. M. 普法夫（1686—1760年）在他的《教会法的起源》（1719年及其后）一书中曾竭力“维护教会的精神权利而不破坏德国国教的国家基础”^[25]，但是他仍然认为教会只是国家内部的一个社会团体，也就是用其成员一致同意的公约组织起来的一种集体。它的建立和尔后的活动都要受地方行政长官的监督。正如他把一切涉及强制施行的教会法规——“绝对的神圣法规”归于行政部门一样，他特别强调婚姻法规也应该由行政部门掌管。这样，尽管他对行政长官如何有节制地使用教会权力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是事实上在他的“社团体系”中并

没有真正限制国家至上论，而国家至上论尤其是由路德派从宗教改革运动中继承来的。

虔信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十分相似，因为它们都把矛头指向教权主义。它们都反对经院神学。两者都致力于削弱现实教会的外界权力。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1635—1705年）就力图用一个仁爱的宗教来替代枯燥无味的路德派的“正教主义”。虔信主义者求助于路德早期的教会民主的思想，甚至认为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是不正当的。斯彭内尔把他的皈依者组织起来，成立虔信主义社团，相互进行教化和研究圣经。他非常注重自觉改宗，而不一定要求立即改宗。他的学生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33—1727年）把新成立的哈雷大学变成了虔信主义的中心，约翰·卫斯理说弗兰克的名字“实际上成了宝贵的灵丹妙药”^[26]。他在哈雷创办了一个很大的孤儿院。他还是翻译圣经的积极倡导人。新教徒传教团去海外传教的第一个推动力是来自哈雷。虔信主义者也创作了通俗的宗教文学，弗兰克的女婿A. 弗赖林斯豪森（1670—1727年）成为他们这一派的圣歌作者。虔信派虽不是唯一的一些人，但他们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伙人，利用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理性主义对宗教的肤浅认识，而理性主义后来在德国压倒了虔信主义，甚至在哈雷也是如此。他们也由于宗教中的个人主义和像戈特弗里德·阿诺德（1666—1714年）这样一些人对正教派采取显然置之不理的态度而使理性主义更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但是无论宗教个人主义还是对正教派的冷漠态度都与坚定的圣职精神很不相符的。

马克·帕蒂森在他的一篇十分著名的论文中曾这样写道：“理性主义”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是“一种统治着所有人头脑的思想习惯”^[27]。正教派和异教徒一样都诉诸理智，而不诉诸权威或感情。洛克的《关于信教自由的信札》（1685年，1689年）把教会看作只是国家内的一个自发组织。他的《论经书中表述的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为他的两个自然神论的信徒铺平了道路。他们是约翰·托兰和马修·廷德尔，前者认为“基督徒并不神秘”（1696年）；后者认为基督教和“创世说一样古老，圣经是自然宗教的再版”（1730年）。与来自牛顿和洛克的自然主义同时存在的还有关于圣经的新学术，这种新学术有时被一些学识不甚渊深的人用来达到“批判”自然神论的目的。理查德·本特利是一个信奉正教的教士，他企图对约翰

• 米尔（1644—1707年）的版本进行校勘，并订出曾为奥里金所熟知的新约文本。同时，在欧洲大陆上，在本特利知道的情况下，约翰·詹姆斯·韦特斯泰因（1693—1754年）在1730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的《绪论》；1751年，他又在阿姆斯特丹抗辩派神学院的庇护所里出版了一本经过仔细校对、附有注释和异文的希腊文的旧约书。1942年在蒂宾根，柏林大学教授J. A. 本格尔（1687—1742年）按语系对圣经原稿进行分类，这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他的《指时针》（1742年）成为约翰·卫斯理的《新约笔记》（1754年）的基础。

对于神经过敏的教士来说，正如本特利对韦克和阿里乌派的塞缪尔·克拉克哀叹的那样，这些对圣经的研究似乎是支持了危险的立场。克拉克和他的信徒们利用了已证明为伪造的“使徒约翰的逗点”。在《三位一体的圣经教义》（1718年）一书中，克拉克认为只有耶稣基督共同永生说是符合圣经的，而尼西亚和亚大纳西信经所提出的圣体共在论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因而他希望这些信经从公众的祷告书中删除掉。浅薄的安东尼·柯林斯在受了米尔的3万个异文（大部分并不重要）的启发下于1713年写了一篇论思想自由的轻率文章。自然神论批评家中最伟大的人物科尼尔斯·米德尔顿（1683—1750年）通过否认宗教奇迹似乎也威胁到圣经中的奇迹；同时他通过某种成熟的论证为19世纪的历史性批判铺平了道路。甚至完全信赖教会的罗马天主教徒也从对圣经的损害中得到好处，因为一般认为圣经是新教徒的信仰。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由于虔信主义影响的扩大，批判圣经的势头慢慢减退下去。当虔信主义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它在德国却衰落了。理性主义的批评在德国取得了“在英国难以想象的”巨大胜利。^[28]尤其是哈雷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7—1754年）似乎如此有力地强调自然教，以致几乎把早已被普芬多夫细致地批驳过的立场又复活起来。沃尔夫在哈雷的继承人J. S. 泽姆勒（1725—1791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虔信主义者，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圣经评论家。他与塞缪尔·克拉克一样认为尼西亚的基督学是背离天启教的。沃尔夫的信徒、汉堡大学的东方语言教授赖马鲁斯（1694—1768年）几乎完全拒绝天启思想本身。后来莱辛把赖马鲁斯的论耶稣复活和“论耶稣和他信徒的目的”两篇有争议的论文发表了，当时莱辛在神学批判方面还不为人所知。在同一领域做出努力的还有其他一些更为正统的人，如J. A. 埃内斯蒂（1707—1781年）、J. D. 米夏埃利斯（1717—1791年）以及J. S. 艾希霍恩（1752—1827

年）。米夏埃利斯的学生艾希霍恩依据法国人让·阿斯特律克写的关于摩西篇的《猜想》一书，以及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洛思论希伯来诗歌的讲稿（这两部著作都在1753年出版），在1781年发表了对旧约做出全面评论的第一本著作。1826年听过艾希霍恩讲课的普西博士认为他的评论很尖锐，但是也掺杂着许多对宗教不敏感的成分。

国家至上论、虔信主义以及理性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提出的基督教重新联合的种种计划之中。在英国，主张把正统的不信奉国教者都包括在英国国教之内的思想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是没有得到赫林大主教有力的支持。

1753年，一位匿名的英国国教牧师这样写道：人们的思想现在平静下来了，愿意听听理智的声音。高教会和低教会之间可悲的差别被放置一边。英国国教派对于不信奉国教者比以往表现得更为宽容谦恭。不信奉国教者对国教的看法也变得更为温和。因此，我们似乎变得心平气和，愿意聆听真理和理智了，承蒙天恩，我们可以与大多数不信奉国教者重新联合起来。[\[29\]](#)

这位作者虽然是一位信仰三位一体论者，但是为了团结的目的，表示愿意对当时通用的过于冗长重复的祷文做出修改。他愿意删去亚大纳西信经和下地狱之说，废除荒诞和迷信的四旬斋，还废止在他看来从布塞尔那里继承来的那种散播神秘的教义问答。他把圣餐式修改得符合“祖因里乌斯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确确实实是个好意见，故而受到我们教会会员最广泛的欢迎”。[\[30\]](#)除了有助于包容其他教派的公祷文之外，还为了克拉克神学的利益编写了其他一些文式。多德里奇的朋友约翰·琼斯怀着这个目的建立了一个天主教基督会。杰出的威廉·惠斯顿在汤布里奇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一篇“阿里乌式”的公祷文。塞缪尔·克拉克留下了一本作为注释的祈祷书。西奥菲勒斯·林赛（1723—1808年）在准备为埃塞克斯街教堂做的一篇公祷文中便应用了这本书。1772年他脱离英国国教后就希望在埃塞克斯街教堂成立经过改革的英国教会。克拉克在长老会中的影响比在国教中要深广得多。1719年在萨尔特山举行的一次不信奉国教者的著名集会上，那些拥护克拉克教义的人们与他们更为正统的教友们分裂了。他们像一度曾是英国国教徒的林赛一样，一般都倾向更为明确的唯一神教论。

韦克大主教在1718年不仅忙于法国天主教会的活动，而且也忙于处理“对外国新教徒至关重要的事务”。^[31]根据英国国教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严格区分非主教派的外国新教徒和英国的不信奉国教者。前者对罗马教廷的错误持异议，而后者则蓄谋反对天主教的纯粹的使徒权力。他情愿把有效的主教继承权交给正统的外国新教徒，只要他们愿意接受16世纪宗教改革者不愿放弃的那些东西。在欧洲，教义不像以前那样严格了，这为路德派和改革派的重新团结提供了希望。三位瑞士神学家——日内瓦人J. A. 特里蒂尼（1671—1737年）、巴塞尔人塞缪尔·韦兰弗尔斯（1657—1740年）和纳沙特尔人J. F. 奥斯特瓦尔德（1653—1747年）都为在“一个合理的正教”基础上实现联合而工作。^[32]他们认为英国国教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在日内瓦教会中享有很大权威的特里蒂尼成功地使日内瓦教会放弃订阅《瑞士评论》。这本刊物公开表示深信圣经中的一点一画都包含着灵感。英国的乔治一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22年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防止它再强加于人。特里蒂尼在1718年说服韦克写信给瑞士的神学家们，向他们鼓吹英国人在非实质性的问题上同意保存分歧，以及不用那些不必要的信条去加重信徒们的良心负担等习惯做法。他把这些说成是新教徒团结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确实英国人常常十分信任他们自己教会的立场。1720年，雅克·塞切斯发现难以说服圣奥尔本斯的教会人员相信坎特伯雷主教在管辖日内瓦方面存在某些障碍。改革派中某些人对古祷文的兴趣似乎加强了重新联合的希望，他们甚至借用罗马弥撒中的祷文。英国的教士们怀着兴趣听到奥斯特瓦尔德在纳沙特尔使用的那篇祷文，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取材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无可比拟的祷告书的。

韦克大主教几年来也一直关注着英国和普鲁士教会联合的计划，这个计划首先是由腓特烈·威廉一世提出，并受到摩拉维亚主教丹尼尔·恩斯特、雅布隆斯基的热情赞助。各色各样的困难挫伤了这个联合的计划，其中最大的困难也许是乔治一世的汉诺威随从们不愿意联合。腓特烈·威廉一世跟他的前辈腓特烈一世一样，从英国国教那里看到了他希望在本国建立的那种教会。1717年宗教改革二百周年纪念（1817年的三百周年纪念亦如此），连同新教徒反对《克雷芒通谕》的强烈情绪，都促进了德国新教徒联合的发展。此外，普鲁士国王在那里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符腾堡的虔信主义者普法夫为这一事业积

极进行宣传。他对诸如主教的继承等这样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极为关注。1723年，他在哈雷出版了一本论述联合的论文集。这种“蒂宾根式的和平”过去是朋友，现在则具有敌意了，它被人轻蔑地嘲笑为“和平，喇叭，火，剑”了。在宣传失败之后，国王企图利用他的领土上的优越性和集中的行政行动来实现他本土上各个教派的联合。这种行政行动是通过一个发展中的负责教会事务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的，如规定群众的礼拜和对牧师的训练等。他本想把牧师候选人限制在他自己领地里的大学里培养，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同意他们只需在哈雷修业两年即可。他还企图通过法令使路德派的宗教习惯和改革派的习惯统一起来，其办法是尽快地消除那些中世纪的遗风与遗物，如祭坛、蜡烛、圣体匣、忏悔室以及十字襟等。虽然他在这方面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因为虔信主义和启蒙运动也都反对礼拜仪式，成了他的同盟军，但是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甚至1736年的巡视也未能完全根除从路德本人那里继承来的旧习俗。约翰·卫斯理在两年之后访问离普鲁士领土不远的萨克森时，还沿用了这些旧习俗。在雍容大度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国王作为最高主教来施加王室压力的方式被取消了。

朴实单纯的信徒的保守主义是对各个教会发生转变的一种制约力量。除了保守主义外，英国国教在普通的祈祷书里有一个正统的、经文的公祷文。这种祷文到这时一直为教士们所喜爱，同时惠特利的《理性的说明》这样一些被广泛传诵的文章以及像罗伯特·纳尔逊的《节日和斋戒》那样被人喜爱的书，都支持英国国教。约翰逊博士在1776年曾把《节日和斋戒》一书称为“在英国除了圣经外最畅销的书”。纳尔逊的书，像《人的全部义务》，着重阐述生活中的普通义务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并谆谆教诲大家要尊重教会和圣经。《理性的说明》和《人的全部义务》都提出要恰当地使用个人的忏悔。为有闲和有学问的人写的约瑟夫·宾厄姆的卷帙浩繁的《基督教的趣闻轶事》（1708—1722年）蜚声欧洲。虽然书的作者指责了外国的礼拜仪式者只是“给罗马教会的新仪礼装饰了一个古老习俗的外表”，但是从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并非没有为英国国教现时的一些习俗进行辩解的动机。虔诚的古老理想远没有被遗忘，甚至有些人还梦想恢复禁欲主义。在不矢忠派中，正如在许多高级教士中那样，圣餐会和祭祀受到了有力的维护。博学的乔治·希克斯在他教堂里使用的那本1549年版的祈祷书，使不矢忠派分裂为两派。1718年，一本不矢忠派

的祷告书出版了。它像托马斯·迪肯的1734年祈祷文一样，反映了东方礼拜仪式的影响。在英国国教内部，对变质说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它违背理性和规律。不偏不倚而十分微妙的沃特兰德教义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它既避开了罗马天主教教义，也避开了茨温利的教义。他们很少举行圣餐会，即使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每月也很少超过一次。据说，这样反而“可以使圣餐会举行得更有宗教性，更隆重”[\[33\]](#)。

英国正统的护教论者对自然神论提出的挑战挺身而出。托马斯·舍洛克对复活叙述的辩护就是一个直接的胜利。沃特兰德对三位一体的辩护则更有说服力，它比年长的舍洛克所做的同样的辩护或沃伯顿在其独特而巧妙的《摩西的神圣使命》（1738—1741年）一书中对旧约的处理都更令人信服。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理智胜任一切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抨击。劳和贝克莱对此做过类似的抨击，而达勒姆主教约瑟夫·巴特勒所做的批评则谨小慎微。他特别强调良心高于理智。在他的《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与自然的结构和发展的相似》（1736年）一书中，他向人们表明基督教至少与自然神论者的自然宗教一样可信。作为高级教士，他认为有一个现世教会是十分必要的，它应具有“一个确定的教育方法和确定的外部宗教形式”[\[34\]](#)。

尽管许多教士十分虔诚，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向慈善学校、习艺所和医院提供了大量的捐款，但英国国教在向新的工人聚居区进行必要的宣教工作时，仍然由于组织不灵活而受到影响。这些地区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口。教会通常宣扬的那种理性的虔诚，严肃有余而热情不足，因此在把误入歧途的人们从往往具有残忍性质的野蛮和异教中拯救出来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感情成分的活动，就不复需要了。这种虔诚缺乏传教的冲动力量。摩拉维亚的兄弟信徒带来了德国虔信主义的温暖，对英国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他们主要是通过激发早期的卫理公会教徒的热情来施加影响的。1722年，斯彭内尔的教子和弗兰克的学生路德维希·冯·亲岑道夫伯爵在他的萨克森的贝尔霍茨多夫庄园里接待了一群遭受迫害、出外寻找栖身之地的波希米亚的兄弟信徒。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赫恩霍特（洛兹山）居民区。亲岑道夫很快成了他们在宗教上的独裁者。摩拉维亚社会的居民受着最严密的监视，以致连柏拉图的方济各会派的修道院院长们都不可能发现他们在婚姻方面有任何越轨的行为。罗伯特·索西曾说过：“除了有退出这

个社会的权力之外，在赫恩霍特就像在修道院一样，没有任何个人的自由，甚至比在耶稣会的悔改所里更不自由。”^[35]除了他们神学上的特殊情况之外，正是由于这个严密组织像煞有介事的做作以及伯爵个人的独裁统治，使他们受到了攻击，其理由是18世纪典型的借口，说他们的存在（正如耶稣会的存在一样）与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组织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有一个时期确实被驱逐出了萨克森。有一个普鲁士的宫廷牧师这样写道：“有关他们内部的事务都是精心策划的。事实表明他们的领导人在逐渐挖他们所定居的那些国家政府的墙脚，企图建立国中之国。”^[36]伯爵不过是希望在现存的为不同教派组织起来的教会范围内，根据彭斯内尔的模式建立一个包括一切虔诚社团在内的摩拉维亚教会，实现教徒大团结。如果这个设想实现的话，那么就可能找到一种促进新教徒联合的方法，但实际情况是，摩拉维亚人是不可能被国教所容纳的。1727年，摩拉维亚礼拜仪式的确定；1737年，亲岑道夫就任摩拉维亚主教；以及因他的慷慨而险遭破产的危机（这是因他认为有必要为其教徒成立专门的财政机构造成的）；这种种都成为分裂的因素。摩拉维亚人在当时新教的传教士中占的人数最多。他们在格陵兰和拉布拉多把当地的皈依者组织成为一个个传教区，类似于耶稣会在巴拉圭建立的传教区。到18世纪末，他们在世界各大洲都有了传教团。

他们在英国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给约翰·卫斯理确定了新的方向。卫斯理兄弟有杰出的父母，他们原来属于不信奉国教派，后来成为严格的高教会成员。1729年，由查理开创的牛津“圣社”在传统的高教会性质的宗教活动，如斋戒、圣餐礼和慈善救济事业等方面十分活跃。他们的举止行为都具有在世俗的大学生中令人瞩目的那种独特的宗教风度。这些人在把威廉·劳在《虔诚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号召》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付诸实现。该书才思横溢、语言严厉。约翰·卫斯理在佐治亚的传教活动失败之后，于1738年回到了英国。他在佐治亚由于过分强调高教会祈祷仪式的规定，也由于爱情生活处置不当，与当地的居民发生了矛盾。他回国后发现“圣社”的另一名成员乔治·怀特菲尔德已把“卫理公会”这个名字弄得闻名遐迩了。怀特菲尔德运用他非凡的口才，传教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从而得到了杰出的亨廷顿伯爵夫人塞利纳的青睐。1739年，他开创了露天传教的重要先例。约翰·卫斯理在去佐治亚的旅途中，被一伙摩拉维亚人迷住了，

他们现实而热烈的虔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回来后从彼得·贝勒那里得知他从未有过那种自觉战胜罪恶的救世信念，因此，他感到自己以往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基督教徒”。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1738年5月24日在伦敦奥尔德斯盖特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皈依的，那时他感到自己的心“异常温暖”。在这个重大经历的影响之下，1738年6月11日他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惊人的布道演讲，宣称救世信仰的本质“不仅仅是纯理性的东西、一种冷漠无情的赞同或者头脑里的一连串思想，而是内心感情的表现”。虽然卫斯理声称卫理公会派教义与“人们所认识到的英国国教的教义”无多大区别，但是他的有代表性的教义却在摩拉维亚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了。他成为1738年5月1日在费特巷成立的第一个“英国国教——摩拉维亚——卫理公会”社团的成员。同年，他又去赫恩霍特朝圣。

1739年至1742年发生了卫理公会和摩拉维亚教派的分离以及卫理公会内部的加尔文派和阿明尼乌派的分裂。卫理公会与摩拉维亚教派实际上于1740年7月在方得里建立卫理公会社团时就已经彻底分裂了。这次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由于亲岑道夫和卫斯理两人的性格，部分是由于对一些听卫斯理布道演讲的人发出的怪声狂叫一事发生了争执；卫斯理对某些教友所教授的“沉寂”教义的强烈不满也是原因之一，该教义认为神的恩典的手段是无关重要的。此外，摩拉维亚教徒们不满意卫斯理把基督教说得完美无缺也是一个原因。1741年，卫斯理的追随者与怀特菲尔德的追随者在宿命论和单独选举问题上发生破裂。后来这两派的领袖和解了。

1743年2月卫斯理为卫理公会起草的最初的教规发表了。这些教规是为一个宗教社团写的指令，而不是写给一个新的教派的。这些指令建议教徒们要参加教区的教会。然而，尽管卫斯理一再希望卫理公会的教徒应留在英国国教内，但实际上1791年他去世时，卫理公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这不仅仅是因为国教的教士对于“有生命力的宗教”抱敌视态度。卫斯理一生从事繁忙的传教工作，足迹遍及英伦三岛，并且写了大量的信件。他在这些工作中成为创立一个伟大、灵活而有效的组织的领袖。1724年，在布里斯托尔开始采用的等级制度不仅是一个募集捐款的有效方法，而且也是监督牧师工作的极好措施。各等级的领导人都接受职责的训练，这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而在教区内引起人们反感的等级常常伤害这种自尊心。1744年建立

的牧师和非圣职传道士年会以及1747年把社团组成为巡回传道区，标志着卫理公会组织的完成。后来，卫理公会的全部财产由这些牧师和非圣职传道士掌握。确实，与其说它是教会中的教会，还不如说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其次，卫理公会教徒有着他们自己的习俗。他们的聚餐会、除夕礼拜、某些赞美诗以及他们的乐队组成都带有摩拉维亚派先辈的色调。露天传道和有组织的牧师巡回制度都是巨大的改革。最后，正如卫斯理自己预见的那样，他自己的教士身份有所削弱。金勋爵关于早期教会的说法使他相信他居然能够任命大主教波特的圣职。斯蒂林弗里特的《和平神学》（*Irenicum*）摧毁了他的圣公会教义。

“在25年前谁会相信我竟会同意在苏格兰教会传教呢？”^[37]很自然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牺牲对于伟大的传教工作十分必要的那些世俗传教士呢？还是把卫理公会教徒保留在国教之内呢？他当然倾向于把这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来处理。很可能卫斯理也和虔信主义者一样，过于强调内心情感的表现使他忽视了教会的秩序。卫斯理默认非圣职人员施行圣礼；他在1763年要求希腊主教授予非圣职的传教士以圣命；1784年，他自己又授予去美国传教的人以圣职；1787年他为了在教区外执行牧师职责而同意接受信仰自由法的保护（就像亨廷登伯爵夫人在1779年接受该法的保护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分裂。

英国国教中福音派的觉醒，虽然与卫理公会派运动无关，但是却受到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虔诚的教士对基督教教义的圣经源泉新的运用的成果。他们中许多人重视威廉·劳的《严肃的号召》。如果说在早期，福音派的牧师和埃弗顿的贝里奇（1755—1793年），模仿约翰·卫斯理的方式，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他们的教区，那么福音派教徒一般都很重视履行维护教会秩序的义务。他们经常牵强地把重视圣礼与对强调皈依经验联系起来，因为有些人不时地会感到教徒和福音传教士很难协调一致。他们反对卫斯理关于基督教完美无缺的理论；在处理神的恩典和自然的关系时倾向于“加尔文主义”，在这方面，他们强烈要求圣公会的仪式书和改革派的牧师支持他们。他们比卫理公会派更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一般来说，他们乐意与不信奉国教者合作，采取的方式常常使高教会派的教徒感到厌恶，虽然他们不像改宗的贩奴商、圣歌作家约翰·牛顿走得那么远。牛顿在1764年至1780年期间，曾任奥尔尼地方的副牧师。1765年，他曾取消过一次他自己周日的祷告会，为的是去听一个当地独立派牧师的传教。特鲁罗的沃克（1746—1761年）和马德莱的弗莱切（1760—1785年）（都严

格地关注教会的规则)；年长的维恩先在克拉彭任副牧师(1754—1759年)，后在哈德斯菲尔德任牧师和在耶林任教区长(他有时不那么严格关注秩序，他后来认为那样不大妥当)；以及1749—1795年在伦敦担任讲师的罗曼等在本质上都是杰出的教区牧师，他们并没有自称为世界性的传教士。与卫理公会派的工作不同，英国国教福音派的工作在中产阶级中是最强的。伦敦商人约翰·桑顿在1754年的改宗大大地支持了福音派的事业。桑顿是那些给福音派带来荣耀的一伙人中最忠实、慷慨和有影响的世俗人物之一。对于福音派来说，正如对卫理公会派、摩拉维亚派、虔信派，乃至信仰卢梭自然神论的萨沃伊的牧师来说一样，宗教主要是感情的事物，而不是理性主义的或冷淡无情的说教。正是这种温暖的感情上的忠诚成了19世纪基督教神奇般扩张的强大动力之一。

(姚乃强 译)

[1] L. 帕斯特：《教皇史》，第33卷，第534页。

[2] 见《自传》(世界古典名著版)，第159页。

[3] 《天主教神学辞典》，第15卷(第二部分，1950年)，第2067条。

[4] L. 帕斯特：《教皇史》(英译本)，第33卷，第300—301页。

[5] 关于这一派人的一些详情，参阅E. 拉维斯《法国史》(1909年)，第8卷，第二部分，第115—116页。

[6] 奥拉托利会系1564年在罗马成立的天主教神父的团体。——译者注

[7] 《上帝子民史》，引自R. R. 帕默《18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徒和不信教者》(1929年)，第70—71页。

[8] J. 威克姆·莱格：《红衣主教托马西的经过改革的祷告书》(1924年)。

[9] A. 福蒂斯丘：《弥撒》(1937年)，第210页；一般见《基督教考古学和礼拜仪式字典》，第9册，第二部分(1930年)，H. 勒克莱尔：《新法国教会祈祷书》。

[10] 《自传》(世界古典名著版)，第76页。

[11] J. 奥格尔维英译本(1729年)，前言。

[12] A. P. 菲古雷多：《试探神学、主教权利和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篡权》(E. H. 兰登编，J. M. 尼尔作序，1847年)，第25页。

[13] 孔代·德卡尔诺塔(约翰·史密斯)：《蓬巴尔侯爵》(1871年)，第131—161页。

- [14] L. 帕斯特：《教皇史》（英译本），第36卷，第419页。
- [15] R. R. 帕默：《18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徒和异教徒》，第129页。
- [16] 转引自H. H. 汉森：《英国国教》（1939年），第128页。
- [17] 《雅克·塞尔瑟斯书信集》（F. 加迪编，1952年），第1卷，第2页。
- [18] W. 韦克：《英国教会和教士状况》（1703年），第118页。
- [19] 约·波特：《教会政治论》（1707年，1838年版），第5页。
- [20] 霍·沃波尔：《乔治二世回忆录》（1846年），第1卷，第148页。
- [21] N. 赛克斯：《18世纪英国的教会和国家》（1934年），第47页。
- [22] 《埃格蒙特日记》（历史手稿，1920年），第1卷，第153页。
- [23] 菲利普·约克：《大法官哈德威克勋爵传》，第1卷（1913年），第121—123页；W. 韦克：《基督教君主对宗教会议的权威得到维护》（1697年），第284—285页。
- [24] J. M. 克里德和J. S. 博伊斯·史密斯：《18世纪的宗教思想》（1934年），第269—273页。
- [25] A. L. 德拉蒙德：《路德以来的德国新教》（1951年），第242页。
- [26] 《日报》1738年7月24日。
- [27] 《论文与评论》（1851年），第257页。
- [28] A. L. 德拉蒙德：《德国的新教》，第91页。
- [29] 《新形式的普通祷文》（1753年）。
- [30] J. H. 勒普顿：《韦克大主教与实现法国天主教和英国国教教会联合的计划》（1890年），第91页。
- [31] 至于韦克的计划，见N. 赛克斯《韦克大主教生平与其时代》（1957年）。
- [32] M. 施密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大陆的全基督教活动》，引自劳斯和尼尔的《全基督教运动史》。
- [33] 《普通祈祷文的新格式》（1753年）。
- [34] 克里德和博伊斯·史密斯：《18世纪的宗教思想》，第104—128页。
- [35] 《约翰·卫斯理生平》（1925年），第1卷，第143页。
- [36] H. 里米斯：《直言不讳话赫恩霍特人》（1723年），第3页。
- [37] 《日志》1753年4月20日。

第七章 君主制与行政机构

18世纪中叶，对政体性质的探讨思潮纷纭。在这些评论家当中，人们最熟悉的也许是孟德斯鸠，他在1748年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还有其它许多作者，其中，比勒费尔德在1759年至1774年间写出了《政治机构》，阿尔让松于1765年写了《法国古今政体研究》，F.K. 冯·莫泽尔在1759年发表了探讨君主职责的《君主与臣民》。但是，当时这些人所感兴趣的问题，在日后的观察家看来，未必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后来的人还必须考虑到1789年以后在欧洲发生的政治上和行政管理上的发展。在现代的观察家眼中，1713年到1765年政府机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是普遍接受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央行政机构日益专业化，以及政府的控制在各地方越来越有效。

18世纪人们对君主政体普遍持有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出于君权神授这一信念。在16世纪，这种观念表现在博丹把国王描述成上帝在人间的化身；在17世纪又表现于巴黎最高法院向路易十四保证：国王的宝座即代表活着的上帝的宝座，王国以内的各个阶层都给予他以活着的神一样的荣誉和尊敬；也表现在波舒哀曾宣称王公们由于是上帝指定来执行其意志的国王的代表，因此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直到1789年，这一概念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依然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甚至连百科全书派，尽管他们对教会的权威毫不迟疑地提出怀疑，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君主制这个统治形式的优越性没有表示异议。

通常人们认为应属于君主的权力是建立在罗马法原则上的。君主不受任何权威的限制，不对任何个人或机构负责。他有权制定法律。他的权力大得无人敢违抗他的命令。他的权力范围必须遍及他的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在紧急情况下，他有权动用属于他的任何臣民的财产。例如，在受到围困和着火时，他可以下令毁掉某一幢房屋，在饥荒时他可以动用私人贮藏的粮仓。这些都是君权的主要特点。由此出发，在实践中国王可以宣布战争，决定和平，缔结盟约，派遣或接受大使，征税，行使司法权和任命下属官吏。君主政体不一定是世袭的。实际上，波兰的王位长期以来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在18世纪瑞

典议会实现了它所要求的决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利。但这两个国家的君权很弱，欧洲其他国家则普遍认为君主政体若要强大，就必须是世袭的。在18世纪用加冕礼和授职礼作为确认国王权威的一种形式已无足轻重。普鲁士国王不需要通过加冕来确认他的权力；法国君主政体力量增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国王们越来越不急于立刻举行加冕仪式。甚至像路易十五那样长期处于未成年时期的国王，也没有明显地削弱法国的君主政体制度。而在西班牙，尽管菲利普五世因长期患忧郁症而不能工作，但其君主政体却依然得以幸存。葡萄牙18世纪的布拉干萨王朝昏庸无能；在奥地利的各领地中，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在8年战争期间受到了挑战；在俄国，王位没有直系的继承人；英国的王位则传给了一个对英国的风俗和语言都一无所知的外国王族；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君主政体都保存下来了。在18世纪的一位观察家眼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有一个君主政体。

但是，在国与国之间，君主政体却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的观察家眼中，一般来说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要比差别更为显著，但在18世纪中期的观察家眼中，它们之间却有明显而重要的差别，例如绝对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之间的差别。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尽管有波舒哀的溢美之词，法国国王远不如其他一些地方的统治者那么专制。比勒费尔德认为法国国王受到法律和习俗的许多限制，因而称不上专制，这种看法得到了阿尔让松的支持。对那些在18世纪中期写作的观察家来说，西班牙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似乎要比法国国王的大。在卡洛斯二世时期，国王的权力受到众多的委员会的制约，但波旁王朝削减了这些机构的权力；而在18世纪中期，西班牙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他即位时干脆地宣布自己继承了王位，他没有必要举行庄严的加冕仪式。实际上，议会开会只是为了向国王表忠心和接受他的命令。比勒费尔德认为，欧洲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如此俯首听命于它们的统治者了。然而丹麦和普鲁士的国王，在理论上拥有同样绝对的权力，而事实上他们的权力更为实际。丹麦自1660年的政变后，一直是个绝对君主政体。普鲁士的统治者在大选侯击败了议会并迫使他们保证交纳一笔固定的税额以后，变得日益专制。在丹麦、普鲁士和西班牙，国王都按自己的所好随意立法。他的权威不受议会、法院、贵族或其他任何中间权威的约束。在普鲁士，前任国王一死，后任国王便立即继位，根本不需要举行加冕或授职仪式。百姓和军队宣誓效忠国王。所有这些统治者的行为都只对上帝负责。

然而，在18世纪观察家们的眼中，普鲁士、丹麦或西班牙的政权虽然它们可以归属于“完全的君主政体”，但同俄国的专制政体之间存在着差别。有一些外国人认为，俄国的专制只可与大特克的统治相提并论。沙皇的统治似乎和古代亚述的国王一样专制，他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臣民对他却像奴隶一样俯首听命。在现代的观察家看来，例如沙皇和普鲁士的专制君主之间的区别似乎不那么清楚。比勒费尔德显然从未去过俄国，但他对俄国的野蛮惩罚手段，似乎特别感到吃惊。当他在18世纪50年代后期著书时，他对彼得大帝的暴力记忆犹新。那时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观点尚未出现，而叶利托维塔女皇的政权的稳定，也未能克服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俄国的独裁者和统治着欧洲的7个国家的专制君主之间有本质的差别。

但是，比当时人们眼中沙皇同普鲁士、丹麦和西班牙国王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的差别，把所有那些专制的统治者与权力或多或少受到国内一些权威控制的统治者区别开来。在阿尔让松看来，两西西里王国的波旁家族国王虽然似乎可以试图建立最绝对的专制统治，但是在他需要额外的钱财时，就不得不召集议会。葡萄牙国王受制于一个强大的教会，而且在重大问题上还必须和议会商量。对于继承问题，1641年在拉梅戈颁布的“国本诏书”中也作了具体规定，而且在财政上葡萄牙国王只能享用1697年批准给他的税款，虽然这个限制在当时巴西提供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实际价值。在瑞典，1718年查理十二世死后议会可以坚持其控制权时，国王的权力则受到了更有效的限制。君主制不仅宣布为由选举产生，而且议会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挑选；而且，当新选的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女王变得太专制时，议会竟能使她退位，另选她的比较听话但并没有继承权的丈夫为国王。根据1720年的宪法，瑞典的议会每三年召开一次；而且，未经议会的同意，不得改变货币的成色，不得宣战或缔结和约，并且不得通过新的法律。英国的情况与瑞典大致相同。在英国，国王是世袭的，也不存在像1720年瑞典宪法那样的成文宪法。但是，1688年当世袭的国王逃亡国外时，王位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先是传给女系，后来又传给远房的旁系亲族继承了。嗣位法虽然不像1720年瑞典宪法那样明确地规定国王的权限，但与半个世纪以来的做法相对照，这一法令实际上意味着：未经这个国家选举产生的议员们的同意，不得征收新税，不得对由法律规定的宗教形式新教做任何改

变，而且也不得通过新的法律。英国与瑞典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瑞典在1772年推翻了这部宪法，恢复了专制；而在英国，1760年以后乔治三世加强王权的企图，却由于议会的强大地位而无法使他能像欧洲大部分强国的国王那样进行统治。波兰国王的权力所受的限制极大，结果这个国家成了治国无术的独特而可悲的典型。在大多数情况下，18世纪中期欧洲的强大政府必定是君主制，而成功的君主制往往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统治者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开拓疆土的大业上，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征集税款并保障充足的军需供应。从这两个前景不妙的根本原因遂产生了中央的和地方的政府机构的改进，结果使得18世纪的君主们比过去任何的统治者更为有力。

18世纪早期行政机构发展的一种趋势，就是中央各部门专业化的普遍增多。这种运动在18世纪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在某些国家中，这种运动早在16世纪就已明显。实际上，专业化的进程在一些国家里到17世纪末几乎已经完成；到了18世纪，瑞典和法国的试验在西班牙、俄国、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各领地上都被仿效。这种发展往往采取的形式是设立类似现代政府的各部。瑞典所进行的专业化改革最为显著和有效，早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夫斯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已基本上改组。他把各种世袭的重要官职逐渐改组成“咨询院”或委员会等专业部门。1614年以这种方式改组的国库到1618年已能有效地工作。从1618年起，首相的职务也逐步进行了改革，财政事务不再属于首相的管辖。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的办公处所也分别在1620年和1632年改为两个部门。这些改革在1634年最后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此以后，瑞典的中央政府由5个部门组成，分别掌管财政、王室联络、防务、外交和司法。各部的首脑参加国务会议。

瑞典的改革对俄国政府机构的发展影响颇大。因为彼得大帝在开始考虑改进俄国的行政机构时比较详尽地研究了瑞典的体制。1715年制定的改革计划，显然是按照瑞典政府各部门的分工和对各种“咨询院”的规定（参见第14章）制定的。彼得大帝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相互重叠，因而造成职权混乱，并发生侵吞公款的情况。1718年他用几个专职部门代替了为数众多的旧式衙门（Prikazi）。新的部门中掌管外交、国防、海军和司法的各个部门，明显是仿效瑞典的做法，其中仅司法部一处就合并了7个原有的衙门。俄国的体制和瑞典的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分别设立3个部门经管财政：一个负责国家税收，第二个

管理收支，第三个称为“薪俸部”。俄国还设有一个专管开矿和制造业的部，另一个部专管贸易。虽然还存在一些机构重叠的现象，但新的咨询院在专职方面比旧有的衙门前进了一大步。各部门的内部也进行了精简。从此以后，各部门负责处理沙皇统治领域内所有地区的事务，而不像旧衙门那样，只管某一地区的事务。

在法国（参见第10章）早在16世纪就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专职化，摄政想在现有的外交、财政和内务各部之外，再建立陆军、海军和商业各部，从而进一步推动专职化进程，但是他的这个努力失败了。在劳的财政计划崩溃后，新的部门消失了，法国回到了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时代逐渐发展起来，路易十四也一直沿用的体制。这就表明国内问题在18世纪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而处理外交问题的国务会议每两周却开会5次，而处理国内问题的内政会议仅开会一次。随着国务大臣一职的设立，行政管理进一步专门化。国务大臣的职务早在亨利二世时期已经出现，到1557年正式称作国务大臣，但当时这个职务实际上只不过是国王的秘书。在亨利四世时期，国务大臣有4名，每人负责处理法国某一地区的事务。但即使在那时，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因为外交事务往往只由某一位大臣负责。在黎塞留当政时，不仅外交事务由一位国务大臣负责，而且从1630年到1643年间有关军事的事务，也逐渐集中到另一位大臣手中。在路易十四时期只实现了部分专门化，4位大臣依旧各自负责国内1/4领土上的事务。但是到了路易十五时期，工作分工就比较明确了。一位大臣管外交，第二位管陆军，另一位负责海军（包括与殖民和贸易有关的事务），最后一位处理王室事务。所谓王室事务，实际上包括许多通常属于内务部门的事务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央的专职化还是不很彻底。有关财政、农业、工业和交通的事务由财政总监负责，此外还有一名掌玺大臣和一名大法官。大法官是终身职务，其他的大臣都由国王随意任免。他们只是国王的个人臣仆，并没有组成一个内阁。即使在弗勒里当政时期，虽然某一人可以称为首席大臣，但在理论上他无权挑选同僚，只能对国王的选择施加影响。他不能控制其他大臣，他们也没有组成一个班子共同工作。

在英国（参见第11章），中央政府的机构和瑞典与法国所发展的机构有一些相同之处，专职化的趋势已迈出很大步伐。国王基本上掌握着行政大权，但英国议会的势力使一些重要职务往往掌握在两院中

的显要人物手中。各种职务的数目相当多，有些官职如大法官、财政大臣、掌玺大臣和海军大臣等职，起源于与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职务。而其他一些官职，如国务大臣、陆军大臣和邮政大臣等，则是较近期才设置的。有一些部门，如财政部和海军部，由委员会经管，另一些部门则由个人负责。与法国一样，这些大臣仍然被看作国王的臣仆，由国王任免。虽然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日后称作内阁的一个制定政策的委员会的成员，但一些王室官员以及高等法院院长、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可以是这一机构的成员。不管什么时候，在内阁共事的大臣之间很少有团结一致的感情。一两位强有力的人物，有时可能迫使其他大臣接受某种形式的统一，但与现代英国的政治机构相比较，18世纪英国的各部和内阁更像当时瑞典的咨询院和国务会议。

在西班牙（参见第12章），波旁王族登基后开始的机构改革和彼得大帝大约同一时期在俄国进行的革新，几乎同样彻底。虽然菲利普五世像彼得大帝仿效瑞典和丹麦一样，模仿了法国的体制，但西班牙的旧机构却没有像俄国的旧衙门那样消失。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政府的运转是由许多委员会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就外交事务问题向国王提供意见的国务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国防委员会，其成员除了国务委员会的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将军或其他军事专家。另外，还有一个宗教裁判委员会。有一些委员会处理西班牙各领地的事务，它们包括阿拉贡委员会、意大利委员会、佛兰德委员会和西印度群岛委员会，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葡萄牙委员会。有许多委员会专门处理卡斯蒂利亚的事务，例如军界委员会、十字军委员会、同业公会委员会和强大的卡斯蒂利亚委员会本身。卡斯蒂利亚委员会的权限极大；它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法律，它做出的判决和对国王的建议形同法律；它接受国王的遗嘱并把国玺传给继位人；作为一个法庭，它审理民事或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案件；它可以审理涉及官员的案件，甚至可以审理反对法院判决的上诉；它审理叛国案和有关国王的案件。甚至在教会事务上，它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它允许教皇的训谕和敕书在西班牙传布；它管理主教出缺时管区的财产；它负责修道院和医院；它颁发教师证书并监督大学的教学内容。卡斯蒂利亚委员会还负责贸易、农业、谷物供应、畜牧业、林业、矿山、道路、桥梁和都市的金融。卡斯蒂利亚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之一是它的“第五法庭”，该机构负责马德里自身的治安。这些各类机构不仅在管理地域上相互重叠，而且它们还统管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各样的事务，

在处理所有这些事务时又文牍来往，慢得出奇。菲利普五世企图在这些林立的机构中开辟出一条快速有效地治理国家的途径，但是虽然他和他们的继位者做出了努力，到了1816年各种委员会的数目竟比波旁家族即位时更多了。在改革西班牙的行政工作上，菲利普所能做到的，就是任命几名类似法国国务秘书那样的大臣，每人主管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从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只继承了一名足可称为国务秘书的大臣。1705年他任命了第二名大臣，负责国防和财政。1714年他又任命了两名大臣：一名负责宗教事务和司法，另一名主管西印度群岛事务和海军。财政由一位财务总监经管。1717年曾企图把大臣的数目减少到3名。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一直到18世纪中叶，大臣的数目一直是4名，1754年和1755年的改革之后，负责财政的官员被升到大臣的地位，这样，大臣的数目就成了5名。

在普鲁士（参见第13章），行政机构在工作专职化之前首先必须取得统一。甚至到18世纪初，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仍由国王像私人庄园似的进行直接治理。普鲁士国王领地上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1/4到1/3。这些领地的土地由王室管事（Beamten）经营，他们的工作受财政委员会的监督。普鲁士的其余部分则由另一批官员治理，他们负责征收国防税。在农村地区这些官员被称为行政区长官（Landräte），在城镇则被称为税务官（Steuerräte）。城镇与农村的征税办法各不相同，但行政区长官和税务官的工作都受各地区的国防委员会的监督。在柏林有一个最高财政和领地委员会负责王室领地管事们的工作，还有一个国防委员会管理普鲁士其余地区的国防税的征收工作。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把这两个体系合并在一起，统一了各省的财政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并在柏林设立了单一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为财政—国防—领地最高总局。统一工作算是完成了，但专职化却几乎尚未开始。这个新设的总局是个奇怪的混合体。它下属的4个分局实际上每一个是1/4的内政部。第一分局管理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第二分局管理勃兰登堡和马格德堡，第三分局负责克利夫斯、盖尔德斯、马克和东弗里斯兰；第四分局管辖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拉文斯堡。各分局负责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总局则经管除外交和司法以外的一切其他事务。腓特烈二世常常尖锐地批评这个非专职化的总局办事拖拉。他在1741年设立了完全专职化的商业部；1746年又设立了陆军部。这两个部同总局都有某些联系，但1742年设立的西利西亚部却和它没有联系。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完成普鲁士中央政府的专业

化，他由于设立了新部门而没有废弃旧机构，反面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有时因为他越过一切中央权力机构直接插手各省的行政而更为加剧了。普鲁士的中央行政机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由一位不知疲倦的天才独裁把不同的机构拢在一起，这些机构才能工作，但腓特烈二世死后才20年，普鲁士邦就分崩离析。斯坦因在他怨言连篇的回忆录中[\[1\]](#)指出了这个行政机构的致命弱点。

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上的中央政权和普鲁士一样，表现出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因为玛丽亚·特蕾西亚从普鲁士的先例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试验中得到了教益。她在1748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增强她的军事实力，在10年时间里她在名义上完成了法国自黎塞留甚至亨利四世以来，或是普鲁士自腓特烈·威廉一世以来所进行的一切改革。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奥地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国务会议。这个由官员们组成的机构的目的仅仅是进行咨询。它使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政府成了一个官僚专制政体，而不是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那样的个人专制政体。内政和财政事务由民政财政部掌管，这个部的权限不仅包括奥地利本土，而且还包括波希米亚王室的领地。这个机构显然是效法普鲁士的，为促进贸易而特设的商务部也是如此。一个负责战争的机构早已存在，经过改组后它的权限扩大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领土。外交部也在1753年进行了改组。除此之外，司法工作与行政工作分开，并且设立了一个新的最高法院来审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全境的案件。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统治下，哈布斯堡王朝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成为欧洲各国政府中专业化分工最明显的体制之一。

18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中央政府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依靠大臣个人；另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则靠各种部门委员会。有些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及其他国家，它们必须先把行政统一，然后才能进行行政改革。在瑞典和英国，由于存在着强有力的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情况就复杂了。尽管有这种地区上的差别，总的来说却是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在一个有时乃至几个国务委员会的辅助下，通过权限日趋明确的各个部门来实现他的旨意。这种国家机器，总的来说是有效的。但是，它和19世纪出现的内阁政府制度截然不同，两者在名称上的某些相同之处，不应该掩盖它们在实质上的差别。

18世纪初，欧洲大部分君主国家的中央行政机构都慢慢地朝着专职化方向发展，但几乎所有国家的财政安排都混乱不堪。把法国、西班牙和普鲁士的情况作一比较，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在大部分君主国家中，国王仍然拥有他过去借以获得岁入、可望支付开销的领地。在法国，这种王室领地已无任何价值；在西班牙，这种领地简直成为负担；但在普鲁士，由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刻意经营，领地的岁入几乎相当于赋税总额。在很久以前就十分清楚：一个国王无法光靠王室领地的岁入维持一支军队，同时还支付国家的各项开支，于是他取得他臣民的代表的同意，征收赋税。到了18世纪，这种赋税许多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固定税。这些赋税名目繁多。通常对进入王国的货物要征收某种关税。关税的轻重出入颇大，主要看进口商是否是本国的臣民，还是一个与本国签有贸易协定的另一国臣民，或是一个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普通外国人。有时候关税按货物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但很难知道关税应征多少，而且大部分口岸走私横行。18世纪另一种十分普通的税收形式是某种形式的王室垄断。国王往往垄断诸如烟草、纸牌、公文用纸和盐等商品的销售。在法国，向每户家庭征收按估计每年用盐量而定的盐税。这种税收虽然备受非议，但绝不是法国所独创。在西班牙，对商品销售征收的非直接税名目繁多。除了一切货物的各种销售都要缴纳10%的商品税外，还有一种消费税（cientos）。对海上出售的商品征收海上商品税，其收入比普通商品税还要可观。对肉类、酒、醋、食油、蜡烛和肥皂要另外课以杂物税（milliones）。这是在菲利普二世时期征收的非常税，原定为期6年，但期满后却一再延长。其他各种商品也有征收类似的税，如冰镇饮料和冷藏保鲜食品用的冰雪要缴纳冰雪税。白兰地酒虽然税款收入不大，也要征税。酱油、糖和丝绸也要征税。在普鲁士，消费税（Accise）是从市镇中征集的，它一度曾是食品和饮料的间接税，也是对每个人及其职业和财产的直接税。据说，这笔税款是普鲁士行政机构的财政基础。在西班牙，税收肯定是造成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18世纪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沃波尔的征税计划会造成奴役和耻辱，这一担心是有些道理的。漫画里代表英国的狮子拉着一辆车，车上沃波尔骑在一个应缴税的酒桶上。狮子的尾巴被截短了，污秽的皮毛下瘦骨嶙峋，四只爪子穿着木鞋，头上套着笼头，由一个骑着独角兽的士兵驱赶着。这幅漫画题为“赋税和奴役”。尽管沃波尔的计划

不可能断送英国人的特许权，但18世纪的观察家们也许是从其他国家的先例中得到启示变得十分警觉了。

在18世纪的情况下，直接税是很难征收的。旧制度下的君主制是没有权力定期估计其臣民的财富的。那个时代金钱通常不是存放在银行里，因而动产几乎是无法估计的。不同的地区要求享受不同的免税权，不同的社会阶层也要求得到不同程度的免税权。即使在普鲁士，贵族们除了东普鲁士的贵族以外，都要求免交称作贡金的直接税，而且普鲁士的税收是按早已过时的财产估计来征收的。在法国，直接税实际上是按土地估算的，但这种估计往往也是过时的；地区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有三级会议的地方的税率要比没有三级会议的地方的税率低。享有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阶层可以免税。其他的直接税，如1695年开征的人头税和1705年开征的什一税，和前面提到的直接税一样杂乱无章。西班牙的直接税有其独特之处，它也影响到贵族和教士。这是因为西班牙的各届国王的财政十分拮据，甚至这两个特权阶层也无法逃避税收。教士们用他们收入的什一税的一部分纳税，称作1/3税，它于1219年交给国王并在1501年成为一项固定税。还有一种什一税是教皇1571年认可的，直到1757年才成为固定税。教士们还交纳一笔税款来支付海军的开支。这项税收于1561年向国王缴纳，为期5年，但后来又延长了。主教要把他从一个新主教区的第一年收入的一半交给国王，并且还要交一大笔钱以备将来用作退休年金。国王还享有西印度群岛神职人员死后空缺的圣职的收入以及接收死于任上的主教们留下的动产。教士们还缴纳一种“十字军”税，还要同俗人一样交商品税和杂物税，不过税率要比俗人低。但是，他们在出售教会领地上出产的农产品时，则不用纳税。自菲利普四世以来，贵族们一直用一笔贡金来代替服兵役。他们在封爵时也要纳税，同样，有官职的人在晋升时也得纳税。

旧制度的君主们费尽心机搜刮钱财。虽说他们还没有连鸡毛蒜皮都征税，但西班牙国王却真的对一草和一木都课税。然而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有普鲁士国王能够设法维持收支平衡，其他的君主均靠借贷过日子，而且王室的信誉极差，各国国王只有付出很高的利息才能得到借款。18世纪末，欧洲人口最多最富饶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国王的极坏信誉，引起了一场财政危机，其结果导致了王室的垮台。普鲁士靠着有效的征税和悉心经营王室领地，充实了国库，但一旦卷入战

争，它仍然得靠外国的津贴。玛丽亚·特蕾西亚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她的政府摆脱对英国的这种津贴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1717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和偿债基金在英国的设立，就特别令人瞩目。卡洛斯二世的个人信誉，随着1672年国库的倒闭变得分文不值。威廉三世不得不用14%的高利率来筹集贷款以支付大同盟战争的开支。英国政府的理财声誉并不佳，它的人口也不及法国国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西班牙国王等的人口多，然而英国国王却仍能比上述这些伟大君主动员更大比例的资源来进行战争。偿债基金的设立表明，英国政府不像法国人那样，它认为战时的债务应予归还，不应一笔勾销。因此，英国的信誉增强了，而法国王室的个人信誉却依然如故。

如果说18世纪初期欧洲各君主国家的财政状况是一些并不具有任何协调的计划，而且是无穷尽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司法行政方面的状况也是一样混乱。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欧洲很大一部分领土上贵族仍旧对农民行使某些封建的司法权。君主们千方百计地想建立起一种惯例：规定领主法庭做出的判决必须经帝国政府的代表的认可，玛丽亚·特蕾西亚就是这样做的，而比勒费尔德则认为这样做最理想。直到较晚的阶段，司法行政工作，甚至在首都还往往兼有执法的职能。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之一就是至少要在中央政府中把这两种职能分开。在法国，司法是由各省法院中的律师们行使的。在18世纪上半叶，对法律的概念还是一片混乱。在法国，南方行使罗马法，北方则沿用习惯法。一直到开明独裁时期（在这个方面，拿破仑可算是所有独裁者之中的最后一个和最开明的一个）法律才被编成法典得以简化。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包括法国本身在内），往往对犯人施加酷刑，以逼迫他们招出同谋者。当时许多观察家对于这种做法表示非议，比勒费尔德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西班牙在国内和西印度群岛都有一大套法律汇编和一系列壮观的法庭体系，但它的司法程序却非常缓慢。

尽管财政一片混乱而且不稳定，司法行政机构不协调而且杂乱无章，有些还属于封建性质，但是18世纪欧洲君主政体的效率无疑日益提高。不仅中央政府的专业化程度增加，而且基层单位的效率也在提高。职业文官的发展是旧制度在这个世纪里最不朽的成就之一。这种新效率的象征是地方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在法国产生于宗教战争时期。这一职位的产生似乎是为了应付内战造成的非常局势。从1560年

以后，一些训练有素的律师，有时被派往法国某地调查某个疑难问题。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就停止了，但黎塞留后来又重新把它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尽管遭到某些非议，马萨林继续这种做法。到了路易十四亲政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制度不仅已在法国各省通行，而且他已不再只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临时官员，而是正规的常驻行政官员了。1689年一名地方行政长官被派到布列塔尼省，这是法国各地接受中央政府代表的最后一个省份。到了18世纪，可以说，法国的盛衰已掌握在为数30名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了。他们由财政总监指派，如在边境省份工作，则由陆军大臣委任。每个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的地区，大致上同旧时的34个财政区中的一个相当。在辖区内，地方行政长官的权限很大；他主管征兵，行使司法权，摊派人口税和征收直接税。他还要经管贸易、工业和农业，转发从内政大臣那里发来的行政命令。有时候实际上正是由他们草拟法案；有时中央政府征询他们的意见；有时他们采取主动，提出备忘录。到了18世纪，这些地方行政长官已身居高位。他们有足够的钱财为自己购买行政法院审查官这个官职，而且即使他们触犯了中央政府而被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官职，他们还可以重操司法工作的旧业。有时，地方行政长官出身名门望族，一般在30岁左右。这在18世纪已不算年轻，有的人在25岁就当上了国务秘书。有时候，地方行政长官感到自己的权势强大到足以与中央政府相对抗：有一名地方行政长官拒绝答复中央政府的质询达4年之久，中央政府曾质询他为什么颁发某项特殊法令，当他终于做出答复时，竟然说他有权这样做。另一名地方行政长官对不得不执行国王的某项命令时，竟公开表示遗憾。还有一名经常把一笔款项加入自己账内，对此中央也经常查询。但是，尽管地方行政长官有时常对中央政府表现出颇为强烈的独立性，事实上他们毕竟还是领取国王薪俸的臣属。他们把行政管理当作自己的职业，尽管当时交通不便，地方的特权和习俗也很强大，但在各省里有了地方行政长官以及他们的秘书和助手，就使得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中央政府比以往的君主制政府更为有效率了。西班牙在一代人以后，也终于采用了相同的制度。事实证明，这些军事地方行政长官，即总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颇有用处。1718年菲利普五世试图在每个省指派一名总督，但最终因行不通而不得不收回成命。但1749年再度设立这一官职，而且这一次这项改革却是永久性的。在西班牙，总督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的待遇比文职官员优厚。总督被派往埃斯特雷马杜拉、巴伦西亚等边境地区，或

马略尔卡岛这样的前沿地区，以及阿拉贡甚至还有卡斯蒂利亚本身。其余17个地区的职位，则由职权范围广泛的文职地方行政长官担任。他们在理论上直到1766年，实际上可能一直到旧制度结束时，都拥有司法权；他们在行使司法权时，由一名民法专家和一名刑法专家协助。他们负责拟定应服兵役人员的名单，并负责抽签决定究竟应该由谁服役。他们要经管军营和弹药库。据说，他们还要研究所在省份的经济情况并提出改善本省经济资源的报告。他们还要测绘本省的地图，确切地标出哪些土地属于国王，哪些属于贵族、教会和军界人物。1749年西班牙国王取消王室的岁入由包税人承包，收税就成了当时刚重新设立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最初的职责之一。在估算和征收税款事务上，地方行政长官得到各种专职官员的协助，如负责地方税的官员及负责盐和烟草专营的官员等。但是，即使有专职人员和省内各地区负责行政的下属协助，西班牙地方行政长官的工作还是多得惊人。正如坎波马内斯所说，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规定虽然很动听，但它们就像柏拉图或托马斯·莫尔的梦想一样，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在普鲁士、瑞典和丹麦，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到18世纪中期时与西班牙和法国的那套有所不同，这项工作是由委员会而不是由个人来进行的。委员会研究各项问题并根据多数票做出决定。但在有效控制各地经济和司法方面大有长进这一点上，却是与法国的制度相似的。在普鲁士的勃兰登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从大选侯时期就开始了。大选侯把他们领地分成许多小的行政单位地区。腓特烈·威廉一世像他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件事上也完成了大选侯的工作，他把普鲁士邦辽阔的领土上的所有行政区划都纳于新设立的17个地方委员会。一个地方委员会有20名到30名成员，其中有的负责一到两个农村行政区，有的管理一些城镇，有的则经管属于王室领地的某些农庄。一般来说，一名官员要检查另一名官员的工作。决定系根据多数票做出，但是少数人的意见也提交给总监。这种省一级的地方委员会权限很大。它们收集赋税和王室领地上的收入，促进工业化，推进向内地的殖民。整体说来，这些官员的薪俸不高，“为普鲁士国王服务”一词成了收入微薄的工作的同义词。因此，发挥主观积极性的余地很少，委员会每个成员都受到他的同事们的制约并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都受到国王颁发的极为琐碎的书面条例紧紧的约束。但是，这种由当地委员会进行治理的制度有许多优点。在普鲁士，官僚机构非常有效率，它的会计工作方法比许多商人的还要好。普鲁士的行政机构

也很少有在英国、汉诺威和萨克森等国中屡见不鲜的包庇的弊端；并且也很少有卖官鬻爵这类的弊端，这种弊端有时是造成法国工作效率低的原因之一。在普鲁士，许多贵族家庭很穷，它们的子弟都乐于到地方政府工作，希望能荣任17个省级委员会中某个委员会的首席长官。

18世纪地方文官制度的性质，清楚地体现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领地上出现的地方文官机构中。玛丽亚·特蕾西亚作为改善地方政府效率、进行变革的基础的体制，是地方行政官。它早在13世纪后期波希米亚王室的领地上已经存在了。担任地方行政官的人，起初都是当地的贵族，在1526年以前，他们一直是波希米亚和西利西亚地方三级会议的权力必不可少的部分。渐渐地，这个机构越来越为皇帝所控制，一部分原因是反对改革的运动导致王室权力的增强，更重要的原因是1620年白山战役以后波希米亚三级会议的势力削弱了。1620年以后，地方行政官不再由地方三级会议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以波希米亚国王的名义指派。1669年对这个机构进行了整顿，提高了薪俸，地方官的下属也有了正规的地位。1748年在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涅奥拉，1753年在下奥地利和1754年在蒂罗尔等地相继建立起波希米亚的地方行政官制度。当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完成时，她统治下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两省一共有47个行政区。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的地方行政官的数量，可以同掌握着法国兴衰大权的30位地方行政长官相比拟。相形之下，西班牙的24位地方行政长官就显得少了。普鲁士虽然只有17个地方委员会，但由于委员会中官员人数多，普鲁士国王的辖地范围较小，反倒不算太少。奥地利地方行政官手下的办事人员往往很少。例如，1760年在摩拉维亚除了地方官本人外，只有两三名事务官、一名秘书、几名职员和一些听差。然而尽管人手少，地方行政官的责任却同地方行政长官一样大得很。1748年这个机构在奥地利各省建立时，规定它的职能是经管军队的食宿和使农民处于“随时能够纳税的状态”。此外，后来又增加了管理流浪者、森林和医院的职责。1765年地方行政官开始负责警察、学校、宗教、交通和商业。1769年，领主法庭的一切判决都必须得到地方行政官的认可。1770年，地方行政官的职责被描述成“可靠地执行女皇陛下的命令，保持地方治安和管理一切有关的公益事务”。有可能还需要有一位“照管一切”的官员，这一事实表明，17世纪中期以来国王政府的治理范围扩大了。18世纪后期地方行政官机构的发展，还表明政府机器

内部发生了变化。1781年按服务时间领取年金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对官职升迁缓慢的不满，表明人们已把地方行政管理看成是一项固定的职业。在文官和军官两者地位孰先孰后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说明这个职业中的成员们正在发展一种团体感。从1776年开始，想要谋求哈布斯堡帝国政府官职的人，必须要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学过行政管理和政治这门科学，即“国民政治经济学”。

同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建立的文官制度行之有效形成鲜明的对比，它的命令在匈牙利执行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国王遇到的困难，不是来自那里徒有其名的议会，而在于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文官制度。匈牙利的每个县都有一名县行政司法长官（föispan），但他同世袭的奥地利各省的地方行政官大不相同。根据1752年颁发、1768年重申的指令，这些县行政司法长官的职责是维护天主教信仰和促进健全的教育。他们要对本县百姓的人数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做出申报；此外，还要负责修路，管理监狱，照管孤儿和保管本地的档案材料。他们要务使皇帝的命令得以贯彻。这些指令在内容上同颁发给哈布斯堡王朝在日耳曼和波希米亚各省的文官并得到有效执行的指令并无区别，但在匈牙利它们就不那么有效了。县行政司法长官往往由一位住在自己城堡中的大贵族担任。这个职务可以由豪族世袭，也可以按照习俗同某个主教的管区联系在一起。县行政司法长官是一个匈牙利的显贵，他对在他看来是个外国人的皇帝服务并无热忱。他对来自维也纳的有关改革的命令敷衍了事，而对维护匈牙利贵族的自由比对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专制政体更感兴趣。在乡间行政区负责司法的匈牙利贵族们，与法国、普鲁士或近在眼前的奥地利的任何官员都不一样，他们更像英国的治安推事。作为皇室权威在匈牙利的唯一有效工具的官员是领薪俸的、收取关税和盐税的那些下属官员。在这些官员中，匈牙利人不到1/10，而且一般来说，匈牙利的乡绅看不起领薪俸的官职。君主专制政体所以扩展到匈牙利，一部分原因是圣斯蒂芬王冠刚好戴在已经成为他的另一半领地上的有效的行政机器首脑的一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头上。但是，匈牙利专制政体的有效程度比起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就差多了，后者的制度是建立在一批在财政方面训练有素的积极能干的官员基础上的。

英国的治安推事和匈牙利的司法官之间相同之处颇多。18世纪英国的治安推事由一名自告奋勇在本乡协助执法和治理的当地贵族或乡

绅担任。他的权力相当大。年赋、军队、贸易、济贫、食品供应、物价、工资和其他各种事务他都要过问。1700年，治安推事受权建立并管理监狱。1744年他们受权收容精神病人。1774年他们又有权批准设立并管理疯人院。1776年以后，他们又专门负责维护公路。1739年他们受权征收一项通用税。然而，尽管治安推事的许多职责和法国的地方行政长官、普鲁士的行政区最高长官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地方行政官相同，但在理论上他的地位却大不一样。正当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的权力日益增强时，在英国国家控制这个思想却无足轻重。一切行政工作被视为仅仅是完成习惯法或成文法所规定的各种任务。治安推事们之所以有地位，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的豪绅。他们终身任职，没有报酬。他们取得了经验，在他们一旦当选为国会议员后，这种经验可能就有用处；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服从中央政府。

从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其标志，在这个时期中欧洲讲德语地区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做了详尽的阐述。这一派政治思想的先驱包括奥西和奥布雷希特等人，他们致力于16世纪萨克森货币问题的研究。随着行政管理的技术的改进，先是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统治下的奥地利，接着在16世纪下半叶的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出现了一批领薪俸的专业官员。他们熟悉罗马法，致力于行政管理工作，被称为官僚机构中的财经专家。实际上，他们是16世纪出现的新的绝对君主制的幕后策划人物。他们与当时英国各届统治者服务的重商主义者不一样，他们重视行政管理问题，而不那么注意贸易问题。在17世纪，当利奥波德一世刻意效仿其表兄路易十四的改革时，奥地利又涌现出另一派财政学家作家。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有贝克尔、冯·霍尼希克、冯·施罗德和泽肯多夫。1727年，在哈雷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讲座这种职位。虽然最初的两名教授加泽尔和迪特马尔都不出名，但这种讲座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它使几代年轻的德国人学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达耶斯是一个对腓特烈二世很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索南费尔斯在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的行政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18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尤斯蒂的阐述最为明确。尤斯蒂宣称，君主制是一切统治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君主的成功是国家的最大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应是一切政府的目的。他接着又说，统治者的任务是保护并增加国家的资源，利用这

些资源来赢取胜利从而确保国家的安全。怎样运用治国之术来增加国家的资源，怎样用这些资源最有效地使国王获得成功，就成为那些渴望出任官职的年轻人攻读的课题，不论是在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或韦廷王朝任职都是这样。

在讲德语的国家中发展的这种研究和行政体制的结果，是建立了一种在19世纪对东欧来说是一种独特的称作文官制国家的政体。这个政体的效率极高，它的官员清廉热忱。但是，这是一种在政治道德上和法国的不同、和英国的则大不相同的社会。在法国，地方行政长官可以而且在实际上已经抵制或批评中央政府；而在英国，大部分司法的和行政的职能，不像法国、普鲁士、西班牙或哈布斯堡王朝领地那样掌握在领取薪水的职业文官手中，而是由乡绅们自愿执行。他们中有的人像柯夫雷的罗杰爵士^[2]那样怪癖，有些则像萨伦乡绅那样难以捉摸。

这就是18世纪欧洲大多数强国中通常存在的君主制政体。它的特点是，在其中心有一位多少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朝廷里有一批越来越精于自己那个行政部门工作的大臣，在地方各省中则有一支日益职业化的文职官员队伍。有些国家并不属于这个模式，但是它们的政绩（有一个国家除外）均无法使它们的政体看起来可以与这种中央集权、专制的而治理有方的君主制政体分庭抗礼。实际上，腓特烈二世就表达了普遍的见解，他说，1718年以后瑞典实际上已从君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它的权力理所当然地要日益衰落。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认为共和制度只能治理小片领土，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联合省的记录，也无法动摇18世纪的这种信念，即君主制具有特点的职能是战争和扩张，而共和制具有特点的状态则是和平和节制；因为荷兰人是在他们的政治体制最接近于君主政体时赢得了最大的成功，而自从奥兰治王室在政府中的作用不那么显著以后，他们在欧洲的威望就江河日下。其他的共和国，像热那亚、威尼斯和瑞士等到了18世纪时，在政治上已是无足轻重了。只有一个国家无法纳入从葡萄牙到俄国，从挪威到那不勒斯整个欧洲都熟悉的这种君主制官僚机构的模式。这个国家就是波兰。

波兰的政体到18世纪时，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没有效率的典型。国王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每次选举由于进一步做出让步而受到限制。国王的权威受到由各等级组成的议会的挑战。中央政府仍旧明显

地与中世纪对官职的安排相类似。每次为期6个月有7名大臣协助国王。但这与法国的各委员会和普鲁士的总局不能相提并论。在各省，国王可以指派一名行政司法长官来颁布国王的命令、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和执行某些司法职责，但行政司法长官的权力比地方权贵组成的议会的权力要小，甚至就像国王的权力不断受到两年一度召开的议会的限制一样。在18世纪的观察家看来，波兰政策的无力，使它的政府形象威信扫地。像比勒费尔德这样的作家，在波兰被瓜分的灾难已表明波兰宪法完全软弱无力以前就肯定地说，波兰的政府机器看上去似乎遵循着某种法规，国家似乎也能按部就班地对付下去。但是他又承认说，波兰的政府肯定是“混乱而又动荡不安”，“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阿尔让松在抨击使波兰无法防御和软弱不堪的统治体制时，就更是直言不讳了。

英国提出了一个使18世纪初期有政治头脑的观察家们很感兴趣的政体问题。在瑞典，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从1718年以后实现了其制约国王的目的，但瑞典作为一个大国却随即衰落了。波兰的议会能够反对国王的一切不得人心的政策，但波兰却成了弱小和混乱的同义词。可是英国尽管议会和国王共同掌握治国大权，它的财富和威望却在不断地增长。17世纪末，英国人虽然不是人们心目中政治才智的楷模，但这个喜欢闹事的民族却成为路易十四最强有力的对手。它正在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财富逐年增长，并且培育出了洛克和牛顿这样的天才。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于1690年出版并立即被译成法文。这本书对徘徊于传统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培尔的怀疑主义之间的一代人影响极大。牛顿在欧洲成名较晚，但不久他就将被人们誉为揭示大自然神秘和混乱的表象下的协调一致的理性法则的先驱。不久，人们就会提问：这些成就与产生这些成就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之间，是否会有某种联系。英国的党派政治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对欧洲事务的影响，以及1714年以后一批詹姆斯党人流亡分子新来到欧洲大陆但却接受了有限君主制原则，也从更为肤浅的方面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洛克的哲学在国外受到欢迎，但他的政治著作却被人忽视了；欧洲对英国的历史和制度的看法受到了极端君权主义者的解释的影响，波舒哀在英格兰的亨丽埃塔的葬礼上的演说，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语言上的障碍，是任何真正理解的很大的阻碍。对专制主义原则的无

条件地接受，又使许多旅行者看不见英国政治的混乱复杂的表象后面的任何长处。但是1685年以后，胡格诺教派的流亡分子，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统治的宣传激情，用法文向欧洲公众发表了许多著作。其中佼佼者之一的保罗·德拉潘-托伊拉斯，他在1717年发表了《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文，1723年又出版了巨著《英国史》的头两卷。这部书在日后多年中是有关英吉利海峡两岸情况的著作典范。德拉潘-托伊拉斯这些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内容，而且也在于它的阐述。他把英国史看成是自由和专制之间斗争的记录，而当时两党之间的斗争则是这个记录的最新、也许是最后的一章，这场斗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混合的君主制”，在文明的时代里维护那些自古以来就有的自由。因此，在18世纪20年代中，人们对英国制度的兴趣就已经很大。他们日渐相信，英国人享有一种含义不太明确的自由，他们想要知道“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滋味”。伏尔泰在英国流亡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权威性的答复。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一书初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位聪明的观察家的印象集锦。实际上，这些印象是经过精心挑选用来阐明英国生活的重要方面，舍去的东西和选上的东西一样重要。乔治二世加冕时的豪华场面被略去了，但科学天才们的威望却通过对牛顿葬礼的描述得到了体现。描写英国贵族时，不是写他们在乡间的豪华住宅，而是写他们提倡种痘和赞助文学。书中并没有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和局限性，但这种信仰自由的现实却通过与教友会教徒家庭一起生活的一大段详尽叙述得到表达。一切都经过悉心安排以便满足人们对英国生活实质的好奇心，并且含蓄地批评了法国当时种种习俗。然而，有一些读者肯定会发现《通信》有一点做得还不够，虽然伏尔泰提到了按比例征税、法律上无豁免权和不得设立领主法庭等自由政府的某些成果，但他对政体的形式所知不多，评述也较肤浅。一直要到1748年《论法的精神》一书出版，欧洲对英国的政体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分析。

孟德斯鸠在伏尔泰之后不久访问了英国。在英国，他很可能从对共和制优点沉沦的不现实的懊丧中改变态度，对“混合的君主制”能为自由做出贡献而欣慰。他还从英国作者那里，特别是从洛克和博林布鲁克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不像伏尔泰那样注重描述，他着重分析。他认为自己有权不提许多他明知存在的局限性。他肯定知道行政

的腐败对立法的不良影响，他把对英国的自由的未来的信心，寄予中产阶级的理智。他写道：“我并不想知道英国人是否享有这种自由。我只需说，这种自由是由他们的法律规定的，这就已经够了。”他发现英国法律显著的特点是，它承认政府的权力显然属于三类——行政、立法和司法，它们应当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行使。尽管在实践中并不总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论点，因为即使大法官既当大臣又当法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既执行法律又惩罚罪犯，他们在行使这两种职责时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法规。然而，孟德斯鸠由于未能对司法制度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且他企图把法律权力的分开和国王、上院与下院之间的政治上的区分混为一谈而又不成功，这就削弱了自己的论点。他的信徒们抓住他分析的主要特点，来支持英国政府的高度理想化的图景，这也是事实。

洛克是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主要来源。英国的作家们也从这同一源泉采取了权力分立和“制约和平衡”这一概念，作为他们国家宪法的显著特色。布莱克斯通提出了这一图景，虽然采取了更精美更现实的形式，同时国内外的许多作家一致认为，这种复杂的权力平衡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由。正是这一点使得英国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一样，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成为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的乐土。虽然卢梭对英国自由的虚伪观念提出了批评，但英国的立宪制的教训已经深深地印入欧洲知识界的脑中。这些教训对那些批评旧制度的理性主义的批评家们，对巴黎最高法院在大革命前夕提出的立宪要求，都有影响。它们的出现，对美国的宪法和大革命时期法国进行的君主立宪制的实验，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乐瑞夫 译）

[1] 这段回忆录的内容载于J. 西利的《斯坦因的生平及其时代》（1878年），第1卷，第267页及以下各页。

[2] 斯蒂尔爵士取自英格兰北部地区曲调《柯夫雷罗杰》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在由J. 艾迪生和其他人主办的《旁观者》杂志中，他是18世纪乡绅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第八章 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

本章所描述的18世纪战争的艺术和武装部队的社会基础，均根据对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等国家的情况研究的结果。奥地利、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情况，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基本一样。

18世纪陆上和海上战争的特点是进行得慢条斯理而且懒散。一直到先是美洲继而是在法国发生的革命战争，战争才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气感。19世纪和20世纪特有的意识形态战也从那时才开始出现。而在现代的时代中，将领们的职责是通过决战赢得战役，可是在18世纪却很少有人对阿尔瓦大公的话表示怀疑。阿尔瓦的话是1760年9月哈德威克勋爵颇为赞许地向纽卡斯尔公爵引述的：“将军们的职责应是克敌制胜；但不一定非经过战斗不可，如果能不战而胜，则棋高一筹。”^[1]

在海战方面，克拉伦登在17世纪对布莱克所做的评语，至今犹为人奉为名言。根据克拉伦登所说，布莱克是“不落陈规的第一人……对长期以来沿用的那种把舰只和士卒保护起来不入险境的陈规，嗤之以鼻。而这种陈规在此以前却一直被人认为是才能和谨慎首先要做到的事情，犹如一舰之长首要的艺术本领，就是能确保其返航重新回到本国”^[2]。对资源有限的18世纪的各国政府来说，陆军和海军是一些耗费浩大的必备之物。军队和舰只是在时间和金钱上的一笔重大投资，一旦在战争中丧失，要重新置备，绝非易事。

战争的艺术也认识到这一点。18世纪大多数战争的基调是先例不容变动——对于僵化了的军事陈规和惯例，采取迂腐的态度。尽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的训练有素、人数比较不多的军队的规模也开始逐渐增大，尽管运输和通信的方法已经改进，但强国在彼此开战时却越来越多地依靠防御工事和围城战术。它们的基本的战略战术一直继续到18世纪末，也无多少变化。在陆上，只训练正规的击剑术而不练格斗；只进行老一套的布阵调动，而不想方设法通过战斗来决出胜负。在海上，整个世纪的特色就是《不列颠常备作战条令》中的那些一成不变的条例，再加上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持作战队列的原则。

1744年出版的《皇家舰队动态报告》写道：“作战队列是一切海战操练的基础和方式，因为这是一切拥有制海权国家的普遍做法。它经受了时间和长期实验的考验，完美无瑕而又毫无改变地从我们先辈手中传流下来。”^[3]据拉马蒂埃莱在其《海军战术》一书中所说，法国海军“一直愿意保证取得或保持征服的光荣，而不愿意取得俘获几艘敌船这种也许比较辉煌但却不太真实的光荣，这一点更接近原定的战争真正的目的”^[4]。两军之间进行较量是不受鼓励的。实际上，与敌军遭遇几乎是一种灾难。只要能保持体面，就应尽量避免战斗，特别是在海上。敌对两军除非在舰型和数量上势均力敌，否则就很少进行交锋。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英国的13艘战列舰全都同样参了战）以前，几乎每次海战中总有一些舰只没有投入战斗，这些舰只只是打几发炮弹，毫无伤亡。敌对双方的舰队运动排成两排平行的队列，以便在一系列单独的战斗中进行指挥，这样就使一场海战完全变成了一场枪炮决斗。一直到1794年，当法国的战列舰对敌方没有直接参战的快速帆舰开火时，这种举动还被人认为是一种无赖行径，开了违犯具体规则的先例。

战争要进行得尽量符合节约；要采取谨慎和防御为宜，而不要靠大胆和进攻。保存兵力是首要的目的，其次才是战果。像布雷多克将军这样的指挥官，代表了使他得以产生的那套制度，这套制度训练他成为一个古板的、井井有条的和不可改变的人物。他缺乏独创的思想，一切都要按照规章办事，绝不越雷池一步。海军上将宾对于任务的困难颇为敏感，而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他的为人虽然勇敢，但却杞人忧天。1756年他在米诺卡岛海战中，由于坚持认为他必须保持作战队列，每一个信号必须符合《常备条令》的规定，因而进一步受到困扰。坎伯兰公爵1757年在哈斯滕贝克战役中按照事先精心制订的计划行动，由于死板地坚持其原定计划不变，因而作茧自缚；他的计划正确，正是其弱点。沃尔夫批评劳登勋爵在北美战事中“死扣条文，抱着不切实际的陈规不放”^[5]，遂使他的军队陷入险境。对于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不留充分余地，对于战争中难以预料的因素即机遇不加考虑，这正是公式化的战争艺术所忽视的问题。1776年有人这样写道：“胜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常理无法推测的一连串偶发事件和偶然原因；而且有无数的事态，既无法预防，也无法预见。”^[6]

由于人们认为海军的职责，主要是直接或间接地保护贸易，尤其在这个竞相建立贸易帝国的时代，因而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战争的防御性质。一旦保护商船队成了海军的一项公认的任务，主要贸易航路就成为海军战略的主要路线，而贸易路线的交会点，就是海军战略的焦点。即便是在新的思想鼓噪而起时，美国的独立战争还在继续这种无决定性结果的海军角逐，“敌人驶离了某个出击目标，而这个目标最通常的并不是它战斗前进中认真要夺取的目标”^[7]；除了一些快速帆船之间的交战外，战斗则是在靠近某条贸易航路的地方进行。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也许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壮丽的海军大战。交战方式仍然是决斗的架势，但全歼敌人的意图则大不相同了。

18世纪的战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情的有限责任的战争，与以往以道义为目的的战争不同，它们只是统治者之间、王朝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为了有限的目的，以有限的手段进行的有限战争，最后以达成某种平衡而告终。这些战争是对三十年战争的恐怖自然产生的一种急剧的反应。在三十年战争中，狂热主义和道义上的愤慨使暴行的数字增加了。虽然有的战争规模不小，但由于严格遵守战争的规则、惯例和法则以及公认的18世纪军事演习的法规，因此破坏和不必要的流血都受到了限制。对仁慈的君主来说，战争同和平一样，都可做出安排。战争艺术规定了详尽的战略、围困、投降、军功章、战俘处理和平民的权利等各种规则。在作战中，军队和平民之间有明确的区分。尽管从严格的法律观点来讲，所有的敌方百姓都应遭到攻击，但在实践中却一般把平民排除在外。平民百姓毕竟是这场角逐的物资供应者，角逐应由专职人员进行。他们是一支把普通百姓排除在外的独立队伍，有自己的组织、纪律、法律和职业标准。那个时代，一个好的政治机构对其臣民所求不多，它把百姓看作国家的一笔有用处、有价值、有生产力的财产，在战争期间应尽可能地少打扰他们的生活。腓特烈大帝的理想是：如果他打一场战争，百姓应不感到战争状态的存在。这是井然有序的官僚化君主制的秩序、稳定与纪律严明、规范化的职业军队作战勇敢的结合。英国人则认为，他们应当充当海军，在商船队上服役，征服敌人的殖民地，并保持工厂开工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陆军中当兵是他人的事；应以津贴资助欧洲的盟国去和共同的敌人对阵。通过这种手段，使平民百姓处于一种在18世纪普遍遭到毁灭的战争中从未有过的安全中。它对武装部队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武装部队是来自社会中那些

在经济上不从事生产的人。这显然是想把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分开来的一种尝试。

战争失去了它的具有想象力的理想主义，无论是在开始还是在进行中，都已经程式化了。战争考虑的主要是力量均衡，它是在王朝之间而不是在民族之间进行的。王室的战争和王室的婚姻，是王室的私产从一个王朝转移到另一个王朝手中的两种手段，不管这种转移是其全部的还是一部分。18世纪上半叶三次主要战争的名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表明战争只是在王室婚姻安排失败或乱得不可收拾时才发生。防御胜过进攻，胜利很少把战败的一方彻底摧毁。由于道路坏、通信慢，冬季作战困难和在敌人领土上的供给问题等所造成的军队缺乏机动，再加上军队的社会成分和陆军的军事结构等，就使得战斗行动既精确又适度，同时也很刻板。由于这些原因，小国能够在列强之中得以幸存。这类狭义的政治性战争，允许妥协，允许安排补偿。如果结果产生的力量平衡和分配比战前还要不能令人满意，那么还可以倒向另一方，即便是在战争的中间也会发生。

18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是均衡。因此，毁灭性的、打破均衡的战斗是不可取的，可取的是一种讲究学问的战争——攻占要塞、弹药库、供应线和重要阵地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出奇用兵比激烈战斗更可贵。阵地战比运动战盛行，这种战略宁要连续不断的小胜利，而不要全歼敌人。战争往往旷日持久，但并不激烈。

围困多于交战，这种战争特点一直到革命战争出现后才改变。攻占敌方要塞比取得一般战场胜利的结果更具有积极的价值，因为除了能立即得到好处外，还可在媾和时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在历来入侵的路线沿途筑起了一系列的要塞，大城镇的百姓们都指靠高墙坚壁来抵御敌人。在易遭敌人突然攻击的边境城市和内地那些居民的忠诚不太可靠的城镇中，统治者把军队部署在护城用的堡垒里，用以预防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叛乱。这类要塞的司令官们都得到书面的指令，明确地规定他们在被围困时应做何等抵抗。如果司令官过早投降，就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1705年路易十四发给要塞司令官们的经过修改的指令，一直到1792年在法军中依然实行。指令要求司令官在要塞实体被攻破后，只要击退一次敌方的进攻就算完成了任务。体面保住了。当然这对受到侵犯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设防的地区应尽

可能持久地进行抵抗。持久的防御不仅能削弱敌军，而且还能争取等待援军的时间，或为下一步的反击做准备。

当炮兵轰破城墙致使进攻的军队能突入城内，当第三条攻击的平行堑壕已经挖好，攻击的步兵离城防突破口不到100码时，要塞司令往往会收到攻方的通牒威胁说，如果他在进攻发起前不投降，守军的生命将得不到保障，城镇将遭到洗劫，他自己也将被处死。一个要塞的司令官如果在敌方提出了体面的条件后继续做无谓的顽抗，他就将因没有正确地遵守比赛规则而受到战争法律的严惩。如果一个地方在攻击前就投降了，攻击一方的士兵就不得在该地劫掠，他们只能指望从他们的指挥官从该地强征的一笔赎金中得到奖赏。如果一个地方是被攻取的，按照惯例，可以听任士兵们在规定的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内进行抢掠，但规定要保护当地居民的生命和体面。“这就是当时惯例认可的士兵的权利。”^[8]

要塞投降时，守军可以储存至少两天的口粮和弹药的供应，并不得毁坏工事。尽管持有这些供应，守军还是被认为已经弹尽粮绝，无法坚持围困了。这是因为若是守军在围困结束时完全没有一切维生的手段，进攻的部队也无法为他们另行提供必要的供应。

围城是炮兵的事，而辅之以步兵。围攻者的大炮先在离敌方工事600码与被攻击的战线平行的第一道平行堑壕里开火。然后再继续挖壕推进到距要塞400码以内的地方建立起第二道平行堑壕。从那里再挖进到距敌工事100码以内设立第三道平行堑壕。在第三道堑壕里修筑起攻城的重炮阵地。第一道堑壕筑成时，战壕揭幕即开始。部队在军旗飘扬、战鼓咚咚声中齐步开入战壕，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在壕中各就各位后，进攻的部队就把军旗插上胸墙向敌方挑战。迟至1781年，拉斐德在约克敦前建起第一道平行堑壕后，他的轻步兵师仍旧严格地按这种欧洲的做法行事。虽然英国人因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在敌人炮火下损失惨重似乎放弃了这种做法，法国人在整个18世纪却一直坚持这样做。在约克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校甚至更进一步，他命令他的轻骑兵营登上胸墙顶部进行兵器示范操练，把英国炮手惊讶得目瞪口呆，连射击都停下来了。

要塞的投降也同样非常流于俗套。围城的军队给予英勇防守后投降的守军以战争荣誉。投降的条件中规定了确切的撤离细节。撤离时

守军鼓号齐鸣，边撤边奏敌方的进行曲以答谢敌方给予的战斗荣誉，同时也表明他们并没有受辱到无法与胜利者相互致敬的程度。在整个18世纪中，人们一直认为要塞必须攻克，但必须通过围困，而不是通过强攻。用迂回来绕过这些据点，或大面积地扫荡而把这些据点留在后面等做法都是不予考虑的。

正如战争艺术在武装部队的社会结构中得到反映，这种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艺术。一定程度上为了有效地维持军队纪律而设置的大型军需供应站，使得军队在战争中能按部就班地而且充分地得到供应。如果允许军队在乡间随意征集粮秣，这就会促使士兵大批开小差。在战役开始前，边界附近的一些地点集结了大批储备物资，作战部队从那里得到供给。在军需供应站前方两三天路程处建起炉灶，用骡马运来的面粉在此烤成面包发给部队。这种做法限制了军队的机动性，把它们束缚在一系列军需供应站上。任何部队都无法安全地推进到离供应基地5天以上行军路程或距通航的河流15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样，像追击溃败的敌军这类迅速而分散的运动，对于这些由各式人物和各种民族组成的军队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运动会把军事机器所计划的次序打乱，给想开小差的人提供太多的机会。当腓特烈大帝为了补充1758年他在霍赫基尔希战役中的伤亡而不得不从他兄弟的军队中选拔兵员时，他规定不得选西里西亚营的士兵。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故乡了如指掌，逃离部队的诱惑力太大了。

阅兵场上的纵列和密集队形即是战场上实际使用的战术队形和动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刻板而严格的纪律和不断操练的原因。腓特烈在1752年写道：“除非在和平时期就对每名士兵在战时必须做到的事情进行严格的训练，否则他们只是一些徒有其名而不知如何打仗的士兵。”18世纪步兵战术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一种最适合使用燧发枪和刺刀的作战形式和队形变换。为了便于射击，士兵们必须并肩站立。但燧发枪装填很费时间。如果一列士兵要永远准备好开火或能保持连续开火，就需要有好几排士兵组成前后数列队形，当第一列士兵发射时，其他几列就能进行装填。普鲁士军队最早取消了第四列，但三列队形在18世纪后期一直是很普遍的。这种队形能使一定数量的军队用燧发枪这种不可靠的兵器发挥最大的火力。腓特烈有一次曾命令士兵瞄准一支向前推进的敌军的前9步处，想借着枪机击发时的跳动刚好使枪口对准目标。

这种一条线的队形需要精确的移动，因此非常缓慢。吉贝尔在其1772年出版的《战术概论》一书中写道：“在30年以前以及今天的某些陆军的战术中，为了组成一条作战线而进行得如此缓慢和复杂的调动，需要花好几个小时。这种作战线必须在距敌较远的安全处进行。一旦作战线组成，如要变动，则是有危险的。”操练的目的是要让士兵能够熟练地装填火药和迅速地开火，是要能敏捷而精确地把行进中的各排散开的纵队（70—80人排成三行）改变成有一定宽度的横向作战队形。在作战队形的组成过程中，部队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即使战列组成后，其两翼也仍是防御能力极差的薄弱环节。为了防止两翼遭到攻击，指挥官们总想在开阔的坡地的一端组织战斗队形，以便利用两侧的低地或崖坎来保护其侧翼。作战线的战术是18世纪战争中伤亡严重的主要原因。人们总是试图不从正面而从侧翼甚至后面去进攻这种战斗队形。为了防御这类攻击，往往又另外组成一条面对侧翼及后方的作战横列，最后就形成了一种面对四方的方阵。如果横列队形的两翼或后方有障碍物保护，那么即使面对强敌也不用畏惧。因此一定要熟悉地理环境，以便找到合适的阵地，迫使敌人要想从正面进攻就不得不冒极大的危险。

海上作战也同样拘泥形式，当然操练则绝不相同。然而在操练上则绝不相同，英国舰队的战术操练的目的，是要贯彻作战指令中的各项原则。但系统的训练进展缓慢，这主要依靠各个海军将领的精力和主动精神或懒惰。英国舰队准备进入战斗时公认的队形是单列纵队。1703年的鲁克作战指令，是以1691年颁发的拉塞尔的指令为依据的。它被奉为18世纪的战术经典，一直沿用到1783年。这两种指令都是在防御的情况下制定的。后来情况改变了，它们却依然未变。某位指挥官在某种环境下发出的特定命令，说明了他想要做什么，或者他命令下属要做什么，但不再被当作指挥一支舰队的司令官的命令，而“常备的作战指令”却是具有更高权威的标准的作战命令，对舰队中的包括司令官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1744年对马修斯海军上将的审讯，使这些指令披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这不仅使人不敢通过实践对指令做出修正，而且使任何想要修改指令的努力都成了越轨行为。此外，如同通信不便使陆上战斗无法机动一样，落后的海上信号系统使那些有魄力的海军将领无法向下属传达与信号息息相关的常备指令表上没有列入的新指令。一位总司令官也许在打破其他大多数清规戒律后仍能指望保住自己，但是，如果他违反了与敌舰平行、相邻

的这个不容变动的战列队形，他就可能会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从1692年的巴弗勒尔战役到1782年的桑特海峡战役，英国海军从未在任何一场堂堂的战斗中一心要击败过敌人。正如在陆战中追击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样，在海战中人们则不主张追击。指令第二十一条规定，舰队中任何舰艇均不得在敌人主体舰队失去战斗力或逃跑之前去追击小股敌舰。既不打破敌舰的战列，又不让自己的战列被敌舰打破，这种作战目的，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因此18世纪的海战就具有炮战的性质。只要双方舰队势均力敌，或近于势均力敌，当双方遵循同一套法则时，18世纪的海军制度就不可能产生出胜负。即使舰队装备优良，司令官素质出众，但受战列队形战术的限制，从战术上来说，依然是非决定性的，而且完全得不出什么结果。

在18世纪，欧洲实际上无法进行冬季作战。道路泥泞或冰冻，使火炮和大量供应的运输无法进行，因此供给无法维持。一旦气候变坏，军队就进驻冬季营地。在海上，运输船队秋天回到港口，作战舰队也奉召返港进行检修，准备来年再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沉没的“胜利号”，以及在此前40年沉没的“联合号”都是由于海峡外侧10月的天气所致。于是人们更加相信，在9月以后还让大舰艇留在海上是不明智的。18世纪发生过多海战的西印度群岛海域，也有一段休战期间。那里的一个经常的因素，是沿着向风群岛而下的偏东北的贸易信风。但从5月到10月，风向几乎转成了正西，而且这段时间的后3个月是飓风季节，它排除了海战的一切可能性。此时，主要舰队沿着北美大陆的东海岸北上，这对美国独立战争来说，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素。

一位旧日的军官在18世纪末这样写道：“军事科学几乎可以说是呆板的。”^[9]形式化战争不需要军官有什么想象力和首创精神。腓特烈大帝在1758年就法国军官写道：“法国军官学到了一套军事术语，但他们只是鹦鹉学舌，其他一无所知。”^[10]法国的司令官布罗伊在七年战争后著书时，把军官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以及必不可少的军事上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在这场战争中的6年战斗中，法军先后由6位将军指挥，其中只有布罗伊熟悉自己的业务。然而他的才能反而使他的指挥权被分割，随后他被撤职并遭流放。下级军官就更无足轻重了。据当时人们的观察，1760年的法军“有时甚至连带兵打仗的一般军官也不知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们要把他们引向何

方，因为参谋们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公开他们的行军路线的”^[11]。甚至在防御和围城战中起重要作用的工程师也问题不少。斯塔德霍姆·霍奇森少将在1761年准备远征贝尔岛时写道：他“还需要一些工程师，最好他们中间有人打过仗。我现有的6名工程师不熟悉自己的实际业务。我敢说，他们在学院时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但我认为要他们进行围城战是很不相称的”。^[12]由于所有的军队都是一个模式，开火和突击非常讲究平衡，所以天才一旦掌握了指挥权，他就能左右战场，激励平庸的部属奋发。这种情况很能说明这一世纪里进行的一些决战。

腓特烈大帝代表了法国大革命前在当时欧洲盛行的情况下能达到的最高军事水平。在法国大革命中，普通公民取代了职业军队，咄咄逼人的机动进攻战略取代了四平八稳的治国方略。再者，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不仅归功于所继承的普鲁士军队的建制和发展，而且同样应归功于他的判断迅速和足智多谋，使敌人大吃一惊。他的军事著作《战争的一般原则》（1746年）、《政治遗言》（1752年）、《军事遗言》（1768年）和《设营与战术基础知识》（1771年），都说明了这两个方面。腓特烈最初主张打“短而激烈的”战争。“拖延下去对我们极为不利。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不知不觉地破坏我们严明的军纪，并且使我国人口减少、资源枯竭。”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它就只应消耗少量的人力、物力。这种想法同样符合18世纪战争的基本情况——国家的资源有限；作战须依赖事先准备好的固定的军需供应站；士兵们尽管训练有素，但处在困境时，内心却无赖以支持的坚定信念。在那些早期的年代中，腓特烈相信战争的目的不是占领或守住一片领土，而是摧毁敌人的力量。进行大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坚决地进攻，并迫使对方按自己的运动而运动，腓特烈的战略主旨一直是迫使敌人运动。即使是被迫处于守势，也应做出一副进攻战的态势——机动、灵活、主动——“用计满足敌人的虚荣心，诱使他们犯错误，将领们就可以利用这些错误”。正如他在1759年所写的：“我的敌人众多，除了进攻别无选择……只要可能，我就不停地进攻，积小胜为大胜。”一个指挥官绝不应该打算在一切方面同时取得胜利，只应在经过精心选择的一点上取得胜利，其结果就能决定全局。

在后来经历了严酷的战争现实的经验后，腓特烈的主张改变了。要塞“是一颗颗强有力的钉子，它们可以把统治者的省份团结在一起”。战斗的部署应根据围城阵地的规则来制定。全面战役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和谋略的反面，即变化和机会。“大部分善战的将领就靠这种随机应变的机智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不被视为一种长处，往往被人认为是一种缺乏才能的表现。”他在1768年写道：“打胜仗就是迫使对手将其阵地让与你。”他越来越主张打阵地战，主张通过从容不迫的复杂调动来积累小胜，并且要在其主要战略方面缓慢从事，虽然在战术上绝不是这样。

虽然腓特烈的战略思想仍然局限于阵地战的范畴以内，但在其战术应用上则和他的所有同时代的人不同。他从来不喜欢被动作战，而对突然袭击总是感兴趣。这是一种以固定的防御工事为基地，不过却是可以自由地袭击敌方阵地和分遣队的主动而挑战的防御概念。战争的状况使他对参战可能得到的好处发生怀疑。他在1775年写道：“欧洲各国的武器装备和军纪大体相同，结盟又往往使交战的双方势均力敌。所有那些参战的王侯们，从当前最大的优势中充其量只能指望取得一系列小胜利后在边境地区是得到某个小城镇，或者一片土地，这连支付战费的利息都不够；而其人口也不及战争中死亡的百姓多。”在腓特烈的领导下，纪律良好、进攻意识强、具有新战略思想的普鲁士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18世纪的防御性战法。但是，由于获得成功的军队往往墨守其打胜仗的那套方法，所以普鲁士军队仍然沿用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腓特烈的编队和队形变换方法，一直到1806年的惨败。

英国有意识地推行海军优势政策，把掌握制海权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决定是跟日益增长的贸易重要性和不列颠岛国易遭海上封锁却又能免遭陆上进攻等各种因素有关的。掌握了制海权，欧洲大陆上的围城攻坚战就能得到海上封锁的支援，还可切断敌军的供应。然而英国陆军有时不得不在欧洲大陆上作战，而当他们先是在美洲殖民地其后又反对美洲殖民地不得不进行陆战时，他们在欧洲所奉行的战争艺术，一般来说总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亨利·布凯在七年战争中指挥过新建的皇家美洲团的一个营。他在1763年写的备忘录中总结“印第安战争”态势时写道：

可以理所当然地说，第一，印第安人总的格言是包围敌人；第二，他们以疏散的队形进行战斗，从不使用密集队形；第三，他们受到攻击时从不坚守阵地，而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要是承认这些原则，那么，第一，参战的部队……必须轻装；第二，既然他们在进攻或防守时不会遭到抵抗，他们就不必组成易遭无谓伤亡的密集队形；第三，他们的队形变换必须迅速地进行，士兵一定要反复训练，能在敌人败退时紧追不舍，不给他们以重新集结的时间。[\[13\]](#)

这显然需要一种不同的战争艺术，需要新的队形变换，特别是轻步兵的队形变换。虽然英国人颇能随机应变，但由于他们受欧洲背景的限制，从来没有跟上形势的需要。队形分散，各自为战的轻步兵并没有适合18世纪的欧洲模式，而欧洲的习惯做法也难以消除。

战术同样也受到欧洲这些死教条——缺乏协同作战、强调围困、不搞突袭——的影响。但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时代已经变了。兰姆中士把美洲大陆上战争的性质说成是“一种不可压抑的热情和复仇心理。幸好这种情况在一般战争中不常遇到”[\[14\]](#)。18世纪陆上作战的规则显然正在打破。

在海战方面，在1782年的桑特海峡战役中，打破了自己和敌方舰队的战列队形的罗德尼，打破了一切常规；他赢得了自1692年以来的第一次光明正大的海战中第一场鲜明的胜利。他俘获了包括敌方舰队司令的旗舰在内的5艘军舰，他的部下胡德另外还俘获了两艘。到这时已可明显看出，死守战列队形永远无法赢得海战胜利，而跟踪追击却往往取胜。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说在舰队战术中，一切命令，特别是在接敌战术中一切命令都应废弃。但是这的确使战列队形和追击有可能明确地结合起来。

归纳起来，在18世纪中，战争是在稳健中进行的。随着对宗教狂热的摒弃，战争的罪恶减少到空前绝后的最小限度。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文明的战争阶段，到美国独立战争末尾和法国革命战争时期告结束。美国独立战争末尾获胜的殖民地人民和法国革命战争对保皇派进行了严惩。战争在17世纪中已不再是宗教狂热的武器，而成了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武器装备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步兵武器方面的唯一改进是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在1740年用铁的推弹杆代替了木制品。炮兵的使用在18世纪中期，按其与其他兵种的比例来衡量，增长得比16—20世纪中任何时期都要快。军队的规模有限制。几乎一直

到18世纪末，才出现有组织的常备师。军队在战斗中仍旧只是组成单独一条连续不断的密集队形。胜利取决于将领的才干而不在于武器优劣，取决于质量而不是数量；而战役则取决于机动用兵而不在于摧毁敌人。人民大众排除在战争之外，规则和惯例使他们免遭战争之害。18世纪的战争被人说成是国王们的游戏，而不是日后那样的民族之间的纷争。参战的各国君主感觉到他们的责任，深知他们臣民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把他们的行动保持在限度之内。他们的军队不是靠征兵征集的；他们不依靠被他们占领的国家供养，也不破坏和平的成果。他们遵守他们军事游戏的规则；他们自己把目标定得适度；并且不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被打败的对手，他们意识到下一次可能会轮到他们自己。战争游戏不应破坏一片升平气象，18世纪特有的骄傲，即那套艺术、规律和风格。总之，战争艺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普遍存在的那种心安理得的自鸣得意。

18世纪欧洲各国中的社会阶级间的界限分明。这些集团的高低是以出身、继承的特权和财产为基础的。封建贵族和贵族阶层是忠诚可靠的，他们指挥舰队和充当军队的军官。贵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军事史，他们主要的、合适的职业是在军队中服役，他们的报酬是勋章和胜利的奖赏。在克罗地亚的军事边境和哥萨克人中间仍然实行真正的封建军役制。占人口大部分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一般被免于参加战争的活动的，以便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就是增加国家的资源，把农业、工业和财政的财富提高到最高的水平。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这些阶级一般都接受和平所加给他们的一切条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些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就毫不关心究竟由谁来统治他们所居住的国土。职业军人来自社会上那些不事生产的阶层：军官来自上层贵族，士兵和水兵则来自下层的失业者、流浪汉和乞丐。这进一步反映了18世纪统治者们，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人力来达到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那种平衡的企图。利用外国人为本国打仗，也是一种统治手段。这样可望打破对手的平衡而又有利于保持自己的平衡。只有英国没有这样的军事贵族，因为英国的各阶级间的社会悬殊不是那么显著，中产阶级和上层之间从来没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英国由于拥有商业财富，它在雇用士兵进行陆战和对欧洲盟国给予津贴方面，都处在比较有利地位。

18世纪所有各国的军队，都是由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成分混合组成，缺乏同一性（外国人约占各国军队总人数的1/4到2/3）。他们的作战素质平平，人们相信，只有靠十分严明的纪律才能把这帮缺乏伟大和共同理想的士兵们纠合在一起。士兵服役的年限很长。打仗只是为了谋生，不是为某个事业而献身。一般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中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被遗弃者，其他比较幸运的阶层对待他们要么是丝毫不感兴趣，要么充其量也是加以蔑视。为了防止他们开小差，往往用各种严密的法规来管束他们，开小差是那个时代军官们最感头痛的事情。募兵制排除了一切礼遇的机会，因此它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例如，那些由抓兵队抓来的士兵，怎么能让它们上岸休假呢？为了使这支大杂烩的队伍成为一支能打仗的部队，就必须由外界或上级强制实施秩序，以创造出某种形式的共同意图。腓特烈大帝写道：“这种秩序、纪律和惊人的精确性使这些军队如同一只钟表的机械，那些齿轮经过巧妙的连接，能产生精确而规律的运动。”^[15]18世纪的指挥官们深信，纪律是军队的灵魂，它能使人数很少的小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使弱的部队能够取胜，让人刮目相看。士兵用不着思考，思考是军官们的事情。对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士兵用不着讲道理，对他们只有严加管束。这种局面，只有通过使当兵这个职业比较有吸引力，给予较好的薪饷，并且给予一切可以行得通的礼遇，才能得到改变。

在英国军队里，即使各个阶层之间社会鸿沟不甚分明，一位观察家在1765年曾评论说：任何一个看到过步兵团队整队的人“都会认为军官们和士兵们友善极了。索霍广场的连队也是这样——全都站在一起，却又界限分明。”^[16]军官们一般都不愿过问和关心士兵的实际供应情况，这被认为是士兵常常开小差的一个原因（严厉的惩罚对减少逃兵的数量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似乎是公认的）。士兵和水兵都是一些单纯、率直、讲求实惠的人，主要关心军饷和伙食这些基本问题——军官们对于这些非常庸俗的事务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像惠灵顿这样的军官太少了。他在1787年一加入陆军就让一名列兵先是只着军装过秤，然后又带上全部行军装备过秤。如果有一名军官受了伤，伤亡名单上会列上他的姓名。但普通士兵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一堆号码。军官和士兵之间既有心理上的，也有实际上的隔阂。正像威廉·蒙森爵士所说的，“当水兵们发现他们的指挥官对海上的规矩一窍不

通，并且不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讲话时，他们就变得顽固又任性了”^[17]。

由于士兵和普通水兵都是来自社会下层，记载他们生活和观点的文字材料几乎全出自军官们之手，因此，对于整个军队的看法难免不带偏见。如果士兵们自己写的信件或日记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把它们公布出来就对揭示18世纪陆海军生活的真实情况会有极重大的意义。上下级之间的这种隔阂，说明了为什么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部对英国海军中如1780年在朴次茅斯港内“无畏号”上酝酿的哗变形势竟然毫无觉察，以致对1797年的各次事件毫无准备。陆海军中大部分守旧派对士兵不屑一顾，即使提及也使用尖刻的语言。解决纪律松懈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官兵间的相互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只能依赖不停的工作和严酷的纪律，士兵们的思想只得让它整天忙于各种勤务。肯彭费尔德说的话，就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要士兵守规矩，就必须让他们一天忙到晚”。“要让人数众多的部队有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分成一级一级，每一级都有军官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士兵们有纪律守规矩。”^[18]所有这一切过分依赖许多军官们的所谓热情。普通士兵中的某些情况是情有可原的，由于对构成特种食品的无知，由于无法用真空防腐的方法来保存食品，以及诊断许多当时还未十分了解的疾病尚有困难。即便如此，这个时代的自满情绪也还是太深了。

在消除官兵隔阂并建立相互信任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伯戈因向第16龙骑兵团他的军官们提出的教导法则，坚决要求军官们必须要了解有关马匹的各种配具，学会装备和驾驭马匹的本领，对各种马具的用途了若指掌。军官不得谩骂士兵，要把他们当作有思想的人相待，有时还应在谈话中开开玩笑。他声称自己反对普鲁士的那种“用棍子驯狗似的训练士兵”的方法^[19]，但是，那些对普鲁士的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忘记了，除了纪律以外还有别的。约瑟夫·约克少将1758年7月在一份论述普鲁士陆军的报告中提出了下述几点意见：尽管腓特烈大帝易患感冒，但他“行军时却从不坐马车，而是一直骑着马和步兵们一同行进，他同他们一起出发，率领他们进入营帐或驻地……他以前还往往同部队一起宿营……军队的军官中只有他和凯特元帅两人住进营房，其余军官都住进帐篷宿营”。这位国王“非常注意让他的士兵们得到一切必需品，我确信，全面衡量起来，只要士兵

们能够习惯于不论在什么场合都须在各级军官的监督下循规蹈矩，他们的生活在这里要比在任何别的军队里强”。普鲁士军队每年都发夏装和冬装，面包供应从不间断。腓特烈“从不让他的军队不必要地劳累。因此，部队一旦学会了他们的课目（这些课目在普军中学起来要比在其他地方快），他们只要完成日常勤务就够了。因为腓特烈在战役的第一个月过去以后，决不在战场上对他们进行操练或检阅，除非当他注意到他们纪律松懈，作为惩罚”。约克的结论说，腓特烈“有理由得到他的军队的信任，因为他的军队确信他总是和他们在一起。在行军中，他与部队打成一片，和士兵随便交谈，了解他们各人的身世。此外，派出的分遣队不论大小，即便是上千人的，他都要陪同出发”。约克还举了一个事实来说明腓特烈对一些细小的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普鲁士士兵从来不自己扛帐篷的支柱，支柱与帐篷一起由马驮运。

这样做避免了好些麻烦。例如，士兵不必再因为支柱与他们的火枪系在一起而在遇到意外时手足无措。打了一仗后，在敌人面前后撤时，士兵们就不会因为没有支柱支撑帐篷而不得不在地面上露宿。而这种情况，我们在战场上失利时是难免的，因为士兵在投入战斗时，必须扔掉带在身边的帐篷支柱。[\[20\]](#)

在英国海军中，像豪勋爵那样的将领是个例外。水兵们都记得他如何常在战斗以后下到船舱里，坐在吊床边与伤员交谈，并把他自己的食品和酒送给他们吃。到了18世纪末，已经产生了某种团队的自豪精神。一艘军舰在一名水兵的一生中，由于彼此接触时间短暂，很少能起到一个团队在士兵生涯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尽管如此，像“胜利号”这样一艘长186英尺，载重2162吨的军舰上，官兵总数近千人，这么多人与外界隔绝，拥挤在这样一个必然狭窄的环境中，除了工作外无所事事，在海上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一种团体精神。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长期封锁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情味。1797年水兵哗变事件发生后，警惕性可能有所提高，但舰上军官对水兵的关心也有了改进。这是个人对舰上伙伴的关心，它在纳尔逊身上尤为突出。

已经可以普遍清楚地看出，入伍以及使用的其他的招募方法，都已无法为即使是18世纪那样的有限战争提供足够的兵员。许多国家开始试探性地寻求某种公平的全民服兵役的形式。普鲁士、俄国和法国最早试行征兵制，奥地利和西班牙在七年战争后也步它们的后尘。甚至在英国，1757年的民兵法案建议用抽签的方法从各教区的名单上挑

选6万名男丁，在每年4—10月每星期训练一次（总共28天），服役期为3年；而皮特的建议甚至比这走得还远。在海军服务方面，法国的“海军军籍登记”和英国的“强制征兵队”成了日后范围更广泛的各种制度的先驱。征兵的对象一开始时只是对有限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实行征兵。全民兵役制的全面实施和完成，还必须有待于战争性质的改变和人民对战争态度的变化。同样，高级军官尽管仍然是贵族的专有领地，但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人数日益增多，特别在那些军职能用钱买得的国家里更是如此。但是这种发展形势并没有使18世纪军队的效率有显著的提高。

1740年，普鲁士的人口在欧洲各国中只占第12位，和平时期军队有8万人。相比之下，法国和奥地利的人口均比它多10倍，但它们的军队分别只有16万人和10万人。普鲁士军队最灵活，进击速度最快。它不但灵活，而且擅长训练有素的机动，组织严密，操练正规一致。腓特烈深信，普鲁士的国王要拥有一支军队，就必须在国内的各阶级之间、在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之间坚定地保持平衡。一个严格的阶级结构对于军队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必须保持贵族阶级，禁止贵族将其土地出售给农民或城镇居民。农民太无知，不能充当军官，而让资产阶级当军官，腓特烈则认为是军队没落的第一步。他非常依靠主要来自农村贵族的军官们的精神和效率，他们不得在其他地方服务。军官必须带领他们的士兵面对危险；既然荣誉对于士兵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他们就必须害怕军官甚于惧怕危险。每个贵族家庭提供一个儿子，让他于12岁到18岁期间在士官生连队服役，然后分配到各团队。约瑟夫·约克少将注意到，上尉军官必须照管好他们的下属军官，这样做的意义是“年轻的军官们时时都在他们上级的监督之下，不得找借口请假，除了他们的勤务以外不得去注意别的事情，这样就可避免这么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时常发生的争吵闹事等各种麻烦。而这类麻烦在别的军队里，据我亲眼所见，是有很坏影响的”。

农民家庭也同样应受到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应被贵族或资产阶级并吞。应征入伍的只有那些不是农业上所必不可少的人。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用处，在于他们是生产者。腓特烈在1768年写道：“有用的、勤劳的人应像眼珠一样受到保护。在战时，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从国内招兵。”陆军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是非普鲁士人的雇佣兵、战俘或外国军队中的逃兵。整营整营的士兵是由奥地利军队的逃兵组成

的。从敌国领土上招兵是普鲁士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742年普军中本国人占1/3，1750年时占一半，1763年时占2/3。1761年普军的总人数占人口的4.4%，而法国当时只占其人口的1.2%。普军中本国人的比例按规定不得少于1/3，他们是通过强制服役征召来的。普鲁士王国由许多州组成，每州负责征召一个团队，并有能力为这个团队提供三次补充（一个步兵团队由5000名火枪手组成，骑兵团队有1800匹马）。男孩出生后，由负责洗礼的牧师报告地方当局，他们在18岁到40岁期间得随时听候军队征调。免于征调的只有独生子、寡妇的儿子、手工业大师傅、神学院学生、孤立的农庄或有一大群家口的农民。

严明的纪律和持续不断的服役被认为是把这样的一支军队变成一个具有一致思想和意志的工具所必需的条件，从而能使腓特烈大帝充分发挥他的统率艺术。他不靠军队的勇气、忠诚或团体精神。他认为，单个士兵，独立小分队或是没有军官监督下的部队都是不可靠的。这种不信任是他反对在战场上分散兵力的内在原因。为了防止开小差，遂制定了各种详尽的规则：军队不得在大树林附近宿营；他们的侧翼和后方应有轻骑兵看守；应尽可能地避免夜间行动等。军队外出筹粮或洗澡时，必须列队由一名军官带领。在普鲁士军队里，平均每37名士兵就有一名军官。对此，约克曾评论说：

我观察到普军中的唯一在别处没有见过的优良纪律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部队行军途经小城镇并因任何原因队伍中任何部分必须在城里停留时，我从未见到一名士兵离开过队列。即使我见到这种停留长达一个多小时，情况也是如此。诚然，所有其他的军队也有同样的规定，但能如此严格遵守的，至今我见到的唯有这支军队。[\[21\]](#)

他在报告中还说，普军里任何一支分遣队从不由来自不同团队的士兵组成。它们总是“由整支部队或根据所需人数按比例从一支部队中抽出。这样，军官就能一直与他部下的士兵在一起”。他的结论是：“执行勤务是精确的，但与我看到过的别的部队相比，他们缺乏生气和欢乐。他们一心在执行任务时普遍有一种沉闷的气氛……这部机器全靠君临其上的君主的天才方能造出、维持和运转。”如果腓特烈失误，则全盘失误。虽然普鲁士的军队这样防范，但其开小差的要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多。伯戈因1766年向查塔姆勋爵报告说，普鲁士军队“对自己士兵逃跑的担忧甚于对敌人的防范。而且，在战斗失利后，失踪的人数往往是死亡或被俘人数的3倍”。因此，有

时候，军官的主要责任是防止士兵开小差，与敌人战斗反倒成为次要的事。因此，尽管普军由于其结构可以称为纪律严明、灵活机动，但它却很少能予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为了克服战斗时的紧张情绪，同样需要贯彻铁的纪律。如果敌人溃逃，得胜的部队必须仍然保持队形，掠夺死伤者的士兵则被处以死刑。1745年腓特烈下令：“如果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左顾右盼意欲逃跑或是擅自离开队形，他身后的军曹就可用刺刀将他刺穿，予以当场格杀。”完全可以设想，18世纪的士兵是一些生性粗直的士兵，他们对于这样的命令比那些一纸空文的种种规定要懂得多。

18世纪初，法国军队曾是欧洲最完美的军事手段。到了七年战争时，它在与汉诺威、黑森和不伦瑞克等诸侯国军队的作战中，却从未赢得过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分配给它的经费不足和对以往一度曾是成功的神圣传统过分崇拜，而且也因为军队的社会成分上的弱点。一系列与宫廷关系密切的将领极为无能，而贵族出身的军官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之间的斗争激烈。到了1750年，有1/3的步兵军官出身中产阶级，他们或是用钱买得委任，或是从行伍中提升。但不管他们能力多大，决定高级军职任命的是出身和财产，而不是本领。高级军职往往由一些既无军事素养又不求上进的人据有。迟至1781年，国王还发出一道命令，规定任何想得到军官任命的人，必须经宫廷家谱专家审定具备1/16的贵族血统。到了1787年，军官队伍明显地分成5个阶层：大贵族出身的军官，有证明具有几百年贵族历史因而能被引见国王的贵族军官，有1/16贵族血统但不属于宫廷圈子的贵族（法国的乡居贵族）军官，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以及那些在1781年的命令关上了新兴中产阶级晋升大门之前得到任命的行伍出身的军官。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均来自前两个阶层。一个宫廷贵族可以在39岁时成为一名将军，但他需要随部队服役8年零5个月。其他贵族须到58岁、服役31年以后才有可能当将军。军官队伍的大多数是由第三个阶层所提供。来自后两个阶层的人，最高军衔只能是中尉，指挥一个连都不可能，退休后的年金也很少。这个制度在1787年陆军委员会的晋升条例中已经做出规定。

法国军队中每15名士兵就有一名军官，人数之多甚至超过了普鲁士军队，不过原因却大不相同。尽管纪律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却是：这时被封为贵族不再是因为提供军官的需要，而是因为军官资格

的设立是为了满足贵族的需要。许多军官很少同他们的部队在一起，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士兵，从来也没有取得他们的信任。军官们的行囊累累，仆从众多，这就进一步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这些数量庞大的军官还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为了使比较高级的军官有事可做，只好轮流进行指挥，元帅和将军们便依次轮流指挥；因此，这就缺乏前后一致的连续性。1775年陆军的总兵力为17万人，军官人数竟达6万。他们的薪俸和年金占军队预算的一半以上，他们中真正在团队里供职的仅占1/6。在近200个团队中，上校有1100名，将军为1200名。到了1789年，军队兵力增加将近一倍，但军官编制却缩小到9578人，其中6633人是贵族。法国的军官们实际上是一批老爷。这场裁减工作主要靠舒瓦瑟尔，他把拿薪饷和年金的军官人数几乎砍掉一半。他迫使实际指挥团队的上校们每年要有一段时间与部队在一起，还为了培养年轻军官规定了定期的训练活动。招兵工作也从连队指挥官的手中转由国防大臣负责。为了取代团队连队里那种“放牧”一样的管理方法，还开始实行一套正规的核算和行政管理制度。

法国军队的组织反映了这种贵族的基础。在各王宫值勤的有王室禁卫军，“法兰西和瑞士卫队”。还有前线的团队以创建团队的大贵族的头衔或法国各省的省名命名。团队的1/4士兵是外国人，其余的3/4则由那些比较不幸的贫苦阶层、游民和失业者组成。1796年为支持奥什入侵爱尔兰而从弗拉兴对英格兰东北部进行的佯攻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其组成的成分问题。在这支由囚犯和逃兵组成的队伍里，有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荷兰人、瑞士人、土耳其人，甚至还有英国人。他们在即将登船时拒绝执行任务，成百地开小差流窜农村，对居民造成威胁，直到被警察搜捕。督政府1796年6月19日写给奥什的信中说，组成这支远征军主力的各个部队应“使法国得以清除掉许多危险分子”^[22]。还规定在法国农村人口中，用抽签办法建立一支民兵，但这支民兵只是偶尔集中在一起，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训练。

法国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官一样，是由贵族充任的。而且甚至更具有排他性，因为海军军官的军职是不能够购买的，德斯坦伯爵（1729—1794年）从1778年到1781年间一直指挥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海域的舰队。尽管他才能出众，却从未得到大多数法国海军军官们的尊重。因为他以前是一名火枪手，而不是一名职业水兵，因而被人看

作一个“外来人”。商船队的高级船员只有在战争持续期间才被编入海军。与英国海军不同，他们在海军中没有前程。在贵族独占的作战部门和驾驶舰艇的航海部门之间，有一道严格的、几乎是封建的界限。尽管如此，法国海军军官在驾驶舰艇方面比英国人受到更好的训练。而海军舰艇建造作为一项专业于1810年始于英国，当时在朴次茅斯成立了海军造船学校。英国海军的教学着重经验，依赖那些最有资历、最聪明的教官。而在18世纪的法国海军学院里，数学、水文学、天文学、航海术、仪器制作和舰艇建造都在课程设置中得到体现。18世纪中期，查尔斯·诺尔斯海军上将认为，法国的一艘装有52门炮的军舰相当于英国的一艘装有70门炮的军舰。法国海军还是信号改革的先驱。

自1689年以来，法国海军就有一套称作“海军军籍登记”的征兵制度。法国是第一个用正规的海军人员来建立一支海军的海军大国。沿海各省的全部海员，被分成为3个、4个或5个组。按各省海员人数多少，每个组在4年、5年或10年时间内服役一年。当一个组被征往海军服役时，其余各组可任意到商船上工作。他们轮流服役，不服役时可领取半薪，但终身必须听从海军调遣。迟至1771年和1786年英国议会才提出了相似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限制英国海军的服役时间，超期就可以要求免役；给那些按全国海员登记名册服役的人员发年金，给予较高的薪俸，并增加奖金；避免国家与商船队之间在战时拼命地争夺海员。法国的制度不得不辅之以强征，因为人们为了得到商船队的优厚工资，往往逃避为国家服役；强征还常把一些从未见过大海的农民以及外国人也抓来服役。显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征募海军人员方面，要解决的还是财务问题。

英国陆军的兵源，一是来自团队军官招募来的志愿人员；二是那些以参军为条件而从狱中获释的罪犯和负债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就有三个团队完全是由这些缓刑犯人组成的；三是根据1739—1763年通过的各项法案用发奖金给教区当局的做法而抓来的贫民，“凡身强力壮的乞丐、算命人、无业游民，以及在教区内无人认识或无法讲清自己来历的可疑人物”。只有第一类人能指望晋升。这类人为数不多。托马斯·皮特1750年提出议案限制当兵的服役期限。他认为“一个人从军绝非出于谨慎或慎重考虑，因为没有一个人头脑正常的人愿意一辈

子受人驱使”。在同一次议会辩论中，巴林顿勋爵声称，大多数普通人从军是因为无所事事、挥霍过度或生活放荡的缘故。

由于英国的陆军在正常情况下保持较小的编制。一旦有外国入侵的威胁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就必须要从爱尔兰借军队，雇佣日耳曼各公国的士兵，或者给予其他国家津贴让他们去打仗。老皮特辞职时，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到800万的总人口中有20万以上的武装人员。尽管英国的军队人数增加很大，但1761年议会仍投票通过309.1万英镑作为给普鲁士人的津贴和支付侦察部队中的日耳曼人部队的薪饷。英国陆军在战时扩充的问题，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分析一下和平年代正常情况下的陆军军官名册，再把这一分析和战时陆军军官名册作一比较，考虑是否同一种（或哪一种）人员才能满足这种大扩充。[\[23\]](#)

皇家海军舰艇上的水兵或是由志愿人员所充当，他们为一艘舰艇的舰长的声望所吸引，例如缴获战利品，或者他本人比较随和，容易侍候；或是由穷苦人家的孩子、孤儿和流浪儿充当。从1756年到1815年，航海协会为舰队输送了3.1万名男孩子，或是抓来的百姓，或是外国人，到了18世纪末，则由负债人、流氓和游民，根据各郡和海港人口多少，规模大小按额定数量编入海军。与陆军一样，海军的志愿人员也为数很少。照约翰逊博士的说法，一个人如果有办法去坐牢，他就不会去当水兵，因为在舰上犹如坐牢，而且还有葬身海底之虞。因此，把狱中的犯人送到舰上去的做法，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有人写道：“为了玩乐当海军，就好比是为了消遣进地狱。”[\[24\]](#)但是一旦加入了海军，倒不在乎他们的出身，而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分成二等水兵或三等水兵。如果说，人们参加海军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奖金和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到了战时就要用抓丁队来弥补爱国主义的不足了。抓丁是一种恶劣的、不公平的征兵制，港口和入港的商船则首当其冲。在和平时期，英国只保持在紧急状况下所需海军兵员的1/5。抓丁是由舰上的军官带着一队水兵进行的。到了18世纪末，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下，则由正式的抓丁队进行。海军之所以要依靠强征制度，原因是，只要海军的军饷不提高，它就不可能吸引足够的人来服役。海军给的报酬不如武装私掠船的多，而生活却比商船队艰苦。既然海军不可能、也不会用各种好处来保留住其人数，抓丁因而就成了一种必要的、然而却是遭人反对的做法。所以遭人反对，这是

因为它严重地干扰了贸易这个18世纪的立国之本。为了维护贸易，曾制定了一些法规来减轻抓丁造成的不良后果。离港的商船则尽量地免于抓丁。航海法也经修改，在战时商船可雇用外国人，可多达占全体船员的3/4。1775年的法令不但中止了商船船员雇用条款的3/4的规定，而且还允许所有在英国商船上工作过两年的外国人称作英国海员。因此，抓丁队就保住了那些有航海经验但宁愿得到商船队工资并守纪律的人，或那些住在海港附近或碰巧来到海港地区的未出过海的人。18世纪，英国的城镇居民很少有看到过大海或战舰。百姓对海军的热情是随着以后英国海滨浴场和一年一度到海边度假的风气日益兴盛才发展起来的。对于向往大海的人，商船队提供了优裕的条件：它的工资在战时会增加，危险性较小，住舱不那么拥挤，生活条件也好。在七年战争的各次战役中，阵亡的水兵是1512名，但病死和失踪的水兵却多达133708名。海军的薪饷从1651年到1797年一直没有变动。二等水兵每月是22先令6便士，三等水兵只有19先令。相比起来，商船上的水手工资有50—60先令。薪饷要等到返回基地港口6个月后才能发给，有时还要拖欠更长时间。在1758年之前，没有任何有效规定，可以把欠饷的任何一部分发给水兵的家属。一直到1825年，水兵欠饷即使发给，拿到手的也是一种只能在伦敦的托尔希尔的偿付局才能兑换的票据。水兵必须在服役期满后才能离舰上岸。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夕，水兵签订的合同只有舰艇一次服役期限那么长，而且不能保证再被雇用。

英国军队是欧洲唯一一支军衔可以普遍用钱买卖的军队。这种交易建立在正规的和固定的原则之上。有钱有势的人在军队里晋升很容易。除了炮兵以外，购买军职的交易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军官本人的才干和爱好无足轻重。对各级军衔晋升的年限没有限制。购买军职对逐级晋升也没有阻碍。年龄大能力强的军官往往因为囊空如洗而被那些毫无经验但却富有的年轻人挤在一边。这一来晋级制度就失去了激励军人立功的意义。花钱受惠、无功受禄往往使得军官队伍变得麻木不仁和不求上进，他们认为他们的前程已命中注定而且毫无指望。

军职买卖流于种种弊端，很多人已觉察到它的缺陷。1760年以后做出了一些尝试来改革和调整这种买官的做法。结果，价格被确定下来，不得超过；并且规定了购买军职的手续。对随意买卖官职以及为幼儿买官等现象，也试图予以处理；还考虑保护那些在海外服役和没

有势力的军官，免受对在国内服役的军官有利的势力的影响。这些调整对反对军队晋升中的潜在势力起到一些作用。然而，尽管买卖官职制度的弊端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但它却一直延续到19世纪战争期间才被废除，当时战争的各种丑闻彻底暴露了这种制度的腐败，导致了一场早该进行的革新。虽然有种种弊病，但官职买卖制度却防止了英国陆军的高级职位成为贵族独占的领地。这一点反映出那个社会中拥有财产的社会基础是地主和乡绅。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同样也认为只有乡绅才能在军队中担任军官。

利害关系是18世纪军队升迁中的一股潜在力量。坎伯兰公爵是王室子弟，1745年他才24岁就指挥一支联军；沃尔夫15岁当少尉，23岁成了中校，他仗着一位无所不能的大臣的支持，在32岁时就当上了少将。惠灵顿1787年17岁时参军，靠着哥哥理查德的势力，当年年底就成了中尉。正如他母亲所写的：“6个月内他在军队里升了两级，被任命为副官。”他24岁任中校，32岁任少将，40岁任中将，指挥远征军，功成名就。

买卖军职和讲利害关系，对于陆军军官的素质大有影响。因为金钱和有权势的亲友总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军官们就不会自觉地去学习有关这门对他们说来往往是不愿干的职业的知识。英国军官不乏天才，但他们缺乏发奋努力的精神。这种情况说明了何以他们的许多战役总是“功败垂成”。英国人如果在经受考验或被逼至绝境时，通常总是能够取得成功的；但是他们没有遇上强敌时，却很少认真作战。结果，和从贵族中选召军官的欧洲其他军队相比，他们的实际作战效果相差不多少。伯戈因在评论1765年奥地利军队的将领时这样写道：“一些人已老而无用，另一些人则靠家庭的地位或宫廷钻营而得到升迁（否则就得不到升迁）。许多人无功亦无过，靠资历提升，把这些人抛开未免有失公平，但是这些人国家决不能委以重任。”到了18世纪末，重任即将来临，新的战争艺术的需要，使欧洲各国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英国海军军官的官职没有买卖。“皇家海军在其最后的组织形式中，军官是由一些精通航海技术，献身于国王海军事业的人担任的。皇家海军给予他们地位，但并不保障他们的职业，报酬有限，但它是一个伟大国家中的一种光荣职业。”^[25]海军军官有的来自贵族和乡绅家庭——来自那些统治家族，或与他们有裙带关系，或能得到他们

照顾的人；也有来自中产阶级——小地主、教士和律师的子弟，他们凭才能和机智得以晋升；还有来自商船队，但他们的数量日益减少。库克、坎佩尔和本鲍等人最终当上了军舰上的高级军官，他们主要靠非凡的才能或特佳的运气。这后一类的军官，由于没有社会地位，通常提升太慢，一生中提升不会太高。也有极少数军官是从水兵提升起来的。

虽然像海德·帕克这样的人在家庭和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势，而肯彭费尔德和杰维斯则根本没有，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海军将领几乎一开始总有一些有利条件或这一类的东西，早年得到某些显贵的庇护才能迅速得到提升。属于统治阶级广泛领域的父母们，把军舰舰长和陆军团队的指挥官等同看待；他们深谋远虑地为子弟们在这两个军种中做好准备。因此，那些没有关系可依靠的军官们，就很难当上旗舰上的高级军官，他们人到中年仍然充当下级军官，而其他人则利用他们的辛劳谋取自己的功名。在战争期间，忙于舰务的正是这样一些从海军候补生到海军上尉的下级军官，而头头们则在岸上长期领取半薪后才到海上来。1797年坎珀唐海战中的胜利者亚当·邓肯在七年战争中赢得了声誉。1764年到1795年任北海舰队总司令时，64岁的邓肯在海上服役的时间总共才两年。出身伦敦富商家庭的霍克海军上将，来自圣克莱塞的科尼什教区，他和大海没有任何关系，一直到1734年29岁时，才当上小舰舰长。但是，他在他的舅父朴次茅斯议员、贸易和种植园专员马丁·布莱登的支持下飞黄腾达。亚历山大·胡德和塞缪尔·胡德爵士兄弟1741年由他们父亲的客人海军上校托马斯·史密斯收留进入海军。史密斯是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的私生子，而利特尔顿则是格伦维尔家族的表亲。塞缪尔·胡德还由于娶了朴次茅斯军舰修造所政府特派员的女儿而使自己的事业更为顺达。迟至1815年，海军上将约翰·哈维爵士在他的旗舰准备前往背风群岛站时，带着一名侄儿当副官，还有两名外甥分别充当海军陆战队中尉和海军中尉。对于这位海军上将的后一要求，引起了老资格的海军大臣的尖刻抨击：“一个舅舅和两个外甥，成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了，决不能让他们这样干。”^[26]另外，肯彭费尔德由于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一直到39岁才当上一艘小舰的舰长。巴塞洛缪·詹姆斯的母亲反对他参加海军，因为“没有能保证通向升官途径的那种关系”^[27]。

其他国家的海军里没有指挥一艘某种级别小舰舰长这样的军职。这种军职把取得这一职位的军官和他们的下级军官完全隔开了。这是这些舰长和他们原本出身的下级军官之间的真正界限，它是有组织的海军等级制度的真正标志。在战时，年纪轻轻就能取得小舰舰长这一职位，这是因为新建的舰只和被俘获的舰只很多。七年战争期间，凯佩尔19岁，豪和康沃利斯20岁，罗德尼23岁就当上了小舰舰长。当上小舰舰长后，每名军官只能在舰长花名册中慢慢地往上爬，一直爬到海军上将。因此，海军高级军官的一生，是由考虑提升和领休职半薪所支配的。英国海军在使用高级军官时，采用非全日制的基础。被任用者只有在实际工作时才能领取全薪。高级军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岸上不工作，但领取半薪留职。1737年之前，根本没有退休一说；在此以后，也形同虚设。“任何一名取得军官资格的军官，只有老死时才算退役。”这很能说明18世纪时的一些做法：很多高级海军军官很穷；因此经常有人批评说，他们只要捕获赏金，不要打仗；1805年以前有不少高级军官进入议会，1805年巴勒姆下令，对于那些想去议会履职的军官请假离开舰队者，不予批准。霍克接替他的舅父的空缺当上了朴次茅斯的议员，任职近30年。罗德尼从1751年到1782年先后当过5个不同选区的议员。塞缪尔·巴林顿从舰长花名册的底层爬到最高层，花了31年的时间。但是，纳尔逊12岁加入海军，17岁当海军上尉，20岁成为海军少校，一年后任舰长，到了39岁为海军少将。人们推算，他要是活着，要到1844年才能当上海军上将。纳尔逊的经历典型地表明18世纪军官升迁的必要条件：人事关系（纳尔逊的叔父1770年到1779年间任海军审计官）、才能和有足够的战争使他能不断地参加战斗。

军官的使用数量，在战时受到编制和造舰计划的严格限制。一直到18世纪末，一名军官每到一艘舰艇服役，都必须得到一次新的任命；他在舰上的岗位任命时尽可能地具体，那时还没有在舰队机关任职的情况。从提供海军军官的各社会阶层中征召军官的办法有几种。由海军部挑选的少数人被称作“国王的听差”，他们从1733年起在朴次茅斯军舰修造厂的海军学院接受训练。这些人须是“贵族和乡绅的子弟，年龄在13岁到16岁之间，每年付15英镑生活费，人数不得超过40名。到1773年，这样的投考者只有15名；这一年为上述阶层保留25个名额，15名海军军官的子弟应邀公费就读。所以，海军部实在没有办法吸引那些通过势力进入海军照样获得升迁的人。1779年乔纳斯·

汉韦创建了一所与上述计划相类似的私立切尔西航海学校，由有关的海军军官支持，为他们的子弟日后进入海军学院或航海生涯提供了初步训练。后来又有一种办法叫“舰长听差”。1794年以前，一位舰长可按舰上每百名舰员配备4名听差的比例，带一批人出海。他们通常挑选的都是自己的亲戚或本阶层的年轻人。1778年帕森·伍德福德的侄儿威廉想去航海，伍德福德就让他去伦敦晋见一位舰长。海军上将兼舰队总司令可允许携带多达50名的听差出海。因此，从这类听差中涌现出像胡德兄弟、豪和邓肯那样的海军指挥官。

对这类人的资格是有规定的。根据1731年的规定，舰长听差的最小年龄限定在13岁以上，但对于军官的儿子，最低年龄为11岁。听差服役4年后，并“在各个方面均合格”，才能评定为海军候补生。至于尉官，最低年龄限制为20岁，具有品行良好与能力合格的证书，1728年后还须经海军部实际考核；有6年海上服役的经历，其中1年为海军候补生，2年作为志愿兵。当然，这些规定也同样阻挡不住人事关系——纳尔逊不仅12岁就进入海军，而且不到20岁就当上了海军上尉；而科林伍德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时的副官约翰·克拉维尔1778年出生，1岁就编入了舰上的花名册，然而1792年他才上舰服役。海军学院的考试似乎纯属形式，但是，如果“舰长听差”这个制度从其结果来评定的话，由此而征召和训练出来的军官，具有深厚的业务知识和经验。领导才能和人事管理，决定的做出和判断力的运用，不是来自形式的训练和教育，而是来自经验。1782年后，当形式的作战体制放松，现场指挥官恢复了作战中的独立性时，那些指挥官们没有辜负大不列颠对产生他们的社会结构所赋予的信任。

（乐瑞夫 译）

[1] L. S. 科贝特爵士：《七年战争中的英国》（伦敦，1918年），第2卷，第95页。

[2] 迈克尔·刘易斯：《英国海军》（伦敦，1948年），第228页。

[3] 《皇家舰队动态报告》（伦敦，1744年），第48页。

[4] A. T. 马汉：《海上强国对历史的影响》（伦敦，第10版），第287页。

[5] 《历史手稿》《斯托普福德·萨克维尔司令官手稿》，第2卷，第257页。

[6] 《历史手稿》《莱恩司令官手稿》，第2卷，第492页。

[7] 大卫·马修：《海军的传统》，第114页。

- [8] 蒂尔潘·德克里塞伯爵：《评蒙特库科利的回忆录》（巴黎，1769年），第2卷，第272页。
- [9] 《对陆军军官的告诫和建议》，一位旧日的军官著（珀思，1795年），第31页。
- [10] R. 洛奇：《18世纪的英国和普鲁士》（牛津，1923年），第140页，注2。
- [11] H. S. 威尔金森：《拿破仑之前的法国陆军》（1915年），第46页。
- [12] 托马斯·凯佩尔：《凯佩尔子爵奥古斯塔斯传》（伦敦，1842年），第1卷，第316页。
- [13] 刘易斯·巴特勒：《皇家来福枪军团编年史》，两卷本（伦敦，1913年），第1卷，第159—160页。
- [14] R. 兰姆：《回忆录》（都柏林，1811年），第175页。
- [15] 皮埃尔·加克索特：《腓特烈大帝》（伦敦，1941年），第216页。
- [16] A. M. W. 斯特林编：《一个约克郡家族的编年史》，两卷本（伦敦，1911年），第1卷，第319页。
- [17] M. A. 刘易斯：《英国海军》，第296页。
- [18] J. K. 劳顿编：《查尔斯·巴勒姆勋爵书信和论文集，1758—1813年》，“海军档案学会”，第32、38、39、3卷（伦敦，1907—1911年），第1卷，第299、306页。
- [19] F. J. 赫德尔斯顿：《绅士约翰尼·伯戈因》（伦敦，1928年）。
- [20] 不列颠博物馆手稿补遗，哈德威克第9，第261册。载P. C. 约克《哈德威克大法官菲利普·约克的生平与通信集》，3卷本（伦敦，1913年），第3卷。
- [21] P. C. 约克：《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约克的生平和通信集》（1913年），第3卷，第222页。
- [22] E. H. 斯图尔特·琼斯：《一次失败的入侵》（牛津，1950年），第88页。
- [23] 参见E. 罗布森《美国独立战争中一支团队的招募》，载《陆军史研究会会刊》，第27卷，第107—115页。
- [24] H. C. 威尔金森：《1684年至1784年间旧帝国的百慕大》（伦敦，1950年），第119页。
- [25] 大卫·马修：《海军的传统》（1944年），第13页。
- [26] 大卫·马修：《海军的传统》（1944年），第190页。
- [27] J. K. 劳顿编：《海军少将巴塞洛缪·詹姆斯的航海日志，1752—1828年》，海军记录学会，第6卷（伦敦，1906年），第4页。

第九章 国际关系

1713年和1714年各国分别签订的11个和平条约几乎使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告以结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依然在交战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已告一段落，大部分交战国家都已能够达成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西班牙的属地被瓜分了。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五世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尽管新教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表示反对。但是，腓力五世不得不放弃对法国王位的权利要求，而且他也不能全部地继承查理二世的西班牙帝国。他得到了西班牙及西属美洲，但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曼图亚、撒丁以及西班牙在托斯卡纳拥有的各港口都归查理六世皇帝。西西里有几年则归属于萨伏依公爵。

除了瓜分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外，1713年到1714年间的各个和约还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在英法之间签订的条约中，汉诺威家族对英国王位的权利要求得到了承认。这无异是对民约论的承认。由于条约中规定，对法国和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所做的安排均须分别经法国和西班牙的国会认可；这一规定又进一步使这个理论得到合法性。法国的外交家们提醒他们的英国同行说，对王位继承问题做出如此规定的意图，在法国的法律中是无效的；统治的权力是神授的；如果法国年幼的王子一旦夭折而王位空缺时，腓力五世的弃权对他自己并没有约束力，但必须按照上帝的召唤而登上法国的王位。但是，他们最后终于接受了公法中的规定，这些规定表示王位问题要按照人所签订的协议来办。

和约的另一个对以后30年中的国际关系具有相当大影响的规定是要沿着法国边境建立一系列的“屏障”。在奥属尼德兰，荷兰人根据1715年11月的条约有权在那慕尔、图尔奈、梅嫩、伊普雷和其他地方驻防。在意大利，萨伏依公爵1713年获得了埃克塞利、费内斯特莱里和其他一些通往阿尔卑斯山的地方，以及东面和南面的阿勒桑德里亚、蒙特费拉特的一部分，瓦伦察、维杰瓦诺等地，因此他可以阻塞法国入侵意大利以及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进入利古里亚的通路。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成就，部分原因是萨伏依公爵灵活的外交手腕，但是，之所以能收到更大的效果，却是由于英国的支持。莱茵河畔的一

些小的地区落入了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各邦的王公手中。根据1714年的拉施塔特和巴登条约，勃兰登堡—普鲁士得到了格尔登的一部分。巴伐利亚收复了巴拉丁领地，科隆的选侯则回到了自己的选侯领地。人们可能指望这些德意志王公不但能够制止法国任何新的侵略企图，而且还能成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相抗衡的力量。然而他们还不够强大，没有英国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英国从这个解决方式中进一步得到了好处。根据这个作为战争结果的解决方案，英国又另外获得了一批对其贸易具有很大的价值的新的海军基地。英国仍然保持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而且它在地中海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因为根据这个解决方案，墨西拿和巴勒莫归于萨伏依公爵，为了达到平衡，又把那不勒斯和勒佐划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往地中海的航路因英国在1703年与葡萄牙缔结的同盟而得到了保护。英国在北方的地位，通过它同汉诺威的关系和与丹麦的结盟得到加强。在英国由此改善了地位的同时，法国的地位却由于乌得勒支条约的条款而被削弱。乌得勒支条约规定，敦刻尔克的海军基地要拆毁，马迪克的基地也不得用于战争目的。

英国还通过一系列的商业条约得到不少好处。这些条约有的是和约的一部分，有的是在战争期间作为巩固联盟的一种手段而签订的。这些条约中签订最早、最成功的是1703年和葡萄牙的条约；接着于1709年和1713年又与低地国家缔结了协定，1713年又另与萨伏依、西班牙和法国签订了三个条约。不必要看出“外来干涉者”的图谋促使英国采取了一种秘密政策（它可以与执政杜布尔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秘密政策相提并论），就可以这样说：甚至在那位对于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的见解如此敏感的纽卡斯尔公爵执政之前，英国的历届政府就一直热衷于用商业的利益来表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

紧接着乌得勒支的和平解决方案之后，看来欧洲大国的结盟关系似乎又要按照人们熟悉的方针重新组合了。人们公认，英国和它的盟国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盟国认为英国在1712年已经背叛了它们而极为紧张。但是，和约签订后不久，看来法国将不准备履行条款，因此英国—神圣罗马帝国—荷兰三国联盟又立即有了新的转机。路易十四似乎决意要规避的条款，就是条约中规定要拆毁敦刻尔克海军基地的那些条款。面对着这个重新出现的威胁，

英国赶忙又同它原来的盟友重新和好。这些原来的盟友对于这种安排发生争吵，即荷兰人将进驻按《乌得勒支和约》规定应划归奥地利的尼德兰南部要塞。几经周折后神圣罗马皇帝、荷兰与英国之间的分歧总算被克服，因于1715年11月签订了“屏障条约”。

然而，到屏障条约签订之时，由于凡尔赛宫廷的政治和人事的变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由他的曾孙，一个年仅5岁体质羸弱的孩子继承王位。根据路易的遗嘱，法国的控制权应由他的私生子曼恩公爵和他的嫡系的侄子奥尔良公爵两人共同掌握。曼恩公爵将成为年幼的路易十五的监护人并指挥王室禁卫军。而奥尔良公爵则拥有摄政的头衔，但他的活动必须受一个拥有授予官职权限的委员会的约束。奥尔良公爵不甘忍受这种约束，他把王室禁卫军、嫡系的王公、政治家们以及高等法院都争取过来。等路易十四一死，他就立即宣布他有指挥王室禁卫军的权力以及任免摄政委员会成员和授予官职的权力。曼恩公爵拒绝担任幼王的监护人，如果他不能同时掌握王室禁卫军的指挥权，从而他就再也不是奥尔良公爵掌权的障碍了。

虽然奥尔良公爵千方百计地使自己成了法国的最高权威，但他的地位并不牢固。腓力五世依然是一个死敌。两个人都一直在考虑路易十五一旦夭折，法国的王位究竟由谁继承的问题。而在18世纪，人们认为一个出过天花的孩子要比两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保险，因而一个体质多病的孩子要长大成人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腓力五世继承法国王位从王室系统来说名正言顺，他对自己曾在1713年的和约中放弃这个权利的事实并不感到十分难堪。他很妒忌奥尔良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役时英勇作战并且享有相当大的威望。甚至有人担心奥尔良可能对西班牙的王位也有所图谋。而且，腓力五世对于这种传说也感到惊骇，公爵还是个业余的化学家，他对于路易十五的父母和兄长之死负有责任；他对西班牙的波旁系的王室人员的生命也有图谋，虽然他曾经声称，如果腓力一旦死后无嗣，他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权利要求而由萨伏依王室继承。在路易十四去世前，这些对手曾有所和解，但腓力五世对于他的罪恶念念不忘。因此，当路易十四一死，据说西班牙驻法国宫廷的大使塞利亚马雷就提出抗议，为主子争取摄政的地位。实际上，他却感到事出意外，1715年并没有提出抗议。但明显的是，腓力五世仍然是一个死敌；而且由于法国宫廷中那些不赞成这

位摄政并对路易十四的私生子曼恩公爵寄予同情的派系想要依靠西班牙的援助，因此这位摄政急需另外寻求一个愿意给他以友好支持的大国。

这位摄政可以寻求此时仍在同西班牙交战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谅解。他也可以试图与英国达成谅解。英国那时的情况特殊，看来与它达成谅解要比与奥地利达成谅解的希望更大。1714年汉诺威的乔治继承了安妮的王位。1715年的选举使得辉格党人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向博林布鲁克、奥蒙德和牛津等托利党人发起攻击。辉格党的政策激起了1715年的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尽管这次叛乱失败了，而且那位来自汉诺威家族的英王和他的辉格党人大臣们依旧掌权，但是在与伦敦商人结盟的大约70户大地主家族中，辉格党人只是少数。英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地区则大都同情托利党。詹姆斯三世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信仰，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英国取得成功的前景。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乔治一世的地位似乎很不牢靠，他不会断然拒绝和法国达成更为密切谅解的建议。

这个计划的倡始人是奥尔良公爵过去的导师杜布瓦神父。1716年杜布瓦奉命乔装前往海牙同当时实际掌管英国外交政策的负责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斯坦厄普伯爵进行极为秘密的会谈。杜布瓦觉得他的主子的前途全在于他此行的成败，但斯坦厄普却并不急于达成协议。接着杜布瓦又被遣往汉诺威继续进行谈判。但谈判开始时进展甚微。杜布瓦当时处境非常不利，因为他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英国保证路易十五一旦死后承认奥尔良公爵是法国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但是他又无法直接这样提出，只能满足于要求英国笼统地保证乌得勒支的整个和约。

斯坦厄普不能同意杜布瓦的要求，因为那时候荷兰尚未承认萨伏依公爵为西西里国王，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理论上讲还在同西班牙国王交战。不仅如此，英国并不急于要和法国结盟。虽然奥尔良公爵对法国向詹姆斯党人输送人员和物资的做法装作视而不见，但1715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已经失败了；而英国的国际地位比1713年已经有了增强；1715年11月英国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荷兰缔结了屏障条约。鉴于法国驻西班牙的大使未能与腓力五世取得谅解，英国却在西班牙新首相阿尔韦罗尼的一力相求下于1715年与西班牙签订了一个商业条

约，从而解决了造成1713年的商业条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失望的小困难。

只是在1716年9月以后，英国宫廷才对与法国达成协议一事变得热情起来。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应归因于北欧事态的发展。1700年在北欧开始的第二次北方大战还在进行。到了1716年秋天，有迹象表明彼得大帝正在对汉诺威的利益形成一种威胁。他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梅克伦堡，同时似乎对进攻瑞典越来越不感兴趣。当勃兰登堡-普鲁士1716年与俄国人联合时，看来这些强国似乎有可能诱使法国加入到它们中去。乔治一世作为汉诺威的统治者，正急于取得波罗的海南岸的瑞典领土；而且由于法国宫廷对瑞典的传统影响，他也准备与法国达成谅解。因此，杜布瓦梦寐以求的英法条约终于在1716年缔结，次年1月荷兰也加入了这个条约。

这个联盟对于英国具有很大的价值。法国至今并未失去路易十四时代所取得的巨大威望；法国的外交家们在欧洲是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它对德意志以及北方国家的影响弥补了英国在这方面的不足。这个联盟的直接结果是，法国劝说沙皇从梅克伦堡撤走军队，并劝说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召回了他的使者格尔茨。人们怀疑格尔茨是在海牙鼓励詹姆斯党人的策划。这个联盟甚至在1723年这位摄政去世以及1721年沃波尔上台以后还继续存在，一直持续到18世纪3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通常是英国的政策指导着这个联盟的行动。这位摄政和杜布瓦甚至不顾法国人的反对而依赖斯坦厄普，而波旁公爵和弗勒里也不是能够反对沃波尔和汤森的人物。

英法两国之所以结盟，是希冀此举将有助于稳定国际局势，从而减少乔治一世或这位摄政的风险，使他们的地位不至于由于重新爆发一场普遍的战争或一场涉及本国的严重国际危机而变得岌岌可危。但是，英法同盟缔结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局势仍然一直非常动荡不定。此时骚乱的主要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波罗的海，瑞典和俄国仍然在那里交战；一个是地中海，西班牙自1713年以后一直是一个对那里颇为不满的国家。每当西班牙的某个政治家试图为其本国的计划通过讨好瑞典或甚至俄国而谋取帮助时，这两处战场就联结在一起了。英国的政策是要结束北方的战争。因为不论是瑞典还是俄国取胜，它们都会对汉诺威的领地和利益造成威胁。英国还想要在地中海建立持久的和平，以便让本国的商人能够从对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的贸易

中得到好处。法国的政策出于的动机有所不同，在波罗的海，法国希望能够维护其传统的盟友瑞典。在地中海，它颇倾向支持波旁的西班牙。但总的来说，英法两国在1717年结盟后的头几年中相互间合作得相当融洽。

第一次严重的紧张局势发生在波罗的海。在这里，瑞典的政策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似乎可能摧毁新建立的英法同盟。这个时候，瑞典的政策是由1714年新晋为查理十二世服务的格尔茨伯爵所领导的。他希望将瑞典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割让给俄国以便媾和。他还进一步希望与法国重新建立传统的联盟。乔治一世想要从瑞典那里取得不来梅和费尔登这两个非教会所有的主教管区。汉诺威家族的这种野心使英国成为敌人。对英国的这一怀疑促使格尔茨去鼓励詹姆斯党人的阴谋活动。但是，虽然英国与瑞典的关系很坏，但英国同俄国的关系也远不如1715年10月那样的亲密了。那时，乔治一世作为汉诺威的选侯实际上已与彼得大帝结缔了同盟，他同意在彼得大帝与瑞典交战时给他以援助，如果彼得大帝保证汉诺威对不来梅和费尔登两地的权利作为报答。俄国军队1716年占领梅克伦堡一事曾经是乔治决定同法国结盟的一个理由。而且，汉诺威的政策以及英国的政策对俄国日益表示冷淡，因为兴建圣彼得堡，控制里加和雷维尔，沙皇为促进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所做的努力，以及认识到俄国的舰队是一支精锐的舰队等，全都说明俄国是地中海中的一个潜在的威胁。1716年和1717年彼得大帝曾试图争取法国为盟友。斯坦厄普于1717年4月以后实际掌管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后，他就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不让俄国取得对瑞典的彻底胜利，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危机发生在地中海，而且不久就同第一个危机牵涉在一起了。在地中海，西班牙的新王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政策可能要把欧洲卷入另一场大战中去。伊丽莎白·法尔内塞非常清楚，她只是西班牙的腓力五世的第二任妻子。腓力的第一任妻子生有两个儿子。虽然一个早已夭折，另一个1759年死时没有子嗣，但无人会认为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日后有可能统治西班牙。于是王后决心为她的儿子们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多取得一些领地。她娘家法尔内塞家族的领地，看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标。在意大利进行劫掠比较容易，因为西班牙国王从法律上讲仍然在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仗，而且他至今仍然没有默认那些原属于西班牙王室的领地已经丢失。法尔内塞的

使者阿尔韦罗尼已尽其所能为西班牙积聚人力物力。伊丽莎白于1716年已使她的势力在西班牙居于支配的地位。1717年8月西班牙已有能力派遣两支分舰队前往撒丁岛，到了10月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手中夺取了该岛。这一事件可以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1717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因此他觉得可以稍稍地把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对他在意大利领地的威胁。在英国，辉格党人急切地要支持这位皇帝，即使这再次意味着对西班牙宣战要牺牲英国的商业利益，也在所不惜。甚至在法国，尽管摄政委员会里有许多人非常不愿同路易十四的孙子打仗，杜布瓦还是打算克服这种情绪，因为他想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承认这位摄政的权利要求。

1718年6月，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极力主张阿尔韦罗尼采取他的第二步行动，派遣自勒班陀海战以来最强大的舰队进攻西西里。西西里岛对任何一个想要控制西地中海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据点。为了准备这次进攻，阿尔韦罗尼使出了他的全部外交手段建立起一个联盟，依靠它来阻挠并牵制他的对手的兵力。他鼓动弗朗西斯·拉科齐在匈牙利挑起内战；他敦促土耳其人继续进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争；他恢复西班牙和这位摄政的法国内部敌人的联系；他使詹姆斯党人在荷兰的阴谋活动死灰复燃；他还同时与瑞典和俄国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能够听从劝说消除分歧，一致对付汉诺威选侯。

有一段时间，这些计谋有的看来颇有希望。彼得大帝1717年8月成功地同法国缔结了一项条约。虽然对于法国一方来说，这个条约只是一纸出于礼貌的空文，但却被宣扬成它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北方和平。1718年瑞典和俄国甚至在阿兰徳群岛上进行会谈，探讨是否可以达成和平的条件。但阿尔韦罗尼的宏伟计划不久即开始解体。1717年英国逮捕了瑞典驻伦敦的使节；荷兰则逮捕了格尔茨本人；阿兰徳群岛上的会谈毫无结果。最后，1718年12月查理十二世被杀，1719年3月格尔茨也被处决。计划于1719年举行的詹姆斯党人起义失败了；原来指望在布列塔尼的起义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地中海，阿尔韦罗尼的政策同样也是不成功的。土耳其人不顾他的紧急忠告，于1718年7月在帕萨罗维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媾和，从而使查理六世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抵抗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侵略。1718年8月7日，英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英国的保持南欧和平“计划”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

虽然这个计划曾于1716年11月被这位皇帝所拒绝。它的目标是要通过说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如果腓力五世作为回报将放弃对意大利的原来西班牙领地的要求，从而在牢靠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样做并不牵涉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长子要放弃对帕尔马、皮亚琴察、托斯卡纳和普勒西迪奥等地的权利要求。萨伏依要把西西里交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换取撒丁岛。作为报答，皇帝将在波旁系无人继位的情况下，同意萨伏依王室对西班牙王位的权利要求。此外，皇帝将承认乔治一世对英国王位和摄政对法国王位的权利要求。在一项秘密条款中，英法两国一致同意对西班牙和萨伏依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把西西里岛割让给皇帝。这个1718年的条约名义上也包括尼德兰联合省，因此，虽然尼德兰并没有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这个同盟还是被称作“四国同盟”。条约签订4天后，英国舰队就在帕萨罗角海面彻底地击败了西班牙人。1718年12月，杜布瓦由于揭发了西班牙大使塞拉马雷的阴谋，因而就使得西班牙看起来显然是个侵略者。这样，他就能克服法国人不愿对一个波旁家族的国王开战这种强烈的情绪。1719年一支法军入侵西班牙，所向披靡，到了这年的12月，腓力五世已准备谈判和平条款并将阿尔韦罗尼撤职。1720年1月腓力五世在英国的压力下，加入了四国同盟，并于1920年6月再次放弃了对法国王位的一切权利要求。争执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将留交10月在康布雷召开的代表会议去解决，但此刻南方的和平总算得到了恢复。

在北方，危机并不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解决；然而在北方同在地中海一样，英法同盟的存在使圣詹姆斯宫和凡尔赛宫的实力得到了加强。1718年12月查理十二世之死，彻底改变了波罗的海的整个局势。瑞典国内的权力落到了贵族手中。他们是坚决反俄的，因此对于英法两国外交家们提出的瑞典与俄国已经开始试探性的谈判应予中止的劝告非常中听。一个由大国重新组成的强有力的反俄同盟，看来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出现。1719年2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意派遣一支汉诺威军队去占领梅克伦堡。但是，当此事尚未做出最后定夺的时候，俄国就采取了有力的行动。1719年7月它入侵瑞典，9月中断了在阿兰徳群岛上的谈判。这种做法只能加速反俄同盟的形成。1919年8月，普鲁士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协定。11月，丹麦停止了对瑞典的敌对行动，同月签订的斯德哥尔摩条约表明瑞典和汉诺威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瑞典割让不来梅和弗尔登。1720年1月，另一个斯德哥尔摩条约表明瑞典和普鲁士之间达成协议，瑞典割让什切青和波美拉尼亚的一

部分以换取200万埃居。6月和7月的条约标志着瑞典和丹麦之间为期8个月的谈判圆满结束。根据条约，丹麦放弃了对吕根和维斯马的要求，瑞典则不再要求分享松德海峡的税收收益。虽然一个声势赫赫的反俄联盟已经建成，但是它还不足以促使北方的战争告结束。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们很不可靠，萨克森和勃兰登堡总是不理睬英国并想再次投靠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于汉诺威军队旷日持久地占领梅克伦堡也开始担心。英国人决定在波罗的海利用诺里斯的舰队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诺里斯的舰只不能追击俄国的舰只进入芬兰湾，而且它们也未能在1721年阻止俄国人入侵瑞典。瑞典国王正想恢复1719年中断了的与俄国人进行的单独谈判。俄国又重新建立了1717年它同法国的盟国关系。最后，还是依靠法国的外交手段，设法在1721年9月签订了《尼斯特兹条约》，北方大战才告结束。英法联盟取得了两项显著的成就。在南方，这两个大国曾迫使西班牙放弃了推翻乌得勒支和平解决方案的企图。在北方，它们使瑞典同它的邻国和解，并且最终结束了自1700年以来一直使波罗的海动荡不安的战争，从而暂时地消除了瑞典和俄国对德意志各邦君主领地的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住了乌得勒支条约规定归于他的领土；在英国，乔治一世的王位更牢靠了；在法国，政府的控制权更加牢靠地掌握在摄政的手中。到了1721年，英法联盟看来颇为成功。

遗憾的是，1721年看来一些重大争端可以得到解决的好形势，几乎前功尽弃。只是到了1729年，这些争端才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首先，康布雷会议出现了麻烦。这个会议是要讨论影响欧洲南部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争端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一直对英法两国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西班牙的不满主要有两点：英国占领了直布罗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让西班牙的一位公爵去占有法尔内塞在意大利的领地。早在1720年1月斯坦厄普访问马德里时，西班牙就再次提出对直布罗陀的权利要求。斯坦厄普无法断然予以拒绝。他却做出许诺，要在一年内将该地归还。但他却在1721年1月去世了。西班牙能够从英国那里得到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乔治一世的一纸文书，许诺一俟有利时机即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讨论。这是1721年5月间的事，而这个有利时机的出现看来遥遥无期。至于西班牙对在意大利的领地的权利要求，腓力五世和他的妻子看不到他们在1718年加入了四国同盟后有什么实际结果。1719年神圣罗马帝

国皇帝确实曾同维克托·阿马戴乌斯进行过谈判，提出由一个皮埃蒙特人当托斯卡纳王位的候选人。1720年查理六世一直在支持一名巴伐利亚人对这个大公国的权利要求。这位皇帝自然不会有什么理由感到满意。他知道，英国的政客们在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斯坦厄普、森德兰和卡特里特曾经倾向于同情查理六世，对他为“国本诏书”争取支持而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汤森、汉诺威家族成员以及英王乔治一世却讨厌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他的“国本诏书”争取支持而做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在德意志危险地增大。查理六世对于不得不依赖这些海上国家的津贴已不耐烦，他迫切地希望增加自己的岁入。为此，他于1722年12月利用新从尼德兰得到的领地，在奥斯坦德建立了一个贸易公司从事经营。

1723年和1724年间各国官场的人事变动，并没有改善英国同法国以及心怀不满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1723年8月杜布瓦去世，4个月以后奥尔良公爵也相继去世。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法国与英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并无严重影响。波旁公爵依旧忠于英国，弗勒里红衣主教虽然不像英国的某些大臣那样好战，但当他在1726年领导法国的外交政策时，最初他并没有奉行一种独立于英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他对想要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务大臣莫尔维尔还有所抑制。西班牙的人事变动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724年1月腓力五世退位，但是他的年轻的儿子继位后，没有来得及掌握政策，更谈不上引导西班牙的外交活动朝着某种特殊的方向发展，就于同年8月去世了。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最明显影响的是英国的人事变动。1724年4月卡特里特下台，纽卡斯尔公爵的势力取而代之。1723年10月，英国就已经通过了一项反对奥斯坦德公司的立法；英国在同一个月里又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条约。纽卡斯尔公爵作为负责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上台后，英国政策中与神圣罗马帝国为敌的倾向加强了。

1721年在康布雷开始的谈判，已经证明进行缓慢而且困难重重。1724年，这些谈判甚至变得更加微妙了。荷兰人想把奥斯坦德公司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1724年4月，西班牙极力敦促英国取缔该公司。法国的外交活动却竭力规避这个问题。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认识到他的危险，并且深信他不能依赖他在1718年曾与之缔结了四国同盟

的英国和荷兰的盟友。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对于他能否根据1721年6月的三国同盟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已经感到非常怀疑。1724年6月，西班牙极力要求归还直布罗陀，但是英法两国只是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康布雷会议。西班牙对于获得实际的援助以便让唐·卡洛斯入主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一事也感到不耐烦。他的权利要求曾得到1718年条约的承认。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于这一条款付诸实施，并不表示任何热情。据说，他曾劝告帕尔马的安东尼娶妻生子，以便后继有人。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儿媳维奥兰特·贝娅特丽克丝的巴伐利亚亲友散布谣言说，如果托斯卡纳的梅迪契的男系一旦绝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巴伐利亚人的利益，将派兵入境清扫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因为这时巴伐利亚人与维也纳的关系正友好。1723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去世，又有谣言说，萨伏依的维克托·阿马戴乌斯将娶他的女儿安妮·玛丽为妻。由于新任大公乔万尼·加斯东不可能有任何后嗣，而且他迟早也会酗酒致死，局势就变得更为紧张。1724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两地的权状授予了卡洛斯，这才使西班牙稍稍得到慰藉；但是他表示不愿让卡洛斯占有这两个地方，并且断然反对西班牙在公爵或大公一旦死后派遣西班牙军队以保证实现他对这两处领地的权利要求。1724年6月，西班牙敦促英法两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让卡洛斯立即前往意大利。但这两个1721年的盟友又一次使这位天主教国王陛下感到失望。西班牙在绝望与愤怒之余，决定试试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协议能否取得什么效果。

1724年11月密使里佩尔达奉派前往维也纳，并于1725年1月开始谈判。法国对西班牙的冷落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更加容易言归于好。1725年2月，作为路易十五的未婚妻而留在法国的西班牙公主被遣送回国，路易另娶了一个名叫玛丽·莱什琴斯卡的波兰女子。到1725年3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间的和约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签字。4月，两国间又签订了通商条约，同月皇帝同意将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一个儿子。“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婚礼钟声就是英法两国的丧钟。”康布雷会议在混乱中不欢而散。

以汤森为代表的英国舆论，坚决反对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因此，1725年9月奥西同盟便受到了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汉诺威同盟的“将”军。普鲁士于1726年退出同盟，恢复了它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的传统忠诚。但是，另外一些国家，例如瑞典、丹麦等却加入了这个同盟。因此，到了1727年，欧洲就形成了两大武装阵营。1727年西班牙宣战，但汉诺威同盟的实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非常不愿支援他的盟友。一场大战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的和平政策。在法国，弗勒里已于1726年接替了波旁公爵。弗勒里设法在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进行调停，1727年5月遂在巴黎签署了预备和约。1728年3月，西班牙屈从了法国以及各海上国家的外交压力。西班牙想通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谈判来达到目的的企图失败了。1729年2月，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拒绝对拟议中的西班牙波旁王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婚姻联盟给予任何保证时，西班牙深深地体会到这场失败达到何种程度。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对此感到厌恶，遂又再一次转向法国和英国。在西印度一带被俘获的英国船只交还给英国，撤除了对直布罗陀的围攻并且恢复了在西班牙经商的英国商人所享有的特权。法国同意西班牙可派遣一支6000人的军队前往意大利，以保证唐·卡洛斯继承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两地。英法两国都忠实而有效地遵守1729年11月签订的塞维利亚条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胁说，如果西班牙军队进入托斯卡纳，他就要入侵该地。而托斯卡纳的大公对于提出权利要求的西班牙也不是真诚的。但是，1730年大公经劝说承认唐·卡洛斯为其继承人，并为此发表了公告。1731年1月，帕尔马公爵去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遂派兵占领这个公爵领地，把它变为帝国的一个采邑。由于新寡的公爵夫人认为自己已经怀孕，最高法院一时无法做出决定。来往的外交信件报告说，公爵夫人非常想吃巧克力，这是怀孕的一个肯定无疑的迹象。但是最后事实证明，公爵夫人弄错了。1731年3月英国根据维也纳条约承认了“国本诏书”。这个“国本诏书”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外交中占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报答，查理六世从帕尔马撤回了他的军队，并允许西班牙驻军不仅可以占领帕尔马，而且可以占领托斯卡纳。7月，托斯卡纳大公加入了塞维利亚条约。10月，6000名西班牙军队在里窝那登陆。12月，唐·卡洛斯接踵而至，他于1732年10月正式接管了帕尔马公爵领地。看起来，英法同盟又一次保卫了欧洲的和平。

在欧洲的东北部，从1721年到1723年的前夕，除了出现为数不多的、为时短暂的危机外，和平总算得以维持。这也应归功于英法同

盟。紧接着1721年尼斯特兹和约签订之后，荷尔斯泰因的查理·腓特烈的野心引起了一场极为紧急的危机。1720年他对石勒苏益格提出的权利要求无人置理，因为人们同情丹麦；但是他对瑞典王位的权利要求却比他的姑母乌尔丽卡更有成功的希望（第15章）。查理·腓特烈是受到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支持的，他一定认为俄国充当瑞典王位的保护人是极为有用的。1725年5月，查理·腓特烈娶了沙皇的女儿以后，俄国的援助就更加起劲了。但是，1727年彼得大帝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相继去世后，对瑞典和丹麦和平的这一威胁就逐渐消失。

1725年里佩尔达使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重归于好后，整个欧洲现有的联盟体系便彻底被打乱了，欧洲的东北部便更广泛地陷入动荡不安。甚至在西班牙的外交发生这个180度的大转变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由于他在康布雷会议上所受到的英法两国的对待而有所醒悟。他已经在设法要和瑞典或俄国，或者和两国同时达成更好的谅解。英国为了制止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这种可能的扩张，在汤森的影响下，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并于1726年派遣一支分遣舰队由海军上将迈耶率领前往波罗的海。事实证明，这位司令官要比1721年倒霉的诺里斯成功。瑞典对此印象很深，遂于1727年3月加入了英法汉诺威同盟。丹麦于4月也步瑞典的后尘。但是，英国在波罗的海的这种有力的政策，也有一个极为不幸的后果。俄国感到十分惊恐，它从1726年的海军示威中看出，这是1716年对俄国在波罗的海占主导地位的势力进行竞争企图的又一个事例。于是它便在1726年8月加入了奥—西同盟。即便是在西班牙背叛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与法英重新达成谅解之后，俄国仍然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盟友。

事实上，从以后的历史角度来看，1713年至1740年这一阶段间的外交发展对于未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当时的观察家们，至少是1733年以前的观察家们，却把它忽视了。这种左右历史进程的影响并不是由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野心和鲁莽从事所造成的，因为法尔内塞所制造的麻烦充其量不过是使意大利的一些领地易主。对于欧洲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和普鲁士崛起为强国。这两个国家是北方大战中的真正胜利者。但是在以后的20年中，这两个国家都觉得自己还不足以奉行一种独立的政策并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1725年彼得大帝死后，在俄国相继接位的统治者都为时短暂：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年）；彼得二世（1727—1730年）；安娜（1730—1740年）；

伊凡六世（1740—1741年）。再加上这些统治者各有其个性，因此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法起到一种一贯有效的作用。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下，积聚了人力、物力，但是他并未能做到纵横捭阖、掌握主动。当瑞典在17世纪威胁北德意志的所有领土时，勃兰登堡曾想推行一个反法政策，一部分原因是法国是瑞典的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大选侯对路易十四在宗教方面的不容置疑的态度感到十分震惊。在1688年到1697年和1702年到1713年的战争期间，勃兰登堡-普鲁士继续推行这一反法政策，并且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荷兰和英国人一边作战。1726年腓特烈·威廉半心半意地加入了英法的汉诺威同盟。但1728年他又退出，转而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盟。普鲁士在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一段时期中得益甚少，这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日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733年普鲁士在梅克伦堡条约中受到冷落；1732年它在波兰的利益又被人忽视；1738年它对于利希和贝格两地的权利要求也无人理睬。但是，在1732年普鲁士和俄国的潜在重要性，对于当时的观察家们来说，还不明显。首先揭示出来的是俄国的重要性，这是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在外交方面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里佩尔达在1725年谈判议订的短命的奥—西同盟。法国为了同1725年的奥西条约相对抗，重新推行它的传统政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诸王公中间建立一个反帝国的同盟，特别是把精力集中在巴伐利亚和福音联盟。1726年奥地利和俄国结盟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摩擦便进一步加深了，因为这一结盟对于法国在瑞典和土耳其的势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也阻碍了法国反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政策。奥俄联盟的后果，在1727年开始显露出来。1727年俄国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得足以占领库尔兰。1728年普鲁士决定放弃与英法的联合，恢复它同奥地利传统的忠诚友好关系。沃波尔总的来说不愿让英国再一次卷入欧洲的纷争，而且他根据1731年的维也纳条约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达成了谅解。这就使法国恰恰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可能将变得尖锐之际企图控制中欧和东欧事务时陷于孤立。1732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承认了“国本诏书”，这使法国的努力再次遭受挫折。法国便于1732年5月与波兰的奥古斯特二世缔结条约，1732年7月又说服了巴伐利亚也同波兰结盟，以此来作为对抗。然而，尽管法国想利用奥古斯特二世来试图动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与俄国结盟的情况下对波兰的控制，但它并不打算支持奥古斯特想让韦廷家族世袭波兰王位的计划。法国希望路

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在奥古斯特二世死后能当选为波兰国王。1732年9月，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缔结了勒文沃尔德条约，让一名葡萄牙王公继承波兰的王位。但是，当1733年2月奥古斯特二世去世时，奥地利和俄国却一致同意承认他的儿子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普鲁士遭到冷落，便允许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过境前往波兰。法国于1733年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加强了它的地位。9月，它同撒丁结盟；11月，它又同巴伐利亚结盟，并同荷兰签订一项条约，荷兰根据条约保证奉行中立政策；11月法国还同西班牙缔结了埃斯科里亚尔条约，从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为唐·卡洛斯取得了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以及一切其他可能被征服的意大利领土的保证。

英国在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采取不卷入的政策。1734年年底，沃波尔向卡罗琳女王吹嘘说，尽管欧洲一年内死了5万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他在那一年曾两度拒绝根据1731年的维也纳条约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援助。1735年他又一次这样做了。人们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会抛弃1731年的条约，而且甚至还会有更严重的危机，即他会同法国取得谅解。

1735年战争结束。1738年11月在另一个维也纳条约中通过了解决方案的条款。奥古斯特三世将成为波兰国王，但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为了和平自愿地”放弃了王位。这就是说，他的当选是合法的。作为失去波兰的补偿，他得到了洛林和巴尔。这两个地方在他死后归他的女儿即路易十五的妻子所有。作为对西班牙决定支持法国的奖赏，又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给了唐·卡洛斯。西班牙领土增加了，为了取得平衡，这时就把长期有争议的托斯卡纳划给了洛林公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军队第一次深深地渗入欧洲，到达了内卡河。不过4年，当1739年俄土战争结束时，弗勒里即提出警告说：“就北方的均势而言，俄国实力的增长已过分强大。而且它同奥地利王室的联合，也是极为危险的。”^[1]因为俄国在这场从1735年到1739年反土耳其的战争中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一评论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俄国和其盟国奥地利协同作战，但是除最初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成功外，不论俄国还是奥地利都无法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1736年土耳其人和波斯媾和，从而就能够腾出手来在巴尔干进行比较有效的角逐。1737年法国开始从中进行斡旋。1739年9月签

订的贝尔格莱德条约标志着奥地利已开始从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条约取得的成就中走下坡路了。但是，俄国看起来依旧十分强大。

但是，1739年到1740年间那场几乎把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卷入战争的危机，却不是俄国挑起的。这场危机一部分是由另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普鲁士造成的，但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长期摩擦的结果。这种摩擦于1739年发展成为一场战争，这是不符合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们的愿望的。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爆发，主要是因为两国就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地区捕获有走私嫌疑的英国船问题发生了争执。这种非法贸易是由私商们进行的，多年来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已是司空见惯。西印度群岛的地理位置对于这种贸易有利。因为这里的盛行风和潮流对于往来的船只都有利，不管是驶往美洲大陆英国的殖民地的船只，或者是返回欧洲老家的船只，都要紧靠着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岛的南岸驶行，然后向北穿过巴哈马海峡。从1670年到1700年间，西班牙当局对英国和荷兰的走私商的活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1713年以后，英国的走私者们发现西班牙新上台的波旁王朝致力于改革，西班牙殖民地当局查缉外国走私的努力加强了。1718年和1727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两场战争，在非法捕捉走私船问题上引起了一系列争端，而且在1731年以前，英西两国的政治关系一直不好，劫掠事件不断发生。但是，自1731年英国在使唐·卡洛斯进入意大利问题上确实给予了有效的帮助后，西班牙当局便积极地制止对英国的贸易进行非法的干涉。从1733年到1735年，尽管西班牙人为了支持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对波兰王位的权利要求而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战，但在对待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商人时仍然有所考虑，唯恐英国会加入欧洲战争以对付西班牙。甚至在1735年以后，英国人仍然受到很好的对待，因为西班牙对于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单独缔结和约一事怒不可遏。但是，虽然西班牙政府为了政治原因可以对英国人的这种非法贸易采取容忍的态度，但它却激怒了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总督。他们眼看着外国船队，有时多达30艘，明目张胆地开来，立即从一个岛上搜集食盐，或装载着谷物和无所不有的给养定期来交换西班牙的骡子，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船只到西班牙的岛屿上来换骡子，有时竟然还把西班牙警备队的船只烧掉了。西班牙殖民地的总督们发现很难劝说士兵们去海岸警备队的船只上工作。波多黎各总督在报告中滔滔不绝地谈到英国和

荷兰的走私者们对西班牙海岸警备队的野蛮行径以及他自己在“说服”当地士兵充当武装缉私船船员时的困难。但是，1737年外国走私者的活动已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总督说服了当地的移民组织了一些更多的武装缉私民船，并在当年捕捉了十多条英国船。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场有关非法贸易的争执中，官方对南海公司却始终没有发表一点怨言。大家公认这家公司的人员在走私。一年一度的班船上的商业事务负责人和其他的船员都进行走私。1725年，“腓特烈亲王”号带着另一艘满载额外货物的单桅帆船同行。1730年，“威廉亲王”号把装载航行中所需燃料和给养的地方都装上了额外的货物。1725年，“皇家乔治”号船上的货物超载之多，据说一旦受到攻击时，船上的大炮皆无法使用。这种情况西班牙的大臣们都了如指掌，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每年一度的班船上的走私比南海公司人员在奴隶贸易的幌子下进行的走私活动要逊色得多。南海公司在西班牙各港口的代理人从事非法贸易肆无忌惮，有时达到了危险的地步。贩卖奴隶船只的船主们往往在压舱物下面装载食品、酒类和整桶整桶的蓝色颜料。但是，这些船主的走私活动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在南海公司驻牙买加的代理人规定的范围以内。而且，虽然董事会本身对于两艘获准贸易的船只的虚报数字采取纵容的态度，但公司方面由于董事中有一名西班牙国王的代表而不得不有所防范。公司的态度是，私人做点买卖并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不应对西印度群岛采取与公司的正式贸易相竞争的行动，其规模也不应大到触怒西班牙当局的程度。大约在1737年，公司驻牙买加的代理人报告说，西班牙当局正在实施新的严格规定。但是公司的非法贸易并没有卷入由于新规定而引起的外交争端。

1737年秋，伦敦、布列斯托尔、利物浦以及其他美洲贸易中心的商人们向国会请愿，要求解除他们的船只西印度群岛被捕捉所造成的苦情。西班牙政府这时不愿与英国发生争吵，这从它在答复英国正式提请它注意的申诉时态度非常和解一点即可看出。英国的申诉很难说是正当的。要求归还的船只中，有5艘看来是被海盗俘获的，而不是被正规的海岸警备队捕捉的；有6艘涉及非常可疑的活动；还有3只是受到了攻击，并没有被捕捉。西班牙政府的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早在1738年西印度委员会的一则官方意见中即已表露出来，内称，“即

使对于非法贸易仍然持有某种怀疑，但制止非法贸易决不应使西班牙官员无视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和谐一致的必要”^[2]。可惜西班牙为了维持这种和谐所做的答复未能及时地阻止英国商人和沃波尔的政敌于1738年3月进一步举行示威，因为这时听说他们在西印度群岛被捕船只上的英国水手们戴着镣铐与强盗和重罪犯人一起被关在加的斯的监狱里，“靠发霉的饼干和咸鱼度日”^[3]，英国的舆论一时哗然。

但是，尽管群情愤激，英西两国负责的大臣们却竭尽全力地设法避免战争。纽卡斯尔公爵给西班牙送去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但是沃波尔另又写了一封信使照会得以缓和。沃波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支持这样一个建议的，即为了解决所有的赔偿要求，西班牙国王应拿出20万英镑，其中6万英镑将由英国政府提供。但是，为了平息民愤，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由海军上将哈多克率领的舰队前往地中海。这种做法使西班牙的大臣们大为愤怒，他们拒绝付给多于9.5万英镑的赔款。这笔为数比较少的款项最后终于被接受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新的困难。西班牙国王想通过南海公司来支付这笔款项。南海公司每年要为把黑人运入美洲向西班牙国王缴纳一笔税款，而过去通常是把这笔税款用来支付西班牙官员的薪俸或者甚至普通的账款。南海公司除了向国王缴纳这笔定期的税款外，最近又经协议，这家公司应向国王缴纳6.8万英镑，作为国王从年度班船“皇家卡罗琳”号的利润中应分到的份额和补偿用新银币缴纳黑奴交易中的进口税和用旧银币支付卖价之间的差额。1738年南海公司拒绝支付6.8万英镑，更不愿向西班牙国王预支为了凑齐9.5万英镑而需要的那笔差额，除非西班牙下达令人满意的命令，归还它们在1718年和1727年两次战争爆发时被没收的财产。西班牙驻伦敦的使节擅自宣称，如果南海公司拒绝付款，西班牙国王则将采用其他办法付款。西班牙法院则下令归还该公司在1718年和1727年被没收的财产。南海公司的主管人员发现有四个方面理由反对这个命令，而要维持和平全靠完全接受这个命令。沃波尔为和平做了最后一番努力，他建议起草一个新条约，这个条约即使在南海公司拒绝为西班牙国王支付9.5万英镑时，也不提废除贩奴合同。新条约于1739年1月签订，但西班牙同时声明，这个条约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才签订的，就是南海公司至少要支付它承认将付给西班牙国王的6.8万英镑。

南海公司拒绝付款。1739年3月英国公众的反西班牙情绪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至于2月本已奉命回国的哈多克海军上将，又接到命令留在原地。纽卡斯尔公爵慑于反对党和舆论，沃波尔则担心法国会配合西班牙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下，英国和西班牙遂于1739年10月开战。

法国的政策远没有西班牙预期的那么友好。弗勒里企图把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注意力从意大利引开，他在凡尔赛宫里煽起西班牙大使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当危机变得紧急时，他又极力主张西班牙支付9.5万英镑这笔款项，如果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撤走。1739年10月，西班牙王子唐·腓力和法国的一位公主缔结了婚约。但是，西班牙如果在美洲贸易上不做出让步，法国就不愿同它建立更密切的同盟关系。1740年8月，法国的一支舰队奉命前往西印度群岛制止英国的侵略，但弗勒里拒绝进一步谈判订立一个政治的或商业的条约。但是，1740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英西战争这时便被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是同奥地利作战的。法西两国军队并不十分得手。1743年西班牙虽然准备同撒丁谈判，但撒丁却已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缔约，西班牙遂作罢。西班牙一怒之下于1743年10月与法国缔结了枫丹白露条约。但是，这个第二次的家族合约并不比1733年第一次的合约更是西班牙或法国的政策的持久原则。

英西战争由于普鲁士在1740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死后所采取的行动而扩大到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自1740年5月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死后，英国就一直想劝说普鲁士新王同英国结盟以便在欧洲大陆上给法国制造麻烦。但是，腓特烈二世十分精明，他不会为英国的政策火中取栗。而且，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德意志的中部和东部以及意大利的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撒丁想在牺牲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的情况下来改善它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巴伐利亚选侯急于想实现他对帝国皇位的权利要求。西班牙则极力想利用帝国势力在意大利北部被削弱所造成的任何机会为唐·腓力获取它在1735年未能获得的领地。法国举棋不定，它起初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是查理六世的继承人；后来又改变这一行动，指出承认“国本诏书”与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作为帝国皇位的候选人不是一回事。英国也在犹豫不决，有的大臣赞成还是与奥地利重新结盟为好，

有的则反对进一步卷入欧洲的事务；当1741年6月决定支持奥地利时，反对这个政策的人们坚持和普鲁士重新会谈。在一片混乱之中，腓特烈二世却清楚地知道什么政策对于普鲁士才是最有价值的。他放弃了收复贝尔格和克利夫斯的企图，于1740年12月入侵西里西亚。

法国却违背了弗勒里的意愿而卷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斗争。这位红衣主教年事已高，别的政治家们于是就取得了路易十五的信任。弗勒里的以法奥谅解为欧洲的稳定和平基础的政策，已被贝尔岛以及其他一些仍然相信反奥的“威斯特伐利亚”政策传统的法国人士鲁莽的反奥纲领一扫而光。1740年12月，法国与腓特烈二世进行试探性谈判时，才发现他所需要的不是一项纯粹防御性的协议。到了1741年6月，法国同普鲁士结盟；7月，它同意用武力援助巴伐利亚；8月，它鼓励瑞典进攻俄国（第18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詹金斯的耳朵战争”的动乱，逐渐平息下来，转为一个不稳定的和平。从1744年年底阿尔让松领导法国的外交事务以后，曾经有过结束敌对行动的可能性。1745年法国和西班牙相继在尼德兰、丰特努瓦和意大利北部战胜了奥地利人和撒丁人，荷兰人和撒丁人便开始向法国求和。和平谈判一度陷于停顿，因为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希望用武力收复西里西亚。但是，在他的军队被普鲁士人打败后，她才准备于1745年12月签订德累斯顿条约，从而结束了和普鲁士的战争。但西线的战事还在继续。虽然1746年5月法国实际上已向英国提出一个和平计划，但是7月间西班牙国王的去世以及奥地利和撒丁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又使英国的希望死灰复燃。但只是在法国对荷兰宣战并在奥属尼德兰无可置疑地打败了英国的军队之后，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和平谈判才变得真正地认真起来。

1748年法国终于同英国而不是同奥地利缔结了和约。因为法国认为这两个国家中，有可能独自打下去的是英国，而不是奥地利。这个和约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带来胜利。西班牙的局势同1739年的相差无几，虽然经过大臣们的更换带来了可以避免进一步产生爆炸性事件这一美好的前景。意大利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和夸斯提拉归于唐·腓力，而唐·卡洛斯则保有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英法两国间殖民地的争端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布雷顿角用来和马德拉斯对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给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但西里西亚却根据德累

斯顿条约割让给了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和俄国两国以战胜国的姿态而出现。普鲁士显示了它的军队具有的价值和国王的天才。俄国把瑞典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征服了芬兰。瑞典只是在同意接受一位俄国提名的瑞典王位继承人后，才收复了芬兰。俄国实际上成为波兰的保护人。俄国1748年在战争结束时，其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是友好或敌对，是影响欧洲未来的一个重大因素。腓特烈不久就表现出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恐惧感，并且指出俄国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1756年发生的使欧洲外交家们感到吃惊的同盟关系上的大改变（第19章），主要是由于有俄国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强国的存在而造成的，并且积极地为普鲁士所一手操纵。

在七年战争（第20章）中，主要的参加者之一是普鲁士国王。1763年签订的和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发生宫廷政变的结果。出于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1763年和约以前的谈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西班牙的政策与普鲁士、俄国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使人想起了阿尔韦罗尼的梦想或里佩尔达的戏剧性的改革场面。但是，在1759年到1763年的这段时间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也像他的母亲在1717年到1732年间的情况一样，无法决定谈判的结果。1763年就像1718年一样，强国仍然是英国、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虽然这时大国的行列无疑地增加了俄国和普鲁士。

1759年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形势对于英国及其盟友普鲁士来说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皮特不得不同意开始和平谈判。甚至布伦瑞克8月间在明登的胜利和沃尔夫9月间在魁北克的胜利也无法盖过普鲁士11月间进一步的惨败。1759年12月，英普两国与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在海牙接触。和谈一直持续到1760年4月，但毫无结果。一部分原因是舒瓦瑟尔声称他想借助于西班牙从中斡旋进行谈判，而西班牙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长子查理三世在1759年就已继承了他的几乎是亲英派的同父异母兄弟的王位。皮特傲然拒绝西班牙进行调停的企图，因此整个谈判一事无成。

1760年战争继续进行。尽管法军和俄军在欧洲取得胜利，英军却在美洲和印度占领了蒙特利尔和阿尔科特，并于1761年1月攻占了本地治里。当1760年6月西班牙驻圣詹姆士宫的大使曾经打算就洪都拉斯的

森林被非法砍伐等问题得到英国的令人满意的答复时，皮特的态度却极为生硬。因此，1761年1月格里马尔迪被遣往凡尔赛同法国谈判建立一个西法防御同盟。1761年年初，考尼茨鼓吹召开一次各国普遍参加的和会。舒瓦瑟尔对此表示赞同，但条件是，会议期间，甚至在会前，各交战国家可以交换使节并在会议外单独地进行谈判。从1761年3月至6月，法西同盟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法英之间也在就和平条件取得一致意见进行谈判。6月，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的成败可能性各占一半，但1761年8月，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家族合约。西班牙同意，如果英法之间到1762年5月1日还不能缔结和约，西班牙将对英国宣战。路易十五同意把西班牙的权利要求应予满足一节包括在他与英国的谈判之中；虽然这样做对于英法的和平谈判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即便是英国的政策在1760年10月乔治二世去世和1761年3月比特执政后已不那么好战。1761年10月，虽然极力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的皮特被击败后离开内阁，但这并没有阻止英国于1762年1月向西班牙宣战。

就在英国向西班牙宣战的那个月里发生了一个事件，使欧洲的战争大大提前结束了。女沙皇叶利扎维塔去世，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查理·腓特烈的儿子彼得三世继位。彼得三世迅速地改变了俄国的政策。他是普鲁士的腓特烈的热烈崇拜者。他希望从反对普鲁士的战争中脱身出来，以便可以坚持使他的家族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地的公爵领地提出部分的权利要求，为他的家族所受的奥尔登堡家族的虐待报仇雪恨。他还对瑞典王位提出权利要求（第19章）。1762年5月，新沙皇同腓特烈二世缔结了和约；同月，瑞典因为害怕沙皇会坚持他对瑞典王位的权利要求，也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应付波罗的海地区的任何不测。1762年6月，沙皇和腓特烈二世缔结了进攻性的联盟。8月，俄国军队协助普鲁士赢得了赖兴巴赫战役的胜利。1762年7月，沙皇被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废黜，不久便遭杀害。但是，虽然新的女沙皇把俄国军队撤出了战争，她并没有废止1762年5月的条约。1763年10月，腓特烈又进一步取得了胜利。1762年的种种事件虽然改变了普鲁士的前景希望，但却没有充分地鼓励腓特烈和他的英国盟友要把战争打下去。

在英国，对于战争的热情甚至到1760年就已一落千丈。这时人们认为英国在美洲和印度都已达到目的。当1761年讨论中的法国和平条件被法国人泄露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舆论对于他们的拒绝的态度表

示遗憾。比特反对皮特的主战政策，急于和法国及西班牙达成协议。他甚至向腓特烈二世施加压力，要他交出领土以换取和平。因此，腓特烈在彼得三世即俄国的皇位后他的境况暂时得到改善一事，看来对于普鲁士名义上的盟友英国的政策来说，几乎是一种失败。比特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非常急于在西部媾和。为此，他打算采取比英国在1759年到1760年间海牙谈判时还要和解的态度。比特不再坚持要腓特烈二世遵守协议，他甚至打算考虑西班牙的不满。1762年2月，马提尼克岛被英国舰队攻占，因此英国处于重开和谈的有利地位。就在同一个月里，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葡萄牙，但进展不大，因此这次战役对于英法谈判起不了什么作用。1762年9月，英国得知它的一支舰队已经攻占了哈瓦那。这个消息使英国大为振奋，它对战争突然又变得非常感兴趣了。但是，比特出于政治原因，决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议会从11月8日延期到11月25日，因此，比特能够向议会提交11月3日在枫丹白露宫达成的和约的条件。在欧洲东部，腓特烈二世1762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再加上俄国政策的改变，使得玛丽亚·特蕾西亚下定决心寻求和平。1763年2月，奥地利和萨克森同普鲁士缔结和约。根据1763年在巴黎签订的条约，英国在印度和美洲得到了不少领地。但是，根据胡贝尔图斯堡条约，普鲁士却不能得到萨克森的领土。而这一点却是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所在。1763年标志着法国威望的下降（但比特的政策却阻碍了英国的影响作相应的增长）。西班牙即便是在卡洛斯三世有力的领导下，对欧洲的事务仍旧影响不大。但是，普鲁士却从这些谈判中明白无误地作为一个强国而出现。而俄国能够影响整个东欧和中欧的力量均衡。

（乐瑞夫 译）

[1] 弗勒里给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谢塔尔迪的秘密指示，引自《剑桥近代史》（1909年），第6卷，第308页。

[2] 1738年5月6日议事会记录。塞维利亚，西印度事务档案。

[3] 英国驻加的斯领事在1738年5月13日写给纽卡斯尔公爵的信中曾对水手们的申诉进行仔细的研究。P. R. O. , S. P. F. , Sp222.

第十章 法国君权神授君主制的没落

在16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里，西欧和中欧的大多数国家的君主政体都是中世纪的和现代的政体概念之间的一种妥协物，也就是中世纪君权神授的概念和一种越来越专制的统治形式的结合。在法国，欧洲政体历史上的这个阶段在其范围里得到了可能的最充分的发展。路易十四作为一位君权神授的君主，体现了一种可以追溯到“魔法王”时代的传统。然而从这位“太阳王”身上发出的光芒并不是夕阳的余晖。新的专制主义同旧的君权神授说的结合使法国的君主制更为生气勃勃，得到新生。必须记住，历史学家笔下的旧制度，也就是那个在1789年腐朽衰败的制度，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前还是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的新政。在17世纪末，用其行政治理结构的效率来衡量，法国比欧洲其他国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然，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势力登峰造极时并没有离它而去；他在国内外享有荣耀时一直健在，他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是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在他死前，苦难和不满在法国普遍存在；而在欧洲，路易十四在他在位的漫长岁月中，行使了继而又滥用了红衣主教们赋予法国的权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乌得勒支条约宣告了他的失败，开始了并不名副其实的所谓“英国优势”时代。这是人们的一贯的描述，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夸大之处。事实上，路易十四的野心受到的部分挫败，是因为整个欧洲联合一致行动的结果。尽管国内十分动荡，但由于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法国的潜在力量依旧远胜过其他国家。要恢复法国原有的那种天然优势，需要的只是再一次实行一项使欧洲各国无法团结一致来对付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把政府机器的效率恢复到马萨林留给“太阳王”的那些著名的大臣治理时的水平。

欧洲另外两个君权神授君主制大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以及日耳曼和意大利一些较小的诸侯国家，都以它们自己不同的形式仿效了法国历史的模式。但是在17世纪的欧洲建立起宏伟的君权神授君主制大厦的是法国。君权神授原则遭到致命打击的地方也是在法国。因此，我们主要通过法国来研究君权神授君主制的衰落，集中注意力于检验这一体制在法国的性质和运转情况，是合理的。对这个体制的解说，在

各个阶段有所不同。19世纪的保皇党人，意识到那时的内政部通过各省长对全国政治和行政生活进行严格控制，回顾波旁君主制，把它看成是不受中央集权官僚机构控制的黄金时代。在德托克维尔表明中央集权绝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发明，而在1789年以前各省地方行政长官对法国各地的控制就跟1799年以后的省长一样严格以后，这种看法虽然仍未放弃，但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泰纳继德托克维尔之后，甚至又把这种论点推向了极端。他声称，君主制中央集权使法国老百姓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尘土”。对历史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后，便会对这两种看法进行修正，而法国政体的情况要比这两种提法复杂得多。

首先，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要有效率，就要把国家划分成为相互有关联的而又有排他性的行政单位。在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要找到这类单位，就该把注意力集中到为数约30个由地方行政长官管辖的财政区。但是，财政区首先是为征集赋税而设置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被用来达到许多其他行政管理目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行政区划。他进一步仔细观察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就可以看出区划重叠的复杂结构，它更像一幅中世纪的镶嵌画，而不是现代国家的那种由不同颜色的简单条块组成的行政区划图。

甚至法国本身也不是一片完整的领土，在其境内还存在诸如阿维尼翁、韦内辛、多姆比、米卢斯和昂里奇蒙和其他许多独立的飞地。此外，国内还遍布各类特殊的管辖区。例如，布荣公国在法律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4万居民的克莱蒙泰属于孔代亲王，那里的一切赋税均由他征集，归他所有。布洛内有它自己的军队，由该省士绅指挥。虽然许多省的省议会已被取缔，但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的议会仍然拥有大权，对地方行政长官实行有效的制约。相比之下，普罗旺斯和勃艮第两省议会的权力要小些。同财政区同时存在但管辖范畴完全不同的还有高等法院的辖区、教会的管区和39个军事管辖区。但是，到18世纪时这些军事管区已无多大重要性了。

君主制甚至在财政制度上也没有取得管理上的统一。那些有地方议会的省份在理论上有权自行征税。这至少意味着它能给中央控制设置障碍和负担比其他地区较轻的赋税。各地的盐税也不统一；有大盐税区、小盐税区、赎金区和免税区之分。各地的盐价从半苏一斤直到12个或13个苏一斤都有。在埃罗、康布雷齐和阿尔萨斯不需要使用印花和缴付相应的税款。法国甚至连关税也不是统一的。5大包税所征收

一种关税。布列塔尼、佛兰德、阿图瓦和其他一些被称作外国省份的地区又有各自特定的关税。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和三主教管区等实际上的外国省份又自成一体。包括敦刻尔克和马赛在内的自由港可以与外国自由进行贸易，但同法国国内其他地方做生意则须缴纳关税。

下级政府机关又是另一种情况。旧有的司法管辖区法院和领主执法裁判所等下属机构，实际上已经失去其全部的行政管理作用，只是在1789年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时才重新活动了一下。那些已经让人民一定程度参加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机构，就是那些遭受地方行政长官侵权最厉害的机构。在一些比较小的行政区，地方行政长官的严密控制使终身任职的居民理事变成了政府的代理人。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一系列法令规定市政官职可以用钱购买。这种做法虽使这些官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国王提名，但仍然受到地方小贵族的控制。因此，到了18世纪，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地方自治权在法国基本上消失了。但是由无数种地方特权构成的限制、权利和习俗，往往使最活跃的地方行政长官都感到约束。此外，财产的尊严并不逊于国王的尊严，但绝大多数的豁免权和特权，包括担任官职的权利在内，都同财产的性质有关系。

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尽管是欧洲最强大的官僚机构在地方的代理人，他却远远没能掌握独断专行的大权。他的作用并不是颁布各项无情的法令，要那些唯唯诺诺的老百姓俯首帖耳地服从，而是像杜尔哥的传记作者写的那样“无休止地陷身于行政管理上的陈规陋习之中，不胜其烦地处理那些无穷无尽的杂事”^[1]。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同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特权发生冲突。如果说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上的巨人，那也只是一个像被厘厘普特小人国的细绳子捆住的格列佛那样被无数陈规旧俗束缚住的巨人。此外，大部分财政区的面积很大，地方行政长官要进行密切的监督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因为他的兴趣的潜在管理范围实际上涉及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地方行政长官虽然主要是一位财政官吏，但他还要监督宗教活动，行使重要的司法和警察职责，管理贸易和工业，甚至还要同当地的司令官一起掌管军权。司令官是地方军事长官，要管理好一个地方的事务，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司令官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地方行政长官虽然拥有这些权力，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足够的手段来持续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力。在地方行政长官官署中领头的是个总帮办，他的手下还有人数不等的帮办。人们往

往指控这些人无能和腐败。一般来说，遭到指责的人往往是些真正干工作的人。可以说，地方行政长官如有某些业绩，那也应当归功于他的下属官员。不对18世纪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活动做更多的研究，就很难对他们下笼统的结论。但是在18世纪后期，地方行政长官长期不在他们自己的财政区，这是屡见不鲜的。这表明他们对于他们的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像杜尔哥那样认真和有效地工作的地方行政长官，虽说不是绝无仅有的，但也未必是一个典型。

地方行政长官的治理受到一张由特权和豁免权织成的网的阻碍。中央政府的权力又受到地方行政长官的独立自主的限制。地方行政长官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只要对发来的指示不喜欢，就可以干脆不予理会。如果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再受到一名官员的违抗，除了将他调开或撤职外，别无其他办法。但是中央政府难得采用这样的办法。同时，即使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地方行政长官，他的力量最终还得取决于中央政府究竟能够并且愿意支持他到何种程度。

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由许多委员会组成的政府。一个有时被称作秘密会议或国务会议的高级委员会决定国家政策，特别是外交事务的重大问题。这个委员会系由国王亲自邀请的人组成。除外交大臣外，国务大臣和财政总监都可能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参加内务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监管全部内政事务并听取对高等法院判决的不服上诉。财政委员会是在1661年富凯下台和取消了财政总监的官职后设立的，负责处理财政问题。它的职能很难同内务委员会区分开来。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很可能经常在一起开会。由法官和最高行政法院查案官组成的御前会议代表着国王的最高司法权。此外，还有一个时而设立时而取消的商业委员会。最后是信仰委员会。它主要负责指派教职。到了18世纪它已经缩小到仅仅充当国王的忏悔神父。然而，这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结构。表面上这是一个由委员会组成的政府，但在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由一些个人组成的政府。国务大臣和财政总监是各行政部门的实际首脑，所采取的决定几乎都是他们个人的决定。

在这些国家要员中首屈一指的是大法官。他是法国司法系统的首脑，是永恒公正的化身。作为这个地位的象征，他是唯一的一个从不为国王逝世服丧的人。大法官也是朝廷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终身官职。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全部实际权力都已移交给可由国王任意任命或罢

免的掌玺大臣了。只有在大法官同时担任掌玺大臣的情况下，他才有权为国王的布告或法令加封盖印，并因此得到因手续费增加的大笔收入。难怪当时有种说法：“当大法官不兼掌玺大臣，等于当药剂师没有糖浆。”国务大臣、财政总监和掌玺大臣一道组成了法国的真正政府。在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务大臣有4名。一名负责外交，一名管陆军，一名管海军兼殖民地和贸易事务，第4名负责整个王室事务，也包括监督教会事务和宗教改革、国内各省事务、警察和护照以及监督警察总监负责巴黎的治安。只有在1749年到1757年间阿尔让松伯爵掌管巴黎时，巴黎才不属这位国务大臣管辖。所以掌管王室事务的国务大臣，有时亦称作巴黎大臣。从行政的角度看，财政总监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他负责财政、农业、工业和交通等。除了王室事务大臣也行使对等权力的那些方面以外，在国内行政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他几乎无所不管。

这些大臣组成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班子。每个大臣都是由国王单独地任命或罢免的。按照传统，常常挑选一些相互竞争的对手而不是同心协力的盟友来担任职务。路易十四使用卢瓦和柯尔贝尔就是一例。大臣之间的竞争，由于他们所率各部门之间原来就存在的竞争而更趋激烈，而部门之间由于职权界限不清，又很容易产生竞争。政府通常设有一名总的名义上的首脑。杜布瓦在1722年到1723年间是首相，奥尔良在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中亲自担任了这个职务。另一位王族，波旁公爵接替了他，但为时也只有两年。弗勒里继而在实际上成了政府的首脑，但他从未拥有“首相”这个头衔。除了他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最后那段时间，他的任期是在摄政死后到大革命之间。旧制度到那时已多少认识到集中控制的作用。舒瓦瑟尔从没有当上首相，他依靠各种官职集于一身而行使权力。在路易十六时期，财政委员会长官看来似乎是个领头的大臣，但也只有洛梅尼·德布里安一人在1787年到1788年间重新使用了首相这个称号。

没有首相这个职位是完全符合旧制度的逻辑的。人们认为国王本人已经提供了在执行国家事务中所需要的统一性。国王同时还是军队、司法和教会的首脑。国王所属的各种委员会，至少在理论上应在国王在场时开会并提出各种建议。他们做出的决定，也就是国王的决定。国王的意愿一经正式颁发，就是国家的法律。国王还能够不通过掌玺大臣公署而用密札发布司法或行政命令，决定国内任何人的命

运。著名的秘密逮捕令就是一个例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的整个法律和宪法，都在国王一人胸中。这是一种人治，而不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国王作为个人掌握大权，并把这种权力指派给某些个人。每个下属官吏都受国王的恩典，因而他就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独立性。专制主义实际上是伴有无纪律状态的。国王或代表他名义的大臣，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但是他们却无法保证这些命令会得到服从。

国王在一切意义上仍然就是国家。君主制是绝对的、神授的，也是家长式的。国王是他的百姓的父亲，永远生活在他可爱的臣民眼前。法国的社会生活集中地体现在国王个人身上和他的宫廷之中，路易十四有意地把这种生活组织得可供公众观赏。如果说，这种生活耗费很大，但至少他让百姓们花了钱看到不少好东西。他向公众开放了杜伊勒里宫和凡尔赛花园。当然免不了发生一些雕像受污损、花木遭毁坏等麻烦事。1789年，阿瑟·扬曾对衣衫褴褛的乞丐和苦力一样的男人在凡尔赛宫里游荡，甚至闯入国王卧室一事发表过评论。就是为了使众目睽睽下的宫廷生活有恰当的规矩和礼仪，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套复杂严格的礼节制度。这套制度对宫廷生活的一切场合，从只许最高级贵族参加的内廷场面直到国王和王后在朝廷大臣们簇拥下进餐的举世瞩目的盛大国宴，都具体作了规定。

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政府的职能上，路易十四时期建立的君主制，要求法国国王能按“大君主”树立的榜样担当起这个角色。但是从1715年到1774年期间继承他的王位的那位法国国王，无论在孩童时期，还是成年以后，都离这些严格的要求很远。但是，即使有一位比路易十五坚强的国王，路易十四所创立的统治体制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也是无法解决的。一方面，这是由一位“大官僚”控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这位大官僚的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因为这个地位有1000年的历史做基础，并且有君权神授说的支持。但是，这整个机器的中心人物，下层各级权力的源泉，其本身也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环境下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凡人。这种特定的环境，就是由宫廷和宫廷中的贵族所提供的。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政府也难免受到宫廷中阴谋活动的影响。一旦由一位比较软弱的人继位，政府就要受这些阴谋活动的支配。随着宫廷中这一派或那一派掌权，国家就会来回不定地摇摆。

路易十四在政府里完成了消灭一切竞争的权力之后，就把全部职责的负担加在君主制身上，但同时他又不给予这个体制以全部权力。在这方面，他走得或者太远，或者不够远。除了最高法院外，其他一切可能分担君主制责任的机构都被剥夺了权力。然而他又让国家的一些高级阶层——教士、贵族和最高法院——保持了足够的独立性，使其能对抗国王的意旨，阻碍官僚机构的工作和有效的治理。实际上法国还远远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尽管有路易十四制定的法典，法制还是十分混乱。正如上面提到过的那样，地方行政长官的治理受到种种特权网的束缚。经济生活的形式结构，依旧是中世纪的。一切工作都得靠金钱或关系才能进行，政府从上到下徇私舞弊，不负责任，腐败透顶。

路易十四体制中的弱点，在他统治的后期已经很明显，当时不满情绪十分普遍。包括沃邦、费内隆、布兰维里耶和圣西门等人在内的一派改革家们相信，有可能消除路易十四的作为并让贵族回来参与政府的实际治理。他们希望年轻的布戈涅公爵能成为一位从事改革的国王。但这个希望由于公爵的去世而破灭了。年幼的路易十五即位后，摄政奥尔良的菲利普掌权后，也有同样的愿望。奥尔良有教养，有能力，过去一直受到路易十四的压制；他的挥霍放荡又影响到他的声誉。奥尔良的首要任务是排除路易十四私生子们争夺王位的要求，并且使自己从路易十四设立的委员会控制中解脱出来。一旦大权在握，这位摄政就制止了政府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情况进一步恶化。路易十四的遗嘱在巴黎高等法院那次著名的会议上被推翻了；这次会议，圣西门曾做过极为生动、虽然不甚确切的描述。[\[2\]](#)这一行动的代价是恢复了最高法院的谏疏权。虽然这确实开始给君主制带来了不少麻烦，但要指责摄政没有预见到他的继承者的懦弱，这也不公平。实际上，不管摄政是否在形式上恢复过谏疏权，只要国王无能，最高法院成员就会重申他们的这个权利。把摄政的行动解释成为只是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他在政府结构上所做的改革被说成仅仅是为他自己继承体弱多病的幼王的野心争取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他愿意与新设立的准备代替国务大臣的委员会共享大权的做法。这些委员会把国内的著名人物，甚至把反对摄政本人的反对者也都包括在内了。奥尔良的新的各部会议体制由6个委员会组成。每个委员会均有包括贵族和王室官员在内的10名成员。6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陆军、海军、财政、贸易、内政和外交事务。时间会证明这

种消除路易十四作为的企图是否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行将面临的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要是没有酿成一场新的投石党运动。这位摄政一反已故国王的政策来处理这场危机。

最迫切的是财政状况问题。这在法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财政形势已经危急到如此程度，奥尔良甚至打算要召开全国三级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财政委员会采取部分拒付债务的手段。它把新近铸造的金路易和埃居收回来，把币值分别从16里弗尔和4里弗尔改成20里弗尔和5里弗尔。它还设立了一个法庭来监督金融家们的交易，压缩他们提出的要求，并在必要时给予惩罚或赔偿。组成这一法庭的法官们立即担任起这个传统的任务，并按老习惯对司法的细节不屑一顾。但是收到的积极效果很小。然而，其他的措施却缓和了王室的财政状况，和平的外交政策又削减了军费的开支。只有彻底改革赋税制度，才能使财政有稳固的基础。而且像这位摄政所希望的那样，让特权阶层重新参加到法国政府中来，他要用改革赋税制度这样的办法来弥补路易十四的制度造成的亏空，则是很困难的。

主要的直接税是人头税。它由财政委员会每年起草敕令征收。人头税先由各财政区分摊，再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分摊到各选区或由三级会议分到各三级会议区。三级会议区大部分是属于人头税区，那里的税款一般按土地计算。土地以外的财产不纳税。加上纳税登记册都是陈旧过时的，相比之下，三级会议区纳税要比选举区轻。在选举区，人头税是按每个纳税人财产计算的属于人头税。这种税无疑是按收税人武断做出的估计征收的。收税人从纳税人中选出，往往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特权阶层当然免税。有许多城镇也能免税，另外一些城市按固定的比率交付人头税，其余的大部分城市则干脆把人头税改成入市税的一种附加税。路易十四时期曾两次试图征收一种任何阶层都不得豁免的税目。一次是1695年的人口税，另一次是1710年的什一税。但教士两次都花钱买得了豁免权；而贵族和城镇不是取得了免税权，就是设法逃税。结果，这两项税目反而成了纳税人的额外负担。非直接税的负担也同样不公平。盐税在各地区之间也不相同，领主缴纳的税率低，教士阶层、司法和财政官吏都予免税。各种不同的贩运税、对内和对外的关税已经提到过了。由教士统一缴纳的献金，同它们的纳税能力相比数目很小。最后必须提到的还有各种货物的间接税，国王征收的入市税（包括对金银、皮革、纸牌和其他物品征收的税款），

烟草专卖权，对一切合法交易和收据等征收的核查税和印花税，以及从现已无足轻重的王室产业收取的实物。这些间接税由包税人负责收集。他们弄到了这些间接税只缴纳一个定数的权利，他们都千方百计进行搜括以谋取私利。国王还通过发行彩票、卖官鬻爵等方式聚敛钱财。实在无可奈何时，还可以依靠借贷。他可以直接进行借贷，也可以在王室信贷不佳时向巴黎都会旅社和地方三级会议等其他机构进行借贷。他还可以以总包税局这样的机构的信誉为保证发行纸币。这些纸币常常以低于面值的价值流通。要了解经济上这种混乱局面的全貌，还需要描述一番五花八门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都致力于减少混乱，恢复秩序或者至少能在公文上写出点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来。高居在这套杂乱无章的制度之上的是一位经常更换人选的财政总监。他那犹如一团乱麻的预算年复一年；在和平时间尚能勉强收支相抵，一到战争时期就穷于应付了。

在寻求一种比破产稍好一些的治疗法国特有的财政痼疾的办法过程中，摄政听从了他的老朋友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的建议。早就为荷兰人所熟悉的信贷的力量，现在也正在被英国和法国所理解。可惜他们对信贷的魔力的早期尝试，都是由一些刚刚学步的新手进行的。但是，劳在给摄政解释他的信贷理论时，是有根据的。他在1716年奉命开设了一家私人银行。这次颇为成功。接着于1717年再次奉命建立了西方公司，垄断了与路易斯安那的贸易。1719年该公司改为印度公司，控制了法国的全部对外贸易。1718年和1719年，劳还首先取得了非直接税的包税权，然后又取得了直接税的征收权和纸币发行权这一革命性的措施。这时，劳便准备解决王室债务问题：1719年取消国债券，并且宣布用公司的股份来支付这些债券。最后于1720年1月，已经成为法国公民和天主教徒的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掌握了法国的全部经济命脉，并且利用这个大权在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圣西门对他的同时代人的批评，通常是很不客气的，而且生来也不喜欢颂扬一个外国冒险家的，但他却把劳说成是“没有贪婪和欺诈，也没有被极好的运气所宠坏”^[3]。但是，这个体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再加上一个赌徒般的乐观本性，使劳把他那个庞大的财政上层结构，建立在实际贸易极为脆弱的基础上。他曾做了一番英勇却又毫无希望的挣扎，妄想挽狂澜于既倒，但当不可避免的崩溃来临时，他只好放弃一切努力，于1720年12月逃离法国。

这套制度的利弊何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已恢复到那位昙花一现的苏格兰人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之前的景况。通过对面值的猛烈贬值，大量的纸币已经紧缩到可以应付的程度。劳的大部分革新已随同他本人一起销声匿迹。这套制度垮台的一个特别不幸的后果，是证实了法国人对信贷机构，特别是对国家银行主张的不信任。债务的规模通过清算得到缩小，但也仅仅是恢复到劳改革前的水平而已。而且，为此还付出了面临新的破产的代价。另外，这套改革给经济生活的刺激却没有完全消失。贸易和工业得益了。劳计划兴建的大道路和大运河也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印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洛里昂日益变得重要起来，美洲的新奥尔良情况也如此。海外贸易得到很大的促进，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开发殖民地的可能性上去了。在法国，那些在改革前期得益，后来又及时脱身的交上好运的地主们摆脱了土地的债务。尽管有许多家庭破产，但也有人由穷变富。这套改革制度的最显著的结果是，财富重新分配和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因而造成混乱。那些被劳暂时地挤在一边的金融家们，以比以前更大的声势卷土重来。他们中间为首的是帕里斯兄弟。其中以帕里斯·迪韦内最有才干，他负责对这套制度进行结算。他在1723年到1726年波旁公爵统治时期虽无其名，但实际上他就是财政总监。在这个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又涌现了一代新的富人。

摄政的改革试验不仅在财政方面告失败，他那个由委员会掌权的制度也垮了台。摄政时期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红衣主教们和路易十四留下的那套制度是很难推翻的。然而，法国虽然又恢复了“大君主”制定的政治习俗和机构，这套停滞不前的制度的弊病，却随着法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显著了。

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尔良和他的大臣杜布瓦总算比较成功（见第9章）。但摄政时期的国内政策，却只能作为一场失败而载入史册。正因为这场失败不能归咎于摄政本人的无能，因而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摄政是一位聪明和强有力的统治者。他认识到法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不害怕采用激烈的措施，因此他挑选了像劳和杜布瓦这样不讲情面、有能耐的大臣来辅助他。他拯救了法国，使之免除一场新的投石党运动的灾难，而且他肯定地使法国政府避免了摄政时期通常难免的混乱，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是他对法国的统治机构进行了根本改革的尝试。这是路易十四时代到大革命爆发之间唯一一场没有像日

后阿尔让松那样停留在纸面上的改革尝试。这场改革遭到惨败的原因，不应该在奥尔良本身的性格缺陷中寻找，而应该到路易十四制定的政体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去找。这一点在整个19世纪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1723年这位摄政去世后，自然由这个血统的各个亲王中的下一位亲王波旁公爵负责领导政府的工作。他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情妇普里夫人所左右。他的无能不久就暴露出来。1726年，年轻的国王原来的导师，深得路易完全信任的年迈红衣主教弗勒里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得足够使波旁下台。1726年至1743年，法国是由弗勒里统治的。这一事实打破了路易十四的体制，虽然这是为时短暂的。路易十四从来不愿完全信任任何一位大臣。在他全盛时期，他往往故意让大臣们彼此钩心斗角，而把领导政策的最高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弗勒里不是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的继承人，而是黎塞留和马萨林的接班人；他不虚此名，成了一个没有首相头衔的“首相”；他是法国的沃波尔，这不是指在议会中，而是指在朝廷中，他靠着国王的信任、本人的才干和用人的能力而掌握大权。同沃波尔一样，他的权威从未受到挑战。在1732年到1737年期间，他作为掌玺大臣和外交大臣与肖夫兰密切配合工作；这是他权力的鼎盛时期。在国王的绝对信任下，他因而能够把自己置于宫廷圈内人物之上。在弗勒里当政期内，各派的倾轧并未支配法国的政策。新的詹森派争端（见原文第229页）的闷火，虽然未被扑灭，但至少也被封闭了。他也像沃波尔一样，不是一位革新者。他认为，法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他为法国提供了这段时间，并没有让这段时间白白浪费。在1717年到1751年间，法国出了一位伟大的大法官阿格索。阿格索即使在不当大法官期间，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编纂法典和改革法律的工作。1730年到1745年间任财政总监的菲利贝尔·奥里是一名工作勤奋、精力充沛和颇为尽职的官员。他即使算不上是一位改革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行政管理能手。在他的治理下，财政压缩到旧制度所能允许的程度。他的那套方法，只要弗勒里的温和的外交政策没有将过分的要求强加于他们，就能成功地维持了财政的稳定。

如果说财政在法国是政府成败的关键，那么外交政策就是财政成败的关键，而弗勒里则尽最大努力维持一项和平的但并不是软弱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指摘他忽视海军，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他的根本

目的是防止欧洲各国重新组织一个反法大联合。路易十四就曾为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因此，他继续奉行杜布瓦的与英国结盟的政策。一旦这方面得到安定，他就能在北欧和东欧重新建立法国的势力，并在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之后，通过维也纳条约将巴尔和洛林公国划归斯坦尼斯瓦夫，并且在斯坦尼斯瓦夫死后将这些领地传给他的女儿，也就是法国的王后和她的子女。

到了1740年，弗勒里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各方面事务的首脑，但是已经开始失去控制权。国王日益独立不羁，这就使他要听取宫廷中对手们的意见，而且这位红衣主教只能通过向新势力让步和接受他根本不赞同的政策来保住自己的地位。1743年1月他去世时，路易决定不再指派任何人来接替他的位置，要恢复路易十四的体制。国王将不再像路易十三那样，只是一名伟大的大臣的“杰出的奴隶”，而是要像路易十四那样，亲自主持御前会议，亲自为法国的政策负责。这个决定绝不能轻视它，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这位国王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是路易十四体制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体制由于路易十五和他的年老的导师之间的一种特殊个人关系而被中止。而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重演的。国王不仅要在位，而且还要掌权，这是旧制度发挥正常作用必不可少的。旧体制是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它仍然保存了许多中世纪国王亲政的成分，这同一个不问政治的懒散的国王是不相容的。

现在就看看这种君权神授说从路易十四传到路易十五后所发生的事情吧。传统的路易十五的形象是不应该全盘接受的。旧制度问题的真正所在，已经被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资产阶级分子、闹派别的宫廷官吏和被解职的大臣们在形形色色的回忆录或假回忆录中对他的性格的故意诋毁所掩盖了。这位“太阳王”的曾孙，起初显然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他原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在全国人民的爱抚下长大；他是法国的第二号受人爱戴的人物；人们对他寄托了无限希望。他冷漠庄严的神态和低沉的嗓音，显示出他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他对宫廷中的繁文缛节应付自如。有关他的无知和缺乏教养的一些说法，都是编造出来的。他不但聪明，而且记忆力过人。毫无疑问，他性格上的致命弱点的根源，应从人类本性的神秘深处去寻找。但是，不管他有什么天生的缺点，他早年在维勒鲁瓦那里受到的教养只是使得这些缺点有增无减。维勒鲁瓦迫使这位幼王过早地暴露于他所憎恶的大庭广众场合。路易十四却对此掉以轻心。对于一个日后既要即位又要统治

国家的国王来说，最糟糕的准备工作就是在朝臣们的簇拥下，在宫廷中受到的教育。在路易十五尚未准备好行使国王职权之前，他对这项工作就已经感到厌倦了。结果，他只能在两件既千篇一律，又变化无穷的东西上去寻求解脱。这两件东西就是打猎和女人。在国王不打猎的时候，人们就说“今天国王没事”。国王有一大堆情妇供他消遣解闷。她们中间只有蓬巴杜侯爵夫人和迪巴里伯爵夫人得宠的时间稍长。但是这些追求，并不能使路易感到长久的满足。他的宗教感使他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只是由于他深信上帝不会惩罚法国国王，才使这种恐惧稍有减轻。路易十五的最大劣根性是他那致命的举棋不定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国家机器的中心陷于瘫痪。它可能是由于他的极端无聊和讨厌处理国事所造成的。然而他又顽固地抓着他的特权和从路易十四那里继承的地位不放。弗勒里死后，他对谁也不信任，并且恢复到在大臣中和宫廷各派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政策。结果，大臣频繁更换而不稳定，遂成了治理国家的一项原则。更糟糕的是，路易还情不自禁地要玩弄阴谋来反对自己的大臣。他生性就爱搞秘密活动。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建立了国王密党和外交部信检局。信检局后来在舒瓦瑟尔下台后又转属财政总监领导，这是个专门从事偷拆来往信件并摘抄部分内容供国王取乐的机构。

在这样一个国王的统治下，宫廷中派系斗争遂成为法国政府的真正结构。宠臣和情妇争相对国王施加影响。凡尔赛宫中派系间的纵横捭阖连绵不绝，女人们在这方面大显身手。阴谋就是旧制度的政治活动。这些阴谋活动在路易十四死后，导致了投石党运动死灰复燃。泰纳的一句精辟的警句概括了这种局面，他说“游手好闲的贵族，就是滋生投石党人的温床”^[4]。

要想真正理解18世纪法国国内外政策的不正常现象，就必须对宫廷内各派系做比以往更为详尽的分析。这里只能简略地列举一二。宫廷阴谋活动在路易十五在位的前期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摄政密党的动机是希望能够继承多病的路易十五的王位。反对派则聚集在旧朝廷那一派周围，得到路易十四的私生子们的支持。但摄政和杜布瓦尚能控制局面，甚至利用1718年曼恩公爵和夫人在塞拉马雷的亲西班牙阴谋中的牵连来推进他们的政策。从杜布瓦下台到弗勒里掌权之间的三年（1723—1726年）时间里，波旁公爵名义上掌管法国，而普里夫人实际上又把波旁公爵握在手心，各派势力则纷纷争夺外交政

策的控制权。弗勒里在1726年的胜利，结束了这场争夺。弗勒里知道如何保持住他对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但坐朝掌权的野心还是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有所表现，并由此产生了“国王密党”。1737年，当肖夫兰开始背离弗勒里的外交政策另搞一套并和波旁公爵进行阴谋活动时，他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可是，当1740年奥地利的查理六世去世并引起了一场国际危机时，弗勒里已经无法控制局势。显然，这位红衣主教不可能永远活在世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已从地平线上升起，宫廷里的官员们也开始考虑如何为新人效劳了。贝尔岛伯爵成了主张对奥作战一派的核心人物。弗勒里只能违背自己的良知予以屈从。他于1743年去世。根据国王的决定，从此不再让其他人继承他的职务。他违心地在身后留下了一个准备参战的法国，连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目的都不甚了然。

阿尔让松侯爵于1743年担任外交大臣。此人惯于制订大胆的计划，但执行起来却又力不从心。即使他的主张比较现实，也不大可能成功，因为路易十五同时还听取了五六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阿尔让松的计划，他只是给予半心半意的支持。阿尔让松的计划遂告失败，并于1747年下了台。莫里斯·德·萨克森军事上的胜利却使法国能够在1748年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和平。在随之而来的10年中，很难说是谁在负责法国的政策。以布罗伊伯爵和孔蒂亲王为主要助手的秘密外交，耗费了国王不少精力。这时法国宫廷中主要的实力人物是蓬巴杜夫人。此时她已不再是国王的情妇，而是他的主要心腹了。尽管她的地位使她不能自己做出决定，但她常常可以决定由谁来做决策。在1756年法奥条约谈判中起主导作用的贝尼斯教长就是她的被保护人。在贝尼斯教长失策后，她又施展影响帮助舒瓦瑟尔于1758年12月当上了外交大臣。舒瓦瑟尔靠蓬巴杜夫人和朝中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以及他自己的机敏和果断，成了弗勒里以后第一个能有效地控制法国政策的大臣。但到了这个时候，法国统治机构的虚弱和混乱，已使法国的实力大减，以至于连舒瓦瑟尔这样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大臣，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法国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有许多，除了诸如它同奥国的结盟脱离了它原来的目的，它在海上陆上同时作战有困难，以及它在东方的盟国已经衰落等起作用的因素外，主要的原因必须从法国政府本身的弱点和不团结中寻找。而这又能进一步追溯到作为国家机器首脑的路易十五本人的缺点。塞居尔伯爵后来这样写道：“懦弱使一切政治计划落了空。把一位天才置于欧洲最小的王位上，把一

些懦弱的亲王置于其他王位，那么前者最终将统治后者并进行一场大革命。”^[5]

在法国的国内治理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弱点。外交政策是受朝廷内派系势力影响的，只要有一位强有力的国王或是得到国王充分信任的大臣，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控制住。国内政策却受到更强大压力的影响。当然国王本人从来没有遭到过公开的攻击，但是他的权力基础，即宗教制裁权和财政资源，却不断遭到破坏。为了方便起见，宗教上的和财政上的斗争是可以分别加以阐述的，但必须记住，实际上这两场斗争是同时进行的。

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意味着全盘接受社会的宗教基础和教会在国家中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幸的是，18世纪法国教会无法对付敌对的詹森教派和启蒙哲学家的攻击。教会的最大弱点在于它不能团结一致对敌。垄断了教会大部分岁入的高级教士，全部来自社会上层。路易十四时代尚能担任主教的波舒哀和马比荣这样的人物，在18世纪就不能担任主教。高级的神职，实际上往往是由一些豪族世袭的。罗昂亲王26岁就当上了坎佩地区的主教，接着又继承他的叔父当上了斯特拉斯堡主教、法国施赈大员、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索邦神学院代理院长和红衣主教。他一心想博得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欢心，结果对他们两人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的清苦景况同上层教士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靠剩下的一部分捐赠勉强维持生活。本堂神父在1686年定下的300里弗尔年俸，在1768年提高到了500里弗尔，而分配给副本堂神父的是最低限度的200里弗尔。这些微不足道的薪俸还是从那些颇不情愿的教区居民那里榨取来的。

尽管下层教士的生活清苦，但与19世纪他们的后继者相比，他们至少还有一个优越之处。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一样，绝大多数是终身任职的，因此他们对主教团的依赖要远比19世纪的教区神父少。在这种情况下，教区的教士们既有充分的理由表示不满，又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表达这种不满。他们通过因埃德蒙·里歇得名的里歇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示他们的反抗。埃德蒙·里歇在他1611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鼓吹教会不应是专制主义的，而应该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他认为，教会应属于包括教区神父在内的全体教士。当宗教上的不满与物质上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时，里歇主义就显得重要了，因为18世纪的法国教会在精神方面正处于低潮阶段。尤其是在高级教士中宗教上和道德

上的松弛堕落现象颇为普遍。教团的教士比世俗的教区教士更自由地接受非正统的观念，而正统的神学理论在思想上也无法同启蒙哲学家们的有声有色的宣传相抗衡。

在18世纪教会里出现的这种宗教热情，主要转向离经叛道的詹森主义。路易十四和耶稣会曾经取消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6]但就在对旧的詹森主义取得全胜的同时，一个新的詹森主义却又不知不觉地在1713年有名的克雷芒通谕发表后兴起。该通谕指责1671年奎斯奈尔写的一部祈祷书《新约道义探讨》中提出的101条论点是詹森主义的。以往在同詹森主义争论时发表的教皇训谕，主要是针对神学家的，但这一次却选了一部广为传阅的祈祷书作对象。这部书曾经得到过巴黎大主教的公开推荐。也许这正是将它挑出来加以谴责的原因。这是对巴黎大主教的独立性并通过他对法国教会高卢传统的一种间接攻击。这个通谕立即引起了公众的愤慨。最高法院多年来第一次抵制了路易十四的旨意，拒绝通过国王强迫主教接受通谕的命令。此举受到教会内外相当一部分舆论的支持。路易十四开始对那些反对通谕的人进行有力的迫害。但是他却在他所引起的这场争论中去世了，留下全国人民分裂成接受派和拒绝派的两派。据伏尔泰的说法，前者只有100名坚持接受通谕的主教及耶稣会和嘉布遣会的成员，而后一派却是全体国民。

摄政开始扭转路易十四的政策。他释放了那些因反对通谕而入狱的人，指派巴黎大主教诺阿耶任教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罢免了耶稣会的勒泰利埃，并给路易十五安排了一名非耶稣会会士的神父弗勒里当忏悔神父。从长远的观点看，在他当时采取的这些措施中，谁会料到最后一项竟是最重要也是唯一有持久影响的呢？奥尔良的这些平息宗教争论的努力，和他解决其他路易十四遗留问题的计划一样，收效甚微。何况新詹森主义的燎原之势，虽然好像是路易十四偶然点燃的，但法国的形势却早就像是一堆干柴了。耶稣会的敌人很多，特别在最高法院中有人。最高法院传统上是法国高卢教会独立自主反对罗马统治的拥护者。因此摄政想达成妥协的解决的做法，使他同巴黎高等法院也发生了冲突。1720年他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1726年斗争又重新爆发。但是到了那时，支持新詹森主义派的主教们的势力已经削弱，巴黎大主教诺阿耶于1729年死前不久接受了克雷芒通谕。

然而，尽管新詹森主义在主教团中逐渐失去了支持，它在下层教士中却赢得了不少信徒。主教们想对下层教士执行纪律，结果同最高法院也发生了冲突。最高法院在1731年的一份宣言中重申了高卢主义原则，宣称“世俗的权力是独立于其他一切权力的。只有它才能负责有关国王臣民的一切事务。教会的神职人员应在国王领导下，对其行使的管辖权向最高法院负责”^[7]，这个宣言第二天就被国王取缔了。国王自幼受敌视詹森主义的教育，王后又完全受耶稣会的控制，被人称为“一元王后”。在教会中恢复纪律显然是可取的，但是从路易十四时代传留下来的那套制度中的固有矛盾非常突出，想要恢复秩序，就必须粉碎一个坚持认为国王的权力要大于教会权力的一派。群众的激昂情绪的增长，增加了政府行动的困难。这是因为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死去多年的詹森派执事帕里斯的墓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系列“奇迹”。人群聚集在墓地周围，“受到剧烈震动的人们”掀起了一阵阵野蛮的宗教狂热。连巴黎的高等法院都变得警觉起来了，因为那时它反对国王的权威，尚不像日后那么充满信心。于是公墓停止向公众开放，弗勒里用刚柔并施的手段，赢得了暂时的平静。

当骚动再一次爆发时，实际上它已经是里歇主义而不是詹森主义了。这一运动除了体现了下层教士对贵族垄断高级神职和岁入的不满外，还代表世俗大众提出进一步参与教会事务的要求。面对下层教士中这种反叛精神，主教团采取了更强硬的纪律手段。德行颇高但却不太聪明的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首先发难，他下令教士不准为那些拿不出由接受克雷芒通谕的神父签署的忏悔证的人举行圣礼。这一来使声称有权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法院重又卷入了这场冲突。它对服从大主教这个命令的教士进行了惩罚。

新的詹森主义争端在1750年前后正当政府忙于下决心迫使教会接受马肖新设立的税目（见原文第234页）时，再一次爆发。国王不但未能抓住时机给教会统治集团施加额外的压力，反而在朝廷中笃信派的影响下，采取反最高法院的立场。为了加强与教会的联合，他甚至放弃了马肖的财政建议。然而最高法院对他这种做法实在并无异议。事实上，它还很乐意让教会来替它承担阻挠财经改革的责任。但是最高法院却并不因此缓和他们对国王宗教政策的对抗。1753年4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大抗议书”，重申它是这个国家基本法规的可信赖的和当然的捍卫者，而且在履行其职责时，如有必要，还要对抗国

王。国王随即下令把高等法院的领袖们逐出巴黎。整个司法系统以停止工作来表示对高等法院的同情。一切司法程序都停顿了，各省的高等法院效法巴黎高等法院的做法予以支持。首都的百姓发生骚动。阿尔让松认为，法国正在滑向一场新的投石党人运动。但是国王又一次做了让步。1754年，双方经过谈判以一个自然无人遵守的颇为荒唐的保密禁规形式达成妥协。1756年教皇的通谕发表，法国的教会放弃了要忏悔证的做法。教士中的詹森主义热情也逐渐消失。但是里歇主义的倾向并未完全消失，它在大革命的早期重又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詹森主义在18世纪所起的作用一直引起注意。胡格诺派虽然已成为一个局部的而不是全国性的问题，但他们的事迹，常常在民间默默地流传。胡格诺派遭路易十四的迫害被驱散镇压后，又因同卡米撒派的叛乱有牵连而在国民中失去了信任。看来他们已不太可能再度成为法国的一个问题。根据路易十四的法律，法国不准存在非天主教的信徒；国王的所有臣民都受教会法管辖；拒绝遵守教会法规就是反对国王。但实际上到了18世纪初，对胡格诺派信徒的迫害已经逐渐减轻。中央政府也很容易地满足于他们表面上的一些顺从姿态。然而，在胡格诺派人数最多的法国南部，主教们却给新教徒的婚礼或洗礼规定了难以遵循的条件。政府在那里想推行温和政策的努力也行不通。反对新教徒的法规仍然十分严厉。禁止他们举行宗教礼拜集会，不然男人将被处以苦役，女人遭到监禁；到国外用新教仪式举行婚礼或洗礼的人，将被大量罚款；传布新教的传教士被捕后有被绞死的危险。绝不能认为这些规定是不起作用的，但在实施时，其影响范围取决于地方长官实施时的热心程度。结果，新教徒的命运主要依各地的形势变化而定。“今天他们因一位地方长官的宽容而得益，但明天继任的长官又可能是残酷无情的。”^[8]他们的最凶恶的迫害者是波尔多和图卢兹地区的高等法院。这两处机构之所以这样做或许并不是出于宗教热忱，而是为了向主教和地方长官维护他们监督宗教纪律的权利。一方面用绞刑、酷刑、监禁和苦役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则时时奋起反抗或逃往国外，这是路易十五的大臣们解决路易十四遗留问题遭到可悲失败的又一个例证。

18世纪50年代以后，对新教徒的迫害，如同对詹森派教徒的斗争一样，开始消失。教会的敌人逐渐得势。那些曾得到王后和王储支持的笃信派在宫廷里失势。在蓬巴杜夫人的庇护下，启蒙哲学家们的反

宗教宣传受到保护和鼓励。就在宗教势力忙于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同时，知识界的无政府状态扩散了。大部分新思想的鼓吹者并不是存心攻击社会和政治秩序，但是批判和科学精神的兴起，必然是危险的，而对宗教的攻击是对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的君主制的潜在威胁。

在此同时，新詹森主义的斗争，虽然已告结束，但高等法院同耶稣会的斗争还在继续。耶稣会会士已无法再指望国王的保护。尽管耶稣会为建立国王的绝对权威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现在却发现，它曾出力帮助制造出来的这个工具已经转而反对它了。人们迟早一定会发现一个由于效忠于外部力量而存的集团是无法同君主专制制度并存的。其他天主教国家在这场反对耶稣会的运动中早已走在前面。法国的耶稣会自己为敌人提供了机会，当时曾广泛进行商业活动的在法属西印度传教的修道院院长佩尔·拉瓦莱特因受七年战争影响而破了产。在处理破产的诉讼中，整个法国的耶稣会都受到指控。巴黎的高等法院趁机责成耶稣会偿付拉瓦莱特的债务；接着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核查耶稣会的规章；最后自然又宣告这些章程与效忠国王是相抵触的。虽然路易本人依然倾向于耶稣会，但他保护他们的努力充其量也只能延迟他们失败的命运。这又是一个君主制削弱的明证。巴黎高等法院于1762年8月颁发命令，在法国取缔耶稣会并查封了它的财产。这样做的依据是因为该会的宗旨“破坏和违背宗教的一切原则，甚至忠诚老实的原则。它有损于基督教的道义，毒害文明社会，煽动敌视国家的权利和国王的权力”。

在高等法院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君主政体在财政方面的衰弱也很明显。在马肖于1745年到1754年期间当财政总监时，一场巨大的斗争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费用使王室的财政又一次面临绝境。马肖决定利用随之而来的和平时期进行一场根本变革。这场变革的主要措施是对一切收入和一切阶层，包括贵族和教士在内，一律征收一项称为二十抽一税的新税。他不理会高等法院的反对。然而，下令设立新税是一回事，要征收这项税款又是另一回事。贵族阶层竭尽全力逃避交税，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抵制征收新税。对马肖的计划来说最致命的阻力来自教士阶层。这一点上文中已经谈到。国王对朝廷中笃信派的压力做了让步。但10年以后在耶稣会这个问题上他又投降了另一方。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教会，国王的处境都是很尴尬的，因为两者对君主政体同样有危险性。君权神授说的原则是教会和

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实践中，这一点很难永久保持下去。这种一致一旦破裂，要么国王不得不为教会而牺牲君主制的利益，要么他不得不忍受君主制的宗教基础遭受损害的痛苦。前一种情况表现在他支持极端的反詹森主义政策或默许教士阶层的反对去支配国家的财政政策，后一种情况则表现在他容忍启蒙哲学家和听任高等法院谴责耶稣会。

对财政总监所依赖的贷款和采取财政上的不太重要的权宜之计来说，要想成功，高等法院的合作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马肖以后的一系列软弱的财务总监为政期间，高等法院实际上控制了局面。各地的高等法院竞相仿效巴黎的高等法院，对当地的地方行政长官发起攻击。雷恩的高等法院和布列塔尼的艾吉永之间的冲突，几乎引起内战。路易十五只是在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即1770年到1774年期间，在面临彻底破产的情况下，才又一次试图重整王室的财政，并把它作为剥夺高等法院进行阻挠的权力的必要的第一步。他找到了莫普和泰雷两位能干的大臣。虽然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1774年路易十五一死，高等法院又受到了年轻的继位者的重用。莫普做到的只是用一场强制的破产暂时缓和一下财政形势而已。

法国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只是旧制度日益衰败的一种症状，但不是其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路易十四及其大臣们建立的社会和行政结构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而社会本身在此同时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要把简化了的路易十四社会模式同现实相一致，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社会是一座金字塔。它的基础是乡下的农民和城镇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经济基础和交纳国家财政所需的税款。反过来，他们指望国王保护他们传统的权利来作为回报。这是那时节国王和百姓之间关系的具体含义。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国王终于承认农民，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是他们的农庄的主人。城里的手工业者组织成行会，获得了专营权。资产阶级本身也是一个特权阶层，因为他们在贸易上受到保护，贵族阶层不得与之竞争。贵族是不许经商的，否则就要受罚，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社会阶梯的更上一层，法律和行政管理均由穿袍贵族掌管。最后，佩剑贵族没有政治权力，以免对君主政体造成威胁，但就纳税来说享有特权；反过来，他们为军队提供

军官并充当宫廷人员，用伯克的话来说“它是上流社会中花花公子们的天堂”。

旧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些设想上的。但是，对实际情况稍加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设想是多么脱离现实。首先，把整个国民分成贵族、穿袍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农民，这样是简单化了，它掩盖了法国社会的复杂的真实情况。事实上，每个阶级有其自己的内部划分，无法形成一个严密的实体。在贵族阶级内，至少有9个重要区分。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区别。后者从有钱的乡绅到守着几英亩祖传农田、一贫如洗的布列塔尼贵族都包括在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从未见到过凡尔赛宫，许多人甚至在当地首府的社会生活中也无法与资产阶级竞争。他们只有在保卫自己的免税权和征收领地费权时才能采取一致行动。教士中有钱的贵族化的高级教士和贫苦的教区神父之间的差别，在前文中已做了描述。穿袍贵族实际上分成了相互严重敌对的两派。一派是高等法院成员，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宫廷成员，如前所述，高等法院派是国王权威的坚决反对者。另一派则包括财政总监，有时包括其他大臣，各地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重要官员。这些人只有一部分来自长袍贵族世家。他们的利益自然是同国王行政机构的利益相一致的。在这一边，高等法院的成员为地方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压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往往他们自己就有这种领地权。另外，地方行政长官们作为国王税收的征集人，则有兴趣保护农村社会摆脱领主的索求。这在高等法院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中，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

非特权阶级的结构同样是复杂的。“非特权”一词本身就是一个使用不当的名词。有钱的大资产阶级在市政机关中的职务往往是世袭的。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市政厅贵族”。在社会阶梯比较下层的是合作社或行会的成员，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世袭的阶级。普通的工匠实际上很难进入他们的行列中去。包税人、有钱的银行家和金融家，有时被称作“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他们和企业主、小商人有明显区别。这个金融阶级是经济社会的主要成分。路易十四的战争使他们得到了大量财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金融王朝充分地利用了18世纪20年代的投机狂热。包税制在18世纪前半叶使包税人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这个制度的巩固，金融家们的势力在转入18世纪后不久达到了顶峰，他们强大得足以被称作国中之国。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向

财富敞开的大门为数寥寥。金融家们的女儿和侄女们纷纷嫁到了贵族家庭，或者渴望像波旁公爵的情妇普里夫人那样，或者像勒·诺尔芒·德蒂奥尔夫人那样，从帕里斯-迪韦尔纳的一个小职员女儿一跃成为蓬巴杜侯爵夫人和国王的情妇，能够为她在金融界的追随者提供宝贵的服务。金钱万能的原则甚至使军官阶层的各级职务也向平民开放了。到了舒瓦瑟尔时期，上尉军衔成了可在市场上购到的一件物品。用钱买得御前秘书一职是通向贵族阶层的一个普通途径。金融家们还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为他们的下一代购得行政法院审查官的官职，以便为日后取得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提名做好准备。地方行政长官的工作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方面的，这对他们来说倒颇为合适。这样，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同他们过去的前辈们一样，正在兴起，向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

总而言之，法国社会的实际结构要比传统的简单划分为三个等级复杂得多。德托克维尔早就把它比作“一些看上去是很简单的物体，但用现代化学对它们进行仔细检验时，却会发现它们中有越来越多按比例组成的独立成分”^[9]。法国社会的问题在于这种各自为政的分裂状况综合在一起，使社会无法团结一致。集团之间的冲突并不由于那个时期的显著的经济增长而有所缓和。法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这种经济进步的源泉来自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并没有给广大农村百姓带来多少好处。一些富有的自耕农及佃农是例外；前者的财产增加了，后者则因地租比农产品价格上涨得慢而受益。另外，城镇正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弗勒里的精心治理，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波动的埃居和金路易的价值也稳定了下来。1726年规定1个金路易可换24个里弗尔。此举促进了国内贸易。但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更为重要。和法属西印度的贸易使波尔多和南特等港口日益繁荣扩大。南特成了奴隶贩子的大本营。法国的贸易在1715年到1740年间实际上增长了一倍，到了1763年又翻了一番。随着贸易的发展，海港地区的商人阶级的财富已能和金融家们的财富媲美。在农业和商业方面滚滚而来的利润的资助和海峡彼岸一小股有影响的移民的协助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伙移民工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詹姆斯党人霍尔克。霍尔克在1745年叛乱后迁来法国。1752年经国王许可，他在鲁昂近郊建立了一家纺织厂。他的事业非常成功，1755年他竟然被任命为制造商总监。技术方面的

发明，虽然不及在英国那样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科学院的鼓励下，也有长足的进步。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最广阔领域是矿山的开发。18世纪法国工业活动开展时期，大片森林已经遭到采伐。要是燃料的来源继续主要依赖森林，森林就会完全毁灭。开矿业的原始和混乱状态，无助于燃料短缺问题的解决。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财政总监奥里在1744年发布了有名的禁令，把开矿许可权重又集中在国王手中并制定了包括保护工人安全在内的矿业经营准则。矿业处在1764年以前一直是财政总监属下的一个机构，它对开矿业实行了持续的严密的监督。虽然仍有一些小型的原始矿山逃避了有效的控制，但规模大得多的矿井这时却建立起来了。其中最大的昂赞煤矿年产量从1720年的55吨增加到1790年的31万吨。另一个发展起来的工业是造船业，特别是南特港和波尔多港的造船业。奥里的努力改善了国内的交通状况，他在1738年建立了劳役制度。城镇财富的增加还表现在外表上，城市建筑的兴起如雨后春笋，巴黎和一些地方城市都出现了一批优美的18世纪住宅。

然而，经济上并不都是这种发展景象。法国的经济跟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各个方面一样，也存在着固有的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的矛盾。法国的工业结构，同法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一样，在大变革时代前夕，还是采用柯尔贝尔制定的那套王家工场、贸易公司和管事师傅等僵硬形式。行会制在18世纪的法国甚至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普瓦捷市，14世纪只有18个行会，到了18世纪就有42个。这些工业行会基本上是世袭的，掌握在人数有限的一些大师傅手中，受警察总监的管辖。只有在市政当局买下了这种管辖权的城市里情况才不是这样。中央控制权掌握在管建筑、艺术、学院和工厂的总监手中。他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和一些能力颇成问题的督察行使权力。工业的发展受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合作社和国王派遣的督察勾结在一起扼杀发明创造。在这种障碍下，工业技术只能缓慢地改进。此外，广泛地分布于乡村中的家庭工业更由于受其性质的限制，很少受到新技术的影响。规模不一的工厂为数不多，而且几乎都是王家工场或由国王授予特许权才开设的。绝大部分工业仍然是由工匠们经营的，通常是由一位师傅带上一些满师学徒经营的。这些学徒们完全受享有特权的师傅控制。1673年柯尔贝尔曾发布命令普及合作社制度，禁止成立满师工匠联合会。但他们仍旧秘密结社，有时在价格上涨的

压力下甚至采取联合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1749年的一项国王命令，禁止满师工匠结成任何性质的联合来左右工匠的雇用或解雇。但是像石匠、木匠和铁匠这些传统上要先随师傅走遍全国才能满师的行业，还是规定了学徒期满后随师工作的年限。在这样的环境下罢工（或如他们所说的联合行动）极为罕见，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最激烈的罢工要数一直是动荡不定的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的罢工。在1744年的斗争中，师傅和满师的学徒们联合一致对抗控制丝织工业的商人。他们在当地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第二年国王的军队开到里昂，运动的领袖遭到拷打、苦役和死刑的惩罚。这个插曲表明地位较低的师傅和满师学徒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通常还不至于在他们之间造成阶级差别。他们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在于满师的学徒想自己当独立的师傅。合作社不断地进行活动反对这种做法。但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的存在，提供了缓和紧张状态的办法。这些地区是巴黎的圣日耳曼区、圣安托万区和其他两三个小地区，这些地方合作社的限制不起作用，而在某些小城镇和乡村，当然不可能组织合作社，在那些地方起作用的是警察局的规定。但是到18世纪下半叶，当局鼓励在城镇受到行会特权限制的工业向农村发展。18世纪中期以后，在重农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开明的舆论开始反对合作社制度。但是对合作社的攻击只有在杜尔哥当政后才得到政府的认可，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取得了最后胜利。享有特权的合作社制无疑是18世纪法国在技术知识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工业革命进展甚微的一个原因，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

造成这个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金融和官僚阶级，而不是工商业阶级。它期望的是改变社会地位而不是经济条件。实际上经济条件对他们已是再合适也没有了。随着大革命的来临，资产阶级将击败特权阶层并接替这个阶层成为国家的支柱。如果君主制在这个阶段能够摆脱特权阶层的纠缠，它也许还能设法领导一场变革来代替一场革命。但是要做到这点，君主制则首先要改变其性质。君权神授君主制的传统、国王本人的个性、宫廷的势力和特权阶层仍然代表的社会力量，都不允许这样解决。路易十四君主制固有的种种局限性，使得它无法领导这场因情况变化随之而来的法国社会结构形式上的转化，因而它注定要垮台。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早在路易十五统治结束之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其他地方的君权神授君主制也在衰亡。但在那里能给予这种政体致命打击的力量，却远远小于法国。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比起前任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的政权，甚至还有所进步；而且，这个国家十分落后，人少势弱的资产阶级无法扮演法国第三等级在1789年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在奥地利管辖范围内，主要是农村人口，不存在推翻法国君主制那样的力量。在普鲁士和撒丁王国，情况也与法国大不相同。最后，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君权神授的君主制早在达到顶峰以前就已被摧毁。所以，在法国以外，再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与路易十四所代表的君主制相比的了；而且，其他任何一国的君主制，只不过是君权神授君主制在法国解体时出现的社会和思想进步的一种无力的反映。

（乐瑞夫 译）

[1] D. 达金：《杜尔哥和法国的旧制度》（1939年），第27页。

[2] 圣西门：《回忆录》（A. 德布瓦斯利尔编，1879—1928年）第29卷，第12—32页；附录一，第467—497页。

[3] 引自《圣西门》，第38卷，第76页。

[4] 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第14版，1885年），第371页。

[5] L. P. 塞居尔：《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1802年），第1卷，第253页。

[6] 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为17世纪詹森主义和文学活动中心，因修女大多拒绝在谴责詹森的文件上签字，1709年10月29日该隐修院被解散。——译者注

[7] 伊桑贝尔、德克律塞和塔扬迪埃合著《法国旧法律概论》（1830年），第21卷，第366页。

[8] J. 德迪埃：《法国新教徒的政治史（1715—1794年）》（1925年），第1卷，第215页。

[9] 德托克维尔：《旧制度》，第2册，第9章。

第十一章 英国

1714年在英国和威尔士居住的约有600万人。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他们的人口正在迅速地增长，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半数以上的人，以及他们的一大半的财富都集中在伍斯特至沃什湾一线以南的地区；几乎有1/4的人口居住在伦敦和邻近的各县。由于观察家的种种偏爱，英国被人看成是一个中心地区过分发达而外表有所扭曲的田园天堂，或者被看成是一个处在乡野蛮荒包围中的文明智慧的小天地。布列斯托尔和诺威奇以拥有可与伦敦的相媲美的商业机构而自豪。但是对金融的控制权却日益移往伦敦。而且，人们必须往北越过边界在爱丁堡才能找到另一个能与伦敦的文化相比拟的文化。不仅如此，伦敦不仅是一国的首都，而且也是一个由遍布世界各地的岛屿、商埠和沿海殖民地组成的帝国领土的都城。伦敦商人的兴趣包罗万象，从北美洲荒原的毛皮到广州的茶叶，从奴隶、蔗糖、香料到纺织品、五金和铁钉。伦敦的商人和布列斯托尔以及一些较小商埠的商人们，关心的是英国产品的出口，许多奢侈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及全球范围的运输业。但是，最大的一笔财富来源是把殖民地和印度的商品向欧洲转口。这种转口贸易对于促进先进的商业技术负有特殊的任务。而英国商人的信贷设施、销售组织和经济专业化对于发展世界贸易和经济资源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难怪18世纪的英国人过高估计了对外贸易的好处，过低估计了出口商品以外的国内生产的重要性，认为限制国内消费乃是商业政策的一个目的，并且维持了一套复杂的、目的在于使英国人能从殖民地贸易和运输业中获得最大利润的规章制度。贸易的收付差额乃是繁荣的晴雨表，而繁荣又是国家实力的第一要事。

英国人用一种近乎狂热的干劲积累了那些注定要在世界历史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资本储备。雄厚的资金，再加上国内安定，便可得到低息资金。私人投资在当时主要被吸引用来进一步扩大贸易，用来购买和改良土地以及在国内搞营建。但是低息资金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国家利用私人存款兴办公共事业，其规模之大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虽然国债从1688年的100万英镑左右上升到18世纪中叶的近

8000万英镑，但政府债券的利率1717年降到5%，1727年降到4%，1749年降到3%。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指望以这样的低息贷入这么多的钱。这个重要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英国能够在战争和获取殖民地方面取得成功。然而，政府尚不直接向一般公众借贷，而是向一些有钱的个人和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股份有限公司举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有势力的人正在从政府稳定和国家的发展中获取既得的利益。这种愿意把私人的积蓄用作公共基金的做法，基本上是立宪政府的一种副产品。取消债务的专断权力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债务是受到议会的保障的；议会还拨付经费和审查公家的账目；而且议会代表性的基础是狭窄的，它只保障有产者手中的钱安全可靠。

英国的经济地理仍然主要取决于海洋和可通航的河流。虽然奶制品和蔬菜可以从邻近的地区运往消费市场，但笨重的货物只能经由水路长途运输。伦敦的用煤来自纽卡斯尔，谷物来自东海岸各港口，建筑用石料来自波特兰和沿海各采石场。经济的统一落后于政治的统一。那些有船只驶往世界遥远地区的港口，它们的经济影响延伸到相对来说比较狭小的内地，它们的许多供应品全都靠水路运输进来。在大量消费品贸易中，只有牲畜的贸易是经由陆路长途运输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头牛羊从苏格兰和威尔士饲养地赶运到中部肥沃的牧场，再从那里跋涉赶往伦敦市场。许多工业产品，也许是大部分产品，只是为当地市场而贩运的。最大的出口工业毛纺织业，主要是在较大港口附近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中部地区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轻便易于运输的商品，不是因为有什么偏爱或特长，而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诺丁汉郡和莱斯特郡制作的袜子，伯明翰市的“玩具”和铁钉，设菲尔德的刀具以及许多县市生产的帽子，都是一些可以在18世纪初期英国的极为简陋的道路上用原始的交通工具进行贩运的货物。制铁工业必须依靠进口的已经熔炼好的瑞典矿砂，因为本国制作焦炭所需的木材，不是已经用尽，就是离国内的铁矿路途太远。

尽管经济由于内地交通的落后而受到限制，但英国的出口货物数量却很大，也很重要。规模巨大的布匹贸易还得到许多其他项目的补充，其内容包括中部地区技术落后、工资低廉的劳动力制造的铁钉和伦敦能工巧匠们制作的钟表和名贵服装。这些制造品在购买东方和殖民地出产的奢侈品和英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某些必需品方面，极为重要。英国缺乏木材，沥青、松脂、黄麻和绳索也很少。这些海军补给

品在英国贸易政策的历史记载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些物品连同生铁的唯一最大的来源是波罗的海地区。人们认为与这一地区贸易的长期逆差，是英国经济地位中的一个严重缺陷。英国需要用硬通货支付这么多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货物，这也许有助于说明英国为什么对黄金总是贪得无厌。这在后来的时代里，不免使人感到可笑。

除了为数不多的商业中心和一些出口制造业颇为重要的农村地区以外，人们看到的英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对于许多乡下人来说，小贩背囊中的货物就是他们见到过的唯一高级产品和东方的珍宝。而且，由于旅行要靠偶尔才有的、行驶很慢的马车，因此无数的英国老百姓往往老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出生地一步。驿站马车尽管又慢又不舒服，却是为有钱人服务的，绝非穷人可以问津；要乘坐私人马车旅行，更是只有真正有钱的人才能办到。除了诺福克东北部因水路运输方便有大规模的商品农业外，大部分农业都是为了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剩余农产品才拿到当地的城镇市场去出售。然而，正是用这些少量剩余农产品转化而来的租税和什一税，构成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维持英国国教的支柱。

农村社会的最高层是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虽然这种大地主不屑与其出身低微的邻居们交往，并且身居都市，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却不得不卷入错综复杂而又琐碎的当地事务的纷争之中。在国家舞台上，他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在当地拥有的权势的程度。这种权势不经一番努力是得不到的。在这个阶层之下而且与他争夺地方权势的天然对手是乡绅。乡绅有时在财产和教养上可与大贵族相比拟；或者只不过拥有几英亩土地，愚昧而无知。不管乡绅在国家舞台上多么无足轻重，但在他的更为卑微的邻人眼里却是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作为一村经济上的主宰，是受到国王委任的地方官，而且由于传统上一贯受人尊敬决断于乡里，因此在当地常享有几乎不受节制而且通常是无人敢于非议的权威。地方行政官的决定，必须要符合习惯法；对于行政官的决定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由于绝大多数被告都是无知而且唯命是从的，因此司法往往是自然状态的，而不严谨。乡绅的足迹很少离开本县，他的抱负的极限通常也只是要博得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们的好感，把他的土地遗产如果说不能有所增多地，但也要毫无减少地传给子孙后代。但是，就连这些并不过分的愿望，常常也要使他卷入争夺当地权势的斗争中去。地主阶层的下面是种地的农民：世袭地自

耕农、官册地自耕农、可随时令其退租的佃农和无地的雇农。这些人合在一起占英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世袭地自耕农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他们在正常情况下要按惯例缴纳地租，但他们不会被夺地，并且可以把土地传给他们挑选的任何人；而且他们的这种独立性不仅使他们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且还使他们赢得了在县选举中的投票权。

在社会等级和社会义务一目了然的农村环境里，统治阶级学到了行为准则和从政的基本知识。他们作为地主兼地方长官，一方面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深信他们进行统治乃是天赋的权力，这就使他们在有时采取残暴的行为时感到心安理得而无动于衷。他们从襁褓时起，就对英国农村生活的事实了若指掌，但时间将证明他们对工业的英国或殖民地美洲的问题，却一无所知。乡村统治阶级的一名成员，在积极执行简单的司法职能和解决当地的行政问题时，通常在经济方面势必也是积极的。表面上一成不变的农村习俗，往往掩盖了社会急剧变革的力量。地主如果要想使他的家族有所发展或者仅仅是要避免衰落，就必须努力奋斗。许多古老的家族，由于债务、经营不善或不谨慎而败落；它们倾家荡产或与有钱的人家女儿联姻。许多古老的庄园变成了一处处的大地产，为正在兴起的贵族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柱；另外一些庄园则被来自城市、东印度群岛或者甚至是来自当地市场城镇的人们所取得。虽然商业上暗下毒手的做法不多见了，但是竞争却是十分激烈的，并且促使传统的农业改变成为商品农业以及争夺地方的政治权力的斗争。17世纪末，一些有进取心的地主已经使用改良的农业技术。随着18世纪的日益进步，有人数越来越多的乡绅寻求使他们的土地能够产生商业利润的办法，并且以改革的热情面对着旷野里的那些杂乱无章而又不经济的带状田地和村民们在其上任意放牧瘦小家畜的那些公地。政治上的斗争，总是由于新兴的豪富之间的竞争以及比较古老但并不富有的贵族继续施加影响而变得错综复杂。但是，在这些年代中，由于大地主们在采取攻势，一个起支配作用的主题便出现了。这些大地主在小乡绅中间搜集附庸，把比较重要的乡绅老爷们逐出国会议员选区；因此到18世纪的中叶，已经咄咄逼人地要染指一向被视为乡绅们禁脔的县议会的议席了；而他们又拥有雄厚资金的财力以及往往高人一等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能够在争夺农业利润的斗争中赢得胜利。

政治斗争的关键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各个自治城市。议会中3/4的议员是由这些城市选出的。而且，在大部分的城市中，人数不多的律师、银行家、商人和酿酒商组成的城市寡头政治集团直接掌握着控制权，他们自己把自己选入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些机构凭着国王的特许状对于城市的财产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并且往往决定任何人可以享有传统的选举资格。一个地主可以通过购买城市产业的办法在城市内建立起一股“势力集团”。他凭借这种做法就可以取得绝对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不乏其例；但是，他通常考虑的是偶尔使用威胁，频频给予许诺，以及给予在他权力范围内所能给予的小恩小惠以赢得自治机构中的多数。一旦成功，他就会被承认是这个城市的保护人，有权提名一名或全部两名议员。作为报答，人们指望他为自治机构中的其他成员取得二等保护人的资格，对城市各界的利益予以关注，并且对从城市的建筑到国家节日的庆祝活动等一应事物给予资助。这位保护人就可以说“我的城市”，但是这份产业得之不易，稍一不慎就将保不住。有些自治城市完全可以像财产一样有钱购买，但卖价之高，往往只有城市商人中的首富或从印度回乡的“新贵”才能问津。控制一个自治城市的代表权如能取得成功，好处就在于可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取得更大的势力，从而可以在地方上增加权势。这种斗争本身就是18世纪英国社会里适者生存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这种社会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英国国教。虽然许多教区工作是由出身低微的牧师和教士们承担的，但教会的领导人、高级教士和圣俸优厚的神职人员却都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并且像拥有土地的乡绅一样共同分享利益并分担责任。教士在教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下，并且由于在精神上对主教阁下的百依百从，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创新精神。虽然终身任职制可以给予他以一定的独立性，但教会的整个传统却容不得任何的宗教特性。宗教补充法律，支持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有条不紊的等级制度的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儿童们被教导着要服从主人，要对社会地位比他们高一等的人俯首听命。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合而为一的典型，往往表现在有钱的教士既是精神上的指路人，又是地方上的治安官，兼有双重的职能。乡绅和教区牧师的联盟，虽然往往由于个人之间的争吵而蒙上阴影，但它毕竟是国民生活的基石，而中上阶层怀着一种超越政治原则的感情依附于教会。

那些不信奉国教者的社会地位则大不相同了，因为不信奉国教者从历史上就与叛逆有关联，而现在在农村社会中，依然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些不信奉国教者不仅分开来自己进行礼拜活动，而且他们的宗教组织也一直对等级社会进行抨击。这些不信奉国教者有一套自立的、往往较为优越的教育体系，有一批训练有素而勤奋的牧师，而且号召不要依靠权势而要诉诸良知和圣经；他们同英国国教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尽管“宗教考察与市政机关任职法”把不信奉国教者贬为二等公民，只要他们其他条件合格，依然还享有投票权。而且由于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城镇和小产业主中间，他们在选举中的影响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因此，这些不信奉国教者对于大地主们在与小乡绅的斗争中作为政治盟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到了1714年，这两个看来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集团之间的奇怪的同盟，就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个同盟构成了辉格党的骨干。

1714年，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区别仍然代表着争夺国家权力的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和意见方面的实际分歧。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党派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旧怨耿耿于怀，由于不断争夺地方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辉格党人便组成了一个由新人和新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政党。他们的领袖来自一些拥有土地的较大的家族；这些家族随着17世纪的每次政治变动积聚土地和势力；而且，他们的头衔，很少是在这个阶段以前获得的。17世纪发展的另外一些受益者，即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正是从这批新贵那里得到较大程度的社会承认和政治理解的，而不是从那些出身世家并且只是从拥有土地阶层的利益来考虑国家政策的达官老爷们。辉格党人作为一代新人，盗用了这个时代新的思想。他们拥护有限君权论和国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支持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支持容忍法和新教徒继承王位，主张同法国对抗，扩大贸易和保护土地或资金等财产。教会和国王结成的党伙反对这些新人，采取守势；他们在安妮女王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进行反击，以后于1714年终于走向无可挽救的失败。他们的失败主要是领导不力。直到19世纪后期，一直形成保守党派核心的拥有土地的乡绅，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出政治领袖。他们通常都是由他们自己阶级以外的人士来领导的；而且，在1714年这样的人物又找不到。主教们中间已产生不出托利党的领袖；旧有的保皇党贵族由于贫穷已被削弱，而且古代的家系已告灭绝。博林布鲁克进行投机，但告失败；哈莱已年迈而心力交瘁；其他具有野心的政客，对于把一个四分五裂、信誉扫地

的政党使之重新振作起来，大都不感兴趣。要是托利党人在思想上不发生分裂，新的领袖可能会出现。但是一些“汉诺威派”托利党人甘心接受辉格党人的欢迎并且忍受叛党的骂名；另外一些托利党人则对于由一位正统的国王承认他的朋友们这一主张极感兴趣，但却又无法抵抗辉格党人曾经利用过的立宪口号的力量。他们可以隔着海峡为国王干杯，但却忘不掉他的罗马天主教。他们可以大声疾呼这个教会处境危急，但又怀疑把这个教会与反叛的主张联系在一起是否明智之举。结果，除了在私下嘀咕一通以外，毫无作为。但是，当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后嗣而战斗的时机果真到来时，除了寥寥无几的狂热分子外，其他人全都待在自己的庄园里坐看事态的发展。托利党人虽然继续留在议会里，但却不再可能组成托利党的政府了。托利党主义一旦被剥夺了行使国家权利的机会，就只能陷于地方政治的泥潭之中，为乡绅们提供一种名义和传统；这些乡绅们同辉格党达官贵人们的力量继续进行较量，并且摒弃了他们曾经一度特别关怀的国王的势力。

对于辉格党人来说，由汉诺威家族继承王位，不仅是一个胜利，而且也是一个扩大胜利的机会。他们此时可以指望把国王的势力增加到他们的势力之中了；他们现在人才济济，这些正是托利党人所缺少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人物。但是，物极必反，他们的全面胜利看来要产生党内的派系分裂。辉格党人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于王朝的稳定，但是形形色色的辉格党人野心勃勃要独揽大权，又抵消了这种认识。乔治一世从以汤森和他的姻亲罗伯特·沃波尔为首的一派人中间挑选谋士，因为他对另一个主要派系的首领马尔伯勒和他的女婿森德兰的可靠性把握不定。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所有辉格党人进行合作要在选举中取胜，要粉碎叛乱而且要把那些不信奉国教的同盟者从托利党人最近政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1715年1月大选胜利，政府在议会中占150席，成为多数。但是，秋天里，不出所料，詹姆士党人诉诸武力。马尔伯爵在苏格兰高地举起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帜，奥蒙德正在德文郡沿海一带进行窥探，西北部的英国的詹姆士党人也处于备战状态。但是，詹姆士党人的领导和战略都是软弱无力的，路易十四的去世又使他们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马尔由于未能在谢里夫米尔把汉诺威事业的苏格兰人重要代表阿盖尔赶走，因此在卡多根将军坚决的追击下，他的部队瓦解。帕莱斯顿的决定性失败，使英国的詹姆士党人的种种希望告幻灭，奥蒙德

也未能把西南部的托利党人发动起来。按照当时的社会准则来说，政府在进行报复时是手下留情的，而且它可以这样做，因为它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场叛乱使政府可以谴责托利党人是潜在的破坏和平的分子，叛乱的失败证明在英国要求和平的愿望要比对旧王朝的任何眷恋之情强烈。动乱给辉格党人以极好的借口，因此他们避免了要在1718年举行的选举。人们解释“七年一次的选举法”既是一种应急措施，也是消除由于选举频繁所带来的耗费和混乱的一劳永逸之举。该法对辉格党的权贵们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现在可以积蓄他们的人力、物力以便用于每7年一次的压倒一切的攻击中。

如果说由新教徒继承王位是辉格党人的一次党派的胜利，那么它也解救了不信奉国教者。这些不信奉国教者默默地忍受着（虽然并不屈服于）宗教考察与市镇机关任职法强加于他们的种种约束，但“临时遵奉国教与教会分立法”已使他们陷于极端惊恐之中。乔治一世即位后，后一条法令成了一纸空文；1717年两个法令即被废除。但是，要修改“宗教考察与市镇机关任职法”的企图必须放弃，不信奉国教者必须满足于1718年的一项法律，即他们中依法选入市镇机构的成员，如在6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即可保留他们的职位。自1727年起，每年的补偿条例使他们可以在选举以后，而不是在选举之前举行英国国教的圣礼。这些措施虽然使不信奉国教者们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的存在不再受到威胁，但并没有给予他们以他们所希冀的一切。而保留“宗教考察与市镇机关任职法”，对于英国的社会有着久远的影响。许多有良知的不信奉国教者觉得难以用有意的欺骗来谋取官职。而法律仍然允许信奉国教者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当选，虽然一旦6个月过后就不能把他们从职位上赶走了。辉格党人让步的最重要结果，是使不信奉国教者能够在他们的人数相当多的市镇的公职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他们是二等公民的耻辱，却无法消除。他们可以通过种种借口，在一些较小的行政机构里占据一些职位，但是这并没有为他们打开通向要津的道路。乡间的许多受过最好的教育、最忠诚的人依旧与官场无缘；他们无法报效国家。他们的势力只能局限于某种单一的集团。如果一个人要想立足于社会，他就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宗教信仰的不同越来越变得同社会阶层的划分相关。辉格党的领袖们就是这样为他们所从属的教会利益服务的。但是，不信奉国教者可以把他们的命运同罗马天主教徒的命运相比较而感到自慰，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被视作外人，在爱尔兰则被看作“国家”的敌人。

高教会派向处于英国社会核心的辉格党人的霸权提出挑战。但是由于委派了辉格党人的主教（1714年以后不久即出现空缺，为数之多实属少有）并中止了公会议，这使对立状况有所缓和。1717年公会议的“下院”准备对班戈的主教霍德利进行抨击，于是政府便出面进行干预，命令公会议休会以拯救它所宠信的主教派代表。除了1741年的一次例外，在1855年以前一直不让公会议处理事务。而下层教士就像他们的同盟者乡绅一样，只能发发牢骚或对上级进行无关紧要的批评而已。随着公会议的沉默，几项真正宗教改革的尝试，也告消失。1717年被迫休会的公会议的议程包括禁止秘密婚姻，改进圣职候选人的资格，建立慈善学校，并扩大国外布道团等项建议。尽管新政府的最顽强的批评者们保持沉默了，但这对于国家并不一定有利。

直接的危险度过以后，辉格党人之间便发生了意见分歧。汤森触犯了国王，因为他在外交政策上与国王意见不合，并且批评了国王的汉诺威的谋士们。森德兰福星高照，他于1716年陪同国王前往汉诺威。1717年汤森被解职后便与沃波尔一起组成反对派。他们表示支持王朝，他们找到了一个既能保持忠诚又能当反对派的两全办法，就是投靠与其父王意见极端不和的威尔士亲王。这种做法具有相当大的宪法意义，因为它是消除反对派具有的强烈的叛国色彩的第一步。新内阁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是史无前例地利用国王的庇护而维持了微弱的多数，因为它企图修改贵族的基本法，因为斯坦厄普的外交政策以及森德兰的财经政策。政府担心乔治一世一旦去世，他的继承人封了一批新贵后，他们在上院中的多数就会被打破。因此，他们根据1719年的贵族法案，提出上院的人数在该年的人数以外不得再超过6名，并以25名世袭贵族来代替苏格兰的16名代议贵族。政府为这个议案辩解说，上院应该不受政治气候不断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个议案在苏格兰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在下院遭到沃波尔的否决，他呼吁乡绅们不要给自己的家族合法的抱负关上大门。

斯坦厄普取得的显著成就是让英国与法国和荷兰结盟以维护乌得勒支和约。这个同盟为汉诺威王朝急需的外部安宁创造了条件。虽然同盟的直接效果只是遏制了西班牙在地中海的野心，但却为英国今后若干年内的政策奠定了基础。森德兰作为第一财政大臣，着手解决国债这个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复杂又费钱，而且偿还遥遥无期。森德兰采纳了沃波尔的建议，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并提出了一个换算

计划，在1727年以前利率一律降为4%。不幸，这个考虑周密的计划竟成了“南海骗局”的直接起因。

这个时期在经济方面的种种谬见之一，就是过分地相信信贷的可能性。国债本身被看成是一种“信贷基金”，可以用来为各项商业计划提供资金。而1711年为了开展与南美洲的贸易而成立的南海公司，就是以接管一大部分政府的短期债务作为资金的。当森德兰提出他的换算计划时，南海公司便想通过降低利率接管债务，发行南海股票以清偿私人手中握有的政府债券并支付750万英镑贴水等办法来加强公司的地位。南海公司唯恐这些好处还说服不了当局接受它的提议，又向大臣们以重贿作为诱饵。公司的利益在于它的声誉的提高（它就可以几乎垄断当时有限的股票市场），在于确定南海的股票与政府债券之间的兑换率（它自己的股票价格越高，它就能够得到越多的政府债券，而这些债券保证最终将按照其面值偿还的）。但是，1720年英国国内外都有可能爆发投机活动，因为自1710年这个不景气年代之后，人们的信心已经逐渐恢复，而生产性的投资机会又太少，无法吸收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地的游资。从1720年年初起，几家新成立的和东山再起的联合股票公司大肆进行股票投机。议会批准了南海公司的计划后，这种投机活动就立刻变得疯狂起来。到了6月，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上涨到它的面值的10倍。于是议会便通过了“诈骗法”，禁止1718年以后成立的公司或滥用原有的特许权的公司发行可转让的股票。南海公司欢迎这个诈骗法，把它当作在股票市场中对付它的竞争对手的一种武器。但是，它对这些竞争者们提出的诉讼却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谨慎的人们在当年夏天就已开始悄悄地抛售股票；到了秋天，人心大乱，整个国家的财政结构似乎都已处于危险之中。

对于国家所造成的损害，并不像常见的个人可怜的失败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还是站稳了脚跟。投机的危机并未造成普遍的不景气。撇开南海公司的投机活动不谈，国家的贸易地位仍旧很稳固。1720年沃波尔返回政府供职后，把南海公司掌握的国债的2/3让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平分，并且把批评的矛头转向股票投机商而不是政府，从而使人们恢复了信心。最严重的后果是对合股金融的怀疑。这种疑惧心理在许多年里一直阻碍着资本流入生产项目，使国家投资市场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挫折。人们想出各种形式的不合股的伙伴关系以逃避诈骗法的各项规定。但是，那些希望进行投

投资者的法律地位依然是靠不住的。18世纪稍后的时候，开凿运河即是由合法的合股投资来提供经费的，但工业的发展却大都不得不靠当事人通过积蓄而不是通过国家股票市场的机器来提供资金的。

南海诈骗案的政治后果是使森德兰派垮台，并为汤森-沃波尔集团上台扫清了道路。年轻的纽卡斯尔公爵把佩勒姆和霍利斯两个家族广泛的势力联合起来；他从支持原来的大臣转而支持新的一批大臣，从而组成了一个由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和地方势力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在今后的许多年里支配着英国的政治。斯坦厄普的门生卡特里特1724年被迫去职，汤森本人也在1730年被迫辞职。剩下沃波尔独自一人领导着一批拥有头等权势但却具有二等才干的人物。沃波尔的政治生涯于1733年达到了顶峰。但在那一年，他的开明的货物税计划遭到失败，他的主动性似乎受到打击。此后7年，他似乎满足于保持他所取得的成果。到了30年代末，他的地位开始动摇。1739年他违背了自己的良知，被迫进行战争，甚至眼看着自己的意见在内阁中遭到否决。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到1742年，在已无法保持对下院的控制时才辞去职务。

沃波尔其人受过乡绅的教养，具有大贵族的傲慢风度并且爱好奢华。他有第一流实干家的才干。由这样一位人物来治理汉诺威王朝统治下的英国是非常合适的。在辩论中，虽然他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他讲话时气势磅礴、娓娓动听，颇有说服力。他精通政治手腕，在议会中，他必须团结稳定的多数；在朝廷里，他又必须要对付各种旨在使他失去国王宠信的阴谋活动。他提出的积极的立法不多，但人们并不指望一个18世纪的政府能有过多的立法，但他的突出的个性给整个一代人留下了强烈而持久的印象。他认识到，要保持王朝的稳定（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目标），只有赢得拥有土地的乡绅的支持，扶持工商业，保持教会平静和避免打仗，才能得以实现。他想减轻赋税的负担，特别是土地税的负担，因为这是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的最沉重负担。他限制中央的控制权不得强加于地方当局，并且允许通过野蛮的刑法来惩治对财产的侵犯。他不愿抨击宗教考察与市镇机关任职条例，以免使高教会派的狂热情绪死灰复燃。只要情况许可，他就尽可能持久地维持同法国的友好关系。他在政治问题上对乡绅的仁慈态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巧妙地运用国王的影响，积极地助长了他在拥有土地的权贵中间盟友的地方权力。辉格党贵族手中积聚起来

的力量，使它看起来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是，沃波尔在乡绅中间逐步培养起来的对国王的忠诚，将在乔治三世手里被用来作为一种与这些权贵们进行斗争的工具。

在沃波尔统治时期，金融业和工商业得益最大。如果说沃波尔没有什么创新，但至少可以说他使他承袭的那套基本上已经健全的体制发挥了力量。到了1727年，他已经用偿债基金偿还了850万英镑的国债，已经把利率一律降低到4%，并且通过谈判得到了一笔利率为3%的新贷款。因此，尽管出现了南海诈骗案，他所取得的成果已然超过了森德兰所期望的。在沃波尔当政的后期，他在财政管理上变得过分大意：偿债基金被用着应付亏空或充作临时经费的一般储备。因此，国家只能用暂缓还债的办法来避免增加税收。沃波尔之所以能够获得低息贷款和信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他自己的商业政策的结果。他的财政政策对商业的节制颇有分寸，不一味追求岁入收益。他废除了出口关税，对某些出口进行奖励，在免除某些国内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关税的同时，又对一些同国内产品竞争的进口货课以重税。这样就对工商业起到支持的作用。库房系统的扩建推动了再出口贸易。这一做法使某些殖民地的进口货物可以存在关栈中而不付关税，并且在交纳一笔货物税后就可投入国内消费市场。沃波尔想把这一制度应用到烟酒贸易中去的企图，被不负责任的反对派说成是一批收税官要增税的前奏。在老百姓的一片吵闹声中，沃波尔不得不在1733年放弃了这一计划，随之他废除土地税的得意计划也夭折了。沃波尔使英国的贸易得到了发展，岁入增加，财政制度大大简化了，证明了国外对国债的不断增长的投资使财政状况日益稳定。

货物税法案的失败，是反对派对沃波尔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胜利。被沃波尔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辉格党人加入了坚持不懈的托利党人反对派；博林布鲁克1723年获准返回英国，但不得进入上院；他在各种反对集团的背后运用他的巨大才能，妄想重新掌权。反对政府的包括有当时最使人难以对付的议员，卡特里特、普尔特尼，以及以科巴姆勋爵为首、包括威廉·皮特在内的突起的坦普尔-格伦维尔派；报刊则为反对派的作家所控制；而且，沃波尔虽然由于乔治二世继位而能够存在下去，并且甚至能够从中得到好处，但新的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却组织了一个宫廷反对派。这么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联合力量竟然长期无能为力，仅仅说是由于沃波尔在两届国王统治期间居于支配地

位，由于他与卡罗琳王后保持着毕生的友谊直至1737年她去世，以及佩勒姆家族的地方势力，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沃波尔可靠的而且往往是不事喧哗而取得的多数，不仅表明国王的影响，而且也表明沃波尔在平息过去的不满和使英国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方面，取得了成功。一直到1739年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出现之前，反对派一直无法找到一个能鼓动全国人民和团结其成员的伟大原则。一些为自己谋取官职的集团便形成了辉格党反对派。这只不过是他们同一些诚实却无野心的托利党人的核心人物之间可能达成的暂时的协约而已。只要反对派中间的辉格党人要求的不是改变制度，只是要分享权力，那么，反对派的这些陈腐口号——反对腐化，汉诺威家族不得左右外交政策，降低税收以及减少开支等，就显得空洞无物了。博林布鲁克曾经试图为反对派提供一个治国的理论，但是他却从未触及英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他同意把1688年的革命看成是“一部新的大宪章，从而产生了新的利害关系、新的治理原则、新的降服措施以及新的义务”[\[1\]](#)。他回顾威廉三世的统治时期，认为这是一位无党派的君主征询英国的一些最贤达的人物的意见进行统治的时期。而议会则不是王室政策的工具，而是国王的一些持开明态度的批评者。当前这个时期的失误就在于一伙大臣篡夺了国王的权柄，滥施权力。但是，博林布鲁克却没有说明威廉时代的这种岌岌可危的平衡是怎样能够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的，或者一个政府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怎样获得必需的稳定。皮特实际上是和博林布鲁克的意见相一致的。即便是他后来也发现，在议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有纪律约束的多数的支持，要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要人民中间没有因巨大的分歧形成分裂，这种纪律只有靠运用国王的影响才能获得。

沃波尔的制度事实上是当时在宪法上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制度在他下台后还能存在下去。他在1742年的辞职，并没有产生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变动充其量不过是增加卡特里特进入内阁以及把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分配给他的朋友。在沃波尔的长期统治期间，一伙被纽卡斯尔公爵称之“老牌辉格党人”的人物使他们自己成了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缺少的人。而一切政治上的组合都围绕着他们转。卡特里特仗着国王的宠信，对待同僚缺乏礼貌，根本不讲什么政治领导艺术，并且指望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树立他在英国的势力。但是他发现自己可悲地错误估计了政治的现实状况。1774年他被那帮“老牌辉格党人”逼下了台，而纽

卡斯尔公爵的兄弟亨利·佩勒姆成了主要阁员，出任财政大臣。另外，光靠势力并不是在一切的谋略中都可取得成功的。即使是最无能的政府，也不得不找到某些赖以立足的原则。佩勒姆兄弟选择的原则是一个“广泛的基础”，或者说，一切表示要真诚依附王朝的人要和解。格伦维尔-坦普尔派中的两人也得到了职位，但是国王1745年是在与大臣们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同意的。甚至剑桥郡的约翰·海因德·科顿爵士这个托利党人也包括在政府中。政府还发布指示说，在基层组织中，地方行政官要从“那些拥护英王陛下政府的有地位有财产的绅士中挑选，不论其党派区别”[\[2\]](#)。

詹姆士党人新的起义告失败，其影响也许并不只是为了巩固新政府的权力所做的政治上的再调整。1745年7月，“年轻的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登陆，唤起高地人起来响应。他在普雷斯顿潘斯击溃了一支英王军队，并占领了爱丁堡。这年秋天，他入侵英格兰，12月到达德比。他在这个离伦敦只有几天进军路程的地方，时运逆转。他的那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得不到许多英国新兵的补充，而且他的后方又有许多人起而反抗。当乔治二世正准备撤离其首都时，这位“年轻的王位觊觎者”却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奔袭伦敦的打算，退到苏格兰去。虽然他在福尔柯克可以再打一个胜仗，但1746年4月却在克洛登遭到惨败。这次惨败不仅结束了詹姆士党人在这次战役中所造成的威胁，而且从此再也不起作用了。在苏格兰，这次叛乱的后果是高地人被征服；在英格兰，则证明了对汉诺威王朝的忠诚，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

亨利·佩勒姆虽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却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下院议员和干练的沃波尔派的理财能手。1748年欧洲恢复和平后，他削减开支，减少土地税，并且实行一个旨在使国债利率降低到3%的伟大的换算计划。1754年他去世后，纽卡斯尔公爵独揽大权，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他的权力。他自己出任财政大臣，并且任命了一位本意良好的外交家托马斯·罗宾逊爵士出任国务大臣，这就引起了两位资历较浅的大臣威廉·皮特和亨利·福克斯的不满，因为他们的野心受到了挫折，因此他们便在下院对这位新任的国务大臣进行攻击。于是，纽卡斯尔便与福克斯进行交易，结果福克斯也当上了大臣。皮特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大加抨击，进行谴责。他的行为导致他被撤职，这未免有点过分。1756年英国在与德意志屡次结盟未成的混乱局面中逐渐卷入战争中去，并且清醒过来时发现米诺卡已丢失，英国也受到

法国入侵的威胁。国外的局势促使国内反对派加快了步伐，因此纽卡斯尔公爵不得不以任何条件来寻求皮特的支持。但是，皮特对任何条件都不接受。他意识到自己在议会中和在国内的力量，因此除首相职位外，其他任何职位都不接受。乔治二世因于1756年11月不得不把他的政府交给这位攻击汉诺威王族使他十分反感并用花言巧语煽动民众情绪使他极不信任的人物来领导。此时，皮特享有无限的威望，对于自己卓越的才干满怀信心，看来似乎不可一世。但他上台后，由于国王持有敌对情绪，而且又得不到老牌辉格党人的一贯支持，事实证明他太脆弱，而缺乏经验的同僚们对于加强政府的力量也帮不了忙。1757年4月，国王突然将他撤职。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危机之后，找到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妥协办法，皮特与纽卡斯尔联合起来，皮特专管战事，公爵担任财政大臣。在随后而来的政局获得暂时稳定的期间，英国才赢得了它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

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这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行动时期。尽管这位英王有着狭窄和固执等种种缺点，但是，作为一位立宪君主，他的行动却要比他的性格好得多。他虽然往往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但是他总是极力把治理好国家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他采取某些行动，为一个有限君权确立了一套新的行为准则，即君主是裁决者，而不是政治活动中的领袖。他的孙子和继位人真心诚意地表示要遵从宪法，但是，要遵从的是威廉三世的而不是乔治二世的宪法。乔治三世设想的实际上是另一种政府，它是受到一个真正忠诚的立法机构的支持，由一位起作用的国王和由他挑选的非党派大臣们领导的。他谴责腐败，对拥有土地的贵族揽权极为不满；这种态度颇为人们所拥戴。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位爱国的国王只是出于无奈才使用了他自己所不齿的手段。但是，他在继承王位时所使用的手法，却使人产生怀疑，认为政治利益是主，国家利益是从。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打破皮特和纽卡斯尔的辉格党人之间的勉强结合。内阁的实力在于皮特的颇孚众望，而要在皮特领导战争取得如此胜利之际将他罢黜是不可能的。于是，和平就成了英王的首要目的。于是，他的朋友兼顾问比特这位在议会中既无影响又缺少经验的人物，显然为此目的而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当比特劝说纽卡斯尔支持他反对皮特向西班牙立即宣战的意图时，时机来了。于是，皮特辞职，并庄严宣称：“作为负责人，我要领导；对于我没领导的事务，我将不负任何责任。”但是，这种说法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

纽卡斯尔公爵不久就对比特内阁日益得势，对他自己被排除在英王亲信行列之外，以及对于在普鲁士没有取得有利条款之前便讲和这一公开的企图等情况感到不安。尽管他不愿交出财政大臣的职位，但他已年迈，而且迭遭不幸，因此终于在1762年5月辞职。除了在1756年到1757年有6个月时间的间隙外，他在内阁中整整任职45年，其中32年担任国务大臣，8年任财政大臣。他虽然算不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也绝不像他的某些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虽然他总是孜孜于政治中的细枝末节，而且陷于一些琐碎但却微妙的任免事务中，但他仍然不失为行政当局和土地贵族权势之间进行联合的主要支柱。这种联合一直是早期汉诺威王朝统治下英国的显著特色。一个稍为不慎的人，如果拥有他的权势，可能会在国家中制造不和，但纽卡斯尔却宁可牺牲某些政治原则的价值以维持稳定。他的始终不渝和能干的良师益友哈德威克与他一道辞职，“老牌辉格党人”中的大部分年轻的成员加入了反对派。左右政治舞台的那种权力均势不复存在了，英国政治中的一章告结束。

政府长期相对的稳定，使人们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信心。在英国，事实证明，政治的主要问题业已解决，当前的任务不是改进而是维持现状。18世纪的人们是把变革同衰败而不是同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政府机构的精神和宗旨没有形式上的修正也可能会改变。18世纪思想上的这种局限性，使人们在对待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态度上进行的政治争论，要比在其他方面更加混乱了。自1702年以后，对国王的权力没有另外增加什么新的限制。国王的行政当局由于税收制度的改进，由于通常为他的政府获得议会多数所做的政治安排而得到了加强。但是，17世纪中对于王权所做的种种限制意味着，如果没有那些比较有影响的臣民心甘情愿的合作，国王就无法利用这种新的力量。如果说，国王的权力增大了，那是因为有足够的臣民希望它增大。

对于许多人来说，国王君临天下不是使人感到累赘，而是实施自治权力的一种保证。早先时候，在法庭中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18世纪，这种情况就成了许多行政手续的特征。在中央以外的周围地区，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地方官的身上。他们管辖一方，既不受人监督，也不接受他人指示。在中央，各部门则壁垒森严，在手续上设置种种障碍，以防止他人染指。这种做法无形中使得油水倍增，从而也

抬高了公职的价值。要想弄清楚这种离心倾向在政府的核心中，在国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上究竟起着多大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在公众看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实际中，根据法律国王是国家的有力的统治者；他的立法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弱到只有一个从不使用的否决权，但是他的行政权力依旧很大。当必须做出政治决定时，国王是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决策者，即便是这项决策是强加于他的，这仍然是他的决策。他有不容置辩的权利，可以同他所愿意的人磋商，并且挑选他愿将政府权力委托给他的人选。然而，在实际上，这种广泛的自由是受到这个政治事实的限制的：任何一届政府在议会中不居于多数，就无法进行工作；国王也只能从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控制议会权力的人中间来挑选他的主要臣仆。

在早先的一些时期中，权势过大的臣民在其地位与正式职责使他不再能够分担政府的实际工作时，他就被夺走了权势。在18世纪初叶，权贵们又再次跻身权势的中心。1714年以后有段时期，一个由一些“能干的大臣”组成的核心内阁出现了。他们居于权力的核心堡垒之中。他们之所以能置身其间，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选举的势力。不管他们在被任命后如何恭顺地吻国王的手，但他们的得势并不仅仅靠国王。不用谈论什么内阁职责的理论，他们也能深深懂得他们在议会中的势力是一种绝不能丢失的资本。最后的决策可能要由国王做出，但是大臣们却是政治权力的经纪人，他们有权向国王提出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反对国王与不担负大臣职务的人物进行磋商，不是为了维护大臣的权利，而纯粹是出于政治手段的需要，以便维护国王和大臣们之间必须表现的同心同德。至少有一次，即1745年2月至1746年间，他们坚持除非国王的决定完全符合他们的意愿，否则他们就不能为国王的政府负责。如果说，尊重国王的意愿乃是他们的一部分职责，他们也知道18世纪政治的结构要求政府内部绝不能自相分裂。正是这种行政权力和选举势力结合在一起，才压制了国王的个人意愿，才把国家引上了现代内阁政治的道路。1760年的核心内阁，其职责没有明确的规定，过去使用的语言在真正的权力平衡方面也含混不清。因此，当大臣们在迫使国王违背其意愿而做某事时，他们并不会承认他们是这样做的。因此，要武断地说1688年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将是愚蠢的。

内阁中没有一个大臣能够理所当然地起领导作用。但是，财政大臣由于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而且还掌握着大量的任命权，因此他在任何一届政府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沃波尔拥有这种权力，再加上他具有驾驭王室人员的无比的才干以及他本人的显性性状，这就使他在迫使持不同意见的同僚辞职或将其撤职时，在充当国王与大臣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渠道时，在制止国王从他处征询意见时，俨然就像是一位现代的首相。沃波尔树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先例，日后人们对某个大臣则将另眼看待。但是，这种先例的概念，仍然是最不明确的。以后的财政大臣并不能根据权利即享有相同的地位，除非靠声望，否则也无法确立这种地位。纽卡斯尔对于内阁同僚们博取国王宠信的企图颇为担心，这种企图有的确有其事，有的不过是他自以为是而已。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名大臣独揽大权是应该受到指摘的。国王对于具体政务已不再做出日常的决策，这一局面的符合逻辑的结果便是，内阁中必然要有另外一个人来起领导作用。然而，现代首相这一职务，则是在一个政党取得了领导地位，使某人在内阁中拥有独立的权力来源并具有特殊的地位后才出现的。

18世纪核心内阁的人数要比现代的少，他们讨论的范围也比较有限。通常一个核心内阁由三名具有古老的头衔但担负的职责却不多的官员（即枢密院长、掌玺大臣和宫廷大臣）、大法官、两名国务大臣以及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大臣职务的两名第一大臣组成。财政大臣也是核心内阁成员，但这一职务往往由第一财政大臣兼任。内阁讨论的事项主要是外交政策，平时绝少讨论国内事务。国内事务由各部门长官自己负责。对议会的做法，可由直接有关的大臣不拘形式地决定。海军在海军部领导下的行政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陆军却发展成为一个责任分散、指挥重叠的体系。这种情况即使在一个行政管理松散的时代，也是突出的。战争政策和军队的部署，则根据作战的地理位置，由负责南方事务或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领导。他还通过副大臣负责民兵事务。军队调动的命令是向陆军大臣发出的。陆军大臣对于预算、征兵和军官任命等项事务也在枢密会上对国王直接负责；至于军纪以及后勤等具体事务则对总司令负责。国王亲自担任全部禁卫军和卫戍部队的司令官。陆海军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则由军械总监向国王直接负责。

国务大臣一职完全可以成为内阁中起领导作用的职务（皮特在担任此职时就是这样的），要是这个职务不是奇特地以地域划分，在任命权方面不是有限的，以及不是不过问财政的话。两位国务大臣作为国王意志的执行者，享有同等的权力；在国内和殖民地事务上，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工；在外交事务上，他们的职责则划分为负责南方的和负责北方的两个部门。商务部负责维护贸易法和航海法，并具体掌管殖民地事务。该部通常就发给各殖民地总督的指令问题，向国务大臣们提出意见，并且在枢密院中就是否认可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案向国王提出建议。一个现代政府所审理的许多事务，诸如济贫法、公路和教育问题等，当时在中央根本就没有具体负责的部门。

虽然1705年有过立法，禁止议会议员担任在此以后所设立的官职，但是，却没有规定原有的职务不得成为挂名的闲差，其职责亦不得由议员来担任。政府刻不容缓地要为它在议会中的“朋友们”弄到一份适当的酬劳，于是就越来越多地把政府的官职当作酬劳了；而且在几个部门中居然配置了两套人马，一套是干工作的，一套是挂名的。一般来说，副手和一般工作人员热心公益的精神比他们长官的强；那里的行政机器运转通畅，其原因通常是因为那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公职人员的献身精神。这些较低的官职最初的任命，通常只是作为对某个想要为其部属或亲属觅取一官半职的重要人物政治上的恩赐。但升迁却主要靠资历和成绩。而解职的情况则是少见的。不称职者可以泰然自若地混迹其间，称职者也可同样稳保其职位。严格地照章办事，对于效率，往往比职业上的懒散更有危害性。这种危害性，由于官吏们薪俸低、油水大（因此许多官吏可以从严抠手续中取得既得的利益），由于许多官吏习以为常地从那些希望在同政府打交道时不会因为不了解复杂的手续而吃亏的人们那里接受礼物作为一种聘请费，就变得日益严重起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作为公款保护人的职责，也通过一场不声不响的变革建立起来。这场变革确定财政部控制政府的开支。海军部不让其财务由别人控制；但陆军部却由于议会一直对它不放心，它的预算只得日益处于被控制之下。一些较次要的部门则受到严格的控制，甚至王室的年俸在支出超过收入时，也不能逃避财政部的干预。这就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各部门花钱和财政部管钱之间的区别。

执行国王的事务这一任务，已从英国的议会转而主要移交给地方行政官员。他们的任务首先是要维持法律和秩序。他们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正规军队的援助。甚至连确定和征收直接税这样一个对于健全的政府如此重要的问题，其工作重担也是由地方官组成的郡委员会承担的。这些直接税包括土地税和以橱窗税为最主要的“各估定税”。这在一个行政管理力量不强的政府里，确实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但是，通过委派领薪俸的官吏来监督郡长的工作以改进这种情况的企图，只取得部分的成功。对中央政府以外的行政权进行一番研究，就能说明18世纪政治的基本公式：这种政府运转如何，效率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那众多有势力的人物的态度了。

国王、上院和下院构成了国家的立法机构。但自安妮女王以后，国王的否决权就没有再行使过。国王无权亲自提出立法。上院议员约有220名，其中26名是主教，16名是苏格兰贵族代表，其余的则是英格兰的世袭贵族。上院议员人数在这个时期增加很少，虽然老的一代去世后，需要补充一些新的血液。上院包括了王国内重要人物的多数，人们把它看成是保证法律和财产不受国王或人们侵犯的保护者。而且，在18世纪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的范畴内，上院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庄严地完成了这一职责。上院的事务大都是纯法律性的；作为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上院还要具体考虑有关离婚的法案以及涉及产权的私法法案。而且，即使在进行政治辩论时，也充满了司法气氛。

下院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那里，重大的辩论往往异常激烈。人身辱骂也不一定受到下院法规或上流社会习俗的制止。而且，党派偏见十分强烈，甚至像选举请愿这类法律问题，纵使证据俱在，也能根据多数原则做出决定。发言大部分是由相对来说的少数人进行的，但问题则由那些沉默的议员们投票决定。其中最受人尊敬的通常是代表英格兰各郡的议员。虽然在18世纪上半叶期间，郡的选举很少是经过竞选的，大部分郡议员都是由当地各党派之间达成谅解而后产生的，但是土地年值在40先令或以上的地产完全保有者享有的理论上的选举自由，使这些议员享有自主和威望。城市议员进入议会的背景是各种各样的。每个城市的选举制度本身就值得做一番研究。选举权由于理所当然的纳税条件，或由于只有拥有一定的不动产才有选举权这一完全不合理的规定而受到限制。城市中的一切自由民均可投票的说

法，往往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市镇自治机构可以根据政治形势随意决定谁是自由民。在某些城镇，选民必须是当地居民。在另一些城镇，非当地居民的选民人数往往超过了当地居民的选民。有些选民完全受保护人的支配；另一些则谁给钱多就可被收买。更有一些选民，则可像任何一宗财产一样在市场上买到。有一些大的贸易城镇，竞选活动实有其事；也有一些小村镇，虽然长期以来贸易凋敝、人口减少，却依然保留了一个自治城市的特权。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有时也遭到抨击，也有人难能可贵地提出改革，但它却还是保留下来了；改革不仅要打乱经过精心安排的各方面的选举利益，而且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即要用一个合理的有关选举权的规定来替代不合理的规定。下院尽管有着种种缺陷，它还是自称它代表英国人民，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18世纪人们的思想并不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上，即与国家利害攸关的人即有资格分担治理国家的任务；他们相信，这样的人也和自由息息相关。有产者被看成是平民百姓自由天然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对于任何侵犯自由的行为最为敏感。下院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有产各阶层，大体相当于这些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地位。它代表地主们拥有的左右一切的势力，大的贸易阶层从来也不乏其代言人，各大学有他们自己的直接代表，而自由职业界的间接代表则是下院中的那些众多的律师。因此，下院要比他们当选所依靠的工具高明，而且一直到18世纪末，对于这些大地主、腐败的市镇自治机构以及金融界的代表表示不尊敬的人，为数甚少。

有一个时期，历史学家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国王的影响似乎在18世纪的政治活动中形成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一种比较现代的看法认识到，这种影响与大地主们所具有的影响总和比较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国王的影响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各个竞争的利害集团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时，国王的影响则大有举足轻重之势。许多议员并不想在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但是他们和他们的保护人却想通过控制国王的任命来增加他们自己的地方权力。一个议员可以给予他的选民们以各种恩惠，包括推荐他们在森林或税务部门任职，到殖民地或政府各部门任职，以及在英王为保护人的国教中吃教士的俸禄。政府的“朋友”可以指望大臣们对于这些推荐给予照顾。政府的“经管人员”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满足这些要求；当他无法做到不负所望时，则要做出许诺；当他的许诺不能兑现时，则要另想办法。谁能处理好

这些难题，谁就能在议会中得到一个稳定的多数。然而任命毕竟粥少僧多，从来无法使每个人感到满意，也无法使议会处理纯机械性的事务。这种危害性不在于使用政治影响，而在于这种做法不断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负有职责的职位被纳入了政治关系网中。为了满足来自下层的要求，腐败便从最高层蔓延开来。教会、大学、法律和武装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政治手段的应急措施而服务。腐败势力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泛滥，其背后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英王的政府必须运转下去；这个政府在议会中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就无法继续下去；而且，只要各统治阶层在基本问题上不发生分歧，那么支持一个政府而不支持另外一个政府的动机则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其他。除非人们遇到了他们所重视的、超越了个人方便的实在问题，否则，党派的纪律是不能代替恩人关系的纪律的。这种情况不能为18世纪的政界人物开脱，但它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体面的人物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家的利益。此外，这也是事实，即舆论从未停止过对议会施加影响。如果说，群众的宣传鼓动成功的情况并不多见，那么，星散的骚乱频频发生，却使英国的上层人士终于明白了，归根结底人民才可能是他们的主宰。

上院既是立法机构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法院；治安官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但是，尽管这两种权力在司法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和最基层混淆不清，司法是独立的而且是权限分明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掌管整个习惯法审判权的法官们，如严重渎职，可由议会两院提出予以免职。他们的委任一直到1760年英王去世时而告终止，否则就将不受干涉地终身供职。习惯法法官一年里有一部分时间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则在各郡城镇巡回开庭。刑法部分也摆脱不了司法部门的管辖，因为治安官们的任何决定，都可以由上一级法院发出令状调阅案卷进行审查。而且，在18世纪，所有重大案件通常都要送交巡回法庭审理。大陪审团虽然不受法官们的控制，却受他们的指导。但是他们仅限于判定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提出刑事起诉，从来不判定是否有罪。原来实施国际法的两种形式的法庭，即教会法庭和海事法庭的管辖权限，由于执行习惯法的律师们的嫉妒而被缩小了。前者只管教士们的非刑事犯罪，如有关婚约的合法性，遗嘱的查验和执行的认定等案件。后者则严格地限于处理海事案件。另外还有一个大法庭，它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它不是一个习惯法法庭；这就是大法官法庭。其实，教会法庭和海事法庭权力

的缩小，对大法官法庭有利。它的裁判权可以扩大到有关遗嘱的案件，对于商业也可以行使广泛的司法权。然而，在18世纪，大法官法庭根据衡平法的裁决终于成为习惯法法庭的一种补充，而不是它的竞争对手。

法官们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对于国家的法制越来越多的控制，带来了另外的一些危险性。法律摆脱了行政的控制，就有可能脱离国家总的生活；或者就会过分强烈地反映法官们和他们所属的那个阶层的偏见。这两种危险在18世纪都是明显的。法律的惯例和程序变得如此僵硬，以至于它给那些训练有素的律师以外的任何人，都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布莱克斯通虽然后来在英国上层的一般教育中恢复了法律课程，但在18世纪初叶，只有那些在浩繁而又艰深的程序中有着既得利益的专业机构，才愿对此问津。司法界拖延成风，费用繁多而且讲究严格的法律细节，因此声名逐年狼藉。而在其核心，在皇家高等法庭、高等民事法庭和高等法院这三大庄严的习惯法法庭中，也是权限重叠，一片混乱。法官们要求按严格的法律形式办事，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奇怪的审判情况：当一个人被控犯有较严重的罪行时，只要能在起诉书中找到一点漏洞，就不仅可以免受野蛮的刑罚，而且还能逃过任何的处分。

法官们虽然不能制定法律，但他们有解释法律的权利。这在成文法和习惯法都没有涉及的问题上几乎就等于是立法权。商业活动日趋复杂，人们希望新获得的产业不致被轻率的继承人出卖或分散，财产需要有新形式的信托，政府资财的新式产权以及旧有法律没有规定转手手段的可转让的股票等，全都提出了法律要有创新的问题。在对付这些挑战方面，哈德威克证明了他是英国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他自由地运用大法官法庭享有的根据衡平法进行裁决的权限，解决已经提出的许多问题。而他所制定的一些规则，后来由曼斯菲尔德勋爵纳入了习惯法。18世纪发生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变革是，商事法规不再是一个由专门法院实施的专门性法律；这项变革没有经过立法机构制定法令，而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决定的。

尽管宪法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但是人们都一致认为其主旨是个人的自由。人们把这种自由看成是英国民族特有的赐福，这是过去各代人们用智慧和牺牲赢得的。一个英国人不会无端地遭到逮捕、监禁或惩罚；未经他所选出的代表同意，不得向他征收赋税； he 可以和朋

友们聚会并且畅所欲言，只要他不扰乱治安；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不是淫秽的、煽动性的、亵渎神灵的或诽谤性的东西。说得更实际些，由于议会制订法律，因此他的自由就是一切要按照议会认为是正当的去做；或者说，由于执行法律是由地方当局掌管的，他的自由也就是要遵守当局所解释的法律。如果争端严重起来，1715年的骚乱取缔法令则赋予地方长官以实际权利认定这是否是一场骚乱；一旦认定后，则可使用武力予以取缔。批评政府的人必须当心有关诽谤的法律。因为，如果发现他所写的文章蓄意破坏治安，他就犯有诽谤罪。要是造成对国王、政府、议会、法律当局或国法的仇恨或藐视，就是犯有煽动罪。而对宗教的任何批评，就可能构成渎神罪。而且，对于陪审团，只是要它确定发表过这些东西的事实并阐明其含沙射影之所在，而不是要它确定诽谤的性质。对贵族的诽谤，径直地由上议院予以惩处。这种情况又进一步扩大成为，凡发表任何有关一个贵族的材料，不论此人是否在世，只要未经其本人或其继承人的同意者，亦在惩处之列。陪审团虽然权力有限，但有时却能帮助那些被控犯有诽谤罪的人。然而，1730年的特别陪审团法，却使法官有权在这种案件中重新组织一个对成员有更高财产条件要求的新陪审团。1729年对印刷博林布鲁克《工匠》一书的印刷商的起诉遭到了失败，但该印刷商后来还是被一个特别陪审团定了罪。这些都是对出版自由施加的严重限制。但在当时，政治性出版物的市场却见俏，有成百的印刷商甘冒被起诉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对煽动性诽谤提出起诉，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认为攻击当朝是不道德的这种思想残余在起作用。但是限制自由的理由，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私人财产的需要。如果说神权已不再能够保护国王，那么对财产的尊重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成为巩固社会的因素了。洛克把民权的产生原因归结于维护财产的需要，18世纪的人们毫无疑问地承认财产所带来的各种特殊地位和特权。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人们做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火行为。轻率地滥施死刑是这个时代的耻辱。所谓的1722年的沃尔瑟姆·布莱克法令，是用来对付沃尔瑟姆福里斯特地方临时发生的骚乱的；这个法令曾几度重又实施，一直到1758年它成为英国的永久性法律的一部分。据说，这个法令给成文法新增加的死刑条目不下350个。另外，却又不做任何努力增进警察力量以配合这些严厉的惩罚条目；人们对17世纪的教训记忆犹新，他们把这些政府公仆看成是潜在的专制工具。因此，英国便出现了一

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刑法野蛮严厉；另一方面对罪行的侦查工作又如此薄弱，以至于犯法行为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这是英国人为他们不受政府约束这种非同寻常的自由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一个对于财产如此关系重大的国家，在精神方面不可能是平均主义的。然而当财产与出身在社会上竞相崭露头角时，这才有可能使某些职业对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18世纪中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为数众多，不容忽视；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如哈德威克，是一位乡村律师的儿子。《类比》一书的作者巴特勒主教，是一个信长老会宗教的布商的儿子；大主教塞克是一个不信奉国教的小地产主的儿子；皮特是一位在印度发财回国的富翁的儿子；克莱武则出身穷乡绅。银行家、律师、粮商等从门庭古老的乡绅手里接过产业，这些乡绅的儿子们则去从商，从事法律工作或去东印度公司任职。这个时期社会的大变革，使大批地产集中起来，从而取代了小庄园，这种情况在北方尤为突出，同时也使大批年轻人去谋求领取薪金的职业。18世纪政治家们的官方文件中，就充斥着他们的求职信。遭到回绝的人只能去从事较低下的职业或在商界谋生。一个幸运的副产品就是，他们把传统的诚实的准则和正派的作风，带到他们新的职业中去。职业的行为准则已经发展起来，这是18世纪的最重要却又最不引人注目的遗产之一。这一情况，再加上对经商和专业人才的需求，就提高了那些由于办理转让地产而致富的律师和逐渐改进其医学能力的药剂师的社会地位。英国的商人，无论在接受职业标准或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当然是不甘落后的。

一个对出生于有产与无产界限以上家庭的子弟提供公平机会的教育制度，促进了这些社会变革。那时的中等学校和公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悬殊。自耕农或店主的子弟可以和当地乡绅的子弟肩并肩地一起受教育。大学里有许多靠做工以取得专业资格的穷学生。许多行业在学徒期间索取的习艺费用并不多。但是在这条“财产线”之下，机会就少多了。而绝大部分英国人（但苏格兰人除外）至死都没有受过教育。慈善学校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数只不过是要让孩子能继承他的父辈们原来的工作。

因此，在一定的界限之上，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固定的社会；在这一界限之下，则是一个相对来说固定的社会。由于有产阶级获得新的财富而富裕起来，两者之间的差距也日趋增大。英国总的贸易有了相

当大的增长，而贸易出超（不论其真伪）也表明大有长进。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肯定地提高了。因为他们不仅钱多了，而且贸易的增长也使他们要购买的商品种类扩大了。但是，这种境况的好转，在多大程度上能给穷人带来好处（如果说带来的话），是一个值得怀疑和有争议的问题。原来的那种认为18世纪初叶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看法，鉴于现代人们对当年伦敦的穷人和手工业者的工资所做的研究，必须予以摒弃。一切材料表明，在伦敦，居民中的下层住房过分拥挤，健康状况不佳，犯罪和卖淫等现象急剧增加。像托马斯·科拉姆、奥格尔索普将军和乔纳斯·汉韦等个人所做的慈善努力，不过是隔靴搔痒。直到18世纪中叶，才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会苦难也许有一天被认为是社会的责任。1751年，第一个行之有效的禁止出售廉价杜松子酒的法令出现了；这种廉价杜松子酒在伦敦的穷人中间简直造成了一场浩劫。这一举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情况就不断地得到改善。对于整个英国的情况，就无法笼统而言了。这不仅由于缺乏资料，而且在一个还有许多人在经济孤立的状况下生活的国家中，各地情况千变万化，估计难免不足。例如，手工匠们的工资状况表明，在伦敦有所改善，在北方有很大的增长，而在西部则停滞或倒退。所公布的物价指数，也几乎完全取自伦敦及其附近的各郡。但是，在一个阶段的初期，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而在其末期有上升的趋势，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阶段物价稳定。在整个时期内，价格要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低。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的大多数穷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且可能还有所好转。

比较肯定的一点是，有相当多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和乡间工业中心。农业的进步加速了这种迁移，这势必迫使一些人背井离乡；而城镇的消费市场日益增长，有助于促使古老的耕作方法的改变，并且使由于拥有的土地集中而预期的利润增大了。没有必要对自耕农的没落大做文章。一个主要的因素是，长期以来总是有人愿意出好价买好地；虽然有些卖地的人可能成为无地的劳工，但许多人的情况不可能都是这样。原先的自耕农可以在正在兴起的佃农阶层，在正在成长起来的工业工匠团体中，在商业世界的新人中，以及在向新世界移民的不断洪流中找到他们的踪迹。农业变革的结果是食品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比较丰富，然而价格并不一定比较便宜。此外，再加上生活环境比较清洁了，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这就促进了

人口的增长。大约到了18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的速度达到了可观的程度。

工业中，国内外的需求和中间商可以获得的资金以及劳动大军均有增加，这就导致更大的生产。但是，这多半是在商人和工匠们所熟悉的组织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利用新的发明物，1733年发明的凯氏飞梭直到这一时期末，才开始使用，但它并没有引起织布业的革命。1742年一架纺纱机就投入工作，但直到1760年机械纺纱依然极为罕见。具有比较直接的重大意义的发现是，18世纪初阿伯拉罕·达比发现的用焦炭代替木炭的炼铁法。这就使奄奄一息的炼铁业摆脱了对本地木材的依赖，并且为一个发展时期铺平了道路。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发明，到18世纪的中叶以前，还鲜为人知。对于大多数资本家来说，剥削廉价劳动力要比安装昂贵的试验用的机器容易得多。但是，工业发展的最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是国内交通的不足。这种情况只是在人们被诱使在一些长远的发展计划上进行投资后才得到改变。沃波尔和佩勒姆所推动的低息贷款为长期投资创造了条件；但是，往往还是缺少刺激投资的因素。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开凿一条7英里长的运河以便把他在沃斯利煤矿的煤运往曼彻斯特。这个尝试的成功，在英国经济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因为它不仅说明了可以指望从这类投资中获利，而且也指明了统一全国经济的方法。

回顾往事，18世纪初期并不像人们至今有时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停顿不前的时代；它是英国历史上颇有创造性的时期之一。在一个小小的“有教养的”社会表象背后，是一个草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弱小者惨遭败北，而那些敢于奋力追求者，其报偿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无数个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贸易的扩张，农业的改良，巨大的财富，乡间的房屋富丽堂皇，城镇的住宅坚实牢靠上；表现在赢得了一个印度帝国和取得七年战争的胜利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对其治下臣民的福利担负责任甚少、只不过保持社会力量平衡的政府领导下取得的。然而，这些成就是同一个政治制度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管现代的学者想做出何种限定，英国人在这个制度下觉得他们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感是17世纪各种冲突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稳固，这个果实是不可能成熟的。

（乐瑞夫 译）

[\[1\]](#) 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政党述评，通信一》（1771年版），第12页。

[\[2\]](#) 英国博物馆补遗手稿第32993号，第308页。

第十二章 西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

18世纪初，西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受西班牙控制。西班牙新建的波旁王朝在野心勃勃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激励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复兴。自1714年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来到西班牙成为菲利普五世的第二任妻子，直到1746年她在丈夫死后退出西班牙政治生活中心为止，她同一系列能干的谋臣们一起积极大胆地活动，使西班牙在有关地中海地区的外交谈判中取得了主动权。由于她同帕尔马、皮亚琴察和托斯卡纳等地有亲缘关系，她的野心也集中在这些领地上，意大利因此受到重新活跃起来的西班牙外交的影响。葡萄牙的情况恰好相反，尽管西班牙波旁王朝第二任国王的王后来自葡萄牙，但葡萄牙却很少卷入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活动。它刚重新获得独立，心满意足。巴西殖民地为它提供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在1750年以前，它满足于享受独立和繁荣，绝少参与欧洲的外交事务，对欧洲文明贡献也极少。在1750年之后，随着蓬巴尔的出现，葡萄牙才突然在改革活动方面奋起超过了西班牙。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和她丈夫的主要大臣能在18世纪初期为西班牙取得外交主动权，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查理二世统治末期西班牙的经济资源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1692年西班牙王室第三次宣告破产。虽然在17世纪中各种赋税已经增加不少，1639年所有出售商品的营业税增至11%，1663年增至14%，1621年对制碱灰用的藜草开始征税，1637年征收印花税，1642年对油类、酒类和醋征税，1649年对肥皂甚至冰块也征收新税；但这一切权宜措施不仅无法满足王室的需要，反而加快了国家的崩溃。到了17世纪后半期，有许多确凿的迹象表明西班牙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往来于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西班牙船队的运输量比100年前下降了75%。许多16世纪初以其制造业闻名的城镇，早在1655年就在抱怨它们已陷于贫困了。托莱多、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巴伦西亚这些原来以丝织业闻名的地区以及以皮革制品而出名的科尔多瓦都纷纷要求救济。许多原来兴旺发达的行会到了1655年几乎销声匿迹了。马丁内斯·马塔提到的这类行会有30个。托莱多的呢绒制品在17世纪的前60年中锐减了近3/4。这些城

镇的人口也减少了。托莱多和塞哥维亚在1594年至1694年间据说居民减少了一半以上。1687年德洛斯·贝略斯侯爵把居民移居美洲称为国家的灾难。1681年法国大使也提到成千上万的人移居外国。国内贸易几乎已不复存在，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以至于到了18世纪人们都说由每年一度的庞大船队运往西印度群岛去的商品中，唯一由西班牙本国提供的只剩下“一些西印度人民喜欢的糖果蜜饯了”^[1]。农业停滞不前的迹象出现得甚至比工业还要早。在1523年以来国会中发出的怨言里以及一些作家在评论1578年、1600年、1608年和1619年西班牙的经济状况时都提到这种情况。1619年的一份卡斯蒂利亚法院报告中就提到许多住房沦为废墟，农民纷纷外逃的景象。

造成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波旁家族清楚地知道这些原因，要想消除它们也并非易事。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1550年到1600年间从西属美洲流入的大量黄金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大量黄金使西班牙人一味追求奢侈生活，变得越来越好逸恶劳。直到1782年还有许多行业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下贱的”。西班牙人把体力工作看作可耻的。新世界的黄金把人们引往海外，使西班牙的劳动力减少。人们还纷纷离开农村及内地城镇向港口聚集。大量的男女百姓加入宗教团体；还有一部分人担任公职，这都加剧了农村和内地城镇人口的减少。1700年西班牙的人口估计为570万，而在查理五世时期据说有800万。陈旧的行会规章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大量琐碎的规定扼杀了工匠的积极性，如像托莱多的金饰匠在开业前必须缴纳大笔保证金。西班牙硬币币值的变化，特别是从1550年至1600年间金铤大量流入，然后是1600年至1650年间货币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进一步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在别的国家里，物价的变化能促进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西班牙由于工资增加比物价上涨快，因此制造商无法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但是西班牙贸易最沉重的负担，如同农业最沉重的负担一样，也许是由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期制定的对一切商品征收的赋税，在17世纪从原来的10%增加到了14%，而且还对各种商品都添加了其他新税目。交通不便也束缚了贸易。直到18世纪，唯一能够畅通的道路，只有从马德里通往各个王宫的大路。像维戈这样一个良港同内地之间竟无交通可言。在西班牙国内由陆路运输商品费用十分昂贵，帕伦西亚的小麦虽然离桑坦德港只有40里格的路程，但在卡的斯的售价却比从法国运来的小麦贵一倍。产地卡斯蒂利亚售价为20里尔1阿罗瓦（1阿罗瓦≈11千克）的酒，在阿斯图里亚斯要卖46里尔。

人口外流、赋税加重和交通不便像阻碍工业一样，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但是西班牙农业在波旁王朝时期的凋零景象还有它特别的原因。西班牙的土壤和气候尽管适宜生长优质小麦，但西班牙绝不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多达40%的土地并不肥沃，或者十分贫瘠。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即使好地也因为盲目毁林而减产。农民砍树烧炭，流动放牧羊群的牧人则用焚烧树木的办法为来春创造更好的牧场，仅剩的一些肥沃土地亦未得到充分利用。西班牙的中部和南部有不少土地从未有人耕种，因为那是放牧羊群的必经之地。每年秋天多达250万头绵羊，通常以1000头左右为一群从索里亚、塞哥维亚、昆卡和莱昂等地途经那里，来年春天又返回原处。土地的所有制也对农业不利。大贵族有时占有大量的土地。这种情况在收地运动发展迅速的安达卢西亚更为严重。这些土地往往只有部分由一群群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的工人在耕作，甚至在较早有人定居的阿拉贡省也有2/3土地是荒芜的。农民须为军队提供营舍，但是他们要取得贷款却越来越困难。除了这些使经济衰退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驱逐摩尔人以及人们都狂热地热衷于关心来世而不致力于现世的繁荣等。因此，菲利普五世在为他争得王位的长期战争结束以后面临着国家经济的凋敝，就不难理解了。

恢复西班牙繁荣的问题极为复杂。这个国家在1713年的社会结构并未减轻这些问题的困难程度。18世纪西班牙社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教会。18世纪末，在全国1150万人口中，职业上同教会有关的人数达191101人。其中教区教士占70170人，虽然他们中间仅有一半左右的人真正关心灵魂问题。还有37550名男人和24348名妇女是各种教团或修道会的成员。余下的还有凡人修士、修道院仆人、圣器保管人、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的雇员以及一些虔诚而又愚昧无知的老百姓。这些人因无望得到做神父的圣职，就担任一些低微的职务或作为献身于上帝的俗人生活在修道院里。另外，从那些被归纳为专职教士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教会对西班牙日常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应起的作用。连最小的村庄也有教堂。人口只有2000的小镇奥尔米多竟有7个教堂、7个修道院。人口为21000的巴利阿多里德，有41个修道院和14个教区教堂，修士修女和神父竟超过全部人口的1/20。整个西班牙到处都有由某个行业的成员或某个地区的居民组成的各种宗教团体。仅在卡斯蒂利亚一地这类社团在18世纪末就有19024个。这种宗教团体至今在西班牙依旧存在，它们一年四季集会礼拜，开展慈善活

动，在复活节前的一周还要穿上长袍、戴上尖顶的高帽上街游行，供奉各个团体特别崇拜的圣像。这些圣像平常保存在教区教堂里，有的还装饰着极其贵重的衣服和珠宝首饰。西班牙教堂中各种宗教礼仪陈设确实非常奢侈华丽。一些本来可用于工农业生产或慈善事业的钱财却被无谓地用在祭坛用具、法衣、圣骨盒、神龛和圣像的饰品上了。虽然在教堂把财产捐献给国家时，人们往往发现它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富裕，但即使这样，那些金银珠宝和法衣的价值依然颇为可观，更不用提绘画和雕像了。18世纪西班牙教会的收入是很大的，教会光从土地上就能收入359806251里亚尔，那时候10个里亚尔就是1比索，而1比索相当于当时英国的4先令4便士。教会从什一税中得到418000400里亚尔，从第一次收获中得到2.3亿里亚尔，弥撒费为53732744里亚尔，洗礼费为1500万里亚尔，主持婚礼的收益有750万里亚尔、葬礼费有6000万里亚尔。此外，还有363万里亚尔是通过出售圣方济会的法衣获得的。许多笃信宗教的西班牙人愿意在死时穿上修道士的法衣。化缘也能收到一大笔钱财，有一种估计认为每年可达5300万里亚尔。再加上各地方还有一些特别的收益，如对小麦征收的税款归圣詹姆斯的康布斯塔拉教堂。对途经萨拉曼卡省的羊群征收的税款归另一座教堂所有。有些地方还向当地的教会送礼，有时是用实物。托洛萨的地方当局为修士们提供木柴，修士们则在大斋期给该镇派遣一名讲道师作为报酬。教士免交买卖税，杂物税也能减少。许多野心勃勃的神父一有机会就离开乡村到有大教堂的城镇或马德里去，希望能在那里得到一个肥缺。最好的职务是在某个大教堂当神父，因为正如批评者指出的，大教堂的神父们从来不用过问洗礼、婚葬、忏悔、布道和其他行政事务，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定期到大教堂出席礼拜仪式。甚至在教堂里，他们还往往把念祷告、唱赞美诗等实际工作交给出钱雇来的唱诗班去做。那些没能当上大教堂神父的人，许多人满足于靠什一税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把教区的行政事务交给副神父管理，把布道让给修道士去负责。不少神父对教义十分无知，因为18世纪在西班牙并非每一个主教管区都遵循特伦托会议要求设立神学院的规定。选举乡村教区神父往往只是一出闹剧。特伦托会议曾规定选举中应有竞争，但在18世纪的西班牙，候选人常常在竞争之前就已经选定了，“好像他们都被上帝事先任命了似的”^[2]。当然不少耶稣会会士是很有学识的，西班牙的主教也决不像法国的主教那样贵族化或那样世故。比如菲利普五世曾指派过一名烧炭人的儿子当托莱多大主教，许多其他高

级教士的出身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微。那些布道的修士颇受人们爱戴。在18世纪，日后成为西班牙特点的那种宗教上狂热和政治上反教权主义并存的奇怪现象似乎还未出现。18世纪西班牙布道坛和忏悔室的影响十分强大，尽管有一些圣洁的、乐善好施的高级教士对促进经济改革饶有兴趣，他们设立示范农场、推广先进农具，但教士的更普通的作用则是以其见识局限于修道院四壁之内，害怕与世俗世界有任何接触的修士为代表的。那些尚未看破红尘的教士则热衷于兴建耗费巨资的华丽的教堂，其中有卡的斯、莱里达、比克等地的大教堂，还有马德里格兰德河畔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和圣塞瓦斯蒂安的圣玛丽教堂，等等。他们在复活节前一周及基督圣体节还组织盛大壮观的活动，带领庄严的游行队伍游行。但是他们也鼓励世俗社会的保守和迷信；对新兴的法国王朝的改革劲头，全西班牙的教士极少给予帮助，就绝大部分而言，只不过是一种阻碍。

跟宗教界的大部分人一样，大多数西班牙贵族对改革的态度不是实际上敌视，就是无动于衷。甚至到了18世纪末，贵族阶级的人数还有50万，几乎占总人口的5%，相比之下，宗教界的人数是191101名。在比斯开省和吉普斯夸省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贵族的后裔。有些乡绅的贵族身份只在自己的村子里得到承认。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他连续生了7个儿子才被算作上等人。但是不管这些贵族有多穷，他们都可以免服兵役，也不用为军队提供食宿。他们欠了债可以不遭逮捕。在他们家的门上可以刻上盾形纹章，人们在同他们讲话时得称他们“先生”。各种收入甚丰的职务也因为他们的出身而对他们开放。普通贵族和卡斯蒂利亚500名有封号的贵族和119名西班牙大公都可以在军队中各级任职。圣詹姆斯骑士团有87名军官，其中有一名的年俸是206971里亚尔，有5名的年薪在10万里亚尔以上。卡拉特拉瓦骑士团有55个职务，其中有6个年俸在10万里亚尔以上。阿尔坎塔拉骑士团有37个职务，最好的一个年俸是178096里亚尔。就连不怎么富裕的阿拉贡的蒙特萨骑士团也有13名军官，中年俸最少的一个是12348里亚尔。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些官职分派给下属。到18世纪，那些有幸得到这些年俸（或者说这些年俸的一部分，因为国王有时把这些官职的薪俸一部分给这个人，一部分给另一个人）的贵族，没有做出廉洁宣誓，或实际承担任何重要义务的麻烦。贵族们还有希望在宫廷中谋到职务。宫廷内部是个拘谨刻板、装模作样、无聊得令人感到压抑的世界。唯一能使人兴奋的事情，只有国王的生日或王族的婚礼。当国王

生日到来时，贵族们从国王和王后面前鱼贯而过，前去吻一下他们的手。王族举行婚礼时，宫内张灯结彩或燃放烟火。当时过访者的报道都证明18世纪西班牙宫廷社会是十分沉闷单调的。宫廷里演戏，有时还有歌剧或音乐会，也举行狩猎活动，但极少交谈。法国客人对西班牙贵族的愚昧无知颇为震惊。那些大公们侈谈他们的祖先参加过的各个战役，但很可能他们对这些战役发生的地点一无所知。在巴伊拉克修道院院长所描述的76位大公中，大部分只是以他们的姓氏、封号和财富才为人知晓。这些人并不反对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有效的专制政府，但几乎没有人对国家的复兴做出任何贡献。实际上，土地所有制，至少是贵族的庄园按照限定继承权制度必须传给长子这部分，被霍韦利亚诺斯等人指摘为西班牙农业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继承人按照限定继承权继承的土地不能出卖，甚至不能用它做抵押来筹款进行必要的改革。在英国可以看到限定继承权不一定使乡村的地主失去进取心，但在西班牙农村中的贵族却完全是麻木不仁的，正像宫廷贵族们一本正经地悉心研究各种礼仪细节和先后次序问题一样。

到18世纪末期，从波旁王朝统治中得益最多的是城镇居民、专业人员、商人和官员，但在1713年这些阶层几乎没有表示出朝气蓬勃的迹象。城镇的规模很小，除了教堂、修道院和教会经管的慈善机关外，大部分建筑物都破破烂烂。住房十分简陋，空空如也，用西欧其他地方的标准来衡量，根本谈不上舒适。17世纪流行的服装样式在西欧其他地方已经过时，但在西班牙依旧存在。服装通常是深色的，剪裁十分朴实。食品很简单，烹调水平按法国标准是原始的。妇女的主要工作是上教堂祈祷，男人则照管生意并把大量时间消磨在聚会、闲谈和抽烟上。喜欢这种景象的观察家可能强调它宁静的一面：

地主们生活舒适，工匠们有活可干，要饭的亦能在修道院门口得到施舍。税款与财产相称。神父受到人们尊敬，教会统治集团比任何时候都英明，国王的权力得到英勇的捍卫。政府当局既不专横暴虐，又能惩处一切理当受罚的罪恶以保护富人。到处都能体现国王的意旨；一人当朝，众人皆服。……我们幸福安宁地生活……在世俗的事务上服从国王的权威，在心灵上则尊重上帝的神威。[\[3\]](#)

而对此持批判态度的观察家则完全可以把对1797年危地马拉人的境况的一般写照用来描绘18世纪初的西班牙人：

……这个人说得不多想得更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根本就不思考。他满足于按别人事先安排好的和别人已经做过的去做。他的生活方式单

调、刻板，一成不变。他自己也永远不会改变，你根本无法同他探讨任何会引起他改变的事情。当改变的好处，或者说改变的必要性已是十分明显时，他唯一的行动指南和准则就是按习俗办事。^[4]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从毕尔巴鄂到加的斯各地城镇里人们通常的思想状态。农村中人们的思想对任何改革更是没有好感。

尽管有这一切阻力，波旁王朝的几位国王在18世纪还是在他们统治西班牙的那段时期里进行了改革。查理二世在1700年去世时，西班牙只有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和一支20只舰船组成的舰队，它的财政业已崩溃。到了1800年西班牙的军队有10万人，舰队中舰只多达300艘，国库里有6.5亿里亚尔财富。在18世纪，西班牙人口从570万人增加到10541000人。它还能够不时地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这些外交活动即使没有为西班牙国王，至少为西班牙王公们收复了一些在乌特勒支条约中失去的意大利领地。大部分引人注目的改革是在18世纪后半叶查理三世在位时期进行的，但有些重要的步骤是在1759年以前做出的。做到这一点颇不简单，因为不管是菲利普五世还是斐迪南六世都根本不是改革家。18世纪前半期西班牙复兴遇到的问题在于两位国王，前一位是个怀疑症患者，后一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起并推行改革呢？甚至可以说，西班牙第一个进行改革的专制君王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在1701年给法国大使马辛的指令中写道：“看起来西班牙的国王自查理五世以来不仅不想保住自己的王业，而且似乎一直在用他们自己的恶行毁掉这个国家。”^[5] 菲利普五世带着法国专家来到西班牙，从此以后宫廷里就有了通晓法国办事方式的人。有时候国家的主要官职可能由一位像波托卡雷罗这样的西班牙人担任，但幕后总有以科尔贝尔的传统培养出来的官员在活动。在接下来的6年里，虽然不时有短暂的宫廷革命的干扰，法国人奥里还是出了不少力，使西班牙能够筹集经费支付为抵制奥地利大公争夺王位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他最早的改革之一是废除许多前朝设立的耗资巨大的机构、特许、年金和补助。1703年他又进一步试图厉行节约和精简。奥里始终无权制订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他至多只能使西班牙摇摇欲坠的行政和财政制度变得稍微有效一点。现在再也没有得宠的人浪费国家的钱财了，税收也征集得比较有效和正当了。这些改革的结果使西班牙国王能设法筹集足够的钱饷支付军队，一直维持到1710年到1711年间的战役决定了菲利普对西班牙的控制。战争耗费财力并

造成破坏，这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明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又大大促进了西班牙的改革。国家能进行一场战争，能驱逐外来侵略者并能实现它挑选自己的国王的权利，这个事实对唤醒冷漠的沉湎于宿命论的西班牙人有很大的作用。国王前往他在意大利的领地时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气，在面临军事上严重挫折时的毅力和来自萨伏依的年轻王后玛丽·路易丝的精明和胆识，都增强了西班牙人的自尊心。尽管菲利普后来退化成了一个长期患怀疑病症的低能儿，拒绝洗脸或换上干净床单，嘴里含着手指痴呆地躺在床上，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打消他在1714年以前留在西班牙人脑际的勇敢有为的形象。1714年以后他已经处于他的第二个妻子、爱揽权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控制之下。在此后的32年中，法尔内塞的野心给了西班牙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强大推动力。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绝不是一个改革家。但她有充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野心。她寸步不离她那位怕老婆的丈夫，宠信那批能在西班牙搞到钱财以使唐·菲利普和唐·卡洛斯立足意大利的顾问们。阿尔韦罗尼不仅只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外交家。^[6]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精力充沛足以使西班牙人望而生畏。他掌权时，西班牙的岁入由于对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进行了更有效的控制而增加了几乎1/3，西班牙的开支却由于失去了在佛兰德和意大利的耗钱的领地而减少了一半。^[7]他认识到通过中央集权可以大大改善西班牙的行政。他有效地削弱了西班牙政府中各种委员会的权力。在他任期内，国务参议的职务变得徒有虚名。为了增加王室的岁入，他不仅继续奉行奥里的削减年金、消除征税中的弊病的政策，而且还尽量促进贸易的发展。他着手改革关税制度以排斥外国制造商。同时他做了一些努力鼓励本国的制造商。1718年他开设了一家印刷厂，并在瓜达拉哈拉开办了一家织布工场。他还继续执行奥里开始的吸引外国工匠来西班牙工作的政策，免除了这些工匠的食品税。1718年他尝试用派遣单艘注册船只前往西印度群岛来代替等待派遣一年一度的船队的办法。但是阿尔韦罗尼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一支新的西班牙舰队。他在加的斯创办了一所海军学院，做出了特别的安排来招募水兵，并分别在加利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兴办了两个造船厂。他采取措施使货物在西班牙国内比较容易流通，而且就在他短暂的任期内，他还做了改革赋税制度的试验。巴伦西亚的年度收入一直是靠对零售货物征税5%，对进口商品

和农产品征收关税5%和对某些特殊商品再征税5%这种办法取得的。1717年除了在海港征收的关税外，其他所有税收都取消了。代替这些税款的是唯一一项盐税。这种做法对巴伦西亚的生产大有好处，织机的数目从1717年的300台增加到了1722年的2000台。

里佩尔达对西班牙复兴的贡献主要依靠他在外交上的厚颜无耻。他竟然能让西班牙在一段时期里与它的宿敌奥国皇帝结盟，使得欧洲各国政府一片混乱。但是他对恢复西班牙的繁荣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规划。也许因为里佩尔达是在联合省出生和受教育的，所以他对贸易非常感兴趣。1719年阿尔韦罗尼下台后，里佩尔达负责经管王室的制造业。他赞成在塞哥维亚开设织布工场和引进外国工匠。据说他还有一项发展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贸易的计划，并提出了如何减少英国人的走私活动，甚至如何使英国人放弃他们根据贩奴合同新获得的向西班牙所属殖民地供应黑奴的权利的办法。他指望西班牙国王会采取经济保护政策复兴西班牙工业；他认为通过设立一家西班牙银行，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工业发展。据传他曾声称靠着这一系列措施，西班牙国王可以有能力维持一支13万人的军队，一支100艘舰船的舰队，并享有每年200万埃居的收入。

里佩尔达还未来得及实施这些经济计划就在1727年垮了台。但不久接替他的那个人却把西班牙的经济治理得欣欣向荣，王室的岁入从1700年的1.42亿里亚尔上升到1737年的2.11亿里亚尔。堂·何塞·帕蒂尼奥出生在米兰公国一个与军队的财政和给养有关的西班牙人家庭。他曾学习神学，考虑过当耶稣会教士，后来改攻法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回祖国担任一个临时性的行政职务。这使他受到了菲利普五世的法国盟友的注意。1707年西班牙国王指派他担任军事条令委员会参事。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他被派往埃斯特雷马杜拉担任行政长官了。帕蒂尼奥在这里开始获得声誉。埃斯特雷马杜拉本来就十分贫瘠的资源在与葡萄牙的战争中已被搞得山穷水尽，但这位新上任的行政长官却使军队恢复了秩序，甚至通过改进税收制度给他们发了军饷。后来帕蒂尼奥被调往加泰罗尼亚。他在那里的强有力的经济和他的效率为菲利普五世的军事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加泰罗尼亚期间，帕蒂尼奥还掌握了建造舰船的各个环节。1717年他被派到加的斯担任陆军和海军总监和负责重建舰队的合同局局长。帕蒂尼奥在那里获得很大的成功。他发现船只都因缺少沥青堵塞船缝而在港

内腐烂，但3个月以后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哈瓦那和维拉克鲁斯进行贸易的船只已经航行在海上了。帕蒂尼奥还开设了一所确实能生产军火的兵工厂。由于阿尔韦罗尼曾指派他领导一个根据乌得勒支条约设立的由西班牙商人和英国商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关税改革，他还因此增长了在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委员会的工作虽被战争打断，但帕蒂尼奥很可能已对英西两国间的贸易内情有所了解。这对他以后的工作十分有用。帕蒂尼奥被从加的斯调往巴塞罗那，他在两周时间内将阿斯杜里亚亲王号军舰装备完毕。主要由于他的努力，1717年一支由13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得以启程前往撒丁。一年以后，西班牙已能派遣22艘战列帆船、3艘武装商船和300艘运输船进攻西西里了。担任西西里行政长官的帕蒂尼奥被迫断送了他自己在担任加的斯行政长官期间建立起来的那支舰队。虽然他是在提出抗议后才服从了阿尔韦罗尼的命令，但在西西里的冒险遭到失败后的数年里，帕蒂尼奥还是受到了冷遇。他后来重又担任了加的斯行政长官，但先后两名海军大臣都不信任并且讨厌他。里佩尔达也不喜欢帕蒂尼奥，曾威胁要把他派到驻外使馆任职，这在帕蒂尼奥看来等于是流放。

正当帕蒂尼奥在马德里等候指示之际，里佩尔达下台了。帕蒂尼奥的朋友施加影响使他在1727年当上了负责海军和西印度事务的大臣。三个月以后，他又负责经管王国的财政。在1729年到1732年的危机中，由于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和王后认为他比拉帕斯能干，又让他担负了首席国务大臣的重任。帕蒂尼奥在任职期间，设法建造了另一支海军来代替在西西里附近损失的那支舰队。1732年一支由60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从阿利坎特出发征服了奥兰，这证明了他的巨大成功。在加的斯和哈瓦那的兵工厂和船厂能够装备舰只，水兵们都领到了军饷，训练军官的学院为当朝培养出了唐·豪尔赫·胡安和唐·贝尔纳多·乌略亚两位杰出的人物。帕蒂尼奥还想方设法从西属美洲征收到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们认为可能的大量钱财。他坚持要求殖民地总督每年上交定额的贡金。南海公司的代理商们后来报告说，西班牙美洲欠南海公司的债务到期不还的借口之一，就是每年必须向西班牙交纳一笔贡金。帕蒂尼奥还尽量从一年一度的贸易船队榨取钱财。1728年他用改变币值的手法得到了大帆船队1/3的财富，而在往常只有1/4。1729年他又对来自西印度的货物额外征收4%的关税，其中至少有2%是归王室所有。“凭借着因洞悉内情才能想出来的种种诡计，他千方百计地为他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多搜括一些钱财。”^[8]1731年加的斯的商人同意

借给国王20万西班牙古银币，同年帕蒂尼奥还说服商人们同意把从西印度运来的货物税率从5%提高到8%。他不再进一步提高税率而是满足于迫使商人们定期把船队开往西印度。帕蒂尼奥不关心商人们的商品能否找到好市场，他只要他们把货物运来西班牙以便他能为王室财库征收更多的税款。他从来就没有能进行彻底全面的改革，他只是千方百计地搜刮钱财来满足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实现政治野心的需要或供菲利普五世实现他在圣伊尔德丰索兴建第二座凡尔赛宫的宏伟计划。王室的岁入确实从查理二世时期的1.42亿里亚尔增加到1737年的2.11亿里亚尔。同奥里和阿尔韦罗尼一样，帕蒂尼奥的主要功劳就是他尽力地保证了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和菲利普五世的野心从未因为缺少舰船或钱财而受到影响。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野心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在18世纪初期的观察家眼中，意大利是个有特殊魅力的地方。“所有那些出于好奇或因公务来到意大利的人都一致同意”，对这个国家最确切的描绘就是“把它称作一座大花园”。^[9]对18世纪初期的旅行者来说，翻越阿尔卑斯山是件使人惊恐而乏味的事情。但是在胆战心惊地走过了紧挨着悬崖的小道，挣扎着爬上那几乎难以攀登的高山，在经年不化的积雪中忍受了寒冷和一片荒芜和“满目凄凉”^[10]的极端无聊之后，旅行者发现意大利是个人间天堂。这里温和的气候被誉为在欧洲首屈一指。农村的土地，至少在北方，极为肥沃。整个国家“像个大柑橘园”。^[11]城镇之多，建筑之精美使旅行者一致公认意大利是举世无双的。在一位像德国人比尔费尔德这样头脑清醒、知识渊博的18世纪中期的旅行家眼中，意大利是繁荣和进步的。这就不难理解伊丽莎白·法尔内塞除了出于家族的自豪和母亲对儿子的奢望外，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机为她的两个儿子得到在意大利的领地。在比尔费尔德和其他旅行者的眼里，意大利的工业和它的自然条件相得益彰。意大利的美酒名闻全欧，柑橘、柠檬和其他水果在北方有稳定的市场。意大利的橄榄油在那时同现在一样极受人们推崇。渔产不仅丰富，而且意大利人擅长腌制保存。采石场生产的优质大理石不仅为意大利建筑增添了光彩，而且受到全欧洲王公贵族们的欢迎。意大利还生产世界上最精美的丝绸。那里出产的天鹅绒、丝袜、罗纱和其他上百种物品工艺超群，外国人都争相购买。比尔费尔德看到的意大利经济的唯一弱点是它出产的谷物不足以自给，但从西西里、希腊群岛和非洲的进口弥

补了这个不足。比尔费尔德还注意到意大利人对航海冷淡，他们把通商贸易让给了更热衷于航海事业的国家。但是他记录了意大利人欣欣向荣的文化生活来抵消这些缺陷。18世纪中期美术界依旧把意大利视为首府。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在意大利都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也毫不比美术逊色。18世纪的旅行者看到为数众多的大学、学院和著名的学者遍布于各地的城镇中。这种对意大利，特别是对罗马的称颂在歌德口中也有反映。但是他们却都没有提到农民的悲惨景况；连罗马和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普遍存在犯罪活动，法律的野蛮和混乱，以及教会的迷信和对异端的不容忍态度。

18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豪富与赤贫对比极为显著的国家。虽然那里城镇数量很多，但中产阶级却为数甚少，这使贫富间的对比更显得触目惊心。南方绝大部分属那不勒斯王国，那里的情景同那些刚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来到伦巴茅平原的旅行者看到的人间天堂大不相同。南部地区，特别是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和卡拉布里亚等省主要是农村。莱切、布林迪西等小镇贫穷萧条，土地贫瘠。气候有时也会变得很坏，干燥酷热，水源缺乏，树木稀少。那里疟疾流行，使农民衰弱不堪毫无干劲。即使在今天，卢卡西亚还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耶稣基督从来也没有光临过埃博利以南的地区。18世纪早期那不勒斯王国农民的景况就更可怜了。他们必须把地里的出产卖给他们的地主，在地主设立的法庭里受审。在从罗马以南到威尼斯南缘的那些由教皇统治的国家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意大利几乎每个国家的教会都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那不勒斯王国就是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教会在那里占有将近1/3的土地。在这个人口约有500万的国家里，修道士和修女有5万名，教士有5万名，主教有165名，大主教有21名。教会每年的收入约为1200万德克特。^[12]在这个欧洲最肮脏贫穷的国家里，大量的教士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并免交一切赋税。死于1723年的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认为，在他的辖区内每一个教派至少有一个修道院是体面攸关的事。在皮埃蒙特，宗教裁判所的活动迫使人们恪守正统，像巴雷蒂或阿尔菲耶里这样的作家只好逃往他乡。意大利许多地方的风俗习惯是野蛮的。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养有武装打手，既能用他们镇压农民又能用来恫吓中央当局派来的代表。在教皇统治的国家里，在1759年到1769年这10年间共发生了1.3万件谋杀案。在富庶时髦的米兰，暴力犯罪活动也屡见不鲜。威尼斯从1741年到1762年共有7.3万人被处死刑或送往军舰上终身服劳役。法律的惩罚很野蛮，拷打通常是

刑事审讯的一个步骤。但是虽然有贫穷、压迫和教会的审查，意大利的文化生活在1713年以后却颇为活跃。这也许是由于那不勒斯和米兰人摆脱了西班牙控制的结果。维科、贝卡里亚、亚历山德罗和彼得罗·韦里、杰诺韦西（欧洲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之一）、菲兰杰里（他写了一部立法史）、帕加诺、德尔菲科、加兰蒂和加利亚尼等人，都表明知识界的活动在意大利并未绝迹。

意大利各国的这种景况在18世纪变化甚大。部分原因是乌得勒支和约解除了西班牙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控制并把它们划归哈布斯堡皇帝治理，更重要的是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种种活动的结果。法尔内塞在1748年已把唐·卡洛斯立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把唐·菲利普立为帕尔马公爵。哈布斯堡家族得到了托斯卡纳的继承权作为它失掉那不勒斯的补偿。皮埃蒙特得到了撒丁以补偿失去的西西里。这些直到1748年才完成的变动是经过35年艰苦的外交活动和5场战争后才实现的。当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欧洲大国一致同意承认昂儒公爵菲利普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的国王菲利普五世。但他们不承认他是16世纪以来一直属于西班牙国王的米兰、那不勒斯、撒丁和西西里等地的统治者。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划给了奥国皇帝，弥补他没有当成西班牙国王的损失。西西里给了萨伏依公爵，以报答他在战争期间为盟国事业做出的贡献，尽管当时他对这一事业是极其动摇的。在那时意大利的王公们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宁可让哈布斯堡家族扩张权力，也不愿让萨伏依兴旺起来，意大利人的这种嫉妒心理在整个18世纪都对哈布斯堡王朝有利。1717年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对撒丁发动武装袭击，1718年又对西西里发动另一次袭击。英、法、奥等列强一致行动打败了西班牙，但随即决定奥国皇帝应把撒丁让给萨伏依来换取西西里。

意大利各国政治区划的下一场变动发生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为她的长子唐·卡洛斯争取对法尔内塞家族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领地，以及在无嗣的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人死后对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继承权的时候。伊丽莎白在康布雷国际会议过程中一直想实现这个计划。它在1725年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暴，当时西班牙和它的宿敌奥国皇帝结盟，震惊了欧洲各国朝廷。但是当奥皇表示不愿冒险打仗来实现伊丽莎白的计划时，她就不惜让谈判结盟的黑佩尔达信誉扫地，于1729年和英法两国缔结了塞维利亚条约。1731年最后一名法尔内塞家族的帕尔马

公爵死后，英法两国均支持唐·卡洛斯继承公爵领地。1733年波兰的王位继承权问题引起了一场大战，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以此为借口让唐·卡洛斯向奥军发起攻击并一举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1735年的维也纳条约确认了这个现实，并把已答应给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的托斯卡纳重新给哈布斯堡家族，作为它失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补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3]又一次为法尔内塞替儿子掠取领土提供了机会。根据1748年的埃克斯·拉·夏佩勒和约，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划给了唐·菲利普。

这些统辖权上的变化总的来说，对意大利是有利的。米兰在1713年由西班牙统治改为由奥地利统治以后，整个治理有了起色。长期受压制的自由思想又在米兰的沙龙里和帕维亚大学内活跃起来。封建的特权和豁免权逐渐减少了。地方政府得到精简，财政进行了改革。土地自1757年开始只要缴纳一项统一的赋税。这种做法推动了精耕细作，使伦巴第富裕了起来。在日后约瑟夫二世当政时期对教会也进行了改革尝试。多达一百来个男女修道院被取缔。1757年和1784年的政教协定规定16世纪后新取得的教会财产也应该纳税。18世纪的米兰为贝卡里亚和其他改革者聚会讨论他们的规划提供了场所。托斯卡纳在约瑟夫的兄弟利奥波德当政时期成了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农奴制被废除，刑法得到修改，酷刑和秘密审讯被禁止；国内的关税哨卡被取消，行会制也废除了；宗教裁判所被取缔，宗教法庭只准受理有关宗教事务的案件。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则比较难办，因为那里的教会和贵族势力非常强大。但是，查理在热衷改革的律师贝尔纳多·塔努奇的帮助下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依据1741年的政教协定，他纠正了教会的一些最严重的弊端。教士们也必须纳税，尽管税率只有平常人的一半。教士的数量从10万人逐渐减少到8.1万人。在法律方面，塔努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审讯的过程不那么野蛮了，贵族的封建司法权受到了限制。但是即使塔努奇本人也无法订出一部全新的法典来。那不勒斯人继续受11种不同法制的管束。在财政方面，查理设法从包税人那里赎回了一部分收税权。他还设立了一项统一的财产税并着手发展对外贸易。在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宫廷在1748年以后成了法国文化的中心。出身波旁家族的公爵在抵制教皇的宗主权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唐·菲利普甚至还废除了教士的豁免权。

在统治机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意大利其余地区，情况依然同17世纪完全一样。威尼斯宁静地躺在海滨的泻湖畔，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有狂欢节的庆祝活动和哥尔多尼最新喜剧的上演才能给它带来一点生机。热那亚牢记它的安全全赖于它严守中立。在罗马，克莱门特十一世对罗马的圣米凯莱监狱的刑法进行改革，成了这方面工作的先驱。本尼狄克十三世是个虔诚的教皇，他禁止赌博和戴假发，但他把政治上的事务全交给科夏处理，因为他自己对世俗的事情一窍不通。克莱门特十二世年老体弱，在1732年以后的最后8年教皇任期内，他是个盲人。1740年到1758年在位的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随和聪慧，是伟大的艺术保护人。霍勒斯沃波尔称他是个“受罗马天主教徒爱戴，受新教徒称颂的人。是个谦虚无私的教士、没有宠臣的王公、不任人唯亲的教皇”^[14]。他订立了一系列宗教协定，从而使那些反对教会的革新家们相信教皇的统治是软弱无力的。在1758年接替本尼狄克直到1769年一直在位的克莱门特十三世，既没有办法避免又无能力控制一场开始威胁到耶稣会生存的风暴的来临。在罗马教廷里当大使依然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但是18世纪的教皇们在国际外交活动中无足轻重，他们对自己辖区景况的改善也几乎毫无作为。在意大利北部，于1720年改称撒丁王国的萨伏依，仍旧隔绝在意大利局势发展的主流之外。萨伏依家族的统治者在危险的外交赌博中下了很高的赌注。他们在1713年获得了大片领土并在1720年后得到了国王称号。维克托·阿马戴乌斯根本不想限制他手下的贵族们的权力或约束教会或宗教裁判所的压迫活动。

那个受德国的旅行家们如此推崇、遍地橘树、空气芬芳的大花园确实是个令人愉快的好地方。那里许多居民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正在开始恢复生机。但是那些没有改换到他们统治下的国家，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依旧是一片污秽、迷信和封建压迫的可怕景象。

1746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去世，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不再支配西班牙的政策，西班牙对在意大利的领地也不再有新的图谋了。它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意志消沉的斐迪南六世连他父亲对军事问题的那种兴趣都没有，他那有气喘病、不会生育的妻子——布拉干萨家族的巴尔巴拉，更缺少伊丽莎白·法尔内塞那样的精力和野心。新的王室对外交事务兴趣不大，对国内的改革也漠不关心。唯一

使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音乐。他们让曾用歌声减轻过菲利普五世的忧郁症的法里内利当了宫廷剧院的总监。斐迪南受他的忏悔神父、耶稣会会士拉瓦荷的影响很大。拉瓦荷定期向他转达耶稣会一个小小的委员会的建议。斐迪南在对外政策上一般是平和的，在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缔结后，他满足于按他的大臣堂·何塞·德卡瓦哈尔-兰开斯特制定出来的一套制度办事。卡瓦哈尔留下的两份政治遗嘱为人们了解他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一份遗嘱写于1745年他上台之前，另一份写于他去世的前一年1753年。卡瓦哈尔的基本考虑是西班牙既是个欧洲大国又是个殖民主义强国。他和帕蒂尼奥一样希望能够开发西属美洲的资源，并利用那里的财富来实现他雄心勃勃振兴西班牙工业的计划。按照卡瓦哈尔的意见，一个强国要能成为西班牙的盟国，就应具备海军力量并能随时阻止其他国家在西属美洲进行走私活动。与他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一样，卡瓦哈尔把欧洲大陆看作一架天平，法国和奥地利各悬在天平的一端。他认为一切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这架天平的平衡，借此来防止战争。他希望使西班牙强大得能够举足轻重，从而做到这一点。他深信恢复西班牙实力的最好办法是在国内进行工业改革。同外国结盟只能是一个辅助措施。在欧洲各国中，卡瓦哈尔主张同葡萄牙结盟，因为同它和好相处就能使西班牙只需防守一边的边境。法国背弃西班牙的次数太多了，两国的国王是争当基督教世界霸主的对手。此外，卡瓦哈尔还认为由于两国王室是近亲关系，因此两国的国王即使不缔结盟约也能保持和好。奥国皇帝常常是西班牙攻击的对象，他又没有海军，所以同他结盟毫无吸引力。荷兰太弱小，不能指望它帮助抵消在西印度群岛地区的巨额非法贸易，而如果它成为西班牙的盟国，非法贸易又是必须容忍的。普鲁士在卡瓦哈尔眼中仍旧只是法国的一个附庸，再说它也没有海军。同样，俄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丹麦在西印度群岛有领地，卡瓦哈尔的前任坎皮略曾认为同这个国家结盟很合适，但卡瓦哈尔却认为丹麦太弱小，不久就把这个联盟废除了。意大利各国、波兰和瑞典都太弱小，作为盟国无多少用处。剩下的唯一一个大国，其财力足以在欧洲称雄，其商业在新世界也很强大，它的国王也不垂涎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属地。这个强国就是英国。尽管有着宗教分歧和从1588年到1667年期间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前半期大部分时间的传统敌对情绪，但卡瓦哈尔仍然认为英国是个最有吸引力的同盟者。在他的任期内，甚至在1754年他死后由理查德·华尔掌管西班牙外交政策期间，西班牙一直

对英国奉行和解政策。1750年两国缔结了一个贸易条约。英国对它的船只在西印度遭到掠夺提出的指控也得到西班牙从未有过的友好处理。但是当斐迪南死后由他较活跃的异母兄弟卡洛斯于1759年继位后，对英国的友好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洪都拉斯洋苏木砍伐者引起的争端、英国人对西班牙船只的抢掠，再加上法国施加的压力，终于促使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但是，从1748年到1761年的间歇时期，西班牙曾经有过使它的经济复兴取得更大进展的机会。

卡瓦哈尔振兴西班牙的愿望造成过一些颇为有趣的事件。同英国的和解一实现，卡瓦哈尔就迫不及待地向驻伦敦的西班牙大使发出指令，让他把有技术的工匠引诱到西班牙去。有时候，人员和机械被偷偷地运出英国，有时候船只却会被英方截获。还有些时候，那些工匠会丢下他们的新主人逃回英国老家。有一名到西班牙的英国毛呢织工据说技术在欧洲首屈一指。但是，招募这些工匠并设法把他们偷运出英国，对西班牙驻英大使来说是件十分头痛的工作。1750年西班牙海军将领唐·豪尔赫·胡安到伦敦收买造船工匠。英国当局起了疑心，唐·豪尔赫不得不化装成一名普通海员，替船长专用的小艇划桨，才算登上了一艘刚巧驶离泰晤士河的比斯开湾人的船而得以脱身。这件事结束了卡瓦哈尔通过驻英使馆招募英国工匠的努力，因为这样做对西班牙工业没有什么好处，危险却出奇的大。1750年以后，有技术的外国工匠主要通过已在西班牙国王那里工作的爱尔兰人私下招募。在加的斯、卡塔赫纳和费罗尔等大海军基地，逐渐形成一个爱尔兰人的派别。加的斯有个名叫穆林斯的人甚至组织起一个船队专门用来运送合法的货物和非法的爱尔兰移民。

恩塞纳达侯爵的改革比起卡瓦哈尔为西班牙工业获取新鲜血液的努力来要更加认真，其影响也更深远。恩塞纳达是在1743年进行改革的大臣坎皮略死后从意大利召回西班牙的。他当上了负责财政、陆军、海军和西印度事务的大臣。他的经历直到那时主要是在海军方面。他在18岁时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在海军部。1730年他被任命为卡塔赫纳的会计检察官。1733年他随一支参加征服那不勒斯的舰队出征。1736年他被那不勒斯的卡洛斯封为侯爵以表彰他的功绩。恩塞纳达回到西班牙以后就大力改进卡塔赫纳和卡拉加的兵工厂，并把加的斯建成一个第一流的海军基地。他还改进了招募海军志愿人员的方法，并在1751年写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阐述海上贸易和捕鱼业的衰

落如何导致了西班牙海军的崩溃。恩塞纳达对西班牙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认真考虑道路问题的大臣。他修起了一条横跨瓜达拉马河连接新旧两个卡斯蒂利亚的道路。1749年他大力革除关税机构中的弊端，禁止海关官员贪污西班牙船只装载的各种食品货物。无疑，恩塞纳达对振兴西班牙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也常常热衷于撰写冗长的报告和制订一些从未付诸实施的计划。他曾经有制订一项统一法典的计划；他还做了大量准备想用一种单一的税收来取代西班牙五花八门的进口税。他派出一个专门委员会为此进行调查，但调查尚未结束，他就在1749年下令实施这种单一税。结果这一措施无人理解，他的命令被西班牙官员们称作一项“只得服从却又无法执行的”命令。恩塞纳达在1754年失势下台，尽管他在查理三世登基后又一次上台，但不久又被罢了官。他的许多宏伟的计划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但他继续推行了奥里、帕蒂尼奥和坎皮略进行的改革。他的为数众多的报告为查理三世的大臣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改革创造了条件。

随着查理三世在1759年即位，特别是在1763年和平恢复以后，波旁王朝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菲利普五世和斐迪南六世统治时期，改革主要是出于外交和海军方面的需要而被迫进行的。这两位波旁家族的国王从任何意义上讲都称不上开明君主。但是查理三世却是一个对改革真正感兴趣的国王，此外他还有在那不勒斯的20年统治经验。他和他的大臣们的成就确实是值得称道的。[\[15\]](#)如果他有一个像他一样能干的继承人，如果西班牙没有先是卷入拿破仑战争后来又陷入内战，如果西班牙也有使北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能飞快地繁荣和强大起来的那些物质资源，他们的这些成就本来也许会使西班牙重新回到欧洲强国的行列里来。

18世纪前半叶，西班牙在新的王朝，野心勃勃的王后和一系列有远见、有干劲的大臣们推动下正在复兴；意大利至少也有一些国家在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有革新精神的王公们治理下，正从长时间的沉睡中逐渐苏醒。在此同时，靠巴西资源而富裕的葡萄牙却正醉心于虔诚的祈祷和葡萄酒生产。这个国家一直到1750年蓬巴尔上台后才开始进行改革。

葡萄牙的土地并不贫瘠，但它的粮食在18世纪还不能自给。当时像比尔费尔德这样的观察家对葡萄牙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当

时的旅行家们声称，在该国约300万人口中，教士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乡绅的人数肯定也很多，而这种人是完全不劳动的。一些人是受雇的外国人，还有些人长期航行在开往西印度或巴西的海船上。宗教上对异端的不容忍态度，使得外国人都宁愿问津葡萄牙。当时还传说葡萄牙的气候不利于生儿育女，那里妇女的生育期都不长。无怪乎能从事工农业、贸易或搞学问的男人数量很少。18世纪中期的葡萄牙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除了生产一些干果和糖果以及修道院里制作的假花和其他花哨的小玩意以外，葡萄牙几乎什么工业品都不能生产。但是靠着出口“英国人必不可少的”[\[16\]](#)红葡萄酒和从殖民地帝国的大量输入，特别是18世纪来自巴西的源源不断的黄金输入，葡萄牙十分富裕。这些财富一部分被花在建造马夫拉城上，还有一部分被约翰五世用来从教皇那里购取特权。1716年他获准把他宫廷内的小教堂变成一个主教辖区。1739年教皇同意这个新教区的主教可享有红衣主教的职权，并同意该职位可由葡萄牙王室成员担任。里斯本建造了一所特别的教堂，设立了大教堂神父的职位，并把葡萄牙全部教产的1/4作为他们的薪俸基金。国王向罗马的进一步捐赠使得那些大教堂神父都变成了红衣主教，而大主教的地位几乎同教皇本人不相上下。1749年葡萄牙国王想得到一个相当于“最信仰基督教的陛下”、“信奉天主教的陛下”或“信仰保卫者”之类的称号。经过反复谈判和赠送值钱的礼物后，他得到了被人称为“信仰最坚定的陛下”的权利。那时候葡萄牙也许是全欧洲宗教机构名目最多的国家，据说全国有近900个修道院。教会不仅控制着全国人口的将近一半，而且占有全部土地的2/3。三个骑士团，即基督骑士团、圣詹姆士骑士团和阿维斯瓦莱骑士团，同西班牙的骑士团一样都是宗教性质的。第一个骑士团有454名军官，第二个有150名，第三个有49名。教廷在葡萄牙特别有势力。科英布拉大学、里斯本大学和埃武拉大学都是宗教团体的组成部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也很活跃。

葡萄牙的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体，但是布拉干萨家族不像西班牙的波旁家族那样为国家增添活力。葡萄牙在1640年反抗西班牙时，这个运动曾带有反专制的色彩，因为引起葡萄牙反抗的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国王未经葡萄牙国会同意就把赋税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但葡萄牙国王的权力逐渐地变得同过去西班牙国王的权力一样大了。国会曾经因为声言要节制国家的开支而遭解散，摄政王曾因国会没收了他的礼品而拒绝接受王位。从理论上讲，要是布拉干萨家族后继无人或

是国王想要征收新税都应先和国会商量，但实际上布拉干萨家族子孙兴旺而从巴西输入的大量黄金也使得征收新税没有必要。因而，从1697年直到18世纪中叶，国会就根本没有召开过。葡萄牙的统治机器和18世纪初期的任何其他专制君主国家差不多，这个统治机器的历史可追溯到葡萄牙独立之时。新国家最初的紧迫任务是和西班牙作战。它对行政机构无暇做全面的改革，即使有所改变也是零星的。1643年的一项法令明确规定在全国起义前存在的一切机构都应继续工作。国王由一个四人组成的国务会议协助工作，此外为了应急还设立了一个军事会议。根据1641年和1642年颁发的命令，由财政专家担任的财政监督官增加到3人。1642年设立了一个海外事务委员会来处理葡萄牙海外领地的大部分事务，但有些经济问题仍由财政监督官处理。宗教事务由过去设立的负责道德规范的机构处理，该机构在1532年就开始工作了。这些机构纯粹是咨询性质的，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由国王做出。他在行政能力方面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在17世纪时国务大臣只有一名，称作枢机大臣。不久，由于工作量太大而增加了一名。国务大臣手下有时有数名官员做助手，有时却可以集一切职务于一身。但是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葡萄牙的总的趋势也是朝专门化方向发展。

蓬巴尔在任国务大臣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27年时间内取得的成绩比西班牙半个世纪里取得的成就还要显著。约翰五世在患了8年痴呆症后于1750年去世，在他患病期间，政府由一个摄政团领导。国王一死，摄政王后便召请塞巴斯蒂安·约瑟夫·德卡瓦略·厄梅洛担任国务大臣掌管外交事务。此人就是后来的蓬巴尔侯爵。这位新大臣设法完全控制新国王约瑟夫一世。直到1777年约瑟夫去世以前，他在葡萄牙始终行使绝对的权力。蓬巴尔以前曾担任过驻维也纳和伦敦的大使。他看到葡萄牙和英国相比，尽管有殖民地的财富却显得萧条和虚弱。蓬巴尔是个很有胆识的人，他毫不迟疑地向教会发起了攻击。教会压制全国的精神生活，它还吞占了来自巴西的一大部分财富，并能对葡萄牙的外交政策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1751年蓬巴尔开始采取行动；从此以后宗教裁判所没有政府批准不得执行任何宗教法庭的判决或死刑。接下来他攻击耶稣会。在1754年到1755年期间，当西班牙决定用转让7个传教地区来换取长期以来它认为是属于西班牙的新殖民地领土时，耶稣会曾进行过武装抵抗。它对蓬巴尔在1755年开设的与马拉尼翁和帕拉进行贸易的公司也十分仇视。蓬巴尔不失时机地将国王的耶稣会忏悔神父免职，并禁止耶稣会会士接触宫廷。葡

葡萄牙的宫廷在约翰五世在位时曾花钱从教皇那里获取宗教特权，现在却向教皇指控耶稣会会士在美洲的恶行。1758年教皇派遣红衣主教萨尔达尼亚到“信仰最坚定的陛下”辖区里巡察和改革耶稣会。一个月以后，萨尔达尼亚命令耶稣会会士停止贸易、布道和听取忏悔等活动。1759年1月根据对一项阴谋杀害国王的指控进行调查后得出的证据，耶稣会在葡萄牙的一切财产均被查封。9月耶稣会被逐出葡萄牙。里斯本的耶稣会学院被改成了一所普通贵族学院，蓬巴尔在科英布拉大学开设了学习自然科学的科系。

就在对教会斗争取得速度惊人的胜利的同时，蓬巴尔又把矛头转向了贵族阶层。1758年9月有人企图行刺国王，同年12月一些反对蓬巴尔最激烈的贵族被逮捕，经调查后他们因犯有煽动这项阴谋的罪行而被处决。正是在这场审讯过程中所发现的文件，使蓬巴尔掌握了他驱逐耶稣会的证据。由于摧毁了葡萄牙仅有的两种能进行有效抵制的势力，蓬巴尔得以执行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1761年他改革了国内的行政制度，废除了许多耗钱却又无用的机构。他简化了司法制度。他通过设立一家与马拉尼翁和帕拉进行贸易的公司和在1756年开办一家有特权用固定价格收购一切酒类的波尔图酒类公司促进了贸易。这种做法虽然使英国人非常恼火并在1757年在波尔图引起了可怕的骚乱，但蓬巴尔仍坚定不移地执行鼓励葡萄牙本国贸易的政策。他加强了葡萄牙的海军使它拥有13艘战列帆船和6艘快速帆船。他修复了要塞，改组了陆军。蓬巴尔的充沛精力和冷酷无情，他对教会毫不犹豫毫不妥协的进攻，使他和（米兰）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有许多相同之处。同那不勒斯的国王唐·卡洛斯相比，他是18世纪改革家中一个更为典型的代表。这些改革家到了18世纪中叶已经开始革新生活的每个组成部分，致使行政、法律、经济生活甚至教会都感到了新时代的凉爽清风。葡萄牙在18世纪初还是西地中海地区也许除了那不勒斯以外最无生气的一个国家，但是到了1763年它在通向有效的专制主义道路上已超越了一切其他国家。后来开明君主统治下的旧政体就是以这种专制主义为特征的。

（乐瑞夫 译）

[1] J. 兰普希尔：《西班牙美洲简史》（1741年），第300页。

[2] 1776年，德斯德维斯·杜·德塞特引自《18世纪的西班牙社会》，见《西班牙评论》，第64卷，第238页。

[3] M. 费尔南兹：《我们祖先的庄园》，第2页。

[4] 《危地马拉时报》，1797年2月20日。

[5] 引自《对法国驻外大使指令集》，第七集，西班牙部分，A. 莫雷尔和H. 莱奥纳东编（法蒂奥，1898年），第6页。

[6] E. 布尔热瓦在《给孔泰·I. 罗卡的私人信件》（1892年）中提供了纠正人们普遍认为阿尔韦罗尼是西班牙积极对外政策发起人这个形象的有用材料。

[7] 巴布1716年2月19日致斯坦厄普信。大英博物馆手稿2171号，第136页。B. J. 鲁德提供了这一情况。

[8] 引自凯莱1729年8月25日致纽卡斯尔的信。

[9] 比尔费尔德：《政治机构》第3卷（1774年），第269页。

[10] 比尔费尔德：《政治机构》第3卷（1774年），第269页。

[11] 比尔费尔德：《政治机构》第3卷（1774年），第269—270页。据说，此书的草稿完成于1757年，但最后一卷是在比尔费尔德死后才出版的。

[12] 欧洲当时流通的金币名称。——译者注

[13] 关于在1739年导致西班牙和英国之间战争的那场英西冲突，请参阅第九章。

[14] 引自1757年6月20日对霍勒斯·曼恩爵士的谈话。

[15] 有关他在1759—1763年间的外交政策细节，请参见本书第九章。

[16] 比尔费尔德：《政治机构》第3卷（1774年），第7页。

第十三章 普鲁士的组成与崛起

1640年至1786年期间，四代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们，把普鲁士从一个由许多分散的和组织松懈的联合体，变成一个欧洲强国。由于兰克以及继承他事业的德意志的学者们（特别是施莫勒、欣策和哈通）在普鲁士国立档案馆的辛勤劳动，我们今天才能够对于这一个半世纪里普鲁士国内的“实际情况”有准确无误的了解。我们可以方便地从编辑完好的《普鲁士卷宗》的各卷中考证证据。关于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和腓特烈大帝的人格如何，以及他们是否值得后代世人们赞美和仿效，由于历史学家们的政治背景不同，伦理观念不同，因此他们所表示的观点也各自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指导这些君主行动的先决条件是无人置疑的：王权是天赋的职守；专制制度是唯一合理的政体；这个政体的主要宗旨是增进国力。腓特烈大帝在政治遗言中说：“国王的臣民们的幸福，实乃与国力并行不悖，但指导整个体制的精神乃是强权政治，不是福利法则。”^[1]

要估价普鲁士统治者们的成就，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从1713年起是如何创业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当时不过是那些比较小的和非常小的国家拼凑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领地”中的一个。它只是在外交语言中才被总称为“普鲁士”。对于普通官员来说，“普鲁士王国”系指帝国疆域以外的东普鲁士。而“普鲁士国王”，对于勃兰登堡来说，则是“选侯”；对于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和克勒韦来说，是“公爵”；对于马克和拉文斯堡来说，是“伯爵”；对于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来说，是“亲王”。这些不同的头衔，反映了这个国家通过继承获得土地，而不是通过军事或外交行动逐渐成长壮大的历史。德意志统治者的权力就是这样以对许多分散的领地拥有合法的头衔作为基础的，这是正常的。但是，比较重要的王朝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努力仿效大的民族国家的样子，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勃兰登堡，大选侯有力地维持他对地方“等级会议”、小贵族以及在向货币制度过渡时期就已如此不服从它们以前的封建上级约束的城市自治机构的权威。他通过改进对王室领地的管理和采用间接税制度

（货物税），以及接受法国的津贴等办法，使中央政权在财政方面实际上摆脱了对等级会议的依赖。这些变革导致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开端，它同各省旧有的官吏一并存在；中央的号令通过这个官僚机构大大加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第一次建立了一支有用的常备军并奉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以与所有这些措施相协调；因此，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强大的基础是大选侯奠定的。

但是，普鲁士要真正称得上是欧洲的一个独立国家，还必须首先要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各省的地理位置分散、经济不发达、人力不足造成的。中央地区跨越易北河和奥得河，勃兰登堡、东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没有天然边界，也没有良好的港口，一直到1720年才通过兼并西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有了什切青。维斯杜拉河以远的东普鲁士，与中央地区隔开，相去甚远，战时难以防守。莱茵河和威悉河畔的那些小省，情况也是一样。腓特烈花费了很大代价夺取并占有的西里西亚，无疑为中央地区增加了一块珍贵的土地。萨克森更为宝贵，所以对之总是梦寐以求的。第一次瓜分波兰中划归普鲁士的西普鲁士及其邻近地区，最后终于使东普鲁士和中央的大块领土连成一片；不过，这是1772年以后的事情了。

普鲁士一直到19世纪，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713年，人们使用千年未变的方法，在这个沙土平原的贫瘠土地上耕作。如同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德意志国家一样，土地保有制对于农业发展是不利的，越是往东的国家，对于农民越是有压制性。即使在大庄园里，主要的目标也是供应家庭的需要，交通很糟糕，而且市场通常相距太远，因而只能是维持生计的经济，即使从技术上来说可以生产剩余的产品。城镇很少，而且很小；实际上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言，只有一种消极的贸易，主要是为贵族从法国进口奢侈品。家庭工业只为当地市场生产最必需的物品，它们受到行会组织的阻碍。行会不再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它们最害怕的莫过于自由企业了。

除经济落后外，再加上三十年战争给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带来的惨重的后果，以及瑞典一波兰战争、鞑靼人的进攻，最后还有1709年在东普鲁士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惨重的。据估计，东普鲁士有1/3的人死于瘟疫和饥谨，而政府却无余力去避免。在1709年到1710年的一年时间里，仅柯尼斯堡一地就死了1.8万人。这种

情况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东普鲁士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法国的1/4，还不到符腾堡、萨克森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3，而勃兰登堡的人口密度也高不了多少，波美拉尼亚的则要低得多。

大选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前就已持有这样一种见解，即只有在他拥有一支完全由他支配的军队，一支在各个分散的省里为他服务而不受当地的统治阶级——等级会议过问的军队，才能维护王朝的利益。在战争期间，边远各省在当地会议的领导下，已经各自为政。如果由选侯继承的所有各省都进行合作，奉行一种共同的政策，在当时除了对王朝有利外，还看不出有别的什么明显的好处；而且，只有选侯强迫那些不愿合作的省份同意才能做到，必要时还得使用武力。1644年，第一次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和平时期兵力则有所减少。接着，中央政府和地方等级会议之间便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就像所有那些在结构上类似而又野心勃勃地要走向专制的德意志国家的情况一样。等级会议并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常备军，它们尤其反对交纳赋税来维持这支军队；而且它们也不希望卷入野心勃勃的政策中去，而愿置身于大国的争端之外，和和乎平地听从上帝的意思。选侯在勃兰登堡这个他的家族中最古老的领地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等级会议于1653年同意征收直接税——“特别税”，只要贵族免于纳税，并确认他们对于农民的权力。在边远的省份，事实证明则需要逮捕领头人并以使用武力相威胁；但到最后，选侯还是如愿以偿了。各省的会议并没有正式废除，但由于等级会议同意征收一种事实上的永久税，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主要作用；即便是在莱茵河流域的各省，由于它们地处边远因而最具有独立性，但从此以后它们也只是关心当地的行政事务而已。到1713年，各省会议的行政职能几乎已经完全由中央政府新任命的常驻官员接管。

腓特烈·威廉一世甚至更不尊重各省自治机构拥有的传统权力和特权，并且蓄意奉行一种极权主义的政策，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但是，他也是满足于建立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力，并且谨慎从事，以免触犯贵族个人的特权，首先不去触犯他们免纳赋税的特权。然而，在中央各省，国王则重申早就被认为是过了时的封建权利。并且不顾“诸侯”的强烈反对，强迫他们每年缴纳过去由于占有土地应服兵役的折偿金。根据同样的精神，他还提出了一个其后果更为重要得多的要求，即贵族子弟应在军队中充当“容克”，即下级

军官，要把它看作是他们对于他们的阶级应尽的义务；并将他们的表现系统地记入“诸侯表册”中以备查核。最初，这一措施也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是由于建立了一支培养年轻贵族的军官候补生团队，由于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国王亲自关怀和以身作则的结果，他是欧洲最先经常穿着军服的君主之一），一种强烈的集体精神和共同责任感便逐步形成。贵族占据本省的主要官职，这是长期以来贵族把持不放的特权。这时，为了公正，为了形成更为广泛的爱国心，在其他省里这些官职则转由他人担任。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的许多措施，同这些十分相似；但在俄国，纪律不得不更加严格。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个国家的贵族一直是一伙乌合之众，很不可靠，远不如德意志的贵族因经常向国王表示效忠，1752年被腓特烈称赞为“受尊敬的、忠诚可靠的贵族”。

如果贵族最初并不把在1713年的那种普鲁士军队里服役看作一种光荣的事情，这并不足为怪。这是一支雇佣军，是由团长们从普鲁士国内外任意使用武力强征入伍的。这些团长只要根据合同使自己的团队达到规定的兵力，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许多军官一直由外国人和冒险家担任；这时他们逐步由普鲁士人取代，主要是由贵族，但并不完全是贵族。官方不赞成强行征兵，因为扩大军队遭到了反对，特别是遭到因征兵而失掉劳动力的地主的反对。但是，强行征兵依然实行，普鲁士得到了一个坏名声。从1721年起，强行征兵仅限于下层阶级，主要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子弟。有时候，他们的东家就是他们的长官。一两年后，他们就获准回农庄重又从事劳动，只是在秋季被召回参加两个月的演习。但是，从普鲁士境外招来的士兵日渐增多，专门从事招兵的军官多达1000名之众，他们带着大笔金钱，不择手段地在那里招兵买马。国王特别愿意出高价为自己的那个驻扎在波茨坦的团队招募“高个子兵”。有时军队里的外籍兵竟达2/3。最后，国内于1733年采用分区征兵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全国分成若干个“区”，每区5000户。各区必须为驻扎在本区或本区附近的某一团队提供补充兵员，而兵员仍然是来自下层各阶级，即农民的和工匠的子弟。这种带有非常明显的阶级歧视的制度，反映了国家的社会结构，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实行，它为全民服兵役制铺平了道路。为了防止许多强征入伍的士兵开小差，仍然不得不实行极端严峻的纪律；但士兵们也受到一些基本训练，养成了守秩序、讲服从的

习惯，这就形成了全国人民的特征，特别是下层的普通文职官员几乎全部是从前军人中招用的。

人们会说，这样一来，原先是私营的工业渐渐地国有化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非常重要的后果。部队驻扎在一些卫戍城镇，全部住在私人房子里。他们占城市人口的一个很大比例，往往达一半或更多一些，他们的补给和装备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央的仓库。驻军的出现，对于当地的贸易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家实行控制物价（这是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驻军的司令官们来实施。国家的和城市的行政制度的制定，实际上着眼于军事需要，充满了军事精神。事无巨细，国王都要亲自过问，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位组织家，热爱秩序和简约。他会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几个小时计算数字；为了保护军服，还戴着亚麻布的护袖。他在波茨坦使用德绍的利奥波德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他的巨人团队进行操练，这就算是他的休息了。无疑地，他本来是要想对全国人民进行操练的，而且他在这方面也走得很远了。

政府主要的问题，是要设法解决军队由于不断扩大所需要的巨大开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遂在财政和行政方面导致了许多重大改革，并且在发展各种生产和促进内部的殖民政策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在这方面非常突出。在他即位时，国家岁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王室领地的收入；二是两种形式的税收，乡村地区缴纳的“特别税”和城镇征收的“货物税”。在他的统治时期由于进一步开发这两方面的财源以及厉行节约，国家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在战争中又积聚了一批财富。

王室领地非常辽阔。据1710年当时人的估计，全部农民中有1/4到1/3是王室领地的农民。腓特烈·威廉一世改变了他的父亲统治时期曾试行过但发现有缺陷的制度，即将房屋和牲畜出售，并将王室土地“世袭地”无限期地租给农民，每年收取一定租金。这个计划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由于管理不当，而且收益大多被王室挥霍一空。腓特烈·威廉一世改用短期出租的制度。这个制度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地一直沿用到19世纪。根据这个制度，王室把整个“阿姆特”（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庄园）租给一个人，包括自用农场、边远农场和农民村落以及所有的附属设施，每年收取固定租税。此人可将其任何部分转租给他人。在6年的租期里，王室管家实际上取得了一个土地贵族所有的那

种权威和权力。他的一部分职责是要维持治安和管理司法。作为报酬，他可将罚款和关税占为己有，可以像庄园主那样享有对磨坊或酿酒厂，尤其是对于农民各种封建劳役的垄断权利。由于他担负一切风险，政府才可指望从王室领地上得到一笔固定的现金收入，从而可以编制预算。农场主无力交租或效能低劣者，可以立即更换。这个制度促进了一个农村中产阶级的成长，他们是农业发展的先锋。这个制度至少是要想通过定期检查、固定劳役并逐渐使之减轻从而使农民免受剥削的一种尝试。进一步的结果是，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用实物给官吏和朝臣送厚礼了。一些传统的根据特权而享有的东西继续存在一些时候，但总的趋势是一切事物都要以客观规定的金钱为基础，对此，财政部门则严格地负有责任。

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的末期，从王室领地所得的收入，大致与征税的收入相等。到1713年，“特别税”和“货物税”都已确立下来。“特别税”这种农村的税收，是一种复杂的财产所得税，而不是实际的地产税。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税就首先在勃兰登堡征收，通常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征收。只是在建立常备军以后，各省的等级会议才同意把特别税作为永久制度。然而各省等级会议原来征收此税的税务官员，逐渐由所谓军粮供应部的文职官吏取代；除东普鲁士以外，各地贵族都成功地抵抗住了对他们自己的土地征收这种税。根据各地的调查，特别税早已过时了；勃兰登堡是根据1624年的调查。各地的税率也大不相同；但又只是在东普鲁士，连腓特烈·威廉一世也敢坚持进行修改，要采用比较公平得多的“统一胡符税”^[2]（Generalhufenschoss）。腓特烈二世在新取得的各省（1742年在西里西亚，1772年在西普鲁士）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措施。但在其他省份，特别税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一直实行到1861年。这对农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根据欣策的说法，特别税平均约为一个农民净收入的40%。此外，我们不要忘记，农民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向地主缴纳差不多同样多的钱。

本来，城乡都征收特别税。但是后来发现对城市的征税过低，于是大选侯便在勃兰登堡实行征收货物税；最初，只是在一些选定的城市中实行，以代替原来的特别税；最后，则成为对城市的统一税收制度。货物税包括数量不大的地税、职业税和人头税，但主要是对食品、酒和各种商品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只有极少数的货物可以免交货

物税。这种税一部分是通过制造商或销售商征收，一部分是在商品运进城市时征收。腓特烈·威廉一世把他即位时在三个省所实行的货物税推广到所有的省份中实行，并使货物税成为一种控制经济的手段，这种手段不久即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即便是在他的继承人统治的期间，货物税仍然只是对城市的中产阶级征收的税。在城市中，工商业都得到精心的管理，以便增加国库的收益。“劳役金”是城市的又一种负担，这是向各户征收的为解决军队住房而提供的公共基金。

17世纪，德意志的许多其他国家也试行过类似的货物税。荷兰曾经带过头，而理论家们普遍赞成间接税。然而，收税并不总是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因为这需要有许多在严格控制下的可靠的官员。施莫勒说，在普鲁士，“主要由于货物税的需要，遂涌现出一支有能力的、办事认真的文官队伍，这支队伍在货物税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负责征收货物税的“地方军粮供应员”的职责，就可清楚地看到货物税的双倍重要性，它既是国家岁入的来源，又是控制经济的一种手段。地方军粮供应员是省军粮供应局派驻城市的代表。而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的最初几年里，省军粮供应局又受柏林的军粮供应总局的控制。要了解这些机构的职能，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进行的民政改革。这是一个非常能够说明这个强权国家兴起的事件；这个国家小心提防着国内自治机构拥有的权力，对其公民经济上的福利表示关怀，但首先决心要每个阶级都为军事实力的建立做出贡献。

城市在军事方面所要担负的职能，是要为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提供住房，并且通过货物税为这支军队支付一笔份额很大的费用。先是步兵，继而是骑兵均先后移住到城市中来。后者是在1718年才进城的，因为在城市里控制他们的行为比较容易，特别是可以保证做到他们买东西要付钱，因为农民曾不断地受到他们的剥削。但是，城市往往是由腐败无能的寡头政治家们统治着，生活过于安逸，讲究传统，首先是独立性太强，不合权力主义政府的口味。于是成立了政府委员会，根据城市的大小，一个一个地或一批一批地对它们进行检查，并且对它们的结构、行政管理和财政制度进行改革。整个过程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但大都在1740年以前完成。地方军粮供应官的责任是维持新的秩序，并且极力保证一切运转正常。

这时，进步分子的精神，就是启蒙运动的精神。他们喜欢合乎条理、讲究理性和实际的事物，毫不尊重个人的传统特权或任何其他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委员会将原有的市议会一扫而光，代之以一些由人数较少、领取工资的官员组成的机构。这些官员终身任职，严格地对政府负责。到腓特烈二世时代，如果这些机构已可以信赖，则准许它们行使增选权（这种权力起初只是有名无实的），但它们仍然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机构，完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3名市长分别负责治安、司法和经济事务，由6名或6名以上来自商业或各行业的市议员协助工作。市议会任命一名书记员、司库和秘书。如果它要召集市民代表开会，只需宣布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办，比如地方军粮供应官要查年度账。检查市议会的工作，尤其是检查市议会管钱的情况，这是地方军粮供应官的事情，与市民无关。在改革期间，国家承担了现存的一切债务，但市议会也因此失去了征税的权力。所有市镇在城外都拥有土地，如庄园、森林、公地，虽然可能非常分散，但面积却往往相当大。这些土地像王室领地一样短期租出，给市镇带来一笔固定收入。市镇的行政经常开支、官员的薪金、街道和公共建筑等的修筑和维修费用，都必须从这笔钱中开支，如有必要，还得从货物税收入中拨款补充。

地方军粮供应官不但要代表政府对一切事物进行监督并与驻军司令官合作，而且还要提出许多城市的改进计划。他管辖的地区，也许是一个大城镇，也许有六七个或更多的小城镇。他居住在这个地区内，并且要定期到辖区的各处走走，随时听取意见和建议。他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治安问题；这是那个时代（不仅是普鲁士）家长式的各级政府所赋予的含义十分广泛的“治安”。他要检查度量衡，为食品的质量取样，协助确定面包、啤酒和肉类的价格，并为出售烈酒颁发执照。他要极力做到给身强力壮的乞丐安排工作，把身体有病的送进医院治疗。他甚至还要管非社会的行为、酗酒、好逸恶劳和不满情绪等。他是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政府通过他来控制工商业，因为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后期，手工业行会已经失去其大部分的作用，政府自己担负起管理工业、调节竞争和维护工业质量的责任。

但是，地方军粮官全部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征收货物税，而且收集时要诚实和节俭。他指派收税员和关卡记账员，检查他们的每日簿记，向上级报送月统计数字。在一个由如此众

多的分散部分组成的国家中，在边境上征收关税并非易事，因此重商主义政策不得不主要通过货物税来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腓特烈·威廉一世及其继承人特别起劲地奉行这种政策。正如施莫勒所指出的，重商主义并不能用它的关于增加钱财或贸易差额等理论来衡量。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企图要使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达到比在城市或（德意志）的领土国家所达到的更加高度的统一，并且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改组社会和政府机构。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意图肯定地是想通过货物税来调节贸易流量，促进国内的各种生产，尽量不让外国奢侈品进口，或对需要进口的货物课以重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国库的利益，归根结底是为了军队的利益。根据同样精神，1721年又对谷物征税，这是针对波兰谷物的进口的，1732年则完全禁止进口波兰谷物；根据同样精神，1718年又禁止原羊毛出口；这项禁令一直实行了90年。补充措施则是：禁止进口外国布匹和棉花，在小城镇建立羊毛仓库，在柏林开办“货栈”，以便生产军官制服用的细布，这个企业后来曾一度由国家接管。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并且给予制造商和熟练工人特别是给予外国人以鼓励，但贸易仍然出现逆差，因为普鲁士的工业仍然处于初建阶段。

政府认为，普鲁士的工业发展特别受到了因循守旧、效能低劣的行会制度的阻碍。四周被农村包围的城市，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现在，人们认为，既然有了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利益而组织一切的中央政府，因此，改革过去曾经适应当时工业需要的城市体制的时候已经到来。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本着它的权力主义的热情加速改革的步伐，不容许任何组织像行会那样要求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实行自治。

当时的行会制度最明显的缺陷是，师傅们无法在学徒期满的徒工和徒工中间维持应有的纪律。但是，人们也有许多别的抱怨，认为熟练工人受到行会的已经过时的规章制度的限制，不能成为独立的师傅；抱怨行会与行会之间，城市师傅和所谓“骗子”的农村匠人之间，为了谁行谁不行的问题争吵不休。已经学徒期满而还没有成为师傅的工匠，早已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整个德意志各地的每个行业的这种行会中心，都已建立了联系。这些被称为“兄弟会”的行会中心，从15世纪创建时起，在一个如此重视一个人要在许多不同的中心

取得经验后才能定居下来的国家中，是很有用处的。学徒期满的年轻工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时，能在他的这一行业开会的客店里获得指教，找到朋友，如有需要，往往还可得到资助，特别是能够得到帮助找到职业。但是，一批年轻气盛的人，有时难免会有越轨的行为；如果他们一无牵挂，一旦出了事就可轻而易举地逃往自己的行业在另外一个城市、甚至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会中心去。各个德意志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设法对付这些工匠的罢工和混乱状况，1672年甚至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帝国法律，但没有奏效。可是，在18世纪20年代中，这个工匠问题在普鲁士变得尖锐起来，因为他们的罢工干扰了兴旺一时的同俄国的布匹贸易（俄国也需制作军服的用布），虽然事实很快证明普鲁士人竞争不过英国人。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倡议下，德意志各国家经过8年的磋商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1731年帝国议会实际上通过了一项各国一致同意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只有各个国家采取行动才能生效。在普鲁士，所有各个行会章程都尽快地修订了，1732年到1735年间还制定了一部新的普鲁士工业法，将行会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督之下，实际上使它们成了政府工业政策的工具；自治团体只有得到许可才能存在。

工匠这个产生动乱的主要根源终于受到了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的工会被取缔，所有的文件被没收，但每个行业仍可像从前一样有个客店作为集会场所（仍然可以作为招工处），仍可保留疾病保险基金，但要受到监督。工匠们仍可像从前那样各处流动，但只是在普鲁士领土范围以内。过去行会的陈旧习俗和用做暗语的由来已久的行话，均被废除，代之以由行会的职员和最后一个雇用他的业主所开具的证明文件，证实他的身份，证明他的品行端正。除非他能提出这种文件，否则无人会雇用他。他在新的雇佣地点，必须把他的出生证明书连同学徒证明书一并交给他的行会。如要更换工作，他必须更换由他现在的业主所开具的证明书。这个制度在德意志普遍使用，事实证明它是一种行之十分有效的管制形式。

即使在这次改革以后，普鲁士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残余，还是要比资本主义远为发达的英格兰多得多。但是，旧的形式业已适应这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的需要，而且一切事物都变得比德意志的其他地方更为官僚化、不讲人情而且平淡无奇。私人企业在某些方面被给予更多的活动余地，但总是在国家的监督之下，而工人则受到比以前更

加严格的控制。熟练工人不得离开这个国家，但却欢迎外国的工人移居普鲁士。学徒期满的工匠同农民一样，要被迫去服兵役，但是工匠师傅以及城市里其他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则可以免服兵役，因为国家需要他们为岁入缴纳货物税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政府越是努力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国家的资源并增加其军事实力，就越是尖锐地感到人力的不足。我们已经看到，这支军队则是从国外大量招募来的。据估计，18世纪从国外招募来三四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在普鲁士安家落户。从大选侯时代起，政府积极鼓励从德意志的其他各地以及从国外向普鲁士移居。统治家族属于新教中的改革派或称加尔文派，而其大多数的臣民则属于路德派；这一事实使得官方政策即使在那个哲学家国王的时代启蒙运动控制普鲁士以前，就已异乎寻常地允许信教自由了。大选侯欢迎在南特敕令取消以后从法国逃出来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当中许多人拥有财产，掌握一些普鲁士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工艺，还有一些人则是杰出的专业人才。1672年—1700年，总共约有2万名法国资产阶级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普鲁士定居下来；他们构成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知识界和经济界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732年，又有大约同样多的新教徒难民被逐出萨尔茨堡教区，来到普鲁士。他们是普通农民，历经无数困难，大多在东普鲁士定居下来。这是人数最多的几批。但是一直到腓特烈大帝统治末年，来自欧洲所有各国的移民，特别是后来从其他德意志国家来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前来。各个中心都有普鲁士的代理人在物色合适的人才，还设有专门的组织接待他们。我们从腓特烈的信件中可以得知，例如，如果萨克森的某个城市发生了火灾，他本人就会亲自吩咐他的一位官员去寻找现在可能愿意移居的有用人才。当然，要吸引人才，光靠宣传还不行，还要向他们提出，可以发给路费，开始时要给予某种支持；如果是农民，则可以给予土地，也许还有牲口和家具；如果是工匠，则可免费或不经正式手续就可取得开业权，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不纳税，当然还可免服兵役。工厂主还可以自己提出条件，他们备受欢迎。施莫勒说，根据保守的估计，1786年普鲁士全国人口中，有16%—20%是1640年以后的移民或其后裔。而根据迪特里希统计的数字，例如勃兰登堡的人口密度在18世纪期间增加了两倍多，从每平方“哩”636人增加到1930人，这个增长率是普鲁士以外的任何一个德意志国家以及他所提到的许多欧洲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所不能与之比拟的。比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09年的人口是1700年的一又五分之四，而法国是一又六分之一。

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国内政策的目的和结果已经简述如上，但是他在在位期间对政府机构所做的改革，对文职人员的改组，以及他亲自掌握控制大权的方法等，仍有待研究。在这些方面，就像他所缔造的军队一样，他给他的儿子提供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无须做多大调整就能胜任腓特烈要求它完成的任何艰巨任务。

我们已经了解，中央政府在城镇的代表——地方军粮官执行着形形色色的任务。地方军粮官是从团队军粮官发展而来的。当军队还在招募中，还在配备团长的时候，团队军粮官就照管着国王的利益。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企业。他的全称为“军粮和税务官”，这反映了他的职位源于军队。他的主要职责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收税。

在中部各省非王室领地的农村中，始终另有一套平行的官员在行使类似的职能。他们叫作“农村税务监督官”。每个税务监督官负责一个特定地区，监督对农村赋税，即特别税的征收；负责农民的（最广义意义上的）“治安”，即领导他们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图办事。这些税务监督官，原先是等级会议在地方税务委员会的代表，现在仍是乡村绅士。他们住在本区，由地方绅士阶级选举产生，除非对这个阶级抱着怀疑态度的腓特烈·威廉一世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只领取很低的薪水。他们不同于我们的治安官，在自己的庄园之外没有司法权。我们已经说过，租借王室领地的王室管家自己负责本地区的“治安”。而且，由于那里不缴纳特别税，承租户已经保证王室可以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所以农村税务监督官无权管辖他们，也管不着他们的农民。

城市的“地方军粮官”和乡村的“农村税务监督官”都对其负责的省级机构称为“军粮局”。军粮局是由一些常任官员组成的、由集体负责的委员会。每个军粮局又受柏林的军粮总局领导。军粮总局也是一个“委员会”式的机构，就是说它是由委员会投票做出决定。所有这一套官员的安排，时间还不长，是出于国家要维持一支费用日益增大的常备军的财政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应该有

这样一种利益观念，即普鲁士是一个统一的君主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不是一批小省的集合。

然而，正如泽莱所说，普鲁士过去的历代国王都是“将军和地主的混合物”。他们不但关心战争，而且也关心王室产业的有效管理。因此，除军粮总局以外，同时还有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财政权力机构，叫作“财政管理总局”。财政管理总局下设若干“所”，每省一个所，通过分布在全省各地的王室管家（每块王室领地，即每个阿姆特，有一名王室管家）管理王室领地。这些所的官员们的眼界要比军粮局官员的褊狭。他们感兴趣的是农村的经济，是开辟除王室领地以外的其他王室岁入的财源，例如盐的专利和啤酒税。不管怎么说，这两套班子经常发生争吵，不利于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两者于1723年合并成为一个管理系统。柏林的中央权力机构叫作“财政和领地”管理总局。各省的军粮局和管理所合并成省军粮和领地管理所。城市的“地方军粮官”、乡村的“农村税务监督官”和王室领地的“王室管家”也合并在一起，仍由原来的地方官员担任。

这种等级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一直沿用到18世纪末。管理总局负责整个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全面行政管理；负责管理它的财政，主要从军事需要出发；并且负责监督贸易和工业，以便促进全面经济繁荣，从而增加国家岁入。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代，这个机构由4名大臣和若干枢密财政顾问官组成，这些顾问官的人数不断增加，起初是三四人，最后竟达20人。每名大臣负责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省，但同时还负责一些全国性的工作。一名大臣负责邮政和造币工作，另一名则管理军需品，再有一名大臣负责土地利用政策和国家的边界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大臣们的分工同时遵循着两条原则，即每个大臣既要全面负责一个指定地区的包罗万象的事务，又要负责所有地区的一项特定工作。地方管理所的职能同样也混乱。它们除了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外，还具有重要的司法职能，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结果便产生了摩擦，后来这种摩擦由于腓特烈又建立了与管理总局平行的职能部门而加剧了。因此，施泰因对行政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1808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

即使是管理总局里的几名大臣级的成员，其职权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每个大臣只能初步考虑本部门的工作，一切问题都要提交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投票做出决定。委员会的集体决定如经国王批准，则

由他监督执行。真正的主动权通常是来自国王，他是委员会的主席，但原则上从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只是在阅读大臣的书面报告后，以“内阁命令”的形式发布指示。尽管在行政法明文规定的任何问题上，管理总局本身可以冠以“奉国王命令”发布政令，无须进一步请示国王，但是这种做法属于小心谨慎，把所有重大问题交由国王去做决定。这种“内阁统治”（同今天英国实行的内阁政府当然截然不同）的专制制度并不是腓特烈大帝的发明。他是从他父亲那里承袭下来的。唯一不同的是，他做出决定以前很少向他的臣属深入了解情况，而他的父亲则常常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办事。

这些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以充沛的精力，在1/4世纪的时间里，对整个普鲁士国进行改革中，在军事、财政、经济和行政方面所做的主要改革，为普鲁士在他儿子的统治下迅速地壮大准备了条件。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极为良好，国家岁入可达700万塔勒尔^[3]左右，其中500万可用于军事。剩余部分不但可以支付文职人员和宫廷的全部费用，每年还可拿出部分储存国库以备战时之用。到1740年，已经节余了近800万塔勒尔，这些钱装入木桶，藏在王家城堡的地下室里。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对于军队的关心，已经远远不止特别宠爱他的高个儿的近卫团了。在一个居民不过200余万人的国家里，他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野战军（就是说不包括守备部队），和平时期的兵力达7.2万人，是他父亲在战时所能征召的人数的两倍，可与法国的16万、俄国的13万和奥地利的8万到10万的正规军估计兵力相比拟。

如果没有这些成就，普鲁士就不可能朝着它后来发展的方向迅速前进。这些成就是在做出一种抉择后取得的，包括相对地忽视了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直到那时，却一直是德意志的各个路德宗小国的主教政府所关心的头等大事。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心追求权力，他把维护下面小国的正义和提倡纯正的教义为来生做准备等均置于从属的地位。他笃信宗教，但又不拘泥教义，具有虔信教徒的倾向。这位国王的宗教政策的目的是，要平息新教徒之间的宗教论战——这在教义上是明确禁止的——并且使路德派（他们是臣民中的大多数）和处于少数的改革派（王族也属于改革派）团结一致，都成为好百姓。他甚至允许军队里的天主教徒拥有自己的牧师。但是，他不愿和耶稣

会会员来往，特别是1724年他们在波兰的托尔恩城对待新教徒的态度，当时他曾试图营救被判死刑的主要人物失败以后，更是如此。

国王在1722年的政治遗训中概述了他的政策，提醒他的继承人不要让任何宗教的牧师干涉世俗事务。而这些牧师全都一心想要成为小教皇。普鲁士的小学教育仍然掌握在教会手里，同别的地方一样不为人重视，就是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也没有什么进展。农村学校极少，教师也只有老兵充任，也许还有坐着干活的工匠，比如裁缝，他们一边缝衣，一边教书。腓特烈·威廉一世也瞧不起高等文化学校，除非是一些明显地有某种实用价值的，如能为军事服务的卫生学校，或能实际训练文职人员的经济学讲座。

至于法律，国王在1722年说，他已经不遗余力尽快地实施法律，不得拖延，并且减少不公正的行为，但收效不大。他后来也没有认真地要求改革法律。他的目标是，一件民事诉讼即使在向两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也要在一年以内得到最后的解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要求将普鲁士的法律编纂成法典。至少在东普鲁士，萨穆埃尔·冯·科策伊公布了一部现代形式的省法典，使司法行政有条不紊。腓特烈·威廉在位的最后几年里，科策伊出任首席法官时，他的改革热情在反对者的阻挠下，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主要因为没有得到国王坚定的支持。总的来说，国王对法学家们是瞧不起的，他强迫律师穿着短得可笑的袍子，以便“让公众知道他们是在跟谁打交道”。在他即位初期，勃兰登堡首先开始对刑事程序做了小小的改革，后来又扩大到其他各省，其结果主要提出了一些中央控制庄园法庭和民事法庭的措施。对被告进行预审以后，诉讼依然完全以书面形式秘密进行。尽管启蒙运动已经取得进展，有些惩罚之严厉，仍然有增无已，虽然已经禁止严刑拷打。窃贼通常仍被绞死，杀婴犯要被装进麻袋活活淹死。

随着王储腓特烈逐渐长大成人，父子间性格上截然不同，由于父亲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家族中的意见分歧以及政治上的钩心斗角，遂导致了德意志的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们经常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意志冲突。这对于像普鲁士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头等重大的危机，因为这个国家的不受控制的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和能力。“假如腓特烈真的干了根据过去的种种传说他所想干的事情，下令处决他的儿子，那么他本想维护的这个国家，反而会处于顷刻崩溃的危险境地。”^[4]但是，普鲁士还算幸运，

王储在目睹了他的朋友卡特被国王下令斩首以后，屈从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虽然他起先满腹怨恨。对于企图出逃之事唯一应当负责的是腓特烈本人，卡特却成了他的活生生的替死鬼。但是，从他后来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开始看到在他父亲可怖的狂热背后，有一个与他自己的本性并不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动机。他在屈斯特林熟悉了地方的政事，并且在有了自己的团队后了解到普鲁士军队的精神以后，这个动机对他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他被感染，意识到对于比自己个人更为伟大的事业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一经与对权力的爱好相结合，那种曾经促使他同父亲对抗的一意孤行，就变成了对于光荣、对于现实权力的追求。这种追求在他当上国王以后，就促使他采取了他的第一个决定性行动，入侵西里西亚。

1737年11月，这位王储就已写信给格鲁姆伯科说：“上帝似乎已经注定国王做好智慧和谨慎所要求的一切战前的准备工作。谁能说上帝不是已经赋予我使用这些准备工作的光荣使命，去实现国王的远见所推进的那些目标？”腓特烈已经认识到，要把继承父亲事业的基本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表现出他自己的生机勃勃的性格。

（正如兰克所说）在老子身上，专制制度仍然以独断专行的形式出现，完全表现为17世纪时的那种赤裸裸地迷信武力，再加上带有虔信派教徒的那种宗教感情。因此，他即便是在对他自己的利益不利的时候，也会认为德意志帝国必须有一个总的秩序。另一方面，在儿子身上，从他早年起就表现出一种朝着他自己的个性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劲头；他以自学者那种双倍的热情吸收他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在宗教方面，他只坚持那些最一般的原则；帝国授予他权力时，他就承认帝国，要求他尽义务时，就翻脸不认账。[\[5\]](#)

要研究这位近代史中最杰出的国王的性格，不属于本章的范围。这位国王的天赋，在许多方面等于天才，虽然这些天赋在他的活动里，十之八九表现为一种能够吃苦耐劳和忍受难以忍受的事物的无限毅力。我们要研究的是，他对于普鲁士的组织和崛起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他在继承父业，在逐步建立军队、行政管理和财政方面所做的贡献。他在遗嘱里恰如其分地声称，他为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那个社会的兴盛，按照他的理解，像每个人一样，尽了他应尽的义务。他在他所做的成就中指出了他维护法律，改革司法，管理国家的财政，通过明智的纪律建立了一支欧洲最精良的军队。正如他坦率地承认的那

样，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始终遵循着腓特烈·威廉一世克尽职守献身国家、严格节约时间和金钱以及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军事效率的传统。此外，他还增加了新的一条，关心作为经济发展前提的司法管理。最重要的是，他冒着前功尽弃的风险，策划了两场战争。结果，普鲁士幸运地第一次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它的国王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在这些方面，主要的事实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史学家们对于这些事实的解释，对于未来行动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在不同的方面要强调什么，由于他们的国籍、政治观点以及总的哲学思想不同而大不相同。在塑造普鲁士性格方面，腓特烈的贡献要比他父亲的明显，尽管影响也许没有那么深远。腓特烈·威廉一世建国过程中产生的集体行为方式，保持了两个世纪，并从普鲁士发展到整个德意志。但是，在他从事第一次战争后被欢呼为“大帝”的腓特烈，甚至抓住了当时对他的政治目标持反对态度的人的想象力，就像年轻的歌德那样使他们在感情上“德国化”，如果说不是“普鲁士化”的话。而对于普鲁士后来的统治者和军人统治阶级来说，他则成为无与伦比的完美榜样了。

腓特烈·威廉一世死时可以瞑目了，他知道普鲁士的命运已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里。但是，当时那些并不了解父子之间和解的全部内情的人们，却吃惊地看到一位在莱茵斯贝格时身边围着许多法国才子、显然热衷于法国启蒙运动文化的年轻王子，一位跟伏尔泰通信，不但用当时的文体写作法文诗歌，而且还写过鄙视征服者、歌颂真正人性的《反马基雅维利》的年轻王子，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名狡猾和不抱幻想的外交家，一名大胆而果断的将军，一名冷酷而又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然而，《反马基雅维利》一书远不是像表面看来那样同腓特烈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相矛盾的。它的矛头主要针对宗教上的忏悔；针对小公侯们无能的独裁统治，抨击这些人可耻，只要抓到权力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腓特烈明确表示过的理想是，一个国王应当是国家的天字第一号的公仆，应当孜孜不倦地为促进民族的繁荣昌盛而鼓励工商业——他可能还要加上这一条，以此作为取得真正权力的手段。

腓特烈即使在登上王位以后，还在他的诗歌中常常谈到（某些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还认真地把它当作一回事），他的最深刻的愿望是要

摆脱战争和一个君主的操劳，“静静地躺在哲学的怀抱里”。但是，他在莫愁宫一面的生活和他另一面的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其说是实在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哲学”主要指文艺生活，就是法国反教权的贤人过的那种怀疑宗教教条、自以为摆脱了庸俗幻想的优雅生活。腓特烈用从法语中汲取的而又始终未能完全掌握的格调和情调写诗，的确从中得到了真正的乐趣和休息。在那个堕落的时代里，一个政治家同样可以做做填写字谜来消磨光阴的游戏。他热望既是名副其实的国王，同时又当聪明睿智的王子，但当国王却是他的命根子。他有时以伊壁鸠鲁的态度，时而（尤其在他的晚年）用斯多葛派的态度，努力从哲学的观点去看待生活中的邪恶。他在后期写给达伦贝特的一些信件中，似乎显示出从上述这些源泉激发出来的并受到艰苦生活检验的真正的智慧。但是，总的来说，腓特烈并无哲学家的超然境界。他的基本信念是，“人生来就要行动”，至于他怎样看待世界，那是无关紧要的。在信心十足的青年时代，他曾希望“通过深思熟虑来迫使命运屈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充分意识到，有的事物比自己个人更为伟大、更为持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他要达到一个他不理解但坚信是存在着的目的，因为尽管他怀疑宗教，但他仍然是一个深信不移的自然神论者。在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继承而来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责任的背后，也许就带有一些这种感情，虽然在他的意识中更多的是对于可能属于他的权力和名望的欲望。

在组织一个强大的国家中，我们认为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完成的带有普鲁士特色的工作已经很多了，腓特烈在这方面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正如哈通所说：“建立普鲁士国家的工作，在1740年以前已经大体完成。腓特烈大帝对其基本面貌并未做什么改变。”

[\[6\]](#)他使这个制度继续朝着强化专制的方向发展。但是，他同他的父亲一样，根本上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组织者，只是他更加雄心勃勃，更能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罢了。他的无限的自信和勇气，可与他卓越的天赋才智媲美，因此从一开始，他的政治目标的形成以及由此而对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对奥地利的态度，正如兰克对父子二人所做的鲜明的对比一样，与他父亲的大不相同。腓特烈·威廉一世性情暴躁，动辄对惹他生气的人挥舞拳头——腓特烈年已18岁时，还当众挨打受辱，因此愤然逃走——但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却爱好和平，愿意节省潜力。军队是他的掌上明珠，决不轻易动用。腓特烈不像他父亲那样尊重帝国的传统，而对于自己的以及他的王朝的尊严，却怀有更

加强烈的感情，因此他认为普鲁士在他父亲的统治时期，在与奥地利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当查理六世皇帝死后，哈布斯堡家族没有男嗣时，腓特烈当即决定了一项大胆的侵略政策。他认为，通过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他就能拥有扩张普鲁士的势力所需要的下一个目标。政策说：“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对西里西亚提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法律上的权利要求。”^[7]腓特烈甚至连谈判都不愿考虑。他不顾一切忠告，不加警告即入侵西里西亚；他低估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志气和品格，坚决要让她面对既成事实。他让法学家们去编造权利要求，那是他们的职责。根据同样精神，他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曾两次计划并在第二次实现了单独媾和。对于这种事情，《反马基亚维利》一书曾明确地加以谴责。

无须着重说明，所以罗列这些事实是为了理解后来的德意志政策。但是，应当记住，腓特烈完全可以这样声称，对于他的对手们，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国际政治中，正如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所说，他是在跟“骗子们和窃贼们”打交道。伴随着战争的每一进程的曲折的外交史，揭示出法国和其他大国同样不顾普通的道德。腓特烈在1743年的《我的时代历史》一书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个人的道德并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只有本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的，一个统治者必须准备在必要时自食其言。这一段话在1746年的版本中说得比较缓和了，但“人民的利益”仍被认为是要首先考虑的因素。在1775年的最后一版里，则试图对由此而给予君主的这种危险的自由有所限制，只是在盟国首先违约或在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履行诺言的情况下，才允许不遵守条约义务。腓特烈声称道德并不能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以制裁做后盾的高等法院可以向之提出上诉，这就把道德与法律混淆起来。从《政治遗嘱》的第一个版本（1752年）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一直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普鲁士已经以实力和决心而闻名于世，但也已因残忍和不可靠而出名了。在这个遗嘱里，他提醒自己的继任者，食言不要超过一次，无论如何不要超过两次。在第二种版本（1768年）里，他争辩说，无论大事小事，即使是权宜之计，要做无人能够信任的马萨林^[8]那样的无赖小人，都是不明智的。他在七年战争中懂得，没有一个国家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他这时需要的是俄国的支持。整个论述说明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无法无天的

状态。这就是例如坎特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写作的背景。要建立他所说的国际联盟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不应再把和约看作是下一次战争的准备工作。因此，他认为，只要外交行动按照“先动手，再找借口”或“如果你干了骇人听闻的事情，就说你没干”这样的准则行事，那么就不可能建立持久的和平。

要研究腓特烈的和平时期的政府体制，最好研究1746年到1756年这10年。这个时间介于两次战争之间，他的主要成就都是从此时开始的。七年战争以后，他的任务是使国家得到恢复，发展已经开始的规划。正如他的《政治遗嘱》所表明的，他始终意识到，作为普鲁士国王，必须经常备战，并把整个政策立足于这种准备。他负双重义务，既要按他家族的传统行事，作为国王又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欣策从中看到了一种悲剧性的因素，因为“这种自由行事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决定他的一生的那种命运”。古奇根据这种解释，做了德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典型的英国式的道德评论：“比较公正的观察家们可能喜欢用这样的老话来说：他是自食其果。”

腓特烈沿用他父亲的“来自国王密室的统治”这一制度，而且更加相信自己，更不相信他人。他根本不相信他的臣民大众的人格，并且蔑视他们的聪明才智，因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国务大臣们只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已，对待他们粗暴无礼。但是，他自己的精力和效率却是无法表扬的。他一夜只睡五六个小时，黎明即起，早饭前批阅大使们的公文和贵族的来信；到正午中饭以前，来信已一一作答；对于如何处理所有的请愿书、政府部门的报告和其他国家的文书（这些已由他的私人秘书分类，供他做出最后决定），则以书面或口头做出明确的指示。威廉二世皇帝后来也仿效这种直接在文书上用铅笔做简单眉批的做法，只是别具一格而已。

这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国王，事必躬亲。他总是高高兴兴地随时集中精力处理手边的工作，日理万机，坚强地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他没有家庭的牵挂——他的那位可怜的王后虽然养尊处优，表面上受到尊敬，但自西里西亚战争以后，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人影——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书桌的台历上记着当天和本周要处理的工作，重要报告预定报来的日期等。全年的工作也有安排，这样他就能在5月到8月之间有计划地视察他的王国，并在秋天视察军队。他出门时总是带着秘书，还是像在家里一样日理万机。

但是，这种以一人为轴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缺点不仅是，在一个世袭的君主国家中，不可能保证连续出现它所必需的一系列的超人。而这个国家的事务，像如今的普鲁士那样错综复杂，即使有腓特烈这样的人物充当元首，这种制度也不会运转自如。正如W.L.多恩^[9]所指出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严重缺乏和谐的协调”，因为腓特烈做事太不自量。他几乎完全靠书面文件来了解情况，因此文件必须尽量写得简单明了，否则送来的文件堆积如山，他是看不过来的。他同大多数官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的经验和判断是用不上的，因为不允许他们发挥主动精神。因此，在非常专门的问题上，他就会草草做出决定，势必要犯错误，然而在原则上他是从不承认错误的。他疑心重重，独出心裁地利用各种形式的查核和反复查核；他让官员们互相暗中监视；又派出名叫“检察官”的特务去监视所有的官员；他直接同下级官员联系以核实他们上司的报告；他每年收集关于所有官员的行为的秘密报告；而且，他还尽量利用每年巡视的机会，亲自检查一切。但是，尽管如此，像西里西亚的霍伊姆这样狡猾的大臣，肯定要尽力使用隐瞒和欺骗的手段，使自己免遭灾殃。^[10]据本肯多夫说，另一个名叫赫尔·冯·富克斯的大臣在床边藏着一只箱子。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箱子一看，发现里面装着的不过是一些法令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据我所知，这些法令均未得到贯彻。”^[11]虽然真正的腐败并不多见，但报喜不报忧、隐瞒事实真相，许多人只是想讨好国王，也许还有点想炫耀自己。在希特勒统治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发生。

总管理局很快失去国王的宠信，因为他办事速度太慢。他在1748年为该局起草的经过修改的指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该局官员的缺点；如果他们同贵族或农民发生争端，他倾向于要他们承担责任。他还提醒他们不要为了增加岁入而去剥削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因为他需要一个忠诚可靠的农民阶级做他军队的后盾，所以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他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解放农民，因为他需要贵族忠心耿耿的支持。出于同样的道理，他不打算像腓特烈·威廉一世过去所做的那样，为王室领地买进贵族的产业。在他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中，他像他的父亲那样，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不过他的观点有着明确的理论基础。他对他的官员们说：“有两件事对于国家的福利有利，一是把外国的钱赚进来，这是商业的任务；二是不让国内的钱不必要地流出

去，这是制造业的任务。”^[12]他即位后第二年，就发现总管理局不能胜任促进贸易和工业的任务，于是便成立了他的第一个职能部。七年战争爆发前，他又分别成立了另外两个部。一个是1742年成立的负责新近获得的西里西亚的事务；另一个是1746年由于在战争中接受了军粮局常使他失望这个教训以后建立的负责军事行政管理的部。

在七年战争后的艰难岁月里，腓特烈对总管理采取了最不客气的态度。1766年，他建立了“税务署”，这就使得他的许多重要官员几乎达到了空前公开对抗的地步。他采取非常步骤，建立了一种在法国包税商德洛内和大约200名法国职员领导下的新的货物税制度。这就表明，他对这些征收货物税的税务官员们的工作效率，甚至他们的诚实程度完全不考虑了。这些法国人引进了法国的收税方法，并且从这位国王的臣民超过1765年收益的部分中榨取了一定比例的金钱。要是挑选出的代理人能做出必要保证的话，国王会像法国人所做的那样，把收税工作全部承包出去的。邮政也曾一度（1766—1769年）操纵在法国人手里。这种别具一格的民族主义，是理性时代非常突出的特征。后来又另行建立了采矿部（1768年）和森林部（1770年）等部。政府的另外几个部门被置于只向腓特烈本人负责的官员的控制之下，即造币厂（1751年）、政府银行和烟草专卖局（1766年）以及咖啡专卖局（1781年）。外交部和司法部甚至在腓特烈·威廉统治时期，就已和总管理局分开。

这些专职的部，摆脱了总管理局的烦琐手续以后，办事速度快多了。为了同样的目的，腓特烈也告诉总管理局本身的各个大臣，无须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就可独立行事。他们跟他们通信，而且常常跟他们的同事个别通信，于是集体负责的原则便逐渐被破坏。这样，国王的负担在一个方面减轻了。因为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他通过详细的“章程”向政府的一个新的部门下达“进军令”后，他们就全面地掌管起全部的日常工作，通常效率极高，虽然都急于按照一套陈腐的方法去行事。但是，也有严重的不利方面，就是没有任何规定，对于共同问题必须要像正常的内阁政府那样加以讨论。他们却要在他们之间公文往还，这样就使原已堆积如山的文件更为增加，而且除国王外谁也看不到一个部门与整个政局的关系。然而，省议会继续控制着各自省内的整个复杂事务，仍然保持着集体责任制。这些机构本应属于总管理局管辖，但国王却绕过总管理局，越来越信任它们，让它们去组

织这些情况迥然不同的地区的经济生活，而地区中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各省议会的议长总是贵族，他们成了地方上最有影响的人物，经常同国王保持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领导下，农村监督官（也是贵族）在王室领地以外的所有乡村地区，这时不仅在中部各省，而且在除边远的格尔德兰和东弗里斯兰以外的所有地方，行使广义上的“治安”权。而地方军粮官像以往一样，实际上继续统治着城镇。西里西亚被占领后，它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按照其他省份的方针组织起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它是被置于一位只对国王负责的大臣的管辖之下。

企图促进国家的经济生活，始终是腓特烈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这种企图就像他的父亲的企图那样，并不是为了每个百姓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他继续努力推行国内的殖民政策，其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为这些殖民者安家落户做好准备，是省议会最棘手的任务。每一英亩土地都要利用起来，即使是沙质荒地、高沼地和沼泽地也都辛勤地开垦出来。这样，在战争间歇期间，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奥得河流域的沼泽地带，便有近300个新村庄建立起来，大多数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七年战争以后，有更多的村庄出现了，当时有4000多万塔勒用于各种改建计划，主要是发展农业。在这一时期，还大力引进英国最新的农业方法和新的作物，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马铃薯，虽然后来也种植甜菜。像对待所有其他的改革一样，农民们顽固地拒不接受这些改革。马铃薯虽是在18世纪40年代就引进的，但一直到1770年至1772年间才开始大量食用，这时如不生产马铃薯，就有发生饥馑的危险。最后事实终于证明，种植马铃薯要比为控制谷物贸易而采取任何煞费苦心的措施还要行之有效。政府试图巩固土地的承租权，但是很不成功。因此，只是为了维护州县的征兵制度，农民的土地才受到保护以免被地主圈为己有。乡村仍是封建性的体制。在绝大多数私人庄园里，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农民仍然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半农奴，往往要负担无穷无尽的劳役。城乡之间保持着鲜明的差别，按照传统的原则，每个阶级都要为国家的军事力量做出自己的贡献，士兵主要由农民充当，贵族则提供军官和主要官员，商业和工业阶级提供军费。

腓特烈特别指望工业能增加国家的岁入，把他父亲时代的消极贸易差额变为积极贸易差额。从这个观点来看，手工业是无关紧要的。

它只提供国内广大百姓家庭消费用的普通消费品，而且数量较少，因为今天商店里出售的许多商品，在当时都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改革以后，行会已经成为由国家监督的机构，用来控制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它们仍然维持原样。腓特烈的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上。在这一方面，普鲁士同萨克森和莱茵河下游的某些地区比较起来，是落后的；与英国、荷兰、法国或瑞士相比，则更为落后。煤和铁的时代还没有开始；在发展这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机械只起着很小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古老的手工艺。然而，工人是按照家庭工业，或旧概念中的“工厂”进行组织的。例如，手织机工人用中间商人提供的纱线织布，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家中织，也可以在中间商人的车间里干。中间商销售产品，他们从中间商那里得到劳动报酬。一些制造业在政府的特别许可下建立起来，摆脱了行会的清规戒律。腓特烈·威廉一世按照这些方针鼓励生产羊毛制品的企图，被积极地继续下去。他的儿子腓特烈对于丝绸更感兴趣，由于缺乏丝绸，国家花去了大量的金钱。他甚至想让柏林附近的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种桑养蚕，但是不大成功。而用进口原料生产上层阶级大量需要的奢侈品丝织品和天鹅绒，倒是收效不小。我们已经知道，普鲁士特别注意寻求具有技术或拥有资本的移民，千方百计地劝使他们在城市——特别是在柏林和波茨坦——定居下来。腓特烈所需要的是个体企业，而不是国营工厂，虽然他接管过一家处于困境的陶瓷厂。但1749年以后，他就像担任商业大臣一样，像指挥打仗一样地领导工业化计划。他与所有有关的人员保持接触，利用普鲁士的驻外代表充当商务代理人。同19世纪的工业相比较，所收效果从数量上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要。因此普鲁士，尤其是柏林，已经顺利地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腓特烈统治的末年，丝织品和毛织品是普鲁士最大的出口项目；从勃兰登堡运往外国（当然包括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丝织品价值达65万塔勒尔，毛织品达62万塔勒尔；运到普鲁士其他各省的丝织品和毛织品的价值分别为47万塔勒尔和50万塔勒尔。棉织品的价值还不到二者之中任何一项的价值的一半。这时，贸易顺差达三四百万塔勒尔，工业总产值估计约为3000万塔勒尔。

从1747年起，腓特烈定期地把贸易统计数字用于制订经济发展的计划，调节货物税率以控制商品的流通。在中部各省和西里西亚，国内贸易的关卡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易北河和哈弗尔河之间以及哈弗尔河和奥得河之间，均开凿了运河，沟通了柏

林的水运贸易，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和什切青被迫放弃了它们的主要权利。同时，又设置了种种障碍以阻止进口货物，因此为了保护各新兴工业便进行了一场关税战，特别是与汉堡、萨克森（莱比锡）和奥地利的关税战。海外贸易的某些不为过分的企图，终成泡影。谷物贸易（主要是黑麦，有钱人才吃白面包）继续通过国家仓库（已从原来的22个增加到32个）加以控制。这是为了备战备荒，保持粮价稳定；这主要还是为了军队的利益，因为军队在和平时期必须自购口粮。在较大的城市里，他们至少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3，波茨坦和柏林的比例还要大得多。事实上，这种经济制度，尤其在保证军队具有战斗力方面，证明它是正确的。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支出虽然增加到约1.5亿塔勒尔，但它无须另行征税就能应付过去。当然，英国的津贴（1758年起每年400万塔勒尔），在占领区征收的战争税（在萨克森，一年从500万到1000万塔勒尔不等），以及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也为筹措战争费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腓特烈统治时期，军队增加了一倍多，从7.2万人增加到19.5万人，最后占人口的4%，差不多需要国家岁入的2/3，才能维持这支军队。同时，战费金库也从800万增加到5000万塔勒尔。差不多一半岁入仍来自王室领地，其余的来自征税。乡村地区的特别税保持原来的固定税率，但货物税却随着中产阶级纳税能力的提高而提高了。

这里，我们无须阐述腓特烈在和平时期是如何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不断地改进他的军队和国家的防务的。他修筑了新的防御工事，特别是在西里西亚；改进了战略补给线上的粮仓制度；定期操练和检查各种武器；写了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指挥手册以及一首引人注目的诗。还密切注视着每年军事演习的各项事务。

腓特烈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首先在司法行政管理方面，几乎没有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在这方面，他实行改革的动力也是出于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司法也必须由国家管理，才能完成巩固国家权力的过程。西里西亚战争一结束，科策伊就能够继续进行在前任国王统治末期业已中断的工作。1746年，他在谒见国王时提出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有三个主要目的：（1）在全普鲁士境内建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司法系统，使用新的统一的程序，尽量减少拖延；（2）精简工作人员并提高其水平；（3）将法律汇编成法典，供全国使用。前两项目标经过5年的努力达到了，但是汇编法典之事到腓特烈统治末

年，仅仅是个计划而已，一直到1795年才由卡默尔完成。改革结果，每省只设一个中心法院。诉讼当事人对该法院多数法官的裁决，只能向柏林的高等法院上诉。法官人数减少，报酬优厚，但不能像以往那样把收费和罚金占为己有，也不准把档案材料送在大学法律系去征询意见。地主必须提供经国家批准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来主持他们的庄园法庭。城市中的其他初审法庭则已经过改革。各地的司法程序都简化了，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速度大大地加快起来。在拖延最为严重的波美拉尼亚，头一年内就解决了3000件突出的诉讼。律师经过考核，一些不合格的被清除出这个行业；他们不得已地继续穿着招人忌恨的短袍褂，腓特烈要求他们这样打扮成法官的模样。

科策伊甚至试图废除行政司法，却没有成功。各省议会在任何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在国家岁入的问题上，保留了很大的司法权。但是，国王本人原则上同意不干预民事案件的正常审判过程，例如在处理请愿书的时候；然而，在刑事案件中他常常进行干预，随意撤换或惩罚他认为不满意的法官，在莫愁宫磨坊主这一著名案件中就是这样。现在事情比较清楚了，在这一案件中，他是错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大大保障了普通百姓的民权，特别是在财产方面，因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维明 译）

[1] O. 欣策：《1752年腓特烈大帝的政治遗言》。转载于F. 哈通所编《论文集》，第3卷（莱比锡，1943年）。

[2] “胡符”是德意志农户占有土地计量单位，大小因地而异，合7—15公顷。——译者注

[3] “塔勒”系德国旧时的一种银货币。——译者注

[4] L. 冯·兰克：《普鲁士历史十二卷》（德国科学院全集，慕尼黑，1930年）第3卷，第341页。

[5] L. 冯·兰克：《普鲁士历史十二卷》（德国科学院全集，慕尼黑，1930年）第3卷，第341页。

[6] 《15世纪至目前的德国宪法史》，第2版，（莱比锡和柏林，1922年），第74页。

[7] O. 欣策：《霍亨索伦家族及其业绩》（柏林，1915年），第324页。

[8] 马萨林是法国枢密主教黎塞留的继任者，法国首相，曾组织法国与紧靠法国边界的德意志各州的防御联盟（莱茵联盟）。——译者注

[9] 《政治科学季刊》，第47卷（1932年），第75页。

[10] 《政治科学季刊》，第46卷（1931年），第417页。

[11] 《普鲁士粮食贸易政策》，第3卷，第40页。

[12] F. 哈通引自经过修改了的指示中的眉批，见《普鲁士行政管理之研究》（柏林，1942年），第23页。

第十四章 俄国

1709年在波尔塔瓦打败瑞典以后，俄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彼得大帝在那次战役前所做的变革都是临时性的和试验性的，大多为了适应战争的直接需要。当波尔塔瓦战役取得胜利，俄国摆脱遭受入侵的威胁之后，他就着手进行一项周密的、坚定不移的改革计划。他的那些永垂青史的业绩，都是通过这项计划取得的。

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是森林，南方肥沃的草原地带尚未开垦。向南推进的殖民运动的开路先锋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他们大多数是逃兵，躲避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逃亡的农民。他们都鄙视农活，靠沿河打家劫舍维持生计。莫斯科省中部是俄国的主要农业区，一些农民烧去小片森林，刀耕火种三四十年，然后转移到别处，再重复这一过程。就是在有比较长久定居的居民的地方，农民也不愿花力气让土壤肥沃起来，因为他们的小片土地每7年到12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多数农民使用一种带有铁犁头的轻便木犁，然而有些人仍然喜欢一种已在俄国使用700年之久的原始钩犁。虽然彼得大帝努力推广长柄大镰刀，农民还是使用普通镰刀收割庄稼。黑麦是俄国中部的的主要作物，但是彼得说服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生产供出口用的亚麻和大麻。从圣彼得堡到喀山一线几乎没有农业，居民大多是伐木者、设陷阱捕兽的人和捕鱼人。但是，整个北部森林地区出产黑貂、貂、狐狸和松鼠皮毛，还出产盐，尤其出产木材，仍是俄国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彼得统治时期，俄国铁产量大量增加，军需品可以自给自足。荷兰工程师维尼亚斯于1632年在图拉建立的铁工厂，经过扩建，为1695年彼得对土耳其人的最初一战提供了大炮和船具。对瑞典的战争开始以后，又利用在拉多加湖西岸发现的铁矿资源，在奥洛涅茨和圣彼得堡建立铸造厂。但是，勘探者已在乌拉尔山脉发现优质铁矿石，那里有大量木材可供冶炼之用。1699年，图拉的工头德米多夫被派往涅夫扬斯克建立铸造厂。彼得去世以前，又有10个铸造厂在乌拉尔投入生产。波尔塔瓦战役结束不久，俄国停止了铁的进口；到了1716

年，反而自给有余，可供出口了。到1725年，俄国的铁产量已达2万吨，其中一半以上出自乌拉尔。

彼得还希望看到他的军队都穿上用俄国自己生产的布制作的制服。但是，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莫斯科地区新开办了15家纺织厂，他的这一雄心壮志却始终没有实现。到1725年，俄国已有各种工业企业200多家，许多拥有几百名工人。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彼得通过国家的直接投资为其中的一些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他不赞成长久使用这种方法。从1712年起，他坚持商人应当把贸易的部分利润用于工业。北方大战之后，他下令将国营企业交给私人。

新企业在劳动力供应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城市，私人企业雇用当地穷人，国营工厂则使用窃贼、妓女、醉汉和孤儿充当工人。在人口稀少的地区，铁工厂和其他企业大量征用属于国家土地上的农民。1.2万多农民应征进了奥洛涅茨工厂，2.5万左右进了乌拉尔的矿山和工厂。从1721年起，允许商人开办的工厂的老板购买农民。为了避免侵犯贵族的权利，这些农民在法律上永远不属于工厂老板，而属于工厂。劳动力虽然非常充足，有技术的工匠却为数不多。一些俄国人受到了在俄国工作的外国工匠的训练。1711年以后，国家要求工厂经理为15—20岁的徒工开设训练学校。但是，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工业技术水平在彼得统治时期并无提高。

在战争的刺激下，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发展国内贸易的许多障碍依然存在。彼得即位以前，铺筑过的大道不过是在土路上铺一层木板。彼得考虑过建设一个石铺道路网的可能性，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而赞成改善水运。1708年，他开凿了连接伏尔加河和涅瓦河的运河，使波罗的海的造船木工用上了伏尔加河中游的栎木。1718年，另一条沿拉多加湖的运河破土动工。但是，运费仍很昂贵。比如，粮食从库尔斯克运到彼得堡，价格要增加1600%。私人贸易还受到关税阻碍，城市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境上均设有关卡。另外，虽然贵族、农民和教士可以免税从事商业活动，每个商人却要交付占营业额5%的年税。信用设施还几乎没有发展。商人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私人票据兑换制度，国家也用它来进行交易。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以及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人们用现金支付小笔款项。但在西伯利亚东部，当地居民依然喜欢物物交换。

彼得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立足点以后，俄国对西方的出口量便逐年成倍增长。攻占英格里亚以后，他要求那些控制着跟西方的大部分贸易的外国商人将他们的仓库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迁往彼得堡。17世纪90年代，每年只有五六十条外国船只停靠阿尔汉格尔斯克。而在1720年，开进波罗的海诸港的商船就有100多条，1725年超过650条。彼得并未有意追随科尔伯特，但他急需钱花，因此基本上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1715年，俄国在西欧开设领事馆，推销俄国商品。国家还出钱派俄国商人出国学习经商之道。1724年，彼得对所有奢侈品和国内能够大量生产的商品强行征收25%—75%的进口税。到彼得去世时，俄国每年出口价值420万卢布的货物，而进口货仅值210万卢布，其中还包括同中东和亚洲的贸易。俄国从这些地区进口棉花、丝绸和茶叶，而几乎没有出口。因此，彼得对西方的贸易政策的成功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彼得发展了工业，扩大了对外贸易，但是还很难得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1701年，他没收了教会的岁入。1710年，他又降低货币的交换价值，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很大不满。国家还扩大了垄断商品的范围，把烟草和食盐包括了进去，连蓄胡、擦窗、洗澡和许多其他事情也要征收间接税。1718年，彼得修改了直接税制度。过去，直接税是按户征收的，但农民一直用结成大户的办法来逃税。彼得访问巴黎归来后，采用了法国按人头征收直接税的制度。他下令普查男性农民的人数，要他们平均分担陆海军的费用。1718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没有明确职业的神父和商人阶级均被划为农民。迄今不纳税的奴隶，现在被宣布解放，也要尽纳税的义务了。男性农民共计550万人，按照新税制，每人每年应纳税74戈比。这样，对每个农民的征税数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由于所有男性农民都有纳税义务，一个成年农民不得不挣到足够的钱来为他的男性孩子，也许还要为他丧失劳动力的父亲纳税。但是，新的征税制度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农民为了纳税耕种了更多的土地。通过这些财政改革，彼得使国家岁入在15年里增加了2.5倍。1724年，国家岁入达到了850万卢布，其中460万卢布是征收人头税得来的。

1725年，俄罗斯帝国的总人口略略超过1400万，绝大多数是俄罗斯族人。在其他民族当中，在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的德国地主受到宽宏大量的待遇，以便在1721年兼并那两省以后赢得他们的忠诚。乌克兰

兰人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同化，特别是在1708年马泽帕背叛彼得以后，那时俄国驻扎官和两团俄国军队进驻了乌克兰首都，乌克兰的土地也赐给了俄国贵族。1722年以后的将近30年里，俄国没有在乌克兰设司令官，乌克兰由彼得堡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1750年任命了乌克兰人西里尔·拉祖莫夫斯基担任司令官，但是他与彼得堡宫廷关系密切，因而继续推行将自己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俄罗斯化政策在伏尔加河中游的鞑靼人和芬兰族人中、在乌拉尔的巴什基尔族人中尤为明显。许多巴什基尔族人被送到乌拉尔矿上劳动。谁不信仰东正教，谁就无权拥有农民。

在人口为俄罗斯族的地区，彼得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但是在他统治的最后15年里大大简化了那里的社会结构。他明确规定了四大阶级的任务，把许多小的社会阶层分别与其中之一合并。1718年的财政改革扩大了农民阶级的范畴。这个阶级到1725年包括了90%以上的人口。贵族占总人口的2%，商人占3%，教士占2%。商人特别受彼得的青睐。彼得不但消除了商人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隔阂，而且在1721年还给予城市很大的自治权。他从里加和列维尔两地得到启示，将每个城市的居民分成两个行会，一个是富商和实业家的行会，另一个是小业主和工匠的行会，由两个行会的会员选举产生的市长和市政官负责城市的税收和司法管理工作。商人虽然是彼得实施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他们保留了传统的服装和习俗。许多人是旧教徒，大多对彼得的文化革新深感遗憾。

农民跟商人不同，他们并没有从彼得的改革中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他们现在除了要给地主做工或交钱以外，还得向国家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税。60%以上的农民是附属于地主的农奴，他们大多居住在中部诸省和从波兰—立陶宛征服过来的西部地区。在莫斯科以南土地肥沃的地区，农民每周得为地主做工两天到三天。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农民依靠制鞋、制陶、画圣像等家庭手工业维持生计，每年缴纳50戈比到两卢布的税。农民交多少钱，做多少工，都由地主决定。地主还有权决定配给农奴多少土地，有权重新分配村里的土地，控制农奴与庄园以外的人的经济联系，包办或阻止农奴的婚事，带土地或不带土地，甚至不带家属出卖农奴。农奴没有地主发给的护照，不得擅自离开村庄。彼得死后不久，地主受权征收人头税。15%左右的农民依靠属于教会的土地维持生计。教士作为地主，通常比普通地主更加苛

刻，因此教会土地上经常发生农民闹事，许多教会农民逃往西伯利亚，或投奔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13%的农民生活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边缘地区，那里几乎不存在农奴制。但是，彼得决心让这些农民负担一定的特别税。他们除了缴纳人头税以外，每年还要向国家缴纳40戈比的年税。国家农民是彼得的主要流动劳动力，他们被用来挖运河，建设圣彼得堡，或在矿山做工，但是他们的生活比地主的私人农奴的生活要好。此外，还有皇室农民和独院小地主，后者在东南边境地区屯垦，拥有小片土地；这两种农民都为数不多，本可划为“服役贵族”，但是在1718年人口普查中均被算作农民，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农民的一部分。

彼得较改变其他阶级更大地改变了服役贵族阶级。16世纪，永久占有土地的贵族和只是在服役期间才拥有地产的“服役贵族”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到了17世纪，这个区别消失了，因为所有地产都已世代相传。1714年，彼得宣布所有地产都可以永久占有，从法律上承认了既成事实。他还用其他方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阶级的成分。彼得吸收其他社会阶级的成员，以壮大贵族队伍；他规定，这种办法即使在他死后还要使用下去。1722年，陆军、海军和政府中的职位都划为相同的14个等级。彼得坚持每人都应从最低的级别干起：谁升到从最高算起的第八级，谁就被授予贵族特权。贵族还被强迫采用新的生活方式。俄罗斯式的服装和胡须均被禁止。彼得推行一种带强制性的款待客人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每个贵族都要轮流宴请他们的同僚和皇帝。这种款待制度同俄罗斯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给那些买不起勃艮第葡萄酒和香槟酒、买不起法国织锦和英国家具的贵族带来了经济上的灾难，而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许多贵族拼命模仿西欧人的穿戴服饰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到几十年就倾家荡产了。除彻底改革贵族的社会习俗以外，彼得重申了贵族应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为国家效劳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在16世纪宣布的，但在他即位前一度被搁置起来。他甚至想封授一批无地贵族，这些贵族会因经济所迫而不得不为国效劳。1714年的《限定继承法》就是为此目的制定的，这部法律与俄国传统的继承法截然不同，它宣布地产不可分割，必须完整地传给一个儿子，或者传给主人选定的一个亲属。1725年，俄国贵族从10岁起强制上学，开始为国效劳。到了15岁，不管愿不愿意，一律离开学校。凡年过15岁还留校者，均被视为逃避为国效劳的行为。年满15岁的年轻贵族大多申请文职工作，但往往3人倒有2人应征入伍，

在3个近卫军团中的一个军团中当5年士兵，然后被派往别的部队去担任军官。很少有贵族志愿进海军服役。那些年满15岁考试不及格的，就被强制送入海军。但是，即使采取了强制手段，海军仍然兵员不足，彼得不得不雇用丹麦人和荷兰人担任船长。年轻贵族如能进入政府，起先可能在参政会或“院”的办公厅，省长办公室，或俄国驻外使团任职。

陆军是另一个被彼得彻底重建的机构。大多数年轻贵族在此服役。在他的前辈统治时期，陆军由外国雇佣军和贵族招募的农民组成。纳尔瓦战役之后，彼得用一支编制划一、征募入伍的常备军取而代之。1705年，每20农户征丁一名。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年征兵人数不等，但是1724年的兵力超过了20万，还不包括10万左右的哥萨克轻骑兵和其他半正规军。军饷由国家负担，但所有驻扎在国内的部队的住房、粮食和军马饲料都得由农民供给。各级人员均为终身服役。

彼得像改革军队一样从根本上改革了行政体制。他1711年动身去进行普鲁特战役前，把政府交给了由9人组成的参政会。回来以后，他保留了参政会，让其为他准备立法出主意，指导地方行政工作，并起最高法院的作用。参政会还附设一个办公厅，负担处理杂务。彼得严密监督着参议们的工作。从1711年起，一名近卫军军官参加他们的会议。该军官奉命逮捕行为不端的参议，并报告他的情况。1722年撤出了近卫军军官，由一名称作“总监察官”的常驻官员代替。彼得还任命一名财政官员，监督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从而完善了监督制度。

从1715年起，彼得感到参政会工作过于繁重。他请教了荷尔斯泰因的菲克，甚至还请教了哲学家莱布尼兹等外国专家，于1718年发布一个总规程，废除了50个俄国“衙门”，将政府分成9个院，每院负责一个方面的行政工作。它们起着参政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一个院负责收税，另一个院负责支出，再一个院监督并协调这两个院的工作。还有两个院分别控制商业和工业。其余4个院处理外交、陆军、海军和司法事务。每个院由院长、副院长和4名委员组成。每个院均设有自己的办公厅，在“监察官”的监督下分头工作。这种设若干院的体制是从丹麦和瑞典抄袭来的，各院的副院长起初都是由外国人担任。

在地方政府的改革方面，彼得进行了许多试验，但是没有一项获得完全成功。1708年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发生骚乱之后，整个俄国划分为8个大省，每省置于省长的控制之下。要是再次发生骚乱，省长有全权动用军队。1713年，彼得将这一治安措施发展成一个全面改革地方政府的计划。他在每个省建立了参事委员会，负责收税，并协助省长处理其他非军事事务。理论上，参事由当地贵族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大多由参政会委任。1715年，省又划分成许多地区，每个地区由一名参事管理。这个体制于1719年摒弃。在那一年，俄国划分成50个省，每省由参政会任命的省长管理。省长在一名收税员，一名森林官和另一名负责征收军粮的官员协助下开展工作。收税员由负责国家岁入的那个院指派，其他的均由参政会任命。然而，这种新体制证明代价太高，彼得死后3年就摒弃了。即使彼得在世的时候，新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多余的，因为在1722年以前，大部分军队驻扎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团级指挥员受命收税和征收军粮。

地方官员甚至用不着管理司法，因为彼得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持行政和司法分离。1725年，俄国有10个审判区，每区都有自己的巡回法庭。然而，法律程序又慢又烦琐，因为1649年以前就没有一部法典。彼得一直想把1649年以来颁布的法律，协调一致但是只有刑法得到阐明。1715年，一部军事法典准备就绪。次年，彼得宣布，法典中关于刑法的部分也同样适用于全国百姓。100多种重罪犯可被判处绞刑、枪决、杀头、烧死、刺刑和车裂等死刑。轻罪犯则被罚送到船上或矿山做苦工，降低社会地位，或坐班房。国家不向普通犯人提供膳食，他们手镣脚铐地被带出去沿街求乞。按照1698年的一项法规，法庭只需考虑书面作证，但是1723年彼得发布了新的指示，允许法官面对面地听取证人和被告的证词。证词的有效程度取决于证人的社会地位。法律规定，教士的证词要比俗人的有效，贵族的比农民的有效，男人的比女人的有效。但是，最受重视的证词是被告的供词。

在对待教会方面，彼得废除了大主教，使教会服从他本人，终于赢得了一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斗争。1721年，乌克兰主教费欧凡·普罗科波维奇为沙皇的这一行动辩护，指出，大主教声称“自己跟沙皇本人权力相等，甚至更加崇高”，在政治上带来了许多不便之处。后来普罗科波维奇又断言，虽然君主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无可争议的权力，但是专制制度也因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赞同并为

全体人民谋利益而得以存在。那第二个论点是彼得的外国行政顾问提出来为国家的存在辩护的。彼得本人于1721年宣誓效忠这个国家。废除大主教以后，1721年设立了宗教会议来管理教会。宗教会议在结构上与“院”相似，但起先完全由教士组成。然而，第一任主席死后，这个职位被废除了，由一个非神职人员担任监察官，指导宗教会议。彼得在教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对教区教士无甚影响，虽然他曾命令宗教会议提高这些人的纪律和教育水平。另外，彼得把大约1.4万名修士和1万名修女视作社会寄生虫。为了防止他们人数继续增加，小的修道院被关闭，进其他修道院也受到严格控制。至于旧教徒，彼得不准他们进入国家机关供职，并向他们加倍征税。但是，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还是享有信仰自由；只有在政治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才受到拷问或监禁。

彼得建立一个普通教育制度的努力，几乎得不到人们的合作。17世纪末，俄国只有一家出版社，一个教育机构——莫斯科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学院。两者都掌握在教士手中。1701—1715年，彼得开办了一所海军学院、一所工程学校、一所炮兵学校和一所医学校。但是，上学的人很少，1714年不得不强迫贵族子弟入学。1715年，各省“为各阶级的年轻人”开办了第一批小学，由海军学院提供教师，海军部承担经费。到1722年，共有小学42所，学生2000名左右。然而，到了1725年，学校只剩下28所，学生只剩下500人，主要因为主教规劝教士不要让自己的子弟进普通学校读书。主教们已在1721年着手在自己的管区内开办学校。到1725年，已有教区学校46所，由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学院为他们提供教师。彼得死后几个月，海军部提议将普通小学和教区学校合并，但遭到了宗教会议的拒绝，剩下的普通学校也大多关门大吉了。

彼得还企图通过提供合适的图书的办法来教育贵族、商人和文职官员，但这一企图也同样没有成功。他亲自挑选了莫斯科宗教会议出版社印刷的许多书籍；圣彼得堡的一家出版社和荷兰的两家出版社也奉命专门为他出版算术、航海和天文等方面的教科书，其中还包括第一部关于哥白尼学说的俄文著作。然而，有关圣徒生平的书籍倒还销售了数千册，奉彼得之命印刷的书籍却很少有人问津。有文化的俗人爱看描写外国年轻贵族谈情说爱的小说，而在1750年以前，这类小说在俄国没有出版过。

1725年彼得死后，君权的专制性质形式上没有改变，但此后再也无人像彼得那样亲自地、直接地行使那个权力了。紧接着的几位继承者大多数是女人。她们追求舒适，喜欢娱乐，对令人生厌的朝政毫无兴趣，乐于找人代行职务。

彼得死时，没有人知道谁将继承皇位。他的独生子阿列克谢据说参与了1719年企图推翻彼得的阴谋活动，已被处决。3年以后，皇帝修改了继承法，允许在位的君主自选继承人，但他却未能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他死后，唯一在世的男性后嗣就是他的孙子、倒霉的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皇位提出继承权，得到了戈利钦、多尔戈鲁基和俄国其他主要贵族家族的支持。他们希望，一旦一个10岁的孩子当了皇帝，他们就能把彼得带进贵族的新成分清洗出去，恢复特权贵族的杜马，让俄国重新回到彼得使其偏离的轨道上去。在其他对皇位提出要求的人当中，陆军元帅缅希科夫特别支持皇后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本是个利沃尼亚的农家姑娘，后来成为皇后。她的地位的变化同缅希科夫的地位的变化同样是巨大的，她跟他一样关心保住自己的地位。

缅希科夫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坚持叶卡捷琳娜的权力要求。作为陆军院院长，他指挥着近卫军。他事先重赏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官兵。正当开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的时候，他命令该团包围了圣彼得堡皇宫。在这种情况下，多尔戈鲁基家族及其同伙别无他路，只得屈服。叶卡捷琳娜依据自己的权力被宣布为女皇，但实际上的独裁者是缅希科夫。缅希科夫也很清楚，选择叶卡捷琳娜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新即位的女皇健康不佳，她的生活方式也未使情况得到改善。如果她死了，他没有第二个候选人可以支持，不得不提出同特权贵族联盟妥协。因此，只要他的对手同意彼得跟他的一个女儿结婚，他就准备接受彼得·阿克列谢耶维奇为叶卡捷琳娜的继承人。交易做成了。按照1722年继承法的条款，叶卡捷琳娜立下遗嘱，提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为第一继承人，彼得后面是她的两个女儿叶利扎维塔和安娜·彼得洛夫娜。

多尔戈鲁基家族方面的成交条件是要求分享一部分叶卡捷琳娜给予缅希科夫的权力。结果双方达成协议，成立由两派人士参加的最高枢密院。新成立的枢密院的会议本应由女皇亲自主持，但是，几次会议之后，叶卡捷琳娜对枢密院工作失去了兴趣，允许枢密院在她缺席

的情况下也可制定法律。到1727年，枢密院已经接管了参政会和那些院的许多重要职责。彼得大帝设计的那个行政体制不复存在了。

1727年5月，叶卡捷琳娜驾崩。缅希科夫履行自己的诺言，宣誓效忠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但是，彼得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候选人，这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新皇帝一即位，缅希科夫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因而心神不安。1727年夏末，这位陆军元帅身患重病。他深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写了一封遗书，要求皇帝照管他的家属。6个星期以后，他病好了。但是，当他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在他生病期间多尔戈鲁基家族并没有虚度光阴。他们赢得了最高枢密院里独一无二的中立者——副院长奥斯特曼的忠诚。他们还将自己家属的一名成员安插到皇室，当上了皇上的教师。最为严重的是，他们已经控制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缅诺夫斯基两个近卫军团。缅希科夫试图恢复自己的权力，但是没有近卫军的支持，他毫无希望。他遭到逮捕、审讯，同全家人一起被流放。他一走，多尔戈鲁基家族马上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缅希科夫的支持者被逐出最高枢密院。皇帝同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的女儿叶卡捷琳娜订了婚。政府迁回莫斯科。“机密处”被废除。彼得大帝庞杂的地方政府体制，在节约的借口下被废弃。省长得到了完全的自治权。有两年半时间，皇帝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打猎，消磨了整个春夏。由于最高枢密院的成员奉命陪驾，国内的管理工作实际上已经陷于停顿。

假如彼得活到成年，他祖父的事业很可能荡然无存。但是1730年1月，就在指定他跟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结婚的那一天，他出天花死了。最高枢密院需要挑选一个新的候选人，但是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在一份文件上伪造彼得的签名，提名叶卡捷琳娜为继承人。枢密院的大多数成员则支持该院另一名成员德米特里·戈利钦提出的不同方案。戈利钦记得瑞典的君权在查理十二死后是怎样被限制的，认为此刻正是向俄国君主专制体制发起一次类似进攻的时机。他挑选彼得大帝的一个侄女、死了丈夫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伊凡诺夫娜作为皇帝候选人。他提出，假如安娜事先同意接受戈利钦本人提出的一些“条件”，那么就把皇位给她。这些“条件”是：在她自己的婚姻、选择继承人、宣战、缔结和约、任命上校以上头衔的官员或处死贵族等问题上，事先要取得最高枢密院的同意。枢密院还将拥有对军队和近卫军的指挥权。

他们给住在米塔瓦的安娜去了信，信中提出了上述建议。她接受了“条件”，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在她抵达首都之前，最高枢密院遭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的反对。1730年1月，各地贵族云集莫斯科，准备参加彼得的婚礼，结果却发现要他们决定君主政体的命运。他们获悉安娜已经答应与最高枢密院分享权力时，无不感到震惊。有些贵族认为，要分享君权的话，也应跟整个贵族阶级来分享。另一些贵族则论证说，只有恢复专制制度，才最符合贵族的利益。

2月25日，安娜抵达莫斯科后两个星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贵族代表团。诗人外交家安季奥奇·坎捷米尔率领一个代表团请求女皇收回专制君主的称号和权力，还提出了一些别的方案供女皇考虑。但是，当近卫军侍官把刀剑摇得叮当作响，明确表示希望恢复君主专制体制的时候，安娜拿起并撕毁了她在米塔瓦签署的“条件”书。最高枢密院被解散，逮捕、处决或流放了除奥斯特曼以外的所有其他成员。其中有些活得长的，后来在新君主即位时得到赦免。但是，特权贵族联盟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了。安娜保证继承彼得大帝的事业，并将宫廷迁回圣彼得堡，以表此意。

戈利钦为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深感遗憾，预言“那些现在使我哭泣的人，将来会哭得更加伤心”。他的预言证明是对的。贵族阶级虽然使君主专制制度摆脱了心怀叵测的最高枢密院，但却发现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他就是女皇的宠臣恩斯特·约翰·比伦。比伦生于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家族，这个家族在17世纪时来到库兰定居，并接受了贵族头衔。1718年，安娜曾经帮助过他。安娜登基以后，他跟着来到莫斯科。他在俄国只担任过御马总监（因为他和女皇都喜欢骑马），没有担任过别的官职，但他为人阴险毒辣，影响巨大。安娜根据他的建议，恢复了“机密处”。在她统治的10年里，一万多臣民因有谋逆嫌疑而遭逮捕。俄国贵族把比伦看作“德国邦”的化身。在整个18世纪30年代，德国邦在宫廷里、在政府里均占统治地位。皇室的高级官职统统给了比伦的从库兰跟来的朋友。米希赫是个官运亨通的军人，他于1716年跟随彼得大帝，现在成了陆军总司令，副院长奥斯特曼也担任了新的官职。

安娜解散最高枢密院时，曾答应恢复参政会在彼得大帝时代享有的全部特权。但是，时隔不久，参政会又一次遭到贬斥。从1730年3月起，女皇得到由奥斯特曼和两名俄罗斯人组成的女皇陛下办公厅的辅

佐。次年，这个人数很少的办公厅重新命名为“大臣内阁”，正式起着女皇和高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作用。最后，安娜终于仿效叶卡捷琳娜的做法，准许这个内阁代理朝政。1735年她宣布，内阁的决定和圣旨具有同等效力。由于内阁里的两名俄罗斯人在政治上是无名之辈，行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奥斯特曼手里。

奥斯特曼本人起初对俄罗斯贵族并不抱敌视态度。安娜从米塔瓦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是他劝告她要深谋远虑，对贵族做些让步。安娜接受劝告，于1730年废除了彼得大帝的限定继承法，并在次年为贵族担任军队官职做出安排。新设立的贵族军事学校，吸收年满15岁的贵族子弟入学。进军校是这个阶级的特权；到20岁离开军校时，他们可直接到团里担任少尉，无须当兵见习。1736年，女皇进一步满足贵族要求，将服役期限于25年，并允许每家留下一个儿子管理家产。可是贵族也真不走运，这项让步是在跟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做出的。在战争期间，1736年圣旨暂停执行。1739年签订和约以后，此项让步按照比伦的指示仍然不予贯彻。

到1739年，贵族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公开反抗朝廷中的德国派，为首的叫作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沃伦斯基，他是彼得大帝手下的一名杰出而又肆无忌惮的年轻行政官。沃伦斯基1729年曾担任阿斯特拉罕省省长；但安娜登基后，他回到首都，向比伦献媚求宠，最后在大臣内阁里得到一席之地。进入内阁以后，他感到羽毛已经丰满，要和比伦一刀两断。他把首都所有的不满分子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其中有教士，也有贵族。比伦知道他们在密谋反对自己，但直到沃伦斯基直接恳求安娜罢免她的宠臣时，他才采取行动。沃伦斯基当即被捕。他在机密处受到拷问后招供：他想毒死女皇，篡夺皇位。比伦处死了沃伦斯基，但是只要近卫军留在首都，他就感到不可能不受到贵族的攻击。早在1730年，他为了确保卫队内部对他本人的支持，创建了一个新的团队——伊兹迈洛夫斯基团。该团由他的一个德国朋友指挥，士兵都是从爱沙尼亚人、利沃尼亚人及其他跟俄罗斯贵族毫无关系的人中招募的。沃伦斯基事件以后，比伦跟一个朋友私下谈过，他打算把近卫军干脆调离圣彼得堡，用普通军队取而代之。

不过，比伦的垮台倒不是由于俄国贵族的民族情绪，而是因为他的德意志同事们的妒忌。安娜在世时，他们不可能劝她跟比伦分道扬镳。但是1740年10月安娜一死，他们就不甘心扮演次等角色了。安娜

的继承人是她的侄女安娜·列奥波多夫娜和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希亲王的儿子伊凡·安东诺维奇。由于皇帝仍是个婴儿，就由比伦出任摄政王。但是，伊凡的母亲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认为自己对摄政王这个位置有优先权，于是谋取明尼赫的支持，把比伦赶下台。明尼赫亲自带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一支部队夜袭比伦的宫殿以后，安娜·列奥波多夫娜就任摄政王。明尼赫以她的名义管理了三个月朝政。奥斯特曼自彼得大帝死后甘愿实行伺机而动的策略已16载，现在感到机会终于来了。他说服安娜·列奥波多夫娜让自己取代了明尼赫的职位。但是，他们的好景也不长，因为1741年11月，外国的干涉触发了另一场宫廷革命。

自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减弱，但是对波尔塔瓦战役的辉煌胜利，欧洲人依然记忆犹新。奥地利、法国和英国都把俄国视作军事上的盟国，先后请其帮忙。奥斯特曼曾于1726年和奥地利结盟，但是自那以后，法国政府不止一次地想把俄国拉入自己的阵营。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红衣主教弗勒里曾派使者来圣彼得堡建议结盟，他提出的条件连奥斯特曼也认为是值得考虑的。随着战争的进行，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但是在1739年又互派了大使。弗勒里派了谢塔尔迪侯爵前往圣彼得堡，明确地指示他破坏奥俄联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侯爵奉命——如果必要的话——策划一次宫廷革命，把奥斯特曼赶下台去。谢塔尔迪抵达俄国不久，就和彼得大帝唯一还活着的女儿叶利扎维塔公主进行会谈。叶利扎维塔本人并没有政治野心，但是她深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士兵们的爱戴（她在圣彼得堡的宫殿紧挨该团的营房），贵族中的那批民族主义者认为可以推举她为君主候选人。

在劝说叶利扎维塔夺取皇位的过程中，谢塔尔迪得到了瑞典大使和公主的私人医生莱斯托克医生的支持，这位医生每年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一大笔钱。叶利扎维塔有几个月举棋不定，然后同意下列计划：瑞典向俄国宣战，瑞军直言不讳地要把俄国人从德国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让叶利扎维塔登上皇位。

瑞典军队已经出动，但是叶利扎维塔仍然犹豫不决。然而，当1741年11月近卫军奉命离开首都开赴前线时，她不得不当机立断了。莱斯托克使这位公主相信，如果她不趁近卫军还在的时候采取行动，那就要坐失良机了。11月24日夜，她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营房里

受到热烈欢呼，带着该团的一连士兵向皇宫进发。到次日凌晨三点，皇帝、他的担任摄政王的母亲、他的父亲、明尼赫，以及奥斯特曼全部被捕。叶利扎维塔发布了登基宣言。她拿出她母亲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遗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她母亲曾安排好皇位继承人的顺序：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后是叶利扎维塔和安娜·彼得洛夫娜。安娜已于1728年去世，但是她的儿子荷尔斯泰因公爵被指定为叶利扎维塔的继承人。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叶利扎维塔保证在有生之年不判处任何臣民死刑。奥斯特曼和明尼赫受到模拟处决，然后被流放。大臣内阁被解散，参政会重新享有过去的特权。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这次革命是一个失败。奥斯特曼被捕以后，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留明出来负责俄国外交，他没有履行叶利扎维塔对瑞典或法国许下的诺言。北方的瑞典军队不但没有被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反而被打得越过芬兰的沼泽地带狼狈逃窜。而俄国却一丝不苟地履行了对奥地利的义务。莱斯托克做出最后努力，编造证据使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德·博特侯爵名声扫地，以便同维也纳断交。德·博特被说成是卷入了推翻叶利扎维塔的阴谋，他的同谋是宫女纳塔莉亚·洛普基娜以及别斯图热夫家族的成员。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以后，洛普基娜和一名别斯图热夫家族的成员被当众鞭挞，割去手足。德·博特被召离圣彼得堡，但是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对他的指控。

十多年以后，英国驻圣彼得堡代表查尔斯·汉伯里·威廉斯爵士倒真想干预叶利扎维塔对继位的规定。18世纪50年代初期，普鲁士可能进攻汉诺威，英国政府大为惊慌。他们指示威廉斯去见叶利扎维塔，提出如她命令俄国军队开进普鲁士，英国政府愿出重金酬谢。叶利扎维塔起初不愿出动俄军保卫汉诺威，但是1746年以来一直受英国人雇用的别斯图热夫把这一建议说得娓娓动听，于是两国在1755年签订了一项协定。然而，叶利扎维塔还未来得及批准，这项协定就因威斯敏斯特条约的缔结而失效了。英国突然同普鲁士结盟，使圣彼得堡大为惊恐。叶利扎维塔登基后第一次学着她先辈的样子，把权力委托给一个“附属于帝国宫廷的会议”。这个“会议”掌握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最高控制权，它的大多数成员赞成恢复俄法两国的友好关系。别斯图热夫和汉伯里·威廉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一事态发展。由于女皇同情亲法派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就寻求“年轻的朝廷”的合

作。汉伯里·威廉斯毫不信任荷尔斯泰因公爵，因为他是个不中用的年轻人，体质虚弱，头脑迟钝，对俄国政治一窍不通。但是，他在1745年娶了安哈尔特-策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公主。这位公主一加入东正教，就改名为叶卡捷琳娜。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叶卡捷琳娜在孤独之中将时间用来研究她丈夫的国家的生活和利益。她是个意志坚定的聪明女人，威廉斯认为她能成为一个极好的同谋。英国大使从她的情人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那里发现，她经济上很不宽裕，就赠给她1万英镑的厚礼，并概略地向她提出了他的建议。由于女皇经常患中风，人们普遍认为她将不久于人世。如果荷尔斯泰因公爵即位，叶卡捷琳娜就将宣布为皇后，地位和权力都和她的丈夫相当，就会保证“会议”中止跟法国的谈判。不过，叶卡捷琳娜十分谨慎，她没有拒绝英国大使的建议，但是也没有承担义务。

七年战争爆发了，威廉斯的计划未能实现。1756年12月，俄国加入凡尔赛条约；1757年5月，在战场上由陆军元帅阿普拉克辛指挥但又得听从圣彼得堡的“会议”指示的俄国军队，越过了普鲁士边界。别斯图热夫和汉伯里·威廉斯认为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但是1757年9月又出现了新的希望。阿普拉克辛在库涅斯多夫村打了胜仗之后，女皇又病倒了。如果她死了，叶卡捷琳娜就要掌权，就会中止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退出同法国的联盟。但是女皇康复了；在法国新任大使德洛皮塔尔的敦促下逮捕了别斯图热夫。阿普拉克辛也被召回首都，并被逮捕，因为据说（也没有什么根据）他在库涅斯多夫战役后撤到梅梅尔的决定是在别斯图热夫的要求下做出的。由于别斯图热夫已将文件烧毁，没有发现不利于叶卡捷琳娜的证据。但是她仍然受到怀疑，因为1757年夏天她一直跟阿普拉克辛书信来往。她受到女皇的谴责。吃过一次苦头之后，她再没有反对叶利扎维塔。她完全退出了宫廷，跟伊兹迈洛夫斯基团的一个名叫格里哥里·奥尔洛夫的军官勾搭。起先，叶卡捷琳娜干这种勾当只是为了消遣，但是她熟谙过去一些年月的历史，知道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大有好处。

1761年12月，叶利扎维塔去世，她的遗嘱得到顺利执行，荷尔斯泰因公爵即位，皇号彼得三世。他一登基，就停止了对普鲁士的敌对行动。皇帝本人非常钦佩弗雷德里克，打算前往波美拉尼亚，将俄军和他本人都交由弗雷德里克支配。但是，他在贵族中很不得人心，他还没来得及出国就丢了皇位。

在整个叶利扎维塔统治时期，贵族继续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叶利扎维塔即位后，曾确认1763年谕旨，把服役期限定为25年，并准备做出更多的让步。18世纪30年代，贵族想出了一种逃避服役的新办法。男性孩子一出世，就把名字写进了近卫军的花名册。这样，他们在婴儿时期就能晋升到军士军衔；刚满10岁，还没有离开父母时，他们已被任命为军官了。而到了25岁，许多人已经达到了将军级别，根据1763年谕旨的条款已够退休资格。比伦曾想阻止这种做法，要叶利扎维塔予以法律制裁。到18世纪50年代，有些贵族强烈要求彻底废除义务兵役制。叶利扎维塔准备做最后让步。但是“会议”劝她至少等到对普鲁士的战争结束以后再说。1761年战争中止后，贵族们要求新即位的皇帝免除他们的义务。彼得显然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答应了这项要求。他于1762年2月发布“贵族解放宣言”，准许贵族除战时以外可以随时离开军队，准许贵族到国外自由旅行，条件是，接到皇帝召令后要立即返回。对于宣言的得益者来说，只有一条不足之处。贵族辞去军队职务以后，终身不得再进宫廷觐见。

1762年的宣言完成了贵族的解放事业，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皇帝感恩戴德。对此他也只能责怪自己。他以嘲弄东正教仪式为乐。他侮辱教士，当众辱骂自己的妻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步兵连在1742年11月革命中功勋卓著，曾被授予叶利扎维塔“御前近卫队”的称号，它现在被逐出了首都，换上了一支来自荷尔斯泰因的部队。荷尔斯泰因的一位亲王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

贵族们再也不能忍受任何更多的侮辱。1762年2月，格里哥里·奥尔洛夫和他的几个兄弟开始在伊兹迈洛夫斯基团和谢缅诺夫斯基团里鼓动官兵支持叶卡捷琳娜。6月，推翻皇帝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6月中旬，皇帝离开首都去乡间度假，然后前往波美拉尼亚和军队会合。在他不在时，奥尔洛夫的一个同谋被捕。奥尔洛夫担心阴谋败露，决定提前行动。6月29日夜，他把叶卡捷琳娜叫到伊兹迈洛夫斯基团营房，唤醒士兵向新女皇宣誓效忠。伊兹迈洛夫斯基团跟彼得的支持者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到天明时，他们领着叶卡捷琳娜来到喀山圣母大教堂，举行了登基谢恩祈祷仪式。

教会没有参与18世纪的宫廷革命。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在1730年危机时曾主动介入，捍卫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宗教会议作为一个整

体，不加区别地为每个君主祝福。官方教会的经济地位很不牢固，使它的领袖无意重返政界。

有8年时间，安娜·伊凡诺夫娜朝廷对教会一直敬而远之。但是在1738年，内阁会议抱怨教会农民所欠的人头税达到了不合情理的数字，参政会受权从宗教会议手里接管了教会土地的管理权。叶利扎维塔生性比她的前任更加虔诚，她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让宗教会议重新控制教会的土地。然而，七年战争爆发了，宗教会议又一次而且永远地失去了主教的和修道院的地产。1757年，这些土地临时由政府官员管理，他们将一小部分收入分配给宗教会议，其余的交给了财政部。战争结束以后，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财政部永久管理教会土地。

尽管教会在财政上很困难，但是，1721年建立的主教管区的学校到18世纪60年代仍然是教育制度的骨干。1737年，宗教会议指示主教们将教区学校改成神学校，给予学生至少小学以上的教育。由于缺乏资金，这一改变不能顺利进行，但是到了1762年，全国已有26所神学校，大约6000名学生。教学水平并不是很高，但这些神学校向圣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输送了许多学生。

圣彼得堡科学院是一个范围比其名称所表示的更广的机构。它不仅包含一个科学院（按照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还包含一所大学和一所大学预科学校。自1726年创建以来，科学院一直兴旺发达。彼得大帝生前曾聘请第一批院士，其中有来自莱比锡的历史学家格哈德·米勒，巴黎的地理学家约瑟夫·德利尔，蒂宾根的博物学家约翰·格梅尔，巴塞尔的数学家尼古拉和丹尼尔·贝努利，以及全欧洲其他真正出类拔萃的学者。到叶利扎维塔登基之时，科学院的一些职位已在俄国人手里。朝廷里的民族主义派和德国帮的政治冲突，反映在俄国教授们想清除科学院内的外国影响方面。1745年，两名德国教授因坚持说9世纪时在留里克领导下定居俄罗斯并建立俄国的北欧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被免职。别的教授也纷纷离开科学院以示抗议。到1750年，有才能的外国人只剩下米勒一人。

大学和大学预科学校发展得不如科学院快，因为入学的学生很少。从1730年起，教区学校和莫斯科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学校的毕业生上大学的费用均由国家负担，但是就连这种方式的劝诱也没

有取得多少成功。科学院的教授们认为，首都生活费太昂贵，学生负担不起，而且在一个有着许多纯实利主义教育机构的城市里，大学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1755年，圣彼得堡又开办一所大学，设有法律、历史、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等系科。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自愿上学的学生人数很少，然而叶利扎维塔答应，上大学的时间可以算作服役时间，以此来引诱贵族子弟入学。

即使做出这一让步以后，上莫斯科大学的贵族也还不如上军事学校的多。军校学员除接受军事训练以外，还学习举止、唱歌、跳舞和外语。到叶利扎维塔统治末年，军事学校已成为首都文艺生活的中心。有个名叫苏马洛可夫的学员翻译了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并在俄国宫廷首次上演。他自己还用俄语创作了第一部有独创性的悲剧。军校学员担任这些剧中的角色，在女皇御前演出。学员们还从英语、法语、德语翻译了许多道德题材的文章，发表在米勒院士创办的第一家文学期刊上。18世纪50年代，他们互相协作，出版了第一批小说（几乎都是翻译作品）。与此同时，法语如果说还没有成为宫廷的官方语言，也已是非常时髦的语言了。富裕一点的贵族直接向巴黎订购书籍。叶卡捷琳娜在登基前已经知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

随着兴趣范围的不断扩大，贵族越来越感到经济上难以支持。在安娜·伊凡诺夫娜统治时期，宫廷成员花费在文化娱乐上的钱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通过立法来限制住房、家具和服装等方面的支出。但是，叶利扎维塔一登基，这种比阔气的风气又重新抬头。贵族以女皇本人为榜样，拼命在圣彼得堡仿制路易十五宫廷里的每一样用品。在叶利扎维塔去世以前，彼得大帝封赠的贵族有不少破了产。还有一些贵族借了贵族银行的钱。那家银行是1754年由财政部提供资金开办的，它用贵族的地产做抵押，以6%的利率提供贷款。接受银行援助的贵族，当时并未认识到他们在把自己置于国家的束缚之下。这家银行开办80年以后，贵族全部地产的2/3以上已抵押出去，而且没有希望赎回。

有远见卓识的贵族将钱投资于工业。18世纪60年代末期，根据一项估计，在325家工业企业中，贵族拥有或管理的就有68家，其比例超过了这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比伦的一个朋友以他的名义向国家租借了乌拉尔的一批铁工厂，比伦从中得到了一大笔收入。中等财力的贵

族，特别是实行缴纳年税的地区的贵族，利用农奴劳动力在自己的庄园里开办了酿酒厂、制革厂、麻织厂和棉织厂。

然而，对大多数贵族来说，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是对土地实行精耕细作。在许多缴纳年税的庄园里，每个农民的应付款增加到4卢布。在土地比较肥沃的省份，农民每星期要被迫为地主干6天活。他们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土地，而是靠从地主那里领取固定的口粮维持生活。结果，农民经常反抗、逃跑。中央政府希望摆脱维持农村治安的重担，于是，授权地主对付不服管的农民。到叶卡捷琳娜即位的时候，地主无须公开起诉，就可将农奴放逐或判处徒刑。

彼得大帝死后，国家财政管理混乱不堪，一连几年没有收支账目。在和平时期，农民缴纳人头税有很大的灵活性，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必须立即付清全部欠款。18世纪30年代，常用这种应急办法筹集足够的现金，支付军队和政府费用。但是从叶利扎维塔登基之日起，国家几乎一直濒于破产。1749年，叶利扎维塔将恢复财政平衡的任务交给了参政会的彼得·舒瓦洛夫。舒瓦洛夫展示了彼得大帝手下“赚钱能手”的那种才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提高各种国家垄断商品的销售价格。贵族银行的资本是由国家伏特加垄断企业的利润提供的。舒瓦洛夫将盐价提高两倍，一年就筹款50多万卢布。七年战争初期，他按照彼得大帝的办法，把一大部分教会收入拨给了财政部。后来遇到急需花钱的时候，舒瓦洛夫又将征收个别间接税的权力交给了商人；商人在得到这种特许权以前，必须事先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舒瓦洛夫关于经济事务的进谏，并不限于预算。1753年，他建议废除国内所有的关税关卡。这一建议在次年得到实施。为了补偿因国内不征关税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遂提高了外国商品的进口税。1731年曾降低奢侈品的进口税，作为对贵族的一项让步，但是1757年舒瓦洛夫起草了一部新的关税法，征收高达100%的关税。1725年到1762年间，俄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3倍多，每年的出口总额达1100万卢布，进口额将近850万卢布，收支差额的比例缩小了。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乌拉尔的铁，最大的主顾是英国。18世纪30年代，英国商人在圣彼得堡享有优惠特权。就是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虽然是俄国的敌人，两国的贸易也没有遇到严重的障碍。

(严维明 译)

第十五章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以后，随着北方战争的结束，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进入了一个迫切需要的和平时期。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丹麦和瑞典两个强国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松德海峡和波罗的海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由于和丹麦属于同一王朝，芬兰公国由于是瑞典王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都受到严重影响。这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冲突到了最后阶段，即在北方战争期间（1700—1721年），与另一范围更为广阔的斗争——许多国家反对瑞典用武力建立的波罗的海帝国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丹麦—挪威在战争中的盟国先后包括萨克森、俄国、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

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来说，北方战争后的解决办法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而当时划定的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的边界却一直沿用至今。丹麦对用武力收复17世纪时丧失给瑞典的斯科特、哈兰德和布莱金格三省已经完全不抱希望，挪威对失去黑尔耶达伦、耶姆特兰和布胡斯伦三省同样也只能望洋兴叹。1718年查理十二死后，瑞典立即放弃了征服挪威的企图，直到18世纪末才又重新打算兼并挪威，不过那时已经不再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征服的办法了。

在北方势力范围内，丹麦—瑞典战争使两大斯堪的纳维亚阵营之间出现了均势，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大动荡的拿破仑年代。从欧洲的力量对比来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所产生的最重大的结果是俄国和普鲁士成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强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降为二流国家。从1720年起，瑞典和丹麦不再是欧洲强权政治的主要参与国。在18世纪的剩余年月里，它们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国的政策，尤其是俄国、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决定的。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战后所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和时间来恢复北方战争

给它们的财政和经济生活造成的破坏。两国所能用来对付战后问题的人力资源非常接近，都有150万左右人口。它们为解决恢复和重建问题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也大致相同。两国都为筹款而变卖王室的土地；为供养与日俱增的人口而发展农业；还按照当时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原则鼓励工业、商业和海运业。两国都急于跟高一级的富裕大国结成联盟，签订补贴条约，以恢复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两国都想巧妙利用外交形势，利用自己在船舶、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产，来获得这样的条约和联盟。最后，两国都尊重欧洲国家的礼让，都具有欧洲人的见解。像在其他欧洲国家首都一样，重商主义理论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占支配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经济理论从英国、法国和德国传到了北方，重商主义理论开始经受考验。西欧国家对科学和技术研究表现出的兴趣，在斯堪的纳维亚也表现得十分强烈，重农主义思想在两国也得到迅速反响。18世纪初期，虔信主义运动声势浩大；1750年以后，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渐占优势。当时的这些宗教、艺术和文化的推动力也很快推移到北方。

虽然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战后所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基础，但是两国对国内问题，对外来影响的反应却各不相同。由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们对问题强调的方面也不同，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的社会和宪法结构里行事。两国过去长期不和，因此看不到彼此存在着共同利益，而理论上互相对立的政体，又使这两个国家彼此产生隔阂。对于丹麦—挪威来说，18世纪丹麦的特点仍然是认为专制政体——仁慈、开明的专制政体，但仍是专制政体——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18世纪瑞典的主要特点则是直到1772年一直强烈反对专制政体，试行议会政治，名曰“自由时代”，即要摆脱专制政体。

整个18世纪，丹麦王国的多数臣民对专制政体心满意足。专制政体是1660年政变后采用的政治制度，一直要沿用到1848年。他们感到庆幸的是，“孪生王国”（这个名称通常用来指1660年到1814年期间的丹麦—挪威）没有像1718年到1772年间的瑞典那样经受党派斗争之害，他们的命运和别的君主国比较起来，也还算不错，别国的专制政体还不如奥尔登堡王朝那样仁慈，那样开明。1660年政变是针对旧贵族的。然而，奥尔登堡王朝至今对他们还抱怀疑态度。1730年打开腓特烈四世的遗嘱时，发现里面包含对他的继任者的告诫，要他警惕旧

贵族企图通过使用武力或渗入政府机关的办法恢复政权。这种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旧贵族已被剥夺特权，又遇上了一个农业萧条时期，到了18世纪已无力与专制政体分庭抗礼。旧贵族的人数在不断减少，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跟奥尔登堡王朝封授的新贵族以及正在崛起的市民阶级相比，也相形见绌。然而，奥尔登堡朝廷的担心说明，历代丹麦国王对于旧贵族，甚至对于居高位的非贵族人士，抱着不信任的甚至是病态的怀疑态度。因此，非常明显，在1776年以前的整个时期里，政府宁可使用非丹麦人。德意志各邦跟丹麦在地理上相邻，王朝之间的关系也相似，野心勃勃的人便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国家；来自挪威以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前者完全、后者部分地为丹麦君主占有）的人常在政府里、军队里干得很出色。18世纪奥尔登堡王朝的君主们知道怎样选贤举能来帮助专制政体运转。其中著名的有舒林、毛奇以及伯恩斯托尔夫叔侄两人，还有其他一大批次要而又胜任的文职官吏。国王按照专制政体的传统，想亲自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但是1746年以后，这个王朝的两代君主一代不如一代，缺乏领导能力，直到1784年为止这些方面的决策工作也已变成成为大臣们的职权范围。

启蒙运动的批判和推理精神，在丹麦并不针对体制问题，虽然它激烈攻击旧政权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总的来说，这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受到君主的鼓励，因此当时人们感到，专制体制的家长作风使得合理的变革更加可能，更加切合实际。不管怎样，君主独裁体制经受了考验：虽然大臣和统治者不断更迭，不同的政务委员会却具有连续性。1766年前奥尔登堡王朝的三个君主当中，通常认为腓特烈四世（1699—1730年）最为成功：他是个有才能、有干劲的君主，满腔热情地致力于解决战后国家存在的问题。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六世（1730—1746年）却是个不大出色的国王，不过他强烈的责任感和虔信宗教，使他急于促进他的臣民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即使意志薄弱、放荡不羁的腓特烈五世也能选用好的顾问，尽管他无意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独立作用。在他统治时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国王的顾问们，或者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统称大臣）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出现了一种委员会政体，这跟君主专制主义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腓特烈五世在世的时候，这种体制还很成功。但是，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七世开始统治时，他父亲留下来的由大臣掌权的委员会政体，跟希望遵循1660年腓特烈三世为专制君主规定的训谕的年轻国王发生了冲突。

这一冲突，加上克里斯蒂安七世患有精神病，便为1770年到1772年的施特鲁恩泽试验铺平了道路。

丹麦在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国内问题，是丹麦农民与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繁荣之间的关系问题。丹麦农民的地位和挪威农民有很大不同，丹麦已经几乎不存在自耕农，而挪威的大部分农民拥有土地，因为当地的贵族已经消亡，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出售王室的土地时，王室佃户可以购进土地。在丹麦，虽然王室土地同样供出售过，但是这里的佃农无力购买土地，土地都卖给了富裕的新贵族和市民。这两个阶级一般来说，都是不在地主。18世纪40年代的一场牛瘟，结束了对德意志和荷兰的、迄今有利可图的牛出口贸易，使日德兰半岛的最后一批自耕农破了产。国王请来了德意志农业专家，着手开垦日德兰半岛的荒地，种植马铃薯，想以此来改善那些自耕农的命运，但是这样做进展势必缓慢。对于丹麦的广大农民，那些岛上的佃农，国王则无能为力。腓特烈四世为了使佃农摆脱对庄园主的完全依赖，曾于1702年废除家奴制（该法将农民终生束缚在他出生的庄园中），规定除了在6年服兵役期间，农民只要事先通知地主，就可以自由迁徙。然而，战争和农业萧条使地主和佃农都贫困不堪。佃农拖欠地租，地主则用增加佃农在庄园的劳动量来进行补偿。农民开始逃离土地。年轻的农民前往城市，或者加入由不满的农民和逃兵组成的乞丐队伍。由于这一发展，庄园主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家奴制。国王拒绝采纳这一倒退办法，但是在1733年，克里斯蒂安六世为确保土地有足够的劳力，军队有足够的兵员，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农民附属于土地”法，规定农民在服兵役年龄（即14岁到36岁）不得离开庄园。地主利用这一法令，将农民更加牢牢地束缚在庄园上。后来，士兵服役期满后按照法律也要返回自己出生的农庄里，跟废除家奴制前的情况并无明显不同。

虔信派教徒和理性主义者都从道德的角度抨击“农民附属于土地”法，而政治经济学家则极力主张需要改良丹麦经济的支柱——农业。他们列举了挪威的例子。在挪威，国王奖励种植块根作物，奖励改良牛种，促进了农业发展。在丹麦，由于一向实行公社式的耕作制度，农民对这种鼓励无动于衷，因此收效不大，或者毫无结果。国王以及许多进步的庄园主和对农业新思想感兴趣的农村教士，都竭力教育国民实行变革。为培养有志进国家机关工作的青年贵族而开办的索

勒学院也鼓吹农业改革。1755年国王生日那一天，腓特烈五世邀请臣民提出全面发展“孪生王国”经济的建议，并答应由君主花钱出版所有有价值的建议。于是，1757年到1764年间出版了8卷《丹麦—挪威经济杂志》，用大量版面刊登了改进耕作方法的建议和改善丹麦农民命运的方案。“农民附属于土地法”被认为同农奴制并无两样，受到了批判，公社式的耕作制度也受到谴责。他们建议允许佃农的孩子继承土地，因为在废除公社式耕作制并用固定地租代替旧制度的自然地租和劳力以后，这样做也许不但能鼓励农民赡养家庭，还能鼓励他改良土地。他们恳求君主实施这些以及其他变革。但是，王室的收入是通过征收土地税得来的，这得依靠地主，军队兵员的补充也得依靠地主，因此国王不能操之过急。1757年，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仔细研究废除公社式耕作制的办法。他虽然没有马上实施改革，但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变革的法令。委员会的工作对宣传新思想大有好处，一些地主个人在改进耕作方法和改善佃农命运方面所树立的榜样作用甚至更大。因此，本章所论述的时期是为18世纪末期的伟大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准备条件的一个过渡时期。

奥尔登堡专制王朝总的经济政策，是要使“孪生王国”互相补足。因此，1735年宣布整个挪威南部地区停止进口外国谷物。挪威的铁、玻璃和其他产品在丹麦市场享有垄断权，丹麦商品在挪威也得到对等的特权，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两国经济。然而，应当注意到，这一制度始终受到大规模走私活动的考验，尤其在挪威，人们十分重视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传统贸易关系，而且发现英格兰纺织品比哥本哈根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即使是走私货的价格）便宜。丹麦—挪威奉行重商主义制度，向准许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从1735年起，随着本地工业企业的上马，越来越多的商品被下令完全禁止进口。1736年丹麦开办了一家银行，为帮助工业提供利率公道的贷款。但是，虽然银行办得很成功，许多新建工业仍然有名无实。请来的外国专家有时是在本国找不到出路的冒险家，国王和政治家在产品 and 工厂的问题上常常容易上当受骗，白白花去大笔钱财。回过头来看，还是加工和销售“孪生王国”及其殖民地的土产品有利可图。但是应当记住，就是在新工业没有牢固建立的领域，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也已经达到：它提供了就业机会，防止了两个王国的金银外流。至于宫廷把浩大费用花在宏伟的建筑工程和奢侈品上，这种开支对国民经济的不利也必须从重商主义的角度去看待。

贸易和海运同样受到鼓励。王室对西印度公司、非洲公司和贸易总公司等贸易公司大量投资，保证其正常营业，并劝告或强迫（如采用按比例克扣政府官员工资的办法）他们的臣民也照此办理。最成功的是亚洲公司，它经营的东方货物在欧洲销路很好。1746年到1756年期间，国王跟许多地中海国家议订了通商条约。这些条约在七年战争期间促进了丹麦—挪威在地中海的贸易和货运的发展。战争年月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海运业普遍带来了繁荣。

重商主义的垄断原则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只是略有改变而已。“孪生王国”的其他城镇对哥本哈根享有的许多特权非常不满。由于大家的批评，国王取消了首都进口盐、烟、酒和蒸馏葡萄制成的白兰地酒等“四种”所谓贵重商品的特权。哥本哈根作为国家经济的神经中枢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挪威，年轻的新兴城镇也分享到旧港市的一些特权。对挪威来说，这个世纪是在物质上和文化上都得到发展的一个世纪。挪威人开始感到中央集权政体已不如从前那样适合他们国家的生活方式了。他们请求拥有挪威自己的政务委员会、高等法院、银行和大学。但是这些要求全部遭到拒绝，因为违反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精神，中央集权国家要求为了整个君主国的繁荣昌盛而将地方利益搁在一边。请求者这时还没有想到脱离丹麦，也没有批评奥尔登堡专制王朝的意思。专制政体确实大大改善了挪威对于丹麦的地位。1660年前倾向于把挪威看作丹麦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现在则认为它是“孪生王国”的平等伙伴了，因此在动荡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产生一个主张脱离丹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前，专制政体广为挪威人所接受。[\[1\]](#)

国王一方面重视恢复“孪生王国”的经济，另一方面还努力提高丹麦在欧洲的地位。表面上，丹麦—挪威是北方战争的一个战胜国，但同反瑞典联盟的其他伙伴相比较，它实际上得利很少，用当初的期望来衡量是令人失望的。得益最明显的是在财政方面，丹麦把自己占领的日耳曼诸省归还给瑞典，把不来梅归还给汉诺威，瑞典和汉诺威都付了钱；瑞典还放弃了自1613年以来它一直享有的松德海峡关税豁免权。然而，丹麦最重大的胜利是瑞典放弃了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传统联盟，同意将石勒苏益格公国的公爵领地部分交给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把石勒苏益格公国分散的公爵领地部分和王室领地部分合并起来，终于能开始扭转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分

裂成公爵领地部分和王室领地部分的进程了；这一进程是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当时克里斯蒂安三世从两个公国中把土地分给他的兄弟们。到17世纪，这种做法的潜在危险日渐明显，瑞典跟独占两个公国非王室领地部分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在王朝上和政治上结成了联盟。通过这一联盟，瑞典获得了一扇在战时能进入丹麦王国领土的后门，挫败了丹麦用武力重新并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部分的企图。1720年和约标志着丹麦重新有效控制两个公国的政策取得初步成功。然而，丹麦人都意识到，瑞典改变传统政策可能不会持久。和约是由瑞典的新国王——黑森的路德维希一世订的，他放弃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事业有他的个人原因：与他争夺瑞典王位的劲敌，就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年轻的查理·路德维希公爵（见原书第332、351—352页）。假如路德维希没有子嗣，到时这位公爵很可能被选为瑞典国王。果真这样，他肯定会拒不执行1720年条约中那些与他在石勒苏益格的利益相违背的条款。为了以防万一，路德维希一世得到了丹麦和约的两个调解国——法国和英国——就他对整个石勒苏益格的权利所做的保证。

在18世纪末，丹麦的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劝说英法以外的其他国家承认丹麦王室对整个石勒苏益格的权利；二是劝说他们承认丹麦王室也是荷尔斯泰因那些分散的公爵领地部分的合法主人。北方战争期间，这些领地大多被丹军占领；但这一占领没有得到任何大国的承认。由于路德维希一世（他是荷尔斯泰因王室领地部分的君主）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太上皇查理六世皇帝表示反对，有些领地只得归还。

虽然这两个目标在1773年以前一直是丹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在最后取得成功之时，两个公国仍是丹麦王室的领地，并没有成为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路德维希一世解除了他在石勒苏益格的新臣民对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效忠宣誓，但是两个公国仍由丹麦大法官厅中负责德意志事务的部门分别管理，没有让负责丹麦事务的部门来管理，后者管理“孪生王国”。两个公国与丹麦本土之间原有的海关关卡依然存在。按照老传统，荷尔斯泰因是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虽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根据1460年宣言同荷尔斯泰因永久结合在一起。这种老传统造成了许多困难，使得路德维希一世无法实现他行政管理一体化的愿望。

对于腓特烈四世的新臣民在1721年向丹麦王室效忠宣誓的措辞，历史学家向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2]，虽然这方面的问题要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时代才有些实际意义。

由于俄国支持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1723年到1727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危机。沙皇彼得对腓特烈四世十分恼火，因为他拒绝让他的儿子娶沙皇的女儿安娜为妻子，甚至不让他接受沙皇头衔。因此，俄国开始实施一个新的计划，要把安娜嫁给丹麦国王的不共戴天之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腓特烈。俄国邀请他去圣彼得堡，并保证他继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丹麦逐渐感到忧虑，担心俄国可能会发动一场战争来收复这位年轻公爵的遗产。这种担忧驱使腓特烈四世向英格兰的乔治一世靠拢，因为英格兰国王是汉诺威的选帝侯，如果北方发生新的战争，他也会为不来梅和费尔登担心。1723年到1726年间的气氛非常紧张。当时瑞典的荷尔斯泰因派（见原书第355页）势力很大，他们准备宣布查理·腓特烈为瑞典王位的法定继承人，这样他就能拥有一支俄瑞联军，就可进犯丹麦，收复他的公爵领地，进而为瑞典重新征服不来梅和费尔登。然而，荷尔斯泰因派在1726年到1727年的瑞典国会里倒了台，因而任何这样的联合进攻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1727年5月叶卡捷琳娜一世去世，形势变得对丹麦有利。旧俄罗斯派现在在圣彼得堡得势，抛弃了查理·腓特烈的事业，他和他的妻子不得不逃离俄国。1727年到1738年期间，瑞典的外交政策掌握在霍恩伯爵手里，他迫切希望遵守和约。1730年克里斯蒂安六世成为丹麦国王以后，哥本哈根的体制也有了改变，新国王撇开他父亲的顾问，着手改善同瑞典的关系。1725年由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组成的汉诺威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已把瑞典和丹麦拉入其势力范围，因为瑞典于1727年3月参加那个联盟，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国。丹麦在乔治一世的倡议下，也根据1727年4月的一项协定，答应在军事上支持联盟。

1731年英法联盟的解体，给克里斯蒂安六世带来了问题，因为从那时起，伦敦和巴黎（经过14年合作之后）在争取北方两个国王的支持方面又一次成为冤家对头。丹麦的最后抉择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丹麦已和瑞典建立起友好关系，二是克里斯蒂安六世希望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将来能实现王朝联盟。由于荷尔斯泰因派在瑞典已经失宠，查理·腓特烈至少暂时没有成功的希望。克里斯蒂安六世确

信，他的儿子——丹麦王太子腓特烈有可能当选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因此，当瑞典在讨论王位继承问题的时候，克里斯蒂安为了增加他儿子当选的可能性，于1742年排斥英国，选定与法国结盟，以取悦瑞典的当权派——亲法的礼帽党。这样，法国在外交上争取丹麦的长期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从1742年到1762年，“孪生王国”一直属于法国集团。与法国结盟的结果，丹麦几乎无偿地得到了有益的补贴，克里斯蒂安六世成功地使国家置身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外，腓特烈五世的大臣们在七年战争期间坚持了中立政策。

然而，在瑞典王位继承问题上，克里斯蒂安六世却注定要大失所望。瑞典农民对丹麦候选人倒还表现出热情，但是，为了赢得其他等级所做的殷勤款待和所花的大笔钱财，都付诸东流了。只有农民一个等级赞成君主主义一事，说明它打算选一个受专制主义传统熏陶的亲王当国王。1743年，瑞典选定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欧丁的阿道弗斯·腓特烈亲王为王位继承人，廉价从俄国那里换取了1741年到1743年战争后的和约。丹麦大为失望，又开始担心俄国和瑞典会联合起来支持丹麦的敌人。叶利扎维塔女皇已经通过1741年政变成为俄国的统治者，她不但已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家族和解，而且还宣布1739年以来担任该家族族长的查理·彼得·乌尔里克公爵（查理·腓特烈和安娜的儿子）为她的继承人。由于公爵可能成为未来的沙皇，他的侄子和继承人（因为他还没有子女）可能成为瑞典未来的国王，丹麦的地位看来很不稳固。当阿道弗斯·腓特烈拒不放弃对他可能继承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任何权利时，克里斯蒂安六世很想马上对瑞典宣战。他开始动员丹麦和挪威军队，但是没有发起进攻，事情很清楚，丹麦不会得到任何外国的支持，而瑞典则可指望俄国帮忙。从丹麦—挪威的地位和它当时的财力来看，和解政策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腓特烈五世统治时期也继续奉行这一政策。1751年，汉诺威出生的外交家伯恩斯托夫开始掌管丹麦外交政策，他对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国王完全占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目标抱有希望。虽然在1762年只是因为丹麦对形势无能为力才避免了战争，但是伯恩斯托夫几乎活到亲眼看到这一目标沿着他1763年到1767年亲自制定的政策路线得以实现。伯恩斯托夫于1770年被迫辞职，1772年去世。交换约定最后于1773年由他的侄子A. P. 伯恩斯托夫贯彻实行（见原文第350页）。伯恩斯托夫任期届满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当俄国暂时放弃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事业的时候，查理六世曾与

安娜女皇一起签订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他于1732年承认丹麦占有整个石勒苏益格，换取丹麦对“国本诏书”的保证。在阿道弗斯·腓特烈因不愿屈从叶利扎维塔而失宠于这位女皇之后，丹麦人于1746年得到俄国友好解决两个公国问题的允诺。更为重要的是，1743年战争危险消除以后，瑞典和丹麦之间出现了谅解。掌权的礼帽党于1749年同意，如果阿道弗斯·腓特烈放弃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可能继承的一切权利，他就可以得到丹麦的奥尔登堡和德尔门霍斯特公国以及一笔钱。1751年，伯恩斯托夫和礼帽党人安排了腓特烈五世的女儿索菲娅·玛格达里娜和阿道弗斯·腓特烈的儿子古斯塔夫未来的婚事，这笔交易也就算敲定了。

然而，查理·彼得·乌尔里克公爵于1754年得了一个儿子（未来的沙皇保罗），这些可喜的安排便全都失去了意义。公爵拒绝丹麦提出的关于友好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一切建议。公爵还再三宣称，一旦他当了沙皇，他不但要把丹麦王室从两个公国，还要从丹麦本土撵出去。因此，当1762年1月公爵成为沙皇彼得三世，决心用全俄国的军事力量来收复家传遗产的时候，奥尔登堡王朝和丹麦便到了危急关头。

直到此时，丹麦—挪威还一直置身于七年战争之外。伯恩斯托夫试图奉行对英国和法国两面讨好的政策，没有锋芒毕露地利用1756年与瑞典安排的武装中立来反对任何一方。“孪生王国”的贸易和海运从战争中捞到很大好处。但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将要登上俄罗斯皇位的前景，在叶利扎维塔女皇在世的最后一年里日益引起焦虑。当公爵登基成为事实之后，俄国和丹麦之间的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沙皇彼得立即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讲和，以便腾出手来进攻丹麦；腓特烈五世的大臣们决心用武力阻止任何想从丹麦国王手里夺取前石勒苏益格公爵领地部分的企图。丹麦完全占有整个公国是得到欧洲多数大国的保证的，丹麦现在已经请求它们给予援助。看来，腓特烈五世通过军事胜利来无可争辩地兼并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保证的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部分的时刻也已到来。丹麦军队已在一年前完成战时编制，大约3万人马现在浩浩荡荡地前去迎战日渐逼近的俄国军队。丹麦舰队的状况要比俄国的好，哥本哈根宫廷人士有理由对陆军接火以后肯定会发生的海战的结果充满信心。在陆上，形势却难以预料，俄国拥有一支经过充分动员和实战训练的军队。还使人感到不安

的是，英国和法国对丹麦要求援助都毫无反应。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虽然要到1763年才满期，但由于丹麦对法国1762年的态度感到失望，这种关系显然已经冷淡下来。

丹麦和俄国之间的问题没有使两国较量起来。彼得三世突然被废黜并死去，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即位，她立即向腓特烈五世表示友好态度，在两国军队已经进入阵地的千钧一发时刻排除了危险。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北方问题的态度使丹麦改变了外交政策。这是跟俄国（代表年轻的保罗公爵）达成和解的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为了最终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伯恩斯托夫愿意牺牲同瑞典和法国的友谊。会谈立即开始。到1763年，女皇已经答应，在她儿子达到法定年龄时达成一项友好的解决办法。1767年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保罗公爵一宣布成年，立即安排实行交换协定。叶卡捷琳娜答应，到那个时候，公爵将调换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部分，放弃对石勒苏益格的公爵领地部分的要求，换取奥尔登堡、德尔门霍斯特和一笔钱。克里斯蒂安七世则答应继续奉行伯恩斯托夫在1762年为讨好叶卡捷琳娜而制定的政策：同俄国一起支持瑞典宪法，即防止瑞典回到专制政体的老路上去，因为女皇担心专制政体与反俄的侵略外交政策是同义语。1773年，保罗公爵达到法定年龄，“交换协定”立即付诸实施。丹麦国王终于无可争辩地完全占有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然而，由于古斯塔夫三世于1772年发动政变，丹麦和俄国所保证支持的立宪政体这时实际上已经完蛋。“交换协定”的双方都无意阻止这次政变，因为俄国正全神贯注于土耳其和波兰事务，丹麦则全力以赴地在对付施特鲁恩泽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国内动乱，除非俄国要它信守协定，这是无论如何不想介入了。

瑞典的“自由时代”^[3]从1718年查理十二世之死开始，到1772年古斯塔夫政变结束。在这个时代里，政权掌握在国内四个等级手里。反专制主义力量在1718—1719年期间所以取得胜利并被认为是正当的，是因为反对派一直在秘密地准备利用如弗雷德里克谢尔德枪击事件所提供的机会。这样，反对派领袖就可在瑞典出现某种危险局势的时刻采取主动。查理十二世没有直系后嗣，也没有解决王位继承问题。对王位提出要求的两个人是他的妹妹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和他姐姐的儿子、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腓特烈公爵，他们是冤家对头。前者只是在事先发誓抛弃君主专制政体的情况下，才得到了

反对派的支持。由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于1719年1月开会。会上，反专制主义派（一个由有影响的地主、武装部队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松散组织）也取得了胜利。为表示与专制政体决裂，议会甚至在辩论王位继承问题以前就审判已故国王的顾问——荷尔斯泰因出生的戈尔兹男爵。他被指控在查理十二世和他的臣民之间散布不信任，更严重的是剥夺政务委员会和政府参与统治瑞典的合法权利。由于这一罪行，他被判处死刑。戈尔兹与荷尔斯泰因的关系损害了议会里那些支持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继位的人的地位。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的丈夫、黑森的腓特烈，却巧妙地同反专制主义派合作，使妻子当选为女王。1719年5月，乌尔丽卡登基，因为她事先表示愿意签署并信守等级议会将要制定的宪法。然而，制宪工作尚在进行，政务委员会和政府各院已经开始对任性固执的女王感到失望。她的举止行为表明，她从小受着专制主义的熏陶。因此，反专制主义派的领袖霍恩伯爵说服乌尔丽卡把王位让给她的丈夫。他们希望她的丈夫会比较顺从等级议会的愿望，因为他对王位毫无世袭权。他们并且商定，如果她的丈夫死在她前面，乌尔丽卡可以继续担任女王。但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追随者再次大失所望，等级议会为了在腓特烈和乌尔丽卡万一死后无子女的情况下保持讨价还价的强有力地位，挫败了他们提名公爵为第二继承人的愿望。查理·腓特烈随即离开瑞典，前往俄国沙皇彼得处避难。他满腹怨气地说，瑞典人太性急，要把时钟“一下子从12点拨到1点”，用未经试验的黑森王族的新家规来替代瓦伏依和卡罗来纳的旧传统。

腓特烈一世正式签署了1720年宪法。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削减了君权。政务委员会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由于国王只有两票之权，意味着君主也可能处于少数。君主封授贵族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其任免官员的特权几乎无效。由于政务委员会已经不再是国王的政务委员会，而是4个等级的政务委员会，因此政务委员会要由议会而不是由国王提名，国王只能从等级议会提出的名单里挑选。宪法强调，委员本身不过是等级议会委任的全权官员，在议会休会期间照管4个等级的利益，一切要对4个等级负责。宪法最后规定，议会至少3年开一次会，国家所有官员都要宣誓拥护宪法。

1719年到1720年建立的宪法机器，并不一定能顺利运转。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尽可以将宪法搁置一旁。但是，腓特烈一世（1720—1751

年）和他的继承者阿道弗斯·腓特烈（1751—1771年）都不能这样做，他们两人都是出生在外国的人，是在事先明确发誓抛弃专制政体的情况下才当选的；两人都没有感到自己是瑞典人。1772年，查理十二世以后第一个瑞典出生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这方面倒占了很大便宜。

由于君主长期处于缺乏影响的地位，政务委员会和等级议会可以自由行事。战胜君主以后，两者之间的某种冲突上升到显著地位。斗争结果，等级议会占了优势。如同君主主义的失败一样，这一胜利也不是不可逆转的。瑞典的早期历史表明，政务委员会懂得怎样控制等级议会。在“自由时代”的最初几年里，尤其是1727年到1738年霍恩伯爵在政务委员会里的势力十分强大的时候，瑞典好像又处在一个为土地贵族、高级官僚和高级教士利益服务的专制独裁的政务委员会统治之下。然而，政务委员会的组成在172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17世纪完善的政务委员会由各院院长（当然成员）和国王的私人顾问组成。所有的政务委员都是终身制（瑞典政府里的其他官职习惯上也是如此）。但在1720年，政务委员会和各院的联系中断了（只有一个例外：政务委员会主席一如既往，要兼任大法官厅厅长）；这种改革为“内阁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各院院长不再是当然成员，政务委员终身制的概念受到削弱。随着政党制的发展，有人提出要求，应当根据每次新议会开会时从四个等级的组成反映出来的各个政党的成败情况，对政务委员做相应的更换。然而，1720年以前的那种政务委员终身为国家官员的概念渐渐消失，必要的弹劾手续被用来罢免那些犯有叛逆和渎职罪行而又不愿自动辞职的政务委员。但是，议会政治原则，即按照议会里各党派地位的相对变化来相应改变政务委员会的组成，在整个“自由时代”还是很盛行。正是这一发展，结束了政务委员会统治时代，保证了等级议会在立宪斗争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另外，等级议会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防止作为4个等级“内阁”的政务委员会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等级议会里最有影响的委员会——重要的“秘密委员会”，接管了原先属于政务委员会的许多权力，但即使是这个委员会，等级议会也不大愿意把实权交给它。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而等级议会又能放心的行政机构，这个问题到1772年还没有得到解决。

四个等级内部也互相倾轧，关系紧张。第一等级并非像其他三个等级那样通过选举进入每次议会，而是由瑞典和芬兰的每个贵族家族的首领（或首领的代表）充当代表。1720年以前，第一等级按照地位的高低分成三个阶级，按阶级投票选举代表；因此两个上层阶级虽然人数很少，但可以通过投票压倒下层贵族。下层贵族主要包括被封为贵族的文职官员和武装部队军官。1720年，他们赢得重大胜利，因为这一年规定了不按阶级而按人数投票。1734年又安排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该等级在各个委员会和代表团中的成员，进一步削弱了上层贵族的影响。贵族院的这一民主化，部分原因是上层贵族在查理十一世和查理十二世统治时期陷于贫困，部分原因是官僚阶级（即下层贵族）的权力的增长。这是“自由时代”的特点。

教士组成第二等级，大主教担任主席，主教是当然成员，由教区教士选举产生的大约50名代表通常出席议会的会议。在这个等级以及第三等级身上可以觉察到某种“反贵族”态度。第三等级由市民组成，他们的代表人数一般在120名左右。这些代表常常是市长或城镇的其他要员，差不多都是有钱人，热心于发展贸易、工业和海运。第四等级是农民，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选举产生，通常有100名左右代表。其他三个等级不信任农民，因为农民同情君主主义。农民持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把专制主义作为制宪理论，而是希望有个强有力的国王来约束一下官僚阶级中的小霸王。正如农村有句俗话说：“这年月，戴假发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土皇帝。”为了抑制第四等级，贵族、教士和市民虽然允许这个等级选择自己的主席，但坚持认为职位的秘书要由其他三个等级的主席提名，他们通常找一个管得住那些同情君主主义的农民的人来担任。第四等级还有一个不利方面，即按照法律，重要的秘密委员会里不准有农民代表，只是在国家危急时刻才邀请25名农民参加这个由50名贵族、25名教士和25名市民组成的机构。

虽然第一等级里的上层贵族和下层贵族之间存在摩擦，但当其他等级起来攻击贵族要求的特权时，贵族院却站在一条阵线上。贵族要求的权利包括：贵族的土地属于贵族专有，如非贵族占有这种土地，必须将土地卖出；实施古代禁止贵族与非贵族通婚的法令；确认贵族的各种经济特权和司法权，酌量免除贵族的税，给予贵族某些管制庄园佃户的法定权利；最后，贵族应享有担任政府（包括政务委员会）

和军队高级官职的重要特权，以及担任其他官职的优先权。三个非贵族等级拒不承认这些要求。1723年，霍恩伯爵以在困难的国际形势面前需要团结一致为理由，设法使双方达成和解。贵族放弃了在担任低级官职方面享有优先权的要求，同意非贵族可以和贵族联姻，并在某些情况下占有贵族土地。作为回报，贵族在政府和武装部队里担任高级官职的特权，以及担任政务委员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然而，在整个18世纪，第一等级和非贵族等级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非贵族要求改变贵族独霸高级官职的状况。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大小官职都应任人唯贤，贵族与非贵族机会均等。一直到1809年，贵族才同意了这个要求。

“自由时代”发展起来的政党，打破了彼此利害冲突的等级和阶级之间的界线。所有党派一致认识到与专制政体相对立的立宪政体的重要性，都希望恢复瑞典的国际威望，都认为需要加速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是：第一，关于瑞典的王位继承问题；第二，关于外交政策的路线问题；第三，关于恢复繁荣的方法问题。

第一个泾渭分明而又寿命短促的政党是黑森党。这个党是以腓特烈一世为核心，以他主张的对外政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主张向汉诺威、普鲁士和丹麦做重大让步，换取同汉诺威—英格兰的乔治一世联盟，以便在波罗的海得到英国海军的支持，共同对付俄国。但是对沙皇彼得发动一场欧洲攻势的宏伟设想落了空，因为南海骗局和劳的垮台使英国和法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于是瑞典不得不听凭俄国的摆布，被迫接受1721年尼斯特兹和约的苛刻条款；腓特烈一世名誉扫地，黑森党遂告破产。

第二个有影响的党是荷尔斯泰因党。这个党把希望寄托在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腓特烈公爵身上。由于俄国支持公爵，荷尔斯泰因党制定了一个同俄国友好的纲领，想以此来恢复一部分已经失去的波罗的海帝国。据认为，如果查理·腓特烈被宣布为瑞典王位继承人，沙皇彼得很可能愿意归还俄国占有的一些省份，或者会用军队支持瑞典收复它割让给普鲁士和汉诺威的土地。1723年议会开会时，荷尔斯泰因党证明十分强大，为查理·腓特烈弄到了一大笔礼金和“殿下”的称号，表明他并未被拒绝继承瑞典王位；次年，该党迫使议会通过同俄国联盟。这一联盟意味着瑞典有可能对丹麦发动战争，又因

英法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做过保证，很可能在欧洲产生反响，因而促使霍恩伯爵和腓特烈一世实现和解。霍恩伯爵自1721年以来一直担任大法官厅厅长，因此又是政务委员会主席，他迫切希望维持和平；腓特烈一世也不希望战争，因为战争只对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有利。出生于汉诺威的英王乔治一世担心，如果北方局势动荡不安，会威胁到不来梅和费尔登的安全，于是帮助促成了这次谅解。因而在1726年议会开会期间，霍恩伯爵与荷尔斯泰因党决裂，并于1727年使瑞典加入由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组成的汉诺威联盟。这一行动只是在得到国王两票的情况下，才在政务委员会上强行通过。

以霍恩伯爵为核心建立了第三个政党——“自由时代”党。这个党由黑森人、赞成汉诺威联盟、传统上亲法的家族，以及不想追随荷尔斯泰因党内极端派去冒战争风险的荷尔斯泰因温和派组成。俄国继续支持那个极端派，甚至在彼得大帝死后还支持。它一会儿用金钱收买，一会儿用武力威胁，要把瑞典拉到俄国一边去。然而，1727年叶卡捷琳娜一世逝世，使查理·腓特烈突然失去了在圣彼得堡的靠山。结果，瑞典的荷尔斯泰因党开始失势并解散。原来组成极端派的那些人依然反对霍恩伯爵，成为“礼帽党”的一个核心力量。正如他们所预言的，当英法恢复抗衡和倾轧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了霍恩伯爵陷入困境。

汉诺威联盟的解体，大大削弱了霍恩的地位，他的总政策受到多方指责。在经济方面，他很快发现反对派的力量不可忽视，不得不违心采取了一些强硬的重商主义措施，例如在1731年成立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这一行动引起了同英国的纠纷。在外交事务方面，霍恩谨小慎微的政策也受到攻击。反对派鼓吹爱国主义政策，尖锐地批评他试图对英国奉行调和政策，并在俄国放弃对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支持以后对俄国也奉行调和政策。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只隐约记得战争带来的贫困和灾难，他们称赞查理十二世是抗击俄国、保卫北方的勇士，叫嚷要用武力恢复瑞典的波罗的海帝国。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激起了反对派的热情。许多瑞典人志愿参战，支持查理十二世原来的候选人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继承波兰王位。他们认为，瑞典和波兰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俄。而霍恩由于在1735年准予延长1724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而被称为卖国贼。

在选举1738年议会期间，反对派以一个组织完善的政党出现，自豪地称自己为“礼帽党”，意指战士光荣的头盔。他们把自己的对手称为“睡帽党”或“便帽党”，意思是，霍恩和他的追随者不过是昏昏欲睡的懦夫，头戴睡帽的老头。这次竞选运动清楚地反映了“自由时代”的一个特点——政党的组织性：他们在咖啡馆举行集会，大量使用政党口号，广泛佩戴党徽，出版小册子，不但便帽党和礼帽党收买选票，就连外国代表也收买选票。外交家慷慨地款待议会代表，支付他们的路费及其他竞选费用，并在等级议会举行重要的投票以前分发财物礼品。到“自由时代”末期，一些爱国者开始反对外国收买选票的极端做法，但是整个“自由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外国金银内流有利于瑞典经济；给代表们资助在政治上也有好处，能尽量延长议会的开会时间（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从而加强4个等级，防止专制政府东山再起。

在1738年的选举中，礼帽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进入了执政时期，一直持续到1765年。霍恩伯爵自动辞职。经过弹劾手续以后，对霍恩在政务委员会里拒绝辞职的同事进行了宣判。所有的人都被判决有罪，认为不能继续担任政务委员职务。政务委员会里的空缺，由礼帽党党员填补。瑞典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解除顽抗到底的政务委员（即所谓“顽固派”）的职务，是“自由时代”议会政治发展中最重要阶段。霍恩本人在他掌权时期，虽然也很想保持政务委员会对于等级议会的强有力的地位，但没有打算妨碍政务委员会里他的那些政治对手的尊严和地位。出于同样的理由，礼帽党里比较稳健的人也不想强迫霍恩的追随者辞职。但是，这个党里的极端派占多数，他们认为，如果让他们的对手继续留在政务委员会里，他们就无法通过那个机构推行礼帽党的政策。多数派的意见获胜，但是开创了一个后来也可用来对付礼帽党的先例。

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礼帽党里的稳健派的观点也比自己党内占多数的极端派的观点更接近霍恩。他们想继续奉行他温和的重商主义政策；他们虽然想恢复瑞典波罗的海帝国，但希望通过谈判，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通过孤立俄国然后要求修改尼斯特兹和约的办法来实现。然而，在这些方面，稳健派也被迫仓促行事。因此，18世纪20年代荷尔斯泰因党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得到恢复（此项政策在1724年的“产品法令”和1726年的进口法中确立下来。“产品法令”以英国

的航海条例为范本制定，对荷兰和英国在波罗的海的海运业打击很大）。礼帽党大力扶植瑞典工业，同时采取了对付外国竞争的强有力的保护性措施。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瑞典和芬兰稳定的出口贸易，尤其是瑞典的铁，获得大量利润，礼帽党才能在很长时间里对新的制造业继续进行重商主义试验。但是，在1762年到1763年的危机（部分因瑞典参加七年战争，部分因国际财政危机的影响所造成）之前，便帽党虽然不断想要抑制执政的礼帽党，但对礼帽党的经济政策理论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同样，两党的农业政策在有些方面观点也一致。查理十一世和查理十二世曾从贵族手里回收王室土地，在瑞典制止了隶属地主的农民阶级的发展（此种情况在丹麦很有代表性）。到1700年，土地大体上平均掌握在王室、贵族和农民手里。在“自由时代”，王室佃农被鼓励交付一笔钱，成为自由纳税农民。这种地位变化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但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威望和政治力量。1757年，等级议会颁布法令，农民如果愿意，可以终止传统的以村为单位的公社式土地耕作制。这场称之为“斯托尔希夫特制”（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强调交换小片土地，最后使土地合并成整块）的改革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要农民改变保守态度，拥护这项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从长远来看却极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两党都意识到，瑞典在失去利沃尼亚粮仓以后，需要增加农业生产，因此都鼓励“斯托尔希夫特制”。1739年成立科学院，它委任利纳亚斯巡视瑞典各省，提出改进耕作方法的建议，并鼓励沃根廷开始人口统计工作，因而得到了礼帽党和便帽党的支持。1749年建立的瑞典政府统计局，是近代欧洲第一个这样的机构。

两党的重大分歧是在外交方面。礼帽党一上台就使瑞典跟法国结盟，而便帽党则憎恶这个联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在外交上怂恿瑞典进攻俄国，以防止俄国支援玛丽亚·特蕾西亚。结果，瑞典还没有做好适当的军事准备就仓促投入战争。礼帽党领袖认为没有必要把大笔钱花在军队身上，说瑞典无意单枪匹马对付俄国。1740年以后，欧洲形势使他们产生了希望，希望在应邀支持彼得大帝的女儿叶利扎维塔赶走沙皇伊凡四世以后，能够收复东波罗的海各省。双方在法国的调停下做了秘密安排：瑞军进攻俄国，同时声明叶利扎维塔一登基立即撤军；作为报答，新女皇把瑞典失去的波罗的海

沿岸国土归还瑞典。便帽党反对这种冒险行径，但是要唤起群众对进行一场反俄战争的兴趣并不困难。1741年7月，瑞典人开始敌对行动。

满怀希望的瑞典人不久就大失所望。战争初期，在俄国尚无准备之时，强大的进攻本可奏效，但是瑞军受到同叶利扎维塔的协议的约束，一开始表现了克制。在叶利扎维塔看来，计划进行得不错；瑞军开进俄国境内，1741年秋天对圣彼得堡造成威胁，这证明是她政变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她一登上皇位，就拒绝或无法兑现协议中她这一方的诺言。瑞典人听到叶利扎维塔登基的消息以后，已经立即撤到芬兰，所以失去了时机；当俄国人开始采取主动时，战争对瑞典人越来越不利。他们的海军此时比俄国强大，但水兵中因流行病而丧失了战斗力。陆军则缺乏指挥员。礼帽党和便帽党之间的党派斗争也带到了战场，瓦解了军队的士气。1742年8月，瑞军在赫尔辛福斯投降，听凭俄国像在北方战争后期那样重新占领芬兰。

1741年到1743年的战争，严重阻碍了芬兰实施它在签订尼斯特兹和约后开始的、由1725年到1727年的一个政府特别委员会制订的恢复计划。1721年以后，逃亡到瑞典的人回来了；一些战俘也设法回来了。俄国人为了在俄国和瑞典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曾有意把奥兰群岛和奥斯特贝登夷为平地，现在两地都又有人定居；城镇（如奥布，俄国人曾拆毁那里的石头房屋，为圣彼得堡提供建筑材料）得到重建。1738年到1741年间，芬兰连年农业歉收，加上1741年到1743年的战争，这个公国本来有所改善的境况暂时又很不佳。但是，当俄国代理人在芬兰投降后巡视那个国家，提出给予芬兰人在俄国统治下的自治，引诱他们抛弃与瑞典的关系的时候，芬兰人却无动于衷。

芬兰的失守，给礼帽党造成严重的困难。1742年议会选举时，便帽党在除市民等级以外的三个等级里获得多数。他们学着1727年霍恩的和1738年礼帽党的样子，用便帽党人填补秘密委员会里的空缺，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言礼帽党就要垮台。礼帽党之所以能够战胜1742年到1743年的急风暴雨，是因为他们无耻而又聪明地把国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王位继承问题上。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在战争期间（1741年11月）去世。当时有人建议，应当宣布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14岁的查理·彼得·乌尔里克为瑞典王位继承人。公爵是查理·腓特烈和安娜·彼得洛夫娜的儿子，因此，通过巧妙利用这位年轻公爵同彼得大帝的血统关系，有可能迫使叶利扎维塔信守同礼帽党领导人的协

议。然而，叶利扎维塔女皇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了这一计划，她邀请她的侄子留在圣彼得堡她的身边，公爵欣然接受邀请。1742年议会开会时，按照宪法无须提出王位继承问题，因为4个等级早在1720年已经做出决定，要到王位空缺时才进行这样的讨论，但是礼帽党故意要转移人民对于在芬兰失败的注意力，开始在议会辩论。这一问题引起了全瑞典的巨大兴趣，并与俄国的和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所有对北方感兴趣的欧洲国家当中也产生了紧张的外交活动。在瑞典，人们普遍感到，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很明显会被选上，因为他的姓氏表明，他不但是彼得大帝的外孙，而且还是查理十二世的侄孙。1742年10月，农民等级带头选他作为王位继承人，其他等级也跟着照办。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圣彼得堡，提议在腓特烈一世死后由公爵继承瑞典王位，并邀请他去瑞典居住。但是代表去得太晚了，因为叶利扎维塔女皇对瑞典国内事态了如指掌，已经说服公爵做他自己的接班人。女皇授予他大公头衔，作为他在俄国的前程的保证。至于公爵本人，他在瑞典代表抵达俄国首都前几天已经皈依东正教。现在，女皇可以对瑞典人采取强硬态度了，她通知他们，只有等级议会选举她亲自挑选的王位继承人，她才同意归还芬兰。她心目中的候选人是查理·彼得·乌尔里克的表弟和假定继承人，吕贝克的亲王兼主教——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欧丁的阿道弗斯·腓特烈。

斯德哥尔摩现在不得不重新讨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许多人提到丹麦王太子腓特烈。1743年3月，第四等级出来支持他。礼帽党倾向于支持法国中意的候选人茨魏布吕肯的巴拉坦伯爵（他和瓦萨王族有亲戚关系），而便帽党则按照英国人的意见支持腓特烈一世的兄弟黑森的威廉亲王。丹麦保证，它的王太子如果当选，它愿意用自己的海、陆军帮助瑞典收复芬兰。但是，三个地位高的等级不愿认真考虑丹麦候选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丹麦王太子当选，将来必然会试图增加王室的权力。因此同俄国讲和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预备会议在奥布一开始，俄国候选人便日渐名列前茅。不久，礼帽党领导人准备同意阿道弗斯·腓特烈，只要俄国愿意归还整个（或大致上整个）芬兰。至于俄国人，他们想尽量保留芬兰南部地区，以确保圣彼得堡门户的安全。1743年春和初夏，瑞典的骚乱在继续发展。第四等级临时派代表进入秘密委员会，这是局势严重的确凿标志。全国农民对于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对于官吏的暴戾专横，对于其他等级拒不支持丹麦王太子，感到非常恼怒。他们从达拉纳谷地，从其他地

区，向首都进军，以示抗议。当瑞俄两国在奥布草签和约的消息传来时，5000名农民已在拥进斯德哥尔摩。和约规定：瑞典牺牲一小片芬兰领土；在阿道弗斯·腓特烈当选为王位继承人之后，俄国立即把其余部分全部归还瑞典。这些条款用船全速划过奥兰海送来，使形势为之改观。礼帽党又一次占了上风，因为农民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只是要求大致上归还整个芬兰。阿道弗斯·腓特烈当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并有权将王位传给自己可能有的男嗣。这一条严重损害了1720年等级议会所珍视的那种将来跟国王讨价还价的能力。8月初签订了奥布和约；同月底，阿道弗斯到达瑞典；10月，1.2万俄军跟着来到，驻扎在瑞典境内，以防止丹麦用武力废除王位继承协定。

奥布和约的直接结果是使瑞典隶属于俄国。那个王位继承人因女皇改善了他在世界上的前程而对她感恩不尽。他在政务委员会里享有一票之权，在腓特烈一世缺席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国王的两票，可以用此来表达他的亲俄态度。俄国在瑞典国土上驻军，并派了一个中队进驻瑞典海军，进一步表明了俄国对瑞典的控制。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状况对礼帽党也有清醒作用。1754年以前，稳健派特辛伯爵担任礼帽党的领导，他坚定不移而又小心翼翼地要使瑞典摆脱俄国的干涉和控制。虽然阿道弗斯·腓特烈拒绝放弃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可能继承的任何权益，但特辛通过同便帽党的合作，通过交换宣言，同丹麦暂时达成了谅解。宣言的大意是：两国停止动员，按照现存的友好条约行事。这些宣言批准以后，俄国没有理由再把军队留在瑞典。到1744年7月，俄军已经全部撤出。特辛本想通过阿道弗斯·腓特烈和一位丹麦公主联姻来加强同丹麦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一计划遭到英国的反对。如同1742年到1743年的王位继承危机时期一样，英国决心防止将来出现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可能性，认为一个强大集团控制波罗的海入口的局面对自己很不利。因此，他们在普鲁士王室为这位王位继承人找了个新娘。1744年夏天，腓特烈大帝的妹妹路易莎·乌尔丽卡跟阿道弗斯象征性地结婚后，特辛亲自护送她来到瑞典。这位普鲁士公主和特辛伯爵之间逐渐产生了友谊。前者非常爱好文艺，后者是礼帽党世界主义文化的代表。通过这种友谊，使阿道弗斯·腓特烈放弃了对俄国的依赖。他的妻子摆布着他，有几年把他带进了礼帽党的阵营。他们两人都希望通过同礼帽党领导人的合作增加君主的权力。但是，虽然他们给礼帽党的帮助，尤其在瑞典—丹麦关系方面的帮助，证明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们的希望却落空了。

叶利扎维塔女皇一发现阿道弗斯·腓特烈已经摆脱她的监护，马上想拉丹麦跟她自己和英国站在一起，在瑞典的党派斗争中支持便帽党，反对礼帽党，而礼帽党又从法国，有时还从普鲁士得到帮助。俄国答应友好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难题，对丹麦人很有引诱力，他们对俄国人的建议做出了响应，1746年到1748年间，丹麦在瑞典的党派斗争中多次与俄国和英国积极合作。为了消除便帽党得到这种与日俱增的支持以后可能带来的危险，礼帽党的领袖利用他们对路易莎·乌尔丽卡的影响，劝她丈夫放弃他可能从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那里继承的权力。这一行动为1749年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友好条约，并为1751年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和路易莎1746年生的儿子）和一位丹麦公主的订婚铺平了道路。通过这些安排，礼帽党和伯恩斯托夫合作了一个时期。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才从丹麦那里得到了叶利扎维塔曾想得到的那种对便帽党的可靠支持。

18世纪40年代，礼帽党和便帽党的组织都更加完善。现在，两党都有一个由主要领导人组成的、决定方针政策的中央委员会；每个党都把党员分成小组，便于严格管理；每个党都有组织秘书，负责召集党员，传达领导的命令。从18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两党在4个等级内几乎势均力敌，但礼帽党设法处于执政地位，部分因为他们玩弄了巧妙的政治花招，部分因为便帽党不如礼帽党那样团结一致，便帽党里的稳健派讨厌并怀疑他们的党对俄国的依赖。

1751年腓特烈一世死后，党派斗争增加了一个新因素。身为王后的路易莎·乌尔丽卡不像从前那样愿意默认等级议会对君权所规定的限制。在精神上她仍属礼帽党范畴，但在政治上，当特辛证明不愿意推进她的计划时，她决定跟他们一刀两断。她开始把为数不少的真正保皇分子以及许多因为失望而从两大党脱离出来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着手建立一个宫廷党。宫廷党的出现，导致了礼帽党和便帽党之间一定程度的和解。两党互相协作，阻止国王在王后的怂恿下对1720年宪法做任何有利于君主的解释。在围绕国王左右文武官员任命的权力、国王接受政务委员会多数决定的义务等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激烈斗争中，君主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为了彻底剥夺国王在官员提升方面的影响，决定以资力作为提升的唯一标准，这一改变对文武官吏和武装部队都十分不利。为了避免国王拒签自己不同意的多数派决定这种尴尬情况，便摹写国王的签字，使那样的决定合法化。王后对礼帽党

和便帽党的对抗措施十分反感。1756年夏，她默许她的追随者用武力夺权的革命企图，王室因此蒙受奇耻大辱。他们的8名主要支持者被处决；古斯塔夫的教育不准他们再管；不可一世的王后被强令听取教士代表对她邪恶行为的训斥；国王被迫宣布，如果他再有违反宪法增加王权的企图，等级议会就可以停止履行对他的忠诚宣誓。4个等级喜气洋洋，制作了一枚徽章来纪念他们的胜利。

瑞典站在普鲁士的敌人一方参加七年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教训那个普鲁士籍王后的政策的继续，虽然主要原因是想从普鲁士手里收复在北方战争中丧失给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礼帽党确信，腓特烈二世无能对付这个矛头指向他的大联盟，认为瑞典只要站在普鲁士的敌人方面参战，就可收复波美拉尼亚。然而，像1741年那样，他们犯了盲目乐观的错误。这场战争（瑞典人称为波美拉尼亚战争）同对俄战争一样没有成功。1741年举国上下情绪激昂，而这一次基本上无动于衷。许多人还同情腓特烈二世，认为他像查理十二世那样英勇善战。由于没有取得辉煌战果，礼帽党的地位日益不稳。礼帽党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必然造成财政上的铺张浪费，迄今还不大明显。现在，由于战争开支造成国家财力紧张，情况就明朗化了。时运倒转使礼帽党内部产生了不和。王后在战争初期一直为礼帽党和便帽党的爱国合作尽力，现在则开始向便帽党靠拢。她本能地感到礼帽党已经日薄西山，希望同便帽党达成有利于宫廷的协议。彼得三世即位后，俄国立即退出了反普联盟。腓特烈二世调过人马，向波美拉尼亚的瑞典人发起强大进攻。为了避免军事上的失败，礼帽党不得不恳求王后去同她的兄长谈判，为瑞典单独签订一个和约。

1762年的和约既没有给瑞典带来好处，也没有带来损失，只是恢复了原状。但是礼帽党终于威信扫地。在为定于1765年2月召开的战后第一次议会举行的竞选运动中，礼帽党为了继续取得国民的信任，强调他们为瑞典的经济生活带来的许多好处：他们促进了工业，他们控制了物价，他们建立了工业法庭，扩大了渔船队和商业队，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很成功。然而，反对党知道怎样利用这一总的繁荣景象背后的阴暗面：许多工业贷款没有偿还；为了支付贷款、奖金和红利，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国家迅速回收的能力；制止农民使用谷物（无论是消费还是出售都是一种运输方便的、立可销售的农作物）家酿烈酒的难题没有解决，即使在丰收年份还需进口粮食。反对党自称便帽党，

主动强调跟霍恩伯爵时代的便帽党是一脉相承的，但历史上则称其党员为“青年便帽党人”，因而也强调了 this 党想要实行新思想。这个党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年便帽党的那种小心谨慎的作风。它急于避免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宣布它打算放弃礼帽党跟法国的联盟，并跟与维持北方和平有关的两个大国——俄国和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与礼帽党的世界主义态度迥然不同，青年便帽党具有独特的瑞典观点，并且引以为自豪。在竞选活动中，人们议论纷纷，要求恢复瑞典人简朴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反对礼帽党政权的铺张浪费。然而，青年便帽党所主张的改革，同18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的反对派所鼓吹的改革一模一样，那就是，放宽重商主义政策，制定积极的农业方针，改革行政管理以调动积极性，反对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新闻自由以促进政治言论自由。

青年便帽党在1764年到1765年的选举运动中获得成功，在4个等级里都赢得了多数席位。他们使用了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弹劾办法，强迫那些不愿主动下台的礼帽党政务委员辞职，提名自己的党员填补秘密委员会里的空缺。政党的交替——青年便帽党用这种和平手段推翻了旧政权——本身就是议会政治发展的结果。礼帽党、便帽党和青年便帽党都把这一发展看作“自由时代”的主要收获。

（严维明 译）

[1] 我们有时仍可在挪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19世纪流行的那种反丹麦态度的痕迹，那是J. E. 萨尔斯的观点的共鸣，但是总的来说，大家日渐认为，奥尔登堡专制王朝真心实意地想要实现两国的幸福昌盛。

[2] 见克里斯蒂安·埃尔斯勒夫1901年、1902年和1913年的三篇论文，载《历史研究论文集》（1937年）和霍格尔·伊尔霍特著《1921年戈托尔普斯克并入森代尔耶兰德，成为王国的一部分》（1945年）。

[3] 对于“自由时代”的评价众说不一。第一个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S. 拉格尔布林迫不及待地为古斯塔夫三世的政变辩护，因此他强调党派间的激烈斗争，强调这些斗争给外国干涉瑞典提供了机会，使瑞典到了像波兰那样分裂的危险地步。19世纪历史学家G. 盖耶和N. 顿伯格继承了S. 拉格尔布林的批判态度。19世纪唯一不持这种批判观点的历史学家是A. 弗赖克塞尔，他赞扬“自由时代”是黄金时代，瑞典国王的权力受到有效的抑制。C. G. 马尔姆斯特累姆是第一位对这一历史时期做大规模研究的近代历史学家，他写下了《从查理十二世逝世到1772年政变期间的瑞典政治史》，共6卷（1855—1877年）。1893年到1901年出版了这部著作的修订本。这部著作虽然主要写的是政治和外交斗争，对党派斗争仍持批评

态度，但直到今天仍有重要价值。1915年，F. 拉杰勒思发表了《自由时代的立法》，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众所公认的观点提出重大的挑战。他是个赞成立宪政治的历史学家，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著作中强调“自由时代”的重要性，它上连瑞典遥远过去的民主传统，下接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民主制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综合性的近作有：L. 斯特富纳的《迄止当代的瑞典历史》（1922年）第9卷（修订本《迄止20世纪的瑞典历史》第7卷）中的“‘自由时代’ 1718—1722年”；C. 哈伦托尔夫的《瑞典人民史》（1928年）第4卷中的“自由时代”；E. 亚尔纳的《从瓦萨时代到自由时代》（1929年）；H. 梅兰德编的《瑞典通史》第3卷（1949年）中W. 霍尔斯特写的有关章节。近年来还发表了有关这一时期各个方面的大量专题文章，兴趣集中在社会、经济、立宪政治和人物等题目上。

第十六章 萨克森人国王统治下的波兰

波兰史中所谓的萨克森时期（1697—1763年），在1717年以后是一个和平不稳定、繁荣虚幻和领导不善的时期；这是一个衰落的时代，波兰蜕化成为萨尔马特（Sarmatia），它是它的居民中少数人的人间天堂，在外部世界看来，它却是一个由地主阶级统治的野蛮而愚昧的地方。“小贵族民主制”一词有时用来形容1572年至18世纪下半叶之间波兰的体制。这是一个自以为是，而又自相矛盾的不当用词，特别是对1697—1763年这个阶段来说，尤为不当。这一制度在其情况最佳的时候，也绝不是一个民主制，不过是一个以可以选举君主的君主制为幌子的贵族统治。这种君主制在17世纪下半叶采取的是寡头政治的形式，而在18世纪上半叶则已沦为无政府状态。

萨克森时期的主要缺点之一，也就是它的明显特色，就是这个国度中的一些重要的家族，为自己争权夺利而进行不断的、毫无结果的斗争。他们的失败，国王又不能制服其敌人而实行自己的权力，这就使斗争持续下去，耗费各派的精力，最后终于使政府机器陷于停顿。

在15、16世纪波兰共和国发展的最初几个阶段中，小贵族在整个国家中来说，虽然是属于贵族统治，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中间却是平等的。可是，到了萨克森时期开始时，小贵族比过去更自由了，但已不再是平等的了。主要的财源是土地，而土地的绝大部分掌握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主体——权贵，即严格意义上的贵族的手中。立陶宛、罗塞尼亚的大庄园是他们的，教会和国家中的高级职位连同其岁收是他们的，结果，权力也是他们的。小贵族们梦寐以求的民政和军队中有利可图的职位以及土地的租赁权，全都直接地或间接地由权贵们赐予。无地的小贵族只有依附贵族和地主维持生计，充当他们的代理人、管家、侍从和小土地承包者。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为了报答权贵们的恩惠，都要在地方议会中投票选举他们为候选人。这种互惠关系使小贵族和小乡绅依附于贵族而为其所利用，以此来对付与国王联合、其首领可以获得更大恩惠的另一派，或者用来作为向国王

进行勒索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议员可否决议会决议的权利，便在17世纪中期重又盛行而且被滥用，作为单独一名议员便拥有了可破坏整个议会工作的一种手段，而且总是为了某个地方权贵，或者，在1680年以后，则是为了某个外国的利益。而在此以前，这种否决权实际上已中止，已经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为了达到理论上的一致而作为议会做法中的一个合理部分。二三十名权贵和大约70万名小贵族作为一方，国王和权贵们作为另一方，双方之间新的契约关系，非常荒谬地使波兰的社会结构变得比中世纪时还要封建主义。这种比拟，由于通常由某个贵族派系所操纵的地方议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拥有广泛的自决权而更为强烈。在17世纪中，他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巴拉丁领地中招募军队，并用他们向他们下属的各阶层征收的税收来维持这些军队。他们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地方行政司法长官的权力，这些地方行政司法长官，过去曾经是国王在各县的臂膀，现在则是他的日益减少的权力的代表。地方行政司法长官的行政职责是很轻松的，就是公布国王的法令，收集赋税、欠款和维持他所驻在的城镇的秩序。他在司法方面的职责比较繁重，但是却可以而且往往也是委派他人代理的。巴拉丁（省长）也是由国王指派的，过去负责现已废除的“总动员”；他仍然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人物，在参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已不再是一名官员了。他在审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诉讼案件中所担负法官的工作，以及他在实施经济管制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就像地方行政司法长官那样，大都交由他自己委派并付给报酬的代理人。岁收的征收工作由在全国议会或地方议会中从小贵族中间选出的征收员和财务管理员办理，地方如有需要，岁收也可由他们处理。在城镇中，市政当局负责征收现行税；在乡村中，则由地主或由授予特权的村社征收。正是由于这种事态——政府为小贵族所有，由小贵族所掌管，为权贵而服务——当时有一位外国旅行者因此就说，波兰这个广阔的共和国，它的文职官员比小小的卢卡公国还要少。

波兰中央政府的职能和组织，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按照规定，大法官履行首相职责，副大法官则履行外交大臣的职责，大马夏尔实际上是警察局长，而宫廷司法官则是宫廷大臣。两名司库分别掌管国家和宫廷的财政，大盖特曼为总司令。波兰的每名大臣，在立陶宛都设有相应的官职。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是由选举产生的立宪君主。除了委派大臣以外，他还可以从150名参议员（大主教、主教、巴拉丁和城堡主）中挑选28名顾问，称作常驻参议员，其中7名

伴随国王，半年轮换。但是，由国王连同其政府和大法官以及参议会全体成员构成的上院，却要服从两年一届的议会的意志，未经议会批准，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决定。国王仍然保有一项原有的权利，就是任命国家中的全部官员的权利。但是，即使在这点上，国王的权力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官员们是不能撤换的，除非犯有重罪才予撤职。国王还有一项特权，就是“将面包分配给当之无愧的人”，换言之，就是把王室的领地终身地分给有资格获得封赏的人们。还有一部分王权，就是给予国家的各个机关以资助，因而这些机关的官员很少是有薪金的。

至于司法行政方面，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制，甚至连一部完整的波兰法典也没有。农民处于庄园主的裁判权之下，庄园主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有一些村庄则除外，在那里，原有的居民曾获得由日耳曼自治城市法律规定的特权。在这些村庄中，他们的后代子孙，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的自治。同样，城市也有自己的法庭，根据日耳曼法律实行审判权。小贵族是根据成文的和传统的波兰法律受审并判决的；刑事案件首先由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审理；而民事案件，则由宫廷经济官或地方法官审理。两造可以根据对他们的判决向几个职能似乎有所冲突的高等法院中的一个，即由选举产生的陪审法庭提出上诉。由国王、参议会和一些代表组成的议会法庭，审理违反习惯法的案件、刑事案件和冒犯官吏的案件；大法官与国王从教会和政府的显要人物中指派的顾问们一道审理对市镇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并审理指控它们的案件；大臣法庭则审理王室庄园的农民对官吏们或承租人提出的上诉。由于两造社会出身不同而产生法律上的矛盾，则根据波兰法律自行解决。法官没有法人团体，既没有律师的职务，也没有法官的职位，但只有职业的抗辩人，他们是经过学徒制受到训练，并且得到这几个法庭的承认。从理论上来说，国王仍然是最高法官，所以在国王空位期间，一切司法程序均告停止，而成立几个临时法庭。但是，事实上，由于立法完全无视行政与司法，所以，议会就像最高法院那样行使权力，并且往往宣布陪审法庭的判决无效。地方议会也根据同样的原则办事，往往也宣布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地方法官或宫廷经济官所做的判决无效。当人们认定国家的全部机构已不能行使其职能时（这在各届萨克森人国王统治期间是司空见惯的），小贵族为了自卫，或者在所谓自卫的幌子下，组织一种联盟，这是一种为了达到

共同的政治目的而自由组合起来的同盟；从理论上说，它的权力来自国王，但实际上却大都是针对国王的。

如果说，波兰的制度赶不上时代，那么它的经济则是落后的。1719年的议会拒绝再进行任何战争，这是不足为奇的。自1648年至1717年的70年中，战争、饥馑、火灾和瘟疫一直闹了55年。本国的和外国的军队的掠夺，比实际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毁坏还要大。财产遭破坏或被掠夺，金钱被盗窃而告匮乏。人口大约减少了1/3，耕地面积因此也减少了。谷物自然也要减产，大约在1750年以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无法改进。由于徭役有增无减，平均每周达3天，因此农奴劳动的产量下降了。农民向地主应尽的其他经济义务，如劳务、现金赋税等，在18世纪上半叶也达到了顶峰。农民的法律地位仍然未变，仍旧束缚在土地上，到1768年以前地主一直对农民持有生杀大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七八百万农奴正在向小贵族做出让步。在17世纪下半叶的大变动中，很大一部分农民失去了他们对农庄所拥有的传统权利。地主这时可以专横地减少农奴租入的土地，或者强迫他出售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中等庄园所占比例减少了，从17世纪的25%到18世纪降到了只占总数的11%；同时，第一次出现了农业劳工，无土地者则为全日制劳工，如只属于土地短缺者，则为非全日制劳工。顺便提一下，分成阶层的已不仅限于农民阶级了；权贵们（中等小贵族几占一半）与其无土地的小兄弟之间的平等，早已名存实亡了。但在乡间的某些地方，人们认为重建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老式庄园所费不赀，因此弃而不用了，代之以契约制。根据契约，农民以免役税换取继续拥有其农场。这种变更就曾在立陶宛的王室领地的某些庄园中和波兹南公国的一些村庄中实行。萨克森时期波兰的农业状况，从由外国船只装运的谷物出口中，就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来。1700年到1719年间平均为2万拉斯特（但泽拉斯特约为3107升）；1720年至1762年期间上升到3.1万拉斯特，出口增加约为前一世纪上半叶平均记录的1/3。在欧洲市场上成功地与波兰竞争的国家有英国、勃兰登堡、利沃尼亚，特别是在18世纪的中期还有俄国。

城市居民总共约有50万人，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比乡村还要糟。撇开华沙不谈，那里的居民在1772年达10万人以上。但泽、克拉科夫、维尔诺、利沃夫的居民在2000人以上。波兹南1773年约有5000人。托恩和卢布林1772年居民约有1万人。还有几十个小城市的居民人

数在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但是，大小城市都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的迹象，而且正在逐步走向痛苦和毁灭。工商业濒临凋敝。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尚有待全面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比较小的城市中，无论如何地主的剥削和不公平的竞争毁坏了手工匠人，使城市变成了一个农业的庄园。地主首先使市政会从属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后，就专横地对手工业行会课以沉重的赋税，最后又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建立自己的作坊，不受市政的管辖，由农奴充当作坊工人，这就终于使手工匠人停业。同时，地主又置当地的商人于不顾，径自进口外国货，从而摧毁他们。绝大部分的商人和大多数的手工匠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城郊从事农业，并且让为土地法所禁止种地的犹太人起着中产阶级的作用，充当小商人和小手工艺人，但主要是充当地主的各种经济专卖事业的特权的赋税承包人，如出售酒、焦油、干草和磨坊的税收等。在王室的自治城市（Boroughs）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过程；这些自治城市被肆无忌惮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们压榨得民穷财尽。按照资本主义方针组织起来的羊毛业，从这个世纪的中期就在大波兰的一些城镇中兴盛起来，只有在波兰的普鲁士、华沙和克拉科夫才能与它并驾齐驱；这种羊毛业是个例外，没有受到这种死气沉沉的统治。但是，在其他的地方，由于没有保护关税，由于缺乏资本，城里人因而不愿在工业方面进行开拓。第一批的实业家，绝大多数都是小贵族。铁工厂少得可怜，编织地毯、帘幕和制镜子等工厂也寥寥无几，这些都是在奥古斯特三世统治的后期建立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全都归功于一些开明权贵的倡导。这种做法虽然有用，但它仍然不能够弥补乡村生产力与制造品消费二者之间令人心烦的差距。虽然小贵族对于不得从事商业感到有所损失，但他们实际上不纳税，免缴出口税；除此以外，还准许他们同样免税进口自用物品。仅仅这些特权，就非常有助于说明波兰中产阶级的贫穷与匮乏。至于就对外贸易而言，小贵族们实际上是暗地里的商业贵族。商人不可避免地索价较高，这就使他失去竞争能力，从而沦为代理商。经济控制也对小贵族有利。国内机制品的价格所以保持很低，是根据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土地所有者的利润提高了，而手工匠人的利润则降低了，这就使投资成为不可能的了。前一时期所带来的货币危机，使萧条更加严重起来。铜货币有剩余，新出现的银币价值降低，只有金币仍保持其价值。银行业仍处在初建阶段，而且是掌握在几个外国人的手中。

很明显，波兰的经济，正如同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一样，由于头重脚轻因而是不可靠的。它在物质上的脆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没有一个建设性的财政和财经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目标本应是把集中在少数宠儿们手中的财富收入的绝大部分转向于国库。

在这种非生产性和孤立的农业社会中，西欧城市的和世界主义的文化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的。教育已不再昌盛。加尔文派教会学校以及在其以前的阿里乌派教会学校，在17世纪的下半叶均被迫停办，从而与西方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消失了。路德派教会学校是德意志的，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札莫希奇学院已奄奄一息，维尔诺学院也不过是一所耶稣会士的学院而已。克拉科夫大学是一个培养教师的摇篮，它把它最后所有的300万兹罗提^[1]都用在为约翰·坎蒂乌斯行宣福礼上面去了。小贵族的教育，几乎全部掌握在耶稣会会士的手中。每个乡间在每个时期都有其值得一提的耶稣会会士。波兰的耶稣会会士已经消除了持异议者所有的竞争，这时认为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因此甚至连教学规则的戒律也不愿遵守了。他们教拉丁文法靠死记硬背；拉丁文诗歌变成了韵律的练习，刻板，大都是颂词式的、讲究拉丁文修辞的夹杂着拉丁文的波兰文；他们的道德教育就是反复灌输自由否决权，小贵族天生超人一等，讲究仪式，宗教上不容异说以及对教会持有毫不犹豫的忠诚等思想。

学问已经熄灭。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K. 尼西斯基的纹章书（波兰王冠……）。最有特色的著作是B. 季米洛夫斯基的百科全书《新雅典》，S. 皮冈把它说成是惊人无知的典范，关于这一点，现在很难确定更应推崇什么：是编纂者的单纯或勤恳，或者还是作者引用假想的材料时的精确程度。在1750年以前，当虔诚会教士冒险出版了哥白尼学说的某些节录时，还没有一本文字著作提到过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说法。当克拉科夫主教兼波兰大法官A. S. 扎鲁斯基把他的私人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时（1747年），才在这片黑暗的国土上透进了一线光明。这批藏书最后达到30万册，手稿1万件，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期的文献，主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一圣贤传、赞美诗集、圣经的传奇和韵文释义。世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的风格是诗体的浪漫文学。但是，能读法文消遣的，就不去读波兰文了。在18世纪转向下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六位政论作家，既没有能够明确说明波兰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改革计划。他们的

著作没有一个是能激动人心或具有说服力，足以与《自由、女王与宫殿主妇》一书的那种自负的乐观主义相比。这本书的手稿在1670年前后问世后，曾出过3个版本，即1727年、1736年和1745年版，它阐述了一般小贵族的政治观。这位耶稣会会士作者写道：“自由的炼狱比专制的地狱好。感谢上帝的保佑，我们虽然在不断地沉沦，然而我们却在发光；我们虽然在不断地毁灭，但是我们却活着……尽管我们处在我们这样的无政府状态，由于政府采取了极其微妙的去芜取精的办法，我们却像其他人一样，居然取得了成功。”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随便使用“否决权”。这个主要原因在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在其“使自由可靠的自由发言权……”（1749年）一文中第一次对它进行抨击（不管是多么转弯抹角地）以前，主要是被掩盖起来了。又过了十多年以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被保护人斯坦尼斯瓦夫·科纳尔斯基才发表了他的《论有效的辩论行为》（1761—1763年）一书来清除《自由、女王与宫殿主妇》一书的有害理论。他在书中提出要有一个对两院制议会负责的、遵循多数决定的政府。这一改革计划一直到下一代才得以实现，但是这本书产生的直接影响，却是重大的：该书第3卷于1762年问世后，没有一届议会产生分裂。科纳尔斯基对公众的其他巨大的贡献，就是1753年对他所属的天主教虔诚会所办的学校进行的改革，改革是按照1740年他本人在华沙所建立的贵族学院的模式进行的。自此以后，虔诚会的学校便讲授批判性的思想、明晰的表达、公民权、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现代和古典的语言。耶稣会会士为了和他们的对手竞争，也不得不照样做。于是，国家的两项最迫切的需要，即一个政治改革计划和一个新的教育体制，就由一个人解决了。但是，科纳尔斯基的活动预示，受到这些活动的全部影响的是随后而来的那个阶段，而不是奥古斯特三世的时代。

1717年，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在经历了20年国内外几乎不断的危机后，终于和他的叛逆的波兰臣民达成了协议。奥古斯特当选后两年于1697年面临着一伙人拥戴一位对立的波兰国王的局面。1697年6月，孔蒂亲王弗朗索瓦·路易受到为数众多的人的拥护，而推选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的人却是少数。两人都动身前往波兰，但是这位法国人于9月底到达但泽时，却受到敌对的接待，并且发现奥古斯特已在半个月前加冕了。他打算与彼得大帝和丹麦国王一道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领地，这就导致了奥古斯特于1701年7月的惨败，瑞典人紧接着席卷了维尔纽斯、华沙和克拉科夫，并利用在1697

年至1699年间反对奥古斯特的那些波兰人，于1704年选出一位名叫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人为波兰的对抗国王。奥古斯特实际上已于1706年被迫放弃王位。当1709年俄国在波尔塔瓦打败瑞典以后，他虽然能够返回波兰，但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莱什琴斯基的支持者们于1711年，其后又于1712年从北方进攻，1714年波兰本国出现了不安定的迹象，到1715年对萨克森军队撤出波兰的要求呈现出一些危险的方面。从国王与小贵族（塔尔诺格罗得联盟）之间的实力较量中，一个想坐收渔利的第三者出现，并在波兰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因素，他就是俄国大使。11月间，在这位俄国使节的倡议下，国王和联盟的领袖们签订了《华沙条约》，这个条约于1717年2月1日得到短命的议会的默认。1717年的条约，是整个萨克森时期唯一一个立法成就，它对于波兰的宪法没有引起任何深刻的变化。它的大多数条款注定是要成为一纸空文的，仅仅使得妥协的各方挽回面子而已。国王的一切决定，必须要经过常驻参议员中大多数人的同意；他在波兰保持的萨克森人的卫队不得超过1200人和6名萨克森人官员；其他的条款也说不上有任何好处；作为军队的财政长官的盖特曼的权力，大大地减少了，他在国王选举中不得充当候选人，但仍为终身职务；这个职务是有害的；军队的编制固定在2.4万人，人数即使如此之少，但也得不到足够的信任。

条约的经济方面，则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军队的编制，一如既往，由本国人和外国的志愿雇佣军组成，如果说它人数少，但它至少是常备军，并且根据情况不再为以后各届议会所固定的了。更为重要的是，波兰的财政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按照类似预算一类的东西进行管理。岁入已明确包括“克瓦塔”（Kwarta）在内。这种赋税是根据已经过时的地籍调查从宽估计，实际上占国王领地上的佃户——“将面包分给当之无愧者”的官员和接受者——收入的2/5，而不是1/4了。包出的关税每年为35万兹罗提，葡萄酒税为5.8万兹罗提，最后是向犹太人社会征收并由其收集的一次总纳税额22万兹罗提。因此，1717年至1764年，国家每年收入约为90万兹罗提；这些岁入司库必须向每届议会汇报开支情况。预算的半数以上充作军队的开支；此外，军队还自己另有安排，征收价值近400万兹罗提的人头税，是向整个基督教徒人口征收的，不过最沉重的负担是压在农民阶级的头上，而且是以过时了的人口调查为基础而征收的；干草钱，即所谓的“越冬费”（Hiberna），由国王和基督教会的产业支付军队，价值约为100万兹

罗提。各巴拉丁议会丧失了为军事目的而征税的权力，但却获准对零售酒类征收零售税（照字面上称为“酒钱”），这是一项以前由国家征收的税，这项收益可用于地方的需要。

调解国为这次妥协而索取的代价是昂贵的。沙皇不仅没有撤退他的军队，反而占领了库尔兰（1718年5月）并违背了他早先与奥古斯特达成的协议，拒绝交出利沃尼亚，要把波兰从波罗的海的沿海地区排挤出去。根据法律规定，库尔兰应在这个公国的克特勒王朝灭绝后归还波兰。另外，他还阴谋扭转与查理十二世的大臣格尔茨结成的各个联盟。波兰的小贵族们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明白他们一直是在为谁帮忙，因此对彼得提出了责难。这位波兰国王在这一反响以及由于沙皇在西欧各国宫廷中日益不得人心的鼓舞下，遂采取了一种摆脱沙皇监护的政策。格罗德诺议会于1718年年底成功地抗住了俄国和普鲁士利用贿赂“否决权”的办法分裂议会的企图，并且准许国王采用让议会体会这种非同寻常的权宜手段；用那位感到震惊的俄国使节的话来说，“好像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似的”。促使沙皇撤军的是波兰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出于增援瑞典前线的需要，而不是由于签订了维也纳条约（见下文）。^[2]

奥古斯特在1717年的条约签订后在使自己摆脱俄国监护所做的努力中，日益向维也纳靠拢。1718年萨克森内阁大臣弗勒明成功地使腓特烈·奥古斯特（未来的奥古斯特三世）和查理六世的侄女玛丽亚·约瑟夫结婚。这种个人关系的联盟无独有偶，在维也纳条约中也有一个，即1719年1月在奥地利、乔治一世和萨克森之间缔结的联盟。有关各方一致同意要迫使俄国撤出梅克伦堡和波兰，保证波兰的边境和它在其属地（库尔兰）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卫奥古斯特二世不受外国阴谋的破坏，以便使他能够实行宪法改革。瑞典在形式上仍与萨克森处于战争状态（一直到1719年12月），但瑞典的友好态度一如既往，而奥地利、瑞典、波兰和萨克森之间反俄结盟的可能性也是可以设想的。现在仍然有待议会（已于1719年年末复会）批准条约并迎来一个军事荣耀的和奥古斯特暗地里希望的权力改革的时代。他的希望不久即令人失望。议员们不仅没有批准条约，而且还反对采取任何可能使波兰卷入另一场战争的政策；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将使小贵族们的产业遭到彻底的破坏。1720年，国王再次企图说服议会参加结成一个反俄集团，但是没有结果。在这次惨败后，奥古斯特二世和波兰人

便各行其是；国王则在谋取韦廷家族的利益；而小贵族们则在虚假安全感的欺骗下，吃、喝、玩、乐，并在他们的无政府状态、愚昧无知和宗教偏执的园地里耕耘着。

天主教徒们希望“在一个天主教王国里只有一种信仰，它的公民们只有一条心、一个灵魂”；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自然要发现“国家不成其为国家，却成了可悲的场所，奴隶的牢笼和压迫的牢笼”。波兰的20万新教徒，大都是由皇家普鲁士和大波兰的德意志路德宗的同乡和移住民组成的，但也包括1000个出身高贵的波兰家族。他们的处境自奥古斯特统治的最初时日起，就每况愈下。在瑞典人占领的短暂期间，他们的日子自然要好过一些。查理十二世恢复了久已被人忘怀了的礼拜自由，而且将会使新教徒的宗教权利与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利相等，要是莱什琴斯基没有使他相信他们不能让他们们的同情心去伤害小贵族们的宗教感情。奥古斯特复位后，新教徒的敌人们便利用了他们与瑞典人的勾结。国王的保护对他们的帮助不大；而且，一有机会，就要他们安分守己，丝毫不得越轨。华沙条约的第4条禁止恢复原来的新教教堂，并且命令将在1704年至1709年间建立的那些新教堂摧毁。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教堂禁止举行一切礼拜，否则第一次将课以罚款，第二次将予监禁，最后则予流放。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担任文官和军职时，天主教徒则优先于新教教徒。天主教的狂热信徒们把措辞松散的条文解释成为是一种法律根据，由此可以在持不同宗教信仰者回到罗马天主教的信徒行列中来以前，剥夺其全部的宗教权利和大部分的公民权利。反对新教徒的行为这时可以提交普通法庭审理，这些法庭清一色地由天主教徒组成，而不是由国王指派的混合人员或由议会委派的代表所组成。至于教堂，人们争议说，它们要是老教堂，即原来是信奉天主教的，则必须使之恢复正常活动；或者是新的，则必须予以摧毁。1717年，立陶宛的法庭以宗教的理由，将它的4名新教徒成员排挤出去，此后，即不允许异教徒担任立陶宛法庭的审理工作。同年，议会也将其7名新教徒代表中的1名代表排斥出去；1718年，这一做法又用于所有的新教徒，并且成为惯例。在奥古斯特二世统治的其余年代里，对于新教徒的迫害虽然没有什么增加，但是极端分子的敌意并未消除。1733年他们说服公议会宣布说，“在本王国内，摈弃那些外国的崇拜”，并且不许非天主教徒担任所有行政机关的职务，“现在任职者则可安于职守”。奥古斯特三世是1572年以来第一个不需要在各种基督教宗派之间保持和平的国

王，他在1736年批准了这一法律。破坏新教教堂和关闭新教学校的事件不断地出现，这些事件在新教徒的死敌大主教K. A. 谢姆贝克1748年去世以前，与其说是为多数的小贵族所赞同，不如说是在他们的纵容之下。据估计，在1718年至1754年间，仅大波兰一地新教徒就失去了30座教堂；在小波兰，他们的损失也不在其下；在立陶宛，原有的51座也减少过半。

波兰的邻国迅即抓住宗教问题作为进行干涉的机会。不信奉国教者，甚至在他们自己开始向新教国家申诉他们的不满并向这些国家请求保护他们的权利（1713年）以前，他们就成了各国之间（普鲁士与瑞典；1707年，1705年，1707年）条约的一些条款的主题。俄国和普鲁士于1730年首先共同保证保卫新教徒和东正教徒社会的权利（见下文）；但是一直到1724年，彼得大帝对波兰的在宗教上居于少数的教派的关注，只限于对至少有60万人的东正教徒社会。东正教那时在波兰的东部和立陶宛是一个正在没落的精神力量。到1702年，东正教合并派^[3]的礼拜式，已经席卷了东部除莫希勒夫以外所有的主教管区；1708年波兰东正教的主要据点——利沃夫的十字派^[4]公会，落入巴西勒派之手。只有俄国的帮助才能挽救东正教社会进一步的解体；但是，一直到彼得一世懂得了它作为一种世俗政策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才提供了这种帮助。1686年的“永久和平”条约的第9条保证东正教徒享有公民权和宗教权利，不过只是在1720年当他在波兰的势力减弱时，以波兰境内的东正教徒社会保护人自居的彼得，才卖劲地与波兰国王进行抗争。奥古斯特二世满足了彼得一世的要求，发表声明保证莫希勒夫主教的福利，进一步明确东正教的全部权利和特权。但是，这样一种个人的声明是背着议会发表的，没有法律的作用。这位沙皇提出抗议，要进一步采取行动；他派出一名代表前往莫希勒夫，要他就波兰境内东正教的状况（1722年）提出报告。但是，两年后在托伦发生的一场吵闹，并没有引起他以进攻作为回敬。

托伦是一个制造业城市，居民中波兰人和讲德语的人数几乎相等；但是却由后者居民治理，因为他们在手工业行会中占优势。天主教的堡垒、不断挑起新教徒的愤怒的，就是当地的耶稣会学院。这两部分居民之间的长期不和，在1724年7月26日达到了顶点。当时一群新教徒的暴民，在一名耶稣会学院学生的挑衅下，闯入了该学院的校园，褻渎了校内的小教堂。这个问题提到参议会后，国王本人虽然对

此表示冷淡，而且一般来说，他对于不信奉国教者并不是不表同情的。但他急于迎合天主教徒的意见，未将此案交由他自己的法庭或议会法庭审理，而于10月间交给了司法官裁决。而这个法庭清一色地由天主教徒所组成，它遂判处12名主要暴乱分子，以及市长和其副手以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制止这场暴乱；法庭还命令修复一所天主教堂，并将市议会的一半席位分配给天主教徒。新教徒们因此遂向西方同宗教的各国提出呼吁。新教各国接着便提出了协调一致的抗议^[5]，但这个抗议没有得到俄国的支持：彼得一世没有重复他早先提出的公正对待东正教这个少数教派以及新教徒的要求。奥古斯特正式拒绝了这个抗议，但他私下暗示，除非让他合理地改革波兰的宪法，否则他就不能对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承担责任。俄国不愿承担义务的态度和普鲁士害怕被卷入的担心，使危机逐渐不了了之。但是，除非波兰国王陛下的不仅每一个新教徒臣民，而且每一个东正教的臣民都对教皇表示悔改，而且两个教会之间的这场对于波兰将产生可怕后果的斗争在未来40年里不会愈演愈烈，罗马天主教的统治集团将不会是手软的。东正教的教士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俄国驻华沙的大使向圣彼得堡提出呼吁，要求阻止这种强迫各教会、全体信徒和各修道院改宗的做法。圣彼得堡将会指示其大使提出正式的抗议，对此大使只能收到一个多少是闪烁其词的答复，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势必要触怒边境地区的那些也是俄国方面支柱的权贵，因此这样做自然要被人认为是不适当的。不仅如此，抗议有时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改宗决不总是被迫的。莫希勒夫的主教伏尔昌斯基在1753年致俄国大使的一封信中说，各教会的会众之所以转向“合并”，是由于教士们“信仰不坚定”。

波兰1720年的议会拒绝加入维尔纳条约，这就使条约不能实现，而且促使俄国和普鲁士实行它们于同年2月在波茨坦缔结的秘密协定的条款。两国保证保护波兰的政治体制，换言之，即促进波兰的无政府状态；保护不信奉国教者的权利；并阻止由萨克森人继承波兰的王位，从而为以后的1726年、1729年、1730年、1732年、1740年、1743年和1764年的条约树立一个样本。奥古斯特对于这个阴谋毫无觉察，却由于小贵族们拒绝了他的民族政策而被激怒，遂一反常态，制订了一个新的肢解计划而与俄国和普鲁士打交道。沙皇此时仍然扮演一个波兰保护者的角色，遂以此行动向小贵族们透露了这项计划，造成了一种极好的印象。俄国根据尼斯特兹条约取得利沃尼亚是不得人心

的。这个条约是在第二年（1721年）在没有波兰参加并且仅规定它可加入的情况下签订的。1720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君士坦丁堡条约，实际上是让彼得摆脱了不干涉波兰事务的义务，并且公然让俄国插足进来。

1720年以后，奥古斯特集中全力去争取其臣民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支持由一位萨克森人来继承波兰的王位，但在这两个方面都遇到了理所当然的、顽固的反对。韦廷家族的人在小贵族们中间如此不得人心，因此1726年当库尔的贵族们要把这块公爵领地交给奥古斯特二世的私生子、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时，议会既不予以承认，也不给以帮助，并且要求把库尔并入共和国，不过并没有指示盖特曼们要抢在俄国人前面采取行动；他们把这位萨克森人赶走，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奥古斯特自己没有权力。他过去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弃他而去支持沙皇。他自己的仆从几乎都已去世，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强有力的宫廷党同。包括权贵们在内的小贵族大众，对于这位萨克森人国王是不满意的；他们希望改换王朝，并且赞同由他们的首领波托茨基家族（大主教蒂奥多和罗塞尼亚的巴拉丁约瑟夫）制定的一个纲领，以便确保自1725年以后即成为法国国王岳父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最后当选为波兰国王。这就是他们1729年和法国大使蒙蒂侯爵达成协议的目的。为此目的，他们寻求奥地利和俄国的支持。如果他们得逞，莱什琴斯基从他们手中接过王位，波托茨基家族除了拥有更大的大庄园，拥有比其他任何贵族家族更多的教会的和世俗的职位，享有更多的“将其分配给当之无愧者的面包”以外，还将行使国王的权力。邻近各国也竭力要挫败奥古斯特为他的儿子腓特烈·奥古斯特取得波兰王位所做的努力。尽管国王已在1713年承认了“国本诏书”，但皇帝还是担心国王或他的儿子参加争夺奥地利王位的继承权。1726年，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他遂与俄国结盟，以便阻止在波兰建立萨克森王朝。奥古斯特孤立无援，而且自1728年即疾病缠身，他遂设法寻求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私人友谊和政治友谊，只是又一次在斗智中败于俄国人之手。1732年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这个密约是由俄国驻柏林大使C. 勒文沃尔德起草的，它把腓特烈·奥古斯特和莱什琴斯基两人都排除在波兰王位继承权之外。如果这位国王在此同时企图搞一次政变，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就将开进予以制止。1733年2月，奥古斯特在走向坟墓的边缘时，曾对他的“好友”大臣格鲁姆

巴科吐露了他的关于在俄国、普鲁士和韦廷家族之间瓜分波兰的“宏伟计划”。

在国内，奥古斯特可以在有限的程度内依靠一个非常类似的宫廷派的，即古老的但至今一直默默无闻的立陶宛的恰尔托雷斯基公爵家族。这个家族在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领导下崭露头角。波尼亚托夫斯基过去追随莱什琴斯基，现为马索维亚（即马佐夫舍）的巴拉丁；他由于婚姻而成为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姻亲，在他们和宫廷之间起着媒介的作用。通过A. A. 恰尔托雷斯基与波兰的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1731年），这个家族遂成为这个国家中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和波托茨基家族比较，人数较少，因此比较团结，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而且热心公益；他们一样地反俄，但却不是一样地亲法；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并不缺乏野心，但其目标却不仅是攫取权力而已；他们不是把他们的国家当作野心家们愉快追逐的猎场，而是他们将要医治的有病的政治机体。他们的正直为他们招来了权贵们的敌意和中产阶级小贵族们的同情。他们不总是支持宫廷的，只是偶尔的，而且是有原则的和出于权宜之计。他们向国王保证（1726年），要在下一次的选举中投票选举他的儿子，这种保证因而也是含糊的，不能认为它是具有约束力的。奥古斯特依然认为，提名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任波兰军队的总司令作为任命他为波兰的大盖特曼的第一步，是得策的。但是，由于这种任命只能由一个完全合法的议会提出，而把盖特曼这一官职视为自己家族垄断的一个部分的波托茨基家族，自1729年以后每当一届议会集会伊始，即使它陷于分裂，其中也包括1732年的那一届，也就是奥古斯特二世统治期间的最后一届议会。宫廷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知道在每一届议会中，他们都将拥有多数。在第一个萨克森人国王统治下，陷于分裂的议会的数字是，在总共13届的议会中就有9届。

据说，强者奥古斯特在弥留之际曾说过：“我的整个一生罪恶不断。”这番话极好地道出了他那可耻的私生活的特色。但这一点不能扩大到他作为君主的一生经历。对于此人，传说他在上帝面前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有意伤害波兰；而且，实际上为公众的利益和维护和平而工作。不管情况如何，正如第二句说法不会开脱他的罪责一样，第一句话也绝不会对他进行谴责。事实仍然是，甚至在他认识到他自己亲政已不可能，而且他执行了一种往往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

政策以前，就在逃避宪法改革的责任。事实证明，他如此不顾一切地在北方进行的冒险所造成的后果，就像对它的邻国有利一样，对波兰是一场灾难。波兰可能收复的或取得的疆土（东部的摩尔兰和利沃尼亚，西部的瑞典属地波美拉尼亚）成了俄国和普鲁士进行的命运攸关的扩张的桥头堡。另外，至于谴责他发明了并且向波兰的敌人提出了瓜分波兰这一主张，是不公正的。^[6]在北方大战分裂的气氛中，这个在1656年第一次设想出来的主张，不仅为奥古斯特并且也为莱什琴斯基所考虑；一直准备和他的朋友或敌人瓜分这个共和国，只要他自己仍然当国王；并且也为立陶宛的分离主义分子所考虑，他们于1705年，又于1714年两次倒向俄国。

在奥古斯特二世逝世前夕，法国驻华沙大使蒙蒂侯爵向法王通报说，尽管在这个国家中一片和平气象，但在其表象的下面，几个为首的家族却在阴谋策划，兴风作浪。但是，在随后而来的空位期间，蒙蒂利用他的说服人的本领和手头的大量钱财等手段，终于使波托斯基和恰尔托雷斯基两个家族和解，并且说服他们接受莱什琴斯基作为他们提出的共同候选人。他的傀儡统治中的这段可悲历史，到这时已为人们所谅解，或者已被人遗忘，而在那个干涉的年代中，他那被人理想化了的人格，在小贵族们看来，成为波兰的自由、伟大和民族传统的象征。

蒂奥多·波托茨基大主教一心要使这次选举的结果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从道义上迫使宗教会议议会通过一项决议，一切外国人不得充当国王候选人，换言之，也就是指莱什琴斯基的所有可能的竞争者。这种排斥一切的行为，是经过全体议会代表签字并宣誓的；要是这些比较滑头的签字者没有保留“一切有关自由选举的立法原封不动”以此来使他们的赞同成为适当的，这种做法就构成了对波兰国王经过自由选举这一原则的违反。与此同时，萨克森运用外交手腕，说服了奥地利和俄国放弃它们排斥腓特烈·奥古斯特以及莱什琴斯基并在波兰扶植葡萄牙王子的计划。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才能够与这位皮亚斯特家族的成员竞争。1733年7月，他和这两个帝国宫廷达成谅解。为了报答它们的支持，他事先放弃了波兰对利沃尼亚的要求，答应将库尔兰归于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宠臣比伦，并且保证他要尊重波兰的自由。罗马教廷从旁相助，宣称对于排斥外国候选人的决议所发的誓言不具有约束力。华沙又一次

出现了大批出高价收买选票的萨克森代理人；不过真正的卖主还难以发现。当斯坦尼斯瓦夫按照红衣主教弗勒里的命令，隐匿身份经由陆上旅行突然在波兰首都出现时，受到了人们几乎一致的热情欢迎。9月，大约1.2万名选举人拥戴斯坦尼斯瓦夫为国王。伏尔泰写道：斯坦尼斯瓦夫一露面就当上了国王——不过好景不长：仅仅由小贵族们的意志来决定国王选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支3万人的俄国军队正在出发，前去保护聚集在维斯杜拉河对岸的布拉格的亲萨克森的少数派。摇摆不定的分子感到惊慌，他们叛变了，渡过了维斯杜拉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许多人都接受了双方的贿赂。英国大使乔治·伍德沃德写道：“如果说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自由，上帝就不要赐给我们这种自由。这就是他们所称的大、小贵族，他们彼此轮流着充当奴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就是，顺境时趾高气扬，逆境时则低三下四。”^[7]俄军一到达，大约有3000名选举人便拥戴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这3000名选举人大都是依附于立陶宛的权贵们的，如果选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产业和特权就将丧失给安娜女皇了。

莱什琴斯基在俄军逼近以前就逃之夭夭。他在但泽避难，并在那里等待瑞典和法国的援助。路易十五认为自己必须宣战。正如阿尔让松所说的，“陛下是与一位平民缔婚的，因此王后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女儿”^[8]。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不是在波兰的疆土上进行的，而且它最终只是对法国有利。法国在伦巴第的进攻，成功地牵制住奥地利的军队；但是法国的外交活动，尽管经过了最大的努力，却并没有能够促使土耳其和瑞典采取军事行动。瑞典人唯恐重犯20年前的错误；土耳其人鉴于安娜女皇破坏了1711年和1713年的条约，本来是会进行干预的，但是由于他们正和波斯作战，因此不愿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所以，莱什琴斯基和他的追随者只好自己单独面对着萨克森人和俄国人了。1月，俄国人围攻但泽。路德教派的居民希望改善他们和法国的商业关系，并且为了能有一位宽容的国王即位，于是就向莱什琴斯基提供各种帮助。他们的由雇佣军组成的军队在封锁、攻击和轰炸下守住了城市，一直守到不得不放弃从海上和陆上获得解围的一切希望。2000名法军于6月到达，但是这并不足以扭转局面，使之有利于防御者。一支人数不多的保王党军队企图杀透重围进入但泽，但是他们被打败了。法国大使提出报告说，这些波兰人既没有军队，又没有大

炮，也没有军火和金钱；自（1683年）维也纳解围后，就没有什么波兰的军队，这只是在报纸的专栏里说说而已。莱什琴斯基已失去信心，并且为他的安全担心，于是就在1734年6月底，偷偷地逃出了这个城市，前往柯尼斯堡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处避难去了。7月，但泽城投降。显贵们，包括陪同莱什琴斯基一道逃亡的后来称为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主要成员在内，被允许向奥古斯特宣誓效忠。8月，斯坦尼斯瓦夫受到来自凡尔赛的充分的鼓舞并且对瑞典和土耳其的干涉抱有充分的希望，可以号召他的追随者继续进行战斗，甚至打算入侵萨克森。11月，在A. 泰洛的领导下在吉科夫（桑多米埃什附近）组成了一个联盟。参加联盟者通过他们的特使奥扎洛夫斯基，于1735年9月与法国签订了一个纯属形式的友好条约，而莱什琴斯基则打算实现法国和普鲁士恢复友好关系，目的在于把普鲁士拖入战争，但是没有成功。弗勒里急于要结束敌对行动，为斯坦尼斯瓦夫做了一次最不该做的努力，试图劝说俄国：他将会是一个比奥克斯特远为合适的邻居。但是，在他没有得到反应后，遂与奥地利媾和。最后的和约规定，莱什琴斯基退位（1736年），但允许他保持他的国王头衔，并且把法国在战争中赢得的洛林公爵领地给予他作为安慰奖。

在波兰，国王与参加联盟者之间的分歧是在1736年6月到7月的“媾和议会”中形成的。议会授权奥古斯特将库尔兰作为封地授予一位由当地议会挑选并为俄国、普鲁士和波兰所接受的诸侯，这是为以后指定比伦的一种婉转说法。莱什琴斯基的第二次的流亡，对洛林是有好处的。他在那里以个人资格做了许多好事，对于波兰来说则不是什么重大损失。他在1733年就像他在1705年时那样的出丑。流亡20年可能使他学到了许多政治哲理，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名军人或政治家。他对于自己福利的关怀有增无减，他比以前更愿意用他的那顶沉甸甸的王冠换取一笔像样的补偿金。他远不是一个“哲学家国王”，而是一个使国王背离其比较正确判断的哲学家。奥古斯特三世作为一个男子汉或统治者，甚至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712年就根据他父亲的命令而抛弃新教；但是，他既不会说波兰话，也不爱波兰。撇开1733年至1736年这个时期以及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不愿待在华沙以外，他在波兰总共待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他是一个蠢材，除了美术以外对其他毫无兴趣，他有一个嗜好——打猎；他把他的良心交给了一个耶稣会会士的忏悔神父，并且把他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宠臣们，1738年以前是打猎队长J. A. 苏尔科夫斯基；以后是

萨克森的首相、最强有力的H. 冯·布吕尔，一个三等的“他的那个时代的黎塞留、梅迪契、罗思柴尔德”。他把波兰的利益从属于萨克森的利益，萨克森的利益又服从于他的王朝野心。

每一个人都承认（莱什琴斯基1734年用当时的本国文和拉丁文夹杂的文体写道）我们共和国辉煌的结构“堤坝本身就会自行毁坏”；它必须要获得援助；实际上，如不出现奇迹，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四壁牢靠吗？四处大门洞开，敌人长驱直入，深入到我们国土的心脏地带，他们在全国各地横行霸道，横征暴敛，到处放火抓人。一个国家，法庭上没有正义，政府部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军队中纪律荡然无存，国库空空如也，政治混乱，它将如何能够继续存在下去？[\[9\]](#)

在以后的30年间，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每况愈下。在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期，议会的自由和国王的权威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完全被打乱了；15个议会中，只有一个议会能够按常规进行活动。在宪法上唯一能够制止国家政治机体陷于瘫痪的补救办法，就是组织邦联，往往是组织了，但却从来没有应用。国王在行使其特权时，只是任命官吏和控制对外政策，从未超过这些权限。这个国家唯一的真正权力，则归属于权贵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官职。如果这些权贵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团结一致，这种权力就可行之有效；但是，布兰尼茨基家族、萨佩哈家族、桑古斯克家族、拉济维乌家族、热夫斯基家族、维西涅夫斯基家族、卢保米尔斯基家族、泰洛家族以及其他二十几个家族，却分成各派，情愿在波托茨基家族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领导下彼此展开争斗。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后，现在看来，波兰历史“居然是一部一小撮家族及其争吵的历史”[\[10\]](#)。无论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还是波托茨基家族，谁也不是强大得足以压倒另一方（用选票压倒对方也无济于事，因为“自由否决权”使多数票毫无意义），双方都依靠他们似乎都认为是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这个办法，但是里通外国，不论实际上是无偿的，或是贪财的，不过总是卖国的。

波托茨基家族的目的是结成联盟把国王赶下台，并与俄国开战。法国或俄国援助的代价是非物质的。它们在1740年至1756年之间喜欢采用的行动方式，就是用普鲁士或法国的金钱贿赂一名议会代表来阻挠宫廷或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并且为了一笔可观的佣金而分裂议会。这些比较明智和正直的自封的“共和派”或“爱国派”和“黄金般的自由”的护卫者，暗地里希望建立一个由约翰·索别斯基的孙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恰尔托雷斯基家族1736年

后对于法国非常失望，此后仍继续为争取最高权力和改革而努力。他们向各国宫廷寻求保护人，1756年后则只向俄国寻求。

大多数对立的权贵们和宫廷看来意见完全一致的唯一问题是扩军问题。不过，如果说大家都希望扩军，其动机则各不相同。波托茨基家族希望奥古斯特把由波兰的大盖特曼（1736—1751年）约瑟夫·波托茨基指挥的新建团队交给法国人和普鲁士人支配；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则要奥古斯特率领他们加入奥俄阵营。恰尔托雷斯基家族都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向1736年到1752年间的各届议会提出拨款计划，但是，由于各派之间缺乏信任，各派领袖缺乏政治家风度，议会代表没有公益精神，因此，这些计划从未得到批准。军队扩充要有钱，要钱就要征税，可是没有一届议会甚至会同意取消先前已答应给予某些困难省份的减税要求，更不用说还要通过征收新税。双方的这种不可妥协的态度，首先是在俄土战争期间显示出来。当J.波托茨基正在筹划一个联盟，并寻求瑞典、土耳其和普鲁士的支持时，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则在试图说服俄国大使支持他们的扩军计划。俄国1739年的胜利，使双方的希望破灭。1741年波托茨基家族又一次企图组成一个自称以扩充军队为目的的联盟，这些建议是他们在最近的一届议会上所反对的，也就是那个要国王下台的秘密建议。到同年年底，又一次与俄国开战的瑞典派出了一些密使，企图要心怀不满的波兰人在俄国的后方采取牵制行动。在这两次事件中，闹事者都是从普鲁士那里得到暗示的。在1742年至1744年的外交和军事事件的背景下，波托茨基家族，由于他们极力要求结盟和依靠普鲁士的倾向，看起来就像是宫廷的天敌。另外，由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同情，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宫廷的天生盟友。由于这种关系，他们于1744年又一次向议会提出重整军备的建议。形势与1719年的很相似，甚至更为有利。俄国赞同真正的改革，可以用来换取参加反对另一个死敌普鲁士的联盟的特权。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获得了女沙皇不进行干涉的许诺，国王则通过同意J.波托茨基提出的关于保持对一支扩编军队的指挥权的意见，而成功地将波托茨基家族争取过来。布吕尔也决心不让事态听其自然发展。他知道普鲁士为了分裂议会而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遂利用一些坐探，其中一名在议会辩论的关键时刻，将一个装满普鲁士金币的钱袋抛在议会的地板上，指控10名议会代表接受了贿赂。议会得到拯救，不过只是成了怒气冲冲地进行反诉的场所，一直到会期结束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也没有惩办卖国者。波兰失去了唯一一次机

会，腓特烈二世从他那1.5万杜卡特廉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中4000杜卡特落入了他的主要代理人A.波托茨基的腰包。两年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为了实现他们倡议已在10年以上的改革，与波托茨基家族又一次达成谅解，而波托茨基家族又使议会陷于分裂。1748年，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好像要清除破坏议会的有害的权力似的，过早地宣扬即将来临的议会是等级的私产。这种做法只持续到让这个家族有足够的时间在议会法国和普鲁士收买的“共和派”破坏以前，提出了要成立一个赋税委员会的建议。

尽管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在议会中受到挫折，但是他们这时却是占优势的；但是，把这个家族推上权力顶峰的布吕尔，不久又使他们垮台。1748年，他们成功地诱使法庭根据伪证证实布吕尔系出生于一个波兰的贵族家庭，这就触怒了对他们的特权原已持有妒意的小贵族们。波托茨基家族利用这一事态。在法院的下一个会议开幕时，波托茨基家族的追随者们就强迫阻止新当选的主席（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一名成员）就职，并对要参加审讯工作的属于对立一派的每名当选法官的授权提出质疑。恰尔托雷斯基家族采用同样的策略，因而法庭没有成立，波兰的（而不是立陶宛的）司法行政部门就停滞不前，一直到波托茨基家族控制了下一届的法庭。此刻，立法和行政机构已是无权的，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无权的司法机构。1750年的议会本来是要审议司法改革问题，就此被波托茨基家族破坏了。根据宪法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剩下的办法也不能使用，因为女沙皇拒绝支持一个邦联，而普鲁士人则暗示说，如果要在俄国的庇护下成立一个邦联，他们就将首先在华沙出现。足智多谋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要求采取行政措施以结束危机。他们提议，让国王不考虑传统、地位高低和势力大小，把官职授予那些愿意与国王的政府合作的忠诚之士。波托茨基家族对于提出这样一个将使权贵们成为贵族统治中的一名公仆的建议表示厌恶；至于布吕尔，则不愿把全部赌注都押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身上；他仍然按照通常的办法任命官吏。他和国王已对改革丧失信心，这时便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王位继承问题。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极力要保持他们日渐衰落的势力，他们向布吕尔提出保证，他们要在即将召开的议会中支持他的关于在波兰永远建立韦廷王朝的计划；作为回报，他们为他们的一名萨佩哈家族的男亲属取得了立陶宛的副首相的职位。但是，波托茨基家族打算在国王一旦去世时支持孔蒂亲王作为国王的候选人，他们肯定要坚持自由选举国王这一原则的。布吕尔认

识到，没有外国的金钱和军队的援助，要废除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的。他就向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方面求助，但都遭到拒绝。这个计划无论如何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个计划将提交给1752年的议会。但是这届议会在其开始时即遭到波托茨基家族的破坏。布吕尔这时便不再为韦廷家族的利益效力，并且也不需要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合作，径自谋取自身的利益。J. 姆尼策赫是一个有野心的阴谋家，他曾想娶波尼亚托夫斯基家族的一名成员为妻，但遭到拒绝；他就娶了布吕尔的女儿（1748年），因而有恩于布吕尔。布吕尔在姆尼策赫的得力协助下，在宫廷中向共和派施加影响。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在失去了布吕尔的同时，又失去了另一个盟友，即1751年以后任波兰大盖特曼的J. K. 布兰尼茨基，他倒向了爱国派一边。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决定，阻止他们家族垮台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化对手。1753年他们一心想要用共同分享奥斯特洛格（Ostróg）的继承权的办法，将某些共和派拉到自己的一边。为此目的，他们已经做出将奥斯特洛格非法瓜分的计划。正好和这个家族的期望相反，而且使他们感到极端为难的是，这个交易不仅没有做到悄悄进行并为人所默许，却在议会中被人揭露出来，并且受到责难。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头一次感到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破坏议会的手段。国王因此遂将奥斯特洛格这个产业交由他的专员们管辖，并且通过布吕尔和姆尼策赫对兴高采烈的共和派恩宠有加。但是，波托茨基家族的政治见解及其政治关系仍然没有改变，这就使布吕尔认为，要用他们来代替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是不可接受的。

波兰在七年战争期间国内形势的一个永久不变的特色，就是外国军队一直不断地在波兰的领土上出现。只有充分考虑这一事实，才有可能看出波兰的所有各派的惰性和眼光短浅，已经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1757年春天敌对行动开始后，俄国军队就进驻立陶宛，一直到战争结束。1758年年初，俄国驻军就驻扎在包括埃尔平和托伦在内的王室普鲁士的主要城镇，不过但泽除外。这些驻军从普鲁士向南移动进入大波兰，并留在那里达4年之久；在1758年到1761年间，他们反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就是以这一地区为基地的。交战一方的出现，必然要招来另一方。1758年普鲁士军队袭击了俄军的供应站；参议会认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他们的权利范围之内的，因为波兰让俄国人进来，就已不能保障它的中立了；1761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袭击，1762年他们回来强迫土地所有者以平价将谷物卖给他们；1763年他们组织

了一次将普鲁士移民强迫遣返的行动，并且为这些移民的土地争取了一笔偿金。

奥古斯特三世在战争刚开始时（1756年）在皮尔纳的败绩，给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在宫廷中和全国内重居优势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头一年，这个家族的恩人、英国大使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曾把小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带往圣彼得堡。这位未来的波兰国王在那里试图取悦于以叶卡捷琳娜女大公为代表的俄国宫廷，请他们劝说奥古斯特宠信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这时国王派遣他作为萨克森的特使前往俄国首都，并指示他要求俄军立即远征东普鲁士。在立陶宛，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对姆尼策赫及其盟友节节让步，而俄军的即将到达，使他们赢得了对议会的控制（1756年）。1758年，J.K. 布兰尼茨基在舆论指责他侵犯了波兰边疆的情况下，遂拿出布吕尔作为替罪羊，并在国王面前指责他违反宪法、心怀叵测地干涉波兰的事务。国王对于这些指控未予理睬，布吕尔遂进行报复，取缔王室管辖奥斯特洛格产业的限定继承权。如果说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没有重新掌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要与宫廷斗争，而不是与它合作的缘故。同年，当国王希望为他的儿子查理亲王取得自1741年起即正式空缺的库尔兰公爵领土时，参议会竟批准了他的暂时的封地要求；这并不归功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而是置他们的反对于不顾；因为这个家族决心要破坏由萨克森人继承波兰王位的机会，他们想要把这个王位由他们家族中的一名成员继承。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已经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并且就从这个时刻起，他们和宫廷的关系，就是不共戴天的了。姆尼策赫自1742年起即担任议会议长，掌握了最高权力，终于得以充分推行他的妥协政策，并提拔亲信。反对他的有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和布兰尼斯基（这时他曾一度站在布吕尔一边，后来又和他吵翻了）以及由于“联盟大颠倒”而分散的“法普派”的残余分子。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向法国人提出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追求英国和俄国的援助，这时正等待叶卡捷琳娜女大公的即位。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自从结识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并几次访问伦敦以后，就成了英国狂；他们几次确实提出要为英国服务。1759年他们希望争取到能够自称为英国派的权利；1761年他们宣称他们准备在俄国的交通线上组织一次起义；1763年春，他们请求乔治三世给予2万英镑的补贴。英国内阁对于这些友好表示何以冷淡，从乔治三世追述过去英国自汉诺威王朝统

治以来对波兰的态度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好的说明：他在1763年写道，“我的王国只对涉及我的盟友们的波兰问题感兴趣”^[11]。

1771年为解决货币改革问题而召开的特别议会遭到破坏。政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颁布了4个连续的法令，把已贬值的货币的价值从名义上降低到实际的价值。罪犯是腓特烈二世。他不仅对大波兰进行掠夺，并且在1757年至1762年之间借助于从萨克森造币厂弄来的冲模和一个由犹太人掮客组成的网，设法把波兰全国的正式货币搜括干净，并且用一种价值不到一半的假币替代它。他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他从皮特那里接受的补贴数，即2000万塔勒。^[12]一时通货猛烈膨胀，民怨沸腾；在司法选举中，小贵族们投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票以表示他们的感情。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夺取了大权，这是他们最后向宫廷采取攻势的信号。在这一年的议会中，他们对布吕尔之子的归化是否有效问题提出非难，借此来破坏议会；在参议会中，他们猛烈地批评政府无能，并且捍卫叶卡捷琳娜的权利，认为她有权把查理亲王逐出库尔兰并恢复布吕尔原来的职位。1763年夏天，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在获得叶卡捷琳娜答应给钱，给武器，如果需要还要进行军事干涉的许诺后，就开始组织一个邦联。胡贝图斯贝格和约一经签订，国王在布吕尔和姆尼策赫的陪伴下回到他那可爱的德累斯顿打猎和观赏歌剧去了（1763年4月）。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战争准备在全力进行。叶卡捷琳娜在N. 帕宁的怂恿下，掌握了主动权并为自己保留了对波兰事务的决定性的发言权；当萨尔蒂科夫率领8000俄军正在向维尔诺开进时，她突然命令他撤军，并停止一切援助直到空位期间。这种意外的发展，使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追随者们造成混乱，处于为难的境地，但是却使他们的敌人胆大起来。以J. K. 布兰尼茨基为首的共和派的权贵们威胁说，要在议会复会时使用武力对付恰尔托雷斯基家族。1763年6月国王猝然去世，这就挽救了这个家族，并且引起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用伏尔泰的《穆罕默德》中的一句话来评论说：“每个民族轮流主宰世界，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

在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期，波兰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大都是由萨克森的外交家们保持的，波兰的使节很少在外国的宫廷中出现。这种做法反映了奥古斯特的对外政策的性质。这种政策首先是为萨克森的利益服务的，其次是为韦廷家族，波兰只是偶尔的。这个对外政策

的基本原则似乎是和他的东部邻国一边倒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原则是受到那些共和派的不忠以及他的那些领地的地理位置所支配的。

俄国人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弱点。对于俄国人在俄土战争期间对中立的波兰领土的侵犯，波兰除了获得不再发生的保证以外，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东西。由于波兰在战争期间采取不介入态度的结果，土耳其人在弗勒里的劝说下，没有坚持在贝尔格莱德的和约（1739年）中重新提出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狼狈不堪的波兰外交官们也没有被允许陈述这样一种意见，即波兰曾经对土耳其表示善意，拒绝了奥地利要站在波兰一边参战的请求。17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二世在国王的代表尚未到达之前，就急急忙忙地向波兰表示敬意，这就引起了波兰和萨克森的怀疑。但是，1741年萨克森人抵抗不住腓特烈提出的慷慨（虽说是代替他人提出的）建议的诱惑，即把摩拉维亚以及一条介于波兰和萨克森之间经过西里西亚的走廊给予萨克森；并且，在俄国的同意下，他们和普鲁士同命运共呼吸地一起来反对奥地利。他们在军事上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但是，当腓特烈经过秘密谈判与皇帝媾和（1742年）时，萨克森人却没有得到任何腓特烈曾许诺给他们的报酬。普鲁士人这时却占有整个西里西亚；大波兰和王室普鲁士几乎全被包围起来，而且从新边疆要去克拉科夫只有两条路才可到达。布吕尔发誓要报复。他遂抛弃了腓特烈，于1745年12月和1744年2月，分别与奥地利和俄国结盟。波兰和萨克森之间领土的合并，是要在损害普鲁士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反普联合的各个成员指望奥古斯特能把波兰拉入这个联合，但是他们的希望，由于1744年11月在格罗德诺召开的一届议会遭破坏而落空。但是，奥地利、英国、荷兰和萨克森仍然抱乐观态度，于1745年1月签订了华沙联盟条约。条约中除其他各项外，还包括一条秘密的义务，要支持奥古斯特即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改革纲领。但是，在这一年还未结束时，西里西亚战争，由于萨克森人及其盟友被打败，遂在1745年12月缔结了德累斯顿条约而告结束。奥古斯特国王1746年4月与法国签订的补贴条约支持了萨克森的军队；而他的女儿玛丽亚·约瑟夫嫁给了法国的皇太子，这就给这个王朝增加了威信。他作为波兰的国王，既没有也不能够对路易十五做出回报，阻止俄军越过这个共和国前往西部战场并返回（1747—1748年）。如果说奥古斯特是一个无用的盟友，路易则是一个两面派的朋友：他想要把孔蒂亲王路易·弗朗索瓦扶上波兰王位的阴谋，就是从此刻开始的。法国的补贴条约满期后，布吕尔1751年与由查尔斯·汉

伯里·威廉姆斯爵士为代表的英国谈判了一个类似的条约，并利用这位英国大使的斡旋，来试探圣彼得堡对于缔结一个保证由萨克森人继承波兰王位的国际协定的意见。他建议说，如果俄国愿意给予这一保证，它可以劝说奥地利和它一道行动。但是，到这时为止，两国中没有一国对于加强波兰的政府一事感兴趣；相反，两国均不赞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进行政治改革的企图。俄国使节在1748年就已经做出安排要破坏议会，如果其他方面没有这样做；而且，玛丽亚·特雷西亚也已经宣称，她将认为废除“自由否决权”是有害的。法国大使布罗伊伯爵在俄国的冷淡态度的鼓舞下，不遗余力地试图把这位波兰国王拉进与法国和波托茨基家族结成的同盟中去。他在失败后，于1755年提出要用150万里弗尔来换取一个反俄联盟。叫嚣战争的“共和派”的反应是令人极为失望的；但是“联盟大颠倒派”则认为他们的保留态度是正确的，虽然这是出人意料的。在七年战争期间，俄国不仅利用波兰作为一个军事基地，而且还利用它自己和法国结成的同盟以及军事形势，在1759年至1761年之间两次坚决要求法国同意修改波兰的东部边界。舒瓦瑟尔认为，只有削弱“黄金般的自由”才能使法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他准备进行合作，但是却为国王秘密的指导者们所制止（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曾通过一名特使向他提出呼吁），并且奉命要通过比较温和的俄国首相沃龙佐夫作为中间人以缓和俄国扩张主义分子的狂热。彼得三世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退出了战争，并且恢复了在此以前传统的关于波兰问题的谅解。彼得三世和腓特烈二世之间将于1762年6月签订的互助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了在波兰采取的共同政策。下一届国王应是波兰人，由缔约各方扶持其登上并保持王位。3个星期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夺取了王位。1764年春天，她和腓特烈在秘密条款中填上了她过去的情夫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名字。

“萨克森”时代最特有的特点是司法或行政都未能进行政治改革。国家的政治机体完全陷于瘫痪，这就导致了波兰的内部主权和外部主权的削减。它在国际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伙伴或对手，它已沦为各国争夺的猎获物，因为奥古斯特二世已经从彼得的盟友沦为他的附庸（1709年）。在波兰议会拒绝加入维也纳条约（1719年）后，奥古斯特便调整波兰的对外关系，使之适应本国王朝的计划。奥古斯特三世实际上是俄国的一个附庸，利用波兰的战略地位来进一步推进萨克森的利益。由于缺少必要的民族团结，因此在1720年和1744年曾两次

使波兰不能执行一种可以使波兰恢复一个大国的地位并至少遏止它的危险邻国之一进行扩张的政策。在波兰，外国的阴谋层出不穷，但全国性的对外政策却一个也没有。在国内，没有一个人或集团可以在没有外国的影响下决定任何重大的问题。在各届萨克森人国王统治下召开的28届议会中，有23届遭到破坏。普鲁士和法国常常是波兰的伙伴，二者之中每个国家都与7次破坏议会事件有牵连，俄国则与11次有关联。只有6届议会是被波兰人自己破坏的。在萨克森人统治的60年期间，波兰的领土实际上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但它的日益软弱正造成了一种真空，只有更新或外国的占领才能填补。俄普两国可以不受惩处地侵犯它的边境，并且把波兰的国土当作“路边客栈”。与政治分裂相随而来的是经济的落后和文化的停滞不前。文艺复兴的迹象并不多见；可是解体的思想，正如所见到的那样，却颇为流行。维持波兰的无政府状态，是普鲁士以及俄国的政策的一个原则。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他的“告诫”（1722年）中，向他的继位者告诫说，要与波兰共和国友好相处，要向它不断地表示他的信任，并要永远地在波兰议会中形成一个亲普鲁士派，以便在适当时可以破坏它。他必须尽力地进行工作，务必使波兰仍然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并且不得有一个主权的国王。作为皇太子的腓特烈二世宣称，普鲁士占领波属波美拉尼亚将是“必要的”，他正在这一主张最后执行以前，在他的1752年和1758年的政治遗言中一再重复这一点。他在别的地方还宣称，他的利害关系要求波兰事务应该仍然处于永远混乱的状态，而且任何一届议会都不应该持续下去。他认为，勃兰登堡王族的力量和波兰共和国的“自由”是相伴随的。俄国以波兰封地的保护人自居。彼得大帝帮助奥古斯特二世建立他的统治，安娜实际上把他的儿子扶上了王位。她的第一内阁大臣奥斯捷尔曼，继续奉行彼得的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到来之前，要一直削弱波兰的政策。在叶利札维塔统治期间，俄国的安全被人认为是要依靠它的盟国的，即滨海各国，玛丽亚·特蕾西亚，还有作为抵挡普鲁士和瑞典侵犯的屏障的波兰国王，只要他也是萨克森的选侯。只要俄国和普鲁士是潜在的或实际的敌人，波兰的准独立就有了保证，无论这种独立是多么的不可靠。俄国的大使们奉命要对波兰国王表示忠诚，并且不要站在任何党派的一边，即便是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但是，俄普联盟和奥古斯特三世之死，招致了波兰的毁灭：它作为一个可以竞争但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的角色，已告结束。普鲁士的领土要求已做明确规定；俄国的领土要求在1763年的Z.

车尔尼雪夫的计划中阐明，这个计划为了“完整和安全”起见，要把帝国的西部边疆拓展。奥古斯特一旦去世，俄国军队就要占领的领土大致与它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所吞并的领土相同。波兰国王去世的消息一经收到即行召开的大臣会议，同意这个计划，但却一致认为，有鉴于某些情况，国家从这个计划付诸实现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在萨克森时代结束时，俄国部分地肢解波兰一事，除了出现奇迹以外，已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

（严维明 译）

[1] 1杜卡特（ducat）=3.42克纯金=36兹罗提。

[2] J. F. 钱斯：《乔治一世与北方战争》（1909年），第292页，注3。

[3] 指主张与罗马天主教合并的东正教教徒。——译者注

[4] 一种直属于主教或大主教的宗教机构。

[5] 没有证据支持J. 费尔德曼的这种说法，即对普鲁士、苏格兰、爱尔兰、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的天主教徒采取了报复行为。见其所著《奥古斯特二世时代不信奉国教者的问题》，《波兰的宗教改革运动》，第3卷（1924年），第115页。

[6] 参见《剑桥波兰史》（1941年），第2卷，第24页W. 科罗普琴斯基的文章。

[7] 国家档案局，S. P. 88/42，第8、9卷，1735年。

[8] 引自M. 波蒂埃姆金编《外交史》，第1卷（巴黎，1947年），第247页。

[9] S. 莱什琴斯基：《自由之声，自由卫士》，1749年出版，1733年写作。

[10] A. 布吕克纳：《波兰文化史》，第3卷（1931年），第12页。

[11] W. F. 雷德韦引自《大不列颠与波兰，1762—1772年》，载《剑桥历史杂志》，第4卷，第3号（1934年），第224页。

[12] 塔勒（thaler），德国过去的一种价值3马克的旧银币。——译者

第十七章 哈布斯堡领地

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查理六世单独对法国作战几个月；但1714年3月7日欧根亲王以查理的名义签订了拉施塔特和约，根据和约，查理保持了他在意大利的领地和西属尼德兰，但必须与荷兰就一项屏障条约达成协议。对法条约于次年得到帝国的批准，屏障条约于1715年3月15日在安特卫普签订。和西班牙尚未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查理不得不调整在自己领地中的地位。他被选上帝位至少是得到一致赞同的，即便是他必须在其上签字的“永久和约”使他的权力比他的父兄更加受到限制。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地^[1]，三级会议既没有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意愿去过问他的继承或现已建立的政府体制的继续问题，这不仅使得君主可以随意决定中央的政策，而且也把主要的行政职能让给了他在各领地的总督（Statthalters）。只有在匈牙利，他的地位尚未得到调整。约瑟夫一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1712年索特马尔和约的谈判，这项和约结束了拉科齐一世领导的长期残酷的战争。然而和约实际上是在约瑟夫死后才签订的，而且还有待批准。再者，它更像停战协定，而不像真正的和约：它规定了停止敌对行动，实行大赦，并继续泛泛而谈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它把对所有具体问题的讨论，推迟到将于1712年召开的议会中去进行。

双方都有人反对和约。查理的军事顾问们，特别是欧根亲王，对匈牙利人的怀疑根深蒂固，像利奥波德二世一样，他们认为匈牙利人“是一个难以对付而好造反的民族，只有用野蛮的手段才能使他们屈服”；而在匈牙利，十字军精神^[2]并未死亡。然而总的来说，双方都有更加广泛和真诚的愿望要达成几十年来未有的持久的解决办法。查理本人深信，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需要安抚匈牙利。他有一次指出，“在这个国家里保持平静是非常重要的”；而他看出除了通过妥协，他没有力量达到这一目的。他又写道：“匈牙利人必须摆脱他们是在德意志人统治之下的这一想法。”此外，他个人一点也没有他家族中普遍存在的对匈牙利的那种反感。至于匈牙利人，他们已疲惫不堪、

精神沮丧，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非常高兴要抓住索特马尔和约所提供的较宽厚的条件，从灾难中拯救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于是，当查理批准和约后在波兹索尼按时召开议会时，匈牙利人颇为迎合他；在谈判中最难对付的一派，实际上是匈牙利的“步兵派”贵族，他们担心如果对大赦做出过于宽大的解释，他们可能失去从他们的“十字军派”对手那里没收的领地，这些领地他们或已获得或正打算据为己有。

议会的过程拖得很长，因为瘟疫的流行使议会不得不长期休会。然而在主要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协议。查理接受加冕并举行了加冕宣誓。他在即位证书上完全按照约瑟夫一世使用的形式签了字。这样，查理就宣誓要尊重三级会议的权利并保卫国家的完整，尤其保证不把匈牙利的某些部分并入他的其他领地。他还庄严地许诺，他只按照匈牙利自己现在已有的或将来合法制定的法律，而不“按照其他各省的模式”来统治匈牙利。特别是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大法官法庭将保持完全独立，不隶属于任何法庭的权威；同样，匈牙利的财政机构将独立于皇室度支局。许多具体的问题交由各专门委员会解决，有一个委员会为匈牙利的现代化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比1942年以前制订的任何计划都更彻底、更富想象力。但这个计划为了进一步考虑而推迟了，宗教问题因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被推迟了。只在其他的两个重大问题上做出了决定，这两个决定最终都对匈牙利的民族事业有害，但当时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匈牙利的贵族由于人数锐减（全国只剩下约3.2万家），农民的人数也大减，所以他们是在真正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工作的。政府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以防止农民离开主人的土地，并对国防体系的整个基础也进行了修改。

“贵族动员”这个老制度保留了下来，但是议会本身承认，“动员”所能提供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国家，因此投票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最初是由2/3的匈牙利人和1/3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根据匈牙利人自己的愿望，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议会同意它应为这支军队出钱，但成功地捍卫了免除贵族直接税的特权，只同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投票确定每年的金额。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国王可以通过“谈判”（Kon Kurszus）或者三级会议的代表委员会对金额表示同意。这笔钱要由传统的纳税人即佃农支付，他们已负担过重的双肩又压上了一个重负。当时曾提出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匈牙利国防委员会，但这个许诺从未实现，而且匈牙利人甚至往往不得成为中央皇室国防部的成员。因此常备军仍然是一个纯粹的中央机构和国王手中

的一种强大工具。由于在和平时常备军的大部分驻扎在匈牙利，这个工具就更为有效，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约，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重新出现骚动。军队的指挥官们可以不与地方当局商量便自己做出安排。由此再次可见，民族独立所丧失的正是贵族们的钱袋所获得的。

在这些谈判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后来成为查理整个统治时期的主旨的那个问题，即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他哥哥的死使查理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后一位男嗣，而他本人1708年的婚姻尚未给他带来子嗣。在母系方面有许多远房的旁系亲属，但剩下的直系亲属只有约瑟夫一世的两位年轻女儿。根据1703年的“相互继承的协议”（纯属家族内的协议）查理在他侄女们之前即位，而他的儿子（如果他有的话）将继承他，但如果他死后无嗣或只留下女儿，那么约瑟夫的女儿们就要继承他。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地，国王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得到承认，没有任何事情排除由女性继承。另外，在匈牙利，根据当时的情况，事情并非如此：如果男系绝嗣，根据现有的条约，国家将恢复其选举国王的权利。

由于女性无论如何不能登上帝位，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室（Hausmacht）对查理尤为重要；他也下定决心，如果他生一个女儿，她应继承家族的领地，而不是他的侄女们。

有证据表明，克罗地亚议会在波兹索尼令人意外地自动提出了这一问题，它指示它在匈牙利议会中的代表们宣布，如果国家恢复选举国王的权利，它就要选举应该统治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那位女性成员。奥地利的这三个省份过去由于防卫起见，曾与旧克罗地亚联合。由匈牙利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匈牙利也应赞成选举一位奥地利女大公，为了支持这一建议，他们不仅承认而且敦促为了匈牙利的防卫利益，她应不可分离地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地联合。但是，这个委员会也提出，这个赞同应是和约的一个部分，和约必须包括有利于匈牙利的相当广泛的让步，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让步。查理不愿意开一个与他的所有领地的三级会议讨价还价的先例。暂时他同意了如果男系绝嗣，匈牙利议会则有权选举国王。但1713年4月19日，在他的枢密顾问官们面前，他庄严地颁布一个单方面的宣言，声称，根据长子继承权的规定，他死后他祖传的所有王国和领地应完整地传给他亲生的男性合法继承人。如果男系绝嗣，

这些领土则传给他合法的女儿和她们的子女，这还是根据长子继承权。如果女系绝嗣，则由旁系亲属继承。事情这时就此做出决定。对法国的战争有待结束，对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后者在这最后阶段更多地使用的是外交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战役，它是查理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所取得的唯一有成果的战役。1714年土耳其政府向威尼斯宣战，并很快地占领了威尼斯在克里特和摩里亚的许多属地。1716年查理与威尼斯重新结盟，并要求土耳其放弃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得。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它向奥地利宣战并派遣一支15万多人的军队越过匈牙利边境。欧根亲王的军队虽然只有6.2万人，但他在彼得罗瓦拉丁迎战土耳其人，并于8月7日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以至他们到了贝尔格莱德才得以重新集结。10月13日奥军占领了在土耳其手中165年的特梅斯瓦尔，肃清了匈牙利的整个东南部。这一年战斗暂时停止，但1717年一支得到大量增援而且有从荷兰调来的河上舰艇支援的军队，在匈牙利南部集结，经两个星期的围城战，贝尔格莱德于8月17日陷落，军事行动至此结束。随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1718年7月31日奥地利和土耳其缔结了巴萨罗维茨和约，根据和约，土耳其政府不仅将巴纳特（从此历史上的整个匈牙利重新统一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割让给查理，还割让了小瓦拉齐亚，包括贝尔格莱德的北塞尔维亚，以及北波斯尼亚的一片土地。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时，查理于1716年5月29日与英国结盟。1718年8月2日他参加了前一年由英国、法国后来又有荷兰参加签订的反对西班牙的联盟。此时查理放弃了对西班牙王位继承的要求，承认了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对托斯卡纳、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继承权，并将撒丁让给萨瓦的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作为他得西西里的交换条件。在西西里的战斗一直继续到阿尔贝罗尼的陷落导致于1720年2月17日与西班牙签订海牙和约，和约批准了查理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的各项条款。

对查理来说，继承问题这时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1716年他得了个儿子，但同年便夭折。他身边只有两个女儿，1717年出生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比她小一岁的玛丽安。看来查理这时肯定不会有亲生的男嗣，于是他认真地转而要使他的女儿获得王位继承权。1720年，他把有关文件的副本，特别包括1713年他的宣言，送给他所有领

地的议会，要求它们正式批准这些文件，以便“各王国和领地的持久和不可分离的联合”得到保证。就大多数议会而言，这只是一种预防，因为当蒂罗尔（匈牙利境外表现出这么多独立性的唯一领地）的三级会议表示反对说，这个文件在颁布之前就应该向他们提出进行磋商时，他们被告知说，“没有一个领地有权违反君主的意志决定继承的问题”；要求议会的，不是同意，而是“纯粹的服从”。事实上，所有日耳曼奥地利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意大利属地以及荷兰的三级会议，最后都无条件并带有“谢意”地接受了这位君主的意志的表示，虽然其中也有一两个地方的三级会议提出了附加条款，说明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意愿。因此，这件事情并没有使这些领地中的任何一个领地与君主之间的宪法关系发生任何变化。

另外，在匈牙利，议会显然有权受到磋商，而查理极想得到议会的同意。他很幸运，1722—1723年将这些文件提交给议会，议员们持支持态度。议员们很清楚，只有帝国军队才把土耳其人赶过了多瑙河。没有人愿意看见另一次土耳其入侵，而“步兵派”也不愿看见最近已解决的问题由于自己的对手“十字军派”重新掌权而再次被提出。与此同时，情况似乎有利于国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达成最终的全面解决。1722年6月30日议会一致同意接受女性继承——正如一位议长所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选举莫斯科人或某个其他国家的人”。由于这一决定和随后的讨价还价，遂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宪法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一直到1848年，而且实际上一直到1918年，一直是个基础。根据1723年的第一法和第二法，匈牙利接受了女性继承，它声明这是遵循君主在其他领地颁布的命令。然而，匈牙利法律和奥地利王位继承之间存在某些不同；前者不仅特地将其范围限于利奥波德二世的男性或女性后嗣——如果他绝嗣，国家就恢复自由选举国王的权利；而根据奥地利的王位继承做法，则可根据由更远的旁系亲属继承王位而提出要求，这是可以争辩的——而且列举了资格条件，不仅列举了合法性和天主教教徒，而且还有大公的地位；从而排除了与下层社会女子婚生的子女。假如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活到20世纪继承弗朗茨·约瑟夫的话，这一点就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了。

只要这样规定的王位继承做法不变，匈牙利便认为它与国王—皇帝的其他领地“不可分割地”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在任何事态下和对付外敌”均有效。但是国王重复了他1715年的决定，即不是按照

其他省份的模式，而是根据匈牙利本身的法律来统治匈牙利并保持它的完整。他许诺说，每一位君主通过加冕宣誓以及有关文书应该肯定这一许诺，并在总的方面许诺尊重匈牙利的自由和权利。在这些许诺中，查理肯定了除非事先得到传讯，贵族享有免受逮捕的特权；并承认贵族享有免税的权利，作为“王国贵族的基本特权”。他还许诺定期召开议会。

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大法官法庭的完全独立性得到承认；它只对国王负责，不受任何法庭、包括枢密院的要求的束缚。为了进行日常工作便模仿波希米亚的州政府（Landesregierung）成立了一个“王室地方委员会”。这个机构将在波兹索尼开会，它以巴拉丁为主席，由三级会议的22名成员组成。它必须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它还可以以议会的名义向国王陈述意见，并监督有关共同军队的决定在匈牙利得到执行。它通过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大法官法庭和国王保持信息往还。

常备军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贵族服役的义务这时只限于特殊情况，即匈牙利受到外国敌人的攻击时。另外，国王可以根据他的判断，在国内或国外，为了进攻或防御目的，使用常备军。一个由巴拉丁主持的议会委员会分配各县、镇应付的“战争税”的比率，以所拥有的佃农数字为计算单位。在低一级，国王须任命各州的首席行政官（称为州长főispán），对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变动。州首席行政官须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州议会并主持选举自己的行政副手（副州长alispán），这个副手和其他州的官员同以前一样，由州的贵族选举。建立了常设在佩斯的最高法院，在匈牙利几个不同地区还有4个其他法院，并且在克罗地亚设立一个法院。一旦达成这些安排，查理的地位就清楚了；1724年12月6日他庄严而公开地重新颁布他1713年的宣言，并经他的各个领地表示同意，这一切遂构成了真正的“国本诏书”。

从此刻开始，查理生活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国本诏书”能获得国际的承认和保证，以便现在看来肯定会成为他的继承人的玛丽亚·特蕾西亚能完整而无争议地继承他的全部领地。的确，当萨克森选侯于1720年和约瑟夫一世的长女玛丽亚·约瑟夫结婚时，以及当巴伐利亚选侯于1722年和她的妹妹玛丽亚·阿玛利亚结婚时，他们都庄严地宣誓承认“国本诏书”优先于“相互继承的协议”。然而查理感到不能放心的是，可能还会对他的各处领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欧根亲王建议他要依靠一支强大而有效的军队并立即着手建立这样的军

队，但是欧洲最大的军队也不能够使外交成为不必要的。查理在王位的继承问题上坚持己见，只是给已是一团乱麻似的国际局势又增加了一根线，这对查理是一根主线，但它与十几个国家互相冲突的野心和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没有这根主线也很难改变随之而来的那个时期的性质，这个时期被称为“会议毫无成就、联盟毫不可靠”时期，是颇有道理的。

最初，查理同时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争执。所有这些国家都感到它们的商业利益，由于他成立了东、西印度贸易公司（下文将论及）而受到威胁。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使查理能够把西班牙分离开来；并且根据1725年4月30日和5月1日签订的文约，既取得了西班牙对“国本诏书”的承认，又取得了它对东、西印度贸易公司在西班牙各港口享有特权的承认。英国、法国和荷兰便结成赫伦豪森联盟（1725年9月30日）作为回答。这个联盟也包括普鲁士在内。查理遂又能够于1726年8月6日与俄国结成同盟与此进行对抗，并因此而带来了他所需要的俄国保证。为了避免与各海上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破裂，他暂时停止了该公司的活动达7年之久。欧根亲王也从普鲁士国王那里获得了他对“国本诏书”的保证以及许诺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丈夫的帝位候选人的资格，只要她嫁的是一个德意志人。西班牙则于1729年11月与英国、荷兰和法国缔结塞维利亚条约作为回答，但是这个联盟却未能维持下去。英国与奥地利靠近；根据维也纳条约（1731年3月16日）查理放弃了奥斯坦德公司，同意西班牙占领帕尔马和皮萨琴察作为回报，他收到了英国、佛兰德和荷兰对“国本诏书”的保证。帝国于1732年采取同样行动，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3个巴拉丁家族则持不同意见。但是，第二年当奥地利与俄国、普鲁士一道支持奥古斯特三世作为波兰王位继承的候选人以对抗法国的候选人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时，萨克森选侯便改弦易辙了。

在以后的3年中，查理一直在和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新联盟进行战斗；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撒丁与这个联盟联合在一起；在德意志，则是巴伐利亚、巴拉丁领地和科隆的维特尔斯巴赫公爵；而俄国作为奥地利的盟国，在波兰冲锋陷阵反对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1735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了预备和约，并且将与此有关的事项作为久远的因素也作出了规定。洛林和巴尔公爵弗兰西斯·斯蒂芬已在查理的宫廷中长大成人，他是查理为他的长女兼女继承人选择的可能成为她

丈夫的人物之一。他最后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以便顺从与西班牙结盟的可能性。但是，对这个问题真正做出决定的还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的愿望，因为她除了弗兰西斯以外，决不考虑其他人充当她的丈夫。1736年2月12日举行了婚礼。1738年11月8日的最后和约基本上肯定了在维也纳所决定的安排。在这个最后和约中，意大利王位的继承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分给皇帝，诺瓦拉和维杰瓦诺分给撒丁，那不勒斯和厄尔巴岛分给西班牙，托斯卡纳则分给弗兰西斯·斯蒂芬；弗兰西斯·斯蒂芬则放弃洛林，给予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莱什琴斯基死后则归属法国。撒丁于1739年2月5日，西班牙于4月31日先后遵循和约。所有缔约国家均承认“国本诏书”有效。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于查理的统治，除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多数历史学家，就像查理自己一样，均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以外的其他各个方面所做的判断，一直是大不一样的。有些人缅怀维也纳曾是“世界政治、哲学、建筑和诗歌的真正中心”的那些年代，以及“奥地利的”精神达到其极端完美的综合与其力量达到鼎盛时，总抱有恋恋不舍的感情。另外一些人则把这些年代看成是一个理智上处于蒙昧、社会和政治陷于停滞不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过程中，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屈从于贫乏的王朝野心。这两种看法各有千秋。

这个时期的“极端巴洛克型的”（Hochbarock）文化是社会和教会之间内在联合的一种表露于外而且可以目睹的迹象；这个社会是一个献身于各种形式信仰的高度贵族化的社会，这个教会则是一样的等级森严、非常世俗的教会。这种文化在查理宫廷中的表现，无论在壮丽方面，或是在纤细和无比优美方面，都是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超过的；因为这个宫廷不仅是欧洲的一个已成为最威严的王朝的所在地，而且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聚集地，在这里，来自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各种势力聚集在一起并与多瑙河流域各民族的势力相汇合，产生出不仅是辉煌的，而且也马上产生出地方的和普遍的结果。主调是意大利的：两位意大利人，阿波斯托洛·芝诺和更有名的梅塔斯塔齐奥，相继拥有宫廷诗人的职位，他们在这个职位中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时时尚的娱乐形式歌剧的剧本编写歌词；但是，从特色

来说，虽然意大利歌剧包括了维也纳的新剧院卡恩特纳托尔的半数剧目；但它也轮流拥有用维也纳方言编写的、人们广泛欢迎的笑剧。

这种生活的中心是宫廷本身；查理亲自编写了一个歌剧，歌剧在掌声中上演，他的女儿们在剧中跳芭蕾舞。宫廷的光辉照亮了维也纳，仅在半个世纪以前，土耳其的杂牌军队的铁蹄就曾在维也纳的城下驰骋；可是，到如今它却像一枝盛开的玫瑰花。不仅霍夫堡本身得到扩大实现现代化，而在它周围的大贵族们，他们获得荣誉最大的可能源泉是来自他们的嗜好和雄心，而不在于他们恪尽职守，他们建造的豪华宫殿与在数量上相等的辉煌的教堂交相辉映。菲舍尔·冯·埃拉赫、多纳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艺术家们的艺术，用喷泉和雕像装饰大街和广场；工匠和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维也纳，或奉皇帝之命从德意志和瑞士被带到维也纳来为一个辉煌、奢华的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必需品。

不过，维也纳的情况特殊；它的光荣是在牺牲各省中心城市和乡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大贵族中只有比较少数的人占有了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在波西米亚各领地，情况更是如此。大贵族们到他们的乡间产业去，只是为了打猎和消遣。他们从他们的农民劳动中榨取的岁收，是在首都花费掉；他们根本连各省的中心城镇的边都不去。玛丽·沃思利·蒙塔古夫人1716年去布拉格，她在写到这个城市时这样写道，它虽然保留它“过去辉煌的某些陈迹”，但是这个城市“建筑陈旧，居民稀少”。妇女们的衣着“就像埃克塞特人模仿伦敦人那样”，追随维也纳的时尚。至于波希米亚的其他地方，她发现这些地方“就是我在德意志见到的最荒芜的地方；村落如此贫穷，驿栈如此简陋，连干净的草料和饮水都不总是可以找到的，而比较好的居住环境，更是没有指望”。

贵族们之间争夺国家的高位，因为大多数的高位只有他们才能担任，因此他们对于地方事务不感兴趣。对“国本诏书”表示同意的波希米亚的议会，由18名贵族和22名骑士组成，这是一个出席人数非常多的议会。比较小的贵族和乡绅同样都是淡漠的，他们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意志以对抗来自中央的强大的反对力量。地方独立性是查理统治的一个特征，这种独立性所以日益减少，并不是由于来自维也纳的任何系统的压力，而是由于三级会议本身表示冷淡；因为查理的表现虽然专横，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固执，但这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

属于性格问题。他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好都说明他倾向于讲究贵族派头，而不是官僚式的统治。因此，在他统治时期在政府机器（匈牙利除外）中实行的这些革新，绝大部分是对现有的中央机构进行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改变。重大的政策是在查理亲自领导下，由枢密院决定的；严格地说，是由参加人数比较少的“枢密会议”决定的，因为“枢密官”这一头衔分布很宽，它只是一种荣誉头衔。皇帝缺席时，由皇室事务总管（obersthofmeister）主持会议；而管辖查理的所有领地的其他官员，是主持皇室国防部和皇室度支局的两主席，分别负责防务和管理由国王直接控制的那些财源；第一奥地利大臣则掌管皇室事务。第二奥地利大臣是负责德意志—奥地利事务的行政首脑，只要这些事务属于皇帝的职权范围之内；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事务由类似的大臣们负责。此外，查理还设立了两个新的大臣职位，分别负责尼德兰和意大利各属地的事务。实际上，由于职权范围不清，这些大臣往往日益拥有最后决定权，置三级会议和各地市政当局于不顾；但是，这并不是故意，而是出于当时通行的做法。枢密院秘书巴滕斯泰因乃是政府机器的真正首脑。顺便说一下，这位在查理的有势力的顾问圈子里唯一的非贵族，对于这个君主国家五花八门的领地上的各种机构实行中央集权或使之一致化方面，在增进对于所有这些土地普遍通用的各项制度的数量和影响方面，并不特别努力。因此，尽管“国本诏书”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奥地利帝国的基础，但是在查理统治期间，在这些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

这种说法在两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欧根亲王已尽力地改善并扩大了常备军，但是，在他死后所出现的瓦解情况表明，他所实行的改革深度不够：这些改革缺乏必不可少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在财政方面也是一样，查理和他的顾问们痛感缺乏金钱，因而使他们所有的政策都受到阻碍；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补救办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这些补救办法。奥地利的中央财政能够置于牢靠的基础之上，只是靠彻底的政治改革，但是他们不打算这样做。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支持国家信贷的手段；由于每次试验都是在其他的试验清理以前就已开始，因此就造成了财政制度的极端复杂化，简直无法存在下去；维也纳市银行成立时并不起眼，但实践证明它却是一个例外。于是就试图由国家组织来扶持工业，因此便在皇室领地中建立了纺织、瓷器以及其他的工厂，不过产品大多是劣等货；而不幸的

是，这些企业中最兴旺的却是建立在西里西亚，不久便都失去了。顺便说一句，这些尝试都遭到行会的坚决抵制。

确切地说，查理统治期间，许多扩大奥地利国际贸易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便已出现。东方公司成立了，以便对东方进行贸易；又从莫卧儿大帝手中取得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科布隆港口；迫使威尼斯承认在亚德里亚海自由进行贸易的权利，并宣布的里雅斯特和阜姆为自由港。在的里雅斯特建立了一支商船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海军；1722年皇帝又批准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给予该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在东、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进行贸易的权利，准其与外国签订自己的商业条约，只要向政府缴纳其纯利的6%的税款。但是，这个企业开始时满怀希望，只是招致了各海上大国的忌妒；最后，查理为了他的女儿的王位继承权这个更加重要的目的，终于将这个企业作为牺牲。这支舰队于1736年卖给了威尼斯。这个企业主要是以查理在尼德兰的属地作为基地，因此这个计划对于奥地利的各省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的里雅斯特和阜姆发展了，通向这两个港口的交通得到了改善，其中包括通过克罗地亚越过塞默灵山口和“卡尔施特拉斯”的那条著名的公路。

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省真正的统治者是基督教的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教士。基督教的繁荣昌盛并不局限于首都一地，即使在首都，许多新建的宏伟建筑物，包括宏伟的卡尔教堂在内，都是基督教建造的；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维也纳才第一次成为一个总主教教区。但是，尽管在维也纳以外许多奥地利的非基督教的大建筑物，都是属于查理统治期间以前的或其以后的时期的，可是却出现了梅尔克、克洛斯特新堡和迪尔恩斯泰因这些大修道院，以及布拉格的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基督教巴洛克式的建筑（如同同时期在萨尔茨堡这个当时归并于帝国的城市以及帝国的其他城市那样）。不过，即便是耶稣会的活动，基本上也是消极的。172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庆祝内波穆克的圣约翰宣为圣徒的盛况空前的典礼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过这是一个例外。否则，耶稣会本身这时对于世界文化和学识就将无所建树，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的记录主要是镇压。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有许多秘密的传教士和布道士越境进入该地，对新教徒不遗余力地进行迫害；监禁、拷打、被判处绞刑等，言之不尽。1722年至1723年萨尔茨堡普遍地驱逐新教徒，皇帝还授权甚至派出军队予以支持；在此之后，卡林

西亚、施蒂里亚和上奥地利于1723年至1725年间又相继发生类似的驱赶事件。新教文学和学问被扑灭，它们不得其所。这些驱逐事件对于造成贸易业和制造业不断衰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这两个方面新教徒是一些披荆斩棘的先驱者。

在这一段时间里，捷克的民族主义达到了最低潮，这是偶然发生的情况，并非出于人为。它所以受到挫折，并非出于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民族敌对，而是由于它和新教有关系；再者，原有的捷克贵族在过去几十年的迫害中已经消灭，而波希米亚的贵族将会发现与捷克的民族主义结成联盟可以从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这一天，则尚未到来。关于这时的波希米亚，现代的主要史学家写道：“没有比这再单调的生活，再普遍的冷漠，再低下的理智和道德水平了。”^[3]奥地利本土的史学家蒂罗尔、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对于他们各省的情况所做的判断也非常相似。

匈牙利的状况，实质上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一直大不相同。匈牙利的史学家们并不认为查理是真心实意要恪守他对这个国家的许诺；尽管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个人是不公正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欧根亲王为首的他的许多主要谋士，对于这个反叛民族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于查理的这些许诺总是做出极其限制性的解释。在几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方面，他们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特兰西瓦尼亚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有争议的“地方”则分给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巴纳特根据帕萨罗维茨和约收复后，在欧根亲王的建议下，作为一块“新获得的领土”而置于军事总督梅西伯爵的管辖之下，他是直接接受维也纳的命令的。巴纳特的收复，使两个新建立的“军事边境地区”毛罗什和蒂萨变得在战略上是多余的了；但是，它们却维持下去，因此在它们以西的一些现有地区，甚至稍有扩大；这样，从特兰西瓦尼亚边境走向亚得里亚海便是一条完整的线了。

1727年以后，查理再次召集议会，于1728年至1729年举行了一次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会议；但是，此后就一直没有举行了。甚至在巴拉丁，巴尔弗1732年去世三级会议应开会选举他的继任者时，查理也不召集会议；而且，他还任命未来可能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的弗兰西斯·斯蒂芬代表他主持这个“委员会”，同时却又向匈牙利人保证说，这一步骤只是“临时性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得人

心的步骤，因为弗兰西斯·斯蒂芬很少到这个国家来，而且来时对待这个国家的上层社会显然非常无礼。匈牙利的宫廷大臣们发现他们事实上是维也纳议事会的下属，他们的意见需要呈报议事会做出决定，并且还要呈报奥地利首席大臣。既没有成立一个匈牙利的王室国防部，也没有成立一个匈牙利的王室度支局；匈牙利发现它在由这两个机构控制的事务方面，就像任何一个省一样，要严格地听命于维也纳。

最后，在匈牙利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自己一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查理便根据1731年的所谓“卡罗利纳决议”，将他的其他领地中新教徒所受到的许多限制，强加于匈牙利的新教徒。罗马天主教遂成为国教。除了1681年经过批准的那些地方以外，新教徒只能私下里举行礼拜，而且当时仅限于家庭成员参加。他们必须遵守天主教的节假日；而且，如果他们使用新教牧师主持礼拜，也必须向天主教的司铎（Stola）交费。用于公职人员就职宣誓的誓文，规定公职人员不准参加这种礼拜。

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定，匈牙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内部的独立性，而匈牙利的三级会议对于自己的事务和国家的事务，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力；这种权力比当时欧洲大陆的（瑞典除外）任何一个相等的阶级拥有的都要大。他们把地方事务大部分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中央的问题上做出的让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贵族们始终不懈地为之奋斗的、每次都取得胜利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免税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国家的前途来说，也许是不幸的。查理一再要求，所有领土，不论是由只交租但不服兵役的佃农耕种的，或是由贵族直接经营的，均应征收战争税，而贵族们总是拒绝牺牲他们的基本特权。像玛丽亚·特蕾西亚所能进行的那样加强王权，肯定会对国家有利，并且可以减少社会上的不公平，而贵族们捍卫他们的合法权利就为这些不平打开了道路。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在不止一次的“谈判”（Konkurszus）争论说，农民已承担不了日益增加的赋税，并且使他们的意见得逞。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即使这一点终究证明它是一种假惺惺的祝福。由此，在匈牙利向国库所交纳的贡献与其他领地向国库交纳的贡献之间，就造成了不平衡，从而引起了这些领地的忌妒和中央当局的不满。贵族们的吝啬，也使得匈牙利

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而匈牙利后来却是非常需要这样一支军队的。

匈牙利的贵族在捍卫他们的事业中之所以如此顽固如此得手，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以匈牙利为怀的；而且，尽管在查理统治期间，贵族自身阶级中的社会成分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原有的家族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消亡，或者已被摧毁，而大赦并未真正地恢复失败者的命运。“新获得领土委员会”在1715年以后已废弃不用，这时地契的验证工作已交由一个匈牙利委员会进行；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委员会中，也是只讲人情，证明文件是不起作用的。在巴兰尼亚的农村中，15世纪时曾经有540个贵族地主，现时只存在6个大庄园和18个小庄园。已经有人对6处庄园提出认领要求，全都没有成功。一直无人提出认领的庄园，则交由国王，通常由查理赠予他的文武官员，以作为偿还欠薪之用。波希米亚在80年以前就采用同样的办法，查理就像他的波希米亚前辈那样，他主要赠予外国人：1715年，在这个基础上，对250个非匈牙利人的贵族家族赠予了“土地拥有权”（Indigenat）。但是接受赠地的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却和波希米亚接受赠地者不同，他们却无法利用他们新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往往是成平方英里的沼泽地或沙地，远在某个无法接近和毫不吸引人的地区，而且是处在一些怪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们中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卖掉这些产业。买主有时是希腊、塞尔维亚或亚美尼亚的移民；但是，更普遍的是一位匈牙利人，或者是一个拥有土地的“步兵派”（Iabanc）家族；或者是一位出身十分低贱者，这也是常事；因为巧买巧卖，才容易发财。由于绝大多数的“步兵派”家族本身就是新生的，因此这时在匈牙利已变得势力强大的“权贵”阶级，主要是由一些新人组成的。由于这一贵族获得其产业，同样希望保持其产业全靠宫廷的恩典，他们遂建立了一个“宫廷”阶级，而哈布斯堡在匈牙利的统治则主要依靠这个阶级（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则是罗马天主教）。但是，在匈牙利还是靠当地人，甚至在政治方面仍然要靠匈牙利人，因为波希米亚的贵族已不再是捷克人了。

查理的统治在匈牙利还出现一种迅速持续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既非开端，也未完成；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而一个世纪以后，它所产生的政治结果，其影响还要深远。这就是新居民移居于这个国家。

据估计，在马提亚一世时代，匈牙利有400万人口；而普遍公认的估计人口在1715年时匈牙利人本身总人口只有170万人，特兰西瓦尼亚为80万人。近来的调查者则称，这一估计少估了50万人，也许甚至少估了100万人。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土耳其的占领以及以后的历次战争使匈牙利的人口锐减。再者，匈牙利的人口在地理分布上也有变化。在中世纪，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山区，实际上荒无人烟。而在中部平原，村落和集市城镇则是星罗棋布。这时，在一些屏障地区（在北部和西北部），则拥有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人口，而中部和南部则重新变成了沼泽地和大草原，那里的村落消失了，为数不多的幸存的人们，为了安全起见，麋居在像塞格德或德布勒森这样的一些大的“乡镇”中。在尼特拉州，1715年的居民为12.5万人；波兹索尼为8万人；肖普朗为8.5万人；沃什有11.8万人，而阿拉德才有5000人；乔纳德2500人；琼格拉德9700人；巴奇-博德罗格为1.2万人，这个州已有大批移民迁入。在这些地区内，正如旅行家们所证实的，可能走上好多天也见不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

由此可以推断，与中世纪相比较，各种种族成分的比例有了很大改变。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两个地区逃避了战争的主要压力，而塞尔维亚人由于在利奥波德统治时期的移民而力量大增。纯属马扎尔人的地区完全处在军队必经之路上，虽然许多马扎尔人已经逃往哈布斯堡边界线那面避难去了，然而根据某些计算，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5世纪时曾达到总人口的90%，但这时只是40%多一点。根据上面引用的起码的计算，他们在1720年的人数只有116万人；估计高一点，为125万人到175万人。

在匈牙利的比较有屏障的地区，1715年以前的人口可能已开始再次增长。但是，增加的过程在全国范围普遍出现，还只是在索特马尔和约以后，更进一步则是在帕萨罗维茨和约以后。这时，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到1787年（下面的数字均适用于这个时期），全国整个来说，人口增加了两倍；查理的统治在这种增加中起到了充分的作用。当然，这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所受到的影响程度也大不相同，因为增长的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战斗停了下来，人口遂普遍增长；由于这一点，甚至有屏障的地区的人口也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匈牙利人，普遍从这些地区流向中部和南部的空旷空间。这种流向一定程度上出于自发，而实际是对当地地主要

想制止这种人口外流的各种企图的一种对抗；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接纳地区新的土地所有者的组织，这些土地所有者中财富比较充实的，包括国王在内，也从匈牙利境外引进大批移民，其中大多是来自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德意志人，由此他们总称为“士瓦本人”。对此，管制巴纳特和军事边境的军事当局，由于征集了更多的由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小分队，从而得到了加强；而且，从多瑙河流域各省也涌来了大量罗马尼亚人的移民，简直无法控制。自然，到了查理的统治结束时，甚至在其统治结束以后很久，匈牙利仍然远为缺少一种最适人口，或者说，缺少它已有人口的最适分布。虽然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已被人认为（已知当时的耕作方法）人口密集，而南部却拥有可供以后几十年使用的空间，而且有相当多的地区，一直到20世纪还是完全空旷的。虽然如此，新居民的移入和人口的重新分布这两个方面的过程在18世纪上半叶，已在大步前进，这个国家开始恢复某种欧洲的面貌。

新居民的移入，使匈牙利的职业结构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梅西伯爵打算在巴纳特引进工业，他从西部带来的居民中有许多人就是工匠。匈牙利西部的某些大土地所有者，也沿着相同的路线进行试验。但是，交通状况仍然太原始，工商业无法有任何重大的发展；再者，土地所有者们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可用劳动力，便无情地拼命使用压力以阻止城镇的发展。匈牙利在极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各种地区间最大的社会区别是：在北部、西部和特兰西瓦尼亚，土地主要是由只交租但不服兵役的佃农耕种的，而在新的大庄园里，则主要是由地主直接经营，这是一种大多数地主所愿采取的经济形式，由于他们的土地当时仍然由贵族直接经营的，因此不必纳税。不仅如此，劳动者在土地使用权的保障上，则不如只交租但不服兵役的佃农；而地主从他们的劳动中所取得的利润，通常要比他从只交租但不服兵役的佃农勉强从事的徭役（不管是多么无情的榨取）中所取得的利润大。巴纳特以及国王亲自掌握的某些地区，居住的是自由的农民；而在“军事边境”中，农民则由于服兵役而免除其义务。

“移入居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不断损害马扎尔的成分的情况下，使由于土耳其战争而开始的民族成分的变化进一步加深。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策的缘故，不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已。民族的迁移主要是出于自发，在这种迁移中，马扎尔人迁向平原，斯洛伐克

人和罗塞尼亚人则步其后尘；这种迁移使北部马扎尔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马扎尔人与罗塞尼亚人之间的民族边界向南推移了许多英里。在东部，罗马尼亚人不仅在特兰西瓦尼亚增加了他们的人数，而且也在“某些地方”和巴纳特出现；而在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在那里是无人知晓的。匈牙利中部主要的仍然是马扎尔人，但是地主们在这里填补了许多无人居住的地方，有时用斯洛伐克人，不过主要的还是“士瓦本人”。在南部，政策是审慎的。军事当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马扎尔人是不放心的，因此有意地设法加强其他的民族成分以对付他们。军事当局宠信的是德意志人，因为他们普遍可靠，此外还有塞尔维亚人。马扎尔人被有意地从巴纳特排挤出去。巴纳特的居民曾经有一个时期包括有17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加泰隆人、法国人和哥萨克人，德意志人的人数最多；巴纳特的人口1720年不到4.5万人，50年后则超过了70万人。塞尔维亚人对于匈牙利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绊脚石；当然，塞尔维亚人对于维也纳的图谋，也是心中了然的；再者，在所有的民族当中，他们单独地提出要求（而且他们可以提出支持他们这一要求的许诺）要在“匈牙利国”的范围内享有一种单独的“民族”地位。议会一再努力要把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遣送回塞尔维亚（这时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或者另行让他们处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总未奏效。不错，局面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希望在一个单一的地区居住，在世俗和宗教方面有他们自己的领袖，他们只对皇帝效忠。与此相反，他们却是散居在边境一带，在奥地利的军事指挥官们的管辖之下。布兰科维奇死后，他们曾经一度被允许选举一名副总督（Vice-voevoda）约万·莫洛斯特里耶（Jovan Monosterlije），但是他在处在奥地利人管辖之下的，他所召集的唯一的一次议会，却被军方解散了。他死后，这个职位就无人再来担任，留给塞尔维亚人的唯一的“民族”权力就是他们有一个主教，主教的权力实际上是很大的；1731年主教的权力扩大到贝尔格莱德和“新获得的领土”塞尔维亚，而且信奉东正教的罗马尼亚人也在它的管辖下。但是，塞尔维亚人即使没有一个他们所希求的组织，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好斗的民族成分，1734年至1735年，他们率先在蒂萨—毛罗什区举行一次认真的起义；但是起义的原因却是出于社会的，或者说甚至是出于匈牙利的政治的，而非出于塞尔维亚的民族原因。叛乱者有罗马尼亚人、各个民族的农民，甚至还包括被放逐的拉科齐的匈牙利党人。

查理统治的结束是不幸的。他所从事的许多次战争，使奥地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仅付出了军人的或平民百姓的鲜血（他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说法就是，这些战争不是在奥地利的本土上进行的），而且还付出了更短缺的东西：金钱。任何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总是欧根亲王第一个提出的，这是有代表性的。1736年4月1日，这位富有经验的军人去世了，就事态所表明的来说，他没有给奥地利的军队留下一个即便是才干平庸的指挥官；而且是在特别需要他的天才和他的特殊经验的时刻。俄国已经进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因此土耳其宣战。于是俄国便请求奥地利根据1726年的条约给予援助。通过英国和荷兰的调停，于1737年8月举行了尼米诺夫会议；查理自己在会上只要求在摩尔达维亚和塞尔维亚做不是重大的边界调整，还有维丁要塞。但是俄国的要求却如此的广泛，因此土耳其政府中断了谈判。奥地利的军队在塞肯多夫元帅的统帅下，于会议期间进入塞尔维亚，并且攻下尼什。但是，当土耳其政府转而认真地进行抵抗时，帝国的军队便被断然地赶了回去，塞肯多夫在被召回以后即被逮捕。土耳其人向前推进时费伦奇的长子居奥治·拉科齐在他们的战线后面自立为特兰西瓦尼亚亲王。

拉科齐的呼吁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他本人也于次年去世；但是，1738年指挥奥地利军队的柯尼希泽格伯爵，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成功，而于1739年继他之后的沃利斯则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克罗茨卡被打败，被围困在要塞内。奈佩格伯爵被派去进行谈判，他和沃利斯两人（两人后来都被监禁）遂于9月1日签订了非常不利的贝尔格莱德和约，根据这个和约，奥地利失去了它根据帕萨罗维茨和约所获得的除巴纳特以外的全部东西。

由于查理对这个条约感到羞辱，这就加速了他的死亡。他于1740年10月29日去世，留下了只有23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军队组织涣散，士气低落；国库空虚；不仅在长期不满的匈牙利，而且在德意志各省和波希米亚，都出现了毫不隐藏的不忠；而在她的边界的另一边，不知疲倦的弗勒里在忙于给奥地利的敌人打气，于是一个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林、普鲁士和西班牙在内的新联盟的轮廓，正在成形。

结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当玛丽亚·特蕾西亚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通告，要求对她继承王位一事予以承认时，巴伐利亚选侯便立即援引

一个老的文件（巴伐利亚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和斐迪南一世的女儿安妮的婚约）为他自己争取继承王位这一权利要求。紧接着，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要求割让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他只是后来才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法律根据），并向玛丽亚·特蕾西亚提出，如果她将这个省割让他，他将支持她对付巴伐利亚，并确保弗兰西斯·斯蒂芬当选为帝国皇帝。玛丽亚·特蕾西亚毅然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因此，腓特烈遂于1740年12月突然入侵西里西亚，并且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布雷斯劳。萨克森选侯这时便推翻它对“国本诏书”的承认，重新提出他妻子根据“相互继承协议”应有的权利要求。西班牙则要求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以及撒丁、伦巴第。1741年5月，法国与巴伐利亚缔结了宁芬堡条约；西班牙、普鲁士和萨克森后来也追随这个条约；普鲁士、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之间取得一致意见，要瓜分波希米亚的各领地。玛丽亚·特蕾西亚只剩下了奥地利的东部各省，还有匈牙利。

最初，玛丽亚·特蕾西亚能保持这种状态，似乎已成为问题。维也纳有一个强大的集团，公开支持巴伐利亚的事业；在匈牙利，形势也极不稳定。查理去世时，匈牙利的议会在休会12年之后，出于需要而召开会议来考虑加冕典礼的仪式问题。对于王位继承本身，并未发生严重的争议，但是三级会议可以完全有理由地抱怨查理没有实现对他们许下的许多诺言，他们希望从他们的新君主那里得到一个比较严格的加冕誓言和就职状。幕后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这是由新巴拉丁亚诺什·巴尔弗伯爵（索特马尔和约调停者之子）和权贵们，或者说是由首席法官格拉索科维奇代表特蕾西亚巧妙地进行的。格拉索科维奇最后终于说服议会接受了原有的誓言和就职状，只有一条补充，就是“贵族土地”免税要成为一个基本法，并且不能更改。

这个问题解决了，加冕典礼于1741年6月25日举行仪式，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继续恶化。7月31日，法国和巴伐利亚的一支联军进入奥地利。查理·阿尔贝特拿下林茨，那里的三级会议承认他为他们的国王；然后他又北上进入布拉格，他在那里也受到同样的接待。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地位几乎已绝望。她的原来就不足的军队，大多已陷在西里西亚。大量援军的唯一可能来源是匈牙利，而那里的议会却固执地一个又一个不停地诉说“不平”。玛丽亚·特蕾西亚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她答应驻蹕布达，并在那里建造一所宫殿；匈牙利的世俗的或教会的高级职务，完全由匈牙利人充任；尊重匈牙利官职的独

立性，并将王国当时另行管辖的各个地方，重新统一起来。每项让步都引起了一项新的要求。

9月11日，玛丽亚·特蕾西亚召见两院议员，向他们说明局势，并且庄严地宣称，她把她自己的、她的孩子们的以及她的国家的命运，信托给他们的英勇和忠诚。与会的匈牙利人被她的年轻、美貌和苦恼所打动，终于按照惯常的程式“生命和血”同意了要求。9天以后，弗兰西斯·斯蒂芬举行副摄政的就职宣誓（议会已经承认他为副摄政）。玛丽亚·特蕾西亚将她的嗣子介绍给与会的三级会议的成员们，他们对于这种场面热情欢呼；约瑟夫二世后来对于他们的态度，注定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大错特错了。

从直接的军事观点来看，议会的姿态主要是象征性的。议会答应，在匈牙利本国由“贵族动员”征兵2.5万人和3万名农民兵，再加上特兰西瓦尼亚、军事边境和巴纳特的军队，这样匈牙利可以出兵（从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10万人。可是由贵族动员和农民兵组成的军队，征募需要时间，而且从未达到所许诺的数字。第一批开赴战场的军队，到头来是最多的一批；它们是由奥地利人指挥的来自军事边境的军队。一些来自匈牙利的军队，他们一旦到达后，即英勇作战；但是，除此之外，匈牙利议会的姿态所起的政治作用，无论是在促使奥地利的王家领地效法这样做方面，还是提高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威望和加强她的地位方面，都是很大的。这主要是因为她看来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国际形势发生了这些变化，反过来又缓解了军事形势。1741年10月9日，她不得已向腓特烈交出下西里西亚；但是，下一年她的军队便将敌人从奥地利清除出去并占领了巴伐利亚。在随后而来的长期斗争中，虽然运气时好时坏，而且盟友屡次更迭，但是，奥地利君主国的存在，不再像1741年夏天那样处于危急关头了。最后，在1745年12月25日玛丽亚·特蕾西亚勉强地与腓特烈在德累斯顿缔结和约以后，长期的争斗由于在1748年10月至11月间签订了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和约，腓特烈保有了他在德累斯顿取得的东西，即除特申、特罗鲍一猎人村和格拉茨以外的全部西里西亚；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保住了她父亲其余的遗产，除了割让给西班牙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与此同时，弗兰西斯·斯蒂芬已于1745年10月4日被选为皇帝。

从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到七年战争开始之间的9年，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第一个改革时期”。在这9年期间，奥地利君主国的内部结构实际上进行了许多意义至为重大的变革；然而，基本上这还是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平静的结束时期，它是为一些特殊目的进行准备。诚然，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欧洲的仁慈的专制君主的画廊中，拥有一个光荣的地位，她总的人生观犹如其人。她认为在上帝的统治下，她在她的领地各地行使她的至高无上的意志，乃是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她的职责只向上帝负责，而不是她的臣民，虽然她也认为，她应当为她的臣民的福利行使她的权力。她利用中央集权以及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原有的三级会议权力这样一些常用的办法，来追求她的目的。然而，她采取的是一些本质上特殊而非一般的措施。她自己经历了贪婪的邻国的进攻，她的整个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失掉了西里西亚让它落入普鲁士的腓特烈之手。她对于这一损失耿耿于怀，因此她决心要弥补这一损失，并且要为自己向腓特烈报仇，她对他深恶痛绝。她这时开始采取的措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而这些措施所采取的形式，则是由她和她的顾问们从过去8年事态中（也是她父亲统治的晚年的事态中，而她曾是这些事态不耐烦的观察家）所汲取的经验的演绎。中心的结论（姑且不谈那些与国际形势直接有关的）是，军队不能胜任它所担负的即便是保卫奥地利的任务，更谈不上收复西里西亚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总是愿意向敌人学习，她把腓特烈的优良的军事效率这一教训，以及许多目的在于直接提高军队的技术效率的措施，深深地铭记在心；对于这些措施她自己非常注意。在这些措施中，有在维也纳新城建立的军事科学院，建立正规的营房，进行对抗演习，改进军官和其他军职人员的状况。但是，她对军队缺乏战斗力有沉痛的经验，而其较深刻的原因却在于政治体制：三级会议仍然掌握批发和扣发给养的大权，即使发给，也是不充足的。最根本的需求，还是要增加国家岁入的来源，这意味着要提高她的人民整个的支付能力的水平；但是，在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以前，现有的这种来源必须要使之能够归于国王，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要涉及简化政府机器并实行中央集权。正如在她后来编纂成册以教训子女的备忘录中所写的，她早在签订德累斯顿和约时就看出，她必须集中精力治理她的各个领地的内部事务，而首要的弊端是：“各个部门同时都把自己的部门看作是他自己的领地。各部首长（Capi）和大臣们是由三级会议付给薪水的，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地支付他们的酬劳；这也是一个大弊端，它削弱了行政机构”，因此他们“永远依赖”三级会议。

玛丽亚·特蕾西亚讲究实际的意识，包括她也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她并不打算在她的所有领地中普遍采用改组这个同一的措施。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大臣，实际上通过有关领土的总督，仍能继续相当独立地起作用，在尼德兰是洛林的查理（弗兰西斯·斯蒂芬的弟弟、玛丽亚·特蕾西亚妹妹马利安娜的丈夫）；在伦巴第，先是斐迪南·哈拉赫伯爵，其后是卢卡斯·帕拉维奇尼伯爵。尼德兰的宪法实际上毫未触动，而伦巴第也是轻轻地触动一下，虽然后来在别的地方进行的一些改革，首先是在伦巴第实行的；这些改革是编制有条理的土地登记册，作为解决土地税的预备措施，以及实施教会财产有责任纳税的原则（在与教廷进行了重要的谈判以后，于1757年实施的）。

匈牙利也被豁免。玛丽亚·特蕾西亚绝不是对于匈牙利宪法的狭隘、寡头的性质有目无睹；她也并不认为匈牙利的三级会议在本质上比奥地利的或波希米亚的更可靠；但是，撇开这个事实不谈，即她曾保证她对匈牙利宪法所做的誓言，特别是对“贵族的”土地免于征税的誓言，她对匈牙利人在紧急关头在波兹索尼给予她的援助，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义务感。再者，她的经验引导她做出与她祖父相反的结论；她写道，匈牙利人本质上是一个好民族，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少的好意。她打算通过说服从1751年的匈牙利议会那里获得定期的供给，但却失败了；而她在别的地方通过强硬的办法硬行取得的同意，使她感到羞耻；但是，当豪格维茨提出把他实行的改革扩大到匈牙利时，她回答说：“我认为在匈牙利实行任何变革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没有一个议会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因为我还考虑到那里的情况特殊，这就更不可取了；否则就会产生痛苦的后果。”

因此，议会就这样没有召开。这些谨慎的做法，避免了匈牙利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也避免了违反宪法这一愚蠢的做法，她却是在权贵中间逐步建立起一个对她自己有利的派别以达到她的目的。她甚至迎合匈牙利的某些愿望。毛罗什和蒂萨的“军事边境地区”被取消，并在斯拉沃尼亚实行州县制。此后，塞尔维亚的事务由“伊利里亚宫廷专使”管辖。特兰西瓦尼亚没有重新合并，但玛丽亚·特蕾西亚同意她以匈牙利女王的身份，统治这个地方。在

佩斯建立了王宫（虽然从未按其原意加以使用），几名匈牙利人被任命担任了要职。

因此，她早期的改革，仅限于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各个领地，而且，即便是在这里，她也没有立即开始。她年轻即位，而且没有经验，因此在她统治的最初年代里，有那么多迫在眉睫的战争与外交问题需要处理，不允许她花费许多时间在一些弱点的背后（这些弱点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原来的政府机器似乎效果不错）寻找它们的根本原因，再者，就像她所写到的那样，她左右的那些大臣们“偏见太深，提不出什么有用的建议；而且他们德高望重，又无法解除他们的职务”。因此，在这些年代中，她除了解决查理的复杂的财政机构外，没有进行重大的变革；这样，恢复王室度支局作为解决国家财政的唯一中央机构，并且把管理皇室事务的权力从奥地利的大臣手中交由一个新的机构“王室—宫廷—国务枢密院”。但是，事实证明这个机构的第一任官员乌勒费尔德伯爵是巴滕施泰因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执行玛丽亚·特蕾西亚自己意愿的人物。

巴滕施泰因这时权势通天，炙手可热，因为“上帝”从玛丽亚·特蕾西亚那里“夺走了”斯塔勒姆贝格、哈拉赫和金斯基的生命。枢密会议新的成员科洛雷多、克芬许莱尔和包贾尼都不是这位富有经验的“秘书”的对手。但是，最后“上帝给她派来”三个可以与之共事并可以通过他们进行工作的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考尼茨，他最初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然而，在他1753年继乌勒费尔德出任首相一职后，他掌握了对一切政策的控制权。另外两位是路德维希·豪格维茨伯爵和鲁道夫·肖特克伯爵（Count Rudolph Chotek）。

豪格维茨是西里西亚的一名贵族。他曾被雇用来改组西里西亚由奥地利保有的那部分地区的事务。他在这个方面取得的成功，使他被邀请就奥地利失去其最富庶的省份后所出现的大量问题（这一形势显然是巴滕施泰因所不能应付的），陈述他的意见。豪格维茨立刻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他盘算，奥地利的安全需要一支至少有10.8万人的常备军。要维持这支军队，每年需要1400万盾，比三级会议通常通过的拨款多出500万盾。为了筹措这笔额外的款项，豪格维茨提出，征税应扩大对一切财产课税，包括贵族的财产在内，并且为了保证连续不断性，应预先批准10年。一旦这样做，“忠诚和服从的三级会议”就要“与军方没有任何交道可打了”，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再不要有进

一步的开支了。除了为军队提供宿舍，而且这也只是在兵营建成之前才这样做。

三级会议得到保证说，这种新的安排绝不会削减他们的权利，但却有不少人反对这样做，首先是来自枢密院内部，在枢密院内，哈拉赫伯爵就自封为贵族的发言人；其次，则在各地议会中，还必须逐一与之进行令人痛苦的商讨。但是，最后各地取得一致意见（卡林西亚除外，那里的改革必须由政府明令强制进行），因此君主掌握军队成为可能的了。然而，马上就可清楚地看出，新的情况要求对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各个领地的内部机构进行彻底的改组。改革在这些领地内一体进行，而且只是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领地内进行；这一事实立即就使这些领地更亲密地团结一致，而与其他领地则形成鲜明的区别。玛丽亚·特蕾西亚在这些领地内推行的下一步措施，就考虑了这种情况。1749年1月15日，帝国政府命令公布司法与行政分开这一根本原则；在继之而来的5月1日，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宫廷大臣们的职权，迄今为止，都一直在同时执行司法与行政的职能，在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保存下来的中央机关中都被取消。另外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取而代之，每个机构的权限都适用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各地，“最高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和一切司法问题的最高权威；而内政部（或称政治与财政管理部）则掌管除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最高权力，它仍然是“王室—宫廷—国务枢密院”的一个部门，而国防则仍属王室国防部管辖。

这两个新机构反过来又都发现，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改组。工作是从准备制定新的、统一的法典开始的，既有民法典，也有刑事法典。但是，这两部法典只是在多年以后才完成的。新的政治管理机构则是在早一些时期成立的。根据管理部的规定，每个领地都要设立一个最初名叫“代表处”，后来称为“王室代表财政处”的机构；再后来在不同的领地中使用的名称就各色各样了——总督府（Gubernium）、政府（Regierung）、州当局（Landesbauptmannschaft）。这些机构原来的职能，就是处理有关军队的一些问题——征兵、薪饷、军队驻地等。这时三级会议已经不管这些问题；但是，由于经过一段时间后，国王将过去属于三级会议的部门掌管的、或者完全无人管理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掌管起来；这些问题中每一问题不是向三级会议而是向“总督府”（Gubernium）负

责。权力的扩大，和第二个例子的管理性质的改变是同样重要的。波希米亚早就分为“帝国行政区”（大体上相等于英国郡的单位）。奥地利的大部分土地则分为类似的小单位，这些小单位是由三级会议任命的、付给薪金并接受其指示的官员们管理的。这些机构以后到处都称为县公署（西里西亚除外）；它们这时已经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而成为系统。它们被置于国王的一名称作县长的官员的管辖之下。它们的工作人员则由其他也是国王臣仆的官员们充实。由于行政区原有的职能没有被取消，因此它具有两重地位，在某些问题上向三级会议负责，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向国王负责。但是，由于国王的活动扩大了，它们后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日益盖过了前一个方面，而这些机构起初只是由县长（*Kreishauptmann*）（通常是当地的一名贵族）、两名助理和一些秘书和信差组成；这些机构本身已发展成为整个奥地利行政体系最重要的部分。凡不是特定地属于任何其他当局范围内的工作，则交由“政治的”管理机构办理，即管理部（*Direcforium*），在其下则交由“特派代表团”（*Deputortionen*）和县公署“*Kreisämter*”办理，这不久就成为一种通常的做法了。

甚至在18世纪40年代末，以后又在18世纪50年代中，这些新设置的官员们发出大量的命令，其中从规定大学的课程到禁止老百姓不得过不必要的节日，一直到规定必须要控制住麻雀的数量。

与这些国内的举措同时进行的，还有外交方面的紧张活动，主要目的是相同的，就是要收复西里西亚。这特别是与考尼茨伯爵这个名字有关联，他多年来一直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最忠实、最可信赖的策划者，考尼茨在某些外交谈判取得成功后，于1748年被准许参加国务会议。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签订后，当玛丽亚·特蕾西亚要国务会议的所有成员就奥地利应奉行何种友好同盟政策陈述己见时，考尼茨还是一个资历不深的成员。大家在与此目的有关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余所有的人都主张要维持奥地利与海上大国以及俄国的关系。考尼茨虽然也同意说，奥地利原有的盟国都是它的“天然朋友”，但是只有他认为，只有与普鲁士不可能保持奥地利所能接受的和平。政策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孤立普鲁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抛弃一切偏见。特别是法国，奥地利必须尽可能地把它争取过来。

玛丽亚·特蕾西亚接受了考尼茨的见解。为此，考尼茨耐心地进行工作，首先出任驻法国的大使，1753年5月以后，又充当大法官兼首相。这是一个艰难而又微妙的任务：艰难在于法普的关系密切；微妙则因为在新的友谊牢靠地取得以后放弃旧的才安全，而且走错一步就会使奥地利陷于孤立。法英在尼德兰问题上的争端，使考尼茨有了机会。1755年这就导致了1756年1月的英普条约；但是，这就使法奥有可能缔结凡尔赛条约，接着便于5月1日签订了条约。8月，腓特烈揭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这时他没有进军波希米亚，而是开进了萨克森。

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属于欧洲史而不是奥地利史。奥地利早期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都取得了胜利，但却未能继续取得胜利。军队再次失败；将军们无能，军队纪律涣散。三级会议几乎到处都表现不忠诚，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要从它们那里获得在战役的某些极为关键的时刻必须恢复她的军队所不可缺少的补贴，就遇到了困难。1763年2月15日，她不得不批准赫伯特斯堡（Hubertusburg）条约，这个条约大体上进一步确定了1745年柏林条约的条款，从而再次承认失去西里西亚以换取腓特烈答应投票赞成选举约瑟夫为罗马人的国王并承认奥地利对摩德纳的王位继承权利。奥地利的内部弱点再一次暴露无遗，于是玛丽亚·特蕾西亚便回过头来进行国内改组这一任务；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战争的直接目的，而是出于更有建设性的精神。

（严维明 译）

[1] 奥地利领地包括上、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克思滕），卡尼奥拉，蒂罗尔，布雷斯戈和布尔戈。波希米亚领地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

[2] Kurucz（意为“十字军”）和Labanc（意为帝国军队中的“步兵”）是当时在匈牙利用来分别指反哈布斯堡派和亲哈布斯堡派的。

[3] E. 德尼：《从白山开始的波希米亚》。

第十八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10月查理六世的突然死亡导致了一场战争，这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国本诏书”得到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保证，但一个国家如对抵抗侵略缺乏准备，仅靠别人尊重条约来保卫自己，似乎是很不够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一支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的军队。她留用了她父亲时代的大臣，他们都老态龙钟，不能胜任；她自己也没有受过政治训练，丈夫弗兰西斯是个不得人心的庸才。更使她陷入困境的是，她不能指望她臣民的忠诚。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许多贵族准备服从跟她争夺王位的巴伐利亚选侯查理·阿伯特·马扎尔贵族看来更热心于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的权势，他们不愿意保卫玛丽亚·特蕾西亚。而查理·阿伯特则公开表示自己有权继承查理六世，虽然这一要求没有根据，他却信以为真。不过，他单凭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债务累累，军队缺乏战斗力，将领和大臣无能。他只有依靠法国的支持，对于这种支持他却满怀希望。

根据1727年签订的条约，如果查理六世死后没有男嗣，法国保证支持选侯对任何哈布斯堡领地提出的这一正当要求。然而，1735年法国对“国本诏书”作了保证；不过，可以争辩说，这一保证并不损害第三方的权利；这一点维也纳应当知道，因为在查理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法国曾经表示愿意从中斡旋帮助解决巴伐利亚的继承权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反应。查理六世一死，选侯马上请求法国支持。他能否得到支持还不一定。1726年以来一直掌管法国政策的弗勒里生来为人谨慎，倾向于一次只追求一个目标。皇帝去世之前，他一直为法国站在西班牙一方干预詹金斯的耳朵战争做准备。支持查理·阿伯特，不但可能引起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而且还可能引起同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战争，因为如果荷兰和英国允许摧毁这个哈布斯堡国家，就会危及他们的自身安全。然而，法国对选举新皇帝的态度，与它对查理·阿伯特的领土要求的态度是紧密相连的。根据1727年条约，法国保证支持查理·阿伯特为候选人。但是，如果在给予这种支持的同时不设法扩大他的世袭领地，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一个皇帝需要大量

的财源来维持自己的尊严。要得到大量的财源，查理·阿伯特只能从玛丽亚·特蕾西亚手里抢夺。

而且，在这个时刻，弗勒里的地位削弱了，因为路易十五开始听信那些极力主张他乘机摧毁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人。弗勒里既没有辞职，也没有被免职。但是法国却违背他的意志，逐渐被卷入要肢解哈布斯堡国家的企图；不过，他还能使用他仍然保持的权利去阻止法国将其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入支持这一企图中去，从而使其失去成功的极好机会。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他确实延缓了法国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1740年12月普鲁士侵犯西里西亚，形势才急转直下。

如果说某个人要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人就是腓特烈二世，因为普鲁士的政策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普鲁士的确有理由对西里西亚部分地区提出要求，虽然理由很不充分，但在腓特烈看来，这些理由之所以有用，只是因为可以用来美化他为了加强普鲁士的实力、取得个人荣誉而采取的行动。很明显，西里西亚是一块值得弄到手的地方。腓特烈认为，如果弄到整个省不大可能，弄到下西里西亚是大有希望的。如有必要，他准备为此打一仗，但他希望速战速决，不发生重大的战斗就能得到它。驻扎在那里的奥地利军队力量薄弱，只能守住几个设防城市。入侵开始以后，腓特烈向玛丽亚·特蕾西亚提出建议：如果她愿意割让西里西亚，他准备付给她一笔钱，支持她保卫其他领地，并在选举皇帝时投她的丈夫托斯卡纳大公弗兰西斯的票。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她拒绝了。她对他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慨，根本不相信他提出的建议。她争辩说，她放弃任何领地都将违反“国本诏书”，因此会削弱她对其他领地的权力。她还建议对腓特烈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她才调集起一支小部队去攻打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军队。她希望，战场上的迅速成功会阻止其他的潜在侵略者，促使“国本诏书”的一些保证国给她以支持。普鲁士军队已有1/4世纪没有打过仗，它的战斗力还不大清楚。

1741年年初，玛丽亚·特蕾西亚满希望会得到乔治二世的援助的。乔治既是汉诺威的选侯，又是英国之王。他倾向于首先考虑他的德意志领地的利益，因此反对普鲁士的扩张。但是，英国的舆论对腓特烈的野心并不特别持有敌视态度。真正引起英国顾虑的是，法国同西班牙结成反英联盟的可能性；而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发挥沿海国家同奥地利和普鲁士传统联盟的作用。英国的政策并不由国

王一人决定。乔治作为选侯，拥有绝对的权力；作为国王，一项政策如果没有下院的支持，他就不能贯彻。凡在当时认为不明显违背英国利益的政策，都可能得到这种支持，因为他们指望国王起领头作用；但是，即使是有要把英国的利益从属于汉诺威的利益的苗头出现，也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始终没有正确理解乔治的奇特地位。起初，他的言论使她相信，英国和汉诺威都会支持她反对普鲁士。同时她还希望，也可以把萨克森和俄国拉入反普鲁士的联盟。

俄国的支持特别重要，因为腓特烈在所有的国家中最怕俄国。萨克林选侯奥古斯特也是波兰国王，他的王位是由于俄国的支持才得到的，因此他可能唯俄国的马首是瞻。实际上，俄国在当时还帮不了忙；它的国内局势不稳定，跟瑞典还在打仗（1714—1743年）（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在斯德哥尔摩的影响造成的），一时还顾不上中欧事务。俄国不能采取行动的直接后果是，这位选侯采取了伺机而动的策略。他迫切需要得到一块土地，以便把萨克森同波兰连成一片。而要得到这样一块土地，他只有损害腓特烈或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利益。他倾向于亲奥地利，反普鲁士。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拒绝为赢得他的支持而割让即便是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她只准备给钱和一块可能从普鲁士那里弄过来的土地。她极不愿意同意支持，也不允许奥古斯特在他一旦当选皇帝后支持把自己的世袭领地变成王国。她认为，这样做是同帝国宪法背道而驰的。虽然奥地利和萨克森于1741年4月签订了同盟条约，但她迟迟不予批准，因为根据该条约，她有义务给予这种支持。

早在3月，已有迹象表明乔治无力控制英国的政策。沃波尔不愿看到英国卷入与普鲁士的敌对行动。他的影响到这时仍占上风，因此英国驻维也纳的使节奉命极力劝说玛丽亚·特蕾西亚同腓特烈达成和解。她拒绝了，但尽管如此，议会仍然在4月底给了她一笔补助金；她被告知，英国愿意按照1732年条约的要求，向她提供1.2万人的军队以捍卫“国本诏书”。给予这种帮助并不一定引起战争；英国准备充当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辅助盟国，而不是主要盟国。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希望英国和汉诺威都能在实际提供援助，并且希望乔治会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她获得萨克森的支持。

在进行这些安排的同时，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威胁也在增加。1741年3月，法国派出贝尔岛元帅为特使，游说那些可能支持查理·阿尔贝特当候选人的德意志各邦的选侯。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使命，企图组织一个肢解哈布斯堡国家的大联盟。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巴拉丁选侯的支持；基督教各国的选侯迄今为止对法国的贿赂和法国的威胁都做出了反应，答应投票赞成查理·阿尔贝特，并且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积极反对法国插手支持查理·阿尔贝特的领土要求。然而，腓特烈迟迟没有表态。他的8万军队现在是中欧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部队首战告捷后，他讨价还价的地位更加有力了。4月，奥地利人终于向西里西亚境内的普鲁士军队发起进攻。腓特烈的军队战线拉得很长，只是由于奥军前进缓慢才免于被各个击破。两军在莫尔维茨遭遇。战斗一开始，普鲁士骑兵就被奥地利骑兵击溃。之后，腓特烈认为大势已去，落荒而逃。但是，普鲁士的步兵却岿然不动，最后终于将奥地利的骑兵和奥地利的步兵都击退。奥地利步兵主要由新兵组成，并不是难以对付的敌手。这次胜利还显示了注重火力的普鲁士步兵训练制度的价值。普鲁士步兵继续不负已经赢得的盛名。而且，腓特烈采取果断措施，改进了他的骑兵。

玛丽亚·特蕾西亚并没有因为莫尔维茨战役的失败而给予腓特烈想要的东西。但法国现在肯定想贯彻贝尔岛计划，对此她实际上已经答应一半。然而，查理·阿尔贝特和法国之间的安排表明，选侯并不处于讨价还价的地位。他没能使法国以条约的形式保证他得到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任何领地；他得到的只是一笔补助金的许诺和一个由贝尔岛制订的关于法国—巴伐利亚联合作战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在占领帕绍主教管区和上奥地利部分地区后，就要进攻波希米亚并拿下布拉格。他们希望普鲁士和萨克森同这些部队将会合作。6月，腓特烈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拒绝他的条件以后，最后与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这样，合作的希望更大了。但是，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承担很多义务。他答应投查理·阿尔贝特的票，保证法国在欧洲的领地。作为报答，他得到了对于他自己领地和下西里西亚的保证，他还得到法国帮助查理·阿尔贝特对付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保证。但是，腓特烈仍可跟她讲和。不管他当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再三催促查理·阿尔贝特和法国迅速而狠狠地出击。

贝尔岛计划进行得很慢，很不合他和腓特烈的心意，不过确实在进行，而玛丽亚·特蕾西亚从其他国家得到军事援助的希望却受到挫折。7月，乔治看到自己的选侯领地受到普鲁士和法国两支军队入侵的威胁，遂拒绝为她而动用他的2.5万名汉诺威军队，并企图通过同她的敌人达成协议来确保汉诺威的安全。萨克森也中止了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谈判，接受了法国的友好表示。7月底，查理·阿尔贝特占领了帕绍。不久之后，一支强大的法军越过莱茵河，前来和他会师。法国一巴伐利亚联军迅速攻占了上奥地利，腓特烈催促他们向防守很差的维也纳挺进，因为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上西里西亚，守卫腓特烈想要攻占的坚固要塞尼斯。如果奥军奉召保卫维也纳，无疑对他有利。但是，腓特烈的建议虽然不是无私的，但在战备上也许是正确的。然而，法国拒不采纳这一建议，而查理·阿尔贝特又得按法国的意志行事。10月下旬，入侵波希米亚便开始了。

由于维也纳面临威胁，加上英国的压力，玛丽亚·特蕾西亚不得不认真努力同腓特烈实现和解。先前，她曾试图用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领土来收买法国和查理·阿尔贝特，但是遭到了拒绝。她还表示愿意把低地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割让给腓特烈，也同样遭到了轻蔑的拒绝。为了能使用她在西里西亚的军队对付法国一巴伐利亚联军，她再次求助于腓特烈。结果，两国于10月初缔结了克莱因·施内伦多夫协定。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全权代表都没有签署文件，但英国派到腓特烈那里的使者海因德福德勋爵按双方同意的条款起草了一个备忘录。腓特烈同意让奥地利军队撤离；玛丽亚·特蕾西亚则同意让他在假围攻后攻占尼斯，并让他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这个要塞和整个下西里西亚；年底前就正式和约的问题开始谈判；同时，协定要保密；如果走漏消息，协定对腓特烈则不再有约束力。写进最后这一条，只能为恢复敌对行动提供了一个借口，如果需要一个借口的话，因为保密是不可能的。腓特烈还不准备签订一个最后的条约，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也不一定想要一个条约。

协定立即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腓特烈得到了尼斯，奥地利军队以用来保卫波希米亚，这时法国和巴伐利亚的攻势显然要转向那里。法国一巴伐利亚联军向布拉格挺进，一支萨克森部队在城下与它们会合，法国为了得到萨克森的这个支援，答应把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部分地区给予奥古斯特，将其建成一个王国。他们在萨克森的支援下猛

攻布拉格。其后不久，腓特烈恢复了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敌对行动。

1742年1月，查理·阿尔贝特当选为皇帝，之后，他自称查理七世。他得到了全部选票——8票。他甚至还得到汉诺威的一票；因为上年9月，乔治为了保护他的选侯领地，曾答应投查理·阿尔贝特一票；作为选侯，他仍将保持中立。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波希米亚的一票没被接受。玛丽亚·特蕾西亚已经任命她的丈夫为波希米亚的两摄政王之一，选举团不承认她通过她丈夫来行使投票的权利；他们也不承认查理是波希米亚国王，虽然他已在布拉格自封为王。决定拥护两者之一，都意味着决心用武力支持这个决定，那就是要让帝国参战。查理在任何具体领土要求问题上从未获得帝国的支持；法国的支持使他当选为皇帝，但仅此而已。

因此，选举对于战争的进程毫无影响。玛丽亚·特蕾西亚可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她把原来保卫维也纳的部队和从意大利调回的其他部队，用来进攻在上奥地利的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这次的进攻是成功的；上奥地利很快获得解放，接着便入侵巴伐利亚，很快就攻占了慕尼黑。在波希米亚的法军处境危险；加上指挥不善，情况更加糟糕。法军的指挥权已经交给布罗伊元帅。他老态龙钟，患中风病，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还不信任腓特烈，腓特烈也不喜欢他，这样就无助于法普之间的成功合作。腓特烈原来希望法军能得到有力的加强，并置于贝尔岛的指挥之下。前者没有实现，而贝尔岛虽然来到波希米亚任职，但布罗伊是他的上级，仍然掌握指挥权。

1741年到1742年的冬天，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军队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匈牙利的贡献。1741年夏末，玛丽亚·特蕾西亚召集匈牙利议会，呼吁马扎尔人给予支持；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她不得不在政治上做出各种让步。双方就让步的确切程度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她得到了一小笔钱和派出一支大军的许诺，这支军队的费用由匈牙利承担。实际上，真正到达前线的军队人数要比期望的少得多。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纪律，喜好劫掠，严重损害了马扎尔骑兵的价值；马扎尔步兵的表现较好。但是，尽管玛丽亚·特蕾西亚没有从匈牙利得到她希望得到的那么多东西，她还是得到了一些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而且是在什么都缺乏的时刻得到的。

到了1742年春，出现了腓特烈想同玛丽亚·特蕾西亚媾和的迹象。他对年初在摩拉维亚的进攻失败感到烦恼。这次进攻是在萨克森和法国军队答应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管是对是错，他认为萨克森人表现很差，法国人也没有尽到本分。他还担心法国不同他商量或者不考虑他的利益，就安排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查理七世和解。他记得他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曾经背着盟国单独媾和，因此相信关于法奥谈判的谣言。腓特烈想要讲和还有别的原因。普军的许多部队自1741年12月以来一直在打仗，迫切需要休息；他父亲积累的战时基金也渐渐耗尽。要补充上也不是易事；在国内借债很不容易，而在国外贷款则根本不可能，因为，且不说他缺乏信用，只要他同玛丽亚·特蕾西亚还处于交战状态，英国和荷兰的金融市场的大门就不会向他开放。

英国渴望实现奥普和解。汉诺威的中立态度很不受英国舆论的欢迎，它促使沃波尔于1742年2月下台。英国首相不得不为汉诺威选侯的罪恶付出了代价。人们预期重新组成的内阁会大力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支持她反对法国，不是反对普鲁士。新上任的负责北方事务的大臣卡特里特希望劝使腓特烈最终加入一个反法联盟；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重新对玛丽亚·特蕾西亚施加压力，以便争取腓特烈。作为报答，英国愿意给她更多的补贴，并派英军援助。有一个计划将一支英国部队派往尼德兰，同已在那里的奥地利军队和一支荷兰部队会合，然后从那里进攻法国。计划看上去很不错，因为法国边界的防守很差。它的缺点是要依靠荷兰的支援，而这种支援是很不可能得到的。

荷兰共和国比大约30年前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弱得多；而且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城市寡头统治集团强烈地倾向于和平。虽然荷兰共和国曾对“国本诏书”做过保证，但只要本国安全不面临危险，就不愿意打仗。如果法国占领了尼德兰，就会对它的安全构成最明显的威胁。为了防止这种威胁，荷兰人获得了在那里的一些城镇——一些关隘要塞——驻军，并且每年从尼德兰的岁收中提取一笔钱以支付驻军费用的权利。但是，荷兰人知道，没有英国的支持，他们不可能保卫这道屏障。荷兰共和国虽然从未沦为一个附庸国，但担心失去英国的支持不止一次促使它按照英国的意愿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然而，荷兰人这次却对乔治二世产生了怀疑。1741年，荷兰人曾认真考虑过履行对“国本诏书”的保证，而这时汉诺威宣布中立引起了反作

用。1742年英国没有能说服他们参加对法国的战争，特别是因为汉诺威没有保证参战。在这种情况下，从尼德兰进攻法国的计划不可能付诸实施。然而，荷兰共和国继续奉行它在1741年开始的扩军政策。这项政策不仅因为荷兰人决心抵抗法国可能对尼德兰发动的侵略，并且准备在德意志给予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军事援助，如果事态发展使得这样做对荷兰有利的话；而且也因为城市里的主要寡头统治集团想以此来向敌视他们的那一部分荷兰舆论表明，他们是多么爱国，多么富有远见。奥兰治的威廉四世希望在共和国里获得和威廉三世同等的地位。他的野心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在民众之中。事情很清楚，如果寡头统治集团看来不能有效地保卫荷兰的荣誉和利益，那么势不可当的群众运动就可能使他上台。而且也不能忽视这样的可能性：由于威廉是乔治二世的女婿，英国可能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因此会煽起这样的运动。所以，共和国的领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特别错综复杂的。

然而，1742年春天，凡尔赛担心而维也纳则希望荷兰人会参加对法国的进攻。这种希望是使玛丽亚·特蕾西亚倾向于同腓特烈和解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普军在5月打败了她的军队。而腓特烈自己现在也愿意同她和解。他担心布罗伊眼看就要彻底被打败，他想要在此之前退出战争。6月，布雷斯劳和约草案宣告奥普战争结束；腓特烈得到了下西里西亚、格拉茨和上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不幸，玛丽亚·特蕾西亚在谈判中把她的利益委托给了英国驻普鲁士的使节。由于英国的政策是实现和解，他没有为她尽力。如果他多做些努力的话，本来可以为她保留除尼斯以外的整个上西里西亚。腓特烈的背叛使布罗伊的军队备受威胁，法军看来几乎处于绝望的境地。几个星期以后，萨克森根据和约草案中的一个条款，也加入了和约，虽然它一无所得。凡尔赛听到这些消息自然陷于一片恐慌。现在，挽救布罗伊的军队成了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1741年以来，一直处于马耶布瓦指挥下的军队是为了对汉诺威造成威胁而一直驻扎在威斯特伐利亚，现在则奉命开进波希米亚以掩护布罗伊撤退。但是，由于担心马耶布瓦可能突然被召回去对付来自尼德兰的入侵以保卫法国，所以要他不要过分冒险。他没有冒险。他向巴伐利亚挺进，迫使奥地利人撤出了被他们所占领的一些地区，然后又进入波希米亚。但是当他发现交通线受到威胁，补给品快要用完时，就迅速撤回到巴伐利亚。然而，布罗伊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贝尔岛指挥后，就前往巴伐利亚，接过了马耶布瓦的指

挥权。法国还企图使用别的办法来挽救在波希米亚的法军，但同样没有成功。弗勒里准备同意把法国军队撤出巴伐利亚，并至少暂时实际上抛弃查理七世，如果玛丽亚·特蕾西亚同意让法军安全撤离波希米亚回国。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拒绝了全部建议。贝尔岛终于避免了投降这场灾难；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军队逃脱了奥军对布拉格的相当松懈的封锁，撤到了巴伐利亚。他留下的守军威胁要焚烧城池，因此获得了有条件投降，被准予返回法国。但是波希米亚战役使法国遭受巨大伤亡；同样重要的是，这次战役也使他们感到不想重返中欧打仗。

虽然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波希米亚战役的结果感到失望，但1743年她在德意志大有成功希望。马耶布瓦奉命救援布罗伊之后，乔治认为现在可以放心地在他的选侯领地之外使用汉诺威军队；1.6万名汉诺威军队已领受英国的军饷，编入了驻尼德兰的英军。他们讨论了奥地利—英国—汉诺威三国联军从尼德兰开进德意志的计划，在那里，联军可以同驻在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军队采取一致行动。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不能把她的军队全部集中使用于德意志，她还得保卫她的意大利领地免遭进攻。

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看来，查理六世之死好像为他的家族提供了一个统治意大利的机会。由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他已把他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生的一个儿子查理立为那不勒斯国王。现在，他希望为伊丽莎白所生的他的次子菲利普把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意大利的全部或大部分领地弄到手；如有可能，还有弗兰西斯的托斯卡纳大公国。菲利普国王实际宣布，他对整个哈布斯堡遗产有权提出要求，但这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使他有可能同查理·阿尔贝特达成协议。根据1741年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宁芬堡条约，西班牙答应给予查理·阿尔贝特补贴；作为报答，后者承认菲利普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意大利领地的要求。现在，就待菲利普去尽力争夺了。不过，要集结一支强大得能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还需要一些时间；在此期间，研究了把这支军队运到意大利的办法。鉴于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阻挠，要把军队从海上运去是很危险的，而且，不管西班牙步兵用什么办法过去，大部分骑兵还得走陆路。菲利普希望，法国不但会让西军通过它的领土，而且还会积极支持他在意大利的计划。但是，凡尔赛认为这些计划不大可能实现。显而易见，撒丁国王的态度对意

大利事态的进程有很大影响。不通过他的领地，军队无法从法国开进意大利；当时的撒丁国王查理·伊曼纽尔拥有一支3万人到4万人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利用皮埃蒙特的山区给入侵意大利造成很大的困难。由此推断，在进攻玛丽亚·特蕾西亚时如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将是非常宝贵的。西班牙能否得到撒丁的支持则是可疑的，因为他的利益所在是要在意大利保持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均势。只有让他扩大领土足以使他认为把哈布斯堡家族逐出意大利不会威胁到撒丁的安全，才是一个可能把他争取到波旁家族一边来的机会。但是，西班牙希望为菲利普王子弄到一块领地，他不愿意为了换取撒丁的结盟而牺牲大片的领地。弗勒里对于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他敦促西班牙和撒丁达成协议，但西班牙却不愿意。西班牙的固执态度促使查理·伊曼纽尔准备同玛丽亚·特蕾西亚成交。他对“国本诏书”从来没有做过保证，查理六世死后还对米兰提出过要求，但他准备以一定的代价给予玛丽亚·特蕾西亚有限的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极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伊曼纽尔不仅要求一大部分米兰公国的领地，而且还要求1713年查理六世卖给热亚那的菲纳莱。英国敦促玛丽亚·特蕾西亚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同法国一样明白跟撒丁结盟的重要性，同样准备牺牲第三方的利益来换取这一结盟。在随后的几年里，查理·伊曼纽尔始终可以指望英国支持他的多数要求。事实上，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英国的友谊是持久的，他才对菲纳莱提出要求。得到菲纳莱，皮埃蒙特就有了一个出海口，使英国舰队的支持更有价值。因此，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撒丁的要求始终是英国和奥地利之间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摩擦的根由。

查理·伊曼纽尔想按照自己的条件实现结盟还有待时日。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迫使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合作。1741年年末和1742年年初，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登陆，其中一部分在属于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个托斯卡纳港口奥尔贝特洛，另一部分在热那亚领地的斯培西亚。这些登陆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法国准许它的土伦舰队保护西班牙运兵船，支援了西班牙舰队。当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力量非常弱，无法进攻法西联合舰队。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登陆以后，开进了罗马天主教国家，本尼狄克十四世无力加以阻止。他们在那里和一支那不勒斯军队会师。然而，联军仍然力量薄弱，它的司令官——西班牙人蒙特马尔无法发起迅速有力的进攻。不过，这支军队构成的威胁，促使查理·伊曼纽尔和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42年2月达成

了一项奇特的协议。查理·伊曼纽尔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保卫她的意大利领地，但保留自己对米兰公国的要求，并且约定在通知对方一个月后可将协定废除。

随着这个协定签订之后，两国便采取了强有力的联合行动。他们在西班牙—那不勒斯援军开到以前一举占领了同西班牙结盟的摩德纳公国。事后不久，英国一支海军中队威胁要炮击那不勒斯，迫使查理国王召回在蒙特马尔军队里的那不勒斯部队。英国之所以能造成这一威胁，是因为它已经加强了它的地中海舰队。1742年1月以后，只有一国的船只把军队或军需品从西班牙运往意大利。西班牙多数的增援部队只好从陆路过去；那就要穿越法国，然后强行通过撒丁领土。

1742年下半年，在意大利没有发生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态。蒙特马尔力量不足，无所作为；查理·伊曼纽尔也不愿参加进来对他进攻。年底，他实际上还把自己的大部分军队调往萨沃依，因为以法国领土为基地的西班牙军队侵入了这一地区。然而，他未能赶走入侵者，不得不在阿尔卑斯山冬天无法通行以前撤退。1743年年初，已经接替蒙特马尔的加吉斯奉命发动进攻。结果，西班牙军和奥地利—撒丁联军在罗马天主教国家的康普-桑多发生战斗。双方都声称取得了胜利，但是加吉斯撤退了。追击是不可能的，因为查理·伊曼纽尔不让他的部队参加。他在同玛丽亚·特蕾西亚达成有决定性的交易之前，决定不再进一步援助她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听取法国的建议，法国越来越想把他争取过去。

法国的政策——如果说它受到控制的话——现在则控制在路易十五的手里。弗勒里已于1743年1月去世。他去世以后，国王宣称，他要干出像路易十四在马萨林死后干出的业绩。但是，路易十五和他的曾祖父迥然不同。他虽然聪明，但既懒惰而又优柔寡断。要有效地领导法国度过危机，是超过他的能力的；但是，他自己既不能干的，却又不愿任命一位首相来替他干。路易遇事藏头露尾，就使情况更加糟糕；大臣们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应当知道的情况都并不总是能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满意的贯彻。但是，效能差有时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原因：缺乏固定的政策。不过，可以非常肯定的是，路易在弗勒里死后首先想要在不严重损害威信的情况下，设法终止敌对行动。从法律上讲，法国实际上并不处于交战状态；它只是查理七世的辅助者。但是，要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确非易事，除非

法国彻底抛弃查理，而路易又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面临的前景是继续斗争，对其结果他则毫无信心。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不能不面对一个大联盟而自己却没有一个强大的盟友。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还没有条约。人们担心西班牙可能同英国和奥地利达成协议，除非法国出高价去争取它的支持，而这样做法国就要承担广泛的义务。因此，跟西班牙结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将来能否得到撒丁的援助。

1743年，英军在欧洲大陆的积极干涉活动，配合了英国的外交努力。这年年初，迄今驻扎在尼德兰的英国军队同汉诺威和奥地利军队并肩开进德意志。之后，乔治便取得所谓的“国务军”的指挥权。同他一道前来的有随从秘书卡特里特；然而，卡特里特并不具有战略方面的才干；据知，他也没有过问过军事。军事由乔治一手处理，而乔治只有勇气，而无将才。他的缺陷造成了严重后果。6月，国务军落入了指挥一支进行阻击的法军指挥官诺阿耶在美茵河上的德廷根设下的埋伏。由于诺阿耶的一名部下无能，以及一些法国步兵表现很差，战斗以法军败北告终。虽然国务军没有追击，但这次失败大大动摇了法军的军心。法军不仅在德廷根受挫。在德意志由布罗伊指挥的另一支法军，面对着由弗兰西斯的兄弟、洛林的查理指挥的奥军，就从巴伐利亚撤退了。没有法国的支持，皇帝的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就一事无成。那些没有投降的部队撤到了弗兰科尼亚。由于一项协议规定他们保持中立，奥地利人就允许他们平安无事地待在那里。

法国帮不了查理七世的大忙，因为他看来面临一次被入侵的危险，而且他对能否打退入侵毫无把握。洛林的查理和乔治二世的军队构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兵力。此外，一支荷兰部队就要派往国务军，实际上也在作战季节结束前加入了这支军队。可是，对法国的威胁并没有转变成为强有力的行动。德廷恩战役以后，国务军实际上毫无作为；洛林的查理的军队单独也不能起什么作用。国务军之所以按兵不动，原因不止一个。英国至今还没有同法国交战——它只不过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辅助者。入侵法国可能引起法国宣战；而且，如果得不到荷兰的支持，英国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想同法国交战，除非英国获得荷兰给予支持的保证。但是荷兰人仍然决心尽量避免同法国开战。英国还得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普鲁士的态度。腓特烈一直拒绝英国劝他同法国打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他不喜欢

国务军在德意志进行干涉。打败法国并不符合腓特烈的利益；而且普鲁士出面干预以支持法国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在国务军实际上仍然按兵不动的同时，英国的外交活动却非常活跃。卡特里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说服皇帝加入反法联盟。他希望，如果把查理争取过来，他就能劝说帝国对法国宣战。而皇帝自己也早就想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样就有助于使他个人得到一些好处。他的希望迄今一直落空，主要因为他要求太高，不愿和法国一刀两断。1743年年初，他在腓特烈的启发下，转过一个念头：使一些教会封地世俗化，兼并一些自由城市，他就可能扩大自己的世袭领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都有过使教会领地世俗化的先例，但天主教舆论却普遍地（虽然不是一致地）反对这种做法。当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露出去时，玛丽亚·特蕾西亚立即宣称她是保卫教会的战士，查理也赶紧否认与这个计划有关系。德廷恩战役以后，查理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很可能成为英国的傀儡。卡特里特同皇帝的使者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所谓的“哈瑙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查理答应遣返法国的辅助军队，努力实现帝国同沿海国家的合作，以便促使法国接受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此外，查理还答应放弃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领地的所有要求；作为交换，他的世袭领地亦将如数归还，并且为了增加税收，还有所扩大。而巴伐利亚则将成为一个王国；在实现这些事情之前，他将得到一笔补贴。然而，这个协议始终没有实现。查理的补贴只能来自英国。卡特里特在英国的内阁同僚得知这些条款时，表示坚决反对。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希望使下院批准这笔款项。

他们之所以不喜欢卡特里特，跟他同事们的态度很有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只受这一方面的影响。英国的舆论很不赞成国务军按兵不动。汉诺威的军队有一大部分是领取英国的薪饷，他们似乎光拿钱，不干事。人们怀疑乔治完全是在追求汉诺威的目标。英国的大臣们虽然不知道在同查理的协议中有保证选侯乔治的利益的条款，但他们也猜到有这类东西存在。

卡特里特感到欣慰的是，奥地利、撒丁和英国于9月缔结了正式的同盟——沃尔姆斯条约。条约保证查理·伊曼纽尔支持奥地利和英国一直到大家都同意媾和，以此报答英国答应给予查理·伊曼纽尔的补贴，玛丽亚·特蕾西亚让给他米兰公国的部分地区和皮亚琴察，以及放弃收复菲纳莱的权利。正如她坦率地承认的，她实际上并没有这样

的权利。但是，英国必须出钱，还要强迫热那亚接受这场交易。玛丽亚·特蕾西亚很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但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当时查理·伊曼纽尔威胁说，如果这些条款被拒绝，他就要接受法国和西班牙最近向他提出的有利建议。不过，根据条约她将来也可能得到一些补偿。条约规定，如有可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将被征服；那样，玛丽亚·特蕾西亚可以得到那不勒斯，西西里则将归于查理·伊曼纽尔。这一规定无助于奥地利和撒丁的合作，因为查理·伊曼纽尔并不希望把波旁家族赶出意大利。另一方面，条约导致热那亚公国支持波旁家族，并促使普鲁士再次参战。1743年年底，腓特烈又气又怕。他非常正确地认为，玛丽亚·特蕾西亚想要合并巴伐利亚或者巴伐利亚的一部分。他决心反对奥地利在德意志的扩张。他试图建立一个由德意志各诸侯组成的联盟，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联盟旨在保卫帝国宪法和皇帝的权力，但是这个计划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破产。1744年年初他发现，沃尔姆斯条约对“国本诏书”的保证没有除去在布雷斯劳割让给普鲁士的那部分领土。他从这一忽略中觉察到了一种阴险的意图，于是着手制订一个计划，趁奥地利不太强大之时，向它发动进攻。

路易十五方面听到沃尔姆斯条约的消息后，深信自己必须同西班牙结盟。为此目的，他于1743年10月保证帮助菲利普国王重新征服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并为菲利普王子弄到帕尔玛、皮亚琴察和伦巴第。然而，这些保证是在一时担心的情况下做出的，路易很快就认为它们没有约束力。

1743年的事态发展在英国本土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乔治未能给予这个国家它所期待的战时领导。他回到英国时，威信扫地，不得人心。其结果之一是，他从此不能再赴疆场。结果之二，人们更加强烈地反对他的宠臣卡特里特。的确，由于乔治的支持，卡特里特竟能留任到1744年11月，但他继续执政并不意味着国王的政策总被采纳。他辞职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乔治无力控制他的大臣，他的大臣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同时控制他的同僚和国王。由于主要的大臣常常意见分歧，英国的政策很不稳定。它虽然在战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效果大受影响。1743年年底实际上已有迹象表明，人们越来越强烈要求英国退出大陆上的军事行动，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和解，即使那种和解需要玛丽亚·特蕾西亚做出更大牺

牲。然而，1744年年初，法国直接威胁英国安全的消息激起了反法情绪。

法国做好准备派遣一支军队同年轻的觊觎王位者一起从敦刻尔克去英国。英国及时得到情报，立即采取对策。只是由于一场风暴，法国的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才避免了一场遭遇战。当法国人明显地看到入侵有许多困难时，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他们继续执行另一个计划。1741年以来，一支西班牙舰队一直在土伦避难。1744年2月，它和法国的土伦舰队一起出海。这支联合舰队奉命去搜寻并摧毁马修斯海军上将指挥下的英国舰队。这支英国舰队一直在封锁土伦的西班牙人。结果是马修斯在土伦附近海面先向联合舰队发起进攻。战斗结果，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向西班牙港口逃窜，尽管它们所受到的损伤相对来说是微小的；因为马修斯的副手没有给予适当的支持，而他自己也没有奋力追击。英国人把这一战役看作国耻；西班牙人——他们的舰艇在战斗中首当其冲——则将其视作胜利，但他们强烈地埋怨法国人没有很好地支持他们的舰队。此后，法西两国舰队没有再进行认真的合作，恢复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毫无希望。

在这些事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于3月间向英国和汉诺威宣战；5月，法国又向玛丽亚·特蕾西亚宣战，并侵入尼德兰。法国是为了履行对西班牙的保证才向这些国家宣战的。它之所以入侵尼德兰，是因为那里是法国很可能取得胜利的战场，法国又急需取得胜利以重振它的士气。入侵部队由路易亲自率领；但实际指挥权还是在萨克森选侯的私生兄弟莫里斯·德·萨克斯手里。萨克斯长期以来一直为法国服务；由于他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教徒，路易一直不愿让他统领一支大军。但是他才能出众，最后晋升为元帅，并被挑选为指挥尼德兰前线的得当选。他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在那里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路易本人不是一个将才，但他有自知之明，很少否定萨克斯的意见。实际上，萨克斯可以用辞职另谋他就相威胁来支持自己的意见。

1744年尼德兰战役的最初阶段对法国有利，这是不足为奇的。法国的精兵强将和敌对的奥地利、荷兰和英国军队相比，绝不是旗鼓相当的。联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又缺乏统一指挥，因此无法阻止法军占领梅嫩、库特莱和伊普雷。后来，另一战线上的事态发展给他们提

供了机会；按照预定计划，洛林的查理率领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渡过了莱茵河。敌军太弱，无法将其击退。为了防止法国遭到入侵，路易带领一支强大的部队赶来增援，留下萨克斯尽力抵抗联军。这时联军在数量上已超过法军。然而，萨克斯胸有成竹，而联军将领们则意见不一致，结果他们一事无成。

联军不仅在尼德兰失去了机会。奥地利人入侵法国也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腓特烈早已再次许定要进攻玛丽亚·特蕾西亚。他不但已经跟黑森和巴拉丁领地结成法兰克福联盟，表面上为了保卫皇帝的权力，但是他也同路易达成了协议。腓特烈要在入侵法国开始以后入侵波希米亚；如预期那样，当奥地利召回它的军队时，法国人就可趁它撤退之际予以重创，如果说不能将它消灭的话。而且，法国人准备给皇帝补贴，让他能够征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个计划很有希望成功；腓特烈开始时也很顺利。他按计划侵入波希米亚，攻占了布拉格。但是，当格林的查理奉命撤退时，他几乎是平安无事地撤了回来。路易在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病倒在梅斯，法军司令诺阿耶不愿追击。路易病愈后，他决定法国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弗赖堡，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他们攻克该城。但是，这对腓特烈毫无帮助。皇帝也帮不了大忙。他带领他所能征集到的一些军队和一支人数很少的法国部队，进入了奥地利已无力保卫的巴伐利亚。1745年1月，他死在那里。然而，腓特烈不得不面对奥军的主力。由于奥军不断地威胁他的交通线，这就迫使他在1744年年底前撤退到西里西亚。

下一个战役开始时，他的前景看来颇为不妙。这时，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主要战争目标是收复西里西亚；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她同巴伐利亚的新选侯马克西米连·约瑟夫于1745年4月在维持战前状态的基础上实现了和解。腓特烈不可能指望法国会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即便是他要求给予补贴，所得到的答复也是含糊其词的。另外，萨克森对普鲁士存有戒心，沿海国家又答应给它补贴，因此它已成为奥地利的辅助国。沿海国家不能眼看玛丽亚·特蕾西亚被制服。入侵萨克森会给腓特烈马上带来战略上的好处，但他举棋不定，因为这一行动可能触怒俄国。于是，他等待奥地利—萨克森联军在西里西亚发动进攻。他看准机会，掌握主动，在霍恩弗里德堡打了个大胜仗。这一战役不但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也是腓特烈个人的胜利。他希望这将使他能够讲和。他准备按照他已在布雷斯劳接受的条款媾和。但

是，尽管沿海国家一再敦促，玛丽亚·特蕾西亚还不愿意承认这些条款。腓特烈为了施加压力，再次入侵波希米亚，但被赶了出去。这次撤退以后，虽然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的索尔又打了胜仗，但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寸步不让，尽管英国警告说，如果她不同普鲁士讲和，英国就不再给予补贴。然而，两支普鲁士军队于12月迅速侵入萨克森，腓特烈又一次挫败了奥地利和萨克森计划中的进攻。他们打败了萨克森，攻占了德累斯顿。这年年底之前，在那里缔结了和约。腓特烈虽然节节胜利，但他只要求回到布雷斯劳协定。他之所以采取温和立场，是因为他害怕俄国以及财政枯竭。萨克森别无他路，只得求和。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同意与腓特烈妥协，只是因为她最近对法国所做的友好表示遭到了拒绝。她曾表示，如果法国放弃同普鲁士的结盟，她愿意把尼德兰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把意大利的部分领地割让给菲利普王子。但是，虽然法国在1745年没有帮腓特烈多少忙，他仍把普鲁士看作是对奥地利的一个重要平衡力量。9月，玛丽亚·特蕾西亚成功地使弗兰西斯当选为皇帝，而法国对于任何会加强哈布斯堡家族在帝国中的影响的事情，都将不会同意。

1745年，萨克斯在尼德兰又取得胜利。战役一开始，他包围了图尔内。联军这时在乔治的小儿子坎伯兰公爵的指挥下企图为之解围，萨克斯在丰特内打败了他们。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把失败归咎于对方。荷兰共和国还没有——始终也没有——向法国宣战，它努力促进和平。英国也有一个主和派。但是，当荷兰人想在协定里包含一个条款来规定尼德兰未来的中立地位时，英国却不赞成这样的条款。另外，英国也很不愿意归还它在6月攻占的布雷顿角。为了英国人能保住这块征服地而继续打仗，对于荷兰人当然不利。因此，他们有充分理由持不同意见。关于和约条款的谈判还在继续时，萨克斯的军队又占领了一些地方。接近夏末，苏格兰爆发了詹姆斯党人起义，因此许多英国部队从尼德兰奉诏回国，这就更加有利于萨克斯的任务。然而，由于1745年的叛乱，在法国不但愿意停止对王位觊觎者的支持，而且对“国本诏书”重新做出它1717年做出过的明确保证以前，英国肯定不愿媾和。叛乱失败以后，它准备讲和了，但到那时，意大利的事态已经几经戏剧性的变化。

1744年，玛丽亚·特蕾西亚试图征服那不勒斯，奥地利在那里仍然有许多支持者。但是，加吉斯的军队得到一支那不勒斯部队的增

援，在天主教国家的南部边境坚决抵抗。双方在韦莱特里打了非决定性的一仗。接着，奥地利军队撤退；他们不得不去支援查理·伊曼纽尔，因为他的领地遭到了一支强大的法国—西班牙联军的攻击。但是，由于法西两国司令官彼此不和，入侵没有取得多大成果。接着，冬天来临，不宜打仗。1745年，波旁军队进展比较顺利。热那亚同意让他们穿越它的领土，并用一支辅助部队支持他们。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大部分军队这时正忙于对付普鲁士；撒丁军队太弱，已无法坚持。加吉斯能够和沿热那亚海岸进入意大利的法西联军汇合一起。但是，两军会师以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将领意见发生分歧，这就给了查理·阿尔伯特一个喘息机会；加吉斯奉命占领尽可能多的指定给菲利普王子的领土，因此他占领了帕尔玛和伦巴第的许多地方。法军指挥官马耶布瓦坚持认为，一切都得服从于粉碎撒丁抵抗力量这个大目标。他只能调动自己的军队，但是他还是能够包围亚历山大里亚，并打算在攻克亚历山大里亚之后攻打都灵。查理·伊曼纽尔发现自己面临军事惨败的前景，于是认真考虑与法国讲和，以保自身。西班牙仍然没有改变对他的敌视态度，但法国仍然愿意付出高价与撒丁结盟。法国的外交大臣阿尔让松对意大利有一个宏伟计划：废除那里的皇权；奥地利要失去它在意大利的领地；最后，意大利各邦组成一个邦联。西班牙强烈谴责这样的计划，查理·伊曼纽尔也几乎同样反感。他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得以实现，他就要听从波旁家族的摆布了。法国的压力最后迫使西班牙同意对撒丁做出让步。但是，奥地利在德累斯顿和约以后很可能派来增援部队，因此查理·伊曼纽尔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路线。1746年2月，当法国人未能全盘接受他提出的停战协定的条款时，他突然中断谈判，同奥地利人一道发起了强大的进攻。

这次进攻一开始取得了胜利，主要因为波旁军队措手不及。西班牙把它们的挫折归咎于法国。路易担心西班牙会同奥地利单独讲和，因此为了安抚西班牙，他下令马耶布瓦先是服从加吉斯的，后是服从在7月接替加吉斯的拉·米纳的命令。表面上的指挥统一没有能够使将领们步调一致。波旁军队实际上逃脱了被摧毁的命运，但主要由于西班牙的坚持，他们撤退到法国的领土上，让热那亚人去听天由命。接着，路易又进一步安抚西班牙，让贝尔岛接替了马耶布瓦。但是，贝尔岛同拉·米纳仍然不能和睦共事。

奥军将领和查理·伊曼纽尔之间的关系同样糟糕。查理·伊曼纽尔虽然把与法国谈判一事告诉了英国，但对奥地利却想保守秘密。然而，会谈破裂以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察觉到谈判的一些情况。她从此不再信任查理·伊曼纽尔，并且认为自己不再受沃尔姆斯条约的约束。奥地利对撒丁持怀疑态度，这对于军事合作的成功不利，特别是在时运倒转的时候。

波旁军队撤走以后，热那亚寻求和解。奥地利人坚持要占领这个城市的城门，并索取大量战争赔款。热那亚的屈服，使英国主张的一个计划能够付诸实行：在地中海舰队的支援下，奥地利和撒丁联合入侵普罗旺斯，目标是占领土伦。然而，1747年年初，入侵者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便退进了皮埃蒙特。他们之所以撤退，不仅是因为遇到了贝尔岛的顽强抵抗，而且是因为热那亚发生了暴乱。12月，热那亚暴民揭竿而起，赶走了城里为数不多的奥地利人。接着，热那亚政府决定反抗；奥军包围了该城；法国和西班牙想来解围；贝尔岛和拉·米纳接到命令，如果可能，就去解围。他们的进攻在1747年进展不大，不过还是对奥地利—撒丁联军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使其解除了围攻。1748年4月签署了和约草案。之后，意大利没有再发生重大的战斗。

1746年7月，菲利普五世突然去世，和解的机会增加了，因为他的继承人费迪南德胸无大志。的确，他希望为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菲利普王子弄到一个公国，但只要面积很小的一个就心满意足。1746年到1747年，西班牙和英国举行谈判，但由于西班牙要求归还直布罗陀，在贸易问题上也毫不让步，谈判遂告失败。然而，路易听到谈判的消息之后，更对西班牙失去信心。不仅如此，法国越来越感到战争的压力，经费越来越难以筹集。英国的海军优势使法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减少；法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交通日益困难。意义深长的是，英国人在1747年攻击了由两支法国舰队护航去殖民地的商船队，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些事件是很重要的，但仅仅这些还不起决定作用。路易求和，并不因为他缺乏物力，而是因为他不想再打下去。法国在尼德兰的胜利也没有消除他的厌战情绪。

萨克斯继续在那里打胜仗。1746年，他又征服了许多地方，并在娄库打败了当年由洛林的查理指挥的联军。萨克斯本想入侵联合省，以便恐吓它们退出战争，但直到1747年他才被允许这么做。1747年，他旗开得胜，占领荷属佛兰德。这更使联军感到耻辱，因为他们是满

怀希望投入战斗的。他们曾计划调集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由坎伯兰公爵指挥，这时他正因克洛顿战役的胜利而享有威望。但是，联军的实际力量要低于估计数字；而且坎伯兰也不是萨克斯的对手。荷属佛兰德的失守在这个共和国里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人民大众深信，只有奥兰治亲王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举行起义，吓得迄今一直反对恢复执政制的五个省的议会慌忙选举威廉。威廉已经是其他各省的执政。英国欢迎威廉晋升，因为这似乎保证了该共和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友。不过，这对于战争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

7月，萨克斯在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洛费打败了坎伯兰，但没能阻止他后撤去掩护那个要塞。然而，法国人却包围并攻占了荷属布拉邦特的巨大要塞贝亨-沃普-索姆。它的陷落使共和国在下一个战役中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除非联军能得到强大的增援。获得这样一支增援部队的最好办法似乎是雇佣俄国军队。

俄国军队是可以得到的。俄国有富裕兵力而且愿意受雇去为别人打仗，因为它已经跟瑞典达成了它认为还是比较满意的协定。实际上，俄国已经同意以一笔补贴为代价保持一支军队，如果腓特烈再次进攻玛丽亚·特蕾西亚，这支军队就可以用来对付他。如果俄国能够获得它的要价，它还愿意派出3万兵力去西欧支援联军。贝亨-沃普-索姆的陷落使俄国做成一笔好交易，但俄军征途遥远，它还没有参战，和约草案就已经签订了。

1748年年初，奥兰治的威廉通知英国政府说，除非英国给共和国一大笔贷款，否则它将退出战争。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不是因为无法筹集资金，而可能是因为厌战情绪。但是，这将使讲和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议会不会批准给荷兰人贷款，而没有荷兰人的援助，英国就不可能在欧洲大陆打仗。不仅如此，英国有理由相信，路易不会想保持他在尼德兰的征服地。1746年到1747年的布雷达谈判之所以破裂，不是因为法国为自己要求大量利益，而是因为英国想要保住布雷顿角。但是英国不准备为此目的继续进行单纯的海战。但是，如果法国想要兼并尼德兰的大片领土，英国可能会把海战继续下去；这种可能性就使得路易仍然保持温和立场。实际上，在1748年年初召开的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上，玛丽亚·特蕾西亚提出，如果路易不反对她夺回西里西亚，或允许她收复割让给查理·伊曼纽尔的地方，她愿意将尼德兰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法国的全权代表利用这些建议在奥地利和

英国之间挑拨离间，希望恶化两国的关系。但是，决定性的谈判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的。两国于4月就条约草案、10月就正式条约达成了协议。其他交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提交给他们的条款。

这个解决方案几乎就是恢复战前状态，例外情况很少。帕尔玛公国和皮亚琴察公国给了菲利普王子；查理·伊曼纽尔保留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根据沃尔姆斯条约割让给他的全部地区（皮亚琴察除外）。荷兰人虽然重新享有在关口要塞驻军的权利，但未能像过去那样每年从尼德兰的岁收中提取维持这些军队的费用。条约也没有确保尼德兰中立。西班牙答应英国恢复“专卖契约”，一直到1752年。还需要提及两点。第一，解决方案的各项条款都在一个条约里得到体现，而不像1678年、1697年以及1713年到1714年那样分别包含在一系列的个别条约里。第二，普鲁士虽然不是签字国，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都有一条保证腓特烈占有西里西亚。然而，从条约的措辞来看，这一保证是否有效还不一定，除非腓特烈愿意对整个条约做出保证，关于这一点，他却明确表示不愿这样做。但是，法国和英国都希望通过这很明显是毫无意义的规定来讨好腓特烈。两国都希望将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能够得到他的支持。谁也不相信条约会开创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领土变化绝不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唯一结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1741年到1742年期间面临亡国危险的哈布斯堡国家，终于作为一个大国幸存下来；实际上，尽管它遭受了一些损失，但1748年的哈布斯堡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比1740年的时候强大了。它的行政管理和政策都注入了活力；它的军队在数量上增加了，士气也提高了；完全可以预料，只要经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可以实行改革，从而进一步提高她的领地的战斗力。她已经证明她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但拯救哈布斯堡势力的并不是她一个人；外国的帮助起了一定作用；她的敌人的惰性和相互猜忌，甚至起了更大的作用。仅用当时的战争条件和战略理论，其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最初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进攻何以软弱无力。更为重要的是，1741年到1742年期间，弗勒里不让法国尽其最大可能的努力；而腓特烈，不管他的愿望如何，也没有尽其一切力量去促使哈布斯堡国家的毁灭。如此良机，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腓特烈在1744年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即会把哈布斯堡国家从大国的行列中排

除出去，但由于法国的惰性，加上他自己犯了错误，奥地利人又奋力抵抗，遂使这个计划落空。腓特烈在那一年他的战役失败后，只指望能恢复战前状态。1745年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的臣民因此开始称他为“大帝”，但德累斯顿和约并没有对他占有西里西亚的权利给予保障。因为条约使得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能够保持强大，足以考虑打一场战争夺回西里西亚，并有一定的成功希望。虽然这个哈布斯堡国家独自很难成为普鲁士的对手，但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不久的将来也并不是没有获得盟友的希望。腓特烈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因此在其财政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不断地迅速扩大他的军队。他的政策是严阵以待；他不想进一步冒险，因此他冷淡地拒绝了法国在签订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以前诱使他再次参战的努力。唯一能打动他的是对普鲁士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那种威胁，而这种威胁要到几年以后才出现。

玛丽亚·特蕾西亚对腓特烈的敌视态度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意大利有了个平静的时期。1748年和约以后，玛丽亚·特蕾西亚认识到，如果她能有一个实现反对普鲁士的政策的机会，她就必须牺牲其他的抱负，而设法终止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长期对抗。由于她在那里所剩下的领地不再受到威胁，所以她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费迪南德六世一旦为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唐·菲利普弄到一块不大的领地，便无意再插手意大利的事务。他并非爱菲利普，他之所以设法要在意大利为菲利普找一块安身之地，只是因为菲利普留在西班牙将会是一桩麻烦。菲利普方面则毫不满足，虽然他知道对于费迪南德不能有多大的指望，但他希望他的岳父路易十五有朝一日会帮他弄到一块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路易虽然慈悲为怀，却无意为了菲利普而另起战端。意大利的另一个波旁国家的统治者，即那不勒斯的查理国王，他满足于等待有朝一日继承身体虚弱、没有子嗣的费迪南德，登上西班牙国王的宝座。与此同时，查理有机会巩固他在那不勒斯迄今不太牢靠的权力，因为玛丽亚·特蕾西亚放弃了奥地利重新夺回那不勒斯的希望一旦显示出来，那里的亲奥派也就没有生气了。因此，1748年以后，意大利不存在发生波旁家族和玛丽亚·特蕾西亚发生冲突的危险。对撒丁的查理·伊曼纽尔来说，这意味着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危险。如果说他没有希望征服更多的领土，他的领地也不会被人肢解。不仅如此，他在1742年到1748年间奉行的两面讨好的政策，如果说这种政策没有给他带来他所希冀的全部好处，但也有

助于避免了他最担心的事——波旁家族或哈布斯堡家族任何一方被完全逐出意大利。他们讲和也罢，打仗也罢，他既不受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摆布，也不受波旁国家联盟的支配。

对法国来说，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较难估价的。最后的协议肯定地与它在1741年所希望的，也与它在1743年德廷恩战役以后所担心的，都大不相同。这场危机是法国花了很大力气挑起来的。它不但在没有损失领土的情况下度过了危机，而且还获得了被人认为是重大的但却是无形的间接好处。如果说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的势力符合法国利益（当时有许多法国人这么认为），那么，普鲁士征服西里西亚无疑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法国未能阻止选举弗兰西斯继承查理七世当皇帝，但弗兰西斯也没有能像利奥波德一世和查理六世在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冲突中所做的那样，让帝国对法国宣战。只要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不和解，法国对帝国就没有什么感到可怕的。不仅如此，战争的进程似乎使法国的敌人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对于荷兰人来说，和约签订的正是时候，使他们避免了再打一仗，如果再打下去，其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他们当然不想参加另一场同样性质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想追随英国。凡尔赛清楚地看到，英荷联盟削弱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准备疏远同英国的关系，这也是明白无疑的。她在1745年和1748年提出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伦敦和维也纳之间的敌意显然对法国有利，而法国的外交活动的所作所为则助长了这种情绪。的确，由于法国没有可靠的盟友，它在这些方面的得益则有所抵消。法国在艾克斯拉沙佩勒谈判中在支持西班牙的利益方面很少尽力，因此条约签订后法西关系冷淡了。普鲁士也靠不住。鉴于法军的实力以及它从前的敌人之间关系的状况，法国看起来自然是令人可畏的。英国人无疑是这么认为的。在英国，人们感到很庆幸，和约使他们摆脱了危险的境地，他们对于未来忧心忡忡。人们认为，英国不能孤立，必须采取步骤找到未来战争中的盟友。虽然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英国与荷兰共和国和哈布斯堡国家的旧的合作体系不大奏效，但英国的统治者对它仍然抱有信心；他们没有认识到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普鲁士的敌对情绪具有什么力量，因此很不愿意为了确保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联盟而让他们国家奉行反普政策。他们害怕的是法国。他们假定，哈布斯堡国家将来同过去一样，也有充分理由害怕法国。这种假定是错误的，但是在路易十五明确地表示法国准备终止它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敌对情绪

以前，还无法证明它是错误的。但是，无论是在1748年，还是在随后的一些年代里，他并没有做出这种表示。这不是人云亦云：一场外交大变动势必要发生，因为玛丽亚·特蕾西亚需要它。

（严维明 译）

第十九章 外交大变动

从欧洲的近代史开始时起，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对抗，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国家的和解，就是最重大的外交变动。1756年，奥地利中止了它与英国的协约，而法国又放弃了它与普鲁士的联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原有的种种联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国和奥地利一致认为荷兰人拆了他们的台；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两国则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英国埋怨说，奥地利人要求的津贴太过分，它派遣的军队却从未达到规定的数额，而且把精力集中在德意志的战争上了。奥地利则反驳说，英国从来没有给予充分的援助，却以威胁强迫奥地利在领土问题上向敌人让步，并且违背了卡特里特关于奥地利的损失可予补偿的诺言，最后竟然完全抛弃了奥地利。但是，战争期间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从而改变了英奥的关系。普鲁士一跃而成为强国，这种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吃惊。在德意志，便从此开始了“两雄并列”的时代。这不仅使奥地利成了一个实力已被削弱、不能胜任的盟友，而且使英国获得了它至今未能得到的东西：一个可以取代奥地利的反法盟友。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的一些政治家们就已在鼓吹与普鲁士结盟以取代与奥地利结盟。即便是那些并没有走得这么远的政治家们也承认，旧的联盟体系由于普鲁士的背离，已经“不中用了”，于是他们就进行狂热而无效的努力，要实现这两个德意志强国真正的和解。纽卡斯尔公爵在经过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后，最后终于在战争结束时取得了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效的控制权。1742年，他就持有“这样强烈的偏见，即奥地利王室是不值得支持的”，可是，这时他却断定，奥地利正是他希望列强联合起来反对法国野心的联盟所必要的基石。他坚决地拒绝了腓特烈大帝提出的由普鲁士取代奥地利，成为英国在欧洲大陆伙伴的建议。为了赢得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欢心，他极力要让她的长子当选为罗马天主教徒的国王；并且与德意志各邦的那些见利忘义的诸侯缔结津贴条约，以此来削弱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亲法派。但即便是在这时，当英国王储弗雷德里克1751年逝世时，玛丽亚·特蕾西亚还对坎伯兰公爵在

伦敦宫廷里日益增长的势力感到悲叹，因为她认为坎伯兰偏向普鲁士。

纽卡斯尔政策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奥地利的意图和野心完全的误解上的，这对于其本人和英国都是不幸的。虽然考尼茨在1753年以前并没有担任奥地利首相，但早在1749年，他就对维也纳的外交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曾在都灵和布鲁塞尔担任重要的外交使节，后来又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会上任奥地利的代表。他在布鲁塞尔的经历使他深信，如果法国决心进攻尼德兰，尼德兰是无法顺利得到保卫的；而且，无论如何，由于海上国家对奥地利在尼德兰的主权所做的种种限制，这个尼德兰省已没有什么价值。他后来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的经历使他确信，英国在使西里西亚回归奥地利问题上，将不会有所作为。而且，他已明白，奥地利要恢复其领导的大国地位，收复西里西亚是一个必备条件。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时，他曾经与法国的代表讨论了以法国支持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来换取把尼德兰的领土割让给法国的这一主张。虽然法国最后愿意与海上各国家而不是与奥地利单独媾和，但是它并没有断然拒绝这个交换计划。因此，考尼茨在1749年3月为奥地利女皇和国会准备的那篇著名的国情咨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收复西里西亚对于奥地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奥地利当时的首要的敌人是普鲁士，而不是由一个软弱无能的国王和意见不一的内阁统治下的法国。因此，奥地利就应当设法使法国相信它的和平意见；并且通过说服法国，要它相信普鲁士是一个多次出卖法国的、不可信赖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的盟国，从而断绝普法联盟。

玛丽亚·特蕾西亚接受了考尼茨的计划。从此以后，除了在她统治的晚期有过一次明显的例外，她总是同意考尼茨外交政策中的各项目标，并且甘愿由他去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要不是受到考尼茨的影响，她本来大概会集中精力于国内的改革的；而对于国内的改革，她的兴趣比较大，而且也懂得较多，这就给她的继承留下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对付普鲁士这个头号敌人。在她的内心中，信守诺言的焦急心情和西里西亚迟早必须归还奥地利的信念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考尼茨向她表明如何了却心愿而又不致问心有愧。由于考尼茨把德意志内部的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一个强权政治的问题——说成是，反对寡廉鲜耻和信奉异教的普鲁士国王，从而就保卫了

神圣罗马帝国、法律和罗马天主教，因此他就赢得了女主子坚定不移的支持。1750年秋，玛丽亚派他前往巴黎设法执行他自己的计划，但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得不承认他的动摇法普联盟的尝试已告失败。撇开法国怀疑奥地利的建议是与英国秘密取得协议的这一点不谈，法国对于这位使节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他用两种腔调讲话，一方面坚持说他的君主是出于和平的意图，同时又暗示，需要组织一次欧洲的十字军以压制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国王，使之不得为害；而普鲁士国王被人公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内亲法派的首领。尽管考尼茨极力掩饰，但他的提议无疑地有冒犯法国的成分。他把他的这次使命的结果总结为：他只是成功地劝说法国不要仇恨奥地利。

与此同时，维也纳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小心谨慎地不让英国和荷兰的外交官知道她的这一坚定的抉择，即只要能够做到便与法国结盟。她表面上一本正经地否认这一谣传的真相，即她为了收复西里西亚正准备再次对普鲁士开战；她对于说她把英国的津贴用来兴建她心爱的申布伦府邸的传说表示愤怒。她明确表示，她并不重视纽卡斯尔的选帝计划，这个计划只会增强德意志各邦诸侯的胃口，并促使反对选举计划的法国和普鲁士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而她最大的夙愿就是要拆散两国的联合。她一再敦促英国政府，如果英国有钱资助欧洲大陆的话，就应当津贴俄国，而不要把它浪费在德意志各邦那些小诸侯的身上，这些小诸侯在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无足轻重，而其忠贞充其量也是可疑的。她在豪格维茨的辅助下极力实行国内改革；同时，她还坚决拒绝恢复海上国家以前在损害她的尼德兰臣民利益的情况下，在尼德兰所享有的广泛的军事和商业特权。甚至在考尼茨1753年从巴黎返回维也纳担任首相时，显然纠正了他对法国的政治上的偏向，同时并决心同海上国家维持公认的并不令人满意的联盟时，奥英关系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地利和英国的联盟从来不是真正亲密的，到了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则每况愈下了。英国越来越专心致力于殖民地的扩张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奥地利对欧洲的西部越来越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英国不感兴趣的中欧和东欧的力量平衡上。当英国固执地对联盟的第三个伙伴尼德兰联合省的衰落视而不见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却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但她不愿为了一个几乎无用的盟国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只是在屏障要

塞和荷兰人在尼德兰的商业特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认识。1754年年底，当与法国的战争在北美洲和大西洋上即将爆发的时候，英国人还普遍指望奥地利会在欧洲大陆上的这场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贡献出它的一分力量，为保卫尼德兰而投入大量的兵力，而纽卡斯尔则认为尼德兰是我们英国人、荷兰人和奥地利人共同感兴趣的地区。人们还以为，如果有必要，奥地利在汉诺威也会助一臂之力。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希望与奥地利女皇和首相的意图相去更远的了。如果英法海战引起了陆上战争，女皇和首相绝不会分散奥地利的兵力，而是要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普鲁士国王。

过去有几次奥地利遇到困难时，曾不得不求助于英国，接受的是英国愿意提供的援助。现在两国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奥地利却决心在援助问题上尽量地讨价还价。英国必须与巴伐利亚、萨克森、黑森等德意志各邦缔结津贴条约，并且把这些德意志的军队与英国自己的军队、汉诺威的以及荷兰的军队联合编成一支大军，以便在德意志和尼德兰使用。英国必须自己出钱争取撒丁国王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给予有效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英国必须立即与俄国缔结一项津贴条约。这一条约已被搁置多年，但如今不仅对于保卫汉诺威和奥地利，而且对于防止法国和普鲁士控制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必不可少的。英国同意给予俄国以足以换取其合作的津贴；同意雇佣8000名黑森雇佣军以保卫尼德兰；并同意设法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恢复原有的津贴条约。但是，英国对共同事业所做的这些贡献是有条件的，即奥地利必须立即增派2.5万名至3万名军队去尼德兰；如果汉诺威遭到进攻，奥地利女皇必须派遣军队参加汉诺威的防御；并且，如果法国进攻英伦三岛，奥地利必须采取牵制行动。考尼茨于1755年6月回答说，鉴于荷兰人完全不采取行动，英国所要提供的援助是不够的，要在尼德兰抵抗法国是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然而，英国的贡献如此微弱，却反过来指望要奥地利在汉诺威遭到进攻时出兵援助并对普鲁士采取牵制行动。尽管如此，奥地利为了挽救原有的联盟体系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将于1755年夏季提供2万名军队保卫尼德兰，只要英国同时也提供数量相等的英国军队或德意志雇佣兵，而且尼德兰联合省和汉诺威也提供数量较少的部队。此外，英国还必须立即与俄国及德意志各邦签订津贴条约，必须采取有效的步骤保障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

当考尼茨的最后通牒得不到答复时，他便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新计划”。这个新计划就是他原来提出的与法国结盟对付普鲁士的那个老主张。这时，法国军队已在尼德兰边境集结。由于考尼茨认为保卫尼德兰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奥地利必须主动把尼德兰的大部分领土让给路易十五的女婿唐·腓力，以收回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会上划归唐·腓力的三个意大利公爵领地。法国可以取得奥斯坦德和纽波特作为抵押。这些建议将由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斯塔勒姆贝格提交路易十五，但不是以通常的方式通过路易十五的大臣们提交，而是在获得国王的绝对保密的保证后，经由蓬巴杜夫人或孔蒂亲王送达。这一困难的决定则由斯塔勒姆贝格自己去决定。他决定通过这位国王的情妇而不是国王的这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心腹顾问送交国王。

法国由于倾听了奥地利的建议而没有损失却有所得。于是贝尼斯便被路易十五选派去与斯塔勒姆贝格进行谈判。贝尼斯是蓬巴杜夫人的被保护人之一，他是一位一文不名的教士，出身世家，以才气闻名，新近担任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这个闲职。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那些逐步导致8个月后签订了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种种决定，都是由国王亲自做出的。路易十五早就希望与奥地利结盟，他认为，只有这一结盟才能保证长期的和平，才能保护天主教会。他不信任普鲁士，鉴于腓特烈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行为，这种不信任是完全有道理的。也许不仅是腓特烈的妙语使路易感到不满，而且他对普鲁士人的僭越态度也感到愤恨，一名勃兰登堡的侯爵在法普联盟中竟成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伙伴。他不得不与一个他曾经有一次把他比作罗马皇帝变节者尤里安的不忠贞的异教徒结成伙伴关系，他那偏执的性格总是感觉受到了触犯。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与路易十五的交往中，一直谨慎地强调宗教利益的共同性。路易十五的情妇和特蕾西亚的朋友贝尼斯教士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可能怂恿过他，但与奥地利的和解基本上却是路易十五自己的作品。

贝尼斯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为这种新体系做了典型的辩解。自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以来，奥地利就已丧失了许多王国和行省，不能再指望君临天下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强国，因此它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盟友，特别是因为到这时为止它一直是抵抗的核心，其周围聚集着法国的敌人。除了德意志外，法国不必担心受到侵略。

与这个举足轻重的德意志强国联合，就可以保护法国边界上的这一薄弱环节，使法国免受战争的灾难和不幸。再者，法国和奥地利的联盟将有利于波旁王室的其他支系，加强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地位。最后，由于英国是法国的真正敌人，而奥地利至今是英国最强大的盟友，因而使英国失去奥地利的支持是明智的策略。贝尼斯及时驳斥了反对法奥联盟的主要论调，即联盟将会使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变得过于强大；并且回答说，他的得意之作第一次凡尔赛条约，是以奥地利完全、绝对地遵守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一旦玛丽亚·特蕾西亚违反这一条约，法奥联盟就会解体，回到原来的状态。

当贝尼斯接到奥地利实际的提议时，他认为这些提议给法国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奥地利断言英国和普鲁士彼此已在进行秘密谈判，这种断言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韦努瓦公爵遂奉命赴柏林探听腓特烈二世的真实意图。倘使尼韦努瓦立即履行了他的职责，而未在法国延误时机的话，这场外交大变动完全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与此同时，贝尼斯有意地拖延时间：斯塔勒姆贝格于1755年9月只获得这样的保证说：法国国王热诚希望维护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并将欢迎奥地利为这个有益的目标而进行合作。奥地利对此答复大为恼火，反驳说：既然奥地利的建议显然不为法国所赞同，奥地利将等待法国的合作建议。于是，贝尼斯便提出了一个由法国和奥地利相互保证的适用于两国欧洲属地的条约。两国的盟国将应邀加入这一条约，但英国总是除外，因为英国早已破坏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在此阶段，贝尼斯于1755年12月说服法王任命四位大臣——马肖、塞谢勒、鲁耶、圣-弗洛朗坦——组成一个枢密院的委员会，领导与普鲁士进行的谈判，从而能够减少（贝尼斯希望）他被关押死在巴士底狱中的可能性。玛丽亚·特蕾西亚对于法国对她第一次提出的建议所做的答复感到失望，遂指示斯塔勒姆贝格在谈判中放弃反普鲁士方面的问题。但在1755年年底以前，她又重新采取进攻。斯塔勒姆贝格又奉命去设法完成几年前考尼茨未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要说服法国，使它相信法普结盟违背常情，从而达到破坏这个联盟的目的。普鲁士一旦达到其目的，就会成为法国最危险的对手，就会抛掉它至今戴着的虚伪的假面具，立即倒向对方。事实上，普鲁士只是狡猾地利用法国，把它当作一种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因此法国能愈早地认识到

这一点，就对它愈好。只要法国信赖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就不可能达成持久的谅解。这位奥地利的女皇最后表示说，法国不妨等待英国和普鲁士的政策揭示无遗时再对奥地利的建议做出决定，比较有利。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紧接而来的几年中，英国和普鲁士的关系达到最坏的程度。英国在战争的过程中，捕捉了普鲁士的商船，并拒绝赔偿。于是，普鲁士就对西里西亚债券的英国持有人停止支付腓特烈曾经保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英国于1750年就已加入奥俄两国女皇1746年签订的条约，虽然它并不同意该条约的第四项秘密条款。腓特烈很清楚，这个条约是针对他的。在18世纪50年代中，英国在和俄国谈判一项津贴条约。腓特烈相信，这项条约一旦签订，也将是针对普鲁士的。腓特烈进行反攻，摆出一副支持奄奄一息的詹姆士党人事业的姿态，并且带头反对罗马人的国王[\[1\]](#)计划，而乔治二世和纽卡斯尔公爵对于这个计划却是极为重视的。

当共同的利益使英国和普鲁士联合起来时，这些争吵都得到了解决，而解决之容易和迅速都说明这些争吵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认为普鲁士在1745年以后已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显然是大错特错，但是腓特烈二世心中非常明白，再要进一步获得领土并非易事。他早就对萨克森和西普鲁士虎视眈眈，一心想要把这些领土并入他的版图。但是他征服西里西亚之举，已使所有的邻国有所警惕。特别是，只要俄国还在他的东部边境上持敌对态度并严阵以待，而且还可能获得英国的津贴，要想重新扮演他的成功经验有任何企图，将不仅是枉费心机，而且是危险的。只要别斯图热夫被推翻，他的继任者被收买来为普鲁士的利益效劳；要是英国由于乔治二世去世而陷入因少数党执政而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困境之中；要是奥斯曼帝国是由一位不负苏莱曼大帝英名的继承人统治；要是法国是由一位雄心勃勃、有无限权威的外交大臣所控制，那么，一场可以进一步给普鲁士带来好处的侵略战争才会吉星高照。这就是腓特烈在他的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所提出的纲领。到1755年，他的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思想中的主要动机与其说是贪婪，毋宁说是担心。

1755年夏，英国和普鲁士之间开始谈判，不伦瑞克公爵充当中间人。英国起初要求普鲁士国王单方面宣布他将不进攻汉诺威，因为法国先前确曾提议要他不妨进攻汉诺威以表示他与法国结盟的诚意。腓

特烈对于受到欧洲这两个主要强国的追求，真是求之不得。他的虚荣心感到满足，他希望充当英法两国之间的调停人。只要他处事得当，总是会有机会给普鲁士带来物质上的好处的。他正确地做出估计，英国对他的接近标志着英奥关系的冷淡，如果说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那是因为奥地利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的结果。他对法国因循怠惰的态度越来越感到厌恶；他对法国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则越来越感到吃惊。法国的财经紊乱，大臣们软弱无能而且意见分歧，法国宫廷关心的不是外交政策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是蓬巴杜夫人的地位以及教会和政府之间的长期争吵。他斥责起草给尼韦努瓦的指示“含糊不清、极其不当”，他像多数人一样认为，法国极力想避免参加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因为这样做就会减小法国在这时已难以避免的对英海战中取胜的机会。

在腓特烈看来，由于他的盟国软弱无力和明显地企图在大陆战争中尽量少起作用，这就可以让他，实际上是迫使他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采取他可能采取的行动。1749年至1754年间，法国建造了38艘大战舰，1756年它就几乎拥有70艘大战舰可以投入战斗。只要法国在陆战中不起重大作用，这支海军力量就可以使它把上次海战结果反转过来。法国大概不会反对德意志中立化，因此，腓特烈向英国政府建议用一个中立条约代替英国原来提出的单方面声明。他怀疑法国正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要求奥地利在法国不进攻尼德兰的情况下答应不给英国以支持。他现在向英国建议的东西，将与这一协议相似，而且，在他看来，他的建议与他和法国结盟并不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个联盟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它并不涉及目前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打起来的英法战争。

在此期间，腓特烈又接到关于俄奥对普鲁士持有敌意的新的报告。这些报告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至少从1746年两国女皇签订条约以来，这种敌意已很明显而且是臭名昭著了。新的情况是英国于1755年9月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这个条约看来把英国与俄奥两国女皇对普鲁士的敌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条约近10年来一直是英俄外交关系的中心问题。它最初是由别斯图热夫提出的，目的是要补充俄国根据防御性的1742年俄英条约所应担负的义务，即英国一旦受到攻击时，俄国应派遣1.2万名军队保卫英国。玛丽亚·特蕾西亚极力赞同这个新条约，认为它是加强旧体系所必不可少的。俄国将在毗邻东

普鲁士边境的西北各省保持数量强大的正规军队。这些军队将保持战备状态，接到通知即可行动，并且有波罗的海的桨帆船和战列舰作为支持。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钱，这笔钱必须由英国政府供给。

虽然乔治二世不是以汉诺威选侯的身份加入俄奥两国女皇的条约，但英国入约的条件规定，如果由于忌恨汉诺威遭受进攻，俄国和奥地利则有义务保卫它。奥地利政府曾敦促英国签订一项津贴条约作为交换条件，但长期以来未获成功。纽卡斯尔宁愿推进选举约瑟夫大公为罗马人的国王的谈判，从而使英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恶化。然而，不久他就不得不勉强地承认，即使是被他收买的德意志各邦诸侯也不敢投票支持这位大公，除非有一支俄国观察部队驻扎在普鲁士东部无掩蔽的边境上以保护他们不受普鲁士的报复。随着英国在实际上放弃了选帝计划，这一有利于俄英条约的论点也就失去了力量。可是英普关系并未得到改善。随着法英两国在美洲的冲突开始，英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着普鲁士进攻汉诺威的这一可能性，进攻或是出于普鲁士自身的考虑，或者更可能是作为法国的代理人。无疑地，乔治二世对他心爱的选侯领地的担心，就使英国的大臣们四出活动；但是，他们责无旁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欧洲大陆上加强英国的体制。

即使俄国认为普鲁士进攻汉诺威的问题包括在1742年条约所考虑的情况之内，但是很明显，1.2万名俄国援军对于直接保卫汉诺威用处也不大，因为这些援军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开到作战地点。比较更为有效的办法是，俄国立即而强有力地东面牵制普鲁士。到了1755年4月，英国内阁决定，他们必须付出他们至今一直认为俄国为其所要采取的行动索取的过高的代价。“我们没有荷兰人就不行，荷兰人没有奥地利人就不行，奥地利人没有俄国人也不行”，托马斯·鲁宾逊爵士这样写道，“当我们是俄国人的主子时，我们就可为所欲为”。因此，甚至在条约实际签字以前，英国原想的这个条约的用途就已根本改变了。这时伦敦的想法是要用这个条约给普鲁士一个威胁，并且希望从而能够防止它进攻汉诺威，也许还能防止欧洲大陆上的任何战争。这对纽卡斯尔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做花钱最少，收效最大。

甚至在腓特烈二世获悉俄英津贴条约已经签订之前，他的丰富的想象就已经构成一幅幅普鲁士遭到进攻的情景：俄国人从东面进攻，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从南面进攻，汉诺威人在英国雇佣的其他的德意

志军队的支援下从西面进攻，而英俄联合舰队则封锁并炮击他的波罗的海沿岸。在这场战斗中，他深信他不能指望得到他的唯一盟国法国的任何有效援助，因为法国正一心想要赢得海上和殖民地的对英战争。再者，如果法国真正希望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那么，腓特烈就会争辩说，德意志的中立对于这个所希冀的目的，就是一种相当大的贡献。他希望这样一来就可使他摆脱困境。看来，由于他在战争中是法国的盟国，势必要冒遭到英、奥、俄三国联合进攻的可怕风险。而在这场战争中，即便是事实证明普法两国出乎意外取得了胜利，普鲁士也不可能捞到什么好处。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拒绝援助法国，这就是说，一个曾经给普鲁士帮过大忙的联盟要最后破裂。这个联盟的终结会损害普鲁士在帝国中的地位，并且清除了迄今为止一直阻碍奥地利和俄国实行反对他的计划的一大障碍。这些考虑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不顾一切的冒险家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和平迷；为什么他发现他当初没有十分认真对待的英国建议，却具有意想不到的吸引力。

英国和普鲁士这时有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维护德意志的和平。1755年12月，英国议会在辩论俄英津贴条约时，英国的大臣们大声疾呼地说，这个条约纯属防御性的，只是在一个欧洲国家进攻英伦三岛或汉诺威时才会援用。他们将英俄条约（尚未经批准）的一个副本送交腓特烈，然后又送交给他一份旨在使战争远离德意志的条约草案。腓特烈接受了条约草案，但由他的大臣波德维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修改意见，即低地国家不包括在中立区之内。腓特烈故意让法国在尼德兰可以放手地行动，如果法国以后一旦在违反他自己的和法国自己的愿望下，要在陆上以及海上和英国开战的话。条约草案经过这样修改后，于1756年1月16日在白厅签字，但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威斯敏斯特协定。

协定的前言叙述了英国和普鲁士要确保欧洲普遍的，特别是德意志的和平的愿望。根据第一条，两国做出许诺，互相不进攻对方的领土，尽力制止各自的盟国对这些领土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根据第二条，两国同意两国的军队联合起来抵抗任何外国的军队进入或通过德意志以保持德意志的和平。协定附带的一项独立的秘密条款明确地把尼德兰排除在条约的范围以外，理由是，根据德累斯顿条约（1745年）普鲁士只保证女皇的德意志属地。虽然这个协定算不上是一个同

盟条约，只不过是一项维护德意志中立的特别协定，但它很快对于微妙的外交平衡产生了缔约双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作用。

纽卡斯尔认为威斯敏斯特协定是把普鲁士纳入英奥联盟的第一步。他通过他的代言人、负责北部事务的国务大臣霍尔德内斯，向奥地利人阐明，圣彼得堡和威斯敏斯特两条约给予他们以反抗普鲁士的绝对安全，从而使他们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把大量援军派往尼德兰，这是他们至今一直借口需要保卫波希米亚而拒绝派遣的。至于俄国，纽卡斯尔和霍尔德内斯甚至就更为傲慢了。他们的态度是，谁出钱谁就说了算数。腓特烈二世对于他的盟国的态度和意图并不像纽卡斯尔那样盲目，可是他也估计错误了。他不仅过高地估计了英国对圣彼得堡宫廷的控制，而且也低估了他的出人意料之举对傲慢的凡尔赛宫廷产生的影响。

1755年8月开始的法奥谈判，到了1756年1月还未取得多大进展。法国坚持要奥地利为进攻汉诺威给予法国间接的但却是实在的援助；奥地利则断然拒绝，并且另外提出一个包括德意志和低地国家在内的中立条约。威斯敏斯特协定签订的消息打破了这一僵局，法奥这才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而签订第一次凡尔赛条约。英国的盟国反对的是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实质，而法国主要反对腓特烈不与法国协商就秘密地与路易十五最痛恨的敌人谈判条约的这种做法。法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似乎已在战争前夕卑鄙地抛弃了法国，并在设法剥夺法国于1648年取得的代表受压迫的德意志各邦诸侯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采取行动的权利。更使法国大丢面子的是，当行动迟缓的法国大使尼韦努瓦公爵带着重修法普联盟的指示来到柏林时，正好及时地从腓特烈那里收到普英协定的草案；同时又得到消息说，条约大概已在伦敦签字。诚然，法国外交大臣鲁耶也争辩说，当英国正在对法国展开一场进攻性的战争时，无论在法律上或道义上普鲁士都无权签订这样一个协定。但从根本上讲，法国的愤恨是针对腓特烈的行为卑劣以及他在欧洲公众的眼中把路易十五置于可笑的境地。

倘若腓特烈愿意放弃这项条约，或者愿意采取顺从的态度以消除法国人的虚荣心，法普联盟也许尚可挽救。但腓特烈对于法国把普鲁士当成一个次等国家的待遇非常愤恨；他曾经这样说：当法国的盟国等于当它的奴仆。确实如此，尼韦努瓦1755年11月的指示就明确地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的，即与普鲁士结盟对于法国来说是有用的，

而与法国结盟对于普鲁士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腓特烈直截了当地反驳法国的责难说，根据国际公法，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正当的；不管怎么说，这样做是为法国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法国不喜欢它，那么他就不得不把他和英国的协约变为联盟。最后，他把自己为了帮助法国进行一场法国所要进行的战争而采取的行动，与法国比较密切的盟国西班牙的完全无所作为做一比较，他就无疑地触动了路易十五及其大臣们的痛处。

在威斯敏斯特协定的消息传到凡尔赛之前，考尼茨又在无可奈何地再次推迟实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反普鲁士的进攻性计划。1755年12月28日，法国明确地拒绝在这一计划中进行合作。它却提出可以与奥地利另外签订一个条约，相互保证法国和奥地利现有的属地以及各自的盟国，唯独要把英国排除在外，因为英国已经破坏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而且未经任何正式宣战，即对法国开战。这一条约将与防御性的同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条约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果在其欧洲属地上遭受进攻，将提供人员和金钱的援助。此外，法国提议，奥地利应保证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把全部英国军队排除在尼德兰以外；反对英国雇佣的俄国援军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如果俄军得以接近法国的边境或进攻神圣罗马帝国内法国的盟国的话，应允许法军在奥地利领土上作战；最后，与波帝朝廷一起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意大利的和平。这些提议说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在进行了4个月的秘密谈判以后，仍然存在的鸿沟既深又阔。

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考尼茨在进行秘密谈判时，必然会怀疑这些谈判是否有价值。但是，1756年1月27日他们在不知道威斯敏斯特协定的情况下，就指示斯塔勒姆贝格有条件地接受法国的建议。他们特别反对做出保证要反对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军通过德意志并允许法国军队在奥地利领土上与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军作战。这一答复还未到达斯塔勒姆贝格手中，威斯敏斯特协定就已传到凡尔赛，法国的谈判者对这位奥地利大使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慨心情。斯塔勒姆贝格尽力利用新的形势。他指出，奥地利早就向法国提醒普英谈判，事实证明奥地利是多么正确。他还进一步煽动法国人的愤怒，以便取得法国对反普联合的积极支持。鲁耶和贝尼斯这时愿意讨论1755年秋天已被路易十五拒绝的奥地利原来提出的计划了，可是他们一接触具体问题时，严重分歧就出现了。

法国已经决定与普鲁士的盟约在1756年6月到期后不再延续。但是法国由于1747年的法—普—瑞典的防御同盟，仍然要对普鲁士承担义务，因为这个同盟要到1757年5月才到期。所以，法国建议，奥地利的反普鲁士计划至少要推延到1757年夏天。再者，即使到那时，如果法国要放弃它与普鲁士的联盟的话，奥地利就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它与英国的联盟。贝尼斯对斯塔勒姆贝格说，由于奥地利无意积极参加法国的反对对奥地利过去的盟国英国的战争，奥地利也不能指望法国积极参加奥地利的反对法国的盟国普鲁士的计划。法普和解必须以绝对的、完全的互惠为基础。

当斯塔勒姆贝格试图争辩说，拟议中的联盟的真正基础应当是摧毁普鲁士国王这个暴发户以保卫欧洲和平时，贝尼斯却不愿听。法国要放弃普鲁士，不愿尽举手之劳保护它不受奥地利和俄国的侵犯，可是，普鲁士失去了西里西亚，这作为它缔结威斯敏斯特协定，而应受的惩罚也就够了。奥地利要求在普鲁士的邻国间瓜分普鲁士邦的计划，走得太远了，法国无论如何也不会积极参与这个拟议中的对普鲁士的进攻。斯塔勒姆贝格本人曾经评论说，法国将会高兴地看到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重建一种合理的均势，但无意恢复奥地利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威斯敏斯特协定使法国和奥地利能够就奥地利原来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它显然没有保证谈判成功。

所以，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56年3月6日指示斯塔勒姆贝格在讨论奥地利原来计划的同时，继续就1755年12月28日的法国建议进行谈判，她希望中立条约与保证可以用来作为奥地利的进攻计划的基础。在考尼茨看来，他的消灭普鲁士的计划，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为了保证打败他的头号敌人腓特烈二世，他除了需要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外，尤其需要法国提供的“第三方军队”的合作。不过，他的特长是有耐心。如果路易十五愿意的话，他十分愿意接受法国分期支付的款项。但是，法国最终必须同意派遣一支6万名或7万名的军队用于威斯特伐利亚。这样就能制止汉诺威以及其他新教国家援助普鲁士，促进奥俄反腓特烈的活动。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了解到，法国实际上甚至拒绝了缔结贝尼斯本人在1755年年底提出的中立条约。法国解释改变态度的原因是，现在缔结这样的条约会使法国难堪，会使腓特烈二世加倍地努力去延长他与法国的联盟。虽然路易十五不会继续普法联盟，可是法国宫廷里还有一个以贝尔岛和阿尔让松为首并得

到驻柏林大使尼韦努瓦有力支持的强大的亲普鲁士派。人们指责腓特烈，说已使这位大使成为欧洲的笑柄。甚至在1756年2月谴责普鲁士行为不当时最响亮不过的鲁耶，却在一个月以后一时不留神地对斯塔勒姆贝格说，与普鲁士结盟是法国的需要。鲁耶等法国大臣们对奥地利女皇的计划了解得愈多，就愈感到吃惊，对于奥地利结盟乍看起来似乎对法国具有的好处，也就愈加感到可疑了。

然而，法国确实已经走得太远，无法返回了。路易十五因为普鲁士悍然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协定，迫切地希望给它以惩罚。而最能公开进行惩罚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奥地利签订一项条约。奥地利威胁说，如果法国一意孤行，坚持拒绝签订中立和保证条约，那么，奥地利就要回到原有的体系去。这一威胁甚至给那些对普鲁士颇有好感的法国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在欧洲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那么它就得面对着奥地利、俄国、海上国家，甚至也许还有普鲁士的人力物力联合起来的局面，而西班牙充其量不过保持中立而已。因此，在贝尼斯大病初愈时，于4月19日对某些大臣（阿尔让松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介绍了他们迄今为止一无所知的法奥谈判的秘密。于是法国的政务会议批准在中立条约和防御同盟条约上签字。这两个条约合称为第一次凡尔赛条约（1756年5月1日），虽然条约实际上是在鲁耶的乡间别墅儒伊签字的。鲁耶和贝尼斯为法国的全权代表，斯塔勒姆贝格代表奥地利签字。

中立条约是仿效威斯敏斯特协定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保证在已进行的英法战争中严守中立；路易十五则许诺不进攻、不危及奥属尼德兰或女皇的任何其他领地。第二个条约是正式的防御同盟条约。条约的序言声称，签字各国的唯一目的是保障各自领土间的和平并尽他们力所能及地保持欧洲的和平。如果缔约的一方在它的欧洲领地上遭到不论哪一个国家的威胁或进攻时，另一方将首先进行斡旋，使威胁和入侵不致发生，如果斡旋失败，则保证派遣一支由1.8万名步兵和6000名骑兵组成的部队，援助其盟国，除非受到进攻的一方不要援军，而愿意接受每1000名步兵每月津贴8000弗罗林和每1000名骑兵每月津贴2.4万弗罗林。法英战争显然不在第二个条约所考虑的情况之内。法国小心谨慎地取得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承认，从而保持了它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权利；奥地利则重新获得了法国对查理六世著名

的“国本诏书”有效性的承认，从而在新的哈布斯堡-洛林王室中保留了哈布斯堡的领地。

这个条约附有五项秘密条款，其中四项十分重要。第一项规定，在目前的英法战争中，如果英国的一个盟国（即使以援军的身份行动）进攻法国或奥地利在欧洲的属地，那么这将属于条约所考虑的范围。这就清楚地说明，主条约的正文中不提目前的战争是有条件的：普鲁士作为英国的盟国而进攻奥地利，就将迫使法国去援助奥地利，而普鲁士援助英国以抵抗法国对汉诺威的进攻，就会使奥地利参战。第二项秘密条款说明，西班牙、两西西里和帕尔马的波旁家族统治者以及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以托斯卡纳大公的资格，都将以列国身份应邀加入这项条约。其他国家在取得相互的协议后，亦可加入缔约国之列。根据第三项，法奥两国为了使彼此之间的真诚谅解得以持久保持下去，同意为完成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的工作而继续谈判，以便最终解决危及欧洲和平，尤其是意大利和平的所有领土争端和其他争端。根据第四项，法国和奥地利保证，在目前英法战争期间，如果没有缔约另一方的了解和参加，不得与任何其他国家订立或延续任何条约。这一条款的目的显然是要防止延续旧体系的任何企图，它也表明新的盟国之间还是缺乏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

但是，这些秘密条款都不能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已经争取到法国的默许，帝国宫廷可以进攻普鲁士。实际上，第三项秘密条款表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为这一条款证实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的主要特点就是：欧洲承认西里西亚并入普鲁士，1756年危及欧洲和平的主要领土争端是奥地利希望收复西里西亚。其实，这一条款的两个部分显然自相矛盾。对于法国而言，也许这一条款真正的问题是指意大利，实际是要为路易十五爱女的丈夫唐·腓力在尼德兰确立某种地位。

总而言之，法国和奥地利在1756年5月1日达成的协议，不管其最终意义如何，在当时来说，它标志着考尼茨争取法国积极参加他的反普鲁士联盟的努力已告失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一项预备条约，以便调整法英战争期间两国的关系；其后再签订包括俄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波旁王室各分支在内的第二个条约，以便消除法奥之间引起摩擦（尤其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原因并巩固法奥联盟；这些主张构成了贝尼斯原来对斯塔勒姆贝格建议的签复的一个部分。1755年9月这些

主张曾使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她的首相大为恼火，可是他们现在却乐意接受了。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条约是建立在缔约国之间误解的基础上。法国主要的大臣们、蓬巴杜夫人，甚至路易十五本人都把协议看作是目的本身，以为条约将会保障欧洲的和平，并可使法国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去进行海上和殖民地的战争。他们非常愿意考虑奥地利要求法国在普鲁士与奥俄两个帝国宫廷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而愿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这些出价很高，法国就可能接受。另外，对于考尼茨和玛丽亚·特蕾西亚来说，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只不过是走向欧洲全面战争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已。在威斯敏斯特协定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之后，这确实使他们感到失望。但是，他们所以认为条约有价值，是因为它公开表明法普联盟已告破裂，并且向他们保证，如果普鲁士进攻奥地利，法国则将给他们以援助。从法国做出这项保证，到如果奥地利进攻普鲁士，法国将保持中立这一诺言，在考尼茨看来，似乎不算一大步骤，因为像他这样有能力的外交家从来不需要打一场“进攻性的”战争的。他所需要的和想要得到的东西只是法国答应通过给予津贴和派遣辅助部队的办法，积极参与他计划中的对普鲁士的进攻。事实证明，双方的意见如此明显地相左，对于奥法联盟并不是致命的，其原因倒不是因为考尼茨的外交手段如何高明，而是由于考尼茨的对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愚蠢。但是，在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签字的时候，他们就已准确地估计了普鲁士国王的性格和预见到他犯错误的可能性，这要归功于奥地利的谈判者们。“我们迟早会实现我们的伟大计划的，”斯塔勒姆贝格这样写道，“也许普鲁士国王自己将会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帮手。”

但是，这些问题要到以后才会出现。条约签字时，除了像阿尔让松侯爵等几个老式守旧或不满现状的政府批评者外，两国宫廷对于这笔交易皆大欢喜。教皇对这两个主要天主教国家的和解感到非常高兴，他把贝尼斯晋升为红衣主教，但是考尼茨却迫切地希望不要引起宗教的狂热，所以本尼狄克十四世告诫他的外交代表绝不要谈及“宗教战争”。相反地，腓特烈却极力做出一副欧洲新教保护者的姿态；而且，在英国，这种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人们所相信，虽然即使在英国，人们通常也认识到，腓特烈“叫嚷宗教，就像人们需要帮助时

就呼喊失火了一样”。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和丹麦人没有参加这场战争，而信奉路德教的瑞典人却加入了法国和奥地利一边。

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在交换批准书后公布了，这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尼德兰联合省也许是受到它的最直接的后果影响。在那里，英国使节约克上校一直在试图劝说尼德兰联合省的议会承认威斯敏斯特协定所考虑的情况，并根据以往条约的规定，把援军派往英国。法国的外交代表一直在敦促尼德兰联合省的议会宣告中立。由于奥地利的背叛，尼德兰共和派和都统派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内部斗争遂告结束，因为没有奥地利的帮助，要保卫尼德兰对付法国的进攻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联合省议会宣布，如果法国向他们保证它对联合省以及尼德兰内的屏障要塞没有敌意的图谋，联合省愿意严守中立。路易十五于1756年6月14日彬彬有礼地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场外交大变动不仅分裂了英国和奥地利，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破坏了海上国家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

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也同样受到直接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影响。俄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物是女皇叶利扎维塔和首相别斯图热夫。别斯图热夫毕生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老谋深算、始终一贯的反法分子；而叶利扎维塔却暗暗喜欢法国。法俄关系自1748年以来即已断绝。但是，1755年秋天，一个自称叫薛瓦利埃·道格拉斯的人，作为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到达圣彼得堡，目的是要恢复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此人的真名叫麦肯齐，他是一个出身西福思贵族世家的军官候补生。这时，俄国宫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亲法派；这个派别以左右一切的宠臣伊万·舒瓦洛夫为首，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和胆小怕事的副首相沃龙佐夫。由于他们玩弄阴谋诡计，致使俄国对英俄之间1755年9月订立的津贴条约的批准推迟了几个星期；但是，首相最后终于迫使女沙皇批准了这一条约。但是，女沙皇坚持要把条约中没有阐明的事情写清楚：俄国为了换取英国的津贴而答应要采取的牵制行动，只有在普鲁士进攻英国或英国的一个盟国时才采取；而且，俄国军队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派往莱茵河、汉诺威或尼德兰。

两天以后，圣彼得堡获悉威斯敏斯特协定的消息。这使首相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由于他强调英国作为一个反普鲁士盟国是有价值的，才获得了女沙皇对1755年9月条约的批准的，但是威斯敏斯特协定证明，英国作为一个反普鲁士的盟国是毫无用处的，因而也就破坏了

俄英联盟的政治基础。俄国签订津贴条约是为了取得用联军进攻普鲁士国王的便利时机，而英国正是利用这一点与普鲁士达成了谅解。这一做法虽然保证了德意志的中立，但却使普鲁士可以放手地在德意志以外的地方展现它的侵略倾向，其矛头也许是针对俄国的。事实上，由于这个条约保护了普鲁士的后方，实际上也就鼓励了它这样做。

女沙皇叶利扎维塔立即成立了一个由她的主要内阁大臣和朝臣们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或政务会，指示他们为了削弱普鲁士的力量拿出办法并采取行动。委员会提出的并经女沙皇以非同寻常的决断批准的第一个建议，包括与维也纳宫廷接近，以便通力合作直接进攻普鲁士。委员会还提议要争取法国的好感，如果可能，还要争取法国保证不去阻挠反普鲁士的联合行动，并且对普鲁士力量的削弱处之泰然（1756年3月）。应当注意到，俄国早在几年前就已敦促奥地利采取直接行动以反对普鲁士，并保证给予支援。与过去不同的是，鉴于英国的背信弃义，现在已经正式决定谋求与法国的和解。

考尼茨的外交才干在处理俄国的问题上，就像在与法国打交道中一样，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他的计划总是假定俄国是愿意进行合作以反对普鲁士的，但是他对俄国政策的不稳定性却有着深刻的印象。自1748年以来，叶利扎维塔在外交事务中的态度变化多端，但总是具有惊人的侵略性质。起初，她向瑞典耀武扬威，不断地使欧洲的各国政府一直感到惶惶不安。接着，她于1753年又把活动的矛头转向对付普鲁士。次年，她又威胁要发动俄土战争。考尼茨宁愿失去俄国的友谊，也不愿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侵略计划中给予俄国以帮助，因为这些计划造成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而又使法国和普鲁士联合起来。然而，他掩盖了他对于这个轻举妄动、毫不老练的盟国的自然的厌烦情绪，并故作恭敬姿态。这种态度，与英国政府对待一个想要得到英国津贴的国家的那种恩赐的、几乎是轻蔑的态度相比较，效果就要好得多。事实上，考尼茨已经认定，到与普鲁士算总账时，俄国将会帮助他的；他决心把时机的选择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在他只有俄国一个盟国时，他决心不去进行收复西里西亚的尝试。他不仅需要一支“第三方的军队”，而且他也明白，要使俄国笨重的战争机器转动起来，就需要给予补助，而奥地利自己的国库是无法提供这笔补助的。法国仅仅袖手旁观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在摧毁它以前的盟国中进行积极的合作。

因此，考尼茨便及时地通知俄国说，英国和奥地利已经分裂，并解释分裂的原因是：英国的唯一仇敌是法国，而普鲁士则是各帝国王朝的真正敌人。当威斯敏斯特协定传开后，他声称这个协定使俄国和奥地利对英国产生了共同的不满。他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可能在法国导致体制的政变，这对于各帝国王朝是有利的。接着，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56年3月13日又指示她的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把奥法秘密谈判的消息秘密地告知女沙皇，并建议奥俄在取得法国同意的保证后，就向腓特烈发起联合进攻。除了女沙皇并不那么深信有必要与法国合作这一点而外，这个建议恰恰与圣彼得堡过去做出的决定不谋而合。这样就进一步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旨在削弱普鲁士国王势力的军事和外交准备工作。4月，俄国提出，如果奥地利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俄国将于1756年出兵8万进攻普鲁士，并保证一直打到玛丽亚·特蕾西亚收复西里西亚和格拉茨时才住手。

这样，在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前，考尼茨就已经向俄国吐露了心事，并且取得了女沙皇的完全赞同。当条约签订的消息在圣彼得堡公布时，不论是亲奥地利的人士，还是朝臣中致力于法俄和解的有势力的集团，都表示热烈的赞同。道格拉斯又在俄国出现，这一次他毫无困难地安排了两国朝廷间的正常外交关系的恢复。他还受权谋求俄国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对俄国因放弃与英国签订的津贴条约而给予俄国以补偿。俄国在对这一提议的答复中，企图用相当笨拙的手法激起法国对普鲁士的敌意。于是鲁耶便有点粗暴地反驳说，法国政府决心维护欧洲的和平；并且至少用暗示的方法拒绝了俄国的对普鲁士开战的计划。虽然1756年5月奥地利和法国间的分歧很大，可是法国和俄国间的分歧甚至更大。

尽管如此，到了这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国已经决定与奥地利共命运，并且唯考尼茨马首是瞻。可以想象，这一决策本来是可能完全被颠倒过来的。别斯图热夫那时还在职，但是，他的地位和威信已严重地动摇。他本人既仇恨法国，又憎恶普鲁士，感到无所适从；即使他在朝廷中仍然有强大的势力足以迫使女沙皇接受他的政策，他大概也不可能制定出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只要叶利扎维塔健在，英国就不能控制俄国。但在1756年夏季，女沙皇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这就使由法定继承人彼得大公和他的夫人（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组成的“年轻的宫廷”得到至今还未享有的重要的政治地位。尽

人皆知，彼得大公是腓特烈二世的崇拜者，而他的夫人这时已成为英国政府重金收买的附和者和坐探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的影响，俄国一直到1756年12月31日才正式加入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然而，之所以拖延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俄国要求得到500万卢布的津贴；法国则拒绝直接给予俄国任何津贴，只是答应通过奥地利给予一笔为数小得多的补贴。法国坚持要维护它与土耳其的联盟，不承认把俄土战争问题包括在条约考虑的范围之内。关于法国的另外两个盟国瑞典和波兰，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俄国一心想要把它的控制权扩大到这些国家。考尼茨担心，俄国加入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可能会使英国和普鲁士引诱土耳其进攻奥俄两国女皇；他特别担心的是，一旦反俄的波兰人结成联盟，起来抵抗俄国军队取道波兰进军，并且向土耳其求援。

最后，终于取得了妥协方案。法国在腓特烈入侵萨克森以后，认识到必须取得俄国的有力合作来对付普鲁士，因此放弃了反对俄军在波兰领土上采取行动的立场。法国则得到了俄国的保证，在使用这一权利时不致损害波兰的自由（这一保证不久就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另外，俄国勉强地接受了法国的这一论点：为了使俄国的军事援助达到所期望的规模，法国提供的津贴必须经由奥地利之手。俄国的女沙皇放弃她的这样一些企图就更勉强了，即断绝法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或者至少得到保证：一旦俄土之间发生战争，法国除了给予补贴外，不得给予土耳其以其他援助。现在，欧洲大陆上三大强国的联合这时已是既成事实。但是，至今还没有什么对付普鲁士的进攻性条约；而且，俄国与奥地利不同，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还与英国保持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因此，纽卡斯尔便与俄国缔结了津贴条约，并且天真地（如果说不是无知地）试图把这一条约和威斯敏斯特协定结合起来；这就彻底地破坏了他自己和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都认为对于英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那个联盟体系。他于1756年3月表示希望奥地利“现在可以向低地国家派遣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而不必担心在德意志境内会受到进攻的风险”；他所表示的这种希望，看来是真诚的。但他没有想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选侯事先不经与皇帝商量，就径自为帝国的和平做出安排，维也纳宫廷当然有理由对此感到恼火。他更没有意识到，已

在和法国进行深入谈判的考尼茨，会把英国重新搬出的这个办法当作一种克服法国宫廷中对第一次凡尔赛条约阻力的武器。

1756年4月7日，英国驻维也纳的使节把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副本送交考尼茨。他坚决表示，英国宫廷确实愿意优先考虑与奥地利的联盟；并且断然声称，英国政府将拒绝参加反对普鲁士的进攻性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必然会带来毁灭和不可避免的破坏”。同时，他要求奥地利对正在进行的奥法谈判做出解释。考尼茨让他等了一个月才给予答复。玛丽亚·特蕾西亚在随后接见这位英国使节时断然地对他这样说，英国与普鲁士缔约就是对她的背叛，“最初获悉这个条约时好像突然患了中风症一样”。当问到她作为奥地利的女大公，是否会卑躬屈膝地投入法国的怀抱时，她回答说：“不是投入法国的怀抱，而是站在法国的一边。”她接着又言不由衷地说，她至今还没有和法国签订什么条约，而且也绝不会签订任何违背英国利益的条约。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考尼茨都指出，威斯敏斯特协定的条款特别令人不快，因为它把尼德兰排除在要保持中立的地区以外，这就招致了法国对这块奥地利属地的进攻。这一考虑无疑地使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法国做出正式的保证，不去进攻低地国家。

当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传到伦敦时，纽卡斯尔认为最迫切的需要是成立一个与之抗衡的体系。因此，他做出加倍的努力去争取俄国。这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俄国，甚至连普鲁士对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忠诚也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在圣彼得堡获得成功的希望并不比在维也纳的大。他在1756年6月就已在考虑另一个办法，就是把欧洲大陆全部放弃给法国，而单枪匹马地和它打一场海上和殖民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布雷多克在美洲的失利和约翰·宾在地中海的受挫都是不祥之兆。纽卡斯尔沮丧地承认，他的1756年1月的杰作已是作茧自缚。英国和普鲁士越来越被欧洲的其他大国所不齿；两国可以有效地而且成功地联合起来的这一主张，早在伦敦出现之前，就已在波茨坦被人所理解了。

腓特烈签署威斯敏斯特协定时，与纽卡斯尔一样，并无改变联盟体系的意图，虽然他确实预想到条约的结果将是英国和奥地利的分道扬镳。他极力地要说服法国相信，这一条约是暂时的，其作用只限于目前的这场战争，并不会影响他与法国的持久联盟。他使尼韦努瓦相信，条约并不像鲁耶所相信的或假装相信的那样附有任何秘密条款。

他指示他的驻巴黎公使克尼福森设法与蓬巴杜夫人建立友好关系，但她有意避开他的友好表示。当法国表示它对腓特烈缔结这一条约多么不满，尤其反对用这一条约使先前签订的1742年的威斯敏斯特条约得以延续时，腓特烈就比他最初打算的更进一步地向英国靠拢了。他郑重地警告法国说，法国如果继续采取目前的态度，就可能迫使他考虑真的和英国结盟。他获悉了奥地利和法国会谈的情况，但最初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认为法国还不至于不了解本国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以至为哈布斯堡-洛林这个新王室的扩张效劳。

当他得知法国无意延长与他签订的防御条约时，他就于1756年3月邀请英国派一位公使前来柏林。可是几个月前，他还解释说，这样的外交使团会使他难堪。他开始谈论建立一个以英国和普鲁士合作为基础的新教国家联盟。在威斯敏斯特协定签订后，他曾经认为奥地利主要是急于希望避免卷入法英冲突。但是，到了1756年5月，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维也纳的宫廷迫切需要的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这种看法主要是根据法国宫廷泄露出的关于奥地利对法国提议的性质的消息而形成的。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一旦普鲁士因为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而受到进攻，显然就迫切需要英国保证给予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尽管英国公使安德鲁·米契尔于1756年5月到达柏林，并且立即赢得了腓特烈的信任，但在1756年的夏季，英国和普鲁士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骤把彼此的关系搞得更为密切。

这场外交大变动和欧洲大陆上七年战争的爆发之间有什么关系，尚需加以考虑。一些历史学家争辩说，联盟关系的逆转使欧洲大陆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是以一种谬见为基础的，即第一次凡尔赛条约虽然在形式上和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目的在于保障欧洲大陆和平的防御性条约，但实际上却是反普鲁士的进攻性联盟的基石。人们一致公认，这就是始终鼓舞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考尼茨的那种前景。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还要走过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他们已经成功地打断了法普联盟；现在，他们必须使法国相信，它的利益就在于积极地参加一场十字军，以便摧毁它以前的盟国。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奥地利和法国在1756年夏季继续谈判的过程和结果。

第一次凡尔赛条约改变了法国和奥地利的相对地位。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签订这一条约是希望避免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当

斯塔勒姆贝格开始怂恿法国对普鲁士发动战争时，就再也得不到国王及其情妇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了。避免战争是蓬巴杜夫人之兴趣所在，战争可能使她与国王分手，并且可能就像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对于在她之前的那位情妇一样，也是一场灾难。战争也会使她的敌人——国防大臣和朝中亲普派的首领之一阿尔让松伯爵的地位提高，势力增大。再者，根据贝尼斯的看法，斯塔勒姆贝格在此以前具有的最大有利条件是，如果法国不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他可以用奥地利将站到法国的敌人一边相威胁。第一次凡尔赛条约一旦签字后，这种威胁不能再使用。奥地利必须约束自己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如果它在新的条件下使用旧的威胁，就会引起它的新盟国的强烈猜疑，使条约带来的实质性好处付诸东流。最后，最有势力的法国大臣们，特别是阿尔让松，还有海军大臣马肖和外交大臣鲁耶，由于不同的原因，即使对法奥联盟并无真正的敌意，但全都心存疑虑。他们无意使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斯塔勒姆贝格早就尝到阿尔让松和鲁耶的恶意的苦头，而现在要由国王出面干涉克服他们的阻力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与法国谋士们的犹豫不决和意见分歧形成鲜明的对照，奥地利的谈判者们仍然具有目标明确的有利条件，可是他们已不再占优势了。

因此，虽然贝尼斯在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签字的那天向斯塔勒姆贝格宣读了路易十五对最近奥地利提出的联合反普建议的答复，可是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继续进行的秘密会谈只起了强调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分歧的作用。路易十五想以不援助普鲁士的诺言和支付一笔现金为交换条件，为他和他的女婿立即把整个尼德兰拿过来。奥地利要求得到法国的一大笔津贴和反普鲁士的有效的军事合作；并且只有在战胜腓特烈并收复了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后，才许诺把尼德兰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而且，除非普鲁士被瓜分并且一蹶不振，否则奥地利就不会感到收复的领地有安全保障。然而，保持德意志的两雄并列的局面显然符合法国的利益。法国希望自己尽量少出力、少花钱以防止奥地利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实际的君主的可能性，并利用德意志联合的人力、物力来对付法国。

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国已同意在入侵萨克森之前就进攻普鲁士；这种说法完全根据1756年8月国王驻辟贡比涅期间，斯塔勒姆贝格在和亲奥派领袖贝尼斯进行一系列非正式的秘密会谈后所写的报告。贝尼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地否认这一说法，并且争论说，只有在普

鲁士先已破坏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后，他才打算让计划中的进攻性联盟的义务付诸实施。因此，拟议中的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协定与两位女皇的1746年条约的著名的第四项秘密条款恰好相似。不错，贝尼斯的这番声明是几年以后所做的，但也绝非公证之论。斯塔勒姆贝格这时肯定不了解，要执行贝尼斯和他共同精心拟定的协定时，肯定还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这种误解在非正式的会谈中是很容易出现的。即使人们把贝尼斯的说法当作事后他为洗刷自己的名声和政策而完全加以否定，但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所商定的措施是经过路易十五的批准的。再者，斯塔勒姆贝格在他的8月20日的得意扬扬的报告中说，法国愿意与奥地利合作，以便达到考尼茨的目的。这个报告说明了谈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分歧的问题，这些分歧问题肯定会拖延达成协议，而且可能最后还要阻挠达成协议。

报告为了确切地说明这些分歧，附有内容不同的附件不下7份。例如，其中一份附件列举了6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另一份附件提到了斯塔勒姆贝格答应向他的朝廷转达的法国谈判人提出的8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一项建议，即奥地利应当放弃瓜分普鲁士的主张，并且应当利用割让低地国家领土的办法以便在它进攻普鲁士时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贝尼斯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法国尚未最后同意考尼茨的计划。法国充其量以毫不掩饰的勉强的心情许诺在一定条件下考虑削弱普鲁士的手段。条件就是：奥地利在反对英国的战争中给予法国积极的支持，允许法国占领佛兰德的各港口，并向英国船只关闭的里雅斯特、阜姆和特斯康各港口。此外，在战争结束时，奥地利必须同意减少英国和汉诺威的属地，减少程度相当于奥地利期望普鲁士被削弱的程度。即便这时，贝尼斯仍不愿让一支法国的辅助部队对普鲁士采取行动，虽然他要付给奥地利女皇一大笔津贴，并将2.5万至3万名日耳曼雇佣军由她调遣。

确实没有必要更进一步研究细节问题。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拟议中的于1757年进攻普鲁士的计划，在外交的讨价还价中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书生空谈了。无论在凡尔赛，还是在维也纳，关于普鲁士军队集结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战争很可能在1756年以普鲁士发动进攻而发生。尽管法国提出了警告，英国提出了低声下气的抗议，但腓特烈还是盲目地走进了考尼茨为他安排下的圈套。由于他自己的轻举妄动，欧洲结成了对他的联盟；不然，这样的联盟是绝不可能形成

的。欧洲大陆上的七年战争是普鲁士对于真正的或假想的被包围的危险做出强烈反应的一个早期例子。考虑到腓特烈二世的性格，这场战争也许是外交大变动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但可以肯定地说，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潘永樑 译）

[\[1\]](#) 即神圣罗马帝国的预定继承人。——译者注

第二十章 七年战争

欧洲的七年战争是由于腓特烈大帝于1756年8月29日入侵萨克森而开始的。这次战争不过是英法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一个部分。这场斗争1754年就已在美洲开始，虽然两国之间的战争到1756年5月才正式宣战。虽然普鲁士为生存而奋斗，是欧洲战争的主题，可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事，由于动用了这两个竞争中的帝国的能力和资源，就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1756年的普鲁士还是一个立国未稳的新国家。它通过联姻，由于各种死亡造成的机会，以及通过征服，把各个分散的部分联合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边界，没有地理上的统一，它的臣民把邻省的人民看作外国人，他们共同效忠的只是君主和王权。这个国家的领土很分散，从涅曼河一直到莱茵河，分成三部分：东部是普鲁士；中部是紧紧相连的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和西里西亚；西部是威悉河畔的明登和拉文斯堡这两小块领地，鲁尔河畔的马克和莱茵河畔的克勒韦斯公爵领地。在这些属地的边缘，延伸着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主权归属未定，有可能是承袭的产业。普鲁士的统一是人为的，而且是不牢靠的；它的边境长期以来争讼不息，纷争频仍；普鲁士不是保就是失，不是前进就是后退，不是扩张就是解体——它从来没有感到满足过，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安全。“在普鲁士，一切都是紧张的，紧绷绷的，紧张得到了限度，而且往往超过限度；这种政治上的改建进行得简直使人无法忍受。”^[1]普鲁士欲成就的大业，几乎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它总是濒于崩溃的边缘。它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靠征服，因此，它更加适宜于充当征服他人的征服者。

这些因素既说明了腓特烈1756年的行动，也说明了欧洲列强何以结成联盟一致起来反对他的诱因。奥地利的主要目的是要收复西里西亚，并且要把普鲁士降为一个德意志小邦的地位。俄国也有要把普鲁士降为一个小邦的意图，并且希望从而吞并东普鲁士（公爵领地）。瑞典希望征服普属波美拉尼亚。法国则希望吞并莱茵河畔的韦塞尔和

克勒韦斯的公爵领地。与奥地利对抗，在法国已是一个习惯问题，对奥战争已成为传统，夺取奥属尼德兰已成为法国的夙愿。作为这场外交大变动（第十九章）的结果，而且作为法国与一个老盟友打仗的代价，难道法国不可以获得在以往战争中没有得到的奥属尼德兰作为补偿吗？但是，肢解普鲁士，结果是使奥地利和俄国的势力扩大了，而法国却从中一无所获；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攻城略地，尤其是从英国手中夺取汉诺威，就能够在和平条约中抵消在殖民地的损失。而要保卫汉诺威不受法国的进攻，英国军队势必要参战，否则英国军队就会卷入法国与其死敌英国之间的更大范围的斗争中去。这场外交大变动也说明了为什么这次战争的许多战役开战时都是踌躇不定的——人们私下里普遍相信：列强新的组合不久必将被旧的体系所取代。

根据1756年1月16日的威斯敏斯特条约而与普鲁士结盟的英国，面对着它一向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个条约的性质完全是防御性的：条约规定，任何国家（显然指法国）一旦入侵德意志，即应给予普鲁士以援助，两国有义务保障德意志的安宁。英国政府把普鲁士拉入它们的防御体系，就是希望要使法国在欧洲处于对峙的僵局之中，而把敌对行动限制在北美洲的范围内。乔治二世在欧洲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汉诺威。一旦战事开始，英国是否应该让英国在18世纪战争中坚定的盟友汉诺威（还有普鲁士）听天由命，而在海外集中全力对付真正的敌人法国——实行“海洋论”？或者，英国应该在殖民地和海上进行主要的战争努力的同时，继续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各种同盟关系——即“旧体系”，从而把法国的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从海外吸引回来投入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中去？第一种办法，在欧洲各国反普鲁士联合一旦成功时，就意味着失去汉诺威，而法国则可完全腾出手来在别的地方对英国发动战争。第二种办法，即是说动用英国的经济优势给予汉诺威、黑森和不伦瑞克的军队以补贴，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以提供军事领导。英国不能在欧洲向法国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但是可以在殖民地削弱法国的努力，而英国人则仍然认为殖民地是主战场。在任何情况下，让汉诺威完全落入敌手，对于乔治二世来说，也无异于被革出教门；这就是说，在媾和时就要做出牺牲，得不到殖民地了。英国政策最后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采取一贯使用而极为有效的折中办法，老威廉·皮特（1708—1778年）指导战争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便是明证。

皮特在1757年出任负责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主管战争之前，曾强烈反对英国为汉诺威的利益而做出牺牲，希望严格集中全力于殖民地的和海上的目标。正像他的那些英雄崇拜者往往所说的那样：“责任心使这位雄辩的爱国者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他所曾谴责过的东西原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接受教训，而不是认为没有什么可学习的。”^[2]正如巴兹尔·威廉斯说，皮特的自我否定是他的晋升之阶。他逐渐承认了在欧洲继续作战的价值——其中包括：从1758年4月开始给普鲁士军队以津贴（第472页）；派遣英军与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军队组成各支联军协同作战；对法国海岸发动海陆联合进攻，使法国人惊恐不安，从而迫使他们把军队撤出欧洲的战役。有人批评对法国海岸的进攻，如1757年9月进攻罗什福尔，1758年进攻圣马洛和瑟堡，以及1761年进攻贝尔岛等，耗资巨大，而且徒劳无功。然而，这些却是精心策划的战役，使法国惊恐不安，牵制了一部分法军，并且削弱了法军对腓特烈和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统率下的联军的作战努力。比特在1758年写给皮特的信中总结这些战役说：“执行时胆怯，即使是最明智的计划也将失败；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即使是有才智的见解，也将一事无成。”^[3]如果说这些战役总的来说指挥失当，这绝不是指责其固有的价值。1760年，为了要在欧洲取得某种决定性的结果，为了向尚未就范的一部分法军发起攻击，从而使战争免于陷入僵局，皮特甚至把他的主要重点放到欧洲的作战方面——因此，伊斯雷尔·莫迪乌特在同年发表的《对于目前德意志战争的考虑》一文中对他提出指责。这篇文章声称，皮特已让牵制战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战斗；文章还重弹海军和殖民地作战论。莫迪乌特认为，要在欧洲与法国打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恢复原来的“大同盟”。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德意志的内战，因此英国偏袒任何一方都只会加剧和延长这场内战；英国应当起调解作用，使和平得以尽快恢复，并引导冲突双方把武器指向法国。皮特的希望是在欧洲大陆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使法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在汉诺威夺回它在海外丧失的利益，是枉费心机的；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到了1761年，英法之间陷入了战略上的僵持局面。法军在海上被打败了，法国的殖民地被占领，法国的贸易被破坏。但是在欧洲，法国及其盟国似乎已稳操胜券，普鲁士显然不是对手。只是由于叶利扎维塔女沙皇凑巧于1762年1月5日去世、反普鲁士的联合随之垮台，这才结束了这场僵局。

从一开始，普鲁士的前景就不妙。1756年它的人口400万，只是奥地利人口的1/3，法国人口的1/5。东普鲁士完全被分隔开来；西里西亚只有一条仅7英里宽的走廊与马克-勃兰登堡相连接；萨克森的边境离柏林只有7英里。腓特烈在3条战线上作战，围攻的敌军集团占压倒优势，他只能指望打机动战，轮番逐个地对付敌人，而首先必须要防止奥俄两军会师。只有这样，他才能运用他的军事技术的优势。分别来说， he 可以与任何一个对手较量；但是，他们联合起来他就寡不敌众了。腓特烈的目标狂妄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程度，而且不择手段。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具有极大的组织才能，并且具有为达到某一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的本领。欧洲的七年战争，尤其是对1757年战役的指挥，都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他的高明的防御战略，他的迅速而果断的攻势和遭到挫折时坚韧不拔的精神。战争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取胜之道。腓特烈的优点在于坚持简单的原则和审时度势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这与他的对手用兵方法墨守成规形成鲜明的对照。腓特烈的指挥统一，内线作战，并有纪律严明的国家力量，这就使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军事上的人力物力。但是，即便如此，他之所以能在各次的危急关头得救，只是由于他的对手固有的弱点——几个朝廷在合作中相互猜疑有余而共同利益不足，各国企图推诿所承诺的义务，或试图分别缔结和约——并且也因为敌军的军事指挥官们平庸无能，或者甚至是不称其职。反普联盟一直采用防御性的机动战术，尽量避免重大的交战，因此很难看清它有什么进攻意图——这是18世纪中直到法国革命时所有战争的共同特点（参见第八章）。

对于腓特烈入侵萨克森，从而展开了这场欧洲战争一事，现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外交大变动与欧洲七年战争密切相关，两者可视为因果关系。腓特烈后来断然声称：奥俄已缔结进攻性同盟，并且取得协议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为了完成准备工作，行动才被推迟。根据这种观点，七年战争是由纯粹防御性的威斯敏斯特条约引起的，奥地利和俄国利用这一条约作为对普鲁士采取敌对行动的借口。腓特烈用一个比喻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把自己比作欧洲的王公们狩猎时的那头鹿。他们邀请了他们的朋友一起前来参加这次杀戮。按照这种观点，腓特烈是在别国的挑衅下被迫发动了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取道萨克森进军去波希米亚攻打奥地利。腓特烈在他的1752年的《遗言》中就有某些支持这种观点的说法。他说，像征服西里西亚这种闪电式的袭击，就像是一本书，其原著很成功，但仿作却

会完全失败了。第二种观点认为，腓特烈蓄意挑起这场战争，希望于1756年征服萨克森，作为进一步攻城略地的预备，以便重演1740年在西里西亚成功的冒险。他曾经一度这样写道：“谨慎适宜于守成，但只有胆大才能取得新的属地。”^[4]无论根据哪种观点，1756年欧洲大陆的战争是否能避免或推迟，显然取决于腓特烈；他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腓特烈敢作敢为，严峻苛刻，因为他感到自己四面受到威胁，也因为他决心要保护他的新国家。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动却使反对他的联盟得到巩固，而他对萨克森的入侵无疑是为了防止这种联盟的。1757年5月1日，奥地利与法国缔结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1757年5月19日，奥地利和俄国又结成进攻性的联盟。

腓特烈入侵萨克森开始时，首先把选侯奥古斯特三世指挥的萨克森军队困于德累斯顿附近的皮尔纳，并在离萨克森边界不远的波希米亚境内的洛博西茨阻击布朗陆军元帅指挥的一支奥地利援军（1756年10月1日）。萨克森军队于10月16日投降。奥古斯特三世被准许隐退到他的波兰王国，其军队被并入普鲁士军队，萨克森被看成是普鲁士的一个行省，遭受勒索和蹂躏，直至战争结束。奥地利遂与法国签订了它的防御条约（即1756年5月1日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作为报复；1757年1月，俄国也接受该条约，并在2月与奥地利缔结了一项新的反普条约。法俄军队这时开进中欧已势在必行；而腓特烈在萨克森的耽搁，使他不得不推迟入侵波希米亚出击奥地利军队的行动。

法国派遣由德斯特雷元帅率领的10万大军的主力部队进军汉诺威，遂揭开了它的欧洲战役的帷幕。英国既不能使这块选侯领地保持中立，也不能保障它的安全；而腓特烈这时正与欧洲首要的军事大国作战，也无力提供有力的援助。乔治二世命令坎伯兰公爵率领他的由汉诺威人组成的军队和从德意志其他各邦招募的雇佣军（总数为4.5万人）的“观察部队”保持防御态势：“我军的态势和作战必须针对我们的主要目的。即对奥地利女皇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采取进攻行动，而只保卫我们自己的领地。”^[5]坎伯兰在哈斯滕贝克战败后（1757年7月26日），奉命退守北海边的施特德。在那里，他在北海和易北河之间被包围，面对着远为强大的敌军，得不到来自英国的援救，遂于9月8日签订了克洛斯特—塞文条约。这不仅使汉诺威和不伦瑞克沦于法国人之手，而且也使普鲁士中部各省暴露，遭受入侵的危险。所有辅助部队均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乔治二世说，他的儿子使他遭到毁灭，也

使他自身蒙受耻辱，然而他却恰恰忘记了，坎伯兰所作所为的全部大权，正是他所授予的。诚然，条约中的灾难性条款不应忘却，但也不应忘记这一事实，即从4月以来坎伯兰的军队在极其危险的关头牵制住了法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使它不能出动对付腓特烈。

俄军在阿普拉克辛的统率下于8月11日进入东普鲁士，攻占了梅梅尔，并于8月30日在格罗斯耶格尔斯多夫打败了勒瓦尔特。俄军因给养困难，且有反方向行进的显著习惯，并且接到女沙皇去世的不实报告，于是便撤出东普鲁士。但是普鲁士人却不能够利用这一好运气，因为他们不得不动调军队去抗击由施特拉尔松出动的、9月间侵入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军队。俄军于1758年1月重占东普鲁士，直至媾和以后才撤出该地。

1757年腓特烈打了4次大仗，其中3次是决定性的战斗，最后两次是他一生胜仗中最辉煌的两次。这年年底，他的威名大振，以至法国外交大臣贝尼斯主张在腓特烈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从而主宰德意志甚至欧洲之前马上媾和；只是由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反对，贝尼斯才打消此议。腓特烈估计这时在洛林亲王查理统治下的奥地利人是他的最强大的攻击者，于是他便开始了迟迟没有发动的攻打波希米亚的战役。先前他对萨克森的入侵就是为此战役所做的必要准备。奥地利人在波希米亚北部的那些大军火库是他们计划中进攻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基地；所以，只要拿下这些大军火库，就可以有效地使奥地利的作战努力无法行动。他在布拉格未能摧毁奥地利的军队（5月6日），奥军撤入城内，他只得围城。一支由道恩统率的奥地利援军在科林遭到腓特烈的攻击（6月18日）。腓特烈在这里从惨痛的经验中懂得了从正面进攻的困难。他发现奥军在一系列小山上部署阵地，与他的连绵的进军序列平行，并且居高临下。他决定把部队开过奥军阵地，以便在与奥军右翼相交叉时，右转弯排成横阵。奥军看到他的行动，对其意图一目了然。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部署，并且加强了右翼。腓特烈的行军纵队的侧翼遭到炮火猛烈的轰击，致使普军的中部违背他的意图，过早地右转弯列成横阵，向奥军阵地的正面发起攻击。腓特烈的计划被破坏了，而且他也被打败了。腓特烈在科林的失败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在进攻敌人的侧翼时，必须出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如果敌人能够看到他的行动，也就不可能向敌人发起突然的攻击。正是由于吸取了这次教训，他在这年稍后的时候在洛伊特恩遂取得了辉煌的胜

利。只是由于18世纪战争的条件限制以及在追击溃敌时所固有的困难，腓特烈的主力才在科林没有遭到覆灭。普鲁士的失利，必然解除了布拉格之围，并放弃了波希米亚。一位英国的观察家描写腓特烈的处境时说：8月28日“这位普鲁士国王这时面对着的有俄国的军队和舰队，2万名瑞典军队，一支由3万名法军支持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和10万名奥地利大军；此外，他的敌人好像还嫌不够多似的，按照协议汉诺威不得设立冬营，这就又有6万名至8万名法军可以投入战斗”。[\[6\]](#)

腓特烈的敌人继续全面推进——奥军收复了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于10月16日进入柏林。在这紧要关头，腓特烈在图林根进攻由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公爵统率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和苏比斯统率下的法军。苏比斯起初把法德联军部署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腓特烈不敢贸然对它进攻。后来，在苏比斯的提议下，法德联军被调到另一个有利的位置，以便更好地掩护自己的交通线并威胁普军的交通线。但是这里却暴露出指挥分散这一弱点。约瑟夫公爵决定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以便到达普军后方。正在注视这一运动的腓特烈，立即把部队运动到一处山脊后隐蔽起来，以便在行进中的法国纵队的先头部队前面摆开两列横队。约瑟夫的军队已来不及列成横队迎击普军，便顿时大乱，于11月5日在罗斯巴赫全军覆没——腓特烈描述这次战斗是一次“斯斯文文的交锋”。

他接着转而攻击曾于11月22日在布雷斯劳打败贝弗恩的奥军。他迅速进军，于12月5日在洛伊特恩击溃了奥军，从而解救了普鲁士使之不致遭到入侵，并且收复了除施魏德尼茨以外的西里西亚全境。奥军在洛伊特恩布成两列长长的横队。普军列成纵队接近，与奥军阵线呈垂直。腓特烈派一支前卫部队暴露在奥军阵线的前方，以掩蔽其部队在隐蔽下向右转，朝着奥军阵线左翼的延伸部位的某一点运动。他的纵队在这里转成横队，成斜角挺进，直至插入敌人阵线的延伸部。这时，普军直接推进发起攻击。奥军除一小部分外均已来不及改变阵势；在其余的部队还未能投入战斗时，遭受攻击的部分就已被击溃。

洛伊特恩之役最好地说明了腓特烈在七年战争中发展的战斗前进和战斗序列的价值。这是对付数量上占优势之敌的斜进战斗序列。斜进战斗前进已在布拉格战役时应用，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种战术在洛伊特恩、措恩多夫（1758年）和托尔高（1760年）均获得成功。只有一次，即在库纳斯多夫一役中惨遭失败。斜进战斗序列包括

由普军的一翼发起侧翼攻击，使之在局部上处于优势。骑兵和重炮集中在这一翼上，以掷弹步兵营等精锐部队为前锋；军队的另一翼并未投入战斗，而是留作后备队，一旦需要时就可投入正面进攻，万一失利时则可用作掩护退却。这种战术不使用造成18世纪战争重大伤亡的传统的平行战斗序列和正面进攻，而是攻击敌军一翼，通常是在敌军大部队还未来得及变换阵势以前就击溃该翼。一支7万人的步兵大军，如按传统的战术形成纵深三列横队，第一列配置4万人，左右两翼间展开5英里。要变换阵势或阵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无论部署什么新阵地，侧翼部队必须行军数英里才能到达新的位置。因此，运用斜进战斗序列就能在大部分敌军尚未投入战斗之前，就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1757年至1758年的冬季，普军进行的各次战役迫使瑞典军队从普属波美拉尼亚撤退，从远至施特拉尔松和皮根岛的瑞属波美拉尼亚撤退。普军只是因为缺乏一支舰队才未能攻占这些地方——因此，普鲁士坚持要求英国提供海军援助（第81页）。这次战争中以后的多次战役都与1757年的战事相似。普军主力进行老一套的进军，一个一个地对付敌人，从奥得河打到易北河，从易北河打到威悉河——几乎毫不停顿地运动。普军很少感到单调和厌烦，而这是18世纪中大多数军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岁月流逝，腓特烈在战略上可能失败了，但在战术上他却抗拒了无情的命运，虽然从物质上来说，他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与此同时，英国改变政策，恢复了在德意志西部的地位。首先，英国借口克洛斯特一塞文条约没有规定停止敌对行动的期限和法国对条约的解释不符合条约的条款，于11月28日废除了该项条约。其次，英国又采取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支持普鲁士的政策。政策声称，必须对普鲁士有更充分的谅解，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坎伯兰的失败。最后终于达到这一目的，签订了年度津贴条约（自1758年4月11日起），英国每年给普鲁士67万英镑的津贴，从而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进行和谈（第467页）。此外，驻施塔德的“观察部队”也得到加强（英国议会批准1758年度给这支部队拨款120万英镑，而上一年是16.4万英镑）并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指挥。这项补贴获得了德意志的最精良的军队的服务。这支“观察部队”掩护了腓特烈的西侧，使法军不能穿过汉诺威进行渗透；这就完成了英国牵制行动的整个框架。从此时起至

战争结束，斐迪南公爵成功地遏制了不断增加的法军，让欧洲的主要战争由普鲁士对付奥俄两国打下去。这样，斐迪南就使腓特烈能够顽强地抗击这两个强国；否则，这种抵抗几乎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普鲁士肩负的沉重负担也就无法支持。此外，法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被分散用到欧洲大陆上的消耗战和战略上谬误的战争中去；而英国却仍然可以自由地把主要精力用于征服甚至在和谈的讨价还价中丧失了殖民地的筹码后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庞大得使人感到麻烦的帝国。

尽管腓特烈在1757年的损失惨重（在布拉格军官死亡400名，士兵死伤1.4万名；在科林军官死亡400名，士兵死伤1.3万名；在罗斯巴赫死伤士兵540名；在洛伊特恩死伤士兵6000名），他在1758年仍然能够把数量上与头一年相同的军队（即15万人）投入战斗。战斗开始时，他又再次首先进攻奥军，结果就像1757年一样未获成功。他在再克施魏特尼茨（4月16日）扫清西里西亚之敌后，侵入摩拉维亚，包围奥尔米茨要塞。这次战役说明了18世纪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不能远离弹药库和基地在敌国境内作战，因为辎重车队容易受到袭击（第八章）。7月间，不得不解除对奥尔米茨之围，因为卢车切断了给腓特烈运送给养和弹药的4000辆辎重车队，也因为围城或作战时工兵数量不足——这是引起18世纪的许多指挥官抱怨的一个显著原因。护送本身就需要1.3万名士兵，而他的军队后来从摩拉维亚退到波希米亚时，全部辎重车队有4000多辆大车，需要分兵去保护，这就极易遭受果敢的敌军的袭击。要保护基地与前进部队之间的辎重车队和给养，这是18世纪中促使轻步兵和轻骑兵编制发展的有力的原因。

就像1757年一样，俄军头一个给普鲁士造成真正的威胁。俄军重新占领东普鲁士后，奥地利要求他们更积极地参战，于是俄军在这种要求的鼓舞下，由弗莫尔统率前进去攻打勃兰登堡。俄军和瑞典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的联合行动也构成一种威胁——瑞典已答应派遣3万人参加这一行动。普军在多纳的指挥下一直在封锁施特拉尔松，这时不得不开拔前去阻止俄军前进。8月15日，弗莫尔包围了勃兰登堡境内奥德河和瓦尔塔河汇合处的屈斯特林。腓特烈调动军队前去解救该城；经过这场战争中的最激烈的一次浴血遭遇战，他于8月25日在措恩多夫打败了俄军。弗莫尔逐步退入波兰境内，勃兰登堡于是得到解救。瑞典军队虽然在失去俄国的支援后已不可能保住普属波美拉尼亚，但它还

是保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使腓特烈在这一年中不能利用该地的资源——瑞典军队只是到了12月才撤至瑞属波美拉尼亚。

在作战的季节里，腓特烈是得不到什么休整的。他这时不得不迅速进军以迎击已侵入萨克森的奥军。“我们的步兵团队，”腓特烈在给其弟亨利亲王的信中写道，“正在变成三驾马车的驭者和传令兵。”这是一种对步兵团队指挥官们和团队的纪律的意味深长的赞誉之词，称赞他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完成对他们下达的号令。道恩在萨克森的目标是再度攻克德累斯顿，他的攻击只是由于腓特烈的到来而转移了目标。与此同时，第二支奥军进入了西里西亚，把尼斯包围起来。腓特烈于9月26日离开德累斯顿，前去解救尼斯之围。道恩据守坚不可摧的阵地，挡住他的去路。腓特烈对道恩的谨慎策略十分恼火，而且他又急于要去解救西里西亚，于是10月10日便在霍赫基尔希迎战奥军。在这里，又是因为奥军未能扩大战果，腓特烈才得以脱身，使他能够进入西里西亚，迫使奥军撤除尼斯之围。

在西部，斐迪南扫清了威斯特伐利亚、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黑森等地的法军。他攻克了明登（3月14日），在埃梅里希把法军赶过莱茵河（3月27日），并在克雷费尔德打败法军新任司令官克莱蒙（6月23日）。但他未能保持住这些战果，也未能像原来打算的那样侵入奥属尼德兰。斐迪南虽然面对着侵入黑森和卡塞尔的法军在苏比斯指挥下进行的反攻，并且面对着由布罗格利指挥的一支在宗德斯豪森打了一次小小胜仗（7月23日）的军队，但他还是成功地守住了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并且全面拖住了法军。于是，法国外交大臣贝尼斯重又提出和谈的主张，结果他不得不于11月去职，由舒瓦瑟尔取代。

1759年，压在腓特烈身上和他的领土上的沉重负担开始显露出来。他只能在战场上投入10万兵力，而且已经能够发动进攻来取得主动。但奥军还在玩弄七年战争翻版的18世纪战争把戏，等待普鲁士发动通常的那种意料中的进攻。他们等待的进攻落空后，又等待着俄军惯常使用的第二步作战运动。现在充任奥军总司令的道恩是一位等待时机的老手：他曾经计划的唯一一次攻势战役，即1760年的利格尼茨战役，是女皇强加于他的，结果以普鲁士取胜而告结束。俄军在新任司令萨尔蒂科夫的率领下从波兰缓慢地向前推进，这似乎证明腓特烈在给其弟的信中对这位司令官所做的描绘是对的：“据说，此人比俄国愚蠢的乡下佬还要笨拙。”萨尔蒂科夫按部就班地侵入勃兰登堡，

于7月23日在齐利楚打败普鲁士将军韦德尔，并攻占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尔蒂科夫在奥地利的一支小部队的增援下（这时该它出场了），于8月13日在庫纳斯多夫彻底打败腓特烈的主力。可以想象，俄军和奥军如果发动决定性的联合进攻（就像在相似的情况下，腓特烈自己这时也会做的那样），本来是可能最后制服这位暂时已告绝望的普鲁士国王的，可是这一回俄军采取行动的动机，又是出于猜忌而不是真正的利害关系。萨尔蒂科夫深信奥地利并没有奋力参战，而且他又决心要保全自己的军队，于是就按原路退兵。

与此同时，帝国军队于8月间攻占莱比锡、托尔高和维滕贝格；9月14日道恩占领德累斯顿。由于俄军撤退，腓特烈便可以腾出手来进兵抵抗这一威胁，收复除德累斯顿外的萨克森全境。腓特烈派遣芬克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切断德累斯顿和波希米亚之间的奥军交通线；但他率领的这支军队于11月21日在纳克森被道恩迫降；于是奥军保住了德累斯顿。

1759年，西部战事从法军开始；北线法军以韦塞尔为基地指向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以法兰克福为基地的南线法军指向黑森。斐迪南企图首先在黑森出击以防止法军进攻汉诺威。但是，4月13日他在贝尔根被布罗格利打败，并被赶回威斯特伐利亚。法军攻占明登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型要塞蒙斯特，对普鲁士构成直接的威胁。只是由于斐迪南8月1日在明登击溃了法军，才挽救了这一局面。这不仅迫使法军从黑森撤退，而且也挽救了汉诺威。但是，这时法国的政策在舒瓦瑟尔的指导下有所改变，要集中兵力对付英国，而让奥俄两国军队去对付普鲁士。根据第三次凡尔赛条约（3月），舒瓦瑟尔把法国对奥地利的津贴减少了一半——600万弗罗林；把派往莱茵河方面的援军限在10万人以内；拒绝把保证西里西亚回归奥地利作为战争的一个目的；并且代表帕尔马公爵唐·腓力放弃奥属尼德兰（根据第二次凡尔赛条约，这一安排是作为帕尔马回归奥地利的交换条件）。舒瓦瑟尔认为，在德意志进行的这场战争只是靠英国的财经支持和物资供应才得以进行下去，而且法国只有在德意志西部才能取得收复在海外的重大斗争中丧失的领土的手段；因此，他设想了一个入侵英国的计划——给敌人的财经心脏以致命的打击，其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而是要造成恐慌和财经上的崩溃。正如皮特曾经在一次描述可能在伦敦城散布的惊恐情绪时所说的：“当崇高而人为的但却是脆弱的公众信用结构在

他们手中崩溃时”，“有名无实的信用就可能在肯特郡遭到入侵”。

[7]舒瓦瑟尔的计划设想要从佛兰德出兵奇袭伦敦：两万名军队从奥斯坦德出发，在埃塞克斯郡沿岸的布莱克沃特河口处的莫尔登上岸，经两天行军就可到达伦敦；两万名军队从布列塔尼出发，在克莱德河口登陆，穿过苏格兰，攻占爱丁堡。由私掠船船长蒂罗带领一中队舰船以敦刻尔克为基地，威胁爱尔兰沿岸，以便把英国的舰队调开；而由孔弗洛率领的布雷斯特舰队和由拉克吕率领的土伦舰队组成的法国舰队主力则集中力量掩护这次军事攻击。皮特没有因为这一威胁而改变他的政策。没有出动国民军，没有招募志愿军，没有发布命令要求人们撤离受到威胁的沿海地区。要把这个冒险计划变成值得一试的军事冒险，唯一的紧要手段就是要打败英国的主力舰队，使之失去战斗力；而英国却满怀信心地完全依赖海军的防御力量。法国战舰只有联合作战才能为这次行动打开道路——而英国的封锁却使这种联合行动不能实现。拉克吕的舰队试图会合时，至8月19日在拉古什遭到博斯科恩的阻击；布雷斯特的舰队出动时，11月间在基贝龙湾被霍克击败。这些胜利，不仅摧毁了法国海军（因而也摧毁了侵英计划），而且也对西班牙的新国王查理三世（那不勒斯的唐·卡洛斯）产生影响，使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他对英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对待那不勒斯的情况记忆犹新。

可能来临的入侵也暴露出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中立的海洋国家在战争期间的权利问题和英国的搜查权问题。舒瓦瑟尔指望鼓动中立的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反对英国，因为英国干涉这些国家的贸易。他希望依靠这一联盟能使荷兰的海军为法国所用，并且得到英国与之没有交战的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俄国的支持。这样做，就能在入侵英国的关键时刻威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制海权。西班牙和地中海诸邦那不勒斯、托斯卡纳、撒丁和热那亚也与这个问题有牵连；西班牙与英国还有许多其他长期存在的争执，特别是在西属洪都拉斯采伐洋苏木问题上，以及西班牙殖民地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走私贸易问题上。

所有中立国家的主要不满是对英国的私掠船对他们的商船所采取的行动和英国对“中立国权利”所做的解释。私掠船是私人所有并由私人装备的船只，根据捕押外国船只特许状而采取行动，即所谓“商人冒险家的结婚证书”[8]；这是一国政府颁发的，授权这些私掠船捕

押敌方的船只，以及载有军队、武器和战争物资——“战时违禁品”——驶往敌国港口的中立国家船只。这些被捕押的船只由海军部法庭处理，如被判为合法战利品，则出售船只和货物所得的收益归捕获该船的私掠船的船主所有——这对于私掠船长一直很有吸引力，常使他们采取过分的行动。英国进一步声称，敌国的货物即使由中立国船只装运，也不能免于被捕押；而中立国则要求，除战争违禁品外的全部货物，均自动地受到中立国家旗帜的保护。英国的解释不仅暗示由中立国装运的敌国货物可能被扣押，而且也暗示英国有权在公海上拦截和搜查中立国船只。根据1756年的规定，英国还要求中立国不得和一个交战国进行任何在和平时期所禁止的任何贸易——因此，中立国不得和法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因为这种贸易在和平时期为法国航海法所禁止，但在战时法国为了获得一般的物资和军火已予解禁。这种贸易可以在法属殖民地与中立国家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之间，或者直接在法属殖民地和欧洲中立国之间进行。皮特为了缓和中立国的愤怒，就对战利品法庭施加压力，尽可能多地把捕押的船只释放，并且打算仅限吨位在100吨以上、火炮超过10门的大型私掠船才能获得特许状有权去捕押船只，以此来控制私掠船长们的过分行动。但是，海运权利无论对欧洲的战争有什么影响，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1760年这个七年战争重大的最后一年中，腓特烈还能够聚集大约10万兵力来对付22.3万反对他的对手——这真是组织工作的奇迹。他的对手再次掌握了主动权。奥军首先从侵入西里西亚开始，卢东6月23日在兰茨胡特打败了一支由富凯统帅的普军，并于7月26日占领格拉茨。道恩统帅的另一支奥军和车尔尼硕夫统率的一支俄军进兵支援卢东。这些援军全都近在咫尺（以9万对腓特烈的3万）；卢东有了这些援军，遂于8月15日在利格尼茨进攻普鲁士军队，结果一败涂地——这是反普鲁士联盟显然未能协调所致。此时腓特烈正忙于西里西亚问题，奥俄军队遂进入勃兰登堡，占领柏林（10月9日至13日）。腓特烈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前去解救柏林，但却未能截住正在撤退的入侵者。同样，奥军也收复了大部分萨克森选侯领地；他们虽然于11月3日在托尔高受挫，但仍守住了德累斯顿。托尔高之役是道恩和腓特烈的最后一战。确实，腓特烈在以后的生涯中还上过一次战场，而那一次并没有打过大仗。托尔高战役再次证明，腓特烈在这时显然是战略的僵持中，从战术上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位高手。

西线的战事同样是胜负不明。布罗格利在科尔巴赫打败了斐迪南的侄子不伦瑞克王储（7月10日）。于是，王储按照斐迪南的命令在莱茵河下游佯攻，但在洛斯特营被卡斯特里打败（10月16日）。只是由于斐迪南在瓦尔堡打了胜仗才挡住了法军进一步的前进，并且解救了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

1761年的事态进一步确定了欧洲的这种军事僵局。卢东于10月16日攻占了西里西亚的施魏德尼茨，因此奥军便能够在西里西亚和西萨克森扎营过冬。俄军进入波美拉尼亚以后，于12月占领了沿海要塞科尔贝格，并留在波美拉尼亚过冬。在西部战场，斐迪南于2月侵入黑森，但在格林贝格附近被布罗格利打败（3月21日），于是被迫撤退。但斐迪南接着也在菲林豪森挡住了法军对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的入侵（7月15日）。普鲁士一直未被征服，但已陷入困境——在此之前一直给腓特烈提供兵源、金钱和军需品并且使他能够将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进行下去的各省，现在已不再给他这些支持了；而且随着皮特10月5日辞职，英国的一直支持和源源不断的补贴已成为疑问。1761年年终，腓特烈对形势做了这样的概括：

每捆稻草、每批新兵、每笔金钱、我能弄到手的一切都是，或者说都成为敌人的恩惠，或者证明他们的疏忽，因为他们实际上能把一切都搜刮殆尽。在这里，西里西亚的每个要塞都任凭敌人摆布。什切青、屈斯特林，甚至柏林本身都向俄国人敞开，他们高兴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在萨克森，可以说道恩的第一回合就把我的兄弟扔过了易北河……如果命运继续对我如此无情，我毫无疑问只得屈服。只有命运能使我摆脱目前的处境。[\[9\]](#)

命运大发慈悲，对腓特烈有所偏爱。由于俄国女沙皇叶利扎维塔于1762年1月5日去世，从1759年以来反普联合背后的推动力量随之消失。正是她坚持反对媾和建议，决心瓜分腓特烈的领土，并且把他降为一名将来对其邻国不能为害的选侯地位。由于腓特烈同样抱有决心，在他统治下的每个村庄绝不能丢失，因此战争将旷日持久在所难免——这场战争，除非发生奇迹，只能以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彻底垮台而告终。叶利扎维塔的侄子彼得三世继位。他不信任奥地利，也讨厌法国，而且几乎崇拜这位普鲁士国王。于是他在5月5日立即与这位普王签订和约，归还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从而取得了普鲁士对于为了维护他的家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权利而对丹麦的战争给予支持。俄军撤离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东部；瑞典也效法俄国的榜

样，于5月22日在汉堡签订和约。根据后来于6月16日签订的一项协定，一部分俄军交由腓特烈调遣，于是腓特烈的军力重振，转而攻击孤立的奥军。7月21日，道恩在布尔克斯多夫被打败；10月9日再克施魏德尼茨，于是普鲁士控制了西里西亚。在萨克森，亨利公爵在弗赖贝格打败奥军，这是七年战争中普军未经国王亲自指挥而获胜的唯一大战役。7月，彼得三世被刺，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联盟破坏，这显然解救了腓特烈（叶卡捷琳娜不想为普鲁士的利益与奥地利进行战争，更不愿意为荷尔斯泰因而与丹麦开战），同样她也无意与普鲁士再启战端。奥地利要单独打败普鲁士并收复西里西亚是不可能的。由于西里西亚不能收复，法国就不能指望自己在奥属尼德兰得到补偿。因此，叶利扎维塔的去世为缔结和约解决军事僵局打开了道路；在此以前，由于普鲁士和俄国的态度毫不妥协，这是做不到的。

和谈的主要过程是：起初，英法试图单独媾和，未获成功，结果法国和西班牙于1761年8月15日签订家族契约。接着，由于俄国和瑞典背离反普联盟，欧洲大陆的战争纯粹成为德意志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统治者之间的王朝争斗。其后英法重开谈判，最后终于取得成功。奥地利孤掌难鸣，无法达到它的战争目的，于是也与普鲁士媾和。媾和的过程反映了战争的双重性质，并证明了这一事实：引起法英战争的目的，在性质上与欧洲其他列强之间的争吵是完全不同的。

腓特烈曾于1759年和1761年两次提议：在举行全面会议着手解决欧洲问题之前，法英应当单独进行谈判以解决两国的广泛分歧。他认为，法国一旦与真正的宿敌媾和，就会很快找到办法迫使奥地利效法其榜样。随着殖民战争的结束，次要的欧洲冲突必定会很快瓦解。腓特烈认为：

法英之间单独媾和可以成为全面和约的基础；这两个强国一旦完全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就可以共同协商，对全面和约的初步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其他交战国必须接受这些条款。阻碍这一建议的是皮特。他不愿抛弃腓特烈或考虑把腓特烈排除在外的任何形式的和约。皮特还认为，应当从法国手中夺取更多的东西，然后再考虑和约的条件；他根据18世纪正統的国际关系概念所制订的牺牲法国以夺取海军和商业霸权的计划，是无可辩驳的。即便如此，皮特在辞职前曾建议腓特烈割让领土以换取和平。这种政策成为比特政策的主旨。比特“决心要扮演主角，但没有下定决心要如何扮演这一角色”。^[10]

人们常常责难比特和他的同僚在普鲁士亟须英国补贴的时候却停止了补贴，从而疏远了腓特烈——腓特烈在1773年还谈到当时对待他的这种无耻手段。但是，18世纪外交做法的基调是机会而不是义务。而腓特烈是最不配指责别人在外交关系中违背条约——在这场战争中，他自己就在英国之前提议进行单独和谈。事实上，在腓特烈因为不能接受英国补贴的附加条件而拒绝补贴以前，英国从未断然拒绝给予补贴。1762年，腓特烈在与俄国进行秘密的而且是不忠诚的谈判时已经走得很远，如果英国内阁获悉谈判的条款，是不会同意的。彼得三世改变态度，促使腓特烈准备了一个最后瓜分奥地利属地的计划。腓特烈保守他与俄国打交道的秘密，这是引起英国不满的主要原因，正如比特在1762年4月9日写的：

普鲁士国王陛下仍然指示他驻在此地的使节……极力要求我们支付以前所给予的补贴。但是，英王宣布的条件是……补贴要用于争取和平，而不是延续战争……令人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目睹我国的慷慨赠予被如此地滥作他用，以致在欧洲酿成新的战乱。因此，英王必须在获得进一步的情报，并且更加清楚地看出可能给予的补贴将做何用途时，再决定是否给予补贴。现在暂停补贴尤属必要，因为，一旦普鲁士国王真的与俄国缔约，结果俄帝国的军事力量在天平的那一头消失，那么他将……没有什么理由要求英国给予任何援助，即使他可能愿意为英王陛下的防务提供一旅之师。[\[11\]](#)

简而言之，英国不愿为腓特烈和彼得三世打算瓜分奥地利和丹麦领土的战争掏腰包。

比特的失策为腓特烈提供了借口，但不能说明他做得有道理。比特的办法是笨拙的，而且考虑不周；但是，过去给予补贴是为了要维持腓特烈使之不致垮台。1762年，腓特烈与俄国结盟后，他就想用这种补贴延长战争。比特没有继续给予补贴的义务，因为这种补贴原来的目的与腓特烈这时打算把它用于的目的已完全不同。英国和普鲁士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因为联盟虽然自1758年以来作用颇大，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分歧。“开始时如此突然而且几乎是出于偶然的联盟，很少能够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忠实地得到遵守的，而且执行盟约时的条件又与原来订约时的条件完全不同。”[\[12\]](#)英国与法国交战，需要普鲁士与法国人开仗；可是，对于普鲁士来说，真正的敌人不是法国，而是奥地利。甚至在经济补贴条约签订以前，腓特烈就曾极力主张英国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波罗的海以压制瑞典舰队和俄国的舰队，而

英国则未曾与这两国交战。所以，这是绝不可能的——且不说有切断来自波罗的海的海军仓库的供应的危险，而英国的海军在其主要的战斗中，要承担更多而且更为迫切的任务。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国的目的大都达到了；而腓特烈的目的则不是这样，他希望，为了越来越是普鲁士的利益而不是英国的利益，联盟要继续下去。1760年后，随着普鲁士的境地似已陷入绝境，英国对于这场只是因为腓特烈不愿意牺牲领土给敌人而延长的战争，越来越不感兴趣——英国实际上往往愿意提出忠告，而不愿提供现金。比特由于对18世纪各种关系的基本现实理解错误，过分热衷于和平，在谋略上又完全不是舒瓦瑟尔的对手，而且完全无视战事可能对英国有利这一事实，因此他希望与法国建立永久的和平，而不是传统的不稳定的休战。这就是他在媾和期间何以置英国以及普鲁士的利益于不顾的原因所在。1762年德意志的战事尤其给他在谈判中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手段，但他从一开始就轻率地把它抛在一边。这种不顾一切的态度，在以后的10年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英国在美洲独立战争中的孤立；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争中极力阻挠英国在各德意志公国招募兵员，并且拒绝任何在英国军队里服役的德意志的士兵通过普鲁士的领土。

皮特的目标是要继续对法国的战争，一直打到法国同意达成保证英国霸权的条款为止。舒瓦瑟尔为了反对皮特的这一目的，则威胁说如果皮特不同意达成较为温和的条件，就要把西班牙拉入战争。1761年7月29日英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就此事做出明确的回答和最后的决定”后，舒瓦瑟尔就准备在西班牙的帮助下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因此，他在1765年制定的一项备忘录中这样解释他的动机说：

于是，我向国王陛下建议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是继续与英国进行这样的谈判，即这次谈判如果不成功，这次谈判由于其简单明了，可以作为皮特在比特的势力面前下台时必然会举行的全面谈判的基础。同时——这是我认为必不可少的第二种策略——我开始与西班牙交换看法，其设想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媾和，西班牙国王将会发现，在谈判中支持我们并保障条约的稳定性，对西班牙有利。相反，如果我们这一做法失败，我的计划则是把西班牙拉入战争，法国就能在西班牙参战这一新的复杂情况下所出现的事态中得到好处，并且补偿它的损失。最后，如果事态不利，我的看法是：西班牙的损失会减轻法国可能遭受的损失。[\[13\]](#)

家族契约及其密约规定：在西班牙对英国的许多不平未得补救以前，法国将不媾和；如果到1762年5月1日为止的8个月内不能缔结和

约，西班牙就将对英国宣战。西班牙即将在这一天接受法国于1756年5月从英国手中取得的米诺卡岛，并在战争期间派兵守卫该岛。如果战争最后取胜，法国将尽一切努力保证在媾和时将该岛割让给西班牙。其他海洋国家如果希望加入此约，亦应允许加入。葡萄牙将被邀请加入此约，以便对英国关闭其港口和停止贸易往来；如果葡萄牙拒绝，它将被看法西两国的共同敌人，是英国的盟国。法西两国将协调一切军事计划。西班牙原来计划的拥护者们就像后来的拿破仑一样，总是认为英国的力量完全依靠它的商业；他们在拿破仑之前就向法国建议组成一个欧洲大陆体系，在欧洲各港口把英国贸易排除出去。舒瓦瑟尔准备争取俄国对这一计划给予支持；西班牙自己则将与地中海各国打交道。这个计划根据要获得某些补偿以抵消英国在海外夺取的征服地这一旧的观点，还建议进攻直布罗陀、牙买加和爱尔兰，甚至建议由法国入侵奥属尼德兰——这真是一个防备这一宏伟计划可能遭到失败的奇特的保险政策。舒瓦瑟尔却希望西班牙集中力量对付葡萄牙——葡萄牙拒绝了要它参加进来反英的建议，因此于1762年遭到入侵。葡萄牙在一支英军的援助下，成功地进行了抵抗。只是作为孤注一掷，舒瓦瑟尔才在1762年计划对英国发动一次法西两国联合的反击，以便迫使它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其办法就是渡过一片没有制海权的海洋入侵英国。为了获得5—6个星期的区域性暂时的制海权，则在葡萄牙采取军事行动，并佯攻直布罗陀和牙买加，进行牵制以分散英国的海军防御力量。为了避免由于大批部队集中而引起怀疑，这次行动预计要采取连续波浪式的运动；默兹和下莱茵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军队作为后备队的10万部队，只是在需要时才向沿海一带进军。

两个波旁国家之间的这个秘密联盟是皮特辞职的原因，因为内阁拒绝了他提出的立即采取措施对付这一可能进攻的要求。舒瓦瑟尔继续与英国和谈，他只是在争取时间等待这个联盟瓜熟蒂落，因此英国终于不得不面对着这个新的敌人。1762年1月2日宣战；到年底，哈瓦那、马尼拉和菲律宾全都落入英国手中，这主要是皮特在辞职前所作的计划的结果。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欧洲列强间所有直接和谈的尝试，在叶利扎维塔逝世之前都未告成功。不妨举例说明。1761年1月22日，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通知俄国首相说，法国由于国内原因需要和平；他还指出，普鲁士由于当时局势危急，肯定会听取合理的建议。第二天，奥

地利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女沙皇在答复中坚持：联盟的原来目的，即“在根本上永久削弱普鲁士国王”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前，就谈不上什么公开的和平建议。此外，她还附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奥地利保有在西里西亚实际征服的土地，调整瑞属波美拉尼亚的边境，并把东普鲁士割让给俄国自己），只要还有一点可能继续战斗下去，腓特烈就绝不会接受的。和会可能召开，但战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休战只会对腓特烈有利。俄国驻伦敦大使戈利钦提出的关于所有交战国及其盟国在奥格斯堡开会调整全面和平的建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762年，法英重开直接谈判。和约的前言于11月3日在枫丹白露签字，并于1763年2月10日在巴黎条约中得到确认。根据条约关于欧洲战争的条款，法国同意归还除普鲁士以外的英国所有的德意志盟友的领土，即撤出和归还汉诺威、黑森和不伦瑞克。普鲁士领土（莱茵河领地克勒韦斯、格尔德和默斯），只有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知悉并同意的情况下才可撤离。双方同意不再向他们的欧洲盟国进一步提供援助。除非西班牙同时媾和，否则英国将拒绝与法国媾和。于是舒瓦瑟尔劝说西班牙同意于1762年8月进行谈判；西班牙根据最后条约从葡萄牙撤出。

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在胡贝图斯堡议定的解决办法，反映了恢复“战前状态”的这一军事僵局。腓特烈不让俄国参加这次为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和谈，因为俄国早已退出了这次战争。腓特烈依然无可争议地拥有西里西亚，奥地利没有为收复这个省再动干戈的企图。腓特烈甚至在1762年与俄国和谈时就准备放弃东普鲁士以换取萨克森，这时他不得不放弃这块选侯领地了。他本来希望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三世全部或部分地保住这块领地，虽则他拒绝为该地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腓特烈也许诺投票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长子约瑟夫大公为罗马天主教徒的国王。

英国放弃了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的法国属地，这就回击了关于它已抛弃普鲁士的讥讽。当一个强国为了保证一个遭受压迫的伙伴恢复“战前状态”而放弃它的一部分征服地时，人们如果认为战胜国的让步与敌国归还该伙伴的领土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关系，这是合乎情理的。英国政府在英法谈判中所采取的行动，向普鲁士保证了它可以收复其西部的属地；这些属地，普鲁士过去是无力保卫的；而且，如果

不是它的盟友英国对法国提出以殖民地作为牺牲，这些属地也是无法收复的。

虽然七年战争没有使欧洲的领土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它对欧洲各国的地位和未来的政策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运气以及腓特烈的军事才能，使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免于覆灭。

普鲁士的四面边境极易受敌，决无希望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免遭侵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贫穷、人口不多的小国君主腓特烈是否能够保持一支与两个大帝国的联合力量相抗衡的军队；这两个帝国中的每一个可以投入战场的军队在数量上都超过他的军队，并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问题腓特烈所以能够顺利地做出答案，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并打败敌人，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奥俄对手联合中存在着缺陷和相互猜忌以及在气质上存在着他能够充分利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弱点。[\[14\]](#)

7年来，腓特烈坚持住了，没有被奥地利、俄国、瑞典、德意志南部各邦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兵力所组成的协调的，但并不完善的联军所打垮，虽然他的属地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普鲁士1/9的人口在战争中死亡；津贴和对被占领地区的掠夺，只能支付战争的财经费用的1/4到1/3。腓特烈自己就这样写道：

普鲁士的人口在七年战争中减少了50万。这个数字在450万的人口当中是相当大的。贵族和农民遭受这么多军队的劫掠和勒索，如今除了破衣烂衫外，已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没有足以维持每日所需的钱财。城镇已不拥有警察，公平的精神和秩序已为无政府状态和自私自利所取代。由于敌军频频入侵，法官和税收机关的工作废弛。随着法纪的荡然无存，轻举妄动和贪婪强暴之风大长。贵族、商人、农民、工人和制造商极力提高他们的劳力和产品的价格。人人似乎都想用敲诈勒索的办法相互毁灭。这就是以前曾经如此繁荣的行省在战争结束后呈现的可怕景象。各省的面貌就像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勃兰登堡。[\[15\]](#)

据战后第一年的估计，波美拉尼亚需要家畜8766头，每头价值25塔勒；1246家农舍毁于战火，需要重建。诺伊马克损失68866头羊。屈斯特林完全毁于炮火。西里西亚空旷的农村需要3723栋房屋、2225座谷仓和3495个马厩；城镇则需2917栋房屋、399座谷仓1380个马厩。选侯地马克损失25000匹马、17000头种牛、20900头母牛、121000头羊和35000头猪。

腓特烈为了使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在欧洲几乎完全限于孤立——与英国不和，与法国没有外交关系，总是与奥地利和萨克森为敌。在这种形势下，与俄国结盟势在必然。俄国参加这次战争除了提高声望以外一无所获，这时则和腓特烈共同对波兰王国的命运发生了兴趣。

法国投入了一场精疲力竭而徒劳无功的战争，在欧洲大陆上扮演了一个从属的角色。它在人口和军事资源方面还是欧洲第一流的强国，但在战争中已不负往日的威望了。法国色厉内荏，要他人以欧洲第一大国相待，但国内意见纷争不已，国力已经削弱，士气受到打击，全国深受震撼。缔结一项保证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普鲁士的军事威望的和约，这对于法国来说只能是“不光彩的和约”，要尽快予以纠正。再者，思想上的习以为常以及政策，使联盟改弦更张变得困难了，这就像使法国陷入这场战争时那样。法国对奥地利的强烈的传统敌意根深蒂固，靠一代人的创造性的外交活动是根除不了的。七年战争灾难性的结果，严重地动摇了法国的王权并为它的垮台做了准备；这个结果是法国政府何以在1791年后匆忙地回到故道上去，回到对奥战争传统去的一个原因——奥属尼德兰被“革命的法国”占领。法国不再是欧洲的仲裁人。在七年战争以后的年代里，力量均势东移。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控制了欧洲大陆的事务，而法国的势力，特别是在东欧的势力被取代了。一些重大事件，如1772年瓜分波兰和1774年肢解土耳其，都没有法国的参加。

英国不能两全其美。英国能够要求比它已经要求的还要苛刻的条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皮特本来可以这样做的：搞垮法国使之无力进行报复，并且使之降为二等国家。在他看来，和约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使敌人恢复了昔日的威风；而且和约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英国得到的地盘抵不上交出的地盘。皮特的现实主义遭到这样一些人们的反对，这些人认为，法国即使被搞垮，也不会永远一蹶不振。像法兰西这样有活力的民族，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报仇雪耻。此外，实际上对海军资源进行垄断，就会激怒各海洋国家，促使他们结成敌对的大联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又满足于维持一种使勇武好斗的敌人可以忍受的局面，结果英国毫无意义地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英国已经走得很远了，超过了法国所能接受的程度。在那个时代，让步表示软弱，而非实力，因此舒瓦瑟尔已在考虑报仇雪耻了。此外，用孤

立主义的和约来结束一场干涉别国的战争，是毫无用处的。七年战争的结果意味着，英国和法国之间这场范围比较广泛的斗争，这场争夺统治权而非几块属地的斗争，仍然有待分晓。

（潘永樑 译）

-
- [1] A. J. P. 泰勒：《德意志历史的进程》（伦敦，1945年），第28页。
- [2] R. 佩尔斯：《美洲对欧洲大陆的战争，1739—1763年》，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1卷，第460页。
- [3] 布赖恩·顿斯托尔：《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伦敦，1938年），第209页。
- [4] P. 加克索特：《腓特烈大帝》（英文版）（1941年），第180页。
- [5] 关于乔治二世1757年3月30日的命令，参见埃文·查特里斯《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塔斯》（1913年），第2卷，第252—255页。
- [6] R. 洛奇：《18世纪的英国和普鲁士》（天津，1923年），第101页。
- [7] R. 佩尔斯：《美洲对欧洲大陆的战争》，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1卷，第441页。
- [8] 迈克尔·刘易斯：《英国海军》（伦敦，1948年），第45页。
- [9] E. 丹尼尔斯：《七年战争》，载《剑桥近代史》（剑桥，1909年），第6卷，第297—298页。
- [10] R. 佩尔斯：《美洲对欧洲大陆的战争》，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1卷，第463页。
- [11] J. H. 罗斯：《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第2编，载《英国历史评论》，第29卷，第269—270页。
- [12] J. H. 罗斯：《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第2编，载《英国历史评论》，第29卷，第275页。
- [13] J. S. 科贝特：《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第2卷，第185页。
- [14] H. A. L. 菲希尔：《欧洲史》，1卷（伦敦，1936年），第759—760页。
- [15] 菲希尔：《欧洲史》，第765—766页。

第二十一章 美洲殖民社会的发展

1. 拉丁美洲

由于欧洲列强的克制，西班牙在1714年看起来还保持着它的美洲殖民帝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许多外界的观察家认为，西印度群岛或其一部分会很容易地与西班牙分离开来。但是，不管这种见解是否正确，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西班牙在政治上得到法国的支持；它的敌人需要的是它扩大贸易，而不是要它扩张殖民地。西属美洲仍属西班牙，只是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声誉已一落千丈。在整个18世纪前半叶，在西班牙的国内外不断出现了大批书籍和小册子，抨击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行政管理机构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其软弱无能。

大多数外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对美洲各殖民地附属国的实际或潜在的财富垂涎三尺，另一方面对西班牙的行政管理失当则表示蔑视。例如，在“一个英国商人”（约翰·坎贝尔）于1747年在伦敦出版的《美洲的西班牙帝国》一书中，这种双重态度就十分明显。作者写道：“恰当地说，西班牙人的弱点乃是他们政府的弱点。这里既不缺人，也不缺少防御的能力。只是省长们以及其他国王委任的官吏如此玩忽职守，以致造成世风日下，腐败丛生、民心萎靡。”这位“英国商人”接着列举外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历次进攻，指出其中一些进攻得逞，但更多的进攻却被当地英勇的抵抗所打退。他因此得出结论说：“因此，看来毋庸争辩的是，这些地区里西班牙人受挫的原因，不在于西班牙人的软弱，而是历届西印度殖民议会的无能。”诚然，发表这些见解的人出于贸易的利益，对向西班牙开战感兴趣。可是，西班牙的作者们也持同样的看法。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阿在1749年合著的《美洲秘闻》一书的序言中，就有类似的论述：“西印度群岛诸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作物繁茂……由于远离国王和他的首辅，而被置于一群只知个人利益者的统治之下……如今沦落到如此地步……正义不张，讲理无门，以致社会混乱不堪，邪恶

横行无忌。”^[1]序言后的报告正文最直率和最详尽地揭露了卑劣的暴政和行政中的腐败现象。而且这是一份由两位被派往南美洲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海军军官写给国王的秘密报告，他们并无诽谤殖民地政府的动机。一些作家把西印度殖民地的财富和潜力跟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无能之间的突出矛盾，与人们对夺取这块殖民地所采取的方式所感到的内疚心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自责的情绪并不新鲜——从16世纪以来，西班牙的理论家们就一直具有这种心理——可是，18世纪政治上的悲观主义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心理。德马克纳斯在他辛辣的《西班牙的遗嘱》一书中，让垂死的西班牙留给它的继承人“……几块有价值的领地。这些领地是一个热那亚人以废黜几个君主和剥夺本地人民自由的方式给我挣来的。我并无凌驾于这些人民之上的权力，正像他们没有凌驾在我之上的权力一样……现在我宣布，我拥有的这些辽阔领地是靠巧取豪夺抢来的……”^[2]他接着写道：“事实上，除了海岸线上一些小小的领地，以及几个岛屿以外，我实际只是控制很少一部分的西印度群岛。那里还有很少一部分土地属于法国和英国。但是，这些国家的勤奋，通过它们的积极活动，也由于我的疏忽大意，使他们能够开发了他们殖民区的内地。”

整个西班牙帝国的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说明上述悲观情绪是有道理的呢？西班牙本身在经历了漫长的、破坏性的王位继承战争后已变得贫困；这场战争是在死气沉沉的查理二世的统治结束以后发生的；它却使波旁家族的腓力五世登上了国王的宝座。国家在查理二世统治下就已衰败不堪。在整个17世纪，敏感的西班牙人由于贫困、失败和不满，心上早已压抑着一种国势衰落之感。他们对这种衰落感的反应是退缩到挑战性的孤立状态中去，对陈规旧俗抱残守缺，拒绝接受或承认外来的思想。17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在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它却没有波及西班牙。根据当时的标准衡量，西班牙和西属美洲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都很落后。许多有头脑的西班牙人感到这种落后状态乃是奇耻大辱。

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直接影响了西印度，因为殖民地中的欧洲人和混血种人的人口日益增多，但却又不能从西班牙得到足够数量的、价格有竞争性的黑奴和工业品；而殖民地产品，除了金银以外，在西班牙市场上也没有多少销路。西属美洲的繁荣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的许多（也许是大部分）海上贸易都是与走私贩子进行的。来自

西欧所有海上国家的商人都公开嘲弄塞维利亚-加的斯的垄断政策，甚至殖民地官方船队也常常运载外国的货物。

如果说西班牙无法供应殖民地的必需品，那就更谈不上能保卫这些殖民地了。西印度殖民地一直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才有了职业军队；而在此以前，各省极易受到攻击，充其量只能靠组织当地的民兵进行自卫。至于海军，它在腓力二世统治末期遭到惨败后，从此一蹶不振。可能负有在进入加勒比海航路上巡逻以保护贸易的巴洛父托无敌舰队则时有时无，因为维持这支海军的经费多次被挪作他用。在战时，从西班牙本土派出的作战舰队常常装备不良，数量太少，不足以担任所负的任务。在和平时期，殖民地人民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击海盗的袭击。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期间，较小海港的所谓“防卫”实际就是撤退，即带着能搬动的财产，匆忙撤到内地，一直躲到危险过去。这种“防卫”方式并非总是不成功的，因为甜酒和黄热病有助于削弱来犯者。当然，大多数较大港口是设防的，也能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正如1741年英国海军上将弗农在卡塔赫纳港发现的那样，但在那时，情况已有改进。在18世纪初，加勒比海大多数港口的海防工事未受重视，卫戍力量很弱。多亏主要城镇全在内地，这成了殖民地最好的卫戍手段。

然而，17世纪西班牙日渐衰落的最严重征候出现在普通的民政事务中。天主教君主（如查理五世，一定程度上还有腓力二世）在选拔重要官员时是相当慎重的，这是他们的显著特点；但到了哈布斯堡家族后来几位君主统治的时期，则是随意提拔宠臣，最后，竟发展到普遍把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出卖官职的做法，从出卖小官职如法律公证人或镇议会的议员，发展到除法官以外的所有各种职务都可以出卖。国王常常无视大臣的忠告，把许多责任重大的职位卖给一点也不称职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又通过代理人视事。在查理二世统治时代，甚至连西印度殖民议事会本身的席位也出卖。这样，当这个殖民帝国的制定政策的主要机构的成员职位就被人视为私人投资，整个行政管理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日趋瘫痪。卖官鬻爵不仅是国王与臣仆之间的简单交易，而且本身就是一宗组织严密的生意。官职不但能用钱买到，而且像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可以馈赠、抵押或没收抵债。人们往往借款来购买官职以进行投机。有时亦可将官职赐予朝廷宠臣，他们再出卖谋取私利。因此，放债人与官职经纪人在交易中作用颇为重要。

国王在西印度殖民地的许多臣仆经常债台高筑，就靠合法的酬金和不合法的勒索来偿还债息。难怪17世纪的殖民地官员在诚实的水平、积极性和勤奋方面整个来说都是低下的。哈布斯堡王室政策的一些值得称赞的特点——如对司法的认真态度和对殖民地土著人民的权益比较体贴的态度——往往被他们忘记了。

但是，整个殖民地的行政机构臃肿，繁文缛节，文牍如山，任何能力高强和忠心耿耿的官吏在工作中总是一定会感到到处碰壁，一筹莫展。在理论上，哈布斯堡王朝的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就是说不请示马德里，对于任何稍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均不得做出决定，也不得动用款项。这就往往意味着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此外，各个中央政府机构即使由能干的大臣掌管，也无力处理每次舰队到达时带来的大量文件。对于一些即使是很小的问题，殖民地总督和检审法院的法官也得等待朝廷的答复，有时要等待几年。决定到达后，执行起来也十分困难，因为在西印度殖民地的发号施令的链条中缺少一些关键的环节。殖民地的各省由省长统治，两个大省则由总督统治，省长和总督都有一个上诉法院为其谋划，上诉法院并起到行政议会的作用。但是，在这些负有责任、享受高薪的命官与地方长官（即今日所谓的地方官吏）之间，却缺少一个环节。地方长官为数众多，除了少数人以外，薪金都很菲薄。他们的辖区大都很小，而且也没有受过什么司法和行政工作的训练。因此，由于上司督察不力，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政绩恶劣。无怪西班牙古老的文学中常把地方长官描绘成可笑的人物。但是，总的来说，地方长官无疑是哈布斯堡的行政体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地方长官的不可信赖，对于印第安人危害最大，因为检审法院虽然特定地负有保护印第安人利益的责任，但它们为数甚少，而且诉讼程序既复杂，花费又大，印第安人根本无法享受上诉法庭的法律保护。监护征赋制——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与印第安人之间所建立的旧的准封建的契约形式——到18世纪初期时，在大部分省份里都废弛了。地方长官成了印第安人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唯一西班牙人，他们的话就是法律。许多地方长官巧取豪夺，横行乡里而不受惩罚。他们估定并征收应向国王缴纳的赋税，强迫有劳役义务的印第安村庄为公共设施服徭役。他们又以地方法官的身份课罚金和收取诉讼费。所有这些职责提供了无休止地侵吞公款和敲诈勒索的机会。此外，他们还以

分派劳役制的名义对一些类别的工业品实行商业垄断。这种分派劳役制本来是为了使印第安的耕种者比较容易地买到欧洲生产工具和其他有用物品的一种手段。但在肆无忌惮的地方长官的手中，这种手段却变成了向印第安人强行推销各种无用而昂贵的货物，从而牟取他们私利的手段。

在殖民地官场中，总督、财务官和法官等省级大员与地方长官这些地方小吏之间的这种脱节，虽然是行政管理上的一个严重缺陷，但却不如西印度殖民地白人社会中两个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严重。尽管大部分的“职业”官员，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官员，都是欧洲出生的；但财富、社会威望和地方势力却大多掌握在充当市镇议员和市镇长官（“直隶市长”）等美洲出生贵族的手中。这些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在惯于使用大量土著劳工的殖民地社会里，养尊处优，妄自尊大，以家长自居。西班牙美洲的白人社会一般来说轻视贸易和体力劳动，他们集中力量从事银矿开发和家畜饲养这类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只需监督他人劳动，而不需自己动手工作。庞大的农庄产业和银矿为他们在城里建起豪华的住宅提供资金。广大的“穷苦白人”也以自己的贵族血统自豪，而且也厌恶劳动。在18世纪，“克列奥尔人”^[3]与殖民地社会中的“梅斯蒂索”^[4]和印第安人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一倾向表现在大学越来越排斥混血种人，从而间接地把混血种人排斥在需要学问的职业以外。

与此同时，克列奥尔人与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他们是强烈排外的贵族，怀着嫉妒和蔑视的复杂心情看待伊比利亚半岛来的西班牙人，包括派来管理他们事务的官员在内——这是乡下人对大都市官吏的嫉妒，是拉丁美洲征服者的后裔对靠着殖民地发迹、由穷光蛋变成富翁的职业抄写员的蔑视。殖民地改革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分散行政权力，更多地利用克列奥尔人的才能，还是为了提高效率和王室控制权进一步实行中央集权。许多资深的观察家向国王提出建议要更多地注意到克列奥尔人的愿望。胡安和乌略阿的著作多处提到克列奥尔人的嫉妒和由之引起的宿怨。他们极力主张政府更多利用经选举产生的市镇长官的权力和威望；他们说，这些地方贵族的命令比欧洲人官员的命令更容易为他们的克列奥尔人同胞所接受。腓力五世的一位大臣坎皮略在著作中也持同样主张，应鼓励克列奥尔人与欧洲人家庭通婚，尤其提倡西班牙军队更普遍雇佣克列奥尔

人、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然而，尽管有这些反复的告诫，18世纪的西班牙政策还是选择了中央集权的办法，这就普遍地无视了克列奥尔人愿望的种种要求。

西班牙的波旁王室在一段时间里，在把西班牙重新纳入欧洲发展的主流中去，并按时行的方针——当时法国的方针——改组帝国政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成功只是部分的，而且按照18世纪的标准，往最好里说，也是缓慢的。卖官鬻爵这种到处存在的政府劣迹，虽然在18世纪程度上有所减少，而且比较细致地被置于监督之下，然而，一直到1812年才被废除。波旁王室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都发生在七年战争以后——如用殖民部代替西印度殖民议会，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建立监督管辖区，作为总督和地方官吏之间的联系环节；废除塞维利亚-加的斯的贸易垄断权，以减轻商业的负担，从而使贸易大增；驱逐耶稣会——所有这些改革，本章暂不论及。改革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的过程从腓力五世时期开始，速度虽不尽相同，但却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

殖民地行政管理中的新精神最早的表现之一，就是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对付教会财产的法令。修道院教士的庞大人数，教会永久管业的大量土地，以及什一税和其他教会税收的沉重负担，所有这一切都是西班牙和西印度殖民地经济中众所周知的民怨之所在。171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列举了这些不平，禁止建立新的修道院设施。1734年，修士会被禁止在10年以内接收见习修道士。1754年又制定立法禁止正式教士参与起草遗嘱。最后这条法令虽则在以后的几年中三令五申，但显然不能实行。在半个世纪后写作的洪堡是殖民时期结束时修道院教士人数和财产的见证人。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早期统治者的反教士立法，除了限制避难权和扩大民事法庭审判犯罪僧侣的权限等明显的措施外，都是贯彻不力和不认真的。但是，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已在产生影响。波旁王室跟他们的前辈不同的是，他们总是声称教会的庇护权是君主直接赋予的，而不是依靠教皇的特许。在这整个时期，在管辖教会中拥护君权的情绪不断增长。18世纪的君主政体不能容忍国中之国；1767年把耶稣会驱逐出所有西班牙的属地，即是国王权力凌驾教会之上的戏剧性的表现。

波旁王室在另一个不同的国王活动领域中进行了一次颇有特色的试验，就是根据腓力五世1728年颁布的法令进行激进的货币改革。这

些法令就是要将制币厂从原来经营的私人承包商手中夺过来。政府将按自己的需要收购金银矿所有的产品并进行加工铸造，不再允许矿主或金银商人擅自铸币。政府制定了详尽的规则，管理新币的设计，从而使偷减币金或制造伪币不能得逞。铸造的金币盾在重量和成色上与银币里亚尔相同；1750年开始实行16：1的固定金银比值后，一盾值两枚“8里亚尔的银币”。新规定几乎立即在新西班牙实施（1732—1733年），但在秘鲁到1748年才实行。新规定不能完全制止货币减色或金银走私——整个18世纪，人们都在抱怨这个问题——但是，明显地改善了财政，节约了开支。可是另一方面，殖民地小面值货币的短缺问题却长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那时没有铜货币，因此，一直到18世纪，印第安人在小买卖中还继续使用可可籽作为辅币。

重新铸造货币的过程中，金银的产量恰好大增。尤其在墨西哥，制币厂里用于铸币的白银量在1700年至1770年间增加了一倍。但是，大部分的制币金银产自几个富矿。在一个财富通常投资在土地上的国家里，流动资本供不应求，不能为矿业提供充分的资金，也不能为深矿提供抽水和维修的机械。18世纪中叶，墨西哥城有3家银行专门为矿主提供贷款，但是它们的财源有限，财政状况也不稳定。另外，开矿的方法则十分落后而又草草，结果只有在地表处蕴藏富矿脉的矿才能保证开采成功。这个工业整个来说是没有效率的；大多数的矿都很小，具有高度的投机性质，而且常遭财务危机的打击。一直到查理三世时期，政府才采取步骤将这一重要的工业加以组织，以便能为这些矿提供较多的资金，为其经营者提供适当的技术训练。

早期的波旁王室虽然很少扶持殖民地的采矿业，但却对把矿业品运往西班牙的海上通道极为关心。政府就像它过去一贯所做的那样，把它在经济事务方面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管理西班牙和西印度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上。外国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塞维利亚-加的斯对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垄断。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要打击走私和重振查理二世时代衰落并在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完全消失的舰队护航的旧有制度。缉私的任务主要交由非正规的缉私船队执行，它的劫掠行为一直给英国造成很大的麻烦。护航舰队在媾和以后不久就开始航行。1720年签订了关于西班牙大帆船和护航舰队的草约，规定定期派遣船队。在1715年至1736年间，小型船队每隔两年至三年开往维拉克鲁斯一次。在此以后，由于战争或战争的威胁，航行停止了20年之久。在

这些年代中，只有5个船队航行到波多贝略；1740年，西班牙大帆船队就停航了。1740年后，船只得到允许绕过合恩角驶向秘鲁，并经常获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补充给养和淡水，虽则这个港口在1778年以前一直是不向一般来往船只正式开放的。当西班牙大帆船队不再航行后，波多贝略的定期集市不复存在了，同时巴拿马监督辖区的繁荣也随之消失。新西班牙船队在1754年复航，断断续续地维持到1789年，护航制度最后被废弃。那时，这项制度早已陈旧得毫无用处了。

在早期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护航制的衰落意味着贸易自由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合法贸易由“注册船只”进行，这些商船自行出航，周转快，效率高。但是，这些注册商船仍然只能由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特许商会的成员承运。只是在其他垄断组织成立后，特许商会的垄断权才被剥夺。因为政府利用外国的办法，即合股贸易公司来挽救贸易的衰落。数量有限的几批私营资本家获得了西印度殖民地的一些特殊地区的商业特权，有时还有行政特权，作为开发这些地区的资源和镇压走私活动的报酬。起初，这些特权只是在那些护航船队的货物很难进入而外国走私贩子却能通行无阻的落后地区，才给予的。于是，加拉加斯公司便在1728年成立，并享有了对委内瑞拉沿岸贸易的垄断权；1734年，加利西亚公司获得了每年派两艘商船前往坎佩切的特许权；哈瓦那公司在1740年成立；与伊斯帕尼奥拉岛和波多黎各进行贸易的巴塞罗那公司在1755年成立。所有这些商业冒险大多由西班牙北部的辛迪加开始的，这个地区的商人通常不插手与西印度殖民地的贸易。他们遭到安达卢西亚地区垄断商人的极力反对。这些公司中，除了一家以外，或由于经营不善，或由于运气不佳，或由于政府干涉，结果都在经济上告失败。只有加拉加斯公司是一个例外，它维持到了1785年，最后并入了菲律宾公司。该公司控制了委内瑞拉海岸，镇压了那里不少外国走私活动，使经海路运到西班牙的可可籽增加了一倍，而且大幅度降低了价格。它还发展了烟草、棉花、染料木和靛蓝等这些有利可图的贸易。它像垄断公司通常所遭遇的那样，受到殖民地人民的痛恨。但是，由于成立了这个垄断公司，委内瑞拉的繁荣也随之开始了。

殖民地的克列奥尔商人没有从这些发展中得益。尽管成立了这些公司，也许正因为成立了这些公司，加的斯的行会做出不懈的努力把南美其余的贸易更严密地限制在行会成员的范围内。1729年，它获得

一项法令，规定只有本行会的有表决权的会员才有权用西班牙大帆船队和护航舰队运送货物的权利。同年，它又颁布规定，禁止美洲的商会充当出口公司的代理人。1735年，又禁止西印度的居民向西班牙汇寄金银用作向西印度出口的货物的投资。克列奥尔商人只有通过行会会员才能在加的斯做生意；虽然此项规定在1749年正式撤销，但实际上在此后的30年内还起作用。帝国内部的贸易自由到查理三世时才扩大到克列奥尔人。这时，克列奥尔商界的怨恨和失望已根深蒂固，单单这一项表示帝国优惠的制度已无法平息。

早期的波旁统治者在政治管理方面同样是保守的。他们在选拔殖民地高级官员时比前辈更为谨慎，仅此一点就足以保证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有明显的改进。除此之外，他们在行政管理的方法上就没有多少重大的改变。但是，他们却彻底改组了西印度殖民地的行政单位。在南美洲，秘鲁总督曾负责管理整个大陆上包括拉普拉塔河上边远而日益扩大的居民区在内的西班牙领土。18世纪，总督辖区一分为三。安第斯山北部的广大地区，先是在1717年临时地，接着在1739年永久性地从利马划分出去，从而在圣菲（即现在的波哥大）成立一个新的总督辖区。基多和巴拿马两个管辖区保持原样，隶属于这个新的总督辖区。但是，巴拿马作为一个独立的管辖区只维持到1751年，它的法院被取消时为止。它的司法和行政事务就转交给圣菲。另外，新近繁荣起来的委内瑞拉于1742年被宣布为一个单独的省，由其总督管辖，脱离圣菲的管辖。从此，委内瑞拉除了与玻利维亚进行过短期的联合外，一直单独存在。智利同样在1778年也成为单独的都督辖区。

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行政管理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该河东岸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复杂化了。葡萄牙人自1680年以来断断续续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面保持了一个小小的要塞。西班牙的第一个正式定居点——东方班达的蒙得维的亚^[5]——建于1729年。双方经过多次争执和动武以后，于1751年签订边界条约，划定巴西边界，其走向大致与今日情况相同。这项界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当时领土的实际归属，一定程度上也是按照地理上的便宜条件制定的。它把一些耶稣会传教区移交给葡萄牙。印第安人居民在传教士的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以抵制移交。最后，当西班牙于1762年卷入七年战争时，这项条约终于被废除。但是，在1777年签订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几乎完全重复这项废约的条款，此后就没有再次发生争议。177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

辖区的成立，是出于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也是出于抵制葡萄牙对河东岸领土要求的需要。论争的结果是，在这块现名乌拉圭的领土上由西班牙人而非葡萄牙人殖民；由于耶稣会传教士表现出的造反倾向，西班牙遂在1767年决定把耶稣会从所有西班牙的属地上驱逐出去。

另外，在北美洲，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和危地马拉都督辖区保持原状不变；1751年制订的在墨西哥北部成立一个单独的总督辖区的计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而于1776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军事管理机构，以对付印第安人的侵扰。但是，加尔维斯对这一变动做出正确的估计：贫瘠的北部诸省无力维持一个单独的总督建制的费用。

腓力五世、弗迪南德六世和查理三世的大臣们在所有这一切的改革中，表现出要考虑地理上的便利和行政管理的效率的决心，而没有接受在哈布斯堡王室统治时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根据偶然的领土征服而划分的原有边界。18世纪中叶的这些变动大多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保持下来。查理三世时代的主要行政单位在下个世纪中差不多都成为各自为政的独立共和国。

随着西印度殖民地原有的行政机构的调整，各个定居省的边境也向外扩展了。这得归功于传教士的活动，他们深入荒漠和森林，远远走在当时的其他探险者的前头。最著名的传教区是耶稣会会士在巴拉那-乌拉圭盆地的瓜拉尼人中建立的30个闻名的村落；但是，在18世纪初期，安第斯山以东的莫霍人和奇基托人中，以及智利南部刚被征服不久的凶猛的阿劳坎人中，也建立了勤劳而有秩序的村社。这些都是耶稣会活动的地域。自1724年以来，圣方济会僧侣在下奥里诺科河盆地也建立了一些成功的传教区。在西班牙属地的最北端，即新西班牙北部的沙漠边境上，圣方济会修士同样也在扩展他们的教区。新墨西哥这个在17世纪末曾是印第安人进行反抗、从事残忍烧杀的地方；在18世纪上半叶，一系列传教团沿着里奥格兰德河前进，重新在这里定居下来。成功的传教活动于1716年在得克萨斯开始了，而在帕努科河和圣安东尼奥河之间的新桑坦德，则始于1746年。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士从索诺拉推进到下加利福尼亚，18世纪末又推进到上加利福尼亚。这些北部的传教区大多得到由小股士兵驻防的要塞（边境堡垒）的保护。它们与瓜拉尼人的村落不同的是：不像那里的耶稣会会士在国王的支持下通常总是把不信教的西班牙俗人赶出教区。撇开这点区别不谈，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教区，全都是按照似乎相类似的规划组

织起来的。他们都在教区神父的指导下从事村社式的农业，以及纺纱和鞣皮等小型辅助工业。许多传教士是农业上的热心革新者，在许多地区引进了本地人原来不懂的家畜饲养和果树栽培技术。今天有不少传教区的遗址上仍能找到果园的断壁残垣。大多数传教区的发展是靠神父们的本事，他们说服半游牧的印第安人在教堂或布道馆附近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并从事定居农业生产。在一定意义上，18世纪的传教区是16世纪监护征赋制的继续。在原始的边民中，这种定居手段比别的办法效率高得多。在耶稣会驱逐后，随着18世纪后期对传教活动兴趣的减退，许多传教区由于无人经营而败落了。但是，在许多地区，殖民活动由继传教士之后来到的并同样受到军事保护的牧场主和探矿者继承下来。所以，16世纪只是在发现新矿、建立新的市镇方面胜过18世纪。旧金山、阿尔伯克基、圣安东尼奥、彭萨科拉、蒙得维的亚、库库塔、科皮亚波、兰卡瓜，以及许多较小的城镇，全都是在这段活跃的疆域开拓时期建立的。

在西班牙美洲疆域扩张的同时，巴西的扩张更为引人注目。17世纪，葡萄牙的殖民大多局限在东海岸和东北海一带的一些小城镇和甘蔗种植园；除了搜捕奴隶的小分队外，没有人深入内地。但是，17世纪末，在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发现了丰富的金矿，于是掀起了涌向西部的淘金热，一时间沿海的一些地区的人口大减，并为法国人于1710年和1711年在里约热内卢乘机武装登陆扫清了道路。这种真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欧洲移民不断地到来而得到填补。18世纪上半叶，巴西的边界推到安第斯山东麓。在主要按交战国在停战时以占领地为领土的谈判原则而达成的1750年边界条约中，西班牙政府承认了这条大大地推进到原来的托德西拉斯线以外的边界。葡萄牙政府把这些新近勘探的、几乎毫无人烟的广大森林地带组建成新的都督辖区。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都督辖区建于1709年；这个都督辖区陆续被划为米纳斯吉拉斯（1720年）、戈亚斯（1744年）和马托格罗索（1748年）3个单独的都督辖区。在边远的南部，西班牙人是危险的邻居；那里的南里奥格兰德畜牧省的殖民是在1734年开始的，1735年圣卡塔林纳建成为一个单独的都督辖区。这样，在南方就形成了一个畜牧业和矿业的社会，其经济和政治力量足与北方较资深的种植甘蔗的畜奴省份竞争。北部殖民地衰落的漫长过程早已开始。1751年，里约热内卢成立上诉法院，管辖南部几个都督辖区的司法事务。1763年，蓬巴尔把整个国家的首都从巴亚迁往里约热内卢。

蓬巴尔从1750年至1777年任约瑟夫一世的大臣，他在葡萄牙的同辈人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对巴西的贡献就像弗迪南德六世和查理三世对西属美洲的贡献一样巨大。葡属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一直比西属殖民地更松散，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封建。蓬巴尔成功地推行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这在如此辽阔和尚未开化的国家是非凡的。他在给予巴西以政治统一问题上，要比任何其他大臣更为尽责；而这种政治统一不像西属美洲那样，巴西竟保持下来了。他废除了很多私人都督辖区，这种辖区显然与时代不合，却一直存在直到18世纪中期，并大大地削弱了王室都督辖区中地方官吏的独立权限。他废除了每年由官方派出船队的笨拙的旧有制度，提倡由商业公司接替葡萄牙的贸易垄断。他对矿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普遍采用先进的开采方法。他像查理三世一样，并出于相似的原因，但却早于西班牙人8年就把耶稣会从他控制的属地上赶了出去，从而给在巴西印第安人中的传教活动、殖民地人民的教育和普遍的智力开发等带来严重的损失。蓬巴尔最终使巴西成为一个有防御外敌侵犯，并且有条不紊地进行开发的殖民地。其财富和人口已可与母国匹敌，而且不久即将超过母国。

不论在西属美洲或葡属美洲，人们感到殖民地正在超过母国，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克列奥尔人奇怪的（然而却是可以理解的）不满之一，似乎就是许多美洲人访问欧洲时所感到的那种幻灭情绪；马德里比起美洲的城市却是这样的寒酸。18世纪在全拉丁美洲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拉丁美洲许多城市中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筑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们的许多“丘里格拉风格”的装饰在形式和技巧上表现了印第安工匠的手艺。拉丁美洲在其他观赏艺术方面并不突出。绘画在殖民地就像在西班牙一样，显然从17世纪就衰落了。18世纪的绘画作品在数量和尺寸上都很可观，但艺术价值不大。然而，对绘画的大量需求证明了财富日益增多，也反映了家庭和城市的自豪感。

在文学创作方面，殖民地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西属美洲的大多数主要城市到18世纪上半叶时有了印刷机，3家殖民地杂志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发行。它们是半官方的《墨西哥报》（1772年）、《危地马拉》（1729年）和《利马》（1743年），都是月刊或半月刊——日报差不多到18世纪末才出现。科学、文学或学术性的杂志在上半世纪完全阙如。在整个18世纪，政府和宗教的检查制度虽则并不特别严

厉，但却是拖拖拉拉、碍手碍脚的，影响了书籍的出版。一直到七年战争后，拉丁美洲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全力推动下，大学中的各专业学院才开始现代化，终于推翻了盖伦^[6]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地位；主要城市中出现了“读书界”；“独立运动”以前的一代人普遍对政治理论产生了特有的热烈兴趣。

七年战争严重地震撼了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在新世界面对着节节胜利而强大的英国海军，大有遭到孤立的危险。加勒比海最坚固的要塞哈瓦那的陷落，这向西属美洲人民揭示了西班牙能派来保卫他们的正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然而，除古巴外，殖民地也没有在战争中遭受多大实际损失。倒是西班牙损失惨重，于是西班牙政府自然想通过更充分和更有效地利用殖民地资源来弥补战争损失。查理三世统治的特点是，与法国的关系更为紧密，更有意地模仿法国的方法和主张，彻底检查帝国的行政和军事结构。查理的目标和方法与他的前辈并无明显不同，只是贯彻得比较彻底，比较不讲情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吏进行更为经常和有效的督察，于是美洲社会对西班牙官场的从属关系更加明显和一致了。与此同时，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地面防务承担了更为沉重的直接责任。七年战争表明，地方民兵不能胜任军事的需要，因此，从战争结束时开始，就在西印度殖民地长期派驻一支数量相当大的正规部队，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支驻军的高级军官通常是伊比利亚半岛出生的西班牙人，这就使克列奥尔人军官认为（无论是对是错），他们的晋升机会和在军中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是美洲出生的缘故而受到损害。另外，由于自由贸易，捐税减少，以及人口和资源的自然增加，殖民地经济非常迅速地繁荣起来。所以，波旁王朝的改革有助于美洲财富的增长，有助于提高自信心，同时也进一步损害了克列奥尔人贵族已经受到损伤的自尊心，加剧了他们的失意感。这个贵族阶层的传统忠诚是对帝国王朝而非西班牙，是对国家而非王权。当雄才大略的君主世系消失时，中枢无主的官僚行政机构就无法再使克列奥尔人继续效忠了。

2. 北美洲

1714年，英国的殖民地仍然是靠着沿海边的狭长地带，从阿尔比马尔湾延伸到缅因河的几个河口，一些孤零零的居民点则南至阿什利河和库伯河，北至新斯科舍；沿着海岸仍有一片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北美洲的居民点仍然集中在水位受潮汐影响的沿海低洼地区。

移民到达各条河流的瀑布线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可是从1713年安妮女王战争结束至1755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北美定居地的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拓荒者跟着翻山越岭追寻水獭和鹿的毛皮商人的足迹，随着在缅因采伐白松和橡木的伐木者的步伐，向大陆内地推进。他们沿苏斯克汉纳河、莫霍克河和康涅狄格河而上，经过地势险峻的阿巴拉契亚谷地，由沿海地带进入缅因和卡罗来那，一心要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种人口向外的压力乃是殖民地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1715年至1750年间，殖民地人口从40万增至125万；到1763年，人口已达约200万。一部分是由于一个农业社会的自然增长的结果，在这个农业社会里，土地充足，食物供应不虞匮乏，而且儿童也是一种经济资产。但是，经过由于疾病、事故和印第安人战争所造成的高死亡率的抵消的人口众多的家庭（富兰克林说，一般有8个孩子），只能部分地解释人口的惊人的增长。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移民在边境和边远地区定居。从英国，大批的劳工和匠人加入了横渡大西洋的官吏、商人、教士和教师等移民的行列。不少移民到达美洲后要在一定期限内做仆役以抵偿赴美洲的船资。一些重罪犯人给马里兰提供了可以代替奴隶的劳动力。但是，英国人只占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到1763年，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高地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胡格诺教徒、德国人和瑞士人等大量各民族移民，已开始把美洲变成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

人数最多的移民集团是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德国人。从1700年到1776年，约有25万爱尔兰的苏格兰人移居美洲。由于英国纺织工业的衰落和严重的地租剥削，由于他们是长老派信徒而被列为宗教考查法规定的没有担任公职的资格，他们只得背井离乡，移居美洲，特别是

在1718年前后及1728年和1741年的饥荒以后，移民数量大增。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首先到达波士顿，但早已在那里的他们的加尔文教徒的同胞并不好客，他们就向内地的伍斯特、伦敦德里、新罕布什尔和缅因东部迁移。后到的大批北爱尔兰人就像德国人一样，被宾夕法尼亚的信仰自由的教友会和简易的入境手续所吸引，奔向费城。他们经过已有移民定居的城镇，向内地移动，进入新泽西，沿苏斯克汉纳河而上，进入坎伯兰的山谷地带，在1730年至1750年间建立了主要由苏格兰—爱尔兰人居住的边境地区。这些移民或他们的孩子又从那里出发，沿着谢南多亚河等山谷地带向西南推移，进入弗吉尼亚和卡罗来那。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有传统的反抗精神，不甘心顺从沿海地区的控制，这种反抗精神使他们在后来的独立战争中，大批地加入美洲殖民地军队。

德国移民大多来自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巴拉丁领地。早期的德国移民到纽约省定居，但当地的大地主不愿意让他们占有较好的土地，拒绝颁发土地证，于是他们大部分只能沿着苏斯克汉纳河而下前往宾夕法尼亚，那里土地较多，制度较宽大，而且他们的不少同胞已在那里定居。到1776年，宾夕法尼亚大约已有11万德国人，约占人口的一半。这些“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大多是路德派信徒；他们中间也有一些颇古怪的教派，如门诺宗信徒、摩拉维亚教徒、浸礼会教徒和施文克斐尔德派信徒。这些教徒是在那些被佩恩说服参加他的“宗教实验”的早期虔信派教徒的率领下，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这些德国人也向内地迁移，迁向兰开斯特郡的肥沃的石灰石土地；沿高山谷地进入马里兰西部，1762年在那里建立了黑格斯敦；并迁向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那的边远地区。德国人移民同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移民一样闻名，他们开辟了大片边境的处女地，面对着各种艰难险阻，而且首当其冲。他们不像苏格人移民那样流动，更有决心定居下来从事农耕。他们选择最好的土地，清理土地无比地彻底，建起坚固的谷仓，准备堆肥，饲养良种家畜，这样，他们很快地把中宾夕法尼亚发展成为富饶的农业区，成为西印度的谷仓。他们是寂静教的信徒，希望自己的宗教生活、耕作和农民的精神文明不受干扰。他们在政治活动方面，仍然没有像北爱尔兰人移民那样起着显著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唯一重要的移民集团，就是由运送到种植园殖民地的黑奴组成的，他们的人数从1715年的大约6万人增加到1760年的大约30万人。

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以及移民们在充实边远地区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事实证明，新英格兰的沿海殖民地的贫瘠农场，不能维持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于是比较不幸运的人们为了寻求一个较好的生活，就向更远的地方迁移。这样，他们就来到了马萨诸塞的中部、康涅狄格的东部和罗得岛。有一些人不怕风险北向溯康涅狄格河而上，进入新罕布什尔，或西去进入上纽约。但是，敌对的印第安人和佛蒙特贫瘠的山坡地，严重地限制了移民向这个方向扩展。于是，新英格兰的居民越来越多地转向航海，以求生存。精明的“新英格兰佬”利用他们的鱼、木材、甜酒和快速纵帆船，在整个大西洋盆地建立起繁荣的贸易网。波士顿、纽波特和纽黑文，与其他大西洋沿岸港口的贸易接触，促进了人们向东北的缅因和新斯科舍、向西南的长岛、纽约、新泽西以至遥远的南卡罗来那迁移。由于康涅狄格的居民移居长岛东部，纽约与康涅狄格之间在纽黑文与长岛的贸易问题上的敌对状态更加严重了。公理教会信徒继续从马萨诸塞拥入东泽西，这就给这个省的一些地区打上了“新英格兰佬”的标记。

在南部的几块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人口的向外分散。在沿海的松林瘠地，谋生乏术的贫苦北卡罗来那居民，靠把大量的森林产品用作海军补给品以维持生活。两种新的主要农作物给南卡罗来那带来了繁荣，也使早期的佐治亚殖民地摆脱了饥饿和匮乏。到1715年时，南卡罗来那沿海地区的稻米栽培已成为投入大批资本的种植业；1730年后，当母国政府准许大米作为列入贸易货物细目单中的商品出口南欧时，大米产量便迅速增长。1742年，又从西印度群岛将更为有利可图的靛蓝引进南卡罗来那。这种染料在英国售价很高，种植者可赢得33%—50%。因此南卡罗来那内地的丘陵地区也开始种植这种染料。与此相比，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种植者的境况却日益困难。在烟草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生产费用却急剧上升，烟草的种植越来越无利可图。由于对大米和靛蓝的需求，每个奴隶的花费从1700年的25英镑上升到1750年的40—60英镑；与此同时，烟草在英国销售时捐税额定得很高。这样，在萧条时期（如1720年至1734年，及1756年至1765年这两段时期内），烟草种植者损失惨重，欠下了商人更多债务。种烟者在商人债主的摆布下走投无路，只能年复一年地榨取奴隶和土地，而所得利润日益减少。结果是，沿海各县的土地地力

消耗殆尽，种烟者只得到边远地区垦荒，因为那里虽无河流航运之便，但可保证较好的收成。大种植园主与小自耕农一样，也苦于缺乏土地。这种对土地的渴望导致有相当多的移民西去蓝岭。经济上殷实和政治上有门路的人，就精明地攫取大片超过他们耕种能力的未经开垦的土地的所有权。由于烟草种植利润的减少，他们便日益指望更多地利用向移民出租荒地的投机手段牟取利润。对烟草种植者的无情压力，结果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边远地区的移民前锋推进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丘陵地带，这样就与沿着丘陵谷地从宾夕法尼亚源源南下的移民发生了冲突。弗吉尼亚人发现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占地者挡住了他们的进路。这些“塔卡霍人”与“科黑人”之间在土地所有权、政治代表权和宗教机构等问题上的冲突，是将来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

佐治亚的早期历史进一步说明，种植园经济有扩张耕地面积和集中成为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倾向。佐治亚是在本时期建立的唯一新殖民地，其目的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对付西属佛罗里达、法属路易斯安那和南方的印第安人的堡垒，为了开发这个地区有利可图的毛皮生意，也为了给英国债务监狱中的不幸者提供一个避难所。佐治亚的创始人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是军人兼慈善家，他设想把殖民地建成为一个边境要塞，由重新开始生活的军垦农民驻守。在这个殖民草创时期，由一个设在伦敦的托管理事会就像指挥军事行动一样指挥其事务。理事会不准签发大块土地的特许证，禁止移民转让自己的土地，并固定自由身份仆人的工资。虽然贸易掌握在私人手里，但政府经营锯木厂和磨粉厂，并鼓励酒、丝和海军供给品的生产。政府禁止黑奴和天主教会，因为一旦与西班牙或法国开战，他们会成为军事上的累赘。为了扶持与印第安人的和睦关系，皮毛贸易受到严格管理，甜酒进口也被禁止。1732年，奥格尔索普以军事行动的周密手段亲自建立了萨凡纳河畔的第一个定居点。到1740年，约有900名英国人和600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已被运送到佐治亚。但是，这一长远规划很快证明是个失算。土地和劳动力的政策使定居者缺乏资金和足够的劳动力，只能限于种植小麦和饲养家畜，从而妨碍了这个亚热带地区的恰当开发。酿酒和产丝的实验都告失败；没有奴隶劳动，稻米生产不能指望与南卡罗来那竞争。由于缺少仆人和甜酒，毛皮商人也裹足不前。殖民理事会被迫逐渐让步。于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增加了，土地转让允许了，甜酒和奴隶的进口也得到了批准。控制的放松使殖民地能更自然地开

发其资源。来自南卡罗来那的大种植园主把开垦出来的土地合并成有利可图的稻米种植园，由大批输入的奴隶劳力耕种。这些经济改革使原来的试验计划破产。1751年，理事会把管理权交给国王。国王就立即把佐治亚改组成一个王室殖民地，设立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委派总督和行政班子。

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劳力，使新开垦的土地增加了生产，殖民地财富也迅速地增多。内地增加的财富大部分落到商人和土地所有者的手里，广大的小本经营的定居移民和工匠对这些人实行的经济控制越来越感到怨恨。

大地主拥有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得到限嗣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的保护，这就迫使移民大批西进，找寻可以完全保有的地产。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勋爵、北卡罗来那的格朗维尔勋爵、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勋爵和宾夕法尼亚的佩恩家族，占有大片地产，为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定居造成了障碍，他们要么绕过这些障碍，要么置之不理，自行占地。哈得逊河畔的大庄园也使南去的移民流向他方。可是，资本雄厚并有政治势力的人，除了原已占有的这些地产外，还利用人口西迁的压力，攫取西部土地的所有权，投机牟利。几批英国人和殖民地的居民在政府的许可下成立地产公司。如伦敦商人亨利·麦克卡洛克的地产公司在18世纪40年代接收了北卡罗来那的大约150万英亩土地；再如弗吉尼亚绅士们的俄亥俄公司在1749年得到国王恩赐的孟农加希拉河和大克瑙沃河之间的土地20万英亩。但投机热不只局限于显贵达官之中。在新英格兰的城镇地区，原有土地所有者的继承人紧紧控制尚未分配的土地，拒绝把公用地的使用权给予新来的移民。结果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无产业的阶层被推出走向边境地区，而地位牢固的地产所有者从地价的增值中坐收厚利，随时可以给新土地投资。这在1725年后导致了传统的新英格兰城镇居民点建立方式的改变。土地不再批给真正的定居移民，而是卖给土地投机者。这些投机者成为在外地主，如上康涅狄格河等地边境村社的经营情况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从新英格兰到南卡罗来那，这种限制性的土地政策使较早殖民地的富有老户与边远地区贫穷新移民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深。

土地是这种情况，资金也是一样。相对而言，小自耕农可以自给自足，但他需用自己的产品换取某些商品，从食盐、糖蜜以至工具

等。内地过剩的产品不限于农产品，因为殖民地的农民随时留心做生意的机会，来补充从土地上得到的生活资料。在边远地区，农民也猎取毛皮、砍伐木材，还从事土地投机；在沿海地区，农民除了从事农耕外，还可能从事捕鱼、造船以至家庭工业。由于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以南地区开发了新的毛皮生产区，毛皮生意大增。森林出产木材、沥青和松脂等产品，为英国提供了造船的必需材料，并为新英格兰造船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新英格兰造出的船只比母国造的更为便宜和轻快。渔场继续为新英格兰的贸易帝国提供赚钱的主要产品。在农业村社中，日益增加的人口对土布和鹿皮衣服、家庭制作的鞋、家具和家用器皿以及土产铁器等消费品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求，大多是自给自足的。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殖民地内部贸易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结果使商品制造业尝试性地发展起来。随着和平恢复，矿业和生铁生产迅速发展；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鼓风炉和铁匠作坊冶炼出的生铁，不仅在殖民地，而且在英国也有市场。但是，这初露头角的制造业与正在意识到扩大美洲市场重要性的英国制造商发生了利益的冲突。结果是，母国政府不准殖民地采取保护措施，如在1732年的制帽条例和1750年的制铁条例等法律中严厉限制殖民地商品开辟海外市场，从而遏制殖民地工业的任何重大发展。

农业村社中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运到港口，为生意兴隆的商会打下了贸易活动的基础。边远地区的农民长期缺少资金，只能依赖商人的贷款，由此产生的边远地区与城镇之间的贸易差额对城镇极其有利。有资金支持的商人处于主动地位，能利用农民的艰苦劳动成果而大发横财。食品、毛皮、鱼类及木材等产品的贸易落入一批人数越来越少而财力越来越大的商人之手，并为像波士顿和费城等大港口所控制，而纽黑文和纽卡斯尔等小港口则吃了亏。这些集团日益严重的垄断性做法，引起小生产者的不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产品走向市场的销路被人控制了。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商人和小生产者在维护自由市场和自由拍卖的问题上，在内地产品沿萨斯奎哈纳河而下运到1729年以后兴起的新港口巴尔的摩因而造成费城垄断的威胁的问题上，一直进行不懈的斗争。

信贷和价格标准的问题增加了边远地区农民对商人的愤恨。母国政府禁止殖民地铸造货币，而殖民地的硬币外流无力平衡外贸逆差，于是殖民地的货币流通便出现混乱。外国硬币不加节制地混合流通，

还不能满足贸易的需要，尽管不断采用了实物交换、商品抵钱、以膳宿代替工资以及以土地偿付政府债务等办法。因此，殖民地不断靠发行纸币作为权宜之计。殖民地政府为了支付承包商在安妮女王战争期间供应的物资，在征税前就发行了债券。这种债券成为货币的代用品颇起作用，以至在和平恢复，这些债券将要退出流通时，殖民地便设法寻求一种新办法以保持债券的流通。因为农民发现，这些债券提高了物价，从而减轻了他们的债务负担。殖民地议会中有民望的一些党派开始主张以殖民地大量的资产土地，而不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债券。于是，“地产银行”开张了，以债券的形式向农民贷款，而农民则以其土地作为担保。因为农民由此所得到的信贷便利比从商人处借贷容易得多，看来这一新办法是使农民摆脱商人控制的受人欢迎的一剂灵药。商人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这一计划，而且普遍地与地主一起反对。引起他们反对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土地成了担保物，债券的发行量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就无法有效控制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结果，在一个又一个殖民地里，民众派强行通过了遭到垄断巨头顽固反对的纸币发行计划，有效地减轻了债务的负担，使债权人躲避要以贬值纸币结账的债务人。在马萨诸塞，纸币于1733年贬值到如此程度，以至母国政府指示贝尔彻总督严格限制以后的货币发行量，并回收已发行的到期债券。农民为了避免受到通货收缩的危害，在1740年组织了一个地产银行发行纸币，其实际流通全赖民众的支持。商人则组织成立了一个以硬币为基础的发行货币的银行，抵制地产银行的纸币，以示报复。结果，农民中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暴乱。用总督的话来说，他们“变得如此胆大妄为，而又厚颜无耻”，居然于1741年进军波士顿。与此同时，商人们向国王申诉。国王立即把“南海泡沫法”的规定用到这些殖民地，宣布地产银行为非法。结果，许多在银行入股的人破产，其中包括老塞缪尔·亚当斯。在罗得岛，农民在议会中的支配地位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他们能在1710年至1750年间先后开办9家地产银行，用新银行的债券支付旧银行的债务。此外，政府继续发行以税收作为支持的债券，但大大超过了税收额，因此贬值到1750年时只有面值的1/8。这时，英国议会采取断然措施通过1751年的货币法，禁止建立新的地产银行，禁止发行当作合法货币用的债券，只准发行由税收支撑的纸币。这项法令结束了由负债人控制局面的全盛时期，在农业村社中留下了怨恨和不平。

随着殖民向边远地区扩展，宗教精神活跃起来。到1714年，老殖民的比较舒适的环境已使宗教热情消沉。尤其在新英格兰，由于视野的扩大和贸易的繁荣，17世纪清教的清规戒律松弛了。公理教会中神秘的劝诫已让位于布道台的说教。人们对巫术审判的惨剧记忆犹新，对陈旧的神学传统抱有怀疑，在思想上普遍地越来越崇尚世俗和理性。在中部的各个殖民地，公理教、路德教以及荷兰新教等不同教派愈益拘泥于形式，而基督教教友会就像英国国教一样精神不振。在英国国教已经确立的南方各殖民地，持自然神论的宗教观，其教士大多来自英国，就像在英国时一样，马虎松懈，贪图钱财。可是，新到的移民，不论是德国人的虔信派教徒，还是北爱尔兰的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却带来了较为严格的宗教气质，使他们在荒野里生存下去，拓荒者的需求重新提出对一种与个人和感情息息相关的宗教的要求。结果是，宗教精神在福音主义的新教运动中涌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教会。大约在1725年后，这种宗教复兴就可明显地被觉察到了。它重新强调人对上帝的神秘感知、人的犯罪感、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以及通过皈依得救的迫切性。这种宗教复兴不管以什么教派形式出现，它在神学理论上都是朴素的和不苛求的。特别是它强调皈依，强调信仰拯救灵魂，这就完全否定了意志自由从而摆脱了守旧的加尔文教义的束缚。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著名的公理会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使新教运动具有最令人敬畏的理智，并以其令人折服的布道在康涅狄格河谷激起一股宗教复兴的浪潮，这种浪潮在18世纪4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受到德国虔信派教义影响的荷兰新教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和新泽西的长老会教徒共同努力，在18世纪30年代进行了一场福音主义的改革运动。从事同样工作的还有在1717年迁居费城并在边境地区的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移民中从事培养牧师工作的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长老会牧师威廉·坦南特和他的儿子、即日后成为复兴运动有力布道者的吉尔伯特。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传教士的努力，18世纪40年代宗教复兴的精神已在殖民地的教堂会众中鼓动起来，1739年以后达到了高潮。这一年，乔治·怀特菲尔德开始了他从佐治亚到新英格兰的著名旅行，这次旅行在全美洲传播福音主义的热忱方面尽了最大的力量。宗教复兴使正统教会内部分裂成“旧说”和“新说”两派。但是，尽管发生宗派分裂和许多浅薄和虚妄的行为，宗教复兴还是给美洲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直接推动了种种人道主义的努力，从鼓动废奴主义情绪，在印第安人中传教，一直到建立普林斯

顿大学和达特默恩大学等。尽管宗教复兴的影响普遍存在，但在边远地区尤为明显。在那里，这种在罪与得救之间具有截然区别的朴素而激动感情的宗教，为边境地区寂寞和严酷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暂时的、有时是持久的慰藉。“新说”的道德热忱，使边远地区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政治上反对正统派控制的反叛精神具有力量。

殖民地社会动荡不安。随着人口、居民区和财富的增大，沿海地区与内地的社会的区别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殖民地的开拓者离开沿海地区前往内地。当他们加入向内地进发的移民洪流时，就告别了海洋，与他们在原来的殖民地社会中的损失一刀两断，毅然面对着西边的林莽和群山前进。阿巴拉契亚山脉中漫长的移民走廊消除了殖民地之间的界线；人们发现，每个殖民地的边远地区之间要比他们与各自的沿海地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各民族杂居，这就开始产生了一个具有明显社会特征的民族混合体。与此同时，有钱有势的人在东部仍然占有财富，并从移民不断进入的内地取得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担心内地的发展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就决心要维护并加强他们的控制。在这期间，随着港口扩大，大批的店主和工匠应运而生，他们的利益与占统治地位的垄断寡头不一样。结果是，有钱有势的一个方面与贫穷的新来移民为另一方面之间，在地方村镇与几乎是主要的大都市之间，在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同时具有地区的和阶级的性质。

1714年至1763年间，沿海社会变得愈益富有和多样化。内地的发展促使港口迅速扩大。费城在1720年有1万人口，到1763年就成了殖民地中人口超过2万的第一大城市。纽约在1720年时有7000人口，1756年时为1.3万人。查尔斯城1720年为3500人，至1763年为8000人。此外，还有纽波特、纽黑文、纽卡斯尔等20个小港，都拥有繁忙的商业人口。这些城镇中最重要的几个不仅是港口。费城、波士顿和查尔斯城是省会，住着政府官吏、商人、专业人员和旅客，也住着店主和工匠。他们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公路和客栈的条件改善了。乘马车可从波士顿旅行到查尔斯城，及离主要港口30—40英里的内地。从1754年开始，纽约和费城之间开辟了一条驿站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3年改组了邮政服务，使通信更加便宜和快速。对于富人和办公人员来说，旅行第一次成了家常便饭。在南方，南卡罗来那的富裕种植园主习惯于在夏季访问省里著名中心城市查尔斯城。结果是，大城镇

不仅在贸易和航运方面，而且在专业服务和社交方面，都成为重要的中心。贸易的利润和种植业的长期贷款为豪华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现金；随着休闲去处的增加，城镇的生活虽则还不能赶上伦敦和巴斯，但至少开始效法汤布里奇和约克。人们在住房、陈设和衣着方面追求的新标准体现了殖民地的风格。这种风格虽则常模仿他人，而且颇有土气，但具有明显的美洲特色，给日益增多的工匠和手艺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闲暇的增加也促使人们追求文雅的活动，如舞蹈、牌戏和音乐，以至阅读和学术活动。美洲最早的报纸《波士顿时事通讯》虽则到1704年才开始发行，但在1713年至1745年间，至少有22种新报出版。印刷机和图书馆满足了更多阅读爱好者的需要。1744年在费城成立了一个美洲的学府，这标志着普遍知识风气的成长，费城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美洲的文化首府。富兰克林在“自然哲学”的一切分科中博览群书，所表现出的兴趣和天才，就是在这种新的思想风气与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发生接触后产生的。

种植业和商业的垄断寡头的财富日益增加，日益变得世故，这与内地的简陋和贫困恰成鲜明的对照。内地逐渐出现一个由男男女女所组成的简朴的社会，他们抛弃了沿海和欧洲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着眼于西部，专心致志解决森林、沼泽地和山区的问题，逐渐形成了具有美洲大陆特色的世界观。它摆脱了传统的习惯，它不停地迁移，使它具有半游牧的性质。它是属于一个由各民族混合的家系，对于英国的传统即使不厌恶，也是越来越隔膜了。人们经受边境上艰难困苦的锻炼，自力更生，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社会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方面，都是建立在反抗的基础上，它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殖民地的控制——越来越持敌对态度。边远地区的社会原来只指望沿海地区保护它不受敌对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侵扰，一旦法国的威胁不复存在时，它就不需要任何一个外界政府。

母国政府远离殖民地，不了解殖民地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定居地的扩大而出现的各种势力。白厅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依靠沿海的垄断寡头，而垄断寡头所关心的只是保护自己对殖民地事务的控制，以便对付人数越来越多的小农和工匠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小农和工匠是乌合之众，不配有政治权力。在大多数殖民地中，一个由商人和地主组成的狭小集团垄断了政治权力，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正

像在母国一样，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势力问题，经济上有实力并得到社会推举的人，就可得到支持，从而就可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寥寥可数的几个家族在国王的庇护下占据了有利可图的位置，尤其是在颁发土地证的问题上，更不会反对拥权自肥。而国王委派的总督对于他的殖民地议会和指望把国王的政策付诸实施时，正是仰仗这些家族在议会中起带头作用。即使垄断寡头想要与民众派联合起来维护议会的权力，以便对付国王，他们也要毫不迟疑地充分利用国王的权力以抵制自下而来的民众压力，甚至还要求助于英国国会的立法，就像1741年把“南海泡沫法”扩大到马萨诸塞殖民地那样。选出的殖民地议会并不总是易于驾驭的，但总是小心谨慎地务必要使议员中的大多数有利于财产的占有。选举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尽管通货膨胀扩大了投票人的数目。新的殖民地区的代表权审批得极其缓慢，而且被另眼看待，以至于在南卡罗来那，沿海各县有6名或8名的代表名额，但面积和人口都大得多的边远地区却只有一名或两名。弗吉尼亚的一些滨海县，由于掌握在一些大种植园主手中，实际上成为“袖珍”选区。新英格兰城镇议会中的选举权，只有早期移民后裔的继承人（这部分人的比例正在居民人口中迅速缩小）才有资格享有。在土地权授予投机者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内地殖民地中，投票权仍然掌握在波士顿地主的手里。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类似，总督在议会中委任治安官和县行政司法长官，但西部各县面积辽阔，因此县法庭往往远离边境地区的诉讼当事人，十分不便。边远地区由于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权，因此它要想获得符合其利益的政策企图，总是受到挫败。虽然边远地区必须为维持殖民地设施而交税，有时还要纳税以支持英国国教，但是要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票数为边境地区的急需项目征税，就很难了，如筑路修桥和维持殖民地民兵以防御印第安人的袭击等。各殖民地议会一贯拒绝提供充分的防御以对付印第安人的袭击，这是引起边境地区提出特别激烈抗议的一个原因。这种政治歧视的结果是，边远地区的农民感到自己成了严重忽视他们利益的东部垄断势力的牺牲品；而且，因为这个垄断集团受到国王委任的总督的庇护，因此，农民很自然地把王室的旗帜看作压迫者的象征。

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屏障长期把英国人限制在滨海地区的殖民地里。但法国人与这些英国邻居不同，他们有圣劳伦斯河和北美五大湖的巨大走廊地带的便利，可以深入内地寻求毛皮。这种分散状况，在1714年时曾形成一个由森林和水道组成的无力的帝国，它从新奥尔良

的冲击堤，经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圣劳伦斯水系相交叉的弧形地区，一直伸展到海潮裂岸的芬迪湾和雾气弥漫的罗耶耳岛。正在艰苦创业的新奥尔良殖民地与远至伊利诺伊境内的一些内陆居民点，组成路易斯安那省。除此之外，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集中在圣劳伦斯河的沿岸，构成新法兰西省。安妮女王战争以后，新法兰西省虽则失去了纽芬兰和新斯科舍地峡，但仍然信心十足地扩张势力。法国的信心建立在使殖民地成功的两种主要产品：毛皮和鱼。但是倘若还要指望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给法属西印度殖民地供给食品的自给自足的社会，那么则注定要大失所望。因为毛皮和鱼的吸引力不可能使移民真正定居，而几乎没有多少新的法国移民愿意辛辛苦苦地从事收成菲薄的农耕劳作。1744年乔治国王战争爆发时，北美洲仅有的5万法国臣民要面对近100万的英国定居者。多亏加拿大的环境和法兰西的性格结合在一起，才使柯尔贝尔的梦想未能实现。

圣劳伦斯河口的法国殖民地与南方的新英格兰邻居不同，未能以渔业为基础建立渔商农结合的灵活多样的经济。法国政府耗费巨资在罗耶耳岛设立巨大的新要塞路易斯堡，并把纽芬兰的法属渔业人口迁移到该岛。法国政府还希望用同样的方式重新安置在宗主权属于英国的盐碱沼泽地上放牧牲畜的阿卡迪亚^[8]农民。但大多数阿卡迪亚居民顽固地选择仍然居住在气候较温和、土地较肥沃的芬迪湾。法国移民的渔业主要还是由布列塔尼开来的大渔船进行的，布雷顿角常住渔业人口仍旧很少，贸易无足轻重。路易斯堡必须依靠阿卡迪亚供给牲畜，依靠来换取法国人的糖蜜的“新英格兰佬”的贸易双桅船供应面粉、生活用品和木材。

在西部，毛皮贸易的需求压倒一切，妨碍了健全的多样化经济的发展。沿圣劳伦斯河两岸，从魁北克到蒙特利尔，庄园主的权力逐渐削弱。庄园主阶层收入菲薄，但还得装点上流阶层必要的门面。于是就贫困下来，只能靠开店、做毛皮生意或开设小事务所来维持生计。祖籍法国的加拿大居民为了维持生活辛勤耕种土地，但农业的境况很糟，他们的比较有进取心的子孙就弃农而去，在山林中谋生。战争和毛皮业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结果使农业一蹶不振。

毛皮贸易不断吸引着敢于冒险的移民和对圣劳伦斯河谷的贫困生活和教会支配一切的生活感到厌恶的人们。加拿大的河湖上的猎人和船夫组成了毛皮业的中坚，他们虽然受到传教士和定居移民的蔑视，

但仍然保持了不顾一切的勇气、无忧无虑、满不在乎的气质和森林中谋生的本领，这种传统是法属加拿大的特色。毛皮贸易的环境正在迅速变化。在南方，曾起了极好辅助作用的易洛魁人已于1713年接受英国人的统治，于是邻近的安大略湖的法国领土就掌握在敌国手中。再往西，印第安盟友的问题由于部落战争而复杂化了。法国人遇到英国人越来越厉害的竞争，因为英国制造商提供较好的贸易商品，如质量更好的水壶和毛织品，还有价廉物美可以取代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甜酒。法国货不能与这些商品竞争，于是蒙特利尔的商人用皮货与奥尔巴尼堡的英国商人换取这些商品。同时，也由于英国人的这种优势，法国人在俄亥俄河谷开始感到来自宾夕法尼亚人和弗吉尼亚人的竞争。在遥远的西北部也有英国人的影响。在媾和时，哈得逊湾公司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它的属地。现在，公司把质量较好的贸易商品经省钱的海路运到水獭的中心产地，所以价格便宜，这样就把印第安商人吸引到公司的贸易站。但在安东尼·亨迪于1754年至1755年间旅行到达此地以前，英国人还几乎没有进入这一流域盆地的内地。而法国人在拉韦朗德里的带领下向西推进，在18世纪40年代就已设立了一系列的贸易站，为他们自己的贸易开发了苏必利尔湖和温尼伯湖之间的地区。这些新地区的开发维持了水獭的供应，稳定了毛皮业的生产。可是，毛皮价格随着成本的增加而提高，贸易利润就愈益减少。由于贸易站远离蒙特利尔1000英里，法国人的货物质量低劣，货物的运输又常被印第安人的战争和英法战争所中断，所以毛皮业的成本急剧上升。尽管毛皮业分布面很广，这意味着小商人对蒙特利尔的大商人能保持较大的独立性，但毛皮是对外贸易，仍然掌握在垄断机构的手中。从1717年起，西印度公司垄断毛皮贸易。当该公司利润减少时，殖民地政府就发生了财政困难，因为政府在财政上依赖毛皮贸易，同时，为了维持边境防御哨所，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了。

新法兰西实际上受到两个垄断机构的统治：一个是贸易机构；一个是政府机构。以毛皮业为中心的经济未能在大西洋盆地地区发展贸易网，而仅仅依赖圣劳伦斯河与法国之间的单一的贸易干线。同样，政府虽则在内地活动颇为灵活，可是死板地集权于魁北克，而魁北克又严格地隶属于法国海军部。新法兰西的政府始终保持了颇为能为毛皮贸易服务的、中央集权的、家长式专制的特色。但是，由于毛皮贸易妨碍了人口稠密定居点的发展，以致政府最后被防御问题弄得计穷力竭，负有全部责任的魁北克总督和各省省长深深缠在防务问题中不能

脱身。在总督和省长周围，法国和殖民地的官员与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商人阶层，形成一个大致与巴黎相仿的社会；当战争和通货膨胀的阴影加深时，这个社会越加声名狼藉，腐败不堪。教会是这一摇摇欲坠社会的唯一平衡力量。在魁北克大主教的领导下，教区神父和圣职人员继续维护赖伐尔的传统，提倡定居的家庭生活，坚持在印第安人中传教，反对毛皮贸易中滋生的瓦解社会的影响。但是，甚至教会也卷入了政治，如勒卢特尔等耶稣会传教士在策动印第安人反对英国人的行动中起了重大作用。面对殖民地生活中特殊严酷环境的加拿大教会，不断从17世纪严峻的传统中吸取精神营养，基本上没有受到“理性时代”新风气的影响。因此，加拿大教会培养了真正的加拿大式的世界观，有力地帮助了加拿大民族意识的日益增长。新法兰西虽然垮台了，但这种民族意识依然存在。

（潘永樑 译）

[1] A. P. 惠特克编：《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阿在他们1749年写的关于秘鲁情况的秘密报告中写的序言》，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18卷，第511页。

[2] M. 德马克纳斯：《西班牙的遗嘱》（1740年），（墨西哥，1821年），第10页。

[3] 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译者注

[4] 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译者注

[5] 东方班达是乌拉圭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旧称。——译者注

[6] 古希腊名医和医术作家。——译者注

[7] 爱德华兹用无可抗拒的逻辑把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推到极端：他断言存在一个无情的上帝，人在道德上的努力无法抗拒上帝的不可理解的得救预定论。但是，尽管他持有这样极端的正统观点，却强调皈依是得救预定论的明证，强调深刻理解人们心理上的不合理性，这为宗教复兴的新运动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8] 阿卡迪亚是新斯科舍的旧称。——译者注

第二十二章 在美洲的竞争

1. 加勒比海

乌得勒支和约使西属美洲保持原状，但在加勒比海存在三个主要原因引起欧洲强国之间的纷争。第一个原因在于西班牙与其余的国家之间。西班牙人决心要坚持对其属地的贸易实行严格的垄断，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这种垄断权而不容其他的海上贸易国家染指；另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同样决心打入这种垄断，他们或是从西班牙政府那里强行取得特许，或是走私，或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令人奇怪的是，公开的冲突并不是经常地发生。西班牙人显然无力维持其全面的垄断，这就引起第二个争端，就是在加勒比海的其他殖民大国中哪一国应该从西班牙的商业削弱中坐收渔利。在这个争端中，英国和法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而它们之间彼此不信任则是两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谁都没有与西班牙发生严重争吵的部分原因。此外，在第三个或第三类争端中，即在未被西班牙占领的西印度群岛的归属问题上，英国和法国也是主要对手。

这些争端在整个18世纪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今天乍看起来很难解释。当然，人们一贯地夸大了西属美洲的财富，但在海盗行径不再是一种半受人尊敬的职业时，贸易似乎成了分享那份财富的唯一明显途径。事实上，西属殖民地的人口——大多数是贫穷、原始的印第安人——的购买力很小，市场上商品容易滞销。但是，这个殖民帝国产品中占很大比例的金银块，激发了重商主义者的想象力。

要与西属美洲进行贸易，就需要在加勒比海设立基地，以便贮存或转运货物，让奴隶恢复体力，走私者也可在这里找到避难所。像牙买加等群岛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实际上，库拉索岛就是有意夺来用作走私者的基地的。此外，西印度群岛中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岛屿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生产大量食糖，以及靛蓝、咖啡、姜、棉花等少量的热带产品。这些产品虽则并不总是卖给种植园主，但都可卖给把它们销往欧洲市场的商人，获取可观的利润。为了生产食糖，西印度

群岛的种植园主像西班牙殖民者一样，从西非进口大量的奴隶。这样，他们就雇用许多船只，并且间接地使生产“贸易商品”的制造商得到好处，因为奴隶就是用这些商品从非洲海岸上买来的。种植园主还进口食品和木材。法属岛屿是从法国获得一部分这种物资的供应，但英属岛屿的供应几乎都来自北美洲。由于北美洲的居民宁愿向法国人购买售价比较便宜的食糖和糖浆，因此英属岛屿的食品进口就必须用金钱支付。英属岛屿为了获得必要的块金、块银，就尤其需要发展与西属美洲的走私贸易。在坎佩切和后来在洪都拉斯湾违禁采伐洋苏木部分地解决了西印度群岛的现金枯竭问题，虽则这一办法还是不够。加勒比海地区的所有问题和所有争端就是这样互相关联着的。

英国人在与西属美洲进行的贸易竞争中，具备一大有利条件或表面上有利的条件。只有南海公司的贸易权得到了西班牙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十分勉强。乌得勒支和约把为期30年的供应奴隶的专卖权分给了南海公司，并可在拉普拉塔河畔设立使奴隶“恢复体力”的地盘和设施。同时，该公司还获得每年向西属美洲运送一船普通商品的新的特权。船舶的大小有限制，而且西班牙国王分享船货的1/4和其余船货利润的50%；除此之外，公司的货物免税进口。西班牙政府的这些特许，虽然还未达到公司的要求，但在表面上令人刮目，使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

然而，英国靠南海公司而拥有的有利条件实际上是春梦一场。首先，每年一船的货物要在贝洛港市场上出售，而且不可赶在西班牙大帆船队到达之前；公司不能像走私者那样选择可以最高价格出售商品的地点和时间，因此它的利润必受到限制。此外，公司为了取得专利权，还特别保证不进行非法贸易。人们公认地，这种承诺是可以违反的——肯定地会被公司本身或公司的个人进行贸易的代理商所违反；而且公司的承诺也不能有效地约束无营业执照的私商。但是，西班牙人却不失时机地重温条约的这一部分；该公司由于持有官方的特许，拥有巨额的股本和在美洲设有花费很大的组织机构，因此容易引起西班牙人的不满而受到损害。公司的董事们知道，一条英国船只的任何越轨行为都可能使公司遭受财产被没收的惩罚。为此，他们有时就劝英国政府和皇家海军军官不要对西班牙劫掠行为采取完全正当的行动。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那些没有特许权的贸易商的利益，因此它就加倍地不得人心。因为公司显然有取代牙买加私商的意图而遭

到他们的痛恨。甘蔗种植园主也痛恨这家公司，因为它提高奴隶的价格，把最好的奴隶卖给西属殖民地，只把无人要的劣货留给英属岛屿。当然，该公司由于不能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得到充分的奴隶供应，就在牙买加购买许多奴隶。根据专卖契约的条款，公司提供的奴隶也必须符合一定的质量要求；这对公司实在是个严重的障碍。

因为它的走私者运入的奴隶质量较差，售价比公司贩运的奴隶低廉，使西班牙殖民者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但是，这种论据并没有缓和种植园主、私商或英国辉格党内支持他们的人的愤恨。

南海公司的活动在英国和英属殖民地尚且为人们所厌恶，在西班牙就更加不得人心。每年一班的航船尤其引起不断的麻烦。在西班牙人看来，这种新花样与他们正常的贸易政策格格不入。只有在彼此抱有诚意和保持亲切关系的情况下，这些特许权才能顺利实施，可是这种情况几乎总是缺少的。1718年和1727年爆发的两次战争中断了贸易；1720年的“南海骗局”危机不仅打断了公司的贸易，而且使公司信誉扫地。即使在正常时期，每年的班船也不能定期航行。西班牙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贩奴特权和每年班船未被接受来代替原来的非法贸易，而是被用来掩护走私。该公司来自牙买加的贩奴船除了装运奴隶外，还装运其他货物；每年的班船在贝洛港卸货，但有时趁夜从牙买加重新装货。因此，西班牙政府在给每年的班船颁发特许执照的问题上不断制造困难；事实上，每年的班船在获得特许权的整个时期内只进行过8次航行。南海公司不断抱怨说，每年的班船赢利甚微，而专卖契约则毫无利润可言。西班牙国王方面则怀疑公司为了侵吞他的一份利益而隐瞒了公司的利润。公司一贯拒绝提交账目以供检查，这就更使这种怀疑显得可信。在商定的30年期满以前，西班牙政府早就对整个特许做法感到厌烦；倘使在补偿问题上能达成协议的话，它早就愿意吊销贩奴特许了。

如果南海公司以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充当其代理人，与西班牙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尚且不能友好地开展稳定的贸易，那么没有特许执照的私商境况怎样呢？三四个外国的殖民地海运船只来往于加勒比海，与各自的殖民地进行合法的贸易，还与西属殖民地进行非法贸易。在政府的严令下，守法的法国商人通常保证不进行非法贸易。另外，荷兰人则武装他们的商船，明目张胆地进行非法贸易；至少，人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走私者。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远比这两国的船只多，但英国

政府决不接受要它像法国那样保证不进行非法贸易的建议。英国在加勒比海的船运包括：南海公司与西属美洲进行合法或表面上合法贸易的商船和贩奴单桅船；正常来往于英国、北美洲或各岛屿的船只；以及驶向拉丁美洲各港口的走私船。为了区别正派的商人与走私者，西班牙人声称有权在西半球海面上的任何地方拦截和搜查外国船只并这样做了。针对这种情况，英国人大声疾呼在公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

西班牙的贸易垄断由海岸缉私船负责实施。这些船只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各港口进行装备，执行当地总督指派的任务。船上配备的水手是在对付海盗的长期战争中训练出来的暴徒。船只由私人出资装备，靠出卖捕获的战利品取得报酬。这些船只在殖民地贸易的正常航道上游弋，拦截遇到的每艘英国船只，搜查“违禁品”。海岸缉私船和西班牙法庭认为，外国船只中装载的任何西班牙殖民地产品——靛蓝、可可、洋苏木或西班牙货币——都是非法贸易的证据。实际上这是一些不足信的证据，因为牙买加生产小批的靛蓝和洋苏木，并生产过可可；而西班牙货币在整个西印度群岛是最为普通的交换手段。此外，一艘商船仅仅因为西班牙法庭认为它在与缉私船遭遇时偏离了驶向合法目的地的直接航道就可被捕获和没收。殖民地总督坐享一份捕获赏金，他们与海岸缉私船船长之间无疑多方勾结。进出牙买加的船只必须驶近佛罗里达、古巴或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海岸，许多安分守己的商船就遭到不公道的捕获和没收。正式的上诉过程旷日持久、花费很大，而且通常毫无结果；甚至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出面干预也常常不能为被捕获的船只得到赔偿。

由于这些劫掠行径的结果，英国要求西班牙赔偿损失的清单越积越多，国民对西班牙人的积愤越来越高涨。商人纷纷要求赔偿损失，反对党在会议中也支持他们。另外，在1718年和1727年两次短暂的战争期间，南海公司在西班牙属地内的财产被没收，因此要求赔偿损失的清单上又加了一笔账。诚然，这份赔偿清单上应扣除南海公司拖欠西班牙国王的款子——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黑奴税和贸易利润的份额，等等——可是公司从未允许将这些账目查明，而各种估计的数字又大相径庭。除了这些财政上的争执和有关航海自由的长期争吵外，还有洪都拉斯的洋苏木砍伐者的问题和边界问题——英国对卡罗来那和佛罗里达未经划定边界的佐治亚提出领地要求的问题。这些争端都没有严重到必然导致战争的地步；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英国

“国民中经商的成分”求战心切，舆论哗然，特别是由于南海公司的强硬态度。

由于南海公司的特殊要求，结束1727年战争的会议被推迟。在整个18世纪30年代，谈判解决分歧的一系列尝试也因与此相似或相关的原因而失败。1737年，公司提出一个解决与西班牙的经济纠纷的巧妙计划，即用黑奴税和西班牙的利润股份抵消一部分南海公司的赔偿要求。该计划得到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赞同，但在马德里举行谈判时，纽卡斯尔就西班牙海上的劫掠问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于是谈判中断；在备忘录中，他的部分论点不是依据较为适用的1670年的“美洲”条约，而是根据毫不相干的1667年的英西条约，从而无意中给西班牙提供了一个拖延的借口。西班牙政府利用这一失策，把南海公司的计划和纽卡斯尔的备忘录束之高阁。同时，海上劫掠继续进行。1738年3月，詹金斯船长带着他的著名的悲惨故事出现了。英国下议院立即坚决表示：“在美洲任何海域航行是英国臣民的不容置疑的权利。”于是，给英国商人颁发进行报复性劫掠的许可证——这真是一种荒唐的姿态，并派遣哈多克海军上将在地中海进行恫吓性巡航。但是沃波尔和西班牙大使之间最后还是达成一项协议草案。这个草案被马德里接受，并且真在1739年1月得到批准，成为埃尔帕尔多协定。根据协定的条款，西班牙将偿付9.5万英镑，即双方各自劫掠的财物估数中西班牙超过英国的部分。可是南海公司拒绝合作，因为协定没有明确承认其航行权利，也没有保证恢复其专卖合同。该公司只愿意接受它自己的1737年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到了这时，英国国内的反对党也舆论哗然，反对任何妥协或协议。纽卡斯尔由于像往常一样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并且对有关法西家族契约的最新报告感到惊恐，便不顾已签订的协定，继续让哈多克在西班牙沿海一带巡弋。西班牙政府就于1739年5月中断专卖合同，作为抗议。9.5万英镑从未支付，英国与西班牙之间遂于1739年10月宣战。

英国的朝野在为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问题而投身于战争时，必然不仅愿意与西班牙作战，而且也愿意与法国作战。法国除了与西班牙有王室的亲缘关系外，长期以来是英国在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主要对手。英国人满怀贪婪和好战的帝国主义情绪投入了战争，因此他们也渴望永久地征服西班牙的属地，这必然会导致与法国的战争。事实上，卡思卡特勋爵的远征军在出发远征西属美洲以前所做的大量准备

工作，已促使弗勒里派出一支由当坦率领的舰队。这本来可能把法国卷入战争，但是当坦的舰队为了等待增援和枉费心机地企图与西班牙舰队会合，在圣多明各长期停泊，以致他的水手患病，给养耗尽，他只得毫无建树地返回法国。在3年中，法国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支持西班牙。弗勒里并不希望战争，他也不特别喜欢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统治下的西班牙。在1744年以前，法国和英国在海上多少保持了和平状态。

英西战争进展缓慢。弗农摧毁贝洛港要塞的这样最初取得的胜利没有再出现。他只得用1740年的部分时间搜寻当坦的舰队。奥格尔和卡思卡特率领下的大军奉派前去与弗农会师，由于命令含混不清而且意见分歧而吃尽了苦头。他们认为哈瓦那防守力量强大，难以攻占，就选择西班牙大帆船停泊的卡塔赫纳为第一个攻击目标，但是对卡塔赫那和尔后对古巴的圣地亚哥发动的海陆联合进攻都未得逞。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海军除此以外只进行了一次值得注意的战争行动，那就是安森舰队进入太平洋的航行，这次航行虽则成绩辉煌，但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甚微。另外，英国人捕获了许多敌方货船，使西属美洲的正常合法贸易陷于混乱。战争期间，只有一个珍宝船队到达西班牙，而西班牙大帆船或商船队没有出航过。贝洛港的大帆船队再也没有恢复航行。贸易只得由单个的、不定期的“注册船只”进行——这些船只虽则比被护航船队速度快，成本低，但常被敌方捕获——或者由英国和荷兰的走私船进行。走私贩子大发战争财，这正是他们政府的打算。英国政府明确命令海军上将弗农尽量为英国商人与敌国殖民地的贸易提供保护和护航。

1744年，在西印度群岛公开爆发的英法战争，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左右这次战争的不是出于夺取新的领土和扩大贸易的欲望，而是两组并存的产糖殖民地之间的激烈竞争。在生产廉价食糖以及与欧洲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方面，面积较大而土壤肥力损失较少的法属加勒比诸岛在与英属诸岛的竞争中越来越成功。由于英国不能控制食糖供应，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所知道的任何和平方法都不能对付这种愈演愈烈的竞争。事实证明，为了阻止法属西印度与英属北美洲的贸易，在英国的西印度利益集团的鼓动下于1733年通过的《糖浆条例》难以实行；这一条例自然激怒了北美洲人，因为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财政让步，例如在1739年不再把食糖列入禁运

商品细目表而准许直接出口欧洲，但这些措施对英国种植园主帮助不大，因为它们没有消除引起困难的根本原因——高昂的生产成本。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萧条影响了英国的行业太多，已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在那好战的贸易竞争时代中，如果和平措施无济于事，人们就欢迎战争作为解决商业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

战争给英国人提供了严重破坏法国食糖贸易的机会，而在公开竞争中他们都不能够打败它。双方的甘蔗种植园主都不喜欢获得新的产糖地；他们担心，生产的增加会降低他们的受到保护的市场的食糖价格。每一方都希望不是去夺取和开发敌方的殖民地，而是破坏敌方殖民地和减少其人口；尤其是抢夺种植园主资本中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和最能移动的部分——奴隶。倘若不能破坏敌人的殖民地，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切断其贸易，剥夺其食品和奴隶的供应，使之困饿以阻止其出售食糖。在这次战争中，特别是海军的活动几乎都局限于这第二类作战行动。到1744年，双方的作战力量都被牵制在欧洲和北美洲，没有兵力可以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任何重大的战役；那里发生的战斗不过是将在1756年爆发的一场远为严酷的斗争的预演而已。作为一种预演，这次战争提供了一些教训。它暴露了法国人由于在西印度群岛设有永久性的海军基地而处于不利地位，还暴露了——正如当坦发现的那样——依靠热带岛屿菲薄的食物资源，要给一支庞大的舰队供给食品，是十分困难的。英国人在牙买加的罗亚尔港和安提瓜的英吉利港内建有船坞，永久性地驻有适应环境的舰船分队，粮食供应没有多少困难。但在另一方面，战争也暴露了英国贸易体制的弊端。法属岛屿依赖于北美洲的粮食和木材供应及爱尔兰的牛肉供应，这本来应使英国人取得一种重要的战术优势；可是，不管有无战争，新英格兰的货主继续厚颜无耻地经由库拉索岛或圣欧斯达齐乌斯岛的中立的荷兰港口直接或间接地与敌国贸易。来自马提尼克岛的袭击英国船运的海盗，常常储备着北美的粮食；与此同时，英属岛屿却缺食少粮，有时不得不由英国供应粮食。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没有解决法英之间在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重要问题。双方的属地没有易手。向风群岛中4个有争议的岛屿——多米尼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多巴哥——宣布为“中立”，双方同意撤出这些岛屿。但即使两国殖民地政府愿意执行这一协议，要把没有组织的一群群占地者集合起来也很困难，这些人大部分是从较老的殖民

地迁来的法国人。这几个岛屿继续成为英国人怨恨之所在和引起下次战争的一个根源。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法国和英国之间缔约只是一次休战。补充欧洲的全面和约和结束西班牙与英国海上争执的1750年商务条约，也同样没有结果。该条约不提航海自由，可是战争正是在争取航海自由的名义下开始的。关于洪都拉斯的洋苏木砍伐营地的令人恼火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南海公司几乎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它已停止贸易，它的“每年的班船”在1733年做了最后一次航行，它的奴隶贸易也在1739年结束。根据条约，公司获得10万英镑，为此它放弃了根据专卖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要求。这样，英国人就放弃了长期以来企图强迫或劝使西班牙人允许英国商人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直接贸易的努力。英属岛屿与西属美洲的非法贸易继续进行，但仍如以前一样，它仍属非法的，并且再也得不到专卖契约的掩护了。这个世纪的下半叶，西班牙表明越来越乐意改组其贸易体制，越来越有能力保护其贸易垄断。英国人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失，而法国人则有所得。法国人一贯坚持传统的贸易方法，把运往西属美洲的货物委托给加的斯的西班牙商人转运。到1750年，这种贸易大多掌握在法国人手里。他们在牺牲英国人利益的情况下，稳步地扩大了在西属美洲的贸易。与此同时，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商业竞争不断扩大，他们对北美的战略压力不断增加。

至少有一位政治家——此人就是皮特——认为：七年战争在美洲的主要目标无疑就是要夺取加拿大以保卫英属北美洲。可是，西印度群岛再次成为激烈斗争的中心，而且这次在那里动用的军队比上一次战争中动用的军队多得多；顺便提一下，也比正在同时进行的争夺印度的斗争中动用的军队多得多。双方都派遣了大批远征军，而且，远征军的指挥官们这时奉命要吞并敌人的产糖殖民地，不仅仅要掠夺它们。政策中的这种变化，得到伦敦的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支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实质问题。战争刚开始时，法国已夺取了英国的米诺卡岛。夺取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就使法国的地中海舰队的部队能调到西印度群岛作战，从而对西印度群岛产生直接影响。接着，英国人又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建有巨大要塞路易斯堡的布雷顿角岛。每一方都认为，占有这两个地方极其重要，并且都希望收复失地而不放弃已取得的利益。促使皮特出兵进攻马提尼克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和避免为了收复米诺卡岛而放弃布雷顿角岛，虽然后来当胜利超出他的预料时，他开始赞成至少要保留几个在西印

度夺取的岛屿，因为它们有保留的价值。即使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总督们和种植园主也支持这种政策变化。加勒比海大规模海战的出现，提醒他们在对付敌国舰队或奴隶暴动中他们人少力薄；并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以战略的观点，而不是以纯商业的观点估量自己的地位。对不断的警报感到厌烦的巴巴多斯和安提瓜的种植园主开始认识到：如果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以及那些中立岛屿掌握在英国手中，至少在战争期间掌握在英国手中，他们的庄园就会更安全些。如果在媾和时决定保留任何从法国人手里夺取的岛屿，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允许这些岛屿生产的食糖进入英国市场的危险；但是，只要驱逐那里的法国居民和禁止后继的英国移民生产食糖，那么连这样的危险也是可以避免的。^[1]

战争中大多数激战是在交战国的战列舰队之间进行的。1757年，法国人从事一项巧妙的计划，在北非、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沿岸进行一个由3支海军舰队协同的行动，这就相当大地破坏了英国的贸易，并使牙买加担心法军入侵达数星期之久；但是法军必须前往救援路易斯堡，这使法国的海军上将们不能在加勒比海有多大的建树。1757年以后，法国人不再继续在西印度群岛海域保持经常性的换防分舰队。因此，从理论上讲，英国海军保卫西印度群岛的最好方法，就是彻底封锁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各港口。英国皇家海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不能同时看守所有的海港，于是强大的法国分舰队有时就偷偷地溜过去；然而，这些法国分舰队大多是驶向北美洲的。因此，1757年以后，西印度群岛的主动权通常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1758年年底，皮特在路易斯堡已掌握了通往加拿大的要冲，并且对于在欧洲取得成功也信心十足。这时，他就向法属西印度群岛发动直接和间接的两次进攻。间接进攻是攻击法国在西非的各站，结果凯佩尔攻占了戈雷达。这次规模较小的战役取得的经济成果大大超过作战部队的费用，它使法国的奴隶贸易一蹶不振，并且严重地阻碍了法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的生产。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比斯开湾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消灭或拖延了原来准备开往美洲的法国舰队，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创造了有利时机。在穆尔和巴林顿统率下出动进攻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海陆联军，发现马提尼克岛卫戍力量强大，难以攻克，就于1759年春季夺取了面积很大、经济富庶的瓜德罗普岛；而邦帕尔海军上将率领的法国舰队到达得太晚，未能解瓜德罗普

岛之围。瓜德罗普岛的种植园主获准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投降。在英法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他们将保持中立；他们的货物将被允许进入英国市场；他们的奴隶将被免除强迫的徭役；他们在英国的军事占领下将保留法国的法律；他们拥有的财产将得到充分的保护。事实上，英国种植园主被禁止在该岛定居；英国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这块殖民地的法国特点。这个岛屿在修复了战争的最初的破坏以后，开始出现新的繁荣，因为英国和美洲的商人蜂拥而来供应它所缺少的食品、木材和奴隶。无能的种植园主逃避了拖欠法国代理商的债务，获准在从安提瓜来的英国代理商处重新举债。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他们终于为自己的食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欧洲和北美市场。瓜德罗普岛的种植园主同时遭到马提尼克岛的本国同胞和英国竞争者的忌妒。这恰好是英国种植园主十分憎恶的那种征服；它直接打击了他们的利益，而没有给他们任何长期的安全保障的许诺。瓜德罗普岛的食糖涌进伦敦市场是1760年糖价跌落的一个原因，也是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强烈不满投降条约的条款的原因。

1759年下半年和1760年全年，皮特全神贯注于对付舒瓦瑟尔对英伦三岛的入侵威胁和为占有加拿大而进行的最后苦斗。在此期间，加勒比海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事。接着在1761年出现了一段在和谈问题上毫无结果和毫无诚意的讨价还价的时期。这时，舒瓦瑟尔由于有与西班牙订立新公约的希望给他撑腰，就坚持要求达到英国不会接受的条件，以等待西班牙做好参战的准备。

西班牙之所以缔结家族公约，一部分原因是英法战争增加了西班牙对英国不满的因素。在和平时期，英国人对其走私者听之任之，不加限制；在战时，他们像交战的海上列强普遍表现的那样，傲慢地无视中立国的海运权利。当处境困难的法国人对中立国开放其饥饿的加勒比殖民地的贸易时，这种形势就更为恶化，因为“1756年战时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导致了更多的船只被英国捕获。更严重的是，当战争形势变得有利于英国和不利于法国时，皮特显然打算（如果他可能的话）夺取北美洲和加勒比海所有的法国属地，包括向风群岛中西班牙曾暗示过主权要求的那些中立岛屿。如果英法在这种情况下媾和，那就会剩下西班牙单独与西印度群岛地区力量无比强大的英国谈判。舒瓦瑟尔为了报答西班牙的支持，答应把满足西班牙的要求作为与英国媾和的一个条件；但在英国看来，把西班牙拉入谈判的做法恰恰使

英国不可能与法国媾和，而且使英西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根据家族公约的规定，如果法英和谈不成，西班牙必须在1762年5月前对英宣战。结果和谈没有成功，英国政府先发制人，在1月向西班牙宣战。

西班牙参战并未解除法国在加勒比海的困境。就在宣战的那个月，罗德尼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刚从英国赶到加勒比海，攻占了马提尼克岛。这时，又有一支强大的法国分舰队在勃雷纳克的率领下，匆忙从法国出发。然而，它在驶往布雷斯特途中由于屡次停下装载必要的给养，起程被耽搁；它到达西印度群岛时已经太迟，未能救援马提尼克岛。勃雷纳克于1762年3月到达圣多明各时，在牙买加引起了那种常有的恐慌。但罗德尼的大舰队占有上风的有利位置，他派出一支足以威慑勃雷纳克的分舰队，使他不敢进攻牙买加。不久，勃雷纳克的远征军发现被孤立无援地封锁在圣多明各。实际上，倘若不是因为牙买加总督和议事会缺乏远见和懦弱无能，坚持把大部分能调动的海军力量留在金斯敦港保护他们的话，法国舰队可能早在到达圣多明各之前就已被歼灭了。

使英国的种植业利益集团恼火的是，马提尼克岛的居民获准的投降条件与瓜德罗普岛的相似。当然，由于没有人指望在媾和时保住马提尼克，它的投降不大可能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中立岛屿的运气较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罗德尼认为英国政府可能愿意保有这些岛屿。多米尼加已于1761年6月向一支北美殖民地部队无条件投降；多巴哥实际上早就属于英国；罗德尼在攻陷马提尼克岛后不久就降服了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岛和格林纳达岛。西印度群岛的所有法国属地中，只有圣多明各仍在法国手中。

在此期间，西班牙不但未能帮助挽救法属殖民地，反而开始丧失自己的殖民地了。英国政府立即准备进攻哈瓦那。海军部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详细地制订了作战方案，避免了1740年困扰卡思卡特远征军的靠不住因素和耽搁拖宕的弊病。主要困难是西印度群岛驻有勃雷纳克的舰队，它虽然既未解救马提尼克，亦未与西班牙人会师进攻牙买加，但至少人们期望它可能会去援助哈瓦那，尤其当罗德尼这时在背风群岛抽调不出机动舰只来的时候。可是，勃雷纳克由于粮食匮乏和水手患病，让法国舰队继续困守弗朗索角；而在这时，波科克和阿尔比马尔统率部队航行穿过这些岛屿，在牙买加补充了更多的舰只和人员，不受干扰地继续航行，前去征服哈瓦那。而西班牙

人一直以为哈瓦那固若金汤。它于1762年8月陷落，引起很大震动。征服者摧毁了一支相当大的西班牙海军力量，获得了巨额的捕获偿金。当胜利的消息传到时，英国政客们欢欣鼓舞，就进一步提高了和谈条件。那一年，西班牙还遭受了另外两次灾难。从东印度群岛出航的一支英国舰队攻占了马尼拉；虽则攻占马尼拉的消息没有及时传到欧洲对和谈产生影响，但是正在进攻马尼拉的消息产生了效果。最后，查理三世原来打算作为牵制行动而对葡萄牙进行的入侵，结果出乎意料地一败涂地。里斯本根本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英国虽则退出了德意志的战争，但没有从哈瓦那转移力量。1762年10月，查理三世有条件地投降。几个月来，法国人一直在迫使他媾和。哈瓦那陷落后，舒瓦瑟尔只得承认在海上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也不是英国的对手。法国不能继续承受战争失利的压力，而它的盟国奥地利最后也准备媾和了。

英国的大臣们似乎像舒瓦瑟尔一样乐意媾和，虽然原因迥然不同。乔治三世渴望摆脱在德意志承担的责任。皮特本来会坚持把战争一直打到波旁家族所有的殖民地都丧失殆尽为止，但他已让位于胆小怕事和缺乏经验的比特。许多英国政客对殖民地领域中英国的巨大优势感到精神紧张，担心将来其他的殖民大国会联合反英。北美洲殖民地居民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受制约；在加拿大被征服后，他们感到已无进一步打仗的必要，他们过去支持西印度征战的那种热忱随之消失。他们毕竟打算继续到法属西印度诸岛贸易，不管这些岛屿是成了英国殖民地或者仍旧是法国殖民地。由于这些原因，巴黎条约是在匆匆忙忙中订立的，也体现了急于成事所需要的让步和妥协。

在英国的大臣们打算加紧和平解决时，战争后期所征服的许多有价值的地盘却使他们感到为难。要媾和，就必须牺牲一些东西；但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纷纭舆论，又必须保持一些超出战争的原有目标以外的东西。战争的主要目的原来是保卫北美殖民地，为此目的，毫无疑问，加拿大或至少加拿大的一部分必须保留在英国手中。另外，加拿大的贸易和岁收很少，而公众有理由指望被征服的殖民地在媾和时能支付一部分战争费用。法属西印度诸岛会马上带来一笔财政收入。这些岛屿比广袤无垠的加拿大更容易由英国人来殖民；而且，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习惯于返回英国花钱，而大多数北美洲的移民守着他们的农场和商业，即使有钱的话也是把钱留在殖民地使用。这就是人们

主张与其保留北美征服的殖民地，还不如保留西印度群岛征服的殖民地的顺理成章的原因。瓜德罗普岛尤其是一项诱人的战利品。奴隶贩子自然极力要求保持它。甚至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也有点转向拥护并吞这些岛屿的政策，因为种植园主和种植园主的代言人已经明白，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将会成为危险的邻居，尤其是当它们被用作私掠船基地时就更为危险。在英国，许多人认为应当保留瓜德罗普岛，甚至宁可不要加拿大。这样，要瓜德罗普岛还是要加拿大的问题，就成为许多政治小册子和激烈论战的主题。倘若议论的只是瓜德罗普岛，政府未必会郑重地注意这场辩论；但在1762年又征服了马提尼克岛。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到底要加拿大，还是要除圣多明各以外的所有法属西印度群岛。罗德尼尤其强调马提尼克岛的战略重要性。看来有可能的是，如果法国一定要占有马提尼克岛才讲和，那么英国就可以保留瓜德罗普岛作为补偿。然而，比特显然认为，法国不会放弃任何已有移民定居的殖民地。于是，他最后决定采取折中办法。他同意归还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并把法国的西非贩奴据点也作为必要的附属物一并归还；但他要求法国割让格林纳达岛和所有中立岛屿，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北美大陆。这些几乎都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向英国的开拓者敞开大门，而且法国人寥寥无几，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与领土一起转让的还有密西西比河道的航行权。在最后的和约条款中，所有这些要求除一条以外，都得到了同意；这一例外就是，法国坚持保留圣卢西亚岛，因为该岛对马提尼克岛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要求保留该岛的理由——正如皮特抱怨的那样——正是英国应该占领该岛的原因。但是法国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比特的温和提案与法国所希望的不谋而合，可是提案没有考虑西班牙的要求。西班牙为了法国的利益卷入了战争，蒙受了重大损失；现在又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被催促着匆忙地媾和。查理三世不想让英国人在墨西哥湾海岸出现，因为他们能从那里孤立佛罗里达和在密西西比河航运的掩护下进行走私贸易，并比以前更容易地截去墨西哥的大帆船队。舒瓦瑟尔不得不承认西班牙的论据是有力的，他最后决定把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转让给西班牙，以换取它对和约的默认。

西班牙和英国没有碰到多少困难就解决了旧有的争端。西班牙放弃了对纽芬兰渔场的要求，同意了由英国法庭裁决战时捕获的船只归

属问题。洪都拉斯的洋苏木采伐营地首次得到了并不牢靠的承认。西班牙答应让伐木者在那里伐木，并尊重他们的财产；英国则答应不在伐木营地设防。居留地的边界和伐木者的权利都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以后的20年中英国人在洪都拉斯的确切地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后，英国把古巴归还西班牙，换取了佛罗里达；西班牙与英国恢复了战争开始时正在实施的商业条约。

布特为了（照他所想象的那样）促成持久的和平，他愿意在殖民地让步。从英国的立场看来，这种意愿是徒劳的，因为在当时与法国保持持久的和平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长期冲突绝没有结束。舒瓦瑟尔根本没有对英国温和的做法感到满意，几乎在条约刚签字时，他就开始在策划和组织报复行动了。布特的和平愿望只使自己接受的条件没有本来可能得到的条件有利——皮特虽则有闹派性的坏脾气，但他这样说还是正确的。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所做的让步是惊人的。古巴控制了西班牙在美洲的贸易的大部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控制了许多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所有这些岛屿又与英属北美殖民地保持紧密而非法的商业往来——这种往来如果变成公开和合法的话，可能会更加兴旺发达。在战略和经济上，英国都很有理由保留一些在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地；然而，这些土地都愉快地物归原主，显不出夺取这些岛屿有什么成果。无疑地，必须考虑这场“血腥的和耗费巨大的战争”会拖延下去的危险性；而且，大概英国的和平缔造者们认为，英国即使不占有法国和西班牙的基地，它的海上优势也总会保障对加勒比海的控制权。然而，皮特的预言在他在世时就应验了。在18世纪60年代曾被人们振振有词地假定英国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制海权，到了18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显得十分不够，以致不能阻挡法国夺取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中的许多岛屿从而威胁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安全。七年战争中英国在加勒比海取得的极大优势在媾和时被全盘抛弃，换取了北美大陆上一些虽则极大但其中有些却是好景不长的利益。

英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北美大陆上大部分殖民地，西班牙人则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丧失了所有殖民地。西印度群岛除了海地以外，都对欧洲的主子保持忠诚，或者说，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背叛主子。可是，西印度群岛虽则对欧洲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巨大的财源，但在政治家的眼中地位正在下降。它们作为大陆贸易的货

物集散地的重要性早就大大地减小了，在1763年以后就更为衰落。它们只能靠出口食糖度日。由于土地肥力耗尽、奴隶劳动力花费大和机械效率低，食糖生产的成本比较高。然而食糖的生产还是越来越多，销售就变得越发困难。除了这些困难外，还有屡次国际战争的破坏。历史较长、面积较小的英属岛屿比法属岛屿更早地表现出困难的征象；但在所有的殖民岛屿上，外在地主和长期负债正在成为惯例。西印度群岛蒙受苦难，并且受苦至今，原因就是这些岛屿被四五个欧洲殖民强国所瓜分，每群岛屿为一个有限的受保护的市场生产食糖。巴黎和约是把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岛屿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的最后机会，然而这个机会被错过了。

2. 北美洲大陆

乌得勒支条约签订以后，北美洲的英法殖民地之间虽然隔着广袤的荒野，但彼此越来越感到忧惧。

在短期内，法属殖民地处于较强的地位。它们力量的基础是荒野中的财富，经济上靠毛皮，军事上靠水路交通，外交上靠操纵印第安人部落。毛皮贸易的条件使坐镇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总督、公司和教会能控制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内地。然而，法属殖民地的弱点正是来自对这种荒野条件的适应，到头来弱点反而使力量的基础相形见绌。法国人的毛皮贸易需要的人力很少。由于他们居民人数少，不能发展农业或工业，甚至不能提供足够的兵员。森林的开发很快就达到了使利润减少的程度。毛皮商人就进一步深入内地，就必须与更远的印第安人部落建立联系。他们由于全力集中在毛皮贸易上，就必须依赖法国提供粮食、工业品和武器。新法兰西的生存依赖于制海权，尤其靠控制圣劳伦斯河口，而圣劳伦斯河口现在受到英国占领的纽芬兰和阿卡迪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法属殖民地的最佳对策是实行大胆的进攻性政策。他们利用集中规划所赋予他们的主动性，在1713年到1754年间把势力从密西西比河和大湖区扩张到阿巴拉契亚山脉。

英属殖民地的力量建立在稳定的定居社会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这种力量必将压倒法国在北美洲的帝国。它依靠比较稠密的居民人口，其边界具有吸引外来移民的弹性。法国殖民地的发展是靠政府统一规划，占领战略据点的办法；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像是一股徐徐推进的贸易和定居的潮流，它的动向受私有利润法则的支配，甚至限制殖民地居民与英国产品竞争的政策也鼓励了殖民地的扩张，因为殖民地居民由于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就被迫进一步深入荒山老林，以取得能够换取英国产品的原材料。他们开发了缅因和新斯科舍的森林以采伐造船用的木材，开垦了宾夕法尼亚的处女地为西印度群岛生产粮食，发展了南方的新种植园以生产更多的大米和烟草。同时，英国毛织品和金属器具质地优良，使英属殖民地居民与法国对手在对印第安贸易的竞争中占优势，而且开发西部土地所需要的资金中有很多来自英国。英属殖民地所处地位的主要弱点是，英国政治的懒散气质助

长了殖民地的自力更生，从而容易产生狭隘的地方主义。对印第安贸易的竞争使弗吉尼亚人与宾夕法尼亚人不和，卡罗来那人与佐治亚人不睦。殖民地议事会不愿意为足够的防务承担费用，殖民地民军只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出动。甚至母国，除了维持保护殖民地的英国海军以外，也不大愿意做更多的贡献。直到1749年，母国才拨款把新斯科舍建成为圣劳伦斯河口的一个卫戍要塞。

只要英法殖民地冲突还是争夺毛皮贸易控制权的问题，法国人就有采取主动并在非正式的战斗中赢得胜利的巨大的有利条件。但当美洲的争执变为欧洲列强之间重大冲突的一部分时，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截断了把法属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脆弱的纽带。在18世纪上半叶，法国和英国把他们在美洲的争执孤立地处理；但是在1756年联盟关系反过来以后，这些殖民地冲突就并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这场斗争终于使英国在北美洲成为主宰的大国。

1714年以后，法国人开始了有条不紊地扩张。这种扩张比英国的贸易商和移民向荒原漫无目的的迁移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时由于英国占领了阿卡迪亚和纽芬兰因而极其重要的圣劳伦斯河口受到威胁；为了保护这个河口，法国便在罗耶耳岛上建立了巨大的路易斯堡要塞，并企图用种种办法尽量缩小英国在阿卡迪亚夺取的地盘：在阿卡迪亚的西部边界的范围问题上进行争夺；发动阿卡迪亚的法国居民移居罗耶耳岛和圣让岛（这种做法基本上没有成功）；还进行较为成功的权谋使留在阿卡迪亚的居民保持中立，并防止他们接受除了1727年严格限定的忠顺誓约以外的任何政治义务；通过天主教会的勒卢特尔神父的亲自努力，把阿卡迪亚居民对天主教的忠诚与对法国的忠诚结合起来，并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如在诺里吉沃克传教的拉勒神父——策动阿布纳基印第安人起来反对新英格兰的新教徒。由于英国在阿卡迪亚的殖民进展缓慢，并且忽视了设在安纳波利斯拉亚尔的小型军事设施，就更助长了法国的这种努力。只有新英格兰的居民把他们的居留地推进到缅因地区，在那里采伐造船木材和在纽芬兰沿海捕鱼，才表现出抵抗法国侵犯的样子。

在远隔半个北美大陆的另一端，法国着手利用沿着密西西比河开疆拓土的辉煌成就，在新奥尔良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其领地的第二个门户。新奥尔良建于1718年，到1722年就成为初期路易斯安那省的首

府。路易斯安那没有实现约翰·劳和他的冒险家伙伴们的乐观期望。那里的气候，印第安人的敌意，开办种植园需要的大笔资金，以及缺乏合适的移民，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尽管靛蓝生产取得了一点成功，但这个殖民地仍然不断消耗法国的财政资源。可是它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交通，扩大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和与海湾内地印第安人的贸易，在战略上十分重要。这样就跟向西推进猎取鹿皮的卡罗来那居民发生了冲突。到了安妮女王之战时，这块边远的荒野已经成为英法争夺印第安贸易中一个不引人注目但很重要的冲突场所。这是夺取密西西比河流域控制权的第一轮斗争。法国人通常能得到乔克托印第安人的支持，而英国人则有切罗基印第安人的支持。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值得一提的有奇卡索族和克里克族——的势力大体上偏向于提供较好贸易条件的英国人。但是卡罗来那殖民地的边境如此没有安全保障，以至于在1715年对雅马西人之战以后，英国政府由于担心法国人在南部印第安人中的优势产生影响，就于1721年在阿尔塔姆哈河上建立一个要塞，保护卡罗来那边境。这个要塞在10年以内成为佐治亚殖民地的一部分。1731年建立的佐治亚，虽则主要是针对法国人的，但也跟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发生了新的摩擦，因为这块新殖民地整个儿是建立在西班牙人声称拥有主权的土地范围之内的。阿尔塔姆哈河上的居留地把英国沿海殖民地的边境推进到圣奥古斯丁附近，这使西班牙人十分不快。圣奥古斯丁、彭萨科拉和阿巴拉契亚的西班牙据点就与印第安人勾结，并且为卡罗来那的逃亡奴隶提供庇护所。奥格尔索普将军为这块新殖民地制订的计划包括讨伐西班牙人；他于1738年率领一支为此目的而装备的军队，回到佐治亚殖民地。1739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敌对行动爆发，这就为袭击佛罗里达提供了借口。但是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在1740年的最后一次远征中，奥格尔索普的军队一直穿插到离圣奥古斯丁几英里处，才由于他指挥不当和缺乏海军协同作战而被迫撤退。西班牙于1742年对佐治亚海岸的反攻同样也没有成功。荒野中的环境仍然极其艰难，如果没有充分的海军支持，任何一方的前哨基地都不能在离开自己的栅栏以外很远的地方有效地行使权力。

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之间的广阔区域，地形十分不便，印第安问题难以对付，路途极其遥远，占有这个地区边缘地带的3个欧洲国家控制薄弱，还不能彼此短兵相接进行搏斗。西班牙

的抱负是由更远的欧洲外交的考虑所决定的，而法国和英国的抱负则是由能够动员多少兵力在战场上与对方进行实力较量来决定的。

这时，法国人在沿密西西比河而上划独木舟航行400英里需时几个月才能到达的地方，草创了一个小小的居留地。它位于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沃巴什河之间的大陆中心部分的伊利诺伊地区。在这里，设防的贸易站夏尔特尔（1718年）、奥尔良（1720年）和文森斯（1732—1733年）掩护了一群6个村落；到1750年，这群村落中已住有1000多法国居民和他们的印第安人妻子，从事贸易和在印第安人奴隶的帮助下耕种肥沃的土地。伊利诺伊生产的玉米给在俄亥俄河谷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粮秣，并且在食物匮乏的时节帮助维持大湖区的如底特律等贸易站。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它是把大湖区和路易斯安那连接起来的重要战略地位，伊利诺伊地区成为法国在内地势力的关键，于是保护它不受英国的侵犯就成为法国政策的基点。法国毛皮商和代理人以伊利诺伊为基地，沿俄亥俄河做生意，并在皮安卡肖、迈阿密和肖尼印第安诸部落中找到有用的合作者。但到18世纪30年代，他们便与英国人遭遇。先是有几十个卡罗来那商人，接着有宾夕法尼亚商人，在进入西部寻取毛皮时发现西部的印第安人渴望得到便宜的“扬基”甜酒和高质量的英国水壶和毛织品。易洛魁人企图保持独立和在俄亥俄河的势力，抵制英国人对该地的侵入；到1740年乔治国王之战开始时，易洛魁人正与法国人谈判，企图把英国人逐出这一地区。

再往北部的五大湖区一带，法国人也在努力加强他们的贸易和战略地位。这里，6个易洛魁部落的大联盟从位于安大略湖以南的奥农达加总部，控制了从阿迪龙达克河至俄亥俄河之间的地区（从沿海迁移来的图斯卡罗拉部落于1723年加入原来的5个部落的联盟）。虽然乌得勒支条约承认易洛魁部落与英国人的友好联盟，但部落联盟继续实行其传统的中立政策，企图让白人之间互相争斗，抵消力量，从而作为加拿大和纽约之间强大的缓冲国而成功地保全自己。易洛魁印第安人组织强大，它作为一个印第安部落的联盟是异乎寻常地稳定的。英国和法国都尊重他们的中立，这特别是因为它有助于头等重要的皮货的收集和运输，从而带来额外利润。6个部落利用有利的战略位置和充当代理人从更西部的部落收集毛皮，在毛皮贸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人的主要贸易路线途经安大略湖和伊利湖。他们很快于1719年在尼亚加拉河上重建贸易站，从这个有利位置成功地控制了大部分

的毛皮贸易。但奥尔巴尼的荷兰商人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就在安大略湖沿岸更远处的奥农达加河口建立一个贸易站。这个建于1725年的贸易站奥新威戈成功地从尼亚加拉的法国人手里夺走了西部毛皮贸易的最好生意。荷兰人成功的诀窍是毛皮收购价格较高，交换的商品更为诱人，尤其是供应大量甜酒。奥斯威戈建立后一年，法国人重建了石头的尼亚加拉堡。纽约来的殖民者针锋相对地在奥斯威戈建立一个坚固的石头要塞；伯内特总督向法国人清楚地表明，英国人将保卫这个要塞反击任何进攻。

但是，奥农达加的印第安酋长们依靠毛皮贸易换取他们现在已不可缺少的欧洲商品，他们决心防止英法竞争酿成战争破坏他们的经济。奥尔巴尼的荷兰人也同样需要和平，他们为了自己的赚钱生意，希望继续保持在安妮女王之战期间与法国人签订的防止该地区成为交火战场的密约。因为荷兰商人与蒙特利尔秘密贸易，靠着用英国人的商品换取法国人的高质量的河狸皮，获得很大利润。这种中立政策也得到在莫霍克流域拥有地产的大土地投机者——如利文斯通家族——的支持。但它遭到魁北克当局的反对，在纽约殖民地也遭到一些主张对法国人采取较为进攻性和较有远见的政策的人士的反对，著名的反对者有连续两任总督伯内特和林顿，还有从事印第安贸易的大商人和谈判老手威廉·约翰逊。但在乔治国王之战期间，拥护中立政策的一派控制了纽约议事会。这样，易洛魁部落的势力和中立政策，加上法国人和纽约的居民都想维持皮货流通这一压倒一切的迫切需要，遂使安大略湖地区英法竞争的压力没有上升到武装冲突的程度。这段隐蔽进攻的时期随着1739年英西战争爆发而结束，而英西战争则并入了更大范围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此后的10年中，北美殖民地的内部竞争因它们母国之间的战争而恶化。但是，母国往往把殖民地的冲突与其他冲突分开，把殖民地冲突的主动权让给本地当局，而只从别的战场上方便的地方抽调海军部队予以支援。这种倾向使殖民地内部竞争的性质保持不变，并使这种竞争不能达到任何重大的结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对俄亥俄河以南的北美大陆的控制比较薄弱，这就使它们不能在这个地区短兵相接较量起来；而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力量保持了大湖区东南方的和平。只有在两个地点，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进行激烈的冲突。他们逐渐认识到圣劳伦斯河口和俄亥俄河上游各个源头的控制权对两国殖民系统的安全都至关重要，于是两地的激烈冲突就成为战争的信号。

具有特色的是，法国人首先采取主动。一接到交战的消息，路易斯堡就出动一个分舰队，立即夺取了小港口康索并骚扰安纳波利斯罗亚尔。英国政府当时正全力应付詹姆斯党人的入侵，不可能在北美洲对法国人发动陆上攻势。但英国国王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臣民认为对法国天主教徒进行突然袭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些天主教徒在圣劳伦斯河口要求的权利威胁到他们的渔场、木材、贸易和正在扩张中的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的边境殖民地。这无异于是对路易斯堡本身发动一场殖民远征。马萨诸塞殖民地能干的总督威廉·谢利以一票的多数说服马萨诸塞州议会同意了这个远征计划，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也为该计划助一臂之力。1745年河面刚开冻时，大约3000民军在一个基特里的商人威廉·佩珀雷尔的率领下登船向圣劳伦斯河进发。如果没有海军力量从路易斯堡的法国舰队手里夺取海洋航道的控制权，此举只可能是一次愚蠢的轻举妄动。幸运的是，谢利说服了纽卡斯尔命令西印度群岛驻防分舰队司令官沃伦协助这次远征。由于新英格兰民军行动快速、保守秘密和勇敢无畏，法国人遭到突然袭击，措手不及，只得把一处重要的炮阵地放弃给围城的民军。这支小部队利用初战胜利的优势，在防止法国援军到达的沃伦分舰队的得力协作下，于6月17日迫使这个大要塞投降。攻陷路易斯堡是乔治国王之战期间北美的英国武装力量的一个显著战绩。几个殖民地总算准备有效地联合起来，在英国海上力量不可缺少的支援下推进殖民地本身的不言而喻的利益。结果是英方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倘若在和谈时得到认可的话，本来会使法国最后失去在美洲的立足之地。然而，对新英格兰人不幸的是，1748年在艾克斯拉沙佩勒，路易斯堡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为了保持均衡，许多考虑，包括考虑到如果保留路易斯堡，那么在同化阿卡迪亚居民这个已经棘手的问题上，又要增加新的难题，结果决定把这个要塞归还法国。这样就丧失了彻底击败法国人的良机。事实证明，再要找机会使英属殖民地有效地联合起来对付法国人，就不会这样容易了；到时候，就需要打一场耗费巨资的战争和动用英国的军队，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和约刚一签订，双方就采取步骤巩固各自在圣劳伦斯河口的阵地。法国人着手重建路易斯堡和尽力保护路易斯堡与魁北克的陆路交通：他们在阿卡迪亚地峡建立博塞儒尔堡，并通过勒卢特尔神父的告诫和他的做弥撒的米克马克印第安人的威胁，使阿卡迪亚居民效忠于法国。1749年，英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加强这个半岛上的阵地。大约

3000名英国臣民被送到这里，在被任命为新殖民地新斯科舍的总督的康沃利斯将军的领导下，建立奇布克土湾东岸的港口居留地哈利法克斯。最后决定，为安全计，除了把全体阿卡迪亚居民迁移到战略上比较不易遭受攻击的英属殖民地外别无选择。在对法国和印第安的战争爆发时，大约1万名讲法语的天主教徒被驱逐出他们的农场，流落到远至新奥尔良和布列塔尼等地，开始过着“失所平民”的不幸生活。

与此同时，在乔治国王之战中，为了控制大湖区和俄亥俄之间那块对法国属地的安全极为重要的地区，大陆腹地发生了一场虽则场面较小、但同样重要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没有因媾和而中断，直接导致了敌对行动，从而开始了对法国和印第安的战争。

战争开始时，法国的计划是从俄亥俄地区逐出英国商人，但是没有得逞。获得控制权的关键在于操纵印第安人。印第安部落的目标是在获得他们的经济所依赖的欧洲商品源源不断供应的情况下，尽量对白人保持独立性。印第安人对白人的外交政策虽则反复无常，难以捉摸，但有一种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一致性。法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指望得到印第安人足够的支持，从而对这个地区建立牢靠的控制；但除此之外，任何一方只要提供较好的贸易条件，就有希望取得暂时的优势。乔治国王之战期间的局势使英国取得这一优势。1741年，法国人干了一件有利于英国人的事：他们把内陆贸易站移交给蒙特利尔的垄断商人，但移交的条件使物价飞涨，从而使英国商人得以容易地以低价竞争。英国商人还跟法籍的“森林中的游荡者”进行有用的走私贸易。此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国海军封锁的压力在内地造成了贸易商品匮乏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印第安部落对法国人逐渐冷淡，而对英国人表示友好姿态。1747年，由于怀恩多特部落酋长尼古拉斯策划反对底特律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印第安阴谋过早地暴露，法国人勉强地逃脱了一场灾难。到公开的敌对行动结束时，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和弗吉尼亚殖民地政府企图通过与印第安人的谈判，以便巩固在俄亥俄地区的这种脆弱的优势；而来自迈阿密河地区皮克威勒尼等贸易站的英国毛皮商人，则利用他们已经打开法国人对大湖区河狸皮贸易垄断的大好机会。

1749年，法国总督拉加利索尼埃决心消灭阿勒格尼山以西的英国势力。他派遣一支由正规部队和加拿大移民组成的远征军，在塞莱隆·德比安维尔的统率下，远达俄亥俄河的岔流处，其目的是要对这一

地区正式提出领土要求和指望用显示武力的办法威慑正在效法迈阿密河地区迈阿密部落酋长拉德穆瓦塞尔的、怀有异心的印第安诸部落。

因为现在俄亥俄河上除了有英国毛皮商人的活动以外，又加上了英国土地经纪人的活动，所以法国更迫切地需要坚持对俄亥俄河拥有完全的主权，即使这样做会与印第安人疏远也在所不惜。到1750年，英国移民的势头在阿勒格尼山脉西麓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沿海的大亨由于再也不能把资金有利可图地投在贸易和种植业上，就狂热地在俄亥俄河流域无人居住的肥沃土地上投资。由此而成立的一些地产公司正在制订计划，准备在法国早已声称拥有主权的俄亥俄河岔流处附近不仅进行贸易，而且进行殖民。1750年至1753年间，这一地区经过了反复的勘察。俄亥俄公司在波托马克河的威尔斯克里克建立一所商行，并于1752年获得印第安人同意在河流分岔处建立一个要塞。

为了先发制人地阻止这些计划实现，法国人采取了攻势。1752年，一支由法国人率领的奇佩瓦部落和奥托瓦部落的印第安军队除灭了拉德穆瓦塞尔酋长和皮克威勒尼的英国商人，一举扫除了英国在俄亥俄中部的贸易利益。翌年，法国新任总督迪凯纳再次派遣远征军，在伊利湖以南的普雷斯克岛、勒伯夫和贝南戈建立3个连锁要塞，排成一线直指俄亥俄河的分岔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总督丁威迪得报后，马上派遣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到勒伯夫堡要求法国人撤退；当法国人置之不理时，就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河流分岔处建立一个要塞。法国人驱逐了这些部队，接着修建了更为坚固的迪凯纳堡。于是，华盛顿于1754年再次受命率领一小队弗吉尼亚民军去赶走迪凯纳堡的法国人。他们在孟农加希拉的大草地的小规模战斗中遭遇，并打败了小股法军，但接着在7月在临时建立的尼塞锡蒂堡被法军打败和俘虏。弗吉尼亚军队与加拿大军队已经交火，于是俄亥俄河流域不稳定的停战结束；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已经开始。

在当时，战争还是以弗吉尼亚人为一方与以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为另一方的非正式冲突。其他英国殖民地根本没有准备支持弗吉尼亚人打进俄亥俄河流域。卡罗来那殖民地由于白人居民少，而且据说存在黑奴对内部安全的威胁，因此不可能出兵。宾夕法尼亚人妒忌弗吉尼亚殖民地支持下的俄亥俄公司；公会控制下的宾夕法尼亚议事会用怡然自得的和平主义掩盖它不愿意为防务而批准征税。纽约殖民地的居民担心冲突会影响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法国人向俄亥俄河的进军已

使印第安人的原有中立政策无效。易洛魁印第安人深感法国人军事势力的强大，为自己的独立遭受威胁而感到焦急，就极力抱怨英国人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保护。为了团结印第安人对付法国人，商务部在1754年6月于奥尔巴尼召集会议与易洛魁部落会谈，7个殖民地派有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一项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印第安政策，但对各殖民地的议事会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关键的弗吉尼亚自治领甚至未派代表参加会议，虽然大会的政策威胁到俄亥俄公司的利益。富兰克林为了给共同防御打下基础而设计的联盟计划，虽然在大会上得到通过，但更不可能被各殖民地的议事会所接受。因此，弗吉尼亚人只得靠自己保卫边境，虽则他们在训练有素的兵员和战争物资的供应方面都不是法国的正规军队和法国的印第安盟友的对手。

因此，英国政府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第一种办法是坚持传统的承担有限义务的政策。根据正统的重商主义理论，殖民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商业；对殖民地的投资，如不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就是不值得的。英国皇家海军只对殖民地的贸易路线提供保护，撇开这一点不谈，殖民地防御当地的攻击则是其本身的责任。俄亥俄河流域的冲突是美洲范围内为了争夺毛皮和土地而进行的商业竞争事件。正如纽卡斯尔公爵所说：“让美洲人打美洲人”，让英法通过已在巴黎为此目的设立的外交机构进行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

第二种办法是支持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居民。这样做就意味着英法的正规军和海军舰只将发生冲突，并且有使局部战争变为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母国政府负责成立新斯科舍一事就已暗示，纽卡斯尔内阁已做了第二种选择。这一抉择标志英国已认识到，北美大陆殖民地的重要性在整个殖民系统中已占首要地位。这些殖民地经过40年的迅速发展，已成为旧帝国中举足轻重的中心。它们作为商品市场和商品生产者对英国海外贸易网的价值如此重大，因此它不能因斤斤计较防务的开支而使它受到损害。此外，它们已不再被看作仅仅是商业上的种植园，而是已成为享有英国臣民权利的人口众多的英国社会。保卫这些殖民地使之不受法国的侵略，已被视为有关国家荣誉的问题。

英国内阁做出其决策后，于1754年11月得到议会的支持，发动一次英国和殖民地协同作战的有限战役，其目的是夺取迪凯纳堡、尼亚加拉堡、克朗波因特堡和博塞儒尔堡。他们希望这些有限目标将把法

国人赶回到1714年的位置，而无须诉诸两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于是，一支人数不多的远征军在布雷多克将军的率领下于1755年年初被派往北美洲。这支远征军没有在宾夕法尼亚，而是在弗吉尼亚登岸，因此要比原计划进行更长时间的行军后，才能到达俄亥俄河。布雷多克的战役计划极其详尽，它包括修筑一条能运送重炮通过荒山野林的道路。攻陷迪凯纳堡的计划虽然十分周密，但耽搁和妨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而丁威迪大抵由于妒忌他的同僚格伦总督在印第安人中的影响，只派遣了很少几个印第安人侦察哨，从而也妨碍了布雷多克部队的进军。当他的部队于7月9日终于开到离迪凯纳堡7英里以内时，一股约有900名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突然成功地袭击了他的行军队列。在接着发生的混乱中，以及由于布雷多克的指挥官们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结果一败涂地。布雷多克阵亡，残余部队溃散，辎重丢失，于是整个战役被放弃。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边境在印第安人的劫掠面前处于完全没有防御的状态。这样就结束了英国政府对法国人进行有限战争的尝试。

其时，法国人虽然决心保卫他们的边远的阵地，但同样渴望把战争局限于美洲大陆。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官员已意识到加拿大在与英国进行任何公开的实力较量中力量薄弱。即使在和平时期，长期的供应匮乏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使比戈省长十分苦恼；这种情况引起的失败主义情绪，只是被拉加利索尼埃等人的爱国主义的论调压倒罢了，对于这些人来说，屈服于英国的扩张是不可思议的。由于法国海上运输不堪一击，并且法国海军还未做好战争准备，法国内阁尤其要避免与英国海军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因此，他们于1755年用快速海军舰只增援新法兰西，成功地避开了奉命只在美洲水域截击法舰的英国分舰队。结果是，法国在1756年夏季夺取奥斯威戈，从而赢得了西部印第安部落的归顺。法国势力依靠精心计划的连锁要塞，这时迫使英国人撤回到山那边的沿海基地。英国在这灾难的一年中，只是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叛变才攻占了新斯科舍地峡的博塞儒尔堡，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

此时，英国内阁看来显然已认识到，必须用全面进攻新法兰西来取代有限目标的战役。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能否保持有限和非正式的问题，很快就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因为1756年年初的几个内发生了欧洲联盟的大变动，这就预示欧洲对法国的战争将出现一个新的局

面。这是由于法国与奥地利结盟，就从欧洲大陆上承担的广泛义务中脱身，腾出力量与英帝国进行海外的斗争。从1756年5月18日开始，英法正式开战。北美洲的冲突终于与欧洲体系的武力冲突合并在一起；从此两个母国都动员军事力量，在美洲大陆上用武力解决问题。

当皮特于1757年就任首相时，英国在美洲的前景是严峻的。新法兰西已得到增援并做好战备。这年夏季，法军打退攻打路易斯堡的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夺取了乔治湖畔的威廉亨利堡。他们占有居高临下的阵地，能够依靠印第安盟友骚扰从新斯科舍到佐治亚的英国殖民地。由于布雷多克的失败而士气不振的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武装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只能指望母国给予保护。但是皮特的自信心和组织才能很快在大西洋彼岸起了作用。他决定把美洲作为这次战争的决定性的战场，计划从陆上发动一次分为4路的战役，并且有效地利用海军力量，以扼杀新法兰西。1758年夏季，他的重新组织的战争努力初见成效。博斯科恩统率的海军部队和沃尔夫麾下的军队组成强大的两栖部队，于7月26日成功地攻克路易斯堡。然而，北美新任英军总司令艾伯克龙比对香普兰湖的法军所发动的进攻未获成功。英军和地方部队在进攻提康德罗加时亦遭惨败。再往西去，形势较好，布雷兹特里特成功地攻克安大略湖和福布斯湖畔的弗隆特纳克堡，并在修筑了一条通过宾夕法尼亚山区的新路后，终于在11月夺取法军已放弃的迪凯纳堡。

这些战绩标志战争已到达转折点。法军虽然顽强地坚守香普兰湖的阵地，但已丢失圣劳伦斯河畔的巨大的外围要塞；弗隆特纳克堡的失守威胁了圣劳伦斯河和大湖区之间的交通；而杜凯纳堡的陷落意味着法国在俄亥俄河优势的结束。占优势的英国海上力量压力则更是不妙。路易斯堡的命运早在前一年冬天就已被决定；那时巧妙地使用英国的舰队在欧洲水域里截击了法国海军，使它不能运送足够的部队去保卫这个要塞。英军捕获法国的供应船只，使新法兰西发生严重缺粮。同时，法国由于损失了船只载运的价值无法估计的与印第安人贸易的商品，就更加难以保持印第安部落的忠顺，而这些部落的游击活动一直是法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英军计划于1759年在新近攻克的基地上对圣劳伦斯河流域发动一次全面进攻。这次战役分3路进行：第一支远征军准备攻占尼亚加拉堡，从而完全切断圣劳伦斯河和大湖区的联系；第二支部队取道香普

兰湖，进击魁北克；第三支部队从东面海上沿圣劳伦斯河而上。第一支远征军攻下尼亚加拉堡，但未能沿圣劳伦斯河向前推进；第二支部队在阿默斯特的率领下占领提康德罗加和克隆波因特，但未能在冬季开始以前打出香普兰湖地区。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沃尔夫将军由圣劳伦斯河口向上游的进军。沃尔夫的两栖部队于9月攻克魁北克之役是一次险仗，全靠海军指挥官的高超航海技术和司令官沃尔夫将军的杰出战术指挥才取得了胜利。魁北克的战果完全证明沃尔夫在权衡利弊后采取的冒险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军队甚至在打败蒙卡尔姆和占领魁北克的大城堡以后，仍旧面临蒙特利尔的强大的留守法军进行反扑的危险。一切全都有待次年春季开到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军增援部队而定。然而，对法军不幸的是，他们的海军力量在上年11月已被霍克击败于基贝龙湾；4月里从波尔多起航的增援船队又被英国海军打散；结果于1760年5月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到达魁北克的首批舰只是英国海军的。英军控制了圣劳伦斯河的整个下游，蒙特利尔于9月的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这样，在两个时期的作战中，英军由于拥有制海权，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北美洲的阵地，有效地在北美洲的荒野里部署了第一流的欧洲军队和动员了殖民地中占优势的人力物力，就成功地打垮了曾扬言要把他们赶回北美洲大陆沿海地区的法军。这些胜利成果与其说是殖民地赢得的，还不如说是母国赢得的，因为虽然殖民地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和像罗杰斯突击队这样的极有价值的辅助部队，但是要打败从法国本土派往“新大陆”的实力强大、组织严密的军队，还需要皮特的组织天才、正规军队的专业技能（尤其当部队在豪和布凯等人的指挥下学会了森林战术的时候）和最为重要的海军优势。

如果说英法在美洲的冲突只是在两个母国间进行人力物力的较量后才最后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新大陆”上英法势力安排的最后决定同样依赖于其他战场的战争进程。蒙特利尔陷落以后，七年战争又拖了两年。乔治三世即位以后英国内阁的改组反映了国内的厌战情绪，结果英国于1761年与法国开始和谈。但是，比特内阁尽管有和平的愿望，但由于法国和西班牙于1761年签订第三次家族公约，还是被迫在1762年对西班牙宣战。巴黎和约直到次年才签字。此时，英国海军已攻占法属马提尼克岛、西属哈瓦那和马尼拉而进一步取得对法国和西班牙的胜利，从而增加了英国的讨价还价的实力。在和谈中，新

法兰西的命运与控制在英军手里的其他法国属地——尤其是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连接在一起。最后，问题归结为：英军是应该给法国归还新法兰西，还是归还盛产食糖的岛屿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英国保留新法兰西和归还西印度岛屿的决策，代表了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主的胜利，他们担心较为富庶的法属岛屿进入英国殖民系统；也代表了英国商人的胜利，他们渴望插手有利可图的加拿大毛皮贸易。最重要的是，这一决策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为了保护英国在北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就需要消除法国对这些殖民地扩张构成的威胁，即使这样做就必须把西印度群岛的战略阵地归还法国也在所不惜。皮特担心，这些战略阵地一旦交还法国就会把英国的运输线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以后的事件证明，北美大陆殖民地毫无阻挡的发展将导致独立的要求，而母国在法国干涉的妨碍下将不能用武力镇压这种要求。但在当时，英帝国在北美洲从沿海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从赫德森湾伸展到佛罗里达的顶端，因为西班牙为了收复哈瓦那、马尼拉和从法国人手里取得似乎无利可图的属地路易斯安那作为补偿，已经放弃了佛罗里达作为交换条件。这样，远涉半个世界的英国海军力量通过取得佛罗里达，就在奥格尔索普将军曾经失败的地方得到了成功。

（潘永樑 译）

[1] 这是人们有时提出的主张。见巴巴多斯一位种植园主写的《关于英国在加勒比诸岛真正利益的意见》。伦敦档案局，英国殖民部，28/50。

第二十三章 在印度的角逐

从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到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印度的穆斯林统治日益衰微，而半独立的“省区政权”逐渐发展，对远在德里的莫卧儿大帝的孱弱后代只勉强地表示忠顺。由此产生的无政府状态使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公司得以干涉印度的事务。英法两国在商业和领土方面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果以克莱武获胜而告终。这样，法国人就被逐出卡纳蒂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如果认为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始于奥朗则布之死，那就错了，因为莫卧儿帝国的衰落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奥朗则布死后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加速了这一衰落过程罢了。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先对阿克巴的政策有所了解。

莫卧儿大帝阿克巴的明智而必要的政策，被他的直接继承者贾汗季、沙·贾汗和奥朗则布完全改变了。他曾苦心孤诣地同意以妥协作为基础，通过实行普遍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废除令人痛恨的对非穆斯林居民征收人头税，努力安抚了信奉印度教的臣民，赢得了他们对他统治的忠诚。但是，他的继承人逐渐背离了这些他的统治的主要原则，到奥朗则布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实行不容忍的政策时达到了高潮，终于引起了印度教徒影响深远的反抗，并迫使德干高原的马拉塔人和印度北部的拉杰普特人、贾特人和锡克教徒举起造反的旗帜。反抗从南部的马拉塔人的王国坦乔尔起，北至遥远的旁遮普平原。阿克巴政府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向农民征收的税负额不超过他们总收成的1/3，因为在莫卧儿统治的印度，行政管理的效率有赖于田赋估量和征收制度的公平合理。但在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下，税负负担有增无减，到奥朗则布统治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税负额已增至农民总收成的一半。这可以从奥朗则布的税负“法尔曼”（诏谕）中看得很清楚。^[1]另外，阿克巴统治时直接向农民征赋的做法也抛弃了，结果田赋转派大增，包税做法愈益普遍。尤其在帝国疆域扩大的时候，情形更是如此。当时欧洲旅行者写的著作证实了“法尔曼”提供的证据，成为中央政府的包税人和其他中间人压榨人民、横征暴敛的见证。这些著作经常提到农民躲债逃亡和田地荒芜的情形，读者可想而

知，当时的老百姓必然是朝不保夕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莫卧儿政权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封建制的。这种自私的官僚机构对人民无止境的压榨，已使人口中最重要的交税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各阶层人民——日益贫困。

诚然，沙·贾汗在其统治初期确曾采取措施，试图纠正他的前任贾汗季的低效率，但他在中亚推行的侵略政策，他出兵越过兴都库什山对巴尔赫和巴达赫尚进行的征伐，以及他收复坎大哈的用兵，却把帝国推到了破产的边缘。接着，奥朗则布为了征服德干而毫无希望地用兵，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政治上的失算和军事上的错误。除了拉杰普特人和贾特人在北方的动乱，使他不能在南方集中全部兵力外，奥朗则布还发现，他不可能在南方各省实行他的不得人心的专制制度，因为南方的地形有利于马拉塔人进行他们特别擅长的游击战。在他统治的后半期，帝国的扩张不仅使财政枯竭，而且致命地破坏了帝国的团结，因为政权的巩固没有跟上土地征服的速度。曾经在德干访问过奥朗则布行营的、学问渊博的意大利旅行家杰梅利·卡雷里记载：莫卧儿军队带着大批嫔妃和随营人员，行军迟缓，在崎岖的山地上无法与行动自如的游击军队作战。所有权威人士都认为，莫卧儿军队这架作战机器已经腐朽不堪了。军队纪律荡然无存，而且奢侈淫逸，娇气十足。敌人的堡垒很少是由于发动正面攻击而攻占的，而奥朗则布镇压马拉塔人的用兵史，是旷日持久的围攻的历史之一，在围城内部没有人叛变的情况下，只得被迫解围。读者也不应忘记，莫卧儿帝国是个外族政府，其力量不是来自古老的传统或民众的支持，而是依赖其军队的效能和皇帝及其主要谋士的才能。大概这就是欧文把莫卧儿帝国的崩溃主要归咎于军队腐败的原因。不能否认军队腐败是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欧文在这里似乎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拉杰普特人组成的大批部队曾经在阿克巴的军队里服役；不应忘记，导致莫卧儿军队衰败的因素之一，就是奥朗则布疏远了拉杰普特人，而阿克巴对他们则是采取安抚的政策。

在印度的莫卧儿时代，没有什么比占领印度斯坦对征服者所产生的腐蚀作用更令人瞩目的了。这些来自中亚的孔武有力的高地人已堕落成专事谄媚的弄臣。从17世纪中叶开始，莫卧儿贵族的品格显然堕落了。年轻的贵族子弟纵情声色，他们流连后宫，为阉奴和出身低微的宠臣所包围，他们投其所好，使这些子弟从小就谙熟各种各样的堕

落恶习。所以，由于阿克巴所建立的行政制度日益腐败，帝国内部腐朽不堪，才是莫卧儿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在穆斯林桎梏下深受压迫的印度教各族臣民的反抗，以及各省省督因洞察中央政府日益衰弱而举兵作乱，都促使帝国加速崩溃。与此同时，来自印度河以西相当于今日波斯和阿富汗等地区的军事入侵和掠夺性袭扰，也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内部混乱。但是，外来的入侵不是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莫卧儿王朝早就出现崩溃的征兆了。

莫卧儿的君权观念咄咄逼人。就像印度教统治者企图成为古代印度的“查克罗婆丁”即最高君主一样，莫卧儿统治者也极力夺取印度次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地位。那里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权力平衡观念。1707年后，当帝国解体时，相互交战的各派的目的，不是为了彼此适当地遏制力量，而是为了完全颠覆对方的权力。帝国幅员辽阔，加上交通不便，这使他们争夺最高权力的努力不能得逞，并使中央集权的一切尝试都归于失败。诚然，阿克巴曾明智地制定旨在中央集权的严格规则，并建立了一套煞费苦心的制度以制约省督的权力。但是，在他去世后，随着帝国的扩张和中央政府的日益削弱，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越来越困难。因此，莫卧儿君主企图在印度全境牢固树立权威，实在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19世纪后半叶交通发展以后，真正实现中央集权才有可能。在18世纪初，莫卧儿帝国的版图从兴都库什山伸展到科罗曼德尔湾海岸，划分为21个“苏贝”或行省，它们是喀布尔、克什米尔、拉合尔、穆尔坦、塔塔（信德）、阿杰米尔、德里、亚格拉、奥德、阿拉哈巴德、比哈尔、孟加拉、奥里萨、马尔瓦和阿马达巴德（古吉拉特），还有6个德干行省：坎德什、贝拉尔、奥兰加巴德、比达尔、比贾普尔和海得拉巴。但是，当奥朗则布于1707年最后病倒时，他的权威在这些属地中处处遭到抵制。

穆斯林统治最根本的弱点之一，是没有明确的王位继承法。虽然穆斯林君主极力为其爱子谋取继承权，但在旧王已崩而新王未立的权力真空期间，贵族和“乌列摩”^[2]全都权力很大，而且通常行使选择新王的权力，甚至可以废黜先王在世时已宣布为嗣君的王子。穆斯林统治的印度当然不例外。由于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规定，就发生同胞相残的冲突，随之出现经济大混乱。奥朗则布之死同样符合这样的普遍规律。他的3个幸存的王子兄弟阋墙，互相残杀。长子穆阿柴姆主管喀布尔和旁遮普，阿泽姆·沙刚刚被任命为马尔瓦总督，卡姆·巴克什

则管辖比贾普尔。王位之争其实是穆阿柴姆和阿泽姆·沙之间争夺设于亚格拉的帝国金库，据估计金库藏金达2.4亿卢比。穆阿柴姆接到父王死讯，即兼程向亚格拉进发，并自行称帝，取号巴哈都尔·沙。他得到其子阿齐姆-乌什-善的得力支持。其子是孟加拉和比哈尔的总督，很快占领了亚格拉城。阿泽姆·沙则在艾哈迈德纳加尔称帝，但由于经费不足，又猜忌其子比德尔·巴克德，不准其迅速进军亚格拉，遂造成贻误。最后，父子联军在亚格拉附近的贾遮被巴哈都尔·沙打败，阿泽姆·沙和比德尔·巴克德均战死。这发生于1707年。巴哈都尔·沙继而进击拒不承认他称帝的乔德普尔的拉杰普特人统治者阿其特·辛格，但这时他的弟弟卡姆·巴克什在比贾普尔称帝，发动叛乱，使他只得撤离拉杰普塔纳前去德干。1709年1月，卡姆·巴克什寡不敌众而被制服。巴哈都尔·沙平定卡姆·巴克什后，返回拉杰普塔纳以对付阿杰米尔和乔德普尔的不肯就范的王公，但是旁遮普的锡克人发动了叛乱，这迫使他与拉杰普特人妥协。

锡克教原先是一个宗教社团，在第一任“古鲁”即宗教领袖那纳克时代（1469—1539年）摆脱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樊篱而自立。那纳克宣传的是和平的教义，但他的继承者们认识到，锡克教徒在莫卧儿帝国内是得不到和平的。在贾汗季和沙·贾汗的统治下，他们都受到迫害；偏执的奥朗则布也没有对他们表示仁慈，曾残酷地处死他们的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所以，穆斯林的迫害把这个清静无为的团体变成了一个由狂热战士组成的教派。18世纪好战的锡克教神权政体的真正创立者是第十代，亦即最后一代“古鲁”哥宾德·辛格（1675—1708年）。他的大半生都在把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以反抗穆斯林的狂热分子。巴哈都尔·沙继位后，哥宾德·辛格加入了帝国军队。他的这一行动，现在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尤其是人们记得他的父亲正是被奥朗则布折磨而死的。他在德干为皇帝服役时被刺身亡。对多年的迫害积怨很深的锡克教徒就聚集在一个名叫班达的自封领袖的周围。班达颇有军事领导的才能，他在旁遮普的大片土地上横行不法，屠杀穆斯林，蹂躏他们的妇女。有意义的是，他还以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在穆斯林印度，君权有3个最重要的标志：即位；以新君的名义铸造钱币；在清真寺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祷词中念诵皇帝的名字。造反者以自己的名义铸钱，立即使本来可以视为地方骚乱的事件变成了对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因此，巴哈都尔·沙急忙挥师北上以对付班达，班达战败后逃匿山区。

巴哈都尔·沙开始统治时已是64岁的老人，既无能力又无精力挽救帝国江河日下的颓势，倒恰如其分地赢得了一个“糊涂国王”的绰号。他的最愚蠢之举是企图让教徒按什叶派的方式背诵“呼图白”。这项宗教革新遭到他的大多数作为正统逊尼派教徒的穆斯林臣民的反对，并导致了在古吉拉特和旁遮普发生骚乱，结果迫使他恢复旧制。要求代代专制君主都是精明能干的，那是不可能的。后期的莫卧儿君主中，可能除了巴哈都尔·沙以外，都是朝廷宠臣和派系控制下的可怜傀儡，因此他们无力采取什么措施制止普遍存在的离心倾向。从1712年巴哈都尔·沙去世，到1719年穆罕默德·沙继位，莫卧儿君主的宝座上曾扶植了5个傀儡。要想了解这些徒有虚名的君主来去匆匆的原因，有必要了解一点朝廷主要派系的情况。

在莫卧儿朝廷中争权的两个主要派系是图兰系和伊朗系。图兰系贵族的祖先与莫卧儿王朝的开国君主一样，来自奥克苏斯河以北地区，在帝国全盛时代曾声势显赫。伊朗系贵族祖先来自波斯，人数较少，但以具有行政管理能力著称。图兰系在军队中形成有势力的集团，属正统逊尼派。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什叶派。因此，两派之间即使只因宗教原因就一直互相仇恨。反对这两个外来派系的是印度斯坦系亦即印度的穆斯林，他们有的是改宗者，有的是先前移民的后裔。这个集团包括许多拉杰普特族和贾特族的酋长，及信奉印度教的下层官吏。在宫廷里，皇帝和他的首辅“瓦济尔”各自培植亲信和门徒，形成宫廷派系，使情形更加复杂。1707年前，派别斗争尚受到遏止，但到奥朗则布的几任软弱无能的继承人统治时，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派系斗争应是帝国覆亡的一个原因。

巴哈都尔·沙的去世是他的4个儿子之间发生内战的信号。贾汗达·沙经过战争即皇帝位。这个专横暴虐、贪恋酒色的懦夫，只统治了11个月即被他的侄子法鲁克·西耶尔推翻。而西耶尔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是由于得到当时的著名的国王拥立者赛义德兄弟、阿卜杜拉和侯赛因·阿里的支持。就在西耶尔当朝时，锡克人领袖班达被迫投降，并被惨无人道地折磨而死。西耶尔忘恩负义，阴谋除掉他的恩人，但未能得逞，结果在他统治的第7年被怒不可遏的赛义德兄弟废黜，双眼被弄瞎，最后被处死。在他之后相继即位的两个体弱多病的年轻君主，在此无须赘言。最后，依然声势显赫的赛义德兄弟于1719年9月拥

立穆罕默德·沙为皇帝。正当这出戏在印度斯坦上场时，德干的马拉塔人政权一直在稳定地强大起来。

领导马拉塔人起来反对奥朗则布的民族英雄是西瓦吉。萨塔拉的王公们就是他的后裔。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印度教反抗运动的领袖，恢复了使用古老的梵语称呼，他的由8名大臣组成的御前会议就称为“阿什塔·普拉德汉”（八头会议）。他的行政体制既是以印度教的政治传统又是以穆斯林的做法作为基础。他的岁收大多靠掠夺邻邦，向他们征收一种名叫“乔特”的税收，即抽取该地区田赋估值的1/4，有时还要征收一种名叫“沙德什穆克希”的什一附加税。与具有爱国热忱的马拉塔历史学家们的学说法相反，西瓦吉并不因征收“乔特”税而负有承担该地防御外侮和平定内乱的相应义务。因此，它不能与后来华伦·黑斯廷斯和韦尔斯利侯爵所推行的英国的补贴联盟制度相比较。缴纳“乔特”只能使这一纳税地区的居民免受马拉塔军队的进一步的劫掠，然而在西瓦吉死后，马拉塔的军官往往另外又要求征收一种名叫“加斯-达那”的马匹草料费。“乔特”税是以武力作为基础的，盛行于18世纪上半叶。那时在印度的任何一个马拉塔人势力强大的地方，都可征收该税。另外，“沙德什穆克希”什一税则局限在德干境内实施，因为人们相信一种合法的虚构说法：西瓦吉声称自己是德干世袭的“沙德什穆克希”的征收人。

西瓦吉死后，其子桑布吉继位。他不是莫卧儿君主的手，在1689年被奥朗则布打败并处死。桑布吉之子沙胡成为莫卧儿宫廷的阶下囚，直至奥朗则布去世后才获释。这一表面上像是和解的姿态，实则是一个目的在于削弱马拉塔人力量的狡猾步骤。果然，马哈拉施特拉爆发了内战，战争一直打到沙胡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时为止。沙胡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巴拉吉·维斯万纳特的努力，此人是奇特帕万或孔卡纳斯特的婆罗门，很有能力，1714年被沙胡任命为他的“帕什瓦”，即首相。沙胡面临着重重困难，马哈拉施特拉的政局一片混乱，以及沙胡身后的几任继任者的软弱，这些都是帕什瓦所以坐大的主要因素。他们逐步取代萨塔拉的王公，成为马拉塔国的首领。巴拉吉·维斯万纳特担任帕什瓦一直到1720年。他恢复了马拉塔地区的秩序，与起义反抗沙胡的马拉塔舰队世袭统领安格里阿讲和，并以其他的方式巩固了马拉塔政权。他使岁收账目复杂化，从而扩大婆罗门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当时，德里时局的混乱也有利于马拉塔政权的巩

固。起初，德里的赛义德兄弟一心想遏制马拉塔的僭越行为，阻止他们侵扰战略要地马尔瓦省。可是，当他们发觉，皇帝正在策划谋害他们，他们与皇帝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时，就转而与马拉塔人讲和。他们确认沙胡拥有西瓦吉属地原来的核心部分，即所谓“斯瓦拉加”的地方（自治地），承认马拉塔人最近在坎德什、贝拉尔、冈达瓦那、海得拉巴和卡纳蒂克征服的全部土地，允许马拉塔人在德干六省征收“乔特”税和“沙德什穆克希”附加税。马拉塔方面给帝国军队提供一支部队，并且每年进贡100万卢比，作为回报。然而，直到穆罕默德·沙在1719年即位时，他才发布诏书“萨那德”，确认了许给马拉塔的这些特权。

马拉塔人的确切目标是什么？现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萨德塞认为：西瓦吉并不希望谋取政治上的支配权，马拉塔的权力后来之所以扩大是他们的保教热忱所产生的间接后果，是因为他们的“印度教王权观念”不是扩张领土，而仅局限在宗教领域。他在谈到最初四任帕什瓦的政策时断言：“他们在北方的全部活动，以及他们在与拉杰普特等民族的交往中，他们坚定地争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帝国或夺取权力，还不如说是从穆斯林的控制下解放印度教著名的圣地。”我们很难理解导致这种论断的推理方法。即使十字军东征也不完全是宗教战争，何况引起民族扩张和帝国发展的因素更为众多而复杂。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宗教动机不是促使马拉塔人渡过纳巴达河侵扰印度斯坦的唯一原因。此外，我们还可肯定，他们侵略成性，以劫掠为业，甚至在奥朗则布之死消除了对德干的直接威胁后，还继续扩张领土。历任帕什瓦似乎懂得，德干太贫困，不能形成帝国的中心，因此，经济上的原因驱使他们侵袭马尔瓦和古吉拉特。马拉塔人起初与信奉相同宗教的拉杰普特人结盟，他们推进到印度的北部，可是他们咄咄逼人的自私政策，令人反感的暴行和掠夺抢劫的癖好，特别是征收“乔治”税的做法，终于使拉杰普特人以及其他印度教的势力与之离心离德。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在1761年反对外国侵略者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马拉塔人在第二任帕什瓦巴吉·罗一世（1720—1740年）统治期间，采取了向印度北部扩张领土的政策。德干六省总督、莫卧儿的副王尼查姆-乌穆尔克姑息纵容马拉塔的扩张政策。穆罕默德·沙即位时，曾把德干六省的行政权委托给赛义德兄弟中年轻的侯赛因·阿

里，但不久皇帝策划宫廷阴谋，使其兄阿卜杜拉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他把弟弟阿里召回德里。尼查姆-乌穆尔克作为图兰系贵族的领袖，反对赛义德兄弟在德里的权势；在这一关键时刻，他认为时机已到，放弃他担任省督的马尔瓦省，而在德干站稳脚跟是可取的。这自然使赛义德兄弟感到恐慌，他们就立即采取措施，欲迫使他就范。但是他们的军队从亚格拉派出不久，侯赛因·阿里就遇刺身亡，此后不久，阿卜杜拉也被德里的图兰系和伊朗系贵族联合起来的强大势力所推翻。一时间尼查姆-乌穆尔克又重新得宠。他委派一名代理人负责管理他的德干各省，自己则前往德里，担任穆罕默德·沙的首相。但是，他对朝廷中不断发生的阴谋感到厌恶，这些阴谋使他对行政改革所做的努力受到挫败。于是他又再次动身返回德干；他在1724年的沙卡契尔达战役中打败了他的代理人，因为他的代理人在皇帝的怂恿下抵制他返回德干。尼查姆在马拉塔人的援助下赢得的这次胜利之日，也就是他在德干确立了他的世袭地位之时，定都海德拉巴。可是，他仍然认为承认皇帝是适宜的，并且不打算以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或使用皇帝使用的猩红伞盖。在“胡特巴”祷词中依然保留背诵皇帝的名字。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各省总督扩大和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尼查姆了解来自马拉塔人的危险，就同意给他们支付德干诸省的“乔特”税，只要允许由他自己征收，因为如果让马拉塔的官吏干涉他的内政，这显然对他不利。沙胡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他的诺言转瞬即不算数了。尼查姆为了保护自己，就开始同一些心怀不满的马拉塔分子密谋，特别是和科尔哈普尔的马拉塔统治者桑布吉的密谋。于是就发生了战争。交战中，尼查姆被比较机动的马拉塔军队包围于帕尔克德，被迫于1728年3月签订蒙格-谢夫冈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尼查姆承认马拉塔人征收“乔特”税和“沙德什穆克希”附加税的合法性，支付所拖欠的税款，恢复被他逐出领土的马拉塔收税官的职务。1731年，科尔哈普尔的马拉塔统治者根据瓦尔纳条约，接受藩属地位与沙胡结盟，于是马拉塔中央政府的地位就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最后，于次年，尼查姆与帕什瓦订立密约。按照密约，只要马拉塔人不在德干向他进攻，也不在塔普蒂河谷骚扰他的坎德什属地，尼查姆就让马拉塔人在印度北部自由行动。这一不光彩的条约，不仅促使马拉塔人向北扩张，也使尼查姆得以在卡纳蒂克自由行使他的权力。

马拉塔人对马尔瓦和古吉拉特的袭扰始于奥朗则布统治的末期，以后，印度的中部一直遭受他们的掠夺，毫无安全保障。为了保证

“乔特”的征收和巩固迅速扩大的帝国，沙胡和帕什瓦改变了西瓦吉所支持的做法：现金支付，把“扎吉尔”即田赋征收权交予边远地区的马拉塔军事领袖。这种称为萨兰查米制的做法，无疑地促进了马拉塔势力的壮大，但也助长了这些“扎吉尔达尔”的独立性，最终导致了马拉塔人的各个独立王国的出现。这一点在马拉塔联邦以后与英国争夺在印度的至高统治权的斗争中，是一个主要的弱点。在这一时期，马拉塔游击队的领袖中突出的有乌达吉·波瓦、马尔哈·罗·荷尔卡、拉诺吉·信希亚和达马吉·盖克瓦，他们分别在达尔、印多尔、瓜利奥尔和巴罗达建立了半独立的邦国。到1734年马拉塔人已在马尔瓦站稳了脚跟。这在战略上极其有利，因为马尔瓦位于连接德干和印度斯坦的几条干道上，成为进攻古吉拉特和西海岸港口的极好的支撑点。到1737年时，他们劫掠所至已远及本德尔汗德、拉吉普塔纳和恒河上游之间的地区，甚至击败帝国军队于德里城下。穆罕默德·沙在绝境之中只得再次把他的这位势力强大的臣民从德干召回朝廷。这位尼查姆受到隆重的接待，擢升为“瓦吉尔—伊—穆特拉克”即帝国首相，封号“阿萨夫·加”。他受命在本德尔汗德驱逐马拉塔人，但他再次证明不是巴吉·罗的对手。巴吉·罗在博帕尔包围尼查姆的军队，迫使他同意签订屈辱的图兰萨兰协定（1738年1月16日）。根据这项协定，承认马拉塔人为马尔瓦的统治者，并割让了纳巴达河和昌巴尔河之间全部领土的主权。

正当印度中部和北部发生这些战事时，马拉塔人也一直在孟买和果阿之间的沿海地带建立他们的势力。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海盗为患，来往于这一海域的欧亚船只不加区别地一律遭到海盗的袭击。马拉塔人最初集中对付詹吉拉的西迪人即阿比西尼亚人建立的海盗要塞。那里的海盗曾支持奥朗则布对西瓦吉的斗争；作为回报，奥朗则布曾允许他们占据从马拉塔人手里夺取的雷加德等要塞。詹吉拉以北30英里处就是马拉塔人安格里阿的总部科拉巴。安格里阿是沙胡的盟友，指挥一支常常被称为马拉塔海军的、由双桅船和桨帆船组成的海盗船队。从科拉巴和其他中心地出海的马拉塔船只不仅受到西迪人，而且受到以巴塞为基地的葡萄牙人的威胁。1733年，孟买的英国人与西迪人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科拉巴的安格里阿所进行的海上劫掠。结果是，西迪人在他们日常的海上劫掠时不再骚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马拉塔人对西迪人用兵也是为了给安格里阿提供保护。1733年至1736年间接连发生的战争中，马拉塔人未能摧毁西迪人的势力，但

确实夺回了大陆上的一些领土，包括他们以前的首府雷加德，西迪人占据该地曾使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特别蒙受耻辱。马拉塔人反对葡萄牙人的战事比较成功。他们对萨尔塞特岛和该岛相邻大陆上的、具有重大商业和战略价值的葡萄牙居留地垂涎已久。他们于1737年攻占塔纳，但巴塞因的葡萄牙人一直殊死抵抗，直到1739年才被迫投降。巴塞因的陷落使马拉塔人咄咄逼人地推进到孟买附近，并导致了最终签订1739年英国—马拉塔商务条约的谈判。该条约准许英国人免税在德干贸易。马拉塔人这次反对葡萄牙人的战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拉塔人何以没有抗击纳迪尔·沙对印度北部的入侵。

在欧洲各国从海路入侵印度以前，来自中亚的入侵曾对印度的历史起了深远的影响。莫卧儿人占领喀布尔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原，就使他们便于征服印度斯坦。他们一旦在印度平原上站稳脚跟后，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控制和保有这一边远省份喀布尔和毗邻的坎大哈地区。当帝国强盛，帝国军队控制着通向旁遮普平原的山区主要通道的东西两端时，印度就没有遭受入侵之虞。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帝国衰落时，就为波斯人在相当于今日阿富汗的地区节节取胜铺平了道路。来自中亚的入侵者分为两类：一类入侵者目的是攻城略地，以求巩固他们在印度北部的势力；另一类袭扰者的主要动机是劫掠。帖木儿、纳迪尔·沙和阿赫默德·沙·杜拉尼都属第二类。

纳迪尔·库利·汗是霍拉桑的一位将军，在波斯的萨非王朝的统治覆亡的废墟上崛起。到1736年时，他已使波斯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充分的巩固，使他终于能够废黜了最后一个萨非王朝的傀儡，僭号称“沙”。为了保卫他的东部边境，他被迫对阿富汗西部骚乱的吉尔扎伊人部落用兵。在德里，穆罕默德·沙的大臣和谋士们认识到西北边境上危机临头时已为时过晚，他们满以为坎大哈将是固若金汤。诚然，坎大哈的莫卧儿省督玩忽职守，但是他的失败必然也要归咎于德里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因为坎大哈省督一再请求增援，但德里一直置之不理。同时期的《图兹奇拉》（*TuzKira*）一书的作者安纳德·拉奥·穆克利斯就证实了朝廷对边境省份的这种忽视。旁遮普的情形也是一样。然而，我们也不应忘记，由于马拉塔人对南方边境的威胁正不断增长，朝廷忽视北方各省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在印度与波斯的断交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是过分地夸大了断交是纳迪尔入侵印度的原因。当然，穆罕默德·沙忽

视了与波斯的友好关系，并且故意怠慢了纳迪尔的使者。他许诺阻止逃犯从纳迪尔的领土上逃入阿富汗，实在是承担了一项不可能履行的义务。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纳迪尔入侵印度的方便借口。关于尼查姆-乌穆尔克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众说纷纭。现代的印度教的史学家指责他是叛徒，说他实际上把纳迪尔请到了德里。而穆斯林作家则认为，关于叛徒说没有任何确实的根据，他们宁可认为他是起了一个危机调解人的作用。指责他背信弃义的说法，在早期极为流行，1741年出版的弗雷泽的《纳迪尔·沙的历史》一书中则可见一斑。蒂洛克·达斯在一首印地语诗歌（写于1747年至1757年）假定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是尼查姆把纳迪尔请到了德里^[3]。有重要的一点要记住，就是，纳迪尔·沙无须邀请，那时印度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已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机会。

纳迪尔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就席卷了阿富汗，因为1738年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陷落。他接着强夺开伯尔山口，在贾姆鲁德长驱直入进军平原并且占领了白沙瓦。12月底在阿克托渡过印度河，1月初攻占了拉合尔。甚至当喀布尔陷落的消息传到德里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通过增援以保护旁遮普。一直到纳迪尔的军队席卷旁遮普时，德里才开始准备阻击。穆罕默德·汗的王公贵族们，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以外，都不想率领自己的军队前去抗击敌人。孟加拉也没有派出一名骑兵前来支援。一直遭到疏远因而没有和解的拉杰普特人，对帝国的覆亡仍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皇帝在绝望中只得求助于马拉塔人，但马拉塔人正忙于攻打巴塞因的葡萄牙要塞，无暇旁顾。印度史学家有时断然声称，这时虽然为时已晚，但若采取果断措施，仍可救帝国于危亡。这种观点未免错误地评价了时局和历史。如果当时一些作者的估计可靠的话，穆罕默德·沙虽然缺乏准备，当时还能调集20万军队，人数至少是波斯军队的两倍。但是历史再次证明，与敌军在速度、机动性、突袭战术和有胆识的军事指挥的全局较量中，单纯的数量上优势是无济于事的。1739年2月24日，两军在离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场帕尼帕特以北大约20英里处的卡纳尔接战，穆罕默德·沙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人们一直过高估计了纳迪尔的胜利伟大之处，因为从军事观点来看，卡纳尔不能称为一次战役，只是一场大屠杀而已。这时，纳迪尔占领了德里，在那里诵读“呼图白”祷文中改诵纳迪尔的名字了。一则谣言误传他身亡，这是引起一场群众性暴乱的信号，结果几百名波斯士兵丢掉了性命。接着波斯军队就对德里居民进行了一

场不加区别的屠杀。用当时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屠杀以后“大街上伏尸狼藉，犹如花径上铺满了残花败叶”^[4]。据不同的估计，被杀人数在8000至15万之间。^[5]波斯人称呼这次战役为“杰汉—库沙—伊—纳迪里”，记载斩杀人数为3万，所获战利品的价值也无法估计。最后，纳迪尔终于感到满意，于是在1739年5月带着沙·杰汗的孔雀宝座和“科·依·诺尔”钻石回师波斯。这次远征，除了夺取了大量战利品和兼并了印度河以西的所有土地外，其主要结果是加剧了印度现存的无政府状态，加速了莫卧儿帝国的衰亡。莫卧儿的威望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除了波斯人的入侵和马拉塔人日益增大的扩张以外，穆罕默德·沙统治时期的印度史，也是能力高强的冒险家和省督崛起的历史。他们开创了邦国割据的局面。细心的观察家会发现，在马拉塔帝国自己的内部也显然有离心的倾向，虽则马拉塔将领们的权力不断增大，独立性不断增强，促进了而不是限制了马拉塔势力的扩张。这段时期的另一特点是，英法在印度南部的竞争愈演愈烈。当英国第一次干预印度政治时，需要对付的几乎所有重要的“邦国政权”，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沙的统治时代。尼查姆-乌穆尔克建立了海德拉巴国。孟加拉的历任纳瓦布-纳济姆都是穆斯林冒险家阿里·瓦迪汗的后裔。而奥德的诸王是该省莫卧儿总督萨达特·阿里汗的子孙。就在帝国这个分崩离析的时期，罗希拉人在罗希尔坎德强大起来，而班加什的帕坦人也在法鲁卡巴德立国。

奥德王朝的开创者萨达特·阿里汗号“布尔汗-乌穆尔克”，于1722年至1739年为奥德的纳瓦布。他不仅保持境内的秩序，而且外拓疆域，终于囊括了贝拿勒斯、加齐普尔、江普尔和楚纳尔诸地。他的继承人萨夫达尔·章（1739—1754年）在1748年被任命为帝国“瓦齐尔”。他邀请马拉塔人帮助他反对法鲁卡巴德的班加什的帕坦人，而班加什的帕坦人则请来罗希拉人帮助。这些盟邦由此都承受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时订立的协定形成了马拉塔人后来对罗希尔坎德提出领土要求的基础。萨夫达尔·章的儿子和继承人即纳瓦布-瓦齐尔苏查-乌德-多拉，他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日益增长的势力发生接触的第一个奥德统治者。东印度公司始则将他打败，继而扶植他上台，在华伦·黑斯廷斯时期帮助他打垮了罗希拉人的势力。

随着穆斯林的统治在印度确立，大批的帕坦人即阿富汗人进入这个国家。奥朗则布死后，他们在印度的居住地越来越多，正如西亚尔-阿尔-穆塔克哈林所说的，一直到“他们就像无数草叶那样纷纷出土”。他们有的在奥德西北地区定居，被称作罗希拉人即山地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就称为罗希尔坎德。这个地区罗希拉人政权的奠基人是一个在奥朗则布去世后来印度到阿富汗冒险家，名叫多德汗。他的养子是个身世不明的改宗者，取名阿里·穆罕默德汗，继他之后成为一支雇佣军队的首领。就在阿里·穆罕默德汗生前时期，这块原来称为卡塔尔的地方改称为罗希尔坎德。起初，阿里·穆罕默德担任这个地区的莫卧儿省督；但后来，他感到自己羽毛已丰，实力强大得足以不再向朝廷交纳赋税，并断言声称独立于皇帝之外。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了由于纳迪尔·沙入侵以后印度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的鼓舞。罗希拉人势力的崛起，对奥德的萨夫达尔·章构成威胁，因为他的领土就暴露在罗希拉人的劫掠之前。于是，萨夫达尔·章劝说皇帝讨伐罗希尔坎德，结果阿里·穆罕默德向帝国军队投降。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因为随着阿富汗统治者阿哈马德·沙·杜兰尼的入侵，他又收复了原有的属地。罗希拉人的势力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德里的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同时也是由于罗希拉人能够利用拉杰普特人的各个酋长与罗希尔坎德的历任包税地主“柴明达尔”之间的内部斗争。

本书已提到贾特人的起义已形成印度教反对奥朗则布不容忍政策的一个部分。人们通常认为朱拉曼是贾特人政权的奠基人，但他只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游击领袖，1721年宁愿自杀而不愿接受失败。贾特人的巴拉特普尔国的真正创立者们有在纳迪尔·汗入侵后的乱世中崛起的巴丹·辛格，以及在阿哈马德沙·杜兰尼入侵后的政局中同样获得好处的辛格养子苏拉吉·迈尔。

在孟加拉，许多年来一直对中央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历任总督迅速采取独立的态度。1740年，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省总督萨尔法拉兹汗被负责管辖比哈尔的一名下属官吏阿里·瓦迪汗推翻。孟加拉独立的“纳瓦布-纳齐姆”王朝的崛起可以追溯到这次篡权。克莱武就是和这个王朝发生接触的。有许多原因促使莫卧儿皇帝承认阿里·瓦迪汗的地位。皇帝很清楚，在纳迪尔·沙占领德里期间，萨尔法拉兹汗实际上已下令铸造钱币，并以波斯君主的名义诵读“呼图

白”，并把孟加拉的剩余岁收输送给波斯君主。但是，看来莫卧儿皇帝接受了540万卢比的贿赂才加以默许的；这笔钱是阿里·瓦迪汗掠夺所得的财富的一部分。阿里·瓦迪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印度著名的金融家查伽特·塞思家族的财政支持，这些人在日后孟加拉的历次大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应当承认，阿里·瓦迪汗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完全有能力在他骚乱的统治区中恢复秩序。不幸的是，他还没有得到一点的巩固时间，就几乎立即被号召去反击马拉塔人的侵袭，以保卫他新近获得的领土。

孟加拉的财富对于一个以德干的贫瘠土地为基地的掠夺性国家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但是，一直到1742年，由于孟加拉与世隔绝，而马拉塔人则忙于在别处征战，因此孟加拉才得救，没有遭到侵扰。随着马拉塔人在贝拉尔的实力在罗怛吉·邦斯勒的领导下得到扩张，孟加拉的边境就暴露在他们的劫掠之下了。除了不断地袭击以外，在1742年至1751年间，曾分别有过5次入侵。马拉塔人利用阿里·瓦迪汗的政变所引起的政治动乱，于1742年在罗怛吉·邦斯勒麾下的一位将领巴斯克·潘特的率领下，首次侵入孟加拉。阿里·瓦迪汗一时被马拉塔军队所包围，但援军的到达使他摆脱了险境。不幸的是，在他摆脱险境之前，马拉塔人已洗劫他的首都穆尔希达巴德，攻占了胡格列，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他们不仅在生长作物的农田和桑园中放马，而且抢劫焚烧村庄，奸淫妇女，蹂躏全省。印度的和欧洲的权威人士在这一点上意见全都一致。当时的一位作者描述这些人形的蝗虫是“屠杀孕妇和婴儿的刽子手”。一位近代的印度教徒史学家发现证据，证明他们肆无忌惮地轮奸妇女，令人难以启齿。^[6]穆斯林作家有时断然声称沙卡尔的历史著作有明显的印度教偏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公允的批评家当然会认为这种断言是不正确的，因为沙卡尔的关于马拉塔人对毫无防卫能力的妇女施暴的叙述，是对这一时期在印度发生暴行进行普遍谴责的一部分，不能认为他是想为他的具有同一宗教信仰者的罪恶洗刷。事实上，只有后来阿富人在德里和马图拉一带犯下的暴行才能与马拉塔人在孟加拉犯下的暴行相比拟。阿里·瓦迪汗终于在卡特瓦打败了马拉塔人。到1742年年底，把他们逐出孟加拉和奥里萨。

马拉塔人的第二次入侵发生于1743年，军队由罗怛吉·邦斯勒统率。沙胡曾把在这几个省征收“乔特”税的权力交付给他。阿里·瓦

迪汗很幸运，因为马拉塔联邦发生内讧，新任帕什瓦巴拉吉·巴吉·罗（1740—1761年）给他提供帮助。引起罗怙吉·邦斯勒与帕什瓦之间竞争的原因很多。帕什瓦声称拥有对孟加拉征收“乔特”税的权利，罗怙吉·邦斯勒对此颇有异议。此外，这位新任帕什瓦夺走了罗怙吉·邦斯勒认为应该属于他活动范围以内的加拉-曼德拉的古老的贡德王国。但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其根源在于马拉塔联邦中的成员日益独立，在于罗怙吉·邦斯勒想要在贝拉尔建立他的势力，独立于帕什瓦；而帕什瓦的政策则要维持这个联邦。在这一意想不到的盟友的帮助下，罗怙吉·邦斯勒遂被逐赶出孟加拉。作为回报，阿里·瓦迪汗同意把该省的“乔特”税付给帕什瓦，外加220万卢比。在这次入侵期间，英国人修筑了马拉塔壕沟以保卫加尔各答，注意这一点是很有趣味的。阿里·瓦迪汗不久就发现，入侵者是不能用金钱打发走的，帕什瓦的承诺也不可靠。因为1744年，他再次被迫与马拉塔人的入侵进行较量。这第三次的天罚是沙胡在帕什瓦与罗怙吉之间进行调解的结果。根据调解，马尔瓦、亚格拉、阿吉米尔、阿拉哈巴德以及比哈尔的一部分划入帕什瓦的势力范围；而罗怙吉则获得比哈尔的其余部分，以及奥德、孟加拉和奥里萨诸省。在马拉塔人的威胁重新临头时，阿里·瓦迪汗遂作孤注一掷，采取背信弃义的手段，在一次会议上杀死21名马拉塔将领，使局势暂时得到缓和。在短期内，孟加拉摆脱了马拉塔人的骚扰，但不久阿里·瓦迪汗又要去对付把马拉塔人延入省内的、拥兵哗变的阿富汗将领。这就导致了1745年的第四次入侵。最后，罗怙吉被赶出了孟加拉，但他继续拥有奥里萨的库塔克。1746年，皇帝希望使这些省份不再受骚扰，遂命令阿里·瓦迪汗每年向马拉塔人交纳一笔款子，作为孟加拉和比哈尔的“乔特”税。然而，阿里拒绝照办，因为他知道支付“乔特”税并不能使自己免受马拉塔人的进一步勒索。再没有什么能比中央政府采取这种优柔寡断的政策和省督对马拉塔人的猛烈抵抗，更能说明帝国的分崩离析的了。阿里·瓦迪汗英勇地继续保卫他的各省，抵抗马拉塔人的进攻，并在1746年至1747年间取得胜利，迫使马拉塔人撤退。但是，马拉塔人在此以后继续用兵，迫使他不得不在1751年与他们妥协，从而同意交纳他们要求的“乔特”税。但是，阿里·瓦迪汗未能把马拉塔人逐出奥里萨。在此以后，奥里萨省除了米德纳普尔周围的一块弹丸之地（即在176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财政管理权“迪瓦尼”的地区），其余地区都在马拉塔人手中，并被并入罗怙吉的领地贝拉尔亦即那格浦尔境

内。马拉塔人的活动并未局限在蹂躏孟加拉的范围内，因为在这些年代里，他们除了巩固他们在马尔瓦和本德尔汗德的势力外，还席卷了卡纳蒂克的大片地区。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多斯特·阿里汗的首府设在阿尔科特，按理它隶属于德干的莫卧儿总督，但他依照当时的趋势，力图摆脱尼查姆的束缚，争取独立，并将其权力伸延到印度南部。他的女婿昌达·沙依布遵循这一政策，夺取了特利支诺波利等地，并威胁马拉塔人的坦焦尔公国。罗怙吉·邦斯勒以及其他显要的马拉塔人领袖不愿意实行帕什瓦所主张的在印度北部破坏莫卧儿势力的政策，而宁愿在印度的南部巩固马拉塔人的势力。他们说服沙胡侵入卡纳蒂克，尽管根据瓦尔纳条约，他已把这一扩张范围让给了他的表弟、科尔哈普尔的统治者桑布吉。所以，多斯特对坦焦尔的威胁导致了罗怙吉率领马拉塔人的大军对卡纳蒂克大举入侵。罗怙吉于1740年在达马尔治理山口打败并杀死多斯特，接着攻占阿尔科特，多斯特的继承人萨夫达尔·阿里被迫屈服。次年，马拉塔军队占领特利支诺波利，俘获昌达·沙依布，并把他解往萨塔拉。这时，马拉塔人企图迫使本地治理的法国总督迪马交出在他辖地避难的昌达·沙依布的眷属，但未获成功。1742年，萨夫达尔被他的表弟穆尔太柴·阿里谋杀。留守特利支诺波利的摩拉利·罗是著名的马拉塔海盗，他的业绩使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加剧。当帕什瓦和罗怙吉·邦斯勒在孟加拉相互争斗时，尼查姆于1743年进入卡纳蒂克恢复秩序并重新确立他的权威。他攻下阿尔科特，委派他自己提名的安瓦-乌德-丁担任纳瓦布。他着手进兵围困特利支诺波利，该城在被围攻5个月后投降，并被交由安瓦-乌德-丁之子穆罕默德·阿里管辖。这就是英法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消息传到印度时印度的事态。一直到这时为止，印度南部的各个欧洲国家的贸易公司，除了在马德拉斯和本地治理两地收容难民外，对这些相互残杀的内部斗争都持超然态度。贸易公司仍然采取防御性政策，其活动仅限于保卫自己的居留地。印度南部这时将成为英法角逐的场所。这种角逐最终导致对印度事务的干涉，从而为欧洲人在印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在印度的贸易听任“土邦”的摆布。除了孟买的英国商人外，各国商人都承认莫卧儿皇帝的宗主权，他们的贸易特权和其他特权主要是以莫卧儿的“法尔曼”为根据。这种

“法尔曼”在半独立的省督和地方官吏的索求下，往往证明是没有价值的。由于商业活动必须获得皇帝的批准，荷兰人遂向贾汉达·沙的宫廷派遣了由凯特拉尔率领的使团。他们虽然获得了重大的特许权，但是，由于皇帝在1713年被害，这些特许权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由苏尔曼率领的派驻法鲁克-西耶尔宫廷的英国使团却比较成功，于1717年获得了帝国的“法尔曼”，确认并扩大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在此期间，尽管印度时局混乱，但它的外贸额（主要是出口贸易）却大幅度地增长。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是：棉和丝质衣料、棉纱和生丝。印度出口贸易中的重大变化是香料贸易的衰落，其原因是欧洲人对甜食的爱好的现在超过了用香料调味的菜肴，而且由于对牲畜使用冬季饲料，鲜肉供应常年得到了保障。印度主要进口商品是铸币金属，尤其是白银。其次是宽幅细布和其他毛织品、铅、铜、锡和水银。简而言之，印度在18世纪上半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方向大体就是这样。

到了1744年，欧洲对印度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荷兰和法国。葡萄牙人虽还占据果阿、第乌和达曼，但已在17世纪上半叶丧失了印度贸易中的地位。与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公司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如1722年正式获得执照的奥斯坦德公司，1729年重建的丹麦公司和1731年成立的瑞典公司，都不能算作重要的竞争对手。在葡萄牙势力衰微后的一段时间里，荷兰人是英国人的劲敌。在孟加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克莱武于1759年攻占钦苏拉才结束。法国人是后来者。在1666年至1689年间，他们已在苏拉特、本地治理、马苏利帕坦、昌德纳戈尔、巴拉索尔和卡辛巴扎开办工厂。此外，又于1701年增加了卡利卡特和1721年增加了马埃两地。最重要的英国居留地是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此外，还有布罗奇、艾哈迈达巴德、斯瓦列、特利切里、卡利卡特、安金戈、波多诺伏、马苏利帕坦、维扎加帕坦、巴拉索尔、卡辛巴扎、达卡、巴特那和马尔达等英国居民点。英国人很幸运，“伊丽莎白伦敦公司”与1698年的“英吉利公司”之间的争端已在18世纪的最初10年中由于它们合并为对东印度贸易的英商联合公司，从而得到解决。而法国人却不幸，他们的公司卷入了1720年垮台的约翰·罗的包括一切的体系中。此后，法国的公司改组为“印度群岛常设公司”，到1740年时就成为英国人在印度的最强有力的对手。

英法之间爆发战争的消息于1744年9月传到印度。起初，本地治理的法国总督杜布雷想谋求通过法英两国在东方的公司达成一项中立条约，以便保护法国的利益。但由于印度的英国公司无权订立这种协定，杜布雷的提议没有成功。杜布雷虽则总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但他无论对时局抱有什么希望，也都因英国巴尼特的到达而彻底失望了。巴尼特率领一支英国舰队在印度海域扫荡了法国的船运，并捕获他们的中国舰队。杜布雷的下一个步骤就是从法兰西群岛调来拉布东内统率的法国舰队。^[7]拉布东内到达的时机对法国人很有利，因为巴尼特已死，并由担心怕事、瞻前顾后的佩顿接替。佩顿在与法国舰队进行了一次没有决定意义的冲突后，终于放弃海岸一带，退避入胡格列河，这样就把制海权暂时让给了法国人。这就使拉布东内赢得足够时间攻占马德拉斯。但在如何处置该城的问题上，杜布雷与拉布东内发生了严重的争论。正在他们僵持不下时，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摧毁了一部分法国舰队，因此，迫使拉布东内回到法兰西群岛进行修整，留下杜布雷接管和掠夺马德拉斯。拉布东内撤离后，英国人的前景好转。随着1748年4月博斯科恩率领大批海军增援部队的到达，英国人重新又取得完全的制海权。英国人企图夺取本地治理，但未获成功，本章就不再赘述了。根据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马德拉斯被归还英国，以此交换布雷顿角岛的首府路易斯堡。有关这些年代，尤其是有关杜布雷与拉布东内的争执，材料十分丰富，使历史学家们对这次战争大为注意。但就其重要性而言，这样的关注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为这场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只是提供了一段喘息时间。但是，这次战争确实表明了海军力量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1748年印度的形势十分悲惨。这一年，阿富汗统治者阿哈马德沙·杜兰尼开始了对印度北部进行的一系列的袭击和远征中的第一次，对此“各土邦”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同年，皇帝穆罕默德·沙去世，软弱无能而又荒淫好色的阿哈马德沙继位，但这些事件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央政府的权威仅局限在德里周围的一小块地区了。1749年，马拉塔的拉贾沙胡之死也同样无关紧要，因为马拉塔的中心政权接着从萨塔拉转移到帕什瓦的首府浦那只不过是早已发生的事件的逻辑结果而已。尼查姆-乌穆尔克之死则重要得多，因为尼查姆之死导致了德干的混乱，终于使法国人能干预其事务。

英法竞争和法国人要想在印度建立帝国的企图，是一个人们常常讨论的题目。法国人对印度事务的干涉在杜布雷任前就已发生。早在1676年，弗朗索瓦·马丹就代表当地的一个酋长攻占本地治理附近的瓦尔多尔要塞。荷兰人也曾与卡利卡特的萨摩林打过仗，并于1717年占领过一些要塞。法国军队曾被一位土王逐出马埃，1725年在法雷尔的率领下又占领了该地。就在最近的1739年，卡里卡尔被法国总督杜马攻占。已经提到过，孟买的英国商人曾采取步骤保护他们的商业不受沿海海盗的劫掠。所有这些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欧洲人的商业。但大规模干涉“土邦”的事务则始于杜布雷。1748年后，英法两国公司之间在印度南部进行着一场非正式的战争。英国人在坦焦尔的继承权问题上偏袒一方，从而首先干涉了印度的事务。然而，这与杜布雷在卡纳蒂克和德干的大规模的谋划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杜布雷第一次进行干涉时也许纯粹出于商业上的理由和个人的利益。即使对他这样想象丰富的人来说，要在印度建立法兰西帝国的念头也是逐渐形成的。他也许是受到布西在德干显然获得成功的政策所启发。评价杜布雷何以未能实现他目标的原因，比阐述遭遇战和围城战更为重要。为此目的，有必要把主要事件作一概述。

1748年，尼查姆-乌穆尔克阿萨夫·查死后，他的子孙们随即为了争夺德干总督之位而发生斗争。他的长子伽各-乌德-丁远在德里，于是他的次子纳赛尔·章与他的孙子穆扎法尔·章之间爆发内战。在卡纳蒂克，安瓦-乌德-丁死后，他的私生子穆罕默德·阿里与多斯特·阿里的女婿昌达·沙依布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法国人支持穆扎法尔·章当德干总督，昌达·沙依布当卡纳蒂克的纳瓦布；而英国人则支持纳赛尔·章和穆罕默德·阿里的要求。英国人为了要援救被困于特利支诺波利的穆罕默德·阿里，遂派克莱武进攻阿尔科特，以减轻对特利支诺波利的压力。克莱武率领人数很少的守备部队，在攻克阿尔科特后，抵抗昌达·沙依布和其法国盟军的反攻，坚守达53天。斯特林格·劳伦斯在特利支诺波利城下打败法军，劳指挥下的法军投降，以及杜布雷未能扭转败局等事件，意味着杜布雷企图控制卡纳蒂克的谋划已经破产。应当注意的是，英国人是被迫诉诸武力的，因为昌达·沙依布在马德拉斯把英国据点周围的土地让给了法国人。

在德干，莫卧儿皇帝承认了纳赛尔·章为其父阿萨夫·查的继承人。但纳赛尔于1750年12月遇刺。于是，法国人文特穆扎法尔·章继

位，并派布西率领法军把他护送到海得拉巴和奥兰加巴德。穆扎法尔·章为了报答法国人对他的承认和支持，就委任杜布雷充任他的代理人，管理克里希纳和科莫林角之间的印度南部各省。当穆扎法尔·章遇刺时，布西立即拥立已故的阿萨夫·查的第三子萨拉伯特·章为总督。萨拉伯特为了报答法国人，就在1751年10月把阿尔科特、特利支诺波利和麦杜拉各省让予杜布雷，杜布雷以后则让给法国，并免除其一切贡赋。现在，布西和萨拉伯特·章又面临马拉塔人的对抗，因为马拉塔人决定把自己的傀儡伽齐-乌德-丁扶植为德干总督。布西感到局势极为严重，几乎要考虑从德干撤退。但这一严重威胁因伽齐-乌德-丁被毒死而暂时缓解。但布西急需金钱，并曾一度想抛弃萨拉伯特·章，因为德干的财政资源不够支持杜布雷的计划。然而，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到1753年7月布西已改变看法，接受了杜布雷的思想方式。^[8]可是，布西的困难依然存在。即使萨拉伯特·章把北部各个沙卡尔的征收税负权都让给他，他也不能迫使那里难以驾驭的包税地主“柴明达尔”拱手交出税负。这就是杜布雷在1754年8月被召回法国时的形势。

人们有时武断地认为，英法两国的公司在斗争开始时双方的资源实际上是势均力敌的。这种错误的臆测，看来是根据在卡纳蒂克所获得的资源，它却没有考虑到法国人在印度的居留地总的来说在各个方面都不如英国人的居留地。莫尔莱在1769年发表了据现在已不存在的文件写成的《印度公司实况回忆》，此书清楚表明，当杜布雷干涉卡纳蒂克和德干时，法国公司的财政状况不能帮助他达到目的。他的乐观和缺乏远见，导致他去劝说法国当局相信他能在印度建立一个本地政权，其税收使他能够做到自给自足，无须母国的财政支持。接踵而至的战争摧毁了这一地区，无法征收他的计划赖以成功的赋税。除此以外，本来应当充入公司金库的资金却进了到印度来做发财梦的法国军官的腰包。杜布雷对此心中有数，因为我们发现他在1751年抱怨布西等军官在德干大发横财。结果是，他年复一年地债台高筑，最后他的存款完全耗尽。所以，不能认为杜布雷是一个在无人过问情况下的牺牲品。他自己没有要钱，而且他也没有接受一分钱。

就以法国提供的部队而论，杜布雷在1750年至1754年间接受了4349名新兵，但是他们是从监狱里扫除出来的垃圾，完全没有受过军人职责的训练。他的军官，除了布西，可能还有曼维尔以外，都缺乏

领导能力，不想在部队服役。1750年4月，13名军官临阵脱逃，而1752年到任的军官则乳臭未干，毫无作战经验，以致遭到士兵的嘲笑。杜布雷未能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是他的军队屡次打败仗的原因，也是导致他在卡纳蒂克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英国的军队和增援部队素质较好，薪金较高，最重要的是统率有方。在卡纳蒂克，没有一个法国军官能比得上克莱武和斯特林格·劳伦斯。这两人在卡纳蒂克对于英国人，就像布西在德干对于法国人一样，举足轻重。但不幸的是，卡纳蒂克正是决定杜布雷成败的关键战场。布西远征德干，就致命地分散了军队，浪费了军力。印度史证明，帝国的创建者需要以富饶地区为中心进行开疆拓土。卡纳蒂克和德干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研究一下杜布雷的书信就会明白，他应该对自己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他不仅乐观到了盲目程度，而且性格上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低估他的对手。对他来说，英国在马德拉斯抵抗的软弱无力和对本地治理围攻的徒劳无功，就是英国人军事上无能的证据。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计划必定会引起英国人的反对。他也没有意识到，在面临坚决抵抗的情况下，他没有必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接替杜布雷的戈德厄到任后，立即与英国人商妥了一项临时条约，结束两个公司间的非正式战争。该约对法国人颇为有利，并且不延及德干。在德干，布西继续得到戈德厄及其继任者德莱里特的支持。所以，伦敦的英国当局建议与马拉塔人结盟，以便把布西逐出德干。幸亏孟买的英国官员拒绝合作。这样，原来准备进行德干战役的克莱武部英军移兵参加了英国人和马拉塔联军对基里阿的进攻，遂于1756年攻克了安格里阿的这个海盗堡塞。假如克莱武被缠在德干不能脱身，他就不会有力量远征孟加拉了。

1756年，阿里·瓦迪汗的继承者、纳瓦布西拉吉-乌德-道拉攻占加尔各答的英国人居留地，并把幸存者监禁在名声不好的“黑洞”监狱。这次事件有确实的历史证据，但许多印度史学家不予承认。西拉吉-乌德-道拉进攻的主要原因看来是担心外国侵略，这种担心归根结底是由卡纳蒂克和德干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引起的。他指责孟加拉的英国商人未经他允许就在居留地设防，并且滥用1717年的帝国法尔曼所特许的贸易特权，这一指责是颇有道理的。但克莱武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加尔各答，迫使西拉吉-乌德-道拉签订一项条约，确认英国人在

以前享有的一切特权。不久就明显地看出，西拉吉无意遵守该约的条款，而与再次跟英国人打仗的法国人合作。克莱武取得曾被西拉吉侮辱和疏远的、有权势的印度教金融家塞思家族的支持，决定以一个较倾向英国公司的傀儡纳瓦布米尔·伽法取代西拉吉-乌德-道拉的副王之位。接着导致克莱武于1757年在普拉西轻易取胜的战事和谈判众所周知，毋庸赘言。但是，这次战役的胜利对英国势力在印度的成长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此役使英国人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从而支配印度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利用其资源摧毁法国在卡纳蒂克的势力。于是，克莱武从孟加拉派遣远征军，攻占马苏利帕坦，把法国人逐出了北部的各个沙卡尔，而这些地方的税收原来是特许给布西的。随着克莱武攻占昌德纳戈尔，法国在孟加拉的势力遂告结束。而且，随着一支远征胡格列河的荷兰海军部队受挫和1759年钦苏拉落入英国手中，英国所有欧洲对手在孟加拉的抵抗都告停止。这样，在法国将军德拉利于1758年4月到达本地治理以前，英国已在孟加拉站稳脚跟。拉利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布西召回卡纳蒂克，他正确地判断，卡纳蒂克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中心战场。

七年战争期间，英法在卡纳蒂克的斗争多半取决于海战。虽然拉利攻占了圣戴维堡，但当他接到达什在卡里卡尔近海失败的消息时，就只得撤出在坦焦尔进行的南方战役。接着他企图攻打马德拉斯，但未获成功。有意义的是，正是从孟买经海路运来的英国援军迫使拉利解马德拉斯之围。艾尔库特爵士率领一营正规军从英国来到印度，这表明英国海上势力增强和英国对到印度的长距离海上航线的控制。库特1760年1月22日在万迪瓦什击败拉利，此役对于英国人在卡纳蒂克的地位，就像普拉西之战对英国人在孟加拉的地位一样重要。最后，在英军的海陆联合进攻下，本地治理被迫于1761年1月投降。

在英法竞争的这一期间，马拉塔人几乎蹂躏了整个印度北部，从纳巴达河到开伯尔山口附近的白沙瓦。人们一直断言：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格兰特·达夫关于马拉塔人在印度河饮马的说法。但是最近的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他的论断的正确。^[9]马拉塔人被阿哈马德·沙·杜兰尼从西北边境的前沿阵地逐渐地逐向南方，杜兰尼在当时的编年史中称为阿布达利，是相当于今日阿富汗地区的动乱中的阿富汗部落的领袖。就印度而言，他就像伽色尼的马茂德；帖木儿和纳迪尔·沙一样，不过是一个袭扰者而已；除了信德和旁遮普外，他不想把其

他印度领土并入自己的中亚帝国。由于阿富汗土地贫瘠，他不得不掠夺印度北部的城市。为了赢得威望和满足他追随者的掠夺癖性，他不得不采取侵略性的政策。从1747年至1769年，他10次侵入印度斯坦。1748年，他到达拉合尔，向德里推进，但终于被击败，被迫退兵。次年对旁遮普的入侵只能算是一次武力侦察。1752年，他征服旁遮普，并把克什米尔并入版图。在1757年，他攻占德里，洗劫圣城穆特拉。他大肆屠杀，但由于军中发生霍乱，只得退兵。马拉塔人于1758年占领旁遮普，赶走留守总督、杜兰尼之子帖木儿，这就导致了帕尼帕特战役。马拉塔人在阿富汗军队推进以前即迅速撤离旁遮普，退至德里，而阿布达里的军队紧追不舍。

与此同时，马拉塔人与海得拉巴的尼查姆做斗争，后者的抵抗力量由于拉利把布西撤至卡纳蒂克而削弱了。尼查姆的军队根本不是马拉塔人的对手，在1760年的乌德吉尔战役中被帕什瓦之弟沙达西夫·鲍打败。尼查姆只得割让一半领土，于是马拉塔人在德干的势力发展到最高峰。现在帕什瓦把将阿富汗人逐出印度北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沙达西夫·鲍。马拉塔人不仅必须对付与入侵者合作的北部穆斯林酋长联盟，而且还得在没有拉杰普特人和其他印度教政权帮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因为“乔特”军事保护税和“沙德什穆克希”什一附加税已疏远了他们与马拉塔政权的关系。马拉塔人顺利地占领了德里，但德里弄不到粮秣和金钱，作为一个基地没有多少用处。于是，他们攻占朱木拿河岸上的昆季普拉，暂时缓解了给养方面的困难。但此举结果却带来灾难，因为更有胆略的阿布达利渡过朱木拿河，切断了马拉塔人与德里的交通。鲍决定在帕尼帕特设防坚守。由于阿布达利的军队较为机动，夺取了马拉塔军队的给养，鲍面对着饥饿，只得离开防御设施，向阿富汗攻击。马拉塔人虽然奋力死战，但顶不住阿富汗人在有将才的阿布达利指挥下的猛烈冲击，终于在1761年1月14日被击溃于帕尼帕特，损失惨重。阿布达利没有想巩固他的地位，于同年3月再次班师回阿富汗。

阿富汗人在帕尼帕特的胜利影响深远。它使尼查姆从乌德吉尔的失败中恢复元气，可能还使海得拉巴国避免了灭亡之祸。马拉塔人全神贯注于印度北部的事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了迈索尔的一个独立的穆斯林政权在一个名叫赫德尔·阿里的本领高强的冒险家的领导下崛起。马拉塔人丧失了威势。印度世界越来越看清楚，不论是帕什

瓦，还是莫卧儿皇帝，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外国人的侵略。此外，1761年后马拉塔联邦的内部纷争也严重损害了联邦的实力。权力现在从帕什瓦的手中转移到将军们的手中：瓜利奥尔的信希亚、印多尔的荷尔卡、贝拉尔的拉加和巴罗达的土著王。史学家往往低估帕尼帕特战役的影响，强调马拉塔人只遭到暂时的挫折，他们很快又从挫折中恢复了元气。这种观点无视这次胜利的真正重大意义：它使英国人赢得宝贵的喘息时机，从而在孟加拉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克莱武的政策是加强英国在孟加拉的地位，并通过一个傀儡纳瓦布进行统治。他的继任者范西塔特在废黜米尔·伽法和代之以米尔·卡西姆以后，犯了加强新任纳瓦布权力的错误。米尔·卡西姆在任职伊始就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威，并在公司职员进行内地贸易的种种弊端的问题上与英国人发生争执。不能否认，公司职员和他们的代理人滥用职权，仗势欺压，劣迹累累，这在华伦·黑斯廷斯当时所做的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大量证据。因此，在许多印度作家的笔下，米尔·卡西姆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者。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争取完全的独立，他的政策是要扭转普拉西之战的定局。这是英国人所不能允许的。范西塔特的同僚们反对米尔的和解政策，这种态度使米尔大为愤怒。于是，他就在1763年进行了可怕的巴特那大屠杀，一举处死150名英国人，犯下了比加尔各答的“黑洞监狱”惨案更为蓄意的罪行。在米尔·卡西姆失败和逃亡以后，那个较为俯首听命的米尔·伽法复位。此后，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皇帝和他的纳瓦布-瓦齐尔、奥德的舒查-乌德-道拉进行了推翻英国在孟加拉势力的最后努力，但他们在1764年被蒙罗大败于布克萨尔。英国人的这次胜利完成了普拉西战役的事业，从此以后，英国人在孟加拉省就成为不可争议的统治者。

（潘永樑 译）

[1] 这些“法尔曼”的波斯文本和英译本，见《亚洲孟加拉学会刊物》（1906年），第223—255页。

[2] “乌列摩”是伊斯兰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3] 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897年），该诗的编译者为W. 欧文，第24—62页。

[4] H. M. 埃利奥特和J. 道森：《印度史学家论述的印度史》（1877年），第8卷，第89页。

[5] L. 洛克哈特：《纳迪尔·沙》（1938年），第149页。

[6] J. 沙卡尔：《莫卧儿帝国的衰亡》（1922年），第1卷，第87页。

[7] 法兰西群岛即今毛里求斯。——译者注

[8] A. 马蒂诺：《布西与法属印度（1720—1785年）》，（1935年），第107—114页。

[9] 格兰特·达夫：《马拉塔人的历史》（1921年），第1卷，第507页；J. 沙卡尔：《莫卧儿帝国的覆亡》（1934年），第2卷，第76页。证实格兰特·达夫论点的证据可以参阅《萨马荷达卡地区印度史档案（Bharat Itihasa Samahodhak Mandal）》中波斯文新闻信札的手稿，及《昌德拉楚达地方档案》

（Chandrachu-da Daftar）第1卷（1920年）和第2卷（1934年）。亦可参阅H. R. 格普特著的颇有价值的《旁遮普的后期莫卧儿史研究》（1944年），第175—176页。

第二十四章 在非洲和远东的经济关系

1. 非洲

18世纪初期，白人在非洲的正式殖民活动已陷于停顿。事实上，一些殖民计划——如刚果的传教士王国、葡萄牙人在非洲东岸的殖民地、耶稣会在埃塞俄比亚的初期传教活动——已被非洲严酷的事实彻底粉碎了。白人移民只剩下安哥拉的商人和开普殖民地的农场主，他们的冲击力，就像他们的繁荣一样，是微小的。但是，如果说欧洲的旗帜或圣经所取得的进展很小，那么，在商业上却正在建立大规模的联系。白人商人的努力、市场的作用和远方各国的需要，正把西非拖进世界经济之中。这倒不是为了获得非洲的原料，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商品可供贩卖的话，西海岸的黄金和象牙本来是不会吸引多少注意的。

贩卖非洲劳力是一宗非常古老的生意。但是由于17世纪“新大陆”的开发，这种生意从原来向北的方向转成了向西的横渡大西洋的方向，奴隶贩卖成为规模更大和更为令人瞩目的掠夺经济。经常的劳动力的供应，对于美洲的种植园经济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只有移民才能提供这种劳动力，而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对于非洲奴隶的经纪人和欧洲的商人，都是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引起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其原因就在于此。

所谓非洲西海岸可以看作延绵于塞内加尔与安哥拉之间的、跨越约28度纬度、长约3500英里的海岸线。18世纪，这一整个地区称为几内亚海岸。按照非洲的标准，此地人口相当稠密。黄金海岸和维达港因聚居着被西印度群岛的买主赏识的黑奴货源而得到奴隶贩子的偏爱。但是，船货必须很快备齐，而且价格越低越好，这种需要驱使奴隶贩子深入内地，远至博尼和新、旧卡拉巴尔，那里他们可以开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资源。奴隶贩子与这些人口稠密地区的接触，使他们

轻率地估计非洲人口可能高达1.5亿。然而，即使有这么多的人口，他们也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同样，他们的批评者们感情用事地念念不忘“几内亚被囚禁之王”，也是没有道理的。沿岸诸部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差异极大，有阿散蒂人和达荷美人的强大王朝或阿坎人部落酋长会议的统治，以至伊博人的小型民主政体；这些人可能开矿，可能经商，也可能务农，很难一概而论，但他们都渴望获得白人的商品，而且大部分受到白人奴隶贸易的影响。

在18世纪，奴隶贸易引人注目的发展是随着蔗糖业的好运而来的；因此，种植园的兴旺就会给几内亚人带来兴隆的生意，除非战争的危险使他们不能出港。1740年以后，直至1770年，糖价一直令人满意地上涨；蔗糖生产（至少在英属诸岛）随之发展。这样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奴隶贩子就加倍地贩卖奴隶。

贩奴的方法尽管大有不同，但在依赖非洲的中间人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中间人的任务是在内地市场上购买奴隶，然后在海岸边把他们集中装船。几内亚人通常从欧洲直驶非洲西海岸，途中在洋流的推送下绕过非洲大陆突出部，接着就开始搜寻船货。它们可以在由本国公司作为奴隶待运站而维持的要塞处停泊；可是，它们如果是私商船只，那么这样做就有困难；还是沿着海岸线随时靠岸，零星地购买奴隶，凑齐船货，较为方便。但沿岸贸易有其零星交易的缺点：这样做旷日费时，没有把握，而且缺乏提供淡水和补给品的良好供应点。因此，较大的公司开始稳定在固定的大市场上做生意，这样就与欢迎他们来办货的本地中间人建立起不断的联系。维达和尼日尔三角洲的巨大贩奴港埠就是这样开始建立的。

这种办法给贸易带来很大便利，但也有其难处。例如，在维达港，商船如不以白兰地、布匹和枪支的形式交付“关税”就不得贸易；接着还得给镇上官吏、划独木舟的人、以及随从用实物交纳许多零杂费用。此外，奴隶买卖的谈判是少数老手才能干的事情。奴隶是以商品换取的；如果商船需要的奴隶还必须到内地购买，那么这些交换奴隶的商品可能必须提前支付。兑换单位概念玄妙，难以了解。沿着向风海岸，兑换单位是铁条；再往东则可能是贝壳或布、铜条或黄金。可是，即使一个奴隶以这种难以弄清的单位定了价格，仍然需要决定用什么商品来支付。最后，还有配备货物以满足难以捉摸的专门

市场的需求的问题。黄铜滑膛枪在下风海岸销路很好，但在其他地方买主则很少；有一段时期，在黄金海岸销售的珠子都必须是蓝色的。

在7月从英国起航的船只，要到次年4月才能到达西印度群岛。这样的航行意味着从投资到收益，周期很长。可是，如果试图缩短耽搁时间，就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烦。船只停在一个港埠购买奴隶，周转速度可能较快些，但由于奴隶贩子竞争激烈，又急于要离开时疫流行的河流，还要为信用问题与中间经纪人争吵，最后可能导致开枪或绑架事件，就像1767年在旧卡拉巴尔发生的事件那样，当时英国商船向镇上的独木舟开火，打死几百人，以鼓励其他奴隶船继续做生意。

当然，各国家公司是无法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的。这些公司在17世纪扩大了这种贸易，主要靠重商主义的观念经营这种贸易。这种观念认为：奴隶应该供给本国的种植园，而不应提供给竞争对手。因此，欧洲各国政府在妨碍其他国家的公司的同时，把支持本国非洲公司作为统一自己的商业帝国的一种手段。于是，在刚果的传教士也鼓励他们的信徒只把奴隶卖给可能是葡萄牙籍的和信奉天主教的奴隶贩子。

由于各国政府希望紧紧控制这种贸易，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商业冒险中需要大量固定资本，各国就纷纷成立本国公司。据说，这种公司具有相当的官方性质，足以控制这种贸易；还设想，由于这些公司实力相当雄厚，足以稳定这种贸易。这些公司根据特许状进行经营，这种特许状给予各国政府希望在非洲沿岸行施的那种独家经营的权利。这些公司在塞内加尔、冈比亚、黄金海岸和维达修筑的要塞就是其势力的显而易见的标志，也是它们出发去尽力垄断邻近地区的贸易的基地。

这就曾是这种贸易的理论。但是到了18世纪，由于销售机会开始扩大，实际做法起了变化。于是荷兰人愿意向所有买主出售奴隶；葡萄牙人愿意从所有的卖主那里购买奴隶；英国商人获得的贩奴特权使他们在1750年以前一直是西属殖民地奴隶的供应者。此外，这种贸易的吸引力也使无执照的私商跃跃欲试。各国的特许公司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但都同样运气不佳。不论当年生意是否景气，要塞必须维持，守备部队必须发饷，贸易必须努力经营。私商就没有这些障碍，他们能把生意做得更为灵活和大胆，经营方法也可更为机敏利落。他们经

营的奴隶比特许公司的多，种植园主离不开私商。18世纪非洲贸易的扩大是私商努力的结果；他们在有利条件下贸易，在任何市场上销货，而与此同时，僵硬刻板的各国国营公司却被迫采取守势了。

在这种情况下，勃兰登堡公司是最先倒闭的公司，也是从事贩奴业历史最短的新手。1682年，勃兰登堡选侯特许一家公司在黄金海岸从事奴隶贸易。从1686年起，该公司在哥本哈根的同意下把奴隶贩卖到丹麦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普鲁士人就以为有了成功的把握，即在黄金海岸建立两个要塞：大弗里德里希斯贝格和塔科拉迪。他们与丹麦人经常发生摩擦，生意不佳，因此到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考虑“放弃这种生意”。1717年，要塞卖给了荷兰人，勃兰登堡乃从这项无利可图的投资中脱身。

丹麦人则发现特许公司有其弱点。丹麦所属的西印度圣托马斯岛加上黄金海岸的要塞，似乎提供了建立一个丹麦的贸易三角的条件。于是从1697年起，丹麦的西印度公司开始在非洲为它自己购买奴隶。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风险太大，利润毫无把握，而且丹麦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市场又太小。因此，从1733年以后，公司开始把生意让给私商。而私商也发现在丹麦市场上冒险无利可图，他们贩运的奴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价格上都不能满足种植园主的要求。于是，在1755年和1765年曾两度试图组建新公司，但结果又都不合需要。丹麦人发觉他们的奴隶贸易是一宗蚀本生意，所以毫不奇怪，丹麦是第一个废除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

然而，这些只是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买卖奴隶的公司，主要的奴隶贸易还是由别的国家做的。在贩奴国家中，葡萄牙的作用也许被低估了。葡萄牙人拥有可以进行奴隶买卖的广阔市场；而且，随着巴西米纳斯吉拉斯金矿和钻石矿的发展，他们需要大量劳动力，并使用各种应急措施来满足这种需要。葡萄牙特许的公司中，有几家因为经营奴隶专卖遇到困难，已经倒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较为灵活的制度。1724年，一家新公司成立，准许可以有限制地独家经营科里斯科和加蓬河之间的贩奴生意；但从巴伊亚、累西腓和里约热内卢来的私商亦获准在非洲海岸的其他地方从事这种贸易。在尼日尔三角洲和黄金海岸，葡萄牙商人与其他国家的商人和睦相处地做生意，常常从丹麦人和英国商人手中购买奴隶。在安哥拉，他们虽然不能垄断这项贸易，但自然处于那一地区的贸易的主导地位。而在北面的塞拉利昂和

冈比亚河一带，他们则得到通常有葡萄牙血统的混血种居民的帮助。这种经营办法是极其灵活的和以经验为根据的。他们由于都在沿岸购买奴隶，就能进行挑选，廉价买进；他们由于和其他欧洲商人保持友好关系，就常常能在其维修保养使他们的竞争者入不敷出的要塞购买船货。因此，英国公司忧心忡忡地谈道“这些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不设任何要塞，却经营了最大的贸易”^[1]。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它缔造了现代的巴西。然而由于葡萄牙人只有这个市场和缺乏进行广泛投机的资金，因此他们还不能支配整个奴隶贸易。

荷兰商人立即受到较少的限制，而且装备也较好。他们虽然以荷兰西印度公司设在黄金海岸的11个要塞为基地进行贸易，但也帮助开辟了维达和尼日尔三角洲的奴隶买卖，实际上在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都插手。在新大陆，他们同样是自由的经纪人，因为他们愿意在库拉索岛和圣欧斯达齐乌斯岛的货物集散地向任何买主销货，从而充分利用市场的需求。此外，他们精力充沛，财力雄厚，能够经营市场上出售的大部分的黑奴。他们是手段巧妙的商人和精明强干的竞争者。他们不肯给非洲的中间经纪人贷款，这正是他们精明的地方。他们仔细研究市场需求，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奴隶，这也正是他们的特点，以致使英国商人在1729年沮丧地推测“大多数到非洲做生意的商船的货载大部分是在荷兰上货的”^[2]。但是，英国及印度殖民地工业能力的不断增长逐渐改变了这种成本率。到1750年，荷兰人已失去优势，他们的竞争者已能高兴地宣称“荷属要塞的货物供应已不如以前了”。^[3]

如果纯粹以经济的观点观察法国和英国奴隶贩子时运的盛衰，那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是18世纪的战争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战时，航速缓慢、不易操纵的敌方贩奴船是明显的进攻目标；而由于战争的影响，新大陆的奴隶价格上涨。在18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斗争中，英国海军力量把法国奴隶贩子逐出海洋；同样，在北美战争期间英国的贩奴贸易本身也陷于停顿。但是除了战争的影响以外，法国对非洲贸易的组织工作需要认真的调查和改进，因为它既不能满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需要，也不能使巴黎的政府满意。1716年，奴隶贸易已向所有法国人开放。4年后，约翰·劳把法属西印度和西非零星的公司合并为新的“西方公司”，企图重新规划三角贸易，但这项计划因财政上的软弱和来自加勒比的抱怨而破产。法国人

的奴隶贸易，就像其他国家的奴隶贸易一样，愈益落入私营公司之手。这些私营公司以南特、波尔多和圣马洛为基地进行贸易，迫使特许公司让出地盘。

然而，这里又必然遇到非洲要塞的问题，因为除了特许公司以外谁愿意维持这些要塞呢？法国的属地划分为塞内加尔部和几内亚部；法国为了经营这些地方进行了大量努力。塞内加尔地区可算作向布蓝克角以南伸展250里格^[4]的地域，包括设在圣路易的法国总部，还有设在阿尔吉恩、波顿迪克、戈雷和阿尔布雷达等边远地区的分站，以及设在加拉姆的圣约瑟夫堡的内陆贸易站。黄金和橡胶贸易很有价值，但每年奴隶出口平均不超过100名；换言之，这不是私营公司能够有效经营的地区，因为黄金贸易需要不断地联络和补给货栈。因此就必须维持要塞，而维持要塞就需特许公司。法国公司力图把英国的贸易逐出这一地区，并在安德烈·布律有力的领导下极力渗入内地。但是，布律在1720年去职后，这些计划都成了泡影。黑人起了疑心，蓄意破坏贸易，以致到了18世纪20年代时塞内加尔部每年亏损350万里弗尔。其次，英国海上力量强大，法国不是对手。1758年，塞内加尔在威廉·皮特指挥的联合作战行动中被占领，从此它作为新合并的殖民地塞内冈比亚的一部分，被英国统治一直到1783年。

私商在战时也并不称心如意。奴隶买卖在太平无事的年代里也是铤而走险的事情。对于法国公司来说，1746年至1748年和1756年至1763年期间的战争年代是最艰难的年代。那时，商船不是被捕获，就是担心被捕获。这使奴隶贸易完全无利可图。不过，在和平时期，奴隶贸易却生意兴隆。私营公司比特许公司更有进取心，生意也做得更好。他们在几内亚部贸易，沿黄金海岸把买卖做到维达，并在寻求安全和搜索更廉价奴隶的过程中，一直到达加蓬及加蓬以南的地区。

这样向着能够买到奴隶的新地区移动，是18世纪奴隶贸易史中最重要的趋向之一。英国的奴隶贩子因组织松散和新手众多，特别适应于这种变动。直到1750年为止，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一直是负责非洲贸易的官方机构；但它从1698年以来已丧失垄断地位；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以后，它的处境十分艰难。贩奴特权本来可能使它时来运转，因为“南海公司”急于要购买它贩卖的奴隶。可是它的供应时有时无，数量甚少，以致“南海公司”在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在非洲经营奴隶贸易。1729年，当贩奴特权重新得到确认时，南海公司决

定不再继续进行非洲贸易，而满足于购买在西印度群岛上岸的奴隶。这意味着它与私商的合作，因为英国商人的生意正愈益落入私商之手。1725年，布里斯托尔的商船贩运了1.7万黑奴，而伦敦的贸易行经手的奴隶数量可能更大；到1750年，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在互相争夺大部分贩奴生意；1/4世纪以后，利物浦中了头彩，它的商船装运的奴隶是英国贩运的全部奴隶的2/3。

英国皇家非洲公司面对如此激烈和巧妙的竞争，除了希望从公共资金中得到援助外别无他法。英国设立的要塞有7个在黄金海岸，一个在冈比亚，一个在维达。这些要塞可能代表了走向正式殖民的一个步骤，但它们的价值能与私商不拘形式的帝国相比吗？1726年，贸易和殖民专员忙于应付的就是这些问题。这家公司不能否认，私商贩运到种植园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公司经营的奴隶数；但它指责私商使种植园主支付较高的价钱。有些种植园主同意这种观点，但专员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不会相信奴隶贸易应当回到独家经营的老路上去。

然而，即令只是为了做黄金生意的缘故，毕竟还有一条应当维持这些要塞的理由。议会中人们可以轻蔑地断言，说公司“现在已一文不值”^[5]，但在1730年，议会还是被说服而投票通过给该公司以补贴。不过，破产仍旧难以避免。公司抱怨补贴太少，而开支太大。1750年，经济补贴被废除，尽管西印度殖民地对废除补贴持有异议。要塞被划归一个新成立的较为松散的机构“对非洲贸易的英国商人公司”管理。新公司向在非洲做生意的每个商人开放，并禁止他们以团体的名义贸易，因此充其量只是原来垄断组织的残余痕迹而已。私商已赢得胜利。

他们的胜利，结果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英国的奴隶贸易带来适应性和进取心，因为这时英国经济正在变得特别适应于给奴隶贸易提供价格合理的宜于出口非洲的商品。1750年以后，由于印度政治混乱而竞争衰落，兰开夏的纺织品就得到了机会。英国奴隶商人抓住时机，在1750年以后的1/4世纪中，逐渐控制了整个非洲贸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把英国向非洲出口（和再出口）的商品价值额提高了400%；在北美战争以前，他们每年贩运奴隶的数量近5万人。他们在贸易中不受节制的性质有助于这种惊人的发展，因为正是那些离开旧有的奴隶买卖中心做生意的贸易行，才能买到大宗奴隶。

尽管如此，私商接着也开始出现少数卖主控制市场的征象。1752年，利物浦原有101家全都是小本经营的奴隶商；但到18世纪末，这项贸易都落入几家大商号手中。法国的奴隶贸易也经历相似的变化，小商人逐渐让位于“安哥拉公司”这样的大联营公司。该公司建立于1749年，经营资本达200万里弗尔，并拥有一支大商船队。荷兰也是如此，“米德尔堡公司”这样实力雄厚的大商行开始插手奴隶贸易。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可以从西非通商的性质中得到一目了然的解答。奴隶贸易是一种有风险的生意，能否赢利很难预料；即使真有利润，从投资到收益也必须间隔很长时间。要找到投合非洲消费者所好的适当商品颇为困难。此外，还可能必须把货物赊给非洲的消费者，而他们有时干脆进入丛林一去不返。即使在奴隶集中以后，投资者的麻烦也没有结束：中途的航程充满危险，奴隶可能反抗，还要担心船只被捕获。最后，到了美洲时，种植园主可能压低销售价格或拖欠对奴隶商人的债务。这种贸易中充满了种种无法估计的因素。

在黄金海岸和维达的传统市场上大量购买奴隶造成激烈的竞争。例如，1739年一艘英国商船在黄金海岸等候船货耽搁了22个月。而在这种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是在西印度群岛贩奴季节刚开始时就把船载的奴隶售出。黑人中间经纪人很快学会了生意的诀窍，他们知道自己占有利地位，就抬高奴隶价格。有充分证据说明，在原来的奴隶买卖中心购买的黑奴成本越来越高。达文南特在1709年注意到这种情况；阿特金斯在1721年发现黄金海岸的黑奴价格上涨；46年以后，据估计价格至少翻了一番。

奴隶贩子很难把这些增加的费用转嫁给种植园主，因此他们渴望开辟新的非洲市场，希望在新市场上出价的竞争不会如此激烈，卖主也不会如此世故。于是，奴隶贸易中更有冒险精神的新手，就向东部和南部前进。有些奔向刚果和安哥拉；有些开始与加蓬做生意；但最重要的动向是向贝宁和比夫拉的海湾，尤其是向尼日尔三角洲的诸港移动。据报道，那里的奴隶价格比黄金海岸的时价低60%。早在1729年，人们就担心“海湾的生意一定做得过分了”^[6]，但是，实际上英国奴隶贸易的霸权正是靠与这个地区的联系才取得的。1771年，英国船只贩卖的奴隶有一半来自海湾；与尼日尔地区的贸易尤其成为利物浦经营的业务。在1784年和1785年，所有利物浦的贩奴船只有63%以上开往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港口。

看来，奴隶成本的上涨可能导致了较大船只的使用，在这些船上拥挤不堪的状况不会那么厉害。南特港在1748年至1782年间采购了146799名奴隶，卖掉127133名，平均损失为13.4%。当生意经营得比较合理时，死亡率下降了。

不过，尽管困难重重，获利还是高的。利物浦船“破浪号”1737年的航行赚取了300%的利润，这也许是一次“大获成功”。但是有证据表明，法国商人在奴隶贸易中预期利润为25%或30%。当时的人们认为，奴隶贸易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早期的反对者批评的是它的不义，而不是它的失策。可是，我们在强调成功的一面时，往往有忘记失败一面的危险。例如，“戴鲁维尔伯爵号”为了等待船货耽搁7个月，然后只装载了两名黑奴就横渡大西洋。总而言之，奴隶贸易不是一项简单的、一帆风顺的事业，而是一种风险莫测的大投机。一些到非洲贸易的商人宁愿做明智的树胶和染料木的生意，而不愿去从事动荡不定的奴隶买卖，这是可以理解的。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与白种移民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虽然海岸上欧洲人的要塞有朝一日会大有作为，但在18世纪，它们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很小。例如，在黄金海岸，边境线时有时无，力量薄弱，白人尽力避免与非洲邻邦发生纠纷。事实上，这些邻邦占优势地位，因为是由他们决定开放或关闭通向海岸的贸易通道，决定准许或禁止黄金和奴隶顺利地流向要塞。因此，白人可能被困在海边，而且，任何对内地的渗透，都可能破坏贸易。然而，在北部地区，非洲人力量较弱，欧洲人的领导较强，进展就比较大。安德烈·布律在塞内加尔决心渗透进入加拉姆的金矿区，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要塞控制这些金矿，甚至想把法国势力扩展到以东600里格处的图尔巴。即使在布律回国后，塞内加尔仍有一派人主张向外扩张，但公司作出裁决，认为“我们要开发的真正金矿就是贸易”，不应打搅黑人。英国人在冈比亚河的冒险中连这点也没有做到。在1720年的“股票投机热时期”，钱多斯公爵兜售开发非洲金矿的宏大计划，说服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派遣一支远征队上溯冈比亚河找寻金矿。结果这次远征一无所获，公爵的财运就此结束。1732年进行的另一次远征也同样运气不佳。

看来，只有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和在内陆的活动是成功的。他们在沿海的政治势力比北部的其他欧洲人的势力有更坚实的基础，因此他

们能较有信心地徐徐向内地推进，虽然现在不能肯定他们渗透得有多远。事实上，葡萄牙人在18世纪是与西非有最大的直接接触的民族。荷兰人对他们要塞中的牧师不感兴趣；英国人派遣了1名传教士，发展了4个教徒；但葡萄牙人鼓励方济各会修道士和嘉布遣会^[7]修士在安哥拉传教，还鼓励他们保持北部基督教残余势力的活动。

如果说欧洲人的渗透微不足道的话，那是大有原因的。白人由于依赖中间经纪人，并且讨厌酷热和潮湿，因此不愿深入内地。但还有一种积极的力量把他们局限在沿海岸一带，这就是强大的军事王国的兴起。这些军事王国本身就是奴隶贸易的一个结果。部落越是强大，就越能掠取较多的奴隶，用来交换商品。结果是阿散蒂和达荷美这样的强大军事王国崛起。在这些王国内，有本领的能人为了控制各港口后面的腹地和给商船保持源源不断的奴隶供应，组成了部落联盟。他们这样做后，进而就容易不经中间经纪人就与海岸一带的白人直接贸易。欧洲人的武器的力量使1708年登上王位的达荷美国王瓜贾·特鲁多得到深刻印象；1727年就是这样的火药和子弹帮助他杀向海岸和夺取巨大的贩奴港口维达。同样，阿散蒂人此时也在忙于组建他们的王国；到1768年，关于他们的消息开始使住在黄金海岸各个要塞里的欧洲人感到忧虑不安。

人们对大西洋奴隶贸易最严重的指控之一，是它挑起非洲邻近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对非洲社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毋庸置疑，奴隶贸易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不能说奴隶贸易破坏了大陆的和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非洲在白人来到之前是个和平的安乐窝。此外，并不是所有战争都产生奴隶，也不是所有奴隶都是由战争而产生的。达荷美人在攻占维达以后的45年中，不断与邻国打仗；但结果从该港出口的奴隶减少了75%。事实上，战争只是获得奴隶的许多方式之一。为了提供保护和缓和劳动力长期缺乏而设置的旧有家奴制度，可以用来惩罚罪行，支付债务，或为没有主人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种制度是世代相传的，在阿散蒂和达荷美这样的社会中，家奴制实际上极为普遍。奴隶一旦托身给主人以后，便享有一些细致限定的权利。但主人在欧洲商品的诱惑下可能不顾这些权利；到达美洲的黑奴中，有一些人肯定曾经是故国的家奴。尽管如此，非洲丧失这么多的人口（虽则他们原来就是被奴役的）也意味着劳动力的严重损失，并使非洲社会中本来很少的起码安全保障变得更少了。

很难说非洲究竟有多少地方受到这种劫掠的影响。人道主义者曾经断言，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已荒芜。他们想象长长的奴隶行列，向着海岸长途跋涉，越过非洲，走向海岸。在18世纪的记载中，有些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看法。但也应当看到，这些证据都是道听途说的，因为在1797年芒戈·帕克亲自押送一支奴隶行旅以前，似乎还不曾有欧洲人这样做过。另外，还应该记住，以非洲人的观点来看，漫长的旅程不一定指长途的跋涉。贩奴头子不会愿意长途押送奴隶，因为长途跋涉会使他们的货物体力耗尽，也会耽搁船期。正因为如此，主要的奴隶买卖中心（如旧卡拉巴尔）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展起来的。把奴隶从内陆市场送到那里只需3天时间，贩奴船能够很快返航。旧卡拉巴尔这样的中心，也许是条件特别有利的地区；许多奴隶还是从5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送来的。但以非洲的标准衡量，这样的距离还不算是长途，也没有远到可以蹂躏中非的地步。对美洲的黑人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还未发现他们中残留着中非风俗习惯的痕迹。

当商人开拓的边境正在非洲西海岸形成时，好望角的荷兰人农场主正在巩固一块白人正式定居的地区。这块殖民地建于1652年，用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的补给基地。它的经济完全是依赖性的，受该公司的管理并为该公司服务，常常遭受本地移民无法控制的时运变化的影响。但是，即使在18世纪初，这块殖民地就在分裂为两部分：一是开普半岛和贝尔格谷地组成的西部地区，一是斯泰伦博希周围的东部农业定居地。后者极力避免与开普敦的政府所在地发生联系，可是他们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好望角的内部市场很小；农场主生产小麦、酒和肉类，收益甚微。不管怎样，公司妨碍着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只可把产品卖给公司授权的买主，并只可通过公司出口产品。这种制度很横暴，但在这一时期也许任何制度都不能刺激开普殖民地的农业，因为它的产品在母国很难找到买主，而且又没有世界需要的或想要获得的产品可以销往国外。确实，公司曾试图帮助，采取措施种植甘蔗、稻米和靛蓝，以使作物多样化，并把葡萄酒和小麦运到荷属的东印度，但这些计划都未成功。开普的经济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间或繁荣一下，这样的时机如1740年至1763年间的战争中，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开进桌湾觅取给养。但是，和平对于贸易不妙，进港的船只越来越少，公司陷入债务之中。1717年，决定运进更多的奴隶解决劳动力的困难。当时的奴隶几乎已有2000名，几乎与自由民的人数相等。奴隶继续不断地运入，到18世纪末，奴隶人口几达1.7万人，超过

了自由民的人数，因此，西部地区就不再是一块主要由白人居住的地方。

但在东部却见不到这种不景气的情况。东部与定居地区不同，它呈现出扩张和向内地移动生气蓬勃的趋势。东部边境以外延绵着一片雨量充沛的土地，除了布希曼人和士气低落的霍屯督人以外，不会遇到更大的对抗。象牙猎取者和牧牛人相继穿过山口，发现外边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公司势力所不及的。移民迅速向外分散，把边境向北面和东面推移。1752年，开拓者越过凯河；1760年，雅各布斯·科特西已渡过奥兰治河。公司反对这种不加控制的大迁徙，于是在1743年给予边民完全的地产所有权，以便减慢移民的势头。但是，这些18世纪的漂泊者的迁徙势不可当。一种称为租借农场的土地所有权制增加了迁徙的吸引力。它允许农场主无限期地租用土地，这土地在名义上是向公司租的，每年交纳租金12块荷兰银币，后来改为24块荷兰银币。这样就使占用公地合法化，从而鼓励了迁徙。此外，由于公地占用者不可擅自分割土地，他的子孙们除长子以外不久又将迁移，这样就越走越远。甚至公司也被迫于1778年承认了这种新边疆。

次年，开拓者与南迁的班图族前锋科萨人发生冲突；于是，从那时起，南非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779年以前，布尔人^[8]所遇到的土著问题，或是不难解决，或可安全地置之不理。那些住在殖民地里的霍屯督人，由于丧失了把部落结成一体的凝聚力，已融合到大多数普通有色人种之中；其中那些仍旧保持部落团结的霍屯督人已退向西南方，或格里夸兰，或奥兰治河，与白人仍旧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依然毫不妥协的布希曼人受到新近扩充的民团组织的追捕。可是班图人却证明更为可怕。

在18世纪，西非和东非的时运显然不同。欧洲人对东非海岸的了解十分模糊，接触极少。大西洋奴隶贸易对东非海岸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那里缺少使欧洲人在西海岸做生意的人口密度和与美洲的联系。东非海岸的贸易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他们把葡萄牙人从大部分占有地上驱逐后，拥有对沿海地区的霸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东非没有力量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非洲人王国。班图人确实在发展，但仍是尚未定居的小股农民，要到这个世纪末的动乱年代才会联合成为大王国。例如，至少从16世纪以来就在纳塔尔定居的祖鲁-科萨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仍过着小村社式的生活，尚未受到白人的干扰。1689

年，好望角的当局曾对纳塔尔颇感兴趣，但并未产生结果。1719年，公司采取较为明确的步骤在迪拉果阿湾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11年后这个站被撤销。从此，在以后的100年中，奴隶贩子和失事船只的水手偶尔靠岸就是欧洲和纳塔尔之间的唯一联系。

在葡萄牙帝国的全盛时期，东非海岸曾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因为在这一带海岸上保持基地对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商业冒险至关重要，而且这些基地也可用来为葡萄牙赢得几个世纪以来由阿拉伯人经营的与内地进行的黄金和象牙生意。这样，在蒙巴萨、苏法拉和莫桑比克的要塞就成了葡萄牙势力的外部标志。但是，荷兰人一连串的打击打垮了葡萄牙的贸易帝国，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随着葡萄牙贸易帝国的崩溃，东非基地也失去了大部分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些基地也受到来自非洲本身的威胁。1693年的一次非洲人的起义，把葡萄牙人逐出了他们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的大部分的庄园；接着，阿拉伯人东山再起，把葡萄牙人彻底摧毁。到1698年，他们已丧失桑给巴尔以北的一切土地；甚至在桑给巴尔以南，阴影也在逼近。葡萄牙只得卖掉苏法拉，并把莫桑比克交给印度政府管理。名义上，莫桑比克省仍然存在，但已有名无实，只在沿海有几处要塞，在内陆保留一批实际不存在的领土所有权。到18世纪中叶，它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帝国。甚至连传教的热忱也已消耗殆尽，只有4座教堂还属于葡萄牙人。他们满足于把贸易让给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去经营，只是黄金贸易除外，因为他们仍然与金矿保持着联系。到18世纪末班图人动乱时，甚至连这一点贸易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葡萄牙人转而经营奴隶买卖生意，因为把奴隶从莫桑比克贩卖到安哥拉，有时还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贸易仅能维持不亏本而已。葡萄牙人在东非的零星属地直到18世纪90年代的改组以前，在经济上是一宗递耗资产。

莫桑比克以东300英里处是马达加斯加岛。从17世纪以来，该岛造成的麻烦比它引起的商业兴趣还要大。海盗早已注意到它的战略重要性，把它作为袭击印度洋上商船的主要基地。但海上抢劫的风险越来越大，致使海盗们放弃了抢劫的买卖，开始从事比较受人尊重的贩卖奴隶的生涯。马达加斯加一旦不再受到海盗的骚扰时，就能设法较正式地进行殖民了。法国人企图建立一个集居地的尝试在1675年失败，此后巴黎就对该岛失去了兴趣。但是，在1715年开始创建的新的法国殖民地法兰西岛，对作为食物供给地的马达加斯加极为关怀。1750

年，法国正式占领圣马里岛，从那里他们能够控制非洲东岸的许多地方。另外，马达加斯加在战略上被认为对印度的贸易有用。当法国的势力在东方消失时，舒瓦瑟尔看出该岛能用来弥补法国的损失。因此，法国在1768年并吞该岛。此举虽则在当时意义不大，但它意味着法国对一块土地保留了有用的领土所有权。

葡萄牙人曾经是非洲东海岸欧洲势力的先锋。当他们的势力收缩时，埃塞俄比亚帝国也同样收缩自保。1633年，当改宗信奉葡萄牙天主教的皇帝苏辛尼斯逝世后，葡萄牙传教士被逐出埃塞俄比亚帝国。他们还想在贡德尔重整旗鼓，结果也遭到猛烈的抵制。此后，与欧洲的接触只是试探性质的。埃塞俄比亚陷入隔绝状态，既不跟西非联系，也不再向印度派遣使团。1699年，夏尔-雅克·蓬塞注意到，虽然祖先是白人的本地人依然享有一定的威望，然而“埃塞俄比亚人对穆斯林和对欧洲人几乎同样感到恐惧”[\[9\]](#)。这种强烈的仇外情绪表现在1706年一个方济各会修道士的冒险引起一场旨在重申国家孤立和隔绝状态的政变。可是，这个国家在隔绝状态中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几任皇帝的政治权力在一系列的宫廷革命中崩溃了。结果皇帝成了提格雷省总督拉斯·迈克尔·西赫尔控制下的不问政事的傀儡国王。当詹姆斯·布鲁斯于1771年进入埃塞俄比亚，进行18世纪非洲探险中最细致的那次探险时，他发现的就是这种破败和与世隔绝的状况。他逗留了两年，与拉斯·迈克尔和皇帝塔克拉·海默纳特二世一起旅行，忍耐和观察了他经历的一切事物。他发现，阿拉伯人掌握着帝国的贸易，他们经陆路把黄金、象牙和奴隶送往北方。确实，欧洲人在东北非洲，除了埃及以外，没有立足之地；地中海沿岸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大陆依然不知道白人的存在。

2. 亚洲

18世纪，欧洲在远东（不包括印度）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已在那里建立起贸易中心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从17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在德川幕府将军们的统治下，几乎处于与世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853年培理舰长率领舰队到达时为止。在此期间，日本留意的外部世界只是设在出岛的外国人居留地。这是一个位于长崎港内的人造小岛，最大宽度还不到300步，岛上一些荷兰商人生活凄惨，处境难堪。这是日本外贸的唯一渠道。所以，在本章中，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广州、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它们的周围地区。在这些经济活动各不相同的地区，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他们历史的这一时期中，本地人无须依赖欧洲的工业制品和他们对欧洲的工业制品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0\]](#)

中国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贡，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心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11\]](#)

这段话摘自乾隆皇帝1793年接见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时颁发的敕谕。其年代虽比本节讨论的时期晚得多，但它包含了理解整个18世纪欧洲对华关系的关键。“中央帝国”自给自足，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都无求于西方。然而，皇帝的圣旨虽则在本质上千真万确，却不免失之简单，因为与西方的贸易是朝廷恩准的，而且朝廷从贸易中充分地享有利益。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是丝织品、瓷器、漆器和茶叶，还有扇子和屏风等一些奢侈品；对这些货物，中国人只愿接受白银（以及后来的鸦片）作为支付手段。

1723年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只局限于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最好机会（如果真有过机会的话）存在于17世纪；到18世纪20年代，这种机会就已明确地不存在了。起初，天主教传教士以他们的科学造诣在宫廷受到欢迎，但是，他们由于在祖先崇拜和“*Heaven*”一字的汉译问题上意见不一，就失去了中国人的信

任。欧洲商人和冒险家（通常只是海盗而已）声名狼藉，也进一步损害了“基督徒”的名声。传教士曾在康熙皇帝朝代的最初几十年中深受恩宠，但在1723年康熙去世以后一年，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1723—1736年）在全帝国彻底查禁了基督教。

到17世纪末为止，葡萄牙人的敌意一直成功地阻止了英国人在广州获得一个立足之地。1689年，英国国内对所有进口茶叶都已抽税，这表明茶叶贸易已被认为具有抽税的价值。1699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其大班艾伦·卡奇普尔颁发领事委任状，任命他为英王派驻整个中华帝国和毗邻岛屿的公使亦即领事。这位官员努力开辟贸易，终于在两年后为公司取得了把商船开进舟山或宁波的许可。于是，公司货船满载10万镑白银开到，但中国官吏不合情理的勒索和当地中国商人的全面垄断，使这次商业冒险完全亏损，船只只能撤回。不过，在这期间，公司在广州和厦门的商业冒险中运气较好。卡奇普尔在交趾支那沿岸的昆仑岛设立了一个商馆，但它的结局却很悲惨。马来人（据说在交趾华人的唆使下）于1705年杀害了这个外国人居留地上所有的居民。这个时期，外国商人遭受的风险和压迫极大，只是因为贸易有巨额利润，他们才继续干下去。

广州的对外贸易由粤海关的钦差控制，欧洲人称该官吏为“行保”或“御商”。贸易事务由4名中国商人经办，他们垄断商务，并有权把生意零星地承包给其他商人。这一发展是外商进行贸易竞争的又一不利条件。然而，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到1720年时贸易已经大大地发展，出口商品数额和价值已大为增加，以致中国人试图建立正规的管理。他们开始对所有货物征收4%的统一关税，以取代“公行”或商会擅自规定的各种税额。“公行”有与外商进行独家贸易的特权，负责外商的纳税事物和保持良好的行为。中国当局现在进一步从贸易中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把关税增至大约16%；此外，外商除了要向海关的收税官吏交纳苛重的“计量税”外，还得向港口出售船用杂货的商人勒索的费用，船只才能得到食品供应。

外商现在十分清楚，他们若不坚决抵制，这种敲诈勒索是无止境的。1728年，他们向广东总督陈诉，要求解散公行，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这种制度已证明对中国政府十分有利，它一方面免除了政府控制贸易和管理外商行为的麻烦，另一方面又保障政府坐收一份必得的利润。因此，公行不久重新设立，垄断权得到确认。事实上，对所有

出口商品，除了抽取原来的苛捐杂税外，还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尽管外商再次强烈抗议，但他们不能使中国政府撤销这一规定。直至1736年的乾隆朝代才废止了这项附加税。可是，即使在那时，中国做出让步的方式使欧洲人再次深切感到，他们获准在中国贸易——实际上就是生存的条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皇帝在废止10%的附加税时，要求外商下跪接旨。对于这种做法，连这些为了早日发财而甘愿暂时忍受任何不公正和屈辱的、受苦已久的外国商人，也感到忍无可忍了。他们集合在一起，誓不做出这种奴颜婢膝的姿势，并保证决不在没有告诉其他人的情况下向中国人让步。皇帝还要求，外国船只上所有武器一律交中国人保存；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一要求，条件是外国商船必须交纳1万美元。此后不久，外商直接与民政当局交涉的权利被取消。公行的商人（后来被称为“行商”）成为外商与政府联系的唯一渠道。这样，在处理控告行商横征暴敛的案件时，行商就成了法官，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由于这种自杀性的政策，中国当局几乎扼杀了对外贸易。1734年，只有一艘英国商船到达广州，一艘去厦门；但厦门的勒索比其他港口更为厉害，该船只得撤回。1736年，广州的外国船只总共有4艘英国船、2艘法国船、2艘荷兰船、1艘丹麦船和1艘瑞典船。在此以前，葡萄牙船舶只限于去澳门。

1742年，第一艘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英国战舰驶达澳门，它就是安森舰长的旗舰亦即他的舰队的仅存军舰“百人队长号”。安森舰长正在进行环球航行，同时与西班牙人作战。他无意屈服于中国人蛮横的要求，拒绝在他的军舰补充食品以前驶离珠江三角洲。他的果断而礼貌的态度无疑使中国人得到一个虽则短暂但却良好的印象。在中国水域出现一艘欧洲军舰，而且这艘军舰拥有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其司令官的要求的手段，这在18世纪还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在这整个期间，西欧各国中只剩下英国人继续斗争，争取中国方面承认他们的人权。1664年，荷兰使节范和伦访问中国朝廷时，曾受到礼遇，但他的使命没有实际结果。时隔130年后，荷兰才又向中国派遣一个外交使团。不过，俄国人比荷兰人和英国人运气都好。他们也曾早期向中国派过外交使团，但无实效。1653年，沙皇阿历克赛派遣的代表拒行跪拜礼，结果被打发离境。以后又有一系列的对华贸易

使团接踵而至，1689年俄国人真与北京谈成了一项条约。两国在阿穆尔河^[12]沿岸经常发生冲突，叶卡捷琳娜女皇也许以边防前哨的勇武为后盾，在1727年派遣使团，这是所有使团中最成功的一个。当然，这次成功一部分原因是雍正皇帝希望抗衡耶稣会传教士的阴谋。这一年俄国人在平等对待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一直持续到1858年。一位权威人士称之为“记载中最长的条约”。

因为公行继续巧取豪夺，并阻止外商与本地当局直接联系，英国的公司宁愿避开广州，再次试图与厦门和宁波贸易。塞缪尔·哈里森、托马斯·菲茨休和詹姆斯·弗林特（汉名洪任辉）奉命到宁波开展贸易谈判。他们得到良好的接待，但当公司的船只到达时，却费尽周折才装到船货。1757年皇帝颁发一道上谕，饬令凡外商船只只准进入广州。弗林特此时已能用汉语流利交谈（这对于该时期的欧洲商人是个独特的成就），他感到他在宁波的贸易努力徒劳无功，于是设法搭乘一艘本地船只到天津，在那里可以把他的陈诉呈递给在京师的皇帝。令人惊奇的是，此举产生了结果，皇帝不仅注意了弗林特的陈诉，而且派遣一名钦差陪他从陆路回广州。到达后，弗林特即去英国人的商馆。不久钦差召见所有外商，通知他们说，已饬令废止“行保”（即御商），免除超过6%的所有捐税，禁止官吏强索礼品，取消外商船只的吨位税。

可是，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次的成功是虚妄的。以后的事件又恢复了中国与欧洲关系多年来的老方式。

钦差大臣做此宣布以后几天，粤督召见弗林特先生，传达皇帝诏令。当他到达后，侍从的官员要他以中国方式行跪拜礼，同时给他出示他们称为圣旨的诏令：因为他违反了外国商船只准许进入广州的上谕前往宁波经商，所以把他驱逐出境，经澳门回英国。同一天，替弗林特撰写陈诉状给皇帝的中国人，以“卖国助夷”的罪名当众斩决。^[13]弗林特本人被捕，解到澳门附近某地，系狱两年半后才获释和准许乘船回英国。看来，公司只要交纳1250美元赎金，即可随时获释，但公司争辩说这会鼓励类似的勒索，因而拒绝缴纳赎金，而只满足于为弗林特的释放递交请愿书而已。这样，公司职员中第一个学会汉语、称职胜任的人，第一个甘冒风险主动推进公司利益的人，竟没有得到雇主的多少赏识。

这个时期，外国商人继续遭受艰难困苦，情况毫无好转。中国人遵循的准则是“蛮夷如野兽，不能以国民标准治之”，而应依古代皇帝的原则“以苛政治之”。S. 韦尔斯·威廉斯^[14]曾指出，实际上在亨利七世统治下的英国，对外商也施行过同样的原则。中国人关于如何对外国人履行义务的观念与宗教改革前的欧洲流行的那种观念没有什么不同。各阶级的人都轻蔑地对待欧洲人，其显著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完全不懂口头和书面汉语。当所有的交际活动都是通过双方都蔑视的、不规范的行话（即“洋泾浜的”葡萄牙语和英语）进行时，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彼此误解和厌恶，常常造成仇恨。这种恶感也因外国水手的行为不端而加剧，他们在度过漫长航行的禁闭生活后上岸消遣时经常酗酒滋事。18世纪中叶，在黄埔登岸的法国和英国水手很少有相遇而不斗殴的。

当上述的这类斗殴引起任何一方的人员毙命时，中国人的反应就是停止贸易。在1780年以前，中国并不干涉只牵连外国人的案件。但在这一年，他们要求交出在一次斗殴中打死一名葡萄牙水手的一个法国人。当这项要求最后得到答应时，犯法的水手即被当众绞死。

然而，1784年发生的一次案件格外明显地表现了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司法观念的不同。一艘英国商船“休斯夫人号”在鸣放礼炮时，不慎在炮膛中留下一颗炮弹，结果打死一名中国人。根据中国人对责任原则的解释，炮手应为死者偿命。当时，蓄意犯罪的概念还不在中国人认识范围之内。当中国巡捕知道英国人不想交出炮手时，就逮捕和关押该船大班史密斯先生。他过于轻信中国人做出的只需该炮手回答“质询”的保证，同意把炮手交给中国当局，以换取自己的自由。事隔6个星期以后，这个倒霉的炮手即被绞决。此举确实违背中国的刑法，因为根据刑法条文，应当允许当事人以20美元赎身。

这一事件虽则发生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但突出表现了外国人在以前6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无能为力的种种不利条件。他们抱怨：船只上货遭耽搁，货物运入广州时遭掠夺，当局每年张贴中伤性布告谴责外国人犯下的可怕罪行，下级官吏敲诈勒索，以及难以接近高级当局。这种形势包含了下个世纪中引起中英冲突的大部分祸根。

印度尼西亚

人们通常认为，东印度的荷兰殖民帝国的创立者是简·皮泰兹·科恩，但实际上尼古拉斯·威特逊对于这个称号更当之无愧。科恩的业绩除了建立巴达维亚城以外都已荡然无存，而该城的名字现在已恢复它还是一个爪哇村庄时的原名（雅加达）。当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繁荣开始衰落时，主要是由于威特逊的努力，公司作为一个农业企业，不是依靠利润，而是依靠纳贡制，才获得了新的生机。那里早已种植甘蔗和胡椒；在18世纪上半叶，咖啡的重要性还不如这些作物。但咖啡的引进使大规模农业企业成为可能。于是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咖啡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范·霍尔恩^[15]曾在自己的园地里试种从印度送来的咖啡，但这种植物在爪哇的异国土壤中生长不好。于是，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逊（此人的成就还包括派遣一个画家描画波斯波利斯遗迹的概图、制作西伯利亚地图和为彼得大帝当咨议）就着手完成这项规划。在他的倡导下，咖啡植株于1707年分发给巴达维亚和井里汶附近地区的土著首领。这些咖啡苗与霍尔恩的不同，长势旺盛，结出了咖啡豆。4年后，展玉的爪哇族摄政官把第一批100磅咖啡交付公司的货栈。9年后，咖啡年产量达10万磅；到1723年产量至少已达1200万磅。

这个生产奇迹没有激发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当时称作“17人理事会”）的想象力，却反而使他们感到沮丧。大规模生产和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低价销售的办法（这种情况下唯一适宜的政策）不可能在公司过时的贸易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原因是，商业的大规模扩展必将使公司的资本大增。董事们对此毫无准备。他们不需要咖啡和其他作物的产量过高；他们希望限制东印度群岛的产品供应。这样他们就能高价出售商品，因此，为了保持垄断地位，他们力主严格控制生产。然而，有一事公司无法控制，那就是走私活动；成千磅的咖啡进入了苏门答腊的英属殖民地明古连。

在东印度工作的公司职员对此情况了如指掌，只是董事们鼠目寸光。在这种垄断制度下，土著摄政官发财致富，而农民则得不到好处。公司由于担心新的财富会给爪哇族摄政官们带来权势和自信心，就采取独断的行动进行控制，并抽取大部分利润以自肥。这就使每担咖啡在巴达维亚本地的价格从50荷兰盾降到12荷兰盾，使种植园受到了限制；并且为了进一步压低价格，巴达维亚的官员还制造了225磅的“山区担”和125磅的“巴达维亚担”的区别——前者用来收货时计

量，后者用来计算支付货物的价钱。他们解释，这样做是为了补偿咖啡干燥时的重量损失。这些措施结果使人民群众憎恨咖啡种植。有几年，公司甚至无法获得它要求的有限定额。因此，它就要求农民上缴规定量的咖啡作为纳贡，这样在名义上农民就不再给马塔兰王苏苏胡南进贡大米和其他食品，因为如今公司对马塔兰的勃良安宣称行施主权。咖啡注定会使荷兰统治者和西爪哇的摄政官在利害关系上结成紧密联盟。

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公司现在由一个商业强权变为一个拥有领土的强权（虽然董事们最不欣赏这一事实）。如果不是因为威特逊的首创精神，促进咖啡栽培，为全面改变公司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铺平道路，那么，荷兰殖民帝国的统治就不会延续到20世纪中期，而很可能随着公司的解体而寿终正寝了。

咖啡种植园的纳贡制度，虽则沉重地压在爪哇农民身上，遭到他们无言的怨恨，但也并非没有附带的好处。例如，J. S. 弗尼瓦尔就指出，在勃良安由于土著王公勒索大米和其他食品形式的贡物，人民不堪重负从未真正地定居。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山谷迁移到另一个山谷，指望逃避纳贡。因而，他们是从事不经济的农业生产的半游牧农民，随着他们的丛林空地中土壤肥力的枯竭，从一地向另一地迁徙。这就妨碍了社会福利和文明的进步。咖啡种植园则把农民束缚在永久性的居留地上，他们在那里的水稻（sawah）种植园中种植大米。

大约到1680年，荷兰人实际上已在群岛各地确立了势力。从那时候起，大多数的土著首领均须把出口产品专卖给荷兰公司。马塔兰事实上已丧失独立，而万丹相对地不受荷兰人干涉的状况也只多维持了几年而已。不过，这些土邦的瓦解，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势力的直接影响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内部的虚弱。勃良安地区各县在1677年就落入荷兰人的控制之中，井里汶不久后也是如此。在18世纪中，政治控制的扩大十分缓慢；直到1743年，爪哇的沿海地区才落到荷兰人手中。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段时期和此后很长时间内，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帝国，实际上还只有爪哇一地。

华人是荷兰人和爪哇人之间的中介人。他们既是该国的主要手艺人，又充当零售商、包税人、放债人和一般的经纪人。他们尽管时时遭到猜疑浪潮的冲击，但总的说来被视为安分勤劳的居民，其地位在

一定程度上比土著居民优越。然而，华人人数不断增加，使荷兰人对他们的存在愈益感到忧虑。到1740年，爪哇约有8万华人。这是荷兰人未能制止秘密移民突然增加的结果。他们中很多人失业，于是荷兰人决定把不能证明自己规规矩矩挣钱谋生的华人送到锡兰去当奴隶。由于荷兰警察的压迫，华人的不满情绪本来就在增长；荷兰人的这一行动更使不满一触即发，结果爆发叛乱，接着演变成一场屠杀。政府显得惊慌失措，无法控制局势，就大肆杀戮，结果1万多名华人丧生。19世纪初期荷兰的爪哇问题权威特明克写道：“公正的史学家会同意范·霍维尔的观点：这场灾难只能归咎于1725年至1740年间掌权的殖民地历任总督的愚蠢无能、玩忽职守和专横独断；如果没有他们的虐政，决不会酿成起义的因素。”^[16]

在这次叛乱（如果这样称呼公平的话）被镇压下去，局势恢复平静以后，华人重操经纪人的旧业并扩大了活动。不久，更多的非法移民补充了他们的人数。不过，蔗糖业在动乱期间实际上已被摧毁。

华人渗入爪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荷兰人把征税权包租给他们。然而，他们增加对当地人民和土地的控制的办法中，最重要的是从土著统治者那里包租大片土地（整个村庄或地区）。土著王公和首领代表包租地区的全体居民订立契约向包租人交纳规定数量的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以现金或实物的形式支付地租。包租人通常像封建领主那样进行控制。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华人在本地人眼中声誉扫地。到1786年，不满情绪已强烈到使人民恳求巴达维亚政府废黜这些苏丹们，在全部领土上建立荷兰人的直接统治。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保护他们不受华人的敲诈勒索。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

在整个这段时期里，荷属东印度公司日益衰败。这主要是因为荷兰的公司管理不善，以致在东印度群岛风气腐败、弊病丛生。可是，在18世纪提交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许多改革方案中，没有一个计划触及主要的问题——需要在阿姆斯特丹实行深刻的改革。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职员实行过度节俭的政策，致使他们接受非法报酬贪污中饱。他们生活的贫富，都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这种捞钱的机会。因此，月薪700荷兰盾的殖民地总督，能带回1000万荷兰盾的财产。然而，18世纪初，26名公司低级职员却因触犯公司的法律而被总督兹瓦德克伦处死。1731年，董事会突然发动一场反对腐化的新运动，暂时制止了走私活动，但同时也剥夺了数百名巴达维亚人的主要收入来

源。1693年，公司的纯利润已达4830万英镑，但由于上述事例所表明
的弊政，此后就每况愈下，到1724—1725年，经营中出现了纯亏损。
到1779年，亏损已达8490万英镑。可是，这些事实是直到账目在日后
慢慢清理时才被发现的。在当时，谁也不知道确实情况。公司的会计
制度从一开始就有缺陷（这种制度是简·皮泰兹·科恩亲自建立的，
一直沿用到公司结束，从未改变过）。爪哇和欧洲分别记账，但两套
账目从未核对或平衡过。不过，到18世纪末，公司内部虽已腐朽不堪，
但外表上却像往常一样繁荣兴旺。公司借来高利贷款给股东支付
红利，从1602年至1800年公司整个统治期间，红利都保持在18%的平均
利率。但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破产是属于以后一个时期的事情，不
在本节讨论的范围之内。

菲律宾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时，土著居民生活在称为“巴里奥
斯”的村社中，由一个松散的但相当具体的形式的政府进行统治。村
社以150户为单位（“巴朗加”），社会划分为农奴、自由民和贵族三
个等级。西班牙人就在当地的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政府，建立了
一个一直沿用到1898年美国人到来时为止的行政制度，并且“以它严
格的中央集权，为以后的联邦及共和国定下模式”[\[17\]](#)。土地制度和
教会也带有西班牙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西班牙人发现那里没有可占有的黄金和香料的财富时，就转向
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他们指望把马尼拉变成东方的商业中心。商船运
来锡兰的茶、暹罗的柚木、中国的丝绒、丝绸和锦缎，以及印度尼西亚
的香料，都卸在马尼拉港，堆存在库房里，等待装上每年定期的大
帆船运往墨西哥。

菲律宾贸易的性质使18世纪中这些岛屿的经济关系史极大地依赖
于殖民势力与华人的关系。至于华人对于菲律宾究竟是祸还是福的问
题，在整个17世纪，一直使西班牙人焦虑不安。一致的意见认为华人是
威胁。指责华人的人，尤其痛恨丝绸贸易。早在1628年，就有人主
张，允许中国丝织品进入东印度群岛和墨西哥是极其有害的，因为每
年从墨西哥运往菲律宾的货币虽然不得超过25万墨西哥比索或面值8里
亚尔的西班牙银币，但是除此以外，外流的货币量无法计算。中国人
不愿接受其他货币，也不愿以他们的丝织品交换其他商品。结果，在

新西班牙铸造的这些面值8里亚尔的银币大部分被华人攫取，而换得的商品却是“草料，这种制造粗劣丝织品的原料，中国人要多少有多少”^[18]。“他们以此削弱我们的力量和增强他们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对我们发动战争，而我们却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19]

这一争论继续到18世纪。塞维利亚的人士极力主张严格限制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贸易，其理由是华人正在耗尽墨西哥的财富。出于这种焦虑，国王在1718年颁布法令，从此以后禁止中国丝织品的贸易。但在次年，墨西哥副王德巴莱罗就对这条禁令提出抗议；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他的墨西哥臣民的利益，他们大多穷得买不起西班牙布匹来制作身上的衣衫，因此依赖中国的衣料。马尼拉和加的斯各自发出请愿书，极力为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辩护。加的斯一度提出让马尼拉经营墨西哥的香料贸易，以取代中国的纺织品贸易。1720年10月27日颁发给墨西哥副王德巴莱罗侯爵的一项法令规定，每年只能有两艘500吨位的大帆船可以从菲律宾群岛开往新西班牙（即墨西哥）。上述商船装运到阿卡普尔科港的货物总值可达30万比索，投资的商品必须严格限制在下列项目：黄金、肉桂、大象、石蜡、瓷器、丁香、胡椒、印度粗棉布、彩织亚麻布（Lienzos pintados）、印度猎豹皮、印花棉布、罗纱、菲律宾产的棉织品、希利科斯毛毯、丝绵和生丝、索具及同类商品。这些商船不得装运丝织品。马尼拉抗议这项法令对群岛所造成的损害。西班牙国王终于在1734年4月8日颁布一项新法令，准许马尼拉的贸易投资额增至50万比索，利润额增至100万比索。

马尼拉的利益最终胜过了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的利益。在此期间，许多华人已于1709年以夺走公共财富的罪名被逐出了马尼拉。这类诉讼使这些华人在18世纪迁到吕宋的一些较小的地区定居。1747年，西班牙国王下令把华人全部驱逐出境，但该令没有实行。

西班牙与英国卷入了“詹金斯的耳朵战争”（1739—1748年）和后来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前一次战争中，大名鼎鼎的安森勋爵在环球航行途中到达这些水域，并俘获了墨西哥-马尼拉的珍宝船。他的随船神父和这次航海史记录者理查德·沃尔特写道：直接输入阿卡普尔科的丝绸制品销售价格比同样质量的欧洲商品便宜得

多。他还写道：“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棉花使欧洲的亚麻布制品没有用处。”[\[20\]](#)

当新任马尼拉大主教佩德罗·马丁内斯·德阿里萨拉于1747年8月27日到达菲律宾时，带来一项把华人逐出菲律宾群岛的敕令。驱逐令早已下达过一次，但历任总督出于个人的利益，没有将其付诸实施。这次，新令又出于权宜之计而被搁置一边。1755年，总督阿兰迪亚接到国王的一道新令，要他把华人统统驱逐出境，但5115名已成为基督徒的华人和另外1000多名“声称正在研究基督教义的人”除外。中国基督徒只要安分守己从事农业就可留下，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仍然做生意。

几年以后，当西班牙人又在欧洲卷入战争时，英国人于1762年攻占马尼拉，并占据该城两年。当马尼拉陷落时，仍然留在菲律宾的华人站在英国人一边。于是，代理总督西蒙·德·安达下令绞死岛上的所有华人。1763年，这项命令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付诸实施。同年，据说在邦阿西楠一地就有6000华人因为支持菲律宾人阴谋驱逐西班牙政权而遭到西班牙人屠杀。1766年，幸存的华人被集中。1769年，排华令尽可能地得到执行。可是，事后不久，勒让蒂就说：“我所认识的西班牙人都为华人的离去真诚地感到惋惜，都坦率地承认菲律宾会因此遭受损失，因为印度人无法取代华人。”（这与1603年屠杀华人后总督德莫尔加的叹息如出一辙。）1778年，这项排华令被撤销，但仍只鼓励中国工匠作为移民入境。1766年的另一法令进一步勒令把所有的英军占领马尼拉期间犯有过激行动的华人天主教徒驱逐出菲律宾，只准真正的基督徒继续居留。

这项排华令于1788年撤销。

当菲律宾的贸易正按上述方式进行时，西班牙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了菲律宾的土地经济。菲律宾所有的土地名义上属于西班牙国王，他把大块地产分配给贵族和天主教修士。一个地主可能领受2.5万英亩地产，有100万户村民住在他的监护区中当他的农奴。他负责征收地方税和国家税，按照自己对劳力价值的理解支付工资；他是领地上奴仆间争执的仲裁人，并且，只根据他的良心，实际上对他们操有生杀之权。他是总督的贪婪的监察员，又是为牧师窥探的耳目，这些牧师坚持教会享有农产品什一税权利。与探险者一同来到菲律宾的天主

教修道士——奥古斯丁会修士、方济务会修士、耶稣会修士、多明我会修士、本尼狄克特会修士等——也都被授予大块地产以从事宗教事业。美国人来到后，这种土地制度虽然得到了修改，但并未废除，一直沿用到共和国时期，成为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的根源。

（潘永樑 译）

[1] 《贸易和殖民专员日志》，1726年4月29日。

[2] 《贸易和殖民专员日志》，1729年3月17日。《枢密院法案，殖民部分文件，1730年3月12日》。

[3] 《贸易和殖民专员日志》，1750年1月10日。

[4] 约合750英里。——译者注

[5] 历史手稿委员会，埃格蒙特，I. 51。

[6] 布里斯托尔公共图书馆：《霍布豪斯文件》，廷德尔和阿什顿致艾萨克·霍布豪斯信，1729年3月13日。

[7]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独立分支，正式名称为嘉布遣小兄弟会。——译者注

[8] 荷兰血统的南非白人。——译者注

[9] 夏尔-雅克·蓬塞：《埃塞俄比亚之行》，第124页，载《哈克卢特协会刊物》，第2辑，C卷。

[10] 例如，英国的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法律要求这家公司的每艘货船载运的出口商品中必须有1/10为英国货；但铅的销路比毛织品好一些。

[11] 原文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或《粤海关志》，第23卷。——译者注

[12] 即黑龙江。——译者注

[13] 事实上只受到降级处分。——译者注

[14] 旧译卫廉士或卫三畏。——译者注

[15] 中文名字范和伦。——译者注

[16] 有关这次起义问题的现代权威约翰内斯·特奥多鲁斯·弗尔穆伦在《巴达维亚的华人与1740年的动乱》（莱顿，1938年）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结论。

[17] 克劳德·A. 巴斯：《菲律宾》，载伦诺克斯·米尔斯等编《东南亚的新世界》（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22页。

[18] 布莱尔和罗伯逊认为，这可能指产于印度的丛生植物**繁**麻（*Boeheria nivra*）。

[19] 胡安·贝拉斯克斯·马德：《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压制中国丝绸贸易的经济原因》（1628年10月7日），载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1903—1912年），第22卷，第279页。

[20] 理查德·A. 沃尔特：《安森勋爵在1740—1744年的环球航行》，第3版（伦敦，登特（平民书库），1930年），第220页。

索引

（此索引中数字为原文页码，印在书中切口一边）

Abdali, 阿卜达利, 见Ahmad shah Durrani

Abercrombie, James, 艾伯克龙比, 詹姆斯, 北美英军总司令,
538

Åbo, 奥布, 瑞典, 359, 360

Åbo, Treaty of (1743年), 奥布条约, 360—361

Acadia, 阿卡迪亚, 512, 529—530, 533—534

驱逐居民 (1749年), 534

Accaiuoli, 阿卡尤奥利, 罗马教皇驻葡萄牙的使节, 124

Ache, de, 达什, 法国海军司令, 563

Adam, Robert, 亚当, 罗伯特, 建筑师, 69, 83

Adams, Samuel, Senior, 亚当斯, 塞缪尔, 大, 507

Addison, Joseph, 艾迪生, 约瑟夫, 作家, 71—72, 80, 98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machinery, system of: 行
政机构和制度

瑞典, 144—145, 352—354

俄国, 145, 323—325

法国, 145—146, 153—154, 215—221

英国, 146, 160—162, 256—265

西班牙, 147—148, 154—155, 487—488, 489

普鲁士, 148—149, 155, 298—300, 303—305, 312—314

奥地利, 149, 155—157, 399—400, 410—414

匈牙利, 157, 391, 396—397

勃兰登堡, 158—159, 294

波兰, 160, 365—368, 372—373

葡萄牙, 289—290

丹麦, 341—342

英属北非, 510—511; 法属北非, 513

莫卧儿帝国, 542—544

马拉塔领地, 546

另见 Cameralists of the bureaus; Civil Service;
Justic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Adolphus Frederick, 阿道夫·腓特烈, 瑞典国王, 16, 348—
349, 360—362

Afghanistan, 阿富汗, 553—554, 563—564

Africa, 非洲

奴隶贸易, 24—25; 各地区, 566—567; 技术和交换单位,
567; 国家公司控制贸易, 568; 普鲁士和丹麦的奴隶贩子, 568—
569; 葡萄牙的, 569—570, 荷兰的, 570; 法国的, 570—571; 英国
的, 571—572; 激烈竞争和成本日增, 573; 利润额, 573—574; 对非
洲社会的影响, 575—576

葡萄牙领地, 25, 569—570, 574, 578—579

欧洲的渗入受到限制, 574—575

荷兰人在南非的居住地, 576—577, 578; 早期开拓者对班图人
的影响, 577

东、西非的对比, 577—578

Africa Company, 非洲公司, 344

Agriculture, 农业

农业劳工状况, 52—53

使用植物研究, 90

改良方法, 244—245, 267

英国, 52—53, 243

西班牙, 270, 271

普鲁士, 293, 314—315; 七年战争的影响, 484—485

俄国, 318

丹麦和挪威, 342—344

瑞典, 358—368

波兰, 368

匈牙利, 406

美洲耶稣会传教地区, 497

Aguesseau, Henri de, 阿格索, 亨利, 德, 法国大法官, 225

Ahmad Shah, 阿赫默德·沙赫, 莫卧儿皇帝, 559

Ahmad Shah Durrani, 阿哈马德沙·杜兰尼, 阿富汗统治者,
24, 554, 559, 563—564

Aiguillon, Armand, duc de, 艾吉永公爵, 阿尔芒, 布列塔尼省
省长, 234

Aix-la-Chapelle, Treaty of (1748年)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1748年), 19, 23, 24, 210—211, 283, 410, 436—439, 620—
622, 559

Ajit Singh, 阿其特·辛格, (印度) 乔德普尔统治者, 544

Akbar, 阿克巴, 莫卧儿皇帝, 541—542

Åland Islands, 奥兰群岛, 197, 198, 359

Albany, 奥尔巴尼, 荷兰人在北美洲的居住地, 532

Albemarle, George Keppel, earl of, 阿尔比马尔伯爵, 乔治·凯佩尔, 海军上将, 522, 524—525

Alberoni, Giulio, Cardinal, 阿尔韦罗尼, 朱利奥, 红衣主教, 西班牙政治家, 195, 197, 198, 278—279

Aleksey, 阿列克谢, 彼得大帝的儿子, 326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达朗伯, 让·勒隆德, 哲学家和数学家, 80, 89, 95, 309

Alfieri, Vittorio, 阿尔菲耶里, 维托里奥, 诗人, 282

Ali Khan, 阿里汗,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 556—557

Ali Muhammad Khan, 阿里·穆罕默德汗, 罗希拉人的领袖, 553

Ali Vardi Khan, 阿里·瓦迪汗, 孟加拉的纳瓦布, 553, 554—556

Alliances, reversal of, 联盟的逆转, 见,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va, 阿尔瓦公爵, 163

America, North, 北美洲

英法殖民和商业的竞争, 21—22, 512—513

与西班牙的殖民冲突, 22—23

耶稣会传教团, 497, 513, 530

18世纪上半叶欧洲人的居住地, 500—502, 528—529

贸易, 502—503; 内部的, 505—507

America, North, British, 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贸易制度, 37—38

人口增长, 500—501, 504

佐治亚的建立和扩展, 503—504, 530—531

土地所有制, 504—505

商业制造业的发展, 505

城乡贸易平衡, 505—507

宗教, 507—508

社会结构, 508—510; 人口, 500, 502; 城市生活, 509

行政机构, 510—511

与法国人的商业冲突, 528—529

英法敌对行动 (1740—1748年), 532—534; 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534—540

另见West Indies

America, North, French, 法属北美洲, 511, 521, 525—526

路易斯安那的发展, 503, 511, 526, 530; 伊利诺伊地区的发展, 531; 以皮毛和渔业为基础的经济, 511—513, 528—529

行政管理, 513

和英国人的商业竞争, 528—529

英法敌对行动 (1740—1748年), 532—534; (1756—1763年), 534—540

America, South, 南美洲

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团, 123—124, 497

巴西: 西班牙殖民地, 269, 288, 496, 498; 葡萄牙殖民地, 498—499, 569—570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冲突, 496

America, Spanish, 西属美洲, 38, 297, 285—286

英国的非法贸易, 206—208, 476, 494; 南海公司贸易, 515—518;

1739年战争, 518

行政管理不力, 487—488, 490—491; 行政管理机构的改组, 495—496; 查理三世统治下的改组, 499—500

依靠地方民兵和装备低劣的战舰的保卫，489

社会结构，491—492

反教会的立法，492—493

货币改革，493

银矿开采业，493

调节与西班牙的贸易，494—495

耶稣会传教团，497

建筑和观赏艺术，499

启蒙运动的影响，499

七年战争的影响，499，540

佛罗里达的殖民地，530—531，540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of, 美国独立战争，168，173—174，183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是贸易中心，42—43

Analogy of Religion, 《宗教比论》（巴特勒主教），108，136

Anda, Simon de, 安达，西蒙·德，菲律宾副总督，591

Anglican Church, 英国圣公会，见Church of England

Anglo-Maratha commercial treaty (1793年)，英国-马拉塔商务条约（1793年），550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1755年)，英俄协约（1755年），20，443，446

Angola, 安哥拉，24，569，574，578

Angria, 安格里阿，马拉塔的“海军”司令，547，550，562

Anna, Tsarista, 女沙皇安娜，14，203，331，335

即位，328—329

恢复枢密院，329

通过大臣内阁会议统治，329—330

与波兰的王位继承，379—380

Anna Leopoldovna，安娜·列奥波尔多夫娜，不伦瑞克女公爵，伊凡六世的摄政，331

Anne，安妮，英国女王，246

Anne Marie，安妮·玛丽，托斯卡纳的科西莫三世的女儿，201

Anson，George，安森，乔治，安森勋爵，25，519，582，591

Atigua，安提瓜，522，523

Antilles，法属安的列斯群岛，35，43

Anti-Machiavel，《反马基雅弗利》（腓特烈大帝），308—309，310

Antin，Antoine François d'，昂坦，安托万·弗朗索瓦·德，法国海军上将，519，520

Anton Ulrich，安东·乌尔里希，不伦瑞克公爵，331

Antony of Parma，帕尔马的安东尼，201

Anwar-ud-din，安瓦-乌德-丁，卡纳蒂克的纳瓦布，557，560

Apprentices，学徒，见Guilds，industrial

Apraksin，Stephen，阿普拉克辛，斯蒂芬，俄国总司令，333，470

Arab traders in East Africa，东非的阿拉伯商人，578，579

Arandia，阿兰迪亚，菲律宾总督，591

Architecture，建筑，2

巴洛克风格的发展，66—67；修改了的路易·坎泽风格，67—68

英国的“古典”风格，68—69

哥特式，69—70

在东欧，70

广场、平台和新月形建筑的设计，70

有插图的书籍，81—83

在奥地利，399

在西属美洲，499

Arcot，阿尔科特，卡纳蒂克首府，211，556—557，560

Argens，Jean-Baptiste d'，阿尔让，让-巴蒂斯特，哲学家，89，96

Argenson，Marc-Pierre de Voyer，comte d'，阿尔让松伯爵，瓦耶的马克-皮埃尔，法国陆军大臣，141，142，143，160，224

Argenson，René-Louis de Voyer，marquis d'，阿尔让松侯爵，瓦耶的勒内-路易，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9，106，218

引用其《日记》，102—103，380

作为外交大臣，210，228，433，462

Argyle，John Campbell，second duke of，阿盖尔公爵（第二），约翰·坎贝尔，247

Aristocracy贵族，见Society，structure of，社会，结构

Armada de Barlovento，巴洛文托的无敌舰队，489

Armies，军队

西班牙的军事长官，154

炮兵，167—168，174

下级军官无能，171，181

轻步兵的演变，173—174

兵役和社会阶级，175，176—177，181，183—184

纪律，176—177，179—180

腓特烈大帝关心士兵，177—178

全国服兵役的开始，178—179

普鲁士军队的服役和纪律状况，179—181，295—296

法国军队的组织，181—182

英军征兵，183—184；购买军职，185—186；晋升，186—187；行政管理，258—259

彼得大帝改革军队，323；安娜的改革，330

玛丽亚·特蕾西亚改革奥地利的军队，410—411，413

国务军，427—429

观察部队，469，473

莫卧儿军队的衰败，542—543

另见Warfare, art of

Army of observation, 观察部队，469，473

Arnold, Gottfried, 阿诺德，戈德弗里德，虔信派教徒，131

Ashanti, 阿散蒂，非洲军事王国，25，567，575

Asiatic Company, 亚细亚公司，344

Asiento, 专卖契约，38，208，278，436，515—516，518，521，568—571

Augustus II, 奥古斯特二世，波兰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萨克森选侯），16—17，204—205，390

反对他当选，371—372

与维也纳条约（1719年），373，389

迫害新教徒，374，375—376

努力确保萨克森继位，377—378

性格和成就，378—379

Augustu III奥古斯特三世，波兰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萨克森选侯）17，205，418，469

婚姻，373，397

迫害新教徒，374—375

继位，379—380

性格，381

未能防止政治腐败，389—390

Aurangzeb，奥朗则布，莫卧儿皇帝，23，541—542，543—544

迫害锡克教徒，544—545

Austria，奥地利

行政机构，149，399—400；文官制度的成长，155—157；财政管理，400—401，412；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411—414

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帕萨罗维茨条约，197，394

“国本诏书”，200，202，204；女嗣继位，393—394，395—396；这项立法，397；有关的贸易特许权，397—398；被废除，408，416

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200—202，283

与俄国结盟（1726年），203

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204—205

匈牙利的妥协，391—393；但维持领土的分裂，402；行政主要由维也纳控制，402—403

“极端巴洛克型的”文化，398—399

国际贸易，401

宗教：耶稣会，401—402；迫害新教徒，402

与1735—1739年的俄土战争，407—408

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军队的改革，410—411，413

艾克斯沙佩勒会议后的外交政策，414—415；收复西里西亚计划，441—442；与法国结盟的建议，444—445，463；威斯敏斯特条约反应，450—453，460；第一次凡尔赛条约，453—456，462；与俄国的关系，456—9

与七年战争，465—466，467；被普鲁士进攻（1757年），470—472；（1758年）473

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战役，474，475；法国津贴减少（1759年），475；占领萨克森，477；和平谈判，479；胡贝尔茨堡条约（1763年），483—484

另见Netherlands, Austrian

Austrian Succession, War of,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7，9，10，18—19，209—210，310，408—410

法国的对外政策，227—228；支持查理·艾伯特，419；受路易十五控制，426—427，429

瑞典的参加，332，358—359

匈牙利的军事贡献，409—410

外交的起源，416—417

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417

乔治二世的地位，417—418；420，422

俄国最初几年按兵不动，418；提供部队（1747年），435—436

莫尔维茨战役（1741年4月），419

法国入侵波希米亚，420；被击退（1742年），421，423—424

普鲁士的和平姿态（1742年），421—422，423

荷兰人不干涉，422—423，428

布雷斯芬预备条约，423

西班牙干涉意大利，424—426；坎波-桑多战役，426；入侵撒丁，433—434

英国军事行动（1743年），427；卡特里特的外交活动，428—429

地中海海战，430；西印度群岛海战，519—520

法国入侵尼德兰（1744—1747年）430—431，435

普鲁士入侵波希米亚（1744年），431—432；入侵萨克森（1745年），432

德累斯顿条约，432

英、荷在丰特内战败，432—433

和平谈判预备会议，436

艾克斯沙佩勒条约，436—439

北美洲战争，533—534

印度战争，558—559

Azam Shah阿泽姆·沙，马尔瓦总督，544

Bach, Johann Sebastian,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作曲家，64

Badan Singh, 巴丹·辛格，贾特人的统治者，554

Baehr, George, 贝尔·乔治，建筑师，70

Bahadur Shah (Muazzam)，巴哈都尔·沙（穆阿柴姆），莫卧儿皇帝，544—545

Baji Rao I, 巴吉·罗一世，马拉塔的帕什瓦，548，549

Baker, Henry, 贝克，亨利，生物学家，91

Bakewell, Robert, 贝克韦尔，罗伯特，牲畜饲养人，59

Balaji Baji Rao, 巴拉吉·巴吉·罗，马拉塔的帕什瓦，555—557

Balaji Visvanath, 巴拉吉·维斯万纳特，沙胡的首相，547

Bánát, the巴纳特，402，405—407，408

Banda, 班达, 锡克教徒领袖, 545, 546

Bangash Pathans of Farrukhabad, 法鲁卡巴德的班加什系帕坦人, 553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242, 250—251

Bank of the Nobility in Russia, 俄国贵族银行, 337, 338

Bantus, 班图人, 577

Barbados, 巴巴多斯, 522

Barbara of Braganza, 布拉干萨家族的巴尔巴拉, 西班牙女王, 285

Barbeyrac, Jean, 巴尔贝拉克, 让, 自然法理学家, 100

Barcelona Company, 巴塞罗那公司, 494

Baretti, Giuseppe, 巴雷蒂, 朱塞佩, 作家, 282

Barnett, Curtis, 巴尼特, 柯蒂斯, 舰队司令官, 558

Barrier Treaty (1715年), 屏障条约, 193, 194, 391

Barrington, Samuel, 巴林顿, 塞缪尔, 海军上将, 189, 522

Barrington, William, 巴林顿, 威廉, 巴林顿勋爵, 184

Bartenstein, Johann Christoph, 巴滕施泰因, 约翰·克里斯拉夫, 奥地利政治家, 400, 412—413

Bassein, 巴塞因, 葡属印度, 550

Batavia (Djkarta), 巴达维亚(雅加达), 585, 586

Bavaria, 巴伐利亚

 与波兰结盟(1732年), 204; 与法国结盟, 205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209—210, 408—409, 418—421, 424; 哈瑙条约(1743年), 428

 与英国的补贴条约, 443

Bayle, Pierre, 培尔, 皮埃尔, 哲学家, 85, 93, 98, 160

Beaumont, Christophe de博蒙, 克里斯托夫·德, 巴黎大主教, 116, 231

Beauséjour, Fort, 博塞儒尔堡, 534, 537, 538

Beccaria Cesare Bonesana, 贝卡里亚, 切萨雷·博内萨纳, 282, 283

Becker, 贝克尔·财政哲学家, 185

Belcher, Jonathan, 贝尔彻, 乔纳森, 马萨诸塞总督, 506

Belgrade, Treaty of (1739年), 贝尔格莱德条约, 205—206, 387, 408

Belleisle, Charles Fouquet, 贝尔岛公爵, 夏尔·富凯, 法国元帅, 9, 210, 227, 418—419, 421, 424, 434, 453

Benbow, 班鲍, 海军上将, 187

Benedict, X III (Vincenzo Orsino), 本尼狄克十三世 (维琴佐·奥尔西诺), 教皇, 113, 116, 122, 284

Benedict X IV (Prospero Lambertini), 本尼迪克特十四世 (普罗斯佩罗·兰贝蒂尼教皇, 113, 117, 118—119, 122—124, 284, 426, 455

Benedictines, 本笃会会员, 118

Bengal, 孟加拉

莫卧儿皇帝承认的阿里·瓦迪汗王朝, 554

马拉塔人的入侵 (1742—1751年), 554—556

克莱武的征服, 562—563

英国统治的巩固, 565

Bengel, J. A. 本格尔, 圣经学者, 132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理查德, 圣经学者, 118, 132

Bergier, 伯杰尔, 耶稣会会员, 117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 乔治, 克洛因主教, 唯心主义哲学家, 71, 110, 136

Berlin, 柏林, 316, 317

Berlin, Treaty of (1745年), 柏林条约, 415

Bernini, Gian Lorenzo, 贝尔尼尼, 吉安·洛伦佐, 建筑师, 66

Bernis, François-Joachim de Pierre de, 贝尼斯, 弗朗索瓦-若阿基姆·德·皮埃尔·德, 红衣主教, 法国政治家, 9, 20, 228

谈判法奥联盟, 444—445, 451—453, 462—463

与七年战争, 470, 474

Bernoulli family of mathematicians, 伯努利数学家家族, 89, 336

Bernstorff, Andreas Peter, 伯恩斯托夫, 安得烈亚斯·彼得, 丹麦政治家, 341, 348—350, 362

Bernstorff, Johann Hartwig Ernst, 伯恩斯托夫伯爵, 约翰·哈特维希·埃内斯特, 丹麦政治家, 341, 348

Berridge, John, 贝里奇, 约翰, 福音派牧师, 139

Berruyer, Isaac, 贝里耶, 伊萨克, 耶稣会历史学家, 93, 117, 125

Bestuzhev-Ryumin, Alexander, 别斯图热夫-留明, 亚历山大, 俄国政治家, 332—333, 446, 447, 456, 458

Bevern, Frederick Francis, 贝芬, 弗里德里希·弗兰西斯, 不伦瑞布公爵, 普鲁士将军, 471

Bhaskar Pant, 巴斯克·潘特, 马拉塔将军, 555

Bibiena, Giuseppe, 比比恩纳, 朱塞佩, 建筑雕刻家, 82

Bielfeld, Jacques Frédéric, 比勒费尔德男爵, 雅克, 弗雷德里克, 旅行家, 政治哲学家, 141, 142, 143, 160, 280—281, 288

Bienville, Céléron de, 比安维尔, 塞莱隆德, 法国殖民地领袖, 535

Bigot, François, 比戈, 弗朗索瓦, 法属加拿大的殖民地长官, 537

Bingham, Joseph, 宾厄姆, 约瑟夫, 不矢忠派, 135

Biology, 生物学, 91

Black, Joseph, 布莱克, 约瑟夫, 化学家, 90

Blackstone, Sir William, 布莱克斯通爵士, 威廉, 法官, 162, 263

Bladen, Martin, 布莱登, 马丁, 贸易与移民专员, 188

Blake, Robert, 布莱克, 罗伯特, 海军上将, 163

Blénac, 布莱纳克, 海军上将, 524

Blondel, Jacques-François, 布隆代尔, 雅克-弗朗索瓦, 建筑雕刻师, 82

Boehler, Peter, 伯勒尔, 彼得, 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 137

Boerhave, Herman, 布尔哈夫, 赫尔曼, 化学家, 90

Boers, 布尔人, 25, 576—577

Bohemia, 波希米亚, 149, 156, 39 In., 393, 399, 404

捷克人的民族主义, 402

行政改革, 413—414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0; 法国人的军事挫折, 421, 423—424; 受腓特烈大帝的侵略, 431—432

与七年战争, 468, 469; 受腓特烈大帝的侵略, 470—471

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布瓦洛-德普雷, 尼古拉, 诗人, 文学批评家, 72, 73, 75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博林布鲁克子爵, 亨利·圣约翰, 英国政治家, 101

政治理论, 253

Bombay, 孟买, 40, 558

Bompar, 邦帕尔, 海军上将, 523

Boroughs, English, 英国的自治市, 245, 261

Borromini, Francesco, 普罗密尼, 弗朗切斯科, 建筑师, 66

Boscawen, Edward, 博斯科恩, 爱德华, 海军上将, 476, 538, 559

Bossuet, Jacques Bénigne, 波舒哀, 雅克·贝尼涅, 特鲁瓦主教, 115, 141, 142, 161

Botta, 博塔侯爵, 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 332

Bouchardon, Edme, 布夏东, 埃德姆, 雕刻家, 78

Boucher, François, 布歇, 弗朗索瓦, 画家, 78

Boulainvilliers, comte de, 布兰维里耶伯爵, 哲学家, 86, 101, 106, 220

Boulton, Matthew, 博尔顿, 马修, 铁器制造商, 31

Bouquet, Henry, 布凯, 亨利, 皇家美洲团队营长, 173

Bourbon, Louis-Henri, 波旁公爵, 路易-亨利, 法国政治家, 200, 219, 227

无能和下台, 224

Braddock, Edward, 布雷多克, 爱德华, 北美英军司令官, 164, 460, 537

Bradley, James, 布雷德利, 詹姆斯, 天文学家, 89

Bradstreet, John, 布雷兹特里特, 约翰, 北美洲殖民地将军, 538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199, 465, 468

反法政策, 204

在大选帝侯统治下, 292—294

建立常备军, 294

税收, 294, 297, 298

鼓励移民, 303

法制改革, 306—307

农业, 314—345

丝和羊毛出口, 316

俄国的侵入（1758年）, 474, （1760年）, 477

Brandenburg Company, 勃兰登堡公司, 568—569

Branicki, J.K. 布兰尼茨基, 波兰的大盖特曼, 384, 385, 386

Brazil, 巴西

西班牙殖民地, 269, 288; 边界条约（1751年）, 496, 498

葡萄牙殖民地, 498—9; 与奴隶贸易, 569—570

Bremen, 不来梅, 345, 347, 355

Breslau, Treaty of（1742年）, 布雷斯劳和约（1742年）, 423

Bridgewater, 布里奇沃特公爵, 267

Brienne, Loménie de, 布里埃纳, 洛梅尼·德, 法国政治家,
219

Bristol and the slave trade, 布里斯托尔和奴隶贸易, 571

Broglie, Charles-François, comtede, 布罗伊伯爵, 夏尔-弗朗
索瓦, 法国驻萨克森大使, 388

Broglie, François-Marie, 布罗伊公爵, 弗朗索瓦-玛丽, 法国
元帅, 421, 423—424, 427, 474, 475, 477

Broglie, Victor-François, 布罗伊公爵, 维克托-弗朗索瓦, 法国元帅, 171, 228

Browne, Maximilian, Von, 布朗, 马克西米连, 康特·冯, 奥地利陆军元帅, 469

Bruce, James, 布鲁斯, 詹姆斯, 探险家, 579

Brue, André, 布律, 安德烈, 塞内加尔的法国西方公司首领, 571, 574

Brühl, Count Heinrich von, 布吕尔伯爵, 海因里希·冯, 萨克森首相, 381, 383—386, 388

Brunswick, 不伦瑞克, 470, 483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496

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de 比封,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 哲学家, 自然科学家, 86, 88, 89—90, 91

Bühren, Ernst Johann, 比伦, 恩斯特·约翰, 库尔兰公爵, 安娜女皇的宠臣, 329—331, 337, 379, 381, 387

Bullion, 西班牙拥有大量条金, 270

Burgoyne, John, 伯戈因, 约翰, 将军, 177, 180, 187

Burkersdorf, battle of (1762年), 布尔克斯多夫战役 (1762年), 479

Burlamaqui, J.-J., 布拉马基, 自然法理学家, 100

Burlington, Richard Boyle, 伯林顿勋爵, 理查德·博伊尔, 68, 81

Burnet, 伯内特, 北美殖民地总督, 532

Burney, Dr Charles, 伯尼博士, 查尔斯, 音乐史学家, 64, 65

Bussy-Castelnau, Charles-Joseph Patissier, 比西-卡斯特尔诺侯爵, 夏尔-约瑟夫·帕蒂西埃, 24, 560—562, 563, 564

Bute, John Stuart, 比特伯爵, 约翰·斯图尔特, 英国政治家, 23, 212, 213, 255—256, 467

拒绝向腓特烈大帝提供津贴, 480—481

和平谈判 (1762—1763年), 525—527, 540

Butler, Joseph, 巴特勒, 约瑟夫, 达勒姆主教, 108, 128, 136, 265

Buxar, battle of (1764年), 布克萨尔战役 (1764年), 565

Byng, John, 宾, 约翰, 海军上将, 164, 460

Cabinet government, 内阁政府

见Great Britain, 政治机构

Cadogan, William Cadogan, 卡多根伯爵, 威廉·卡多根, 247

Calcutta, 加尔各答, 40, 558

“黑洞”监狱, 24, 562

Caldara, Antonio, 卡尔达拉, 安东尼奥, 作曲家, 64

Cambrai, Congress of, 康布雷会议, 199—201, 203, 283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69, 88, 108

Cameralists of the bureaus, 官僚机构中的财经专家, 158—159

Cameron, Charles, 卡梅伦, 查尔斯, 建筑师, 70

Campbell, Colin, 坎贝尔, 科林, 建筑师、作家, 81

Campbell, John, 坎贝尔, 约翰, 《美洲的西班牙帝国》作者, 487

Camperdown, battle of (1797年), 坎珀唐战役 (1797年), 187

Campillo, Don Joseph del, 坎皮略, 唐·何塞夫·德尔, 西班牙政治家, 286, 287, 492

Campo-Santo, battle of (1743年), 坎波-桑多战役 (1743年), 426

Canada, 加拿大

见America, North, French

Canals, 运河, 267, 316, 319

Cantillon, Richard, 坎特龙, 里夏尔,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 48, 92

Canton, 广州, 581—585

Cape Breton, 布雷顿角, 210, 433, 436, 512, 521, 559

另见Louisbourg

Cape of Good Hope, Dutch settlement at, 好望角, 荷兰殖民地, 576

Caps., 便帽党, 见Sweden条

Caracas Company, 加拉加斯公司, 494—495

Carlos, Don, 卡洛斯, 唐, 见Charles III, 西班牙国王

Carmer, Johann, 卡默尔, 约翰, 普鲁士首相, 317

Carnatic, the, 卡纳蒂克

马拉塔人入侵, 556—557

王位继承斗争 (1748年), 560—561

英法在卡纳蒂克的战争, 563

Caroline, 卡罗琳, 英国女王, 10, 253

Carr, John, 卡尔, 约翰, 建筑师, 69

Carracci, Agostino and Annibale, 卡拉齐 (兄弟) 阿戈斯蒂诺和安尼巴莱, 画家, 77

Cartagena, 卡塔赫纳, 489, 519

Carteret, John, Lord Carteret (Lord Granville), 卡特里特, 约翰, 卡特里特勋爵, 格兰维尔勋爵, 英国政治家, 200, 251, 253—254, 422, 427—430

Carvajal y Lancaster, Don José de, 卡瓦哈尔-兰卡斯特, 唐·何塞·德, 西班牙政治家, 285—287

Cary, John, 卡里, 约翰, 商人, 47

Catchpoole, Allen, 卡奇普尔, 艾伦, 英国驻中国领事, 581

Cathcart, Lord, 卡思卡特勋爵, 海军上将, 519

Catherine I, 叶卡捷琳娜一世, 女沙皇, 14, 15, 203, 212, 326—327, 347, 583

Catherine II, 叶卡捷琳娜二世, 女沙皇 (昂哈尔特-策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特公主), 14, 16, 143, 458—459

婚姻, 333

推翻彼得三世, 334—335, 350, 386, 389, 479

与丹麦和解, 350

Céléron de Bienville, 塞莱隆·德比安维尔, 法国殖民地领袖, 535

Cellamare, Antonio Ciudice, 塞拉马雷, 安东尼奥·朱迪西, 西班牙驻法大使, 193, 198, 227

Ceramic industry, 陶器工业, 31

Chambers, Sir William, 钱伯斯爵士, 威廉, 建筑师, 69, 81, 83

Chancelier, office of, 大法官法庭, 218

Chanda Sahib, 昌达·沙依布,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 556—557, 560

Chandernagore, 克莱武攻占昌德纳戈尔, 563

Chardin, Jean Baptiste Siméon, 夏尔丹, 让·巴蒂斯特·西梅翁, 画家, 79

Charles VI, 查理六世, 皇帝, 17—18, 64, 191, 199, 209, 227, 310, 346

在帕萨罗维茨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 197

确认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 198, 394—395

与“国本诏书”, 200, 393—394, 395—396, 397—398, 416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 200—202

和匈牙利和解, 391—393

宫廷文化, 398—399

迫害新教徒, 402, 403

去世, 408, 416

Charles VII, 查理七世, 皇帝（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伯特）, 397

要求继承查理六世, 408, 409, 416—417, 419

当选皇帝（1742年）, 421

军事行动, 420, 424

放弃哈瑙条约中的权利, 428

进犯巴伐利亚并去世（1745年）, 431

Charles II, 查理二世, 英国国王, 152

Charles II, 查理二世, 西班牙国王, 269, 275, 488, 489

Charles III (Don Carlos), 查理三世, （唐·卡洛斯）, 西班牙和两西西里国王, 19, 122, 201, 205, 211, 213, 276, 282, 424, 438, 476, 525

取得帕尔马公爵领地, 202

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进行社会和教会改革, 283—284

在西班牙的改革，287—288；在殖民帝国，499—500

另见Elizabeth Farnese，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

Charles XII，查理十二，瑞典国王，13，15，16，143，195，374

去世，197，198，339，351

Charles Albert，查理·阿尔贝特，巴伐利亚选侯，见Charles VII，Emperor

Charles Edward，查理·爱德华，小王位觊觎者，254，382，430，433

Charles Emmanuel III，查理·伊曼纽尔三世，撒丁国王，425—426，429，433—434，436，438

Charles of Lorraine，洛林的查理，奥地利将军和尼德兰总督，411，427，428，431，435，470

Châtelet，Mme de，夏特莱夫人，88

Chatham，查塔姆伯爵，见Pitt，William

Chauvelin，Germain-Louis de，肖夫兰，热尔曼·路易·德，法国政治家，225，227

Chernyshev，Count Zachary，车尔尼雪夫伯爵，俄国政治家，390

Chétardie，谢塔尔迪侯爵，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331

Chile，智利，496

Ch' ien Lung，乾隆，中国皇帝，582

China，中国

和西方贸易，26，40，58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冒险事业，581，583；控制广州的外贸，581—582；欧洲各国商团，583—584

耶稣会传教团，123，580—581

不信任外国人，584—585

印度的中国经纪人和包税商，587—588

中国商人在菲律宾，590；被驱逐，591；取消驱逐令，592

Chmielowski, B., 季米洛夫斯基，波兰百科全书编纂者，370

Choiseul, Étienne-François, 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弗朗索瓦，法国政治家，9, 21, 36, 219, 579

军事改革，182

与七年战争，211—212, 228, 388, 474；计划入侵英国，475—476, 523；和平谈判，481—483, 525—527

Chotek, Count Rudolph Christian, 肖特克伯爵，鲁道夫·克里斯蒂安，奥地利首相，412

Christian Brothers, 公教弟兄会，126

Christian VI, 克里斯蒂安六世，丹麦国王，341—342, 343

外交政策，347—348

Christian VII, 克里斯蒂安七世，丹麦国王，342, 350

Churaman, 朱拉曼，贾特人游击领袖，554

Church, Eastern Orthodox, 东正教会，321, 325, 335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87

欧洲新教领袖，126—127

和世俗政府的关系，127—130

不信奉国教者，128—129, 133

新教统一运动，133—135

正统的和拒绝宣誓信奉国教的礼拜仪式，135—136

缺乏传教热情，136

福音派运动的开始，139—140

与维持社会秩序，245—246

公会议闭会（1717年），249

Church, Lutheran, 路德教, 130—131, 134, 135, 306, 374, 507

Church, Protestant, 新教, 51

神秘的倾向, 109

英国国教在新教中的地位, 126—127; 不信奉国教者, 128—129, 133

德国的经过改革的教会和路德教, 130—131; 虔敬派教徒, 131
基督教重新统一计划, 133—135

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成立, 136—138

卫理公会运动开始, 137—139

法国迫害新教徒, 232—233; 杜波兰, 374—376; 在奥地利, 402; 在匈牙利, 403

Church,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贵族占有教会的高等职位, 51, 229

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的教义, 108—109; 学术和文献批评的传统, 118; 迫害和镇压耶稣会, 123—126

对西班牙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 271—273; 遭立法的反对, 492—493

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奢华, 281

意大利各地的教会改革, 283—284

在葡萄牙的势力, 288—289

在波兰迫害新教徒, 374—376; 在奥地利, 402; 在匈牙利, 403

另见Jansenist movement; Jesuits

Civil service, 文官制度

文官的社会地位, 62—63

文官制国家, 159

成长和发展: 在法国, 153—154; 在西班牙, 154—155; 在普鲁士, 155, 303—305; 在奥地利, 155—157; 在匈牙利, 157, 在德意志, 158—159, 在英国, 259—260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塞缪尔, 阿里乌斯派神学学者, 132, 133

Claude Lorrain (Gellée), 克劳德·洛兰(热莱), 画家, 77, 79, 82

Clavell, John, 克拉维尔, 约翰, 科林伍德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副官, 190

Clement XI (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 克雷芒十一世(乔瓦尼·弗朗切斯科·阿尔巴尼), 教皇, 113—115, 123, 284

Clement XII (Lorenzo Corsini), 克雷芒十二世(洛伦佐·科尔西尼), 教皇, 113, 122, 124, 284

Clement XIII (Carlo Rezzonico), 克雷芒十三世(卡洛·雷佐尼科), 教皇, 113, 125, 126, 284

Clement XIV (Giovanni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克雷芒十四世(乔瓦尼·温琴佐·安东尼奥·甘加内利), 教皇, 126

Clinton, George, 克林顿, 乔治, 北美殖民地总督, 532

Clive, Robert, 克莱武勋爵, 罗伯特, 克莱武, 41, 265, 560, 562—565

Coal, 煤

早期工业使用, 29

产量迅速增大, 32

法国采煤工业, 237—238

Cobham, Lord, 科巴姆勋爵, 253

Cocceji, Samuel von, 科策伊, 萨穆埃尔·冯, 普鲁士首席法官, 306, 317

Coen, Jan Pieterzoon, 科恩, 然·及埃特佐恩, 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领袖, 585, 589

Coetsee, Jacobus, 科埃特塞, 雅科布斯, 南非的荷兰开拓者, 577

Coffee, 咖啡

生产, 26, 585—587

贸易, 33, 34, 40

Coffee house, 咖啡馆, 70—71

Coffin, Charles, 科芬, 查尔斯, 赞美诗作者, 118—119

Co-hong, 公行

见Hong Merchants

Coke, Thomas William, 科克, 托马斯·威廉, 莱斯特伯爵, 政客, 农场主, 59

Colbert, Jean-Baptiste, 柯尔贝尔, 让-巴蒂斯特, 塞涅莱侯爵, 法国政治家, 33—34, 41, 214, 218, 238

Collier, Jeremy, 科利尔, 杰里米, 不矢忠派, 74

Collins, Anthony, 柯林斯, 安东尼, 自由思想家, 85, 132

Collins, William, 柯林斯, 威廉, 诗人, 77

Commerce, 商业。见Trade and commerce

Campagnie des Indes, 印度公司(法国) 见East India Company (French)

Company of the West (French), 西方公司(法国), 570—571

Condillac, 孔狄亚克教士, 哲学家, 87, 95, 110

Confederation of the Six Nations, (印第安) 六部族联盟, 531—533

Conflans, 孔弗朗, 法国海军司令, 476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宗, 507—508

Conscription, military and naval, 征兵, 陆军和海军, 178—179, 182

海军军籍登记, 179, 183

强征入伍, 179, 184—185

Constantinople, Treaty of (1720年), 君士坦丁堡条约 (1720年), 377

Consulado of Seville and Cadiz, 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商会, 494—495

Conti, Antonio, 孔蒂, 安东尼奥, 科学家, 89

Conti, François-Louis de Bour-bon, 孔蒂亲王, 弗朗索瓦-路易·德·波旁, 228, 371—372, 384, 388

Cook, James, 库克, 詹姆斯, 航海家, 187

Coote, General Sir Eyre, 库特爵士, 艾尔, 将军, 41, 563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贸易特权, 344—345

Coram Thomas, 科拉姆, 托马斯, 商人, 慈善家, 266

Cordara, 科尔达拉, 历史学家, 113

Cornwallis, Charles, 康华里斯, 查尔斯, 康沃利斯勋爵, 188, 534

Corny, Here de, 科尔尼, 埃雷·德, 建筑师, 68

Corregidores, 地方长官, 490—491

Cortona, 科尔托纳, 建筑师, 66

Coscia, 科西亚, 红衣主教, 284

Cosimo III, 科西莫三世, 托斯卡纳大公, 201, 281

Cossacks, 哥萨克人, 175, 318, 322, 323

Cotton, Sir John Hynde, 科顿, 约翰·海因德爵士, 英国政治家, 254

Cotton trade, 棉花贸易, 40, 41—42, 495

Courland, 库尔兰, 373

Cracow, 克拉科夫, 波兰, 369, 372

克拉科夫大学, 370

Creoles, 克里奥尔人, 491—492, 495, 500

Croatia, 克罗地亚, 393, 401

Cuba, 古巴, 499, 527

Culloden, battle of (1746年), 克洛顿战役 (1746年), 254, 435

Cumberland, William Augustus, duke of, 坎伯兰公爵, 威廉·奥古斯塔斯, 20, 186, 440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32, 435

与七年战争, 469—470

Currency, 货币

法国货币, 237

波兰货币, 370, 386

西班牙货币, 493

北美洲的纸币, 506—507

印度货币, 545

Customs duties, 关税, 见Trade and commerce

Czartoryski, Prince A.A., 恰尔托

雷斯基亲王, A. A. , 378

Czartoryski family, 恰尔托雷斯基家族, 17, 371, 378—379, 380, 382—387, 390

Czernicheff, 车尔尼切夫, 俄国将军, 477

Dahomey, 达荷美, 非洲军事王国, 25, 567, 575

Damaji Gaikwar, 达马吉·盖克瓦, 马拉塔游击队领袖, 549

Damien, Jean-François, 达米尔, 让-弗朗索瓦, 企图谋杀路易十五, 125

Dance, George, 丹斯, 乔治, 建筑师, 69

Danzig, 但泽, 波兰, 368—369, 380

Darby, Abraham, 达比·亚伯拉罕, 和炼铁, 267

Darjes, 达耶斯, 经济哲学家, 158

Daun, Count Leopold, 道恩伯爵, 利奥波德, 奥地利陆军元帅, 470, 474—475, 477, 479

Deacon, Thomas, 迪肯, 托马斯, 不矢忠派, 135

Decker, Mattew, 德克尔, 马修, 经济学家, 46—47

Decker, Paul, 德克尔, 保罗, 建筑师, 69, 81

Defoe, Daniel, 笛福, 丹尼尔, 作家, 59, 71, 73

Delhi, 德里, 遭迪纳尔沙的洗劫, 552; 遭阿哈马德沙·杜兰尼的洗劫, 564

Delisle, Joseph, 德利尔, 约瑟夫, 地理学家, 336

Demark, 丹麦, 15—16, 355

社会结构: 贵族, 52, 54, 341; 农民, 55; 商人, 341

君主的权力, 142—143, 340—341, 345

北方大战后的和解, 339—340

和瑞典的和约(1720年), 198—199, 346

与西班牙结盟， 286

行政机构， 341—342

土地改革和改进耕作法， 342—354

和挪威经济结成一体， 344—345

外交政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345—347；对瑞典，
348—349， 360—362；对俄国， 349—350；

“交换”， 350

与奴隶贸易， 568—569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勒内，哲学家， 88， 94， 96

Desfontaines, Pierre-François, 德方丹，皮埃尔-弗朗索瓦，
哲学家和评论家， 106

Deshima, 出岛，荷兰人在长崎港的居留地， 579—580

Dettingen, battle of (1743年)，德廷根战役，(1743年)，
427， 428

Diderot, Denis, 狄德罗，德尼，哲学家， 85—86， 91， 96，
97， 103， 110

Dinwiddie, Robert, 丁威迪，罗伯特，弗吉尼亚总督， 535， 537

Diplomatic Revolution, 外交大变动（联盟关系的逆转）， 7，
18， 19—20， 211， 414—415， 538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后的英奥关系， 440， 442—443

考尼茨的关于与法国结盟的计划， 441—442；贝尼斯和斯塔勒
姆贝格的谈判， 444—445

英国与俄国的资助条约， 20—443， 446；与圣彼得堡协议， 447
—448

英普关系， 445—449；与威斯敏斯特协定， 449—450， 461

法、奥对威斯敏斯特协议的反应， 450—453；第一次凡尔赛条
约， 453—456

俄国对威斯敏斯特协议的反应, 332—333, 456—459
与七年战争的爆发, 461—464, 466, 468
Dissenters, 不信奉国教者(英国), 新教, 128—129, 133,
246
辉格党人让步, 248
Dithmar, 迪特马尔, 经济哲学家, 158
Doddridge, Philip, 多德里奇, 菲利普, 不从国教派的神学学
者, 128, 133
Dohna, Christoph von, 多纳, 克里斯托夫·冯, 普鲁士将军,
474
Dolgoruky family, 多尔戈鲁基家族, 326—328
Domina Palatii Regina Libertas, 《自由、女王及宫殿主
妇》, 371
Douglas, Chevalier, 道格拉斯, 薛瓦利埃, 456, 458
Downing, Sir George, 唐宁爵士, 乔治, 驻海牙大使, 46
Dresden, Treaty of (1745年), 德累斯顿条约(1745年),
210, 211, 388, 410, 432, 437, 449
Du Barry, Marie-Jeanne Gomard de Vaubernier, 迪巴里伯爵夫
人, 玛丽-让娜·马尔·沃贝尼埃, 226
Dubois, Guillaume, Abbe, 杜布瓦, 纪尧姆, 神父, 法国政治
家, 192, 194—195, 197, 198, 200, 218, 227
Duclos, Charles Pinot, 杜克洛, 夏尔·皮诺, 哲学家, 97,
110
Dumas, Benoit, 杜马, 贝诺瓦, 本地治理总督, 41, 557
Duncan, Adam, 邓肯, 亚当, 坎珀唐子爵, 187
Dunkirk, 敦刻尔克, 海军基地, 192
Dunton, John, 邓顿, 约翰, 书商, 政治记者, 71

Du Pin, L.E., 迪潘, 路·埃, 詹森派学者, 115, 118, 122

Dupleix, Joseph, 杜布雷, 约瑟夫, 法属印度总督, 41, 558—562

Duquesne de Menneville, 迪凯纳·德梅内维尔侯爵, 北美法国总督, 535

Duquesne, Fort, 迪凯纳堡, 535, 537, 538—539

Durai Sarai, Convention of (1738年) 图兰萨兰协定 (1738年), 549

Dutch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群岛, 26, 40—41, 576

咖啡生产, 585—587

荷兰势力扩张, 587

压迫和屠杀中国“中间人”, 587—588

中国包税商, 588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见Holl and

East India Company (British), 东印度公司 (英国), 40—41, 48, 265, 558

与南海泡沫公司, 250—251

与中国的贸易, 581, 583; 公司对洪仁辉的待遇, 584

East India Company (Danish), 东印度公司 (丹麦), 558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东印度公司 (荷兰), 26, 40—41, 558

在南非, 576—577

与印度尼西亚咖啡生产, 585—586

走向破产, 588—589

East India Company (French), 东印度公司 (法国), 34, 41, 223, 513, 558

财政弱点, 561

East India Company (Swedish), 东印度公司 (瑞典), 356, 364, 558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荷兰势力, 40—41, 585—589

与七年战争, 525

另见Dutch East Indies

East Prussia, 东普鲁士, 293, 297, 468

俄国入侵 (1757年), 470; (1758年), 473—474

East and West Trading Company, 东西方贸易公司, 397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 92—93, 103—104

Education, 教育, 107—108

在英国, 128, 265—266

在普鲁士, 306

在俄国, 325—326, 335—336

在波兰, 370, 371

另见Universities

Edwards, Jonathan, 爱德华兹, 乔纳森, 公理会牧师, 109, 110, 508

Eichhorn, J. S., 艾科恩, J. S., 圣经评论家, 133

Eisen, C., 艾森, 雕刻家, 83

Elizabeth, 叶利扎维塔, 女沙皇, 14, 16, 21, 143, 212

即位, 331—332

给贵族的特权, 334, 336

与教会, 335

财政改革, 337—338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358—360

对威斯敏斯特条约的反应, 332—333, 456—459

与七年战争的反应, 467, 478

Elizabeth Farnese,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 西班牙王后, 6, 11, 19, 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 196—198, 199, 205, 209, 269, 277, 282—283

El Pardo, Convention of (1739年), 埃尔帕多协定 (1739年), 518

Encyclopédie, 《百科全书》, 85—86, 92, 95, 102, 106

Engraving, 雕刻, 82—83

Enlightenment, 知识界启蒙运动, 3, 307, 308, 371—381, 499

自然神论的论争, 85—86

宗教信仰自由的衰落, 87, 229, 233

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攻击, 87—88

科学的普及, 88

牛顿物理学的影响, 88—89

向经验主义发展, 89—90

化学的进展, 90

生物学的展望, 91

社会科学, 91—93

历史和历史哲学, 93—95

心理学, 95—97

享乐主义, 97

理性的功利主义, 97—98

先天的伦理感, 98; 伦理感是理性的规律, 98—99

政治思想, 99—103

经济思想, 103—104

乐观主义, 104—105

朝着完美发展的概念, 105

思想的传布, 105—107

教育制度, 107—108

宗教的正统, 108—109

哲学思想的归纳, 110—111

人道精神和科学经验主义的出现, 112

Ensenada, Zeno Somodevilla, marquis de la, 恩塞纳达侯爵,
塞诺·索摩德维拉, 西班牙政治家, 287

Entail Law of Peter the Great (1714年), 彼得大帝的继承法
(1714年), 14, 323; 被废除 (1730年), 330

Erlach, Fischer von, 埃拉赫, 菲舍尔·冯, 建筑师, 69, 81,
399

Ernesti, J.A., 埃内斯蒂, J.A., 圣经评论家, 133

Escorial, Treaty of the (1733年), 埃斯科里亚尔条约 (1733
年), 205

Espen, Zeegers van, 埃斯本, 齐格斯·范, 教会法规学家,
119, 121, 122

Espirit des Lois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
3, 75, 86, 92, 102, 141, 162, 336

Estrées, Louis-Charles-César, duc de, 埃特雷公爵, 路易-夏尔-塞扎尔, 法国元帅, 469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579

Eugene Francis, 欧根·弗兰西斯, 萨瓦-卡莱格南亲王, 18, 391, 397, 400, 402, 407

Euler, Leonard, 欧拉, 莱奥纳德, 数学家, 89

Evangelical movement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中的福音派运动, 139—140; 北美的福音派运动, 508

Ex omnibus, 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的通谕, 117, 232

Falconet, Etienne Maurice, 法内康涅, 艾蒂安·莫里斯, 雕刻家, 79

Family Compact (1761年), 家族契约 (1761年), 479, 482—483, 523—524, 540

Farinelli (Carlo Broschi), 法里内利 (卡洛·布罗斯基), 意大利歌唱家, 285

Farming, 耕作技术, 见Agriculture Farrukh-siyar, 法鲁克-西耶尔, 莫卧儿王朝皇帝, 546, 557

Febronianism, 弗布朗尼乌斯主义, 87, 121—122

Febronius, 弗布朗尼乌斯

见Hontheim, Nicholas von

Fénelon, François, 费奈隆, 弗朗索瓦, 哲学家, 73, 75, 76, 101, 103, 109, 220

Ferdinand VI, 费迪南德六世, 西班牙国王, 276, 285—286, 435, 438

Ferdinand, Prince, of Brunswick, 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亲王, 467, 473, 474, 475, 477—478

Fermor, Count William, 弗莫尔伯爵, 威廉, 俄国将军, 473—474

Fick of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的菲克, 324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亨利, 小说家, 75

Figureido, A.P., 菲古雷多, A.P., 教会法规法学家, 124—125

Finale, Italy, 菲纳莱, 意大利, 425, 429

Finck, 芬克, 普鲁士将军, 475

Finland, 芬兰, 16, 57, 211, 339—340

被俄国占领（1742年）, 359—361

FitzHugh, Thomas, 菲茨休, 托马斯; 东印度驻中国代表, 583

Fiume, Italy, 阜姆, 意大利, 401, 463

Fletcher, John Willaim, 弗莱彻, 约翰·威廉, 福音派神学学者, 139

Fleury, André-Hercule, 弗勒里红衣主教, 安德烈-埃居尔, 法国政治家, 8, 36, 106, 116, 200, 219, 331, 379

对西班牙的和解政策, 202, 519

对俄国力量提出警告, 205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210, 227—228, 416—417, 424

财政和内政的治理, 224—226, 237

宗教上的温和态度, 230, 231

Fleury, Claude, 弗勒里, 克洛德, 法国天主教自主派学者, 118

Flint, James, 洪仁辉, 东印度公司驻中国代表, 583—584

Flitcroft, Henry, 弗利特克罗夫特, 亨利, 建筑师, 69, 81

Florida, 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殖民地, 530—531, 540

Fontainebleau, Treaties of: 枫丹白露条约: （1743年）, 209; （1762年）, 213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vier de, 丰特奈尔, 贝尔纳·勒博维埃·德, 哲学家, 73, 88

Fontenoy, battle of (1745年), 丰特努瓦战役(1745年), 432

Forbes, Joseph, 福布斯, 约瑟夫, 美国将军, 538

Formey, Jean-Louis-Samuel, 福尔梅, 让-路易-萨米埃尔, 哲学家, 105

Fouquet, 富凯, 普鲁士将军, 477

Fox, Henry, Lord Holland, 福克斯勋爵, 亨利, 霍兰, 英国政治家, 254

Fragonard, Jean Honoré, 弗拉戈纳尔, 让·奥诺雷, 画家, 78

France, 法国

贸易与工商业: 与英国竞争, 6—7, 11, 18, 21—22, 24, 36—39; 吨位统计, 28—29; 工业发展和组织, 30—31, 237—239; 重商主义的调节政策, 33—35; 进出口平衡失调, 35; 因海军力量薄弱而受挫, 36, 46, 435; 在印度的商业利益, 40—41; (另见East India Company, Franch),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41—42; 垄断公司受抨击, 48; 迅速扩大, 237; 与西属美洲的贸易, 516—517; 奴隶贸易, 570—571

税收, 8, 53; 盐务税, 150, 216, 222; 人头税和其他直接税, 151, 221—222; 关税, 216; 二十分之一税, 234

社会结构: 贵族, 50—51, 55, 235; 农民, 53; 资产阶级, 61, 236; 法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63; 人口, 214—215, 237; 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的变化, 235—237

建筑: 巴洛克式, 67; 路易十五式, 67—68; 市镇房屋, 70; 建筑插图书籍, 82

文学: 讽刺文学, 72—74; 戏剧, 75; 小说, 75—76

绘画、雕塑、雕刻, 78—79, 83

启蒙运动: 自然神论的论争, 85—86; 对形而上学的抨击, 87—88; 科学的普及, 88; 牛顿物理学的影响, 88—89; 社会科学, 92—93; 历史研究, 93—94; 感觉心理学, 96; 社会伦理学, 98; 自然

法则法理学家，100；对英国宪法的赞美，101—103，160—162；经济思想，103—104；启蒙思想的传播，105—107；教育制度，107—108；正统宗教观点，108—109；哲学思想综述，110—112

宗教：关于“克雷芒通谕”的论战，114—117，122—123，230—231；宗教学者，118，对耶稣会教士的镇压，125—126，233；高级教士的财富和低级教士的贫困，229；里歇主义，229，231—232；对胡格诺教派的迫害，232—233，302

君主政体，142，214—215，219；负全责而无全权，220；受挫于宗教的论争，229—233；受挫于财政不稳定，233—235；受挫于法国社会的变化，239—240

行政管理机构，145—146，215—217；司法行政，152—153，218，220；文官制度的发展，153—154；各种委员会的治理，217—218；大臣间钩心斗角，218—219，224—225，226—227；这种制度的弱点，220—221；财经管理，220，223—224，225，237—238（另见税收条）

战争，陆战与海战：常规性质，163—165；陆军军官无能为力，171，181；陆军服役的建制状况，181—182；海军服役的建制和状况，183；海军力量日益增长，447；1759年的败仗，476

乌得勒支条约以后联盟的体系，192—195，197—198

与西班牙的关系（1723—1725年），200—202；1793年的英西战争，209，416

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204—205，380—381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210，408；外交政策，227—228，416—417，426—427，429；对查理·阿尔贝特的支持，419；入侵波希米亚，420；军事上的挫折（1742年），421，423—424；（1743年），427；入侵尼德兰（1744年），430—431，432—433，435；早期和平谈判，436；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436—439；在西印度群岛的战争，519—520

与外交大变动，210—211；考尼茨的结盟建议，441—442；贝尼斯和斯勒姆贝格间的谈判，444—445，463；对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反

应，450—453，460—461；第一次凡尔赛条约，453—456，459—460

与七年战争，211—213；英国陆上和海上的进攻，467；对汉诺威的进攻（1757年），469—470；在罗斯巴赫的失败，471；法军受到英国观察部队的遏制，473；在克雷费尔德的失败（1758年），474；1759年的战役，475；入侵英国的计划，475—476；与家族契约，481—483；巴黎条约，483；“不体面的和平”，485；在美洲的战争，521—528，536—540

在印度：英法竞争的增长，553，558；杜布雷在印度建立帝国的企图，559—560；他失败的原因，561—562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地，578—579

另见America, North, French; Jansenist movement

Francis Stephen of Lorraine, 洛林的弗兰西斯·斯蒂芬，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209，283，398，402—403，408，416，417，454

当选皇帝，410，432，438

波希米亚的共同摄政，421

Francke, August Herman, 弗兰克，奥古斯特·赫尔曼，虔诚派教徒，131

Frankfort, League of, 法兰克福联盟，431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本杰明，85，107，509

联邦计划，536

Frederick IV, 腓特烈四世，丹麦国王，341—342

外交政策，345—347

Frederick V, 腓特烈五世，丹麦国王，342，343

外交政策，348—349

Frederick William, 腓特烈·威廉，勃兰登堡选侯（大选侯），11，292—293，298，302，568

Frederick William I，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11—12, 56, 134, 569

行政改革，148, 150, 155；财政管理，296—299

文官制度，298—300；工业基尔特的行政改革，300—302，文官制度的改革，303—305；司法小改革，306—307

对普鲁士成为强国的贡献，203—204, 294—295

建立普鲁士军队，295—296, 305—306

鼓励移民，302—303

宗教政策，306

对儿子的教育，307

对波兰的政策，389

性格和成就，308, 310

Frederick II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2—13, 18—19, 20—21, 56, 62—63, 64, 107

宗教上的信仰自由，135, 455

行政改革，148—149, 158；指派法国的税收承包人，313；建立政府专职部门，313—314；建立中央司法制度，317

与战争艺术，165, 169, 176, 317；战略思想，171—173, 468—469, 472；对军队的关心，177—178；征兵制度和军纪，179—181

作为王储，307

性格和能力，308—310

政治哲学，310—311

“从国王的内阁进行统治”，311—312

农业改革，314—315

工业改革，315—316

鼓励国内外贸易，316—317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209—210，310；入侵西里西亚，408，417；在马尔维茨击败奥国军队，419；取得尼斯和下西里西亚，420；和平的愿望（1742年），421—422，423；沃尔姆斯条约后决心进攻奥地利，429；入侵波希米亚，431—432；赢得霍恩弗里德堡并入侵萨克森，432；与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436—437

外交大变革：与英国的关系，446—469；与威斯敏斯特协定，449—450，460—461；撕毁与法国的联盟，450—453，461

与七年战争，212—213，363，386，415；进攻萨克森，464，465；他的高明战略，568—569；入侵波希米亚（1757年），470—471；在罗斯巴赫打败法国人，471，在洛伊特恩打败奥地利人，471—472；1757年的伤亡，473；在佐恩多夫打败俄国人（1758年），474；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战役（1758年），474；1759年的失败，475；托尔高的胜利，（1760年），477；与彼得三世的和约，478—479；失去了英国的补贴，480—481；与胡贝尔茨堡条约（1763年），483—484

与波兰的王位继承，376—378，383，388—390

Frederick I，腓特烈一世，瑞典国王，346，351—352，362

接受1720年宪法中有限权力，352外交政策，355

Frederick Augustus I，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萨克森选侯。

见Augustus II，King of Poland

Frederick，腓特烈，丹麦王储，360

Frederick，弗雷德里克，英国王储，10，253，440

Freemasonry，共济会纲领，106

Freiberg，battle of（1762年），弗赖贝格战役（1762年），479

Frelinghuysen，Theodore，弗里林海森，特奥多尔，荷兰新教牧师，508

French and Indian War，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534—540

Fréron，Elie，弗雷隆，埃利，哲学家，108

Freylingshausen, A., 弗赖林斯豪森, A., 虔诚派教徒, 131

Fronde, the, 投石党运动, 99, 101, 227

Frontenac, Fort, 弗隆特纳克堡, 538—539

Fuchs, Paul von, 富克斯, 保罗·冯, 普鲁士政治家, 312

Fur trade, 皮毛贸易, 503, 505, 511—513, 528, 532, 540

Fux, Johann Joseph, 富克斯, 约翰·约瑟夫, 作曲家, 64

Gages, Jean Bonaventure Dumont, Count, 加吉斯伯爵, 琼·博纳文图·杜豪, 西班牙将军, 426, 433—434

Gainsborough, Thomas, 盖恩斯巴勒, 托马斯, 画家, 51, 79

Galiani, Abbé, 加利亚尼神父, 经济学家, 92, 282

Galicia Company, 加利西亚公司, 494

Galileo' s *Dialogo*, 伽利略的《对话》, 89

Galland, Antoine, 加朗德, 安托万, 作家, 73

Galvez, Don Bernado, 加尔维斯, 堂·贝尔纳多, 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 496

Gandon, James, 甘登, 詹姆斯, 建筑学作家, 81

Gasser, 加塞, 财政哲学家, 158

Gaulli, Giovanni Battista, 高利, 乔瓦尼·巴蒂斯塔, 画家,

77

Gay, John, 盖伊, 约翰, 作家, 75, 103

Gazette de Hollande, 荷兰公报, 107

Gelée, Claude, 热莱, 克洛德, 见Claude Lorrain条

Gemelli-Careri, 杰梅利-卡雷里, 意大利旅行家, 542

General Trading Company, 贸易总公司, 344

Geneva, constitution of the city, 日内瓦市宪法, 100

Genoa, Italy, 热那亚, 意大利, 425, 429, 433

1747年围城, 434

Gentleman's Magazine, 《绅士杂志》, 69

Geology, 地质学, 91

George I, 乔治一世, 英国国王, 4, 134, 199, 247, 355

与1716年的英法条约, 194—195

与彼得大帝的关系, 196, 347

George II, 乔治二世, 英国国王, 212, 253, 447—448

性格, 255

与1745年詹姆斯党的叛乱, 254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17—418, 420, 423, 424; 统帅英国军队, 427; 日益不得人心, 430

与七年战争, 466, 469—470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英国国王, 59, 540

重振王权的努力, 144, 255—256

对波兰的态度, 386

Georgia, 佐治亚, 518

建立和发展, 503—504, 530—531

Gerard, Alexander, 杰勒德, 亚历山大, 哲学家, 80

Germany, 德国

社会结构: 农民, 54; 贵族, 55; 中产阶级, 60, 61—62; 德国音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64—65

建筑, 66—67, 69—70

政治哲学, 99—100, 101, 110

路德教和新教, 130—131, 134, 135

宗教学术的发展, 132—133

行政管理机构, 158—159

美洲的德国移民, 501—502

见所属各邦条

Ghazi-ud-din and the succession in the Deccan, 伽齐-乌德-丁和在德干的继承斗争, 560

Ghisolfi, Giovanni, 吉索尔菲, 乔瓦尼, 画家, 82

Giannone, Pietro, 詹农, 彼得罗, 律师, 120—122

Gibbon, Edward, 吉本, 爱德华, 历史学家, 93, 118, 120

Gibbs, James, 吉布斯, 詹姆斯, 建筑师, 68—69, 81

Gibraltar, 直布罗陀

西班牙对美国占领的不满, 199, 201, 209, 435; 被围困(1729年), 202

Giornale (Scipione Maffei), 《日报》(希皮奥内·马费伊), 107

Giovanni Gaston, 乔瓦尼·加斯东, 托斯卡纳大公, 201

Glen, 格伦, 英国殖民地总督, 537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von, 格卢克,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冯, 64

Gmelin, Johann, 格梅林, 约翰, 博物学家, 336

Godeheu, 戈德厄, 法属印度总督, 562

Geortz, Count George Henrik, 格尔茨伯爵, 乔治·亨里克, 瑞典政治家, 195, 196, 197, 351, 373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华尔夫冈·冯, 308

Goguet, A. Y. 戈凯, A. Y. 自然法理学家, 100

Golitsyn, Prince Alexis, 戈利钦, 阿列克赛亲王, 俄国驻英大使, 483

Golitsyn, Prince Dmitry, 戈利钦, 季米特里亲王, 俄国政治家, 328—329

Golitsyn family, 戈利钦家族, 326—328

Gourney, Vincent, de, 古尔内, 樊尚德, 经济学家, 48

Govind Singh, 哥宾德·辛格, 锡克教祖师, 544—545

Grandes Remonstrances (1753年), 大抗议书, 231—232

Granville, Lord, 格兰维尔勋爵。见Carteret条

Grassalkovich, 格拉沙尔科维奇, 匈牙利大法官, 409

Gravelot, Hubert François, 格拉夫洛, 于贝尔·弗朗索瓦, 雕刻家, 83

Gravina, Gianvincenzo, 格拉维纳, 詹温琴佐, 自然法法理学家, 94, 100

Great Britain, 英国

贸易与商业: 与法国竞争, 6—7, 11, 18, 21—22, 24, 36—39; 吨位统计, 28—29; 与技术发展和工业改组有关的贸易, 29—31; 用于贸易与工业发展的资金, 31—32, 43—44; 重商主义的政策, 32—33, 46—47; 海军力量是发展必不可少的, 33, 39, 45—46, 192; 在印度的商业利益, 40—41 (又见East India Company, British条);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41—42; 垄断公司受抨击, 47—48; 商务条约, 192; 与西班牙美洲的贸易, 206—208, 515—518; 十八世纪的贸易平衡, 241, 266; 国内贸易与交通, 242—243; 与西班牙的通商条约 (1750年), 286; 奴隶贸易, 571—573; 与中国的贸易, 581—584

税收, 9, 52—53, 151, 152, 252, 260

社会结构: 贵族与农民间的关系, 52—53, 243; 贵族在政治上的作用, 58; 重商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出现, 58—59; 职业阶层的出

现，60—61，265；人口，241，266—267；乡绅，243—245；教育制度，265—266

建筑：“古典式”，68—69；哥特式，69；城镇住宅，70；带有插图的建筑书籍，81—82

文学：报刊，71—72；讽刺文学，73—74；戏剧，74—75；小说，75；“伤感”诗歌，76—77

绘画，79

启蒙运动：关于自然神论的论争，85—86；牛顿物理学的影响，88—89；感觉心理学，95；社会伦理，98；政治思想，101

法国赞美的政治机构，101—103，160—162；经济思想，103；伯克莱的理想主义，110

政治机构：在法国受到赞美，101—103，160—162；自治城市，245；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区别，246—247；行政与司法间的关系，256—257；内阁政府的开始，257—259；国务秘书职务，259；闲职，259；宪法和上院的作用，260；和下院的作用，260—261；皇室，261—262

英国教会：欧洲新教教会的领袖，126—127；与世俗政府的关系，127—130；圣经学术研究，132；新教联合运动，133—135；正统的与非效忠派的礼拜仪式，135—136；福音会运动的开始，139—140；与社会秩序的维护，245—246；公会议闭会（1717年），249

君权政体，142，144；汉诺威家族的继位，247；实际权力，256—257；国王的否决权，260

行政机构，146；司法管理，157—158，243—244，257，260，262—265；自由的扩大和权力的分开，160—162，264；财政管理，242，250—251，252，260；文官制度的发展，259—260；专业行为准则的产生，265

作战军事：规则和条例，163—165；战略，173—174；官兵之间缺乏信任，176；征兵，178，183—184；买卖官职，185—186，晋升率，186—187

作战海军：规则和条例，163—165；海军优先政策，173；战略，174；官兵间缺乏信任，176—177；人道的影响，178；征兵，179，184—185；庇护和晋升，187—189；军官的资格，189—190

乌得勒支条约以后的结盟体系，192—195，197—198

与瑞典和俄国的关系（1716年），196；（1719—1720年），198—199；（1727年），203，347

与占领直布罗陀，199，201

与西班牙的战争（1739年），209，416，518—519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209—210，416；乔治二世的地位，417—418，420，423，424；卡特里特的军事和外交计划，422—423，428—429；乔治二世时期的军事行动（1743年），427；乔治二世日益不得人心，430；土伦的海战，430；丰特努瓦战役的失败（1745年），432—433；初步和谈，436；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436—439；西印度群岛的战争，519—520

与外交大变革，210—211；英奥关系缺乏诚意，440，442—443；对俄国的补贴条约，443，446，458；圣彼得堡协定，447—448；与普鲁士的关系，445—449；与威斯敏斯特协定，449—450，459—461

与七年战争，211—213；防御条约的义务造成的困境，446—447；哈斯滕贝克的失败和克洛斯特塞文协定（1757年），469—470；观测陆军的加强，472—473；舒瓦瑟尔的入侵英国的计划，475—476；使用武装私掠船，476—477；比特停止对弗里德里希的补贴，480—481；与家族契约，482—483；巴黎条约（1763年），483，486；为了保证恢复普鲁士现状而牺牲殖民地利益，484；美洲的战争，521—528，536—540

在印度，550，555；英法间贸易竞争的增大，553，558；贸易使团，557；与杜布雷的斗争，561—562；克莱武在孟加拉的胜利，562—563；英国统治的巩固，565

又见America，North，British条；Bank of England条；Dissenters条；Jacobites条；National Debt条和Sinking Fund条。

Great Elector, the 大选侯见 Frederick William, elector of Brandenburg 条

Greuze, Jean Baptiste, 格勒兹, 让·巴蒂斯特, 画家, 78

Grimaldi, marquis de, 格里马尔迪侯爵, 西班牙政治家, 212

Grimm, Baron, 格里姆男爵, 107

Grodno, Diet of (1718年), 格罗德诺议会 (1718年), 373

Gross Jägersdorf, Battle of (1757年), 大耶格斯多夫战役 (1757年), 333, 470

Grotius, Hugues, 格罗齐乌斯, 胡格斯, 政治哲学家, 99—101

Grumbkow, General von, 冯·格鲁姆巴科将军, 普鲁士政治家, 378

Guadeloupe, 瓜德罗普岛, 522, 523, 526, 527, 540

Guadja Trudo, 瓜贾·特鲁多达, 荷兰国王, 575

Guatemala, 危地马拉, 496, 499

Guilds, industrial, 工业行会

法国, 238

西班牙, 270

普鲁士, 300—302, 315

俄国, 321

波兰, 369

Gustavus II Adolphus, 古斯塔夫斯二世, 阿道尔夫斯, 瑞典国王, 144—145

Gustavus III, 古斯塔夫斯三世, 瑞典国王, 349, 350, 352, 362

Haddock, Nicholas, 哈多克, 尼古拉斯, 海军上将, 209, 518

Hague, The, Treaty of (1720年), 海牙条约 (1720年), 395

Haider Ali, 赫德尔·阿里, 迈索尔统治者, 565

Haiti, 海地, 527

Halifax, Nova Scotia, 哈里法克斯·新斯科舍, 534

Halley, Edmund, 哈雷, 爱德蒙, 天文学家, 89

Hamann, Johann Georg, 哈曼, 约翰·格奥尔格, 哲学家, 109

Hamburg, 汉堡, 43

Hamburg, Treaty of (1762年), 汉堡条约(1762年), 479

Hamilton, Alexander, Lieut, -Col., 汉密尔顿中校, 阿历山大, 168

Hanau, Treaty of (1743年), 哈瑙条约(1743年), 428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韩德尔, 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克, 作曲家, 64, 65

Hanover, 汉诺威, 203, 204

- 对梅克伦堡的军事占领, 198—199
-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18, 420, 422
- 与外交大变革, 443, 447—448, 452
- 与七年战争, 466, 469—470, 478, 483

Hanway, Jonas, 汉韦, 乔纳斯, 旅行家, 慈善家, 189, 266

Hardouin, 阿杜安, 让, 耶稣会历史学家, 93, 118, 125

Hardouin-Mansart, Jules, 阿杜安-芒萨尔, 朱尔, 建筑师, 67

Hardwicke, Philip Yorke, earl of, 哈德韦克伯爵, 菲利浦·约克, 大法官, 129, 163, 256, 263—264, 265

Harrach, Count Ferdinand, 哈拉克伯爵, 斐迪南德, 奥地利驻伦巴第总督, 411, 413

Harrison, Samuel, 哈里森, 塞缪尔, 东印度公司驻中国代表, 583

Hartley, David, 哈特利, 戴维, 哲学家, 96

Harvey, Sir John, 哈维爵士, 约翰, 海军上将, 188

Hastenbeck, battle of (1757年), 哈斯滕贝克战役 (1757年), 164, 469

Hastings, Warren, 黑斯廷斯, 华伦, 印度总督, 565

Hat Act (1732年), 制帽条例 (1732年), 505

Hats. 礼帽党, 见Sweden条

Haugwitz, Count Ludwig, 豪格维茨
伯爵, 路德维希, 波希米亚和奥
地利首相, 412—413, 422

Havana; 哈瓦那, 213, 483, 499, 519, 524—525, 540

Havana Company, 哈瓦那公司, 494

Hawke, Edward, Lord Hawke, 霍克勋爵, 爱德华, 海军上将,
187—188, 189, 476, 539

Hawksmoor, Nicholas, 霍克斯穆尔, 尼古拉斯, 建筑师, 68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爱尔维修, 克洛德-阿德里安, 哲学
家, 86, 95, 96, 97—98, 122

Henday, Anthony, 亨德, 安东尼, 513

Henry IV, 亨利四世, 法国国王, 145

Herring, Thomas, 赫林, 托马斯, 坎特伯雷大主教, 127, 133

Hesse, Prince William of, 黑森的威廉亲王, 瑞典王位的候选
人, 360

Hicks, George, 希克斯, 乔治, 不矢忠派, 135

Hindustanis, 印度斯坦人, 545

History, historians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史的史
学家, 93—95

Hoadley, Benjamin, 霍德利, 本杰明, 班戈主教, 87, 129, 249

Hoche, Lazare, 奥什, 拉扎尔, 入侵爱尔兰 (1796年), 182

Hochkirch, battle of (1758年), 霍赫基尔希战役 (1758年), 169, 474

Hodgson, Studholme, 霍奇森, 斯塔德霍姆, 少将, 171

Hogarth, William, 贺加斯, 威廉, 画家, 75, 79—80

Hohenfriedberg, battle of (1745年), 霍恩弗里德贝格战役 (1745年), 432

Holbach, Paul-Henri d', 霍尔巴赫, 保罗-亨利·德, 哲学家, 86, 117

Holderness, Robert D' Arcy, 霍尔德内斯勋爵, 罗伯特·达西, 450

Holker, John, 霍尔克, 约翰, 詹姆斯党人, 法国工业品总监, 30, 237

Holland (the Dutch Republic), 荷兰 (荷兰共和国) 见 Netherlands United条和Provinces of the 条

Holstein-Gottorp, Adolphus Frederick, duke of, 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公爵, 阿道夫·腓特烈, 见Adolphus Frederick, king of Sweden条

Holstein-Gottorp, Charles Frederick, duke of, 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公爵, 查理·腓特烈, 15, 203, 212, 346—347, 351—352, 355—356

Holstein-Gottorp, Charles Peter Ulrich, 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公爵, 查理·彼得·乌尔里希。见Peter III, Tsar

Holstein-Gottorp, family of, 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家族, 15

Holzbauer, 霍尔茨鲍尔, 作曲家, 65

Honduras, 洪都拉斯, 伐木业, 211, 286, 476, 515, 518, 521; 与西班牙的协议, 527

“Hong Merchants”, “行商”, 581—583

Hontheim, Johann Nicholas von, 霍恩泰因, 约翰·尼古拉·冯, 特里尔副主教(弗布朗尼乌斯), 87, 121, 125

Hood, Alexander, 胡德, 亚历山大, 188

Hood, Samuel, 胡德子爵, 塞缪尔·胡德, 海军上将, 174, 188

Horn, Count Arvid Bernhard, 霍恩伯爵, 阿维德·伯恩哈德, 瑞典政治家, 15, 347, 351, 352

与贵族特权, 354

外交政策, 355, 356

与黑森人和荷尔施泰因人的关系, 355—356

便帽党领袖, 356

被礼帽党击败, 357

Hornigke, von, 霍尼希克, 冯, 财政哲学家, 158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577

Howe, Richard, Lord Howe, 豪勋爵, 理查德·豪, 海军上将, 178, 188

Hoym, 霍伊姆, 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大臣, 312

Hubertusburg, Treaty of (1763年), 胡贝图斯堡条约(1763年), 213, 415, 483—484

Hubner, Martin, 许布纳, 马丁, 自然法法理学家, 丹麦人, 100

Hudson's Bay Company, 哈得孙湾公司, 48, 512—513

Huguenots, 胡格诺教派

丝织工人, 30, 59

对胡格诺派的迫害, 232—233; 在普鲁士受欢迎, 302

在美国, 501

Hume, David, 休姆, 戴维, 哲学家, 48, 49, 61, 91, 93, 96, 98, 101, 103, 110

Hungary, 匈牙利

社会结构；农民，53—54，393；贵族，56—57，392—393，403—404；中产阶级，62

行政机构，157，391，396；司法管理，397；基本上受维也纳控制，402—403

索特马尔条约后与奥地利和解，391—393

税收，393，403—404

与奥地利由女性继承王位，393—394，395—396；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让步，408—410，411—412

把土耳其人赶走（1717—1718年），394

查理六世维持领土分割现状，402

宗教：天主教为国教，403；新教无能为力，403

人口增长，404—407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409—410；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421—422

Huntingdon, Selina, 亨廷顿伯爵夫人，塞利纳，137，139

Hutcheson, Francis, 哈奇森，弗朗西斯，哲学家，98，101，103，110

Hutton, Matthew, 赫顿，马修，坎特伯雷大主教，127

Hyderabad, 海得拉巴，548，553，564

Hyndford, Lord, 海因德福德勋爵，英国派驻腓特烈大帝的使节，420，423

Illinois District, 伊利诺伊地区，法国人居留地，531

Indemnity Acts, 赔偿法，248

India, 印度，23—24，40—41

莫卧儿帝国效率的衰落，541—543

行政机构，543；设有长子继承规定，543—544

巴哈都尔沙即位，544

锡克族叛乱（1709年），544—545

巴哈都尔沙的脆弱统治，545

宫廷中图兰派和伊朗派间的斗争，545—546，548

西瓦吉奇统治下的马拉塔，546；

沙胡统治时期，547；马拉塔对外侵略的动机，547—548；马拉塔对德干的权利要求，548—549；对马尔瓦和古吉拉特的劫掠，549；对锡迪斯和葡属领土的袭击，550；入侵孟加拉，554—556；入侵卡纳蒂克，556—557；被阿哈马德沙·杜兰尼逐出印度西北部，563—565

纳迪尔·沙阿的入侵，550—552

“省区政权”的兴起，553—557；罗希拉力量的扩大，553—554

贾特人起义，554

欧洲贸易使团，557—558；贸易公司，558

英法战争（1744—1748年），558—559；（1756—1760年），563

法国建立印度帝国的尝试，559—560

德干和卡纳蒂克的继位斗争，（1748—1750年），560—561

英国征服孟加拉，562—563；英国统治的巩固，565

又见Bengal条和Carnatic条

Indians in North America, 北美的印第安人，503，512—513

英法两国竞相与之进行贸易，529，531

耶稣会传教士，530

六邦联盟，531—533

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534—540

Indigo trade, 靛蓝颜料贸易, 34, 35, 41, 495, 502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见East Indies条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工业组织“家庭”体制, 30—31, 315

工厂体制的开端, 31

用于扩展的资本, 31—32, 237, 267

在法国, 34, 237—239

力量大到足以向政府政策挑战, 49; 罢工, 238—239

在普鲁士, 300—302, 315—316

又见Guilds, industrial条

Innocent XIII (Michele Angelo Conti), 英诺森十三世, (米凯莱·安杰格·孔蒂), 教皇, 113

Insurance, marine, 海上保险, 44

Intendants, 总督, 153—155, 159, 215—217, 220, 235—236, 513

Irish artisans in Spain, 西班牙的爱尔兰工匠, 286—287

Iron Act (1750年), 制铁条例(1750年), 505

Iron production, 生铁生产, 30, 38, 242, 267, 318—319, 338, 505

Iroquois Indians. 易路魁印第安人。见Confederation of the Six Nations条

Italy, 意大利, 59, 63

音乐传统, 64, 281

建筑, 66, 281; 建筑雕刻, 82—83

绘画, 77—78

科学思想的传播, 89

维科的历史哲学，94—95

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反教皇和反教士的传统，120；矫饰和奢侈，281—282；改革开始，283—284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权利要求，196—198；199—202，205，269，277，282—283

比勒费尔德对意大利的描述，280—281

社会结构：贫富悬殊，281；贵族，282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424—426，433—434，437—438

又见所属各邦条

Ivan VI，伊凡六世，沙皇，203，331

Jablonski, Daniel Ernst，雅布隆斯基，丹尼尔·恩斯特，摩拉维亚主教，134

Jacobites，詹姆斯党人，194，196，197，237

1715年起义，247—248

1745年起义，254，433

移居美洲，501

Jagat Seths，查伽特·塞思家族，印度银行家，554

Jahandar Shah，贾汗达·沙，莫卧儿皇帝，546，557

Jahangir，贾汗季，莫卧儿皇帝，541，542，544

Jamaica，牙买加，514，516，520，524

James, Bartholomew，詹姆斯，巴塞洛缪，海军少将，188

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威尔士亲王（詹姆斯三世，“老觊觎王位者”），194

James, John，詹姆斯，约翰，建筑师，68—69，81

Jansenist movement，詹森主义运动，109，229

与“克雷芒通谕”，114—115，123，230—231

得救预定论，116—117；与摈弃理性和精神自由，117—118

下级僧侣和俗人的热忱，231—232

Japan, 日本，579—580

Jats, 贾特人，554

Jaucourt, Louis de, 德若古，路易，政治哲学家，102

Jenkins, Captain Robert, 詹金斯舰长，罗伯特，518

Jenkins' Ear, war of,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25，38，209，416，518—519

Jenyns, Soame, 詹宁斯，索姆，政治家，97

Jesuits, 耶稣会教士，108，284，306

与自然法则和超自然真理之间的笛卡尔主义两重性，109

学术成就，118

政治重要性日益减少，122—123

传教团：中国，123，580—581；巴拉圭，123—124，497；西印度群岛，233；北美，497，513，530

葡萄牙持敌视态度，123—124；被逐出葡萄牙，124—125，290—291

在法国被取缔，125—126，233

最后解体（1773年），126

在波兰，370，371，375—376

在奥地利，401—402

西班牙持敌视态度，493

Jews, 犹太人，欧洲城市中的犹太人住区，60

在波兰的地位，366，369，372

John V, 约翰五世，葡萄牙国王，288，290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塞缪尔, 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110

Johnson, Samuel, 约翰, 塞缪尔, 作家, 71, 105, 135, 184

Johnson, William, 约翰逊, 威廉, 与美洲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商人, 532

Jombert, 戎巴尔, 建筑雕刻家, 82

Jones, Inigo, 琼斯, 英尼戈, 建筑师, 68, 70

Jones, John, 琼斯, 约翰, 天主教基督精神协会创始人, 133

Joseph I, 约瑟夫一世, 皇帝, 391, 392, 393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皇帝, 122, 283, 409, 484

Joseph I, 约瑟夫一世, 葡萄牙国王, 123, 124, 290

Joseph of Saxe-Hildburghausen, 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 奥地利陆军统帅, 471

Journal de Trevoux, 《特雷武报》, 106, 108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期刊和报纸, 71—72, 106—107

Journeyman, 工匠。见Guilds industrial条

Jouveney, Joseph de, 儒旺西, 约瑟夫·德, 耶稣会神父, 108

Juan, Don Jorge, 胡安, 唐·豪尔赫, 西班牙海军上将和经济学家, 279, 286, 487—488, 491—492

Justi, 尤斯蒂, 财政哲学家, 158—159

Justice, administration of, 司法行政管理

 法国, 152, 3, 218, 220

 英国, 157—158, 243—244, 257, 260; 权力分立, 162; 法院, 262—265

 意大利, 283—284

 普鲁士, 306—307, 317

 俄国, 324—325

波兰, 367—368, 384

匈牙利, 397

奥地利, 413

英属北美洲, 511

中国人的概念, 585

Juvara, Filippo, 尤瓦拉, 菲利波, 建筑雕刻家, 82

Kam Bakhsh, 卡姆·巴克什, 比贾普尔总督, 544

K' ang Hsi, 康熙, 中国皇帝, 580—581

Kantemir, Antioch, 康捷米尔, 安蒂奥克, 俄国诗人和外交家,
329

Karnal, battle of (1739年), 卡纳尔战役 (1793年), 552

Katte, Hans Hermann von, 卡特, 汉斯·赫尔曼·冯, 普鲁士军官, 307

Kaunitz, Wenzel Anton, Prince von, 考尼茨亲王, 文策尔·安东·冯, 奥地利政治家, 19—20, 122, 212

外交政策, 412, 414—415; 收复西里西亚计划, 441—442; 保卫尼德兰的计划, 443—444; 对威斯敏斯特条约的反应, 451—453, 460; 第一个凡尔赛条约, 454—455, 461; 与俄国的关系, 457—459

Kay, John, 凯, 约翰, 英国发明家, 30, 267

Kempfenfelt, 肯彭费尔特, 187, 188

Kent, William, 肯特, 威廉, 建筑师, 81

Keppel, Augustus, Lord Keppel, 凯佩尔勋爵, 奥古斯特, 凯佩尔, 海军上将, 188

Ketelaar, 凯特拉尔, 荷兰驻贾汗达沙宫廷大使, 557

Kip, Johannes, 基普, 约翰内斯, 雕刻师, 81

Klein-Schnellendorf, Convention of (1741年), 克莱因-施内伦多夫协定, 420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克洛卜施托克,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 哲学家, 109

Kloster-Camp, battle, of (1760年), 克洛斯特-坎普战役 (1760年), 478

Kloster-Seven, Convention of (1757年), 克洛斯特·塞文条约 (1757年), 470; 被废除, 472

Kneller, Sir Godfrey, 内勒爵士, 戈弗雷, 画家, 79

Knobelsdorf, Johann-Georg-Wenceslas von, 克诺贝尔斯多夫, 约翰-格奥尔格-文策斯拉斯冯, 建筑师, 69

Knowles, Charles, 诺尔斯, 查尔斯, 海军上将, 183

Knyphausen Baron Dodo Heinrich von, 克尼福森男爵, 多多·海因里希·冯, 普鲁士驻巴黎大使, 461

Kolin, battle of (1757年), 科林战役 (1757年), 470—471; 伤亡, 473

Konarski, Stanislaw, 科纳尔斯基, 斯坦尼斯瓦夫, 波兰政治哲学家, 371

Königsegg, Lothaire Joseph Georg, Count von, 柯尼希泽格伯爵, 冯·洛塔尔·约瑟夫·格奥尔格, 奥地利陆军司令, 408

Kroszka, battle of (1739年), 克罗兹卡战役 (1739年), 408

Kunersdorf, battle of (1759年), 库纳斯多夫战役 (1759年), 475

Küster, Theodore, 屈斯特尔, 特奥多尔, 学者, 118

La Bourdonnais, 拉布尔多内, 法国海军上将, 558—559

Labrador fisheries, 拉布拉多渔场, 34

La Clue, 拉克吕, 法国海军司令, 476

La Demoiselle, 拉德穆瓦塞尔, 迈阿密的印第安部落酋长, 535

La Fontaine, Jean de, 拉丰丹, 让, 作家, 72

La Galissonnière, 控加利索尼埃, 北美洲法国殖民地总督, 535, 537

Lagos, battle of (1759年), 拉古什战役 (1759年), 476

Lagrange, Joseph-Louis, 拉格朗日, 约瑟夫-路易, 数学家, 89

Lally, Thomas, 拉利, 托马, 法派驻印度殖民地的将军, 563, 564

Lamb, R., Sergeant, 兰姆, R., 中士, 174

La Mettrie, Julien de, 拉美特利朱利安, 哲学家, 86, 96, 97

La Mina, marquis de, 拉·米纳侯爵, 西班牙将军, 434

La Mothe le Vayer, François, 拉莫特·勒瓦耶, 弗朗索瓦, 历史学家, 93

Lancret, Nicolas, 朗克雷, 尼古拉, 画家, 78

Landshut, battle of (1760年), 兰茨胡特战役 (1760年), 21, 477

Langley, Batty, 兰利, 巴蒂, 建筑师, 69

Largillière, Jean Raoul de, 拉日利埃, 让·拉乌尔·德, 画家, 78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拉罗什富科公爵, 弗朗索瓦, 作家, 72

Lauffeldt, battle of (1747年), 洛费尔特战役 (1747年), 435

Launay, de, 德·劳奈, 普鲁士收税官, 313

Lavalette, Père, 拉瓦莱特, 佩尔, 西印度群岛的耶稣会布道团长, 125, 233

La Vèrendrye, 拉韦朗德里, 法国殖民领袖, 513

Law, Jacques-François, 劳, 雅克-弗朗索瓦, 特利支诺波利的法军司令, 560

Law, John, 劳里斯顿的劳, 约翰, 8, 34, 41, 145, 530

信贷的理论, 223

他的体制的垮台, 223—224, 355, 558

与奴隶贸易, 570

Law, William, 劳, 威廉, 新教神学家, 109, 136, 137

Lawrence, Stringer, 劳伦斯, 斯特林格, 将军, 560

Le Blond, A. -J. -B., 勒布隆, 建筑师, 70

Le Brun, Charles, 勒布朗, 夏尔, 画家, 78

Le Brun, Pierre, 勒布伦, 皮埃尔, 耶稣会学者, 118

Leclerc, Jean, 勒克莱尔, 让, 哲学家和批评家, 107

Le Courayer, 库勒雷尔, 巴黎圣热纳维埃夫修道院院长, 116

Lehwaldt, Hans von, 勒瓦尔特, 汉斯·冯, 普鲁士军队总司令, 470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兹, 戈特弗里德·威廉, 哲学家, 99—100, 104—105, 110, 123, 324

Leipzig fairs, 莱比锡博览会, 60

Le Loutre, 勒卢特尔, 耶稣会传教士, 513, 530, 534

Lenoir, 勒努瓦, 法属印度殖民地总督, 41

Lely, Sir Peter, 莱利爵士, 彼得, 画家, 79

Lenglet du Fresnoy, P.N., 朗格莱·迪弗雷努瓦, P.N., 历史学家, 93

Le Notre, 勒诺特尔, 园艺美化家, 67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皇帝(汉诺威选侯), 158

Leopold II, 利奥波德二世, 皇帝 (托斯卡纳大公), 62, 283, 391, 395—396

Leopold of Anhalt Dessau, 安哈尔特德治的列奥波德, 174, 296

Le Sage, Alain-René, 勒萨日, 阿莱因-勃内, 作家, 76

Leslie, Charles, 莱斯利, 夏尔, 不矢忠派, 129

Lestocq, Armand, 莱斯托克, 阿尔芒, 叶利扎维塔女皇的御医, 331—332

Leszczyński, Stanislas, 莱什琴斯基, 斯坦尼斯瓦夫。见 Stanislas Leszczyński

Le Tellier, 勒泰利耶, 耶稣会神父, 114, 230

Lettres de cachet, 密扎, 219

Lettres philosophiques (Voltaire), 《哲学书简》 (伏尔泰), 3, 102

Leuthen, battle of (1757年), 洛易顿战役 (1757年), 471—472; 伤亡, 473

Levant, the, 黎凡特, 地中海东部诸国通称, 英法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 41—42

Levant Company, 黎凡特公司, 48

Le Vau, Louis, 勒沃, 路, 67

Leyrit, de, 莱里特, 德, 本地治理总督, 562

Libel and sedition, 诽谤和煽动, 264—265

Liegnitz, battle of (1760年), 利格尼茨战役 (1760年), 21, 477

Lima, Peru, 利马, 秘鲁, 499

Lindsey, Theophilus, 林赛, 西奥菲勒斯, 神学家, 133

Linnaeus, Carolus, 林奈, 卡洛拉斯, 瑞典博物学家, 3, 90, 358

Lisbon earthquake (1755年), 里斯本地震 (1755年), 104, 123

Literature, 文学

报刊文学, 71—72

讽刺文学, 71—74

戏剧, 74—75

小说, 75—76

“伤感”诗歌, 75—77

亲教信仰的辅助读物, 370—371

Lithuania, 立陶宛, 365, 366, 368, 384

迫害新教徒, 374, 375

七年战争中被俄国占领, 385

Liverpool and the slave trade, 利物浦与奴隶贸易, 571, 572, 573

Livestock, trade in, 牲畜贸易, 242

Livonia, 利沃尼亚, 373, 377, 379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哲学家, 48

感觉论心理学, 3, 94—95

欢乐论心理学, 97

政治思想, 99—100, 103, 130, 160—162, 264—265

宗教思想, 131

Loewenwolde, Count Carl, 勒文沃尔德伯爵, 卡尔, 俄国驻柏林大使, 377

Loewenwolde, Treaty of (1732年), 勒文沃尔德条约 (1732年), 205

Lombardy, 伦巴第, 408, 411

London, 伦敦

广场和街道的规划, 70

咖啡馆, 70—71

作为贸易中心, 241—242

贫民情况, 266

London Gazette, 《伦敦报》, 71

Lopukhina, Natalia, 洛普基娜, 纳塔莉亚, 被指控为反对叶利扎维塔女皇的共谋者, 332

Loudoun, John Campbell, fourth earl of, 劳杜恩伯爵 (第四代), 约翰·坎贝尔, 164, 473, 477—478

Louis XIV, 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 5, 7—8, 101, 115, 141, 146, 153

与《克雷芒通谕》, 114, 230

与乌得勒支条约, 192—193

与君主制的状况, 214, 239—240

宫廷, 219—220

迫害新教徒, 232—233

对西班牙复兴的影响, 276

Louis XV, 路易十五, 法国国王, 9, 116, 125, 142, 146, 212

即位 (1715年), 193, 220

婚姻, 201

性格, 226—227, 426

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影响，227—228，380，388；希望与奥地利结盟，444；第一次凡尔赛条约，450—453，455

与耶稣会的论争，230—233；同情耶稣会，233

财政困难，234—235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417，426—427，429；率领法军入侵尼德兰（1744年），431；与艾克斯拉沙佩尔条约，438—439

Louisa Ulrika，路易莎·乌尔丽卡，瑞典国王阿道夫·腓特烈的王后，361—362

Louisbourg，fortress of，路易斯堡，529，533—534，538—539，559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503，511，526，540

法国人开发，530

Lowth，Robert，洛思，罗伯特，希伯来语教授，133

Lully，Jean-Baptiste，吕利，让-巴蒂斯特，作曲家，64

Lyttelton，Sir Thomas，列特尔顿爵士，托马斯，188

Macanaz，M. de，马卡纳斯，M. 德，《西班牙的遗嘱》的作者，488

Machault d' Arnouville，Jean-Baptiste de，马肖尔·达尔诺维尔，让·巴蒂斯特·德，法国政治家，9，445，462，财政政策，231，234

McCulloch，Henry，麦卡洛克，亨利，伦敦商人，504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578—579

Maderno，Carlo，马代尔诺，卡洛，建筑师，66

Madras，马德拉斯，22，24，40，210，557

被杜布雷攻占，558—559，562

Maffei，Scipione，马费伊，希皮奥尔，新闻记者，107

Magyars, 马扎尔人, 406, 421

Maillebois , Jean-Baptiste-François Desmarets , Marquis de, 马耶布瓦侯爵, 让-巴蒂斯特-弗朗索瓦·德马雷, 法国元帅, 423—424, 433—434

Maine, Anne-Louise-Bénédicte de Bourbon, duchess of, 曼恩公爵夫人, 安娜·路易丝·贝内迪克特·德波旁, 277

Maine, Louis-August de Bourbon, duke of, 曼恩公爵, 路易奥古斯特·德波旁, 227

Mainville, 曼维尔, 印度的法国军官, 561

Malagrida, 马拉格里达, 耶稣会布道团传教士, 123, 124

Malaria in Italy, 意大利疟疾流行, 281

Malesherbes, 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马尔塞布, 克雷蒂安-纪尧姆, 德·拉穆瓦尼翁, 法国政治家, 86

Malhar Rao Holkar, 马尔哈·罗, 荷尔卡, 马拉塔游击队领袖, 549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政治经济学家, 128

Mandeville, Bernard, 曼德维尔, 贝尔纳, 诗人, 97

Manifesto on the Release of the Nobility (1762年) of Peter III, 彼得三世的“贵族解放宣言”(1762年), 334

Manila, 马尼拉, 483, 525, 540, 589—592

Mannheim, 曼海姆, 65

Mansfield, Sir James, 曼斯菲尔德爵士, 詹姆斯, 大法官, 264

Mar, John Erskine, earl of, 马尔伯爵, 约翰·厄斯金, 247

Marathas, 马拉塔人, 23—24, 541—542

西瓦吉的统治, 546

沙胡时期力量得到巩固, 547

攻城略地的动机，547—548

对德干地区的权利要求，548—549

对马尔瓦和古吉拉特的劫掠，549

对西迪人和葡萄牙领地的进攻，550

入侵孟加拉（1742—1751年），554—556；入侵卡纳蒂克地区，556—557

被阿哈马德沙·杜兰尼逐出印度西北部，563—565

Maria Amalia, 玛丽亚·阿玛利亚，巴伐利亚的查理·阿伯特（查理七世）的妻子，397

Maria Josepha, 玛丽亚·约瑟夫，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的王后，373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18，19，20，54，56—57，63，142，395

婚姻，398

即位和加冕，408—409；对匈牙利人的让步，409—410，411—412

对君主制的观点，410

行政改革，149，152，155—156，411—414

军队的改革，410—411，413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该条），209—210，310，408—410，416—439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后的外交政策，414—415；希望与法国结盟，444，445；对威斯敏斯特条约的反应，451—453，460；对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看法，455，461

Marianne, 玛丽安，查理六世的幼女，395，411

Marie-Antoinette,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王后，229

Marie Leszczyńska, 玛丽·莱什琴斯卡, 法国王后, 201, 205, 225, 380

Marie Louise of Savoy, 萨瓦的玛丽·路易丝, 西班牙王后, 276

Marivaux, Pierre de, 马里沃, 皮埃尔, 德, 作家, 76

Marot, Daniel, 马罗, 达尼埃尔, 建筑师, 81

Martinez de Arizala, Pedro, 马丁内斯·德阿里萨拉, 佩德罗, 马尼拉大主教, 591

Martinique, 马提尼克岛, 213, 521—524, 526, 527, 540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thought, 教学, 数学思维, 3, 89

Mattheson, Johann, 马特森, 约翰, 作曲家, 歌唱家, 65

Matthews, Thomas, 马修斯, 托马斯, 海军上将, 170, 430

Maudiut, Israel, 莫迪乌特, 伊斯雷尔, 军事历史学家, 467

Maupeou, 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 de, 莫普, 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坦·德, 法国大法官, 234

Maupertuis, Pierre-Louis Moreaude, 莫佩尔蒂, 皮埃尔-路易·莫罗德, 哲学家和数学家, 89

Maurice of Saxony, 萨克森的莫里斯。见Saxe, Maurice, comte de

Maximilian I, 马克西米连一世, 皇帝, 158

Maximilian Joseph, 马克西米连·约瑟夫, 巴伐利亚选侯, 432

Mayer, 迈耶, 海军上将, 203

Mazarin, Jules, 马萨林, 米尔, 红衣主教, 法国政治家, 7, 153, 214, 225, 310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204

被彼得大帝占领(1716年), 195—196, 373

被汉诺威军队占领（1719年），198—199

Meissonier, Juste Aurele, 梅索尼埃, 米斯特·奥雷尔, 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师, 67—68

Menshikov, Prince Alexander Danielovich, 缅什科夫亲王, 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 陆军元帅, 俄国政治家, 326—328

Merchant Adventurers, “商业冒险家”公司, 48

Merchants, 商人

按其作用分类, 27

法国的金融和商业阶级, 236

伦敦和布鲁塞尔的商人, 241

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商会, 494—495

英属北美洲的商人, 506—507

Mercure de France, 《法兰西信使报》, 106

Mercy, Count Claude, 梅西伯爵, 克劳德, 奥地利将军, 402, 406

Mesenguy, 梅桑居伊, 神学家, 118

Meslier, Cure de, 梅斯利埃神父, 哲学家, 86, 96, 104

Metastasio, Pietro, 梅塔斯塔齐奥, 彼得罗, 诗人, 399

Methodists, 循道宗, 51, 128, 136

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影响, 137—138

与摩拉维亚派分裂, 138

循道宗各社团的教规和宗旨, 138—139

Mexico, 墨西哥, 493, 499, 526, 589—590

Michaelis. J. D., 米夏埃利斯, J. D., 圣经批评家, 133

Middelburg Company, 米德尔堡公司, 572

Middleton, Conyers, 米德尔顿, 科尼尔斯, 自然神论者, 132

Milan, 米兰, 282, 283

Military Orders in Spain, 西班牙的军事勋位, 274

Mill, John, 密尔, 约翰, 圣经学者, 132

Minas Geraes, Brazil, 米纳斯吉拉斯, 巴西, 569

Mining, 采矿业。见Coal.

Minorca, 米诺卡岛, 164, 255, 521

Mirabeau, Honoré-Gabriel de Riquetti, Count, 米拉波伯爵,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德里凯蒂, 106

Mir Jafar, 米尔·伽法, 孟加拉的纳瓦布, 562, 565

Mir Kasim, 米尔·卡西姆, 孟加拉的纳瓦布, 565

Missions; Missionaries, 传教团; 传教士, 22, 126

 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 123, 580—581; 巴拉圭的传教团, 123—124, 497; 西印度群岛的传教团, 233; 北美洲的传教团, 513, 530

 摩拉维亚兄弟会传教团, 137

 非洲的葡萄牙传教团, 578, 579

Mitchell, Andrew, 米契尔, 安德鲁, 英国驻柏林大使, 461

Mniszech, J., 姆尼策赫, J., 波兰政治家, 384—387

Mogul Empire, 莫卧儿帝国。见India条

Mohilev, Poland, bishopric of, 莫希勒夫主教区, 波兰, 375—376

Molasses Act (1733年), 糖浆条例 (1733年), 38, 519—520

Molière, Jean-Baptiste (Poquelin),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波克兰), 戏剧家, 72

Mollwitz, battle of (1741年), 莫尔维茨战役, (1741年), 419

Moltke, Count Adam Gottlob, 莫尔特克伯爵, 亚当·戈特洛布, 丹麦政治家, 341

Monarchy as a form of government, 君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形式, 5, 7—8, 101

君权神授说, 141, 191, 214—215, 229, 239—240, 325

君主的权力, 142—143; 在波兰, 160, 366—367; 在法国, 219—220; 在英国, 256—257; 在普鲁士, 294—295; 在俄国, 325; 在丹麦, 340—341, 345; 在瑞典, 351—352, 362—363

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限制, 143—144, 219

总督是国王赋予薪金的行政官员的观念, 153—155, 159, 215—217, 220

君主制度和财政原则, 158—159

腓特烈大帝的观点, 309, 311—312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观点, 410

Monosterlije, Jovan, 莫诺斯特利吉, 约凡, 塞尔维亚副总督, 407

Monson, Sir William, 蒙森爵士, 威廉, 海军上将, 176

Montagu, Lady Mary Wortley, 蒙塔古夫人, 玛丽·沃特利, 399

Montcalm, Louis-Joseph, marquis de, 蒙卡尔姆侯爵, 路易-约瑟夫, 539

Montemar, 蒙特马尔, 意大利西班牙驻军将领, 426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孟德斯鸠, 夏尔·路易·德塞孔代, 哲学家, 3, 65, 73, 75, 76, 80, 86, 92, 103, 122, 141, 159, 336

社会伦理学, 99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496

Montfauçon, Bernard de, 蒙福孔, 贝尔纳·德, 69, 118

Monti, Antonio Felice, marquis de, 蒙蒂侯爵, 安东尼奥·费利切, 法国驻华沙大使, 377, 379

Montreal, 蒙特利尔, 512, 513, 534, 539

Moore, 穆尔, 海军上将, 522

Morality, the moral sense, 道德感的伦理学。见 Enlightenment

Morari Rao, 摩拉利·罗, 马拉塔领袖, 557

Moravia, 摩拉维亚, 473

Moravian Brethren, 摩拉维亚兄弟会, 4, 109, 136—138

Moreau le Jeune, Jean-Michel, 莫罗·勒热内, 让·米歇尔, 雕刻家, 83

Morelly, 莫雷利, 哲学家, 97, 104

Morland, George, 莫兰·乔治, 画家, 77

Morville, Charles-Jean-Baptiste, count de, 莫尔维尔伯爵, 夏尔-让-巴蒂斯特, 法国政治家, 200

Moscow, 莫斯科, 319, 326

莫斯科大学, 335—336

Moser, F.K. von, 莫泽尔, F.K. 冯, 政治哲学家, 141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578

Muazzam, 见Bahadur Shah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阿里,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 557, 560

Muhammad Shah, 穆罕默德沙, 莫卧儿皇帝, 546, 548, 549

与纳迪尔·沙的入侵, 551—552

去世, 559

Muller, Gerhard, 米勒, 格哈德, 历史学家, 336

Mun, Thomas, 曼, 托马斯, 经济学家, 46

Mungi-Shevgaon, Convention of (1728年), 蒙格-谢夫冈协定 (1728年), 549

Münnich, Burkhard Christoph von, 米尼赫, 伯哈德·克里斯托夫·冯, 俄军总司令, 329—330, 331—332

Munro, Sir Hector, 芒罗爵士, 赫克托, 英国将军, 565

Muratori, Ludovico Antonio, 穆拉托里, 卢多维科, 安东尼奥, 考古学家和教士, 118, 120

Murtaza Ali, 穆尔太柴·阿里,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 557

Music, 音乐

德国音乐传统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64—65

意大利歌剧在奥地利, 399

Muslims, 穆斯林, 543—545

Musschenbroek, P. van, 穆申布鲁克, 彼·冯, 科学家, 89

Muzaffar Jang and the succession in the Deccan, 穆扎法尔·章和德干的继承问题, 560

Mylne, Richard, 迈尔恩, 里查德, 建筑师, 83

Nadir Shah (Quli Khan), 纳迪尔·沙阿 (库利汗), 波斯统治者, 550—552, 554

Nanak, 那纳克, 锡克教“祖师”, 544

Nantes and the slave trade, 南特港和奴隶贸易, 570, 573

Naples, kingdom of, 那不勒斯王国, 122, 191, 192, 205, 424

教会的穷奢极欲, 人民贫困如洗, 281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9

Nasir Jang, 纳赛尔·章, 德干的莫卧儿总督, 560

Natal, 纳塔尔, 577—578

National Debt (English), 国债(英国), 242, 250, 251, 252

Nattier, Jean Marc, 纳蒂埃, 让-马克, 画家, 78

Natural law jurists, 自然法法理学家, 100—101

Natural sciences, 自然科学, 89—90

燃素理论, 90

生物学的推测, 91

Naval power; Navies, 海军力量; 海军对于外贸发展是必不可少, 33, 35—36, 39, 45—46, 165, 192

使用海军的条例和常规, 163—165, 170; 被罗德尼打破, 174

避免冬季战役, 170—171

英国海军的服役状况, 178; 征募新兵, 179, 184—185; 官职的恩赐和晋升, 187—189; 军官的资格, 189—190; 海军部, 258—259

法国海军的新兵征募和服役, 183; 发展, 447; 1759年的失败, 476

海军补给, 供应的来源, 243

西班牙海军, 275, 277, 278—279, 286—287; 海军保卫西属西印度群岛, 489; 舰队护航, 494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海军的运用, 425—426, 430, 558—559; 七年战争中, 467, 476—477, 522—526, 537—538, 539—540, 563

马拉塔“海军”, 550

Navigation Acts (1673年, 1696年), 航海条例(1673年, 1696年), 32—33, 37, 43, 46—47, 185

Necker, Jacques, 内克, 雅克, 法国政治家, 29, 46

Needham, John Turberville, 尼达姆, 约翰·特伯维尔, 生物学家, 91

Neipperg, Wilhelm, Count von, 奈佩格伯爵, 冯·威廉, 奥地利军队司令, 408

Neisse, siege of (1758年), 尼斯围城战 (1758年), 474

Nelson, Horatio, Lord Nelson, 纳尔逊勋爵, 霍雷肖·纳尔逊, 海军上将, 189, 190

Nelson, Robert, 纳尔逊, 罗伯特, 神学家, 135

Netherlands, Austrian, 奥属尼德兰, 119, 210, 411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30—431, 432—433

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和奥属尼德兰的防务, 442—443

Netherlands,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尼德兰, 联合省

海运商业, 1, 27—28, 33, 39, 516—517

在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和殖民, 40—41, 585—589; 在北美洲, 532; 在印度, 557, 558, 559; 奴隶贸易, 570; 在南美洲, 576—578; 在日本, 579—580; 派往中国的贸易使团, 583

丧失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 42

商业结构中弱点的根源, 42—43

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 43—44

外贸与民族利益的关系, 45

重商的中产阶级的兴起, 59—60

绘画, 79—80

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与英国的关系, 192—193, 198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2—423, 427—428; 军事挫折 (1745年), 432—433; (1747年), 435; 初步的和谈, 436;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438—439

对第一次凡尔赛条约的反应，456

Neumann, Johann Balthasar, 诺伊曼, 约翰·巴尔塔札尔, 建筑师, 66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es, duke of, 纽卡斯尔公爵, 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 英国政治家, 192, 200, 251

与1739年的英西战争, 208—209, 518

与七年战争, 254—256, 536

性格和成就, 256

外交政策, 440—441, 442, 443, 448—450, 459—460

Newcomen's atmospheric engine, 纽科曼的气压机, 29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511

New Spain, 新西班牙。见America, Spanish

Newton, Isaac, 牛顿, 艾萨克,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3, 88—89, 160, 161

Newton, John, 牛顿, 约翰, 赞美诗作家, 139

Niagara, Fort, 尼亚加拉堡, 532, 537, 539

Nicholas, 尼古拉斯, 怀恩多特的印第安人酋长, 535

Niesiecki, K., 尼西斯基, K; 波兰学者, 370

Nile, battle of the (1798年), 尼罗河战役 (1798年), 164

Nimirov, Congress of (1737年), 尼米罗夫会议 (1737年), 407

Nivernois, duc de, 尼韦努瓦公爵, 法国驻柏林大使, 445, 447, 450, 453, 461

Nizam-ul-mulk, 尼查姆-乌穆尔克, 德干的莫卧儿总督, 548—549, 551

建立海得拉巴国, 553

逝世, 559, 560

Noailles, Adrien Maurice, duc de, 诺阿耶公爵, 阿德里安莫里斯, 法国元帅, 106, 427, 431

Noailles, Louis-Antoine de, 诺阿耶的路易-安托万, 巴黎大主教, 114, 115, 116, 122, 230

Noblesse, division of, in France, 法国贵族的分类, 235—236

Norris, Sir John, 诺里斯爵士, 约翰, 海军上将, 199, 203

Norway, 挪威, 339—340

自耕农, 342

与丹麦的经济一体化, 344—345

与丹麦的政治平等, 345

Nouveau testament en français (Ques-nel), 法文版《新约》(凯内尔), 4, 114—115, 230

Nouvelles littéraires, 《新文学》, 106

Nova Scotia founded, 新斯科舍建立, 529, 534, 537

Nymphenburg, Treaty of (1747年), 尼姆芬堡条约 (1741年), 408, 424

Nystadt, Treaty of (1721年), 尼斯特兹条约 (1721年), 199, 202, 355, 359, 377

Ogle, Sir Chaloner, 奥格尔爵士, 查洛纳, 海军上将, 519

Oglethorpe, James, 奥格尔索普, 詹姆斯, 佐治亚殖民地创始人, 130, 266, 503—504, 530, 540

Ohio, Anglo-French hostilities in, 英法在俄亥俄的战争, 534—536

Ohio Company, 俄亥俄公司, 535, 536

Old Calabar, 旧卡拉巴尔, 568, 576

Oldenburg dynasty, 奥尔登堡王朝, 341, 349

Olmütz, siege of (1758年), 奥尔米茨包围战 (1758年), 473

Oporto, riots in (1757年), 波尔图骚乱 (1757年), 291

Optimism, Philosophy of, 乐观主义哲学, 104—105

Orford, earl of, 奥福德伯爵。见Walpole, Sir Robert

Oriental Company, 东方公司, 401

Orleans, Philip II, duke of, 奥尔良公爵 (菲利普二世), 法兰西摄政, 192, 197, 199, 200, 218

 与英国为缔约进行谈判, 193—195

 行政改革, 220—221; 他的国内政策综述, 224

 财政试验, 223—224

 与詹森主义的论争, 230

Orlov, Count Grigory, 奥洛夫伯爵, 格里戈里, 333, 334—335

Ormonde, James Butler duke of, 奥蒙德公爵, 詹姆斯·巴特勒, 247—248

Orry, Philibert, 奥里, 菲利贝尔, 法国财政总监, 225, 237—238

 西班牙的财政改革, 276—277

Osservazioni letterarie, 《文学观察报》, 107

Ostend Company, 奥斯坦德公司, 200, 397, 558

Ostermann, Count Andrei Lvanovich, 奥斯捷尔曼伯爵,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 俄国副首相, 327, 329—333, 332, 390

Ostervald, J.F., 奥斯特瓦尔德, J.F., 神学家, 134

Oswego, 奥斯威戈, 荷兰贸易站, 532, 538

Oudh, 奥德, 556

 萨达特·阿里汗建立的王朝, 553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69, 108

O' zarowski, 奥扎洛夫斯基, 波兰驻巴黎使节, 381

Painting, 绘画

形式的古典主义, 77

倾向巴洛克风格的运动, 77—78

法国的幻想主义画家, 78

英国画家的现实主义, 79

在西属美洲, 499

Pálffy, Count János, 帕尔菲伯爵, 雅诺什, 匈牙利的巴拉丁, 402, 409

Palissot, Charles, 帕利索, 夏尔, 作家, 108

Palladio, Andrea, 帕拉第奥, 安德烈亚, 建筑师, 68

Pallavicini, Count Lucas, 帕拉维奇尼伯爵, 卢卡斯, 伦巴第的奥地利总督, 411

Panama, 巴拿马, 494, 495—496

Panin, Count Nikita, 帕宁伯爵, 尼基塔, 俄国政治家, 387

Panipat, battle of (1761年), 巴尼伯德战役 (1761年), 24, 564—565

Pannini, Giovanni Paolo, 潘尼尼, 乔瓦尼·保罗, 画家, 82

Papacy, 教皇统治

政治势力的衰落, 113, 126, 284

在《克雷芒通谕》问题的争论, 114—117, 122—213, 134, 230—231

主教派对罗马教廷的独立姿态, 119

受到詹农的攻击, 120—121; 受到费布罗尼乌斯的攻击, 121—

Papal States, 教皇国

贫困, 281; 暴力罪行, 282

Paraguay, Jesuit mission to, 巴拉圭, 耶稣会传教会, 123—124, 497

Paris, *Parlement* of, 巴黎最高法院, 221, 230—234

Paris, Treaty of (1763年), 巴黎条约, (1763年), 21, 483, 485—486, 525—528, 540

Pâris brothers, 帕里斯兄弟, 法国金融家, 224, 236

Parker, Sir Hyde, 帕克爵士, 海德, 海军中将, 187

Parma, 帕尔马, 198, 201, 205, 269, 298

唐·卡洛斯继位, 202, 283

被唐·腓力取得, 436

Passarowitz, Treaty of (1718年), 帕萨罗维茨条约 (1718年), 17, 197, 206, 394, 402, 405, 408

Passionists, 苦难会, 126

Pater, Jean Baptiste Joseph, 帕泰尔, 让-巴蒂斯特·约瑟夫, 画家, 78

Patiño, Don Jos' e de, 帕蒂尼奥, 堂·何塞·德, 西班牙政治家, 278—280

Patna, massacre of (1763年), 巴特那屠杀 (1763年), 565

Paul I, 保罗一世, 沙皇, 16, 349, 350

Peasants, 农民。见Society, Structure

Pelham, of Henry, 佩勒姆, 亨利, 英国政治家, 254

Pepperrell, William, 佩珀雷尔, 威廉, 路易斯堡的征服者 (1745年), 533

Percy, Thomas, 珀西, 托马斯, 选集编纂者, 77

Perrault, Charles, 佩罗, 夏尔, 诗人, 73

Perrault, Claude, 佩罗, 克洛德, 建筑师, 67

Persia, 波斯, 纳迪尔·沙时期入侵印度西北部, 550—552

Peru, 秘鲁, 493, 495

Peter I the Great, 彼得大帝, 沙皇, 7, 13—14, 15, 16, 56, 62, 143, 203

行政改革, 145, 323—324; 司法改革, 324—325

进军梅克伦堡(1716年), 195—196, 373; 进军库兰(1718年), 373

支持荷尔斯泰因的查理·腓特烈对瑞典王位要求, 203, 347, 355

土地和工业的改革, 318—319

改善国内交通, 319

鼓励与西方的贸易, 320

扩大税收制度, 320, 321—322

关于贵族为国效劳的看法, 322—323

军队改革, 323

废除主教职权和改革教会行政, 325; 支持波兰的宗教少数派, 375, 376

试图扩大世俗教育, 325—326

Peter II, 彼得二世, 沙皇, 14, 203, 326—328

Peter III, 彼得三世, 沙皇(查理·彼得·乌尔里希, 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 14, 56, 332, 348, 458—459

拒绝接受瑞典王位, 15—16, 359—360

与七年战争, 212—213, 334, 388—389, 478—479

婚姻, 333

即位, 334, 349, 363

被推翻, 335, 350

Petrovaradin, battle of (1716年), 佩特罗瓦拉丁战役, 394

Petty, Sir William, 佩蒂爵士, 威廉, 经济学家, 27n.

Peyton, Edward, 佩顿, 爱德华, 海军准将, 558

Pfaff, C.M., 普法夫, C.M., 虔敬派, 蒂宾根大学校长, 130—131, 134—135

Philip II, 腓力二世, 西班牙国王, 150

Philip V, 腓力五世, 西班牙国王, 142, 147, 154, 191, 273, 278, 435

觊觎法国王位, 193—194; 被拒绝, 198

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见该条), 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 196—198, 199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4—425

铸币改革, 493

疑病症, 276—277

退位, 200

Philip, Don (duke of Parma), 腓力·唐(帕尔马公爵), 19, 205, 209, 424, 432, 435, 444, 454

获得帕尔马和皮亚琴察, 282—283, 284, 436, 438

又见Elizabeth Farnese, Italian claims

Philippine Company, 菲律宾公司, 495

Philippines, 菲律宾, 25—26, 483

贸易和经济关系, 589—591

排华(1755年), 591

土地所有制, 592

Piacenza, 皮亚琴察, 198, 269, 283, 398, 429

为唐·腓力取得, 436

Piarist Order in Poland, 波兰的虔诚会, 370, 371

Piedmont, 皮埃蒙特, 281—282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5

Pietists, 虔敬派教徒, 131, 132, 507

Piranesi, Giovanni Battista, 皮拉内西, 乔瓦尼·巴蒂斯塔, 建筑雕刻家, 82

Pirna, battle of (1756年), 皮尔纳战役 (1756年), 385

Pitt, Thomas, 皮特, 托马斯, 英国政治家, 184

Pitt, William, earl of Chatham, 皮特, 威廉, 查塔姆伯爵, 47, 49, 184, 253, 265

与七年战争, 211—212, 254—256; 反对为了汉诺威而牺牲英国利益, 466—467; 与舒瓦瑟尔的入侵英国计划, 476—477; 拒绝单独媾和, 479—480; 与家族契约, 483; 在加勒比海进行战争, 521—525; 在北美洲, 538—540

Plassey, battle of, (1757年), 普拉西战役 (1757年), 24, 563, 565

Pluche, Abbé, 普吕歇神父, 88

Pocock, Sir George, 波科克爵士, 乔治, 海军上将, 524

Podewils, 波德维尔斯, 普鲁士政治家, 449

Poland, 波兰

社会结构: 农民, 54, 368; 贵族, 57, 365—366; 中产阶级, 62, 369; 人口, 368—369

建筑, 70

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144, 160, 366—367

行政机构, 160; 中央政府的职能和组织, 365—367; 司法行政, 367—368, 384; 财政改革, 372—373, 386; “自由否决权”, 382, 388; 行政机构的混乱和腐败, 382—385, 389—390

税负, 366, 372—373

经济上的弱点: 土地, 368; 贸易和工业, 369—370

教育, 370

文化生活, 370—371

反对奥古斯特二世, 371—372; 反对萨克森人继承王位, 377—378, 388—389; 奥古斯特三世继位, 379—380

华沙条约后为俄国控制, 373, 388

宗教信仰不自由, 374—376

瓜分波兰主张的开始, 379; 俄国和普鲁士的领土要求, 390

大家族间的竞争, 382—385

与七年战争, 385—387

为萨克森的利益而实施的外交政策, 387—389

Polish Succession, war of,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18, 19, 356

外交根源, 204—205

解决方案, 205—206, 380—381

Political Testament (Frederick the Great), 《政治遗嘱》(腓特烈大帝), 310—311, 446, 468—469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 3—4, 99—103, 499

Poltava, battle of (1709年), 波尔塔瓦战役 (1709年), 16, 318, 331, 372

Pombal, Sebastian Joseph de Carvalho e Mello, 蓬巴尔, 塞巴斯蒂昂·约瑟夫·德卡瓦略-梅洛, 葡萄牙政治家, 11, 22, 288

敌视耶稣会会士，123—125，290

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290—291

巴西的改革，498—499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363，465

被瑞典侵入（1757年），470；撤兵

（1758年），472

Pompadour, 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蓬巴杜侯爵夫人，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9，86，226，228，233，236，444，447，455，461，462

Pondicherry, 本地治里，24，41，211，557，558，562，563

Poniatowsky, Stanislas,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马索维亚的巴拉丁，333，378，385，389

Pope, Alexander, 蒲柏，亚历山大，诗人，51，65，71，73，74，97，98，104

Pöppelmann, Matthus Daniel, 柏培尔曼，马陶斯·丹尼尔，建筑师，67

Population, 人口。见各国条

Portobello Fair, 波托贝洛博览会，515

Portugal, 葡萄牙，278

在非洲的属地，25，569—570，574，578—579

罗马天主教会，51，122，288—290；蓬巴尔对耶稣会的敌视，123—125，290—291

王权，143，289

西班牙军队的入侵，（1762年），213，482，525；撤兵，483

对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活动漠不关心，269

人口，288

农业和工业的凋敝状况, 288

行政机构, 289—290

蓬巴尔的改革, 290—291

在南美洲的属地, 496; 奴隶贸易, 569—570

在印度的属地: 遭马拉塔人的进攻, 550; 贸易站, 558

Potato, cultivation of, 马铃薯的栽培, 314, 342

Potocki family, 波托茨基家族, 17, 377, 378, 382—385, 388

Potocki, A., 波托茨基, A., 波兰政治家, 383

Potocki, Josef, 波托茨基, 约瑟夫, 罗塞尼亚的巴拉丁, 377, 382—383

Potocki, Teodor, 波托茨基, 特奥多, 波兰大主教, 377

Potter, John, 波特, 约翰, 坎特伯雷大主教, 127, 139

Poussin, Nicolas, 普桑, 尼古拉, 画家, 77, 82

Poznan, Poland, 波兰波兹南, 368—369

Pozsony, Diet of, 博约尼议会, 392—393, 396, 411—412

Prades, Abbé de, 普拉德神父, 86, 106, 125

Pragmatic Army, 国务军, 427—429

Pragmatic Sanction, “国本诏书”, 200, 202, 204, 209, 377, 454

 女性继承王位, 393—394; 在匈牙利得到确认, 395—396

 颁布(1742年), 397

 订约列强, 397—398

 废除, 408, 416

Prague, 布拉格, 399, 409, 420

 布拉格之围(1757年), 470—471; 普鲁士军队的伤亡, 473

Premier ministre, office of, 首相职位, 218—219, 225

Press, freedom of the, 出版自由, 264

Prestonpans battle of (1745年), 普雷斯顿潘斯战役 (1745年), 254

Prévost, Abbé (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d' Exiles), 普雷沃神父 (逃亡的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 作家, 76

Price, Richard, 普赖斯, 理查德, 统计学家, 128

Prie, Madame de, 德普里夫人, 波旁公爵的情妇, 224, 227, 236

Priestley, Joseph, 普里斯特利, 约瑟夫, 学者, 128

Privateers and the rights of neutrals, 私掠船和中立国的权利, 476—477

Progress of mankind, emergence of idea, 人类的进步, 观念的出现, 105

Prokopovich, Feofan, 普罗科波维奇, 费欧凡, 乌克兰主教, 325, 335

Property rights, speculation on legitimacy of, 关于财产权合法性的思索, 103—104

Protestant Church, 新教。见Church条

Prussia, 普鲁士

税负, 12, 54, 150, 151; 有效率的税收制度, 152, 300, 303—304; 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税收的增加, 296—299; 雇用法国包税人, 313

社会结构: 农民, 54, 296—297; 贵族, 55—56, 294—295; 官僚, 62—63; 人口, 294, 302—303, 484; 农村中产阶级, 297

英国普鲁士教会统一的计划, 134—135; 宗教信仰自由, 306

王权, 142—143, 294—295

行政机构，148—149；文官的兴起，155，303—305；市政改革，298—300；工业行会的改革，300—302；“总监”的权力，304—305，312—313；司法行政，306—307，317；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政府各部门的专门化，313—314

普鲁士军队：由“大选侯”创建，294；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295—296，305—306；在腓特大帝统治时期，171—173，177—178；统计数字，179—180；服役和军纪状况，180—181

加入反俄联盟（1719—1720年），198—199，397

作为“强国”出现，203—204，440

所属领土的布局，292—293，465

农业，293，314—315

瘟疫和饥谨（1709—1710年），294

工业，300—302，315—316

贸易和商业，300，316—317；奴隶贸易，568—569

鼓励移民入境，302—303，314，教育，306

与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376—378，383，388—390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210—211，310；入侵西里西亚，408，417；莫尔维茨战役，419；克莱因·施内伦多夫协定，420；入侵波希米亚，431—432；霍恩弗里德堡战役，432；入侵萨克森，432；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436—437

与外交大变动，211，440，443；与英国的关系，445—449；与威斯敏斯特协定，449—450，460—461；废除与法国的联盟，450—453，461

与七年战争，211—212；进攻萨克森，464，465，468—469；英国的义务，466；入侵波希米亚（1757年），470—471；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特恩的胜利，471—472；1757年的伤亡，473；1758年各次战役，474—475；1759年的军事挫折，475；在托尔高的胜利（1760年），477；与俄国媾和，478—479；丧失英国经济补贴，480—481；胡贝图斯堡条约（1763年），483—484；战争的后果，485

又见Brandenburg; East Prussia 条

Psychology, 心理学

感觉论心理学, 3, 95—96, 110

欢乐主义心理学, 97

Pufendorf, Samuel von, 普芬道夫, 萨穆埃尔·冯, 政治哲学家, 99—100, 130

Pulo Condore, British factory at, 昆仑岛, 英国贸易代理站, 581

Pulteney, William, earl of Bath, 普尔特尼, 威廉, 巴斯伯爵, 英国政治家, 253

Quadruple Alliance (1718年), 四国同盟 (1718年), 198, 200—201, 249

Quebec, 魁北克, 512, 513, 539

Quesnay, François, 魁奈, 弗朗索瓦, 48

Quesnel, Pasquier, 凯斯内尔, 帕基埃, 4, 114—115, 230

Quiberon Bay, battle of (1759年), 基贝龙湾战役 (1759年), 476, 539

Quli Khan, 库利汗。见Nadir Shah 条

Racine, Jean, 拉辛, 让, 戏剧家, 72

Raghuji Bhonsle, 罗怙吉·邦斯勒, 马拉塔领袖, 554—557

Rajputs, 拉杰普特人, 541, 542, 547—548, 552

Rákóczi, Györgé, 拉科齐, 居奥治, 特兰西瓦尼亚亲王, 408

Rákózi, Francis, 拉科齐, 弗朗西斯, 特兰西瓦尼亚公爵, 197

Râle, 拉勒神父, 耶稣会教士, 530

Rameau, Jean Philippe, 拉莫, 让·菲利普, 作曲家, 64

Ramsay, A. -M., 拉姆齐, A. -M., 政治哲学家, 101

Ranoji Sindhia, 拉诺吉·信希亚, 马拉塔人游击队领袖, 549

Rapin-Thoyras, Paul de, 拉潘-托伊拉斯, 保罗·德, 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161

Ras Michael Sehul, 拉斯·迈克尔·西赫尔, 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总督, 579

Rastatt, Treaty of (1714年), 拉施塔特条约(1714年), 391

Rastrelli, Carlo, 拉斯特雷利, 卡洛, 建筑师, 70

Ravajo, 拉瓦约神父, 费迪南德六世的耶稣会忏悔神父, 285

Ravenscroft, Edward, 雷文斯科罗夫特, 爱德华, 英国戏剧家, 74

Raynal, Abbé, 雷纳尔神父, 经济史学家, 36

Razumovsky, Cyril, 拉祖莫夫斯基, 西里尔, 乌克兰的哥萨克军事首领, 321

Réaumur, René-Antoine de, 列奥米尔, 勒内-安托万·德, 法国科学家, 89

Redemptorists, 赎罪主义者, 126

Reimarus, Hermann Samuel, 赖马鲁斯, 赫尔曼·塞缪尔, 东方语言学教授, 圣经批评家, 132

Religion, 宗教, 4

对建筑学的影响, 66—67

怀疑论对正统思想的挑战, 85—87, 229, 233

地质学和生物学发现对宗教的挑战, 91

与对人类历史的解释, 93—94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势力, 108—109

宗教学术, 118, 131—132

与君权神授说, 141, 191, 214—215, 229; 法国君主制度受宗教争论的损害, 229—233

与社会秩序, 245—246

普鲁士的宗教信仰自由, 306

在北美, 507—508, 513

又见Church; Missions; Papacy条

Reval, 雷维尔(塔林的旧称), 321

Reynolds, Sir Joshua, 雷诺兹爵士, 乔舒亚, 画家, 51, 71, 79, 80

Ricci, Lorenzo,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its, 里奇, 洛伦佐耶稣会会长, 125

Rice cultivation in America, 美洲栽培水稻, 502—503, 504

Richardson, Johathan, 理查森, 乔纳森, 画家, 80

Richardson, Samuel, 理查森, 塞缪尔, 小说家, 75—76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黎塞留公爵, 普莱西斯的阿尔芒-让, 红衣主教, 7, 145—146, 153, 225

Richer, Edmond, 里歇, 埃德蒙, 114, 116, 122, 128, 229

Riga, 里加, 321

Río de Janeiro, 巴西里约热内卢, 498

Riot Act (1715年), 骚乱取缔法令, 264

Ripperda, Jan Willem, 里佩尔达, 汉维莱姆, 西班牙政治家, 201, 203, 204, 277—278

经济改革计划, 278

下台, 279

Robinson, Sir Thomas, Lord Grantham, 鲁宾逊爵士, 托马斯, 格兰瑟姆勋爵, 英国政治家, 254, 448

Rodney, George Brydges, Lord Rodney, 罗德尼, 乔治·布里奇斯, 罗德尼勋爵, 海军上将, 174, 188, 524, 526

Roebuck, John, 罗巴克, 约翰, 铁匠, 30

Rohan, Armand-Gaston-Maximilian, 罗昂亲王, 阿尔芒·加斯东·马克西米连, 红衣主教, 229

Rohillas of Rohilkhand, 罗希尔坎德的罗希拉人, 553—554

Rollin, Charles, 罗兰, 夏尔, 巴黎大学校长, 107—108

Romaine, William, 罗曼, 威廉, 福音派教会牧师, 139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会。见Church条

Rossbach, battle of (1757年), 罗斯巴赫战役(1757年), 471; 伤亡人数, 473

Rouillé, Antoine-Louis, 鲁耶, 安托万-路易, 法国政治家, 445, 450, 451, 453, 458, 461—462

Roumanians, 罗马尼亚人, 406—407

Rousseau, Jean-Baptiste, 卢梭, 让-巴蒂斯特, 诗人, 73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法国哲学家, 76, 98, 99, 100, 104, 111, 159

Royal African Company (British), 皇家非洲公司(英国), 25, 48, 516, 571—572, 574

Rubens, Peter Paul, 鲁本斯, 彼得·保罗, 画家, 77, 79

Russia, 俄国

社会结构: 农民, 54—55, 321—322, 337; 贵族, 56, 321, 322—323, 330, 334, 336—337; 中产阶级, 62; 臣民的俄罗斯化, 320—321; 人口, 320—321

赋税, 54—55, 320, 321—322

建筑, 70

沙皇的权力, 143

行政机构，145，323—324；司法行政，324—325；彼得二世时期制度停滞不前，328；安娜时期奥斯捷尔曼的控制，329—330；彼得大帝以后的财政管理，337—338

占领梅克伦堡（1716年），195—196，373；占领库尔兰（1718年），373

反俄罗斯同盟（1719—1720年），198—199

加入奥西联盟（1726年），203，331

俄土战争（1735—1739年），205—206，383，387，407—408

农业，318

工业，生铁生产，318—319；纺织业，319

国内交通，319

与西方贸易，320，338；派往中国的贸易使团，583

军队改革，323

教会改革，325；支持波兰的宗教少数派，375，376

教育，325—326，335—336

“贵族银行”，337，338

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腓特烈，347

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权利要求，349—350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211，332，418，435—436；打败瑞典和芬兰，358—359；占领芬兰，359—360；奥布条约（1743年），361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以后的对外政策：与英国订约，443，446，458；圣彼得堡协定，447—448；对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反应，332—333，450，456—459；与波兰王位继承问题，376—378，380，388—390

与七年战争，333—334，383；入侵东普鲁士（1757年），470；向勃兰登堡进军（1758年），473—474；（1759年），475；彼得三世的和约与对腓特烈的支持，478—479

Ruthenia, 罗塞尼亚, 365, 406

Rutherford, Thomas, 拉瑟福德, 托马斯, 哲学家, 103

Saadat Ali Khan, 萨达特·阿里汗, 奥德王朝的创立者, 553

Sadashiv Bhau, 沙达西夫·鲍, 马拉塔人领袖, 564

Safavi dynasty in Persia, 波斯的萨非王朝, 551

Safdar Ali, 萨夫达尔·阿里, 卡纳蒂克的纳瓦布, 557

Safdar Jang, 萨夫达尔·章, 奥德的纳瓦布, 553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西班牙要塞, 530—531

St Domingue, 圣多明各, 519, 524, 526

St John of Nepomuk, 把内波默克的圣约翰奉为圣徒的活动, 401

Saint-Lambert, Jean-François de, 圣朗贝尔, 让-弗朗索瓦·德, 诗人, 97

St Lucia, 圣卢西亚, 520, 526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318, 319, 320, 326, 329, 358, 359

科学院, 335—336

St Petersburg, Convention of (1755年), 圣彼得堡协定 (1755年), 447

Saint-Pierre, Abbé de, 圣皮埃尔神父, 自然神论者, 功利主义哲学家, 98, 105

Saint-Simon, Claude-Henri, 圣西门, 克洛德-亨利, 哲学家, 101, 220—221, 223

Saints, battle of the (1782年), 桑特海峡战役 (1782年), 170, 174

Salabat, Jang, 萨拉伯特·章, 德干的莫卧儿总督, 560—561

Saldanda, 萨尔丹达, 里斯本教区的红衣主教, 124, 290

Saltykov, 萨尔蒂科夫, 俄国将军, 387, 475

Sambhuji, 桑布吉, 马拉塔人领袖, 546, 548

San Ildefonso, Treaty of (1777年), 圣伊尔德·丰索条约 (1777年), 496

Santa Fé (Bogotá), 圣菲 (波哥大), 495—496

Sardinia, 撒丁, 122, 191, 197, 198, 205, 398

被西班牙进攻 (1717年), 279, 282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5—426; 沃尔姆斯条约 (1743年), 209, 210, 429; 佛朗哥西班牙的军队入侵, 433—434

又见Savoy条

Sarfaraz Khan, 萨尔法拉兹汗, 孟加拉的莫卧儿总督, 554

Sarkar, J., 沙卡尔, J., 印度历史学家, 555

Savoy, 萨沃依, 191, 198, 426, 成为撒丁王国, 284

Saxe, Maurice, 萨克森伯爵, 莫里斯, 法国元帅, 228, 377, 431, 432—433, 435

Saxony, 萨克森, 199, 293, 316

与奥古斯特二世在波兰的继位, 371—372

与维也纳条约 (1719年), 373

与奥古斯特三世在波兰的继位, 379—381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18—420, 422, 423, 432

与英国的补助条约, 443

与七年战争, 464, 465, 468—469, 477; 胡贝图斯堡条约 (1763年), 483—484

Sayyid brothers, 赛义德兄弟, 546, 547, 548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见Slesvig-Holstein

- Schröder, von, 施罗德冯, 财政哲学家, 158
- Schulin, Johann Sigismund, 舒林, 约翰·西吉斯蒙德, 丹麦政治家, 341
- Schweidnitz, Silesia, 西里西亚施魏特尼茨, 478, 479
- Science, 科学
- 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普及, 88
 - 牛顿的数学和物理, 88—89
 - 自然科学, 89—90; 生物学的推测, 91
 - 社会科学, 91—93
 - 科学院, 107
- Sculpture, 法国的雕塑, 78—79
- Seckendorf, 泽肯多夫, 德国财政哲学家, 158
- Seckendorf, Friedrich Heinrich, Count von, 泽肯多夫伯爵, 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奥地利陆军司令, 407
- Secker, Thomas, 塞克, 托马斯, 坎特伯雷大主教, 127, 128, 265
- Sedition, 煽动叛乱。见Libel and sedition条
- Ségur Louis-Philippe, 塞居尔伯爵, 路易-菲利普, 大使, 228
- Semler, J. S., 塞姆勒, J. S., 圣经批评家, 132
- Senegal (Senegambia), 塞内加尔(塞内冈比亚), 570—571, 574
- “Sensibility”, “情感”, 76—77
- Septennial Act, (1716年), 七年选举条例(1716年), 248
- Serbia, 塞尔维亚, 406—407
- Serçes, Jacques, 塞赛斯, 雅克, 神学家, 134

Serious Call (William Law), 《庄严的召唤》(威廉·劳), 109, 137, 139

Servandoni, Giovanni, 塞尔万多尼, 乔瓦尼, 意大利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家, 67

Seths, 塞思家族, 印度银行家族, 562

Settlement, Act of (1701年), 王位继承法(1701年), 144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7, 10, 20—21, 39, 211—213, 333—334, 385—386, 388—389, 415

外交大变革和七年战争爆发之间的联系, 461—464

普鲁士入侵萨克森(1756年), 464, 465, 468—469

英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义务, 466—467

英国在哈斯滕贝克的失败和克洛斯特-塞文协定(1757年), 469—470

普鲁士入侵波希米亚(1757年), 470—471

法国在罗斯巴赫的失败, 471

奥地利在洛伊顿的失败, 471—472

英国人加强观察部队, 472—473

普鲁士的伤亡人数(1757年), 473

俄国对勃兰登堡的威胁(1758年), 473—474; (1759年), 475

奥地利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战役(1758年), 474; (1759年), 475; (1760年), 477

舒瓦瑟尔入侵英国的计划, 475—476

英国私掠船对中立国船只的攻击, 476—477

军事僵局(1761年), 478

彼得三世的和平条约和对腓特烈的支持, 478—479

英国停止补助腓特烈，480—481
家族契约，481—482
开始和平谈判的困难，483
巴黎条约（1763年），483
胡贝图斯堡条约（1763年），483—484
英国为保证普鲁士维持原状而牺牲殖民地利益，484
战争对普鲁士经济的影响，484—485；对西班牙帝国的影响，
499—500
美洲的战争，521—528，536—540
Sévigné, 塞维尼夫人，作家，72
Seville, Treaty of（1729年），塞维利亚条约（1729年），
202, 283, 397
Shadwell, Charles, 沙德韦尔，查尔斯，剧作家，74
Shaftesbury, 3rd earl of (Anthony Ashley Cooper), 沙夫茨
伯里伯爵，（第三）（安东尼·阿什利·库珀），道德哲学家，98
Shan Jahan, 沙·贾汗，莫卧儿皇帝，541, 542, 544
Shahu, 沙胡，马拉塔领袖，546—547, 548—549, 555, 556,
559
Shakarkhelda, battle of（1724年），沙卡海尔达战役（1724
年），548
Shenstone, William, 申斯通，威廉，诗人，76—77
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谢里丹，理查德·布林斯里，剧作
家，75
Sherlock, Thomas, 舍洛克，托马斯，伦敦主教，93, 136
Shiahs, 什叶派，545
Ships, merchant, 商船，43

美国的造船工业, 505

西班牙声称享有搜索权, 517

Shirley, Willaim, 谢利, 威廉, 马萨诸塞总督, 533

Shuja-ud-daulah, 舒查-乌德-多拉, 奥德的纳瓦布, 553, 565

Shuvalov, Ivan, 舒瓦洛夫, 伊凡, 俄国政治家, 456

Shuvalov, Peter, 舒瓦洛夫, 彼得, 俄国财政长官, 338

Sicilies, the Two, 两西西里王国, 143, 198, 205

Sicily, 西西里

西班牙的进攻(1718年), 279, 282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429

Siddis, 西迪人, 550

Sikhs, 锡克教教徒, 544—545

Silesia, 西里西亚, 156, 293, 465, 468

腓特烈二世的入侵, 210, 310, 408, 417; 霍恩弗里德堡战役, 432

割让给普鲁士, 211, 410, 423, 436—437, 454, 483—484

行政管理, 314, 412—413

考尼茨收复西里西亚的计划, 441—442, 458; 奥地利的入侵(1760年), 477

Silk industry, 丝绸业

法国, 238—239

普鲁士, 315—316

中国, 590

Silver mining industry in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的银矿开采业, 493

Simon, Richard, 奥拉托利会友理查德·西蒙, 117

Sinking Fund in England (1717年), 英国偿债基金 (1717年), 9, 152, 250, 252

Siraj-ud-daulah, 西拉吉-乌德-多拉, 孟加拉的纳瓦布, 24, 562

Sivaji, 西瓦吉, 马拉塔领袖, 546, 547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31, 208, 237

非洲的奴隶贸易, 24—25; 奴隶贸易地区, 556—557; 交易的方法和单位, 567; 国营公司控制的奴隶贸易, 568; 普鲁士和丹麦的奴隶贩子, 568—569; 葡萄牙的奴隶贩子, 569—570; 荷兰的, 570; 法国的, 570—571; 英国的, 571—572; 激烈的竞争和上涨的费用, 573; 利润额, 573—574; 对非洲社会的影响, 575—576

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 25, 36—37, 514—515

美洲种植园中的奴隶, 503—504

又见Asiento条

Slavery, 家奴制, 575

Slesv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5—16, 203, 212, 355

与瑞典的联盟, 345—346

被承认为丹麦国王的属地, 346

俄瑞(典)对该地区的权利要求, 348—350

对丹麦有利的俄国解决方案, 350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经济学家, 46, 98

Smith, Thomas, 史密斯, 托马斯, 海军上校, 188

Smollett, Tobias, 斯摩莱特, 托拜厄斯, 小说家, 75

Smuggling, 走私活动, 38, 39, 150

西属美洲的走私活动, 206—207, 278, 286, 489, 494, 514—517; 条金走私, 493

在挪威和丹麦, 344

在印度尼西亚, 586

Soanen, 索安昂, 塞内茨主教, 116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91—93

财政学, 158—159

Society, 社会结构

18世纪主要是贵族性质, 50—52

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52—53

中欧和东欧农民的地位, 53—55

贵族的政治权力, 55—58

中产阶级的出现, 58—60; 专业人员的地位, 60—62; 公务人员的地位, 62—63

法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63; 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235—237

战争时期平民的地位, 165—166

社会阶级和武装部队, 175, 176—177, 181, 183—184, 296

英国的乡绅, 243—245; 英国人的移动, 266—267

西班牙: 教会的影响, 271—272; 贵族, 273—275; 职业阶层, 275; 西属美洲, 491—492

意大利: 巨富和赤贫, 281; 贵族, 282

俄国: 农民, 321—322, 337; 贵族, 322—323, 334, 336—337

丹麦: 贵族, 341; 农民, 342—343

瑞典: 贵族, 353, 354; 自由民, 353—354; 农民, 354

波兰: 贵族, 365—366; 农民, 368; 中产阶级, 369

匈牙利：贵族，392—393，403—404；农民，403；人口的增长，404—407

英属北美洲，508—510

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影响，575—576

Sonnenfells, 宗南费利斯，财政哲学家，158

Sophia Augusta of Anhalt-Zerbst, 安哈尔特·策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见Catherine II, Tsaritsa条

Sophia Magdalena, 索菲娅·马格达莱纳，瑞典古斯塔夫斯三世的王后，349

Sorø Academy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索勒学院和农业改革，343

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苏比斯亲王，夏尔·德罗昂，法国元帅，471，474

South Sea Company, 南海公司，10，25，279

“南海骗局”，250—251，252，355

与西属美洲的贸易，515—518；非法贸易，207—209

奴隶贸易，521，571

Spain, 西班牙

财政制度，46，276，287；间接税收，150，269，271；直接税，151，154，277

罗马天主教会，51，122；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271—272；收入，272—273；教士，273；反对天主教教会的法令，492—493

社会结构：贵族，55，273—275；人口，270—271，276；对教会的影响，271—272；职业阶层，275

君主的权力，142—143

行政机构, 147—148, 277; 司法机构, 153; 文官的增加, 154—155; 出卖官职, 489—490, 492; 殖民机构, 490—493, 495—496; 查理三世的改革, 500

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对意大利的权利要求, 196—198, 199—202, 205, 209, 269, 277, 282—283

对英国占领直布罗陀的不满, 199, 201

18世纪初的经济崩溃, 269—271, 488—489; 经济的复兴, 275—280; 与英国的商业条约(1750年), 186; 卡瓦约尔的工业改革, 286—287; 币制改革, 493; 与西属美洲贸易的调整, 494—495, 514—518; 与菲律宾的贸易调整, 589—590

农业, 271, 274—275

海军力量, 275, 277, 278—279, 286—287

与英国的战争(1739年), 209, 416, 518—519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该条), 209—310, 408, 424—426, 430, 433—435, 519—520; 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438—439

与七年战争(见该条), 211—213, 476, 481—482; 对殖民地的影响, 499—500; 在美洲的战争, 523—525, 526—527

又见America, Spanish; Brazil; Missions各条

Spallanzoni, Abbé, 斯帕兰扎尼神父, 生物学家, 91

Spanish Succession war of,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6—7, 38, 191, 276

Special Juries Act, (1730年), 特别陪审团法令(1730年), 264

Spectator, 《旁观者》, 3, 51, 59, 60, 71—72, 74, 75, 80

Spener, Philip Jakob, 斯彭内尔, 费利浦, 雅各布, 虔信主义者, 131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 巴鲁赫, 哲学家, 87

Stahl, Georges-Ernest, 施塔尔, 乔治-埃内斯特, 化学家, 90

Stamitz, Johann Wanzl Anton, 斯塔米茨, 约翰·文策尔·安东, 作曲家, 65

Stanhope, James, Lord Stanhope, 斯坦厄普勋爵, 斯坦厄普, 詹姆斯, 英国政治家, 194, 195, 196, 199—200, 249

Stanislas Leszczyński, 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 波兰国王, 16—17, 225, 371, 374

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204—206, 356, 372, 377, 378—381, 398

被赐予洛林公国, 381

Starhemberg, Count George Adam, 斯塔勒姆贝格公爵, 乔治·亚当, 奥地利驻巴黎大使, 444—445, 451—453, 455, 462—463

Steele, Richard, 斯蒂尔, 理查德, 作家, 71—72, 98

Stein,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施泰因,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 普鲁士政治家, 149, 305

Stillingfleet, Edward, 斯蒂林弗利特, 爱德华, 伍斯特主教, 95, 139

Stockholm, Treaties of (1719年, 1720年), 斯德哥尔摩条约 (1719年, 1720年), 198—199, 346

Strikes, 罢工。见Industrial organization条

Struensee, John Frederick, 施特鲁

恩泽伯爵, 约翰·弗雷德里克, 丹麦政治家, 342

Sugar trade, 蔗糖贸易, 33, 34, 35, 39, 41, 514—515, 519—520, 523, 528

Sulkowski, J. A., 苏尔科夫斯基, J. A. 波兰奥古斯特三世的宠臣, 381

Sunderland, Charles Spencer, 森德兰伯爵, 查尔斯·斯宾塞, 英国政治家, 249—250

Sunnis, 逊尼派, 545

Suraj Mal, 苏拉吉·迈尔, 贾特人的统治者, 554

Surat, 苏拉特, 40, 558

Surman, 苏尔曼, 英国派驻法鲁克-西耶尔宫廷的使节, 557

Sweden, 瑞典

社会结构: 贵族, 50, 57—58, 353, 354; 自由民, 353—354; 农民, 354

君主的权力, 142, 143—144; 反专制主义力量, 351—352; 1720年宪法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352; 路易莎·乌尔丽卡企图恢复君主权力的努力, 362—363

行政机构, 144—145; 四级会议和组成和权力, 352—354

北方大战后的解决方案, 339—340

乌得勒支条约后的外交政策, 195—196, 347

与俄国的敌对行动 (1719—1720年), 198—199; (1741—1742年), 358—359

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关系, 203, 345—347; 查理·彼得·乌尔里希拒绝继承瑞典王位的请求, 359—360

阿道夫·腓特烈国王的推选, 347—348, 360—361

拥护腓特烈一世; 乌尔丽卡退位, 351—352

黑森党和荷尔斯泰因党, 355—356

重商主义政策, 356, 357

农业改革, 357—358

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211, 332; 在芬兰被俄国击败, 358—359; 与俄国占领芬兰, 359—361; 奥布条约 (1743年), 361

与七年战争, 212, 357, 363; 入侵波美拉尼亚, 470, 472; 汉堡条约 (1762年), 479

礼帽党与便帽党的党派斗争, 356—359, 361—362; “顽固派”, 357; 1764—1765年的选举运动, 363—364

Swedenborg, Emmanuel, 斯维登堡, 伊曼纽尔, 神秘主义者、预言家, 109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 乔纳森, 作家, 73

Switzerland, 瑞士, 60

Szatmár, Treaty of (1712年), 索特马尔条约 (1712年), 17, 391, 392, 405

Szembek, K. A., 谢姆贝克, K. A., 波兰大主教, 375

Takla Haimanut II, 塔克拉·海默纳特二世, 埃塞俄比亚皇帝, 579

Tanucci, Bernardo, 塔努奇, 贝尔纳多, 那不勒斯的政治家, 122, 283—284

Tarlo, Adam, 塔洛, 亚当, 卢布林的巴拉丁, 381

Tatler, 《闲谈者》, 51, 71

Taxtion, 税收

关税和王室专利是国家岁入来源, 150—151

征收直接税的困难, 151

法国, 8, 53; 盐税, 150, 216, 222; 人头税和其他直接税, 151, 221—222; 关税, 216; 二什一税, 234

英国, 9, 52—53, 151, 152, 252, 260

普鲁士, 12, 54, 150; 直接税, 151, 296—299; 有效的征收制度, 152, 300, 303—304; 法国的包税商, 313

西班牙, 46, 150, 269, 271, 276, 287; 直接税, 151, 154, 277

匈牙利, 53—54, 393, 403—404

俄国, 54—55, 320, 321—322

勃兰登堡, 294, 297, 298

波兰, 366, 372—373

印度, 541—542, 546, 548—549

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包税商, 588

Taylor, Sir Robert, 泰勒爵士, 罗伯特, 建筑师, 69

Tea trade, 茶叶贸易, 33, 40

Tegh Bahadur, 得格·巴哈都尔, 锡克教“祖师”, 544

Tencin, Pierre Guérin, 唐森的红衣主教, 皮埃尔·盖兰, 里昂大主教, 116

Tennent, Gilbert, 坦南特, 吉尔伯特, 奋兴运动传教士, 508

Tennent, William, 坦南特, 威廉, 长老会牧师, 508

Terray, Joseph-Marie, 泰雷, 约瑟夫·玛丽, 法国财政大臣, 234

Tessin, Count Carl Gustav, 泰辛伯爵, 卡尔·古斯塔夫, 瑞典政治家, 361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宗教考查与市镇机关任职法, 246, 248, 252

Textile industries, 纺织工业, 30—31, 40, 49, 242—243, 315—316, 319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在普鲁士的影响, 293—294

Thomasius, Christian, 托马西乌斯·克里斯蒂安, 政治哲学家, 100, 130

Thomson, James, 汤姆森, 詹姆斯, 诗人, 76—77

Thorn, 托伦(波兰), 375—376

Thornton, John, 桑顿, 约翰, 福音派, 140

Thurot, François, 蒂罗, 弗朗索瓦, 法国海军司令, 476

Ticonderoga, Fort, 泰孔德罗加要塞, 538, 539

Tiepolo, Giovanni Battista, 提·埃坡罗, 乔万尼·巴蒂斯
塔, 画家, 78

Timber trade, 木材贸易, 243

又见Honduras条

Timur, 帖木儿, 旁遮普的阿富汗人总督, 564

Tindal, Matthew, 廷德尔, 马修, 自然神论者, 131

Tithes, 什一税, 53, 151, 272

Tobacco, trade, 烟草贸易, 33, 34, 150, 252, 495, 502—503

Tocqué, Louis, 托克, 路易, 画家, 78

Tocqueville, Alexis Clérel de, 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克莱雷
尔·德, 215, 236

Toland, John, 托兰德, 约翰, 自然神论者, 131

Tomassi, 托马西, 红衣主教, 118

Tomé Narciso, 托梅, 纳尔奇索, 建筑师, 66

Torgau, battle of (1760年), 托尔高战役 (1760年), 477

Toulon, 法国土伦, 430, 434

Tour, Quentin de la, 德拉图尔, 康坦, 画家, 78

Toussaint, François Vincent, 图森, 弗朗索瓦·樊尚, 86, 97

Townshend, Charles Townshend, 汤森勋爵, 查尔斯·汤森, 英
国政治家, 59, 195, 200, 201, 247

批评汉诺威的顾问, 249

辞职 (1730年), 251

Trade and commerce, 贸易和商业18世纪初的迅速增长, 1—2,
27—30, 237

荷兰的海上商业, 1, 27—28; 在东印度群岛, 40—41, 585—
589; 在黎凡特, 42; 商业结构薄弱的根源, 42—43

英法的商业竞争，6—7，11，18，21—22，24，28—29，36—39；在印度，40—41，553，557—558；在黎凡特，42—51；在北美，529，531

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商业的发展，13，319—320；舒瓦洛夫的发展，338

非洲的特许公司，24—25，568—574

与中国的奢侈品贸易，26，40，58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冒险事业，581，583；广东控制的对外贸易，581—582；欧洲在中国的商团，583—584

重商主义的管理政策，29，32—33，34，42—43，300，344—345，357；垄断公司受到实利经济学家的批评，46—48；垄断公司受到理论家和哲学家的批评，48—49

技术进步和新商品的制造，29—31，237

贸易和工业扩张的资本来源，31—32，43—44

对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海军力量，33，35—36，39，165，192，435

欧洲各地之间的贸易，42—43

外贸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45，241

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150—151，216，252

商业条约，192，286

在西属美洲的违禁贸易，206—208，476，494，514—518

英国的国内贸易和交通，242—243，266；谷物交易所，259；职业行为准则的兴起，265

18世纪初西班牙贸易的崩溃，269—271；经济的复兴，277—280；卡瓦哈尔和恩塞纳达的改革，286—287；与西属美洲贸易的调整，494—495，514—518；与菲律宾贸易的调整，289—290

庞巴尔组织的葡萄牙贸易，291

普鲁士的国内货物税，300；腓特烈大帝鼓励国内外贸易，316—317

丹麦和挪威的经济一体化，344—345

波兰的出口货物，368，369—370

奥地利的贸易特许权和“国本诏书”，397—398，401

战时中立国的贸易权利，467—477

北美洲的贸易，502—503，511—513；北美洲内部的贸易，505—507

欧洲驻印度的贸易使团，557—558

东非的阿拉伯贸易，578，579

也见Merchants；Slave-trade；Smuggling各条以及各贸易公司条

Trafalgar, battle of (1805年)，特拉法尔加战役（1805年），165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391，400，402，404，406，409，412

Trembley, Abraham, 特朗布雷，亚伯拉罕，生物学家，91

Trichinopoly, 特利支诺波利，556—557

Trieste,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401，463

Troost, Cornelis, 特罗斯特，科内利斯，画家，79—80

Tucker, Josiah, 塔克，乔赛亚，经济学家、神学家，47，49

Tull, Jethro, 塔尔，杰思罗，农场主，59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杜尔哥，安娜-罗贝尔-雅克，法国政治家，94，217—219，239

Turkey, 土耳其

奥土战争（1716—1718年），197，394

俄土战争（1735—1739年），205—206，383，387，407—408
与法国的联盟，459

Turretini, J. A.，图雷蒂尼，J. A.，神学家，134

Tuscany, 托斯卡纳，200，201，269，281，398

唐·卡洛斯被承认为继承人，202，205，283

社会改革，283

Udaji Powar, 乌达吉·波瓦，马拉塔游击队领袖，549

Udgir, battle of（1760年），乌德吉尔战役（1760年），564

Uhlefeld, Count, 乌勒费尔德伯爵，奥地利首相，412

Ukraine, 乌克兰，321

Ulloa, Antonio de, 乌略阿亚，安东尼奥·德，西班牙经济学家，46，92，487—488，491—492

Ulloa, Don Bernardo, 乌略亚，唐·贝尔纳多，279

Ulrika Eleanora, 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瑞典女王，143，203，351—352，359

Ulster, 北爱尔兰人移居美洲，501

Unigenitus, 克雷芒十一世的《通谕》，114—119，122—123，134，230—231

Universities, 大学

大学与科学院的兴起，106—107

法国，108

英国，128

哈雷和法兰克福财政科学的教授，158

俄国，335—336

波兰，370

拉丁美洲, 499

美国科学院, 509

Uruguay, 乌拉圭, 496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97—98, 100—101

Utrecht, Treaty of (1713年), 乌得勒支条约 (1713年), 113, 191—192, 282, 514—515, 531

又见*Asiento*条

Uztáriz, Jerome, 乌斯塔里斯, 西班牙经济学家, 46, 92

Valero marquis de, 巴莱罗侯爵, 墨西哥总督, 590

Vanbrugh, Sir John, 范布勒爵士, 约翰, 建筑师、剧作家, 68, 74

Van Dyck, sir Anthony, 范戴克爵士, 安东尼, 画家, 79

Van Hoorn, 范和伦, 荷兰驻中国的使节, 583, 585—586

Van Loo, Charles André, 范洛, 夏尔·安德烈, 画家, 78

Vansittart, Henry, 范西塔特, 亨利, 孟加拉总督, 565

Vattel, Emmerich, 瓦泰勒, 埃梅里奇, 国际律师, 100, 101

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沃邦, 塞巴斯蒂安·普莱斯特·德, 法国元帅、政治哲学家, 220

Velletri, battle of (1744年), 韦莱特里战役 (1744年), 433

Venezuela, 委内瑞拉, 494—495, 496

Venice, 威尼斯, 282, 284, 401

Venn, Henry, 维恩, 亨利, 福音会牧师, 139

Verden, 费尔登, 347, 355

Vernon, Sir Edward, 弗农爵士, 爱德华, 海军上将, 519

Versailles, Palace at, 凡尔赛宫, 67, 83, 219

Versailles, Treaties of (1756年), 凡尔赛条约(1756年), 415, 450, 453—456, 458—460; (1757年), 469; (1759年), 475

Vico, Giambattista, 维科, 詹巴蒂斯塔,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3, 94—95, 110, 282

Victor Amadeus, 维克托·阿马戴乌斯, 萨伏依国王, 200, 201, 284, 394

Vienna, culture of, 维也纳文化, 399

Vienna, Treaties of: 维也纳条约: (1719年), 373, 376; (1731年), 202, 204, 205, 397—398; (1735年), 283; (1738年), 205, 225

Villeroy, François de Neufville, duke of, 维勒鲁瓦公爵, 弗朗索瓦·德·纳夫维尔, 路易十五的导师, 226

Villinghausen, battle of (1761年), 菲林豪森战役(1761年), 478

Vinnius, 维尼亚斯, 俄国的荷兰工程师, 318

Vintimille, 万蒂米尔, 巴黎大主教, 116, 118

Violante Beatrix, 维奥兰特·贝娅特丽克丝, 托斯卡纳科西莫三世的儿媳, 201

Virginia, 弗吉尼亚, 535—537

Volchansky, 伏尔钦斯基, 莫希列夫主教, 376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伏尔泰, 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卢埃·德, 哲学家, 3, 61, 65, 73, 74, 75, 76, 80, 96, 97, 99, 108, 112, 230, 308, 336

宗教思想, 85, 86—87

科学兴趣, 88

历史著作, 93, 379

对乐观主义的驳斥, 104—105

政治著作, 161—162

Volynsky, Artemy Petrovich, 沃伦斯基, 阿特米, 彼得洛维奇, 俄国行政官员, 330

Vorontsov, Count Michael, 沃龙佐夫伯爵, 米哈伊尔, 俄国首相, 388, 456

Wake, William, 韦克,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115, 116, 126—127, 128—129, 133—134

Walker, Samuel, 沃克, 塞缪尔, 福音会牧师, 139

Wall, Richard, 华尔, 理查德, 西班牙外交大臣, 286

Wallace, Robert, 华莱士, 罗伯特, 经济学理论家, 103

Wallis, 瓦利斯, 奥地利陆军司令官, 408

Walpole, Horace, 沃波尔, 霍勒斯, 作家, 69, 127, 284

Walpole, Sir Robert, 沃波尔爵士, 罗伯特, 奥福德伯爵, 9—10, 81, 195, 247, 418

与教会的关系, 128, 129

税收计划, 151, 251, 252

与1719年贵族法案, 249

拒绝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204, 205

与1739年英西战争, 208—209, 518

与“南海骗局”, 250—251, 252

辞职(1742年), 251, 422

性格与成就, 251—253

为首相树立先例, 258

Walter, Richard, 沃尔特, 理查德, 安德勋爵的牧师, 591

Waltham Black Act (1722年), 沃尔瑟姆黑色法案(1722年), 265

Wandewash, battle of (1760年), 文迪瓦什战役 (1760年), 563

Warburton, William, 沃伯顿, 威廉, 格洛斯特主教, 87, 130, 136

Ware, Isaac, 韦尔, 艾萨克, 建筑师, 69, 81

Warfare, art of,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世纪的战争艺术法则和常规, 5, 163—165

有限目标的战争, 5—6, 18, 165, 174—175, 468

平民的地位, 165—166; 中立国的权利, 476—477, 523

包围战, 166—168

供给基地, 168—169, 473

战场上的战术队形, 169—170, 472

避免冬季战役, 170

腓特烈大帝的战略思想, 171—173, 468—469, 472

新战术方法的开始, 173—174

又见Armies条; “海战” 见Naval power条

Warna, Treaty of (1731年), 瓦尔纳条约 (1731年), 549, 556

Warren, Sir Petet, 华伦爵士, 彼得, 海军准将, 533

Warsaw, 波兰华沙, 369, 371, 372, 379

Warsaw, Treaty of (1717年), 华沙条约 (1717年), 372, 374

Warton, Joseph, 沃顿, 约瑟夫诗人, 评论家, 77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186, 535

Waterland, Daniel, 沃特兰德, 丹尼尔, 神学家, 136

Watteau, Antoine, 华托, 安托万, 画家, 68, 78

Watts, Isaac, 瓦茨, 艾萨克, 赞美诗作家, 128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原富》(亚当·斯密), 49

Wedell, Carl Heinrich von, 韦德尔, 卡尔·海因里希·冯, 普鲁士将军, 475

Wedgwood, Josiah, 韦奇伍德, 乔赛亚, 陶器制造商, 31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威灵顿公爵, 阿瑟·韦尔斯利, 186

Werenfels, Samuel, 韦伦菲尔斯, 塞缪尔, 神学家, 134

Welsley, Charles, 韦斯利, 查尔斯, 神学者, 赞美诗作家, 137

Wesley, John, 韦斯利, 约翰, 4, 77, 109, 116, 131, 132, 135, 139

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 137—138

Wesley, Samuel, the elder, 韦斯利长老, 塞缪尔·神学者, 诗人, 128

West India Company (Danish), 西印度公司(丹麦的), 344, 569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23, 489, 499, 奴隶贸易, 25, 36—37

与英国、法国的商业关系, 37—39, 43; 与西班牙, 514—518

英法之战(1744—1748年), 519—520; (1757—1763年), 521—528

又见South Sea Company条

Westminster, Convention of (1756年), 威斯敏斯特协定, (1756年), 20, 332, 415, 449—450

法国、奥地利对协定的反应, 450—453, 460—461

俄国的反应, 456—459

防御性质, 466

Wettstein, John James, 韦特斯泰
因, 约翰·詹姆斯, 圣经学者, 118, 132
Wheatly, Charles, 惠特利, 查尔斯, 神学家, 135
Whiston, William, 惠斯坦, 威廉, “阿里乌派”神学者, 133
Whitefield, George, 怀特菲尔德, 乔治, 监理会教徒, 137,
138, 508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 the (1620年), 怀特战役 (1620
年), 156
Whydah, 维达镇, 贩卖奴隶站, 566, 567, 570, 571, 572, 575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英国国王, 152
William IV of Orange, 奥伦治的威廉四世, 423, 435—436
Williams, Sir Charles Hanbury, 威廉斯爵士, 查尔斯·汉伯
里, 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 332—333, 385—386, 388
Willis, Browne, 威利斯, 布朗, 建筑师, 69
Windward Islands, 向风群岛, 520—521, 523—524
Witsen, Nicolas, 威特森, 尼古拉斯, 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领
袖, 585, 586
Wolfe, James, 沃尔夫, 詹姆斯, 将军, 164, 186, 211, 538—
539
Wolfe, John, 沃尔夫, 约翰, 建筑师、作家, 81
Wolff, Christian, 沃尔弗, 克里斯蒂安, 科学家和哲学家,
88, 99—100, 104, 107, 132
Woodward, George, 伍德沃德, 乔治, 英国驻华沙使节, 380
Woollen industry, 毛纺工业, 315—316, 369, 529, 580n.
Worms, Treaty of (1743年), 沃尔姆斯条约 (1743年), 429,
436

Wren, Sir Christopher, 雷恩爵士, 克里斯托弗, 建筑师, 68

Xosa tribe (Bantus), (班图人) 豪萨部落, 25, 577

Yamassee War (1715年), 雅马西战争 (1715年), 530

Yorke, Joseph, 约克, 约瑟夫, 陆军少将, 177—178, 179, 180, 456

Yorktown, siege of (1781年), 约克敦围城战役 (1781年), 168

Young, Arthur, 扬, 阿瑟, 34—35, 219

Young, Edward, 扬, 爱德华, 诗人, 77

Yung Chêng, 雍正, 中国皇帝, 581, 583

Zaccaria, 扎加利, 基督教辩论家, 122

Zatuski, A. S., 扎鲁斯基, A. S., 克拉科夫主教, 370

Zemzoff, 泽姆佐夫, 建筑师, 70

Zeno, Apostolo, 泽诺, 阿波斯托洛, 查理六世宫廷诗人, 399

Zinzendorf, Nikolaus Ludwig von, 亲岑道夫伯爵, 尼古劳斯·路德维希·冯, 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始人, 109, 136—138

Zorndorf, battle, of (1758年), 措恩多夫战役 (1758年), 21, 474

Züllichau, battle of (1759年), 齐利希奥战役 (1759年), 475

Zwaardecroon, 兹瓦尔德克龙, 印度尼西亚总督, 588

Zweibrücken, 茨韦布吕肯的巴拉丁领地伯爵, 瑞典王位候选人, 360

8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763—1793年

[英] A.古德温 (A.Goodwi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8: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8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763—1793年

[英] A. 古德温 (A. Goodwin)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8卷,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年/（英）A. 古德温（A. Goodwin）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书名原文：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8,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ISBN 978-7-5203-2594-3

I. ①新… II. ①A…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763—1793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3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52

字数 822千字

纸书定价 18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8: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ISBN 978-052104546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致谢

编者谨向彼得·默里博士、J. 林奇博士、J. 罗伯茨博士和M. S. 安德森博士致谢，承蒙他们在编辑本卷的重要阶段一俟接到邀请即同意鼎力合作。他们均欣然接受并完成了时间十分紧迫的任务。编者深知未能给予他们以在通常情况下本应有权要求得到的充裕时间来撰写或最后修订他们的文稿。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人口、商业和经济思想](#)

[一 人口的增加](#)

[二 贸易](#)

[三 经济思想](#)

[第三章 文学与思想：浪漫主义倾向，卢梭、康德](#)

[第四章 音乐、美术和建筑](#)

[一 音乐](#)

[二 美术和建筑](#)

[第五章 科学和技术](#)

[第六章 教育的思想、实践和机构](#)

[第七章 武装力量和战争艺术](#)

[一 海军](#)

[二 陆军](#)

[第八章 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

[一 与亚洲的关系](#)

[二 与非洲的关系](#)

[第九章 欧洲的外交关系（1763—1790年）](#)

[第十章 哈布斯堡各领地和德意志](#)

[第十一章 俄国](#)

[第十二章 瓜分波兰](#)

[第十三章 伊比利亚各国和意大利各国（1763—1793年）](#)

[一 伊比利亚各国](#)

[二 意大利各国](#)

[第十四章 英国统治以外的美洲社会的发展](#)

[第十五章 革命时代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第十六章 美国革命（1763—1793年）：宪法问题面面观](#)

[第十七章 从帝国、战略和外交诸方面看美国革命](#)

[第十八章 从美洲的情况看美国独立：社会和政治面面观；向西部的扩张](#)

[第十九章 英国改革的开始：帝国的问题；政治和行政；经济增长](#)

[第二十章 欧洲背景下的法国行政管理和国家财政](#)

[第二十一章 法国旧制度的崩溃](#)

[第二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

[第二十三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第二十四章 法国的改革与革命（1789年10月—1793年2月）](#)

[附录 18世纪欧洲和北美人口增长统计资料](#)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从1763年的《巴黎和约》到30年以后的欧洲反对革命法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这段时间里，一种西方文明的轮廓很快地显露了出来。代表其特征的种种主张和象征，大多明显地具有“近代”色彩。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同威斯敏斯特帝国政府之间的内战，英国空前的工商业扩张，法国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及人口稳定但不平衡的增长，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经久不衰的革命变革的势头。西欧还爆发了一系列规模虽小但其结果促使这一阶段的潮流向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平等的方向发展的革命，如：1768—1789年在小小的城市共和国日内瓦爆发的斗争，其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上解放中产阶级代表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没有特权的本地人；1784—1787年荷兰的“爱国”运动；1789—1792年在奥属尼德兰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掀起的分离暴动。甚至在保守的英格兰，自相矛盾的辉格党信条中所固有的激进主义在以下两次事件中也得到了新的强调：一是1779—1780年主张议会改革的郡县“联合”运动；二是1787—1790年为恢复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被剥夺的公民权利而展开的鼓动活动。一些历史学家在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激进运动以及它们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联系之后，从这段时期中找到一种在西方世界许多地方共同存在的激进改革和革命变化的模式。^[1]

这种研究方法之产生，是因为不满足于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作孤立的而不是更广泛地从已经出现的18世纪“大西洋共同体”^[2]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倾向。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西欧与新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商业、知识和宗教交往的产物。在这种广阔的联合体内，随着速度越来越快的航运和邮政往来而把港口和城市中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和观念遂得以广为传播而畅通无阻。^[3]有人认为，1763年以后大西洋两岸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们同样信奉天赋权利的哲学，同样主张人民主权的观点，同样倾向于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成文宪法，并且力主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都可担任公职。^[4]这些政治原则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双向交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文学和哲学学会，共济会支部、科学和学

术团体，并且有急剧增加的首都和地方的报纸。在这一共同体内，激进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倡导者们相互同情并为共同的理想所驱使，在反对教会和国家已确立的权力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这种合作关系清楚地表现在英国“哲学”领域不信奉国教的领导人——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对美国独立运动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托马斯·潘恩进行的强有力的共和政体宣传，以及美国先后驻凡尔赛的两位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对法国自由派改革的同情和鼓励。相比之下，1789年以后英国兰斯多恩勋爵的鲍伍德功利主义改革派与巴黎米拉波的被驱逐出境的日内瓦合作者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则显得不那么成功，而且靠不住。在英吉利海峡两岸，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和法国的类似团体——黑人之友社展开的与此相似的宣传鼓动情况也是如此。^[5]

有一种观点认为，朝着现代民主方向发展的这种总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反抗各种欧洲“合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贵族权势，这类机构包括全国的和地方的议会、国会、拥有最高权力的法院或国教等，以及英属北美的殖民地议会和总督议事机构。^[6]1763年以后，这些贵族权势中心受到来自三个主要方面的压力。在法国，尚存的地方三级会议和高等法院，因波旁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和改革政策而岌岌可危；在中欧和北欧，全国和地方的议会的权力正逐步地被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专制政体日益壮大的权力所侵蚀；在殖民地美洲、英国、日内瓦和联合省，立法议院或地方议会遭到来自中产阶级或民众激进主义的压力和批评。由于受到上述种种抨击，以及部分地迫于日渐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特权阶层重新强调其豁免权和独有的市镇特权。这种贵族的“反动”在法国最为明显，其表现形式是俗人、教士和司法界贵族之间在政治上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后导致企图阻止对旧体制的激进改革，即所谓的1787—1788年的贵族反叛。然而这种反动也明显地表现在：1782年贵族政变后日内瓦“自由派”的被驱逐；马扎尔贵族和保守的比利时议会反对约瑟夫二世皇帝推行的社会和行政改革的叛乱；以及1787年对荷兰“爱国者”的镇压。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美和西欧正在演变的革命形势极为复杂，表明“保守主义和反革命不是仅有的对革命的‘反动’，而革命本身就是对18世纪各种势力的一种反动”^[7]。

尽管关于西方出现一场普遍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概念主要是用政治术语来陈述的，但是人们对在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之外没有类似的推动力这一点，则是从中欧和东欧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来加以解释的。实际上，西欧与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西欧，英国旧日的封建主义只留下几丝残余的痕迹；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早已获得人身自由，他们拥有的土地一再被划分。但在易北河以东地区，除了普鲁士国王的直辖领地之外，整个严酷的封建体制仍然存在；尤其在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拥有大片土地的庄园依旧原封不动。但是，人们早就认识到，社会不公正感和对经济状况不满的严重程度在欧洲西部地区反而更加突出，因为在那里封建主义已放松控制，人们对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封建反动”更加憎恨。东、西欧之间在其他方面的三个差异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西欧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不满情绪。第一，正如托克维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的那样，在法国，贫困潦倒的地方贵族在教区一级已经丝毫无法行使行政职能；而在德意志中部的农村，尽管邦议会已不发挥作用，但普鲁士、奥地利和马扎尔贵族仍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第二，虽然在法国，中央政府不愿意阻止贵族牺牲农民来恢复已废弃的封建地租；而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则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以保护皇家领地以外的农奴免遭贵族的无理压榨；在哈布斯堡领地上，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规定了农奴向地主承担义务的数额；而约瑟夫二世甚至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取代这些义务，即根据年收成以货币计算出一种固定的并降低了比例的贡赋。第三，在中欧和东欧，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中心寥寥无几，且彼此相距甚远，基本上不存在造成激烈动荡局面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人数众多并且有影响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法国成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名副其实的熔炉的缘故。因为在法国，中产阶级对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憎恨，以及农民对尚存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不满，都会由于君主权威的崩溃和全国性危机的迫近而更加增强。

这种普遍的民主运动的思想自七年战争结束起就支配着西方世界，其可贵之处是它突出强调了常常被那些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一个真相：在美洲以及西欧的许多地方，旧的体制和机构、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都受到有同样思想的激进派的怀疑和挑战；而且究竟是从上而下地推行激烈的改革还是从下而上地进行革命，这一选择摆在了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的面

前，而不只是法国政府面前。毫无疑问，18世纪80年代西欧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和动荡，不仅是由当地的情况，同样是由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概念、榜样和策略造成的。而法国革命多少也是由于从在它之前爆发的小规模的欧洲革命中吸取了动力而促成的。进一步的研究也许会有助于更清楚地找出西方世界许多国家改革派之间存在的多种联系。这一西方世界的文化统一维系于18世纪的世界主义、贵族子弟所崇尚的大陆旅行、“启蒙哲学”运动的声势以及索列尔所描述的一些“游牧王朝”。另一方面，这一论点也许会过分夸大不同革命运动之间的共同点而低估了它们彼此间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曾对启蒙运动思想对美国革命政治原则的形成所起的所谓重要作用提出疑义；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很难将这一阶段的英国历史比作一种即使是准革命的模式；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则不无道理地认为，这种观点有低估1789年革命的独特历史意义的倾向。[\[8\]](#)

在介绍本卷内容时，也许可以强调七年战争和1763年巴黎和约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很少会有争论的，因为在随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西方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从这一来源中也许能找出当时国际关系改变方向的踪迹，这种改变立即使中欧和东欧的政治问题明显突出了。七年战争引起的物质破坏和经济混乱使得原交战国——战胜国和战败国——同样地需要紧缩财政和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在北美，对加拿大的征服，使英国政府面临着帝国的防务和重建等急迫而麻烦的问题。波兰眼下的命运和奥斯曼帝国的最后结局，“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地区朝着开明专制制度发展的倾向，以及在第一个英帝国的教会分立等，都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与七年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和平条约有关。

巴黎和约的直接后果是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盟友，同时更坚定了法国首席大臣舒瓦瑟尔为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丧失的领土进行复仇的决心。1763年以后，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它所说的普鲁士为了与法国单独言和而脱离了它，而是1756—1757年各同盟国逆转的长期后果，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直率地公开承认和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毫不在乎纽芬兰鳕鱼捕捞场的命运。[\[9\]](#)法国与奥地利同盟的后果之一是它放弃了原先打算侵略奥属尼德兰的企图。这自然而然地削弱了英国与联合省的长期联系，并加强了当时荷兰人欲在欧洲大陆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倾向。法奥同盟

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进一步稳定了意大利半岛的政局，而在1748年之前意大利半岛一直是波旁—哈布斯堡冲突的主战场，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巩固波旁家族协约。最后，由于该同盟显然不符合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支持，奥地利同盟者便促使法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越来越增强了置身于东欧事务之外的倾向。英国政府采取的类似态度，也可说明它在这一时期未能实现与俄国结成政治同盟的原因。

舒瓦瑟尔直到他1770年下台之前，一直借助其优越的大臣地位，把法国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集中于重新建立本国的海军和陆军实力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革法国的殖民地管理体制方面。^[10]舒瓦瑟尔虽然依旧忠实其与奥地利的关系，但却小心翼翼地限制其在大陆上的义务，而且明显地把他一手造成的1761年法兰西—西班牙攻守同盟视为从英国夺取海军优势的主要手段，因这种优势在七年战争中使法国惨遭失败。与路易十五旨在维护波旁王朝在波兰的利益而建立的秘密外交体制相比，法国1763年以后的官方外交政策主要侧重于与英国重新恢复海上和殖民地的竞争。这一政策正好与西班牙的最高利益紧密相连，即保卫它的殖民领地和保护它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垄断地位。^[11]由于法国同盟者是西班牙在该阶段唯一可利用的一个，因此法国盟友拒绝支持西班牙1770年与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争议一事，也未严重影响波旁王朝各强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它们在大西洋角逐的关键地区击败英国的前景，无论如何得靠它们恢复海上力量均势的能力和促成英国政府与美洲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早日恶化。英、法和英、西在殖民地和海上优势的角逐，在1763年以后又继续起来，腓特烈大帝让普鲁士退出大西洋争斗的决心和法、英政府不卷入中欧和东欧事务的决定，几乎把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东西两部分分割成各自独立的政治世界。^[12]但是，英国和波旁王朝各国在大西洋世界的公开决裂自然也就推迟，直到美洲各殖民地成功地起来造反，并且由于奥古斯特三世于1763年10月去世而造成的波兰选举王位的空缺所引起的中欧和东欧的一场持久而严峻的危机，直至1772年波兰被第一次瓜分和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缔结凯纳甲湖条约结束敌对行动时这场危机才得以解决。^[13]凯纳甲湖条约承认俄国在黑海的航行自由，并有保护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基督徒的含糊不清的权利，以及在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土地上，有一个尽管受到限制，但却可靠的据点。这一条约标志着近东问题的开端。近东问题将在后来的18世纪剩余的时间和19世纪

大部分时间里始终纠缠着欧洲的政治家们，因为它预示着土耳其可能很快全部落入俄国的统治，或者遭到瓜分。^[14]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1763年以后，主要的欧洲大陆列强的国内政策，也部分地受到七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后果的影响。战争期间，中欧的大片土地被荒废，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工商业陷入混乱。在一个相互竞争、掠夺成性的各国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原先的交战国会感到有足够的安全，即使在媾和之后，也不能放松它们的军备。与此同时，那些抱有修改现状目的的国家则希望不仅维持，而且要增强自身的军事潜力。因此，在1763年以后，各国统治者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恢复和紧缩经济，而当务之急是需要确保增加国家的岁入。在各主要交战国中，只有普鲁士经过战争仍显露出国家财政完整无损，从而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得以从王室国库中抽出大笔资金用于资助旨在帮助财源枯竭的普鲁土地主的农村信贷机构，得以免费分发玉米种子和牲畜，并重建农场。^[15]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花在这类农业补贴方面的开支就达700万塔勒。^[16]以英格兰银行为模式的货币改革，于1765年1月设立了国家贴现银行，并为征收间接税而采纳了一种法国式的税务管理制度，这些都表明这位普鲁士国王在这一时期全神贯注于国家财政问题的程度。^[17]在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和法国采用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则更耐人寻味。七年战争结束时，奥地利的公债高达3亿古尔登^[18]左右。年轻的约瑟夫二世把他所继承的全部个人财产（2200万古尔登）交给财政部使用，使公债的年利率从6%降至4%。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在财政大臣哈茨费尔德的指引下，寻求更为激进的补救办法，设法从一般的贵族和教会人士的大量免税财产中索取。当匈牙利的贵族在1764年以维护其财政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辩解说无特权等级的纳税限度早已超过时，便导致特蕾西亚女皇于1767年颁布皇家法令，规定匈牙利农民的劳役量以干预封建关系。因此在1771—1778年，这种保护农民、限定他们对其封建领主的义务的政策，在奥属西里西亚、下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施蒂里亚等地得以实施。^[19]虽然这一措施是一种旨在暂时不触动贵族的财政豁免权的妥协，而让无特权等级有可能负担更大比例的国家税收，但是特蕾西亚女皇却因而开始了一种社会的改革政策，她的儿子后来实施这一政策，直至其必然发生的结果——农奴制的废除。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天主教违抗政府关于教士需向

国库纳税的要求而造成的各种后果，因为自1768年起，奥地利的教士开始纳税，不再享有天主教的豁免，于是1769年开始解散修道院，修道院的基金首先转向更加一般的教会用途，而后则转向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用途。通过上述和其他的手段，奥地利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到了1773年，财政收入比10年前几乎翻了一番。走向更大程度的国家专制和社会改革政策的趋势，即后来所谓的开明专制，就是这样根植于财政需要之上的。

在1763—1769年间的法国，也曾有过增加国库岁入的类似企图，其办法是延长享有特权的各等级的某些战时税和更平均地重新估定平民税，但这些企图遭到了高等法院一致的强烈反对。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这部分反动势力中首次提出了召集三级会议的公众要求。为安抚那些不驯服的地方行政官员们，路易十五被迫减缓了财政改革的行政计划，并勉强同意驱逐耶稣会。只是在1771年莫普大法官推行激烈的司法改革粉碎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反对之后，泰雷神父方得以采取一系列激烈的财政应急办法，在路易十五在位的最后岁月中为法国的国家财政奠定了较前牢固的基础。[\[20\]](#)

在诸多因素中，财政的考虑若不是更重要地，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地影响着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对待美洲殖民者的态度。总之，当时英国对美洲的财政政策似有三个主要目的：决心制止普遍以航海法为借口而造成的在各殖民地偷漏海关税收的现象；企图通过帝国议会法案在美洲提高税收；尽力在各殖民地改变和加强其行政权力，使财政独立于殖民地的议会。显然可见，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希望为英国纳税人卸下因七年战争而翻了一番的国债的沉重包袱。根据战时的经验，也需要为美洲殖民地提供一种有效的防御体系，而且急需给作为整体的帝国赋予一套更加合理和统一的行政机构。这些政策并不是由那些孤陋寡闻和无能的大臣们匆忙地临时制定的，也不是受任何企图征服或奴役殖民者或为宗主国的私利而利用他们日渐兴隆的事业的不可告人的阴谋所驱使。但是，在大西洋彼岸的商界人士和激进领导人的眼里，这些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最终成为爆发一场内战的原因并以第一个大英帝国的崩溃而告终。

在美洲的殖民者看来，英国政府1763年以后在财政问题和帝国问题上所采取的这种更加明确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新措施”，有限制他们自己向西扩张、破坏他们商业繁荣的来源和侵犯他们殖民地立

法议会的宪法权利和特权的危险。^[21]随着这些殖民者和帝国政府之间分歧的扩大和误解的加深，辉格党政治领袖们在美洲的宣传活动加剧了这些怨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希望的妥协更难以实现。但是，就实际意义而言，美洲人认为这些年来英国政府正企图贯彻一项帝国政策，一反它过去的“明智而有益的不理睬”的做法，这并非言过其实。该项政策是惨痛的战时经历的产物，同时也是商务部一些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官员和身处美洲边疆受过痛苦折磨的军人行政官员向政府所提建议的产物。

帝国政策中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是试图尽力解决由于保护西部殖民边疆免遭印第安人的攻击而产生的种种复杂问题。^[22]1763年春，西北部的部落在他们的渥太华人首领庞蒂亚克的领导下举行暴动，由于殖民地政府在进行镇压中未能充分协作，以致有必要增加英国正规军在战略要地的驻军，并再次向印第安人保证，不让殖民地居民再向西扩张。乔治·格伦维尔内阁在1763年10月7日以皇家公告的形式，正式解释了这项于两年前就已勾画出的政策，即在印第安人尚未被平抚前和尚未制定出关于这些地区的土地拓殖的一致标准之前，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上殖民。由于这一决定，政府不仅兑现了在战时与印第安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所产生的义务，而且还力图改变殖民扩张的方向，把它从皮毛贸易地区转向北方的新斯科舍和加拿大以及南方的佛罗里达。^[23]新的分界线虽然并非固定不变，但在美洲所保持的这条线却与某些殖民特许状中所包括的西部土地所有权不相一致。看来该分界线自然会招致南方土地投机者和边疆开拓者的反对，因为他们急切希望离开所居住的受潮水涨落影响的东部海岸平原地区，那里谋生的机会很有限。^[24]尽管1768年以后帝国政府不得不放弃这一限制性政策，但是其后批准的殖民定居计划没有一项来得及在革命爆发前奏效。革命前夕，诺思勋爵的政府在1774年的魁北克法中尽力安抚加拿大，恢复了帝国控制俄亥俄以北的西部领土的政策，结果在北部沿海殖民地中再次引起了最严重的恐惧。

1763年之后，“新”帝国政策的第二个内容是恢复并严格实施航海法，并企图通过议会法令在美洲征税，向殖民者转嫁一部分增加了的殖民地防御费。格伦维尔政府仿效皮特的战时措施，加紧了对海关部门的管理，在马萨诸塞，更多地诉诸“协助令状”和代理海事法庭的裁判权。该届政府在执政的一年内使航海法规中所“列举”的商品

数目翻了一番还要多，并禁止殖民地政府发行纸币。然而最重要的是，该届政府为寻求增加财政收入，于1764年通过糖税法，引起了颇有势力的新英格兰商人的反对；1765年3月的印花税法，又在美洲最直率和有影响的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抗议。使殖民地人民公开向新帝国政策的方法和原则提出挑战，是因为一并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在战后经济衰退的时期，企图终止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走私贸易，以及决定放弃不得人心的以征用方式为殖民地防御提供经费的做法。^[25]“自由之子社”雇用暴徒以暴力反对殖民地的印花税税吏，使印花税法在美洲名存实亡；殖民地商人们对英国商品进行的经济抵制，迫使该法在1766年废止。但这两件事在随后的英美关系危机中都不如以下事件重要，即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残余”议会中的挑衅，和1765年10月印花税法大会通过的较为温和的决议。虽然针对英国政府的这种人身的和经济的抵制方式后来在1765年和1774年之间的数度冲突事件中再次奏效，但是印花税法危机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使宪法原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公开化，导致了最后的分裂。在这之前，殖民者倾向于依靠他们的皇家特许状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在这以后他们强调在英国宪法范围内自身享有的种种权利：征税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审判要由陪审团进行；他们可上诉要求申冤。这些既接受对英国国王的从属关系，也接受帝国议会以对外关税手段来管制贸易和商业的殖民地人民，现在把旨在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对内税收的企图斥为“违宪”。^[26]当“公告令”中重申帝国议会的最高立法地位“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于各殖民地时；当汤森企图——尽管不成功——强迫殖民地的上级法院批准扩大“协助令状”的使用范围，以及当他把从另外一系列关税收入拨作支付殖民地总督、法官和官员的薪金时，这些措施便被视为对殖民地立法会议的地位和权利的直接侵犯，并被视为“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的一部分。^[27]为孤立和平息马萨诸塞对茶税的抵制而在1774年颁布的几项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证实了他们的这些疑虑，并表明英国政府在面对殖民地的一再抵制下，终于诉诸高压政策。^[28]在这一威胁下，第一届大陆会议实际上推翻了帝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的最高权力。^[29]最终放弃效忠国王，并以正当理由要求享有天赋权利，只是到开战之后，认识到需要有外国盟友时，才在独立宣言中加以表明。

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最初时就是这样一场殖民地的造反，或者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第二次英国内战。但是，由于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反叛成功的可能有赖于外国的干涉，因此随着战争的继续，不久便演变成一场国家间的冲突。^[30]在1776年年初的几个月中，殖民地人民确信法国会参战，而且西班牙和联合省会谨慎地给予捐助。于是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政治解放，而且也是为了瓦解和分裂大英帝国。^[31]就领土野心而言，“造反者”从一开始就打算征服和吞并英国在北美的所有其他领地——加拿大，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岛，纽芬兰和东、西佛罗里达。美国人几乎有同样的信心计划夺取西欧的贸易口岸和大西洋西部的海军霸权。由于在初期征服加拿大的企图受挫，同时越来越需要得到法国的经济和海军的援助以维持生存，最后迫使美国人把眼前目标限于争取与法国正式结盟作为赢得战争的必要手段。

使殖民地人民感到幸运的是，法国外交部的韦尔热讷伯爵在恢复大西洋的商业和海军力量的均势方面，其决心不亚于他的前任舒瓦瑟尔。他认为，不管美洲内战的结果如何，法、英的交战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独立宣言之前，法国就已开始向殖民地运送秘密援助的军事物资了。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政府不顾杜尔哥的拼命反对，于1776年5月决定保证执行向殖民地人民提供财政援助的政策。^[32]但是，由于西班牙人不情愿支持一场有可能引起西班牙自己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属地不稳的反叛，以及法国人担心殖民地的抵抗运动可能失败，直到1777年10月美国人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之后，韦尔热讷才公然提出与殖民地人民正式结盟。根据1778年2月6日签署的条约规定，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两国互相承认对方在新大陆的领土，并约定把战争进行到美国的主权得到保证为止。英法两国到7月已处于交战状态，但是，法国海军投入关键性的大西洋战场则推迟了很久，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不愿意承认美国的独立。另外，也是由于佛罗里达·布兰卡执意要强迫英国给予波旁王朝各国以实质性的好处，以此作为联合调解殖民地冲突的代价，或者作为法、西两国入侵的结果。西班牙只是出于贯彻这一有限的战略和获得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以及它在中美洲的权利，于1779年6月作为法国的盟友参战。^[33]在法国的怂恿下，随着北方列强武装中立的形成和荷兰的卷入，英国于1780年完全被敌对势力所包围。尽管在同年春季罗尚博率领的一支规模不大的法国远征军

在罗得岛登陆，但法国海军的主要活动仍集中在西印度群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虽有华盛顿的得力而精心的领导，但仍差一点在1780年年底被打败。翌年5月，法国舰队受命配合殖民地的军队作战，结果德格拉斯终于在切萨皮克湾外击败了格雷夫斯，使康华理率领的英军在约克敦投降。正如华盛顿本人曾一直预期的那样，法国的财政援助，尤其是海军援助，被证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1783年在凡尔赛的媾和中，英国海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印度洋、西地中海和加勒比海战胜了波旁列强一事，也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谢尔本的巧妙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活动，其结果不仅防止了第一大英帝国的彻底瓦解，而且也剥夺了法国和西班牙似乎已握在掌心的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土和经济利益。

这一成功的要素在于事先已与美国谈判专员富兰克林和杰伊达成了谅解，即在承认美国独立的同时，还答应美国提出的向五大湖以南的原西北地区扩张领土的要求。这一和解包含着牺牲谢尔本希望建立英美联邦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共同体的幻想，但是它使英国保住了对加拿大、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控制，并在实质上破坏了法、美联盟。

[\[34\]](#)相比之下，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得到了某些好处，尽管英国因其北美帝国部分崩溃而蒙受了屈辱，但波旁王朝各国接受了大体上并未触动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收获的和解。最为重要的是，韦尔热讷意欲变美国为法国的经济卫星国的希望破灭了。

美国革命在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反响是深远而广泛的。美国战争的灾难在英国政治方面的反应是：约克郡的中产阶级地主们和伦敦的激进分子在1779—1780年期间精心组织了争取“经济”和议会的改革运动。虽然这种鼓动加深了对罗金厄姆辉格党人的议会改革的不满，而且只达到了极其有限的目的，然而10年之后年轻一代的辉格党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议会改革时，他们并未忘记各郡的一些社团向议会施加压力而采用的种种“美国的”方式。但是，不论是1780年还是1793年出现的这些政治运动，都没有革命的意图。战时的需要，格拉顿的雄辩，以及爱尔兰志愿军的武装示威，促使罗金厄姆于1782年勉强同意爱尔兰议会的立法独立。美国殖民地的丧失还使1783年以后英帝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不是减少而是更加严重。虽然负责官员的态度仍是顽固地坚持殖民地政策的重商主义原则，但在以后的10年中，皮特则为一种更加明智和持久的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由于美洲的分立结果使英

国在东方的贸易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诺思勋爵1773年的管理法案又不够完善，使之有必要在比较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建立与印度的官方关系。^[35]皮特政府1784年的印度法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经商行为中遵守更为严格的标准，并将该公司的董事们交由国王任命的政府管理机构管理，同时，通过该法修正案的方式，授予驻加尔各答总督以超越其参事会的必要权力。此外，由于原来的美洲殖民地不再向运往海外的英国囚犯开放，于是1788年在悉尼建起了第一块流放地，这便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化的开端，它与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和太平洋的开发都有连带的关系。后来在1791年，由于被流放的美洲帝国效忠派坚持要求在上加拿大建立代表机构，导致该省从下加拿大分离出去，这两个地区都获得类似自治的权利。而皮特则坚持以为，并在实际上提出加拿大的税收应“由他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决定”的主张，他显然没有忘记1776年的深刻教训，尽管当时的处境不同。最重要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在财政方面造成的后果，为1784—1789年之间皮特推行的一整套财政、商业和行政改革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36]这些改革不仅确保英国战后期间的恢复，而且使英国得以从商业和工业扩张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中受益。

在法国，1783年以后对财政改革挑战的反应做出得太晚了。正如杜尔哥所预测的那样，在那里由于参加美洲的战争而引起的财政混乱，在几年的时间内导致了全国性的破产和旧制度财政的崩溃。正如七年战争遗留的财政问题使英国政府采取了最终失去其美洲殖民地的新帝国政策一样，美国独立战争的财政烂摊子将法国置于如此的困境，除了召集三级会议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第一次显贵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了卡洛纳和布里安倡议的财政改革方案，以及他们呼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要求，这实际上等于美国人的“无代表权就不纳税”要求的翻版。在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之间随后的辩论中，法国自由派贵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人士有几个曾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美洲的战争。这些人得到保守的巴黎高等法院中一批年轻法官的支持，这些人因赞赏美国新宪法而被称为“美国人”。法国贵族中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由于担负革命党的政治领导和全力支持中产阶级争取平等的要求，就使1787—1788年贵族叛乱最终必然遭到失败，为1789年决定性斗争中人民事业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这一贡献时常为人们所遗忘。^[37]

然而，英国战后的10年主要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所谓经济“起步进入了自给自足增长”的状态，即上一代历史学家所称的“产业革命”。虽然关于这一现象的年代一直是经济史学家们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目前有见地的一致看法是：那次不仅改变英国，而且改变整个现代世界的突然出现的增长，其发生的时间是在乔治三世在位的第三个10年，而不是在最初的10年。关于这一突然增长的起因，如今人们不大从英国发明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因为这些技术革新，除瓦特的转缸蒸汽发动机外，其范围有限，并不具有革命性；而更多的是从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在海外殖民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从它率先开发棉花贸易中寻找，因为这为控制大规模的市场，并向这些市场供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些市场会保证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不断扩张，同时也使英国通行比较低的利率并推广新的企业经营技能。^[38]此外，人们还正确地强调了这一时期促进英国商业和工业增长的种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水陆交通网络迅速改善；和苏格兰合并的法案签署以来，已有一个很大的国内自由贸易区域和足够的港口设施，以及除英国在欧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现的资本主义和科学耕作方式的农业。这种农业已可以维持增长迅速的城市人口，并有足够的钱可赚，而不需要吸取英国从世界贸易中所获的全部资金，并对农村人口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后备军有着足够重大的影响。^[39]早在1790年，英国的社会结构就在明显地朝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方向转变，其最终形成是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不过，甚至到1793年时，工厂体制的发展也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使在纺织业方面也是如此。工业革命虽已开始，但还未大踏步地进入其充分发展的势头。

在“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大陆地区，1763—1789年间最显著的政治倾向是朝着建立传统上所称的“开明专制”的政府体制发展。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开明专制”的说法含义模糊不清，因而对它是否有用提出疑义，但似乎还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作为过时的和毫无意义的文学术语而加以抛弃。^[40]18世纪末叶大陆“专制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为君主专制辩护的新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使用了新的行政手段，而且表现出某种允许用世俗的观念和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经济理论来改革其政策的倾向，即使不能改成这种样子，至少也披上了这种色彩。^[41]

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欧洲君主（或他们的大臣们）关心刺激他们各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其中有些人则是希望通过对中世纪残存的重叠和倒退的地方管辖权加以合理改进或干脆取消，以便使他们的各领地在行政上有更大的凝聚力。而其他一些君主则是设法通过建立一种在政府中有效的伙伴关系或者绝对的独裁政治来解决重新抬头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无天的贵族的问题。这些目的严格说来是很实际的，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开明的专制君主”采取的方法和政策均与当代的需要有关，若不从18世纪理性主义的背景、不从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首先是自然法理论这一情况，不从当时统治者改善其臣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不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等方面来看待，就难以理解上述的方法和政策。

当时为取代业已丧失信誉的神权学说而提出的各种专制主义新概念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洛克的契约论和重农主义者的各种政治理论。开明专制理论的经典公式在弗里德里希的《论政府的形式和君主的职责》一文中已有陈述。在1771年私下为伏尔泰和其他朋友印刷过的这篇短文，很清楚地包含着君主制的契约论观点，并明确地阐述了统治者对其臣民所承担的义务。^[42]“为使君主永不背离这些义务”，弗里德里希得出结论说，“他应铭记他与他的臣民是完全一样的人；如果他是某个社会的首席行政官、最高司令、首席财务官或首席大臣，这不是为了让他仅仅作为象征，而是要他切实履行那些职责。他只不过是国家的头号仆人，有义务正直、理智和私毫不利己地行事，就好像随时要向其公民们汇报执政的情况”。^[43]新的专制主义学说的另一个来源是重农主义的“合法专制”概念。^[44]早期的重农主义者避开社会契约的充分严密性，而就其职能上的特征为绝对的，但不是专制的君主制找到新的思想支柱。把这些职能与捍卫自由和财产等同起来。为了使君主能够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能，便认为君主应拥有立法和执行两方面的权力。但是，在立法权力方面，君主须接受由选举出来的土地拥有者组成的咨询会议的指导，并将任务限制在“宣布”和用成文法来体现那些永远不变的自然经济秩序的原则。这在实践中意味着重农主义者希望排除君主对各种经济势力自由活动的干预，并且意味着通过一种独立的有关职权的规定把他限制在履行其“合法”职能的范围之内。也许除了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之外，没有哪位君主对这种学说产生任何兴趣，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俄国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在向1767年的立法委员会发出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她反对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

开明专制君主们在使政府机制现代化的努力中，采取了类似技术性质的行政改良。文献和记录以前一直被视为部长和官员们的私人财产，这时被归入国家档案以作统计和计划之用。从前依靠征敛、以权谋利和出卖官职的收益的官员，这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财政中领取固定的薪水。出于经济的考虑，裁减了冗员和减少了宫廷补助；对政府账目的审计，过去只用来作为对官员们品德的司法审查，现在则进一步加以推行用来了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当前状况。接着制定了财政体系和预算控制。着手进行了各种人口调查，从事地籍测量以促进财政改革，国内外的报纸被利用作为情报的来源，技术、农业和科学的知识有步骤地用来为各级政府服务。^[45]进步的经济计划虽然还不成熟，而且只为了应急之用，但终于起步了。^[46]

把“开明专制”当作一种有效或可信的政治概念加以接受，存在某些困难，这是由于人们对诸如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专制君主公开表白的诚意存有疑虑，因为他们都曾私下把他们哲学方面的心腹朋友和顾问们的“开明”设计嘲讽为乌托邦。因此，18世纪君主们的“开明”常被人们与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学宣传相提并论，目的是博得其他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对政府体制的赞同。实际上这种体制仍然凭借使用压制性的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任意监禁，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影响这些君主的改良政策的“开明”，其性质无论如何不同于其倡导者们在被不确切地称为“哲学大师”或冠以欧洲伟大思想家们的得意门生的称号时所阐明的含义。这些君主在他们的基督教会改革中采取的宗教容忍和反罗马教廷的政策，表现出中立的成分比世俗的成分要多。他们的社会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人道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动机。他们的财政和商业政策往往随经济思想的最新发展而变化。^[47]至少在以上种种方面，这一时期的专制统治是审慎地前进的和“开明的”，这里说“开明”并无贬义。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和叶卡捷琳娜二人就其社会同情心方面的顽固态度而言都是保守的，甚至是中世纪的，如果说他们谁都不愿冒损害封建统治之险，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专制统治仍然依赖他们的特权阶层的合作和支持。那些以激进或革命的主张进行实验的人则遭到约瑟夫二世悲剧性的命运。约瑟夫宣称要使“启蒙哲学”成为他

国土上的立法者，他就背离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真正信条，这种信条是以经验，而不是以教条为根据的。

“开明的”改革在欧洲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政教关系日益紧张；进一步向民法和刑法的法典化和现代化发展；在德意志中部，公众对贵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虚华和妄自尊大的批评日益增多，同时还要求减轻专制主义者政府的苛政。

教会与国家关系出现危机，其本身的原因是在基督教教会改革领域中维护了世俗君权和在天主教国家内反罗马教廷的主张不断蔓延的结果。奥地利的“约瑟夫主义”从推崇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会政治的费布朗尼乌主义中汲取了动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来自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传统。^[48]在西班牙和意大利，18世纪“政治上”的詹森主义的传播加强了王权至上论的各种历史性权力要求。不过这两种现象都反映出天主教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君主和主教日益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同样趋势，以及教会本身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样决心。反罗马教廷的主张赢得的最显赫的胜利是在1759—1767年之间把耶稣会从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驱逐出去，并于1773年7月在波旁王朝各君主的共同压力下，迫使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该会。^[49]在哈布斯堡的领地上，容忍非天主教徒，由国家控制普通的神学院，制止默祷教团，并对教会管理区域进行了重新规划。在西班牙，限制宗教法庭的权限，由王室控制主教的任命，并使大学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在意大利本土，没收了教会土地，通过立法禁止永久管业权、对教士征税，并限制教堂的庇护权。统治者们实行的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决心维护其王权，以对抗顽强但已软弱无力的教皇统治。^[50]这都是一些先例，当接着在革命的法国建立了立宪会议后，便在高卢教会中出现了宗教分裂。

编纂法典的行动与其说显示了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的进步，不如说是表明继续强调国家权力的至上。1794年的弗里德里希法典^[51]除包括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的全部范畴外，还把君主作为国家唯一代表的独特地位再次加以确定。并对贵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在法律上予以承认。^[52]出自开明的西里西亚法理学家苏亚雷斯之手的这一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融合在一起的法律，适用于情况复杂的整个普鲁士各领地。把它说成是在国家建设方面促使社会倒退的做

法，也许不能算过分不公正。在俄国，编纂成法典的与其说是法律本身，不如说是贵族的种种特权。^[53]在哈布斯堡诸领地，1786年颁布的一部新民法法典的第一部分，在继承法中废除了除某些例外情况的长子继承权原则，并规定未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可以离婚，从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与罗马教廷的争执。1787年的一部反映出受贝卡里亚影响的刑法，确认了废除拷打和死刑，减轻了16世纪严酷和不人道的刑罚。这些刑罚在先前的一部1768年的法典中大部分依然存在，它十分恰当地被称作“特蕾西亚的惩罚女神”（Nemesis There-siana）。

^[54]

最近对德意志中部开明专制的影响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强大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多地把矛头对准顽固的普鲁士社会结构，对准从约瑟夫二世改良政策的倒退，以及奥地利秘密警察的镇压行径。^[55]奥地利和匈牙利开明专制所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民、学生和城镇工人阶级组成的第四等级的政治觉醒。在此之前，他们始终由于1787年土耳其战争的财政和军事负担以及约瑟夫二世和传统宗教活动的干预而被疏远。这些没有特权的阶层从约瑟夫二世推行的改革中受到鼓舞，开始追求彻底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这却远非约瑟夫二世原先的意图，而是法国革命家们的新信条的一部分。^[56]

约瑟夫二世不顾贵族是否能接受和是否影响其特权，试图革新其所辖版图内的行政、法律和社会制度，表明当推行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措施时，欧洲专制主义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将随之而来。这种危险在路易十六的法国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显露了出来，因为在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这场推翻波旁君主政体和彻底清除封建残余的大革命，其本身就是受那些与开明专制君主动机相同的改革措施的鼓舞而突然发生的。对这场大革命的研究，对法国和近代世界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深远，在最近30年的一些学者手上，这种研究已达到了新的重要领域，他们一直试图从大革命参与者中最活跃的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的角度来重新解释这场革命。关于这些学者的某些发现以及历史学家们对这场翻天覆地的动乱有更大重要性的种种新见解的概述，在本卷的后面几章中均有所叙述。^[57]

长期以来，旧制度中存在的财政、宪法和经济等方面的种种问题需要果断地加以处理。当最后到了1787—1788年卡洛纳和他的继任者

布里安提出解决方案时，顽固不化、彼此倾轧的特权阶层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府危机。倘若他们的解决方案能早一点付诸实行的话，也许会避免政府的垮台。于是改革的重任不得不委托给由普选产生的三级会议，而不是委托给由精心挑选的有利害关系的贵族组成的准代表机构。大革命在1789年春获得的第一个战果就是对这个陈腐的机构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使其成为拥有制宪权力和最高政治统治权的国民议会。第二个战果是国民议会不顾被强行解散的威胁，通过攻打巴士底狱而维护了它的权威。1789年接踵而来的其他“战果”有：8月4日晚封建制度被部分推翻；发表了不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到十月事件时，改革道路上的剩余障碍最终被扫除。[\[58\]](#)

在革命的初期，正如伯克所认识到的那样，法国革命变革的模式已经形成，因为，虽然“1789年的原则”是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精心制定的，而且新秩序的建立也是他们的功绩，但是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广大群众直接参与了政治。这种模式后来在直至热月政变为止一直在不断向左转的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一再出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该时期农民暴动和巴黎工人阶级的活动及群众心理的研究才显得如此重要。[\[59\]](#)群众参与革命政治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原因，即农民对制宪议会未能成功地“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感到不满，城镇居民对能否得到便宜的大众主食——面包的充足供应表示关切，巴黎工人为争取最低日工资水平所做的努力，以及1792年以后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令人不安，因而人们希望对日用消费品实行官方价格控制。有时正是资产阶级立法的狭隘的排他性促使革命日子的突然来临，如：拒绝给“消极”公民以选举权、不准体力劳动者参加国民自卫军、对集体请愿权加以限制等。有些时候，革命群众显然是受一些激进的领袖、记者和享有盛名的俱乐部的煽动而投身于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支持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提出的要求，为反对专制君主的否决权而大声疾呼，在国王出逃失败后全力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共和请愿，举行游行示威以支持布里索派的战争政策和雅各宾派为废黜和处死路易十六而施加的压力。[\[60\]](#)群众中流传的谣言和集体的恐惧——诸如贵族策划的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阴谋，假想中的各种“匪帮”的颠覆活动，富有的投机商人大量囤积食品，以及在普鲁士入侵的紧要关头施展的“第五纵队”的诡计等所引起的恐惧，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骚乱，

其反应就是激进的动荡局面在城乡的延续，最终在1792—1793年巴黎城市实行的直接民主和带有惩罚性的九月大屠杀中达到了顶点。

这种群众性革命行动的间接政治影响是意义深远的。首先，它导致革命议会中的“爱国”领导层不断地发生分化——最早的一次是穆尼埃与温和派退出了制宪议会，以及1789年十月事件之后米拉波变成了秘密的王党分子。更加重要的向右转是1791年7月马尔斯广场“屠杀案”后“立宪”派即斐扬派，以及推翻君主制后布里索派即吉伦特派的转变。这种先倒向温和，然后又倒向反动政策的变节行为，主要是由对政治激进主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感到不安而决定的。国民公会中的中产阶级民主派，为了保持巴黎“无套裤汉”的支持，准备接受他们的经济要求，这就是雅各宾派。^[61]其次，对雅各宾及其他知名俱乐部在巴黎日益增长的影响所引起的恐惧，促使他们的反对派考虑通过发动军事独裁而实现反革命。纳博讷、拉法耶特和迪穆里埃三人都曾想到这样的方案，并曾跃跃欲试。^[62]这些隐秘的野心加速了法国在1792年春与奥地利开战，而且在1793年迪穆里埃叛变后，使法国险遭覆灭。最后，革命的法国，作为雅各宾极端主义和恐怖时代的发源地，不仅招致欧洲专制君主们的敌意，而且疏远了在英国的许多最初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它还到处对涉嫌的激进分子动不动就进行政治迫害和国家审判。雅各宾主义的幽灵在欧美许多地方继续游荡，直至下一世纪许多年后依然未散。

公正地说，这种极端主义的行为，是那些甚至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就从前特权阶层手中夺过政治主动权的自由派贵族们和中产阶级改革派们从未打算进行的。在1789年最初的群众暴动后，即使最开明的“爱国党”成员都希望保持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不论它的“封建主义”色彩有多重，并且希望保留贵族的社会地位和尊贵的特权，以及神职人员对大多数公职的控制。但是当路易十六与移居国外的贵族同流合污并求助于外国势力后，立法议会中的布里索派领袖们便决定没收逃亡者的财产和根除教士的影响。在与奥地利开战之后，对国王叛国罪的延期诉讼使得罗伯斯庇尔得以借助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和各省的联盟派的支持而推翻了君主制。随着普选权和共和政体的出现，法国终于达到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状态。

然而，最终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是随后几代政治家们从大革命的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也不是其在进行政治和社会试验中出

现的激进主义，而是其意识形态对全球的吸引力。人民主权论导致了关于世俗国家的各种理想，在消灭封建和贵族的特权后实行的政治和社会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和对祖国的热爱给后来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的扩展以一种新的强大的推动。^[63]一些观察家甚至从雅各宾派专政和共和二年的社会民主政体中看到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渊源。^[64]

伴随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和欧洲旧政权的衰亡而来的是崭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地平线的展现，它的轮廓随着“启蒙运动时代”接近尾声而显得愈加清晰。就这些以及其他方面而言，这个时代是个过渡时代，因为虽然它仍然从旧世界的共和理想和艺术光荣中获得灵感，但它已开始对早期启蒙运动的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抗，并在艺术、音乐和文学领域朝着未来的浪漫主义迈进。^[65]在这方面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新古典主义和卢梭。在形而上学的探索领域内，康德的先验哲学指出了人的理性的界限以及首次使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理智原则调和一致，从而带来了又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66]然而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还有科学推进力的复活，它曾在20世纪前50年放慢了节奏，但现在又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了解方面产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新发现。^[67]

（张志军 译）

^[1] 重点参见R. R. 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欧美政治史，1760—1800年》第1卷（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9年），以及J. 戈德肖《伟大的民族，1789—1799年法国革命在世界上的扩散》（巴黎，1956年），第1卷，第1章。

^[2] 原文为Atlantic community。——译者注

^[3] M. クロス：《大西洋文明：18世纪的起源》（纽约州，伊萨卡，1949年），第2章。

^[4] J. 戈德肖和R. R. 帕尔默：《18—20世纪的大西洋问题》，《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罗马，1955年）论文集》第5卷，第219—233页。

^[5] 关于米拉波的合作者的情况，参见J. 贝内特律《米拉波的追随者，革命动荡中四个被流放的日内瓦人》（日内瓦，1962年）。

^[6] 参见后面第15章，原文第432页（书中凡原文第×页均见本书边码）。

^[7] R. R. 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第22页。

[8] 对这种总的论点的批评，见M. 莱因哈德《论法国革命史：最近的论著及前景》，载《编年史，经济、社会、文明》，第14卷，1959年，第554—556页，以及A. 科班《民主革命的时代》，载《历史》，第45卷（1960年10月），第234—239页。有关不同的论点，即启蒙运动思想在促使革命以后时期美国制宪概念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见贝林《18世纪美国的政治历程与启蒙运动思想》，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1962年），第339—351页。

[9] F. 斯潘塞：《1762年的英普决裂：对历史的重新评论》，载《历史》，新丛刊，第41卷（1956年），第100—112页。关于外交的革命，见该丛刊第7卷，第19章。

[10] 见后面第7章第1部分《海军》，及A. 坦普尔·帕特森《另一支无敌舰队，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英国的企图》（曼彻斯特，1960年），第2章。

[11] 关于在西班牙殖民帝国范围内陆续放松对商业的限制的情况，见后面第14章。

[12] 见后面第9章，原文第253、266页。

[13] 关于该时期波兰衰落的主要原因，见后面第12章。

[14] 见后面第9章，原文第265页。

[15] O. 欣策：《霍亨索伦王朝及其业绩》（柏林，1915年），第380—381页。

[16] 18世纪时仍在通用的德国银币。——译者注

[17] 关于一些开明的专制君主在这一时期首要关注的是财政问题的观点，见C. 莫拉泽《财政与专制：论开明君主》，载《编年史，经济、社会、文明》，第3卷（1948年），第279—296页。关于1763年以后普鲁士恢复的情况，见W. O. 亨德森《腓特烈大帝经济政策的研究》（伦敦，1963年），第3章。

[18] 1892年以前奥地利通行的银币。——译者注

[19] 见后面第10章，原文第282页。

[20] 见后面第21章，原文第597页。

[21] 见后面第18章。

[22] E. 赖特：《自由的结构，1763—1800年》（纽约，1961年），第40—48页。

[23] J. 史蒂文·沃森：《乔治三世的统治，1760—1815年》（牛津，1960年），第183页。

[24] 特许状中包括西部土地所有权的殖民地有：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约、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

[25] 纽卡斯尔和皮特重新恢复了征用的做法，即政府大臣行使国王的特权，要求各殖民地立法会议以定额手段规定共同防御经费。然后国会再向殖民地补偿一部

分（常常是大部分）费用。

[26] 见后面第16章，原文第455页。

[27] 关于已故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对汤森的美洲政策的论述，见《权力的十字路口》（伦敦，1962年），第203—212页，又见O. M. 迪克森《协助令状——革命的一个起因》，载R. B. 莫里斯编《美国革命的年代》（纽约，1939年），第40—75页。

[28] 见后面第17章，原文第484页。

[29] C. H. 麦基尔韦恩：《美国革命——从宪法角度的解释》（纽约，1923年），第116页。

[30] 见后面第17章。

[31] R. W. 范·阿尔斯泰纳：《崛起的美洲帝国》（牛津，1960年），第2章。

[32] 韦尔热讷和杜尔哥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是导致后者1776年5月12日下台的主要因素之一。H. 格拉高：《改革的尝试与法国专制制度的灭亡（1774—1778年）》（柏林，1908年），第114—132页。

[33] A. 坦普尔·帕特森：《另一个无敌舰队》（曼彻斯特，1960年），第3章。

[34] 关于谢尔本在媾和时的帝国政策，见V. T. 哈洛《第二大英帝国的建立，1763—1793年》（伦敦，1952年），第6章。

[35] 见后面第8章，第1部分。

[36] 见后面第19章。

[37] 对这一时期法国贵族社会结构的精辟分析，见M. 莱因哈德的文章《18世纪下半叶的精英与贵族》，载《近现代历史杂志》，第3卷（1956年），第5—37页。

[38] 参见E. J. 霍布斯鲍恩《革命的时代，1789—1848年的欧洲》（伦敦，1962年），第2章。

[39] 关于英国地主在工业发展（特别是在矿业、运输和炼铁业）中的作用，见G. E. 明盖伊《18世纪英国的地主阶层》（伦敦，1963年），第8章。

[40] 最新的一种说明见F. 哈通的《开明专制》一文，载于历史学会的单行本（G. 36）（伦敦，1957年）——这是他在《历史杂志》第180卷（1955年）发表的文章的英译文。

[41] 我在此处部分地依据了J. M. 罗伯茨博士在其论文《意大利的开明专制》中提出的“实用定义”概念，他的论文载于《18世纪意大利的艺术与思想论文集》（罗马，1960年），第26—27页。

[42] 《文集》，第9卷，第195—210页。

[43] 《文集》，第9卷，第208页。在此使用“公民”一词，而非“臣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44] L. P. 梅：《梅西埃·德拉里维埃所阐明的合法专制和开明专制》，载《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公报》，第9卷（1937年），第56—67页。

[45] 见后面第20章，原文第566—567页。

[46] 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布里埃内向法兰西显贵会议提交的五年计划（1787—1792年），作为恢复财政平衡和推迟召开三级会议的手段。J. 埃格雷：《革命前的法兰西，1787—1788年》（巴黎，1962年），第179—185页。

[47] 有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见后面第2章，原文第47—54页。

[48] 关于费布朗尼乌主义，见第7卷，原文第21—22页。

[49] 见后面第13章，第2部分，原文第391页。

[50] 有关庇护六世教皇与开明专制君主的关系，见E. E. Y. 黑尔斯《革命与教皇统治，1769—1846年》（伦敦，1960年），第2章。

[51] 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制定的法典，即《普鲁士国家公法》，在他死后于1794年正式生效。——译者注

[52] 托克维尔关于该法典的著名分析，见J. P. 迈耶编《旧制度与大革命》，《全集》，第2卷（巴黎，1952年），第268—271页。

[53] 有关叶卡捷琳娜二世1785年的贵族宪章，见后面第11章，原文第316页。

[54] H. 克雷奇迈尔：《玛丽亚·特蕾西亚》（哥达，1925年），第187页。

[55] H. 布伦什维格：《18世纪普鲁士国家的危机》（巴黎，1947年）和E. 旺格曼：《从约瑟夫二世到雅各宾审判》（牛津，1957年）。

[56] 见后面第10章，原文第300—301页。

[57] 见后面第21—24章。

[58] 见后面第23章。

[59] 在这方面的主要先驱者是已故的G. 勒费弗尔教授。他的结论性研究成果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北方农民》（两卷本）（巴黎，1924年）和《1789年的大恐怖》（巴黎，1932年）。

[60] G. 吕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1959年），书中各处。

[61] 有关19世纪革命模式中重复出现的这种政治转变，见E. J.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伦敦，1962年），第62页。

[62] 见后面第24章，原文第702—703页。

[63] G. 勒费弗尔：《世界史中的法国大革命》，载《法国大革命论文集》（巴黎，1954年），第315—326页。

[64] J. L. 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1952年）。

[65] 见后面第3、4章两章。

[\[66\]](#) 第3章。

[\[67\]](#) 见后面第5章。

第二章 人口、商业和经济思想

一 人口的增加

18世纪欧洲人口的估计数有很大幅度的误差；直接的人口调查做得极少而且做得不完善，大多数数字是从计算户数得出的，而户数除残缺不全外，对各户的人数也必然要做随意的假定才能得出人口的总数。这样的估计数字虽然可以提供一个国家人口近似规模的相当可靠的数量，而要根据以求出一个国家中人口的增长率则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这些估计数字是随行政效率的高低而变动的，它们给人的总印象很可能是夸大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不过可以肯定，18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是在增长，而且就整个欧洲而言，人口在1760年以后比以前增长得更快。^[1]现在回顾起来，人们自然把这次人口增长看作作为过去200年特征的人口持续不断增长的第一阶段，并以生活水准提高或医药和公共卫生改善这样一些新的影响来加以解释。但也应该看到，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增长只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些地区和低地国家、俄罗斯、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以及德意志的一些地方速度较快。即使在这些国家（除俄罗斯、某些普鲁士省份、芬兰和爱尔兰外），18世纪后期的增长率也许每年不超过1%。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也许还有瑞士，年增长率为0.5%左右或者更低，这样的增长率在较早时期是很寻常的——例如，格雷戈里·金^[2]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在17世纪末每年增加0.4%。

此外，在18世纪后期人口增加最快的某些地区，迅速增长是长期性的；德意志的部分地区自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人口便一直迅速增长，俄罗斯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在这些地区，18世纪末人口增长并不是从停滞状态突然上升的。在瑞典和芬兰，人口实际在北方战争停止后20年内增加得比18世纪后半叶更快。因此，虽然出现增长加速的现象，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尤其明显，但这种加速并不具有普遍性。需要加以阐明的的问题不但有18世纪后期某些

地区人口增长加速的原因，还有某些地区长期比别处增长率高的原因。

我们感谢马尔萨斯对人口的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加以区别——前者是推迟或避免结婚，后者是战争、饥荒和疾病。工业革命前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是预防抑制在起作用。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在父母的肩上，而不是由大家庭或家族集团负责，因而在决定是否或何时结婚的问题上人们为获得建立独立家庭手段的能力所左右。在容易获得支撑家庭手段的地方，人们结婚就比较早，过独身生活的比较少；在生活条件困难的地方，人们往往推迟结婚，或者根本不结婚。这样，关于婚姻的习俗最终趋向于适应可以得到的财力，从而防止过快的人口增长。倘若人口增长超过可能得到的土地和农业设备，农民们后出生的儿子就会发觉不容易获得并耕种他们自己的田地，于是当上了雇农、家仆或士兵。

这种对婚姻的控制是否由于人们婚后限制生育而更甚，我们不得而知。在所有社会里一向实行流产和原始的避孕技术，但根据当时评论的语气也许可以断定，除法国外，这时这些方法的使用尚未普及足以有效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程度；在其他地方，则主要靠诸如荒年之类的异常情况。

人口还周期性地受战争、饥荒和疾病等侵袭的抑制。在没有充分肥料供应和有效灌溉方法的情况下，当时粮食收成的丰歉波动程度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直接死于饥荒的人在总的死亡人数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一次歉收往往加剧疾病所造成的后果。同样，虽然战争的直接伤亡比瘟疫造成的死亡小，但军队的过境和交通的混乱使社会更容易发生流行病。在由于这些原因造成死亡率高的年份里，人口大量增长的现象可能并非在老人和婴儿中间，而是在年轻人和5岁以上的儿童中消失了，尤其在像M. 古贝尔提到的博韦地区那种死亡率特别高的地方更是如此。[\[3\]](#)

根据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1798年）第一版中提出的最初观点，饥荒和疾病乃是对人口增加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加速度的人类所施加的惩罚。高死亡率是过高出生率导致营养不良和过分拥挤而造成的结果。不过，经过仔细检验的瑞典和英格兰的情况表明，高死亡率与人口压力看来似乎并无密切关系。歉收年份的出现频率与严重程度取决于气候，而不取决于人口占有资源的比例；尽管粮价的起伏对

城市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很大，而且在贫民区比在富人区更加敏感，但坏收成本身往往并不足以造成重大而范围广泛的死亡率上升。死亡率特别高的年份主要由于流行性疾病，这往往伴随着出现某一地区地方性疾病的异常流行。流行病的发生和居民抵抗这种疾病的能力均与粮食供应无密切关系，而且尽管某种流行性疾病比如肺结核可能是受营养水平的影响，但最致命的流行疾病其特性和致命性并不取决于粮食供应，而是取决于引起流行病的各种因素，如气候，特别是温度和降雨量，而且取决于城市化的程度。因此，至少在英格兰和瑞典，人口的预防抑制看来已使人口的增长适应于土地和设备的供应，从而稳定在一定的生活水准上，虽然这种水准用现代标准来衡量是极低的，但已高出仅能维生的最低水平，足以避免重大饥荒并避免直接由饥荒引起的疾病。高死亡率并不是由高出生率引起的；也许这样说更符合事实，即死亡率水平高有许多与粮食供应并无关系的原因，而且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结婚年龄和过独身生活等手段使出生率适应于这个水平。马尔萨斯本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认为，这一点对于欧洲长期有人居住的一些地区是普遍正确的。他写道：“在近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进步的国家里，目前使人口控制在生活资料实际水平上的主要抑制途径乃是对婚姻的审慎的约束。”

这些结论对于整个西欧并不同样适用；在欧洲大陆的各部分，人口之所以能适应资源，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作用的大小程度并不一样。习俗上更注重以生活水准为结婚条件，而不是以年龄为结婚条件的地区，预防抑制最起作用。但在某些地区，由于机会充分而形成的婚姻习惯无法适应后来由于这些机会减少而出现的情况。结果，在人口增长严重影响生活水准的地方，一旦遇到暂时的人口急增或连续几年歉收，便很少有缓冲其影响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率对歉收更加敏感，流行性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蔓延范围也就更加受生活水准的直接影响。例如，爱尔兰居民比英格兰居民更容易受歉收之害；萨克森选侯领地1770—1772年歉收造成的高死亡率，使当地1780年的人口还低于1744年。

各国间死亡率的不同变化不论是什么原因，看来可能的是，人口正常迅速增加的国家 and 人口缓慢增加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的出生率水平；而它们出生率的不同则可能反映了他们往往因结婚年龄和过独身生活的人的多寡的不同而出现的生理和营养状态。令人非常瞩目的增长地区——高达每年3%——是北美，那里充裕的土地为早

婚提供了机会。俄罗斯人口迅速增长也反映了边疆地区特别不重视预防抑制的情况。因为俄罗斯的一户有许多个家庭，青年人结婚后并不独立门户；此外，农民的土地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力强弱或“吃饭的人”的数目来重新分配的，这种做法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不断增加，但同时又促使人口增加，因为在那里大家庭受到奖励，而不像西方的情况那样往往要受到惩罚。在芬兰还有在普鲁士东部，高增长率则反映出人口稀疏地区所提供的种种机会。

芬兰的增长率比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要快很多，表1可以说明这一情况。

表1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丹麦	31.0	28.2	2.8
挪威	32.4	25.0	7.4
瑞典	33.6	27.4	6.2
芬兰	41.3	28.1	13.2

就其他人口迅速增加地区来说，证据想必也是根据环境条件而推测出来的。爱尔兰甚至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人口增长加速之前相对高的增长率可能也是由于早婚和高结婚率；因为爱尔兰人素有如佩蒂所说“从最初有结婚能力起”就结婚的名声。

对比之下，人口增长最缓慢地区是那些建立新家庭的手段最受限制的地方，除农业之外没有什么谋生机会的地方，以及在农业方面谋生机会由于土地稀缺和大庄园普遍存在而受到限制的地方。西班牙的状况即如此，虽然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和巴伦西亚的人口在18世纪中翻了一番多，但有许多大庄园和受牧主光荣会[\[4\]](#)压迫的埃什特雷马杜拉在18世纪末还跟该世纪初一样人口稀少；而整个西班牙的人口在一个世纪里也只增加了50%。西班牙作家萨米恩托认为，他的国家“人口减少”的原因不仅在于教士过独身生活，还在于俗人中未婚者占很大比例，这些人由于农业资财的分配不公，没有能力维持家庭；1768年人口调查中16岁到25岁的人口中结过婚的只占20%多一点，这个事实表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5\]](#)

在意大利，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约每年只有4%，而托斯卡纳和波河流域的增长速度最慢，因为两地人口业已非常稠密，精耕细作农业的潜力也已耗尽。建立独立门户的家庭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结婚时间便被推迟；在18世纪的威尼斯，男人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在29.9岁到31.7岁之间，女子在28岁到29.8岁之间。奥地利的情况比较模糊，因为该国包括像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以及波希米亚等人口相当多的省份，也包括像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等人口密度只有前者一半的省份。后两个省份人口稀少，不能完全以土壤贫瘠为由加以解释，有人把这种情形归因于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和地主家族（Gutsherr-schaft）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和农村中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些人结婚晚或者根本不结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太穷，供养不起家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主不允许没有生计的人结婚。^[6]但是在普鲁士，同样的社会制度却并未与人口的迅速增加发生矛盾，欧洲南北边疆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的这种对比，其原因可能是南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佳，不太可能成为大宗的粮食出口者，因而无力支持人口的迅速增长。

在法国，据勒瓦瑟的估计，1770—1789年之间人口的增长率每年不到5%，18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这并不是由于结婚年龄的改变或结婚者比例的改变，而是由于婚后控制生育。限制生育的愿望与农民需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因人口增多而被分割得更小的威胁有关，因为当地没有大量的保留土地，除务农外也没有迅速增加的谋生机会。18世纪后期，人口的增长业已导致将家庭财产平分的做法，这是一种只有在除家庭财产外别无适当出路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为孩子们提供生计的办法，这个办法本身已足以说明有必要建立小家庭。

由此看来，各国之间人口增长的巨大差异主要在于出生率的不同。但这并不是说18世纪下半叶在某些国家中明显的人口加速增长也是出于同一缘故。

这种加速增长并不一定是由于全新的影响在起作用。在欧洲大多数地区，除大城市外，在没有流行病和战争，收成正常的年份里出生人数也许超过了死亡人数。因之，有幸在这些方面都如人愿的任何一段时期里人口就可能会增加。18世纪下半叶看来就是这样的时期。死亡人数的波动在18世纪没有17世纪那么强烈，18世纪下半叶又比上半

叶平稳。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疾病流行的20年；在20年代爆发了鼠疫；30年代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感冒横扫西半球，另外还爆发了天花、斑疹伤寒、伤寒和痢疾。相反，18世纪后几十年里，在欧洲的南部和北部长时间都没有发生严重的疾病。例如在西班牙，虽然瘟疫一直是农村地区严重的地方病，1784—1787年和1790—1792年蔓延成流行性疾病，但18世纪下半叶主要的流行病只限在城市里。1709年的流行病波及全国，而1800年的流行病则局限于加的斯、塞维利亚及其附近地区。

此外，死亡率特别高的年份虽然暂时减少了人口的增长，但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人口突然猛增的年龄结构。流行病发生的年份不但死亡增多，而且使婚姻推迟；不但婚姻推迟因而生育也推迟，并且现有已婚夫妇的生育也减少了，部分是因为配偶死亡而致家庭破裂，部分是因为出现高死亡率的环境不利于怀孕。但是，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一旦消失，出生的人数便大量增加；推迟的婚姻这时完婚了，许多年轻人比起以往的习惯结婚年龄提前，因为他们这时可以较早地继承家产和职业，如果不是瘟疫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他们是不大会这么早成家立业的。由于高死亡率而锐减的配偶数这时已由具有更高生育能力的新婚配偶所补充。这种出生人数的突然增加造成十分令人瞩目的年龄结构的波动，这种人口的猛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显示出一种波浪般的效果。在这种猛增之后大约30年时间，人口中便会出现不正常的高比率的年轻成年人。倘若当时正好出现十分有利于结婚的条件，有利的年龄结构和早婚双管齐下，便会出现10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口大爆炸。

英格兰人口在18世纪后期之所以增长得比较迅速，部分可以用这些原因来解释。1725—1729年天花流行，接着便是30年代的生育高潮，大约在25年之后，英格兰人口中便出现了不正常的高比例的年轻成年人，其他条件也有利于结婚。因此，1760年前后便出现了结婚高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口增加。由于同样原因，瑞典在1750—1765年、1774—1780年、1791—1798年也出现了人口增加的高潮。

因之，人口变化的传统作用过程可用以解释18世纪下半叶人口比较迅速增长的大部分原因。究竟是否全部新的影响在发生作用以及这些影响的范围和性质如何，至今仍然众说纷纭。那个时期的低死亡率

是表明一种永久性的改善呢，抑或它只是由于1763年后长时期的和平以及天气良好，再加上流行病发病率幸而有所减少等有利因素而造成的呢？淋巴腺鼠疫在欧洲的绝迹——最后一次严重爆发是1721年在普罗旺斯地区——固然是一件永久性的成绩，然而，尽管鼠疫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要引起大量死亡，但这种病的爆发次数往往相对较少，并且限于一定的地区，所以它的绝迹并不是低死亡率的重大原因。有人争辩说，18世纪末法国的婴儿死亡率在下降；而5—14岁和15—24岁年龄组的死亡率实际上固定不变，1—4岁年龄组死亡率下降是因为天花几乎已完全绝迹，这种病在1789年以前是造成这个年龄组30%死亡的原因。^[7]在英格兰因天花而死亡的数字也有所减小，这是18世纪后期实行接种牛痘和19世纪早期实行注射疫苗的结果。但是，除了天花这一疾病外，并找不到对人的平均寿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医疗方法有所改善的证据；医药设备的任何增加都局限在城市，它甚至不足以抵消城市化对死亡率带来的不利影响。

可能对人口增长有重大作用的一个新的影响乃是食物供应的改善，根据法国的证据已经得出结论：饥馑与死亡的相互关系在1770—1789年间并不像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那么明显；欧洲许多地方1770—1772年和1795年的歉收与1709—1710年的坏收成相比，对死亡率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8]18世纪后期任何这种使欧洲人口遭受饥荒之灾的可能性的减小，都不能仅仅归因于食物供应的改善；由于各种互不相干的原因，一些往往是由于食物匮乏而引起的疾病不再像以前那样肆虐，这样，歉收所引起的死亡就减少了。但是，也许由于气候条件较好，作物品种大大增加，以及耕种方法的改进，某些地区歉收的情况已经减少，而且也许由于粮食贸易的组织工作有了改进，在粮食储备不足的地方，通过从储备有余的地方输入粮食，也比较容易减轻收成不足所引起的困难。除广种马铃薯的贫困地区外，并无证据表明营养与抵抗疾病的能力有什么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被用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而并未增加每个人的消费量；尽管农业生产力并没有提高，但人口的增加很可能已在生活水准很低的地方引起了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抑制。

总之，尽管较低的死亡率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表明各种新的影响在起作用，但事实很可能是，作为近代标志的主要是一种在较早时期出

现的暂时有利条件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死亡率的开始持续下降。在19世纪初期，在那些有证据可查的地区，死亡率又再度上升了。

在某些地区，18世纪后期人口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放松了对婚姻的审慎限制。布拉班特人口在29年内增加了40%——由于布鲁塞尔、卢万和安特卫普的人口只增加了25%，而且由于该地区已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种增加速度就更引人注目——部分反映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农业的改进对结婚的机会起了促进作用。在爱尔兰，有人争辩说，由于马铃薯种植的普及以及为了满足英格兰对谷物的日益增加的需求而把牧场改为耕地；加速了现有土地的再分配，并开垦了新土地。结果，农家的儿辈们发现在18世纪后期获得土地和成婚比以前容易了。在英格兰，176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加速，特别是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可能促使人们更加愿意结婚，犹如边疆地区由于土地充裕而促使人们愿意结婚一样。至少在英格兰，认为当时存在着有利于生育的影响的看法具有现实根据。马尔萨斯写道：“人口迅速增长的最必要的条件是对劳动力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此外，如果没有这些有利于出生率的影响，那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低死亡率而导致的人口增长，将会产生出现在法国而不是英格兰的那种人口出生率的相应下降。然而，那种认为存在着长期保持或促进出生率的影响的看法，尚无详细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至于18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的提高，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发展——经济迅速发展的地方生活水准不会降低，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地方，生活水准就会降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 贸易

（一）贸易的模式

在蒸汽应用于运输以前，各种类型的货运费用都非常高昂，因此，与生产总量相对而言，贸易量是很小的。此外，在修筑铁路以前，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的费用低得多，所以，在有海洋或河流连接的地区，即使是相距甚远的地区之间进行的贸易，也远远超过只有陆路连接的地区即使是同一国家内的地区之间的贸易。欧洲本身内部有一些欧洲产品的长途贸易，例如在莱比锡进行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工业品和东欧的初级产品的交易，以及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间以苏黎世、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为中介进行的大量贸易。但是，主要贸易地区却集中于大海——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周围，而主要的欧洲贸易城市乃是那些在西欧和中欧的人口较稠密地区及其周围地区之间交换货物的城市。

最重要的综合贸易是在欧洲与南、北美洲之间的贸易。西印度群岛有欧洲所需要的大量剩余产品，主要有糖、咖啡和几种数量较小的产品如棉花、靛蓝、辣椒和生姜。从马里兰到卡罗来纳这样一些种族杂居的殖民地也生产大宗农作物。北部殖民地几乎没有什么在欧洲市场上有价值的大宗产品，只有多余的粮食和木材。这种各国各有其特产的情况，使建立一个复杂的交换系统成为可能。英国向大陆南部殖民地出口的制成品大致上与从这一地区进口的初级产品平衡。英国在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有相当大的贸易逆差，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支付所抵消，与大陆北部殖民地的贸易则有较小的顺差。北部殖民地部分依靠输往西印度群岛的粮食，部分依靠与南欧之间的贸易顺差来弥补与英国的贸易赤字；鱼、木材和小麦产品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口，换取酒、盐和水果，然后航运到英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的殖民地主要用金银锭来交换制成品。虽然法律规定这些地区的贸易由母国垄断，但事实上一大部分贸易是由英国人或法国人进行的。输入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大部分制成品由英国和法国供应。这些制成品（如英国商品）部分是用进口羊

毛、水果和酒来偿付；但法、英两国在与伊比利亚半岛贸易中都有巨额顺差，由西、葡两国用金银锭来结算。因此，部分出口到北美的英国商品最后是以金银锭输入英国的形式来偿付的。大西洋地区国际贸易的国际结算从来不是顺顺当当的，美国商人在美国革命前夕所负沉重债务也许可以说明从长远来看已存在着某些难以解决的纠葛。但与大部分其他主要贸易地区相比，这些困难并不严重。欧洲需要的初级产品，在新大陆最后是可以用品来偿付的。

在远东，17世纪贸易的大扩张把欧洲商人带进了一个不大愿意进口欧洲商品的地区。印度，主要是孟加拉，向英国出口棉织品、丝绸、硝石、靛蓝、糖，以及在同中国进行贸易中所获得的大米、茶叶和其他产品。英国则主要以输出布匹，还有铅、铁和铜作为交换。虽然从绝对数字上讲，这些出口商品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它只约占英国从东印度进口货物官方数值的1/3。印度在英国人能提供廉价的棉布以前是个不愿意接受欧洲商品的市场，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同东方的贸易差额因而是以输出金银锭，以及以政治性质的汇款来清偿的，对中国则以出售印度的鸦片来清偿。

在与中东和近东的贸易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不过程度上较轻。这种贸易主要是以布匹和殖民地产品交换奥斯曼帝国的天然特产如纺织品原料（主要是棉花）、谷物、皮革、油和香料；并且主要通过法国的代理商，这些天然特产通过北欧成交，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直接运往萨洛尼卡、的里雅斯特、威尼斯和热那亚。在这种贸易中也有以金银锭或硬币结算的。

第四大综合贸易区域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西欧的传统粮仓，特别在歉收的年份西欧依靠从那里输入粮食；除小麦外，但泽业已丧失其在这项贸易中先前所处的支配地位，因为出口的主要地区已经东移。波罗的海还提供由芬兰、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和瑞典出产的木材——1760年后通过松德海峡出口的木材数量激增——以及瑞典和俄国的铁，俄国输出的铁在这个时期不断增加。1784年通过松德海峡的商船，大部分（37%）是与德国港口进行贸易，其次（26%）是与俄国。大量出口货物至少在最初是运往英国和荷兰。对荷兰的出口，大部分分售到其他地区，但对英国的出口则留在当地。作为交换，英国人则提供制成品和一些殖民地商品，地中海沿岸国家提供食盐（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葡萄牙的）、酒、鲱鱼、服装、皮革、殖民

地产品，尤其是在1740年之后还提供一些原棉和羊毛。18世纪40年代以后，波罗的海进口的殖民地货物增加得很快。尽管如此，仍有余额（尽管为数很少而且在不断减少）不得不用金银锭来进行结算。

远距离贸易一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一个地区的天然特产同另一地区的天然特产交换，二是制造品同天然特产交换，三是制造品同制造品交换。这三种交易在这个时期同时并存。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第一种，同美洲的贸易大部分属第二种。第三种贸易则很少：在较先进地区之间进行特产交易，另有一些是以西方羊毛织品同东方的亚麻织品进行交易，但可能数量不大。就数量和价值而论，天然特产的交易是最重要的，但具有最大潜力的贸易乃是少数高度专业化地区的制成品同周围地区天然特产的交易。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英国的贸易已经几乎全是以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

大体上说，国际贸易的模式取决于相对成本。在某些部门，如在粮食贸易中，也许绝大部分如此。但是，在欧洲国家政治控制或影响所及的地区，贸易的分布和性质却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航海措施和垄断公司——而出现反常现象，以确保母国保持主要的贸易优势。此外还存在制成品贸易的壁垒，例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彼此设置的壁垒以及禁止印度产印花平布贸易的种种措施。

殖民大国企图在它们的殖民地市场上保持垄断地位这一事实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由一个国家以政治手段占有的市场，其性质使市场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差别。至于不同殖民制度所制定的法规究竟有多大效果，以及这些法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贸易偏离其本来的流通渠道，那就很难说了。几乎从一开始，西班牙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就受到了严重损害，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英国扩大了其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机会，实际上赶走了那个地区的竞争对手法国。从1766年起，英国人采取了一系列的努力，试图把英属西印度群岛建成同西班牙殖民帝国进行贸易的集散中心。从1766年通过第一个自由港法，经历不断修改到1787年和1805年的修正案，英国人设法促进英属西印度群岛各自由港与外国种植园之间的贸易。西班牙人则放宽西班牙人同西属美洲贸易的限制以抵制英国的压力。根据1778年的自由贸易法令，取消了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的贸易垄断权，允许西班牙与中、南美所有主要港口互相进行直接贸易。^[9]这项措施旨在通过允许西班牙子民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有很大程度上的贸易自由，以便降低价格，从

而使他们能较好地对付外国闯入者的竞争。事实上，放松限制的确促使与西属美洲的贸易迅速扩大，但它未能成功地抑制在贸易中份额不断增加的英国人的侵入。到18世纪末，虽然西班牙对其殖民地贸易的垄断，除了为适应路易斯安那的特殊环境而放宽限制外，在理论上讲仍是完整的，但根据当时的估计，实际上却已有多达25%的贸易额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保持垄断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西班牙的制造商和商人不能满足殖民地的需要。

如果说西班牙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是在外部压力下崩溃的，那么英国人的垄断则是被内部的压力所打破。英国人保持对其西半球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地位的努力远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严酷。1730年后允许北美殖民地出口大米，1739年后允许把糖直接输往地中海，直到巴黎和约后试图加紧执行贸易法和航海法为止，旧殖民体系的运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此外，英国经济与其殖民地之间有天然的互补性。至于对旧殖民体系的各种控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贸易模式的反常，则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人们有时争辩说，这种控制并未使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符合贸易的自然条件；也有人指出，美洲殖民地的叛离并未在实质上改变英美贸易的趋势。但1783年在事实上的确形成一些变化。有人估计，在独立战争之前，如果不计走私货物，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有2/3—3/4是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美国的独立使帝国在美国输出的货物中所占份额减少到1/2，不列颠诸岛所占份额则从1/2减少到1/3。^[10]此外，美国的独立确实导致伦敦作为贸易中心地位的一定程度的衰落，就烟草来说尤其如此，尽管导致这种衰落的还有别的经济力量。

根据美国的经验做出的论证实际上没有多大说服力。1783年后，就严格的经济意义而言，英国当然是大部分制成品的最大的供应源。在18世纪早期情况却不是这样。有一些证据表明，旧殖民体系在其早期，是按照若依它自己的意愿行事绝不会采取的路线指导需求的。1783年对贸易造成的变化相对说来比较小，这一事实有助于加强由旧殖民体系形成的商业纽带。我们有理由说，一百多年的控制已形成了种种商业纽带，即使在贸易控制停止执行以后，它们依然把英国与殖民地在商业上联结在一起。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是肯定无疑的，即如果不规定一定种类的殖民地产品必须首先运到英国，那么伦敦在国际商业和金融方面

就不会这样快获得如此优越的地位。英国并不是最优良的天然商业中心。例如，荷兰就具有相当多的优越条件：荷兰掌握着在欧洲大陆上分销亚洲、非洲和美洲产品的控制权，甚至在它必须从英国获得这些产品的情况下仍然如此，由此可看出，它的力量是多么大。同样，德国也有很大的优越条件，例如，在对美国停止行使航海法令后，不来梅很快就成为桶装烟草的集散中心，而汉堡也很快便与美国建立起直接的商业往来。

到18世纪后期，英国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比其他国家要进口更多的殖民地产品，仅仅这一事实就使它在转口贸易中占有特殊的优越地位，因为它拥有了较大的股本，发展了市场设施并积累了有关资源的知识。然而，要是没有对旧殖民体系的种种控制，使伦敦成为巨大转口贸易中心的过程就会慢得多；而且，由于到伦敦购买殖民地货物的顾客往往还需要解决运输和商业金融问题，所以这些控制也有助于使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这一时期荷兰作为船舶和商船供应者的地位进一步衰落。荷兰人在这两个领域都让位于英国人。例如在布匹的运输方面，英国通过松德海峡装运的份额以牺牲荷兰而得以大大增加。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航运的绝对数量在60年代或70年代一直持续上升，但后来他们相对来说输给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任何中间人的地位都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他们所服务的双方迟早会彼此直接交易。荷兰不仅面对英国的竞争，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特别是瑞典的航运也大大发展起来。就殖民地商品来说，英国和荷兰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均已下降，到1771—178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本身，运输了将近2/3通过松德海峡的进口货，这10年间瑞典所占份额的百分比几乎与英国持平。在从波罗的海出口的粮食方面，18世纪初荷兰人曾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但在18世纪打入这项贸易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诸国，而不是英国，英国船只在这项贸易中始终未占很重要的地位。1771—1780年，在通过松德海峡运输的粮食总量中，荷兰只占41%。除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两地外，销售殖民地货物中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贸易中心，也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1740年后汉堡的生意日益兴隆，在这一时期成为从阿尔汉格尔和波罗的海运往英国的日益增多的粮食贸易的主要转口港；随着革命战争的爆发，汉堡接过了原先由阿姆斯特丹进行的大部分贸易。法国发展它自己的殖民地贸易转口中心。

1780—1783年的英荷战争对双方的航运都产生了不良后果。18世纪荷兰的捕鲱业衰落，不仅被18世纪后半叶在该业中占据较大份额的瑞典人，而且被哥德堡兴起的捕鲱业排挤出波罗的海。

英国人给予荷兰人的打击，或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商人采取的主动行动，都没有什么令人特别惊异的。但这个时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之一乃是法国人建立一支庞大的商船队的失败。1767年通过松德海峡的6495艘船舶中，有203艘开往、299艘开出法国港口，但其中属于法国人所有的只有10艘。尽管法国的贸易增加，但法国的航运却被排挤出许多航线。荷兰人和英国人，特别是在1740年以后的瑞典人，把法国人挤出了与北方国家的贸易。理由很简单：法国的运费比丹麦或荷兰高出20%—30%。法国的航运业主要是保持与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因为它在这些地方采取了某些保护措施，此外，它保持着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和东方的贸易。

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对贸易的限制大大放宽。虽然这些放宽措施很少是由明确的自由贸易思想所促成的，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反映出并且推动了贸易的增加。法国对其西印度殖民地贸易的垄断，遇到了英国在保持殖民地贸易垄断地位时所遇到的同样困难——西印度殖民地和北美殖民地的互补性使得用前者的食糖产品交换后者的粮食有利可图。此外，法国人没有能力充分保证其殖民地所需要的产品供应，这不仅导致大规模的非法贸易，而且导致1763年、1767年和1779年对垄断的放松，最后导致1784年8月30日法令的颁布，规定建立6个贸易中心，允许外国船只对一些指定的商品进行范围广泛的交易。1778年的法令开放西班牙与其殖民地间的自由贸易。到美洲殖民地革命时，第一个英帝国的最重要部分脱离了旧的殖民体系。对国内贸易也放松了。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的德意志各邦从1775年起组成了单一的关税区，1796年扩大，把加利西亚包括了进去。即使在俄国，由于粮食生产大户的贵族以及商人的压力，于1753年取消了国内关税，1762年又做出安排允许粮食自由贸易；不过，叶卡捷琳娜总的经济政策一般说来是限制很严的，对进出口课以高关税并加以种种限制，并在1785年颁布的手工业者管理条例中加强了行会组织。最后，根据1786年英法商业条约，法国降低了对纺织品、皮革、金属器具和瓷器的税率——有些降低了10%——英国则取消了对葡萄牙优惠而对法国葡萄酒和烈性

酒实行的歧视性税收。由于英法两国之间走私活动猖獗，所以很难估计这项条约的效果如何，但法国终于在1793年宣布废除此条约。

（二）贸易的趋势

这个时期的整个国际贸易没有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从英国的数字推断出一些情况，因为英国的贸易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数额大，分布也广。英国通过合法渠道进口的货物，经过1735—1747年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之后，到1775年有了很大增加；1775—1782年由于对美洲殖民地战争的影响有所下降，然后又上升，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产品的出口量，除那次开始较早持续较长的停顿外，可以说明总的格局；上升到1764年后，出口平稳下来，接着出现了20年的比60年代初期没有上升而是往往下降的局面；然后从1786年起又有一段时间出现令人瞩目的发展，只是在1793年由于战争的爆发曾暂时中断。18世纪最后20年，英国进出口增长率合计每年稍低于5%，而18世纪上半叶则每年不足1%。促成这种增长的主要地区是北美以及东、西印度群岛。在为欧洲市场服务的荷兰和德国，英国未能保持它在60年代初出口猛增时取得的利益，以致英国对德国的出口在80年代后期比60年代后期没有什么增加，对荷兰的出口则减少了。

很难说英国贸易的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进程而不仅仅是英国所占部分的变化。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外，英国所占份额肯定是一直在增加的。例如，在通过松德海峡的航运中，英国的份额在1770—1780年10年中一直在上升，超过了26%。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增长，理由很明显：英国的长期竞争力因技术改良而加强，在90年代对法战争中，英国削弱了欧洲大陆上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并限制它们接近海外初级产品的生产国，从而为它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并使它取得大部分转口贸易。90年代英国贸易的显著增加当然主要是削弱其对手而取得的。但英国贸易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进行，因而有可能使40年代和50年代的贸易扩张和80年代的再次扩张成为广阔地域的贸易模式，并且，除了受像战争那样特殊动乱的干扰外，从40年代起基础条件对扩大世界贸易一直是有利的。

1740年后，通过松德海峡的贸易显著增加，1771—1780年10年中有71.2万件布匹运过，而在18世纪早期则每10年平均只有40万件左

右。法国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在40年代也开始上升，虽因战争曾一度中断，而后又继续增加，直至18世纪末。法国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贸易扩张还有其他一些迹象。60年代末尼古劳斯·恩斯特·克勒曼率先沿多瑙河而下与克里米亚进行纺织品、纸张和铁器的贸易，而维勒夏芬舍公司（Willeshavensche Company，1782—1784年）则在第聂伯河口升起了奥地利国旗，虽然该公司在商业上以失败而告终。

[\[11\]](#)1784年缔结的奥土贸易协定为德意志的纺织品进入奥斯曼帝国打开了大门，一直到1788年，奥地利与土耳其的贸易取得了长足进展。

[\[12\]](#)俄国出口的铁一直在增加，这部分是得益于瑞典人推行限制铁生产的政策。国际粮食市场日益兴旺。未受这种普遍增长影响的主要地区可能只有德意志和中欧。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这些地方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对英国货物需求的呆滞，反映了这些地方的收入未得到增加，而并不单纯是由于它们的需求转向其他国家或国内的供应来源。

贸易扩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它使欧洲更容易受商业危机的影响，而受饥荒的影响则减少了。它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首先，它引起对欧洲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在现存生产结构中难以增加这些商品供应的地方，促进了发明和工业组织的变革。对这种意见也许可以提出反驳说，最初最重大的变革出现在为国内市场服务的行业，例如，不是出现在严重依靠出口市场的毛纺织业，而是出现在最初并不过多依靠出口市场的棉纺织业。诚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通常首先出现在一向靠进口来满足业已存在的国内需求的行业，因为对工业家来说，他们首先是试图扩大生产那些公认为人们已需求的商品。第一步是把外国货赶出国内市场，然后再出口并向国外扩张。在英国，也许还有欧洲大陆的一些地方，18世纪上半叶低廉的粮食价格解放了对比较简单的制成品的购买力，工业便应运而增长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增加。然而，事实仍然是，固然国外需求支持了贸易的扩大，即使在那些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发展的工业也是如此，但在那些发生最重要的技术发展的工业中，日益增加的国外需求才是至关重要的。

但其次，贸易的扩大影响到国内市场的性质。贸易不仅仅是增加了财富；它往往还会改变收入和财富极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现

象是西欧社会的特征。在土地贵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贸易对财富分配起到一种缓解作用。它增加了中等收入者的相对重要性，因为这些人为了经久耐用的物品（相对于高质量的精品而言）提供了更好的市场，这是很穷和很富的人都办不到的。这就是说，他们正好是为一些最适用于机器生产的商品提供了市场。

就这两方面讲，贸易的扩大都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但是，欧洲有好些工业地区在18世纪中期技术状况或组织性质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萨克森、西里西亚、德意志的矿区、乌拉尔的金属冶炼和加工中心、里昂的丝织业、巴塞罗那的纺织品生产均如此。总之，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技术，大多数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其他地区也有些进展，如居纽发明了蒸汽机。为什么这种突破出现在英国呢？

部分原因是英国的国内市场较为有利。货物从这个国家的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的自然便利程度大大优于大陆国家，而且英国是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此外，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其工业总产值而言，其国外贸易在18世纪后期出口大大增加之前很久就已占很大比重，结果使其社会结构比较具有灵活性。由于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性，中等收入阶层（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在英国一般比在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结果是，面向英国制造业的国内市场——购买力和构成这个市场的人们的爱好——比大陆的大部分国内市场更为有利。人均收入较高；持有超过维持生计所需的相当多余的钱可以用于制成品消费的人相对较多；他们宁愿多买些商品而不愿意让钱闲着。

但是，英国市场扩大本身还不足以迅速导致18世纪最后几十年在英国明显出现的那种产量的加速增长。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英国的出口货在北美找到了有重大价值的市场。北美地区具有使其成为经济发展强大促进因素的特殊性。它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它的经济对英国经济起补充作用；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开发的市场——也就是说补充作用还未加以充分利用；它的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它的总收入随着移民增多而更加迅速地增加。此外，与欧洲相比那里的收入分配要平等得多，因而需要的商品都是经久耐用的大路货，这种商品的生产最有可能进行技术改进。1788年英国商品出口到美国的净值达150万英镑，出口到英属美洲的为120万英镑；出口到主要欧洲市场的合计为370万英镑，但后者的增加要慢得多。从各方面看，新大陆的市场呈现出一种与东方和中东市场截然不同的特色，东方和中东市场的人均收

入低，总收入没有增加，那里的人不大喜欢进口的制成品，因而出口多进口少，英国不得不向那里输出金银锭来加以抵偿。波罗的海地区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类似。因此英国同北美的密切联系对它的发展至关重要。

法国的对外贸易也在扩大。法国和英国所处位置都适合贸易，并有某些类似之处。两国都拥有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使它们能以殖民地产品进行大量转口贸易。不过，法国与海外地区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再出口，这样的出口增加了商业利润，但不能直接构成对法国货物的需求；在整个18世纪，法国的再出口量——主要是再出口到德意志和北方的糖和咖啡——比国内产品的出口量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此外，法国出口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天然产品，主要是葡萄酒和烈性酒。它出口的制成品几乎全是纺织品，主要销往德意志和奥斯曼帝国以及法国殖民地。新大陆的法国各殖民地的需求，在绝对量上从来比不上英属殖民地。尽管法国商人牢牢占有地中海东部地区，但这个市场对制成品的需求却一蹶不振。60年代以后，法国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口的商品其增长速度比法国向该地区的出口要快得多。再者，在1763—1773年的扩大以后，法国出口到奥斯曼帝国的布匹数量下降，法国出口货行销的地区也由于其他外国商人的竞争而变得狭小了：在这个地区，英国竞争卷土重来；在希腊则有来自奥地利的压力；在黑海地区，法国不得不把贸易让给奥地利和俄国。18世纪最初几十年，法国的贸易在其出口货行销地区有过一次扩大后，在该世纪末的几十年里则趋向于集中在原来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出口货行销的地区。

英国在80年代出口的加速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但是，至少在棉织品方面，这些改进部分是由于英国在前几十年业已与迅速发展起来的市场发生了联系的结果，而市场的迅速发展则是由一些毫不相关的原因促成的。欧洲大陆的纺织工业——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纺织工业——其销售市场上的需求增长得十分缓慢，因此，它们并没有面临改进技术和组织方法的同样需要。

但是，它们在获得国外市场方面虽各有其特点，但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对所有各主要工业领域的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为满足这种增加了的需求而采取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劳动力和天然资源

供应充足的部门，主要是以增加家庭组织形式为基础的现有类型的工业来满足需要。在劳动力充足而技术简单的部门，家庭式工业具有真正的优越性：它可减少商业资本家的一般管理费用，使他容易避免由于需求的暂时减少而造成的损害。在劳动力和原料供应缺少的部门，工业不是无法扩大（或者搬迁），就是靠发明新的技术以克服劳动力和原料的匮乏，如果工业是掌握在机敏而又有技术创造性的人手里的话，在这些新技术中就包括组织劳动力的新技术——工厂。某些英国工业是靠扩大由家庭组织的工业来满足需求的扩大，这或是因为新方法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难以发明出来，如毛纺业的情况，或是因为容易得到额外的劳动力，如黑乡^[13]的金属品制造业的情况。但是，在那些出现短缺的地方——如棉纺织品制造业缺乏劳动力，采矿业缺乏动力——事实证明需求乃是发明之母。正是在现有方法不再可能增加生产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发明新的方法上。诚然，国内需求也在增加，铁和铜，麻布和丝绸，对国内市场的供应可能与出口量的增长并驾齐驱。但是，继续不断推行技术革新的棉纺织业，其出口量要比国内销售量增加得快得多。

与波罗的海、地中海东部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其速度取决于欧洲对这些地方产品的需求增加的程度。这就不禁使人想到，对美国贸易的扩张情况与此截然不同，其速度取决于美国人收入的自动增长。但英国的输出在其价格低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时增长得最快，这一事实表明，贸易的扩大一般发轫于欧洲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对西印度群岛产品需求的增加。即使如此，美国由此而增加的收入中的非常大的一部分被用来购买欧洲特别是英国货物，正因为如此，大西洋贸易在这一时期欧洲工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 经济思想

18世纪后期出现了对经济的系统分析，这种分析后来成为下一个世纪经济学的核心。这种分析主要在钻研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并提出政策措施。经济政策的纲领并无新颖之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是在于这些纲领的数目、范围及其与经济运转的一般观点以及有条理思想而不是与直观相联系。18世纪初虽出现过一些富有才智和洞察力的经济学著作家——如坎特龙和孟德斯鸠——但就著述的质量和涉及的领域而言，18世纪稍后几十年的著作却是前无古人的。

举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说：在法国有魁奈的《经济表》（1758年）和卷帙浩繁的重农主义著作，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在西班牙有坎波马内斯的《论民间工业的发展》（1774年），在意大利则有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和奥尔特斯的《国民经济》（1774年）。

这些经济思想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日渐增长，部分是由于出现了一些需要用分析方法加以解决的复杂问题。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运用理智的习惯往往使人们先从一般意义上来进行解释，而与此同时，当处理实际问题时则需要用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理智分析能力发展的最有力的促进因素乃是把神学家业已应用于（或来自）整个世界和科学家业已应用于物质世界的一种思想，即自然秩序自动调节的思想运用于经济事件。根据这一思想，就其丝毫也不会改变的形式来说，认为在表面看来混乱的事物背后存在着一种秩序，保持这种秩序的不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图，也不是人类为此目的而做的努力，而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本能所起的作用。这个上帝被认为是仁慈的，这样建立起的秩序被认为是有利于人类福祉的。

这一自然秩序的观念（它的各个部分是有联系的）对经济研究是有力的促进因素；因为只有人们相信经济行为中存在一致性，他们才会去探索这种一致性及其各种模式。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才更

加容易从对特定实际问题的考察中，概括出能够阐明广泛范围的经验的一般规律。

亚当·斯密的这一观念来源于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它给了他一种改变宗教信仰的力量。但是，把在其他方面业已取得丰富成果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上是从自然法则的经院式概念所产生的——转移到经济学领域，显然还是经济学思想发展的下一个步骤。同样的思想独立地出现在重农主义者身上；他们所说的“自然的和独立存在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就是社会的这种自然力量所趋向的长期平衡。这种见解后来在最尖锐的重农主义批评家之一的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的著作中也可找到非常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如不干预自然，它就会导致平衡，导致事物的自然状态和最使人愉快的状态。”

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自然平衡的思想采取了比其他经济学家更加极端的形式。魁奈认为，它包含着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协调一致。更加重视经验的亚当·斯密，尽管多次谈到“看不见的手”，但他还是认为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家们对从这个观念引申出来的实际政策也作了各不相同的推论。可是，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著作家都同意这一事实，即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彼此息息相关，而个人的种种自发决定往往会形成一种模式。一些最有影响的英国和法国著作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西班牙和许多意大利的著作家就是根据这些观念来考虑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实际问题的。

这种普遍设想所造成的富有成果的影响乃是这个时期人们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增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能力的增强也是前几十年人们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特别是16世纪和17世纪经济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对外贸易和国家财政问题——的成功尝试积累的结果。到18世纪后期，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充分的工作，从而保证成为那个时期特色的综合性巨著的问世。

这些巨著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一些迫切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形成对经济思想的独立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理论上的预想支配着著作家们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研究，但有时一个特殊问题的迫切需要则决定了一种理论的发展或促使某一著作家提出与他的思想的总体系不相符的建议。对政策所提的建议受实际经济情况以及著作家对这些实际情况的想法及其所继承或发展的分析这些实际情况的知识传统的

影响；有时几个著作家对政策——如对国内粮食贸易——做出相同的结论，这纯粹是出于实际考虑而并非由于任何共同的思想影响所致。

最有系统也是唯一形成具有自觉意识的群体的经济学著作家乃是重农主义者。他们主要关心的两个实际问题是农业的停滞和王国政府的财政困难。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重农主义者手中的解决办法出自同一理论的假设。农业是产生净收入（也就是超过成本的收入）的唯一经济活动，因此，推进资本主义农业（大规模耕种）以取代小规模的分益佃耕制乃是主要的实际目标。正因如此，重农主义者要求取消对粮食的国内运销和出口的限制，因为这造成价格的疲软。根据同一理由，他们提议改革税制——废除封建特权并对地租征收单一税；因为豁免贵族的税等于是把赋税落在耕种者身上，侵占了更换设备所必需的费用。此外，由于这种豁免，使国家收入不足，政府也就不得不给予或维持一些财政和专营方面的特权，使享有这些特权的人吸取了大部分的经济盈余（净收益）。结果便直接打击了资本家、商人和行会的特权。这样，财政和农业复兴这两个问题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重农主义者便不仅抨击重商主义的法规，也抨击封建特权。他们的纲领的全部条款的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农业分得由它单独产生的经济盈余的大部分，以便鼓励农业投资。

亚当·斯密的纲领具有一种不同的倾向，但就他的情况而言，其纲领也是出于以下信念，即不但认为现存的限制和法规造成资源的错误分配，而且特别认为这些限制和法规是牺牲农业而促进了贸易和工业（尤其是前者）。他的全部著作旨在说明在英国和在整个欧洲一样，私人往往觉得把他们的资本投入远处的贸易比用于改进国内农业更加有利。他的著作包括相当具体的改革纲领：废除对自由选择职业的限制，如有关学徒和定居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出售和私人使用土地的法律和惯例；主张国内自由贸易；取消对进口货的税收和其他限制，以及对出口货的税收和津贴。

在18世纪，经济思想和其他时期一样，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者之间，不但在着重点上，而且在他们的经济分析方面，都存在重大的区别。有一些重要的法国经济学家——例如杜尔哥——他们与重农主义者的关系密切，但严格说他们并不是该派的成员；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对当时经济问题的态度不同于或相反于重农主义者的假说，例如福尔博奈，他于1767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探

讨》。亚当·斯密并没有完全理解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他那一代英国人的思想。

此外，即使在那些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预想为其一般思想前提的人们当中，他们从政策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也有很大不同，他们之所以各有侧重点，部分是由于推理方法不同，部分是由于他们面对的问题性质各异。英国不存在类似豁免贵族的某种税收的情形，而这种情况乃是形成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财政问题的核心。主人和公司的权力比较小。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在英格兰很不严格，尽管在苏格兰情况不同，那里的永久限定继承权实际上与大陆上的长子世袭财产和委托遗赠相类似，因而使亚当·斯密关于土地自由买卖的论述对他的法国和西班牙读者比对英格兰读者更感贴切。土地共用权对最经济地使用土地造成种种阻碍，这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容易引起隐蔽的行动。国内贸易自由在英国不成为一个问题。首先，对外贸易自由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比在重农主义者的著作中占有大得多的篇幅。后者鼓吹废除粮食出口贸易的限制系出于他们希望保持农产品的好价钱。作为实际问题，保护法国农业是无可非议的，而如果保护是必要的话，他们对农业繁荣的重视一定会引出不同的结论；而作为理论问题，他们却把贸易排列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靠后的地位。正如里斯特所说，他们“被看作是自由贸易的奠基人，并非因为他们抱有促进贸易的任何愿望，而是因为他们对贸易持一种鄙视的自由放任态度。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摆脱这样的信念，即认为自由放任会导致商业的全部消失”。

尽管如此，在一般经济思想领域中，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者还是具有最广泛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的整个作用（当这些思想广泛流行后）在于为由一些实际建议构成的纲领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这个纲领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依据。

那些西班牙著作家正是凭借这一整套思想，吸引了一些想要解释和改变他的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人们。最重要的著作家卡普马尼、坎波马内斯、霍韦利亚诺斯虽然就他们各自的专题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思想的总的体系是派生的。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从法国人——不但是重农主义者，而且还有老米拉波^[14]（其《人类之友》一书对他们有巨大影响）、杜尔哥——和亚当·斯密那里学习来的。在这些影响下，他们采纳了经济自由的原则。霍韦利亚诺斯写道：“政治的首要原则是给予人们以尽可能大的自由，在此范围之内，商业、人口和财富均

可获得增长。”他们反对重商主义者关于财富和金钱的观点，基本上采取了重农主义的态度，把农业当作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个时期最具有特色的西班牙人的著作——例如霍韦利亚诺斯的两篇报告《关于自由从艺的报告》（1785年）和《关于土地法的报告》（1794年）——就是试图间接地将自由主义的原理运用于西班牙的境况。

运用这些原则的最重要领域是农业。在西班牙著作家中也和在法国著作家中一样，很多人攻击大领地庄园以及维护这些大庄园的法律，也攻击公地和各种公民权。霍韦利亚诺斯主张采取措施限制领主的永久管业权并分配公地。对大庄园造成的问题，人们的看法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在公地问题上，则和在法国一样，存在一些矛盾心理，因为尊重个人的财产权，很可能导致赞成现存的土地共用权和赞成把公地划分成个人各自拥有的份地；即使在霍韦利亚诺斯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在主张分配公地的同时，又依据卢梭的理论而赞成保持财产公有。不过，毫无疑问，西班牙经济学著作家大多主张分配公地，而且在1760—1780年间国王和地方当局曾立法分配公地，有些法令还是由坎波马内斯起草的。在西班牙，还有人攻击社团而要求职业自由，特别是在坎波马内斯和霍韦利亚诺斯的著作中。

即使在“自由”思想颇有影响的西班牙，这些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并非是完全一致或始终一贯的。因此，在社团问题上，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卡普马尼为社团的特权进行辩护，而反对坎波马内斯的攻击，卡达尔索也曾为这些特权进行辩护。虽然在重农主义的影响下，西班牙著作家们攻击美洲殖民地贸易由加的斯垄断的安排，但他们对国外贸易基本上不感兴趣，就连霍韦利亚诺斯也早就准备在对外贸易上放弃自由主义原则，提出一项法律，允许进口粮食，不过在丰收时暂停生效。至于坎波马内斯，则更加注重从实际经验出发，因为1790年撤销他曾竭力鼓吹的1765年允许粮食自由贸易的法令一事，就与他有关。

在意大利，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没有那么彻底，这部分因为有些最重要的意大利思想家是官僚——几位那不勒斯的启蒙思想家是政府官员，韦里和贝卡里亚都是米兰政府的成员——因而比较容易修改思想以适应具体情况；部分是因为这个国家政治上分裂；部分则因为经济思想具有独立的生命力。西班牙著作家的理论基本上是派生的；意大利著作家们才有一定理由可以自称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最有独创见解

的。把重点放在农业上是普遍的现象。例如，杰诺韦西主要关心的是鼓励农业，即使这样做意味着限制工业发展；加埃塔诺·菲兰杰里承认农业的突出重要性。但以几位意大利著作家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却是十分微弱的。例如，他们当中最伟大的贝卡里亚，起初是个温和的重商主义者，虽然他后来也受到重农主义者关于农业、取消行会以及国内自由贸易的主张的影响，但他始终反对对外贸易的完全自由。的确，在意大利著作家中，提出国内自由贸易纲领同时又提出保护性纲领，乃是很寻常的现象。例如，杰诺韦西把制成品的出口和原料的进口与制成品的进口和原料的出口加以区别，认为前者应允许自由进行，后者应严格加以控制。韦里同样提出应将国内自由贸易与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相结合。这些人选择了“自由主义”纲领中那些可能促进他们国家发展的内容，但他们也深知意大利的经济落后，认为完全而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并不适合他们的目的。

尽管有上述种种差异，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著作家的设想和实际建议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个纲领与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纲领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17世纪德国经济学著作家，如约翰·贝歇尔和冯·霍尔尼克，在他们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方面与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者相似，但当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在18世纪尚未形成系统的时候，德国的重商主义却在大学和政府中都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思想发展。在德国，这样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即认为国家对人民经济上和道德上的福利应负直接责任。应该采取社会和经济计划的措施以促进人口和就业的增长。因此宗南费尔斯（1738—1817年）鼓吹促进原料出口和限制原料进口，而尤斯蒂（1717—1771年）则鼓吹通过国家计划以促进工业，制订建立信贷组织的计划，发放津贴并豁免税收以鼓励外国移民。

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良好的行政管理和君主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经济学是行政管理人员的经济学；它系统地研究国家官僚机构面临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尤其是缺乏促进经济进步的自发力量和行政及税收制度脆弱的落后国家。因此，其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比法国和英国经济学的内容要广泛，探讨的主题着重点也不同：它包括行政管理，往往还有技术，并特别注意国家的财政和通货。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一般方法比较具体并且以经验为根据，这一点从他们在王室权力的争论中对财政政策的主张与只对一个阶级征收单

一税的重农主义建议（这直接产生于他们对纯产品的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别就看得很清楚。

看来，在18世纪的英国，王室收入问题似乎仍像17世纪早期一样存在。英国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也是从对王室收入的一些思考而产生的，如在克兰菲尔德和培根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英国有关王室财政的著作从来不曾显示出单独成为一个经济学分支的迹象，这也许是因为造成王室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在宪法方面的原因（而不是行政管理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也许是因为经济学著作家们的兴趣集中于国外贸易；到18世纪后期，系统的经济学在英国兴起，国家财政已不再是紧迫问题——这个问题业已由国家税收和长期债务加以克服——国家财政虽然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在整个科学中已不再为人们所渲染了。

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关心国家及其收入，这说明为什么他们重视人口和就业的增加；重视工业胜于商业，以及为此目的推行的具体措施；重视保护措施和自给自足以及贵重金属。

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代人的纲领之间存在差异，部分由于这些著作家所处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对政策承担的责任程度不同。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大多数担任学术界的职务，但他们乃是君主们的顾问，而这种情况在法国著作家中很少见，在英国著作家中则根本没有。这些差别部分是因为西方较富裕国家中私人企业的实力较强，各种实际问题性质也就不同；部分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统不同。

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践纲领产生于一种对经济秩序运行方式的看法，并且是由一般原理引申而来或者说至少是以一般原理为依据的。与此相反，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实践方案则并非出自一整套基本原理；它们是行政官员对实际问题的反应，因此不是很一致的，也不大有意识地以理论为依据。如果说有什么理论的话，那显然是重商主义的理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冲突的，因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是一种正常状态。

不过，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是如何按秩序进行的基本看法，与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者的区别并没有像他们在言词上表现

出的那么大。

首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前辈重商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小。亚当·斯密最杰出的思想是在他公开抨击重商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其中有一些是重商主义著作家们自己所作的深入观察，所持的保留意见和提出的纠正办法的自然发展。此外，某些重商主义思想仍然保留下来，例如，人口论者的思想仍发挥着充分的力量，不但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而且一直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中都是如此。亚当·斯密（重农主义者也一样）认为人口不断增加，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

其次，大部分对调控措施的攻击，事实上与其说是来自自由放任的原则，还不如说是来自对当时实行的某些具体调控措施的反对。亚当·斯密和魁奈对现存经济体制之所以持批评态度，并不一定是或并非主要是由于他们持自然秩序的主张。他们的经济哲学使他们在表达观点时带有一种教条式的尖锐性，甚至在这些观点本身并非产生于这种理论时也是如此。如果说有些著作家之所以对一些具体规章条例更加持批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持有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的话，那么其他一些著作家之所以喜欢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厌恶具体规章条例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性质。例如，在西班牙，虽然行会受到攻击部分是因为它们限制人权——“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由权利就是人类为生存而劳动的最坚定、最不可侵犯和最神圣的权利”——但人们往往是仅仅根据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来对此进行辩解。

那些根据自然秩序的思想而对现存制度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们，有时却最终无须再引用这一特别依据来进行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大部分抨击也是通过详细列举具体规章条例的不利之处，而不是指出干预经济法则一般说来是不可取的这一点来进行的。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方案的细节有时比他们的语言的口气更讲求实效的话，那么一些最重要的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一般看法比起他们的实际方案来，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更多共同之处。尤斯蒂和宗南费尔斯跟亚当·斯密一样，他们关于经济秩序的设想深受自然法则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他们的实际方案有所不同的话，部分是因为作为落后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更敏锐地注意到短期的困难，而对经济中独立存在的力量的作用与方向持更悲观的看法。

不可否认，他们的实际纲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可能被夸大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近期纲领距离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甚远。虽然自然秩序的一般观念导致对现存规章条例持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但这一观念并不排斥对实际问题持各不相同的看法；问题在于这一秩序在多大程度上由现在的事态体现出来。持最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西方作家们设想国家在取消由于重商主义而形成的各种限制的时期应发挥积极作用。在重农主义者的纲领中则认为应发挥主动作用：国家将承担公共工程的建设和修筑道路的任务。正如纪德所指出的，他们认为应该缴纳的税收总额约占当时法国总收入的12%。至于尤斯蒂，则主张取消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取消垄断，并废除贸易公司的特权；他提出的限制进口的税率也是比较轻的。

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实际建议与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以及腓特烈大帝的政策是相一致的；它们确认和发挥了国家的传统作用。反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则是对现存体制的攻击，因而，必须考虑他们对政策所起的影响的问题。

这些思想在政策的形成上起多大作用呢？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实际的人们对急迫而具体的形势（在形势本身的各种事实所决定的狭小限度内）做出的特定反应呢？凯恩斯认为，实际的人们只不过是重复已故思想家们说过的话。另一方面，有一种看法认为“政策……乃是政府在各种实际问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陷入其中的一套做法，它们逐步达到一种有意识的一致性，最后开始作为政策来为自己进行辩护”。争论再继续下去，在18世纪和在其他世纪一样难以解决。思想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有时看起来很密切。德奥梅松反对“公共牧场”的措施，多少是受了重农主义的影响。杜尔哥作为财政大臣所实行的政策中的某些办法，诸如取缔手工业行会、改革财政管理和建立国内粮食自由贸易制度，也是受了重农主义的一定影响。制宪议会的许多社会、经济和体制改革也是以重农主义思想为依据的。

西班牙国王于1765年7月11日下令取消粮食税，允许国内自由贸易，甚至允许出口，但规定了最高价格，这些就是对坎波马内斯的《税务问答》做出的反应。韦里在米兰政府任职时取消了包税制（1770年），并降低和简化了关税（1786年）。对于1786年的伊登条约，人们往往认为是亚当·斯密思想对皮特产生影响的结果。

但是，即使像这样的措施也都是一从实际出发的考虑，是一个明智的行政官员不借助理论也完全会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肯定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是派生的思潮。但是也奉行一些符合重农主义观念或以重农主义言论为之辩护的政策，这是由于受当地环境的支配，或根据简单的常识而独立地制定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在形成关于政策的某些设想方面所起的作用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挥着威力，和凯恩斯思想在我们时代发挥威力的情况十分相似，只不过其目的不同而已。这些思想至少可以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采取的措施提供一套为之进行辩护的武器；但至多也只是造成一种倾向，即在某种形势下提供的有限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出可以最大限度放松限制的那些政策。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提出了有利于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设想，但是这种思潮变化的主要果实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收获到的。

（吴良健 译）

[1] 在附录中（原文第715页）有一组可信程度各异的估计数字。有些地区的数字（特别是匈牙利）是受移民的影响，而不光是由于自然增长。

[2] 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 1648—1712年），英国统计学家，所著《1696年的英国概况》一书对17世纪末英国人口和财富状况有翔实论述。——译者注

[3] P. 古贝尔：《17世纪博韦地区人口问题》，刊于《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7卷（1952年）。

[4] 原文为Mesta，系西班牙古时的牧主公会。——译者注

[5] 奥尔蒂斯：《18世纪西班牙社会状况》（马德里，1955年），第58—61页。

[6] K. 许内曼：《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时期奥地利的人口政策》（柏林，1935年），第42页以下。

[7] J. 布尔热瓦-皮夏：《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的一般趋势》，载《人口双月刊》，第6卷（1951年）。

[8] C. E. 拉布鲁斯：《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第182页。

[9] 见后面第14章，原文第401页。

[10] H. 希顿：《美国贸易》，载C. N. 帕金森编《贸易风》（伦敦，1948年），第196页。

[11] H. 哈尔姆：《18世纪哈布斯堡的东方贸易》（慕尼黑，1954年）。

[\[12\]](#) N. G. 斯沃罗诺斯：《18世纪萨洛尼卡的贸易》（巴黎，1956年）。

[\[13\]](#) 即英格兰南斯塔福德地区的工矿区，因工业污染严重而得名。——译者注

[\[14\]](#) 他是法国著名革命家米拉波伯爵的父亲。——译者注

第三章 文学与思想：浪漫主义倾向，卢梭、康德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25年，欧洲的思想情况十分复杂。在某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某些比较落后的社会阶层，旧的正统观念仍占有统治地位，例如，相信王权神授和世事皆由天命。与之并肩存在的有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即后来通称的“启蒙运动”。它首先受到知识分子和大资产阶级的欢迎，但也日益侵入其他社会阶层的思想领域。它的口号是：要理性，不要传统；要现在的幸福，不要来世的拯救。就是这个启蒙运动，坚持要求对所有社会制度重新评估，从而为1789年的大变动做了准备。但这期间令人最感兴趣的特征是，其中还存在着第三种倾向，即革命性和反动性二者同时存在：就旧的正统观念而论，它是革命的；就启蒙运动而论，它是反动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实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就是说，它首先把人看作有理性的动物，因此指望用抽象推理去解答所有人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人不仅仅是一架有生命的计算器。启蒙哲学家们的这种片面性迟早一定会引起强有力的反应：强调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的力量，想象力的灿烂光辉，以及需要面对甚至接受我们四周所有存在的奥秘。启蒙运动获得充分的发展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上半叶即浪漫主义时代，但它的基础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奠定的，也就是我们将在这里论述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它表面上是理性主义的，骨子里却带有初期浪漫主义的潜流，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界对革命者表示反感的最初表现。

想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摆脱理性主义的某种愿望，在18世纪初已显露出来了。尤其在艺术领域内，精确推理的精神很容易阻碍和削弱想象力的发挥。例如，卡尔·菲利普·埃曼努埃尔·巴赫的乐曲把天真自然、质朴无华的曲调恢复到恰当的位置，拒绝受制于旋律配合合法的形式主义原则；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勇敢地保卫莎士比亚“自然狂放”的诗剧，反对戈特舍德迂腐的诗论，即要求舞台剧应有合乎逻辑的结构，韵律应当过细地保持，诗体要永远纯正；在园林建筑方面一

个新时代开始出现，强使花草树木严格地按几何图形栽种的勒诺特尔^[1]的风格开始被抛弃，而按地势固有的自然潜在能力来设计的方法愈来愈被重视，正如伟大的“大地改造者”布朗所做的那样。这种早期的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应在宗教界也许最为强烈。仅举一例，威廉·劳于1728年写的《严肃号召过虔诚和神圣的生活》“拒绝了理智的主张，声称神秘的上帝统治着宇宙，通过人的心灵深处的直觉……与人通话”。^[2]虔信主义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像发酵剂一样在欧洲社会的深处起着作用，并往往弥漫开来使整个社会复兴起来。虔信主义在包含一切的意义上说，绝不仅仅是新教的，更不用说是宗派主义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伟大的方济各派传统的一个支流，曾在16世纪重新体现在伟大的圣方济会托钵僧团体中，它的力量和影响现在达到了高峰，而且像卫理公会派一样往往唤起一种“心灵的宗教”。

所有这些趋向都体现在一个伟大而尊严的人物的思想之中。这就是让-雅克·卢梭。他出生于1712年，活到1778年。他虽生活在18世纪，但不仅仅属于18世纪。他暴风雨般的个性既不能容忍凡尔赛宫廷生活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也不能忍受巴黎沙龙愤世嫉俗的急躁言行。他是，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成为一个典型的放荡不羁的人。这个处境使他感到更加痛苦，因为他深深渴望着友谊和爱情的慰藉。在这方面他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因为与他同一代的许多领袖们，例如在德国的伦茨和哈曼，甚至赫尔德、康德和席勒等，虽然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要职，但都同样不能在当时的社会里取得一个立足点，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接纳。“我付出多少就要得到多少”，卢梭于1757年10月1日写信给德乌德托夫人说，“因为我没有对任何公正地回报我的人提出什么要求，我痛苦地发现没有找到一颗响应我心的心，而自动退隐下来了”。^[3]这样，让-雅克·卢梭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隐居者。但在独居中他并不是一个快乐的隐居者。他的强迫孤立可以在心理学上找到同样的特征，一种深切的向往，它不像肉体激情，也不像世俗野心，没有明确目标，所以往往变得在性格上永不知足，甚至不可思议。在这方面，卢梭也是他同一代人的典型，而不是例外。“我的幸福的全部内容”，歌德让作品中的一位主人公说，“是热烈地追求我所没有的东西和我所不知道的

东西”。^[4]以同样的精神，伦茨感到没有人比古代英雄坦塔罗斯更能象征自己，成为永远得不到饱食的饥饿的不幸牺牲品。

歌德在他的伟大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描写了一个年轻人的令人心碎的景象。他深深陷入这种精神状态的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在其主要性格里，许多人认出了他们自己的影子。就人们处理日常问题的能力而论，这种思想状态是不会取得成果的一一维特的自杀只是他一生合乎逻辑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一但是它创造了一种所有艺术能够自由发展的气氛。像卢梭一类人脱离了比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能实现的还更为渺小、狭隘和有限的当时的现实，而在幻想联翩的美梦生活中找到了藏身之处。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宏伟的，但是不切实际的新社会假象，其中仁慈统治一切，和平得到保证。这样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对自然界以及对自然美的关系，与旧的理性主义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后者看来，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宏伟壮观，但只不过是南北驿道上一个麻烦的障碍而已。“与自然亲切交谈”是当时的口头禅。而它的最受赞美的形象之一是把自然当作伟大的母亲，孩子们在深忧或者狂欢时便能投入她的怀抱。当卢梭在情绪最忧郁的时候，当他因热爱社会受挫陷入厌世和迫害狂的深渊之中的时候，他便出远门考察植物，采集森林田野里的花卉而得到慰藉。

在卢梭早期生涯里，大约到1744年或1745年为止，我们发现他仍然以旧制度的语调说话。他在1740年写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意见书中，^[5]丝毫没有那种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断定人类是天生善良的基本忏悔；而且也无任何敌视上流社会之处。正相反，卢梭辩解说，在这一时期，那个上流社会使得我们惬意地从事于消遣娱乐活动，如音乐、绘画、打油诗、美女等，以驱散蛰伏在我们当中的各种激情的危险力量，从而获得非常积极的教育效果。但是不久他的观点彻底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立场倒了过来。他从此至死，一直教导说，人从大自然的怀抱中降生下来时是好的、善良的和高尚的。人身上没有原罪的污点。人的真正堕落是随着他进入腐败、邪恶、卑鄙的社会而来的。社会是人为的，人为这个词既有人工造出来的本意，也有不真诚的意思，即社会充满了阴谋诡计，它的每根纤维渗透着传统习俗、虚伪做作和欺骗谎言。社会必须改造，以便与原始的基本人性取得一致，甚至可以说与慈爱的上帝的意志取得一致，因为上帝的仁慈意图已经被人们，正是那些自称为看不见的造物主的奴仆的人们败坏殆尽了。在

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对“文明”社会的丑恶现象的激昂说教，不过是一种酸葡萄哲学。看来好像是卢梭没有做好蒙泰居伯爵的秘书工作，后因傲慢而被轻易地于1744年8月6日撤职，最终迫使他脱离了那个他反对的无容身之地的世界。那封写于1749年致马尔库西的神甫德莱唐先生的信，不仅是卢梭笔下第一次对腐败的巴黎社会的激烈攻击，而且是一种早期的迹象，表示他正转变为一个被愤懑、讥刺和怨恨所支配的人。卢梭开创的新哲学，从传记的角度说来，是一桩个人的琐事，但在历史舞台上，它的影响却注定要非常非常重大。

卢梭一生事业的最后28年专注于传播上述观点。这是他非常成功的一项事业，因为这些观点已经深入欧洲的思想意识。但在我们论述那些作为他宣传媒介的书本之前，最好还是先把卢梭社会理想的特征加以说明。这些理想同他描写的当时丰富多彩的现象是并列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当然是假装的——在描写日内瓦社会和日内瓦政府。卢梭在他离开出生地日内瓦，并大胆地投入上流社会中去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加尔文教义，信奉天主教了。在他失望沮丧之余，他作为一个忏悔者回过头来转向自己国内的诸神。他重新加入加尔文教，重新获得因一度叛教而失去的公民身份，从此以后他把自己说成是“日内瓦公民”而感到自豪。这时，在他心中，他所热爱而念念不忘的被多少有些美化了的日内瓦形象，同一种与古代社会的，尤其是帝国前的罗马和斯巴达的美好景象融为一体了。再没有什么书像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那样对卢梭的思想产生更为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影响了。很明显，他深信在加图的罗马与加尔文的日内瓦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这种东西里面，他认为有集体生活成功的全部奥秘。很不容易说清楚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因为卢梭是一位给人们以高度暗示而不是作简单明了论述的作家。但是，如果我们给上述这种东西定义为“共和精神”，或许可接近他的信念的核心。卢梭的理想公民是有道德的人，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的锻炼，有坚强和独立的个性。他认为他已看到在三个共和体制的古典中心实现了这样的典型。卢梭用它来同凡尔赛宫的寻欢作乐者和巴黎的寻欢作乐者，即旧政权宫廷社会中那些天真的骄奢淫逸者，以及比较理性地、系统地崇拜贤哲们所信奉和传播的最大幸福原则的一些忠实信徒这两种人相比。对于这两种典型，卢梭不但否认其人的价值，而且认为他们都没有适应健康而持久的社会生活的能力。

不难看出，当卢梭谈论，或者确切地说热衷于鼓吹他所谓的历史典型时，他给我们显示的不是一幅实际的而是虚构的图像。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后，他住在日内瓦的同胞市民迪庞于1755年6月20日写信给他：“你给我们描述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我们现在如何如何。”^[6]正如许多其他社会理想曾在历史的幌子下被提出来一样，卢梭的理想也同样是由他对未来的希望，而不是由任何过去的现实所决定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斯巴达的、早期罗马的以及日内瓦的某些特征乃是卢梭所设想和期望的那种社会的标志。

首先，重要的事实是：这三个城市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即不但小于我们现代的特大的拥有卫星城镇的大都市，而且小于卢梭时代的巴黎。卢梭本人告诉我们，当时日内瓦约有2.4万居民。^[7]原来，一个2.4万人的社会乃是尚未完全脱离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群体，其成员仍然被置于一切生命体的摇篮中，只能说达到了人的“自然”模式的程度。而且，这样大小的乡村城镇往往是紧密结合的相邻单位，其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人人皆知的，因此有大量的虽非正式，但并非没有效果的道德监督。谁愿意世界上居住的都是有道德的和爱国的人（这种道德和爱国心是以睦邻友好的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谁必定期望这种类型的社会环境。同样的情况也将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样，一个良好的政体将会产生，以补充良好的社会体制。不但不会有当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罅隙隔阂，而且公民作为选民会确切地知道权力将委之于谁。所有候选人对于选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而使权力归于理应得到并胜任行使权力的人。

所有这些都是卢梭的社会政治梦想的重要内容。但是共和罗马和当时日内瓦的另一个特征，甚至更有助于人们试图去认识其本质并了解其影响。共和罗马和当时的日内瓦，大体上都属于社会成分比较相同的群体。卢梭这样研究古代史得到的印象（一种并非毫无道理的印象）是：罗马原来聚居着一群顽强的农民，他们耕种着祖传的土地，培养各种必要的本领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付国内的统治者和国外的潜在敌人。这种类型的农民将各自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并没有任何高度发展的分工，不依靠任何至关重要的市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福利，而公共福利对他们的劳动来说仅仅是一种意识不到的事。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下面这一点也是

卢梭社会理想的主要部分，即个人的独立对他来说是第一愿望。至于他认为的由社会契约而产生的整个社会，对他来说只是第二位的现象。因此，“自由”是卢梭政治词汇中的关键字眼之一。但“平等”也是另一关键字眼。农民群体通常是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的，尤其是当耕地周围尚有大片未占用的无主地时，如果需要增加土地，他可从中再开拓一些或另外再获取一些份地。卢梭之所以严厉谴责第一个筑起篱笆圈起一小块土地并说“这是我的”的人，从他上述的观点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正是这个人迈出了第一步，走向欧洲贵族们所享有的现代土地垄断，最终破坏了古代农民们享有的事实上的平等。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卢梭把像日内瓦那样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同早期罗马典型的乡村公社的结构等同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种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特征确实是一样的，也就不难理解了。日内瓦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社会成分比较相同，比较自由和平等。日内瓦有一群以钟表匠和其他手工艺者组成的独立生产者。虽然他们毫无疑问在互相竞争，但是他们的美好生活首先依靠他们自己的行业和技能。他们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正如罗马的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家宅和土地一样。两者的相似是明显的。卢梭的社会理想如简化成简短的公式，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或者是农民和手工艺者的社会，或者是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上无雇主，下无奴隶。他在一段最具有特色的论述中写道：“法律总是对有产者有利，对无产者不利。因此可得出结论：只有在人人都占有有一些，而无人占有太多的情况下，社会状况才会对人类有益。”[\[8\]](#)

显然，这种理想观念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了当时存在的第三等级的愿望，或者在今天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使社会结构复杂化，并使整个卢梭学说的观点已失去其过激性质的情况下，主要是系统阐述了中产阶级的抱负。卢梭对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具有吸引力，而旧正统派对贵族和僧侣具有吸引力；伏尔泰式的哲人则是对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卢梭之所以超越同时代人，不仅因为他个人具有卓越的天赋，也不仅因为他体力上的无能和生活的经历使他养成了作为政论家为使其书籍和小册子具有必要的尖锐锋芒所需要的那种辛辣和尖刻，而且因为他站在一个新的高屋建瓴的地点观察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这些重大问题，而就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而言，这样看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卢梭是从《论科学和艺术》一文开始他的伟大征程的。1749年第戎科学院提出以“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淳化社会道德？”为第二年获奖论文的题目。当卢梭碰巧遇到这个问题时，一种强烈的感情占有了他，震撼了他的内心深处。五年多来一直在他脑海里酝酿着的所有那些不平静的思想，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到了实处。他认识到他已形成自己的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他在自传《忏悔录》中告诉我们的说：“我一读到这些字眼，就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新人。”^[9]他是这样答复该科学院的问题的：文明曾经对各种美德起着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它曾败坏而不是纯洁人的道德。它已使我们天真无知的祖先们那种朴实的蒙昧粗野状态消失，而代之以虚伪的温文尔雅，表面上也许令人愉快，但实际上掩盖了许许多多的丑恶，如伪善、背信弃义、冷酷、猜忌、恐惧、仇恨等不一而足。卢梭坚持认为历史总是重演同一模式：文明同时带来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埃及、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好像不可避免地都走过同样的悲惨道路。他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试图说明个别的科学和艺术是如何产生于人类的缺陷，并且如何适应并增强这些缺陷。例如，天文学起源于迷信，修辞学来自阿谀奉承，如此等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受到谴责，因为本来就有几位伟大的“人类导师”值得人们感激怀念，但是他们已经过时了。而现代的文人们对社会生活是有害无益的，尽管他们显得生气勃勃，但并非出自真正的启蒙愿望，而更多的是渴望个人出名。只要他们确立某种情调，受到奖励的是聪明机灵，而不是英雄气概。

他第一次发表的这篇《论科学和艺术》语气既富挑战性，也不容忍异说。在《致博尔德先生的最后答复》中，他力图反驳一位很有才华的评论家的论点，竟然这样写道：“如果我是一个黑人国家的首脑的话，我宣布我要在边境线上竖起一个绞刑架，把第一个胆敢入境的欧洲人和第一个企图出境的本国人毫不留情地绞死。”^[10]无怪乎法国连同欧洲其余各国都大吃一惊，聆听以前从未听过的这种言词。

继第一篇得奖论文之后，卢梭于1755年发表了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二篇论文。这次第戎科学院出的题目是：“人间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为了就前一个问题展开争论，卢梭必须就他认为与之有关的基本问题形成某种意见：在不平等现象开始改变人和人类社会前，人是什么样的？要想找到人

类的这一原始模型，好比寻找格劳科斯^[11]塑像的本来面目一样，这个塑像长期沉没在大洋深处，被咸水腐蚀到已经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野兽了。研究所谓的“尼格里希亚”^[12]也帮不了忙，因为他们也经过了某些历史变化。卢梭得出结论，我们能够通过内省的方法，最好地重现原始人的光辉形象，一如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那样。我们大家在内心中仍然保持着原始人性，只不过文明垃圾已经日益掩盖了它，必须予以清除或者至少不去想它，以便让纯真的原始模型显出它的真实轮廓和色彩。这些就是卢梭这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新论文的基本论点。

通过这样的内省，我们能大体上描绘出人在天真无邪的孩童时期当是如何生活的图像。他的需要少而简单：他要吃饭、睡觉和寻找配偶，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手段唾手可得。既无肉体上的也无精神上的病痛折磨他。没有肉体上的，是因为病弱者未脱婴儿期已悄然离世；没有精神上的，是因为反应还没有开始投影于人脑。对死亡也无恐惧。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社会习俗给我们在生活中带来的错综复杂的麻烦也不存在，甚至也不存在家庭把人束缚住，剥夺他的独立性。男女偶然相遇又分手。孩子一断奶就必须自己喂养自己。原始人实际上就是这样互不往来的。卢梭不久在他的《爱弥儿》中写道：“人类并不是生来就聚居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而是散居全球的……他们愈是聚集在一起，相互就腐蚀得愈厉害。”^[13]但是，人虽然天生互不往来，但并不反对社会，因为他对人类各种形式的苦难都怀有怜悯和同情的心情。这种天然的生来就有的品质与理智毫无关联，事实上，理智才能的过分发展将会削弱这种品质。在文明开始使人类进化，更确切地说，是败坏人类之前，也就是人类因而自相矛盾地在还没有进入社会生活并思考道德问题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合群和比较讲道德之前，这种品质是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像动物一样，人类起先享受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固然是在有限的视野以内，但却是一种自然而单纯的幸福。

然而未来苦难的种子从一开始便埋藏在人身上。大自然给予人两种极有价值但也有潜在危险的禀赋，即自由的意志和追求知识的完善。一旦社会生活开始发展，它们就被人认识了。社会生活究竟为什么会发展，对卢梭来说，是个难解之谜，是个大难题。因为，他认为社会状态带有趋于组织化的内在倾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无忧

无虑的祖先有什么吸引力。他对社会习俗是如何形成的即使有什么理论的话，那也是把它归因于各种不幸环境的积聚，这些不幸环境多少带有偶然性，“或许从未发生过”，^[14]就像气候变化和地球上人口的增多。但是，无论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因多么说不清，卢梭告诉我们，其后果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停止过游牧生活，这意味着不但不再到处漂泊，而且意味着不再随时更换配偶。但是定居下来便产生各种习惯，这些习惯可由“我的”和“你的”两个词加以概括。于是一旦这些概念产生，无数的罪恶便接踵而至：嫉妒与羡慕，虚荣与傲慢，如此等等。于是，小块土地的私人专用权确定了这些发展。在卢梭的哲学里，这些发展就像《圣经》中堕落所起的作用一样。有了财产，便产生了不平等。有了不平等，便产生不安全。人们互相猜忌，为维护他们所占有的东西而操心发愁，为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恐怖所威胁，终于在某些富人的怂恿下同意把财产提高到法定原则的水平。这便是第一个社会契约，一个虚假的社会契约。其恶果只有靠某种新的更好的社会契约来加以克服。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卢梭政治理论的核心。他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比得上他的论文《社会契约论》更为感人。该书出版于1762年，书中他深思熟虑地研究了日内瓦共和国这个人口不多的典型国家的最初宪法并将之理想化。这里，如同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那样，立论的基本信念是这样的论点，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对于人类来说并非真正自然形成的东西。因此，如果这种生活要想存在并继续下去，必须要有意识地来安排，即通过契约加以确定。其基本意见是：从前有若干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意志创造了一个新的实体，一个新的存在，即社会团体和国家。从此以后，不仅有那些已经联合起来的人们的个人意志，而且除此之外有一种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在法律支配之下的公意。这种社会的公意，不同于，而且凌驾于社会内的个人意志，不过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终结。当然，如果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即一个人的意志从属于另一个人的意志，那么个人自由一定会消失。但这绝不是订立真正的社会契约所产生的情况，这同卢梭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讨论的立法的虚假形式恰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国家和社会的缔造者所服从的不是个人意志，而是一种非个人的意志，换言之，是一种对所有人有同样约束力的客观法则。这种非个人的意志，这种客观法则，

简言之，这种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可与即使史前时期的“自然”人也受其约束而并不丧失其基本自由的自然法相比拟。读者可以看出，卢梭在他这篇最重要的论文中，其态度已从主要是批判性的转变为比较建设性的了。论文告诉我们，这一创造性的行动带来一种在共同法律下的共同生活，人类得到的要比损失的多。这一行为用道德的公正替代了野蛮本性；用有公民特征的理性自由替代了野蛮人享有的未开化的独立地位；从而为更开化的生存奠定了基础，使“愚昧笨拙的动物”转变为“理智的生物”，成为“人”。^[15]

于是，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状况被断定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困难了。“人总是自发地向往善，但他们并不总会自发地认识善。”^[16]在没有系统表达的公意中所隐含的内容必须在系统陈述的公共法律中明确地加以规定。如何使前者在变成后者的过程中丝毫不会丧失任何东西呢？面对这个艰巨任务，卢梭转而依靠两个权宜手段：在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采取由多数决定的办法；采取由梭伦和利库尔戈斯^[17]式的立法者进行干预的办法。多数决定本身很可能符合真正的公共利益，只要投票者掌握准确的事实并不受愚民宣传的影响，但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会如此。卢梭显然是设想：在像他想象中的那样的小社会，而且是需求不多而简单明了的正常社会中，意见的冲突往往出现在技术性的事务和方法上，而不是在原则或实质的问题上。前者应该依靠理性的讨论及和睦友好的决策加以解决。但是不管所有这些可以多么好地导向正确的行动路线，卢梭似乎宁愿选择立法者的干预，尤其是关系到基本法时应如此，由立法者断定什么是公意并把它写成文字。立法者必须说大家要说的话，只要他们知道怎样说。所以他仅仅是他们的喉舌，不是他们的主子。由于这个原因，立法者的行为不是侵犯，而是履行订立契约的人民的主权。对于法律的施行有可能落入不爱国的人们手中的危险，卢梭看到只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广大人民对被委之以执行公意的任务的人们保持不懈的警惕。

这一理论，总的来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社会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通常被说成是个人主义的，原子的，或机械的。它把第一位的存在归于个人，认为人就像是社会的原子，而把社会看作派生出来的东西，是第二位的，是较低一级的实体。这种观点在通篇《社会契约论》中是明确的。在卢梭为百科全书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专条中说得更加清楚。因为，虽然他在文中把社会的农、工、商活动比

作人体的消化过程，并运用更多的这类比喻，但他从相反的、固有的传统中借鉴的仅仅是它的语言和外部装饰。就他的论点的实质而言，毫无疑问，他认为社会根源和存在并不是由于大自然，而是由于习俗和惯例。社会的产生和继续活动是因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要它这样。他们之所以要它这样，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存在于公共的生活模式中。

尽管如此，卢梭仍感到社会不仅仅是，也必然不仅仅是一种公用事业。他认识到若要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继续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普遍具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准则，共同的设想和信念。没有这些，它的内聚力就会太弱，抵不住不可避免的历史转变和冲击。这就是卢梭以研究宗教的社会作用来结束《社会契约论》的缘故。为了巩固国家的结构，需要有一种公民的信念。基督教起不到这一作用，因为基督教——至少是真正的基督教，即圣经的福音所体现的基督教——太注重修来世了。逆来顺受的士兵永远不会起到这一作用，面对暴政或暴政威胁同样本能地忍气吞声的公民也是如此。然而基督教也绝不应被另一套教条来替代。人们的信仰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面对终极的奥秘，出现不同意见是可能的，而且应当得到尊重。公民的信念应该只关系到公民的事务。所以卢梭简洁地陈述其信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有一个全能而至善的神；有一个死后因正义受到奖赏，邪恶受到惩罚的生命；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不接受这些主张的人就是反社会的，应被放逐国外。实际上，卢梭甚至写道：“如果有人已经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是一样的，那么就应该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18]在这里人们几乎可以亲眼看见罗伯斯庇尔的严厉形象，隐隐出现在他老师的后面，其影子投向他的前面，在罗伯斯庇尔的后面则是断头台。

上面引述的词句把多少有点冷酷而不协调的说法写入书中，使许多人感到痛苦。例如格林写道：“一部像《社会契约论》这样崇高的创作，竟然加进去如此可怕的词句而损坏了它的形象，乃是文学记载上最令人不解的谜。”^[19]诚然，这段话所表达的态度是不能宽恕的。但是尽管它是不能宽恕的，却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必须想到，卢梭的理想既不是无政府的状态，也不是自由主义国家，更不是类似这样的公民国家，由于缺乏更合适的词语，我们也许可以说成是一种睦邻社会。在一个小村庄，或在一个封闭式的部落或市镇，社会压力

总是强有力的，并且必然如此，尤其是要实现高度的道德风尚的话。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放逐曾经是他们的法律的最新规定。

简略地看一下卢梭两篇次要的并非纯理论性的论文，将会使我们对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述告一段落。一篇是他的《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写于1771年前后。他在此文中主要建议：因幅员比较辽阔，波兰应当划分成小的自治州。他写道：“几乎所有的小国，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其繁荣昌盛就因为它们不大；因为所有的公民都互相认识，互相监督；因为公民的首领能亲自发觉哪些错了，哪些必须纠正；因为他们的命令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贯彻执行。……只有上帝才能统治[全]世界。治理大国是需要超人的才干的。”

[\[20\]](#)1765年的《科西嘉宪法草案》涉及一个大自然将其疆域绘制得很狭小的国家，引发了卢梭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关公民道德完善的问题。他劝导科西嘉人应当坚持过他们祖先过的那种艰苦而质朴的生活；他们应当回避对外贸易，因为它带来腐化；他们甚至应当在用钱上吝啬。道路不多更好，因为这样居民们将会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从而保持他们坚强的独立性。至于财产，理想的是每个科西嘉人应当只占有其劳力所及的土地。在实践中，既得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不过必须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朝大块地产发展。在所有这些论点中，不难听到日内瓦人——加尔文派教徒——和小资产阶级的声音。

除了恰当地说应称为政治著作的作品之外，卢梭主要在两部小说中表达了他的想象力，这两部作品都是在《社会契约论》发表之后几个月内出版的：《新爱洛伊丝》（1761年）和《爱弥儿；或论教育》（1762年）。两部书中把对待自我、上帝和大自然的一种新态度，介绍到欧洲的思想中。正如弗洛伊德一样，卢梭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区别我们本身具有人的自我（这是固有的和基本的）和社会的自我（这只是次要的和外来的）。要了解我们自己并实现自我，我们必须找到人的自我，而这只有在我们独处时才会显示出来，而绝不会在社会中显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追求的那种自我显示的独处状态，不应是在房间和斗室中的独处，因为在这些地方四周墙壁围着我们，好像在逼迫我们，仍然会对我们谈论社会、义务、纪律和所有其他文明的和人为的因素——它应当是自然的独处状态。只有在自然的独处中我们才能处于，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在这时

我们才能接受到我们知识范围所能达到的对造物主的认识。正如《新爱洛伊丝》里临死的女主人公的话所表明的，在卢梭的宗教思考中，既没有圣经，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立足之地——既没有神的启示，也没有道的化身的立足之地。卢梭对神的概念，像在《爱弥儿》中题名为《萨瓦牧师的自白》的那部分中所典型地阐明的那样，是纯自然神论，即没有任何教条、具有某种泛神论倾向的宗教。像在他之前的斯宾诺莎一样，卢梭发现要区别自然与自然的创造者是很难的。对任何强调认为这是一种智力上不充分的状况，实际上是思想糊涂的证明的人，他一定会回答说，鉴于我们四周都是奥秘，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

一点也不奇怪，《爱弥儿》一书的“不敬神”学说受到加尔文派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同样谴责。在1763年5月12日卢梭又一次切断了同他心爱的故乡日内瓦的一切联系。他宣布放弃日内瓦市民身份，以回答上议院对他这本书的公开谴责。但比来自正统观念的敌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聚集在《百科全书》周围的所谓“贤哲们”，即伏尔泰式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的同等的，如果不是更猛烈的敌视。一条很宽阔的鸿沟现在把卢梭同霍尔巴赫和达朗贝尔等人隔开了。而公众曾一度把这些人同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卢梭颂扬感情，而这些人主张理智；卢梭反对创新，他们为革新而自豪；卢梭相信人类的历史变异和可变性，他们则以人性永远不变的概念指导活动；卢梭认为自然和独居是高尚生活的真实背景，他们则认为城市及其沙龙才是高尚生活的背景；卢梭接受神的存在，他们则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这些分歧首次尖锐地表现出来是在1757年年底至1758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当时卢梭编辑了他的《论道德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整个矛盾集中到一点：他解释说，启蒙运动哲学家们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他的理智。而他接着说，但在我看来在于他天生的善良。聪明的增长既没有使我们更明智，也没有使我们更善良、更快乐。作为一个民族，“就我们的智能来讲，我们是渺小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感情，我们是伟大的”。^[21]《爱弥儿》的出版可以说使上文中所预示的卢梭同霍尔巴赫一伙人之间在理智、道德和个人等方面的疏远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表面上两个阵营之间愈益敌对的论战看起来像一场纯文学上的争吵，但实际上是整个两派哲学，且不说是两个阶级的对抗。我们的全部研究已经证实我们开头所下的断言，即如果说伏尔泰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仍在高喊改革，但已多半满足于当时的状况，那么卢梭

便是小资产阶级的首领人物，热衷于彻底革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宣扬无产阶级和未来的无产阶级运动。对那些哲学家们，最使卢梭感到恼怒的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是他们的教条，即他们认为就幸福来讲，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余地，因为所有的人通过习惯已经适应于他们的命运了。卢梭写到《爱弥儿》中的那个可怜男人时说，“没有什么习惯能把他从厌倦、疲惫和饥饿的肉体感觉中解脱出来”。^[22]这句似乎平常的话比乍看起来的含义要多得多。这句话与其说是在18世纪后期说的，倒不如说是在即将跨入一个新时代，即19世纪说的。诚然，在1761年旧制度仍在进行着统治，特权阶层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决战还未到来，但是《爱弥儿》的作者与他的《百科全书》派的老朋友们之间的冲突已预示着巨大的社会动乱即将来临。

卢梭学说作为一个整体，其真正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看一下不禁使人联想到卢梭学说，并可与卢梭学说相提并论的英国和德国的发展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经济上英国远比法国发达。因此在英国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传递者是一种典型的工人阶级运动，即卫斯理教派。卫斯理教派一直用创建者最喜欢的字眼，被说成是一种“心灵宗教”。这个说法不禁使人回想起《爱弥儿》中的一句简短而富有表达力的话：“真正的崇拜是心灵的崇拜。”^[23]约翰·卫斯理与英国国教教士之间的关系，同卢梭与启蒙运动者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爱德华·扬在他的《夜间思考》一书中称上述教士们是“冷心肠的、冰冻了的形式主义者”^[24]）。卫斯理和卢梭都激烈反对极端的理性主义、外表的社会一致和对宗教的冷漠。为了对自己被指斥为狂热者进行辩护，卫斯理于1771年8月12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欣斯特拉先生称作狂热的东西本身，只不过是心灵宗教而已；换言之，即是圣灵中的正义、和平和欢乐。这些东西必须是感觉到的，否则它们便不存在。因此，所有笼统谴责内在感情的人，不在宗教中给欢乐、和平和爱情以存在的余地，结果把宗教化成一具干枯的死尸。”

这些就是卢梭学说的真正特点所在。人们甚至可以从约翰·卫斯理的追随者们的陈述中比从卢梭本人那里更清楚地听到这些特点，因为卢梭本人仍然有许多东西来自旧的精神。^[25]但是他已感觉到潮流，并且被潮流所席卷，以致在《对称之为卫斯理派的忠告》一文中，他称他们是“宣称追求心灵神圣和生命神圣的人”，心灵在这一

定义中是关键词。没有比该运动产生的赞美诗文学更能显示出它所充满的那种高度炽烈的感情了。把那些往往过分通俗，但总是暖人胸怀的查尔斯·卫斯理的诗歌，与形式上虽更完美，然而十分冷漠无情的赞美诗（譬如艾迪生的）相比较，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英国的卫斯理派教义与法国的卢梭学说共同具备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卫斯理在他的许多次旅行中总是随时留心观察乡村的美景。足以代表他的特性的是他对都柏林周围没有飞鸟和对马恩岛鸟类繁多有着同样的感受，而这些事情，理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注意到的，更不用说去写它们了。在他关于《家庭宗教》的布道中，他劝告父母引导孩子们通过对自然仔细思考来认识创造自然的上帝：“虽然你看不见上帝，但上帝在天上，比太阳还亮得多！是他，是上帝，创造了太阳，创造了你、我和万物。是上帝使得花草生长，使得树木葱茏，并在上面结果。”很明显，这是具有卢梭风格的主题。虽然卫斯理总是小心谨慎地不越过一神论雷池一步，从未偏离到泛神论，但他和那种认为造物的奥秘首先是自然的奥秘的人同属一个门第，则是不会有误的。二者出于同一渊源，即上帝的游咏诗人圣方济各的渊源，他把爱慷慨地给予太阳兄弟和月亮姐妹，给予鸣禽和游鱼。

大约在这个时期，处在一个理智更高深和社会水平更提高的英国社会，表现出对原始事物和自然状态重新产生兴趣，反对讲究文雅和人为的做作。这是一种对卢梭呼吁回归大自然的肯定答复，虽然比较起来热情或许还有点不够。像罗伯特·洛思的《希伯来人的敬神诗》（1753年）一样，罗伯特·伍德的《荷马的创作天才与作品》（1769—1771年），以及理查德·赫德的《关于骑士文学与传奇文学的通信》（1762年发表时未署名）等为消除当时存在于知识界的反对原始民族“野蛮”和“粗暴”的文艺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并为莪相诗歌铺平了道路。莪相诗歌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极大成功证明在二三十年内公众已经脱离理智主义者所藐视的一切非抽象的、准数理的和新的东西多么远了。莪相诗歌本身出现在1760年与1763年之间，并不像它们自称的那样是远古年代的吟游诗歌，而是出于苏格兰一位名叫詹姆士·麦克弗森的教师之手。这些诗歌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真的吟游诗歌这一事实，证明公众对原始文学的态度当时还是热情有余而缺少辨别能力。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像麦克弗森这样的苏格兰高地人，他的根

子仍然可以回溯到史前时期的生活传统。他出生于1736年^[26]，在氏族社会里度过他的童年，这个社会当时还没有开始最后崩溃。

洛思、伍德等人通常被说成是“前浪漫主义”作家。欧洲大陆各国也出现了一些人物，理应获此称号。其中最伟大的大概要数德国的尤斯图斯·默泽尔，他的《奥斯纳布吕克史》开始写于1762年，发表于1768年及以后几年。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位让-雅克·卢梭在德国知识界的同道，两人的共同信念主要是他们偏爱非官僚政治的小城邦和传统的乡村式生活。然而默泽尔之超越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仍然很有限而且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把他同洛思和伍德相比，但是不能把他同卫斯理会教徒相比。他容许欧洲上空吹来的清新空气触动和改变他的作品，但不容许它彻底改变他的生活。然而还有一批德国人，他们把心完全自由地向清新空气敞开，因此他们的整个人被改变了。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狂飙突进派。意为“有紧迫感和强烈追求的人”。^[27]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年轻人，出生于18世纪40年代，现正逐渐趋向成熟。为了突出表现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背叛，他们之中许多人扔掉“上流社会”仍在坚持戴的撒了粉的假发，披着他们的天然头发四处走动——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们决心要“回到自然中去”。于是卢梭主义作为一次运动，在莱茵河以东明显地表现为青年运动的形式，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英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比法国更先进些，那么德国就更为落后了，那里简直没有工人阶级能够吸收和传布的新道理。市民作为一个阶级实在太胆怯，太容易屈从于政治当局，太受现存的半封建社会的牢固控制，以致不敢在任何重大程度上鼓起勇气朝着新的激进的革命哲学前进。只有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听从号召，加以响应。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人使我们想起卫斯理派，纵然他们的背叛并不总是以特定的宗教形式出现的。

事实上，它往往以宗教形式出现。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是这批人物之一。他接受路德教的牧师职位，正如约翰·卫斯理接受英国圣公会的一样。但是不久，他对旧教派牧师同伙们的态度变得互相疏远了。他在1772年3月21日致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的布道就像我的人一样，没有多少是牧师式的：它们是全部心灵中流露出来的人的感情。”^[28]赖因霍尔德·伦茨在他的诗《爱德华·阿尔威尔斯的无与伦比的宗教赞美诗》中表达的甚至更加鲜明，其中一节直译如下：

不，我呼喊——救世主！上帝！

这颗心已干渴，渴望得到满足！

假如做不到，那么宁可

打碎您创造的形象！

正如这些诗句所表示的，有些年轻德国人被卷入狂飙运动中，过着狂热的生活。激情驱使他们达到了如果没有丧失自制能力的话本可避免达到的地步。其中相当多的人无异于歌德小说中不幸的维特，结果都精神崩溃，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自杀身亡。不管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如何从感情出发加以重新解释，他们的叛逆行为的动力一般促使他们越过基督教教义的范畴而陷入泛神论。歌德的两篇早期作品：《……牧师们致……新牧师的信》和《两个重要而迄今未讨论过的圣经问题》（二者都写于1773年），明显地受到了卢梭的《萨瓦牧师的自白》的信念的启发。这些文章的某些段落读起来表面上像是约翰·卫斯理写的，但其精神毋宁说是卢梭的。经过了几年的探索，赫尔德、歌德和他们的许多友人在新柏拉图哲学里找到了新的思想掩蔽所（外表上表现为他们加入了共济会）。根据新柏拉图哲学的说法，现实世界的一切弥漫着一种神圣精神——虽然是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已不再是一神论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已不再被想象为一个确定的人。这就是同一思潮在英国使宗教复苏而在德国却使宗教削弱的原因——实际上，在德国为偏激的无神论和像费尔巴哈或马克思等人的唯物论敞开了大门。就在这个时期，上帝=自然的公式被确立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里，这一公式使上帝一词很易于被人们丢掉和丧失。

新精神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实在太多了，不能在这里一一加以详细考察。其表现得最典型的例子是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剧本《强盗》，首次发表于1781年，再次发表于1782年，在书的扉页上印着一头跃立的猛狮和题词：“在蒂拉诺斯。”该剧写的是卡尔和弗朗茨兄弟俩的故事。弗朗茨是旧社会的典型产物：自私、虚荣、懦弱，但首先会为自己打算，并善使心计。另一方面，卡尔则是一个大自然造就的人——有点像青年人那样的粗野，但正直、坦率、坚强和心胸开阔。由于这些品质，他终于被逐出庄重而高尚的社会，被迫加入一个由其他桀骜不驯的年轻人组成的帮派，成为活跃在波希米亚森林里的造反者——庄重而高尚的社会里没有像他这类人的安身之处。即使这样简单扼要地描绘其主要角色，也可显示出该剧是把卢梭关于人的“自然”与“非自然”，正确与错误的学说搬上了舞台。主题和倾向

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如默尔克的《奥海姆先生传》，克林格的《西姆松·格里萨尔多》，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等等。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讨论了以下矛盾冲突：一方面是基本的、自然的和纯正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是它们的主人公同社会上冷酷、没有生气、矫揉造作的外表礼节和习俗进行的斗争。这些人物生活中的戏剧，通常总是悲剧，就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卢梭所阐明的主题已为西方主要国家所接受，并加以转换而吸收进自己的基调中。这样便产生了许多变异，同时反映并表现出欧洲的一致和民族的差异。在研究其主要表现时，曾经一再使我们把它说成是造反，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1789年的政治大危机。但是造反和革命似乎注定难逃火的规律：它们倾向于走极端，好像要冲向无政府状态。当这种现象出现时，反作用的力量必然产生；法律与秩序必须重新加以维护。拿破仑就是这样。在他身上我们必须看到他既是18世纪最后10年大动乱的产物，也是它的逆流。现在，思想意识的历史同政治事件的历史呈现出一模一样的模式。在18世纪60年代，欧洲思想界从一个世纪以来强加于他们的理性主义枷锁下解放了出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享受到新发现的自由并对其进行实验。到90年代，回到更有纪律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来到了——实际上是回归理性（而且是不止一种意义上的理性）。在上一代风暴之后，首先倡导并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平静的伟大哲学家是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赫尔德和歌德分别出生于1744年和1749年，前面已经谈到他们最后以泛神论者而告终。他们是满怀着那种永远无法下定义的，也没有理性可约束的“海洋一样情感”的人。另一方面席勒生于1759年，是他们较年轻的同代人，则发现屈从于康德思想的严肃的准则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18世纪中叶各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现实生活的因素中，无不最后导致荒谬的结局。那些新人反对死板的形式主义，比如戈特舍德的诗学，他们通过柯珀的诗句嘲笑地说：[\[29\]](#)

诗人不是用矩尺和卷尺工作，
像铁匠和木匠那样完成图样。

但不久他们便发现，没有格律的诗往往流于结结巴巴。他们反对庸俗道德的繁文缛节，但他们立刻发现一个社会没有某种道德，即某种纪律，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主张所有个人的权利“都是他们自己的”，但他们马上发现如果这条原则彻底实行起来，共同的生活将分裂成为不相关联的私人世界，其中每一个人不是自由人而是囚犯。从J. G. 哈曼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多么容易变成现实。哈曼是康德的柯尼斯堡同乡，被称为“北方魔法师”^[30]，这里“魔法师”意味着“深奥莫测的人”。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遇到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话，哈曼的作品确实无法读懂。但是他的语言——一种像天书似的神秘语言——极为晦涩暧昧，以致很难窥测其中心思想。他认为，有关“自然和历史的书籍”，除了“密码和暗号”外，什么也没有，因此要求天才应当摆脱一切规则，好比“无花果树抖落它的果实”一样。^[31]所以他说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预言、玄想和世界末日学说的深渊，直到再没有什么人能留下来追随他。可是康德多么不同啊！他努力寻找真知的条件，和约束所有人的正确行为的准则。

通过对狂飙突进运动的感情激励进行检验和提炼，康德做出了对他的时代最大可能的贡献。他使一些概念成为永恒，否则它们也许很可能是短命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重要性绝不限于他生活的年代。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把他与诸如柏拉图或阿奎那等系统阐述了恒久不灭的哲学的伟大人物等量齐观。在我们说他是18世纪的伟人之前，至少必须指明他的永恒意义存在于什么地方。

直到康德的时代，欧洲哲学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个传统的差异是多么深，从以下事实即可看出：甚至在中世纪矛盾就已经出现，而且纵使有人尽一切诚挚的努力想打破僵局，但二者总是势不两立，难以和解。在1781年，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首次问世时，要把如此完全不同的原理合在一起，也许仍然认为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恰恰就是康德所完成的功绩。

或许举一例最能说明涉及的是什么问题。人们经常谈论原因和结果。哲学家们经常试图确定这两个字究竟应作何解释。理性主义者感到困难不大，他们断言：我们的理性就提供了全部答案。康德因而把他们的哲学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当我们依照逻辑规则思考问题时，我们从前提得出结论，其过程一点也不神秘。所以，得出的论点是，我们思想上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向我们揭示出在我们思想之外的物

质世界里因果关系的本质。相反，经验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有关这种联系的任何知识如果要站得住，必须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观察。但是外部世界并没有给我们表明因果律的内在作用过程。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某些事实“X”接着发生了后来的事实“Y”。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反复出现，便逐渐习惯于把“X”同“Y”互相联系起来，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联系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充其量可以断言：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条因果律。这种态度说明了为什么经验主义者的立场往往也被说成是“不可知论的”。康德既不受理性主义—教条主义的肯定论点，也不接受经验主义—怀疑论的否定推断，但他自己的答案却仍然明显地与二者相似。他教导说，因果关系本质上可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现实，因为它存在于我们本身之外。但是我们的头脑是这样构造的，它会通过因果的模式把适当的连续现象联系起来。这种因果模式是先验的（存在于任何具体经验之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可与理性主义立场相参照）。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一种思想形式——在同具体经验接触之前仅仅是空洞的可能性；它还不是现实，甚至连精神上的现实也不是；它只能通过在外部世界观察那些提供和归入这种模式或形式的事例来加以认识——我们也仅仅能认识它——（就是说，在经历之后或通过经验而凭经验来认识它——即经验的推断）。康德用这种观点把许多世纪以来相匹敌，毫无结合倾向的两种思想路线结合在一起了。

康德把这一调和原则应用于哲学上所有的基本争端。比如，时间和空间，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曾是先天的概念。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它们是外部世界的特征，我们认识它们同我们认识空间里的东西和时间上的事件一样，并无二致。在康德看来，它们都是认识的形式，属于人类认识的范畴，在人类具有认识本身之时即已具有，因为它们都是认识的基本要素。这样，康德就随着理性主义走得很远。但是形式没有内容等于零。对于形式当然可以这样说：只有当某种物质来形成它们时，它们才会成为现实；而这种（认识的）物质，只有当我们通过眼、耳、鼻、味觉和触觉认识到外部世界时，才会被我们所认知。因此，不但理性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经验主义观点最突出的要点也同时被接受下来：“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直觉。” [\[32\]](#)

从总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一专门性的哲学，其超越一切之上的重要性何在是显而易见的。大致加以阐述，我们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大哲学家如柏拉图和圣·托马斯，直接把他们自己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康德则开始证明：哲学的有决定意义的和唯一会产生成果的任务乃是研究人类的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确定真正的认识是怎样才完全有可能，以及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康德之前的哲学家们总是设法去识破存在的奥秘；而康德则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人类周围的奥秘而言，什么是人类认识的必然界限？这就是康德所声称的他引起的哲学上著名的“哥白尼式的革命”。^[33]他的哲学与超验（transcendent），即超越人类知识及其各种可能的事物没有关联，但却是一种超验（transcendental）哲学，研究一切知识的极点，即人类理性的灯光所能照亮的区域和必须永远留在黑暗之中的另一区域之间的分界线的哲学。当我们向外推进，达到我们的认识的限度所强加于我们的极限时，我们终于碰上了三大“观念”，即上帝、自由和永生。它们的真实性我们确实能够设想，因为各种事实都表明它们；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真实性我们却永远也无法充分地得到掌握并证实，因为它们处在我们所知的事实之外。这三个“观念”使我们得以成为有活力的人，有“实践理性”的人，能够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确定当中绘制出一条航线。但是从“纯粹”理性的观点看，这些观念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定的东西，因为它们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这使我们必须探讨一下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康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局限的人，而不是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根据一个老的传说，康德的书斋里只有一件装饰品，即一幅卢梭肖像。毫无疑问，至少在他的实践哲学里，这位柯尼斯堡的哲人是深深地受益于那位日内瓦先知的，正如他本人深深地倾慕后者一样。卢梭在他给德乌德托夫人的第五封论道德的书信中^[34]宣称，“人类生活里所有合乎道德的东西，存在于人的意图中”。这几乎可以说是概括地预言了康德的伦理学教导。诚然，康德并没有同卢梭一样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这一点是重要的，它表明康德学说作为一种伦理体系，既是卢梭学说的继续，也是它的对立面。但是，就积极的行动准则而言，却令人吃惊地没有区别。康德学说，如同卢梭学说一样，均可纳入一对孪生的概念：自由和平等。

康德解释说，人可以从双重观点来考虑。我们可以把人看作是一种现象，如同其他现象一样。这样人看起来如同所有其他现象，如动物和无生命物体一样，受同样的法则和规律支配。这种探讨方法对于科学家，比如生理学家来说是自然的和合适的。但是对于伦理学来说，这种方法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开始考虑伦理行为的时候，我们立即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人是直觉地、坚定不移地知道他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他是自由的。当我考虑我应当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的时候，比如我应不应当宁肯邻居比自己更幸福，或者相反，这时我并不涉及各种各样的现象及其因果律和偶然性，我必须完全独立、负责地来做出自己的决定。于是我能够听从责任的召唤，而且必须要求自己这样去做。在康德看来，这就是人的真正伟大之所在。康德写《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比写《纯粹理性批判》时更感到自豪。按照康德全部著作中这部最主要的著作的论点，“善”与“恶”不属于外部世界，也不在外部世界中表现出来。因为在那里每一件事物看起来都是必然发生的，而“善”与“恶”是存在、对立和作用于人们的意识——照卢梭所阐述的即人们的意图——中的概念。对康德来说，符合义务的实践，意味着有规则地按这样的方法行事，即抵制我们天生的邪恶倾向，超脱其影响。如前面我们着重指出的，这是康德不同意卢梭的地方。但是显然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相同点远比分歧点更为重要。因为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赫尔曼·科恩称它为他的“纯粹意志的伦理学”——除了把义务奉为神圣外，还会是其他什么呢？而把义务奉为神圣，我们在卢梭的著作中同样也可以找到。卢梭谈到罗马和斯巴达的伟人英雄，如库尔提乌斯和加图时说，他们总是把公共福利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康德和卢梭都是跟着斯多葛派^[35]和传统的新教徒的足迹走的。

像这样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意志行为上的道德体系，必然会对人的行为的后果不感兴趣。康德学说事实上承认古老的格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伸张正义。它提倡的伦理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严格的，而不是有条件的、可调整的和功利主义的。照康德自己对它的表达，它的命令是“绝对的”，而不是“有前提的”。但是这意味着：它确定的行为规则必须是严格地抽象的或正式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允许存在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行为模式，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去考虑权宜之计，因而失去自己的特性，最终导致屈从于丧失道德的享乐主义。绝对命令必须像是这样的：“要做得对，不管什么后果。”但这一公

式太含糊。怎样才能使它更明确些呢？怎样才能把它加以详尽说明以便指导像人类那样必须在同伙圈子里生活和行动的生灵呢？康德总是待在形式主义的框子里，为了提出他的论点，他问道：如果我们抽象地来考虑，社会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它是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所组成的集合体，每个自我都有天赋的自由做出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作为有道德的动物的特征。社会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一定会问：在什么条件下所有联合起来的人们能够平等地坚持他们固有的自由而生活下去呢？对康德来说，社会生活的全部问题都包含在这个问题之内。很明显，对它的回答必须是：假如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就必须允许同伙们有同等的机会，像他们为自己要求的一样自由地、理智地做出决定和付诸行动。因此，康德的著名公式“绝对命令”就是：“只按照这样的准则去做，即依靠它你才能同时使之成为普遍法律”，^[36]即每个人的法律。它是一个产生于深奥的平等主义的公式。

这是卢梭的理论又一次被以更理性和更哲学的外观提了出来。这本《实践理性批判》应当大大地归功于26年前发表的《社会契约论》。因为二者要人服从的制约因素都是法律，“公意”只要仍然不是某一特定人的意志，只要它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必区分个人，那么如果说它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的话，那只是为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

这样，康德吸取了卢梭的政治和社会学说的非常宝贵的核心，把它从原来提出这一学说时所带的短暂存在的外壳中解脱出来，使之具有一种得以持续到遥远未来的形式。康德为卢梭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比他对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解释更足以说明问题的了。卢梭的著作不管对或不对，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社会契约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即使在18世纪也都知道这是无稽之谈，充其量不过是推测出来的历史。毫无疑问，康德认为社会契约是一种历史的虚构，是从来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指明了这种虚构能够具有多么巨大的实际用处。它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试金石，可用来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测试一般的政治安排，特别是法律的制定。假如我们设想，所有公民经过理智的考虑之后，愿意赞同这些安排和立法，假如这些安排和立法能够成为一个自愿加入和普遍承认的

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那么按照绝对命令的要求，很明显它们就是好的。否则就会是坏的。这样一来，社会契约的概念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幻想，而变成一条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政治——“管理”——原则，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理想。

所有这些都说明康德把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的最优秀的思想加以综合，提高到更加完善的地步。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它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常被这样称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说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因为他的著作使数百年来欧洲主要思想家所从事的哲学探索上的一些主要思潮趋于一致并臻于完善。说他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因为他的哲学的最终结果引导人们把精力从理论回到实践、从思想回到行动。《纯粹理性批判》好像在说：你在探索奥秘、追求真理方面能走多么远就是多么远，不可能再远了，否则就割断了一切形而上学推理的源泉，即相信可能有一天会知道显然不可知的事物。另一方面，《实践理性批判》则表明人在恪尽义务和追求理想时是最伟大的，这一教训已深深地渗透进欧洲的共同潜意识之中。19世纪是一个实践者的世纪，不是梦想家的世纪，而在促成这一事态中，伊曼努尔·康德的作用是不小的。

当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时，欧洲历史的指针已牢固地定在了这个方向上。诚然，对此最早最卓越的文学反应之一——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是为保存或恢复旧秩序而进行的激烈的辩护。伯克坚持认为，一个如卢梭和康德所想象的意志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将缺乏必要的社会凝聚力。只有有组织的地方才会有秩序；只有存在着像我们在健康的有机体中发现的那种以牢固建立和得到保卫的整体为基础的职责分工的地方，才会有组织。如果没有使统一中又有差异的等级，没有使差异中又有统一的权威，一个社会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伯克嘲笑那些认为社会只不过是一种像在“胡椒和咖啡、白布或烟草、或某些其他无关紧要的买卖”中签订的“合伙协议”一样的人。他把社会定义为一个传统的群体，是“我们出生于其中的古老秩序”。[\[37\]](#)

然而，尽管伯克能够给新世纪的第一个——反动的——25年以深刻的印象，但未来却不属于他和同他一样想法的人。接着出现的是另一位先知，即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他的口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很适合成为唯物主义时代的口头禅。边沁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道德及立法原理概述》于1789年问世，藐视所有形而上学是一种愚蠢的、无益的消遣。他给他的朋友乔治·威尔逊写信说：“我才不关心自由和必须这两种毫不值钱的东西。要是我看到我脚跟前躺着……有关该课题的任何……新真理，我几乎不认为值得去弯腰把它们拾起来。”^[38]那种事情现在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把全体社会成员的欢乐增加到最大限度，把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不用说，这种赤裸裸的、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同任何其他根本主张，例如康德的严格的理想主义一样，会引起同样多的哲学上的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类理性方面的先入之见已经过时了。18世纪最后30年内取得的巨大科技进步，在人们眼前变幻出一幅富裕世界的白日梦。虽然在从那时以来步步实现的只不过是一些引起新的失望和向往的东西，但它却支配历史和社会达百年之久，这一点大概是可以理解的。

（程子明 译）

[1] 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19世纪法国著名园林建筑师，以设计凡尔赛宫等多处皇家园林而闻名。——译者注

[2] 本书第7卷，原文第109页。

[3] 《书信全集》（1924年及以后几年），第3卷，第125页。

[4] 莫里斯：《少年歌德》（1910年及以后几年），第2卷，第54页。

[5] 摘自呈递给圣马里耶先生的关于其儿子的教育问题的意见书，见《书信全集》第1卷，第367及以下各页。

[6] 《书信全集》，第2卷，第193页。

[7] 富克斯编：《关于戏剧问题致达朗伯尔的信》（1948年），第125页。

[8]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2卷，第39页。

[9] 七星诗社版（1950年），第344页。

[10] 新版《文集》（1819年及以后几年），第1卷，第141页及以下各页。

[11]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译者注

[12] 尼格里希亚（Nigritia），苏丹的古称。——译者注

[13] 加尼耶编：《爱弥儿》（1939年），第37页。

[14]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1卷，第168页。

[15]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2卷，第36页。

[16]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2卷，第50页。

- [17] 梭伦，古雅典立法者；利库尔戈斯，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译者注
- [18]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2卷，第132页。
- [19] 《让-雅克·卢梭》（1955年），第304页。
- [20] 沃恩编：《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1915年），第2卷，第442页。
- [21] 《书信全集》（1924年及以后几年），第3卷，第361页。
- [22] 加尼耶编：《爱弥儿》（1939年），第266页。
- [23] 加尼耶编：《爱弥儿》（1939年），第381页。
- [24] 爱德华·扬：《夜间思考》，第8页。
- [25] 参见R. 诺克斯《宗教狂》（1950年），特别是第515页及以下各页。
- [26] 原文为1763年，按系1736年之误。——译者注
- [27] 源于F. M. 克林格所著剧作名。
- [28] 绍尔编：《与卡罗琳·弗拉赫斯兰的通信集》（1926年及以后几年），第2卷，第68页。
- [29] 参见柯珀的诗《对话》（1782年）。
- [30] 这一绰号，首次被C. F. 冯·莫泽尔用来称呼他。哈曼与布莱克的心理类型有显著相似之处。
- [31] 罗特和维纳编：《论文集》（1821年及以后几年），第1卷，第148页；第2卷，第430页。
- [32] N. 肯普·史密斯译：《纯粹理性批判》（B75），缩写版（1934年），第61页。
- [33] N. 肯普·史密斯译：《纯粹理性批判》（B75），缩写版（1934年），第22页（B XVII）。
- [34] 《书信全集》，第3卷，第364页。
- [35] 此处原文为Stoa。斯多葛派将履行义务视为神圣职责。——译者注
- [36] 《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第47页。参见T. K. 阿博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论伦理学原理的著作》（1923年版），第38页。
- [37] 里文顿编：《文集》（1826年及以后几年），第5卷，第184页，以及第6卷，第207页。
- [38] 鲍林编：《文集》，第10卷，第216页。

第四章 音乐、美术和建筑

一 音乐

我们对于启蒙时代最后几十年内音乐的进展只是逐渐有所认识，而且仍然很不全面。海顿和莫扎特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作曲家，而海顿在他自己的年代已在国际上有名了。这一伟大时期的音乐历史，虽然同样吸引着专家学者和凡夫俗子，但至今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评价。德国文学界的情况则不同，它已出现了一些评论18世纪同期几十年的卓越专著。其中H. A. 科尔夫的《歌德时代的精神》强调卢梭、康德对赫尔德和歌德的作品的重要影响，从而做出了显著贡献。鉴于音乐是一门极为独特的与本身的技巧联系在一起的艺术，谁认为歌德的诗学和美学与音乐无关，谁就是一位浅薄的音乐家。

因此，科尔夫设法探索“古典主义”的标准，以及他试图将“古典主义”定义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与19世纪“浪漫主义”二者独特的均衡融合体的做法，是值得全部应用于音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写的各种音乐通史，有两部是论述启蒙运动时期的。^[1]恩斯特·比肯的《洛可可风格与古典风格的音乐》（波茨坦，1931年）是该作者编著的《音乐手册》丛书中的有关卷帙。吉多·阿德勒主编的《音乐史手册》（第2版，2卷本，1930年）包括有关18世纪的几章，特别是阿德勒的《维也纳古典学派》、罗伯特·哈斯的《18世纪的歌剧》和威廉·菲舍尔的《1750—1828年的器乐》。

不出人们所料，德国编者比肯一定会强调曼海姆和柏林的重要性，而奥地利编者阿德勒则自然要颂扬维也纳的音乐荣誉。^[2]然而，断言这一时代唯一最伟大的音乐成就现代奏鸣曲是创立于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地点——维也纳、曼海姆、柏林或者米兰——除了抱有偏见者外，是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考察一下原始资料，出现于眼前的是作曲家和公众都对巴洛克时代的音乐表示普遍不满的情景，以及在各个不同地点同时探索适合18世纪后期格调的音乐结构的词汇和种类。在

这种情况下究竟谁占优先地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追溯到支配海顿中期和后期交响曲的四乐章格式的起源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格式由贝多芬而臻于完善，并在以后各个时期保持领先地位直到沃恩·威廉斯时期。阿德勒发现的格奥尔格·马蒂亚斯·莫恩1740年于维也纳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曾是一个议论很多的主题。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开头与结尾的快板之间，除了通常的徐缓调之外，还包含一小步舞曲。于是人们可以设想，这种意大利式的三乐章交响曲的延伸，流传并发生在维也纳（莫恩在那里任卡尔斯教堂的风琴手）的时间是约翰·斯塔米茨于1741年定居曼海姆之前。另一方面，正当斯塔米茨和曼海姆人开始支持把小步舞曲作为交响乐章的时候（巴黎也和曼海姆一样），维也纳的作曲家们瓦根赛尔与年轻的海顿和莫恩自己在继续写作三乐章的交响曲。加之，海顿在他无数次的结构实验过程中，发现把小步舞曲包含在交响曲中是悦耳动听的，并非受斯塔米茨的影响所致。海顿是在他的中期这样做的。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事情的症结。因为，现代交响曲是通过海顿18世纪80年代在巴黎和伦敦的作品的成功而确立的。海顿的小步舞曲导致贝多芬的谐谑曲，就这样改变了器乐的未来进程。但是仅仅将萨马蒂尼、斯塔米茨或者C.P. 埃马努埃尔·巴赫看成是海顿的先驱，对这些大师们是有失公允的。他们的某些作品，例如埃马努埃尔·巴赫的钢琴奏鸣曲和斯塔米茨的交响曲，除了它们的重要历史意义外，今天是作为艺术作品来欣赏的。与此同时，否认这些作曲家的形象比海顿和他的年轻同代人莫扎特稍逊一筹，则未免强词夺理了。一个叫海顿的人的高超技艺和他一生的经验当然也是形成和建立一种持续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格调所必需的。所以，说到音乐上的维也纳时期和维也纳古典风格，并不意味着谁占优先地位，也不意味着在产生某种艺术方面有独占的权利；它只是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欧洲的著名作曲家，不论生活得好坏都住在奥地利的首都，他们不一定出生在维也纳，但都定居在那里，并死在那里，例如格鲁克（1787年）、莫扎特（1791年）、海顿（1809年）、贝多芬（1827年）和舒伯特（1828年）。当拿破仑派了岗哨守护在海顿的家门口，以示对这位垂死大师的尊敬时，他承认维也纳是欧洲的音乐首都。这一名称实际上一直保留到1897年勃拉姆斯逝世时为止。

以上这些都可以从仔细阅读最近的音乐史中找到。另有两类出版物：词典和专著会大大增长我们的知识。

格罗夫的《音乐词典》，从问世起（第1版，4卷本，1879—1889年；第5版，9卷本，1954年）就为研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等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帮助。它的编纂发起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乐派权威。在它最近的一版中，内容广泛的海顿条目包含着别处所没有的新颖的研究成果。一本叫做《音乐的过去和现在》的德语百科全书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资料。到1960年为止，它已经出版了8卷，其中“古典”和“巴洛克”等词条表现出对文化和音乐两者历史的掌握令人钦佩。海顿和贝多芬的传记的词条旁征博引地从各个方面补充了格罗夫词典里的资料。

现代的学术性专著详尽讨论一个作曲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乃是19世纪中期的产物。1856年，奥托·雅恩这位权威学者发表了他的4卷本《莫扎特》的第1卷。这部杰出的作品曾被译成许多文本；^[3]在一个世纪内，它经过几次不同的修订，共出了七版德文本。雅恩严谨的典型很快被克里赞德尔的《韩德尔》、斯皮塔的《巴赫》和C.F. 波尔的《海顿》（共2卷，1875—1882年）所仿效。虽然我们对19世纪的这些作品，因它们难免有遗漏而可以多加指责，但是这些作家们的耐心工作至今还没有完全被取代。雅恩的《莫扎特》有所欠缺，主要是由于在写作时他对其他稍为逊色的大师们的作品几乎都不知道。既然莫恩和斯塔米茨的交响曲直到雅恩逝世之后才被发现，雅恩没有讨论他们是不能指责的。同样，任何生活在瓦格纳的“未来的音乐”同汉斯立克的“美的观念”发生矛盾时候的人，都不应当因为过分强调莫扎特的阿波罗式的和永久的美而受到指责。在我们今天，莫扎特艺术的超凡的和悲剧性的诸方面，也同样被某些雅恩的评论家所夸大了。雅恩对音乐学术的不朽贡献体现在一种新的理论之中（尽管应用得有缺点），即一部艺术作品应当在考虑到早期的和相关的作品的情况下来加以剖析。这种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在20世纪的专著中产生了结果，其中我们可以选出三种。

在1912年，G. 德·圣富瓦和T. 德·韦策瓦合写的《莫扎特的音乐生涯……》的头两卷出版了。^[4]作者鄙弃了传记的琐事，从结构上研究了莫扎特的全部作品，并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他的许多同代人的作品。他们修改了莫扎特成长过程的年表，并讨论了他在萨尔茨堡、维也纳、米兰、曼海姆、巴黎和伦敦等地所吸收的各种模式。这样，这部法国专著对学术做出了新的贡献——风格的评论。赫尔曼·阿贝特

全面修订的雅恩的《莫扎特》（第5版，2卷本，1919—1921年），使我们对18世纪的知识打下了不浅的基础。也许阿贝特有时太尊重雅恩的方法了，但是他对雅恩在论述历史时的一些“离题的话”作了十分重要的修改并增加说明，则是非常高明的。阿贝特关于各种不同流派的音乐直到莫扎特时期为止的论述，不论是歌剧、交响曲，还是弦乐四重奏，仍属于所谓古典音乐时期的最优秀的历史作品，虽然他不赞成雅恩关于莫扎特音乐中美的成分的观念，他对它的不协和与悲剧性的方面的论述是公允而适度的。

海顿的遭遇就不大好。当雅恩于1869年去世时，他把已积累的关于海顿的资料转给了达姆施塔特的C. F. 波尔，把他关于贝多芬的研究转给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A. W. 泰尔。这两位学者都已移居奥地利以研究和发表关于维也纳时期音乐的论著。两人都没有在有生之年完成任务。1927年雨果·博茨泰比尔为波尔未完成的研究增写了有用的第3卷。^[5]1955年H. C. 罗宾斯·兰登所著《约瑟夫·海顿的交响曲》出版，其中包含了海顿104支交响曲的修订年表和对其作曲风格演变的评价。兰登是根据散见于奥地利各处的海顿原稿加以仔细考察，并且研究了地方图书馆里的材料，包括手稿、抄件和水印本等而取得的成果。

当我们考虑前几代人成就的记录时，海顿在音乐主流中的地位便显示出来了。17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作曲家有拉莫、巴赫、韩德尔和D. 斯卡拉蒂，他们创作的音乐风格大部分表现为庄重而守旧的，一直到18世纪后期为止。诚然，维也纳大师们的正规的格调有时是意大利人促成的。弗朗切斯科·孔蒂（1681—1732年）1713年在维也纳任宫廷作曲家。他为他的歌剧《胜利的帕拉德》（1722年）作了一支序曲，至今被恰当地誉为交响曲的先驱：^[6]它分三个乐章，合起来组成快—慢—快的模式，其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实际上是奏鸣曲的格式。然而，这种模式属于例外而不是常规。虽然D. 斯卡拉蒂（1685—1757年）的奏鸣曲在风格和模式方面令人吃惊地超越了它们的时代，但斯卡拉蒂仍然写了许多大键琴的练习曲，表现出对1750年以后在奏鸣曲形式中变得如此高度标准化的主音调关系并不关心。^[7]孔蒂和其他作曲家创作的许多歌剧序曲也可说是同样如此。

到下一代，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蒂尼（1701—1775年）有在米兰工作的有利条件。米兰是格鲁克和莫扎特受教育的重要城市。大

概由于这个原因，他的作品更直接地影响着维也纳大师们。不仅是他的歌剧前奏曲、交响曲、协奏曲，而且他的四重奏和三重奏都显示出现代协奏曲所熟悉的那种有一定结构的模式。但是在模式结构的内部有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了：形成鲜明对照的章节显现了真正的两重性，并且就在那里开始了海顿的有名的主旋律展开部。^[8]

然而，在18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内，海顿的主要前辈们出世了：维也纳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年）、瓦根赛尔（1715—1777年）和莫恩（1717—1750年）；曼海姆作曲家里希特（1709—1789年）和斯塔米茨（1717—1757年）；佩戈莱西（1710—1736年）和卢梭（1712—1778年）；最后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1714—1788年），他一生的事业分为柏林和汉堡两个阶段。

佩戈莱西和卢梭的共同成功，敲响了拉莫和韩德尔作曲的那类庄严歌剧的丧钟。《女佣作主妇》和《乡村占卜师》（1752年在巴黎共同上演）的成功清楚地表示一般听众并不需要高贵堂皇，也不需要庄严和丰富多彩的和声，所需要的是旋律，只需要旋律，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旋律。佩戈莱西的喜剧杰作1733年在那不勒斯上演时，原来只打算作为幕间插曲为查理六世皇帝的妻子演的。当晚的主要节目是大歌剧《傲慢的囚犯》。^[9]但是，被卢梭和歌德称赞过的《女佣作主妇》甚至今天还是人所共知而被演唱着，而佩戈莱西的庄严肃穆的歌剧却静悄悄地躺在图书馆里被束之高阁。滑稽女歌手的调子简单新颖，直接呼应了该世纪的斗争口号——“回归自然！”巴黎的各艺术派系很快组成了两个阵营：“王后派”支持意大利人，坚决反对“国王派”偏袒法国本国的作曲家。佩戈莱西的各种旋律后面紧跟着变音，比大歌剧的华彩经过句较少掩盖用言语表达的歌词。虽然在吕利和拉莫的庄严的悲歌剧^[10]与佩戈莱西及那不勒斯同行们的滑稽喜歌剧之间作比较有失公允，却没有人真正介意流派风格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如果说让-雅克·卢梭的《乡村占卜师》不大可能被称作意大利式的，那么它的俭朴而有感染力的曲调则保证它成为巴黎保留节目存在达60年之久。拥护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的人们期望旋律不受对位法或和声法的妨碍，而是一种直接的、像民歌一样有感染力的旋律，它说的是一种人类全体的语言。在前几个世纪里，作曲家们以能用调子美妙的原始材料完成作品而自豪，现在他们的目标一开始就是选择和创

造恰当的旋律。曲调的独创性和适当是首先要考虑的。时代的调式从珀西的《英诗辑古》在欧洲大陆的疯狂流行得到了反映，伴随而来的是热衷于赫尔德和歌德、沃尔特·司各特、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民歌。当赫尔德赞美格鲁克的大歌剧《奥菲欧》（1762年）时，他赞扬其唱段简单朴素，一如英国的叙事曲。只要作必要的修正，赫尔德的话是对的，因为喜歌剧风格的朴素对格鲁克有重大影响，韩德尔曾批评格鲁克一点也不懂得对位法，就像他（韩德尔）的厨师一样。这个批评是够精明的，但是这位伟大的韩德尔一点也不明白音乐的多声特征是属于旧制度的，而格鲁克表面上看起来是缺点的东西在一个渴望清楚易懂的音乐语言的时代正好帮了他的忙。海顿曾劝告过：“当你想要知道一曲音调是否真美，你演唱时就不要伴奏。”

格鲁克的《奥菲欧》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音乐上的卓越之处。在许多方面，《阿尔西斯特》（1767年）、《帕里德和埃莱娜》（1770年）、《伊菲姬尼在奥利德》（1774年），特别是《伊菲姬尼在陶利德》（1779年），都是更成功的艺术作品。但是格鲁克及其脚本作者卡尔扎比吉轰动一时地向梅塔斯塔齐奥式的歌剧霸权进行的挑战却抓住了欧洲人的想象力。为了意大利歌剧的缺点去责备梅塔斯塔齐奥是不公正的。那时的听众，一如现在的听众，渴望的是唱段歌剧和分段歌剧，就是说，歌剧的大部分含有为歌星演唱的段落或单元的唱段。格鲁克在维也纳，哈塞在德累斯顿和约梅里在斯图加特满足了这种要求，而梅塔斯塔齐奥从1730年到1782年一直是维也纳的宫廷诗人，他为各个宫廷提供了一种风雅诗和戏剧结构，理想地适应了这种意大利风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格鲁克宣布他将为戏剧真理奋斗而震惊了音乐界；他的歌剧从此以后除了常规唱段以外，包含了大量的合唱与纯器乐音乐（芭蕾舞音乐）相混合的内容。这个做法比系列歌剧更有点传统的悲剧性伴奏诗歌的味道：实际上，它是在意大利形式中注入了法兰西的成分。

格鲁克着手进行了一件同样重要的改革（虽然不那么容易被公认），他把歌剧一场的时间作了重要的延长。按照梅塔斯塔齐奥的风格，剧中的英雄（或反面人物）唱完他的歌词立即下台，表示其戏剧和音乐的基本单元已经结束，这种变动频繁和短促的结构一去不复返了。维也纳版本的《奥菲欧》（1762年），在俄耳甫斯恳求复仇女神

的部分，包括一个合成唱段，十个单独的段落融合成整个一大唱段。这种编排方法是注定会影响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的。

当时仍在世的海顿的主要前辈，斯塔米茨和C. P. E. 巴赫，在音乐作曲的新风格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塔米茨1741年在曼海姆加入巴拉丁选帝侯的宫廷管弦乐队时是24岁。他出生于哈布斯堡领地波希米亚的布罗德镇。^[11]就欧洲其他地区而言，斯塔米茨是德国作曲家。像他的同胞里希特和瓦根赛尔一样，他们分别在曼海姆和维也纳活动。这些德国作曲家的作品，以意大利语书名《德国作曲家创作歌曲集》^[12]于18世纪50年代在巴黎出版。意大利语当时是（一如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通用的音乐语言，但是说德语的国家逐渐取代了意大利，成为欧洲产生音乐家的主要地方。^[13]同样，莱比锡后来取代了巴黎成为音乐作品的主要出版中心，虽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继续保持它们的有利地位。

斯塔米茨的力度强弱法和正规的结构在从不足100小节的早期意大利序曲发展到宏大的贝多芬《英雄》第一乐章的道路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他是一位非凡而胜任的管弦乐队教练；某些所谓曼海姆乐派的效果，例如著名的渐强音音节已经在18世纪受到勃尔尼的注意和钦佩。这种逐渐加强的方法不应仅仅看作斯卡拉蒂和韩德尔的回声强弱法的鲜明对照。它是一种新的交响乐思想和模式的标志：其主旋律（或主旋律组合）被写得更加仔细、更富戏剧性，因而必然要被安排在更为宽广的结构中。

C. P. 埃马努埃尔·巴赫1740年成为腓特烈大帝的古钢琴乐手。1767年著名的泰勒曼逝世后，埃马努埃尔·巴赫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担任汉堡五所主要教堂的市音乐指挥，直到1788年逝世为止。巴赫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出版他的作品。在海顿以前这些作品被列为音乐印刷业最重要的出品。声乐（主要是歌剧）超越于器乐之上的情况在埃马努埃尔·巴赫时期仍然占着上风。这两种音乐在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中势均力敌，不分高低。直到19世纪早期贝多芬对舞台的冲击，天平才倾斜过来。埃马努埃尔·巴赫主要是通过键盘教给年轻的作曲家们如何达到以下两个目标的结合：即写出真正符合表现方法的器乐风格，同时用像歌唱一样的曲调来感人心腑。不断创作的系列奏鸣曲从作品1号六首“普鲁士”奏鸣曲（纽伦堡，1742年）到“为行家和业余爱好者”所谱写的奏鸣曲、回旋曲和幻想曲（莱比锡，1787

年），说明了他的这种教导。此外他写出了18世纪最出名的钢琴指南《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的真谛》。^[14]他写的乐曲和理论著作都透露出一种新的“严肃性”，一种比起海顿和莫扎特来更接近于贝多芬的艺术权威观点。埃马努埃尔·巴赫主张旋律用歌曲来表达并且要能够唤起诗的乐句。这些概念明显地模仿了卢梭，巴赫把它们传授给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和J. A. P. 舒尔茨。

当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戈特弗里德·范·斯威滕男爵委托巴赫谱写六首交响曲，并且作曲家可以自由发挥创作思想，不必因考虑技术困难而受束缚的时候，由巴赫权威的影响而引起的波澜大大地扩展。这些写于1773年的不同凡响的作品，以它们严肃认真的精神，预示着海顿和贝多芬的最深奥的乐曲的到来。无须强调范·斯威滕在18世纪后半期对音乐事业著名的慈善行为。在他的维也纳住宅里曾数十次演奏过巴赫的六首交响曲。他的住宅简直成了音乐活动的真正场所，星期天有音乐会，其主人不断地鼓励年轻的音乐家。在那里莫扎特安排了韩德尔的《弥赛亚》在某一次音乐会上演奏。男爵亲自安排了海顿的歌剧脚本《创世记》和《四季》的演奏，并对有关这些清唱剧的音乐谱曲提出了建议。贝多芬的第一部交响曲就是奉献给这位奥地利的艺术赞助人的。而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海顿和莫扎特找到了罕见的机会去研究埃马努埃尔·巴赫的作品，并从中发现新的旋律和新的精神。^[15]

1732年海顿出生于下奥地利，8岁时被带到维也纳，充当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唱诗童，以后20年，他一直留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中断过。从1761年到1790年他为埃斯泰尔哈吉亲王们服务，需要住在维也纳东南方从25英里到50英里的各领地的行宫或者就住在维也纳本地。除了1790—1795年间几次去英国旅行外，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首都，直到1809年逝世为止。与不停地旅行的韩德尔、格鲁克和莫扎特等人相比，海顿的音乐生涯是平静的，不是非常世界性的。因为他漫长的一生很少在国外度过，他所听到的音乐大都是奥地利人或者是住在奥地利的意大利人谱写的乐曲。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的模范乐曲。他研究了埃马努埃尔·巴赫的数十首乐曲，后来又研究了韩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于是他对模范乐曲进行增音。但是，基本上，海顿是自学成才，独立发展的。他的尝试发自他的想象力丰富、有条理、有锻炼的头脑，最终产生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不

同于他的年轻同代人中某些人——如歌德、莫扎特、海顿的天才似乎不需要别人伟大作品的鞭策和激励。这并不是因为他对他所处的环境不敏感；他对莫扎特的音乐有反应，他研究韩德尔的清唱剧的体验明显地影响了他的《创世记》（1799年）和《四季》（1801年）。然而，尽管圣-富瓦和阿贝特把这种影响用过多的篇幅归于莫扎特，海顿的伟大的模范乐曲仍然是屈指可数的。在曼海姆乐派已经把四乐章格式包含进小步舞曲而臻于完善之后，海顿似乎是独自重新创造出这种程式的。海顿独立发展的道路还有其另一面，即在他的104首交响曲中很少应用著名的曼海姆渐强音。

海顿集中精力于器乐，直到他40岁（1772年）为止。最早的交响曲是简短的，3个乐章加在一起只相当于18世纪90年代庄严的伦敦交响曲中某一部的第一乐章或最后乐章稍微多一点。海顿1761年加入为埃斯泰尔哈吉公爵服务的乐队。在这新的岗位上，他继承了一支比他曾指挥过的任何乐队都更为优秀的管弦乐队。由于这个原因，他得以扩大他的思想境界。住下来的第一年，他写出了第6、7、8交响曲。海顿似乎也不太肯定他是否愿意谱写1740—1770年在欧洲盛行的豪华风格的娱乐乐曲，或者他的交响曲是否将成为一种表达持久而深刻的构思的媒介。比较严肃的态度时时占据上风。在第22交响曲（《哲学家》，1764年作曲）第一乐章的降E大调主音调中，一种缓慢而庄严的柔板，有着赞美诗般的主旋律，用号和英国短号演奏，并由调低了的弦乐器伴奏。

很可能出现忧郁音调的短音阶，在海顿早期交响曲中是完全找不到的。然而在1765年和1772年之间，海顿创作了D小调《哀悼交响曲》、F小调《受难交响曲》和主音调微弱的升F小调的所谓《告别交响曲》。

在18世纪后期，交响曲是为业余爱好者谱写的，海顿只是难得破了例。他最严肃认真的构思是保留给为音乐鉴赏家和知识界献演的弦乐四重奏的。如果说J. S. 巴赫的《48首赋格曲》被看成是赋格曲创作的准则的话，那么海顿的《83首四重奏》可以称为四重奏的权威典范。其中前12首显示出它们的继承性——维也纳人喜爱的嬉游曲和小夜曲形式的户外娱乐节目。这些轻快的作品充满了主旋律，因为它们不能在露天用古钢琴演奏，所以不受较早时期的和声法的影响。总的来说，器乐是为舞蹈配乐的，海顿的早期四重奏通常在五乐章中包含

二节小步舞曲。但是海顿在埃斯泰尔哈吉以新的交响乐精神——一种与舞蹈精神根本相反的精神——创作了大量作曲之后，他在四重奏的创作中注入了新的风格因素。在组成作品第3号（四重奏第13号至第18号）的六部作品中，有四部用的是四乐章形式，而各个乐章的艺术境界和乐曲长度都相应地增加了。人们怀疑：是否由于这种冲破陈套的过程和小提琴部分增加了光彩和难度使得作品非同凡响，导致出版的延误。因为，第一组，即第1首至第6首于1764年已在巴黎出版，第二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而第7首至第12首于1766年在巴黎出版后，第二年也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但是作品第3号，虽然是在60年代中期写的，但直到1777年才付印（巴黎，巴约）。[\[16\]](#)

在后续的一组乐曲：第19首至第24首（1769年），第25首至第30首（1771年）和第31首至第36首（1772年）中，海顿完善了他的四重奏写作。最后一组写成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于是海顿、歌德和莫扎特时代的室内乐的古典阶段就此完成了。早期的雄壮风格，其旋律在最高音部，下面仅仅是伴奏，在这里被第一小提琴担任首席地位的四部结构所取代了。随着这一发展，作曲的整个结构增添了一种新的严格性。魏玛的贤哲说过：“对于我本人，这（四重奏的演奏）永远是最明白易懂的器乐音乐：人们听见四个聪明人在谈话，并且期望从他们的对话中学到些什么，从而开始知道每种乐器的特殊性能。”[\[17\]](#)实际上，海顿的创作方法常常证明它在艺术史上的价值：海顿通过复归一种已经过时的风格，完善了他写作四重奏的模式。因为，在这里隐约出现的赋格曲是非常明显地属于韩德尔、拉莫和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时代的。到18世纪70年代，有些作曲家准备调整卢梭和佩戈莱西的新风格，虽然并不抛弃它。有一种要求严格、严肃、紧凑的愿望，海顿的弦乐四重奏赋格曲只是其中一例，其结果是给维也纳、曼海姆和其他音乐中心的革新增加了深度和技巧。

海顿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功绩，躺在他的桂冠上而停止写四重奏乐曲。在九年之间，他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声乐、歌剧、清唱剧和弥撒曲。这有许多原因：其一，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发现海顿的新风格太冗长沉闷；其二，他的赞助人修建了一座“新凡尔赛宫”，其中豪华的舞台是准备在国家庆典时上演歌剧的。为对玛丽亚·特蕾西亚1773年访问埃斯泰尔哈吉城堡表示敬意，海顿创作了《不可靠的妄想》。四

年后写了《月中世界》。1779年又写了《荒岛》，后者很明显受格鲁克的《奥菲欧》的影响。

海顿的声望继续上升。这位作曲家终于成为中产阶级群众所特别喜爱的人物。1780年维也纳出版商阿尔塔里亚出了一套海顿的钢琴奏鸣曲，接着在1781年又出了他的六首新创作的四重奏乐曲（第37—42首）。海顿称这六首作品是用完全新的和特殊的手法谱写的。实际上它们并不很新。海顿巩固和扩展了1772年的进展，但是，是在公众所能接受的方式下进行的：虽然没有一个乐章标明是“赋格”，但是有赋格曲的弹奏法。这批得到公认的出版物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提高了海顿的声望，并增加了他的收入。他去维也纳的次数更多了，在那里与年轻的莫扎特交往和切磋，成为他的乐事。1784年他完成了他的声乐创作活动之后——至少暂时是这样——放弃了歌剧和礼拜仪式音乐，再次专心致力于器乐创作。他的目光现在注视着遥远的天边，越过维也纳，朝向巴黎和伦敦。1785—1788年海顿写了11部交响曲，成为巴黎的时尚；1787—1790年他写了四重奏第44—68首。当埃斯泰尔哈吉的管弦乐队在米克洛什亲王于1790年逝世后被解散时，海顿有几个选择去向的机会，包括到那不勒斯宫廷任职。但是现在他宁可脱离宫廷的生活而接受J. P. 扎洛蒙的建议前往伦敦。他将会得到的报酬是：写一部歌剧300镑，写六部新交响曲300镑，上述二者的版权200镑，写各种不同的新作品20首200镑，义演音乐会200镑。鉴于海顿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很少，莫扎特试图忠告他这位较年长的朋友和导师有关旅行的不便和语言的障碍。海顿以他的艺术应对全世界具有吸引力这一经典说法回答说：“我的语言全世界都听得懂。”因此他照顾大众的需要，提供巴黎和欧洲都准备接受的音乐。这种音乐不属于意大利的“王后派”，也不属于法国的“国王派”，甚至也不具有维也纳的特征。总之，他已把这些不同的风格锻炼成一种歌德笔下的“聪明”人所喜爱的综合物，不受国界的限制。从1791—1792年在伦敦创作的协奏曲起，海顿的后期作品包含有莫扎特的成就，并与贝多芬对维也纳的初期影响出现在同一时代。[\[18\]](#)

莫扎特在欧洲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他与海顿不同。海顿是车轮工人的儿子，而莫扎特有幸（于1756年在萨尔茨堡）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不但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一位能干的教师，而且在他儿子不平静的大部分生涯中扮演

着向导和良师。从六岁起，这位年轻的天才屡次出现在皇亲贵族面前，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在慕尼黑选帝侯和维也纳的玛丽亚·特蕾西亚面前演奏之后，接着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在那里歌德听了他的演奏）参加了音乐会的巡回演出。1763年圣诞节，他在凡尔赛宫给蓬巴杜夫人演奏，1764年4月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给乔治三世演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在巴黎印行时，他年仅八岁；在伦敦印行时他是九岁；一年后又在阿姆斯特丹印行。他的歌剧《米特里代特》《阿斯卡尼奥》和《卢乔·西拉》成功地在米兰上演了接连三个冬季（1770—1772年）。然而莫扎特却在1791年被埋葬于贫民的墓地。

莫扎特如果有意去迎合他所在年代的社会势力，他的物质前途当不会给他造成忧虑。但是海顿是慢慢地摆脱本地赞助者的影响，而莫扎特却是与他们斗争。尽人皆知的1781年他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决裂以及他以后在维也纳以卖艺为生的自由作家生涯，都是准备不够和理由不充足的行动。莫扎特在同出版商打交道时也同样笨拙。当霍夫迈斯特在1785—1786年间委托他创作三部钢琴四重奏乐曲时，这位当时已30岁的成熟的作曲家却交给霍夫迈斯特一首深奥晦涩的G小调。在被告知公众觉得那首作品太难之后，莫扎特转向同意出版他的降E大调四重奏的阿尔塔里亚。这件作品虽然技巧上比较容易，但是正如当时报刊评论家所很快指出的，对日常演奏来说仍然要求太严。^[19]除这种缺乏处世艺术和策略以应付资助者、出版商和一般群众之外，莫扎特还有一个更根深蒂固的不大尽责的毛病。他的音乐不再占他全部的时间。海顿的艺术是启蒙运动后期的完美体现。莫扎特的乐曲明显地反映出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他像一个两面神，在启蒙运动衰落中发射出又一分光辉，同时又预示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莫扎特在音乐风格演变上所处的地位集中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内，当海顿的最后作品出版时，贝多芬已经创作了他的最初五部交响曲了。莫扎特走在他的时代之前10年或20年，并不可避免地走在普通听众之前，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因为他既不是像贝多芬那样的革命家，也不是像塞巴斯蒂安·巴赫那样的不再时髦的人。而当他于1781年移居维也纳时，他的事业依靠的却是普通听众的钱包。

那一年莫扎特创作了《伊多梅尼奥》。这部歌剧几度耽搁后于1782年1月29日在慕尼黑上演。就是这部歌剧成为成熟的艺术家与年轻的作曲家的分界线，而且除1791年急忙写成的《蒂托的仁慈》外，它

是莫扎特对旧式风格的庄严歌剧唯一的杰出贡献。18世纪后期，人们并不掩饰认为大歌剧的风格太庄严，品位太高。卢梭的精神再次风靡国外并通过歌德的话说，“来自富丽庄严的东西并不能回归于艺术”。^[20]莫扎特表现出对戏剧的真实性的关心。他写信给他父亲说，《伊多梅尼奥》中的神谕是以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为蓝本的，必须简短。他指出“假如《哈姆雷特》中鬼魂的谈话没有那么长，它的效果会更好”。另一方面，管弦乐的宣叙部则不妨延长些，因为在希望与恐惧之间的彷徨，会“由于明暗对比法而收到极好的效果”。这样，莫扎特追随格鲁克的榜样，试图给梅塔斯塔齐奥的歌剧赋予更多的戏剧逼真性和多样性，使独奏唱段减少不间断的连续性。结果使《伊多梅尼奥》包括一些动人的管弦乐和合唱乐的片段。莫扎特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采取了必要的权宜手段，把法国因素融入基本上是意大利的结构中去了。

在管弦乐的宣叙部，说话声与管弦乐的富于表达力的短句交替进行，这是莫扎特的杰出手法之一。这个方法是卢梭想出来的，他辩解说，法兰西语言不适于歌唱。他在这种思路下谱写了《皮格马利翁》，它是一出新体裁的音乐戏剧，剧中说话声与管弦乐并列。1770年在里昂首次演出；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则是在1775年（剧本全文为卢梭所撰写，某些乐曲也是卢梭谱写的，虽然大部分乐曲出自库瓦涅之手）。卢梭运用说话声音的自然主义手法，引起了广泛的赞扬，特别是在德国诗人和音乐家中，当这种“情节剧”在魏玛和维也纳上演时，歌德和莫扎特两个人都欢迎这种新的安排。莫扎特仿效卢梭锤炼作品，这些作品转而影响了贝多芬的《菲岱里奥》和《埃格蒙特》，韦伯的《自由射手》，并间接地影响了舍恩贝格的“吟唱”（半像唱歌半像说话的唱法）。

莫扎特反应之快只不过是才思敏捷而多产的前奏曲而已。他一研究巴黎的肖贝尔或伦敦的克里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就模仿，然后完善他们的风格。他在1788年夏季以两个月的时间谱写了三部他的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交响曲，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值得后世赞赏；然而那仅是他通常习惯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已。研究一下他极少的短曲和许多手稿不得不使人认识到他的听觉想象和记忆力是绝无仅有的。^[21]模仿常常是莫扎特的出发点：他的第一部弦乐四重奏（1770年）很像萨马蒂尼的风格；1773年夏季在维也纳写的六部四重奏有着

海顿影响的痕迹。1772年海顿创作的四重奏把雄伟的风格同严肃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引起人们的兴趣。海顿40岁时在一种基本上是单旋律的结构中引入了对位法的因素，他的这种技巧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人后来均曾赖以进行创作。莫扎特在16岁时“对于此道还不是对手”。^[22]海顿的F小调四重奏（第35首）是以赋格曲性质的奏鸣曲形式为终曲的，在终曲中他用的主旋律，或“结束语”，是帕黑尔贝尔（1674年在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任助理风琴手）、库瑙（1684年在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任风琴手）、韩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巴赫等老一辈大师们所经常运用的。对位法用于这类素材是有效的，这一点谁也无法抗拒。莫扎特首次运用它是在他1773年的F小调四重奏的小行板里，随后在1791年的《安魂曲》中得到绝妙的运用。四重奏乐章的创作艰难而费力。莫扎特的乐曲虽然一直到1781年才达到艺术成熟的程度，然而他的作品在18世纪70年代已经是大众所需求的了。

著作权的概念，实际上即独创性的概念，太新鲜了，以致没有引起作家和音乐家们的关注。莫扎特模拟前辈的技巧是任何其他作曲家都比不上的。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胜过所模仿的榜样，所以他的方法是正当的。在《伊多梅尼奥》的船只失事场面中，后台管乐伴奏的合唱同前台弦乐伴奏的合唱遥相呼应，其优美的协奏曲效果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的才华超越了格鲁克运用类似的方法。

莫扎特在维也纳一定居下来，就证明协奏曲本身，而不是协奏曲效果的简单应用，乃是莫扎特发挥他才能的主要途径。在1782—1786年之间，他只谱写了两部歌剧——《后宫诱逃》和《费加罗的婚礼》。在同一时期他写出了15首钢琴协奏曲，他希望用它们来漂亮地征服“键盘乐器之国”的维也纳。半个世纪以前，韩德尔在伦敦已经发觉在大斋期演奏音乐会的好处，因为在此期间剧院关门，歌剧禁止上演。现在同样的机会摆在了莫扎特的面前。一部歌剧的标准收费，不论是意大利的还是德国的，都是450古尔登，^[23]大约等于莫扎特18世纪80年代一年的房租。对比起来，他从1784—1786年演出的一连串三次大斋期音乐会上每年能赚到大约1500古尔登，还不算在其他大斋期音乐会上的特邀演出。尽管他能赚许多钱，但他大部分时间停止了谱写社会上盼望他写的那种乐曲。1787年看来是关键的一年：《费加罗的婚礼》和C大调钢琴协奏曲在1786年出台之后，莫扎特专心致志于作曲以表达他的成熟的信念，而不考虑公众的爱好。他没有用拜伦的

悲观情绪，而是用阿波罗神的宁静态度，坚持提醒他的听众注意包含在卢梭的简单小调和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庄严合唱曲之中的艺术领域的最终伦理价值，伴随着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救世主式的希望而发出的阿莱基诺式^[24]的笑声。他本人的信仰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友爱。他和海顿都属于共济会教团，因而他的信仰受到共济会的纲领的影响而得到加强。

人们曾以大量篇幅证明《唐·乔万尼》^[25]（1787年）不但是一部完美的歌剧，而且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魔笛》（1791年）意义深刻，同时像现代小歌剧一样引人入胜，它以帕帕盖诺的轻佻衬托萨拉斯特罗的威严腔调。只要举出《魔笛》的合唱段作为莫扎特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以及《唐·乔万尼》的音乐结构作为莫扎特永恒伟大的例子，就足够了。18世纪最后的数十年内，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和精神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复兴预示着浪漫主义的来临。^[26]如果说莫扎特和舒伯特（生于1797年）是被误解了的天才（的确，在整个19世纪他们是这种人中人们最喜欢引证的例子），那么巴赫则是被遗忘的天才。他在维也纳范·斯威滕的家里获得新生是通过历史性际遇而受到重视的个人偶然事件之一。因为正是在那里，两位伟大的作曲家学习并汲取了已不合时尚的塞巴斯蒂安的风格。如前面所述，海顿一旦在他1772年的四重奏中探索到新的风格后，其发展过程是徐缓渐进的。莫扎特从1782年起直到1791年逝世为止则没有那么稳健，曾由于过分注重严肃的风格而招致失败。从奉献给海顿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1783年）中的小步舞曲，C小调弥撒曲（1783年）中的“谁是托利斯”（Qui Tollis），以及D小调钢琴协奏曲（1785年）这三部作品，可以看出有一条向在《唐·乔万尼》的前奏曲和《魔笛》中经受磨难的场面中所采用的缓慢而庄严的风格发展的线索。男女主人公赴汤蹈火，飞越天空的情节，作为罗马天主教徒的莫扎特选用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路德派新教的赞美歌来伴奏，大概并不那么奇怪，奇怪的倒是那乐曲的总调子对于维也纳式的神魔歌剧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而且完全出乎听众的意料。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及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都受益于莫扎特之热衷于巴赫。

然而这种热情不是永远无限的。强烈的同情或怜悯是绝不允许在以后浪漫主义全盛时期的作品的风格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或甚至最后的）表达形式的。《唐·乔万尼》的终曲是说明莫扎特驾驭能力的

恰当例证。莫扎特把他的歌剧称为欢笑的戏剧，即是喜歌剧而不是悲歌剧。是的，死亡的场面扭曲滑稽歌剧的结构达到极点，因为它选用了D小调的阴沉基调，它的长号使人联想到《伊多梅尼奥》和《阿尔西斯特》那样的悲歌剧，它的半音阶特征使人联想到塞巴斯蒂安·巴赫。但是莫扎特在收到上述效果之后又转而采用大调调式和快速节奏，就像是仍然活着的角色表达出生的信念。从在布拉格（1787年10月29日）第一次上演起，曾做出种种努力试着在唐·乔万尼死的时候用落幕的办法来“改进”这部歌剧。^[27]但是，这种省略的办法与莫扎特终曲的结构是背道而驰的：从音乐上讲，终曲需要重新回到D大调，从剧情上讲，则需要充分表现出存活者的信念。事实上，莫扎特的艺术勇气，以笑声而不以眼泪作结尾，对20世纪歌剧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施特劳斯的《蔷薇骑士》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的历程》便可看出这一点。悲剧和喜剧的融合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柏拉图的《宴话篇》。但是，除莎士比亚和莫扎特外，几乎没有创作家能够成功地从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形式中塑造出风格的统一。贝多芬是比莫扎特更严格的清教徒，他认为《唐·乔万尼》的题材是轻薄无聊的，但是他还是仿效莫扎特的艺术手法——第九交响曲结尾时用的不是庄严的行板，而是有力的快板（甚至最快速度），不是小调而是大调调式。尽管如此，贝多芬的最后一句歌词表明的一种献身的决心，而莫扎特则像普罗斯佩罗（Prospero）一样，用微笑来打发我们散场。

二 美术和建筑

在18世纪下半叶，对一切艺术领域都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叫作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主义形式。在法国和德国，到18世纪中期，洛可可风格的“泛滥”产生一种普遍的反作用，反对华丽与轻浮。倾向于古典主义的严谨与和谐是高乃依和拉辛、普桑和芒萨尔等人的法国传统的基本部分，这种倾向在新的理想——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和新的美学理论（以罗马为中心，并由移居罗马的法国人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最详尽地加以阐明）的影响下，重新决定性地确立起来了。然而新古典主义不仅仅是欧洲艺术中不朽的古典主义倾向的复兴。关键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鼓吹通过严格的仿古途径回归古典主义的原则，现在由于考古知识的增加，尤其是对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发现和发掘，变得更加容易了。希腊艺术，虽然对原作仍然几乎一无所知，在理论上却居于首要地位。19世纪人们主张把公元前5世纪作为所有艺术是否优秀的检验标准，这种倾向是在18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28\]](#)很明显，把这么多的热情耗费在那么少的现有的希腊艺术品上导致了一种过分崇拜的现象——这一热情本身其浪漫主义色彩远远超过古典主义；的确，新古典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恰恰是这种对古物尤其是遗迹的浪漫主义探讨方法。皮拉内西关于古罗马的铜版画就是把精确的考古同狂热的、富有诗意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最好例子。[\[29\]](#)哥特复兴式在英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研究古物的热情与浪漫主义的想象的结合，并且不难看出卢梭、狄德罗和共和主义者的爱好是如何变得等同于革命艺术的，尽管大多数革命艺术家——勒杜、韦斯特——在政治上保守的。[\[30\]](#)

罗马是这一国际运动的中心，[\[31\]](#)部分原因是当时所有赞助人和艺术鉴定家都把以罗马为中心的“大旅游”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到后半世纪，它也变成艺术家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中许多人在意大利花费多年时间，边学边教。通过充当代理人和向导，许多年轻艺术家结识了贵族，后者就成了他们以后的赞助人：雷诺兹、威尔逊和诺勒肯斯都是不同情况下这一类的例子，并逐渐取得了给予北方艺术家的新的专业身份。这种自从米开朗琪罗以来在意大利传统的受人尊

敬的待遇，以前他们从未享受过。“大旅游”效果最为显著的例子可在法国找到。1750年，德·蓬巴杜夫人的弟弟，后来成为侯爵的德·马里尼，与雕刻家C.-N. 科尚和建筑师苏夫洛一同作了一次旅行，这两人的观点都是强烈反对洛可可风格的。马里尼1751年被任命为皇家建筑总监（实际上是艺术部长），他使法国艺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官方影响是巨大的。

尤其重要的是皮拉内西和温克尔曼。他俩的大半生都是在罗马度过的。詹巴蒂斯塔·皮拉内西（1720—1778年）是一位威尼斯建筑师，1740年定居罗马。他献身于大型的铜版画作品，其作品分布于全欧洲，是形成欧洲人意识到古罗马的雄伟及其没落的光辉的最为重要的直观因素。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古罗马人》和《罗马景色》^[32]的影响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实际上前者可能曾对后者的诞生做出过贡献。皮拉内西把建筑学和考古学上的精确性同登峰造极的想象力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微妙的比例变化使他的铜版画具有直观性并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而遗址本身在当时或许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现在则由于它们已经失去一切浪漫主义的联想，就肯定起不到这种作用了。^[33]他的最有独创性的铜版画是根据想象中的监狱而创作的《监狱》（开始大约作于1745年，重作于1761年）。对于追随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代人来说，这幅作品可以说明他的浪漫主义表现的某些源泉，也可说明许多建筑师从他那里学到的某些轻微的自大狂。^[34]皮拉内西对于所有视觉艺术的影响极大，部分原因是他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也力图形成一套美学的原理，但成就不大。他的反希腊倾向把他引入站不住脚的地步，但对于激起这种反希腊倾向的对古希腊文化的崇拜必须首先做某些详细的论述。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1717—1768年）是一位贫穷的德国补鞋匠的儿子。古希腊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虽然他声称到希腊去是他唯一的志向，却又极力拒绝前往那里，所以他对希腊艺术的原作几乎一无所知。他设法透过希腊雕塑像的罗马复制品看到它们所蕴含的原理，他把这些原理首次于1755年出版的小册子《论希腊绘画雕塑品的仿制》^[35]中用清晰的德语散文加以阐明。这位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本小册子在德累斯顿出版之后，他才前往罗马，在那里度过他一生中所余下的几乎全部时间。几年后，经过深入研究保存在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文物，他写出了一部篇幅更大的《古代艺术史》

[\[36\]](#)，这大概是现代第一部艺术史，把古代艺术看作希腊、罗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也写了许多考古文章，但是在他第一部著作中，已经可以找到关于纯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简单扼要的说明：“我们要达到伟大，甚至可能的话，举世无双，其唯一的途径就是师法古人。……希腊的艺术家开始更进一步[超越对自然界的观察]，而形成美的总概念，不论是关于人体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人体的比例关系，都高于自然本身。”

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章包含着对整个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基本阐述：

所以，希腊艺术杰作的突出的、普遍的特点在于，不但在它们的表情方面，而且在动作方面，都有一种崇高的朴素和宁静的宏伟。正如海洋的深处一样，不管水面上风浪多么险恶，它永远是平静的，所以希腊的雕塑像，即使在受苦受难中，也表现出崇高和克制。尽管拉奥孔是在受难之中，但这样的精神仍被刻画在他的雕像的脸上——而且不仅仅是在脸上……他并不像维吉尔所描绘的拉奥孔那样发出惊人的尖叫。他的嘴张得不够大，不像是在叫喊——它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痛苦的悲叹。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伟大通过全身而表现出来，达到同等程度，彼此互相平衡。拉奥孔在受难，但他是像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一样受难：他的不幸直刺我们的心，但我们仍愿意以这位伟大人物的坚强意志去忍受不幸……那位艺术家自己也一定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

这最后一句话对温克尔曼来说同样真实，因为正如一位现代评论家所指出：“当他看着这个被认为是真物的艺术品时，他被一种伟大启示的光辉照耀得眼花缭乱，他看到希腊艺术与众不同的特性。他实际上是出神了。像许多其他有洞察力的人一样，他是在说出真理，这种真理并不是应用于他眼前的目标，而是与他脑子里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37\]](#)

毫无疑问，在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考古发现是对古典文物的热情再次兴起的直接原因。的确，温克尔曼本人特别提到的某些最早的赫库兰尼姆的发现，在他来到罗马之前“在德国土地上”已经为人们所知道，“并受到赞赏”。这些雕像早在1706年已经被发现，但赫库兰尼姆的发掘直到1738年才进行，就是在那时进展也很慢。庞贝在1748年被发现，直到1763年才系统地开始挖掘。两处都遵守了最严格的保密。由于当局所持的态度，外界无人知道上述发现，直到1755年才公开发行了在赫库兰尼姆发现的古物中的雕版画的第一本巨型画册。

[38]虽然温克尔曼本人要想得到准确的资料很是困难，但是他的影响却在于，他能确定某些事实，并在他的1762年公开信中公布于众。

[39]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767年出版的最后著作《未经发表过的古代文物》，但是尽管如此卖力，古典艺术的真实情况，因为难以取得可比材料，所以仍然有待于确定其性质。例如，大量的希腊花瓶在那不勒斯及其附近被发现。有两组极精美的收藏品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他是英国驻那不勒斯的大使（以被称作埃玛的丈夫而更知名，埃玛是他的夫人）。他的收藏品被精心地用雕版印刷出来，编成目录，使众多的人得以看到——事实上他的第一批收藏品于1772年售予大英博物馆——但是很长时期谁也不了解这是希腊花瓶。它们被认为是埃特鲁里亚的，尽管它们的铭文是希腊语。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兴起一股风靡一时的狂热，被怀亚特和韦奇伍德·亚当兄弟二人巧妙地加以利用来赚了大钱。韦奇伍德仿制花瓶取得极大成功，连他的工厂也命名为埃特鲁里亚，直到今天，它成了我们祖先在考古学上失误的证据。

早期阶段的新古典主义在安东·拉法埃尔·孟斯（1728—1779年）的作品中看得最为明显，温克尔曼称他是两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画家。他的《帕那萨斯》（1761年，于罗马阿尔班尼别墅）表现了温克尔曼和孟斯本人所详尽阐述的理论的主要特征。孟斯也是好几篇论文的作者，风格上与温克尔曼相同。像温克尔曼一样，孟斯早年生活艰苦，改信天主教，受到同样环境的影响——德累斯顿（他父亲是德累斯顿的宫廷画师）和罗马。他首次去罗马是在1741年，比温克尔曼早14年。他两次去西班牙，任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师，他的最佳作品大部分是在这里画的。在他一生中，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声望远远超过提埃坡罗。提埃坡罗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年被孟斯的党徒们施展阴谋，搞得痛苦不堪。[40]不过孟斯对西班牙王宫藻井画的处理上明显比《帕那萨斯》少些新古典主义，后者是在温克尔曼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总的来看，孟斯大概是现在人们认为最著名的肖像画家。在他的时代，学术界认为他是把绘画从洛可可风格的衰败中拯救出来的救星，虽然雷诺兹（他对孟斯的许多理论有同样的见解）认为他作为画家是有弱点的，在他的《演讲录》中只提到他两次，而且相当轻视他。

《帕那萨斯》是为温克尔曼的雇主与赞助人阿尔巴尼红衣主教的新别墅里所绘制的藻井画。这幅画可能打算用来作为宣言书；的确，它标志着与传统形式的巴洛克藻井画的彻底决裂。而孟斯本人仅三年前在罗马的圣·欧塞比沃教堂作画时仍然采用上述传统风格。这个传统的基础是采用引起人们错觉的仰角透视法——目的在于设法让观赏者向上看，以为自己可以看穿天花板仰视人物飘浮在他头上。《帕那萨斯》抛弃了这种引人产生错觉的概念，以便回复到直角交构图法；就是说，画面与观赏者的视线想象成直角，而不管观赏者的实际位置或者图画放置在什么背景。构图的处理恰似浮雕艺术，阿波罗站在中央，九位缪斯围绕着他。画面几乎没有深度，只有一般的风景作背景。主要人物几乎是《贝弗德勒的阿波罗》的逐笔描摹；缪斯们则或多或少直接脱胎于梵蒂冈宫里拉斐尔的《帕那萨斯》，或者脱胎于《缪斯石棺》一类的古代浮雕或《埃尔科拉诺古文物》中的雕版画。他试图与拉斐尔和古人们比高低，这是他经过艰苦努力而到达的顶点。但是他的构图太注重意识，生硬而无生气，人物造型完全没有创作新意，只是机械地照搬现成的姿势。就这一点来说他只不过是拟古典主义者的典型。但是在一位更伟大的艺术家手中，这种模仿古代原型的方法可能成为传达真实感情的一种媒介。

所以，早期新古典主义风格绝不是全部模仿希腊艺术作品。许多绘画，不论是孟斯的还是韦斯特的，都略具普桑的风格。这个事实为探讨风格问题提供了线索，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因素是贝洛里于17世纪后期所阐明的理想美的理论。^[41]这个理论，就绘画而论，主张以拉斐尔，而不是希腊无名画家的作品为临摹的范本。贝洛里是普桑的朋友和赞赏者，一般认为普桑在把拉斐尔同古代风格结合起来方面是成功的。

在雕塑和建筑方面，起作用的则是一些很不同的因素。雕塑家们有多得多的作品可以模仿，虽然大多数的模特儿——如《贝弗德勒的阿波罗》《贝弗德勒躯干雕像》《拉奥孔》——久已闻名，并且就新的考古学的意义上讲不是希腊的。在18世纪后期是否有许多人在区别哪些作品是希腊的，哪些是希腊—罗马的方面能够跟得上温克尔曼是值得怀疑的；至于雕塑家是否关心这种区别则更值得怀疑了。18世纪末最伟大的雕塑家如乌东和卡诺瓦，针对贝尔尼尼学派的著作更加关心的是追求俭朴的风格，而不是严格的尚古主义。乌东的《圣布鲁

诺》（1764年，于罗马，圣马利亚德格利安吉利广场）以其令人心驰神往的俭朴而闻名，但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乃是他的肖像雕刻，特别是他的许多《伏尔泰》雕像表现出他追求的是富于表情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形式。卡诺瓦的作品受希腊观念的影响更深些，但是他的白色大理石的“拿破仑”裸体巨型雕像（藏伦敦惠灵顿博物馆，在米兰有一座铜像）晚至大约1806—1808年间问世，而他的教皇陵墓（圣彼得教堂，1784—1787年和1787—1792年）看来不过是表面上的新古典主义。然而古罗马雕刻，或许最主要的是在英国，仍然是不断给人以灵感的源泉。在英国，J.M. 赖斯布雷克（1694—1770年）的半身雕像和浮雕，在18世纪早期已经显示出直接模仿除罗马之外的古代作品。不过，他的浮雕概念根本不同于纯粹新古典主义者，例如班克斯，因为他们专注于具有表现力的轮廓线。

在建筑学方面，理性时代的标志是严格的功能主义在理论上的首次表现。建筑学从定义上说就是一种实用的、功能性的艺术。然而18世纪的理论家一味探求理性和功能的概念（还有对“自然”的含义不明的定义），超越了前人所持的任何见解。这种学说是由三个人提出来的，他们都是教士，没有一人是开业的建筑师。早在1706年，它就在卡农·德科德穆瓦（1651—1722年）的《建筑学新论》里首次出现。但其中所坚持的建筑学方面的真理、自然性和理性，不过是新的外衣下的旧的正派理论而已，然而它却被洛多利和洛吉埃所接受，并大大地加以发展。

帕德·卡洛·洛多利（1690—1761年）没有任何著作，但是他的教导影响广泛。他的出名主要是由于他的学生、威尼斯贵族安德烈亚·梅莫。梅莫在1786年出版了一本《洛多利建筑学基础》；同时也由于一些作家如阿尔加罗蒂等在此之前曾对洛多利的主张展开了讨论。他的理论无疑在他生前已为人所共知。他的两项主要主张似乎惊人的新颖。第一，他主张不应当有什么装饰，尤其在建筑物的正面，除非它真正能体现内部的、结构上的特色，因此他不赞成维特鲁威为希腊神庙所作的辩护，在这些神庙中原本是木材的栋梁上隆起了石饰（排档间饰和三陇板），这些石饰不再具有“真正的”功能。第二，所有建筑物都应当适合材料的性质。第一个信条，即外表应“表现”内部，已经成为现代建筑学的战斗口号。第二个信条现在很流行于雕塑家中间，但对于20世纪最先进的建筑家来说，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可塑

性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洛多利时代，上述两种理论都被认为是反维特鲁威的，更确切地说是反巴洛克风格的。大多数巴洛克风格的杰作有着过多的装饰，正面常常与后面建筑物的“实际”毫不相称。此外，像普罗密尼这样的人们所主张的建筑的可塑性被认为是滥用了石头的不朽基本性质。洛多利的功能主义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他要求用新方法设计家具，使之适于人体的形态，而不是相反。他以威尼斯的小划船为例，说明物体的美是由于它完全适应它的功能。洛多利的学说大概被法国耶稣会会士马克—安托万·洛吉埃（1713—1770年）所吸收。他写了一部威尼斯历史（可能因此认识了洛多利），并在1753年发表《建筑论》和1765年发表《建筑评论集》对功能主义理论加以推广。^[42]他的书读者很多——例如索恩似曾送给学生们多本，在索恩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此书各种版本11册。洛吉埃的新贡献在于反对视觉美而主张特点和表现力——富有表现力的建筑——而实际上美可以利用基本的几何形式来加以保持。这种纯形式理论在法国非常流行，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几年。但是它没有引起英国建筑家们的多大兴趣，因为在英国兴起的“风景如画运动”允许“富有表现力的建筑”的魅力从原有的风景画和园艺的理论中发展起来。^[43]

这两个因素——坚持17世纪贝洛里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和新的理性主义建筑理论——是对“我们要达到伟大……其唯一的途径就是师法古人”的理论进行修正的主要原因。抵制希腊影响的另外两个方面可以简短地提一下。一是认为伟大的罗马传统本身不过是更早更纯的希腊风格的派生物，从而很自然地产生了观念的改变；二是哥特式风格的复兴。对许多更保守的18世纪艺术家来说，希腊风格（假如那些幸存的实物真是更早的作品的話）当然看起来比罗马风格在艺术上要差些；他们不说希腊风格纯正，而是说它还不成熟。当然这种思想感情在罗马最为强烈，但许多非意大利人也同样热情地赞同。皮拉内西和钱伯斯可以说是这两种人的典型例子。皮拉内西的建筑理论相当混乱，^[44]犯了在他私生活里非常突出的那种急躁病。1761年他出版了《罗马的宏伟和建筑》一书，以回答一位匿名的“调查者”（实际上是苏格兰画家阿伦·拉姆齐），更是为了回答勒鲁瓦的《希腊最优秀的文物遗迹》^[45]一书。皮拉内西断言埃特鲁里亚人实际上是所有建筑物的创造者，他们的雄伟风格有些像埃及的。凯吕斯在他的《埃及、埃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古文物汇编》（1752—1767年）中认为

埃特鲁里亚人是希腊人的祖先，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多少关于他们的情况，因此意大利人很方便地为一切希腊文明虚构出一个神话般的埃特鲁里亚先驱。P. J. 马里埃特在1764年的《欧洲文艺报》上将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皮拉内西则于1765年发表《对马里埃特先生的信的意见》作为回答，其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关于建筑的意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重申他的主要论点，提出托斯卡纳柱式与陶立克柱式无关；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在《关于建筑的意见》中抛弃了他的维特鲁威的和考古学的立场，辩称真正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按照他所喜爱的去创作，去信仰——在这些方面天才证明一切是有道理的。这个立场恰恰就是几年以前皮拉内西的朋友罗伯特·亚当所采取的。^[46]这就是把他们二人看作革命艺术家、浪漫主义先驱的理由。

皮拉内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访问了帕埃斯图姆的希腊神庙。^[47]到那时候，他已改变观点，认为它们既是优秀的，也是希腊的（虽然这一点尚有一定限度）。这种陶立克粗柱，主要的特征是没有底座，给他的印象很深。但它们又是那么陌生，因此很久才得到普遍承认。相反，它在这个世纪的晚年却变成最先进的建筑风格的标志；尤其是在法国革命年代，它成为抵制学院式传统的象征。

皇家艺术院院士威廉·钱伯斯爵士（1723—1796年）在创建皇家艺术院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该院第一任司库，而且是他的杰作萨默塞特住宅的官方建筑师。他代表帕拉迪奥和罗马的传统，通过不断参照直到他那个时期的法国和意大利各个时期的作品，使之成为现代的东西。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希腊风格比罗马风格更简洁纯朴，因而更优美。根据维特鲁威的权威论点，他不得不承认罗马风格要比希腊晚一些，而且至少部分地是从希腊派生出来的。关键的问题是希腊陶立克粗柱有凹槽而无底座，大约从4.5个直径高（帕埃斯图姆）到5.5个直径高（帕台农神庙为5.48），而罗马陶立克或托斯卡纳式柱则通常没有凹槽而有底座，常常有8个直径高。这就给他提供了机会抨击希腊作品似乎不够优美匀称的根据。在他的《民用建筑概述》（1759年），尤其是1791年增订第三版中，正当希腊概念更加流行时，他反对希腊优越的观点。在一篇讲稿里，他比较无顾忌地评论支持希腊风格的人说：“他们也许可以同样成功地用霍屯督人和狒狒来对付阿波罗和角斗士，就像以希腊式建筑反对罗马式建筑一样……看

到……把许多赞美的话滥用于实际上很少值得或根本不值得一顾的东西，它给每一位聪明的建筑师提供了嗤笑的机会。”[\[48\]](#)

钱伯斯去世时，有关希腊的论战已接近尾声，但是仍有不少人批评索恩设计的英格兰银行（1788年以后）所表现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其中有两位这样的人：一位匿名写了《威廉·钱伯斯爵士纪念碑铭文》，另一位则写了一首枯燥乏味的题为《现代哥特人》的歪诗（二者都刊印于1796年）。[\[49\]](#)

抵制希腊理想概念的第二方面是哥特式的复兴和与它有关联的风景如画运动。在18世纪中叶流行着好几种内部装饰风格——中国式的、希腊式的、哥特式的、埃特鲁里亚式的和后来的印度式的。只要它们被认为只不过是流行一时的东西，它们就是没有害处的小事。钱伯斯之所以激动得使用了过分的言辞，是因为他认识到斯图尔特之推崇希腊，亚当之推崇埃特鲁里亚，是在树立潜在的对手来反对古典的罗马风格。起初，哥特式似乎只不过是霍勒斯·沃波尔手中像玩具一样的新东西，但是到该世纪末，在怀亚特手中以及作为古文物研究的成果，它本身也足以构成一种有竞争力的风格。诗人格雷是首批严肃对待哥特式建筑的人之一。当时普遍公认的说法是各大教堂是在丹麦人入侵之前建造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的知识水平。

[\[50\]](#)

迎合民族主义的需要便容易为人们所赞赏，因此哥特式风格很快就变成了英国历史的一个方面。这一理论的充分发展是在19世纪初期。当时新的议会大厦原打算设计成都铎式的，因为伊丽莎白朝代标志着英国全盛时期的顶峰。希腊式与哥特式的正面碰撞，以及许多精神上的困惑，虽发生在19世纪，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场斗争就已在酝酿，法国大革命本身又大大地推动了把哥特式看成是英国的民族荣誉的论点。哥特复兴式与风景如画运动相互之间的确切关系是很难说清楚的。二者都是浪漫主义的，二者又都产生于特定的英国环境，不过风景如画运动对世界各地的影响远远胜过哥特式的复兴。风景如画运动是英国对视觉艺术所有贡献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但是由于它在风景园艺方面比在其他任何媒介方面表现得更为充分，所以它的重要意义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就其原来的形式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把一片风景看成好像是一幅体现立体感的由克洛德、萨尔瓦多·罗萨或加斯帕·普桑所作的画。即是说，它的原意与现在流行的意义

正好相反：现在流行的看法认为风景如画的景物是适合于作成画的景物。当伯克的《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一书（1757年；到1792年出了11版）把视觉享受分成崇高和秀丽时，情况开始错综复杂起来：崇高暗含有畏惧甚至恐怖——急流和悬崖——的意思；而秀丽则是我们现在往往称之为整洁或漂亮——合乎规范的布置整齐的花园小径。这些范畴排除了那些可欣赏的东西如克洛德或加斯帕的风景画（但是“野蛮人萨尔瓦多”无可争辩地属于崇高）。因此，风景如画成为一个适合的中性名称，在“匀称中有某种奇异”，具有未雕琢的或残缺的浪漫乐趣。于是风景园艺家们能够“改进”自然本身的面貌，兰斯洛特·布朗（1716—1783年）也因而获得“大地改造者”的雅号，因为他总是能够看到他的顾主花园里潜在的可能性。汉弗莱·雷普顿（1752—1818年）是世纪末的伟大代表，他留存至今的《红皮书》^[51]表明了他参照“整个地貌特征”而做的改造工作“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虽然不久便出现了一些过分的言行，围绕术语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很久，但是英国式花园是传播浪漫主义的有利因素，特别是在人们改变了作画时抄袭模仿的习气，转而欣赏园艺师巧妙创造出的现场自然美后，情况更加如此。风景如画的最确切的定义是尤韦达尔·普赖斯爵士在他的《论风景如画风格》（1794年；最后文本有3卷，1810年）一书中所提出的，这里他追求的是形式的错综复杂，以及“粗犷和突然的变化，结合成参差不规则的景物”。^[52]这些特点可以在托马斯·庚斯博罗的作品中看到，他无疑是那个时代英国最优秀的画家。他的风景画和想象画是风景如画风格的典范。

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中心主要是伦敦和巴黎。罗马主要是学习研究的重要中心。当时还在世的最伟大的画家中有三位出在威尼斯——卡纳莱托（1697—1768年）、瓜尔迪（1712—1793年）和最著名的提埃坡罗（1696—1770年）——但是三位都是洛可可风格的代表人物，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家认为洛可可风格只是琐碎无聊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许被当做是属于较早年代的。所以本章其余篇幅专门用于简要探讨在英国和法国最具重要意义的各流派。

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几乎正当雷诺兹任皇家艺术院院长之时，即从乔治三世于1768年创办该院到1792年雷诺兹去世为止。第一次公开画展迟至1760年才在伦敦举行。早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艺术家与其赞助

人之间的关系的新概念是使画家、雕塑家能够有地方展览出售他们的作品的关键，正如长期以来巴黎的情况一样。乔治三世本人对艺术的兴趣导致他为此目的而创建了一所艺术院。但是人们认为这比不上同时建立的学校更有重要意义，因为讲授艺术理论在当时看来远比实践更为重要，人们认为后者只是一种手工艺。雷诺兹是担任新创建的艺术院院长的唯一人选。因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肖像画家，而且曾到过意大利，在文艺界活动过，而且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都是一位绅士（他是一位曾担任巴利奥尔学院研究员的牧师的儿子）。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艺术院享有也许是最高的威信并取得最大的成效，因为几乎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都是它的成员。^[53]雷诺兹的爵士身份和在院长席位上所作的《艺术演讲录》使这个新建的机构获得的学术地位，足以与各大学相匹敌。艺术院院士具有的地位仅次于爵士的“先生”的头衔，可以穿类似学院院士的长袍。雷诺兹本人于1772年被授予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

毫无疑问，雷诺兹对英国艺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担任院长的声望甚至超过了他作为画家的个人成就。仅就他同像约翰逊博士或埃德蒙·伯克这样的人保持友谊这一事实来说，就给予所有英国艺术家一种崭新的身份。他的《艺术演讲录》要归功于约翰逊和伯克二人。伯克1757年的《关于崇高美与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与雷诺兹的《艺术演讲录》相比，显得十分浅薄。但是同时代的人难以相信这些演讲会是出自一位画家之手。^[54]

如同法兰西学院和所有传统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在雷诺兹看来画家的任务是用理想的形式表达道德情操，而历史画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途径。这是雷诺兹1769—1790年之间在艺术院宣讲的15次演讲所阐述的原则。他画了很少几幅纯粹的历史画，但他颇有见识地把历史理想主义揉进他的肖像画中，从而把肖像画本身提高了。《贝蒂博士像》或称《真理的胜利》（1774年，阿伯丁大学）题材涉及被人们信以为真的贝蒂对异教徒休谟、吉本和伏尔泰的驳斥，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早在1758年苏格兰人加文·汉密尔顿（1723—1798年）就在罗马画过纯历史画。^[55]但是，雷诺兹对英国艺术的影响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艺术院画展的性质不同，由于他从1786年起为奥尔德曼·博伊德尔的莎士比亚画廊所作的画，还由于巴里和以后的海登以当历史画家谋生的坎坷尝试。詹姆斯·巴里（1741—1806年）是伯克的

门徒，1766—1771年在意大利曾受伯克的资助。从1777年开始，巴里花了六年在伦敦艺术学会的大厅中作了巨幅绘画《人类文化的进展》，画面上人的肖像不协调地与神和神的化身并列在一起（库克船长与泰晤士神父）。巴里是一位历尽艰难的爱尔兰人，由于一心一意从事历史画的创作而濒于饥饿。他支持美国革命，因此非常奇怪的是，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的历史画的真正革命却是两位美国亲英分子——本杰明·韦斯特（1738—1820年）和J. S. 科普利（1738—1815年）所为。^[56]韦斯特是乔治三世的亲信画师，恩宠有加，继雷诺兹任皇家艺术院院长。他年轻时曾去意大利（1760—1763年），在那里深受温克尔曼—孟斯—汉密尔顿一派人的影响。回到伦敦后，他画了许多小型的、普桑风格的画，选题来自古典历史或者神话，例如《雷古卢斯从罗马出发》（1769年；皇家收藏品），在皇家艺术院首次画展时展出，韦斯特是该院创办人之一。就在下一年，他画了《沃尔夫将军之死》（1770年；渥太华：有其他版本）。这幅著名的画1771年在艺术院展出，通常被认为标志着与新古典主义原则的彻底决裂，因为事件发生在同时代（1759年），人物穿的是现代服装，甚至可以看出是军服。然而事件发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韦斯特为了强调这一点画进去一个切罗基印第安人，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这个人在场。这样，他的画所表现的就是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事，即使不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沃尔夫将军之死》这幅画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神话化了：它肯定不是第一幅描绘现代事件，或甚至现代服装的历史画，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两幅表现沃尔夫之死的画，二者都逼真地描绘了这一事件。然而韦斯特的画之所以享有崇高的荣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巧妙地把学院派的崇高风格同主题的爱国主义的现代意识结合起来，因而把他弘扬当代题材看成是革命之举是公正的。这幅画非常成功。甚至巴里也展出了一幅十分类似的作品（皇家艺术院，1776年；新不伦瑞克博物馆），但它是失败的——大概是因为它只不过是韦斯特原画的摹本，仅仅加上一些“古典”的姿势而已。新的浪漫主义的历史画概念，把这种画看成是记录当代人物，特别是本国的人物所做出的英雄业绩的手段，这种概念由科普利在一系列十分引人入胜的，起着现代新闻摄影作用的绘画中充分确立起来。其第一幅，也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幅，是《布鲁克·沃森与鲨鱼》（1778年；波士顿和克赖斯特医院）。这幅画记录了一位后来成为伦敦市长的人的历险情景。他在哈瓦那港游泳时被鲨鱼咬掉一条腿，后被同舟

人救起。这幅画，连同接着问世的《查塔姆之死》（1779—1780年；泰特美术馆）和《皮尔逊少校之死》（1783年；也在泰特美术馆）所具有的新闻影片的性质，在严肃的绘画中是十分新鲜的东西，与雷诺兹所倡导的强调基本特征的原则决定性地决裂了。大卫的《马拉之死》（1793年；布鲁塞尔）是一幅奉献给一位法国大革命的英雄的画，如果没有科普利这位美国人率先提倡的风格，它是无法想象的。19世纪早期许多法国绘画也受到另一种英国绘画发展趋势，即奥尔德曼·博伊德尔的莎士比亚画廊的影响。博伊德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图片商人，他委托雷诺兹和所有主要的艺术院士为他设在蓓尔美尔街的画廊绘制了一批以莎士比亚为题材的大幅绘画。印制雕版画是他用来支付画家润笔的手段。莎士比亚的罕见的天才激励了像罗姆尼这样一些人潜在的浪漫主义，焕发了富塞利的想象力。莎士比亚题材绘画的大部分历史不在本章论述范围之内，但是罗姆尼和富塞利，连同巴里，都是给布莱克早期作品以主要影响的人。班克斯和弗拉克斯曼的雕塑必须提到，虽然弗拉克斯曼在欧洲的巨大声誉靠的是他的线条画，而不是他的雕塑，而且不管怎样他的艺术生涯实际上只是他从罗马回来之后在1794年才开始的。

在建筑学方面，这时期包括：威廉·钱伯斯爵士的官方风格，它应同“亚当革命”相提并论，后者在18世纪70年代以其富有庞贝式灵感的内部结构而达到了顶点；亨利·霍兰（1745—1806年）的法兰西风格，反映着福克斯圈子里的人的情趣；以及希腊复兴式风格的开始，其关键日期是在1758年，当时斯图尔特在哈格利的场院内建造了一座庙宇，它是雅典提修斯神庙缩小了的翻版。30年之后，约翰·索恩（1753—1837年）被任命为英格兰银行的建筑师，开始改建工作，最后包括改建所有的旧建筑，并大面积地加以扩建。他所设计的大厅和办公室具有自己的高度新古典主义的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当和斯图尔特，也要归功于洛吉埃和洛多利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法兰西作品有着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

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发轫以追溯到从马里尼、科尚和苏夫洛1751年意大利旅行归来算起为宜。^[57]第二年凯吕斯伯爵（1692—176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卷《古文物汇编》，收入数百幅埃及、埃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的古文物的雕版画（按此顺序排列），并有一篇序言说明他愿意将尽可能多的样板公之于世，既为了历史学家，也为了艺术

家，以帮助他们“更紧密地接触到崇高而俭朴的古代风格”。
[58]1754年科尚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向金银匠发出的请求》，这是一篇呼吁书，呼吁回到俭朴的形式和直线条，以取代洛可可式金银匠们的作品所采用的花体装饰。然而更重要的是苏夫洛（1713—1780年）通过马里尼接到建筑巴黎圣热纳维埃夫教堂的委托，即我们更为熟知的先贤祠。委托是在1755年，到苏夫洛死后于1790—1791年才完成，当时它被改名为先贤祠，并且作了几处修改，以增加其严肃古朴的风格。事实上，该教堂是安东尼奥·达桑迦洛和米开朗琪罗所建筑，更确切地说他设计的是罗马圣彼得教堂同伦敦的圣保罗教堂的结合体。它的门廊直接脱胎于罗马的万神殿。有一个时期，它的圆顶也是如此，但后来被修改成十分近似于圣保罗教堂的圆顶（苏夫洛曾于1766年特为此作了画）。那种希腊十字形的平面图可能也是来源于圣保罗教堂的伟大模范设计，这在雕版画上是众所周知的。先贤祠，尤其同圣彼得或圣保罗二座教堂比较起来，常常被批评为太轻巧和浮夸，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批评来自建筑的全过程，因为很快就出现了裂缝，在1778年就对其坚固性进行过一次全面调查。这又是因为苏夫洛把圆屋顶和拱顶放在有直柱顶盘的圆柱上，而不是架在角柱或者扶壁上，因而破例把哥特式的结构原理同他设想的希腊的雄伟壮丽结合在一起的缘故。苏夫洛的学生布雷拜昂在1780年写道：其主要目的是要把哥特式结构的轻巧同希腊建筑的纯洁和雄壮结合起来。[59]为此目的，苏夫洛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的技术上的权宜手段，主要是在砖石结构中使用了精心制作的铁带。[60]这种结构上的杂乱，加上明显地缺乏希腊建筑细部的知识，使先贤祠无法跻身于十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列，即使如此，洛吉埃本人曾称赞早期的设计是“完美建筑的第一位的样板”。[61]像同时代的亚当兄弟的作品一样，苏夫洛的先贤祠是向大革命即将爆发前几年的建筑风格发展的过渡阶段。

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值得钦佩的法国建筑师，他们的大多数现在都因一座建筑物而知名。比较纯正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发展的几个最重要阶段可以在让-弗朗索瓦·查尔格林（1739—1811年）设计的圣菲利普-迪-鲁莱教堂（1765年前—1784年）和雅克·贡杜万（1737—1818年）设计的医学院（1769年—大约1780年）中看得出来，二者都在巴黎。圣菲利普教堂的设计者意回到早期基督教长方形大教堂的原始俭

朴风格——这种类型的建筑也适合于被认为来源于典型的古代建筑。医学院则除了十分精巧的平面布局外，正面也吸引同时代人的注意，其中心和两端完全是一个整体，一条直线柱顶盘也连成一体毫无间隔，上方也没有任何三角楣饰。剧院建筑也很重要，其中维克托·路易（1731—1800年）设计的两座，一座在波尔多（1772—1780年），一座是法兰西剧院（1787—1790年，现为法兰西喜剧院），与克洛德-尼古拉斯·勒杜在贝桑松建造的剧院（1778—1784年，1958年毁于火灾）是同时代的作品。勒杜（1736—1806年）和部雷是两位主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虽然勒杜的作品很少幸存到现在，而部雷几乎完全是一位行政官员和理论家。勒杜1771年被任命为皇家盐矿监督官，任期达23年。这就使他有机会于1775—1779年在阿尔克-塞南（贝桑松附近）建造了一些建筑物，具有庄重而俭朴的外形，奇形怪状的粗琢石和“具有特色的”装饰——石缸加上垂吊着的钟乳石状的盐，以“表示”建筑物的功能。他在该地的大部分作品在1926年被毁，但是勒杜也利用机会为肖城精心设计他的理想城市规划图。它是严格对称的——为了几何图形的美——它的建筑物也以外形的质朴美，如圆柱形、金字塔形和球形（这势将使人难以居住），以及表现其功能为前提。其极端的例子便是河流监督站。这所房子将建成一个横卧的圆筒形，河水穿流其中，像一部水轮机。可怜的监督员将住在筒壁周围的房子里，可想而知，一定被水声聒耳欲聋，墙壁也一定潮湿得水淋淋的。另一个带有卢梭思想特色的建筑是“奥伊克玛”（oikema），打算用作一种高尚的妓院，实际上是一座很漂亮的希腊神殿，坐落在美丽的风景之中。^[62]尽管勒杜具有革命的建筑思想，但他于1793年被捕入狱，并几乎被当做保皇党送上断头台。他最出名的作品（其中四处至今尚存）是巴黎的收税关卡或叫征税所，建于1784—1789年之间，革命爆发后停建。其中有些是希腊风格的庙宇，有些是立体几何图形式建筑的尝试；但是数量惊人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建筑物的变形。^[63]

1804年他出版了一部篇幅很大、体例杂乱的著作，书名为《从艺术、风俗和法规来考虑建筑》，书中有他自己作品的多幅版画和一句颇带卢梭思想色彩的晦涩的话——“建筑师在这本伟大的‘感情之书’（Book of the Passions）中可找到他的各种各样的主题”。

一种以最夸张的方式表达出的类似自大狂的风格可以从艾蒂安-路易·部雷（1728—1799年）的作品和理论中看到。他的《关于艺术的论文》直到最近才出版。^[64]他的作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是一座牛顿纪念碑的设计（1784年），它由一个巨大的球体构成，通过许多小孔将内部照亮，收到天穹的效果。球内底部是一座衣冠冢。^[65]

不管是“富有表现力的建筑”和勒杜在“感情之书”中的说法如何，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更重视绘画的题材而非建筑的题材。对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狄德罗主要在评论沙龙艺术展览会上曾强调过。18世纪70年代格勒兹一举成名，他表现家庭生活中平凡的伦理关系的绘画题材和他的伤感剧风格与狄德罗本人的风格十分相似。格勒兹（1725—1806年）在1755年的沙龙艺术展览会上闻名画坛，其作品深受大众欢迎，直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新古典主义的更严格的主题影响了他的名声为止，这引起他以掺杂着色情成分的伤感情调的风格来进行反击。纯粹新古典主义的严谨风格可在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的一幅题材十分重要的画《贺拉斯兄弟之誓》（罗浮宫）中看出。如果说孟斯的《帕那萨斯》是典型的早期新古典主义绘画，那么大卫的杰作从任何意义上讲同样可称作革命的新古典主义的典型。这幅画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1783年专为路易十六所作，但题材是大卫自己所选择。1782年大卫曾看到高乃依的戏剧《贺拉斯》的演出，深受感动。所以他建议用高乃依编剧所依据的李维著作中所叙述的故事作为这幅杰出的历史画的题材。他的建议被接受了。他花了178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罗马作画，1785年在沙龙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国王的赞扬，并及时地收归王宫所有。这幅画之所以重要有三个方面的——它标志着大卫自己风格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篇政治宣言，它是一篇新古典主义的宣言，可与部雷的牛顿纪念碑（1784年）或勒杜的勒伊收税关卡（1785—1789年）相提并论，因为二者与《贺拉斯兄弟之誓》都绘有庄重的（地道罗马式的）上面带连拱廊的陶立克柱式。

《贺拉斯兄弟之誓》的主题最能显示其革命性的一面。贺拉斯三兄弟誓以与库里阿斯三兄弟单独决斗来保卫罗马的故事，这是一部朴素的以尽职献身为主题的罗马道德故事。故事接下去是贺拉斯兄弟中唯一的幸存者无情地把他的姐姐杀死，因为她为她的未婚夫库里阿斯兄弟之一而哀悼，而没有为罗马得救而欢庆。当他以杀人罪受审时，

他的父亲出庭为英雄的儿子辩护，理由是尽忠报国应胜过私人情爱。大卫最初选用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主题，并且曾有一幅画画的是心情激动的父亲为他的面带凶相的儿子辩护的情景。^[66]

十分聪明的大卫放弃了这个场面，采用了更为大家所能接受的主题，即三个儿子对他们的父亲宣誓：不战胜，毋宁死。那些掩面而泣的妇女足够提示故事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为国家效力这个一般的道德可以拿来用于路易十六的法国，同样可以适用于革命的乌托邦。但《贺拉斯兄弟之誓》之所以成为政治宣言，部分在于题材的内在含义，部分则在于实际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所包含的意义。天生的感情是不允许干扰国家的需要的一一奇怪的是，这件事却发生在帝王时代的罗马一一这种思想大概在18世纪80年代比现在更为流行。这些斯多葛学派的美德是与共和制罗马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一一虽然不合逻辑一一转变为与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在背景上，罗马陶立克式圆柱上朴素的砖拱，除形成舞台后部的垂直面并相应地将人物分成三组外，直接与罗马的那种庄严气氛有关（大卫本人在1785年的一封信中说，在圆柱上加拱顶是表示这是埃特鲁里亚式的；他的意思当然是指纯洁、原始和朴素）。从思想上以这种柱形取代爱奥尼亚式或科林斯式的柱形，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很明显，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联想即使在温克尔曼生活的年代也是不可能想到或理解的。然而据可靠传闻，大卫本人曾说过，尽管他的题材来自高乃依，但他的画要归功于普桑。^[67]

这样，新古典主义从拉斐尔和普桑的古典风格的和谐开始，发展成一种公认的风格，在于它与考古学的严谨性有关，受到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发掘工作的促进，并且由于一些鼓吹美国 and 法国革命理想的著作家们在自然、感情和古朴的风尚之间树立起具有同等价值的关系，从而使它获得一种新的道德力量。由此可以恰当地看出，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经过慎重考虑选择法国尼姆的方形大厅作为样板来建造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座公共建筑物，即1785—1796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州议会大厦。

（程子明 译）

^[1] 见第6卷第3章第2部分。英、美一系列音乐史还没有涉及18世纪后期。P. H. 兰的《音乐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1941年）及O. 斯特伦克的《音乐史料读物》

（1950年）或者有帮助。

[2] 意大利学者们，其中有福斯托·托雷弗兰卡曾恰当地提醒我们注意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蒂尼和他的同胞们的影响。

[3] 英译本是P. D. 汤森翻译的，共3卷（伦敦，1891年）。

[4] 最后第5卷出版于1946年。

[5] 泰尔逝世时，他的贝多芬研究（1866—1879年）只出版了3卷，第4、5卷是H. 戴特斯和H. 里曼修订和完成的（1907—1908年）。

[6] G. 阿德勒：《音乐史手册》第2卷，第797页及以下各页；雨果·博茨泰比尔：《前奏曲……的历史》（莱比锡，1913年），第82、258页及以下各页。

[7] “奏鸣曲形式”这一名称，表示一种结构模式，适用于钢琴键盘（或其他乐器）的奏鸣曲，也适用于四重奏和交响曲。

[8] 参见E. 比肯《洛可可风格与古典风格的音乐》，第28、175、210页。

[9] 这是佩戈莱西写的第三部庄严歌剧。

[10] 参见第6卷第3章第2部分。

[11] F. W. 格林的小册子《波希米亚—布罗德的小先知》（巴黎，1753年）的书名曾以讽刺的口吻提到此地。该书拥护佩戈莱西和卢梭的现代音乐。格林曾与卢梭和狄德罗一起参与编纂《大百科全书》。

[12] 参见《德国音乐的纪念碑》；第2组：《拜恩》；第3年度，第1卷，第34页；第7年度，第2卷，第26页。

[13] 参见第6卷，第3章，第2部分。

[14] 第1、2版，柏林，1753年和1759年；第3、4版，莱比锡，1780年和1787年；W. 尼曼编辑（莱比锡，1906年）；W. J. 米切尔编译本（纽约，1948年）。

[15] 另参见C. P. E. 巴赫的《圣母颂》，C. 戴斯编（纽约，1950年）；《第三交响曲》，E. F. 施密德编（汉诺威，1932年）；《第二交响曲》，E. F. 施密德编（汉诺威，1933年）；《莫扎特年鉴，1953年》（萨尔茨堡，1954年），第15—31页。

[16] 大部分海顿的早期作品并非由他授权出版这一事实，证明欧洲人需要他的作品。有时候四重奏是作为嬉游曲加上号的部分出版的。参见M. M. 斯科特《海顿作品第2号……和第3号》，《皇家音乐协会会刊》第61卷（1934—1935年），第1—19页。

[17] H. 阿贝特：《歌德与音乐》（1922年），第54页。

[18] 贝多芬首次访问维也纳是在1787年，当时他想跟莫扎特学习，因母病而很快作罢。

[19] 参见阿贝特《莫扎特》，第5版，第2卷，第193页；A. 爱因斯坦《莫扎特》（1946年），第263页及以后各页。

[20] H. 阿贝特：《歌德与音乐》（1922年），第79页。

[21] 《音乐季刊》第43卷（1957年），第187—200页。

[22] 爱因斯坦：《莫扎特》（1946年），第176页。

[23] gulden，德奥旧金银币名。——译者注

[24] Arlecchino，意大利即兴喜剧中聪明机智的滑稽男仆。——译者注

[25] 亦译《唐璜》。——译者注

[26] 关于浪漫主义的发展在音乐方面的表现，见第9卷，第8章（二）。

[27] D. J. 格劳特：《歌剧简史》（1947年），第288页及以下各页；《泰晤士报文艺增刊》，第61期（1962年8月10日），第592页。

[28] 特别见J. J. 温克尔曼《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1755年），和J. D. 勒鲁瓦《希腊最优秀的文物遗迹》（巴黎，1758年）及其英译本（伦敦，1759年）。参见后面第98—99页。

[29] 近年来法国关于这点用了一个有用的名称“浪漫主义前期”。“浪漫的古典主义”的说法是S. 吉迪昂于1922年创造的（《巴洛克后期风格与浪漫的古典主义》），菲斯克·金博尔1944年在《美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将之译成英文，但现在看来被用得太过随便了。

[30] 巴里、班克斯和布莱克是明显的例外。布莱克属于后一代人（1757—1827年），他的作品大部分不属于本章范畴；其余两位大概是与当时的社会不相适应的人，而不是自觉的政治革命者。

[31] 大量古物的收藏，特别是梵蒂冈的各公共博物馆在这时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32] 《古罗马人》……1748年及以后几年；《罗马景色》，1745年起，总共包括137幅古代与现代罗马的铜版画。皮拉内西发表了许多其他出于对文物和地志的兴趣的版画集，使作品总数增至1000幅以上。1757年他被选为伦敦文物协会名誉会员，同时也是罗伯特·亚当的私人朋友。

[33] 例如，请将那些以君士坦丁大教堂的巨大拱门为背景的姿态各异的小人物（景观画，H. 114号）与该遗址的现代照片相比较。

[34] 典型例子如乔治·丹斯（第二）设计的纽盖特监狱，建于1770—1778年，毁于1902年。

[35] 德文原书名为《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见前引书）。有两种英译本早在1765年和1766年即已出版（前者系菲斯利所译，在伦敦出版，后者在格拉斯哥出版）。大量节录可以很方便地查阅E. G. 霍尔特的《艺术史资料》，第2卷（1958年），第335—351页。

[36] 德语本《古代艺术史》，共2卷（1764年）。早在1766年它即被译成法语，后又被译成意大利语（1779年和1783年）和英语（1850年）。

[37] E. M. 巴特勒：《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1958年），第47页。温克尔曼的主要论点早在1766年就受到莱辛在其《拉奥孔》一书中的挑战。

[38] 《埃尔科拉诺古文物……》共9卷（1755—1792年）。在此之前出版方面的尝试有：《最初发现的情况说明》（伦敦，1750年）；《关于赫库兰尼姆的论文集》，W. 福代斯译自意大利文本并加注释（伦敦，1750年）；《收藏数量与出版状况……》（罗马，1751年）；《关于赫库兰尼姆绘画的通信》（布鲁塞尔，1751年）。

[39] 《关于赫库兰尼姆遗址发掘的公开信》（德累斯顿，1762年）。法语译本题为《关于……出土文物致布吕尔伯爵的信》（德累斯顿，1764年）。

[40] 戈雅的早期作品受这两位画家的影响很深——提埃坡罗在装饰画和壁画方面，孟斯在他的早期肖像画方面。

[41] 尤其是在他的《思想》一文中所阐述。该文成为他最出名的著作《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一书的导言（罗马，1672年）。

[42] 《建筑论》（巴黎，1753年和1755年）。英译本，1755年和1786年。德译本，莱比锡，1768年。《建筑评论集》（海牙和巴黎，1765年）。另参阅W. 赫尔曼《洛吉埃与18世纪法国建筑理论》（伦敦，1962年）。

[43] 即使索恩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也是“建筑的诗意”的一位热情的信仰者，而正如约翰·萨默森爵士所指出的，这“正好同当时最崇尚的某些风景效果相类似”。见下面原文第106—107页。

[44] 参见R. 威特科尔的文章，载《瓦尔堡研究所学报》，第2卷（1938—1939年），第147—158页。

[45] J. D. 勒鲁瓦：《希腊最优秀的文物遗迹……》（1758年）。第一次真正试图出版有关希腊古迹的书是在1751—1752年间由理查德·多尔顿进行的，他后来担任乔治三世的图书馆管理员。这次影响不大，并被勒鲁瓦的书所取代，接着又被斯图尔特和莱维特的《雅典古物》（1762年）第1卷所取代，后者是他们在1751—1753年间大肆宣扬的希腊之行的成果。重要的建筑物收入第2卷。此卷迟至1789年才出版，是由于斯图尔特的拖拉而延误，以致他死后才出书。建筑方面的希腊风格的全面复兴是19世纪，而不是18世纪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延误所造成的。

[46] 见1763年致《批评的原理》一书作者卡姆斯勋爵的一封信。亚当理论的主要论述见《……作品集》第1卷（1773年）的序言。

[47] 他所作的15幅画收藏在索恩博物馆，据认为是在1819年以前为索恩所得；在亲王大街的英格兰银行的门廊（1804年）有无底座的希腊陶立克式粗柱。

[48] 转引自N. 佩夫斯纳和S. 兰《阿波罗或狻猊》，载《建筑评论》，第104卷（1948年），第271—279页。

[49] 《现代哥特人》和《铭文》全文都刊载于A. T. 博尔顿《约翰·索恩爵士的肖像》（1927年），第62—65页。

[50] K. 克拉克爵士：《哥特复兴式》（第2版，1950年），第46页及以下各页和第4章。

[51] 爱德华·马林斯所编《雷普顿设计图手稿集》（4卷本）。——译者注

[52] 起初普赖斯和他的朋友理查德·佩恩·奈特攻击布朗和雷普顿缺乏足够的绘画美，但是后来他们在定义问题上发生了争吵。有关整个问题的情况，见N. 佩夫斯纳《理查德·佩恩·奈特》，载《艺术学报》，第31卷（1949年），第293—320页。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中对风景如画运动中过分言行的批评，是这类批评中的最佳之作。

[53] 罗姆尼和罗伯特·亚当是突出的例外。几乎可以肯定亚当是受到钱伯斯的排挤；但罗姆尼则是拒绝参加展览因而落选的。

[54] F. W. 希尔斯：《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文艺生涯》（1936年），第134页及以下各页。希尔斯翻印了一页雷诺兹的手稿，其中有几处约翰逊亲笔的文字修改。

[55] E. K. 沃特豪斯在《英国皇家艺术院学报》第40卷（赫茨讲座，1954年）上发表的文章和他所著《1530—1790年的英国绘画》（1953年）。

[56] 两人都住在伦敦，韦斯特是宫廷画师，科普利则是艺术院院士。两人虽都不公开支持革命事业，但称作亲英分子也许言过其实。

[57] 在此以前的一个起因可能是拉丰特·德·圣耶内的《对于法国绘画现状若干起因的看法》（巴黎，1746年）。

[58] 凯吕斯很接近于温克尔曼的概念，认为艺术史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汇编》七卷本出版于1752—1767年。

[59] 转引自E. 考夫曼《理性时代的建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

[60] 有人甚至曾说：他发明钢筋混凝土结构。参见L. 奥特科尔《法国古典建筑历史》，第4卷（1952年），第196页。

[61] 转引自L. 奥特科尔《法国古典建筑历史》，第4卷（1952年），第190页。

[62] 据认为这一罪恶的景观可使“贞洁的婚姻之神引导人们结婚”。这句引文和大部分关于勒杜和部雷的事迹，可以在E. 考夫曼著《三位革命的建筑师》（费城，1952年）一书中找到。

[63] 其图片见M. 拉瓦尔和J. -C. 莫勒合著《克洛德-尼古拉斯·勒杜》（巴黎，1945年）。

[64] 由H. 罗泽瑙出版（伦敦，1953年）。

[65] 在这一时期，法国建筑师们曾为牛顿设计过好几座纪念碑，大概是作为启蒙运动的象征。

[66] 在F. H. 黑兹尔赫斯特的《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誓〉的艺术发展》一文中有这幅画的复制品，见《艺术学报》，第42卷（1960年），第59—63页。

[67] 转引自F. H. 黑兹尔赫斯特的《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誓〉的艺术发展》一文中有这幅画的复制品，见《艺术学报》，第42卷（1960年），第59—63页，该书又引自A. 佩隆《贺拉斯画的研究》（巴黎，1839年）。

第五章 科学和技术

1763—1793年的短短30年期间，在科学和技术历史上，尤其在现代化学的创立和蒸汽机的改进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蒸汽机的改进有赖于单独的凝汽器的发明，这一改进直接导致蒸汽动力的发展。物理学的三大部门即热、电和磁的定量研究的基础在这些年份中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地质学和生物学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在这一时期之初，牛顿理论不但渗透到科学思想领域中，而且还通过英国的亨利·彭伯顿和法国的伏尔泰及夏特莱夫人的著作，超越了科学领域的界限进入一般的思想和文学中。但是除了天文学和力学，其他学科没有这样充分的进展，化学还是用少数最基本的成分来解释世界上物质的复杂性。

在数学和力学方面，这个时期的研究以概括和演绎为特征。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1736—1813年）继续18世纪上半叶对微积分的研究工作；他扩展数学分析和方程理论，并在178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分析力学》一书。这一著作在力学史上仅次于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阿德里安-玛丽·勒让德（1752—1833年）进一步研究变分法和数学的其他分支，同时对力学研究做出贡献。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年）奠定了画法几何学的基础。用它可以把三维物体以二维来表示，他的著作于1795年出版。在这些数学研究中，拉格朗日走得最远，他对数学与力学进行综合研究。不久，这种研究就由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年）在他的著作《天体力学》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从而形成了杰出的动力学体系。在实验方面，对固体物质在流体中运动时流动阻力的研究中，先前研究者未能按照实验数据得出系统的理论。这一失败，大部分已被阿贝·夏尔·博叙（1730—1841年）纠正了，他和达朗贝尔及孔多塞共同进行实验中取得的成果发表在《流体阻力新实验》（1777年）一书中。数百次实验表明，阻力随着运动物体速度的平方而变化。其他这类的详细实验是由比亚伯爵皮埃尔-路易-乔治（1734—1809年）在18世纪80年代进行的。在力学方面，继承的实验传统也可以从在夏尔-奥古斯坦·库仑（1736—1806年）对弹性的研究工作中见到，在实验中，他研究毛发

纤维、蚕丝以及金属线的扭转。1792年在巴黎天文台，让-夏尔·德·玻尔达（1733—1799年）和让-多米尼克·卡西尼（1748—1845年）在测量一个重要的引力常数，即单摆秒摆动时间的长度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欧洲大陆的天文学主要是在数学方面的研究，就在这段时期内，拉普拉斯提出他的星云假设，并着手写《天体力学》。在英国，大多数天文学研究工作都是观测天象；在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1732—1811年）的领导下，1766年创刊了《航海年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成为航海者的指导。1781年，威廉·赫歇尔（爵士）发现新的行星——天王星，这是有史以来被发现的第一颗行星；使用架在斯劳的一架巨大的望远镜，他得以把许多迄今未观察到的恒星进行编目。在1783年他开始测量恒星分布的相对密度，次年他观测到银河出现在天穹上像一个一端开口的硕大圆环，太阳不在它的正中心；因此银河系看来像是一面凸透镜。他还观察和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星云，并且得出结论，认为太阳不是停止不动的，而是向着太空中遥远的一个点在移动。

已经知道，所有行星都以相同方向，几乎在同一平面上围绕太阳旋转，大多数卫星都围绕着它们的主星以同一方向和几乎同一平面旋转，而太阳的轴向旋转和行星及卫星的轴向旋转同样是同一方向。在拉普拉斯看来，各种不同旋转在方向上的一致表明太阳系的所有组成部分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并在1796年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太阳系的形成是由于原来炽热旋转着的气态星云凝聚并随后分裂成许多部分，最后冷却收缩而成的。然而，在这之前，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1708—1788年）曾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旋转方向的一致；他假设有一颗彗星与太阳相撞，撕裂出太阳炽热物质的一条喷流，这种物质冷却以后并凝结成行星和它们的卫星，这些星体自然地保持着成为它们起源的太阳物质的旋转方向。虽然布丰的理论比拉普拉斯的理论更符合现代观点，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布丰在他的《自然史》（1778年）里，从这个理论引申出一些关于地球历史的一般概念；他设想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物质慢慢地变冷，太阳仍旧保持炽热，而作为太阳物质分离出来的一部分的地球，它的形成经过了七个阶段，或者说七个时期，七个时期的长短，根据他所能得到的数据估计出大约数字。在第一个时期，地球从炽热状态变冷，成为熔融状态

并变为球形，时间大约3000年。第二个时期估计约为3.5万年，由于继续变冷，产生进一步凝固，形成地球收缩表面原始的深谷和山脉，周围被大气环绕，气体仍然太热以致不能凝结为水。第三个时期约2500年左右，地球及周围大气冷却到足以使水分凝结在地面，形成覆盖一切的包围整个行星的海洋，这种情况，据布丰观察，可以解释高山上出现海生动植物化石的原因。第四个时期估计为1万年，此时陆地开始出现在水面上，这是由于海水通过冷却和收缩的地壳裂隙往下流，流入地壳内层。这时出现了植物，但是许多植物被水冲到地壳裂缝中去，这样导致在那里产生火山。这种现象布丰假设是水火之间猛烈作用的结果。第五个时期约为5000年，这与前一个时期的火山猛烈爆发比较，是一个平静的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动物——柱牙象、大象、犀牛、河马——但是仅生存在两极地带，地球的赤道部分仍旧太热，不适合动物生存。第六个时期大约也是5000年，陆地分隔成巨块或几个大陆，形成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人类出现了。在第七个时期，地球成为现在的样子，人类开始控制他的周围环境和使用他的力量去帮助自然的力量，但是最终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地球变冷将是缓慢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直到它最后变得过分寒冷，使生命无法继续生存；在这第七时期的早期阶段，或者说目前时期已持续了大约5000年；估计未来的时限是9.3万年，此后，地球上的生命将灭绝。这些观点具有历史意义，它清楚地不同于普遍公认的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地球过去只有数千年历史的概念。此外，布丰曾试图把他的理论与地质学的数据与热物质冷却试验的结果以及与观察溶液沉积层沉淀速度相联系。在以他那极为明晰而动人的独特文学风格和以他那至今仍然吸引着现代读者的优雅语言对此作了详细阐述后，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离开巴黎，到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所达不到的地方。几乎不需要指出，现代地质学和史前史学主要是从他的理论发展起来的。

在这个时期里以很大的准确性确定了地球的平均密度。在1774年，内维尔·马斯基林再次试图进行早在18世纪早期做过的试验，他用一条铅垂线悬挂在大山附近，通过巨大山体对铅垂线的引力作用测量垂直的偏斜度；在珀斯郡的希哈利恩山所做的观察表明，地球的平均密度约为水的密度的4.5倍。随后，在1797—1798年，稍后于我们论述的时期，亨利·卡文迪什阁下（1731—1810年）对于这项观测方法做了重大的改进，得出的值为5.488，这个数字和最近测定的5.5270极为相近。另一个重大测量的尝试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天文学家用

这一距离作为测量宇宙时使用的“尺度”，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在1761年和1769年他们依靠观察金星的运行，但是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准确地确定金星和太阳“接触”的时间有困难；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无论如何，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英国的、法国的以及其他国家的天文学家们在这次测量中进行很大规模协作。

在这个时期内，科学仪器有很大改进，改进范围这么大，技术上又这么复杂，很难在有限篇幅里加以讨论和描述。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改进就是皮埃尔·勒鲁瓦（1717—1785年）在1766年制造，1770年加以说明的航海時計，它使航海人员在海上测定标准时间，从而能够确定他们所处的经度，他们需要的纬度信息可以从天文观察取得，由此弄清他们所在的位置。它取代了比它稍早一点，几乎和它同样出名的，由约翰·哈里森（1693—1776年）设计的仪器。这个时期科学仪器的设计和制造及其改进吸引了许多卓越的工匠，但是他们人数太多，他们的贡献范围太广，而且有时技术性太强，也就无法在这里列举，虽然有必要提一下他们工作的高质量和独创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采取的制造规模。在英国，较杰出的人物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在法国，则被皇家授予爵位证书，得到这种荣誉要由皇家科学院提名；他们在科学发展和组织中起了非常必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物理学中最早的进步发生在热学领域，它第一次在定量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这主要是由于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年）在18世纪60年代初期所做的工作。布莱克第一次对热的重要观测是用温度表测量热的强度不是热的量；他然后设计一种测量热量的仪器。在他那个时候之前，人们早已熟悉使用温度计，导致人们观测不同“热”的许多邻近物体（我们今天说不同温度，当时说不同的热），如果不去动它们，过一段时期，用测温计一个一个测试它们，在表上都显示出同一读数；较热的物体冷了下来，较冷的物体暖热起来，当时科学思想说是它们已经获得了所谓“一种热平衡”。但是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密度不同，有的较重，有的较轻。通过所谓“热平衡”的观测，得出的结论是：热在它们中间分布不是均衡的，而是根据它们不同的密度，重的物体得热较多，轻的物体得热较少。这个结论在当时很有道理，认为它符合于某些实验，而在实际上都是一种误解。但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乔治·马丁（1702—1741年）于1739年观测到，用同一容量和同一形状的玻璃器皿，分别盛以

同等温度和相等容量的水银和水，放在大火上，水银受热比水快得多；同时在相反的实验中，水银的冷却也快得多；但是根据当时的理论，因为水银比水重13—14倍，它变热或变冷的时间应该比水长13—14倍，而实验结果所表明的却完全相反。从这些观测中，布莱克得出的结论是，水银与水相比，变热和变冷都比水快得多，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比水的热容量小得多；他指出不同的物质的“热容量”彼此大不相同，这与它们的不同密度无关，或者像他后来所说“热容量”是“特定的”。约在1780年，“比热”这一术语取代了老术语“热容量”；而且，在此期间，布莱克指出如何测量一种物质的“热容量”与水的“热容量”之比，方法是把已知量的一定温度的物质与已知量的另一温度的水相混合，观察这样合成的混合物的温度，然后从一种物质的温度下降和另一种物质的温度上升，计算出这两种同等量的物质中产生同一温度变化的相对热量。因为水经常被当作两种物质中的一种，它成为测量所有“比热”的标准。

布莱克继这个领域之后的研究，导致发现了“潜热”。这一发现对于引导詹姆斯·瓦特发明单独的凝汽器以改进蒸汽机有重要影响，是向蒸汽动力时代迈进的有力的一步。布莱克从简单地观察雪和冰的融化开始。在布莱克重新考虑这些事实之前已有人假设，一大块的冰是在热的作用下融化的，其温度逐步上升至熔点，这时只需要温度稍稍上升一点，整个冰块就会很快融化成水。但是，布莱克对这种普遍持有的看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因为，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冬季积贮的雪和冰将在春季几乎是一起融化的，形成洪水和急流从山上倾注下来，对挡在它面前的一切造成灾难性的毁灭。可是发生的情况正相反，融化过程要几个月，有时山顶积雪经过夏季仍不融化。再则，他发现，把温度计放到水与雪或冰的混合体中，只要还有冰在水中未化，它继续保持冰的熔点的温度。只有当全部的冰都融化时，温度才开始升高。他认为，在长时间的融化中，热是逐渐地不断进入冰和水的混合体中，对温度计没有影响。因此，正如他所说的，这样的热可称为“潜在的”。根据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和理解，他得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测量这种热量。他拿两个小玻璃瓶，每个瓶装上水，其中一瓶水加冷直到瓶内的水结成冰，另一瓶加冷刚刚达到冰点；然后把两个瓶子放到比冰熔点高出7华氏度的屋子里。盛冷水的瓶子在半小时后达到室温；另一装冰的瓶子，经过10小时半后^[1]才使瓶内的冰融化并达到室温。因此，布莱克说，因为冰经过20小时半才融

化并达到室温，而同量的水只需半小时即达到室温，可见原来装着冰的小瓶需要吸收比水多21倍的热量。所以，半小时内进入一个小瓶内的热量是7华氏度，进入另一个小瓶内的热必定是7华氏度的21倍；但是必须从这147华氏度中减去只用于全部冰融化后提高水的温度达到与周围空气同温的7华氏度。因而，140华氏度的热在温度计上没有记录，但是被认为是“潜在的”。

关于冰的融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大量热这一现象的发现，使布莱克的好奇心转向沸腾或蒸发的类似过程。在这方面人们也普遍相信，当水达到它的沸点时，只需要再稍稍加热就可以把它全部变为蒸汽，但是布莱克指出，水从达到其沸点到变成蒸汽的过渡是缓慢的，而且要求更多热的供应。在和他曾经做过的冰融化的实验相似的实验中，他表明，一定数量的50华氏度的水加热4分钟达到沸点212华氏度，然后再有20分钟全部可变为蒸汽。因此，很清楚，试验的第一部分的4分钟内，有212华氏度减去50华氏度，即162华氏度的热进入水中；在试验的第二部分，20分钟内必然有5倍的热量进入水中，就是说这个测量体系要810华氏度的温度。因此看来，融化和沸腾两者都吸收大量的热，这些热没有作为增加的温度记录在温度表上，所以这些被吸收的热叫作“潜在的”。对于热现象的量的研究此时广泛开展；对固体和液体的以及甚至气体的许多“比热”被确定下来，为测量热膨胀特别是为测量固体热膨胀设计了一些精确的方法和适用的仪器，并由此获得了工程学方面极为需要的关于热量守恒的确切知识。

看来热本身的性质是物质性的。自从17世纪以来，热被一些人看作内部的运动形式，而另一些人把它看作一种物质实体。而如果说热是运动，那么要把物体提高到同样温度，在体积相等的情况下重物体要比轻物体需要更多的热，因为激动重物体的分子需要更多的运动。前面已经提到的马丁的实验就决定性地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把同等体积的水银和水提高到同等温度，水银需要的热量比水少。因此，热似乎是物质的。于是，有人曾多次试图（常常是用巧妙的方法）找出它的重量，但是他们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或者得出相矛盾的结果。1787年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1753—1814年）进行的研究（到1799年才发表）是最精确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他在小心控制和精心计划的实验中，以十分灵敏的，能察觉百万分之一重量变化的天平，称装在密封玻璃烧瓶内的大量的水。他第一次称水的重量是在它

处于液体状态时，第二次称重量是在水已经结成冰时。多次试验表明重量没有改变，不过已知融化那么多冰，并使融化的水达到装置试验设备屋子的室温所需要的热量，足以使同样大的一块黄金的温度提高到白热的程度。拉姆福德的结论说，如果热是物质，那么它必定是“无限稀薄的，即使在它最浓缩的状态下，也会使我们要想发现它的重量的一切尝试都成徒劳的东西”。他认为热更有可能是一种运动的形式。

在18世纪中叶，化学领域很少或没有迹象表明将立即出现任何深刻的和根本的变化。化学家的世界仍旧是由土、气、火和水四大要素构成和由盐、硫黄和水银三种基本物质产生的世界。气和水的元素性质是无可怀疑的；土也是如此，虽然存在着很多类型，看来也是元素，它的不同形式仅仅是不同的表现；然而火，虽然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胡克认为是运动而不是物质，但按照燃素理论经过实验比较坚定地承认它是一种元素，这种理论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支配着化学思想。从观察燃烧和点火，这个理论设想所有可燃物普遍含有易燃的“燃素”，当物体燃烧时，它以火的形式，有时作为伴随产生的火焰的形式释放出来。

因而从化学家的观点看，自然仍然被认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在1754—1755年，约瑟夫·布莱克在研究新近发现用作药品的一种名叫碳酸镁（magnesia alba）的新物质的化学特性时，发现弱性碱和苛性碱所含的成分不同，前者含有空气，而后者没有。他在后续的实验中发现这种空气和大气中普通空气的化学成分不同。这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差别，布莱克把这种新发现的空气命名为“固定空气”（就是现在人所共知的“碳酸气”）。他没有分离或收集它，但是他在正确的定量实验中，确定了弱性碱所含有这种空气的量，他还注意到它的特性类似酸。1766年，亨利·卡文迪什阁下（1731—1810年）研究了得自某种稀释酸作用于各种金属所产生的“气体”；它能点燃，所以把它叫作“可燃空气”（它就是现在所共知的“氧”）。因此，卡文迪什承认有三种“空气”——大气中的普通空气、约瑟夫·布莱克发现的“固定空气”和自己发现的“可燃空气”。在这一领域内，继承卡文迪什的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他在1772—1777年分离并识别出七种新的“空气”或气体，大家更熟悉它们新近的名称：氧、氨、氯化氢、氧化氮、氧化二氮、过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大

约与此同时，在1772年，丹尼尔·拉瑟福德（1749—1819年）分离出另外一种他叫作“有毒空气”的气体（现在名叫氮）。这种“气体化学”（如人们所称呼的）的迅速发展，为化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在这方面普里斯特利分离出来的后来叫作氧的气体最为重要。他在1774年8月将某种金属灰加热而取得它。（金属在长时间加热过程中变为粉末状物质，这种物质叫作“金属灰”；人们认为焙烧和燃烧一样，金属在焙烧过程中释放出燃素，那是金属的共同组成部分。）普里斯特利发现这种新的“空气”能大大增强蜡烛火焰的燃烧。1775年3月，他发现它比一般空气更适宜于呼吸并能帮助呼吸持续更长时间。所以它是一种胜过一般大气中空气的支持燃烧和呼吸的空气。按照当时燃素化学理论，大气中的普通空气一直受到家用火炉、工业锅炉、呼吸、腐烂作用和发酵中释放出的“燃素”的污染。这种新发现的“空气”由于它较高程度适应燃烧和呼吸，在普里斯特利看来，它是不带燃素的空气。因此，他称它为“脱燃素空气”，这是化学家所知“氧气”的第一个名称。由于已经叫作燃素的作用，不断地污染普通空气，最终将会使我们的大气不适于燃烧和呼吸。普里斯特利寻找到某种大自然恢复日益不适合使用的空气的方法；他在1771年从绿色植物的作用中发现这种方法，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种恢复空气的方法只有在日光影响下才能起作用。这一点是后来在1779年由约翰·因根-豪茨（1730—1799年）观察到的。

与此同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1743—1794年）从物理研究转向某些吸引他注意的化学问题。他对确定供巴黎市民公用饮水的纯洁度的试验很感兴趣，他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和缺乏任何令人满意的化学试验的条件下，他只得依靠液体比重计用物理方法测量水的密度。但是用蒸馏法净化饮水和随后用液体比重测定法测量它的密度的方法似乎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像化学家们仍然相信的那样，水是可变化至少部分会变化为土的话。拉瓦锡从有关这个主题的大量文献中收集的证据，未能使他确定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如何。因此，在1768年秋天至当年年底到1769年年初的冬天，他把已知重量的水装入一个称过重量、密封的玻璃器皿内加热三个多月；他观察到水中逐渐出现土状微小薄片物质。在实验完成时，把水和土状物质取出，称生长出来的土和玻璃器皿的重量，他发现（在他

的实验精确性限度内)器皿减轻的重量和形成的土状物质的重量几乎相等。所以玻璃器皿内土状物的产生是由于水对它的溶解和腐蚀作用,因此,水并没有,甚至连部分也没有变为土。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有的一个古代化学信念,就这样最后被否定了。

以同样的方法拉瓦锡使用密封的玻璃容器进行焙烧研究,他把称过重量的金属在这种容器内焙烧,结果发现容器和它所装金属的总重量没有改变。然而,当容器的密封两端启开时,能听到空气急冲进去的嘘嘘声,好像是有些空气在焙烧过程中被消耗了,而容器和它里面的金属增加了重量;而且,进一步将焙烧过的金属从容器内移出再次称重量时,增加的重量等于先前观察到的空气冲入封口后容器连同所装金属所增加的重量。或者也可以说,等于冲入打开的封口,以代替焙烧中所消耗的空氣的重量。这样,金属在焙烧过程中重量的增加(化学中早已看到的事实),看来是由于与空气化合的缘故。大约在同一时候,拉瓦锡从另外的实验中做出类似结论,当硫和磷燃烧时,分别产生出硫酸和磷酸,硫和磷与空气化合产生这两种酸,同时,它们增加的重量等于与它们所化合的空氣的重量。这些结论与燃素理论的解释,实际上与它的原理相矛盾。这一原理把所有燃烧不是看作化合过程,而是随同燃素释放的分解过程。当1774年秋天普里斯特利来访巴黎,拉瓦锡和他会晤后,拉瓦锡以他对于焙烧和燃烧过程性质的新认识,重复并扩展普里斯特利的工作。在1777年他得出结论说,只有一部分,大约是 $\frac{1}{6}$ 的空氣(据更精确的实验指出是 $\frac{1}{5}$)在焙烧过程中与金属化合,在燃烧过程中与硫及磷化合,而其余的空氣在这些过程中没有起化学作用。在一次典型的加热和焙烧水银实验中,用一个恰当的安排的装置,使水银与一定限量的空氣接触,他成功地使空氣中产生化学变化的成分与水银化合,由此把它从 $\frac{4}{5}$ 的未发生化学变化的,亦即他称作碳酸气的气体中分离出来,他发现这种气体能够将生命致死和将火熄灭。将焙烧过的水银从容器内取出加热并收集和它化合的那一部分空氣,拉瓦锡发现这一部分空氣有助于燃烧和呼吸。因此,他把空氣分析为两个成分:如他所说,一种是非常适合呼吸的,而另一部分是“窒息的”。空氣不可能再被认为是一种元素,它是两种迥然不同气体的混合物。

但是放弃燃素理论仍然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它曾被证明是多么有用的受普遍同意的理论,很难让位给使用范围有限的拉瓦锡关于燃

烧和类似的化学过程的发现；多年来相信拉瓦锡理论的人只有这一理论的这位杰出创立人。他满足于不做进一步争论，而只是提出他的意见作为更符合实验证据的供选择的解释。无论如何，他继续研究这些问题，写成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呈送巴黎科学院，并逐渐地积累对他理论的有利证据。可是他的理论处于一种明显的难以解决的困境。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燃烧过程都是与大气中的活跃成分的一次化合，这种成分他此时称为“氧”，“易燃气体”的燃烧应该产生一种和氧化合而形成的产物，所有企图探测出这种化合物的努力都告失败。当炭燃烧时，他已经指出，它和氧化合，产生布莱克所说的“固定空气”，这种气体现在看来就是“碳酸气”。

1783年6月拉瓦锡在巴黎的夏尔·布莱格登那里听说，卡文迪什发现，当“易燃气体”燃烧时，产生水。他立即意识到这一新的观察发现的重大意义，并在匆忙设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点。从这次实验和后来所做更精心设计的实验中，他得出结论说，水是一种“易燃气体”和氧的化合物，并把水分解为这两种成分，以证实这个结论，方法是使水和铁发生化学反应，铁与水中的氧相化合，除去了水中的氧的同时，释放出“易燃气体”。作为这个重要发现的结果，这种气体很快被重新命名为“氢”或“水的构成成分”。卡文迪什不同意这样的结论，相反，他设想实验中所取得的水（他是观察和研究这种产物的第一个人），原来就是作为这两种“气体”的组成部分存在于它们之中，它是燃烧过程中从这两种气体沉淀产生，而不是由这两种气体化合形成的。但是化学家们现在承认，水已被证实为一种化合物。由此古代“元素”中的两个已经分解为它们的组成成分了：空气是氧和氮的混合物，而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火成为普遍公认的“热物质”，是一种没有重量的元素；至于多种形式的“土”，主要由于有了这些发现，对物质的化学成分有了新的理解，把它当作一种元素的想法很快也不存在了。

在这个时期以前，对于自然界存在的或化学家实验室配制的各种不同千变万化物质的化学组成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不了解它们的组成成分，不可能制订恰当的化学名称系统。很多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例如帕尔马伯爵的火药；有些是以它的配制方法命名，如“钟制硫黄油”；其他则保持七种古代已知金属与七种天体的旧有联系，例如，“金星的矾”，这种名称仍盛行于这门已经知道空气和水的化学

成分的科学中。如果能够把它叫做系统的话，它是经过很多世纪逐渐形成的杂乱无章的系统。在那些世纪里，根本还不知道怎样命名物质的化学成分。早在1782年，路易-贝尔纳·吉东·德莫尔沃（1737—1816年）曾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拉瓦锡以及克洛德-路易·贝托莱（1748—1822年）和安托万-弗朗索瓦·德福尔克拉（1755—1809年）三位法国化学家加入他所从事的研究，他们和拉普拉斯都是首先接受拉瓦锡以氧取代燃素的新化学思想的。他们在1787年提出题为“化学命名法”的建议，主张根据物质的化学成分命名各种物质。他们决定把不能分解的物质列为单一成分物质，虽然这些物质后来可能证明是化合物。这些是第一批被列在新名称系统中的物质，其中大多数保持着它们的旧有名称。它们被分为五类：第一类包括热和光，氧和氢；第二类包括与氧结合而形成的各种酸，包括硫、磷、碳和氮以及不知名的许多酸根化合物；第三类是金属，现在第一次把它们看作单一物质，按燃素理论曾把它们当作化合物；第四类包括土壤、硅、氧化铝、氧化钡、石灰和氧化镁；第五类包括碱、氢氧化钾、碳酸钠和氨。这些建议是暂定的，提出时信心不足，并毫不犹豫地指出，有些被定为单一物质，将来有可能证明是化合物。

在着手研究由两种单一物质组成的物体时，改革者们现在必须应付大量各种各样的物体，他们依赖于分类法。有一种类别是酸类，凡认为属于这类的全部物体都含有酸化要素或元素——氧，由于全部物体都包含这种物质，就决定以它的另一个成分为名，所以制定出“硫酸”“磷酸”等名称。在一种同样单一物质与较多或较少的氧结合而产生两种酸时，例如与硫化合时的情况，于是把“硫酸”的名称仍旧给予与较高比例的氧化合的酸，而把与较小比例的氧化合的酸叫做“亚硫酸”。迄今仍称为金属灰的物质组成了另一种类，这一类都是由两种单一物质组成的，其中一个成分氧是它们都含有的，所以给予它们一个共有的“氧化物”名字，为使彼此有区别，名字的另外一半使用组成它们的另一个单一物质的名称，例如氧化锌、氧化铜等。同样的，有很大一批物质（包括盐）由三种单一物质组成，给予它们的名称来自组成它们的酸和它们所含的金属或其他物质。照此方法，许多从硫酸取得的大量盐类给予分类名称“硫酸化合物”，分别称为“硫酸铜”“硫酸锌”等以便相互区别。对于其他酸类的各种盐给予类似的名称，如“碳酸铅”“硝酸银”等；对于碳、氮和其他酸类的盐也同样命名。这个新的命名方法，得到化学家们的普遍承认，这个

命名原则的正确性相当明显，它证明适合于未来的发现，直到今天它基本上仍然在使用。

两年之后，在1789年，拉瓦锡发表他的经典著作《初等化学概论》，为那些开始研究化学的人们提出新命名系统的完整和详细的解释。《初等化学概论》为现代化学奠定了基础。就像几乎刚刚一个世纪前，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一般。虽然它是为学生们写的，但它包括许多带有插图的新的内容。这里还第一次阐述了被称为物质不灭定律的理论。在18世纪的化学中和在更早时期化学的许多方面表现得很清楚的这个重要原理是拉瓦锡从酒的发酵过程中以重量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对每一项反应物和每一项反应产物都仔细称量，结果表明，在研究的化学变化结束时产生物质的总重量和原来使用的物质的总重量完全相等。他在《初等化学概论》中正式发表的物质不灭定律第一次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做出的，原文摘引如下：“无论在人工还是在自然作用中都不会创造什么，在任何作用中，等量物质存在于作用之前和作用之后，这可以视作一个定律。”在这同时，他介绍了现在广泛地为后代所熟悉的“化学反应式”，指出“做化学实验的全部本领”是以他刚刚宣布的原理为基础，并且“因为葡萄汁产生碳酸气和乙醇，我可以说，葡萄汁=碳酸气+乙醇”。但是，《概论》最有革命性的特色是它的元素表，这是第一份这种表。在两年前与他的同事一起改革化学名字命名法时，他们共同建议把某些物质定为“不能分解的物质”并把这类物质列出55种，现在他径直称这样的物质为“元素”，或者，引用他的原话来说，“属于自然界所有王国中的单一物质，也可以认为是物体的元素”。在这个较短的表中，他把55种物质减少为33种，因为他正确地删去了假定为元素基的有机酸；该表以光、卡（热物质）、氧、氮和氢开始，接着包括硫、磷和碳，还有氯化酸、氟化酸和硼酸的未知根，接着是金属（共有17种），末尾是土（石灰、氧化镁、重晶石、陶土和燧石）。固碱、钾碱和碳酸钠，虽然它们从未被分解过，但还是被删掉，因为拉瓦锡从它们的性质来看怀疑它们是化合物而不是元素。这份表是保守的，然而却是精确的；19世纪初，汉弗莱·戴维分解了钾碱和碳酸钠，肯定了拉瓦锡认为它们是化合物的意见。在《概论》中新化学得到它最后和正式的解释。两年后，在1791年，拉瓦锡有理由写道：“所有年轻科学家都采纳这个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化学革命实现了。”

但是在新化学完成前，随着他对氧及其在呼吸中的作用的認識，拉瓦錫和拉普拉斯已經闖入生理學領域，研究呼吸的量。他們一起在巴黎軍械局拉瓦錫的實驗室內工作。他們設計出一種熱量計，它利用冰的融化量來測量熱、冰的溶解潛熱（見本書原文第119頁）已從原來由布萊克進行的另一個實驗中得出。用他們設計的冰熱量計，他們向人們顯示，呼吸是一種燃燒，但是其過程複雜，不過，在這裡將試圖做一簡單概述。在他對呼吸的早期研究中，拉瓦錫曾表示，通過呼吸，進入肺部的氧轉化為“固定氣體”或碳酸氣，他用一般方式做出結論，動物體內的溫度，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健康時保持在高於周圍環境的不變水平，這個溫度在氧轉化為“固定空氣”時，用氧釋放出肺內的“熱物質”（如他所稱呼的）來保持，正如炭在火中燃燒，當氧轉化為“固定空氣”時釋放出熱一樣。

拉瓦錫和拉普拉斯於1782—1784年進行的一系列新實驗中，開始了：（1）測量放在熱量計中一只豚鼠所釋放的熱在10小時內所融化的冰的量。釋放出來的熱量融化了13盎司的冰；（2）在另一個分開的裝置中，他們燃燒稱過數量的炭，在熱量計中測定產生的“固定空氣”的量；（3）他們燃燒另一些稱過重量的炭，測量所產生的熱量（按照融化冰的量計算）；這後兩個測量使他們能夠測量出形成任何量的“固定空氣”所產生的熱回到他們的第一個測量，他們在另一個實驗中測定出（4）豚鼠在10小時呼吸中所產生“固定空氣”的量[在這個時間內豚鼠所釋放的熱已在第（1）個實驗中測定]；從他們的第二和第三個實驗中，他們現在能夠計算出形成這個“固定空氣”量所產生的熱。他們根據融化冰的量得出的值為10.5盎司。他們承認在如此困難的實驗中，必定有許多不可避免的誤差，而且13盎司和10.5盎司的值表明的是這種情況下可能期望的最滿意的數值。他們考慮到豚鼠在第一個實驗中釋放出來的熱和它在10小時內呼吸產生的熱相當，因為在那段時間內它的體溫沒有下降，而是始終很接近它在開始時的溫度。這個動物的生命過程在那段時間內補充它不斷消失在它四周的熱。在那段時間內（10小時）13盎司的冰塊被融化，而豚鼠用它的呼吸恢復相應量的熱；炭與氧化合產生的“固定空氣”相等於豚鼠在那段時間呼出的氣體，而這些“固定空氣”融化了幾乎一般多的冰（10.5盎司）。因而拉瓦錫和拉普拉斯認為在呼吸過程中氧轉化為“固定空氣”產生熱，是保持動物體溫的主要因素，就是說，它使動物的體溫保持在恒定的高於它周圍環境的溫度，他們假設，變化是在

肺内发生的，虽然现在我们了解到变化发生在肌肉里。但在这些研究中表明了氧在呼吸中的作用，而所进行的量的研究表明呼吸是一个化学过程，而不是像长久以来设想的仅仅是机械式的换气过程或以新鲜空气来冷却肺部。以后在革命前夕进行的实验中，拉瓦锡发现水也是在呼吸过程中形成的，这点可能是在融化的冰的数量方面它们的值有差异的部分原因。在后来进行的这些实验中，拉瓦锡指出，一个空腹的人在休息时，他的耗气量冷天比热天多。在进食后消化过程中耗氧率大约增加一半，而在操练、活动或工作中，其耗氧量增加到接近一个休息中空腹人的3倍，人在消化过程中进行工作耗氧量增加到将近4倍；当耗氧率以这种方式增加时，他的脉搏跳动率也加速。但是此人的温度实际上保持不变。由于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处决而中断的这些实验标志朝向现代生理学的巨大进步，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呼吸这一化学过程远远比这些研究先驱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与拉瓦锡没有任何联系的卡尔·威廉·舍勒（1742—1786年）也研究空气的组成，并作出结论说，空气由两种“气体”组成即“火空气”和“臭空气”，前者相当于拉瓦锡发现的氧，后者相当于氮。舍勒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实验家，有很多发现，包括氯和丙三醇以及多种酸类（无机酸和有机酸）。他对燃烧的研究是在他家乡瑞典进行的，但是直到后来其他人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发表他们的成果后，才为人所知。

为解决不同反应物质之间的化学亲和力即化学吸引力问题，人们做了许多尝试。这些工作开始时希望找出某种类似牛顿万有引力法则的化学力的定量规律，但是结果只得到精心制作的纯质量性的亲和力表，主要是由托尔贝恩·贝格曼（1735—1784年）精心绘制的。他所做的数千次实验没有考虑到减轻化学吸引力作用的所有物理条件；当然，他是在那些基本的化学顺序号（原子量）发现之前进行这项工作的。可是他的表收录了一大批非常有用的质量方面的化学知识。18世纪90年代，由耶雷米亚斯·本亚明·里希特（1762—1807年）做出了更令人满意的工作，虽然他的文字风格有些晦涩，虽然他往往无中生有地假设一种独特的数学关系，然而他根据他发现的两种中性盐在溶液中起反应而产生的化合物依然是中性，因而得出结论说，在这些反应物质的成分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固定的量的关系。为了用较通用的词语来表示这个道理，他断言在它们的化合物的化学元素之间有某种固

定的质量比例。他测量若干种酸先和一种碱再和另一种碱的反应量，然后再测量若干种碱先和一种酸再和另一种酸的反应量。把每种酸和每种碱反应的结果列在分开的表格上。虽然他知道能够中和固定重量任何一种酸的不同重量的各种碱，也能够中和固定重量的第二种酸以及固定重量的第三种酸等，但是在这项研究中还有待于他的继承者恩斯特·戈特弗里德·菲舍尔（1754—1831年）来将里希特的工作成果归纳成一份表，于1802年发表。此表展示化学的这种基本规律，后来被不很恰当地叫作反比定律，虽然它实际上确立的是不同物质的重量在化学上是彼此等价的道理。

普里斯特利在他写的《电的历史和现状》（1767年）一书中概括地叙述了这个正在发展的科学的一些事实和理论。他首先记录和研究“侧面闪光”和电的振荡释放，书中他还提出电吸引力规律和万有引力规律一样，是一种平方反比律，事实上和后来库仑指出的一样。在这个时期所做的未发表的实验中，亨利·卡文迪什研究了现在称做电的“电势”和“电容”，在这同时他指明在导体中电荷全部存在于它的表面，而相似电荷间的排斥力大小依照平方反比律进行。卡文迪什做的这项工作直到他的未发表论文于1879年由克拉克·麦克斯韦编纂出版后才为人所知，但是库仑使用扭力天平进行仔细的测量，于1784年及随后几年发表的测量结果表明电的吸力和电的斥力都遵循平方反比律。正像他在一次测量事例中得出结论说，“在两个相似的充电的圆形小球体之间的排斥力的大小与它们中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大约在这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表明平方反比律也适用于磁的吸力。测量电流量的简单仪器设计出来了。这种仪器叫静电计，它们靠带电荷的软木塞或木髓球的排斥力工作，或者像亚伯拉罕·贝内特（1750—1799年）有名的仪器那样，是靠在密封圆柱形玻璃瓶内装置一对金叶间的距离来测定的。在这个时期内在电方面所进行的最重要工作可能是由波洛尼亚大学解剖学教授路易吉·伽伐尼（1737—1798年）进行的。在他的题为《论电对肌肉运动的影响》（1791年）的研究论文中，伽伐尼着重指出为他解剖准备的活青蛙腿如果与一个与地面接触的导体相接时附近出现电荷，它就显示出震颤。与许多重大发现的情况一样，这个发现也仅仅是偶然观察到的。经过多次各种各样的实验，使伽伐尼对于这种奇怪的效应做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它可能由于他称为“动物电”的那种东西的作用；第二，因为两个不同的金属的接触能够产生振动，可能是由于从那个接触中引起某种电作

用。他宁愿选择前一个解释。他的工作吸引了一大群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在他们中间有科莫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亚历山德罗·伏打（1745—1827年）。他已经是起电盘和电容器的著名发明家，还发明了麦秆静电计，他用这种仪器连同他发明的电容器可以检测微小的电荷。伏打否定动物电理论，认为震动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时产生的金属电。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结束后不久，伏打运用他的发明制成现在人所尽知的电池，从而发现了电流（1800年）。虽然在地磁理论中没有什么可记载的重大进展，但对磁偏角和它的变化进行了许多新的系统观察，而且在1768年，维尔克发表了一份“磁倾角”的等倾图，这是第一张包括了地球表面广大部分，即欧洲、非洲和南美洲连同大西洋和印度洋以及部分太平洋的地图。

在以自然科学领域日益发展的定量研究为特色的时期里，气象学得到更关键性的研究和更系统的组织，最后断绝了它和占星学长时期的联系，摆脱了古代亚里士多德“气象学”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里它成为应用物理学首批范例之一。拉瓦锡在他早期科学研究的日子，就能够合理地提出，如果有较好的通信条件，应当有可能做每日天气预报。实现这个变化的最有贡献的两个人是晚年定居在伦敦的日内瓦人让-安德烈·德吕克（1727—1817年）和巴黎附近蒙莫朗西的教区神父佩尔·路易·科特（1740—1815年）。德吕克在他的著作《大气变化的研究》（1772年）一书中报道他对于气压计和温度表这两种极为需要的气象仪器的结构、制造、各种类型、标准化和用途的彻底和关键性的实验，这两种仪器在他手里得到完善的情况难以详述。他还对气压计测定高度方面做了很大改进，并把研究工作扩展到更深的境地，写成了《气象学新观念》（1786—1787年）。科特的《气象学专论》（1774年）一书论述他对大气现象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实际观察，包括风和雨、雾和露、雷和闪电、彩虹和朝霞等，以及幻日和海龙卷。该书还描述和讨论种种理论和仪器，并提出列成表格的长时期资料。从这些观察得出一般性论断是困难的，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经验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但是它把重点放在精确的测量上，这在探讨这些复杂问题的新方法中是有代表性的。在他写的《气象学论文集》（1788年）一书中，科特扩展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在许多国家气象站所做的大量观测结果。18世纪结束前，巴黎的皇家医学会，尤其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在1780年建立的效率很高的皇家气象学会，利用与世界许多地方观察者们通信，收集协调一致取得的气象资

料。后一个学会的主任是一位有名的气象学家约翰·雅各布·黑默尔（1733—1790年），他的总部设在选帝侯于曼海姆的城堡里。从西伯利亚延伸到北美设有57个观察站，备有标准仪器和规定观察范围的观察员们，按特定的表格记录他们仔细的观察报告，一日三次在规定的间隔时间向曼海姆报告。以后他们的报告经过整理摘要刊登在该学会的星历表上，直到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以后，由于政治组织瓦解，这些很有用的活动遂告停止。1788—1792年在肯德尔和凯西克两地进行的一些有趣的观察报告由约翰·道耳顿（1766—1844年）刊登在他的《气象观察和论文集》（1793年）上，那时他尚未提出他的原子学说。

地质学方面以岩石水成论者和火成论者之间无益的长期争论为特色。水成论者把所有岩石都看作水溶液的层层沉积。火成论者则认为地球内部热能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沉积岩的凝固作用；他们认为凝固是地球的地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认为熔融物质从地球内部向外突出到地壳，例如这可以通过花岗岩识别出来。尽管让-艾蒂安·盖塔（1715—1786年）曾在这一世纪的前半叶辨认出一大批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的死火山，但他同时清楚地认识到水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但是他断言玄武岩是水成的。因此他就以这种奇妙的方式既成为火成论之父，同时又是水成论之父。尼古拉斯·德马雷（1725—1815年）在中欧进一步发现更大地区的死火山。他在反对盖塔中得到满足，认为玄武岩是火山形成的。他记下最古老的熔岩上出现几百英尺厚的成水平的沉积层。他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劝告争论者亲自去往现场看一看证据。在18世纪初叶已经做了各种尝试去测定地壳中主要地层类型的时间顺序，而在下半世纪约翰·戈特洛布·勒曼（卒于1767年）和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菲克塞尔（1722—1773年）成功地建立起岩石的地质年代的先后次序（前者测定哈茨山和厄尔士山脉的地层，后者测定图林根的地层），从而奠定了科学地层学的基础。菲克塞尔还记录了不同地层中各种不同的化石，这些化石有些全是陆地动物的，另一些则全是海洋动物的，这表明有些地层从前曾在海洋的下面。

水成论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1749—1817年）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弗赖贝格矿业学校的教师，没有什么著作出版，但通过他的教学和他学生的著作，使他的观点引起同时代人

的广泛注意。他是一个善于讲演的人；他很单纯、固执和自信。他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假设，他在家乡萨克森观察到的地质岩层顺序是普遍性的；谈到那些花费时间建立地球起源理论的地质学家时，他抱轻视的态度；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然而他的理论体系充满了假设，除了他自己对它们的信念外，它们没有可靠的基础。可是他能够提出萨克森地区各种地质形成的时间顺序，并把它们排列为五组：原始的、过渡的、沉积的、衍生的以及最后也是最近的一种是火成的。据维尔纳的看法，地球最初是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固体的核；原始的岩石是从这些巨大水中的溶液结晶而成的；过渡型的岩石有的由导致它们沉淀的溶液，经过化学反应而产生，有的由于单纯的机械性的沉积作用；第三组和第四组是当大水退去时或当陆地再次被淹没时形成的；第五组火成岩石的形成期最近而且纯属偶然，是由于积聚在地壳中的煤燃烧的结果。海洋是地质变化的一大动因。火成论者的领袖詹姆斯·赫顿（1726—1797年）不否认水对于这些物质的作用。他的《地球的理论》于1785年在爱丁堡皇家学会首次宣读，随后于1795年扩大篇幅出版。他认为地球的过去历史必须根据这种仍然看得到在起作用或公认最近还有活动力的自然过程来解释。他写道：“对地球来说，任何非自然的力量都不能援用，除了那些我们知道其原理的作用外，任何作用都不能承认。”

尽管大多数岩石看来是在海底沉积而成，赫顿还是认为后来它们受地下热的作用而凝固，而来自下面的熔化物质侵入它们之中。在这种变化中，原来呈水平状的岩层上升、倾斜、断裂、褶皱甚至扭曲成垂直状态。变化在不停地进行；风和气候慢慢地使这样形成的岩石裂解；雨水和河流将岩石屑粒带入大海；新的沉积地层在海底形成，它们又复升高，再次受风和气候的腐蚀；在这个不停地沉积和侵蚀的消长过程中，“没有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终止的前景”。赫顿恢复了健全的科学地质学观点。虽然他的文字风格晦涩难懂，但是他对他所设想的地球表面的变化的描述不乏壮观之处。他在进一步发展地质科学方面的影响意义深远。

制图学的理论研究受到许多几何学家的注意。约翰·海因里希·朗伯（1728—1777年）在1772年，莱昂哈尔德·欧拉（1707—1783年）从1777年起，和拉格朗日在1779年都对各种新旧投影法进行了关键性的研究。发现新大陆的科学航海，如由伦敦皇家学会组织的詹姆斯·库克船长（1728—1779年）的那些航行需要更多更好的海图和地图，但是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制图学的最大进步出现在法国，两张有名的地图是在那里制作的。第一张是非常著名的《卡西尼地图》或称《科学院地图》，它是在1750年开始认真绘制的，但是计划却是差不多在一个世纪以前由柯尔培尔制订的。此图在1789年完成。让·皮卡尔（1620—1682年）被列为在这方面最早做出贡献的人中的一个。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1714—1784年）完成这项工作，但在该图出版的五年后死于天花。它印成183张，是第一份根据三角测量和地形勘察而绘制的全国地图，可说是18世纪法国制图学家们的科学能力和工艺技巧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最后几张实际上是由卡西尼的儿子雅克-多米尼克（1747—1845年）完成的，1793年有时被作为这份伟大的地图最后完成的日期，比例是1：86400，183张纸拼起来的这一份地图大约是高11米，宽 $11\frac{1}{3}$ 米，就是大约高33英尺宽34英尺。

在这个时期另一份著名的法国地图仅仅完成了一部分，它是《法国矿物分布图》（1780年），由盖塔和安托万-格里莫阿尔德·莫内（1734—1817年）编制。原来打算绘制230幅，实际只完成32幅，但它是收录地质或如当时所说收录矿物学资料的第一份地图。

继卡西尼的地图出版之后，对法国西北部和英国东南部这两个毗邻地区进行了法英联合三角测量，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准确地测量巴黎天文台和伦敦天文台之间的经纬度之差；卡西尼在1783年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提交伦敦皇家学会是很自然的。在英国这项工作由威廉·罗伊少将（1726—1790年）领导，第一个步骤是1784年在豪恩斯洛希思的平地上，准确地测量出一条基线，这条线稍微超过5英里。由于某些材料和某些仪器不实用，使工程推迟很久，直到1787年才完成观测资料。罗伊的最终目标是普遍调查不列颠诸岛，而在1791年，即罗伊去世后一年，军械署署长里士满公爵得到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持，继续罗伊开始的勘察工作，并作为一项军事任务把这项工作扩展到全国。这一发展影响了其他各国政府去勘察它们的领土，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勘测制图工作已是19世纪的事情了。

从1763年到1793年科学学会在数目上有所增加，而且出现某些专家团体。在爱丁堡有一个哲学学会建立于1739年；它于1783年获特许状，改名为爱丁堡皇家学会，它的《学报》亦于1788年出版。1780年在波士顿成立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1785年开始出版它的《学报》；它是美国建立的第二个科学团体，在它之前的是1743年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努力而在费城建立的美国哲学学会。皇家爱尔兰学会是18世纪后期建立的，由大约于1782年在都柏林组成的一个学会改组成立，它的《学报》于1788年首次出版。都灵皇家科学院在1783年成立，里斯本的皇家科学院则成立于1779年。在这个时期，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地还有一些由教授和学者组织的哲学或科学学会。18世纪60年代在伦敦有一个研究昆虫的昆虫学会（这种组织中的第二个），1762—1766年一直举行集会；一个昆虫家学会1780—1782年经常召集会议；另外一个“促进博物学发展”的学会于1782年开始集会。最后这个学会更令人感兴趣，因为有才干的会员对它的方法和工作不满，而导致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1759—1828年）、塞缪尔·古迪纳夫（1743—1827年）和托马斯·马香（约1747—1819年）于1788年建立林奈学会。史密斯在1784年得到了林奈的植物标本集、藏书和手稿，现在这些都归他协助建立的学会所有。在欧洲大陆建立了许多地方上的科学学会。在英格兰这个时期建立的最重要地方科学团体是曼彻斯特的文学和哲学学会，它建立于1785年。它的前身是一个科学俱乐部，每星期开一次会。它的第一卷《学会纪要》于1785年出版。这个学会的建立是模仿法国建立省级科学学会的做法，也可能部分地由于对此类学会的建立仅限于大都市的做法的一种反应。新建的学会反对带有大都市地方观念的任何做法，它认为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必须更广泛地在王国的主要城市组成这类学会。在伯明翰有一个组织很松散的但是很有名气的学会——明月社，它的会员资格没有任何明显的规定或任何拘泥形式。它在激发科学探索方面的影响很大。在以下事实中也可看出，参加它的集会的人员中有伊拉斯谟·达尔文、马休·博尔顿、塞缪尔·高尔顿、詹姆斯·基尔、威廉·威瑟灵、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等。

虽然这些新的科学学会大多数都用成卷的学会纪要或学报发布他们的工作成果，但这些外加的出版物只占18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新科学期刊的很少一部分。在18世纪开始时这类文献仅有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出版物、贝勒主编的《共和国文学新闻》和莱比锡出

版的《博物杂志》。到1800年新出版的科学杂志约有75种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医学期刊在内。这些刊物大多数在1750年以后创办；其中只有5种刊物在18世纪的上半叶出版，这个情况清楚地表明18世纪的下半叶大大增加了科学活动。创刊于18世纪下半叶的69种新科学期刊中，有9种出版于1750—1759年间，6种出版于1760—1769年间，9种出版于1770—1779年间，20种出版于1780—1789年间，25种则出版于最后的10年中。这样看来18世纪出版的69种科学刊物中，创刊于18世纪最后20年的刊物就有45种。专门刊登物理和化学文章的科学杂志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物理观察》于1771年在巴黎出版，由弗朗索瓦·罗齐埃神父（1734—1793年）主编；《化学杂志》于1778年在莱姆戈出版，由洛伦茨·冯·克雷尔（1744—1816年）主编。它们的出现只能部分地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增加，促使物理和化学有创见作品的增加来加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于学术出版工作拖延情况严重而造成，尤其在法国，学术作品中有时大量积压不能发表。同时在18世纪临近结束时，科学研究工作加速，更加需要及时发表，至少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如此，因为他们非常关心出版，唯恐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别人抢先发表。有一份很有趣味和很有名望的英国科学期刊在18世纪80年代出版，就是威廉·柯蒂斯主编的《植物杂志》，第一期于1787年出版。在18世纪80年代还有1789年在巴黎出版的《化学年鉴》，那是正当大革命开始之年，当过去追求不到的特权已不再需要的时候。它的编辑人员中有拉瓦锡、贝托莱、居东和福尔克拉。1789年在伦敦出版了《哲学杂志》第一期，它很快成为重要性仅次于伦敦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学报》的一份杂志，《植物杂志》《化学年鉴》和《哲学杂志》全部继续出版到现在。

18世纪下半叶对实用技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在科学和工艺之间很少联系。在少数事例中科学进步带动了技术的改进。但是这种改进一般说来远非科学发明的结果，也不是对自然作用有更好的科学了解的结果。例如在化学工业方面，实践不是走在化学理论的前面就是和它完全没有联系。甚至时至今日，工艺学也不仅仅是应用科学的另一个名称。18世纪有素养的人们内心对实用技艺的态度是来自17世纪种下的根源。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在17世纪60年代建立时，二者的目的虽非全部但却明白地是功利主义的。皇家学会是集合一群业余爱好者的组织，它似乎觉得编辑一部《工艺行业史》的工作过于繁重，而在几年后便放弃了，不过兴趣仍然存在，这点从学会的

工作和通信中表现得很明显。另一方面皇家科学院则是一个小小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业余爱好者少而专业者多，成员是拿薪金的政府公务员，有责任研究部长交下来的技术问题，并要对部长负责。1754年（皇家）艺术学会也曾担负起促进英国实用工艺的责任。它的第一期《学报》于1783年出版，对组织工艺研究和鼓励创造发明实施了十分必要的改进，与此同时，皇家学会秘书长约翰·哈里斯（约1667—1719年）完成了他的两卷本《技术词典》（1704年、1710年），伊弗雷姆·钱伯斯（卒于1740年）在1728年出版了他的两卷《百科全书》，这是一部“艺术和科学的万有词典”。巴黎科学院则长期铭记柯尔培尔在1675年的建议，应当由它的会员编一套叙述实用技艺的丛书，这部带有雕版插图的丛书，在多次延迟之后，终于以《皇家科学院的先生们批准的工艺美术汇编》为书名，以83卷对开本在1761—1788年间出版。在此书长时间拖延期间，狄德罗和达朗伯尔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51年出版，紧接着其后各卷很快问世，到1780年，全书35卷全部出齐，并附有大量精美的插图，该书的全名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狄德罗解释说，这项工作的意图之一是赞扬和鼓励实用工艺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并引导科学家到工匠的工场中去。狄德罗这个最后目的是否成功值得怀疑，但是他在该书中给予工艺学的巨大篇幅把科学和工业结合在一起，从暂时看来也许科学从这种结合中给予对方的少，而从对方得到较多的好处。

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发明单独的凝汽器从而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这是这个时期科学发明直接用于技术进步的少数事例之一。1763年当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为器械制造者履行职责过程中，修理纽科门蒸汽机的模型时，他看到用向汽缸内喷射冷水的方法来冷却发热汽缸的做法所造成的大量浪费热量的现象使他感到吃惊。冷水凝结蒸汽产生一种部分真空，由此来完成活塞向下的冲程；在下一步活塞向上冲时又要一股新的蒸汽去重新加热冷却了的汽缸，这股蒸汽中有许多就这样冷凝，浪费了它的热量。在讨论他观察的结果时，瓦特从约瑟夫·布莱克那里懂得后者发明的潜热理论，因而更清楚地意识到在纽科门蒸汽机工作过程中热的大量浪费。在1767年他突然想到蒸汽在汽缸外而不是在内部冷凝的念头；办法是将一个单独的凝汽器通过一个龙头和汽缸连接起来，以便经常保持冷却状态。后来，他进一步改进这项工作，在汽缸四周加一个蒸汽套以保持它的热量，同时

使用蒸汽而不是用大气中的冷空气，推动活塞下冲。1769年瓦特获得了专利权，并在1775年与伯明翰索霍工厂的马修·博尔顿（1728—1809年）合伙，开始制造蒸汽机。第一批型号是单向作用的，但双向作用的蒸汽机（用同样大小的汽缸能产生双倍的动力）在1782年获得了专利权。一种叫作行星式齿轮的装置能使过去的往返运动变作旋转运动，这个装置是他和威廉·默多克（1754—1839年）共同设计的，并于1781年获得专利权，而离心式调速器是1787年开始使用的。到1788年可以说旋转式蒸汽机已经标准化，并被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博尔顿-瓦特的合伙关系于1800年中止，所制造的机器约500台。在这个时期还制造出其他机器，但是在这里不能细述。

舍勒在1774年发现氯的漂白作用，1785年贝托莱把它应用在工业上，这是另一个直接运用科学发现的例子。先前把纤维织品用碱处理后曝晒在“露天漂白场”，然后用酸分几个阶段加工。作为贝托莱新方法的结果，“漂白场”不再需要，因此而占用的大片地面可以用在农业上。贝托莱试图根据氧的作用来解释染色过程的化学原理是有独创性的，但是与其说他是坚定地依据化学上的证据，不如说他是受当时缺乏机械理论的启发。

这是一个机械发明的伟大时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卒于1778年）在1765年发明了“詹尼纺纱机”，一个操作者能管8个纱锭，而后来改进的型号一个人能操纵80个纱锭，结果是哈格里夫斯的房子和机器全遭一群暴民捣毁，这批人由于害怕机器代替人力，将使他们挨饿。1769年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1732—1792年）发明一种新的纺纱机叫做“水力架”，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它用水力驱动。这种机器纺出牢固而细的纱线，用它织布不需要亚麻经线。塞缪尔·克朗普顿（1753—1827年）在1774年发明了另一种纺纱机，即克朗普顿“走锭精纺机”，把哈格里夫斯机器的原理和阿克赖特机器的原理结合起来，这种机器生产的棉纱和印度的棉纱一样细。1763年法国工程师尼古拉-约瑟夫·居纽（1725—1804年）设计了一种蒸汽车，但是它看起来不大稳固；1784年默多克在雷德鲁斯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车的模型。邓巴的安德鲁·米克尔（1719—1811年）在1786年第一次成功地发明了谷物脱粒机；这种机器的后来的一个型号可把谷壳吹掉，谷粒从碎谷和草粒中筛出来。约翰·菲奇（1743—1798年）从1785年起在美国成功地制造了几艘汽船。在1787年威廉·赛明顿（1764—1831

年)设计出一种发动机供这种汽船使用。但是这些蒸汽动力的原始尝试,试验性多于实际性。蒙戈尔费埃兄弟于1783年6月5日在里昂附近的阿诺奈,成功地使纸做的充满热空气的大气球升上高达6000英尺的高空。继这项试验之后,在气球方面取得非常惊人的成功。两个月后,在8月27日一位法国物理学家J. A. C. 夏尔(1746—1823年)从巴黎的马尔广场把一个叫“夏尔利埃”充满氢气的气球放上天空。它在15英里外降落下来。皮拉特尔·德罗齐埃(1757—1785年)在1783年10月15日乘上一个被拴住的蒙戈尔费埃热气球升到80英尺的高空,又在11月21日偕同步兵少校达尔朗德侯爵,乘另一个蒙戈尔费埃热气球从巴黎作第一次空游,25分钟后在离出发点约6英里外的地方着陆。人类乘氢气球首次升入高空是在同年12月1日由它的发明者夏尔实现的。其后在其他国家和法国又有多次飞行。1785年1月7日美国内科医生约翰·杰弗里斯和一位有经验的气球驾驶者J. P. 布兰查德成功地横渡海峡从英国飞到法国。在大约18个月中发展是迅速的。后来法国的革命军队中成立了气球连,由吉东·德莫尔沃领导,有一个气球成功地在1794年的弗勒吕斯战役中进行了侦察。

工程师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以经验和经历为基础,而不是根据科学原理,对于力、功和能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威廉·斯米顿(1724—1792年)集工匠、工程师、科学家于一身,用实验来研究这些关系问题,并把他的研究结果在1759年和1776年提交伦敦皇家学会,但是在他的结论中仍然没有清楚了解一个施加的力引起的运动量是可以根据动量或运动力来考虑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发展机械动力和制造重型和大功率机械为特征的时代在研究相关的科学原理方面受到了阻碍,因为它缺乏适合的计量单位体系和令人满意的命名法。与此同时,生铁的产量,在1788—1796年间增加了1倍,在下一个10年内又翻一番,这主要由于亨利·科特(1740—1800年)在1784年设计的“搅炼”法的成功,把生铁改变为有韧性的可锻铁。铁轨代替了木轨,第一座铸铁桥于1779年竖立在艾恩布里奇,第一艘铁制船建造于1787年。

很多其他有独创性的设计在这个时期创造出来,我们只谈其中三件。詹姆斯·瓦特在1779年制造了一种简单的复印机在他通信时使用。瑞士人艾梅·阿尔甘(卒于1803年)在1784年制成一种改进的油灯;它有一条管形的灯芯和一个玻璃筒状的灯罩,增加空气供给,它

冒的烟少而亮度大。在1792年默多克设计了一种装置，用一个曲颈瓶和几根管子燃烧煤气作为他在雷德鲁斯的住宅照明之用。

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发明时代和一个机械发明的时代，这也是拉瓦锡和拉普拉斯的时代。尽管英国科学依然是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天地，尽管科学教学工作（除数学外）大部分仍掌握在医学教授或不信国教的科学院的导师或博物学的巡回讲师手中。但在巴黎的王家公园中在布丰的指导下，这些年向公众讲授知识的教授包括鲁埃勒、贝尔纳和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德方丹、马凯、福尔克拉、拉马克和法国科学界其他领导人。巴黎出版界大量印行布丰的《自然史》和多卷的《百科全书》以及《工艺美术汇编》和科学院每年出版的《历史和学术论文集》及许多卷补充出版物，还有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新创刊的专门科学期刊如《物理观察》和《化学年鉴》。除18世纪法国这些经典著作外还有许多物理特别是化学方面的教科书。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是通过法国的著作家来学习化学的。还是在巴黎，1766年皮埃尔-约瑟夫·马凯（1718—1784年）的第一部化学词典，1781年马蒂兰-雅克·布里松（1723—1806年）的第一部物理学词典先后问世。在法国有许多科学方面的职位，特别是在化学和化学工业方面，例如在塞夫尔的瓷器工厂和染色工业中。杜尔哥在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的短暂时期内，于1775年取消了火药工场，代之以建立新的火药专卖局来制造供应全国的火药，拉瓦锡因为他的化学方面的知识被任命为四个总监之一。科学院也宣布对有关火药制造的最优秀论文进行竞赛评奖，参加了此项改革。拉瓦锡在这个负责岗位上改组硝酸钾和火药的供应，并通过化学试验和弹道发射试验大大地提高了火药的射程和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它的产量，射程大约增加了 $\frac{2}{3}$ ；几年内改变了从前的不足，弹药库内装满了优质火药，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有能力向美洲殖民地输出火药。因而也使得在拿破仑战争中优质火药能得到充足的供应。拿破仑理应把他胜利的一部分归功于这种条件。在另一情况下，由于供应不足导致科学院宣布对制造碳酸钠的最优秀论文授奖。这个奖在1790年被尼古拉·勒布朗（1742—1806年）赢得，并于1791年开始制造。勒布朗采用的原料就是普通食盐、硫酸、石灰石和煤。把食盐和酸一同加热，得到硫酸钠，把它与石灰石和煤的混合物一起加热，得到叫做“黑灰”的一种碳酸钠和硫化钙的混合物。用水提取这种混合物并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溶液结晶产生碳酸钠。勒布朗的“黑灰”或“苏打灰”的制作方法成为并长期保留为化学工业

的基本方法之一。与此同时，在整个时期里，科学院对很多发明、制造和对公众有重要性的问题做出了报道：这里只提几件就够了，例如巴黎的供水、气球、街道照明、医院和监狱等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采用了最新的科学知识。此外，法国科学家还发现了空气和水的组成成分，阐明了氧气在燃烧和呼吸过程中的作用，设计了一种新的和符合要求的化学名称系统并制订了第一部现代化学元素表。除了确立化学变化中物质不灭的原理并随着建立化学反应式外他们还用实验方式证明平方反比律是带电和带磁物质中间产生的引力和斥力的定量规律；他们把新的化学知识应用于黑色火药和碳酸钠的制造以及用在漂白过程中；他们还让其他民族知道如何绘制全国地图，并绘制成第一张地质图。它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现时代和机械的发明时代，革命前的30年还是法国科学处于学术顶峰的时代。

（李秀芬 译）

[\[1\]](#) 原文如此。似与下文“20小时半”和“21倍”不符。——译者注

第六章 教育的思想、实践和机构

革命时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所有变革和调整，实质上都是来源于行将结束的理性时代的思想基础。教学实践和内容二者的概念是高度结合的，即使其沙龙气氛有时较课堂气氛更浓。就是在这些年里，在全面考虑达朗伯尔所指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俗和我们的成就”的含义时，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意识到其所处的中心位置。但是，如认为教育思想的发展仅与启蒙运动的一两个主题有联系，则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在评价这种思想推动力量所涉及的范围方面，大概谁也不会比维克托·库辛的条件更为有利了。他在法国帝制时期在巴黎新开办的师范学校里接触到观念学派的思想，后又在德国大学里接触到先验论，继续从事在完全不同的哲学气氛中促进法国初等教育的重建，在这种气氛中，教育的规划是在奥尔良君主政权统治下完成的。他说，18世纪使“一切”都受到严格的检验。这是“使教育首先成为一个问题，然后成为一门科学，最后成为一门艺术因而形成教育学”的时期。他虽然也承认教育学是一个荒谬可笑的词，但这项事业本身是神圣的，它作为一个与科学有关的主题是在革命时期充分发展成熟起来的。

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家们首先致力于提出一种对现实的设想，认为现实是由一套明白易懂的规则来保持其秩序的。所有参加这一思想运动的人都相信“人的理解力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无须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去认识世界体系”。恩斯特·卡西雷尔就曾这样概括这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理解世界的新方法——也许并不如某些思想那么新——势必会导致支配这个世界的各种新方法产生。18世纪是一个对人类理解和主宰自然进程的能力抱乐观态度的世纪。通过正确理解人类活动的源泉，人们便有希望发现改善经济生活，并使社会秩序更如人意的奥秘。世界的未来要靠对事实调查的结果进行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比较，而不论这种调查结果是通过内心的反省还是通过对感官察觉到的事物进行科学衡量而取得的。因此，对于教育思想家来说，当时流行思潮的意义几乎完全是积极的。

这样一位思想家对于怀疑天启宗教的那些辩论，或对于传统做法的不良景况，并不十分担忧，而是由于对理性的效用抱有信心而受到鼓舞。因为，在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所表达的意义中，他看到好像有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方法，可以运用人们的智力资源去不偏不倚地分析各种事物的迹象，从中概括出新的真理。这是按上述顺序就可实现的思维过程。诚然，事实证明60年代以前从大师们的著作中摘选出来的公认的教育理论，其积极成果微乎其微，令人失望。洛克对这个时期的讨论所给予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而他的关于只有感性知觉才是支配儿童思想成长的唯一因素的概括性论点，远比他的论教育的两篇论文要成功得多。他对教师的作用和对改进课程的要求所做的判断是明智可行的，同时却又不够系统，并显得不十分有把握。他相信通过智力训练来约束思想有好处，这似乎与他主张个人思想自由的惊人观点很奇怪地自相矛盾。与此同时，伏尔泰这位进步观点的杰出阐明者，对自由思想界所做的贡献是任何主张通过普遍建立学校来传播新文化的建议所不能比拟的；霍尔巴赫，这位在一代真正的启蒙哲学家舞台上的最后一人，并往往被认为是对旧的社会秩序批评得最激烈的人物，也不能举出任何实例证明可以用教育来拯救人民大众。

到18世纪后期，新学说的教育含义越来越清楚，也使人对一度难以理解的寓意有了印象。当哲学上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河以东各国达到高潮时，新旧思想方法之间的差别一下子就使新的观念和实践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关注教育的大科学家普遍敌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敌视从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所承袭下来的宗教问答式的教学方法，这当然就影响到对教育的态度。他们对一些学术垄断中心的怀疑，由于他们厌恶这些中心的宗教正统观念而更加深了。有关“常识”的学说（洛克对这一学说的形成贡献很大，他本人在很长时期曾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住院学生）对专家学者迟迟没有吸引力。比较老的学术机构，其活动几乎到处都处于衰落状态，这已是明显的事实。当时的风尚是轻蔑地把他们看作是已不合时代要求的東西，应随时让位给组织和传播知识的新方法。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其本身正在经受着考验。

在这个主张的发展过程中，1765年法国的《百科全书》第17卷（也是正文最后一卷）^[1]的问世是一个引人注目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部伟大作品用新的手法提供知识。我们看到作者们本身是一个

没有隶属关系的松散的专家组织，其中有些人被大家认为只是正在成长中的专家——正如书名页上宣称的是“一群文人”。他们在一个题材的框架或结构的范围内工作，不但突破了与常规学术表达方式相联系的一切规则，而且把条目的重点放在通过实际经验进行的探索和对制造及实验工艺的研究的基础上，看来把一种新理性（logos）的精神灌注到对学问的追求中去了。尽管其中许多作品由于一位顾虑重重的出版商的压力被删改过，但这部百科全书明显地表现出信奉一个观点，而不是“集众书于一”的外国模式和仿制品。这类外国模式之一是《不列颠百科全书》，1768—1771年在爱丁堡出版，共三卷。法国的《百科全书》不可否认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宣言书，他们献身于促成一次思想方法和教育方法的变革；同时它真诚地打算对当代知识进行全面的考察（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设想过的），以指导那些老练成熟的有闲阶级分子。百科全书派反对经院式学风不只是就这个词的简单含义而言。他们打开知识之图，让公众去审阅，而不需要牧师或教师做媒介。因此这里体现着一种成人教育的观念，即通过印刷文字传播信息给任何可阅读法语的地方的所有老练成熟的读者。诚然，还没有人仔细考虑过对较贫困的公民也应当通过这种媒介扼要地提供知识。

以这些形式和其他形式而投射出来的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产生的影响，对关心教育的人来说不能不带有令人感到困惑的特点。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现自己受到挑战，要去执行许多任务。围绕着以人类本性为中心这个唯一的原则的独立性，似乎需要有一个准则作为重新确定自己的课程内容的依据。作为他们的教育方法出发点的基本原理，必须承认支配人类行动方向和支配无生命粒子运动的规律都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结并可以验证的。它们提供一个机会，向这些人展示出知识的连续不断的广阔范畴，并反复灌输乐观主义。最后，理论必须适应一种求知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依赖的是观察力和有分析的调查研究，而或许要不顾权威的主张。如果说读了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著作能够使教育工作者相信，宗教教育通过训练使年轻人敬畏无形的暴君，从而逐渐削弱了他们面对人生问题的主动性和勇气，那么就需要考虑提出另一种替代办法来培养他们的个性了。当时的整个思潮一定使他们意识到出现了一个空白。要填补这个空白必须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培养道德精神的计划以摆脱那些超自然的束缚。卢梭的成功大概就

在于他的大部分教育理论所依据的是他对这个空白的性质的认识。探求新理论的实际体现，不言而喻就是向一个教育机构被旧传统以压倒优势统治着的世界挑战——这种探索，正好说明为什么在全欧洲有能力聘请私人教师的士绅家庭中，以私人教师取代学校的情况日益普遍。在教育机构中如何进行教育，如何检验人们的信念的完整性，这些问题终于向理性是完美无缺的和不可战胜的理论提出了无情的挑战。这是理性时代晚期自相矛盾的方面之一。

于是，有关知识的学说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各种倾向，往往受到当时流行的洛克学派心理学的激励。知识局限于五官所能够将外部的刺激传达给自己的主体的范围内。从经验主义者的主张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儿童都有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需求。所以，人开始有生命，平等就必然是他们共同具有的条件。而且，正如拉夏洛泰所极力主张的，除非证明女子有一套不同的感觉，否则上述论点似乎会把男性学生才能优越的说法推翻。

休谟曾经指出，要是没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坚信不疑的感性体验和思维联想的原理，再没有什么可用以说明小学生个性发展的连续性的最微小的迹象了。所以，对新一代的理论家来说，把智力和感情生活二者的教育同更好地理解思想成长的实际机制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很明显，不管怎样空谈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如何有价值，但整个感觉论哲学所依靠的有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点内省的想象而已。切切实实的工作还有待完成：第一要找出什么是行为的原动力，它给予不论老年人或青年人的生活以激励和指导；第二要表明课堂教导的方法究竟能够提供何种更贴近生活的，或许更复杂的智力和感情的模式。到18世纪中叶，理论心理学——如果当时的哲学讨论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由于在使用概念实体方面顾虑太多，唯恐超越那些已经在使用的概念，因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抽象领域。正是在这一点上，孔狄亚克神父出来用他的《感觉论》和《动物论》挽回了面子，并允诺在教育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发展。

知识的传播是不受国境限制的。在宣扬进步学说方面，带头的几乎都是具有某种国际联系的人。这样，在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中，或更多的是在教育改革中，提高人类素质的思想也就跨越了国界。一个完整的理解网络通过通信而保持着，并通过个人间的相互介绍而得到加强。这一网络从萨斯奎汉纳河彼岸的荒原延伸到圣彼得堡的新海滨

区。这些接触因对实际可行的计划感兴趣得以加强。有二十多个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著名的一个，赞同并推行这些计划。1761年，丹麦一所慈善性学院的教授约翰·巴泽多移居阿尔托纳，开始发表他的最早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属于18世纪思想界所钟爱的类型，是为政府领导的教育系统制定的，适用于任何一个大的德意志邦，具有完整的教育层次和可调整的宗教课程。当时他得到全欧洲知识界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相信扩展新知识的国家间兄弟般的关系，并且相信作为这种知识的成果会促进更慷慨的人类美德的发展。在众多改革家都对之有好感的共济会成员中，教育几乎成为一种传教事业。科学概念的传播和关于“实用”教育的思想——教授实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共济会分会成员之间的互访。共济会运动是从英国传开的，在一定时期出现的某些表现形式令人吃惊，以致激起严厉的批评；但是，事情的较为阴暗和奇怪的方面并不在于教育的改革。共济会成员反对官方的教权体制（至少在拉丁美洲是这样，在那里他们的这种敌对态度得到热烈的响应），大力推行世俗教育，以致被认为是传统教育整个教义的死敌。

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帝俄那里更有力地显示出他们的影响了。在那里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N. I. 诺维科夫尽管强调共济会思想中比较严肃的和有宗教色彩的一面，而反对莫斯科的伏尔泰派的怀疑论，但他仍是改革的急先锋，特别是在莫斯科刚觉醒的学术生活方面。诺维科夫是俄国最强有力的教育革新家，直到他遭到叶卡捷琳娜大帝随后实行的反动政策的禁止为止。

共济会成员特别关心教育的真正呼声可在巴黎听到。在那里，爱尔维修、拉夏洛泰、富兰克林、拉瓦锡、福尔克拉、布丰和杜邦·德内穆尔都是这个庞大又很有影响的世界主义团体的成员。该团体于1776年在拉朗德的领导下最后组成“文艺九女神”支部。这个杰出知识分子团体的改革精神是极其有力的，论述法国教育建设的每一篇重要的公开备忘录都及时地出自他们支部的某个人之手。这种类似传教的宣传工作以1795年构想并创建一批中心学校（*écoles centrales*）而达到顶点。

如上所述，教育实验的部分背景是科学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科学方法日益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也注意到有实验头脑的人们的兴趣转向应用科学的具体运用上，特别是转向生物学的研究。这种侧重

点的转移对化学来说有深远的含义；我们看到对如何认识人类知识的生理基础，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态度。关于人的神经系统与动物界的这种现象，这二者的发展完善过程和二者之间的相似性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思想。于是出现了从更侧重抽象的数学创造力向仔细观察周围的自然现象的明显转变。儿童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自然现象，受到密切注意，进行比较，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林奈既在动植物的分类学方面，也在对医生使用的药物的系统检查方面奠定了现代科学分类方法的基础。由于他的工作，我们转向对生物的功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一点可以在例如列奥米尔对人体活动和动物行为的化学作用进行的研究中看到。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在他的不朽著作中表现出的对人类学的兴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形态学方面的主张，他对感官的功能和对动物生殖的近似进化论的描述，都是从根本上反对林奈的早期方法论的。布丰提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部自然史，由此而产生了卢梭关于教育要按照自然阶段来进行的概念。C. F. 沃尔弗对哺乳动物组织的代谢作用的研究和伽伐尼将肌肉—神经的动力与物理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性发现，同样都与人体功能的原理有关。所有这些开拓性的研究，都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生理行为现象与思维现象有关。在教育思想范围内，兴趣的转变反映在从课程改革方面比较狭窄、比较注重学校教育的概念（曾两度任巴黎大学校长的夏尔·罗兰所著《论学习》充分论述了这些概念）转移到以更加广阔、更加全面的思想去关心（当然在学术上是见识浅陋的）校内外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物质的和社会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产业革命这个史诗般的时代，除了少数几位之外，所有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知识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活动都远离古老的学术中心。这是一种自学成才的倾向，因此，早熟就成为更突出的特点。科学发明出自受教育较少的人之手，他们受到工业要求改进的召唤，或者完全出于好奇。可以这样说，苏格兰的各大学给有天赋的人才提供了更多的鼓励。诚然，他们授予的学位虽在别处遭到蔑视，但是在医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新学科吸引了许多思想活跃而有才能的人跨越国境而来，而且为北美洲新发展起来的学术中心提供了人员。到18世纪末，爱丁堡医学院已誉满全球。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令人鼓舞的气氛中，当年化学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约瑟夫·布莱克，能够一边在学院任职，一边从事他的调查研究工作。但是这个时期更加典型的是约翰·道耳顿，他作为光学的先驱和现代原子学

说之父，是注定要成为伟人的。他出身于坎伯兰的织布工人家庭，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校教师。后来当了一名自谋生路的教授科学的家庭教师，他所处的环境使他得以结交他所需要的一些有影响的人。他的实验条件是当地的哲学协会，最后是由伦敦的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建于1799年）提供的。

在新大陆，不论是在西班牙文化的天主教世界，还是在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的多种宗教并存的环境里，大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比在欧洲受欢迎。虽然招收的学生不多，但他们在各行业吸收新人员方面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压力很大。13个殖民地在革命时期的人口为250万，有7所已被社会承认的大学一级的学院。如果把新罕布什尔的一个教会基金会建立的达特茅斯学院和后来成为费城大学的富兰克林费城学院也计算在内，则共有9所。必须认识到这所费城学院的重要意义，它夸耀地藐视古典传统，并以其科学课程成为以古典课程为基础的旧式职业训练方式与新式的实用学院之间的连接环节。这些小规模学院后来都升格为大学，它们是重要而有影响的。新建立的各州要求监督它们自己的高等教育，而旧的宗教控制则主张观点独立和不受世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院的重要性和影响的确是足以引起政治上的分歧。

大学应在知识界居领导地位，这一原则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到严重挫折；而在拥有18所具备四个系全额编制的大学的法国，大学的威信本已几乎完全蒙上阴影，而由于巴黎大学校方的荒唐行为，更使它们威信扫地。该大学当局屈从于政府的政策，谴责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之类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著作，使他们的知识成为笑柄。在中欧，许许多多大学一直在丧失它们的社会影响和尊严。它们被当作地方学校来对待，被认为是只关心自己，搞宗派和缺乏文明。专制诸侯们毫不尊重它们；而启蒙运动的伟大潮流似乎并未引起它们的重视。尽管如此，它们在培训新官僚政治的人才方面对政府的贡献是不能轻易抹杀的。

然而反常的是，恰恰是在中欧这个古老习俗最顽固不化的地方，事态的发展却给已确立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生和活力，而且可能拯救了大学教育的主张，使之免于消亡。不论是在汉诺威的，还是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体制下都有新创办的大学。世俗当局不但宽容它们，而且还鼓励它们发展繁荣。格丁根和哈雷的大学开始实行新的路

线：它们想方设法跟着时代前进。前者仍属上流社会所欢迎的王公贵族们上学的地方，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学者来当教授，他们受到款待，薪俸也不低。新兴科学在这里得到机会传播和宣扬自己的主张；已被承认的各学科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政治学、法学以及新兴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招引来了新的学生。虽然也有挫折，但课堂上的学术自由在格丁根一般说来已成为现实。学者的哲学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这时已为德意志其他地方树立了榜样。哈雷作为先行者曾给格丁根以所需要的激励，则显然表现出一种有利于神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倾向。普鲁士的哈雷大学表现出类似的宽容精神。对思想进行研究的一些主要学科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哲学系（即文科）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弗长期统治时期被准许占据首要地位。哈雷的学术研究既有尊严又富有冒险精神，使这所大学闻名于整个德意志，并且在有影响的文明之邦的招牌下给普鲁士的领导地位赋予新的重要意义。哈雷把理性的哲学探讨同清教徒的虔信主义卓越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德意志学术复兴的重要特征，并给条顿民族的启蒙运动增添了明显的理智色彩。格丁根在经典学术研究上的实力，更重要地或许表现在人文主义的复兴方面，它使德意志的学术研究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把书籍当作求知手段去阅读，并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的训练课目的一部分，已成为近代人们的时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丁根的榜样，它设置了一所宏大的大学图书馆。随着莱比锡和埃朗根以及德意志其他大学的学生们开始仿效这种新的榜样，独立阅读的风气和对更高深的研究的成熟态度，成了这些大学生生活的普遍特点。在莱茵河以西的学术界，类似的对学问的尊重只有在莱顿和乌得勒支才能找到。

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一切极端事物都在德意志相融合，并通过某种辩证的过程对新形式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在这里，至少如保尔森所指出的，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研究机构，即经特许成立的由著名学者参加的各学会（以柏林皇家科学和文学院为典型，该学院由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努力而获得国际地位），成功地同各大学和睦相处和互相了解。各种思想得以在一种或许是独特的气氛中取长补短，相互受益。在欧洲其他地方，一些享有特权的学术社团忽视大学。他们知道科学革命是他们的事业，并且觉得只属于他们自己。各研究院被有意识地加以保持，作为那些从事开拓性工作的人的集中地和得到鼓舞的源泉。除了英国以外，如果把这些学术社团看作不受政府控制，或甚至

不受宫廷的奇思异想的摆布，那也是不正确的。但是相当多的这种机构有充分的理由能够声称它们在执行学术领导任务，给有前途的学者授奖，组织演讲、示范和实验，报道正在进行的工作，促进新的调查研究和通过印刷品传播信息。它们保持科学作品的出版经常运转而不停顿；它们推动旧的学术领域中和新的文科领域如考古、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新的研究工作。

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团体或协会是将伦敦的皇家学会、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及其姊妹机构法兰西科学院作为成功的样板而建立的。莱布尼兹奖学金的慈善精神成为衡量他们发挥作用是否完善的尺度。在革命前夕，这些有势力的团体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达到了顶点。的确，巴黎科学院在拉瓦锡——他先后曾任院长、秘书和司库——的影响下成为一所称得上有势力的全国性机构，可与现代的国内研究机构相比。它实际上是长期性研究工作的积极组织者和推动者。当革命危机冲击它时，当局仍在要求提出更多的报告，包括关于制定新的十进位度量衡制的工作报告，但是官方的经费那时被扣发了。拉瓦锡是一位最胜任的组织者和一位科技教育的权威，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科学奇才。他用自己的大量私产维持科学院开支，直到几个月后他被送上断头台为止。

有些研究机构，如以费城为据点的美国哲学会（1760年成立）和以波士顿为据点的科学与艺术学会（1780年成立），都是私人企业自发努力的结果。但是公认的较大的机构模式则是国家特许建立的团体，这样就可以享有得到王公贵族们赞助的威望。于是，瑞典和丹麦这两个君主国，也像较小的公国一样仿效它们的大邻邦。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指望获得实际的回报。弗里德里希在柏林重建他的科学院时在全欧搜罗学者，指望他们就国王提出的任何课题提供线索和研究情报。对那些譬如受骗上当的人来说，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像普鲁士的科学院一样，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也是作为莱布尼兹丰富的思想的产物而于1724年成立。它作为一个由外国人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日耳曼人管理的机构，在18世纪后半叶几乎不受俄国人欢迎；但它是这个国家在学术、科学进步和教育原理等方面最重要的工具。它的创建者沙皇彼得打算把它作为一所宏伟大学的前驱；实际上它一直起着大学的作用，直到亚历山大的教育改革采用德意志学术研究机构模式为止。

这些由国家建立的文化组织被认为特别适合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这便是在法国学者们自己组织的团体在1793年被国民公会全部清除的原因之一。但是，如不对那些名声不大但专业性较强的团体的工作做出正确的评价，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是几乎不可能评定的。这些团体往往是从大的团体中分离出来的，或者是在慈善事业的支持下成长的。在伦敦，皇家学会仍保持着自己的古老尊严，林奈学会和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则以这种方式创立起来。在地方上的中心城市则有一些较小的组织。事实上在18世纪的下半叶，数以百计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机构以及由一些致力于文化的普遍提高和传播的学者组成的小团体遍布全欧洲。它们形成了乐观时代文化机器的积极组成部分，虽然它们的地位尚未得到承认。最突出的是在法国它们培育了人们的信念。大约有500所地方上的学术团体，其中许多拥有皇家特许证书赋予的特权；它们积极地组织讲课、作报告和从事科学问题的研究。有关它们活动的许多资料有幸保存了下来。资料表明，大约1760年之后，这些小士绅、喜欢发表见解的牧师和工商人士的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探讨一些文字上的问题转而更关心实际问题，如农业生产经济、科学和工业发展的趋势，以及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观点等。在这些争辩中，人们培养起产生1789年“陈情书”的那种舆论气氛。他们在当地的学术团体后来成了地方上那些支持革命洪流的政治俱乐部，虽然并非是直接延续下来的。

在18世纪，对于儿童自然发展应占的地位未有充分的思考，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法国文献中是相当明显的，而欧洲思想界是从英法文献中汲取营养的。脑力的联想一经紧密配合，就能够通过感官的窗口对投射到脑海中的材料加以利用，进而扩大联想的范围，使之飞跃到最高境界。尽管这种脑力联想能力的表现是明显的，而且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但这种心理学对它所处的时代的吸引力与其说是由于它的建设性启示，不如说是由于它是一种能够很好地自我完善的学说。它认为婴儿从一无所知而产生一种“知性”，这种“知性”从婴儿诞生起开始产生、发挥作用并扩大自己的资源，而不存在任何天赋观念的原有才能，也不存在令人厌倦的关于灵魂的各种推论。人的感官被认为不必借助外力就能够刺激有知觉生命的所有器官进入动态；但它们同其他物质活动一样，必须遵从同样的自然规律。所有这些说法都支持经验论的主张，反对笛卡儿关于精神能够独立存在的假说。人们只是观察到自己的思想在活动。人们试图回忆自己儿童时最早的内省，这

或许会有微不足道的成功。但是，规律则要求内省的材料永远来自外部的刺激。

教育工作者由于被赋予无限权力而被誉为调节儿童环境的人。他们只能对学生暗示，让学生把自己经过理性思考要采取的行动与另外一些途径相比究竟孰优，或者按洛克的说法，孰劣。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学生走向积极的起点。这对学生进步的内心活动是不是一种有用的引导呢？是什么能激励人的学习愿望？在哲学家看来成功地论证分析的方法是正确的，而在学校教师看来这只是空洞无益的表述而已。

在德意志，对用“感觉论”来进行解释表示出彻底的怀疑，这一点已变得很明显。牛顿和洛克的影响在这里没有多大力量。在康德最终试图把理性论和经验论融合在一起之前，对思想倾向起主导作用的是莱布尼兹和对他的学说进行系统阐释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弗。莱布尼兹推翻了笛卡儿的由几何学而产生的学术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这位法国人关于思想的力量看法。在采纳了他对整个自然界的机械论态度的同时，莱布尼兹也坚信思想的自主性和演绎逻辑的功效。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心理的或主观的对成长问题的研究方法，在德意志有关教学法的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莱布尼兹坚持认为知识的基础是不变的，人的思想的想象力对它是能够掌握的。这个论断就把他同启蒙运动哲学家们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如此，他仍要在“事物具有完全不同的顺序”（关于自行发展的单子的学说有此含义）的范围内激发一种对教育的想象力。一切有意识的生物的生命应当都是在其内部萌发的。德意志思想界就这样继承了莱布尼兹的意愿，认为能推理的头脑具有一种直觉领悟真理的本领，并不需要以经验为基础的检验来给予支持和鼓励；它毫不怀疑人的思想有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掘出各种能动的可能性；它很容易地承认，随着世界的持久和谐的显现，人的理智有力量慢慢地增进对公正和正确行动的理解。

于是，我们发现在欧洲中部许多地区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向，即完全把教育看成是人在追求明确的判断力过程中发生的某种事物，而所依靠的始终是天赋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求学者有能力从自己的意识中编织出知识。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洛克关于理解发展的学说相对立的了。谢林之所以能够在耶拿大学鼓吹永不知满足的德意志思想是由个人的理性和自己的冥思苦想产生的，正是由于他意识到可以得到

强有力的支持。费希特对学生如何去用他们的头脑比对他们要学习什么更感兴趣，这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此。他断言知识精英最适合在哲学课堂里培养出来，这也是在替许多大学同事们说话。在试图表明天赋理性的力量在思想形成的连续过程中都在起作用方面，莱辛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他占有的或表面上看起来占有的真理，而是在追求真理时所付出的诚实的劳动。”莱辛完成了一项宏伟的任务，即说明全人类的教育（其中个人教育只是一个微观缩影）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宗教经验和道德修养的阶段而完成的。赫尔德将这一经验推而广之，开始研究存在于部落或民族群体中的道德。客观理性的立论在莱辛的学说中已站不住脚，至此即告结束。当18世纪将近结束时，德意志的问题不是国家愿不愿意教育公民，而是如何防止公民被像费希特那样的浸透着极端信念的教育者的思想所感染。

由于洛克学派心理学以及它所强调的被动接受状态在法国已根深蒂固，所以在18世纪下半叶试图摆脱该学派枯燥的局限而恢复某种自由的努力就成为那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主动意志于是开始恢复其原有的地位。从逻辑上讲就似乎是意志先于观念而存在。长期以来由于一种荒谬的禁欲主义，作为“感情”领域而被忽视了的人性中说不清楚的一大要素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休谟对归纳逻辑的基础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后，无论是在牛顿的崇拜者中间，还是在仍然强有力的笛卡儿学说潮流中，纯理性作为思想的活动原则而得到的推崇明显地在减弱。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曾提到过的德·孔狄亚克神父的心理学论文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像卢梭那样一些对此抱反感的人们的思想。首先孔狄亚克是一位公认的教育学专家。他发表了一套为帕尔马法国宫廷年轻的斐迪南公爵设计的学习大纲。这件事有其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早期的一个课程范例。如他所说，它旨在鼓励学生对知识进行思考，而不是去积累。而更重要的特征是它尽力为儿童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按自然顺序排列，从人类最早期的神话开始直到现代的科学。这里，孔狄亚克不仅在近代有关综合课程的概念方面，而且在随后形成的有关儿童应依照自己的发展阶段再体验人类的历史方面，都是一位先行者。

孔狄亚克在力图更加实际地论述通过感觉而成长的理论时，他抱着尊重的态度赋予洛克的理论以现代的内容。他把分析的方法用于内省的结果，成功地表明：在头脑中对感觉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就可能产生意识的一切积极的作用或功能——如注意、判断、记忆等行为。在孔狄亚克看来，感觉到这些资料就构成一次心灵的活动；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然史”（这是他用的名称）也只有从才能的角度来加以证实，而才能只不过是经过转化的感觉而已。尽管人们很难解释基本的感觉是如何由自然赋予的能力而产生注意力的，但似乎在人的头脑中还是被赋予某种充满活力的东西，即某种潜在的力量，能够区别观察到的结果，渴望从经验中学习和获益，并且能以某种方式表达愿望和冲动。尽管在某些地方有点像在变戏法，但我们却正在进入现代心理学的时代。

这些研究结果的许多推断对那些信奉孔狄亚克学说的人们起了作用。这些研究结果的独立性和研究手段的经济简便使他们高兴。经过婴儿时期最初的模糊探索之后，精神生活可以正确地说成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持续的、没有等级之分的由儿童的感觉本身支配的行动，一个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做出判断的无止境的过程，所以谁也不能再主张去区别哪些情感和机能是高级的，哪些是低级的，或评价思想活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难道这些不是很明显的吗？于是精神上的判断只不过是有一些需要中间加以辨别所产生的结果而已。后来的一些评论家（特别是曼恩·德·比朗）表明，孔狄亚克的分析尽管十分细微，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哪儿去寻找能够用来解释什么是自我的内心经验或意志是怎样产生的有关资料，他不得不无视对性格的教育。尽管如此，他仍然提出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有影响的改革群体所信赖的教育哲学。

孔狄亚克对生理学上的验证不感兴趣。用一套能够接受并处理使这种模型运动起来的刺激的肉体器官来说明他所说的感觉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在孔狄亚克发表论文前的一段时期，戴维·哈特莱已经在研究人体神经兴奋对心理的知觉伴随着在肉体上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直到1781年他的振动理论的译文在德意志发表后哈特莱才在欧洲出了名。在他的理论中隐藏着一些甚至他自己也清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位深信宗教的思想家，极不愿意让他对自觉行为的心理学解释危害心灵不受神经振动影响这一现实。此外，他虽然为功利

主义学派的道德行为论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又最有创见地详尽阐述了联想主义理论。为了对自私、野心、逃避痛苦和人类的许多不光彩的个人打算做出解释和剖白，他莫名其妙地试图使这一切屈从于基督至善的仁慈要求，这很难说是正确的。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哈特莱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人物。他在心理学上的探索研究，由于得到一位为改进教育和改善人性而不懈努力的传教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大力支持，将会对18世纪末英国的教育思想产生影响。这项探索研究中与最大幸福原则有关的全部含义由年高德昭的穆勒及时地予以阐明。他不再考虑当时已经过时的旧式生理学，而在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篇幅很长而带有论战性的教育条目时采取的写法是提出一些步骤，以此在年轻人中间细致周到地进行明智的个人利益的教诲，使之能够极大地造福于民主社会的福利。穆勒把18世纪心理学的各种概念加以综合，其部分重要意义在于他把这些概念运用于各阶层的儿童，就像法国的观念学派出于类似的理由所做的一样。

向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教育理论发展的主流是法国的路线。它是由那些乐于自称为孔狄亚克的学生的人们所倡导的。德斯蒂·德·特拉西伯爵和皮埃尔·卡巴尼斯都是科学家，二人都急于埋葬没有肉体的灵魂学说的最后痕迹。他们把孔狄亚克神父的感觉转化论解释为神经信息转化论，他们用脑组织和神经节的活动来说明问题。思索就是运用人的神经系统。

德·特拉西发现人体里有一种管“行动”的内部感官，它使意图的形成和执行具有更多的意义。医生兼解剖学家卡巴尼斯说过，脑子的功能是把本能（他把本能说成是有机性质的）转化成行动并分泌出思想，好像肝脏分泌出胆汁一样。他对教育的贡献给后继者没有带来多少影响，因为他们对他的直率的唯物论感到十分震惊。他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把思想成长 and 人性成长的各个阶段同人体的发展阶段（如青春期之类）联系在一起；其次他把对思想行为的含义的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这些含义涉及病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卡巴尼斯认为，儿童智力的出现受早期感情生活中人际关系和群体压力的影响，或许最后为这些因素所决定。

德·特拉西比他的朋友孔多塞幸运得多。在被判死刑的情况下，他在监牢里写下了他的教育理论，并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恐怖统治的报复。当时碰巧卡巴尼斯正在冷静地研究断头台上的牺牲者在其生命宣

告终止时肉体上出现的各种状态。后来由于政府部门中的朋友们帮助，这二人得以将当时称作“观念学派”的他们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教育理论付诸实施。以后，拿破仑·波拿巴便决定禁止他们的整个教育哲学，并从教学中清除这些异端观念。他建立公立中学（lycées）以取代中心学校（écoles centrales），按照传统的经典原则进行教学。

中心学校的伟大设计在它们短促存在的时期里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学校实现。该设计是按照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教育思想模式拟定的固定课程的少数典范之一。博物学、数学、应用科学、文明史等每一门课都被有意识地、合理地、前后一贯地安排在为男孩们精心制定的选修课程的框架里，他们将从13岁到19岁度过六年的学习生活。科学学科将得到一种新的“基本原理课”的补充和加强，这种基本原理课将教给学生孔狄亚克会赞成的那种感觉和精神概念之间的联系。观念学派的理论认为，如果言词能以一种基本法语记录下这些概念的话，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基础上，一种清除掉虚伪和误解的具有理性的完整的道德，将使新一代人能够创立一个乌托邦社会。这些基本概念的心理基础绝不仅仅是暗示20世纪的行为主义，而且也使人们感到了逻辑实证论的迹象。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重建的手段所起的作用在法国已经讨论了40年。直接受孔狄亚克的影响而写成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同代人爱尔维修所著，书名是难以翻译的《精神论》（*De L'Esprit*，1758年）。其中发表了关于人性的范围和局限的惊人评论。这一著作可能是推动启蒙运动的出版物中最著名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创见。尽管如此，我们满可以有理由说，一个作家表现出这样的能力来揭示出各种隐藏的内在关系，实在是有权声称他具有思想上的独创性。《精神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它把孔狄亚克的思想方法大众化了；第二，它把卑鄙的动机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的程度，致使一切高尚的意愿似乎成了感情要求的扭曲表现；第三，它把成人和儿童都看成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其明显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把一切都看成不存在差别了。宗教和宗教学说所受到的粗暴对待几乎是分析的其他部分所造成的震动的附带产物。国家的福利完全依赖于其全体公民所受的是何种教育——就是说，依赖于他们所受的教育

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容易受错误的影响，或使他们能设法保护自己免受错误的影响。这个论点是确实无误的。

如果说爱尔维修似乎是贬低伦理训练，把它看成只不过是公共福利为一时方便而利用的东西；但他同时把教育抬高到比通常所给予它的突出得多的地位。实际上他是在宣称，社会和公共道德就其效能来说完全依靠教师所做的工作，尤其是靠那些负责形成初期习惯的早期训练的教师的工作，爱尔维修一直认真地指出，一个教师应当受到本职工作的训练。年轻人之间在智力和公益心方面的明显差别是过去所受不同教育的结果。在本质上，所有健康儿童的天资是极相似的，天才与其说是与生俱来的，不如说是教师的本领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际上，立法者和教师们共同担负着国家的幸福和安全的责任。

爱尔维修断言，人的动机只不过是促进自私，他并不想缩小这个断言的影响。所谓的卑鄙的情欲或隐蔽或明显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似乎可能要威胁社会。但是为这些冲动而悲叹或试图消除它们是无济于事的。对社会来说，应当去促进并利用它们使之发挥最大的好处。这似乎指的是在一个改革了的社会中教育工作者的作用之一。顺便说一下，爱尔维修的思想中固有的严重自相矛盾之处在这里几乎暴露出来了，因为，如果说社会生活中改革了的秩序能够通过教育政策来建立的话，那么首先要求这种改革了的秩序能保证教育承担这项任务。几十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中的山岳派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

尽管这些学说似乎对于教会、大学和政府机关中所有谴责它们的当权者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而且即使是詹森主义者和耶稣会士也一致认为爱尔维修的言论是对宗教的不敬——但其作者肯定不是有意侮辱公益精神。对许多人来说，爱尔维修在作品中极其坦率地讨论动机与道德问题，给人以某种宽慰的感觉。所有这些怪异的言论都带有一种慈善的色彩，并乐观地相信人性会改善。广泛地讨论教育问题是一个涉及对整个社会环境产生影响的过程，这显示了新的思想方法。此外，辩论方向的转变使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到自己是出色的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为了强调这一点，爱尔维修主张专门进行公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以及实用知识的训练，因为这将会使年轻人像公民一样成为生产者。

虽然他著述的论文在当时似乎很可能开辟激动人心的前景，的确也引起了许多争论，但这些论文对教育机构以至教育实践的直接影响却比我们预料的要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1771年去世以后若干年。就在他死的那年罗伯特·欧文诞生了。

虽然欧文这位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实业家不像巴黎沙龙的知识分子那样有强烈的吸引力，也不像威廉·戈德温那样有道德上的说服力（通过后者欧文间接地学到了爱尔维修的环境论），但是他能够并决心把全面教育（l' éducation peut tout）的学说在新拉纳克的工厂里通过引人注目的实验进行检验，并因此而赢得了英国幼儿学校运动创始人的美名。对于欧文以及他用以改善社会的有力的并经过严密论证的方法来说，品德是外部力量的产物乃是不辩自明的真理，“用理性培养任何人群，他们都会成为有理性的人”。

实际上，爱尔维修和他的同道们的学说是强调社会接触的影响，并把注意力放在主要是实际行动而非出于想象的方法上，这种方法能将儿童的天性转变为实现有益生活的目的。不可否认，爱尔维修有助于促使功利主义思想在西欧的发展。这种思想接触到教育，就像它在许多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意味着要修改几乎完全以语文教学为基础和尊重公认的权威而制定的传统课程。即使在初等教学一级，功利主义者主要关心的也是阅读和计算的实用本领，而牺牲宗教教义问答的学习。只是在可以泛称为中等教育的领域，学校的组织和教学方法才有显著的区别。

一种被称为“感觉心理学”的理论肯定将会在课堂上付诸实践。可以列入这类模式的学校是一些建立在往往被称为“感觉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学校，它们所赖以建立的是这样一些性质的教育：依靠讲求实际的方法，依靠学生自己掌握资料，依靠行动的方法和依靠把“生活环境”的发展作为教学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并非都是新鲜事物，而是属于培根哲学的旧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夸美纽斯就已经在理论上对这类性质的教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推崇。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趋势显然已经以各种方式适应社会的需要。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偶然的试验扩大为一时的风尚，一些新的教学设施开始符合一定的要求。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特质（这在新教国家里最为明显），要求航海、测量、商业会计方面的教育，以及与这些科

目相适应的数学技能。那些把孩子的前程寄托于贸易和实业的父母们也要求讲授现代语言。

贵族们的骑士学校和马术学校已使几代德意志人熟知根据职业上的需要而替代古典文科学校的主张。然而上述新运动几乎还没有触及特权阶级的常规教育，似乎也没有改变古典教育已确立的种种做法，这些大都仍然掌握在教会团体和教区僧侣的手中。于是我们在18世纪男生学校和慈善学校的章程中看到的确实是另外一种教育形式的成长，而不是发展主流中起调节作用的因素。改革主张被纳入轨道，其影响也仅限于这个范围。

这种明显不能同传统调和的情况，其原因可以从英国的发展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英国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地方所仿效。这些模式到18世纪60—80年代中期已牢固地确立起来。这类学校常被称为“不信奉国教的学校”。虽然这个名称并不适用于所有这些学校，但它表明这类学校本来的功能是为居民中那些根据法律不得进入与政府机构有关的职业的不信奉国教者而设立的学校。希望以牧师为职业的人得到相适应的训练，而支持这些学校的家族中一些不算贫穷者则追求商业利益，二者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或教师们对科学、历史、政治和哲学等课程的兴趣不断提高的原因。在最著名的不信奉国教的学院中，例如在达文特里（1752—1789年）和在有“北方雅典”之称的沃灵顿（1757—1786年）的学院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直接向大学水准挑战的高等学术研究，而在带有较多的世俗倾向的私立学院里，课程中实用的和职业性的部分则不断提供实验的机会。那些不太出名的私立学校的校董们，虽然对课程的革新十分感兴趣，但几乎不关心教学的原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英国的独立学院（或许有200所左右）最受欢迎的顶峰时期大概已经过去。由于失去了某些原有的宗教奉献精神，它们受到的欢迎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卫斯利教派运动的福音传道未能触及不信奉国教者的学术观点的根源，这时却似乎由于受自然神学要求的鼓舞而更活跃了。这类学校中规模较小的私立学校的兴衰也不能泛泛而论。由理事会管理的较大的学术机构最引人注目，也最易受到舆论的攻击。当哈克尼学院（1786—1796年）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宏大的新事业以明显的大学形式建立起来的时候，由于其教职员和学生都同情雅各宾派，立即变得臭名昭著。这便更加

强了人们的印象，认为不信奉国教者都具有叛逆和革命的色彩，从此这些学院逐渐走向衰败。

但是，在这以前很久，英国的学院已经跨越大西洋而建立起一个协会网络。不停活动的讲师们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经验。在13个殖民地的新兴城市里，到那时几乎到处都在仿效古典语法学校的模式。富兰克林的文章《建立一所英国式学校的计划》（1751年）体现了他为费城建一所学院的早期计划，这引起了人们的某些兴趣。然而，正是在美国革命时期，一种新型的现代学科的教学开始出现在一些比起英国模式来或许学术气氛较少的学校里，但更密切地与赞助这些学校的商人家庭在职业上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在观念上也更世俗化一些。1778年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创办的菲利普斯学院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样板，但也已经有其他的类型。从此以后，美国的院校以其广泛和实验性的“实用”课程背离了欧洲的传统，为以后的州立中学开辟了道路。

在德意志，它的现代学校实科中学按照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建立，成为最早趋于成熟的学校。尽管如此，其实用主义的课程也曾招来新人道主义学术领袖们的猛烈批评。具有发展前景的现代型学院在柏林（1747年）和汉堡（1763年）出现了。但约翰内斯·巴泽多1774年在德绍创办的博爱学馆（Philanthropinum）堪称一个伟大的典型。学馆的校长吸引了一大群有才华的人作为教师。该学馆实行寄宿制，男女同校。长的假发和时髦服装被简单合体的便服所取代。领潮流之先的现代课程和生动而富于想象的教学方法，包括语言的直接教授法，在广大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学校的创办者在学术界也已很出名。在巴泽多开创的新事业中，他那个时代教育方面的一切进步影响，包括卢梭的影响，似乎都能得到体现，而人们有时把促进这一试验归功于卢梭的影响。巴泽多的天才在于他能够把有益的主张运用于课堂技术，并且有示范能力和宣传能力。但是他的才能仅限于此，因为他缺乏坚毅精神，动辄与人争吵，没有组织能力。他在德绍所做的工作的真正重要性在于，离开他的教师们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感染别人。他的著作在德意志知识界普遍流传。德意志的实科中学在他的榜样的鼓舞下在广大地区发展起来，有些是由才能杰出的人管理的，如卡姆佩和扎尔茨曼，以及像沃尔克这样的传教士。沃尔克在叶卡捷琳娜的庇护下在圣彼得堡开办了一所博爱学馆。

卡姆佩引起我们注意的部分原因是他促使《鲁滨逊漂流记》以及这本小说的一切主张在教育界大为流行。笛福的这本书以及仿效它的类似作品越来越受欢迎，这表明进步人士对于把实践的方法、适应环境以及自力更生奉为目标非常感兴趣。卢梭笔下的爱弥儿在15岁以前除了这本书外不许有别的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概在爱弥儿的创造者心中有一种意识不到的想法，认为这个孩子是在独特的孤立情况中培养的。作为笛福这本书的翻译者和改编者，卡姆佩本人的贡献在于他作为一位优秀的进步教师感到原著的故事里从破船打捞起来的東西太多了些。他自己的“鲁滨逊”登上孤岛时，除了随身衣服外一无所有，但丝毫不妨碍他的适应能力。

从做中学习，从设法解决生活问题中学习，这些实际上是作为新的思想流派的部分教诲而加以鼓吹的。这个流派是在卢梭的激发下兴起的，它摆脱了儿童应受理性指导的旧模式，树立了对想象力的崇拜。卢梭并非是在实际教育儿童方面唯一具有创见的人。关心讲求实际的教育方法曾经是启蒙运动信奉的在共同理性基础上求进步的一个方面。但是卢梭关于儿童天性的新观点体现了一种反唯理智论的主张。它完全改变了在教育事业中对教师的作用所采取的态度。爱尔维修认为只有环境才能起左右习惯和品德的作用，这个流行于当时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挑战，正如他把教师描绘成是儿童性格的启蒙性高明塑造者的说法所受到的挑战一样。卢梭提出成长是内在力量作用的理论。他对当时流行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缺点感到愤慨，转而探索形成品德的新的源泉。“我已放弃了理性”，他于1758年写道，“我求诸天性，即内在的感情，它引导我的信念，而不受我的理性的影响”。他重新探索感情和意志；他的社会哲学和他的教育理论都承认意志是第一位的，是建立在认为没有任何高明的办法能使人们个别地或集体地接受他们还不准备接受的东西这样的信念基础上的。卢梭提出以内省为基础而形成人们的品德这一新的理论，有助于说服浪漫主义运动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观点的完善比智力的敏捷更适合于作为目标。

卢梭这位18世纪想象力最丰富的教育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教师们的思想，仍然众说纷纭。确实，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在康德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中开始明显看出对他的著作中潜在的一些可能性作出了比较成熟的思考。这时人们开始充分地意识到强制不是促进学习能力的办法这一教训，在课堂上贯彻兴趣原则

的内容也设计了出来。与此同时，卢梭的一些激励人心的似非而是的论述则是直接针对普通读者而发的，他向这些读者阐述了消极的教育和以慢求快的观念，对此他提出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不要将儿童发展能力的下个阶段提早。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赞赏者在他们的上层阶级家庭里进行了许多尝试，依照在《爱弥儿》（1762年）里所树立的典型，在没有传统的束缚并完全在自然影响的条件下，培养年轻人的生活能力。在这本出色的著作里，卢梭设法把大量有关生活、道德和培养子女方面的想法集中在一起，把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一个结构松散的故事为外衣而表现出来。这里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他仍然沿用了已在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0年）中成功地加以利用的方法。在该书几处热情乐观的段落中，他关于性格发展的许多哲理已经予以阐明。该书中朱丽的冒险历程，连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政论文章都必须加以研究，以便领悟他的教诲的全部意义。

卢梭经常声称：在人类一切事情中，需要根本考虑的是道德问题。这一点无论就个人的成长和衰老的角度，还是就左右人们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而言，同样都是正确的。因此，对年轻人的教育，若实际上抛开社会基础而孤立地加以研究——在《爱弥儿》一书中这是作为惊人的成就完成的功绩——乃是一种培养气质的工作；就像在不同背景下培养卢梭的政治著作中所经常描述或提示的那种积极献身的公民一样。再没有比爱弥儿由一个私人导师引入生活的情况更加与世隔绝的了。当然，富家子弟聘请导师在18世纪的社会里是平常的事。就对爱弥儿的教育而言，导师承担着绝对的责任。我们看到他从刚刚脱离自然所赋予的天真状态开始接受导师给予的教诲，培养他真诚并具有正确的观点，几乎直到他成年，而没有被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所玷污。虽然批评卢梭的人们无疑过分强调了卢梭强烈拒绝承认人类受原罪玷污的态度，因为他似乎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新出世的人的生命与其说是性本善，不如说无善恶之别。的确，他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为什么并非生来就恶的人，会在文明生活的历险过程中由于罪恶的交往而使自己彻底地受到腐蚀。

卢梭这样坚持认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产生道德堕落，这是与启蒙运动相背离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卢梭在其他文章里常说，需要对青年进行完备的社会训练以适应一个尚未完善的社会各种条件。这种

训练借助一种培养高尚德行的方法可以避免腐败。这样，全体公民具有正确的教育所培养起来的集体目标，去实现他们的共同意志，就一定会引导城邦（polis）的公民达到社会至善的境界。这种解释帮助我们消除了以下矛盾，即《爱弥儿》显示出明显的个人主义，而且完全忽视普通儿童谁也无法逃避的人类环境，而卢梭在另外地方却坚持青年人应受到社会所组织的训练。当他为《百科全书》第五卷（1755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已经在雄辩地主张公民的义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国家作为青年的监护者要胜过亲生父母。斯巴达式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常出现在这位热衷于古代历史的学者头脑里。如果儿童在实现了民主的制度中统统都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培养成长起来，如果他们完全接受公众意志必然要加给每个人身上的各种要求，如果他们生活在不断地对他们讲他们的国家，即他们慈爱的母亲的直观教学的氛围中，那么，卢梭断言，毫无疑问他们自然就会保护她。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详尽阐明表达共同目标的工具（他特地称之为“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重要性时，对经过训练的公民应具有的勇气和优良的特殊品德曾给予更严密的考虑。现在，由于他赋予这种共同意志以唤起人们共同的公民信仰的启示力量，从而使它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了。教育的突出任务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和义务。凡参加与这种共同意志相关的事，不论男女，甚至其大部分思想的趋向均将受到控制。为了造就具有这样品质的公民，就需要有一套公众的教育法规，并辅之以各种社会常规和见解，此外还要有一种吸引人的共同目标使之得以巩固。这种共同目标就其性质不亚于是极权目标，因为责任感是每个人都必须自愿承担的。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教育机构的性质仅仅隐约地提到而没有加以阐明。三年以后，在卢梭所草拟的科西嘉宪法的手稿中，也写得并不更清楚。卢梭把自己想象成这个岛上拥有权力的立法者，着手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规划。该规划明确要求每个人在20岁时应在一次庄严而无条件的献身行动中，把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明白地奉献出来。最后，在1772年所写的《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中，卢梭毫无保留地建议采用一种国家教育的形式，专门对年轻的公民灌输为公的精神——这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使波兰走向复兴之路的主要而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建议是实际的机智与远非实际的理想主义的混合物。但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即天主教波兰在她的新生活中必须有完全非宗教的学校，由上层政治家组成的强有力的领

导集团进行管理，他们必须设法保证人民“在爱好上、感情上、需要上”都是爱国者。

一方面，国家机构所从事的只不过是年轻人毫无例外地进行教育，这个观点在卢梭把他的聪明智慧专注于宪法的制定时已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另一方面，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又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就个人来讲应鼓励感情和独立思考的内在力量。这二者显而易见是矛盾的，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寻找某种调和。人们相信卢梭本人在准备该书再版时，曾经试图使之取得某种调和，如果对同科兰塞（Corancez）谈话的报道被正确地加以解释的话。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爱弥儿的培育过程，其本身即表明它毕竟算不上是一种允许儿童依照自己的情况、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自由地取得经验的教育制度。孩子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和保护。他的导师经常提出某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和新的情况，遵循着一套事先规定好的培养计划。孩子的教育进程远非顺乎自然，而似乎像是一连串精心安排好的陷阱一样。在这种对他“自然”迈向成人时代的进程进行上帝般的监护下，几乎没有他选择机会的余地。康德本人是仰慕卢梭的，但他曾批评导师制是付出很高代价设计出来的机制。而且，虽然与为科西嘉和波兰的青年爱国者所设计的经历比较起来，爱弥儿的培养计划似乎的确还是自由和宽松的，但他的导师在某些地方确实很像是理想国中的立法者。对于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论点，我们可以从卢梭承认他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这一点找到正确的辩解。当时的法国几乎不可能提供合适的社会环境，让像爱弥儿这样的儿童受到德育训练。对爱弥儿受教育过程的叙述不得不当作一个典型故事或一篇寓言来阅读，以启发和激励法国上层社会成员们的想象力，敦促他们实际上去彻底改变流行于1762年的几乎一切有关贵族子弟教育的观念。社会教育手段的改革只能是卢梭为一个尚不存在的法国而设计的。

然而在卢梭晚年的现实法国里，传统的教育机构确实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如同在其他几个国家里一样——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所要求的那种公民学校终于变成了普通的教育机构。

在天主教世界里，从立陶宛到巴拉圭，其整个教育结构由于耶稣会的解体而受到极大震动时，事态几乎是偶然性地开始发展的。这个过程用了14年才完成。有些密切涉及最有势力的阶级的学校教育和政

治权力的分配的问题，直到克雷芒十四世1773年颁布《我们的上帝与救世主》敕书才有了明显的结局。^[2]由数千名基督教世界最优秀的教师指导的教育制度的崩溃固然不会不对文化的源泉产生影响，但是它在包括更广泛的战线的斗争中，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人们曾指责耶稣会的学校课程刻板僵硬，守旧过时，过分狭隘地局限于旧的“理性学习”（Ratio Studiorum）的教育哲学。虽然如此，这类院校仍不乏学术成就或有用的智力培训手段。它们合在一起构成欧洲文化地图的主要特征。耶稣会机构的最后一次统计资料是在1749年汇编的。不包括神学院，世俗院校的总数：法国有89所，意大利有133所，西班牙有105所，而在德意志各地（包括荷兰）和东欧有200—300所。有人曾经稍微夸张地说过：耶稣会在允许他们办学的国家里长期以来担负着培训知识精英的责任，实际上耶稣会士遭到反对的要害正是他们对于教育在塑造人的品格方面所起的作用知道得不是甚少而是太多了。耶稣会神父们的被驱逐，对其他从事教育的宗教团体，如皮阿里会、巴纳拜会和奥拉托利会^[3]来说，是让他们进入这一领域，增强他们自己的影响的信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受到鼓励接收整个学校机构。至少在法国，奥拉托利会成为拓宽教学课程范围的重要革新者。后来在革命的黑暗年代里，唯独他们受到优惠的待遇，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耶稣会退出的学校，到处都被置于更加严密的国家纪律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既有大量被没收的捐款可供使用，又有现在突然腾出来的空旷场所可供改革，这就给仁慈的君主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将高等教育办得更接近于符合当时风行的中央集中管理的模式。

在法国，这只不过是把一些耶稣会的教育机构，包括笛卡儿曾经学过的古老的拉弗莱什公学，转变成军事训练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许多有关改组的计划和请愿书。像拉夏洛泰这位主张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律师和反耶稣会的急先锋，就要求政府进行控制和课程的现代化。但是，他却从要求政府当局扩大学校社会基础的态度上退缩回去，实际上谴责公教学校弟兄会^[4]让轮船服务员接受高于他们身份的教育。杜尔哥在给国王的一向是清楚而有力的条陈中，追求实行一种类似普及教育的计划，主张人人接受公民义务的训练。“十年之后，陛下，您的国家的面貌将完全改观。”狄德罗（如果阿姆斯特丹一本论公共教育的小册子没有把人弄错的话）对于工人的文化被忽视表示痛惜，希望建立国立学校加以补救。在他的闻名于世的论大学的科学

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备忘录中，他劝告叶卡捷琳娜女皇说，在没有提供普通教育之前就建立科学院，无异于从屋顶开始建筑大楼。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各领地，玛丽亚·特蕾西亚1760年以来一直在考虑进行改革，当耶稣会的问题爆发时，考尼茨聪明地避免了出现暴力行动的局面。他在涉及各级学校的全面改组中继续争取到这些领地的合作。人们发现，这一点可能是通过把耶稣会的某些旧人员调去从事低级教学而做到的。这样，就可以使初等和中等学校同教会的拉丁语学院建立某种联系：它们就能够与高等学术领域相衔接。至少在书面上看起来，哈布斯堡各领地似乎有一套人类已知的最有条理的国家管理学校的制度。

保尔森曾说过，启蒙运动对中欧天主教国家的影响，显著特点是其突然性。约瑟夫二世一旦将哈布斯堡的继承权掌握在他一人支配之下，便立即设法推行义务教育制，统一课程和语言文字，并且出其不意地对他的福利国家的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整顿，只是暂时地使反对势力陷于瘫痪。在欧洲历史上教育改革第一次成为统一政策体系中有真正明确内容的一个部分。从宗教基金的世俗化和教育人才的转移可以取得所需的人力物力。由于一个未来新型的多瑙河帝国无疑需要有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这样做的目的也就很明显了。因此，约瑟夫的公共教育政策是非宗教的和重实效的。它恪守道德规范，反对自由教育的过高要求；它也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看来它并不愿为培养多余的学者而安排经费。当到处因变化的迅速而感到不安的时候，在遥远的奥属尼德兰，迎接改革的却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敌视态度。在那里甚至还不理解约瑟夫所引进的对基督教所有派别的宽容，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把神学院置于政府管辖之下的做法，确实对煽动布拉班特人民发动1789年起义起了作用。

在德意志地区，约瑟夫计划的某些精神在利奥波德二世的反动统治下继续存在，但是在广阔而民族杂居的地区，那里显然缺少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一影响深远的普及教育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计划不周而归于失败。

下面是一个例子，它既表明荷兰人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也表明莱顿大学（它长期以来在科学方法上居于欧洲的导师地位）的学术影响范围之广：著名的生理学家格哈德·范·斯威滕，由于是天主教徒，

竟无法在自己的医学院当一名教授，但却在东欧成为第一流的医生，而且是维也纳医学界伟大的临床学派的奠基人。而几乎随之而来的是他成为一名受尊重的专家，他的意见决定了哈布斯堡王朝教育改革的性质，并在学校里实行以本国语言进行教学。

在普鲁士和萨克森，实际上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地区，国家管理普通学校的情况，由于打破原先由教派管理的一统天下而开始得到了维护。弗里德里希 1763 年的乡村学校管理条例（Landschulreglement）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确实保证强迫学生去教区学校上学——只要那里有一个合格的教师任教——或者说，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确实影响了他那分散的领土上的人民的文化程度，几乎是无法肯定的。但是毫无疑问，策德利茨作为弗里德里希的公共教育大臣而实行的管理制度结果形成了一项政策，将初等和高等教育组织，连同初露端倪的有组织的师资培训，看成是治理国家的明智措施。不论是 1788 年实行的古典式高级文科中学毕业生的考试制度，还是在同年颁布的限制教学和出版自由的法令，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反映了警察国家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曾赢得康德、威廉·冯·洪堡和歌德的支持，并在裴斯泰洛齐的教导中终于体现为一种可行的教育原理的那种进步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因素，是完全不赞成约瑟夫二世式的“依靠法令的启蒙”的。它是以与此完全不同的精神而运作的，这种精神在普鲁士几乎找不到适当的表现形式，即使在耶拿战役之后的振兴时期^[5]也是如此。

当我们探寻 1789 年后法国政治大论战所产生的新事物和奇异现象时，所有以上这些思潮以及在荷属尼德兰和瑞士各州开始产生效果的许多更开明的教育思想的发展，都必须加以考虑。大革命的发动者们是在哪个阶段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在这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呢？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推翻旧政权和教会财产特权把他们卷入繁重的重建工作呢？

1791 年的宪法关于学校的前途没有定论。尽管如此，它还是给人们以希望，即建立一套全体公民共同享受的公共教育制度，至少初等教育是免费的。这时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完全经过整顿，被置于省和市镇的框架之内，而且很明显意在利用这种结构使之将各级教育组织也纳入其中。当塔列朗在新宪法颁布后几天实施一项教育措施时，他曾提醒人们注意这个设想。他讲到法国教育十分贫乏的严峻事实，要求

议会在把权力移交给继承其权力的机构之前即作出决定。制宪议会除设立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外，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畏缩不前。到了立法议会时期，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事业，有必要委任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这样就使从立法议会一直到国民公会有记录在案的活动中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延续了下来，标志着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教育确实是这两个机构深切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些专门委员会是努力工作的，随着思想潮流从布里索派发挥分散的主动精神的主张转向由国家统一管理的观点，争论的语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的感受却一直是只要革命的各种紧急需要一旦得到缓解，需要建立国家管理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列入议会议事日程的首位。

于是出台了许多方案。有些是两个议会本身提出来的。然而，除了一个之外，所有这些计划都难逃失败的命运。虽然国民公会1793年实际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可行的，但它仅仅涉及关于合格教师地位的共和制原则，而完全没有能够激励地方行政区所十分缺乏的行动积极性。这样，革命性的论战是在整个国家处于漠不关心和无人管理的背景下进行的。教育机构先是由于1789年的世俗化和没收政策而失去基金，然后又流失了它们的大部分教师，幸存下来的也是在得不到当局保护的情况下苟且生存。就这样，在巴黎唯一幸存下来的老的著名教会学校就只有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曾一度就学的古老的耶稣会的路易学院。在革命时期它一直没有关闭。

与此同时对已作出许诺的重建原则正在进行审查，向立法议会提出报告的任务落到了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的肩上。这位思想高尚的人类进步的倡导者对教育思想的影响之大远非对他一生业绩的单调的叙述所能完全显示的。在最后阶段，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在革命时期的立法草案中提出他的主张，使其接受检验。当时他所有的计划一个接着一个地遭受悲惨的命运，毫无结果，他本人也成为国民公会中互相敌对的受害者。最后，如果可以把《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一书看作孔多塞的政治声明的话，他对教育的各个方面——或许除有关课堂技术方面的论述之外——都阐述了他的思想。从提倡自由的生活和实现普遍理智，到他在当公立教育委员会主席时草拟的报告中对全国性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都面面俱到地加以阐述。

孔多塞的全国统一模式的教育计划是代表公共教育委员会于1793年4月正式提出来的。它无疑是在两个革命议会中提出的各种重建计划中表达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除去它那些理想主义的辩护辞藻，人们可以看出它既是对一个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思想领导地位的爱国社会群体在教育方面的需要所作的实际调查，又集中了许多具有令人难忘的敏锐含义的箴言。它将一套教育原理与一套教学规划的设想融为一体，有权被奉为法国启蒙运动实际思想的顶峰。它在对待政治基本原则方面所表现出的自由主义使山岳派十分不满，也使孔多塞的思想被罗伯斯庇尔斥责为卑鄙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布里索派的影响表现在所提方案的每一点中。它们表现为要求政府官员不得参与他们所就学的学校的事务，创建一个自治机构全国协会（Société Notionale）——一个地位高于所有学院的学术团体——负责监督国民教育系统和聘任教师，要求其某些成员必须是常驻该机构的地方人士，以及所有成员均不受政治干预。这样，如果报告被通过的话，公共教育的未来本会掌握在一个由学者和教授按等级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手中，他们的重要任务包括建立两种初等学校——第一种在性质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学，第二种则是一种中学。在这里，孔多塞事先就已提出后来在欧洲实行的许多办法。在再高一级的教育方面，他计划设置110所教授高中课程的学校，而在金字塔的顶端设置9所学园（lyceum）承担大学的任务。这个系统的所有部门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各级教师除了正常教学外还负责担任某些成人教育工作。甚至连武装部队的需要也没有被忘记。作为一项组织工作，计划似乎打算建立一个管理一切的法国教育总署（Université de France），这个机构后来相应地根据1806年和1808年的拿破仑的教育法而建立起来。然而孔多塞对课程要求所作的仔细分析却提供了一幅与上述事态发展完全不同的图景。他的报告之所以在文化史上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提出的教学精神和教学内容。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次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革命的教育哲学的全部含义。我们看到他把实际的和科学的研究，换言之即把“人类一切知识的各种因素”和为促进社会逐步改进而进行训练的方法，在统一的制度下结合起来了。这无疑是以公民为中心的课程内容。拉丁文和古代文学被挤掉了，部分是由于必须增加自然科学和数学、农学和机械工艺课程（而由于还要增加伦理学和政治学，就更加需要压缩上述课程）；部分则是由于需要以当时流行的社会理想取代各种传统错误思想的腐朽影响。在所有各级的教学

上，孔多塞试图说服他的读者：新的教育学要求学校教育的制度来一次彻底的改变。虽然他也同意一个学龄儿童肯定没有能力吸收所有各门基础知识，然而聪明的学生可以同时修数门课程。智力稍差的学生则以较慢的速度学习一门课程。报告为改革者提出了综合课程的课题。

国民公会继承了书面的孔多塞方案。它对之进行了审议，但开始趋向于采取一种更加平等主义的立场，而不考虑阶梯式教育的主张。最后，山岳派的热情分子独树一帜，提出了一个以勒佩尔蒂埃·德·圣法尔若的小学计划形式出现的很有创见的措施。这是得到苛刻的罗伯斯庇尔某种形式认可的第一个为未来设计的模式。它在革命文献中的重要地位，既不是由于它对教育学的认识，也不是由于它实际可行。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它，是因为它显示的魄力，以这种魄力计划利用教育的手段，造就具有正确的精神和气质的年轻公民。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就是要让永远的公正和德行支配一切。这在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和圣茹斯特的新共和政体大纲中是必然会博得人心的国家目标。

现在，人们声称，遍布整个风景如画的共和国的新的寄宿学校网将促进全体公民所共同追求和无私为之奋斗的美好的生活的实现。这些学校，其实整个教育计划，将是完全崭新的事物。儿童们都有义务住进这些“平等校园”中的一所，无一能豁免，因为这必将是未来国家的一种“全民征召”。法国全体男女儿童将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从事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以及阅读、书写、工艺学习、军事训练（限于男孩）、纺织洗涤（限于女孩）并学唱爱国歌曲和自由民族的英雄事迹，等等。通过这种有益健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而焕发天生虔诚的献身精神，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将会把革命推向前进。

勒佩尔蒂埃的这个国民小学计划始终未颁布施行，其中许多内容似乎借鉴了卢梭的主张。它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信仰宣言，它实际上闪耀着满足社会愿望的炽烈光辉，这种愿望属于在热月政变中宣告垮台的那些人。他们要求平等的情绪和要求实现无套裤汉民主的愿望，使他们藐视人为的专业训练和高等文化，而实际上藐视社会变动的必要。虽然某些发生偏差的专业培训不容否认是存在的，例如炮兵军官和工程师的培训。背景是针对军事的和社会的工程训练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法国需要国家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的辩论已经在开始进行。

恐怖时期在教育领域里的成就只不过是少数几项目光短浅的立法。这些立法把初等教育的责任委诸各个市镇，任何私人教师只要能取得一张公民证，都可管理学校。所有各行政区，不管本地方言是什么，在学校里都必须用法语。有事例可以证明当地的雅各宾俱乐部曾审查过申请当教师的人的品德和政治观点，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关心如何改进学校工作。的确，当时对罗伯斯庇尔和思想相同的雅各宾派的控诉有一部分是说他们阴谋使下一代人愚昧无知。这一事实表明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即使那些在反对恐怖统治的热月反动中接管了政府的人，也并不急于修复对群众教育水平造成的破坏。诚然，这时立法曾明确规定市政当局对失职行为应负的责任，但是即使如此，地方官员也得不到从中央来的帮助或指导。在督政府执政期间也许曾接着出现一些细微的改进，但这完全是由于私人的和教会团体的教导使对教育的尊重得到恢复。尽管由于反宗教的法律和共和社会一些令人难堪的方面，如十日礼拜制，曾造成许多困难。官方的供给变得微乎其微。在这一领域，革命缺乏一批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以推进其政策。

就这样，在法国的英雄时代，尽管争论激烈，但没有做出任何事来填补由于旧制度下的学校垮台而造成的空白。的确，在督政府执政初期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就是根据1795年2月的拉卡纳尔法在每个省建立“中心学校”作为高等职业预备学习的重要据点。这种学习或许真正能为全体法国公民提供“因才就业”的机会。前面已经谈到，拿破仑对中等教育的改革优柔寡断地从这个实验退却了。尽管如此，即使那些赞扬18世纪综合工科学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组织和人员配备都是效率不高的，这些学校也从未达到创建者期望达到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革命时期所做的积极工作仅仅限于创建了很少几所高等专业学习中心，如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工科学校，此外恢复了少数暂时被查封的科学研究机构。热月政变者设法建立了一所国立研究院（后来称为法兰西研究院）作为所有学者们研究各门知识的中心。这所研究院又试图把孔多塞和观念学派，以及那些希望恢复重新活动的皇家学术机构的原有威望的人的某些主张付诸实施。

资产阶级继续得以使其子女在数目有限的私立学校里受到很不错的教育。这些学校多数由教会团体控制。但所有这一切仍处于遭到镇压的阴影之下。因为督政府仍与教会为敌，禁止招募受过教会教育的

人任公职，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这样，由于战争、通货膨胀，以及没收的财产不够提供福利服务以取代过去教民的捐献，所以法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资源短缺，未能开设学校或培训教师。它的思想在战胜旧制度下的教育传统方面取得的胜利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对人民大众来说，革命则是开始了一个“教育贫乏”的时代。这是英国人自己在大众教育方面乏善可陈，在制定公共政策的动力方面情况更糟的状况下对时代的简单称呼。

（程子明 译）

[1] 原文如此。按《百科全书》共出版28卷。1765年系狄德罗完成文稿审阅的年份。——译者注

[2] 该敕书下令解散耶稣会。——译者注

[3] 皮阿里会（Piarists）、巴纳拜会（Barnabites）、奥拉托利会（Oratorians），前二者为创建于意大利，后者为创建于意大利和法国的天主教派。——译者注

[4] 天主教从事青少年教育的在俗人员组织，1684年成立于法国。——译者注

[5] 指1806年耶拿战役普鲁士失败后，在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领导下实行的改革。——译者注

第七章 武装力量和战争艺术

一 海军

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都主要是海上战争，但英国人在七年战争中运用得极其成功的战略原则，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却几乎毫无踪迹了。18世纪英国海军战略的关键在于，在布雷斯特和土伦海面部署力量，以封锁法国的主要舰队。这项战略由弗农和安森初步提出，霍克和博斯科恩大力推行，最后由文森特爵士和康华里总其成，使之臻于完善。这项战略使法国舰队无法向其海外殖民地进行有效的支援，而英国则得以从事他们所谓的联合作战以征服这些外围地区。由于凯佩尔于1778年7月27日未能在乌尚海面迫敌决战，派遣拜伦去拦截来自土伦的德斯坦舰队又为时过晚，法国海军不但得以同美洲殖民者协同作战，而且没有遭到任何拦截就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在当时所有的领袖当中，乔治·华盛顿似乎是最能理解海上力量的含义的。在与德格拉塞的通信中，他经常强调：单凭法国的财政和海上援助便可以使他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在法国舰队和美国陆上部队出色的配合迫使约克顿投降后，他写道：“你会看得出，在目前的斗争中，无论陆军发挥多大的作用，海军仍然要起决定性的作用。”^[1]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之所以失去海上霸权，不仅因为英国在从印度到加拿大相隔万里的海面上是在没有盟国单独作战的条件下保卫自己的殖民地的，而且因为没有把握住战略原则。不然，仅此一点便可以弥补由于英军在两次战争期间普遍存在的虚假安全感所造成的装备劣势。有限的船只并没有在紧要关头集中使用；反之，在关键时刻却分散力量而无力遏制敌人。美洲的木材和人力供应断绝则是另一个新的困难，因为它占了殖民地航运业的1/3以及约2000名海员的来源。甚至在美洲叛乱开始被桑威奇（1771—1782年间任英国海军大臣）严肃地对待后，皇家海军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当时它面对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后来又得到荷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武装中立同盟的支援。

当时流行于整个欧洲海军的战术理论缺乏独创性，这就加剧了英国在政策和战略上的失败。这一时期的战术理论同陆军战术一样，都带有极端形式主义的烙印。保持密集战斗队形几乎被认为其本身就是目的。权威理论家比戈·德·莫罗克1763年的著作《海军战术》已被译成英文，他写道，“海上不再有决战，这指的是赖以完全结束战争的战斗”。因为在巴夫勒尔海战（1692年）和桑特群岛海战（1782年）之间进行的15次战斗仅有6次可以称为决战，而且即使这些战斗与其说是整列战舰的战斗，还不如说是追击战，所以显然就出现了战术上的僵持局面。两位决心一战的指挥官例如叙弗朗和休斯，率领势均力敌的舰队，在印度洋海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而不会使对方丧失一艘军舰。

法国1765年的《条令》（ordonnance）总结了莫罗克的学说，认为如果两支舰队以相反的航向列队前进，在队列靠近以前都避免发生战斗，那么双方都不会遭到挫败。英国海军的《作战指令》也规定了同样的防御方法，这些方法开始不过是海军将领们为他们自己使用而设计的一些具体的队形变换，但现已编纂成为《常备战斗指令》了。如果一个海军将领未能排列或保持舰队的队列，他就会像马修斯在1744年那样被撤职，或者像宾在1757年那样被枪决，或者像凯佩尔在1778年那样以同样的罪名遭到审讯。德斯坦声称，根据已积累的经验，每一艘舰只的路线都是先规定好的，如同芭蕾舞的每一个舞步都是设计好的一样，而且如果不发生风向的突然改变或其他意外事故，战斗便会进行得很顺利。^[2]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以致罗德尼在马提尼克岛试图集中优势力量向敌舰队列的一部分发起攻击时，他的前卫舰队的舰长竟然不能（或者像他所设想的那样，竟然不顾）理解意图何在。同样，1781年9月5日，格雷夫斯和胡德获得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消灭切萨皮克湾的德格拉塞舰队，而他们两人却宁愿保持战舰队形，而不愿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去进攻敌人，从而导致10月约克敦的陷落。

英国的多次失败都是由于信号系统的缺陷使最高指挥官所采取的行动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造成的。根据信号中所采取的“位置”法，旗子在某一位置挥舞，表示《作战指令》中的某项有关条目。拉布尔多奈设计了一套比较灵活的信号系统，这个系统采用表示数字的三角旗来表示旗语通信手册中的大量条目。这种信号系统经豪和肯彭费尔

特改进，于1782年在英国采用。但是一直到1800年霍姆·波帕姆爵士的《航海词汇》出版，在业已采用的数字旗语中增添了字母旗语以后，才有可能使海军将领采取正确无误的信号，以满足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的需要。

1782年的事态发展终于使正统战术丧失信誉。4月12日的桑特群岛战役中，风向突然改变，在法国的战舰队列中形成了两个缺口，从而使罗德尼得以在两处突破法舰的队列。^[3]与此同时，叙弗朗在他与爱德华·休斯爵士的战斗中采取了一种比法国人通常采用的更具进攻性的攻击方式。就在那一年，英国的战术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无疑也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可是，这还不能说（如其作者所说的那样）已经发明了一种打破战舰队列的程式。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的舰队总是毫无例外地受挫，甚至被打败，而又从未丧失一艘舰船或几乎未牺牲一个人呢？”埃尔丁的詹姆斯·克拉克在他的《论海军战术》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采用非正统的机动方法才能击败法国战术训练的优势。他在1804年的增订版里引用了罗德尼和叙弗朗的战例来证明他的论点。到1790年《作战指令》失效时，实战战例和理论论证业已打破了古老原则的禁锢，于是，像纳尔逊后来所表明的那样，海上决战才有可能得以再次实现。

英国海军和平时期人员的建制在1.4万—2万人之间。此外，还应加上皇家造船厂雇佣的3000名造船工人，造船厂当时已快要成为英国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舰队在战时迅速得到扩充，“留作后备”的旧船编入现役并建造新船以应战争日益扩大之需。因此，1763年海上各类船只有270艘，船员7.6万名，而在1783年则拥有船只430艘，船员10.7万人。^[4]

船员中近半数受战时入伍津贴的吸引而自愿入伍的。曾于1786年建造第一艘教练船的乔纳斯·汉韦领导的航海学会把来自贫寒阶层的男子和男性青年派往海上。其余的人则从商船征募而被迫服役，这种做法受到航海条例的鼓励，以便国家得以在紧急时刻集中使用海员。战争爆发后，这些条例得到修改，以便可以雇用更多的外国人。在18世纪末实行这种有组织的强迫服役以前，征募工作一直是由地方长官授权的抓兵机构进行的。各港口的抓兵队都有固定的“集合点”或征募中心，把抓来的兵员从这里转移到新兵船只或值勤船，以便分配到有关船只服役。这些船只的船长还授权从回国途中的商船上强征

船员，在外国船只上搜寻逃兵，甚至可以雇佣外国海员。随着服役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便有越来越多的平民阶层获得“保护”，豁免服役。这包括船夫、渔民、商船上的学徒和高级船员、不足18岁或超过50岁的男子甚至还有不以海上工作为职业的居民，因为只能征用从事航海职业的人。像斯摩莱特那样的小说家和罗兰森那样的漫画家都可能抨击过抓兵队的野蛮行径，可是曼斯菲尔伯爵也谈过其合法性的一面；他说强征入伍“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做法。国家的安危是使这一做法得以存在的唯一根据，和可以为之辩护并证明其正确的唯一理由”。布莱克斯通和瑟洛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瑟洛任检察总长时，海军部曾就少数几个反对强征入伍的上诉案例之一征求他的意见，对此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5]这种征兵形式当然是不人道的，效能也低，受到军官和士兵同样的反感，但是却别无选择。1777年通过法案，采取法国海员注册的做法，从某些阶层征召海员在海上服役。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证实这种做法起了什么好的作用。^[6]只要船上的海员一旦结算了工资，海军部便无法控制这批人；只要船上的工资和条件使人们对服役望而却步，那么在船上配置船员的问题便无法得到解决。实际上是国家不愿保持一支常备海军，尽管由于国家拥有一支舰队而不得不保留一支军官队伍。正是这种情况使陆军中买卖军职的做法无法在海军加以实行。

海军上将弗农写道：“我们的舰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首先是靠暴力配置人员，其次是靠残酷虐待来维持。”^[7]开小差的比例很高使这一问题更趋严重，这与其说是由于船上纪律严厉，还不如说是由于食物低劣，工资微薄和没有岸上假期。1749年海军军纪法中所明确记载的战争条款以及《海军条例》所规定的不经军事法庭的处分以12鞭笞刑为限等法规，同陆军的刑事条款不相上下。真正的残酷虐待在于那些令人发指的刑罚，如军事法庭可以在整个舰队强制执行鞭刑，以及由残暴的水手长挥动绳索的一端进行抽打等非正式的惩处。于是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鉴于众多的士兵是被强征入伍的，必须采取严格的纪律，恶劣的条件又给服役带来不好的名声，因而使征兵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从共和政体至1797年兵变，军饷和食物水平始终未变。当时军舰上的饷金（普通海员一个月19先令，干练的海员一个月22先令6便士）普遍低于商船，而且经常拖欠不发。发放的饷金票据还必须拿到非官

方经纪人那里以引人反感的低于票面的价值去兑现。食品供应的数量表面上看来丰盛，但由于承包人的欺诈，储存食品不当以及除咸肉和饼干以外的其他食品难以保存，由供给部门（通常被称为“老象鼻虫”）分发的食品质量非常恶劣，臭名远扬。配给的食品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以弗农的绰号“老格罗格拉姆”命名的“格罗格”掺水烈酒，因为他是把水掺入酒中以防酒醉的创始人。

强征入伍的另一个恶果是供应船上污秽条件所带来的发病率。如果采用肯彭费尔特和其他人的建议，发给统一制服以代替发给事务长以廉价购来的“罩衣”的话，那么，像斑疹伤寒这一类的病就不会这样流行了。^[8]疾病造成的人力损耗在海军各个舰队都极为常见。疾病的发生足以使整个舰队陷入瘫痪，1779年德奥维利埃号在英吉利海峡巡航时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型舰队经常停泊在西印度群岛，那里黄热病极为流行，除金鸡纳树皮外苦无良方可治。医治好坏血病固然无疑是18世纪医学的辉煌胜利之一，但直到40年以后才正式采用这种防治方法。安森在环球航行中丧失了3/4的船员以后，哈斯勒海军医院的詹姆斯·林德大夫于1753年发现橘子和柠檬汁具有预防此病的作用。在库克的第二次航行中，无人因患此病而减员，虽然他本人只食用云杉酒和腌卷心菜，并且以价格昂贵为由反对分发果汁。一直到1795年，林德的学生特罗特和布兰才得以正式使用这种防治方法。1779年，送进医院的海员为4万人，而1804年在海军规模大得多的情况下，住院海员仅为1.2万人。^[9]

另一方面，18世纪的海军为军官提供了诱人的职业。1748年采用蓝白色统一军服之后，海军取得了与陆军同样显赫的声誉。军官除工资外，还可以从变卖战利品中增加收入，所以只要有技术和机会就有可能获得巨大的财富。^[10]但是由于没有退休制度，在和平时期对舰长职位的竞争便很激烈，而长时间靠“半薪”又使军官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国海军和东印度公司船队服役盛极一时。

一个打算成为海军军官的男孩要么必须以根据命令成为志愿军人的身份（即姓名与国王姓名首字母相同的男孩[King's Letter Boy]，罗德尼就是其中的最后一例）参加海军，由海军部推荐在朴茨茅斯的海军学院获得一席之地；要么按更普通的方式，根据军官们在船上可以带一批随从的古老做法去当舰长的侍从。官方规定的最低年龄是12岁，但为了获得资历，军舰的名册上往往出现小于12岁的男孩

姓名。在海上服役四年之后，这些男孩将被列为军官候补生。这类军官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年轻人”，即等待着在21岁时参加海军上尉考试的军官，一类称为“老人”，即没有通过考试的军官。此后提升则取决于势力和资历。从舰上低级军官提升的机会逐渐减少，可是也有被强征入伍的船员成为将领的例子。也有许多人从准尉擢升为上尉。詹姆斯·库克在七年战争爆发时自愿加入海军后，正是经由这一途径获得高级军官职位的。

势力取决于家庭和政治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明目张胆地亵渎官方规章。罗德尼的儿子16岁便当上了舰长。更有甚者，教区牧师的儿子纳尔逊从12岁起在他叔父的船上服役，18岁便当了上尉（他叔父是海军的审计官），21岁时便任一舰之长。此后政治影响和良好的服役记录都更为重要。海军部不仅控制了10个议员选区，可以作为赏赐给予其高级的军官和官员。而且已选入议会的许多高级军官也会为其他海军军官谋取利益。桑威奇伯爵任海军大臣后肆无忌惮地利用职权结党营私，搞私人关系，证明政治和海军的结合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1\]](#)尽管对他腐化堕落的名声未免言过其实。

1778年凯佩尔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事情便发展到了顶点。在副司令官休·帕利泽爵士的挑拨下，凯佩尔竟然受到审判，帕利泽不仅是凯佩尔的政治对手，而且不久前被委任为海军陆战队中将，这乃是凯佩尔垂涎的一个挂名职位。凯佩尔无罪释放后，个人宿怨便具有政治意义。他拒绝再在桑威奇麾下任职，豪和巴林顿也效法他的榜样。其后果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侵略迫在眉睫之际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指挥官来指挥海峡舰队。这时罗德尼接管了西印度群岛舰队，他发现这种状况“几乎毁了海军”。凯佩尔继桑威奇之后任海军大臣，罗德尼本人则在桑特群岛大捷之后其职位为一个无名之辈所取代，这都是典型的事例。[\[12\]](#)

桑威奇曾抱怨海军军官往往视舞会重于公务，他的海军将领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1778—1790年间任海军审计官的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曾私下警告过他，这种事态应归咎于他的“政治管理体制”，“海军部的整个系统已腐朽不堪，倘若不尽快改弦更张，必然会在阁下面前崩溃”。[\[13\]](#)正是这种情况使人们相信1779年福克斯、凯佩尔和豪在议会中的攻击乃是事实，因此，桑威奇在一片人声鼎沸的气氛中被迫辞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桑威奇指责他的前任在他1771年

继任时便已造成海军的这种“可悲局面”。毫无疑问，他在战争年代取得了重大的实际进展，诸如用铜皮包盖整个舰队的船身，采用短程臼炮，把舰队由原来的66艘战列舰扩大为92艘，并补充了木材的库存。所有这些都是1782年诺思（用谢里登的话来说，“诺思生来是个要毁灭英国海军的人”）内阁倒台，他被卷入一场更大的风暴中时提出来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无论是不赞成他私人生活的米德尔顿，还是对他的政策不满的霍勒斯·沃波尔，都在证词中指出，作为一名行政首长，他都胜过他的前任和后任。但他所激起的个人恩怨加上他所指挥的战争的不幸后果，却败坏了他的声誉。[\[14\]](#)

对整个海军管理的情况进行调查是必须做而在战时不能做的。在战时，海军的行政职能由海军部、“各位海务大臣们”，或掌管海军大臣办公室的七位委员领导。与供应有关的事务则由下属各委员会分管，其中主要是海军委员会，其主要官员是审计官、财务主管、检查官和条例管理官。另外还有军粮委员会，伤病人员管理委员会，后者除管理医疗部门外还负责战俘事务。1785年，米德尔顿当审计官时，策划建立了一个调查费用支出和滥用职权的委员会。委员会的建议相对说来比较温和，如建议增加工资以取消临时津贴，管理军需官和办事员的活动，并且更加认真地审查账目以检查由不可靠的承包人“在这个军粮供应部门中所犯下的大量错误”。但无论是皮特首相还是豪海军大臣都显然不会按这些建议采取行动。米德尔顿遂于1790年辞职。至于公布报告的动议则在1797年遭到否决，以致报告一直到1806年才得以公布于世。[\[15\]](#)

由于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和大型船只的建造，木材和海军木材的储备一直是影响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一个问题。柯尔培尔曾警告过他的同胞，法国可能因缺乏木材而灭亡。他制定的森林法使国王有权以木材优先供应海军，但这项权利并未一贯得以行使。此外，由于替换材料缺乏，尤其是桅杆木的不足，严重地削弱了法国海军的力量。在英国，尽管由于伊夫林进行了重新造林的宣传，使其早在100年前就实施了植树计划，但造船材料同样还是供不应求。缺乏栎木的原因有二：一是商船数量增加，二是由于炼铁业对木炭的需要。在18世纪初叶曾采取措施，限制船上的雕刻物的数量以节省木材。因此，同以前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船只相比，18世纪的船只上“华而不实的装饰”不见了。建造一艘三级战舰（这种装有74门大炮的船是舰队的主力）需要

3200车栎木和400车榆木。军用造船厂每年要消费22000车木材，为了对木材进行干燥处理，规定要有三年的木材储备。[\[16\]](#)

桑威奇于1771年任海军大臣时便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因为“军用造船厂的木材已所剩无几，而且海军部对于获得木材已无计可施，普遍认为英国的木材业已消耗殆尽”。剩下的木材储备仅有13000车，因为在过去五年中每年要耗费31000车，而且还因为当时东印度公司舰队的扩充。于是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东印度公司舰队的造船计划和为了打破木材商的联合行动而进口更多的外国木材。10年之后桑威奇声称，库存的和已签合同的木材已达80000车。但由于缺乏经过干燥处理的栎木以及良好的船桅和桅桁，国家已经遭受许多严重的损失。海军委员会的保守政策固然应为这种局面承担部分责任，但是要说委员会完全忽视了国外和殖民地的木材来源也不尽然：过去多年来一直从波罗的海地区大量进口，而且在委员会的信件中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证明对北美的森林进行过勘测，当地大量木材上有归国王所有的宽矢形标记。在美洲战争爆发伊始，木材普遍短缺也不能归罪于桑威奇，而是因为在上次战争处于高潮之际采用了未经干燥处理的木材建造船只。例如，当时建成的“皇家乔治号”于1782年使之侧倾以进行检修时，船底竟由于腐朽而脱落；而1765年下水的“胜利号”却一直保存完好，安然无恙。然而殖民地的造船厂并未获得应有的发展，在美洲只建造了几艘小型战舰，第一艘是1748年建造的“波士顿号”护卫舰。米德尔顿替代萨克林任审计官后，情况有所好转，主要是因为米德尔顿更多地利用私营造船厂而使皇家造船厂储备更多的木材。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维修好的舰只1766年为56艘，1783年为68艘，1789年为101艘。[\[17\]](#)

大多数欧洲的桅杆、桅桁、船壳板、绳索和树脂都来自波罗的海地区。因此，保证这一地区的供应并严禁敌人染指，便成为英国的首要政策。据此，英国海军在战争年代坚持其作为交战国而拥有的搜查禁运品的权利，因而往往同“航行自由，货运自由”的中立主义原则发生冲突。当波罗的海国家在1780年，后来又在1801年建立武装中立同盟以维护自己的主张时，英国海军的反应即是进行武装干涉以保持松德海峡的畅通无阻。在从这一地区进口木材方面，法国的大西洋港口要比英国的港口更加容易受到攻击，但土伦可依赖意大利进口的栎木。法国尤其欠缺优质桅杆木，必须依靠由较短的木材制成的桅杆，

而这种桅杆被证明是不顶用的。可是法国对手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从美洲战争即可见一斑。1778年拜伦没能赶上德斯坦，部分原因就是他的舰队在暴风中被吹断了桅杆，而美洲的造船厂又没有足够的备用品。1781年格雷夫斯行动迟缓，未能阻止德格拉塞进入切萨皮克湾，也是由于备用品的短缺。次年舰队在纽芬兰海域一场暴风中所遭受的损失表明，暴风雨造成的损失往往比敌人的行动所带来的损失要严重得多；由于天气恶劣而沉没的船只要超过在那次战争所有作战行动中沉没的船只。

舒瓦瑟尔-斯坦维尔公爵于1761年任海军大臣。此后10年中，法国海军和海运事业获得引人注目的复兴。他的侄儿舒瓦瑟尔-普拉兰于1766—1770年任海军大臣，由于受巴里夫人的影响，他们双双失势。但在1786年卡斯特里确定改革以前，他们的继任者一直在法国社会尖锐矛盾的限度内继续他们的工作。因此，如果说柯尔培尔可以称为法国海军的奠基人的话，那么舒瓦瑟尔公爵便是法国海军的重建者。

他的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报复英国，因为英国在七年战争期间使法国屡受损失。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之间展开角逐的第一个战场乃是在南太平洋寻找传说中的澳大利亚未知土地。为了寻找这块土地，第一次海军科学探险是在布干维尔、拜伦、沃利斯和库克这样的环球航行家领导下装备起来的。库克从1768年到1779年在夏威夷去世这段期间的三次航行中，在航海学方面的发现和成就使他的前辈黯然失色。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现代太平洋地图，而且有在海上保持健康和精确制图等方面他所确立的新型标准。^[18]他制图之精确主要是由于他运用了由约翰·哈里森发明的第一个实用航海天文钟，他在1772—1775年第二次航海中使用了哈里森的第四型号航海天文钟。这是18世纪发明的最重要的航海工具，因为它解决了如何确定经度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经度委员会。

在法国能够在欧洲战争中采取报复政策之前，对法国海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在舒瓦瑟尔对法国海军所处困境的描述并呼吁皇家资助失败以后，他便转向公众，尤其是南部和西部的商人阶层。结果是利用捐款竟制造了15艘备有75门炮以上的战列舰。到他离职时，法国海军的这类战列舰已由原来的40艘增加到64艘。在革命爆发前不久，曾设想过拥有81艘战列舰的平时编制，但这个数字实际上从未实现。除了这一重建运动之外，舒瓦瑟尔和他的继任者还开发了法国和

西印度群岛的主要港口，以及在洛里昂、罗亚尔堡（马提尼克岛）、瑟堡、敦刻尔克等地建造新的基地。[\[19\]](#)

几任海军大臣在力求改革海军军官结构方面都收效甚微。存在于英国海军委员会的行政官员和海军部的作战军官之间的差别，在法国则由于严重的社会分裂而更形加剧。柯尔培尔所规定的财务监督（intendants）的权力以及被称为“文人派”（la plume）的军内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超过了称为“军人派”（l' épée）的作战军官的权力。舒瓦瑟尔1765年颁布法令，纠正了这种差别以提高作战军官的地位，但他的继任者德布瓦讷（1771—1774年在任）则企图反其道而行之，把海军军官地位同陆军拉平，甚至剥夺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军服。这种意图非常不得人心，致使德萨尔蒂内（1774—1780年在任）在任期间解散了近半数下属行政机构，以便在和平时期为作战军官建立海防哨所。这样，在法国参与美洲战争时，海军在行政上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因此，卡斯特里1780—1787年在任时恢复了后勤军需机构较为广泛的权力，并于1786年颁布法令，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些改革。

比“文人派”和“军人派”之间权力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各级作战军官内部的相互妒忌。构成“大军官团”（Grand Corps）的正规军官（也叫做“红制服” [rouges]，以他们的红色马裤而得名），是从军校学员中原被称为护旗军（gardes-de-pavillon）的一批人中间提拔出来的，都是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的贵族子弟。为了扩大这批人的人数，舒瓦瑟尔允许出身低微的海军人员（通常被称为“蓝制服” [bleus]）在商船上或皇家海军服役，但他们永远不会被提升为高于中尉的军阶。卡斯特里进一步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学员中选拔称为“有教养者”（élèves），以取代只有证明是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受到提拔的旧体制。这样的改革不合贵族阶层的口味，因为他们继续把在海军服役看作低于在陆军服役。但是，一旦“红制服”被大革命所淘汰，政府便得以从这支后备力量中选拔军官。一批同样受到蔑视的是所谓的“闯入者”。他们是从前曾在陆军服役或从事某种别的职业的军官。可是，正是像德斯坦（曾经是一名士兵）和布干维尔（曾经是一名律师）这样的“闯入者”给当时的海军历史增添了光彩。甚至伟大的叙弗朗也遭到过他同事们的蔑视，因为他的家族尽管也是正式的“红制服”，但却属于地位低微的贵族，没有在海上的服役历史。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海军中由于这种妒忌带来的困难要比英国海军中由于政治分歧带来的麻烦严重得多。如果说罗德尼可以抱怨他的舰长没有完全支持他的话，那么叙弗朗在印度洋上遇到的麻烦何止这些。据1782年一份报告的记述，“在海军里，无论是在高级还是在低级军官中间已毫无军纪可言。一些舰长不服从舰队司令发出的信号。另一些在军舰上无所事事，结果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当时要消除军官队伍中种种令人憎恶的偏见是不可能的。但一旦和平来临，便有必要改革这种恶劣的军官体制以矫正这些弊端了”。^[20]连续几任的海军大臣对此作出的努力皆付诸东流，而正规军官的过分傲慢态度也招致革命者的攻击。到1792年军官队伍中的半数移居国外，剩下的许多人则遭到杀害或贬黜。^[21]由于海军军官对国王抱有特殊的忠诚，这种职业便与保皇党人一视同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起一支代表国家武装力量的新海军，以取代一向不把自己看作社会一部分的职业海军。从1789年到战争爆发，平均主义的狂热业已将旧式海军摧毁，但又尚未建立起一支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式海军。

尽管柯尔培尔采取了海军军籍登记制度，但舰队的海员问题仍同英国一样难以解决。在沿海各省的居民中征召各级航海人员的体制被证明同当时抓兵队的情形同样困难重重；在海上服役也并不受人欢迎。虽然为了把大约9万人有义务服役的体制变得更具有人情味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人员仍然奇缺，以致需要建立一支特殊的“海军陆战队”。这就是舒瓦瑟尔的“皇家步兵和炮兵部队”，卡斯特里于1786年将其改编为一支拥有6000名海军炮兵的部队。由于这些海员只在战时才在舰上服役，这支部队从来不受海军指挥官的欢迎。舒瓦瑟尔还设立了海军军医学校和海军造船技师部队（被称为海军工程部队），这些成就较为传之久远；设在巴黎的上述学校和部队总部一直存在到现在。

法国海军尽管人员不足，可是在战争艺术训练和造船水平两个方面却领先于英国。如前所述，莫罗格献给舒瓦瑟尔的专著乃是战术论著的典范。舒瓦瑟尔改组皇家海军学院以示表扬，因为这所学术机构是莫罗格于1752年创办的。肯彭费尔特并不是对法国战术训练表示赞赏的唯一英国军官，但在实战中他们的防御措施往往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法国路易十六登基大大增强了法国海军的声誉，因为他是唯一对海上事业感兴趣的法国君主。激发他有这种兴趣的是他的家庭教师、造船工程师和艺术家奥扎纳。在国王亲临造船厂访问的激励下，国家不惜重金大力实施造船计划。法国船只被捕获后有时立刻被改装成英国旗舰的事实，和英国船只在吃水深度处往往有标记注明是由哪一艘法国船只提供的型号，这些都最有力地证明法国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是英国人对甲板上的脏乱现象却评价甚低，到18世纪末，法国在造船技术方面是否仍占有优势已令人怀疑。^[22]他们的船只的船体较大，可以发射大量排炮，但由于他们习惯于在侧翼开火以打断敌舰的桅杆，所以在近距离交战中从未发挥过威力。当然这种作战方式得以保存自己以便再战，但叙弗朗抱怨说，英国军舰的铜皮包底技术（法国直到1785年才采取这种技术）改进了英国船只的航海质量，使法国这种战术减小了威力。1786年以后，两国的战列舰都限制在100门炮以上、80门炮和74门炮三个等级，不过仍在使用的还有少数老式的第四级战列舰。至少还有两艘法国三层战列舰配备了多至118门炮。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海军每年耗资约1.6亿里弗尔。战后的五年中每年的费用仍为4500万里弗尔，可以说海军经费是使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23]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位海军大臣拉吕泽纳曾试图削减经费，但随着他的辞职和1788年叙弗朗的去世，旧制度下的海军可以说已走到尽头了。尽管已经下水的船只仍然可以使用，当时最优秀的造船工程师桑纳也还继续在为共和国主人服务，但由于大革命初期的过火行为，海军军官队伍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为了弥补军官队伍的枯竭，1791年4月公布的法律取消了商船服役和军舰服役的差别。海军军官学校二年级学生（称为aspirants）作为新军官在海上服役四年之后便可授予军官军衔。但是，由于雅各宾派的持续整肃运动，不久便不得不从几乎任何一级的军阶中提升军官。旧海军中得以保留下来的少数几名著名军官之一的布干维尔抱怨“海军赖以生存的军队纪律已荡然无存”，^[24]然后带着厌恶的情绪提出辞职。由于对“大军官团”不信任而且对他们是否忠于中央政府心存怀疑，行政管理军官乃得以取得完全胜利。布雷斯特和土伦暴动和兵变之后，海军院校被关闭，作战军官由他们的船员选举并在军事法庭上设陪审团。^[2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旧海军进行最激烈批评的雅各宾派让邦·圣安德烈

竟成为1793年战争爆发后国民公会被迫建立的新革命海军的主要负责人。

1775年10月，大陆会议的海军委员会下令用武器装备四艘军舰，组成美洲“大陆”海军。可以说美国海军从此便诞生了。由每个殖民地派出一名成员新组成的海事委员会宣布建立海军陆战队两个营之后，军舰总数增加到13艘快速帆船。《独立宣言》发表时，舰队增加到27艘各种类型的舰只，不过其中只有6艘正式建成的军舰，而且没有一艘是装有75门炮的战列舰。而当时英国单是在美国海域就有71艘战列舰。伊塞克·霍普金斯是美国第一任海军舰队司令，在他的麾下拥有5名海军上校和5名海军上尉，其中保罗·琼斯是装有24门炮的旗舰“阿尔弗雷德号”的第一位海军上尉。除了这支大陆海军（某些人士对建立这支海军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以外，许多州还拥有自己的海军，特别是弗吉尼亚州的海军拥有50艘小型舰艇用于海岸防御。

至于军服、海军惯例和有关处理战利品的法律等事项，委员会遵循的是英国海军部制定的规章。在各主要港口建立的海军管理处的供应职能与委员会执掌的行政权力之间形成的一种明显的差别，与在英国普遍存在的差别相似。一直到1779年，海事委员会才被一个较小的海军委员会所取代，这可以说是现代海军部的真正前身。战争结束后，所有的军舰均被出售，只有一艘装有75门炮的战列舰“美利坚号”赠送给法国国王，以报答“他对美国的慷慨支援”。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由海事代理处（在海军委员会撤销后接替其位置）退休，在此后几年中美国海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大陆”海军的任务主要局限于同陆军的合作，不过在海上也有过10次俘获，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保罗·琼斯于1779年在弗兰伯勒角海域指挥“博诺姆·理查德号”（一艘前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俘获了英国护航舰“塞拉皮斯号”。琼斯曾是一名远航欧洲的军官，但当富兰克林以美国驻巴黎公使的身份了解到琼斯可以向他提供船只时，琼斯的重要性主要是进行商业性袭击，他的船员则是些成分复杂、在私掠船上常见的一伙人。新英格兰的居民传统上盛行私掠巡航，因此海军人员从未超过3000名海员和170名军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私掠船的船长或船员出身。这样，在1776—1782年间，一方面私掠船的数量由186艘增至327艘，另一方面海军船只的数量却由25艘减少至7

艘。在战争期间，编入现役的美国私掠船^[26]总数为1151艘，而英国商船一共损失了3386艘。^[27]

在当时，私掠巡航是海战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这是摧毁贸易的主要途径。在欧洲海域，其重要性虽已每况愈下，但对之仍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护航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且由于私掠巡航使海军失去成千上万的一流海员而遭到官方的反对。但是，在走私猖獗的年代，这样的优秀海员很容易转而去充当私掠船的船长或船员。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它们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仅在一年之内就有120艘利物浦私掠船雇用了8754名船员。在战争期间，英国一共签发了大约2150张海上捕拿敌方商船的特许证。在美国海岸，私掠巡航空前盛行，而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又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可以拦截顺墨西哥湾流回到西风带纬度地区从事西印度群岛贸易的船只。然而，新斯科舍的位置也同样有利于捕获美国沿海的商船，结果有319艘被捕获的船只在哈利法克斯的殖民地海事法庭上被宣布没收。许多船只是被军舰捕获的，但是新斯科舍殖民地当时没有加入美国起义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有机会通过私掠巡航而获得财富。^[28]

除海军巡洋舰外，另有两种极易混淆的船只承担摧毁贸易的任务。私掠船本来是私人战舰，不携带货物，但凭海上捕拿敌方商船的许可证装备其武器并编入现役。然而，“海上捕拿许可证”一词是用来表示某一在进行贸易的商船及其所携带的有关文件（文件附有官方有关捕获船货的规定：禁止私自赎取和买卖，并指示将捕获的船货带到最近的一处殖民地海事法庭宣告没收）。如果想避免受到海盗行为的指控，如果船主的船员想受到保护而免于强征入伍，那么购买一张这种许可证就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事。如果私掠船只所得的财富不如从前那么多了，那么美国和法国巡洋舰给英国商人带来的损失无疑会使这场战争在英国不得人心。

俄国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海军强国。彼得大帝使俄国成为波罗的海强国；这时，他大体上已在英国和荷兰的帮助下建立起第一支俄国海军，在他去世之后，这支海军便遭忽视，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俄土和俄瑞（典）战争中才得以重新恢复。海军的大部分军官仍然带有外国血统，但这时俄国人往往是在外国技师的监督下为他们自己建造了更多的舰只。在派遣来的英国军官中，查尔斯·诺尔斯爵士、约翰·埃尔芬斯通和塞缪尔·格雷格最负盛名。美洲战争结束时，许多

领半薪的英国军官进入俄国海军服役。可是，当有人建议聘用保罗·琼斯为波罗的海海军司令时，他们便以辞职相威胁，表示不愿在一个被他们视为叛徒的人手下服役。因此，琼斯只在黑海受聘很短的一段时间。塞缪尔·本瑟姆最初在俄国陆军任上校，后来又担任皇家海军总监，在装备一支舰队与克里米亚的土耳其人作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87年又在拉多加湖附近建立了一座制炮厂，英国工程师在该厂引进了大口径短炮和其他新式大炮。[\[29\]](#)

1769年，俄国舰队在海军上将奥尔洛夫统率下首次在地中海露面，但是在切斯玛打败土耳其人的却是由格雷格指挥的火攻船。到1787年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爆发时，俄国人已开始在克里米亚拥有基地，于是有可能建立起先由沃伊诺维奇后由乌沙科夫指挥的黑海舰队。在四年之内，这支舰队的船只由7艘战列舰增加到21艘。更具规模并拥有54艘战列舰的波罗的海舰队（虽然仅有1/4的战舰编入现役）当时正用以与瑞典作战。这支舰队的司令格雷格在唯一一次获得出色胜利的霍格兰海战中阵亡，1790年维堡之战的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其新舰队司令奇恰戈夫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敌军的无能。迄至战争结束时，俄国已成为称霸波罗的海的强国，因此一旦建立武装中立同盟就成为为西方提供紧要海军补给品的主要威胁。[\[30\]](#)

在革命战争前夕，精确地对比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海军实力是不可能的，因为登记在册的舰只的数量往往同其在海上的战斗能力没有什么关联。较弱的海军强国很少能同时投入所有的舰艇，其军官也没有足够的海上经验以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西班牙海军舰艇虽多（其中包括装有114门炮的四层甲板的“桑蒂西马·特立尼达号”，这是法国装有118门炮的“马赛贸易号”被毁之后最大的军舰），但由于人员配置不足和供应恶劣，便毫无实际价值可言。当雅各宾派声称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海军时，他们没有指出法国海军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已不在职。然而，除护卫舰和小型舰艇之外，以主力舰的数字相对比仍然是合理的。1792年英国拥有115艘战列舰，法国76艘，西班牙76艘。荷兰登记在册的有49艘，但由于其海岸水域较浅，其船只具有独特的构造。庞大的东印度舰队在荷兰的海上活动中占主要地位。1781年多格滩之战时，荷兰军舰作战英勇，1797年在坎珀当之战中再显神威。但在这两次海战之间的时期，荷兰舰队算不上是一支劲旅；当法国入侵荷兰时，荷兰舰队便轻易地在冰上为法国的一支骑兵部队

所俘获。在1780—1790年之间，由于武装中立以及西班牙（或努特卡湾争端）和俄国的危机所引起的恐慌，波罗的海海军的规模迅速扩大——丹麦舰队由14艘增加到40艘，瑞典舰队由15艘增加到27艘，俄国舰队由22艘增加到50多艘。^[31]尽管如此，皮特出于对当时局势之考虑，于1792年2月17日建议削减海军预算，理由是“就欧洲形势而论，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比现在更有理由期待15年和平岁月的到来”。^[32]

二 陆军

随着法国旧王朝末日的到来，其军事力量同其他方面一样，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陆军及战争的规模虽已大幅度扩大，^[33]但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和对投入的增加了的资源利用情况却极其糟糕。以死板的横列队形来发挥低劣武器和部队的最大效益的做法，结果反而更难以在前线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有效的打击。带有笨重供应的后勤部队的大兵团陆军只能缓慢行进，不能随时向处于劣势的敌人投入战斗。结果不是弱方得以逃避战斗就是失去决战机会。战斗于是就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拖延下去，直到战斗双方都由于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带来的巨额军费而不得不休战为止。只有天赐良机偶然一击或军事天才才会摆脱这种困境。

从1763年到1792年，在欧洲主要强国之间几乎不存在陆上战争。这个喘息的机会被用来谋划在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如何使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正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结果。新兴的军事思想是对已形成的体制普遍进行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同一思潮的激发下，新兴的军事思想只有在整个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在提高部队及其指挥官的素质这一重大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是这种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改变陆军的组织成分，而这除非在政治上发生剧变，否则是办不到的。甚至在战术、战略和改进武器等问题上，这个规律也仍然适用。既得利益集团会从中作梗，各专业部门的本位主义也起着相当重要的阻挠作用。不同兵种的专家在他们所喜爱的行业中往往是些真正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却不能以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战争，也不能使自己的专业活动贡献于一个总的计划，而是以专业本身为目的。这种专业局限性乃是旧制度积重难返的弊端的一部分。只有那些习惯以新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根据某些普遍原则检验一切体制是否还适用的人们才能超越这一局限。只有与既得利益集团势不两立的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战胜这种局限。

军事改革家有他们的特殊困难，他们在文职部门工作的同事虽然对他们一般表示同情，但仍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部分计划。最初，军人同文职人员一样，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他们普

遍认为，只有本人是个有经验的军人并亲自统率过部队的统治者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寄希望于革命者和国会议员；但是，只有在必要的压力下，这些人才能满足军人们的需要。因此，只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开始认真采纳新的方法。在这之前，军队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如同本书上一卷所描述的一样。但是，由于所做的预备工作如此广泛，使得变革一旦来临就会表现得猛烈而迅速。这便是在本章进行论述之前应作的必要说明。[\[34\]](#)

首要问题是找到一种使胜利者彻底击溃而不仅仅是击败其对手的作战方法。战术的革命通常需要新武器的发明。18世纪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但缺乏完全彻底的创新。结果是新的战术仅仅是对旧战术的改进，而不是全盘否定。工业革命来得太晚，甚至对拿破仑的几次战争都没有真正充分地发挥作用。[\[35\]](#)零星的新发明虽名扬四方，但还需要许多互为补充的发明，这些发明才能发挥其充分的作用。小型武器的变化甚微，虽然由于一些次要的发明，以及有一种趋势（尤其在法国）允许个人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瞄准并开火而不必遵从指挥官的指令，使这些小型武器得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一支仅有两横列纵深的战斗部队这时已拥有足够完成战斗任务的火力，但是任何国家的指挥当局都不敢背离三横列的传统模式。人们已承认有来复线的武器具有高度准确性并采取措施予以推广使用。欧洲步枪既笨重又不准确，但是到了1750年，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者研制出一种轻便的长杆步枪。优秀射手用这种武器可以击中距离300码的人（用旧式步枪即滑膛枪他只有40%的机会击中距离100码的人）。1775年许多美洲人希望靠这一技术成就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预先受到不要信赖技术的警告。这种步枪系前装枪，其命中率的提高是由于采用紧压的子弹和有槽纹的枪筒，但这也使装弹很难：滑膛枪射击三次，它们只能射击一次。这种步枪不够坚固，无法佩带刺刀，而且在战斗中当第一轮破坏性齐射之后，在重新装弹之前有可能受到白刃战的袭击。英国军官弗格森发明了一种适合上刺刀的步枪，并且通过转动手柄便可以开关的装弹口从后膛装弹。这种步枪射击得至少跟滑膛枪一样快，也许其主要的优势在于一个人可以在隐蔽处侧卧装弹。但是，还存在新的困难。当时战场上常见的浓烟往往使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进行准确的射击，而且在最初进行远距离射击会造成弹药短缺。要使步枪确立其在战争中的地位，就必须无烟并有便于携带的弹药。在地面起伏不

平的国家中用其狙击是理想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用处不大，即使美国人不久也大规模限制其使用。一位美国权威人士于1811年写道：

“在滑膛枪停止使用的地方，步枪才得以兴起。”[\[36\]](#)

对比之下，在炮兵领域里几乎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此以前，炮兵在战斗中的活动深受其重量和动作迟缓的限制。如今，在几项重要发明的帮助下，经过大量的努力，使炮兵获得了机动性。在斯特拉斯堡一家法国兵工厂工作的瑞士人让·德·马里茨（1680—1743年）研制出一种制造加农炮的方法，首先铸造一个所需形状和大小的坚固金属圆柱，然后用钢钻把它钻空。在过去，加农炮的炮孔一直是用中间带有心型的铸模制造而成。通过钻孔制造出来的武器更加坚固而又准确，这样便使游隙，即炮弹和炮筒内径之间的空隙减少了。这就意味着可以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炸药的爆炸力。马里茨的儿子把他的发明带到荷兰，然后从荷兰传入英国。在英国，本杰明·罗宾斯（1707—1751年）已发现测量抛射体速度的方法，这就为某些特殊武器的威力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据发现，炮弹的速度同装药的多少并不一定成正比，而当时每次发射所用的火药都过多。结果证实，同一炮弹，可以用装药较少，也就是重量较轻的火炮推动其达到同样的射程。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文职人员从事的工作。在德国，首先对较轻的火炮真正感兴趣的是军人。1744年，列支敦士登亲王受命领导奥地利炮兵部队，当时奥地利炮兵要比普鲁士的差得多。他从整个欧洲罗致专家，这些人的工作使奥地利的火炮有了重大改进，尤其是1753年以后。他的手下有一位格里博弗尔，此人在奥地利部队做出卓越贡献之后，被舒瓦瑟尔任命为他祖国法国的炮兵总监。从1765年起，法国采用了新的理论。制造出来的火炮通过缩短炮筒大大减轻了重量，但并未降低其威力。这种火炮更容易而又准确地进行瞄准。那时制造出来的四轮马车可以更平稳地行驶，而不再是仿制笨拙的农用马车，也不再用小公牛牵引。轻盈的炮身可以用人力在战场上搬动。如今，炮兵可以同步兵并驾齐驱了。一部分炮兵骑上马，甚至可以跟随骑兵和散兵一起行动了。马拉炮兵似乎是弗里德里希大帝于1762年首先使用的。法国于1791年开始采用，这特别适合革命部队的那种热情。

由于火炮此时的用途更加广泛，其数量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大幅度地增加。当时冶金业在英国初步兴起，也促进了火炮制造的发

展。过去陆用火炮用青铜制造，这是一种相当稀少昂贵的金属。铁则不够坚固，由铁制造的火炮又厚又重，只能在海上使用。焦炭炼铁不仅可以增加铁的产量，而且可以使铁更加坚固。这样就可用来生产陆用火炮，从而为陆用火炮的发展排除了障碍。

这样，尽管步兵的火力增强得很有限，但这时却拥有比过去火力更强的重武器，可以使步兵在突击前向敌方阵地发动炮击。迪泰尔在他的小册子《新式炮的用途》（1778年）中设想部队和火炮协同作战，相互保护。在进攻中，火炮靠其机动性带来的安全保障，可以在开火之前杀伤1000码以内的敌军。火炮还设法配置在敌军战线的延长线上以轰击其侧翼。这样做总是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炮弹沿着敌人横队扫过要比穿过横队更能给敌军造成大的伤亡。但旧式炮兵到达战线延长线的位置要费很长时间，致使失去耐心的指挥官大声疾呼：

“总是拖延时间。”新式火炮密集而致命的火力使敌人难以抵抗。把迪泰尔的哥哥说成是当代最伟大的炮兵拿破仑的首席军事教官是很恰当的。

可是，炮兵的力量仍然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结构得到了改进（而且路面更加平坦），但火炮仍然是运输的沉重负担。必须权衡火力和机动性两者之间的得失以作出结论。倘若不能正确权衡二者的得失，优异的技术成就也会成为军事上的弱点。格里博弗尔的工作几乎前功尽弃，因为他那些比较保守的同事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些人一度败坏了他的名誉。例如，他们极力强调旧式长炮比新式短炮的射程长而且射线直。这种观点大部分不正确，但也并不是始终不正确。在某些情况下，牺牲远距离炮击以减轻一些重量，因为实践证明这在战场上毫无用处。格里博弗尔采取的是广义的军事观点，而反对他的人则是抱着狭隘的技术观点。就是那些创新的人也不能摆脱专业的局限性。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提高了炮兵的机动性而感到自豪，并且过于洋洋自得而允许增加火炮和随行弹药车的数量。尤其是许多小型炮在运输中可能引出不值当的麻烦。所有这一切有再一次降低军队调动速度的危险。也许因为格里博弗尔的体系最接近于完美的平衡，因此法国在1825年以前一直采用这个体系。只是在建成铁路之后，当时炮兵最初显露出来的全部潜力才得以充分发挥。[\[37\]](#)

改进武器的尝试，其后果如何，人们半信半疑，这就使人们难以决定如何去改进战术。火力不断增加说明应以非正规的编队取代完全

排列整齐的队列。这样，既可以得到更大的机动性，又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地形。18世纪80年代各国都有以这种方式作战的“轻步兵”。英国在美洲认识到这种部队的重要性，而美国独立战争使这一点成为大多数有才智的军官所首先关注的问题。地势荒芜使俄国人也成为非正规战争的先驱。彼得大帝的非正规作战方式令萨克森伯爵很感兴趣，他在丰特努瓦战役中的军事部署就是受曾在波尔塔瓦击溃瑞典防线的建立一连串筑垒据点的作战方法的启发。然而，首次在西欧大规模使用轻步兵的乃是奥地利人，他们把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招募的用来对付土耳其人的当地非正规部队引进德意志。法国由于采用下面叙述的纵队阵形，自然就需要轻步兵，于是大力发展轻步兵的训练和战术，因此他们或许无须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中再学习什么。^[38]不过，对普鲁士人来说，那场战争的经验却极为重要。在18世纪中叶，他们在每场战争爆发时都采用快速征兵的方式对抗奥地利的轻步兵，应征者大多是外国人。18世纪80年代，他们建立了常备轻步兵部队，并吸收了许多从美国服役回来的德国军官，包括年轻的格奈泽瑙和像奥克斯和埃瓦尔德这样的专家。普鲁士轻步兵在瓦尔米战役中表现的才能不亚于在1813—1815年历次战役中的表现。^[39]

但是，虽然非正规队形从此在战斗中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不过在武器进一步改进之前，基本上仍是次要的事。在战场上打破僵持局面最需要的是一种简而易行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方法。为此，仍然需要老一派人所主张的密集队形。美国革命军的好枪法，起初由于操练不足，队列松散，以致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布兰迪万河和日耳曼敦两次战役的失败，部分是由于他们成纵队前进，因此没有像英国陆军那样能在阵地上发挥其全部力量。此后，他们欣然向施托伊本男爵学习旧世界的阅兵场队形。^[40]完全依赖轻步兵的陆军是会遭到失败的，因此英国的戴维·邓达斯和法国的吉贝尔两人都反对这种把军事见解引向这条道路的时尚。前者认为，正是由于缺少优秀的骑兵，才使得轻步兵在美国变得如此重要。后者则以为，整个这场狂热只不过是为了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战斗的中心部位使主力部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启示来自那些设法按完全相反的方向谋求改进的人们，他们不是把重点放在火力武器的潜能上，而是放在其局限性上。在福拉尔（1669—1752年）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与其

说是“火力”，还不如说是“冲击”。他对引进火力兵器几乎感到遗憾，而迷恋于冷兵器。他建议陆军的大部队沿着前线间隔一定距离呈纵队排列，这样就能以他们的密集队形突破并从侧面攻击排成横列和依靠火力的敌人。他认为，横队排枪射击若命中率不高，则其效果只不过同少数士兵准确射击一样；这样，各纵队之间留下的空间事实上便可以由轻步兵的独立小分队来据守。这些观点在法国陆军中有大批的支持者，因为法国陆军经常使用纵列进攻并认为这特别适合法国的民族气质。法国士兵总是没经过很好的训练，而且不擅长在炮火下沉着地呈横队站立，但在密集冲锋的激情刺激下却能发挥他们的非凡才能。在18世纪50年代，纵队进攻被列入法国的正式训练教程。

这些早期纵队阵列很糟糕。其创造者极其蔑视火力武器，他们的“冲击”概念也毫不成熟。他们设想，一大群人就会具有一个坚固物体的特性，有如一只大槌。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密集队形往往造成混乱或行动迟缓。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冲击”的效果都会化为乌有。纵列战斗妨碍大部分战士使用自己的枪支，并不能带来某种优势。随着火力的增强，无人再相信这种观点。大部分法国人在七年战争中与普鲁士人对阵之后，对纵队作战失去信心。

然而，纵队阵形是当时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这是机动性同密集队形相结合的唯一方式。横队阵形只会行动缓慢，事实上也无法改变方向。一列纵队如不过于密集，便可向任何方向迅速前进，而且不受天然障碍物的阻挠。这乃是对前线的既定目标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有效打击的显而易见的方法。法国人和普鲁士人同样对纵队在战场上的运动能力而不是其战斗能力进行了可行性调查。1763年以后，法国人采用了一种新式纵队，其规模较小，不太密集，更适于快速运动。当时最重要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种纵队和横队之间真正迅速转换的办法，可以把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同最大的火力结合起来。吉贝尔父子采用一种由普鲁士人发明却很少使用的机动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41]小吉贝尔的《战术总论》（1772年）试图综合不同流派的新颖军事思想，并设法提出某一种赢得决战胜利的公式。

吉贝尔的作战方法，其目的在于使部队能在敌人面前自由调动，而不是固定在预设的阵地上。他的办法是，首先使一切队形变换应用自如，简便易学——在这方面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产儿。必须练习四种基本运动方式。其他任何运动方法都是较简单运动方式的组

合，大部队的队形变换实际上是小分队队形变换的大规模再现。其次，他尽量大胆采用一种不规则队形。横队不再是笔直的。其中的小分队在急速行进时也可以颠倒正常的次序而加以部署。结果，一支以并行纵队前进的部队在跑步前进时可以变换成同前进的横队相平行或呈任何角度（在两侧或在一侧）的横队。此外，部署在横队阵形某一部分或正向这一部分行进的部队也可以同样迅速地移动到另一部分。将领可充分利用地形来部署他的部队，而且不必一成不变地直到部队实际上已在敌人火力之下时才进行部署。通过在最后一刻增援横队阵形的某些部分，和改变不同纵队阵形的队形，以使部队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强或更弱，他便可以加强突然袭击的效果。一支在战斗开始前才不得不开始布横队阵形而且只能缓慢地变更其位置的旧式军队，一定会被打垮。如果交战双方都采用这种新方法，那么两位将领中比较老练的一方便仍有希望取得决定性胜利。

吉贝尔认为，决定胜负的进攻乃是集中压倒优势的火力打击敌人横队阵形的一部分，继之以发起冲锋而一举消灭之。他主张由仍然呈横队阵形的步兵发起冲锋，但将领可自由地采取另外两种方式。弗里德里希大帝主要依赖骑兵冲锋，以之作为驱散已被他的火力击溃的敌军之方式。他训练他的马匹高速冲锋，因此普鲁士骑兵也许比步兵更优于其他国家。吉贝尔要求的就是这种模式的骑兵，并认为骑兵冲锋乃是打击一支业已彻底瓦解的敌军的有效武器。

吉贝尔建议在下述情况下采用纵队阵形的步兵冲锋：在阵地狭窄的战线上发起进攻；进攻部队可以在隐蔽的情况下接近敌人；以及向敌方的突出部发起进攻。在最后一种情况下，由狙击手袭击突出部的正前方，纵队则向火力稍弱的侧翼进攻。由于两点原因，纵队进击在新的作战方法中发挥的作用比吉贝尔所预见的要大。首先，在大革命期间，法国陆军扩编招收大量毫无经验的平民士兵，纵队进击可鼓舞士气的特点这时便使之特别有用。其次，当时的趋势是以更加不规则的队列进行战斗，随着轻步兵的增加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而吉贝尔的作战方法本身就具有这一趋势。这就是说，防御工事可以充分利用自然障碍物而形成曲线状，即形成一系列的突出部分；这样，进攻者便须以隐蔽的方式接近敌人。根据吉贝尔本人的原则得出的结论就是，进攻必须采取纵队阵式。就此而言，福拉尔及其学派的中心思想获得了胜利，即提供“火力”的轻步兵和进行“冲击”的纵队各有各的特

殊作用，以取代想使两种作用兼而有之的归于徒劳的横队阵形。另一方面，正是吉贝尔及其同一代人提供了运用这一原则的实际可行的方法。他们的功劳还在于摆脱了偏执狂而坚持自由选择为不同环境设计的若干不同编队形式。

即使在法国，由于旧学派犹作最后挣扎，新的作战方法的胜利依然是姗姗来迟。普鲁士人早已制定了新的方法，可使横队阵形较迅速地推进。一位名为比尔赫的幸运士兵把这些新方法带到法国，使人们对纵队阵形失去了一定的兴趣，在1776年“普鲁士化的”操典中就很少提到纵队了。一位纵队阵形的老坚决支持者迪梅斯尼尔·迪朗为其观点提出一种新的内容，包括当需要火力时如何把纵队变成横队的方法。1778年在诺曼底的沃瑟进行了检验两种作战方法的对抗演习。迪梅斯尼尔的纵队变横队的方法被证明毫不灵活，而这样的纵队由于具有优越的机动性，似乎使纵队阵形重新确立了信誉。结果人们要求兼容并纳，普遍支持吉贝尔的折中办法。1791年操典主要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草拟的，不过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工作则是由一些完全支持纵队阵形的人所完成的（主要在1788年）。这部操典乃是法国在几次重大战争中所采用的战术及训练方法的基础，一直到1830年才被废除。

[\[42\]](#)

促使进行决战的方法就是这样被探索出来的。倘若没有能使陆军采取攻势以迫使敌人进行战斗的新战略的发展，这一切也是无用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加强防御中找到的，而防御原本被认为是造成对峙局面的因素之一。这时，步兵和炮兵的火力已足以使任何部队的小分遣队在面对数目占优势的敌人时抵御一段时间。因此就有可能把一支军队分成若干部分，若其中的一部分受到敌方攻击，也可以与之作战，直至其余部分赶到交战地点与之会合以战胜敌人。前进中的分遣队形成一个网，可以展开来包围较弱的对手，使之无法不战而逃。可是，除非发起进攻的部队能够快速移动，否则这个方法便难以奏效。在这方面，西欧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道路和内陆航道的极大改善，不仅使人员和装备物资得以顺利转移，而且使命令和情报可以加快传递。甚至在1700年以后作战部队也往往根本不用道路，这部分是由于这些道路质量太低劣，部分是由于旧操练体制要求士兵保持过宽的距离，致使道路容不下行进中的纵队。此外，部队还由于供应的困难而降低行进的速度。然而，财

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在每一个地区都储有更多的食物和粮秣，还有更多的马车运送粮草。因此，一支部队更有可能依靠农村征用粮草而不必自带一切物资。在1778—1779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发生的那场短暂战争中，敌对双方都是广泛依靠战区农民种的土豆供给部队。此后这次冲突就以“土豆战争”著称。[\[43\]](#)把一支部队分成若干支队也可以比全队挤在一条道路上更易于转移，供应也方便。

但是，改革者并不认为这种把部队分成若干支队的做法是解决战略问题的办法。在吉贝尔看来，这似乎首先带有旧学派特征的缺点。集中兵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主张较少地而不是较多地将部队分开。只是到后来，他才得出结论说，可以用一个支队与敌人的主力交战，而依靠巧妙地部署其他支队和指挥官的机敏，使其他支队朝枪炮声的方向前进。但有这么一种情况，即地形迫使战略家不得不考虑使用支队作战。这就是山地战。在这种战争中，战斗局限于在若干分隔开来的关隘进行。1764年布尔塞出任格勒诺布尔参谋学院院长。此人像吉贝尔的父亲一样，七年战争期间曾在布罗伊麾下任职。他的注意力自然被阿尔卑斯山战争中的各种问题所吸引。为了教学需要，他编写了《山地战原理》一书。他理所当然地主张把一支部队分成三个纵队，从中路到两翼的距离不超过一天的行军路程，以便于迅速集中兵力。在山地作战中，他不得不让部队分成更多的分遣队，以便在穿越山脉的所有道路上同时作战，出奇制胜。一支行进中的部队的各支队应尽可能充分利用同其行军道路相连接的侧翼山路。进军的每一段行程的开始和结束要尽可能近；这样，倘若有一个支队遭到攻击，别的支队可以通过战线前往营救。一支纵队如一时无从避免处于孤立状态，那就必须极端谨慎地移动。各纵队应尽可能通过信号和信使保持联系，主要目标在于可以集中一起进攻敌军并同时进入开阔地出现在战场上。

一支以这种方式前进的部队可以同在战场上采取新队形得到同样的好处——即可以迫使敌人守卫整个战线，而进攻者仍可以集中兵力攻击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布尔塞建议采取一个“多分支”的作战计划，即以一个“分支”作为主攻，而在其他地方发动一系列辅攻。如果主攻失利，则辅攻可以扩大进攻。他认为，在守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够发起第一次进攻的进攻者，占有与在内线作战的部队同样的优势：正如他所指出的，守方必须防守一个圆弧，而攻方则只需守卫一

条弦线。守方最好不要试图防守一条防线，而应撤退到一个可以控制所有山隘的地点。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由于需要保护交通线并包围各堡垒，其兵力必然越来越分散。防御部队如果保持兵力集中，则有望将进攻部队各个击破。如果进攻者竟然胆敢放弃保护其交通线，那就有可能在其自己控制区内遭到反击。布尔塞认为，胜利属于表现得最机动灵活的军队一方。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防御阵地的明智选择虽占有很大篇幅，但已不是主要问题。吉贝尔则走得更远。他说，不是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阵地。如果进攻部队发现防守部队占据一个坚固的阵地，那么，无论行动多么艰巨，他们就应绕过这个阵地。防守部队最终必然会被迫发动战斗；对力量较强的一方来说，即使条件不利，战斗总比没有战斗好。

刚刚开始形成的新战略，对认识防御力量的特性和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战争处于相对静止的时期，欧洲各国都力争通过设置堡垒防线以保护各自的边界。当时有许多人对其效用提出疑问。布尔塞认为堡垒防线很有价值，但他考虑的是山地这一特殊情况。吉贝尔则认为堡垒防线毫无用处，理由是富有冒险精神的部队会毫不犹豫地穿过堡垒防线而直捣中心城市；只是在保护兵工厂时才需要防御工事，他批评工程师们没有有效地把他们的专业知识用于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建造的防御工事规模巨大，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守卫。对此，蒙塔朗贝尔的防御工事提供了某种答案。他的“垂直”防御工事体系是提高炮兵质量和数量的一种副产物。堡垒不再是由土木工事而是由火力，即由大量安装在“暗炮台”中的火炮来保护的。这种炮台是由非常厚实的顶部和墙壁筑成的拱形建筑，火炮通过四面的射击孔向外发射。这样，堡垒就变得更像现代坚固的碉堡，而不像城堡了。到这时为止，这些见解还令人半信半疑，主要是因为火药的烟雾和火焰往往使人无法在暗炮台中藏身。^[44]但有趣的是，与现代防守理论隐约出现的同时，现代的攻击学说也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前面已经指出，供应部队需要采取新的方法。布尔塞感到急需解决的，不仅是运送供应物资的车辆不应妨碍部队行动，而且在部队到达之前的弹药准备工作不致暴露部队的前进方向。他的补救办法是沿部队所有可能行进的路线建立弹药库。1760年他就已经建议在德国战区周围的一些地点建立供应站，以便布罗伊的部队可以从一条补给线转移到另一条补给线而采取迂回行动。但是大量增设兵站牵涉大量的

财力和人力。吉贝尔承认布尔塞所提出的在前进线路上设置弹药库的做法是有价值的，但他更关注的是部队在超越这些兵站供应范围之外进行强行军时应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靠农村提供补给。他尤其不满承包商对战略的影响。承包商的兴趣仅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利润，因而他们迫切希望部队前进的时间和路线能符合他们的最佳条件来采购和发放供应品。倘若一次作战计划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他们便会宣称供给的困难难以克服，这时对供给问题一无所知的将军们只得勉强同意。吉贝尔希望把必需品的供应交由国家来管理。

如果一支部队主要以分散的支队采取军事行动，那就要在不同的军兵种之间有更紧密的配合。许多下属指挥官而不是一两个最高指挥官会发现，他们指挥的部队包含所有的兵种，因而需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每个兵种及其存在的问题。因此，吉贝尔提出骑兵的训练应尽可能与步兵训练相一致，这样无论哪一个兵种的军官就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指挥另一兵种。格里博弗尔规定，步兵战术研究是炮兵军官训练不可缺少的部分。参谋工作的规模和复杂性会大大增加。指挥其支队分散在各处的部队要有大量的书面命令和报告。支队的行动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以保证他们能够朝正确的方向迅速行动，并且必须处于能够迅速集中的位置。这就需要对地形进行广泛的侦察。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在于，在和平时期就应准备好精确的地图并前往可能交战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自18世纪初以来，制图已经引起重视，但直到这时，精确而周密的测量才真正开始。

在这些需要的刺激下，欧洲各国陆军开始采取措施建立现代总参谋部。最初采取的行动通常是，在军需司令部下设立制图处。军需司令部从事部队的供应工作，因而也需关注部队的行动。这就要求制图人员对此以及对阵地的选择提出建议。因此，他们发展成为军事行动方案的制定者。奥地利陆军在制图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约瑟夫二世在位时，他们测量了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绘图5400张。在英国，国家测量任务委任给了唯一拥有必要技术资源的军械署（1784年）。这是英国日后若干年间在参谋工作组织方面落后的一个原因。法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测量工作（于1744年开始）是由文职人员完成的，但在参谋工作计划方面走在最前面的却是法国人。1763年后，他们最大的愿望乃是制定一项侵略英国的可行方案。在布尔塞的指导下，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18世纪唯一一份军事计划。它非常类似于一种只有在铁路发明

以后才是必要和才可能制订的时间表的安排。1766年布尔塞建立的机构在1771—1783年间正式中止活动并于1790年被撤销；但其作用似乎事实上一直延续下来未曾中断。普鲁士的参谋机构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政期间几乎并不存在。只是在他的继任者在位后，才在军需司令部下增设了一个正式机构。1796年这个机构受命从事测量工作。只是到了1800年以后，普鲁士的参谋机构才领先于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由于拿破仑的非凡才能完成了他的参谋人员的大量工作所致。

各国的参谋工作在1793年以前都未取得重大进展。参谋军官的人数很少，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总是不能得到很好的运用。他们主要从事制图工作，这就使他们认为阵地比兵力的配合更为重要，并且往往使他们反对新战略，而这种新战略是非常需要他们的。在战略上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专业的局限性与单纯的保守思想一样起着同样大的阻碍作用。在参谋机构方面，两位重要的杰出先驱者——奥地利的马克和普鲁士的马森巴赫——在以后的重大战争中成为结局最为悲惨的败将绝非偶然。[\[45\]](#)

尽管技术方面的障碍使改革难以进行，可是同整个政治方面的障碍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旧式战争的真正基础及其存在的理由在于认为军官和士兵都是懒惰和愚蠢的，而且低级人员只要有胆量就会开小差。而新的方式则是要求各级军官和士兵都具有聪明才智和发挥主动精神，甚至训练的简化似乎也是由于深信士兵通晓事理，无须死记硬背地学习行动的每个步骤。另外还要求具有强烈的忠于职责的献身精神：一支部队，以支队形式分散各地，当地生产什么就靠什么生活，俭朴而不舒适，除非具有这种精神，否则不可能使他们凝聚在一起。

明智的军人都会认识到，军队的振兴有赖于国家的振兴。吉贝尔把欧洲各国政府在军事上的软弱归因于政府的暴虐。这使它们无法激励军人的忠诚，也不愿意激励军人的热情，因为它们担心具有尚武精神的军人也具有造反精神。他首先要求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甚至要求国会机构亦复如此。这样，爱国主义才会重新焕发出来，人民才会心甘情愿地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军队也才会从此拥有大量有能力和正派的公民。

有若干因素促使军事思想家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同情改革家，甚至同情在公众中广为传播的反独裁主义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家有許多人属于哲学界。吉贝尔是莱斯皮纳斯小姐^[46]的朋友，他的《论文集》的发表使他成为沙龙中的重要人物。在德国，有才智的军人为文学杂志撰稿，甚至在大学执教。战争和进步思想在一些技术兵种军官身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工程师卡诺，他是阿拉斯学会成员并赢得第戎学会奖。他们当然对那个时代的科学研究感兴趣，而当时科学家也都关心社会问题。而且由于他们手下没有几个士兵或者根本不帶士兵，所以在专业问题上很容易陷入乌托邦的思想。^[47]由于赞美古希腊和罗马的时代特征，人们普遍相信依靠武装公民来保护共和国乃是军事上的理想，只要环境许可，就能做到这一点。美国独立战争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拉法耶特声称：“它使公民能承受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辛苦劳作而又毫无报酬，这就是我们士兵的生活状况，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艰苦、最能忍耐的人。”^[48]士兵们认为，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中也充满着军事上无与伦比的希望，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些希望往往并非以与军人们的计划相一致的形式出现，并且由于军事上的种种错误而使之破灭。特别是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不无道理地永远担心军队觊觎政治权力，从而败坏了军事思想的声誉。除非找到可以利用这些军事思想的方法，否则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振兴其军队的。

为了提高军官的素质，大陆各国军方主张长期以来赞同采用主要由狭隘阶级利益所产生的各种方法。中小贵族越来越感到难以靠自己的庄园为生，于是越来越转向陆军以作为维持生计的替代方式。他们在大多数陆军部队中构成现役军官的主体，其中不乏才能出众的人。可是他们的职位并不如意。在一般情况下，地位较高和报酬较丰的职位全为富有的宫廷贵族所垄断。有时富有的资产阶级也竭力设法跻身于这个诱人的圈子。在法国，甚至出现债台高筑的上校把贫穷的贵族从自己的团队赶走，而把官职卖给有钱的平民的情况。大陆国家通常规定把大部分军事职务留给贵族成员。但这项法规普遍未予执行。

中小贵族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在陆军中日益下降的地位。他们以日益尖锐的语调断言，军队的美德是他们本阶级的特点，而资产阶级是绝不可能产生优秀军官的，因为他们毫无荣誉感。克雷诺尔侯爵1764年写到，军官应来自“民族中最纯正的部分”，他解释说他们应该是

这样的人，即“倘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不是出身于高贵的血统，那么由于他害怕失去社会地位，即由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耻辱，就会对这个人起约束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他所缺乏的勇气。可以肯定，只有贵族才是这样”。^[49]他们同时认为，一名优秀的军官需要具备勤奋和俭朴的品质，基于此，他们反对把最好的职位分派给无所事事的廷臣。正是在这点上他们把自己的主张同军事改革联系在一起。在此以前，陆军军官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是在从事一种职业，而只是被赋予特定职责的政府官员，这些职责是其他各种人都可以担负的。而如今，军事改革家们实际上是要求军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这也是出身贫贱的贵族军官力图保持他们的利益和社会阶级地位而发出的战斗口号。

首先表明军事改革对中小贵族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是普鲁士陆军。普鲁士各邦诸侯密切关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特意规定军官应该被视为邦内的一等阶级，位于文职官员之上。中小贵族在军官中占主导地位。七年战争之后，在战争期间由于扩充而被接纳入陆军的资产阶级军官大部分又被赶出军队；更为重要和不同寻常的是，提升并不限于廷臣和王公贵族。在贵族内部机会均等，家贫如洗的贵族也可以跃居高位。陆军为贵族提供的生活资料非常充足，军官与士兵之比大大超过了奥地利陆军，这也是普鲁士陆军成功的一个原因。军官也竭尽全力来报效军队。军纪对他们如同对士兵一样严格，这是另一个独特之处，说明为什么普鲁士陆军的军纪非同一般的严厉。^[50]

普鲁士的现在其他地方成为一套普遍应用的原则。路易十四的私生孙阿尔克骑士（chevalier d'Arc）写了《军事贵族》（1756年）一书，驳斥那种认为贵族应放弃对以职业谋生所抱的偏见的看法。他认为贫穷的贵族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因此他事实上是反对他们不再过贫穷的生活。奢侈对他们会起腐蚀作用，使他们不宜服役。因此对国家来说，商业扩张是件坏事。如果商业扩张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得过高，那么每个人都会被迫从商以发财致富；如果奢侈成风，不是富人就要遭到鄙视，同样的情况也就会发生。

阿尔克要求发动一场由国王本人领导的反奢侈运动，教育人民鄙视奢侈；教育贵族放弃奢侈生活，为公共事业献身而过俭朴的生活，这样才会保持贵族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则这种优越地位就必然会归于豪门巨富。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一个贵族

家庭”应拥有“有保证的收入，这样国家的保卫者就会自行增加”。

[\[51\]](#)因此，陆军应为整个贵族阶层提供生计。不担任军官的贵族应编入特别的军官候补生连队做一般战士。军队将成为贵族作为一个优越阶层的明显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克希望军官永远身着军装出现于宫廷，这同法国的传统做法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立了军功应奖以贵族称号，士兵中有功劳的应授予军衔。这虽然很有道理，但这种做法只不过缩小了军官及其下属之间的隔阂，并将军队与其指挥官的特权联系在一起了。卡诺于1792年谈到“被称为前沿部队的是最低的和可怕的行业”[\[52\]](#)是完全有理由的。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观点显然容易受到强烈的反对，军官应该是“高贵的人”的看法当时是无懈可击的。据1775年的报道，由于军官和士兵的社会地位相等而使新的美国陆军的军纪遭到破坏，“因为士兵不能忍受由那些除了靠好运气获得高官外别无其他优势的人来指挥，何况他们自己同样也有获得官位的希望”。[\[53\]](#)此外，军官必须是受过教育的人。但是，除东欧之外，这些要求并不表明具有贵族血统的人可以垄断军官的职位。事实上，非贵族出身的人通常并没有被排除在炮兵、工程师和轻步兵之外，这种要求也就被放弃了。当需要具有特殊才能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时，贵族便依靠不上了。他们确实没有受到过什么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那些较贫穷的贵族。于是，建立主要为贵族服务的士官学校的尝试便应运而生。这些学校办得都不太成功。在法国，由圣日耳曼创办的军事学校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实现要通过考试才可以授予军衔的条件。普鲁士贵族军事学校的课程设置期望太高，更适于培养外交官而不适于培养军人。格里博弗尔的炮兵学校办得很好，但要把法国贵族训练成为工程师的种种设想看来终成泡影，[\[54\]](#)另一值得怀疑的问题是，军事改革家要求按资历提升——可以肯定，这就无法保证胜任工作的军官得到提升。然而，必须指出，美国新建的陆军军官同欧洲的贵族一样都坚持要按资历提升，因而大陆会议曾为争取保留提升他们所垂青的人的权利进行过艰苦的斗争。甚至在法国革命时期，制宪议会也接受了团以下军官按资历提升的原则，但团以上军官则按资历和是否为王室所宠信二者综合考虑。

据此应得出的结论是，能从大量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成员中选拔军官的国家会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强在政治上产

生的影响，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各国议会由于担心军人篡权，主要关心的是确保军官始终要从掌握政权的公民群体及其同情者当中选拔。这样形成的政策便无法改进把军衔保留给贵族的体制，并难以奖励有功人员和吸引贵族入伍。在英国，买卖军衔的情况仍然存在，而不利有能力却没有钱的人，理由是据说这样可以保证陆军掌握在有产阶级的手里。美国当局倾向于采取更严厉的做法，大陆军军官退休后，一半的工资也不愿发给。军队的压力最后迫使当局同意照发，但是很少有军官得到任何退休金。美国人对当官的人依靠政府的开支为生深恶痛绝，即使是致残的退役军人。他们把军官当作一般公民，战争结束后应重操旧业或解甲归田。这里不鼓励职业军人。

这些原则在辅助部队中执行得更加明确。从1757年起，对英国民兵的军官实行具有财产资格的制度，而且在服役五年后，如有适当资格的人来替代，就必须退役（而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美国民兵的军官由兵士选举，兵士都是武装的普通公民，军官自然也是一样。法国在建立立宪政体后，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在陆军中，新任命的军官如果不是从行伍中提升的，就必须是有选举权的公民或他们的子弟——这就是说，他们必须具有财产的资格。国民自卫军的军官以及从前线服役的志愿人员中提升的志愿军军官都是由士兵选举的。无论是财富还是声望都不是选择军官的重要条件，部队因而也就遭受损失。

法国最后终于采取了相当明智的政策，但这是在经历了特权阶级的垂死挣扎，对陆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之后才采取的。1775—1777年任陆军大臣的圣日耳曼支持中小贵族。他反对陆军中富人的势力，并实施了一项逐步消除买卖军衔现象的计划。每次买卖军衔的价格比原价减少1/4，一直到无利可图为止。同时实行根据同事的推荐从军士中提升军官的政策。这些原则都为制宪议会接受并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1791年实行买卖军衔需付补偿金，这种做法方才全部废止，1790年有1/4下级军官的空缺由从下层士兵中提拔的人来替补。他们有一半人是依靠资历，一半人是由全体军官投票选出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终于开始推行通过考试的办法以取代不授予士兵以军衔的制度。

圣日耳曼的计划还有一些是在他退休以后由他的友人努力完成的。1781年颁布的皇家法令要求新任命的大多数军官提出父系四代都

是贵族的证明。这项法令遭到很大的误解。法令并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重申早先的同类法令而已；它本身为后来颁布的比较严格的法令所修订。它并未使平民不可能成为军官；仍然允许士兵晋升为军官，但一般认为这更不容易做到了。给贵族保留的权利是，无须先经过当兵就可以当上军官，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留这种权利。这再次打击了富人的势力。穷人并不在乎服役时间的长短；中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却在乎这一点。^[55]

如果说1781年以后陆军军官的处境很快变得无法忍受的话，这倒不是由于服役的限制而是由于晋升的限制。改革者为了争取他们的方案得到支持，必须与宫廷贵族达成妥协。高级军官不再是朝臣的独占领地；作为补偿，有必要规定平民和半贵族只能担任最下级军官。^[56]此外，贵族现在设法染指技术兵种，如前所述，这在过去并不是他们的领地。陆军中不满情绪于是沸腾起来。中小贵族强烈要求在他们的等级范围之内得到平等待遇。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则带着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处境日益恶化。在革命前夕，大部分军官都不愿保卫旧政权，这也是旧政权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1789年后，惩罚降临到贵族出身的军官，不论贫富都一样，其实主要系富有贵族的罪过所致。制宪议会废除了陆军军官的全部特权，并要求他们宣誓效忠，直至最后干脆把他们撤职。起初，大部分军官还留在陆军，后来投奔瓦伦，^[57]不久又大批出走。1789年在役的6633名贵族军官（占军官总数的2/3），到1794年年底已有5500名移居国外。^[58]但是，当时在孔代的领导下，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组成了一支阿尔克所设想的那样的小部队，^[59]这支部队生活艰苦而忠于自己的事业。贵族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就补充陆军士兵这个问题而言，有头脑的军人越来越注意实行普遍军事训练。这就会为陆军提供更优秀的新兵：体格健壮、忠诚老实而又充满爱国热情的农民。这还会减轻陆军的财政负担，由于陆军费用猛增，致使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破产和政府倒台的威胁。每人在陆军培训一段时间即可以建立一大批经过训练的后备人力，一旦紧急需要便可应召入伍，但平时国家却几乎不用花一文钱。

大多数国家存在的“只限于在罪犯和贫民中征兵”^[60]的制度，不能提供符合质量的士兵，而且这样提供的士兵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这种制度非常不得人心。其管理工作往往是专横而不公正的。像卢梭等具有民主同情心的人士谴责这种制度对穷人是个不可忍受的负担。经济学家和他们在政界的追随者则反对它使生产工人的数量下降了。令人遗憾的是，要实行普遍征兵就会更加不得人心。征兵扩大到中产阶级和技术工匠使经济界的反对更为剧烈。有人还认为，普遍服兵役会使某些地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些地区人力短缺而有些地区则长期存在未充分就业的现象；后者当然是征集兵源的地区。^[61]在英国和法国，广大人民对强迫征兵深恶痛绝，频频发生暴乱，对当时毫无知识又安土重迁的农民来说，要他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那里乃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整个世界。对军医来说，思乡病是一种公认的疾病，当兵士实际上看来由于思乡病而死亡，或至少是由于思乡导致其他疾病而死亡的时候，根本算不上是思乡病流行了。因此有正当理由认为，兵士应该从流浪汉中征募。^[62]

因此，1763年以后的趋势是停止而不是加强普遍征兵。法国民兵不再被用来作为迫使人们参加陆军的工具，勉强维持了多年后，终于在1790年解散。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停止强制征募士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期间各团队领导征募士兵时条件自然极其苛刻。于是，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监督体制以防止滥用职权和征召的士兵人数日渐减少。1792年的法律（到1813年依然有效）重申普遍服役的原则，但保留大量免征的安排。^[63]

大多数政府不但根本无意建立“公民军”，甚至不愿从自己的部队中清除外国雇佣兵。像瑞士和黑森这样土地贫瘠而人力过剩的国家向经济繁荣而人力短缺的国家提供防卫者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圣日耳曼在法国担任陆军大臣前曾任丹麦陆军大臣，在该国着手推行过“本国化”的政策。他设法用从本国征募来的士兵以替代许多由德国人组成的部队。1773年，规定丹麦语替代德语为陆军指挥语言。但排除外籍士兵的工作一直到1804年才告完成。法国制宪议会批准建立一支2.6万人的外籍部队。到瓦伦事件^[64]以后，除了瑞士籍军人以外，所有外国人均不准再有他们的准自治组织。瑞士卫队在1792年为保卫路易十六反对其臣民而战斗，后来不得不把剩下来的瑞士士兵都遣送回国。普鲁士的目标仍然是在陆军中保留1/3的外籍军人，一直到1801年吕内维尔条约签订才不得不停止征募。不过，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普

鲁士，外籍团队好像都欺骗性地征募过大批本国入，以避免支付把真正的外籍军人从遥远的原籍运回国内的巨额花费。

征兵花费不多，而且征召的军队——“武装的人民”——有望比职业军人更忠于宪法，如果宪政国家的政治家们不是受到这些因素吸引，征兵制很可能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他们力图通过推行义务制以建立一支比正规陆军更合平民心意的部队。这些部队也逐渐满足了军事上的需要。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保卫当地的民兵。对所有男性公民来说，在民兵中服役是强迫性的，但每年仅训练几天，而且他们也很少或不愿远离家乡去服役。但如果他们与正规部队协同作战，阻止攻击者集中其主力进攻正规部队，他们肯定是能在反击入侵部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他们可以使入侵之敌无法有效地控制其通过的农村地区，无法从当地得到任何供应，并可不断骚扰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例如伯戈因在萨拉托加的投降作出了众所周知的贡献。但他们不能取代正规军。

在这方面更能起作用的是1757年改革后的英国民兵。其目的主要是在战时接管保卫英国的任务，使在国外作战的英军无后顾之忧。民兵在每次战争期间组成，必须在英国各地服役。在平时，民兵只是偶尔集合在一起训练：1786年起，2/3的人每年集训一个月。从理论上讲，所有合格人员必须服役：经抽签选定的人组成分队服役一定年限，然后相继由其他分队替代，直到所有人都轮训完毕。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由别人代替服役。总有许多没有志愿加入陆军的农村居民愿意参加民兵，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派往国外而可以在当地士绅的保护下同邻人们一起服役。民兵颇使在政治上支持它的人感到失望，因为后者希望把民兵服役时间缩短，更像美国民兵一样。但尽管民兵在他们看来像正规部队，其气质却大不相同，不过它确实可以为国家的兵员增添一分力量。

在法国，制宪议会用预备役部队来替代民兵，后备军通过志愿应征入伍，意在保持一批与正式加入军队的人一样的兵员。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按人口比例征集，而是要求拥有过剩人力的贫穷地区作出超过其份额的贡献。^[65]预备役士兵在平时稍许接受训练，在战时即并入陆军服役。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主要用于维持治安，人员是全国革命者当中的志愿入伍者。制宪议会规定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均有义务参加国民自卫军，所以它同美国的民兵非常类似。当国王逃

奔瓦伦事件使议会担心来自国外的敌人和本国正规陆军进攻的时候，议会自然就转而依靠国民自卫军，整个自卫军在短期内曾警戒待命，并按各单位规定的志愿人员指标，组建起一支拥有9.7万人的常规部队。不久又作出了一项对其战斗力具有破坏性的决定，即让这支部队的战士每年12月有机会暂停服役。1792年春战争爆发后，又组建了另一支拥有7.4万人的志愿军。志愿军实际上大多不是（中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成员而是由他们雇来的替身；不过他们中间的确也有许多令人可敬的资产阶级成员，他们出于爱国动机参军并且注定要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官。这种制度同英国的民兵一样，是一种间接的征兵方法，它召集了一批永远也不会参加正规部队的人。1792年7月，立法议会冒险采取了一项差不多是强制性的步骤，命令每个驻地的国民自卫军选拔若干人员以完成先前所要求实现的指标。

于是这种半征召服役的预备役部队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但这时的人数不多，所受的训练也不严格。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战争仍然比较简单，其起码的知识士兵很快就能学会。拿破仑征召入伍的士兵就像以前的志愿军一样，是在向国境进军途中进行训练。^[66]英国民兵平时每年只受一个月的训练，普鲁士的士兵则不过受两个月训练。但是，训练结果的优劣完全取决于更紧密地学习正规军，而不是去考虑平民是否能够接受。关键在于要有一批有经验的骨干军官和军士。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训练没有经验的士兵而产生惊人的效果，^[67]这是业余军官无法做到的。英国的民兵经过很好的训练，因为教官和某些军士均系正规军人，但对民兵的领导却无方。法国的志愿军虽然素质优秀，但开始时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情况的改善是缓慢的，直到悲惨的军事危险处境迫使政治家们于1793年批准其同正规陆军合并。在英国，这个过程是逐步进行而且是不完善的，1799年开始有较多的正规军官在民兵中服役，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受过训练的民兵调入正规军团队。^[68]

当然，如果正规军的素质能够改变的话，那么，把征召入伍的兵士编入正规军就会较少遭到反对。此外，还可以吸收较优秀的士兵自愿加入陆军。为了达到后面这一目的并希望不经过征兵而建立一支强大的后备军，有人提出缩短服役期限。当1792年战争爆发时，法国动员士兵在战时入伍服役，期限为二或四年。美国大陆军最初的服役期也只有一年。后来，美国和英国都规定服役期为三年或整个战争时

期。在两种情况下，都引起带来麻烦的误解，即士兵是否有权在哪个期限较短就在哪个期限届满时退役。这在美国引起1781年的一次兵变，在英国于1783年也发生类似的事件。这种实验并不成功。

关于军纪，所有的军事新理论都指出，对士兵不应再是强迫命令，而要明智地加以领导。吉贝尔认为，“我们同士兵讲的道理不够”。甚至连普鲁士正统派理论的伟大倡导者扎尔德恩也认为：“苛刻对待新兵是不适合的也是不人道的。……任何人都不应忘记士兵也是人；大多数士兵在受到良好待遇的情况下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士兵为一个善待他和受到他信任的军官所做的事要远远超过为一个虐待他的军官所做的事”。^[69]他和其他人都强调指出，军官对自己属下士兵的个人情况都要有详细的了解。训练要很好地安排，要教导新兵懂得所从事事业的意义。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操典是一些各式各样规则的杂乱堆集。1791年的法国操典则是一部经过很好规划、分成若干课程的教材。

野蛮惩罚逐渐匿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还坚持使用鞭笞。曾经高呼“血背”以奚落英国军队的美国人不久也看到了鞭笞被引进自己的部队：国会限制受鞭笞的数目，但想方设法使这有限的鞭笞令人更加痛苦。^[70]另一方面，在普鲁士，1787年以后鞭笞的刑罚日益减少。在法国，圣日耳曼用剑的扁平面殴打以替代鞭笞，但这项改革被认为不当，因为人们认为这比鞭笞更恶劣。制宪议会废除了笞刑并大大放宽了整个军事审判体制。军事法庭从此设立了由各级军人代表组成的陪审团。

各国政府作出各种努力来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以免使士气低落。人们认为，应当允许士兵结婚：家庭生活可激励负责的行为。普鲁士鼓励外籍士兵娶本地人为妻，认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开小差。对军装朴素、衣着暖和、改善伙食以及驻地卫生条件提出许多要求。在法国提出要努力完成两项目标：一是面包洁净，二是营房内一张床铺最多睡两个人。甚至不顾在公认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增加军饷，1790年法国士兵的军饷实际上增加了1倍。在英国，军饷实际上全部用于伙食和衣着而且实际上无法满足这两项的需要。1792年军饷有些微增加，使士兵在扣除上述费用后一年能剩余现金18先令10个半便士。^[71]美国大陆军的军饷，根据其国会雇主的材料，是比较优厚的，每人每月为

6²/₃美元。但士兵们认为军饷仍不够花，而且其实际价值随着货币的迅速贬值而迅速下降。

法国和英国长期以来就有给年老军人发放年金的储备。但在普鲁士，无论给军官还是给士兵发放年金却是一种恩赐，而且极为罕见。财政拮据妨碍了改善，其悲惨后果是不适于服役的士兵退役后无法生活。扣除士兵的各项必需费用的军饷制度到处引起舞弊行为。在英国，1780年以后会计制度有所改进。在法国，在舒瓦瑟尔已经采取若干措施之后，制宪议会授权一个由每个团队的各级军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清查前六年的账目。这样，士兵便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他们应得的财政收益，而且意味着会更加忠诚和有更好的军纪。[\[72\]](#)

这些改革使陆军初步成为适合正派的公民参加的职业。这些改革并没有在政治上减轻对陆军的敌意。议会里的政客们往往对仁慈的措施表示同情：他们有时认为，如果对军队少采取一些粗暴的行动，军队也就会少一些奴性，更会拒绝成为暴政的工具。但危险在于，官兵的关系会变得太好，反而不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一支爱国部队，经受过种种新的而又比较严酷的战争考验——像在福吉谷经受过严冬考验的美国军队一样[\[73\]](#)——就很可能产生一种强烈的休戚与共的感情，并树立起一种信念，认为他们有权对政治施加影响。革命的政治家们担心打了胜仗的将军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于是制定了把这种危险降到最低程度的种种权宜措施。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法国制宪议会则赋予立法机关以否决宣战的权力并以国家的名义永远放弃征服别国的战争。这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理想主义的流露，而是提供法律基础，以反对军事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而发动战争。在以后的立法议会里，左派曾设法制定一些措施，以区分“合理”服从和“被动”服从，使军人只服从合法的命令，但未能成功，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诱发了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长期不和。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在处理哗变部队反对上级的事件中，使自己对军队所做的有益工作大都化为乌有，严重损害了良好的秩序。

到1793年，各大国在军事改革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人们当会看出，法国取得的进展最大。有一段时间，法国落在德意志各邦的后面。现在则赶上并超过了它们。社会因素对此起了很大作用。普鲁士

的技术兵种较弱，而当时技术兵种不仅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对整个军队所起的作用超出了思想家和领导者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产生技术人员的中产阶级在德国不如在法国受到尊重。技术人员在普鲁士陆军中被轻视，结果就不能吸引有才能的人。^[74]公民军之类的理想在法国比在德意志更容易付诸实现。但是，对这一点也不应过分强调，因为法国的相当于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人们曾大力推动改革，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普鲁士容克阶级本身是能够吸收新思想的。奥地利在若干领域的进展一向引人注目。奥地利没有法国社会的优越条件，但它的陆军却受到一位能干的君主约瑟夫二世的培育。在查理大公爵的关怀下，奥地利陆军一度曾领先于普鲁士并英勇地抵抗了改革后的法国。

正是因为法国早先遭受了失败，所以才激励它作出努力，使它这时居于领先的地位。德意志并不缺乏改革的活动。在德意志各城市发行的研究军事问题的期刊数目惊人。在普鲁士，胜利并未引起骄傲自满，对当时的体制完全可以自由地提出批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活动仅热衷于完善现存的思想或阐述一些过分新奇的事物。法国的失败对法国改革来说是有一定益处的，因为他们引以为得意的理论受到了与之相竞争并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制度的挑战。他们必须抛弃偏见，向敌人学习。正是对法国和普鲁士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综合，奠定了法国未来胜利的基础。普鲁士的胜利使德意志人热衷于任意追求抽象概念，其学术专家们则陷于夸夸其谈，重复老调。毫无军事思想的高明专家比比皆是。迈纳特教授于1788年发表了一本《大学军事数学研究》的书，林德瑙则于1790年抱怨什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战术不是“以精确的几何学定律”为基础的。^[75]

但是，法国的技术优势由于当时政治上所处的困境而无法得到发挥。舒瓦瑟尔于1770年下台后，他的重要改革受到危害；与杜尔哥同时任大臣的圣日耳曼，则由于两人被解职，他的伟大工作也半途而废。在1778—1789年期间，由吉贝尔和其他改革家控制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着手实施一些重要的变革，改革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但由于革命时期对军官的清洗和军纪的松弛，似乎一度使整个事业毫无意义。由于在政治上无法采取措施扩充兵员，法国军队的规模相对来说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的地位。1791年，制宪议会批准建立一支总数约达25万人的陆军和后备军。而普鲁士的人口要少得多，当时却可以征召25万人入伍。奥地利差不多是此数的2倍，而俄罗斯则超过2倍。法国在路

易十六时代几乎可以同整个欧洲较量，现在却有好几个国家可与法国并驾齐驱。

在英国和俄国，“本国”非正规战的传统与由崇拜普鲁士的人所输入的思想二者之间的斗争；减缓了两国在战术上的进展。英国的力量由于受到同法国一样的政治因素和由于需要海军这两方面的影响而缩小了。陆军和民兵的平时编制不到10万人，战时最多也只能增加1倍。陆军十分缺乏职业精神，要保持其效率水平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提高了。对比之下，俄国在宗教和习俗上与其邻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是在拥有这些有利条件下开始起步的。这就是说，他们从事的战争一般都具有“民族”性质，可以在部队中激发起一定程度的热情。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灵活的战术体系，与法国出现的极为类似。苏联历史学家曾声称，在纵队阵形的发展这类问题上，俄国人是真正的先驱者。情况虽似乎并非如此；但俄国看来很好地跟上了西方的步伐。

真正拖俄国——英国也一样——后腿的是运输问题。英国和它作战的各战场之间横隔着汪洋大海。俄国同样为大片广阔无垠的领土所隔绝，道路缺少，地方供应不足。就这两国而言，整个高度机动的陆军的新体制要依靠征用地方供应来施展其威力是困难的，除非是在小规模的基础上进行。英国海上的实力在这方面可以弥补不足。但陆军对海运的需要却不断增多：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的需要同七年战争高峰时的需要不相上下。不仅如此，行政机构也无法满足迅速集结船只、护航、运兵和供应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这项任务要由一些各司其职的大臣和高级官员共同来完成，而他们却往往彼此不和，又没有一位上级来领导他们。1775年10月已安排好并计划于圣诞节前起航的一支远征部队一直到1776年2月初才离港，中途遇到逆风，耽误了行期，5月才抵达新大陆。由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这本应使英国人得以在美国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始终未能迅速行动以使之成为现实。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曾（继老皮特之后）极力主张建立一支永久性运输预备船队，用铜皮包装船底，使之便于迅速航行。^[76]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因而英军依然是无风就无法航行。

这样，欧洲便大体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均势。但法国革命的发展扫除了法国军事进步的障碍，从而打破了这种均势。法国长期以来曾经是一个越来越爱好和平的国家。伦理学家长期以来谴责大多数战争乃是王室利己主义的表现，他们这种观点得到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

有力支持。他们认为，侵略战争同关税一样，是牺牲邻国利益以增加本国财富的愚蠢行动，到头来只会使大家都陷于贫困。战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明智的。不仅制宪议会，就是路易十六的主要大臣如杜尔哥、内克尔、韦尔热讷等人都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像吉贝尔这样的军事改革家的思想也并无不同。他的理想之邦应是和平地对待邻国。“它不嫉妒邻国的富有，也不嫉妒邻国征服别人，也不干扰邻国占有远方领土。它懂得过多的领土意味着衰弱；提供奢侈贸易的远方殖民地会助长本国的罪恶……它不侵犯邻国的商业……理解有商品就要交换；只要销路畅通，商品不用人为鼓励就会自行流通。”^[77]他认为，只有卫国战争才能在军人当中激发迫切需要的爱国热情。

从1792年起法国所从事的正是这种战争——保卫革命。要不丧失革命的果实，就必须给陆军以长期以来所需求的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革命者不得不一反以往爱好和平而变得好战——的确，他们过去越爱好和平，现在就变得越好战。军事历史学家有时贬低大革命的军事重要性，指出在革命后发生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在旧政权下演变而成的，甚至指挥官也是由旧政权培养出来的。但是知识的发展既产生了军事科学的进步，也产生了它的反面，即对战争和军队的厌恶。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样只有革命激发出来的意识形态热情才能赋予战争的新体制以必要的推动力量。没有这场革命，战争的新体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两者一结合不仅改变了欧洲社会，而且令其他欧洲国家震惊，促使它们以同样的热情从事军事改革。

吉贝尔早就对眼前事态的进程作过设想：“假定欧洲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富于才干，足智多谋又有组织性；他们把严格质朴的美德和全国性的民兵组织与已经确定的念念不忘的扩张计划结合在一起；他们懂得如何少花钱来进行作战并依靠战利品来养活自己，不会因财政缘故而不得不放下武器。那么这个民族会征服其邻国并推翻我们脆弱的宪法，其势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78]但也许他关于未来总的潮流的说法仍然比较带有预言性质。他的理想之邦只有在“其臣民受辱，领土被侵或繁荣遭到破坏”时才会进行战斗。但是，

一旦参加了战斗，它就将以其坚决的意志全力以赴而决不会放下武器，一直到取得其应有的赔偿为止。它的作战方法将不会是目前各国采用的方法。它并不想为征服而征服。它将派出远征部队而限于防守部队。

它会满怀愤怒，把火与剑带到敌人的国土上。它将向企图扰乱其安宁的一切人报仇雪恨，毫不留情。任何人都不要把这种按照自然规律进行报复的行为称为野蛮和对虚伪的战争法规的违犯。这个原来心满意足而又爱好和平的人民遭到了侮辱。它只有奋起并离开温暖的家庭。如有必要，它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这会赢得心灵上的满足，为自己的民族报仇雪耻，并通过复仇的壮举以保证该民族的未来和平与宁静。因此，积极防止犯罪的稳健的法理学者深知，在一旦罪行犯下后，如何毫不留情地追究罪犯，严厉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以防止坏人受到引诱铤而走险。^[79]

宗教战争以来泯灭的爱心，即对正义的热爱，重新回到了战场。这就为“进行全面战争”奠定了道义基础。

（王青 译）

[1] 《华盛顿—德格拉塞通信集》（1931年），第150页。

[2] 转引自卡斯泰《海军的军事思想》（1911年），第63页。参看J. 科比特爵士《〈作战指令〉与信号和操作规程》（海军档案学会）。

[3] 这次部署的功绩，曾有多人声称归于自己。其中有克拉克（见《航海镜报》，第20卷，重刊了他1806年的小册子），罗德尼的旗舰舰长道格拉斯[见H. 道格拉斯爵士《海军的演变》（1832年）和《巴勒姆文件集》（海军档案学会），第1卷，第279页]以及罗德尼本人（见芒迪《罗德尼生平》，第2卷，第229页）。

[4] 海军部档案局（P. R. O. ），7/567。

[5] 雷克斯对塔布斯案，1776年。见海军部档案局7/299卷宗中的法律意见。又见J. R. 哈钦森《抓兵队》（1913年）和贾斯蒂斯·希尔德斯利《抓兵队》（1925年）。参见乔治三世时期的征兵法，19。

[6] 《议会史》，第19卷，第81页。法案系根据海军上尉汤姆林森的计划提出，计划见《汤姆林森文件集》（海军档案学会）。参见伍德的方案，载《桑威奇文件集》，第4卷，第389页（海军档案学会）。

[7] 《一名英国海员目睹之真相》，参见《弗农文件集》（海军档案学会），第547页。

[8] 《巴勒姆文件集》，第1卷，第307页。参看J. 林德《坏血病论文集》，斯图尔特和格思里编（1953年），第386页和C. 劳埃德和J. L. S. 库尔特《医学与海军》，第3卷（1961年）。

[9] 巴罗：《安森生平》（1839年），第480页。见库克致普林格尔的信件，载J. 林德《坏血病论文集》，斯图尔特和格思里编（1953年），第407页。一份官方报告记载了1776—1780年发病率和开小差的情况：总人数增加到175900人，阵亡1243人，病死18541人，逃走42069人。

[10] 例如，芬奇舰长在1778年变卖战利品所得份额为62000英镑。在前三个月另一次变卖中所得份额为15000英镑。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 Mss. Comm.）：《拉特兰手稿》，第14页。

[11] 参见纳米尔《政治结构》（1957年编），第29、36、141页。

[12] 《桑威奇文件集》，第2卷，第190页及以下各页；第3卷，第275页；第4卷，第298页。《巴林顿文件集》，第2卷，第315页；《巴勒姆文件集》，第1卷，第366页；第2卷，第201页。《拜厄姆·马丁信件集》，第3卷，第291页（以上各书均由海军档案学会出版）。

[13] 《桑威奇文件集》，第2卷，第259页及以下各页；第3卷，第275页。《巴勒姆文件集》，第2卷，第18页。《议会史》，第20卷，第174页。

[14] 《桑威奇文件集》，第4卷，第282页及以下各页。《巴勒姆文件集》，第2卷，第10、30页。《沃波尔回忆录》，第4卷，第170页。《议会史》，第22卷，第878—931页。

[15] 议会下院：《会议文件集》，1806年，第7卷，第309页。《巴勒姆文件集》，第2卷，第337、347页。

[16] 《桑威奇文件集》，第4卷，第310、354页。见R. G. 阿尔比恩《森林与海军强国》（哈佛，1926年）和P. W. 班福德《森林与法国海上力量》（多伦多，1956年），不过前者对桑威奇时代的论述应加以修改。

[17] 《巴勒姆文件集》，第3卷，第18页。

[18] 见J. C. 比格尔霍尔编《詹姆斯·库克航海日记》（哈克卢特学会，1955、1961年）。

[19] G. 拉库尔-加耶：《路易十五时代的海军》（1910年），第420页；《路易十六时代的海军》（1905年），第56页。参见M. 卢瓦尔《1789年的皇家海军》（1892年），第57页。

[20] 引文见拉库尔-加耶《路易十五时代的海军》，第598页。

[21] 参见N. 汉普森《共和二年的海军》，第43、44页。

[22] 参见H. 沙佩勒《美国大型帆船史》（1935年），第78页；J. 查诺克《造船史》（1802年），第3卷，第222页。

[23] 马卢埃的数字，转引自M. 卢瓦尔《1789年的皇家海军》（1892年），第277页。

[24] 转引自E. 舍瓦利耶《共和国早期法国海军史》（1886年），第32页。

[25] L. 莱维-施奈德：《国民公会议员让邦·圣安德烈》（1901年），第1卷，第299—312页。参见N. 汉普森《共和二年的海军》，第43、44页。

[26] 在战时被征用的私掠船亦称武装民船。在此统一译为私掠船。——译者注

[27] C. O. 波林：《美国革命时期的海军》（纽约，1906年），第157页；E. S. 麦克莱：《美国私掠船史》（纽约，1899年），第113页。

[28] 塞勒姆的埃塞克斯学会1911年出版的哈利法克斯法庭记录，以及新斯科舍历史学会学报，第12卷。参见G. 威廉斯《利物浦私掠船史》（1897年）；《海上法律和惯例》（海军档案学会，1916年）；海上捕拿敌方商船特许证登记簿，1778—1783年，海军部档案局，7/325。R. 戴维斯：《英国航运业的兴起》（1962年）。

[29] M. S. 安德森：《大不列颠与俄国海军的成长》，载《海军镜报》1956年5月号。

[30] 参见R. C. 安德森《波罗的海海战》（1910年）和《利凡得历次海战》（1952年）。参见《詹姆斯·特里维南回忆录》（1959年，海军档案学会）。

[31] 关于数字比较，见查诺克《造船史》和W. 詹姆斯《英国海军史》（1837年编），第1卷。法国和西班牙舰艇的估计数字可能太高：1793年法国服役的舰艇仅为67艘。

[32] R. 库普兰选编：《小威廉·皮特战争言论集》（第3版，1940年），第16页。

[33] M. 罗伯茨：《1560—1660年的军事革命》（1956年），第14—15页。

[34] 一般参考S. 威尔金森《拿破仑之前的法国陆军》（1915年）；C. 戈尔茨《从罗斯巴赫战役到耶拿战役》（法译本，1896年）；L. C. 哈奇《美国革命军的管理工作》（1904年）。

[35] J. V. 内夫：《战争与人类进步》（1950年），第330—331页。

[36] J. W. 赖特：《美国革命中的步枪》，载《美国历史评论》，第29卷（1923—1924年），第293—299页。

[37] G. 福克斯：《英国的火炮制造者》（1937年）；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野战炮”词条；A. 多勒切克：《奥地利炮兵史》（1887年）。

[38] J. 科兰：《18世纪的步兵战术》（1907年），第275页。

[39] C. 雅尼：《普鲁士王朝军队史》（1929—1933年），第3卷，第130—131、165—168页。

[40] J. M. 帕尔默：《施托伊本将军》（1937年），第144—166页。

[41] J. 科兰：《18世纪的步兵战术》（1907年），第135—150页。

[42] J. 科兰：《18世纪的步兵战术》（1907年），第135—150页；J. F. C. 富勒：《英国18世纪的轻步兵》（1925年）；E. M. 劳埃德的《步兵史》（1908年）则可靠性较差。

[43] H. 德尔布吕克：《兵法史》，第4卷（1920年），第479页。转引自内夫《战争与人类进步》，第323页。

- [44] M. 赖因哈德：《伟大的卡诺》（1950年），第1卷，第8章；M. R. 蒙塔朗贝尔：《优于进攻的防守艺术……即垂直防御工事》（1793年）。
- [45] J. 科兰：《拿破仑的军事教育》（1901年）；D. D. 欧文：《总参谋机构的来源》，载《近代史杂志》，第10卷（1938年），第161—179页；J. 帕尔杜斯：《皇帝约瑟夫二世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记录》，载《维也纳科学院哲学史部研究报告》，第63册，第II部（1919年）。
- [46] 莱斯皮纳斯（Mlle de Lespinasse, 1732—1776年），18世纪巴黎最杰出、最具解放精神的文学沙龙之一的女主人。著有《书信集》（1809年）。——译者注
- [47] 赖因哈德：《伟大的卡诺》，第205—206页。
- [48] 转引自E. 罗布森《美国革命》（1955年），第166页。
- [49] E. G. 莱奥纳尔：《18世纪陆军及其问题》（1958年），第175页。
- [50] C. 雅尼：《普鲁士王朝军队史》（1929—1933年），第3卷，第35—38页。米拉波：《论普鲁士王朝》（1788年），第7卷。
- [51] E. G. 莱奥纳尔：《18世纪陆军及其问题》（1958年），第184页。
- [52] 赖因哈德：《伟大的卡诺》，第230页。
- [53] 《历史手稿委员会：斯托普福德-萨克维尔夫人手稿》，第2卷，第17页。
- [54] 赖因哈德：《伟大的卡诺》，第149页。
- [55] G. 西克斯：《旧王朝末期还需要全由贵族来担任军官吗？》，载《近代史评论》，第4卷（1929年），第47—56页。
- [56] 参见前第7卷，第181—182页。
- [57]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国王路易十六逃亡和被捕获的地方。——译者注
- [58] L. 哈特曼：《革命时期王室军队的贵族军官》（1910年）。
- [59] 孔代，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亲王，曾招募流亡贵族组成所谓“孔代军”。——译者注
- [60] C. M. 克洛德：《国王的军队》（1869年），第2卷，第10页。
- [61] C. 普瓦松：《1789至1792年间的陆军和国民自卫军》（1858年），第186—193页；A. 德普雷：《外省军团和1773年10月19日的法令》，载《近代史评论》，第13卷（1938年），第267—286页。
- [62] M. 莱因哈德：《革命时期的思乡病与兵役》，载《法国革命史年刊》，第30卷（1958年），第1—15页。
- [63] J. 热伯兰：《外省民兵史》（1882年）；W. O. 沙纳汉：《普鲁士军事改革，1786—1813年》（1945年）。

- [64]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王路易十六逃亡和被捕获的事件。——译者注
- [65] C. L. 沙桑和L. 埃内：《革命期间（1899—1906年）的国民志愿军》，第1卷，第4—8页。
- [66] G. 勒费弗尔：《拿破仑传》（1935年），第191页。
- [67] 见W. O. 沙纳汉：《普鲁士军事改革，1786—1813年》（1945年）。
- [68] 法国的情况参见C. 鲁塞《1791—1794年期间的志愿军》（第2版，1870年）。
- [69] 他编写的《步兵战术基础》手册（1783年），法译本第3—4页。
- [70] B. 诺伦伯格：《重新评价华盛顿和革命》（1941年），第216—219页，转引自罗布森《美国革命》（1955年），第158页。
- [71] J. 福蒂斯丘：《英国陆军史》，第3卷（1902年），第522页。
- [72] 见沙纳汉《普鲁士的军事改革》；L. 芒蒂翁《法国旧王朝的陆军》（1900年）。
- [73] 福吉谷（Valley Forg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战略要冲。1777年冬，华盛顿率败军在此经历了严寒、饥饿的考验，重振了大陆军的士气。——译者注
- [74] 米拉波：《论普鲁士王朝》（1788年），第7卷。
- [75] W. O. 沙纳汉：《普鲁士军事改革，1786—1813年》（1945年），第3章；戈尔茨：《从罗斯巴赫到耶拿》，第253—255、286—290页。
- [76] E. 罗布森：《1775—1776年向南方殖民地的远征》，载《英国历史评论》，第66卷（1951年），第535—560页；海军档案学会：《桑威奇文件集》，第1卷，第97页和《巴勒姆文件集》，第2卷，第45页。
- [77] 《军事著作集》（1804年），第1卷，第47—48页。
- [78] 《军事著作集》（1804年），第1卷，第16页。
- [79] 《军事著作集》，第1卷，第51—52页。

第八章 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

一 与亚洲的关系

在本卷论述的这段时间里，可以看到欧洲和亚洲的关系在三个主要方面有所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上升为在印度的最强有力的管理机构之一；英国的贸易在进一步向东扩展；欧洲人对亚洲的知识日益广泛和深入。在莫卧儿帝国崩溃后的权力斗争中，东印度公司变成了富庶而肥沃的孟加拉和比哈尔两者的统治者。而且，它不仅把法国从印度政治的有效参与中驱除了出去，还经受住了它的主要敌手马拉特人和迈索尔人的挑战。东印度公司此时成为一个印度的政权，代表莫卧儿皇帝统治着这些省，并着手改革那里原有的行政体制。如果说它的各种改革起了把印度人从高级职务中排除掉的作用的话，这种改革却也让拥有财产权并效忠其统治的印度土地拥有者阶级得以兴起。而购买它为进行反对迈索尔的提普苏丹的战争筹款而发行的债券的人中就有印度投资者。印度的货物不仅出口到欧洲，而且排除荷兰的反对，随着英国贸易的扩张而到达东方各海洋和到达中国，从而有助于弥补其迅速增长的向欧洲的茶叶出口。虽然它所预期的在印度帝国获得的利润令它大失所望，而且不得不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并为此屈从于某种监督措施，但是它对中国贸易的利润掩盖了它所有的损失，并把它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荷兰的公司由于在美洲战争期间中断了它的欧洲贸易和它在亚洲遇到的日益加剧的竞争而遭到削弱，而且在本国建立起不同情它的政府后不久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培养起来的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兴趣，被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所接受，而洛可可风格对异国情调和风格奇异的喜爱，这时又增添了对富有天然情趣的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时尚追求。英国公司关注其行政管理问题的同时，更被印度的文明所吸引。公司的某些职员后来成了有名的东方学家。正像他们作为官员准备以印度的方法治理印度那样，作为学者他们则坚持认为印度的文学和哲学值得按照其本身的意义而无须按照欧洲的思想方法而加以研究。

1765年克莱武从沙·阿拉姆皇帝手中获得了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1]三省的“迪万尼”（diwani），即民政权，以每年纳贡作为报酬。他认为公司在莫卧儿王朝的权威下进行统治将会是有利的，皇帝也许缺乏权力，但他仍能博得尊重并可使人获得社会地位。他的批准不论在印度和欧洲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不仅能有助于得到公司印度职员效忠，而且也有助于防止它的欧洲敌手们的妒忌。甚至英国议会也不愿接管它使之成为即使是名义上由国王统治的直辖领地。负责征收孟加拉的各项赋税和行使审判职权的官员称迪万^[2]，公司指派了一名印度人穆罕默德·里萨汗作为代表充当此职务，而纳瓦布^[3]也指定他作为自己的代表管理行政部门，包括掌管刑事审判。正如公司在孟加拉的政府于1767年所满意地指出的：“我们可以把目前的情况当作我们的春天，在纳瓦布名字的掩盖下，悄悄地使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进行运转。”^[4]克莱武自己估计，可从这样一种经济安排中得到巨额的利润。他预言可“净得”“165万英镑，将用它来支付投资的所有费用，提供中国珍宝的全部钱款，保证您们在印度的其他所有殖民地的需要，此外还可为您们的金库留下巨额的结余”。^[5]但是管理费用之大和收益之少都超出了原来的预期，而在1767年英国主管部门决定每年强令公司上缴40万英镑。那些购买了公司的股票盼望它继续升值的投机商们，不顾1772年的财政危机，利用自己的影响继续维持股息的利率。当公司最后被迫向政府请求帮助时，毫无疑问，随之而来的是某种方式的政治控制。^[6]

虽然公司处境如此困难，但其职员似乎非常富足。带着从东方掠夺物归来的纳瓦布^[7]们已经是令人讨厌的暴发户。他们被斥责为暴君，甚至传说他们私人的贸易活动曾助长了孟加拉饥荒的发展。政府除了借给公司140万英镑使它渡过眼前的灾难外，还试图纠正那些在政治小册子中和议会里大声疾呼要它注意的弊端。但是，这些纠正措施并未根本改变公司的行政体制，反而使产生的冲突超过了改革。在1773年管理法的名义下，任命了1名总督和4名参事，但下属的各项任命由公司决定。从英国派出的3名参事是以改革家的精神而来的，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作为公司的一位老职员，却没有驾驭他们的权力。他很快就卷入了与他们的冲突。为了听取对公司职员和一般英国臣民的指控，成立了一个最高法院。但并未十分清楚地规定它的司法权限，于是很快它就卷入了与公司操纵的孟加拉政府的冲突。马德拉斯和孟

买的政府被禁止在未得到总督和参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宣战或缔约，但在“紧急情况”下允许例外，这就给争吵留下了极大的余地。

与此同时，公司本身正在修改由克莱武建立的“双重管理制”。董事会很快就怀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税收在它可能进入国库前已被“一大批无所事事的谄媚者”所截留。^[8]公司中的一些欧洲官员于1769年作为监督员被派往各地区进行调查。但是尽管孟加拉在1770年发生了饥荒，被认为有1/3的居民丧生，而1771年的税收，用政府的话来说，“仍通过粗暴手段使之保持在它以前的水平”。^[9]不过，董事会已决定公司必须更多地参与行政管理，并于1771年下令孟加拉政府“要起迪万的作用”。穆罕默德·里萨汗被免去了公司代表的职务，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试验和争论的时期。监督员变成了税务官，不过董事会并不信任他们，他们很快就被撤了回来。地方性的税收机构建立了起来，但是并不成功。最后税务官们重新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区县。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土地的田赋额。它以五年为一期把田赋包给柴明达尔^[10]，承包的土地还可以拿出来拍卖，以此取代逐年确定赋税额的办法，但这种做法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种可以拍卖的规定鼓励了许多老的柴明达尔，他们在投机性的出价中，出于保住他们土地的迫切心情，要么出价过高，要么被迫抬高价格。新政策因此造成了经济灾难和社会混乱，柴明达尔的权利引起的争论延续了20年之久。争论的一方说他们只不过是包税人，而另一方则认为他们是世袭的地主。有关税收政策的争论实际上是由这样一种说法引起的，即公司的任务是遵循莫卧儿王朝的惯例。事实上，“柴明达尔”一词可用来指各种不同的人，从新近被指定的包税人到古老家族的王公们都在内。但是在莫卧儿王朝的权威衰落期间，职务变为世袭已成一种普遍的趋势。董事会决定在五年承包期满之后禁止继续拍卖。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因为这样做是对世袭权利的损害。

随着公司决定起迪万的作用而带来的司法体制的变化也影响了柴明达尔们。在莫卧儿王朝的权威衰落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了本区县的实际统治者，因为纳瓦布的司法权超不出主要城市多远。现在，正规的民事与刑事法庭已成立，而且进行了许多试验和变革。最初是授权税务官管理民事法庭，后来又由各地区的税务机构负责，到1781年又任命了独立的法官。另外，正像沃伦·黑斯廷斯对曼斯菲尔德勋爵所说的，“对沿袭已久的地方法规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变，只

不过是恢复其固有的各项原则而已”。^[11]按照只包括民事审判的“迪万尼”的理论，刑事法庭由印度法官们主管，他们向穆罕默德·里萨汗负责，后者仍然是纳瓦布的代表。刑事法庭施行的是穆斯林法律，而民事法庭则不论原告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都施行原告个人所遵循的法律。如何确定这种法律是首先遇到的问题。由威廉·琼斯爵士这样的学者来收集和翻译，并由法庭委派了一些印度教和穆斯林法律顾问。这样使得法律比较严密了，尽管法律的施行已不再那么专断。柴明达尔们本身也受到法庭的管辖，新任命的民事法官也行使地方行政长官的职权，受权监督他们的警察机关。地方的习惯法和豁免规定已经让位于司法行政的系统化和统一化。

不论公司怎样表白它的意图在于恢复莫卧儿王朝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但它与皇帝的联系在1771年受到严重的干扰。马拉特人企图在10年前的帕尼帕特战役的惨败后英勇地恢复过来，向印度北部派了一支大军，并说服皇帝返回德里受他们的保护。黑斯廷斯停止缴纳公司的贡赋，并不屑一顾地认为：皇帝授予“迪万尼”权一事仅仅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足为凭，实际连3个半便士也不值”；公司是根据“最高的头衔，即权力”而拥有其领地的。^[12]马拉特人过高地估计了皇帝的威信，但他们的注意力不久就完全转移到在1773年年轻的帕什瓦^[13]纳拉扬·拉奥被谋杀之后在浦那发生的权力之争中了。

孟买政府立即被卷入。以一块领土为报酬，它贸然同意支持死去的帕什瓦的叔父拉古纳特·拉奥。拉古纳特·拉奥自称是继位者，但他被怀疑与谋杀案有牵连，而且遭到以纳纳·帕德尼斯为首的摄政会议的反反对，后者以帕什瓦的遗腹子萨瓦伊·马达夫·拉奥的名义继续管理着国家。支持一个王位竞争者的要求，是获得势力的惯用手法，但孟买政府既过高估计了它自己的力量，也过高估计了拉古纳特·拉奥治理国家的本领。其结果是一连串精疲力竭和徒劳无功的战争，在此期间孟加拉政府还不得不派兵支援孟买。海达尔·阿里是一位强有力的军人，他已在迈索尔篡夺了权力。他也许是反对马拉特的一个有用的同盟者，但是马德拉斯政府引起了他的敌意，他在1780年横扫卡纳蒂克地区直捣马德拉斯城下。^[14]此时正值英国与法、荷交战之际，法国人同时为马拉特政府和海达尔·阿里提供援助。公司的处境似乎危在旦夕。但是黑斯廷斯除了派艾尔·库特爵士支援马德拉斯外，还成功地袭击了帕什瓦属下中最强大和最有野心的马哈吉·信迪

亚，从而与马拉特人缔结了和平。信迪亚在瓜廖尔的堡垒陷落和他自己在锡布里失败后，同意向浦那政府施加他的影响。通过萨尔拜条约（1782年），公司答应不再支持拉古纳特·拉奥，帕什瓦则答应不再与欧洲的其他国家结盟，同时信迪亚以保证人资格保证双方都严格遵守条约，此事促成了马拉特人力量的瓦解。对浦那的控制越来越不耐烦的信迪亚，现在被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公来对待，公司并向他的宫廷派了一名驻扎官。当莫卧儿皇帝请求帮助镇压地方骚乱时，黑斯廷斯拒绝干预，而信迪亚却得以放手致力于在德里建立他的势力。与此同时，在海达尔死后，公司在相互归还掠夺物的基础上与他的儿子提普媾和，并拒绝参加浦那政府反对迈索尔的一场新的战争。但信迪亚的势力在北方的增长引起了浦那的恐慌和不满，于是纳纳·帕德尼斯立即请求公司也任命一位驻在帕什瓦宫廷的驻扎官。由于公司的宿敌如此地耗费了他们的精力，而且它的驻扎官们又居于如此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公司的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了。

但是在英国，沃伦·黑斯廷斯积极有力的政策受到密切的关注。他被说成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邓达斯把他比作是“一个亚历山大或一个奥朗则布”。^[15]管理法仅仅是牵制公司的统治，但没有提供控制它的手段。英国内阁有权审阅来自印度的函件，1781年又获得了否决董事会的批复的权力。但要贯彻它自己的政策，势必依靠非正式的手段来影响董事会，而这往往难以奏效。在内阁说服董事会召回沃伦·黑斯廷斯之后，股东会——股份持有者的总机构——曾有过两次推翻了董事们的决议。因此，1784年皮特的印度法建立了一个常设的督察委员会，享有批准和修改发往印度的函件的权利。但是公司仍然保留着某些权力和大部分影响，董事会仍旧是管理机构。来自印度的函件仍然寄给董事会，对函件的批复仍然是在东印度公司总部作出，由董事们签发。不过，一旦某一函件已由督察委员会批准，股东会就不得再加以更改。董事会仍有权在公司职务中任命令人垂涎的书记人员。不过，在实际上不得不与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分享这一任命权。总督和省督仍由董事会任命，但国王和宫廷都有权把他们召回。但在实际上则是由内阁遴选，经宫廷批准。

总之，这是一种约束制度，它鼓励办事宁可慢些，但要谨慎从事。但由于与印度的通信联系十分缓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给那里的由公司领导的各政府留有自行作出决定的余地，因此速度问题对英国

政府来说不如对它们那样重要。沃伦·黑斯廷斯的确感到处处掣肘，因为管理法未能使他消除行使其权力的种种障碍。当时的历史学家古拉姆·侯赛因·汗曾把公司的行政管理同一位印度的统治者作了对比，他认为公司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决策的缓慢，其原因就是政府实行的委员会制度。但是1781年的一项法令确定了最高法院裁判权与公司的行政管理之间的界限；1784年皮特的印度法加强了孟加拉政府对所属各管辖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权威；1784年总督的参事也从4人减至3人，而且两年之后授权他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越过他们行事。英国议会一旦得以在公司的国内管理机构中有了稳固的发言权，就非常愿意加强公司在印度的政府。对沃伦·黑斯廷斯的弹劾也许证明英国议会意欲在印度政治中运用道德规范，但当时已经时过境迁了。菲利普·弗朗西斯是根据管理法派去的参事之一，而且是弹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实际上是设法使他在印度未能阻止的黑斯廷斯的行为，在英国受到惩罚。邓达斯劝皮特支持对黑斯廷斯的弹劾，他的看法似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他是妒忌黑斯廷斯可能成为他在督察委员会中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黑斯廷斯本人曾与反对内阁各项印度政策的利益集团有联系。^[16]但是不论那些对弹劾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们的动机如何，审理过程提供了一个这些人发泄从普拉西战役以来对公司的嫉妒和怀疑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发表许多大意是认为被统治者的权利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雄辩演说的机会。与此同时，皮特的印度法为未来提供了某种安全保障。从此以后，公司将与督察委员会以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共同治理其领地，后者可以阻止它所不能支持的任何建立帝国的轻率冲动，并阻止它所无法承受的任何导致贪污腐化的倾向。

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和当时威胁到印度公司的各种危险，似乎证明需要保持稳定和谨慎行事。除建立督察委员会外，还试图以某种法令对公司的各项政策加以约束。公司的红利已经制定了章程加以固定。皮特的印度法警告公司，“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扩张统治范围”是“同英国的愿望、荣誉和政策所不相容的”，因此禁止实行侵略性的政策。^[17]有关孟加拉当时实行的税收政策的社会后果的报告业已送达英国，根据同一法令指示公司调查柴明达尔们的不满，并制定他们缴纳租金的“永久性规章”。^[18]同样，董事会得出结论说柴明达尔是“不满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负债累累，或者

沦为乞丐”。总之，董事会指责孟加拉政府“在没有紧迫的需要或明显的理由的情况下任意进行试验”。人们很可能认为“我们的政府缺乏稳定的政策”。^[19]

1786年任命康华里勋爵为总督一事，表明英国当局所希望的改革将会实施，而稳定性将成为改革后的行政管理的特征。尽管在约克敦遭受了失败，但康华里素有才能出众和为人正直的名声。和他的前任们不同，他不是公司的职员出身，因此他既未沾染公司的传统做法，也未卷入公司的腐败行为。克莱武曾强迫公司的职员们签订不接受馈赠的契约，但他们仍可经营个人的商业，不过黑斯廷斯取消了对他们的货物免税的做法，这种做法曾给他们以超过其他商人的好处并激怒了担任纳瓦布的米尔·卡西姆。特别使董事们恼怒的是公司从印度出口的货物似乎质量低劣，远不如其职员们为自己谋利而卖给国内或卖给外国各公司的货物。特别使康华里烦恼的是他发现几乎所有的税务官都在从事有损于他们行政职责的私人经商活动。几乎无法阻止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弥补他们微薄的工资收入，除非能增加他们的工资。康华里说服董事会批准大幅度增加工资，并严禁个人经商。从事公司商业活动的人被单独组成完全独立的分支，他们被允许个人经商，因为实际上很难阻止他们这样做。即使如此，他们今后也并不是通过以赚钱的合同向公司提供资金，而是作为代理人监督生产并向公司报账。然而，如果说康华里实现了把受契约约束的文职人员和商务活动分开的话，他也就开始使这些文职人员和印度社会脱离了。他的另外一些改变的结果是只限于这些文职人员才能担任高级职务，而这些文职人员都是欧洲人。一旦印度人被排除在负责职位之外，他们便立刻被认为是不配担负重任。而那些获得高薪的文职人员，现在既失去了印度同事，很快便也就失去了印度朋友。

董事会从黑斯廷斯时期的复杂而代价昂贵的尝试中退了回来，它决定：如果把过去交由各法官分别负责的民事审判权和行政长官的职能交给收税官们去负责，将会“更加简便、有力、公正并且经济”。^[20]这项变更由于更加接近印度传统而受到许多公司职员的欢迎。但很快就积压了许多拖延不办的案件，使康华里得出结论：收税官们没有时间从事司法工作；他还认为，交给他们这么多的权力是危险的。只有建立一种检查制度才能保证司法机关的公正，特别在税收案件中更是如此。因此，他在由收税官所行使的行政权，与由地区法官兼地

方长官所行使的司法权之间实行了完全的分权。迄至那时为止，刑事审判权一直掌握在向穆罕默德·里萨汗负责的印度法官们手中。康华里认为他们绝不会同意他提出的对穆斯林刑法所做的更动，遂用由英国法官掌管的巡回法庭来代替他们。至此，公司开始公开侵犯克莱武曾保留给纳瓦布的司法权。施行英国刑法及其有关应判处死刑的各项罪行的规定并无可怀疑之处。最高法院以伪造罪判处婆罗门南达·库马尔死刑，在印度人眼中似乎是一种野蛮的处罚。但穆斯林刑法的某些方面在英国人看来似乎同样不公正和不人道。黑斯廷斯曾试图说服穆斯林法官们在衡量一个杀人犯罪行的轻重时，应更多地考虑其动机而不是所使用的凶器的类型，但毫无结果。董事会曾谨慎地提出也许会说服法官们“避免作出残酷性的处罚”——换言之，即断肢。^[21]康华里也极力反对实行允许近亲赦免杀人犯的做法，理由是这会使婆罗门由于他们的种姓而逃避惩罚，因为没有印度教徒能参加执行一个婆罗门的死刑。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刑法按照英国的观念进行了修改。以监禁代替了断肢；杀人犯根据他们的动机而不是他们的手段而加以审判，受害者的近亲丧失了赦免权。总之，司法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和详细，也更加系统和统一。对任何人都没有区别，不论是婆罗门和非婆罗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柴明达尔和农民，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康华里并不试图证明自己的改革恢复到莫卧儿政府的黄金时代。相反，他宣称“即使实施古代法规的时期”，也有许多滥用权力的地方。^[22]他也并不打算全盘引进英国的各种体制。他一旦发现改革穆斯林法律的先例，便求助于它。他的意图是纠正“穆罕默德法律中那些最明显地违反天赋公正和社会善良的部分”。^[23]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照顾公众舆论。他本人很可能认为天赋公正在英国的体制中表现得比在其他国家的体制中更为明显。但是，至少他的改革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个不像英国的或穆斯林的刑法那么残酷的惩罚制度。尽管如此，就其分权而论，就其依靠成文法而论，和就其没有歧视但烦琐的审判程序而论，康华里建立的司法制度更类似于英国的而不是印度的观念。

他还把这尊为他的税收政策的必要背景。皮特印度法要求制定管理柴明达尔缴纳的税款的“永久性规章”。康华里却发现他们“经常处于一种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从而决定对制度作根本性的改变是必要的。1793年，他宣布政府的税收需要是不可更改的。他认为如果

柴明达尔知道增加生产能力不会导致增加税额的话，他们将会改善他们的土地。不论柴明达尔们的状况有多么不一样，从此以后将被视为是一个性质相同的阶级，他们对土地拥有财产权，可不经政府许可而卖给任何人，而政府则可以因为他们不纳税而扣押和出卖其土地。对康华里来说，老的柴明达尔能否幸存似乎并不重要。如果他们缴不起赋税的话，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卖给那些能够缴纳赋税的人。可能买土地的人，包括那些印度人在内，也许是商人。他知道这些人将会投资于公司的债券，并认为一旦清偿了公债，这些人的储蓄将不会有其他出路。乱花钱和无所作为的情况将因之而转变为节俭和讲求效率。土地的产权将由法官予以保护，以免被非法侵占，即使是被收税官所侵占。为自身利益所驱使，新生的土地贵族将会开发国家的资源，并一定会忠诚地支持政府。但是对农民的权利却很少保护。曾期望柴明达尔给农民一种为期10年的租金证明（帕塔斯，pattas）以防止不正当的摊派。但事实证明农民们并不愿意接受这种以10年为限的权利。他们认为证明应长期有效，大小和地力都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土地应无限期归他们租用。柴明达尔还授权可因不付租金而扣押和出卖他们的佃户的财产。康华里设想柴明达尔们会认为拥有一种有利可图和满意的租佃关系对自己有利。但是，当时孟加拉尚未从1770年的饥荒影响下充分恢复过来，要找到佃户十分不易。由于人口的增长，柴明达尔们没有理由采取温和的态度。此外，出售土地的法律的严格实施往往会割断柴明达尔和农民之间的传统纽带，因为有些旧柴明达尔的土地被剥夺了，便迫使其余的柴明达尔以同样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佃户。与此同时，柴明达尔作为一个阶级，要求他们解散他们的地方警察，并取消了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他们在自己的地区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一种经济性的，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成为他们与他们的佃户之间的唯一联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柴明达尔缴纳的赋税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康华里已经看到了这点，并设想政府可以从商业税增加的利益中支付它的开支，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乐观的假设。不过，柴明达尔的财富的增加鼓励了转租，各阶层的不在地主最终受到了孟加拉农民的支持。就像官员与百姓间的非个人关系促进了法治那样，柴明达尔与佃户之间的非个人关系促进了经济法规的运行。这种永久的解决办法，确实使孟加拉的乡村地区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这样该地区的资源能够得到开发，但其社会代价是昂贵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里才制定了有关租佃关系的法规。

黑斯廷斯时期公司各政府对印度其他势力所推行的冒险而反复无常的政策，带来了巨大危险却没有获得明显利益，于是英国政府要求结束此类战争和征服的计划。在信迪亚暂时处于软弱之时，沙·阿拉姆皇帝在1788年被罗希拉人首领古拉姆·卡迪尔废黜并弄瞎，这时康华里拒绝干预。另一方面，他认为和迈索尔再次开战已无法避免，遂决心不让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再陷于孤立。当尼扎姆^[24]提出与公司订立新协议时，他解释说议会禁止他缔结新条约，但答应在必要时公司的军队可给予帮助，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付公司的任何同盟者即可。当指出哪些人是同盟者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把迈索尔的提普苏丹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一直受到批评，认为它既不符合1784年印度法的精神，又是一种挑衅的姿态，虽然对于好战的提普来说是否还需要更多的挑衅是值得怀疑的。随后发生的战争，马拉特人和尼扎姆都参加了公司一方，结果是提普被割去了一半的领土。康华里声称：“我们有效地削弱了我们的敌人，也并未使我们的朋友过于强大。”^[25]的确，马拉特人的力量似乎正在内部分裂。信迪亚很快恢复了他在德里的地位，尽管沙·阿拉姆眼瞎，仍然被恢复原位，并对古拉姆·卡迪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但是当他把势力扩张到印度北部时，浦那的纳纳·帕德尼斯更加怀疑他的最终目的，遂鼓励其首要敌手荷卡尔的野心，以与之相抗衡。当信迪亚于1792年向南推进到浦那，并将其势力凌驾于帕什瓦之上时，纳纳的这种疑心看来是有道理的。荷卡尔及时地对他在北方的势力进行了挑战，但在拉凯里遭到失败。不过马哈吉·信迪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于1794年死去，留下了一个才能远远不如他的继承者，所有这些斗争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削弱了马拉特联盟的势力和浦那政府的权威。与此同时，英国的公司则兴隆发达。

另一方面，法国公司在巴黎和约后不久便不复存在了。法国此时恢复了它在1749年所控制的印度属地。但英国此时已拥有孟加拉的控制权，钱德拉纳加已不再是设防城市。甚至连出口货物的供应，公司也要依靠英国的善意。它缺乏充足的资本，很快就不得不请求政府的帮助。它的财政状况被揭露后引起了强烈的非难，以致1769年中止了对它的优惠，1770年其属地由国王接管。而政府对印度几乎没有更多的兴趣，当1778年对英国的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人毫不费力地占有了在那里的法国属地。1782年一支法国舰队到达印度水域，有3000名法

国部队登陆支援海达尔·阿里，这在马德拉斯引起了惊惶。法国部队未能有效地配合海达尔，但是法国舰队司令叙弗朗却比英国舰队司令休斯更胜一筹，他很快夺得了英国刚从荷兰人手中得到的内加帕塔姆和亨可马里。这样一来使英国人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没有港口，必须到孟买去整修和躲避10月到1月之间来自东北的季风。另一方面，法国人则能够从亨可马里和亚齐两地来威胁孟加拉湾。亨可马里有一个全年可使用的良港。亚齐在苏门答腊，叙弗朗决定在此过冬。但是在和平谈判中，英国人拒绝容忍任何在印度的法国政治势力重新抬头。他们同意恢复那里的法国属地，但仍不允许在钱德拉纳加尔设防。他们只允许法国自由、安全和独立地经商。但法国人如不能恢复过去的势力，他们也决心不放弃未来而让英国人控制亨可马里，因此把它归还给了荷兰。英国人只能满足于内加帕塔姆了。而如韦尔热讷所说，与亨可马里相比，让内加帕塔姆在英国人手中“有益而且无害”。^[26]法国人在其后来同印度各派势力的关系中继续暗示他们有朝一日将会派远征军把英国人赶出印度。但当提普的使节们在1788年到达巴黎时，法国政府仅仅向他们表示一番敬意，而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回程的船上，正装载着要法国军队从印度撤出的命令。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决定派一部分军队增援本地治里，但实际到达的不到400人。因此在1793年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又一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法国在印度的各殖民地。卡洛纳在1785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在专营印度贸易方面曾有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但在1790年它失去了垄断权，后来被国民公会解散了。只有法国的军事冒险家们留存了下来成为英国人的麻烦。在这一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印度各派政治势力尽心效力，以欧洲的方式招募并训练骑兵、步兵和炮兵。像为皇帝服务的马德（Madec），为奥德的纳瓦布服务的让蒂尔（Gentil），为尼扎姆服务的雷蒙（Raymond）和为信迪亚服务的布瓦涅（Boigne）只是其中最著名的几个。^[27]英国人对这些仍留在印度的军人心怀疑虑，既担心他们给潜在的敌人提供战斗力，又担心他们还可能保持着对法国的忠诚。

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考虑就这样影响着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发展进程，而它在印度以外的扩张则更多地决定于经济上的考虑。^[28]正如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欢迎法国被驱逐出加拿大从而使国家的精力得以转向更有用的途径那样，美洲殖民地的动乱似乎向许多英国人指明了建

立一个以商业为基础的帝国要比建立殖民地更为有利。英国的统治集团比法国的统治集团更容易接受这种考虑。甚至小皮特也宣称他的印度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公司商业的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起，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这个倔强的公司职员带头鼓吹在亚洲进行探险航行，为扩大英国贸易做准备。这种论点由于公司难以支付日益增长的从中国出口的茶叶的货款而更加理由充足了。1762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后切断了西班牙白银的供应，情况更加如此。事实证明公司无力填补来自印度的亏空。

普拉西战役后，公司得以用殖民地的公私收益来支付其出口货物的钱款，就已经停止将白银输入印度，伴随政治动荡人们聚藏白银，从而加剧了白银的不足。古拉姆·侯赛因·汗和其他一些人怀疑孟加拉的财富被那些携带财产回国的英国人吸干了。也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是靠“普拉西战役的掠夺品”提供财源的。这种看法后来被民族主义作家们所发展。^[29]事实上，那些在印度发财回国的人发现从欧洲公司购买汇票是汇回他们的财富的更简单和有利的办法。欧洲公司则用这些钱采购从印度出口的货物。这一时期对欧洲的主要出口仍然是棉布、丝绸、硝石和胡椒。但到这一时期末，欧洲市场正被英国的机纺棉布所占领，英国公司鼓励其他出口品的尝试未取得多大成功。而由私人企业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靛蓝却成为有利可图的出口物。公司认识到出口货物而没有等价的进口是会引起经济问题的。1785年董事会致函孟加拉称：“我们认为存在一种危险，恐怕那些把过多的岁收以商品方式输往欧洲的国家得不到回报，势必会使我们的领地财源枯竭，难以支撑。”但是他们仍决定照样增加其“投资”，即采购出口到欧洲的货物，他们用以安慰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公司的收购量少于往常的话，印度生产这些货物的手工业工人们将会受到伤害。这种思想后来也在那些维护英国统治，反驳民族主义者的批评的著作中出现过。总之，只要能从孟加拉输出白银，不是流入印度其他管辖区的政府就是流入中国。董事会仍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可以“从孟加拉提供购买中国货的款项，而不致榨干中国的流通硬币，因为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的”。^[30]1784年皮特的抵代税法促进了公司的茶叶贸易，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

欧洲虽然也有一个中国丝绸、瓷器和异国情调奢侈品的市场，但茶叶在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商品。英国是主要的消费者，虽然由于战

争的耗费迫使茶叶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使得走私非常有利可图。当抵代税法将税收从119%降低到12.5%时，英国公司对贸易的控制得到了保证。丹麦和瑞典的公司的贸易很快下降，那些名气不大的新发家的公司更加受害匪浅。不过荷兰公司已在欧洲发展了它自己的市场，从未依靠走私者来找顾主。它在亚洲各地广泛进行的贸易也使它能够从广州大量进口胡椒、檀香、香料和锡。但是英国公司感到难以为1784年以后大量增加的它从中国的出口物找到支付手段。^[31]它除了要运送大量白银外，还增加了英国毛织品和铅的进口，并曾试验代销英国的锡和铜。公司在印度的各政府尽了一切努力，但在填补支付平衡差额方面作出更重要贡献的则是从事“国内”或亚洲贸易的私营商人。公司鼓励他们把印度货物——特别是比哈尔的鸦片和孟买的棉花——运往广州，但他们必须把货款收入存入公司在那里的金库，兑换成它的票据。这笔钱公司用来支付其茶叶的出口。与此同时，英国对华贸易的扩张对中国当局在广州设立的“公行”的商业垄断强加了压力，而英国的制造商们则批评公司的垄断行为妨碍了他们在商业扩张中得到公平的份额。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前往北京有两个主要目的，即为英国对华贸易增加便利条件，和为英国的制造商们在亚洲其他地方另找新市场。其次的目的则是收集有关中国和远东整个地区的情报，以消除在广州的英国人的不满，并提高英国在中国的声誉。但马嘎尔尼只达到了收集情报的目的。有人说如果他遵从了中国的习惯向皇帝叩头的话，他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但也有人争辩说，荷兰使团在第二年虽行了叩头礼，却受到比马嘎尔尼更坏的对待。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荷兰人在去北京的途中所受到的无礼是地方官员们的粗鲁所致，与帝国政策无关，在他们返回的途中便受到了特别好的待遇。但是中国政府把所有这类使团都看作是朝贡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须改变它的贸易体制。

当1773年在婆罗洲东北岸附近巴兰邦岸岛建立起第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时，其目的在于吸引中国帆船并广泛促进英国对华以及对董事会称为“亚洲人迹罕到之地”的贸易。^[32]但该殖民地管理不善亦未设防，两年之后丢弃给来自苏禄的掠夺者。此后，商人兼船长弗朗西斯·莱特敦促公司在槟榔屿建立一个殖民地，他强调该处之所以有用不仅是个港口，而且可作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站。这是一项比较成功的事业，尽管孟加拉政府决定避免在邻邦进行政治上的冒险。

吉打苏丹同意了这项要求，期望得到公司的帮助来抵抗暹罗人的攻击，但是1786年在该地建立殖民地后，孟加拉政府却拒绝与他缔结任何性质的防御同盟，他继续认为他被欺骗了。槟榔屿未完全履行它原先的承诺。但是来自印度的“国内”商人在扩大对华贸易时已不顾荷兰人的反对而强行进入印度尼西亚的市场，用印度的产品交换白银和当地的商品而运往广州。在1784年的和约中荷兰最终承认了英国船只在东海的航行自由。

尽管荷兰公司在这段时期经济困难，但它仍能在亚洲抵制当地的反对而保持其政治势力。在锡兰，荷兰人向康提国王发动了进攻，因为他们认为国王一直在鼓励反对他们在科伦坡地区的权力。一支荷兰军队在1765年抢劫了康提，不过他们未能在哪里长期待下去，翌年签订的条约把锡兰全部沿海地区的主权让与了荷兰人。康提王国从此与外部世界隔绝，国王作出保证不与外国缔结任何协定，荷兰人则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外国的攻击。但是英国人在1782年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亭可马里，虽然他们没有留下一支足以抵御叙弗朗的驻军。这块地方只有归还荷兰人，因为不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打算看到它在对方的手中。这场战争也干扰了公司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致使它不得不请求本国政府给予财政帮助。政府派了一支由范布拉姆（Van Braam）率领的分舰队使公司得以击退正在兴起的布吉人的势力。布吉人此时已控制了柔佛，并正在袭击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的据点。荷兰人为了对付他们在婆罗洲的利益所遇到的同样威胁，通过支持该岛统治者的对手们，在该岛的西南两方都建立了他们的势力。但是他们这种努力未能持久，于1791年决定撤退。当荷兰落入法国的控制并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后，威廉五世从他的流亡地英国命令在东方的公司官员们把荷兰的属地交给英国以免其落入法国人之手。不管这些命令是否起了作用，英国人事实上毫无困难地控制了开普、锡兰以及荷兰在印度、苏门答腊西海岸和马六甲的属地。他们暂时没有占据爪哇。在荷兰，公司管理机构于1795年由一个政府控制的委员会所替代，公司本身于1799年12月31日宣告结束。它的财政状况曾是其本国政府已往数年来关注的一件事，而它的职员们仍在牺牲公司的利益而为他们自己发财。英国的公司只是在最近才由康华里把它从自己的官员们的贪污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它在日益增长的中国贸易中所得的利润正在掩盖它在其他地方的亏损，1793年得以把它的特许权再延长20年，荷兰的公司则在它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垮台后就不像它那么幸运了。

尽管如此，不论在英国还是在荷兰人们都普遍认为在东方谋求事业乃是最快的发财之道，到那里去的人也别无他求。由于议会相继对克莱武和黑斯廷斯时期的调查所揭露的情况，以及由于一些激进的著作，特别是在欧洲广为流行的雷纳尔神父的著作的影响，上面的想法更加有说服力了。的确，仅就那些城市的外观看，像加尔各答及其古典式圆柱和门廊，或者巴达维亚及其水道和荷兰式的砖房，必然会使人们想到住在那里的欧洲人并不大关心东方的审美观念。而在欧洲却似乎对此更为欣赏，人们可以在基尤皇家植物园或者慕尼黑的英国公园看到中国的塔；威廉·钱伯斯爵士采用了耶稣会士阿蒂雷（Attiret）所赞美的中国园林建筑及其模仿自然的艺术，而且这种对中国园艺的爱好从英国传播到了法国和德国。但是人们也可能会辩称，这一切并不是真正对东方思想本身的欣赏。阿蒂雷曾赞美的那种不规则的美，“无秩序的美”和“不对称”的风格正好与反古典主义的潮流是一致的。^[33]不论是花园或住宅，中国式和哥特式的物体和图形同样都被吸收，有时会发现它们并列在一起。

而且，欧洲人研究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时，往往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它们与基督教欧洲的关系，而是常常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寻找人类原始语言的根源，或是他们所认为的在《圣经》所记述的大洪水之前肯定已流传的那种宗教的痕迹。耶稣会士不顾被指控与异端妥协之嫌，大力赞扬中国的文明，他们中的象征论者^[34]声称在中国的古书中发现了有关亚伯拉罕或挪亚^[35]的材料。在印度，当弗朗西斯·威尔福德的梵学家们领悟到他所寻求的东西后，他们为他伪造了一本神圣的经文，其中包括闪、含和雅弗^[36]的故事，不过用的名字是沙尔玛、查尔玛和雅佩蒂，甚至连大学者威廉·琼斯爵士也被欺骗了。但是这样的争论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如果说伯拉罕玛（Brahma）^[37]是亚伯拉罕的讹误，那同样也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伯拉罕玛的讹误。^[38]因此伏尔泰曾强调指出他认为的未被歪曲的印度教教义既是古老的，又具有启蒙精神。或许印度是文明的摇篮，吠陀印度教是人类的原始宗教。他所认为的古代吠陀经文，事实上好像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或皈依者的作品，它所阐述的印度教教旨似乎与基督教教义相类似。当他称赞中国文明的价值并把孔子学说描绘成一种开明的自然神论时，他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耶稣会的资料。不过他的意思是中国和印度都曾有过比基督教欧洲的文明更古老和往往更开明的文明。

弗里德里希大帝说他是追随塔西佗的榜样，因为塔西佗曾称赞日耳曼人以使罗马人也成为优秀的人。虽然通过描述一位开明的东方来访者的惊奇或愤慨来批评自己的国家是当时人们喜欢采用的写作方法，但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是在中国找到了他们学说的实在的基础的。这里实行的是一种真正施仁政的专制主义，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保证行政官员像贤哲一样地明智，皇帝则是按自然法来进行治理，用不着天启宗教的帮助和干预。普瓦弗尔曾劝告欧洲的统治者仿效中国皇帝，因为他们十分了解农业的重要性，以致亲自开始春耕的第一犁——魁奈也曾发挥这一主题。不过重农主义者也不是完全不受批判的，另一些人——如安森或格林——对异口同声的称赞持强烈的异议。但总的说来中国被当作欧洲的样板。

虽然欧洲人在写有关亚洲的著作时仍然倾向于着眼于欧洲，不过这一时期人们的兴趣在扩大，伏尔泰就曾不无理由地批评波舒哀的《世界史教程》范围狭窄。印度也同样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那里供职唤起了少数优秀人士对这个国家的文明，特别是它的宗教的兴趣。道和霍尔韦尔都曾在那里的英国公司任职，伏尔泰从他们两人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关于印度教的知识，他们都热衷于强调他们在印度教教旨中所找到的深奥与精微的道理。沃伦·黑斯廷斯曾亲自推荐并由政府资助出版由公司另一名职员查尔斯·威尔金斯完成的《薄伽梵歌》的英译本。当公司担负起更多的行政责任后，它起用了一些语言学家以及印度教和穆斯林律法的翻译家为其服务。以178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建立为标志，开创了东方学研究的传统。1778年在巴达维亚也建立了艺术和科学学会，虽然最初还没有明确的东方学研究的倾向。此外也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即欧洲的爱好的标准并不是应考虑的唯一标准。当托马斯·珀西在1761年发表他的一些中国文学译作时，他认为有必要辩解说“如果用欧洲评论的法则来检验”，它们“在许多地方会遭到反对”。^[39]但是威尔金斯的《薄伽梵歌》是在董事会的授权下于1785年出版的，附有沃伦·黑斯廷斯的信作为序言，大意是说不应用“从古代或现代欧洲文学中衍生出来的规则”来判断它，而应按它本身作为一本深刻的哲学和神学著作的价值来判断。^[40]同样，威廉·琼斯爵士出版他翻译的《沙恭达罗》时，也称赞迦梨陀婆是“印度的莎士比亚”。^[41]黑斯廷斯和琼斯甚至希望鼓励在英国研究东方文学。一方面，东方文学有它自己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另一方

面，黑斯廷斯希望对《薄伽梵歌》这类著作的了解会消除他的同胞们把印度人作为未开化的人而加以藐视的倾向。其后不久，威廉·罗伯逊列举威尔金斯的《薄伽梵歌》和琼斯的《沙恭达罗》作为印度达到高度文明的例证，并从道义上告诫欧洲人应该改善他们对印度人的行为。^[42]此外，马斯登写他的《苏门答腊史》时，曾试图指出欧洲人的举止在这个国家是多么令人讨厌：甚至在舞蹈方面，欧洲人常常觉得东方的风格“可笑”，而苏门答腊人则觉得欧洲的风格同样“滑稽”。^[43]然而这是激动人心的发现时代。但不久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把东方的生活方式视为无效率而加以贬斥或视为邪恶而加以鄙弃的时代。

二 与非洲的关系

到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抱着新的期待和希望注视着非洲。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引用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话说，该大陆及其人民不仅能生产珍贵的金属，而且能生产“东、西印度贸易中的所有最昂贵的商品”；“他们一旦转向工业和引进技术之后，欧洲的产品和制成品出口到那里的数量也许会比出口到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数量都要大”。^[44]商人们和制造商们正在寻找新的市场，政治家们由于他们的殖民体系在战争中受到了损害，也在做类似的梦；在这一阶段，人们在采取试探性的步骤去发现他们背后可能存在的实质性东西。

要使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推断变成值得给予信贷的企业，第一位的需要就是准确的地理知识。扩展贸易的愿望有力地增强了研究正在发展的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在非洲所显示出来的兴趣，就像在其他未勘探地区所显示出来的一样。在林奈的鼓励下，许多瑞典植物学家在规模不大的旅行中进入陌生的国土，像斯帕尔曼在开普地区所作的那样，记录下该地可能拥有的经济潜力以及门类繁多的社会学方面的详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基尤皇家植物园植物研究主持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也鼓励在非洲的植物采集者。与他保持通信的人中有詹姆斯·布鲁斯，1768—1773年他在阿比西尼亚旅行时所作的考察是受到对门类广泛的各种科学的好奇心的驱使。班克斯在1788年建立“非洲内陆考察协会”方面起了作用。这个由学术界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会餐俱乐部虽然首先关心的是增进学识，但自然而然也就对商业发展的可能产生兴趣，它经过审慎考虑将其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据认为是非洲最富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苏丹西部。

西北部得到了优先的考虑，尽管在非洲建立的大量欧洲人殖民地在最南端。到18世纪末，那里的欧洲人约有2万人，而且殖民地的边境还在不断向前推进。仅开普敦本身就有大约1.5万居民，其中1/3是欧洲人。比较富裕和优雅的房屋的主人们享受着当时欧洲某些城市居民的舒适生活。18世纪没有从欧洲吸引来什么新的移民，直到1795年建立在民族出身基础上的差别日趋减少，因为南非的环境产生了一种独

特的殖民地文化，统一使用南非荷兰语，统一信仰影响广泛的荷兰归正教会。

但在经济方面，殖民地的未来如何仍然无法断定。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不十分鼓励出口货物的生产，只把开普视为一个战略基地和为其商人供应谷物、肉类和酒的地方，而不当作一个殖民地。它也很难提出什么主要产品来扩展商业，这个温带地区并不特别肥沃，不能提供欧洲国家在本国无法生产的东西。大量的土地供殖民者（作为一个整体）获得舒适的生活水平，而他们在荷兰经济中所应起的作用，则由于公司在财政上和商业上的种种限制的约束，没有发展的希望。到1779年在开普地区发生了一场爱国运动，它引用洛克、格劳秀斯和亚当·斯密的话，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和更加自由的贸易，扩大公民权和更广泛的代表权。

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争夺越来越对该地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英法在印度的冲突以及随着英国势力在那里的巩固，使伦敦当局不仅急于确保他们自己去印度的“中转站”，而且不能容许法国利用开普敦。荷兰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干预；德·叙弗朗海军上将于1781年抢在英国远征军之前占领开普，以及后来法国人对联合省内“爱国者”反对派的资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部非洲成为日益严重的帝国角逐的地区。因此革命的法国对荷兰的入侵很可能威胁到英国在东方以及在大陆上的利益；从而为它提供了在1795年夺取开普的机会。[\[45\]](#)

南非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东部各地区的阿非利加人边境居民。实行族长统治的牧民和猎人，强横粗野，比在西部定居的拥有奴隶的农民更加顽强，对政府和束缚更具有反抗性。[\[46\]](#)获得6000英亩的整块贷款农场，[\[47\]](#)被视为每个新一代成员出生后应享有的权利。大迁徙的布尔人为得到这样的土地，把他们的定居点的边界一直向前推进，直到与科萨人相遇为止。科萨人是逐渐向南迁移的讲班图语的民族的前锋，他们也在寻找新的牧场。公司的政府试图规定一条边界线以隔开这两部分人，但是双方都不肯自愿地限制自己的扩张。渐渐地，布尔人因为拥有火器，而且他们的加尔文派宗教信仰、贪婪、恐惧和顽固的种族傲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决心，使他们的力量加强了，于是向东推进其边界。1779年科萨人并非是无缘无故地抢劫了阿非利加人的牛群，于是揭开了“第一次卡菲尔战争”。1781年布尔人的突击队

获胜，把边界推进到了菲什河。不过这只意味着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许多科萨人仍留在菲什河以西的地方（有些人与布尔人通商，或者受其雇佣），一些阿非利加人则渡河到达河东地区。到1793年旱灾期间重开战端，其直接责任至少应归咎于布尔农民林德克（Lindeque）；政府代表梅尼耶（Maynier）在未把科萨人赶到菲什河对岸，也未收回全部被盗牛群的情况下讲了和。但冲突在继续。1795年，边境居民被他们认为是政府的亲黑人态度所激怒，发动了叛乱，并宣告成立独立的赫拉夫·里内特边疆共和国。^[48]虽然这些阿非利加人的目标是地区性的，但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他们大力追求这一目标。他们与波斯尔思韦特的发展当地非洲人经济潜力的梦想背道而驰。

在菲什河以北，最初代表欧洲人在东海岸的势力的是莫桑比克的正在衰落的葡萄牙人殖民地；在该地的绝大多数殖民者都是果阿人或黑白混血种人。有少数奴隶被船运到开普及美洲；虽然商人们偶然谈到在这些水域的“经商的新途径”，但是在他们去东方的旅途中却从未在那里停留。在马斯克林群岛拥有发达的种植园殖民地的法国人对从东非或马达加斯加获得奴隶和供应极感兴趣，但是他们对重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政治立足点并不热心，1768年之后，这些立足点几乎是令人感到可笑地逐渐落入匈牙利冒险家贝尼奥夫斯基（Benyowski）手中。^[49]1777年一位法国商人建议政府在基卢瓦建立一个新殖民地，一个新的特许公司将在那里沿着海岸进行奴隶和象牙贸易，并出售法国枪支和白兰地酒，以及印度纺织品。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让法国商人也能在迄至当时为止一直由阿曼的阿拉伯人控制的东非与西亚之间的贸易中占一席之地。但法国当局不愿冒与马斯喀特冲突的风险，而让这种较小的贸易由阿拉伯人加以保护。^[50]法国更关心的是对印度的西方通道的政治影响而不是实行东非贸易的风险计划。

同样的考虑支配着列强们和埃及的关系。少数欧洲人意识到这个国家在商业方面的前景，它不仅可以作为对亚洲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又可作为非洲商队的终点站。但实际的贸易仍然很小。部分是因为马木留克贝伊对苏丹的权威的反抗造成政治不稳和混乱，部分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力保护它在海上贸易通道上的特权。土耳其人则禁止基督教徒在红海贸易，并得到英国利凡特公司的支持。因此当贝伊们在1766—1779年间鼓励英国船只从印度航行到苏

伊士时，上述两个公司成功地怂恿政府反对这样的事态发展。法国商人却在埃及进行更多的贸易；^[51]有些法国人认识到埃及的潜在重要性，可以作为向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发动新的攻击的基地。舒瓦瑟尔-古菲埃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开始新的尝试以发展法国在埃及的势力，不过还没有取得成功。英国的反应却是举棋不定，虽然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业已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来，当时向印度紧急派遣部队首先要通过苏伊士。为了保证通信和对付法国的活动于1786年在开罗重建的领事馆，由于节省费用于1793年撤销——恰恰是在法国恢复其领事馆的时候。^[52]

欧洲与北非沿岸其他地区的关系更多的是与地中海而不是非洲的事务有关。在商业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统治当局与利凡特地区关系最为紧密，不过它们与南部欧洲的商业关系的规模和稳固性往往被低估了。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进口制成品，其中一部分供应穿越撒哈拉的商队。同时出口谷物和当地的其他产品，主要是输往里窝那和马赛。在摩洛哥也一样，像穆拉伊·穆罕默德（1757—1790年）这样的强有力的统治者鼓励欧洲商人，但控制其贸易的地点和条件。有利害关系的欧洲人偶尔提议在上述北非诸国采取军事行动。西班牙在休达与奥兰之间保持着五块小小的领土作为据点。葡萄牙在1769年以前一直据有马扎甘。但总的说来，欧洲只满足于对已有的贸易提供保护，并不寻求过多改变它与马格里布的政治或经济关系。

^[53]

但人们逐渐认识到马格里布还有内陆地区，撒哈拉商队的商路（数千奴隶带着黄金、象牙和其他产品，每年通过这些商路抵达地中海）可能为同苏丹西部开展更广泛的贸易打开方便之门。^[54]非洲协会最初倾向于通过这条路线进行考察工作。1788年它派出的首批使者莱迪亚德和卢卡斯分别从开罗和的黎波里出发，虽然前者死亡，后者返回，但协会通过不引人注意地询问撒哈拉商人的方法使非洲的地图大大地精确了。但是，物质上的困难，再加上那些在已有的贸易方式中获得利益的人对外来的闯入者采取抵制态度，使得撒哈拉被探险家们视为畏途，对贸易事业来说也无希望可言。1790年，协会新派的使者霍顿从冈比亚开始了他的探险，芒戈·帕克在1795年也是这样做的。欧洲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西海岸，在其未来发展方面同样是一个关键地区。

1763年跨越大西洋的奴隶出口，在绝大部分西部非洲的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对种植园劳工的需求仍在扩大，只是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而暂时受到妨碍。英国人是带头者，除了供应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外，还供应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法国的奴隶贩子们在七年战争后不久就使这种贸易很快从完全停止的状态中得到了恢复。1784年以后，由于得到政府的津贴，他们在安哥拉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英国人。葡萄牙的奴隶贩子们显然生意依旧兴旺；北美洲的贩子们甚至在独立前就在航运奴隶。西班牙在1778年宣称费尔南多波岛属于自己，目的在于加入这种贸易。似乎只有荷兰人，可能还有丹麦人退却了。还没有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可靠的数字以说明奴隶贸易的规模、地区分布和起伏波动情况，但综合现代的各种估计，足以说明那个时期从西非输出的奴隶平均每年在8万人之上。这些人半数以上大约是由英国船只装运的，法国船只运载的约占1/4。[\[55\]](#)

虽然奴隶是西非最重要的出口，但并不是唯一的。机会好的话，黄金和象牙也是有利可图的，只是数量较小而已。沿海地区的大象头数在下降，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用谨慎的怀疑态度来对待有关非洲矿产丰富的诱人故事。在染料木的贸易方面，到1788年有12艘英国船被雇来直接将其运往欧洲。[\[56\]](#)来自塞内加尔河附近森林的树胶是某些纺织品精加工的必需品，成为国际上争夺的一个主要目标。英法两国先后在圣路易斯站住脚后便设法让经营树胶贸易的卜拉克纳人和特拉尔扎人专门到波多尔和沿河港口交易；而竞争的另一方则设法在大西洋沿岸的阿尔金或波滕迪克进行贸易。但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地方有任何非洲的产品重要到足以成为欧洲与非洲之间直接贸易的大宗商品。这30年间直接从非洲进入英国各港口的货物的价值只及英国向非洲出口的1/9。[\[57\]](#)为了装满货船也可能购买少量的皮革和蜡，棕榈油和靛蓝，经过美洲而运到欧洲；但是劳工仍然是大西洋经济中非洲所能大批供应的唯一最重要的商品。

欧洲人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奴隶贸易上，并非由于人性特别残酷的扭曲所致，甚至根本也并非出于各国政府有计划地安排殖民地经济的愿望。这个时期的特征之一是反复为在西非发展新的农作物和市场制订计划。这些计划或多或少都是不明确的和基于错误的情报。1766年，英属塞内冈比亚总督奥哈拉抱着荒唐的希望在于蕴藏着黄金的加拉姆地区建立欧洲人殖民地，从邻国获得棉花、大米、烟草和靛

蓝，并通过在地中海沿岸的商队中的代理人在更东边的尚待考察的地区为英国制造商们开辟广阔的市场。^[58]与此同时，在安哥拉，蓬巴尔^[59]派去的精力充沛的总督索萨·科蒂尼奥正在努力发展白人殖民地、商业性农业，甚至铸铁业。德马内神父（Abbé Demanet）（后来的塞内加尔公司发起人之一）则把萨卢姆河和卡萨芒斯河不仅看成是通往金矿的道路，而且是木材、靛蓝和其他野生产品的来源。德马内认为布拉马岛可以种植棉花和甘蔗，他的想法被总督所采纳，他当时任总督的随从牧师。^[60]1777年轮到英国寻找替代美洲殖民地的地方了。英国议员坦普尔·勒特雷尔在攻击英国的非洲利益集团的现有组织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异想天开的前景，即通过冈比亚河到达尼罗河，从而为英国货物开辟巨大的新市场，并获得与“我们从美洲获得的一切贵重产品”同样丰富的资源。^[61]1785年，英国政府认真考虑以流放罪犯向上冈比亚移民的办法。但利用旧世界来补救新世界均势改变的希望，仍然是建立在对地理和农业情况知之甚少的基础之上的。

18世纪后半叶在英法两国都出现了使非洲贸易走向“自由化”的倾向，就狭义上讲垄断局面已告结束，立法机构谋求保证国旗下活动的个体商人的经商机会。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两国政府自身势必起更主动的作用，承担起原先由享有特权的公司以其赢利维持的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责任。英国对非贸易商公司是1750年在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经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不得以法人资格进行贸易。它的作用是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由议会给予津贴，负责管理现有的贸易站，以维护所有英国对非贸易商的利益。这样一个机构也许满足了在黄金海岸业已立足的商人的需要，不过批评者指责它不起作用并牟取暴利。但它难以胜任既有内陆贸易又有更复杂的边界问题的被占领的塞内加尔的管理工作，也无力抵抗在该地区继续角逐的法国人。^[62]因此，1765年塞内加尔各征服地和较早的冈比亚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成为塞内冈比亚殖民地，建立了一个“在环境差异所允许的范围内的”美国模式的政体。但是英国政府没有适当的机构管理这样一个殖民地，更谈不上去实现奥哈拉的美梦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它轻而易举地丧失了塞内加尔，并将冈比亚贸易站交回商人控制。

1763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把它们在非洲剩下的一些机构交给了国王（仍保留在怀达的贸易站直到1767年）。戈雷岛归皇家总督管辖，他

们尽最大努力恢复大陆上的法国财产，出租达喀尔四周的土地，重建在若阿勒、波图达尔和阿尔布雷达的贸易站，并设法把内陆贸易从冈比亚的英国人那里转移开。但是从巴黎得到的支持是软弱无力的，这块殖民地主要起着法国奴隶贩子向更远的南方航行时的停靠港口的作用。像非洲殖民地通常发生的那样，殖民者社会内部常发生冲突；商人们埋怨总督们滥用他们的地位牟取私利，而总督和私商们则联合起来告发一个新建立的公司。在70年代和80年代相继以不同的称号开始利用其巴黎的影响在非洲谋取新的特权。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西洋海军力量的变化，非洲政策不再具有任何优先地位，使法国于1779年得以重新占领圣路易。这一收获在凡尔赛和约中加以确认，英国的谈判者们集中注意于取得波滕迪克的橡胶贸易。在更南的地方，军事行动的力量对比比较势均力敌，因而该和约中没有包括直接损害英国在奴隶贸易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款。

但是胜利使法国政府得以着力扩展其对非政策的范围。在塞内加尔河本身，塞内加尔公司逐渐取得了控制权。从1786—1791年，它垄断了从布兰科角到佛得角之间的所有贸易，并承担制订殖民地预算的责任。不过在更南的地方则通过津贴运输奴隶的费用和一年一度的海军巡逻来鼓励私商们的活动。它与沿海的萨卢姆等王国签订条约，目的是希望转移从冈比亚进行的内陆贸易。法国人那里曾经商多年的位于塞拉利昂河口湾的冈比亚岛于1785年1月落入法国手中。1785年11月给总督德·布夫勒（de Boufflers）的训令中首次包括有关更加往南地区的法国商人们的一般情况。^[63]1786年在黄金海岸的阿莫库建立了一个法国的贸易站，由怀达的总督管辖，他也受权更积极地保护和扩展从拉霍角到阿德拉之间的法国商业。^[64]朗多弗船长代表圣马洛的一家商号在瓦里建立了一个工厂，但未获得独家经营法国商业的特权。^[65]由于发起它的政权垮台，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发展步骤半途而废。

尽管那些“策划人”，甚至政府，对内陆的兴趣有增无减，欧洲贸易对西非各民族的直接影响不论就重要性和地理范围来讲仍然有限。欧洲人很少离开海岸和可航行的海湾一二英里以上。在“谷物海岸”的贸易通常实际上是在停泊于海岸外面的船上进行的。只有在贩奴地区以北的地方，才试图在河流上游的地方建立贸易站，收效也大不相同。在冈比亚，商人定期来到后来以麦卡锡命名的那个岛的上

游，有几次曾航行到巴拉孔达瀑布以上的地方。溯塞内加尔河而上，波多尔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英国人和法国人先后派微弱的兵力驻守该地。一年一度的贸易旅行远达与法莱梅河汇合处上游的圣约瑟夫城堡的废墟。塞内加尔公司的一个代理人从陆路于1786年来到该城堡，但在做了一年生意之后被杀害了。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再无其他任何地区的水路可以这样没有严重障碍地航行，这里的经济也不完全是贩卖奴隶，那些内陆的国家愿意而且能够保护欧洲人的贸易，以换取保证给他们的利益。

在其他地方向内陆渗透所遇到的最严重障碍不是崎岖的地形所造成，甚至也非流行病所致。处于沿海有利地位的非洲统治者，不愿意让欧洲人经过那里而进入他们邻邦的国土。唯恐因此而危及他们的商业垄断。即使在塞内加尔河上，加拉姆的护航队在中间的一段路程上也不得不穿过敌对民族的夹攻。坚定的欧洲人只要受到充分的鼓励无疑能克服这种敌对行动，但是只要奴隶构成西非贸易的大宗商品，对内地的渗透就不会有收获。如果不在非洲保持可观的武装力量——这是贸易所获利润难以供养的，而且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打算——欧洲人就不可能自己去捕获奴隶，更无法把奴隶安全地运送到海边，而他们更希望能运到紧靠船的地方。因此，在那些沿海人能够提供有秩序的机构并保证定期供应奴隶的地方，符合欧洲商人的利益的做法是与他们合作，依例纳税，遵守当地的经商惯例，并接受与之交易的人所规定的大部分行动限制。这种关系也许比通常所保持的那种关系牢靠得多，不仅有许多欧洲人独自在非洲生活多年，有着绝对的个人安全，而且他们一般都会发现，以贸易货物的方式，向非洲的代理人和中间商提供大量信贷，是安全而有利可图的。

然而，欧洲的文化影响仍是表面的。欧洲人对当地供应者的依赖，可能使他们对非洲的体制出于利害关系而给以某种尊重。种族傲慢并非奴隶贩子们的一成不变的特征，欧洲人无法无天或欺诈行为的最坏的事例并非正规商人们所为，因为他们要保持信誉。但是很少产生亲密的社会接触。即使在大陆上已形成永久贸易机构的地方，欧洲人为谨慎起见，也往往把他们与邻居的交往减小到最低限度，并多少依照正式的传统做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有在安哥拉和刚果才有算得上有规模的基督教传教团体，他们在那里的老辈人中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他们的影响似乎很难深入。

当然，非洲社会对经济关系中的变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响应。对外贸易有时会使一个能随机应变的当地王朝增加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资源，帮助它加强并扩展其势力，如在阿散蒂和达荷美。另一方面，在老卡拉巴尔，埃菲克人因给欧洲船只供应奴隶而繁荣起来以后，开始在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扩展其政治权威，特别在商业性事务中更是如此。这些商人居住在进口的两层木屋中，用英语与利物浦的商人通信，据说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英语学校。埃菲克人的社会明显地因贸易而改变了。^[66]然而他们像绝大多数非洲人一样，除了机灵的生意经和对某种类型的消费品感兴趣以外，还没有从欧洲直接移植来什么东西。

在西非，最近似于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殖民地的是圣路易，它是法国人在塞内加尔河的一个岛上建的一座城市。在1779年归还给法国时人口有3018人，其中包括383名欧洲人和777名黑白混血人或自由黑人。在大约10年内人口总数翻了一番，大部分是自愿从内地来的移民。许多非洲人和黑白混血人是工匠或小贩，其余人则因从事到加拉姆的贸易航行而发了财，这是绝大多数欧洲人所不愿从事的。天主教徒在这里占多数，有些是穆斯林，1779年以后法国总督从他们中间任命一位市长，要他负责当地的警察事务，^[67]葡萄牙人在比绍、罗安达和本格拉的各殖民地，曾一度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时已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在比绍仍然有许多非洲人和黑白混血人至少还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念珠和十字架也出现在奴隶贩子们的商品中。那些殷实的非洲商人，他们懂葡萄牙文，用他们自己的船航行远达里斯本。^[68]但是在黄金海岸一些殖民点（满怀希望地称为“城堡”）只有极少数在城堡里面或在所属的村庄里面的非洲商人或仆人学会了欧洲人的技术或思想。在1780年，有211名非洲人依靠法国人的怀达城堡为生，这个数目被官方认为是过大了。另有500—600名非洲人为10个英国人的城堡服务。

沿海地区的非洲人的确有某种接受欧洲教育的要求，往往出于一种理由，坦白地说就是“读书，并学会像白人一样凶狠”。^[69]为达到此目的，少数人来到欧洲，瓦里的布达孔王子在巴黎学习宫廷舞，并用单簧管演奏军乐曲。仅利物浦一地，估计每年有50个黑人或黑白混血的儿童在上学。菲利普·夸克在伦敦受过教育并接受神职后，于1765年带着英国妻子回到了海岸角，开办了一所小的学校，主要是为

了贸易站的孩子。[70]但一般说来，欧洲人在西非的据点仍然是外国文化独立的飞地，而不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传播这种文化的桥头堡。

在有些地区，也许没有严格划定的边界线。在冈比亚和开普芒特之间，葡萄牙和英国的商人们定居于相对隔绝的海岸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欧非商业阶级。土著非洲人和黑白混血人作为委托人或中间人起着重要作用，在外国商人自己无法到达的内陆地区从事赊账贸易。工资劳动者，称为“格拉梅塔”（grumettas），有时学习欧洲的技术；有的英国工厂用当地的劳工建造大型近海船只，运奴船有时雇用非洲人做水手。在贝宁湾，除黑白混血人外，还有从巴西当奴隶回来的黑人。亚当斯船长曾提到约鲁巴纺织品出口贸易在这里发展的情况，[71]这些商人阶级的成员也许会说一种混杂着葡萄牙语或英语的方言，他们送孩子去欧洲受教育，甚至信奉天主教，口口声声说“我们的主”（Pater Noster），并让偶然来访的神甫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但是，整个说来，即使是最密切的商业来往中，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也少得惊人而肤浅。因此很难证实当时关于由奴隶贸易产生的接触正在逐渐使非洲“文明化”的说法。

通过进口实际货物换取奴隶也并没有间接地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些进口货中主要是纺织品（许多是印度制造的）和五金器具，起主要作用的是当地的消费者。在黄金海岸的一些地方，巴西烟草是贸易的主要项目：朗姆酒、白兰地和其他酒精饮料虽然可找到日益扩大的市场，但仍只是次要的货物。[72]然而，即使说非洲进口的货物没有起败坏其人民道德的作用，但用人换来的货物也不能认为会帮助经济发展——货物中引人注目地缺少生产工具。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进口货是枪支、火药和子弹，到1775年时该类商品已成为贸易中主要的和占支配地位的项目。不管贸易中使用的枪支质量如何低劣，能得到它们往往给掌握它们的人以决定性的权力。达荷美的历代国王非常了解这一点，他们在18世纪曾数次进行战争以保证该地区的进口货物都集中在怀达一地，受他们的控制，并保持那里的武器交易由王室垄断。

对外的奴隶贸易究竟是怎样导致非洲社会的堕落以及究竟堕落到什么程度，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许多次战争可能是为了获得奴隶而引起的，但是获得奴隶并不是引起非洲所有战争的唯一原因。19世纪的“合法贸易”也同样是造成许多冲突的原因。战争也不是得

到奴隶的唯一来源，有少数是被绑架的，有的是为了抵债而出卖的，许多人是因为行巫术、凶杀和通奸而被流放的。不过，即使说怜悯有时会使反对这种贸易的人夸大其恶劣影响，但有一条基本的批评意见也许能够概括一切。沿海地区对奴隶的显然是贪得无厌的需要，使那些其经济以出口人力为基础的人民极难适应，也使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劳动增加农业或林业作物的生产。就连皇家非洲公司的辩护士波斯尔思韦特也看到了奴隶贸易“将永远阻碍这些民族走向文明和贸易向非洲腹地的发展”。[\[73\]](#)

虽然在废除奴隶贸易的仁慈要求背后，显然有经济原因，但是要说废奴已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则是另一回事。到18世纪80年代，欧洲的经济变化正在使依靠奴隶贸易赚钱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但由于非洲生产不出对新兴工业十分重要的商品，而且也无法证明有出产任何这种商品的可能性，因此没有明显的理由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从立法上加以废除。在美洲的许多不发达地区仍然大量需要不熟练的劳工，而且英国纺纱机对棉花需求的增加实际上似乎使这种需要进一步增加。如19世纪也将表明的那样，仍然存在一个不仅使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得以继续而且还可能大大扩展的充分的经济基础。

然而即使从商业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但并非对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丹麦人发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所需的劳动力——大致每年新添奴隶1200人——为数太少，难以支撑不论是私商还是特许公司所进行的奴隶贸易，使之有利可图。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试图鼓励在黄金海岸东部建立咖啡和棉花种植园，但没有多少成效。[\[74\]](#)1783年，克里斯蒂安堡总督试图在沃尔特河上实行进军政策以加强丹麦的基地，结果建立了三个新的城堡。但这仅仅是增加了贸易的管理费用，并没有改变经济上的问题，于是该王国在1792年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丹属西印度群岛将依靠自然再生产来代替从国外输入。10年间该群岛的奴隶人数以及女性所占的比例虽都将有所增长，但从1803年起丹麦将禁止其国民从事奴隶贸易。[\[75\]](#)

其他的国家则发现要把人道主义与明智而稳妥的政策二者调和一致并不那么简单。法属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圣多曼格岛，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劳动力，而法国反对奴隶贸易的著名人士也只是在安的列斯群岛的阶级和种族冲突迫使革命的议会注意这类问题时，才变得重要起来。1788年建立的黑人之友社，由于其成员都是知名人士而博得了知

识界的尊敬，其中有布里索、孔多塞、米拉波、拉法耶特、西哀士。但是，在法国几乎不具备使反对奴隶制的主张得以发展成一场有效运动的条件。提交三级会议的一般陈情书只有49份是指责奴隶制的，其中几乎全都只不过是主张最终废除奴隶贸易。[\[76\]](#)

在英国，经济的发展逐渐指出了与非洲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途径。美洲的丧失提出开辟热带产品新来源的要求的同时，日益成长的制造业利益集团要求扩大市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在帝国的经济中相对地失去了重要性，它们的特权地位似乎对国家的繁荣不再是主要的了，从而变得比较容易受人攻击。后来，有远见的人士认识到，土地肥力的下降，新进口的劳动力对英国诸岛来说，不如对它们的手对手更重要。废奴运动虽然并不完全是由于突然意识到民族的价值而出现的，但也不完全能够从经济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经济的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在全世界明显出现；而许多有权势的人长期以来相信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富裕有赖于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一个主要代表土地所有者的议会是强烈地倾向于维护财产所有权、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在西印度群岛的特权的。即使经济的变化使议员们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奢侈的生活，但如果没有人道的和宗教的人士有意对这些心安理得的人提出挑战的话，立法行动可能会长期拖延下去。[\[77\]](#)

由贵格会教徒四年前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在1787年扩大以后，废奴主义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它的首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克拉克森在他的实地调查中使用了有重大意义的新方法。他为了能在枢密院、历届议会委员会和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公众面前拿出准确的材料，他走遍全国，测量船只，查阅档案，并询问了不计其数的海员。他把大部分注意力用来证明，一旦废除奴隶贸易以后，非洲可以为增长中的欧洲贸易提供何种产品。成千上万包括证据和忠告的传单和小册子到处流传。各大地方城市中虔诚的男男女女组织了反对奴隶贸易的各种请愿。1788年，首次在下院举行有关废奴问题的辩论，规定每只船可载奴隶数目的多尔宾法案在该年得到通过。1792年以前，维护奴隶贸易的人一直采取拖延战术，于是下院在原则上通过四年内加以废除。这场斗争并未取得胜利，战时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延迟了最后的解决，不过进展的迅速仍是惊人的。

废奴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的非洲政策局限于禁止输出奴隶，许多人也在寻找一种欧洲与非洲之间关系的新的经济基础。有的人支持

非洲协会的考察计划，另一些人，特别在塞拉利昂则主张推动殖民化。那里的殖民地是由格兰维尔·夏普和英国其他一些关心“救济黑人贫民”的慈善家所发起创办的，它采用了生物学家亨利·斯米思曼的建立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殖民地以开发该地区资源的计划。政府给了一些援助，于是411名移民，有黑人也有白人，在1787年4月离开了普利茅斯。尽管夏普的热心关怀十分具体，但这个殖民地的问题并未能实际地预见到，到1791年，原来的移民重新集合时只有64人了。但是与此同时，该计划通过1791年经议会批准建立的塞拉利昂公司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下院议员、银行家和福音派牧师亨利·桑顿被任命为该公司董事长，使该计划有希望得以有条不紊地实施。这时有人提出依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定居在新斯科舍的黑人亲英分子为殖民者的主力，结果其中有1196人于1792年1月航行去非洲。^[78]

新发起者们的双重目的反映在他们最初的指示中。该殖民地将建立“一种以真正的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对非贸易，运出英国的制造品和其他进行交易的商品，运回交换来的非洲产品”，其最后目的是“向一个长期停留在野蛮状态的广袤国家送去工业和文明的幸福”。将努力在该殖民地种植甘蔗和其他农作物，打开与遥远的内陆的贸易。^[79]董事们不承认在人道主义理想与商业意识之间有什么冲突可言。虽然利润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但他们最终还是期望得到利润，即使仅仅是为了证明该计划是经过周密构想的。后来有些作家硬说他们的动机是唯利是图。当时一位愤愤不平的人把董事们说成是：“一群伪善的清教徒”，因为他们使用的方法并不完全是商业式的，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用来描写移民的进步和谴责奴隶贸易的篇幅远比为其不正当收支平衡进行辩护的篇幅大得多。^[80]

认为塞拉利昂是一个由贪婪的银行家和狂热者结成的不稳定的联盟所从事的孤立的冒险事业是无法令人满意的。经济目的是较早期非洲发展计划的直接发展；而慈善目的当时也是其他人所共有。1779年，一群斯维登伯格^[81]的信徒计划在西非建立一个乌托邦式殖民地，一度引起古斯塔夫三世并非没有个人打算的注意。^[82]1792年，一批由275人组成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着手进行一项计划不周和注定要失败的计划，用自由的非洲劳工在布拉马岛上发展甘蔗、棉花和靛蓝的种植园。^[83]在新斯科舍人到达塞拉利昂后不久，附近的奴隶贩子们便重新试图在塔索岛上培育种植园作物。^[84]如果考虑

到发起这项事业的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应当说塞拉利昂是在非洲沿海发展种植业和与非洲内陆开展贸易的许许多多尝试中资金最足、设想最大胆并且最成功的一个。

尽管如此，它的成功依然是有限的。最初几个月，在正式房屋尚未建起之前，疾病就夺去了许多移民的生命。事实证明在该半岛发展农业是令人失望的，在毗邻地区继续存在的奴隶贸易造成许多困难。如果财政支持不济的话，这个殖民地可能已经垮台了。但就是这个幸存下来的群体，却向非洲移植了诸如福音派基督教和陪审团等当时英国文化的各种特征。的确，新斯科舍人从前的殖民经验使他们显得过分坚持他们的政治权利，过分热心于某些宗教仪式，甚至连那些虔诚的董事们也适应不了。周围的地区也受到了影响。邻近的种植者将食品送到弗里敦来出售；曼丁卡人商贩从苏丹带来黄金、象牙和皮革来出售；当地的一些人设法在这里上学或寻找挣工资的工作；移民们开始外出到从蓬戈河到歇尔布罗河的各条河流进行贸易。1794年，公司的两位欧洲职员到达了富塔贾隆。^[85]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条件下，这块新殖民地开始改变着非洲的社会。

战争在欧洲开始后，扩大非洲产品贸易的可能性从而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并进行了一些小规模试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在奴隶贸易中有牢固利益的欧洲人和非洲人仍然对任何新的发展抱有偏见，革命战争也使废奴主义者的努力放慢了步伐并遭到了歪曲。

（屠尔康 潘日霞 译）

[1] 奥里萨仅仅指米德纳布尔地区。

[2] 迪万（diwan），莫卧儿王朝时期相当于财政、司法大臣的官员。——译者注

[3] 纳瓦布（nawab，亦拼为Nabob），莫卧儿王朝时期的省督。——译者注

[4] 来自孟加拉的函件，1767年1月24日，第4段，N. K. 辛哈（编）：《威廉堡——东印度公司总部（India House）书信集》，第5卷（1949年），第277页。

[5] 克莱武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函件，1765年9月30日，第12段，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来函，第7卷，第29页及以后各页。

[6] 政府提供的援助有一部分通过了1773年的茶叶税法，允许公司可以直接向美洲殖民地出售茶叶，而不必先打包在英国公开出售。该项措施在宪政冲突的关键时刻大大地触犯了影响很大的殖民地利益集团。见后文第16章，原文第458页。

[7] 纳波布（nabob），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译者注

[8] 致孟加拉函件，1769年6月30日，第13段，N. K. 辛哈（编）《威廉堡—东印度公司总部书信集》，第5卷（1949年），第212页。

[9] 来自孟加拉的函件，1772年11月3日，第7段，印度事务部档案局，第11卷，第84页。

[10] 柴明达尔（zamindar）原意为“土地持有者”，在印度历史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柴明达尔的性质有所不同，这里主要指政府的田赋征收人。——译者注

[11] 1774年3月21日黑斯廷斯致曼斯菲尔德信，G. R. 格莱格《沃伦·黑斯廷斯》，第1卷（1841年），第401页。

[12] 1772年2月23日，黑斯廷斯致G. 科尔布鲁克爵士，不列颠博物馆，手稿29127，第15b。

[13] 马拉特人首相的称呼。——译者注

[14] 与传说相反，他并未蹂躏整个卡纳蒂克地区，因为他自己想要占领它。见C. C. 戴维斯（编）《马嘎尔尼勋爵私人通信集》（皇家历史学会，卡姆登文件第3辑，第77卷，1950年），第IX页。

[15] 转引自L. S. 萨瑟兰《18世纪政治中的东印度公司》（牛津，1952年），第384页。

[16] S. 魏茨曼博士：《沃伦·黑斯廷斯与菲利普·弗朗西斯》（曼彻斯特，1929年），第186—187页，对皮特突然改变了主意，或他曾有意支持黑斯廷斯的说法提出了疑问。C. C. 戴维斯博士：《沃伦·黑斯廷斯与小皮特》，载《英国历史评论》，第70卷，第609页及以下各页提出皮特曾一度持有对黑斯廷斯不利的意见，也许是由于受到伯克和弗朗西斯的宣传的结果。

[17] 24，乔治三世，C. 25，XXXIV。

[18] 24，乔治三世，C. 25，XXXIX。

[19] 致孟加拉的函件，1786年4月12日，第6、23段，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函件，第15卷，第330页及以下各页。

[20] 致孟加拉的函件，1786年4月12日，第85段，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函件，第15卷，第373页及以下各页。

[21] 致孟加拉的函件，1786年4月12日，第88段，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函件，第15卷，第375页。

[22] 备忘录，无日期，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税收评议，1790年12月3日，第191页及以下各页。

[23] 备忘录，无日期，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税收评议，1790年12月3日，第191页及以下各页。

[24] 尼扎姆（nizam），旧时印度海得拉巴土邦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25] 康华里致H. 邓达斯信，1792年3月4日，C. 罗斯（编）《第一代康华里侯爵查尔斯书信集》，第2卷（伦敦，1859年），第154页。

[26] 韦尔热讷致雷内瓦尔信，1783年1月18日，转引自V. T. 哈洛《英国第二帝国的建立》，第1卷（伦敦，1952年），第392页注。

[27] 德·布瓦涅实际上是萨伏依人。甚至在他离开印度之后，韦尔斯利总督还错误地担心他的影响，说他是“波拿巴的主要心腹”。见S. P. 森《在印度的法国人，1763—1816年》（加尔各答，1958年），第542页注。

[28] 这种扩张增加了在英法斗争中控制开普的重要性，参见后面第238页。

[29] 那些同情他们的作家也发展了这种看法，如布鲁克斯·亚当斯（《文明与衰退的法则》，1895年）和威廉·迪格比（《“繁荣”的英属印度》，1901年）。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说法毫无疑问被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接受（《印度的发现》，1946年）。

[30] 致孟加拉的函件，1785年9月15日，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函件，第14卷，第111页及以后各页。

[31] 公司销售额中出售茶叶的总量从1783年的5857882磅增加到1796年的20750994磅。这些和其他的数字在E. H. 普里查德的《早期英中关系的关键性年代，1750—1800年》中均有分析（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报告，第4卷，第3—4号，华盛顿州普尔曼，1936年），第150页。

[32] 董事会致韦茅斯勋爵信，1768年10月28日，转引自V. T. 哈洛《英国第二帝国的建立》，第1卷（伦敦，1952年），第86页。

[33] 陈寿仪（Ch' en Shou-Yi）：《18世纪英国的中国园艺》，《天下》（*T' ien Hsia*），第2卷，第4号，第321页及以后各页。

[34] 象征论者（Figurist），基督教徒中认为圣餐只是耶稣的肉体、血、灵魂和神性的象征的一派人。另一派真体论者则认为耶稣的体血真正存在于圣餐中。——译者注

[35] 亚伯拉罕，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挪亚，基督教《圣经》中洪水后人类的新始祖。——译者注

[36] 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挪亚的三个儿子。——译者注

[37] “伯拉罕玛”即“梵天”，印度教主神之一。——译者注

[38] 中国学者辩称基督教亦起源于中国人的信仰，关于这一类似倾向，见C. S. 钱（Ch' ien）在《圣经研究》中的文章，第1卷，第1号，第13页及以后各页，他在文中还提出：传教士对西方知识的传播，由于与基督教教义联系在一起而受到妨碍，不过是否还有别人会传播西方知识，仍然是个问题。

[39] 托马斯·珀西：《好逮传》，第1卷（伦敦，1761年），第XII页。

[40] 黑斯廷斯致纳撒尼尔·史密斯信，1784年10月4日，载威尔金斯译《薄伽梵歌》（伦敦，1785年），第7页。

[41] 琼斯（译）：《沙恭达罗》（加尔各答，1789年），第V页。

[42] 罗伯逊：《关于古人对印度的认识的历史研究》（伦敦，1791年），第288页及以后各页。

[43] W. 马斯登：《苏门答腊史》（伦敦，1783年），第230页。

[44] M. 波斯尔思韦特：《世界贸易和商业词典》（伦敦，第2版，1757年），“非洲”（第1卷，第24—25页），“几内亚”（第1卷，第923—928页）各条；《非洲探险的重要性之思考……》（伦敦，1758年）。

[45] V. T. 哈洛：《英国第二帝国的建立》第1卷（伦敦，1952年），第125—135页。

[46] I. D. 麦克龙：《南非的种族态度》（约翰内斯堡，1937年），第6、7章。

[47] 贷款农场（loan-farm），在南非，从政府获得，每年缴纳偿还租金的土地。——译者注

[48] J. S. 马雷：《梅尼耶与第一个布尔共和国》（开普敦，1944年）。

[49] H. 德尚：《马达加斯加史》（巴黎，1961年），第79—91页。

[50] R. 库普兰：《东非及其入侵者》（第2版，牛津，1956年），第76—83页。

[51] G. 朗贝尔编：《马赛商业史》，第5卷，《1660至1789年的利凡特》，罗贝尔·帕里斯著（巴黎，1957年），第367—692页。

[52] F. 夏尔-鲁：《18世纪的英国、苏伊士地峡和埃及》（巴黎，1922年）；《埃及考察的由来》（巴黎，1910年）。H. L. 霍斯金斯：《英国通向印度的道路》（纽约和伦敦，1928年）。

[53] 参见F. 夏尔-鲁《1830年以前的法国和北非》（巴黎，1932年），特别是第305—307页。

[54] 例如，索尼埃：《非洲海岸纪行》（巴黎，1791年）；P. 马松：《1560—1793年法国在柏柏尔非洲殖民和通商史》（巴黎，1903年），第642—644页。

[55] 这些估计中最详细和权威的也许是罗伯特·诺里斯的《情况和文件》（Accounts and Papers），1789年（XXVI），《协商委员会……的报告》。它的数字74200人似乎太低了。

[56] 罗伯特·诺里斯：《情况和文件》（Accounts and Papers），第一部分，迪恩·蒂斯特的证据。

[57] 根据《情况和文件》1789年（XXVI）和D. 麦克弗森《商业年鉴》（伦敦，1805年）的计算。

[58] 国家档案馆，伦敦：殖民部，267/13，奥哈拉致康韦信，1766年5月28日，7月25日，9月7日。

[59] 蓬巴尔侯爵，1750—1777年葡萄牙的实际统治者。——译者注

[60] J. 迪菲：《葡属非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第71—73、143页；德马内：《新编法属非洲史》（巴黎，1767年），第1卷，第XIV、213页及以后各页，第226页及以后各页；C. 舍费尔：Instructions Générales……（巴黎，1927年），第1卷，第20页，国王致梅纳热的备忘录，1764年12月22日。

[61] 《议会史》，第19卷，第311—315页。

[62] 国家档案馆：殖民部389/31，商务部致国王信，1765年2月21日；E. C. 马丁：《英属西非殖民地：1750—1821年》（伦敦，1927年），第5、7章。

[63] C. 舍费尔：Instructions Générales……（巴黎，1927年），第1卷，第128页及以后各页，国王备忘录，1785年11月18日。

[64] C. 舍费尔：Instructions Générales……（巴黎，1927年），第1卷，第1卷，第128页及以后各页，给古尔格的训令，1786年11月23日。

[65] 《朗多弗船长回忆录》，J. S. 凯纳编（巴黎，1823年），第2卷，第44页及以后各页。第90页及以后各页。

[66] D. 福德（编）：《老卡拉巴尔的埃菲克商人》（伦敦，1957年）。

[67] P. 拉巴尔特：《塞内加尔的旅行……》（巴黎，共和10年），第22—23页；S. M. X. 戈贝里：《非洲的旅行……》（F. 布莱格登译；伦敦，1802年），第1卷，第112页及以后各页；P. 居特吕：《塞内加尔史》（巴黎，1910年），第241、258—259、262页。

[68] P. 比弗：《非洲备忘录……》（伦敦，1805年），第40页及以后各页，第275页，第320页及以后各页，第405页。D. 兰雄：《18世纪的黑奴贩运业》（布鲁塞尔，1956年），第30页。

[69] A. M. 福尔肯布里奇：《到塞拉利昂的两次航行》（第2版，伦敦，1802年），第37页。

[70] 《情况和文件》，1789年（XXVI），第一部分，附录4、5；F. L. 巴特尔斯：《菲利普·夸克，1741—1816年》，《黄金海岸和多哥兰历史学会学报》，第1卷（1955年）。

[71] J. 亚当斯：《十次非洲航行见闻录……》[伦敦，无日期（1821年）]，第25页。

[72] 1783—1787年英国向非洲出口的详情，见《情况和文件》，1789年（XXVI），第4部分，表A。

[73] 《世界词典》，第1卷，第25页。

[74] H. 德布伦纳：《黄金海岸的著名丹麦牧师》，《黄金海岸和多哥兰历史学会学报》第2卷（1956年），第15页；C. D. 亚当斯：《丹麦植物学家在几内亚的活动，1783—1850年》，《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3卷（1957年），特别是第35—38页；C. B. 瓦德斯特罗姆：《论殖民地化……》（伦敦，1794年），第175—178、316—317页。

[75] E. 唐南：《有关对美洲的奴隶贸易的说明性文献》（华盛顿，1931年），第2卷，第616—617页。1792年3月16日皇家敕令。

[76] G. 加斯东-马丹：《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历史》（巴黎，1948年），第169—171页；B. F. 希斯洛普：《从三级会议的一般陈情书看1789年的法国民族主义》（纽约，1934年），第276—277页。

[77] 关于废奴运动，可将R. 库普兰《威尔伯福斯》（1923年），和《英国的反对奴隶制运动》（1933年），以及G. R. 梅勒《英帝国的托管制度，1783—1850年》（伦敦，1951年），第1章，与埃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查珀尔希尔，1944年）相比较。又可参阅T. 克拉克森《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伦敦，2卷本，1808年）。

[78] R. R. 库钦斯基：《英国殖民帝国的人口统计调查》，第1卷（伦敦，1948年），第2、11章。

[79] L. E. C. 埃文斯：《早期塞拉利昂的政体》，载《塞拉利昂研究》，第XVIII卷。

[80] 福尔肯布里奇：《到塞拉利昂的两次航行》，第186页；《塞拉利昂公司……报告要旨》（伦敦，1794年）。

[81] 18世纪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82] C. B. 瓦德斯特罗姆：《论殖民地化……》（伦敦，1794年），第2部分，第179—196页；斯滕·林德罗思：《亚当·阿弗泽利乌斯》，载《塞拉利昂研究》n. s. 4（1955年）。

[83] P. 比弗：《非洲备忘录……》（伦敦，1805年）；C. B. 瓦德斯特罗姆：《论殖民地化……》（伦敦，1794年），第2部分，第130—174页。

[84] 福尔肯布里奇：《到塞拉利昂的两次航行》，第48页注；C. B. 瓦德斯特罗姆：《论殖民地化……》（伦敦，1794年），第2部分，第116页；《情况和文件》，1789年（XXV），第288页及以后各页（安德森的证词）。

[85] C. H. 法伊夫：《塞拉利昂史》（伦敦，1962年），第11章。

第九章 欧洲的外交关系（1763—1790年）

1763年的和约结束了欧洲和海外的七年战争，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18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巴黎和约使英国仅次于西班牙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殖民大国。英国在北美已明显占据优势，并肯定有可能控制印度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胡柏图斯堡条约使普鲁士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尽管就强国一词最完全的意义来衡量还略逊一筹。当时许多人认为，普鲁士保住了西里西亚是那个时期最伟大的军事成就；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领导才能似乎又充分弥补了普鲁士在物质上的许多弱点。

但是，不可能指望保持长时期的和平。事实上，大多数观察家在1763年以后都不抱此期望。无论是英国在殖民地和海上对法国的优势，还是普鲁士不受哈布斯堡王室侵犯的安全保障，都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战争失败使法国的自尊心遭受极大的损害。法国的海外帝国虽已瓦解，但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以及非洲和印度的一些贸易据点——却保留了下来，因此，其羞辱和愤恨丝毫未消，报复英国之心丝毫未减。再说，英国的胜利已引起西欧的普遍不安，唯恐英国凭借其海上力量垄断欧洲的海上贸易和独霸海外扩张的机会。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发现，他的胜利对已遭到失败的他的对手来说，除赢得了尊敬之外，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进一步的怨恨。由于战争期间的经历，哈布斯堡王朝的各个领地对战争的巨额耗费仍无力承担，并且对战争虽然取得一些胜利却一无所获感到失望，玛丽亚·特蕾西亚这时已感到厌倦和幻灭。因此，她在国际事务方面采取小心谨慎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她个人始终十分厌恶和不信任普鲁士国王；保持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的传统决心已由首相考尼茨-里特贝格亲王，特别是皇后的长子约瑟夫大公在维也纳有效地体现出来，约瑟夫的影响无疑在与日俱增。

因此，显而易见，英法的互相猜忌和奥普（更确切地说是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伦王室之间）的敌对将会影响今后多年的国际关系。

然而，除了这两个当时已根深蒂固的对抗以外，还可以看到威胁1763年以后整整一代人欧洲和平的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第三个因素。这就是波兰具有悲剧性和潜在危险的局势。波兰的国力衰微和政府腐败在18世纪初已引人注目，以后几十年形势更每况愈下，到七年战争时期，波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实际上已落到十分衰败的境地。在1763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强邻瓜分波兰的计划虽仍然仅仅停留在计划上，但最终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可见。奥古斯特三世已不久于世，这预示波兰王位又要进行一次选举，有可能引发国内混乱和国际纠纷。当他于10月初去世后，继承人的遴选立即成为欧洲政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

不仅如此，波兰的命运很可能对另外两个一度强盛现已衰落的国家瑞典和奥斯曼帝国产生影响。瑞典由于北方大战败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直未能恢复，而瑞典贵族结党营私，出卖祖国，又几与波兰贵族如出一辙。土耳其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日趋衰落，无可挽回，其主要原因是宗教保守主义受到学者和教士阶层（即乌力马）[\[1\]](#)的鼓励和禁卫军的保护，其势力之强大，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任何同类势力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外交史大体上可按照以下这三个问题来撰写：英法在海上和海外的角逐；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伦王室在德意志的对抗以及波兰问题。18世纪60年代末起又出现了第四个问题：俄土关系。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但每一个问题又可在很大程度上看成是独立存在的。这四个问题中有三个出现在中欧和东欧；这意味着1763年以后欧洲政治的利益和活动中心已明显东移。在莱茵兰，在低地国家，在意大利半岛，这些多年以来国际激烈纷争的场所，这时其领土状况已相对稳定。这同波兰或巴尔干的局势形成明显的对比。任何西欧大国，法国可以部分除外，都无法对欧洲大陆东半部的事务施加直接的影响。而除法国以外，任何大国实际上也无意施加这类影响，即使法国也只是断断续续地这样做。英法这一时期在殖民地的角逐，无论从长远来看对世界具有什么意义，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却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这一时期的欧洲许多重大问题均非源于西欧，一般说来西欧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

在西欧，18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是法国显然恢复了力量和自信。这主要应归功于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德·舒瓦瑟尔-斯坦维尔的领导。他是一位虽然并非才能过人，但精力充沛的大臣。到60年代末，在他领导下已使法国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获得在七年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和声望。法国的力量和雄心的重振，可以从60年代重组陆军，尤其是努力重建海军这两件事情上看起来。更重要的是，舒瓦瑟尔设法有步骤并且成功地巩固和加强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战时联盟。这一联盟关系体现在1761年8月签订的家族盟约中。从巴黎和约到法国大革命，这期间法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核心乃是它与西班牙的联盟，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1756年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舒瓦瑟尔本人于1765年曾经说过，与奥地利的联盟“是不稳固的，同极其重要的法西联盟完全不同”。他对路易十五说，如果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卷入与英国的战争，一定会得到法国的支持而“不管您的王国会处于什么情况”^[2]。巴黎和马德里保持友好关系，从某些方面看是出人意料地顺利。尽管法西联盟完全没有取得什么陆军或海军的胜利，但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后期仍然保持不动摇；这同事实上的英普联盟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于1758年结盟，于1762年灾难性地和无可挽回地宣告破裂。卡洛斯三世及其大臣们和法国人一样，对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获得的胜利既感震惊，又极愤怒；与此同时，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和收回梅诺卡岛，使马德里愤愤不平，导致了英西两国之间一场无休止的小争端。法、西两国政府的野心并非总是一致的，但在对付共同敌人英国方面却保持了某种基本的一致。18世纪60年代两国之间的联盟有所加强，最引人注目的是1768年签订的商业条约。

舒瓦瑟尔至少早在1765年9月就已着手筹划的向英国报仇的战争，主要是一场海上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他决心不重蹈其前任在1756年的覆辙，在欧洲承担代价昂贵和分散精力的军事义务。通过威胁在佛兰德、布列塔尼和西班牙北部集结兵力，或由西班牙进攻葡萄牙，可以迫使英国分散力量和资源；但不能让战争成为一场欧洲战争。可以不去触动汉诺威，法国必须集中力量占领英国的殖民地，如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起义反抗其母国，则应给以帮助；更重要的是向英国本土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3]

这些主张是明智的；舒瓦瑟尔的继任者韦尔热讷伯爵后来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曾予以实施，收到某些效果。但是，60年代的英国历届内

阁却全然不理解当时法国战略思想的意向。它们认为，英国仍需要大陆盟国，以便尽可能将波旁王朝各国的力量牵制在欧洲的陆战中，并保卫汉诺威。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汉诺威一直被认为是任凭法国摆布的人质。但要找到这样的盟国非常困难。相当多的英国人，且不说乔治三世本人，仍然认为奥地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英国的天然盟国；但奥地利与法国由种种纽带联系在一起，此时它显然无意割断这些纽带。弗里德里希二世正确地认为，与英国结盟有可能卷入一场新的英法战争，这是他下决心要避免的；且不说他对英普之间1762年的互相攻讦记忆犹新。不仅如此，自1764年以来，普鲁士的国际地位由于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结盟而有了保障；^[4]因此同英国联合将不会有什么收获。这样，就只剩下俄国是英国希望与之结盟的唯一欧洲大国。缔结英俄条约的谈判于1762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而终成泡影。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几届英国政府虽然毫无疑问希望与俄国结盟，但拒绝付出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的代价。后者为了收买瑞典议会和参议院，使之置于俄国羽翼之下并免受法国的影响，需要巨额款项，而它们拒绝提供如此多的钱。英国还拒绝帮助她在奥古斯特三世去世以后将俄国支持的候选人扶上波兰王位。更主要的是，它们拒绝允诺当土耳其进攻俄国南部边境时支持俄国。为了给这些拒绝找出理由，它们辩解说，君士坦丁堡如采取表示敌意的行动，将会给英国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贸易造成损害；而更有可能是由于也许当时英国有理由相信，俄土战争不久即将爆发，而英国支持这位女皇在近东的野心将一无所获。

而使结盟谈判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耳其条款”。但是两国谈判有好几次接近成功，而且有助于促成1766年缔结的一项重要的英俄商约。如果英俄谈判获得成功，那么就会成为俄国外交大臣N. I. 帕宁伯爵于18世纪60年代后期设法建立的“北方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野心勃勃建立“北方体系”的计划由俄国驻哥本哈根公使科尔夫男爵于1764年年初提出，它将形成俄国、普鲁士、英国、瑞典、丹麦和波兰的大联合，以对抗波旁王朝各国，首先是反对法国。帕宁希望，这样一个联盟将会“使俄国摆脱长期依赖他国的局面，并使俄国……处于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位，并且在北方保持和平与稳定”。^[5]他的这些计划并非毫无结果。这些计划促使他认为，一个在俄国影响下的强大而复兴的波兰，将替代奥地利而成为俄国未

来的主要盟国，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这种态度曾有许多年对俄国的波兰政策产生了某些影响。这些计划还导致1765年俄丹联盟的缔结，为两年以后最终解决两国在荷尔斯泰因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端铺平了道路。^[6]但是帕宁计划的北方体系同18世纪许多国家间新的广泛的合纵连横一样，都虚有其表而难以实现。如事实所表明的，英国和俄国除经济协定外未能达成政治协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对此体系毫无热情。他只希望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唯一盟友，因此向圣彼得堡施加影响，使之不与英国签订条约；他对扶植波兰也感到不快，因为这碍于他向波兰扩张的野心，而且他对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结合的真正价值深不以为然。随着1768年9月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爆发，北方体系便迅速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对英国来说，同俄国结盟，即使成功了，在一场由舒瓦瑟尔预料的主要是在海上和殖民地进行的战争中同法国较量也于事无补。不过，18世纪60年代英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加上国内政治冲突的日益突出和美洲动乱的日益严重，都大大降低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声望。反之，法国的实力和自信却显然与日俱增。1766年，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去世，洛林公国根据1735年维也纳条约的条款终于正式成为法国的领土。而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更为主要的是1768—1769年法国征服并吞并了科西嘉岛。热那亚共和国由于无力镇压该岛多年发展起来的反对其统治的叛乱，于1764年8月同意让法国军队驻守岛上五个城镇。1768年5月，热那亚与法国政府签署一项条约，实际上将该岛卖给法国，由法国支付200万里弗尔并保证热那亚本国领土的完整。虽然法国花了一年时间才击溃了科西嘉叛乱领袖帕斯夸莱·保利及其追随者的抵抗，但在1769年6月全部占领了该岛。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担心法国占领科西嘉岛可能会加强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因而提出抗议，事实证明毫无结果。英国内阁软弱无力而且陷于分裂，到1768年秋季对法国的行动便忍气吞声地加以默认。英国的软弱使英国在欧洲的声望大为下降，特别是证实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想法，即英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有力的盟国。

仅仅不过一年以后，科西嘉事件未曾引起的英法新的事端已一触即发。1770年6月，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派遣的一支西班牙远征军，占领了英国在福克兰群岛埃格蒙特港的一小块殖民地。这在伦敦激起了极大愤慨，而在马德里却无意作出让步或听取英国的抗议，因

为福克兰群岛一直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领土。双方都在积极备战，看来一场英、西战争迫在眉睫，而法国肯定会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如果舒瓦瑟尔继续掌权的话，他已做好准备的报复英国的战争很可能就发生了，尽管他本人极力谋求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他在朝廷的地位在一段时间以来日益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即与他对立的大臣、国王的情妇巴里夫人的敌视和对他的国内政策不满的极端天主教势力。结果国王于1770年12月突然将他革职。西班牙政府由于失去法国立即支援的可能而被迫屈服。1771年1月西班牙同意将埃格蒙特港交还英国，但避免明确放弃它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利要求。于是这次危机的结果是英国取得胜利。但这只是一次不完全的胜利，一方面虽然是由于英国本身的实力，但另一方面却是由于路易十五的软弱，因而它无助于防止英国声望在欧洲的日益下降。两年以后，一位讽刺小册子的作者写道，事实上，“近几年来，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何等高尚、何等果敢而又何等坚定不移，结果是，尽管我们因此赢得了荣誉和征服地，我们却招致了欧洲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我们的蔑视与侮辱”。[\[7\]](#)

然而，比科西嘉和福克兰群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东欧的危机。早在1763年2月，俄国一个由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就决定波兰下一届国王必须是一名波兰贵族（piast）而不是一个外国人。几个月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即在波兰边境集结重兵，并进行安排，贿赂波兰有权势的人物，加强由恰尔托雷斯基家族领导的波兰亲俄势力。在圣彼得堡，人们获悉法国在设法影响波兰下次国王选举，可能是支持萨克森统治家族的某个成员，因为波兰最后两位国王都来自这个家族，另外，还有更令人担心的事，即土耳其人可能进行干预。因此，叶卡捷琳娜二世急于尽可能获得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她在波兰的野心。不久就明显看出英国的支持已没有什么希望；奥地利政府虽然没有明显表示反对俄国在波兰的图谋，但由于它是法国的盟国，因此注定在某种程度上持共同的反俄态度。不仅如此，对哈布斯堡来说，未来在德意志进行战争时，萨克森将是其非常有用的盟友；这件事本身就构成充分的理由支持一位萨克森候选人登上波兰王位。剩下的就只有普鲁士了。从1763年2月起一直几乎到他去世为止，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叶卡捷琳娜进行了长时间而又虚伪的信件往来；到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向她送交了一份俄普同盟条约的草案。10月（奥古斯特三世于该月5日去世），俄国女皇认为同普鲁士结盟已刻不容缓；1764年1月底，向弗里德里希二世送交一份俄国的草

案，弗里德里希仅作了些小的修改后即表示接受。4月11日，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条约有效期为八年，双方承诺在一方遭到进攻时，另一方即进行军事支援。^[8]双方还保证支持瑞典的1720年宪法，最重要的是双方还保证维护波兰的现有宪法（换句话说，即继续保持波兰的混乱局面）和波兰君主由选举产生的制度。另外还通过一个附加的密约，一致同意支持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前的情人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波兰国王的候选人。他于9月如期当选。

1763—1764年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尽管法国自认为是波兰的传统保护国，但已不可能再在波兰施加多大的实际影响了。这部分是由于法国在波兰的外交工作既不统一又陷于混乱。与法国的官方代表德波尔米侯爵同时工作并时常与之发生冲突的还有路易十五于40年代建立的一个名叫“秘密”（secret）的特务网，从事国王的私人秘密外交，但收效甚微。实际上，情况往往比这更为复杂，因为有时这些特务彼此互相对立或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当时法国的政界人物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波兰事态的发展。他们全神贯注于殖民地和海上事务，即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越是有必要坚持法国反对英国的立场，就越是要注意避免深深陷入东欧事务。1763年5月，舒瓦瑟尔的一位同族兄弟，当时任法国外交大臣的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在一份有关法国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极力主张：当前，在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原来被保护国中，法国只有不明确的和间接的利益；即使瓜分波兰对法国来说或许也是无足轻重的。

虽然如此，法国政府目睹一个俄国傀儡登上波兰的王座也不能不怒火中烧。直至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一年以后，法国才承认他为波兰国王；而且即使在以后法国也没有向华沙派外交代表。看到法国势力和威望在东欧每况愈下就不免感到羞辱；而无论是舒瓦瑟尔还是路易十五都是强烈反俄的。路易十五于1763年9月写道，“任何能使俄国陷入混乱，使之重新回到微不足道的地位的事，都是符合法国利益的”。^[9]法国自己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也不能指望从其盟国奥地利处得到什么帮助。但是许多法国政界人物似乎认为土耳其人是一种可能用以制止俄国势力的发展甚至使之逆转的有效武器。1763—1764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瓦利埃·德·韦尔热讷按照巴黎的指示，竭尽全力劝说土耳其政府支持波兰王位的萨克森候选人并以武力反对俄国军队进入波兰。他没有取得成功。1765年7月，土耳其政府决

定承认波尼亚托夫斯基。尽管如此，法国怂恿土耳其干扰俄国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舒瓦瑟尔极不负责任和缺乏远见地一再敦促韦尔热讷设法挑起俄土之间的战争。[\[10\]](#)

俄土战争于1768年9月爆发，但不是法国在君士坦丁堡外交活动的结果，而是由于波兰的事态发展。由于波兰对俄国势力的反抗日益增长，加上俄国对波兰的军事控制越来越明目张胆，土耳其政府的恐惧和不满也随之迅速加剧。1768年年初建立的巴尔同盟促使问题尖锐化。7月，乌克兰非正规部队（Haidamaki）在追击逃跑的同盟分子时，烧毁了波多利地区地区的巴尔塔小镇，明显地侵犯了土耳其的领土。罪犯并不一定是俄国士兵，俄国政府企图推卸此次事件的责任，但已无济于事。10月6日，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奥布列斯科夫被囚禁于七塔城堡，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于是开始。

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大臣们极不欢迎这场战争。这意味着要在俄国南部边境重新投入大量军队并使俄国在波兰的形势更为复杂。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导致欧洲的某个大国，最可能是奥地利，在近东进行反俄的干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即决定要在这次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尽可能攫取一切好处。1768年11月，在圣彼得堡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一旦签订和约，俄国必须获得其船只在黑海的自由航行权（这是彼得一世在位以来俄国政策的一个目标），并在黑海取得一个港口。俄国还要牺牲波兰的利益而扩张俄国的领土。除了这两个战争目标之外，很快又增加了第三个：使克里米亚汗国（其疆域包括广袤的黑海草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俄国政策的传统目标，俄国最终吞并克里米亚的构想已开始具体化了。[\[11\]](#)但克里米亚汗国将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的卫星国，其统治者悉由土耳其苏丹任命；土耳其政府认为该国继续由土耳其控制乃是防止俄国在黑海地区扩张其势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屏障。因此，要求克里米亚独立肯定会遭到君士坦丁堡的强烈反对。而这个要求并不能完全满足俄国不断增加的战争目标。到1770年，圣彼得堡一致的意见是，俄国还必须吞并刻赤和耶尼卡莱的要塞，从而控制亚速海通往黑海的刻赤海峡。否则，俄国于1769年年初即已占领的亚速海便毫无价值，不仅如此，到1770年年底，俄国政府又要求将位于多瑙河流域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置于其控制之下，为期25年，作为对俄国战争费

用的补偿，并要求将亚速海以东一块广袤而界限不清的地区卡巴耳达斯并入俄国。

由此可见，俄国的战争是野心勃勃的。1769—1771年俄国陆海军的辉煌胜利^[12]表明，如果没有外部势力介入，确实是实现这些战争目的中的许多项的大好机会。可是，到1771年，欧洲列强显然已不愿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近东为所欲为。战争一开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敦促她也许可以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调停尽快媾和。英国（这是女皇可能愿意接受的）和法国（这是女皇坚决拒绝接受的）也提出调停。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可能出现奥地利采取某种行动以保护土耳其人并防止俄国充分利用其胜利的危险。奥地利有可能采取这类主动行动，并可能引起奥俄战争，这样战争就必然会波及普鲁士，而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十分忧虑的。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俄土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考尼茨在维也纳极力强调有必要积极反对俄国涉足波兰和近东。他甚至建议奥普实行可能的和解，其基础是由奥地利收复部分西里西亚，而普鲁士则得到由俄国控制、仍然正式是波兰共和国一部分的库尔兰公国作为补偿。但他的主张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决心保持和平。1765年继承其父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约瑟夫先后于1769年8月在西里西亚的尼斯和1770年9月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同弗里德里希二世举行私人会谈。这些会谈虽然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和猜测，但未取得重大结果。直到1771年年初，对俄国取得的辉煌胜利，奥地利一直引人注目地保持缄默。到那年2月初，玛丽亚·特蕾西亚才决定必须制止俄国进一步扩张；6月，当维也纳获知俄国对土耳其提出的全部要求时，在那里爆发了一阵惊恐和愤怒情绪。这时俄国政府已修改了它的条件，只要求多瑙河两公国独立，而暂不要求将其转由俄国控制。但是，即使如此，考尼茨和约瑟夫二世也无法忍受。理由是这样严重地割去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将会破坏欧洲的势力均衡。于是，奥土两国十分秘密地于7月初在君士坦丁堡签署了一项奥土密约。根据这项从未获得批准的协定，奥地利允诺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政府，以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作为回报，土耳其每年向奥地利提供一大笔财政资助，用于加强奥军力量，同时割让瓦拉几亚西部某些领土。1771年7—9月，奥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叶卡捷琳娜二世无意放弃对两公国的要求，奥地利政府则开始备战，并与巴黎谈判，争取在

同俄国的战争中得到法国的帮助，这场战争看来肯定将于次年春季爆发。

但是维也纳并不真正想打仗，圣彼得堡也是一样。9月5日，玛丽亚·特蕾西亚向普鲁士驻维也纳代表罗德保证，她希望维护和平而且如有可能将说服土耳其人向俄国妥协。皇后的这一独自行动深深触怒了考尼茨，因为这势必会削弱奥地利在前几个月中采取的好战姿态在柏林和圣彼得堡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和约瑟夫二世当时都明白，叶卡捷琳娜二世向土耳其人提出的许多要求都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已不可避免。到10月，达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妥协。事实已很清楚，奥地利将不反对俄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而俄国也不反对两公国仍承认土耳其为其最高君主。

然而，除此之外，在几个月以前情况似乎已表明，在近东未能充分满足的领土野心，可比较安全而方便地在孤立无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波兰得到满足。1770年年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访问了圣彼得堡。在这之前，他就比他的哥哥对在近期吞并西普鲁士的前景持更为乐观的态度；10月，他草拟了一份由奥、俄、普共同监管波兰事务的计划。他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留下很好的印象，那次访问收到意想不到和极其重要的成果。1771年1月8日，女皇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向他建议瓜分波兰。她指出，奥国已经占领了齐普斯的两个领主采邑（starosties），^[13]“为什么不能我们大家都拿一点呢？”俄国陆军大臣Z. G. 切尔尼谢夫伯爵就此作了具体的解释，他敦促普鲁士占领伸入东普鲁士的波兰一块面积很大的领土瓦尔米亚（埃尔梅兰）主教管区。^[14]

亨利亲王对瓜分波兰的想法极表欢迎。几周后他一回到柏林，就设法消释了他哥哥担心俄国会从中获取过多利益的想法。结果从1771年年初起，弗里德里希二世便开始敦促奥地利政府同意瓜分波兰，作为保持国际和平的最佳途径。5月，他试图通过同俄国签订瓜分波兰的预备协议，而迫使考尼茨和玛丽亚·特蕾西亚采取行动。到10月底，维也纳被迫在原则上同意瓜分波兰。尽管有许多细节问题仍有待解决，而且玛丽亚·特蕾西亚经过反复考虑后，才于1772年8月接受瓜分条约，但波兰共和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虽然俄土战争和由此产生的奥俄在巴尔干的对抗从根本意义上说并不是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原因，

但毫无疑问它们在加速瓜分上起了重大作用，也许还决定了瓜分所采取的方式。

即使在瓜分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和奥地利积极反对的危险消除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仍然面临强迫土耳其按照其条件媾和的任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1772年8—9月，俄国和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在摩尔达维亚的小镇福克沙尼举行会谈，但谈判很快宣告破裂，原因是土耳其坚持其苏丹即使无权任命克里米亚的可汗，至少也得保留对克里米亚可汗行使其权力的批准权。当新的和会于11月末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俄国人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但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土耳其人抵制俄国兼并刻赤和耶尼卡莱，并不愿让俄国战舰在黑海自由航行。谈判一直拖延到1773年3月仍无结果。对俄国政府来说，媾和这样长期拖延下去是严重的。战争已使俄国蒙受重大牺牲，已经无法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从1773年9月起，普加乔夫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已经震撼了全国很多地区。[\[15\]](#)更重要的是，瑞典几十年来由于派系倾轧和政治腐化而陷于瘫痪，而此时突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团结，在波罗的海再次成为俄国的强劲对手。

多年以来，法国对斯德哥尔摩的政策一如既往，不是趁机利用瑞典的党派斗争，而是加强瑞典的君主政体。1771年2月逝世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国王并不是一个能废除瑞典宪法并在一个复兴的君主政体支持下团结全国的人物。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古斯塔夫三世年轻有为，精力充沛而且胆识过人，这些都使人产生了国运好转的希望。他父亲逝世时他正访问巴黎，并立即得到法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允诺，以恢复王室的权力。他继位的头几个月里处境非常困难，但在1772年8月得以通过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废除了1720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王室先前所拥有的地位。

瑞典的革命是一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似乎是法国引人注目的政治胜利，因为法国的影响这时可能已在斯德哥尔摩居于支配地位；而对俄国来说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因为不久它会发现它与取得胜利的古斯塔夫三世处于战争状态。这两种看法都不完全正确。法国建议与瑞典建立防务联盟毫无结果；这部分是由于根据新宪法古斯塔夫未得到参议院同意不能与外国签订任何协议，部分还由于路易十五也无意使法国对其他国家承担任何新的义务。人们所预料的俄瑞战争并没有爆发。尽管从1772年年底到1773年年初几

个月期间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叶卡捷琳娜二世对瑞典的事态深为震怒；而且她在与古斯塔夫三世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丹麦的积极支持，因为在丹麦施特鲁恩泽倒台后，^[16]亲俄势力重新掌权。然而，北方仍然保持了和平，这部分是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在女皇进攻瑞典时支持俄国；更重要的是由于女皇当时仍在全力与土耳其政府周旋，她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陷入这场斗争之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破裂以及结果有必要对土耳其人至少再进行一次战斗，使俄国为消除1772年8月政变的影响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归于无效。就这样，女皇为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所取得的成功而在波罗的海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到1773年秋季，俄国统治阶层对与土耳其进行的战争的结局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切尔尼谢夫伯爵在9月极力主张放弃对刻赤和耶尼卡莱的领土要求以利于实现和平；甚至还有人怀疑克里米亚是否会获得独立。这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显示出她在位期间的好几次危机中表现出的那种勇气和精力。1774年4月，俄军总司令、陆军元帅P. A. 鲁勉采夫奉圣彼得堡发出的命令渡过多瑙河。到7月初，首相穆辛扎德帕夏率领的土耳其主力部队由于俄军的进攻，处于被分割和包围的严重危险之中。因此，在该月上旬，穆辛扎德向鲁勉采夫建议举行和谈。和约于21日在保加利亚的村庄凯纳甲湖签字。兴高采烈的叶卡捷琳娜告诉鲁勉采夫说：“俄国从来还没有签署过这样的和约。”^[17]根据和约，俄国获得了卡巴尔达斯、刻赤、耶尼卡莱以及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一小块领土和第聂伯河的入海口，换句话说，在黑海获得了一个虽然有限但可靠的据点。它给了俄国在黑海航行的自由，俄国商人得以通过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对非土耳其船只封锁的海峡。和约还赋予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东正教堂的权利，并以含糊不清和具有潜在危险的词句规定该教会和“为该教会服务的人”在土耳其政府中有代表权。根据一项秘密条款，土耳其政府同意支付450万卢布的战争赔款。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汗国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土耳其苏丹保留授予可汗职务的权力。但这纯粹是一种宗教仪式，并无任何政治控制的含义。

就土耳其来说，这些条款，特别是克里米亚的独立，是灾难性的。一直到1775年1月，土耳其苏丹才十分勉强地批准了该条约。即使在批准以后，仍然想方设法避免履行这些条款。1775年5月，土耳其还将摩尔达维亚北部一个称作布科维纳的省让予奥地利，希望以此消除

哈布斯堡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所抱的敌意，以便能更有效地对抗俄国。特别是由于土耳其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并以采取军事行动相威胁，使克里米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虽然1779年3月签订了艾纳利—卡瓦克协定，重申凯纳甲湖条约的主要条款，并再次宣布克里米亚的独立，但即使这样，问题仍然远未获得最终解决。

1774年的和约不仅使土耳其人，而且使欧洲列强警觉起来。它似乎预示俄国要在黑海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随后向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新的无法抵御的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似已指日可待，这意味着俄国势力将大大增强，从而产生一些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法国来说，这种前景特别难以接受，因为法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盟国，法国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和地区贸易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1768—1774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教训之一在于，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此时要保护受到俄国势力威胁的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受害国家已无能为力。法国在地理上远离这些国家，本身又陷入内部的严重分裂。如前所述，法国政府在1763年之后主要忙于在殖民地和海军方面同英国竞争，因此无意使国家在东欧投入堂吉诃德式的冒险事业。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曾就法国应如何采取行动支持波兰人或土耳其人提出过少数建议，这些行动尽管很有局限性，但都由于英国的敌意和疑虑没有起什么作用。因此，1772年3月法国外交大臣艾吉永公爵提出的英法为支持波兰人而在外交上进行合作的建议，没有得到伦敦方面的响应。第二年春季，法国建议，作为支持土耳其人的一个姿态，派遣一支法国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但在英国的反对下不得不放弃。俄土战争和第一次瓜分波兰有力地说明了一个由于1763—1764年的波兰危机而显露出来的事实，即以西欧为一方，东欧和中欧为另一方，至少在当时分别形成两个政治世界。一方的成员似乎不大可能对另外一方的事态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又一次证实了这个观点。英、法、西三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殖民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欧和中欧国家对事态的进程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1775年夏末和秋季，英国政府曾抱着极大希望，从俄国雇佣两万名步兵，用以对付造反的殖民地居民；但是到了10月，即可明显看出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在战争期间，曾几次提出建议，通过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斡旋或调解来恢复和平，也都毫无结果。1781年1月英国政府建议，由俄国按照

1762年达成的条件促成和平，而以俄国获得梅诺卡岛作为回报，亦属徒劳。确实，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0年年初着手建立的武装中立同盟严重地伤害了英国。女皇在3月10日致交战国政府的声明中，宣布了一系列令英国非常恼恨的原则，尽管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该声明大部分是重复丹麦政治家伯恩斯托夫1778年9月的建议）。中立国船只可在交战国港口之间自由航行。不得在中立国船只上没收属于交战国公民的财产，除非这些财产是禁运品。对任何交战国港口的封锁，如属合法，必须有效实施。因此，几乎欧洲所有航海国家都已加入了武装中立，目的乃是反对英国干预中立国的航运业，并反对英国政府像其以前历届政府一样宣称在战争期间可行使“海上权利”的。武装中立严重妨碍了英国在战争最后几年充分施展其海上威力。但它对斗争的结局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美洲战争结束之前，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大臣们的主要注意力再次集中于近东地区。

于是，法国政府从1778年起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英国，而不必像1744—1748年和1756—1763年那样，在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部署大量部队。即使如此，1774年起直到1787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外交大臣的韦尔热讷伯爵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谈期间都面临严重的困难。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有效政治合作经常出现严重困难。这部分是因为卡洛斯三世感到他在1770年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被法国所抛弃，所以此时不愿跟着法国走。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这两个国家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场战争。法国政府在承认英属美洲殖民地独立以及接待美国的外交使团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愿意的地方。这通过它于1778年2月承认这些殖民地独立以及随后富兰克林在巴黎深受欢迎就可以看出来。而另一方面，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则同欧洲所有其他统治者一样，对殖民地叛乱的想法深恶痛绝，而且作为中南美殖民大帝国的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胜利。这些人很可能在战胜英国之后接着进攻西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或许更严重的是，他们获得独立的榜样可能在西班牙各领地内找到效仿者。马德里没有正式接待美国的使者。一直到独立战争结束，西班牙政府才承认美国的独立。此外，韦尔热讷及其同事们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攫取领土。他们所希望的是打击英国的威信和危险的海上霸权；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未来法兰西帝国主要是一个建立在从纽芬兰、西印度群岛和印度获取的相对来说较小的收益基础上的商业帝国。而对西班牙政府来说，牺牲英国的利益而获得大片领土——佛罗里达、梅诺卡，可能还

有牙买加，特别是直布罗陀——才是最重要的。促使西班牙参加战争的并不是韦尔热讷的要求，而是英国拒绝割让直布罗陀以及英国于1779年3月拒绝西班牙由于希望收复这个要塞而提出的调解建议。

战争的进程也并没有使法国和西班牙更有效地联合。除没有取得成功的围攻直布罗陀之役外，两国在陆上或海上极少进行合作；西班牙甚至还从1780年夏季开始同英国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和谈，尽管这些和谈并非认真进行的。法国在斗争中的另一个欧洲盟国尼德兰联合省也并不比西班牙更可靠。英国于1780年12月对荷兰宣战，原因是荷兰坚持同美洲叛乱分子进行贸易，更重要的是荷兰接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参加了武装中立。英国的行动虽给荷兰贸易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但并未破坏这个共和国内许多人，就连荷兰执政威廉五世本人也仍然抱有的亲英情绪。在1781年，巴黎曾担心尚未承认美洲殖民地独立的荷兰可能与英国单独媾和。

因此，英国虽然在战争中遭到军事上的失败，^[18]但当和谈于1782年4月在巴黎和伦敦开始时，与其欧洲的对手相比，仍然处于相当强大的地位。它面对的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而是四个单独的敌人——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国，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英国首相谢尔本勋爵遂得以巧妙地利用这种局势，于1782年11月28日与殖民地方面单独签署条约，使韦尔热讷极为恼火。再者，法国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使这位大臣急于结束战争，而罗德尼4月在桑特群岛的胜利以及法、西联军9月间大举围攻直布罗陀的失败，使英国谈判代表手中又握有几张强有力的新牌。

因此，当凡尔赛条约终于在1783年1月达成一致时，英国输给欧洲对手的实际权益大大低于人们有时所估计的。韦尔热讷尽管作出了巨大努力，也未能为法国在印度得到他朝思暮想的利益，即大笔的领地税收。法国扩大了在纽芬兰的捕鱼权，在西印度群岛得到了圣卢西亚岛和多巴哥岛，在西非得到塞内加尔和戈雷岛，从法国贸易的观点来看收获不可谓不小，但从其他方面来看毕竟意义不大。西班牙收复了佛罗里达以及1782年2月法国远征军从英国手中夺取的梅诺卡岛。但最高奖赏直布罗陀却未能到手。西班牙政府为得到直布罗陀所做的努力几乎使谈判陷于破裂，乔治三世和谢尔本原本也有意放弃这项要求，而在其他地方换取适当补偿，例如波多黎各或法属西印度群岛一组岛屿。但英国舆论拒绝考虑割让这个要塞，因为在1779—1782年大围攻

中成功地保卫了它以后，直布罗陀已如当时有人所说的成为“英国人崇拜的金偶像”，^[19]因此西班牙在极端勉强的情况下达成了和平协议，而未能收复该地。与荷兰的和约于1783年9月达成协议，最后文本则到1784年5月才签字。和约规定将锡兰的内加帕塔姆贸易站割让给英国，并赋予英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各领地自由航行的权利。

英国虽然被迫承认以前的各殖民地的独立，但是除了承认这项重大的失败以外，在1782—1783年的谈判中几乎没有失去什么实际有价值的东西。乔治三世于1783年1月写道：“我要感谢上帝，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其中还应包括必须保持国内的团结和热情，而终于能够同法国和西班牙签署这样好的和约，而且我相信同荷兰的和约不久也将签署。”^[20]从英国的观点看，这恰当地概括了和约有关欧洲和亚洲方面的内容。

美洲的事态发展与德意志事态发展之间当时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隔绝的。18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最后导致战争的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严重摩擦，对美国独立战争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巴伐利亚选帝侯领地，或者至少其一部分，这种想法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维也纳的政治家。特别自17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建议，可以拿西属或奥属尼德兰来交换该选帝侯领地。哈布斯堡王室若获得巴伐利亚，便可拥有以多瑙河流域为中心的一片比较集中的领土并提高自己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这给它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布斯堡以这种方式加强自己实力的任何努力必定会遭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猛烈反对，因为他十分明了，约瑟夫二世渴望获得任何可以得到的领土，并对其母后为约束这样做而施加的影响表示不满。1778年年初事态的发展似乎对奥地利有利。它可能即将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巴伐利亚的大部分领土。马克西米连-约瑟夫选帝侯于1777年12月30日逝世。他的继承人是巴拉丁选帝侯苏尔茨巴赫的卡尔-特奥多尔。此人无合法子女，只有许多私生子女，他急于给予这些子女以合法地位，结果在1778年1月，他继位才几天，就同意承认哈布斯堡对巴伐利亚大约1/3领土的要求（按维也纳的说法这部分领土包括失去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和皇室的封地）。作为回报，卡尔-特奥多尔本人获得了金羊毛勋位，他的私生子女们也都获得法律上比较优厚的规定。

这项协议显然是无视法定权利，因为甚至连玛丽亚·特蕾西亚也承认哈布斯堡在巴伐利亚的领土要求是“过时的、缺少根据的”。^[21]尤其是它忽视了该选侯领地的假定继承人茨韦布吕肯-比肯菲尔德公爵的权利。而且萨克森选帝侯也声称对马克西米连-约瑟夫在巴伐利亚的自主土地拥有权利。尽管如此，考尼茨和约瑟夫二世认为他们的计划不会遇到很激烈的反对。他们指望得到自1756年以来就是哈布斯堡盟友的法国在外交上，必要时在军事上的支持，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盟友俄国此时似仍专注于近东事务而不会成为自己危险的反对者。柏林本应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但弗里德里希二世此时年事已高，不愿打一场新的战争。何况他还有自己的王朝野心。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这两个法兰克尼亚^[22]公国的统治者属于霍亨索伦家族一个较远旁支。这个支系很可能要绝嗣。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希望列强能承认霍亨索伦家族较近的支系勃兰登堡享有该两公国的继承权。因此，承认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权利和弗里德里希承认哈布斯堡在巴伐利亚的权利二者很可能作为交换物。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维也纳作出了非常错误的估计。茨韦布吕肯公爵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强烈反对牺牲自己的权利，而把他继承的一部分领地并入哈布斯堡的版图。他的态度赢得了德意志一些小诸侯的极大同情，因为对他们来说，约瑟夫的侵略和专横政策越来越显得具有威胁性。更严重的是，法俄两国的态度比原来预计的对奥地利要不利得多。叶卡捷琳娜二世（她出身于德意志一个较小的统治家族）不喜欢对德意志政治结构作重大改变的主张，不过由于当时俄土紧张局势依然同1777—1778年一样严重，她不大可能在德意志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十分不愿给奥地利以任何支持。韦尔热讷虽然希望继续与哈布斯堡保持1756年结成的联盟；但他和舒瓦瑟尔一样，并不把这个联盟视为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他已在1777年4月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中告诉路易十六说，奥地利从联盟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法国，维持这个联盟的唯一真正理由乃是要在大陆保持和平，以便使法国能集中力量在海上和殖民地与英国对抗。不应该考虑扩大法国在该联盟中承担的义务，保持普鲁士的势力使之成为在中欧抗衡哈布斯堡的一支力量，特别符合法国的利益。他最后说，即使得到奥属荷兰也无法补偿奥地利势力大扩展给法国带来的损失。^[23]法国在次年整个危机期间一直坚持这个态度。1778年3月10日，法国驻维

也纳大使布勒特伊男爵被告知，法国政府不能承认奥普在巴伐利亚的争端属于1756年联盟范围内的事，因此，“情况不允许陛下在德意志可能发生的战争中除保持中立外发挥任何作用”。[\[24\]](#)

在起草这封信函时，奥普之间的紧张局势变得越来越尖锐。两个大国都不想打仗。5月20日，普鲁士政府提出一个复杂的妥协解决方案。方案建议哈布斯堡只保留巴伐利亚的两个地区。作为交换条件，哈布斯堡应将荷兰的林堡和海尔德两个公爵领地以及仍然散布在巴伐利亚各地的一些皇室封地割让给巴拉丁选侯。作为对萨克森选侯在巴伐利亚的封建地产的补偿，他可以获得上巴拉丁领地的一部分和苏比亚（Suabia）的一些皇室封地。奥地利将不反对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最后与勃兰登堡选侯领地合并，或者（从弗里德里希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重要条款）如果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统治者同意的话以这些领土与卢萨蒂亚交换。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于是战争已不可避免。7月初，普鲁士军队越过了波希米亚边界。

随后发生的战争（萨克森参加了普鲁士一方）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战斗，双方由于开小差和疾病损失的人比战斗中伤亡的人要多得多。而且这场半心半意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柏林和维也纳之间谈判的结束。战争爆发才几天，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在约瑟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派遣奥地利一位主要的外交家图古特男爵与普鲁士政府谈判一项妥协解决方案。8月，她提出如果弗里德里希二世放弃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与勃兰登堡合并的主张，奥地利可以放弃1月与巴拉丁选帝侯达成的协议，但未成功。到8月中谈判破裂。到9月中，叶卡捷琳娜二世鉴于俄土紧张局势趋于缓和，便越来越强调她决心捍卫德意志各邦的权利。这越来越引起维也纳的关注。11月初，法国政府尽管全神贯注于对英国的战争，但同意与俄国一起共同充当调停人。到年末，谈判进入缔结一项俄普军事协定，规定俄国派一支援军帮助对奥地利作战。虽然弗里德里希认为叶卡捷琳娜对他援助不力而表示不满；但此时事情已很清楚，奥地利在军事上没有取得胜利，又无法从其他国家得到有效的支持，除了让步已别无出路。1779年2月16日，维也纳政府接受了预备和约，仅仅给予它巴伐利亚的一小部分。3月13日和会在奥属西里西亚的特申开幕。N. I. 列普宁亲王代表俄国，布勒特伊代表法国充当调停人。会议于5月13日结束时产生的解决方案体现在奥地利、普鲁士、巴拉丁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之间的一

系列协议中。奥地利接受了以莱茵河、多瑙河和萨尔察河为界的巴伐利亚的一部分领土，而放弃了在该选侯领地上的其他权利要求。它还同意不反对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最终与勃兰登堡合并。萨克森选帝侯得到一笔钱，作为其在巴伐利亚的封建地产权的补偿。

弗里德里希二世因此有理由宣称战争以胜利而告终，虽然对普鲁士来说并非压倒一切的胜利，而且“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我们将被认为是未来制衡奥地利专制主义的一支有用的力量”。^[25]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巴伐利亚继承权而进行的斗争，使俄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明确也更公开地介入了德意志的事务。同法国一起作为1779年各项协议的保证国，俄罗斯在德意志政治中所取得的地位堪同法国过去130多年以来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证国而享有的地位相提并论。

然而，1778—1779年的挫折丝毫也没有减弱约瑟夫扩充领土的野心。1780年年底他的母后去世，使他不再受其温和路线的影响，因此人们普遍担心他也许会从事一系列侵略性冒险行动。甚至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之前，他就在设想与俄国结盟，以孤立普鲁士，并把奥地利与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就在他独自治理哈布斯堡各领地不出六个月时，这一联盟虽然还未在形式上，但实际上已经形成。这体现在他于1781年5月与叶卡捷琳娜二世交换的信件中，在这些信件中，双方相互保证对方的领土和在波兰的现有地位。很快又加上共同采取行动反对奥斯曼帝国并可能瓜分其欧洲领地的措辞含糊但富于诱惑力的计划。对叶卡捷琳娜来说，有可能得到奥地利的帮助来反对土耳其人，是结盟的主要原因；而当1783年4月她把克里米亚汗国并入俄国，从而结束了克里米亚连绵不断的动乱局面后，这个联盟对她的价值就得到了证明。法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阻挠这次兼并所做的努力，由于约瑟夫和考尼茨拒绝给予支持而归于失败。1784年1月，土耳其政府在法国的劝告下，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和库班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叶卡捷琳娜多少有些夸张地告诉约瑟夫，她的成功“完全是由于皇帝陛下所进行的有利于其盟国的斡旋”。^[26]

令某些观察家感到意外的是，约瑟夫竟没有利用克里米亚危机为自己夺取土耳其的领土；但是，甚至在这场危机结束以前，他永无止境的野心就已在尼德兰显露端倪。他过去一贯反对1648年蒙斯特条约关于斯凯尔特河向非荷兰船只关闭的规定。对他来说，这项规定不仅羞辱地阻挠了他在尼德兰的领地的贸易，而且明显地侵犯了他的臣民

利用这条河流的天赋权利——而这种天赋权利的思想早已开始对有关国际事务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781年，他决心开放斯凯尔特河的航运。他于1781年年底和1782年最初几个月开始迫使荷兰人从当时已毫无用处的要塞撤出其驻防部队。接着于1783年10—11月有意制造了几起边境事件，并占领了荷兰的三个小要塞；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首次向斯凯尔特河现行的管理体制提出公开抗议。1784年4月初，又试图派一艘商船从安特卫普沿河而下通过荷兰要塞利洛，要塞向船只开炮。8月23日，奥属尼德兰总督贝尔吉奥索伯爵发出开放斯凯尔特河的最后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奥地利政府可放弃对荷兰的领土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马斯特里赫特领土的要求。这个建议看来将会严重威胁尼德兰联合省的商业生活，因而激起了强烈的敌对反应。10月8日，一艘从安特卫普起航前往奥斯坦德的奥地利船只在桑弗廷根附近被荷兰人俘获。奥地利立即召回驻海牙公使，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危机得以和平地而且再次以令约瑟夫感到不满足的方式解决，部分是由于法国的态度。韦尔热讷对奥地利在俄国兼并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失望，而且极力避免采取任何将荷兰推入英国怀抱的行动。早在1784年5月21日他就曾向荷兰许诺，法国将在荷兰与约瑟夫的争端中斡旋。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默尔西·阿根托伊尽了一切努力，法奥关系在1784年年末还是日趋恶化。于是法国在11月17日致维也纳的照会中明确表示，法国将支持荷兰联省议会，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约瑟夫二世皇帝的新盟友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不反对他的野心；但是她除了向联省议会发出一份照会外别无其他援助，她在照会中说，她认为皇帝的要求是正当的，希望能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然而，1784年最后几个月出现的另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因素，促使约瑟夫越来越愿意同荷兰达成协议。这时他希望以整个奥属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因为他在慕尼黑的代表勒尔巴赫已在8月与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开始谈判，目的在于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多年梦想。这位皇帝希望通过在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斯凯尔特河问题上作出让步，而取得法国对上述交换的同意。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给予的支持对他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虽然卡尔-特奥多尔十分愿意以巴伐利亚交换更有价值的尼德兰，但仍然是该选侯领地的假定继承人茨韦布吕肯却不愿意，据认为，法国政府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

结果，约瑟夫无论是在开放斯凯尔特河上，还是在巴伐利亚—尼德兰交换问题上，都一无所获。1785年1月2日在凡尔赛宫召开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决定，奥地利获得巴伐利亚除了会危险地增强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和破坏在德意志的力量均势外，还可能对法国的阿尔萨斯领地构成威胁。因此，法国对此是否表示同意必须取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否同意。这一决定便破坏了正在进行中的交换的任何可能性；2月13日，卡尔-特奥多尔正式否认曾经考虑过交换。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得以在柏林结成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联盟，以后德意志许多较小的邦，不论信仰天主教的还是信仰基督教的，都陆续加入。这个“诸侯联盟”目的在于在神圣罗马帝国中保持现状。联盟条约中有一个秘密条款，各成员保证在抵抗任何入侵或夺取巴伐利亚的行动中相互支持。这对约瑟夫的声望是个重大的打击，遏制他的德意志野心的行动也宣告完成。

约瑟夫皇帝和荷兰人为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的谈判，在法国的支持下于巴黎举行。但同与联省议会有关的所有谈判一样，拖延了好几个月。一直到1785年11月8日，枫丹白露条约才得以签订。条约使约瑟夫得到布拉班特和林堡的一小块领土，完全拥有斯凯尔特河桑弗廷根上游的地区以及作为对他放弃对马斯特里赫特的领土要求的回报而给他1000万弗罗林。但斯凯尔特河迄未开放；这个条约实质上是这位皇帝的一次失败。

1762—1763年以后明显可见的东欧和西欧政治实际上的隔离80年代后期已开始消失。1787年8月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的一场新战争开始引起一系列事件，到1789—1790年导致了一场与过去仅仅是地区性冲突不同的欧洲危机；这在25年来还是第一次。吞并克里米亚远远不能满足俄国在近东的扩张野心。80年代初，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顾问们便策划进一步扩张的宏大计划。将会建立一个“希腊帝国”，不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和希腊本土，而且包括保加利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可能由她的孙子康士坦丁大公爵来统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则可能合并成为一个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自治国家“达契亚王国”，由女皇宠信的G. A. 波将金公爵统治。然而，这些方案始终只不过是梦想或愿望，而谈不上是计划。1787年战争是由一些比较有限而具体的原因引起的。它主要是由于土耳其对俄国在高加索扩张势力不满（1783年夏，格鲁吉亚大部分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土耳其政府设

法限制俄国领事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活动；以及土耳其政府废黜亲俄的瓦拉几亚大公而引起的。

同1768年的情形一样，战争的爆发使俄国政府措手不及，因此在冲突的早期阶段，俄国部队未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它所处的国际地位也不很妙。约瑟夫二世也无法否认，1781年与叶卡捷琳娜缔结的联盟所规定的情况业已出现。但他是极其勉强地于1788年2月参战的，而且很快发现，战争的需要使他在匈牙利本已不得人心的统治更加声名狼藉。更重要的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希望收复1743年在奥布条约中失去的荷兰领土和1721年在尼斯塔德条约中放弃的波罗的海各省，于1788年7月对俄国突然发动进攻。一时间他似乎已威胁到圣彼得堡，因为当时该城的守军只有几千人。而最主要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86年8月去世和由此而引起的普鲁士政策的新方针，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英普联盟出现，在欧洲事务中自176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并且似乎将会介入近东事务。

1787年9月，一支普鲁士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摧毁了尼德兰联合省亲法的“爱国”势力，恢复了执政以前所拥有的权力。执政的妻子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妹妹。随后，于10月初签署了英普条约，1788年4月15日签署了英荷及普荷同盟条约，并于1788年8月13日签署了更为重要的英普防卫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外部进攻，要相互给予援助，缔约国双方保证联合省的领土完整和宪法。到了1788年夏末，约瑟夫二世陷入重重困难，特别担心不得不面对普鲁士进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同土耳其进行艰苦战斗的前景。到12月，叶卡捷琳娜已决定放弃建立达契亚王国的愿望。再者，法国由于从1787年以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作为国际关系一个因素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英国和普鲁士得以放开手脚对俄国和奥地利采取可能的行动。俄、奥、法、西四国结盟的谈判在整个1788—1790年期间拖延不决，最后归于失败，这多半是由于法国作为盟国显然已毫无价值，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同盟本来是可以大大加强约瑟夫和叶卡捷琳娜的地位的。

事实上，叶卡捷琳娜的困难并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严重。古斯塔夫三世在瑞典国内正面对严重的不满（他希望通过战争胜利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乃是他突然进攻俄国的一个原因），在他宣战后不到几周，他的军事行动由于瑞典军队的一次严重兵变而一时陷于瘫痪。

无论英国还是普鲁士都不赞成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进攻，丹麦为了履行其对俄国的同盟义务在9月加入了反对古斯塔夫的战斗。几天之内，丹麦部队似即将占领哥德堡。只是由于英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休·埃利奥特（在未得到伦敦训令的情况下）进行干预，才迫使丹麦人同意于10月9日实行暂时停火。普鲁士以倘若丹麦继续与瑞典作战，即将进攻日德兰半岛相威胁，这才迫使丹麦先是延长停火，后来又与古斯塔夫三世媾和。但是，瑞典由于其国王的轻率行动，而处于比北方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危机之中。

古斯塔夫遭受这些挫折后除了于1789年7月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于事无补的同盟和财政补助条约，并从英国和普鲁士得到一些财政援助外，一筹莫展。他的军队除1790年7月在斯文克松德获得一次重要海军胜利外，在对俄战争中别无所获。因此他于同年8月14日在芬兰韦雷拉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媾和。他对俄国的进攻无疑对土耳其具有重大的价值，使它一时在欧洲政治中位居关键地位；而瑞典却从中一无所得。他同意缔结韦雷拉条约破坏了自己对土耳其政府所作的单独媾和的诺言；而且在条约文本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土耳其和土耳其的利益。条约刚一签字，古斯塔夫马上就开始谈判建立俄瑞丹联盟，充分表现了他反复无常的典型性格。

从俄国的观点来看，英国与普鲁士的根本决裂甚至要比瑞典的削弱更为有利。皮特是经过长期的犹豫不决之后才于1788年同普鲁士结盟的，他把这个联盟看作是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手段，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在大多数英国政治家看来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与此相反，柏林把这个联盟看作是在领土方面取得重要收获的踏脚石，而当时支配着政治领域的是近东的事态发展，而且一直到1791年都是如此。柏林希望，约瑟夫二世在巴尔干取得大量权益之后，作为回报，在普鲁士的武装调停下他可能被迫将加利西亚割让给波兰。作为交换，波兰会将但泽和托伦交给普鲁士，这样，普鲁士君主国的东部边疆就完整并大大加强了。这个计划从许多方面看乃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典型做法，它是由普鲁士外交大臣赫茨贝格于1787年11月拟订的。这项计划在伦敦遭到冷遇，并且从一开始英普联盟双方的目的就是完全相反的。此外，尼德兰南部反奥革命的进展是在1789年引起了英普不和的另一个因素，因为普鲁士建议承认联省的独立，而这是英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英国此时仍渴望与奥地利建立某种联盟。

然而，到1790年最初几个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处境日益困难。1月31日，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公使迪茨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普鲁士于次年春季参战，并规定把克里米亚和1787年以来失去的所有领土归还给土耳其。两个月以后，普鲁士政府又与当时反俄势力日益强大的波兰签订一项条约，两国相互保证领土完整并承诺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彼此援助。在柏林，军方极力主张不应理睬英国的警告和犹豫而向波希米亚发动进攻；并认为进攻后不久奥地利即会溃败，那时就可把种种条件强加给俄国。英国政府也正在缓慢而勉强地转向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伦敦的大臣们当时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把波兰开发成为向英国海军提供主要补给品的来源，而过去都是由俄国提供的；^[27]到1790年春，同波兰签订通商条约并保证波兰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自由贸易越来越成为英国政策的中心思想。

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20日逝世，首先使叶卡捷琳娜失去了其奥地利盟国的帮助。约瑟夫的弟弟和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也许是当时最明智的领导人，他充分认识到哈布斯堡各领地所处的危险国际地位，必须清除当时面临的普鲁士的威胁。于是利奥波德立即向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发出私人信件，表达他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尽管考尼茨强烈反对看上去像是向普鲁士投降的任何表示，但解决奥普分歧的谈判到4月已在进行。赫茨贝格继续坚持至少将部分加利西亚割让给波兰（因而也希望将但泽和托伦割让给普鲁士），这使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两国代表仍于6月26日在西里西亚的赖兴巴赫举行了会议。7月11日，体力衰弱和反复无常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认识到，这个交换计划遭到土耳其、波兰和英国的强烈反对，突然决定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与奥地利达成协议。赫茨贝格的计划被放弃了，利奥波德二世通过7月27日的赖兴巴赫协定，保留了加利西亚，并在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斡旋下，同意与土耳其政府媾和。普鲁士以暂时放弃扩张主义野心为代价，取得了表面上的外交胜利；但利奥波德却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在合理和体面的条件下的和平。

赖兴巴赫协定当然并没有结束俄土战争。一直到1792年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才在她的西南边界推进到德涅斯特河的条件下与土耳其政府媾和。不过，1790年7月奥普和约以后的局势发展已不属本章的范围。到赖兴巴赫协定签署时，1763年的国际关系结构至少已发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1763年时虽已强大但仍地处远方，并被西方的政治家

和外交家多少有些看不起的俄国，已在领土扩张方面比欧洲其他国家表现出更大的能量，这时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强国。1763年时从许多方面说还是欧洲最强国家的法国，这时则注定今后许多年要在国际事务中处于相对软弱无能的地位。几乎所有的观察家对它正在经历的这种变化的真正性质仍然不能正确理解。哈布斯堡各领地的削弱在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已显露出来，而在约瑟夫二世时代则已成为明显的事实，而且在许多方面加剧了；普鲁士的削弱也在迅速变得清晰可见，德意志显然跟过去一样，仍是欧洲政治中一个软弱而不稳定的地区。英国的声望和财力虽已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是尽管皮特开始关注在近东的利益，英国基本仍是孤立主义的——从许多方面看，在1790年较之6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重要的是，围绕着欧洲外交活动的一些问题产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业已奠定。近东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英法在殖民地的角逐，以及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室在德意志的宿仇，不久即将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将是由于法国新政权的存在以及波兰的消灭而提出的种种问题。

（王绍仁 译）

[1] 乌力马（ulema）主要指土耳其的穆斯林学者或宗教、法律权威。——译者注

[2] 《舒瓦瑟尔公爵回忆录》（巴黎，1904年），第389—390页。

[3] 关于舒瓦瑟尔的战略计划及其在18世纪60年代期间的发展，J. F. 拉姆齐：《1763—1770年的英法关系》（伯克利，1939年）第3章有扼要的论述。

[4] 见后面，原文第258页。

[5] 《俄罗斯帝国历史学会资料汇编》，第67卷（圣彼得堡，1889年），第25页。

[6] 见本书第7卷，原文第350页。

[7] 《巴黎和约后欧洲秘史概略》（伦敦，1772年），第37页。

[8] 如土耳其进攻俄国，或普鲁士在威悉河以西的领土遭到进攻，属例外情况，此时仅要求财政援助。

[9] P. 兰恩：《从亨利四世到韦尔热讷时期的法国外交》（巴黎，1945年），第265页。

[10] 见L. A. 德博纳维尔·德马尔萨尼《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瓦利埃·德·韦尔热讷传》（巴黎，1894年），第2卷，第304—308、317—319页中所引舒瓦瑟尔1766年4月21日和6月19日信函。

[11] H. 于贝施贝格尔：《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东方政策》，第1卷（斯图加特，1913年），第265、269页。

[12] 见下文，第11章，原文第324页。

[13] 见下文，第12章，原文第338页。

[14] 《弗里德里希大帝政治通信集》，第30卷（柏林，1905年），第406—407页。

[15] 见下文，第11章，原文第313页。

[16] 德国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鲁恩泽1768年以来对有些精神错乱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有极大的影响。他是皇后、英王乔治三世的妹妹卡罗琳·玛蒂尔达的情人，从1770年最后几个月起一直控制着丹麦政府，直到1772年1月在一次宫廷阴谋中被推翻。他短暂统治的特征是，在丹麦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了非常迅速和广泛的改革，尽管有时考虑不周，而且俄国对丹麦外交政策的影响也短时期下降。

[17] 《俄罗斯帝国历史学会资料汇编》，第13卷（圣彼得堡，1874年），第429页。

[18] 见本卷第17章，原文第503—505页。

[19] V. T. 哈洛：《不列颠第二帝国的建立》，第1卷（伦敦，1952年），第361页。

[20] J. 福蒂斯丘爵士编：《乔治三世1760至1783年书信集》（伦敦，1927—1928年），第6卷，第222页。

[21] A. 冯·阿尔内特编：《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书信集》（维也纳，1867—1868年），第2卷，第171—172页。

[22] 法兰克尼亚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个支系，曾统治法兰克尼亚公国。——译者注

[23] G. de R. 德弗拉桑：《法国外交史》（巴黎，1811年），第7卷，第132—140页。

[24] G. de R. 德弗拉桑：《法国外交史》（巴黎，1811年），第7卷，第195—197页。

[25] 《政治书信集》，第42卷（莱比锡，1931年），第420页。

[26] A. 冯·阿尔内特编：《约瑟夫二世与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通信集》（维也纳，1869年），第218、223页。

[27] D. 格哈德：《英国和日益发展的俄国》（慕尼黑—柏林，1933年），第292页及以下各页。

第十章 哈布斯堡各领地和德意志

一

七年战争的结束使德意志的许多邦进入了恢复和改革的时期。中欧广大地区——普鲁士、萨克森、波希米亚和莱茵兰——一片荒芜，饱受抢劫掳掠和横征暴敛之苦，民不聊生。沉重的战争税收使经济陷入枯竭的境地。许多邦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重建和改革。

在维也纳，战时的迫切需要清楚地显示出豪格维茨改革工作的不足。^[1]丧失西里西亚造成的影响固然已克服，岁入也有了很大增加，可是，在经历了4年战争之后，哈布斯堡帝国的财政已完全耗尽，行政管理陷入混乱。1756年所呈现的那种外交上的光辉前景已经消失，现在担心的是奥地利会沦为二等国家。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豪格维茨的改革工作本应加以扩大进行的。进一步变革的倡议来自首相考尼茨，他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是由于国内行政管理的混乱。在这个阶段，考尼茨仅限于提出单纯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方案。为了促进哈布斯堡情况千差万别的各省之间更大程度的团结，并使政策在行政方面更加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他建议成立一个咨询性的国务委员会（Staatsrat），具有“从中央”考虑国内各项事务的职能。国务委员会于1761年开始工作。考尼茨本人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他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财政管理机构，使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于1765年置于哈茨费尔德的最高领导之下。

哈茨费尔德的财政机构在其对手宫廷审计处（Hofrechnungskammer）的路德维希·青岑多夫的工作的配合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自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政府对其资金和支出有了比较精确的概念，草拟下一年度的预算并核查上一年度的账目。七年战争期间承受的沉重的国债负担在1766年有所缓和，新皇约

瑟夫二世于该年利用其父遗留下来的一大笔财富，将平均利率从6%减至4%。预算平衡指日可待。

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根本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除非采取特殊措施以避免危机，否则战争可能会再次带来与七年战争爆发后引起的同样的财政困难和行政混乱。所以政府的计划不仅是加强帝国的防务，而且要避免下次战争中的财政破产。这个目标单纯依靠行政改革是无法达到的。必须使国家的岁入有大幅度的增加。

七年战争的经验已经表明，承担直接和非直接税主要部分的非特权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已无力交付更多的税款了。确实，他们显然需要休养生息。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意图是要动一动交税少的特权阶层的财富。为此目的，她于1764年夏季召集了匈牙利议会。

匈牙利“国家”——实际上是权贵、缙绅和教士，因为只有他们在议会中有代表——凭借他们的宪法和在哈布斯堡帝国内的特殊地位，得以使匈牙利的财政负担与其他各省相比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顾问们明白要想让议会作出任何让步是何等的困难。他们用以应付这场即将来临的斗争的方式，不仅具有哈布斯堡政策的特点，而且具有开明专制主义的一般特点。他们鼓励一位匈牙利学者亚当·科拉尔研究匈牙利的法律和历史，以便为这位匈牙利女王[\[2\]](#)向议会提出的要求提供法律和历史的依据。就在议会开会前夕，科拉尔显然是主动地发表了其研究成果。[\[3\]](#)

女王提交议会的咨文包含两项要求：增加匈牙利的税收；把贵族在战时出人员服封建兵役的义务——改变为向国家交付现金，俗人和教士完全一样。科拉尔著作的发表激怒了议会，拒绝考虑上述要求，直到该书被查禁，作者受到惩罚。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声望虽然由于议会的态度而遭到重大的损害，但她还是在劝说下正式查禁该书，为讨论她的要求扫清了道路。即使如此，议会仍然顽固坚持反对态度，有关替代服封建兵役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在提高匈牙利税收问题上也遭到议会的反对，其理由是匈牙利农民早已一贫如洗，无力再多缴税款。政府在回答这种论点时预示下一步将采取改革计划中的重大步骤：“如果议会采取适当措施（从而按女王的答复行事）以促进纳税居民的福利，女王陛下一刻也不会怀疑，后者……不久即可免于所要求的增税义务。”[\[4\]](#)

议会没有接受这一暗示。它在一些比较顺从的贵族的推动下通过了少量增加税款的议案，但宣布解散，而未讨论政府有关减轻农民封建负担的建议。

即使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不管等级会议的反对，决心减少农民的封建负担。有关农民处境的一些报道使她大为震惊，并深深触动她人道主义的感情，从而加强了她的决心。从1766年起，派出了皇家特派员前往匈牙利各县，坚决地确定和调整农民的义务。1767年颁布了关于整个匈牙利的调整法令（*Urbarium*）。这项法令使匈牙利农民成为世袭的租借人，有离开自己租借地的自由。凡拥有法定大小租借地的农民，有义务一周内从事一天带有役畜或两天不带役畜的劳役（如领主的田地有急需则劳役天数加倍），并且一年内有一天伴随领主狩猎。法令总的倾向可以恰当地概括为把“现有的最低限额改变成为最高限额”。^[5]执行法令的任务掌握在皇家官员而不是地方当局的手中。这样，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便与领主的子民第一次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其结果是皇家的权力以牺牲宪法作为代价而增大，从而使贵族们对未来充满了忧虑。

在匈牙利推行的原则同样在哈布斯堡的其他领地加以实施。就在匈牙利调整法令实施的当年，政府也要求施蒂里亚的等级会议^[6]就减轻农民封建负担的方式方法提出方案。这项法令毫无疑问反映了女王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施蒂里亚传统的农民负担也许是最沉重的，至少在1772年加利西亚创帝国封建压迫新纪录之前是如此。施蒂里亚等级会议进行了一系列阻挠活动，使此项调整法令拖延实施达十多年之久。

与此同时，奥属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农民叛乱和饥馑，使政府的关注集中在波希米亚领地的土地上。在与特别召集的等级会议进行初步谈判期间，明确阐明了政府坚持的原则。规定“农民作为构成国家权力基础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必须能维持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农民必须能养活自己的家庭，并能缴纳平时和战时所需的政府费用”。在未来任何确定的惯例均不得违背这项原则。

在匈牙利以外的第一个调整法令于1771年在奥属西里西亚颁布，确定了一周三天劳役的最高限额。由中央控制，不受等级会议支配的新的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实施手段。^[7]尽管饥荒已引起广泛的灾难，

共同摄政的约瑟夫也失去了耐心，波希米亚等级会议仍然采取拖延策略。因此，继而于1772年在比较顺从的下奥地利颁布了下一个法令。在这个省，传统的负担相对较轻，法令规定以两天带役畜的劳役为最高限额。在国务委员会委员克雷塞尔报告说再次延误将会引起严重骚乱以后，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制定的期待已久的法令终于在1775年颁布了。最高限额劳役规定为每周三天。施蒂里亚等级会议于1778年也获得这一比较宽大的让步。

国家对封建负担的调整在得到实施的地方使农民深受其益。所有的调整法令都规定，凡传统负担低于新的法定最高限额者均不得予以增加。不仅如此，农民使用土地权的安全保证也增加了，因为政府利用其在各省新成立的行政机构实施禁止驱逐佃户的旧法令，从而防止了纳税人数目的减少。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了解到农民的详细情况之后良心深感不安，特别是自从1775年后波希米亚不断发生农民骚乱以来更加如此。她深知她的立法未能终止封建主的所有不法行为，并用明确的言辞谴责领主们继续剥削他们的农奴。她于1777年1月写信给她的儿子斐迪南说：

“这些封建主在可怕地剥削农民。”两周以后，她又写道：“我们知道，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些可怜的人在遭受残暴的压迫。”^[8]在这种心情下，她准备接受像拉布和布兰克等激进而开明的顾问的建议，这些人曾建议在波希米亚从事进一步的改革，在草拟调整法令中起了主导作用。从共同摄政的约瑟夫的笔下，我们看到有关她的意图的描述：“……她要废除农奴制，要专断地确定几百年来农民为租种土地而与他们的领主所订立的一切契约的内容和缴纳的一切钱款的数目，要改变整个农村经济体制，以最终减轻她全体子民的负担和义务，而丝毫不考虑到封建主……”^[9]

约瑟夫显然认为，对一个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母亲听凭良心和忧虑的驱使走得太远了。他估计，倘若新方案付诸实施，大部分封建主将会失去一半收入而濒于破产。因此他同一致反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贵族大臣们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这项宏伟的计划遂告失败。^[10]布兰克被流放到士瓦本，拉布则只有在皇家土地和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庄园上实行他的原则而聊以自慰。

就这样，从贵族手中取得更多财富的坚持不变的决心，使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政府沿着社会改革的道路走了很长一段路，成为重要的社会变革的起点。当政府的注意力转向教会的巨大财富时，其后果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向教士提出的要求同向贵族提出的要求完全一样——为国库收入提供更多的钱，并得到保证，不会有更多的财产通过转为教会所有而逃避严格的征税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与之谈判的对手不是一个省议会而是罗马教廷。问题在于，教廷是否会比匈牙利议会顺从一些，玛丽亚·特蕾西亚这次是否也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来执行。

种种迹象表明，不会遇到严重的反对。考尼茨一再强调，皇后在这类事务上一向不会未得到罗马教廷的同意而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在1762年谈判之初曾通过探求历史上关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有约束力的”事例来加强政府的立场。

但不久就非常明显地表明，新教皇克雷芒十三世及其国务卿托里贾尼极不愿意对世俗权力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相反，他们坚持教皇在米兰公国的圣职委任权一事似乎说明，罗马教廷已转而采取攻势了。1762年10月教皇的一道谕令拒绝同意对米兰的教士增加税收。托里贾尼提出，达成协议必须以扩大教皇对奥地利教士的影响为条件，从而巧妙地为修订教士纳税的现行规定而举行的谈判设置了障碍，因为这个条件是考尼茨所不能接受的。

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教皇的反对所作出的反应同对匈牙利议会的反对所作出的反应如出一辙。当考尼茨于1768年年初就同教廷举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提出报告时，她加了如下批示：“如罗马教廷拒绝同意修订教士纳税的规定，那就不用进一步谈判了；因为我已决定使用我的合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自行行使管辖权。”[\[11\]](#)

在防止更多的财富落入教会手中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政府可以提出她的前任所颁布但一直被忽视的许多法令。她本人1753年颁布的法令也同样未能收效。罗马教廷明确表示其敌视的态度。因此，1760年以后进行的重大行政改组包括实施国家有关教会事务的条例。1765年在米兰公国设立了经济委员会（Giunta Economale），接着在1769年为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两个领地颁布了政教关系特许令（Concessus in Publico-Ecclesiasticis）。1768年6月2日就上述经

济委员会发出的秘密指示确立了一切不是由耶稣基督具体委托使徒管理的教会事业均属世俗当局管辖范围的原则；指示中有一个很短的目录，列出了委托使徒完成的教会使命；并宣称，君主自由地赋予教士的各种权利和特权与任何其他法令一样，可予以修改或废除。^[12]秘密指示中确定的这些原则于1769年予以普遍执行。^[13]这样，就奠定了“约瑟夫主义”的基础。

为这项必然要遭到教会激烈反对的政策提供理论和历史根据的任务落在国务委员会委员海因克的肩上。考尼茨也就这个题目写了大量文章，但我们现在尚无证据表明他这些文稿曾经起过什么作用。^[14]

就这样，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政府为自己制成了实用而有理论根据的武器，用这些武器，政府不仅可以实现其与其说是有限的不如说是独创性的目标，而且把教会的全部财富和组织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约瑟夫二世后来充分运用了这些武器。与此同时，玛丽亚·特蕾西亚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也决心亲自广泛使用这些武器。1767年制止教会获得财产的第一个有效的法令在米兰公国实施。1768年以后，向教士征税而不再享受教皇的豁免。1769年，解散了第一批修道院，其捐赠基金全部转交给贫穷的教区。1771年公布的法令确定24岁为立誓当修士的最低年龄，入修道院时携带的财产最高限额为1500弗罗林。

解散耶稣会自然也就合乎逻辑地符合这种模式。政府不愿而且也无力支付新教育制度的经费，而如果要使改革工作贯彻始终，这项教育制度是迫切需要的。没收耶稣会的财产而充作一项教育基金（Studienfond）并依靠这笔基金在哈布斯堡帝国每个省建立了国立小学。由西里亚西的费尔比格尔神父于1774年草拟的教学大纲旨在培养“有用的、忠顺的基督教公民”。新的基金还使中等学校的改革得以实现，其目的在于提高中学的质量，使之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这笔基金为一些大学提供了新的教授席位，这些教授按照科拉尔和海因克为捍卫政府而提出的各项原则来教育未来的文官。

在变革和改革的所有这些年代里，约瑟夫负责军队事务。他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帝国在财政和行政管理方面日益增长的实力应充分反映在它的军队和国防上。为此目的，他与他的恩师、第一流的组织家

拉西陆军元帅进行合作，以饱满的精力进行工作。他实行部分征兵制以替代强征入伍的办法来提高兵员的数量和质量。部队经常进行队列训练和演习。由于改善了部队家属和伤病员的供应，部队的士气有所提高。部队装备现代化，沿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边界的防御工事也得到了加强。新型大炮之多连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也为之感到吃惊。

毫无疑问，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七年战争后从事改革“并无近期发动战争的意图”。^[15]战争的经历使她真正渴望和平。但考尼茨或约瑟夫并非如此。考尼茨仍热衷于扩张计划，以恢复失去的对普鲁士的优势。约瑟夫则急切希望一试他的新型部队，以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在18世纪弱肉强食的国际法则下，一个国家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扩张。

因此，根本不存在奥地利拒绝参加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可能性。皇后为之悲伤，而考尼茨和约瑟夫则表示欢迎。普鲁士也非常高兴，两国的力量对比仍旧保持不变。

决定性地打破这种力量对比是奥地利1778年进行侵略的主要目的。巴伐利亚的新统治者查理·特奥多尔愿意将国土出卖给约瑟夫，以换取一笔年金和徒有虚名的荣誉。奥地利与法国结成牢固的联盟。普鲁士同俄国的联盟则正在削弱。考尼茨不愿坐失良机。奥地利军队于是越过边界，占领了下巴伐利亚，使考尼茨得以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他确实没有料到弗里德里希会冒战争的风险。但是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希从瓜分中几乎一无所获。因此他决心要奥地利降低其要求，即使这意味着战争也在所不惜。由于约瑟夫态度坚决，普鲁士军队于1778年7月越过边界进入波希米亚。虽然没有打几枪，但约瑟夫在接着进行的战役中失去了信心。他身为三军统帅却缺乏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垂涎已久的军事荣誉从身边溜走了。

约瑟夫的徒劳无功，他母后的反对战争，加之弗里德里希施展才能，虚构出俄国扬言要站在他一边进行干预的幻景，使奥地利无计可施，只得放弃其要求。根据1779年的特申条约，将萨尔茨堡北部一个小区因菲特尔（Innviertel）割让给奥地利“以满足其自尊心”。考虑到战争的巨额费用，这个结局是太不值了。

二

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80年11月逝世，约瑟夫成为哈布斯堡领地的唯一统治者。新政权执行的政策并无根本变化。1780—1790年期间政府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早已确定，只是新政权缺少旧政权那种政治老练和处事谨慎的明显特点。约瑟夫没有完全继承母后的坚强性格，而是以外表上的严厉、尖刻和不能容纳反对意见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这位新统治者认为改革工作并未结束。他对军事力量已达到的水平深感不满。巴伐利亚继承权战争暴露了毋庸置疑的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弱点。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首先承认上次战后我国局势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已大大恶化，我国的各个省已陷入贫困，无力维持目前的军事编制。只有改善我国的农业、工业、贸易和财政，才可能保持并扩大我国的军事力量，以应付未来的种种意外事件。”[\[16\]](#)

如约瑟夫所看到的，在他执政之初所面临的局势下，即使执行一项旨在保卫帝国免遭邻国进攻的纯粹的防御计划，也需要国家的财政状况有重大的改进。但不久他就使自己和他的文官们追求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他必须拥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推行进攻性军事行动，以便在未来确实能扩张领土。为了给这种军事机器创造财政基础，必须在政府开支上厉行节约，使富有阶级作出更大的贡献，并最大限度地发展国家经济的每个部门。这就是约瑟夫二世的政治纲领。鉴于前朝的经验，这位新统治者不举行加冕典礼，以免受到他拟议中的改革影响的富有阶级利用传统的套话和诺言作为阻碍他改革的武器。

他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厉行节约。整个宫廷都必须奉行皇帝自己身体力行的俭朴的生活方式。他通常身着一套普通军服，他的宫殿在同代人看来就像一个军事司令部而不是欧洲卓越君主的寓所。约瑟夫改组行政机构的目的和结果至少是既加强节约又加强集权。财政部（Hofkammer）与波希米亚—奥地利总理公署合并，特兰西瓦尼亚总理公署与匈牙利总理公署合并；奥属西里西亚、戈尔兹和卡林西亚各省

的政府分别与摩拉维亚、的里雅斯特和施蒂里亚各省的政府合并。这样，便可大量减少领取国家薪金的官员的数目。

典型的“约瑟夫主义式”的节约措施也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推行。通过适当控制学费和奖学金，每年入学的学生人数严格限于预计空缺的文官人数。允许以这种方式继续办学的只有维也纳、佩斯、卢万和帕维亚的大学，其他大学均降格为中等学校（Lyzeen）。显然，约瑟夫二世不想赞助专攻“纯粹”科学和艺术的学者和作家。他没有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和作家来维也纳，他尽可能明确表示也不鼓励本国入朝这方面发展。甚至连莫扎特，尽管皇帝本人演奏并欣赏他的音乐，也在这场雷厉风行的节约运动中受到损害。

在税收方面，约瑟夫在与母后共同摄政期间就曾明确表示：“财政机构的任务是尽可能少地、恰当而正确地征税，对低层阶级不应强加过重的负担。税收应平均分配，贵族、农民和市民都应按其收入纳税。即使有些人享有某种特权，也仍应像其他人一样对待；对负担过重的人也应公正地对待。”^[17]

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所沿用的赋税制度根本不符合这些要求。不论是在各省之间还是在各阶级之间负担都是不公平的。大量的贵族土地并未列入现有的土地登记册内，而且登记入册的贵族土地的税额也远远低于农民土地的税额。匈牙利的贵族认为自己应全部豁免纳税。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查看1782年的账目时，曾评论说，竟有为数达2100万弗罗林的“巨额”款项被列入征税工作的花销。^[18]

皇帝弥补所有这些缺点的简单方法是实行一项完全根据土地登记册而征收统一土地税的计划。预期国家财政可从几个途径获得好处：增加土地税的收益使得废除一些不经济的税种成为可能；按收入征税将会清除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障碍；按照当时流行的重农主义理论，增加土地的税收将有助于对土地的更加集约化的利用。

约瑟夫积极进行落实此项计划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他需要的是18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末日判决书”。^[19]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省已进行过人口普查，作为1771年实行征兵制的基础。1784年，约瑟夫下令在匈牙利进行人口普查。自尊而富有独立精神的马扎尔人的反应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家们对“末日审判”调查的反应毫无二致，这无疑部分是由于他们怀疑普查的背后另有目的。据记载，各县议会

提出了郑重的抗议，官吏遇到了许多积极的反抗，王国的自治行政当局拒绝执行这项命令，从而明确表示出它同情的是哪一方。

约瑟夫在1783年访问匈牙利期间，发现他母亲的法令在许多地区不过是一纸空文，那里的县政当局根本不敢想干预权贵们肆无忌惮的封建暴政。因此，他把进行人口普查看成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他作出让步，“那么在未来的一切事情上皇家将再无权威可言”。^[20]为了让人们依从，他派遣了一营步兵进入匈牙利，下令逮捕任何反抗者，一律押送维也纳而不论其职位高低。人口普查才得以进行。

编制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省完整的土地登记清册的工作于1785年开始。在匈牙利，约瑟夫解散了无限期阻挠这项工作的宪法机构，而代之以特蕾西亚的行政体系。约瑟夫向他的弟弟简要地讲述他的改革时说：“我用8个保证执行我的命令的人替换了54个无所事事的人。”^[21]1786年土地测量员在匈牙利开始工作。

正是土地税这项工作才使得约瑟夫重新考虑他母亲关于进一步制定有关农民的立法的建议。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当时及以后，约瑟夫所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农民，特别是波希米亚的农民正在采用政治鼓动的办法以求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封建负担。1781年有关农民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政府对农民改善自己的境况的努力进行控制。然而，1785年以后，约瑟夫主要关心的则是找到一种简便而满意的方法来计算农民的财力物力，以便评估土地税的数额。他决定农民以现款向领主缴纳其每年总收入的固定百分比（约占17.67%）以替代其以前所有的封建负担。据此，每个人，不论是领主和农民，均按其估计的土地总收入来确定其应缴纳的土地税。^[22]

人口普查和土地登记于1789年完成。该年2月颁布法令规定，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统一的土地税为其总收入的12.22%。加上应缴纳的抵代封建性负担的17.67%，农民还剩下总收入的70%用于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购买所需种子，以及向教区、神父和乡村学校校长缴纳的款项。由于省等级会议的行政机构此时已与省政府合并，征税工作便完全成为政府的责任。为了对付许多农民认为他们将会，或者应该完全免除封建负担的想法，法令加入了一条对拒绝向领主缴纳租金的人处以重罚的威胁性条款。为了反驳贵族提出的法律和历史上的论据，文件还包括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理论中的一些论点。我们在文件

中可以读到：“说贵族在有农民之前就拥有土地，并且他们是根据某些条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岂不是胡说八道？如果没有人耕种土地，他们肯定马上就会饿死。”^[23]

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法令还是引起了各省等级会议的一致反对和农民的广泛骚动。即使约瑟夫二世的寿命再长一些，他是否能实施这项法令，肯定是值得怀疑的。

考虑到哈布斯堡各领地的经济相对落后，除非同时实行发展经济的政策，否则仅仅靠改组税制是不大可能使国库收入有显著增长的。前面已经指出，^[24]约瑟夫之所以推行新的土地税，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手段。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大臣们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经济对于增加国库收入和国家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她执政期间在这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约瑟夫二世真心实意地追求这个目标，他既不允许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允许自己的倾向性妨碍这一目标的实现。他判断一切现行的传统做法和机构的唯一标准，乃是看其是阻挠还是促进他领地内的工农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夫的宗教宽容政策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他共同摄政期间，他经常一有机会就阐明他的态度。这同他母后形成尖锐的对照，后者在干预其领地内的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方面一向犹豫不决。他写道：“我在世俗事务中，准备接受任何人的服务，而不管其属于哪个教派，就这一点而论，我是主张信仰自由的。让每一位有能力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对每一个有能力的人，对我们有用的人，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活动的人，我都准备授予公民权。”^[25]

约瑟夫即位后立即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并下令撤销前朝规定的种种惯例。他原想把事情只限于纯实际方面：事实上取消现存的各种歧视，但不事宣扬，不发布可能损害天主教会声望和权威的公告。^[26]然而，在一个公众舆论迅速觉醒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步骤。有关事实上的宗教宽容的消息很快便泄露出来，引起对新政策的实质的纷纷猜测。这就迫使约瑟夫着手公布宗教宽容法令（1781年10月），以便对他的宽容政策的限度不致产生误解。^[27]大批子民登记信仰某些受到宽容的新教教义一事引起他高度的关注，不久，他便发布指示，使上述登记更加难以进行。

如果说宗教信仰不应妨碍“合格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以自己的技术为国家服务的话，那么，在哈布斯堡领地的许多省内仍然把人束缚在领主庄园的农奴制也不应该妨碍人们这样做。1781年11月至1782年7月间公布的废除农奴制的一些法令声称新的自由将会造福于农业和工业，但警告农民，他们仍要服从各自的领主。认识到提高农民的地位即意味着提高农业的水平，这可能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约瑟夫遵循像约瑟夫·冯·宗南弗尔斯等自60年代以来支持农民事业的开明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终于将他的农民立法扩大到全部世袭土地的使用权。

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约瑟夫二世有关行会的立法。这些基本上是限制性的组织虽然没有遭到公开压制，但已完全丧失了阻挠生产或商业活动的一切权力。这只不过是让每个有能力的人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条件下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的政策的一个方面。

约瑟夫二世的最后一项经济立法乃是1784年建立的保护主义体制。这一体制严格禁止进口可在哈布斯堡领地生产的所有产品、物资和食品，或可以用国内产品替代的物品。这一体制自然对依赖现在不准进口的外国商品的贸易为生的人造成不利的影响。但这给受到很好保护的国内市场以有力的刺激。不仅如此，约瑟夫还得以同摩洛哥、土耳其、俄国和新建立的美国签订了一批与他的进口限制不矛盾的有利的贸易协定。

如果约瑟夫自己提出的证据可信的话，他的政策不久就取得预期的结果。他在给他弟弟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说：“沿着多瑙河通往利凡特和克里米亚的航运在与日俱增。……在不存在违禁商品的情况下，工业和制造业在蓬勃发展。许多过去依靠在自己的国家生产商品为生的纽伦堡、士瓦本，甚至英国人现在都在这里定居从事制造业。”^[28]

约瑟夫的教会政策必须联系上面概述的总政策加以研究。与约瑟夫政府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在这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的也是要求提高工农业生产并推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构为国家服务。

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考尼茨于1768年向经济委员会发出的一些指示为由国家发起的教会改革奠定了基础。^[29]约瑟夫想做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从体现在这些指示中的原则中找到依据。

由于约瑟夫眼前所关心的是其领地的经济发展，必然就把修道院制度看成是最不可取的现象。这种制度夺去了经济迫切需要的资金，妨碍许多可能有用的公民为国家服务。这种状况是这位皇帝所无法容忍的。他在位头几个月发布的一系列法令，使他自己成为修道院人才和经济资源的唯一主宰。1781年11月政府对茅尔巴哈（下奥地利）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不法行为进行的调查，给他一个极好机会颁布法令，解散属于这些默祷教派的所有修道院。政府为其行动进行辩护时称“长期以来有证据表明，这些对它们的信徒毫无用处的教派已不会使上帝感到愉快”。[\[30\]](#)

许多修道院的建筑这时被改作工厂、货栈、粮仓和住所。大量的土地在市场出售。同时还决定，根据约瑟夫主义神学家劳滕施特劳赫提出的一份报告，僧侣可以向他们的主管教区的主教申请取消他们的誓约。[\[31\]](#)然后，他们可以进入院外教士的行列，担任皇帝希望他们从事的许多“有用的”职务。

被解散的修道院的被世俗化的财产构成“宗教基金”（Religionsfond）的基础，政府用这笔基金资助整个主教管区和教区的改组工作。居住在哈布斯堡领地以外的主教失去他们自古以来享有的管辖权。精力充沛的“约瑟夫主义者”被提升担任新设立的主教职位。根据教区的范围不得超过离教堂一小时步行距离的原则，改组了旧教区并设立了许多新教区。约瑟夫显然认为，教士在人民中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他让他们扮演一种受过高度训练和具有专门知识的文官角色。他们要教导人民摆脱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的古老的迷信；教育人民理解实用基督教的价值；使人民铭记遵纪守法的极端重要性；当人民陷入逆境时给予鼓励；如果有可能还给予各种实际的帮助。

约瑟夫在教士中遇到强有力的抗拒，这使他深信国家有必要控制教士的教育和训练。为此他下令在每省的首府建立一所“总神学院”（1783年）。由劳滕施特劳赫制定所有神学院都必须遵守的课程内容。到1786年，新设立的神学院已经垄断了对还俗教士和修道士的教育。

同他的母后一样，约瑟夫也关注他推行的教会改革措施能得到教皇的批准，但是他有充分的准备，一旦遭到拒绝，他就自行其是。

1782年，罗马教皇庇护六世对维也纳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访问，旨在使皇帝的教会立法作某种修改。谈判的过程使他深信，他必须或者接受既成事实，或者眼看他的拒绝被认为毫无意义而遭到蔑视。他选择了前者，从而保全了面子，可是却为以后皇帝进一步提出要求打开了大门。1783年，约瑟夫重申久已失效的任命米兰公国主教的权力。教皇所能做的只是再一次保全面子，在1784年1月签订“友好协议”，“授予”皇帝早已夺取到手的权力。^[32]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公开破裂在1787年似乎迫在眉睫：庇护六世拒绝为一名根据主教管区改组而新任命的大主教举行正规的授职仪式。约瑟夫在考尼茨的鼓动下扬言“要恢复整个天主教会曾实行了13个世纪之久的确认主教任命的惯例”。^[33]但由于这位有争议的大主教候选人的去世，皇帝才没有将这一威胁付诸实施。

据我们所知，事实和数字都说明，改革的伟大计划实现了计划制定者预期的目的。波希米亚、下奥地利、施蒂里亚、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的纺织和冶金工业都有了发展。波希米亚的工厂数目增加了150%。维也纳近郊的工业区迅速扩大，全市人口超过20万。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贸易中居支配地位。经济发展的成功反映在国库收入的增加上，从1781年的65777780弗罗林增至1788年的87403740弗罗林。军队正常编制在豪格维茨改革后确定为10.8万人，现在则达到30万人。士兵的条件、地位和装备都有很大的改善。约瑟夫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确实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约瑟夫在位时期的悲剧在于皇帝本人未能将其成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转化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确实可以这样说，他的外交政策的失败损害了他已取得的成就。

约瑟夫外交政策的柱石是1781年与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结成的联盟。约瑟夫和考尼茨都庆幸自己拆散了俄国同普鲁士的联盟。如果法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奥地利和俄国都指望在领土上取得一些好处。土耳其的领土是叶卡捷琳娜垂涎的目标。她觊觎克里米亚半岛，并梦想希腊王国成为她的卫星国。约瑟夫则仍期望获得德意志的领土，以便恢复过去对普鲁士的支配地位。

叶卡捷琳娜于1783年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开始采取行动。约瑟夫全力支持他的盟友，向土耳其施加明显的压力以使其就范。最后

他获得了成功，可是却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使各国外交界深感惊讶。理由是很明显的。他帮助叶卡捷琳娜一弹未发就得到了克里米亚，他认定这就会使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德意志问题上给他以有效的支持。他在德意志索取领土的计划已接近成熟了。

巴伐利亚再次成为约瑟夫实现其野心的目标。像在1777年设想的那样进行明目张胆的兼并已不可能，但约瑟夫已作好充分准备，以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尽管他得出结论，这样做会在税收上有所损失。占领巴伐利亚给他带来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付普鲁士的好处，远远超过财政上的微小损失。

约瑟夫和考尼茨对俄国将会给予有力支持深信不疑。当年俄国势力投向普鲁士一方曾是奥地利1779年的野心归于破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次对实现这些野心岂不也会起同样的决定性作用吗？1779年持敌对态度的韦尔热讷，将会通过以在斯凯尔特河争端问题上对尼德兰联合省进行战争相威胁而迫使其保持缄默，并以出让卢森堡而诱取其采取支持的态度。普鲁士则可通过给予在维斯杜拉河上通商的特权而得到安抚。

后来这个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曾得盟国奥地利之助而毫不费力得到克里米亚的叶卡捷琳娜竟对这个盟友采取了荒唐可笑的形式上支持的态度。这位精明的德意志公主丝毫不想满足其盟友对德意志的野心。尽管这个盟友对帮助她实现在巴尔干的野心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忙于消化巴伐利亚的皇帝暂时不可能去积极关心在巴尔干的冒险计划的。

叶卡捷琳娜对领土交换计划采取明显冷漠态度，使韦尔热讷更加坚决执行反对的政策，并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提供了机会组成“诸侯联盟”（Fürstenbund），使约瑟夫二世在政治上遭到极不体面的失败。约瑟夫原本试图在德意志恢复哈布斯堡的支配地位，面对的却是一个由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诸侯都参加的、承认普鲁士领导地位的组织。

经历此事之后，约瑟夫开始怀疑同俄国结盟的用处。然而，同普鲁士和解的替代方案立即遭到考尼茨的拒绝。叶卡捷琳娜因而得以继续推行其在巴尔干进一步扩张的计划。为了确保奥地利的合作，有必要让约瑟夫感觉到她已经足够强大，即使没有奥地利的合作，她也下定决心单独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于是她向约瑟夫发出访问克里米亚

的邀请。邀请的口气很明显是向一位地位较低的伙伴发出的，骄傲的约瑟夫必然会予以拒绝。这一次又是考尼茨说服他暂时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奥俄联盟。

尽管叶卡捷琳娜和波将金特意安排了壮观的场面，约瑟夫对俄国的攻击力量仍然持怀疑态度。同时他肯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不足以向土耳其发动全面的进攻，因此极力主张推迟进攻。事态的发展是由叶卡捷琳娜和土耳其政府决定的。叶卡捷琳娜只关心得到奥地利的合作，根本不担心在奥俄联盟内力量对比会向有利于奥地利的方向转化。土耳其政府则知道进攻即将来临，不准备坐待侵略者作好充分准备。因此，当叶卡捷琳娜向君士坦丁堡提出新的要求，而土耳其作出强烈反应时，犹豫不决的约瑟夫在1787年年底处于不得不按联盟的条款行事的境地。如果说约瑟夫还有机会拒绝叶卡捷琳娜巧妙地给他安排的充当俄国的助手的角色的话，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路德维希·科本策尔很快就破坏了这个机会。这位平庸的外交官对俄国大臣们告诉他的有关俄国军事力量的情况和叶卡捷琳娜本人必要时将单独行事的坚定决心都一概深信不疑。^[34]约瑟夫相信了他的大使提供的情报，并在两次都未能占有贝尔格莱德之后于1788年2月向土耳其政府宣战。

按照欣喜若狂的女沙皇的说法，约瑟夫的决定“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王侯、杰出的天才”。^[35]实际上，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皇帝专心致志于东方事务，给比利时人以可乘之机，发动叛乱以反对他的行政和教会改革。军队需要大量的供应则给了桀骜不驯的匈牙利贵族以公开反对的机会，并在农民当中给他们提供了一大批追随者。贸易混乱，物价飞涨，征收新的战争税在所有各省的所有各阶级中引起激烈反对，从而有助于使贵族的反对势不可当。

与这些损失相比，实无收获可言。战争的巨额花费很快就把宫廷审计处处长查理·青岑多夫伯爵精心治理好的财政推向了崩溃。1788年的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全面失败。同1778年一样，约瑟夫这次仍是一个不称职的将军。他不得不目睹某些蒙受耻辱的挫折。事实证明，俄国的军事实力远远低于轻信受骗的路德维希·科本策尔所作的估计。健康情况不佳迫使约瑟夫无法在1789年的战斗中亲自统率军队。这一年战斗的高潮是在富有作战经验的陆军元帅劳登指挥下占领

贝尔格莱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奥地利军队的声誉。即便如此，战争仍无胜利结束的前景。普鲁士、波兰和萨克森沿奥地利边界集结军队，并鼓励了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叛乱分子。约瑟夫不得不准备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焦急不安地探询叶卡捷琳娜是否能给他足够的支持以对付普鲁士进攻的威胁。否则他将不得不考虑单独同土耳其媾和。

事实上，约瑟夫二世从1740年以来就将帝国领入最严重的危机。他在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和备受失败的折磨之后，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让他的弟弟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去面对种种后果。

三

作为所谓“开明专制主义”的典型改革纲领，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还没有别的统治者曾尝试哪怕是部分地这样做过。当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过只是几平方英里版图的统治者，即使有此愿望，也根本不具备成为有效的改革者的用武之地。就中等规模的邦的统治者而言，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也只有三个。一个是截至1774年的美因茨选帝侯埃梅里希。他曾把他领地内的教会组织完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以致考尼茨也利用其法令作为他在哈布斯堡各领地进行教会改革的先例和典范。^[36]一个是从1768年起任萨克森选帝侯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四世。他曾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把他的国家从七年战争的浩劫和耗损中恢复过来，使之在经济上成为德意志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另一个是巴登总督查理·弗里德里希，他曾征收土地税，废除农奴制，减轻农民的封建负担，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人们绝不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其他统治者都放弃了增加收入的愿望。但情况似乎是，只要有可能，他们宁可不采用开明专制主义的办法。有些统治者采取让自己的子民去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充当雇佣军的办法获取大量财富。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查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采用这个办法获得的纯利润达500万泰勒。^[37]

过去的流行看法将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看成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看来不得不赞同这样的结论，即这种观点是俾斯麦时代的遗风，当时德国的历史学家如想晋升或得到允许利用档案，就必须效忠于普鲁士。这位普鲁士国王的政治著述中也许包括无人能与之比拟的关于开明专制主义的理论阐述。可是他的实践远远背离了他的理论，往往更像一个不开明的小暴君而不是开明的专制君主。弗里德里希同约瑟夫二世一样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外国人前来定居开垦荒地，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但他严格禁止侵犯普鲁士贵族的即使是微小的财富和特权，在他整个在位期间，直接的土地税一直维持在原来的低水平，而间接税则不断提高。所以，弗里德里希绝不是在从事税收改革，而是引进了法国包税制的最落后的方面。商业和财

政利益方面的考虑丝毫也没有促使他给予农民以迁徙自由或坚持减轻农民过重的封建负担。他坚决反对做任何事情以损害社会的封建成分，这也许是人们在18世纪德意志所能看到的最彻底的中世纪特征。

普鲁士的司法改革是唯一可与奥地利真正相比拟的领域。按理说，改革的详细计划应由法律专家来制订；普鲁士的法律专家同奥地利的同行一样，都受到启蒙运动司法理想的启迪。普鲁士的科策伊（Cocceji）、卡默和苏亚雷斯同奥地利的马蒂尼和基斯具有同样的观点。而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一样，经常无视法律原则，任意干预法律程序。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宗教不持固执的态度是他的同代人称颂他为开明专制君主的主要原因。结果是，当时自由讨论宗教问题在柏林盛极一时，深受形成舆论的分子和作家的赞赏。然而，目光比较锐利的人了解这种“柏林式自由”的限度。莱辛在柏林遭到压制。1769年当他决定离开柏林时，写信给显然对普鲁士首都的状况感到满意的尼古拉解释他作出决定的原因时说：

不要对我谈论你的柏林式的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它只不过是随意取笑宗教的自由。……让某些人试一试在柏林自由地写些别的东西，就像宗南费尔斯在维也纳所写的那样；让这些人试一试按照宗南费尔斯的方式把真理告诉宫廷里的那帮暴徒；让某些人在柏林支持农民的权利或抗议专制和剥削，就像在法国和丹麦所做的那样，那么，不要多久你就会从亲身体验中了解到，目前在欧洲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具有奴役性的。[\[38\]](#)

四

与开明专制主义改革伴随而出现的是非特权阶层的政治大觉醒。最初的动力来自上面，特别是在哈布斯堡领地内，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都经常努力动员社会舆论的支持以反对贵族和教会的反对势力。在本章前面已提到的科拉尔关于匈牙利法律的著作，宗南费尔斯发表在《没有偏见的人》中的描写农民处境的文章，^[39]在教皇访问维也纳期间纷纷出版的反教皇和反教会的小册子——这些和许多类似的冒险活动都暗中得到政府的鼓励，以便使有争议的立法得以实施。

这种诉诸公众舆论的做法造成的后果超出了政府的预料。为政府的政策提供根据的各种政治思想和原则由政论家们加以详尽阐述，并最后被用来对贵族特权、基督教义，以及专制主义本身的基本论据提出质疑。

在这个现在被称作“民主革命的时代”，激进的政治著作对舆论的总的气氛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其影响也不限于政治领域。在整个德意志和哈布斯堡领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经常出入于新建立的半公开阅览室（Lesekabinette），农民则聚集在能给他们念报纸的人周围，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流露出的愿望，不仅使不开明的而且使开明的统治阶级都深为惊恐。

开明专制主义限制妨碍国家充分行使权力的贵族特权。公众舆论开始对贵族特权本身的合法性加以否定。为了了解农村中这种新态度的典型表现，无须探讨开明专制主义进行的封建改革前发生的农民暴乱和农民起义，^[40]而应探讨这些暴乱和起义之后出现的激动不安的局势。农民正获得足够的兴旺并想进一步致富。君主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明显冲突预示着封建制度的加速灭亡。关于要对领主继续履行种种义务的一些庄严的声明都被农民看成是领主们玩弄的骗局而被置之不理。农民通过他们的报纸随时得到1789年7月法国事态发展的消息，这只会使农民坚定自己的态度。因此，在1789—1791年期间，在哈布斯

堡诸省、萨克森、西里西亚以及德意志其他许多地区，农民作出强大而广泛的努力来摆脱一切残余的封建义务。

如果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期的文献来判断的话，就可以知道，在农民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跟他们站在一起，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要求。从事理论研究、文学创作和新闻工作的作家们尽管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相对落后，但都积极参与了知识界有助于为法国革命铺平道路的骚动。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们不能再忍受依附于门第高贵的上流阶层。他们有许多人认为依附于贵族是不堪容忍的耻辱，而宁愿过贫困的生活，这在当时德意志和哈布斯堡领地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从他们的独立地位出发；他们可以提出完全平等的要求，表现真正的心灵高尚，嘲笑那些追求或接受空头称号的人。^[41]凡是可用来谴责封建特权的话，在当时德意志能够最好地表达作家们在这方面的愤怒激昂情绪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中都得到了反映，比格尔在他言辞犀利的短诗《农民致最尊贵的暴君书》^[42]中明确无误地号召进行最后的清算，而莱辛的悲剧《爱米丽雅·伽洛蒂》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同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一样明确地宣告了特权制度末日的来临。^[43]

在开明专制主义的宗教和教会政策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制定这些政策的动机和这些政策对公众舆论产生的影响二者相背离的情况，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实行的宗教宽容只限于为他们所设想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范围之内。他们需要移民的技术和干劲，所以让移民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但对于那些宣传从他的军队开小差不算是不可饶恕的大罪的耶稣会士，弗里德里希则立即将他们处死。约瑟夫也竭力残酷无情地扑灭波希米亚农民中的异端邪说。然而，即使官方实行宗教宽容的程度有限，但对公众舆论仍有很大促动，有助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扎根成长。这一发展在当时的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奥地利诗人阿尔克辛格尔在其诗作中对宗教宽容所下的定义遭到约瑟夫二世检察官的禁止；莱辛的《智者纳旦》是我们所看到的写这个问题的最伟大的剧作。

对宗教宽容所采取的新态度为广泛地进行宗教探索铺平了道路。莱辛本人是德意志圣经评注的先驱，他的思想接近于把基督教看作“博爱教育”的讲坛。各地的教育界都在展开有关宗教的“大辩论”，怀疑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当时的风尚。约瑟夫二世的宗教革

新引起了全民论战。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连维也纳郊区的皮匠和裁缝都在讨论莱辛的神学著作，探讨《创世记》和《新约全书》，并得出结论说在自然界之外不存在什么上帝。^[44]

当人们考虑这种对传统信仰和权威发动的进攻时，只能认为对专制主义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事。开明的专制君主们在理论上承认他们是“国家的仆人”，其职责在于增进他们的子民的福利。可是他们的子民们却不曾得到一贯实施增进这种福利的政策有任何保证。

德意志这一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界的大胆行动乃是发表了施勒策的文章《国家的公开告发制度》（Staatsanzeigen），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为这种保证提供一种替代办法。只要他的君主乔治三世^[45]赋予他所需要的新闻自由，施勒策就威胁要进行对其君主不利的宣传来阻止暴政行为。

与此同时，我们在奥地利还可以看到要求建立近代式宪政和代议制政府的最初迹象。所宣扬的主张是，政府的宗旨，即开明专制君主口口声声所说的模糊不清的“普遍福利”，应该以约束君主及其继承者的基本法的形式加以具体确定。同时担任政治学教授和高级文官的宗南费尔斯的确曾向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继承人提交过一项这样内容的计划。君主专制制度应通过颁布若干原则作为基本法以约束自己，这些原则将保证公民权利和符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46]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宗南费尔斯朝着代议制政府的方向发展了他的计划。凡有关重要立法和在各省实施的政府原则，皇帝都应真诚地与代议制议会协商。

在哈布斯堡领地，由于约瑟夫二世推行的许多政策引起了不满，使新的政治觉悟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农民抵制对他们的宗教仪式进行的干预，担心新的土地税，并且对继续承担封建义务感到不满。城市居民对禁止进口他们喜爱的商品和取消价格控制表示反对。皇帝任意加重法庭的判决，在各个阶级中引起愤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非常不得人心，因为对这个东方邻国的积怨大部分业已消失，而且军队的巨额需要引起物价空前飞涨。在一个到处可以阅读报纸的时代里，各种新的政治抱负、政治思考和议论，公众的强烈不满都以直言不讳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现象。在整个帝国，公

众舆论已成为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在比利时和匈牙利这两个民族主义已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的地方，人民实际上都聚集在特权阶级举起的反叛旗帜之下。

五

开明专制主义并非出于本意而激起的社会和政治骚动，不久就在哈布斯堡各领地和整个德意志招致一股压制性立法的浪潮，使得开明的和非开明的专制君主之间的区别模糊起来。这种强调镇压的新现象是普遍的，而且绝不只限于在此时期由新统治者继位的国家。不仅如此，这种现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好几年就已明显可见，而一般往往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这种现象的根源。

在哈布斯堡领地，早在1785年12月就出现了新政策的最初迹象，当时颁布的有关石工工会会员的法令，派给警察一项新的任务，即密切注意公众舆论的动向。次年，警察在以佩尔根为首的一个有自主权的部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警察得到秘密指令，规定监督公众舆论是其主要任务。明确规定可使用雇佣密探，有时还派遣这些人打入内部充当坐探。约瑟夫二世利用警察进行预防性逮捕，处以各种违反法律的刑罚，并把“不受欢迎的”外国侨民驱逐出境。[\[47\]](#)

新政策最初的矛头指向所有声称采取开明政策的统治者所允许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这方面，巴伐利亚率先于1785年镇压“先觉社”，[\[48\]](#)并由查理·特奥多尔以前的耶稣会忏悔神父弗兰克实行教权恐怖统治。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继位后也起而仿效。重要的教会事务部落入蒙昧主义者沃尔纳手中。他是1788年颁布的《宗教诏书》（Religionsedikt）的起草者，诏书规定所有讲授路德派教义的人必须遵循最严格的正统观点。到处都对诏书提出激烈的批评，但并未能使诏书作任何修改，实际上反而促成更严厉的审查条例的出炉（1788年12月）。由沃尔纳的忠实门徒希尔默尔为首的新的审查委员会于1791年5月建立。紧接着便查禁了柏林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尼古拉主编的《德意志万有文库》和格迪克主编的《柏林月刊》。在普鲁士的镇压机构完善以后，沃尔纳又向毗邻的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同样的行动。[\[49\]](#)

哈布斯堡王朝的宗教政策和审查政策也仿效这些先例。约瑟夫二世不再忽视奥地利大主教、枢机主教米加齐提出的抗议，于1788年采

取步骤强制大学教授必须遵守严格的天主教正统教义。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颁布法令，表明在中学推行正统教义的意图。1790年1月关于审查制度的法令取消了1782年法令中一些开明的条款，而代之以沃尔纳1788年12月诏书的某些内容。利奥波德二世继续执行这项政策，进一步采取措施恢复大学中对天主教信仰已被削弱的权威，并禁止可能损害教会和宗教声望的出版物。

普鲁士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的大臣们由于没有其他活跃的反对派要对付，所以能够集中他们的火力对付那些“创立新教义的人和自封的开明人士”。而约瑟夫二世却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因为特权阶层不跟他合作以反对来自下层的新威胁。相反，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皇帝的种种困难和普遍的不得人心，组织群众来支持他们的反叛。匈牙利的贵族抗拒新土地税，比利时的教士反对国家控制的总神学院，提出“自由”的口号，站在包括所有阶级在内的群众运动的前列。他们各有自己的不满和愿望，也都习惯于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如果其他省的等级会议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也一定会获得同样的响应。

这种局势恰好与约瑟夫二世外交政策的灾难性失败同时出现，迫使约瑟夫二世不得不向特权阶层作出影响深远的让步，这就标志着他的统治的寿终正寝。1790年年初比利时的完全丧失表明这样的让步所不可避免地引发的后果。为了避免这类灾难的再次发生，约瑟夫废除了有关匈牙利的所有法令，只有关于农民解放、宗教宽容和教区改组的三项法令除外。1790年2月约瑟夫二世去世后，利奥波德二世不得不暂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他废除了关于征收土地税和抵代劳役的二月法令并且关闭了总神学院。各省的等级会议也召集会议，考虑进一步提出的不满陈述。

如果利奥波德听任帝国继续处于他的前任带来的危险的外交和内政的孤立处境，那么等级会议（几乎是清一色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就有可能逼迫他作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更多的让步。毫无疑问，这样的行动自由意味着哈布斯堡领地内开明专制主义事业的毁灭。但利奥波德二世成功地把国家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从而恢复了他自己的行动自由，以挽救并发展他的前任们的事业。

利奥波德通过他老练的外交和情愿放弃最近占领的贝尔格莱德要塞，把他的国家从灾难性的对土战争中挽救出来，并排除了来自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边境的战争威胁。同普鲁士的谈判于1790年6月以签订赖兴巴赫协定而告结束，这就使得匈牙利和比利时的叛乱分子失去了他们一直依靠的外国支持。此后，利奥波德坚持拒绝因一时冲动或受到引诱而参与任何国外冒险行动，不论在法国或在波兰均如此。由于没有值得信赖的盟国，又缺乏财政资源，他明智地让自己只限于执行一种“被动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他得到年事已高的考尼茨的全力支持，考尼茨这时已放弃了他早年的侵略政策。[\[50\]](#)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同普鲁士、英国和波兰恢复了良好的关系，而且避免了同俄国或法国发生裂隙。

为了结束国内的孤立状态，利奥波德二世决定利用使反对派陷入分裂的纷争。他注意到非特权阶层对议会中听到的完全是封建野心的声音感到失望。他同样注意到贵族对中产阶级和农民迅速高涨的社会和政治抱负深怀忧虑。他从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当农民采取步骤反对重新服劳役时，利奥波德对此表示欢迎并加以鼓励，并利用其缓和领主的要求。在匈牙利，他鼓励其利益和意愿与占统治地位的马扎尔贵族发生矛盾的各个民族和阶级。为此，他委托并资助他人撰写小册子，目的在于恐吓议会放弃其极端的要求；把注意力放在一般市民和农民日益高涨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愿望上。他接受各市镇代表参加陈情委员会，并支持他们和农民争取在议会中拥有真正代表权的斗争。利奥波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从议会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促使议会在自己通过的立法中体现出前几代君主在位时期的某些重要的改革。到他在位末期，匈牙利议会已通过了特蕾西亚式的限制劳役的法令，废除了农奴制并采取了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原则。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已愿意接受约瑟夫实行过的以土地登记作为税收基础的办法，以及农民和领主的土地税额平等的原则。在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已制订好强制推行抵代劳役的计划。

利奥波德由此而给予非特权阶层的鼓励，自然助长了他们的抱负并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如果他要想赢得并保持他们对帝国的信任，使他们永远脱离反对派，他就必须至少满足他们的某些愿望。

利奥波德二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满足非特权阶层的政治愿望的努力，是他出乎意料的短促的统治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这在欧洲几乎是唯一一次以不采取单纯的镇压措施来应付法国大革命挑战的尝试。

恢复并维持和平使土耳其战争造成的某些困难得以缓解。利奥波德废除了约瑟夫制定的刑法典中触怒当时开明舆论的某些最野蛮的条款。他允许最高法院调查佩尔根领导的不得人心的警察部的违法行为。其结果不仅使受害者获得了释放并恢复了名誉，而且还颁布了一项人身保护法令，禁止预防性逮捕并采取措施对警察进行司法控制（1791年2月）。佩尔根拒绝接受对他在前朝期间的行为所作的含蓄批评并于1791年3月辞职。利奥波德没有任命佩尔根的继任人；相反他根据公开宣称反对专横统治的宗南费尔斯提出的一项计划对警察进行改革。在享有自主权的警察部被撤销后，“秘密”警察也难以存在下去；警察的社会职能增加了，引人注目的是，根据1791年11月的法令，建立了免费的社会医疗机构，隶属于维也纳的警察机关。

由于鼓励非特权阶层在议会中得到更多的代表权的努力，利奥波德便不得不面对宪法改革的问题。关于皇帝正在考虑采取的方针的谣言传到了英国大使的耳朵里，他报告说：“皇帝陛下据说已采取了由于法国改革的危险蔓延而无法避免地形成的思想，或者至少认为那种平等精神的致命进展已无法通过由君主自愿作出让步而在属于他版图内的某些国家制定新型宪法的办法来加以有效的约束了。”^[51]

1791年5月，施蒂里亚获得向议会派遣十名代表、向等级会议常设委员会派遣一名代表的权利。同年秋，利奥波德在布拉格举行加冕典礼并提出在波希米亚进行宪法改革的问题。根据英国大使的报告，批准“市民和农民定期举行会议”乃是皇帝的意图。12月，宫廷办公厅的大多数顾问建议就斯蒂里亚农民请求在议会享有代表权的请愿书作出肯定的裁决。1792年2月，波希米亚等级会议的代表前往维也纳亲聆利奥波德关于非特权阶层在议会享有代表权以及其他一些建议。与此同时，正在匈牙利为进行同样的改革奠定基础。可是出人意料的是，3月1日利奥波德在一次腹绞痛之后去世。^[52]

他的各项政策在他死后很少继续执行，有些政策被他的继承人彻底改变了。尽管如此，他在短暂的在位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保

证某些至少是启蒙运动的成就得以在随后出现的反动时代延续下来。

（王绍仁 译）

[1] 参见本书第7卷，第412—414页。

[2] 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年起成为奥地利女大公；1741年和1743年加冕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5年其夫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后，她成为皇后，1765年其子约瑟夫二世继位后，她作为皇太后掌握实权。——译者注

[3]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1卷，第206—208页。

[4] F. 克罗内斯：《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匈牙利》（格拉茨，1871年），第17—18页。

[5] H. 马扎利：《18世纪的匈牙利》（剑桥，1910年），第193页。

[6] 在大部分世袭统治的行省内，等级会议由教士、领主和骑士三部分“席位”组成。皇家自治市镇是官方的“第四等级”；他们的代表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减少到徒有其名的地步。只有蒂罗尔省的等级会议中有农民的代表。

[7] 第7卷，原文第156—157页。

[8] 转引自F. 费日多《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者——约瑟夫二世》（巴黎，1953年），第140页。

[9] 约瑟夫二世致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的信件，转引自F. 费日多《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者——约瑟夫二世》（巴黎，1953年），第139—140页。

[10] E. 古格利亚：《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生平和政绩》（慕尼黑，1917年），第2卷，第355—356页；F. 费日多《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者——约瑟夫二世》（巴黎，1953年），第141—145页。

[11]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1卷，第266页。

[12]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1卷，第289—290页。

[13]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

1790)，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1卷，第105、386页。

[14]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1卷，第335—384页。

[15] 参见本书第7卷，第415页。

[16] 《关于考尼茨回忆录的评论，1779年》，见E. 本尼迪克特《约瑟夫二世皇帝，1741—1790年》（维也纳，1936年），第263—264页。

[17] 转引自P. 冯·米特罗法诺夫《约瑟夫二世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维也纳，1910年），第411页。

[18] A. 冯·阿尔内特：《约瑟夫二世和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通信集，1781—1790年》（维也纳，1872年），第1卷，第159页。

[19]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即土地登记清册，为国家对土地情况进行调查后汇编的资料。始于中世纪的英格兰，为当时最卓越的政治成就。以人们在这种调查记录面前无可求告，故俗称“末日审判书”。——译者注

[20] A. 冯·阿尔内特：《约瑟夫二世和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通信集，1781—1790年》（维也纳，1872年），第1卷，第240页。

[21] A. 冯·阿尔内特：《约瑟夫二世和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通信集，1781—1790年》（维也纳，1872年），第1卷，第269页。

[22] 这项立法不包括小农和无地的劳动者。

[23] R. 赖特尔：《未着紫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Maria Theresia und Joserh II, ohne Purpur*）（维也纳，1954年），第105页。

[24] 见前面原文第288页。

[25] 米特罗法诺夫：《约瑟夫二世》，第712页。

[26] C. 霍克和H. I. 比德尔曼：《奥地利国务委员会》（维也纳，1879年），第335—339页。考尼茨也曾一度反对颁布宗教宽容法令（同上，第338页）这一事实似乎可说明F. 马斯最近提出的关于考尼茨的宗教政策的动机在于敌视天主教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另参见米特罗法诺夫所著书，第713页。

[27] C. 霍克和H. I. 比德尔曼：《奥地利国务委员会》（维也纳，1879年），第340页；米特罗法诺夫所著书，第713—714页。

[28] 阿尔内特：《约瑟夫二世与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第2卷，第17页。信的日期是1786年5月14日。

[29] 见前面原文第284页。

[30] 转引自C. 霍克和H. I. 比德尔曼：《奥地利国务委员会》（维也纳，1879年），第395页。

[31]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I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3卷，第74页。

[32] L. 帕斯特：《罗马教皇史》，第39卷（伦敦，1952年），第473页。作者称这一协议是“皇帝的一次胜利”，而马斯的新解释则说这一协议是“考尼茨……的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似乎没有根据。（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2卷，第108页。）

[33]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2卷，第516—517页。

[34] A. 贝尔：《奥地利1774年以来的东方政策》（布拉格，1883年），第86—87页。

[35] A. 贝尔：《奥地利1774年以来的东方政策》（布拉格，1883年），第89页。

[36] F. 马斯：《约瑟夫主义——1760—1790年奥地利历史的根源》（Der Josephinismus-Quellen zu seiner 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1760—1790），III，《奥地利资料》（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第2部，第73卷，第33页。

[37] 泰勒（taler），德意志旧时银币。——译者注

[38] 转引自F. 梅林《莱辛逸闻集》（新版，柏林，1953年），第379页。

[39] 参阅E. 默尔·林克《奥地利农民的解放，1740—1798年》（纽约，1949年），第98—102页。

[40] 这包括1784年特兰西瓦尼亚的霍里亚起义，起因是前几年的改革未能在该省正确实行。

[41] 参见莫扎特的名言“心灵使人高尚”（《莫扎特和他家人的通信集》，席德迈尔编，慕尼黑，1914年，第2卷，第91页）以及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格爾的诗《知识高于贵族称号》（1789年）。

[42] Der Bauer-an seinen durchlauchtigen Tyrannen（1773年）。

[43] G. 卢卡奇：《德国近代文学史纲要》（柏林，1955年），第24—25页，提出了这种比较。

[44] E. 万格曼：《从约瑟夫二世到对雅各宾派的审判》（伦敦，1959年），第16—19页。

[45] 乔治三世为英国国王（1760—1820年在位）和汉诺威国王（1814—1820年在位）。——译者注

[46] S. 阿德勒：《政治立法与普通民法法典的历史联系》，载《普通民法法典颁布百年纪念论文集》（维也纳，1911年），第94—104页。

[47] 汪格曼《从约瑟夫二世到对雅各宾派的审判》，第37—44页。

[48] 先觉社（Illuminati）为18世纪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主义的秘密社团。——译者注

[49] J. 德罗兹：《德意志与法国革命》（巴黎，1949年），第29—30页；H. 布伦施维希：《18世纪末普鲁士国家的危机》（巴黎，1947年），第201—202页；此书中将审查条例的日期说成是1789年，有误。

[50] 参见《王室、宫廷和国家的档案（维也纳）》，国家部分，有关波兰的指示》，1791年，第82卷，第14—15页：“由于我们的处境并不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所以在任何波兰事务方面今后都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干预……”

[51] 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7/28，第109号，报告日期为1791年10月15日。

[52] 关于利奥波德的改革和可能的意图的充分论述，可参阅汪格曼《从约瑟夫二世到对雅各宾派的审判》，第82—105页；A. 万德鲁斯卡《利奥波德二世》，两卷本（维也纳，1963—1964年）。

第十一章 俄国

从创建圣彼得堡到七年战争结束的50年期间，这座由彼得大帝肇画的河边要塞和商业首府已变为一个展示奢华和消闲生活的杂乱无章的场所。由彼得征集终生服兵役或从事行政工作的俄国贵族，从1735年以来日益逃避他们的责任。1762年2月，他们被免除了为国家尽的一切义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满足于重新回到外省难以想象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而仍然在朝廷任职和留在京城的贵族家庭则似乎决心以销声匿迹的生活方式消磨时日。彼得时代建筑师兴建的质朴无华的建筑已被更多地为君主和朝廷显贵们兴建，由威尼斯的拉斯特雷利和他的同胞设计的外形豪华的新的宫殿和府邸所包围。在一个一次宫廷政变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将积蓄的财富充公的时代，节俭并不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但是，圣彼得堡仅是这个新帝国的橱窗。对散居在北方几条河流沿岸村落的捕兽者，对挣扎在俄罗斯中部依靠贫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同莫斯科公国时代比较起来，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不同的是税收提高了，每一个村庄还必须送更多的男子去军队服役。彼得关于建立地方政府的体制、新法院和全国小学教育网的计划由于不受重视和经费不足已全部被束之高阁。即使在1755年建立起一所新大学的莫斯科，“满街仍充斥愚昧无知之人”。地主新获得的自由与对农奴所作出的相应让步是不相称的，尽管地主对沙皇的义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农奴制度在道义上的根据。相反，大多数地主要求他们的农奴缴纳更高的地租和服更多的劳役。矿业院^[1]已无法从乌拉尔的国营铸铁厂获利，到1740年已几乎全部将其租给私人经营。在18世纪50年代一个短时期里，俄国生产和出口的铁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到1763年，产量已经在下降。探矿者已无法就近在俄国的适当地区找到煤矿和铁矿。由于俄国厂主未能从木炭炼铁改用焦炭炼铁，不久他们就把优势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2]当年彼得大帝对在整个北方大战期间保持预算平衡而引以为自豪，但他的继承人却甚至谁都没有想过要仿效他的榜样。尽管通过各种别出心裁的新方式征收间接税，并且自1757年以来国家岁入由于占用教会的土地收入而有所增加，但当俄国退出

七年战争时，其国库已空空如也。1762年，俄国在波美拉尼亚的士兵有八个月没有领到分文薪饷。

因此，对俄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四五十年的和平更好的了，因为在这期间可以恢复并巩固彼得大帝建设现代国家基础的努力：但是在以后一段时期里和平并未降临。相反，1762年上苍却赐给俄罗斯一位它从未有过的最富有教养而同时又最野心勃勃、最挥霍浪费的统治者。当叶卡捷琳娜即位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预见到她统治的时间会比彼得大帝以来所有前任都长。在伦敦和巴黎，人们认为彼得三世退位不过是新的一系列宫廷政变的开始，就像1740—1741年间所发生的那样。这位新女皇在她保住王位的问题上简直可以说是极尽凶狠残暴之能事。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能够使她自称她的继位是合法的。他丈夫退位后即遭到监禁，但只要他仍然活着，他继承王位的权利就是无可争议的。伊凡·安东诺维奇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样，他在婴儿时期于1740年继位，但次年即被叶利扎维塔废黜，从此便在修道院度过余生。除了她已经清除的几位可能与她争夺王位的人之外，叶卡捷琳娜还必须决定如何对付以尼基塔·帕宁为首的野心勃勃的一帮贵族，他们准备接受她为女皇，条件是她要结束俄罗斯的君主专制制度，将其最主要的王权转交给享有特权的寡头政治集团。为了对付这些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叶卡捷琳娜无法从她学过的关于君主制的书本中得到任何忠告。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也许对一个地位稳固的君主应如何行事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但对一个仍然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的女皇却没有提出什么忠告。因此，她除了仿效她的几位前任的做法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是无情地消灭对手和慷慨地对贵族赐予特权。在她即位后一周，她的丈夫就在罗普沙要塞被勒死。凶手大概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叶卡捷琳娜是否下令处死彼得不得而知，但她至少默许了这件事。六个月以后，伊斯梅洛夫斯基军团的一批军官曾释放被监禁的伊凡·安东诺维奇并将其扶上皇位，想以此超越奥尔洛夫兄弟获得的好运。他们未能得逞；但当1764年第二次企图这样做时，女皇急令处死伊凡·安东诺维奇。于是有若干年时间，除了她的儿子保罗外，她已经没有必须认真对待的觊觎王位的手了；而保罗虽声称生来就有权继承他父亲的皇位，但根据彼得大帝的继承法，这一要求是无效的。

那些曾经希望叶卡捷琳娜将自己权力委托给一个贵族会议的人同样感到失望。1762年，帕宁提出一项命令草案请女皇考虑，规定“把合理行使立法的权力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的少数人”。叶卡捷琳娜签署了此项命令，甚至还任命了贵族会议的六名成员；但当她日益明显地看出帕宁的意图后，便将此项计划束之高阁而不作任何解释。从此，她甚至拒绝考虑将她的权力授予他人的可能性，但是为了使贵族保持友好态度，她几乎满足了贵族提出的在法律和地方政府方面增加特权的每一项要求。

她在特权问题上依从贵族的第一个迹象乃是她就最后处理以前属于整个教会和各个修道院的房地产所作出的决定。这些房地产的收入在1757年作为战时的临时措施曾转交给国库，但在1762年4月，即俄国退出七年战争后三个多月，叶卡捷琳娜的丈夫裁定国库永远保留对教会土地的控制权。每年有一笔固定的款项交付给东正主教公会和各修道院，剩余部分则由国家留用。在彼得逊位后不久，教会领袖吁请叶卡捷琳娜改变彼得的决定。这位女皇对她所入籍的国家的宗教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不真诚的。她出生在一个新教徒家庭，接受自由思想的教育，是不会去仿效她的前任叶利扎维塔那种单纯的虔诚信仰的，而且众所周知，她曾在私下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嘲笑俄国教会的礼拜仪式。但是，在公开场合，她深知作为女皇她应如何行事，在必要的场合还同大家一起吟诵祷文。在即位之初，她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为了得到教会对她的王位的认可，她同意废除彼得的命令，将教会土地交回主教公会管理。但是，当富有的贵族抗议教会拥有土地是侵犯他们的独占权之后，她又将这项决定撤销了。1762年年末，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并提交一个非教会人士显然占多数的委员会审议；叶卡捷琳娜遂于1764年3月批准委员会的建议，将所有教会产业（以及教会的农奴）交还国库。这一次没有表明这项变动是临时性的。结果是900多所修道院中有将近500所被关闭。18世纪20年代以来构成教育系统支柱的主教管区神学院也不可能全部保留。与彼得大帝宣布的意图相反，教士的教育水平大大下降。教会人士中唯一表示抗议的是罗斯托夫主教阿尔谢尼·马茨耶维奇。他遭到主教公会的谴责并被遣送到北方一个边远的修道院，后来又单独监禁在雷瓦尔要塞，在该处饥寒交迫而死。

1764年以后，俄罗斯全部土地的所有权，除王室和国有土地外，都归属于贵族，尽管贵族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有20年之久并未得到法律的承认，但是，他们却立即获得了一些其他的特权。1765年，允许贵族无须提交国家法庭而判处他们的农奴从事强迫劳役。此外，为了帮助贵族处理剩余粮食，赋予他们酿造和销售伏特加酒的垄断权。叶卡捷琳娜虽一再被迫进一步扩大这个阶级的特权，但在这样做之前，她都进行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以了解全国各社会集团的愿望和要求。

叶卡捷琳娜作为伏尔泰开明君主理想的生动体现而赢得名声，主要是由于她决定于1767年召集一个委员会从事编纂法典的工作。她本来并无意使该委员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立法议会，但狄德罗访问圣彼得堡时极力敦促叶卡捷琳娜将其改成永久性机构。委员会的唯一任务是制定新的法典，以取代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1649年制定的法典和从那以后颁布的一大堆混乱而又往往相互矛盾的立法。为此目的建立一个委员会的设想是由彼得大帝首次提出的。在彼得大帝本人、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安娜·伊凡诺芙娜和叶利扎维塔在位期间也确曾分别建立过处理这一任务的委员会，但均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不仅如此，彼得二世和安娜·伊凡诺芙娜还曾邀请各省的贵族选举“优秀而博学之士”参加这项工作。因此，叶卡捷琳娜无论在建立委员会方面，还是在安排委员会接纳选出的成员方面都不是创新者。但1767年委员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叶卡捷琳娜为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而发布的敕令，除农奴外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在委员会有代表权，并要求每一个集团就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提出声明。

委员会于1767年8月首次开会时成员超过了560名，政府代表仅占28名（包括唯一一名教士的代表），其他536名代表均来自一般居民。这个比例同以往历次委员会大不相同：过去官方代表占据多数，现在新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对立法全都没有经验，这就使得重新制定法典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在他们中间，由536名选出的代表提交了1441份请愿书，其中1000多份是由自由农民提交的。在某些问题上，所有请愿书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一份包含抗议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另一方面，每个阶级都要求某种程度的分权，不仅是行政权，而且还有教育、司法程序以及其他只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才享有的利益。与这项要求同时提出的还有对税收负担的抱怨，因为代表们合理地断言，

在农村征收的赋税全都用于为圣彼得堡谋福利了。每个阶级还要求严格确定自己的地位并扩大自己的特权。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请愿书几乎都坚决要求给予他们拥有土地和农奴的绝对权利并对他们的农奴享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要求免受酷刑和肉刑（烙印和裂鼻孔是这方面最常见的刑罚）；有的甚至要求免除监禁。他们坚持要求，只要他们愿意，便应有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权利。后面这项要求遭到商人阶级的强烈反对，不过商人自己也希望与贵族同样有权拥有农奴。自由农民的请愿书同商人和贵族的针锋相对，因为他们要求既从事商业又拥有农奴的权利。

农奴虽然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却未被邀请派任何代表出席委员会，也没有一个人被指定担任他们的正式发言人。但是，即使在委员会召开之前，女皇已明确表示了对农奴制的态度。她要求由她赞助于1765年成立的皇家自由经济学会组织一次讨论农奴制的论文竞赛。竞赛是国际性的，获奖者是亚琛大学的一名法律博士。他参赛的文章从人道主义和经济角度猛烈抨击农奴制。叶卡捷琳娜并未准备考虑解放农奴，因为这会一下子就失去贵族的友好态度，但她认为应通过立法或某种其他控制方式来缓和目前地主与农奴关系的专横性质，以保证分配给农奴耕种的土地有足够的面积，并保证以货币或劳役形式从农奴索取的租税不至于太不合理。委员会中的某些开明地主如彼得·帕宁和共济会成员叶拉金要求遵循这样的方针立法，作为防止社会动乱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

在委员会的开幕式上，叶卡捷琳娜发布的圣谕给俄国各个社会阶层提出的一些基本上实际可行的要求投下了阴影。她早在1764年即已开始这项工作；1765年7月，她曾告诉伏尔泰有关赋予她的国家以一系列新法律的计划，而且直到颁布圣谕之前都得到伏尔泰的忠告和鼓励。然而，这个文件本身并没有以伏尔泰的任何著作为基础，而几乎完全是根据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而这两本书是1766年才到她手中的。叶卡捷琳娜毫不掩饰她得益于这两位作者。事实上，她往往强调她自己的著作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同之处；而在对于修改孟德斯鸠以适应自己意图的章节，她则缄口不提。她写道，俄国版图之广袤要求赋予其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君主制度的真正目的在于匡正人民的行为，以便达到至善之境界。公民的平等包含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他们全都应遵守同样的法

律。使用酷刑是与一切自然和理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自然法则要求统治者必须防止一切使人民沦为奴隶状态的情况发生，但是“有许多奴隶不应立即或根据一项通用的法律赋予公民权利”。^[3]尼基塔·帕宁在阅读圣谕初稿后评论道，“这些原则的力量足以摧毁任何壁垒”；但他是无须关心这一点的。圣谕通篇使用的语言对作为代表的俄国听众来说极其陌生，与其说会引起打破传统信仰的热情，倒不如说使人们因好奇而感到吃惊。

委员会的会议进程并无多大意义可言。在总共77次的大部分会议中，每个阶级的代表所作的一套一套的发言都是重申他们在请愿书中早已阐明的观点。会议没有激烈的争论，也没有通过调和不同阶级的不同观点来致力于起草任何新法律的文本。无论是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分别召开的19个工作委员会上，议题一个接一个，但毫无结论。因此，到1768年12月叶卡捷琳娜宣布委员会全体会议休会，一些工作委员会继续工作时，会议仍未取得什么积极的进展。叶卡捷琳娜声称休会的理由是让代表们返回自己的团队去同土耳其作战，但没有什么人相信这是她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批评女皇的人认为，她的“开明态度”从来就不是基于真诚的信念，召开这样的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使西方世界获得良好的印象而已。另一些批评者在提到叶卡捷琳娜自称是“职业新手”（*commenÇeuse de profession*）时认为，由于一部新法典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草拟完成，她便对这项计划失去兴趣。从叶卡捷琳娜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事实似乎同上述两种看法不同。在1767年以前，她一直对她的人民抱有一种难以理解但在上流社会中流行的误解。她以前深信（莱布尼兹曾经向彼得大帝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犹如一块璞玉，可以听凭具有独创性的人任意加以雕琢。而这个委员会却使她大开眼界，使她了解到俄国具有不容忽视的传统；贵族、商人和农民都抱有他们不会轻易舍弃的、彼此冲突的愿望；俄国人并不比法国人和奥地利人顺从。不管怎么说，委员会的工作虽突然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作用。圣谕、请愿书和会议的辩论合起来代表了民族自我反省的一个合乎法律程序的开端，而1767年首次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获得使人民满意的解决之前始终在困惑着民族的良心。圣谕第十章所反映的贝卡利亚关于刑事法庭形式的意见成为1864年法庭改革法的基础。地主和农奴关系的调整问题在19世纪初叶一再提出讨论，直到在40年代正式提交地主考虑，终于在1861年通过农奴解放法，以两年为过渡期依法对地主强制施行。

在18世纪60年代末之前，叶卡捷琳娜试行、后来又放弃了另外两项措施以彻底改变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在她作为一个年轻女子研究俄罗斯的时候，她曾经对彼得大帝建立全国范围的非宗教教育网的倡议被他的后任叶卡捷琳娜高阁这件事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她继位以后，她的目标不仅是要把彼得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且还要重新改组教育制度以造就“新型的人民”。她的这项计划得到艺术院院长兼公共建筑和园林总监伊万·别茨基的支持，此人还同时负责圣彼得堡的美化工作。别茨基深信，道德败坏仅仅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造成的不良后果；培养“高尚的公民”并不难，只要使儿童完全摆脱父母的影响，并在排除与外部世界的任何接触的条件下采取特殊的方法即可。经过莫斯科一所弃儿学校的实验，附设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大学预科和军校的贵族学员队均接收4—5岁的儿童入学，按照别茨基设计的特别课程，对这些儿童更多地灌输道德操行而不是学习知识。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创办了一个教育青年贵族妇女的团体，后来称为斯莫尔尼女子学院，也是根据同样的方针办学。

叶卡捷琳娜本人在一个短时期内还在一家讽刺性期刊上写文章为圣彼得堡受过教育的社会人士充当道德导师的角色。当时，社会讽刺文学是俄罗斯新闻界比较新的特点。这份杂志的第一位倡导人是剧作家苏马罗柯夫，他的《勤劳的蜜蜂》（1759年）抨击了乡村贵族的傲慢和无知。叶卡捷琳娜的《杂谈》（*Omnium Gatherum*）最初于1769年出现在该刊，想以此提高她的读者的礼貌水平。例如，她抱怨说，妇女在社交中说话的嗓门太高，她们在自己子女面前谈些不恰当的话题，等等。有一期刊登了一位假想的记者（也许就是叶卡捷琳娜本人）的文章，请编辑先生谈谈“天赋的和俄罗斯人”的习惯与“邪恶的和鞑靼人”的习惯之间的区别。编辑回答说，不信守诺言是鞑靼人的习惯，而信守诺言乃是俄罗斯人古老的传统。失礼、贪婪和妒忌全都是鞑靼人的习惯。另外，还有五六种这类刊物在1769年问世。其中有些刊物充当称赞叶卡捷琳娜的《杂谈》的角色，极力宣扬她的训诫是多么充分地被人们所领会。但有一家刊物《雄蜂》（*The Drone*）发出的却是不顺耳的声音。该刊物的编辑尼古拉·诺维科夫曾担任1767年委员会一个工作委员会的秘书。他在刊物中批评贵族对商人的态度和对农奴的待遇。叶卡捷琳娜的刊物谴责他把事情说得过于严重了。他们之间第一次发生笔仗仅仅持续了一年，但在她的统治结束之前又郑重其事地再次爆发了。

女皇放弃她介入新闻事业的轻率行为标志着她认为完美的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完美生活和完美政府之最好处方的结束。在1770年，她的精力仍不减当年，还决心在行政体制方面留下自己特殊的印记；但从此以后，她就倾向于采取比较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措施。于是她听任俄国的事态发展而不是再按她自己的主动精神来决定变革的步子了。在以后的15年里，她制定的三项重大的法规全是为了满足向1767年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中所提的种种具体要求。其中有一项几乎是在叛乱席卷俄国欧洲部分东部各省时于惊慌失措中起草的。

1773年的叛乱不限于某一个对政府不满的集团。叛乱领袖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在他的旗帜下广泛团结了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所有对圣彼得堡漠视俄国老百姓愿望而心怀不满的各个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起义发端于（乌拉尔）雅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当地的普通哥萨克人对他们的“长老”（大部分由圣彼得堡任命）的仇恨由于叶卡捷琳娜于1772年决定结束哥萨克人的自治地位而加深了。叛乱分子在与政府军首次交锋失利后由普加乔夫予以整编，他本人是一名从俄国军队开小差回来的顿河哥萨克人。1773年秋，普加乔夫宣布关于彼得三世的死讯是官方捏造的。他本人就是前沙皇。由于这种策略，他获得了数以千计的对他的事业的支持者。这时加入哥萨克人起义队伍的人有：在乌拉尔南部工厂做工的农民，当地居民中的非俄罗斯人，例如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此外还有一些旧礼仪派的群体。从18世纪初以来，旧礼仪派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彼得大帝有条件的宽容政策被他的后继者所放弃。叶利扎维塔在位期间，当局竟然组织军事讨伐来强迫这些不信奉正教者皈依官方的信仰。另一方面，彼得三世谴责以宗教为理由进行迫害，从而使主教公会大为震惊。这样，尽管叶卡捷琳娜没有对旧礼仪派进行过惩罚，但这些人仍然把她丈夫的名字同宗教自由联系在一起。

到1773年10月底，由普加乔夫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已兵临奥伦堡城下，周围农村全部落入其手中。莫斯科派出的一支1500名的军队也无法赶走普加乔夫，竟不得不由比比科夫公爵率领大军前来解围。普加乔夫在此遭到失败后，移师北上到达巴什基尔地区，向当地居民许愿，说他将会把所有圣彼得堡人永远撵走。他再次遭到失败后，迂回到政府军侧翼，向西挺进直指伏尔加河，占领了喀山要塞，从而将他的哥萨克叛乱变成农民战争。在喀山四周农村，农奴纷纷起来反抗他

们的主人，掠夺他们的庄园，预期叛军不久可逼近莫斯科。这些古都周围都修筑起防御工事，刚从波兰和土耳其凯旋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被派去与叛军作战。但普加乔夫的战线拉得太长，他不去进攻莫斯科，而是挥师南下到自己的家乡顿河流域。在长途行军中，他的部队由于开小差而大量减员；顿河哥萨克拒绝再给他以支持；到1775年1月他被出卖，落入苏沃洛夫的军队之手，审讯后被处以绞刑。

在战役的最后阶段，叶卡捷琳娜亲往莫斯科了解军事形势，研究叛乱发展得如此广泛和迅速的原因并决定采取对策，以免再次爆发。首先，她感到有必要阐明在农奴和地主的冲突中她本人同情哪一方，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说，贵族的兴隆和安全是与整个帝国的繁荣和安定不可分的。其次，这次叛乱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体制的缺陷。从彼得二世在位时起即普遍存在的任意行事的做法，以及每个省督均可依此随心所欲治理本省的情况，导致工作无人负责，难以获得真实情况以及组织对策时拖延时日等弊端；于是叶卡捷琳娜下决心尽快为一个比较稳定而可靠的体制奠定基础。1767年委员会的一个尚未解散的工作委员会已经为起草一部新的地方政府新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工作。女皇接过该委员会未完成的草案，在诺夫哥罗德总督雅各布·西弗斯的帮助下，亲自撰写了最后文本的大部分。她说，新体制的灵感来自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因为她曾于1774年年初阅读了这部著作的法文译本。她宣称，她的目的在于让俄国贵族在地方政府中发挥像英国绅士所起的那种作用。但就条例的大部分而言，可以看出其真正来源近在国内。贵族在1767年的请愿书中曾要求在省一级建立行政委员会和地方法院，并建议在地方政府新体系内的某些职位由贵族自己选出的代表担任。叶卡捷琳娜决定同意这项要求，把波罗的海各省于1721年从瑞典学来的行政体制推广到整个俄国欧洲部分。

根据1775年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全国分为50个省（gubernii），各拥有30万—40万人口。省再分为县（uyezdy），各拥有2万—3万人口。每个县的行政长官（kapitan-ispravnik）由该县贵族选举。每个省和县的首府，分别为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设立法院，法院成员由本阶级选举产生。在每个省的首府，这三个由选举产生的法院共同组成一个社会救济厅（prikaz obshchestvennogo prizreniya），处理有关公共卫生、教育和慈善基金的分配等事务。每个省和县的贵族还选出自己的省和县的首席贵族（predvoditel）。

这个职位虽只限于负责照顾贵族出身的寡妇和孤儿，但由于其享有威望而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然而，虽然许多职务当时都由选举产生，但圣彼得堡的长臂仍可通过其行政机构的渠道一直伸到县的首邑。每个城市的警察监督权仍掌握在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市长（gorodnichy）手中。选举产生的法官所作出的判决还需经省首府的民事和刑事法庭审查，而这些法庭的成员都是由圣彼得堡任命的。征税和分配修建道路以及其他公用事业的款项等事务悉由省税务局（kazennaya palata）掌管，其工作人员同样系政府官员；所有省的事务最后均由省长及其参事会（pravlenie）成员负责，这些人都是由参议院提名然后由女皇任命的。

1785年实施的向贵族颁赐特权证书的办法和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新体制。特权证书赋予贵族以在省级和县级的议会中的永久和正式的地位，而按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规定，贵族的县议会仅仅每三年召开一次，以补充政府中选举产生的职位。允许议会向省长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向女皇本人提出建议。在其他方面，特权证书毫无例外地满足了贵族在1767年请愿书中提出的所有要求。从此，只有贵族才有权拥有或得到“有居民的土地”（即有农奴的土地）。允许贵族建立工厂，并出售他们的土地的产品。贵族可以不纳税，免受肉刑。而且只有经贵族法庭审判后才能剥夺其爵位、财产或生命。俄国贵族的特权在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在沙皇制度的最后100年中也再没有增加。

由于1775年的地方政府体制大部分是根据波罗的海诸省现行的体制，所以在全俄国施行的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是以里加的特许状为模式的。1767年，商人阶级要求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等级作出较严格的界定；于是将城市居民分为六类，包括从彼得大帝建立的三个行会的商人到永久居住在城区内“靠体力劳动为生”的城市居民（posadskie）。所有城市居民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参加全市杜马（obshchaya gorodskaya дума）以及地方城市体制中规定的市议员的选举。全市杜马从每一类城市居民中推选一人组成六人杜马，任期三年。这是一个行政机构，每周开一次会，由市长担任主席。

叶卡捷琳娜设计的地方政府体制一直推行到1864年而没有什么重大变动。她的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一直实施到1875年。这些行政体制改变的长期影响当她在世时是无法加以评价的，因为要俄国欧洲部分

改行新体制就得花三四十年的时间。当时可以看到的唯一后果是由于任用数以百计的省级政府的新官员并支付他们的薪金而大量消耗国家的财源。叶卡捷琳娜认为这笔费用的支出是正当的。因为它将会在全国建立起更有效率和更负责的行政机构。她没有预见到各省的小官吏的浮夸和拖拉作风将成为果戈理和其他19世纪中叶作家喜爱嘲笑的对象。选出的行政人员并不比政府官吏更热心办事。尽管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叫嚷要拥有选举行政官员的权利，可是当选的人却对工作不感兴趣。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有点像恢复了1762年已废除的义务服役制度。更糟糕的是，在地方政府任职并不具有按彼得大帝的官秩表自动晋升的权利，像在军队和中央政府任职的人那样。贵族的省议会多半对本省的事业漠不关心；一直到1857年贵族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才真正关心国家大事。

在1785年之前和以后，叶卡捷琳娜都谈到她想改组中央政府，以使地方政府的改革工作获得“圆满”的结果。但是，除了在1768年对土战争开始时建立了一个顾问性的国务委员会之外，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到1785年，女皇已接近60岁。如果说，在70年代初她已不再相信好的原则的作用，而相信好的体制的价值的话，那么，到1785年，她又认为好政府的主要条件是要有好的人民。毫无疑问，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可是多年的阿谀奉承所造成的恶果使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至少在国内事务上，她逐渐认为，拥有好人民一切优秀品质的就是她自己。她在位后期的私人秘书赫拉波维茨基曾描写过她是怎样管理她的“小庄园”的。每天上午要聆听她训示的人都齐集在她的前厅等候。10点以后，他们被召唤进入她的卧室，一次一人。卧室内有两张桌子，供女皇本人和觐见者分别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只需几分钟的商讨就可以对小到处分宫廷仆人、大到瓜分波兰等事务作出决断。每天上午的接见从不超过三小时，一天的其余时间均用于个人消遣。她对迅速作出决定的事往往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她依赖觐见者的机智圆滑来掩盖这种对实情的无知，并满足于主要凭本能作出自己的决断，而她这样做得非常高明。

然而，在18世纪80年代末之前，她再度将注意力转向教育制度。别茨基不是从士官生中培养有训练的军官而着重培养“高贵公民”的努力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促使叶卡捷琳娜重视较传统的教育方法。她曾一度考虑在南方建立一所新大学，但被劝止了，理由是当时

的莫斯科大学一直未能吸引很多的学生入学。她要莫斯科的教授们解释大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他们回答说，这是由于经费短缺，以致无法任命学生感兴趣的所有学科的教师。他们还要求通过大学的最后考试，应成为进入政府工作的必要资格。但女皇并未为这些理由所说服。她认为除非在低层次具备受教育的适当机会，否则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人要求受高等教育。于是，她在1786年宣布在每一个省和县的首府为各阶级的子女开办国民学校的构想。负责这项新计划的是一个名叫扬科维茨的塞尔维亚人。他曾在匈牙利监督建立学校网，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推荐给叶卡捷琳娜。新学校除阅读和写作课程外，将开设数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在高年级还开设自然史、物理和机械学。扬科维茨为此选译出一些奥地利教材，并根据奥地利的《教学法》编写了一本教学法指南。但是，尽管进行了所有这些周密的准备，但在实施新方案时仍遇到一些严重的困难。首先，新学校的经费必须由省的社会救济厅提供，而该厅从事各项事业的经费有限；因此，学校的预算一般都保持在最低限度。其次，幼童入新学校学习的热情不高。在某些省是由警察勒令儿童入学的。另一些省当局则全部关闭了以前存在的膳宿学校，劝导学生转学到新学校，最不愿意入学的是贵族家庭的儿童，因为新学校接纳商人子弟入学，与首都的士官生学员队或请私人教席授课相比，吸引力差多了。即使在有儿童愿意入学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师资短缺的现象。第一批教师是从主教管区的神学院征集来的，这方面的来源告竭以后，在圣彼得堡才迟迟开办了师资训练学校，这些困难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最后10年的教育统计数字中都有反映。1786—1791年间，俄罗斯各类学校入学儿童人数从刚过4000人增至近18000人，而1791—1796年间，数目却毫无增长。

[\[4\]](#)

叶卡捷琳娜特别关心她的新教育计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与她的个人威信息息相关。她在晚年不能容忍在她本人关心的种种活动中有其他私人发挥主动精神。到1786年，教育成为叶卡捷琳娜同几位俄国共济会积极分子意见分歧的中心问题。18世纪30年代，俄国共济会第一批会员主要是被共济会的礼拜仪式所吸引。60年代，路德派信徒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共济会支部中占统治地位（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士官学校和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但在70年代末期，尼古拉·诺维科夫开始致力于促进俄国普通人民的福利和教育，以此来实现共济会关于人类兄弟友爱和道德复兴的理想。诺维科夫开始对共济会感兴

趣，是因为他认为共济会可以替代70年代在圣彼得堡流行的伏尔泰主义。叶卡捷琳娜自称伏尔泰主义者，她至少力图理解伏尔泰的教导的真谛，而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成员中少数人自称是“伏尔泰主义者”则没有充分的根据。在他们看来，伏尔泰主义只不过意味着放弃宗教信仰、社会义务和一切公认的美德。这是一种极端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采取这种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受过代价昂贵的外国教育，与粗俗和出身贫贱的人不同。诺维科夫虽然也准备放弃对教会的依恋，但同时代人中流行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与他格格不入，他在共济会的理想中找到了更可以接受的信仰和行动的基础。

他于1775年同他两年前加入的共济会同支部的一些成员一起在圣彼得堡为城市贫民开办了两所学校。维持学校的经费来源于销售一份新杂志《晨光》的收入。该杂志的一些谈论道德问题的无害的文章深受群众欢迎，但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怀疑。叶卡捷琳娜不愿给这两所学校以官方的支持，并拒绝了这份杂志的征订请求。1779年诺维科夫迁往莫斯科，建立了共济会新支部，租用了莫斯科大学的印刷所，并扩大了他的出版物的范围。他在莫斯科还与一位刚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的名叫约翰·施瓦茨的德国人进行合作。施瓦茨本人是一名神秘主义者和路德派信徒。起初，他认为诺维科夫在把共济会的真正宗旨引上了歧途，但到1782年他接受劝告，放弃了他的全部财产来资助莫斯科的一所师范学校。1783年首次允许私人拥有并经营印刷所后，诺维科夫和施瓦茨共同创办了一家印刷公司，在以后八年内出版了400多种书籍。

这些书有的是教育书籍，有些则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书籍，如《城乡文库》，其中没有一本是讨论严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但是，诺维科夫的事业越发展，女皇就越不满。首先，她希望使社会舆论转而反对共济会，于是写了一些嘲笑共济会理想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诺维科夫出版了一本俄国不信奉国教者的历史书，女皇试图以信仰异教的罪名对他提出控告；但受命审查诺维科夫出版公司的出版物的莫斯科大主教却找不出起诉的根据。1787年，俄国的中部各省遭受饥谨，诺维科夫开展集资活动，从莫斯科的富商募集了数以千计的卢布，购买粮食散发给受灾者。叶卡捷琳娜谴责他“企图赢得下层阶级的同情”（对1891年组织救济饥荒的地方自治会的自由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但诺维科夫无视这次攻击所包含的阴谋。他继续

在莫斯科进行出版活动。直至1791年女皇把他的案件交给她的秘密警察头子斯捷潘·舍什科夫斯基亲自处理为止。

对诺维科夫来说不幸的是，法国革命的爆发正逢圣彼得堡一位新宠的出现。60岁的女皇在1789年爱上了皇室卫队的一位比她小30多岁的军官普拉东·祖博夫。祖博夫心胸狭窄，性情暴躁，生来最恨和解与容忍。他喜欢作出迅速而干脆的决定。他对于有可能危害女皇安全的任何活动非常多疑。随着他对女皇的控制的增长，女皇的见解也带有他的色彩。叶卡捷琳娜本人以极度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法国王朝的崩溃。她对冲击巴士底狱“极为震惊”，对废除贵族称号“表示愤怒”，对国民议会中“拙劣的匠人和鞋匠”手中的权力之大“感到惊愕”，因此，她对她的驻法大使帮助法国王室逃离巴黎予以热情的赞扬。但她同时认为，法国局势的发生完全是由路易十六及其顾问们的软弱无能造成的。她相信，一位有才能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是不怕革命的。另一方面，祖博夫不断警告叶卡捷琳娜国内危机四伏。他提醒说，在西欧先觉社已暴露出其政治组织的真面目，并声称俄国的共济会一定也有政治抱负。事实上，诺维科夫就是根据一项政治罪名于1791年被捕入狱的。舍什科夫斯基指称他曾试图劝诱保罗大公爵参加共济会运动，并计划扶植保罗登上王位以替代其母后。第一条指控虽有某种根据可言，但诺维科夫坚决反驳第二项指控。但叶卡捷琳娜还是怀疑他参与了反对她的阴谋，于是他被判处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禁15年，“对他说来也许会有时间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

诺维科夫受到严重惩罚的理由是：他是一个拥有相当数目追随者的运动的领导人；而且从叶卡捷琳娜登上王位之初起，他就是她的肉中刺。但与此同时，一位独居的人物由于出版了一本书而触犯了女皇，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本名叫《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书于1790年年初问世，同年6月，叶卡捷琳娜阅读了该书。此书在形式上好像在模仿斯特恩的《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但作者亚历山大·拉季舍夫是卢梭和雷纳尔的狂热信徒，在这本长达25章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俄国生活中不公正行为、农奴的悲惨处境和地方官吏的残忍无情的感想。他最后建议解放农奴。叶卡捷琳娜说他“感染了法国人的疯狂”，是“比普加乔夫还要坏的叛乱分子”，并下令舍什科夫斯基调查他的活动。他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祖博夫敦促叶卡捷琳娜防止法国人的疯狂在俄国青年中进一步蔓延，因而

勒令在西欧大学就读的俄国学生全部回国。法国的书籍和杂志完全被禁止出售。路易十六死后，要求所有在俄国的法国公民宣誓效忠新国王，否则就离开俄国。叶卡捷琳娜称之为检疫的这一措施一直坚持执行，她的儿子更是变本加厉，一直到1801年他去世之后才有所放松。

如果说叶卡捷琳娜在行政事务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雄心勃勃，而比较注重实际的话，在外交事务方面却完全相反，从谨慎小心的经验主义反而走向极端的冒险行事。她即皇位时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可以遵循。俄国参加七年战争，虽耗资巨大，伤亡惨重，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它最大的收获是博得了它的军队能征善战的名声，但即使就这一点而言，由于彼得三世于1762年1月突然决定与普鲁士媾和而受到损害。与普鲁士结成新的联盟在国内不受欢迎，并且遭到外交院多数成员的反对，他们都希望回到彼得大帝确定的与奥地利永久结盟的体制上来。但外交院自从1757年别斯图热夫-留明被免职后就一直没有正式院长。由于没有一位负责的大臣的指引，叶卡捷琳娜只得亲自制定政策。她在即位宣言中批评她丈夫把国家的命运拱手交给了以前的敌人，以此表示她满足于圣彼得堡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她并未谋求与奥地利恢复老关系。她认为，同这两个主要国家集团都保持距离，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俄国的利益。她希望对其他大国都不承担义务而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希望利用俄国的欧洲邻国无暇他顾的情况和它们的弱点而得到好处，以便在没有外国的援助和干预下实现她自己在波兰和黑海的目标；希望一旦出现机会，俄国便以和平缔造者和国际争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从而提高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俄国在欧洲政治上的影响与分量。以上就是她在位整个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她曾经有三次在一时的压力下或追求短暂的利益而决定放弃这些原则，但每一次她事后都为自己的决策感到后悔。

孤立政策实验的头两年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是一次重大的失望，和一次初步的成功。她曾经希望，作为一个中立者，她会被邀请主持1763年胡贝图斯堡和平会议，但她甚至未被邀请参加结束七年战争的初步会谈。同年，她把萨克森的查理公爵逐出库兰公国，恢复了比伦在该公国的地位；在奥古斯特三世去世之后，使她以前的情人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国王。但是到1764年，来自国内的忠告和国外的压力，迫使叶卡捷琳娜放弃了行动的独立性。就在奥古斯特三世去世的前几天，叶卡捷琳娜任命尼基塔·帕宁为外交院

院长。此人受过良好教育，但比较懒散而好幻想，他制定的外交方针同俄国的传统愿望和当时的可能条件均毫无联系；他敦促叶卡捷琳娜放弃中立地位，并设法同北欧各国结成以俄国为首的联盟以反对法国和奥地利。除俄国本身和波兰外，涉及的国家都信奉新教。帕宁认为这些国家会愿意站在一起反对两个天主教大国。除俄国外所有这些国家就领土而言都是小国，帕宁设计的这个联盟体系乃是一个弱者反对强者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个“北方协议”成功的前景极为黯淡。只要叶卡捷琳娜本人希望按她自己的条件来解决“西部领土”问题，俄国和波兰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帕宁曾希望英国会被吸引加入这个联盟，并起到以前法国在瑞典和丹麦国内政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但与英国旷日持久的谈判未能就全面联盟的条件达成协议，尽管英国大使于1766年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商业条约。60年代俄国在斯德哥尔摩花了大量的钱并未能制止瑞典专制政体于1772年在法国的鼓励下复辟；而且尽管帕宁劝说叶卡捷琳娜放弃她儿子对荷尔斯泰因公国的要求，以期取得丹麦对他的计划的支持，但他却未能从这一慷慨的姿态中得到什么回报。至于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并不喜欢一个由俄国、英国、丹麦和萨克森结成的军事联盟，也不愿参加任何由俄国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集团。但他相信，单独同俄国结盟，他便有可能遏制叶卡捷琳娜在波兰的野心而进一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帕宁欢迎俄普联盟的方案，想以之作为北方协议体系的基础。根据1764年4月11日缔结的条约，两国相互保证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给予支持；两国还承诺在瑞典和波兰采取共同政策，防止对波兰宪法作任何修正，并采取联合行动为波兰不信奉天主教者（不论是东正教徒还是新教徒）取得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上述条约曾两度展期，一直到1781年仍然有效。叶卡捷琳娜在以后几年中曾经把这项条约的后果说成是：“世界上最可耻和最无法忍受的事物。”自条约签字之日起，她在波兰或黑海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遭到来自柏林的不满和告诫、威胁和警告。1764年年底，当俄国驻华沙的代表强迫波兰议会扩大波兰东正教徒和新教徒的政治权利时，弗里德里希认为，这个问题与在议会中保持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相比是次要的。1768年，当列普宁亲王迫使波兰议会批准一项尊叶卡捷琳娜为波兰宪法保护人的俄波协定时，弗里德里希抱怨说，她未免太专横了。当土耳其苏丹于同年向俄国宣战时，弗里德里希立即争取并获得了他与俄国的条约的延长。当鲁勉采夫占领布加勒斯特

并等待援军以便渡过多瑙河时，弗里德里希警告女皇说，奥地利是不会容忍俄军永远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他说，在中欧避免一场新冲突的唯一方法乃是牺牲波兰以满足俄国和奥地利两国的要求。

然而，尽管叶卡捷琳娜抱怨弗里德里希的干预，但是她的行动自由只限于与她可动员的兵力相当的规模。她曾经预料在波兰发生战争，所以自七年战争结束以来，有一支3万多人的俄国军队几乎一直部署在波兰。她最希望避免的是俄国同时与土耳其作战；但在1768年10月，一支亲俄的乌克兰团队越过土耳其在巴尔塔地区的边界，追击一支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军队。土耳其苏丹在奥地利和法国答应给予支持的鼓励下，决定把这次边境事件作为战争的借口。战争爆发后，叶卡捷琳娜专门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咨询意见，如同叶利扎维塔在七年战争前夕所做的一样。会议决定，第一，在攻取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最后一个据点之前，不对土耳其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一俟波兰战役结束，一个俄军兵团将据守南部边境防线，以对付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则向多瑙河挺进，以防止土耳其军队向北移向波兰领土。不仅如此，为了以俄国的海军力量震慑西欧，并促使巴尔干信奉基督教的各国人民反叛土耳其苏丹，女皇宠臣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建议派遣波罗的海舰队经法国和西班牙沿海岸进入地中海东部。陆军和海军行动开始进行得还顺利，但不久就由于没有增援部队和资金不足而停止进军。到1770年，鲁勉采夫占领、失去又再度占领布加勒斯特。但他抱怨他没有足够的军队继续前进（与御前会议的预料相反，战斗仍在波兰进行）。到1770年2月，波罗的海舰队的三支特遣舰队，由奥尔洛夫的兄弟指挥，英国出资装备，英国海军军官协助，在希腊西海岸登陆。好几个月以前，希腊人就勇敢地声称他们已准备好起义，但现在时机已到，他们却又丧失了勇气并抱怨说还没有作好准备。奥尔洛夫对此极为反感，登陆后10天，又召回他的军队上船，改变了他的计划。第四支特遣舰队由舰队司令埃尔芬斯通率领，正在驶往希腊。当这支舰队到达后，奥尔洛夫决定俄国舰队与土耳其舰队进行战斗。在切斯马湾的四小时的战斗中，俄国将土耳其所能集结的全部作战舰艇击沉或使之失去作战能力，但这只不过是获取军事上威望的一次胜利。在地中海摧毁土耳其舰队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奥尔洛夫的力量还不足以考虑强行通过海峡。

就在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提出他瓜分波兰的建议。起初，叶卡捷琳娜并不想接受。早在1763年，她就批准过一个计划，将俄国的西部边界扩展到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5]但这个计划并不包括中欧强国应获得波兰领地作为补偿的内容，她想要这些强国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帕宁宣称，女皇不会同意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波兰任何领土，除非奥普同意俄国获得亚速和塔甘罗格，建立一个独立的克里米亚和俄军长期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但按这些条件行事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当奥地利首相明确表示奥地利是不会容忍俄军在多瑙河的存在时，帕宁改变了调门。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同奥地利作战，另一条是吞并波属立陶宛“以实现我们大家的愿望”。其中哪一条更吸引人是不言而喻的。他放弃了俄国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要求，并同意与奥普协商它们将获得波兰领土的大部分。

帕宁的决定在国内遭到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抨击。奥尔洛夫指责说，帕宁竟允许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皇后从俄军在波兰的胜利中获得好处；但帕宁争辩说，根据任何其他条件要推进到德维纳河是不可能的，何况在瓜分波兰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对土战争不可能取得圆满的结束。和谈在土耳其的请求下于1772年6月开始，但几个月后因土耳其苏丹拒绝让克里米亚独立而破裂。但到1774年春季，叶卡捷琳娜最杰出的青年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从波兰调到多瑙河前线；他和他的司令官鲁勉采夫分别在对土作战中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女皇也急于将鲁勉采夫的部分军队调回俄国对付普加乔夫的叛乱；于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新的和平建议便立即被接受了。1774年6月21日在凯纳甲湖达成的条款一定会使彼得大帝心满意足。克里米亚宣布了独立，俄国获得了亚速海北部海岸线，包括亚速和塔甘罗格两个港口，以及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一个黑海据点。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自由航行并自由出入海峡；在叶卡捷琳娜的坚持下，土耳其苏丹同意承认她和她的继承人为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宗教自由的保护人。有了新的边界，从俄国南部最富饶的地区便很容易出入海上了。如今，至少在和平时期，可以有一条通过地中海不冻的海域把俄国和欧洲其他各国连接起来的海路了。而且，由于苏丹承认俄国同他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之间具有种族和宗教的联系，这便为圣彼得堡干预奥斯曼帝国北部的内部事务提供了根据。

和平恢复后，帕宁仍忠于同普鲁士的联盟，但是女皇却另有打算。对她来说，凯纳甲湖条约并非事情的终结，而仅仅是开始。1772年她在紧急情况下被迫付出代价才获得奥、普同意她强加给土耳其苏丹的条件。这种在压力下讨价还价的经历是不合她的心意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她计划通过建立一个三国同盟，以便在南方再次进行扩张之前就获得这两个中欧大国的同意。她从第一次对土战争中吸取的另一条教训是必须保存实力和集中使用力量。1768—1774年，她可使用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在波兰和土耳其作战。如果她不能保持一支足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部队，俄国军队要想承担义务为别的大国的利益服务是不可想象的。在凯纳甲湖条约签订后的五年内，有两次她被请求在俄国没有直接利益的争端中给予军事援助，两次她都拒绝了。其中一次，她利用她的中立地位在双方之间进行了调解；另一次她以中立国权利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因巴伐利亚继承权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弗里德里希满以为根据1764年条约的条款可以指望得到叶卡捷琳娜的军事支持。女皇经过考虑，断定弗里德里希在争端中理由充分，但她并不准备通过参加战争给予帮助，而是设法说服双方达成协议。1779年双方在她的指引下于特申达成解决方案，这就增强了她的信心，认为她已被选定为欧洲的仲裁人。帕宁的继承人曾夸耀说，特申条约以后，没有俄国的同意欧洲是不会放一枪一炮的。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她在政治上也是真心实意同情英国的，可是她认为并没有充分理由要派遣俄国军队去同北美殖民者作战，并对英国由于她拒绝帮助而感到受了轻视表示惊讶。由于她拒绝承担义务，使她的名字再次增加了光辉。于是便仓促发表了武装中立宣言，并仓促作出组成中立国联盟的决定，向交战国表示俄国的实力和地位丝毫不比他们逊色。在战争行将结束之前，诺思勋爵曾应允若叶卡捷琳娜能促使法国和西班牙按照他的条件媾和的话，将把梅诺卡岛割让给俄国。她几乎同意接受这个请求。但她认为，这一允诺附带有某些条件；于是她终于认定，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甚至比在地中海西部取得一个据点更为稳妥。

随着中立国联盟的建立，帕宁在外交院的事业宣告终结。他本人从未像叶卡捷琳娜那样具有坚定的信心。她已决心割断与普鲁士的联系。到1781年年底，她同约瑟夫二世签订了新的联盟条约。此时圣彼

得堡的外交决策已转入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期间崭露头角的两个人的手中。格里戈里·波将金开始在政府工作，1768年他自愿入伍在南方战线鲁勉采夫麾下服役，不久就迅速提升为将军，由鲁勉采夫举荐给女皇，在战争结束后被召到圣彼得堡。在1774年后的两年里，这位喜怒无常、狂妄自大的人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从1776年直至1789年普拉东·祖博夫出现以前，他始终是她的顾问和引路者。他同她一样喜欢虚荣和投合时好。在智力和教育方面两人不相上下，但他缺乏她那种严肃彻底和专心致志的作风，而在这方面继帕宁正式担任外交院院长的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正好补足了他的缺陷。别兹博罗德科出生于乌克兰，曾在基辅学院学习，能操几国语言，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天生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从事艰苦工作的巨大能力。在波将金的影响下，叶卡捷琳娜放弃了三国联盟的计划，理由是：向南方扩张的时机一旦成熟，单有奥地利一国的同意也就足够了。在特申协议达成之前，叶卡捷琳娜通过与玛丽亚·特蕾西亚通信已经恢复了同维也纳的接触。奥地利首相预见到将会同普鲁士再次发生冲突，正在寻求某种增加安全的保障。1780年，约瑟夫二世访问俄国采取了第一步，1781年5月正式结成同盟。尽管考尼茨认为这主要是针对普鲁士的措施，但对叶卡捷琳娜来说，这不过是向土耳其发动新攻势的第一步。

到1781年，别兹博罗德科制订了一个改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也称“希腊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俄国第一步先获得布格河和德聂伯河之间的黑海海岸地区，包括可以控制两河入海口的奥恰科夫要塞，然后放弃在这一地区得到更多领土的一切要求。第二步将是从小土耳其人手中解放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把这些地区合并成一个独立于俄国的达契亚公国，由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公爵统治（在俄国之外，人们认为波将金为自己保留着这个称号）。最后，在土耳其人被彻底逐出欧洲之后，计划恢复拜占庭帝国，立1779年出生的俄国大公康斯坦丁为皇帝。同时，别兹博罗德科建议，奥地利应获得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而埃及或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其他某些领地可给予法国。计划也提到要给英国和西班牙以某些补偿。

叶卡捷琳娜花了两年时间同约瑟夫皇帝讨论这项“计划”，但是就连她这位新盟友对这项计划的含义也深感惊异。他抱怨说，奥地利所获的战利品太少了，并且同样要求占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但

叶卡捷琳娜是不容易劝阻和说服的。1787年春，在奥地利皇帝的陪同下，她作了一次显示实力的克里米亚之行，克里米亚早在四年前已宣布效忠俄国。土耳其苏丹的反应是要求恢复克里米亚的独立。9月1日土耳其人向奥恰科夫附近海上的两艘俄轮开火，于是叶卡捷琳娜向土宣战。1788年，制订新的计划派遣波罗的海舰队前往地中海，但英国海军部拒绝提供像1770年那样的帮助。而且就在舰队从圣彼得堡起航之前，瑞典国王在英国首相皮特的怂恿下，根据一项同土耳其缔结的老的盟约，向俄国宣战，并在离俄国首都仅几十英里的地区发动地面进攻。奥地利晚些时候也参加了战争，一面作战，一面注视西欧的事态发展。在革命波及比利时后，便匆忙与土耳其媾和。普鲁士国王公开站在土耳其人一边，承诺给瑞典以军事援助，并沿库尔兰边境显示武力。1791年3月皮特准备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叶卡捷琳娜放弃她解决奥恰科夫事件的计划，按照合理的条件媾和。最糟糕的是，同年5月，波兰利用俄国身陷南方而无暇他顾之机，公布了一部新宪法。

当波将金负责指挥黑海战斗时，别兹博罗德科面对几乎一致的反对声决定作出让步。1790年夏天，瑞典国王急于准备同法国作战，别兹博罗德科热切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在维持战前现状的条件下媾和。他甚至同意放弃俄国对芬兰的要求和叶卡捷琳娜作为瑞典宪法保护人的权利。他无视皮特对俄军占领奥恰科夫提出的抗议（最后通牒始终没有发出），但决定停止进一步实施占领巴尔干的计划而将波将金的部分军队调往波兰。波将金于1791年10月去世。虽然苏沃洛夫已攻占了伊兹梅尔要塞，列普宁公爵也在多瑙河以南的激战中击败土耳其人，但1792年1月在雅西由别兹博罗德科本人参加的和平谈判所提出的条款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土耳其苏丹最后被迫同意割让克里米亚给俄国。他还同意割让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海岸线（敖德萨就是在土耳其要塞的废墟上于1793年建立的）。在其他方面，雅西条约只不过是重申18年前凯纳甲湖条约已达成协议的条款而已。

对土战争结束后六周，叶卡捷琳娜通知奥地利和普鲁士大使，她建议废除1791年5月的波兰宪法，并迫使波兰人信守以前波兰对她的保证；一支6.5万人的俄国军队进入波兰“以恢复其自由”。这项声明虽并非有意向两年前同波兰签订了防御同盟条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提出挑战，但叶卡捷琳娜却万万没有想到普奥会让她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波兰的命运。长期以来，波将金坚持俄国应设法通过瓜分或其他任何

形式取得波兰的乌克兰的富饶省份，女皇也在1791年给他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她不反对再进行一次瓜分。^[6]事实上，俄国通过第二次瓜分波兰不仅得到了波兰的乌克兰全部，而且得到了明斯克和维尔纳地区。由于波兰的疆域缩减到以前的一半，别兹博罗德科抱怨说，波兰太小而无法成为俄国和欧洲中部大国之间的缓冲国，因此需要整个一军的部队来维持秩序。根据这些理由，在1794年柯斯丘什科起义之后他为俄国参加最后的瓜分进行了辩解。通过三次瓜分，叶卡捷琳娜解放了所有“与我们具有同一信仰和血统的人”。她收复了所有“西部领土”，并且外加即使依据最过分的历史论据也无法认为应属于俄国的大片波兰领土。但是对她来说，未来比过去更为重要。她更感兴趣的是她在波兰南部攫取到的领土的潜在财富，并更加满足于看到，由于新的边界延伸到涅曼河和西布格河，她的帝国的界限向中欧推进了400英里之遥。

俄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中所取得的领土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俄国军队在波兰作战中一马当先。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正同时与法国作战。由于估计到这一点，叶卡捷琳娜曾一再敦促两国加紧努力对付法国，而让她去对付波兰的“雅各宾分子”。她还同样强调说，一旦波兰战斗结束，她就会给两国以军事支援。可是在华沙陷落后，她却迟迟不愿履行诺言。她埋怨说，普法蒂和使她从波兰撤军变得不安全，但还有其他拖延的原因。她最新的宠臣祖博夫制订了一项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想以此打击别兹博罗德科。一支俄国军队将采取传统方式通过巴尔干发动进攻，而让第二支军队通过高加索和波斯进入小亚细亚。在两支部队会师后，黑海舰队在叶卡捷琳娜亲自指挥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海上包围土耳其首都。1796年2月，一支远征军离开圣彼得堡进军波斯。一直到11月，叶卡捷琳娜才终于同意派遣她的一部分精锐部队，由苏沃洛夫指挥去援救奥地利。但在苏沃洛夫离开波兰之前她去世了，她的继承人撤销了她的命令。

波兰和土耳其战役的代价是高昂的，加上女皇一向忽视预算问题，所以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更加严重了。60年代初，她曾向阿姆斯特丹各银行借款，^[7]但从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开始，她靠发行纸币以弥补支出。1769年首次发行的纸币总共不过250万卢布，有好几年时间纸卢布在国内外均与银币同值。但到1787年，流通的纸币将近1亿卢布，叶卡捷琳娜才正式声明不再增发纸币。这一诺言并没有兑现，90

年代初又印制了5000万纸卢布。到1796年，一卢布纸币在国内只值70戈比银币，在伦敦外汇市场上只值2先令6便士，而10年前则值3先令5便士。俄国对外贸易差额在叶卡捷琳娜时期没有显著变化，进口商品值为出口商品值的2/3—3/4不等，但出口贸易的性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96年，铁仅占出口总值的5%，而在50年代则占25%—30%。海军用品这时成为主要出口品，占出口总值的40%以上。从亚速海各港口出口粮食业已开始，但当时在贸易总额中还是微不足道的项目。据估计，在18世纪末，俄国生产的全部粮食只有20%由粮农在市场上出售，出口粮食则只占1%左右。^[8]在国内，工厂数目急剧增加，大部分新开业的是棉纺厂。随着棉纺业的兴起，开始了工业组织发展的新阶段，因为棉纺厂的主人不是国家、富商或贵族，而是新兴的企业家阶级，其中包括富裕起来的农奴。其结果是，一方面炼铁业和亚麻制造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归属农民或罪犯，而棉纺厂从一开始就雇用相当比例的雇佣劳工，而且不久就全部成为自由雇佣的劳工。有些棉纺厂雇用的工人多达1000人。虽然圣彼得堡最早有关机械织布机的报道出现于1793年，但生产却几乎全部是依靠手工进行的。但是，工业的增长仍然太小，不足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叶卡捷琳娜继位以来，俄国人口从1900万人增加到2900万人（如把新兼并领土的人口计算在内，可达3600万人）。到18世纪末，总人口的不到1/25住在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口各接近25万人。除这两大城市外，只有里加、阿斯特拉罕和喀山这三个城市的人口达3万人。

叶卡捷琳娜在模仿墓志铭方式所写的自述中说，“她继承俄国皇位后，即欲行善事，力图为其臣民带来幸福、自由和福利”，这一表白不应轻率地加以否定。对她统治初期动机之真挚不可根据她晚年圣彼得堡的政治气氛而加以非难。1767年以前，她热诚地希望把启蒙运动的原则通过鼓励立法的方式在俄国变成现实，这一点是没有理由加以怀疑的。即使在70年代她已变得目光短浅后，也仍在作出不断的努力以期结束彼得大帝继承人所采用的杂乱无章的统治方法。即使在90年代，由于对她的阿谀奉承而使她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时，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和未完成的工作仍使她不时感到内疚。事实上，她通过建立体制使俄国走上朝现代化国家进一步迈进的阶段。她建立的体制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持续存在近90年之久。不仅如此，除了她在世时的实际成就之外，她从18世纪60年代起公开宣传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在19世纪的社会立法中得以实现。在外交政策方面，由于她的雄才大略和

法国国内的虚弱，她的成就远远超过彼得大帝，把俄国直接带入欧洲的心脏地带。除1809年获得芬兰、1812年获得比萨拉比亚，以及1815年获得“议会波兰”外，俄国在欧洲的边界自1796年一直到君主政体倒台始终没有变动。而在她去世后的60年里，国家活动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变革步伐都缓慢得微不足道，与她在位的34年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可以对她提出的所有责难中，最严重的倒不是她有时把她个人的声誉看得比公共福利还重要；也不是她在贵族的压力下对农奴每况愈下的处境视而不见；同样也不是她在普拉东·祖博夫的影响下制定了反革命的政策，并由她儿子保罗使之更加完备达到荒谬的程度，以及由她孙子亚历山大一世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行为的理论。最严重的应当是，她没有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努力开发国家的物质资源，而舍此俄国是绝不可能信心十足地发挥大国的作用的；还有，她在波兰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导致债台高筑，严重通货膨胀，国家衰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如果说叶卡捷琳娜对她外交政策在财政上引起的后果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她的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叶卡捷琳娜是能在欧洲强国之间进行仲裁并把她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第一位俄国君主；而且，鲁勉采夫和苏沃洛夫战败俄国宿敌所取得的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胜利，至少部分应归功于她。俄罗斯民族对自己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所处的地位已经十分敏感，而且在传统上对公私花费都毫不吝惜。对这样一个民族来说，三四十年时间的国家财力破产与如此振奋人心的事态发展相比不过是很小的代价而已。

（王绍仁 译）

[1] 帝俄时代政府部门称院（college），到1802年9月始改称部。——译者注

[2] 亚历山大·贝科夫从地理和技术方面，而不是从组织管理方面论述了俄国铁矿厂主面对西欧对手的挑战而失败的原因。见所著《俄国经济的发展》，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7卷（1954年），第2期，第137—149页。

[3] 圣谕的1768年英译本全文见W. F. 雷德韦《叶卡捷琳娜大帝文件集》（剑桥，1931年），第215—309页。

[4] P. N. 米留科夫：《俄罗斯文化史论文集》（巴黎，周年纪念版，1931年），第2卷，第2册，第763页。材料来源为圣彼得堡教育部档案。

[5] 《俄罗斯帝国历史学会论文集》第51卷，第9—11页。

[6] 备忘录全文的重印件见X. 利斯克《叶卡捷琳娜二世1791年的波兰政策》，载《历史杂志》，第30卷，第295—301页。

[7] J. 冯·布洛克：《19世纪的俄国财政》第1卷，第73页。

[8] D. 普罗托波波夫：《论俄罗斯粮食贸易》，载《国有财产部公报》第5卷，第3期（1842年），转引自P. A.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第95页。我一直未能找到普罗托波波夫的原作。

第十二章 瓜分波兰

请看百科全书派笔下愚昧无知的国王们，他们变成了道貌岸然的骗子。他们巧妙地将王国瓜分，如同人们过去讲道时对教义进行分段一样。而他们屠杀百姓却是不眨一眼的。这就是那个启蒙世纪！

霍勒斯·沃波尔致迪·德芳夫人的信

1773年4月13日

三次瓜分波兰一完成，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就着手研究造成这几次瓜分的原因。先是有一些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叙述和诽谤，继而在下一代人是关于国家治理不当的种种令人沮丧的传说。而在1830—1831年起义失败后，人们便把整个国家存亡的问题升华为高尚而诗歌化的题材了。从1846年加利西亚大屠杀开始到1863年惨遭失败的起义为止，一系列的挫折使浪漫诗人的救世主式的愿望化为泡影。从此，随着浪漫主义在诗歌中的最终消失，历史才成为严肃学术研究的对象。1862年，华沙大学已设立波兰史讲座，克拉科夫大学和利沃夫大学也于1869年和1882年相继仿效。担任克拉科夫大学历史教授的舒伊斯基于1880年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并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这个国家就注定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肯定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波兰的衰亡是由波兰人自己几百年的罪过所造成的。舒伊斯基显然是受了达尔文的影响，不过并非完全如此。因为这一论点与其说是一个动物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它最早是由“克拉科夫学派”一位老前辈卡林卡提出来的。卡林卡在对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统治期间波兰的道德状况进行评价后，于1868年得出结论说，是波兰人自己造成他们国家的衰亡，由此而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乃是咎由自取。像舒伊斯基一样，博布任斯基在1879年发表的文章中对波兰向东扩张表示哀叹，认为波兰的衰亡是由于未能把自己建设成一个近代国家。波兰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不肯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牺牲政治自由。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克拉科夫学派的反驳。斯摩棱斯基于1886年指出悲观论者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科尔宗在其对瓜分时期的研究（1881—1886年）中指出，尽管波兰遭受严重的外部伤害，但这个国家仍显示出许多迹象，表明它的机体是强健

的。一直从事在欧洲外交背景下波兰的国家地位研究的阿斯凯纳齐说，瓜分的原因不在于共和国本身而在于当时欧洲的局势。O. 巴尔泽尔于1915年认为，波兰体制的缺点与中欧大多数国家具有共同性，因此，瓜分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治理无方，而是波兰邻国的贪得无厌。T. 布热斯基在1918年^[1]提出了一些就方法论来说有些混乱的说法，似乎没有追随者。1927年，经济史学家鲁特科夫斯基^[2]认为瓜分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经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1935年，O. 戈尔卡指出，对波兰的过去和未来所持的“乐观的”和“悲观的”传统观点，其逻辑是颠倒的。客观地看问题，“悲观论者”其实是乐观论者，因为由本国所犯错误而导致的损害，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纠正的；而“乐观论者”实际上乃是悲观论者，因为波兰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其邻国之间的阴谋总能使波兰失去独立。戈尔卡的其余论点今天读来固然令人伤感，但对其重新估价的正确性还是必须予以承认的。

瓜分是18世纪流行的主要政治手段，是君主们以势力均衡之名解决争端和调整彼此潜在力量的合理方式。专制君主被认为是他所统治的领土的所有者；各民族没有公认的权利；因此获得不论是由哪个民族居住的领土，都被认为是纯粹的好事。任何国家，特别是复合国家的领土，往往成为其邻国进行海盗式掠夺阴谋的目标，因为这些邻国发现他们的共谋并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北方大战发端于分享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领土的计划，西班牙的继承权于1713—1714年被分割，奥地利的继承权在1741年也险遭同样的命运。在西欧，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两个结成一伙，在不是被迫把充当狼的角色改成充当羊的角色角色的时候，便对诸如巴伐利亚、莱茵兰的一部分、荷兰、奥属意大利、汉诺威以及英属、法属和荷属殖民地这一些肥肉垂涎三尺。在东欧，俄国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法国可能给予的帮助下，正在准备蚕食土耳其的版图。特别是在东欧和中欧，面临的选择似乎越来越是瓜分别国或遭别国瓜分。俄国就是为了削弱普鲁士才参加七年战争的。根据别斯图热夫制订的计划，在战争胜利后，奥地利可获得西里西亚，波兰获得东普鲁士；作为回报，波兰将库尔斯兰的宗主权让与俄国，并接受在白俄罗斯修改俄波两国边界。波兰竟然与这样狡猾的伙伴为伍，原因并不在于波兰的外交官是否机敏（因为波兰没有发言权），而是由于奥古斯特三世不仅是波兰的当选国王，而且还是萨克森的选帝侯，因而制止普鲁士的扩张对他有直接

的利益。最后，就波兰而言，面临的是肢解——把领土的四肢从躯干上割去——让位于干脆彻底的瓜分。到1769年8月，即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准备将波兰的领土交付普鲁士，作为与普鲁士结盟的报偿。与此同时，法国则建议将波兰先瓜分给奥地利，然后瓜分给普鲁士，以阻挠德意志诸邦结成伙伴。

第一次瓜分波兰后不久，韦尔热讷就注意到这是违反势力均衡原则的，并说：“两个世纪以来，各大国一直集中其全部注意力于防止其中任何一国占据优势，往往因此而达到不惜耗尽其全部资源的程度。现在，一种新的组合替代了普遍均势体系；三个大国建立了自己的组合。它依据的是均分赃物的原则，因此势力均衡大大倾斜于对它们有利的一边。”^[3]这其实就是索雷尔所说的“共同分享的制度”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诡辩，把行为的公正与平均分享混为一谈。参加瓜分波兰的每一位君王都乞灵于势力均衡的原则，这是那个时代诡诈的思想风气的特征。弗里德里希二世告诉后人说，瓜分的主要原因是想避免一场一触即发的全面战争。他接着说“不仅如此，还必须保持像普鲁士和俄国这样紧邻之间的势力均衡”；^[4]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参加瓜分的大国通过平均获得土地来保持彼此之间势力均衡的决心——这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坚持的正式安排——称为“向欧洲提出的一种真正崇高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imposante）主张”。^[5]

波兰遭到瓜分，许多块领土被投入势力均衡的天平，其原因在于波兰弱小，是一个以缺乏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著称的落后地区，唯一闪亮的只是新学术的一缕微光。波兰军队的官兵有18500人，无法与俄国的35万、普鲁士的20万和奥地利的25万人相抗衡来保卫国家。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态，当时的人多半归罪于1717年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改革以来没有触动政治制度。用博布任斯基的话说，它仍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寡头政治的国家”，由一个只醉心于统治的当选国王进行治理。王位是一个并不值钱的位置。获得王位的人只会通过分配官位和有俸禄的闲职来争取参议院中寡头政客的合作及其在议会中的仆从的支持。这些得到恩宠的权贵能更好地给予各种名称的贵族（szlachta）武装保护、就业和租用权。这些贵族便选举他们的恩人指定的人进入议会以表达他们的谢意。在议会中，两百多名代表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行使自由否决权，使整个议会的工作无效。选民若对行政当局不满，在宪法上体现为可结成同盟，同盟更经常地是反对国

王而不是联合在他的周围。只有同盟议会不实行一致同意的制度，而是以多数票通过的原则自由立法。封地，或称“领地”的位置越靠东方，当地寡头政治集团的势力就越大，他们的侍从、官员和佃农便越加顺从并且人数也越多，居于中间地位的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他们的程度也越大。就整体来讲，贵族虽然常常是贫穷和没有文化的，但对自己的出身始终引以为自豪，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他们很注意体面，爱斗成性，不守规矩，虔诚地信奉天主教，思想落后，看不起外国人、异教徒和商人。他们构成社会金字塔的顶层，而构成金字塔至少3/4的是被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耕种的农民（villani, subditi）。免除劳役和兵役而代之以货币地租的情况只在零零落落的一些地方才有，这只是一种在地主圈地和要求农民增加劳动时间的期间作出的一种例外安排。这种倒退到新封建社会的措施只会产生自由精神（aurea libertas）而不会产生物质财富。农业生产水平很低，据截至1787年的统计，在更靠西部的地区，每粒谷种的收获量在15—18粒之间，而在波兰，最高不过15粒；制造业微不足道，交通运输缓慢；税收主要由商人承担，从而使商业停滞不前；但贵族进口供其享用的商品享受免税待遇，从而得到好处，结果导致国库拮据。货币的供应量很小，农民手中很少有钱。此外，主要由于在七年战争期间，继而又在1770年，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的欺诈性军事行动，连铸币的成色也降低了。

在17世纪，波兰日益虚弱最引人注目的早期征兆也许是东部边境的退缩，这与普鲁士和俄国疆域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形成鲜明的对比。到1667年，由于波兰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在安德鲁索沃签订的和约，致使波兰原位于主要河流彼岸因而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边界的长度从70%减少到37%，原位于主要河流内侧因而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边界长度从30%增加到63%，只有实际上沿主要河流的边界长度仍保持不变。在奥古斯特三世在位期间（1733—1763年）或者甚至更早，波兰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一个积极的力量。仅仅是由于波兰国土的面积，才使波兰不致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而是大国制定政策的对象。

18世纪选出的国王都是某个强国安插的人物——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的后台是瑞典和法国，奥古斯特三世的后台是俄国，而1764年上台的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则是仰仗他以前的情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恩典才得以占据王位的。[\[6\]](#)他是俄国和

普鲁士可以接受的“适当人选”（sujet convenable），偶然也是波兰选民所能接受的。他与他的前任不同之处在于他知道他不可能对未实行改革的萨尔马提亚^[7]进行有效的统治。改革派的其他领导人以及他母亲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成员也都深信这一点。波尼亚托夫斯基（加冕后称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胸怀壮志，天赋聪慧，又受过良好教育，曾游历德意志、法国、英国和俄国。他具有迷人的魅力，风度翩翩，工作能力很强，但同时极端虚荣自负，奢侈无度而追求享受。他奉“勇敢加耐心”为座右铭，而且从未表现出缺乏这二者。但是，他统治国家的观念与民族的理想却大相径庭，在1792年为了挽救尚可挽救的事业，他竟然与卖国分子为伍，而未能像英雄那样为国捐躯，因而永远也得不到后人的宽恕。人们认为，他理解波兰的局限性是他的弱点，他性情柔顺是由于胆小怕事。他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沉浸于18世纪世界主义的文化之中，他追求的不是战场上而是在逐步改革和文化艺术上的荣耀，他找到了荣誉没有呢？他参与起草1791年的宪法以及大胆振兴工业的努力往往被人忽略，而由于他签署了两个肢解波兰的可耻条约使他的道德形象大为减色。但是，尽管他在位时期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令人沮丧的被称为“瓜分的时代”，但在这位国王亲自鼓励和关注下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艺术和学术复兴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时代”。这虽然多少有些偏颇，但不失为对他所作出的努力的恰如其分的赞扬。

斯坦尼斯拉夫和叶卡捷琳娜不久就发现他们是在分道扬镳。女皇所希望的是俯首听命和维持原状，而国王却希望至少不要干预他的改革计划——一个受多数人意志约束的常设议会。他不怀疑叶卡捷琳娜要不遗余力地保持她常说的波兰的“适度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即同普鲁士一致行动进行武装干涉并履行于1764年缔结并于1769年延长至1780年的俄普同盟条约的秘密条款。这样的行动方针势必要导致瓜分。但圣彼得堡尚讳言瓜分一词。切尔尼舍夫兄弟鼓吹“修改”俄国西部边界，而帕宁则反对瓜分。因为这不仅违反了帕宁的北方体系的原则，^[8]而且违背了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对波政策的整个传统：专注于施加影响而不分割其领土。但是，即使帕宁也不止一次地在普鲁士的诱惑面前动心。

叶卡捷琳娜本人由于不喜欢现成的体系，准备根据“环境、局势和推断”来改变俄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则从来没有

忘记自己的目标，即通过取得波属普鲁士把不连在一起的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连为一体，并且不是用武力，而是按照他1752年所作的政治遗嘱所说的，“像洋葱一样，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平静地枯萎”。

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弗里德里希有句讽刺的话“悲伤归悲伤，攫取归攫取”，可以概括她作为统治者和基督徒的双重使命而左右为难，成为一个勉强参与瓜分的人的行为特征。然而在1769年，甚至在这位女王的忏悔神父[\[9\]](#)解决这个良心问题之前，宫廷军事委员会就下令占领了匈牙利只能提出欺骗性合法要求的波兰飞地齐普斯；在1770年又占领了三个地区。正是这后一行动表明了奥地利愿意参与瓜分，并促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普鲁士亨利亲王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都来自己动手呢？”从而宣告这位亲王胜利完成了他自愿承担的出访圣彼得堡的使命。就在此前不久，弗里德里希二世曾在致其兄弟的信中承认，瓜分的想法对他仍有吸引力，但他感到他难以胜任。但是，到1771年1月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增强了普鲁士的实力。叶卡捷琳娜已经造成了一个她无法再独自控制的局势：在不信奉国教者的权利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已导致内战和外国干涉。

波兰有两种不信奉国教者：新教徒有20万多一点，大部分住在该国西北部，另有大约60万东正教徒，住在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兰虽在16世纪被称为异教徒的避难所，但长期以来已放弃了宗教宽容的传统。新教徒贵族大部分属加尔文教派，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也不能担任法官和文官，这一群体一般不准修建新的教会集会场所，也不许进入旧式的学校和礼拜场所。东正教曾有400多万信徒，但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其整个特权阶级，包括其主教在内，由于改奉东仪天主教的礼仪而成为罗马天主教徒。起初多少还是出于自愿，到后来则由修道院、整群的教徒和教堂采用系统的高压手段所造成。对弗里德里希来说，如同他的前任一样，宗教少数派不过是破坏波兰共和国还残存的法律和秩序的另一个工具而已。他的目的不是纠正异教徒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消除坏名声”，而是与叶卡捷琳娜一起根据1720年以来俄普两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中都列入的秘密条款采取共同行动，继续保护他们的权益和加强俄普同盟。叶卡捷琳娜女皇不是这样：她把自己的名声押在了胁迫波兰人给予不信奉国教者以宗教自由上，其程度连当时英国北方事务国务大臣康韦也认为是“不合理的”，很可能引起“危险”和“忌恨”。[\[10\]](#)不信奉国教者从国外获得指导，1767年

年初组织了两个同盟，东正教徒在斯乌赫，新教徒在托伦。心怀不满的罗马天主教徒受俄国人的蒙蔽，也同样在拉多姆组织了一个同盟，只是在俄国大使的庇护下才被迫谈判一项政治和宗教的解决办法。这项解决办法是通过1767—1768年的同盟议会完成的。其“代表团”（一个代表委员会）赋予东正教徒、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以完全的信仰自由、修建和改建教堂和学校的权利并准予担任公职。此外，还将共和国的法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法，包括自由选王制、自由否决权和贵族的特权。第二类是实际法规（*materiae status*），包括税收、铸币、军队规模、外交事务，等等。第三类是有关当前经济事务的法律，这类法规今后经简单多数同意即可批准。这样，宗教自由就和政治上的特许权联系了起来。

以发源地命名的巴尔同盟（位于波多利西亚），其宗旨是捍卫信仰和自由。这是一个游击性的组织，由一些既能战斗又从事掠夺的独立的抢劫集团组成。其政治领导人一贯相互倾轧。有些人致力于恢复萨克森王朝，另一些人则主要是反对恰尔托雷斯基王室；两者都是反俄的。因此，它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但似乎都要求缩小王室任意恩赐官职的权力，以废除自由否决权作为交换条件。同盟的成员并不都是顽固的萨尔马提亚人。他们当中有新教徒、共济会员和希望求教于卢梭、马布里和梅西耶·德拉·里维埃等人的西方崇拜者。这个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在旅行和谈判中学会了运用政治头脑；他们于1773年发表的最后宣言不再是仅仅进行指责而是提出了民族独立的新口号——“独立”（*niopod-ległoś*）。

乌克兰人民因反对波兰地主及其犹太代理人以及东仪天主教士诱劝人们皈依的方式而发动叛乱，致使巴尔同盟在波兰东南部的发展受阻。这些“骚动的、不满的人”（*haydamaki*）认为自己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遭受的苦情会得到俄国的支持，就像他们的宗教热情曾经得到俄国的鼓励一样。他们于是就用“神圣的刀”袭击地主的住宅、牧师住所和城镇。俄国人很快就感到必须镇压这支可能的第五纵队，特别是由于叛乱分子纵火焚烧了土耳其的巴尔塔镇。然而，土耳其人在法国的唆使下拒不和谈，于1768年10月向俄国宣战。

在此期间，在波兰建立的其他一些同情巴尔同盟的地方同盟，最后于1769年年底联合组成总同盟。总同盟的总部设在匈牙利，舒瓦瑟尔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以迪穆里埃上校为首的军事使团。在这位上校的

煽动下，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宣布波兰处于王位空缺状态，称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暴君和篡位者。但是，同盟在这年秋季企图绑架国王，从而使自己在国内外名誉扫地。这年夏季以来，在法国的斡旋和奥地利反对俄国的行动的帮助下，总同盟和恰尔托雷斯基王室之间仍存在和解的可能，这样一来和解的机会就丧失了。第二年春季，总同盟的各派便开始逐个向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投降。这时俄普两国已经签订了瓜分的条约，因为它们获知奥地利将不会向俄国开火以履行其于7月间对土耳其所作的关于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波兰独立的秘密承诺，并且愿意参与瓜分。瓜分是根据1772年8月签署的有关条约实现的。

波兰割让给普鲁士的是：西面位于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之间的地区，以及再往东面的埃尔梅兰。割让给奥地利的是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大块三角地带，其北边正好在克拉科夫以南，东边至利沃夫东北方。割让给俄国的是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以东的领土。总计约5万平方英里，占其全部领土的1/4，人口400万，而其总人口约为1150万人。

尽管这次肢解使国家元气大伤，但在以后的一段时期，仍实行了一项政治改革计划，出现了学术活动大发展的局面，为16世纪以来所仅见。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社会最上层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从那时起这种思潮已波及无力去国外旅行或为子女聘请外国教师的人们中间。此后，在教育改革、政治事态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各地兴起。[\[11\]](#)

全国再次出现出国旅行的狂热。根据当时的一位诗人的描写，一位到欧洲各大城市旅游归来的青年绅士看到的现象之一是对宗教的冷漠态度：

伏尔泰没有说“礼拜天去做弥撒”，
爱尔维修说，离婚不是罪恶，
卢梭仇视圣水，
洛克说什一税纯粹是欺骗，
牛顿痛恨大斋期的40天，
狄德罗认为听牧师布道真是可怜，
达朗贝尔著文反对按手礼。……

这些和其他一些西方作者的思想通过报刊得以广泛传播，其中最主要的是《箴言报》，这是《旁观者》在波兰的翻版。遵守宗教仪式的人数下降。对许多人来说，1784年在波兰和立陶宛这个“大东方”联合在一起的共济会员们的人道主义格言比教义问答集更能引人入胜。但是，在信仰和理智之间并没有出现矛盾。的确，在神父或有学问的耶稣会士身上，宗教与政治、文学或科学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事实上乃是波兰天文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先驱，尽管他们感觉到不容易把他们的观察所得与教会的理论统一起来。

为了接管新解散的耶稣会的基金和教育职责，国民教育委员会^[12]于1773年建立。这个机构在促使生活和思想脱离教会控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委员会于1783年改组，领导一个自治机构，负责波兰和立陶宛的整个高等和中等教育，包括师资培训工作。新近改革的克拉科夫和维尔诺两所大学构成这两个省的总校，下面设分校及其下属支校。在第二次瓜分时，由委员会监督的约70所学校拥有1.4万—1.5万名学生。分校学制为7年，课程设置各校相同，其中有拉丁语、波兰语、伦理学、法律、古代史和地理、波兰史、数学、几何、逻辑学、博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卫生学）、物理学、农艺学、园艺学和书法。虽然许多课程，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采用拉丁文或拉丁作者编写的教材，但同过去耶稣会士教的那种半属中世纪、半属人文主义的全部拉丁课程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如果说委员会的工作只取得了部分成绩，那是由于委员会缺乏必要的世俗教师骨干、教科书和教学辅助设施，还由于委员会很少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

尽管如此，委员会教科书所用的文字成为波兰科学术语的基础，其拉丁语和波兰语的语法不仅使文字拼写规范化，而且成为后来许多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波兰语经过现代化和删除了过多的拉丁成分，再次成为适应性强的文学媒体。这个时期的文学虽未产生伟大的作品，但满足并激发了社会的需求。诗歌，特别是讽刺诗和感伤性的抒情诗，不乏上乘之作。模仿和改编外国的剧作也取得一定成功。印刷品经常引起和推动大议会^[13]的辩论。

文学艺术界、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多数出类拔萃的人物构成一个围绕着国王旋转的小太阳系，国王本人是这个太阳系的建造者和推动者。吸引他多才多艺的头脑的学科之一是历史研究。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为了向其国人证明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他任命前耶稣会士纳鲁谢维奇重新撰写波兰历史。他可以利用档案材料并配备有抄写人员，但对这位并非出于本意的编史家来说，这项任务是过于沉重了，在1775—1779年写成的六卷^[14]包括到1385年为止这一时期的历史。按照那个时代的做法，纳鲁谢维奇采用了旨在进行批判的方法，“因为批判的方法教导人们如何区别善与恶，现象与真实，如何用理智的天平来权衡人类事务，追溯其根源，研究其方法并评判其结果”。

面对虎视眈眈的俄国并在开明的少数派的影响下，1764—1768年以及1775年的历次议会通过的立法，微妙地为1788—1792年的大议会的工作准备了条件。可以看到，一个像中央集权政府的体制正在缓慢地替代以前在个人、各省以及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形成的僵局或公开斗争的局面。虽然由于基本法不容违反而且实际事务性法规又受全体一致通过原则的约束，以致拖延了改革，并妨碍行政工作，但是“经济事务”可以不受否决权的影响，再加上同盟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有关议会议事程序的新规定，才有可能取得某种进展。作为第一个步骤，各省议会对自己的财政权力作出了限制，并在选举出席议会的代表时必须按多数人的意愿行事。根据当时开始形成的观念，绅士虽然由出身来决定，但只有拥有一定财产才能成为公民，这样由于一部分无地的贵族被排斥在外，从而减少了贵族的代表人数，就使得权贵连同他们的仆从的影响削弱了。行政系统更加专业化，体制也更加统一；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限制了财政大臣和部队指挥官（hetmans）迄今为止所掌握的过于广泛的权力；王国和公国于1773年都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把许多王室特权转移到一个由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常务院手中，从行政管理上说并非毫无好处，即使这个不受人欢迎的机构是根据基本法的一项附加规定而设立的，而这项规定是由俄国大使强行提出，经议会的一个“代表团”于1775年通过并由俄国提供保证的。

必须有可靠而增长的收入来支付从事这些改革的费用。类似于预算的费用在1768年并再次在1775年和1776年获得了批准；国王恢复了铸币权，1766年发行了新货币，并在税收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1764年，犹太人缴纳的税额改为按人口计算；酒类消费税改成消费品零售税；1775年又进行了一些意义更加深远和持久的改革。曾在1764年连同人头税一齐被废除的烟卤税这时重新恢复。以新形式出现

的烟囱税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以50%的附加税替代了过去从王室庄园的佃农征收的用于军队的税（hiberna）。永久性地恢复征收进出口货物税；由教士捐献的慈善补助费（subsidium charitativum）每年增加到70万兹罗提^[15]；从王室领地的地产和房产收入中提取的25%的税（kwarta）几乎增加了1倍；开始征收一些新的进口税，如食盐税、烟草税和印花税。结果是收入稳步增长，从1776—1777年的1200万上升到1789年的1540万。

大议会（1788—1792年）^[16]以更加紧张的工作继续深化前20年完成的任务。虽然没有投票通过任何预算，但大议会始终控制着政府的支出。大议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重整军备。为此目的，它于1789年批准一项从土地收入中征收“永久性捐款”的办法，贵族按10%，教士按22%征收。犹太人的人头税、城镇中的烟囱税和从王室领地的房地产征收的税等全都提高，并对兽皮和屠宰也进行征税。波兰国家收入就这样又增加了1倍多；从1788—1789年的1550万增加到1789—1790年的4350万，到1790—1791年又下降到3000万左右。立陶宛的增长率大致相同。1789年由贵族选举产生的维持良好秩序的委员会使政府的行政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在缓和中世纪社会所特有的种种限制和减少不平等现象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非特权个人的权益。1768年，地主丧失了对自己的庄园的农民的生杀权，但无须为杀害农奴而偿命。1776年废除对行妖术者的死刑，也废除了司法中的酷刑。1775年起，从事贸易的贵族也不再会因这样做而有丧失地位之虞了。城市居民仍然“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人。其地位在贵族和农民之间”，但城市贵族和教士的“特许权”或者可以说是治外法权（jurydyki, serwitoriaty）在1764年和1768年被削弱了。

人们普遍认为，1791年5月3日的宪法不仅是大议会而且也是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在位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因为这部宪法证明波兰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宪法起草者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在序言部分宣称，他们珍视国家的政治生存超过个人的生命和幸福。这部法的十一条可概述如下：

第一条：神圣的罗马天主教仍是国家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但保证其他宗教教徒的信仰自由。

第二条：确认贵族的权利和特权，并宣布其不得变更。

第三条：确认同年早些时候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地位的文件，并将其列入宪法。结果由国王建立的所有自治城市均享有自治权。为城镇和全体城镇居民制定新的司法制度，无论是贵族还是城镇居民一律根据城市法进行审判。过去属于贵族的特权的基本法，现在适用于所有城镇居民。凡新设城市上诉法院的市镇都有权在警察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以及城市高级法院派出它们的全权代表。城市同样有权向地区的维持良好秩序委员会和议会派出代表。城镇居民通过担任全权代表，或晋升上尉官衔，或在法律、行政机关担任相应职务，或通过购买土地，或根据定额分配制制定的议会特别法，都可以成为贵族。城市贵族和教士的特许权现已最终加以废除。

第四条：农民受法律保护，地主与其土地上的农民签订的任何协议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并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所有新移民和归国移民都享有完全的自由。

第五条：政府由三种权力构成，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第六条：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参议院议长由国王担任。国王有投决定性一票的权利。众议院可讨论有关一般性法律和政策性决议案，首先是讨论国王提出的法律和议案。参议院只有在制定法律时才能行使暂停性否决权；涉及政策的决议案必须由议会全体会议表决。参议院由主教、封建领主、城堡主和若干大臣组成。议会在短期内一经通知即可召开会议，每两年更新一次。“任何问题、任何地方”都根据多数票作出决定；废除自由否决权、解散同盟和同盟议会。宪法每25年修订一次。确认以前调整地方议会职能的法律；其成员进一步限于地主和某几类终身承租人以及受押人。一项单独的有关议会的法律也于1791年通过。204名代表不再受地方议会指示的束缚。城镇的24名代表无投票权，几乎也无发言权，因为他们只能就城市的问题发言；议事规则也进行了修订。

第七条：最高行政权力属于国王及其议事机构。行政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及保证其执行。王位由萨克森选帝侯家族世袭。宣布国王本人神圣不可侵犯。由于他不可能事事均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无须为他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国王议事机构的成员有：大主教、由国王本人任命但可由议会撤换的5名大臣以及2名无投票权的秘书。议事机构

的每项决议必须经国王签署并经一名大臣副署。为正确履行行政职能，成立四个委员会，分别掌管教育、警察、军队和财政等事务。委员会成员由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依法根据上述委员会的指示行事。

第八条：司法权力只能由法院行使。地主、城市居民和农民分别接受其司法机构的管辖。

第九条规定设立摄政委员会。第十条是关于王室儿童的教育事宜。第十一条是关于国家军队问题。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关系于1791年晚些时候加以重新确定；王国和公国只设一个财务署、一支军队和一个共同的政府，但除国王议事机构外，各部均有两套。

这部宪法的起草者（其中包括国王本人）究竟主要是仿效什么模式，还得靠比较宪法学者自己确定。^[17]不过，他们最好不要全信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致法国国民议会公开信中所说的波兰人是仿效了法国树立的伟大榜样。他在致一位外交代表的信中吐露心声说，波兰宪法与法国宪法“恰恰相反”，并有充分理由说：它是一次彻底的政治改革，而现存社会秩序则原封不动，从而赢得柏克的赞许。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替代了一个自封的共和制度，但是保留并确认了等级的划分。只是稍稍修改了一下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设计而已。第一，对贵族内部已明显可见的重新划分层次的过程加以合法化并促使其加速进行。估计在总数为72.5万的贵族中的约40.7万没有土地者，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过去的政治寡头在参议院获得席位而得到了满足，而中层贵族则跃居顶端。第二，在城镇居民和贵族分离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道路，按照宪法的说法，就是通过把资产阶级中最成功的成员（仅约40余万人）晋升为贵族，从而为贵族“注入新的和有效的力量”，然而，无论这部宪法的某些起草者的计划如何深远，^[18]它也谈不上是为未来设计的蓝图，而只不过是当时社会变化的总结和从1764年开始的政治变革达到了最高点而已。

就立法而言，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还必须从实际效果来判断，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可能起了负面作用。过去制作低劣的银币现在又过于精致；低于同黄金的比价，反而被低劣的外国银币赶出了流通领域。全国没有军火工业来装备10万军队，议会为支付新军军费而批准征收的税额低于倡议人的预计。含糊不清的征税条

文，导致税款数额过低，加上缺乏有经验的征税人员，致使1789年征收到的税额为900万兹罗提而不是预计的1600万兹罗提。

但是，波兰人未能在经济上取得较快的发展不能只责怪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在第一次瓜分带来的不利条件下艰苦工作的。除1772年遭受无可弥补的领土损失之外，还应加上巴尔同盟时期的军事劫掠，以及1775年在胁迫下同普鲁士签订的灾难性商约^[19]所带来的贫穷。

商约所订的条款无疑是由普鲁士来建立起一套关税制度，旨在以最低价格从波兰获得初级商品，而为普鲁士的制成品在波兰占领市场。这不仅阻碍了波兰工业的发展，而且普鲁士通过这条收税途径每年获取近1900万兹罗提的可观利润。通过双向边境的货物，双方各征收2%的常规关税。通过普鲁士领土的货物过境税为12%，但是如果被认为是普鲁士工业的必需商品，则过境税为30%。不仅如此，从当时仍在波兰手中的但泽经过原波属普鲁士王室领地到达波兰这一交通要道，也视为过境贸易。实际上，12%的关税经普鲁士海关官员计算竟达30%—50%；而30%的关税，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染料，竟达300%以上。

这种经济封锁显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776年波兰通过维斯杜拉到但泽的运输量下降到2/3，在但泽港停泊的船只数减少到将近1770年的一半，通过但泽出口的农产品下降到1769年的37%。波兰的贸易总额为7000万兹罗提，而贸易逆差这时上升到2600万兹罗提；波兰同普鲁士和通过普鲁士的贸易总额降幅之大，甚至使弗里德里希也深感忧虑。他于1781年下令其海关官员征税额不得高于法定的12%，并下令调查普波贸易关税的实施情况。普鲁士的束缚虽然放松了，但随后的进展还是归功于谷物价格的上涨和开辟了通往黑海的新的出口通道。波兰出口增加了，到1784年与进口达到了平衡。据估计，在1781年，除匈牙利酒类以外，波兰进口了900万兹罗提的奢侈品。这大部分来自普鲁士。根据1775年商约的规定，波兰人在某些指定的普鲁士城市购买丝织品和高级布料，只缴纳4%的过境税，而沿波兰边境居住并得到普鲁士政府资助的工匠还向波兰西部提供其他的制成品。普鲁士对波兰的封锁加上普鲁士对波兰的贸易攻势，对新兴的波兰工业产生了窒息性影响。对染料课以过高的关税，导致大波兰地区^[20]的纺织业的崩溃。到1785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从事这项家庭手工业的工人便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人数下降15%，因为中间商们发现，把为

此而生产的布匹和亚麻布送到边境的另一侧去完成最后工序反而便宜得多。

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在自己私人庄园和王室领地上开设的各种工业企业以及其他企业遭到的命运，可以说明他在位期间制造业的处境。^[21]国王建立了两座炼铁高炉，一座于1768年在布列斯特附近建成，还未获利就不得不租给他人；另一座在桑博尔附近，1766—1775年进行生产。这两座高炉生产的铁质量低劣，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人问津。1765年波兰东南部建成的一家织布厂在第一次瓜分中丧失。1768年在华沙开设的贝尔韦戴尔陶瓷厂于1780年倒闭，十之八九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这又是因为劳动分工不合理和产品规格不合要求所致。立陶宛财政大臣蒂岑豪斯代表国王于1765—1780年在格罗德诺附近国王领地开设并经营的制造奢侈品的综合工厂，也未获利，只有织布厂是个例外。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分析说，以强迫劳役为基础的蒂岑豪斯的管理制度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内部组织混乱，技术工人和进口材料成本相对过高，结果是价格没有竞争力，同时也缺乏资本和信贷。同其他有权势的人一样，国王虽开得起工厂，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周转资金而无法维持其经营。早日收回投资的希望往往落空，当时通行的12%的利率过于高昂，并且也无法找到现成的推销行业的服务。国王其他几家工业企业的收益也同样令人失望。1782—1795年开设的一家铜矿证明是不经济的，不得不租给他人；一家大理石采石场于1782—1794年向宫廷提供产品，但原拟开设的一座露天煤矿因运输费用过高而被迫放弃。

这个时期最大最成功的制造业是在华沙以西的沃维奇，属于大主教迈克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封地上开设的一家亚麻厂。工厂为一家公司所有，其董事会中贵族和市民人数相等。6名权贵承担管理职务，以鼓励家庭加工业的发展，6名市民则负责出售公司的产品并为公司服务。生产则交给本地村妇以及监狱女犯和教养院收容的妇女去做（当时这种做法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华沙）；她们纺成的纱线由中心厂织造并加工成最后成品。有时也从外面购进未加工的亚麻，为其他生产厂家进行加工。

在这些和其他工厂中，有些（虽然并不是全部）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则没有什么良好的组织，与作坊一样。这些工厂对全国的产量增加作用无几。由于实际上缺乏自由劳动力市场、全国规模的需求和可

观的资本积累，实现资本主义尚属遥远的将来。全国的生产方式同社会结构一样变化不大，而波兰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与知识界的革命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泽被隔断了，在南方和北方都失去大片土地和很大一部分说波兰语的人口。使波兰不得不开始在政治上倾向东方，在经济上则倾向南方。计划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两条运河，皇家运河和奥金斯基运河于1784年完成，把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同第聂伯河连接在一起。但土耳其人仍不允许使用德涅斯特河运输波兰谷物，俄国人则禁止重新使用位于萨莫吉蒂亚已废弃的波拉加（波兰根）港。叶卡捷琳娜对波兰走上经济自主道路的前景表示不满，仅仅于1782年对波兰通过陆路出口到赫尔松的货物的关税稍作降低。在这里，有一位由权贵变成商人的普罗特·波托茨基创办了一家黑海贸易公司。但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所迫切希望的却远远超过这些，他希望俄国允许波兰进行政治改革，以之作为波兰帮助俄国占领克里米亚的回报。他的有关请求于1783年遭到拒绝，在1787年又再次以稍加修改的形式重新提出。只要有会，国王就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俄国和奥地利计划中的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执行这种政策在道德上是卑鄙的，但在经济上则是合理的；单是比萨拉比亚就可以给波兰提供良好的海岸，而德涅斯特河又可以弥补维斯杜拉河的不足。斯坦尼斯拉夫和叶卡捷琳娜于1787年春在第聂伯河畔的卡纽夫讨论了联合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俄土战争爆发后，国王于9月提出一项结盟的详尽建议。叶卡捷琳娜经过九个月的沉默之后，接受了波兰提出的军事援助并准备为它提供补助，但不允许进行政治改革和获得领土。

俄国的拒绝使新议会的方案变得毫无意义。议会的成员业已组成一个旨在增加国家收入和扩大军队的保王同盟。由于俄国和奥地利私下决定如未经改革的波兰一旦受到普鲁士进攻时即予以保卫，于是普鲁士的使节提出了他的反建议。他以主子的名义放弃干预波兰内部事务的任何权利并提出两国结盟而不附带任何条件，迫使国王撤回同俄国结盟的建议。议会于10月20日作出决议招募10万军队（后减至6.5万人）；11月，常务院的军事部门被撤销，而代之以一个议会委员会。正如俄国大使及时指出的，这项决定违背了基本法和1775年的保证条约。但是，由于叶卡捷琳娜正同瑞典和土耳其作战，波兰才得以无视俄国的报复威胁，而推行一项改革纲领。1789年2月，撤销常务院，由

一些议会委员会接管其职能。同年春季，俄国和奥地利同意波兰所提出的从波多利亚撤出两国军队的要求，这是从1719年以来尚无前例的事件。5月，波兰向伦敦派出特使，以探讨发展英波贸易而绕过普鲁士关税壁垒的可能性。皮特虽对一旦同俄国发生战争将获得海军补给品感兴趣，但认为普鲁士友好地参加一项贸易协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与普鲁士的结盟迟迟未能实现。普鲁士本来的意图不过是以抗俄为名在干预波兰事务的过程中夺取但泽和托伦。因此，虽然在表面上作出与其意图相反的声明并提出结盟，但普鲁士对波兰重整军备和政治改革是不赞成的。然而，当普鲁士在1789年早些时候决定于来年春天向奥地利发动进攻时，同波兰结盟就成为必要的，于是为此目的开始了谈判，但是波兰同但泽的贸易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成了达成协议的障碍。普鲁士设想以割让但泽和托伦来换取降低关税，而这是波兰舆论完全不能接受的；甚至连亲普鲁士的爱国人士也认为，只有允诺以加利西亚作为交换才说得过去。最后，为了达成妥协，便将贸易问题推迟到以后去讨论。根据1790年3月29日签订的普波条约的条款，两国保证彼此领土的完整。在一方遭到进攻时，另一方有义务进行调解，必要时将采取军事行动。这些条件同样适用于任何外国借口任何以前的协定对波兰内政进行的干涉。若敌对行动不可避免，普鲁士国王将投入3万兵力进行干预。波兰人不明白，这后一条款从一开始就被柏林视为极端麻烦的义务，而且整个条约也只有在同奥地利开战时才有用处。由于波兰军队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等原因，双方于6月达成协议：尽管条约存在有关条款，但双方所热切希望的是，在同奥地利的战争中波兰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到仲夏时节，奥普军队已摆好架势，准备在西里西亚采取行动，但普鲁士为挑起战争而进行的谈判，竟出人意料地导致问题的解决。根据赖兴巴赫条约，奥地利接受了普鲁士提出的苛刻条件：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媾和以前先同土耳其政府停战。就这样，奥地利赶快脱手避免了更多的损失，甚至排除通过谈判给予普鲁士任何好处，而赫茨贝格从1778年起就希望实现的土地交换计划，即奥地利放弃加利西亚给波兰，以换取在土耳其得到领土，而波兰则将但泽和托伦回报给普鲁士，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在此期间，波兰在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1789年9月，议会成立了一个改进政府工作的委员会；11月，来自国王特许自治城市

的269名代表抵达华沙，请求国王恢复并扩大他们过去的特权；这项要求在次年4月通过的城市法中得到满足，后来被载入宪法。议会在1790年就波普联盟进行辩论后，在其法定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决定通过选出一批新议员而将目前众议院议员人数增加1倍。选民除了获得一次机会就改革的原则进行表态外，还要求他们就议会和国王提出的关于赋予萨克森选帝侯以继承权的问题发表意见。在11月举行的选举中，改革事业取得了胜利；在180名新议员中有120名是“爱国人士”。当扩大的议会于12月开会时，宪法改革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有些建议，如由国王及其议事机构进行治理等，不久即体现在5月3日的政府法案之中。

议会在闭会之前，于9月已通过了由同一委员会起草的一套新的基本法律和两项重要修正案：宣布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并放弃1775年俄国作出的保证。在普鲁士对奥开战计划彻底失败以及俄国和瑞典新近签订和约的情况下，波兰的这种姿态只会激怒俄国并触犯普鲁士。这也无从鼓励普鲁士国王同这位波兰国王共同工作；也与当时正在讨论的将波兰王位继承权赋予某一普鲁士诸侯的计划不相符合。不过，这两项修正案，还没有立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第一项修正案，赫茨贝格称为“背信弃义”，预示着将有不祥后果，但毕竟没有立即发生。为准备进攻奥地利而集结的军队还可以用来对付俄国。1791年1月，英国和普鲁士要求俄国恢复土耳其的现状；同月，英国表示愿意与波兰签订贸易和政治协定，但以普鲁士也参加为条件。这就意味着要割让但泽和托伦，因为这是普鲁士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不管波兰是否同意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实现。如果波兰同意，普鲁士将会认为有义务保卫波兰而反对俄国；否则，普鲁士就可能同俄国联合起来对付波兰。摆在波兰领导人面前的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此之严酷，他们只有采取闭眼假装看不见的态度。议会沉浸在爱国激情之中，要它改变政策也同样没有希望。对这样的政策，英国特使黑尔斯和他的波兰朋友们所能得到的最多也不过是授权外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的一纸指令。而黑尔斯感到当时已毫无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在波兰，由于没有一个正当的政府，公众和议会的意见至高无上；在英国，尽管就宪法上来讲存在根本差异，但情况也没有两样。3月28日，乔治三世向议会宣布，他认为有必要扩充海军，以便为普英要求在严格的意义上恢复黑海的现状增添力量。英王的讲话是在皮特

授意下发表的，皮特认为一定不应让俄国占据奥恰科夫以及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沿海地区，以防止俄国成为南方海军大国。但是，无论是议会还是公众，都不太清楚奥恰科夫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要让英国的老朋友和好主顾把这块地方交还给基督教的传统敌人。北方出口贸易处于危机之中；伦敦、诺里奇、威克菲尔德、利兹和曼彻斯特都异口同声地发出“不要同俄国打仗！”的呼声。这种情绪在下院和政府内部都引起了共鸣；托利党的多数在下降，内阁意见分歧。皮特的力量遭到削弱并作出了让步；这是“他从未遭到过的最大屈辱”。[\[22\]](#)

俄国振兴军备的失败[\[23\]](#)也招致拟议中反俄联盟的瓦解。在波兰，国王和爱国分子在国家应有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政府的共同愿望下，在几个月以前联合在一起；现在，他们都感到一旦有可能，他们就必须有所行动。5月3日，一部在极为秘密的讨论下炮制的新宪法在众议院半数以上议员缺席的情况下，由出席议员多数通过。王位改为世袭，不再是国际政治的筹码；并希望以国王为首的政府能够执行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但是，这时开展外交活动已为时过晚。

普鲁士对这部宪法的态度[\[24\]](#)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普鲁士的外交代表警告“爱国分子”说，如果波兰政府体制未得到普鲁士同意就进行重大改变，他的政府便不会履行联盟条约；而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正式表示他同意“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实际情况是，普鲁士政府确实认为自己已解除承担的义务，但又让波兰人从非正式的暗示中去揣测其中意思。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91年7月（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媾和后）签订的条约中，根据利奥波德二世的建议，列入了一项条款，保证波兰领土的不受侵犯和完整，以及波兰的宪法。然而，在1792年年初，当奥普两国在俄国和土耳其媾和后恢复其联盟时，普鲁士利用法国当时的局势对有关波兰的条款进行了修改：两国只承诺尊重一部自由的宪法。普鲁士政府这时认为，俄国在波兰重新发挥影响已无害处，到2月中旬已在考虑另一次瓜分。1792年3月1日利奥波德去世后，这种前景更加接近。4月，普鲁士使节在一项口头声明中宣称，他的政府认为自己并没有义务捍卫这部新宪法。这时，波兰不得不单独去应付叶卡捷琳娜的报复。她决心要打击并粉碎波兰的雅各宾主义分子，教训波兰人不要小看俄国，并惩罚他们忘恩负义的国王。1792年5月14日，波兰的保守分子在她的保护下组成一个同盟（表

面设在塔尔哥维查，实际上是在圣彼得堡）以反对他们声称的1791年5月3日的革命阴谋；四天之后，俄国军队入侵波兰。当波兰人天真地援引联盟条约请普鲁士给予援助时，普鲁士建议波兰人击败俄国。波兰军队仅仅能对入侵者稍作抵抗，国王只有进行谈判。7月，国王屈从于叶卡捷琳娜的要求，而且他生性倾向于妥协，于是承认了塔尔哥维查同盟。叶卡捷琳娜在延长了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盟条约后，她的地位已强大到足以单独对付波兰，不过她还是选择了一条稳健的方针，同普鲁士分享战利品，而奥地利则放弃了它的那一份而换取了它取得巴伐利亚。1793年1月23日签署的俄普条约表明这次瓜分是针对革命的一次行动。这真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摧毁了波兰的叛乱，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在法国采取同样行动的实力。普鲁士攫取了但泽以及从琴斯托霍瓦经索哈切夫到贾乌多沃一线以西的地区，人口约110万。俄国则获得了从德鲁雅到平斯克，从而到兹布卢奇河以东的地区，居民300万人。

议会于6月在格罗德诺开会，批准瓜分的行动。出人意料的是，它遭到了顽抗，只是在蛮横的压力——军队封锁、监禁、没收财产——和进一步报复的威胁下才屈服的。于是，属于波兰的仅仅剩下一个小小的俄国保护国，面积约8万平方英里，人口约400万以及一部倒退的宪法。[\[25\]](#)

波兰军队虽然在1792年战败，但并未被击溃。许多将领都在等待时机以便及早重新投入战斗。在华沙和其他地方，许多知名的民间人士在法国革命成功的激励下也在考虑举行大规模起义。共济会的支部网为这两部分人的领袖们提供了开会的场所，不久彼此就联合在一起策划起义，并且同在德累斯顿避难的五月宪法的倡导者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些人当中有柯斯丘什科将军，[\[26\]](#)他在最近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被认为是未来起义的领袖。由于面临军队人数即将从3.7万人减到1.5万人和华沙的共谋者遭到逮捕，起义遂被迫提前举行。柯斯丘什科于3月底抵达华沙，负责领导起义。运动的纲领概括为下列口号：“自由、（领土）完整、独立”，柯斯丘什科得到一个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后来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而告终。

他的军队从一开始就以2：1处于劣势。尽管地方民兵也立了功绩，但加在一起仍无法弥补缺乏训练有素的军队，特别是缺乏装备的弱点。农民援军手中所持的、可以置敌人于死命的直立大镰刀毕竟不

能取代枪炮和弹药。撇开战略上的考虑不谈，起义者终于在战斗了8个月之后不得不放下他们手中已空无子弹、损坏无法使用而又得不到替换的火器。

这些手执大镰刀的人首先在4月4日克拉科夫附近的拉茨瓦维采战役中战绩辉煌，这也是柯斯丘什科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于是起义声威大震，扩大到东南远及沃伦地区，往北则达到立陶宛。4月中旬，华沙居民向俄国驻军发动进攻，为波兰人取得战争中，也是整个世纪中最大的胜利。到4月底，起义军几乎控制了第二次瓜分后留下的由波兰占有的全部领土。普鲁士于5月的入侵及其6月与俄军会师使形势对柯斯丘什科更加不利。在6月初两次失利和克拉科夫失陷后，约2.8万名波兰军队退守华沙，同9000多名城市民兵会师。2.5万名普鲁士军队到8月底才向首都发动进攻，但被击退，不久又向西撤退以便镇压波兰西部的地方起义；1.4万名俄军则在固守的阵地前滞留，后向南撤退。然而，维尔诺不幸于8月初落入俄军之手。随着令人生畏的苏沃洛夫从乌克兰南部抵达波兰，俄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更加居于压倒地位。10月10日，A.波宁斯基率领的一支小部队由于未能在马切约维采与柯斯丘什科会师而被歼，本人也受伤被俘。不到一个月后，普拉加郊区遭到苏沃洛夫军队的猛烈袭击，并且在违反苏沃洛夫的指示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居民遭到屠杀。华沙投降了。托马斯·坎贝尔^[27]悲叹起义者的失败：

啊，时间长河中血流成河的图画，
萨尔马提亚倒下了，没有眼泪，没有罪过；
找不到一个慷慨的朋友，也没有同情她的敌人，
她双臂仍然坚强有力，在灾难中也无人怜悯！

华沙爆发起义后，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和她驻波兰首都的全权大使伊格尔施特勒姆的反应不谋而合：向普鲁士求援。看来俄国已缺乏单独采取行动的财力和人力。普鲁士迫切希望得到报偿，预期俄国会提出要求，由拿骚公爵把自愿帮助的信息带到圣彼得堡。俄国政治家们在波兰问题的看法上意见分歧，但别兹博罗德科、奥斯特曼，也许还有叶卡捷琳娜本人都主张瓜分。至少到6月底，叶卡捷琳娜已拿定主意，并已就原则问题同奥地利进行了磋商。图古特表示同意。叶卡捷琳娜得到这个暗示后便发表声明，称三国王室采取措施的时机业已

成熟，这不仅是为了扑灭在波兰燃起的火焰的最后火星，而且是为了防止它死灰复燃。

如果说从此以后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的话，其原因是火星已酿成熊熊烈火，而消防队员却彼此争吵不休。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对克拉科夫及其他领土提出要求，互相冲突，而叶卡捷琳娜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从华沙后撤一事表现出无尽的愤恨。苏沃洛夫的胜利使叶卡捷琳娜在镇压起义之后出现的更加激烈的争论中得以进行仲裁。11月，奥地利接受了女皇提出的条件，但普鲁士却坚持把其边界线推进到温达瓦河、涅曼河、维斯杜拉河和纳雷夫河一线。由于同普鲁士的谈判处于僵局，俄、奥两国为了调整并力图说明新的肢解方案是合理的，交换过三次内阁声明。第一次说，鉴于共和国已完全无力在法律下和平生活，也无法产生坚定有力的政府以防止像这次叛乱这样的麻烦重新发生，三国认为有必要由其邻邦对波兰实行最后的瓜分。第二次为奥地利参加1793年的瓜分做了准备。第三次则再次提出瓜分土耳其的秘密计划。与所有人的预料相反，而且确实与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意图相反，普鲁士于1795年4月5日在巴塞尔同法国单独签订和约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在波兰的领土要求，并没有反对其被遗弃的伙伴奥地利和其盟友俄国。普鲁士已无力再单独发动这样的战争，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盟友，因此和平才得以保持。1795年8月，普鲁士终于接受了俄国的领土要求，但保留同奥地利进一步谈判的权利。普鲁士与俄、奥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于1795年10月签订。俄奥边界现在已扩展至布列斯特以西的布格河沿岸，而俄普边界则从该处延伸到格罗德诺和涅曼河沿岸。普奥边界大致沿皮利察河、切尔斯克和华沙之间的一段维斯杜拉河以及布格河下游的大部分划分。普鲁士兼并了约90万波兰人口和华沙，奥地利获得了约100万人口和克拉科夫，俄国则增加了200万人口。1797年1月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条约使共和国的事务宣告结束，并写明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于近期退位。缔约国在一项单独的秘密条款中同意在称谓中永不再使用“波兰王国”一词，它今后将永远被取缔。[\[28\]](#)

柯斯丘什科（1764—1817年）作为领导他受人控制的国家的第一位平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有关他的一切几乎都带有新时代的特点并宣告19世纪的来临——他出身中产阶级，在波兰和巴黎求学期间是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追随者，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是一个信

任普通老百姓的卢梭主义者，并往往富于浪漫色彩地按自己的愿望来估量自己的力量。他是参加过两次战争的老兵，因而认为担任武装起义的领袖是自己的天职。他把士气看得比人数重要，因此既相信常规武器的威力，同样相信佩剑等随身武器的作用。照柯斯丘什科看来，波兰的大镰刀跟法国的长矛和刺刀是一样好的武器，特别当采用福拉尔骑士和H. 劳埃德将军的著作中所主张的步兵纵深阵形时，使用这种武器更加有效。柯斯丘什科认为，只要团结一致，波兰是能保卫自己对抗俄国和普鲁士的，而达到团结一致的最好办法是赋予农民在5月3日没有得到的东西。1794年5月7日他在波瓦涅茨发表的声明正说明了这一点。农民摆脱了桎梏，得到了同地主进行合法斗争的权利，因为已禁止地主任意侵占农民的土地。徭役以过去每周劳动的天数按反比例减少，即按土地的大小和劳动能力来确定：从5天或6天减少到3天或4天，从2—4天减少到1—3天，从1天减少到半天。作为减轻劳动的报偿，农民有义务按合理的工资以雇工身份劳动，还要帮助那些服兵役的人种地。但是，地主出于自私的目的，阻挠实施波瓦涅茨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得到贯彻，就会在波兰为农民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而且会比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状况更先进。而结果是，贵族与起义疏远了，而身受俄军苛捐杂税和百般虐待的农民也没有被争取过来。

柯斯丘什科虽然对农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并不想让波兰走法国革命的道路。在华沙十多万居民当中虽然可以找到最大多数的法国革命的信徒；但是，无论是心怀不满的下层民众，还是以前撰写政治小册子而从1792年以来已不再活跃的那些先锋人物，以及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会转变为政治俱乐部的手工业者，就其人数和力量来说，都不足以把波兰首都变成另一个巴黎。暴动和游行示威由于5月9日逮捕并于6月28日未经审讯而公开将一些主要的卖国贼绞死，从而达到高潮，但当局终于控制了局势。近1000名“雅各宾分子”遭到逮捕；1794年6月华沙民兵使用的誓词和口令说明了他们的政治纲领：“农奴制——可耻；出身——是偶然的，自由——幸福；人民——权力。”一般老百姓对法国革命的反应与其说是盼着推翻国内的敌人，不如说是打倒外部敌人以求得解放。这也正是柯斯丘什科所希望的，并构成他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武装起义的战略计划的基础。

自1792年以来，法国革命之得以保全，与其说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倒不如说是法国的敌人因波兰的事态发展而分裂，以致削弱了彼此的力量。就这点来说，法国革命实已受惠于波兰。普鲁士更热衷于获得但泽、托伦和最大份额的波兰领土而不是摧毁法国革命，因此乐于让奥地利承受在法国作战的主要压力，而法国也利用这种愿望，让自己的军队撤回，丝毫没受损失。1793年秋，格罗德诺的议会在俄奥使节的秘密怂恿下，拒绝割让任何领土给普鲁士。对此，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不能因“次要任务”而牺牲“首要任务”，遂匆忙将军队从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调往波兰，从而使法国军队免遭某种惨败。法国国民公会曾于1792年11月19日宣布，准备给予所有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以无偿援助。但事实与此相反，这一诺言从来没有兑现。德累斯顿的爱国者在国民公会外交政策的鼓励下，把不久前当选为共和国名誉公民的柯斯丘什科派往巴黎作为他们的代表。^[29]他提交给吉伦特派领导人的备忘录表明，他希望波兰树立的榜样为奥地利（在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普鲁士（在西里西亚）以及甚至俄国的被压迫民族所效仿，使这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不得不退出波兰。接受备忘录的人由于早已决定默许进一步瓜分波兰以换取同普鲁士媾和，却提出一旦时机成熟，将执行一项向波罗的海及其岛屿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计划，来欺骗柯斯丘什科。总之，即使他们愿意恪守国民公会的诺言，他们也无法这样做，因为法国于1793年春正忙于保卫自己的领土而自顾不暇。柯斯丘什科只得两手空空返回德累斯顿。第二位使者于同年年末抵达巴黎，也一无所获。武装起义的爆发也未能动摇山岳派政府捍卫法国革命而不顾其他一切的决心。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才允许波兰使者出席国民公会，其主席科洛·德布瓦向他说教：在一次大革命中，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强有力会产生种种不良后果。在晚秋时，法国救国委员会为了发动一次由波兰、瑞典和土耳其人协同进行的牵制战役，决定派遣一名使者携带一笔款项前往波兰，不过此时俄国人早已开进华沙了。法国这种小心谨慎而且为时已晚的姿态所付出的代价，同它从波兰抵抗的崩溃中所得到的好处简直是无法相比的。通过巴塞尔和约，波兰起义成了法国革命的牺牲品。

在1830年革命时期，波兰扮演了诱饵的角色而再次为法国提供了同样关键的帮助。在这两次重大时刻，波兰都没有任何盟友。在1794年，波兰周围的邻邦都在欧洲这块大陆上寻找殖民扩张的出路。撇开

这些恶劣的处境不谈，应该把柯斯丘什科的起义看作是一次计划不周的冒险，而并不是不计后果的赌博。所得远远超过所失。继武装起义之后的瓜分在任何情况下迟早都会发生的。在被瓜分之前，波兰人至少表现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而且知道如何保卫国家。武装起义是五月宪法合乎逻辑的结果。

认为波兰肯定会有一个盟友的错误看法，对第二次瓜分波兰起了重要作用。在导致瓜分的事态发展中，波兰人表现得轻率和轻信；普鲁士人口是心非，英国人表现出岛国民族的狭隘特性，而叶卡捷琳娜则怀有俄国式的报复心理。波兰这次遭到瓜分是由于它想要好好地治理自己而受到惩罚，而1772年那次瓜分则是由于自己治理不善而受到惩罚。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的无政府状态而招致俄国和普鲁士出于私利而进行的干涉。1772年进行的交易的基础则是补偿：对俄国是补偿其对土战争的胜利有限，对奥地利是因为它未能取得土耳其任何领土，而对普鲁士则是因为它充当了中间人，而且采取了有效措施免得它失去别人已得到的利益。虽然这一次像在1793年，在很大程度上像在1795年一样，推动力都来自普鲁士。但是，普鲁士受到社会舆论和后世的谴责却比应有的少得多。

至于瓜分的“原因”虽然可以从波兰内部和外部存在的环境中寻找，但事实仍然是，倘若波兰的体制稳定，经济又发展得较好，就不会使自己处于被肢解的境地。因此，瓜分并不是一出三幕悲剧，而是一出戏的最后一幕，其序幕可追溯到16世纪。

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给瓜分者带来一些相对的和绝对的好处，但没有一个能保持长久。普鲁士使领土连成了一片；奥地利在良心上并不平静，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俄国在中欧领土上打入了一个楔子，与普鲁士形成面对面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地理壁垒拆除了，这推迟了两国的冲突，但最终并未能避免。总之，瓜分给19世纪带来了波兰问题，它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

1772—1794年这段时间，波兰社会生活也出现了新的现象。华沙承担了一个近代首都和任何地方所具有的政治重要地位，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好像是为了抵消塔尔哥维查的保守分子和卖国分子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经过改革的学校培养出波兰人的一个新的阶层。这些人思想激进，倾向民主，出身于城市或地主家庭，但通常并不拥有私人

财产，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波兰国家遭到镇压使进步的时钟倒转，并迫使这些各方面的精英把他们的精力由从事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转向恢复民族独立这一崇高而范围有限的事业。

（王绍仁 译）

[1] 《历史季刊》（1918年），第173—240页。

[2] 《旧波兰被瓜分的经济基础》，载《近代史评论》第7卷（1932年），第363—389页。

[3] F. 皮戈特和G. W. T. 奥蒙德：《武装中立的历史资料》（伦敦，1919年），第45页。

[4] 《回忆录，1763—1775年》，《全集》第6卷（柏林，1847年），第35、37页。

[5] A. 冯·阿尔内特编：《约瑟夫二世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通信集》（维也纳，1869年），第3、4页。G. 策勒在《1789年前国际政治中的均势原则》一文（《历史评论》1956年，第36页）中错误地认为瓜分者在1772年并未提出势力均衡。

[6] 参见S. 阿斯凯纳齐《波兰最后的选帝侯》（格丁根，1894年）。

[7] 维斯杜拉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译者注

[8] 见前面第11章，原文第322页。

[9] 见O. 福斯特·巴塔利亚《玛丽亚·特蕾西亚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载《历史季刊》（1926年），第411—416页。并附有德文附录。

[10] 国家档案局，S. P. 波兰，94，康韦1767年12月8日致拉夫顿函。关于英波关系可参阅W. 科诺普琴斯基《英国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载《中欧事务学报》（1948年），W. F. 雷德韦《大不列颠与波兰，1762—1772年》，载《剑桥历史学报》（1934年）和D. B. 霍恩《英国舆论与第一次瓜分波兰》（爱丁堡，1945年）。

[11] 见J. 法布尔《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启蒙时代的欧洲》（巴黎，1952年）；B. 莱希诺多尔斯基《波兰的启蒙时代·政治史、体制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情况》，载《波兰历史学报》第4卷（1961年），第147—174页。

[12] 见J. 若贝尔《波兰国民教育委员会》（第戎，1941年）。

[13] 大议会（Great Sejm），即1788—1792年的议会，亦称“四年议会”。——译者注

[14] 见M. 内奥米夏·鲁特科夫斯卡《A. 纳鲁谢维奇主教和他的〈波兰民族史〉》（华盛顿，1941年）。俄国使节曾禁止该书第一卷的出版。

[15] 当时40兹罗提等于1英镑。

[16] W. 卡林卡：《波兰的四年议会》（柏林，1896—1898年）虽已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有用的书籍。我未看到J. 克罗兹《波兰四年议会的立法工作》（巴黎，1913年）。

[17] 参见C. E. L. 科尼克《1791年波兰宪法与法国宪法之比较》（洛桑，1918年）。W. 库拉《18世纪波兰经济史》，载《波兰历史学报》第4卷（1961年），第133—146页。

[18] 见J. 迪姆《1791年波兰宪法中的经济问题》（弗罗茨瓦夫，1959年；英文摘要）。

[19] J. A. 怀尔德：《1775年波普商约》（华沙，1937年；有法文附录和英文摘要）。

[20] 波兰历史上称波兹南、克鲁什维卡、格涅兹诺、卡利什地区为“大波兰”（Wielkopolska [Poloia Major]）。——译者注

[21] 见W. 库拉《18世纪波兰制造业概况》（华沙，1956年）。英文摘要不完全可靠。

[22] J. H. 罗斯：《威廉·皮特与民族复兴》（伦敦，1911年），第617页。

[23] 见M. S. 安德森《英国对俄国的发现，1553—1815年》（伦敦，1958年），第6章和D. 格哈德《英国与日益上升的俄国》（慕尼黑，1933年），第6章。

[24] 1788—1792年间的普波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最近的研究见J. 达特凯维奇《四年议会时期的普鲁士与波兰》，载《历史观察》（1935年）和《格但斯克问题……》，载《托伦科学协会论丛》（1954年）。

[25] 见B. 德姆宾斯基编《波兰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的历史文件》第1卷（利奥波尔，1902年；未再版）和R. H. 洛德《波兰第二次瓜分》（坎布里奇[哈佛]，1915年）。

[26] 见M. 海曼《柯斯丘什科将军的领袖和流放生活》（纽约，1946年）。

[27] 英国诗人（1774—1844年）。——译者注

[28] 参见R. H. 洛德《第三次瓜分波兰》，载《斯拉夫评论》（1925年）。

[29] 见J. 格罗斯巴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巴塞尔条约以前的波兰政策》，载《法国大革命史年鉴》（1929年，1930年）。

第十三章 伊比利亚各国和意大利各国（1763—1793年）

一 伊比利亚各国

在1763年，经历了七年战争的西班牙已国力变弱，较前明智，卡洛斯三世和他的大臣已明白，要获得实力和安全没有什么捷径，西班牙只有依靠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才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存在下去并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过去波旁王室曾作过努力来阻止这种衰微趋势，但无力扭转。在卡洛斯三世于1759年继任西班牙王位以前任帕尔马公爵和那不勒斯国王时，就表现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宣称他的抱负是恢复西班牙的伟业。他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许多品质。尽管他的智力有限——从他对打猎有近乎幼稚的入迷或许可见一斑——但他严肃认真，处事勤勉，给外国观察家和他的臣民留有深刻印象。他信教虔诚，生活有节，并忠贞不渝地缅怀前妻——萨克森的玛丽亚·阿马利娅，她在他登上西班牙王位不久后即去世。他的君权意识强烈。从对他儿子的告诫中即可看出他的专制主义观点：“任何批评政府行为的人，即使政府行为不好，也都构成犯罪。”^[1]不过，重要的是他在任用大臣方面显示出治国才能。他不从政治无能的贵族中挑选顾问，有时也传闻不从中产阶级中挑选，因为它尚未被承认是西班牙的一支力量，而是从下层贵族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律师中挑选，他们既忠于专制王室，又心向启蒙运动思想的贯彻实施。不过，他早期的任命显示出他对外国人，尤其是意大利人的宠爱——如他任命斯奎拉切侯爵为财政大臣，格里马尔迪侯爵为外交国务大臣——这使他在新臣民中失去了一些人心。但他吸取了教训，用西班牙人取代他们，并起用素质较高的人，如任命能干的律师曼努埃尔·德·罗达为司法大臣；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德·坎波马内斯从1762年起任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的检察长；军人出身的行政官员阿兰达伯爵1766—1773年任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主席；特别是任命开明专制主义的理

想臣仆、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何塞·莫尼诺于1766年起为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检察长，并于1776年接替格里马尔迪任首席国务大臣。

虽然这些人中有的受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但他们的政策谈不上具有什么意识形态倾向，也没有对宗教进行公开抨击。启蒙运动哲学在卡洛斯三世的思想中没有位置，对他的臣民的影响也很小。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西班牙人阅读过法国启蒙哲学家的著作，而且他们并不一概接受其观点。法国人对当时社会、政治和宗教机构的批评，西班牙人没有作出什么反应；这并非由于宗教法庭（这是人们可以逃避的），而是由于政府当局和西班牙人民信奉天主教和忠于专制王室。事实上他们谋求的不是新的哲学，而是对行政、经济和教育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卡洛斯三世政府革新精神的动力只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实力和繁荣。科学发现并不是由于其本身目的，而是由于它可以成为促进生产和农业的手段才受到重视。这从半官方的经济社团组织的工作中可见一斑，他们随着君权从巴斯克地区扩展到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大城镇，目的只是通过研究和试验来促进农业、商业和工业。这些组织虽然遇到了保守势力的某种敌意，可是在观念上绝不是反教会的，而且成员中有不少教士。改革探索的整个运动被恰当地称为“实用文化和管理文化”，^[2]其目标是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知识。

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上面，西班牙社会中的保守分子最初感到突然，难以接受，政府中出现了外国人，并且存在着真正的不满，使得早期的抗议活动具有爱国和赢得人心的感染力。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遭到失败，通货膨胀和接二连三的歉收带来了食品价格上涨，加上斯奎拉切为改革而增税，所有这些，引起了广泛的怨恨，并可能被那些对政府执行新路线感到惊慌失措的人所利用。最后，斯奎拉切又想实施一条旧法，禁止人们在马德里穿戴阔边呢帽和长斗篷，理由是这种穿戴可能为刑事犯提供伪装。他这一企图终于触发了马德里1766年3月的暴乱，随之扩散到西班牙中部的其他许多城镇。在首都，一批暴徒攻击了意大利人大臣们的住宅，国王本人逃到阿兰胡埃斯，屈辱地接受了起义者的条件：放逐斯奎拉切，取消关于着装的法令，降低食品价格。在官方看来，1766年的暴乱不只是反对试图改变民族服装的外国大臣，甚至也不是出于百姓的不满，而是由于有人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企图用武力来更换政府成员和政策，这意味着他们抵制改革或改革计划，特别是抵制改革经济和教会事务。据报道，暴乱是一些

贵族和教士策划的，他们想把斯奎拉切赶走，阻拦卡洛斯进一步改革。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3]尚无证据表明，耶稣会士作为一个教派参与了暴乱，但无疑有些耶稣会士个人与暴乱确有牵连，并企图说明暴乱是正当的。这给政府提供了可归罪于整个教派的材料和消灭这一教派的机会，它过去的活动被认为是对专制王室的威胁。

在对付西班牙教会方面，卡洛斯三世处于有利地位，1753年罗马教皇曾与西班牙国王缔结政教协定，认可西班牙国王有广泛的任命权、司法权和征税权，他想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些权力。教会本身几乎无力抵抗这种专制。在1000万人口中有20万神职人员和约3000座教堂，教士的数量可能已超出了国家的支持能力。经济上教会力量强大，占有大量土地和岁入，其收益多半用于慈善事业、教育和向国家捐助，但改革派还抨击教会不从事生产，尽管教会物力雄厚，却无法形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国家的侵犯。主教由国王任命，而通常能胜任该职的绝大多数是坚定的王权至上主义者。在拥有财产和所受教育方面，高层和下层教士大不相同，神职人员的分布也不合理，托莱多这些地方人员众多，而农村教区却连神父都没有。修道院内的修士同他们的对手在俗教士之间也存在分歧，这些都削弱了西班牙教会，使它受到攻击。另外，国王处理教会事务的权力在西班牙的支持者大有人在，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有。这些王权至上的拥护者被他们的敌手称为詹森派，可是他们的詹森派教义同法国早期詹森派提出的感恩祈祷问题丝毫没有有什么关系，仅在批评罗马教皇的司法权、宗教派别以及把各种流行的虔诚行为看作迷信等方面有相同之处，那些希望西班牙的教会能体现更多民族特性的人，还得到了高卢主义^[4]和费布朗尼乌主义^[5]等其他外来的反教廷倾向的影响的支持和鼓励。

同信奉王权至上的西班牙教会的其他派别相比较，18世纪的西班牙耶稣会并不特别信奉教皇至上论，许多耶稣会教士，特别是王家忏悔神父，和其他教派的信徒一样坚决维护王权。尽管如此，耶稣会士仍保持了他们的誓言：服从教皇和维护他们作为教廷代表的声誉。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在美洲殖民地也受到怀疑。一个有着总部设在西班牙之外的国际性组织的教派，被看作是对王权的妨碍。为贯彻1753年的政教协定，卡洛斯三世认为必须认真对付国内和罗马的反抗。他即位几年后便开始摊牌，禁止出版谴责法国教义问答手册的教皇敕书，该手册否认教皇无谬说并包含敌视耶稣会的观点。当西班牙宗教法庭庭

长出版了该教皇禁令后，就被逐出马德里，囚禁在一修道院，直到他乞求王室宽恕方罢。另外，卡洛斯三世于1762年1月18日颁布法令，规定从今以后，教廷的一切文件，都必须得到王室的准许，才能在西班牙出版。该法令虽在1763年7月暂停实施，但在1768年又告恢复。

耶稣会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事件上的反对行为，使卡洛斯三世更坚定了要除掉该教派的决心，他认为该会是对他专制权力的挑战。这项决定得到了他的大臣们的坚决拥护，他们中有些人如坎波马内斯和莫尼诺，都来自对耶稣会在教育中的影响以及它依附于高层贵族而感到愤慨的阶级。结果终于爆发了1766年的暴乱，虽然暴乱的起因显然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导致的不满，可是政府宁愿相信暴乱是耶稣会及其盟友煽动起来的，他们企图改组政府，阻止进一步改革。教廷提出抗议，认为耶稣会个别教士的行为不应使整个教派遭到损害，但为时不久，整个教派显然已处在危险之中。官方对此事的调查掌握在阿兰达之手，斯奎拉切下台后，他于1766年被任命为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主席，由坎波马内斯和莫尼诺协助其负责恢复秩序的任务。对耶稣会的指责十分激烈，并掀起宣传的狂热，表明对它的谴责不仅硬说它卷入了马德里暴乱，而且它在政府中的敌人称他们“鼓吹狂热，煽动叛乱，教义虚伪，极端骄傲，令人无法容忍”，并构成“扰乱国家，直接反对大众福利的公开帮派”。^[6]一个包括僧侣统治集团成员在内的王室委员会，判定耶稣会犯有煽动暴乱罪。接着，1767年2月27日颁布王室敕令，将耶稣会逐出西班牙及其领地，就像它早在1759年被逐出葡萄牙、1762年被逐出法国一样。该法令还禁止公众议论该事。在执行中，虽然被牵连的8000名耶稣会士和来自西班牙其他教会的人士实际上都未反抗，阿兰达仍采用了无情的军事手段。这一措施不仅获得了奥古斯丁会等对立教派的拥护，并且得到了有王权至上思想的主教团中大多数人的拥护。当罗马教皇于1769年询问西班牙僧侣统治集团对上述措施的意见时，42位主教赞成，6位反对，8位拒绝回答。

西班牙政府并不满足于驱逐耶稣会，它还决心镇压所有地方的耶稣会，为此需要罗马教廷的合作。那些离开了西班牙的耶稣会士，定居在教皇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出于政治和财政原因，教皇克雷芒十三世虽然也不愿他们待在他的国家，但他抵制了波旁王室国家要求镇压他们的压力。所以卡洛斯三世及其盟友只好谋求物色一位较听话的教皇继承人。选举红衣主教甘加内利为克雷芒十四世教皇，是反耶稣会

国家的一次胜利。克雷芒十四世终于在1773年7月21日颁布了镇压耶稣会的敕令。西班牙政府在罗马的主要代理人是何塞·莫尼诺，其助手是巴斯克斯神父和博伊克萨多斯神父，他们分别是奥古斯丁会和多明我会的会长。莫尼诺甚至对教皇敕令的起草都能施加影响。为酬谢他的效劳，卡洛斯三世授给他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的称号。

剩下的还有耶稣会教义及其财产的问题。教义遭到禁止，财产被充公，并首次用于公共教育。政府保证耶稣会的财产用来兴建新的教育中心、医学院，为贫困学生兴建大学宿舍，耶稣会的岁入则用于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事业。王室法令规定，小学教育全由世俗教师任教，上学是义务，并对大学教授职位进行管理。这些规定并未全部执行，解散耶稣会的受益者是国家而非社会。

西班牙的教会从属于国家一事，由于宗教法庭的司法权的被剥夺而宣告完成。宗教法庭本来已经是王室的工具，但在政府看来，由于它以前同耶稣会沆瀣一气而失去价值，卡洛斯三世政府中的改革派认为它是教皇权力至上的维护者。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重申君权高于宗教法庭，卡洛斯三世比他的前任开始更有效地行使君权。1768年和1770年的法令规定了书刊审查的程序，宗教法庭的审判官限于审问异端邪说和背教行为，并且只在罪名成立后才能监禁当事人。王室的这种限制宗教法庭司法权的行动的意义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宗教法庭在宗教事务方面的传统权力并未触动。然而宗教法庭已不能无视政府的态度，审判官的任命也挑选比较温和的人，加上它本身失去了生气，从而缓和了它的行动。

镇压1766年暴乱、驱逐耶稣会士，都是卡洛斯三世的改革派大臣们的胜利，此后，他们又得到了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新主席阿兰达伯爵的名望和权威的支持。阿兰达是一位贵族、军人和温和的改革派，对卡洛斯三世在恢复秩序和信心方面是有用的，但他未制定过任何政策。这一任务是由政府主要经济顾问坎波马内斯和在1776年接替格里马尔迪任国务大臣的佛罗里达布兰卡完成的。经这个集团之手，王室的政策目标并没改变，只是做法改变，执行得较过去更谨慎些。

改革不仅要依靠立法，而且要依靠政府机构去执行。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地方豁免权在18世纪早期已被废除，使所有西班牙人臣服于一个共同政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逐步得到执行。卡洛

斯三世继续贯彻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方针，在他的统治下，议会——全王国唯一的议会——像以前波旁王朝一样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国王仍谋求通过更有效的统治加强其专制统治。政府的政务会议制度——哈布斯堡统治的典型做法，即把分管政治、行政、司法等职能的各委员会联合在一起的体制——已被早期波旁王朝的体制所修改，它吸取了法国君主政体的经验，开始试行个人负责的大臣制。后者热衷于由自己决定政策，便削弱政务会议的权力，使它逐渐只限于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到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政务会议体制的衰落已趋于停止，在他任命坎波马内斯和佛罗里达布兰卡为检察长、阿兰达为主席后，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乃重现生机。但其办事的缓慢成为进行有效治理的障碍，政务会议本身也热切希望只管司法工作。实际上，现在被称为大臣的王室秘书们，成了在卡洛斯三世领导下治理国家的主要动力。卡洛斯三世承袭的有五个部门——国务、陆军、财政、司法以及海军和西印度事务部。权力集中在一小批人手中，他们与国王不断保持联系，对政策给予过去所缺少的有力指导，这些大臣让政务会议去处理行政和司法方面的具体事务，他们则致力于筹划和推行政策，把中央的权力扩展到全西班牙，并在税收、国防、地方政府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此外，还经常而系统地利用委员会（Junta）^[7]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大臣们可在会上一同讨论政策。最初，这种做法只任命一些专门委员会以处理特定的事务，后来开始不定期地召开国务委员会（Junta de Estado），发现这是解决部门间的分歧，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的方法，佛罗里达布兰卡鼓励他的大臣同事们经常开会，1787年7月8日终于颁布法令，使内阁成为常设机构，这是西班牙政府长期以来所需要的一个集体负责和持续存在的机构。

大臣们又有自己的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s），1718年，西班牙开始设这个职位，但到1749年才显出成效，这可说是波旁王朝最具特色的行政改革。地方行政长官负责本省整个行政和经济发展，并负责征兵和军需供给。卡洛斯三世统治时，他们呈报的本地情况的报告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他们承担的这一任务也许是难以完成的，因为他们经常遇到同更熟悉本地情况、因循守旧的地方长官（corregidores）发生职权冲突的危险，这些地方长官在各省所属的小辖区内反映地方行政长官的活动。地方长官的

专横残暴在18世纪虽比17世纪有所收敛，但人选的素质仍然较差，1783年起开始了决定性改革，过去这些职务凭借恩宠授予，并可随意撤换，现在则进行改组，按重要性和收入分成三等，只要有才能即可担任，并制定了升迁制度。

在这种体制下，城市没有独立行动的余地，此外，由于城市的岁入很多，中央政府不能忽视，因此从1760年起，它通过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和它的代理人地方行政长官对城市的岁入密切加以监督。然而，卡洛斯三世在加强其官吏的权力的同时，还试图扩大地方政府的职权，并使之更具有代表性。大概是由于卡斯蒂利亚城镇曾发生动乱的缘故，1766年实行了坎波马内斯的一项改革，每年选出普通市民的代表参加市政会议，较大的城镇有四名代表，居民少于2000的市镇选两名代表。从理论上讲，这是那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因为这项改革给人民在城市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并许诺取消市政会议完全由世袭和终身委员垄断的制度。然而其实际结果大不一样。由于世袭委员们的敌视和人民的冷漠，新代表的力量太微弱，无法发挥影响，只能使他们希望自己也成为终身制，从而跻身于本地的寡头统治集团。尽管如此，这项改革还是表明政府希望在重振其权威中赢得西班牙社会的合作。

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农业因过去被忽视而受害，现在又处于危机之中。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通货膨胀，从1750年到1790年，物价上涨了35%。由于西班牙中、南部地区耕地不足，地租上涨甚至高于物价的上涨。对土地的需求增大的根源在于人口明显增加——在18世纪内人口从约600万增加到1000万以上，而由于有势力的牧羊主组织“牧主光荣会”享有传统的牧场特权，把大片可耕地改作草场，并由于西班牙的土地分配不公，贵族和教会占有永远属于他们或有永久管业权的大量广阔未开发的庄园，情况就更加恶化。在西班牙中部，实行的是短期租佃制，佃户有被收回耕地的危险，使农民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在南部，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大部分是贵族大庄园，由做零工的劳工耕种，形成了农业无产者，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所以对农民来说，公地对维持他们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牧主光荣会、大地主以及市镇本身占据着大量土地，要获得土地谈何容易。市镇由当地寡头统治集团和贵族联合在一起进行管理，他们宁愿让私人占有大部分市镇土地，只留很小一部分作为公用。最后更糟糕

的是，贵族还掌握着广泛的封建领主管辖权，他们可以提名法官和地方官吏，向成千上万的市镇和乡村征税。^[8]所以很清楚，需要采取一些根本性纠正措施来清除妨碍发展农业和促进农民大众福利的许多障碍。

卡洛斯三世政府曾设想制定一个较合理的政策作为其土地纲领的起步。1762年，坎波马内斯被任命为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的检察官，负起经济事务方面的广泛使命。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著作《论永久管业权》，书中认为只有使农民对所耕作的土地产生吸引力，才能国富民强，并鼓吹国家干预，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改善土地分配状况。他还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当局对土地状况作了广泛的调查，这些报告于1771年和1784年编辑出版。与此同时，开始了小规模改革。1763年，政府下令暂停收回短期租佃土地的做法。1766年4月，在巴达霍斯地方行政长官倡议下，将土地以固定的低租金分配给本地公民；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一做法，并下令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其他城镇实行，1767—1768年又推广到安达卢西亚和拉曼查地区，无地劳工和农民有优先分配权。1770年，西班牙各地都奉命将尚未耕种的市镇所有的土地加以圈定并进行分配。不过除了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外，该措施收效甚微，因为劳工没有资金，难以指望不毛之地会有收成，加之市镇当局不是无视该法令，便是把利益给予了当地的寡头政治集团。分配私有荒地的尝试也未获得成功。至于封建领主的管辖权，虽然坎波马内斯似乎有意将其废除，但国王对触动他们的权益和财产权犹疑不决，只满足于在任命官吏时扩大了政府的干预权。向莫雷纳山区荒芜地区移民似乎为此提供了较好的前景。1767年，坎波马内斯制定了一个在莫雷纳山区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王室领地的荒芜地区建立移民区的计划。由巴勃罗·德·奥拉维德监督该计划的实施，经过最初一段的踌躇后，德国和法国的天主教移民，接着是西班牙人都来此定居，促进了过去不毛之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过这类地区仅占西班牙的一小部分。

政府没有取消牧主光荣会，不过采取了某些措施削弱了它的权势。1786年取消了它可用固定租金永久使用过去一度用作牧场的任何土地的权利。1788年，允许土地所有者有权围圈其土地，种植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作物。但是实施这些措施时已是国王统治的末期，只不过是对已存在情况的认可而已。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比粮价要低；要养

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迫切需要耕种更多的土地；大地主们也急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而从中获利，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农业经营者，而不利于牧羊主。因为“这一次国王的目的和地主想支配更多农田的愿望正好一致了”。^[9]在1765年的谷物法中，同样可以看到双方利益的一致。该法令取消了粮食的最高限价，允许在西班牙境内自由贸易，除荒年外可以出口；这些法律再次给农业提供了刺激，一直到1790年被废除为止。但是，即使在这些农业兴旺、务农收益增加的年份里，实惠也并未落入农民手中。结果，尽管起步时很有希望，最后却表明，卡洛斯三世政府从来就无意进行根本的土地改革，政府的政策是以不危及保守势力的利益为限的。

在商业政策中，也可看到政府顺应占优势的经济力量的倾向，不过它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实际上，卡洛斯三世政府主要关心的不是农业，而是殖民地商业和国内的制造业。它的政策是，向殖民地贸易开放所有的重要港口，并保护西班牙制造业不受竞争的影响。1765年和1778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殖民地贸易向西班牙和美洲的大部分港口以及所有西班牙国民开放，^[10]从而使已经开始发展的工业和商业在国家的帮助下放手发展。或是经过加的斯，或是直接走私，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港以外的西班牙港口都在从事与美洲的贸易。特别是巴塞罗那，在获得合法特许权之前就深深地参与了殖民地贸易，它的出口基础是从173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复兴。

卡洛斯三世的政府和以往的波旁王室政府不同，它不是把国有制造业——尽管生产奢侈品的王家工厂得到了发展和改造——而是把改善私营企业经营的条件作为其工业政策的基础。令人鼓舞的是，王室敕令试图使体力劳动成为西班牙贵族所尊重的工作。此外还取消了行会对企业雇佣人员进行种种限制的习俗和做法。在西班牙制造业主的压力下，实施了一种旨在保护国内生产的关税政策，或对外国货物征税或禁止其进口，禁止棉花进口以保护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棉花生产，禁止五金进口以保护巴斯克地区的冶铁业。1778年，很多小的布料不准进口，1788年，所有的布料以及亚麻、羊毛和棉花产品都不准进口。尽管海关的效率低下，无力防止走私，但政策还是起到一定作用。试图改善工业经营条件的类似办法还可以在王室的国内财政政策中看到。卡斯蒂利亚的税比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纳瓦拉和巴斯克诸省都多且重，这是卡斯蒂利亚要比半岛其他地区的工业落后的部分原

因，因为税收影响了制造业主不愿创办工业。为了促进卡斯蒂利亚制造业的发展。国王似乎准备削减税收。1779年，取消了经营国内和销往美洲的羊毛产品批发交易的营业税，零售交易的税率也从14%降为2%。1785年，降低了所有物品的营业税。1786年，在西班牙国内销售国产麻布和亚麻布全部免税。与此同时，为缩短西班牙中部和周围地区的运输时间和减少运输费用，开始修建新的公路和运河，使卡斯蒂利亚能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外国进口货进行竞争。尽管这些措施并未使卡斯蒂利亚恢复贸易平衡，但还是改善了其处境。

然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发展更快。巴伦西亚早已在出口优质生丝，现在开始生产丝绸，虽然在国外仍难以与法国产品竞争，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与法国丝绸较量。巴斯克地区各省的铁匠铺和铁工厂生产的铁器，进一步受到1775年实施的禁止外国五金产品进口法令的激励。加泰罗尼亚开始更快地工业化。其中以新兴的棉织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它从其他商业企业吸收资本，成长时期又得到早期波旁王室的税收政策的帮助。卡洛斯三世最初曾中止实施该政策。1760年实行了对外国棉布课以重税的政策来代替禁止进口的法令，但由于引起巴塞罗那棉布制造商的不满，1768年重新实行了不准外国印花布进口的禁令，1771年又禁止一切棉布进口。随之而来的是棉织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工厂，并模仿外国的纺织方法和仿制外国纺织机。到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海外市场的交通被切断，这一发展才告中断。但在实现和平的1783年之后的10年中，棉织业的发展达到顶峰。加泰罗尼亚至少有80家工厂，2500架织机和8万名工人，在棉布生产方面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

出口贸易自由在工业产量提高的支持下，使西班牙在其市场供应方面能与外国对手一争高下。这还称不上是一场工业革命，在世界市场上，西班牙仍难以同法国和英国竞争，但在国内和其殖民地市场上，则能够向后者进行挑战，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它在这些市场上的占有额有了显著增加。像农业兴旺的情况一样，西班牙工人阶级也没有在新的繁荣中分享到好处。工资赶不上物价上涨，尽管它为制造商创造了大量利润并为工业投资创造了大量资本，但国家并未制定任何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人民大众处于贫困愚昧的状态，仅能企求教会的善举。卡洛斯三世政权的目标是谋求国家实力而并非人民福利。问题仍然是：西班牙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善它在海外的处境吗？

商业目标与帝国的国防力量密切相关。西班牙极力希望保卫它的殖民地免遭敌手攻击，同样希望保护其贸易不受外国的侵犯。^[11]它最强的竞争对手是英国，卡洛斯三世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极力保持殖民地的势力均衡。这就是他于1761年8月同法国缔结“家族盟约”，使两个波旁王朝国家结成攻守同盟的原因。该盟约使西班牙卷入了法国同英国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1762年1月，英国也向西班牙宣战，卡洛斯三世错误地低估了英国的战争潜力，在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投入了一场殖民冲突。英国的海军力量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力量，七年战争对西班牙及其盟友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根据巴黎和约（1763年2月），西班牙不但同意英国在洪都拉斯有伐木权，并放弃了纽芬兰渔业的一切权利，而且必须把它在战争中夺取的唯一土地萨克拉门托归还给葡萄牙，并把佛罗里达和西班牙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土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则把征服的哈瓦那和马尼拉归还给西班牙，西班牙还从法国获得路易斯安那——以及一条需防范其敌手的新边界。然而，如果说西班牙被打败了，但并未被彻底摧毁，结盟的波旁王朝国家仍在加强他们的联盟及其财力物力。对西班牙来说，这是唯一可得到的联盟，虽然在把英国赶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法国于1771年拒绝与西班牙合作，使“家族盟约”又一次发生动摇，可是，向英国算账的时机并未耽搁很久。

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解除了英国向南扩张伤害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危险，并给西班牙一个收复失地的机会。趁敌手无暇他顾之时，西班牙从加的斯派出远征军，于1777年占领了巴西沿海的圣卡塔利娜岛，夺取了位于拉普拉塔河河口的葡萄牙前哨基地萨克拉门托。然而，干预美国独立战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卡洛斯三世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很想使他的殖民竞争对手难堪，他从1776年起就私下帮助反叛者；另一方面，他又怕危及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这使他于1779年6月出面进行调解。反叛者的胜利，很可能给他的殖民地树立一个将使他后悔莫及的榜样。然而，想损害英国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卡洛斯三世乃效法法国，于1779年参加战争，试图以既不给英国殖民地提供很多直接援助，又不承认美国独立的做法来谋求西班牙的利益。在投入冲突之前，西班牙政府同法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1779年4月），确定了目标，并规定在和约中将把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12]美国独立仅仅一笔带过，而且只是作为争取西班牙国家利益的一

个机会。它重新征服了佛罗里达，占领了巴哈马群岛上的英国据点，并且把敌人从伯利兹的补给基地上赶走。在欧洲，在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入侵英国的尝试遭到失败后，西班牙就将注意力转向直布罗陀，用一支8000人的军队将其包围。围攻旷日持久，最后归于失败，因为西班牙未能实施海上封锁，没有力量防止向驻军提供的救援。另一方面，西班牙的一支远征军于1782年2月收复了梅诺卡岛。根据凡尔赛和约（1783年9月3日），西班牙重新获得了佛罗里达和梅诺卡岛，但将巴哈马群岛归还给英国，并在伯利兹给予英国人一定权利。

考虑到西班牙遭到的失败，它在战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战争却给其经济造成损害。它远未能给殖民和商业方面的主要敌手以沉重打击，而且也没有能维护它同殖民地的交通往来的海军力量。1778年的自由贸易条例迟迟未能实施，西班牙的出口贸易受到了打击。政府还失去了来自美洲的收益。美洲的财富依然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项，但能否收到则取决于西班牙同主要的海上强国英国是处于和平还是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意味着封锁，收不到美洲的进益，迫使西班牙政府采取别的财政应急办法，或征收新税，或发行纸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卡洛斯三世的其他部门表现不错，却没有好的财政机构，预算从未平衡过；他只好求助于外国贷款，往往条件很苛刻，举债越来越多。最后政府只得以发行纸币来应急。从1779年开始的同英国的战争，意味着美洲财富的中断。当增税仍不足以筹集到足够的战争经费时，便发行有利息的王室债券，也作为合法货币流通。为恢复王室信誉，出生于法国的财政家弗朗西斯科·卡瓦鲁斯奉命于1782年6月创办了第一家西班牙国家银行——圣卡洛斯银行，其目的是收兑债券。随着同英国媾和而来的是收到在美洲积累的财富，银行开始回收债券，其价值始告恢复并持续了10年。

和平也使西班牙的对外贸易再次获得发展，工业也对战后国内和殖民地的消费需求作出了响应。比较自由的贸易以及工业的兴旺开始产生效益，西班牙享受到其殖民帝国的某些果实，这在过去长期是被其北欧的商业竞争对手所独享的。卡洛斯三世的政府创造了促进地主、商人和工厂主的利益的条件，他们的利益也被看作是国家的利益。当卡洛斯三世于1788年去世时，可以盖棺定论，他已使他的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之路，生活在西班牙境内的一些阶级的处境比30年以前要好。

所以，给卡洛斯四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并非没有希望，如果他能继续他父亲的政策和政府的话。但有两件事使这成为不可能，这就是新国王的为人和法国事态发展的影响。君主专制政体的成败除其他因素外决定于君主的品质。卡洛斯四世未受过良好教育，智力低下，又缺少他父亲的那种意志力，显出他处理国事的无能，实际上他也不花什么时间去过问国事。戈雅曾经描写过他的那种软弱和愚蠢的慈善，这也是他的政治态度的一个特点。戈多伊回忆国王每晚都要问他，“今天我的臣民们在做什么？”^[13]他并不是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决断，有人认为他的妻子应对他的所有作为负责的看法是不对的。不过，卡洛斯四世之所以失去人民的尊敬和信任，那位刚愎自用、寡廉鲜耻的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的政治影响起了不小的作用。她生性淫荡，甚至在她于1786年前后发现那年轻的卫士曼努埃尔·戈多伊并令人吃惊地擢升他之前就已经出了名。

事实上，卡洛斯四世即位之初，还是继承了过去政策并任用原来的大臣。他让佛罗里达布兰卡继续当首席国务大臣，政府仍具有自由倾向，如曾试图防止继承财产的过度集中，并采取了促进商业和海运等措施。但是这些计划未见成效，而且不管怎样，政府的沾沾自喜很快就由于西班牙境外发生的事件一扫而光。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吓坏了佛罗里达布兰卡，并从此左右了他的全部政策。不过如果认为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他过去的主张的倒退，那也是不对的。作为西班牙王家大臣，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是合乎常理的。不管佛罗里达布兰卡曾经多么相信进步和启蒙思想，他仍然效忠于他的专制君主。他的政治观点中是不容许不服从合法权威的。在他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费尔南·努涅斯的一封信中，他表明了对法国所发生事件的忧虑：“据说本世纪的启蒙运动教育人们懂得了他们的权利，但它也使人们失去了真正的幸福并不知道满足，而且失去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我们西班牙不需要这么多的启蒙思想，也不要它带来的后果——在行动、语言和著作中都目无合法权力。”^[14]他认为西班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被传染。他迅速采取措施，不让西班牙人知道法国的事态发展。他试图通过严格的新闻检查封锁来自法国的消息。1789年9月，他下令所有港口和边境加强戒备，阻止法国报刊入境。12月，他授权邮局检查并没收可疑的包裹。1790年1月1日，颁布了禁止涉及法国大革命的一切材料入境的法令。当革命文献

在1791年继续流入西班牙时，他动员了宗教法庭为其效力，甚至沿法国边境驻扎了隔离部队。1791年2月24日，又颁布王室敕令，西班牙的一切私人期刊均停止出版，只允许经过重重新闻检查的官方报刊继续发行。出于这种对宣传的害怕，政府对西班牙境内的政治议论也进行压制，鼓励宗教法庭更严厉地去对付启蒙运动的鼓吹者。从政府人员的变动也可看到这种反应。1790年，卡瓦鲁斯被宗教法庭告发并囚禁，霍韦利亚诺斯被放逐到阿斯图里亚斯。1791年，坎波马内斯本人也被解除了其卡斯蒂利亚政务会议主席之职。

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使西班牙政权免于被颠覆。然而这种恐怖只是人们的设想。在西班牙固然存在着许多不满，但这种不满是经济性质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如1789年2月巴塞罗那的面包骚动，1790年年末至1791年年初那个冬季加利西亚的纳税骚动。虽然在政府和知识界中存在少数百科全书派，有人甚至对法国1791年的宪法倍加赞扬，但这些并不代表西班牙人民大众的意见，他们对法国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关心就更谈不上了。1792年2月28日，佛罗里达布兰卡本人也被解除职务。他下台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是因为贵族们对他的权力和低微出身的不满，还是因为他曾敦促卡洛斯四世放逐被人怀疑是王后情夫的戈多伊而引起王后的不满所致？更可能的是由于这位大臣对法国实行毫不妥协的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拒绝承认路易十六向法国宪法宣誓的有效性，认为这会危及法国王室，卡洛斯四世只好牺牲他的大臣来维持他同法国王室的关系。阿兰达接替佛罗里达布兰卡任首席大臣，他着手改变前任的政策。国务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纯属咨询性质的国务会议，那是一个早就奄奄一息，现在又毫不中用的机构。阿兰达还缓和了西班牙官方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放宽了政府曾试图用来保护自己的严厉的新闻出版法律。

然而，时隔不久就断定实行温和政策为时过早。1792年8月，路易十六被废黜，法国国王一家人被囚禁，加上新共和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及其革命的扩张政策，使得西班牙再次举国紧密团结在一起。1792年11月15日，阿兰达被解除职务，由曼努埃尔·戈多伊接替，一般认为，他是因得到王后的宠幸才飞黄腾达的，并从王室卫士一跃而为最高贵族，25岁便当上了首席大臣。随着戈多伊的上任，西班牙政府又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后期那种典型的遇事临时应付的作风。戈多伊是个典型的宠臣，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并不是由于他的条件，他既无经

验又无才能，而是由于他个人同王室的关系。人们预料他会法国采取坚定的政策，但是他企图既挽救路易十六的性命，又不使西班牙卷入对法战争的尝试失败了。法国国民公会对西班牙的干预表示愤慨并轻蔑地加以拒绝。而戈多伊也拒绝了法国的要求——除法国保留在巴约讷附近的驻军外，双方共同裁军——于是，1793年3月7日法国向西班牙宣战。面对战争已无法避免的事实，戈多伊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支持。但是重要的因素不在于西班牙需要什么，而在于法国需要什么，而法国要的是战争，是把另一个波旁家族从王位上赶走并把革命带给西班牙人民的战争。

然而西班牙人民并不需要革命，1793—1795年的战争出现了西班牙历史上最自发的人民参与。牧师在布道时为它祈祷。捐赠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志愿参军的人非常踊跃，以致无须征兵。西班牙人民再次表现出他们对宗教和君主的传统热情，他们以战斗的激情拒绝了革命及其一切影响，以致一位革命代理人于1793年年初写道：

“西班牙人的宗教狂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人民认为这场战争是宗教战争。”^[15]使革命派惊骇的是，4月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鲁西永，这固然只是一次时机并未成熟的胜利，但在1793年余下的时间里，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的军队不得不忙于击退西班牙的入侵。

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政权虽然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开明专制主义，但这个词用于葡萄牙的政权就不合适了。诚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试图通过国家的行动来改造社会。但在葡萄牙，这种尝试并非源于启蒙运动思潮，且国家力量更弱，社会也比西班牙更难变革。葡萄牙的君主们——若泽一世（1750—1777年）和玛丽亚一世（1777—1816年）——很少过问国事。没有行政管理的传统，没有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的任何机构，也没有任何能够纠正这些弊病的办法。立法虽然不少，但绝大多数是在王室大臣庞巴尔侯爵的授意下制定的，可是大多数不起作用。庞巴尔本人不是启蒙运动的人物。他的政策和治国方法逐渐堕落成为恐怖主义和残酷无情，是对当时的改革思潮的一种荒唐的曲解，受到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蔑视。庞巴尔的杰出特点是能够有效地应付紧急情况，例如他对1755年地震和随后对里斯本重建的处置就是这样。这使他的统治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而名垂后世。^[16]

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基本上以来自巴西的黄金为基础，它使政府有独自の货币供应，但这个政权并非没有政治和教会方面的反对者，庞巴尔最初的任务之一就是除掉一切可能的反对中心。庞巴尔出身于下层贵族，他虽原则上不反对贵族，但他所关心的是把上层贵族排除在权力之外。1758年，若泽一世遇刺，庞巴尔暗示这是豪族阿韦罗和他的其他敌人塔沃拉家族所为，并以企图弑君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像西班牙那样，在18世纪下半叶，国家加强了对教会的控制，对耶稣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他把耶稣会士逐出宫廷，禁止他们经营商业后，又暗示他们参与了1758年的弑君阴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于1759年把他们逐出葡萄牙。在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和西班牙后，庞巴尔还支持波旁王朝各宫廷要求教皇解散该组织。庞巴尔对耶稣会的攻击仅是他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执行的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限制给宗教的遗赠，试图将教育非宗教化，并把除了关于宗教事务以外的主教裁决权均置于国王管辖之下。他的宗教改革无自由主义可言。他关注的不是废除宗教法庭，而是使它更可靠地为国家效力，这一点从他要求宗教法庭的所有判决都需取得王室的同意后才能执行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庞巴尔还于1769年取消了新旧基督教的区别，试图以此来限制宗教法庭活动中的反犹太主义偏见。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试图把庞巴尔的经济立法说成是经过认真思考而产生的，但显然他自己没有一贯的计划，只是应付日常事务。他认为由于英国在葡萄牙的国内和殖民地贸易中占据优势，使葡萄牙受到损害，所以他试图保护葡萄牙不受英国商业特权之害来复兴葡萄牙的经济。他的错误在于把英国的优越地位归因于条约规定的特权而不是由于其雄厚的资本和货物的质量。他认为，通过立法手段和设立商业机构就能改变这种局面。同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也存在贸易支付逆差的问题。它的进口——特别是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超过出口——大部分是葡萄酒——因此逆差需要用从巴西弄来的黄金支付。庞巴尔禁止出口黄金，并对贸易加以限制，只有在某些地区建立垄断性大公司，如1756年建立的上杜罗葡萄酒总公司的特权集团才能从中获利。同年，他还设立了商务委员会（Junta do Comercio），控制一切有关商业的事务，这个新机构开始限制英国货物的进口。然而，由于缺乏资本和强大的中产阶级，立法收效甚微。他的工业政策试图在毛纺、麻织、玻璃制造、造纸等工业中把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王家工厂与私营

工厂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但这并非什么根本性措施，而是纸上谈兵，因此一事无成。庞巴尔并非在发动一场工业革命。[\[17\]](#)

在教育方面也有许多停留在纸上的计划，如1759年设立公立学校，可是学校却没有教员。1761年，庞巴尔建立了一所贵族学院，为100名贵族出身的子弟安排了详尽的课程，但课程太多而无法实行。1768年建立了王室新闻检查局，负责审核批准在葡萄牙出版的一切书刊报纸；1771年，又授以指导小学教育的职责。1772年，庞巴尔亲自全面修订了科英布拉大学的课程，使之现代化。但是他并不是百科全书派，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依然被禁止。另一方面，他则在1773年废除了葡萄牙境内的奴隶父母所生的孩子仍是奴隶的制度。

1777年2月，若泽一世去世，其长女玛丽亚一世继位，像她父亲那样，她对政务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庞巴尔曾试图不让玛丽亚继承王位，因而失去了新君的信任，便于1777年3月提出辞职。辞呈被接受，78岁时他退隐到他封爵的小城。后来他被加上了侵吞公款、专制独裁等种种罪名，被判有罪但获赦免。他死于1782年。新君即位伊始，就耸人听闻地把庞巴尔恐怖统治下数百名受害者从监狱和女修道院中释放出来。女王还改变了庞巴尔对待塔沃拉家族和其他对上届王朝不满的贵族的政策；1777—1780年陆续宣告他们并未犯弑君之罪，予以释放，并恢复名誉。在女王的丈夫同时也是她的叔父佩德罗三世的影响下，她为被驱逐出境的耶稣会士发放了养老金，允许他们个人回国。然而，由于玛丽亚一世精神失常，1792年终止执政，由她的儿子巴西亲王以她的名义进行统治，1799年，他被授予摄政王称号。

两位著名的贵族——安热雅和塞维拉，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也说明了贵族的复出。政府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但没等到这些问题解决，国外的事态发展就使他们黯然失色了。法国大革命使葡萄牙政府产生了和欧洲其他专制政权相类似的恐怖心理。在法国试图要葡萄牙保持中立未能得逞后，葡萄牙于1793年7月与西班牙签订了反对法国的临时互助条约，9月它又与英国缔结了互助和保护商业的条约。有了这些保证，葡萄牙便派出一支部队在加泰罗尼亚战线支援西班牙。

二 意大利各国

从表面上看，意大利半岛是一个被海洋和山脉所围绕的统一体。细看地图才知道，它是由许多地区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整体；其构造受亚平宁山脉左右，南方同北方差别很大。18世纪时，各地情况也多种多样。意大利各地区的社会彼此几乎互相隔绝，并因气候和地形的差异而迥然不同。富饶的波河流域同半沙漠的阿普利亚地区的卡皮坦纳塔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教皇管区^[18]富裕，而亚平宁山脉以西的教皇领地却甚为贫困。波坦察距萨莱诺60英里，却是意大利最寒冷的地方之一。意大利人的生活，同他们的地方景色和气候一样，也是千差万别；当阿瑟·扬^[19]发现洛迪周围的农庄富得流油的同时，生活在奥特朗托附近的人们仍穴居洞处。连语言也助长着半岛的分裂状态，有二十余种方言，一个人即使说的是意大利语——托斯卡纳地区的语言——也不一定能保证农村中的居民都听得懂。18世纪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缩小这些差异。只有那不勒斯王国有一条从该国通往罗马的良好道路。而在一些地区，各市镇之间很少有联系，它们往往代表了另外的，即历史和政治上的隔离，使半岛更加支离破碎。这里的大城市虽比其他国家要多，但是没有一个都市能成为全意大利文化生活的中心。大城市顶多是一些省会，至于意大利的大多数小市镇，则仍然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种环境中，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是意大利人，但是绝大部分人只知道他们是波洛尼亚人、威尼斯人，或者，如果他们的群体意识超越了他们的城墙的话，也只称自己是皮埃蒙特人或卡拉布里亚人。他们知道（就许多不同的意义而言）他们是某些统治者的臣民；形成意大利地方主义的政治框架从1748年即已确立。境内有两个王国（撒丁王国和两西西里王国），托斯卡纳大公国，帕尔马和摩德纳两个比较小的公国，以及皮翁比诺小公国。有三个已停滞不前的共和国，即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圣马里诺太小，其规模称不上是一个共和国，不过它比其姐妹共和国的寿命都长）。奥地利统治着伦巴第平原上以前的米兰公国和曼图亚公国。最后还有教皇国。

这样罗列看不出结构上的重要差别，诚然，在这些国家中，有大多数其统治原则日益明确，大多数都受到“开明专制主义”统治方法的影响。但它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首先，尽管政府和法制均趋于合理，但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帝国的统一体。教皇管区这个地名本身就突出说明它与圣彼得教堂的财产是有区别的，而托斯卡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官方联系只不过是它们共同效忠于大公本人而已。威尼斯各省的行政体制虽然具有相当的一贯性，但以忠于共和国著称的特雷维索政府和强烈要求独立的弗留利贵族政府两者之间也有很大不同。封建豁免权、特权、法律的多样化以及事实上的孤立状态，使那些试图在这些国家探求奥斯丁的主权学说^[20]的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上述这些情况也不断使意大利人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地方主义色彩。它们也表明了各国在权力和生存力方面的变化。举例来说，虽然三个共和国都牢牢地由寡头政治集团所统治，但它们面临的却是不同的问题。威尼斯无法使它的政治结构适应其商业的没落；政治家们几乎都认为它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热那亚人虽然仍掌握着作为大的货物集散地的一些资源，但是在科西嘉却遇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此外，由于共和国在1746年曾投降过奥地利，独裁寡头们受到人们的怀疑。只有在卢卡看来是稳定的。大的君主政权比共和国更有力量，能参与欧洲的争夺。但撒丁王国形式上虽是封建的，却有高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比两西西里王国的力量要强得多。后者的资源配置受到各种特权和岛国的独特地位的妨碍。托斯卡纳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彼得罗·莱奥波尔多提供了一个“开明”政府的模式，只有奥地利统治的伦巴第地区可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教皇国实在是行政管理混乱的别称，在启蒙运动时期还由一名牧师来统治，其害处实难以估计。荣誉称号可以成倍地授予，但这样做毫无意义。只要重复下面这点就够了，即决定18世纪意大利人生活的首要因素同以往一样，仍是政治、社会 and 地形上的差异。所以，要看出总的历史趋势并非易事。在大多数情况下，1763年，意大利人生活在狭小的社会中，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地方意识的强烈影响。在这种差异中寻找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萌芽是毫无意义的。

寻找自由的萌芽也同样毫无意义。意大利人的公民或政治自由没有什么保障。在存在等级会议或议会的地区——例如在西西西里或撒丁——它们的作用不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就是只为了保护小集团的特权。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立法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手

中。现行的体制和阶级结构都不可能使真正的代议机构得到发展。意大利人享有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由于国家体制缺乏凝聚力而造成的与中央集权的无缘。社团的和地方的特权发育不健全以及城市的和社团的寡头们的权力缺乏凝聚力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作为。除此之外，意大利人的自由毫无保障，虽然有时相当广泛，但取决于他们的统治者是怀有善意还是表示冷漠。在1763年时，意大利就政治而讲还是一个旧式“自由”的群体，现代国家尚有待形成。

约近半个世纪的和平（1748—1796年），使各国有可能在国内进行各种经济和行政改革的试验，也使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政治制度得以存在下去。和平基本上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在“外交革命”^[21]上的相互对抗告终才得以保持的。当在意大利制造麻烦的两大保护国——法国和奥地利——停止了争夺意大利卫星国的斗争后，向外扩张的撒丁王国失去了充当盟友待价而沽的机会。意大利没有一个统治者强大到足以动摇1748年意大利获得的和平局面，在1796年以前，除了热那亚于1768年把科西嘉转让给法国外，意大利也未发生过重大的领土变更。这种稳定局面没有因统治王朝的更迭而受到干扰。尽管在不久前波旁王朝才扩展到那不勒斯和帕尔马，哈布斯堡王朝扩展到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但他们很快都适应了新的环境并牢牢地定居下来。虽然由于玛丽亚·卡罗莱娜（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女儿）在1768年嫁给了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和由于埃斯特家族绝嗣而把摩德纳遗赠给哈布斯堡王室，使势力范围发生了轻微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无足轻重。法国在帕尔马的文化影响以及英国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商业和外交影响都未能打乱半岛的稳定。因此，它的一成未变的政治结构不成其为历史，这一时期的重要性需从别的方面来加以探讨。

意大利与欧洲其他部分都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这就是人口在18世纪增长很快。准确数字虽难以确定，不过意大利的人口似乎由18世纪初的1100万又增加了700万左右。由于意大利的经济落后，人口增加对资源需求的压力一定很大。尽管农业是其无法估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意大利的经济依然受原有体制的支配，城市是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在意大利工业趋于衰落、世界贸易从意大利港口转向他处之后的长时期内，城邦国家的“城邦经济”继续左右着其经济思想和立法。意大利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来还没有像18世纪时那么低过，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它的工业也无足轻重。工业主要分布在波

河以北，几乎不可能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生计，布雷西亚仍然生产武器，皮埃蒙特出产的丝绸，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出产的羊毛制品对它们各自的地区仍有重要意义。在一些纺织企业中，可以看到现代工厂组织的萌芽，这些企业雇佣了成百的工人，其中有一两个企业甚至雇佣了上千的工人。不过与以前几个世纪兴旺发达的出口业相比，这些核心似乎并不重要。对雇佣劳工的业主来说，港口当然是重要的（其中热那亚、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四个港口，到1800年均已有10万以上的居民，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中，只有罗马和米兰两地有这么多的居民）。然而，只有里窝那似乎还保持着昔日的繁荣。意大利以出口农产品闻名，表明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业也因地区不同而各异，主要的农产品有粮食、食油、大米、酒、丝、大麻和亚麻，它们的重要性也因地制宜，北部的农民主要把养蚕作为副业，对他们颇为重要，在18世纪，向法国出口的生丝显著增加。外国人总把意大利看作是得天独厚的产粮国家，就整个半岛而言，粮食可以或接近自给自足。可是人口在增长，饥荒频仍，主要的产粮区还有伦巴第、卢卡、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这些地方希望出口剩余粮食，而热那亚、巴勒莫、摩德纳则总要进口粮食，教皇国只有在其全部领地同年均获丰收时才不需输入粮食，而这种情况是很少遇到的。意大利北方需从中欧进口牲畜；在半岛其他地区，除南方的牧羊业外，畜牧业更为少见。地区情况的多样化也有好处；据说在那不勒斯，山脉两侧的庄稼从未在同一年份歉收过。总之，看来意大利农业的成功之处似乎在于它能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

尽管如此，这幅总体情况的图景是虚假的。该时期的大量有关农业的著作都注意到农业的落后状态。生产虽未停顿，但在一个被外国人羡慕的国家中，产量之低令人沮丧。有时可以归咎于自然的原因。例如，1763年，西西里的庄稼遭到病害，日子难过，在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死了许多人；1764年，那不勒斯也发生了同样的情景。这使整个意大利的粮食供应都陷于混乱，但这次造成的灾难还不及1766年那次严重。当时几乎意大利的所有地区都遭了灾，约2/3的庄稼被毁。尽管由于农民本来吃得就差，缺粮并未使他们惊慌失措，但这却意味着数千人的死亡。坏年成虽然也许是特殊情况，但缺粮则频频发生。一位杰出的托斯卡纳农学家曾经讲过，他估计托斯卡纳大公国每三年就有一年缺粮。除了病虫害外，霜冻、水旱灾害和地震也造成了损失。即

便是繁荣的伦巴第农业地区，皇家税收官也只好减免土地税来弥补自然灾害的损失。不同的土地和气候环境，意味着自然灾害的打击也轻重不同。收获季节漫长——从5月起直到7月中旬——表明意大利农业的多样性，在米兰的一些地区，一年可以收割五次牧草，而在其他地区，需用树叶来弥补牧畜饲料的不足，有时甚至全用树叶当饲料。西西里的农业耕作技术虽然更为落后，但因土质较好，生产的玉米比大陆上那不勒斯的好。有些地区受沼泽之害；庞坦等地的沼泽有4万英亩，几乎与波河下游、雷诺河下游和科马基奥湖周围的沼泽一样糟糕。不仅土地荒芜，这些地方还是疟疾的渊藪。有些地区常遭水灾，不但意味着一年收成无望，而且使土地长期遭到破坏。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在费拉拉附近地区，水旱灾害有时接踵而来，要水的时候不下雨，在短暂的雨季中又大雨倾盆。这些问题每年无法解决，后果之一便是山坡的植被都被冲光，森林被毁，成为被冲蚀的不毛之地。

这些天灾降临不均，又无法预测，技术的进步并不总能抵消其害。那时已经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22\]](#)托斯卡纳有些地主，早在政府着手以前，就试验用排涝和轮作等耕种技术。在有些地方，精耕细作已形成制度。皮埃蒙特因精耕细作，在贫瘠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波河流域相当有组织的水利设施是其农业丰收的基本原因。然而总的情景仍是，这片蕴藏着潜在财富的土地的开发技术落后。伦巴第的水利灌溉系统算得上是好的，但古罗马的灌溉系统几乎都已损毁。轮作技术普遍不佳。好的牲畜很少。甚至对明显的资源的简单利用往往也被忽视。只是在这些年才开始利用泥炭作燃料。造成这一落后的原因必然是复杂的，尚需进行详细的探讨，除了单纯的守旧和迷信之外，还应当考虑改进计划对资本有无吸引力的问题。但是还必须估计到意大利经济的基本缺陷，由城邦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即四分五裂的局面。事实上，不能把意大利农业看作是单纯生产粮食的产业。

四分五裂的后果是市场狭小，价格人为确定，这些使得生产很少超过自给的水平。另一后果是交通条件差；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地区，即伦巴第平原水运便利，最为繁荣，各地区划界而治，以致无法采取区域性的行动来解决区域性的问题。雷诺河对费拉拉和波洛尼亚两个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彼此却为它而激烈争吵不已。币制混乱，各有各的度量衡制度，把想跨越政治疆界做生意的商人弄得精疲

力竭。公民特权和自私自利也妨碍了贸易的自由往来；热那亚不准将玉米在斯佩齐亚运上岸，维罗纳禁止从维琴蒂诺河进口葡萄酒，伊斯特里亚必须经过威尼斯港进口所有的外国货。在所有地方，农业经济的自然利益为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僵化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作出了牺牲。对贸易最严重的障碍是通行税和关税壁垒，在这个时期，它们只是逐步地被部分取消。其影响程度各异，皮埃蒙特较轻，热那亚则较重。在那不勒斯有数百种税，税率变化无常。威尼斯的伦巴第各省的衰落看来至少部分是由于其税收政策造成的。对粮食作了专门的限制。很多政府仅仅从社会秩序和财政收入的角度而不是从繁荣商业的角度来考虑粮食贸易。普遍规定限制出口，大多数国家都设官吏从事采购足够的粮食。然而，尽管生产粮食的农民被迫向国家粮库缴纳粮食，对磨面粉和烘烤面包也有详细规定，但政府仍难确保粮食供应。1764年那不勒斯粮荒时，实行了强制收购的做法，反而使得本来可以得到的少许粮食也被掩藏起来。罗马还出售粮食出口许可证和面包烤制权利，导致了政府的腐败和面包价格昂贵，人们只得通过各种躲避或违规的做法来减轻这些条例的管制。例如，关税壁垒促使走私成为一种几乎独立的行业。尽管行政管理的漏洞很多，但对一个差不多是毫无生机的经济来说，这些过于苛刻的条例仍然是沉重的负担。

尽管各地区存在差异，这种经济仍然支撑着整个意大利差不多相似的人口结构。其顶部是少数统治集团的骨干。对这部分人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描述，不过其总的特点通常是这些人出身贵族，其权力主要基于土地财产，再加上他们都在教会或国家中担任要职。贵族门第的差别很大：他们可能是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城市的贵族，或是刚刚封爵的新贵。1763年时，他们有时还掌握着一些社团组织以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某些贵族和传统精英集团成员并不行使政治权力，有些则是真正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地位和表现因地而异，在那不勒斯的某些地区和弗留利，贵族差不多享有中世纪的独立地位，据说那不勒斯每五个人中，有四个人生活在封建管辖权之下，很多人需服劳役，而在伦巴第，封建主义实际上已经消亡。在威尼斯，许多贵族已将他们在意大利境内的庄园出租给他人，享受着不在地主们通常享有的特权。而在伦巴第，贵族则生活在他们的佃户和雇工之中。彼此关系往往还算密切。在皮埃蒙特，大庄园只是个别存在；而在那不勒斯内地，则到处都是。

应当注意的是，这个精英集团有一个总的特点。他们不愿别人分享其权力。实际上也无人能与他们角逐，不存在一个渴望分享权力的中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低水平，妨碍着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已出现的一些富有的资产阶级都成了土地占有者。尽管在那不勒斯律师的职位相当重要，但是专业人员和行政官员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危险性通常是很小的（他们作为君主的臣仆所具有的危险性是另一个问题）。其结果是，只要存在着政治生活，它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角逐，或者是贵族对不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政府行为的反对。教会是觊觎其权力的唯一可能的势力，然而贵族已在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这个阶级之外是人数相对较少的城市居民和大量的农民，在城镇中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从事各种职业的半无产者。比较多的人在大工厂中做工，那些具有专门工业技能的人大多当了师傅或工匠，他们或是为自己或是为给他们供应原料的大企业主工作。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或当贵族的奴仆，或做依附于他们的平民。此外还有乞丐，因为行会的种种限制，使就业的机会大为减少。不过意大利人口的基础是农民。不同的租佃制度如司法制度，意味着各地农民的差别也很大。庞坦沼泽地区的居民生活悲惨，而阿尔卑斯山麓的农民则比较富裕。西西里的农民大多数住在城镇，伦巴第的农民则住在乡村。有些人出于实际的目的完全依附于他们的封建主，另一些则成为流动的劳工。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普遍实行分成租佃制（*mezzadria*）；这一制度促使地主经常密切关注并鼓励其佃户的耕作。有些农民仍是正式的农奴，这些人大多数都一贫如洗，而且似乎越来越穷。18世纪，没有土地的劳工（*braccianti*）的数目在增加。在农村，暴力行为、农民骚动和匪徒抢劫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过轻重程度各地区不同而已。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日常食物只是玉米或小米，加上一点食油、豆类和盐（意大利种植土豆进展缓慢）。除了少数运气好的地区外，农村普遍贫困，即使偶尔有普通农民发迹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仍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农民也无别的地方可去，城镇也只可能提供他们行乞的机会而已。

所以在这个时期，决定意大利社会的第二个重大事实是渗透于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之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停滞状态。这种停滞状态当然要引起人们的探究，经济学界人士要求改变这种状态，这构成意大利

启蒙运动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对这个思想运动所作的贡献，是意大利这一时期的历史上最为生气勃勃的力量，当然经济学并不是意大利思想家们唯一感兴趣的方面。

在意大利学术史上，18世纪是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而其最令人感兴趣的自然是这一时期的各种思想。本章仅限于论述这些思想在改变意大利社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而这又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首先，意大利的环境特别有利，长时期的和平使意大利容易接触外国的书籍和外国旅游者；意大利人自己也去国外旅行。外国王室来访时还带来大批人员，特别是帕尔马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法国艺术家和学者。此外，广泛的宽容态度也有利于先进思想的传播。在某些国家，新闻还受检查，宗教法庭仍在行使其处于没落中的权力，但思想迫害的情况已不多见。具有社会权威的拘泥于形式的天主教教义已因受到怀疑而削弱。半岛各地的割据状态造成的有利结果，是各地政府很少进行合作来限制各种思想的传播。文化界的精英或许是除教会外唯一具有超越地方主义的社会意识的集团。虽然法国的来访者可能会感到意大利的沙龙还带有某些地方色彩，但重要的是确实存在着真正的文化界的精英。它的弱点是爱赶时髦（而且可能会轻信卡廖斯特罗^[23]之类人物的骗术）；另外，虽然意大利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杂志《咖啡馆》（*Il Caffè*）只存在了两年，然而，不管它多么不成熟，却拥有一批读者，就这些人所思考的问题来讲，他们相当于意大利的启蒙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事业来讲，有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整体而言，意大利的教育有充足的基金资助，很多最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在大学任教，而且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大学充满活力。除大学外，各种图书馆和研究院也有助于思想的传播。然而，对启蒙运动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还是由于政府愿意任用有思想的人士。政府行政部门有很多职位可供选择。有些人作为某位统治者服务后，又为另一位统治者效力；蓬佩奥·内里^[24]在托斯卡纳开始其行政官员的生涯，后协助玛丽亚·特蕾西亚改革伦巴第地方政府，最后又回到托斯卡纳为玛丽亚的儿子效力。

所以具有启蒙运动思想的人是在有利的气氛下工作的。他们人数众多，难以把他们归入一个集团。他们得益于他们的前辈，特别是穆拉托里^[25]的文学和历史著作，但是他们自身的成就则通常是在自然科学或行政学和法理学等方面。在科学方面，伽伐尼^[26]、伏打^[27]和

斯帕兰扎尼^[28]的成就在整个欧洲都是杰出的，这里无须赘言；尽管他们的成就具有伟大的科学意义，但对当时意大利人生活的直接影响却很小。但是在法理学、罪犯教育学、经济学和史学方面，帕尔米耶里^[29]、菲兰杰里^[30]、彼得罗·韦里^[31]、贝卡里亚^[32]等人（仅举少数人）的成就则在当时就起了作用。除了贝卡里亚的著作《犯罪与刑罚》（1764年）外，这些人主要是对意大利而非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有一句可以说是永垂史册的话：“数目越大则幸运越多。”（*maggior felicità divisa nel maggior numero*）但意大利的启蒙运动首先是意大利的，它的作家的眼光集中于意大利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特点是具有一种直接与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关意识。它以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为根据，目标往往是谋求“社会福利”，为达目的而不拘泥于手段。体制的好坏以效果来判断：如韦里和加利亚尼^[33]将贝卡里亚的以结果判断是否犯罪的原则应用于别的领域。这使他们愿意通过现有的政府进行工作并在政府谋求职业。在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达到高潮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担心这种做法的潜在危险。与此同时，为实现他们的纲领，他们效力于王室。虽然纲领这个词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改革派的确切目标在各国有所不同。不过这些目标都是以共同的设想为基础的。改革派所谋求的社会福利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改善。而且他们认为通过消除对财产的自由利用和劳动的自由雇佣的各种限制，就可以实现这种改善。自由贸易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卡利^[34]和加利亚尼都坚持认为，环境会改变实际状况。不过大多数改革派则认为自由放任的主张是可取的。这同他们同时要求加强他们的国家的权力的主张并不矛盾。他们相信他们要政府贯彻执行的政策一定会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到处设法集中国家的权力并改进国家机器。妨碍君主行使统治权的各种障碍应当予以清除。

实际上，也许除托斯卡纳外，没有任何国家能确实符合改革派所信奉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其他各地改革的步伐和成效差异很大。奥地利人在伦巴第实现了政府权力的集中，而塔努奇^[35]在那不勒斯根除滥用封建特权现象的努力却遭到了失败，两者形成了对比。另外，改革并不完全都是“开明”影响的结果；差不多每个地区，改革都是由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而实行的。有时，像撒丁或威尼斯等十分保守的国家也出现了改革。实际上这在1763年以前就为人们所知。统治者也并不总是同他们的主张改革的顾问们意见一致，如约瑟夫二世在伦巴

第的改革所引起的反应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这些年代中的成就，大都是由于受了启蒙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启蒙运动是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巨大推动力量。

在各个国家中，以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在加强中央政府方面走得最远。在这两个国家地方政府都成立了新的代议机构，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并且可以收回。利奥波德希望他的人民实行自治，然而他是唯一能这样做的君主；其他地方的政府都在竭力削弱地方自治权使之无法取得新的立足点。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司法制度的中央集权制，那不勒斯政府撤销了许多享有特权的法庭。在伦巴第，对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打击与财政改革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地方，财政改革的障碍，与其说是贵族的特权，毋宁说是城市的特权。有的时候，经济政策同样使政府左右为难。例如，征收通行费的权利同取消对贸易的限制二者就是互不相容的。

在经济事务方面，各国政府都需要改革自己的关税制度。托斯卡纳在这方面带了头。1766年，粮食的境内限制完全取消。接着于1775年允许粮食出口，关闭了国家粮食供应局，最后在1781年撤除了境内的一切关税壁垒。其他国家也起而仿效——伦巴第在1785年，那不勒斯在1791年，甚至连教皇国也部分废除了对粮食的限制。改革的另一对象是妨碍贸易的众多的社团和行会；托斯卡纳于1770年取消了这些组织，西西里和伦巴第随之仿效，这是把经济从城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又一方面。对教会永久管业权、长子继承权、限嗣继承权等法律体制也进行了改革，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对后两者的改革有待于由革命政府去进行。各国政府通过修建排灌设施、改进耕作制度等积极措施来促进经济的改善，再加上各种改善计划的实行，尽管成效有所差别，但总的成就是显著的。它无疑加快了向区域经济的过渡。

毫不奇怪，改革派对教育也极为关注。在这些年中，出现了有能力担任政府骨干的行政官员，这件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健全的。他们之中有的曾在比萨或帕多瓦任教或就学。1771—1773年，帕维亚大学进行了专门的改革，后来成为改革的理论研究中心，因此它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教育工作最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有些统治者对改善道德的关注。虽然其中也有很多体现出陈腐的东西——例如，利奥波德对赌博采取了死板的态度，约瑟夫则把女修道院中修女穿紧身胸衣看成是危险的事——但是，如果不把对改善道

德充满关切这一点考虑进去，就难以衡量意大利启蒙运动及其各种表现所起的作用。颇为奇特的是，这也是促使改革派同传统保守势力发生冲突的最决定性的原因之一。自身的利益决定了这种抵制行动，如波洛尼亚参议院反对教廷测量地籍（catasto），^[36]或如米兰贵族抵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并导致西西里贵族们煽动百姓骚动，反对他们实行改革的地方长官等。但是，激励许多教会人士反对改革的各种思想对这些人来说具有更多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功利思想和自私自利引起的问题还要多。

就这一时期来说，以政教关系问题作为线索进行叙述，是最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以政治为线索的叙述方法。政教关系问题在意大利，虽然其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有着普遍的影响，因此应该把它作为形成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因素，与经济结构和启蒙运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极为复杂，不是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的。原则上，教廷和主教团对改革派或支持他们君主的一切目标并不持敌视态度。单从财政原因来看，教皇国也不能这样做；它们贫穷，需要改善经济。这一时期先后有克雷芒十三世（1758—1769年）、克雷芒十四世（1769—1774年）和庇护六世（1775—1799年）三位教皇，至少最后一位热切地想作为改革家和建设者名垂青史，他对经济事务和公共工程颇为关心。

（本尼迪克十四世教皇在位时为他树立了好的先例）阻碍教皇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教士的特权——教皇对限制这种特权几乎无能为力——以及长期存在的地方割据和地方特权，在教皇管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这种情况加强了复杂的关税制度，往往通过特许免税而使少数个人和社团获得好处。对此，庇护六世的做法同一切世俗统治者的做法大致相同。他于1777年取消了除教皇管区以外的所有内部关税。并大量投资兴建公共工程，特别是蓬蒂内沼泽的排水工程和修建公路。他还设立了工业学校。尽管在他任期内成就并不突出。但它至少表明教廷与政府改革之间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

另一方面，意大利教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的争吵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那不勒斯长期存在的王权至上的传统，培养了一批能言善辩的人物，其中以詹诺内最为著名，早在1763年以前，他就迫使教廷作出了重要让步。在威尼斯也长期存在争吵；教皇的濯足节训谕（In coena domini）^[37]不准在这里发表。所以，重要的是要辨别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新的情况破坏了政教对峙的局面。

有些事应归功于启蒙思想的大气候。尽管许多思想家和作家依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生活的年代欧洲正处于世俗和理性主义的背景之下。教廷处境不佳，被某些批评者称为冒犯自然、违背理性和常识。正是在这种世俗精神到处弥漫的背景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具体争论。例如，经济学家不喜欢教士占有土地，认为它束缚了生产力，并认为教会的永久管业权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人口理论家对禁欲表示担忧，其中有一位称其为禁欲传染病，他们几乎都希望能限制教士，特别是修士的数目。但是最激烈的争论还是在法律问题方面。庇护权之类的制度的建立、宗教法规的存在，及其在世俗人婚姻和立遗嘱等问题上的运用、教会人员享受治外法权以及教士在教育中占支配地位，以上这些都是与君权不受约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

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在意大利全境爆发出来。在那不勒斯，塔努奇本人总是毫不妥协，他的继任者也是这样。到18世纪末，那不勒斯有很多主教职位由于没有任命人担任而空缺。约瑟夫二世迫使庇护教皇接受由他来挑选米兰大主教。在托斯卡纳，弗朗西斯为了重划教区，甚至让教区主教位置空缺。他的继任者利奥波德则对庇护权加以限制。威尼斯没收了教会的土地，限制它的永久管业权和宗教节日的数目。摩德纳通过立法反对教会的永久管业权，并向教士征税。帕尔马于1764年废止了永久管业权，以对付教士占有土地的经济危险。另外，发布教皇的信件和训谕都需先得到王室准许。正是这些引起了这个时期政教关系的第一次大危机（即在耶稣会问题上的危机）陷入了绝境。

关于解散耶稣会的经过，大部分应属于整个欧洲历史的范畴。耶稣会越来越不受欧洲统治者们的欢迎。在它于1767年受到那不勒斯和帕尔马的波旁王朝政府反对之前，就已在葡萄牙和法国遭到镇压。克雷芒十三世早就表示过他同情该组织。到了1768年，他决定开除帕尔马公爵的教籍，并颁布告诫书，禁止其信徒服从帕尔马关于废止教会永久管业权和强迫教士纳税的法律，作为对帕尔马改革性立法的回答。各波旁王朝宫廷立即团结在一起，与法国夺取阿维尼翁和弗内森地区^[38]相抗衡，那不勒斯占领了其境内的两处教廷辖地——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接着所有的波旁王朝宫廷一致要求取消耶稣会。克雷芒十三世逝世（1769年）后，选出克雷芒十四世，据说在决定人选方面波旁王室起了决定性作用。1773年，克雷芒十四世颁布了《我们

的上帝与救世主》训谕，解散了耶稣会，才收回了上述两处教廷控地。

这段插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各波旁王朝君主结成统一战线所起的作用，并显示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达到新的激烈程度。据认为，克雷芒十四世是一位愿意向新的趋势作出让步的教皇，但是他在1774年就去世了（或许难怪人们会相信他是被耶稣会士毒死的）。其继任者庇护六世不大愿意作出让步，在他任职期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吵再度爆发。在托斯卡纳，利奥波德已经限制向罗马教廷付款，以加强对庇护权制度的攻击。1788年，同那不勒斯的关系恶化到将罗马教皇的使节驱逐出境的地步，在伦巴第，约瑟夫废除了庇护权、宗教法庭、教士的司法豁免权和教会的永久管业权；所有这些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也都类似，不过在奥地利统治的各省推行得更坚决彻底，并且同时取缔了女修道院和神学院，废除了教皇的濯足节训谕，并任命约瑟夫的人为米兰大主教。甚至庇护六世访问维也纳也未能动摇约瑟夫的決心。

1775年后，尽管教廷在耶稣会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但其处境并未改善——而且它遇到的麻烦并不限于意大利。虽然如此，并未使庇护六世的立场有所软化。事态的发展可以描述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吵趋于明朗化：双方对抗加剧，拒绝妥协。一些原先反对罗马教廷的人，由于担心天主教本身陷入危险，变成教廷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很多原先只是反对耶稣会的人，现在成了教皇的反对者，当人们认为庇护六世受处于幕后的前耶稣会士的影响后情况尤其如此。这里有必要谈谈意大利詹森派的情况，因为意大利历史学家在过去30年中对它十分注意并花费了大量笔墨。

“詹森主义”和“詹森主义者”这两个词，有时被当时和以后的作者们加以扩大，几乎包括了所有持进步见解的人。尽管这种看法对一般的解释来说过于热情，不过情有可原，因为意大利詹森主义的性质含糊不清，容易令人误解。詹森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很多方面，而且并非所有詹森主义者都对所有这些方面同样关心。从一个方面来说，它是一种神学运动，关心的是坚持并纯化奥古斯丁派的教义。它也是一种道德运动，谋求改革教会的纪律和世俗的礼仪。就哀叹膜拜圣徒和维护主教的权威等方面来说，它又是一种注重礼拜仪式和主张教权主义的教派。就起初反对耶稣会，后来又反对

罗马教廷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常常是政治性的。这些方面虽有区别，然而又不能割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詹森主义从未出版过一本有名的著作，或产生过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它没有像法国伟大的领袖人物那样的英雄角色。对于它的影响未免言过其实。意大利詹森主义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意大利教会内部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同主张改革的王朝结盟形成一支反对教廷的力量。

詹森主义对教会内部的影响在罗马本地具有重要意义。究竟哪些是詹森主义的影响是很不容易识别的。例如，红衣主教马雷福斯基是一重要集团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应否被看成是詹森主义者却难以肯定。诚然，他与罗马的反耶稣会派的领导人关系密切，他本人也组织过对耶稣会的镇压。他任命佐拉^[39]和坦布里尼^[40]等詹森主义神学家担任重要的教职，并曾和搞分裂的乌得勒支教会的代表一起开过会。很多詹森主义者与该教会有联系。在克雷芒十四世在位时，上述活动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得到教皇准许的；因为克雷芒十四世同情詹森主义者鼓吹的许多主张。他在1765年曾经是教廷礼拜仪式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反对让给圣心会一个职位。正是在他的任期内，乌得勒支教会的代表来到了罗马。他顺应了18世纪早期存在的教皇鼓励理性和探索性活动的传统，在克雷芒十三世时，无疑曾背离了这一传统。对詹森主义者来说，克雷芒十三世时代好像是在本尼狄克十四世和克雷芒十四世两块绿洲之间的一片沙漠。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詹森主义者得到这么重要的同情，取得的成就却如此之少。不过这或许也暴露了该运动的某些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最大成就是解散了耶稣会，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压力，而是由于波旁王朝向一位对耶稣会至少不友好的教皇施加压力的结果。意大利的詹森主义者包括形形色色的人，难以取得成效。因为他们主要是一些学者和神学研究人员，对思想问题和重大问题有兴趣，除此之外便几乎毫无兴趣，一直到底护六世就任教皇后，他们的反教廷的观点才使他们有了某些凝聚力。

18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还没有出现断然的决裂，但罗马的气氛却有变化，表明詹森主义的影响在下降。许多詹森主义者实际上离开了该城市。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指望世俗力量同情支持他们基本上属于教会和教义的利益的趋势加强了。由于詹森主义关于上帝的思想的教义一直在削弱现实世界的教会的影响，使得争

取世俗力量的支持比较容易做到。所以那些主张改革的君主们对教皇权利的攻击并未使詹森主义者感到很大的不安；他们有的甚至把这些君主们看作是上帝反对罗马的工具。他们对主教和地方教会在同罗马教廷打交道中的独立性的同情，同主张改革的各国也是一致的。他们也并不担心国家对宗教独立的威胁；实际上，他们是埃拉斯都主义者，^[41]对“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训条，他们同支持罗马教廷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最后，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说，君主的庇护本身可能是讨好君主的行为。

实际结果各不相同。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支持詹森主义者；撒丁国王就积极反对他们。尽管在威尼斯反对罗马教廷的势力很强大，但詹森主义并未在该地留下什么痕迹。詹森主义者真正的保护人有两位：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以及约瑟夫二世。在约瑟夫的庇护下，帕维亚大学成了意大利詹森主义者的主要教学中心。在托斯卡纳成果更为可观。利奥波德改革托斯卡纳教会的愿望，受到皮斯托亚主教希皮奥内·德里奇的怂恿。在几年以前，德里奇曾是罗马一个有名的詹森主义集团的成员。1786年，德里奇在皮斯托亚召集了由他的教区神职人员参加的一次宗教会议。在10天会议（9月18—28日）期间，提出了许多阐述奥古斯丁教义观点的主张，否认教皇在纪律处分和教会组织方面的最高权力，声称教皇只是“同辈中的为首者”（*primus inter pares*），并把对修道士的纪律处分权以及对他们的圣职授任和修道的监督权赋予各主教。这次会议还认可了1682年的《高卢主义条款》。^[42]利奥波德对此还不满足，不顾主教们的疑虑，敦促德里奇于第二年再召开一次托斯卡纳主教会议。会议虽召开了，但结果却不妙；主教们直率地谴责了会议及其詹森主义的各项主张。

这件事充分表明，在教会内部，詹森主义处于少数派地位。在教会外部，它也未获得普遍的支持。詹森主义者在普拉托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引起了暴力骚动。1790年，群众骚动把德里奇从皮斯托亚赶走，1791年，他辞去了主教职务。实际上，这次宗教会议是意大利詹森主义的顶峰。1791年，詹森主义的刊物《基督教年鉴》（*Annali ecclesiastici*）从托斯卡纳迁到瑞士卢加诺出版，不过，直到1794年，教皇训谕《信仰的权利》才谴责了这次宗教会议及其作品。

詹森主义者命运的衰微，并没有使他们在意大利事务中的影响消失。不过，他们举足轻重的时期已经过去。詹森主义者作为少数派，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神学和教会内部的整顿。但即使如此，仍有许多詹森主义者从事在教民中的传道工作。一旦共同对耶稣会的敌对态度消失，詹森主义者与靠近詹森主义者的人彼此之间在看法上的许多细微差异就显现出来，以致他们难以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他们的成就一直限于地方性的和思想方面的，只有在得到如克雷芒十四世或利奥波德那样有权力的庇护者的支持时，他们的成就才可能持久一些。这表明他们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投身于一些革命的共和国，诚然，对其中某些人来说，同情革命并不仅仅是投机。德里奇与格雷古瓦^[43]有通信联系，许多意大利的詹森主义者，以巨大的兴趣关注着法国由于《教士公民组织法》而引起的事态发展，在那里，高卢主义似乎终于为人们所接受。但詹森主义者的这种同情，使他们失去了意大利保护人的支持，他们不得不赶快为他们的同情民主的罪名进行申辩。1789年后，他们和许多意大利人一样改变了立场。

欧洲对意大利半岛的再次干预，终于使意大利的历史发生变化。不过，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这一后果暂时还不明显。到1792年年底时，革命影响仍相当有限。对攻占巴士底狱消息的反应不一。阿尔菲耶里^[44]作出了热情的反应，然而不久，流亡贵族开始来到，他们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散布开来。波旁家族各宫廷牢记它们的家族关系。在约瑟夫二世去世、利奥波德于1790年迁往维也纳后，意大利半岛开明改革的这两位主要倡导者一去不复返了。改革的步伐早已放慢。伦巴第的改革派对约瑟夫的激进思想和改革步伐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自治权的丧失感到惊恐，开始转而反对他。幸运的是人们为此进行了许多工作，因为大多数意大利国家这时都对改革的危险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尽管已经存在的那些新的、经过改革的体制一般未受到触动。于是，尽管那不勒斯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它还是焚烧了菲兰杰里的著作并查禁法国的报刊，表现出它对革命的恐惧。在威尼斯，国家的宗教裁判官开始搜查受法国思想鼓动的持不同意见的分子。很快，“雅各宾党人”（giacobini）这顶帽子就扣到了那些想利用法国的事态发展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伦巴第温和自由派贵族的头上，教皇国禁止出版阿尔菲耶里的悲剧作品（剧作家于1792年离开巴黎，对革命已失去幻想），并开始搜捕共济会会员。1792年，在费拉拉发现了一个“俱乐部”，引起了轰动。

这些都不太重要。意大利各国在外交上的反应也不大。皮尔尼茨宣言发表后，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同情。^[45]当教皇国和撒丁成为法国侵略的首批受害者时，那不勒斯的斐迪南曾经并非认真地提出意大利各国结成联盟。但是热那亚、威尼斯、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诸国仍固执地保持中立，教廷也依然很不信任他（巴黎深知这些情况，1792年，那不勒斯政府受法国的鼓励占领了教皇领地）。在18世纪结束时，法国的影响已深深地渗入半岛。1792年12月，那不勒斯不顾英国的压力，接受了法国派遣的大使。固然这位大使是在法国海军上将发出最后通牒后才被接受的，但这件事本身表明法国在地中海的势力之大。罗马教廷很快也变得更好说话。命令它的港口给法国船只供应食物。12月，法国代办德巴斯维尔到任。虽然他在罗马朱庇特神殿轻蔑地把红衣主教们说成是“穿紫红袍的傻瓜们”，并发号施令式地要求把逃亡的法国贵族逐出意大利，说明未来的关系不会有改善的希望，但是在当时，教廷和其他的意大利国家（除撒丁外）一样，是愿意设法同法国保持关系的。

因此，意大利历史不能以1792年年底为线来分期。意大利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换阶段只进行了一半。容许启蒙运动进行实验的同时，对半岛政治和经济结构起了保护作用的和平阶段正在消失。而在和平阶段消失的情况下，更会显示出“意大利”这个名词是多么容易令人误解；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都不相同。在1792年之前，不存在什么“意大利”对革命的反应。正因为如此，要弄清楚意大利人在1763年到1792年间的生活有何种变化是困难的。而且，由于我们已经弄清楚的东西中仍然存在许多空白点，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对意大利报纸在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对共济会支部所充当的角色，对教士的社会构成和他们的活动，对改革派立法造成的经济后果，对意大利农业的详细结构，等等，仍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因此，对18世纪的意大利，实际上需要给予像过去三四十年中对革命以前的法国历史那样的关注。

（许怀民 译）

[1] 转引自A. 多明格斯·奥尔蒂斯《18世纪的西班牙社会》（马德里，1955年），第27页。

[2] J. 萨拉伊：《18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的光辉》（巴黎，1954年），第165页。

- [3] 见V. 罗德里格斯·卡萨多《卡洛斯三世的对内政策》（巴亚多利德，1950年），和《卡洛斯三世时期的教会与政府》，载《美洲研究》第1卷（1948年），第5—57页，他认为暴乱是在耶稣会的纵容下策划的，而耶稣会士C. 埃吉亚·鲁伊斯所著《耶稣会会士与斯奎拉切暴乱》（马德里，1947年），则称暴乱是自发的。
- [4] 在法国出现的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译者注
- [5] 关于费布朗尼乌主义，参见第7卷，第121—122页。
- [6] 1767年4月30日特别委员会咨文，见M. 丹比拉和科利亚多《卡洛斯三世在位时期》（六卷本，马德里，1890—1896年）第3卷，第628—633页。
- [7] 亦译“洪达”。——译者注
- [8] 数字见G. 德斯德维斯·迪·德泽《西班牙古代政治制度》（三卷本，巴黎，1897—1904年）第3卷，第130—131页。
- [9] R. 赫尔：《18世纪西班牙的革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8年），第117页。
- [10] 见下面第14章，原文第401页。
- [11] 参阅后面第14章，第398页和400页。
- [12] 参阅后面第17章，第501页。
- [13] 普林西佩·德·拉·帕斯：《回忆录》（西班牙作家文库，二卷本，马德里，1956年），第1卷，第409页。
- [14] 转引自C. 阿尔卡萨·莫利纳《佛罗里达布兰卡的政治思想》，载《政治学评论》第53卷（1955年），第53页。
- [15] 见P. 比达尔《东比利牛斯山省法国大革命史》（二卷本，佩皮尼昂，1885年），第2卷，第100—101页。
- [16] 对庞巴尔及其政策的不同解释，见第7卷，第12章，原文第290—291页。
- [17] 见J. 德·马塞多《庞巴尔时期的经济状况》（波尔图，1951年），第263页。
- [18] 教皇管区（Legations），为教皇国的主要行政区，由枢机主教治理。——译者注
- [19] 阿瑟·扬（Athur Young, 1741—1820年），英国农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述家。曾经营农庄并游历英国全境以及法国等地。——译者注
- [20] 奥斯丁（John Anstsin, 1790—1859年），英国著名法理学家。——译者注
- [21] 指奥地利与英国及法国与普鲁士的联盟破裂后重新结成的同盟。——译者注

[22] 地理科学院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1753年成立于佛罗伦萨，致力于农业的改进。

[23] 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 1743—1795年），意大利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法国大革命前在巴黎上流社会曾红极一时。——译者注

[24] 蓬佩奥·内里（Pompeo Neri），1706年生于佛罗伦萨，曾在比萨任公法教授，1735年起为大公服务。1748年到米兰，1770年任托斯卡纳政务会议主席，1776年去世。

[25] 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年生于维尼奥拉；意大利18世纪最伟大的学者，1695—1700年在米兰的圣安布罗斯修会工作，后受聘于摩德纳的皇家图书馆，直到1752年去世。其大量著作中最著名的有《意大利史料集》（1723—1738年），《意大利中世纪文物研究》（1738—1743年）和《意大利编年史》（1744—1749年）。

[26] 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1737年生于波洛尼亚，曾在大学讲授解剖学，并对电的生理作用进行了观察，曾因此与伏打发生了重要争论（参见注⑤）。1798年去世。

[27] 亚历山德罗·伏打（Alessandro Volta），1745年生于科莫，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重大发现。曾任教于帕维亚，在他同伽伐尼进行辩论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试验；他的发明有电容器和伏打电池。1827年去世。

[28] 拉扎罗·斯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1729年生于斯坎迪亚诺。生物学家，对胚胎学和对循环系统及消化系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曾任教于雷焦、摩德纳和帕维亚。1799年去世。

[29] 朱塞佩·帕尔米耶里（Giuseppe Palmieri），1721年生于马蒂尼亚诺。职业军人出身，后任文职官员，1791年起任那不勒斯财政委员会主任。1793年去世。

[30] 加埃塔诺·菲兰杰里（Gaetano Filangieri），1752年生于那不勒斯。他的成名作是《法律学》（1780—1789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工作，参加那不勒斯财政委员会后不久于1788年去世。

[31] 彼得罗·韦里（Pietro Verri），1728年生于米兰。1766—1786年为奥地利行政当局工作，他还撰写并出版了一批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要著作。他的主要政绩是废除了伦巴第的包税制（1770年），他的最著名的著作为《米兰史》。该书第2卷在他1797年去世后两年出版。

[32] 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年生于米兰。除所提到最著名的著作外，他还写过一些论述经济的著作，并在米兰的帕拉丁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也曾为奥地利当局效力。1794年去世。

[33] 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年生于基耶蒂。曾当过神父、外交代表、文职官员，并且是一位文人。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小

麦贸易的对话》（1770年），在他从巴黎回到那不勒斯后不久出版，他在巴黎时任那不勒斯大使馆秘书。他后来曾担任重要行政职务。1787年去世。

[34] 吉安·里纳尔多·卡利（Gian Rinaldo Carli），1720年生于卡波迪斯特里亚，经济著作家，受雇于米兰的奥地利当局，1795年死于该地。

[35] 雷奥纳尔多·塔努奇（Reonardo Tanucci），1698年出生于斯蒂亚，先在比萨教授法律，后到那不勒斯，先是为查理四世效力，最后进入摄政委员会，任大臣直到1776年，他的政策是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他于1783年去世。

[36] 为征税的目的而对地籍进行的调查。

[37] 一种教皇训谕，于每年濯足节发表（因而得名），其中包括因犯某种罪过而遭开除教籍惩处的案例汇编，对这些罪行的赦免权保留在教皇手中。最后一次发表于1768年。

[38] 弗内森地区（the Venaissin），法国旧省和教皇领地孔塔-弗内森的一部分。——译者注

[39] 朱塞佩·佐拉，1739年生于孔切西奥，神学家，1788—1799年任帕维亚神学院院长，1806年在帕维亚去世。

[40] 彼得罗·坦布里尼，1737年生于布雷西亚，应召到罗马爱尔兰学院任职，后在帕维亚任教（1778—1792年）。1794年出版了他的《神学—政治书信集》，后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工作。1827年于帕维亚去世。

[41] 埃拉斯都主义，关于国家有权干预教会事务的一种学说。以瑞士神学家埃拉斯都而得名。——译者注

[42] 法兰西教会神长大会所通过的限制教皇权力的条款。——译者注

[43] 巴蒂斯特-亨利·格雷古瓦（Baptiste-Henri Grégoire），1750年生于韦奥，曾活跃于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是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布卢瓦主教，1791—1807年曾任卢瓦-谢尔地区的行政官员。同情高卢主义、詹森主义和共和派的观点，他在1819年当选法国众议员一事引起公愤，宣告无效。1831年在巴黎去世。

[44]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1749年生于阿斯蒂，诗人兼悲剧作家，1787—1792年住在巴黎，1792年赴佛罗伦萨，于1803年去世。

[45] 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发表的共同宣言，号召欧洲各国用武力帮助法国路易十六恢复统治。——译者注

第十四章 英国统治以外的美洲社会的发展

当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于1700年去世时，西班牙如何塞·德加尔韦斯所说，“已差不多与其死去的主人一样成为一具僵尸了”。^[1]西班牙的“领地辽阔富饶，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国家”，^[2]但却缺少公路、工业和商业。在此之前的100年间，人口减少了150万。农业凋敝，行政管理体系混乱不堪，货币状况一团糟，国库告罄。如果说在新大陆几乎可以说“没有哪片宁静的沙漠还未被西班牙染指”的话，那么西属美洲殖民帝国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各种习惯势力和惰性势力以及欧洲诸列强的相互猜忌，而不是由于西班牙本国的内在实力所致。即使像有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它垮台的时机尚未成熟，或者尚未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存在着种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弊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749年两位年轻的海军军官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为国王写的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只描述了这个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情况。^[3]

然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的年代中，西班牙本国从它在17世纪沦入的衰落中以惊人的活力崛起。它的经济停止了衰退，然后开始回升。它的行政体制按照法国和专制主义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实行了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它的人口再次增加，在100年中几乎翻了一番。王家岁收增长了，尽管其开支也增加了。即使说经济变革的进程、农业的复兴、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增长等未能满足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们的期望，但现在看来，西班牙在卡洛斯三世统治期间以及在卡洛斯四世统治的早期似乎出现了晚秋小阳春似的繁荣景象。比利牛斯山脉旧景依存，但是18世纪末的西班牙不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西班牙式的世界了。

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的发展和扩张尤其引人注目。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700年就已疆土辽阔，而到了1763年，其领土面积大增，20年后

又扩展得更广。尽管西班牙在七年战争结束时丧失了佛罗里达，但却获得了新奥尔良和广阔而没有明确边界的路易斯安那。1783年佛罗里达作为西班牙援助美洲大陆英国殖民地的反叛的补偿而收回后，西班牙便完全控制了墨西哥湾。诚然，路易斯安那是一件招惹是非的礼物，西班牙于1800年毫不犹豫地把它还给了法国，三年后拿破仑又把它卖给了美国。但即使没有路易斯安那，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领土仍然连成一片，从加利福尼亚到合恩角，将近跨越一百个纬度。虽然在最北边，西班牙（在1790年签订努特卡湾协定时）被迫放弃了对北美西北海岸的独占权，但在最南端，它于18世纪70年代开始在巴塔哥尼亚建立殖民地。[\[4\]](#)

防御是西班牙殖民帝国扩张其疆土的动机。由于对葡萄牙感到恐惧，西班牙占领了今为乌拉圭共和国的“东岸地区”。[\[5\]](#)西班牙对该地的占领始于1724—1726年建立蒙得维的亚，直至1777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小海港科洛尼亚-德尔萨克拉门托移民镇方告完成。对英国的恐惧——如果英国不在1766年占领福克兰群岛（尽管它于1774年同意撤出该群岛）的话，会是这样吗？——促使西班牙向南推进到巴塔哥尼亚沿海地区。在新西班牙北部边境的扩张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西班牙希望路易斯安那成为抵御英美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渗透的屏障。1769年西班牙开始向加利福尼亚殖民也是为了阻止俄国在太平洋的推进。当1776年7月4日费城的“自由钟”敲响第一个英国殖民帝国的丧钟时，比它还要老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防御性扩张仍在继续。就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人建立了旧金山。

当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世纪末到达其领土的最大范围之时，也正是其最为繁荣之日。它的几个省区的相对重要性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在南美，西班牙财富和实力的传统基地秘鲁失去了其原先的突出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南方的拉普拉塔各省和北方的委内瑞拉则脱颖而出。可与这些原先处于边缘并被忽视的地区的崛起相匹敌的，在岛屿殖民地中有古巴的崛起，在巴拿马地峡以北则是新西班牙的经济复兴。新西班牙此时已从人口长年下降的状况中恢复过来，其矿藏提供着占世界产量一半的贵重金属。对新西班牙来说，18世纪是创业的时代，这并非偶然。尽管在墨西哥城——从几乎任何一方面来讲都是在西半球首屈一指的城市——乞丐满街，但政府的收入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5倍多，其矿产品产量的增加也与此相当。

18世纪末期，新西班牙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哈瓦那和拉普拉塔的航运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关税收，古巴食糖和委内瑞拉可可的出口，拉普拉塔各省皮革的出口，以及西班牙与西属美洲之间贸易的全面增长，都无不同样说明当时扩张的情景。当然，并非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所有地区或所有经济部门都同样从贸易的增长中获得了利益。局部和地区性的停滞，甚至是局部和地区性的衰落也是显而易见的。像西班牙人对西班牙国内状况提出批评一样，一些西属美洲人，以及一些西班牙人，也在为西属美洲的经济落后而悲叹。但是不论他们的抱怨多么有理由，事实仍然是：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日益增加——1800年再次达到西班牙人口的一半，尽管仍少于第一个改革法案时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人口的总和——整个西班牙殖民帝国从来还没有比它垮台前夕更加繁荣。

促成这次经济，实际上是政治复兴的最明显的刺激力，来自波旁王朝的行政、商业和经济改革。引起早期波旁王朝注意的是西班牙的而不是西属美洲的各种问题，但是一次重大的行政改革则是由于西属美洲的问题所引起的。包括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诸共和国的广大地区，在此之前从属于利马，还有一部分从属于圣多明各。1717年均归入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1723—1724年间一度被废除，1739年又重新建立，不过委内瑞拉在三年后成为一个单独的将军辖区。另外，帝国商业体制的两项重大改革也是由于西属美洲的问题所引起的。由于为新西班牙和南美洲供应货物的运输船队早已衰落，腓力五世曾企图重振船队和大帆船队，但未成功，于是在1740年决定全部停航。此后只有特许的船只方准单独地驶往西印度群岛的某个港口，或绕过合恩角直驶秘鲁。1754年商船队真的恢复了，并于1757年重新驶向新西班牙，此后开开停停，直至1778年为止。不过大帆船却完全消失了，随着大帆船的消失，有名的贝洛港贸易集市，连同巴拿马王国的繁荣也随之寿终正寝了。更早些时候进行的第二项改革是建立特许贸易公司。其中至少有一家加拉加斯或称吉普斯夸公司，于1728年获得在委内瑞拉沿岸进行贸易的近乎垄断的特权。它经营了很长时间，且较成功，附带地也给委内瑞拉带来不少好处，不过当地居民对它并不完全感到满意。

在早期波旁王朝统治下，西印度的天然贸易通道就这样开始打通了。在理论上确定的西班牙对西属美洲的贸易垄断范围内，加的斯和塞尔维亚商人的实际垄断权部分地受到了侵害，虽然这仅仅是由于在其他地区建立了竞争性的垄断公司。至少在南美洲北部试行了一种比较现实的行政管理体制，而且发现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在西班牙本土，于1714年设立了西印度事务部，它连同国务、司法和陆军各部一起，预示着一度大权独揽的西印度院的衰落，以及政务会政府将被一个由帝国控制的更有效的新机构所取代。

然而直到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才像英国一样，着手进行殖民帝国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只不过规模要比其最大的殖民对手小得多。对波旁血统中最精明能干的君主卡洛斯三世（他于1759年继位）来说，他过晚而且轻率地参加那场欧洲的和殖民地的冲突而取得的惨痛经验——哈瓦那被占领，丧失了佛罗里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在帝国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方面谨慎进行的引人注目的改革，既是由于国外法国的告诫，也是由于西班牙国内的舆论所致。但它们的目的是极其实际的。如果说国王现在试图给殖民地政府注入新的效率，如果说他试图振兴殖民地贸易，这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帝国的防御，保护帝国不受侵略，特别是英国的侵略，消除外国的经济竞争，以及恢复西班牙在欧洲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实力。而正如1763年以后的英国殖民地政策一样，在西班牙的政策中财政问题是首要的问题。防务需要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则意味着改革。

早在1763年年底就在马德里成立了一个部际委员会，每周四开会，“讨论与西属西印度的未来安全和增加天主教徒国王陛下在美洲的财政收入有关的事项”，也讨论重振海军的事宜。^[6]作为补充，于1764年又任命了一个五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Junta Técnica）以审议贸易问题。与此同时，任命亚历杭德罗·奥赖利为监政官前往安的列斯群岛调查古巴和波多黎各的防务状况。1765年，任命阿塞·德加尔韦斯为墨西哥财政总视察官和新西班牙监政官，此人后来成为西印度事务大臣。

1765年2月，在任命德加尔韦斯一周前，“专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不可能指望一个皇家委员会提出彻底放弃殖民地垄断政策的建议，“专门委员会”当然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摆在它面前的令人难

忘的客观教训却是旧的限制性制度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哈瓦那通常每年有两艘船驶抵，每年的进出口关税收入为3万比索；而在英国人统治下，1762年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却是40万比索。至于西班牙的殖民对手们的非法贸易对帝国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所带来的损害，则是有目共睹的。迪奥尼西奥·德阿尔塞多在1761年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的走私额为600万比索，^[7]这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前的作者们的估计，^[8]而这种估计大概远远低于实际数字。显然应采取分步骤制定更有力的措施，以对付走私商人本身，并且这样做了。然而很明显，要抵制国外的压力，保护西班牙的垄断地位，也必须从内部改善这一垄断制度的状况。提出的改善方案是实行比较自由的，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的贸易，即放松旧的商业体制。这一方案也得到了西班牙有见识的舆论的支持。于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矛盾的现象：英国在1763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建议在其殖民帝国实行加紧控制贸易活动的措施，而西班牙却建议采取放松贸易控制的办法。

1764年采取了初步措施：开通科鲁尼亚与哈瓦那之间每月一次的邮递业务，与新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和铁拉菲尔梅相连接；后来又补充建立了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上邮递业务。不过此时根据1765年10月16日的一项法令，开放了西印度群岛——古巴、圣多明各、波多黎各、特里尼达和马格丽塔——与西班牙北起桑坦德东至巴塞罗那的九大港口的通商。对横跨大西洋与塞维利亚和加的斯这两个安达卢西亚港口通商的限制便一举而结束。现在商船可以不需获得国王的特许证而航行，而且吨位税和其他税也已简化和降低。这项试验十分成功，以致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的区域不断扩大，1768年扩大至路易斯安那，1770年扩大至坎佩切和尤卡坦，1776—1777年扩大至南美大陆的圣玛尔塔和里奥德拉阿查，1778年2月扩大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根据1778年10月12日的所谓“自由贸易法”，西班牙和南美、中美的所有比较重要的港口（由于加拉加斯公司的利益，委内瑞拉的港口除外）都被准许相互通商，尽管还不是自由地，至少是可以直接地进行。委内瑞拉的正式例外情况一直延续到1789年加拉加斯公司不复存在之时为止。同时帝国其他地区所享受的特权也赋予了新西班牙。此外，随着美洲港口和西班牙港口的逐步开放，以及妨碍贸易的关税的修改，长久以来对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亦被放松或取消。到1777年，新西班牙、危地马拉、新格拉纳达、秘鲁、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享有各自的产品彼此间进行贸易的相对自由。当然，对外国

人和对外贸易，则该帝国仍实行关闭政策。不过由于十分特殊的原因，1782年允许西班牙臣民和西班牙船只在路易斯安那和法国之间进行贸易；1789年，允许外国人向西印度群岛供应奴隶。在其他方面，帝国垄断的原则仍然原封未动。但是到了1790年，即卡洛斯三世去世两年之后，贸易署本身也被撤销。这一事件标志着逾两个半世纪以来支配帝国贸易活动的做法几乎全部被取消了。

放松帝国的控制与卡洛斯三世所推行的政治和行政改革无关。实际上后者的方向与前者截然相反。对领土进行了调整，某些地区的地位提高了。1777年，委内瑞拉将军辖区扩大，并于九年以后设立了自己的检审法院（*audiencia*），即高等法院。智利将军辖区也从秘鲁总督辖区中独立了出来。1776年，新西班牙北部边界诸省改组为内陆省（*Provincias Internas*），由一个基本上独立于新西班牙总督的统领（*commandant-general*）领导。同年，出于政治和战略原因——一方面害怕英国，另一方面担心葡萄牙人从巴西发动侵略——建立了美洲第四个，即拉普拉塔总督辖区，不仅包括原来的拉普拉塔地区各省，而且包括上秘鲁（今玻利维亚）各省。作为一个“南美洲的堡垒”^[9]，这个总督区在1777年被确定为永久性的总督区，它的建立是这个殖民帝国后期政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犹如1778年自由贸易法令在帝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一样。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改革，表明在西班牙人民日益认识到美洲的地理问题和地区状况：18世纪末存在的领土安排已经勾画出未来西属美洲各国的主要轮廓。但是这种领地的分权——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并未触及殖民统治的中心原则。无论在哈布斯堡还是波旁王朝的统治下，帝国实行的都是专制主义。虽是一种家长式的专制主义，但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它的原则是权威原则，正如波旁王朝在西班牙扩大了王权的范围一样，他们也力图加紧对美洲的控制。为了建立更好、更有效的政府以及增加王室财政收入，卡洛斯三世恢复了陈旧的视察制度，即由一个皇家专员对殖民地进行全面视察。1765—1771年何塞·德加尔韦斯对新西班牙进行的全面视察即是最著名的例子。此外，西班牙的开明专制制度也反映在美洲任用比较精干的文职官员上。新西班牙的第二代雷维亚西赫多伯爵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为了像卡洛斯所希望的那样“统一上帝赋予我的伟大帝国的政府，并在我的美洲广阔领地上建立良好秩序，使之幸福并受到保

护”，^[10]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波旁王朝广泛的行政改革试图作出的回答是，通过把各殖民地划分为总督辖区，从而使殖民地政府制度化和集权化，在权威性最差、最无效的一级——地方和省政府一级恢复权威并加以控制。

源自法国、后为西班牙所采用的地方行政长官制^[11]首先于1764年在古巴以有限的方式试行。德加尔韦斯对耳闻目睹的当地状况深感震惊，在1768年强烈主张将此制度全面推广至新西班牙。但是经过了14年多的试验和争论之后，这个制度才开始全面采用，先是1782年在新建立的拉普拉塔总督区，两年后在秘鲁，1786年在新西班牙，到1790年已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在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地方，西班牙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gobernadores intendentes）取代了总督和市长等原来的地方官员。这些原来的地方官员的暴政和腐败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史上留下了令人伤感的一页。他们的渎职违法行为在1749年遭到胡安和德乌略亚二人严厉的谴责，^[12]直接促使30年后图帕克·阿马鲁印第安人大起义爆发。新任官员及其委派的代理人（subdelegados）和其他助手一起在他们的地方行政长官辖区的殖民统治集团内充当着无所不管的角色，特别是主管司法、行政、财政和作战四个部分，并与总督和将军划分了职权范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可能，冲突也就产生了。但是没有任何改革会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开明专制主义中最开明的思想。改革是为了建立起健全而有效的政府，如果说其目的在于增进王室的福利，尤其是王室的财政福利的话，那么它也是按照西班牙的伟大传统增进其臣民的福利。

波旁王朝的政策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通过建立和改组殖民地民兵以补充现已增加的来自西班牙的正规军，从而加强海外的军事力量，并危险地赋予它以特别的法律豁免权和特权。当然，这仅仅是导致旧殖民体系全面变革的帝国防务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为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开辟了实现其抱负的一个新的领域。二是缩小教会的特权和扩大王室的圣职授予权。这是在18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做法的继续，并在教会事务方面可与在世俗行政事务方面加强王室权威的做法相提并论。这种权威的性质以及波旁王朝王权至上主义发展到何种程度，从1767年突然而富有戏剧性地将耶稣会逐出西班牙领地这件事上可以充分地得到说明；专制主义是容不得对手的，无论是

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手。第三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国王鼓励在新世界开展科学调查，其目的是刺激生产，尤其是矿业生产。18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矿业专家，如埃吕埃尔（Eluyher）兄弟和巴龙·冯·诺登夫利希特，被派往新西班牙、新格拉纳达和秘鲁等地。在墨西哥，皇家矿业学院于1792年开办。正是这一学院以及植物园和美术学院使洪堡评论道，“在新大陆上没有哪个城市——美国的城市也不例外——能像墨西哥首都那样设有如此漂亮或如此完备的科学机构”。^[13]由鲁伊斯、帕冯和多姆比率领的以及由马丁·塞塞率领的两支植物考察队分别于1777年和1787年前往秘鲁和新西班牙。国王支持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在新格拉纳达进行的植物学工作，并且在18世纪末为亚历山大·冯·洪堡及其同伴法国博物学家艾梅·邦普朗穿越南美洲北部、古巴和墨西哥的伟大探险提供了一切便利。

卡洛斯三世死于1788年，他倡导的改革事业尚未完成。但是他留给他那好心但无能的继承人的帝国与他当初继承的帝国相比，不仅更大更强，而且更富裕，治理得更好。王室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不过一般来说征收的代价和殖民地当局的开支也同样增加了。不论在大陆或各岛屿，帝国的防务加强了。牙买加罗亚尔港的防御工事无法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工事相比。帝国的行政体系已经改进，王家政府的人员，至少是上层文职官员已有较大的改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更为有效而扩大。帝国的贸易已经复兴，仅在1778—1788年10年时间里，其价值估计增加到7倍。在贸易中，运来的西班牙商品与外国商品相比，比例也增加了，这清楚地表明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诸省，在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工业正在复兴。殖民地的制造业则受到损害。基多的纺织业和拉普拉塔西部各省的制酒业因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而遭受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新西班牙的矿产量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随着西属美洲人口的日益增长和欧洲对西属美洲提供的药材、染料木、皮革、糖、烟草以及金、银的需求不断增加，生产的增加不仅仅限于矿业，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也在扩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778年航运了15万张皮革，1783年则为150万张。洪堡在18世纪末认为，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农业创造的财富远远多于秘鲁开矿所积累的财富，而在新西班牙，墨西哥矿区生产的金、银的价值比农产品价值却低“几乎1/4”。^[14]

在美洲，如同西班牙的情况一样，卡洛斯在位时期进行的大改革几乎没有激起公开的反对。甚至连驱逐耶稣会也只不过引起了一些地方性骚动，而在殖民地世界，骚动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与18世纪80年代的大暴动，如1780—1781年秘鲁图帕克·阿马鲁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和新格拉纳达的市民起义相比，1767年的这些动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这些运动是当地环境和特殊情况的产物。其中一次反叛的矛头是针对地方总督的压迫的，其中秘鲁总督的压迫比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残酷。因此这些总督后来被行政长官所取代。另一次则是抗议高税收，而高税收主要是由于西班牙卷入美国独立战争而造成的。这两次起义都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它们一下子生动地揭露了广大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15]的处境。但它们并没有表明对国王或王室普遍或者说到处存在着不满情绪。虽然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反叛确实可能对西班牙是个警告，并为西属美洲树立了榜样，但是西班牙政府害怕的并不是内部的瓦解，而是“欧洲列强们”和来自外部的破坏。

然而，尽管帝国体系中曾一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从总体上说，波旁王朝的改革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旨在加强帝国体系的措施最终却导致了该体系的削弱。18世纪，随着殖民地的日渐繁荣，克里奥尔人自觉意识的倾向不断增强。克里奥尔人与“半岛人”之间，即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与出生在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人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和加深。洪堡曾讲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连未受过教育、缺乏文化修养的穷困不堪的欧洲人都认为自己比出生在新大陆的白人要高一等。”^[16]他还指出，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以后，特别是在1789年以后，克里奥尔人开始称自己为美洲人。^[17]卡洛斯三世的改革一反传统习俗，对那些由于改革而失去或削弱了权力和特权的政府官僚和商业寡头集团的成员来说，是太“开明”、太“自由”了，以致无法适应。而对克里奥尔人土地贵族和正在崛起的克里奥尔人资产阶级来说，这些改革又不够自由，不合他们的胃口。商人和矿山主以及土地拥有者在上层形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贵族阶层，即使他们的底层也远离为他们服务的各阶级。但作为土地的主人，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属美洲人力图用政治权力来加强其经济实力。然而那些曾许诺建立起更加良好和更加有效的政府的各项改革，却没有美洲人参加的份。在改组后的各省政府中，新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全都是西班牙人。按照受偏见影响的原则，只准许克里奥尔人担任低级职务——

波旁王朝的政策根本不考虑建立一个由克里奥尔人组成的行政管理阶级——对克里奥尔人自尊心的这种侮辱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卡洛斯三世的改革一方面激起而同时又使之落空的，还不仅仅是克里奥尔人的政治抱负。商业体制也已放宽了限制。富有更多创业精神的新商人进入了贸易界。营业额增加了。但是“在帝国范围内通商的自由却激发了与整个世界自由通商的要求”。^[18]如果说西班牙的经济在卡洛斯在位后期“以数世纪以来前所未闻的方式”繁荣起来，^[19]但西班牙的经济复兴仍无法跟上各殖民地经济需要的步伐。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激增，用不了多久克里奥尔人就会对帝国的这种经济体系感到不满意了，因为在这种体系中西班牙扮演了一个其财政和工业实力、其手段和技巧都不足以完成其任务的角色。

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殖民地社会的全盛时期，它反映在城市的装饰和改善上——这本身就是物质财富增长的表现——反映在当地爱国主义的高涨、学术活动的提高、期刊出版的增加，以及种种团体和俱乐部的成立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1801年才有了一份报纸，加拉加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则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看到报纸。但是在墨西哥，何塞·安东尼奥·德阿尔萨特主办的《文学报》（这不是他办的第一个文学刊物）从1788年出版到1795年，内容充满了有关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医学、哲学、地理和历史的文章。名气更大的《秘鲁信使报》于1791年问世，每三天出一期，直至1795年。《危地马拉报》在停刊60多年之后于1794年复刊。哈瓦那的《新闻报》（*Papel Periódico*）于1790年创刊，圣菲-波哥大的《新闻报》创刊于1791年。另外还有其他许多报纸和周刊，有些是新闻，有些是评论，大多数寿命较短，但在19世纪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爱国经济学会，其中9个在1795年之前，6个在此之后成立。这些美洲人的团体是按照西班牙同类团体的模式创建的，主要关心的是改善当地经济条件和开发当地经济资源。但它们也关心传播一般的有用知识。创办于1793年的哈瓦那学会建立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并管理着一所女校，而创办于1794年的危地马拉学会不仅开办了教授纺织、绘画、数学的学校，还设立了一项支持美洲文学的论文奖。

这些经济学会直接反映出18世纪西班牙“启蒙思想”向西属美洲的渗透。殖民地各大学这时正努力把自己从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

的权威影响下解放出来，它们的复兴进一步表明源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并在欧洲大陆盛行的一些哲学和科学思想已传播到西属美洲。尽管实行宗教法庭的审查制，但大陆并没有封锁思想。这些思想通过西班牙人的著作从西班牙传入。它们随着卡洛斯三世的“开明”行政官员之后而来到。它们被装在归来的旅游者的脑子里而带回来——越来越多的有钱的克里奥尔人去欧洲访问。它们为西班牙国王在新大陆开展的科学考察所促进。另外，它们还通过非法引进禁书的途径传入。如洪堡所指出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墨西哥取得最大进展。但在哲学方面，也像科学一样，美欧之间的文化时间差在渐渐缩小。“启蒙思想”虽然只影响到一小部分人，但到卡洛斯三世去世时已在西属美洲有了很大进展。[\[20\]](#)

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中的这种新精神，在卡洛斯四世继位后并未能持续多久。到1792年年底，卡洛斯三世在位时的那些杰出的大臣要么已去世，要么已下台，西班牙政府的日渐衰弱很快就在美洲反映了出来。旧秩序下的许多滥用职权现象又重新出现。即使在王室有能力支付其低级官员的薪金时，也从未能向他们足额地支付。在新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与旧体制下一样，低级官员只有在贪污受贿方面堪与他们的萎靡不振相提并论。至于最高层的行政长官的实施状况，至少在拉普拉塔总督区，行政长官所表现出的魄力在激励地方市政会议采取新的行动方面发挥了有益的，即使是出乎意料的作用。但是赋予行政长官以广泛的权力则得罪了公私两方面的既得利益者。这导致了新旧官员、行政长官与总督，以及行政长官与检审法院法官之间围绕管辖权的冲突。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上秘鲁，行政长官与加拉加斯检审法院之间一直不和，殖民地政府本身四分五裂。在那里，为加强王室控制而推行的改革，实际上却仅仅起了削弱王室控制的作用。

如果说殖民帝国在卡洛斯三世在位的末年达到其鼎盛时期的话，那么它的衰落以及西班牙的衰落在1792年以后发展得极其迅速。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开始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分裂和瓦解的进程，并最终对西属美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90年，在温哥华岛西岸的努特卡湾的归属问题上与英国的一场争执——西班牙在这一争执中被迫作出了让步——标志着帝国防务性扩张的终结和领土退缩的开端。三年后与法国的战争，结局是按照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西班牙让出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属圣多明各殖民地——东部的2/3。1796

年与英国的战争使西班牙在1797年失去了特里尼达。最后为了扩大帕尔马公国，作为交换，1800年将路易斯安那退还给了法国，三年后美国又将它买去。

但是，西班牙起先以敌人，尔后又以盟友的身份参加法国革命战争的行动，还带来了其他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后果，其影响远远超过丧失这两块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西印度殖民地，甚至超过自愿退还路易斯安那领地。与英国的战争始于1796年10月，一直持续到1808年，中间只中断了两年半。战争的结局是致命性的。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或几乎被切断。西班牙的经济被严重打乱，西班牙海军几乎被摧毁，它的殖民地只得完全依赖本地和外国的资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额从1796年的500万美元跌至1797年的33.5万美元以下。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国王在1797年11月18日颁发敕令，向中立国船队开放西属美洲的港口，尽管有严格的限制。这是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1799年该敕令就被废除，因为如同撤销令所抱怨的那样，它“全面地造成”对国家及其臣民利益的伤害。^[21]但是法律所禁止的，地方法规却继续允许，而且王室本身也予以认可。虽然1802年恢复了和平，也恢复了旧日的限制性体制，但1804年再度开战后，这些港口又重新开放。

其结果，或部分的结果是美国在古巴至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智利之间的航运和贸易的迅速增长。然而，繁荣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贸易，英国的贸易也兴旺了起来。西班牙的海岸警卫船和卡洛斯三世的商业改革也曾为制止走私贸易的增长做出过努力，但无疑并未能予以彻底制止。为了开展墨西哥湾和西属南美洲北岸（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英国于1766年在多米尼加和牙买加设立了自由港，1787年以后又将这一贸易体系扩展至西印度的其他战略要点。对这种从自由港与西班牙各殖民地进行的贸易，在和平时期受到鼓励，在战时则需得到特许。在西班牙看来这是走私贸易，而在英国看来则是合法贸易。这种贸易虽有短暂的盛衰，但总的来说，在不断上升。牙买加是这一贸易体系的中枢，而拿骚和特里尼达以及其他一些岛屿均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根据也许有些夸大的说法，在18世纪末，仅特里尼达一地向西班牙各殖民地提供的货物每年就值100万英镑。^[22]然而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并非只有加勒比地区的走私贸易兴旺起来。英国商人同美国商人一样，打入了拉

普拉塔地区。甚至在太平洋沿岸，部分是由于南海捕鲸船的活动，走私贸易也发展并巩固了它的阵地。1796年之后的那些年，外部经济对帝国壁垒的压力日益增加。国王在1802年虽然还可以空谈重建帝国垄断的旧体系，但到1802年，这种旧体系早已几乎无法挽救地遭到破坏。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这一体系便彻底崩溃了。

1789年以后欧洲发生的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准备西属美洲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提供了帮助呢？如果说到卡洛斯三世去世时，“启蒙思想”已在西属美洲殖民帝国广泛传播，那么在那些通常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文献中，卢梭的著作早已特别为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所熟悉。所有在1764年之前发表的卢梭著作，都已自由地传入各殖民地，而且还在不断传入。南美洲北部未来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性格怪僻的导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就是根据《爱弥儿》的最佳原则来培养他的学生的。被指控进行颠覆活动而于1795年入狱的基多的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斯佩霍，也是受了《爱弥儿》的影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马里亚诺·莫雷诺于1810年翻译出版了《社会契约论》的西班牙文版，不过删去了其中关于宗教的那一章。的确，也许没有哪位欧洲作家产生的影响能有卢梭的那样深远。^[23]然而不论卢梭对西属美洲产生了何种影响，震惊西属美洲人的还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从一开始，如当时在西班牙的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等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就像英国的华兹华斯和骚塞一样被同一种激情澎湃的浪涛所感染。在新格拉纳达，安东尼奥·纳里尼奥于1794年在他自己所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人权宣言》的西班牙文译本，为此他受到监禁，并被流放。三年之后，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发生的密谋，即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玛丽亚·埃斯帕尼亚的密谋，清楚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理论的影响。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榜样并不是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希望在西属美洲加以仿效的。颠覆性的政治观点并未广泛传播。持这些观点的只限于一小部分克里奥尔人知识分子。其中最不屈不挠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是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在1771年离开出生地委内瑞拉后，直至1806年才返回。

但是，如果说法国革命理论的精髓在西属美洲没有广为传播的话，那么英西战争和西班牙与西属美洲联系的被切断，则使人们就近认识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及其榜样的威力。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

1804年所说的，在近期的战争中，西属美洲人不无遗憾和愤慨地看到，他们的船只不能远离海洋，而北美人却可航行于任何海域，进出任何港口。^[24]美国商人中，也许不止一个人像航行至智利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年轻人理查德·克利夫兰一样，在其货物中夹带着一本很方便地被译成西班牙文的《联邦宪法》和《独立宣言》。洪堡同样提到，自从特立尼达岛落入英人之手后，附近的大陆地区的面貌业已改观，在卡里亚科，他“第一次在这样的气氛中”听到人们“热情洋溢地提到”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名字。^[25]

此外，西班牙殖民帝国这时有遭到直接进攻的危险。英国原先拿不定主意究竟是掠夺西属殖民地呢，还是与之通商，现在则在究竟是征服还是解放这些殖民地之间犹豫不决。1797年，特立尼达总督在该岛被占两个月之后接到指示，要他鼓励大陆上的革命，并作好了入侵拉普拉塔的准备，但同年又取消了入侵计划。不过从根本上说，英国对贸易比对领土更感兴趣。它的计划是商业和战略性质的，而不是为了征服殖民地。1806年，海军准将霍姆·波帕姆爵士和陆军准将贝雷斯福德从好望角出发远征，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次进攻行动的责任在于波帕姆，他的计划根本未经批准。如同米兰达率领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远征一样，也是在1806年，掠夺拉普拉塔的入侵同样失败了。最初虽取得胜利，随后便遭到惨败，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被夺回，企图再次征服该地的军队投降，接着便是撤出蒙得维的亚。这些事件在拉普拉塔的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总督逃之夭夭，是克里奥尔人才击败了英国人。这些当地出生的“美洲人”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西班牙帝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页即将在欧洲而不是在美洲写出。拿破仑在1807年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在“带有拿破仑色彩的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下，^[26]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以及葡萄牙殖民帝国即将从根基上动摇。

可与18世纪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扩张和发展相提并论的是葡萄牙的大殖民地巴西的扩张和发展。根据1494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葡西两国领地的分界线被确定为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27]处南北走向的一条线。这条线至少在西班牙人看来是从亚马孙河口略往东穿越南美大陆，直达现在的桑托斯镇略往西的圣保罗海岸。然而，早在17世纪，来自北方马拉尼昂州的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以及南方的淘金者和捕奴者，即圣保罗著名的“奴隶猎取队员”^[28]都已向西和向

南远远地越过这条旧日假想中的条约线。由于17世纪末在后来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29]的地区发现了巨大金矿，接着在18世纪20年代又在米纳斯吉拉斯发现了钻石，在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发现了金矿，从而坚定并加剧了葡萄牙殖民者这种向西面的推进。

随后引起的来自巴伊亚、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淘金热，不仅波及巴西的所有定居点，而且波及葡萄牙。成千上万的移民——巴西人、葡萄牙人、白人、黑人、混血种人等——纷纷涌入矿区。新的城市建起了，新的将军辖区设立了。1720—1748年，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先后成为单独的将军辖区。巴西发现的新财源，使已经由于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而日益衰落的东北部甘蔗种植园获得了支撑，这时葡萄牙的若昂五世又可以大肆挥霍，过起了想象不到的豪华生活。大量的巴西黄金也源源不断地从葡萄牙流入了英国。

但是葡萄牙的势力不仅是向西朝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分界线推进并越过此线，而且还向南边的拉普拉塔河地区推进。1680年，国王已在该河的北岸建立了科洛尼亚-德尔萨克拉门托移民镇。这个葡萄牙基地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岸，通过这一中心可将走私货运入秘鲁的腹地。这些走私货大部分是由巴西船队从里斯本运到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商品。科洛尼亚之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犹如牙买加之于西属南美洲北岸地区。该镇不久便被西班牙人摧毁，但接着又重建起来。四年后，又建立了拉古纳，后来成为圣卡塔琳纳将军辖区。此后，巴西的殖民活动转向南方的肥沃牧区，圣卡塔琳纳和南里奥格兰德，以及内地的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各省。科洛尼亚反复被西班牙占领又放弃，1750年根据马德里条约割让给西班牙。作为交换，葡萄牙得到了乌拉圭河以东由著名的耶稣会传道区占有的领土，同时葡萄牙对亚马孙盆地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亦得到承认。但是传教团的印第安人反对这一转让，科洛尼亚仍由葡萄牙人控制，该条约本身也于1761年被废除。实际上，拉普拉塔河以北边界地区因殖民野心而爆发的冲突，直至1777年才暂时得到解决。当时新成立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新到任的总督，率领一支约万人的远征军，占领了科洛尼亚和圣卡塔琳纳岛。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据圣伊尔德丰索条约再次试图划定它们美洲领地的分界线。这次，西班牙虽保留住了科洛尼亚和原耶稣会传教区的领土，但葡萄牙保持了它对亚马孙河地区广阔内地的领土所有权。葡萄牙还保住了圣卡塔琳纳和南里奥格兰德牧区，1801年它还占领了

乌拉圭河以东原耶稣会传教区的领土。随后在1807年把圣佩德罗的里奥格兰德的地位提高为将军辖区。

伴随着这些领土和经济的变化而来的是行政管理的变化。在1762年之前，巴西总督（有时称副王）的驻地一直是巴伊亚。由于认识到葡萄牙在拉普拉塔河以北有争议的地区实行进取政策，以及巴西南部和中部，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两个将军辖区不断增加的重要性，这个殖民地——此时已正式成为总督辖区——的首府于1763年从巴伊亚迁至里约热内卢。这要归功于若泽一世（1750—1777年）长期统治时期葡萄牙的实际独裁者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骚塞认为此人“没有良心、缺乏人道”，他写道，“他的野心的值得称颂的伟大目标”，“乃是使他的国家受益并使葡萄牙即便不是恢复到它一度拥有的国外殖民帝国，起码也要恢复其国内原有的那种繁荣富裕的状况”^[30]。庞巴尔是个不知疲倦进行工作的人，早在卡洛斯三世把耶稣会士逐出西班牙和西属美洲之前八年，他就已把耶稣会士逐出了葡萄牙和葡属领地。他抑制贵族的权力，整顿了国家财政，彻底革新了国家的内政。他还将注意力转向了巴西。虽然庞巴尔在葡萄牙殖民帝国推行的改革不如卡罗利内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改革那样广泛，但是两者都是为了相似的目的，即加强王室的控制和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

葡萄牙殖民帝国行政体制一直不如西班牙殖民帝国那样组织健全，而且这种状况仍然继续着。但庞巴尔为促进巴西的统一和巩固王室的权力作了很大努力。司法行政得到了改善。1751年在里约热内卢设立了一个新的高等法院，类似于巴伊亚已有的法院。1754—1757年编纂了39卷的法典。1765年在数省建立了司法委员会（Juntas de Justiça）。仍然存在的私有的将军捐赠地（capitanias-donatárias）——半封建性质的世袭将军辖区——通过购买或没收而废除了。迄今一直直属于里斯本的马拉尼昂州被解散，由此而组成的帕拉和马拉尼昂两个将军辖区最后被并入巴西。在法律上，印第安奴隶制被废除，对犹太人的迫害也结束了。推广了民兵制，招募了殖民地民团，并从葡萄牙调来更多的正规军。1765年从里斯本起航的有护航的船队被一种巡逻制度所取代，不过后来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护航船队在1797—1801年间曾短暂恢复。部分是为了给巴西吸收新的资本，部分是为了摆脱英格兰对通过里斯本的巴西贸易的控制，1755年

和1759年先后建立了两个垄断性质的贸易公司，即“大帕拉和马拉尼昂总公司”和“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公司”。后者不如前者成功，但在1777年庞巴尔下台后两者均未能存在多久。

此时，巴西进一步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矿业周期^[31]已至尽头，黄金出口量在1760年以后不断下降，到了18世纪末，米纳斯吉拉斯的各矿区，包括著名的维拉里卡（欧鲁普雷图），正在或者已经衰落。另一方面，在18世纪的下半叶，农业则出现明显的复兴。这部分是由于欧洲对诸如糖、棉等主要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所致。棉花同南部各将军辖区种植的咖啡一样，是较新的出口作物。在18世纪80年代，从葡萄牙流入英国的不再是巴西的黄金，而是巴西的棉花。18世纪中期，使里约热内卢崛起的是黄金和钻石，而在该世纪末，甘蔗和棉花则使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显赫地位。

尽管矿业地区在衰落，尽管母国实行限制性政策——国王曾于1785年竭力停止殖民地的制造业——但巴西的财富和人口仍在稳步增长。在18世纪，巴西的人口实际上增加至大约10—11倍，到了1800年就已与葡萄牙的人口相等，不久便超过了它。巴西的一个个孤立的居民点处于半奴役半自由的地位，在种族和肤色上不知分多少等。它们分布在沿海岸一个大的弧形地带，从帕拉的棉花和可可种植园伸向南里奥格兰德的牧区。深入内地，亚马孙河上游1400英里处的塔巴廷加和巴拉圭河上游的科伦巴便是帝国的前哨。各将军辖区中人口最多的是内陆省米纳斯吉拉斯。但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及附近地区。建立在单一作物和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种植园制度，在巴西占主导地位。在南方和北方，土地的占有开始形成本地的贵族，这些贵族已把自己看成是巴西人而不是葡萄牙人。在巴西与在西班牙殖民地一样，美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由糖坊主、棉花和粮食的大种植园主、牧场主和牛群拥有者构成的土地贵族，在自己的种植园和自己的地方上是些大人物，常常还控制着市政委员会。他们鄙视普遍控制着殖民地商业生活的葡萄牙商人和移民，因而也引起这些人的憎恶。这种情况在1807—1808年间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当时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逃到巴西安身。仅仅在半个世纪前成为巴西首都和总督驻地的里约热内卢成为葡萄牙的首都和君主的驻地。

当时巴西仍是农业而非城市化社会，教育十分落后。该殖民地没有印刷厂，没有大学。职业阶层中的巴西富人在海外的科英布拉和蒙彼利埃受教育，殖民地的学校为数不多，教育大多掌握在耶稣会士手中，他们的被驱逐，对改进教育状况毫无好处。1772年成立了一个科学团体，称作“里约热内卢科学协会”，1779年改组为“文学社”，90年代被解散。其成员，或者说是部分成员，因被指控进行政治活动而遭逮捕。在艺术方面，最突出的是建筑。在建筑师和雕塑家中有一个名字尤为突出，这就是阿莱雅丁诺，绰号“小跛子”。他的真实姓名是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利斯博亚（1730—1814年），他在米纳斯吉拉斯建造的明快的巴洛克式教堂创造了自己的风格——阿莱雅丁诺风格。

虽然与某些西属美洲殖民地相比，巴西的文化生活不那么发达，但也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它从葡萄牙和科英布拉、从蒙彼利埃和法国汲取营养。巴西人到国外旅行。年轻的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在17岁时就被派往科英布拉，1800年在那里成为教授。他后来在争取巴西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人们阅读欧洲的书籍，有法文的、葡萄牙文的和英文的。后来牵连进著名的“米纳斯密谋”，也是当时主要文学家之一的克劳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曾试图翻译《国富论》。他在维拉里卡的朋友卡农·路易斯·维埃拉·达席尔瓦的藏书中有拉丁、法、葡、英、意、西等文种的书籍，其中包括孟德斯鸠、马布利、孔狄亚克和伏尔泰的著作。

导致克劳迪奥自杀的“米纳斯密谋”的重要性也许被夸大了。这次密谋是1788年由若阿金·若泽·达席尔瓦·沙维尔陆军少尉组织的，并得到米纳斯吉拉斯其他一些居民的支持。沙维尔当过牙医，因此被人们普遍称为“拔牙师”。这次密谋的目的是推翻葡萄牙统治，创建一个共和国，并将首都迁至圣若昂-德尔雷伊。但是密谋被人向政府告发了，“拔牙师”于1792年在里约热内卢被处决，其同谋者被流放到非洲，这场运动的主要起因也许是对米纳斯吉拉斯当地状况的不满，首先是“拔牙师”个人的不满情绪。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革命在米纳斯吉拉斯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而更明显的是反映出法国“启蒙时代”政治思想的影响。这次事件是个孤立的现象，并未在巴西历史上留下什么永久性的痕迹。不论是在1788年，还是在20年后葡萄牙王室抵达里约热内卢时，革命的思想均未在巴西广为传播。

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还有两个欧洲强国在南美大陆巴西的西北方拥有殖民地，这就是法属和荷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卡宴）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断断续续的殖民化过程后，越来越深地陷入停滞状态。在18世纪中期成为约500名欧洲人和5万名奴隶的家园。为了补偿法国丧失加拿大的损失，舒瓦瑟尔在1763年雄心勃勃地试图在库鲁河畔建立一个大的白人定居点，但除了损失1.4万条性命和3000万里弗尔外一无所获。1776年就任总督的维克托·皮埃尔·马卢埃劝导种植园主多种甘蔗，少饮甘蔗酒。他还设法在沿海低洼地排水，使这块殖民地大致能够自立。但是种植园主们强烈地反对他，最后他于1778年在一片唾弃声中引退。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混乱使开始出现的这些改善完全停顿。1794年法国国民公会废除奴隶制时——1803年拿破仑又恢复了它——绝大多数奴隶离开了种植园。拿破仑战争期间维克托·于格曾极力保卫这块殖民地，但于1809年被迫向一支英葡联军投降，直至八年之后才重归法国。

与法属圭亚那的停滞状态相比，荷属苏里南殖民地却给人以富有，甚至豪华的印象。在荷兰西印度公司及其合作者（组成苏里南特许协会）的统治下，它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不仅出产甘蔗和可可，而且生产咖啡和棉花。但是，它经常处于对奴隶暴动的恐惧之中，并深受反叛黑人劫掠之害。在荷兰西印度公司直接控制下的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劳伦斯·斯托姆·范格拉弗桑德。这位最杰出的荷属圭亚那行政官员于1738年抵达埃塞奎博，1742年担任该地指挥官（commandeur），在德梅拉拉建立后，于1750—1772年任两河地区^[32]总监。这两条河流已向各国的移民开放，并许诺10年之内免缴人头税。在斯托姆的鼓励下，来自巴巴多斯和其他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到18世纪末，当地白人大多数为英国人，所有的棉花种植园和大多数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均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根据1732年授予伯比斯协会董事们的一项特许状而由该协会治理的伯比斯则不那么繁荣。它因1763年的一次奴隶暴动而遭受重大损失，直到许多年后才得以恢复。

对所有的圭亚那殖民地来说，18世纪末年危机的年代。荷兰于1780年加入武装中立，埃塞奎博、德梅拉拉和伯比斯随即被英国的私掠船所占领，一年后被法国“解放”。荷兰恢复统治后，接着在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爆发了殖民者和荷兰西印度公司之间在税收问题上展

开的激烈斗争，直到1791年特许状期满方告结束。两河地区（同苏里南一样）随后便被置于三级会议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由于1795年尼德兰联合省执政的逃跑，联合省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并成为法国的紧密盟友，圭亚那殖民地再次处于随时会被占领的境地。埃塞奎博、德梅拉拉和伯比斯三地于1796年被占领，苏里南于1799年被占领。1802年它们被交还给巴达维亚共和国，但1803—1804年再度被占领。但这一次只有原为英国殖民地的苏里南归还荷兰，而埃塞奎博、伯比斯和德梅拉拉不久便成为英属圭亚那殖民地。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端的老牌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33\]](#)

圭亚那仍然是殖民地，只是其中有些地方换了主人。尽管英属北美殖民地爆发了起义，但不仅是中美洲、南美洲而且西印度群岛等地的欧洲殖民地均未改变其地位。

圣多曼格在18世纪的崛起仅仅是昙花一现。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该殖民地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出产最多的地区之一，以残酷无情但却有效的方法组织生产甘蔗、咖啡和棉花，每年雇用1000多条商船与法国进行贸易。它的政府甚至比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政府还要极权，掌握在一位军事总督和一位文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在当地不存在任何代议机构。其社会结构异常复杂。为数不多的白人——约35000人——分为“大白人”和“小白人”。“大白人”包括大种植园主、富商及高级文职官吏。“小白人”则指其余的白人。白人又分为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即土生的人和国外出生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彼此极端憎恶。在他们之下，受到所有白人鄙视的是“有色人”，而不论这些人处于何种地位。这些人又被称为“自由黑人”（affranchis），人数为28000左右。所有的自由人，只要带一点点黑人血液，就成为“有色人”。他们当中有极少数是纯粹的黑人，极少数几乎是纯白人，大多数则是混血种人。这些“有色人”的物质财富一直在不断增加。其中许多人既是奴隶主又是地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受到极大的羞辱，尤其是受到“小白人”的羞辱。法律把他们排除在有学问的职业之外，禁止挥霍浪费的立法还不许他们仿效欧洲人的时尚，如佩带剑或腰佩武器等。最后，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也在阶级结构体系之外的，是庞大的奴隶劳动力。奴隶人数近50万，其中半数以上是不久前才输入的非洲出生的人，而不是在本岛上出生的人。有很少数人，如苏里南的反叛黑奴和牙买加的“逃亡黑奴”，是逃脱了奴隶制

的控制而在森林和高山深处野居或靠打劫为生的人。其余的人则常常受到白人和“有色人”的残酷压迫，因恐惧而低声下气地生活着，而且在他们自己中间散布着恐惧感。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大白人”中少数有雄心的人不顾总督的反对，坚持向三级会议派出代表，期望为该殖民地赢得一定的自治权，并由他们自己担任总督。他们被人权宣言吓坏了，认识到把革命的注意事项吸引到圣多曼格事务中来的危险，但为时已晚。于是匆匆忙忙获得了国王的授权，召开了一个只对国王负责的殖民地议会。但是，伤害业已造成。此后，该殖民地的命运便同法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法国的废奴主义团体“黑人之友社”大力维护“有色人”的事业。起初国民议会就自由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前后矛盾和意义含糊的法令（每项法令均在该殖民地引起剧烈的反响），最后在1792年4月不仅通过法令批准了“有色人”的选举权，而且派遣三位雅各宾党人为特派员，率领6000人的军队前来，确保这一法令得以实施。这些人于1793年8月宣布奴隶获得解放，他们的行动在1794年2月得到法国国民公会的批准。

与此同时，圣多曼格出现了可怕的情景。“大白人”首先对当局提出挑战。但是革命的激情迅速蔓延，先是感染了“小白人”，继而影响了“有色人”——混血种人的第一次起义发生在1790年春季和秋季——最后波及黑奴。该殖民地北部的黑人大起义于1791年8月开始，造成了恐怖局势，而不久爆发的种族战争，即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有色人”起义造成的恐怖，足以与之相提并论。抵达该地的雅各宾党人专员于1792年9月取代了先前的几位专员，但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些专员行使独裁权力，先是加剧了“大白人”和“小白人”之间的分裂，接着又以“大白人”和“小白人”的利益为代价，抬高了“有色人”的地位，最后他们又因转而支持黑人并制定解放奴隶的法令而疏远了“有色人”。到了1793年年底，圣多曼格殖民地已化为废墟，其繁荣已被摧毁，社会秩序已荡然无存。在北部，数以千计的白人不是迁走就是被屠杀。在东部，则受到该岛西班牙控制部分的入侵威胁，因为法国与西班牙已于1793年3月宣战。而在南部，不久又在北部和西部，英军应绝望的种植园主和白人移民的请求登陆，开始进行干预，一直持续至1798年，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和代价。

在以后的七年中，出现了黑人、混血种人和英国占领军之间的三角战争。领导黑人的是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图桑，又名卢维杜尔，原是奴隶，曾参加过1791年的黑人起义。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开战，他便在该岛东部参加了西班牙的军队。很快得到擢升。1794年，他下令屠杀西班牙士兵，率领手下的黑人士兵投奔了法军。他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因此在1796年被授予副总督的职位。他于1798年安排了英军的撤离，还极为巧妙地确保了最后一批法国官方代表返回法国。在他与英国人的斗争中，得到了混血种人领袖安德烈·里戈的帮助。当时图桑控制着北部，安德烈·里戈控制着南部，在那里他实际上把黑人重新置于奴隶地位。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联盟并不和谐。随着英军的撤离，图桑和黑人便毫无顾忌地向里戈和混血种人发动了一场种族战争，使南部地区备受蹂躏，荒无人烟。剩下的事就只有占领西属圣多明各了。西属圣多明各根据1795年的巴塞尔条约割让给法国，但经法国同意，仍由西班牙人占据。1801年它被占领，同年颁布了一部在全岛施行的宪法，任命图桑为终身总督，并有权指定其继承人。迁走的白人又被请了回来，黑人开始好好地工作，圣多曼格又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一年后这种局面就结束了。拿破仑由于签订了亚眠和约而暂时脱身，把注意力转向新世界，派他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去行使法国的权力。图桑被迫退位。他被背信弃义地逮捕并解往法国，1803年4月死于法国的一所监狱中。勒克莱尔先于他死于在法国军队中肆虐的黄热病。黑人和混血种人听到混血种人的社会地位被重新剥夺和奴隶贸易恢复的消息后，绝望中被迫再次奋起反抗，而这次则是一场独立战争。战争的双方都骇人听闻地残暴。但是欧洲战火又起，敲响了法属圣多曼格的丧钟。1803年11月，法国人向附近海上的英国海军投降，1804年1月1日，黑人领袖让-雅克·德萨利讷宣布海地独立，在此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几乎已看不到任何活着的白人了。

（张志军 译）

[1] 约翰·林奇：《1782—1810年西属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地方行政长官制度》（伦敦，1958年），第1页。

[2] 威廉·罗伯逊：《美洲史》（最后审定的第5版，3卷本，伦敦，1788年），第8卷。

- [3] 《美洲状况的秘密报告》（伦敦，1826年）。虽然这份报告被认为是两个人所写，但德乌略亚即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主要的作者。
- [4] 位于内格罗河畔的卡门-德巴塔哥内斯（Carmen de Patagones）建立于1779年。
- [5] 东岸地区（Banda Oriental）指拉普拉塔河以北和乌拉圭河以东的领土。
- [6] A. S. 艾顿：《根据家族盟约进行的西属殖民地的改组》，载《西属美洲历史评论》第12卷（1932年），第274页。
- [7] 奥克塔维奥·希尔·穆尼利亚：《国际政治中的拉普拉塔地区。总督辖区的建立》（塞维利亚，1949年），第103页。
- [8] 这是赫罗尼莫·德乌斯塔里斯根据1704年的一本英文小册子提出的数字。见约翰·基帕克斯译《商业和海运事务的理论与实践》（2卷本，伦敦，1751年），第1卷，第137页。
- [9] G. 塞斯佩德斯·德尔·卡斯蒂略：《利马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载《美洲研究年鉴》第3卷（1946年），第791页。
- [10] L. E. 费希尔：《西属美洲的总督制》（伯克利，1929年），第97页。
- [11] 地方行政长官制（intendancy system），亦译监督管辖区制。——译者注
- [12] 见前面原文第397页，注③。
- [13] 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新西班牙殖民地政治论文集》（5卷本，巴黎，1811年），第2卷，第11页。
- [14] 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新西班牙殖民地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25页；第3卷，第286页。
- [15] 梅斯蒂索人即印欧混血种人。——译者注
- [16] 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新西班牙殖民地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2页。
- [17] 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新西班牙殖民地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3页。
- [18] C. H. 哈林：《美洲的西班牙帝国》（纽约，1947年），第345页。
- [19] 理查德·赫尔：《18世纪的西班牙革命》（普林斯顿，1958年），第146—147页。
- [20] 有关上述各段，可比较R. J. 谢弗《西班牙世界的经济团体（1763—1821年）》（纽约州锡拉丘兹，1958年）；J. T. 兰宁《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的18世纪启蒙运动》（纽约州伊萨卡，1956年），及A. P. 惠特克编《拉丁美洲与启蒙运动》（纽约，1942年）。

[21] 《阿根廷史料》第7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年），第157页。

[22] 特里尼达备忘录，国家档案馆，殖民部381/2。

[23] 但是在18世纪晚期的思想影响中，人们过多地——也许是太多地——注意16世纪西班牙天主教思想的各种理论的复活，尤其是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的理论的复活。

[24] W. 雅各布：《关于占领西属美洲的计划以及对其居民的特征和看法的观察》，1804年10月26日，国家档案馆，查塔姆文件，G.D. 8/345。

[25] 《1799—1804年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海伦·玛丽亚·威廉斯译，7卷本，伦敦，1814—1829年），第3卷，第196—197页。

[26] 查尔斯·K. 韦伯斯特爵士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12—1830年——外交部档案馆文献选编》（2卷本，伦敦，1938年），第1卷，第8页。

[27] 1里格约为3英里或3海里。——译者注

[28] “奴隶猎取队员”（bandeirantes），原意为“打旗的人”。17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内地猎取奴隶的远征队，因其通常均有一面队旗，故名。——译者注

[29] 意为多种矿产区（General mines）。

[30] 罗伯特·骚塞：《巴西史》（3卷本，伦敦，1810—1819年），第3卷，第505—506页。

[31] 指葡萄牙人掠夺巴西资源过程中继“红木周期”“食糖周期”之后出现的黄金、钻石开采热。——译者注

[32] 指埃塞奎博河和德梅拉拉河。——译者注

[33] 圣多曼格（Saint Domingue），亦译为法属圣多明各，即今海地。——译者注

第十五章 革命时代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18世纪末叶有一个革命时代，宛如16世纪有过一个新教改革时代那样。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所有国家发生的事情都一样。16世纪到处对教会的状况深为不满，不过只有某些地方以各自的方式皈依新教——路德教、英国国教或加尔文教，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的长时间里连新教这个共同的名称也不肯接受；某些信奉新教的地区反而回过头去信奉天主教，以致多数欧洲人终于仍然信奉罗马教会。同样，在据认为是革命时代的18世纪最后1/3的时间里，存在着对政府和社会状况的普遍不满。许多国家对顺乎人心的改革方向抱有相同的想法。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出现了相同的关键性政治词汇：“贵族政治”和“封建主义”对那些赞成新秩序的人来说含有贬义，“人民主权”“平等”和“天赋权利”对他们则具有褒义。还有少数词如“宪法”“法律”以及“自由”等则是所有人都赞赏的，尽管有着不同的含义，不过，只有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和法国这两个地区，革命才达到永久摧毁旧政权的地步。只有在法国，革命进行了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法国人才完全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因为就连美国革命也受惠于法国的干预才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在1789年之前和之后，其他革命运动也大量涌现，在爱尔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奥属尼德兰、日内瓦、波兰以及意大利各国都发生过。在英格兰和匈牙利，有些人的观点如果得以实现的话，也足以称为革命。约瑟夫二世试图在哈布斯堡各国进行一场反特权阶级的君主制的革命，在瑞典，这样的革命由古斯塔夫三世以有限的方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在德意志，类似的现象如许多德意志人在18世纪90年代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思想革命”。拉丁美洲在1810年后获得了独立。最后——尽管1815年很难说是最后——大多数欧洲人重新生活在旧政权的统治之下。不过，全欧洲以及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

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内容。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似乎没有领土限制。伯克则认为它是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一场内战。重

复希望发动一场所有国家的人民反对所有国王的战争的法国和其他革命者在1792年发出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叫嚣，如今已不会令人信服；最好还是听一听荷兰保守的年轻贵族G. K. 范·霍亨多普的说法。他于1791年在鹿特丹写道“在所有国家中”形成了两大党派。他说，一个是教会和国家的党，它相信“一个人或若干人有权治理人民大众，这种权力是神授的，并得到教会的支持”。另一个党他称为人民主权或民主党，这个党不承认任何政府，“除非它是在从属它的人民的自由赞同下产生的”，并主张“凡参加政府的人都应对他们的行为负责”。^[1]既然革命时代发生的种种冲突均可以归于仅仅这两方，那么对双方的分歧就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说法了。

用霍亨多普的话说，这两大党派的力量、成分、发展、目的和命运，因国家的不同而迥异。当时也跟历史上所有的时期一样，欧洲人的世界乃是一个既协调一致又复杂多样的混合体。在18世纪，其最活跃的中心是一个一匹马用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人送到伦敦或巴黎那么大的地方。这个欧洲人的世界向东延伸至俄国，向西则延伸至美洲的业已由好几代欧洲人后裔定居的那些地区。本章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考察这一地区，以期说明那些社会的和思想感情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便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地方发生了革命，而有些地方没有发生；有些地方出现了革命的宣传鼓动，有些地方则没有；有些地方同情革命，有些地方却不同情。它勾勒的是一幅略图，从图上可以看到种种差异、相似之处以及相互间关系的概貌。在这样的地图上，有许多东西必须从略，连绵不断的山脉只是几条线，大城市只是几个小点。这样的地图显然不能替代尺幅更大和更加精确的作品；不过，它也许有它的用处。

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从乔治·勒费弗尔教授的著作中看到，应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四个不同运动的共同产物。它们是：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和城市工人阶级革命。正是由于这四种革命同时发生才形成了这场伟大的革命，也正是由于这四种革命具有不同目的，才使这场革命十分复杂而且旷日持久。一批有造反精神的贵族在资产阶级暂时的支持下，迫使路易十六于1788年召开了三级会议；但是，正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分歧，或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推行必要的改革遭到失败，才造成了1788年以前政府的垮台；并且，正是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或资产阶级拒绝接受一

种贵族革命的目的，才使三级会议于1789年6月变成了国民议会。正是由于农民起来反对庄园制度，以及资产阶级领导人接受了农民的要求，才使得国民议会得以继续存在下去。正是由于巴黎小市民——市场女摊主、工匠、小店主和短工——的起义，才给了国民议会中各先进的党以力量。贵族的倾向于反革命，甚至乞求外国的援助，激怒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各式各样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作为一个阶级，谁也不会去赞成反革命的纲领。事实上，正是他们协同一致的力量，促使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成功达到了旧政权永远无法复辟的程度。法国革命激起了所有阶级参与政治行动的热情。倘若上述四个阶级中任何一个阶级持冷漠态度，或仅仅持保守态度，那么，事态一定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冒着某种武断的危险说，没有贵族的反叛就不会有三级会议，没有资产阶级的反叛就没有国民议会，没有农民的反叛就不会废除“封建制”，没有城市人民大众的骚动，就不会有抵抗反动势力的坚定立场，没有农民和人民大众的动乱也就没有抵御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国民自卫军。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同样的普遍意义上看到，为什么其他一些革命运动夭折了。在匈牙利，议会中的贵族于1790年公开反叛利奥波德二世；但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农民又持敌对的态度。农民也起来造反，与一年前法国许多地方的情形不相上下。他们的起义被称为自1514年以来最猛烈的匈牙利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受到已故约瑟夫二世所试图进行的改革的激励，农民反而为他的弟弟利奥波德而战，反对他们自己的马扎儿领主。匈牙利农民起义被从帝国其他地区调来的军队所平息。在波兰，1788—1792年之间，国王与贵族发动了一种反对权贵和俄国势力的革命；城镇阶级的软弱和农民的消极态度使改革家们在反对反革命势力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荷兰，奥属尼德兰和爱尔兰，很明显革命运动仅局限于城镇中产阶级。荷兰的爱国者党于1784—1787年间发起一场革命，但农村人口保持沉默，而城市下层阶级却支持奥兰治亲王，1789—1790年间的比利时民主派受到议会派的镇压，并受到受宗教狂热影响的农民的恐怖对待。爱尔兰志愿军以及1798年的爱尔兰人联合会，在农村天主教群众中也没有足够的基础。同样的弱点还影响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由当地的革命者同法军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各短命的共和国——巴达维亚、海尔维第、阿尔卑斯山南、利古里亚、罗马以及帕特诺珀等共和国。在这

些共和国中，没有一个把农业人口争取过来，拥护新秩序的。所有这些共和国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政权，只有一小撮比较先进的激进分子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这些地方的革命均由于本地的原因而引起，目的在于满足地方的需要，但其力量均依靠法国的军队。可以把这些中产阶级和城市革命运动的情况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作一对比。在美国，也是由于法国陆海军的行动，才使明确的军事和外交解决成为可能。但是，北美的反英起义在农业人口，特别是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农业人口中，在人数较少的城镇居民和一些在美洲被当作贵族看待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倘若没有法国的支持，也许会成为一种无限期僵持的非正规抵抗的局面。

就这一点而言，上述看法意在说明：若想了解革命时代的社会与心理基础，如本章标题所提示的那样，那么就必须研究各个国家的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镇劳动阶级，以便弄清这些阶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对他们的人数和力量有个概念，注意他们彼此之间和对政府所持的态度，并研究使他们联合或分裂的各种条件。“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乃是一些抽象分类的名称，其内容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极为丰富的。法国贵族的成分十分复杂，法国农民则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把同样的词语应用于十多个国家，其具体含义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波希米亚的领主并不相当于英国的领主；华沙的市民（burgher）与图卢兹的资产者（bourgeois）或利物浦和费城的资产者相比，是完全不相同的人；而东欧、法国、肯特和康涅狄格等地的“农民”之间，其差别就更大了。要看到这些差别，切不可把什么人都纳入同一类或仅仅从局部出发，以便弄清楚这四种社会分类在不同的国家中究竟具体是指什么。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欧和东欧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别很大，其分界线大体上是沿着易北河和波希米亚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这条线以东的城镇都很小，而且相距较远。在俄国的波罗的海各省、在波兰、在波希米亚和在匈牙利，其城镇居民是日耳曼人，有些地方是犹太人，这种情况极为普遍。而且，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种族上都与邻国不同。在波兰，50个最大城镇的全部居民，总数也只不过比贵族人数的一半稍多一些——这个比例可以用来跟法国相比，法国50个最大城镇的人口是贵族的5倍；在英国，单是曼彻斯特、利物浦和伯明翰等地人口1801年的合计数，就约等于帕特里克·科洪^[2]将之列入靠非劳力收

入为生的贵族，即男爵、爵士、乡绅以及女士和绅士的那些人的总和。在东欧，由于商业发展和君主政体的水平较低，使得在西欧看到的那种不论是商业型还是文官型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城镇享有的政治地位还不及中世纪。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议会中实际上不再有他们的代表，而在匈牙利议会的下院中，他们总共只有一个投票权，与农村也只有一个绅士作为代表一样。

在这个东部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地主。普鲁士、哈布斯堡和沙皇统治的各国的基础就是迎合地主的愿望，而波兰的地主则根本阻止任何有效的国家的发展。他们的主要愿望在于就地控制他们的农业劳动力。农民毫无自由可言。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农奴，当时一般称之为“子民”，指的是地主的而不是国王的子民。农奴为地主从事无偿劳役。在遵守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法律的地方每周三天，在逃避遵守这些法律的地方达每周六天，而在像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地方，比哈布斯堡领地更加不注意减轻农奴制的痛苦。没有地主的许可，农奴不得离开庄园，不得因婚配而离去，也不准去学一门手艺。对从事农业的大众来说，劳动力的流动率几乎等于零。更恰当地说，这完全按地主的指示行事。地主可以按通常的方式经营其庄园，或采取把农产品或林产品销售到远方市场上去的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它，也可以将他们的一部分劳动力转向工业或矿业活动。东欧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与奴隶劳动相结合的贵族企业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农奴是置身于经济和政治体制之外，毫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动机可言；他可能挨饿，也可能果腹，取决于收成的好坏，但工资的波动、就业机会的多少、商品买卖价格的起伏等，也许可以使一个法国农民激动，而在东欧就不会有多大影响；至于政治当局或法庭，则除地主本人外，不过是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道听途说中听到的遥远的事物。

结果是造成各阶级之间的隔阂与互相疏远。我们在20世纪听到的只是一种与种族差异联系在一起的憎恶情绪。在波兰的四年议会中，一些议员一想起市民当上了代表便火冒三丈，以致以退出议会相威胁。这个议会是与制定1791年的革命宪法联系在一起的，确实曾同意接受市民的代表，但拒绝称他们为议员，而称为全权代表，因为议员的称号是保留给由州议会派出的贵族的。就好像城镇是这个国家的外来成分。农民实际上按其生活的状况似乎成了另外的一个民族，约瑟夫二世曾试图通过改革使他的帝国的农民变成类似革命前的法国农民

那样，免除强迫劳动和体罚，干活拿工资或按土地缴纳固定的赋税。但帝国所有议会中的贵族地主们异口同声地发出警告与非难。他们说，老百姓太幼稚，金钱刺激对他们不起作用；太没有责任感，一旦付给工资，就会拿钱上酒店去挥霍；太懒惰，不监督就不干活；太贫穷而无知，除非在工头监视下，“精神太粗鲁”，而且缺乏荣誉感，只有以监禁相威胁才能威慑住。总之，老百姓太不开化，没有“体罚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就无法对付他们。^[3]波希米亚议会对应将捷克的农民称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的提法表示惊讶。在东欧，“国家”一词通常是指由贵族和乡绅组成的政治国家；市民是局外人，农民则只不过是人罢了；把国家看成是所有各阶级组成的共同体，这种思想——革命时代的基本思想——在易北河以东是难以通行的。阶级差别是比种族差别更难逾越的障碍。

这种土地乡绅和奴隶劳动力并存的严酷局面，使美洲的某些地区与东欧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西印度群岛以及从弗吉尼亚到南方操英语的地区。伯克曾把弗吉尼亚人同波兰人相比，其实他也可以把他们跟匈牙利人相比。他认为由于受奴隶制的四面包围，在上述两种情形下，人们具有的某种高度的自由意识就变得更加尖锐了。美洲的奴隶主和东欧的农奴主都忙于参加郡县的各种会议，他们对城市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喜欢中央政府而乐于加以抵制，他们具有贵族的自我意识，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工人们天生低劣而不可救药。在这些方面，他们不自觉地如出一辙，从相反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相似之处在波兰思想最激进的改革家胡戈·科瓦泰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他甚至主张立即废除农奴制。他于1790年指出，美洲和欧洲的黑奴和白奴都是人，平等的人，地球的公民。美洲的种植园类似东欧的大庄园，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仍然有差别。即使在南卡罗来纳，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白人并且是自由人。那里不但有许多规模较小而不拥有奴隶的农场主，特别是在这些南方州的西部，有许多新近从宾夕法尼亚或爱尔兰和德意志迁来的人，似乎还没有接受没有奴隶制就无法生活的观点。在18世纪，就在棉花王国^[4]兴起以前，许多奴隶主本人已对奴隶制的价值持怀疑态度。首先，为了眼前的利益，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一些土地贵族可能并且确实很容易同查尔斯顿以及北方城镇的商人结合到一起。他们还可以联络一些小农场主作为政治上的追随者。虽然可能偶尔发生阶级纠纷，但在一个新建立

的国家里不存在什么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阶级隔阂，而且除黑人外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世代相传的疏远感。

可以用与东欧相对比的办法来了解西欧。在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荷兰和法国，是德意志人称为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的地方，以区别于地主家族所有制（Gutsherrschaft）。领主的生活不是靠经营自己的地产，出售其产品和亲自或通过监工去指挥从属于他的劳动力，像在东欧那样；他们的收入来自领地或庄园的农民向他缴纳的赋税、免役地税、通行税、租地继承税，使用炉灶和葡萄榨汁器缴纳的费用等。这些农民，按法律规定可以自由来去、买卖、为争取工资而受雇于人以及在乡村的权利和习俗容许的范围内耕种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领主享有残余的司法权，但受皇家或领地的其他法庭的管辖。但从根本上来说，“封建主义”已成为财产和收入的一种方式。其特征在于，获得这种收入的是贵族。但是，特别是在法国，庄园的所有权按法律规定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因而有许多资产者、教会团体、学院、医院甚至农民也获得这种收入。然而，获得收入的这些人不再从事经营管理或其他方面对社会有益的经济贡献。因此，在革命时代的法国和邻近国家能够而且确实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将这种收入废除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经济体制受到强烈的干扰。革命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却保持了连续性。

农民按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已引起分化。一些农民是地产的所有者，他们占有的土地尽管要缴纳庄园的各种赋税，但是产权有了保证，可以继承并受到法庭的保护。其他的农民以年度为期租种若干片土地，或按分成的办法在土地上从事劳动。在多数地方有一大批农业无产者，按日计工资受雇于另一些农民、贵族、资产者或其他土地所有者。好多农民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产品拿到城镇上去出售，在西欧与在东欧和美洲不同，这里很少有离开至少具有某种地区重要性的城镇超过一天路程的地方。在东欧，农民可能成为自然灾害的牺牲品；而在西欧，农民则既可能成为各种经济力量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其受益者。价格和工资的升降都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18世纪中期是农业人口比较幸运的时期。农产品价格逐渐缓慢上涨，使那些占有或租种足够的土地并拿出产品出售的人受益。大约1770年以后，这种价格上涨的趋势停止了，这至少在法国（拉布鲁斯教授的著作使人们对法

国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农民非常不利，因为随着收入的减少，领地税、地租以及种种税收即使保持固定不变，农民的负担也感到比以往重多了。事实上，负担本身越来越重，政府需要征收更多的税，上层阶级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也使得许多领地所有者更加苛刻地征收领地税，这在旧政权的末期叫作“封建的反动”。与此同时，纯粹靠工资收入的阶级，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都遭受到工资增加远远少于食住价格上涨的痛苦。

易北河以西地区，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也是资产阶级的领地。由于这一名称本身的意义就很难加以界定，也就无从对之作出数字上的估计。城市的大小无法准确表明，因为城市资产者特别是在法国，可能主要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就18世纪资本主义和工业技术的性质而言，城市化并不能表明工业的发展。那不勒斯从表面上看是除伦敦和巴黎之外的欧洲最大城市，但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生活的巨大中心。

形成“资产者”型社会的是制度而不是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土地贵族本身，甚至一些农民也可能成为资产者。一个国家，如果土地所有权和对人的管辖权这两者有了区分，如果土地拥有者不是封建领主，如果土地可以向任何有钱的人开放、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如果土地拥有者不满足于获得通常的收入而是想方设法增加产出以发展他的资产，或者像伦敦房地产主或美洲土地投机商那样持有土地是为了增加其价值，或者用作抵押物为从事商业或工业或改进农业而筹集资金，那么，如果达到这个程度，它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封建”国家了。这种发展形式在英国已达到最高程度，它使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成员有了共同的观点，而且由于在法律上没有阶级之分，因此至少对团结一切有产者以反对革命的诱惑起了作用。如果说法国发生了革命，那部分是由于为数众多的贵族继续依靠封建领主式的收入为生，而又没有东欧地主那样的实权；与此同时，还由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富有的开明贵族有可能取得比较现代式的财产权，而摆脱了封建领地式的习俗和个人地位，并允许产权拥有者在运用其所有权方面有更多的自由。

为了进行这种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属北美北部各省，从宾夕法尼亚到新英格兰，已经是“资产化”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资产阶级。美国在建国时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农村。一百个美国人当中生活在像波士顿那样大城镇的还不到3个人，而波士顿当时也只有

16000人。相应的数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01年约100人当中有17人；法国1787年约为11人。英属北美殖民地至少就数量来说是农场主的世界，而且除了南部的大种植园和哈得孙河流域的庄园制外，是一个小农场主的世界。由于这些农场主是土地拥有者而不是租佃者，他们甚至不能算是英国或法国含义上的农场主。他们拥有明确而不受干扰的财产权。他们的权利并非源于某某领主的家族，而是根据近代法律在可以记起的时间里是由皇家授予的。他们既无须上仰仗于贵族，也不必下依靠一定数量的雇工。每个家庭耕种自己的土地，不像欧洲农民那样在情感上束缚于土地。农场是收入的来源；可以随时放弃，到更远的西部去寻找更好的农场和机会。全体居民受一种占有欲、事业心、流动性以及独立自主意识所感染，至少与相应的英国或欧洲下层阶级相对比是如此。

然而，在欧洲和美洲都有一些人和机构很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些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注重培养人、有固定收入和工作习惯的人。这些人感到自己高于普通群众，但还不属于社会精英之列。尽管可以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一行列，但这个阶层本身却几乎像贵族和农民阶级一样是世袭的。既然我们是在做概括的论述，那么可以说资产阶级家庭是从中世纪以来的两种方式兴起的：不是与政府就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在中欧，官僚资产阶级比商业资产阶级的实力要强大。由于缺少出海口，小政治团体的林立、行会系统和自治城镇的强有力等因素，妨碍了商业与银行业的发展和大规模资本的形成。当地的市民不是为某一王侯效力的行政官员，就是在由国家计划并出资的制造业当雇员，在普鲁士就是如此。或者，他也许可以开办一个在投资和销售额上都不是很大的企业，例如，奥属尼德兰最富有的银行家、布鲁塞尔的爱德华·德瓦尔基尔斯每年收入6000英镑，与伦敦城之负盛名的最大富翁威廉·贝克福德年收入10万英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基本上是小共和国的一些地方，比如在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和瑞士的州，某些市民家族本身就构成永久性的政府人员，并从按惯例规定的津贴获取收入。如统治纽伦堡的20个贵族家庭以及伯尔尼或米兰的相应贵族就是这样。米兰的贵族与德意志或法国的贵族一样，要是他跑去从商，就会降低威信或丧失地位。

在英国和荷兰，出身于商界的资产阶级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由于私人拥有资本、从跨海洋的贸易中获得利润，以及由于仅仅在政府

的一般监督和保护下习惯于冒风险和处理事务，因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独立地位，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出现这么大的商业阶级。据估计，1800年左右在英国2.28亿英镑的国民总收入中，约有4000万英镑来自国内外贸易，而地租的收入仅为3500万英镑。至于荷兰，商业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就更大了。不过，在荷兰诸省中，某些市民家族和商界出身的人已成为“摄政官”更多地忙于政务而不是经商。富有的荷兰人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靠从国外投资中赚来的钱生活。1777年，他们拥有40%的英国国债，并同法国人一道资助美国革命。

在法国，官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人数众多，而且居于重要地位。古老而完备的君主政体，复杂的法庭网络，18世纪陆军部、邮政系统和道路桥梁管理机构的迅速扩大，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与政府有关的律师、官吏、工程师以及各种专家的人数。在革命前夕，法国有78个各拥有10000多人口的城镇；每个城镇不仅有其商业阶级，而且有已经确立并往往享有特权的市政寡头集团。巴黎的银行家和包税人以及商人和因与西印度和亚洲通商而致富的港口船主，则代表了一个比较纯粹的出身于经济活动的资产阶级。此外，由于科学、学术团体、印制和读者群的发展和增加，在法国比在别处更加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乃是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比德意志和英国的相应群体对现状更为不满，与政府和商界的日常联系也较少。有些人，如伏尔泰，系出身于赚了一大笔钱的真正资产阶级家庭；更多的人也许在经济上处于卢梭那样的困境；有些人，像孟德斯鸠，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而大多数人，像杜邦·德·内穆尔或孔多塞侯爵，则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主张建立一个废除特权和贵族统治，为不是贵族的人发挥更大作用开辟道路的社会。

革命的和激进的运动主要是针对“贵族统治”的。“贵族统治”这个词有时具有相对的含义，因使用人所处社会地位之不同而各异。因此，出身名门望族的法国贵族在1788年所抱怨的也许是宫廷的贵族统治，而英国乡绅们所憎恶的则可能是大贵族老爷和太太的贵族统治。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795年拥有约60万人口的巴黎这个城市中，一位怒气冲冲的工人可能高声咒骂：“所有的富人都是流氓恶棍，在巴黎有数以百万计的这种人应受到惩处！”^[5]即使如此，为了现在的目的，为这个词下某种定义仍然是可能的。

贵族统治与贵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方面，在某些君主制国家，有一些非常普通的人可能由于王室采取的举措而获得贵族地位，像犹太人神父宗南费尔斯由玛丽亚·特蕾西亚封为贵族地位，或者像杜邦·德·内穆尔由于他担任制造业的检查官所做的贡献而获得了贵族特许状。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贵族统治者。另一方面，没有贵族的国家无疑也实行过贵族统治。1776年以前，在英属美洲就存在贵族统治，由在总督的参事会中占有席位达三四代人已久的某些联姻的家族组成。这帮人在公共事务中一直继续在起作用，并且在获得授予的土地方面得到明显的好处。在实行共和制的日内瓦也存在过贵族统治，在1768年革命中，那里的小型委员会中地位已经确立的贵族受到市民中民主派的反对。米兰的贵族无疑是贵族统治者，就像威尼斯高度非封建的“贵族”或纽伦堡的统治家族一样，他们只许自己而不许别人佩剑和戴有羽毛装饰的礼帽。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个自由城市，1731年制定了一项法律，把居民分成五个等级。最高一级是在市政委员会拥有席位达“一百年”的人，这些人还持有神圣罗马帝国颁发的世袭贵族特许状。在荷兰，贵族是无足轻重的；该省的全体贵族实际上在议会中只有一个投票权，18个城镇就只有18个投票权。荷兰的贵族统治是由一些摄政官构成的；这些人如果追溯其祖先，主要都出身于城市自由民。但是，这些人现在控制在某些世代相传的家族手中。在英国，只有200名实际的贵族，其余的贵族从法律上讲是普通人；但存在一种土地贵族，实际上通过议会统治着这个国家。根据格雷戈里·金和帕特里克·科洪的估计，这批人不到全部人口的1.5%，与对法国贵族的估计数字相当。东欧的贵族成分比较复杂，人数较多，而且不受严格的限制，估计在波兰占人口的8%，在匈牙利为6%。

按照18世纪的含义，可以将贵族视为一批享有世袭优越地位的人。他们受到别人的敬仰，彼此之间有私人来往或希望在初次引见时受到平等的对待；一般情况下相互联姻，从诸如地租、旧日的投资、在教会或国家机构领取薪俸，通常参与公共事务，在最好的情况下则认为能为他人谋福利尽一份责任。在一些即使有信仰自由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统治集团按照法律或在事实上应是信奉国教的。在英国，根据宗教考查法，只有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重要职务；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则只限于荷兰归正会教徒，在法兰克福只有路德派教徒才可以在市镇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活动必须具备教会成员资格，这在各地都是如此。在宗教感情受压抑的时代

里，很难说不信奉国教的人还成其为一种政治势力。而那些最热衷于宗教的人，像英国的卫理公会派和德国的虔信派教徒，实际上通常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但是，对国教持不同意见，即不信奉国教的人，在某些地方乃是产生不满情绪的根源；它产生一种排除异己或歧视异教的情感。事实上，这通常也是中产阶级地位的一种标志。英国的不信奉国教者、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徒、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最倾向于改革的人。詹森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在法国，新教少数派虽然跟大多数居民一样响应革命，但15名新教徒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和约30名新教徒在国民公会上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对新教徒来说乃是一场革命。不过，把法国革命归因于新教徒的行动，如同归因于启蒙哲学家和光明会成员一样，实乃是后世反革命哲学的奇谈怪论。

贵族认为在自己的庄园或较公开的场合，以及在更高的层次上在教会、军队和政府向其他人发号施令是自己的领导职责。一位失去了权力的贵族比一个处于同样处境的资产阶级成员会更加感到灰心丧气。到处都有贵族用以发挥某种公共事务作用的场所：在英国和爱尔兰有议会；在英属美洲有由总督任命和由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的参事会；在荷属和比属尼德兰以及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瑞士和意大利，有市政会议和等级会议等复杂的系统；在法国有称作高等法院的若干处法庭，以及像依旧存在的各省三级会议；在普鲁士有军队和文职机构；在波兰有省议会和中央议会；在瑞典有议会，议会的四个院中有一个由贵族组成；在哈布斯堡诸国有由土地权贵和缙绅享有垄断权的议会和郡议会。甚至在俄国，根据1785年制定的贵族条例，贵族也被赋予西欧式的个人的和共同的特权。从波兰的无政府状态到英国的议会制政体，从中欧的小邦到所谓的专制君主制大国，政府都参与这种行动或至少与这一类法人团体合作。这些法人团体的一般特征是或者指定它们自己的成员，或者在一定的阶级中自行吸收成员。众所周知，下院的议员大多是由议会的政客们指定，或是由本人就是议员的内阁大臣指定的。在18世纪的世界里，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是近代意义上的，真正的选举是罕见的。倒是一些英属美洲殖民地议会的下院可能称得上是欧洲人世界上最真实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甚至在美国革命之前就是如此，而且许多殖民地的选举是通过非常广泛的投票进行的；1757年，在马萨诸塞的沃特敦，据说有90%以上的成年男子实际上都投了票。政治团体一般都坚持其“独立性”，反对国王或团体外的

群众的干预。年轻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1771年说，“保持议会的独立……是我们的职责，无论它受到平民还是国王的抨击都无关紧要”。巴黎最高法院、荷兰或比利时的议会以及其他各种团体的代言人也有同感。

以上所描绘的图景还只是静态的。还需进一步阐明可以作为整个欧洲特征的种种变革与趋势。这里最好再次提醒读者注意，对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事态发展，应参阅本卷的其他章节。本章的其余部分试图概括说明不仅是在一个国家看到的发展变化。人们可以将以下各点作为1789年以前25年中独具特色的现象：比方说，社会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同时变得更加贵族化和更加资产阶级化，就是说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日益要求得到承认，结果导致冲突；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较年轻的年龄段，这就使城乡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困难，并且对资产阶级形成一种危机，因为年轻人找到满意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结果导致悲观失望；七年战争后各国政府普遍努力增加国库收入，结果引起宪法危机，因而将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想引入实际政治舞台；作为这类宪法危机的后果之一，美国革命爆发了，这一事件又引起欧洲的骚动，从而使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得到更加直接而实际的应用；与此同时，出版比一般通信有了长足发展，因而舆论的影响日益增加，其特征之一就是人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令人满意的变革，并且相信这样的变革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开明的时代”里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资产阶级在迅速壮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和文学史上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贵族却并没有相应地衰落。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的壮大，正是一些除出身外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在他们的身边的出现，似乎已使得上层阶级更加自觉地贵族化了。许多迹象显示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排他性。在某些小的共和国，能进入统治集团的极为罕见；在伯尔尼，有资格从政的家族数目在1651—1787年间由80个降为68个，在拥有14万人口的威尼斯，1796年只有111个这样的家族，而在1367年这个城市还比较小时却有240个家族。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长期统治对容克贵族有利，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的地位日益加强，像俾斯麦那样的家族当时第一次成为这个新的霍亨索伦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热心支持者。普鲁士政府主要文职机构中任职的城市公民对贵族的比例，在18世纪30年代比以后任何时期都要高，直至魏玛共和国成立。法国高等法院的成员变得更加自觉地贵族

化了。随着每一代人的出现，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最早年代越来越久远，18世纪60年代各高等法院开始要求其新成员必须具有四代贵族身份。高等法院阻挠法国政府企图册封军界贵族和商界贵族，即把晋升为贵族作为对资产阶级军官和知名商人的一种鼓励。到18世纪80年代，就再也没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法国主教了，1781年的法令还要求不是通过逐级晋升而谋求军衔的青年人提出自己是四代贵族后裔的证明。

在一个把祖先的价值看得很高的社会里，仅仅随着时光的流逝就可以使知名的祖先的人数增加，从而使活着的人的家族关系也增加了。在1775年弗吉尼亚总督的参事会里，12名成员中有10人是以前的成员的儿子或孙子，而且这12人中至少有10人彼此有关系。在1734—1832年近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下院有超过半数的议员是早先的议员的儿子、侄子或孙子。在1761年选出的第一次与美洲发生纠纷的下院里，有113人是从男爵或爱尔兰贵族，或者是希望有朝一日在上院占有一席之地的英国贵族的长子。在与革命的法国开战的1790年的下院里，有134人属于这类人。在整个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人数日益增多的议员是上过公学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人，他们在那里受过统治阶级集团精神的熏陶。与此同时，从1761年的议会开始，全部或部分收入来自商业活动的议员人数显著增多。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经济机构允许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在同一个企业中投资，尽管下院中真正从事商业的人与贵族相比数目似乎已在缓缓上升。阶级差别依旧，许多甚至更明显了。城里人购买乡下的地并不像以前那样成为乡绅。按照乔治·克拉克爵士的说法，到1760年“阶层的划分虽不像世袭等级制度那样了，但大致可划分出社会不同集团之间功能上的差别”。霍尔兹沃思发现，在选拔治安法官方面存在着不断增强的排他性，越来越拒绝任用“任何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人”。^[6]

贵族满足于当贵族，资产阶级则有待于成为贵族。真正的绅士看来很容易获得中产阶级人士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教育、地位、威信、合适的婚姻。事业，交谈中正当的语气，以及进入客厅时适当的举止。在资产阶级对待贵族的态度的深处埋藏着一种妒忌与轻蔑相混合的东西，一种道德上的阶级意识，一种性格上的坚强品质同一个人由于社会地位优越而养成游手好闲和华而不实作风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这种情绪甚至渗透到社会的下层，致使“美德”成了1793

年法兰西共和国的口号。但这种情绪在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各个层次中到处明显可见。普鲁士的城市公民以其道德上的真诚著称，康德的哲学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位身居约瑟夫二世顾问高位的奥地利人冯·基斯发表他对波希米亚等级会议中傲慢的青年贵族的感想时说：“我希望出身显赫家庭的青年人专心致志于学习法律和科学，以他们的生活方式树立一种热诚和勤劳的榜样……那时我就会成为第一个支持他们的要求的人。但是，我从多年从政的经验中知道，这些出身于贵族门第的青年绅士是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的！”^[7]

上等和中等阶级的青年人为谋得许多同样的职位而展开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贵族和资产阶级家庭都有更多的儿辈存活而长大成人；学校的增加以及在德意志大学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年人希望谋求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当的职业。政府、军队和教会中的职位需要的人较多，因为其他职业的发展甚微，而且涉及大规模管理私人事务的有薪俸的职位又非常之少。对英国人来说，即使在失去13个殖民地以后，由于殖民帝国继续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得不同阶级的青年人有可能获得合适的工作。其他地方的情况似乎是，即使商业、政府、军队和教会等组织有所扩大的话，但远远赶不上本世纪后半叶青年人人数的增加。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还有可能成为将军；而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被授予军衔的，除非他以前曾当过士兵。与此同时，在普鲁士，在文职政府中供职的人员中贵族出身的人与市民出身的人相比，数目在不断上升，由于可以理解的奇怪现象，在资产阶级化最明显的地方，即这个君主国的西部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东部的贵族更满足于待在他们自己的庄园中。

贵族家庭出身的青年人一般说来比较容易谋得称心如意的职位。在西里西亚，在政府各部门任职的贵族平均年龄为27岁，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平均年龄为42岁，在英国的下院，第一次当选议员的乡绅平均年龄为32岁，商人则为40岁，而那些其父亲或祖父曾当过议员的人，进入下院时的平均年龄要比其他人年轻9岁。在法国的最高法院任期为终身制，平均年龄低得惊人，因为家庭的影响使得年岁很轻的人也可以进入最高法院任职。在格勒诺布尔最高法院，半数成员通过特殊的规定，在法定年龄25岁以前就进入了该法院；而在法国革命前夕，巴黎最高法院全部成员中有一半人的年龄在35岁以下。众所周知，这个

时期的革命者一般都是青年人。至于他们许多对手的情况亦复如此，则往往知道的人很少。

七年战争使各国政府负债累累需钱很急。它们想尽办法增加国库的收入。它们订出许多新的税收项目。它们还通过刺激贸易和生产以期增加整个税源；这些政策引起了与行会条例和地方特权的冲突，因为日常的经济活动是通过这些条例和特权受到保护的。欧洲大陆各君主国千方百计编制新的花名册和地籍簿，以便对土地价值作出的评估与实际收入相一致。在英国，对土地的估税还固定在1692年的水平；议会中的地主势力阻止上述想法的实施，于是英国政府便越来越采用征收印花税和其他间接税的办法。在欧洲大陆各国，地主使用他们的一切手段反抗重新评估税额；正是主要在这一问题上导致了法国君主政权1763—1774年间与巴黎最高法院和其他最高法院的一场危机。一些政府还试图向迄今免于纳税的阶级和省份征税。因此，在一向比奥地利少缴税的匈牙利，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64年试图增加100万弗罗林的收入，这样便增加了在此以前免于纳税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的负担。匈牙利议会坚持其宪法上规定的特权，抵制她的做法。此后，她便撇开议会行事，而议会则一直到约瑟夫二世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发生准革命的情况下，才于1790年复会。哈布斯堡中央政府对行会、市政当局和财政特权的类似威胁，在比利时各省和在米兰人当中引起了根据宪法进行的反抗行动。由此而引发了1789年的比利时革命，并造成1796年米兰人竟然欢迎波拿巴的那种心态。

在法国，同样性质的争论于18世纪60年代引出了一套革命词语，如果说还未形成一种革命心理的话。大臣们力图参加税款的收入或用其他的办法显示王权。各省最高法院在巴黎最高法院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加以反对，不仅维护它们为皇家立法进行验证或表示异议的一贯权利，而且要参与立法活动本身。它们宣称要为了公民而采取行动，反映“国民的呼声”，捍卫宪法、天赋权利和根本法。他们认为，作为集体，各最高法院乃是“法国全国性的、首都的、大主教教区的和君主的法庭”^[8]。路易十五于1766年在巴黎最高法院鞭笞法庭开庭时对此作出的回答，对王室的绝对主权作了一个法国国王前所未有的最引人注目的肯定。看来，正是这些由现实政治而不是由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的思想引起的争论，使关于主权的性质和地位，关于宪法、真正的政治代表权、法律以及公民权的性质等都成了问题。从1771年到

1774年，旧的最高法院被全部撤销。一位保皇派小册子作者公开指责最高法院是“穷凶极恶的世袭贵族”。为之辩护的是一位贵族，他宣称法国必须“非波旁化”。路易十六即位后恢复了旧的最高法院，它们为不断用以维护其特权的自由得到恢复而兴高采烈。1776年这一年，不仅美国国会，而且跟欧洲任何特权机构一样拥有特权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都在夸耀其“不可侵犯和不能转让的权利”。

同年，巴黎最高法院阐明了它根据宪法所具有的性质，它抗议杜尔哥提出的温和的平均主义纲领。这项纲领包括某些附带实行的税收改革，废除行会的特权以及将王室的劳役，即农民修路等劳役改为各个阶级均需缴纳的税金。该最高法院警告说，这样的“税收平等”将会“导致公民社会的解体”。这样的“人类思想所做的努力”乃是徒劳地违抗在一切应有的地方均保持的“宇宙规律”。这样，巴黎高等法院就在埃德蒙·伯克之前提出了伯克的想法。他还宣称：“根据法国的宪法，法国的君主政体由若干具有明显特点并且互相独立的等级所组成。这种地位和人员的明显区别是与民族一道形成的；它是与我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一起诞生的。”^[9]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曾试图提高在其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无论从任何角度来比较，这些殖民地实际上一直是免税的。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平均每人纳税还不到1先令；而在英国本土则为每人26先令。美利坚人抵制印花税条例和征收有效关税。他们甚至否认英国议会有向他们征税的权利。英国议会在1766年的《公告令》中声明它拥有无所不在的主权来进行反击，不过一时并未付诸实施，并放弃了征税活动。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久便使得这一主权的整个含义大白于天下。为了解除东印度公司的负担，英国议会授予它在美洲直接销售茶叶的权力。这违背了殖民地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的普遍愿望，这些人唯恐英国以隐蔽的方式征税。当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在波士顿港被捣毁后，英国当局考虑到著名的茶党乃是一系列骚动事件的最近一次出现，便得出结论认为已无法再根据1691年马萨诸塞特许状进行治理。英国议会根据其拥有的主权通过了一项关于改进对马萨诸塞政府的管理的法令。这个法令在未同居民商议的情况下对马萨诸塞的宪法作了根本性修改。它削弱了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加强了国王任命的总督的权力。各地美利坚人感到了对他们的政治权利的无法估计的威胁，纷纷派遣代表参加大陆会议以支持马萨诸塞。

因此，美国革命从表面上看来是作为保守的运动开始的，目的是在一个较大的政治体系中保持在财政上和政治上享有特权的自治。在这一点上，美国革命类似于比利时或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且，就法国大革命是以重申社团特权和免税权利而反对王室这一点而言，它甚至类似法国大革命本身。美利坚人像匈牙利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或者像巴黎最高法院一样，是要维护他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自由，他们的“不可侵犯和不能转让的权利”，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实质。在美洲，历史、习俗、宪法、权利以及自由等概念都有不同的含义。在欧洲，这些词语涉及等级制的、封建的、贵族的以及教会的社会形式。在美洲则不同。马萨诸塞的议会，即立法机构的下院，实际上是选举产生的，并且是由相对平等的独立的小农场主选出的。在这方面它可能与匈牙利的议会、布拉班特或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巴黎的最高法院，因而也与英国的议会有很大不同。在美洲是保守的或习惯的东西，对欧洲来说则是激进的革新。

无论如何，事态的发展不久便驱使美利坚人不愿再仅仅是保持令人义愤填膺的现状。与英军的战斗遂于1775年4月开始。许多对武装起义畏缩不前的美利坚人这时仍忠于国王和议会。尽管并非所有的当地贵族，但其中许多人的情况确实如此。这些人世代与英国当局关系密切，因而有理由赞赏当代英国的生活方式。结果，他们在爱国者眼中名声扫地。起义的领袖们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力量，防止英国当局卷土重来。一些有名望的，采取妥协态度的和处境危险的人，设法使自己适应中下层阶级的需要。起义者公开反抗议会，为英王所拒绝承认，被宣告不再受英国王室的保护，并面对一切合法政体和法庭纷纷解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权力原则、一个使他们的行动有据以成为是合法的新的主权国。他们通过宣布实行人民主权而找到了这样的国家。为了摆脱无政府状态，为建立新的政府清理基础，使他们的航运船只能够进入欧洲各港口，并且能获得法国的援助，美洲起义者在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之后，于1776年7月宣告成立一个独立的合众国。

究竟这个只不过是原来的殖民地的合众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从英国脱离出来；同时它们的内部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革命化，在美国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对那些纷纷返回英国或涌入加拿大的逃亡者来说，这的确是一场革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转到了大大小小的新主人手

中。在一些州，选举权的范围扩大了。大多数州的州长，这时是由州议会下院选出的，在马萨诸塞州，州长是经公众投票选出的。经选举产生的上院取代了以前经指派而组成的总督参事会。英国国教的牧师是同情英国的，在大多数建立了这种教会的州教会均被解散。在新英格兰，公理会牧师是反英的，他们的教会仍保留某些特殊的权益。不过，在革命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群体因宗教信仰而感到政治权利受到排斥。一般说来，革命似有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道德水平，对贵族的虚荣自负更加持怀疑态度，对一切形式的个人优越感也抱一定的怀疑心理。这种优越感从美洲最早殖民时起就已出现，一直是美国人态度的特征。如果说美国是贵族遭到失败的地方，那么，在欧洲遭到失败的则是民主主义者——用路易·哈茨的话说——这种状况可以说是由于美国革命以及后来对它的赞美而造成的。

不管怎么说，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是直接而又非常巨大的。革命战争本身就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使法国国库不堪重负，而且这次是致命的。它将荷兰卷入，引起了18世纪80年代夭折的爱国党人的革命。在美洲遭受的灾难使英国不得不于1782年赋予爱尔兰议会以自治权。心理上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爱尔兰志愿军和荷兰爱国党人以美国先驱者为榜样，组织起武装连队。在英国，像威尔克斯、卡特赖特、普赖斯以及阿宾登伯爵等早就开始主张议会进行改革的一班人，甚至在殖民地人民公开造反之后，比伯克派辉格党议员更加同情美国人。英国的激进派和美国人一样，不认为议会作为一个机构拥有主权，也不相信议会应当真正代表“人民”并对“人民”负责的理论。1780年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甚至比美国人走得更远，它建议实行现代民主式的代表制。既是爱尔兰议会下院又是英国下院的煽动者的亨利·弗勒德于1790年在英国下院提到美国人时说，“不充分的代表制的这一秘密已在美洲战争的雷鸣声中暴露在人民面前”。他进而评论“事实上的”代表制的各种谬误说，英国人将像美国人那样不再赞成这种代表制。英国的改革者大多是不信奉国教者，因而感到与新英格兰息息相通。为了争取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他们指出：在美国的州和联邦宪法中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在政治上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的，试图以此加强他们的论证。对此，皮特回答说，这两个国家的宪法所依据的有关教会和国家的概念是迥然不同的。[\[10\]](#)

塔列朗在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岁月时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美国”。^[11]在法国引起的激情是极为巨大的，但也并不仅限于法国。在芬兰，某些阴谋反对瑞典国王的贵族谈论的也是乔治·华盛顿。在俄国，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引起叶卡捷琳娜的不快。她说，他比普加乔夫还要坏，因为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在波兰，推行改革的斯坦尼斯拉夫国王在他的书房里放着华盛顿的半身塑像，而在托斯卡纳，利奥波德根据弗吉尼亚宪法为他的公国拟订一部宪法。在布达佩斯，共济会会员称自己是美洲支部，而在意大利则在烧炭党出现以前就成立了一个费城人秘密团体。在德意志人们的意见存在较多分歧。在汉诺威，人们对美洲战争持英国人的看法，但大多数德意志人则以诗歌、散文、历史著作和学术性小册子抒发对美国人的热情；黑森的伯爵领主出租军队给英国用以反对美国人。这一行动引起的愤怒据说是最早的一次公众舆论在这个小小的专制国家持批评态度。

在法国，除对据认为是美国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状况迸发出难以想象的激情外，还对美国的新政府进行了许多严肃的讨论，对此，许多著名人士，诸如杜尔哥、马布利、孔多塞、莫尔莱和米拉波等人在1789年以前就密切予以关注了。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已通过合理而详细的计划建立了新的政府。在每一个州里，代表们在议会或代表大会中行使人民的主权。议会为州拟订成文的宪法；它建立政府，宣告其诞生，并明确地授予它以权力；它建立并规定了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并巧妙地使之彼此制衡，以防止滥用权力。总之，美国人似乎已实现，从而证实了社会契约的思想。国王与最高法院之间的争吵使得宪法在法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孟德斯鸠的时代以来，对英国宪法的赞颂也曾产生过同样的影响。自1776年开始在法国一再印行的美国宪法，与巴黎最高法院或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宪法有所不同。就渊源讲，美国宪法似乎代表了一种自由而合理的自决行为。就内容讲，美国宪法根本不提继承的地位，无论是皇家的、权威当局的或贵族的；除代表权外谁也没有任何权力；没有统治阶级，没有法定的规则，没有社会等级，没有税收上的特权，也没有一个人因出身而拥有任何特殊的或个人的统治权利。所有的人都是公民，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在国内感到不满的法国人把美国人理想化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从他们的英国的和殖民地的历史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另一些人则显示出一种日益增强的革命心理，把美

国人所经历的变革的规模加以夸大并为之狂喜。他们认为美国人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包袱，不受偏见、迷信和中世纪蒙昧时代的影响，是理论上的人类的样板。J. B. 布里索于1780年向一位朋友吐露自己的内心看法时表示他赞成“激进而彻底的改革”，并接着说，“如这种改革在美国各个地区得以推行到底，则百倍的幸福将降临美国”。[\[12\]](#)

新世界的解放对意识到其哲学上的广阔视野的一代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而且，由这一重大事件激发出的感情同眼前的国内状况所引发的其他一些感情交织在一起了。启蒙运动的全部要旨在于传播社会进步的坚强信念。随着美国的独立，这一信念便更加明确地具有一种新时代业已初露曙光的含义。除非是那些最自满的人，美国革命看来还只不过是业已开始的一系列伟大解放变革的第一次变革。气氛变得充满了期望，存在了许多世纪的状况似乎轻而易举就改变了，仅仅是理论著作家们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更有可能实现了，凡是美国人已经做到的别国人也一定能做到。认为必须保持现行秩序的看法已经破灭。不耐烦的情绪在增强，“顷刻之间”一位图卢兹的律师——一位在10年以后成为国民公会议员并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在称赞美国时写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人类在顷刻之间办不到的”。[\[13\]](#)

一些主要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对贵族的行为举止和种种特权日益感到厌烦。这是由欧洲的境况产生的，并因美国出现的情景而变得尖锐起来。欧洲的中产阶级满意地看到在那块土地上没有任何人会享有超越自己应有的权力；在那个国家人受到应有的尊敬，真正的功绩得到应得的报酬，没有一个阶级是无足轻重或徒有其名的，人们是按他们的能力和贡献而加以评价的。一位法国外交部的雇员向往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曾诗意盎然地写道：

在没有出身和等级区分的地方

最正直和最可敬的人

总之最有用的人，永远是最伟大的。[\[14\]](#)

在1783年一期《柏林月刊》上刊登的一位无名氏作者所写的一首诗中，也憧憬着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可爱的平等，而没有卑鄙的贵族，这些人是欧洲的瘟疫，玷污着纯朴的习俗，而无视善良的人。”[\[15\]](#)在这样一些词句里，和其他与美国无关的作品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与这些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疏远的浓厚情绪，一种与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倾向，一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或精神上的逃逸，罗兰夫人曾幻想跟她的丈夫幸福地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德意志人会因为欧洲一半人口还没有横渡大西洋而感到吃惊；而在英国，甚至像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这样有声望的人，由于他们的朋友普里斯特利于1791年在伯明翰受到教会和英王的暴民的粗暴对待而感到愤怒，因而他们总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要移居美国。

事实上，有数目惊人的心情不安的人移居美国。荷兰的阿德里安·范·德·肯普在爱国者运动失败后前往纽约；一位因煽动颠覆政府而被伯尔尼当局监禁的瑞士青年逃脱后投奔了美国；一位撰写过一本论《北美与民主》的小册子的德意志人施莫尔也逃向同一方向。波兰人涅姆采维奇在柯斯丘什科于1794年失败后便定居于新泽西，并在那里结婚，直到拿破仑的大公国时期才返回波兰。在移居美国的英国人当中，最著名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但还有许多其他人，如托马斯·库珀和约翰·宾斯等，都在英国改革运动遭到镇压后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爱尔兰人当中，汉密尔顿·罗恩、沃尔夫·托恩和纳珀·坦迪都于1795年前往美国，但后面两位在法国战争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新的希望时返回欧洲。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治年鉴上充满了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新到美国的人的姓名，他们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离开了家园，往往成为正在崛起的杰斐逊党的重要支柱。保守的联邦党人称他们为“外来民主的卑劣工具”。^[16]美国于1798年颁布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主要是针对英国和爱尔兰的激进分子的。因为，尽管其中说的都是雅各宾主义的话，但实际上移居美国的雅各宾党人或法国人寥寥无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793年作为驻费城公使而轰动了美国的激进派吉伦特党人埃德蒙·热内不仅在美国定居下来，而且通过结婚而进入纽约上层社会。几年之后，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位生活在美国西部的恐怖时期的老雅各宾党人，在这个充满宽容气氛的新国家，他已成为那里的一个坚定而又心满意足的公民。

在美国革命激发出激情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发展，革命时代的出现便是难以理解的。18世纪下半叶是交通通信获得惊人改进的时期。在道路建设、邮政服务、驿站马车和客栈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使不同地点和不同阶级的旅客得以聚会到一起。A. R. 蒂博多于1760年左右在普瓦捷骑马前往

巴黎，花了一周时间；而当他于1789年作为普瓦捷的第三等级代表前往巴黎时，乘驿站马车只走了三天便抵达凡尔赛。当奥尔良公爵于1788年想把他的看法传达到各省时，他只需把他的宣传材料付邮即可。没有一位以前的奥尔良公爵能这么容易就挑起骚乱的。出版印刷业、书报杂志的数量、它们的普及性以及读者大众的人数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在英国，1750年有90种报纸和杂志出版，1780年为158种，1800年为264种。在德国，发展甚至更迅速。在美国的一个地理上并没有扩展的州，新泽西州，于18世纪60年代发行了1份新报纸，70年代为5份，80年代为8份，90年代达到19份。在法国，最快的增长是随着革命一同爆发的，这就是跟其他事件一起出现的新闻出版革命。众所周知，1789—1800年间单是在巴黎就发行了1350种新报纸，当然，它们当中有许多是短命的。

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多欧洲的语言中开始使用“舆论”这个术语。不仅有更多的人在阅读和谈论它，而且他们更加频繁地在政治问题上阅读并谈论这个词。关心国事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有一种期待各方面改进的心情，认为改进并不一定是政府独自的行动，也是应普遍关心的正当问题。在德意志，1790年以前有29种杂志名为《爱国者》，并用了各种引人注目的形容词。人们发现，有许多人跟自己的想法相似，有许多比地方的或私人的更重要的共同问题，也是许许多多毫不相识和远在别处的人所意识到的。到处兴起了读书俱乐部和研讨会，或者说至少人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团体的迹象，在法国有被科尚称为“思想协会”的社团，在列日有“读书会”，在巴塞尔有彼得·奥克斯于1787年描述的阅览室，在曼彻斯特、美因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有文学和哲学学会。这些团体集体订阅书报杂志，通常对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所注意的一切问题，即科学的、文学的以及哲学方面的问题都感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更多地思考政治问题。这些团体也许比更著名的共济会支部更具有实际重要作用，因为后者崇尚秘密和神秘行动，使其影响受到限制。

在激励并提高公众舆论的意义方面，美国革命的新闻报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七年战争中崭露头角的英国在许多欧洲人的眼里是近代的迦太基，海上的无情暴君。而一群远方的爱国者竟然敢于反抗这一庞然大物，这似乎是一件难以形容的令人激动的事。起义者发表的公开文件充满了启蒙运动所普遍传播的思想。因此漫不经心的读者

也可以从新近发出的电讯、激动人心的事件以及像乔治·华盛顿那样的有趣人物中吸取普遍的原则。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的国家（一定程度上的法国，或奥属尼德兰与德意志诸邦），人们对本国政府的体制和行为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因此，对美国革命以及美国新政府的成就从正反两面开展讨论，就成了鼓吹各种政治思想的替代办法。对于单纯的读者来说，很容易把争论的问题简单化。英国人代表专制、剥削和傲慢。美国人代表自由和平等，代表勇敢、机智和自我牺牲。称美国的事业为人类事业的不单是托马斯·潘恩一人。像瑞士的伊萨克·伊塞兰那样谨慎的新闻记者和哲学家也认为，压迫美国就是压迫整个人类。

对于那些没有阅读和写作习惯的下层阶级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特别是1789年以前的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在决定革命时代的事态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即使在法国，农业和城市的劳动阶级也是最后才在政治上觉悟起来。在其他地方，他们一般说来仍然是麻木不仁的，或者实际上很容易受到煽动而反对新的思想。荷兰的民众支持奥兰治亲王，布列塔尼的农民则支持他们的贵族。工程师詹姆斯·瓦特（他的儿子成为臭名昭著的“雅各宾党人”）对1791年伯明翰暴乱中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表示愤慨：只有贵族能够把普通群众纠集在自己周围，至于“民主主义者”瓦特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则实际上相信法律与秩序，主张把权力交给称职的人。[\[17\]](#)

不过，甚至在英国也有严重不满情绪的迹象，至少一直蔓延到托马斯·哈代或年轻的弗朗西斯·普莱斯所属的那些熟练的而又有自尊心的工人队伍之中。诚然，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可能比在法国存在较强的真正工人阶级意识。用伦敦通信协会的组织者托马斯·哈代的话说，该协会是由零售商、小店主和技工组成的。它讨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低贱而悲惨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像中层甚至上层阶级的改革者一样，认为他们的困难乃是由政府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从政府中捞取的好处、代表制和宪法的各种缺陷所造成的。人们对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处境，怀有一种几乎非革命不可的切肤之痛。一群设菲尔德的工人于1794年问道：“要是宪法不把我们当回事，那么，宪法对我们还有啥用呢？”[\[18\]](#)敌人被认为就是贵族。托马斯·哈代在一封以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多少有些不规范的语言写成的私人信件中，把诚实工人所受苦难归因于“那帮傲慢无礼而

骄奢淫逸的人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这帮人除要我们相信世上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供他们这一小撮毫无价值的人享用之外，让我们再一无所知”，^[19]这就使人想起在这同一时期法国以无套裤汉为特征的那种针对贵族强烈的道德非难。

因此，英国的劳动阶级和商业阶级都要求进行议会改革。驱使这两部分人分道扬镳的是开始于1792年的英国政府对法国大革命作出的反应。英国的商业阶级虽然可能感到不满，但又没有更多的抱怨足以使这种不满情绪长期存在下去。几年以前，在曼彻斯特为反对放宽爱尔兰贸易法的请愿书收集到的签名，比为争取议会代议权的请愿书所收集到的签名要多得多。1792年政府也就是说贵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政治性的俱乐部和集会。像詹姆斯·瓦特或曼彻斯特的托马斯·沃克这样的人，他们如果继续坚持反对立场，肯定会失去太多东西，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严重的工人阶级骚动虽延续了多年，但改革运动却失去了首领，偃旗息鼓达一代人之久。

就法国来讲，勒费弗尔教授关于革命群众和暴民的论述，为革命时期少数人的社会心态作出了最可贵的研究。^[20]问题在于阐明那些于1789年7月14日偶然在皇宫游荡的人们，或成群的农民，或苦于面包缺乏和昂贵而怒气冲天的男男女女，怎么就会由于某些偶发事件而一下子变成了一支集体的力量，承认临时推举的领袖，对一致认定的敌人同仇敌忾，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甘愿冒种种危险，不加深思熟虑，不怕招惹灾祸，就投入了行动。在18世纪，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出现暴徒和面包骚动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中又增添了一些新事物。早在1788年公认的权威当局陷入尴尬局面以至于崩溃，使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王召集三级会议，随后在4万个地方议会进行选举，甚至使最贫困的人也处于迫切期待大事即将来临的状态。小事遂成为星星之火。一瞬间看到或听到的某种事物可能使深藏在心底的种种看法发挥作用而突然变为行动，勒费弗尔称之为原先已存在的集体心态，是经过多年积累而形成的。交谈、阅读或倾听一些比较有文化的朋友高声朗读报纸，在酒店、教堂、市场的生活，城镇与乡村的接近，工作的变动，旅游者的往来，有关大人物的丑闻，国王在北美进行的战争的新闻，对已经或并未看到或读过的一些大胆直言的书籍或小册子的内容的了解，人们看到，甚至连名不见经传的人也对事态现状提出批评，人们感到，当时存在的许多东西既不公平，也无

必要或永久存在下去——所有这一切在1789年以前都对潜在的革命心理的形成起了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满，都有自己私人的不幸；并非每个人都遭受所有的苦难，有些人受的苦并不很多。但情况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使种种不满汇集成对一种制度的控诉。农民在思考自己的困境时，并不将这归咎于个人的不幸或归咎于他的主子是个坏人或不正直的人，而把它归咎于贵族之类的典型人物。这样一种典型人物，或者说共同目标的形成，就使得1789年的农民革命成为可能。在这场革命中，大批大批的农民在预先没有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采取惊人的自发行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闯进了庄园主的住宅，撕毁了规定他们的义务和地位的法定文件。

就城镇劳动人民而言，典型的敌人是“贵族”。因此，普通老百姓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同资产阶级合作，直到随着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本身在普通人看来也成了贵族为止。如国王支持贵族，整个国家也就转而反对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倘若破坏性群众骚动的巨大浪潮把教会也吞没了，那是因为教会没有划清它的利益与贵族的或封建的教派的利益的界线，所以，实际上不信教的人的思想观点便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巴黎举行示威的少数人，虽然仅仅是为日常饮食的基本需要所迫，但他们的思想具有更大的力量。一位因在1791年的共和请愿书上签名而被捕的厨娘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她懂得请愿书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权力组织”。最重要的是，当时有一种争取普遍幸福的共同愿望，只有邪恶的人和玩弄阴谋的人才会反对这种心情。有一种已经到了赢得普遍幸福的关键时刻，如果错过它便很可能一去不复返的感觉。这就足以说明什么叫做革命狂热。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斗争，它引起的敌对行动，也就是战争；考虑到在国际规模上维护旧秩序的贵族势力结成阵营反对拥护新秩序的力量；估计到会遇到种种风险、争论，因而采取替代的办法，将普遍幸福降低为比较温和的英国式的普遍福利，那么就很难说由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这些情绪是主观的幻想或者是完全错误的。

（南木 译）

[1] Brieven en Gedenkschriften（海牙，1876年），第3卷，第60—61页。

[2] 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英国警察制度改革者，曾任英国第一个正规的警察局泰晤士河警察局局长。——译者注

- [3] P. 冯·米特罗法诺夫：《约瑟夫二世：他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译自俄文版（维也纳与莱比锡，1910年），第632页。
- [4] 指美国南部产棉各州。——译者注
- [5] 转引自G. E. 鲁德《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动机》，载伦敦大学《历史研究学报》，第26卷（1953年），第71页。
- [6] G. N. 克拉克：《1760年以前的英国财富》（伦敦，1946年），第160页；W. S. 霍尔兹沃思：《1689—1783年的上议院》，载《法律季刊》第55卷（1929年），第438页；关于下议院的统计数字，参见G. P. 贾德《1734—1832年的议员》（纽黑文，1955年）。
- [7] 米特罗法诺夫：《约瑟夫二世传》，第627页。
- [8] R. 比卡尔特：《18世纪的最高法院与国家主权概念》（巴黎，1932年），第173页。
- [9] J. 弗拉默尔蒙：《巴黎最高法院谏书》（巴黎，1898年），第3卷，第278—287页。
- [10] 《议会史》第28卷（1790年），第413、457页。
- [11] 塔列朗：《回忆录》（巴黎，1953—1955年），第1卷，第83页。
- [12] 布里索：《通信与论文集》（巴黎，1912年），第18页。
- [13] J. B. 马埃：《1784年在百花诗社所作关于北美革命伟大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演讲》（图卢兹，1784年）。
- [14] L. G. 布尔东：《美洲游记：作者与神父的对话》（巴黎，1786年），第23页。
- [15] 转引自H. P. 加林格《德国公众舆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态度》（莱比锡，1900年），第65页。
- [16] 转引自约翰·C. 米勒《自由的危机：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波士顿，1951年），第32页。
- [17] 埃里克·鲁宾逊：《一个英国的雅各宾党人：小詹姆斯·瓦特》，载《剑桥历史学报》第11卷（1955年），第351页。
- [18] 《告英国人民书》，载《1794年4月7日……设菲尔德一次公众集会的会议录》（设菲尔德，1794年），第41页。
- [19] 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手稿，大英博物馆藏，另增加的手稿27814，第178页。
- [20] 乔治·勒费弗尔：《革命的群众》，载《法国革命研究》（巴黎，1954年），第271—287页。关于法国下层阶级的革命心态，亦可参阅前引G. E. 吕德新近发表的文章以及理查德·科布《1793—1794年法国的革命心理》，载《历史杂志》，第62卷（1957年），第181—196页。

第十六章 美国革命（1763—1793年）：宪法问题面面观

政治史学家把七年战争（或称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结束到法国革命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的北美洲历史，以成功地建立一个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为分野，划分成两个部分。宪法史专家也许不大注意连续进程中的这一变化。在美国革命以前，宪法问题是如何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共同体制框架，各殖民地可以在此框架内继续实行其继承下来的各具特色的内部自治。美国革命以后，宪法问题则成为由这些殖民地演变而成的几个州能否具有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新地位所需要的那种共同行动的机构。新建立的全国政府不得不为乔治三世的顾问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从这一公认有局限性的观点来看，这段历史有其内在的连贯性。这就是本章所探讨的目标。

到18世纪中叶，那些后来形成新的合众国核心的13个英国殖民地都享有某种形式的代议体制，犹如大西洋西部及加勒比海另外8个岛屿殖民地所实行的那样。尽管这些殖民地的情况及其经济社会结构都有重大的差异，但它们的体制却有出自同源的相似之处。这种体制实际上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和与其相角逐的其他欧洲强国的类似活动各自所具有的两个不同特点的产物。这种殖民活动大部分是各个企业活动的结果，这些企业有时但并非总是采取法人团体的形式；这种殖民活动部分地是由一些反对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集团所进行的。

在所有这些殖民地中，英国人在政治上占有优势。他们来自一个盛行自由结社传统的国家。由于这种传统，大部分属于公共性质的工作，一般由社会来领导，而不是职业官僚机构的事务。本国的这一特点使殖民地的地方机构也具有非常相似之处，不论是新英格兰的各种市镇，还是更往南的那些实行郡县制的殖民地都是如此。

新英格兰的绝大多数殖民地按照马萨诸塞的模式成立了为人们所熟悉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立法机构，同时

有总督及其助手们即参事会——这是将那些大特许公司的机构跨越大西洋移植的结果。弗吉尼亚在来自伦敦的公司统治垮台之后，建立了皇家殖民地通常所具有的正规体制：一个任命的总督及参事会和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马里兰代表着典型的领主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实质上是企图把封建主义的观念移植到新世界的环境中。但是在新世界领主尽管保持了某种经济和社会的作用，在政治上则受到限制；领主们提名的总督需经国王批准，而移民们成立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则不容加以反对，到18世纪，实际上人们都赞成在所有殖民地实行代议制。1774年，曼斯菲尔德勋爵规定的原则是：一旦允准成立议会，皇家的税收特权即被废止。

虽然从英帝国的观点看，每个殖民地都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但普遍倾向于把各殖民地政府纳入同一个模式。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以及在马里兰，领主制尽管在17世纪末曾一度中断，但一直延续到美国革命。而纽约则是在1685年、新泽西在1702年、南北卡罗来纳在1728年成为皇家殖民地。佐治亚受托人的权力和使用权从一开始就受到限制；而且该殖民地也在1751年被直接置于国王控制之下。马萨诸塞1691年的新特许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体制与上述皇家殖民地相类似，这意味着减少殖民地政府的自治权，不过由于把参政权扩大到特定的教会成员的圈子以外，从而结束了迄今占统治地位的寡头统治式的清教徒神权政治。尽管在马萨诸塞放宽了限制，但在九个殖民地仍保留了用税收支持教会的既定制度，直到美国革命为止。如除罗德岛外新英格兰全境是公理会的势力，其余大多数殖民地则为英国圣公会。普遍存在着以宗教皈依为根据的政治歧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随着人口成分的变化，特别是在英国圣公会占优势的殖民地内，宗教上的分歧也增加了它在不满意因素中的比重。

各殖民地政府的行政部门以总督及其参事会为代表。总督的职责很重要，它来自君主的职责。他是军队的总司令，文职政府的首脑；他可以召集、暂停和解散议会，否决其法案，或者将其留交帝国政府考虑。他和他的参事会行使殖民地上诉法院的职能。各殖民地的议会本身是由享有不同参政权的人选举产生的，总的说来人口中有钱有势的人享有更多的选举权，老殖民地地区比内地移民地区也占优势。其议会的立法职能从属于帝国议会，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掌握着财源。

除三个殖民地外，其他所有殖民地的总督及其参事会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在马萨诸塞，国王只任命总督，参事会不由他任命；在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则二者均由议会选举。这样，行政部门通常认为其权力来源与议会的权力来源不同，从而加强了作为整个体制特征的分权原则。法院由行政部门建立，其地位尽可能与英国的司法制度接近。

这些殖民地在同母国发生决定性冲突的前夕，其体制相当于母国体制的缩影，不过更多依照的不是当时英国的体制，而是头两代斯图亚特王朝君主时期英国的体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立法机构提供经费。当时的类似例子在爱尔兰可以找到。1719年的爱尔兰属地法明确规定：爱尔兰议会的存在并不影响英国议会为该国制定法律的权力。没有统一的法规确定英帝国政府与美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于帝国用以进行实际控制的各种体制的作用，留下了误解的充足余地。

殖民者们认为他们通过自己选举的议会来代表他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他们作为英国人所固有的，皇家发给总督的召集议会的指令只是宣告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不是产生这种权利。尽管立法机构可以通过投票和决议行事，不受保留权的约束，但在否决权问题上也存在争议。但是最严重的还是经费问题，总督们设法得到经常性的经费，而殖民者们则认为如果这样做，他们就没有机会防范经费被侵。从皇家的观点看，实行每年拨款的办法意味着殖民者若不赞成其任命的总督、法官或其他官吏，或反对这些官吏的行为，就可以扣发他们的薪金；而且岁入不是由委派的官员，而是由议会本身选举的司库所掌握。

在对待各殖民地提交的立法方面，帝国政府主要关心四个方面的问题：防止在英国法律和殖民地法律之间出现矛盾并捍卫宪法；在母国公民与殖民者打交道中保护母国公民的利益；防止被认为是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立法，以免根据这些立法为殖民地提供更加灵活的讨价还价手段；最后一点是避免在技术上有缺陷的立法。在皇家殖民地和领主制殖民地，上述目的可以通过直接拒绝批准发生抵触的法律来达到，在这方面枢密院起着第二议院的作用。在特许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不可能实行直接拒绝批准的办法；但是枢密院可受理来自殖民地法院的上诉，实际上行使着司法复审的权力；这种程序后来被推行到所有的殖民地。只有大约5%的殖民地法律被直接驳回，但对上诉进行

复审则更为重要。从1695年到1783年有795起案件由殖民地法院提交枢密院，有157起得到维持，336起被撤销，147起被驳回。美国革命前10年间枢密院处理的仅仅由美洲大陆各殖民地提交的司法案件，只略少于美国最高法院建立头10年所处理的案件。虽然并没有企图把英国法律本身引入各殖民地，英国的法规也没有延伸到各殖民地，除非在这些法规中特别提到殖民地。但英国法律仍是应用的标准，首先是必须确保国王的特权及有关贸易的法律不受任何可能的侵犯。殖民者认为英国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享受习惯法利益的权利，是他们固有的权利。习惯法的诉讼程序及习惯法可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在18世纪不断为殖民地法院所采纳。

由帝国关税系统负责实施的贸易法通过1673年的一个法令及随后的立法推广到各殖民地。对于实施贸易法的特别关注，表现在从1697年开始在各殖民地建立了代理海事法庭。有关贸易法的案件可以由上述法庭或由案件发生所在地的有裁判权的普通法庭审理。各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是由枢密院的委员会正式授予的。在贸易事务方面商务部及其主管大臣（始建于1696年的机构和官职）要听取枢密院委员会的意见。商务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真正重大的决定，如任命事项、陆军和海军问题、财政及印度政策等，在18世纪上半叶则是属于南方事务部国务大臣主管的政务。

1748年哈利法克斯勋爵出任商务大臣，着手试图将商务部建成实际上是帝国政府的美洲部，以便使贸易再度活跃起来。1752年枢密院的一项命令带来了使他的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变化。但是当哈利法克斯在1761年离开商务部后，殖民地的任免权又回到了南方事务部手中，当时由皮特任该部国务大臣。1752年命令所规定的其余权利到1766年也被撤销。但是随着美洲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又作了进一步的试验。1768年希尔斯伯勒勋爵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或称“美洲事务大臣”，他和他的后任达特茅斯勋爵都兼任商务大臣。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部能够应付殖民地活动触及母国利益或政策的一切有关事务。财政部通过各殖民地的检察官和总审计官与关税督察官发生直接的关系。陆军部以及更为重要的海军部在每一关键时刻都关注着殖民地事务，此外还有皇家森林总勘测官等一些帝国专职官员。

一个关心枢密院审议的任何案件和关心任何行政或政治问题的殖民地，需要知道国家大多数主要部门正在干什么，并且需要使自己处在意见能够上达的地位。到18世纪，每一个殖民地在伦敦都保持有一个代理人，在代理人的名单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埃德蒙·伯克等人的名字。但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英国议会对殖民地事务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是有了更多的立法，而且随着内阁制的发展，一些主要负责美洲事务的官员——殖民地事务大臣、商务大臣、财政大臣——越来越紧密地卷入议会政治变化无常的讨价还价活动中。代理人不但需要与商务部那些精明强干和经验丰富的官员打交道，而且还要知道他们打通议会的路子。用后来的术语说，他们需要成为“议会的说客”。这也不单纯是一个政策问题。在今天我们不会不注意到18世纪政治中官职任命权的重要性；在美洲，需要任命的官职很多，是那些有穷亲戚和依附者的政客们角逐的目标。实际上，某些素质差的人被塞进各殖民地任文职或军职所引起的愤怒，被认为是帝国政府与美洲人之间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帝国政府与美洲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由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巨大而繁荣的社会，能够继续接受帝国议会的统治，而这个议会并没有它们的代表参加，并且使这个议会的权力和要求大大增加的各种事件，也并没有它们参与。毫无疑问，英国人比美洲人更容易接受下述观点：凡对整个帝国有利的事，也最符合各个殖民地的利益。殖民者们不仅不愿意从一个帝国的角度来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多半也不愿以超出各自殖民地的较为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1686年到1721年，在不同的时间，伦敦曾提出过一些统一殖民地的方案。唯一付诸试验的是詹姆斯二世的“新英格兰自治领”计划，但由于他的垮台而失败。18世纪中叶，来自法国的挑战再度引发统一殖民地的设想。本杰明·富兰克林向1754年召开的各殖民地奥尔巴尼会议提出的计划，建议将殖民地的某些权力授予一个联盟政府，另外一些权力则保留给帝国政府。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洲，这一建议都未取得任何进展。

而且，美洲人在对待英国的宪法原则方面带有一种仿古的意识。英国已经接受了议会主权的观念，而美洲人依然认为议会应受习惯法和自然衡平法的限制。乔治三世即位后，殖民地政府要求法院颁发新

的协助令状以便准许实施反走私斗争所需要的搜查和扣押。当时马萨诸塞的律师詹姆斯·奥蒂斯正是根据上述观点为此事进行论证的。

殖民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殖民地特许状是基本法的一种形式，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特权直接来自国王。英国议会无权随心所欲地改变帝国的宪法结构。在殖民者看来，帝国具有准联邦的性质。各地方立法机构属于一个共同的国王，由英国议会代表整个帝国行使一定的权力。要充分揭示这些分歧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尽管人们可以把这场争论写成是由于英国人有权诉诸独立宣言所提出的普遍权利而引起的，但几乎所有最终导致脱离英国的因素在最早的有关争论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而且当时如果不是采取过分谨慎态度的话，这些因素会在文件中表达得更为直截了当。奥蒂斯在1762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中争论说，各殖民地的款项只能由它们自己的立法机构筹措，行政部门无权支付未经授权的开支，即使在紧急状况下也是如此。否则人们怎能说殖民者享有了英国臣民的全部权利呢？这些权利是“根据上帝的法律和自然法、根据习惯法以及根据议会的立法（还不算国王颁发的所有特许状）”赋予他们的。

即使不发生由于英国政府在七年战争后的财政需要，以及由于殖民者经过消除法国威胁而获得的新的行动自由所造成的危机，宪政状况看来也难以继续保持稳定。确实，殖民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并非永远站得住脚。人们很难决定政府的帝国职能究竟应该是哪些，也很难决定一项公认的帝国职能，例如防务，是否就会成为进一步获得权力的来源。国王对整个帝国防务所承担的责任是否就会使他有权通过帝国立法而征税，或者制定一些有关土地拓殖、与印第安部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法规？后一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由于1763年的公告规定在尚未制定出帝国的北美政策之前，暂时禁止扩大土地拓殖范围。

如上所述，问题仍然在于，国王的权力事实上是由大臣们行使的，而大臣们的态度又会被议会的压力所左右。殖民者长期以来努力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与议会而非乔治三世发生争吵。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当帝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怎样才能使殖民者确信这种行动是为了帝国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某个强大的压力集团的利益呢？如果帝国政府宣称有权向全体征税，难道它能肯定主要负担不会落到在议会中没有代表的那部分人身上吗？那些遥远的殖民地采取了

什么纠正措施来制止帝国官吏诸如在关税方面进行勒索之类的违法行为呢？这难道不是要求他们自己的法院具有最高权力吗？最后，相信帝国政府及议会可以采取行动而不会影响各殖民地的内部局势，岂不是不现实的吗？帝国的影响遏制了使殖民地议会更具代表性的企图；经济法规把生产纳入一定的渠道而排除其他渠道；它影响了借贷双方的关系，而这在新的社会群体中总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加强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集团。形成这些统治集团的殖民地传统领导人渴望对帝国权力至少给予部分的支持；但他们担心自己被更激进的分子所胜过。同样，在美洲政策上的冲突，在国内同激进势力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联系在一起。双方的领导人都觉得越来越难以妥协了。有关宪法的争论，是在一些并不享有为妥协寻找比较长久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自由的人们中间进行的。

而且，双方对于各自对手的立场的误解也使妥协的可能性变得黯淡起来。在英国政治中，议会反对派部分是有意地，无疑部分也是不自觉地竭力歪曲反对殖民统治运动的实际要求，这并非最后一次；他们认为这样做与他们自己的事业是一致的，并且利用它为政党的利益服务。查塔姆断断续续提出在地方自治政府基础上建立联合帝国的设想虽然是宏伟的，但它对美洲那些具有狭隘的地方思想的人缺少吸引力。他们既没有建立联合帝国那样高的要求，而对自治的要求又比这多。

英国加强帝国控制机构的努力始于18世纪50年代，但由于战争而中断。它的主要目的原在于制止普遍存在的逃避贸易法规管制的行为。为达此目的，现在又加上了建立边境防务常备力量，以及控制西部贸易和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等措施。1763—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政府的政策都抱着这样一些目的。

殖民者不能直接反对1764年的食糖条例，因为当时仍承认帝国议会管制贸易的权利；但为审判违反关税法规的人所定的新条款，特别是打算更多地使用代理海事法庭的做法，却大大遏制了偷税行为。旨在便于保持常备军力的1765年新驻营条例也遭到了殖民地的反对。但主要的不满是由1765年的印花税条例引起的。该条例以最直接的方式引起了帝国议会是否有权向殖民地征税的争论。殖民者普遍认为一个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的机构无权向他们征税，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就法律上讲他们参加这样的机构是不可能的；但英国人几乎毫无例

外地在原则上一致反对美洲人。既然被选为代表的也只是极少一部分英国人，那么征税权就与代表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下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组成部分”所固有的。一位殖民地代理人报告说：“他们说征税权是每个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他们对美洲没有这种权力，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权威了，那么美洲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王国了。”而且这样征税是有先例的。

殖民者们仍准备接受主要为控制贸易而不是提供税收。他们在英国议会中的一些朋友争辩说，这意味着他们把“国内税收”与“对外税收”区分开来，认为这不是一回事；但他们的一些代理人宁愿让这样的误解继续存在而不加纠正，这样才不致失去他们为废除印花税条例本身所需要的同情。在大西洋的彼岸，在一些私人团体的决议中，在报纸的措辞中，甚至在各殖民地议会的宣言，以及它们的代表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条例大会的宣言中，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英国议会有任何征税的权力。马萨诸塞颇有见地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爵士清楚地看到在这场关于谁有征税权的争吵背后，实际上有美洲人更广泛的要求：即他们的政府并不从属于大不列颠政府，而是与之同等的，因此他们与大不列颠的唯一联系是通过双方共同的国王。他建议英国议会应临时增加各殖民地的代表，然后再建立一套帝国政府的普遍的和一致的制度，该制度既确定美洲各政府的权力，又对他们实行适当的限制。但是，这样一种召开帝国制宪会议的主张，在当时未免过于大胆了。

有两个更为直接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新征的税是否只是为了支付共同的防务费用呢，还是通过征税的办法提供经费，使他们的政府无须依靠当地的资助，从而削弱殖民地的议会？而如果说格伦维尔按照该条例的措辞坚持说它只涉及防务是对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筹款呢？各殖民地的代理人辩称，应该允许各殖民地自行筹款；但是从他们过去的争吵和不一致的记录中，不难看出他们根本不可能就各自应承担的比例达成协议。

比反对印花税条例大会所引起的宪法争论更具说服力的是像“自由之子”那样的一些超出法律管辖范围的团体实际上拒绝执行犯众怒的印花税条例。对英国货实行广泛抵制的可能性促使英国商界请求取消该条例。继格伦维尔政府之后的罗金厄姆内阁过于软弱，无法抗拒国内的运动，转而同意废除该条例。但印花税条例在1766年的废除并

不表明英国议会被说服同意美洲关于宪法性质的观点。伴随而来的公告令宣称议会拥有“制定有足够约束力和确实有效的法律及法规，以约束在任何情况下都臣属于大不列颠国王的各殖民地及其人民”。可能是希望能使双方都满意，因而没有特别提及税收问题。殖民者们会注意到该公告令是仿照了对爱尔兰的法令，而爱尔兰的税收事实上并不由伦敦征收；议会中的顽固派则可心安理得地认为他们并未放弃任何重要的东西。

财政问题由于1766年的税收条例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该条例降低了对糖浆的关税，适用于从英国的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地进口的糖浆；减税使走私无利可图，税收总额激增。但是美洲人坚持反对一切加强征收关税的企图，并拒绝执行驻营条例。马萨诸塞和纽约的立法机构由于拒绝为反印花税条例暴动的受害者提供赔偿而在英国引起了愤怒。皮特—格拉夫顿内阁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提出的计划再次引发了宪法之争。国内对土地税的削减要用对进入各殖民地口岸的某些商品征收的关税来弥补。实施这一法令的收入用于支付殖民地总督、法官及其他皇家官吏的薪金。关税部门通过在波士顿设立专门的督察局而得到进一步加强；176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代理海事法庭。另一项法令暂时停止纽约议会的活动，因为它曾与其他地方议会一起抵制驻营条例。只有在领地问题上由于放弃了1763年宣布的政策而使帝国的控制有所放松。

1768年2月，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向其他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发出一份通知，号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汤森条例的政策。反对的理由是基于一个已经明确宣布的观点，即国王的美洲臣民享有“公平权利充分享受英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准则”，包括非经自己选择的代表的同意不得向其征税的权利。再则，如果他们的总督、法官和其他文职官员完全依赖于国王的供养，就不能说他们已享有自由。希尔斯伯勒勋爵函告，马萨诸塞议会必须撤销其决议，否则将被解散，其他做此考虑的议会也要被解散。但是新的殖民地选举只不过增强了反对派的力量。对波士顿新的海关督察官员，采取了像反印花税条例暴动那样的暴力行为，并且还发生了谨慎地开展全面抵制英国货物的行动。

人们已经开始怀疑，像约翰·迪金森那样的美洲温和派人士仍然在鼓吹的中间立场是否行得通。说英国议会拥有某些权力——如控制贸易——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能把它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吗？要

么是议会拥有全部立法权威，要么是它没有任何权威，情况难道不就是这样吗？美洲人如富兰克林开始认为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就英国议会而言，它毫不犹豫地绝对赞成前一种观点。1769年2月它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谴责在马萨诸塞所表现出的观点，并宣称议会解散后在波士顿召开的州的代表会议是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大不列颠国王的新的违宪权力机构”的证明。如果出现反叛分子，必须把他们带到英国受审。这一威胁进一步刺激了殖民地的舆论，骚动随即扩大到南方各殖民地。

新的危机也是在宪法冲突并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渡过的。汤森条例规定的税收在财政上失败，于是在1770年被取消，仅仅保留了茶税以保全原则，不过实际由于大规模的走私而被偷漏。至于美洲领导人，由于担心殖民地的舆论日益激化而准备加以默认，结果是以后的几年出现了一种不安定的休战。对这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很自然地与母国的争端转移到殖民者完善他们自己的组织以利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过去由于缺少这种合作而使反抗行动遭到挫折。但实际上仍存在一系列的争论，致使一些重要争端继续存在：在马萨诸塞由于从关税收入中支付官员薪金以及市政会议倾向于自己从地方政府机关变成政治论坛而引起的冲突；由于所谓的1770年“波士顿大屠杀”并且宣布向怀有敌意和有攻击行动的群众开枪的军队无罪而引起人们注意的英国继续驻军问题；关于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缉私船葛斯比号在罗德岛附近海上被焚一事而未能查获罪犯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对违法者无法确定或进行惩罚，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拒绝官员们所执行的宪法上和道德上的法律制裁。但直接后果是1773年3月建立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并指示对授权一个调查法庭“把在美洲被控有罪的人移送到海外的地方接受审讯”的当局进行调查。

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美洲有了一个强大的政党，它用美洲人本身的观点和他們所声称的权利来看待事态的变化。当英国还是从一个个单独的殖民地的角度考虑问题时，这个政党已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性质。在此关键时刻，1773年的茶叶条例为殖民地领导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争论点从而使他们的运动转变成为一个对抗的政府的雏形。茶叶条例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美洲和殖民地零售茶叶是在三个方面提出的挑战：它威胁到商人的生计，这个阶层的人一直不愿意为了抽象的宪法原则而牺牲商业的兴旺；它使茶叶价格下降从而大大减少

了走私的获利，而走私利益的重要，是不可能通过直接行动加以制止的；最后，它表明英国议会似乎总是把殖民地政策从属于国内有势力的公司的利益。

各殖民地立法机构再次提出了抗议，并且再次使用了武力——即“波士顿茶党案”，这种直接而公开的反抗使得英国议会中仅存的对殖民者的同情也消失了。几乎只剩下查塔姆一人仍坚持英国议会无权向美洲征税的观点，虽然还有伯克，认为这类行动尽管合乎宪法，但是不明智的。大多数官方人士都支持政府任命它在北美的英军司令为马萨诸塞总督，其明确的目的是以武力来恢复对该殖民地的权力，并支持议会通过被美洲人称为1774年的“四项不可容忍的法令”。这些法令是：波士顿海港法，规定封闭该港直至对被暴动者倾入海中的茶叶作出赔偿；马萨诸塞政府法，修改该殖民地特许状，以削弱议会的权力而增加总督的权力；新驻营条例；最后一个司法权条例，该法令规定马萨诸塞的官员在执行公务方面被指控犯有死刑罪时，可送到其他殖民地或英国受审。同年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即颁布魁北克法，将弗吉尼亚的“老西北部”划归加拿大，并批准在加拿大永久实行法国的法律并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特权地位，该法令在两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上向殖民地舆论提出了挑战。

此时美洲的领导者们已经接受了詹姆斯·威尔逊在该年8月发表的对《英国议会立法权力的探讨》一文的见解，认为英国议会的权力完全来自它所代表的那些人。因而，用杰斐逊的话说，“它是由那些与我们的宪法无关和不被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人们所组成的机构”。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的背景。这次会议于9月在费城召开，目的在于协调对英国的经济制裁以达到全面取消那些触犯美洲人的措施，并纠正会议确定的所有其他令人不满的弊端。弗吉尼亚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上述制裁并推选了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尽管它仍然宣称它是由“国王陛下恭顺和忠实的臣民”组成的，但他们对恭顺的看法与英国人对恭顺的看法相去甚远，已无法弥合。

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集标志着这一时期宪政史的一个新阶段。虽然并未放弃努力去寻找可以同母国和解的办法，但由于会议承担了处理各殖民地与帝国政府的关系的责任，它就不得不起着整个殖民地初期政府结构的作用。而由于这包括准备采取对抗措施，所以会议在这方面的活动明显地阻碍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大陆会议内部现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民众领袖这时否认英国议会会有权通过在任何问题上影响殖民地的立法。保守派仍认为帝国应有一个共同的立法机构，这只能是英国议会，但他们希望限制其权力——这项任务已经被证明是极难完成的。在讨论殖民地居民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不满时，分歧意见非常尖锐。有些人希望采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基础——自然法，并且认为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而非其他。R. H. 李宣称“我们的祖先并未发现这里有政府”。另一些人仍希望把争论限制在英国宪法范围之内。移民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忠诚，而如果民众同意是唯一的检验标准的话，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议加拿大法呢？

结果，《怨情宣言》^[1]成了一个保守的文件，它承认国王对殖民地法案的否决权和英国议会对贸易控制的立法权。并提到以“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和“英国宪法的原则及某些特许状或契约”作为殖民地居民权利的基础。

不过上述这一切还都是纸上空谈，因为大陆会议批准了萨福克县决议案，该决议案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最近制定的有关马萨诸塞的一些法令是必须服从的，并鼓吹在殖民地内建立一个保留全部税收和创建一支民兵的对抗性政府。大陆会议还制定了在对英贸易方面实行抵制与禁运的广泛措施。这些措施将实施到英国议会取消所有引起不满的法令为止。不言而喻，这对于任何一个拒绝与这一反抗计划合作的殖民地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当时的报纸及小册子所显示的公众舆论也比大陆会议的正式立场更激进，都在谈论对独立的向往、国王恶劣行为以及为自由美洲制定宪法应遵循的原则。

保守派现在不得不对问题寻求较具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而不单是要使情况恢复到1763年以前，殖民者将这一年界定为他们所不满的各项政策开始的年份。这表现为一个由约瑟夫·盖洛韦提出的建立帝国联邦的很完备的方案。盖洛韦准备把殖民者所要求的权利减少到只剩下一个：免受美洲移民的祖先离开英国以后英国议会所制定的所有法律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必须建立某些共同的机构来照顾帝国的整体利益。为此目的，（除现存的英国议会之外）应在美洲建立一个联邦立法机构，它包括由国王任命的总议长和由各殖民地议会推迟的参议

会。关系到各殖民地共同利益的法案需要获得这一机构和英国议会的双重同意。这样，各殖民地就会承认他们需要保护，作为回报它们继续效忠于国王。

当人民的思想越来越认定以完全独立为目标时，盖洛韦的方案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可能性。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其意义在于，像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这样一些反对者所持的论点在许多方面预示着后来在独立后，在商讨建立共同机构的问题上出现的“州权”主张。盖洛韦对他的方案的辩护也预示着后来主张建立联邦的各种论点，特别是他强调：除了帝国这一纽带外，在各个殖民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它们虽然各自完全独立，但必须有某种贸易方面的共同规章。

英国方面，同样企图继续保持帝国的纽带。一直和富兰克林保持接触的查塔姆在1775年2月1日提出的一项法案中建议：应请求美洲大陆会议承认英国议会在立法上的最高权力，但不包括使用军队“侵犯和破坏人民的正当权利”的权力以及不通过美洲人自己的议会而向他们征税的权力。作为交换条件，美洲大陆会议应考虑在财政上分担帝国政府的负担。2月20日的诺思决议案没有走得那么远。它规定每个殖民地向帝国防务提供经费并负担其文职政府的开支（这使后者得以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这样就可以不再向帝国纳税。但它不承认在美洲存在任何普遍权力的可能性。

但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在1774年年底至1775年初的那个冬季，各殖民地所选举的代表大会采取了战时体制。1775年4月19日发生在莱克星敦的冲突是武装的殖民者与皇家驻军之间日趋严重的紧张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在6月波士顿地区的战斗变得很激烈时，美洲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英国政府方面则采取了措施，包括对付殖民者的贸易的措施。这表明英国政府意在千方百计迫使殖民者就范。

美洲人采取的立场是在5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才确定的。会议于7月10日通过的必须采用武力的宣言，仍然是一个保守的文件；它指责英国的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背信弃义，而且迫使他们不得不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美洲人仍然不希望建立独立的国家，只要他们面临的危险消除，他们就会放下武器。

7月8日会议批准了一个新的向国王的请愿书，建议制定一项庄严的协定，可以说是美洲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对美洲臣民的权力。如英国放弃对他们征税的权力，各殖民地将使其所经营的贸易服从管制；或者，如各殖民地能与世界各地自由进行贸易，它们将承担义务按帝国的要求负担它们应缴岁收份额，条件是英国在本土征税的税率不得低于向殖民地征税的税率。请愿书还提到：拒绝这一建议即表明满足美洲人要求的最后可能性宣告终结，剩下的只有他们完全独立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必要认真去考虑在以后斗争的各个关键时刻所提出的某种以成立帝国联邦来解决问题的建议。1778年诺思提出的和解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美法联盟，它规定放弃直接征税的要求，只保留对贸易的控制。给1778年6月抵达美洲的卡莱尔和平委员会的指示是：可以给各殖民地在帝国范围内的事实上的自治，并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席位。盖洛韦在1778年10月离美赴英，1779年提出了一项新方案，包括在英国立法机构设立一个美洲分支机构，并加上一个由贵族组成的上院。迟至1782年，富兰克林还让来自英国的非官方代表们获得一种错觉：一项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方案，结果可能是英国和它从前的殖民地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谢尔本勋爵似乎确曾寄希望于达成一项效忠于共同的国王但分别建立议会的协议——按照以后的说法叫作“自治领地位”。1783年企图在英国与当时已独立的合众国之间建立密切商业关系的不成功的努力——这一尝试由于在航海条例问题上受挫而失败——可以看作联邦观念的最后反映。但实际上，很早以前这种观念就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从1775年夏天开始，那些掌握美洲政治的人们已经确定了完全独立的方针。

1778年2月诺思的建议在7月31日遭到大陆会议的拒绝，认为它是伪善的，其真实目的在于挑起各殖民地之间的不和。会议现在集中力量于军事任务，但保守分子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挠那些倾向独立的决议——如废除海关，在各殖民地建立独立的政府以及向世界贸易开放美洲港口等。但是英国的态度使得它们的地位下降。约翰·亚当斯宣称，1775年12月22日的《美洲查禁法》（American Prohibitory Act）应该称为“独立法”，大陆会议接到此法令后，挫败了一项否认各殖民地确实在谋求独立的动议。1776年4月6日大陆会议向所有国家开放美洲各港口，并且在5月15日采取决定性步骤，建议各殖民地为自己制定独立的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大陆会议中一些较激进的殖民地已占了上风，5月4日罗得岛宣布独立于英国。

就在大陆会议采取上述步骤的同一天，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建议大陆会议宣布各殖民地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它们应组成邦联，但每一个殖民地均有权确定其政体并管理其内部事务。这一决议是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大陆会议中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又有了新的根源。某些保守派人士已经成为，或者后来成为“保守党人”——支持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持与英国的联系。那些在原则上接受独立思想并且继续在美洲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人，要求首先解决中央政府问题，在保持独立地位的前提下，解决各殖民地之间所存在的纠纷。激进派则要求先分别在各殖民地一级完成独立，而把结成邦联推迟到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这些分歧可以用党派利益之不同加以解释，但这却使实现独立的步伐放慢了。

1775年年底至1776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对不屈不挠的富兰克林提出的一个邦联计划进行了一些讨论，虽然这只不过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计划，该计划仍谋求恢复与英国的关系。但与1754年他的“奥尔巴尼计划”相比，拟议中的联盟更强有力，不过中央政权没有征税权，这无疑是依从了最近提出的反对英国议会有征税权的那些论点。但各殖民地将不按单位，而是按人口推选代表；大陆会议本来可以有全权处理对外事务和控制向西部的扩张，以及把它的立法权扩大到“普遍福利所需要”的一切事务中去。但是，当时普遍占据支配地位的激进分子不希望把一种中央权力改换为另外一种中央权力。

关于必须在就邦联的组织形式取得一致意见后才独立的论点被推翻了，因为各殖民地的处境是，如果要成功地进行战争，它们就必须取得独立。美洲人无法为外国，特别是法国的援助提供其所要求的补偿，除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现在已普遍承认美洲人有权把自己看作独立的国家了。汤姆·潘恩的《常识》一书获得成功，也许正是这种新的心态的最好证明。

6月7日，R. H. 李在约翰·亚当斯附议下提出三项决议案：第一个是宣布“殖民地联邦”（United Colonies）乃是且有权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二个决议案认为，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争取“与外国结盟”是适宜的；第三个则决定“制订邦联计划交给有关殖民地研究和批准”。来自中部各殖民地的保守派代表设法推迟到7月1日再作出决定；但是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准备起草一个在大家一致同意后发表的独立宣言。该委员会的初稿主要是杰斐逊在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协助下起

草的，于6月28日提交大会，其论点与杰斐逊两年前出版的小册子《英属美洲权利概述》中的论点极为相似。

7月2日独立决议案在大会上通过，宣言草稿被采纳；经过对本文的某些修改之后，于7月4日通过，可能是在当天得到签署。

独立宣言后来之所以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具有纯文学的性质。它是一个形式简单的文件：论述了政治哲学；将之运用于美洲殖民地；列举了目的在于将殖民地置于专制统治之下（该宣言是这样陈述的）而采取的种种侵犯殖民地权利的举措；结论是独立。

杰斐逊在很久以后声称，宣言并非是什么独创的东西，只不过是“表达了美国人的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甚至像“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引人注目的思想也能在更早的文件中找到。但重要的是这一原则的实质，即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某些权利，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就使美国人把自己独立的宪法存在建立在纯粹的契约论国家学说的基础之上，无须传统法规的支持。确实，在几个州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建立政府的步骤（不要忘记也曾使用武力迫使仍然强大的保皇分子支持他们）已进行了一段时间。

1775年各革命政府通过各种代表大会和委员会接管了各州的权力。这些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在初期就致力于建立更为永久性的机构。大概是由于美洲人熟悉殖民地特许状的缘故，他们起草了正式的成文宪法——这是英语世界自从克伦威尔当权时的王位空缺期以来第一次重新制定宪法。较早的一些宪法是由作为立法机构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并未经过民众批准。但是，当这种程序在马萨诸塞遭到反对后，1779—1780年专门召开了制宪代表大会，并作出一些表示，将文件提交给人民审议批准。新罕布什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宪法真的被全体选民否决了，1783年又产生了一部新宪法，于1784年得到批准。通过这些试验性的尝试所找到的方法就成了典型的美国制宪方法，即召开专门的制宪代表大会，然后付诸公民表决。这种程序与然后交付正规的立法机构批准的程序之间的不同，后来为宪法高于法律的思想铺平了道路，从而也为美国式的司法复审制度铺平了道路。

这些新宪法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主要是模仿殖民地时的模式，有经选举产生的州长和上院以取代由国王或领主任命的人。这些宪法因而包括关于立法机构的条款。立法机构一般由两院组成。有由

立法机构或选民直接选举的唯一的行政首脑——州长。选举权则只限于有产者或纳税人才拥有。选举权问题是保守派与激进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而且他们在有关宗教的条款、官员的职权、立法权的分配，以及州长相对于立法机构的权力范围等问题上也都存在分歧。激进派主张立法机构的权力至高无上，保守派则赞成分权的原则。总的说来，激进派在关于扩大选举和关于内地有更多的代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此外，就整体而言，权力集中在立法机构，尤其是在下院。只有在马萨诸塞，州长才有否决权。而在其他各州，州长的权力往往受到很大限制。激进派也不相信关于司法独立的思想，有几个州法官由立法机构遴选，而且任期很短。而与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这些在宪法中有更多民主条款的州形成对比的是像马里兰那样一些仍由保守派控制的州，其宪法文件中激进派的影响表现得较少。

当然，在宪法条款上的冲突只不过是反映了在如何行使独立权问题上的冲突。在激进派控制的地方，他们采取行动反对诸如国教的特权、奴隶贸易、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等，并且推进法律的改革及教育的发展。正是由于各州都重视这样的历史背景，才形成近代在中央对宪政发展的各种解释的特征。这一学派最初受查尔斯·比尔德的《从经济角度解释美国宪法》一书的启发。他在该书中提出的论点是：1787年最终制定的宪法，是由一群思想保守的有产者，特别是政府债券持有者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他们害怕各州已建立的那种民主，因而希望由中央来限制他们所声称的极端行为。在他看来，依据邦联条款组成的美国政府的弱点，由于宣传的目的而被夸大了。因此，那些想加以修改的人不仅包括他们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

比尔德的论点为梅里尔·詹森所接受并加以发展，这表现在后者有关这一时期的两本书中：《邦联条款》和《新国家》。詹森坚持认为反对英国的斗争只不过是各殖民地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的一部分，而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独立，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激进派的要求时需要依靠英国的保护。那些没有投入亲英阵营的保守派人士现在把他们的砝码押在了主张尽可能地加强新的邦联政府或联邦政府的权力上，以使政府能起到同样的抑制作用。他们最初失败了，邦联条款只给予中央政权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一点也不比大陆会议为进行战争所行使过的权力更多。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保守派的反击成功，才使比尔德所论述的新的联邦宪法得以通过。

应该注意的是，比尔德的史学方法及其结论的确实性，受到美国史学家们的许多批评，至于哪些立论仍然成立和无懈可击应由社会政治历史学家来评说。从宪政发展的观点看，詹森所阐明的比尔德的观点看来有两个弱点。首先，他对于革命前和革命后为美洲各政治共同体建立共同体制所作的努力的连续性似乎没有论述。其次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要求对其机构的形成的影响有过分轻描淡写的倾向。防务问题、扩大殖民区域的政策问题以及贸易关系问题，在有关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阶段的文献中所占的篇幅过大，以致使人有理由感到这些文献贬低了那些制定宪法的人的重要性。

人们不应忘记，大陆会议即使在邦联条款确认其地位以前，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即已行使政府的职能了。如招募和统率军队、谈判条约、发行货币以及筹借款项等，这些都是不能等到缓慢的制宪过程完成后才办的事。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发现他们自己不仅是这个孕育中的国家的立法者，而且作为它的各委员会的成员，也在行使行政职能，甚至在从事某些司法活动。这种经验，以及他们关于殖民地政府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对帝国政府工作方法的知識，构成了他们创建一个更加持久的体制的基础。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后人会注意他们每一个记载下来的词，来试图回答一个或许是玄奥的问题，即，从时间上和逻辑上讲，各州的独立和组成全国性的美国政府究竟孰者为先。

1776年6月12日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13人委员会（每州1人）起草宪法。一个月后它提出了以约翰·迪金森的草案为基础的定稿。这一草案赋予国会以相当大的权力，使之继续成为由各州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一院制机构。像流产的富兰克林计划一样，征税权由各州保留，但各州应按人口负担共同的开支。国会有权处理各州边界纠纷，限定它们向西的边界，并建立新的州。虽然国会不拥有控制贸易的专门权利，但各州不得征收与国会所订条约相冲突的赋税。虽然按照拟议中的邦联制而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应保证每个州管理内部事务的全部权利，但这实际上只限于那些与划归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抵触的事务。

迪金森草案是大陆会议中激烈争论的主题。那些应向共同的政府提供大部分开支的大州，反对在共同政府作出决议时只有同等的发言权；在计算它们的纳税额时要计算奴隶数目一事，也成为详细讨论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对西部未殖民领土有大量要求的州，它们反对拟议中的把这方面的权力交给国会的主张。

战争的命运打断了宪法的辩论，直到1777年9月才重新开始。到11月15日邦联条款得以完成。总的说来条款按照的是迪金森的草案，不过在保留各州的主权方面使用的语言更为明确，达到了可以看作是激进派的一次胜利的程度。对于各州间争论的主要问题，决定向中央提供的财政贡献应根据不同的州的经过改良的土地的价值来计算；放弃了为要求获得土地的各州确定西部边界的企图。这一让步后来导致了很长时间的拖延。在大陆会议否决了各种修改提议之后，有8个州在1778年7月18日同意了条款。同年冬，又增加了两个州。但是，马里兰坚决反对有关土地问题的方案，1780年9月大陆会议同意所有西部土地的所有权均归大陆会议；这些土地应“加以殖民并组成明确实行共和制的州”。这些州应“成为联邦的成员，与其他州享有同样的主权、自由和独立”。在这一障碍清除之后，大陆会议才得以在1781年3月1日宣布通过邦联条款。

尽管根据邦联条款国会^[2]控制着对外关系的一切方面，并有权在各州间充当仲裁者，但其地位无疑是软弱的。关于这一点，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首先它几乎没有任何控制各州的行动的权力，例如，各州就有发行纸币的充分自由。其次，有各种方法限制它的威信。每六年中任何一位议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国会议长在三年中任期不能超过一年。议员可以被本州的立法机构召回，从而使他们有效地从属于立法机构。因而许多领导人宁可选择州政府提供的有比较广阔的活动余地的职务，这是可以理解的。唯一的后果是各州在国会中的议员人数不足，这部分是由于它们吝惜费用。议程的处理最低限度需要七个州议员团通过，而这往往难以达到；决定重要事件则至少需要九个州投票；重大决议则需经全体一致同意。大州的议员们把这一缺点归咎于国会本身。如果各州按财富或人口比例产生议员，如果国会可以按多数票行事，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当国会授权任命文职官员及管理行政事务的各委员会，从而奠定了后来的行政部门的基础时，作出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国会

议员不得担任有报酬的职务——在经过了一段政府权力没有明确划分的时期之后，分权的原则再次变得突出。其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限制了国会实行领导的机会。

这一体制是重要的弱点，就像已能预见到的那样，是它的财政条款——在财政上依赖各州，而靠各州如数缴清其摊款是不可能的。以前曾提出过建议把征收进口税的权利赋予国会以纠正这一状况，但是州与州之间的竞争使这些建议无法实现。不久又暴露出另一个漏洞：由于国会不能控制各州，从而妨碍了它履行其对外的责任，特别是缔结商业条约。1784—1785年，国会讨论了是否有可能修改邦联条款，使它有权控制贸易。虽然曾经提出建议，增加的任何岁收可直接分配给各州，但事实证明这种让步还不足以使反对者罢休。

在其他方面，各州也妨碍了国会运用签订条约的权力。1787年3月国会以两票反对作出决议：根据宪法签订条约是“这个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要求各州取消任何违背这些条约的法令，并指示其法院按此原则行事，而不管州的法律中任何与此相矛盾的东西。

在前一年夏天，国会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因而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整个情况，于8月7日建议另增加七个条款。国会将有权（有九个州同意）控制对外贸易和各州之间的贸易，并以惩罚的方式对欠款不缴的州征收额外的款项。作为最后一个手段，它有权自行规定并征收税款，强制州的官员代它行事。各州必须向国会选派议员；对公然反抗国会管辖权的州可以使用武力以外的所有强制手段；建立联邦司法机构；作为最后的制裁手段，可以宣布某州违反了联邦契约。

从当时的舆论情况看，这样的建议等于是承认失败；因为任何将之付诸实施的企图都会使邦联四分五裂。但是，事情很明显，就在1786年夏末马萨诸塞州的谢斯起义和罗得岛发生的支持有利于债务人的法律的成功骚动——一般认为以上两方面的形势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击”——之前，政府体制上的这些缺陷已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到。另一点也是清楚的，后来加以考虑的大多数补救办法，在全面修改条款的运动开展之前也已经相当充分地讨论过了。

大陆会议在移交权力以前制定了法律以履行关于西部土地的决议和给它的责任。1784年一项以杰斐逊报告为基础的法令规定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地区应该逐渐设州的办法，但它被1787年7月13日著名的西

北法令所替代。后者（在1789年重新加以颁布）成为以后管理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的基础，也成为处理其他地区类似发展的模式。该法令制定了一种可称为典型的美国办法，为拓殖确定了一个有限自治的阶段，作为在平等基础上完全加入联邦的一种准备。法令的被通过表明，在某些方面国会认为自己拥有某些不完全属于原来各州间所约定的权力；而从规定法令涉及的地区永久废除奴隶制的条文可以看出议会要求拥有影响更深远和最后更有争议的近似最高统治的权力。

对那些关心推动修改邦联条款的人来说，机会的到来几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1785年3月来自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专门委员为解决波托马克河通航而引起的问题举行会议，会议建议要求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也加入该协定。当这一建议提交弗吉尼亚州议会时，麦迪逊提出了一个由所有州的专门委员参加会议的计划，“目的在于接受和支持对国会在贸易方面的权力作必要的扩大”。1786年1月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确定会议于9月在安纳波利斯举行。

许多关心国家前途的人相信这一宪法改革的企图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如果失败，联盟是否能存在就值得怀疑了。但是即使各州不得不同意派代表，代表们又能就一项计划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各州又准备批准它，它是否就能成功呢？有些人确实怀疑其目的实际上在于防止国会扩大权力，而且也不知道北部和东部各州是否会切断与南方的关系而自行结成比较稳定的邦联。

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一次不完全的会议；只有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弗吉尼亚派代表参加；新泽西代表团建议召开一次规模较广泛的会议，9月14日由汉密尔顿起草的决议获得一致同意并由主席约翰·迪金森签署。代表们建议：与会各州努力使其他州一致同意任命专门委员于178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开会，讨论合众国的形势，制定他们认为使联邦政府的宪法能适应联邦紧急状况的其他条款；并为此目的向合众国国会提出一项法案，在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并经每个州的立法机构确认之后，使之实际达到上述目的。

出于“尊重的动机”，一份决议的抄件被送到国会，并在1786年9月20日正式提出。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一些人认为应由国会采取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分别由各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作为开始。但是

谢斯起义所造成的恐慌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特别巨大；在11月3日至次年1月17日一直在休会的国会中，支持召开建议中的会议的主张变得强硬起来。到1787年3月初，拖延采取行动的各种企图被克服，国会同意召开建议中的会议试试看。

即使如此，持怀疑态度的仍大有人在。但在得知（除民主思想很强烈的罗得岛外）所有州都将派代表出席，而代表们都得到了可以自由行事的指示，不限于只讨论商业问题后，怀疑态度遂有所减弱。

1787年5月28日，费城会议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有代表七个州的29名代表出席。总共选出了74名代表，实际与会者55人。每次会议的参加人数平均在30人左右。代表们的身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多数人担任过公职，有39人是国会议员，许多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华盛顿在5月25日当选为主席，而且并非仅仅是名义上的职位，特别是因为他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富兰克林此时已81岁高龄，体力过于虚弱不能参加辩论，但是他的幕后影响却很重要。他的出席把这次大会与33年前首次试图在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盟的奥尔巴尼会议直接联系了起来。

代表们决定开秘密会议，对他们的讨论进行严格的保密；不如此恐无法达成妥协。另一方面，这使历史学家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直到1840年麦迪逊笔记公开发表之后，才得以追踪讨论的细节。最近，有一位美国法学史专家（W. W. 克罗斯基教授）声称，麦迪逊的笔记并不可靠，认为他曾对之进行篡改，以便使他在会议上的记录更符合他后来主张州权的立场。但这一看法并未被普遍接受，看来没有充分理由改变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会议情况的看法。其他代表们所作的部分记录，证明麦迪逊的笔记基本上是准确的。

5月28日会议正式议程开始前一定是先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否则很难设想能如此迅速地就一种不能再称为修改邦联条款而是按新计划起草宪法的步骤达成协议。有些代表可能曾宁愿走得更远，把州的主权完全交给一个新的统一的政府；但多数人预见到，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广泛的权力赋予一个其权威直接来自人民的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给它以必要的控制权，以防止各州侵犯它的行动权限。这是对会议的结局发挥了最主要作用的两个人——麦迪逊和詹姆斯·威尔逊的基本立场。最突出地主张进一步实行中央集权的汉密尔顿在6月18日

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但并不期望会被接受。在会议进行期间，他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缺席的。

麦迪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弗吉尼亚的伦道夫5月29日向会议提出的方案的制定者。该计划代表了大州的观点。在全体委员会上一直辩论到6月14日各小州要求休会以便使他们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止。另外一个赋予中央政府较少权力的方案，由新泽西的威廉·帕特森在6月15日提出，又讨论了三天。6月19日投票表决表明，有七个州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因而他在修改后被提交会议讨论。这一方案在会议上从6月19日讨论到7月26日，这是达成重大妥协的关键性时间。讨论的结果提交给了一个细节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在7月26日到8月6日举行了会议，就在这最后一天，全体大会复会。一个文本委员会从9月8日至12日将文件定稿并于9月13日至17日之间由会议最后完成。

伦道夫方案虽然在某些根本方面做了修改，但仍是后来的宪法结构的基础，而且其建议都是直接从根据邦联条款所建立的政府的那些最不令人满意的方面来考虑的。政府的三大部门：立法、行政、司法将分立。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第一院直接由选举产生。第二院由第一院从各州立法机构提名的人中遴选。两院的投票权均根据各州的财富或人口按比例分配。立法机构拥有现在的国会的一切权力，再加上各个单独的州无法行使的所有权力。此外，它还对各州违反宪法的立法拥有否决权，并有权对不履行其义务的任何州用武力实行强制。行政部门由立法机构推选，可以连任两届。行政部门与“适当数目的国家审判员”一起组成一个复审委员会，拥有中止行使某项立法的否决权。在处理影响整个国家的事务中，广泛的权力授予国家司法部门。州的官员必须宣誓支持宪法。

如全体委员会6月19日所报道的，对伦道夫建议的辩论暴露出根本性的两难局面：有必要全部收回各州的主权吗？新的宪法真的是要这样做吗？威尔逊否认各州有主权，因为它们不具有主权国家对外关系方面的职能。一个各州的联盟在某些方面来说应是一种邦联，但在其他方面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在赋予它的权限范围内，联盟就是公民自身的联盟，因此它可以直接按照权限行事。整个讨论表明主权、联盟、联邦和邦联等概念是多么的模糊和缺乏明确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是在处理那些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的过程中，按照美国的目的而确定的。

帕特森方案表现出任何方案都存在的局限性，最终也不过是对邦联条款进行修改而已。它本可以给国会以更多的权力，并在中央设置一个双重行政机构，以及一个全国性的司法部门。对各州来说，邦联拥有的权力将大致和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所声称的对殖民地拥有的权力相同。但是它仍存在着邦联条款下政府的固有弱点；对于那些拒绝按要求行事或在行动上蔑视条约义务的州，政府除了使用强迫手段之外别无他法。正如麦迪逊在反对这一计划时所作的长篇讲话中所指出的，在该计划中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保证在一些特定的州能够有完善的内部立法和行政管理”。如果大会采纳某种类似于汉密尔顿6月18日提出的方案的话，就可以有这样的保证了。汉密尔顿的方案从帝国时代的做法中沿用了各州州长由联邦政府任命，以及有权否决与联邦宪法或立法相违背的州的法律的思想。

但是，汉密尔顿的极端民族主义要比“小州”集团提出的有局限性的方案更没有可能被接受。麦迪逊也未能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按自己的意旨行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对行使州的主权的某些特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限制，并坚持联邦政府的合法命令，对个人而不是对各州具有约束力。因此，这些命令首先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施行。

宪法的实际制定过程并不是对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一系列决定，而是就伦道夫方案所提出的问题用心良苦地作出的妥协。主要的分歧，并不是关于联邦的形式，而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分歧，在较小程度上讲是拥有奴隶的社会群体与不拥有奴隶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

最严重的冲突是关于新国会的形式。大州希望设两院，每院均实行比例代表制；小州则希望继续按邦联条款，实行一院制，每州都有相等的发言权。反对它们这种在一个院内享受平等的最低要求，几乎使会议陷入分裂；不过它们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下院（财政法案由该院提出）将实行比例代表制。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比例代表制中如何计算奴隶的问题。南方各州希望在为分配国会议席而计算人口时把奴隶包括进去，但在分担直接税时又不计奴隶。北方各州自然要求相反的做法。帕特森方案的妥协办法是，为上述两种目的计算人口时，都按5个奴隶相当于3个自由公民计算。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妥协是，国会应拥有贸易控制权，

但由于对此有争议，规定了下述条件：国会在1808年以前不得禁止对外的奴隶贸易，并不得给予一个州的港口以比任何其他州的港口更多的优惠。

关于大陆内地的前途问题，并没有由于接受了邦联条款和通过各项法令而最终得到解决。保守分子竭力限制建立新的州，或让现有的州分立。关于后一点，他们取得了成功，即在现有州的领土上，不经它们本身的同意，不得建立新的州；但是西部地区正在经过规定的领地阶段向正式的州过渡。而看来那些制定宪法的人似乎只想到了已经包括在合众国政治边界内的土地；因为宪法中没有关于如何治理新获得的领土的条文。

在新的联邦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主要的新规定，是有关行政部门的构成以及决定把它委托给一个人领导。对于这样一种安排可能“倾向于导致君主专制”的担心，通过规定总统作出重大任命或谈判条约时应有参院的参与条款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这样，参院可望起到像原来殖民地的参事会那样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立法机构的上院。

对赋予总统以否决权而带来的潜在权力也表示了担忧。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才达成一致意见，即在他行使该项职能时不得涉及司法部门。否决权受到这样的条款的限制，即两院可以通过2/3的多数将其推翻。这与殖民地时期的先例明显不同。

制宪辩论及其结果最令人感到奇怪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在英国行政部门越来越受议会控制的发展形势。宪法没有规定实行政治上的责任制，而只限于规定弹劾的法律制裁效力，并把它推广到总统以外的其他联邦官员身上。尽管英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弹劾是一种很笨拙的政治手段。尽管如此，无论是这一事实，还是把所有官员都排除在国会之外的做法，都不能用来证明它完全不存在某种责任内阁制的思想。

关于拟议中的国家司法机构的作用问题，也是在制宪过程的不同阶段不断考虑的一个问题。伦道夫方案涉及这一问题，并列举了国家司法机构有权受理的案件类型（海事、涉外或税收）。但是，7月18日会议决定应将其权限扩大到“涉及全国性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律的案件，以及其他涉及国家的和平与和谐的案件”。最后的文本使之兼有特定的权力和一般性权力。关于司法机构本身的组成也同样难以达成

一致意见。最后，会议只限于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而让国会去解决低级法院的组成问题。

宪法对美国司法机构未来作用的最具特色的一些方面没有作出任何结论性的答案。关于司法复审制度没有具体指明是对州的有关立法而言，还是对国会本身的法案而言。后来的一些评论家争辩说只能是指前者。确实，绝大多数人认为至少应对州的法律进行复审，因为可以看出，关于联邦法院有权就州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的条款，乃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对麦迪逊原建议的国会有权否决州的法律的方案替代。有人断言宪法中的措辞说“本宪法，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各种条约“皆为全国的最高法律”，这就是对国家立法进行司法复审的正当根据，但这有些难以支持辩论本身所提出的根据，虽然可望将其用来作为论据以反对成立一个复审委员会而把总统与司法机构联系起来的建议，但是，从宪法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性质本身显然可以推论出这样做的依据，而且当时的评论家，如《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就是这样来进行论证的。

看来在宪法的这部分和其他地方人们也许是有意识地接受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便使其比较容易被批准。有几个州争取批准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首先每个州都必须专门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大会，而双方都希望能选举尽可能多的支持自己的人，然后又需在大会上进行辩论。各州虽然是分别通过斗争取得了结果，但是有关某一个州所发生的情况的报道，显然会对其他州产生影响。例如在纽约州，尽管汉密尔顿个人对宪法有保留，但带头给予支持，包括将他极有影响的文章编入《联邦党人》文集。宪法的支持者在选举中虽然失败，但最终得到了成功，部分是由于纽约市威胁要退出该州自行与联邦妥协。

宪法的反对者一般说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曾参加或者赞成召开制宪会议但不喜欢现在的文件的人，另一种是一开始就反对制宪运动的人。但也可以从他们提出的论点来另行划分。一个集团是从古老的共和思想立场出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政府能成功地管理像合众国这样辽阔的地区；地方的利益会遭到忽视，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将会比乡村地区有更大的影响；选举产生的官员们离他们的选民过远，无法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控制；他们会由于自身或某种派系利益而滥用他们控制选举或订立条约的权力；最后，宪法缺少一个权利法案。总的说来，这种攻击主要来自南方。

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由中央作出的各种安排，给个人或机构以过多的权力，他们要求更多的制约和平衡，他们要求在参院休会期间，总统应有一个正式的咨询机构，他们认为有关职务轮换制和防止总统和参院成为终身制的条款太少了。这些人的基本态度是不信任一切政府，特别是民主政府。

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没有人提到司法复审制，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对各州权力的限制——这是反对比尔德认为的关键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有力论据。从批准的时间顺序中可以看出在小州中争论较少：看来尽管它们自己的方案被制宪会议所拒绝，但它们在参院获得平等的代表权，从而得到了安抚。特拉华在1787年12月7日以其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第一个批准了宪法；接着是宾夕法尼亚在12月12日（46票对23票）；新泽西在18日（一致通过）；佐治亚在1788年1月2日（一致通过）；康涅狄格在1月9日（128票对40票）；马萨诸塞在2月6日（187票对168票）；马里兰在4月26日（63票对11票）；南卡罗来纳在5月23日（149票对73票）；新罕布什尔在6月21日（57票对47票）；弗吉尼亚在6月25日（89票对74票）；纽约在7月26日（30票对27票）。原定最低限度须有9个州批准（仅就那些作出此项决定的各州而言）。现在宪法已生效了。北卡罗来纳在8月2日（184票对83票）拒绝在权利法案及其他修正案被采纳以前加以批准。它最后在1789年11月21日被批准（195票对77票）。罗得岛一直坚持到1790年5月29日才批准（34票对32票）。会议也期待弗蒙特加入联邦。弗蒙特自1775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州；不过纽约州一直在和新罕布什尔争夺对它的拥有权，因而阻止它加入联邦。弗蒙特在1791年1月10日接受了宪法，3月4日被国会接纳，成为原来的13个州之外的第一个加入者。

北卡罗来纳州并不是唯一一个坚持没有权利法案就拒绝加入联邦的州。有些州曾得到保证：一旦宪法被通过，就将进行一些修正；虽然另一方面也指出，权利法案事实上是多余的，因为新政府不像英国政府，它没有君权，不能超越所赋予它的权力行事。第一届国会上麦迪逊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其中有10条被采纳，后来便被称为权利法案。其中前8条回顾了国王们与臣民们斗争的背景：规定了宗教自由（并禁止确定任何国教）以及言论、新闻、集会和请愿自由。美国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并受到保护，不得无理予以拘捕和搜查，不得为

同一罪行受两次危害，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并在其他审判程序中保证能受到法庭的公正对待。其余两条修正案涉及对宪法结构本身的解释：宪法中列举的人民的权利不得被认为已是详尽无遗的；未授予合众国或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被认为是“一律保留给各州或保留给人民行使”的。但是企图把联邦政府权力仅限于明确授予它的那些权力的主张，遭到麦迪逊及其他温和派，以及彻底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并且取得了成功）。多数人同意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都必须拥有被含蓄地承认的权力”。

原邦联国会的最后一个法案使政府的新机器得以开始运转。1788年9月在11个州批准了宪法之后，它决定在未来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推选出总统选举人，在1789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投票，3月4日新总统就职。

各州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民众选举或通过州立法机构推选出总统选举人。华盛顿被一致选举为总统，约翰·亚当斯位列其他六名候选人之首而成为第一位副总统。各州并选举出它们的国会下院议员，并由它们的立法机构选举出首批参议员。新国会像行政部门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汉密尔顿的影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当遇到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时，它总是抱有民族主义者的偏见来处理。它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出自己的议事程序，并通过立法创建各行政部门。在完成前一任务时，它依靠了大陆会议的成果。因为在激进派最初通过国会本身各委员会在一切方面取得成功之后，保守分子获得了控制权并通过单独的行政官员掌握了处理各种事务的权力。没有一个新的官员接替相当于自第一届大陆会议以来就由查尔斯·汤姆森担任的国会秘书那样的职务。在建立内务部的建议遭否决以后，1789年设立了国务卿这一新的职务，把沟通联邦政府与各州关系的原国会秘书的职责与自1781年以来由另一个秘书负责的指导对外事务的任务集于一身，在创建陆军部时，国会只是接管了自1781年以来一直运行着的业务；邮政机构就更早了，是1775年在富兰克林主持下建立的。根据1789年的司法机构法设立了总检察长的职务。总检察长虽没有自己单独的一个部，但成为重要的行政官员和总统的顾问。

组建财政部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因为联邦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早期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与各州的关系的影响。国会根据邦联条款曾对这方面的政府组织进行过一系列改革。1781—1784

年，罗伯特·莫里斯任财政总历时权力极大，以致在他失势后这一职务改为由一个委员会来担当。曾有人建议应再任命一个由督察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但后来决定恢复由一个部的部长来负责。另一方面，决定设立财政部部长的法案给他规定了其他同僚们所没有的向国会通报其工作并咨询国会意见的特殊责任；而如果第一个担任这一新职务的汉密尔顿能保持他的职位和突出的影响更久一点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此基础上把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变成某种像英国首相那样的职位，使总统仅仅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地位。

但是在实施新宪法的头几个月和头几年所作出的几项决定，有助于保证联邦政府成为所谓的“总统制”政体。虽然总统的任命需经参议院批准，但是，在就设立国务卿一职的法案进行辩论时，同时也否定了企图使总统的撤职也需经参议院批准的主张。此外还决定各部的部长不得在国会辩论时发言，因此他们与国会的接触仅限于书面通报和出席各种委员会的听证会。最后，总统内阁得到迅速发展，而这个机构在宪法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内阁的兴起，部分是由于为了填补华盛顿企图利用参议院作为参议机构遭到失败后所出现的空白，他仅有一次出席参院会议进行协商，但并不成功。于是形成一条规律：每逢有关条约而需要“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时，即意味着对行政部门的行动作事后的批准。总统与国会的正式联系是通过年度咨文或特别咨文。这两种方法都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中规定授权总统以书面方式征求各部首脑意见的办法就不够了，因此，到1793年这些官员和总统定期举行会议已成规律，“内阁”一词也由此而被采用。

国会在审议其面临的事务时征求财政部建议的趋势，使该部成为早期大部分立法的有效来源。但是进一步扩大财政部部长的权力受到了阻挠，这是由于对汉密尔顿在1790—1791年一系列报告中提出的财政计划遭到反对而形成的。汉密尔顿要求按票面价值偿还邦联债务，承担并偿还州的债务，特许成立国家银行，并建立保护性关税。这些建议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与那些支持农民观点的人格格不入的。他们的反对态度由于对宪法的怀疑而更加强烈。特别是银行法案只能依靠含蓄地享有的权力，因为并未赋予联邦政府建立这样一个银行的权利。当这一法案在1791年被通过时，华盛顿就其是否符合

宪法征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意见。他们两人的意见互相冲突。这就为建立新体制下的第一批政党奠定了主要的原则。

汉密尔顿在费城会议上要求赋予全国性政府以广泛的权力，但未能达到目的。现在他争辩说，每一个主权政府都应有权扩大其任何必要的权力，除非是明文禁止的权力。杰斐逊（在国会得到麦迪逊本人这样杰出权威的支持）则争辩说，这样广泛的解释将把宪法所规定的限制一扫而光，并把国会变成一个随自己的意思行使绝对权力的机构。汉密尔顿在这场论战中坚持总统内阁在政策上必须一致的观点，因此各部首长不宜抨击彼此的政策。随着杰斐逊在1793年年底，汉密尔顿在1795年年初相继退休，这一目标终于达到了。华盛顿政府仍掌握在这时被称为联邦党的手中；而随着反联邦党人（一个主张州权的政党）作为一个活跃的反派的出现，美国宪法体系和美国政治生活的模式便具有了明确的特征。

（张志军 译）

[1] *Declaration of Grievances*, 亦译《殖民地权利和怨恨陈情书》。——译者注

[2] 1781年3月1日邦联条款批准后，组成邦联政府。大陆会议停止行使权力，设立邦联国会。——译者注

第十七章 从帝国、战略和外交诸方面看美国革命

大不列颠通过七年战争获得了大片领土，使它有必要认真从事10年前就已开始试探的帝国改组工作。英国得到了法属加拿大、南北佛罗里达以及实际上从阿勒格尼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领土，这不仅使英国在北美的属地面积扩大了1倍，而且也产生了组织、管理及防务等方面新的复杂的问题。首先要求帝国同化8万名左右的法属加拿大人，他们的语言和宗教都与英国不同，而且也不熟悉英国的法律和政体。获得横贯阿勒格尼的辽阔的荒原，要求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西部政策。这一政策要考虑到在土地定居、皮毛贸易，以及印第安人等方面相互冲突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突然之间把英国在美洲的属地从商业性改变为一个领地帝国，就必须改革内外的防务体系。

英国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瓦解。改组旧的殖民体系以及强迫殖民者们直接为维持这一扩大了了的帝国作出贡献，从而迫使殖民地领袖们重新审查他们在帝国结构中的地位，而且对英国这些要求的宪法根据提出了疑义。这样的反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他们远离英国，加上英国专注于其他事务而对他们的疏忽，美洲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享受着相当程度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已被他们认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过美洲的反对立场发展到独立的顶点，却是由于法国被逐出北美后各殖民地地位的迅速改变所致。当1763年长期威胁他们安全的因素消除后，殖民者们越来越不愿接受即便是已有的对他们自由的限制，更不要说去默认那些新的限制了。

1763年4月，接替比特的乔治·格伦维尔内阁，在有关西部的问题上是能够顺应潮流的。10月7日颁发的禁止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定居的皇家公告，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在于等待时间以便制定一项全面的西部政策。^[1]但就帝国问题的军事方面而言，是经不起这样拖延的。虽然法国的威胁已消除，但看来有种种可能会卷土重来，而需要继续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由于1763年的庞蒂亚克起义而显得更加实

际了。关于在各殖民地常驻1万军队的决定已在战争期间付诸实施。过去的经验似乎证明了除依靠英国常备军外没有任何一种殖民地防务体系是行得通的。1754年的奥尔巴尼会议未能形成自愿的联盟，在驱除法国人的斗争中殖民地迟迟不采取行动而且吝惜作出贡献，以及对阿默斯特要求帮助镇压庞蒂亚克阴谋的呼吁置若罔闻——以上种种都证明各殖民地间相互猜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美利坚人无法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在内阁看来，殖民者们仍旧应该承担一部分已经增加了的殖民地行政及防务开支，这是必要的，也是公正的。美洲的民政及军事机构的开支，从1748年的7万英镑增加到1763年的35万英镑。按照英国人的看法，进行七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殖民地的利益，殖民者乃是英国胜利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当战争使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并使国内的税收仍保持在战时高水平的时候，殖民者的税收负担却很轻，对帝国国库没有作出什么直接的贡献。

因此，提高殖民地税收就成为格伦维尔政策的主要目标。他的第一项措施1764年的税收条例，一般被称为食糖条例，代替了1733年的糖浆条例。糖浆条例的一项规定是对殖民地进口的外国糖浆每加仑课以6便士的关税，但这一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纸空文。格伦维尔的新措施除对酒类、咖啡、细麻布和细棉布课以重税外，把外国糖浆的关税降为每加仑3便士，但要严格执行。为了保证其有效，对于实施贸易条例及航海条例的机构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于许多仍滞留在英国的美洲海关官吏，命令他们或者履行职责，或者辞职。为了防止走私，船只申请办理出入港手续时需有另外的证件，并授权颁发援助令状。针对尽人皆知的殖民地陪审团不愿给走私者定罪的恶劣现象，把审理税收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交给了权力已大大扩大了代理海事法庭，并且恢复了皮特在战时实行的用海军制止非法商业的做法。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改革无效而腐败的殖民地海关，它迄今为止所上缴的税款只占其开支的1/4。

食糖条例，特别是其实施所带来的前景，在殖民地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商人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因为在那里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不顾1733年的糖浆条例，而从法属西印度大量进口蒸馏酒所需要的糖浆。新英格兰人争辩说这种贸易根本无法负担食糖条例所强加的关税。他们争辩说，该项措施将使他们失去唯一可以使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的主顾，从而将切断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硬币来源。但是，殖民地的抗

议没有多久就不再局限于经济范围了。因为它不同于先前的一些贸易法之处在于它公然承认其目的不是管制商业而是为了征税。这样，食糖条例不久就从宪法的角度遇到了挑战。

不过，在1765年通过印花税条例之前，殖民地的反对活动还局限在局部地区。实行印花税条例是由于食糖条例只能带来要求殖民者提供的税款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一措施把英格兰自1694年以来就已实行的这项税收推广到各殖民地。该条例在议会中几乎未经反对就被通过。它要求报纸、商业票据，以及法律的和其他的文件都必须贴印花。它实际上影响到这个社会中最爱发表言论和最有势力的一些阶级，在殖民地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应。^[2]这一措施被指责为不合理的新花招，并由于群众的行动而无法生效。印花发行者由于遭恐吓而辞职，凡是群众行动所到之处印花的供应均遭破坏。此外，殖民地商人们也以不进口作为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与此同时，有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反印花税条例大会，起草了一个权利与不满宣言，指责印花税条例具有“侵犯各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的明显倾向”。但是1766年废除印花税条例并不是由于殖民地的压力，由于不进口而使对殖民地的贸易陷于瘫痪，从而引起了英国商界的抗议浪潮。罗金厄姆内阁避免使用武力迫使其就范的办法，遂以此为借口而放弃格伦维尔的措施。

殖民地对废除印花税条例表示的欢欣是建立在误认为伦敦改变了主意这一基础之上的。而如公告令所清楚表明的，英国议会在宪法问题上连一寸也未后退，内阁在征收殖民地税收方面决心也未有任何减弱。确实，不久从其企图继续推行1765年的惩治兵变条例中就显示出来了。这一措施目的在于改进殖民地各海港军队供应不足，实际上等于要求各殖民地议会为英国军队提供兵营、给养而征收直接税。虽然多数殖民地至少是部分地遵照执行了，但它们做得十分勉强，而且附带条件，目的是保持未来行动的自由。纽约议会最初直截了当地拒绝执行这一条例，最后只是在受到中止议会的威胁时才表示服从。

继废除印花税条例之后，罗金厄姆政府通过1766年的税收条例以谋求进一步安抚殖民者。该条例将糖浆税从每加仑3便士降低到1便士，但把征税范围扩大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生产的糖浆。这一措施虽使从殖民地关税的收益有所增加，但财政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实际上，由于议会在1767年年初为减轻国内土地拥有者的负担而减少土地

税的结果，使财政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为了弥补税收方面的损失，查塔姆内阁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在1767年对殖民地进口的玻璃、铅、油漆、纸张和茶叶征收新的关税，其收入被用来不仅支付殖民地的防务费用，也用于殖民地的民政费用，这样就可以不再依赖于各殖民地的议会。为了进一步加紧控制实施贸易法令的机构，汤森又建立了一个美洲海关税务专员署，把它设在了波士顿。

汤森的措施再次在美洲引起了轩然大波。约翰·迪金森在《宾夕法尼亚一农民致英国殖民地人民书》（1768年）中从宪法的立场对之进行谴责，在《马萨诸塞通告》中言词更加激烈。这一新计划敦促殖民者再次采取在反对印花税条例时证明行之有效的报复措施。1768年3月波士顿实行了不进口措施，其他殖民地海港也在其后不同时间采取了同样措施。在波士顿由于新设立的海关税务专员署强制推行各项税收法和贸易条例而发生了严重的动乱。^[3]由于城市居民公开的敌视，税务专员们发现他们的任务日益难以完成。6月，在他们扣押著名的激进分子约翰·汉考克的多帆单桅船“自由号”的企图失败之后，他们的权威彻底垮台，派遣军队去恢复秩序，只不过导致进一步的冲突。1770年3月冲突达到了顶点，发生了所谓的“波士顿惨案”，有5名波士顿人在与英军的冲突中被杀。

但此时殖民地的团结却开始分裂。保守的观点由于看到激进主义和暴民行动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而感到震惊。同样明显的是商业抵制并未被一致遵守，有些港口则利用这一形势，牺牲其竞争对手而从中牟利。^[4]因此有许多人准备欢迎新成立的诺思勋爵内阁所伸出来的橄榄枝。诺思得出结论，认为汤森的关税无利可图，因而在发生波士顿惨案的当天取消了除茶叶税外的所有关税。茶叶税之所以被保留，是为了“作为议会最高权力的标志，而且是其有权统治各殖民地的一种有效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纽约放弃了不进口的做法，其余各港口也不顾激进派的抗议而加以仿效。

除了1772年在罗得岛外焚烧英国税收快船“葛斯比”号的事件以外，取消汤森税后的几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各殖民地在经过了漫长的战后萧条之后，又恢复了繁荣。殖民者似乎已对斗争感到厌倦，激进主义也已黯然失色。走私活动虽未完全根除，但至少已经减少，议会征税也成为正常的事实。但是这种暂时的宁静，在1773年由于通过了茶叶条例而被打破了。条例的目的是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

财政困难，而允许它向各殖民地直接出口茶叶，并在那里以零售方式销售。该条例虽然会使消费者购到价格较低廉的茶叶，但却会使殖民地商人受到垄断的威胁，而走私集团则有毁灭的危险。这就使得后两种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与站在宪法立场上进行反对的激进派联合在一起了。运到查尔斯顿的茶叶虽然上了岸，但不允许出售。运到纽约和费城的货则遭拒绝而退回英格兰。在波士顿，一群伪装成印第安人的人在1773年12月16日登上了茶叶船，把货物扔进了港湾。

波士顿茶党案使1763年以来时断时续的争论再次陷入危机。面对殖民地第三次反抗，英国政府放弃了安抚政策转而采取高压手段。1774年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强制性的或不可容忍的法令，关闭了波士顿港直至被毁的茶叶得到赔偿；修改马萨诸塞特许状以牺牲该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来增加行政当局的权力；规定把某些罪犯引渡到英格兰受审，并企图制止逃避为军队提供合适军营的行为。

这些措施远远未能像设想的那样孤立马萨诸塞，反而使其他殖民地联合起来保卫它。由于激进派的巧妙宣传以及各通讯委员会的工作，殖民者充分注意到共同行动的必要性。1774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发出了召开各殖民地会议的倡议，9月5日12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此时殖民地的舆论又由于魁北克法案的通过而火上浇油。该措施在今天被看成是试图以一种政治手段解决如何治理加拿大的问题，^[5]但在当时，一些老殖民地的居民却认为是对他们的自由的新威胁。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加拿大的特权地位以及在那里继续施行法国的法律制度，对美洲殖民者的舆论来说，似乎是“闻到了罗马天主教教皇制度的强烈味道”，并且预感到一种专制制度的建立。而把加拿大的边界延伸到俄亥俄河，看来是企图阻止向西部扩张。大陆会议深信采取一致反抗行动是必要的，不过起初对应采取什么方式有分歧意见。会议起草了一份宣言，阐述了根据宪法而提出的论据，请求国王采取纠正措施；并且同意成立一个包括不进口、不出口，以及不消费英货的各种协议的联盟，于1774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为保证严格遵守联盟的协议而成立了各种检查委员会，这就使殖民地的抗议行动明确无误地具有非法性质，并在1774年年底至1775年初的那个冬季发展成为一场公开的、尽管并未正式宣布的反叛。为推选参加费城会议的代表而召开的各地方的代表会议，在无视皇家总

督的情况下继续开会，在有的地方，它们承担起政府的职能，并在各殖民地到处推行战时体制，监督民兵的组织与训练，征集军需用品。这些防御准备对内阁来说本应是个警告：只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才能使这场争论和平结束。但是，诺思勋爵在1775年2月20日的和解决议并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与其说是为了和解，不如说是在挑起冲突。诺思的建议是对能支付自己民政管理费用并对帝国防务作出令人满意的贡献的任何殖民地，暂停征收议会所制定的税款，这无论怎么说都已经为时太晚了。等它传到美洲时，敌对行动早已开始。

敌对行动是在英国企图阻止美洲殖民者的军事准备时突然爆发的。1774年秋季，驻北美军队总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被任命为马萨诸塞总督，并命令他强制推行强制性法令。六个月后，伦敦批评他行动不力并命令他逮捕殖民地领导人，盖奇接到指示后从波士顿派了700名士兵去16英里以外的康科德去收缴殖民者聚积在那里的枪支弹药。但是此时农村已被动员起来，4月19日英军在莱克星敦被一队马萨诸塞民兵挡住了去路。双方开了火并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同时，在康科德集合了大队民兵，双方展开激烈交火。英军在摧毁了剩余的军事储备后返回波士顿途中，不断遭到袭击。在他们很艰难地收复了该城市后，他们发现已被一支虽然组织得很差，但却很强大的新英格兰军紧紧地包围了。[\[6\]](#)

莱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消息被激进的宣传分子们巧妙地加以渲染，甚至起到了弥合各殖民地分歧和加强它们保护殖民地权利决心的作用。参加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多数仍希望在帝国的框架内保持这些权利，但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各殖民地应“立即处于防御状态”的决定。响应马萨诸塞的请求，大会同意担负起包围波士顿军队的责任，批准成立一支两万人的大陆军，并号召各殖民地完成规定的名额。6月15日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将军和殖民地联军总司令”。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与其说是考虑到他的军事经验（这是微不足道的），不如说是出于权宜之计。人们感到由一个弗吉尼亚人来指挥一支主要来自新英格兰的军队，有助于促进殖民地的团结。选择一位富有的、保守的种植园主，会满足那些担心激进主义蔓延的人。而且华盛顿曾是大陆会议的成员，似乎可以保证不致出现军事统治。在挑选华盛顿的直接下属时，政治上和派别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陆军少将的军阶授予指挥包围波士顿军队的阿蒂马斯·

沃德、另一位新英格兰人伊斯雷尔·帕特南、来自哈得孙流域的土地拥有者菲利普·斯凯勒和一位定居在弗吉尼亚的前英国正规军军官查尔斯·李，还有一位是出身于英国军队的霍雷肖·盖茨，他被任命为副官长。

华盛顿7月初在剑桥^[7]就职，他看到大陆军正在从并不精确地被称为邦克山战役^[8]的血腥战斗的影响中恢复士气。5月末，豪、克林顿和伯戈因三位将军抵达波士顿援助盖奇，使他振作起来，主动进攻。虽然由于增援部队的到来使盖奇的兵力增加到6000人，但他只同意为防止进攻而夺取邦克山，因为该高地可以从查尔斯顿半岛俯视波士顿。但是在他尚未采取实际行动之前，一支美军已捷足先登。这支部队虽是派来占领邦克山的，但它占领了地势更高的布里德山。豪曾于6月17日指挥军队进行了击退美军的尝试，深信殖民地的民兵不是英国正规军的对手。但他行动迟缓，给了美军以时间来改善他们本已坚固的阵地，而且豪还错误地忽视了利用海军切断美军通向大陆的退路。因此，经过三次正面进攻英军才占领了布里德山，把美军逐出半岛。豪的2500名进攻部队伤亡人数达1000以上，而防守一方的损失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

盖奇经过他的军队的这次重大伤亡，布里德山战斗之后再未发动进攻。豪于10月接替了盖奇，同他的前任一样谨慎，更迫切希望从波士顿撤退到一个更有利的作战基地。美军没有任何进攻的条件。确实，华盛顿不得不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集中精力来克服大陆军在布里德山战役中所暴露出来的突出弱点。殖民地联军毫无组织纪律可言，并缺乏合格的军官，其武器和弹药也少得可怜。更为糟糕的是兵力的持续下降，因为士兵们不愿超期服役。其“公益精神之缺乏和品德之低下”是华盛顿始料未及的。

到1776年初春，这些困难已部分克服；再次招募充实了大陆军的队伍，并且获得了新的军火供应。此外，由于在提康德罗加缴获大量大炮并在冬天把它们奇迹般地运到了波士顿，华盛顿最终具备了发动进攻的条件。3月初他的军队占领了多切斯特高地，该地可俯视波士顿城，而英军由于力量太弱一直未能将其占领。豪认识到波士顿将很快就要守不住，曾一度企图赶走敌人。但一场大风暴打乱了他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他决定撤出。华盛顿渴望保全该城市，对英军的撤退未加阻挠。1776年3月17日豪的军队和1000余名亲英分子一同乘船逃往哈

利法克斯，从而放弃了一度是13个反叛的殖民地中最后一个英国据点。

与此同时，美军对加拿大发动的一场入侵被击退了。这次入侵的目的是想促使加拿大成为新生的殖民地联邦的第14个成员，并防止英国把该省作为惩罚性军事行动的跳板。当大陆会议在1775年6月批准在加拿大的行动计划时，似乎大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几百名英国正规军可以用来防守加拿大，而新英格兰军在伊桑·艾伦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联合指挥下于5月间占领提康德罗加和克隆波因特后，从尚普兰湖攻入该省已毫无阻拦。美洲殖民者也相信会得到法裔加拿大人的援助。

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没有根据的。魁北克法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加拿大人的不满，而在新英格兰爆发的反天主教活动对加拿大的舆论起了反作用，尤其在贵族和天主教统治集团中更是如此。因此，入侵者们发现法裔农民并不帮助他们，如果不是公开表示敌意的话。^[9]更何况由于准备工作的拖拉，加拿大远征军到9月才得以成行。当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指挥军队通过缅因荒原袭击魁北克时，理查德·蒙哥马利指挥的入侵大军溯尚普兰水道而上。蒙哥马利在黎塞留河畔的圣约翰堡遇到英军的顽强防守而被阻达两个月之久，直到11月13日才攻陷蒙特利尔。这样，在他的由于开小差和疾病而已削弱的军队与阿诺德的军队在魁北克城下会师之前，寒冬已经降临。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利用了这一延迟的机会加强了要塞的防御，而攻城的士兵则缺乏所需的重炮来摧毁结实的城墙。然而，由于蒙哥马利的大部分军队预定在该年年底遣散，因此他不得不试图以强攻夺取魁北克。这一攻势是在12月30日一个暴风雪之夜进行的，美军惨败：蒙哥马利阵亡，阿诺德受伤，损失惨重。虽然阿诺德继续包围该要塞达数月之久，但要取得胜利已不可能。天花使他的士兵大量死亡，等到一支强大的英国增援部队在1776年春到达时，他不得不撤围。到6月底，美军也不得不放弃蒙特利尔并在混乱中从加拿大撤退。

从莱克星敦第一次战斗到发表独立宣言，其间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大陆会议有好几个月都在继续宣称它对国王的忠诚。多数代表，像大多数的殖民者一样，仍抱着并不一定非脱离英国不可的希望。他们倾向于相信，高压并不是国王的政策，而是出于“一个腐败的内阁”。一直期望他们要求纠正错误的请求会得到一个和解性的答复。

但是到了1775年与1776年之交的冬季，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乔治三世镇压的决心并不亚于他的大臣们。对于7月送出的橄榄枝请愿书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国王在10月间议会开幕式演说中嘲笑殖民地表示的忠诚，并重申以前发表过的发动战争的意图。12月22日的美洲查禁法宣称反叛的各殖民地不再受国王的保护，并对殖民地贸易实行禁运，这就使各殖民地的许多动摇者相信必须脱离英国。另外，准备雇用德国雇佣军来镇压的消息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1月发表的小册子《常识》中反映了正在发展中的情绪。通过对君主制的直接而激烈的攻击，潘恩破除了美洲殖民者可以依赖国王保护的错误观点，而指出只能在投降与独立之间作出选择。事态发展的本身也正在得出同样的结论。殖民者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想不被制服，外援是关键；但是只要他们仍留在帝国内，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外援。而且一年来的战斗已造成严重的苦难，并大大削弱了对母国的依附。因此在1776年春季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指示其代表在大陆会议上投票赞成脱离。4月6日大陆会议向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美洲港口；5月10日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州政府的建议；7月2日理查德·亨利·李主张美洲独立的决议案被通过；两天后大会表决批准了伟大的独立宣言。

尽管独立宣言在当时以及后来都给爱国事业以极大的鼓励，但它对美洲的舆论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促进了团结，不如说是造成了分裂。它受到那些认为脱离的时机已成熟的人们的热烈欢迎，却疏远了那些无法使自己放弃传统的亲英思想的人。亲英分子在殖民地人口中究竟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但最通行的估计是1/3的人支持革命，1/3的人反对，而1/3的人漠不关心。但是这种分类尽管简单明了，却不正确。^[10]更可能的是，到1776年夏，至少有半数美洲居民赞成独立，而在其余的人中，中立分子在人数上可能超过了亲英分子。但是积极的亲英分子人数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在每个殖民地和社会各个阶级中都有这样的人。在纽约和新泽西他们可能占多数；在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他们的人数也少不了太多；在南北卡罗来纳人数也相当多。只有在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几个最老的殖民地，亲英分子的人数才微不足道。按比例而言，亲英思想在富人中最为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固有的保守主义，加上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皇家官吏和英国国教牧师特别倾向于继续效忠国王，此外，除了在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外，律师、商人和大种植园主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试图根

据阶级或职业来分析亲英思想的做法，在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内战这一事实面前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各社会集团，甚至家庭都发生分裂，自己人反对自己人了。可能有3万美洲殖民者冲突期间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而到冲突结束时，有多达8万人加入了亲英分子的行列，迁徙到加拿大、新斯科舍和英帝国的其他地方。

在英国，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虽然其程度并不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严重。武力政策在议会受到激烈的批评。伯克坚持鼓吹和解；福克斯为了表示对美洲的同情，穿着大陆军的浅黄与蓝色的衣服；戴维·哈特利和约翰·威尔克斯争辩说军事再征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批评大多出自单纯的派性，^[11]就连查塔姆也难免是利用美洲问题为政党利益服务。尽管他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是真心渴望和解的，但他们和政府一样不愿放弃英国议会为各殖民地立法的权力。一旦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必须在屈服或高压之间作出决定时，就只有少数人仍继续把反叛者的事业当作共同的事业了。平等精神在国内的复兴，进一步助长了教会人士及乡绅们对反叛者的敌视，从而保证了内阁的战争措施得到稳定多数的支持。确实有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宁愿辞职也不愿与美洲殖民者作战。但这类在以前的记载中被着重强调的事例，加起来总数并不多。武装部队整个来说其忠诚从来不成问题。诚然，对于一场很可能会打乱贸易和妨碍讨还美洲债务的战争，商界是有人反对的，但这种反对既不是全心全意的，也不是持久的。^[12]确实，英国舆论大都坚决支持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并且继续这样做，尽管热情有所下降，直到最后在约克敦遭惨败为止。

乍看起来，重新征服北美是英国完全能够胜任的任务。英国的人口与北美相比是3：1，它具有无限多的作战资源和陆海军方面的压倒优势。但是，有利条件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多。向反叛者作战所涉及的后勤问题是难以应付的。越过3000英里的海洋，运送并维持一支部队，是极为繁重的工作。与美洲的通信既慢又不可靠；过去在美洲的战役中可从本地得到供应，现在都要大量地从英国运送。美洲的森林、高山和沼泽以及它的恶劣气候和漫长的距离都不适合于采用欧洲的作战方式。由于交通不便，任何行动都是困难的；用重武器装备的部队根本不可能迅速前进。更何况战争爆发时发现英国像往常一样并无准备。自1763年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已惊人地削弱，主要原因是议会强烈要求节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在桑威奇管理下皇家海军

船坞贪污腐败所致。陆军的力量也下降了，为了在美洲作战需要迅速增兵时，只能从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的统治者那里获得。战争期间像这样获得的雇佣军大约有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来自黑森-卡塞尔伯爵领主。

1775年11月参加诺思内阁任殖民地大臣的乔治·杰曼承担了指指导战争的责任。作为一个战时的大臣，杰曼远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能。^[13]他精力充沛地克服了最初围绕着英国作战努力出现的混乱：及时向加拿大增援，在哈利法克斯组建起由豪指挥的强有力的远征部队，都是他的功劳。杰曼也并没有像经常被指责的那样犯了从伦敦指挥战争的荒唐错误。例如他对1776年战役的指示：占领纽约，向新英格兰进军，既非是独断，也并没有束缚了豪的手脚。豪被授予自由采取行动镇压叛乱的充分权力。但是豪同时被任命为总司令以及和谈特派专员的双重职务，暴露出一定程度的目标上的混乱，反映了内阁未能决定究竟是和解还是镇压。这种犹豫不决，加上杰曼过分依赖亲英分子的支持，从而造成英国在美洲的军事行动过于分散的特征。

杰曼对亲英主义的信赖使他过早地向南方各殖民地派出了远征军。他相信南方的亲英分子只需要英国正规军的帮助就能够推翻反叛政府，因此在1776年年初命令克林顿在彼得·帕克爵士的舰队的支援下率领军队向南北卡罗来纳发动猛攻。但是当克林顿的远征军5月集结在开普菲尔河附近的海上时，南方的亲英分子已遭到两次重大的失败，使他们已无意于进一步冒险。在弗吉尼亚，叛军的民兵于1776年1月1日占领诺福克，使亲英分子失去了该殖民地的最后立足点。在北卡罗来纳，一支由穷乡僻壤来勤王的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1600人的队伍，在前往威尔明顿的途中遭到截击，并在1776年2月28日的穆尔河桥战役中被击溃。这一挫折打乱了克林顿的计划，他决心进攻南方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查尔斯顿。但是这次行动失败了。大陆会议向查尔斯顿派去援军，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克林顿和帕克在6月28日用海军炮轰击以攻占该港城堡失败后，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已无济于事，遂驶离该港前往纽约与豪会师，从而使南方各殖民地有两年的时间未受攻击。

豪从波士顿撤到哈利法克斯后第一个目标是夺取纽约。纽约控制着通向加拿大的哈得孙—尚普兰路线，拥有大西洋沿岸最优良的港口，而且也是亲英主义的主要中心。对这一城市的攻击开始于1776年7

月2日在斯塔滕岛登陆，这一天也正是大陆会议投票赞成独立的日子。3.4万名英国远征军得到了豪将军之兄海军上将豪勋爵所率领的舰队的强有力的支持。华盛顿认识到纽约的战略重要性，已于4月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到这里，并在布鲁克林高地建立了防线。但是他的军队部署不当，在1776年8月27日长岛战役中被包抄，遭到惨重失败。只是由于豪在获胜后未能及时乘胜追击，才使华盛顿得以渡过伊斯特河，撤退到曼哈顿。

经过一个短暂的间歇（其间豪氏兄弟曾企图通过协商结束敌对行动而未奏效），英军在9月中旬再次发动进攻，并轻取纽约。华盛顿由于其军队大大处于劣势，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全面作战。在英军的推进面前向北先撤至哈勒姆高地，再撤至怀特普莱恩斯和北堡。豪在追赶中行动迟缓，丧失了在此诱歼敌军的机会。但他突然改变战线，占领了曼哈顿北端的华盛顿堡，俘获3000人和大量装备（11月16日）。这为入侵新泽西打开了道路。到12月初，康华里推进到特拉华河，追击华盛顿的士气涣散的军队。当时如果迅速推进，几乎可以肯定费城将落入英军之手。这个城市实际上没有设防，它的陷落看来已迫在眉睫，以致大陆会议逃到了巴尔的摩。但是天性谨慎而又拘泥于欧洲战争观念的豪，已无意在作战季节将近过去的时候采取新的行动。轻而易举地占领新泽西，使他相信美利坚人的抵抗正在瓦解，因而满可以把最后一击推迟到来年的春天。于是他命令康华里进入冬季营地，从而耽误了提供给英国将军的一举粉碎美军抵抗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这一出乎意料的休战给华盛顿以机会，他迅速抓住时机向英国人拉得过长的战线进行了反击。1776年圣诞之夜他再次渡过特拉华河，袭击守卫特伦顿的德国雇佣军，俘虏千人。几天后他突然包围了康华里的增援部队，并在普林斯顿击溃另一支英军。华盛顿退到莫里斯敦后，让他的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六个月，这时他可以满意地回顾一下他在短短的冬季战役中获得的战果了。他以一支人数只有豪的1/6的军队，居然迫使英国人放弃了他们在1776年战役中所获得的大部分地方。这样一来，华盛顿既恢复了他自己正在下降的声誉，也为美国的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

直到近年来，历史研究才推翻了围绕着英军在1777年作战中所采取的战略的各种荒谬说法。[\[14\]](#)过去一直认为，在考虑不周的情况

下，杰曼企图从伦敦协调两支相隔很远的军队的行动：他计划把军队集中在哈得孙河流域；根据该计划，要求豪以大量兵力北上与伯戈因从加拿大南下的部队会合；遭到惨败是由于杰曼未告知豪他应如何行动。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一从伦敦指导整个战略的企图。在伦敦制订的唯一计划是从加拿大发动突然袭击。这是伯戈因在1776年与1777年之交的冬季回国时与杰曼商定的。伯戈因的远征按计划是一个独立的行动，并未设想其胜败有赖于豪的密切配合。豪仍有权制订自己的计划，并经杰曼批准，决定他在1777年的主要任务是入侵宾夕法尼亚。但他也决定留3000人在哈得孙河下游，“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为从加拿大进军提供协助”。

豪以其典型的行动迟缓，一直等到1777年仲夏才重新采取行动。直到7月23日他才以260艘船只和1.5万人从纽约驶向特拉华河，以费城为其目标。当发现特拉华河防守严密时，远征队转向切萨皮克湾，并于8月25日在叛军首都以南50英里处登岸。华盛顿试图在布兰迪万河阻止英军前进（9月11日），但像在长岛那样遇到包抄而被迫撤退。他对阻止英方攻克费城（9月25日）无能为力，但是在10月4日对豪在日耳曼敦毫无准备的军队进行突袭取得了初步胜利。后来只是由于大雾使战场陷于混乱，以及康华里率援军赶到才遭到失败。一个月后，豪攻陷了特拉华河下游的防御工事，遂向英国船只开放了这条河流。当他准备舒舒服服地在费城过冬的时候，华盛顿把他的军队撤至西北20英里处福吉谷的荒无人烟的高地。但占领费城并非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摧毁华盛顿的军队本应是豪的主要目的，而它却依然存在。当豪徒劳无益地在宾夕法尼亚与他的对手周旋的时候，在遥远北方的森林里，英军遭到了惨败。

伯戈因后来虽然竭力否认，但他从加拿大开始南下时，明知道不能指望从豪那里得到什么主要的援助。但当他在1777年6月中旬率9500名以英、德人为主，以加拿大人、亲英分子和印第安人为辅助部队的大军出发时，他对胜利是满怀信心的。但他低估了在荒野行军的困难，虽然7月6日他攻克了离奥尔巴尼只有70英里远的提康德罗加，但他后来却进展缓慢。被庞大的辎重车队所拖累，他的军队发现由于桥梁的破坏和路障的设置而行动越来越困难了。8月15日伯戈因的一部分军队在新罕布什尔民兵手中的本宁顿遭到了严重阻击，到初秋时由于缺乏给养以及美军不断增加的抵抗而不得不停止前进。与此同时，陆

军中校圣莱杰率领的由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企图从安大略湖到达奥尔巴尼，也以失败告终。圣莱杰遭到斯坦尼克斯堡美军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费了很大力量才在奥里斯卡尼打退了一次民兵的袭击（8月6日）。当阿诺德率领下的第二支美军逼近时，他的印第安盟友抛弃了他，他不得不撤至奥斯威戈和蒙特利尔。从此以后伯戈因的形势迅速恶化。他的军队由于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的开小差而削弱，到现在只剩5000人。他的漫长的供应线一直回伸到加拿大，在新英格兰民兵集结东进后，这条供给线一天比一天容易受到攻击。他的前方是盖茨的军队，人数最后达到1.2万民兵和5000大陆军。只有迅速撤退，才能挽救入侵者。但伯戈因孤注一掷地向这时只有20英里远的奥尔巴尼突破，他两次试图从弗里曼农场（9月18日）和比米斯高地（10月7日）突破美军防线杀出一条去路，均以伤亡惨重而被击退，这时伯戈因发现自己被包围。10月17日他的精疲力尽的士兵在萨拉托加放下了武器，但是并没有投降。由于盖茨担心克林顿的救援部队会从南方开来，遂同意伯戈因提出的建议，达成协议：允许败军返回英国，条件是其成员在战争期间不再到美洲服役。但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议，“协议军”最终成为战俘。

萨拉托加战役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把法国也拖入了战斗，从而使一场地方性的叛乱变成了一场世界战争，力量的对比日益对英国不利。但法美联盟的成熟尚需时间，1777年与1778年之交的冬天，当外交家们还在巴黎进行活动时，美国的革命事业经历了一段苦难和分歧的阶段。盖茨得胜的军队在其民兵回家之后解体了。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大陆军则在他们条件恶劣的福吉谷营地备受艰辛之苦。周围的农村历经战乱，粮食已颗粒无存，再加上投机和牟取暴利使得从其他地方得到供应也很困难。此外，由于运输的中断，福吉谷只能断断续续地得到数量很少的食品和服装。确实，要不是这年冬天气候比较温和，也未发生流行病，否则全面的灾难很可能会降临到服装破烂和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大陆军身上。

像他的军队一样，在福吉谷这严酷的几个月里，华盛顿本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现在看来，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他的阴谋的说法是不可靠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存在着一个像华盛顿以及他的军事同僚们所认为的“康韦阴谋集团”。^[15]但是在大陆会议内外，无疑存在着有一股不满意这位总司令的暗流。在有些军营中，人们担心会像以

前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那样，他周围的人“有时对华盛顿将军迷信般地尊敬”将会导致军事独裁。也有人对华盛顿的防御战略提出批评，把他一再未能挫败豪的原因归咎于这一战略。更有甚者，一些人对费城的陷落感到懊恼，因而开始对华盛顿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并把他的战绩与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者盖茨的战绩相比。1777年11月事情发展到顶点，在大陆军中服役的一个出生于爱尔兰的法国军官托马斯·康韦将军写给盖茨的一封信的内容被披露出来。康韦在信中表示希望由盖茨来替代“这个软弱的将军”。但是批评刚一公开化就结束了。军队的大部分都已表示忠诚于华盛顿，大陆会议也不得不支持他，急忙表示对他的信任。结果康韦辞职而去，盖茨虽然不是没有野心，但并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他也同时隐退。除曾在1780年的南方战役中短暂而并不顺利地出现过之外，便默默无闻了。从此以后，尽管很长时间胜利仍与他无缘，但华盛顿的权威已是无可争辩的了。

大陆会议的领导人从战争的初期阶段已认识到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外援只能来自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海上强国。美国人对这两个大国，尤其是法国怀有传统的反感。只因这是他们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他们才决定向波旁王室求援。甚至在宣布独立之前，他们就在这样做了。1775年11月大陆会议建立了一个秘密通讯委员会与“我们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委员会立即授权一个住在伦敦的弗吉尼亚人阿瑟·李试探外国列强的意见。1776年3月又授权一名康涅狄格商人赛拉斯·迪恩去法国寻求军事和财政援助。但是在迪恩尚未到达巴黎之前，路易十六的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已决定给反叛的殖民者们提供秘密的援助。在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看来，美洲的反叛是“法国的一次独一无二的和出乎意料的好运”，给了它一个长期以来寻求的洗雪七年战争的屈辱的机会。但是在设法使英国和它的殖民地脱离关系时，韦尔热讷的目的并不在于收复法国在北美失去的领地。他的野心在商业上，而不在于领土。他相信美国独立将会削弱英国的商业而使法国的商业得益。但路易十六在开始时不愿冒秘密援助可能带来的战争风险。法国财政总监杜尔哥也是这样，因为他看到韦尔热讷的政策是对他自己扭转国家破产的努力的威胁。但是韦尔热讷的论点占了上风，1776年5月2日路易十六授权拨款100万里弗尔作为向美国人秘密船运武器和给养的费用。不久西班牙为同样的目的也提供了同样数目的款项。为了保密，用这些钱所购得的战争物资是通过以剧作家博马舍为首的一个空头商行罗德里格·

奥塔莱斯公司运送的。博马舍与韦尔热讷密切合作，有时他受权执行秘密援助计划。波旁王室对美国革命事业援助的价值，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美国人在战争最初几年所用的火药有90%来自欧洲，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博马舍的空头商行运送的。特别是导致伯戈因在萨拉托加失败所用的枪支弹药主要来自法国的兵工厂。此外，允许美国人使用法国及法属西印度各港口的设施，也是美国人的武装民船能成功地阻止英国航运的原因。

但是，在豪于1776年秋季接连获胜后美国所面临的危险，迫使大陆会议进一步与法国进行接触。会议的代表们不知道法国已决定给予帮助。他们在9月26日任命赛拉斯·迪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后来由阿瑟·李所替代）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凡尔赛宫廷，带着要求获得军需物资和要求立即公开承认美国独立的指示。一项与法国结盟的建议，在大陆会议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被否决了，理由是担心承担任何会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义务。这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最初就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孤立主义遂成为其指导原则。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一登上法国国土就担当起美国代表团的领导职务。确实，他的超人的能力以及长期的政治经验，使他有资格担此重任。在巴黎他享有不同寻常的盛名。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名气，早在他到来之前已众所周知；他的魅力和朴实风度征服了知识界。但是，尽管富兰克林为美国的事业争取到普遍同情，而他争取法国成为交战一方的努力，却长期未能奏效。他最后达到目的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机敏的外交手段，不如说是由于萨拉托加战役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伯戈因的失败终于使韦尔热讷相信法国可以放心地进行干涉，不用担心美国的垮台，而鉴于英国致力于和解已迫在眉睫，使韦尔热讷同样看到，法国的干涉再也不能拖延了。但是，按照1761年的“家族盟约”，法国在采取敌对行动之前必须与西班牙磋商。韦尔热讷先试图争取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干涉，但他的努力却遇到了西班牙的拖延，他然后说服路易十六单独行动。韦尔热讷不仅向美国谈判代表们提出缔结他们受权缔结的商业条约，而且提出缔结正式的联盟。他的建议立即被接受，1778年2月6日在巴黎签订了两个法美条约。一个友好与通商条约规定美国和法国在商业上实行互惠，第二个条约则规定一旦英法开战，联盟立即生效。根据联盟条约的规定：法

美双方保证尊重各自在新世界的领地，同意进行战争直至美国的独立被“正式承认或默认”；双方并保证不单独媾和。

正如韦尔热讷所预见的，诺思勋爵对萨拉托加战役消息的反应是作出让步，希望能把美国人重新拉回到帝国之中。诺思1778年2月的和解建议，同意了美国人在三年前所提出的所有要求，特别是明确放弃了英国议会有权向殖民者征税的主张。议会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并被说服废除了茶叶条例和1774年的强制法令，授权派遣一个谈判委员会前往美国。尽管和解建议比与法国结盟的消息先到达美国，但大陆会议以建议不充分和不真诚为理由，一致加以拒绝。诺思不知道建议已遭拒绝，派遣了一个以卡莱尔伯爵为首的皇家委员会，向大陆会议提出除独立以外的任何和解条件。但是当卡莱尔委员会在6月到达费城时，其使命之无望便立即一目了然了。不仅大陆会议已批准与法国的条约，而且军事形势也突然起了变化。委员们原来信心十足地指望军队会支持他们的和平建议，但他们发现克林顿根据一项皇家指令正在准备撤出费城，而该项指令诺思却故意不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大陆会议的接触，得到的回应是除承认美国独立或撤出英国军队外拒绝任何谈判。这使他们别无选择，只好随军队一起撤至纽约。

从费城撤退是由于得到法美联盟的消息而必须修改英国战略的第一个后果。1778年3月从伦敦发给接替豪任总司令的克林顿的指示，要求他在北方采取守势，准备对佐治亚的远征，并为在西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提供部队。在放弃了美国首都之后，英国的舰队和陆军都要集中在纽约，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守住克林顿在1776年12月攻克的海军基地罗得岛的纽波特。

克林顿把他的一部分军队由费城从海上派往纽约。他本人则率主力在1778年6月中旬从陆路出发。他一路上被华盛顿紧追不放。华盛顿的军队经历了福吉谷的艰苦考验，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充满着新的活力。由于新任命的军需总监纳撒内尔·格林精力充沛地工作，大陆军大部分得到了重新装备。而部分地由于副官长冯·施托伊本“男爵”的工作，这支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都大为改观。6月28日华盛顿在蒙茅斯郡府命令由查尔斯·李指挥的军队向英军后卫发动进攻。由于李的无能，攻击失败了，如果不是华盛顿率主力及时赶到，美军也许会遭到失败的结果。蒙茅斯战役暴露了李的徒有虚名，使他离开指挥职务。他在战场上与华盛顿发生口角，后被送交军事法庭。他被判犯

有不服从命令、不必要的可耻退却以及不尊重总司令等罪。这场战斗本身未分胜负，克林顿再未遇到阻击而到达纽约。

蒙茅斯战役是在北方打的最后一场大仗。此后英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仅限于在边境上和海上进行的一些袭击了。边境战争进行得空前激烈。特别是陆军上校沃尔特·巴特勒的保王派别动队和印第安辅助部队；1778年分别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边境上的怀俄明和切里瓦利两次大屠杀就是他们所为。巴特勒的军事行动虽然不必要如此野蛮，但至少有着明确的军事目的，即转移华盛顿对英军主力移动的注意力。这也是1779—1781年在沿海一带进行的劫掠性袭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纽黑文和新伦敦等新英格兰城市被付之一炬。弗吉尼亚也遭到同样的对待，但是1778年英国在南方的主要目标是佐治亚。这是一个最孤立，人口最稀少，因而也是联盟中最弱的州。住在它边境上的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以靠近英国人而闻名。尽管迄今为止对英国武器的出现的反应令人失望，但对佐治亚的亲英主义力量仍寄予希望。这种希望并非全是幻想，因为1778年12月29日普雷沃斯特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攻陷萨凡纳后，聚集在皇家旗帜下的人数之众多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个月后，攻占了奥古斯塔，并于1779年3月3日在萨凡纳以北50英里的布里亚尔克里克击退了本杰明·林肯的救援部队。这样就完全收复了佐治亚，并部分地恢复了文职政府。

法国在1778年6月的参战，对英国的制海权构成了主要威胁。到那时为止，英国一直得以封锁美国的各港口，任意攻击海岸线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不受什么干扰地越过大西洋运送给养。美国人没有足以作为一支舰队作战的海军，更不要说向豪的分舰队挑战了。大陆会议在1775年秋建立了海军委员会，为大陆海军总共提供了50多艘船只，各州的海军船只几乎也有这么多。但这些船只不是战列舰，只不过是改装的商船，最多只能算是快速帆船。虽然偶尔有单船作战的情况，但其任务主要是破坏通商。美国海军中的杰出人物是出生于苏格兰、过去贩卖过奴隶的约翰·保罗·琼斯。他从设在布雷斯特的基地袭击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航船，破坏了安装在怀特黑文的大炮，并在1779年9月在弗兰伯勒岬附近海上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俘获了英国装有50门大炮的快速帆船“塞拉皮斯”号。但是琼斯的功勋无论多么惊人，在军事上的意义却不大。事实上，美国人在海上最成功的活动是掠捕敌方的商船，从事这项活动的人有时超过大陆军的人数。战争期间美国

征用了2000艘以上的武装民船，其中大部分在新英格兰。掠捕敌方商船不仅是一种爱国行动，而且也是一种虽带有风险但有利可图的事业。例如，像贝弗利的卡伯特和塞勒姆的德比这样的新英格兰家族，就是靠这种利润发家的。对于这种掠捕活动给英国商船所造成的损失估计不一，但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掠捕活动对美国的事业却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对维持华盛顿的军队也没有起多大作用；而它对英国跨越大西洋的供应线的威胁，到1778年由于实行了有效的护航制度而受到还击。

无论如何，英国的海上力量还不足以对付强大的法国海军。法国海军主要是靠舒瓦瑟尔的努力从1763年兴起的。在1778年7月，凯佩尔在韦桑岛附近海面与占优势的法国海军作战也只能是不分胜负，这次海战被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意味着最终失去美国。1779年西班牙加入战争后，英国海军力量进一步穷于应付需要。1778年以来不断存在着的入侵威胁，只是在第二年英吉利海峡一场暴风吹散了法国—西班牙舰队后，才得以避免。直布罗陀陷入包围，一支法国舰队活跃在印度洋上，西印度产糖的岛屿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落入了法国人手中，甚至牙买加也面临严重的危险。

尽管如上所述，由于失去了制海权，英国被迫处于守势，但是法国舰队在美国水域的出现，并未立即产生预期的结果。早在1778年3月，即正式宣战之前三个月，德斯坦伯爵就率领12艘战列舰和5艘快速帆船离开土伦前往美国。但德斯坦的行动丧失了一系列的时机。由于他的行动特别缓慢，这位海军上将在7月8日才到达特拉华角，截击从费城撤出的英国舰队为时太晚。即使如此，在纽约进行一次成功的打击还是可以的，因为法国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大炮数量上都超过了豪勋爵在桑迪胡克的舰队。但是德斯坦拒绝这样做，担心他的船只吃水太深不易安全地驶过沙洲。一个法美舰队联合袭击罗得岛纽波特的计划，运气也不佳。德斯坦的舰队在一场风暴中受损，只得驶回波士顿进行整修。这使美国人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当德斯坦在11月离美前往西印度群岛时，他们对法国结盟后果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除了1779年秋德斯坦参加另一次也遭失败的围攻萨凡纳的军事行动时，曾短暂地重新露面外，法国海军的主要力量几乎有三年时间没有返回美洲大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法国参战的目的更多的是削弱英国，而

不是使美国获得独立。因此，它集中其海军力量于加勒比海，目的在于得到英国的产糖岛屿。

如果说法国是对美国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西班牙则是公开地敌视了。虽然西班牙在1779年6月参加了反英战争，但它这样做并不是与美国而是与法国结盟。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从一开始就被马德里看成是对西班牙帝国利益的威胁。西班牙担心美国的共和主义及其扩张会鼓励它的殖民帝国起来造反，并削弱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位，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由于这种担心，也由于被法国决定单方面宣战所惹怒，西班牙朝廷有一年多之久不理睬韦尔热讷不断要求它参加干涉的压力。在整个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的政策是指望把英国不仅从地中海，而且从加勒比海赶走。因为后者已成为英国向西属美洲属地进行商业渗透的基地。但西班牙最念念不忘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如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必要时则通过战争。^[16]它起初想以继续保持中立为代价从英国得到这个要塞。这是它1778年试探性地向英国提出调停建议的动机。这一行动失败后，卡洛斯三世和佛罗里达布兰卡便准备与法国达成协议。通过1779年4月12日法西阿兰胡埃斯条约，西班牙保证参战，但作为交换条件得到了实质性的让步。法国同意帮助它收复梅诺卡、莫比尔、彭萨科拉、洪都拉斯湾以及坎佩切海岸，并答应不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决不讲和。

荷兰最终也加入了与英国为敌的行列，虽然在冲突中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从战争一开始，英国就与荷兰在中立国海上权利问题上和荷属西印度的圣尤斯塔修斯岛成为巨大的美国武器运输中心问题上存在着摩擦。对英国来说，荷兰商人向法国和西班牙提供海军必需品是不能忍受的最后因素，于是1780年11月向荷兰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不久就宣战了。

武装中立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英国在外交上进入更加孤立的阶段。在韦尔热讷的鼓励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0年2月把对英国搜查中立国船只检查禁运品的做法感到不满的波罗的海国家联合在一起。作为对中立国商业的一种保护手段，同盟并不起什么作用。如叶卡捷琳娜本人所说的，这是一个“武装的废物”^[17]，但到1783年，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

英国在欧洲所遇到的日益增加的困难，有时并不一定就能使美国得益。由于还不能向克林顿发起进攻，华盛顿在1779年至1780年间继续经历了难以把军队维系在一起的困难。法国的参战使许多大陆军士兵相信，一定可以把战斗交给他们的盟友了。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军队生活的艰苦日益增加，而如果与文职人员获得的利益相比，这种艰苦就更加倍地令人难以忍受。部队中许多人不是开小差就是拒绝再次应征。甚至像斯凯勒和沙利文这样的高级军官以及汉密尔顿和门罗这样的杰出人物，也觉得他们可以光荣地辞去他们的职务了。但是比这种自满和自私更严重的对美国事业的威胁，则是先后出现的叛变和兵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向克林顿提出以2万英镑的代价交出西点要塞，固然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负债累累和他对美国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但使阿诺德变节的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大陆会议没有对他的军功给予他认为应有的承认，以及由于他因侵吞公共财产而受到军事的惩处，因而心怀不满。华盛顿认为西点若丧失，“对美国事业的打击即使不是最后一刀，也会是致命的伤害”。这或许有些夸大，但这件事肯定会使克林顿得以控制哈得孙河并孤立新英格兰。不过阴谋未能实现。因为克林顿的密使约翰·安德烈少校在1780年9月最后一次与阿诺德约会后的归途中被俘，向美国人泄露了进行中的阴谋。因为安德烈是在美国防线内穿着便服被抓获的，遂被作为间谍处决了。而阿诺德却逃走了，后成为一名英国的将军，领导了一场对自己故乡新伦敦的袭击，并参加了最后几次南方战役。[\[18\]](#)

1781年年初宾夕法尼亚及新泽西前线的兵变属另一类型，与阿诺德的叛变不同。这些兵变不是不忠的表现，而是对大陆军中服役条件长期积压在心中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尽管格林对后勤部门作了改革，但食品和服装的供应仍然不足，部分是由于各州当局的忽视；部分则由于作为交换手段的大陆和州的纸币暴跌引起的财政混乱。货币的贬值对士兵们的打击更为直接，他们军饷的价值不断降低，军饷一开始就少得可怜，而且还往往拖欠好几个月。不过，尽管这种艰苦在整个军队中普遍存在，但在宾夕法尼亚前线由于在应征条件上与民政当局发生争吵而引起了特殊的不满。虽然兵变者拒绝了克林顿要他们叛变的诱惑，但他们在1781年1月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直到答应纠正错误为止。宾夕法尼亚人所取得的按照自己的条件重新服役的胜利，鼓励新泽西前线也跟着学习他们的榜样。但是华盛顿感到与兵变者的谈判拖得太久了，他坚持用武力镇压这第二次兵变。

1779年秋，联军围攻萨凡纳的失败以及德斯坦舰队的返回法国，为英国向南方各州发动大规模进攻铺平了道路，于是开始了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诱使华盛顿在北方与其决战的企图一再失败之后，英国决定把它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大陆军难以获得供应、运输和增援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大量黑人居民、毗邻的印第安人和出名的亲英主义，都吸引英国人发起攻击。1779年12月，在已收复佐治亚和交通已不再受法国人威胁的情况下，克林顿从纽约率一支庞大的舰队和陆军航海南下，经过四个月的围攻占领了查尔斯顿并俘虏了5000驻军（1780年5月12日）。在康华里的指挥下，南方远征军迅速平定了南卡罗来纳，卡姆登一役（8月16日）重创盖茨指挥的一支匆忙集结的美军。盖茨仓猝向北卡罗来纳撤退，导致他被撤去指挥职务，这也许是不公正的。但是，虽然入侵者在三个月内消灭了两支美国军队，而且每支军队的规模都相当于萨拉托加战役中被打败的军队，但是形势开始变得对他们不利了。康华里的南方战役，显示出英国企图收复美洲，即保持和巩固它征服的地方所面临的基本困难。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驻守如此辽阔的地区，因此，一旦主力军开往别处，英国的警戒部队往往很容易受到攻击。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迹象，但距离完全征服南卡罗来纳还很远。抵抗不过是转入了地下，而马里恩、萨姆特和皮肯斯所领导的游击队仍在沼泽地带活动。而且许多原来在查尔斯顿陷落时准备投降英国统治的南卡罗来纳人，后来由于亲英分子对他们的过去压迫者实行野蛮报复而改变了态度。因此，当康华里从卡姆登向北挺进进入北卡罗来纳，去扫除他所认为的南方抵抗力量的最后残余时，农村马上就在他背后奋起抵抗，威胁他的交通并袭击他的边境哨所。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对北卡罗来纳的入侵也遭到了意外的挫折。虽然康华里的主力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到达了夏洛特，但是一支亲英分子组成的辅助部队，却在金斯芒廷陷入包围，并被歼灭（1780年10月7日）。当接替盖茨担任南方战场指挥官的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组织起一支新的美军后，英国人的处境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格林获得的首批战果是丹尼尔·摩根将军在考彭斯击溃了巴纳斯特·塔尔顿指挥的一支英国分遣队（1781年1月16日）。不久以后，康华里在吉尔福德县府所在地使格林遭受了他一系列失败中的第一次（3月15日），但他自己在战斗中也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以致不得不从北卡罗来纳内地撤至沿海的威尔明顿。4月，当康华里向北进军与在弗吉尼亚作战的英军会合时，格林抓住时

机，在南、北卡罗来纳发动了攻势。虽然先后在霍布柯克山（4月25日）和尤托斯普林斯（9月8日）受挫，但格林在南卡罗来纳游击队的帮助下，把英国分散在边远地区的哨所一个接一个地消灭掉。到了夏末，康华里征服的地方已全部丢失，在弗吉尼亚以南英国占领的地方只剩下了查尔斯顿和萨凡纳。

康华里未经批准进军弗吉尼亚，使他的军队陷于有被在切萨皮克湾的法国舰队切断的危险之中，这是他后来在约克敦遭到惨败的最初的原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咎于克林顿，因为在他意识到他的部下的危险处境时，既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坚持撤退，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加以拯救，直到为时已晚。^[19]尽管克林顿对康华里企图任意确定战略感到恼怒，但他在准备救援活动时行动迟缓，则是由于他认为法—美联合进攻纽约城已迫在眉睫。华盛顿在1781年年初得知德格拉斯海军上将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正在前来与他以及在纽波特的由罗尚博指挥的法军联合作战时，纽约确是他要进攻的最初目标。华盛顿只是在后来才被罗尚博说服，把他们的联合行动转向弗吉尼亚，遂使康华里的军队成为他们复仇的对象。法国舰队之所以能未受任何挑战而离开西印度群岛，是由于罗德尼海军上将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尾追德格拉斯，必要时一直追到美洲大陆。但他虽然知道德格拉斯离开西印度群岛，并正确地猜测到其意图，但罗德尼只是命令胡德前去追击，并向在纽约的格雷夫斯发出警报后，以健康不佳为由返回英国格兰了。罗德尼的预防措施失败了，德格拉斯在没有受到阻击的情况下于8月底到达切萨皮克，有4000人的军队一同到达，以支援拉法耶特防止康华里逃跑。不久以后，华盛顿和罗尚博的军队也到达弗吉尼亚，从而使康华里面对一支两倍于自己的军队，有效地把他围困在约克敦半岛。从海上逃跑的机会由于罗德尼的失误本来已经很小，而由于德格拉斯在9月5日切萨皮克湾口的一次作战行动中击退了格雷夫斯的舰队，使这种机会进一步渺茫了。但是最终决定康华里的厄运的是纽约迟迟未派出救援部队。直到10月17日克林顿和格雷夫斯才开始他们的救援尝试，而到他们抵达切萨皮克时，康华里早已投降了。被彻底包围并被赶进他们在约克敦的防御工事内的康华里和他的7000人的军队，在10月19日放下了武器。

约克敦的投降实际结束了在美国的战争。华盛顿希望进一步与法国合作，但由于德格拉斯返回西印度群岛而落空，遂使大陆军过于软

弱而无力单独发起进攻。英国虽然还有3万军队在纽约，但也只能在美国继续处于守势。不过海上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英国的运气有了明显的好转。虽然梅诺卡丢给了西班牙，但是直布罗陀最后由于豪率领的一个救援分舰队在1782年9月的到来而解了围。英国的制海权在这之前由于罗德尼在多米尼加附近的桑特群岛海上摧毁德格拉斯的舰队（1782年4月12日）而得以恢复。

但是美国战争的巨额开支以及再无取胜的希望，现在已使英国舆论相信进一步努力是无益的。约克敦战役导致和平的要求突然高涨，反映在内阁在议会中的多数日益减少上。1782年3月下院通过动议，放弃一切采取高压手段的企图，随后诺思辞职。先由罗金厄姆，后由谢尔本接替了他。乔治三世对事态的变化感到懊恼，曾一度提到逊位，但在4月勉强同意派一个已退休的苏格兰商人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前往巴黎与富兰克林谈判。

和谈暴露了法美联盟的裂隙之深。尽管法国努力使美国获得独立，但它竭力阻止美国有加强其实力的任何机会，这个目的日益明显地为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等美国和谈代表所看出。代表们有充分理由怀疑韦尔热讷想把美国排除在纽芬兰渔场之外，并支持西班牙对阿勒格尼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领土的要求。事实上法国自己垂涎于纽芬兰渔场，而韦尔热讷则由于未能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觉得有义务在美洲为西班牙得到补偿。尽管美国谈判代表们得到大陆会议的指示，要他们与法国密切协商达成和议，但他们决定，自己国家的利益要求他们与英国开始单独谈判。然而尽管谢尔本急于利用这两个盟友之间的不和，并通过一个慷慨的和平使美国与法国疏远，但他也发现富兰克林对加拿大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尽管如此，谈判时间虽拖得很长，但是在1782年11月30日草签的预备和约以及在翌年9月的最后文本中所确认的条件，都对美国极其有利。^[20]大不列颠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美国的疆界确定如下：北界为沿圣克罗伊河和圣劳伦斯河与缅因州之间的高地直至北纬45度线，再从那里到圣劳伦斯河，并沿该河和大湖区直到伍兹湖及密西西比河源头处；密西西比河本身成为西部边界；南部边界为阿巴拉契科拉河和圣玛丽河。主要由于约翰·亚当斯勇敢捍卫新英格兰的利益，美国人得到了在纽芬兰附近海上捕鱼，以及在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尚无人定居的地区晾晒并加工鱼类的“自由”，但并不是权利。条约也涉及两个在谈判中争执很大的问

题，尽管后来证明这样处理并不能令人满意。双方同意：英国商人在寻求收回他们真实的战前美国债务时，应“不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大陆会议应“真诚建议”各州发还被没收的亲英分子的财产。

英国在成功地与美国单独媾和并在重新恢复了的海军力量的支撑下，得以比原来估计的更少的代价与它的其他对手们媾和。1783年1月20日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约只是在细节上对1763年的解决方案作了修改。法国得到了塞内加尔和多巴哥，收回了1763年在印度拥有的要塞和工厂，并且略为扩大了在纽芬兰的捕鱼权。西班牙收复了梅诺卡；它对整个佛罗里达的权利得到了承认。这些条款加上英国与美国之间单独达成的那些条款，以及英荷条约所达成的条款，都由1783年9月3日的凡尔赛正式和约予以确认，从而正式结束了战争。

谢尔本与美国达成和平解决的目的在于恢复英美友谊，奠定“更能适应目前双方的情绪和利益的一种新关系的基础”。给予美国以慷慨的和平条件是旨在达到这种和解的第一步。按照谢尔本的希望，紧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商业联盟，而最终是某种形式的政治上的重新联合。但是在他同时代的人中仅极少数人持有与谢尔本相同的看法，因此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议会对草签的美国条约的不满，特别是由于未能给亲英分子以赔偿，从而导致谢尔本政府在1783年2月被推翻。议会对皮特的把美国的船只和产品与英国拥有和来自英国的船只和产品几乎置于同等地位的法案同样不满。英国的商业利益集团赞成这种让步，但舆论却普遍受到谢菲尔德勋爵的小册子《论美国的商业》的深刻影响。这本小册子是在议会就这一法案进行辩论时出现的。谢菲尔德辩称：这一措施将削弱英国的商业航运，从而使海军失去海员的后备力量。他断言：要赢得美国贸易，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作让步，因为那个国家太弱，无力对英国的歧视进行报复。这些论点占了上风，皮特法案遭否决。根据一系列枢密院令，1783年美国船只除进行美国产品的直接贸易外，被排除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其他一切地区之外。由于谢菲尔德小册子中所表示的担心，加上美国也担心陷入纠缠不清的联盟，致使谢尔本所倡议并由福克斯所继续的试图与美国签订商业条约的努力遭到失败。^[21]

谢菲尔德的政策被采纳后，给英国航运业带来立竿见影，但昙花一现的利益。由于英美贸易绝大部分是三角贸易，把美国船只排除出西印度群岛，使大量的运输转归英国的船只。正如谢菲尔德所预料

的，美国由于受到邦联条款的约束，无法对英国采取有效的反措施。中央政府无权管辖商业，而各州进行报复的努力由于不能制定一项共同的政策而宣告失败。但是，1789年联邦宪法生效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用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比较广泛的权力，国会加紧通过了一些有利于美国航运业的区别对待的法律。特别成功的是1789年7月20日调节吨位税的法律，规定美国沿海贸易仅限于美国航运，有效地把英国船只排除在日益增长的棉花三角贸易之外。

英国在商业上的排他性，特别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给予美国船只和产品的各种特权加以对比，不能不在美国引起愤慨。1783年的和约也对英美之间的谅解同样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条约的每一条款几乎都有含混不清之处，引起了后来的很多争论。有关疆界的争吵和捕鱼权的摩擦，都一直搁置到19世纪，但关于违约的争吵却立即发生了。关于不得妨碍英国债权人讨还战前债务的要求，遭到许多州的公开蔑视，特别是在南方，那里的种植园主欠了苏格兰商人大笔债务。更加明目张胆地遭到蔑视的是关于亲英分子的条款，几乎每个州都不理会大陆会议关于发还被没收的亲英分子财产的劝告。这些违约行为，给了英国以借口，拒绝执行“以最方便的速度”从美国土地上撤出的条约义务。英国守备部队继续占领着美国—加拿大新边界线美国一侧的七个军事据点，虽然英国把美国先前的违约行为作为借口，但它保留西北地区这些据点的真正动机，是要给该地区的加拿大皮毛商以时间，来改组他们的商业并撤出他们的财产。直到1796年这些据点才最后移交。

和约的含混不清也导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摩擦。虽然1783年英美条约的最后文本承认北纬31°线为美国的西南边界线，而西班牙则要求以其北100英里处的亚祖河为界，并继续占领着密西西比河左岸的纳奇兹。此外，在密西西比河通航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论，直到1784年西班牙一直不准美国人航行。直到1793年在这个问题上以及边界争端上均未能达成协议。

到这时为止，美国的独立仍然是不完整的。英国和西班牙的驻军还留在它的土地上，仍未能毫无争议地控制10年前条约所给予它的领土。它被两个欧洲大国的殖民地所包围，双方都威胁着它的安全，并且看来排除了它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大陆腹地没有出海口，从而使西部的不满发展到威胁联盟永久存在下去的地步。曾经大大推动了独

立运动的孤立主义愿望仍然未能实现，因为与法国结盟所承担的义务继续有效。只要美国承担着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保卫法属西印度群岛的义务，美国人就不可能摆脱欧洲事务。欧洲正在开始一个几乎是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属地问题也将因而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时候，美国的前途，甚至它的继续存在似乎仍是未定之数。

（陈沫 译）

[1] C. W. 奥尔沃德在《英国政治中的密西西比河流域》（2卷本，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17年）中分析了巴黎条约之后10年中英国的边疆政策。但是，奥尔沃德的说法在某些方面为T. P. 阿伯内西的《西部土地与美国革命》（纽约，1937年）以及R. A. 汉弗莱斯的《谢尔本勋爵与1763年公告》（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9卷[1934年]，第241—264页）和《谢尔本勋爵与英国殖民地政策，1766—1768年》（见前引刊物第50卷[1935年]，第257—277页）作了重大的修改。整个问题在文森特·T. 哈洛《第二大英帝国的建立，1763—1793年》（伦敦，1952年）中重新做了研究，见第162—198页。

[2] E. S. 和H. M. 摩根的《印花税条例危机：革命的序幕》（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53年）一书描述了殖民地抗议的情况。

[3] 在奥利弗·M. 迪克森《航海条例与美国革命》（费城，1951年）一书中着重指出了美洲海关税务专员署在挑起殖民地的敌对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4] A. M. 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1763—1776年》（纽约，1918年），第4、5章。

[5] 见R. M. 库普兰《魁北克法：对于政治手段的研究》（牛津，1925年）。

[6] 艾伦·M. 弗仑奇在《美国革命的第一年》（波士顿，1934年）一书中对莱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有争议的一些方面作了适当的论述。

[7]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城镇，亦译坎布里奇。——译者注

[8] 这次战役主要是在邦克山附近的制高点布里德山进行的。——译者注

[9] G. M. 朗在《加拿大与美国革命》（纽约，1935年）一书中对加拿大人的态度进行了分析。

[10] J. R. 奥尔登：《美国革命，1775—1783年》（伦敦，1954年），第87页注。

[11] 哈洛：《第二大英帝国的建立，1763—1793年》，第150页及以后各页。

[12] L. B. 纳米尔：《美国革命时期的英国》（伦敦，1930年）表明（第296页）至少某些商人对高压政策的抗议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例如，格拉斯哥的商人们一方面在1775年年初发出支持殖民者的措辞强烈的请愿书，一方面通过他们在议会

的议员们向诺思保证他们的意思不是要反对，而只不过想在美洲赢得信誉，以便易于讨还他们的债务。

[13] J. R. 奥尔登：《美国革命，1775—1783年》（伦敦，1954年），第68页。关于更加近期的为杰曼辩护的意见，参阅P. 麦克西《争取美洲的战争，1775—1783年》（伦敦，1964年），该书出版时本章已出校样。

[14] 权威著作为特罗耶·A. 安德森《美国革命期间豪氏兄弟的军事指挥》（纽约，1936年）。

[15] 这是伯恩哈德·克诺伦贝格的《华盛顿与革命……》（纽约，1940年）第65—67页，及L. H. 巴特菲尔德在其主编的《本杰明·拉什的书信集》（2卷本，普林斯顿，1951年），第2卷，附录1，第1197—1208页中共同得出的结论。

[16] 塞缪尔·F. 比米斯：《美国革命时期的外交》（纽约，1935年），第6章。

[17] 武装中立同盟英文为“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武装的废物”英文为“Armed nullity”，二者的字母和读音均相近。——译者注

[18] 卡尔·范多伦：《美国革命秘史》（纽约，1941年）主要叙述了阿诺德的阴谋。

[19] 关于为克林顿的辩护以及对约克敦惨败的责任的重新评价，见威廉·B. 威尔科克斯《英国通向约克敦的道路：对不统一的指挥的研究》，载《美国历史评论》第52卷（1946年），第1—35页。

[20] 关于谈判的详细情况，见塞缪尔·F. 比米斯：《美国革命时期的外交》（纽约，1935年），第14—17章。

[21] 哈洛：《第二大英帝国的建立》，第6—9章。

第十八章 从美洲的情况看美国独立：社会和政治面面观；向西部的扩张

根据1763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北美大陆为英国和西班牙所分占。法国只留下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这两个岛离纽芬兰海岸不远，法国渔民可在此晾晒他们捕获的鱼。到1793年，英国业已丧失其加拿大以南的殖民地：原先的13个殖民地已于1783年独立，并在一度踌躇之后于1787年联合起来，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州（佛蒙特于1791年以及肯塔基于1792年）；至于东西佛罗里达则已于1783年归还西班牙。

1763年，英国所属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从风暴频仍的布雷顿角岛到潮湿的奥克弗诺基沼泽沿海岸绵延达1600英里。在两端均设有军事前哨基地。新斯科舍于1710年为英国所占领。50年来它是抵御布雷顿角岛上的法国人的一个脆弱的皇家基地。哈利法克斯是作为抗衡路易斯堡的基地于1749年建立的，并派去了3000殖民者。1755年把法国人从芬迪湾和安纳波利斯河畔的阿卡迪亚殖民点赶走。在新英格兰移民的帮助下，英国人的人数由1766年的1.1万人增加到1775年的2万人。1758年新斯科舍被允许成立代议制的议会。1769年爱德华王子岛（原名圣让岛）成立单独的政府，其议会于1773年首次召开。1784年在圣约翰（原名帕尔敦）只有少数定居者，这年有3000名美国亲英分子大批迁来，使新不伦瑞克建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在这些边界尚未划定的沿海殖民地背后是魁北克省。这个具有法国特色的省还不够成熟到可以建立代议制政府的程度。据詹姆斯·默里总督于1766年计算，只有19户信奉新教的人家居住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境外——作为一个群体，是“一群我从未见过的最不道德的人”。而在远方的伊利诺伊乡村的万森、卡斯卡斯基亚和圣路易则有1500名左右的法国人居住——在1763年是一群无国籍的人。

1763年之后的几年里，在最后一个针对西班牙的缓冲殖民地佛罗里达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特别是在原西属佛罗里达位于查特胡奇河及阿巴拉契科拉河以西的部分，即西佛罗里达地区。这个地区包括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大部分，直至北纬31°以南和密西西比河以东以及彭萨科拉、比洛克西和莫比尔等城镇。它不包括由法国割让给西班牙的新奥尔良在内。1764年的佛罗里达的北部边界从北纬31°移到从亚祖河与密西西比河汇合处以东的一条线，把纳奇兹周围的肥沃地带也包括进来。在莫比尔和伊贝维尔河畔的曼查克，英国建有要塞，不过后者历时不长；彭萨科拉成了南部印第安人监管区总部和政府的所在地，西佛罗里达于1766年也成立了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东佛罗里达进步较慢并且远离密西西比河，乃是一个要审慎加以处理的问题。允许在该地成立一个正规的议会，以鼓励开发“丝绸、葡萄和其他有益于生产的产品”。殖民化试验开始了——1767年由安德鲁·特恩布尔医生带领1500名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梅诺卡人在离圣奥古斯丁以南60英里的新士麦拿定居下来，组成了一个奇特而注定要失败的殖民地，在当地种植靛青和甘蔗。在1781年，即在不再是英属殖民地的前两年，东佛罗里达有了议会，仿效的是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模式。

位于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和芬迪湾高潮区之间的诸殖民地，在政府、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差异极大。尽管它们的起源迥异，英王还是逐步对之一一实行了直接统治。到1763年只有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三个领主殖民地以及康涅狄格和罗得岛这两个自治省，即具有法人资格的省仍不受皇家的控制。甚至连佩恩^[1]的自由主义对他也不起作用：1765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派遣到英国要求废除领主所有权并要求乔治三世对宾夕法尼亚实行直接控制，但毫无结果。

除了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总督和立法机构全系选举产生以及马萨诸塞的参事会系选举产生之外，所有其他殖民地几乎都采取同一形式的政府。总督由国王或领主任命，而后由总督任命参事会——其成员差不多总是出身于最富有的公民；总督通常将他们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总督通常但并非总是英国人，并且往往身在他乡，其职责由一位副总督代理——这位副总督有时被误认为是“总督”——他本人往往是苏格兰人。只要不违反殖民地特许状和英国的法律，所有的殖民地都设有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些议会到1763年业已确立了它们提出法案、征收赋税以及筹措经费等权利。

在美国，政治争论的长期传统采取了多种形式：大小地主之间或东部与西部各县之间控制议会的斗争，在免役地税问题上的斗争，为少数民族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以及——在1763年以前的10年间到处可见的——议会与总督之间控制财政收入的斗争。在大多数殖民地，总督的薪金已靠年度拨款；他难以长期抵制立法机构的压力。至于对他的控制，尽管很少有人认为是对“王室”权威的一种抑制，但至少也被看作是对他往往要倚靠的那些权力过大的臣民的抑制。无论1763年英国的局势如何，1688年时的许多问题在各殖民地却依然存在；许多地方上的局势，不论是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以前还是以后都还是按光荣革命的固定不变的老眼光来看待的。国王也就是总督，英国议会也就是殖民地议会；要保证殖民地的各项权利，不仅要诉诸权利法案，而且要诉诸成文的特许状。由此人们可以看出，1776年的情况和1688年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固然，选举权如在英国一样受财产条件的限制，而且官僚阶级垄断了最理想的职位；但选举是公开竞争的，而且往往十分激烈，投票也采取口头方式。对投票权与财产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新近的看法是强调扩大投票的范围，财产的限制也会随之而容易加以克服。此外，通过教区委员会、县法院、城镇会议和议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是很多的。政府的模式看起来很可能是皇家的模式；在某些地区，如纽约，实行的是寡头政治，而在其他地方，如罗德岛，则具有排他性；许多法令，尽管执行得十分松弛，但目的在于维护帝国利益。然而尽管如此，在公众的争论中和在各殖民地选举议员和市政委员的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与白厅的权威相违背，因而最终向其提出挑战的生气勃勃的力量。[\[2\]](#)

对殖民地形形色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概括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含义像政治含义一样可以说是民主的，但民主制却姗姗来迟。大批殖民者远非贵族式的人物，社会的变动很大，拥有财产的现象很广泛，从而削弱了阶级划分的意识。然而它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同当时的英国一样具有贵族社会的性质。到1763年，已有了明显的上层阶级，包括大地主、富商和律师、总督与副总督、税务官员以及一些“政府的朋友”。在某些殖民地，这些人谋求成为排他性的集团，不过它们始终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他们之中可能包括像费城的约翰·麦克弗森那样的富有冒险精神的私掠船船长，或者像J. S. 科普利那样的富于进取心的画家。比他们较低的是一个庞大而不断变化的中等阶级，有教士、教师、小商人和律师、拥有土地的农民、城镇

的手艺人和店主、政府的小官吏、种植园的监工、船长等，总之是“中等人”。再往下主要是无财产因而也无投票权的工人、工匠、自耕农或贫穷的边疆拓荒者组成的劳动大军，其中有许多是德国人或苏格兰—爱尔兰人。原先，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曾经是订立了服务年限的契约奴仆，或者是一些罪犯。单是马里兰在1748—1775年就收容了9000名以上的罪犯奴仆。^[3]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契约奴仆：赎身奴仆。^[4]在南方，手艺人和工匠较难找到。到1763年，黑奴几乎完全替代了契约奴仆成为南方的劳动力，不过，在别处仍继续有白人契约劳工到来。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位教师就是在这种制度下来到美洲的，而革命时期最有趣的日记之一系出自一位名叫约翰·哈罗尔的契约奴仆之手。^[5]根据传说，至少有一位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即新罕布什尔的马修·桑顿是契约奴仆；建造冈斯顿大厅的威廉·巴克兰以及大陆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也是契约奴仆。威廉·艾伦曾说：“你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之一。”^[6]

到18世纪中叶，又有一种没有什么专长的劳动力出现在阿勒格尼高原的山谷和从莫霍克河流域到佐治亚只长松树的沙原的有人群居地区的西部边缘。这种劳动力大都是从德国、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招募来的。但也有从弗吉尼亚东部地区招募来到西部的人。当地人和移民一样，都想拥有土地，其次就是到远离人烟的地方，以求得他们在原来的社会即在欧洲和弗吉尼亚东部地区所不曾享有的安全和自由。就美洲本身而论，这种向西迁移不仅开拓了边疆，而且普遍解放了生产力，并保持了高的工资。莫霍克、哈得孙、萨斯奎哈纳以及谢南多厄各河的河谷、印第安人的小路和荒原大道都变成了交通和贸易的通道以及经济上有发展前景的途径。^[7]发展途径也各不相同，因为拓荒者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在南北卡罗来纳西部的茂密藤丛中，他们一般放牧牛群；在坎伯兰山口，他们捕兽和经商，他们从肯纳贝克和佩诺布斯科特等河流域前往大岸滩捕捞鳕鱼和鲑鱼，或者砍伐栎树和白松。

正是这支边疆上的力量很快就与法军前哨站和印第安人发生了冲突。他们的西部敌人一旦被赶走，事实证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受英国人——或弗吉尼亚东部地区的人——的控制了。他们对所有为维持别人享受而他们不能分享的舒适生活而征收的任何赋税，或对他们不同情的种种规章制度，都采取敌对态度。尽管对这些人的“民主”特征也许未免有些夸大，但他们对权力机构，无论是贵族制、君

主制还是教会，也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提出了挑战。到了1776年，每100万人当中已有25万以上的人生活在边远地区——而在南卡罗来纳，每5个白人当中就有4个生活在边疆或山麓地带。尽管来自弗吉尼亚东部地区的殖民者、教友会的商人和哈得孙河流域的大庄园主力图保持欧洲的文化和跟欧洲的联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西进的每一步而减少：因为穿鹿皮衣的丹尼尔·摩根的士兵们和穿浣熊皮衣的丹尼尔·布恩的士兵们身上看到的是，而且象征的是经济实惠。^[8]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向英国提出的政治挑战背后，是边民们为抗议东部商人和殖民者而提出的更加深刻和更加不易对付的挑战。不断变动着的边疆的文化，如路易斯·B. 赖特近来所说，也许基本上还是英国式的，^[9]但它却是一种单纯而质朴、与费城和查尔斯顿相距甚远的文化。这是一片由小木屋和为维持生活而小规模经营农畜业、靠玉米粥糊口和以亚麻羊毛交织的土布为衣的乡土；一片机会、贫穷和复兴精神并存的土地。

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成员靠自身的繁衍和外来的移民而不断增多：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比比皆是——每一个家庭的儿童平均达7.5人，而妻子们则因经常生孩子而耗尽体力。人口事实上每30年增加一倍，尽管新英格兰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别的地方要慢一些。1763年殖民地的人口近200万，其中约1/4为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约1/6为黑人。到1775年人口达到250万。据最初的统计，1790年为3929214人，其中757208人是黑人。^[10]

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其多样性及其地域主义。在1763年以前的10年以及以后的30年里，康涅狄格的东部跟西部争吵不休，北卡罗来纳西部和东部之间还发生了一场丑恶的内战。新英格兰瞧不起面积小而又无法无天的罗得岛；纽波特和普罗维登斯彼此相互鄙视；早在1765年盖奇就认为罗得岛不过是个“动乱不安的小小殖民地”。^[11]当时，跟以后的情况一样，人们对纽约怀有很多疑虑。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彼此之间都发生边界纠纷；所有的殖民地在反对印第安人时跟它们反对法国人时一样，彼此都迟迟不相互帮助——这也同纽约和费城迟迟不帮助其余的殖民地反对英国一样。詹姆斯·奥蒂斯于1765年曾怀着忧郁的心情预言：“要是听任这些殖民地一直胡作非为下去，明天美洲将会成为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地域主义甚至更加根深蒂固，这乃是岩石与土壤、种族与宗教的产物。很久以来，新英格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无数的港湾促进了海运业的发展，短小湍急的河流是水力的资源，造船用的木材也极其丰富。这里的农业尽管跟别处一样是很原始的，但多样化、规模小，因而不受困扰着南方的物价波动和生产过剩的影响。在西印度群岛和南欧有现成的推销过剩渔产品的市场；在西印度群岛、新英格兰和非洲之间又进行着兴旺的三角贸易。这种蓬勃发展但不光彩的甜酒、糖蜜和奴隶的交易，有着罕见的种族和宗教的相同背景，而且受英国人和清教徒在政教方面的各种倾向的支配。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正受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自然神论的影响，但程度还不太深。在像爱德华·拉特利奇那样的南卡罗来纳人看来，新英格兰居住的都是些“下流奸诈并按平均主义原则行事”的人。它受到宗教集会和城镇集会上一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随着新英格兰人定居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北方佬的那种勤俭、审慎和尊重知识的美德便传到了西部。在那里就像在纽黑文和波士顿一样，到处兴建起小红校舍和高大的白尖塔。

中部殖民地——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特拉华——的情景则迥然不同。在哈得孙、萨斯奎哈纳和特拉华三大河流域有大量富饶的土地，因而中部殖民地成为其余各地的粮仓。内陆航运比北部和南部要顺当得多，因此人们是最早沿着莫霍克河和萨斯奎哈纳河到达西部的。人口的状况极其复杂：继在特拉华河畔定居的第一批瑞典人和在纽约定居的荷兰人之后，又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莱茵兰德意志人（到1776年，至少1/3的宾夕法尼亚人口是德意志人）、好斗的苏格兰—爱尔兰人、温和的教友会信徒以及其他虔信宗教的人群。如果说教友会信徒和德意志人都是好庄稼人的话，德意志人还擅长于制玻璃、制砖和炼铁，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是富于冒险精神的边疆开拓者。荷兰人的势力在哈得孙流域以姓名上带有“范”和“韦尔特”的著名上层阶级而留下了它的痕迹：这里的政府比别的殖民地显然缺乏民主；范·伦塞勒的庄园占了罗得岛面积的2/3。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是殖民地最活跃的港口；1763年费城有2.3万人，事实上是北美的最大城市。它有这个国家第一个流动图书馆、第一所医科学学校、第一支消防队和第一份法律杂志，77家书店和117家客栈。

南方更加具有明显特色，英国商人和地主早就在此定居，并沿着缓缓流淌、河口宽阔的潮汐河流按照新的方向在不断发展。^[12]不管詹姆斯六世和一世如何严加谴责，约翰·罗尔夫“发现了”烟草，使之成为切萨皮克湾地区的主要作物；在南卡罗来纳，主要是种植稻谷和靛蓝；在这两个地区，种植园很早就发展起来。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4/5的黑人生活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这种经济提高了其主人的自给自足和管理能力，华盛顿在维农山庄就拥有比他1789年就任总统时多得多的一批手下；它保留着阶级区分、圣公会教会、教区政府以及古老的英格兰习俗。它主要从英国招募新的成员。它给英国运去谷物并买进英国的货物；也把儿辈送往英国接受教育——不过往往是送到爱丁堡和律师学院，有时也送到老牌大学中去学习。南方富于农村风味；种植园的宽大的房屋既是工厂和旅舍，又是住宅，有时可能还是个文化娱乐中心，像詹姆斯河畔的“韦斯托弗”（Westover）、罗伯特·卡特的“诺米尼霍尔”（Nomini Hall）或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南方海岸平原地区也跟新英格兰和费城一样有牢固确立的传统，不过很不相同。这是一个热情欢乐、爱发脾气、对受伤害非常敏感、开放、不很精明和无忧无虑的社会。北方佬感到这样的社会不合他们的口味。乔赛亚·昆西认为，南卡罗来纳是一片“富有而气派十足的种植园主、贫困而无精打采的农民以及卑贱的奴隶”的土地。^[13]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支缺乏效率、几乎完全没有主动性的黑人劳动力，以及一种使土壤日益遭到破坏的烟草经济。南方不仅在社会而且在经济方面受惠于英国。杰斐逊直率地把与他同时代的种植园主们描述成为“依附于某些伦敦商行的一种财产”。^[14]1775年弗吉尼亚人欠英国债权人的钱约达200万英镑。

因此，如果说1763年在13个殖民地彼此之间还有某种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致性的话，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微乎其微的，即使在那些具有共同地方特征的殖民地之间亦复如此。殖民地人的傲慢和妒忌是众所周知的。这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因素造成的。当时的交通通信仍很困难：迟至1801年杰斐逊任总统时，他还为蒙蒂塞洛与华盛顿之间的8条河中有5条既无桥梁又无船只而悲叹。富兰克林于1754年在奥尔巴尼议会上提出的一项联合计划，比起他当邮政局局长和建设邮路所起的作用来，既没有取得很大成功，又显得无足轻重。

地域主义使关于殖民地对1763年以后英国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反应作任何简单的描述都变得很困难，尽管有许多带普遍性的原因在起作用，迫使双方的关系走向分裂。原因之一是在北美（而不是在英国）人们日益认识到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各种差异。这个事实往往由以下一些人以爱国的言辞陈述于世：像汤姆·潘恩等当时为革命进行辩护的小册子的撰写者、像班克罗夫特等19世纪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许多编写美国教科书的人。那些第一批前往美洲的人是前去寻找宗教或政治宽容的英国清教徒；那些逃避查理一世暴政的人是走在他们时代之前的平均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些逃避克伦威尔暴政的人是保王党党员和贵族；弗吉尼亚1676年的培根起义和新英格兰的反对总督安德罗斯的斗争，以及洛克和英国革命的传统激励了1776年的人们。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有许多夸大其词的地方：“移居美洲的清教徒”有一半是罪犯；很少清教徒追求或实行宗教宽容；沃顿贝克教授曾揭穿弗吉尼亚保王党论点的这些夸大之处。^[15]然而，新近的研究工作又引人注目地重新肯定了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原则的胜利的论点。这主要是由克林顿·罗西特、马克斯·萨维尔、埃德蒙·S. 摩根以及欧文·布兰特在他的麦迪逊传第一卷中提出的。^[16]一种不同的、几乎是民族主义的态度在各殖民地日益形成，这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德意志人、苏格兰—爱尔兰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定居的地区，他们没有天生的理由尊重同英国的联系。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个人中有18个人不是英国人的后裔；哈得孙河畔庞大而富足的荷兰庄园里产生了像斯凯勒将军那样的革命领袖。各殖民地由各移民人群定居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即使他们中间出身高贵人家的子孙并不像“美国革命女儿”组织所说的那么多，但富于勇敢和冒险精神和信奉异端原则的人起码超过他们所占人口的比例。美洲提供了新的环境，强调接近自然、生活质朴、进取心和适应能力。支持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一个美国农民的信》（1782年）中所主张的观点的，有以杰斐逊为首的一大批思想家组成的整个学派，他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植物和动物以及新旧世界之间在地理、科学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17]因此，无论边疆地区产生的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天生的贵族，但人们当会一致认为：美洲的多种语言的居民，以及他们远离欧洲的地理位置，正将一种新的观点注入了政治领域。正如下一代的边疆社会成员自己也会在更加新颖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条件下看待这些老问题一样。

此外，如前所述，1688年的一些问题在各殖民地仍然存在。尽管杰斐逊把他起草的宣言说成是“表达了美国精神”并说“撰写时并未求助于任何书本或小册子”，但其措辞却是洛克用过的。而且，也正如杰斐逊所说，宣言的思想是美国人所熟悉的。人们不愿再忍受英帝国的高度控制为时已久。迄至1765年，英国唯一能干预的领域仅是商业——航海条例已属一纸空文，殖民地总督经常受到殖民地立法机构的威胁，帝国立法大都被束之高阁。这种政策，或者叫作无政策，被人们赞扬为有益的置之不理或“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暧昧态度”（波拉德教授语）。它事实上显示出行政手段通常很容易胜过政治家风度；它积累起一大堆宪法问题，结果导致乔治·格伦维尔这位第一个设法通过立法手段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热切、轻率而迂腐的大臣的垮台。如曼斯菲尔德勋爵所说，英国当局把殖民地议会看成只不过是市自治机构或郡议会，它们是根据恩赐的特许状——它们的法律地位——而存在的。面对殖民者来说，殖民地议会相当于英国议会。伯纳德总督说，它们是“完全的国家，除了有同一个国王之外，再没有其他依靠于英国的地方”。^[18]当他们为提出的抗议寻找合法的依据时，他们在17世纪，在关于法律至上和没有代表权就不应纳税的理论中找到了依据。他们看到，这曾经也是在英国进行的斗争的动机。美国革命的兴起是出于一种在宪法上忠于17世纪思想的意识。在1774年以前并不存在什么“共和”思想。

因此，倘若近年的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看法，即最早的美国革命神话的话，那么，它就完全破坏了美国神话的连贯性，美国人似乎一直在为英国人的自由与权利而战，而不是为反对暴政而战了。班克罗夫特认为乔治三世行为邪恶的看法已为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和已故的理查德·帕雷斯的研究成果所否定。英国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优柔寡断及软弱无力，而不在于它坚持其统治权。撇开宪法上的含糊不清之处不说，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工作也是任意行事的。对担任南方事务部国务大臣的纽卡斯尔来说，殖民地提供的不是制定政策的机会，而是任用亲信的机会。1768年以前，一直没有设立殖民地事务部来制定协调一致的，哪怕是根据对情况的了解而制定的政策。没有一个管理整个殖民地的政治机构，各殖民地本身也没有行政管理中心。它们无法联合起来，于是英国不得不替它们采取行动，并且承担引起它们不满的风险；起码格伦维尔在他的1764年建议中提出告诫

时，还没有任何的黑色的风暴信号从科德角或旧康福特角^[19]升起。像许多美洲风暴一样，狂风暴雨是骤然降临的，事先并无任何警报。

过去10年学术界着重研究殖民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心自由的问题，这就使人们倾向于对1913年查尔斯·比尔德的《从经济角度解释美国宪法》一书问世以来已流行40年的论点表示怀疑。在该书中他认为，开国元勋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他们设法保全既得的财产免受民主制度的危害；1787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有40人持有政府债券，拥有奴隶和土地；他们起草的文件旨在阻止而不是促进社会改革。借用伯克评论英国革命的话说，美国革命“不是一场要进行而是一场要防止的革命”。比尔德并不是第一个强调阶级冲突和社会对立的重要意义的人，^[20]但他比起大多数其他人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深入，并且在他的激励下出现了一系列最有价值的专著来研究这场革命背后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局面，^[21]不仅是正在上升的殖民地资本主义与采取限制政策的白厅之间，而且还有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论点虽然进一步拓宽并加深了对革命问题的研究，但始终未得到普遍的赞同。C.M. 安德鲁斯在他的《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第4卷（“聪明机智而且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为了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而对事实逻辑作肤浅的处理”）和一批研究革命时期马萨诸塞历史的学者，^[22]以及1956年罗伯特·E. 布朗在对比尔德进行全面批判的《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一书中都对之提出了质疑。到这个时期，每个州都已经有了了一批胜任的研究人员能够对这种令人不满的论点作出任何单独的解释，自然也就足以用来论证比尔德的中心论点是否正确了。

而且这一论点也不容易根据1763—1776年的情况证明其正确。各殖民地的阵营划分各不相同，错综复杂，几乎毫无模式可言。新英格兰的激进主义植根于自豪而虔诚的波士顿，而不是植根于平均主义的边疆地区；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像荷兰的庄园一样产生了一批革命领袖人物，尽管一旦与英国关系破裂，他们的思想无疑属于保守的一派；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人边疆开拓者，特别是北卡罗来纳的高地人，曾于1746年卡洛登战役中与坎伯兰公爵作战，30年后却不合常理地在穆尔河桥战役中为他的侄子乔治三世而战。^[23]如果说南卡罗来纳边疆地区属于保王派，那么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边疆地区就整体而言却属于爱国者。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商人倾向于保王派，查尔斯顿的商人

亦如此，但查尔斯顿的两个最富有的商人——亨利·劳伦斯和加布里埃尔·马尼戈——却是爱国者。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商人集团随着财富的转变而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在马萨诸塞至少有200人于1776年3月跟随英国人离开波士顿。经济和社会的力量是在地方上而不是在全国范围起作用。尽管这两种力量可以把一些集团推向革命，但却不像宪法或政治的原则问题那样激起同样的热情。认为华盛顿的那支小部队能够同心协力一起度过八个严冬靠的仅仅是对经济问题的关心，那是不可能的。[\[24\]](#)

近来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两方面的新问题。菲利普·戴维森和阿瑟·M. 施莱辛格认为革命并不是自然而然爆发的，而是进行精心宣传而取得的胜利。当时不仅有塞缪尔·亚当斯，而且还有一大批爱国者——鼓动者。乔赛亚·沃伦可以提醒那些在波士顿“大屠杀”之后去凭吊他们父辈们“殉难”场所的儿童要小心谨慎，以免“你们滑倒在溅过你们父辈们的脑浆的石头上”；但他却没有强调约翰·亚当斯曾为军队辩护，而且波士顿的一个陪审团在审判军队的法庭上宣判他们无罪，而且也不曾强调殉难者的数目只有五人。奥蒂斯、乔赛亚·昆西、约瑟夫·霍利、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伊萨克·西尔斯、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和汤姆·潘恩这些人也都劝告人们不要采取温和态度。这些人背后是一些劝导人们的机构——各地的通讯委员会、一些俱乐部和劳工协会以及每个殖民地的商人团体、自由之子社、莫霍克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水手协会、费城爱国会以及其他团体。约翰·亚当斯曾说，它们的各种集会感染了人们的思想并“给他们灌输了自由思想”。[\[25\]](#)而在这些机构的后面又有1775年在美洲出版的42种报纸——几乎都是自由党人办的——以及无数的小册子和传单。新闻出版界先是受印花税法，后又受汤森条例纸张税的打击，于是把自己看作是暴政的第一个受害者。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教士从他们的讲道坛上一再重复宣讲这些主题。盖奇将军和哈钦森总督自然就认为，这场争取独立的运动乃是一班居心叵测的人巧妙安排的阴谋。他们的看法在英国为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26\]](#)

在新近的研究工作中，另一项主要的贡献是L. H. 吉普森作出的，他认为这场革命基本上是“帝国大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余波。在历时九年的战斗中，殖民地人民并未担负像英国承受的那种重负，这就使他们在1763年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他们憎恨格伦维尔所推行

的政策，尽管这项政策的用意是慎重而明智的。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无论殖民地人民是否想要进行革命，只要法国的威胁一旦被消除，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用伯克的话说，新的帝国主义使英国似乎“像一只用议会法令全部武装起来的豪猪，压制着贸易和美洲”，这就引起摆脱了法国人束缚的人民的憎恨，即使这个帝国主义本身还是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殖民者不愿受任何控制或最终由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任何税收。1780年约翰·亚当斯说的话在1770年是同样符合实际情况的——“美洲不习惯于负担沉重的赋税，那里的人民还不像在英国那样经历过承受苛捐杂税的锻炼”。瑞典的一位旅游者彼得·卡尔姆在18世纪50年代也看到了同样的力量——“极度的自由和繁荣养成一种不可驯服的精神”。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也证实，在美洲激起愤怒的倒不是伦敦采用新的有力措施的意图，而是一些具体事情，英国海关督察员、税务官以及1764年后设立的代理海事法庭的管理方法以及巧取豪夺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对和平时期驻扎常备军的主张也同样引起愤恨，因为“英国大兵”的存在甚至比他们的花费还要令人惶惶不安。[\[27\]](#)

因此，近年的研究工作认为，在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存在多种多样潜在的利害冲突。它并未证实对贸易体制存在任何普遍的不满。[\[28\]](#)正如哈珀教授和迪克森教授所表明的，航海条例本身对殖民地贸易并无很大障碍，实际上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类似措施的限制还要少些。殖民地的烟草、食糖和咖啡垄断了英国的市场；对海军军需品的生产发给奖金；由于有了航海条例，才有繁荣的殖民地商业海运；尽管不受重视，对各殖民地的海上和西部边疆均加以保护。许多不受欢迎的商业规章制度并不曾付诸实施。惹起争端的是1763年后的整顿和改革，而未必全是殖民制度。

尽管如此，由于自然环境而不是由于任何政策上的错误，英属北美的一部分感到自己难以适应英帝国的体系。新英格兰不生产英国取之于殖民地的大宗谷物、烟草、棉花、羊毛以及稻米，尽管那里的造船业很发达。它很少为英国资本提供投资机会。它像在它之前的老英格兰一样，只能靠贸易和海洋。按过去的说法，它的商业带有浓烈的鱼味，就像它的神学带有浓烈的硫黄味一样。[\[29\]](#)由于没有商品换取它所需要的制成品，它便竭力鼓励地方工业并发展其与西班牙、葡萄牙和马德拉以及同法属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以其木材、鞋子、

面粉和大量的劣质鱼去换取硬币，但更多的是换取糖和糖浆用以酿酒。1750年马萨诸塞大约有63家酒厂，在罗德岛的酒厂也许有这个数的一半。^[30] 尽管1733年颁布了糖浆条例（并未有效地实施），但与法属各岛屿的违法贸易还是发展得很快，甚至在七年战争期间亦复如此。在1763年和以后的10年一样，新英格兰的商人从非法贸易或走私活动中获得了他们利润的大部分；当要求他们服从法律时，他们就拒绝承认法律的有效性以示愤怒。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酒乃是美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因素。正是根据诺思勋爵1773年的条例制止约翰·汉考克走私茶叶，才使他这个暴发户成了爱国者。新英格兰的商人乃是比尔德论点的最好的——尽管并非全体都如此——见证人。^[31]

到了1763年，南方也有它自己的不满，因为商业体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南方而实行的，尽管这些不满也还不是主要对政策制定者而是对自然环境本身的不满。集中种植烟草逐渐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并减低了这一作物的价值；生产过剩使价格下跌，而运费和保险费仍然很高；切萨皮克湾港口的苏格兰代理商以及格拉斯哥和伦敦的商行似乎在欺诈种植园主。1763年，“苏格兰人”这个称呼在美洲像在伦敦一样不受欢迎。革命战争期间，被弗吉尼亚人没收的保王派财产中，有1/3是属于诺福克的苏格兰商人的。种植园主手头终年缺少现金并受到1764年货币法的打击。除非是像华盛顿那样的人，拥有大庄园（通过自己的本领、通过继承财产或通过跟寡妇结婚而得来的），然后使种植的作物多样化或从事土地投机买卖，才有可能过舒适的生活。但即使是华盛顿也对他不得不依靠在3000英里以外或在港口的代理商，感到成了不公正的牺牲品而愤愤不平。

南方的另一问题——在较小程度上也是中部殖民地的问题——乃是西部土地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与南部经济密切相关，因为它不断需要获得新的土地。根据1763年10月的一项英王诏谕，大湖区以东法属加拿大组成魁北克省，西属佛罗里达成为东佛罗里达省，阿巴拉契科拉河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地区则成为西佛罗里达省。^[32] 但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的领土则宣布为印第安人保留地，非经英王特别允许白人不得迁入。限定印第安人在一些特定的商站进行贸易。这常常被认为既是在心理方面的一种失策，又是对殖民地现有的权利，即殖民地特许状中规定的从海到海的条款^[33]的侵犯。事实上这乃是试图忠实地履行在战争期间对印第安人作出的承诺（例如1758年的伊斯顿条约，1760

年的兰开斯特条约和1762年与俄亥俄河流域印第安人订立的底特律条约，以及1761年与切罗基人达成的协议），也是为了安抚——为时已太晚——庞蒂亚克所领导的反叛的塞内卡人。其用意是开明的，在一定程度上如埃格雷蒙和谢尔本所认为的那样。伊利诺伊的乡村居留地需要防卫，最终还需要建立文职政府。^[34]这关系到公正的问题，也关系到皮毛交易。诚然，这跟某些边疆开拓者（这些人无视这一点），以及像弗吉尼亚的俄亥俄公司和北卡罗来纳的理查德·亨德森公司等投机公司的利益背道而驰。但是，其目的并不是想建立永久性的障碍，而且其影响也很小。英国商务部于1767—1768年间曾考虑在西部实行一些新的计划，不过并不很热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计划会影响毛皮贸易。这些计划中最重要的是万达利亚计划即印第安纳公司，这家公司是由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些“受害的商人”感到不平而筹建的。在它的支持者当中有富兰克林和威廉·约翰逊爵士。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意见冲突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它们的竞争者弗吉尼亚的俄亥俄公司——于1773年为万达利亚拟定了专利权证书，它将获得今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东部大部分土地。但是，诺思政府于1774年2月禁止一切土地转让。随着革命的到来，这些计划——就像亨德森法官在肯塔基的计划一样——均化为泡影了。

禁止土地转让对个人投机商，即美国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所有的殖民地总督都是投机者，比如纽约历届总督穆尔、邓莫尔和特赖恩，新泽西的威廉·富兰克林，北卡罗来纳的多布斯全都是投机商，1767年，华盛顿曾敦促他住在约克加尼河畔的朋友威廉·克劳福德为他大量收购土地，说他一直认为英王的诏谕只不过是“暂时安抚印第安人人心的权宜之计而已”。到1768年，英国政府只得默认英王诏谕线已不再起作用。同易洛魁人签订的斯坦尼克斯堡条约以及同切罗基人签订的哈德莱博条约（1768年）和洛哈伯条约（1770年）将该线进一步向西推进了。1763—1765年的庞蒂亚克起义失败之后，印第安人与一批又一批接踵而至的殖民者保持着不稳定的和平。保持这样的和平并不是根据英国议会制定的法规，而首先是靠1763—1768年的防御措施和格伦维尔认为应由殖民地帮助支付费用的英国驻军，其次是靠两位印第安人督察专员的手腕，即南方的约翰·斯图尔特（1762—1779年任督察专员）和在莫霍克人地区他的府邸中以印第安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半传奇式人物威廉·约翰逊爵士（1755—1774年任督察专员）。英国得到边疆地区行政官员很好的服

务，比它应得的还要好。这些官员深知他们无法阻止外来人的流入，而这些外来人憎恨魁北克法以及1774年2月诺思禁止土地买卖的决定。到1775年，匹兹堡和惠灵乃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北美人并没有由于那些与他们注定要向西扩张的命运背道而驰的法律而停止不前。^[35]

于是，在经过反复受到伤害和掠夺的一段历史的影响下，到1775年一个新的国家宣告诞生了。反英的抗议声业已引起民族主义激情的迸发。克里斯托弗·加兹登在1765年召开的反印花税条例大会上宣称：“在这个大陆上，不应当分什么新英格兰人、纽约人，我们大家都是美利坚人。”九年以后，帕特里克·亨利演说道：“不再有什么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利坚人……一切差异都已摒弃无遗。整个美洲已结成一体。”尽管有这些爱国主义的赞美词，但地域主义和排他主义在1861年仍然像在1776年那样明显存在。13个殖民地是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联合抗英的。用范·泰纳教授的话说，它们是13个独立的州“暂时在获得它们各自的独立的事业中一致行动”。^[36]在大陆军反英斗争的同时，也存在每个州和每个地区之间以及每个州和地区内部的社会集团之间争夺权力、影响以至土地的斗争——就是说，一场究竟应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的斗争。

在州与州之间存在着会引起冲突的边界纠纷。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之间有长达20年之久的皮特堡归属之争。康涅狄格曾对沿萨斯奎汉纳的怀俄明河谷提出领土要求，并企图以武装人员进驻该地区。纽约和新罕布什尔为占有格林山而争吵不休。人们对弗吉尼亚的从海到海的领土要求持怀疑态度——这种情况在马里兰直到1781年仍然存在。除奥蒂斯、盖洛韦和布拉克斯顿外，许多人都认为只是靠了英国的力量才防止了殖民地之间多次内战的爆发。

更加令人惊慌不安的是社会的紧张局势，这在1763—1776年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南北卡罗来纳；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情况较好一些。1763年宾夕法尼亚边境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因庞蒂亚克起义而恐慌，在兰开斯特附近杀害了20名友好的科内斯托加印第安人。边疆地区的法官和陪审团对佩恩总督命令审判罪犯的公开指示置之不理。由此便引发了边疆地区麻烦的挑战以及1764年600名“帕克斯顿青年”（以他们的一个城镇为名）向费城进军，他们对东部教友会教徒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和他们在议会中无足够的代表

权表示愤慨。三个东部县的1.6万名选举人在议会中的议员人数是五个西部县的1.5万名选举人在议会中的议员人数的两倍。帕克斯顿青年受到富兰克林的安抚；他们的领袖拉扎勒斯·斯图尔特迁居更远的怀俄明河谷，于1778年被杀害。他们在革命中与技工及其在费城的公众领袖结成共同的阵线，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在1776年的宾夕法尼亚宪法中得到了表达。[\[37\]](#)

1766年，纽约议会在对驻营条例采取了比前一年较为同情的看法。当它面对由韦斯特切斯特和达奇斯两个县的土地租佃和高地租而引起的一系列暴力行动时，便求助于皇家驻军。自称“自由之子”的农民在受到被赶出所租土地的威胁时，便真的实行起自由来了。他们砸开了波基普西监狱并组织了一次向纽约的进军，焚烧了皮埃尔·范·科特兰特和兰伯特·穆尔的住所。对伦敦的权威采取十分开明态度的自由党人，当造反直接指向他们时就不那么高兴了；约翰·莫林·斯科特和罗伯特·利文斯顿无理判处“平均主义者”以重刑。正如一个人挖苦地说：“只有他们自己才称得上是暴乱。”[\[38\]](#)

从1764年到1771年，北卡罗来纳的骚乱层出不穷。在西部边疆的定居者（有许多是从北部经弗吉尼亚大谷地新近到达的移民），于1765年为梅克伦堡县的土地所有权而发生战斗。到1767年，他们又展开斗争，反对财务官和县司法官的贪污腐败以及律师收费过高。1768年他们组织了“制约者会”，这一旨在进行自卫的团体，由特赖恩总督动员了民兵并允诺进行改革才被压制下去。他们于1769年控制了议会，但特赖恩以议会对英国所持的态度为由将其解散；而且后来也没有进行什么改革。1770年他们在希尔斯伯勒要求建立公正的陪审团和公共财务制度。像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一样，当局害怕他们向首府进军。特赖恩率领一支殖民地民兵进攻群龙无首的“制约者”，于1771年在阿拉曼斯战役中击败了他们，并处决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出现了再一次向边疆的撤退，这次是撤入田纳西，从而又留下痛苦的后果。因为这场斗争决定了这个州对革命的态度。当他们1771年的敌人于1776年成为革命者并且马丁总督对他们表示了特赖恩不曾表示过的同情时，“制约者”仍然站在保王派一边，他们在穆尔河桥战役中为英国而战，并继续为英国和他们自己而进行了一场丑恶而令人厌倦的内战逾五年之久。那些在东部地区叫嚷要求英国给予自治的人们却不愿将自治给予在西部山区的自己的同胞。[\[39\]](#)

南卡罗来纳的西部边疆也同样不安宁，同样是由于没有法庭、没有行政长官，而且——令人难堪地——在内地没有牧师。此外还由于人们感到他们成为东部人和圣公会教徒统治的受害者。查尔斯顿道貌岸然的种植园主——商人贵族原来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当他们越大西洋时是自由主义者和辉格党人，而当他们穿过长着松林的荒原到西部后却成为冷颜厉色的人和托利党人了。[\[40\]](#)

在这些事例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西部势力，它们在整个革命时期继续存在，并在1786年马萨诸塞的谢斯起义和1794年的威士忌酒叛乱中再次浮现出来。[\[41\]](#)法庭为数极少，法官又远在天边，不知何时能盼到，而且费用高昂。在宾夕法尼亚，人们害怕印第安人；而在南北卡罗来纳人们更怕其他的白人。“我们不像是生活在英国政府的治下……而好像是生活在匈牙利或德意志，生活在战争状态中，不断受到轻骑兵和残暴士兵的袭击……”[\[42\]](#)人们提出了一些期盼能实现的要求：发行纸币；修筑更多的道路；用一种按支付能力或用实物缴纳的税以替代人头税；投票选举；制止投机倒把者，这帮人通过他们“东部后台”的势力攫取了大片无人居住的地产；以及西部在东部议会中获得较公正的代表权，这是从莫霍克人到斯莫基人的共同呼声。如果说伍德梅森痛斥那些“专门给对方制造麻烦的讼棍和爱打官司的歹徒”“流氓和娼妓”的这些话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是过分激动的话，那么，对1769年10月北卡罗来纳安森县260名居民提出的虽不十分雄辩但比较感人的请愿书应当不会有什么怀疑了。这份请愿书最后要求“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或其他知名的爱国人士为代表，代表这个不幸的省份去觐见英王陛下并向英国的一些部委提出请求”。

[\[43\]](#)

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国王诏谕线或英国的恶劣行径；他们要求公正、良好的秩序、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主；他们的敌人是弗吉尼亚东部地区唯利是图的律师和小官僚，这些人像英国的代理人在港口一样，在当地干尽坏事。这就是帕特里克·亨利为之说话的那个地区；安德鲁·杰克逊也正是在瓦克斯霍度过他的成长时期的。弗吉尼亚以南的边境居民在整个革命期间倾向于保王主义。在宾夕法尼亚、纽约以及一定程度上在佛蒙特，边境居民则是热诚的爱国者。

随着第二届大陆会议慢慢地走向独立，这些社会力量也涌现出来。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早就意识到这些力量的存在，并因为这一点和其他原因对独立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查尔斯·李把他们称为优柔寡断的人，他们的“一点点血已经让蚊子吸光了”。由于他们的总督没收了武器并宣布解放那些要起来造反的黑人，这些种植园主才部分地克服了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论他们对山里人的看法如何，一旦英国召唤奴隶和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他们是有用的同盟者；但他们依然不过是同床异梦的伙伴。

革命领袖们在为他们的事业争取边境居民支持方面显示了相当高明的本领。但是，手段高明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同情，也不会产生明确的社会或政治改革计划。萨姆·亚当斯不信任马萨诸塞西部的农场主；约翰·莫林·斯科特在纽约也批评他们；在新伯尔尼或查尔斯顿与“制约者”的领袖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只有在宾夕法尼亚边远地区和城镇在从事共同的事业；这主要是由于辉格党人放弃了在宾夕法尼亚的领导权。

美国革命在反对英国和反对这种社会动乱方面都始终采取了适中的方法。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各殖民地是沿着中间道路摸索前进。动乱把一些温和派赶到了保王派一方，特别是在纽约以及费城的贵族中间。但是，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一开始在革命领袖们当中就很明显。南部的种植园主，如弗吉尼亚的卡特·布拉克斯顿或南卡罗来纳的罗林斯·朗兹，嘲笑新英格兰的“亲爱的民主”，不过最终并不怀疑独立的价值。古韦纳尔·莫里斯之所以反对独立，乃是因为他认为独立以后纽约就会被“暴民”所统治——“阁下，请相信我”，他在给约翰·佩恩的信中写道：“自由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在他整个一生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6年后他玩弄营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把戏时，他谴责“当代的杰克·凯德之辈……是这帮群众的带头人”。但他最终还是成了一名爱国者。[\[44\]](#)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费城的托马斯·沃顿也对这类畏惧心理产生了共鸣。1775年10月富有的詹姆斯·艾伦参加为保卫费城而组成的一支队伍，当时他提出的理由是，“一个人不这样做是要受到怀疑的，因此我选择肩上扛枪，与他们一样；因为我相信，小心谨慎的人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可以使他们遵守秩序”。在3月间，他认为，“群众的疯狂举动仅仅比屈服于茶叶条例好一点”。英国在对待殖民地方面，没有比把抱

这种怀疑态度的人们不但逼上了独立的道路，而且逼上革命的领导地位更应当受到谴责的了。

中间道路和约翰·亚当斯所说的“熟练的领导艺术”在战争年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中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担心出现贵族，但并没有出现无政府状态——也许北卡罗来纳除外，因为在那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英国任命的总督丧生。大陆会议于1776年5月宣告，所有皇家政府都将予以取缔，新的州政府应当建立起来。这件事完成得很顺利。每个州都制定了宪法——有时，像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则是更改了现行的特许状。除马萨诸塞外，其余所有的州都在几个月内草拟了各自的宪法。所有宪法均系书面文件，并出自法学家之手；所有宪法都包括权利宣言；都强调分权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首要地位——选民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利害关系的人，虽然这时这种利害关系的风险小了些。在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在马萨诸塞和新泽西，只有新教徒才可以任公职。通常立法机构的成员或州政府官员都要受财产的限制。立法机构通常选出州长，任期只有一年，而且所有州的州长实际上都丧失了否决权。宾夕法尼亚的选举权范围非常之大，所有的纳税人都有投票权，而佐治亚的第一部宪法则规定只设一个议院；其他的州都设两个议院，第二院有时由一个选举团选出，旨在用以制约詹姆斯·艾伦和约翰·亚当斯以及其他许多革命者所害怕的“群众”。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的西部地区获得了一些席位，但低于它们应得的份额，尤以南卡罗来纳为甚。只有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州的新宪法称得上是民主的文献。

社会革命也远不如政治革命那么引人注目。保王党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家和领主的土地也被没收了。新罕布什尔的约翰·温特沃斯爵士、缅因的威廉·佩珀雷尔爵士、莫霍克河谷的约翰·约翰逊爵士、纽约的菲利普斯家族、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勋爵、佐治亚的詹姆斯·赖特爵士等人的庄园均遭破坏。但是，当保王派的土地被出售时，其动机在于惩罚或财政上的需要，而非出于平均主义。除纽约州非同寻常地解散59处被没收的庄园之外，在通常情况下土地作为一个单位出售给富有者或投机商；几乎所有的州长都对不动产感兴趣。事实上，出售的价格和条件对“小人物”来说比英国人以往的做法更为不利。然而，由于价格飞涨，土地最终落入了小土地所有者手中，连带投票权也一起由这些人所拥有。不受限制地获得和占有财产实际上

是像言论自由一样重要的公民权利——而且对18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有更多的意义。财产当时主要是不动产并且已广为分散，被人们看作是奋斗与成功的报偿而不是继承物。财产的封建性质的消失并不是软弱的表示而是力量的表现。1775—1789年间每一个州都废除了免役地租。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在纽约和南方亦不复存在：但限定继承权并非是普遍的习俗，即使在东部地区剥夺这种权利已是寻常的做法，至于长子继承权只是在无遗嘱的情况下才采用。这些权利的废除看起来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但并没有削弱种植园经济或长期实行限定继承权的家族；相反，它标志着在一个空前扩展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一种权利，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太多的机会。宗教信仰自由也加强了，这部分是由于脱离了原来的教会，部分是由于取消了国教（但不是公理会），部分是由于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的传播。

有些趋势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开明的。殖民地的刑法始终不像英国的刑法那么严厉，至少在北部各州这时甚至变得更为开明。1776年宾夕法尼亚的宪法规定死刑只限于四种罪行。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制定的法典则将死刑限于谋杀罪和叛国罪。该法典因一票之差而未获通过，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颁布实施。国会于1788年在西北地区^[45]对死刑作了同样的限制。反奴隶制运动有了进展：到18世纪末，大多数的州业已禁止输入奴隶，整个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则已规定废除奴隶制或逐步解放奴隶，多数南方人认为蓄奴是一种罪恶行径并通过订契约或立遗嘱解放奴隶，像罗伯特·卡特和乔治·华盛顿所做的那样。乐观的看法是期待奴隶制自然消失。自由对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它严格地限于一种性别，而且也没有带来当地在艺术上的繁荣。

政治紧张局势之后，是一个少见的稳定时期。唯一的也是一个少见的原因是缺少外来的移民：1776—1825年，进入美国的移民只有25万人。这就使这个国家的模式得以固定下来；西部的土地在大量的人涌入以前就已属于美国。共和国处于令人欣慰的平衡状态。开明的力量在起作用，但它们属于传统的和主要是继承下来的一些势力。在几乎所有新建立的州里，无论是边境地区还是东部地区，有财产的人都处于统治地位；而理想主义者却往往证明自己是称职的行政官员。

在1776—1787年的建设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是10年骚动期间的那些煽动家和小册子作者仅仅充当着次要的角色。[\[46\]](#)

尽管如此，独立战争在三个方面导致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农场主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得到了好处；保王派在战争中丧失了一切；在中央一级则自由与秩序终于在1777年和1787年两部联邦宪法中得到了调和。

如果说商人阶级在战争中受到损害，如果说东部地区的某些种植园主由于无法输出他们的产品而再也不能恢复以往的兴旺，那么，许多小农场主却富裕起来了。参军的人数目始终很少。除战争末期的南方外，农业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很小。1776年以后，新英格兰的军事行动几乎已经停止。农场主得以高价出售其产品而获益——双方的军队均购买他们的产品，再加上通货膨胀——这就使他们有可能还清他们的债务。在罗得岛，债务人极力求债权人收下已贬值的通货。只要战争一直打下去，农场主就富裕起来了。

此外，1783年同英国关系的破裂既是政治方面的，也是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尽管新制定的各州宪法可能反映出英国的谨慎态度，但是英国七年来一直是敌人，而对英国的仇视这时便降临到保王派的头上。保王派的规模和命运一向为美国历史学家所轻描淡写——正如他们在军事上的种种潜力为当时英国领导人所忽视一样。保王派的消失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他们身后留下了许多不动产。它标志着大多数殖民地贵族的消失。这时在上层为一代人提供了机会，尽管这对穷人来说是沾不上边的。当今波士顿的一些古老家族绝大部分起源于革命时期的暴发户：汉考克与罗得岛的布朗家族一样，是靠做走私生意起家的。当杰斐逊说“具有天赋的才德兼备的贵族”这话时，大概不完全是他的由衷之言。但他也许并没有想到任何波士顿人。美洲殖民地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人自然是不可胜数，但到1783年出现了在这种意义上的真正的权力转移。

过渡到独立在地方上比在“国家”一级要容易得多。许多激进的领导人在反对英国的同时，实际上也反对在他们自己地区以外的任何一级政府。杰斐逊说过，不论是地方上还是在中央，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并且由于他们把考虑这些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大陆会议于1777年接受了邦联条款并将其提交各州审

议。这些条款直到1781年尚未获得批准，因为有几个州，特别是马里兰州和新泽西认为，那些持有从海到海特许状的州（弗吉尼亚、马萨诸塞、佐治亚、康涅狄格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将可以获得阿勒格尼山脉与密西西比河甚至太平洋之间的所有土地，这是不公平的。马里兰州本身也并不是完全讲道德的：它的一些公民与伊利诺伊—沃巴什公司和印第安纳公司有着利害关系，因此希望从大陆会议得到比别的州有利的条件。下述这些土地要求没有一项是没有问题的：纽约州根据易洛魁人放弃了他们的财产权利为理由提出的土地要求也许是最没有道理的；弗吉尼亚的土地要求是最大而理由也是最充分的，而由于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在1778—1779年对伊利诺伊一些城镇进行的战争中获胜，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但是如果坚持这样做，那么这项要求将会使由共同努力而赢得的大片土地给予某几个州，并将会使它们得以支付战争复员军人的遣散费和偿还它们的债务，从而使它们的税收保持在低水平。在这些州同意放弃它们的土地要求后（虽然是在它们全都这样做之前），马里兰州才同意了邦联条款；弗吉尼亚放弃土地要求的行为特别高尚，杰斐逊和理查德·亨利·李的主张真正是为共和国着想的。然而，直到1802年，佐治亚州才作为最后一个州同意放弃了土地要求。合众国在1783年赢得独立时，才得以继承了数亿英亩的大片西部公有领地作为共同财产。

对新兴的联邦主义作出的这一让步，对迄至那时为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大公无私精神的各州来说，实属值得注意的一个步骤。历史学家们对此都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直至最近，谴责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依据达10年之久（1777—1787年）的邦联条款成为一种风气，并附和约翰·菲斯克而把这10年称为“危急时期”。^[47]近年来梅里尔·詹森对此作了有益的纠正。^[48]他强调说，首先，邦联条款乃是殖民地经验的表述，比起各个州来，对民主的理论作了远为明确的阐明：权力不属于行政部门，征税权掌握在地方手中，立法机构居于重要地位。如果说这些年来政府有什么失败的地方的话，那主要应归咎于各州不尊重国会提出的要求，而不应归咎于该文件在宪政方面的局限性。当国会要求授权通过征收进口税来筹款时——1768年的阴暗时期^[49]——遭到罗得岛的拒绝。国会既不能征税，又不能劝告各州征税。于是不得不发行纸币，纸币很快就贬值了，不久“连一块大陆流通券^[50]都不值”便成了口头禅。各州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而

当债权人拒绝接受这种纸币并开始取消农民的赎取权时，谢斯上尉和马萨诸塞州约两千农民便起来造反。这些骚乱几乎不能归咎于国会。

其次，詹森教授已经证明，把1783—1787年间出现的一些尖锐问题归因于邦联条款本身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时经济严重不景气，通货也更加紧缩。战争对国内工业和农业的刺激已不复存在。英国军队已离去，各地农民失去了销售产品的市场。脱离英帝国使新英格兰失去了它的西印度群岛贸易，南方则失去它在英国享受的津贴，虽然它并不是经常在英国出售产品。当马萨诸塞试图阻止英货倾销时，新罕布什尔却迫不及待地吸收了这些货。州与州之间的边境冲突和关税争端不断发生。纽约与新罕布什尔所争夺的格林山，当时由富于传奇色彩而不可靠的艾伦兄弟们所控制。由于该地区还不是一个州，企图并入加拿大。^[51]罗得岛这个原13州中于1790年才最后加入联邦的州，它这样做只因它受到了其余各州的关税歧视。华盛顿在1785年维农山庄会议上实际上企图解决波托马克河沿岸的这类纠纷，由此而开始的商谈导致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英国保留在西北地区的皮毛收购站，以及西班牙与印第安人和白人在密西西比地区的相互勾结都不是由于邦联条款造成的。新国家确实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不仅是宪法方面的，也涉及经济和外交各方面。但是，到1787年，繁荣在逐渐恢复，特别是在南方。

邦联有一项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在1781年各州移交给国会的领土上殖民。由肯塔基地区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这个西北地区，以前鲜为人知，因此对既具有政治家性格又具有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性格的杰斐逊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国会曾为西北地区制定过三项法令（分别于1784年、1785年和1787年颁布），虽然第一项法令后来被撤销了。这些法令规定在殖民前先对领土进行一次勘测，并在新英格兰边界线上建立一些城镇，以尽量减少与其他定居者以及与印第安人的摩擦。某些地段留作建造学校用和作为退役军人的赏赐地（弗吉尼亚的军人区和康涅狄格的西部保留地即由此而来）；其余的土地则以每英亩1美元出售，但出售的最低限额为640英亩。这就不是给老百姓，而是再一次给土地投机商提供了机会。1787年的法律以杰斐逊于1784年制订的计划为基础，规定治理一个地区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国会任命的总督和法官进行治理；第二阶段，当该地区拥有5000成年男性自由民时，即可选举自己的立法机构；第三阶段，当人口达到6万

时，即可承认其为州，与现有各州居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整个这一地区将产生至少3个，至多5个州：它们是俄亥俄（1802年建）、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威斯康星。要是按照1784年杰斐逊的草案——他建议成立14个新州——那就会有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州名出现。因为他不仅对新世界的文化，同样对旧世界的文化也表现出兴趣。除上述这些熟悉的名称之外，他还建议采用梅特罗波塔米亚（北俄亥俄）、萨拉托加（俄亥俄南部）、阿塞尼西匹亚（芝加哥）、西尔瓦尼亚（明尼苏达）、佩利西匹亚（肯塔基东部）和切尔松尼萨斯（密歇根）等名称。^[52]

西北法令完全同宪法一样重要。它们在这些地区以及后来的新地区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由陪审团审判以及实施教育；它们在整个这一地区，即俄亥俄河以北和以西——美国的第一条国界内永远废除了奴隶制，并通过鼓励自由白人殖民者迁入，从而使这个地区具有其自由的特征。然而，过了至少一代多人的时间，土地价格才有所下跌，信贷法才有所宽松，小土地所有者才有了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土地投机商，特别像马纳塞·卡特勒牧师、鲁弗斯·普特南将军以及俄亥俄公司，^[53]在腐败的国会议员唆使下大发横财。不过，比1770年以后任何其他特征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些法令将独立宣言的原则成功地推广运用于一片广袤的处女地。它们为日后相继成立的36个州确立了它们可以遵循的先例。它们具有非殖民化的精神：原先的十三州虽然享有由于早期殖民而带来的优越地位，但并不享有控制其他州的帝国特权。结果，新的地区自然就指望新的全国性政府能发挥其权威。这些地区当时和后来始终是关注全国性利益而不是关注州权的地区，求助于州权在这些地区也从来不像在某些原先13个殖民地那样具有同样的魔力。这些法令还加快了在玛丽埃塔和辛辛那提的移民——虽然一直到1795年签订了《格林维尔条约》才赢得了与俄亥俄印第安人的和平。无论这些法令的条款有多么不尽如人意，1785年和1787年的这些规定仍不失为富于远见而又明智。

老西南部存在的问题则迥然不同。到该地区移民有三大障碍，但在1785年以前均在逐步加以克服。这些障碍是：1763年的英王诏谕线，这条线在1776年以前并未生效并已由于革命而自动取消；印第安人问题；以及阿勒格尼山脉这个天然屏障，这是三者之中最大的障碍。有四条路线可以穿越该山脉：通向五大湖和俄亥俄河上游的哈得

孙—莫霍克路线；1758年华盛顿和福布斯曾经走过的通往匹兹堡的那条艰难的路线；经由兰开斯特、约克、弗吉尼亚河谷以及坎伯兰山口的费拉德尔菲亚马车大道，在山口处与荒原大道连接并横穿肖尼人的“勇士小道”（the Warrior Path）；以及通往该山脉东部和南部的路线，即福尔莱恩大道（Fall Line Road）。莫霍克是易洛魁人的地盘，他们在约翰逊的影响下仍然忠于英国，他们的首领约瑟夫·布兰特（塞耶丹尼吉）曾于1777年同他的印第安战士们与圣莱杰^[54]并肩战斗。在哈尔迪曼德将军的支持下，1783年以后把安大略的土地“赏赐”给易洛魁人。克里克人占据着南部，在1783年以后的若干年里企图在颇有才干但欺诈成性的混血首领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带领下在西南地区与英国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周旋。麦吉利夫雷是个商人也是个勇士——是在东西佛罗里达印第安人贸易中拥有垄断权的潘顿和莱斯利公司的成员。克里克人、西班牙人、前保王党人以及像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那样的冒险家们使得亚拉巴马地区难以治理。总之，这是个硬木林密布的地区，很难开垦——但它的黑土壤看上去却很有诱惑力。

穿越该山脉的中心通道是位于今弗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三州分界处的坎伯兰山口。一位南方的历史学家说，它因在美国边疆史中有着传奇色彩而引人注目，“就像温泉关在古希腊历史上的传奇色彩一样”。^[55]F. J. 特纳在他著名的论文中，就是想象在坎伯兰山口看到了1793年的情景，“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驱使下”，“一支代表着文明的队伍排成单列”通过该山口，其中有“沿着通向咸水泉的小路缓慢前行的牛群、印第安人、皮毛商和猎人、牧民、拓荒的农民……”^[56]从这个山口容易前往肯塔基盛产蓝绿茎牧草的草原、纳什维尔盆地，或前往坎伯兰大卡诺瓦河及田纳西河的肥沃低地。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沃克医生于1750年发现或者是重新发现了该山口，并且在它的附近或以西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移民点。1769年一个弗吉尼亚的移民点开始在沃托加建立，1771年詹姆斯·罗伯逊和约翰·塞维尔所领导的一批“制约者”来到这里，增加了移民人数。同年，在勘测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边界时发现，沃托加位于北卡罗来纳境内——虽然最近一处北卡罗来纳移民点远在100英里之外。沃托加人已懂得独立并珍视独立：他们在男性公民选举权和代议制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沃托加联盟，一直存在到1776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华盛顿县为

止。美国独立后，北卡罗来纳将其西部土地让与合众国，这时塞维尔领导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早已被人们忘却的”富兰克林州，虽成立了一个政府，但从未获得国会的承认。

在沃托加以西，丹尼尔·布恩和长期从事狩猎的人们在1769—1775年间积极从事活动，沿荒原大道通过山口到达肯塔基河畔的布恩斯伯勒。肖尼人对这些活动进行了抵抗，但他们在1774年邓莫尔之战[57]中被安德鲁·刘易斯将军在波因特普莱森特的卡诺瓦河口附近击败。肖尼人的首领康斯托克签署了一项条约，放弃了俄亥俄河以南和以东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北卡罗来纳的理查德·亨德森法官打算在这个地区组织一个像俄亥俄公司和万达利亚公司那样的公司；通过进一步收买切罗基人的土地所有权（1775年的锡卡莫尔沙洲条约），他声称控制了从坎伯兰山口向西一直伸延到田纳西河和俄亥俄河汇合处的地区。他把他的领地叫作特兰西瓦尼亚。他希望得到英王的支持，但这项计划随着美国革命的爆发而夭折。大陆会议驳回了他要求承认他的殖民地的申请，因为弗吉尼亚提出了从海到海的土地要求。弗吉尼亚于1777年根据哈罗兹堡居民的要求，在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带领下采取行动，把这一地区作为肯塔基县而置于其保护之下；这是极不恰当而又完全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径。到1783年，肯塔基大约有两万定居者，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地区也达到了同样的人数，在那里另一个与世隔绝的人群签订了另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条约，即坎伯兰条约。在条约上签字的284人中只有10人继续活了10年，而在274名死者中有273人死于非命。可是，尽管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残暴无比，西南地区的人口还是增长得很快；他们受到像威廉·布朗特等土地投机商的鼓励，后者劝说北卡罗来纳将其田纳西的土地于1783年公开出售。1785年俄亥俄河上的船只达1000多条，每条船上有好几家人。据1790年首次人口调查，估计肯塔基有7.4万人，田纳西各殖民点约有4万人，到1793年整个西南部可能已达到25万人。

对新建立的联邦来说，当时的的问题不在于鼓励移民，而是要限制建立不成熟的政府，并在许多对土地和对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人之间进行调解。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都不存在一个保守的联邦政府限制民主的边疆发展的情况。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边疆几乎全是由土地投机商开发的——就像最早期的殖民地那样——而除非它们达到可观的数目，否则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独占土地的领主而不是民主。人们根本

不讲究行为是否合乎规范。在1763—1796年之间民主就像交通一样是很缓慢地穿越这条山脉的。[\[58\]](#)

西部的未来以及西班牙同一些西部人的勾结，给第一任总统提出了一些难题。华盛顿就是在一个印第安人条约问题上同参议院发生第一次摩擦的。1790年他邀请麦吉利夫雷到费城言和——尽管除了加强克里克人讨价还价的力量外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但是，西南部依靠其大量的狩猎资源、肥沃的土壤及其长时间的生长季节，正在迅速发展。肯塔基由于与俄亥俄的贸易而繁荣起来，于1792年被接纳为正式的州。它的宪法是南方第一个规定不受财产限制的男性公民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宪法；但仍保留了奴隶制，并且迄至1799年为止州长和参议员仍是通过选举团选出。田纳西是由沃托加和坎伯兰的各居民点合并而成，于1790年成为“俄亥俄河以南的地区”，1796年建州，不过仍然不如肯塔基那样民主。然而，第一个新建州的荣誉于1791年归于佛蒙特。如果说战争使这个国家统一了起来，新宪法又赋予它一个联邦政府的话，那么，北部和南部的边疆却是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大因素。如果按摩根教授的话说，美国乃是革命之子而不是革命之父，[\[59\]](#)那么，可以说它也是西部边疆的后代。

（南木 译）

[\[1\]](#)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年），英国教友会教徒，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译者注

[\[2\]](#) 参见C. S. 西德诺《持有不动产的绅士们：华盛顿在弗吉尼亚的政治实践》（1952年）；罗伯特·E. 布朗《1691—1780年中产阶级民主与马萨诸塞的革命》（1955年）；菲利普·S. 克莱因《1817—1832年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费城，1940年）；J. R. 波尔《马萨诸塞州的选举权和代表制：统计资料》，载《威廉和玛丽学院季刊》第14卷，第4期（1957年10月）。参见伦纳德·W. 拉巴里《美洲的皇家政府》（1930年）。

[\[3\]](#) 参见A. E. 史密斯《受奴役的殖民者》（1947年）。

[\[4\]](#) 殖民地时期以出卖劳动力来偿还赴美船费的人。——译者注

[\[5\]](#) 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第6卷（1900—1901年），第65—107页。

[\[6\]](#) 布里登博：《反叛的城市》，第148页；参见T. J. 沃滕贝克《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初期移民》（1922年），R. B. 莫里斯《殖民时期美洲的政府和劳工》（1941年）；布里登博《殖民时期的手艺人》（1950年），第1章。

[\[7\]](#) 参见梅里尔·詹森《新国家》（1950年），第424页。

[8] 丹尼尔·摩根（1736—1802年），美国革命时期将领；丹尼尔·布恩（约1734—1820年），美国从事游猎的边民领袖，二人均是当时传奇式人物。——译者注

[9] 路易斯·B. 赖特：《大西洋边疆：殖民地美洲的文化》（1947年），《不断变动的边疆的文化》（1955年）。在迈克尔·克劳斯的《美国革命前夕殖民地之间美洲文化面面观》（1928年）中，他说明所有殖民地的文化模式是多么的一致。

[10] 埃瓦茨·B. 格林和弗吉尼亚·D. 哈林顿：《1790年联邦人口普查前的美国人口》（纽约，1932年），以及斯特拉·H. 萨瑟兰：《殖民地美洲的人口分布》（纽约，1936年）。

[11] 盖奇1765年9月23日致康韦的信。英国殖民部，5/83。

[12] 然而，至少有三个“南方”。卡尔·布里登博将之分为切萨皮克社会、卡罗来纳社会和边远地区移民。参见《神话与现实》（1952年）。

[13] 《小乔赛亚·昆西日记》，载《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学报》，第69卷（1916年），第454页。

[14] 保罗·莱斯特·福特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纽约，1894年）第4卷，第155页。参见大英博物馆，手稿补充部分，33030，第160—162页。

[15] 《弗吉尼亚的贵族与平民》（1910年）。路易·B. 赖特反过来又证明沃顿贝克的说法有过分的地方：《弗吉尼亚的第一批绅士》（1940年）。

[16] 克林顿·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时代》（1953年）；马克斯·萨维尔：《自由的种子》（1948年）；埃德蒙·S. 摩根：《共和国的诞生，1763—1789年》（1956年）；欧文·布兰特：《詹姆斯·麦迪逊：弗吉尼亚的革命家》（1941年）。参见30年前提出同样论点的C. H. 范廷《独立战争的起因》（1922年）和查尔斯·沃伦《宪法的诞生》（1929年）。

[17] 参见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纪事》（1784年）；D. J. 布尔斯廷《托马斯·杰斐逊的失去的世界》（1948年）。

[18] 1765年11月23日伯纳德致巴林顿的信，见钱宁和库利奇合编《巴林顿—伯纳德通信集》（1912年），第98页。

[19] 科德角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旧康福特角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均为著名海岬。——译者注

[20] J. A. 史密斯：《美国政府的精神》（1907年），以及卡尔·贝克尔：《纽约地区政党史》（1909年），他在该书中用了一句现在著名的话，即他是在研究一场不仅是关于地方自治，而且是关于应由谁来治理地方的争论。

[21] 大阿瑟·M. 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1918年）；J. 富兰克林·詹姆森：《美国革命是一场社会运动》（1926年）；卡尔·布里登博：《荒原上的城市》（1938年）、《反叛的城市》（1955年）；梅里尔·詹森：《邦联条

款》（1940年）、《新国家》（1950年）；L. M. 哈克：《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1940年）；伊莱沙·P. 道格拉斯：《反叛分子与民主派》（1955年）。支持比尔德论点的资料可以在有关各州的大批研究资料中找到。

[22] 罗伯特·E. 布朗：《中产阶级民主与马萨诸塞的革命，1691—1780年》（1955年）；奥斯卡和玛丽·汉德林：《独立后马萨诸塞州的激进派与保守派》，载《新英格兰季刊》第17卷，第343页；罗伯特·泰勒：《革命中的马萨诸塞西部》（1954年）。

[23] 夏洛登战役是1746年4月在苏格兰进行的苏格兰军与坎伯兰公爵率领的英格兰军的战斗。穆尔河桥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中1776年2月革命军击败效忠派军队的一次战斗。——译者注

[24] 可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波士顿受尽战争、税收和通货膨胀之苦。参见布里登博《反叛的城市》（1955年），第48页以及其他各处。

[25] J. 亚当斯1769年8月14日的日记。《亚当斯文集，约翰·亚当斯的日记和自传》（L. H. 巴特菲尔德编，1961年），第1卷，第341页。

[26] P. 戴维森：《宣传鼓动与美国革命》（1941年）；A. M. 大施莱辛格：《独立的前奏，对英国的新闻战，1764—1776年》（1958年）。

[27] L. H. 吉普森：《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尚未出版）；L. A. 哈珀：《英国的航海法》（1939年）；O. M. 迪克森：《航海条例与美国革命》（1951年），特别参看第208—265页；C. E. 卡特：《总司令部》，载R. B. 莫里斯编《美国革命的时代》（1939年），以及《驻美陆军司令部的作用，1763—1775年》，载《美国历史评论》第28卷（1923年），第475—488页。

[28] 但可参见L. M. 哈克的书《美国传统的形成》（1947年），第17章。他争辩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限制自由经商的斗争。

[29] 基督教《圣经》中把硫磺喻为地狱之火的燃料。——译者注

[30] L. M. 哈克：《第一次美国革命》，载《哥伦比亚大学季刊》，第27卷，第3期（1935年），第一部分。单是纽波特就有16家酒厂；纽约和费城为数也相去不远（C. 布里登博：《反叛的城市》，第74页）。

[31] A. M. 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1763—1776年》（纽约，1918年）。

[32] 七年战争法国战败后，根据巴黎条约魁北克于1763年割让给英国。1763年西班牙将佛罗里达让给英国，以交换哈瓦那。——译者注

[33] 即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译者注

[34] 参见布凯的手稿。大英博物馆手稿补充部分21638及以下部分；伊利诺伊历史资料汇编，第10卷：《1763—1765年的关键时期》（奥尔沃德和卡特合编，1915年）；吉普森：《美国革命前的英帝国》第9卷，第226页。

[35] 这种命运除指向西部扩张外，同样也指向南方扩张。可对照伊斯雷尔·普特南1773年在西佛罗里达建立军事冒险公司的事实，并参阅A. 庞德《莫霍克的约翰逊》（1930年），特别是该书的附录；J. R. 奥尔登：《约翰·斯图尔特与南方殖民地边疆》（1944年）；A. F. C. 华莱士：《特拉华之王蒂德厄斯坎》（1949年）；J. W. 莱德克：《忠诚的莫霍克人》（1938年）。

[36] C. H. 范·泰纳：《美国革命》（1905年），第182页。

[37] J. P. 塞尔萨姆：《1776年的宾夕法尼亚宪法》（1936年）；A. 内文斯：《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美国各州》（1924年）；伊莱沙·P. 道格拉斯：《反叛者与民主派》（1955年），第214—286页；R. L. 布伦豪斯：《1776—1790年宾夕法尼亚的反革命》（1942年）。

[38] 欧文·马克：《1711—1775年纽约殖民地的土地冲突》（1940年），第134—145页。

[39] 《北卡罗来纳殖民时期档案》（桑德斯编）第9卷（1890年），第329—333页。

[40] 《革命前夕的卡罗来纳边疆。圣公会巡回传教士查尔斯·伍德梅森的日记和其他著作》（R. J. 胡克编，1953年）。

[41] “制约者”的领袖赫尔曼·赫斯本德于1771年在阿拉曼斯战役中逃脱，奇怪的是后来又卷入威士忌酒叛乱中。道格拉斯：《反叛者与民主派》，第99页。

[42] 《革命前夕的卡罗来纳边疆。圣公会巡回传教士查尔斯·伍德梅森的日记和其他著作》（R. J. 胡克编，1953年），第213页。

[43] 《北卡罗来纳殖民时期档案》第8卷，第78页，但也应参阅卡尔·布里登博在《神话与现实》第160页中对“制约者”所作的审慎的评价。

[44] 古韦纳尔·莫里斯1778—1779年曾为大陆会议代表。1792—1794年任美国驻法大使。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杰克·凯德是1450年反对英王亨利六世政府的大叛乱的首领。——译者注

[45] 1787年美国划定的行政区域，包括后来的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各州。——译者注

[46] 参见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政界天才人物》（1953年）；伊莱沙·P. 道格拉斯《反叛者与民主派》（1955年），特别见第16章；A. 内文斯《革命期间和以后美国各州的情况》（1924年）；以及《托马斯·杰斐逊文集》（尚未出完，1950—）（博伊德编）。

[47] J. 菲斯克：《危急时期》（1888年）。

[48] 《邦联条款》（1940年）；《新国家》（1950年）。

[49] 此处原文为shades of 1768，疑有误。1768似应为1786，指谢斯起义发生时邦联的困难处境。——译者注

[50] 即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译者注

[51] 格林山地区后划入新成立的佛蒙特州。艾伦（Ethan Allen）及其兄弟均为当时土地投机商，领导着一个名为“格林山兄弟会”的武装组织。——译者注

[52] 《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汇编》第6卷，第581页，以及第591页上的地图。参见杜马·马隆《弗吉尼亚人杰斐逊》（1948年），第413页。

[53] 卡特勒（1742—1823年），原为独立战争中随军牧师；普特南（1738—1824年），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二人均是俄亥俄公司的合伙人，利用退伍军人的身份，以贬值的大陆流通券的票面价值购买了大片公地。——译者注

[54] 圣莱杰（Barry St. Leger），英军上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指挥保王军在莫霍克地区作战。——译者注

[55] 克莱门特·伊顿：《老南方的历史》（1949年），第115页。

[56] F. J. 特纳：《美国历史中的边疆》（纽约，1920年），第12页。特纳在他列举的人中主要遗漏了土地投机者，这种人尽管不在这一支“队伍”中，也是其在东部的首要组织者。对特纳的遗漏的改正，参阅乔治·W. 皮尔逊《特纳论文中的边疆与边疆开拓者》，载《宾夕法尼亚历史和传记杂志》第64卷（1940年10月），第449—478页。以及《边疆与美国的体制》，载《新英格兰季刊》第15卷（1942年6月），第224—255页，另可参阅M. 凯恩的《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观念的一些看法》，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27卷（1940年12月），第379—400页。

[57] 亦称邓莫尔伯爵之战。英王任命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伯爵对肖尼人发动的战争。——译者注

[58] 参见T. P. 阿伯内西《从边疆到田纳西的种植园》（1932年）；《西部地区与美国革命》（1937年）。

[59] 埃德蒙·S. 摩根：《共和国的诞生，1763—1789年》（1956年），第101页。参见汉斯·科恩《美国的民族主义》（纽约，1957年）。

第十九章 英国改革的开始：帝国的问题；政治和行政；经济增长

1763年的巴黎和约把英帝国推上了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从而使外交与帝国的组织在以后约30年内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问题。法国在美洲的势力已被粉碎，但帝国的防御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正如庞蒂亚克叛乱所显示的，印第安人的势力仍是个威胁，并可能成为法国恢复野心的借口。英国政府通过1763年的英王诏谕，要求白人殖民者不要进入印第安人的狩猎区，因为他们在那里已引起很大的敌意，并试图使扩张仅限于与美洲生活中某些最有势力的力量相对抗。一支常备军也应予以保持，从英国本土加以控制但由殖民者支付经费。在大西洋两岸的权势人物看来，改组殖民地组织机构的时机也已成熟，因为这些机构常常妨碍上次战争的有效进行。迄至这时为止，英国政府集中注意力于控制帝国的海上和商业联系，在帝国的自给自足体制下，北美殖民地已兴旺发达起来，人口、地域和财富迅速增加。直到很晚的时候，北美人极少有公开反对帝国的这种管理方式者，但他们在立法上立场迥异，有人主张立法应主要是管理贸易，有人则主张立法应主要是提高税收。下院对税收进行着广泛的控制，在它看来，征税显然是地方议员的职能，而没有他们参加的帝国议会，不应侵犯这种职能。这种看法似乎可以由虽然处于高度依附的地位但财政上却有自主权的爱尔兰议会加以证实，而且爱尔兰这个殖民地的历史又是与北美的历史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进行体制改组的传闻使反抗帝国征税变得更加迫切。1764年格伦维尔的食糖条例遭到了抵制，而他为避免北美人抵制1765年的印花税条例而采取的拙劣办法又使他被指责为进行欺骗。在这次危机中，北美人和英帝国议会所引用的宪法原则终于导致战争的爆发。北美人承认帝国的立法权力，但不承认它的征税权力；罗金厄姆的辉格党人虽然撤销了印花税条例，但在公告令中却比格伦维尔关于北美人“实际上”在英国议会中已有代表的说法更加过分，提出了国王和一些政治家越来越坚持的议会享有充分主权的主张。一方严重怀疑英国阴谋破坏他们的自由，另一方则怀疑北美人完全是坚持要求独立，并推翻英国议会的权力。

在印度举行的和谈在比北美距离英国较近的地方引起了直接的麻烦，因为克莱武与劳伦斯·沙利文^[1]之间谈判的最终破裂是由于东印度公司与政府之间对和约条款的协商产生误会而引起的。克莱武寻求当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佩勒姆派的支持；沙利文则得到内阁的支持，从而形成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政治派系斗争第一次进入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局面，很快就对东印度公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印度，法国和土著势力的垮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该公司的行政管理陷于分裂。

1763年和约的仓促签订，像1783年一样，导致了国际范围的严重金融紧张局面。英格兰银行主要关心的是对处于更加糟糕的困境中的大陆各商号给以支持，但它的硬币库存量已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因而造成银行债券和统一公债价格的急剧下跌。然而，人们也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七年战争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在危机初期阶段以后，便进入了一个从1764年到1769年的低息贷款时期，而公债的稳步上涨则鼓励资本投入更加有利可图的私人渠道，这在18世纪是常见的。修建运河和道路以及圈地的计划一下子增多了起来。铜和铁的出口量增加了。尽管繁荣的景象还不普遍，但这些年却标志着在经济发展广阔浪潮中掀起的一个令人高兴的漩涡，英国和法国都从中获得了好处。

和谈也给乔治三世提供了起用他的宠信比特的机会。在他即位时由于战争的原因他没有这样的机会，老皮特因未能实现他立即发动对西班牙战争的要求于1761年10月辞职；随后，纽卡斯尔和哈德威克转而支持对西班牙的战争，但当他们发现比特坚定地支持国王坚持媾和并逐步在内阁中发挥影响时，便于次年5月辞职。乔治·格伦维尔（当时在政治上已与其兄坦普尔勋爵分道扬镳）和贝德福德公爵填补了这两个空缺，并使福克斯于1762年10月进入内阁，以便通过下院实现媾和条款。纽卡斯尔曾鼓励他的许多朋友和追随者继续留职，希望他会像在1756年那样尽快返回内阁，但在圣诞节议会休会期间，福克斯全部解除了纽卡斯尔公爵在议会中的同党的职务，从而决定性地表明了国王所支持的是哪一方。这次清洗在强烈的抗议声中甚至扩大到行政机构中他提拔的一些人。虽然对其中的许多人的职务另行作了安排，但已有约30年的时间还没有看到过如此剧烈的变动，以致许多文官已经认为，他们在皇家高兴的时候所担任的技术性职务本来会保持终生的。留下的空缺都由国王、贝德福德和福克斯的朋友们所填补。

于是，国王不但在职务上而且在权力上安插了他的亲信，但已经产生了与他的期望迥然不同的后果。乔治三世是按他父亲和反对派领袖们制订的那套爱国的计划培养大的，因而对所有他视为“背弃”老皮特和其他朋友的人都采取一种病态的厌恶态度。比特和他都不够成熟，他们显然夸大了上一朝代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们现在的凝聚力，而抱着迂腐的意图实行一种德政，与此同时有意地鼓励人们同莱斯特府^[2]和托利党人断绝关系，因为它们令人回想起前两个朝代统治开始时的情况。比特在英国政界缺乏自己的根底，他发现既然老皮特不愿效力，他就必须与两党中的一个进行合作，结果他的德政便只好由亨利·福克斯来实行了，而福克斯是当时所有政治家中把政治与任用亲信等同起来的最突出的一个。

比特不像他的主人，他从未学会如何与政治风暴斗争。他使和平条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但受到威尔克斯在报刊上的恶毒抨击，而且在出现商业衰退时曾亲身经历了受伦敦城激进分子操纵的暴徒的袭击；他寻求托利党人和独立人士的支持的努力也宣告失败，而老皮特则由于财政大臣达什伍德提出的苹果酒税法案而暂时与佩勒姆派重新联合起来。比特于1763年4月8日辞职。福克斯也辞去了下院领袖的职务，但保留着他收入丰厚的财政部主计长的职位，在获得霍兰勋爵的称号后结束了他积极的政治生涯。福克斯虽然不喜欢格伦维尔，但他认为没有人能替代由格伦维尔领导的政府。新政府仅仅以格伦维尔的少数追随者和贝德福德派为基础，似乎过分软弱而难以持久，但事实上它维持了两年之久，并且联合了两个政治集团，这两个集团后来终于成为在70年代出现的强有力的宫廷党的组成部分。

格伦维尔在政治上是同老皮特、坦普尔及其家族^[3]一起成长起来的，只是不久前才表现出明显的顽固倾向。在他放弃早期立场而支持和平后，于1761年任下院领袖时被坦普尔所背弃。他也不愿在对待当时的两大问题即威尔克斯和北美问题上让步；反对他的佩勒姆派也被迫采取同样坚定的立场，从而促使党派活动复活。起初，顽固的立场使国王与格伦维尔之间形成一种联盟，因此当载有对国王进行恶毒攻击文章的威尔克斯所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的第45号于1763年4月23日出版时，内阁大臣们发出通用逮捕状将威尔克斯逮捕。这种仅仅同国王的法律官员商议后就发出逮捕令的做法，迄至那时为止只限于在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才采用。威尔克斯由法庭宣布无罪后，开始提出

反诉，尽管毫无困难地把他逐出了下院，但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大有文章可作的争端。1764年年初梅雷迪思和萨维尔在一批佩勒姆派的鲁莽青年人的支持下，开始就由于威尔克斯案件而引起的法律问题提出一系列动议，从而于2月14日使支持内阁的多数减少为10票。这时国王和格伦维尔下决心进行反抗。一年以后，反对派就通用逮捕状问题再次对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但又一次未能将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当政界在威尔克斯问题上掀起一阵狂潮之际，格伦维尔在北美征税的各项措施被人们所忽略，并未预料会在大西洋对岸迅速引起强烈反对。格伦维尔的被解职也与这些根本性问题无关。乔治三世厌恶格伦维尔的作风，以及他反对比特在幕后所起的影响。毫无疑问，对比特的怀疑导致了内阁企图将王太妃^[4]（比特与之关系密切）排除在可能的摄政者的名单之外。这一插曲后来被国王认为是一种欺骗行为，使他比以往更加下决心更换他的政府。在当时反对派处于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这种变动不会被认为是国王的软弱。纽卡斯尔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反对派由于这位公爵起初厌恶反对派，由于他组织工作上的无能，以及由于他违背自己的判断而屈从于年轻人的煽动而尝到了苦果；哈德威克的儿子们助长的野心对它造成了妨碍，而老皮特的离开更使它遭到极大的削弱，因为老皮特永远不会宽恕他们在1761年采取反对西班牙战争的立场。然而，尽管国王瞧不起纽卡斯尔和他的朋友们，但这时已别无选择，只得转向他们。于是内阁团结一致，而且在要求排除比特的势力方面格伦维尔集团捐弃前嫌，与贝德福德派结成工作联盟；老皮特虽然对比特丝毫没有畏惧，但也决心不就职。由于格伦维尔、贝德福德和老皮特站在了一起，国王便不得不接受纽卡斯尔的所有朋友。

72岁的纽卡斯尔决心实施他在1762年打算推行的计划，在不担负职务的情况下对内阁施加影响；因此，使公众普遍感到意外，一向只以热衷于赛马而著称的罗金厄姆竟当上了财政委员会主席。^[5]几乎没有哪届内阁在开始时这样不顺利。国王对旨在补偿1763年屠杀辉格党无辜者事件而大规模进行撤职表示恼怒，而纽卡斯尔则对撤职的人太少而感到不快。在密室中拥护这届内阁的主要人物坎伯兰公爵在议会召开之前去世。更重要的是，内阁是假定老皮特不久以后将会参加进来，从而在下院中担任非常重要的领导而组成的，但老皮特心里明白，他必须等待方能按自己的条件掌握权力。内阁在开始时从事他们

处于反对派时所选定的事业；它撤销了苹果酒税，通过保护斯皮特尔菲尔兹的丝织业以迁就伦敦城激进分子，并宣布签发通用逮捕状为非法。抱着推行老皮特的政策可能使其入阁的希望，他们废除了印花税条例，但通过了另一项“通告令”申明议会拥有充分的主权。然而，老皮特却不为所动；而且，不仅格伦维尔和贝德福德两派人仍在支持他们的印花税条例，而且许多托利党人和“国王之友”都强调指出对北美的抵制作出让步是愚蠢的。内阁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在1766年1月以后似乎随时都会瓦解。最后一击是由心怀敌意的老皮特打出的，他得意扬扬地宣布自己已与党派活动无关，并向国王提出希望组织一个不受格伦维尔派支配的内阁。

罗金厄姆派把他们的垮台归咎于比特一派人受国王的指使针对他们而进行的颠覆活动。的确，罗金厄姆派十分缺乏驾驭议会的能力，因而不得不雇用比特手下的一些干实际工作的人，国王则不仅希望更多地吸引这样的人以加强他们的政府，而且在最终相信内阁正在解体时，实际上还同比特商量过对策。但其他许多情况却鲜为人知。更准确地说，比特派就是“国王之友”，是在格伦维尔内阁的末期方才形成的，当时一批干实际工作的人、苏格兰人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在1763年以前就同比特建立了联系的人发觉自己受到首相粗暴地反对“宠臣”以及他决心垄断苏格兰的官职任命权这些做法的威胁。他们对罗金厄姆更不抱多大的希望。在他受命组阁时，有些人如詹金森挂冠而去，其他一些人则作为对1763年殉难者的补偿而被赶出了政府。在罗金厄姆的坚持下，国王警告这些人支持新任命的大臣，但在废除印花税条例等有争议的措施方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对一个其生存前景未卜的政府也看法不一。有关这些年来比特同国王以及同“国王之友”的关系尚缺乏证据，即使有也是相互矛盾的；其他各派也许抱有过多的疑虑，因为1766年1月“国王之友”曾表示，只有找到了某一位新的领袖他们才会成为内阁的基础，而当国王次年夏季与比特疏远后，他们便以其他方式开始各谋安全之策了。

1766年7月乔治三世授予老皮特以全权组织政府，看来终于有了组织一个可以令国王和议会都满意的稳定内阁的希望了。自从老皮特辞职以来，他本人便成为一股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势力。无论政府还是反对派都无法忽视他也不能依靠他，但现在他享有了他曾经拒绝分享的最高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格伦维尔和罗金厄姆所不曾享有过的

国王的信任。但是，老皮特打破党派活动的努力却很快迫使三派人成为反对派，并且一直到老皮特辞去职务为止，结成它们在美国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形式。老皮特本人担任了掌玺大臣并晋升为贵族，他带着他的私人随从，并打算由他本人行使监督权；诺辛顿是国王在内阁中的唯一亲信；康韦和格拉夫顿来自罗金厄姆集团。不过，罗金厄姆极力要康韦离开政府，他的其他朋友则由于王室遣散人员而辞去职务。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贝德福德派也坚定了立场，于是查塔姆^[6]不得不支持比特派中那些干实际工作的人，因为这些人自己也不能确定该走哪条路。查塔姆大胆的帝国政策和拟议中的英俄联盟均遭失败，而祸不单行，1767年年初他又得了很厉害的精神病，从此便闭门谢客了。

查塔姆一定无时无刻都会感到，要把这个由与他意见不合的朋友格拉夫顿和谢尔本为一方和不听他支配的康韦和查尔斯·汤森为另一方组成的内阁团结在一起是很困难的；但这时在印度和北美发生的引起争论的问题已超越了政府和反对派的分歧。由于股票价格上涨，使得东印度公司不顾董事们的忠告而提高了股息，查塔姆受此鼓励，扬言议会将对该公司进行干预，目的在于敛取现金以缓解预算困难。汤森和康韦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同董事们举行谈判。这样，公司内部的派别便立即与议会中的派别联系在一起了；要不是查塔姆收回了有关政策，使谢尔本得以达成妥协，英国政府很可能发生分裂。妥协方案是东印度公司每年向国家上缴40万英镑而不减轻其所负的领土责任，但它的股息应受到限制。这项解决办法未顾及业已引起的一些帝国的根本问题，并预示着由于暂时性的以及随之而实行的控制股息和分享投票权等规定而带来的进一步的政治干预。与此同时，在几乎不受人注意的情况下，性情乖僻的汤森未经授权就在下院允诺将从北美征税以支持在该地的驻军，从而增添了新的麻烦。

政府虽然软弱，而意见分歧的反对派似乎更加软弱。但是，到了1767年夏季，情况已很清楚，要保持稳定非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不可，无论是反对派中那些干实际工作的人所希望的由各反对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还是由政府与反对派中的某一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均可。1767年7月国王授权格拉夫顿收买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属意于贝德福德派。而另一方面康韦则支持罗金厄姆派，因为这一派人敌视格伦维尔，因而可能受到国王的喜爱。然而，罗金厄姆只考虑在十分广泛以致使国

王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府，而建立这样的联合政府是他的力量所达不到的。尽管这些谈判看来是毫无结果的，但它们却标志着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罗金厄姆承认国王有挑选他的大臣的权利，但拒绝在格拉夫顿的领导下工作，而设法使国王的选择仅限于他本人。就连格伦维尔派和贝德福德派的支持，他也只是在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条件下才会接受。此外，在罗金厄姆拒绝入阁而国王仍然敌视格伦维尔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应由贝德福德派来组阁了，而几乎可以肯定，贝德福德派在这位年迈的公爵和贪婪的里格比领导下宁愿在政府中听命于格拉夫顿也不愿在反对派中听命于罗金厄姆。1767年12月讨价还价结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内阁的天平向反对在北美采取妥协政策的方面倾斜。

在1768年的大选中，反对派多少增强了它的力量，但宫廷的地位在这届议会结束时比在其开始时大大加强了。在新的情况下，第一个受害者是谢尔本。他忠于查塔姆的殖民地政策，只有他一人仍然反对在北美采取强硬措施并反对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格拉夫顿为了忠实地实现查塔姆的同贝德福德派妥协的愿望，于1768年10月将谢尔本免职，结果查塔姆却跟他一道辞去了职务。

由于约翰·威尔克斯而引起的这场争执不仅将查塔姆派赶出了政府，而且终于把格拉夫顿本人也拉下了马。威尔克斯于1768年返回英格兰，并当选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下院议员。在激怒了国王和大臣们之后，他因发表一篇诽谤性文章而再次被逐出议会，并且在三次重新当选之后被下院宣布为没有资格再当选议员的人，而把他的席位赏给了被他击败的对手。两年的监禁使威尔克斯成为一名都市民主的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的英雄和当之无愧的重要政治人物。尽管对历届内阁来说，18世纪通常的做法是建立多数派，但对反对派来说，更常见的做法是诉诸下院以外的舆论而不是在宫廷中进行密谋，特别是求助于独立的上层社会人士以及两个除喜欢持反对立场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社团：牛津大学和伦敦城。“伦敦城激进主义”是英国政治中的独特现象；它是在伦敦商人的资产阶级自豪感以及他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一种主要为地主阶级和大富豪利益服务的政治体制之外的意识的基础上滋长起来的。威尔克斯当时之所以能特别成功地把伦敦的力量动员起来，归功于两个主要因素。过去，他的主张被查塔姆和罗金厄姆这两个反对派用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现在，他们急需某种新的推动

力，便开始对伦敦城发生兴趣，于是威尔克斯利用这两派之间的竞争来挑起伦敦城对无论是不得不听命于反对派或政府，还是不得不听命于贵族或国王而产生的不满。其次，威尔克斯不像最初鼓吹伦敦城激进主义的贝德福德和巴纳德那样，他利用对他的迫害，利用那些把他看作受害者的人在金钱上的支持以及利用威斯敏斯特和首都其他地区地方政治中骇人听闻的状况，使自己成为群众政治的首领；的确，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历次选举中很难找到反对他的人。利用这些手段，威尔克斯只用了很少几年时间便把与官方有联系的反对者赶出了伦敦城，并迫使他们也主张采用他们所不喜欢并损害他们在议会中的利益的激进措施。

威尔克斯问题为1769年的反对派提供了共同的立场，而随着动乱的加剧，内阁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查塔姆抓住这个机会于1770年1月重返上院与罗金厄姆携手合作，并利用其全部影响把卡姆登和格兰比挤出了内阁。查尔斯·约克在国王的敦促下出任大法官，但很快便去世，也许是自杀身亡。在被这些同事和下院中许多独立人士所背弃、被恶毒的小册子作者朱尼厄斯所羞辱的情况下，格拉夫顿本人也像胆小怕事的康韦一样，辞去了职务。

国王不得不再次敦促他可能物色到的人组阁，于是挑选了诺思勋爵；诺思是一个出身于托利党人世家而生性保守的无党派政治家。作为大臣，诺思勋爵的能力很快就在下院受到考验，因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给了反对派以极大的鼓励，他们消除了分歧，向内阁发动了猛攻。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格伦维尔提出的选举法，这项法令把有关选举的申诉状的审判权从整个议会转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诺思遭到失败，但在由威尔克斯和伦敦城激进分子所提出并受到反对派支持的一些问题上，他却以差距不大但具有决定性的多数赢得了胜利。威尔克斯的主张已开始过时；这就使独立的舆论倾向于内阁，结果在各反对派中出现了无法掩饰的分歧。罗金厄姆派也就不再把查塔姆所热烈支持的“权利法案派”看在眼里了。

1770年11月13日议会再次开会时，反对派由于格伦维尔去世而进一步削弱。格伦维尔的支持者追随他们的老盟友贝德福德派加入了新的宫廷集团。反对派企图利用由占领福克兰群岛而引起国际危机作文章，暴露出了他们实际上的软弱，并且随着内阁由于韦德伯恩于1771年年初的加入而得以加强，反对党派便走向了衰落。在一些主要问题

上，查塔姆和罗金厄姆几乎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就连保持日常的联系在一方看来是可耻的，在另一方看来也是令人厌烦的。北美爆发战争后，查塔姆已不再有什么势力，罗金厄姆集团也正在慢慢地趋于灭亡。这时也像1765年的情况一样，除非殖民地的许多问题重新爆发而且政府方面不幸遭受失败，否则他们要想东山再起已不可能。

于是，由于反对派幻想的破灭，诺思的体制方才得以稳固地存在了10年之久。在行将就木的国王的热诚支持下，内阁靠“国王之友”中的一些专业行政官员——约翰·鲁宾逊、杰里迈亚·戴森、查尔斯·詹金森——的勤奋工作而得以维持下来。这些人都是干练之才，尽管罗金厄姆派指责他们犯了各式各样的卑劣行为。诺思与议会周旋虽无惊人之举，但稳健慎重，尽量利用有利形势。威尔克斯案、北美的动乱以及自由派为了撤销教士必须签名承认三十九条信纲的规定而进行的富有战斗性的宣传鼓动，所有这一切都驱使倾向于保守的独立人士倒向宫廷一边，于是八面玲珑的诺思抓住这个机会，在议会内外进行活动。尽管由于对议会的意见过于敏感因而不愿充当国教的坚决捍卫者，诺思还是于1772年当选为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实际上使这个神圣学府作为反对派喉舌的历史宣告结束。但殖民地问题却预示着新的灾难即将到来。

1767年以后，由于需要安排一项永久性解决办法，内阁对东印度公司事务的干预延长了时间。到1769年年中达成了一项协议；据此，英国对印度领地的治理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把该公司的股息限制在12.5%，一旦股息超过6%，便将强加给它严厉的财政负担。该公司内部各派为了继续进行斗争而不惜借用荷兰股票以投票赞成冒很大风险进行的投机，这时，该公司的弱点便暴露出来，并且由于发生了两大危机而使1769年的解决方案失效。1769年5月从印度传来的坏消息一下子打破了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兴旺景象；而且，由于该公司面临破产，内阁和反对派都不遗余力地设法结束在东印度公司总部的争论。沃伦·黑斯廷斯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并赋以更大的权力，但英国国内改革的希望则因1772年6月伦敦遭受的前所未有的严重信用危机而受到挫折。随着十数家商行的倒闭，东印度公司处于危急的境地，因为它每年两次从英格兰银行借进巨款而同时在等待收回其每年两次的售货款。现在该公司被催还通常可以拖欠的债款，而自己收到的货款却异常缓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该公司的股息和上缴国家的款项是根据

对其从孟加拉取得的收入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确定的，而其在孟加拉采购物品的开支却大量地用伦敦开出的支票来支付，这就无论如何也没有满足过要求。如今，由于急需挽救东印度公司并使之得到较好的管理，一切治标的办法就只好弃之不用。拟定了各种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诺思提出的管理法案。这项法案要求通过最低限度的改革和政府的监督以制止该公司在国内外活动中种种最恶劣的弊端，并计划在1780年延长其特许状时对该公司进行更加大刀阔斧的改组。罗金厄姆派竭力利用这次危机，在该公司业主当中大力进行煽动，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当时东印度公司业已信誉扫地。

在接着出现的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论中，首先是在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的争论中，反对派表现了较大的一致，并且发现在1772—1773年的危机中业已显露出来的诺思内阁的软弱无能为对之进行抨击提供了重要的根据。18世纪的政府机构根本不能适应有力地执行政策，而诺思勋爵的政府又格外缺乏活力，而且组织松散。诺思本人肥胖而嗜睡，又缺少自己在政治上的追随者，因此格外避免得罪人，1772—1773年折中的东印度公司法案是由他手下的一些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能手在没有真正的政治领导下能够通过谈判取得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对这样一种体制来说，在北美殖民地酝酿中的动乱将证明完全是一场难以经受的严峻考验。

不仅国王而且内阁的多数这时都支持在北美采取坚定的措施，但诺思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对派领袖的要求和国内正在联合在一起的保守势力的要求都作出了让步。这种表现了他的性格特点的让步，似乎可以证明人们对丝毫得不到英国的好处的北美人抱有极为恐惧的心理是有道理的。而在战争爆发后，在指挥战斗方面同样缺乏决心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诺思的犹豫不决使一些大臣泄了气，达特茅斯和萨福克是两个无能的大臣，而实干家桑威奇和杰曼两人又都不孚众望。不久，诺思本人便极想退休，但他这时已是国王心爱的恩宠人物，有些像以前的比特那样。国王慷慨地为诺思还清了欠债，并得到了只要工作需要他就不会离职的诺言。随着北美的局势日益恶化，诺思变得像个长期受痛苦折磨的人而不是战争的领导人，悲伤地抱怨说他被“拴在这场赌博中了”。诺思变得如此无能，以致在萨福克去世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大臣职位一直在空着。而接替这一职位的韦茅斯则据说正在和反对派调情。

因此，许多事情要靠国王和政府下层干实际工作的人来处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国王的最得意的一段时间；当他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将失败时，他仍然坚定不移，但由于缺乏想象力，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他的刚愎自用逐渐破坏了他本来就不稳定的心理平衡，一旦政治局势缓和下来便产生令人震惊的后果。在那些实干家中，主要的有查尔斯·詹金森，此人于1778年接替巴林顿担任陆军驻议会代表。巴林顿曾为军队的采购工作和升迁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通行规则，但缺乏行政魄力和当时所需要的与议会打交道的才能；此外，他不赞成打仗，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工作缺乏热情。詹金森在他所负责的那个小范围军事工作领域里令人钦佩地严厉推行增加效率和节约的措施：尽管他不是内阁成员，但由于职务关系，他可以经常接近作为武装力量统帅的国王，并受到信任。这曾引起一种传说，据说他是乔治在一场粉碎内阁专制主义的斗争中的工具之一。财政部大臣约翰·罗宾逊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吏，他是诺思的终身幕僚，曾促使诺思更坚决地抵制伊登和韦德伯恩为了晋升而进行的盛气凌人的阴谋活动，促使詹金森推动国王去督促首相；尽管到1780年鲁宾逊被诺思的冷漠态度所激怒，但国王的一句话就足以保住他的乌纱帽。

美国独立战争不仅使内阁的分工出现了临时性变化，而且大大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的局面。这场冲突本身引起了种种紧迫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更加尖锐的政治分裂。近些年来渐渐影响政府的保守情绪这时更加强了。教会、大学和许多乡绅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起而维护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许多独立人士也永远围绕在宫廷的周围；然而反党派也和内阁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自从威尔克斯案和他在米德尔塞克斯当选议员的事发生以来，罗金厄姆派第一次感到大有可为了；他们反对宫廷，也反对战争，从而成为从接连不断的灾难中最有希望的受益者。

确实，在1779年和1780年，沃波尔垮台的局面似乎又将更加富于悲剧性地再次出现。陆军的战败和海军的危险处境以当时人们意想不到的程度发生了，而且比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形还要严重。诺思与瑟洛相互敌视是众所周知的，内阁像沃波尔时期一样陷入分裂，鼓励了反对派。法国又一次介入了这场斗争，从而使殖民地问题空前尖锐起来。诺思勋爵的管理法案在印度甚至连所希望的暂时喘息时间也未出现；到了国内局势对诺思内阁变得日益严重时，马拉塔战争和海德尔

• 阿里发动的进攻使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麻烦更加复杂，而且1781年年初据报一支法国舰队出现在科罗曼德尔海岸附近海上。1773年建立的体制的运行责任主要落在了工作过劳的詹金斯和鲁宾逊身上，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提出一项可在1779年和1780年解决印度问题的新方案。面对恢复了活力并且掌握了菲利普·弗朗西斯提供的材料的反对派的攻击，常常“痛苦地昏过去”的诺思已无法治理国家，这样的局面一直拖延到1781年提出进一步临时应急的立法为止。

帝国的困难甚至还更加紧迫地发生在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1768年，作为增加军队和经费以保卫北美边境安全的回报，爱尔兰议会的任期被限制为八年，而且一个不习惯于处理选举事宜的内阁不得不举行一次普选。这时，爱尔兰总督辞职，由白金汉希尔勋爵接替他的职位，他希望通过实行改良政策使爱尔兰在反美斗争中起到作用。可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爱尔兰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不佳。北美独立战争使每一个问题都恶化了。爱尔兰起而响应反叛的属地的榜样；在爱尔兰和在北美一样受到法国干预的威胁。而且，战争破坏了一项在暗中进行的重要贸易以及与法国的通商，于是政府对爱尔兰粮食的出口实行禁运。当人们得知诺思对爱尔兰的要求并非无动于衷，并以他那种圆通的作风在宗教和商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便更加倾向于把这个国家的苦难归咎于英国政府。1778年4月8日，在诺思的支持下，下院通过了五项决议，取消了航海制度强加给爱尔兰的大部分负担。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工业城市立即作出了剧烈的反应；对此，政府再一次作出了让步，从而将上述商业方面所作出的让步几乎全部取消了。

这种为了英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公然牺牲爱尔兰繁荣的做法，由于正好发生在爱尔兰志愿者运动兴起的时候而更加具有危险性；志愿者运动开始时是为了防备法国的，但不久就威胁到同整个英国的关系。就在由爱尔兰贸易法案引起的风暴发生以前，诺思就已准备勉强接受北美人除独立以外的一切要求。对爱尔兰来说，教训是显而易见的；禁止进口商品的协定开始执行。控制权落到了同时得到不信奉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徒支持的志愿者手中。1779年和1780年，在英国反对派煽动性言论声中，终于作出了甚至比爱尔兰领导人所希望的还要大的经济上的让步。这时爱尔兰人要求实现立法独立，从而使诺思的不幸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了。

随着帝国在东方和西方都呈现出摇摇欲坠之势，七年战争结束时看上去十分荣耀的政教体制这时已是另一番景象，于是众多的评论家纷纷起来指出这种体制的弱点。在北美战争爆发以前若干年，一些不信奉国教的自由派已在论战中重新起着带头作用，他们或者抨击布莱克斯通的观点，即认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不信奉国教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由于宗教宽容法才取消了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他们或者极力支持英国国教中自由派关于放宽签名承认三十九条信纲的规定的要求。如今，他们不但希望他们的北美兄弟繁荣兴旺，而且可能从他们认为教会是各教区的联合体这一观点出发，类推出一种用于在北美实行自治的宪政体制。战争带来的种种政治问题重新点燃了不信奉国教的下层社会的希望，他们从未停止出版关于内战的小册子；不信奉国教的领袖人物如普赖斯公开出面支持北美并主张改革；为了鼓励战争时期招募新兵而对罗马天主教徒作出的种种让步，要是不给予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也是不公平的；而当被人们推选出来捍卫政教的壁垒的牛津大学名誉校长诺思勋爵逐步拆除了这一壁垒时，一个要求进行议会改革和撤销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的重要运动已在不信奉国教者当中酝酿成熟了。

在战争时期航海制度虽有一部分暂时停止实行，但仍然有证据说明英国的航运业一直可以获得在通常情况下得到的收益；进入英国港口的外国船只总吨数所占的比例从1775年的13%上升到1782年的36%，即使这样也有人对正统的经济观点提出了批评。起义所造成的震动扩大了像乔赛亚·塔克和亚当·斯密这些人的影响，他们对为保证殖民地的“从属地位”而实行的经济管理制度早已提出了批评。爱尔兰的关税纠纷表明英国的工业尚未达到不需要保护其产品市场的程度，然而作为英国第二帝国基础的各种思想却已在到处传播了。

但是，战争引起的最迫切问题是预算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英国的税务结构相对而言缺乏伸缩性，因此占极高比例的七年战争的费用只得靠借债来支付。^[7]和平恢复后，国债负担的增加使减轻税收的余地缩小了；1767年反对派提出把土地税从每镑缴4先令的全额税率减为3先令，便曾使人们大吃一惊。财政大臣们考虑从北美或印度征税，而一部分支持罗金厄姆派的乡绅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则悲观地得出结论认为，税收制度如此缺乏伸缩性，若再引起另一场战争势必导致灾难，因此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和平。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于1780年与英国的敌人结盟，切断了信贷的一个重要来源，从而造成新的财政困难。对政府来说，幸好英国国债中荷兰所占的份额一般被估计过高，而且为支付美国独立战争中所需费用而借的钱几乎与七年战争中所借的钱相等。诺思不得已只好在大众消费方面增加税额，用以支付这笔债款；并且鉴于由行政部门征收所得税是行不通的，于是便通过对消费——房租、雇用仆人、马匹、四轮马车、养狗之类——抽税，来从不断增加的个人收入总额上打主意。这项新工作主要由征收窗户税的部门负责，特别是由评定税额的检查官负责。在他手下的文职官员敦促下，诺思在这个部门实行了改革，任命了一批督察官，监督这些检查官员。

然而，直至战争末期，税收的收入仍增加甚微；而随着1780年大选的临近，赋税负担却加深了政治危机。约克郡人对纳税甚为反感，而且唯恐对土地税进行重估，米德尔塞克斯的改革运动者尤其如此。怀维尔认为，随着大选的临近，他的协会[\[8\]](#)有可能促使政府人事费用的缩减。他希望联合各郡的改革者以达到加强宪法的独立作用的目的，必要时通过拒绝纳税或只支持赞成他们目标的议会候选人来进行制裁。他并对在爱尔兰和北美发展形成的抗税手段投以友善的目光。罗金厄姆派企图使改革运动转而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但他们的计谋败在了怀维尔手下；怀维尔把“代表大会”，即各郡的协会派有代表参加的伦敦委员会变成了他树立个人权威的工具。但罗金厄姆反唇相讥，他对约克郡人说，他们的郡在议会拥有相对说来较多的议员，这有助于在税收问题上保护他们；而这一令他们难堪的事并没有使赋税负担很重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城市地区的改革者感到为难。于是改革运动终于分裂。这时怀维尔得出结论：如果他们想干成任何事，他们就必须与罗金厄姆派妥协，要求议会每三年一届而不是每年一届。

与此同时，罗金厄姆派想通过要求实行经济改革而从这次危机中得到好处。据称，精简政府机构既可缓和预算问题，又可调整宪法与国王之间的力量平衡。从1777年起巴雷就一直提出议案要求调查土地税管理情况，1780年伯克又提出他的经济改革法案，旨在减少王室的开支。诺思采取的办法不是完全反对该法案的原则，而是在细节上击败了该法案。而且，对这一法案的辩论耗费了对讨论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大量改革请愿书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请愿书终于在1780年4月6日一并加以讨论，那天也正是威斯敏斯特联盟（Westminster

Association) 举行第二次大会的日子，会场上旗帜飘扬，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发表了富于煽动性的演说。出乎内阁的意料，邓宁在下院提出两项决议案，集中体现了请愿者的请求；其中第一个宣称“国王的势力一直在扩大，现在还在不断扩大中，到了应予缩小的时候了”。

这个要求无疑是受到当时疯狂进行的隐蔽活动的激励，它自始至终含蓄地出现在伯克的宣传运动中，并且是克鲁提出的剥夺税务官员选举权的法案的依据。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它是不正确的。在这一时期辩论中充满了毫无根据的断言。这表明议会各派当时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的专门知识。税务官员中有资格在选举中投票的人数，和下院中政府退休官员的人数都被邓宁和他的朋友们大大地夸大了，而且到1780年，由财政部支配的下院官员人数和议会席位从乔治三世即位以来已大大减少。但是，邓宁弹的虽是老调，但声音过于洪亮，以致议会中的独立议员不能听而不闻；他的著名动议以233票对215票通过，他的第二项动议则无人反对而通过。但他未能利用他的成功。克鲁的法案在下院遭到否决，关于承包人的法案则在上院遭到否决；纽马基特赛马周期间议会休会才使战斗的气氛有时间平息下来；邓宁力图将本届议会开成一个长期会议，直至皇家的势力削弱为止，这使他失去了独立议员的支持；在举行大选以前，戈登骚动再一次使保守的舆论联合起来支持政府。

因此，尽管在内阁、全国以及爱尔兰、北美和东印度公司事务各方面同时爆发了危机，但并未使政府在根本上动摇。不过大臣们从1780年时机并未成熟的解决中一无所得，政治局势也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善。一项解决东印度公司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推迟实行而已。在1780年，虽然给了爱尔兰以范围十分广泛的商业上的让步，允许它从事殖民地贸易，并免除对不信奉国教者的圣礼考察，但动乱局面仍在继续。1781年颁布实施爱尔兰人身保护法，次年格拉顿赢得了立法独立权。在英国，请愿运动发生了分裂，各郡委员会的力量转移到一些不大引人注意的渠道。反对进行节省开支的改革的多数派人数增加了，但议会仍要求提出报告，于是诺思于1780年被迫任命了一批清查政府账目的督察官，这成为后来建立的更加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的先驱。他们在以后六年中散发的各种报告大大消除了政客们在行政事务方面的无知；他们提出了一项可以评价大臣们政绩的改进计划；于是

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通过他们的报告和他们各自的辛勤工作为政府机构的改革建立了一种模式。

诺思也一直想辞职和摆脱军事上惨败的趋势。在北美、西印度群岛以及梅诺卡岛连遭失败，法国舰队又威胁着本土和印度洋海域。1782年2、3月间支持内阁的独立人士开始减少，从而壮大了要求和平的少数派力量。3月19日一批乡绅通知诺思，他们不再支持他，内阁于次日提出辞职。由于国王极力排除福克斯入阁，一切支持内阁的尝试均告失败。最后，罗金厄姆获得组阁的机会。

1767年罗金厄姆所采取的策略，意味着大大削弱被大多数政界人士认为是国王的合法权力的东西；国王在宪政方面的影响以及他那顽固的性格受到了充分的考验。国王把自己同美国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而议会中的多数不可能再支持战争；罗金厄姆进一步坚持要国王同意永远削弱王室官职任命权的立法。第二届罗金厄姆内阁是由首相的追随者与谢尔本和查塔姆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事实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内阁更短暂和更不光彩。罗金厄姆派既要求给予北美以立法独立权，就无法拒绝给予爱尔兰这种权力。伯克的王室年俸管理法案虽获通过，但第三大臣的职位并未永久取消，过于奢侈的王室费也未停发。克鲁法案虽终于被编入法令全书，但并未产生什么直接效果；克拉克的禁止政府承包人进入议会下院的法案，也未起到改革政府承包制度的作用。国王对罗金厄姆比对他以前的任何一位首相更加冷淡。罗金厄姆派对查塔姆派的宿怨也使他们与查塔姆派同事们的关系趋于恶化。由于罗金厄姆的去世，这届内阁开始后仅三个月便告终。为了排除谢尔本组阁，福克斯竟然提出内阁有权遴选自己的首脑，并建议由波特兰公爵出任。这个要求甚至没有得到自己追随者的赞成，在遭到拒绝后，他也因而辞职。

谢尔本的新内阁包括查塔姆派的两代人，老一代中有首相本人、格拉夫顿和卡姆登；年轻一代中有小威廉·皮特（谢尔本曾把他引荐给罗金厄姆，但没有成功）任财政大臣，跟随他而来的还有他日后的亲信邓达斯（在下院和苏格兰政界已负有盛名）和他的亲戚坦普尔勋爵和威廉·格伦维尔。^[9]新内阁在下院的力量总计有130—140席，诺思集团有120席，福克斯集团近90席，其余的人不属于任何派别。要通过与北美的和平条件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其他两派结成联盟。然而谢尔本并没有下大力气掌管他的内阁，更没有设法驾驭下院；罗金厄姆

在政治上的继承者仍在千方百计施展一切手段以压倒查塔姆在政治上的继承者，甚至不惜与诺思结成联盟。在诺思这一方，则必须为卷土重来创造较好的前景（如果他的追随者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话），并且设法破坏谢尔本在结束这场他毫无成效地进行的战争方面的信誉。谢尔本采取行动太晚，未能阻止福克斯和诺思之间的联合，而于1783年2月底以前被迫下台。

福克斯的朋友们这时拒绝担任职务，除非是在波特兰的领导下。因为波特兰在福克斯的鼓励下要求赋予行动自由，特别在任命次要的大臣方面的行动自由，以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国王一直拒绝作出让步，希望小皮特救助他，但小皮特比他的父亲更加蔑视贵族，一直按兵不动，甚至在1783年11月福克斯仍希望把他争取过来。国王从年轻时起便喜怒无常，此时更是怒气不消，便以拒绝晋封他的大臣们为贵族的办法来表示他的不满。但是，大臣们仍以压倒性多数开始举行内阁会议，国王的对策使他们感到意外。

12月的第二周，约翰·鲁宾逊从对议会所作的一项仔细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在这届议会中不可能有支持另一个内阁的多数，但经过大选将会获得相当大的多数。在此之前，福克斯又以他的东印度公司法案的方式向国王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约翰·鲁宾逊早在1778年就草拟了一项解决东印度公司问题的计划，以后10年的立法都是以此计划为基础，但由于诺思内阁日趋解体、该公司管理系统的崩溃以及公司的混乱局面所引起的激烈政治争斗而终于一事无成。罗金厄姆和谢尔本两届内阁对这种局面也都束手无策。公司的财政濒临随时崩溃的境地，对它的批评甚嚣尘上，不可能再拖延不决了。福克斯的法案建议大大缩小公司的权力并将之交给一个委员会，委员按议案规定的任期任命。福克斯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坚持实现他的党过去发表的各次宣言所提出的主张，并在既不加强总督也不加强国王的权力的前提下在印度实行改革。对此，该公司中福克斯的政敌极力加以抵制；他们大事宣扬尊重特许状；他们坚持认为福克斯是在抢夺在一个大陆上的官职任命权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在位或不在位。而且热烈的争论吸引了国王和许多有事业心和有能力的人，如邓达斯、小皮特、詹金森、瑟洛和诺思的一些朋友，包括约翰·鲁宾逊。鲁宾逊非常熟悉下院和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运行机制，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对小皮特更具有根本

性意义，因为在上院否决了东印度公司法案后，国王于12月18日授权小皮特组阁。

小皮特在他政治生涯的这一阶段的动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福克斯认为，倘若小皮特主要是为野心所驱使，他就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那么好。但小皮特具有他父亲那种自觉的纯洁品格，对他治理国家的使命具有同样的自信心。此外，战后英国政局已稳定下来，他也许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是同国王携起手来专心致志地完成他从格伦维尔等先辈手中接过来的行政与财政改革的时候了。总之，在国王的支持下，他在下院人数占优势的反对派猛烈攻击面前寸步不让。

直到3月，当福克斯的多数派势力已呈崩溃之势时，小皮特才解散了下院。这一推迟使鲁宾逊根据对12月举行的选举的预测转而同自治城市的支持者达成牢固的协议，加之由于圣诞节议会休会之后持独立立场的议员大批进入议会，以及福克斯犯了种种错误等原因，反对派便日益变得智穷力竭了。当选举终于举行时，结果证明议会成为小皮特整个体制的基础，因为大约有70个反对派议员包括一些领袖人物均丧失了他们的席位。不过这次选举与早些年的一些选举性质上并无不同。鲁宾逊虽然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组织，但他的预测在总体上比在细节上要准确，而且尽管东印度公司极力在竞选运动中支持内阁，但它几乎无法比过去做得更多。也有一些地区真实的公众反应是支持内阁的。

新内阁包括：两位背弃诺思的老贝德福德派辉格党人瑟洛和高尔；两位皮特的朋友利兹和拉特兰；一位谢尔本派辉格党人西德尼，海军部的豪，以及激进分子里奇蒙。这个内阁以及选举的获胜并不足以保证小皮特的安全。首相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派人的领袖，因为他必须罗致一批追随者，这样才有利于保证他留任的机会；但谁也不像小皮特那样对充当党的领袖缺乏热情，以致1788年他的追随者据估计只有52人，而倘若他一旦失去职务，其中只有20人会坚持原来的立场不变；相比之下，福克斯一诺思集团却超过了150人。由于谢尔本的政治声望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盟友，小皮特就只好依靠“王党”，并且像他父亲那样依靠他在持独立立场的议员中能够赢得的支持。议会的状况同时影响着内阁的组成和政策。紧缩开支和实行改革这两项政策不仅与小皮特的气质和短暂的政治经历相符合，也与持独立立场的议员们的主张相符合，于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小皮特之手转

变成政府机构的全面改造。实行这样的政策需要有能力的实干家。约翰·鲁宾逊这时已几乎隐退，但1786年查尔斯·詹金森以贵族身份重新担任了新近恢复的商务部的首脑；雄心勃勃的威廉·伊登也获得了一个职位并赴法国完成一项商务使命。

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掌握在同一类型人的手中。亨利·邓达斯虽醉心于当官、女人和钱财，但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也不乏理想，这表现在他的解决东印度公司问题的计划上。在1784年以及以后的修正法案中小皮特使这项计划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小皮特的表弟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也同样具有才干，任财政部主计长、商务副大臣，1789年成为下院议长，与小皮特一起形成内阁中的三人集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像是处理个人或近乎家务事的内阁狭隘基础变得越来越明显。大臣们要是得罪了持独立立场的议员或某些支持自己的议员，政府的真正缺陷便不止一次地明显暴露出来。1785年小皮特设法实行与爱尔兰互惠的低关税的努力受到了挫败，而他关于议会改革的方案则进一步暴露出弱点。小皮特原本是为了救助国王而出任首相的，而乔治三世却将改革问题束之高阁，并声称他的责任是让有关措施提出而不对任何反对它的人施加影响。然而，内阁已处于分裂状态，国王对之持敌对态度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也影响了宫廷派，甚至一些会从这项法案中得到很大好处的乡绅也唯恐继议会改革之后将实行土地税改革而裹足不前：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这项法案遭到否决，小皮特也从此再没有重提这件事了。

1788年国王患精神病，这就再一次尖锐地引起王室支持的问题。由于国王不再行使他的权力，小皮特的议会多数开始逐渐消失，于是内阁中有一派人建议同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但小皮特成功地赢得了时间。在危机中，他受益于中产阶级出于感情因素而掀起的一阵保王浪潮，并且由于国王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不断地获得了权力。而国王的精神失常只不过是他隐退的许多原因之一。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位首相与国王一样小心谨慎地行事。1788年，已下令商务部对奴隶贸易进行调查的小皮特宣布他将于下次议会开会时采取措施反对奴隶贸易。他之所以反对奴隶贸易的种种弊端，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由于他同威尔伯福斯的友谊。^[10]但内阁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分歧。原先经常支持小皮特的各大海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转而反对他；有的托利党人认为煽动反奴隶制是

不信奉国教者耍的花招（尽管牛津大学对之表示支持）；小皮特终于拒绝采取主动行动，而只是采取了由多尔宾促成的一项小措施以改善奴隶在海上运输期间的待遇。小皮特在撤销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以及议会改革等问题上同样也放弃了主动行动。毫无疑问，他的从政经验和他意识到在这种时候力图使国王同意实行他不喜欢的政策是危险的，更不用说是白费气力了，从而挫伤了他朝气蓬勃的改革锐气。同样毫无疑问，他不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冒失去他不可靠的多数派的危险。但是，政府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立法方面，而是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实行开明的行政管理方面。

诚然，小皮特和平时期政府的长远成就在于它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政策。在这一领域里，小皮特在处理预算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弱点。诺思曾试图通过对奢侈品征税和通过主要用对公众消费品所征收的税来偿还的公债来支付北美殖民地战争的费用；由于在战争时期偿还国债的费用已增加了约60%，因此在和平时期减轻土地税已毫无希望。迫切需要的是通过按收入征税的办法以增加税收制度的灵活性，而最受人们普遍赞成的方式乃是重新评估土地税。但是，小皮特却有许多像诺思所开的那样的妙方，于是对所有各种马匹、男女仆人也大征其税，并加强了窗户税的征收；甚至在1793年战争^[11]爆发后他还坚持对发粉、狗、钟表等征税；对此，谢菲尔德勋爵讥之为“有意取悦于年老的贵妇人或有资格受这类待遇的男人”。直到1797—1798年，税收只够支付战争费用的1/3，而统一公债已跌到50，这时小皮特才被迫征收早就有必要征收的那项税收。

小皮特对此事之所以处理不力，原因无疑是他当时处于公众的强大压力之下，避免另一种形式灾难的发生。在他的政府组成前夕，政府账目督察官们曾设法向全国提出警报，必须通过志愿捐献的办法清偿国债。到了1785年，小皮特希望沃波尔旧有的偿债基金每年能有100万英镑的剩余金额，并征求各个方面人士的意见，以纠正国债这一显然是压倒一切的弊端。1786年建立的新的偿债基金可以看出采纳了政府账目督察官们所提出的报告中的建议，因为它采取了极严格的预防措施，不仅保证每年有100万英镑的剩余金额，而且规定这笔款项必须不折不扣地用于偿还国债。1792年，即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通过新的立法使这项剩余金额有所增加。于是，这笔本可以使小皮特用来炫耀经过整顿的税收体制的成就的税收余额，被转而用来解决一些有影

响的人强烈要求加以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即减少国债了。革命战争的爆发证明这种想法造成了双重的不幸结果：一方面小皮特无法再从现行税收制度中榨取到可观的额外收入；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遵守偿债基金首要的法律性质——其不可侵犯性——把税收的收入花费在无利可图的债务偿还上。

不过，尽管当战争爆发时还有一些主要的任务尚待完成，但在财政管理的许多部门已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府账目督察官们极力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必须改进审计工作。财政部的体制，目的在于制止侵吞公款，但它却既不向政府通报它在财政问题上总的立场，也不要求公共会计师及时清理账目。舆论早已反对这样的体制，因为亨利·福克斯正是利用这一体制，在当了八年财政部主计长（1757—1765年）之后，一直到他死平均每年落入他手中的非法定的收益有23657英镑之多；他的收益之巨大，一般从他用于购置土地的大量开支和他为儿辈们还债的数额就可以推测出来。人们还怀疑他利用官方情报和公款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尽人皆知，福克斯的继任者里格比在北美殖民地战争期间也发了大财。对于海军财务官员和财政部主计长这两个职位，督察官们提出由私人掌握公共基金的做法应予制止，现金则应以财务官的官方名义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存入英格兰银行。这一原则由邓达斯在1785年提出的一项法令中采用，随后便推广到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部门。关于收支差额应自动由一个财务官转给他的继任者的规定并不仅仅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它实际上是建立一种财务管理并非是由个人而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人来执行的任务的观念，从而成为担任公职的人的地位方面的一场革命。尽管这一法令并未能防止邓达斯本人的丑恶行径，但它从立法上确立了要达到的目标。再者，在银行开设官方账户促进了小皮特于1787年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即建立统一基金。一切公共收入均需归入该基金，一切开支均由该基金支付。

在税务部门，无论在方法上和人事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小皮特领导下，不再像从前那样常常是把高级文官的职位任命那些在城市选举中有影响的家族成员担任，更多的是委派给那些有才干的专业管理人员，这些人也对改革事业作出了贡献。旨在通过征收额外的窗户税来替代大部分茶叶税以打击走私活动而实行的抵代税制，是在海关总署经数年讨论而制订的一项计划的基础上实行的；政府账目督察官们主张实行的另一项计划，即统一关税的计划，也是由海关总署策

划，由两位著名的海关官员威廉·斯泰尔斯和理查德·弗雷温详细加以制订的。在征收直接税方面，皮特在负责评估应缴税额的地方官员，即税务检查员中也实行了重大改革。这些人的工作将成为专职的任务，他们必须经过考试和受过一个时期的培训之后才能获得任命，并受到鼓励，将来有可能提升为监察官。监察官最初是由诺思勋爵任命来监督税务检查员的；这时在级别上已进行了改革、人数已增加并被很有效地用于对付拖欠税款的纳税人。近代的国内税收监察官就是由当时的监察官直接沿袭而来的。这时，整个地方上的税额评估机构已经为征收所得税作好了准备。不仅如此，尽管已估定的税额的总数已大大增加，但小皮特却使收税人手中掌握的公款现金的余额明显减少。

根据政府账目督察官们提出的其他一些原则也取得了某些进展。督察官们谴责发给文职官员报酬加奖金的做法，建议一切职务均实行薪金制。紧缩经费的意图使大臣们支持这项政策的热情大为减退，而关键在于解决“预付款检查官”（Auditors of Imprests）的问题。这些人随着预算的增加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也在成倍地增加。在受到进一步的压力之后，小皮特于1785年任命了五名实行薪金制的督察官替代了他们，其他“预付款检查官”的工作也逐步地集中在这五位督察官的手中。关于军械署的报告中，督察官们提出政府应对军用物资和劳务支付现金而不再采用赊购的办法，并应鼓励通过竞争订立合同。小皮特这时设法通过竞争为军需品和贷款寻找投标者。某些官员拥有向大臣们和其他官员供应文具的专门权利，但皮特于1787年在新宫院（New Palace Yard）设立了政府的文书局，这个局迅速得到了扩大。

最后，政府账目督察官们极其强烈地谴责由通过设立副职而造成存在许多闲职和毫无用处的职位的情况。这在海关和财政部特别多，由于推行紧缩经费的改革运动，这些部门受害也尤其严重。伯克的政府编制法取消了王室和政府部门的134个职位，谢尔本根据财政部管理条例和议会的法令甚至更加雷厉风行，据估计，小皮特仅在1789年一年里就取消了税收部门765个无用的职位。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由于实行了近代的行政管理原则，通过削弱国王的“势力”，从而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后果。1780年以前业已开始的国王势力的衰落，此后其进程便不断加速，推动了国王不再由个人行使其权

力，内阁增加了凝聚力和政党组织在下院占据了优势这一缓慢的变化过程。

政党的分野明显了，整个政治气氛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终于激化了。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英国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不仅那些在1788年恢复庆祝英国革命光荣传统的革命团体感到欢欣鼓舞，而且那些乐于看到法国外交势力一落千丈的人们也额手称庆。然而，一些新兴的改革团体从英伦海峡对岸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启迪，特别是受到许多自由派不信奉国教者的支持，后者所信奉的上帝一位论的神学观点甚至比他们的政治抱负更加受到严厉的法律上的歧视。他们中的一员普赖斯博士布道时要求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伯克的名著《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曾引用了普赖斯的这段布道词。普赖斯进行布道的伦敦革命协会还发起了与法国的革命团体进行友好通信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792年2月，促使惶惶不安的保守分子把这个协会跟法国发生的过激行为等同起来。然而，这时伦敦通讯协会和其他团体中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人们已成为改革运动的先锋，而法国的流亡贵族和教士则已使上层阶级感到法国革命给教会和贵族带来的威胁。在英格兰，尤其在苏格兰，狂热的改革派已经同法国建立了暧昧的关系；潘恩和上帝一位论者普里斯特利被选为法国国民公会的代表；保皇派和反平均主义者的各种团体相继出现，伦敦和各郡的改革者与上帝一位论者受到了暴力威胁。到1792年11月，与法国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处决，2月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

到这时，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在潘恩和伯克的著作中找到了福音。随着1792年4月人民之友会的成立，议会议员中直接出现了政治上的分裂。人民之友会的成员中有菲利普·弗朗西斯和福克斯的一批年轻而狂热的追随者，虽然不包括福克斯本人在内。议员们受到激烈的报纸宣传的影响，1793年格雷提出的改革动议以281票对4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小皮特说这项动议是革命的。政局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小皮特推行的大多数压制措施都是以最大限度的压倒多数通过的，他那不可靠的多数地位的日子已经过去；同样，唯一的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即造成小皮特与国王隔阂的议会改革问题也不复存在了。自摄政危机以来的历次内阁更替中，小皮特显然愈来愈受到国王的支持。1792年他终于促使国王将瑟洛解职。由于格雷公开表示要提出一项改革动议而使辉格党人公开分裂，于是小皮特便决定向辉格党的保

守派提出条件，并从1792年5月起与他们举行谈判，一直谈到1794年6月。

小皮特后来承认，他把由于人民之友会的组成而导致的辉格党人的分歧估计得太严重了。在要求将议会改革作为使人民获得种种自由的一种手段，以及认为法国革命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干这些方面，小皮特和福克斯并没有多大分歧；确实，福克斯看不出除了国王外还有什么会对自由构成威胁，但两种人使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一方面是波特兰、菲茨威廉以及原先诺思的追随者所组成的集团。这批人害怕革命，公开或秘密地希望参加政府；另一方面是那些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事事崇拜法国的叫嚣者。尽管如此，福克斯通过极力宣扬他们掌握着完全取代当前政府的大好时机而把他这派人团结在一起，因为这个政府由于瑟洛的去职而大大削弱。而小皮特却通过支持波特兰公爵当选为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并授予他嘉德勋章的办法，始终把政府的大门敞开。然而到了1793年年初，福克斯对付皮特的策略没有一个再能掩盖辉格党的分裂了。人们开始脱离该派。仅仅由于福克斯继续保持了与波特兰的感情，才使这位公爵直到1794年才加入了政府。然而小皮特像福克斯一样，比起波特兰派辉格党人来受法国政治极端做法的影响更小，这大大改变了皮特内阁的激进性质，从而形成了一个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法国革命实际上完成了威尔克斯、宗教自由主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仅仅部分完成的事业；它第一次在英国政坛上建立了一个按规则行事的政党。

与此同时，在教会的掌权者中间，观点上也有了重大的改变。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已深深地侵蚀了尊重极端的古老教会传统和把三十九条信纲作为阐释圣经启示的做法；1773年，甚至连牛津大学也只是由于未能就采用一项经兄弟大学证明可行的替代方法达成一致意见，才继续坚持把签名承认三十九条信纲作为大学考查的内容的。“羽毛客店协会”^[12]和自由派不信奉国教者在70年代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要求取消教士必须签名承认三十九条信纲的规定所做的种种努力，表明要想以同样的立场来维护现有的秩序是多么困难；与此同时，福音派教徒的影响和人数也正在英国国教内外稳步地扩大，并强烈地反对自由派的上帝一位论倾向，斥责教会的掌权者不热心宣传三十九条信纲的全部教义，特别是有关得救预定论的教义。在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阿明尼乌派的不安情绪增加了。这是因为沃伯顿为英国国教所作

的辩护是以功利主义为依据的，即认为英国国教得到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信奉。而这时不信奉国教者（包括卫理公会教徒）的力量却以惊人的速度在成倍增加，特别是在威尔士以及中部和北部的某些地区。在爱尔兰公民中实行充分的宗教宽容并没有给王朝和政府造成明显损害，这大大地鼓舞了英国的不信奉国教者，他们要求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以及宗教宽容法所规定的签名承认三十九条信纲的做法。鉴于本世纪最后25年间不信奉国教者势力的复活，一旦作出这些让步，只能是加强不信奉国教者的势力而削弱国教。

因此，主教们几乎一致反对对不信奉国教者作进一步的让步，在他们的训谕和布道中告诫教士们重视信仰和德行的统一，坚持获得圣职的教士的权威，并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以此来对付福音派教徒的热情。主教们说服小皮特与他们一道反对不信奉国教者提出的要求，小皮特只是勉强地同意，而在路易十六垮台后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法国发生的对教会的攻击在主教们看来已使战争变成了一场圣战。主教们以当时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方式坚持认为国家的权威和基督教徒的行为准则都来自神的启示。在这场对理性主义势力的猛烈攻击中，对卫斯理派的攻击渐渐平息了，直至世纪之交拿破仑同法国教会讲和后，教阶制度才重新完全处于守势。与它相对抗的不信奉国教的理性派和福音派，继续占据了优势；结果，在接踵而来的改革年代里当对教会的威胁再度出现时，便激发了一场更加激烈的重申教会权威的运动。与此同时，福音派和主教们也以各自的方式促进了浪漫主义思想感情的发展，对启蒙运动势力提出了挑战。

福音奋兴运动始于30年代和40年代。它引用了许多互不相关的悔罪实例，并保证以某种方式可以得救，这种方式终于为世人所周知；这一运动的发展往往比卫斯理、惠特菲尔德或其他任何伟大的领袖的权威的发展还要快。因此，这个起源于安立甘宗的运动在教会之外取得了它轰动一时的成就，而且在神学上的严重分歧使福音派不论在信仰和宗教仪式问题上都分道扬镳了。最初，这个运动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在世纪末，虽然威尔伯福斯已远非英国福音派教义在议会中的唯一代表，但亨廷登伯爵夫人的同道们，和卫斯理的追随者们发现，他们只有按照宗教宽容法登记为不信奉国教者才能保住他们的财产，只有放弃圣公会授予的圣职才能继续担任牧师的职务，于是不由自主地逐渐成为不信奉国教者。卫斯理派教徒参加安立甘宗的礼拜仪

式虽然在很久以后终于成为安立甘公教派教义的牺牲品，但在18世纪末以前卫斯理派中有许多人已经脱离了国教，而且有更多的人从来就与国教没有任何积极的联系。自17世纪末以来，不信奉国教者正在上层社会中失去影响，而在中层和下层社会中有强大影响的福音派不信奉国教者也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恢复这种影响。尽管如此，在不信奉国教者当中，福音派教义发挥着强大的影响，甚至比在国教中的影响还要大；无数次的教民集会反对当时流行的上帝一位论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政治主张。关于礼拜仪式的文章和赞美诗大量增加，对感恩祈祷也重新恢复了热情。卫斯理派的保守主义也许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加以约束，但是不信奉国教的托利党人的存在在少数自治城市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局面。

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经济发展乃是教会和国家发生变化的基础。1783年战争结束时出现了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经济困难，但随后便出现了甚至比七年战争后更引人注目的繁荣景象。这一繁荣的浪潮乃是1792年各种各样的政界人物都持乐观态度的基础。在小皮特和那些带有保守倾向的人看来，经济发展似乎是由于健全的财政和事业精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自由而管理完善的政府自然而然产生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反对派和不信奉国教的自由派看来，使收益能够充分不断上升的最好办法似乎是扩大自由体制的范围，而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到1792年年末英国的信贷机构已处于紧张状态，利率的上升和破产数字的增加似乎预示着1772—1773年那样的危机的来临，当时战争的爆发突然引起了一场大恐慌和使资产保持流动的普遍努力。虽然利用信贷和恢复出口来支付战争费用很快便减轻了这一打击所造成的影响，但伴随着1793年危机出现了激进政治的广泛传播。

1784年开始的经济恢复似乎首先是由于对外贸易扩大的激励。1784—1792年间出口额几乎增加了70%，并且证明美国是个在不断扩大的极好市场。1788—1792年英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半，其中约87%是美国进口的制成品；在西印度群岛、亚洲和德国也找到了日益扩大的市场。随着出口的增加，投资也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圈地证券、公路证券以及修建运河的经费成倍地增加，而砖的产量也几乎成倍增加，航运量也在不断上升，以满足海外贸易新规模的需要。麦克弗森于1793年写道：“在九年和平时期中由成功的商业积累起来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机械制造和内河航运业。”的确，这些年不仅

大力兴修运河，而且炼铁、纺织和动力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很大一部分工业革命的传统故事。虽然机器纺纱当时在整个纺织业中还未得到普遍的推广，但工厂制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致力于将其不仅推广到威尔士而且推广到了英格兰南部和西部从事纺织业的各郡。原棉的进口和棉织品的出口在不断增加，尽管棉织品出口的重要性还不能与毛织品的出口相提并论。毛织业在技术上比棉织业保守，但其产量却迅速增加；1783—1792年在西区几乎增加了一倍。即使迄至1786年为止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的炼铁工业这时也开始兴旺起来了。

1784—1792年，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从111上升到200，统一公债从54上升到90。公债券价格的上涨鼓励了在私有企业的投资；由于英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可以获得的信贷也增加了。但是，在繁荣达到巅峰时，尽管这些财源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开始感到紧张。1793年战争一爆发，肥皂泡便破裂了，并引发出一场危机，使英国的许多银行遭到致命的打击。特别是那些发行了可兑现纸币的银行。一时间整个金融机构受到了震撼；在伦敦城的压力下，政府准备发行财政部证券，以缓解有信誉的商行所处的暂时困境。

劳工的实际工资问题一直在争论不休。虽然农产品的价格多变，但其他产品的价格却相对稳定。直到1793年战争爆发才开始采用以信贷支付战争费用，并引发了整个世纪以来幅度最大的物价上涨。有些工资，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工资，同样是稳定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从美国独立战争到法国革命战争这10年期间，农业和工业熟练工人的工资看起来有所增加，但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是根据下述情况得出的结论：茶叶、食糖、啤酒和廉价纺织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受手工业工人支持的一些机构如各种小型团体、互助会和工会等也到处出现了。至于那些缺少熟练技术以及从事正在衰落的行业的劳工，他们的前景并不美妙，特别是在那些因爱尔兰移民的到来而使就业竞争更加激烈的地区。

因此，从1763年到1793年这30年间诞生了许多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在反对法国的伟大斗争中支持了这个国家，而且成为19世纪英国的特征。一个旨在保证原材料供应的殖民帝国已经丧失了，但它仍在吸收着大量的英国制成品，从而为建立一种旨在保证市场的殖民帝国提供了模式。印度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那里建立了一种国王与公司

之间长期分享权力的制度。爱尔兰也可以勉强地归于这一类情况。在美国的独立终于得到承认之后，谢尔本和福克斯不得不谋求缔结一项通商和防务条约，以便把他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失败了，但在赋予爱尔兰以自治权时试图获得同样的保证，也遭到了失败。小皮特也希望通过缔结一项慷慨的通商条约以换取爱尔兰提供帝国防务经费，以便把爱尔兰束缚得更紧一些，并希望通过议会改革使新教势力占据上风。所有这些希望都破灭了。福克斯在那些还没有自信心能够在失去原有的保护的情况下生存的制造商中制造骚动，以破坏小皮特的方案。由于英国的改革宣告失败，在爱尔兰推行议会改革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尽管小皮特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表明，英国的安全不可能再靠都柏林城堡^[13]在爱尔兰议会的影响而顺利地获得了。1785年的通商决议案以极微弱的多数在下院勉强获得通过，以致使之付诸实施是办不到的。1789年年初，当威尔士亲王似乎很可能成为摄政时，一些主要自治城市的议会席位捐客和格拉顿都设法与福克斯和解，一度压倒了宫廷派的残余势力。要恢复英国驻爱尔兰总督的权力就得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贿赂，而倘若由于法国大革命对爱尔兰的影响而发生新的危机的话，仍然无法保证政府能够得救。到了1793年，实现合并而使爱尔兰问题变成一个国内问题，已经是可以预见到的事了。

在国内政治方面，到了1793年，政党正在获得新生，国王的个人权力业已走向下坡路，现代政府机构正在建立之中。小皮特已经为不久即将被迫推行的新财政体系建立起机构。英国未来赖以生存的煤、铁、棉花和蒸汽等方面的最新发展的规模之大，足以证明“工业革命”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自由理性主义业已在英国教会的神学和政治两方面打下了它的烙印。与此同时，福音奋兴运动则正在形成将在下一世纪产生影响的各种主张，并为英国第一次在海外履行其伟大使命提供了推动力。要不是发生了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话，旧秩序的终结肯定会比实际上要快得多。

（南木 译）

[1] 沙利文出身于爱尔兰不著名的家族，在印度待了多年，于1740年进入东印度公司服务；1748年后不断提升；1752年12月返回英国；1755年任该公司董事；1757年任副董事长；1758—1764年任董事长。

[2] 莱斯特府（Leicester House）是英王乔治一世之子，威尔士亲王（后即位为乔治二世）在伦敦的宅邸。乔治一世在位之初，该府邸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聚会的场所。乔治二世在位之初，托利党人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则是支持废王詹姆斯二世的詹姆斯党人。——译者注

[3] 坦普尔（名理查德·格伦维尔，坦普尔是其爵位）之妹是老威廉·皮特之妻。——译者注

[4] 此处王太妃原文为（Princess Mother），系指乔治三世之母。乔治三世之父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早故，未及登上王位，故其母称王太妃。——译者注

[5] 原文为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一般由首相兼任的内阁主管财政事务的最高职务。——译者注

[6] 查塔姆即老皮特。他于1766年被封为查塔姆伯爵。——译者注

[7] 从1756—1763年政府全部收入的43.4%是完全靠借款来筹集的；特别是战争费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靠借款来支付的，可以将战争第一年和最后一年的开支加以比较来说明：1762年的战争总开支比1756年多9.79百万英镑；1762年的净借贷比1756年多7.34百万英镑。

[8] 克里斯托弗·怀维尔（1740—1822年），英国鼓吹议会改革和宗教自由的激进教士，他领导的组织称“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译者注

[9] 坦普尔勋爵是本章前面（原文第539页）提到的坦普尔伯爵理查德·格伦维尔之侄，继承了其叔父的爵位。是小皮特的表弟。威廉·格伦维尔是乔治·格伦维尔之子。——译者注

[10]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年），英国政治家和慈善家，皮特的密友。以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著称。——译者注

[11] 指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参见后面原文第559页。——译者注

[12] 1772年一批不信奉国教者在斯特兰德的“羽毛客店”草拟致下院的请愿书，要求废除签名承认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的规定。——译者注

[13] 都柏林城堡为爱尔兰独立前英国统治当局驻在地。——译者注

第二十章 欧洲背景下的法国行政管理 和国家财政

18世纪后期，在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建立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共同趋势。这一趋势是更加引人注目的增进个人自由的努力的对应产物。因此，这个美国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和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宪章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的时代，也正是近代国家开始巩固其力量的时代。正如启蒙运动思想家们^[1]试图界定国家的性质以及人的性质那样，在尔后的年代中，他们的思想表现为国家和人二者的特点都更加明确地得到了体现。中央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同步增强可以从以下这样的事件中看到：在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法国，耶稣会的势力遭到破坏；在法国大革命中则教会和贵族的势力遭到破坏；在法国和英国，使中产阶级最终得以控制中央政府的社会、政治和宪政大变革，往往掩盖了官僚势力的加强；而自由的传统则有时使人们以为，在伟大的革命时代，国家的力量只有在那些盛行“开明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里才会得到加强：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卡洛斯三世的西班牙等。但由于亨利·皮雷纳给开明专制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国家的合理化”^[2]从而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开明专制君主本身转移到他们对国家所作的改革的性质上去了，这些改革工作就其意图和效果而言，与当时在英国和法国实行的改革计划非常相似。在这两个国家，政权的建设虽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它是通过议会及其各委员会授权而不是由专制君主所强加的，其质量和持久性丝毫不逊色，在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方面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英国，一些机构，其中首要的是政府账目审计委员会（Commission for Examining the Public Accounts, 1780—1787年），向议会提出各种报告，从而为改革性立法提供了基础。这种立法与以前的立法性质完全不同，以致有人说从1780年开始的10年“似乎代表了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3]在法国，从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中也开始了类似的改革，并由历届革命政府进一步加以推行。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两个国

家所完成的真正的行政管理革命，都源于18世纪后期的这些改革计划。

讨论一下这些变革的一般性质，作为更加详尽地论述法国改革运动的背景，将是有益的。这些变革的总的后果是通过类似技术性的改进，使国家机器更加有效而强大。的确，这种改革的基础似乎是一种新的看法，即把行政机构当作一部由各种零件复杂地组装而成的机器，各个零件各有其特殊功能但又都从属于整体。很清楚，当人们为实际目标而工作时，组成班组比各自单干要有效得多。君主的臣仆们获得了很高的个人地位，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公众的关系完全是私人关系。有许多人是由他们所服务的公众付给酬劳，有许多人是被授予权力，从他们所掌握的公款中提取一部分；而有些人则甚至可以将公款用于私人投资来获得收入。那些用金钱买得公职的人则从他们的这种投资中获得利润。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上述各种付酬办法越来越多地由中央金库支付的固定薪金所替代，中央金库从而得以控制并协调公务员们的活动。过去这些公务员往往把他们自己的履历档案和其他文件视为私人财产，除他们自己外与他人无关。因此很难汇集准确的统计数字和其他正式资料。此外，大多数官吏过去像私人雇主一样雇用自己的职员和勤杂人员，而现在国家开始在各级雇用负一定职责的公务员。像薪金一样，职责也开始有了明确规定，并有条理地分配给每个雇员。这样，领干薪的人减少了，政府可以知道每个官员应如何支配他的时间。从会计制度的演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从以个人为重的独立官员向非个人的群体转变的情况。过去对官员的账目的审计仅仅是一种司法性的审查，考查会计个人是否诚实；现在，它同时成为行政性考查，以深入了解国家事务的真实情况。最后，官员们过去可能是由于亲身对国王有所了解才建立起个人对国王的忠诚，现在则变成一种对王室或国家的非个人的忠诚关系。

随着公务员个人越来越成为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行政管理不仅变得更加非个人化，而且变得更加职能化。事实上，正是这种职能的概念，才使法国的文官获得了“公务员”（fonctionnaire public）的称号。行政机构开始按现今熟悉的金字塔式结构系统地组织起来。从低级雇员组成的宽广底层一直到由副部长或副大臣组成的顶端，层层各司其职。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是一种人员按级从属和委任职责的制度，一个人可以按照节约开支和增加效率

的方式领导并监督数以百计的人员的工作。在这种制度下，雇员们与他们的职责是明确分开的，组织的基础是因事设人而不是因人设事。按照丹麦和法国改革运动的知名人物圣日耳曼伯爵的话说：“事非因人而设，人则为事而用”，正是由于运用了这一功利主义原则，才使得类似性质的工作开始集中在同一个部或同一个机构中，并得到加强。每个行政机构开始具有一种基本目的，如征税或管理国内行政事务，等等。有关财政和司法的事务，过去由许多不同的机构处理，以致管理混乱，如今则由财政部和司法部分别管理。这种将职责系统地加以集中的结果，便需要有专门知识和经专门训练的人员，这种专门知识和训练可以在任职之前获得，也可以在任职期间获得。这样，非专业公务员便逐渐让位于专业公务员，因为如果国家行政机构要变得更像一部机器，它的零件就必须加以精心配置。与此同时，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也就具有了某种凝聚力和集体精神。尽管人不可能像机器零件那样精确地发挥作用，但对人员和工作有系统地加以组织大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力量。

关于国家的组织或“管理”（Wirtschaft）^[4]的社会学理论，在德、奥两国是由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其中或许以J. H. G. 冯·尤斯蒂（1720—1771年）和J. 冯·宗南费尔斯（1733—1817年）最具影响；在法国则是由以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年）和米拉波侯爵（1715—1789年）为首的重农主义者提出的。这两派对国家与自然的关系持迥然不同的观点。重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恢复和保持“自然秩序”，而不是去干预其运行；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则倾向于认为国家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如何进行组织是一门自然科学。但两派人都鼓吹一个信条，即由强有力的专制君主实行系统的功利主义改革。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对公众舆论具有影响，因而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法国的那一派，但也许与其说他们是那个时代行政革命的起因，不如说仅仅是一种征兆，因为改革的推动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内部各派势力。

欧洲行政体制发展的一般特点的最清楚的说明莫过于法国的历史了。在最高层倾向于将国王的各个政务委员会加以统一，将其注意力限于国家最重大的问题上，而将有关的行政事务留给官员们去做。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很难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时间，往往过分具体地讨论某些问题，而把其他问题全都留给手下的一些常务官员去

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苦于缺乏领导，因为路易十五在位后期很少过问政府工作；从1757年起出席这些委员会的王太子又于1765年去世。他的儿子于1774年即位成为路易十六后没有主持这些委员会的经验。在宫廷各派的争斗中没有出现强有力的人物能担当起重任。因此，这种委员会制度竟能演变到那样的程度实属出人意料。据《王室年鉴》记载，路易十五主持过四个主要的委员会：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 d'En-haut）、处理某些内政问题的诏书委员会（Conseil des Dé'pêches）、王国商务委员会（Conseil royal de Commerce）和王国财政委员会（Conseil royal des Finances）。此外，国王原则上领导着财政及指导国务委员会（Conseil d'Etat privé Finances et Direction），但实际上由大法官或掌玺大臣来主持。这是一个较大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30名国务委员、6名财政监督和80名国王司法助理（Maîtres des Requêtes）中的许多人。其职责是处理当前司法和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这种委员会体制在1763年时虽然与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几乎毫无二致，但在官方的外表下面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国商务委员会已有20多年没有开会。而且除了在1787年6月试图加以恢复后曾短暂地开过会之外就再也没有召集过。一些重大的商务问题由商务署（Bureau du Commerce）加以处理，而它是一个行政机构，其成员大都是一些官员。在四个仍在工作的委员会中，高级行政官员——大法官或其副手掌玺大臣、财政总监，以及陆军、海军、外交和王室事务四位国务大臣——是最有影响的。例如，财政总监督控制着王国财政委员会，因为他和他管辖的部负责为委员会的会议准备议题。而且，尽管该委员会把次要的工作交给下属的两个委员会，即“大指导委员会”（Grande Direction）和“小指导委员会”（Petite Direction）去处理，本身只管那些需要确定原则和解释法律的问题，但仍然感到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这类问题交由财政总监与国王一起作出决定，甚或由财政总监自己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即财政监督们作出决定。结果，许多以委员会法令名义颁布的法律，实际上并非由国王主持的会议所制定，而是由行政官员们制定的。1777年6月的一项敕令批准了这种做法，成立了一个行政性的财政诉讼委员会（Comité contentieux des Finances）以处理除有关政策问题以外的一切事务。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是迈向适当分担职责的一个重要步骤。诉讼委员会主要由一些财务监督组成，这就使王国财政委员会和财务总监从

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们能更多地注意政策问题。这样，王国财政委员会似乎可以着手果断而有力地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了，然而情况却相反，不久，它就开始每年只不过召开七八次会议，实际上把领导的责任都推给了财政总监和诉讼委员会。因而掌玺大臣于1788年将后者称之为“实际上的财政委员会”。^[5]与此同时，其他委员会也有类似趋势，即只管政策性的问题，而将行政性问题交由官员们处理。1789年8月9日终于形成一项法律，把诏书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交由一个各部联席诉讼委员会（Comité contentieux des Départements）负责处理。这项法律还规定将最高国务委员会、诏书委员会和王国财政委员会合并成一个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从而完成了委员会的合并工作。这个合并后的委员会没有机会证明它是否比以前的各委员会更有效率，因为不出几个星期国民议会便承担起领导国家的任务。

各委员会中负责执行政策的成员——各国务大臣和财政总监——到18世纪中叶已是规模庞大的各部的首脑。但由于各种政府职能分工不明确，使这些部的工作效率受到了削弱。把政府工作合乎逻辑地划分为司法、公共工程和内政等部门的思想始终未能在行政工作中认真地付诸实行。这是仅凭经验办事造成的混乱。就连陆军部、海军部这样职能显然很单纯的部也夹杂了许多属于内政方面以及与它们本来的职能无关的财政和司法任务。结果是造成许多工作浪费重复，高级官员极端依赖其下属，因为不可能指望他们懂得下属五花八门而且互不相关的任务。大多数高级官员在买到官职后就可以置他们的同事和上级于不顾，这样的各行其是更增加了不团结。由于这些组织上的缺陷，在大多数部担任行政职务实非易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雇员显示了热情和才能。除非当时的人们开始懂得行政组织的重要性，否则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王国的官员们曾著书立说和制订各种计划，似乎是适应日益强烈的对秩序、简政和效率的要求而涌现出来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之一是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他在工作和著作中都显示出他已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在时间、精力和理解力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下要想管好一个部的话，那么这个部能够以合理而统一的方式行使职能是多么重要。

外交大臣德·托尔西（1699—1716年任职）曾让外交部授权其秘书处、档案室和政治学院训练年轻的外交官。财政工作于1775年统一于基金署（Bureau des Fonds）。从1767年起，账册和档案都系统地加以保管起来。下令进行这项改革的舒瓦瑟尔发现，一个依靠仔细研究剪报资料和各种报告的情报部门要比间谍机构更有用。根据1767年的一项规定，舒瓦瑟尔规定了工作时间，并统一了过去由外交部各部门任意管理的电报密码工作。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密码工作并没有认真而有效地加以对待，但在这时，它成为单独的部门，有其自己的领导，以便加强效率和保密性。1775年成立了测绘局，关注国界和地理上的问题，并于1780年成立了地图保管局。美国独立战争后，韦尔热讷把上述这些工作纳入两个政府所属的局，各由一名仅次于国务大臣的高级官员来领导。1792年迪穆里埃最后又将这两个局合并，而把与之无关的外省行政事务交由新建立的内政部负责掌管。

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改革虽开始较晚，但进行得同样彻底，也许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花在战争上的钱比花在外交上的钱要多得多。七年战争之后，舒瓦瑟尔试图改进征兵、军需和军事演习等工作的方法，但收效甚微。这一工作继而由圣日耳曼伯爵（1775—1780年的陆军大臣）进一步加以推行，收到了永久性的效果。他为法国陆军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非常有战斗力。他通过打击买卖军阶的做法，减少军官的军阶和各级军官的数目，以及实行军官晋升制度，逐渐形成了一种灵活的等级结构。他把招募工作从用钱招募的连队（100里弗尔招一名步兵，120里弗尔招一名骑兵）改为交由军队自己办理，不准军官像以往那样强迫人们入伍，而是建立起受管理委员会监督的招兵站。团队的管理委员会由不同军阶的五名军官组成，定期开会决定团队的经费开支，保管档案和账册，并向陆军委员会委员提出报告。陆军委员会委员以往由文职官员担任，权势很大而且职位可以用钱买得，与一同共事的军官不断发生摩擦。圣日耳曼将他们改成军队的组成部分，废除了委员职位的买卖制度，使之作为职业岗位纳入军阶制度，圣日耳曼的工作由塞居尔伯爵继续进行，后者作出了诸如建立永久性的总参谋部等极为有用的贡献。两位有才干的国务大臣萨尔蒂纳（1774—1780年在任）和卡斯特里（1780—1787年在任）在海军部相继作出了同样重要的改革。1784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以及1786年1月1日的法令，被奉为法国皇家海军的圭臬。由于预计将与英国作战，18世纪70年代的海军和陆军

组织获得大的改善，1788—1789年海军又得到进一步的改进。这是因为主张进行改革的大臣们被允许花费大量的钱。

陆军部和外交部的发展先于其他部，因为它们的职能具有紧急性，使它们很早便集中掌握在王国政府手中。主要为了国家的生存，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其结果是到16世纪末陆军、海军、外交和王室事务各部的大臣都由专职人员担任，而当时在内政方面管理权仍然分散在由地方、私人、司法和王室掌管的各式各样的部门手中。直到1791年5月25日，中央政府才成立了司法、税收（Contributions Publiques）和内政等部，使其权力得以凌驾于法院、贵族和各省之上。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过程是从17世纪就已开始的。当时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开始向各省派出常驻代表（Commissaires départis），通常被称为司法、治安和财政督察官。在18世纪后期，共有32—34名这样的督察官，即省督，其中有一些是由陆军大臣派到边境各省的，其余的则是由财政总监派往内地各省的。这些省督并不像普鲁士各州的行政管理部门那样受到严密的控制，以免使他们丧失主动性。由于这些人是被任命而不是靠花钱买的官职，而且通常是靠能力而不是靠他们在宫廷的关系而获得任命的，所以正如内克尔所说，这些人成为从旧制度造就出来的最优秀的行政官员。可是，他们的效率却受到三个不大遵纪守法的权力集团的限制：省三级会议、高等法院和巴黎行政当局。

在总面积占整个王国约一半的13个拥有省三级会议的行省中，省三级会议由于坚决捍卫古老的权利和特权，对抗王国政府的侵犯而得以幸存下来。它们在司法、治安和财政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定期召开会议对之进行检查，因而它们由于效忠本省而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使它们得以保持下来，直到1789年人们热衷于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把这种对地方的忠诚一扫而光。此外，省长们尽管已经丧失了许多权力，但仍然可以给省督制造很多麻烦，但省督与1787—1788年间建立的省议会之间比较令人满意的关系，却预示着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冲突的停止，而且在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斗争之后，仍然在整个19世纪艰难地维持了下来。尽管难以对付，但各省的三级会议和省长并不像宫廷那样对成长中的国家行政机构形成强大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具有行政和司法职能的13个高等法院（parlements）乃是国王权力机构的强有力的敌人。此外，诸多的财政法庭亦复如此：如财政局

（Bureaux des Finances）、间接税法庭（Cours des Aides）、审计法庭（Chambres des Comptes）以及金融法庭（Cours des Monnaies）。

如果说王国行政部门由于这些法院和省三级会议的对抗而受到牵制的话，那么，它还因巴黎的各部和其他机构的混乱局面而遭到削弱。省督还需与一大批互不协调的机构相配合。他们也许与财政总监署（Contrôle général）关系最为密切，而在该机构中，也和大部分部一样，组织涣散，而且职责五花八门，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管理。许多事情都由各个局自行其是，往往按局长或某些派别的意志而不是按政府的政策办事。这些局有许多是非常有用的，后来合并到1791年成立的税务部和内政部。但旧政权总是为如何把这些局组成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部门这一问题而苦恼。在1763年，这些局已有很长时间被随意地划归六个财政督察官（Intendant of Finances）管辖。像丹尼尔·特吕代纳那样杰出的财政督察官一个人就可以管好他所领导的好几个部门的复杂多样的工作，而且可以改进其中许多部门的工作质量。特吕代纳实际上是矿务局的创建者。这个局鼓励并领导了煤、铁及其他矿藏的开发。他也是桥梁公路工程局（Ponts et Chaussées）的创建者，该局所修筑的壮观的法国公路受到阿瑟·扬等旅行家的称赞。^[6]然而那些碌碌无为的财政督察官就不得不依靠他们的下级，而这些人则往往利用这一点谋取私利。总之，这些靠花钱买来官职的财政督察官实际上脱离财政总监而各行其是。因此，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行事的财政部的内克尔于1777年6月撤销了这些财政督察官的职务。内克尔下台后，虽然又恢复了财政督察官的职位，但是成为矿业、税收承包或桥梁和公路等专业方面的督察官。与此同时，负责领导商业和工业的商务督察官（Intendants of Commerce）也顺利地并入了这个部。从1764年开始，这些职位一旦出现空缺，其买卖制度便被废除，而由国王司法助理作为商务督察官直接来填补。1787年6月这些商务督察官所管辖的局合并，由他们中的一员德托洛藏统一领导。1764年设立了第五个国务部，终于将财务总监署所管辖的这些纯属行政事务的职能转由该部负责。前财政总监亨利·贝尔坦被任命来接管后来属于内政部的这些工作任务：农业、矿业、运河、档案，等等。但这个部于1781年又撤销了，此前也始终没有解除财政总监的最重要的非财政职能，即对商业和工业的管理。

商业和工业之所以长期以来与财政一起加以管理，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收入只能随着国民总财富的增长而增加，而国民总财富的增长又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繁荣。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自柯尔培尔的时代以来，政府一直在推动出口贸易，深信这是增加其黄金和白银储备的最直接的方法。为了鼓励将纺织品、五金器具、皮革和金属产品以及奢侈品销往国外，由40—50名产品检验员和差不多同等数目的商标检验员（Commis de la marque）组成一个能干的班子，来维护质量和规格的官方标准。凡农产品以及可用作工业原料的任何产品都不得出口，因为据认为销售产品所获得的利润要靠制造产品所消耗的劳动力和技能。然而，产品的出口受到津贴和低关税的优惠。为了衡量这些措施的效果，贸易平衡局（Bureau de la Balance du Commerce）利用海关记录汇集进出口货物的统计数字。另一方面，对国内贸易的管理则被看作是一个在互相冲突的各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公正的“平衡”的问题。国王认为有责任协调各省、各城市、各行会以及各个人的要求，因为他们总是要求取得专营权、免税权或其他特权。这些需要由巴黎作出决定的请求和其他官方事务，通常由某一位商务督察官的办公室接受，它可能将之提交财政总监定夺或提交贸易平衡局的会议讨论处理。这样的会议由国务委员、国务大臣、财政总监、警察总监、巴黎财政区督察官（Intendant of Generality of Paris）、一部分国王司法助理和商务督察官组成。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务督察官先将有问题的问题提交税收总承包人的代表以及主要贸易城市派出的商务代表（Deputies of Commerce）审议。这两部分人之间的观点经常发生冲突。这种独特的办事程序表明财政总监的基本职能乃是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与全国的工商业利益。财政总监的任务似乎是既要收集鹅下的金蛋，又要照顾好下蛋的鹅。不幸的是，由于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越来越依靠税收总承包人，因此，作出的决定往往不利于商人和制造商而有利于金融家。而由于人们厌恶商人、制造商，以及城市和各省当局动辄利用政府的援助作为相互倾轧的武器，并且认为任何对上述这些人有利的决定都是对私人利益的让步而违背国家税收的需求，从而使上述倾向更加严重。而最糟糕的是，直到大革命爆发，政府都是在甚至牺牲全面的行政改革以满足它对现金的渴求。

但在18世纪中叶，由于对国家普遍的经济发展的兴趣出现了新的高潮，于是许多负责商业管理的官员开始从事贸易、工业和农业。如

樊尚·德古尔内、伊萨克·德巴卡朗和克利科—布莱瓦谢等商务督察官，特吕代纳和蒙塔朗等财政督察官、工业产品总监察官（Inspector General of Manufactures）弗朗索瓦·布里松以及其他许多人员都被越来越多的问世的经济方面的书籍所吸引。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家贫困，导致人们要求变革，从而使这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潮流应运而生。虽然经济理论各异其趣，但毫无疑问，重农学派轰动一时的学说处于领先地位。这派人主张废除各种规章、关税、垄断和其他一切对工商业的约束，使法国可以享受“自然秩序”的益处。但大多数官员的行动和著作只表现一种日益抬头的信念，即认为促进国家富裕和繁荣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对工商业进行管理，而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除重农学派外，争论的问题不在于政府该不该干预经济事务，而在于应如何进行干预和政府应将其努力集中在什么地方来增进普遍的繁荣。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证粮食的稳定供应？是否应该鼓励“自由集市”？是否应允许国内消费奢侈品？政府应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制造并销售印花布（toiles peintes）？政府的财政需求怎样才能与国民经济的繁荣协调一致？这就是商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们专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实际后果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少依靠规章，给经济企业以更多的鼓励，更多地收集有关工商业和农业的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早先的财政总监，如奥里，已经利用过统计资料，在整个18世纪下半叶，各商会、省督、商务代表（他们已成为王国的官员）、工业产品监察官以及其他官员均曾承担准备越来越多的经济档案和报告的责任。C.E. 拉布罗斯写道：“18世纪的财政总监解决问题越来越少，而披阅材料却越来越多了。”^[7]至于财政援助的问题，必要时一直从包税款和商业基金（Caisse du Commerce）中发放贷款或补助金，特别是给纺织业。商业基金是从对殖民地的货物抽税而提取的。1776年建立了一家贴现银行（Caisse d'escompte），以4%的低息发行短期贴现商业证券，企图以低息短期信贷随时提供财源，并以此降低当时流行的利率。这种鼓励信贷的愿望，还导致于次年创立了典当业。但总的说来，商业和工业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技术援助可能更多些。发明者、技术人员、设计人员以及技术书籍的著作者可获得定期津贴、补助金和奖金。科学院的成员都委以某项研究工作：贝托莱负责染色技术，旺德蒙德负责研究机械，多邦通负责研究羊的饲养。曼彻斯特的制造商、逃亡到法国的詹姆斯党人约翰·霍尔克以外国工业品总监察官（Inspector

General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1755—1786年任职) 的身份成功地将英国的机器引进了法国, 并吸引了一批英国的发明家和熟练工人。另外有四个工业品和商业总督察官的职位往往只是挂名差事。如试验新机器的沃康松和从事各项经济项目的杜邦·德·内穆尔。杜邦于1785—1786年曾汇集外国关税和贸易的情报资料, 向与英国谈判商约的法国代表提供咨询。1791年国民议会撤销了这些官职, 但增加了某些形式的对企业的直接鼓励。例如, 根据1791年9月27日颁布的法律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 负责对当年另行拨出的用以鼓励机器和新工艺的发明者的200万里弗尔如何使用提供建议。

比财政和技术援助更加有效而起关键作用的是通过建立一套统一的计量制度, 特别是通过在国境上建立统一的海关税卡, 使国民经济得以实现一体化。中世纪以来, 君主们就试图采用标准的度量衡, 但均属徒劳。即使是成功地统一了货币制度的柯尔培尔面对这一艰难的任务也一筹莫展。1791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使米制得以采用, 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了可贵的方便条件, 同时也证明了国民政府新建立的权威胜过了王国。而通过1790年11月30日起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将海关体系加以统一则具有大得多的意义, 因为它使政府得以掌握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的行政手段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一直阻碍省际贸易的关税壁垒被拆除了, 国境线上的海关加强了, 以便使之能真正有效地对付走私者。仅仅在边境上集中建立了750个海关检查站, 替代了过去分散在全国的由于进行检查和实行官僚式的管理而阻碍交通的一千多个检查机构。通过对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和有价值的原料的出口征收15%或20%的关税, 使政府得以对本国的工业提供虽然不大却很实际的保护, 以对付英国的竞争, 同时也鼓励了法国的出口。

此项改革使柯尔培尔于1664年开始进行的工作得以完成。那年他把法国北半部各省组成一个关税联盟。由于管理它的是由包税人合伙组成的公司, 因此称为“五大包税区”(Cinq Grosses Fermes)。因其他各省拒绝放弃地方关税和加入这一联盟, 柯尔培尔乃于1667年试图在王国周围设卡对一系列进口的制成品和出口的原料征收高额关税, 以保护法国经济。这一制度直到大革命时仍基本保持不变。它对抵制不适合需要的外国制成品并非十分有效, 部分是因为在缴纳了1667年规定的关税以后, 这些制成品可以豁免所有的国内税, 因而往往以可能比法国产品还低的价格出售。因法国产品需缴纳各种国内

税，往往使它们的价格上升15%或者更多。此外，为了抵消国内税所造成的法国商品的额外成本，不得不对售往法国的制成品在边境上征收约30%或更高的关税，或者干脆不准进口。然而，禁止进口和高额征税却助长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事实上，边境上的海关税卡十分软弱，在大部分港口，特别是巴约讷、马赛、敦刻尔克和洛里昂，都有一批承包人（*assureurs*）。这帮人以12%或15%的低价将货物偷运进法国，大发横财。这些海关税卡之所以如此软弱，主要是由于管理税卡的总包税人不是把它们看作一种经济控制，而只是看作一种税收，必须使其提供尽可能多的税款收入。他们和他们的雇员们并不关心什么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消灭外部的走私活动，而且实际上他们甚至还可以通过对商人和走私者进行罚款以及拍卖没收的货物而从中谋利。

柯尔培尔在留给18世纪这项半改革性的制度的同时，还留下了他的改革政策的启示。正是这种启示而不是经济理论家们的著作引导了近四代改革者们去努力实现他们称之为“单一税计划”（*le projet du droit unique*）的设想。大多数的改革者跟柯尔培尔本人一样，都是政府官员，对所涉及的实际问题都很了解，从1700—1710年以里昂人让·阿尼松为首的商务代表们鼓吹进行改革；1720年，他们的计划重新恢复了活力，几乎由商务委员会（*Council of Commerce*）事实上的领导人米歇尔·阿梅洛付诸实施。从1726年直到1745年前后，这一改革运动由一个总包税人拉勒芒·德·贝茨领导。但一直到七年战争之后，财政总监贝尔坦有了一个由财政督察官、商务督察官、商务代表和总包税人组成的小组制订的新计划，政府才开始认真作出努力。最后的计划于1787年在显贵会议上提出并于1790年由国民议会仅仅稍作修改后通过。该计划是由一位领薪金的官员马依·德·科尔梅雷领导的一个政府特设的关税改革局（*Customs Reform Bureau*）用了10年的时间制订并主持执行的。

改革计划之所以直到大革命时期才付诸实施，足以说明旧制度下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性质。在布列塔尼、阿尔萨斯、洛林、三主教区、[\[8\]](#)佛兰德、吉耶纳和其他边境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那里的人们认为，同王国的其他地区结成关税联盟将会损害这些省的贸易。另外，反对还来自贸易界、制造业和城市的一些利益集团，因为它们获得了豁免国内税收的特权，不愿失去它们在国内贸易中的特殊“自由地位”。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克服来自

这些方面的反对，就像1790年终于做到的那样，因此在七年战争后总包税人也开始反对改革了。而在此之前，这些总包税人一直是愿意支持关税体系的统一的，因为他们希望接着会实现更加有利可图的食盐和烟草的专卖，即盐税（gabelle）和烟草税（tabac）的类似统一。按照古老的协议，各省的食盐和烟草销售价各不相同，有些省如布列塔尼，完全豁免盐税，其他省如阿尔萨斯则豁免烟草税。为了将价格不同的地区分割开来而设立的关卡，大致同内地的海关税卡相一致。倘若所有这些关卡同时都予以废除，全国不仅实行统一的关税，而且实行统一的盐税和烟草税，那么货物税就可能会大大增加。许多政府官员和包税人，如拉瓦锡^[9]都曾指出过这一点。然而，那些享有特权的省份反对征收盐税和烟草税的态度一直很强烈，以致在1763年后成为全国性的要求全部取消这些专营权的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越来越惧怕这一运动，总包税人也开始反对关税改革，特别是在1783年以后，因为当时食盐和烟草的专卖实际上是他们仅存的特权，其他税收都已经置于政府各委员会的管辖之下，他们已不再有多大力量去染指。鉴于在财政上必须依赖这些总包税人，王国政府除非把盐税和烟草税也加以统一，否则统一关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下，政府不可能把这两种专营权同样扩展到整个国家。1790年，制宪议会不顾总包税人的反对废除了盐税和烟草税，并将改革后的海关体系置于政府的税务局（régie）控制之下，从而打破了上述困难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牺牲了上述前两项税的全部收入和海关税收入的大部分。关税不再称得上是一种税收，而仅仅成为一种经济控制手段。显然，这些只不过是整个财政制度的改革中作出的一些变革而已。

税收改革的趋势表明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按照公认的主要缺陷来衡量，税收的不公平依然存在，这是因为面对享有特权的城市、省份和社会阶层的抵制，国王是很软弱的。不公平的税收意味着对公民不公正，而对中央政府来说则意味着控制的无力、管理的混乱和岁入的减少。在大革命期间，公民以服从于一个更强大的国民政府为代价而赢得了纳税的平等。一位研究税收制度的学者写道：“旧制度下财政管理的突出特点是甚至不惜损害国王高高在上的利益而大力关心私人的利益。”^[10]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在税收方面的私人利益尽管受到保护，但对之作出了规定和限制，国家则宣称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

征收所需要的任何税收的最高权力。因为，当国民议会确定了公民应将其收入的1/5贡献给国家的原则时，不仅意味着国家不会再多要，同时还意味着它千方百计地多要。

表面看来，税制改革的特点是从“间接”税转变为“直接”税。在18世纪很快流行起来的这两个词是由重农主义者采用的，^[11]旨在区别从他们认为是财富唯一来源的土地或土地的收入中直接征收的各种税赋与仅仅是间接地从土地征收的各种税赋，例如对商品的制造、运输或销售所课的税。重农主义者根据他们的学说，赞成“直接”税而谴责“间接”税。这一理论上的特征同时表现在征税方法上的实际差别。而由于征收“间接”税引起了公众的十分强烈的愤怒，以致制宪议会于1790—1791年废除了大部分间接税，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适当的。其中主要的几项是盐税、烟草税、关税、销售葡萄酒及其他含酒精饮料的间接税、在不同时期对皮革、铁、纸张和布匹等产品征收的检验合格费、中央政府征收的某些进入城市的商品的入市税以及领地税（domaine）。领地税一方面包括王室领地的封建税，另一方面包括印花税以及财产转让登记应缴纳的税。这些税的税率按照国王与地方当局订立的古老契约全国各地各不相同。为了防止酒类、食盐、烟草等商品从低征税省或免税省走私到毗邻的高税省，警卫队不停地巡逻。国内的这种税区边境十分漫长而难以防卫，因此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认为走私有利可图，不惜冒罚款、坐牢或黥面以及苦役的风险，而且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于是与税务官们进行了如同打内战般的斗争。几乎所有的间接税都是由总包税人来征收，正如内克尔所说，国王应当感谢这些总包税人，因为是他们把群众愤怒的火焰引到自己身上。然而，真正反对税制改革的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省份，如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因为，要是总包税人、内克尔、卡洛纳和其他主张改革的行政官员能够克服地方特权的抗拒的话，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税可能早已在整个王国统一起来，也就无须设立国内的关卡和采取控制措施了。然而，这一制度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之处，虽为特权阶层所维护，但使之更加严重的是总包税制在税收方面有效地进行的盘剥。群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以致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各种税收和所有的税站均被一扫而光。只有关税、印花税和注册税继续存在。但人们对这种牺牲国家收入的做法颇为怀疑。例如，制宪议会只是以372票对360票通过废除烟草税的。在督政府和此后的政权统治下，“间

接”税大部分被恢复，但以统一的形式并在国民政府直接监督下征收。

主要的“直接”税是人头税（*taille*）、人口税（*capitation*）和廿一税（*vingtième*）。人头税是向非贵族和非特权的地主征收的税种，在三级会议不复存在而由财政区负责管理财政的地区，人头税由国王征收，在仍有三级会议的地区则由三级会议征收。三级会议因享有此特权而向国王定期缴纳补偿（*don gratuit*）。人口税原本也是一种人头税，但1763年后被视为人头税的附加税。廿一税则是对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得，以及公职和工业的收入所征收的5%的税。虽然这些税和“间接”税一样不正规，但人们对之并非十分痛恨。这部分是由于这些税多少还有章可循，部分是由于在征收时较少使用暴力，部分则是由于重农主义者认为这种5%的土地廿一税乃是他们所鼓吹的单一税的样板，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人头税也同样根据土地的价值按比例征收的话，也一定会令人满意的。而要对人头税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就必须编制土地登记册，但这受到特权阶层的阻挠。因此，人头税的不平等及其收入之低是与中央政府的软弱分不开的。其他国家的政府此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卡洛斯三世曾试图实行按比例征收土地税，但未获成功。约瑟夫二世虽然确实在其奥地利帝国完成了土地登记，但据此而进行的革命性税制改革于1789年11月实行后三个月便与约瑟夫二世一起寿终正寝了。只有在法国，中央政府作为一场社会革命的受益者有足够的权力实现这项改革。例如，18世纪70年代，地方的土地登记办法曾由杜尔哥在利穆赞拟定，中央政府也曾考虑，甚至曾计划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因此，对被制宪议会任命来完成土地登记工作的桥梁和道路工程局工程师德·普罗尼所领导的一组官员来说，这项工作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在动乱的年代里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以致在第一帝国时期以前一直没有取得土地登记的满意结果。新规定的四种直接税中最重要的财产税，最初不得不以旧制度下不精确的评估为基础来征收。尽管如此，税收的趋势显然是朝着按照对个人财产的精确评估征税而发展的。因此，对个人来说，除非是经过调查，否则平等是谈不到的。

税收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征税机构的效率，在旧制度下总包税局（*General Farm*）是最有效率的机构。作为半私人性质的追求利润的收税人企业，它几乎受到整个国家的谴责。但把它单纯视为一种行政

管理制度而论，到1763年它已经变得十分有效。弗里德里希二世很称赞这种制度。他邀请了许多包税官员协助他进行自己的财政制度的改革，并聘用了曾任包税局长的德拉·埃耶·德·洛内担任他的首席财政顾问。总包税局由40名（1756—1780年增至60名）总包税人领导，其中几位最富有和最有经验者作为资金管理会议（Assemblée des Caisses）的成员，为公司作出一切带根本性的决定。资金管理会议也是与政府的唯一合法联系。其他总包税人则在公司的董事会或负责监督各省局局长工作的相应的局工作。每个省局的局长（在1763年总共有123名）负责某一地理区域的下列五种主要税收的一种：财产税、间接税、盐税、烟草税和关税。每个局下设许多业务单位，如烟草仓库、盐仓、警卫队队部等，每个单位由人数不多的收税员、主计员、办事员和警卫官进行管理。常驻的或流动的检查官经常对管理情况以及档案和账目进行检查。自局长以下，所有人员都是挣工资的雇员，像近代企业或政府部门一样，都按照严格的从属等级制度组成。经常不断有通知和命令下达，档案由各级保管，局长和总包税人都可从定期报告中了解到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为了使所有这些书面报告更加方便，还印制了各式各样的表格。人事档案表明，就总体来讲，要求雇员具有高标准的行为和效率，尽管在档案中经常也注意到雇员的后台和保护人。为了防止雇员们与走私者勾结一起，人员经常从一个处和局调到另一个处和局。调动有时是提升，因为达到一定级别后，总包税局的工作便成为终身职业。待遇条件是很吸引人的，因此一般都愿长期从事此项工作。早在1739年，警卫官每年均可有两周的带薪假期。根据1768年2月21日的一项决议，在总包税局的某些分支机构由雇员和公司双方出资建立了养老基金。在每个地区根据对生活费用的估计，按级别规定了薪金。1781年巴黎总局的雇员们要求增加薪金，他们写信给雇主说：“房租、食品以及所有主要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早已打破了20年前所规定的关于[我们的]劳动工资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之间的比例。”^[12]作为对这些要求的回应，薪金常常增加，特别是在18世纪80年代。但跟大多数王室官员不同，他们的薪金依然很低，因此，当1790—1791年制宪议会各委员会建立文官制度时，他们的薪金几乎一点也没有减少。总包税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一直保持着这一组织的效率。他们投入大量资金，也由之获取大量收入。根据每六年签订一次的协议，他们上缴给国王的钱从1763年的每年1.24亿里弗尔增加到1788年的每年1.5亿里弗尔，尽管到1788年他们负责征收的税仅

仅剩下了盐税和烟草税；然而，总包税人及其他投资该公司的人所得的利润仍高达数百万之多。要是总包税人也像他们的局长们那样成为为王室服务的挣薪金的官员的话，王室收入的增加一定会是可观的。在大革命期间，总包税局保存下来的各部分被收归国有，并并入了文官队伍。

三级会议不复存在的各省征收直接税的王国财政官员是靠用钱买来的官职，因而不依附于什么人，与国王的关系是一种大致类似总包税人的契约的关系。但他们既没有以任何实际可行的方式联合在一起，也没有一个行政机构为其服务。48名或更多的总收税官（Receivers General），每人都签订一份契约，规定他需向国王上缴一部分人头税。他们则按照类似的契约，可从众多的收税员处收取由他们负责的那部分税款。收税员在通常情况下有408人。最后，每一个收税员又必须按照同各教区的税务官签订的契约行事。廿一税由类似的机构负责征收，人口税则是作为人头税的附加税来征收。以上人员均不拿薪水，而是从他们经手的税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并提取他们为买他们的官职所花钱数的5%作为利息。他们与上级的唯一联系就是上缴固定数额的钱这一法定义务。对不诚实或无效率的收税员采取法律行动十分缓慢，完全代替不了经常不断的行政监督措施。他们只向审计法庭提交唯一的一份账目，而且交得太晚，对行政管理毫无用处。由于对收税员和总收税官的要求并不单纯是向王国财政部（Royal Treasury）上缴他们的收入，而且往往还要求他们替王室付款，因此实际上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检查。1792年最后对总收税官进行清查时，总共56人中有36人拖欠的款额竟达约2000万里弗尔之多。如果说许多收入是在收税过程中流失了的话，有许多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被这个花钱无度的机构浪费掉了。拨给民政和军事部门的经费，也是由一批独立的、用钱买得官职的财务人员和主计人员负责管理。1787年审计法庭曾报告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员中有50人宣告破产，致使国王损失了4000万里弗尔。造币厂的官员、年金发放人（payeurs des rentes）以及其他许多人员也都同样地掌管着经费，其结果也如出一辙。

国家除了要为这些人的不诚实和无效率付出代价外，在支付经费时还需为所有这些官员以及总包税局支付公务费用。像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政府需要全国各地经常不断提供钱款以偿付它所耗费的物品

和公务的费用。部分是由于硬币运输起来费时耗资，且担风险，部分是由于完整的国家财政制度的建立需要经过持久的计划和改革，而这种努力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因此国家用钱不得不尽量用手头可以取得的任何款项来支付。这样，政府的雇员或供应商便从就近的收税员或其他财政官员处领取薪金或结算账目。如就近的官员没有足够的现金满足需要——而且政府又越来越多地透支——他们就会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并要政府为使用这笔钱而付利息。政府总是需款孔急，即便是付6%—10%的利息也接受这样的借贷。财务官员、总收税官和总包税人成了国家的财东，他们经常从私人手中以5%的利息借来钱，而以6%或更高的利息贷给王室，把差额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当各部门的财务官员开始把拨到他手上的供部门一年开支用的专款又返回来借给王室时，这一制度就为害无穷了。据估计，通过这种手段，仅一个财务官一年就可使国家损失达115万里弗尔，他本人从中获取40万里弗尔。

[\[13\]](#) 这些官员由于他们的贷款而取得各种期票——付款通知、指券等——大部分先扣取了将来的利息。当王室越来越穷，无法承兑这些期票时，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其手下官员的破产。在大革命前夕，王室欠总包税局的钱已几乎达到7000万里弗尔，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欠下的。

使用这种高息短期贷款，可以看出政府已穷困到何种程度。由于难以得到足够的税收来弥补4/5以上的经常开支，财政总监不得不借钱来弥补年度赤字。到1788年赤字已高达1.25亿里弗尔。借钱已很困难，因为政府在过去已背上了不守信用的坏名声。路易十五本人也和公众一样不信任政府，宁愿把自己的钱财投资给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14\]](#)和总包税局。政府的信誉如此之差，以致各省的三级会议、教士和声誉良好的金融家能够以4%的利率借到钱，英国政府借钱的利率可能更低，而法国政府却不但被迫为短期贷款，而且为它的永久公债（rentes perpétuelles）、终身年金（rentes viagères）、养老基金以及其他贷款付出高达10%的利息。只要有可能，王室就通过省的三级会议举债，以便利用它们较好的信誉。但是到了1763年，债务已积累到政府无力偿还的地步。历届财政总监通过将本利合计，并尽可能拖欠、赖债等办法，才使国家这条船得以稳住，并促使其他投资者把钱投给国家。到1788年为止，国王的信誉尚未完全丧失，这年国家总支出的半数，即近3.2亿里弗尔需用于为估计约达50亿里弗尔的债务支

付利息。^[15]该年8月，王国财政及商务委员会（Conseil royal des Finances et de Commerce）主席洛梅尼·德·布里安宣布暂停支付一切债务的利息。很快就接替他任财政大臣的内克尔则主要用从尚未形成国家银行的贴现银行（Caisse d'escompte）借来的纸币来支付这些利息。内克尔原打算在1789年6月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之前用这个办法作为渡过困难的权宜之计，但这却成为给国家提供资金的一种新途径。

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609年）、瑞典（1656年）、英国（1694年）、丹麦（1736年）、普鲁士（1765年）、俄国（1770年）以及其他国家早已将中央银行作为财政部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它可以起两种主要作用：一是处理国家债务，从而节省利息和手续费，否则的话这些利息和手续费将会流失给官员们和金融家们。二是可以用银行的纸币以低利率为政府的证券贴现，纸币可作为一种打折扣的信贷方式为政府服务。中央银行似乎是以商业手段处理政府财政的最佳机构。在法国，一直到1800年2月13日才成立了中央银行。这也许是由于约翰·劳的银行惨遭失败（1720年）^[16]引起人们对这种机构严重的不信任，也许是由于反高利贷的法律（直到1789年10月12日才废除），获得既得利益的金融家的影响以及王国政府的惰性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妨碍了中央银行的成立。但是在此以前很久，劳、佩蒂、柴尔德、科尔佩珀，特别是理查德·坎特龙等人的著作，^[17]加之英国在银行业方面的实践，已使许多人相信成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最初，这些人的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一种能够通过提供低息信贷以降低一般利率并刺激经济发展的机构。^[18]经过几次开始又受挫之后，以庞肖为首的一批金融家于1776年说服了杜尔哥为实现他的目的而开办了贴现银行。但该银行从一开始就与政府的财政纠缠在一起，因为杜尔哥为其所颁发的特许证规定，在注册的1500万里弗尔资本中，2/3必须存入国库。在1783年、1787年和1789—1790年，政府促使其董事们通过发行证券来贷款。这些证券作为法定货币从1788年8月18日起在巴黎，从1790年4月17日起在全国强制流通。1789年该行发行的这种证券价值达1亿里弗尔，1790年达2亿里弗尔。仅仅由于制宪议会开始用另一个来源，即特别金库（Caisse de l'Extraordinaire）发行的纸币来偿还该行的债务，才使它免于破产。

新证券，即注定要失败的指券（assignats）是作为两项重要决定的结果而发行的。这两项重要决定是：对旧制度下的所有债务，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欠的债均承担责任。以出售教会财产所得的收入偿还上述债务。没收教会土地——这是中央政府行使其权力的典型应急手段——后，随之又以革命的方式对这笔潜在的财富加以利用。政府将不委托任何私人的金融企业清算这笔财产，而是由它自己来进行处理。土地不能一下子都予以出售，否则价格会下降。而对现金的需要总是比谈判出售土地要急得多，为此建立了特别金库发行以没收的土地的价值为转让基金的债券即指券。指券由清算管理局（Administration de la Liquidation）兑付，在土地所有权得到解决，以及教会土地售出后，便将等值的指券停止流通并予以销毁。这种将政府的债务转变成不动产的做法，这种将历史埋葬到教会土地中的做法，唯一蒙受损失的是教会，因为教士将被列入国家的工资名单。正如结果所显示的，指券作为现金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以致政府终于把它作为法定货币强制流通，而且大大地超额发行。它十分有效地弥补了每年的赤字，甚至比在旧制度下起的作用还大；在1790—1791年两年间，政府的正常收入仅能勉强支付其2/5的开支。在1790年发行了将近1.25亿里弗尔的指券纸币，1791年的发行额超过了6亿里弗尔。然而在1791年，出售教会财产仅仅回收了3750万里弗尔。到该年年底，指券贬值几近1/4。这样，不管新政权的意图如何，国债也像用以计算其价值的通货价值一样，贬值了近25%。显然，税收的收入也丧失了近1/4的购买力，因此必须发行更多的指券以弥补赤字。但更糟糕的局面接踵而来。1792年法国开始进行战争，要求特别金库提供资金支持战争。通货膨胀以空前速度继续增加，尽管救国委员会在1793—1794年通过冻结物价来控制通货膨胀取得某些成效，但在1796年以前一直未认真设法建立一种稳定或正常的货币制度。

与18世纪在法国普遍流行的特别（l'extraordinaire）财政概念相对立的正常（l'ordinaire）财政概念，意味着收支经常保持平衡，而这是旧制度和革命政府从未能做到的。它们经常处于紧急状态，使用任何可以到手的资金来应付任何最紧迫的需要。尽管如此，在18世纪最后25年，近代国家预算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控制，已经按照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预算方针开始在法国形成。预算乃是一个完整的财政计划，于年初制订，目的在于掌握该年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当然，任何突然出现的紧急状况要求采取非常的措施。为使预

算有效，政府必须能够预见并控制国家的开支，并找出适当的途径和方法应付这些开支。大多数财政总监都做不到这两点，似乎仅仅对财政制度做一些探索，草拟出他们在任期间每年的粗略收支平衡表而已。内克尔在他的《财政报告书》中发表了他对1781年正常收支进行探讨而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包括用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特别开支。由此而引起的对内克尔的数字的争论，证明了他的论点，即仅仅为了了解国家财政的准确情况，也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旧制度在最后的年代中越来越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卡洛纳认真仔细地给显贵会议准备了一些改革计划，1788年洛梅尼·德·布里安得以公布了革命前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认真编制的预算。他没有机会把预算付诸实施，在以后年代中的事态发展使一切实现有预算控制的正常财政的尝试均化为泡影。尽管如此，在种种政治事件的外表下面，通过王国财政部加强中央对财政的控制，编制国家预算已迅速地成为可能。到1791年年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除非得到立法机构法令的批准，几乎支付不了任何款项。财政部编制的用来控制其几个月的工作的各种简要报表，越来越像是国家的预算。

在旧制度下，王国财政部只是许多金库（收取并分配金钱的独立的财务或基金管理单位）中的一个，负责王室收支的管理。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财务官（trésoriers）、总收税官、总包税人、年金发放员以及其他许多官员或官员群体。他们在行使财政职权时完全不受王国财政部的控制而处理自己所掌管的资金。收税的部门常常拨款给支出的部门，并支付政府债券和年金的利息。这些钱根本不经过财政部之手。在所有这些支出完成后，剩余的钱理应解交财政部，但政府往往透支，没有余款可以上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量款项冻结在各式各样的金库中，财政部甚至毫不知情。1788年财政部收支的款项几乎不超过国家总预算的一半。^[19]但在此以前很久，为了加强控制和节约开支，已开始压缩财政方面的职位来进行整顿。1772年，泰雷裁减了大部分高等法院的年金发放员和财务监督员的职位，这些法院的薪金以后由总收税官来发给。为推行这一政策，杜尔哥计划裁减并合并机构，直到组成单一的金库，即王国财政部。虽然杜尔哥称这个计划为“我的计划”，^[20]但实际上这是几位财政总监的共同计划。他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的继任者内克尔把这项计划推行得比他本人更加深远得多。

在大革命前，有两位财政大臣，即雅克·内克尔（1777—1781年在职）和洛梅尼·德·布里安（1787—1788年在职）对加强财政部的控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内克尔于1778年10月18日作出决定，宣告所有的金库都是王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因此不仅应对审计法庭负责，而且应对王国财政部负责。然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撤销了政府各部门的一大批财务官的职位，每一个有国务大臣的部只设一名财务官，一些独立的机构，如桥梁和公路工程局也各设一名，其余各机构则共设一名负责各项开支的出纳员（Trésorier payeur des dépenses diverses）。最后，他命令以一个12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48个总收税官。这些改革也需花费很多钱，因为每撤销一个职位，必须退还在职者买官时所出的钱，并在付清这笔钱之前承担5%的利息。此外，留任的财务官还要求配备下属雇员。因此，尽管这样做最终会节约一些钱，但正如内克尔所阐明的，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组织起能够加强财政大臣和王国财政部的控制权的财政制度。他还运用其他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颁布一项法律，命令凡实际上不在可以支付款项的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养老金和奖金，均应由王国财政部发放。内克尔下台后，他的大部分工作陷于停顿；但洛梅尼·德·布里安于1787年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后又恢复进行。1787年11月和1788年1月颁布的法令撤销了将近300个财政方面的职位。最具重要意义的是1788年3月的一项法令，由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财政部全部收支的管理，取代了各部的财务官和两个王国财务保管（Gardes du Trésor royal）的职位。1788年3月15日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改组财政部，以便更严格地控制各部的支出。这样，各部的经费就不再由各部的大臣或财务官来掌握了。但仍有许多金库独立存在。

大革命时期，在统一的国库的管理下，国家的财政得以巩固。这主要应归功于以下几个人的工作：制宪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孟德斯鸠侯爵、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泰奥多尔·韦尼埃、1792—1793年任税务部长（Minister of Public Contributions）的艾蒂安·克拉维埃、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成员皮埃尔·康邦。1790年12月保留三级会议的各地区的财务官和总收税官以及1781年内克尔下台后恢复职务的总收税官均被裁减，令其将账目及已收款项移交给王国财政部长（Director of the Royal Treasury）。从此，财政部便直接与新任的地方收税员（District Receivers）打交道。这些地方收税员是在前一个月替代了旧的收税员的。1790年12月下令总包税局的收税员将

款项直接上交国库，从此总包税局在财政上的独立地位也宣告结束。分散的金库也逐一被撤销，它们所掌握的资金上交财政部。最后连特别金库也被撤销，因为1793年1月4日指券的发行被取消了。1793年8月15日建立公债持有人总名册（Grand Livre de la Dette publique），凡50里弗尔以上的政府债务均登记入册，由此开始通过一系列法令将分散全国的国债加以统一，从而完成了上述巩固财政的工作。与此同时，制宪议会的各委员会感到在财政改革问题上直接与财政部长贝特朗·迪弗雷纳打交道更加方便。财政部在运营过程中日益强有力，在1791年各部的改组中它成为以往的财政总监署的主要继承者。1791年3月10日和18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将财政部改组成一个由6名委员管理的独立机构。这两项法令潜藏着议会中的中左派斗争的胜利，他们争取由立法机构控制财政部而反对中右派的支持者们由行政部门控制财政部的主张。当财政部在大革命后终于被移交给行政部门时，它已经从先前的委员们的工作中取得某些效益。委员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对庞大的财政部组织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在他们提出的对洛梅尼·德·布里安遗留下来的这个机构进行改革的几项措施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普遍采用了复式簿记，以便利为立法机构准备账目。立法机构很可能要检查财政部的账目，因为这些账目开始很完整地反映出政府收支情况的全貌。

人们往往认为18世纪之所以出现独立存在的银行，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使清理账目变得容易。主管每一个银行的财政官员负责该行的账目，对13个审计法庭中的一个负责。他每年提交的账目报告，是他如何处理个人所负责经手的王国资金的记录。在审计法庭审查完他的账目，改正了错误并最后表示他已履行了自己的任务后，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他买官所付的钱被视为一笔存款或保证金，如果他未能履行职责，这笔钱就充公了。审计法庭虽然检查他的账目是否准确，但并不过问他花了多少钱。简而言之，它像是一种进行司法性审计的财政法庭，只要账目是属于这种个人的、司法性质的，那么，由于允许每个官员和机构独立管理资金，清理账目的工作肯定就会很容易的。

但在1763—1793年期间，官方的会计工作的效用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源于财政总监及其他人员要求了解全国财政的全貌。他们需要确定每一个银行的财务状况，倒不是为了检查官员们

是否诚实，而是为了汇集收入、支出和现存金额的统计资料。他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账目报告总是拖延很久才上报，对当前实际工作毫无用处；而且官员们总是对这种干预他们个人事务的做法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他们只对审计法庭负责。账目清算的拖延并不妨碍司法审计。总包税局及其他效率较高的部门拖延达2—4年，只有拖延达10年或15年时才会成为严重关注的问题。这种拖延部分是因为总是规定在某一年度内应收应支的经费是多少，而在该年的钱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全部收取、开支或报销以前是无法结账的。资金的流动异常缓慢，以致官员们不得不同时记好几年的账目。好几位财政总监曾试图要求尽快提交账目报告，以便他们能通过审计法庭了解到王国的财政状况。但第一位认真设法了解真实财政状况，而不仅仅是王国财政部状况的是内克尔。内克尔认识到控制财政像控制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重要，下令所有的财政官员每月向财政部提交他们的会计账目简报。洛梅尼·德·布里安则更进一步消除了某些最严重的拖延和混乱情况。最重要的是在布里安任内开始改变造成拖延的主要原因的簿记方法。法国政府与当时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英国的财政部和税收部门除外）采用的是一套烦琐的簿记制度，除非等到财政年度终了，否则平衡收支账目极端困难。平衡和结算一年的账目十分费时费力，这正是高级财政职位需由两名官员隔年轮流担任的原因之一。每一位官员负责清结他不在职的那一年的账目。复式簿记方法使人们可以随时平衡账目，并能经常对手头实际掌握的钱数。因此，这种方法既可在事后，也可在当时检查收支情况。这种方法从16世纪以来即已在许多私营商号采用，18世纪初也曾试图在总包税局和总收税官的金库中加以采用。在革命前夕王国财政部的海军会计部门亦已加以采用，因为当时花在海军上的钱越来越多。1791年制宪议会的财政委员会坚持在整个改组后的国家财政部全部采用这种簿记方法，但很难找到受过训练的能够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员。尽管如此，它仍然逐步替代了其他方法，因为在此以后为了行政管理和统计上的目的，需要经常性的会计账目。

王国财政部的账目只限于国家税收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的收入则由于账目的拖延再加上财政官员的抵制而无法得到精确的情况。对自己的财政状况一无所知是王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内克尔曾宣布1781年的财政剩余有1000万里弗尔，而卡洛纳却辩称赤字达4600余万里弗尔。尽管这不同的说法部分是由于误解，但也说明向财政总监

递交的账目是多么不清。国民议会以及以后的历届政权都决心要了解真实财政状况，并发现和清理所有未清的账款。1790年12月6日撤销审计法庭后，它们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所有会计账目须依次送交以下部门：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送交财政部；为了最后的审计送交审计署（Bureau of Accounting）；为了批准审计结果送交立法机构；最后送交地区法庭（District Tribunals），以便就账目而引起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诉讼。财政部的工作尚差强人意，而审计署则多年来人员不足，积压了数以千计的全国性账册，一直可追溯到1759年，还有2000多份城市的账册，可追溯到1781年。到1795年，该署的15名委员只完成了其中400份的审计工作，因为他们唯恐出错，被立法机构发现。然而国民公会却连其中的一份都没有时间批准。1795年2月16日和12月9日颁布的法令纠正了这种局面，主要是恢复了会计部门以前享有的在司法上的独立性质。重新建立了一个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到1800年该法院清理了旧政权积压下来的账目的将近一半，而它在1810年的报告仍然声称正在审查七年战争时的账目。[\[21\]](#)使会计制度适应行政管理的目的固然十分重要，但人们发现把最终的审计权交给以前的审计法庭之类的机构手中同样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改革是以一个全国性的审计法院替代13个独立的审计法庭。

王国政府对它有多少钱或多少雇员从来就心中无数。实际上，王国的钱和个人的钱很难分清，以致官员们和金融家们能够以半私有财产作为掩护。用半公有的财产进行投机。但到了1793年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开始迫害金融家、供应商和战时的奸商。[\[22\]](#)这项维护秩序和加强控制的措施比较明确地界定了什么是公共资金。虽然由改革家和革命家构成的这伟大的一代所追求的有效组织国家的目标直到王政复辟之后才真正实现，但到了1793年人们已有可能谈论国家财政了。此外，到了这时公务员也有了新的凝聚力和地位。其人数的增加反映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官僚机构”（bureaucratie）这个词。政府总是对自己的行政管理进展情况缺乏了解。例如内克尔对政府各部门究竟有多少雇员仅仅能大致猜测出一个数目来。不过他这种要求了解情况的愿望是符合他那个时代行政改革的潮流的。1790年7月5日制宪议会颁布法令，要求财政委员会详细编印各部和其他机构当时的、1788年的以及至少前10年中两个时期的人员组成情况。尽管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它象征着一种了解和控制政府职务的强

烈要求。这时，官僚已可以称之为公务员了，因为他们已不是王室的而是国家的官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已不同于私人的生命和财产了。于是，法国人称之为“政府”（la chose publique）的东西便诞生了。

（沈胜白 陈简青 译）

[1] 参阅本书第7卷，第5章“启蒙运动”（A. B. C. 科班著）。

[2] 转引自《开明专制主义史》，载《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学报》第9卷（1937年），第193页。

[3] J. E. D. 宾尼：《英国的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1774—1792年》（牛津，1958年），第282页。

[4] 此处原文“housekeeping”和德文Wirtschaft原意为“家庭管理”。——译者注

[5] 米歇尔·安托万：《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财政委员会》，载《近代和现代史杂志》第5卷（1958年），第183页。

[6] 让·佩托：《桥梁公路工程局史，1599—1815年》（巴黎，1958年），第138、157页。

[7] C. E. 拉布罗斯：《旧制度末期和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第7页。

[8] 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洛林公爵领地上的梅斯、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译者注

[9] 拉瓦锡曾于1768—1775年任征税官。——译者注

[10] 让·维兰：《旧制度下直接税的恢复》（巴黎，1952年），第8页。

[11] 费迪南·布鲁诺：《法国语言史》（巴黎，1930年）第6卷，第484页。

[12] 国家档案馆，巴黎，卷号：G' 63，手稿。

[13] 《当前国库组织的说明》（1790年），藏大英博物馆，法国小册子档，F. R. 502。

[14] 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直到大革命前一直享有征税权，因而处于优势地位。——译者注

[15] 弗雷德里克·布莱施：《财政与货币革命》第2卷，第3部分（1934年）。

[16] 约翰·劳（1671—1729年），苏格兰货币改革家。1716年获准在法国建立一家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试行其改革计划。初期颇见成效，后因与投机倒把和政治阴谋纠缠一起而失败。1720年他被迫逃离法国。——译者注

[17] 佩蒂（1623—1687年），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论赋税》；柴尔德（1630—1699年），英国经济学家，曾任东印度公司总督，著有《关于贸易和货币利息的简要考察》等；坎特龙（1734年卒），英国经济学家、金融家、货币理论家，著有《一般商业之性质》等。——译者注

[18] 罗贝尔·比戈：《贴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起源》（巴黎，1927年），第25页。

[19] 弗雷德里克·布莱施：《财政与货币革命》，第2卷，第3部分，第205页。

[20] 杜尔哥：《文集》（舍勒编），第5卷，第573、593、312页。

[21] 维克托·马塞：《大革命期间的国家审计制度》（巴黎，1893年），第48页。

[22] 让·布夏里：《18世纪末叶的巴黎金融家》（3卷本，巴黎，1939—1940年），第1卷，序言。

第二十一章 法国旧制度的崩溃

法国的旧制度——一种在中世纪社会残余中运行的君主官僚制度和—一个享有传统权利的庞然大物——往往显露出虚弱和不稳定的迹象。但是对于同时代人来说，这些缺点并不意味着这种旧制度已经濒于瓦解。保守的和革命的思想家们都把君主制度视为理所当然，都以不同的方式称赞它有着田园诗般的历史。保守派反对改革日益发展的官僚制度，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证据，证明在旧体制下君主政体与王国中的其他势力和谐共事。而革命的思想家，即那些希望对行政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人们，则是从绝对君主制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他们主张由一种开明的官僚制度为王权服务，这样就会为共同的利益进行统治，而不受中世纪的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妨碍。专制的国家机构只管征收适当的赋税，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管理警察和司法。它在有限的职能范围内是真正专制的，但它将保持一种局面，即普遍实行自然法而不受中世纪的偏见和不必要的清规戒律的干扰。要有一个其管理任务减少并简化的强有力的政府，这种主张贯穿在18世纪所有法国自由派思想中；正是在这一点上，甚至卢梭也同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找到了某些共同之处。

在路易十五统治期间，为法国君主制度效劳的开明官吏们曾进行过多次尝试以改善国家的财政和清除妨碍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性做法。官僚机器在整个这一时期大大得到改进。它不仅录用了一些开明而有才能的人士为其效劳，并使辛勤工作的官员（区别于大量无能的官员）大大增加，而且没有使政府机器到了耗费巨大和不堪重负的程度。在财政总监和省督中出现了一批能干的部门负责人和称职的下属。^[1]正如阿尔达谢夫^[2]在他的综合研究和其他人对个别省督的研究中所表明的，在各省，财政区（Généralités）的督察官们都是开明而能干的行政人才，并得到副手们的协助。的确，路易十五遗留给他的继位人一个远比他从太阳王^[3]手里继承的要有效得多的官僚机构。

然而，这个官僚机构的成就是非常有限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多又困难，就像被周围的社会包围着的囚徒一样的国王很少给予他的大臣们所需要的不断支持。一切改革的尝试——哪怕是那些温和的以及为增进效率和普遍认为需要的改革——也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固然，有时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政府，也曾给它以活力并产生了效果；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绝大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是站在王国官僚机构行政管理工作的对立面。这些集团以宫廷中的重要人物为代表，并得到道德上和哲学上各种观念的支持，常常凌驾于国王的意志之上。一次又一次试图进行的改革都被迫放弃；大臣们频频被革职，谁也不敢肯定第二天还会留在官位上。

在法国，改革的尝试从柯尔培尔当政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在进行，而18世纪许多拟议中的改革（例如试图废除国内的关税壁垒^[4]），大都是重复或继续柯尔培尔的努力。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利益的增加和维持法国在欧洲的影响的需要，实行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变得越来越大，预计进行的改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直到七年战争结束或甚至以后，改革才变得十分紧迫；但即使在此时，改革对旧制度来说也还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旧法国的社会满足于它的传统秩序；即使那些鼓吹改革的人，尽管具有革命思想，也只是要求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温和改革。王国官僚机构中的开明分子则更加温和而近乎缩手缩脚，他们仅仅试图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少数节约措施，对工业和农业给予某些鼓励，也许还设法清除财政体系中少数突出的弊端。这样的改革热情也并非国王的大臣们普遍都具有。大多数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效劳的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积极性的话，也只不过是设法通过权宜的财政措施来筹措足够的经费以改善陆军和海军而已。许多法国人都痛苦地认识到有必要使军队保持良好的状态。虽然他们像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六）本人一样，意识到法国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威胁，并在亚洲和美洲不断被英国所挫败。他们也认识到必须有严格训练的军队来对付国内的骚乱；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意识到他们正处在革命剧变的危险之中——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旧政权的大臣中的典型人物是舒瓦瑟尔公爵（尽管在许多方面他是杰出的），他在1758年12月继贝尔尼枢机主教之后担任外交大臣。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与金融家克罗扎的女儿结婚，在军队

服役之后，先在罗马后在维也纳出任大使。他进入外交部应当归功于蓬巴杜夫人和他与宫廷的某种关系。当时，法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很混乱。战争进行得很糟，财政状况岌岌可危，君主政体受到高等法院的指责。^[5]舒瓦瑟尔坚定不移，在1763年2月签订了巴黎和约，这个条约使法国几乎丧失了它的整个殖民帝国。但是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一个丧失了殖民帝国的政府并不比一个试图要特权阶级多缴一点税的政府更危险。舒瓦瑟尔仍旧留在职位上，和他的同僚一道面临着支付战争赔偿和重建消耗殆尽的军队的任务。^[6]他善于权变又有胆略，实行了一个驱逐与高等法院法官们为敌的耶稣会士的计划，以安抚这些法官；并成功地说服路易十五改变他早期的宗教政策。1764年11月，路易十五解散了耶稣会组织。随后几年里，舒瓦瑟尔又说服了波旁王室其他统治者效法路易十五的榜样。迫使教廷接受波旁家族盟约于1773年7月解散耶稣会也主要是他所为。他还利用这一家族盟约，通过至少6桩波旁—哈布斯堡联姻而与奥地利结合在一起，然后计划向英国进行报复。

舒瓦瑟尔在很多方面都为王朝服务得很好，路易十五也很赏识他的效劳——实际上，舒瓦瑟尔是国王臣仆中能够以辞职相威胁来粉碎罢黜他的阴谋活动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但总的看来，舒瓦瑟尔给王朝造成了许多损失。他的外交政策尽管有魄力但缺乏远见。他忽视了俄国在欧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及其同普鲁士的结盟，这一联合对法国的保护国波兰造成了危险。在这一点上，路易十五或许比他的这位大臣更聪明一些；他独立地执行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即所谓的“国王的秘密”（le secret du roi），^[7]即保持与波兰、土耳其、瑞典和普鲁士的联盟。然而这项政策始终不过是一系列纸上交易。国王缺乏足够的经费去影响波兰本身的事态发展，而且执行他的政策的代理人都是些庸才。波兰最终被三个北方的宫廷所瓜分；奥地利抛弃了法国而与普鲁士拼凑成一个协约。到这时，舒瓦瑟尔已下了台。要是他继续掌权的话，即使他不重视波兰，也能够阻止对波兰的瓜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一定会发现外交形势对法国不利。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和它在19世纪的地位相似，它的地理位置鼓励它在新大陆、远东和地中海东部从事海上事业，但这也使它卷入了大陆的斗争，因而甚至它的防卫性措施也往往看起来具有侵略的意图。它的这种双重地位不仅对它的财政构成很大的负担，而且使它得到了欧洲公

敌的名声，甚至在追求合理的民族利益或欧洲势力平衡时，法国也备受怀疑和由于不利的联合而不断遭受挫折。固然也有过外交局势使被紧紧束缚的欧洲出现缓和松弛的时刻，但舒瓦瑟尔的时代不在此列。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评论舒瓦瑟尔：作为一个外交家，他精明强干而且不屈不挠；如果处在有利的时机，无疑他会有更多的成就。

比他在外交方面的失败更重要的是他忽视了在法国维护王室的权威。尽管他改善了陆军和海军，但他的耗费却损害了国家的财政。他安抚高等法院的政策并没有为他自己和为国王获得他们绝对的支持。实际上，它们的要求这时更大了，而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与高等法院法官们结盟的舒瓦瑟尔，又无法筹措经费支持他所坚持的大胆的外交政策。1770年12月，他失去了权力，他报复英国的梦想也化为泡影。就在他被罢黜前，他安排了国王的孙子（后来的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姻。他曾天真地希望这样一来不仅会加强与奥地利的联盟，而且一旦路易十五死去，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地位。

舒瓦瑟尔的下台——如法国18世纪许多大臣们下台一样——是国王与高等法院之间冲突的结果。这一特殊的斗争起源于雷恩高等法院检察长拉夏洛泰鼓动他的同僚法官们抨击布列塔尼军事指挥官艾吉永公爵的有作为的行政管理工作。舒瓦瑟尔本人并未与法官们公开冲突。当时他仍然设法安抚各高等法院并且正在鼓励它们把他的同僚大法官莫普和财政总监泰雷神父赶下台。1770年4月，莫普建议路易十五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对艾吉永的起诉。舒瓦瑟尔反对这一行动。但引起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在福克兰群岛的争端中采取鼓励西班牙对抗英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可能导致一场战争。在这件事上，路易十五站在了泰雷一边。泰雷使国王和其他大臣们相信国库无力为这场战争提供经费。舒瓦瑟尔被流放到他在安布瓦兹附近尚特卢的庄园。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他的下台，而是他任职时间之久。

在一连串的宫廷阴谋之后，艾吉永终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从而开始了“三人集团”的执政，他们一直执政到路易十五长期统治的结束为止。在18世纪，法国君主政体从来还没有像这时那样在表面上如此强大而又那样不得人心。在进一步冲突中，法官们蔑视一次由国王主持的高等法院会议而举行罢审。1771年1月19日夜，火枪手们向每位法官送去一封密札，[\[8\]](#)命令他们表明是否准备恢复其司法责任。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拒绝作出保证。第二天夜里，他们中的130人就被流放到

边远的地方，并且没有任何补偿地被剥夺了他们用钱买来的职位。次日，莫普根据一项其序言指责司法制度弊端的法令，建立了六个最高审判法院（superior councils）分别在各区行使以前由巴黎高等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但高等法院的一部分，即大法庭（Grand Conseil）被保留下来作为审理王室案件的特别法庭和贵族法庭（这个法庭后来被人们称为“莫普最高法庭”）。它也起着国家法令登记机构的作用，并被赋予对法令的合法性提出抗辩的权力，即可以对王国立法的方式而不是其实质提出抗辩。不久以后，莫普撤销了审理财政案件的间接税法庭和中央刑事法庭（Châtelet）。他还希望取缔各省的高等法院而在全法国建立最高审判区法院，但此项计划未能赢得国王的同意。然而他已经打破了高等法院法官们的权力；而且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及时行动挫败了共和派的一次阴谋。这些人打算废除君主制度而把统治权交给一批贵族——一批新兴的贵族，他们拥有财富和官职（官职本身就是一种财产）并在不同程度上吸纳、取代或废弃了旧的佩剑贵族。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体制的平衡已经被严重地打破而有利于专制统治，他们害怕过分专制的君主政体会招致反对。的确，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对高等法院法官们势力的衰落表示惋惜。詹森派和高卢派都看出耶稣会士插手了莫普的政变；各省的贵族害怕失去特权和地方的自治权；就连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伏尔泰除外）也对莫普持高度怀疑态度，尽管他们同样不喜欢高等法院。在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看来，莫普的专制主义不是开明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害怕群众将被政府抛弃而落入被流放的司法官员们的领导之下。因为，尽管群众表现出某种热情来接受莫普新任命的司法官员，但莫普本人，尤其是他的同僚泰雷却非常不得人心。然而莫普并不像他的坏名声和对他的许多诽谤（the Maupeouana）所说的那样恶劣；他随时准备起用答应改过自新的那些被流放的司法官员；毫无疑问，他新建立的、很快就开始顺利进行工作的司法机构比起旧机构来要受欢迎。此外，除推广最高审判法院制度外，莫普的意图在于彻底改革整个司法程序并使之富于人性。许多准备工作已开始进行。但是，在莫普尚未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他就下台了。不过他的秘书勒布朗在波拿巴执政时期编纂法典和改革司法程序时，广泛地吸取了莫普的工作成就。

即使仅仅就避免破产而言，财政改革要比司法改革紧迫得多。整个路易十五在位期间，先后担任过财政总监的奥里、马肖·德·阿诺维尔、贝尔坦和德·安沃都曾试图改进财政制度和向特权阶级征收少

量赋税，但只落得不是被司法官员们就是被在宫廷中有影响的人士所挫败。^[9]而泰雷神父尽管比他的前任们的地位更巩固一些，也没有对特权发起正面进攻。但他作了艰苦努力来使入能敷出。他实施了马肖的改进了的评估廿一税的方法；他在巴黎改革了人头税，使其收入几乎增加了1倍；他额外增加了各种通行税和其他税种的数额；并在同总包税人^[10]订立的新包税契约中获得2000万里弗尔的额外收入。不仅如此，他还暂停兑付国库债券；把养老储金会的养老金连同利息转为单个人的养老金；减少了应付给各种公债持有者的欠款；推迟偿还到期贷款的本金并暂停偿还债务。他还为创立更多的终身和永久性养老金而随意举债。但是他却没有实行他在就职时向路易十五所作的承诺，即许诺节省王室、陆军和海军的开支。相反，他在巴里夫人的朋友们中间任意挥霍钱财以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干，是因为他善于并敢于巧取豪夺，既避免了财政崩溃，又能敛取到足够的现金。他是一个阴险的人，高个子、驼背，且冷漠无情，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行政官员。而实际上泰雷对财政一窍不通；他为国王起草的各项声明都没有说出真实情况。泰雷采用一系列应急办法来克服眼前的困难，而它们大部分是以重金作抵押，最终将毁坏政府的信誉。当杜尔哥在1774年出任财政总监时，他估计年赤字是3700万里弗尔，而总债务达2.35亿里弗尔之巨。

如果说这些数字多少接近真实的话（由于会计制度十分混乱，使得财政总监根本无法说出准确数字^[11]），那么政府还不至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令人担心的倒不是债务和年度赤字的数额，而是在问题还没有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前，处理起来却有明显的困难。路易十六在位期间，债务总额和年度赤字均在剧增。法国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耗费了大约20亿里弗尔，这个数目相当于法国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总花费（而且还不是实际价值，因为物价已普遍上涨）。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年度赤字为8000万里弗尔，而在1787年已增加到1.12亿里弗尔。公债的准确数额不得而知，但每年花费在应付债务上的钱远远超过3亿里弗尔，即大约占国家年支出的一半。在这6亿多里弗尔的国家年支出中，就有1/4多用于陆军、海军和外交方面的开支。用于民政开支的仅仅不到1/4。宫廷的开支（即若干王室机构的开支和发给朝臣们的年金和馈赠品的耗费）完全没有减少，最高时达到约3500万里弗尔。

法国旧制度历史上一个简单而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王朝无法提供足够的战争费用。它固然在一百年期间设法避免了财政崩溃，但在此期间（大约从柯尔培尔下台到大革命前夕）国债增加，国家的开支导致年度赤字的加大。不管是经济上的临时措施，还是消费增加和价格上涨带来的间接税收入的增加，都不足以应付公债的支出和行政开支的增加。王朝越来越多地依靠各种形式的贷款。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金融家和食利者的强大阶级，它与其他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战争和军队的花费虽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没有超过国家的承受力。法国毕竟拥有肥沃的土地，大约2600万人口和颇为发达的工商业。国家的税收，不论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平均到每个家庭只有50里弗尔或者60里弗尔。如果间接税仅仅是对奢侈品征收，而且如果直接税完全按收入的比例核定，那么税收的负担就会落在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实际上还能够承担更重的负担的阶级的肩上。而事实却是直接税主要落在了农民和城镇中贫苦阶级身上。贵族、教士、众多有官位的人和许多城镇都免缴人头税（产品的一定份额）。人口税（它不是严格地按人头，而是按收入征收；收入的计算不是按纯收益而是按产量）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廿一税也是如此，这种税是以极低的税率向贵族征收的。

间接税由于是根据消费纳税，因而稍微平均一些；尽管如此，它对贫穷阶级构成的负担也比对富有阶级更沉重，因为这种税多数是向普遍需要的消费品征收的。对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商品食盐所课的盐税，在某些县份特别重，其总额在旧制度结束时大约为5000万里弗尔。另外一项沉重的负担是对制鞋皮革征收的皮革税（*marque de cuir*）。它是一种间接税，即消费税。这类税是对酒、烟、铁、贵金属和其他许多商品征收的。对商品征收的还有关税（*traites*）。这类税是在边界、港口和国内的许多海关税卡（这是某些省份还处在法兰西王国境外的时代的遗物）征收的。在国内对法国工业和商业征收关税有非常大的副作用。比如来自英国的货物可以比法国同类商品卖得更便宜，因为法国商品可能必须通过若干个海关税卡从而要缴纳各种通行税（*péages*）。从柯尔培尔时代起就曾制订过许多计划取消国内海关税卡，但尽管这些计划留有余地而且作了仔细的准备工作的，政府

却始终不愿冒暂时失去收入或者由于执行这样的改革而可能耽误实现收入计划的危险。[\[12\]](#)

虽然国家的收入在整个18世纪都有所增加（部分是由于消费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对间接税和直接税厘定的税额较重），但现行的财政制度难以使国家收入的增加适应国家日益增加的需要。贫穷阶级纳税的数额毕竟有限度；而向纳税人敛取钱财的又绝不仅仅只有国家。法国农民承受着三重负担，除向政府纳税外，他们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并向他们的地主尽多如牛毛的封建义务。什一税（尽管很少按1/10征税，通常是按1/12或1/15征税）像人头税一样是一种最严酷的负担，因为它是按产品而不是按纯收益来课税的。封建义务虽已不像早年那样繁重，因为它们通常已被货币地租所替代，但由于价格的上涨，货币的实际价值下降了。但是，在大革命前的30余年时间里，地主们往往缺钱花或需要投资用的资本，于是雇用一些研究封建法律的专家（feudistes）查索土地契证（terriers）以便恢复已经废除的权利要求。由此而增加的农民金钱负担也许比实际的贫困更为农民带来痛苦。到处发生农民骚动，这已是无人不知的事。虽然在正常时期它们会很快遭到失败，但在1789年革命形势发展起来的时候，农民们便聚众而起反对地主们，焚烧封建契证并且开始屠杀一直受到狩猎法保护的猎物。

关于农民承受的三重负担——王国税收、什一税和封建义务——人们不可能作出一般性的估计。像法国所有的阶级一样，农民也并非完全一样：从雇用劳力的富裕农民到有时但不总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分成制佃农（métayers）和短工，不一而足。农民越贫穷，纳税的负担也相对地越重，这是一般的规律。在土地收益分成制和很小的农庄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产品缴纳的第一次税，即什一税，往往要占去40%或更多的收益。封建义务和地租往往又可能拿走剩余部分的1/12。剩余部分的一半又可能要缴国家的税。根据杜尔哥在1766年所作的计算，[\[13\]](#)像利穆赞这样的贫困地区（杜尔哥一度曾任该地区的省督），一个家庭所剩余的常常只有125—150里弗尔（约合6英镑）。而这还不是灾祸的全部。农民都得服劳役（corvées），其中最繁重的是强迫修路。尽管大部分农民都未能充分就业，通常有的是时间，但他们对必须无偿地劳动极为愤慨。

在一个国家中，450万贫苦家庭缴纳税收的大部分，而大约50万个家庭却在不同程度上免交国税，这个国家是注定无法平衡发展的。这种税收制度固然在特权阶级中造成了财富的积累，王朝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到钱；然而与此同时，它又限制了资金流入生产企业，导致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大大低于它们可能达到的程度。如果农民少受一些蹂躏，他们当中会有许多人成为富裕农民。固然这样的农民在一些由城镇提供的市场足以抵消苛捐重税所起的妨碍作用的地方是可以找到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光是沉重的税收就足以使农业停留在小耕作的规模上，即一种小农庄的土地制度，一些人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另一些人则是分成的佃农。在保存这种某种程度的原始土地制度方面，贵族的习俗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贵族们享受免税待遇和来自封建地租的收入，很少为耕种自己的土地操心；他们谈论起土地来，通常也只是意味着雇一个管家，由他把土地租出去，有时租给自耕农，更经常的是租给分成制佃农。

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又制约着法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农民为工业产品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市场。另一方面，农民就业不足有可能为正在城镇以外发展的乡村工业提供劳动力。而在这些地方，行会的限制性体制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确实，资金在不断地流向比较新兴的和自由的工业以及商业企业中。这些资本大部分是由那些逃避了重税的人提供的。在旧制度临近结束时，甚至一些贵族的成员也向工业和商业企业投资。然而，尽管资本的增长足以为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带来发展，但资本增长的总的环境却阻碍着充分开发法国的人力、技术和天然产品的丰富资源。在法国虽然也可以看到大致像英国的某些发展状况，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仍然主要是经济停滞地区。

同样，18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大大改变了旧制度下的阶级结构。这一阶级结构既可以从法律角度，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看。从后一个角度可以观察到这些变化。尽管像旧时一样法国从法律上划分成三个阶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但三个阶级的组成人员都经历了变化。几乎全部由宫廷贵族充当的高级教士，由于拥有土地（占王国土地的1/6）、收取什一税并免于纳税，已相对地富裕起来。下级教士（教区神父和没有教区的神父）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变得相对地贫穷。在贵族的等级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财富情况的变化（他们在有些地区占有50%的土地，在另一些地区则仅占10%）。由于增加了新受封为贵

族的财界人士，以及常常与商人和金融家联姻，高级贵族财富情况的变化比以往要大；有些贵族非常富有。而在这个等级的另一端，许多乡绅（hobereaux）在外表上与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傲慢和他们生锈的佩剑。他们往往很贫穷，却自认为高人一等。贵族的这种孤傲在旧制度接近告终的几十年间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新贵族，即那些担任司法或市政职务，或者通过花钱买官而成为多如牛毛的国王秘书的那些贵族当中尤为如此。

第三等级，即所有那些在教士和贵族等级之外的人，则从富商和工业家，到工业和农业无产者两个极端的人不一而足。杜尔哥对它的构成进行了恰当的分析。^[14]他清楚地看到资本的发展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产生的影响。他特别注意到工业中没有资本的临时工和无地少地的挣工资农业短工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也看到分成佃农与农业短工有某些相似之处，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转移，大多数分成佃农（除少数可能成为自耕农外）将加入到挣日工资的短工的行列，实际上小的土地所有者最终也会是这样。因为，由于资本的增长，大耕作将逐渐地在各地取代小耕作，迫使那些非常小的农民出售他们的土地，而由富裕农民或那些从工业和贸易中获得资本的人购买。在旧制度结束时，农民还拥有法国近一半的耕地。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所有者（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出售或耕种他们的土地），然而他们的土地仍需承受各种封建负担。只有极少数农民的土地享有自主所有权。甚至连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从农民或贫穷贵族手中买来的土地，情况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拥有的土地很可能要占法国已耕土地的大约1/6。虽然耕作这些土地的通常是自耕农，但资产阶级所有者耕种自己土地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或雇用管理人和短工，或者把土地出租给分成佃农。

正如杜尔哥所了解到的那样，无地人的数目正在增加。这部分是由于人口从1726年的1800万增加到1780年的2600万。在这期间法国的已耕地面积虽也增加了，但是从荒原、沼泽地和林地上开垦的土地无法满足所有的需要。而且无论如何这些新开垦的土地通常是被那些拥有资本开垦它的人所获得。再者，尽管在法国没有发生过可与英国相比拟的圈地运动，但各处的公地的减少已使得靠自己的份地难以维生的农民人数增加了。但更重要的是在继承法方面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土地将由越来越多的继承人分割，因此，除

无土地的人数增加之外，拥有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农民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当中一些人虽然在乡村工业中找到了工作或者当日工；但农业和乡村工业的整个发展始终不足以实现充分的就业。结果在旧制度临近结束的几十年期间，流浪汉和乞丐（有些人做季节性或临时工作）的数目大大增加。由于庄稼经常歉收，导致面包价格的上涨，和由于消费品价格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普遍上涨使物价上涨远远快于工资的增加，[\[15\]](#)因此使这些不幸的人以及实际上各种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处境更加恶劣。据一项对物价的详细调查表明，消费劣质谷物的穷苦阶级受害最严重，日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大约1/4。但是，尽管消费品价格上涨了，而农场主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指望的那样从涨价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实际上，农产品的价格（至少从1776年以来）在不断下降。不用说，大多数贵族也感到生活拮据，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还可以利用他们的封建权力而把他们的某些损失转嫁给不幸的农民。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旧制度即将告终的数十年间，财富虽正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但却处在无法应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状况下。难怪贵族比以往更牢牢地抱住他们的特权不放。难怪在乡村和城镇中不时出现骚乱。同样，难怪穿袍贵族在他们公然反抗国王时总会在群众中找到相当大的支持。在大革命的过程中，群众虽然将会另外找到领导人；但是在旧制度下面已经存在各种心怀不满的人，统治权威一旦崩溃，就可能导致一场社会起义。正如在出现革命党人以前就存在着革命思想一样，也存在着不满分子和潜在颠覆分子，一旦有领导人出现，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人的领导。所有这些在当时还不明显。例如，在表面上农民是温驯的；直到1789年起草了教区陈情书之前，我们还看不出任何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的不满情绪有多么强烈，直到这年8月，当农民起来破坏封建制度时，我们才看到了他们激烈对待他们的地主的证明。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1789年的行为是他们的思想突然转变的结果。新的情况只不过是政治形势加剧了他们的感情并使把思想转化为行动而已。他们的领导人是他们当中比较有胆识的人。国民议会里的人往往倾向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此他们的革命是自发的，起义的蔓延是由于互相仿效而不是通过组织。

在巴黎，政治革命的领导人并非出自旧制度下遭受蹂躏的群众，而是出自第三等级的上层——那些未能进入贵族行列的人。他们在低

级教士中找到了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十分痛恨高级教士的无所事事、虚饰浮华和唯我独尊。甚至某些贵族（当然只是极少数）也和他们联合在一起，这些人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和平等主义理想。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富裕的人，拥有财产并认为每一个人都享有保持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他们并不很关心贫穷阶级，他们关于平等的概念局限于他们要求废除等级。首先，他们憎恨贵族的特权和盛气凌人，因为这些人的目空一切不仅限于凡尔赛，也表现在巴黎的和各省城市的沙龙中。他们阅读过并赞赏卢梭对贵族的攻击、老米拉波的著作和邦塞尔夫对封建制度的谴责。杜尔哥虽身为贵族，但敌视特权，曾促成了邦塞尔夫的著作的出版。

在这些和其他许多著作中，旧制度的整个基础受到质疑；而它们所运用的则是与旧制度本身一样古老的思想体系，因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先河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更早的文艺复兴时代。[\[16\]](#) 思想方面的这种新时尚甚至在高级教士当中和宫廷本身也可以找到。在18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怀疑、批判和褻渎之风日益蔓延，当局强加检查制度的一切努力收效甚微，因为旧制度下的警察制度已不足以镇压各种地下著作和集会，或防止从国外进口颠覆性出版物。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重要的学校开始教授牛顿的物理学，几乎完全背离了旧的教育制度；随着耶稣会的被取缔，旧秩序最强大的堡垒之一已不复存在。同样，正统思想也有着坚定的捍卫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竭力阻止改宗新思想的浪潮。因此，理性时代仍是对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旧理论强有力的和雄辩的加以重新肯定的时代。它也是宗教在虽日益衰落但数量众多的信仰团体中（有时是采取少见的富有感情的崇拜方式）复活的时代，以及作为19世纪天主教伟大复兴运动先河的对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在思想上进行反抗的时代。在宫廷中，尽管某些派别思想多变而自由，但也存在着强大的宗教派别（虔信者），他们得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最大的同情。但是那些捍卫宗教生活方式的人是四分五裂的。詹森派行政官员（已不再是17世纪教义上的詹森主义者）和国王争夺对教会的控制，要求拥有对异端分子进行迫害的权力，并要求国家具有比国王本人能够接受的更加极端的高卢派教会的权威。不用说，这些争端只会使旧式组织的宗教更加信誉扫地，而捍卫正统信仰的企图只能是导致宣扬反教权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声势更加高涨。

人们曾试图对在旧制度下新思想的流行情况（从量的方面）作过估价。这些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学家们对大革命究竟是反抗经济压迫的起义还是新思想传播的结果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而促成的。泰纳^[17]争辩说，旧制度下的法国是一个服用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毒药的完全健康的政治机体；鲁斯唐^[18]也把革命的起源说成是由于受少数哲学著作的影响；为他的巨著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莫尔内^[19]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们的著作是否曾被广泛阅读；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阅读它们。他还致力于研究新思想究竟在哪个层次的人们中更加普遍流行。为此，他研究了一些不大为人们熟悉的文献、地方上的报刊、较小的沙龙和文艺集会的记录、图书馆的书目和私人的信件。他得出结论认为：新思想受到广泛的支持，而且伟大的作家们（甚至早期的伏尔泰）在他们发表著作以前就已拥有大批追随者；但是他也发现那些受到广泛支持的新思想并非充满革命狂热。他断定，如果说旧法国仅仅是害怕什么思想的话，那么它是没有理由害怕的。他唯恐被人认为是他因此主张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旧制度的崩溃，于是他表白说他没有能力讨论这个问题，以此来消除一切对他的怀疑。

莫尔内发现在法国各地、在知识界——在巴黎、在各省的大小城镇，甚至在乡村——大多数人都非常注意实际问题——税收、工业限制、耕种、封建义务、谷物贸易，等等。至于农民群众，除1789年一些教区的陈情书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陈情书也不像是根据百姓普遍的意见共同写成的，而有迹象表明是出自教区会议之手。它们（像陈情书普遍表达的那样）表现出非常克制和仅仅限于实际的目的。的确，18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功利主义；尽管它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秩序概念，就大部分而言，它所表达的内容是朴素、直接而实际的。但是说法国自由主义思想是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并不是否认它是革命的。说它是革命的是因为它的基本态度，因为它确立了新的准则，而且因为它在要求变革和改进时谴责了旧制度的大部分秩序。这种思想所赖以存在的实用形式本身就意味着它在大部分居民的不同层次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它是实用的（尽管是革命的）它就不是存在于那些狂热的和有政治意识的人们的心中，甚至连新宗教的高级神父们也并没有任何真正的颠覆性阴谋——进行任何政治起义和有组织的反叛的思想。卢梭曾说过，导致暴

力行动的革命必须避免；他十分害怕顷刻之间推翻法国君主制度的庞大结构的想法。封建特权最尖锐的抨击者之一的马布利以及其他一些更加极端的思想家，如梅利叶神父、兰盖和布里索、莫雷利神父和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都完全没有任何推翻特权阶级享有的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权的政治计划。最极端的革命思想家们仅仅满足于谴责现存的机构和确定目标，并没有提出任何称得上是革命的方法。他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希望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一个相信理性必然胜利和群众对加速开明统治无能为力的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信念是人们唯一能够期望的。许多大臣和官员已经表现出开明的态度，因此设想君主政体能够迅速地开明起来并着手追求开明的目标就不会被认为是荒谬绝伦的想法。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人民想通过一条快速和容易的道路达到完善，他们却没有紧迫感——至少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年代是如此。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临近结束的年代，就像在路易十四统治结束时那样，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年老的国王驾崩并从旧制度下的政治的角度出发迎接前途未卜的未来。宫廷各派别已经准备好重启党争，而启蒙哲学家们却天真地希望新王登基能给国王的周围带来开明思想。终于，以前深受人们爱戴的路易十五于1774年5月10日比预料的要早地离开人间，他的子民们并不感到惋惜。他的孙子贝里公爵路易继承他的王位。然而新的国王似乎未能给人以什么指望。尽管他的宗教信仰倾向于使他为人们谋福利，但他缺乏智慧和意志力；他更喜欢一时兴起干些体力劳动和打猎，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行政工作。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同样不称职。她没有统治的理想，确实也没有权力欲望，因而没有责任感；她感情易于冲动，往往显示慷慨大方，从而容易上阴谋者的圈套。她总是为她的朋友博取恩宠而使路易十六遭受人们对宫廷的非议。同样，（正如奥地利人所了解的那样）她不可能对法国的政策施加任何可以预见到的影响。就连舒瓦瑟尔（他的心腹韦尔蒙神父与这位皇后关系密切）也很快就认识到他不可能把莫普、艾吉永和泰雷神父赶下台。理由很简单，他的政敌虔信派受到国王的宠信。就是这派人说服了路易召回老资格的政治家莫尔帕，希望他能帮助这位新王应付复杂的宫廷阴谋。然而国王的这位导师并未得到首席大臣的头衔，而且他懒于政事，未能成为弗勒里那样的角色；但他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从一开始就认真设法鼓励国王自己作决定。没有多久，政府就实行了改组。群众非常高兴的是“三人集团”被罢

黜。韦尔热讷出任外交大臣，米罗梅斯尼尔任掌玺大臣；杜尔哥在海军部短时任职后成为财政总监。说来也奇怪，他被提拔到这个高位上主要得归功于韦尔蒙神父的影响，而虔信派对此十分不满，因为他们知道杜尔哥从不作弥撒。

杜尔哥曾任里摩日省督13年，在那里他进行了一些改革。因此他进入政府受到启蒙哲学家们（包括伏尔泰）的欢呼，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而重农学派则希望他能够把他们的经济理论付诸实施。杜尔哥本人不是重农学派（他不接受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的理论），但是他的确接受了他们关于税收的许多观点。像重农学派那样，他认为一切税收最终都落在了土地上，对工业和商业征税是无视一项自然法则。他还认为赋税只能对纯利润并且以适度的税率来征收，从而能为农业积累资金，而没有资金农业就不能发展。最后，他主张完全的贸易自由并认为必须取消对工业的一切限制。简而言之，这些就是杜尔哥的理论。但是作为一个国务大臣，他采取了相当低的姿态，只进行了小规模，如果得到国王的支持肯定能行得通的改革。他显然希望不要因为马上进行广泛的变革而引起政治风暴，而只是应付国家眼前的财政困难和零零星星地清除一些压迫贫穷阶级的弊端，但从一开始，反动舆论就害怕他将正面打击特权；而且使他陷入十分为难境地的是许多他的支持者过早地宣称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杜尔哥虽然称不上是舒瓦瑟尔和莫尔帕那样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们对人民和政治派别有深入的了解），但也并不缺乏政治智慧。他认识到他必须与莫尔帕保持友好关系，因为莫尔帕和韦尔蒙神父会在国王和王后那里为他说好话。他也认识到改革必须是逐步的。他深知温和的改革能够经受住个别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而任何真正激进的纲领将会引起共同一致的反对。他还进一步认识到，每一项财政改革都必须安排得不致引起收入的任何损失，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决定反对试图立即取消国内税卡的任何做法——这项改革虽然已经由财政总监署计划实行，但很可能会导致暂时的财政损失。

杜尔哥绝不是一个坚定的理论家。尽管根据传统和信念他是反对高等法院的，然而他认为恢复高等法院法官的职务是适当的，不过应削弱它的权力。他或许希望如果让旧法官恢复职务，政府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他知道无论如何莫尔帕和米罗梅斯尼尔最终将会恢复旧法院，或许还是无条件地恢复。一个四人委员会——杜尔哥、莫尔帕、

米罗梅斯尼尔和萨蒂纳——与国王一起秘密开会彻底讨论了整个这一问题。由于莫尔帕拒绝带头，只好由杜尔哥提出一项折中方案。他主张保留一个主要由莫普派法官组成的大法院（Grand Conseil）。如果法官们被停职或拒绝工作的话，就由它来接管政府工作。杜尔哥的决定可能是明智的，而且他本人也无法对它的后果——重申法官们的权力——承担责任，因为不管是国王、米罗梅斯尼尔，还是莫普都没有给他以必要的支持。其结果是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损害。尤为甚者，杜尔哥还招致了虔信派的怨恨，他们本已害怕他的哲学，现在更谴责他恢复了高卢教会派的高等法院。

杜尔哥已经承担了进行某些改革措施的任务，如果他不设法对财政进行某些整顿，他实际上就没有理由留在职位上。在接受财政总监的任命时，杜尔哥曾上书（1774年8月24日）国王提出了他的计划的纲要，并将理性的语言化为富有感情的语言，以便更加能打动路易十六。^[20]简言之，他的计划是：“不破产；不增税；不借款；……把支出减少到低于收入……以便偿还长期未清偿的贷款。”据此，他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推行了一些小的节约措施和对间接税的小改革，包括对盐税的微小改革。他还废除了连带义务（*contrainte solidaire*）这一蛮横的做法。根据这一做法，人头税的收税人可以强迫教区内缴税多的人偿付拖欠税款的人应缴纳的税款。随后又采取了另外一些小的改革和节约措施。到1775年年底，杜尔哥把支出减少了6620万里弗尔。他也把贷款利息从870万里弗尔减少到300万里弗尔出头（正是这给了财政恢复以最大希望）。他在国外的信誉也良好，现在有可能以低息向荷兰借款从而把贷款利息从7%改为4%。新贷款600万不能在巴黎借到，因为据闻对杜尔哥的意图抱彻底怀疑态度的金融家们准备制造一次银根的紧张。然而，杜尔哥希望通过建立贴现银行直接向投资者举债1000万里弗尔，但此项计划引起教士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谴责这是高利贷，在杜尔哥执政期间阻止它的实施。^[21]

由于杜尔哥在1774年9月颁布法令重申贝尔坦1763年5月关于谷物自由贸易的措施继续有效，已经树立了另外的敌人。这一措施使巴黎以外的国内谷物贸易得以自由进行。为首都提供粮食始终是一个特殊问题，而杜尔哥认为在大规模和自由的商业在各省繁荣以前，在巴黎实行谷物自由贸易是不明智的。而且，他还知道，尽管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主张在各省实行谷物自由贸易（这些法官在被流放时得知各省有

很大一部分人支持谷物自由贸易），但他们不大会同意废除巴黎的谷物法。因此，杜尔哥满足于实行不大会引起严重困难的有节制的改革措施，但不久在重商学派和自由贸易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宣传小册子战。支持杜尔哥的重农学派新闻工作者加剧了这场论战，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杜尔哥将根据他的学术理论很快实行一整套的改革。比小册子大战更重要的是1775年3月开始的谷物骚乱到5月初已蔓延到巴黎近郊和巴黎本身。在巴黎，大约有500人的一群暴徒抢劫了一些粮库，包围了财政总监署。警察局长勒努瓦缺乏经验，杜尔哥只好亲自采取军事措施以保护巴黎和周围农村的财产，很快就控制住了局势。但这次事件已引起了与高等法院的又一次冲突。然而，杜尔哥度过了这次骚乱；国王仍然坚定不移；杜尔哥进一步发布了23条新规定，增加了谷物贸易的自由。但是他的胜利再次引起破坏他的地位的企图。已经有人在谈论瑞士财政家内克尔将取代他。内克尔在他的能干的妻子帮助下得到宫廷中许多人的宠信，他并且已经享有能够整顿财政而又不用掏特权阶级的钱包的名声；内克尔本人也收买了蹩脚诗人佩泽侯爵。此人与国王保持秘密通信，批评杜尔哥而为给钱的主子说好话。在整个这一时期，在皇后经常光临的盖梅内沙龙活动的舒瓦瑟尔分子，重新作出努力让他们的领袖东山再起，以替代莫尔帕；而且另一次攻击又来自高级教士和虔信派，他们知道杜尔哥曾企图改变加冕誓言并希望解除对新教徒的种种歧视和限制。

杜尔哥的政策招来的所有这些对政府的攻击使莫尔帕既气愤又担心；而在杜尔哥这方面则对莫尔帕造成的延误，对他玩弄的小阴谋，对他在他的地位并未受到严重威胁时就急于保护自己越来越不耐烦。杜尔哥希望路易十六相信他的价值，因此决定推行他的改革，于1776年1月开始向路易十六亲自主持讨论的国务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常被称为六项法令。这些改革相对说来还是温和的，因为杜尔哥仍然相信他必须推迟主要的改革，直到国王年龄更大一些之后再实行。六项法令之一是取消对巴黎谷物贸易的大部分赋税；第二项是撤销巴黎的一些毫不起作用的码头、菜市场 and 市场的办公机构；第三项是撤销不起作用而铺张浪费的征收巴黎肉类交易税的机构普瓦西税务所（Caisse de Poissy）；第四项是改组征收牛羊等板油税的行政管理。其余两项法令要重要得多。其中之一是取缔巴黎的大部分行会（这条是由前商业督察官阿尔贝仔细拟定的）。另一项是废止王室劳役——这一措施是与各省省督磋商后仔细准备的。设立一种向所有地

主征收的税——税率非常轻——来替代农民在道路上所服的劳役。用这项税收来支付在道路上劳动的人的工钱。法令的序言，像杜尔哥提出的其他法令一样，在各教堂加以宣读，其中有对特权的一般性谴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得到教士保证给予支持的高等法院法官们把他们的攻击集中在这项措施上而不是攻击取缔行会的措施。取缔行会的改革措施在教士中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拥护，因为它把行会的慈善事业转而由他们来控制。甚至在法令提交登记备案之前，法官们就对之加以谴责。米罗梅斯尼尔已经告诉法官们，这一措施和另外的措施正在拟订中，而在国务委员会中对这些措施有不同意见。为了挽救他的法令，杜尔哥不得已作出让步，允许教士们免缴替代劳役的税。

这些法令最后于2月7日提交给高等法院。法官们提出抗议并同时谴责邦塞尔夫的《封建权利的弊端》，那时尚不为人们所知的这部著作企图说明封建义务应当废除，而且是符合贵族们的利益的。在谴责邦塞尔夫和抗议六条法令时，法官们都把它描绘成是一种正在被一步一步地揭穿的新的理论体系。然而，尽管莫尔帕反对，但路易十六在1776年3月12日举行了一次亲自主持的高等法院会议。那天晚上，巴黎灯火通明，劳动人民兴高采烈。当消息传到各省时，农民庆贺废除劳役。然而这一情景只不过加强了要把杜尔哥赶下台的决心。在这种压力下，莫尔帕这时转而坚决反对他的这位同事。一封伪造的杜尔哥与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这封信意在加罪于杜尔哥——递交给了路易十六；这件事加上其他阴谋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现在敌视这位大臣）的影响，导致了杜尔哥的被罢黜。就在几天前，杜尔哥曾警告国王，正是由于英格兰查理一世的软弱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就这样一个大臣下了台——后来卡洛纳也这样下了台——如果给他以适当的支持，他或许能够克服王朝的财政困难，而假如给他以时间，他本来会建立起一种有利于王国经济更迅速发展的体制。但是，正如杜尔哥自己也认识到的，任何广泛的改革计划得到持续的政治支持的机会确是微乎其微的。他有一次曾这样告诉国王：“陛下，弊病的根源在于您的国家没有宪法。”他继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但他设想的宪法仅仅包括一套分级的行政会议制度。他几乎没有想到特权阶级将拒绝在一个消除社会差别的计划中进行合作。他号召群众力量起来战胜贵族统治的一切观念，像卢梭的一样，都是模糊不清和不切实际的——一切生活在大革命以前的人实际上都难免会是这

样的。他天真地希望改革的深入人心将会阻止特权阶级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并将导致一切阶级都会在执行由上面决定的行政政策中进行合作。

杜尔哥的政绩在1776年夏天迅速地遭到破坏。他的继任者克吕尼恢复了劳役；谷物的自由贸易停止实行；行会再次得到合法的存在。1778年年初，国王决定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北美人——对这一行动杜尔哥早先曾加以反对，因为它花费太大并存在英国牺牲法国以补偿它在美洲的损失的危险。为这场战争筹措经费的任务落在了内克尔头上。1776年10月克吕尼逝世后，内克尔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财政总监塔布罗·德·雷奥的顾问。1777年6月他成为财政大臣。他认为信贷具有神奇的力量，于是依靠各种形式的借贷（贷款、彩票和终身年金），从而债台高筑，增加了年度赤字。但他的确也曾试图采取一些节约措施并加强了在财政上对王国财政部的控制。他继续推行杜尔哥的改组政策，从而节省了用于管理总包税人的某些税种的费用；他设法改进政府的会计制度；他裁撤了许多办事机构；他在王室事务方面实行了一些小的节约措施，但节省的钱被增加的年金所抵消。在商业政策上，他是温和的柯尔培尔派：尽量保持了大部分限制性体制，但有时也允许某些商品和某些贸易的自由，甚至准许谷物贸易的某些自由。1779年8月，他废除了王室领地的永久管业权，但不准备冒险对贵族的土地实行此项改革。此外，他还有意在战争之后在税收方面进行广泛的行政性改革。为实行这些计划，他在1778年2月提出杜尔哥关于建立地方行政会议的主张，不过作了重大的修改。作为试验，这年夏天他在贝里省的布尔日建立了省行政会议，这个机构包括12名教士、12名贵族和24名平民，他们按人头而不是按等级投票。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分配税收，管理劳役和安排雇用穷人做工。它的决定要提交给省督和省议会。从一开始，这个机构就遭到贵族和法官们，甚至经济学家们（他们更喜欢杜尔哥的计划）的谴责。而当这个省行政会议自己建议应当转变为一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并应受权改革人头税和劳役时，后一种人就立刻改变了腔调。然而，政府拒绝采纳这些建议。同样，它还决定在穆兰、格勒诺布尔和蒙托邦三个财政区再建立三个行政会议，不过由于当地的反对，头两个始终未能行使其职能。

尽管内克尔建立行政会议的计划遭到攻击，但他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除了因他能够为战争筹措费用而又不增税从而获得好名声

外，他还小心谨慎，避免攻击贵族或教士，也避免采取行动恢复他的新教徒伙伴们被剥夺的政治资格。^[22]然而，有不少人仇视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高级教士和高等法院法官开始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他像杜尔哥一样从来没有得到莫尔帕和其他大臣们的充分支持，尽管1780年10月他得以让他的亲密朋友卡斯特里替代了萨蒂纳，尽管亲内克尔的舒瓦瑟尔分子塞居尔在12月进入政府，但生病一段时间后重新掌权的莫尔帕比以往更急于赶走内克尔。为了保护自已，内克尔得到国王的允许在1781年2月发表了他著名的《财政报告书》。他宣称有1000万里弗尔盈余，而没有公开承认有4600万里弗尔赤字，希望以此来恢复他正在下降的声望。他的说法被广泛接受，他的著作也销量甚大，其结果是新的贷款轻而易举地就筹措到了。但与此同时，《财政报告书》中的错误信息和它含糊不清地宣布要进行的改革，却引起了对他的政府的许多攻击。他的敌人甚至非法翻印和出版了他就建立省议会问题提交国王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秘密的。高等法院很快就加入这场争论并提出了反对关于建立波旁内省议会的法令的抗议书；而批评内克尔最力的人们之一的卡洛纳写了一本小册子嘲笑内克尔和他的计划。这时，内克尔向路易提出要求给他国务大臣的头衔，掌管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财政，并在整个法国建立省议会。但是莫尔帕取得了胜利；内克尔知道一切都完了，于是在1781年5月19日提出辞职。六个月后，年迈的莫尔帕逝世。决心不再要导师的路易十六拒绝要他任命德·贝尔尼红衣主教，或舒瓦瑟尔，或布里安大主教接替莫尔帕的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任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这样，韦尔热讷就成为首席大臣那样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这个头衔，的确也没有胜任这样角色的才能。

新的财政总监是若利·德·弗勒里，他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关系密切。他出掌财政只是根据这一谅解，即他不久将接替米罗梅斯尼尔担任掌玺大臣。他征收第三种廿一税并增加间接税来代替完全依靠贷款的做法，但很快就引起普遍反对，于1783年3月被免职。他的继任者德奥梅松因试图从总包税人那里榨取财源而受到同样惩罚。里尔省督卡洛纳接替德奥梅松。卡洛纳同他在部里的同僚布勒特伊一样担任这个职务主要靠的是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和王后的影响。在宣誓就职时，这位新财政总监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将减少公债和重新分配税收负担。最初，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令人震惊的财政状况并在两年间随心所欲地酬谢那些为他任职出过力的人。为王后买下了圣克卢城堡；还清

了国王的兄弟们的债务；把巨额款项用来帮助破产的盖梅内（Guéménée）家族。但是卡洛纳也知道，由于他的前任们没有偿还贷款的利息，政府已信誉扫地。为了恢复信任，他大手大脚地在公共设施上花钱。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开始看到财政已从根基上腐朽。1786年在杜尔哥的旧同伙杜邦·德·内穆尔、特吕代纳、勒努瓦和富尔凯的帮助下，他开始制定了一个彻底的改革方案。他也认识到要使财政改革成功必须同时进行政治的和行政的改革。因此，当他计划以一种用实物缴纳的新土地税来取代廿一税时——此项税按统一税率征收并不得豁免——他计划通过各级地方议会来管理。各级地方议会的成员包括所有等级的人。同时，他计划实行劳役抵代税并废除盐税和国内海关税卡。他还希望扩大印花税，从而像新的土地税一样，将其主要落在特权阶级和富有阶级身上。最后，为了减轻底层阶级的负担，他建议把人头税限制在收入的1/20之内。

为了消除1.12亿里弗尔的年度赤字，他计划增加7000万里弗尔的收入和减少开支4500万里弗尔；为了减轻国债负担，他计划把短期贷款的偿还时间从仅仅10年延长到20年。为了应付还债的需要，他打算筹借新的贷款。一旦税收增加，他希望能减少国债。按照他的打算，这种税收的增加将来自于由于废除内地海关税卡、取消对谷物贸易的主要限制以及把王室产业按照租赁使用权的方式出租所带来的繁荣。

卡洛纳拟议中的改革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意味着除了取消特权外，还将摧毁大部分旧制度的结构。为了便于进行这些广泛的改革，他建议国王召开一次显贵会议，其成员由国王指定。他希望这样做将会使政府避免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发生冲突，并平息已经提出的召开旧的三级会议的要求。他设想显贵会议将会成为一种扩大的由国王主持的政务委员会，这些人将会对赋予他们此项殊荣感到满意，从而变得容易加以驾驭。最主要的是他必须使整个改革事业得以迅速实行，以便避免发生过多的争论。但路易十六照样是那样拖延不决；因为他很少关心对特权的攻击，而且不愿损害教士的合法存在。根据米罗梅斯尼尔和韦尔热讷的建议，他倾向于实行一种分阶段改革的政策。但是卡洛纳拒绝零敲碎打的改革和折中的办法；他希望调动舆论反对特权阶级；需要利用国王的权威来作出最大的努力挣脱国债和年度赤字的桎梏。国王终于作出了让步，于1786年11月底同意在来年1月29日召开显贵会议。但是，卡洛纳取得这次胜利，却使韦尔热讷和米罗梅斯

尼尔成了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知道卡洛纳似乎已发现显贵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从，于是开始策划推翻他的阴谋。卡洛纳并没有企图在这次会议中安插自己的人。会议成员共144人，其中高等法院法官37人，大贵族和血统王公43人，王室顾问和省督12人，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12人，市政官员26人，教士成员仅14人。

对吁请这样的会议（上一次是在1626年召开的）给予帮助，卡洛纳确实抱乐观态度。尽管会议成员是按人头而不是按等级投票，但他们都是拥有特权的人。而当时卡洛纳所处的地位还不能无视特权阶级，就他的政治见解而言也不会去那样做，即使做也不会超过杜尔哥和内克尔。像为开明专制主义服务的所有改革家那样，卡洛纳、杜尔哥和内克尔之所以是革命者，仅仅是就他们反对旧制度的许多观念而言，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的财政和经济问题只有通过废除特权和种种限制性做法才能得到解决。虽然一般说来他们看到必须引导广泛的群众舆论来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和由来已久的偏见；但他们总是从完善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问题，只会考虑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不会想到号召第三等级的上层行动起来。实际上，即便是他们的思想能够跳出他们传统的思想王国，他们能不能这样去做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上层资产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性的整体，更说不上是一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了，或许在那些建立了省三级会议的省份是例外；但即使在那里，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往往也不过是追随另外两个等级的领导。

卡洛纳召开显贵会议的权宜之计在我们看来也许是毫无用处的；但对于他，这也许是他可能采取的唯一政治手段，因为他已经排除了任何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想法（以前它最后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那些属于旧制度下传统官僚阶层的人把全国三级会议看成是使君主官僚制度感到难堪的中世纪的古老机构；他们容忍省的三级会议只是因为废除它们绝无好处。卡洛纳赞成召开显贵会议，至少是希望爱国情绪会超越阶级的和法国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但在这一点上他很快就失望了。14名教士，在纳博讷大主教德·狄龙和与卡洛纳争夺权利的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的巧妙领导下，控制了这次会议，而且在会上有许多敌视卡洛纳的人。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推迟到2月22日才召开。在推迟期间，卡洛纳的敌人们已经聚集在一起并准备好了他们的论证。当会议终于召开后，他们都无意接受卡洛纳的革命性计划。他在介绍他的计划时使用了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非常革命的语言。

他们向他提出挑战，要他提出详尽的财务报告，而这正是卡洛纳希望避免的。他们总的策略是不公开捍卫特权，而是对卡洛纳的计划逐点进行攻击并预计到种种困难。但是他们捍卫的正是特权，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会接受新的土地税。卡洛纳企图利用一份题为《告公众书》的备忘录而诉诸公众舆论以挫败对手，但未能奏效。这个备忘录由一个名叫热尔比耶的律师起草，主要通过低级教士的代理机构免费散发。但是这个小册子在第三等级中几乎得不到同情。至于说到公众舆论，卡洛纳的遭遇比在显贵会议上还糟，因为舆论已经对他无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卡洛纳犯了挪用公款罪。毫无疑问，他遭受这种指控是咎由自取。他终于在4月8日被罢黜，他失宠的方式和10年前杜尔哥下台的方式十分相似。如果卡洛纳劝说路易削弱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力而不是召开显贵会议的话，他的结局很可能会好一些。在他的继任者布里安任内，实际上尝试这样做了。因为在1788年5月8日国王召开了高等法院会议，实施由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制订的取消高等法院政治权力的法令。根据这批法令成立一个全权法院（大致与莫普提议建立的高等法院相似）负责登记王国的立法，由47位执行法官接管高等法院的大部分的司法工作。但是这次未遂政变发动得太晚了。王朝很快就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这一行动曾经由显贵会议提出过，现在则由高等法院法官们、教士会议和公众舆论提出了要求。不仅如此，拉穆瓦尼翁拟议中的改革促使法官们在某些省份煽起了暴乱。布里安作出了让步，拉穆瓦尼翁的改革也停止实行了。

这些事件再一次表明由上面发动的革命性改革的失败。它们还表明了君主政体自身内部的冲突——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官僚体制与君主政体作为一种贵族体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来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过。要是全国三级会议得以继续召开的话，很可能演变成英国式的君主政体。但事实是，作为官僚体制的君主政体以向传统的权力作出让步为代价取得了胜利，得以避免受代议制机构的控制。只有在那些保留了省三级会议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例外。在没有全国三级会议的情况下，高等法院自称有权代表国家，并且在它们与国王斗争的最后阶段，尽管它们本质上是保守的，却使用了革命的语言并坚持赞扬美国革命的思想。到了1788年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君主政体已无法从旧制度的范围内找到自己的权威的新基础。法兰西国家得以在没有骚乱——不经历社会的司法和社会结构的激烈变革——的情况下渡过动乱时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君主政体的原则没

有立即受到攻击，但实际上意味着君主政体必须彻底改造自己。虽然这种改造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不管是路易十六还是那些企图挽救王朝的人，都没有能力或足够的力量来领导这场大革命。大革命只能是以翻天覆地的方式发展了。

（张瑶 译）

[1] 见前第二十章，原文第572—573页。

[2] P. 阿尔达谢夫：《路易十六朝的省督们》，茹斯兰多译（3卷本，1909年）。

[3] 太阳王（le roi soleil），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4] 见前面第20章，原文第576及以下各页。

[5] 关于国王与高等法院的早期冲突，见本书第七卷，原文第220—221、230—236页。

[6] 见前面第7章，原文第183页。

[7] 指路易十五于1748年左右建立的秘密外交网，向欧洲各主要首都派去谍报员，越过大臣们直接利用秘密手段处理外交事务。——译者注

[8] 由君主签发并由一名国务大臣副署的发给个人的密封的命令。

[9] 见本书第7卷，原文第225、231、234页。

[10] 关于对总包税人的管理，见前面第20章，原文第580—581页。

[11] 见前第20章，原文第589页。

[12] 见前第20章，原文第577页。

[13] 《关于负担过重情况的陈述》，见G. 舍勒编5卷本《杜尔哥文集》，1913—1923年出版，第2卷，第445—477页。

[14] 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G. 舍勒编5卷本《杜尔哥文集》，1913—1923年出版，第2卷，第533—601页）和他的官方信函（散见于各处）。

[15] 见C. E. 拉布鲁斯《旧制度告终和大革命开始时法国的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

[16] 见A. 科班《追求人性。启蒙运动在近代史中的作用》（伦敦，1960年），第29、40页。

[17] H. A. 泰纳：《旧制度》（J. 迪朗译，1876年）。

[18] M. 鲁斯唐：《启蒙哲学家与18世纪的法国社会》（1906年）。

[19] D. 莫尔内：《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1933年）。

[20] 见G. 舍勒编《杜尔哥文集》第4卷，第109—113页。

[\[21\]](#) 见前面第20章，原文第584页。

[\[22\]](#) 1781年11月的一项法令取消了对新教徒的大部分歧视和限制，但直到1791年9月才实现了完全的平等。

第二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

“保持冷静，像英国人一样。”白哲特这句避免在巴黎起义中为不良影响所左右的格言，很可以作为他的同胞编纂法国大革命史的指针。由于党派倾轧和年深日久的偏见给几乎所有法国人撰写的法国大革命史的著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所以盎格鲁-撒克逊学者自然就具有相对而言不偏不倚的优点。然而，过分相信这种超脱不良影响的能力和过分强调法国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同他们特定的政治偏见之间的关系则是危险的。有很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历史著述”所下的定义包括哪些内容。如果一方面我们对一切阐明大革命意义的报刊文章进行考虑，或者另一方面仅限于对各种通史^[1]的一般结论进行比较，那就必然会出现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联系的情况，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实际上就是仅仅专注于作出阐释（这在任何史学研究中都是必要的课题），那么大量的研究成果，对细节的看法，以及对事件的叙述，都会从我们的网中滑走。^[2]真正的历史著作的宝库对任何人都是有用的。“进步”的历史学家也从莫蒂默-泰尔诺、瓦隆和勒诺特尔等“反动分子”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中受益，而加克索特对大革命的攻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蒂埃对腐败堕落的社会底层的错综复杂的调查研究。

然而，即使承认“史实”中存在着广泛的无人问津的领域，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的个人看法并不应认为仅仅是他的“偏见”而不予重视。这些看法往往构成他独到的见解和洞察力的基本成分。随着世界的变化，大革命的一些新的方面必将继续不断显露出来。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会与国家关系破裂的背景下，教士和反对教会的人都写出了一些有关宗教史的严肃著作。社会主义的兴起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在研究中忽视了一些方面，就像1914—1918年间的配给制和通货膨胀激励人们对恐怖统治时期的经济背景作出新的评价一样。当然，一般地说，我们能够判断出什么是对大革命的“右派的”解释，什么是“共和派的”和“社会主义者”的解释。但是，在“右派的”解释中，为什么有人赞扬路易十六，而有人则赞扬流亡贵族或拿破仑，甚至赞扬救国委员会？为什么有的“共和派”

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是对他们的理想的侮辱，而有的则认为这是必要的？为什么“社会主义者”有人选择罗伯斯比尔，而有人则选择埃贝尔？对资产阶级的作用有人表示同情，而有人则加以仇视？政治并不能说明所有这些选择。即使能够说明，政治倾向的感情方面也并不总是符合逻辑的。在法国历史学家中间，在暴力问题及其合法性问题上的心理倾向，一直是同党派立场一样重要的造成分歧的界线，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团结的“倾向”其作用往往大于政治所造成的分裂作用。影响是多种多样的：看来似乎是直接来自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很可能会追溯到巴尔扎克那样顽固的正统王朝主义者。人类的活动和动机中有一种使历史学家困惑的复杂性，而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动机中也有一种使史学研究者困惑的类似复杂性。史学研究的历史，和史学本身一样，必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辩论”。

尽管现代历史学家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具有马克斯·韦伯认为的理想典型（*Idealtypus*）——为了便于讨论而提出的一个名称上的概念——的性质，但重要的是不应忘记，1789年的事件从一开始就被当时的人看成是一场“革命”。他们相信自己已处在某种有其自身的连贯性的局势之中。因此自然就试图撰写它的历史。他们的著作在观点和方法上反映出在旧制度末期用以教育读者的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典型方式所具有的影响。博杜安和隆东诺的7卷本革命立法词典（共和八年至九年）堪与居约和迪朗·德·马亚安纳篇幅浩大的僧俗法律汇编相提并论；隆东诺的《法国大革命日期考证》（共和七年）也令人想到圣·莫尔的本尼迪克教派编年史。通史的编纂者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古代经典作家，以及在较低层次上从丹尼埃尔、梅扎雷和韦托神父那里承袭了强调风格和文学形式以及“哲理性”表达的倾向。而对于能力平庸的著作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理想。到1792年年底，已有两部称得上是大革命“历史”的著作问世，一部的著作者是“两个自由之友”，另一部的著作者是拉博·圣-艾蒂安。这两部著作采用的阐述方式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沿用。

“两个自由之友”属于资产阶级，既惧怕大众又惧怕王室，反对教士但并非反宗教，其记述仅限于巴黎的政治事件和公众舆论的演变，开梯也尔之先河。拉博将大革命视为法国历史和人类理性发展的顶峰，将之界定为特权与全民族的冲突，强调人民所起的作用，“其热情是崇高的，其设想是深入人心的，其行动是粗暴的，其复仇心理是突然爆发，有时是残暴的”，其热情创米什莱之先例，其方法则开斯塔爾

夫人和基内等“哲理派”历史学家之滥觞。在1796—1797年和1800—1801年间，出现了一种撰写内容连贯的大革命史的尝试。因为在这些年对新闻的限制放松了，事态的发展比较缓慢，大量的回忆录使政治评论家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除了一部以外，这些历史著作都没有多少价值，尽管它们偶尔也告诉人们其作者个人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的难得的零星材料。拉克雷泰尔在为他谴责大革命的著作进行辩护时，为消除人们的敌意曾说：“我自认为具有权威性，并非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家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天哪，哪有这样的人呢？）而是一个亲眼目睹者所具有的权威性。”他的这部书是将《箴言报》和几部回忆录融会在一起，而以塔西佗的风格写成的一部著作。在这些热月政变后写成的历史著作中，只有一部资料丰富而且政治观点属于自由派，那就是图隆热翁子爵的著作。图隆热翁是一个支持第三等级和共和国的贵族。他从一些私人档案中搜集史料，明确地将他搜集的资料与他的回忆区别开来，而且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革命战争作了精辟的研究，为约米尼和梯也尔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尽管他不是任何一派的辩护士，但他承认他支持任何一个能够掌握他的国家的命运的政府——他“多少有点像是一个统治主义者”。后来研究大革命史的许多法国历史学家也很可能适合于作出这样的表白。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当代人应对自己所处时代写出概括的解释性历史，而让后人去作出详细的叙述。如果考虑一下法国流亡贵族所写的带有历史著作性质的作品，或许可以找到对这一理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正是在流亡者的这种紧张心理状态下，并为了适应宣传的需要，才炮制出在许多小册子中已经暗示的革命起源的“阴谋论”。巴吕埃尔的大部头著作《雅各宾主义史论文集》（*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1798—1799年）提供了打开迷宫的钥匙：在内部和外部都曾策划过阴谋。哲学家们和工匠工会会员们与雅各宾俱乐部的冒险家们结成联盟，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则是一个笼罩在人们心中的上帝，他用人类的邪恶作为对亵渎神灵的惩罚。对于右派来说，这样的解释是一种部分免除责任的说法。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罪恶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用普罗亚尔神父在其著作的扉页（1800年）上的话说，路易十六“在没有登基前就已被赶下了王座”。

然而阴谋论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大革命研究中的根本性的和最吸引人的问题，即各种思想与事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巴吕埃尔看来，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精心的组织而产生的。拒绝放弃启蒙运动信仰的夏多布里昂和塞纳克·德·梅朗，以及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则比较实际和比较敏锐地看待这种联系：各种思想或者是通过野心勃勃的利益，或者由于“潮流”的强制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个选择的过程，或者说由于那个世纪人们刻板的思想，出现了一种畸变。少数人仍对思想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和马莱·迪庞一样认为统治世界的是感情，即把哲学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疾病的症状而不是其起因。确实，右派的论点表明他们对一些细微的差别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施展各种手法，不愿将18世纪学术著作的主要荣誉拱手让给一批阴谋家。根据流亡贵族们提供的线索，后来的许多作者，特别是保守主义者，在各种思想和传播思想的机器中寻找大革命的根源。后来泰纳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摆脱了阴谋论这一虚假外衣；科尚则放弃了泰纳认为革命的根源在于过分制度化的说法。对于这种观点，实际上和对于其他许多普遍接受的观点一样，人们可能会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性将这种观点说成是右翼史学学派，除非是武断地认为一切激进主义在人道主义的外表下面都隐藏着断头台，或者找到了证据明显地证明革命是由少数人发动的说法。人们对史学研究中特殊见解的作用过分地予以重视，而对各种传统的阐释方法的持久作用过分地轻视。在某些学术中心将前者像对待神圣的白象一样虔诚地加以维护。典型的对大革命的右翼解释，产生于流亡贵族中间，而它之所以绵延不绝，不仅是出于论战中逻辑上的需要，同样出于感情上遗留下来的东西。

流亡贵族们所创立的颇有见解的带有愤懑情绪的理论，以另外的方式给关于大革命的各种见解增加了内容，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假说。曾经担任过地方行政长官的塞纳克·德·梅朗很快就去探讨旧的中央集权制日益衰落的权力。博纳尔颇具想象力地注意研究旧制度的组成特点，其中特权和出卖官职等于是形成了一种不受约束的体制。夏多布里昂、梅斯特尔和塞纳克·德·梅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一场由贵族发起的“投石党运动”。蒙洛西埃尖锐地将大革命说成是由于为有才能的人开辟了前程和将大批地产置于拍卖师的锤下，从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说来奇怪，对于恐怖统治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竟出自右派，出自流亡贵族。

在梅斯特尔和夏多布里昂看来，这是大革命的核心所在。尽管他们个人受到了损失，但前者能够冷静地想这乃是上帝在修剪树木的枝杈，后者则承认对于世风颓败的时代来说专制统治是必要的。夏多布里昂说道，雅各宾党人虽来自地狱，但他们却带来了全部才智。他们战胜了外国军队、内战、通货膨胀、饥荒、腐败。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罗伯斯比尔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他的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设法以暴力实现作为民主前提的道德革命。在思想上对祖国的热爱使梅斯特尔这个萨伏依人走得更远。他谴责贵族流亡国外是犯罪，而赞扬沾满血迹的雅各宾党人和篡国者拿破仑，因为他们打退了外国人，挽救了民族统一。这样，我们在流亡贵族身上看到了法国右派在史学研究中一直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的最早和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而这构成了右派历史著作与左派历史著作之间的一座桥梁。人们可以谴责1793年的原则，但不能谴责它的成就。在三色旗下走向胜利的是法国。祖国、土地以及你出生的地方树下的坟墓，实际上是无法搬上开往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行李车上运走的。

正如爱国主义为流亡贵族和他们的剥夺者提供了共同点一样，历史决定论也是如此。萦绕在流亡贵族心中的思想是，大革命乃天意或命运所决定——总之，估计错误和为之进行辩解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只要情况是这样，不管把它称作什么都可以。然而估计错误的不仅仅是他们，神秘的保守主义的宿命论也并非唯一的一种历史决定论。随着大革命的继续发展，它采取了预想不到的和恐怖的形式。尽管如此，它始终与进步的信念交织在一起；它换了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同时越来越使自己的事业同整个民族的利益密不可分。这样，它就鼓励人们承认那些他们不理解的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抗拒的事件的实际存在，直到人们迷惑不解的事物也似乎成为一种有机的整体，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图隆热翁根据某些统计资料说，革命就像宇宙中物质的物理变化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拿破仑凭着他用以衡量一切事物——除了他个人的野心——的百试不爽的现实主义，将这一趋势看成所有法国人都必须顺从的历史公式。他在发给阿尔马神父的、目前已臭名昭著的有关历史编纂的指示中，提出以一种避免从感情出发的方针对待近年的恐怖统治——“既不要责备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也不要责备那些活下来的人。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由形势和事物的本质产生的各种因素，或预见这样的事态发展。”如果这位皇帝要写大革命的历史而不是将革命视为他的传奇故事的序幕的话，他一定

会用梯也尔和米涅的腔调讲话。这两位历史学家后来都被指责为“宿命论”。而这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胜利者乐于用“事物的本质”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正如以此来证明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一样。而失败者则乐于说他们与其说是屈服于敌人，不如说是屈服于命运。

在1789年达到成人年龄的那一代人中，一些才智出众的代表人物一直活到王朝复辟时期才来解释大革命。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发出自己的声音。拿破仑本人就构成一次新的贵族流亡。他舒适地待在鲁里塔尼亚^[3]式的囚禁地厄尔巴岛上时，可能已还原为同他自身一样大小的人物，在大西洋中的一块礁石上，新的神秘光环又笼罩着他。从那时起又出现了一部关于大革命的福音：这场大革命在这位皇帝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位英雄继续推进其事业，并将其民族自卫的旗帜插到荣耀的顶峰。波拿巴的神话和现实把19世纪的史学研究与1789年隔离开来。他的一生经历要么是历史决定论的极端例证，要么是其反证。在他身上，大革命达到了它合乎逻辑的结局——对它的背叛。然而，不管对历史学家来说波拿巴主义如何富于挑战意味和引起分裂，它仍然是一个一致的爱国主义主题。法国人对他们最终遭到失败感到愤愤不平，不愿抛弃他们的英雄。对帝国的憎恶没有妨碍基内的母亲在匈牙利骑兵的铁蹄踏过时落泪，也没有使斯塔尔夫人在看到来自亚洲边疆的军队在巴黎歌剧院的台阶上站岗时不感到伤心。在斯汤达尔、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文学作品中明显表达的爱国忠诚，同样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著作中反映了出来。有人说，有“一种光荣的阴谋”将国民公会的胜利同帝国的胜利和早先封建时期和君主时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18世纪在拿破仑超人般的冒险事业达到顶峰时，更加使人们感到大革命史的编纂工作陷入更尖锐的自相矛盾的境地——并出现了其主要的偏见，比右派或左派的偏见更加微妙和更加具有高尚性质的偏见，即爱国主义的偏见。

同波拿巴一样，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和圣西门在全国三级会议的年代都是二十几岁年纪；梅斯特尔、博纳尔、蒙洛西埃和罗德雷的年龄则较长。现在，在25年之后，该他们评论他们那一代人亲手做的事情了。他们所做的虽然有着极强的共同点，但也各有某些不同，因为他们或是“外国人”，或是流亡贵族。只有圣西门和罗德雷属于例外，前者过分倾向于空想，后者过于深思远虑，都不接受派别的偏见。他们都是为思想而生的作者。由于他们，关于各种思想在导致大

革命方面所起的作用的辩论才继续进行下来。梅斯特尔和博纳尔仍坚持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乃是灾难的根源，因此在18世纪文学的熠熠光辉之下潜伏着革命，就好像从利凡特地区驶来的船只上装载的珍贵货物中混杂着瘟疫一样。博纳尔说：“从福音书到《社会契约论》，造成革命的是书籍。”另一方面，念念不忘内克尔、英国宪政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斯塔尔夫人，通过将1789年的自由思想的永恒原则与那些运用这些原则的人所表现的激情加以区别来捍卫自由思想。自负使法国人攻击特权而不攻击专制统治；骄傲则妨碍他们效仿英国，他们追求抽象而逃避现实。自尊心尚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强调对特权的猛烈抨击——“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争取平等”——才是找到了足以说明问题的主要途径。从斯塔尔夫人和博纳尔开始，夏多布里昂和鲁瓦耶·科拉尔继而努力探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即革命的平等主义这一主题，认为革命的平等主义使社会沦为“仅仅由孤立的个人构成的一片尘埃”，缺乏抵御无政府状态或专制统治的凝聚力。这种对自由和平等的反论后来经历了光辉的发展过程，最终出现了托克维尔。

如果说平等是推动力的话，那么似乎可能意味着在导致大革命的因素中社会紧张关系比思想运动更为重要。圣西门和罗德雷之所以这样认为，前者是因为他相信科学的建设性原则只是现在才开始从历史废墟上出现，后者则是因为他是以一个由知识分子转变成行政官员而形成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来评价思想的作用的。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一种至少积蓄了六个世纪的能量的特殊社会力量乃是革命性变革的因素。在圣西门看来，创建君主政体是一批王室法律顾问（*légistes*），然后他们又像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那样摧毁了这个君主政体。而在罗德雷看来，创建和摧毁君主政体的则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向有才能者开放仕途的资产阶级，以及作为附带现象而产生的自由。这个关于新兴中产阶级的主题，后来成为1789年那一代人创建最深刻的理论的活动与1820年年轻的一代的史学研究相互融合的基础。奥古斯坦·蒂埃里，特别是基佐，以此作为他们阐释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来也怪，他们走到这一步并非是由于受罗德雷的分析的影响——因为罗德雷迟迟未发表其作品——而是由于另一位老一代的代表人物蒙洛西埃的一本判断欠妥的著作而重新引起的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蒙洛西埃争辩说，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使贵族权利的所有权状具有重要的地位。1820年，蒂埃里和基佐作出了讥讽的回

答。他们像西哀士在1789年所做的一样，接受了这一具有种族性质的假说，但推演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按蒂埃里著名的比喻，雅克·博诺姆获得了进行报复的权利，而他在获胜后表现出来的蛮横是他的悲惨经历和他不熟悉自由的纪律的结果。基佐写道：“13个多世纪以来，战败的种族为摆脱征服者的桎梏而战。我们的历史就是这种斗争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它就叫作大革命。”这里有一个悲剧性的谬误，因为第三等级并不等于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并不就是人民。

曾经品尝过旧制度下美好生活（*douceur de vivre*）的滋味和感受到革命混乱的影响的那一代人，总无法摆脱追究其原因的念头，并为命运的神秘作用所困扰。那些晚十几年出生的人，即1789年的中、小学生，则往往把大革命看成基本上是实际的东西——为终生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提供了进阶的机会，造成了财产的大转移。斯汤达尔和P.-L. 库里埃的现实主义为巴尔扎克开辟了道路。他们以在被剥夺公权和赢得胜利的外表下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物质利益的苦涩味道感染了他。最早的名副其实的大革命史，即梯也尔和米涅的著作是进步的，自鸣得意的，而且由于对历次战役、各种演说和日常事件的叙述，又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与此同时，在史学研究的边缘，还写出了另一类历史，即一种由于通货膨胀和出售国家财产（*biens nationaux*）而形成的新社会的编年史。最后，《人间喜剧》这部具有洞察力和充满悲观情调的曲折迷离的巨著将要成为比最早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的叙述更加重要的阐释大革命的文献。

1823年开始发表著作的梯也尔和次年出版著作的米涅，也都属于巴尔扎克那一代人。他们是在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受的教育。当时法国正忙于创造历史而无暇讲授历史，教科书不过是罗列一些史实的梗概，教育界把历史仅仅当作文学课的附属物。与他们的德国同时代人、在专业学术领域里遨游的兰克形成鲜明对照。梯也尔和米涅都是靠自学成才、具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他们是通过政治性报刊来开始研究大革命的。然而他们的著作却构成历史研究在法国真正复兴的组成部分。虽然司各特的小说和夏多布里昂对中世纪的研究也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基本上可以说法国人这时正面对着历史，因为历史正以大革命的形式面对着他们。蒂埃里说过，对于帝国的衰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甚至不比伏尔泰知道得更多。梯也尔和米涅公开声明他

们写作的政治目的；他们提出要为革命时代辩护，并证明革命时代的续篇，即波旁王朝的覆灭迟早要到来，正如英国1640年随之而来的将是1688年一样。但是米涅后来的经历表明他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而梯也尔的经历表明他与此相反。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一个小册子撰写者的目标的话，那么他连十卷书也写不出来。在1823年，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渴求通过文学写作成名的年轻人将转向历史，而且作为具有开明政治观点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很可能选择大革命的历史。

将“不可避免”一词用于这些年轻人，有些劝善惩恶的意思，因为他们毫不吝惜地将各种宿命论的力量运用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的人物的身上。他们为路易十六悲叹，赞扬米拉波的思想，将拉法耶特奉为偶像，崇拜吉伦特派的英勇、智慧和高尚——但排除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在梯也尔的著作中，这种宿命论还不成系统；而在米涅的著作中，宿命论则是他阐释历史的不可改变的架构。他除了故弄玄虚地提到一个奉行卢梭的原则的“庞大而狂热的派别”外，对思想运动几乎置之不理——思想运动只不过是更加起持久作用的各种推动力量的一种反映而已。大革命乃是一个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进程，第三等级的财富和知识都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全国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将一场已经形成的革命变成法令”的缘故，也正是为什么专制统治必然灭亡，平等必然要取代特权的缘故。然而，虽然有些事件是由于这一基本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但另外一些事件则是由一种直接的决定因素而产生的，如特权阶级的反抗。如果没有贵族流亡和教会分裂，就不会有共和主义；没有外来战争也不会有恐怖统治。在米涅的著作中明显可见的这种论证方法，在梯也尔的著作中则是含蓄的。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把8月10日作为大革命的分水岭，即“群众反对中产阶级和立宪君主的起义”，“绝对平等体制的开始”。在这天之前，指导革命的是长远的必然性，胜利必将属于中产阶级；而在这天以后，进行统治的一定会是米涅所说的“群众”或梯也尔所说的“群氓”——“自从塔西佗看到他们为皇帝的罪恶喝彩以来他们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必须赢得战争。于是便出现了“令人沮丧和穷相毕露的人民政权”，而没有教养的群众是残酷的。在1789年，人民是安分守己的——他们是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在1792—1793年，他们被召来作为挽救法兰西的最后的残忍手段，因为反动倒退已使自由资产阶级无法解决问题了。

中产阶级注定要兴起，这是米涅和梯也尔同基佐和蒂埃里、罗德雷和圣西门共同持有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使恐怖统治和民众统治成为反动和战争的结果这一直接的必然性，则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爱国主义的需要而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是大革命迫使梅斯特尔和夏多布里昂等贵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两个宿命论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才能够解释1789年（米涅承认，当时路易十六本可以通过作出牺牲来避免灾难）和1799年（当时波拿巴可以在维护自由或摧毁自由之间作出选择）之间的悲剧何以会发生。实际上，关键的错误是专制君主犯下的，而其间的恐怖行动则是民众所为。这样就为开明的中产阶级开脱了罪责。当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即摆脱了使用暴力的歧途之后——终于到来时，他们仍然有希望取得控制权。因此，尽管同时代的人将梯也尔和米涅视为“宿命论”的历史学家，而我们则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的宿命论只不过是后来的共和派史学家的“环境论”。说到底，命运和环境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

梯也尔和米涅是同时代人，又是朋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自然应放在一起考虑。他们是革命史研究中情投意合的孪生兄弟。然而，把他们的著作放到一起分析可能会产生误导。圣伯夫凭着他一贯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在明显一致的对历史的阐释背后，两个人的气质却十分不同。米涅从他早期关于中世纪制度的文章一直到他事业的结束，都在潜心研究“使人类成为工具”的那些必然性，即历史的内在架构，它的“骨骼”，而梯也尔的宿命论则是同他的善于清晰地说明问题的天才，同他能把事件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透彻的叙事风格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还可以补充说，米涅作为历史学家和宣传家，是严肃而毫不妥协的；而梯也尔天生爱出风头，他热情奔放，无所不知，喜欢搜集奇闻逸事。作为知识界一个有进取精神的人，热衷于投人之所好。米涅无动于衷地论及大革命中的屠杀和残酷行为，并用他的中心论点加以解释；梯也尔则力求详尽，甚至包括一些不足凭信的细节，并进一步作出具体的和心理方面的补充解释——必须承认，过于生动了——“*Mens immota manet, lacrymae volvuntur inanes*”。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是反教权的，都对贵族没有好感，但前者干脆把旺代说成是不开化的地方，而后者却把它描绘成一个原始的乐园，由虔诚的教士和家長式的地主统治，既是对法国的威胁，又是一个奇妙的世界，而却被大革命强求一致的做法可悲地摧毁了。两位历史学家都是爱国者，但

前者只看到生存的残酷必然性，以致最终拥戴一名除了物质方面对大革命一无所知的军人；后者则沉迷于历次战役的细节，团结在旗帜下而不管擎旗者是什么人，最后以膜拜拿破仑而告终。米涅的分析是诚心诚意的，而梯也尔尽管对悲惨的事件并不敏感，却有着更广泛的同情心和更大的宽容。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政治家，有他信奉的纲领，但到了危急的地步，他也愿意恭维他人和作出妥协。如同他在半个世纪后主张建立共和国一样，他的历史著作属于那种“使我们分裂最小”的历史著作。

梯也尔和米涅所希望的和平革命于1830年7月发生。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主题，就像希腊与野蛮人的战争成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的主题那样。七月王朝的失败迫使一代人（他们的历史哲学是一心追求进步）认为革命尚未完成，仍然为争取实现其合乎逻辑的目标而奋斗。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完成，在1789年以后的10年以及在1830年究竟失去了什么？就社会的角度而言，答案可能是不妙的一一维克多·孔西德朗说，“大革命”不过是“上层阶级之间的一场争吵”。自由派历史学家赞扬1789年和资产阶级。要是有人称赞1793年和无产阶级，把罗伯斯庇尔奉为革命理想的化身，为恐怖统治进行辩护，认为它是获得新生的手段，并且为热月政变过早地断送了社会进步而感到遗憾，那会怎么样呢？实际上，人们对这些恐怖事件的记忆是抹不掉的。1796年，巴贝夫以罗伯斯庇尔的理想的名义起而反对督政府，比奥纳罗蒂则对他的领袖忠诚不渝，于1828年出版了有关他们为争取平等而策划密谋行动的记述。这一传统通过洛朗、拉波内拉耶和卡贝继续传下去，而关于这一主题的真正的史学研究则见于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中。在其著作中对罗伯斯庇尔的残酷表示的遗憾与对他的尊敬交织在一起，视他为未来反对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原则的化身。于是，对大革命的分析由巴贝夫传给了饶勒斯（他将巴贝夫称为“伟大而优秀的”，“我们的大师”），传给了马蒂埃，以及普遍传给了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从巴贝夫那里还产生了一种革命专政的理论，通过比奥纳罗蒂传给了布朗基和马克思，最后传给了列宁，由列宁将之付诸实践。社会主义者对1789年的重要意义所做的解释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是按照一种理论模式来评价大革命的，而这种模式追本溯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大革命本身的产物。

左派从巴贝夫那里继承的是独裁的、感情用事的和平均主义的遗产，从圣西门和孔德那里又继承了一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即有组织的、科学的和等级制的思想模式。前者宣称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是它的先知，它认为大革命唤起了真正的革命意志，但中途被野蛮地扼杀了。后者则宣称狄德罗是它的理论家，丹东则是其第一个实践者，并且认为大革命实现了必要的破坏，但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孔德出生于拿破仑雾月政变前一年，对那个时代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读过多少使他熟知历史知识的书籍。尽管如此，他以其聪明才智致力于从理论上对大革命进行探讨。他认为，虽然18世纪的哲学基本上是起消极作用的，然而有一位18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破坏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重新组合。他就是狄德罗。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集中体现了科学、综合性和条理性。在大革命中有一位英雄运用了这些原则，他就是丹东。孔德赞赏开明的专制。由于他，国民公会第一次受到非罗伯斯庇尔派的赞扬，认为它是一次构想绝妙和具有自觉意识的短暂的专政尝试。孔德认为丹东确立了理性的宗教，并从1792年8月10日起到他被处死一直统治着法国。在这样的错觉下，他赋予丹东以黎世留或克伦威尔应享有的地位。这一为丹东恢复名誉的举动，正好也是（相差几年）米什莱直觉地赞扬丹东和维尧姆驳斥关于丹东贪污受贿的指责的时候。这一指责即使是在热月政变之后也仍未受到驳斥。这样，到了19世纪中叶，有两个思想学派将国民公会时期视为大革命中的伟大时代。罗伯斯庇尔派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丹东派则是一个新出现的学派。

极左的解释是对民族团结的威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埃斯基罗斯、卡贝和拉波内拉耶试图证明大革命源于上帝的意旨和基督教的教义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比歇——他既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同上述几个人有所不同——宣称大革命“本质上是天主教的”并令人难堪地将恐怖统治与圣巴托罗缪惨案相提并论来为之辩护的原因之一。^[4]的确，法国人的一个最为根深蒂固的天性就是希望爱国主义的团结和国内的和平。路易·勃朗对罗伯斯庇尔的赞美和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厌恶并没有减少他对公开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反感。关于恐怖主义者他写道：“他们的暴力行动遗留给我们一个和平的命运……恐怖统治由于它极端的过火行为已变得永远不可能再发生了。”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教训，拉马丁写出了他那生动但并不准确的《吉伦特派史》。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不要去读

它。这是为人民写的。人民将要发挥主要作用。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必须使他们对处决人感到厌恶，以便即将到来的革命可以避免第一次革命时的过火行为。”他对事实真相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史学研究者总是将这部书置之不理，让它由于本身的错误而自生自灭。不过，这部书“将历史著作提高到小说的水平”，而作为一部小说，这部书却才华出众，内容丰富。拉马丁所描绘的大革命的图景是一幅和谐的大神话，其中对立各方最终都实现了和解。所有死去的人都是为子孙后代而死的——“让我们在他们的坟墓前重归于好”。《吉伦特派史》是一部以不幸与必然之间难以调和的传奇般的阴暗关系为基础而写成的史诗。拉马丁并不是在“为断头台镀金”，而是否定一切残酷行为，即使事实证明这些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民主必然到来，但是让它在没有进一步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到来，就像一场将征服世界的和平革命一样。

1847年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以及路易·勃朗和米什莱的历史著作的头几卷问世。这三个作者属于同一代人，就像梯也尔和米涅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在出版关于一场已经过去的革命的著述，并且期待着一个共和国，期待着“人民”登上政治舞台，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立宪君主王朝。到1847年，“人民”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含义，却具有无限的感情色彩。从1830年起，与王朝复辟时期的右翼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转向左翼，并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注。“以前诗人说：公众；今天诗人说：人民。”文学从政治罗盘上的不同部位反映出转向群众的趋势。这在巴尔扎克直接涉及大革命的最重要著作《最后一个朱安党人》（1829年）的序言和雨果的《昂杰罗》（1835年）的序言中、在奥扎纳姆的《走向野蛮》、在拉梅内的普遍选举将会是保守的稳定因素的直觉中，以及在来自极左翼的更加直接的和卢梭分子的挑战中都可以找到。米什莱1846年发表的《论人民》呼吁资产阶级忘记它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这在由小财产所有者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对恐怖统治的恐惧（这是由中产阶级中一些个人所实行的血腥制度）——并与人民共命运，在人民中恢复自己的力量。这是他关于大革命的历史巨著的中心思想。自发的和丰富的激情，而不是理智，乃是革命时代最值得夸耀的感情。所谓的“领袖”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傀儡”。关于他自己的这本书，米什莱写道：“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主人公只有一个——人民。”

米什莱关于人民的概念与19世纪中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潮流和文学潮流，与1848年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十分一致，以致人们容易过低估计他的见解的独到之处。他的思想如同他的写作风格一样，有着强烈的个人特征，是他个人孤独世界的内在产物。“我们生为人民，也将回归人民。”他的历史著作中的巴黎民众，是以他尊敬的父亲的形象而出现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大革命期间在一个荒废的教堂的听众席上印刷东西的印刷工人。革命的群众是被从小就折磨他的那种贫穷所激怒的。这种感情上遗留下来的伤痕，由于一位有志成为哲学家的青年此前所进行的历史哲学研究而更加强烈起来。基内将德意志的思想，特别是赫尔德的思想介绍给他。从基内和在许多知识界人士的传记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古怪的霍夫曼派哲学家和行政官员库辛那里，特别是从他自己对维科的研究以及对诗歌和英雄传奇的研究中，米什莱形成了他关于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自由与必然永远是矛盾冲突的，人类具有神奇的力量，许多伟大的思想在人民身上体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他在卢梭和大革命本身启示下产生的信念：相信人生来是善良的。他的历史哲学中的人民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从感情出发和就集体而言的，并非建立在对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它不存在内在的矛盾斗争或等级差别。人民的特点由地理、神话和语言形成，具有正义的思想，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自发力量，本能地争取卢梭所主张的集体自由而非个人自由。米什莱最初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承认君主政体和教会是自由反对必然的斗争中的工具。但是从1843年起他开始反对教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惊人的想象力本能地染上了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色彩。于是，他以自己的写作风格的非凡力量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历史感召力站在了大革命一边。然而他的思想狭窄而缺乏宽容精神。用他的口头禅来说，他之所以使大革命“复活”，是因为他重新体验到大革命的狂热并为之所感染。由于他谴责基督教，使他的论证失去了普遍意义。在他的思想中，“人民”这一庞大的集合体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现象，一种法国历史学家想象中的最爱国的东西。

在《全球史引论》（1831年）中，米什莱将他的国家描述成文明的辉煌顶峰，因此当他转而支持大革命并在其中发现了法国的精髓时，他感到自己处于整个世界进步的关键时刻。法兰西对各国说：“这是我的血，喝下去吧。”^[5]他故意用圣餐礼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大革命无异是一种新的宗教，正义的宗教。被梯也尔贬低

为只不过是哲学上的陈词滥调，米涅也只用寥寥数语表示称赞的《人权宣言》，现在成了热情歌颂的对象，“新时代的宗教信条”。这来源于两位伟大先知的著作：一位是教导人民他们的神圣使命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卢梭；一位是拉伯雷、莫里哀以及法国人道和讽刺精神的继承者伏尔泰（他被路易·勃朗和比歇不公正地说成是“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启示下，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教会”，根本不需要采取《教士公民组织法》这一与腐朽的基督教妥协的手段。

一个1789年在精神上团结一致的民族，一个甚至连马尔斯广场枪杀事件^[6]这样的社会仇恨都没有能够分裂的第三等级，一个永远憎恶残酷行为而且宽宏大量的“人民”；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说罪恶累累的宫廷、贵族和教会，以伪善的英格兰为首的外国势力的罪恶阴谋，为了反对这一阴谋，法国拔剑进行一场“崇高的战争”——以上这些就是米什莱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解释。在他浓烈的感情背后隐藏着一个革命的帝国主义者的狂热，以诗歌、同情和学识各方面的巨大力量来为两个美好的神话即“法国”和“人民”服务。没有这些，我们对革命动力的理解将会贫乏得多。而有了这些，关于大革命的史学研究又会长久地陷于危险之中。研究大革命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幻想家。尽管如此，米什莱的著作在法国的史学研究中仍保持着类似圣经的地位。因为不论严厉的批评会给这些著作的文字上的解释带来多么大的打击，它们仍然是鼓舞人心和焕发精神的力量源泉。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它们给共和派带来了希望，而当共和国胜利后，它们又成为反对徒具虚名的官僚政治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占领下，吕西安·费弗尔求助于这些著作，就像莫诺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所做过的那样。米什莱是共和主义者，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教权，但笃信一种人道的宗教；爱国家，但不受拿破仑的魔力的诱惑；按照大革命的理想而不是按照大革命的事件，按照它在人类未来进步中的地位而不是按照其历史根源来阐释这次革命。他写的书成为人们的信条，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被奉为正统经典。如同宗教的信条一样，这种经典比起产生它的神话来要温和、合乎逻辑并富于智慧；但另一方，任何由这种神话而产生的系统阐述从来都无法再现原有的热情的那种神奇力量。读者们要想在这种神奇力量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读卡莱尔的著作，用魔法驱赶魔法。在米什莱将他的“复活”方法运用于大革命之前10年，卡莱尔用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生动画面使人们回忆起

革命的巴黎，鲜明处犹如熠熠闪电，黑暗处犹如遭受雷击。这两位作家都具有生动地再现往事的惊人本领，一个是以奔放的热情，另一个则是以梦魇般的幻觉。对两个人来说，戏剧中的主人公都是人民；他们都赞扬丹东而贬低罗伯斯庇尔，都把革命暴力归咎于欧洲的包围、“施展阴谋的贵族”和“被革出教门的异端教士”。然而，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也几乎很难再找到在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方面比他们两人更加不同的了。对卡莱尔来说，爱国主义和进步是毫无意义的。他用以界定法国大革命的是它摧毁了什么，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它是一场“公开的暴力反叛，是摆脱了禁锢的无政府状态反对腐败透顶的权威所取得的胜利”。我们从路易十五临终时说起，以便我们有时间重新审视一下那些必须清除的“谎言”和“欺诈”。这些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麋集的人们群情鼎沸，士兵在边境上死去，事实证明各种制度只不过形同虚设，人民被背叛了，直到一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开启青铜色的双唇下令发射出一阵葡萄弹，“把我们特别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东西炸得飞上云霄，成为过去的事”。卡莱尔以波拿巴出现为结束。他还没有进入崇拜英雄的阶段，他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仍然是他关于历史乃是无数传记的精华这一理论的伟大而唯一的胜利。就像是一个对人类的理想漠不关心的上帝把这种理想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永恒的从属现象”（*sub specie aeternitatis*）一样，他所忧虑的是世上的混乱，关注着那些身陷自己无力控制的事件中的可怜的人们。他敦促我们宽恕那些最卑鄙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因为至少他的房东喜欢他，他的兄弟为他而死——“愿上帝对他和我们仁慈”，而且甚至连小人物的命运也常萦绕在他的心头——如在扮演理性女神后同她作书商的丈夫共进晚餐的“莫莫罗夫人”，那些信守自己的誓约，为了每天6便士的报酬而为抛弃了他们的国王效劳的瑞士人，一个名叫“佩蒂翁-纳蒂纳尔-皮克”（Pétion-National-Pique）的小姑娘——“全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冷漠的”。在米什莱看来，真正的现实是集体，是人民；而在卡莱尔看来，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革命的集体是暴民，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是爱国的社会凝聚力，而是狂热。对卡莱尔来说，充满米什莱的画面上的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可怕的决斗，并不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是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秘密进行的斗争。“人之堕落可达地狱最底层，犹如人之高尚可及天堂最高巅。”其他人对大革命的界定及对其实质的论述，对他来说就像是硫磺一样，一点即会燃烧起他对历史的解释。大革命是一个为无数个人

进行道义斗争而设置的舞台。这样，卡莱尔既未能理解大革命，同时又给大革命的研究增加了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所缺少的一个领域，即悲剧的方面。7月的夕阳照耀着远在宁静的大海上的航船和在土伊勒里宫的奥兰治厅里欢舞的人们，而在市政厅却高悬着人头；收割人在田野中劳作，而9月的大屠杀却在进行；当夏多布里昂漫游在新大陆的原始森林中时，他的家人则走上了断头台。这些事情在发生，然而人若失去了灵魂，它们也就毫无意义了。大革命前后矛盾并具有破坏性，它的太平盛世的美景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同卡莱尔相比即可看出，米什莱在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但歪曲事实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他的著作也标志着决定性的变化。因为尽管他看不起学究式的引经据典，然而他的历史著作却第一次表明他对档案文献有着系统的了解。在法国，1830年是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一年，同时也是史学研究新时代的开始。这一年，基佐推动了本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编目和出版的大规模工作。米什莱本人则成为国家档案馆历史档案部的领导人。这种旁征博引的新治学精神的影响，1833年第一次在革命史的研究中显示出来。这一年，比歇为了宣扬他独具特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开始出版他在各俱乐部和各种会议上的演说、辩论词、预算方案和会议记录。这个多卷本的资料汇集，至今对学者仍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曾大大获益于各种回忆录（并不都是确凿可靠的）、口头回忆和种类有限的报刊。依靠这些方便的资料，各种颇具才华、明白易懂，然而有失偏颇的阐释远远超过了研究，而有关大革命历史的主要资料却几乎无人去触动了。旧王朝毫无效率的中央集权统治迷恋于官僚主义的文牍工作；大革命中的陈情书、立法文件、各种表报、各种请求或通知，以及没收来的教会和私人档案更使其分量大大增加。结果各城市图书馆以及各省和中央机关的档案馆堆积的文献资料如汗牛充栋，成为退潮后留下来的无人整理的财富。历史学家可能再也不会再在研究一场革命时接触像这样的原始资料了，因为这是在人们建立起供后人利用档案文献的制度之前官僚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场大革命。然而，米什莱是第一个潜心研究这堆烂泥般的、没有分类索引的档案的人。从他起才开始了对大革命文献认真整理的工作。人们有理由期望档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应该是一系列有明确内容的专论——或许可以为我们保留下来后来被销毁的巴黎各区和科尔德利埃俱乐部的档案。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人们引证资料只是为了直接服务于一般的综

合论述。米什莱是从哲学和全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大革命的，而托克维尔则是从对民主进行综合社会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大革命的。总之，这是一个《人间喜剧》和《历代传说》^[7]的时代。

1850年，博德里拉尔似乎认为1848年所发生的事很可能会对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引起煽动性小册子撰写者与拥护专制主义的编年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并妨碍“自由派和议会派”对大革命所作的解释的出现。然而不出一年，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国民公会史的第一卷问世，其作者是一位代表奥尔良派观点的学者普罗斯佩·德·巴朗特。该书除了起到像在荒野中呼喊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到来外，别无什么重要意义。巴朗特赞扬1789年的人们，并认为国民公会除了在国防方面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成就。这是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者中一批卓越人物的典型理论。这些人当群众浪潮席卷帝国时，在他们的沙龙和法兰西学院中陷入了困境。布罗伊公爵（他娶了斯塔尔夫人的一个女儿）、他的儿子阿尔贝和女婿奥森维尔伯爵，以及巴朗特和托克维尔，发现他们实现议会制政府和行政分权的希望被专制主义所摧毁，于是逃避在历史中寻求慰藉。巴朗特以国民公会作为他研究的主题，奥森维尔加入了第二帝国煽起的对拿破仑神话的攻击，托克维尔则在对大革命前夜的法国的研究方面产生了成果，既论述了自由派反对拿破仑第三的立场，又成为分析史学的杰作。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论点清晰透彻，像伟大艺术作品那样会让人误以为简单易懂。从一个角度看，该书是一本政治性小册子：在18世纪的法国，有一种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所没有的自豪的独立精神——目空一切的贵族，因占有土地和有权投票决定税收而得意洋洋的教士，保有地方行政权的三级会议继续存在的地区（pays d'état），滥用权力的地方长官和花钱买得官职的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阶级和集团，各自都决心捍卫自己的特权。当时服从国王是出于尽忠；资产阶级追求享受的热情，为行使权力提供方便的那种表面的社会平等，由各自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整个民族屈从于一个独裁者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该书是一篇关于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论文。在这以前20年，托克维尔曾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以美国作为实行以现代文明为基础的法律的范例——民主不可避免地发展，自由与平等永远是辩证地存在，为在急剧滑向绝对平等的趋势中

保持某种自由而必须采取某些宪法手段、社会措施和宗教信仰。现在，他从自己的国家的角度说明了这一过程的一种病态的变种。对自由的要求是如何晚于对平等的要求出现的，而对自由的要求又是如何首先消失的。从而使要求获得自由的法国人最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器并甘愿在一个主子统治下平等地生活。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该书基本上以此而出名——旧制度在它完美无瑕的外表下面存在着重重矛盾。在某些方面，该书的思想综合了王朝复辟时期逃亡贵族和自由学派史学研究所能达到的一些最卓越的概括论述——夏多布里昂关于大革命由一场贵族的投石党运动开始的看法，博纳尔所特别坚持的关于旧制度下的各种弊端等于是一种自由体制的主张，鲁瓦耶·科拉尔关于自由与平等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斯塔尔夫人对革命精神的平均主义实质的深刻见解。在另外一些方面，托克维尔的解释产生于他本人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直接观察，以及他为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些现象而提出各种历史假说的才能。他在这本书问世以前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清晰地论述了他的一些主要结论。圣-伯夫曾批评说“思考在先，了解在后”，意思是说他是抱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前去美国的。但这正表明一种特点。对于那些重视初步假说的历史学家，以及对于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聪明才智这一无可辩驳的真理来说，托克维尔永远是一个范例。然而，尽管有上面的种种说法，他的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直接求助于档案资料——国家档案馆、安德尔-卢瓦尔省档案馆、各市镇的登记簿、土地赋税册、请愿书——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并不是在已有的叙述框架中加进一些生动的细节描述，而是服务于在新的史学领域中有计划地建立一种构想，即研究产生大革命的法国行政体制和阶级结构。

罗伯特·格雷夫斯通过克劳狄乌斯之口说，“历史是老人的游戏”。^[8]托克维尔出生于1805年，在此以前的10年中，米涅、梯也尔和米什莱先后诞生。托克维尔直到1856年才发表他的伟大著作，而上述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已作为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而成名。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经历了幻想破灭的岁月；作为一个贵族，他看到自己阶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他的宗教信仰趋于老成，转变成一个讲求社会功利的自然神论者；虽然在1848年出现了对财产的威胁，但他却获得思考问题的时间，使他能忘却自己的恐慌而仔细审视这场阶级战争的伟大场面。他对实际事务有了独到的深刻了解，只有一个终生从政者——特别是一个不成功的从政者——才有可能给一个聪明的观

察家提供这样的深刻了解。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使他具有他的前辈历史学家所缺乏的公允态度。他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自己所属的阶级是反对专制主义的理想壁垒，因此他将法国的贵族看成是现成的英雄。然而，贵族由于他们享有的特权而与整个民族脱离，从而形成了一个等级。与英国的贵族不同，他们不再能左右或形成舆论。由于托克维尔对法国贵族的衰落作出了这一眼光敏锐的评价，他的感情也就失去了寄托。托克维尔虽然对资产阶级有点蔑视，对高卢教会也有些偏激（他忽视了该教会内部分裂成各种派别），对农民的不满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公正地对待；但他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贵族一样，对农民太疏远，不能区分法国农村地区底层各个不同的阶层。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中最冷静和最公允的一个。

以前的历史著作（基内的除外）都是叙述性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分析性的。其他人认为大革命是1789年在资产阶级即“人民”的推动下开始的，而在托克维尔看来1787年才是开始的时间，而且如果他能活着发表其著作的第二卷的话，他也会专门用一部分来写贵族的反叛。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抱着希望写作的，他们面向正在破晓的一个新时代。而对前途持悲观看法的托克维尔则用过去来解释大革命：“应该到大革命之前那段时间里，去寻找唯一能把它照亮的明灯。”其他人使用的是概括而不确切的宿命论式的词句。而托克维尔投身于争取平等的大规模历史运动，并承认旧的社会大厦迟早将崩塌，因而能比较恰当地估计在上帝安排的范围内人类能做到些什么。然而在他的阐释中，个人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也不去研究政治、宫廷生活和战争，而这些是那些善于作激动人心的叙述和心理描写的人喜欢追求的方面。他撰写的是行政制度、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君主政体中央集权政策的影响，购买土地的农民，巴黎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1788年的歉收——这些都是他分析的基本材料。革命的紧张局势是在阶级结构的框架中加以描述的。的确，托克维尔和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一样错误地把他所描述的历史群体看成完全是铁板一块——未能强调主教与神父、文官与武官、富裕农民与贫穷农民之间的对立——就像他所崇拜的启蒙哲学家们表现出的任何时代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有一种理论上的一致一样。尽管如此，他在方法论方面还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说：“我谈论各个阶级，唯有他们应该占据历史。”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各社会单元的论述虽过分简单化，但他善于发现各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别的能力弥补了上述缺陷。他一方面蔑视那些大量乞灵于“种族”和“气候”之类可以作多种解释的字眼的人，另一方面也蔑视那些一味堆砌事实“粪堆”的人，决心揭示那些明确的和合乎逻辑的联系。如有可能，他就设法进行比较——如在纳税和实行统治的英国贵族与逃避纳税和不进行统治的法国贵族之间，在没有受到怀疑论攻击的英国教会与易受攻击的法国教会之间，在欢迎革命的莱茵兰和巴黎周围进步的有地农民与反对革命的旺代省的落后农民之间，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存在的开明专制统治或封建统治之间进行比较。明确的答案并没有能够得到，对于证据还要用怀疑的态度进一步加以检验。在米什莱看来饥荒是一场危机，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日趋兴旺的繁荣才是更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封建赋税之所以遭人痛恨并非因为它们是压迫性的，而是因为它们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农民之所以忧心忡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苦难之中，而是因为他们孤立于所有其他阶级之外；人民起来造反不是在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之时，而是在他们看到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之时；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当它试图进行改革的时候。这类固定的说法今天已在史学研究中普遍使用，而它们最初是在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头脑中形成的。

《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对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它既鼓励了综合性论述，也鼓励了探索性研究。左派采用了它的方法，即研究阶级间的紧张关系，右派则按照它提供的线索为革命前的法国恢复名誉。然而说来也怪，该书直接带来的唯一重大的成就是在外交史方面，而外交史是托克维尔所回避的。索列尔在概括说明他的《欧洲与法国大革命》（1885—1904年）时说，“法国大革命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颠覆欧洲的旧世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似乎是欧洲旧世界的新生，是欧洲历史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托克维尔在行政体制和农村中发现了法国历史的连续性，而索列尔则是在大使馆里和战场上发现这种连续性的。专制统治、民族统一和天然国界是理解旧王朝——以及革命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钥匙。索列尔这个诺曼底实业家的儿子与托克维尔这个诺曼底贵族的儿子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富有，有文化，具有世界眼光（两个人都打破习俗娶了外国妻子），对国家事务和写作活动都已有经验。他们着手研究大革命时都已成熟，很有自信并能够兼容并包。他们都厌恶恐怖统治，为战争感到遗

憾，但他们都坚持认为：大革命由于其深刻的根源和持久的成就，乃是法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都将自己关于连续性的论点推向极致。《欧洲与法国大革命》以对拿破仑作出宿命论的辩解而结束，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则作出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推论：旧制度、大革命和19世纪的行政制度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现象。如果托克维尔能够完成该书的第二卷的话，他肯定会把恐怖统治和革命专政与消除差别的平均主义，而不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乃是其总的根源而不是偶然条件的产物的推论，曾是极端反动的流亡贵族所欢迎的推论之一，不久又被泰纳的系统而又轻率的妙论所采用。

托克维尔具有悲观主义的洞察力，泰纳则具有悲观主义的狂热。按照保罗·布尔热的说法，泰纳认为历史乃是“机遇为心理学家们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如果是这样，那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研究大革命这个暴露出民族心理的历史阶段的。^[9]然而，事实上1870年的战败和巴黎公社驱使他担负起对他的民族进行病理诊断的责任，去追溯就像是导致两个手指坏死一样导致丧失阿尔萨斯—洛林的恶疾的根源。关于泰纳1871年是由于恐慌而变成反动分子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他以前的通信可作为反证。色当战役的失败和内战的爆发产生的基本影响是使他的达尔文式的悲观主义变得激进和彻底起来。另外一些学者，如勒南、埃米尔·蒙泰居和库塞尔-瑟内伊，将大革命视为脆弱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央集权统治和官僚制度陷于瘫痪的开端，而法国正是被这些东西毁掉的。但泰纳在撰写他的《当代法国的由来》（1876—1893年）时，其痛苦心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他剩下的唯一信仰——对科学的信仰——正在崩溃，千方百计地想把这种信仰与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具有腐蚀作用的“理性”加以区别。作为一个宿命论者，他无法愉快地接受必然性这个概念，因为他的宿命论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就像他喜欢与之相对比的詹森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的宿命论一样。“善与恶就像是糖和矾两种产品一样”，人类和民族是由种族和周围环境形成的——但它们仍然要受到严厉的道德裁判。法兰西也要受到这样的裁判。希望事情出现另外的情况而逃避裁判是不可能的。泰纳的通信表明，这种不可避免论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际——“我们在1789年背离了我们的自然演变进程”，“当时有两条路可走”，“只需再多一点共同意识……”这种内心的紧张状态使批评的锋芒更加尖锐，随着《当代法国的由来》一卷接一卷地问世，人们

逐渐清楚地看到，它包含着一种对所有各方——君主政体、大革命和帝国——历史上的各种理想的全面谴责。该书不是一部进行宣传的著作，至少它不支持任何事业，也不鼓吹任何救治办法。历史给人们一种苦涩的知识方面的满足。正如施本格勒后来所说，最好是“走到底层去观察”。

评论泰纳的人一致认为，在他身上两种不同的灵感奇特地融合在一起，一种是诗的灵感，另一种是逻辑的灵感。他的自我表白说明，在1862年时他意识到某种变化，第二种倾向占了上风，修辞的才能和思想上合乎逻辑的归属，越来越受到闪电的火花和激烈的感情的支配。在泰纳自己看来，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建立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就像他极端崇拜的德意志的史学研究一样。这种方法从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角度寻求各种规律，像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那样将事物分门别类，按照居维叶的方法，通过详细研究特定的器官来推断有生命的整体的秘密。然而，泰纳以一种超出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爱好，实际上是以他所崇拜的主要大师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爱好来钟情于他那些“小事实”的无穷无尽的含义，并以一种接近于卡莱尔和米什莱的“复活”的强烈感情把这些含义加以具体阐明。他的科学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艺术现象。史学之于泰纳，犹如文学之于福楼拜、左拉和莫泊桑。每一个敏锐观察到并认真记录下来的细节，都是以绝望的磷光为背景来显示出其轮廓的。

“所有经过精心选择的小事实……就是今天整个科学所具有的材料”——它们也构成那个时代自然主义文学，和以“密集冲锋”的军事战术为基础的散文风格的基本内容。泰纳在他的这些事实中间寻找线索，以便能使他得出概括性解释的公式：构成一个人性格的秘密的是“主要的才干”（*faculté maîtresse*），左右一个历史时期特点的是“环境”（*milieu*）。一旦找到了这种公式，就能够开始作出体现所有事实的解释。这一著名的“方法”毫不留情地将解释上的各种细微差别置之不顾。正如圣-伯夫所说，在大的历史因素与各个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存在的余地，“不把握这些原因，就不可能作出任何解释”。各种事件是在单一的国家环境中，而不是在千差万别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同层次上向前发展的。历史解释变成了铁板一块：摄政时期、^[10]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宫廷变成了一幅静止不变的画面；斑斑点点的亮光和阴影构成的叛乱四起的土地变成了一片

模糊；由“18个”样板构成的“无政府状态”；救国委员会或革命法庭这样的机构和拿破仑之类的人物都被描绘得绝妙地凝固成一个姿势。

在泰纳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如此生动复杂地说明过革命形势；在此以前和以后也几乎没有人敢于把整个复杂形势纳入单一的公式。革命精神被描述成由“科学精神（l' esprit scientifique，完美无缺的）和“传统精神”（l' esprit classique，一种由纯粹理性的抽象论证而产生的破坏性精神——“推理的理性”[la raison raisonnante]）所构成的爆炸性混合物。由此而产生了集中体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的教义。这一教义从文学中传下来，通过咖啡馆里的政治家传给了街头暴民。这是一种“致病的细菌”，进入一个患了病的社会的血液，导致精神狂乱和惊厥。这里的假设，即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著作包含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认为思想乃是原动力（而不是结果或其他因素的外在形式），并未得到证实。仅仅一张从笛卡儿到卢梭的曾服务于“推理的理性”的思想家的名单，其本身就是一个反证。泰纳提出了“传统精神”这一公式，而他却不仅成为他的研究方法的受害者，也成为他的气质的受害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对18世纪的描述没有把发展变化的情况包括进去（他忽略了宫廷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斗争），并使自己受到心理学概念的广泛影响。由于气质的缘故，他不愿意论证出现骚乱是有其原因的，因此尽管他把旧制度下的苦难状况描绘得十分阴暗，但他在解释大革命时仅仅把这摆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从研究文学史（他曾说他愿意用一百卷外交文献换取切利尼的自传^[11]）转而研究一般历史的，因此往往在他最熟悉的这一领域中寻找中心论题。知识分子很容易相信他们宿营的思想营地驻扎着将出发去征服世界的军队。

革命精神有自己的工具——雅各宾派。他们在整个民族中是少数，来自资产阶级下层和人民的上层，受到那些革命的抽象概念的煽动。这些概念也许会暂时影响青年人，但只有在一个处于解体过程的社会中才会形成持久的狂热。雅各宾派是在《社会契约论》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他们没收财产，摧毁家庭生活和宗教，并利用丧失了一切传统约束的社会所泛起的渣滓——“患癫痫病和道德败坏的乌合之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纳用“传统精神”，信奉这一精神的雅各宾派，以及泛起的沉渣，完成了他对革命恐怖的解释。在谈到巴

士底狱的陷落时没有提及王家部队的集结，流亡贵族被赶走犹如路易十四驱逐新教徒一样；在论述6月20日和8月10日的起义以及9月的大屠杀时只是偶然提到战争和国防。欧拉尔说，这就好像描述1870年12月巴黎居民蜷缩在地下室中，靠任何能入口的东西充饥，而却掩盖了德国军队正在包围着这座城市一样。泰纳笔下的革命者还不仅仅是一些狂热分子，由于泰纳不写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他就把他们的行动贬低为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了。

《当代法国的由来》一书的论点带有偏执狂的色彩，就像其作者笔下的雅各宾党人一样。在怀有敌意的严厉的批评下，它搜集的丰富资料也显得软弱无力了。然而，泰纳的偏见和“科学”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偏爱回忆录，而对目击者的证据抱有偏见，但由于他搜罗的范围远远超出报刊和官方报告，并注意对他的原始资料进行交叉研究，从而显示出大量收集新的文献资料的各种途径。对他来说，法国既包括巴黎，也包括外省，他的历史著作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和社会，如果说他没有完全实现他在其英国文学史中提出的理想——了解在工场、办公室和田野中的卑微公民——的话，他至少在努力从暴民和造反的农民身上十分贴近地去了解他们。别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首都发生的官方“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而泰纳却以他喜爱的一些小说家所特有的那种能够洞察卑鄙的动机和可怕的事件的眼光，将外省发生的无法无天的暴行也写进了编年史。“人民”这个米什莱笔下的光荣神话，在他以悲观主义的态度认真审视后，将之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而大革命如果说是一场贯彻始终的革命的话，那也似乎只是少数人所为。泰纳认识到英国在政体方面，德国在哲学方面，北欧国家在文学方面更胜一筹，这一点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求学方面曾经历过一段学徒生活，这使他摆脱了爱国主义的偏见。他对大革命的谴责，既不是为了维护波拿巴主义，也不是为了维护正统。君主政体是自掘坟墓，理论家们摧毁了文明的最后屏障，贫民窟的人们任意发泄自己的欲望，而一位暴君则抓住了自己的机会。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当代法国的由来》的第一卷于1875年问世，当时法国的历史研究正在经历转变。多方面的影响促成了这一变化：德意志的学术成就，巴黎文献学院的建立，勒南和菲斯泰·德库朗热的影响，迪律伊在帝国晚期实行的教育政策。1876年，曾根据泰纳的建议前往德国学

习的莫诺，仿照德国的《历史杂志》创办了《历史评论》。在以后的30年中，出现了十几种重要的史学期刊，包括《法国革命》杂志，到1894年史学研究专业训练在高等教育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革命史研究的关键变化在此以前八年即已发生，这年巴黎市政当局出资在巴黎文学院设立了革命史课程，欧拉尔任第一位教授。在以后的36年当中，他除发表了大量有创见的著作外，还出版了30卷的文献资料——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正如科尚和马蒂埃意味深长地指出的，除非是祭起某种决定性的方法和雇用了“魔鬼”，否则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欧拉尔还激励他人在他的领域从事广泛的研究，勒努万、卡昂、布拉厄施、索德里姆小姐、帕里塞和马蒂埃（这位弟子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并胜过了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法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某种“工业革命”，其特征是详尽细致地研究，有分工，有专业，从而大大增加了研究成果。

进行学术调查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给予巴朗特、基佐、布罗伊、托克维尔、奥松维尔和（经过不光彩的拖延之后）泰纳以最高地位的法兰西学院虽仍然给予其历史学家——索列尔、拉戈尔斯^[12]和马德兰——以荣誉，但学术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教育界。教育界在学术上注重内省功夫，搜集资料严格而精确，政治气氛倾向于共和派和德雷福斯派。历史家学如塞、奥塞尔、塞诺博斯、欧拉尔和马蒂埃等都是人权同盟的成员，该组织争取释放德雷福斯所遵循的理想使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并且聚集了那些愿意“在大革命这一共同基础上”联合在一起的不同派别的共和主义者。欧拉尔对他的信念直言不讳：“我是大革命恭顺而怀着感激之情的儿子，因为它解放了人性和科学。”^[13]在德雷福斯案件和废除政教协议上发生斗争但取得胜利的第三共和国，在1789—1794年间的事态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先驱并受到鼓舞，对过去的崇拜不仅影响了政治，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皮埃尔·拉塞尔讥讽地说，这就是“教育界的官方理论”。这样的嘲笑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公正。尽管欧拉尔本人为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写过许多文章，并认为非教会学校使梯也尔的保守的共和国转变成民主的和非宗教的共和国，又为各学校编写了反教权的和共和主义的教科书，但他仍认为他的专业研究是严格的不偏不倚的。他曾说过，“你越是决心要将政治排除在你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外，你就越有责任在其他方面专心致志于政治”。欧拉尔傲慢的自信和马蒂埃好斗的武

断态度在今天早已是不合时宜了，但重要的是人们不应忘记这些著作家驾驭资料的杰出能力看来其前人是不可达到的，而在他们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们不够谦虚，但并非不真诚。他们的不足之处，像泰纳一样，尽管表现不同，但都是由于过分依赖“科学的”方法而造成的。这种方法就像朗格卢瓦和塞诺博斯在一部著名的手册中所概述的，是以“历史只不过是利用文献”这个前提出发的。历史被认为并不是对我们提出的有关过去的问题的回答，而是一些由证据确定的孤立的“事实”，并按它们原来的样子重新拼到一起，就像一幅被地震破坏了的镶嵌画一样。19世纪末在法国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历史，在批判性的学术水平方面是杰出的，然而由于存在一种错觉，认为要做到不偏不倚只需克服个人因素，即观察者的散光症就可以了。几乎没有人看到在对待宗教或各种理想的冲突时需要同情心。历史被等同于一种方法，很少考虑到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识论”，即历史知识的性质以及必然性的问题。

欧拉尔在谈及大革命时说，“为要理解，就需要热爱”，而这是一种他在研究与之相当的其他主题时不愿采取的方法。他拒绝将自己的研究课题看成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平常的时期，或者将当时的每一个严酷的事件都从其本质上加以论述。相反，大革命就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以及实现这一宣言的尝试”，是法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鲜花盛开的持续过程。假如欧拉尔听到有人谈到两千年前历史上另一个独特的阶段时将基督教定义为“福音书以及实现它们所宣讲的教义的尝试”，那么他一定会头一个站出来断言这是对特殊性的诽谤，并揭穿这种轻易否认存在各种迷信的和不容忍异端的事件的做法。这种宗教性质的对比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因为欧拉尔同米什莱一样，认为1789年创立了一种世俗的和人道的宗教，这正是现代进步的起源。他在1906年宣称，在当今世俗共和国战胜“神权原则”之前，在法国撰写科学的历史著作的尝试的条件肯定是不成熟的。这是一种需要孔布和克列孟梭这样的人鼓吹的奇特的公正态度。广泛传播这位历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的声音，常常带有世俗宣讲团（Mission laïque）宣传委员会主席的口气。

米什莱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欧拉尔用带有学术气息的散文来加以表达。各联盟^[14]的精神，共和二年^[15]军队的精神，就是大革命的精神。而既讲求实际又梦想通过教育实现进步；既热爱和平又如

烈火般号召爱国抵抗运动的丹东则是大革命的英雄。孔德和米什莱（还有伏尔泰）对欧拉尔的思想形成起了主要的影响。欧拉尔将他们那种崇尚积极进取和抒发感情的精神，与近期对丹东的“腐化堕落”或他对九月大屠杀^[16]应负的责任这类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结合起来。米什莱关于“人民”的概念再次流行起来，不过加上了实际的限定——“条件是把法国人民看成是有组织的群体，而不是乌合之众”。自发地聚集在爱国的市政当局周围的人民、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乃是大革命的动力。欧拉尔曾指责泰纳从17个例证便得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结论，而他也在更大的范围上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没有充分排除报纸或担负使命的代表们之间的通信这类史料中的宣传成分。他在撰写政治史时忽视了其阴暗面和动机中的个人气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官方集团”如立法议会、俱乐部、市政当局、庞大的革命官僚机构、持反对态度的部队等，而对社会集团以及造成它们分化的经济问题却很少谈及。他自以为正确地设想数百万不知其姓名的人思想上是一致的，对大革命忠心耿耿，而实际上这些人的看法并没有记录可查，经常只能是靠推测。他宣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大革命以拿破仑的加冕而宣告结束，其理由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政教协定和巴黎圣母院的仪式基本上是“反革命”行动，背叛了人道这一新的信念。而当渴望得到面包和荣誉的巴黎工人欢迎他们的主人并使共和派资产阶级陷于无能为力的状况时，行动的主要动机就被违背了。“自由派与人民之间的分裂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与普选权似乎成了与自由互不相容的东西。”当世俗原则被抛弃，“人民”的团结一致遭到决定性的破坏后，大革命就结束了。

从梯也尔和米涅起，某种类似“环境论”的看法成了为大革命进行辩护的人们所接受的理论。甘必大的报纸《法兰西共和报》刊登的阿弗内尔的文章《革命的星期一》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说法：1789年并没有共和运动，当时或此后也都没有“共产主义”理论——极端行为仅仅是对特权阶层的反抗所做出的反应。欧拉尔接受了这一环境论，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加以支持。直到瓦伦事件之前，共和主义并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导致君主政体垮台的乃是普鲁士的入侵。那时的革命政党与19世纪的不同，没有纲领，革命宪法也并非以系统的理论为基础。《人权宣言》的某些思想是从美国某些州借鉴而来的。1791年的宪法是妥协的产物，1793年的宪法是权宜之

计，而共和三年的宪法则是积累起来的恐惧的反映。恐怖统治是对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回答以及对特权的反抗，是“在特殊环境驱使下具有自由与和平意图的一代普通人”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尽管这些结论并不新鲜，而且其中有些过于简单化，因而不能公平评断历史的复杂性，但欧拉尔的解釋还是很高明的。从此以后，类似泰纳那样的指责大革命的思想奇特的文章便没有了立足之地。后来研究大革命的著作都不得不尊重根据所处的环境和出现的危机而撰写的编年史。

欧拉尔作为一个温和的共和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承认1789年的原则为极左派提供了某些支持，但坚持认为变革应该是逐渐进行的。大革命中社会主义者所赞赏的东西，他都认为不过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值得重视。这样的冷漠传统不大可能使巴贝夫的门徒们满意。然而，暴力行动具有一个特点：能够把自己造成的分裂局面让人们误以为是由理论造成的分裂局面。于是，人们对恐怖时期的记忆，以及后来对公社的记忆，促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主张改良的可能派和拒不妥协的盖德派。因此，左派对大革命的阐释没有继承下来一个现成的公式。他们不得不确定经济决定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他们的论点；他们不得不在罗伯斯庇尔与埃贝尔之间、在起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与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他们不得不在暴力改革与非暴力改革两种理论之间作出选择。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1901—1905年）很大的优点在于，在以上的所有抉择中，作者都作出了最文明的选择。他开宗明义地表示，“我们计划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向人民，即工人和农民，详细论述1789年至19世纪末发生的事件”。很少有历史学家如此直率地公开声明自己的倾向，而又能如此恰当地避免受偏见的影响。饶勒斯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以仅次于柏格森的名次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但仍然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急切希望“将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直与资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流血和仇恨的坏名声挽救出来”。思想并不受经济决定论的支配；他明确坚持认为思想有赖于一个由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以实现决定性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的思想当时还没有充分形成——例如，勒沙普利埃法^[17]的通过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中产阶级将财产视为自由的基础，作为真诚悔罪的结果，并且“在当时环境条件下，他们是代表所有的人讲话的”。饶勒斯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

是和平主义者。他没有被爱国主义的幻想冲昏头脑，认识到欧洲的“专制君主”更愿意避免同革命的法国作战，因而惋惜失去了通过和平改革转变世界的机会。《社会主义史》尽管充满激情和冷嘲热讽，但在某种程度上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平心静气。托克维尔和饶勒斯都是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他们将有文化修养的人的敏感性和那些了解在人类事务中活动的局限性的政治家的现实态度带入了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还带来一种相对而言置身事外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本人所效忠的阶级在他们看来其利益处在大革命的边缘——一个是已成明日黄花的贵族，一个是时日尚未到来的无产阶级。

饶勒斯的研究范围虽广，但只是一段插曲，而且是非专业性的。而他的弟子马蒂埃却将教育界新科学知识的全部影响带给了大革命研究的社会主义学派。他的大量著作中对大革命的阐释和饶勒斯的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蒂埃强调思想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就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情况来看，他与欧拉尔的分歧始于对思想运动的不同看法，而在有关人的个性的争论上达到了顶点。他的博士论文认为，大革命中的宗教实验与思想运动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不是像欧拉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防方面的权宜之计。^[18]在出现这最初的观点分歧之后，这两位历史学家在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性格的解释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分歧。罗伯斯庇尔是马蒂埃的偶像——“我们为他一生的教诲和他死的象征意义而热爱他”。丹东沉溺于腐化堕落，而罗伯斯庇尔旨在重新分配财产使之有利于穷人的风月法令则是革命理想主义的顶峰。马蒂埃从阶级和经济力量的角度来解释大革命（有时考虑得太不成熟——如在一个简单的对比中他将吉伦特派等同于财产和商业，将山岳派等同于工匠和消费者），但是在他看来，真正的大革命说到底是由少数理想主义者构成的，他们陷于孤立，甚至被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群众所误解，为试图强行实现社会正义而与腐败的人们进行毫无希望的搏斗。

在马蒂埃颇有影响和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中，饶勒斯的理想再度获得生命，不过没有他那种平和的态度。资产阶级“愚弄”了人民。他们的所谓国民自卫军主要是防止抢劫活动的组织。对罗伯斯庇尔所反对的宣战提出了指责，而对恐怖统治却进行了辩护——那并不比在世界大战中枪毙逃兵更坏，而且最后在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

手中成为“锻炼未来民主的红色熔炉”。马蒂埃对每个人物的评判是严厉的，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以是否忠于大革命这一主观原则为基础，根据其名声如何用锋利的刀刃任意砍杀。吕西安·费弗尔说他是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外表上道貌岸然……好像是法律影片中的检察官，或者情节剧中的一个富基埃-坦维尔式的人物”。^[19]尽管如此，人们很难对马蒂埃的无情感到遗憾，因为正是由于这样才使他在解释大革命方面所作的贡献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他曾在一本著作（该书出版于1916年，这也足以说明问题）中，以一种富于情感的词句谈论爱国者和享有权利的人民，但该书的整个倾向，是要打破由米什莱广为传播和由欧拉尔偷偷带进学术领域的关于“人民”的神话。在另一方面，马蒂埃似乎像是左派的泰纳，因为正如泰纳重新挖掘农民起义这一研究领域一样，马蒂埃埋头研究巴黎的下层社会——密探、团伙头目、贪财的记者、军队的承包商、警察的密谋。从右派方面，观察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密切注视混乱的局势，希望从中寻找出蓄意策划的正式阴谋，现在暴露出从左派的高层中有可能看到实际的和形形色色的自私阴谋，像霉菌一样在混乱时期的黑影中繁衍滋生。

这种失之偏颇和过分渲染的看法，加上社会主义原则的影响，以及正经历着适应全面战争而运转的经济，就把马蒂埃的才华引向经济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普鲁东对历史学家的嘲笑——“他们编写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剧本”——一直保持着影响。当然，在这之前曾有过托克维尔，还有勒瓦瑟埃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开拓性著作（1859—1867年），以及巴尔扎克的小说的潜意识的持久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变化只是到了19世纪将结束时才出现。当时，由于有在俄国的经历而倾心研究农民经济的卢奇茨基^[20]发表了研究农村小地产和出售国家地产的学术著作（1897年），六年之后，饶勒斯又说服政府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出版有关大革命经济史的文献。马蒂埃一直没有机会仔细研究法国农民、封建赋税和土地占有体制。在他的综合史（1922—1927年）中，这些题目只是轻描淡写地加以论述，但是在他的晚年，他集中精力研究战争和恐怖统治的经济背景。《昂贵的生活费用与恐怖统治时期的社会运动》研究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系列食品供应危机以及伴随而出现的思想运动——旧制度下调节经济的各种理论在下层阶级中依然存在，而资产阶级则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第一个最高限价法令被看成是山岳派为争取忿激派的支持反对吉伦特派而付出的代价；

恐怖统治是普遍实行最高限价法令的手段，而热月政变则确定了资产阶级通过经营廉价地产和由于通货膨胀而取得的胜利。《昂贵的生活费用与恐怖统治时期的社会运动》发表于1927年。在此之前三年，M. 勒费弗尔的杰作《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北方农民》问世。大革命的研究进入其最重要的阶段——详细研究社会变革背后的经济结构与各种力量。^[21]

欧拉尔将大革命视为自己的采邑，由他征收贡赋的私人领地。马蒂埃曾这样说过，而他自己也非常无礼地对待侵入这一领地的人。那些欲染指这一领域但无力与教育界的专家们竞争的保守派，由于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赏识而得到慰藉。该学院曾将戈贝尔大奖（Grand Prix Gobert）授予马德兰^[22]的法国大革命史（1911年），并接纳加克索特和班维尔为院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通俗化”的史学著作有了极大的需求。单调乏味的环境中的大众教育以及陷入悲剧性变革过程中的不安感觉，造成了一种留恋如画往日的怀旧感和渴望得到轻松愉快的解释的心情。为迎合这种情绪，右派历史学家撰写了一些很有文采的教本——如芬克-布伦塔诺关于旧制度的（1926年），加克索特关于大革命的（1928年），以及班维尔关于拿破仑的（1931年）。所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同，但都是爱国的。加克索特并没有被军事上的胜利所迷惑，但他尽可能将社会的瓦解归咎于德意志文学的影响和格林、卢梭、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内克尔等“外国人”身上。另一方面，马德兰则对民族主义战争的英雄们顶礼膜拜——丹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卡诺运筹帷幄；波拿巴和他的元帅们则在两翼等待再创下一幕的辉煌史剧。相比之下，路易十六则受到冷眼看待。他是一个血管中毫无亨利四世血液的可怜的国王，真不愧是在被废黜中度过一生的斯坦尼斯拉夫的外孙。^[23]尽管右派的爱国主义性质各异，但他们描述的旧制度下的法国的面貌则是一样的。托克维尔为恢复旧社会的名誉提供了线索，从此就有人鼓吹建立一个由职能集团和有机组成的各地区构成的国家的理想。如拉图尔·迪潘的社会天主教理论，勒普莱对大革命期间有关遗嘱的立法造成的“不稳定家庭”的研究，迪尔凯姆的社会连带主义和迪吉的多元论，以及米斯特拉尔的传统地方主义。地方上的文物工作者公开了大批吸引人的古物，使巴博得以写出描绘乡间生活的随笔，西卡尔神父得以唤起人们对高卢教会独立时期丰富多彩的往日的回忆。旧制度的丰富多彩是很引人入胜

的。饶勒斯和马蒂埃由于强调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繁荣变化，也起了促进作用。右派乐于利用这一证据，将之也用于农村生活（根据是农民向收税人隐瞒了他们的实际财富），再加上一些关于巴士底狱如何舒适、密札具有宗法性质的奇闻逸事，并通过与20世纪过度中央集权的不光彩的法国相比较来增强其说服力。

那么流血的革命是如何从旧王朝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发生的呢？或许可以从不安分的少数人中间往往邪恶思想容易发酵滋长这一传统中找到答案。不过自从社会主义兴起后，左派也对这样的解释表现出令自己尴尬的兴趣——只是把贬义的形容词去掉了。^[24]1904年，保守派分子法盖宣称，各种陈情书证明“1789年的原则根本就不存在”，而驳斥他的则是马蒂埃。团结一致而自发行动的“人民”的神话一旦被打破，而且一旦人们普遍接受革命活动只是由少数人进行的这一观点，那么，革命乃是知识分子策划的阴谋的论点就开始失去其作为右派论据的战略价值。既然连奥尔良分子的和外国的阴谋都可以利用，而且大批野心家在一切合理的改革都实现以后很久仍然为了个人利益而继续保持着激昂的情绪，那为什么还要责怪那些虽反复无常却能蛊惑人心的情报呢？这至少是马德兰的解释，而且在1911年，右翼史学研究似乎正逐渐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波拿巴主义的观点，认为这场革命包括各种根本不相同的利益，并且是玩弄计谋，各种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掩饰而已。有人认为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并认为右翼又重新回到流亡贵族和泰纳的传统，这是科尚的思想倾向造成的结果。科尚是巴黎文献学院的高才生。他精通档案，这使他堪与教育界那些大史学家相匹敌。欧拉尔为了探索泰纳的真面目，花费了他生命的两年时间；而科尚一个独到的回答（1909年）就使情况完全改变，并新创了从此以后用来概括关于革命起源的两派观点的著名词语——“环境论”和“阴谋论”。“阴谋论”虽然听起来颇富戏剧性，而且科尚为证明和界定这一论点而作的研究始终没有完成，但是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关于勃艮第地区全国三级会议代表选举的研究（1904年）和他去世后发表的《思想团体与布列塔尼的革命》（1925年）表明，他进行的调查研究要比人们设想的更细致而较少戏剧色彩。他蔑视共济会“斗篷短剑”式的或奥尔良分子的各种阴谋理论。他曾告诉莫拉斯，他正在探索的“独创的体系和神秘的和谐关系”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网络，而不是一只毒蜘蛛居于中心的蛛网。为了替泰纳辩护，他抛弃了泰纳对暴民的那种固有的恐惧，而回到托克维尔关于民主运动存在

着实行暴政的固有危险的论点，并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揭露出来的在选举的虚伪外表下面政治“机器”运作的情况来加以论证。他在共济会支部、文学社团以及成千上万地方团体和协会中发现了宣传革命理论的活动，以及这些组织在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中操纵选民的初步迹象。关于18世纪的革命理论有大量著作问世，而在其他著作中，在专门研究历史的那部分著作中，对贵族的反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了研究——科尚的著作则涉及这两者之间的关键问题：思想是驱动各社会阶级和事态发展的力量。当对旧制度末期的阶级结构的研究正在把“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这样一些简单划分的类别分成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时，就更有必要对1789年它们之间的明显团结一致加以说明了。科尚的《思想团体与布列塔尼的革命》对如何理解各种抱负和理想结成这一奇异的联盟提供了一个公式。

科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欧拉尔死于1928年，四年以后马蒂埃也离开人世。于是M. 勒费弗尔成为大革命研究的首要学者。他是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大师，并且将彬彬有礼的态度带到争论之中，将论点中的细微差别纳入综合分析之中。这时，对大革命的研究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学术领域，有专门的刊物、机构和专家。外国学者也加入了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队伍。法国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干预，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回报。批判的方法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人们只需将勒费弗尔和泰鲁万小姐编辑的全国三级会议文献与欧拉尔的汇编相比较，或者将卡隆精选的有关九月大屠杀的史料与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比较，或者将卡米耶·布洛赫、塞和勒佐尔把相互关联的陈情书加以编辑发表的方法与以前的编辑者所采用的方法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已取得的巨大进步。以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取代了从零星史料概括出一般性结论的研究方法。克拉纳·布兰东对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所属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1930年），格雷尔对恐怖统治和流亡贵族的社会影响和年代范围进行了论述（1935年，1951年），对巴黎起义的社会构成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对大革命的思想渊源的研究现在也能够求助于莫尔内所提供的有关文学印刷品流传情况的精确材料（1933年）。此外还有关于秘密手稿传播情况的资料。尽管莫尔内提供的资料止于1789年，但其他人正将他这一主题的研究延伸到大革命的年代。M. 拉布鲁斯（1933，1944年）将精确的统计引入经济史，因此我们现在已可以将米什莱的“饥饿革命”同托克维尔的“繁荣革命”融入一个以18世纪的物价曲线为基础的单一模式之中了。

历史学家的观点仍然针锋相对。显然，M. 勒夫隆持天主教的观点，而M. 索布尔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前者并非教会的坚决支持者，后者也并非无产阶级的坚决支持者。像盖兰那样连饶勒斯和马蒂埃都被他指责为缝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口袋中”的专爱进行论战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左派承认农民和工人都没有纲领或阶级意识，而两次全面战争使所有各派都认识到危机会带来野蛮行为的必然性。以勒费弗尔的著作为典范确立了其地位的综合方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拉尔和马蒂埃，但要更复杂、更广博。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强调社会集团行动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集团内部的分化。例如，资产阶级进行了大革命，但他们是尾随贵族反叛之后进行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同无套裤汉结成联盟。他们胜利地兴起，但是他们无论作为集体还是个人，都并非与开始斗争时的那个阶级完全一样。在一篇短文中，勒费弗尔消除了丹东的信徒与罗伯斯庇尔的信徒之间的斗争。他并没提出新的证据，而只是研究了两个学派所设定的先决条件。尽管环境论仍占据中心地位，但已借助许多细微的差别而加以修正。恐怖统治是一场阶级战争，一场个人仇恨的冲突，一种代替无组织的暴力活动的办法，非基督教化所产生的一种附带现象，对战时经济的承认和保卫国家的权宜之计。并且与从大革命第一天起就存在的对“贵族的阴谋”的恐惧有密切关系。

在对大革命的阐释方面这种一步一步提高的细微变化虽然不能完全解释为由于循着新的方向进行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所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法国第一次出现是M. 阿隆从哲学方面向历史学家提出挑战，要他们摒弃实证主义中暗含的“宿命论成分”，而去研究“可以追溯既往的概率”。这种方法意味着必须排除曾迷惑了同时代人的那种认为革命是单一的、不存在性质差别的看法，排除他们出于党派利益，根据支持或反对大的整体而决定其观点的传统做法。这也意味着必须放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事态发展的主要模式本来是良好的，但“环境”像恶魔一样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在一场大革命中包括许多革命，各有自己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原因”说明为什么所有这些革命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果有人要就这些变化过程进行辩论，每一个都会有其“赞成者”和“反对者”，而且每一个都是与其他变化过程相反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这些冲突既合乎逻辑又无法预料，正是悲剧的素材，而每一次冲突都会抵消一系列可能性，即可能出现的悲剧。但

是，说明如何从现在可资利用的大量新资料和研究方法中产生新的综合法，不是本章的任务——那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即那些他们所研究的课题的“君主和立法者”的任务，而不是一个仅仅研究史学著作的历史学家的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的开头说道：“假如我是个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来空谈应该做什么事了；我会去做那些事情的，否则我就会保持沉默。”^[25]

（葛佶 陈沫 译）

[1] 或许可以举出两部特别令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感兴趣的著作。作为前一种方法的例子，如S. 梅隆《对历史的政治利用：对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者的研究》（1958年）。作为后一种方法的例子，如P. 法默《法国回顾自己的革命渊源》（1944年）。

[2] 例如，本文仅举了几部首先想到的比较老的著作而没有提到一些不可或缺的学术著作，如德罗兹：《路易十六朝历史》（1839—1842年）；西乌：《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历史》（1872—1881年）；许凯：《大革命时期的战争》（1886—1896年）；布雷特：《全国三级会议文献汇编》（1894—1904年）；梅利埃：《巴黎各区》（1898年）。

[3] 英国剑侠小说作家霍普的著作《曾达的囚徒》及其续篇《鲁珀特》中空想王国的名称。——译者注

[4] 这里没有篇幅讨论基内在关于大革命的“宗教”解释的辩论中的独特立场。这个“梅斯特尔的新教徒”的论点在思想史上是很吸引人的，但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或许可以略而不提。

[5] 这里引用基督教圣经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的话。在圣餐中饮葡萄酒以象征耶稣的血，后来成为基督教圣餐礼的一项习俗。——译者注

[6] 指1791年7月17日由拉法耶特指挥的国民自卫军开枪射击在巴黎马尔斯广场集会要求国王退位的群众，造成50多人死伤的事件。——译者注

[7] 雨果所写的长篇史诗。——译者注

[8] 这是英国作家格雷夫斯在其以第一人称写的历史小说《克劳狄乌斯一世》中的话。——译者注

[9] 或许以他1860年（指责卡莱尔把大革命描绘得过于阴暗时）说过的话——“这里不缺乏慷慨和热情”的精神。

[10] 指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奥尔良公爵摄政的时期。——译者注

[11]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年），意大利金饰工艺家、雕刻家、作家。其自传曾流传全欧。——译者注

[12] P. 德·拉戈尔斯：《大革命宗教史》，5卷本（1909—1923年）。该书在感情上倾向于天主教。

[13] 欧拉尔在他的刊物《法国革命》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述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这些文章对本文主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14] *Fédérations*，指1789年革命时由各个城市的国民自卫军自动组织的联盟。——译者注

[15] 即1793年。——译者注

[16] 指1792年9月巴黎大批屠杀被监禁的囚犯的事件。——译者注

[17] 1791年6月14日，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的勒沙普利埃提出并通过的法律，宣布一切工人或雇员的结社均为非法。——译者注

[18] 不过马蒂埃后来在一篇研究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文章（1911年）中十分强调制宪议会与教会之间破裂的经济原因。

[19]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法庭检察官，在恐怖统治时期颇有权势，以铁面无私著称。自称审判过包括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内的二千余名反革命分子。——译者注

[20] 卢奇茨基（1845—1918年），俄国历史学家，有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大革命前夕法国农民史方面的著作问世。——译者注

[21] 1933—1934年，施内尔布、布雷施和哈里斯开始发表研究税收、金融和指券的论文——马里翁的著作（1919—1921年）为之奠定了基础。

[22] 1900年，马德兰发表了一部富歇的学术性传记。

[23] 亨利四世系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路易十六的祖母系波兰逊王斯坦尼斯拉夫一世之女。——译者注

[24] 布尔什维克革命表明，革命者是如何为少数人所起的教育作用而自豪，托洛茨基就是如此。而克伦斯基则辩称革命是“在沙皇制度崩溃的混乱中诞生的”，持环境论的观点。

[25] 中译文引自《卢梭文集·社会契约论》，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看来，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各种思想之间的战争，而这场革命的爆发则是一系列政治危机——1787年显贵会议拒绝卡洛纳的税制改革方案，全国三级会议的召开，国王1789年7月11日罢黜内克尔——的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高潮，而造成这些事件的背景，则是农民和骚动的城市居民一致聚众而起，在世代积郁的不满和希图轻而易举掠得好处的愿望激励下，等待着同贵族、收税官和城市当局来一次清算。然而在近半个世纪中，这一普遍看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饶勒斯、马蒂埃、勒费弗尔和拉布鲁斯等作家的著作所修改，而所有这些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影响。随着有关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人们发现有必要更多地注意总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尤其是成分极其复杂的农民和小市民特有的不满情绪和社会要求，因此，这些人的介入不再仅仅被看成是对凡尔赛和巴黎的贵族、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言行所作出的回响和反应。人们也更多地注意旧制度下的法国最后25年当中的“封建反动”以及高等法院和外省贵族的目标，正是他们进行了1787—1788年间著名的贵族反叛；实际上有人甚至宣称，这一插曲不仅仅是揭开了1789年种种事件的序幕，而且标志着大革命本身的开场。^[1]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罗伯斯庇尔就这样看，而夏多布里昂则写道：“贵族开始了革命，而平民赢得了革命。”然而就比较普遍的情况而言，近年来研究的结果已将强调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从凡尔赛和巴黎转向外省，并将大革命的爆发说成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在1789年夏天发生激烈冲突的那一时刻。

当然，说这些不同的冲突可以追溯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如果不是追溯到“大帝”^[2]本人统治时期的话——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然而，从路易十四去世到1789年的财政大危机这一阶段中，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的既不是殷实的农村地主，也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甚至也不是投石党贵族——事实最终证明，他们都有各自特定的账要同旧制度算。挑战一方面来自难以驾驭的巴黎和各省的高等法院法官，另一方面来自城乡的小消费者——首先是购买小麦和面包的人

——在整个18世纪，他们经常同当局发生冲突，往往是暴力冲突。确实，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经常由于工资和工时举行罢工；工资往往赶不上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在旧制度后期；巴黎的织袜工、书籍装订工、建筑工人和搬运工在1724年、1737年、1776年、1785年和1786年，里昂的丝织工人在1744年、1774年和1788年都举行过罢工（后面几次几乎达到起义的程度）。但是，当时还没有工厂制度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雇佣劳动者同其他小消费者一样，更关心能否提供便宜和充足的面包，而不是自己能挣到多少钱；他们更易于以哄抢食品而不是以罢工来作为社会抗议的形式。然而，城市雇佣劳动者尽管在巴黎和纺织工业中心（里尔、里昂、特鲁瓦、色当、鲁昂和兰斯）人数众多，但在外省的小城镇和传统工艺的故乡则是少数。无论如何，农业短工的人数要比他们多得多，大量的农村小地产所有者、小条植农、分成佃农和葡萄种植者——这些人构成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仍靠购买面包和粮食来糊口，在周期性萧条时期尤其如此——的人数就更比他们多得多。^[3]对这几百万人来说，面包是主要食品，即使在正常年景也要占到他们的开支的50%左右。在物价飞涨时——例如1709—1710年的饥荒时期以及像1725年、1740年、1752年、1766—1768年、1770年和1775年物价上涨不那么触目惊心的时期，他们要把收入的60%、70%甚至80%用在面包上，更可能的情况则是他们不得不忍饥挨饿。因此，在这些年份出现暴乱，往往伴随着由城市工人、小店主和手工匠人以及小农在国内不同地区实行的民众物价控制（即由民众规定价格）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这些事件本身并未构成对现存秩序的严重威胁，然而，它们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最普遍的一种经济骚乱形式，同时又是大革命从旧制度中连同其他许多东西一道继承下来的一种动乱形式。

这些骚乱中范围较广、最接近于导致革命爆发并与大革命本身过程中许多群众运动最为相似的，是1775年4—5月间席卷巴黎、法兰西岛地区及毗邻各省的“面粉战”，^[4]然而，这些骚乱尽管规模很大，并在当局和有产阶级中间引起关切，但却没有造成直接后果。部分原因是粮食危机尽管严重而广泛，但相对而言延续的时间短，到10月份价格就开始下降了。其次，杜尔哥在当时仍完全忠于政府的教士和军队的支持之下设法粉碎了这一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卷入这一运动，什一税、封建义务和狩猎法令等问题还没有发生。

最后也可能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开始向现存秩序提出挑战，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要反对一场其矛头指向他们本阶级成员和一位大臣的运动；当初这位大臣上台时曾受到他们的欢迎，他所实行的改革——包括粮食自由贸易——曾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实际上，在某些城镇还集结了资产阶级的民兵来粉碎骚乱。总之，“面粉战”的主要教训是，在18世纪法国的条件下，任何雇佣劳动者、工匠和农村贫民的孤立运动都没有希望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当然，如果这类事件得到其他社会阶级在行动和思想上的支持和加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此后12年，尽管是利润下降和生意萧条的时期，^[5]但粮食价格较低或稳定。整个法国每一塞蒂埃^[6]谷物的平均价格在20—24里弗尔之间。在巴黎，面包的价格一直相当稳定：我们从巴黎书商哈迪的日记手稿中得知，在1767—1775年间，一个四磅重的面包的价格很少低于11个苏，而1776—1789年间正常价格是8个苏或9个苏，只有在1784年很短一段时间里上涨到10.5个苏或11个苏。因此，尽管一场相当规模的危机已在成熟，但当时的人们却看不到。这是一个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发生的一些群众运动也是分散的和零星的，原因各不相同：1778年在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1784年在贝耶、1785年在雷恩发生了面包骚乱。1784年和1786年，在巴黎发生了反对总包税人新近对进入首都的家畜、肉类、葡萄酒、木柴和其他消费品设卡征税而举行的一系列抗议中的第一次。也是在巴黎，人民中间反教权的情绪似乎又有所抬头：哈迪记录下来1783—1789年间的一些事件，使人回想起18世纪20年代对耶稣会和1752—1753年间在告解证（billets de confession）问题上对巴黎大主教的敌视。

1787年是贵族反叛开始的年头，这一事件拉开了1788—1789年间革命危机的帷幕。它是由法国加入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财政危机而产生的。为了弥补越来越大的赤字，担任财政总监的卡洛纳建议采取一系列新的、严厉的补救办法（其中扩大印花税和按土地年生产普遍征收土地税两项后来引起最深刻的争论），这些措施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整个财政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并保证王室从直接税中获得持久和不断增加的收入。^[7]这类计划通常应提交巴黎高等法院，而为了避开它的反对和阻挠，决定专门召开一次显贵会议，其成员由国王挑选。会议于1787年2月22日召开。

但是由于利益的冲突和这位大臣普遍不受欢迎，计划宣告失败。顽固的少数派自然对给他们所珍视的免税权造成威胁感到不满，城市的代言人则反对印花税，因为这一税种的负担将主要落在商界身上。开明贵族虽然原则上不反对这些措施，但觉得这些措施既不完备，又可能因为没有有效的保证而被一位胡作非为的大臣所滥用。为了打破僵局，国王于4月8日将卡洛纳解职，在王后的要求下，由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取代。然而，尽管布里安获得显贵会议的信任，并且是卡洛纳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但他的成就也并不大。在细节上作了某些让步后，他不得不在实质上退回到他的前任的计划上去。一度显贵们是合作的：他们同意了所有建议，但由于突然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可能是由于他们的会议招来潮水般的小册子文章的缘故），他们坚持这些建议在实施前应提交巴黎高等法院，或者最好是（这是拉法耶特的建议）提交自1614年以来一直没有召开过的全国三级会议。显贵会议在勉强作出这一决定后，于5月25日解散。

又一次，正是司法界的寡头集团而不是高级教士、外省贵族或血族王公们最坚决地向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提出了挑战，并打响了“贵族反叛”的第一枪。然而，高等法院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反动机构。除少数亲王、公爵和主教外，它的主要审议机构——贵族法庭（the cour des pairs）——大部分由年轻法官组成（在知道年龄的72人中，有59人在35岁以下^[8]），他们分成两个主要政治集团，一部分人希望利用一切机会维护自己的特权——包括古已有之的和篡夺来的——而反对政府的权力，另一部分是以后来成为制宪议会成员的阿德里安·迪波尔为首的少数派。他们在启蒙思想家和美国革命的激励下，迫切希望实行意义深远的宪政改革。当时的形势形成了这两个集团，它们的最终目标虽不一致，但都对政府的“专制统治”抱有戒心，并且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希望通过全国三级会议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面对布里安的建议，他们自然都同意放松对粮食销售和出口的限制并欢迎建立省议会，但对印花税表示抗议，断然拒绝土地税，并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处理财政危机。然而，尽管在8月召集的国王参加的一次高等法院会议上颁布了一些法令，几天后巴黎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到特鲁瓦，但在对抗中取得第一回合胜利的是高等法院而不是这位大臣。各省的高等法院按照近时的做法，联合一致支持巴黎高等法院，而政府则由于对荷兰危机处理不当而进一步陷入困难境

地，于是匆忙收回关于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并在9月底恢复了巴黎高等法院，以换取其同意将廿一税延长到1792年。

高等法院重返巴黎时，多菲内广场、阿尔莱大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地方一片欢腾。法官们是经验丰富的煽动家，在以往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已开始传播“民族”和“公民”一类字眼，并由于宣称自己是传统自由的捍卫者而在资产阶级和平民中间享有相当广泛的支持。这次庆祝活动还是比较克制的，但这些活动标志着从1775年粮食骚乱以来首次在首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骚动。人们焚烧了卡洛纳和王室儿童家庭女教师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的模拟像，新桥（Pont Neuf）上燃起了篝火，王室卫队施放了焰火。从哈迪的描述和9月28日（那是一周庆祝活动的高潮）逮捕人的情况来看，骚乱似乎首先由法院的职员引发，并得到旧城区奢侈品行业的学徒和工匠的支持。后来的示威游行的主要支持者市郊和市场区的群众几乎没有参加。在资产阶级中除律师外当时还没有人卷入。

然而危机加深了。最初，巴黎高等法院同意为继续借款进行登记，以换取在1792年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明确承诺。但是谈判在11月再度破裂，在辩论中特别直言不讳的奥尔良公爵和两名为首的法官被流放。1788年5月，高等法院发表声明，谴责由政府独断专行的整个制度，包括人们极为反感的密札，因此在民众中的声望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回答是派军队包围法院，迫使高等法院的人将他们的领导人交给王室法庭，并颁布由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起草的六项法令。这些法令中止了各高等法院的活动，将其受理上诉的权限大部分交给47个新建立的审判庭，并将它们登记王室法令的权力移交给所谓的“全权法院”。

政府希图通过这些措施离间难以驾驭的高等法院与整个民族——特别是大批中产阶级检查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最高权力法院”的垄断行为断绝了这些人晋升的道路。这是一次严重的失算，政府的这次政变不仅没有争取到同盟者，反而引起全国范围对其策划者的造反。首先，原本被请来投票表示感谢的僧侣会议，却对中止高等法院活动表示抗议，并重申僧侣享有免税权。公爵和贵族们也同各高等法院一起表示抗议。最后，贵族们尽管长期以来一直与司法界的寡头集团作对，这次却找到了表示支持的好时机：他们希望借此保护自己在财政方面的特权不受进一步攻击，并通过新建立的

省议会扩展自己的政治权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像米拉波和拉法耶特那样（而不是像迪波尔和巴纳夫那样）的“爱国者”——反对特权和“专制”的“民族”斗士——一直倾向于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而现在却反而倾向于站在高等法院一边。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全国三级会议的召开。夏季，在波尔多、第戎、格勒诺布尔、波城、雷恩和图卢兹这些具有地方分离主义和贵族自治传统的城市爆发了骚乱。在多菲内，贵族和第三等级一起非法恢复古老的省三级会议；在布列塔尼，他们团结一致抗议政府的“专制统治”。在格勒诺布尔，由律师手下的职员们发起，得到城镇居民和进城的农民支持的大规模骚乱，使中止了权力的法官们没有离开这座城市达五天之久。在雷恩，贵族们通过煽动手段利用民众对粮食自由买卖造成的物价高涨，地方长官和军事长官在街上受到攻击，并被围困在家中。

面对这样的团结一致的反抗，政府再度被迫作出让步：许诺在1789年5月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由内克尔取代布里安，拉穆瓦尼翁的司法改革中止实行，高等法院很快就被召回。在巴黎，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在多菲内广场和其他通向法院的地方举行庆祝。点燃起篝火，乘坐马车通过新桥的人被迫向亨利四世的塑像鞠躬并高喊“打倒拉穆瓦尼翁！”然而有一个新的因素使这些骚动超出前些年的规模和限度。由于严重歉收，长期稳定在9个苏的4磅一个的面包的价格在8月17日上涨到9.5个苏，20日上涨到10个苏，9月2日涨到10.5个苏，9月7日涨到11个苏。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下，郊区民众加入了两天前由高等法院职员发动的骚乱，并完全改变了骚乱的性质：骚乱扩展到市场区和大学区，一直持续到9月底（其间有短暂的间歇），并造成严重伤亡和大肆逮捕，受害者主要是散布在各区的雇佣劳动者和工匠。巴黎的无套裤汉同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的农民一样加入了这场运动；但他们还只是特权阶层的小伙伴。真正的革命危机还没有到来。

1788—1789年之交的冬季，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并引起各种力量的根本性重新组合。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和为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进行的准备。拉布鲁斯教授的研究工作的重要功绩之一就在于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大革命前夕造成法国不同社会阶级不满的普遍原因和特殊原因。对包括自耕农、工业家、商人和佃农在内的许多人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时期：1733—1778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稳定上升，如前所述，经济方面不

满情绪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仅限于雇佣劳动者和小消费者——以及难以驾驭的法官们。1778年以后，部分是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有10年时间物价不断下降——大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是逐渐下降的，但葡萄酒和纺织品价格的下降则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在这一时期，由于沉重和持续的赋税，什一税以及封建领主的盘剥，小佃农、自耕农、葡萄种植者和其他分成佃农的净收益的下降往往远超过价格下跌的幅度，而大土地所有者能够利用封建赋税来缓和收入的下降。在这种“革命前的不适”之上，又突然降临了1787—1789年更大的灾难：表现为连续的坏收成，随之而来的粮食短缺，由于政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严峻，不出两年小麦价格在北方主要产区翻了一番，1789年仲夏32个财政区中有27个小麦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水平。^[9]在巴黎地区，1788年7月的一场反常的冰雹使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在巴黎地区，4磅一个的面包价格在11月8日上升到12个苏，28日涨到13个苏，12月11日涨到14个苏，最后，在1789年2月1日涨到14.5个苏；这一价格一直保持到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与此同时，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已经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危机，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以及1786年的英法商约所造成的来自英格兰的竞争而进一步加剧。结果，这年冬天在每一个纺织业中心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根据工业检查官对1788年9月至1789年1月情况的报告，在亚眠有4.6万人失业，在鲁昂有1万人，在法莱布有8000人，在卡尔卡松附近有3万人，在里昂有2.5万人。而在特鲁瓦和色当有一半织机停开。在巴黎本地，据报道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涌入。这样，积累起来的经济病症和社会不满为当时开始进行的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准备工作带来十分不祥的兆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迄今一直不参与各次事件，或者仅仅在持不同政见的特权等级中起次要作用的第三等级中的各有产阶级登上了革命的舞台。引起冲突的普遍原因深深根植于旧制度之中：在这个世纪中，殖民地贸易、土地的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均大大增加，而资本投入和生产的发展即使在繁荣时期也由于特权公司、封建地主和专制王朝在每一关键时刻对起码的资本主义自由——雇工自由、生产和销售自由——的种种限制而受到妨碍。然而，尽管由此而造成的冲突最终之所以如此尖锐和起了决定作用是由于上述这些更深刻的对立，但是这时接着出现的资产阶级与特权等级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在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权和表决权问题上产生的。9月25日，巴黎高等法院要求

全国三级会议应按1614年那样组成——各个等级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并分别进行表决——这样它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民众自由权利代言人的声誉。尽管巴黎高等法院后来收回了这一声明，然而损害已无可挽回。12月，皇族王公们指责第三等级的要求危及国家的安全，更加直言不讳地坚持维护特权。对于构成第三等级政治喉舌的专门职业者和产业主来说，这种做法的目的十分明显——保持特权等级在全国三级会议中的支配地位，使第三等级的作用仅限于投票表决由其他等级已批准的赋税，特别是保证他们所珍视的教士和贵族享有的免税权。巴黎高等法院的声明引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宣传小册子浪潮，几乎毫无间歇地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其中最著名的是1789年1月底发表的西哀士神父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本小册子大胆地宣称，“民族”是由第三等级一家构成的，否认其他等级能在其中发挥任何有益的作用。但是大多数作者的论点仅限于反对特权等级的要求，坚持第三等级在全国三级会议中应有双倍的代表权，表决则应共同进行（“按人头计算”）而不应由每个等级分别开会进行。这一观点在1788年12月27日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当时内克尔在首先征求第二次显贵会议的意见（他们提出相反意见）后，说服御前会议同意第三等级代表的名额加倍；而表决方式问题仍暂时搁置。^[10]

但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也造成重大后果。1月，马莱·迪庞指出，问题已经不是国王与特权等级之间在宪法问题上的冲突，而是“第三等级与其他两个等级之间的一场战争”。第三等级被承认为“民族”领袖，同时，特权等级似乎已完全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固然，多菲内高等法院继续支持民众的事业，直到1789年夏天仍得到普遍拥护；在布列塔尼，贵族与第三等级围绕内克尔的声明爆发了武装冲突；贵族也还能在雷恩的平民百姓中找到支持，这些人在1月末的面包骚乱中同时高呼：“国王万岁！贵族万岁！”但这种情况只是例外，并且越来越少。更令人吃惊的是，王朝重新以民众自由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12月27日路易十六发表声明，似乎站到了全国范围的改革和减轻经济痛苦的要求的一边，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希望（la grande espérance）：国王将亲自召集全国三级会议，以便找到矫治年深日久的不满的办法。正如香槟省小岛区（Les Islettes）的一位农妇1789年7月对阿瑟·扬所说的：“听说现在有些大人物要为那些穷人做一些事，但她不知道是哪些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做，除非上帝恩赐我们好日子，因为

人头税和其他赋税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了。”^[11]与这些希望伴随而来的虽然往往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确知特权阶级将竭尽全力阻碍这些希望的实现（“贵族的阴谋”），但它们在激励小业主和城乡贫民在接着而来的春季和夏季中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干劲方面仍起了一定作用。

与此同时，1789年1月24日发布了关于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的规定，为了表示政府的诚意，还请人民提出自己的陈情书以指导会议的审议。选举的安排就范围而言虽很广泛，但极为复杂，而且由于政府在内克尔授意下拒绝对候选人或纲领作任何指导，因此给一些寡头政治集团和有专业的资产阶级以尽量影响选举进程的可能，这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般说来，选区按以往的司法管辖区，即所谓的大法官辖区（*bailliages*）和司法总管辖区（*sénéchausées*）划分；但巴黎作为一个单独的选区，重新恢复的多菲内三级会议也被授予指定自己的代表的权利。代表由各等级分别选举。特权等级的成年男子均享有直接选举权；所有25岁和25岁以上的世俗贵族在他们的选举人会上均有投票权，自己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均可。主教和教区神父享有同样的权利，不过公祷团成员和修道士只有权选派代表参加。第三等级的代表则在选举权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通过更加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产生。除在巴黎规定选举权限于每年缴纳6里弗尔人头税的人之外，所有年满25岁，名字列入纳税名单（不管缴纳多少）的法国人都有权在各自的初选会上投票，也就是说或者在自己的教区，或者在城市中自己的行会。简而言之，除了家庭佣人、无户籍者（*non-domiciliés*）、住在父母家中的儿子、最为贫穷的劳工和真正的贫民之外，所有男性成年平民都有选举权。但是这一等级最后当选的代表，只有经过两个、三个或者四个阶段——取决于该选区是城市选区还是农村选区以及是主要的是次要的大法官辖区（或司法总管辖区）——才能产生出来。

不管政府的动机是什么，这种制度毫无疑问最有利于城市中有专业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第三等级的选举人会上的讨论中和选举中处于支配地位，充分利用他们实际上垄断了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的有利地位，并拥有手段和空余时间来协调“爱国者”的共同行动、印刷通知和小册子和进行竞选活动，而乡下的工匠和农民，更不用说劳工和农村贫民，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城市资产阶级夺得了第三等级

代表中的大部分席位绝非偶然：到凡尔赛去代表第三等级的610人中，约25%是律师，5%是其他专业人员，13%是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从事农业的最多只有7%—9%，即使在这部分人中也只有极少数是农民。

[\[12\]](#)

正是在这一竞选过程中，在宪政改革的推动者中产生了所谓的“爱国者”派。这部分人虽然主要是鼓吹第三等级的目标，但他们中间包括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和孔多赛侯爵这样的富有的贵族，阿德里安·迪波尔、埃罗·德·塞舌尔和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这样著名的高等法院法官。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在大革命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有些人属于共济会支部，另外一些人则属于著名的“三十人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在迪波尔家里聚会，由律师、开明贵族和教士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组成（塔列朗和西哀士也是其中的成员）；还有一些人，例如西哀士和米拉波，则充当委员会与奥尔良公爵之间的联系人，这位公爵在进行着他自己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这些事实使得历史学家过分强调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革命宣传鼓动的中心，并夸大了共济会和三十人委员会的作用，把它们的活动看成是一个破坏旧制度的共同“阴谋”的证据。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共济会支部吸收的人具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通信联络的发展尚不足以在一些相对而言不知名的人们中间形成有高度组织的指导中心。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在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中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领导人，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全国性的讨论，并给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与他们大致持相同观点的人的自发行动打上他们的性格和思想的印记。

与此同时，选民们草拟了自己的陈情书。陈情书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由教区或行会的初选会草拟而提交给大法官辖区的选举人会议的，另一种则是由大法官辖区选举人会草拟直接提交给全国三级会议的。直接提交给全国三级会议的这些综合性陈情书原来共有615份，其中522份保存了下来，相当均衡地分属于三个等级。[\[13\]](#)正如人们可能预想的那样，教士和贵族的陈情书（巴黎城内的贵族的陈情书明显地属于例外）强调他们的传统特权与免税权，虽然他们也承认财产平等的原则。同时，他们同第三等级一道要求废除绝对君主制的许多更具压迫性和奢靡浪费的做法。他们直言不讳地谴责财政方面的滥用职权和奢华铺张、大臣们的独断专行、密札制度、反常而令人气愤的内地

关税以及当时实行的度量衡制。在更加积极的方面，他们要求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和个人自由（尽管没有要求信仰自由），并且颁布一部宪法。该宪法一方面保持君主政体的传统权力和权威，同时赋予定期召开三级会议以制定法律和就税收问题进行表决的权利。税额的估定与征收则委托选举产生的省、市议会负责。总之，在涉及政治和行政改革的问题上，三个等级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看法。

但是第三等级的综合性陈情书——几乎都是由资产阶级分子起草的——却要求的多得多。他们不仅要求言论、著述和集会自由，贸易自由和不受任意逮捕的自由，而且普遍坚持要求实现所有三个等级的完全的公民平等——也就是说，教士和贵族不仅要放弃像农奴制那样完全名誉扫地的残余物，并且还要放弃什一税、磨坊税、实物地租、狩猎权和领主司法权等沿袭已久的特权。虽然资产阶级即使不是从切身经历中，至少也是从考察农民的不满中了解到许多东西，然而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土地——在陈情书中如果说曾经提到过的话，那也实属罕见。

要了解农民的特殊要求以及不大经常得到反映的工匠和雇佣劳动者的要求，我们必须转向大量的教区陈情书和偶尔才能看到的行会陈情书。这类陈情书中有些像第三等级的综合性陈情书一样，是（全部或者部分）以传阅的形式提出的。雇佣劳动者和比较贫穷的农民即使有权参加选举人会，也往往由于受到恐吓、必须去干活或者由于根深蒂固的屈从于雇主或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处境而不能参加会议或者默不作声。尽管如此，至少还是有足够数量的教区陈情书保存了下来，可以说明两个事实：一是这些阶级全心全意支持资产阶级对专制王朝以及在土地所有权和司法方面的封建残余所提出的批评，另一个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往往在其他方面使他们同第三等级中的城市产业主（或地主）产生尖锐的分歧。

在陈情书中，如同在这一时期整个的小册子文章中一样，很少能够听到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声音。在巴黎，没有像在其他一些地区那样，邀请各行会在它们自己专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初步的陈情书，而即使是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地方，一般也把刚出师的工匠排除在工匠师傅们的会议之外。然而，由于当地的情况或出于偶然，在兰斯、特鲁瓦、马赛和里昂事实上还是听到了雇佣劳动者的不平。在这些地方，更多表达的与其说是工人对低工资的关切，不如说是对高物价的关

切。最普遍的情况是，在政治、社会和产业问题上，他们唯雇主的马首是瞻。农民的陈情书则要直截了当得多。除了整个农村社会普遍性的不满外，我们还可以听到自耕农、分成佃农、小条耕农和短工们的特殊不满。在鲁昂地区，小麦的价格涨到每蒲式耳8里弗尔，4磅一个的面包的价格涨到16个苏，村民们要求将两者的价格都降低一半。在布列塔尼，雷恩附近的小农抱怨说，纳税和封建领主盘剥造成的沉重负担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满足了收税人和地主的要求之后，一块年产值为40里弗尔的条田的所有者所能得到的净收入仅10里弗尔。在皮埃尔维尔教区（科唐坦），自耕农直言不讳地谴责王室官员以及什一税和狩猎权，以致大法官拒绝接受他们的诉状，而是自己口述了一份陈情书！在洛林和埃诺，一些无地农民和小自耕农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村镇里比较富裕的人鼓动的圈地法令和清理土地计划。在孚日，某教区的陈情书抗议说，在划分公地以后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短工的做法，破坏了短工与自耕农之间迄今存在的和谐关系！总之，教区陈情书既反映了在反对王室收税官、什一税享有者和地主时将农村社会一切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纽带，也反映了小消费者与大生产者、无地劳工与佃农和地主的进一步分化。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深刻地影响大革命在乡村中的进程和结果。

与此同时，小消费者并没有将他们的抗议局限于陈情书中的言辞上。作为对1788年的坏收成和粮价急剧上涨的反应，1775年以来第一次旷日持久的消费者运动于12月开始了。这场运动不仅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秋天，而且很快便同小土地所有者反对封建狩猎权、什一税和领主赋税的运动汇合起来。随后，这两个运动又同资产阶级和市民的政治行动汇合起来，在1789年夏天共同达到高潮。

反对粮食短缺和物价上涨的叛乱在省督们以及代理人的报告中均有记载；泰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这些资料来源描绘出他那“自发的无政府状态”的片面图景的。这场叛乱采取了传统的形式——从抢劫运粮船和粮仓，强行控制面包、面粉和小麦的价格（有时是在顺从的当局合作下进行的），袭击面包房、集市和市政厅，到攻击税务官员、商人、磨坊主和农场主，以及到处——虽然很少是不分青红皂白——毁坏财产，不一而足。12月和1月，这类报道从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图赖讷传来，3月和4月从勃艮第、多菲内、法兰西岛、朗格多克、尼韦奈、奥尔良、皮卡第、普瓦图、普罗旺斯和图赖讷传来，5月和6

月从康布雷西斯、利穆赞和里昂地区传来，7月从香槟和诺曼底传来。这些骚乱中对社会震动最大的是4月底在巴黎的圣安托万郊区爆发的那一次。两个著名的制造商、巴黎第三等级受人尊敬的成员勒维荣和昂里奥的住宅遭到洗劫并被烧毁。王家轻骑兵团奉命开枪，许多暴乱者和旁观者死伤，主要是圣安托万和周围地区的工匠、学徒和雇工。尽管这场骚乱的直接原因是据认为这两个制造商要降低工资，但根本的原因是普遍存在的面包匮乏和价格昂贵。这场骚乱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尽管人们怀疑这场骚乱是神父们和另外一些特权等级的著名支持者挑起的，目的是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前夕败坏第三等级的声誉，然而据报道说骚乱者曾高呼当时的“爱国”口号：“国王万岁！内克尔万岁！第三等级万岁！”

在1788年后几个月，巴黎地区偷猎和攻击猎场看守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到了春天，这类行动发展成更加普遍的反对狩猎法以及王室和贵族的狩猎权的运动。在孔蒂亲王位于塞日、蓬图瓦斯、亚当岛和博蒙的庄园——这些地区都曾在1775年发生粮食骚乱——自耕农和雇农由于雹灾颗粒无收，于是在12月开始捕杀他们田地里的兔子。这一活动在春天扩展到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和附近的村庄，结果同骑警发生冲突。在科尔贝尔和沙图发生了暴力冲突。首都以南和以西的所有村庄由于许多年来受王家猎场的掠夺而采取行动。6月间以非法进入国王的森林和贵族的保留地的罪名而被缴械。2月，多菲内的农民拒绝向地主缴纳传统的免役地税，3月他们暴力袭击被指控囤积粮食的教士和贵族。3月，在马诺斯克人们向塞内主教提出同样的指控。在布列塔尼，农民冲进市场，高喊“贵族和高官们是乔装打扮的粮商”。与此同时，在阿图瓦的瓦西，十几个村子的农民成群结伙地杀灭瓦西伯爵的猎物，并且拒绝今后再向他缴纳传统的农产品什一税（soyeté或称terrage）。3月从普罗旺斯，4月从加普，5月从皮卡第、布列塔尼和康布雷西斯，7月从佛兰德都传来农民反抗王家赋税、什一税和封建领主的各种捐税的消息，这一运动接着又引起7月底和8月间规模更大得多的运动，蔓延的地区远至阿尔萨斯、诺曼底、埃诺、马孔奈和弗朗什孔泰。骚乱过后到处是被破坏的城堡和被毁坏的庄园的地租账册。

因此，由国王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正式宣布开幕的全国三级会议，由于危机和争吵而陷于分裂，或许就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了。很自然，第三等级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它已经在使自己的代表

比传统增加一倍方面赢得了重大让步；在它进一步要求实行共同表决办法方面，据知也得到教士中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派（第一等级的代表中有两百人是教区神父）和贵族中约50名开明分子组成的一个人数较少的少数派的支持。此外，巴黎就在附近，在那里“爱国者”派有着使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第三等级与其他等级的斗争中，他们所给予的绝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

在凡尔赛，没有一件事不伤害平民的感情或能够实现他们及早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们接到命令必须穿着传统的黑色服装，从旁门进入会议大厅，在一切方面都令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地位的低下，由于内克尔的政策和掌玺大臣巴伦坦的政策相互冲突而陷于分裂的国务委员会又一次缺乏坚定的领导：内克尔在三小时的发言中建议特权等级自动放弃税收方面的豁免权，同时又忠告第三等级表现出克制，不要坚持要求所有三个等级共同表决，而是由三个等级分别确定哪些问题可以共同审议和共同表决。在第三等级看来，在关键问题上国王显然是站在特权等级一边：各个等级如不联席会议，允许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就将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让步；没有其他等级中看法相同的代表的支持，他们将会在表决时始终被对手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所击败。正是由于上述这些考虑，现在造成了在审查代表权的程序性问题上的长时间的争论。第三等级坚持要求讨论每一个代表的授权是否有效，作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更重大问题的第一步。而其他两个等级的领导人也同样看到，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等于向接受举行联席会议的原则迈出了步子，那将实际上破坏贵族和教士的支配地位和表决实力。

三级会议最初的五个星期被用来设法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5月7日，第三等级拒绝审查自己的代表权或者组成一个单独的议事厅。另一方面，贵族们则于5月11日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针，于两周后郑重宣布，按等级表决是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教士却由于内部分歧发生分裂。5月8日，尽管教士同意审查自己的代表权，但没有宣布自己组成一个单独的议事厅。5月27日，保守的主教们以微弱的多数阻止本等级接受第三等级的邀请，共同讨论存在争议的问题。政府寻找妥协方案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6月10日，第三等级在群众的支持下，决定挣脱羁绊自行其是。它邀请其他等级共同审查代表权：如果他们拒绝与会，它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单独行事。在少数教区神父的参加下，它于14日完成了对选

举结果的审查，选举了一名主席（巴伊）和两名秘书，并于17日以491对89票的多数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第三等级在采取了这第一个革命行动后又发布了两项法令。一项规定，不论根据什么理由解散国民议会，都将使一切现行赋税失效。另一项规定，新宪法一旦确立，公债将加以统一，由整个民族承诺支付。6月20日，又遇到新的挑战。新成立的国民议会通常使用的会议大厅——看来是出于偶然——被关闭，代表们被拒之门外。全体代表跟随巴伊主席转到附近的一个网球场，除一人外都庄严宣誓，国民议会在宪法牢固确立之前决不解散。在此前一天，教士们以微弱多数决定站到第三等级一边，在以后的几天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第三等级。

甚至在上述最后一个反抗行动之前，内克尔就曾敦促国王行使他的权威，打破各等级之间的僵局，采取主动行动实行立法改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建议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在会上宣布像全国三级会议将来应如何组成这类问题应由联席会议讨论，而涉及每个等级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则应分别审议。在国务委员会内部激烈争论之后，于6月19日作出第一项决定——大概是根据内克尔的建议——于22日召开御前会议。但此时国王像以往一样优柔寡断，又听信了其他顾问的意见。皇太子于6月初去世后，宫廷隐退到马尔利，在那里王国周围是一群以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廷臣，他们的看法又得到王后和特权等级领袖们的支持。国王听从这些人的话，同意撤销自封的国民议会的6月17日法令，将未来全国三级会议的组成问题交由各个等级分别讨论，并以显示武力恐吓第三等级。御前会议推迟到6月23日才召开，已被秘密同意解除职务的内克尔决定置身事外。这次又是没有一件事不伤害第三等级的感情：特权等级在大厅内就座，而让第三等级在雨中等候；大厅被军队包围着；整个会议进程充满了像国王亲自主持的高等法院会议那样的专断气氛。主要的事情是由巴伦坦宣读两项国王声明。第一项宣布国民议会的决议无效，并且在建议接受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讨论的原则的同时，明确坚持凡与第一、第二等级的特权与豁免权有关的问题应分别审议。第二项声明概述了王家委员会的立法计划，声明提出大体上将按照所有三个等级在它们各自的陈情书中所主张的方针改革旧制度的体制，但旧秩序的社会结构却原封不动。它明确表示，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庄园的税赋将视为专有的权利，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不得要求放弃任何财政特权。最后，命令各等级散会，次日在各自的议事厅恢复讨论。

然而宫廷派的计划未能得逞。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冲进王宫的院子要求内克尔继续留任，由孔蒂亲王指挥的士兵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御前会议结束后拒绝解散，并受到米拉波的历史性讲演的激励。国王被迫作出让步：内克尔继续留任，不仅国民议会（现在有830名代表）继续控制着自己的议事厅，而且，到6月27日，其他等级其余的代表也接到明确的命令与之合厅议事。

与此同时，在巴黎出现了一个革命领导核心，在人民起义的帮助下马上给予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以坚决的支持。在此之前，首都的专门职业者阶级和商人阶级对粮食危机造成的郊区和市场区起义一触即发的状况并不同情；但是，随着最新消息从凡尔赛传来，他们开始设法引导事态的发展。没有这些引导，7月的革命几乎不可能进行到底。大约在这个时候，奥尔良公爵（他已参加新的国民议会）周围的那些小册子撰写者和新闻工作者开始在罗亚尔宫^[14]建立永久性的指挥部，在此每夜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从哈迪所说的“极端革命党”那里接受口号和指示——如果不是资金的话。也是在这个时候，巴黎第三等级的407名选举人——他们本来的任务是指定第三等级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开始定期在位于首都中心的市政厅集会。这两个集团后来在7月的事件中发挥了不同的然而又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在初期，只有罗亚尔宫曾给予群众运动以积极指导。当市政厅满足于起草组建市民民兵（即资产阶级民兵）的计划时，罗亚尔宫则通过宣传鼓动和任意开支等有效措施，将首都驻军的主力、原来忠于王室的王室卫队争取了过来。6月30日由罗亚尔宫指挥的群众释放了11名由于6月23日在凡尔赛拒绝向人民开枪而被关押在修道院监狱的卫队士兵。支持第三等级观点的传单在巴黎卫戍部队中广为散发。7月8日，一名试图将这类材料卖给驻扎在马尔斯广场的军官和士兵的报贩被逮捕。7月10日，80名炮兵脱离了设在残老军人院的军营，他们在罗亚尔宫和香榭里舍大街受到公众的盛大欢迎。

然而军队的不满——这是后来事态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由于这类手段造成的，其根源在于旧制度本身深刻的社会冲突和分化。七年战争以来，曾花费了很大气力来提高军队的效能和士气，然而这些努力由于在任命和提拔军官方面的尖锐矛盾而受到致命的影响。对于外省的小贵族来说，军人生涯是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甚至往往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然而由于宫廷贵族（王族、大

地主和所谓的“朝中有人的贵族”（*présentés*）要求垄断几乎所有的指挥岗位，从而损害了这些小贵族的利益。历届政府一直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既满足这两部分贵族的要求，又要让他们的要求照顾到不得不通过向富有的资产阶级卖官鬻爵来补充国库的迫切需要的情况。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旧制度末期的“封建反动”力图使情况朝着有利于贵族的方向变化，从而加深了平民和取得贵族地位的平民（*anoblis*）对政府的不满。但它也加深了贵族内部的分裂。好处大部分落入宫廷贵族手中，外省的贵族愤愤不平地看到他们在宫廷里的对头所占据的高级军事职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15]1788年3月的法令正式认可了这一趋势，该法令实际上禁止小贵族升为上校军衔，而有钱的军官（由士兵擢升的资产者）则不得担任中尉以上军职。由这些和其他措施引起的不满还不仅限于小贵族和平民。实行改革的大臣——从杜尔哥到布里安——的干预也影响了宫廷贵族的忠诚；一部分军事贵族——如拉法耶特、诺阿耶、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路易·德·纳博讷等——或由于曾在美国服役，或由于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也深信必须进行深刻的宪政改革。除在军官中间普遍存在的这种忧虑和对效忠产生疑惑的状况，还必须加上士兵中间的不稳。造成士兵不稳的原因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从普鲁士引进了新式的训练方法和军纪，以及由改革派大臣组成的历届内阁几乎没完没了出台的新规章。^[16]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革命前夜的军队成为在镇压民众骚乱时不可靠的工具。在贵族反叛期间，在布列塔尼、多菲内和其他地方命令自己的部队不要向示威者开枪、拒绝逮捕造反的法官并普遍为自己的士兵作出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榜样，而且士兵们很快就要照样去做的，主要是那些心怀不满的出身于外省贵族的军官。1788年12月“国务委员会决定”第三等级在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增加一倍，此后的事态发展无疑曾使大批的、而且比例越来越大的军官回到效忠宫廷的立场，但到这个时候，军队本身已开始表达他们自己对军官及苛刻的军纪条令的不满，而“爱国者”的思想和口号开始在他们中间得到支持。2月，内克尔曾告诉马卢埃，他自己之所以对敦促采取更果断措施犹豫不决，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不满；到4月中，（据斯塔尔夫人称）他忠告国王不要派军队到凡尔赛恐吓三级会议，因为如果他们公开表现出对代表们的同情，这样做将会是软弱而不是力量的表现。到了6

月，这些担心变成了现实，当时在凡尔赛的孔蒂亲王的部队拒绝向抗议罢黜内克尔的巴黎人开枪。几天之后，在4月的圣—安托万骚乱中曾效忠宫廷的王室卫队在巴黎大街上游行，高呼“第三等级万岁！我们是民族的士兵！”与革命群众亲如兄弟，并在攻打巴士底狱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不满后来扩散到前线团队，甚至扩散到某些外籍部队（占全国军事力量的1/4）；据称只有三个团队——其中2/3的人是来自塞文山脉和朗格多克地区的新教徒——完全没有受到“爱国者”思想的传染，直到1792年8月最后崩溃前一直忠于国王。[\[17\]](#)

与此同时，宫廷派试图最后一次维护国王的权威，以对抗“爱国者”在巴黎的宣传鼓动活动。6月26日，六个外省团队被调到凡尔赛。7月1日，又从外省招来另外十个主要由瑞士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团队包围首都。布罗伊元帅被任命为凡尔赛的总司令，由瑞士人贝森瓦尔负责指挥巴黎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最后，7月11日，国王再次被说服解除内克尔的职务，将其放逐，由王后的宠信布勒特伊男爵改组其政府。这一消息于12日中午传到巴黎，引起令人震惊的后果。下午，巴黎人涌入罗亚尔宫，演说家们——其中有卡米耶·德穆兰——发出拿起武器的号召。人们很快组织起游行队伍，抬着当时的英雄人物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走上大街。戏院被迫关闭，以表示哀悼。在路易十五广场，游行群众与奉命清理杜伊勒利花园的朗贝斯克亲王指挥的骑兵发生了冲突。贝森瓦尔撤到马尔斯广场。首都落入人民手中。

随着阵阵警钟，成群结队的起义者与两天前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的群众汇合到一起。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过程中，54个税卡有40个被有计划地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铁栅栏被推倒，办公室和家具付之一炬，税务官员被赶出宿舍。罗亚尔宫插手了这件事，而且两个据说属于奥尔良公爵的税卡安然无恙，这无疑是意味深长的。纵火者一般更感兴趣的是清算那些与食品和酒类价格大幅度上涨有关的机构，而组织者似乎更关心打破总包税人的垄断和控制武器及人员进出首都。当夜，在市北部边缘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武装起来的市民和王室卫队又一次在罗亚尔宫的指挥下攻入圣—拉扎尔兄弟会修道院，搜查武器，释放囚犯，并将52车粮食和面粉运到中心市场。紧接着这些活动之后，发生了当地的贫

民和失业者的大规模袭击行动，抢劫了建筑物里的钱财、食物、银器和密藏的珍宝。

但是7月12—13日那夜最主要的事情是搜寻武器。首都各地区的宗教场所均被光顾，制造枪支、甲冑和马具的作坊均被查抄。这一过程的无数目击者的记事流传了下来，巴黎的枪炮制造作坊曾向国民议会提出有关他们的损失的声明，总数达115118里弗尔。他们似乎并未得到赔偿，而且应该算是大革命的次要的受害者。

13日上午，巴黎的选举人采取果断措施，力图控制形势。他们组成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本市的临时政府，并决心制止不加区别地武装全体居民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成群结伙的无业游民和无家可归者——他们之中一些人曾参加了袭击税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行动——同在凡尔赛策划阴谋的特权等级一样，对市民的安全和财产构成巨大威胁。考虑到这两种威胁，这时他们认真着手组织一支市民民兵。很明显，国王听从劝告同意在次日所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先发制人。当时巴黎被划成60个选区，各家的户主都被召去参加选区的会议。每个选区出200人（后来是800人），巴纳夫曾写道，当晚有13200名市民登记并得到装备。所有的游民、无赖、甚至大批有工资收入的定居者都被排除在这支队伍之外。随后开始解除“非正规人员”的武装。然而只要骚乱还在继续，武器就会继续落入未经许可的人手中。人群包围了市政厅，要求得到武器和弹药。商会会长、临时政府的代理首脑雅克·德·弗莱塞尔竭力限制武器的散发，打发人到军械库和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去搜寻武器，结果一无所获。这一“叛变行为”使他在第二天付出了生命。与此同时，选举人派他们当中的勒费弗尔主教去负责看守市政厅地下室中堆放的军火，但是围聚在这所建筑周围的半武装的人群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尽快地分发弹药，也无法按希望的那样加以区别。

14日上午，搜寻武器的活动仍在继续，在河对岸的残老军人院发生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袭击。参加的有七八千市民，运走了3万支滑膛枪。正是这些人喊出了“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其目标并不是释放囚犯（那里只有7名囚犯），而是去夺取最近从军械库运到那里的弹药。此外，这座城堡作为过去专制统治的象征为人们所普遍憎恨。据认为该城堡配备有强大的武装，其大炮——当天早上已瞄准了圣安托万大街——能给密集的房屋造成巨大破坏。此外，在夜里还传说有3万

名忠于国王的部队开进圣安托万郊区，并已开始屠杀当地居民。尽管如此，起初并没有认真考虑要强攻巴士底狱，起码忙于在市政厅指挥行动的选举人委员会并无此打算。根据他们自己的记述，我们知道他们曾建议同该城堡守备司令官德洛内谈判，要他交出负责保管的火药，并将火炮撤下城堡的防御墙。德洛内接待了他们的代表，并许诺只要不受到攻击就不开炮。然而已经进入外院的群众设法放下通往内院的吊桥，德洛内认为马上将发动正面进攻，于是下令手下士兵开火，在随后的混战中，包围者有98人死亡，73人受伤。他们无比愤怒，选举人委员会失去了对行动的控制。决定性的打击来自王室卫队的两支连队，他们响应曾任正规军军士的于兰的号召，带着当天上午从残老军人院搬来的五门大炮来到城堡前。在几百名武装平民——圣安托万和周围几个区的工匠师傅、工匠和工人^[18]——的帮助下，他们将大炮瞄准大门。德洛内先是威胁要炸掉城堡，但被手下人劝阻，放下主吊桥，向围攻者投降。他自己和100名守军中的6个人被杀，德·弗莱塞尔也遭到同样下场。巴士底狱就这样陷落了。

巴士底狱陷落本身虽然并不重要，但却造成意义深远的后果。贝森瓦尔将他的部队撤到圣克卢。国民议会至少暂时获救并且得到国王的承认。宫廷派开始分崩离析，孔代、布勒特伊和波利尼亚克亡命国外。在首都，权力无可置疑地转到选举人手中，他们建立了市政委员会，由巴伊任市长，拉法耶特任国民自卫军司令。7月17日，国王本人前往巴黎，在50名代表（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陪同下在市政厅内受到胜利者的接待，作为默认形势转变的象征，戴上了标志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徽。现在，国民议会似乎可以太平平地着手工作了。

但是，外省还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从春天开始，由于饥饿和突然出现了平息郁积多年的不满的希望而引起的暴动此起彼伏。7月的第三周，来自巴黎的消息通过口传和代表们的书信传到了乡村和集市，给农民暴动火上加油，并使之进一步蔓延。农民暴动也推动了一系列较小城市的革命。各省的资产阶级与农民和城市小消费者不一样，他们主要是仿效巴黎和凡尔赛发生的事件。7月15日，当内克尔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南锡时，有人对阿瑟·扬说：“我们是个外省市，必须等着看巴黎出现了什么情况。”“城市革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的地方，如沿海的佛兰德地区，原有的市自治机关扩大了其基础，采用了三色帽徽，继续执政。有的地方，如波尔多，则仿效巴黎的榜样，让

位于当地的选举人大会。在更多的地方，如里尔、鲁昂、瑟堡、第戎、雷恩和里昂，旧的权力机关被推翻，由全新的机构所取代，往往承诺降低面包的价格。在几乎所有上述情况下，权力转移的同时都同巴黎一样组建了国民自卫军，以便应付贵族反攻和群众暴动这两方面的危险。与此同时，省督或者被赶走，或者销声匿迹，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导致王权的削弱。

伴随这几个星期的食品骚乱和农民暴动而来的是一种被称为“大恐慌”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是经济危机和巴黎革命的产物。这一危机既增加了游民的数量，又促使农民对领主的盘剥愈加不满。贵族派在凡尔赛策划的各种阴谋，虽确有其事，但却被夸大得不着边际。他们7月14日在巴黎失败后，为首者逃亡国外，巴黎的军队溃散到农村地区。这些都使人真的相信贵族正准备在跑到农村胡作非为的散兵游勇的帮助下很快进行反攻倒算。在7月的后半月，起码有六次“大恐慌”的浪潮席卷了国内大部分地区，每次都是由当地发生的偶然事件和惊慌失措造成的。只有阿尔萨斯、布列塔尼和洛林未受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浪潮对自耕农反对领主的运动产生的影响，都是进一步推动了这类运动，例如在多菲内的维里约，武装起来对付假想土匪的农民，转而攻击城堡。总之，7月和8月，在全国各地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夷为平地的城堡，庄园的登记册被付之一炬。为首的往往是一些据说领受了国王本人的命令的人（“de par le Roi”），农民似乎显然认为清算他们的领主即使不是在执行国王的具体命令，也是在实现他的愿望。[\[19\]](#)

来自外省的消息迫使国民议会立即注意封建特权问题和农民的要求。必须做出妥协，而妥协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方式：由开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于著名的8月4日之夜宣布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和免税权。然而国民议会关于“封建制度已被完全摧毁”的说法却给人以错觉：农奴制的残余，劳役和教会的什一税虽公开废除了，但是某些更繁重的特权和义务——其中包括实物地租、土地转移和出售税——后来通过个人购买行为又恢复了。地主之所以一直没有拿到钱（赔偿总数估计为40亿里弗尔）与其说是由于立法者的远见卓识或宽宏大量，不如说是由于农民经久不衰的战斗精神。最后，雅各宾派所控制的国民公面对既成事实，于1793年7月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未偿还的债务一律取消。

早在7月11日，国民议会就收到了由拉法耶特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第一个草案。外省的暴乱平息后，对此问题的讨论马上就继续进行，经过激烈争论，包括十七条的《宣言》于8月27日通过。同美国《独立宣言》一样，这个宣言旨在阐明这场仍在进行的革命的一般原则。宣言还以严肃而实际的形式确定了第三等级在综合性陈情书中要求的和当时法国人期望享有的权利：保护财产、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纳税义务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制宪议会应及时使这些原则分别通过立法加以阐明。然而国王宣称宣言会鼓励进一步的动乱，拒绝加以批准，就像他拒绝批准8月4日之夜所颁布的法令一样。

国王的行动不会不鼓励代表中的少数派。这些人与宫廷结合在一起，即使不能取消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仍然希望制止革命的进程。这一集团（人们后来称他们为“英国派”）与多数派在建立第二院和国王否决权这两个有关宪法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直到首都再次爆发起义，国王和议会转回巴黎才得到解决。以平民中的穆尼埃和贵族中的拉利·托朗达尔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国王应在立法问题上享有绝对的否决权，并应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第二院。第二项建议几乎没有获得通过的可能，因为不仅议会中的左派和中派反对它，就连外省贵族也由于担心自己被排斥在上院之外而强烈地加以反对。然而关于否决权的建议却被抓住不放，从而造成了更尖锐的分歧。以罗亚尔宫为据点的巴黎“爱国者”要求彻底加以拒绝，但凡尔赛的“爱国者”代表的代言人巴纳夫却准备在主张妥协的中派帮助下进行谈判。8月29日谈判破裂，巴黎人的地位得到加强，由圣于吕热侯爵和一批罗亚尔宫的新闻工作者发动的第一个行动是试图鼓动巴黎人向凡尔赛进军，请国王返回首都他的祖宅。这次努力没有成功，因为不仅巴纳夫和他的同事反对，而且缺少巴黎平民中的足够支持，而只有他们才能实现这一计划。

然而，由于一系列因素——向平民灌输“爱国者”的政治主张，粮食危机的加剧和宫廷的挑衅性措施——的共同作用，这一目标在五个星期之后实现了。普通巴黎人深受进步舆论潮流的影响，这一点在竞选活动期间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当时圣安托万郊区的暴动者和其他人无所顾忌地支持第三等级的权利要求而反对其对手。凡尔赛辩论的情况以惊人的速度传到罗亚尔宫和沙滩广场上的人群中间。在8月24

日，即《人权宣言》通过之前，有一个枪械工被捕后在城堡受到反复审问时，坚持“人权”赋予他公正审讯的权利。据马卢埃说，一个星期之后“可以看见轿夫们在议会外对否决权问题激动不已”。9月间，随着政治危机的深化，有报道说，沙滩广场上的雇佣劳动者和慈善工场的失业工人表示愿意随时前往凡尔赛要求王室返回巴黎。

然而，粮食危机又一次使群众骚动持续不断而且愈演愈烈。7月22日，一个4磅重的面包的价格从14.5个苏降到13.5个苏；8月8日，在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后，由于补贴，价格进一步下降到12个苏。然而随后出现的平静时期仅仅是昙花一现，收成虽不错，但是由于长期干旱，磨坊主碾不出足够的小麦，由此造成的面粉和面包短缺给投机者带来好处，却使面包房主焦虑万分，因为他们是群众报复行动的首要目标。8月和9月，在巴黎、凡尔赛和圣但尼不断发生面包骚乱，其间一名面包师和一个市政官员被愤怒的群众杀死，另有许多人受到“吊到灯杆上”的威胁。哈迪的日记中写道，从9月中开始，市场区和郊区的妇女在骚乱中起了领导作用。在10月5日向凡尔赛的大进军也是由她们首先发起并带动了她们的男人。

但是，同7月里的情况一样，最终促使首都的“爱国者”和平民起义的还是凡尔赛的事态发展。9月11日，巴纳夫说服议会敦促国王同意接受一种有权暂停某项法令实施的否决权的妥协方案，作为交换条件，国王应收回对8月法令的否决。正是由于议会坚持后面这一要求，使宫廷决心试图再次显示武力来打破僵局。9月15日，路易十六在拒绝了温和派提出的将议会迁往外省某城市的建议后，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该团于9月29日抵达。10月2日王室卫队举行宴会表示欢迎。这时，作为民族象征的帽徽被扔在脚下践踏，王后和她的孩子们受到了几乎不可思议的狂热欢迎。第二天，这一事件在巴黎广为报道。“爱国者”派报刊号召进行报复。这次，巴纳夫不再反对诉诸武力，至少从他事后的评论来看是这样。丹东在科尔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拉法耶特携带一份最后通牒前往凡尔赛；德穆兰重申了他对巴黎人发出要求国王返回首都的号召。10月4日星期日，在罗亚尔宫举行的会议上响应这一号召。次日清晨，中心市场和圣安托万郊区的妇女冲击市政厅，要求得到面包并搜寻武器。在市政厅外面一个在攻陷巴士底狱时表现出众的名叫斯坦尼斯拉夫·马亚尔的看门人加入她们的队伍。她们说服他带领大家前往凡尔赛向国民议

会提出要求。她们排成两列，冒雨前进，（或者如人们传说的）边前进边呼喊：“杀死面包房主、面包房主的老婆和徒弟。”几个小时之后，巴黎各区的2万名国民自卫军——他们迫使犹豫不决的拉法耶特带领他们——以及用滑膛枪、棍棒、长矛武装起来的各式各样的平民也跟随在她们后头。面对这声势浩大的阵容，国王不需要更多的劝说就下令向首都提供粮食，并批准了8月法令和《人权宣言》。但这些让步已不能使起义者满足了。次日，国王及其全家放弃了逃走的最后一个机会，被迫同游行示威者一道返回巴黎。十天以后，国民议会也回到巴黎。这样，法国王朝在离开祖先的发祥地一百多年后又重返故地作了短暂的逗留。

巴黎第二次挽救了国民议会，确实如巴纳夫所写的那样，它挽救了“人民的自由”。7月革命的成果曾由于凡尔赛继续存在宫廷派而岌岌可危，现在得到了巩固。10月起义将国王置于国民议会多数派、巴黎市政府和各区的监视之下，并清除了“英国派”的影响——其领导人跟着阿图瓦和布勒特伊流亡国外——从而建立了君主立宪派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在巴黎表现为巴伊作为市长、拉法耶特作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长期进行着统治。很快，通过果断措施面包危机得到控制，巴黎平民的起义精神已达到了目标，随后制定了军事管制法，对“造反”处以死刑和对激进报刊进行新闻检查，使起义精神受到限制。早在10月21日，一个名叫米歇尔·阿德里安的曾在巴士底狱服劳役的人，就因企图在圣安托万郊区煽动“叛乱”而被送上了绞架。这样，在经历了革命爆发阶段的长时间暴乱之后，有专业的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开明贵族中的盟友——1789年的人——似乎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着手去完成他们的立法和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制定宪法的任务了。

然而，尽管此后的18个月是一个相当平静和社会和谐的时期，但事实将证明这是一种幻象。革命连一半都没有完成。不仅王朝将证明它在和平时期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背信弃义，但不会更生，而且农民仍然顽强地表示不满；小业主不会长期接受被排除在“积极”公民行列之外的境遇；广大小消费者也将会更加有力地向商人、银行家和大生产者所设想的“市场自由”提出挑战。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动乱还在后头，并将使大革命远远超出1789年10月的范围；然而大革

命是一个整体，伴随其爆发阶段而出现的各种事件、冲突和思想就已经播下了大动乱的种子。

（艾平 译）

[1] A. 马蒂埃：《法国大革命》（3卷本，1922—1927年）。

[2] 指路易十四，史称“路易大帝”。——译者注

[3] C. -E. 拉布鲁斯：《18世纪法国物价及收入变迁概况》（2卷本，1933年），第2卷，第637页；《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1944年），第XIII—XIV页，第625页。

[4] 见第21章，原文第609页。

[5] 见原文第659页。

[6] 塞蒂埃（setier），法国旧时谷物容量单位，约合150—200升。——译者注

[7] 见前面第21章，原文第613—614页。

[8] J. 埃格雷：《革命前的法国》（巴黎，1962年），第154页。

[9] 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危机》，第IX—XII页；《十八世纪法国物价及收入变迁概况》第2卷，第640—641页。

[10] 然而内克尔的秘密报告表明，按照法律，仍应按等级分别表决。G. 勒费弗尔：《八九年》（巴黎，1939年），第67页。

[11] 《1787，1788，1789年法国旅行记》（剑桥，1929年），第173页。

[12] A. 科邦：《法国近代史》第1卷（1957年），第140页。

[13] B. 希斯洛普：《从综合陈情书看1789年法国的民族主义》（纽约，1934年），第8页。

[14] 罗亚尔宫（Palais Royal）原为黎塞留所建，后归王室，称王宫（音译罗亚尔宫）。后为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此时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约瑟夫加入第三等级。宫前广场成为群众集会中心。——译者注

[15] 见本书第7卷，原文第179、181—182页及本卷第7章，第2节。

[16] 关于上述内容，可参阅H. 卡雷《法国史》，E. 拉维斯编，第9卷（1910年），第53—60页；L. 哈特曼《革命前夜的王国军队军官》，载《历史评论》第100卷（1909年），第241—268页；第101卷（1909年），第37—79页；又见E. G. 莱奥纳尔《18世纪的军队及其问题》（1958年），第12和14章，不过这些材料并没有对前引著作补充什么内容。

[17] E. G. 莱奥纳尔《18世纪的军队及其问题》（1958年），第293页，注①。

[\[18\]](#) 国家档案馆，T514，《攻占巴士底狱人员名单》（共662人的姓名）。这份积极参加攻占该城堡的人员的名单尽管不完整但很重要，因为它是唯一一份记录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员的地址、职业甚至还有民兵单位材料。

[\[19\]](#) G. 勒费弗尔：《1789年的大恐慌》（1932年）。

第二十四章 法国的改革与革命 (1789年10月—1793年2月)

10月危机后，国民议会继法国宫廷之后从凡尔赛返回巴黎，此时它可以尽快着手完成制定新宪法的任务了。反革命的危险再次减少，到11月首都的粮食短缺也已克服。^[1]8月的法令及时地取消了封建特权，11月3日正式颁布实施，至少暂时缓和了农民的不满，并赢得了时间，使研究封建制度的法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得以考虑所宣称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究竟总共有多大。由于现任的官员们临时继续工作，避免了司法和地方政府行政工作的间断。11月3日高等法院的活动被停止，从而消除了反革命势力在各省进行反抗可能利用的跳板。尽管10月危机促使路易十六对强加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王权的种种限制提出了秘密而郑重的抗议，^[2]尽管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也鼓励了比利时民主派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尼德兰的叛乱，但这些反响都未引起欧洲对法国进行干涉的危险。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满足于认为法国在大陆的政治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销声匿迹。法国对外关系上第一次严重的困难实际上到1790年5月才出现，到国民议会庄严宣告废弃侵略战争和领土征服而达到顶点。特别是国民议会于11月2日决定将高卢教会的地产收归国有，消除了国家即将破产的危险。

然而，采取这些紧急措施以进一步削弱行政机构的权力并捍卫立法机构的独立和在法律上的最高地位，表明国民议会对国王顽固保护教会和贵族的封建特权是多么不满，它对国王有可能背信弃义是多么存有戒心。路易十六已被剥夺了中止或解散立法机构的权力和提出立法的权力。他拥有的暂停某项法案实施的否决权也仅仅限于一般的而不是“与宪法有关的”法令。尽管保留了世袭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但现在他的王位是根据宪法所规定的条款来保持的，已不是天授的权利。他不再是“法兰西和纳瓦拉国王”而是“法兰西国王”，很快将被列入文官花名册，被称作“第一官员”。更具有严重政治后果的是，国民议会否决了米拉波的一项动议，这项动议要求允许大臣们参加议案的审议，虽然不参加表决。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规定当届

议员不得参加政府。这项法令始终未改变，因此革命的法国没有能享受到责任内阁制和议会政体的好处。^[3]自从10月事件起，米拉波作为在国民议会拥有议席的大臣就扮演着王朝拯救者的角色；而从现在起，由于当大臣的野心遭受了挫折，他只能指望成为受国王雇用的秘密顾问，设法用计谋破坏正在制定的宪法而不是革命。

然而，这时将主要的权力交给未来的立法议会，这不仅是由于议会对行政机构心存疑虑，或者它遵从分权的原则；同样是由于西哀士神父从重组的宪法委员会内部施加的影响。^[4]西哀士已经为制宪议会政治主张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他继承了穆尼埃的衣钵，成为革命的宪法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西哀士在革命前坚决反对特权，但由于废除教会的什一税受到伤害，表现出对直接民主的怀疑，并同开明贵族一起支持重农主义者关于宪法应规定由一批优秀分子进行治理的主张。他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加以区别和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加以区别的主张，被用来作为限制选举权的根据。他强调宪法的“代议”性质，从而使议会的决定更加倾向于使公众的政治权利仅限于行使选举权。他认为民族团结这一革命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反映在他系统陈述并被法国许多近代宪法中奉为神圣的信条中，即议员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的选区，而是整个民族。

西哀士的影响在为立法议会制定的新的选举办法中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议员的间接选举，以及在初选会上对候选人、选举人和投票人的财产资格的要求，使选举功能的行使限制在比西哀士原设想的还要狭窄的社会成员范围之内。议会不顾格雷古瓦神父和罗伯斯庇尔的抗议，于1789年10月22日决议，有当选议员资格者仅限于那些缴纳直接税价值达一个银马克（约合50法郎）的人；12月22日又要求参加初选会和选举团的投票人需分别缴纳相当于三天和十天劳动价值的直接税。尽管如此，这次确定的选举权仍然比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选举权要开明，因为它确定的“积极”公民约有430万人，而“消极”公民为200万人。这种经常被抨击为反民主的议员间接选举制，在法国一直存在到1817年；对选举人财产资格的要求只是在1792年临时取消，直到1848年才废除。^[5]

未来的立法议会被赋予独立地位和意味着保证其实际上垄断政治权力的权限。由于取消了“必要的授权”，议员可不受其选民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享有议员豁免权。每年召开会议，会议和议事程序不

受约束，不得予以解散，有权提出立法并有权发表声明而不受甚至国王暂停实施法令的否决权的限制，这些就使立法机构享有空前的独立地位而不受行政机构的干涉。有权充分控制国家财政，每年对军事开支进行审查，有权设立或撤销一切国家机构，有权强迫大臣履行法律义务并密切监督外交政策，这些使立法议会拥有类似英国议会那样全面的最高权力。

虽然这样的中央集权在米拉波等批评者看来似乎有形成一种新型的一院制议会独裁的危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把行政管理的责任极大地分散给广大的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当局而得到弥补。^[6]在改组地方政府的体制方面，当务之急不在于填补由于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垮台而造成的真空，而在于如何规范在这年早些时候出现的那些经选举产生的革命市政机构的地位。此外，如果要合理调整旧制度下混乱的行政体制的话，还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而有序的组织体系，以便新建立的宗教单位和司法单位将来能够被吸收进来。由于许多旧的市政寡头统治集团已经垮台；内克尔关于改革地方三级会议的不关痛痒的方案也已被否决，但最主要的是由于8月4日废除了保留三级会议的地区的财政和自治特权，改革的道路已经被扫清了。1789年7月底，杜尔哥原来的伙伴杜邦·德·内穆尔曾第一次提出过行政分权的问题。9月29日，图雷以宪法委员会的名义向议会报告了关于将法国划分为省（department）、市（commune）^[7]和区（canton），以及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地方政府的建议草案。将历史省份按几何图形划分为83个省的主张来源于西哀士；关于地方政府的组织则是图雷照搬1787年的省议会制度而来的。由于在市政府的辖区也应是教区这一点上有着共识，而且显然在这方面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最初的讨论集中在市政组织的问题上，并于1789年12月14日通过法令批准实行新的制度。法令规定全法国的城镇和乡村均建立小型的市政府（corps municipaux）和协商性的议会（conseils généraux）。前者由一名市长和若干官员组成，后者由市政府和为数更多的著名人士的代表组成。代表国王参加议会，并有权就一切地方事务提出意见的是一位国王代表（procureur），其职能类似英国的市镇议会秘书。所有这些官员和议会均由市镇中缴纳相当于十天劳动价值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选举产生。虽然对地方上大多数重大事务的处理均需经市镇议会的同意，但掌握市镇行政实权的是市政府。这些机构除负责管理地方日

常事务外，还拥有广泛的维持治安的权力，包括必要时实行戒严的责任，后来还被赋予评估和征收新的直接税的权力。

然而，组建1789年12月22日法令所规划的新的省（department）、专区（district）和区（canton）的工作，直到1790年2月26日方告完成。这是因为宪法委员会提出的原计划经过议会的许多修改，而且因为省界的划分要由那些最有资格仲裁地方纠纷的人——各有关地区的议员——根据历史条件和地理状况来确定。省和专区政府的行政体制大体与市政府相同，不过其选举制度像国民议会的选举制度一样，不是一个阶段而是分两个阶段——省的选举团由“积极”公民在区的初选会上选出。省和专区（而不是区）现在有权建立协商性的议会。前者由36人组成，后者由12人组成，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每两年改选半数。省议会的半数成员，专区议会1/3的成员可当选为省和专区的“执政官”（directory），行使行政职能。省政府有权征收直接税，建立医院、监狱和慈善工场，监督农业和商业发展的计划。专区的职责是编制“积极”公民和新的纳税人的花名册，监督国民自卫军的组建，后来又负责组织收归国有的财产的出售。在各省选举一名地方行政长官总代表（procureur-général-syndic），在专区则选举一名地方行政长官代表（procureur-syndic），作为与中央政府联络的一种方式。这些官员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在地方上实施。1791年3月修改宪法时，赋予国王以废除省政府制定的与法律或内阁命令相抵触的法令以及停止其实施的权力。同样各省也被赋予向专区行使这种维护纪律的权力。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暂停地方议会权力的做法都必须经立法议会批准，立法议会亦可宣布其无效，因为只有立法议会才有权解散地方议会。

到1790年2月，全国已划分成83个省，547个专区，4732个区和43360个市镇（commune），新的地方议会亦于2月至6月底之间选出。新的行政机制有其弱点——市政组织，特别是在首都和大城市，不必要的复杂。市镇、专区和省的议会中社会成分之间的差别导致了摩擦，而中央又缺乏有效的控制，这就使得对市镇直接民主的进展情况很少或根本就无法进行检查。^[8]不过，由于公众的要求而迫使议会实行的实质上的权力分散却给了法国一种新的民族团结意识，其明显的表现是1790年春季出现的地区性联盟和在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时在巴黎举行的联盟节。地方分裂主义曾使在旧制度下促进法国行政统一的

一切努力遭受失败，而且在1789年仍然有一定势力，这时已经销声匿迹。以上所确定的地方政府体制，虽然经过修改，但一直延续到今天。

议会所面临的第二个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巨大而复杂的封建土地制度。8月法令所宣告的“彻底废除封建制度”与地方上继续保持着某些还必须缴纳的地租，这种实际存在的矛盾即使不能证明其合理，也应加以解释。迫于农民叛乱的压力而紧急制定的一些临时解决办法，必须以最后的立法形式加以确定。1789年10月9日起，这些问题被交给议会的封建委员会处理。由著名法学家梅兰·德·杜埃和特隆歇主持的两个小组委员负责将封建权利加以分类和制定废除的办法。然而，处理这些问题的1790年3月15日和5月3日的法令却表明，尽管封建主义从法律上说现在已经消灭，但仍不准备马上彻底废除经济上的封建主义。这种对于农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的要求拒绝予以承认的做法，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只能归因于中产阶级对财产权的重视；法学家们眼光短浅的保守主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限制，可能的话要求挽回，他们以前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

8月4日夜对废除封建权利作出更详细的规定后，随之而来的一周内，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重新抬头，甚至连那些促成了这一被里瓦罗尔称之“财产上的圣巴托罗缪惨案”的人也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行动是否明智。此时，那些曾被那次彻夜举行的著名会议上的动人热情所感染的贵族，仍然可能在怀疑他们的一时冲动是否会得到他们的选民的同意；一些谨慎行事的人认为，在激进的解决办法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挽救封建财产权的做法很容易受到损害。而另外一些未出席8月4日会议的人则批评由布列塔尼俱乐部“暗中进行破坏”的自由派所操纵的在议会中进行的“仓促”表决。^[9]这些看法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789年8月5日至11日有人试图对废除封建狩猎权和私人司法管辖权，对至迟到1790年7月20日前废除贵族的荣誉称号，以及对8月法令的各种限制性条款提出争议。尽管人们也明白对废除农奴制的少数残迹已不应提出质疑，想挽回或减少在来源于农奴制的各种权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也已无能为力，但许多享有封建地租的人却相信，只要这些权益符合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就应予以保留。这意味着要求实行一种赎买制，这样一来将使贫苦农民摆脱这些赋税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在旧制度的后期，资本主义的方法已进入农业，结果也使这类封

建义务的财政收益增加了；而当利率趋于下降的时候，如何使资本的再投入能够从这种补救办法中获利，也成为一个问题。[\[10\]](#)

在1790年3月15日的法令中，对封建义务进行详细分类所遵循的原则是来源于罗马法的关于封建统治权（*féodalité dominante*）和封建契约（*féodalité contractante*）之间的法律区分。据此，封建义务和采邑义务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个人的义务，这种义务被认为是由封建领主非法侵占或榨取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属契约性的地租，缴纳这种地租代表在自由或屈从的条件下的土地租用权。为了重新解释8月法令并付诸实施，议会现在解释说，封建制度的废除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封建财产今后将变成自由拥有的财产，而封建地租虽在赎买前继续保持，但将转变成经济地租。[\[11\]](#) 个人义务和契约义务的区别，虽然可使法学家们感到满意，但并不能完全应用于封建义务这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而且在它被农民理解之前，将会被看成仅仅是法律上的诡辩而加以拒绝。[\[12\]](#)

1790年5月3日的法令规定，每一年契约性质的金钱义务应以相当于20年的收益来赎买；实物义务则应以其年收益的25倍赎买，从而确定了并非不合理的赎买率。然而实际赎买过程中附加的种种条件，往往使赎买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赎买只是允许进行，而并非必须进行。赎买时，由地主与佃户个人订立协议，而不允许采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在赎买年度义务之前，必须偿还全部剩余欠款，并偿清一切临时性义务款，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佃户也负担不起这些临时性的苛刻盘剥。凡以前必须集体偿付的义务，也必须在同一时间进行赎买。这样，由于有些佃户无法筹措到必需的资金，就妨碍了其他能够筹措到资金的佃户取得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

由此而导致的农民希望的破灭，由于议会的财政和经济改革对他们的影响而更加强烈。虽然1789年8月已在原则上决定无偿地废除教会的什一税；但同时又规定，在国家向被没收了财产的教士发放工资以前，什一税将继续征收。根据1790年4月20日的一项法令，教士的工资将从1791年1月1日起发放；这样，直到那时为止，什一税的征收仍然合法，而且实际上在加重。即使在上述日期之后，废除什一税带来的好处也仅仅落入土地实际所有者的腰包。同样，议会1790年5月14日的决议规定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应通过拍卖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这也剥

夺了贫苦农民扩大耕地的机会。而即使如此，他们也宁愿将他们微薄的资金用于购买这种土地，也不愿用于赎买他们现在租种的土地的契约义务。最后，按照重农主义思想所采取的使农业和贸易摆脱各种限制和垄断的措施，疏远了大多数农民，因为他们一向是深深地依赖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农业的集体方法和国家对谷物贸易的管理的。议会对小的农业经营者的利益作出的唯一让步是保持对谷物出口的禁运，取消大部分食品的间接税，和保持牧场的公用权。这些措施根本不能保护农民免受由于适应大地主扩大圈占地和其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采用的新设施所带来的经济灾难。这就是造成农村地区特有的骚乱局面的根源，而这些骚乱是立法议会在解散前夕才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平息的。[\[13\]](#)

更加悲惨的后果是旷日持久而且愈演愈烈的宗教分裂。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于议会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来改造高卢教会。[\[14\]](#)对罗马天主教会在法国与世俗当局和与教皇的关系的这一重新界定，一方面对教士陈情书中所表示的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对1789年8月4日高卢教会法人组织的遭破坏，同时也对随后发生的教会地产的收归国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迫切需要对教会组织进行这样的改革，是由于议会在1790年春季承担了将来要为公众礼拜仪式提供费用和负责偿还革命前的教士债务的义务。议会的主要目的是创立一种国教，摆脱旧制度的政治弊端和社会不平等，不受任何一种外国教会的控制，具有民主的组织形式并适合于新的地方行政制度。据辩称，这种改革将要影响教士的公民事务，但不影响其宗教事务，更非试图干涉教义或教规。由于这种改革将是世俗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因此将不受国王否决权的影响，并普遍认为，必要时可劝说或强迫教皇予以默认。此外，人们深知，议会中教士代表的大多数，包括以很有影响的艾克斯大主教德·布瓦热兰为首的一批开明高级教士在内，将会支持这项计划。因此，议会及其宗教委员会对政教关系问题所抱的态度虽然不是有意挑起争论，但却是过分自信了。宗教委员会方案于1790年5月底提交议会讨论，7月12日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国王听从大臣会议中他的教士顾问——波尔多大主教、掌玺大臣尚皮翁·德·西塞和维埃纳大主教勒弗朗·德·蓬皮尼翁——的建议，于7月22日表示“接受”。

新法规的主要内容是：调整主教管区的边界使之与省界一致，废除1516年的政教协议，规定由全体在册的“积极”公民，不论其宗教

信仰如何，选举主教和教区神父，由国家向高级和低级教士以及主教团成员发放合理的工资，即由法国大主教而不再由罗马教皇发给。教士公民组织法中有许多地方对低级教士具有吸引力。它向他们提供了在教阶中上升的机会，而在18世纪中，教阶的上层只限于有贵族身份的人；它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一倍；它允许他们推举自己的教区神父；它完全保证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它满足了那些支持里歇主义者关于建立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宗教会议的主张的人们的要求。^[15]另一方面，在新制度下以前主教的声望和权威均已下降。现在除了单纯的精神和宗教方面的职能外，主教已别无其他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严格限于驻在地，他们在自己的教区内行使管辖权必须同一个常设的教区神父——主教会议进行协商。尽管如此，他们的选举无须再由罗马教皇批准这一点无疑被许多主教认为是对他们作出的牺牲的重要补偿，和对主张主教会议权力至上的高卢主义的一种受到欢迎的让步。^[16]

然而，尽管教士们的反对意见是慢慢地表达出来的，但事实证明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规定不仅对法国大主教，而且对罗马教皇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主教管区由135个减少到83个，意味着一些主教将失去主教职位，而另外一些主教的管辖权却扩大到更大的地区。而特兰托公会议的决议和圣职任命的正式手续——规定主教只能在严格划定的他的教区内行使管辖权——排除了这样转移权力的任何可能性，除非是按照正式的教规手续获得准许。^[17]议会甚至超过了教士陈情书中所表明期望，因为它规定世俗人，不论是新教徒、犹太人，甚至无神论者，均可参加“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士的选举。

然而，1790年秋季爆发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实际冲突主要是由于议会毫不妥协地拒绝了布瓦热兰关于改革应提请法国教会的一个全国会议予以批准的建议。这样的步骤虽有可能为实现可以接受的妥协铺平道路，但其代价却是侵犯了国民议会的主权，而且还会引起教会将企图要求恢复其作为国家内部一个自治体的地位的风险。^[18]结果议会向教会提出了一份实际上的最后通牒，而把要求教廷接受其决定这一困难的谈判任务留给了政府。这一使教士公民组织法得到合乎教规的“洗礼”的替代办法在议会中甚至连激进的改革派也冷静地加以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以兼并教皇在法国领土上的飞地——阿维尼翁和弗内森——相威胁，教皇庇护六世最终会被迫同意的。在谈判的结果如何尚不知晓之前，议会又进一步朝着宗教分裂的方向采取了一个步

骤，而且这次是无法挽回的一步。1790年11月20日它强迫法国所有获得有俸圣职的教士宣誓，要求他们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拥护已成为法令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违者即被免职。这样，教士就不得不作出选择，或者接受当时受到法国许多主教谴责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或者失去他们的教职。在这次信仰危机中，主教们的行为与低级教士的行为形成明显而重要的对比——全体主教除七人外都拒绝接受，而教区神父几乎有一半人宣了誓。这样，甚至在教皇好不容易才决定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和1791年3月10日和4月13日将革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简要地告知法国各主教之前，教会便突然陷入了宗派分立的局面。庇护六世的行动产生的主要后果是引起已宣誓的许多教士收回了誓言，导致大多数法国主教在1791年期间流亡国外，最后使由于在宗教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感到内疚的路易十六相信，必须逃出巴黎寻求安全，与革命决裂。

与宗教分裂相对应，在制宪议会的政治领导人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这是由于开明贵族那一派中间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反映的结果。这一派人的领导人是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三人集团。这个集团通过要求加快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速度而于1789年9月从穆尼埃和温和派手中夺取了对爱国者派的控制。然而，到1791年春季，这一派人却认为已经到了阻止革命继续发展，并且趁有财产和选举权的贵族所争取到的利益还没有受到反革命和激进平均主义这两个极端派的危害之前而予以巩固的时候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人集团只不过是米拉波于1791年4月初去世后继续奉行其政策、实现其野心和承担其秘密使命而已。他们还希望修改宪法，以便加强王朝的地位并通过废除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而为他们上台执政铺平道路。然而，1791年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冲突正在首都出现，政府几乎还没有从前一年秋天在南锡和布雷斯特发生的严重的陆、海军兵变中恢复过来，法国南部广大地区由于不断爆发宗教狂热和贵族反革命活动而陷入动乱之中。在这样的时候，新的温和派，即“宪政”派所扮演的只不过是“维持秩序”派的角色。

造成这种保守倾向的恐惧不安心情是由于1790年冬季在首都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俱乐部和联谊会，和1791年春季出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而引起的。这些团体原来的宗旨是促进没有选举权的无产者受到公民的和政治的教育，但在马拉的鼓励下很快就变成了积极

的政治压力集团。^[19]这些俱乐部主要由“消极”公民组成，吸收妇女参加，表现了群众对议会推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日益强烈的不满，并提出要求不仅宪法，而且甚至连一般性立法也应交由群众批准。它们还激烈批评巴黎市政府由资产阶级组成，拉法耶特的国民自卫军实行社会歧视。在这些俱乐部中巴黎的无套裤汉第一次被承认为革命的力量而崛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代表了对中产阶级精英的支配地位提出的一种新的更加强有力的挑战。^[20]虽然第一批群众俱乐部曾寻求并得到雅各宾俱乐部的赞助，但后来在1791年春季建立的一些团体实际上都是由科尔德利埃俱乐部衍生出来的。它们本身实际上是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的第一批鼓吹者。

标志着1791年春天首都工人运动的事件是大批失业者听到即将关闭市政当局扶持的公益性工场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一些打短工的木匠、制帽工人、印刷工人和钉马掌师傅们为支持最低日工资而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在国民议会中的中产阶级议员看来，这些事态发展之所以表现出骚乱的特点，首先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要求得到科尔德利埃俱乐部激进分子的支持，而且该俱乐部参与了向议会提出威胁性的请愿。其次，在以前由雇主控制的行会最近被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解散后，6月初由8万巴黎工人组成的“总联盟”扬言要通过直接施加压力、设纠察线和总罢工来实现对工资的要求。^[21]

针对这些事态发展，议会于1791年春天通过了一系列法令，这清楚地表明它对激进主义日益感到担心。4月底，它禁止“消极”公民加入巴黎国民自卫军；5月7日，它以宗教自由和缓和局势为由，允许抵制教士公民组织法的神父在教区教堂中举行弥撒；5月9日通过法令禁止集体请愿冲击群众俱乐部；最后于6月14日根据勒·夏佩利埃的动议通过了一项法律，以严厉的惩罚禁止组织工会和雇工协会，禁止为提高工资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体谈判，以及设立纠察线和举行罢工。^[22]与此同时，由于在5月11至15日举行的殖民地问题的重要辩论中巴纳夫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的既得利益辩护，以及由于5月16日罗伯斯庇尔的自律性法令规定制宪议会的成员不得当选为下届议会的议员，因而在三人集团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出现了公开的分裂。^[23]这时三人集团显然以温和派的面目出现，而他们的政治抱负只有在巴黎的直接民主被摧毁、议会被说服修改宪法，从而使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制止首都的阶级冲突和各省的内战危险的有效堡垒的情况下才会实现。

王室于1791年6月20日逃往瓦伦并于25日被押回巴黎的事件，一向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些事件第一次使共和制的问题成为法国公众关注的中心。它们使温和派与雅各宾俱乐部的民主领袖之间的分裂长期存在下去；它们在人民心中引起对王室的口是心非产生新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表明甚至像法国这样大的国家在民族危急时期没有国王也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并驱使欧洲大国——特别是奥地利和俄罗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巩固它们的王朝利益，反对革命的新秩序。

普通群众对王室逃跑事件的直接反应是：在首都，人们既表示愤怒却又漠然视之，在外省，人们惊惶不安，害怕出现反革命和外国入侵。支持建立共和国的群众示威接踵而起。斗争在巴黎是由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和一些联谊会发起的；在外省则由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的一些团体起而仿效。在首都，共和主义得到孔多塞“哲学上的”支持，布里索、德·博纳维尔和卡米耶·德穆兰的激进刊物上也大力加以宣扬。然而，这个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获得真正的动力就陷入了困境。并非所有的激进派都公开支持建立共和国。马拉一如既往地要求实行群众专政，丹东似乎主张由奥尔良派摄政，而罗伯斯庇尔则保留他的意见而似乎又支吾其词。由托马斯·潘恩起草的一份共和宣言，受到西哀士的反对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24]国王的返回巴黎，制宪议会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共和政体，人们普遍感到废黜路易十六很可能会使国家陷入与奥地利的战争，这些很快就使共和派丧失了采取主动行动的可能。

国王安全返回巴黎，议会便马上中止了他的权力，直到对他的命运和地位作出最后的决定。接着议会平稳地接管了行政部门的权力，采取紧急步骤号召数十万的男子志愿到边疆保卫国家，暂停新议会的选举，并开始自行对所谓的国王是被人“拐带”的详情进行调查，以设法为国王开脱。在这次危机中，决策的主动权掌握在以三人集团为首的温和派小集团手中。作为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订立的秘密协议的一部分，巴纳夫及其同伙设法使议会宣告国王和王后无罪（7月15日）。在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的支持下，温和派使用武力对付各群众俱乐部7月17日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的要求实行共和制的请愿，以此坚持其上述决定。

在国王逃跑到瓦伦的事件发生后，巴纳夫比以前更加成功地利用了议会对激进主义和外国干涉的恐惧。就这一点而言，他的主要对手——巴黎的激进派和好斗的流亡者成了他最有用的盟友。当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群众俱乐部强烈要求由议员们的选民，而不是由议员们来决定王朝的命运，从而藐视议会的权力时，很容易就会促使议会对共和派采取强硬的手段了。对这种公开蔑视议会的最高权力的做法，回答似乎只有一个——对马尔斯广场的示威者采取戒严手段，镇压各群众性俱乐部和迫害激进派领导人。尽管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民主少数派与马尔斯广场的共和派示威者断绝了关系，但温和派仍然与他们原来所组织的雅各宾俱乐部分裂，建立了自己的新团体斐扬俱乐部。^[25]只是由于外省的分支团体保持忠诚和罗伯斯庇尔的努力，才使雅各宾俱乐部避免了由于这次分裂而完全解体。

在此关键时刻，用不着巴纳夫提醒议会也会想到：按照激进派的意愿审判或废黜国王，很可能会使国家陷入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危险。事实胜于雄辩。在王室安全地逃出巴黎前一直不愿许诺向路易十六提供任何形式的积极援助的王后之兄利奥波德二世皇帝，这时提议各大国采取联合行动保卫法国王朝的利益。在他1791年7月6日发给俄国沙皇和英国、普鲁士、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撒丁国王的所谓帕多瓦通函中，号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维护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及其家庭的自由和荣誉，并制止法国大革命危险的极端行为”。他建议各大国发出措辞强烈的抗议书，由它们的大使在巴黎递交。在抗议书中它们要求毫不拖延地恢复路易十六的自由，并宣布它们拒绝承认未经国王同意的任何法国的法律或宪法。如若巴黎的极端分子不屈服于这一联合步骤，将继而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虽然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撒丁欢迎拟议中的协同行动，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答复持谨慎态度，英国政府则拒绝承担义务。尽管如此，7月25日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一直互相猜忌的竞争对手缔结了初步的防御联盟，双方同意采取联合行动结成一个欧洲协同比以解决法国的的问题，此举为未来的反法联盟奠定了主要的基础。不久，8月4日利奥波德与土耳其人在西斯托瓦媾和，以便从东欧脱身。

与此同时，逃到比利时的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于7月初在亚琛与阿图瓦伯爵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相会。流亡分子在此地大张旗鼓地扬言准备用武力在法国早日恢复旧制度。由于普罗旺斯声称

有权成为法国的摄政，由于边境部队的军官大批逃走而壮大了孔代在沃尔姆斯的军队，这些威胁对法国议会来说无疑比实际情况要严重。

然而，挽救路易十六，使之免于被审判和废黜，以及消除“红色”共和主义的直接危险要比通过实行和解政策和修改宪法来阻止革命容易得多。在制宪议会接近结束时，三人集团把尽快消除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希望寄托在实行一项就政治家的见地来看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前提之上的计划上。这项政策首先是想通过号召流亡分子在他们的地产尚未被没收之前返回法国，和通过修改教士公民组织法来消除革命带来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其次，三人集团希图修改宪法以便使之能为国王所接受从而为恢复王权奠定基础。第三，他们希望利用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他们的秘密调解人，劝说奥皇勿再进一步以干涉法国事务相威胁。^[26]三人集团与宫廷达成协议的基石是他们试图修改宪法以加强行政部门。他们希望以此促进他们组织政府的野心的实现，并使利奥波德皇帝相信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将在法国出现。这样，任何按照逃亡分子的意志恢复旧秩序的企图就成为多余的了。然而，他们在1791年8月和9月期间为废除关于议员不得担任政府职务和不得进入下届议会的法令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他们关于赋予国王以绝对否决权和设立议会第二院的希望已化为泡影，而对现行宪法条文的修改也仅仅限于很少几处，大部分都成为幻想。^[27]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议会中对三人集团政治野心的怀疑由来已久，一方面是由于右翼议员拒绝合作。

虽然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不愿意屈从于流亡分子，但他们不愿完全接受巴纳夫所鼓吹的和解与共存的政策又各有其理由。王后拒绝与拉法耶特有任何接触，她视宪法，即使是修改后的宪法为“怪物”。她对瞒着三人集团继续请求利奥波德结成大国武装联盟以武力恢复王朝的权力也毫无悔意。利奥波德虽然承认法国王室的安全受到斐扬派的保护，但认为法国的政治形势得到恢复主要是由于他自己采取主动发出了帕多瓦通函。这位皇帝生性谨慎，又对叶卡捷琳娜在波兰的侵略阴谋心存疑虑，因此认为不推翻三人集团是明智的。不过他决定保持恫吓和虚张声势的政策，认为这样既能够惩戒法国的极端分子，又可以不介入流亡分子所主张的武装干涉。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骑墙态度，他于1791年8月20日向斐扬派保证，只要修改后的法国宪法能够自由地为路易十六所接受，他将予以承认，并在8月

27日与普鲁士国王密商后发表了著名的皮尔尼茨宣言。在宣言中皇帝和国王承认在法国恢复秩序是欧洲所有君主共同关心的事，因此邀请各国与他们一起帮助路易十六恢复一种既可维护君主的权利，又符合法兰西民族的福利的君主制度。如各国一致同意这一政策，缔约国将立即采取步骤予以实施。由于利奥波德从对帕多瓦通函的答复中已经知道上述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皮尔尼茨宣言绝不可能使他承担武装干涉的义务。然而，由于阿图瓦伯爵和他的政治顾问卡洛纳同时出现在皮尔尼茨，因而流亡分子强调宣言在反对革命方面的重要意义，这只会加深法国人对利奥波德皇帝的战争意图的恐惧。

在这样的情况下，路易十六在1791年9月13日接受修改后的宪法，并颁布政治赦免令释放巴黎激进派和共和派分子，这丝毫也未能挽救制宪议会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局面。尽管制宪议会在建设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它只关心中产阶级贵族的狭隘利益并追随斐扬派的政治指导，因而长期丧失了群众的支持。它已成为一个精疲力竭和名声扫地的议会，于9月底关门大吉。

做准备以待1791年10月1日召开立法议会，即使对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来说，也是使他们感到畏惧的十分严重的任务。它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是制宪议会遗留下来的，都关系到国内的行政和一部尚未实行的宪法的实际运作。从一开始，它的成员便面对着不断恶化的财政形势，愈来愈加深的宗教分裂，外省日益严重的骚乱和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以及与一个令人怀疑的行政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然而，更加紧迫和难办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在皮尔尼茨宣言造成的紧张局势下法国与欧洲各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正常时期这个问题也许已经分别地加以解决了，而在现在的局势下，这些问题也许不可避免地应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了，因为它们即使不是由于即将发生的反革命行动所造成的，也都受到这种反革命行动的影响。新一代的革命议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可以用布里索派演说家伊斯纳尔的话来加以说明。他说：“我们的前辈利用哲学原则和群众起义的手段获得了自由；我们的任务是利用外交和武力的手段来巩固它。”^[28]

立法议会的成员是依比制宪议会成员限制更严的选举权规定选出的。他们在知识上不如前辈知名，也不如前辈富有。他们主要来自专业阶层，大部分是律师、新闻工作者、医生、军人和商人，不过也有少数开明贵族和“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士，这使得这届议会的

社会构成多样化。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在总数745人中约有350人——形成一个中间集团，这个集团最初独立于由264名斐扬俱乐部支持者组成的右翼，以及由136名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尔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组成的左翼之外。中派持温和观点，主要关心的是拥护宪法，既反对斐扬派，又反对左翼雅各宾派极端分子。因为前者不会反对巴纳夫所主张的那种对宪法的修改。而后者开始看风使舵转向谨慎的共和主义。但立法议会很快便显示出同时分裂成右的和左的派别的倾向。1791年12月，听命于拉法耶特的斐扬集团中的“自由”派与布里索派结成一个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秘密联盟，这时，其余的斐扬派分子和雅各宾派便在政治上降低到软弱无力的地位。这是可以说明立法议会之所以表现出好战倾向的事态发展之一。因为遭到挫败的两派都批评战争政策，而主张中立的中派最后则转而支持战争政策。遭到失败的两派均由以前的制宪议会成员从议会外面给予领导——比较反动的斐扬派由三人集团领导，雅各宾少数派则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相反，最终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的一派则是由布里索在议会内部给予坚强的领导。后者被其同时代人通称之为布里索派，后世人则称之为吉伦特派。

[\[29\]](#)

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开会不到几个星期，便把注意力转向反革命活动的两个方面——拒绝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神父在旺代省和奥弗涅省煽动的暴乱和流亡分子在莱茵兰和尼德兰发动的敌对性示威。主要是在以布里索为首的一批雅各宾派政治家的唆使下，11月9日通过了针对流亡分子的镇压措施，29日通过了针对反抗的神父的镇压措施。虽然承认聚集在沃尔姆斯和科布伦茨的流亡者仅仅对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但上述行动所针对的正是这些敌人而不是一般而论的流亡者。然而，此项法令的背后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存在着要填补因忠于王室的军官逃往国外而空缺的1.2万个职位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指券开始贬值的时候，议会也不能忽视制止流亡分子的收入从法国外流的问题。11月9日的法令规定，一切加入法国境外的武装集团和在1792年1月1日前未回国的流亡者，均将以叛国罪论处——没收其财产，一旦捕获即处以死刑。针对反抗的神父的立法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通过。由让桑纳建议、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作为议案提出的原草案，包括考虑得很周到的和解内容，本来很可能会缓和宗教分裂的激烈程度。[\[30\]](#)不幸的是，11月29日通过的法令的最后文本，其条

款几乎完全是镇压性的。不过，现在要求那些拒绝按1790年11月27日规定的誓言进行宣誓的人进行新的公民宣誓，目的不在于使之在宗教良心上承担义务，而是对一切因拒绝宣誓而表现不忠的人的处罚相应地更加严厉了。法令宣布这些“被怀疑”有叛国意图的人，均将剥夺其由制宪议会发给的教士年金，可将其逐出家门，如判定曾犯有煽动公民骚乱的罪行，可判处二年监禁。

当国王根据三人集团的意见否决了上述两个法令后，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紧张关系更加尖锐，接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府危机。现有的政府一直是由满足于听从巴纳夫及其同伙的指挥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组成，但在11月底和12月初，由于受到议会的强烈抨击，其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三人集团的影响减弱，而议会中布里索派的影响加强了。主要的变化是在政治舞台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路易·德·纳博讷伯爵于12月7日取代迪波泰尔任陆军大臣。^[31]纳博讷虽然缺乏国王的信任，但由于他采取有力措施使陆军适应战争的需要，由于他与议会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而且凭着他人格力量，很快就在政府中获得了堪与首席大臣相比的优势地位。

12月下半月，纳博讷及其支持者与布里索达成了秘密协议，以便联合当时要求对奥地利开战的力量。由于陆军大臣与议会保持着密切关系，很顺利地便获得必要的信贷，用于组建三个集团军共15万人的开支。三个集团军由罗尚博、吕克内尔和拉法耶特指挥。这种联合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拉法耶特再次与三人集团决裂，和由于罗伯斯庇尔反对布里索的战争政策，结果在雅各宾派的队伍中出现分裂。达成谅解的基础是纳博讷转变态度，接受了布里索派的看法，即认为法国的真正敌人不是特里尔选帝侯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准备战争，必须设法与普鲁士，可能的话还要与英国结成联盟。然而纳博讷和布里索两人内心的动机却是完全相反的。布里索之所以主战，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这将会揭露宫廷与皇帝之间的秘密关系，从而可以破坏国王的影响，而纳博讷则认为这样可以实现一种军事专政，以便结束革命并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威。这个联盟的寿命不会很长，但它暂时挫败三人集团的调和性主张，并有助于消除罗伯斯庇尔的警告。

^[32]

直到这时为止，布里索派的雄辩家们为对奥战争提出的理由并不能说服人。他们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弄错了外来危险真正来自

何方，他们满足于激烈的雄辩、受群众欢迎的口号，而对即将发生的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其性质错误地抱有幻想。只有对一切均抱怀疑态度的罗伯斯庇尔才告诉了他们，他们与纳博讷达成的交易包含着军事独裁的危险，他们希望得到奥地利领地上“被奴役的”人民的援助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受了像军用物资承包商和金融投机者这样一些想发战争财的人的欺骗，他们轻信了比利时、日内瓦和荷兰的流亡者杂凑起来的一些队伍表面上的保证，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急于跟在法国军队屁股后面返回他们的家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准确地反映出外省对不顺从的神父们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已无法再容忍，他们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叛国阴谋作出了真实的估计，他们充满沙文主义的夸大言辞也符合正在迅速高涨的法国民族主义精神。

然而，直到1791年12月下半月似乎才从维也纳发出严重的挑衅。在路易十六9月中旬接受了宪法并恢复行使国王的职务后，利奥波德二世不仅满足于将建立欧洲协同体的计划搁置起来，而且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向他提出的应在亚琛召开大国军事会议的建议甚至采取了嘲笑的态度。^[33]但12月24日法国外交大臣向立法议会转交了利奥波德的一封照会，要求恢复受到1789年8月4日法令侵犯的德意志王侯在阿尔萨斯的封建权利。一周以后，由考尼茨起草的一封日期为12月21日的外交文件，也送到了法国议会。文件在宣告皇帝和特里尔选侯将疏散流亡分子后，这位首相警告说，如果特里尔选侯受到纪律涣散的法国军队的威胁，帝国驻低地国家的将军本德尔元帅将给予军事援助。利奥波德根据对蒙斯特和约（1648年）条款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而捍卫德意志王侯在阿尔萨斯的权利，并在应该选侯要求保护的请求时，只不过是履行其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元首的基本义务。他的意图肯定不会是要发动战争。然而奥地利的照会大大激怒了法国议会。关于法国政府未能阻止其军队侵犯帝国领土的说法是对法国政府缺乏权威的无理指责。文件中提到“各国君主应协同一致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君的安全和尊严”，意味着考尼茨认为他可以给法国议会下达命令。这样，12月的文件就给布里索派带来了好处，使他们的论点增加了迄今为止缺乏的说服力。它使议会中关于战和问题的公开辩论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使主战派占据了一切优势。从此，情况就突然滑到了深渊的边缘。尽管最好是把考尼茨后来的照会解释为 he 是在玩弄“战争边缘政策”，但毫无疑问，在立法议会中，大多数人的看法一直在越来越坚决地主张采取敌对行动。

在外交委员会对考尼茨的话的含义进行了考虑之后，它的报告人让桑纳于1792年1月14日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要求国王设法从皇帝那里寻求和平的保证，保证他不参与任何行动来反对法国宪法“或法国人完全充分掌管自己政府的独立性”。法令还要求利奥波德确认，一旦法国受到攻击，他将履行他根据1756年5月签订的法奥联盟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如果这些保证不在1792年2月10日以前作出，皇帝的拒绝将被视为一种敌对行动。这些要求的目的在于为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铺平道路——这才是这封时限很短的最后通牒的目的。法令指责利奥波德在前一年7月与普鲁士签订预备性防御条约就已经违反了与法国的联盟；不过对他的要求首先是公开放弃建立欧洲协同体的计划。^[34]1月18—25日对上述要求所作的修改仅仅是：将最后通牒的时限延长到3月1日，并要求将1756年的条约不能看成是与法国国王，而是与法国民族订立的条约。

考尼茨在2月17日发出的一封急件中对上述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是试图重新玩弄他错误地认为在前一年夏季用以对付制宪议会时十分成功的恐吓策略。此举的目的在于坦率地要求尚未确定政策的议会核心推翻布里索少数派的支配地位，采取三人集团所鼓吹的政策。而事实上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拉梅特敦促路易十六于3月9日将纳博讷撤职后虽短时间获得胜利，但却使布里索派在第二天指责勒萨尔奉行姑息政策而向其提出弹劾，导致整个斐扬派政府的倒台。新政府以外交大臣迪穆里埃为首，布里索派提名的罗兰任内政大臣，发明指券的日内瓦人克拉维埃尔管理财政。其他大臣有：德·格拉夫替代纳博讷任陆军大臣，拉科斯特继代表国王利益的德·莫勒维尔任海军大臣。所以，尽管新政府在政治上并非一致，但由于迪穆里埃居于支配地位，在外交部和内政部对常任官员进行了清洗，这意味着该政府已由布里索派有效地加以控制。

随着拉梅特和迪波尔的政治影响的消失、利奥波德二世皇帝在1792年3月1日的逝世，以及迪穆里埃的掌权，维持岌岌可危的和平的机会已几乎等于零了。继承利奥波德统治奥地利的弗兰茨二世年轻气盛，更多地受以施皮尔曼男爵为首的奥地利主战派，而不再是年迈谨慎的考尼茨的影响。迪穆里埃在旧制度下从事秘密外交达30年之后，终于看到他改造欧洲外交结构的机会。迪穆里埃是革命前法国反对与奥地利结盟的首要人物法维埃的信徒，他决心一战，并主张对尼德兰

发动军事袭击。他采取了纳博讷的计划，继续与普鲁士和英国保持外交接触以孤立奥地利，并像纳博讷一样，秘密地希望通过武力行动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是建立一个独立和中立的比利时共和国，认为这个解决办法将保证英国保持中立。即使在与英国和普鲁士的谈判毫无进展之时，他仍对成功抱乐观态度，在3月期间满足于仅仅与考尼茨交换最后通牒。4月20日，立法议会以仅仅7票反对通过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宣战的决议，为的是希望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均不致卷入。[\[35\]](#)

在尼德兰轻易获得军事胜利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旨在孤立奥地利的外交谈判以失败告终；在法国东南部爆发了反革命运动；在战场上将军们拒不服从命令，国王也否决了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向议会的权威均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1791年的宪法已被撕得粉碎，1792年8月10日波旁王朝被首都爆发的群众起义推翻了。有四个主要因素对这次国内危机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拉法耶特以武力逼迫议会修改宪法；第二，不论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均未能应付国内安全和国防问题；第三，以巴黎各派和外省的联盟派为代表的议会外势力介入了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政治斗争。最后，罗伯斯庇尔对这些民主力量的政治领导。

路易十六暗自预料对奥战争将导致法军在军事上的失败。罗伯斯庇尔则预言它将使国家陷入军事独裁的危险。这两个预言很快都应验了。因为开战后头几个星期，进入尼德兰的法军在与奥军交战时就狼狈后撤，杀害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指挥官。而拉法耶特将军则决心重新获得他由于马尔斯广场“屠杀事件”而失去的在首都的支配地位。军事挫折一部分是由于布里索派未能有效地作好充分备战，但一部分也是由于迪穆里埃坚持要在尼德兰发动攻势，而反对那些墨守旧制度时期老一套的防守战略的将军们的意见。战役刚开始，法军总司令罗尚博便提出了辞呈，而拉法耶特则与奥地利开始秘密停战谈判。拉法耶特这时已与他的布里索派盟友决裂，最后接受了斐扬派的政治观点。提议停战的目的是使他能够将他的军队转移到首都以便实现三人集团所主张的那种宪法修改。拉法耶特这时认为法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流亡者，也不是来自奥地利人，而是来自雅各宾派各俱乐部和各群众团体。后者已经从1791年的“三色旗恐怖”中恢复过来，必须以武力加以摧毁，尽管他向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建议遭到拒绝，他的军队也表

现出并不愿意支持他进一步实现其政治野心，但拉法耶特在1792年整个夏季仍随时准备在巴黎进行干预，以支持主张恢复秩序的一派人。他实际上已经充当了军事独裁者的角色。

在此期间，不论是布里索派政府还是立法议会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办法应付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和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1792年1月和2月，由于滥发指券和前一年秋季西印度群岛叛乱造成的食糖短缺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在巴黎郊区的圣安托万和圣马塞尔发生抢劫食品店和按群众决定的价格出售消费品的事件。这些暴力行动均遭到严厉镇压，而对群众要求官方管制食品价格则一直置若罔闻。

法国东南部的贵族叛乱已被挫败，但并不是靠中央政府进展缓慢的措施，而是靠来自马赛的“爱国者”军队对阿尔勒和阿维尼翁采取的强有力的地方行动。甚至更加严重的是重新发生的遍及洛特、康塔尔和阿韦龙各省广大地区的焚烧城堡的行动和农民暴动。此前，国王拒绝批准进一步针对不顺从的神父的立法和在巴黎建立供两万名外省国民自卫军驻扎的军营的决定，从而造成了政治僵局。按照泰奥多尔·拉梅特和迪波尔的建议，国王于6月13日免去他的吉伦特派政府大多数人的职务，并否决了它最近采取的安全措施。不久以后迪穆里埃辞去职务，被任命为北方军的司令。

为反对由所谓的“奥地利委员会”控制的宫廷和由一些政治上不足取的人组成的斐扬派新政府，巴黎各民主郊区的无套裤汉迅即作出反应，于6月20日举行非法的武装示威游行，冲击土伊勒里宫，目的在于逼迫国王恢复吉伦特派政府并批准立法议会的法令。这次示威游行不但没有能吓倒国王，而且还给拉法耶特提供了他等待的机会。对议会来说幸运的是当这位将军在6月28日到议会要求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和其他群众性俱乐部时，并没有带他的军队。次日，他也未能劝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向各俱乐部进军。这位将军受到孤立和拒绝，只好重返他已放弃的军职，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最后目标。

由于外部危险迫在眉睫，议会又未能采取果断行动，情况越来越清楚，一旦议会外的力量组织并武装起来，再得到地方上的力量的增援，这种力量就会进行新的干预。地方上的力量拥有各省国民自卫军中态度坚决的武装部队，吉伦特派的领袖们邀请其中一些部队于7月14日参加联盟节，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阻止国王否决在巴黎设立军事营

地的计划。另外一些部队则自愿在新的斐扬派政府为谨慎起见设在苏瓦松的营地服役。7月2日议会允许后者在前往目的地的行军途中穿过城市，但条件是在联盟节以后三天之内必须继续开拔。一周后这些参加联盟节的部队进入首都。这些部队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不同，后者的军官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或保王派，而地方上的联盟派大部分是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分子，甚至是共和派。正是这些联盟派首先在7月17日向立法议会提出要求停止路易十六的权力。虽然在7月一个月内他们只有一些小分队进入巴黎，而且他们的总数始终不超过五千人，但他们却起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的作用，以便扩大邀请他们的人在首都各激进区，亦即各选区的政治权力。在这各方面的压力下，议会允许各区议会从7月25日起每日开会，市政当局则在7月27日决定准备在市政厅建立一个中央通讯委员会，由48个区的代表组成。这样一来，该委员会就使巴黎公社本身转变成，起码是经过思想的传播转变成暴动的中心。

议会在7月11日采取的一项动议——宣告“祖国在危机中”——也对局势的明朗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直接效果是使首都的力量对比转而有利于民主派。^[36]在政治上，它引起了各区和联盟派要求废黜国王，而不仅仅是停止他的权力，并且为允许“消极”公民进入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部队提供了论据。在这月月底，由于不伦瑞克公爵发表了威胁性宣言，^[37]加之来自马赛的同盟派部队高唱着其著名的进行曲开进巴黎，上述法令在加剧首都政治紧张局势和激励普通居民方面所起的作用又更进了一步。

最后还需着重说明罗伯斯庇尔在决定起义者的策略手段和政治目标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说服联盟派，一旦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在联盟节过后甚至应不顾议会的命令而继续留在首都，直到宪法危机解决。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与联盟派中央委员会制订了协同一致的行动计划，并起草了他们向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和致各省的信。特别是他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伟大演说中阐明并系统论述了起义将要实现的政治计划。在演说中，罗伯斯庇尔放弃了他以前所扮演的1791年宪法“保卫者”的角色，对政府和议会都进行了正面的攻击。在一个激进的四点纲领中，他主张推翻王朝；以一个通过普遍选举权而选出的国民公会取代立法议会；基层议会应经常召开会议，以监督议员并清洗各省的政府、法庭和政府官员。这些要求

中有些是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如马尼埃尔和丹东，以及巴黎各区最初曾提出过的，但直到它们为罗伯斯庇尔所赞成并重新加以阐述才成为一致同意的起义原则。在此以前，他曾警告联盟派和各区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这时他意识到罢工的时刻已经来临。

由于不伦瑞克宣言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人们得知它是在国王煽动下发表的，于是巴黎48个区中除一个区外，于8月3日联合请求议会废黜路易十六。议会于8日拒绝接受对拉法耶特的控告，并无视公社提出的废黜路易十六的要求，这样，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据知己计划于10日举行的起义。然而，尽管立法议会这时已只不过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机构，但它对这次导致占领并部分破坏土伊勒里宫的新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后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被迫承认了举行起义的新公社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是该公社下达了最后攻击土伊勒里宫的命令。它被迫放弃了议会对国王的保护，同意将国王及其家属囚禁在由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中。根据公社的命令，议会将召开根据成年男子普选权选举出的国民公会，以便为自己的存在确定依据。新的巴黎市政当局控制了各区、警察和国民自卫军，实际上主宰了首都的政治形势。立法议会由于承认了这个新的竞争对手，才得以暂时保持了自己的存在。即使它在首都已几乎毫无威信可言，但它仍然是全国普遍承认其权力的唯一宪政当局。

在议会中的温和分子退出后，有效的决定均由吉伦特派议员一手包办。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已成为群众起义的意外受益者，尽管他们从7月中旬起一直在设法防止这次起义。其结果是立法议会没有正式废黜国王，而仅仅是暂时停止其权力，并且建立了一个由六名被推选出的大臣组成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代行国王的权力。以前的吉伦特派大臣罗兰、克拉维埃和塞尔旺重新掌权，与他们在一起的有蒙热掌管海军部、勒布伦掌管外交部，丹东掌管司法部。后者虽非正式的、但是实际上的新政府首脑，直到他9月末辞职，在指导国防方面起着推动力的作用。以前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也可当选为国民公会成员，此项决定和间接选举制（旨在防止可能出现普遍选举权的效果）也是吉伦特派提议的产物。

从8月10日到9月20日行将就木的立法议会举行其最后会议，匆忙通过了大量立法以在平等的原则上改变法国的体制。最根本的改变

有：实际上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痕迹；改革继承法；决定将已没收的流亡者的庄园分成小块土地转让其所有权；制定公民结婚和离婚的条例。^[38]对不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士实行自愿流亡国外或强制驱逐出境，以及将新的自由平等宣誓毫无例外地扩大到一切教士的法令，开始了反教权恐怖主义的新阶段。^[39]

并非不重要的重要是王朝被推翻带来的外交和军事后果。停止路易十六的行政权力，等于自动结束了国王所接受的外国大使们的使命，并使法国驻外外交官员失去了他们的官方地位。瑞典公使离开法国，随之于8月13日外国代表开始纷纷撤离。8月17日英国大使高尔勋爵被召回，至月底，法国与荷兰共和国、西班牙、丹麦、波兰、俄国、瑞士联邦以及大多数意大利国家的一切正常外交联系均已断绝。尽管英国政府强调撤回其大使并不意味着会破坏其中立政策，但两国最终决裂的前景已令人感到为期不远了。就在此时，普军在不伦瑞克公爵指挥下越过法国边界，拉法耶特投向奥地利人一方。清洗在战场上的法国贵族出身的指挥官已势在必行，于是向法军派出特别督察员付诸实施。拉法耶特的指挥任务由迪穆里埃接替，吕克内尔则由凯勒曼取代。23日隆维要塞叛变投降，月底凡尔登陷落在即，加之巴黎受到第五纵队活动的威胁，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是9月间对巴黎的囚犯进行了屠杀。

在国民公会代表的选举中，由于文盲、恐惧和恫吓等原因，普遍选举权未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一些省份，有资格投票的人有3/4在基层议会选举中弃权，还有许多人因拒绝进行新的自由平等公民宣誓而被禁止参加选举人会议。在巴黎，所有同情保王派和斐扬派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投票均需当众进行，选举人会议都掌握在雅各宾俱乐部手中。结果巴黎代表团24名成员全部是雅各宾派、忠实的共和派和支持巴黎公社的人——罗伯斯庇尔得票居首位，马拉是最后一位当选者。一些吉伦特派领导人，如布里索、佩蒂翁和孔多塞，在巴黎落选，但作为省的代表取得了席位。各省的选举人较少受到激进分子的压力，比较倾向于选举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出了名的人物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派。但雅各宾派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成为由内政大臣罗兰发动的一场诽谤运动的目标。这些因素以及由于实行了间接选举制，就使得国民公会的社会 and 职业成分接近于立法议会，并使吉伦特派在新议会中拥有能够起实际作用的优势。

国民公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20日召开——这天也正是迪穆里埃和凯勒曼在瓦尔米战役中阻止了普军继续进犯的日子。一开始，代表们中间政治上和谐一致的机遇似乎很好。瓦尔米战役后，由于普军后撤，军事上的危险减轻，巴黎公社对议会最高权力的威胁也减少了。国民公会的第一个法令——9月21日废除君主制——实际上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接着，不可避免地是宣布成立共和国。当一致同意人身和财产均应受到国家的保证和共和国应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时，最初可能造成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分歧的根源得到了排解。巴黎公社派出的一些督察员在地方上明显地鼓吹的农村共产主义的幽灵，和吉伦特派一些人如比佐所主张的“联盟主义”的妖魔似乎都已经被驱除了。国民公会的首要任务——制定新的共和国宪法——虽然十分繁重，但似乎并非不可能完成的。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分裂，国民公会的会议自始至终为吉伦特派代表与雅各宾俱乐部的“山岳派”代表之间激烈而不可调和的矛盾所纠缠。尽管这些集团或派别称不上是有纪律的政党，但他们所争夺的是对国民公会的控制。这些矛盾之所以如此激烈，责任在于吉伦特派。是他们使议会陷入严重的不和，并拒绝一切和解的努力。他们与雅各宾派之间的分歧，有些是来源于布里索与罗伯斯庇尔从立法会议起就存在的永无休止的个人争论。另外一些则是由于吉伦特派就8月10日和9月大屠杀事件问题进行反击而引起的。他们攻击雅各宾派是“无政府主义者”，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被诋毁成是想要建立独裁制度的“三人集团”。这些指责反而使指责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他们不但受到议会中比较温和的分子——所谓的“冷漠派”（phlegmatics）——的谴责，而且受到地方上的吉伦特派支持者的谴责。尽人皆知的卢韦与罗伯斯庇尔之间的长期争斗只能是加强了后者作为“山岳派”领导人的支配地位。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各派之间在首都的政治重要地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是罗兰的支持者再次提出的问题。拉苏尔斯认为首都应当只发挥与其他任何省份一样的影响，这反映了吉伦特派害怕巴黎公社的权势过大和巴黎各区任意进行干涉。罗兰和比佐不顾一切地从各省调来特别警卫保护国民公会，这使反对他们的人攻击吉伦特派（即使没有根据）是“联盟主义”以破坏他们的名誉。不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索布尔把这种斗争说成是阶级矛盾的组成部分。^[40]这种解释所强调的无疑是存在于吉伦特派与当时的金融界、军事承包商和投机商之间的联系，并且把雅各

宾派与无套裤汉的利益和要求看成是一致的。虽然把吉伦特派说成是自由放任原则的捍卫者，而把山岳派说成是不得不主张国家干预的人而严格地加以区别未免言过其实，但可以当然地把吉伦特派看成是典型的有产阶级（la bourgeoisie possédante）的代表。

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进行的个人诬蔑运动的反击是审判路易十六。雅各宾派通过此举不仅希望加强共和政体，而且要使他们的政敌陷入困境并丧失威信。任何企图拖延制定对路易十六的审判程序的做法都很容易被加以曲解，而且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以及比这个更大的政策问题的争论或许会使吉伦特派陷入分裂和困扰。因此，当瓦尔米战役的胜利使路易十六失去其作为政治人质可能具有的价值后，雅各宾派就马上尽最大努力促使审判早日进行。在接踵而来的政治对抗中，吉伦特派被迫依赖一些临时应付办法（这不但不能掩盖反而暴露了他们的犹豫不决）和为了混淆主要问题而采取的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做法。他们为拖延审判而作出的一切努力，由于12月20日在土伊勒里宫发现了藏有国王与流亡分子交往的不可逃避的证据的铁柜而归于徒劳。12月11日，当路易十六面对法官——国民公会的成员——接受审判时，他被控犯有重大政治罪行的罪名就已经成立了。他顽强地拒绝承认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的可靠性，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他的首席辩护人——德·塞兹——主要是根据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进行辩解，但事实证明这是救不了命的稻草。当事情已很明显国王难逃被判有罪时，吉伦特派作出两方面的努力来救他的命。其一是由萨莱在12月27日提出建议，议会的判决需经公民投票批准方可执行。然而，这等于是对国民公会的最高权力提出异议，自然就招致议会中某些派别的反对。它也起到分裂吉伦特派本身的作用——这突出表明他们缺乏一个政治团体的纪律和凝聚力。在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后，他们的最后努力是建议缓期执行，此举也宣告失败。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使他的许多臣民感到惊愕，使国外无数同情者感到恐惧。由于吉伦特派态度暧昧，在审判最后阶段投票反对，他们就在政治上做了许多自掘坟墓的事。他们已经不能再控制国民公会中无派别的代表。

从王朝覆灭到审判国王的最后阶段，法国外交政策很快就受到事态发展的压力。11月，外交部从8月初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一变而成为革命宣传在国外的传声筒。12月，国民公会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领土扩

张的方针。由于它不断向欧洲已确立的秩序、向国际协议的尊严，以及向尼德兰的经济和军事安全提出挑战，直接导致了英国的敌视和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形成。

丹东在临时行政委员会发挥决定性影响期间，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采取守势。而当丹东于1792年9月底辞去其政府职务后，新的因素马上就决定着法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这些新的因素首先是由勒布伦掌管了外交部；第二是法军在新的领导指挥下取得了一连串胜利；^[41]第三是产生了如何管理法军“解放”的外国领土的问题。

1792年8月勒布伦被选为外交部部长后，法国外交政策就由一位革命前的新闻工作者来掌管了。他从春季起曾作为副部长负责指导法国与英、荷以及奥属尼德兰的关系。^[42]迪穆里埃当时任命他担任此职，是因为他与来自列日和比利时的流亡者中一批联合在一起的民主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准备在法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共和国。迪穆里埃在热马普战役后迅速向尼德兰推进，使这些人的目标实现在望。然而在这时比利时的民主派面临着保守的国家主义派的东山再起。这一派的领袖范·德尔·诺特曾建议建立一个比利时王朝，由奥兰治、勃兰登堡或汉诺威三个王室中选择一位君主。正是为了对付这一新的危险，勒布伦促使法国行政委员会于1792年11月16日宣布斯海尔德河航行自由。法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新起点，目的在于使安特卫普的商业利益集团相信，在法国的保护下，将来他们的经济一定能够繁荣，以此来扭转他们拥护在比利时实行君主制的倾向，并且更普遍地让比利时人相信，他们无需害怕由于法国的胜利而带给他们自己的独立。^[43]然而，自从1648年的蒙斯特条约以来，斯海尔德河就对除荷兰以外的一切国家关闭。宣布斯海尔德河贸易自由不仅是单方面篡改了一项重要的国际条约，而且侵犯了由英普两国于1788年共同保证的联省共和国的权利和特权。^[44]为了赢得在行政委员会的同僚们的支持，勒布伦不顾国际条约而求助于自然法的原则。国民公会也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于11月20日在大声喧嚷声中批准了这项行政法令。^[45]23日，法国炮舰不顾荷兰联省议会的抗议强行闯入斯海尔德河口，诡称是要攻击安特卫普要塞。对荷兰的直接威胁和最终对英国的海军威胁再也不容不闻不问了。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来自莱茵兰的请求法国保护的各种请愿书，国民公会于11月19日在鼓掌欢呼声中通过了一项法令，许诺给予一切希望恢复其自由的人以“友谊和援助”。这一法令大大增加了皮特对所预料的来自英国激进团体的危险的担心，而直接产生的重要后果是英国政府放弃了已经在海牙开始的关于全面和解的非正式谈判。^[46]皮特和保守的“忧虑人士”认为斯海尔德河的开放和友谊与援助法令是蓄意挑衅行为，旨在将英国拖入战争，并同时煽动英国国内激进分子的不满情绪。12月1日采取了动员部分民兵和加强英国海军战备的预防措施，议会也于13日复会。两天后，即12月15日，法国国民公会确定了其有关法军所征服的领土的政策，明确表明它实际上奉行兼并政策。^[47]这一决定首先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为了制止法国的硬币储备外流到比利时，而迪穆里埃又已经无法靠当地的贷款来应付沉重的军费开支。根据康邦的动议，现在宣布为“解放”国外受统治人民而花费的战争开支将通过发行以没收的教会财产和贵族地产作为担保的指券来支付。在征服的领土上，教会的什一税和封建义务均将被废除，政治权利只限于非特权阶级才能享有，临时政府在法国控制下建立，通过由法国行政委员会派出的特派专员来管理。法国以前向比利时人作出的尊重他们的独立的一切保证就这样均被弃之一边了。这些决定不仅会疏远英国，而且会疏远比利时的温和派、天主教徒和反革命分子。后者如果进行抵抗，随即就进行正式的兼并。^[48]这是“向权贵开战，对平民和平”的政策（guerre aux châteaux, paix aux chaumières）。现在，革命的新秩序将随着进行征服的法军输出到国外；解放的代价则由没收特权阶级的财产来承担。

然而，当对英战争的危险逼近时，勒布伦和吉伦特派却表现出犹豫不决。12月初，行政委员会将迪穆里埃进攻荷兰的计划搁置起来。勒布伦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一再就友谊与援助法令的目的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以消除英国对该法令的恐惧。^[49]迪穆里埃严厉批评12月15日的法令，并尽最大努力避免在比利时付诸实施。吉伦特派由于企图推迟对国王的处决，对与欧洲其他国家发生全面战争深表忧虑。他们知道决一死战只会对无套裤汉有利，因此愈来愈表现出像以前斐扬派感到的同样的恐惧和忧虑。1793年1月底，丹东敦促国民公会通过宣布法国的“天然边界”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著名法令，其目的不是要扩大而是要限制革命的兼并。^[50]

不幸的是，从1792年12月中旬起法国的外交政策不再由勒布伦和行政委员会掌握，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公会决定。与欧洲的敌对行动的扩大问题，如同路易十六的命运问题一样，成为各政治派别之间争执的根源。问题越变得复杂，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双方的态度就越是模棱两可和深思熟虑，双方观点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罗伯斯庇尔本人并不大赞成由雅各宾分子康邦促成的12月15日的法令，对兼并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的影响来防止冲突的扩大。吉伦特派的一些人，如凯尔森，热烈鼓吹对法国的传统敌人英国开战，硬说英国的殖民帝国和财政体系很容易就会被彻底摧毁。布里索和其他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担心，如果吉伦特派参与了与皮特的直到最后一刻的谈判，他们将会被反对他们的人指控为叛国和反革命，因此会失去议会中平原派的支持。^[51]这些就是为什么勒布伦和行政委员会未能满足英国政府关于撤销攻击性法令并充分保证荷兰的安全的要求的原因。在这样的僵局下，与英国和荷兰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对国王的处决也只会产生在法国的敌人的名单上增加西班牙的后果。^[52]1793年2月1日，国民公会向英国和联省共和国宣战。3月间，法国已与除俄国和一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了。

（王丽华 译）

^[1] J. 戈德肖：《1789—1804年的反革命》（巴黎，1961年），第2章。

^[2] J. 肖米埃：《从瓦伦事件到路易十六被处死期间西班牙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波尔多，1957年），第8页。

^[3] R. K. 古奇：《法国的议会政治，革命的根源，1789—1791年》（纽约州伊萨卡，1960年），第127页。

^[4]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P. 巴斯蒂很能说明问题的文章《西哀士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载《法国革命》（1939年），第142—165页。

^[5] P. 坎贝尔：《法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1789—1957年》（伦敦，1958年），第19页。

^[6] 有关制宪议会的行政改革，在J. 戈德肖的《大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法国的体制》（巴黎，1951年）一书第3章中有详细论述。

^[7] 市（commune）为法国沿袭至今的地方基本单位，市的大小不一，有的是大城市，有的是小村镇，commune亦译为“公社”，如后面出现的“巴黎公社”。——译者注

- [8] 对地方新政府的利弊得失的评价，见A. 科班的文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政府》，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8卷（1943年），第13—31页。
- [9] G. 勒费弗尔：《1789年》（巴黎，1939年），第183—186页。
- [10] G.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与农民》，载《法国大革命研究》（巴黎，1954年），第256页。
- [11] M. 加罗：《法国私人税、大革命和土地所有制通史》（巴黎，1959年），第186页。
- [12] M. 加罗：《法国私人税、大革命和土地所有制通史》（巴黎，1959年），第196页。上述区别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因为就封建契约关系而言，大部分写明土地转让合约的地契已经遗失或毁坏。这些地租往往不是按契约，而是按已经无法追忆的习惯数目来缴纳的。
- [13] 见后面原文第706页。
- [14] 对这个有争论的问题的资料最丰富和看法最公允的论述之一，见J. M. 麦克曼纳斯最近的研究著作《旧制度下法国的宗教社会。对18世纪昂热的研究》（曼彻斯特，1960年）。
- [15] 关于里歇主义理论对18世纪法国低级教士的影响，见E. 普雷克兰《十八世纪的詹森主义者与教士公民组织法》（巴黎，1929年）。
- [16] 莱维-施奈德的重要文章《旧制度末期法国主教团的行政自治》（《历史评论》第151卷[1926年]，第1—33页）也许对这一点有些言过其实。
- [17] 见G. 皮奥罗《教会组织与对第一批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主教的认可》，载《法国大革命史年鉴》第28卷（1956年），第346—355页。
- [18] J. 勒弗隆：《1759—1846年的革命危机》，见A. 弗利歇和V. 马丹编《天主教史》第20卷，第63页；K. D. 埃德曼《人民主权与教会》（科隆，1949年），第4章。
- [19] 关于这些俱乐部的情况，可参阅伊莎贝尔·布尔丹《大革命期间巴黎的群众团体》（巴黎，1937年）。
- [20] 对无套裤汉的社会和政治主张的很有新见地的论述，见R. 科布的研究论文《1793—1794年法国的革命意识》，载《历史杂志》第42卷，第146期（1957年10月），第181—196页。
- [21] G. 吕代：《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1959年），第84页。
- [22] 在法国，罢工直到1864年、工会直到1884年均属非法。
- [23] 关于这次殖民地问题的辩论，见J. 布鲁哈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与殖民地问题》，载《马克西米利安（1758—1794年）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W. 马尔科夫编（柏林，1958年），第115—158页。

[24] 关于西哀士为君主政体辩护曾有潘恩和孔多塞与之共谋的证据，见A. O. 奥尔里奇《理性之人，托马斯·潘恩生平》（伦敦，1960年），第148页。

[25] 关于斐扬俱乐部，参阅G. 米雄《斐扬派历史论文集》第12章《阿德里安·迪波尔》（巴黎，1924年）。

[26] 《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巴纳夫的秘密通信（1791年7月—1792年1月）》，A. 索德尔海姆编（巴黎，1934年），第54—61页。

[27] 两处主要的修改是：从宪法中删去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以及选举制度的改变。前者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新的立法议会修改教会法，以便消除宗教冲突。而由于在新的议会中掀起了反教权的新浪潮，这种可能不复存在。见后面原文第697—698页。增加对选举人资格的限制也帮不了温和派的忙，因为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仍按1789年制宪议会所制定的选举权规定进行。

[28] 《议会档案》，第1辑，第37卷，第545页。

[29] M. J. 西德纳姆的《吉伦特派》（伦敦，1961年）对这一派别的来历、性质和政治作用作了很有价值的说明。

[30] 按照让桑纳的草案，教士的选举制度和宗教宣誓方式将予以修改。它也将使教士不再承担进行公民身份登记的义务。参阅A. 弗利歇和V. 马丹编《宗教史》第20卷（巴黎，1949年），第91页J. 勒弗隆的文章《1789—1846年的革命危机》。

[31] E. 达尔：《纳博讷伯爵（1755—1813年）》（巴黎，1943年）；J. 波普朗和G. 勒费弗尔：《纳博讷担任大臣时期的研究》，载《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第19卷（1947年），第1—36、193—217、292—321页。

[32] 关于罗伯斯庇尔对战争政策的批评，见G. 米雄《罗伯斯庇尔与1791—1792年的革命战争》（巴黎，1937年）。

[33] 利奥波德认为该计划“无用甚至有害”（J. 阿尔诺—布特卢普：《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政治作用》[巴黎，1924年]，第101页）。

[34] H. 格拉高：《法国立法议会与1791—1792年革命战争的起源》，第116页。

[35] 利奥波德二世同时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36] F. 布拉厄施：《1792年8月10日公社》（巴黎，1911年），第105、125和139页。

[37] 普、奥联军总司令、普鲁士将军不伦瑞克公爵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发表的宣言。——译者注

[38] 1792年8月25日的一项法令，实际上把此前必须赎买的一切年度封建义务予以废除，因为不能靠提供原来的转让土地的地契作为这种义务的根据。关于出售流亡者的庄园的法令于8月14日通过，关于离婚的法令于9月20日通过。迈向政教分离的重要一步也于9月20日采取，将登记公民出生、死亡和结婚的责任由教会转

交给市政当局。禁止限定继承权（substitution）的法令于8月25日通过，最后由国民公会于10月25日予以确认。

[39] 驱逐出境的法令于8月26日、实行新的公民宣誓的法律于9月3日通过。

[40] A.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简史》（巴黎，1962年），第225—226页。

[41] 最引人注目的胜利是迪穆里埃于11月6日在热马普取得的。这次胜利使他不出几个星期就侵占了整个比利时。

[42] P. 米雷：《大革命期间的外交部，1787—1804年》（巴黎，1877年），第161—164页。

[43] P. 塔西埃：《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起源：外交部长勒布伦》，载《北方评论·纪念路易·雅各布专辑》第36卷（1954年），第263—272页。

[44] 见前面第9章，原文第275页。

[45] 根据是：国家间的河流作为贸易和文明的通道，按照自然法应向所有国家开放。

[46] 在联省共和国议长范·德·斯皮格尔与法国驻海牙代表德·莫尔德于11月17日和19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在普遍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和保证法国王室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和解的可能性。这项建议是由英国驻海牙大使奥克兰勋爵提出，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各海上强国也一定曾在法国与奥、普之间进行过调停（H. M. C. 第14号报告，附录：第5部分[德罗普莫尔文件]，第334、339和341页）。

[47] 萨伏依实际上已于1792年11月27日被兼并。

[48] 要想在占领的领土上防止反革命活动，兼并成为唯一可能的政策（A.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简史》[巴黎，1962年]，第236页）。

[49] 勒布伦争辩说，该法令只适用于与法国作战的国家，而且援助并非要提供给少数不满分子，而是提供给那些正在努力摆脱外国统治而面临被镇压威胁的全体人民。

[50] 关于法国的“天然边界”的理论，长期以来被法国历史学家如索列尔等认为在法国历史上已有很久的渊源，只不过在近期才提出来。首先发表这一主张的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莱茵兰人J. G. 福斯特尔于1792年11月15日在劝说迈恩斯（Mayence）的居民赞成由法国兼并时提出的（G. 泽勒：《旧王朝与天然边界》，载《近代史评论》第8卷[1933年]，第305—333页；P. 萨尼亚克：《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属莱茵》[巴黎，1917年]，第80页；A.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简史》[巴黎，1962年]，第236页）。

[51] 参阅D. 威廉斯《1793年戴维·威廉斯和詹姆斯·蒂利·马修斯出使英格兰的使命》，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3卷（1934年），第659页。

[\[52\]](#) J. 肖米埃：《从瓦伦事件到路易十六被处决期间西班牙与法国的外交关系》（1957年），第15章。

附录 18世纪欧洲和北美人口增长统计 资料^①

（参见原文第25页注）

美洲大陆殖民地	1750/2000	—	美国 4000(1790 年)
法国	22000(1752—1763 年)	24000(约 1770 年)	26900(1801 年)
俄国 ^②	19000(1762 年)	—	29000(1796 年)
意大利	15484(1750 年)	—	18091(1800 年)
那不勒斯	3953(1765—1766 年)	4450(1775—1776 年)	4964(1801 年)
教皇国	2189(1769 年)	—	2400(1782 年)
皮埃蒙特	1795(1750 年)	1954(1774 年)	—
西西里	1319(1747 年)	—	1660(1798 年)
伦巴第	1086(1768 年)	—	1154(1799 年)
托斯卡纳	1079(约 1750 年)	—	1188(约 1800 年)
撒丁	360(1751 年)	437(1782 年)	461(1821 年)
威尼斯	149(1760 年)	141(1776 年)	137(1797 年)
萨伏依	247(1756 年)	—	422(1801 年)
西班牙 ^③	9308(1768 年)	10410(1787 年)	10541(1797 年)
奥地利	6135(1754 年)	7937(1784 年)	8511(1800 年)
匈牙利(内)	1718(1720 年)	—	6468(1787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6140(约 1750 年)	7531(约 1780 年)	9156(1801 年)
爱尔兰	3191(1754 年)	4048(1781 年)	4753(1791 年)
苏格兰	1266(约 1755 年)	—	1678(1801 年)

续表

波兰	11000/11500(1764 年)	—	—
普鲁士 ^④	3617(1763 年)	5015(1780 年)	5844(1793 年)
普鲁士某些省	2497(1752 年)	3487(1778 年)	3911(1789 年)
荷兰	—	—	2078(1795 年)
比利时	—	2273(1784 年)	3000(1799—1800 年)
布拉班特	445(1755 年)	618(1784 年)	—
葡萄牙	2100(1732 年)	—	2900(1800 年)
瑞典	1781(1750 年)	2021(1775 年)	2347(1800 年)
丹麦	806(1750 年)	843(1775 年)	926(1800 年)
挪威	591(1750 年)	718(1775 年)	883(1800 年)
芬兰	422(1750 年)	610(1775 年)	833(1800 年)
瑞士	1200(1700 年)	—	1700(1798 年)

注：① 数字单位以千计。

② 1796 年的 2900 万不包括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俄国兼并的地区的人口。

③ 西班牙 1797 年的人口统计异常不完全。

④ 普鲁士的人口数字包括 1772 年扩张的领土在内。

资料来源：

美洲大陆殖民地：E. B. 格林和 V. D. 哈林顿：《1790 年联邦人口普查前美国的人口》（纽约，1936 年），第 6 页。美国 1790 年：《联邦人口普查》。

法国：E. 勒瓦瑟：《法国人口》，I（巴黎，1889 年），第 213 页和 216 及以下各页；E. 埃斯莫南：《埃克斯皮利神父和他的统计工作》，载《近代史评论》第 4 卷（1957 年），第 276 页。

俄国：P. L. 利亚申科：《俄国国民经济史》（英译本，纽约，1949 年），第 273 页。

意大利全国：K. J. 贝洛赫：《意大利人口变迁史》第 3 卷（柏林，1961 年），第 354 页。皮埃蒙特：贝洛赫，同上书，第 3 卷，第 353 页。那不勒斯：贝洛赫，同上书，第 1 卷（柏林，1937 年），第 230 页；西西里、托斯卡纳和教皇国：同上书，第 2 卷（柏林，1939 年），第 152、237、122 页。伦巴第：M. 罗马尼：《1750—1850 年伦巴第的人口变迁》，载《经济与历史》杂志，第 4 卷（1955 年），第 413 页。撒丁：F. 科里多雷：《1479—1901 年撒丁人口资料史》（都灵，1902 年），第 43、47 页。威尼斯：D. 贝尔特拉米：《威尼斯人口史》（帕多瓦，1954 年），第 59 页。

萨伏依：R. 卢梭：《1861 年以前萨伏依的人口》（巴黎，1960 年），第 220—221 页。

西班牙：多明格斯·奥尔蒂斯：《18 世纪的西班牙社会》（马德里，1955 年），第 58—59 页。

奥地利（“在帝国参议院有代表的领地和王国”）：《国际统计年鉴》（海牙，1916 年），第 6 页；A. 居特勒：《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时期的人口普查，1753—1790 年》（因斯布鲁克，1909 年）。

匈牙利：G. 蒂林：《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的马札尔人》（布达佩斯，1938 年），第 36 页；整个匈牙利，即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和军事边境的人口，在 1787 年为 9516000 人（同上书，第 34 页）。1720 年全国人口估计为 2582000 人，但 S. 萨博（《匈牙利民族》，布达佩斯，1944 年）认为最多不超过 300 万到 350 万。

英格兰和威尔士：J. 布朗利：《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和死亡率史》，载《公共卫生》，第 29 期（1915—1916 年），第 228 页。

爱尔兰：K. H. 康内尔：《1750—1845 年爱尔兰的人口》（牛津，1950 年），第 25 页。

苏格兰：J. G. 基德：《苏格兰人口统计》，苏格兰历史学会，第 3 辑，第 44 卷（1952 年），第 IX 页。

波兰：科尔宗：《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统治时期的波兰，1764—1794 年：经济和行政史》第 2 版（克拉科夫，1897—1898 年），第 1 卷，第 63 页。

普鲁士（包括 1772 年兼并的领土）：O. 贝尔：《关于日耳曼民族人口统计的发展》，载《公共统计档案》，第 17 卷（蒂宾根，1914 年），第 50—89 页。

普鲁士各省：V. 伊纳马－施特内格和哈普克：《人口的变动》，载《简明社会科学辞典》第 2 卷（第 4 版，耶拿，1924 年），第 672 页。

荷兰（1931 年的尼德兰领土）：J. C. 拉马尔为《1815—1931 年尼德兰和荷兰王国历史地图集》（海牙，1931 年）所作的注解（第 231—272 页）。

比利时：H. 范·韦费克：《比利时历年人口密度》，载《Studi in Onere di Armando Saponi》（米兰，1957 年），第 1428 页。布拉班特公国：A. 科泽曼斯：《17、18 世纪布拉班特的人口》（布鲁塞尔，1939 年），第 224 页。

葡萄牙：M. 赖因哈德：《世界人口史》（巴黎，1950 年），第 149 页。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H. 吉勒：《18 世纪北欧国家人口统计史》，载《人口研究》第 3 卷（1949—1950 年），第 19 页。

瑞士：W. 比克尔：《中世纪末以来瑞士人口史》（苏黎世，1947 年），第 49 页及以下各页。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dam, Robert, 亚当，罗伯特，英国建筑师，111

伊特鲁里亚风格，106

“亚当革命”，110

Addison, Joseph, 艾迪生，约瑟夫，英国作家，69

Adler, Guido, 阿德勒，吉多，奥地利音乐学家，《音乐史手册》主编，81

1740年发现格奥尔格·莫恩的交响曲，82

Adolphus, Frederick, 阿道弗斯，弗雷德里克，瑞典国王，他的逝世，263

Africa, 非洲

贸易：荷兰成为比英国更好的非洲货物集散地，37；非洲土著和黑白混血种人在贸易中的作用，246；用于交换奴隶的商品种类，246—247；非洲、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514；除奴隶外的出口，241

奴隶贸易：奴隶出口比其他出口更重要，241；废除奴隶贸易的要求，247，248，249；七年战争的影响，241

非洲协会，237；它的探险活动，240—249

南非，施帕尔曼勘探开普地区，237；开普地区的经济和文化，237—238；卡菲尔战争，238—239

埃及：商业状况，239；战略重要性，240

北非，240

西非公司，241

开发非洲的计划，241—242

英国对塞内加尔的治理，242—243

1783年凡尔赛条约的影响，243—244

向内地的渗透，244

欧洲人与非洲人的结合，245—246

非洲人要求接受欧洲教育，246

在塞拉利昂促进殖民，249—251

African Association, 非洲协会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创建该协会，237

探险活动，240，249

Aiguillon, Emmanuel Armand de Rechellieu, duc d' , 艾吉永公爵，埃马纽埃尔·阿尔芒·德·勒舍利厄，595，596，607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 达朗伯尔，让·勒·隆德，法国哲学家，143

卢梭和达朗伯尔的思想分歧，68

《百科全书》，138

Alexander, 亚历山大，俄国沙皇

教育改革，152

以反革命政策作为国际行为的准则，331

America, North, British, 英属北美

殖民地的发展，509—510，514—516

根据巴黎条约法国丧失的殖民地，5，230，480，509，537

红种印第安人起义，9，481，523，537；导致禁止殖民者的政策，10，480—481，522，537

帝国统治的加强，10—11，438：糖浆条例（1773年），481，521；惩治兵变条例（1765年），483；税收条例（1766年），456，

483; 印花税条例 (1765年), 10, 438, 455, 482, 483, 520, 537 (1766年废止, 482, 483, 538); 实施航海法令, 10, 37, 38; 公告令 (1766年), 11, 438, 456, 482, 538; 根据汤森条例征收的税 (1767年), 483, 520 (废止, 484); 食糖条例 (1764年), 10, 455, 481—482, 537; 茶叶条例 (1773年), 458, 484, 522, 527 (废止, 497); 魁北克法 (1774年), 10, 459, 460, 485, 488, 523, 546; 波士顿海港法 (1774年), 459, 484, 497; 马萨诸塞政府法 (1774年), 438, 459, 484, 497; 驻营条例 (1774年), 459, 484, 497; 司法权条例 (1774年), 459, 484, 497

革命运动的兴起, 457, 458, 485, 521—526

反对印花税条例大会 (1765年), 455, 456

第一届大陆会议 (1774年), 11, 438, 459—460, 461, 485

第二届大陆会议 (1775年), 461, 462—463, 466, 486, 526

富兰克林的建议, 463

波士顿茶党, 438, 458, 484

美国革命, 108, 114, 161, 417, 421, 433, 439, 526

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年), 1: 成为欧洲的榜样, 440—442; 最初是一次殖民地叛乱, 11; 法国向殖民者出口火药, 141; 英国海军的战略, 174; 需求造船用的木材, 182; 建立民兵的理想, 203; 欧洲提供的雇佣兵, 297; 俄国同情英国, 326; 阻碍英国向南扩张, 371; 被西班牙用来促进自己的殖民利益, 372; 美洲各阶级人民的参加, 424; 英国人的意见分歧, 490; 英国发动战争遇到的问题, 490—491; 英国的进攻, 491—495, 498—499, 503—505; 结果导致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化, 439—440, 527—530; 法国加入战争, 12, 495, 496, 498, 499, 500, 650 (引起财政危机, 656); 西班牙加入战争, 12, 371, 500, 501; 独立宣言 (1776年), 11, 187, 516, 676 (宣言发表的原因, 439, 453; 宣言的起草, 463—464; 对宣言的反应, 489); 莱克星敦战役 (1775年), 461, 486; 占领查尔斯顿, 503; 邦克山战役, 486—487; 约克敦围城战役, 490, 504, 505; 布兰迪万河战役, 493; 萨拉托加战役, 494, 495, 496, 497; 蒙茅斯战役, 498; 萨凡纳战役, 499, 503; 凡尔赛和约, 13, 268,

505—506（造成的困难，507—508，531；领土解决方案，530—531，532—535；西北法令，532—533）；美国革命的各个方面，516—521

政府，2：英国在殖民地实行较好的行政结构的愿望，8—9；各殖民地议会，433，438，448—450；任命英国司令为马萨诸塞总督（1774年），458；政体，510—511；向独立的过渡，530；马萨诸塞特许状（1691年），438，449

宪法：关于英国改变殖民地宪法的权利的争执，453—454，459—460；各州宪法，464—465；邦联条款（1781年），467—468，473，530—531；保守派对宪法的反应，468—469；费城联邦会议，470—472；伦道夫计划，472；帕特森计划，472—473；制宪冲突，473—475；批准宪法的斗争，475—476；权利法案，477；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477—478；组织，478—479

立法：英国控制殖民地的立法，450—451；奥蒂斯主张只有殖民者的立法机构才能筹款，453，537；政府的立法权与司法和行政分立，450；各殖民地立法机构的影响，517

司法：新建立的全国司法机构的任务问题，474—475

免役地税、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528—529

税收：殖民者抗议帝国税收，455—456，457；抵制英货的步骤，456；公告令，456；税收条例（1766年），456

贸易，521；与欧洲的贸易，34，35，37，40；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39，514；与非洲的贸易，514；英国的垄断，37；美国独立的影响，37，39，507；英国的枢密令（1783年），507；英国商品的市场，42—43，45；奴隶贸易，241，514

军队的士气，501—503

海军，187，499

宗教，514，529

社会，426—427，429，431，434，511—513，514

人口的增加，28，513，514，714

加拿大，七年战争中征服加拿大，5；英国改变方针向加拿大进行殖民扩张，9（法属加拿大成为魁北克[1763年]，522）；诺思勋爵的魁北克法（1774年），10，459，460，485，488，523，546；美洲殖民主义者在独立战争中的领土要求，12（他们袭击加拿大，487—488）；在1783年凡尔赛和会上英国保持了控制权，13；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分离（1791年），14；帝国效忠派联合会，489—490，528，530

America, Spanish, 西属美洲

贸易：英国和法国的加入，34；贸易主要是制成品和天然特产的交换，35；西班牙主要港口向殖民地贸易开放，369；取消出口到美洲的羊毛商品的营业税，370；18世纪后半叶的总的发展，398—399，405；自由贸易法令（1778年），39，369；自由贸易区，401—402，406

对基督教的政策，404；驱逐耶稣会士，404，405

社会，406—407，426

科学考察，404

启蒙运动：殖民地各大学的复兴，407；新思想的传入，407—408；卢梭著作的传入，410

起义，405

军队的编制，404

法国革命的影响，410

法国革命战争，408—409

独立战争，410—411

独立（1810年），421

政府：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建立，399；帝国商业制度的革新，399—400；卡洛斯三世的严厉控制，402；监督辖区制度，403—404；卡洛斯四世在位时期政府滥用职权情况再度发生，408

Amiens, Peace of（1802年），亚眠和约，419

Anglo-Dutch War (1780—1783年)，英荷战争，38

对海运的影响，38—39

Anson, George, First, Baron, 安森，乔治，第一代男爵，英国海军上将

战略，174

环球航行，178

Antonovich, Ivan, 安东诺维奇，伊凡，俄国沙皇（1740年），307

死亡，308

Aranda, count of, 阿兰达伯爵，卡斯蒂利亚委员会主席（1766—1773年），361

驱逐耶稣会士，364

威望和权势，365

被黜，375

Architecture, 建筑

新古典主义，96—102：功能论，102—103，110—113

哥特复兴式，104，105—106：与风景如画风格运动，106—107

希腊复兴式，110

Arkwright, Sir Richard (1732—1792年)，阿克赖特爵士，理查德，发明水力架的英国人，139

Armies, 陆军

武器的发展，191—194

战术，194；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术，195；俄国的战术，195；福拉尔的战术，195—196；纵队战术，196；吉贝尔的战术，196—198，203

战略，198—200

防御工事, 200

军需, 201

参谋机构, 201—202

许多军事家跻身于启蒙哲学家之列, 203

美国的民兵, 203

军官的阶级利益, 203—206; 军衔, 206; 辅助部队, 206—207; 圣日耳曼对法国军官所采取的政策, 207—208; 军队特权革命的结果, 208

征兵制, 208—211

Art, 艺术

浪漫主义作家, 109—110

新古典主义, 96—97, 110—113

中国艺术, 234

Asia, 亚洲

发现航行, 230

贸易: 英国成为亚洲货物的集散地, 37; 中国的对英贸易, 231—232; 抵代税法, 231; 计划在基卢瓦岛建立殖民地使商人得以参与东非与西亚之间的贸易, 239; 在亚洲为英国货物扩大市场, 563; 英国的贸易殖民地, 232—233

荷兰人在亚洲, 233—234

对东方研究的兴趣, 234—236

Astronomy, 天文学, 见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lantic Community”, “大西洋共同体”, 1, 3, 13, 16

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激进主张的鼓吹者, 2

对英国“哲学”领域的不信奉国教者的支持, 2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33

Augustus III, 奥古斯特三世, 波兰国王

着意遏制普鲁士的发展, 335

在他在位期间波兰作为积极力量的衰落, 337

去世, 6, 253, 255, 258, 322

Aulard, François Victor Alphonse, 欧拉尔, 弗朗索瓦·维克托·阿尔方斯 (1849—1928年), 法国历史学家

人权同盟成员, 642

依靠科学方法, 643

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 643—645

与马蒂埃的分歧, 646

研究泰纳的真实思想, 649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第一个监禁罪犯的殖民地, 14

在新南威尔士的殖民, 14

Austria, 奥地利

七年战争结束时的国债, 7

限制农民的义务, 7—8, 281—283

经济扩张, 293

镇压政策, 301, 302

教皇抵制对教会的征税, 8, 284

社会改革, 8, 284—285

第四等级的觉醒, 20, 300—301

解散耶稣会, 285

人口增长, 29

军队, 285

占领巴伐利亚，286

贸易：奥地利国旗插在第聂伯河口，41；奥土商业协定（1784年），41；牺牲法国的利益而在希腊和黑海地区扩大贸易，43；约瑟夫二世的保护主义体系，291

与法国结盟，签订巴黎条约后的影响，5

奥普战争（1778—1779年），199，270—271

对巴伐利亚提出领土要求，269

与俄国结盟（1781年），272，327

奥土战争（1787年），274，328

赖兴巴赫条约（1790年），277，351

瓜分波兰，285—286，329，340，355—356

与法国的战争（1792年），701，702

与普鲁士结盟（1791年），694

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695，696

Bach, Carl Philipp Emanuel, 巴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德国作曲家

海顿的主要先驱之一，85

恢复自然的朴实无华的旋律，56

腓特烈大帝的大键琴师，87

在他创作的时期声乐胜过器乐，88

海顿研究他的乐曲，89

Bach, Johann Sebastian,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德国作曲家，85，93

斯皮塔的专著，83

风格，84

对海顿的影响，89

“四十八首”及其他赋格曲，90，91

赞美诗，95，96

Bacon, Francis, Baron Verulam, Viscount St. Albans, 培根，弗兰西斯，弗鲁兰姆男爵，圣奥尔本子爵，英国作家，51

Baden, Margrave of, 巴登侯爵，见Charles Frederick

Bailly, Jean-Sylvain, 巴伊，让-西尔万，法国国民议会主席

庄严宣誓在宪法制定以前不解散国民议会，668

被选举为巴黎市长，674，679

Baltic Sea, 波罗的海，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33，35，182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法国作家，619，639

对法国史学的影响，623，630

Banks, Sir Joseph, F.R.S., 班克斯爵士，约瑟夫，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家，鼓励研究非洲的植物生态，237

Bar, Confederation of (1768年)，巴尔同盟，259，339—340

Barfleur, Battle of (1692年)，巴夫勒尔战役，175

Barry, James (1741—1806年)，巴里，詹姆斯，英国画家，110

一生专注于历史画，108

模仿韦斯特的《沃尔夫将军之死》，109

对布莱克早期作品的影响，110

Barry, Madame du, 巴里夫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敌视舒瓦瑟尔，257

泰雷神父对她的朋友们的宽大，597

Basle, 巴塞尔，33

Basle, Treaty of (1795年)，巴塞尔条约，419

Bat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 417, 424

Bavaria, Elector of, 巴伐利亚选帝侯, 见Charles, Theodore

Bavarian Succession, War of,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战争显示出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弱点, 286

俄国未支持普鲁士反对奥地利, 326

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博马舍, 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隆·德, 法国戏剧家, 496

Beccaria, Cesare, 贝卡里亚, 切萨雷, 意大利经济学家

反对对外贸易的完全自由, 50

叶卡捷琳娜二世研究他的《论犯罪与刑罚》, 311

他的著作成为1864年俄国法院改革法的基础, 312

他的著作在法理学、刑罚学、经济学和史学方面的作用, 387

Bechers, Johann, 贝歇尔, 约翰, 德国经济学家, 类似英法重商主义者学说的理论, 50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 德国作曲家, 83

他的谐谑曲, 82

雅恩对贝多芬的研究, 84

英雄交响曲, 87

埃马努埃尔·巴赫探讨贝多芬作曲的严肃态度, 88

对维也纳的影响, 92

交响曲, 93

莫扎特的影响, 94, 96

Benedict, XIV, Pope, 本尼迪克十四世, 教皇, 389, 392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 英国哲学家,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学说, 79—80

Bezborodko, Alexander, Prince, 别兹博罗德科公爵, 亚历山大, 俄国总理大臣, 327

希腊计划, 327

外交政策, 328, 329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 德国政治家, 297

Black, Joseph (1728—1799年), 布莱克, 约瑟夫, 苏格兰科学家, 149

对热的观察, 118, 128

比热, 119

潜热, 119—120, 138

发现“固定空气”, 122, 125

Blanc, Louis, 勃朗, 路易, 法国社会主义者, 法国革命史, 629, 631

Bonaparte, Napoleon, 波拿巴, 拿破仑, 法国皇帝, 宿命论观点, 622; 入侵伊比利亚半岛, 411, 415; 作为炮兵的能力, 194; 作为参谋军官的能力, 202; 征募的士兵, 211; 重新坚持法国在新世界的势力, 419; 1796年进入米兰, 437

他的加冕称帝成为反革命行动, 644

教育制度, 157, 171; 1803年恢复奴隶制, 416

拿破仑的传奇, 623

逆潮流而行直到18世纪末, 73

承认维也纳是欧洲音乐之都, 82

卡诺瓦的拿破仑雕像, 102

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地位, 622, 623, 638, 640, 648

Bonifácio, José de Andrada e Silva, 博尼法西奥, 若泽·德安德拉达·埃·席尔瓦, 巴西独立领袖, 415

Boscawen, Edward, 博斯科恩, 爱德华, 英国海军上将, 他的战略, 174

Boullée, Étienne-Louis (1728—1799年), 部雷, 艾蒂安-路易, 法国建筑师

作为行政官员和有理论见解的建筑师, 111

《关于艺术的论文》, 112

牛顿纪念碑, 113

Boulton, Mathew, 博尔顿, 马修, 英国实业家

明月社成员, 136

与詹姆斯·瓦特合作, 138

移居美国的思想, 442

Bourcet, Pierre Joseph de, 布尔塞, 皮埃尔·约瑟夫·德, 法国军事理论家

格勒诺布尔参谋学院院长, 199

《山地战原理》, 199—200

供应工作, 201

参谋组织, 202

Brahms, Johannes, 勃拉姆斯, 约翰内斯, 德国作曲家

交响曲, 96

逝世, 82

Brandywine, Battle of (1777年), 布兰迪万河战役, 195

Breteuil, Louis Charles Auguste Le Tonnelier, baron de, 布勒特伊男爵, 路易·夏尔·奥古斯特·勒·托内利埃, 法国外交家

驻维也纳大使, 270: 特申和会的调停人, 271

担任大臣, 672

流亡国外, 674

Brienne, Loménie de, 布里安, 洛梅尼·德, 图卢兹大主教, 法国政治家, 613, 670

任命, 656

任大臣, 21: 财政改革, 15; 中止拉穆瓦农的改革, 616; 他关于销售和出口谷物的建议, 657; 财政, 587, 588; 任皇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 584; 财政改革, 589

与卡洛纳的角逐, 615

失去权力, 658

Brissot, Jacques Pierre, 布里索, 雅克·皮埃尔, 法国政治家, 441

对特权阶级的态度, 606

共和主义, 692

法国革命中的布里索派, 697, 698, 699

在国民公会中, 707

与罗伯斯庇尔的争吵, 708

战争政策, 699, 712

Broglie, Marshal de, 布罗伊元帅, 法国将军, 672

Brown, Lancelot (“Capability”), 布朗, 兰斯洛特 (“大地改造者”), 英国园林设计师, 56, 106

Brunswick, duke of (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 Brunswick-Bevern), 不伦瑞克公爵 (查理·威廉·费迪南德·不伦瑞克-贝弗恩), 普鲁士将军, 704, 705, 706

Bücken, Ernst, 比肯, 恩斯特, 德国历史学家, 81

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1708—1788年), 布丰伯爵,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 法国科学家, 116—117, 141, 148

Burgoyne, John, 伯戈因, 约翰, 英国将军

美国独立战争，493，494：抵达波士顿，486；在萨拉托加投降，210，494

Burke, Edmund, 伯克，埃德蒙，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著作家

对法国革命的看法，21，422：《法国革命感想录》，79，559

王室年俸管理法案，552，559

经济改革法案，551

《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106，108

赞赏1791年波兰宪法，346

对美国问题的看法，426，458，490，520：伯克作为美国在伦敦的代理人，452

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比特伯爵，约翰·斯图尔特，英国大臣，546

被乔治三世任命为首相，538，539

与法国媾和，539

辞职，539

Cabanis, Pierre, 卡巴尼斯，皮埃尔，法国科学家，157

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卡洛纳，夏尔-亚历山大·德，法国政治家

任大臣：财政改革，15，614；改革，21，579，586，614，656；东印度公司的改革，230；财政，590，613—614；召开显贵会议，615—616

在皮耳尼茨，696

被免职，616，656

Camperdown, Battle of (1797年)，坎珀多因之战，190

Campomanes, Pedro Rodriguez, 坎波马内斯，佩德罗·罗德里格斯，西班牙政治家和经济学家，360

经济思想, 49, 50: 《论民间工业的发展》(1774年), 45;
《税务问题》, 54

在卡洛斯三世时期任大臣, 363, 365, 368: 市政会议的改革,
367

被免职, 374

Canada, 加拿大, 见America, North,

British

Cantillon, Richard, 坎特龙, 理查德, 爱尔兰经济学家, 45

Capmany y Montpalau, Antonio de, 卡普马尼-蒙帕劳, 安东尼
奥·德, 西班牙学者和政治家, 49

Carli, Gian Rinaldo, 卡利, 吉安·里纳尔多, 意大利经济学
家, 387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苏格兰作家, 法国革命史,
632, 633

Catherine II, 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 大帝, 俄国女皇,
17, 18, 147, 163, 167, 189, 440, 695

即位, 307

贸易, 39, 330

外交政策, 321—329, 331, 338, 693—694

武装中立同盟, 501

结盟, 255, 272, 294, 326, 338

波兰政策, 257—258, 262, 335, 349

对奥地利扩张的态度, 270

扩张主义政策, 274, 294

在欧洲遇到的困难, 275, 276

对基督教的政策, 308—309

编纂法典，309—312

教育制度，312—313，317—319

地方政府，314—317

财政，329—330，331

Cavendish, Henry (1731—1810年)，卡文迪什，亨利，英国科学家

计算地球的平均密度，118

对空气的研究，122，125；对电学的研究，130

Chambers, Sir William, R.A.，钱伯斯爵士，威廉，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皇家艺术院校长

参与创建皇家艺术院，105

风格，110；崇尚中国式园艺，234

Charles I，查理一世，英国国王，516，611

Charles III，卡洛斯三世，西班牙国王，360

开明的专制主义，565

在西班牙实行的政策，360—361，397：对耶稣会的政策，363—364，413；行政机构，365—367；在殖民地的行政机构，403，406，409；农业，367—369；贸易，369—370，372，373；财政，372，580

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影响，254，400；西班牙与法国的关系，254，266；美国独立战争，267，371—372，501

逝世，373，402，404，408

Charles IV，卡洛斯四世，西班牙国王

在位期间，373—375

Charles VI，查理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5，278

Charles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 查理（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297

Charles Frederick, 查理·弗里德里希，巴登侯爵，296

Charles, 查理，萨克森公爵，322

Charles Theodore, 查理·特奥多尔，巴伐利亚选侯，286，301

Chateaubriand, François-Auguste vicomte de,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奥古斯特，法国作家，633

对启蒙运动的态度，621

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和对革命的态度，622，623，624，626，635，653

Chatham, Earl of, 查塔姆伯爵，见Pitt, William

China, trade, 对华贸易，34，35，218，230，231，232

Choiseul, Étienne de Choiseul-Stainville, 舒瓦瑟尔，艾蒂安·德·舒瓦瑟尔-斯坦维尔，法国大臣，594—595

巴黎条约后的政策，594

要求对法国在七年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进行报复，5，12，183，254，257

外交政策，259，594—595；改革殖民地行政管理，6；参与援助波兰总同盟，340；有计划地加强与西班牙的联盟，254；鼓励西班牙在福克兰群岛争端中抗拒英国，595—596；法—西攻守同盟（1761年），6，254；反对将与奥地利结盟作为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础，270；安排未来的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以加强与奥地利的关系，595；忽视俄国在欧洲势力的加强及其与普鲁士的结盟，594；对英战争政策，254—255，256，257

改革，214，570；陆军和海军改革，6，183—184，254，500，595；财政改革，213；建立测绘局，570；驱逐耶稣会士，594

未能在法国支撑皇家权力，595

最高法院权力的增加，595

在卡宴建立殖民地，416

被免职（1770年），214，257，595—596

Cisalpine Republic,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424

Clarkson, Thomas, 克拉克森，托马斯，英国慈善家，249

Clement XIII (Carlo Rezzonico) Pope, 克雷芒十三世（卡洛·雷佐尼科），教皇，283，389，392；去世，391

Clement XIV (Giovanni Vincenzo Ganganelli), Pope, 克雷芒十四世（乔瓦尼·温琴佐·甘加内利），教皇，19，166，389，392，394

Clinton, George, 克林顿，乔治，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501，502

总司令，498

围攻查尔斯顿，503

在约克敦的失败，504，505

Clive, Robert, First Baron, 克莱武，罗伯特，第一代男爵，英国政治家和军人

在孟加拉实施“迪万尼”，即民政管理权，219

“双重”管理制度的变化，220，225

议会调查他的问题，234

Coalition, First European, 第一次欧洲联盟，709

Colbert, Jean-Baptiste, marquis de Seignelay,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塞涅莱侯爵，法国政治家

法国海军的“缔造者”，183，184，185；认识到木材在造船方面的重要性，181

重商主义政策，573

关税同盟和关税改革，577；货币制度，576

对绘制地图感兴趣，134；对实用艺术感兴趣，138

Commutation Act (1784年)，抵代税法，231

Condillac, abbé de, 孔狄亚克神父，法国哲学家，158

心理学论文，155—156

Condorcet,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孔多塞侯爵，玛丽·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法国教育家和哲学家

为法国教育制度提出的计划，170—171，173

黑人之友社成员，248

关心美国，441

共和主义，692

Constantine Nikolayevich,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俄国大公爵，274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army promotion, 大陆会议与军队军官的晋升，206

Cook, James (1728—1779年)，库克，詹姆斯，英国海军上校和探险家

发现新西兰的航行，134，178，183

在七年战争中服役，179

Coote, Sir Eyre, 库特爵士，艾尔，英国将军，222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皮埃尔，法国戏剧家，113，114

Cornwallis, Charles, First Marquess, 康华理，查尔斯，第一代侯爵，英国将军

海军战略，174

美国独立战争，492，493：卡姆登战役，503；约克敦失守，13，505；南部战役，503—505

关心东印度公司，234

被任命为印度总督，225

在印度的改革，225—228

Cort, Henry (1740—1800年)，科特，亨利，英国发明家，140

Costa, Claudio Manuel da, 科斯塔，克劳迪奥·曼努埃尔·达，巴西作家，415

Cotte, Père Louis (1740—1815年)，科特，佩尔·路易，法国科学家，132

Cousin, Victor, 库辛，维克托，法国教育家和哲学家，143

Cowper, William (1731—1800年)，柯珀，威廉，英国作家，73

Crimea, 克里米亚，260，262，264

吞并，272，294

Crompton, Samuel (1753—1827年)，克朗普顿，塞缪尔，英国发明家，139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奥利弗，英国护国公，516，628

Dalrymple, Alexander, 达尔林普尔，亚历山大，苏格兰探险家，230

Danton, Georges, Jacques, 丹东，乔治·雅克，法国政治家

性格，646

参加法国革命，628，632，643，651，678：腐化，644；主张奥尔良派摄政，692；巴黎公社领袖，705；司法部长，706；被控试图实行专制，708；在临时执行委员会中的影响，709；法国的“天然边界”，712

Darwin, Charles Robert, 达尔文，查尔斯，英国生物学家，333

David, Jacques-Louis (1748—1825年)，大卫，雅克-路易，法国艺术家，113，114

Davy, Humphry, First Baronet, 戴维, 汉弗莱, 第一代从男爵, 英国化学家, 128

Defoe, Daniel, 笛福, 丹尼尔, 英国作家, 162

Denmark, 209, 264

海运业, 39, 190

贸易, 231, 248

与瑞典作战, 275—276

Dessalines, Jean-Jacques, 德萨利讷, 让-雅克, 海地革命者, 420

Destutt, Antoine Louis Claude, comte de, 德斯蒂伯爵, 安托万·路易·克洛德, 法国哲学家, 教育理论家, 156, 157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法国哲学家和文人, 628

Dolben's Act (1788年), 多尔宾法, 249

Du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迪穆里埃, 夏尔-弗朗索瓦, 法国政治家和将军

要求在法国实行军事独裁, 22

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701; 行政变革, 570; 进攻战略, 702; 辞职, 703

在法兰西战争中指挥权由拉法耶特转到他手中, 706; 参加瓦尔米战役, 707; 攻击荷兰的计划, 712; 在尼德兰迅速挺进, 710; 比利时战役, 711

Dundas, 邓达斯, 见Melville

Dutch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群岛, 34

Economic Ideas, 经济思想, 45—54

重农主义学派, 47, 48, 53, 54; 重商主义经济学派, 50—52, 53

Eden, Treaty of (1786年), 伊登条约, 54

Education, 教育

大学, 149—151

科学院, 151—153, 161

教育思想, 153—160, 162—166: 与教育制度, 160—162, 166—169; 在法国, 169—173

Egypt, 埃及

商业前景, 239

战略重要性, 239—240

Elizabeth, 叶利扎维塔, 俄国女皇, 307, 324

Emmerich, 埃梅里希, 美因茨选帝侯, 296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印度政治中的支配地位, 218—219

从英国加以控制, 219, 564

政治成为东印度公司总部中的因素, 538, 542, 545—546

约翰·鲁宾逊拟定的向东印度殖民的计划, 553

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 553, 554

皮特的印度法案, 223, 555; 抵代税法, 231

诺思的管理法案, 546, 548

命令直接在美洲销售茶叶, 438

对华贸易, 218, 231, 232, 234

改革措施, 220—221, 225

在浦那的权力斗争, 221—223

Enlightened Despots, 开明专制君主

何谓开明专制, 16

欧洲君主们的实际目的, 16

重农主义者关于“合法专制主义”的观念，17

宣传的主旨，18

对待欧洲各大学的态度，150

亨利·皮雷讷论专制君主的著作，565；他对这些专制君主的统治与英、法的统治所作的比较，565—566

对贵族特权的限制，298

政府机构的近代化，17—18

法典的编纂，19—20

腓特烈大帝，18，297，565：他的教育改革，168—169；《论政府的形式和君主的职责》，17；政治著作，297；鼓励移民，297；主张间接税，296；司法改革，297；腓特烈法典，19；对宗教不持偏执态度，297；宗教容忍，299；另见Frederick the Great

约瑟夫二世，18—19，297，565：宗教容忍，299；实行义务教育，167；行政、司法和社会制度的改革，20，288—293；另见Joseph II

叶卡捷琳娜大帝，18：试图实行开明治理，331；拒绝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17；另见Catherine the Great

卡洛斯三世，565：挑选开明的顾问，360；另见Charles III

Enlightenment, The, 启蒙运动

欧洲各种思想在美洲的传播，1—2，407，442

政教关系日益紧张，19，389—391：驱逐耶稣会士，19，166—167，390，565

法典的编纂，19—20；腓特烈法典，19

舆论运动在英国的发展，20，298—301

反对启蒙运动的表现，23，301—303

欧洲存在新思潮的条件，55

要求重新评价一切社会体制，55

作为理性哲学的启蒙运动， 55

浪漫主义的兴起， 55， 561

教育思想的发展， 143—144： 维克托·库辛与意识学派， 143；
与德国的先验论， 143； 法国教育的重建， 143； 新旧思想的对比， 144

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对本体的看法， 143

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哲学启蒙运动， 144

欧洲各大学， 150

法国百科全书派， 145

爱尔维修：《论精神》， 158—159

卢梭在教育理论方面提出的挑战， 162—166：《爱弥儿》，
163， 165；《社会契约论》， 164—165

七年战争后新思想扩及政治领域， 433

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贵族加入法国第三等级， 604

夏多布里昂和塞纳克·德·梅朗鼓吹启蒙运动， 621

在意大利， 385：经济思想， 385；改革， 388—389；各种思想的传播， 385—386；文化精英， 386；各大学的活动力量， 386；开明学者， 386—387；启蒙运动的影响， 388（中央政府的加强， 388；司法的中央集权， 388；财政改革， 388；教育， 389）；政教关系问题， 389—391

Estaing, Charles Hector Théodat, Comte d'， 德斯坦伯爵，
夏尔·埃克托尔·泰奥达，法国舰队司令， 184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指挥海军， 174， 182， 500， 503

战略， 175

Esterházy, Prince Miklós, 埃斯泰尔哈吉亲王，米克洛什，匈牙利音乐赞助人， 89， 91

Estonian Trade, 爱沙尼亚贸易， 35

Europe, 欧洲

“民主主义”革命，1

在中欧和东欧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3：它们与西欧的比较，3—4

开明专制君主，16：专制主义的概念，16—17；行政改革，17—18；政教关系，19；法典的编纂，19—20；腓特烈法典，19

人口：迅速增加，25，433，435；人口的控制，26—28；增加缓慢的地区，29；在18世纪下半叶，30—32；流行病及其影响，30—31；食物供应的改善及其影响，32；死亡率没有持久的下降，32

贸易：与美洲的贸易，33；与远东的贸易，34—35；与中近东的贸易，35；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35

在东方和西方的势力范围划分，265—266，274

1763年后的外交问题，252—253

巴黎和约（1763年）后对英国的担心，252

瓜分政策，334—335

革命潮流，421

社会结构，424：东欧的社会结构，425—426

社会，432—433，434—436，442，445：西欧的社会，427—429，429—431

社会冲突，433—434

美国革命的影响，440，442—443

通讯，443—444

Family Compact（1761年），家族盟约，6，254，371，594

Ferdinand，斐迪南，那不勒斯国王，380

试图建立意大利联盟，395

Filangieri, Gaetano, 菲兰杰里，加埃塔诺，意大利经济学家，50，387，395

Finland, 芬兰, 328, 331, 440

人口增加, 25, 26, 28

贸易, 35

Fischer, Ernst Gottfried (1754—1831年), 菲舍尔, 恩斯特
• 戈特弗里德, 德国化学家, 130

Folard, Jean Charles, Chevalier de (1669—1752年), 福拉尔骑士, 让·夏尔, 法国军人和军事著作家

在战场上“冲击”胜于“火力”的方针, 195, 197

主张使用步兵纵队, 195—196

Fontainebleau, Treaty of (1785年), 枫丹白露条约, 274

Fontenoy, Battle of (1745年), 丰特努瓦战役, 194

Forbonnais, François Véron Duverger de, 福尔博奈, 弗朗索瓦·韦隆·迪韦尔热·德, 法国经济学家, 48

Fox, Charles, James, 福克斯, 查尔斯·詹姆斯, 英国政治家,
551

福克斯—诺思联合内阁, 553—554, 555

东印度法案, 553—554

要求维护议会的独立性, 433

与美国签订商约未能成功, 507

企图排斥谢尔本任首相, 552

福克斯的朋友们是“人民之友协会”的成员, 559

政治策略, 560

格拉顿试图与福克斯和解, 564

France, 法国

教育, 169—173

人口增加, 25, 29—30, 602, 714: 在18世纪下半叶, 31

社会, 427, 428, 430—431, 434, 593, 600, 601—603

1789年以前的宪法斗争, 437—438; 动乱, 665; 各种俱乐部, 690—691, 693, 703

贸易, 33, 36, 40, 612: 与南美的贸易, 34; 与非洲的贸易, 239—240, 242, 243—244; 奴隶贸易, 241; 黑人之友社, 2, 248, 418; 需要大的商船队, 39; 对英贸易壁垒, 36; 放松垄断, 39; 英法商约(1786年), 39; 对外贸易的扩大, 43—44, 660; 印度公司, 229, 243

1789年以前的君主专制主义, 592

行政机构, 568—574, 612

革命前的行政管理: 舒瓦瑟尔, 254, 594—596(外交政策, 594—595); 三人集团, 596—598, 607; 杜尔哥, 607—611; 内克尔, 611—613; 卡洛纳, 613—616; 布里安, 657—658

财政, 574—591, 597—599, 608—609, 611—612, 614

1788年的司法改革, 658

经济, 427, 600—601, 659—660: 税收, 578—582, 597, 599—600, 608, 612, 614, 657; 总包税人, 580—582, 588, 597, 613, 672; 指券, 582, 588, 697, 703, 711; 1775年巴黎的谷物争论, 609, 657, 666; 经济动荡, 654—655, 659—660, 665, 677, 703

外交政策, 595—596, 709—713: 波兰政策, 258—259(1792年波兰事态发展的影响, 357, 358); 对奥地利扩张的态度, 270(1756—1757年法奥联盟的作用, 5); 家族盟约(1761年), 6, 254, 371, 497; 对东欧事物缺乏兴趣, 5; 英国的不满, 252; 兼并科西嘉(1768—1769年), 256—257; 法美联盟, 495, 496, 498

军事: 海军, 593, 690(海军事务, 183—187, 254); 陆军, 214—215, 254, 593, 670—671, 697, 703—704(战术, 195, 196—197; 军官与特权, 203—204, 205—206, 207—208; 预备役军队, 210; 军饷, 213); 革命的后果, 216—217(国民自卫军, 210—211, 644, 674, 675, 678, 691, 703, 704, 705)

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598；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598；七年战争，574，594，598，670；美国独立战争，184，266—267，371—372，547，586，598，611，650，656，659，660（海战，500；1783年的凡尔赛条约，268，506）；1783年与西班牙的战争，419；法国革命战争，585，641，701，702，706—707，710（瓦尔米战役，707—709；宣布斯海尔德河航行自由，710；友谊援助法令，711，712；向英国和荷兰宣战，713；遭普鲁士入侵，644，706）；拿破仑战争，570

耶稣会，565，594，596，604，656

殖民地：法属圭亚那（卡宴），416；圣多曼格，417—418（1790—1791年起义，418—419；英国的占领，419；宣布独立，420）

根据巴黎条约丧失在美国的殖民地，5，230，480，509，537

美国革命的影响，440，441

共和主义的兴起，692，697，704

革命，1，4，20—23，55，79，106，114，156，191，320，421，422—423；革命史研究，618—652；革命的起因，603—604，665—666；思想根源，604—606；类型，20；社会心理，446—447；显贵会议，614，615—616，656；贵族叛乱（1787—1788年），3，15，586，653，656，671；三级会议，23，418，422，446，572，584，614，615，616，617，626，650，656，657，660，661，662—663，667—668，669；第三等级，660，661，663，664，666，667，668，669，676，677；陈情书，663—665，689；国民议会，21，230，418，423，569，575，577，578，590，604，668，669，671，674，676—677，678，680—681，684，689，691；八月四日之夜，675—676，683，685；八月法令，676，678，680，685，686，699；巴黎高等法院，657—658，660—661；巴黎民众起义（1789年），672—674；进攻巴士底狱，21，394，641，660，673—674，684；农民革命（1789年），447，603，674—675；人权宣言，21，418，565，631，643，676，677，678；向凡尔赛进军，677—678；十月的日子，21—22（群众干预的重要作用，21—22；九月惨案，22，641，644，650，707，708）；制宪议会，206，207，208，210，212，213，

216, 578, 579, 580, 581, 585, 588, 590, 591, 676, 681—690, 691—692, 693, 694—695, 696, 698, 701, 707; 王室逃往瓦伦, 208, 209, 210, 692, 693; 科尔德利埃俱乐部, 691, 692, 693, 696, 705; 吉伦特派, 697—699, 707, 708, 709, 712; 雅各宾派, 22, 622, 640, 691, 692, 693, 696, 697, 702, 703, 704, 707, 708, 709, 712; 政治后果, 22, 23 (自由派贵族的政策, 23); 宗教分裂, 687—690, 698, 706; 斐扬派, 693, 695, 696, 697, 701, 702, 703, 707, 712; 立法议会, 211, 213, 681—682, 683, 687, 696—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国民公会, 588, 590, 629, 634, 676, 705, 706, 707—713; 巴黎公社, 645, 705, 708; 救国委员会, 585, 588, 591, 619, 640; 恐怖统治, 172, 619, 621, 623, 626, 629, 644, 645, 646, 647, 650, 651; 热月反动, 647; 皮尔尼茨宣言 (1791年), 695, 696 (各专制王朝的敌视, 23; 督政府, 173, 579, 628)

Francis II, 弗兰茨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701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美国政治家, 411, 526, 648

美国驻凡尔赛使节, 2, 187, 267, 496, 497, 505

美国哲学学会的创立, 135

“文艺九女神”支部成员, 147—148

《建立一所英语学校的计划》 (1751年), 161

他的著作的影响, 440

北美殖民地派往伦敦的代理人, 452

向奥尔巴尼大会提交的计划, 453, 516

皮特就北美殖民地的争端与富兰克林协商, 461

加入殖民者与议会的斗争, 457, 462, 463, 510

对制宪会议第一次会期的影响, 471

在美国建立邮局, 478

安抚帕克斯顿暴动青年，524

Frederick II, The Great, 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235，565

重商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正好与他自己的政策相符，53

著作，17

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担任他的古钢琴师，87

支持柏林皇家科学和文学院，151，152

在普鲁士的统治：对贵族有利，434；试图保护农奴免受贵族过度的苛捐杂税之苦，3（拒绝削弱封建统治，18）；教育，主张在教区学校实行义务教育，168；财政，7，252；税收，297（推崇总包税制，580）；改革，297；外交政策（对波兰的态度，256，338；瓜分波兰，262，324，335；与俄国结盟（1764年），255，258，323；巴伐利亚问题，269，274，286，294，326）

七年战争后对英国的态度，5：对纽芬兰的捕鳕业缺少兴趣，5；要求普鲁士摆脱大西洋斗争，6

军事战术，214，252：仿效法国，671；使用马拉炮，193；缺少参谋机构，202

去世，275

Frederick Augustus IV,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四世，萨克森选帝侯，296

Frederick William 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275，302，353，355，357

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二世与他接近，以改善两国关系，277

与波兰缔结防守同盟（1790年），328

瓜分波兰，353，357：从华沙撤退，355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法国东印度公司，229—230

Frend, Sigmund,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奥地利心理学家，67，

Gainsborough, Thomas (1727—1788年), 庚斯博罗, 托马斯, 英国画家, 107

Galiani, Ferdinando, 加利亚尼, 费尔迪南多, 意大利经济学家, 387

Galicia, 加利西亚, 282

Galvani, Luigi (1737—1798年), 伽伐尼, 路易吉, 意大利科学家, 131, 386

Gálvez, José de, 加尔韦斯, 何塞·德, 西班牙政治家, 400, 403

Geneva, Republic of, 日内瓦共和国, 58, 59, 60, 64, 68

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斗争 (1768—1789年), 1, 431

立法议会受到的民主压力, 2

贵族政变 (1782年), 3

Genovesi, Antonio, 杰诺韦西, 安东尼奥, 意大利经济学家, 45, 50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英国国王, 15, 92, 300, 448, 453, 518

比特内阁, 538—539

格伦维尔内阁, 540

罗金厄姆内阁, 541, 552

查塔姆内阁, 542—543

格拉夫顿内阁, 543—544

诺斯内阁, 544—552

谢尔本内阁, 553

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 553—554, 555

皮特内阁, 554—564

皇家艺术院的建立，107

对本杰明·韦斯特的支持，108

对军械厂感兴趣，135

要求与奥地利结盟，255

在凡尔赛条约中有关直布罗陀的争论，268

要求扩充海军（1791年），352

意图征服美洲殖民者，488

美国独立战争，505

要求对宾夕法尼亚采取直接控制，510

George IV，乔治四世，英国国王，564

Germain, Lord George，杰曼勋爵，乔治，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491，493

Germany，441

开明专制主义的影响，20

人口，25

贸易，33，35，40，41：汉堡的重要地位，38；不来梅成为对美国贸易的集散地，37—38；德意志成为单一的关税区，39；法国到德国的转口，43；18世纪末扩大市场，563

Glorious Revolution（1688年），光荣革命，511，559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格鲁克，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德国作曲家，82，85，89

《奥菲欧与欧律狄刻》（1762年），86，91

莫扎特追随他的歌剧风格，93，94

Godoy, Manuel, Duke of Alcudia，戈多伊，曼努埃尔，阿尔库迪亚公爵，西班牙首席大臣，373，374，375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德国作家, 73, 85, 89, 90, 92

《少年维特之烦恼》, 57

他的诗学和美学与音乐的关系, 81, 93

对民歌的热情, 86

对教育的兴趣, 168

Goya y Lucientes, Francisco, 戈雅·伊·卢西恩特斯, 弗朗西斯科, 西班牙画家, 373

Grafton, Augustus Henry Fitzroy, Third Duke of, 格拉夫顿, 奥古斯塔斯·亨利·菲茨罗伊, 第三代公爵, 英国大臣, 542, 553

内阁, 543—544

Grasse, François Joseph Paul, comte de, 格拉斯伯爵, 弗朗索瓦·约瑟夫·保罗, 法国海军司令, 504, 505

Grattan, Henry, 格拉顿, 亨利, 爱尔兰政治家, 564

给予爱尔兰以立法独立, 14, 551

Great Britain, 英国

1763年以后在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中的财政考虑, 8—9

对待印第安红种人, 9

对殖民者实行的限制性政策, 10, 480—481, 522, 537

北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 451—453

加强对北美的殖民控制, 10, 11, 437—438, 438, 454—455; 航海法令, 10, 517, 521, 549; 魁北克法, 485, 523, 546; 食糖条例, 10, 455, 481—482, 537; 惩治兵变条例(1765年), 483; 印花税条例(1765年), 10, 438, 455, 482, 537, 541(1766年废止, 10—11, 456, 482, 483, 538, 541); 税收条例(1766年), 483; 公告令(1766年), 11, 438, 456, 482, 538, 541; 茶叶条例(1773

年），458，484；马萨诸塞政府法（1774年），438；和平请愿书，438；第一届大陆会议，459—460，461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11—13，174，238，326，371—372，424，439，490—495，498—500，503—505，546，547，552；独立宣言（1776年），439，463—464，489；武装中立同盟，501；法国加入该同盟，499，547，650；西班牙加入该同盟，500；联合省加入该同盟，501，550；凡尔赛条约，13，505—506，507—508

军事：海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4—175，215，499—500；战略，175—176；海军，176—181；陆军，208，209，215；战术，194；民兵，210；作战条件，212，213

战争：七年战争的结果，480，538；与西班牙的战争（1761年），371；法国革命战争，409，443，559，564（宣布斯海尔德河航行自由，710—711）；拿破仑战争，564

外交政策：外交孤立，5；失去对东欧事务的兴趣，5；拟议中的英俄联盟，255—256；与西班牙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争执（1770年），6，257，371，398，545，596；英普荷条约（1788年），275；第一个英帝国的分裂，5，480

贸易，35—36，40，401，562—563；工业和商业的发展，1，41—43；管理法案不完善，14；美国革命的影响，37，564（枢密院敕令，507）；转口贸易，38；奴隶贸易，241，243，556（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团体，2，248）；对英国各殖民地的贸易垄断，37；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的突出地位，15，377；针对法国的贸易壁垒，36；东印度公司，14，218—229（在中国，231—232；在埃及，239—240；在非洲，241—242，248；在塞拉利昂的殖民，249—251）；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34；与北美的贸易，34，42—43，507；与南美的贸易，34，409；与印度的贸易，34—35；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35；要求与波兰进行贸易，277，351；英俄商约（1766年），255，322；英荷战争（1780—1783年），38—39；英法商约（1786年），39；与葡萄牙的商约（1793年），378

社会和政治上的不满（18世纪90年代），445—446

经济, 15, 436, 562: 英格兰银行, 7, 538, 546, 563; 国债, 8, 557; 财政, 5, 49—50, 556—557, 563; 1763年以后的财政困难, 538, 549; 财政管理, 557—559, 564, 565—566; 工业革命的根源, 15—16; 通讯, 15; 发展工厂制度, 16; 技术革新, 15; 伊登条约 (1786年), 54; 要求“经济改革”, 550—551, 552

人口: 增加, 25, 26, 714; 流行病, 31

社会, 430, 431, 434—435

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559

宗教, 545, 560—561: 福音派教会的复兴, 561—562, 564

政治, 440; 郡县“联合”运动 (1770—1780年), 1; 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与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 (1787—1790年), 1, 432, 440, 549, 556, 559, 561, 562; 改革运动, 13, 443, 556, 560; 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 13, 541, 544, 546, 547, 550; 乔治三世时期的历届内阁, 538—564; 米德尔塞克斯选举, 543—544, 550; 诺思的管理法, 546; 皮特的印度法 (1784年), 555

Greece, 希腊, 324

贸易, 43

Greece, Ancient, 古希腊, 98, 99, 203

Grenville, George, 格伦维尔, 乔治, 英国大臣, 538

内阁, 540; 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 10, 481—482, 517, 518, 520, 537, 540; 加强殖民地控制, 454—455; 印花税条例, 456; 禁止在阿勒格尼山以西建立殖民点, 9, 480; 坚持要殖民者支付他们的驻军的军饷, 523

Grenville, William Wyndham, First Baron, 格伦维尔, 威廉·温德姆, 第一代男爵, 英国政治家, 555

Grey, Charles, Second Earl, 格雷, 查尔斯, 第二代伯爵, 英国政治家, 560

Gribeauval, 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格里博弗尔, 让-巴蒂斯特·瓦凯特·德, 法国将军, 194

统率法国炮兵，193

训练炮兵军官，201，206

Guibert, Jacques Antoine Hyppolite, comte de, 吉贝尔伯爵，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法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195，199，203

战争理论，200，216，217

《战术总论》（1772年），196，203

进攻战线的机动性，196—197

骑兵仿效俄国，197

利用步兵冲锋战术，197

1791年操典采用了他的方法，198

军需供应的组织，201

加强士兵军纪的方针，212

他的军事委员会实行的改革，215

Gustavus III, 古斯塔夫三世，瑞典国王

即位，263

推翻1720年宪法，263

恢复君主专制制度，322

未经参议院同意不能与列强达成协议，263

国内的严重不满情绪，275

反对特权阶级的革命，421

军队中的哗变，275

进攻俄国，275—276，328

与法国流亡贵族合作，694

Halifax, George Montagu Dunk, Second Earl of, 哈利法克斯伯爵（第二代），乔治·蒙塔古·邓克，英国政治家，451

Hamann, Johann, Georg, 哈曼，约翰·格奥尔格，德国作家，74

Handel, George Frederic, 韩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德国作曲家，91

克里赞德尔的研究文章，83

风格，84，87，94

歌剧，85

对格鲁克作品的评论，86

清唱剧，89：它们的影响，89

在大斋期间演奏协奏曲，95

Hanover, 汉诺威，255

Hardy, Thomas, 哈代，托马斯，伦敦通讯学会的创始人，445

Hargreaves, James, 哈格里夫斯，詹姆斯，英国发明家，他的“多轴纺纱机”，139

Harrison, John (1693—1776年)，哈里森，约翰，英国科学家，他的航海天文钟，118，183

Hastings, Warren, 黑斯廷斯，沃伦，印度总督

孟加拉总督，545

在印度的统治，221：未能使改革的影响对东印度公司起作用，220；给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225；拒绝帮助莫卧儿皇帝，222；处理司法问题，221，226

建议出版《薄伽梵歌》，235，236

被召回英国，223；议会调查，234；受到弹劾，224

Hatzfeld, Karl Friedrich, count, 哈茨费尔德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地利政治家，7，279—280

Haugwitz, Ludwig von, Count, 豪格维茨伯爵, 路德维希·冯, 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首相, 279, 293

Hawke, Edward, First Baron, 霍克, 爱德华, 第一代男爵, 英国海军上将, 174

Haydn, Joseph, 海顿, 约瑟夫, 奥地利作曲家, 81, 87, 88

对他的作品的研究, 83, 84

主要的前辈, 85

生平, 88—89

音乐生涯, 89

器乐作品, 89; 交响曲, 82, 89—90; 弦乐四重奏, 90—91, 95; “八十三首四重奏”, 90

声乐作品, 91

名望, 91—92

伦敦之行, 91

海顿对莫扎特四重奏的影响, 94

Helvétius, Claude, Adrien, 爱尔维修, 克洛德·阿德里安, 法国哲学家, 158—159, 162

Helvetic Republic, 海尔维第共和国, 424

Hemmer, Johann, Jacob, 黑默尔, 约翰·雅各布, 德国气象学家, 132

Henri IV, 亨利四世, 法国国王, 648, 659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赫尔德, 约翰·戈特弗里德, 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81, 86

接受路德派教会牧师职位, 71

新柏拉图派哲学, 72

泛神论, 73

Herschel, Sir, William, 赫歇尔爵士, 威廉, 德国天文学家, 116

Holbach, Paul-Henrid', 霍尔巴赫, 保罗-亨利·德, 法国哲学家, 68

Holland, 荷兰, 见Netherlands

Holland, Henry Richard Vassall Fox, Third Baron, 霍兰男爵(第三代), 亨利·理查德·瓦萨尔·福克斯, 英国政治家, 539

在议会中攻击桑威奇勋爵, 180

任财政部主计官时获取的利益, 557

Holy Roman Empire and Febronianism, 神圣罗马帝国与费布朗尼乌主义, 19

Howe, Richard, First Earl, 豪伯爵(第一代), 理查德, 英国海军上将, 采用的信号系统由拉布尔多内设计的信号簿改编而成, 176

拒绝在桑威奇领导下服役, 180

拒绝接受米德尔顿关于调查收费和滥用权力情况的建议, 181

美国独立战争: 英国舰队司令, 492; 殖民地海军无法与之抗拒, 499; 在桑迪胡克的法国舰队舰只数超过英国舰队, 500; 援救直布罗陀, 505

皮特内阁的成员, 554

Howe, William, fifth Viscount, 豪子爵(第五代), 威廉, 英国将军, 美国独立战争, 492: 抵达波士顿援助盖奇, 486; 占领布里德山, 487; 杰曼赋予他自行处置权, 491, 493; 侵犯宾夕法尼亚, 493; 占领费城, 493—494

Hubertusburg, Treaty of (1763年), 胡柏图斯堡条约, 252, 322

Hugues, Victor, 于格, 维克托, 法国军人, 在拿破仑战争中保卫了法属圭亚那, 416

Humboldt, Alexander von, 洪堡, 亚历山大·冯, 德国科学家, 411

穿越南美北部、古巴和墨西哥进行植物考察, 404, 407

Hume, David, 休谟, 戴维, 苏格兰哲学家, 108

哲学理论, 146

攻击归纳逻辑的基础, 155

Hungary, 匈牙利, 195, 275, 441

贵族抵制纳税(1764年), 7, 280—281, 437

玛丽亚·特蕾西亚调整农民的劳役, 7, 281

第四等级的觉醒, 20

人口普查(1784年), 288

叛乱(1790年), 423

Hutcheson, Francis, 哈奇森, 弗朗西斯, 苏格兰哲学家, 46

Hutton, James, 赫顿, 詹姆斯, 苏格兰地质学家, 134

India, 印度, 548

法国丧失在印度的殖民地, 5

英法冲突, 238

国王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分权, 564

马拉特战争, 222, 548

沃伦·黑斯廷斯任总督, 220, 221, 222, 225, 226, 545

克莱武的“双重”管理制, 219, 538

康华理勋爵任总督, 225—228

在浦那的权力斗争, 222—223; 萨尔拜条约(1782年), 222

孟加拉的柴明达尔, 220—221, 224—225, 227—228

贸易, 231: 与英国的贸易, 34; 东印度公司, 218—221, 538

诺思的管理法案，220

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553—554

皮特的印度法案（1784年），555

另见India Act

India Act（1784年），印度法案，555，730

条款，14，227

建立常设的督察委员会，223，224

加强孟加拉政府的权力，223

Industrial Revolution，产业革命，15—16，563，564

Ireland，爱尔兰

承认爱尔兰议会的立法独立，14，440，551，552

爱尔兰属地法（1719年），450

议会改革，564

人身保护法案（1781年），551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状况，548，550

志愿兵运动，548—549

起义（1798年），423

公告令仿效为爱尔兰发布的同样法令的模式，456

爱尔兰议会的地位，537

爱尔兰移民激化了争取在英国就业的斗争，564

贸易，555

拟议中的与英国的商业条约，564

合并问题，564

人口增加，25，26，28，32，714

宗教，561

Italy，意大利

“政治上的”詹森主义的扩散加强了王权至上论的各种要求，
19

政教关系问题，389：教廷不敌视启蒙思想，389；妨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389；庇护六世作出的变革，389—390；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政教冲突，390；开明思潮的新趋势，390；反对教皇权力所采取的步骤，390；那不勒斯和帕尔马镇压耶稣会（1767年），391，392，393

意大利的詹森主义，392：对它的影响言过其实，392；在教会内部的影响，392；它的影响在罗马日益衰落，393；詹森主义的保护者，393；皮斯托亚的宗教会议，393，394；詹森主义者志趣各异，394

意大利各国的比较，378—380

政治：立法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380；意大利的政治制度支离破碎，380；停滞不变的政治结构，381

经济：各城邦仍以“城邦经济”占统治地位，381；关税壁垒增加了走私活动，384（关税制度的改革，388；与公司和行会的改革，388；与法律制度的改革，388）；向区域经济的转变，389

社会结构，384—385，428

贸易，33；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381；工业，381；粮食贸易，383—384；关税政策妨碍贸易，383

农业：产品，381—382；落后状况，382；歉收，382；贫瘠的土地，382；生产方法，383；分散状态，383；各使用各的货币，383

教育，389

人口增加，25，29，381，714

秘密会社“费城人”，441

启蒙运动：新思想的传播，385—386（改革，388—389）；文化精英，386；各大学的力量，386；开明的学者，386—387；启蒙运动的影响，388（中央政府的加强，388；司法的中央集权，388；财政改革，388；教育，389）；改革的步子缓慢，394—395

法国大革命，395—396

James, I & VI, 詹姆斯一世和六世，英国国王，515

James II, 詹姆斯二世，英国国王，453

Jankovic, 扬科维茨，塞尔维亚教育家，318

Jansenism, 詹森主义，19

在法国高等法院的影响，605

在意大利，19，392：影响不大，392；在教会内部，392：在罗马的影响日渐衰落，393；皮斯托亚的宗教会议，393，394；詹森主义者志趣各异，394

在西班牙，362—363

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的保护，393

Jassy, Treaty of (1792年)，雅西条约，328

Jaurés, Auguste Marie Joseph, 饶勒斯，奥古斯特·玛丽·约瑟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645，653

《社会主义史》（1901—1905年），645，646

和平主义政策，645—646

对历史的解释，646

敦促政府公布有关经济史的文献，647

强调新兴的资产阶级创造的繁荣革命，648—649，651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托马斯，美国政治家

驻凡尔赛宫廷的使节，2：他促使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成为交战国的努力未取得成功，497；萨拉托加战役后法国态度的改变，497

起草美国独立宣言，463，517：宣言与他的小册子《英属美洲权利概述》的相似之处，464

华盛顿就银行法案是否合乎宪法征求他的意见，479

选择尼姆的方形大厅作为在里士满建造州议会大厦的模型，114

“蒙蒂塞洛”作为文化中心，515

对通讯情况表示不满，516

对政府的看法，530

对西北部的关注，532：1784年关于西部地区的报告，469；为此提出的计划，532

Jenkinson, Charles, 詹金森，查尔斯，英国政治家，554

1778年继巴林顿任陆军驻议会代表，547

已不可能指望在1779和1780年形成新的印度殖民地，548

任商务部长（1786年），555

Jesuits, 耶稣会，宗教团体

被逐出西班牙，364，565

解散，19，166—167，390，565

政教关系的危机涉及耶稣会，390

在那不勒斯和帕尔马遭镇压（1767年），391，392，393

路易十五同意将该会驱逐出法国，8，594

João V, 若昂五世，葡萄牙国王，412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塞缪尔，英国作家，108

Jones, John Paul, 琼斯，约翰·保罗，美国海军军官

“阿尔弗雷德”导旗舰海军上尉，187

作为商船袭击者的重要作用，188

在黑海服役，189

参加美国独立战争，499

José I，若泽一世，葡萄牙国王，376，

413

逝世，377

Joseph II，约瑟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开明专制主义，18—19，565；所奉行的政策与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相一致，53，291；作为唯一的统治者的政策，286；改革，3，20，387；封建制——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计划被约瑟夫所放弃，283；试图改变农民的封建负担，4，289，426；教会——教会基金的世俗化，167；修道院的土地和建筑物，292；打击教会特权，391；约瑟夫支持詹森主义，393；干涉宗教活动，20；宗教宽容，290—291；对教会的政策，291；重新划分教区，292；教育新的牧师，292；建立地方上的总神学院，293；庇护六世到维也纳试图修改新的立法，293；教皇强制接受约瑟夫选择的米兰大主教，390；教育——试图实行义务教育，167；统一语言，167；世俗教育，168；经济——需要实行严格节约，287；在教育方面，287；财政集中，287；减少国债，7，280；保护主义制度，291；有关行会的立法，291；与摩洛哥、土耳其、俄国和美国的贸易协定，291；税收，287；负担应平均分配，287—288；在完整登记基础上的统一土地税，288（预期能获得的利益，288）；约瑟夫下令在匈牙利进行人口普查，288；汇编土地登记，288—289；确定土地税（1789年），289，580；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手段，290

外交政策，293—296：巴伐利亚的野心，269，273—274，294；企图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272—274，294；欧洲困难，275；与俄国结盟（1781年），272，326；签订奥土密约（1771年），261

军队，214；军事的改进，285；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暴露出的弱点，286；哈布斯堡各领地的弱点显而易见，278

决心在德意志维护哈布斯堡的领导权，252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年），261

命令军队执行测量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202

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荐扬科维茨, 318

向特权让步, 302—303

试图实行君主制改革以反对特权阶级, 421

反对他的统治的叛乱, 3; 马扎尔贵族的叛乱, 3, 423; 比利时保守阶层的叛乱, 3; 布拉班特的起义(1789年), 168; 他在伦巴第的改革引起的反应, 388

逝世, 277, 303, 394

Jovellanos, Gaspar Melchior de, 霍韦利亚诺斯, 加斯帕·梅尔奇奥尔·德, 西班牙经济学家, 49, 50

Justi,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尤斯蒂, 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冯, 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著作家, 51, 53, 567

Kaffir wars, 卡菲尔战争, 238—239

Kant, Immanuel (1724—1804年), 康德, 伊曼努尔, 德国哲学家, 73

先验论哲学, 24

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24, 74—75, 153

他的同胞J. G. 哈曼, 74

严格的理想主义, 80

哲学, 76—79, 435

对赫尔德和歌德的著作的重要影响, 81

卢梭的影响, 163, 165

支持德国教育的进步运动, 168

Karl-Theodor of Sulzbach, 祖尔茨巴赫的卡尔-特奥多尔, 巴伐利亚选帝侯, 132, 269, 273, 274

Kaunitz, Wenzel Anton, Prince von, 考尼茨亲王, 文策尔·安东, 奥地利政治家

行政，279：对耶稣会采取温和政策，67；关于与罗马教廷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的报告（1768年），284；鼓励约瑟夫选举自己的主教，293

外交政策：希望看到遏制俄国在土耳其的前进（1771年），261；企图获得巴伐利亚选帝侯领地，269；与俄国和解以应付将来与普鲁士的进一步冲突（1780年），327；利奥波德与普鲁士和解的行动（1790年）使他感到失望，277；支持利奥波德的和平政策，303；起草致法国议会的外交文件（1791年），699，700；与迪穆里埃交换最后通牒，701

Kellermann, François Christophe de, duke, of Valmy, 克勒曼，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弗·德，瓦尔米公爵，法国元帅，707

Keppel, Augustus, first Viscount, 凯佩尔，奥古斯特，第一代子爵，英国海军上将，美国独立战争

在乌桑特岛附近决战未胜，174，500

被指控未能保持舰队行列，175

攻击桑威奇，180

Khan, Muhammad Reza, 汗，穆罕默德·里萨，印度人代表，219，220，221，226

Kleeman, Nikolaus, Ernst, 克勒曼，尼古劳斯·恩斯特，奥地利商人，41

Kollar, Adam, 科拉尔，亚当，匈牙利学者，280，285，298

Kosciuszko, Thaddeus, 柯斯丘什科，塔代乌斯，波兰爱国者和将军，356，443

反对在波兰的俄国人的起义（1794年），354

腊茨瓦维采战役，354

普鲁士人与俄罗斯人联合，354

华沙投降，355

波瓦涅茨宣言，356—357

间接援助了法国革命者，357

访问巴黎，358；未得到法国援助的承诺而返回，358

Kutchuk-Kainardji, Treaty of (1774年)，凯纳甲湖条约，6—7, 265, 325, 326, 328

La Fayette, Marie-Joseph 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拉法耶特侯爵，玛丽-约瑟夫·吉尔贝·迪莫蒂埃，法国将军，626

美国独立战争，203；德·格拉斯到达切萨皮克湾协助他，504

黑人之友协会会员，248

建议召开三级会议，656；希望进行政府改革，658；深信必须进行宪法改革，671；“爱国者派”成员，663

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674, 679, 691；《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初稿，676；科尔德利埃俱乐部敦促他携带最后通牒前往凡尔赛，678；皇后断绝与他的一切往来，695；斐扬派领袖，697；要求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和群众性俱乐部，703；立法议会拒绝支持反对他的举措，705；与奥地利进行秘密谈判，702；指挥革命军，698；解除他的指挥权，706

Lagrange, Joseph-Louis (1736—1813年)，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法国数学家，115, 134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阿尔方斯·德，作为法国历史学家，629

Lansdowne, Marquess of, 兰斯多恩侯爵，见Shelburne

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年)，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法国数学家，140

在《天体力学》中详述了他的力学体系，115, 116

接受拉瓦锡的新化学，126；他与拉瓦锡一起进行的呼吸作用的实验，128—129

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1743—1794年)，拉瓦锡，安托万-洛朗，法国科学家，140, 578

对锻烧和燃烧的研究，123—125

根据物质的化学构成对其命名的原则，126

《初等化学概论》，127，128

物质不灭定律，127

对元素的研究，127—128

对呼吸作用的研究，128—129

被任命为火药专卖局四总监之一，141

“文艺九女神”支部的成员，148

给巴黎科学院的津贴，151—152

Law, John, 劳，约翰，苏格兰银行家，584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1780年)，武装中立同盟，13，
182，190，266，326，501

Lebrun Tondu, Pierre Henri Hélène Marie, 勒布伦·通迪，皮
埃尔·亨利·埃莱娜·玛丽，法国外交部长（1792年），706

他在法国外交政策演变中的作用，710

设法减轻英国对《友谊与援助法令》的恐惧，712

未能满足英国政府取消该法令的要求，713

Leclerc, Jacques, 勒克莱尔，雅克，法国将军，419，420

Ledoux, Claude-Nicolas (1736—1806年)，勒杜，克洛德-尼古
拉斯，法国建筑师

存留的作品，111

被任命为皇家盐矿监督官，112；在阿尔克-塞南的建筑物，
112；为肖城设计的理想城市规划，112；巴黎的收税关卡，112，113

《从艺术、风俗和法规来考虑建筑》一书的出版，112

Lefebvre, Georges, 勒费弗尔，乔治，法国历史学家，65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北部农民》，648

在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地位，650

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重新评价，651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Baron von, 莱布尼兹男爵，戈特弗里德·威廉，德国哲学家，153—154，312

Leipzig, 莱比锡，贸易中心，33

Leopold II, Emperor (Grand Duke of Tuscany), 利奥波德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托斯卡纳大公爵），296

在托斯卡纳的统治：限制庇护权，390，391；限制交付罗马的钱，391；支持詹森主义，393；参照弗吉尼亚宪法为托斯卡纳宪法作准备，440；迁居维也纳（1790年），394

受重农主义君主制主张的影响，17

在位期间约瑟夫纲领的某些方面仍然保留，168

国内政策：废除有关土地税的二月特许令；代替劳役制；关闭总神学院，303；设法结束君主政府在国内的孤立状况，303（利用农民的要求来缓和地主的要求，303；鼓励匈牙利反对马扎尔贵族的人，304）；匈牙利接受某些改革，304；废除约瑟夫刑法典的一部分，304；让最高法院监督警察部，304（警察改革，304）；宪政改革问题，305；恢复大学中已削弱的天主教权威，出版检查似乎削弱了教會的威信，302

外交政策：使奥地利退出对土耳其的战争（1790年），303，353；与普鲁士谈判并签订赖兴巴赫条约，277，303，353；提议列强采取联合行动保护法国君主政权的利益，693；普奥缔结防御同盟预备条约以解决法国问题，694；结果利奥波德在西斯托瓦摆脱了东欧问题，694；发出帕多瓦通函，695；与法国的三人集团妥协，695；皮尔尼茨宣言，695，696；布里索派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法国的主要敌人，698—699；奥地利外交文件，发给法国议会，699—700

匈牙利的叛乱，423

逝世，305，701

Le Roy, Pierre (1717—1785年), 勒鲁瓦, 皮埃尔, 法国科学家, 118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莱辛, 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 德国作家, 299, 300

Leszczynski, Stanislas, 莱什琴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 波兰国王, 440, 648

瑞典的官吏, 337

Liechtenstein, Prince, 列支敦士登亲王, 193

Ligurian Republic, 利古里亚共和国, 424

Lisboa, António Francisco, 里斯博阿, 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 巴西建筑师, 415

Literature, 文学

卢梭的著作和哲学: 《论科学和艺术》, 61; 为第戎科学院写的论文概述了他的哲学, 61—62, 64; 《爱弥儿》, 63, 67, 68, 69; 政治学说与《社会契约论》, 64—65, 66, 67, 78; 《论政治经济学》, 65; 《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 66—67; 《科西嘉宪法草案》, 67; 《新爱洛绮丝》, 67; 《论道德的书信》, 68

卫斯理教派的著作: 约翰·卫斯理的著作, 69, 70; 查尔斯·卫斯理的著作, 69

莪相诗歌, 70

前浪漫主义的著作, 70

尤斯图斯·默泽尔的《奥斯纳布吕克史》, 70—71

狂飙突进运动, 71—73, 74

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和哲学: 《纯粹理性批判》, 74, 77; 《实践理性批判》, 77, 78;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调和, 24, 74—75, 153; 哲学, 76—79, 435; 对赫尔德和歌德的作品的重要影响, 81; 卢梭的影响, 81

埃德蒙·伯克的著作: 《法国革命感想录》, 79

杰里米·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79—80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57，72

Lithuania, 立陶宛, 341, 346, 348, 354

政体, 343, 344

Livonian trade, 立窝尼亚贸易, 35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英国哲学家, 155, 516

契约论, 17

关于常识的理论, 144; 关于认识发展的理论, 154

他的影响在德国不甚大, 153

他的理论被开普殖民地的爱国运动所引用, 238

他的著作在葡萄牙遭禁, 377

Louis XIV, 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 205, 215, 606, 641, 653

Louis, XV, 路易十五, 法国国王

外交政策: 秘密外交, 6, 594;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胜利由于路易十五地位的软弱而引起争论, 257; 不打算让法国在瑞典承担新的义务, 263; 舒瓦瑟尔告诫他在任何反对英国的战争中都应支持卡洛斯三世, 254

国内政策: 开明的官僚政治, 592—593; 推行改革失败, 422; 他的政府实行的委员会体制, 568; 削减内阁提出的财政改革, 8; 和公众一样对法国财政的稳定失去信心, 583; 宫廷, 640; 同情宗教正统观念, 605; 驱逐耶稣会, 8; 在巴黎高等法院鞭笞法庭开庭时肯定绝对统治权, 437

舒瓦瑟尔政府, 594—596; 驱逐耶稣会, 594; 认识到需为七年战争付出代价, 594; 外交政策, 259, 594—595 (忽视俄国在欧洲日益加强的影响以及俄国与普鲁士的联盟, 594; 安排未来的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姻以加强与奥地利的关系, 595; 在福克兰群岛争端中支持西班牙, 595—596); 未能在法国保持王家的权威, 595;

改善陆海军，6，183—184，254，500，595；高等法院的权力增加，595；倒台，214，257，595—596

三人集团的统治，596；流放法官，596；莫普改革司法制度，596，597；泰雷试图进行的财政改革，597—598

逝世，606，632

Louis XVI，路易十六，法国国王

即位，568

恢复原有的高等法院，437

他的财政大臣杜尔哥，141

本人对航海事业感兴趣，185—186

政府不稳定，593

主要大臣们受自由贸易学说的温和观点的影响，216

婚姻，595

同情严格的宗教正统观点，605

认识到法国受俄国和普鲁士的威胁，593

叶卡捷琳娜指责他对革命软弱，320

韦尔热讷告诫路易十六在互相结盟中奥地利所获大于法国，270

法美联盟，496，497

美洲战争对财政的影响，598

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没有能力引导革命，617；1788年12月27日的国王宣言，661；路易十六被迫召集三级会议，422，667；1789年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失败，668—669；路易十六拒绝同意人权宣言，676；宫廷从凡尔赛迁至巴黎，677—678；路易十六向西班牙的卡洛斯四世提出秘密抗议，680；对路易十六宪法权力的限制，680—681；接受教士的公民组织法，688；他决定逃出巴黎，690；逃往瓦伦成为一个转折点，692—693；接受修改的宪法，696；国王否决反对流亡贵族和反抗的教士的法令，698；迪穆里埃的恢复国王权威的计划，701；

路易十六支持对奥战争的理由，702；土伊勒里宫的群众示威未能使路易十六屈服，703；联盟派要求停止国王权力并将其废黜，704；路易十六对不伦瑞克宣言应负的责任，705；攻击土伊勒里宫并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705；废除君主制，707；审判并处决路易十六，708—709；对英法关系的影响，713

Louis XVIII, 路易十八，法国国王，621

Lowth, Robert, 洛思，罗伯特，英国圣公会主教和学者，70，71

Lunéville, Treaty of (1801年)，吕内维尔条约，209

Macpherson, James, 麦克弗森，詹姆斯，莪相诗歌的作者，70

Malouet, Victor Pierre, 马卢，维克托·皮埃尔，法属圭亚那总督，416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英国经济学家，26，33，52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7

Mansfield, William Murray, First Earl of, 曼斯菲尔德，威廉·默里，第一代伯爵，英国首席法官，221，449，517

Marat, Jean-Paul, 马拉，让-保罗，法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690，692，707，708

Maria I, 玛丽亚一世，葡萄牙女王，376，377—378

Maria Amalia of Saxony, 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利亚，西班牙王后，360

Maria Carolina, 玛丽亚·卡罗莱娜，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的妻子，380

Maria Luisa of Parma, 玛丽亚·路易莎（帕尔马的），373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蕾西亚，神圣罗马帝国皇后，431

税收：对世俗贵族和教士的征税，7，280；试图在匈牙利增税并对贵族征收更多的税，437

规定农民的劳役，4，7，425

其政策与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相一致， 53
约瑟夫主义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遗产， 19， 284—285
哈布斯堡各领地的弱点， 278
希望和平， 261
反对俄国的扩张， 261—262
敦促土耳其与俄国和解， 262
瓜分波兰， 262， 338
巴伐利亚问题， 269
七年战争的后果， 252
访问埃斯泰尔哈吉城堡， 91
莫扎特为她演奏， 92
哈茨费尔德的财政管理， 279
蓬佩奥·内里帮助她改革伦巴第地方政府， 386
逝世， 272， 286

Marie Antoinette， 玛丽·安托瓦内特， 法国王后

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595
在政治上没有责任感， 607
1784年底维护法奥关系的努力， 273
她的影响导致杜尔哥的被撤职， 611
巴纳夫为她 and 国王开脱， 693
与利奥波德皇帝秘密会谈， 694， 699
断绝与拉法耶特的一切联系， 695

Maritz， Jean de（1680—1743年）， 马里茨， 让·德， 瑞士发明家， 对火炮的改进， 192—193

Martine, George, the younger, 马丁（小），乔治，苏格兰医生，119，121

Marx, Karl Heinrich, 马克思，卡尔·海因里希，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619，628，637

无神论和唯物主义，72

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653

Maskelyne, Nevil（1732—1811年），马斯基林，内维尔，英国皇家天文学家

创刊《航海年鉴》（1766年），116

测定地球的平均密度，117—118

Mathematics, 数学，见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hiez, Albert, 马蒂埃，阿尔贝，法国历史学家

法国大革命史，646

与欧拉尔的分歧，646；对政治腐败的研究，647；恐怖统治的经济背景，647

Maupeou, René-Nicolas-Charles-Augustin de, 莫普，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丁·德，法国大法官

激烈的司法改革，8，596，597；压制地方高等法院的计划，596；打击高层地方行政官吏的权力获得成功，596；设法使整个司法程序具有人性，597

启蒙哲学家们不喜欢他的专制统治形式，597

舒瓦瑟尔企图推翻他，595

他的失权，607

Maurepas, Jean-Frédéric, Phelypeaux, comte de, 莫尔帕伯爵，让-弗雷德里克·菲利波，法国政治家

路易十六的政治导师，607

杜尔哥认识到与他的友谊的重要性，608

莫尔帕对杜尔哥的政策提出批评，610

反对路易十六支持六条法令，611

迫使内克尔辞职，613

逝世，613

Maximilian-Joseph, 马克西米连-约瑟夫，巴伐利亚选帝侯，逝世，269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商业上的重要地位，33，35

Melville, Henry Dundas, First Viscount, 梅尔维尔，亨利·邓达斯，第一代子爵，英国政治家，555

弹劾沃伦·黑斯廷斯，223，224

谢尔本内阁的成员，553

支持乔治三世，554

邓达斯进行的财政变革，557

Mengs, Anton Raffael (1728—1779年)，孟斯，安东·拉法埃尔，德国艺术家，100—101，102，109

Methodism, 卫斯理派教义，见Religion

Michelangelo (Michelagnolo Buonarroti Simoni)，米开朗琪罗（米凯拉尼奥洛·博纳罗蒂·西莫尼），意大利艺术家，98，110

Michelet, Jules, 米什莱，朱尔，法国历史学家，636，637，639，643

法国大革命史，629，631—632

《人民》，630；人民的概念，630，633，641，644，647；历史哲学，630—631

开始第一次严肃的法国大革命文献的编集工作，634

Middleton, Sir Charles, Baronet, 米德尔顿从男爵, 查尔斯, 英国海军审计官, 216

Mignet, François, Auguste Marie, 米涅,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 法国历史学家, 629, 636, 644

史学理论, 627

被指责为宿命论, 622

在著作中申述政治目的, 625

希望成为历史学家, 625

法国大革命史, 626

对《人权宣言》的态度, 631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 英国哲学家, 156

Mirabeau, the elder, 老米拉波, 法国重农主义者

《人类之友》, 49

社会学理论, 567

他的著作的影响, 604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ti, comte, 米拉波伯爵,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德·里凯蒂, 法国政治家

黑人之友社成员, 248

密切关注关于美国政府的讨论, 441

日内瓦的合作者, 2

梯也尔和米涅赞赏他的思想, 626

改革政府的愿望, 658

作为三十人委员会与奥尔良公爵之间的联系, 663

第三等级代表由于他的讲演而集合在他的周围, 669

制宪议会拒绝他提出的允许大臣们参加议会审议的动议, 681

他对将权力集中于立宪议会的看法，682

在十月事件后成为秘密的保皇派，22，681

逝世，690

Miromesnil, Armand-Thomas Hue de, 米罗梅斯尼尔·阿尔芒-托马·于埃·德，法国掌玺大臣，613，614，615

Moñino, José, count of Florida Blanca, 莫尼诺，何塞，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西班牙政治家

西班牙驻罗马的主要代表，364

首席国务大臣（1776年），361，365

鼓励内阁同僚更经常地集会，366

致力于专制君主制，373

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373—374

被免职，374

Monn, George Matthias, 莫恩，格奥尔格·马蒂亚斯，奥地利作曲家，82，85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德斯鸠，夏尔·路易·德·塞康达，拉布雷德和孟德斯鸠男爵，法国哲学家，45，441，619，636

关于已经确立其地位的君主应如何行事的教导，307

叶卡捷琳娜拒绝他关于分权的原则，17

《论法的精神》，311

Moravia, 摩拉维亚，8，282

Möser, Justus, 默泽尔，尤斯图斯，德国作家，70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扎特，沃尔夫岗·阿马多伊斯，奥地利作曲家，81，82，83，84，89

生平，92

奥托·雅恩的专论文章，83
米兰对他的教育有重要影响，85
格鲁克的《奥菲欧与欧律狄刻》对他的影响，87
在他的作品中声乐和器乐同样多，88
与海顿的友谊，91
他的写作由于约瑟夫二世的节约行动而受到损害，287
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决裂，92
与出版商打交道，92
在促进风格变化中的地位，93
歌剧，94，95：《克里特国王伊多梅纽斯》，93；《唐·乔万尼》，95，96；《魔笛》，95；《狄托的仁慈》，93
新音乐剧《皮格马利翁》，93
交响曲，94，96
模仿其他作品，94
协奏曲，94，95
在大斋期间的演出，95
小步舞曲，95
Mughal Empire, 莫卧儿帝国，218
衰落，219
Münster, Treaty of (1648年)，蒙斯特条约，272
Muratori, Ludovico, Antonio, 穆拉托里，卢多维科·安东尼奥，意大利学者，386
Music, 音乐
音乐的历史、理论和专论，81—84

海顿以前的主要音乐家的作品：佩格莱西，85；卢梭，86；格鲁克，86—87

海顿的生平和作品，88—92

莫扎特的生平和作品，92—96

Mutis, José Celestino, 穆蒂斯，何塞·塞莱斯蒂诺，西班牙植物学家，404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632，634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141，192，409，416

Narbonne, Louis, comte de, 纳博讷伯爵，路易，法国将军

反对革命和实行军事独裁的计划，22，699，701

转向布里索派论点，认为皇帝是法国的主要敌人，698

Naval Discipline Act (1749年)，海军军纪法，178

Naval power; navies, 海上力量；海军

战略，175—176

英国海军：征募制度，176—177；状况，177—179；军官，179；官职恩赐制度，179—180；海军部，180—181

木材缺乏，181—183

法国海军：改革，183—185；征募制度，185；与英国海军的比较，185—186

美国海军，187—188；私掠巡航，188—189

俄国海军，189

Navigation Acts (1673—1696年)，航海条例，10，176

Necker, Jacques, 内克尔，雅克，日内瓦金融家和法国大臣，579，609—616，624，648

鼓吹和平，216

财政大臣，570，584，587，612：发表1781年《财政报告书》，586，590；称赞地方的督察官，571；改革与节约，612—613；取消财政督察官，573；命令所有财政官员每月向国库提交简报，589；只能推测出政府各部门雇员的数目，591

抛弃旧政权的许多观念，615

意识到军队的不满情绪，671

三级会议：说服御前会议将第三等级的代表增加一倍，661；拒绝候选人或纲领提供指导，662；演讲，667；敦促国王打破各等级之间的僵局，668；他关于改革地方三级会议的方案遭到拒绝，682—683；替代布里安，658；巴黎人要求恢复他的职务，669

倒台，588，653，672，675

Nelson, Horatio, first viscount, 纳尔逊，霍雷肖，第一代子爵，英国海军上将，176，179

Neri Pompeo, 内里·蓬佩奥，佛罗伦萨行政官员，386

Netherlands, Austrian, 奥属尼德兰，269，270，294，303

法国放弃了侵略奥属尼德兰的企图（1756—1757年），5

比利时民主派的反叛（1789—1792年），1，423，680，710，711

约瑟夫二世企图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272

法国革命战争，702；宣布斯海尔德河航行自由，710

Netherlands, United Provinces, 尼德兰联合省

荷兰爱国运动（1784—1787年），1，3，423，440

立法议会受到的民主压力，2

中立政策的发展，5

社会，430，431

贸易，35，37，40，218；航运的衰退，38；英一荷战争（1780—1783年），38—39，268；荷兰东印度公司，231，233—234；在印

度的贸易，229；在南非的贸易，237—238

加入美国独立战争，501

凡尔赛条约，268，506

殖民地：荷属圭亚那（苏里南），416；埃塞奎博，416；德梅拉拉，416；伯比斯，417

海军，190

约瑟夫二世企图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272

恢复执政的权力，275

英—普—荷条约（1788年），275

法国革命战争：宣布斯海尔德河航行自由，710—711；法国向荷兰宣战，559，713

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东印度公司

贸易：与非洲的贸易，237—238；与亚洲的贸易，231—232

不顾当地的反对在亚洲保持其政治权力，233

劫掠康提，233

在婆罗洲确立影响，233

英国抵代税法的影响，231

在法兰西战争中荷兰遭法国入侵时公司将各领地移交给英国，
233

财政状况，233—234

在税收问题上与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的殖民者进行斗争，417

Newcastle, Thomas Pelham, duke of，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英国政治家

利用南部事务大臣的职位任意授予官职，518

国王求助于纽卡斯尔，540

纽卡斯尔决定不在内阁中任职而在内阁中发挥影响，541

辞职（1762年5月），538

Newton, Sir Isaac, 牛顿爵士，艾萨克，英国数学家和科学家，113，155

牛顿学说的巨大影响，115

《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基础，127

万有引力定律，130

North, Frederick (Lord)，诺思，弗雷德里克（勋爵），英国首相

内阁：反对派的削弱，544—545；主要问题，545；关注东印度公司事务，545，546；诺思的管理法案，546；马拉塔战争，548；在爱尔兰的困难，548—549；议会改革运动，549；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的废除，549；对他的正统经济思想的批评，549；诺思任命监督税务检查员的督察官，558；税收，549—551；间接税，550；伯克的经济改革法案，551；美洲殖民地问题（管理法案的不足，14；魁北克法表明改变殖民地控制的办法，10，485，546；1775年2月20日的决议，461；取消除茶税以外的所有汤森税，484；萨拉托加战役后对各殖民地作出让步，497；废除茶叶条例，497；与强制法案，497；1778年的和解决议，462，485，497；和解决议遭大陆会议拒绝，462，498；派卡莱尔委员会前往费城，498）；英国舆论支持他的北美政策，490；设法为战争拨款，556；对付美国独立战争的办法，546—547；军事上惨败的趋势，552；提出如法国和西班牙接受他的和平条件，便将米诺卡岛割让给俄国，326

福克斯—诺思联合内阁，553—554，555

辞职，505，552

Northern War, 北方战争，25，253，307，334

Novikov, Nikolay, 诺维科夫，尼古拉，俄国教育家，147，319—320，321

Orleans, duke of, 奥尔良公爵，要求获得法国王位者，669，672

Orlov, Count Aleksey, 奥尔洛夫伯爵, 阿列克谢, 俄国政治家, 307

Orlov, Count Grigory, 奥尔洛夫伯爵, 格里戈里, 俄国政治家, 324, 325

Ortes, Giammaria, 奥尔特斯, 贾马利亚, 意大利经济学家, 45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失去兴趣, 5

与俄国的战争(1768年), 259—262, 323—325

与俄国签订凯纳甲湖条约(1774年), 6—7, 265, 325

与俄国的战争(1787年), 20, 274—275, 349

雅西条约(1792年), 328

贸易: 与欧洲的贸易, 35; 与法国的贸易, 43; 在埃及的贸易, 239—240; 奥土贸易协定(1784年), 41

势力的衰退, 253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威尔士社会主义者, 159

Padua Circular, 帕多瓦通函, 693—694, 695

Paine, Thomas, 潘恩, 托马斯, 英国作家

宣传共和主义, 2

关于美国的著作, 445, 463, 516, 520

《常识》, 463, 489

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 559

为法国起草共和宣言, 692

Palmieri, Giuseppe, 帕尔米耶里, 朱塞佩, 意大利行政官员, 387

Panin, Nikita, 帕宁, 尼基塔, 俄国政治家, 311, 326

他企图建立的“北方体系”, 256, 338

贵族的首领，307

希望叶卡捷琳娜把权力交给贵族会议，308

被任命为外交院主席，322

忠于与普鲁士的联盟，325

反对瓜分波兰，338

Paoli, Pasquale, 保利，帕斯夸莱，科西嘉领导人，257

Papacy, 罗马教廷

反教皇情绪，19

开明专制君主的法律改革与教会法律发生冲突，20

Paris, Treaty of (1763年)，巴黎和约，1，5，37，229，371，398，508，594

直接后果，5，252

Park, Mungo, 帕克，芒戈，苏格兰探险家，240

Parthenopean Republic, 帕特诺珀共和国，424

Paul, Grand Duke of Russia, 保罗，俄罗斯大公，308，320，331

Pedro III, 佩德罗三世，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一世的王夫，378

Pergolesi, Giovanni Battista, 佩戈莱西，乔瓦尼·巴蒂斯塔，意大利作曲家，85，91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俄国沙皇，312，325，331

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152

俄国海军的创建者，189

打破常规的军队编制，194；他的官秩表，317

要求黑海航行自由，260

由于缺少经费或不重视，不得不放弃改革，306—307

主张召集委员会编纂法典，309

Peter II，彼得二世，俄国沙皇，309，314

Peter III，彼得三世，俄国沙皇，307，314，321

Philip V，腓力五世，西班牙国王，399

Piranesi, Giambattista (1720—1778年)，皮拉内西，詹巴蒂斯塔，意大利建筑师，98，104—105

Pitt, William, earl of Chatham, 皮特，威廉，查塔姆公爵，英国首相，10，490，552

辞职（1761年），538，540

声称议会无权向美洲征税，458

提出法案，要求美洲大陆会议承认英国在立法上的最高权力，461

使用海军压制1763年以后重新抬头的非法贸易，482

拒绝在比特手下任职，539

罗金厄姆组阁，认为皮特将会在晚些时候加入，541

拥护威尔克斯的支持者，544

1766年内阁：组成，542；大刀阔斧的帝国政策，543；拟议中的与俄罗斯结盟，543；皮特的精神疾病，543；以议会干预威胁东印度公司，以便索取现金，542；汤森在下院未经授权作出承诺在北美征税，542

辞职（1768年），543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皮特（小），威廉，英国首相，554

谢尔本内阁成员，553

邓达斯与弹劾沃伦·黑斯廷斯，224

1783年的法案将美国的船只和产品置于几乎与英国的船只和产品同样的地位，遭到否决，507

内阁：下院的组成，554；大臣，554—555；皮特对爱尔兰实行低互惠关税的努力遭到失败，555，564；议会改革方案，555；议会改革运动，560；担心来自法国的革命思想的蔓延，559—560；各教会统治者观点的变化，560—561；福音派教会的复兴，561—562；皮特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的态度，440，561；拒绝在禁止奴隶贸易方面采取主动，556；国王不再过问政治，555—556，559；财政政策，556（1797—1798年实行新税制，556—557；确立了非个人财政大臣职务的概念，557；防止滥用公共基金，557；在英格兰银行建立官方账户，557；建立统一基金，557—558；税收部门在方法和人员方面的改变，558；抵代税，558；统一关税，558；税务检查员的变化，558；替换预付款检查官，558；军械署的改革，558；撤销无用的税收机关，559）

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经济扩张，562—563；法兰西战争爆发后扩张停止，563

印度法（1784年），14，223，224，227，231，555

抵代税法（1784年），231

加拿大法，14

尽管皮特关注近东，英国的外交政策仍是孤立主义的，278

俄罗斯加强军备的失败，352

如普鲁士友好参与，有意发展英国与波兰的贸易，350

建议削减海军预算支出（1792年），190

与普鲁士结盟（1788年），276

法国革命战争，711，712

Pius VI, Pope (Giovanni-Angelo Braschi)，庇护六世，教皇（焦万-安杰洛·布拉斯基），393

前往维也纳以便保证约瑟夫二世的教会立法得到修改，293

希望后人把他看成是改革者和建设者，389

废除除教皇管区之外的一切国内关税，389—390

向公共工程投入资金，390

建立工业学校，390

被认为受到耶稣会的影响，391

法国议会认为以兼并教皇在法国的领地相威胁就可以加强他的支持，689

谴责法国革命的教士公民组织法以及政治和社会改革，690

Place, Francis, 普莱斯，弗朗西斯，英国激进改革家，445

Plassey, battle of (1757年)，普拉西战役，224, 230

Plato, 柏拉图，希腊哲学家，74, 76, 96

Plutarch, 普卢塔克，希腊作家，58

Poland, 波兰，5, 333—334, 336

封建制度，3

政府，336, 342—344

边境，336—337

宗教，338—339

教育，341—342

经济，346—347

改革，351

贸易，347—349, 350；与普鲁士的商约（1775年），347；拟议中的英波贸易协定（1790年），277

外交政策，349—351

普波条约（1790年），350

巴尔同盟，339—340, 347

选王王位空缺（1763年），6, 253

第一次瓜分（1772年），6，253，262，285—286，335，340，346，348，359

俄国的政策，256，258，317，323

俄土战争（1768年），259—262

大议会（1788—1792年），343—346

宪法（1791年），344—346，352，358，426；其后果，346；外国的态度，352—353

第二次瓜分（1793年），328，353，358—359：对法国的间接帮助，357，358

起义（1794年），354—355

第三次瓜分（1795年），355，594

Poltava, Battle of（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194

Pombal,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lo, Marquis of, 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葡萄牙政治家，376，413

宗教政策，376

贸易，377

教育，377

辞职，377，414

去世，378

Pompadour, 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蓬巴杜侯爵夫人，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92，98，594

Poniatowski, Stanislaus (Stanislaus Augustus)，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波兰国王，322，340

致法国国民议会的公开信，346

为法国所承认（1765年），259

为土耳其所承认（1765年），259

统治，337—338，344，348

逊位，356

Population，人口，见各有关国家条

人口的普遍增加，1

Portland，William Henry Cavendish Bentinck，third duke of，波特兰，威廉·亨利·卡文迪什·本廷克，第三代公爵，英国政治家

福克斯提名他为内阁首脑的候选人，552

福克斯的支持者拒绝在除波特兰公爵以外的内阁首脑手下任职（1783年），553

皮特支持推选他任牛津大学校长，560

由于他继续受到福克斯的钟爱，致使他直到1794年均未任公职，560

Portugal，375—378

驱逐耶稣会，19，376，391

马德里条约（1750年），412

贸易，39，377，521：在南美洲殖民地，34；在非洲，239，240，242，245—246；奴隶贸易，241

教育，377

与西班牙的条约（1793年），378

与英国的商约（1793年），378

美洲殖民地，411—412：采矿业，412，414；领土变化，412—413；驱逐耶稣会，413，565；庞巴尔的改革，413—414；农业，414；人口，414；社会，414—415；米纳斯吉拉斯的叛乱，415—416

Potemkin, Grigory, 波将金, 格里戈里, 俄国政治家, 326—327

促使叶卡捷琳娜放弃她的三国联盟计划, 327

1788年在俄土战争中负责黑海战线作战, 328

要求瓜分波兰, 329

Priestley, Joseph Rev., 普里斯特利神父, 约瑟夫, 英国化学家和新教神父

对“气体”的研究, 122

分离出氧气, 122—123

对绿色植物呼吸作用的研究, 123

会见拉瓦锡, 124

《电的历史和现状》(1767年), 130

明月社成员, 136

支持戴维·哈特利在教育方面的工作, 156

移居国外, 443

Prussia, 普鲁士, 20, 692

封建制度, 3

七年战争中被英国背弃, 5

土地信贷银行, 7

货币改革, 7

引进法国的税收管理制度, 7

编纂法典, 20

人口的增加, 25, 28, 29, 714

高压政策, 301—302

军队, 204—205, 209

美国独立战争, 195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326
瓜分波兰, 286, 329, 340, 355—356
与波兰的商约(1775年), 347
赖兴巴赫条约, 277, 351
普波条约(1790年), 350
与俄国结盟(1764年), 255, 321, 323, 328
奥普战争(1778—1779年), 199, 270—271
英—普—荷条约(1788年), 275, 276
与奥地利结盟(1791年), 694
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 695, 696
法国革命战争, 644, 706; 瓦尔米战役, 707, 709
Pugachev, Emelyan, 普加乔夫, 叶梅利扬, 俄国称帝者, 321,
440
 领导1773年叛乱, 313—314, 325
Quebec, Act(1774年), 魁北克法, 10, 459, 485, 460, 488,
523, 546
Quesnay, François, 魁奈, 弗朗索瓦, 法国经济学家
 《经济表》(1758年), 45
 自然平衡说, 46
 对现有经济体制持批评态度, 52
 农业重要性的问题, 235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导, 567
Raphael, Sanzio, 拉斐尔, 圣齐奥, 意大利画家, 101, 102,
114
Reformation, Protestant, 新教改革运动, 421, 623

Regulating Act (1773年)，管理法案，219，223

Reichenbach, Covention of (1790年)，赖兴巴赫条约，277，303，351

Religion，宗教，432

对理性主义的反动，56

卫斯理派教义，69—70，161，432，561，562

亚洲的宗教，234—235

在北美洲，439

Reynolds, Sir Joshua，雷诺兹爵士，乔舒亚，英国画家，97

对孟斯的看法，101

皇家艺术院主席，107—108

《艺术演讲录》，108

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duc de, Cardinal，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红衣主教，法国大臣，628

Rigaud, André，里戈，安德烈，南圣多明各穆拉托人领袖，419

Robespierre, Maximilien，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法国革命家，66，619，628，629

在对奥战争中对国王的背叛行为加速了君主政体的崩溃，23

他就读的巴黎路易学院在革命期间仍然开课，170

勒佩勒蒂埃的初等学校计划受到他的赞许，171

被指责为要使下一代人处于无知状态，172

企图通过武力实行道德革命，622

米什莱和卡莱尔贬低罗伯斯庇尔而赞扬丹东，632

对法国革命作解释的左翼分子需要在他和埃贝尔之间进行选择，645

马蒂埃和欧拉尔对他的性格持截然不同的看法，646

勒费弗尔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评价，651

罗伯斯庇尔认为贵族叛乱是革命的第一声枪，653

陪同国王返回巴黎的代表之一，674

抗议议会决定将代表选举资格限于交纳相当于1银马克直接税的人，682

他与三人集团的决裂，691

在丹东鼓吹由奥尔良派摄政时他支吾其词，692

在他的努力下雅各宾俱乐部得以保持下来，693；在立法议会中领导雅各宾少数派，697；由于他反对布里索派的战争政策而分裂，698

纳博讷—布里索联盟不理睬他的警告，699

他参与确定联盟派的方法和目的所起的重要作用，704

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抨击行政和立法机构，704—705

国民公会代表选举中在巴黎得票最多，707

与布里索的个人争吵造成国民公会的分裂，708

在法兰西战争中不完全支持法国的兼并政策，712

预言战争将导致法国实行军事独裁，702

失去权力，358

Robins, Benjamin, 罗宾斯，本杰明，英国数学家，193

Robinson, John, 鲁宾逊，约翰，英国行政官员

国王的朋友，545，547

财政大臣，547

无法指望他提出一项可在1779和1780年解决印度问题的新方案，548

1783年的议会调查，553

熟悉印度议会和下院运行机制的重要性，554

退休，555

Rockingham, Charles Watson Wentworth, second marquess of, 罗金厄姆，查尔斯·沃森·温特沃思，第二代侯爵，英国政治家

第一届内阁（1765—1766年），541：组阁的前提是设想皮特将在随后入阁，541；废除印花税条例，482，541；公告令，482，541；税收条例，483；大批解除职务引起国王不快，541；废除苹果酒税，541；保护斯皮特尔菲尔兹的丝织业，541；宣布通用逮捕状为非法，541

继续威尔克斯的事业，544

考虑重建政府，543

拒绝在格拉夫顿手下任职，543

他的追随者设法使改革运动转而对他们自己有利，550；要求实行“节约”改革，550

第二届内阁（1782年），505，552：国王不信任他，542；他坚持要国王同意削弱王室官职授予权的立法，552；对爱尔兰立法独立作出让步，14，552；伯克的王室年俸管理法案，552；克拉克的将政府的承包商排除于下院之外的法案，552

逝世，552

Rodney, George Brydges Rodney, First Baron, 罗德尼，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第一代男爵，英国海军上将，175，179，184

西印度群岛舰队司令（1778年），180

由于他未服从命令致使法国舰队于1781年未受到攻击即离开西印度群岛，504

在桑特群岛附近海上的胜利恢复了英国的制海权，505

Roland de la Platière, Jean Marie, 罗兰·德拉·普拉蒂埃，让·玛丽，法国内政大臣，705，707，708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国，424

Rome, Ancient, 古代罗马，113，203

卢梭的看法, 58, 59, 60, 61, 77

皮拉内西的蚀刻版画是欧洲认识古罗马伟大成就的重要视觉因素, 98

温克尔曼对古文物的研究, 99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法国哲学家, 153, 626, 631, 648

对浪漫主义的影响, 56, 73

对财产的看法, 49

性格, 56—57

人性本善的基本信念, 57, 58

对社会的看法, 57—58

他的思想的传播, 58

社会理想, 58—61; 理想公民, 59;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59

受到欧洲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61, 68

著作, 61—69: 《致马尔库西的神甫德莱唐先生的信》, 58;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59, 62; 《论科学和艺术》, 61; 《忏悔录》, 61; 《致博尔德先生的最后答复》, 62; 《爱弥儿》, 63, 67—68, 162, 163—164, 165—166; 《社会契约论》, 64, 65, 66, 78, 164, 165, 640, 652; 《论政治经济学》, 65, 164; 《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 66, 165; 《科西嘉宪法草案》, 67; 《新爱洛绮丝》, 67, 163; 《论道德的书信》, 68, 76; 他的著作在葡萄牙被查禁, 377; 对贵族的抨击, 604; 他的著作作为克里奥尔人所阅读, 410

教育理论, 57, 146, 148: 在《爱弥儿》一书中所阐明的理论, 162, 163—164, 165; 对爱尔维修的挑战, 162—163; 承认意志居第一位, 163; 他对教育的影响, 163; 勒佩勒蒂埃的初等学校计划颇受他的影响, 172; 在《新爱洛绮丝》中提出的性格发展的哲学, 163; 背离启蒙运动, 164; 在《论政治经济学》中论证公民的义务,

164; 《社会契约论》中论公民的责任, 164—165; 论教育机构的性质, 165; 在《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中主张采取国家教育, 165

卫斯理的影响与卢梭的影响之比较, 69

谴责暴力革命, 606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是他的门徒, 321

与百科全书派的相似之处, 592

给左派留下的知识遗产, 628

卢梭思想成为莱茵河以东地区的青年运动, 71

康德受卢梭的影响, 77, 78

伯克反对卢梭思想的论据, 79

他的著作对赫尔德的重要影响, 81; 对歌德的重要影响, 72,

81

音乐的新风格, 93, 95

歌剧, 85, 91; 《乡村占卜师》, 86

埃马努埃尔·巴赫模仿卢梭, 88

他的名字等于是革命文艺, 97

受孔狄亚克的哲学论文的影响, 155

Rowan, Archibald Hamilton, 罗恩, 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443

Rumford, Benjamin Thompson, Count, 拉姆福德伯爵, 本杰明·汤普森, 美洲出生的英国科学家, 121

Russia, 俄国, 5, 20

封建制度, 3

人口增加, 25, 28, 330—331, 714

贸易, 35, 39, 41, 43, 330

教育, 147, 152

海军, 189, 190

陆军, 215; 战术, 194

财政, 329—330, 331

地方政府, 314—317

哥萨克叛乱 (1773年), 313—314

叶卡捷琳娜的外交政策, 321—329, 331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同情英国, 326

俄土战争 (1768年), 259—262, 323—325

凯纳甲湖条约 (1774年), 6—7, 263, 264, 325, 326

雅西条约, 328

与普鲁士结盟 (1764年), 255, 323,

338

与奥地利结盟 (1781年), 272

奥土战争 (1787年), 274—275, 328

瓜分波兰, 325, 329, 340, 355—356

Rutherford, Daniel (1794—1819年), 拉瑟福德, 丹尼尔, 英国化学家, 122

Saints, Battle of the, 桑特海峡之战 (1782年), 175, 176, 268

Saint German, Claude Louis, comte de, 圣日耳曼伯爵, 克洛德·路易, 法国陆军大臣

在丹麦任陆军大臣时推行“本国化”政策, 209

改革, 567: 采纳中小贵族的主张, 207; 打击贪污受贿行为, 570—571; 为法国革命军奠定基础, 570; 设立征兵站, 571; 改进征

兵、补给和调动工作，570；用刀剑的扁平面代替鞭笞进行惩罚，212；建立士官学校，206；改革停止，214

Saint-Simon, Louis de Rouvrouy, duc de, 圣西门，法国社会主义者和作家，623，628

声称是法学家们创建并毁灭了君主政体，621

中产阶级注定要兴起的基本思想，626

St Vincent, John Jervis, First Earl, 圣文森特，约翰·杰维斯，第一代伯爵，英国海军上将，174

Salbai, Treaty of (1782年)，萨尔拜条约，222

Sandwich, John Montagu, Fourth Earl of, 桑威奇，约翰·蒙塔古，第四代伯爵，英国海军大臣，181

以贪污腐化闻名，179，491

舰队司令们拒绝在他手下任职，180

对海军进行改善，180

Saratoga, Battle of (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12，210，497，503

Saxe, Maurice, comte de, 萨克森伯爵，莫里斯，法国元帅，194

Saxony, 萨克森，33，299

工业，42，44

Saxony, Prince Charles of, 萨克森查理公爵，见Charles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人口增加，25，26，28，714—715

贸易：航海业的增加，38

Scheele, Carl Wilhelm (1742—1786年)，舍勒，卡尔·威廉，德国化学家

对空气组成的研究, 129

发现氯的漂白作用, 139

Schiller, Friedrich, 席勒, 弗里德里希, 德国作家, 72, 73

Schubert, Franz, 舒伯特, 弗朗茨, 奥地利作曲家, 83, 95

居住和逝世于维也纳, 82

Science, 148

数学与力学, 115—116

天文学, 116—118

科学仪器的改进, 118

自然科学, 118—121: 化学, 121—130; 电学, 130—131; 气象学, 131—132; 地质学, 132—134; 制图学, 134—135, 141

各种学会和出版物, 135—137

Sessé, Martin, 塞塞, 马丁, 西班牙植物学家, 404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年), 七年战争, 4, 5, 6, 14, 36, 174, 183, 196, 204, 215, 241, 307, 321, 371, 521, 538

财政紧缩和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5

国内政策受战争支配, 7, 279, 436

Sharp, Granville, 夏普, 格兰维尔, 英国慈善家, 249

Shelburne, William Petty, Second Earl of, later marquess of Lansdowne, 谢尔本, 威廉·佩蒂, 第二代伯爵, 后为兰斯多恩侯爵, 英国政治家, 2

对1763年国王就加拿大问题发表的声明的看法, 522

1782年与美洲殖民地单独签和, 268

凡尔赛条约, 13, 505

希望美国忠于共同的国王, 462

试图与美国缔结商业联盟, 507, 564

福克斯企图阻止他组阁， 552

内阁， 553： 与东印度公司妥协， 542； 设置了许多挂名的和无用的职位， 559； 处理爱尔兰问题， 564

失去权力， 506—507， 543

不可能成为皮特的盟友， 555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Abbé, 西哀士， 埃马纽埃尔·约瑟夫， 神父， 法国政治家， 692

《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小册子， 661

三十人委员会成员， 663

权力赋予立法议会主要由于他的影响， 681

阐明制宪议会的政治权力， 681

对直接民主表示怀疑， 681

对划分新的省份的主张， 683

Silesia, Austrian, 奥属西里西亚， 8， 33， 299

工业， 42， 44

管理法令（1771年）， 282

西里西亚的丧失， 279

Sindia, Mahadji, 信迪亚， 马哈吉， 马拉特土邦主， 230

在马拉特战争中同意讲和， 222

作为履行1782年萨尔拜条约的保证人， 222

东印度公司将他作为独立的王公对待， 222

康华理拒绝援助他， 228

逝世， 229

Smeathman, Henry, 斯密斯曼， 亨利， 英国博物学家， 249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苏格兰经济学家

他的自然秩序学说，46

对农业的兴趣，47：改革纲领，47—48；自由贸易，48

西班牙经济著作家借鉴他的著作，49

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与斯密和重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大，52

他的思想的来源，52

对现有经济体制持批评态度，52

他的思想对皮特的影响，54

开普地区的爱国运动在要求自由贸易时引用他的话，238

对航海体系的攻击扩大了他的影响，549

《国富论》，565

Sonnenfels, Josef von (1738—1817年)，宗南费尔斯，约瑟夫·冯，奥地利政治作家，431

鼓吹促进原料的出口和限制原料的进口，51

深受自然法则思想的影响，53

约瑟夫二世遵循他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291

《没有偏见的人》中的文章，298

向玛丽亚·特蕾西亚提出的计划，300

利奥波德按宗南费尔斯提出的计划进行警察改革，304

他的影响，567

Sorel, Albert, 索列尔，阿尔贝，法国历史学家，637，638

Soufflot, Jacques Germain, 苏夫洛，雅克·日耳曼，法国建筑师，先贤祠的建筑，110—111

South Africa, 南非

斯帕尔曼在开普的勘探，237

开普地区的经济和文化，237—238

卡菲尔战争，238—239

Spain，西班牙，19，397

人口增加，25，714；发展缓慢的地区，29；流行病，30

启蒙运动，361

改革，361—362，400

教会，362—363

耶稣会，19，363—364，565

宗教法庭，364—365，374

卡洛斯三世的治理，365—367，400

马德里的暴乱，361—362

经济，367

农业，367—369

海军，190

海外军队，404

殖民地，397—400，402

贸易，240，369—370，405，521：在南美殖民地，34，369，370，399；垄断殖民地贸易，36—37，400（放松垄断，39）；自由贸易法令（1778年），36，369，402；奴隶贸易，241，402；技术委员会，400—401；自由贸易区，401—402

与葡萄牙签订的马德里条约（1750年），412

七年战争，230

家族盟约（1761年），6，254，371，497

福克兰群岛争端（1770年），6，257，266，371，398，596

美国独立战争，12，266—267，370，496，500，501，505；结局，371—372，372—373

凡尔赛条约（1783年），268，372，506，508

与葡萄牙的条约（1793年），378

与法国的战争（1793年），375，408—409，419，713

Spallanzani, Lazzaro, 斯帕兰扎尼，拉扎罗，意大利生物学家，386

Spanish Succession, War of（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334，397

Sparta, 斯巴达，59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巴吕赫，荷兰哲学家，67

Stall, Mme de, 斯塔尔夫人，法国作家，623，634，671

“哲理派”历史学家，620

为1789年的自由思想辩护，624，635

Stamitz, Johann, 斯塔米茨，约翰，波希米亚作曲家，82，87

Storm van' s Gravesande, Laurens, 斯托姆·范·格拉费桑德，劳伦斯，荷属圭亚那的行政官员，416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33

Styria, 施蒂里亚，8，281—282

Suarez, Karl Gottlieb, 苏亚雷斯，卡尔·戈特利布，西里西亚法理学家，20

Suffren, Saint-Tropez, Pierre André de, 叙弗朗·圣特罗佩，皮埃尔·安德烈·德，法国海军上将，175，184

美国独立战争：在与爱德华·休斯爵士作战中采用进攻性更加强的攻击方式，176，229；在印度洋上遇到的困难，185；对海军战术不满，186；对亨可马里的进攻，233；占领开普地区（1781年），238

Suvorov, Alexander,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俄国将军，332，355

普加乔夫被出卖落入他的军队手中，314

从波兰转移至多瑙河前线（1774年），325

在1787—1792年战争中夺取了伊兹梅尔的要塞，328

1796年被派前往救援奥地利，329

Sweden, 瑞典，315

贸易，35，41，231；船舶的增加，38

人口，27，714

舍勒关于燃烧的研究工作在瑞典进行，129

势力的衰落，253

俄国和普鲁士决心维护1720年的瑞典宪法，258

法国加强瑞典君主政体的政策，263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的逝世（1771年），263

古斯塔夫三世：即位，263；废除1720年宪法，263；恢复专制君主制，322；没有参议院的同意无法与外国达成协议，263；国内的严重不满，275；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421；军队中的哗变，275，进攻俄国，275—276，328

Swieten, Gerhard van, 斯威滕，格哈德·范，荷兰生理学家，168

Switzerland, 瑞士，209

人口增加，25，715

Taine, Hippolyte, 泰纳，伊波利特，法国历史学家，642，649

从1870年的战败回顾法国的历史，638

宿命论者，638—639

《当代法国的由来》，638，639，641

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639—640，643

对革命恐怖的解释，640—641

对自发的无政府状态的描绘，665—666

欧拉尔的评论，644，645

马蒂埃看起来像是左派的泰纳，647

科尚支持泰纳，649，650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de, 塔列朗-佩里戈尔，夏尔·莫里斯·德，奥顿主教和法国政治家，440

三十人委员会成员，663

Tamburini, Pietro, 坦布里尼，彼得罗，意大利神学家，392

Tandy, Napper, 坦迪，纳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443

Tanucci, Reonardo, 塔努奇，雷奥纳多，意大利行政官员，388

Technology, 技术，138—140

Terray, Joseph-Marie, Abbé, 泰雷神父，约瑟夫-玛丽，法国财政大臣

严厉的财政应急措施，8，597：撤销年金发放员和财务监督员的职位，587；改进税收方法，597；没有减少王室、陆军和海军的开支，597；缺乏财政知识，598

国王听信他的话，607

不得人心，597

舒瓦瑟尔设法推翻他，595

在西班牙与英国的福克兰群岛争端中拒绝支持西班牙，596

Teschen, Treaty of (1779年)，特申条约，271，286，326，327

Thiers, 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梯也尔，玛丽·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法国政治家，629，636，642，644

在他之前的一些著作家，619—620

被指责为宿命论，622，626

第一批法国革命史历史学家之一，625

引起人们反感的宿命论，626，627

以8月10日划分革命阶段，626

与米涅的对比，627

反对教权并不同情贵族统治，627

将人权宣言斥之为哲学上的老生常谈，631

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25

Thomas Aquinas, Saint, 托马斯·阿奎那，圣，74，76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亚历克西·德，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443，447，624，636，642，647，648

编写历史的理论，620，635

对革命前夕的法国的研究，634，636—637，638

对大革命的独到见解，636

从各社会集团的角度观察历史，637，646

民主暴政的危险，650

繁荣革命，651

Tone, Theobald Wolfe, 托恩，西奥博尔德·沃尔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443

Tordesillas, Treaty of (1494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411

Torrigiani, 托里贾尼，教廷大臣，283，284

Toussaint Louverture, Pierre-Dominique,

图桑·卢维杜尔，皮埃尔-多米尼克，海地黑人解放者，419，420

Towshend, Charles, 汤森，查尔斯，英国政治家

在美洲殖民地采取的措施，11，483，484

任皮特-格拉夫顿内阁财政大臣时的纲领，456

反对查塔姆从东印度公司征收现金的计划， 542

Trade, 贸易

水运的重要性， 33

放松限制， 38—39

贸易的趋势， 40—45

另见各有关国家条

Trafalgar, Battle of (1805年)， 特拉法尔加海战， 410

Turgot, Anne-Robert Jacques, 杜尔哥， 安娜-罗贝尔·雅克，
法国政治家， 215, 604, 615, 683

经济理论， 607：《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45；与重
农主义者的联系， 48, 54；西班牙经济作家借鉴他的思想， 49；鄙弃
侵略战争， 216

巴黎高等法院抗议他的纲领， 437

改革：财政， 437, 438；将皇家徭役改变成所有各阶级均缴纳的
赋税， 437—438, 610, 611；废除行会特权， 437, 610；向国务委
员会提出改革方案，即六项法令， 610；六项法令受到行政官员们的指
责， 610；作出让步允许教士豁免缴纳代替徭役的赋税， 610；六项法
令提交高等法院， 610—611；创立贴现银行， 584, 587；取消火药工
场， 141；要求实行普遍教育， 167

反对援助美洲殖民地的政策， 12, 496

美国独立战争后预料法国将出现财政混乱， 14

对美国新政府感兴趣， 441

计算农民的赋税负担， 600

认识到随着人口的增加无地的人数目也在增加， 602

改革使宫廷贵族的忠诚受到影响， 670

对他的政策的攻击使莫尔帕担忧， 610

内克对他的批评， 610

莫尔帕策划推翻他，611

塔布罗·德·雷奥继续奉行他的财政政策，612

Turkey, 土耳其，见Ottoman Empire

Turkish War (1787年)，土耳其战争，20，189

Union with Scotland, Act of (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法，1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13，443

兴起，23，424，448

海军，187—188

步枪的发展，192

战术，195

陆军，203，206—207，213；军饷，213，民兵，210

贸易，43，409：1784年后日益发展的市场，562；汉堡建立起直接联系，38；与奥地利的贸易协定，291；担心出现纠缠不清的联盟从而妨碍与英国缔结商约，507

独立宣言（1776年），439，489，533

美国革命后的事态发展，439—440

联邦遇到的问题，535—536

美国的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443

凡尔赛条约，505

Universities, 大学

苏格兰的，149

新世界的，149

法国的，150

德国的，150—151

Valmy, Battle of (1792年)，瓦尔米战役，195

Vaughan Williams, Ralph, 伏昂·威廉斯, 拉尔夫, 英国作曲家, 82

Verela, Treaty of (1790年), 维雷拉条约, 276

Vergennes,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韦尔热讷伯爵, 夏尔·格拉维埃, 法国政治家

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时的工作, 259

外交大臣, 607, 613: 支持美洲殖民地居民, 12, 497; 把美国改变成法国经济卫星国的希望落空, 13; 采取舒瓦瑟尔的计划,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攻击英国, 255; 在战争中遇到的困难, 266; 设法削弱英国的特权和海上势力, 267; 未能在印度保持法国的利益, 268; 企图把美国排斥在纽芬兰渔业之外, 505; 支持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土要求, 505; 参与斯凯尔特争端, 273, 294; 瓜分波兰, 335; 鼓励叶卡捷琳娜结成武装中立同盟, 501; 拒绝将与哈布斯堡结盟作为法国政策的基础, 270

把测绘局和地图局改成两个行政性局, 570

促使国王同意实行分阶段改革的政策, 614

杜尔哥反对他的战争政策, 496

Vernier, Théodore, 韦尼埃, 泰奥多尔, 法国制宪议会成员, 588

Vernon, Edward, 弗农, 爱德华, 英国海军上将, 174, 177

Verri, Pietro, 韦里, 彼得罗, 意大利经济学家, 50, 387

在米兰取消包税制, 54

降低并简化关税, 54

Versailles, Treaty of (1783年), 凡尔赛条约, 243, 268, 398, 406

Vienna, Treaty of (1735年), 维也纳条约, 256

Volta, Alessandro, 伏打, 亚历山德罗, 意大利科学家, 131, 386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伏尔泰,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德, 法国哲学家, 108, 144, 605, 625, 631

与腓特烈大帝的友谊, 17

对印度教感兴趣, 235

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友谊, 307, 311, 319

开明君主的理想, 309

与《百科全书》的关系, 68

乌东的伏尔泰雕像, 102

科学思想通过他的著作进入一般思想领域, 115

他的著作在葡萄牙遭禁, 377

赞赏莫普的司法改革, 596

支持杜尔哥进入政府, 607

通史的编纂者利用他的著作, 619

对欧拉尔的影响, 643

Von Hornigk, 冯·霍尔尼克, 德国经济学家, 50

Wagenseil, Georg Christophi, 瓦根赛尔,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 维也纳作曲家, 85, 87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里夏德, 德国作曲家, 87

Walpole, Robert, 沃波尔, 罗伯特, 英国首相, 547, 557

Warfare, 军事学

新的军事思想, 191

武器的发展, 191—194

战术, 194—198, 215—216; 战略, 198—200

防御工事, 200

供应, 201

法国革命的影响，216—217

关于海战，见Naval Power；另见Armies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乔治，美国总统，440，444，522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领导各殖民地，13，519；对海上力量含义的理解，174；被任命为联合殖民地的将军和总司令，486；担任坎布里奇的指挥任务，486；消除军队中的弱点，487；占领多切斯特高地，487；渡河撤至曼哈顿，492；渡过特拉华河占领特伦顿要塞（1776年），493；攻占普林斯顿，493；布兰迪万河战役，493；豪占领费城，但未能赶走大陆军，494；在福吉谷扎营，495，498；对他的指挥的不满，495；华盛顿从费城追击克林顿（1778年），498；蒙茅斯战役，498；巴特勒的作战行动转移了华盛顿的注意力，499；1779—1780年保持军队一致遇到的困难，501；对西点失守的看法，502；将进攻目标从纽约改为弗吉尼亚（1781年），504

特里尼达人对他的热情，411

被选为费城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主席，470

当选美国总统，477

向国会发表总统特别咨文，478

安排与军官的定期会议，479

在印第安条约问题上第一次与参议院发生争吵（1790年），535

Watt, James, 瓦特，詹姆斯，苏格兰工程师，446

明月社成员，136

发明旋转式蒸汽机，15，138

布莱克对潜热的研究帮助了他，119，138

与马休·博尔顿合作，138；他们制造蒸汽机，138—139

发明简单复印机，140

伯明翰暴乱干扰了他的工作，443，445

考虑移居美国，442

Wedgwood, Josiah, 韦奇伍德, 乔赛亚, 英国陶瓷工艺家, 100

Weimar, Republic of, 魏玛共和国, 434

Werner, Abrahm Gottlob (1749—1817年), 维尔纳, 亚伯拉罕
• 戈特洛布, 德国地质学家, 132—133

Wesley, Charles, 卫斯理, 查尔斯, 英国卫斯理教派领袖和赞美诗作者, 69

Wesley, John, 卫斯理, 约翰, 英国卫斯理教派创始人, 72, 561, 562

与英国国教的关系不像卢梭与启蒙运动分子的关系那样, 69

West, Benjamin (1738—1820年), R.A., 韦斯特, 本杰明, 皇家艺术院院士, 英国画家

受到乔治三世的慷慨赞助, 108

皇家艺术院院长, 108

受意大利温克尔曼-孟斯-汉密尔顿一派人的影响, 109

《雷古卢斯从罗马出发》, 109

《沃尔夫将军之死》, 109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贸易: 18世纪末的贸易扩大, 40, 41; 与欧洲的贸易, 33—34; 与英国的贸易, 34, 563; 与北美的贸易, 39, 514, 521; 与非洲的贸易, 514; 新英格兰多余渔产品的市场, 514; 自由港法令 (1766年, 1787年, 1805年), 36; 英国企图将西印度群岛作为与西属殖民地贸易的转口中心, 36

丹属西印度群岛: 劳工政策, 248

法属西印度群岛要求大量输入劳动力, 248; 法属殖民地未受到七年战争的损害, 252

拥有土地的绅士和奴隶般的劳动力并存的严酷事实, 426

美国独立战争：克林顿派军队到西印度群岛，498；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落入法国之手，500；德斯坦前往西印度群岛，500

1790年和1791年的起义，418—420，703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威廉，英国慈善家

皮特受威尔伯福斯的影响注意采取行动反对奴隶贸易，556

议会中安立甘宗福音派的代表，562

Wilkes, John, 威尔克斯，约翰，英国鼓动家和改革家，545，560

论证重新征服美国已不可能，490

在报纸上攻击比特，539

格伦维尔不愿在对付威尔克斯上屈服，540

《北不列颠人》报第45号的出版，540

他挑起的争论把查塔姆的追随者赶出政府，并使格拉夫顿倒台，543

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543—544，547

Winkelmann, Johann Joachim (1717—1768年)，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德国作家和艺术家，114

详细论述以罗马为中心的新美学理论，97，98

《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98—99，748

《古代艺术史》，99

纯粹新古典主义理论，99

对古代社会发现的兴趣，99—100

《帕那萨斯》是受他的影响而画成的，101

对本杰明·韦斯特的影响，109

Wood, Robert, 伍德，罗伯特，英国作家，70，71

Yorktown, siege of (1781年), 约克敦围城战役, 13, 174, 175, 225, 490, 504, 505

Young, Arthur, 扬, 阿瑟, 英国农业改革家, 572, 661, 675

Zola, Giuseppe, 左拉, 朱塞佩, 意大利神学家, 392

Zubov, Platon, 祖博夫, 普拉东, 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信

成为宠信, 320, 327

害怕政治组织, 320

革命思想的传播, 321

策划自己的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 329

在叶卡捷琳娜制定反革命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影响, 331

Zurich, 苏黎世, 33

Zweibrücken-Birkenfeld, duke of, 茨韦布吕肯-比肯菲尔德公爵, 269, 270, 273

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 1793—1830年

[英] C.W.克劳利 (C.W.Craw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9: 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 1793—1830年

[英] C. W. 克劳利 (C. W. Craw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9卷, 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 1793-1830年/ (英) C. W. 克劳利 (C. W. Craw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9, 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ISBN 978-7-5203-2596-7

I. ①新… II. ①C…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793-1830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4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杨林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52.5

字数 834千字

纸书定价 18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9: 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ISBN 978-0521045476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 [第一章 导言](#)
- [第二章 1780—1830年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
- [第三章 武装力量和战争艺术](#)
 - [一 陆军](#)
 - [二 海军](#)
- [第四章 文学和思想中的革命影响和保守主义](#)
- [第五章 科学和技术](#)
- [第六章 宗教：欧洲和美洲的政教关系](#)
- [第七章 舆论与教育](#)
- [第八章 欧洲艺术的几个方面](#)
 - [一 视觉艺术](#)
 - [二 音乐](#)
- [第九章 1793—1814年战争时期的势力均衡](#)
- [第十章 1793—1814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历史](#)
- [第十一章 拿破仑的冒险](#)
- [第十二章 1814—1847年法国的政治情况](#)
- [第十三章 1795—1830年德意志在体制和社会方面的发展](#)
- [第十四章 1792—1847年的奥地利君主国](#)
- [第十五章 1793—1830年的意大利](#)
- [第十六章 1793—1840年左右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 [第十七章 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 [一 低地国家](#)
 - [二 斯堪的纳维亚](#)
- [第十八章 1798—1825年的俄国](#)
- [第十九章 1798—1830年的近东和奥斯曼帝国](#)
- [第二十章 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
- [第二十一章 欧洲与热带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 [第二十二章 1794—1828年的美国与旧世界](#)
- [第二十三章 拉丁美洲的解放](#)
-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法联盟与维也纳会议（1813—1815年）](#)
- [第二十五章 1815—1830年的国际关系](#)
- [附录 法兰西共和历说明](#)
-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1793年至1830年是一个充满风云变幻和具有重大后果的时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企图在一卷书中概括欧洲的情况及其与遥远地区的某些联系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想要沿着1815年的“自然边界”对这块地方进行一下透视，也会是一种挑战，并且引起一些有时被弄得难理解的问题。本卷的目的在于勾勒出一幅图像或者俯瞰图，而不是提供压缩的记录。扣人心弦的插曲，局部性的决战，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可能仅仅一笔带过，甚至不列入索引。不过，压缩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也不是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基本东西迄今尚无定论，仍然大有商榷的余地。关于本书所叙述的时代已经刊印的历史记录远比关于18世纪的多，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万花筒式的变化，而由于政治舞台的换景和战争风云的弥漫，我们对这些变化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与1789年以前的显然平静而富有信心的时代相比，甚至与法国革命最初阶段那个不仅在法国人看来是清楚地显示出可以适用于整个欧洲，也许可以适用于全人类的一些普遍原则的短暂时期相比，当代人所表达的声音更尖锐，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分歧。从另一方面讲，在1830年以后的时期，即被恰当地表述为欧洲力量的顶峰时期（第10卷），历史记录虽然要更多一些，但是越来越系统化了，人们更有规律地搜集社会的基本资料，至少是用便于统计分析的方式加以搜集。

近来人们虽然极力用详细的例证来检验概括性的论断，但是有关欧洲这一充满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许多主要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人口的普遍增长，究竟与死亡率的某种下降，与粮食供应的增加，或者与工商业活动的增加，有怎样明确的关系呢？“被解放的”各国人民在摆脱旧日的赋税和徭役之后又遭受新军队和新官僚的暴力掠夺，从物质上和他们的世代来说，究竟二者的利弊如何？究竟有多少人参加战争？有多少人阵亡或病故？又有多少人只是由于开小差而失去踪影？我们能否概括地陈述强制当兵打仗对于成千上万未致伤残的幸存者的人生观的影响？或者说，每个人对于被抓去当炮灰这件事的反应像对于其他任何生活经验一样是否各有不同呢？维也

纳和会究竟是强权政治中的一个插曲呢？或者说，巩固强权政治的企图预示着国际关系准则将发生一种持久的变化？法兰西共和国与传统宗教之间的敌对状态是促进还是阻碍它们各自的生存呢？拿破仑对罗马教皇的待遇最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圣职人员使人民群众实际上疏远了帝国政权？这种冲突对于政教双方究竟产生哪些长期的后果呢？这种冲突果真是反映出宗教哲学和世俗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或者说，它毋宁是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1789年，高级教士几乎陷入旧的社会秩序之中而无法自拔，以致到1830年左右，教会才刚刚开始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列举很多。

专门研究1789年（而不是1793年）至1815年的历史或者研究1815年至1848年（而不是1830年）的历史的学者们，往往把拿破仑的垮台当作一个分水岭。他们不是把和平当作序言和尾声，就是只将战争当作各种事件的背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1789年的“纯洁的”和真正重要的理想最好是在前一卷加以研究，而大动乱的持久后果会在下一卷中揭示得更为清楚。一言以蔽之，1793年到1830年这一时期只不过是三明治的夹心而已，不均匀地涂着强烈的刺激品和人造的镇静剂。不过，三明治没有夹心就没有滋味。过去有人说，在1789年到1815年间，法国是“向历史开战”，又说，1815年以后，保守同盟企图“把时钟拨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两种企图必然都要失败。可是，这种对比当然过于简单化了。在第一个时期的最初阶段，守旧的要求就开始与革新的要求交错在一起。在1815年以后，许多保守分子反而理解到向历史开战是很危险的，历史既包括“启蒙运动”，也包括过去30年的历史。时钟的比喻并不十分贴切，因为这往往会使人误认为复辟的政府当时没有弄清“运动的方面”，因而是情有可原的。那些政府认为它们自己只是想降低革命征服的狂热激情，而不是想去拨慢进步的时钟。他们的诊断和治疗虽然往往很拙劣，但是这些年间所进行的只是一个过滤和消化的过程，而不是完全拒绝整整一代人不得不用以充饥的那种混合食物的过程。

这是一个战争频仍及其直接后果伴随而来的时期，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尽管并不是建功立业的性质。除了它的戏剧性而外，这一时期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究竟认为在这个时期里暴力支配观念是主要的呢，还是暴力为观念服务是主要的？另一个是：战争本身在决定变革的方向和广度方面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从技术上讲，

这并不是一个陆战或海战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参见第三章）；但是战争的规模和持久性，以及为了适应这些情况而采取的各种方法（征兵、封锁、筹款、宣传），都是在未来的战祸中能够大大利用的。本卷中有几章可以帮助人跨过1815年的障碍，即使没有人想要在1793年或1830年设立新的障碍，这样做也会是有益的。我们选择一个以处决路易十六之后的全面战争状态为开端，而以查理十世逊位，避免发生战争为结尾的时期，反映出当时欧洲对法国的全神贯注，可能也标志着欧洲陷入内部革命的一个阶段。后来的革命变革大都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战后开始的，并且没有发生由外来干涉直接引起的战争。

在第二章中提出一些事实和数据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对改变经济结构的力量加以评价；在英国，这种变化是很迅速的，而在欧洲大陆，则有快有慢甚至有些国家还很不明显。在分国叙述的几章里指出了经济结构变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联系。回顾起来，最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人口持续的、加速的，几乎普遍的增长——对这一过程既没有全面的精确估计，也没有充分的说明。农业在整个欧洲仍然居于主要地位，在南欧、东欧以及中欧的大部有压倒一切之势。农业机械化时代尚未到来，农村的生活方式到处还是传统的一套。不过，耕作方法的改变尽管不是戏剧性的，却是多种多样，到处风行，而且日益增多。产量有了提高，作物的品种增多了，市场越来越不局限于当地了。三件同时发生的事——物价的上涨，粮食的增多，需要哺养的人口的增多，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似乎很难排出任何明确的顺序。

交通运输虽然仍因循守旧，但也有一些不同。各国政府这时能够利用信号系统，天气晴朗时在重要城镇之间传达信息。有些公路比较好，对于邮件来说，对于官吏来说，以及对于有盘缠的旅行者来说，走这些公路会迅速和安稳一些，但是商品在公路上并没有比过去运输得更快。若干水路有了改进，在少数工业地区，新的运河网仿佛是运输方面的一场地方革命。19世纪20年代，在港口和沿海航运中已经开始使用蒸汽了。1790年以前，在一些矿山中和矿山周围，固定式蒸汽抽水机和马拉的有轨运货车已经分别成为常见的事物；到1830年，把引擎和铁轨结合起来的蒸汽机车早就经过实验证明，肯定能走得更远和更快。长途客货运输还未试行，甚至在1837年，巴黎人似乎还把他们的刚刚开辟的通往圣日耳曼的第一条郊区客车线路看作只不过是一个

新的玩具。但是在五年以前，《环球报》上就刊载一些文章，预言蒸汽不但会消除大洋的障碍和大洋与大洋之间的障碍（苏伊士和中美洲），而且会把国与国之间的疆界降低为仅仅是城市的边界（参见第十章，原文第434—435页）。

有些著作家对于消除国与国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壁垒表达了同样的乐观情绪。然而，这些壁垒是与商业的扩展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以及用最经济的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密切相关的。实业家本身更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在本国政府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攫取受保护的市場；只有在国内市场过小，或者自己的生产方法远比邻国先进，一时间不必惧怕因相互进行更自由的贸易而引起外国竞争的条件下，实业家才赞成打破保护的壁垒。英国工厂主千方百计要去渗透拿破仑强加给欧洲大陆的自我封锁线，而一旦和平来临，就利用这一大好机会涌入大陆市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法国和比利时的实业家这时已经习惯于在半个大陆上拥有开放市场，而到1815年以后，他们要去寻求阻止英国货大量流入的保护，并且很快取得保护，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从长远来看，英国煤炭、钢铁和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对于欧洲的工业变革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推动力。

关于英国的领先地位的实际证据，或者关于对此所作出的某些解释的讨论（参见第二章，原文第39—43页），在这里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讲清楚。不管怎样说，在1790年以前，英国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在本卷叙述的时期只需要说明这样一点：英国不但维持住领先地位，甚至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其他国家既不缺少发明能力（法国政府比任何地方更加重视科学技术），也不缺少商业或工业的企业。然而即使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不断打仗，但是大多数国家一遇到战争就遭到比英国更大的破坏，比英国更加前途渺茫。为了迅速赶上英国，这些国家必须在财政方面取得比战争时期更大得多的稳定。不管有多少理由，但是，如果说1830年以前欧洲已经发生工业革命，则是错误的，只有比利时一个国家，以及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大都市算是例外。有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急于提倡工业，因为它可能扰乱社会秩序（如在维也纳和罗马那样）。大多数政府依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而不采取发展工业政策，即使各国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几乎全是亚当·斯密和J. B. 萨伊的信徒。只有一个统治者——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做试验，他以国家全面垄断的方式发展商业和工业，目的在于

筹集陆军和海军的军费，但是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虽然各国政府通常都是鼓励开辟新的财源和增加新的收入，但是它们非常担心的是急剧变革的社会后果以及由于采用新机器（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而引起的突然波动。旧式的工匠不可能理解新技术的优点，因为新技术会使他们失业，各工厂会雇用妇女儿童看管机器来代替他们。他们不是像卢德派工匠那样采取暴力行动，就是无可奈何地依靠公家的或私人的救济为生。乡下人涌入城市的速度比为他们提供住房的速度快，因而对于身心都会发生不良影响，而且一遇商品萧条，他们很容易沦为赤贫。研究英国以外的这些情况的最早的详尽论著之一是由一位保守派、信奉天主教的省长撰写的。^[1]路易十八曾经说过，他希望在每一个省都有这么一个省长才好。这位省长并不像某些保皇党人那样不切实际地鼓吹恢复旧的行会和公会，也不从社会偏见出发指责工厂主，只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而大为震惊。在法国，摆脱贫困被视为主要是教会的事情，完全没有16世纪英国解散修道院后那种用地方税收进行公共救济的传统。这时，英国的救济制度正遭到猛烈的抨击。而法国在1790年以后，维持或者恢复教会慈善团体丝毫不比英国的旧济贫法更能解决人口迅速增长的中心地区所发生的无法预料的问题。经济学家的主要流派真正相信：如果要减慢变革的速度或者缓和转变的过程，那只会延长极度的痛苦和推迟把日益增长的富裕所带来的果实全体人民中间进行最后的分配。不久，在19世纪30年代，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在英国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的帮助下不得不去研究英国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直到1839年，普鲁士才根据英国从1801年就已经实施，但到1833年之后才进行有效监督的方针，稍微减轻工厂中童工的痛苦。

在这个时代，有一种机械发明很可能会给一个国家，甚至给它的文明带来绝非暂时性的问题：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直接引起奴隶贸易的扩大（参见第二十一章）和美国奴隶制的发展，其惊人程度不下于它给生产带来的跃进。而这时候，法国制宪议会正在以理性和天赋人权的名义，慈善家们正在以人道的名义，虔诚的基督教徒正在英国最有效地以宗教的名义，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虽然由于经济的理由，并结合其他的理由，人们断定奴隶制度最终将会衰落；但是在这个时代，推动废奴运动的则是那些坚持人权当先而不管私人既得利益或者国家经济收入的人们。

工业方面的某些波动是由于时代潮流的变化或者各国政府的关税政策的改变，也由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但是，许多波动的出现以及其猛烈程度的增加，都是由于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难以应付任何突发的信用危机造成的。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大财阀所能起的稳定作用，在与合法政府和革命政府打交道上要比在商业和工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引人注目的军事承包商乌弗拉尔与督政府签订巨额的合同，时而受雇于拿破仑和复辟的波旁王朝，时而被他们投入监狱。他所制订的向历届政府提供资金的大规模计划过于投机冒险，并无助于稳定。但在1815年以后有过这样的时期，无论法国的波旁王朝，或者南美的一些共和国，都是靠外国银行家苟存下去，而这些银行家的利润和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是成正比的。梅特涅为了感谢路特希尔德家族贷款给他和他的皇帝，曾经支持德意志议会改善法兰克福犹太人的地位（1817年），并帮助路特希尔德弟兄五人全都取得男爵爵位（1822年）。

用任何经济标准来衡量，英国饱经战乱之后，在世界大国之中成为最富有和最稳定的国家。伦敦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巨大国际中心；英国的强大海军保卫着数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商船，这些商船把各种各样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第一次近代工业革命的大量产品和英帝国日益扩大的海外领地的初级产品。同时，英国的农业也能够以高水平耕作和高地租收入而自豪，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谷物法的保护下，价格不受和平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在所有这种繁荣昌盛之中，农业劳动者分享的利益甚至还赶不上工厂的非熟练工人或者普通的水手，但是，他们之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同欧洲大陆上的同类劳动者调换位置。机械时代的使用机器的工匠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在英国，他们的人数之多已经足以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而由于国外要求他们前去工作，他们就更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了。乔赛亚·韦奇伍德在劝说他的熟练陶工不要为大陆上的重金征聘所诱惑的时候，曾遇到很大困难。毫不奇怪，没过多久，英国人的普遍自满情绪就同他们的事业精神不差上下了；有好多人在竞赛中完全落后了；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有产者却相信这正是进步的代价。在处理自由和权威之间的平衡这一问题上，英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幸运一些。英国面临在按平均统计数字计算的全面经济进步与个人、集团，甚至阶级遭受的苦难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要比其他国家更早一些。这种苦难虽然在波特的《国家的进步》一类的著作中可以避而不谈，但是对于那

些终生不得不忍受苦难的人们来说，却是时刻不能忘怀的。一言以蔽之，财富生产的澎湃高涨还缺少相应的高度本领来控制它的步调或者分配其物质福利，达到促进稳定的程度。那些“只讲实际”的人对这些问题也没有足够的注意，因此，这些问题就成了夏尔·傅立叶等乌托邦主义者或空想家探索的领域。在他们的诊断中，有许多地方十分敏锐和中肯，但是由于大家嘲笑他们所开的某些处方的古怪离奇而黯然失色。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进行的实验更有成效得多，它可以证明这样一点：在一定条件下，成功的企业能够与人道的考虑相互结合。

在1830—1831年间，欧洲的政治地图与40年前惊人地相似。法国的征服虽然激动人心，但是毕竟昙花一现，它所扶植的（北）意大利王国、莱茵联盟或萨克森的华沙公国很少留下什么痕迹。法国本土的疆域与以前几乎完全一样，德意志诸邦的外部边界也是如此。如果说意大利仍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的四周也毫无变动；值得自豪的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的消失是战后仍保留下来的最大变化。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丧失了它们的海外帝国的大部分，但是它们本土的疆界并没有变动。瑞士的外形简直没有什么改变，而新近联合组成的尼德兰王国正在分裂成几乎与200多年以来地图上所习见的情况相同的两个部分。在北方，瑞典把芬兰割给俄国（1809年）而从丹麦手中取得挪威（1815年），但这些只是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地区的易手，并非由于主权的改变而丧失原来的实体；瑞典只是在1815年收复它在波罗的海彼岸波美拉尼亚的最后一个据点遭受失败后，才认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在德意志内部，一个古老的、倾颓的房架虽然还能稍遮风雨，但是过于腐朽，经不住翻修，因此在拿破仑的触动下突然崩溃了。德意志人完全没有进行政治统一的心愿，因为他们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大多高谈宇宙观，而对现实政治的见解极端狭隘，往往犹如井底之蛙；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扭转1803—1806年的急剧变化，大鱼通过这次变化吃掉了大部分小鱼，因此，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争夺统治权的潜在斗争中所面临的已经不是300多个邦，而是易于控制的不足40个邦的集团。

奥地利在德意志以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地位巩固，北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对岸的沿海地区显然是它的牢不可破的据点，它不打算用直接统治的方式，或者用恢复它在1806年由于过时而同意废弃的选

帝称号的方式，而是用它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所施加的那种影响，用它在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中的盟主地位，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去支配德意志。而普鲁士呢？它在耶拿战役之后被拿破仑彻底肢解，1815年后虽然得到充分的补偿，但是并没有恢复原状，因此，只能期望通过进一步直接攫取，或者通过严密的控制，才可能称雄。它的省份由东面的一大块（这一块向西越来越窄）和西面的一小块组成，两块之间由汉诺威、布伦瑞克和黑森等地所形成的带状地区隔开，这一带状地区的宽度没有一处是在30英里以下，大部分远远超出30英里。它从瓜分波兰所得到的那一部分领土，还没等到完全同化，就在1806年丧失了，而在1815年收复之后，遇到了恢复原状的问题；而在萨克森北部和过去一直处于法国影响之下的一些教会和世俗的公国所组成的巨大的莱茵兰省，又有建立新统治的问题。普鲁士的许多新臣民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正如西里西亚人（这时是第三代的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不愿并入一个路德—加尔文教派的国家，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直到腓特烈大帝的时代为止，这个国家在梵蒂冈始终没有派驻外交代表。一个能够在1817年靠一道圣谕把普鲁士的路德派教会和加尔文派教会从行政上联合起来的政府（参见第六章，原文第176—177页），会发觉以同样粗鲁的方式对待罗马天主教教士可不那么容易。

在1815年，没有一个人梦想恢复旧德意志的政治地图；而且，即使罗马对将几个教会大公国（在七个或八个选帝侯中，科隆、美茵茨和特里尔占三个）世俗化非正义行为公开表示遗憾，但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帕卡还是看得出来，如果这些公国恢复原状，必然是一种累赘，而不是一种财富，因为它们的社会秩序已经根深蒂固，罗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的特权有碍于教会的统一和纪律。德意志的主教们近来倾向于约瑟夫的建立一种民族国教的思想，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有钱有势，他们就会更乐于听罗马的话了”。^[2]不过，罗马和它的朋友们还都没有考虑到，罗马本身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利（除必要的居留权外）是否不久也会成为一种累赘，因为在1814年大部分教皇国家几乎毫无疑问地恢复原状了。

俄国显然强大的实力，已经向四面八方扩大。取得芬兰虽然得利很小，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波兰会议王国（1815年）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795年瓜分波兰时所攫取的领土以及普鲁士在1793年瓜分波兰所攫取的领土的一半左右，而俄国瓜分去的全部领土依然在俄国

的手中。迄至1831年，波兰王国还没有完全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两国之间存在关税壁垒，它还拥有本国的军队，由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任总司令，而他在1828—1829年间拒绝派遣波兰的一兵一卒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可是，其他强国在波兰王国的一切势力都被排除，为时不久，波兰爱国者的活动就造成了推行更残酷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借口。在南方，俄国多半出于需要而不是出于选择，这时策划使土耳其依旧作为欧洲的一个弱小的仆从国家，而不直接把自己的边界朝那边推进。但在1812年，俄国兼并了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的一部分），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则是使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完全脱离君士坦丁堡的行政管辖的一系列条约中的最后一个。不管这些“多瑙河公国”（未来的罗马尼亚）的最终命运如何，一支俄国军队一直占领到1834年。在黑海的亚洲一边，俄国的欧洲盟国无法轻易阻止俄国的扩张，只好牺牲土耳其在高加索（1801年）和亚美尼亚（1829年）以及波斯在里海附近（1813年，1828年）的利益。俄国对西伯利亚的逐步渗透一直远达东部海滨；1799年沙皇授予一家“俄美公司”控制白令海两岸的现有和未来的居民点（大多猎海豹皮）的垄断权。俄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1824年）和与英国达成的协议（1825年）把阿拉斯加殖民点的南部边界规定为北纬54° 40'；而俄美公司远到南面圣弗朗西斯科湾的殖民点直到1839年才正式撤销。可是由于补给困难，由于与其他强国的摩擦，再加上管理不善（“当董事是一个美差，但是当股东则非常危险”），到1830年，俄国已经完全感到在这一地区没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俄美公司苟延残喘，一直拖到1867年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为止。^[3]

就土耳其来说，直接向俄国割让的领土并不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那么惊人。就连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主权的限制也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俄国在对付罗马尼亚强有力的民族运动时，也还几乎没有进行这样的限制。对将来来说更加不吉利的是：苏丹被迫允许塞尔维亚人实行真正自治（1817年）和承认一个虽小但是野心勃勃的希腊王国的存在（1830年）。尽管穆罕默德二世在加紧他对亚洲各省的控制方面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时在埃及却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宗主。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长长的北部边界并无变动，所有的欧洲列强至少还在口头上尊重奥斯曼帝国“独立与完整”的原则（参见第十九章）。

如果说俄国和土耳其的边界远远跨出欧洲以外，那么，英国统治的界线则大大扩展到拿破仑未曾到达的地方。英国在家门口实行了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在立法上的联合（1801年），虽然它的间接起因是战争和法国革命对于1798年起义的影响，但对政治地图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由于英国在长期拖延之后才给予罗马天主教徒所渴望的政治权利（1829年），而且几乎还没有考虑如何解除农民的痛苦，英爱真正和解的前景就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显示出英爱联合对英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对英国在欧洲和在美国的声誉的全部不良后果。梅特涅已经在以爱尔兰为例来反驳坎宁为希腊申辩的论点。人们并未因为帕麦斯顿是一个爱尔兰地主而更加相信他为民族事业和自由事业进行斗争的真诚。虽然如此，比利时的天主教徒以及法国某些天主教徒仍热衷于奥康内尔取得成功的新鼓动方法，这间接表明英国的制度最终完全可以适应于采纳群众意见或满足群众需要。

英国的海上力量大为加强：在欧洲水域，它占有了马耳他岛（1800年）和赫尔戈兰岛（1815年），占领了伊奥尼亚群岛（1815—1864年），成立“七岛共和国”，在战略上完全控制了这一保护地；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它在红海口和波斯湾占有立足点，并缔结了一些条约（参见第十九章），另外，它还据有开普省以及阿森松岛和毛里求斯岛（1815年）；再往东，它取得了锡兰（1815年）、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1819年），而且不久前在澳大利亚开辟的殖民地也逐步发展起来。关于英国在印度的势力的显著加强，本卷第二十一章有所描述。在大西洋彼岸，英国为了争夺南美洲的立足点而进行战争，但是不待停火，它就放弃了一度怀有的希望。不过，它占据了荷属圭亚那的一部分，总算在地峡以南得到一小块殖民地（1815年）。英国对美国的战争（1812—1814年）并未使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发生变化；在落基山两侧尚未开始有人定居之前，1818年为划定一条西至落基山的人为的但是稳定的边界线开辟了道路。英国的西印度群岛，再加上特立尼达、圣卢西亚和多巴哥（1815年），对于英国防止欧洲列强在中美或南美施展不利于己的阴谋，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海军力量依然很弱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对于美国也间接有着重大的价值。从商业上讲，北美独立以后，英国对美国的贸易显著地扩大了，不久以后，英国与南美洲的交易虽然更具有投机性质，但是交易额却大有增长，这就意味着西印度群岛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大西洋贸易的枢纽。但是，在1830年，对于英国来说，西印度群岛依然比印度

到当时为止更为重要。1783年以来受限制的西印度群岛本身与美国的贸易，也由于英国通过立法而比较容易进行了（参见第二十二章）。

因此，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在政治地图上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欧洲内部，战争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留下的痕迹已寥寥无几，而且，除了在德意志和较小程度上在意大利外，也没有沿着此后半个世纪所要遵循的路线清楚地指明。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也出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大多数变化比较持久，或者导致大方向相同的进一步的变化（印度、马来亚、澳大拉西亚、南非、北美和南美）。但是，法国的爆炸力在欧洲是不能以它对地图的影响来衡量的。尽管在1815年已经按照至少10年以前皮特就预示的路线确立了势力的均衡（参见第二十四章），尽管几个覆灭的王朝已经复辟，但是，要用“复辟”二字表述1815年以后欧洲其他各方面的情况，则容易引起误解。法国人和战争给欧洲造成的一切，无论是由于直接行动，或者是由于煽动，大多证明已不可逆转。人们通常说，1815年后的一代人是生活在一个与梅特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反动时期。确实，对“非正规”政府，曾有过强烈的反应，也有些人企图把政府与传统的支持联结在一起，而不是与试验或时机联结在一起。可是这些情况有的可以回溯到1799年或者更早，回溯到伯克和他的信徒，回溯到18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理想的迅速幻灭，回溯到年轻时的梅斯特尔和博纳尔，回溯到波拿巴将军召回和雇用流亡贵族，并且下令在米兰大教堂为法国在意大利的胜利举行一次赞美上帝的感恩祈祷（1800年）——这个举动震动了督政府的某些成员，并且一步步导致1802年4月政教协定的缔结，和协定似乎包括的一切内容的实现。随着执政府和帝国的出现，高昂的革命斗争的短暂时期开始看起来像是介于部分地依靠传统来维持稳定的两种权力并未中断的制度之间的一个插曲。另一方面，1815年以前行之有效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改革大多依然存在，而那些刚提出的改革则尚未失去它们的动力。在18世纪这一代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人会被称为“反动派”，因为这个词新流行的含义是指政府所共同适用的准则的急剧的变革。在1776/1789年以前，听从政府算是正常，动乱是不正常。

“革命”一词是用来形容政治中的命运车轮的一次转动，如果把这个车轮再转动一下，也许会带来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也可能出现人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反动”这个词，如果用了的话，也并无褒贬之意，正如钟摆来回摆动时出现的“反作用”一样。那些相信人类会进步的人，一般与反对现存秩序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可是到了1789年以后，

人们普遍认为“革命”是一个几乎无法逆转，而且可能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尚未完成的进程；“反对”就是一切要阻止这一进程的东西，通常带有邪恶的意思。那些讨厌“反对”这个臭名而在最近给自己贴上“保守派”标签的人们，正在鼓吹抵制被认为是一种进程的变革，不仅仅是维护他们反对当前敌人的权利或权力。

这个至今仍然使很多著作（不仅是政治方面的）具有其特色的新名词，可以与人类将会达到完美境界的观念和对此观念的反抗联系在一起（参见第四章）；我们无须坚持说这一类学说中的哪一种是普遍流行的，就可以在18世纪早期的许多政治思想和行动中随时随地觉察到乌托邦就在眼前的暗示。的确，到1830年，一种微妙的转变似乎已经开始，“反动”更多的是与“自由主义”，而不是与“革命”相对而言。这意味着，目标并不在于简单地用另一个政权代替一个政权，而在于保证在任何政权下作出决定的方法是通过公众讨论，而不是单单靠一纸命令或者暴力镇压。然而，19世纪早期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身上都带有乌托邦主义的味道；有些把过去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保守派和一些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在1830年还没有这样的称号）也是如此。甚至功利主义者，尽管他们轻视天赋的权利和义务，最初也几乎没有认识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从切萨雷·贝卡里亚到杰里米·边沁及其信徒们，都把这一原则当作抨击根据常识看来可能妨碍幸福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在法律和财政政策方面的制度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认为使人受不必要的痛苦，正如强征自相矛盾的赋税一样愚蠢。不幸的是，感觉到痛苦，甚至减少造成痛苦的原因，要比解释什么是积极幸福或去创造这种幸福容易一些；但是功利主义者的哲学虽然浅薄，但这并不一定会贬低他们的武器的力量，至少从消极方面来说，在排除幸福的障碍方面是如此。他们的“制度决定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尽管好的制度并不能使人变得善良或幸福，我们总可以承认，坏的、过时的或者起坏作用的制度使人更难变得善良或幸福。要想理清类似的行政管理方面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样的事，提出“它有什么用处”这样的问题要比提出“它的真相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更有效些。

在法国本土，制宪会议和立法议会（参见第八卷）除了消灭特权而外，废除了陆军、海军、地方政府、税收、教会、中小学和大学中的大部分现存制度，而留下一片建筑工地，上面除大堆垃圾外，还有

一些重新施工的材料待装配，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随后的情况在本卷第十章有所叙述。不幸的是，在制宪议会给人印象最深的建设项目中，地方政府官员选任制度这一项受到战争和各种紧急措施的冲击，直到波拿巴实行新的省份建制（为了消除历史造成的割据状态而改用不带政治倾向性的省名），并亲自委派了80多个省长，才得以实行；这些省长失去了过去地方总督拥有的司法和财政大权，但是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却比过去更加牢固地集中起来了。另外一个建设项目是“教士公民组织法”（1790年），此法以选举产生国教主教的原则为基础，与罗马的教阶制度和普遍原则水火不相容。该法始终没有赢得广泛的承认，最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教会和国家的分离（1794—1801年），由于是在敌对状态中产生的，难以实现。后来又由拿破仑的政教协议（1802年）所取代，由于这一协议正好反映出“大多数法国人”的法国天主教会观点，才得以经历复辟时代而实行百年之久。

国民公会（1792—1795年）的人们对国内权力的集中程度正如其前人将之分散的程度一样，但是他们那没有生效的“1793年宪法”表明：分权依然是目的，集权只被当作在紧急状况下图存的手段：“没有道德，恐怖就没有用；没有恐怖，道德就没有力量”（罗伯斯庇尔语，1794年2月5日）。紧急状况一部分是国民公会自己制造的；它过分热衷于“向历史宣战”，不仅在国内，同时还要超出国界“救援一切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产生了法国人的强烈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最初带有革命精神，但是为时不久，就完全是好战的和贪婪的了。随着纸币（指券）的崩溃，督政府不得不让它的军队在被解放的国家里依靠私自劫掠和公开勒索维持生活；热月之后，崇高的希望在国内已经消失，法国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也逐步集中到军队和将军们的丰功伟绩上。督政府需要有一个具有平民精神的将军充当吉祥物，他们发现波拿巴是最适当的人选。

第十一章概述拿破仑的冒险事业，第十章则概述拿破仑作为执政和皇帝对法国的统治。这些年头是行政官员发挥才干的年头，无论他们是军人，或是文官；是走上“向天才开放的大道”的新人，或是在旧政权下只能得到比较平凡的前程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贵族家庭出身，往往怀有忠君思想，他们为第一执政的共和国，为1804—1808年的共和帝国，或者最后为回光返照的世袭的王朝帝国。在1814年，除了王朝而外，得到恢复的东西极少。因此，不可避免地，王朝更多地

使用给拿破仑效劳过的人，而不是“纯粹”保皇派。路易十八本人虽从未向“篡位者”屈膝，但是在他手下的大臣、省长和行政官员中，有很多人曾经卑躬屈节；而在“百日”期间再次屈膝的那些人，只要不是积极助拿破仑为虐，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大多数都未被触动。政治性的辩论，以及在报刊、小册子和书籍中公开交换思想，都比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更加自由得多；1814年的宪章并不是骗人的东西，尽管在后代人看来（以及在那些完全是要推翻王朝，或者不会因推翻王朝而受到震动的当代人看来），这一宪章是有种种局限性的。用第三共和国的一位宪法学家的话来说：“我们的行政始自帝国，我们的政治始自王朝复辟……大革命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依然是消极的。它摧毁了旧政权；它为现代制度扫清了场地，而拿破仑却在这块场地上建造了他的专制主义的大厦……实际上实行自由与权威相结合的现代体制基本原则的功劳，应属于王朝复辟。这个原则的作用历久不衰。”^[4]1830年以前和以后法国君主立宪制的试验，在第十二章作了概述。

在1830年以前，或者实际上在1848年以前，除了几个较小的国家以外，在其他地方，代议制政府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不过在1815年以前，它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进展。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文盲。科学家和学者们不大受政府形式的干扰，只要它们十分稳定就行；尽管在法国，精密科学技术的威望大大提高，而在德意志，哲学和语言学的威望则空前高涨（参见第五章）。官吏、职工和商人阶级一致要求宪法权利；工业中的逐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转移（或者创造新财富），比起本身反映出新现实和旧传统之间的差别的积极政治鼓动来，更加使人们对宪法权利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要使制度适应一个在变动中的社会模式，这种工作必然是缓慢的。像圣西门以及他往往持不同意见的信徒们（奥古斯特·孔德原来算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政治预言家可能宣告一个专家政治的、实证主义者的时代正在到来，将代替以土地为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土地依然是（在当时来说）表明财富取自其他来源的最好证明的漫长历史时期。但是，对于埋头于错综复杂的当代事务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预言家就显得离奇古怪，或者说异想天开了。他们也不是“雅各宾党人”所理解的民主政治的先知。在那些从1789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学到和什么也没有忘掉”的人当中，不仅有特权时代的遗老（以及在特权很少遭到破坏的地方的特权的继承者），还有

“1792年的人们”，这些人徒劳地一直期待着重新上演大革命的局面，如果可能的话，不演其在国内的暴力行为，但是不能不演革命在国外的光荣冒险事业。

从1807年起普鲁士出现的“新面貌”（参见第十三章），到1815年以后还没有消失，尽管立宪派的希望比在德意志的其他邦更加渺茫；但是农奴的解放一开始就表明，农奴所得到的利益要比大地主少，有些大地主当时就预见到，如果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土地也就不再被束缚在农民身上。普鲁士对新老臣民以及比较软弱的邻国的最大吸引力，不过是严格的行政管理 and 经济优势的前景而已。这种优势首先来源于过去的传统，由于普鲁士各大学的研究成果——拟订普鲁士邦法（Landrecht）而得到加强，“邦法”在1794年编纂成典（但商法一直到1845年才编成）。优势之二来自1818年普鲁士确定的适中的关税和1828年开始邀请愿意参加的邻国加入关税同盟。1818年的法律一反过去那种限制谷物出口的制度，同时全面降低了税率。它还使普鲁士所有各省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制度，但边界线与面积二者的比率仍然非常高。因此，关税同盟除了具有获得实际利益，或许还有更长远的政治利益的前景外，会带来节省开支的直接效果。同时，公路的修建旨在消除或者减少关税壁垒，例如在汉诺威和黑森之间开辟从哈尔伯施塔特到科隆的公路（1819年）和由帕德博恩向南的支线（1829年）以及从马格德堡到汉诺威的公路（1829年）。

在1823年起成立的普鲁士的各省议会中，莱茵兰省议会最为活跃，但不存在中央代议制度。就汉诺威与英格兰的长期联系而论，1815年以后的汉诺威令人感到奇怪地“反动”；但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许多邦都像法国那样有了以范围狭小的选举权为基础，但是保护公民权的宪法，例如拿骚（在1814年以前）、魏玛、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都在1816—1820年间）。这些邦宪法（特别是巴伐利亚邦宪法）都是以启蒙思想，而不是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精神的。联邦法案（1819年）虽规定各邦实行立宪制度；但是不久以后，各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就遇到了在它们看来不是宪政的而是革命的运动。早期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或激进派固然还有许多像啤酒上面的泡沫一样的浮浅的东西，但整个来说，实行代议制宪政的各邦政府没有像未实行宪政的各邦政府那样受到严重的威胁。

保持固定状态的原则部分地是由于奥地利的盟主地位而强加给德意志联邦的。虽然梅特涅在外交和行政方面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但在立宪问题上实行这个原则是合乎他的意愿的。但不管情况怎样，皇帝个人的观点以及这个君主国的特殊情况使上述原则很少有任何改变的余地（参见第十四章）。奥地利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形成的各“民族”没有一个符合刚刚抬头的以种族和语言为标准的民族概念；再加上皇帝手下的政府缺乏实行宪法的经验，只有匈牙利王国有一部旨在保护马扎尔贵族古老特权的宪法，这些贵族的思想更接近英国颁布大宪章时兰尼米德贵族们的思想，而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者。从1812—1825年，皇帝避免召开匈牙利议会就不足为奇了。首先，避免战争符合他1815年之后在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利益，因为欧洲的“运动各方”大都指望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希腊人期待俄国在20年代对土耳其作战，法国左派在1830—1831年鼓动路易-菲利普去干涉意大利、比利时或波兰。革命运动由于邻国害怕受到影响也可能触发战争：梅特涅感觉有必要对那不勒斯进行干涉，俄国则表示要干涉西班牙，法国也决定这样做。梅特涅也认为，各国统治者能有助于预先遏制这种令人困窘的局势。众所周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曾经答应梅特涅，不经奥地利同意决不进行宪政改革；但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是：“斐迪南还受到警告，不要试图取消缪拉所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参见第十五章，原文第429页）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北方政府与意大利其他各地的政府（也许要除去托斯卡纳的“自由主义绿洲”）相比并不算坏。这个政府并不比以前在法国统治下的政府更具有异族统治的色彩，反对外国统治本身的人为数很少，尽管他们向往着未来。我们很难用目前的标准来评价教皇国政府，它是马虎的家长式统治和严重无效率的独特混合物；但是，在红衣主教孔萨尔维任国务卿的时候，这个政府的意图很难说是“反动的”。孔萨尔维充分意识到向后看的危险性；在1814年8月写给未来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一封信中，他已经在敦促国王和他的弟弟仿效梭伦的和解工作，而不要仿效查理二世“既然答应忘记过去，而又不宽恕任何人，破坏了自己的统治，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再次垮台做了准备，到他弟弟的统治时代终于垮台了——这一次永远无可挽回”。^[5]但是，在庇护七世逝世（1823年）后，孔萨尔维给罗马的狂热分子让开了路，1821年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各种运动使意大利各地的警察活动得到强化，最直接

受到影响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中为数较少，但生活富裕而直言不讳的那些人（参见第十五章）。

虽然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名称以明确的政治意义的是西班牙（参见第十六章），但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自由主义的性质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这是由教会的独特地位决定的，并与陆军军官，很快又与王室和宫廷中互相敌对的集团有关。在1812—1830年之间，各党各派都不愿意放弃海外殖民帝国，这一点压倒了所有其他的问题，西班牙的1812年宪法——采取一院制议会，内容繁杂，而且没有关于修改的规定——是19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战斗号角，但是到1830年以后，更加实际可行的比利时宪法开始起这一作用。

欧洲的小国在1815年以后有了发展议会制度的最好机会，它们之中有一些利用了这一机会，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参见第十七章）。它们比较起来不像别的政府那样全神贯注于国际政治，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德意志内部各邦的宪法在上面已经讲到了。波罗的海已经不再是大规模角逐的焦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经济上都受到和平的沉重打击。在丹麦，直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开始引起群情激愤以前，官僚主义的，但并非反动的政府的安静日子几乎没有受到扰乱。但是，瑞典在1809年体制下的三级会议和挪威的单一的众议院（1814年），在老练的外国统治者贝纳多特（初为王储，登基后称查理十四世，1818—1844年在位）的一王兼治下，才得以真正存在。尼德兰和瑞士由于强大的邻国谋求均势和遏制法国而获得独立，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外国政府的压力，不让政治避难者在它们境内进行活动。瑞士的政治在1847—1848年以前仍然主要是由贵族掌权的地方自治，但是在尼德兰，新教的荷兰和天主教的比利时两者之间的不稳定的结合推动了有组织的政党的成立，这一推动力经受了1830年之前开始的分离危机而保持下来。已经成为欧洲工业革命先锋的比利时（参见第二章，原文第54—55页），在英明的国王利奥波尔德一世的统治下，不久也被公认为欧洲大陆君主立宪的典范（参见第十卷，原文第191页）。它的独特的政教分离实行得相当不错，它的法兰西文化（在它作为法国的一部分20年之后）仍然掩盖着在大半个国土上作为受过政治教育的各阶层的文化基础的佛兰芒文化。在比荷合并期间（1814—1830年），威廉一世为了抵制法国的影响，力图推行荷兰语

而不是佛兰芒语，但得不到广大人民的响应。因为那时候的佛兰芒人对荷兰语还不能运用自如，甚至还不大懂得。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在位（1801—1825年）和他死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插曲的重要意义，在第十八章中加以论述。他的统治和以前的几位皇帝一样，是以差不多完全东方式的宫廷政变开始，而在神秘中结束，由于皇室内部对继承问题采取不必要的但不无前例的遮掩态度，这种神秘更加深了。然而，在他的统治期间，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了。在国内，斯拉夫派对“亲西方派”的反击，到19世纪20年代才刚刚开始，并且受到官方的怀疑；在国外，仇视俄国尚未成风，至少在1828—1829年的土耳其战争之前只是个别情况。亚历山大青年时期受到他的家庭教师法裔瑞士人、共和主义者拉·阿尔普的思想的熏陶；他有几年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大贵族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言听计从；在位的最后时期，他在外交政策上摇摆于另外几个非俄罗斯人顾问之间：一个是德裔职业外交家涅谢尔罗杰，一个是在意大利受教育、具有希腊人的思想感情、觉得在瑞士比在圣彼得堡更舒适的科孚岛人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另一个是梅特涅，他对亚历山大的影响时断时续，每当亚历山大返回俄国，梅特涅的影响就减弱了。所有这些人都是比较年轻（在1815年都不满50岁），而亚历山大本人，在1825年他的统治结束时，也只有47岁。

尽管有着这一切“西方的”影响，或者，也许是因为这些外国影响是施加在一个在俄罗斯环境中生长的人身上，亚历山大还有他的另一面——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和蒙昧无知；在俄罗斯帝国的内政方面，他的主要私人顾问全都是俄国人，虽然他们远远够不上老政治家的资格。斯佩兰斯基是东正教神甫的儿子，本人也是在神学院受教育的，他倾向于在传统的体制内实行行政改革；但在1812年他失宠以后，乖戾而残暴的阿拉克切也夫上了台，西方观察家们从来也没有摸清他的性格。叶卡捷琳娜二世原为一位德意志公爵之女，她乐于对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使她虽身在异域而能处之泰然。但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处事认真的俄罗斯统治者，很可能在精神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主要受的是西方教育，一方面他周围却是原始生活状态。当1813—1814年间俄罗斯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在西方人眼里留下的形象是野蛮的游牧部落和“靠皮鞭的统治”；但是，不能再把俄国说成是“泥足巨人”（狄德罗语）了；不久，千方百计想要博得沙

皇亲善的巴黎人却为沙皇本人的魅力和他的随从的举止文雅而惊异不已。过了最初几个月，俄国占领军就不再特别不得人心了；许多比较年轻的俄国军官成了最“先进的”沙龙的座上客，其中有些人还把西方思想和憧憬带回国去，在1825年12月之后，这些东西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死后出版的著作《圣彼得堡之夜》（1822年）是一部畅销书（不仅在法国），这部书文笔生动，对贵族社会有细腻的描写，并且预言最终势必发生一场会使俄国变得比以往强大得多的革命。卡拉姆津的七卷本（每卷都很快有了译本）《俄罗斯帝国史》（1819—1826年）最早提供了有关俄国历史的可靠资料。^[6]在亚历山大一世死后而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梅特涅所作的评论是有点道理的：“俄罗斯的传奇结束之日，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开始之时。”^[7]

在共和政体的北美（参见第二十二章），制宪工作是在革命胜利之后，而不是在革命之前或者在革命期间交叉进行的。在战争及其余波期间，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的直接影响不如战前的20年或1830年以后的20年间那么明显。法国人沉浸于他们自己的革命潮流中，不再需要仿效榜样，因为这个榜样发展进程的细节已不像先前它所起的普遍鼓舞作用那么与己有关。美国人同样有着自己专心关注的事情，他们对法国的好感也因希望的幻灭而减弱了。旷日持久的海战阻碍了他们与欧洲的接触，他们对这场对抗的感情随着哪一方最破坏或干扰他们的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而时时发生变化。总的说来，欧洲已经做的事情或者计划做的事情都加强了中央联邦政府的力量，因为许多重大决定都得由它作出——购买路易斯安那，保护美国商人，决定对英国的战争与和平（1812—1814年），以及后来对欧洲干预中南美甚至向中南美殖民的谣传作出反应。

相比之下，中南美的历史倒是与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参见第二十三章）。“说西班牙抛弃了西印度群岛和说西印度群岛抛弃了西班牙，几乎是一样正确。”^[8]的确，每个大行省的总督与马德里的联系要比他与不易到达的邻近行省的联系更多一些，这个事实意味着：第一，费迪南德七世的逊位（1808年）使各行省不知所措，并且陷于孤立；第二，由这些行省形成的独立国家，不具备结成玻利瓦尔和其他一些领袖所梦寐以求的联邦的坚实基础。各行省的独立运动的意义是不明确的——最初有一部分是以国王的名义反对马德

里的法国篡位者，但是不久（有些人认为从最初起）就宣布目标是永远摆脱任何欧洲政治君主的统治。不过，并未与母国的文明脱离。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关于在那些通过调停仍无法使之与西班牙和解的行省保持世袭君主制度的主张已经毫无前途可言，尽管有巴西由葡萄牙王储统治的例子，但此人宁愿对付新世界的各种困难，而不愿为旧世界的事务烦恼。那些新共和国的宪法虽然显示出法美两国的影响，但是完全拒绝采取法国的高卢主义和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它们全都规定罗马天主教为政府承认的唯一宗教。

战时和战后列强的频繁改变结盟关系，在第九章、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中作了叙述。性质不同的政权和敌对的意识形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格局呢？在1793年，看来法国各邻邦的政府以及另外一些较远而受到威胁较少的政府，是为了捍卫旧秩序，反对革命法国的思想、榜样和传道式的侵略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在行动上是三心二意的：两年后，普鲁士、荷兰和西班牙媾和了（1795年4—7月）；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在名义上与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结盟，却因她在瓜分波兰而一直不让俄国参战。她的继承人保罗一世似乎为仇恨和激情所支配，而缺乏冷静的政策：一方面，他个人关注马耳他，对英国人在海上对待中立国的做法深感愤慨；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法国，想遏制法国在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势力而靠近英国，两种思想展开了斗争。尽管如此，在1799年，一支俄国陆军派往意大利，一支俄国海军分舰队出现在科孚岛，都成了新的不祥之兆，使英法两国政府几乎同样感到惊慌。

随着拿破仑作为执政以及以后作为皇帝的权力得到巩固，只有像撒丁国王这样的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君主才始终把拿破仑看作背叛革命的篡位者。尽管未来的路易十八也许会对教皇和稍后苏丹承认拿破仑的称号提出抗议，但是法国不再会屈服于别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任何抵制。他们可能害怕法兰西帝国力量过大，正如他们后来害怕俄国的力量那样，但他们的行动方针却受眼前形势变化的支配。对于拿破仑的权势是否能永久保持，他们可能心存怀疑，但在1806年1月巴伐利亚国王却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拿破仑前妻的儿子。四年后，另一个最老的王朝（也是第一个和革命的法国交战的王朝）通过联姻而与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的拿破仑直接联系在一起；奥地利在1814年是不得已才拒绝接受其继承人的。甚至始终怀着仇恨的英国人也欢迎1801

—1802年的亚眠和约，而且虽说不无疑虑，事先也无法确切知道，这个和约只换得一次短暂的休战而已；英国政府也没把波旁王朝的复辟当作重开战端的一个官方目的，在此之前皮特实际上是以此为目标的。对于亚历山大一世来说，在提耳西特与拿破仑结盟（1807年），并不比两年前联合反对拿破仑需要更多的借口；虽然他们之间的谈判的长期拖延只表明双方在土耳其和黑海海峡问题上的想法有着多么深刻而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并没有被宣传成是一次“冷战”的构成部分。沙皇在断然拒绝拿破仑向俄国公主求婚以后，由于拿破仑出其不意地娶了一位奥地利公主，以及不久以后法国吞并奥尔登堡而废黜了亚历山大的姻兄，都大为恼火，但是几乎直到即将入侵俄国的迹象变得十分明显时为止，在外表上还保持着友好和联盟。

在俄国的战役，以及后来向西横穿德意志，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战役（再加上威灵顿的胜利在西班牙显然深受欢迎）使沙皇相信必须依靠群众支持的心情又一度复活了。在1804年，他曾经谈到“认为法国的事业是各民族的自由和繁荣的事业的普遍舆论”^[9]。十年后他又指出，拿破仑不是被各国内阁而是被各国人民推翻的，必须为欧洲的一种既合乎宪政又是尚武的和民族的新精神找到一个出路。^[10]普鲁士政府在幸免向法国屈膝后，依然不大相信顺应民心有什么用处，而且实际上，拿破仑并不是被爱国的义勇军，而是被职业军队打败的。但是，普鲁士的军官们并不全都希望恢复官僚君主制度，例如格奈泽诺，希望德国建立自由主义政权的心情正如他向法国坚决复仇的心情一样强烈。沙皇的心情，加上他对波旁王朝和普鲁士都一样不信任，使得他在1814年坚决主张法国要有一个宪章。

导致1814—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解决方案的那一段外交历史，在第二十四章中作了概述，此后几年的外交历史则见第二十五章。大家公认，在从事和谈的人们的心目中，与保证列强间公正稳定的平衡这一愿望相比，“合法性”只起很小的作用。关于以遏制法国为目标的四国同盟，与沙皇主张在普遍保证和解和现存政权的前提下列强结成基础更为广泛的同盟，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历史学家们依然意见不一。有人说，沙皇亚历山大为了确立在俄国庇护下的全球均势，指望依靠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海上强国，在欧洲以外则依靠美国，以抵消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奥地利在中欧的优势；而且他一再提

出扩大同盟的建议未能成功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这几年中的真正胜利。美国在沙皇心目中的重要性也许被夸大了，^[11]但是他在1815年9月关于“神圣同盟”的设想肯定不是主张建立一支各国君主反对本国人民的警察力量。荷兰和符腾堡是最早参加这一同盟的小国中的两个，瑞士和汉萨同盟的城市在1817年夏天也参加了，美国直到1819年6月才拒绝关于参加同盟的邀请。神圣同盟的意图也不是计划建立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因为沙皇近来并不反对达成一项保证，包括保证土耳其的疆界，只要俄土两国关于布加勒斯特条约（1812年）的争端首先得到解决的话。

沙皇提出的更为广泛的方案，最初由于本身含义模糊而减色，随后被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扼杀，最终由于他自己的心情变化而被埋葬。1820年秋，他怀着失望的心情从华沙来到特罗保，最后的议定书尚未签署，就传来他自己的谢苗诺夫团发生兵变的消息。他的1815年的神圣同盟没有恢复力量，但是他这时准备把范围缩小的同盟用于反革命目的，而法国袖手旁观，英国则提出抗议。几个月后，希腊传来的消息使他重又陷入一个新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可以不承认这次起义，但是他对起义的后果却不能漠不关心。他可能设法弥合对土耳其的关系的裂痕和抛弃如今令人难堪的仆从卡波迪斯特里亚斯（1822年7月）；但是，这个保守的同盟经受不了这场东方的纠纷，也经受不了坎宁利用东方的纠纷和西属美洲问题来破坏任何色彩的大同盟概念的信誉的做法。在沙皇本人去世（1825年12月）之前，同盟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不到两年，由于俄国、英国和波旁王朝的法国联合一起，不依靠它去解决希腊问题（1827年7月伦敦条约），以及九个月后，俄国连三国联合也不理睬就对土耳其进行战争，从而公开地抛弃了该同盟。

在1815年以前和以后，尽管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由它们的野心、恐惧和利益而不是由任何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但是所有统治者（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也不例外）对待本国人民的态度肯定都受到对“雅各宾主义”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18世纪90年代，这种恐惧并非毫无道理，无论在伦敦或维也纳，都同样地反映出来。对混乱和暴力的恐惧可能被大大地夸张了，但确实拿破仑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要比法兰西共和国（包括恐怖时期）及其所有短命的姐妹共和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得多。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国内斗争结果会比对外战争造

成更大的影响，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可以作为例证。然而，18世纪90年代的事件所造成的法国人的“大分裂”却是不易愈合的；在政治上，断头台切下的头颅比躺在国外沙场的尸体更加使人难忘。从1800年到1815年，战争和战争的需要到处都阻碍着国内改革，或者使得国内改革带上狂热的色彩；1815年以后，由于害怕激进的变革导致内战，并从内战转成对外战争，必然促使政治成为死水一潭。保守主义不仅来自政府一边，因为在欧洲（甚至在美洲的容易变动的社会里），激进分子为数很少，尽管相应来说他们的呼声更强烈。而秘密公社和共济会组织并不是“人民的神圣同盟”反对君主神圣同盟的可靠支柱。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激进分子都赞赏法国的榜样。第四章描述了思想界和文学界对法国榜样的某些反应。在这里可以补充几个事实：在思想上得益于法国革命不浅的马志尼，经常指责法国人重权利而轻义务；虽然性情古怪但是头脑灵敏的夏尔·傅立叶谴责法国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因为它仍然使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把持在少数人和男性的手里；[\[12\]](#)杰里米·边沁和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虽然像法国人一样不尊重传统，但对天赋人权的“无政府主义谬误”也同样不尊重。他们主张进行斗争毫不留情地砍除枯木朽株，这往往使他们成了欧洲民主政治家的盟友；但是，他们同圣西门及其信徒们一样，也不得不仰仗技术管理专家，甚至开明的独裁者用“改良”方式传播幸福。边沁本人在晚年曾写信恭维埃及的独裁者穆罕默德·阿里，功利主义者对英国在印度的行政官员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参见第二十章）。[\[13\]](#)

在1815年以后，激进主义与18世纪（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法国革命）之间最有力的联系大概是反教权的情绪，这种情绪已经变成怀疑一切授予圣职的宗教，特别是罗马教会的情绪，而对约瑟夫二世来说并非如此。许多国家的上层教士的特权地位促进了这种情绪的增长，从哲学上的怀疑，或者司汤达文雅的嘲讽，到保罗-路易·库里埃粗野的谩骂，在各种层次上都有所表现。到这时候，狄德罗的隐晦手法（部分地由书报检查制度造成）和伏尔泰或吉本的温和怀疑态度，都被正面的攻击所代替；但是，在这一时期更普遍的仍然是以前那样求助于“合乎常情的”唯理论或自然神论，认为基督教对于有教养的人是不相干的和荒谬可笑的；而不是在接受天启教的传统解释方面遇到令人讨厌的新困难（这起因于对《圣经》的批判或自然科学）的严肃

的不可知论者的那种痛苦的探索（参见第六章）。在二者之间，一个厌恶享乐主义或物质主义而觉得基督教传统有很大社会价值的关心社会生活的品格高尚的人，实际上很可能采取“基督教自然神论”的立场，这和稍后的本杰明·乔伊特的立场不无相似之处。受过日内瓦学派熏陶的基佐毕生都力求在胡格诺派教会内部寻求一种可以回避这些最棘手的难题的折中主义的信仰，他在谈到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从来没有失敬之处。托克维尔念念不忘自己的天主教会教育，当他在1820年前后不再是一个专职而虔诚的天主教徒后，他并没有产生获得解放的感觉。他在临终时接受圣礼，这大概只是表示反对猛烈批评罗马的人，而不是表示自己完全回到天主教方面来。[\[14\]](#)

总之，男人中的绝大多数（且不说人类的另一半，她们的意向被男性思想家们严重忽视）并不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私人生活不相干或荒谬可笑，即使他们除了在出生、结婚和死亡时举行宗教仪式而外，往往由于习以为常而对宗教轻视起来。不论有文化的或没文化的，吃饱饭的或挨饿的，他们都可能像他们长辈一样，感到宗教戒律不适合他们的欲望；但对一个教导人们说不论文盲和无知者或者有学问的人在精神上同样都具有内省和洞察力的宗教，他们大概不会认为在理智上是无法接受的。就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模式除受村庄或小镇上的邻居的影响外，还受季节的支配；如果他们有一点空暇，他们也无心去阅读报纸、参加或者观看有组织的体育和文娱活动。因此，大概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在反教权激进主义得到群众反应的地方，那种反应并非经过思考后对基督教教旨本身的排斥，而是对教会和教士未能遵循教旨的一种抗议——有很多人在偶尔议论教士的时候，总是期待教士的行为能够达到一种他们从来不会想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标准。在1848年2—3月，教士们一度深得人心，即使巴黎也是如此，这表明，共和主义者的情绪，或者至少是人民大众的情绪，并不一定是反教权的。

无论如何，19世纪20年代最轰轰烈烈的运动——希腊人的起义和南美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它们的目标并不像它们的方法那么激进。反对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单纯正教情绪，以及非常单纯的政治自由观念，是希腊参加战斗的人们普遍的动力；他们本地的领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感情。在南美洲，某些领导人在宗教的和政治的目标上也许比较脱离本国的人民，但是，几个新共和国无论多么不稳，看来在事态发展过程中远没有开始时那么富有革命性。梅特涅肯定理

解这一点。他似乎更关心南美的方法和榜样，而不是关心其结果；此外，他早在1825年就提出宁愿要一个小的独立的希腊，而不要一个虽在名义上从属土耳其而实际上仰俄国鼻息的大希腊，他说的似乎也是真心话。如果说在1848年以前的梅特涅的奥地利，以及在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几年和尼古拉一世整个在位时期（1825—1855年）的俄国，依然以政治稳定为口号的话，这不仅应归因于统治者的个性，而更多地应归因于这两个帝国的特殊问题，1848年奥地利的动乱和1856年俄国的动乱使全世界都看出了这些问题，但几乎没有加以解决。

然而，从1828年左右起，在法国和比利时，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使得像基佐或路易·德·波特那样具有保守倾向的人都滑向（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革命的边缘；在英国，对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以及罗马天主教徒采取宽容态度（在此以前在政治上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而且要求议会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在德意志，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对未来具有深远影响；在美国，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所有这一切，加上已经偃旗息鼓的1830年的种种大变革，似乎在宣布一个新的世代已经到来，这个世代比较乐于面对讨厌的变革，在要求或预言变革时也较少乌托邦式的空想。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逐渐演变为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两卷本，1835年、1840年）不但有多种文字译本，而且大量畅销，另一方面，本廷克决定在印度推行西方式教育（1835年），这两件事都具有某些新奇的意义。这两个人既是贵族出身，又有贵族的倾向，但是一个人公然在思想上作大胆的尝试，另一个人则在政策上采取大胆的行动，这在20年前都是难以设想的。格列高利十六世让位给庇护九世，一度给自由派天主教徒带来希望。普鲁东（第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革命著作家）和卡尔·马克思比他们的先驱前进了许多，但是两人都声称对事实比对权利的道义基础更感兴趣，都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在人间建设天堂城市将让位给进行社会工程。

“如果国家的权力增大，舆论的威力也随之增大。”（参见第七章，原文第180页）1789年宣布的新闻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不仅由于形形色色的政府压制或者操纵新闻和舆论，而且由于发行量小，缺乏财政上的独立，从而容易被用金钱收买。尽管如此，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宪法中还是重新确认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报纸在种种限制之下，还是在法国整个复辟时期公众就各种原

则进行的争论中，以及在对英国政治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关于议会改革的辩论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学和思想方面影响深刻的潮流在报纸上反映的当然不如评论杂志上反映得多，在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有很多这类刊物；尽管它们往往是一些小集团的昙花一现的机关刊物，但却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战斗，哲学上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战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上的传统主义与批判主义之间战斗的论坛。

但是，这些争论的成败关键要在一般学校和大学中才看得出来；不管是一般学校还是大学，中心问题是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目的。卢梭的信徒们认为发挥个人的力量是最主要的，裴斯泰洛齐和罗伯特·欧文则认为在民众教育中首先要促进社会效用和社会目的。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威廉·洪堡在德意志大大推动了古典人文主义的传播；德意志的语言学家在大学预科学校中，历史学家以及法学家在大学中，也都是如此。但是，国家在组织世俗教学方面所起的作用，使它在1815年以后的普鲁士取得领导地位（至少对于小学），而在法国，复辟时期继续保持拿破仑实行的严密组织的传统，只是重点不同而已。拿破仑的教育总署并不敌视天主教，只要天主教信守政教协定和忠于帝国政权就行。在路易十八时代初期，教育总长丰塔内依然留任，保王派贵族们未能除掉拿破仑所创造的政教协定或教育总署这对孪生的怪物。不久以后，教士们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据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很难深深地渗入教育总署，不管夺取职位也好，或者改变它的方向也好。拉梅内和改革运动家们继续把教育总署看作“漠视宗教”的堡垒。

在英国，宗教对所有各级学校教育的影响，要比法国大，或许比德意志也大些。比安德鲁·贝尔领导的全国贫民教育协会和约瑟夫·兰开斯特创办的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为代表的初期的国教与反国教的宗派斗争并没有影响这种情况，甚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兰开斯特还曾提倡他那独特而又节省开支的学生“互教互学制度”。双方都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虽然历届政府都认为教育和宗教当然要有密切的联系。在捐资兴办的文法学校里，包括许多地方上的和少数为上层阶级开办的学校，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数学往往教得很少；但在一些不是捐资兴办的私立学校里，包括一些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反国教的学院，则教授各种语言，甚至教授一点科学。牛津和

剑桥以校规松弛而著称。在这两个封闭社会中，至少有才能的年轻的英国国教徒可以相互教育，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促使一些高年级同学中思想上的推动力；但是，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几乎是不能再降低了。直到19世纪中叶，改革之风始终很轻柔。高等教育缺乏任何真正的制度，因而学术和文化的培育主要依靠那些利用和增加自己私人藏书的英国绅士们的阅读习惯，依靠他们对有非凡天才的人——这些人在地方上崭露头角后跻身于伦敦的文学界或法律界，或者通过大学而进入国教——的资助。收获有时不如人意，但也可能异常丰硕。

在政治和战争的风云变幻的背后，而且与这种变幻或者与已经扩散的新经济力量并无明显的关系，有些个人或者极少数人组成的小集团正在从事各种发现或者正在影响人们的思想，旨在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或人生观发生更大的变化。科学发现必须由个人，而且有时很孤独地进行；伟大的人物过去都是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工作，只是由于他们对观测、解释和整理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发现的东西具有共同的爱好，或者由于都在细心研究有助于他们的工作的精确工具，彼此才发生联系。这种个人的智力活动虽然并不新颖，但是现在新的发现却日益增多。在这些人物中，有些人作为教师和写系统的论文来传播知识。由于组织和传播知识，就产生了科学家的专门职业和接受新科学思想的更普遍的愿望。在巴黎以及直接受到法兰西“文化帝国主义”影响的中心，国家给科学家以荣誉和资助，特别是对那些能够为它服务的科学家们。法兰西研究院和综合工科学学校促进了其他地方的科学的发展，首先是对普鲁士学院、由洪堡弟兄新创办的柏林大学（1810年）以及德意志的其他学术中心有所推动，后来这些地方的声望都超过了法国的样板。

这种组织过程，以及天才科学家们的事业前景，在第五章中结合对拉普拉斯在数学分析方面，拉格朗日和约瑟夫·傅立叶在力学和热的抽象分析方面，伏打和安培等人在电学方面，多尔顿和贝采利乌斯等人在物理化学方面，拉马克和居维叶（从不同角度）在系统生物学方面，比沙和马让迪在实验生物学方面，赫顿和史密斯在地质学方面的成就的扼要介绍，都作了论述。不久以后，地质学和生物学就给关于地球上何时开始有生命和关于各不同物种的起源（科学家之间关于这一问题还继续有所争论）的传统信念以冲击。

“理论科学对工业依然很少贡献”，但是在理性的和经验的“机会强压下……工程人员和实业家的行为与科学家的行为产生了共鸣”

（参见第五章，原文第141页）。例如，蒸汽机和初期的化学工业得力于经验甚于理论，但是，萨迪·卡诺对热的见解或者法拉第的实验（两者分别产生了热力学和发电机）则表明发明和理论之间存在着联系。米制是法国革命的一项遗产，最初确定于1799年，但是此后40年未被广泛采用。采取统一规格的通用机器部件，保护发明家和专利，出版技术词典和技术杂志——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一时代开始或发展起来的。在技术方面，英国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领域，本卷所论述的时期在英国以技工学校的普遍建立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立（1831年）而告终。

“1793年，十字架和三色旗在欧洲千百万人中已成为对立的象征。”（参见第六章，原文第146页）第六章考察了1793年以后40年中各国政府与各有组织的教会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并指出教会内部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起源于天主教徒对王位与祭坛的统一产生怀疑，也起源于特别是一些新教徒对传统的护教论提出更加深刻的挑战。施莱艾尔马声称，宗教“并不是一套教条式的主张或道德准则，而是一种内心的、直接的和直觉的，凭其本身的价值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存在”（参见第六章，原文第169页）；基督教教义体现基督教徒的经验；它受历史的制约，它的表现形式也会由于这种体验的性质在时间的推移中发生变化而变化。因此，神学也必须准备去迎接新知识和新经验的挑战。

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在各种艺术中（参见第八章）不如在文学、教育和教会活动中反映得那么直接。古与今之间、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尊崇有教养的人们的共同意识所能接受的形式与尊崇生动表达的个人感情之间交织在一起的战斗，并不是由穿着明显不同的制服的军队，而是由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采取不同姿势的聚合在一起的个人或集团进行的。一幅描绘帝国的战争场面的“古典主义”绘画，在效果上可能与一幅优雅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同样感人。如果给这一时期的伟大音乐作品贴上简单的标签，那就更加轻率了。但是，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在发生与科学不无相似的变化，即在采取一种更加职业化的形式，除私人的室内乐而外，还出现

了公开演奏会；作曲家也和著作家一样，与出版商和公众发生了利害关系。

科学和技术，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通过报刊引导舆论、神学和宗教生活，以及音乐和视觉艺术等的发展方向，不是在所有点上都相同的。理论科学无论在方法或目的上，都不是与技术十分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都专注于探讨可以衡量和可以利用的知识，从而都会产生新的力量：智能方面的力量会带来它自己特有的一种满足；经验方面的力量会带来无法满足的和显然无法控制的社会效果。科学和技术都没有使个人的生活和人类的社会事务变得井然有序的力量。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提供就业机会为目标的“开明”教育思想，（使有才能的人有发展前途）与卢梭的解放人类和公民的丰富感情为目的的教育观同时发展，形成自相矛盾的局面。出于理性的自然神论和对公民爱国主义的革命崇拜，以及近乎宗教式的神灵膜拜，都会像过去的宗教体系所做的那样成为强权政治手中的玩物。理性和直觉只要能各走各的路，就不一定发生冲突。理性和直觉真的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两种活动吗？——他为什么不可能既对运用知识或改进实用手段感兴趣，又对珍惜自己的形象或重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感兴趣，或者对寻求人类生存的美妙和痛苦的根源也感兴趣呢？然而，每当一方想取得独占地位的时候，两者就兵戎相见了。就像帝国和教廷一样，它们很难纳入教皇基拉西乌斯的自主共存的理论。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将会滑到唯理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背心中去，还误以为黄袍加身；而直觉精神则会陷入主观浪漫主义的从表面上看不出的泥淖，还误以为是跳进一个碧波万顷的海洋。贝多芬的音乐也许最接近于能在这时代把两者协调起来。

（周国珍 译）

[1] F. P. A. 德·维尔纳夫-巴热蒙：《基督教政治经济学，即对贫困原因的性质的探讨……》3卷本（巴黎，1834年）。根据1829年所写的一篇报告。

[2] J. 施密德林：《近代教皇史》（1800—1846），再版（柏林，1933年）第1卷，第207页，注5。

[3] S. B. 奥肯：《俄美公司》，英译本（哈佛，1951年版）。

[4] J. 巴泰勒米：《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代法国议会制政府引论》（巴黎，1904年），前言。

[5] 孔萨尔维致阿图瓦的信，1814年8月。P. 里涅里：《维也纳会议》，第271—272页，J. 勒弗隆转引自弗利希、马丹合编的《教会史》第20卷（巴黎，1949年），第309页。

[6] R. T. 麦克纳利：《1814—1843年间法国新闻评论中的俄国形象》，载《东欧历史研究》第6卷（柏林，1958年），第82—169页。

[7] 梅特涅致奥滕费尔斯的信，1825年12月18日，见《回忆录》（英译本，1889年）第4卷，第261页。

[8] 《剑桥近代史》第10卷（1907年），第277页。

[9] 1804年9月11日。转引自M. 布尔坎《神圣同盟史》（日内瓦，1954年），第19页。

[10] K. 瓦利谢夫斯基：《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第2卷（巴黎，1924年），第378页。

[11] M. 布尔坎《神圣同盟史》（日内瓦，1954年），第183页，注1，布尔坎就这个问题对J. H. 皮雷纳的《神圣同盟史》（两卷本，1946年纳沙特尔版，1954年日内瓦版）一书提出疑问，但他对该书的绝大部分是推崇的。另外参看《克莱欧》杂志第9卷，第1期，第4册，J. 德罗兹对皮雷纳的论文的一个注（巴黎，1953年），第583页。

[12] R. C. 鲍尔斯：《夏尔·傅立叶对法国革命的反应》，载《法国历史研究》第1卷，第348—356页（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1960年）。

[13] 参看T. 斯托克斯《英国功利主义者与印度》（牛津，1959年）。

[14] D. S. 戈尔茨坦：《托克维尔的宗教信仰》，载《法国历史研究》第1卷，第379—415页（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1960年）。

第二章 1780—1830年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

在1834年，夏多勃里昂觉得：“欧洲正在朝着民主主义飞奔……法国和英国好像两个巨大的攻城槌，一再捶打旧社会行将坍塌的城壁。”主要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的确已经开始侵袭欧洲。到1830年，英国通过直接影响或者模范作用，已在向欧洲和海外传播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的新生产方法、新经济政策和新社会思想。英国主要依靠扩大国际贸易和依靠输出人员和资本，确实成为带动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增长的引擎”，其长远的结果是：国际的专业化和互相依赖有所增加，并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关系网。但是到1830年，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以外，各国的面貌并没有剧烈的变化。尽管英国和比利时的煤田变成发展的重心，尽管各国普遍把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但是在欧洲的广大地区里，特别是在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谋生方法依然和几百年以来的情况大致相同。1826年，比利时的一位议员在看到本国工业不断增长时说：“所有的国家都把它们的目光转到工业这个可靠的和无尽的财富源泉上，也转到能够使工业大大扩展的对外贸易上。”然而，在1830年，欧洲经济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即使在英国，1760年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50%，而到1800年依然占35%，1830年仍占25%。其他任何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都不如英国低：在1830年，意大利和法国的总人口中有60%是农村人口，普鲁士为70%以上，西班牙是90%，俄国和整个东欧为95%。

尽管如此，城镇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缓慢上升。到1830年，欧洲大约有25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中英格兰有4个，苏格兰有1个），而伦敦在1800年人口将近百万，这时已有150万了；巴黎人口在75万以上；君士坦丁堡可能有50万；圣彼得堡和那不勒斯超过30万；维也纳、莫斯科、柏林、阿姆斯特丹和都柏林超过20万；汉堡、华沙、米兰、罗马、马德里、巴勒莫、威尼斯、里昂、布达佩斯、马赛和巴塞罗那分别超过10万。然而，在1830年，欧洲城镇和人口的分布情况与15世纪中叶的情况没有多少差别。

城镇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农村间，它们主要成为周围地区的工业、商业和行政中心。只有在三个地区（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和英国），人口有明显的集中现象，而在这一时期，只有在英国，人口的分布有显著的变化（向中部和北部转移），城市人口也有显著的增加。在欧洲，城市的分布和人口的分布依然主要取决于农业；在英国，人口的集中已经和煤炭紧密联系起来。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大都市，在英国，则各地普遍增加。欧洲仍然保持着1750年普遍存在的倾向，即广大地区的人口密度趋向一致，大多数国家每平方英里在60—90人之间（比利时和意大利稍高，西班牙稍低）；英国人口的分布除伦敦外，集中在伯明翰—利物浦—赫尔三角地区，在这一时期，农业郡的人口并未减少，但是流入上述工业发展地区的人口则显著地日益增多。

不过，国家继续依赖农业，以及城市的缓慢增长，并不是衡量1830年以前经济变化的尺度。19世纪经济方面的突出现象大概是欧洲人口的增加。欧洲人口在1650年约为1亿，到1750年增至1.4亿，到1800年达到1.87亿，到1850年达到2.74亿。在1750年以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0.3%；到1900年则为1.2%。虽然欧洲人口普遍增长，但是各国的增长程度有所不同：在1750—1850年间，英国增长得最快——每年平均增长1%；而像普鲁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增长率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在1800—1850年间，英国的增长率达到每年1.5%，而在1780—1830年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足以使其人口到1900年增加一倍。[\[1\]](#)

关于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出生率增长或死亡率降低（也许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没有确切的根据；关于决定这一社会指数的基本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也同样无从确定。作为欧洲的一种现象，而且是18世纪初便开始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能像英国历史学家们往往解释的那样，用工业化进行说明。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由于死亡率的降低，那也肯定不是由于药品和医院的改善，因为在1875年以前，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如果说人口的增加是由于出生率不断增长，那也不是由于结婚年龄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现代的婚姻模式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然而，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会同意这样一点：在18世纪，死亡率显著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原因。在有统计数字可查的地区，人的平均寿命确实有所增加：瑞典在1755—1840年间从33岁增加到40岁；美国在1789—1850年间从35岁增加到41岁。

1832年法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8岁，1841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为40岁。特别是有更多的儿童活了下来，婴儿死亡率从原先触目惊心的水平逐步降低。人口经过几个世纪的稳步或缓慢的增长之后，到18世纪提高了增长的极限。随着瘟疫和饥荒威力的消失，死亡循环的幅度也缩小了，结果，人口不再出现周期性的大批死亡。

瘟疫的逐渐减少也许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黑鼠莫名其妙地从欧洲消失了吗？但是，饥荒的影响的不断减弱则是农业改进的结果。亚当·斯密曾经论证说：“农村的开垦与改进……必须优先于城市的增加。”食物供应和人口的长期平衡（后来马尔萨斯作了极度悲观的分析），意味着农业的进步对工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因为粮食生产扩大，耕种面积和生产率都有增加，人口才能大量地增长，工业才能指望有劳动后备军。在18世纪，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700年以前，人口的多寡取决于传统农业生产食物的可能性，城镇和工业都集中在食物丰富的地区；1700年以后，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加上交通的改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的增长，使欧洲有可能养活它的迅速增长的人口。在这以前，食物供应一直没有伸缩的余地，以致每一次歉收都意味着饥荒，意味着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抑制，可是这时，食物供应越来越有弹性了。在以前，只有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先进农业才有利可图，而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对食物和原料日益增多的需要在刺激着生产的不断增长。

在这种变化中，市场的力量是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特别是谷物价格从1750年开始上涨，到1790年以后已经达到战时的高水平，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1815年。促进生产增长的技术变化是：圈地，减少休闲地，实行更好的轮作和种植饲料作物；开垦荒地和增加耕种面积；为提高生产率改进技术和改变组织（以农场为单位，改变所有权和使用权）。意大利、荷兰和法国从17世纪开始一直继续到18世纪的垦荒工作，使西欧和南欧都增加了可耕的土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向乌克兰大草原、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移民，使俄国的东方部分增加了大量的农业地区；在英国，圈地和强占牧场使先进农业的可耕面积增多了。

但是，不仅耕种的土地增多了，而且在更多的地方耕种的效率提高了。在欧洲农业的历史中，任何时期的革新都没有这一时期多。[\[2\]](#)

最重要的发明是布拉班特犁和英国与之相应的罗瑟拉姆犁——亦即现代犁的原型。这种犁可以深翻，适合大庄园的精耕细作。它出现在18世纪初期，到1800年已经广泛使用。由于深耕，多施肥料（由更多的家畜供应），以及分畦耕作（由于条播机而更加方便），庄稼长得更好了；收割的进步（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镰刀、脱粒机和扬谷机），使产量也增加了。同样重要的是相互关联的作物和牲畜的改善：在更好的轮作制中增加了饲料和块根作物（如苜蓿、紫花苜蓿、芜菁和土豆），有了更多的人工牧场（*prairies artificielles*）和更好的田间管理。所有这一切都使生产率的增长达到足以在冬季饲养更多牲畜的程度。同时选择良种牲畜和改进动物饲养则使牲畜的体重增加，羊毛和牛奶的产量增长。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所屠宰的牛羊的体重的增长，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德意志和尼德兰的牛奶产量的增长也是同样惊人的：在1750年，每头奶牛在产乳期的出奶量不到150加仑，而在1800年已经增至220加仑甚至400加仑，黄油搅拌和乳酪压制也有相应的改善。^[3] 饲料作物与食物作物轮作的良好方法在佛兰德等先进农业地区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但是直到1750年以后才更普遍地应用。

概括地说，与“旧农业”联系在一起的是：耕种公地，农民使用土地要接受奴隶般的条件，而所得的粮食仅够维持生活——村庄和公地是农村生活的基础，在1750年，从法国东北部起一直到乌拉尔山脉，几乎全是进行三种田地轮作的公地，另有公共的牧场和树林，并使用原始工具进行耕作。“新农业”的趋向是有利可图的农业，那些小农场或者由小农场合并成中型农场，种植能换现金的作物（粮食或工业原料），农场对土地的使用由市场来决定。在18世纪，剩余农产品主要来自大庄园；而在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地来自小农场了。在1750—1850这100年中，欧洲农业的近代模式——精耕细作的家庭小农场——已经确立了。“最普遍的自发倾向”是：农户分散开来，农家聚居的村随之解体；例如，在比利时、荷兰、法国的佛兰德、巴黎周围、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都有这种精耕细作的小农场。在西班牙，据说“凡是小农场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就像是花园；凡是庄园很大的地方，土地就像是荒漠”。英国是个例外，在那里，大庄园耕种得最好，人们认为农民的小农场大多像爱尔兰的小农场一样糟糕。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普鲁士、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南部，大庄园所以继续

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地理条件使得精耕细作困难或者不经济，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和政治条件加强了封建地主的所有权。

一般说来，整个西欧都有这样的动向：加强耕种者对土地的权利，废除各种封建的义务，使对土地的“从属”权变成“完全”的所有权。到1850年，除了俄国和罗马尼亚而外，农奴制已经从欧洲消失了。在农奴制的消失过程中，法国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废除封建的权利，而不给予任何补偿。然而，这种新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把18世纪的王族已经取得的部分成就向前推进一步，那些王族试图削弱土地贵族的权力而加强王权。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在英国消失了，在法国也消失了大部分。在1790—1815年间，法国占有或影响所及的地区，如荷兰、普鲁士、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通过了反封建的法令，不过改革的程度和对封建主的补偿，各地区并不一样。另外，在1815年以后，例如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封建权利又有一些恢复，以致南欧和东欧在整个19世纪期间都继续存在着半封建的土地租赁制度。

的确很难作出任何种类的概括。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或由农民使用；也不是所有的农场都是合并了的；更不是所有的农场都提高效率甚至有了改进。英国和法国北部的大庄园效率很高，正如德意志西南部的大部分公有地的农业一样；西班牙和法国西南部的合并起来的农场一般效率很低。随着封建占有的松缓和耕作的商业化，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扩大了，但是在1830年，分成制农（*métayers*）或租地农（一般是短期使用）所掌握的土地比土地所有者掌握的土地要多。在比利时，租地农占优势，在瑞士小土地所有者占优势，而在伦巴第，分成制农占优势。土地收益分成制^[4]可能是最普遍的而又最糟糕的租佃方法。关于伦巴第的情况，J. C. 劳登曾经这样写道：“分成制农从来没有发家致富，但彻底破产者也极少；他们不是常常改变的。”尽管村社共耕制已经崩溃，大庄园的解体还在继续。例如，普鲁士关于促进合并的立法就比法国的立法更有效力，在法国，解体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北部的大农场里，在1780—1830年这一时期里，已经完全没有解体情况的国家只有联合王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其他地方，农场往往是由一小片或数小片土地组成，迟至1900年，欧洲1/3以上的农场还是分散的。尽管西北欧（例如斯堪的纳维亚）趋向于通常由合并而形成的中型农场，东欧和南欧（例如西西里）趋向于通过兼并形成非常大的地产和非常小的农场并存的局面，但是，即使在同

一地区，农场的大小也千差万别。在同一国度内，这种差别也往往十分显著，例如法国北部和南部就相差很远。产品也有地区的差别，因为它反映出耕作单位的组织形式和土地肥力。到1830年，欧洲南部倾向于园艺专业化，而北部则专门饲养牲畜，东部则专门种植谷物。一般说来，从西北向东南，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差。精耕细作程度可以用资金和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以及牲畜的集中情况来衡量，只有精耕细作生产饲料的情况下，牲畜的集中才有可能。在所有地区，日益发展的城镇的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正如J. 凯尔德后来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城镇的数目和城镇的人口的大量增加，蔬菜和鲜肉的生产，饲料的生产，以及生产牛奶的牧场必然都要扩大。”谷物需要较少的资本、较少的劳动、较少的管理和较多的土地，所以越来越多地在欧洲的边缘地区种植，然后运往内地和西部。

正如土地占有方式、农场大小、精耕程度和产品种类各有不同，生产效率差别也很大。尽管普遍有所进步，生产力也显著增长，但是到1830年，已经完全在进行着会使欧洲的农场变得过小，并且一般来说会使农民与贫困画等号的过程。依然经常发生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存的缺粮现象，尽管交通的改善减轻了由于缺粮而产生的致命后果。在南欧和东欧，依然有悲惨的贫困现象，因为农业工人是在大庄园（latifundia）中、农民是在极小的农场中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是引起均权立法措施的一种因素和未来革命的源泉。

国际贸易对农产品与日俱增的需求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刺激。例如英国在1700年的进口货物中，“食品杂货”和原料只占30%，在1800年则占60%，而在1814—1845年这一期间，食品在总进口额中平均占28%，原料平均占67%。这一时期，甜菜和土豆产量的迅速增长充分说明日益发展的国内市场对于农产品的重要意义；而羊毛生产的增长和改良（特别是由于普遍饲养美利奴羊），也是日益发展的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明证。1801年在西里西亚建成了第一家甜菜制糖厂；到1836年，欧洲的甜菜糖总生产量达75万吨。土豆在18世纪最后25年间才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广泛种植，而到1800年以后，土豆的产量在法国和德意志迅速增长，到19世纪中叶，土豆已成为西欧人主要食品的一部分。英国是毛织品最大的生产国，所以羊毛产量的增长可以根据英国的进口来测定：从1776年至1799年，英国每年平均进口羊毛250万磅，从1830年至1834年每年平均进口3520万磅，迄1820年为止，

主要供应者为西班牙，其后则为德意志。美利奴羊在18世纪传入法国和德意志，它也为这两个国家日益发展的国内毛织工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原料。

为了供养欧洲日益增多的人口，交通的改进也像食品生产的增长一样必不可少。城镇的扩大和工厂的增多不但要求运输食品，而且要求运输原料和制成品；货物的交流和货物输送的距离都有所增加。歌德在1825年就注意到：“铁路、快邮、汽轮以及一切可能的交通手段，都是文明世界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些交通手段必须价格较廉，特别是在运送矿石之类分量重而价值低的货物的时候，以便价格加上运费不至于大到使专业化无利可图的程度。例如，1816年以后尼德兰的农业专业化就意味着向联合王国出口越来越多的黄油，从波罗的海输入越来越多的粮食。1830年以前，工业中的大规模专业化只局限于英国，当时，它还差不多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它也越来越依靠进口的原料，在1830年小麦进口为220万夸脱，棉花进口为2.612亿磅，羊毛进口为3230万磅。

在英国内部（欧洲在较小的程度上），煤炭使用的不断增多是改进交通的最有力的推动力。当煤炭消耗量不大的时候，少量的煤炭是用牛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矿井和市场的距离幸运地像纽卡斯尔和伦敦一样的地方，才由河道和海路运输比较大量的煤炭。随着消耗的增加，最初是改进水路，然后又修建专门运煤的航道。英国最早的近代式运河是从圣海伦煤田到默西河的桑基运河（1757年）和从沃斯利矿山到曼彻斯特的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1761年）。开掘运河当然是欧洲的一项古老技术，但是，英国的运河系统是1750—1850年间在一些新的刺激之下，并在前一世纪改进主要河道的基础上修筑的。英国的运河是日益复杂和曲折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英国的运河地图就是英国工业的地图；在1750年，可以通航的水道只有1000英里；到1850年，已有4250英里运河把主要河道和工业城镇与海港和伦敦联系起来。

欧洲的水路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除法国和低地国家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运河系统，在上述这些地区以外，在19世纪前半叶，更多的是改进河道而不是开掘运河。在法国，到1830年，巴黎向南与卢瓦尔河联结起来，向北与比利时日益发展的工业和煤矿联结起来。比利时有一个苦心经营的运输网，一部

分是古已有之，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大大地扩充，它把蒙斯煤矿和沙勒罗瓦煤矿向南与巴黎联结起来，向北与布鲁塞尔、根特和安特卫普联结起来。然而荷兰虽然有许多运河，但一直到1830年以后才与比利时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迄至1830年为止，荷兰未能得到比利时的煤炭作为发展工业的主要原料。欧洲其他地方，在1830年以前只是星星点点地开掘运河，没有一处像英国那样使运河形成全国运输系统的一部分。

公路的改进比修筑运河更为普遍，但在经济上则意义较小，改进公路的动机也各有不同。公路的改进好像1789年以前的反封建法令一样，几乎完全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绝对君主制度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物。例如在法国，由于中央政权感到需要良好的公路，由于成立修筑和保养公路的行政机构和技术机构，由于车辆的改进和运输量的增加，到1780年就修成了25000英里有等级的公路。法国的公路系统是欧洲的模范，由于拿破仑的军事野心，它不但得到养护，而且远远伸出法国的边界，通向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在苏格兰正像在法国一样，对公路的需要部分是由于军事原因；但是在英格兰，经济的动机比较多，而且是比较零碎地解决的。1750年以后管理公路的任务逐渐从地方当局移交给依法特设的公路通行税托收局，在1829年，这种托收局有3780个。英国的公路得到改进，蒂尔福德和麦克亚当的筑路技术在英国以外被广泛地使用；但是随着运河的迅速发展，公路在大量运输粮食、原料和制成品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从18世纪到1830年，欧洲公路改进得很少，在铁路发展之前，运输一直是经济扩展的一个障碍。

但是，在1830年以前，运输的改进并非仅仅是有了较好的公路和更多的运河；运输货物技术的重大发展是在1830年以后，以机车和汽船的出现而达到了高峰。在1830年已经有了机车，但是它们的存在只是作为未来的样板，而不是作为现实的例证。同样，虽然1812年在克莱德河上已经有一条汽船，1822年在塞纳河上也有一条汽船，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木制帆船才结束了它的晚年的光荣历史，快速帆船使船舶的发展不是在体积上而是在设计上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在造船方面，用铜板包船底，船架和装备方面愈来愈广泛地使用铁，这都是重大的发展。但是在1830年联合王国登记的汽轮只有39艘，平均净吨位87吨。航运业的变化是在数量方面，不是在种类方面，欧洲的商船队在1780—1830年间迅速扩大了。从大不列颠对外贸易雇用船舶

（英国的和外国的）的数目，可以对商船队的扩大管窥一斑。在1783—1830年间，英国外贸船只总数从5182艘（平均180吨）增至19907艘（平均146吨）。1830年，在全世界各海洋上的船舶远比上列数字多得多，尽管它们的设计和体积150年来很少发生变化。

“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T. S. 艾什顿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谈到英国，“是如何使数目空前增多的一代代孩子们吃饱、穿暖和有工作”。^[5]现在回顾起来，人口的增长是1780—1830年这一时期最惊人的特征，但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英国工业的进步。英国的优越地位在18世纪归功于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与君主专制不同的君主立宪政体，在19世纪初期则几乎完全归功于机械技术。在1740年，“效法英国”（à l’ imitation de l’ Angleterre）一词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到1830年，英国已成为“工业欧洲的老师”，不断有人前去求教，英国也派遣企业家、工程师、工长和操作机器的工人到欧洲各地去建立和运营工厂。法国大部分的大型冶金企业都是在建立之前派人到英国访问的；1830年，一个姓科克里尔的英国家族在比利时建立起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1824年雷米家族和赫施家族（他们有两个人在英国专门学习过），在英国炼铁工人的帮助下，将搅炼法引入了德意志。^[6]人们羡慕并且渴求英国的“神奇机器”（J. A. 布朗基在1823年这样称呼英国的机器）；禁止英国机械出口和工匠外流的法令在宣布取消的很久以前，就普遍无人理睬了。

英国是经历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国家，但是这场革命的起因以及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理由，从来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在英国的工业生产中，作为革命标志的急剧上升运动是在1780—1790年10年间发生的，但是，在此以前的80年间，生产率就以每年平均2%的幅度不断增长，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倍。到1780年，法国的发展也是很显著的，工业增长率大致相同，贸易额也增加了3倍。但是有两点重要的差别。第一，从1660年以后，英国煤矿生产的煤炭是欧洲煤矿产量总和的5倍；在1700年，英国煤炭的产量超过法国产量的30倍，到1800年，依然超过20倍。在1750年以前，欧洲大陆很少使用煤炭，直至1800年之后才普遍使用，这比英国迟了150年。在1700年，英国每年的煤消耗量已经达到人均一吨半，到1800年又增加了一倍。英国的煤炭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百万吨来计算的原料；煤炭的大量运输说明大量投资修筑运河是正确的；采煤中的种种问题促使蒸汽机更加完美；煤炭是大规模冶铁

必不可少的燃料，而没有铁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煤炭又是大量生产砖的必不可少的燃料，而没有砖，房屋建筑就永远跟不上人口增多的步伐。第二个区别不是那么明显，但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是自发的，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则带有人为的色彩，是专制君主追求大量消费和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结果。例如在法国，由于不同程度地由国家所有或国家资助，就形成了制造业的等级制度。^[7]英国也有享有特权的公司，但是一般来说，决定工业企业的收益的，亦即决定它们存亡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然而，企业自由只是英国社会环境的特点之一，英国的社会环境比其他各国都更有利于经济的变革。在这个环境里，政治是稳定的，社会是机动的；人们普遍接受非宗教的和个人主义的哲学；科学技术知识很普及；人身和财产比欧洲大陆有更大的保证。虽然其他国家同样有生活的世俗化，科学同样地发达，而且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也同样有了自由，但是与法国相比，英国在突破经济限制和行会制度方面要先进得多；与德意志相比，英国的有利之处是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国家的统一，因而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与荷兰相比，英国有丰富的煤和铁。孟德斯鸠曾说英国人“在三个重要方面比其他各国人民都遥遥领先，那就是虔诚、商业和自由”。在英国工业化之初能够压倒潜在对手的有利条件之中，没有一个条件是绝对突出的，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合在一起，却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星座。英国既然有了不妨碍革新的社会和政治气候，工业和商业已经发展起来，在地理上处于有利的地位（有煤炭和铁矿，位置适中，运输距离全都很短），又有充足的资本和扩大的市场等经济上的先决条件，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然而，列举各项有利条件并不能说明问题。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生产率的普遍增长，其前因、后果和构成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只有一件事是相当肯定的：转折点。在1780年以后，工业品生产显著增长，这种增长的技术基础可以认定是：迅速采用搅炼法、转缸式蒸汽发动机和改良的棉纺机。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远因，当时的和19世纪的解释都强调四个因素：主要由于亚当·斯密的功劳，经济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放任；英国商业的扩张；由于有新的机器以及发明和使用这些机器的工程师和工匠，生产率不断增长；早期企业家的勤俭和献身精神，他们提供了开创新的工业过程所必要的资本和艰苦劳动。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生产的国家，” 1816年弗兰克兰·刘易斯

在下议院中说，“不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比其他地方低廉，而是因为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都有保障，因为我们有良好的政府，因为我国有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因为我们有丰富的煤炭，因为我们有精巧的机器和机械，因为，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不易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在遭受战祸的国家里，一切改良的进程都被打断了；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雄厚的资本积累，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力抗衡的，而且，我们的资本家不是根据造成生产更不稳定的法律雇用工人”。[\[8\]](#)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肯定影响了18世纪的政治家，并且是19世纪国家政策的明显的基础，但是不能说亚当·斯密对1780年的工业化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在那时候，英国和欧洲大陆有许多人都认为要使经济增长必须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资本积累和发明创造当然是更为重要的。例如，T. S. 艾什顿就有这样的论点：“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资本”“乃是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步伐所以加速”的原因。在18世纪初，利率为7%或8%，到1750年下降为3%或4%，这对于希望圈地的土地所有者来说，以及对于开挖运河和修筑公路的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尽管新的工业家主要是靠努力多捞利润来扩大资本的。英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是很显著的，到1800年，伦敦有52家私营银行，各郡有400家，共同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周转资产。发展需要资本，在18世纪后半期，除荷兰外，英国的资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充足而且利率较低。

但是，生产率增加的直接原因无疑是技术的进步：使用动力传动的机器；用煤代替木材作燃料；用铁代替木材作建筑材料；由工厂进行生产；交通有所改进。在工业革命期间，较好的机器对生产率的影响大，收效快。罗伯特·欧文在1816年说：“在我的新拉纳克的工厂里，大约由2000个年轻人和成年人管理的机械动力和操作……现在完成的工作量，在60年前需要由苏格兰的全部工业人口来完成。”这种进步说明从1760年至183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760年，收入和人口增长得很慢，而到1830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5%，平均实际收入也以同样的比率递增。

塞缪尔·斯迈尔斯说过：“对英国工程技术的最大刺激是贸易——不但国内商业发展起来，而且扩大到了国外。”没有可以进入的国内外巨大市场，没有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工业新产品的消费者，就不可能有生产大大增长的工业革命。特别是价格的降低才使市场有可

能如此扩大，因为工业革命的产品趋于低廉而丰富。也许英国企业家最重要的发现是广大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薄利多销机器制的廉价产品要比以高额利润小批出售优质产品更能成为普遍积累财富的基础。

现在可以叙述一下英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和后果。英国本来是以农业为主，经济稳定而相对来说比较先进，但也拥有相当大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又有偏重于国际贸易的成熟的商业组织。在18世纪初，英国开始逐渐改变它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然而除了应付货币贬值和略微增加固定资本外，所余无几。人口在缓慢地增长，此外并没有什么要求变化的强大推动力，企业家的才能主要在商业上寻求出路。正如P. 曼图所描述的那样，商人们变成了工业的鼓动者（les excitateurs de l'industrie），^[9]他们为农业生产和国内制造商积累资本并开发国内外市场。在1740—1780年这一阶段，对农业的大量投资以及对交通的较少量的投资，大大提高了经济的工业潜力，使1780年以后有扩大积累的可能。1740年以后，人口的增长和国内外贸易的扩大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力，而采用崭新的生产方法和增加国民收入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使经济能够在按人口计算实际产量方面持续不断地增长。尽管在1740年以后总产量不断增长，但是只有在1780年以后，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才猛烈上升；在1700—1750年间，按人口计算的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每年为0.3%，而在1750—1800年间则增至0.45%，在1801—1831年间增至1.1%，在1831—1851年间增至1.5%，在1782—1855年间，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是2%—4%，比1780年以前的增长率高1倍以上；在1800—1830年间，按人口计算的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50%。1730年以后，本国产品的收入显著增加，这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刺激力，由于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这又是1740年以后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的推动力。从1780—1800年，国际贸易额增加了1倍，在增长缓慢的战争结束后，到1840年又翻了一番。这就难怪G. R. 波特在1836—1838年出版的《国家的进步》一书中提到英国时，指出英国为“各国的翘楚”和“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农业，因为尽管手工工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1770年的20%增加到1812年的25%，1831年又增加到33.5%，但在1780—1830年间，农业仍然每年平均提供国民收入的1/3。这是不足为奇的：在18世纪开始的农业革命使同样数目的农民可以养活到1830年增加将近1倍的总人口。

在工业中，纺织品和铁的生产，以及煤炭的开采，都有重大的进步。棉纺工业的增长可以从进口的原棉、雇用的人员（1831年为50万人，其中约有一半在工厂里）、出口的数量、机器的使用（到1831年有1000万个纱锭，8万台动力织机）等指标来衡量。^[10]炼铁工业由于采用焦炭熔炼、搅炼法和转动法以及蒸汽机而发生了革命：1788年总产量约为7万吨，其中至少1/5是用木炭炉冶炼的；1806年有162座焦炭炉，仅有11座木炭炉，产量为26万吨；到1830年，大概有300座焦炭炉投入生产，产量为70万吨。采煤能力由于蒸汽机（用于排水和拖运）和铁路而有显著的提高，1700年已经生产260万吨，到1780年为640万吨，到1800年为1010万吨，而到1830年为3000万吨。英国工业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工业集中于产煤区，到1830年，差不多全部棉纺织业都在兰开夏，40%的炼铁业在南威尔士，30%的炼铁业在斯塔福德郡。在1780年，炼铁和棉纺业在国民收入中大约占5%弱，在1810年起超过10%，到1830年约为20%；在1796—1798年间，棉织品占出口总额的13%，在1815—1825年间则占40%。到1830年，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像它在19世纪其余年代里一样重要；在兰开夏、约克郡西区和布莱克地区，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里，城市和工业的成分占主要地位，尽管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但生活水平却是在逐渐提高。

1780年以后，英国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工业生产快。然而，对欧洲经济更有意义的是，进口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更快一些：1796年以后，英国的商品贸易多年来一直是入超（迄至1830年每年平均900万英镑），逆差的弥补是靠扩大无形收入、商船队的收益（1820年英国占世界海运业的40%）、商业和金融佣金、国外英国侨民（企业家、技工、官员）的储蓄，以及对外投资的收益（1817年国外资产达2500万英镑，1832年达1.13亿英镑）。英国贸易的入超是由于这样两个重要因素：自从机械化以后，英国的出口价格降低了（因而不利于以货易货，而且把工业革命的某些利益以廉价工业品的形式送给了外国人）；对于欧洲和海外的原料与食品的生产者来说，英国市场是重要的。1800年英国贸易约占世界贸易的27%，1840年占24%；在1800年的世界贸易中，非英国制品向英国市场输出的占42%，1840年占36%；在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口货中，1800年英国产品约占40%，1840年占25%。

^[11]

关于贸易的对象，在1780年之前和1830年之后，英国主要都是以美洲和欧洲为主：在此期间，一般来说，英国1/3的进口货由欧洲提供，40%以上的出口货销于欧洲市场，而北美（包括西印度群岛）向英国提供40%以上的进口货，1/3以上的出口货市场。在构成方面，英国贸易是后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一个样板：出口货主要是新工业品——棉花、毛呢、铁器；进口货是原料和食品——在这一时期，小麦、羊毛和棉花占进口净额的21%，茶、糖、烟草、糖浆和酒类占30%。在1800—1830年间，在英国的进口总额中，原料从40%增至70%弱，食品从20%增至30%弱，而工业品则降至5%；在出口方面，工业品从83%增至96%，到1815年，棉纺织品占出口货物的40%以上。由于英国仍然是唯一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又是遥遥领先的最大贸易商，于是就在英国需求初级产品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专业化的格局。当双边付款在国际贸易中已很普遍的时候，进口就由出口直接反映出来；因而，销售英国工业品的北欧广大市场是直接随着英国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谷物而浮动的。不过，由于多边付款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18世纪的三角贸易还是趋向于多边的结算。英国对美国和北欧的贸易是逆差，但对其他地方（如南欧、南美和亚洲）则是顺差。美国对欧洲的贸易是顺差，但被世界其余地方的逆差抵消。即就欧洲内部而言，俄国和瑞典对英国的贸易是顺差，但被购买南欧的货物所抵消；比利时、法国和德意志在欧洲的内部的贸易中有盈余，以此弥补对海外（特别是对美国）贸易的亏损。

自从世界各地与英国的贸易这样频繁之后，由此产生的极其复杂的亏损和盈余便越来越多地在伦敦进行结算，以免金银块大量地流动。1832年，内森·路特希尔德宣称：一般说来，英格兰是“整个世界的银行……印度、中国、德意志、全世界的所有交易都由此处操纵，并在这个国家结算”。在1800年，伦敦已经是欧洲的商业金融中心，它提供短期和长期信贷、海上保险、航运、商业设施和货栈，这些服务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例如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依然是国际结算的重要票据交换所。在1780年经营欧洲银行业务的有许多特许的公立银行、一些私立大商业银行和无数私立的小储蓄银行。银行业最初是从存款和贷款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期间，它日益从事调拨国际资金和发行钞票。1750年以后，旧的储蓄银行逐渐让位于半国营性质的发行钞票的银行；在1800年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把全部或部分发行钞票权交给它们，例如1803年授予法兰西银行在

巴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1806年又授予它在有分行的省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到1830年，英国、尼德兰联合省、瑞典、挪威、丹麦、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都有了拥有特权的发行钞票的国家银行。同时，商业和投资银行以及英国的农村银行也都应运而生，以满足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对通货和信贷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从中取利。主要的推动力是需要有贸易信贷和改善的划拨贸易差额的机构。但是，各国政府为了弥补开支和收入之间的时间差距，为了偿还由于持续的和普遍的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而造成的国债，需要短期的和长期的贷款，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里，银行为了支持政府的确大大开展了接受存款以及购买商业证券和政府公债的业务。英国的银行一般都避免对工业发放长期贷款，但在欧洲大陆，例如在比利时，也开始有投资银行出现。

国际银行的设立对于未来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银行以伦敦为中心，专门应付日益增多的国家借款。1817年乌弗哈尔—巴林—霍普合营银行向法国贷款3.5亿法郎，1818年路特希尔德银行承担了普鲁士的第一次国外贷款。到1825年，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尚未独立的希腊全都有外债；在海外，也开始向南美洲的一些贫穷的独立政府发放了大批贷款。路特希尔德家族首先抓住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好机会，1815年这个家族颇有策略地把五个成员安置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欧洲的国债总额大致从1780年的5亿英镑增加到1820年的15亿英镑，然后缓慢地增长，到1848年达到17.3亿英镑。

各式各样的金融发展都带来独特的通货膨胀和危机问题，这些问题因战争而加剧。通货膨胀不但引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主要用货币数量说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而且引起控制钞票发行额的实际问题。由于周期性的危机，包括大量的银行破产，人们开始考虑银行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期的作用，考虑保护公众免受金融机构不稳定的影响这个实际问题。例如，英国由于对货币问题进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终于在1844年颁布“银行特许法”，企图以此控制银行和通货，从而防止危机的产生。

英国的对外贸易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830年，第二个出口大国法国的出口总值还不到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尼德兰联合省的出口总值不到英国的1/4，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总值就更少得多了。工业

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任何地方的工业化都无法与英国的工业化相比。一般来说，距离英国愈远，其贸易额和工业化程度便愈低，受到英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近邻。南欧、东欧和北欧则大不相同，这些地区在1830年以前依然变化很小。在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是原始的农业经济，除加泰罗尼亚以外，工业的发展微不足道。土耳其由于国际贸易日益增长和采取非常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圈地耕种和手工生产都有增长。1832年《奥斯曼导报》报道说：“欧洲其他国家通过比较愉快或不愉快的政治结合努力去实现的事情，奥斯曼帝国早已由良知、宽容和殷勤好客完成了。……商业自由的威力在这里是没有限制的。……极端平和的税收是这种商业自由的权威的补充。”但是，这种政策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由于政治制度造成了普遍的暴政和不安，不仅被一笔勾销，而且还使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土地的耕种者成为不公平和压迫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牺牲品。只有在分裂成一些民族国家之后，才会得到较快的发展。

与此相反，意大利的经济不振主要是由于分裂，迄统一为止，意大利始终是“一个停滞的和落后的文明国家”。在18世纪，政治的分裂，贸易的壁垒，可怜的交通，行会的制约，狭小的市场，货币的不统一，以及继续维护特权，使得一度十分繁荣的经济变为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经济。拿破仑的征服和统一曾经带来一些积极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被封锁和法国人的榨取抵消了。在战争以后，当这些利益有一部分可以取得的时候，特权和旧政治疆界的令人不安的恢复，使发展更加停滞不前。只有通往欧洲其他地区的天然门户伦巴第和皮埃蒙特，才有比意大利的其他部分进步的农业和工业，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方，农业还是压倒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刚刚起步的软弱的纺织品工厂化生产在内。其他地方有一些纺织工厂（机器在1820年引入普拉托，甚至那不勒斯也在1830年之后建立了第一批棉纺厂），但是在整个意大利，铁的生产微不足道，煤炭生产则等于零。1830年以前，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灌溉与合并以及封建制度的衰落使农业生产有些增长，这种增长也只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一致而已。各地农民的境况都很悲惨。当约翰·鲍林爵士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意大利时，他曾报道农民目不识丁、愚昧无知、崇尚迷信、敌视革新，以及“与世隔绝”。“有无数的农户几百年来占有同一的农场，既未增加一文财富，也未增添半点知识。”

西班牙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有启蒙运动，有在启蒙运动影响下认为可以用立法发展经济的维新的文官，有80个称为“国家之友”的经济团体，因而在卡洛斯三世统治下有十分进步的经济思想和某些自由化的商业生活，但是，使西班牙从一个头等国降为二等国的痼疾依然未愈。西班牙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出口原料（酒类、油类、羊毛、生丝和矿石），换回粮食和工业品，连手帕也从曼彻斯特输入。正如戈埃蒂所指出的那样，手帕上很鲜艳地印着著名斗牛士的面孔。谷物不足是西班牙经济中最显著的不合理现象，这是领主制度及其耕作太差的大庄园（Latifundia）所造成的结果，也是除了北部之外普遍缺乏小型或中型农场所造成的结果。饲养牲畜占有重要地位。直至1836年才撤销的牧民荣誉会（Mesta）拥有破坏性的移动羊群，威力可以从牧民荣誉会的特权看出来，而佃农的势力则很小。有2.5万“毫无生气的村庄”，但足以刺激密集农业或者成为工业发展中心的大城镇却寥若晨星。西班牙工业之所以不振，一部分是由于城镇小和未能开发殖民地市场，但也由于保守的行会存在的时期太长。城市中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受到贵族的轻视；在农业很少盈余而工业盈余甚至更少、交通极差和市场狭小的经济中，他们宁愿依赖行会的保护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对工业的支持微不足道，就像在法国一样。对外贸易大多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例如在加的斯），对外贸易的利润都流向国外。“领土辽阔、闭关锁国、商业关系停留在重商主义思想能够想象到的极端排他性上的”西班牙大帝国的经济，在1800年比过去的西班牙有较大和较快的发展，但是它对工业品的需要不是通过西班牙的工业化，而是通过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来满足。战争使情况更加糟糕：它摧毁了政府，加剧了通货膨胀，中断了羊毛贸易；最终，战争使英国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占据了工业品的市场。西班牙殖民帝国曾经是西班牙财富的保障，它既是金银的源泉，又是一个市场，在一个每20人中就有一个贵族的社会里，它又是贵族阶级谋求职业的途径。只有拥有制海权并已打入南美市场的禁区的英国，才能在殖民地独立来临时处于有利的地位。由于失去帝国，又加上通货膨胀，已有的货币问题加剧了：从1770年至1800年物价上涨了60%，而1800年以后物价上涨得更快。虽然法国的入侵促使成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并且在1811年起草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马上又恢复了贵族的特权，经济发展又缓慢下来。1820年自由派的起义毫无效果，但是到了1830年，西班牙再一次发生暴乱。在那

时候，只有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有一些主要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

东欧的经济增长率也比西欧缓慢。俄国在1720—1851年间人口骤增4倍，部分是由于向各方扩张领土——这种扩张在经济上的长远意义是：俄国获得新的潜在资源，并能够直接接近西欧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俄国也有相当的工业。的确，俄国大概是18世纪炼铁工业发展最显著的一个国家：1800年，乌拉尔生产的铁为6.55万吨，因为缺少国内消费者，有一半要输往国外，主要是输往英国。但是，尽管产量突出，技术却十分落后，用的是木炭冶炼炉（1800年有87座）和手工打铁。同时，考虑到俄国的幅员和人口，工业中的总成绩就不如表面上那么出色，在1770年，俄国约有5万名“工厂”工人，在1825年有21万名。工厂有抛弃农奴而雇用自由劳动者的倾向，但是到1830年，只有棉纺业雇用的工人大多为自由工人，随着工厂生产的发展，庄园生产逐渐衰落，从而逐渐破坏了大概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状态。另外，到1830年，俄国还发展起一种显著的地区专业化。在北方，农奴制已经逐步消失，新经济作物（如亚麻、土豆和大麻）比率的增大是来自自由农民的生产。中部和南部的黑土地带仍然保持着农奴制，尽管它提供市场的产品也日益增多，这部分地是为了满足地主对工业品，特别是对进口货愈来愈大的需求，同时也在迫使农业进行改革，例如更广泛地采用三茬轮作。俄国的出口品很少——铁、亚麻、牛油、木材、谷物；进口货则多种多样——纺织品、金属制品、砂糖、酒类、油类以及多种消费品。俄国由于对英贸易的顺差，能够进口南欧的奢侈品，愈来愈多地装饰贵族家庭。但是，在1830年以前，经济发展缓慢而不稳定，在解放农奴以前，发展必然受到了阻碍。

在奥地利帝国，可能促使经济发展的启蒙运动和改革在1789年突然停顿了。继之而来的是封建的反对，在弗兰茨二世统治年代，竟然达到限制建设工厂的地步，尤其是在维也纳。结果，工业的发展迟缓起来；尽管封锁刺激了棉纺业的机械化，而和平和从英国进口廉价物品却带来了危机，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生产还是停滞不前。在19世纪30年代，进步很迅速：到1840年，波希米亚的手纺机几乎完全不见了，蒸汽机得到普遍使用。农业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的扩大促使生产更多的谷物（例如在匈牙利），新产品（例如土豆、甜菜和细羊毛）也增多了。但是，由于弗兰茨在1798年恢复封建的权利，大批贵

族土地成为世袭财产（特别是在匈牙利），这就使农业的商品生产困难起来，直到1848年以后，还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没有开发。尽管如此，在主要农业地区，贵族地主还是推动了有利可图的大规模耕作和1815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到1830年，在奥地利的领土内，机器的使用仅限于纺织工业（主要是波希米亚的棉纺业）；其他工业（冶铁和制糖）的机械化只是在下一个10年才开始。

在北欧，一度是欧洲巨大商业中心之一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性降低了，这时只进行铁、木材和谷物的贸易。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在这一时期里，农业有显著的改进，土地的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各地纷纷建立由类似英国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很有效率的中型农场。但是，除了瑞典的冶铁工业以外，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业依然规模很小，行会的势力虽然收缩，但在整个时期依然是强大的。英国在冶铁方面作出的榜样以及英国对铁和木材的需求，是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瑞典的发展最引人注目：谷物生产大量增加，到1830年，该国几乎不再需要进口粮食；铁的生产从1750年的6万吨增加到1781—1830年间的每年平均8万吨，虽然瑞典在欧洲铁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800—1850年间从10%下降到2%。尽管瑞典的铁厂老板在各企业中起带头作用，他们迅速采用搅炼法，在1804年引进第一台蒸汽机，而且愈来愈多地使用水力，但是他们无法与英国的焦炭冶铁竞争。木材加工居第二位，在1780—1830年间，出口量增加了60%。铁和木材都以英国为主要市场，要不是由于战争，由于英国冶铁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英国对加拿大木材采取保护政策，本来可能增加得更快一些。不管怎么说，1830年瑞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稳步前进的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放宽了关税），农业有所改进，开始有较好的交通（例如戈塔运河），有两个重要的大城市，还有木材和冶铁这两个发展中的工业部门，此后会刺激经济更迅速地发展。

挪威于1814年由丹麦让与瑞典，它有一个农业经济，出口木材、鱼类和某些金属。除木材外，它的资源比瑞典更为有限，而木材工业的发展则由于垄断和由于害怕毁灭森林而限制产量也受到了阻碍。然而到1800年，该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为耕者所有，民政机关掌握在非贵族出身的人们手中。在战争以后，可耕地有所扩展（虽然该国仍然依靠进口粮食），伐木量和海豹与鲸鱼的捕获量有所增加，但是到1830年，经济仍没有真正增长的迹象。丹麦的繁荣已经依靠出口食品

（特别是谷物），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商业和运输业也占有重要地位。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的入口，直到1857年都征收通行税；它在1800年有700艘船，在1839年有1600艘；哥本哈根是波罗的海的重要贸易中心；关税的改革以及早就建立的保税货栈（1793年）促进了过境贸易。战争的结束必然带来英国的竞争，但是丹麦需要英国市场，因此在1824年签订了以互惠为基础的商务条约。农业在发展，实际上到1830年已经完成了农场合并的过程，因此，在那个时候，丹麦的经济即便说不上先进，也是比较繁荣的。

在欧洲大陆上，比利时是经济最为发展的国家，尽管法国和德意志也有重大的进步。然而，德意志经济的强大在1830年还很不明显。伏尔泰预言德意志注定要永远贫穷，似乎已被几次战争和1815—1828年普鲁士的萧条所证实。虽然州的数量减少了，而普鲁士的面积又很大，使得德意志的分裂状态有所缓和，但是没有关税同盟作为走向统一的最起码的步骤，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比利时和英国新工业的竞争阻碍了德意志旧工业最先进的和最有市场的亚麻织物和冶铁的发展。容克贵族在农业中的支配地位和行会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都使不利于发展的制度结构得到了加强。然而，1815年以后的逐渐工业化乃是土地改革和取消关税壁垒的结果。1815年之前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和消灭行会对工业的控制；在1818—1834年间随着关税同盟的形成，州和州之间的关税壁垒也垮台了。德意志拥有煤铁资源，这些资源以后将给欧洲最大的重工业提供原料，但在1830年之前几乎没有开发。在德意志的两个最大煤田中，鲁尔由于它的宝藏无人知晓和由于它靠近比利时的煤铁企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小；而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则与世隔绝，如果没有普鲁士政府的资助，是根本不会开发的。结果，冶铁依然主要依赖于木炭。早在18世纪80年代，焦炭冶炼和搅炼法已经引进上西里西亚，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其他地方并未普遍采用。即使在上西里西亚，使用焦炭冶炼也只是在煤矿的附近地区；在西里西亚的其他地区，由于木材丰富，使用木炭冶炼的时间甚至比德意志其他地方还要长。莱茵河东岸的山区对于生产金属制品是最重要的，在1840年，德意志1/3的鼓风炉仍然由这里提供原料。广泛分布在德意志中部的炼铁工业，在19世纪由于鲁尔、西里西亚和从外国进口的廉价铁的竞争而日趋衰落。如果说德意志的未来在于煤和铁，那么它的过去和现在却在于羊毛和亚麻的织品。1800年亚麻织布是主要的工业，那时在普鲁士的出口中纺织品占75%，其中有60%是亚麻布，只有

4%是金属制品。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的亚麻布特别受到整个欧洲的欢迎。波罗的海各港口输出的基本出口品——谷物、木材和布匹，在战后时期都有减少。主要运往西班牙、英国和美洲的亚麻织品，在1815年以后与廉价的英国亚麻布和棉织品相竞争，出口日益减少，这在亚麻布的手工织工中间不断造成社会性的悲剧。但是，制造羊毛织物也是德意志的一项古老的工业，自从18世纪引进美利奴羊之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即使如此，1820—1840年间，仍有大宗生羊毛输往约克郡。纺织是一项新兴工业，1800年以后迅速发展，1815年以后纺纱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到1835年已有15万个纱锭。三项巨大的制度改革——废除农奴制、限制行会势力和组成关税同盟（Zollverein），再加上从比利时和英国来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以及国家兴建企业和资助企业——是1830年以前德意志经济所以得到发展的原因。然而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农业经济，即使在工业最为发达的几个州（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也是如此。为了建立足以维持专业化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如1814年一个拥护统一的人所论证的那样，为了防止造成“波罗的海沿岸是葡萄园、哈尔茨山脉是玉米地，或者莱茵河畔的山区是牧羊场”的局面，经济的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在1783年，所谓低地国家的地区是由奥属尼德兰（比利时）、联合省（荷兰）和列日公国组成的。比利时是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工业革命也是首先通过这个门户传入欧洲的。比利时的工业所以突出，基本原因是：比利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通向三个逐渐发展的巨大市场（法国、德意志和英国）；可以通航的河流加上运河，在1830年提供1000英里以上的国内水路，使比利时得天独厚地与西欧大平原连接起来；比利时有容易开采的煤矿和铁矿，虽然不如英国或德意志的储量多，但也足以促使发生工业革命并坚持下去；由于纺织和冶金都有古老的工业传统，就提供了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拥有安特卫普这样一个巨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在这些有利条件以外，还要加上历届良好的政府：在比利时并入法国时期，公路得到改善，开通了斯凯尔特河，在对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的时候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受到保护的市场；1815年以后与荷兰合并，在威廉一世明智的支持下，在19世纪20年代，工业趁机发展起来。政府对工业有直接的支持——由威廉和国家发放贷款，也有间接的支持——关税减轻和金融机构扶助工业；例如，在1830年建立兴旺的冶铁业时，这一

类的鼓励就起过很大作用。比利时在1780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城市社会，为了养活这个社会，佛兰德的农业像英国农业的效率一样高。尽管1815年的和平导致比利时脱离法国和形成莱茵河流域的市场，导致欧洲市场向英国货物开放，但在1820年以后，却有减轻关税、政府补贴工业以及发展运河来作为补偿。1821年，由于派遣伦琴中尉去考察英国的冶铁工业并与比利时的冶铁业作一比较，保证了技术的迅速提高。伦琴发现只有一家比利时钢铁厂——列日附近塞兰的约翰·科克里尔钢铁厂能够比得上英国的钢铁厂，他建议建立一个国营工厂，采用英国工厂的设备，开始时雇用英国技术工人。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是由政府向科克里尔两次发放大批贷款，以扩大他的工厂。科克里尔工厂是欧洲第一批统管生产和销售全部过程的组织之一，由一位有杰出才能的企业家将之扩大成一个工业帝国，在1830年，这个工业帝国的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比利时像英国一样，也是个大产煤国，从1790年起，产量随着工业的普遍扩大而增长，到1830年已达250万吨。纺织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829年纱锭数量等于1810年的2倍，织机等于3倍。然而，为比利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主要基础的是默兹河沿岸的煤铁联合企业。尽管如此，用焦炭冶炼取代木炭冶炼进展得很慢，在1820年以后才由奥尔邦在格里文日和由科克里尔在塞兰建立第一批烧焦炭鼓风炉，即使到了1842年，比利时的120座熔铁炉中也只有45座是烧焦炭的。扩大银行业以提供信贷和资本，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促使工业和银行业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后来成为德意志的特点。特别是1822年成立“低地国家民族工业促进总公司”（向工业家提供贷款）和“荷兰贸易公司”（促进出口），防止了金融对工业化和商业的卡脖子现象。到1840年，比利时尽管由于脱离荷兰而发生秩序混乱，它在技术上仍然是欧洲大陆最先进的国家，它生产消费品以及汽船、火车头和纺织机械，正如J. H. 克拉彭所指出的那样，比利时“在工业方面是唯一能和英国并驾齐驱的国家”。

虽然比利时在法国和威廉一世统治下颇为繁荣，荷兰却全面遭殃。荷兰的商业经济在18世纪已经落后。最后一场英荷战争损害了依然很重要的对美洲的贸易和对东方的贸易，削弱了荷兰的商船队，从而引起荷兰商业的彻底衰落；在拿破仑时期，荷兰失去一些殖民地和许多船只，荷兰的商业每况愈下。威廉一世的目的是要“使尼德兰再度成为在世界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的集散中心，荷兰王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有权享有这种地位”；但是他所恩赐的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比利

时注重保护贸易，荷兰注重自由贸易，这种政策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两个国家在合并之后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威廉一世修筑的公路、运河和港口对比利时有直接的好处，而对荷兰却只有长远的利益。如果政治上保持统一，那么，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主张——由一个工业的比利时和一个商业的荷兰组成一个有效的帝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但是1830年的革命使比利时暂时失去了市场，使荷兰更加长久地没有工业。使荷兰重新成为货物集散地的努力成效很少；在18世纪90年代，汉堡垄断了英国商品的经销权；从1800年至1815年，虽然在封锁之后贸易仍在继续进行，荷兰却失去了它的传统商品；1815年以后，关税以及英国的竞争使它难以重新获得原先的市场。威廉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单一的贸易公司进行贸易，这个办法失败了。原先的批发商品——香料、糖、鲱鱼和亚麻布，被煤、铁和棉花取而代之了，而这些又都不是荷兰专有的物品。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但是较小港口的前途却更可能成为农业地区的集市，而不是国际的商业中心。荷兰势必要从商业转向农业，1801年和1804年法国取消封建特权，更助长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到1830年已经对荷兰的贸易发挥重大的作用。

法国在18世纪是西欧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国家，但在1780年以后却被英国超过了。甚至在此以前，更多的资本积累、更多的工业投资和更完善的金融机构已经使英国遥遥领先。在法国，行会的势力、沉重的课税以及限制性的商业和航运制度，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战争进一步扩大了英法两国经济上的差距。米什莱在观察1800年的欧洲时，注意到法国的群众在涌向兵营，而英国的群众则拥向工厂。农业继续在法国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它的最显著特点是“稳定不变”。然而，尽管基本粮食作物仍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的要求却引起一场农业革命——建立人造牧场，种植块根作物，围场和改进牲畜饲养。这场革命是1750年以后在巴黎附近开始的，然后慢慢地扩展，直到建设铁路之后才对农业发生猛烈的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财富与国土的地力恰好成正比”，他们促使政府和大地主改进农业。的确，18世纪的许多农村贵族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是靠锐意经营他们的庄园而不是靠领主权利来积累财富的。但是，市场很少超越省界，而且唯一巨大的专业化是栽培葡萄酿酒。在南方较为贫瘠的土地上，两年轮作制一直保持到1830年以后；其他地区实行三年轮作制，但除巴黎附近和法国的佛兰德以外，农业毫无进展。甚至

在1789年以前，土地所有权都已经普遍分散，到处都有不可胜数的自耕农。法国革命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结果有大量财产易手，但这对于耕作方法并没有很大影响。的确，除了栽培土豆和甜菜而外，1830年以前，农业没有大的变化。工业的情况也是一样。尽管修筑了公路和运河，但在铁路建成之前，法国经济的地方主义及其分散的小规模家庭工业依然如故。在18世纪，煤炭的产量比较大，但是来自分散的煤田，而且就地使用，大多是在中央高原及其边界地区。1760年以后，圣艾蒂安的煤经卢瓦尔河运至巴黎，1789年法国煤的总产量为50万吨，1830年为180万吨。但是，由于迟迟不采用蒸汽机，继续使用木炭炼铁（1819年以后为了保护地主利益，又增加关税以维持木炭的价格），以及容易得到比利时的煤，在1840年以前，煤炭的生产受到了限制。在18世纪，炼铁业由于燃料短缺和政府朝令夕改而受到阻碍；虽然从比利牛斯山到比利时边界到处都有炼铁厂，但是大多数铁厂的规模都很小。在1827年，这种地理上的差异依然存在，那时共有424座鼓风炉，分布在45个省；生产单位都很小，在所生产的34万吨铁当中，只有4万吨是用搅炼法生产的。在1830年，仍然有86%的铁是用木炭冶炼的。纺织工业（例如北方各省的棉纺和毛纺织业）的变化比较大，但是除1815—1830年间米卢兹的棉纺业外，没有根本性变化；在1830年，共有50万个纱锭和2000台动力织机在运转。到1830年，法国的原棉消耗量共达7000万磅。羊毛纺织业的变化比较慢，而丝织业则更慢一些。法国工业技术的普遍落后，可以从1840年法国只有2803台蒸汽机这一事实看出来。尽管战争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化，但是它却夺走了法国的殖民地市场，而又没有给予法国永久性的欧洲市场作为补偿。战争还鼓舞了在大陆体系下和拿破仑帝国政区内的保护工业。在战后的竞争世界中，由于英国货可以自由进入欧洲，法国只有棉纺织业发展迅速。

因此，1780—1830年这一时期并不是欧洲普遍工业化的时期，尽管煤、铁和纺织工业都有重大而又广泛的发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一般只有棉纺织业发生工业革命，到1830年，欧洲大陆棉纺织业的棉花消耗量将近英国的3/4。然而在这时候，英国生产的煤仍然占欧洲总产量的80%，铁占欧洲总产量的50%，蒸汽机几乎占欧洲总台数的100%。因此，一般说来，这是人口和贸易增长的一个时期，而不是工业化的时期，“贸易中贪得无厌的原则”，特别是英国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人们说：“在没有英国商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

商业可言。”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在受人羡慕和效法的英国鼓励之下，乐观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心成为19世纪的特征。法国革命尖锐地提出了阶级关系问题和阶级冲突的危险；工业革命虽然突出了贫富的对比，却使人人都怀有富裕的希望。这两种革命都有助于打破旧制度层次分明的社会等级制，都鼓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从而导致以经济上的差异代替法律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作用的基础，以放任自由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维护旧制度的旧势力极力要保持现状，它们可以推迟但是不能阻挡自由扩展的私人利益集团反对故步自封的和束缚手脚的腐朽当局而引起的变革。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工业中的行会制度的衰微（在立法的帮助下），个人取得更大的自由（可以占有和处理财产，为了经济上的机会可以迁居别处），贸易的自由化。工厂主和商人很快就组成影响国家政策的压力集团。1819年德意志“商工联合会”和1820年“伦敦商会”提出的要求贸易自由化的两个著名请愿书，正是工厂主和商人的努力的典型表现。在这一时期——1783—1793年——的开始，整个欧洲都在进行关于贸易特权的谈判，虽然被战争多次打断，但在1815年后谈判又继续了。正像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所阐明的那样，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的优越性已被新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影响极为普遍，在1800年以前，《国富论》一书已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的译本问世。亚当·斯密不仅攻击重商主义，而且向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在“一只无形的手”能够操纵的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经济利益协调的理论。J. B. 萨伊的市场法则加强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这一法则强调供应，认为生产为消费提供资金，而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T. R. 马尔萨斯和D. 李嘉图一派则不那么乐观，他们相信一切成本都可以归结为劳动代价；他们说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如何提高地租，直至报酬递减律降低利润和节余，结果成为静止不动的、工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因此，古典经济学家虽然证明放任自由是正确的，但在李嘉图的体系中包含着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既然存在着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暴力行动，阶级斗争理论似乎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工人阶级逐渐获得经济和政治觉悟的社会中，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对现状不满和对财富分配不满的产物。现在，能力和出身一样，成为更加普遍的进身之阶，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出身卑微的人

从贫穷中上升为有钱有势的人。不过，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对现存思想和制度的怀疑，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对未来社会的安排计划。都市化、工厂和较好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使工人阶级更容易联合起来。国内秩序混乱一部分起因于群众的经济不满（例如害怕机器），一部分起因于革命思想（例如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这种混乱引起反动和镇压；但是也有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和人道主义者，他们主张进行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去规定新兴工业中的工作条件。到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普遍同意拉马丁的说法：“如果社会和政府不去探索和解决无产阶级问题，将会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可怕的爆炸性问题。”这时英国已经通过了第一批工厂法，这些法令不久即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样板。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的条件是在逐步改善的：1830年英国的实际工资比1780年提高了50%；在1840年，路易·菲利普建立的一个委员会也表明，法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肯定比大革命以前好得多。在其他地方，除了比利时而外，改善不大显著；然而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比率有所增长的地方，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向更好的方面改变。正如麦考利1830年在谈到英国时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国家比1790年还穷吗？我们坚决相信，尽管统治者有种种管理不当之处，但英国几乎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富。有时略有停顿，有时暂时倒退，但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一个浪头也许会后退，但是潮水显然在汹涌而来。”

（郑项林 译）

[\[1\]](#)

人口（单位）：百万

年 份	俄 国	奥地利	法 国	德意志	英 国	意大利	西班牙
1800	约 40	28	28	23	15	18	15
1830	约 57	36	35	35	28	25	18

[\[2\]](#) G. E. 富塞尔：《1500—1900年的农具》（伦敦，1952年）指出：在17世纪只有7项农业的重要发明，1701—1750年有8项，1751—1814年有30项，1815—1841年有16项。

[\[3\]](#) B. H. 斯里克·范·巴思：《公元500—1850年间的西欧农业》（乌得勒支和安特卫普，1960年）；O. 奥尔迪什英译本（伦敦，1963年）。

[\[4\]](#) 土地收益分成制（*métayage*）是土地租佃的一种制度，耕种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一定比例的产品作为地租（一般为产品的一半），而土地所有者则全部或部分提供牲畜和种子。

[5] T. S. 艾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年》（牛津，1948年），第161页。

[6] 参见W. O. 亨德森《英国与工业欧洲，1750—1870年》（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其中对英国人在欧洲工业中的活动有详细的叙述。

[7] W. C. 斯科维尔：《资本主义和法国的玻璃生产，1640—178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1950年），第125页。这里指出有四个集团：皇家工厂（由国家所有和运营），王室工厂（享有专卖特权和免税），享有特权的工厂（由国王特许，有某些特权），在这三类下面的是未得官方承认或赞助的企业。

[8]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4卷，第778页。

[9] P. 曼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巴黎，1906年）。

[10] （I）原棉进口（百万磅）1771年，4.8；1785年，17.9；1790年，31.4；1800年，56；1811年，90.3；1821年，137.4；1831年，273.2。（II）棉织品出口：1820年，2.5亿码布，2300万磅纱；1830年，4.45亿码布，6500万磅纱。

[11] A. H. 伊姆拉：《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经济因素》（哈佛大学，1958年），第2章。

第三章 武装力量和战争艺术

一 陆军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的第八卷中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在他生活时代所发生的战争中的革命。他说，18世纪的战争是国王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各国人民的战争。战争并不危及民族的存亡（正如奥斯特利茨战役和耶拿战役之后的普鲁士那样），只是征服敌方的一两个省。这类战争只是国家的事情，只是一个独裁政权的事情，与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暴力受到谋略的制约，事实上，这就是20世纪所谓的“有限战争”。

然而，1789年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克劳塞维茨继续说：

虽然根据一般看问题的方式，在1793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一支很小的武装部队，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种力量。但战争再一次突然变成人民的事情，变成3000万人民的事情，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公民……

在所有这一切都经波拿巴之手完善之后，这支以全民族力量为基础的强大军事力量就踏遍欧洲，确确实实地粉碎了一切，当它只是与旧式军队遭遇的时候，其结果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引起了反抗。[在另外的地方]战争本身变成了人民的事情……

因此，自从波拿巴时代以来，战争首先在一方，然后又在另一方成为全民族的事情，具有一种完全新的性质……[\[1\]](#)

对于1789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说，在军事问题上也和其他问题上一样，一个基本问题是要区别哪些是真正革命性的东西，哪些是在18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已经逐渐发展起来的。克劳塞维茨作为法国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的目击者对这一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不抱任何疑问。在他看来，当时各大强国的军队，就像在整个18世纪的一般情况那样，纪律、训练、装备和服役的一般素质都大致相同。他认为，18世纪的有限战争所以变成他那个时代的总体战争，是由于把民族精神灌输到战斗中去，结果形成整个民族间的相互对立。战争的目

的、军队的规模和作战的地域，仿佛全部被新精神给扩大了。战争成了全民族的事情。结果，有限战争的限制被推翻了。作战的目的现在变成了“把敌人打倒，不到敌方颓然倒地就绝不可能住手或在双方的战争目的上达成任何谅解”。

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很难表示异议。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那些革命性的事物并不是因为武器的变化而引起的，新的战术方式和方法的影响也颇为有限。产生这些革命性事物主要是由于“全民皆兵”的出现，由于“全民武装”使得大规模扩军成为可能，以及由于放弃了边疆政策或王朝政策而采纳了新的民族政策。“全民武装”就是这种政策的军事工具。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大革命前的年代里从来无人知道或无人考虑爱国主义对战争的影响，以及将这种精神以征兵的形式实际加以应用。萨德就曾主张征兵可以避免暴力和欺诈手段：这种手段是以拉壮丁的方法来组成名义上的志愿兵。法国的军事改革家吉贝尔不仅主张全民兵役制，而且主张军事训练应有民族特性。卢梭声称只有一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全国民兵才足以保卫一个自由国家。但这些人提出这些主张时并不抱希望，特别是吉贝尔已预见到只有政治革命才能带来军事革命。

即使法国大革命到来时，最初它也并没有使人意识到将会培育出一支新型的军队和新的作战方式。1789年的陈情书曾多次要求取消地方民兵，其用意是政治的革新将使对武装力量的需要减少而不是增多。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解散旧王室的军队，而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军事力量来代替它，至少在当时没有组织。这种暂时的无组织状态所造成的最严重问题是失去了2/3的军官。在1789年的将近1万名军官队伍中约有7000人是贵族。当然，并不是所有这7000人都反对大革命，更不用说那些平民出身或靠运气擢升的军官了，但他们中间确实有许多人是反对大革命的，而且很快就弃职投奔到特里尔和科布伦茨的流亡贵族那里去了。攻占巴士底狱，组建国民卫队，1790年2月颁行新军事体制的根本法令（其中规定任何公民都能升任各级军阶和职务），以及在新的誓词中要求把对国家和宪法的效忠置于传统的对国王的效忠之上——这一切都加快了瓦解的过程。军官的叛离从1791年全年一直持续到1792年。

早在1789年12月，杜布瓦-克朗塞就要求实行全民性的短期兵役制和建立一支小型的正规军。他主张应将公民权与服兵役的义务结合在一起。但是制宪议会决定保持领饷金的志愿入伍制。从理论上对征兵制的反对在国家武装部队的实际需要面前是毫无用处的，特别是在大革命日益增长的暴力行为使得欧洲其他王国的态度变得逐渐敌对的时候更加如此。因此，从1791年6月开始，法国陆军的规模就不断扩大，那年夏天下令从各省国民卫队的志愿人员中新组建总人数为10万人的158个营。1792年5月立法议会要求再招募7.4万名志愿兵。然而，这次志愿的原则在执行中有所限制，每个省和地区都分配定额，如果志愿的人数达不到指标，其余的则通过抽签强征入伍。次年春天又使用了同样的办法。许多志愿兵在1792年年底就已服役期满，估计需要约3万名新兵。这么大的数目光靠招募志愿兵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于是国民公会同意在18岁到40岁的未婚男子中，通过抽签征召人员来弥补志愿兵的缺额。向各省派出了专员去催促征兵活动。

尽管如此，志愿兵役制显然完全失败了。实施大规模的强制征兵已迫在眉睫。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卡诺的法令，通过征兵组建543个营，直接由陆军部长管辖，分配到前线的11个军里去。

[据宣布]国家号召所有的法国人都来保卫自由……从此时起直至敌人被逐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需服从军队的需要。年轻人开赴前线，有家室的人制造武器、运送粮食，妇女制作营帐和被服或到医院工作，孩子们把旧布料改成绷带，老人们被送到广场上为战士们鼓气，教导他们仇视国王和保卫共和国的统一。

这是近代全民武装的宣言。这些号召都实现了。有40万以上的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即被征人员中的第一类应征入伍。他们和志愿兵一起满足了共和国军队在其后五年里的需要。到1794年春，法国已有75万军队。此外，在1793—1794年冬天实现了旧军队的余部与新军队的合编，而这是疑虑重重的早期革命政府所坚决反对的。

拿破仑原则上沿用了已在共和国军队中确立的征兵和晋级的方法。与此同时，执政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军队最清楚地显示出那些在这一时期妨碍全面贯彻“全民武装”原则的实际局限性。

共和六年（1798年）的一项法令把已在实施的征兵条例更合理化了，虽然这些条例直至1811年才最后编入法典。按法律，所有20岁到25岁之间的法国男子都应服兵役，但即使在此年龄范围内，其普遍性

也是有限的。首先，法律本身就免除了许多种人的兵役义务，包括已婚男子，不管是否已婚但有人要靠其供养的人，后来还有教士。其次，出于财政和经济原因，通常只征召花名册上的一部分人，直到帝国最后的危急年代才改变。最后，那些被征召的人可以找人替代，这种特权实际上早已形成，到1802年5月就合法化了。

在督政府时期，最初从拿破仑开始，每年的征兵数目由立法议会批准，并决定各省分配的名额。市政当局给那些应征的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决定哪些人应入伍并处理替代问题。这样的安排当然为行贿舞弊开了方便之门，许多环节都有可乘之机。于是拿破仑试图将整个制度更直接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1802年他下令在各省设立征兵委员会，由省长和几名军官助手组成，其职责是审查所有那些要求免除兵役的人。三年后，地方议会被解除了一切与征兵有关的职权，它们的工作由省长和副省长们接管。从此，这些官员们负责拟订适于服役人员的名单、严格按抽签办法选出实际应征者，安排新兵体检和处理找人替代问题。在这些场合中，团的军官也在现场，即可视需要提出专业性意见，也负责把选出的新兵送到他们的营地。

这一整套做法明显地违反了一条革命原则，即平等的原则。不管最初的抽签选拔做得如何公平，最后能花钱找替身这一特权显然是对富人有利。以科多尔省为例，在帝国中期一名替身的代价是2000—3500法郎，被征入伍的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付得起这个价钱。更何况拿破仑企图通过控制报名和体检这些早期环节来消灭舞弊的办法是否十分成功也是大可怀疑的。

但是，如果说平等的原则在这一方面受到了损害，那么在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方面却受到了国民公会、督政府和拿破仑的一贯遵循。革命军队从建立之日起就为那些雄心勃勃、满腔热忱的年轻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拿破仑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个传统。的确有可能从最低一级晋升到最高一级，拿破仑手下的元帅们的履历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晋升不是靠出身或文化水平，而是靠作战英勇。荣誉只能通过战斗中的实际行动来获得。尽管拿破仑颁授各种勋章或荣誉称号时从不吝惜，但区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关键是作战的素质。这样一来，现在军官们与旧政权的军官相比，要和士兵们接近得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像今日一些技术兵种存在的那种关系，例如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里的全体乘员常常不重视

他们之间的军阶差别。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军队中，这种没有差别的现象之所以更有可能发生，也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由专职军人组成的总参谋部。

但是不难认为这一时期的征兵像20世纪那样有条不紊。在1800年到1812年之间，拿破仑共征召了约110万法国人。即使是1812年到1813年的紧急征召，其人数也远没有达到应服役名册上的一半。随着需要的增加，拿破仑先是使用外籍军团，然后使用盟国和仆从国的军队。但是，这种表面上有节制的做法掩盖了这个制度内在的一些过火行为。这些过火行为使服兵役从光荣的义务变成了广泛的苦役，特别在1805年以后战争变得几乎连绵不断时更是如此。例如，在1803年有17万以上的1792—1799年度征召的士兵仍被留在部队里，并且一直无限期地留下来。那些当年未被征召的或已经找替身的人也并不保险。因为难保日后不征召那些属于以往应征年度的人服役。这种情况1805年就出现过。最后，在极度需要的时候，应征年度也可以提前。例如，为了尽力弥补在俄国和莱比锡战役中遭到的损失，提前于1813年10月征召了应该在1815年服役的人。这样的年轻人从法律上说不到服役年龄，然而在1814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约有8万名这样的人在兵营受训。正是这些弊病使许多法国人认为征兵制是不可忍受的，以致拿破仑的许多坚决支持者在1815年的危急时刻还企图说服皇帝不要再进行征兵。

除法国之外，普鲁士是在这个时期里社会和政治解放与军事上全民服兵役同时并举的最重要的国家。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的几个月里，施泰因和他的革新派同行们一致认为普鲁士的解放需要有一支全民的军队，而在普鲁士，只有通过给予所有普鲁士臣民以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权利才能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同法国一样，政治上的解放和军队实行征兵制成为全民武装的两大支柱。

诚然，这些革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疑虑重重和拿破仑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受到阻碍。国王的态度很重要，因为他是整个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里保守思想的典型。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由义务兵或民兵组成的军队对职业军队的效率是一种威胁，也是对国王权威的潜在威胁。拿破仑根据1808年9月的巴黎条约，不准普鲁士军队总数超过4.2万人，并且禁止建立民兵。现在很清楚，甚至后备役的替换制也是建立在非常有限的基础上，因而在1813年实际上没有组成一支人数众多的民族解放军。但在另一方面，为了播下

新思想的种子以便在情况好转时就能获得丰收，做了许多工作。新的陆军部自1809年后在沙恩霍斯特的主持下消除了对1806年的惨败起很大影响的民众与军队之间的隔阂。征兵和培训军官方面的改革也向同一方向发展。当1813年危机到来时，全民动员的概念已经过充分的辩论和筹划，因此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采取行动。首先，东普鲁士邦议会决定动员由18岁到45岁的壮丁组成的一支后备军。然后，在1813年2月整个普鲁士实行了全面征兵。所有年龄在17岁到40岁的男子，除了已参加军队或志愿的民兵者以外，都要按东普鲁士的模式编入后备军，或编入国土防卫部队和游击队。这种精神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全民皆兵的精神是一致的，到1813年年底，普鲁士已有约30万人（占人口的6%）拿起了武器。这支军队几乎是腓特烈大王的常备军人数的2倍。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军事革新表明普鲁士和法国取得了颇为相似的进展。耶拿战役以后，普鲁士的革新者们，特别是沙恩霍斯特，急于结束贵族垄断军官队伍的情况。用格罗尔曼的话来说，“为了打仗，不一定要出身于哪个特定的阶级”。1808年8月国王的一项命令宣布：“今后任命军官职务，平时将根据知识和教育，战时则根据武勇出众，机敏过人。……在军界中一直存在的根据社会地位给予的特惠，从此一律取消。任何人，不管其家庭背景如何，都有同样的义务和同样的权利。”

国王及其亲信不久就对这种做法加以限制，1815年以前即已如此，以后就更加坚决了。但是这些革新带来的某些机构改革，例如为选拔和培养军官而设立的新的军事院校，给普鲁士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尽管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存在，但一个军官所具备的智力素质的价值得到了正式承认。

当然，全民战争时期到来的最显著的标志是武装人员和军队规模的剧增，这种战争在20世纪被称作总体战。18世纪的将领们自马尔伯勒以来，作战时投入的军队人数在5万到7.5万之间。腓特烈大王在洛伊滕和库纳斯鲁多夫战场上使用的军队只有4万多一点，而在莫尔维茨战役则更少。1796年，拿破仑在他对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的战果辉煌的战役初期，似乎只有3.5万人。在马伦戈战役时，他率领的军队增至5万。到1805年乌尔姆战役和1806年耶拿战役时，他调动的军队已各达18万到19万人，及至1812年入侵俄国时，他集结的军队总人数竟达

这个数目的3倍。拿破仑的对手们也顺着这个总趋势发展。的确，单独作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拿破仑匹敌。但奥地利在乌尔姆战役中集结成了8.5万人，在瓦格拉姆战役中人数更多。1806年普鲁士投入耶拿决战的总人数几近15万。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一致决定集中近60万军队，分路向巴黎进军。当林尼战役和滑铁卢战役在同年6月打响时，法国、普鲁士和英国的约25万人聚集在战场上决一胜负。“武装集群”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如果说从人力方面来看，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的话，那么从所使用的武器来看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一时期的武器还是在18世纪里缓慢发展起来的那些武器，而且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大革命带来了意义不可估量的道义力量，但早期的工业革命在战争的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与之相比却微不足道，尽管这场革命使英国有能力进行长达20多年的战争。

滑膛枪是当时的主要步兵武器。这种滑膛、枪口装弹的燧发火器早在18世纪初就已普遍使用，而且直到滑铁卢战役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步兵的标准武器。有膛线即来复线的枪管的优越性自16世纪以来即为人们所知。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中就有来复枪手。但是，制作来复线耗资大，而且很难与前膛装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一时期一直普遍使用燧发滑膛枪，通常还配上刺刀。这样，步兵使用的是一种近代的射弹和突击兵器合而为一的武器。

欧洲任何型号的滑膛枪或燧发枪都不是很有有效的武器。火石会磨损，枪膛因使用粗糙的火药而损坏，火药本身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也很难保持干燥。装填弹药的复杂过程使得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射击速度也很难超过每分钟1发，最多2发。子弹在约200码以外一般已无杀伤力，而且只是对较大的目标才有效。例如，法国的滑膛枪在这个距离的误差是约9英尺。因此，步兵往往要等目标十分接近时才开火。

在这一时期，阻碍发展一种真正有效的步兵武器的种种技术难题，同样也阻碍了制造出准确度高的火炮。弹道学在17世纪已经颇为发达，落后的不是炮火的理论而是实践。只要火炮还没有膛线，还由前膛填弹并用粗糙的火药发射，就不可能获得快速和准确的炮火。与步枪一样，火炮在熟练的炮手的操纵下每分钟发射一次，至多两次。由于没有消除后坐力的装置，每次发射后还得重新校正炮位。一门发

射12磅炮弹的大炮最大射程可达到3500码，但其有效射程只达到一半或更少，因此通常使用的射程要近得多。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以来的军事革新家们曾试图以统一火炮型号和加强其机动性，特别是战场上的机动性来改进野战火炮。法国的革新家格里博瓦尔在18世纪中叶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他在七年战争后出任军事总监。他缩短了炮管的长度以减轻火炮的重量，他还改进了旋膛工艺，减少游隙，从而增加了准确性。他把野战炮的口径减少为三种，即发射4磅、8磅和12磅炮弹的火炮。他还主张用马牵引火炮。此外，他的改革实践成为1778年出版著名著作《野战中新式火炮的使用》的基础。此书的作者谢瓦利埃·迪泰尔是一个团的炮兵军官，拿破仑后来在此团中任尉官。

法国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从旧政权末期到大革命和帝国时期一直缓慢但又持续地发展，这一点我们在炮兵里比在其他任何兵种里看得更清楚。^[2]尽管拿破仑是个天才，他在炮兵战术方面的革新并不比他在其他兵种方面的革新更突出。在那些年代里，炮兵总的来说沿着三个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同拿破仑本人的业绩几乎全然无关。首先，炮兵逐渐被组成独立的团而不再分散配属在步兵或骑兵中。尽管拿破仑做了一些变更，但当时在埃及和稍后在俄国，配置炮兵的最起码的单位一般是师。其次，越来越多地使用马匹牵引的炮兵，1792年4月立法议会通过的有关此问题的法案说明了这一点。最后，炮火在战场上的集中使用：炮兵的价值不再只是骚扰敌人，阻碍其在战场上集结兵力，而是在发起步骑兵袭击以完全摧毁敌人之前，在敌人的阵列里轰出一些缺口。迪泰尔的书拿破仑肯定读过，他在书中写道：

在为炮兵寻找阵地时，首要考虑的目标应是敌人的部队而不是它的炮兵。除非其炮兵对我方所掩护的部队干扰极大，否则就不必理睬。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除了为保护我方部队迫不得已外，决不要同敌人的炮兵进行炮战。如上所述，我们的主要目的必须是在能够摧毁敌人的部队或他们的掩体时向他们开火。

炮兵的相对力量和重要性在第一帝国的战争中不断增长。这或多或少是对兵员质量下降的补偿，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表示拿破仑的天才日趋衰退，遂渐渐以蛮力替代计谋。在1805年和1806年的战役中，帝国陆军平均每千人配备两门大炮，到1809年的战役时这个数字略有增加。到了1812年增至每千人三门半大炮，在战役的某些阶段这个比

例还要更高些。1796年马尔蒙在卡斯蒂利奥内用19门大炮突破了敌人的战线，而1809年在瓦格拉姆和1812年在莫斯科，为了完成相似的任务集结了100多门大炮。在滑铁卢，拿破仑在战斗开始时也集结了同样多的大炮。

既然提到滑铁卢，那么注意一下下述情况也是很有趣的。在那场战役中，英国人用马匹牵引的炮兵证明要比法国人的优越，而英国人当初正是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这种机动的重要性。1818年，法国陆军部设置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英国人通过改进马拉炮兵的组织，“已经把野战炮兵发展成一支新兵种”。

骑兵除了执行侦察，在进攻和退却中担任掩护，和在远离主力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独立作战外，在战场上也一直起到重要作用。自从火器出现以来，有关这些作用的性质和适用于骑兵的武器的概念有过很大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骑兵装备有火器，通常是一支短小的马枪，一般说来无多大作战价值。在另一些场合，像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克伦威尔和马尔伯勒等司令官们则坚持认为，骑兵在战场上的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突击武器，应使用冷兵器马刀。在保护步兵战线薄弱的侧翼方面，骑兵的作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在进攻尚未突破的步兵阵线时，其价值颇令人怀疑。

大革命初期的年代里，法国军队的骑兵极为薄弱。许多逃亡贵族原来都在骑兵团中供职，有时整团整团投向敌人，骑兵的专业性很强，无法迅速重建。而且，作为由诸兵种合成、能独立作战的单位而组成的师的建制逐步发展，导致使用骑兵的规模日趋缩小，骑兵与步兵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和灵活。把马刀而不是火器视为骑兵适用的武器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了。

拿破仑作出了几项重要改革。首先，他把重骑兵团的数目由25个减到14个，减了几乎一半。但他把保留下来的那些团装备成名副其实的重骑兵，他们着用胸甲和背甲。他们从未被分散成师属骑兵，而是保持下来当作战场上后备的突击力量。他们的编制是单一兵种组成的旅或师。滑铁卢战役的那天下午以密集队形冲击威灵顿方阵的就是内伊指挥下的胸甲骑兵。

拿破仑的第二项改革是大量增加普通骑兵团和轻骑兵团，逐渐把龙骑兵从骑马的步兵改造成真正的骑兵，使他们更像猎骑兵和骠骑

兵。这一时期整个欧洲都在把龙骑兵从一支独立的兵种改变成常规骑兵。拿破仑把大部分轻骑兵、猎骑兵和骠骑兵作为军属骑兵，一个军配有二到四个骑兵团。余下的轻骑兵被编成旅，与龙骑兵一起组成骑兵后备队。这支后备队即使在战场上的突击中用不上，也能用来进行追击。这种追击有时能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转化成一場击溃战。在乌尔姆战役和耶拿战役中，这种骑兵追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一时期各国武装部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实际上自16世纪的矛枪兵以来他们一直是如此。大量装备和训练步兵要比骑兵和炮兵更容易。总的说来，步兵在发展这一时期的战术上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以及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步兵的通常作战方式是排成横队。横队中步兵部分由二至三行滑膛枪手组成。他们有时一起开火，有时各自开火，有时整个横队一起开火，有时以连、排为单位开火。前文中已指出，滑膛枪不那么有效，因此步兵火力的目的是通过持续不断的齐射来造成威胁。但是除非距离较近，否则就是这种齐射的杀伤力也不大。这就意味着步兵必须靠高度的队形纪律来弥补其火力之不足，而这一点是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达到的。

法国在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步兵在战斗中的最佳展开方式肯定有过不少探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军事评论家都认为排成横队是一个好办法。其最严重的缺陷之一是在战场上组成横队往往要占用好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而正在列队的部队通常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吉贝尔就认为步兵横队尽管在火力控制和防御上是最好的战术部署，但在进攻时密集的纵队有时更有效，特别在地形起伏的战场上更是如此。吉贝尔还认为，在排成横队以前，以营为单位的纵队在战场上更容易展开，而且在战斗进行时调动也更快速。他写道：

在30年前和今日的一些军队的战术中，为组成横队而进行的调动过程非常缓慢和复杂，往往要用好几个小时。队形必须在远离敌方的安全地带排列，而且一旦组成，要改变它是很危险的。但是采用我的方法，就可以在尽量晚的时间和尽量接近敌人的地方安全地组成队形。而且在队形组成后还可以改变其序列，也就是说，根据敌情采取对应措施。[\[3\]](#)

在大革命前的20年里，在法国横队形的主张者和纵队形的拥护者不断进行舌战。结果，1791年制定新的步兵操典大体上是一种吉贝尔所主张的折中办法。这个一直沿用到1831年的操典在许多情况下倾向

于使用横队；但通常组成横队的方法是先排成密集的纵队，而且纵队在进攻中的一些优越性也得到认可。换言之，指挥官有权依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使用横队或纵队。

在同一时期，另一个争论不休的有关问题是在主要阵线前布置散兵活动的利弊。那些神出鬼没的散兵对有条不紊的阵列的骚扰作用在18世纪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肯定在奥地利军队中已经使用。奥地利人用一伙克罗地亚人作散兵。萨克森元帅从中得到启发，在他自己的军队中也配备了散兵部队。英国人用来复枪手组成别动队，使之担当相类似的角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们用此来对付森林地带的狙击手。尽管1783年以后解散了别动队，但到了1800年在英国军队中重又出现轻步兵或来复枪队。有名的来复枪旅实际上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这种轻步兵在营一级有选择地组成，装备有轻型步枪并接受散兵作战的特别训练。法国人在1791年的操典中没有专门提到这一问题。但是现代法国权威们声称并不是因为官方反对散兵活动，而是为了让指挥官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见机行事。

那些在1789年之前大体上只是泛泛而论的题目，到了1792年就变得具有非常现实的重要。革命的法国最初同欧洲的各王国进行战争时，并没有突然摆脱老传统。1792年和1793年，法国的将领还倾向于使用横列队伍，因为他们军中老兵都是这么训练出来的，而新兵最初也适应了这套旧办法。瓦尔米战役就是这么打的。使用密集横队进攻也尝试过一两次，例如在热马普战役，但结果不大令人满意。然而，到了1794年，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大量新征入伍，虽然士气并未低落但纪律松弛的法国北方军中，要以横列队形作战实际上已不可能。于是大量法国步兵分散成散兵作战，在进行骚扰射击时隐蔽起来，遇到反击时就后撤。洪得夏乌特战役的情况就是这样。沃尔莫顿的汉诺威兵团与一大群法国散兵打了四个小时。那些散兵受到攻击时退到树林、篱笆和建筑物后面隐蔽起来，不断射击，直到把他们面前的横队完全打乱。

这种松散的队形是勇敢但缺乏训练的热情战士们的自然反应。但是那些法国的新入伍士兵一直在很快地取得经验。事实上，有效的散兵战同列成横队作战一样，都需要熟练的战士。下一步就是由那些专门训练的散兵为列成纵队的步兵发起进攻打乱敌军铺平道路。这种情况在1794年9月的斯普列蒙战役中曾出现过，进攻的纵队上着刺刀冲入

敌阵。这些纵队跟在散兵的后面，以连或分队为单位组成，其纵深有24人或12人。不管是哪种组成，只有前两行能使用火器，其余的人只能靠人多硬冲来完成任务，但用这种做法对付一支已被散兵火力打得凌乱不堪的单薄的横列队形却十分有效。

到1795—1796年，法国的混合编队作战已臻于完美。这是由散兵、横列队形和纵列队形相结合，再加上炮兵和骑兵的支援。这种混合编队可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情使用各种战术。但基本上是以散兵骚扰敌人战线，用仍排成横列的各营来阻挡敌人，不让它进行有效的集中，最后在选定的地点用纵队进行突破。

不管是因为革命热情引起的士气高涨还是因为战术的确优越，法国军队使用散兵和密集纵队横扫了整个欧洲。纵队在多次战斗中证实比横队优越。然而，如果横队中的士兵训练有素，指挥的将领在使用横队时能适应新的情况，那么新战术仍可能被旧战术击败。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就做到了这一点。纵队在与未被打乱的步兵横队对抗时处于十分危险的无防御状态。训练有素的火力总是要比单纯的勇猛精神更为优越。以下两段引文把这个问题的实质阐述得十分透彻。第一段引文出自1802年出版的一本作者佚名的英文小册子。

法国军队是由混合编队的士兵组成的。他们是些新入伍的毫无经验的志愿兵。最初他们遭到挫折，但同时战争也造就了一批军官和战士。在开阔地带，他们把军队编成纵队而不用横队，因为他们要保持横队队形有困难。他们把进攻作战的范围缩小到某些点上，向这些点投入整旅整旅的部队，不断地用新部队补充那些被击退的部队，直到把敌人打败，占领阵地。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无法按常规作战，于是企图把战斗范围局限于一些重要地段上。这种办法奏效了。只要能取得最后胜利，他们就毫不顾及损失。他们不爱惜他们的士兵，因为他们不愁无人补充。数量上的一贯优势是他们的有利条件，只有高度的技巧和指挥恰当才能与之对抗。

第二段引文写出了情况的另一面。它选自比若在1815年后所写的著名的叙述。

英国人普遍占据着一些精心挑选的居高临下的防御阵地，他们只暴露出兵力的一部分。首先进行一阵通常的炮战。不久，我们就匆忙地向前推进，既不研究阵地的情况，也不考虑是否有可能从侧翼进攻，只是从正面硬攻。离英军阵线约1000码时，士兵们有些激动，相互招呼着加速前进；纵队开始有点混乱。英国人静悄悄的连枪都不举，沉着得看上去像一堵长长的红墙。这情景无疑对我们年轻的士兵产生了影响。我们很快就冲

得更近了，高喊着“皇帝万岁！冲啊！上刺刀！”士兵们用枪口挑起军帽，开始跑步前进。激动引起了混乱，队列有点乱，我们一边打枪一边向前冲。但英军的阵线依然静悄悄的，一动不动。甚至当我们离他们只有300步时他们还是不举枪，似乎根本无视迫在眉睫的风暴。对照十分强烈；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敌人这么久不开火，那么，控制了这许久的火力一旦发射出来，一定够我们受的。我们的热情冷下来了。英国人那种即使只是表面上的不可动摇的坚定沉着压倒了我们闹闹嚷嚷、令人发昏的混乱，使我们发慌了。就在这极端激动的时刻，英国兵抬起了枪口。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使我们许多人停住了脚步。敌人开火了，他们持续不断的密集齐射横扫我们的队伍，使我们伤亡惨重。我们回过身来想重整旗鼓。就在此时，敌阵中爆发出三声震耳欲聋的欢呼，在第三声欢呼声中他们冲到我们跟前迫使我们狼狈逃窜。[\[4\]](#)

但是这类英国人胜利的故事只是表象，不应无条件地接受。首先，拿破仑知道纵队只有在充分做好准备的战场上才能取胜。他曾说过：“即使在开阔地带，纵队只有在压倒优势的炮火准备后发起进攻才能突破横列队形。”而威灵顿尽管对横队信心十足，也知道这种队形需要有掩护。对他同法国人进行的战役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他只要条件许可，总是首先用自然地形，其次用布置在前面的散兵，最后用侧翼的炮兵和骑兵来掩护他那由步兵组成的横队。

这一时期的军队还在另一个方面打破了过去100多年来的传统。大多数18世纪的军队缺乏机动性是因为他们通常得依靠预先储存好的仓库进行补给。很难说这是对30年战争中野蛮和破坏的一种反作用，还是许多士兵常有的那种出于人类本能的小心谨慎。客观事实是仓库决定了交通线，从而也决定了作战的规模。

吉贝尔在这一方面同他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预见到了打破传统，获得机动性和突然性的好处。如果军队不受其补给的限制，能按自己选择的路线运动，它就能获得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吉贝尔写道：

一个好的军事管理当局从一个地区的资源中能够获取惊人之多的东西。我指的是像佛兰德和德意志大部分那样的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地区。我的观点既不排除他，也不极端。我不会对一支军队说：“不要辎重队，不要仓库，不要运输工具；要经常依靠所在地区就地供应；必要时得向乌克兰的荒原进军；上帝会给予你们食物。”我认为军队应该有辎重队，但数量应尽量少，应同其兵力相称，应同其作战地区的自然条件相称，也应同一般作战所要求的物资力量相称。如果军队的出发点是河流或边境，就应以此为基地，选择从防御和作战计划方面看都适当的地点，建

立仓库和兵站。但如果必须进行一次大胆的作战或强行军，军队就有必要打破常规。设想敌人出乎意料地在我方无法也不愿进攻的地点立足，我们如果向其侧翼进军则定能将其赶跑或从后面包围击溃。按现在的做法，进攻方向一变就得重新安排兵站和运输线。为了设置这些新仓库不得不花15天时间。我想避免的就是被供应限制住我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运动是主要的，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我必须要它们服从我的运动。我们一定得在敌人以为我们被供应问题捆住手脚时能前进。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必须出其不意，使敌人无暇喘息，使它在付出代价后认识到一条经久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在一支组织严密、头脑清醒、有耐心、能机动作战的军队面前，没有什么阵地是能够守得住的。一旦紧急情况过去，我方的运动达到了目的，后勤补给就可以恢复通常那种有条不紊的制度了。[\[5\]](#)

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建立就地征集军需的制度，既是根据某种军事理论，也是出于当时国内行政管理混乱状态的逼迫。拿破仑在1796年3月接管衣衫褴褛、饥饿不堪的意大利远征军时，他告诉他们出路在于征服米兰和富饶的伦巴第平原。显然，对获胜的军队来说，只要他们的战场在富饶的人口稠密地区，这就是维持供给的办法。1812年波兰和俄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正如克劳塞维茨后来指出的，靠士兵各自觅食来维持一支军队是行不通的。如果一支军队要“就地生存”，那就得按正常手段依靠地方当局有计划地征集。

如果不对拿破仑在上述种种发展中作为一个将领所起的作用作一番评价，那么，本章的概述将是不完全的。首先应指出的是拿破仑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革新家。在这一方面他无法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或腓特烈大王相提并论。他对武器或战术的发展并未作出任何重要贡献。甚至在他专修的兵种炮兵方面，他也只是在中期和后期的那些战役中才发明了密集炮火掩护。即使如此，他使用炮兵的方式，也并不表明他发展了一种新战术概念。在各兵种中，各类武器的应用和使用这些武器时的战术观点更多地出自路易十六时期的革新家和大革命初期军队的实践而不是出自拿破仑本人。这种评价也适用于“全民武装”这种庞大军队的发展过程。据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说过：“我打了60场战役，可是除开我一开始就知道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对他的将才，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完全确切的评价。

那么，拿破仑作为一个“伟大的统帅”杰出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能调动非常庞大的、有时多达20万以上的军队，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驰骋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他能神机妙算地把这支大军运动到预定的阵地迎敌，把敌人各个击破。他还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集

中起绝对优势的兵力。拿破仑把革命的激情和军事上打破常规的做法发展到登峰造极。“闪电战”既是第一次意大利战役的特色，也是乌尔姆、奥斯特利茨和耶拿诸战役的特色。后来的各次战役也表明他有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各个击破的本领。事实上，滑铁卢之战尽管最终失败了，但开始时却颇有希望，有着与以往同样的成功因素。侵俄战争失利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拿破仑作战的地域一开始就过大，无法亲自予以有效控制；部分是因为道路和农业状况大大低于西欧的水准，不可能进行迅速的运动和就地取得补给；还因为俄国人能够后撤，而且他们决定后撤而不是死守硬拼。

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指挥才能，这种能在敌人的部署上找到弱点并迅速集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给予打击的指挥艺术，还产生另一个后果。拿破仑是亲自计划、亲自指挥各次战役的。他觉得如果不把全部细节交代清楚，他就连最有经验的元帅也信不过。因此，他没有建立常设的参谋机构，也没有留下参谋工作的传统，与他同时代的普鲁士革新家们，不管有什么短处，在这一点上都比他聪明。他们已完全认识到个人领导的害处，因此吸取经验教训，建立了常设的参谋机构。这一点是普鲁士军队在19世纪获得较大成功的奥秘之一。

二 海军

吉本在谈论军队时说，将它们用于“临时性的无足轻重的较量”的那种战争的年代，到了纳尔逊和拿破仑时代就结束了。这时，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战争，其规模已发展到空前之大。代表海军将才的纳尔逊和代表陆军将才的拿破仑在集中兵力这个基本战术原则上完全一致，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纳尔逊所说，“只有依靠数量才能消灭敌人”。而且，由于旧的“作战指令”已被新的信号手册（特别是霍姆·波帕姆爵士的《航海词汇》）所取代，纳尔逊就享有战术上的自由。这使得他能像在尼罗河战役中那样非常杰出地随机应变，或者像在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那样精密地设计出独特的攻击方式。那时期英国海军拥有大量才华出众的军官，这就使他能够取得成功。在他的率领下获得胜利的舰队是由圣文森特勋爵训练的，他的“那帮兄弟们”受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洗礼。一种新的领导精神补偿了当时行政机关中的种种缺点，而他的对手却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和大革命早期过火行为的影响，其效率受到了损害。

如果说风帆时代的海上力量是依靠一支高效的作战舰队、一支兴旺的商船队，以及一批能对殖民领地发动攻击的海外基地这三个因素的话，那么，战争开始时英国处于有利地位。尽管如此，负责战争总方针的邓达斯所采用的传统战略，受到了海军当局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这种战略消耗资源。在征服殖民地的政策方面，由于1795年取得好望角，1796年取得锡兰等地而大获收益。但在欧洲大陆，经过八年的战争连一个立足点都没有得到。英国人好几次在欧洲大陆上登陆，都遭到可耻的失败。直到战争后期，先在埃及和意大利南部，随后在西班牙，两栖作战的战术才逐渐完善。海上力量的进攻性用途，即在敌方漫长的防御线的任何一点上登陆并维持一支部队的能力，得到了成功的示范。威灵顿曾告诉一位海军军官：“要是有人想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我就告诉他，正是由于我们的海上优势我才有能力维持我的军队，而敌人却做不到这一点。”^[6]

随着拿破仑的势力扩张到整个大陆，封锁他的舰队和破坏他的贸易就需要集中更多的舰只。封锁战略是从上个世纪发展而来的，但战

术的变化却仍不过是理查德·豪和纳尔逊的公海远距离封锁以及圣文森特、康华理和科林伍德主张的近海封锁。由于当英国战舰驶离战位时，法国舰队就有机会突破封锁（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前一战术的成功遇到困难。对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加的斯和土伦的近海封锁，最后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不仅需要参加封锁的舰艇和人员有极大的耐力，而且还需要用后备舰艇来替换和补给在战位上的舰艇，这样的后勤支援，耗费浩大。然而，如马汉所说，正是“这些从来没有被拿破仑的‘大军’看在眼里的、远方的历尽风暴的舰艇，挡住了他统治世界的企图”。[\[7\]](#)

不管这个战略是由战列舰或是由快速巡洋舰来执行，对它的最大考验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项政策是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使法国再也不可能成功地入侵英国之后制定的。法国有人主张一方面让英国为了封锁几乎整个欧洲的海岸线而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又不让它进行海外贸易，这样就会把它拖垮。但是通过扩大信贷制度，发展新的贸易方式以及赫尔戈兰等地为基地进行有组织的走私等办法，英国出口的实际价值从1805年的1100万镑增加到1811年的4300万镑。[\[8\]](#)

法国人采用武装私掠这种传统的办法来破坏英国的贸易。作为对策，英国在1798年制定一项法令，规定除了特许的走私船（为它们支付的保险费较高）之外，所有船只必须有军舰护航。从西印度群岛或波罗的海起航的庞大船队往往只有一到两艘快速帆舰护航，但在危险水域布置了支援舰队。到了战争末期，船队被敌方俘获的危险已很小。私掠船依然在英吉利海峡出没，因而劳埃德保险社的保险商们对海军部施加压力，要求给予更好的保护，但是显然这种袭击对法国人已无多少好处。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舰队的活动，欧洲大陆从海外的进口几乎完全停顿了。[\[9\]](#)

法国在1793年2月对英国宣战时，没有一支值得称道的海军。为了同一支拥有115艘战列舰，总数达400艘的敌舰队作战，法国人只拼凑了246艘舰艇，其中战列舰只有76艘，而真正能服役的不过27艘。这些舰艇是旧政权的海军遗留下来的，但雅各宾派对军官阶层的敌对态度使服役的海军军官所剩无几。港口一片混乱。1791年的法令取消了商船队和海军之间的一切差别。海军陆战队被解散了。当时盛行的平均主义解除了一切纪律的束缚。莫拉·德·加尔在他从布雷斯特起航的

首次短程巡航中抱怨说，他根本无法使50个以上的水兵在一定的时间里留在甲板上。[\[10\]](#)

对旧海军最激烈的抨击来自让邦·圣安德烈，他是一个对海军并不甚了解的煽动家。由于他对这个贵族化职业“不可一世的骄横”有着刻骨仇恨，大委员会于1793年9月授命他组建一支共和国海军。但这一步为时已晚，无法挽救土伦的舰队。英军在12月撤离土伦之前胡德焚毁并俘获了42艘各类舰艇。让邦尽管比不上卡尔诺，还是靠着 he 充沛的精力在布雷斯特成功地建立了一支新舰队。无能的莫拉被维拉雷·德儒瓦斯所取代。后者在1791年还只是海军上尉，到1794年就升为海军元帅了。旧海军的另一些人员，像范·斯塔贝尔、尼埃里和冈托姆等人，尽管出身资产阶级，同样很快地升为将官。著名的舰艇设计师萨内像过去为旧海军建造舰艇一样，为新海军继续造舰。维拉雷的舰队在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表现出来的狂热勇气使让邦的工作大增光彩，但这次的经验告诉他光靠革命热情而没有训练和纪律是不够的。一支2.5万人的海军炮兵重新组成了，军官也不再由士兵选举产生。对海军军籍登记进行了修改，使8.8万名海员有义务服兵役。1794年2月用三色旗取代了波旁王朝的白色旗，以象征这种新的精神。[\[11\]](#)

由于担心各军港不效忠而在国民公会时期开始的海军行政机构的集中化，到了督政府时期继续进行。当局着手重建一支拥有1300名军官和6万名水兵的职业化共和国海军。越来越多的旧海军军官被重新起用，其中包括布律埃斯、维尔纳夫和德克雷等人。同样，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也把陆军的方式应用于舰队。水兵被编组成营。在比旧时更广泛的选拔基础上建立起由将、校、尉级军官组成的领导阶层。1810年，作为候补军官的少年们登上了为他们设置的训练舰艇。不管是在岸上还是在港内的舰艇上，训练都很紧张，但这还是无法弥补航海和作战经验的缺乏。事实上，法国海军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纳尔逊和拿破仑所开创的那种战争艺术上的革命。

1801年到1814年间德克雷领导海军部的整个时期始终贯穿着一种毫无生气的战略态度。除了远征埃及和1805年的舰队活动，那些偶尔突破封锁外出的巡航都由于指挥官避免战斗而毫无建树。德克雷千方百计不让皇帝把舰队用于进攻，所以皇帝完全有理由埋怨他找不着一位不惜牺牲几艘舰艇来赢得胜利的海军将领。这种战略方针是“保持

一支舰队”。按这位海军大臣之见，只要法国及其盟国在它们的主要港口建造足够多的舰艇，英国的海军力量就会被削弱。因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海军主力被摧毁后制订了一项大规模造舰计划，建造了83艘战列舰和65艘快速舰。结果是尽管法国在战争中舰艇损失惨重，到1814年舰队还拥有103艘战列舰和157艘快速舰。这场海上战争的特点从双方的损失对比中足以窥见一斑。法国在战争中被俘和被击毁的舰只共有377艘，由于舰只失事而损失的是24艘，而英国相应的数字是10艘和101艘。[\[12\]](#)

拿破仑从他前任手中继承的另一战略方针是进犯英国。雅各宾派在开始这场战争时原打算派5万名法国军队在英国登陆。1796年隆冬当奥什的入侵部队抵达班特里湾时这个计划几乎实现了，但当时天气坏得根本无法登陆。拿破仑设想的各种计划在此无法细述。但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到1805年8月已有2343艘船只能从海峡各港口运送167590名士兵去登陆，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进行牵制的庞大计划也似乎准备就绪，然而能立即登船的士兵人数却不到10万人。英国非常成功地阻挠了皇帝的那些计划，因此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惨败之前，皇帝已把他的战略转向征服欧洲大陆而不承认他曾企图进犯英国。[\[13\]](#)

除了在1827年的短暂时期里为克拉伦斯公爵重新设置海军最高长官这一职务之外，英国海军一直由海军部和海军委员会共同管理，直到海军委员会（连同分管粮秣、运输和伤病员等下属委员会一起）于1832年被取消为止。1778年到1790年查理·米德尔顿爵士任海军委员会长官时，以及1805年到1806年他作为巴勒姆勋爵任海军大臣时，负责军事和行政工作的海军部同负责文职人员和供应的海军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最为融洽。然而他认为这种两元制不会令人满意，因为海军委员会长官的地位仅次于海军大臣，是海军一切事务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在海军部里也应占有一个席位。当他的改革意见遭到否定后他辞职了，但在一段时间里继续担任顾问。[\[14\]](#)

在1801—1804年间圣文森特任海军大臣时，这两个机构的关系最为紧张。作为行政长官，长期以来他深信“海军的文职部门腐败透顶”。战争刚一结束，他就不顾海军委员会的反对，以充沛的精力亲自着手调查各造船厂。他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朴次茅斯已经够糟了，而查塔姆更是无法形容。”以严厉著称的圣文森特轻而易举

地破坏了早期工联主义者约翰·加斯特领导的一次造船工人罢工。但当阿丁顿内阁因拒绝采取行动对付木材托拉斯这样强有力的组织而“反抗”时（圣文森特原话），他以辞职相威胁，迫使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然而在1804年，皮特成了圣文森特的辉格党同人福克斯称作“经纪人造反”的代言人。他对海军的所谓无能状态的攻击导致了政府的倒台。圣文森特误以为和平能够持久，因而的确限制建造小舰艇，并且没有充分利用商船造船厂。但是当海军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随后几年公布时，他所指控的掠夺和投机行径证明确有其事。

[\[15\]](#)

这就是他留给后任梅尔维尔勋爵的遗产。1805年4月对海军财务局的第10号调查报告公布时，梅尔维尔被控在1792年经管此机构时滥用公款。通过了一项对他的不信任案，但在实际弹劾中（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这样的弹劾）却以他不是有意造成那些损失为理由，宣布无罪。[\[16\]](#)正是这次审判使科贝特成为政府的批评者，也使当时最杰出的快速舰舰长科克伦勋爵成为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

梅尔维尔下台后巴勒姆重任海军大臣，他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后一个海军军官。在他的短暂但十分重要的任期内，海军的两个部门实际上合为一体。这位八旬高龄的海军上将除了筹划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外，尚有余时进行许多行政改革。他将海军的工作部门化，并禁止海军现役军官请假去参加议会的会议，虽然他尚未禁止他们当选为议员。各种规章都予以刷新，1808年增订的《海军部军官规章和指令》基本上是他一手制定的。最后，他建立了新的文职设计师和工程师办公厅来代替1796年成立的海军工程总监办公室。

这个机构在1813年撤销之前，担任领导的是塞缪尔·边沁将军，他是杰里米·边沁的兄弟，曾在俄国长期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他为造船厂的革新做了不少工作。1795年他把蒸汽机应用于抽水和驱动马克·布鲁内尔爵士发明的大量生产船台垫块的机器。他还聘请伦尼修筑了普利茅斯港的防波堤，此后该港代替托尔贝成为海峡舰队的主要锚地。他在他的继任者威廉·塞宾斯爵士（自1813年至1832年任监督官）之前就使用对角桁架和水密舱来加强船体，不过用这种新方法建造的第一艘大舰是1815年的“豪”号。[\[17\]](#)

这一时期军舰的船体除了开始使用椭圆形船尾和船体稍许加大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由于上甲板的大口径短身炮的数量大为增加，根据火炮的数目来确定舰级的旧办法变得十分混乱。于是在1816年统一制定了下述新标准：一级舰为三层甲板的战列舰，有100门以上的大炮和800名水兵。二、三、四级舰为双层甲板的战列舰，分别拥有80门、74门和50门大炮。五、六级舰为单甲板的快速舰，分别拥有36门和24门大炮；各舰的任务是巡洋，不属于战列舰范围。那些较小的双桅炮舰和单桅炮舰不属于大型舰艇，由低于上校级的军官担任舰长。1803年，英国各皇家造船厂的规模可以用它们所雇用的造船工匠人数来作比较。德特福造船厂是420名，伍尔威奇是360名，查塔姆是640名，希尔内斯是180名，朴次茅斯是900名，普利茅斯是800名。一些工匠被选送到朴次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以便形成一支海军造舰的力量。

这些庞大舰队的建造和维修造成了比上个世纪更为严重的木材缺乏。造一艘730吨级74门炮的军舰需要1977车橡木，570车榆木，139车杉木和2500车松木，共值4.7万英镑。在战前，除了建造商船要用木材约8万车外，建造军舰约用2.5万车。一个委员会预料到英国橡木的短缺，建议使用杉木，结果战争中一些军舰是用从加拿大进口的杉木建造的。另一种尚未开发的木材资源是印度的柚木。孟买的工匠们于1805年用柚木建造了第一艘快速舰，在战争结束前还造了几艘一级战列舰。为了节省木材而采用的其他办法还有用“墙式船舷”来代替老式的“内倾式船舷”，以节约弯形木料；用铁制支架来代替木制肋材。拿破仑封锁波罗的海的企图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旧有模式，使得从北美洲进口木材的比例从战争开始时占原进口量的1%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的54%。1803年圣文森特攻击整个合同制度时，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木材危机。商人们在海军委员会和下院一部分人的支持下，拒绝提供木材直到政府倒台为止。这种自私的做法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敌人的政策。[\[18\]](#)

自1779年开始使用近程的大口径炮以来一直到战争结束，在大炮方面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改进。英国水兵在使用大炮和小型武器方面的训练远胜于他们的敌人，英国人的射速约为每2分钟3发，但有效射程只略大于1/4英里。然而，大部分海战是在更近的距离进行的。纳尔逊在给向他建议使用一种新式瞄准器的人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想看

看这种瞄准器。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像往常一样尽量接近敌人，这样，我们的炮火就不会错过目标。”^[19]实际上，海军军官们依然靠操纵军舰而不是靠操纵大炮来达到舷炮齐射，而且在作战中主要采取登上敌舰将其俘获的办法而不是将其击沉，因为实心炮弹除非偶然引起敌舰爆炸，否则是很难击沉木质军舰的。这是海军的伤亡远比陆军为少的主要原因。甚至在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中英军仅有449名阵亡，而敌人损失的4408人中大部分是在战斗结束后的风暴中淹死的。但是英国军舰在同美国的哥伦比亚式大炮较量时，依靠近距离战斗的做法却失败了。哥伦比亚式炮是一种介于大口径短身炮和远程炮之间的火炮。由于装备军舰是军械署的责任，因此在训练方面没有统一性。施拉普内尔于1787年发明的榴霰弹除了用于臼炮之外很少得到应用。在战争的最后10年，炮术的标准肯定是降低了。尽管如此，如果一名军官是个热衷于炮术的人，他也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布罗克指挥的“香农”号只用11分钟就战胜了“切萨皮克”号便是一例。霍华德·道格拉斯上校对海军炮术的低劣印象尤深，他在1820年就此发表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法国受到重视，但在英国却遭到冷遇。直到1832年，他和几个有影响的朋友一起创设了“优秀”号军舰炮术学校，其后果是解散了海军炮兵队，在此之前，一切炮术问题都是由它负责的。

有两件发明将使海战完全改观，尽管这在100年之后才发生。这两件发明是火箭和潜水艇。威廉·康格里夫爵士将他发明的燃烧火箭称作“没有炮身的大炮灵魂”，1804年曾用这种火箭攻打布洛涅，后来又在海上和陆上均使用过。潜水艇同火箭一样，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但由于推进问题而同样未能进一步发展。布什内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曾企图使用水下舰艇，但另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于1803年为法国人建造的“鹦鹉螺”号才是第一艘能“钻到水下的船”。英国海军部后来雇用了富尔顿，让他建造各种型号的水雷和“鱼雷”（他起的名字）用来攻击布洛涅的法国舰队，但是大部分军官认为这些武器违反战争规则。^[20]

富尔顿的名字通常是和轮船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1802年建造“夏洛特·邓达斯”号的威廉·赛明顿被认为是航海工程之父的话，那么富尔顿于1807年建造的“克莱蒙”号则是美国第一艘商用明轮船，而他的双体船“德莫洛戈斯”号（1814年）则是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尽管它从未参加过战斗。^[21]由于使用风帆英国海军在战

争中占了压倒性优势，海军部就不急于鼓励发展蒸汽动力的军舰。尽管在1822年以后海军使用了拖轮，但明轮船不适合于作军舰。第一艘参加实战的蒸汽动力军舰是1824年缅甸战争中的“黛安娜”号。在欧洲水域第一次参加作战的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由阿布尼·黑斯廷斯指挥的“卡尔特里亚”号。黑斯廷斯和他在希腊海军中的上司科克伦勋爵都对蒸汽动力的前途十分热情。他们在1827年的作战活动促使了纳瓦里诺海战的爆发，这是风帆军舰之间的最后一场海战。

这场史无前例的漫长而大规模的战争对英国人力的需求，可以从征召加入海军的海员人数得到说明：1793年是2.4万名，1797年是12万名，1814年是14万名，到了1820年下降为2.3万名。1801年的统计表明海军征召了13.5万名水兵，商船队雇用了14.4万名海员，而当时的英国人口只有800万。征召这么多人的办法与以往几乎相同，但随着压力的增大，这些办法不得不加以扩大和补充。得到所需要的3500名军官倒不困难，因为海军比陆军的财源茂盛，他们有机会获得俘船奖金、俘虏奖金（每名俘虏得5英镑）和运送公共财物的运货奖金。快速舰的舰长们当然要比进行封锁的舰队获利更多，但将领们对在他们的封锁岗位上俘获的每一艘船只都享有1/8的收益。因此，像基思勋爵这样的指挥官，因占领了好望角而获得6.4万英镑。他在地中海服役的四年中，尽管一仗未打，但他那份战利品和运货奖金却达112678英镑。海德·帕克爵士在他西印度群岛的岗位上据说获得20万英镑，而埃克思默斯勋爵在东印度群岛则获得30万英镑。^[22]在一场战争的开始，一项“奖励海员”法令规定了分配的比例。尽管很多钱财落入了经营战利品的海军法庭的律师们手中，海军军官们仍然能发大财。随着和平的到来，艰苦的日子开始了，军官们只能领到半薪。由于没有退役军官名册，高级军官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以致许多人战争一结束就在军界之外找到了工作。

参加海军的人的年龄和来源基本上同以前一样，大部分来自英格兰南部和苏格兰低地的海军世家。尽管为了让孩子早日提升往往弄虚作假，谎报海上服役时间，但通常的入伍年龄是12岁左右。从1794年起传统的“舰长侍应生”改称为“一级志愿水兵”，二级水兵由将来担任军士长的人组成，三级则是少年水兵。舰长依然可以特别照顾某些人，但是进入海军学院必须由海军部提名，该学院在1806年改名为朴次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然而，绝大多数少年直接登舰服役。

军舰上的职务顺序是舰长或指挥官、副舰长、中尉、航海长、炮长、水手长、船工长、航海军士和见习生。见习生有许多种，一般分为老生和新生。老见习生并不指年龄大小，而是那些未能被提升为中尉或正在等待委任的人。那些代理航海军士职务的新见习生被授予临时中尉的军衔以区别协助航海军士长驶船的真正航海军士，这些临时中尉将在许许多多的小型舰艇上担任军官。要升到舰长，必须具有有利的关系，在遥远的驻地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升迁——连续两任东印度群岛海军司令的儿子在17岁时就当上了小军舰舰长；但是，此后的晋升就只能靠资历了。

当时称为海勤军官的有两种：授衔（或行政）军官和委任（或专业）军官，后者又分为诸如军医、事务长和随军牧师这些文职人员和从军士升任的航海长、炮长、水手长和船工长等人。1816年的一项法令最终确定了一些改革，使委任军官（包括军士长）的地位有所改善，以便吸引适当的人才。他们从此可以晋升为尉官，并穿着军官制服。甚至在战争初期加薪中唯一没有得益的牧师，在1812年也增加了工资，不必再依靠水兵的布施来补充他微薄的薪金了。这种提升在不断进行，但下级水兵晋升的机会却越来越小。^[23]在确定了舵手、文书军士和厨师这些职务的同时，号手、清炮手等过时的职务被取消了。舰上还有一队陆战队员，他们与其他舰上人员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执行纠察任务，自1802年称为“皇家”海军陆战队。

普通水兵中既有被战时优厚的赏金吸引来的志愿兵，也有被征兵局强征来的水兵，这个局于1793年取代了过去不定时的强征办法。然而，如果舰上人员不足，舰长仍可派出征兵队或从海上遇到的商船上强征水手。直到1795年，按法律只能强征海员入伍，但在那年制定的两项“定额”法案规定了英国各郡和城镇应提供的兵员数额，例如，剑桥郡为126名，德文郡为393名，伦敦为5704名，达特默思为394名。地方长官受命依据教区名册征兵，从地方税中支付赏金，并接受顶替人员。但实际上，人员不足时他们就从监狱中收罗往往完全不适宜服役的犯人充数。海军上将科林伍德在1797年水兵哗变后不久写的信中表达了当时颇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那些“定额人员”是这场动乱的祸根。因为他们同通信协会、爱尔兰人联合会等社团有联系（虽然并没有发现他们受雅各宾党人的直接影响）。科林伍德在信中说：“比利

• 皮特手下的人，来自各郡的志愿兵，还有那些潦倒的政客们才是真正闹事的人。他们喝饱了啤酒，一派胡言，蛊惑大众，倒霉的水兵只是为他们火中取栗的工具。……你能指望这帮从绞刑架上和监狱中漏网的渣滓干什么好事？可是这种人在这场战争里却占了我们许多军舰上兵员的大多数。”^[24]还应指出，这些人（例如在诺雷建立“海上共和国”的首领帕克和斯皮特黑德哗变领袖乔伊斯）出色地组织了1797年4月和5月的哗变。

对水兵的请愿无动于衷和海峡舰队长期的无能领导是哗变的直接起因，因为水兵的要求是出自多年来的不满。普通水兵的薪水自共和政体以来一直停留在每月19先令。现在薪水虽然提高到25先令6便士，但还得扣除给格林尼治皇家水兵收养院、随军牧师和买工作服（当时还没有制服）等种种费用。水兵们必须等军舰领到饷金后才能领取他们的工资券，而工资券在港口兑换时又被大打折扣。伙食上的舞弊是食物极差的主要原因，水兵们还抱怨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但是在这方面出现两项改进措施，规定必须分发柠檬汁以防止败血症和1813年开始提供肉类罐头。由于担心水兵开小差，当局没能满足上岸休假的要求。在战争末期，逃兵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战争结束之前也不可能放松严厉的纪律措施。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改善服役条件的倾向，这表现在废除了诸如吊打和夹道鞭笞刑等野蛮的惩罚。此外，给伤员发放抚恤金（这时格林尼治皇家水兵收养院已收养2700名士兵，达到顶点）和照顾阵亡士兵的妻子和家属的办法也有所改进。为了照顾孤儿寡妇，军舰的花名册上，记载了一些伪造的阵亡士兵的名字，他们的薪饷被用来做慈善事业。但是，哗变事件没有再度发生主要是因为纳尔逊向军官们传授了他带兵的艺术，并且用他所获得的胜利提高了水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疾病和逃兵造成的减员加剧了因维持一支庞大的舰队给国家带来的人力上的紧张情况。对战争中死亡的103660名海军的分析表明其中有82%死于疾病，20%死于海难事故，只有6%是在战斗中阵亡的。除了这些损失之外，还有113273名逃兵。^[25]如果没有18世纪最后10年里海军医学上发生的革命，因病死亡的人数可能还要多。由于吉尔伯特·布兰爵士和托马斯·特劳特医生的坚持，40年前詹姆斯·林德提出的改革措施大部分得以实现。这些措施包括对舰上的病号给予更好的治疗，采用分部门的办法使军官能更好地管理水兵，以及在1795—

1796年通过普遍分发柠檬汁来消灭败血症。几年以后开始接种牛痘，从而使天花也得到控制。只有斑疹伤寒和黄热病这两种主要威胁仍未消除。海军外科军医的地位在1805年也终于得到改善，他们成为穿制服的后勤军官，并增加了工资，因而吸引了较好的医生到海军服务。

[\[26\]](#)

武装私掠巡航和海防民团这两种职业使得征兵更为困难。当局对私掠船一直是不满的，因为它占去了海军一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1803年到1806年之间，尽管由于巡洋舰遍布海上而私掠船的收获不大，但仍然有约407万人在私掠船上工作。[\[27\]](#)为了抵御入侵，1798年成立了由渔民和沿海志愿人员组成的民兵组织海防民团，在沿海一连串的碉堡和信号台上值勤，并用他们的船只组成一道最后防线。这支民团从来就不是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它反而为许多本应该在海上服役的人提供逃避兵役的去处。在1810年入侵的危险早已过去时，民团的人数达到了23455人的最高峰，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28\]](#)

对一艘军舰上的人员所作的分析表明，其比例大致如下：志愿人员占15%，强征入伍的人占50%，按名额分配征来的人占20%，见习少年占8%，外国人占15%。[\[29\]](#)外国人中有一些是自愿参加的，但大部分是在海上被强征的，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领事途径得到释放。这部分人中最多的美国人。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交战国商船数目的减少，美国的商船激增，另一方面是因为伪造的国籍证明文件太多，很难把真正的美国公民和英国的逃兵区别开来。很可能是由于这一点，应官方要求而获得释放的美国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在1803年到1805年期间要求获释的1500名美国人中，只有273名获释。据估计，1812年有6000名以上的美国人在英国军舰上服役，其中有2500名因拒绝同自己的祖国作战而遭监禁。[\[30\]](#)依照J. Q. 亚当斯的看法，1812年到1814年的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坚持搜查商船的权利，虽然战争的根源可能在于英国要求征服加拿大。英国人要求搜查中立国的船只以寻找违禁品和逃兵，其根据是斯托厄尔勋爵提出的观点“海上司法权的基本原则是公海上的船舶并不构成所属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美国的“航行自由、运货自由”原则及属于同一类的主张“贸易自由和保护海员权利”。这一长期争端早在1806年就几乎酿成战争，当时英国军舰“豹”号的搜查队在离亨利角只有10海里的地方从美国船只“切萨皮克”号上带走了一名逃兵和三名国籍不明的人。美国的赔偿

要求遭到拒绝，这种情况直到1812年还未改变。在战争前夕，屡遭反对的那条中立国必须在英国许可下才能进行贸易的敕令被取消了，但是政府虽然能够作出一些让步，却从来没有放弃追捕逃兵的权利。这个问题在和平条约中也没有提及。

英国政府的顽固态度所依仗的是它的海军建立起来的海上霸权，而这支海军由于胜利而变得有些疏忽大意。美国只有8艘快速舰和8艘较小的军舰来同包围欧洲整个海岸线的庞大的英国海军对峙。考虑到美国海军在1798年以前遭到忽视，这支小舰队的效率令人瞠目。美国海军部于1798年成立，同时建立了一支720人的海军陆战队。尽管某些人害怕设立一支常备的武装部队对民主制度可能造成威胁，但是为了保护新兴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实际上必须振兴海军。到1812年，海军兵力已增长到4000名水兵（全部志愿人员）和500名军官，其中有许多人在同法国共和时期的“准战争”和对阿尔及利亚海盗的作战中积累了经验。但是在对英国人作战的第一年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由乔舒亚·汉弗莱斯设计的三艘44门炮的快速舰要比欧洲的快速舰更为优越。当时各国的军舰因为上甲板上大炮的数目增多，因此实力要比估计的强，一艘44门炮的快速舰实际上多装了22门臼炮。这样武器精良、久经战斗的军舰要比英国的38门炮的快速舰更为厉害。尽管如此，随着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接近尾声，英国海军把庞大的海上力量移向美国海岸，成功地切断了沿海的交通并进行了几次登陆，其中有一次烧毁了华盛顿城。马汉从中得出的战略结论是，“战争不是由几次杂乱无章的战斗或海上较量决定的，而是通过集结兵力并巧妙地加以配合使用来决定的”。[\[31\]](#)

但是在大西洋西部，私掠船的活动依然十分活跃。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军舰仅俘获165艘船只，而美国的私掠船却俘获了1344艘，其中有些船只极为值钱。新斯科舍人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但是在哈利法克斯处理的俘获船只的数字表明海军在破坏贸易方面的作用更大，海军的快速舰俘获了490艘船只，而私掠船的成绩是200艘。[\[32\]](#)若不是英国人那时已实行一套有效的护航办法，他们在美国私掠船手中的损失一定还会惨重。

英国在经过20年全球范围的海上战争之后，取得了海上霸权。虽然为了日后的和平，英国归还了已征服的爪哇等地，但从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好望角、毛里求斯岛直到锡兰的一系列基地确保了英国

通往东方的航线。尽管在战争中蒙受损失，注册的商船总数从16079艘增加到24418艘，总吨位上升了100万吨以上。^[33]与此同时，英国海军拥有军舰1168艘，其中包括240艘战列舰，这支力量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丹麦和美国的海军都被它所击败，而瑞典和俄国的海军当时尚无足轻重。英国海军独霸海洋的时代开始了，但是风帆时代的海战已经接近尾声，蒸汽铁甲舰和爆炸弹的时代即将降临了。

（乐瑞夫 译）

[1] C. 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J. J. 格雷厄姆上校英译本，3卷本（伦敦，1873年），第3卷，第54—55页。

[2] 关于这方面的发展，参阅马蒂·洛尔马《革命战争期间的法国炮兵》（赫尔辛基，1956年）。

[3] J. A. H. 吉贝尔伯爵：《战术概论》（伦敦，1772年）第1卷，第183页。

[4] 转引自S. 威尔金逊《拿破仑之前的法国军队》（牛津，1915年），第58页。

[5] 吉贝尔：《战术概论》第2卷，第58页。

[6] 《T. B. 马丁爵士信札》，R. V. 汉密尔顿爵士编（海军文献协会，1898年）第2卷，第409页。参阅《基思文件》，C. 劳埃德编（海军文献协会，1955年）第3卷，第259页及以下。

[7] A. T. 马汉：《法国革命战争中海上力量的影响》（伦敦，1893年）第2卷，第118页。

[8] E. F. 赫克谢尔：《大陆封锁政策》（牛津，1922年），第42、166、245页。

[9] 战争期间的327项报告中有200项报告表明没有获利。1803—1813年间，圣马洛的156艘私掠船只俘获170艘船只。L. 维尼奥尔：《经济史杂志》（1927年）；H. 马洛：《最后的私掠船》（巴黎，1925年）。但根据《劳埃德船舶登记杂志》，战争初期英国损失惨重——七年损失3466艘；其中有许多又被夺回。

[10] E. 谢瓦利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海军史》（巴黎，1886年），第51页。

W. 詹姆斯：《英国海军史》（伦敦，1837年），第1卷中有关于两国海军统计数字的对比。

[11] 参阅L. 雷维-施奈德《国民公会成员让邦·圣安德烈》（巴黎，1901年）；N. 汉普森：《共和二年时期的海军》（巴黎，1959年）。

[12] 迈克尔·刘易斯：《海军社会史，1793—1815年》（伦敦，1960年），第348页。

- [13] E. 德布里埃：《登陆英伦三岛的计划，1793—1805年》（巴黎，1902年）第4卷，第464—466页。
- [14] 《巴勒姆文件集》，J. K. 劳顿爵士编辑（海军文献协会，1910年）第8卷，第33页。参阅O. 默里爵士《海事录》，1938年。
- [15] 《圣文森特信札》，D. B. 史密斯编辑（海军文献协会1922年，1927年），第1卷，第378页，第2卷，第33页。参阅J. S. 塔克《圣文森特传》（伦敦，1844年）第2卷，第123、208页。
- [16] 《议会辩论集》第4卷，第255页以下。《年鉴》（1806年），第112页以下。《圣文森特信札》第2卷，第37页。
- [17] 见边沁夫人《S. 边沁爵士传》（伦敦，1862年），以及《调查委员会第三号报告》（1805年）。
- [18] R. G. 艾尔比昂：《森林和海上力量》（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26年），第115、356页。参阅《圣文森特信札》和《海军编年史》第12卷，第34页。
- [19] 《公文集》第4卷，第292页。
- [20] 关于康格里夫，见《海军杂录》第4卷，第423页以下。关于富尔顿，见《基思文件》（海军文献协会，1955年），第3卷，第7页以下。
- [21] 参阅H. P. 斯普拉特《蒸汽船的诞生》（伦敦，1958年）；G. J. 巴特利特：《大不列颠与海上力量，1815—1853年》（牛津，1963年），第197页。
- [22] C. N. 帕金森：《在东方海域的战争，1793—1815年》（伦敦，1954年），第349页。《基思文件》第3卷，第218页。刘易斯：《海军社会史》，第316页以下。
- [23] 刘易斯：《海军社会史》，第44页以下。
- [24] 《科林伍德通信集》，E. 休斯编（海军文献协会，1957年），第85页。参阅C. 吉尔《1797年的海军兵变》（曼彻斯特，1913年）；G. E. 曼纳林和B. 多布里《海上共和国》（伦敦，1935年）。水兵们的请愿书存海军部档案局1/5215卷中。
- [25] 参阅刘易斯《海军社会史》，第442页，和W. B. 霍奇在《R. 统计协会学报》（1855年）上的文章。
- [26] 参阅C. 劳埃德和J. L. S. 库尔特合著《医学与海军》第3卷（爱丁堡，1961年）。
- [27] J. 巴罗：《安森传》（伦敦，1839年），第467页。在战争期间签发了约四千份捕押许可证；见签发登记册，行政文件7/325.649。
- [28] 《基思文件》第3卷，第133页以下。
- [29] 刘易斯：《海军社会史》，第139页。

[30] J. F. 齐默尔曼：《对美国海员的强征》（纽约，1925年），第106页。参阅A. 斯蒂尔《剑桥历史学报》第9卷（1949年），第331—351页；T. 罗斯福《1812年战争》（纽约，1882年），第42页。

[31] A. T. 马汉：《海上力量及其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伦敦，1905年）第1卷，第5页。

[32] 埃塞克斯学院刊印的船名册（塞勒姆，1911年），参阅J. 麦克莱《美国私掠船史》（1899年）。

[33] C. E. 费尔：《贸易风》，帕金森编（伦敦，1948年），第83页。

第四章 文学和思想中的革命影响和保守主义

法国革命是空前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对于欧洲甚至世界的未来都会产生可怕影响，这一点没有逃出某些同时代人的眼睛。法国革命最激烈的反对者埃德蒙·伯克早在1790年就意识到他在目击第一场“完全的革命”。康德在1798年预言说：这种现象永远不能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约在25年之后，司汤达宣称：“在2000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中，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习俗、思想和信仰方面如此激烈的一场革命。”甚至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阿恩特这样吹毛求疵的观察家在回顾中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公开承认我们从那一野蛮和疯狂的革命受到极大的恩惠……不承认它把在事件发生前20年或30年大多数人只要一想到就会发抖的思想注入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那么，我就会是一个极端忘恩负义的人，就是一个伪君子。”

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使欧洲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冲击。在那初期阶段，欢乐远远压倒了恐怖。的确，大家都感到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新世界正展现在眼前。威廉·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有抒发这种心情的不朽名句：

生逢曙色多佳幸，
天堂极乐属少年。

他的朋友和合作者柯尔律治曾经用生动的文笔追怀，“希望像已经足月的神之子一样从全人类的心灵中生了出来”。青年诗人骚塞、戏剧家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以及激进派托马斯·潘恩和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也同样热烈拥护法国革命的原则。伯克进行攻击的几个月以后，麦金托什就在《为法国人辩护》（1791年4月）中作了热情的辩解。

在德意志，法国革命深深地震动了知识界。在法国革命40年之后，黑格尔把这次革命比作日出的奇景。与他同代的其他主要思想家，我们仅举极少突出的例子，如费希特和谢林，以及年迈的康德、

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维兰德和荷尔德林，历史学家赫德尔、约翰内斯·米勒和施勒策尔，全都毫不含糊地欢迎法国革命。那些在巴黎亲眼见证革命的德意志人向国内寄回充满激情的长篇报道，进一步传播了这种表示欢迎的态度。其他地方，如奥地利改革家宗南费尔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意大利诗人阿尔菲耶里，西班牙青年作家马尔切纳，瑞典政论家托里尔德，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都此唱彼和，扩大几乎震荡全世界的反响。阿瑟·奥康纳曾于1795年5月在爱尔兰议会发表演说，他的几句话绝非过甚之辞：“整个欧洲思想界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不局限于这个国家，也不局限于那个国家，而是像使革命诞生并且仍然继续哺育它成长的一些伟大事业一样普遍。”

这种普遍存在的热情基于种种不同的动机，而这些动机的总根源则是这一时代对社会和政治所抱的极端乐观的态度。启蒙运动的中心信念是相信人和社会能够达到至善的境地，现在这种信心已经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在1784年，康德曾经信心十足地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到了1792年，他仍然坚决相信人类必然向着日益完善的知识和道德的境界前进。对法国革命的广泛传播和热烈欢呼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康德证明：人类存在着一种利他的道德素质，至少在它的基本构成方面是如此。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表明拥护革命的心情时，需要有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1]

在法国，进步是人创造的这一思想的主要宣传家是孔多塞侯爵，他的名著《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是在1793—1794年动乱的日子里写成的。甚至在恐怖时代的高潮中，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孔多塞仍坚持他的人类道德在不断完善的信念，1794年4月，他为坚持自己的世俗信念而牺牲。他明确地看到了人类最光辉的前景，在《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一书中，他以大胆而哀婉的词句作为结束语：

这种冥想是他的一个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他对迫害者的记忆不会来纠缠他；在那里，他在思想中与恢复了天赋权利和尊严的人生活在一起，忘记了为贪婪、恐惧或嫉妒所苦恼并因此而堕落的人；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们生活在一个由理性创造的、为人类之爱所熟知的最纯洁的欢乐而增辉的乐土中。^[2]

威廉·戈德温在英格兰颇有影响，他在《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1793）中，曾经设想一个与过去基督教徒所期望的太平盛世没有多大区别的世俗的天堂。他预言说：“在那个

幸福的日子，将没有战争。”这一预言与仍然流行的全世界博爱的理想（即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的世俗翻版）毫无二致。与此极为相似的是，孟德斯鸠用“共和精神就是和平”一语所概括的普遍的信念。因为，不仅在革命的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大家都期望在专制的王朝、那些世世代代的苦难制造者被推翻之后，战争自然就会停止危害人类；至少，作为帝王狩猎活动的战争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由此可以推论：当人民处于作为统治者的新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战争丢在一边，因为卷入战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举例来说，这就是康德为法国人争取代议制政权的努力深深打动的原因，康德认为这种政权“不可能是好战的”。出于同一原因，他认为推翻绝对君主制度是走向代议制的联邦的第一步。这时候，康德已经开始认为战争是道德的最大障碍，但是他非常现实，并不抱有当时十分普遍的幻想，即马上就会消灭这种最大的社会罪恶。他在著名论文《论永久和平》（1795年）中，只是设想一个以日益尊重国际公法为特征的渐进过程：战争一点一点地变得更为人道，而后变得不那么经常，直到完全消除侵略行为。

相信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希望法国革命会带来人们向往已久的理性时代。尽管反理性主义的学说在18世纪从来没有绝迹，而现在又显然获得阵地，但是一般来说对理性的崇尚特别是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崇尚依然非常流行。威廉·戈德温认为理性是通往真理和美德的正确无误的向导。他是在加尔文教派中特别严格的一派的教养下长大的，但是很快就认为宗教束缚人类自由运用理性的本能而开始摒弃一切宗教，最后则醉心于智力本身。他认为由一系列理性法则体系化了的纯粹的人类理性是医治人类一切政治和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康德和黑格尔，孔多塞和戈德温，以及许多思想相同的人们，全都梦想一个理性的王国，很多人深信他们的时代正是在地球上建立这一王国的第一阶段。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1830年）中，热情地描绘了他们在法国革命最初进行立宪试验时的思想状态：

顷刻之间，理念、正义观树立了权威，非正义的旧体制经不住它的冲击。就这样，制定了与正义思想相适应的宪法，从此，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从太阳悬在天空、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以来，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亦即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而他在理念的鼓舞下建立起现实的世界。阿那萨戈拉首先提出理智统治世界的口号，但是到现在

人类才进展到承认思想应该支配精神现实的原则……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为这个时代雀跃欢呼。[\[3\]](#)

奇怪的是，另外一些人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来歌颂法国革命。在受到当时正在开展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的人们当中，最流行的思想是：这一革命已经开始在纯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人类的生活。我们也不可否认，过去在等级社会压抑之下的非理性的强大力量被革命释放出来了，对于事态的这样一种转变，浪漫主义者由于对极端理性主义持批判态度，也就当然认为是件极大的好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法国革命许多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非理性的，或者说下意识的冲动的爆发，正是浪漫主义对理性开战的信号。两种运动在热烈争取自由这一方面又是一致的。在由三种理想组成的法国革命的战斗口号中居于首位的“自由”理想，很自然地与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在最初阶段所特有的主观主义态度融合在一起。被称为“自身解放”的这一潮流可与文艺复兴中的类似倾向相比，但是远远超过了它。自古以来的忠诚和信仰的束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有松弛，但是法国革命使这一过程发展到了顶点。突然之间，一切思想和理想再次被投入了坍塌，因而某些早期的浪漫主义者认为个人本身就是唯一坚定的支柱。费希特不仅在高度主观主义的原则上发展了一种认识论的体系，而且甚至宣称，善与恶只有在个人的良知意识到它们的时候才存在。这种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大胆的青年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和他的一些朋友。同时，浪漫主义对自由的追求也不限于个人。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奥古斯特·威廉认为，每个民族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天才，因而必须容许自由发展它自己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然，要求所有文明民族同法国古典格调的僵硬标准相一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文化方面的爱国主义已经变成浪漫主义的主要副产品之一。然而，人们将会看到，浪漫主义者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错综复杂的，而且绝不是明确赞成的。

争取自由和博爱的革命憧憬，在经过充满希望的序曲之后，很快就遇到失望和沮丧，然而争取平等的伟大而艰苦的斗争却有着更为长久的影响。夏多勃里昂感到遗憾的是：平均主义的热情在法国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情绪，它像野火一般燃遍其他欧洲国家，最终又燃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虽然几经浮沉但是锐气未减。正如人类一切伟大的理想一样，对平等的原则可以作出几种不

同的解释。例如，它可以意味着所有人类不论社会地位高低都有尊严。这正是罗伯特·彭斯的诗篇《人总是人》（1795年）的主题。平等的原则也可以意味着逐渐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因而，托马斯·潘恩早在1791年就在《人的权利》中主张官办教育和建立一种在社会正义的事业中能够导致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制度。正是基于同一思想，1789年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主张所有的人，由于他们是人，都有享受福利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著名的法国科学家拉瓦锡（他后来在恐怖时代牺牲了）大概是第一个宣布这一思想为一种政治原则的人。^[4]康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竟至反对一切世袭特权，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平等的机会。他还指出，应该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当作人基本的而且确实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除非这一点能付诸实施，否则他理想中的法治国家就永远不会确立起来。自称为“人民的护民官”的巴贝夫和他在1796年密谋中的几个同伙使平等主义达到它的应有的结论，他们把产品共有和建立“一个没有贫富之分的真正社会”纳入他们的社会纲领。在政治领域中，平等的思想还意味着公民仅作为社会的一员，就有参与确定整体意志的权利。这样，政治的重心就从君主转移到产生一切主权的人民或者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标志着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阶段。在潘恩的《人的权利》中，以挑战的姿态记录了这些民主的成就，兰克认为上一世纪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思想的影响可与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相比，他把人民主权形容为“现代社会永远活跃的酵素”。

^[5]

平等思想一旦形成之后，就不能不导致要求两性享有平等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例如，孔多塞在1790年就论证说：“要么是人类之中没有任何人享有任何真正的权利，要么便是大家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任何人只要他投票反对别人的权利，无论是出于宗教、肤色或是性别的考虑，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6]支持女性解放事业的，在迄至那时为止享有特权的男性中，的确不乏其人。杰里米·边沁、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和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就是大力帮助宣传这一运动的男性楷模。希佩尔在他的论文《论妇女公民权的改善》（1792年）中发出惊异的呼声，他说：法国尽管在极力争取平等，但是还没有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巴黎的国民公会确实拒绝了要求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1793年10月30日，国民公会强制取缔了在革

命前期纷纷成立的所有妇女俱乐部。有人认为，这一镇压妇女的事件可能与发生在同一个月的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审判与处决有关。

在这方面，这一运动的一位妇女先驱者的命运是值得一提的。在法国革命前不久，奥林佩·德·古日（她是一位诗人的私生女，本人是一个二流剧作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哲学泰斗》，在这部小说中，她要求给予妇女平等的教育。革命刚开始，她就投入了火热的战斗。她的许多活动之一是创办刊物《不能再忍受》，接着在1791年9月，她大胆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然而为时不久，由于她感到妇女解放被束之高阁，同时又对审判国王心怀不满，她就脱离了革命，猛烈抨击雅各宾派的专政。1793年11月3日，由于胆敢给罗伯斯庇尔写一封公开信，她便在断头台下为这种大胆行动付出了当时所需的代价。在《宣言》第十条中，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其大胆的女权论：“妇女已经有走上断头台的权利，她也必须有登上讲坛的权利。”

英国后来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在那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爱尔兰血统）由于发表《为女权辩护》（1792年）而轰动一时。她在这篇文章中主张教育机会均等（甚至包括男女同校），呼吁男女应在共同的人性基础上相互合作。在她的遗著长篇小说《妇女的不幸遭遇》的片段中透露了上述论文的背景：不幸的婚姻、酗酒、龌龊、贫困、生男育女，特别是野蛮的男子对于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虐待，所有这一切都是她纳入小说的真实的回忆。在她短促而波澜起伏的一生快要结束时，她成为威廉·戈德温的妻子，虽然他们夫妇都不赞成婚姻制度。她的女儿玛丽的出生对她来说是致命的，她于1797年逝世，而女儿玛丽后来成为雪莱的第二个妻子。

在其他方面，平等的原则也作为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得到发展。人人有公民权的概念使犹太人没有公民资格的陈规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中长期以来对这些受侮辱的、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偏见已经减弱了。约翰·洛克和约翰·托兰德曾经要求宽容犹太人，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美洲殖民地人民入籍法案，大大推进了在世界那一部分为犹太人争取平等的总的事业。当美洲殖民地脱离母国的时候，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确认为了普遍的平等，但没有特别提到犹太人。在德意志，莱辛的剧本《智者纳旦》（1779年）表现了宗教宽容的人道主义思想。意味深长的是，剧本的男主人

公是以莱辛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松为典型，门德尔松出生在德绍的犹太人区，但这时已是一位驰名遐迩的哲学家。两年后，普鲁士的高官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在柏林出版了其颇有影响的论文《论犹太人公民权的改善》。

法国是第一个给予犹太人全部公民权利的欧洲国家。米拉波所著《关于摩西·门德尔松和对犹太人的政治改革》（1787年）畅谈犹太人的问题，他对一个如此富有天才的民族竟然长期被剥夺发展他们的能力的机会表示遗憾。米拉波作出结论说：“一旦这个民族的成员充分享有公民权，他们很快就会上升到有贡献的公民的水平。”同年，一位犹太发言人宣称：“我们不要求恩惠、照顾，也不要求特权，我们只要求有这样一项法律，它能够使我们拥有一切人都毫无例外地会分享到人权。我们还要求撤除把我们和其他公民隔离开的壁垒，因为我们不准备再去忍受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侮辱性的区别。”在国民议会中讨论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时候，另外两位犹太人作家——塞尔夫·贝尔和萨尔金德·胡尔维茨也尽最大的努力来宣传这一事业。在国民议会中支持这一事业的人中，有米拉波、罗伯斯庇尔，以及最出力的格雷古瓦神甫。1791年9月28日，法国宣布犹太人为平等的公民。这就发出了逐渐解放欧洲犹太民族的信号，表面上看来，这一过程似乎到1917年俄国革命才告完成。

最后，平等的思想是与对奴隶制的容忍完全水火不相容的。正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法国的“黑人之友协会”诞生了，制宪议会宣布法国殖民地的奴隶都是法国的公民。对于最终废除奴隶制度，法国的革命原则所起的作用正如英国废除奴隶制运动的强烈宗教感情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

至于说臭不可闻的奴隶贸易，英国就应该在取消这种贸易中起带头作用，因为在18世纪期间，英国控制奴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这种贸易所包含的对人性的贬低，不仅遭到一大批基督教的和人道主义的作家和诗人，特别是约翰·韦斯利、巴克斯特、汤姆森和考珀的谴责，而且也遭到亚当·斯密、约翰逊博士和《对人的观察》的著者的儿子戴维·哈特利的非难。然而，首先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的却是公谊会的教友们。正如解放犹太人的情况一样，这一运动也是在美洲开始的，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伍尔曼（1720—1772年）和安东尼·贝内泽（1713—1784年），后者是在撤销南特敕令之后离开法国的

一位胡格诺派教徒的儿子。主要是由于贝内泽的努力，大西洋两岸普遍展开了拥护废止奴隶贸易的宣传活动。在英国，1783年公谊会的教友们建立一个“拯救和解放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和阻止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的协会。三年以后，年轻的托马斯·克拉克森把一篇用拉丁文写成的、由剑桥大学副校长皮卡德博士推荐得奖的论文译成英文出版，标题为《论奴隶制度和贩卖人类》。克拉克森是争取废止奴隶贸易的最坚强的战士，他的合作者是一群人道主义的福音派教友，即亨利·桑顿、扎卡里·麦考利和格兰维尔·夏普领导的所谓“克拉珀姆教派”，他们在议会的发言人是具有影响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废止奴隶贸易派并不全力攻击奴隶制度本身，因为他们认为，结束奴隶贸易不仅会迫使种植园主对待他们的奴隶更人道一些，而且还会最终导致奴隶的解放。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地反对这一改革意见，某些原来支持废止奴隶贸易运动的政治家，当他们在法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开始认为这一运动是“雅各宾主义的可恶的蛛网中的一根丝”（伯克语）的时候，也不再支持这一运动了。

虽然在1792年下议院已经同意逐渐废止奴隶贸易，但是直到1807年，英国议会才通过了威尔伯福斯所提出的关于禁止英国臣民和英国船只参与任何奴隶贸易的法案。同年，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立法。1808年，托马斯·克拉克森出版他的具有丰富资料的英国废止奴隶贸易的历史^[7]时，是怀着极为满意的心情的。但是直到1811年规定今后凡有违反者一律以重罪论处时，英国的禁令才产生更大的效力。在英国的巨大压力下，特别是英国派海军在非洲海岸附近的洋面上巡逻，欧洲其他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丹麦除外，它已经走在英国前面）才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都效法英国的榜样。随后就是废除奴隶制度本身了。

上面已经提到，文化上爱国主义的高涨是与浪漫主义者对表现自由的要求分不开的。然而，民族主义政治学说的来源则更为复杂。虽然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肯定是民族主义政治学说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在法国革命中，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很快就在欧洲其他部分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显示出它的爆炸力量。当被压迫的民族集团大声疾呼要求解除他们的苦难的时候，在民族主义的革命冲击下，在制度与文化方面格格不入的国家就摇摇欲坠了。沃

尔夫·托恩称爱尔兰为“一个被压迫、被侮辱和被掠夺的民族”，并非没有道理。他是丹东和托马斯·潘恩的门徒，也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创立者（1791年），他的原则都是从法国的榜样引申出来的。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毫不妥协的，当他的大部分追随者认识到在爱尔兰不可能以立宪方法进行自由主义的议会改革时（如埃德蒙·伯克的很有卓见的《致赫尔克里士·兰格里什爵士的几封信》主张允许爱尔兰天主教徒有选举权，就没有受到理睬），就都接受了他的观点。1798年沃尔夫·托恩为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发动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这位领袖也被处死。托恩死后出版的自传是这一时代有关爱尔兰生活的最杰出的作品。尽管这一次起义和其他一些民族起义大都失败了，但是却有颠覆某些较大政治单位的危险，欧洲各民族对拿破仑政权的抵抗也是如此。不过，当许多较小的政治实体由于实行统一而受到攻击并终于被摧毁的时候，民族主义也能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起作用。例如，拿破仑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所造成的剧烈变化就为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未来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划了一条有益的界线。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依恋的感情，而后者则是自豪感压倒一切，这种自豪感往往导致目空一切和侵略成性。这两种感情虽然有时泾渭分明，但在现实中却很容易相互混淆；例如，雅各宾的爱国主义很快就沦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引起或者至少是加强了受其蒙蔽者的爱国主义的反应。不管怎么样，在这一时代所发展的民族主义不仅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发生矛盾，而且也与个人解放的理想日益冲撞。像巴雷尔或卡尔诺之类的雅各宾派，以及后来费希特在他的《对日耳曼民族讲话》（1807年）中，都极力贬低个人而抬高民族的地位。这种感情在危机时代是很自然的，而当黑格兰坚决主张只有把个人意志融汇到整个社会的历史意义中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固定的教条了。因而，人道主义启蒙运动的两个基本理想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已经完全放弃了。如果说法国革命的爆发正赶上启蒙理想的最高潮，那么，在1793年以后的严峻年代里，潮水便开始后退了。结果产生的幻灭情绪被人恰如其分地描写为“启蒙运动的挫折”^[8]。我们可以从这一背景出发来研究保守主义的起源。

自然，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失望。康德在他的论文《学派之争》（1798年）中，企图以雅各宾派所犯的错误不能与过去时代暴君的罪行相提并论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他承认法国革命从表面上看是一次失败，但是仍然坚持说，最终必定会证明它是造福于人类的。费希特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然而，更普遍的是：恐怖时代和法国的侵略使人产生惊恐万状和大失所望的感情。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所做的残酷无情的工作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丹麦诗人扬斯·巴格森最初曾以《自由颂》欢颂法国革命，现在则写他的铿锵有力的《复仇女神赋》了。在德意志，弗里德里希·席勒和其他一些理想主义者都认识到，自由的理念也会被人滥用，理性也和宗教一样会被人用于罪恶的目的。现在席勒认为，法国人的教养还不够讲平等的程度。他作为激动人心的剧本《强盗》的作者接受法国公民资格之后不久，就对法国革命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他像前人贾姆巴蒂斯塔·维科一样，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正在衰落的文化会产生比蛮荒时代更坏的混乱和腐败状态。诗人荷尔德林的话大概最为深刻：“使国家变成一座地狱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人们企图使它成为自己的天堂。”

在英国也是如此，许多以前赞美法国革命的人现在都变成它的敌人了。华兹华斯由于革命的恐怖行动而极端沮丧，他在《序曲》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现在法国人反倒成为压迫者，
把自卫战争变成征服战争；
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
过去为之斗争的美好理想；
在皇天后土的明鉴下，
公然提高自由的价钱。

柯尔律治的瑰丽的《改宗歌》（1797年）标志着他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一年之后，他觉得“不论什么时代，不论政府形式如何，统治者总是一丘之貉。他们要多么坏有多么坏”。不过，他的反感还不像他的朋友们那样激烈。许多年之后，他说：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雅各宾派，但是雅各宾派的信条中有许多好的东西，而且反对党的错误也同样严重，远远令人难以宽容。直到1815年以后，他才对他依然称为

雅各宾主义的势力的壮大感到更为吃惊。而骚塞则早在18世纪终了时就完全抛弃他过去的观点，变成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了。有人说他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的“保守派”一词的人。[\[9\]](#)

在有可能发展保守派的政治观之前，必须充分认识法国革命的种种危险。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家比都柏林出生的辉格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做了更多的工作。伯克在他著名的《关于法国革命感想》（1790年）中，就已经认识到大众民主本身就包含着暴政的因素，并且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半宗教的性质，它充满了劝人入教的精神。伯克使用保守派的整个武库向革命学说进行猛攻，特别详细阐述了政治和社会延续性的好处。他坚决主张，社会是正在生存的人们、已经作古的人们和尚未出生的人们的结合体。在过去的一切伟大传统中，他最热烈拥护的是骑士精神。这样一段独具慧眼的妙论是值得全文引用的：“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家的时代；欧洲的光荣永远消逝了。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再看到那种对显贵和异性的极大忠诚，那种高尚的谦恭态度，那种尊贵的温顺神情，那种由衷的服从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受人奴役之中还保持一种高贵的自由精神。金钱难买的精神美德，为国捐躯的侠义行为，对男子气概和英雄事业的大力支持，已经全部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感觉污点像创伤一样疼痛的、在对付暴力时勇气倍增的、碰到任何事物都会使其高贵起来的、邪恶一遇到它就会退避三舍的敏感的原则性和纯洁的荣誉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伯克像大多数早期的解释某种信条的人一样，肯定是对他所讲的问题言过其实了。结果，那些反对他的人们——菲利普·弗朗西斯、托马斯·潘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很容易指责他对旧政权的罪恶行为不闻不问和对1789年以前法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尽管如此，伯克的思想在英国和国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上自帝王开始，来了一阵赞美的大合唱。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兰最后一代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像乔治三世国王一样热情称颂。在德意志，诺瓦里斯称颂《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是一部反对法国革命的革命著作。出生在西里西亚的普鲁士政论家弗里德里希·根茨把《感想》译成德文，并加了大量的注释和附录。根茨最初曾以热烈的词句欢迎1789年的事件，但是，他在第二遍或第三遍熟读《感想》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时正当普鲁士从严阵以待的中立转为公开的战

争。根茨把他的译本呈献给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并在1792年12月23日上书国王，宣称他是由于怀着反对法国诡辩术的坚定目标而翻译了“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并且说他本人在附录的一卷中“企图在政治和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反对革命制度的完整理论”。此后不久，根茨就得到了早已垂涎的“军事顾问”的头衔。在对麦金托什的有力回答中，他以一个改变信仰者的热情，详细论证了法国革命早期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问题。

歌德像伯克一样，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革命。当时他已经40岁了。他阐述他自己的信条是：如果说青年倾向于民主观点，那么中年人则易于看到贵族政治的价值。歌德于1776年定居魏玛，他在魏玛的模范宫廷中的从政经验使他更加坚信：改革必须从上至下，秩序比自由更为可贵。虽然歌德并不是法国旧王朝的辩护士，但是法国革命的几个方面，特别是政治渗透一切的倾向，使他深感不安。结果造成的永不休止的骚乱状态使人民“像躺在一张病床上”来回翻身一样，不断地从政治的一边翻到政治的另一边。他认为政党和报刊的纷纷出笼是不健康的现象，他的喜剧《市民将军》（1793年）表现了他对宣传的强烈反感。最主要的是，这位法兰克福的贵族非常害怕无知群众的起义，他预言说，这些群众会很容易成为厚颜无耻的政客和残酷无情的暴君的牺牲品。结果，千百年发展起来的欧洲文化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预言与伊拉斯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动乱时期所作的预言十分相似。

浪漫主义者对革命思想的积极贡献在上面已经简略地提过。使革命家和浪漫主义者发生共鸣的是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某些主要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则属于最早对革命的平等主义（至少对它的更为深远的含义）提出批评的人们的行列。他们担心，受过教育的阶级有朝一日会被群众所吞没。欧洲文化在降低水平的过程中，会庸俗化到不复存在的地步，根据一些当代历史学家所说，古代罗马文明就曾落到这样的下场。柯尔律治有一次曾讥讽硬把智慧归功于人类大多数的讨好群众的行为。德意志的荷尔德林、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格雷斯和谢林，法国的司汤达、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等，都对群众文明日益侵犯个人自由的可怕前景表示哀叹。斯塔埃尔夫人也预见到这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胜利的群众会要求知识高的人降低标准，去讨好现已成为主人的知识较低的人。崇拜她的自由主义者邦雅曼·贡斯

当曾经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你和我都不应生活在这个世纪里……今天已不存在个人，而只有穿着制服的军队。”他还哀叹道：“我们这些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穿着制服的可怜虫，已经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像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或者西里西亚的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那样一些过去的杰出人物当然要痛惜封建主义和骑士精神的时代的消逝了。亚当·密茨凯维奇也是如此，在他的伟大史诗《塔杜施先生》中，以绚丽的色彩和怀旧的心情描绘了他的故土立陶宛的波兰士绅传统的但是已经消逝的生活。的确，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反对平等主义的主题是如此明显（至少在1830年以前），以致某些历史学家说浪漫主义是欧洲贵族阶级的绝唱。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观点包含着相当一部分真理。在浪漫主义贵族的名单上，可以把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缪塞、拜伦和莱奥帕尔迪放在前列。在其他没有贵族身份的浪漫主义者中，也有些人对过去比较确定的社会等级的时代有着怀旧的感觉。在这里，令人想起“威弗利小说”的创作者。不错，歌德在狂飙突进运动时代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已经开创了骑士戏剧的传统，但是，骑士小说这一体裁却是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它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则要归功于司各脱的想象天才。他的全部作品把封建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感情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完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之中，而且由于苏格兰英雄理想的时代比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距离现代要近得多，而使那些传统得到复活。

在那些别有用心的反革命知识分子之中，有一群有影响的法国流亡作家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在他们里边，布列塔尼人夏多勃里昂子爵显然独树一帜。他在流亡伦敦期间出版了《关于革命的历史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论》（1797年），在这部早期著作中，他就已经宣称法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于1809年开始执笔的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中，重新对法国革命的主要原因进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告诉我们，贵族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有一个光荣的优越时期；其次是特权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贵族政治日益衰败；最后进入空虚时期，贵族政治走向灭亡。但是，对没落的旧政权的统治阶级失去信心，并不意味着他很信任在贵族时代之后掌握政权的人民。在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治重心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大的移动，夏多勃里昂对完全不再尊敬任何性质的权威感到痛心。他在《回

忆录》中发牢骚说：“一切权威都不复存在了：经验和年纪，出身或天才，智能或美德，一切都遭到否定、批判和蔑视。”他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神圣权威的世界”。各种派别的浪漫主义者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讨厌中产阶级的统治。

自封的里瓦罗尔伯爵一生的最后九年（1792—1801年）是在布鲁塞尔、伦敦、汉堡，最后在柏林度过的，他以锐利的眼光对革命的情景作了观察。伯克曾经在《政治报》上读过里瓦罗尔对法国革命初期阶段的记述，他称里瓦罗尔为法国革命的塔西佗。里瓦罗尔像伯克一样，但是独立地发现了法国革命与较早的宗教改革运动颇为相似。他指出，自从1798年以来，政治斗争往往转化为宗教的或半宗教的斗争，尽管法国革命显然具有反基督教的性质。新的革命政治哲学在取代宗教的职能，虽然这是一种纯粹世俗性的职能。里瓦罗尔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他还像他的流亡同胞马莱·迪庞一样，认为新的政治狂热甚至比旧的宗教狂热更为残酷无情。与新思想作斗争，枪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有同样新的思想。他哀叹的是：同盟国在与法国革命进行战斗中，总是欠缺“一年时间，一支军队和一种思想”。里瓦罗尔还观察到，人毕竟不是像启蒙的哲学家们企图说明的那样具有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人类受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权力欲的支配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政治学必须研究一下人类情欲的理论。甚至最文明的民族，也远远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摒弃野蛮行为。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启蒙运动的时代并不存在，而且也永远不会到来。里瓦罗尔肯定是对群众行为进行心理研究的最早的人士之一。他为法国革命的狂风恶浪所震惊，在著名的对恐怖时代的控诉书^[10]中发挥了作为作家的最大威力，这个控诉书后来给文学批评家圣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里瓦罗尔还像伯克一样很早就预见到，法国革命总有一天会“由军刀”来结束，革命的继承者必然是暴君。他本人喜欢强有力的立宪君主国。在他看来，某种社会上层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贵族却不存任何幻想，他说，这些贵族只不过是他们祖先的幽灵而已。里瓦罗尔也是争取国王与教会结成保守同盟的最早的战士之一。

在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的论战文章中，宗教和政治纠缠在一起，解也解不开。当法国人入侵他的故土萨伏伊

的时候，这位以前的自由主义者被迫于1792年出逃。他不久就摇身一变，开始采取极端反革命的态度，的确，1796年他在纳沙特尔所出版的《法国评论》很快就成为流亡者的圣经。德·梅斯特尔甚至比伯克更有力地强调宗教的社会职能。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一个贵族所能犯的最大罪行就是攻击基督教的信条。”他解释说：“一个贵族就是一个世俗的传教士：宗教就是他最主要和最神圣的财产，因为宗教保护他的特权，一旦没有宗教，特权也随之消失。”^[11]因此，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所呈现的一切魔鬼般的可怕情景，正是上帝对不虔诚的法国统治阶级的惩罚。一旦此罪已赎，法国就会重新抬头，秩序和宗教也会随着王政一起恢复。德·梅斯特尔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似乎是神权政治思想，因为他坚决认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是神命的结果。然而，如果深入一步进行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宗教的职能（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驯化下层阶级。德·梅斯特尔所关切的是社会秩序和从属关系在国家政权中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否定一切成文宪法，特别是近代议会制度；正因为如此，他坚决主张统治阶级与人民永远要依照血统或财富来分开，因为他担心，一旦人民普遍失去对权威的尊敬，整个政府就会垮台。

在法国流亡者博纳尔子爵的政治思想中，激进的成分少，保守的成分多。他回国后对帝国默默地支持，甚至就任拿破仑的教育总署的咨议。他把法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归因于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腐蚀力量。1796年博纳尔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学说》在康斯坦茨出版，其中对法国革命的各种理想，特别是对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权的理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国家必须而且永远应该分成君主、大臣（亦即贵族）和臣下（亦即人民）这三个范畴。他非常讨厌独立表达个人思想，而给予传统一种光荣，对过去的理想仅仅由于它们年深日久而加以颂扬。在革命的风浪当中以及在风浪的余波中，他都渴望社会稳定，而且到17世纪而不是18世纪的法国社会里去寻求。同时，像博纳尔一类的天主教守旧分子否定18世纪关于人性的乐观主义，而回到基督教的原罪观。这与革命思想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在操德语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普鲁士，瑞士人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的反革命理论曾经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这些理论的要点已经包含在他的《一般国家学说手册》（1808年）之中。在他的主要著作

《国家学说的复兴》（1816年开始在温特图尔出版）里，他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阐述。正是根据这部书的题名，才把1814—1830年这一时期作为欧洲的复兴时期来描述，尽管英国从1660年到1688年的复兴时期也是一个典型。哈勒是伯尔尼的一个贵族，而伯尔尼的社会结构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很小，他以封建的或行会的传统作为他的政治思想的中心。他充满了对中世纪的盲目崇拜，尽管他自己承认他从来没有读过关于那一时代的任何一部著作。只要是存在已久的君主、贵族，或者平民寡头集团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哈勒都给它加上神圣的色彩。他甚至走得更远，居然提出一个“强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这个邪说令人想起诡辩家卡利克尔斯，当然还有霍布斯，以及预言家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哈勒甚至比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更明显地利用宗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他改信天主教（1820年）似乎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虽然往往比哈勒的思想更精微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王政复辟时期自然会大大盛行，但这一时代也出现了第二次革命的热潮。雪莱在这方面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对于一个1792年出生的人来说，法国革命只是一个传闻，并不是亲身经验。在伊顿公学时，雪莱就已经起来反对学校的各种仪式。那时他第一次读到戈德温的《关于政治正义之研究》，这一著作对他的锐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仙后麦布》有些部分读起来简直如同把这位哲学家的文章改写成了诗行。他的成熟的诗篇，如《伊斯兰的反叛》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也都宣传戈德温的思想：人类完美境界、平等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这位青年煽动家在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期间所写的战斗性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反映了戈德温的激烈的反教权思想，由于这本小册子，雪莱被学校开除了。雪莱既然反对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婚姻作为一种圣礼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他又追随戈德温的脚步，宣称现在的婚姻制度是人类幸福的敌人。他在为《仙后麦布》所写的注释中说：“夫妻相爱到什么时候，他们的结合就应该维持到什么时候。在他们感情恶化之后，硬要他们同栖的任何法律，都是不可容忍的暴政，都是最不值得容忍的东西。”雪莱在他自己的波澜起伏的一生中，就是这样行动的。法国小说家乔治·桑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言行的。在讨论1792年实施但于1816年废除的离婚法时，她于1837年写信给拉梅内说：“对于毫无希望的不幸婚姻所造成的野蛮的不公平状态和无穷无尽的痛苦，我只能找到一种补

救方法。这种补救方法就是给予解除此种婚姻的权利，以及再婚的自由。”

雪莱曾经多次涉足当代的政治。例如，他曾前往爱尔兰去促进撤销合并运动和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并且拟定一个交给公民投票表决的议会改革计划。他还积极支持给予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雪莱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贵族阶级是“靠技术工人的劳动吃饭”的“社会寄生虫”。他始终不变的热情，他对残暴和苛政的极度厌恶，使他写出了讽刺诗《无政府状态的伪装》（1819年）。他起初是理性的鼓吹者。但是后来他离开了戈德温的教条式的理性主义，因为他这时已经认识到“在心灵能够爱、慕、信任、希望和忍受之前，道德行为的理性原则是撒播在人生大道上的种子”。^[12]

雪莱的朋友拜伦勋爵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旗手甚至享有更普遍的名声。的确，他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公开表示同情，他甚至积极地支持意大利和希腊的革命运动。不过，拜伦并不热爱民主，他曾一度称之为“恶棍的贵族政治”^[13]。难道法国革命没有表现出暴民也可以转化为压迫者吗？他以同样的心情在1820年写信给约翰·卡姆·霍布豪斯说：“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反对纯粹的改革原则，而是反对会为民主暴政开路的下流的、狡猾的、肮脏的平等论者。”^[14]拜伦非常以他的贵族出身自傲，这就难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对压迫者的憎恨超过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他的激进主义可能由于在与拜伦夫人分离（1816年）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名字为上流社会所不齿而更加尖锐起来。不管动机为何，拜伦的讽刺诗肯定激发了英国国内外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唐璜》的最后几章、《青铜时代》和最后的但同样感人的《审判的幻景》。他为希腊独立事业而牺牲生命，使全世界的政治理想主义者都受到感动。正是在意大利、波兰、俄国和巴尔干各国，以及在海因里希·海涅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政治思想活跃的德意志，最强烈地反映出拜伦死后的影响。马志尼在1835年写道：“总有一天民主政治会记得拜伦所给予的一切东西。”

在拜伦的俄国崇拜者和竞争者当中，我们只要举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名字就够了，他是俄国唯一真正的而又重要的浪漫主义者。莱蒙托夫也像他的伟大偶像一样，认为自己正处在与社会环境交战的状态。对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令人窒息的政体和支持这一政体的社会各阶层，他只有像在《悼普希金》一诗（1837年）中所表示的那样横

眉冷对而已。普希金本人在《村庄》一诗（1819年）中大声疾呼废除农奴制度，在1826年的审判中，曾经明确提到他的早期诗歌影响了一些十二月党人。上述两位诗人都不得不为他们的大胆行为付出代价，从莫斯科被流放到边远的省份。

在18世纪最后三十几年出生的几代人，也都是亲眼看到必然改变地球整个面貌的工业大革命的初期阶段的人。当时有些人对于其最后结果仍难估计的变化带有惊异的眼光，这是不足为奇的。新工业蓬勃发展的地区的可怕现象往往损害了浪漫主义者的美感。在英国，骚塞在《关于社会的进步和前景的对话》（1829年）中，早就谈到后来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在反对机械化世界的畸形发展的斗争中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作家乔治·蒂克纳在1819年参观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及其周围地区之后，这样描述他的印象：“在煤矿的每一个竖井旁，都有大量开采出来的好煤在不断燃烧，大地上的景象简直是一片火海，这映照着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看起来实在可怕。我们仿佛走进了但丁的阴暗世界一般。”约翰·马丁有强烈感染力的绘画《神罚的伟大日子》中的远景，是从他在死沉沉的夜里跑遍“黑乡”得到了启发。他对儿子说，甚至在神罚的地狱中，他也想象不出任何比这更可怕的东西。浪漫主义者对城市化生活中日益增多的人工因素也抱有反感。也有些人，特别是骚塞，担心可能有一天会无可挽回地打乱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在骚塞匿名发表的《英格兰来信》（1807年）中，包含着对工业革命中人的地位问题的最早的一些批评意见。他的结论一针见血：“在商业中，甚至比在战争中还要厉害，把人和牲畜主要当作机器使用，而且对牺牲他们更加毫不在乎。”柯尔律治也对经济问题与社会、道德和宗教性质的问题的依存关系作了很多的探索。他讨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派的教条，因为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从经济方面探讨人类劳动的问题。因而，他始终不断地谴责那种把“人当作东西、工具、机器、财产”的制度。他在《朋友》（1809年）中明确地说：“那些宁愿牺牲人去创造国家财富（它只是在统计表上才是国家的）的经济学家们忘记了即使从爱国的目的出发，也不应该将任何人作为东西来对待。”

日内瓦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迪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也认为经济学家们过分脱离现实，他还指出，那些经济学家往往主要是从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去看问题。西斯

蒙迪为了猛烈反对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把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的新原理，或财富与人口的关系》（1819年）。他的部分论战的矛头指向亚当·斯密的法国门徒让-巴蒂斯特·萨伊，萨伊曾经断言，由于每一件产品都会找到它的消费者，所以工业生产率的任何增长都必然有益。西斯蒙迪则认为，这等于本末倒置。他在1818—1819年访问英国期间曾经研究英国在拿破仑之后的危机，这一研究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消费水平太低，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吸收增加了的工业产品。他断定说，除非彻底检查现行的经济结构，否则还会出现同样的危机。在他所提出的社会改革建议中，包括要保护工人不受失业的威胁和允许他们为抑制压迫的目的组织工会的法律。他对工业革命混乱时期的关切集中体现在他的告诫之中，他说，人类的利益不应牺牲于“一切工业同时出现的贪婪行动”。一言以蔽之，“必须防止富人的贪婪”。

上面最后提到的三位思想家——骚塞、柯尔律治和西斯蒙迪，还可以加上巴伐利亚人弗朗茨·冯·巴德尔——很清楚地预见到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控诉之一，即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物。因此，人们从马克思逝世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深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会感到奇怪。不过，浪漫主义者也反对将会渗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幸福论的精神。另外，西斯蒙迪尽管拥护影响深远的社会立法，他却像反对资本主义一样地反对社会主义，因为他认为两种制度都是中央集权，所以都是人压迫人的制度。

只是在1815年之后，偏执的社会改革家夏尔·傅立叶才开始受到较多的注意，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尽管傅立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也为工业革命的某些现象深感担心。他不喜欢集中化和大规模生产，对新工业时代必然对较小的企业构成威胁这一事实极为痛心。他的以农业手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理想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但是他有若干新鲜的和向前看的思想，如必须可能地使劳动变得吸引人和愉快。他比以前的任何思想家都更加坦率地针对竞争性组织所造成的浪费进行攻击，并提出他自己的所谓“法伦斯泰尔”的独特设想，“法伦斯泰尔”是由约1600人和约5000英亩土地组成的一个集体。傅立叶不仅在他的热烈的理性主义方面，而且在他对许多改革家都认为极为可怕的婚姻制度的明显轻蔑方面，与戈德温颇为相似。他还同戈

德温和孔多塞一样，对人体的日益完美和人寿的大大延长充满希望，明确地预言平均寿命可以达到144岁。

在英国，罗伯特·欧文在宣传和实践社会改革方面取得了异常卓越的成就。欧文出生在威尔士，曾在曼彻斯特工作数年，在那里，他完全了解到工厂制度丑恶的一面。在他成为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和股东之后不久，便开始以真正空前未有的方式改造那个企业。他不顾合伙人的坚决反对，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每日16小时减少到10个半小时。他废除了招收10岁以下的童工制度，住在这一村庄的所有儿童从5岁起接受免费教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从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新拉纳克都变成一个模范的场所。此后，欧文开始推进工业条件的更普遍的改善。他在《新社会观》（1813年）中，像骚塞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把工厂的监工对无生命的机器的爱护与他们对有生命的机器的轻视作了对比。他在一篇呼吁书《致英国制造业主》（1818年）中，竭力强调儿童过早就业的恶果。欧文的一些（绝非全部）建议被纳入1819年的皮尔法案——第一个有效的工厂法。就是在这一时期，欧文开始动员国外的公众舆论。他邀请外国的政治家们视察新拉纳克，当他出席亚琛代表大会并提出《代表劳动阶级提出的两份备忘录》的时候，又与他们作进一步的接触。也是在那里，他与当时极端保守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相见，根茨对欧文计划的反应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们不想使群众富有而不再依靠我们。如果他们达到那样的地步，我们怎能管理他们呢？”

[\[15\]](#)

由于不满足于他的斗争所取得的小小的成功，欧文于1825年离开旧世界前往新大陆。他的名声先于他本人到达新大陆，因为几年以前，纽约就创办了以他的原则为基础的“公社促进协会”。欧文到达新大陆以后，从基督教拉普派手中买下印第安纳州的和谐村，拉普派像其他几个宗教社团一样，是按照公社的路线经营他们的居民点的。欧文的居民点（已改名新和谐公社）的指导思想与前一代不同的地方是“其目的在于向全世界传授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只让特选的少数人摆脱人类邪恶的毒害”（G. D. H. 科尔语）。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拉普派显然过着一种俭朴自足的生活，而新和谐公社则从一开始就发生内讧，部分原因是其中的成员是杂凑在一起的。新和谐公社耗费了欧文4/5的财产，面临垮台的时候，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预先

经过道德训练，人们不可能适合在公社中生活。1828年回到英国之后，他一度成为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坚定的博爱主义是他的改革热情的主要源泉。虽然他承认17世纪的公谊会教徒约翰·比勒早已具有他的某些思想，^[16]但他反对现存的一切宗教，并且谴责基督教教会。欧文相信人的性格完全是由外界社会的影响形成的，他不能接受基督教所谓的道德责任心系每一个人所固有的观点。他在大半生中都是一位坚强的理性主义者，直到最后，一种经过长期压抑的对超自然的追求才使他转向唯灵主义。

克洛德·亨利（圣西门伯爵）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创见的也是最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他热烈欢迎工业时代的曙光，甚至宣称全部历史都在向这一完美境界前进。虽然他本人是名门贵族的后代，但是他完全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起初在法国革命期间放弃了自己的贵族称号，后来又把贵族纳入“游手好闲的阶级”，依照他的意见，这一阶级是应该推翻的。尽管圣西门本人在青年时代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勇作战，但他把军官阶级也列入这个阶级之内。他认为最重要的阶级是实业家阶级，他对“实业家”所下的定义是：“所有为生产操劳或是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几种手段去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或物质享受的人。”这一定义包括三类人：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他不仅建议实业家要在国民议会中占较大的比例，而且建议这一阶级的成员要以专家为顾问，计划公共事务和作出大规模公共工程的设计。他进一步提出，行政部门要由银行家组成。至于整个新制度的构想，则要一位元首去完成——这个建议颇有开明专制主义的味道，但是也有现代极权政治的可怕回响。当然，圣西门完全准备抛弃个人自由的理想，因为它“会大大阻碍群众支配个人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危险的、破坏性的和革命的”18世纪，在他的想象中，19世纪则是以“组织、凝聚和统一”为标志的。他否定人民主权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在给权力主义的药丸裹上糖衣的特殊努力中，圣西门试过使他自己和他的门徒们相信：在新的工业制度下，政府的职能将不再是令人厌恶的人对人的统治，而是按照任何具体情况的需要管理各种事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怀着同样的幻想来展望“国家的消亡”的。

人们原先期望太平盛世的前景将是法国革命的成果，而这时却把它与工业革命（如果可以使用当时还未发明的这个术语的话）联系起来。过去人们把共和国与和平完全等同起来。现在，圣西门则相信：

在新的时代，行政制度和工业体制会自动地是和平的。回头来看，1789年的政治革命依然是具有伟大意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必须有相当广度的一种科学革命才能完成。除物理学外，圣西门认为他的著名门徒奥古斯特·孔德命名为社会学的科学新分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圣西门不和后来某些盲目崇拜科学的人一样，他完全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苦闷，但是在他看来，返回任何旧有的宗教都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是：自16世纪以来，教士并没有跟着时代的科学精神前进。他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政权效劳的科学家们，也不是毫无非议。不过，他仍然坚信，在未来的社会中，科学家和学者们能够在知识方面，甚至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为此目的，他主张设立一个所谓的“牛顿委员会”担负中央领导的职能。

在他早期著作中，圣西门并没有太多注意工业革命的有害影响，但是，由于1817年发生严重而普遍的危机，由于他研究了英法两国工业情况，他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他的论断为卡尔·马克思的论断开了先河。他写道：“工人看到他们自己被剥夺了对他们的劳动的享受，而这种享受正是他们劳动的目的”。因此首先必须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的确，圣西门提出了非常现代的思想，社会必须以提高人数最多而又最贫困的阶级的福利为目标进行组织；这比他早期坚持的机会均等和废除世袭特权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新的学说形成他在1825年逝世前不久所写的最后著作《新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他突然想起他的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是可以从基督教伦理观中找到根据的。他虽不赞成基督教伦理观的整个体系或基督教理论的其他方面（他的确认为已经过时了），但他依然对耶稣关于人类应该彼此视为兄弟的教导具有深刻的印象。于是，尽管从基督教的博爱中删除了人爱上帝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仍然与纯世俗的宗教挂起钩来。

圣西门逝世后不久，他的几个门徒发表一项题为《圣西门主义》（1828年）的声明，除系统地阐述老师的思想外，还加上了一些新的思想。这篇声明强调给予所有人工作（或者如后来所称的“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并且主张进行宏伟的公共工程计划，如挖通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发展全世界的铁路网等。特别有现代意味的是，这些计划旨在统一全球。为了贯彻执行这些计划，声明提出建立规模巨大的工业公司。所以如果说他们的学说包括了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真正特点的话，它也首先提出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在

“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口号的基础上取消遗产继承制度。在声明的执笔人圣阿芒·巴扎尔（他从前与神秘团体烧炭党有联系）的影响下，声明中包括了这个和其他一些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皮埃尔·勒鲁变成了圣西门派左翼的思想家。这一经常采取怪诞方式的运动开始不久，就披上了一种教会的外衣，而以巴扎尔和巴泰勒米-普罗斯佩·昂方坦为它的精神领袖。在不可避免的分裂之后，古怪的昂方坦单独承担领导责任。后来人们所称呼的“圣西门教”吸引了许多信徒，其中有一大批犹太人，特别是圣西门的得意门生，在许多年后编辑老师全集的奥兰德·罗德里格斯，以及第二帝国时期在银行界大显身手的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兄弟。主要是圣西门主义的救世味道引起了某些新解放的犹太人的共鸣。^[17]他们虽然固守他们所继承的传统的那个部分，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了他们祖先的宗教，甚至能够以圣西门为他们的救世主了。这一宗派的非犹太人信徒的态度大概也同样令人惊异，因为这些堕落的基督教徒的宗教热情在圣西门的圣经《新基督教》中得到了，或是似乎得到了满足。

如果说在一方面孔德的实证主义受到了圣西门的启示，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把他和前面提到的两位社会改革家与下一代人联系起来，这只要引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于他认为他本人和卡尔·马克思的先驱者的三位前辈所作的赞词就可以了解。恩格斯写道：“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绝不会忘记它是建立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人的学说的基础之上。不管他们的学说是多么奇妙和充满空想，他们属于所有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通过天才的直觉，预见了我们现已科学地表明的无数真理。”^[18]

在政治和社会思想史中，从1789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时代。特别是法国，二月革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一时代的开始与结尾之间，有意大利出生的布奥纳罗蒂对巴贝夫1796年的“平等派密谋”的叙述（1828年）作为中间的纽带。布奥纳罗蒂曾亲自参加这一密谋，他给后来人们所称呼的巴贝夫主义罩上一种神秘的光环。他的最主要的门徒奥古斯特·布朗基是一个长期从事密谋活动的人，在他一生的76年中，足足有33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场革命剧中的“女主角”是弗洛拉·特里斯坦，她的父亲是一个有秘鲁血统的西班牙人，母亲是法国人。她是第一个设想建立国际工人联合会

的人，这在她逝世前一年所著的《工会》（1843年）一书中有所描述。

在主张比较和平地进行社会改革的人们当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艾蒂安·卡贝和路易·勃朗。前者受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巴贝夫思想的影响。他在匿名出版的《伊卡里亚旅行记》（1839年）中，描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国家绝对地控制一切主要的活动。一切私有财产都被废除，作为平等的象征之一，强制穿完全一样的衣服。公民从摇篮直到坟墓，都要接受思想教育。卡贝也像欧文一样，在美国试验了他的思想，他在伊利诺伊州瑙武建立的伊卡里亚居民点最后也遭到与欧文的新和谐公社一样的命运。路易·勃朗，父亲为法国流亡贵族，母亲是西班牙人，他以《劳工组织》（1839年）一书出了名。他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同，和激进民主派同样相信普选一旦实施，它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工具。建立一个强大而仁慈的国家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他，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第一次建立起来，虽然在建成后，合作将会以更大的效率来代替竞争。

恰恰是卡贝和勃朗分别给国家规定的在社会转化中的作用，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思想发生了矛盾。在当时的社会改革家中，几乎只有这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恢复了对自由的崇拜，而其他许多社会改革家已经决心把自由作为平等的祭坛上的牺牲品。另外，蒲鲁东几乎是唯一真正平民出身的社会改革家。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对那些并非来自普通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非常不信任。关于他的思想和影响的任何讨论都不在本卷的范围之内。

那位真正和海神一样变幻莫测的人物拉梅内神甫，在他曲折的思想历程的晚期阶段，也猛烈攻击许多改革家和革命家的独裁主义的计划。另外，拉梅内神甫与他们还有不同之处，他不仅像马志尼那样既强调人的权利，也同样强调人的义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能在以上帝为共同的父亲的思想基础上维护平等的观点。对于他（而不是对于马志尼）来说，人类平等的理想来自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平等就没有发展的前途。他几经思想变迁，始终坚信社会改造工作必须以基督教为基础。早在1817年，在主张返回基督教的主要论文《论对宗教的漠视》中，他就主要提出以基督教为改造法国社会，当然还有欧洲社会的手段了。拉梅内并非完全是单独地大胆企图把基督教与革

命思想调和起来。法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比歇以及稍后的康斯坦丁·佩克尔都是为同一目标而努力。而在波希米亚，信奉天主教的哲学家贝尔纳德·博尔扎诺于1831年构思出一个乌托邦社会——《来自最美好的国家》，这部书直到他去世数十年之后才出版。然而，没有一个人是像拉梅内那样怀着对太平盛世的热情而写作的。他的《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用圣经的语言表达激进的社会思想，不到一年就印了八版。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在他的通谕《教皇通谕》中谴责了这部书，毫无疑问，梵蒂冈在拉梅内神甫的神学盔甲中发现了严重的裂缝。尽管如此，拉梅内怀疑教皇已经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梅特涅公爵的强大压力，这一点并没有错。看起来，梅特涅甚至对通谕的词句本身都施加了影响。^[19]

拉梅内在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之后，便以令人吃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作为反击：他摒弃了教会和整个基督教，而逃避到一种融合自然神论、泛神论和崇拜“人民”偶像的模糊不清的思想中。此后，他在签名时把“拉·梅内”写成“拉梅内”，以示断绝与贵族的任何联系。他曾经作为基督教复兴的先驱活动了很多年；现在，这同一个人又成为自然神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拉梅内的思想不稳定从他常常改变职业也反映出来。他最初是一位教师，随后有些勉强地从事圣职，再后以写作深刻的政治和宗教书籍驰名欧洲，后来又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而现在，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则是一个政治小册子的作者。在他的论文《论现代的奴隶制度》（1839年）中，仍然闪烁着他的著作特有的光辉。在这篇论文中，他描绘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敌对情绪的图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八年之后起草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极有可能受到这篇著作的影响。总之，拉梅内的直接影响要比他的社会思想更为激进；虽然他是一个相信选举权而不相信革命的渐进派，但是在1848年，他在国民议会与激进的极左派坐在一起。他逝世（1854年）以后很久，他的许多思想又在几个欧洲国家在基督教社会党的政治纲领中复活了。在他死后，对这位尽管多变却是大胆的思想家的争论一直继续了100多年。

（曹道明 译）

^[1] 康德的论文《人类是否在继续向好的方面前进》，1792年写成，六年后才得到发表。

- [2] 《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琼·巴勒克拉夫英译本（伦敦，1955年），第202页。
- [3] 《历史哲学讲义》，见《黑格尔全集》（柏林，1840年）第9卷，第535—536页。
- [4] 见1789年拉瓦锡作为国民议会议员为他自己的选民起草的《指示》，《全集》第6卷（巴黎，1893年），第335页。
- [5] 《以十六和十七世纪为主的英国历史》（柏林，1861年）第3卷，第287—288页。英文版（牛津，1875年），第2卷，第542页。
- [6] 《论准许妇女享有公民权》，1790年发表于《1789年社会报》。
- [7] 《英国议会废止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进展和完成的历史》，2卷集（伦敦，1808年）。
- [8] 艾尔弗雷德·科班：《寻求人性。启蒙运动在近代史中的作用》（伦敦，1960年）。
- [9] 杰弗里·卡纳尔：《罗伯特·骚塞和他的时代》（牛津，1960年）。
- [10] 《法语新辞典引言》（巴黎，1797年）第1卷，第231—235页。里瓦罗尔的同时代人也许不会同他一样作出如上评价，但我们回顾历史，这却是昭然若揭的。参阅汉斯·巴尔特《安托万·德·里瓦罗尔与法国革命》，载《瑞士世界历史论丛》第12卷（伯尔尼，1954年）。
- [11] 《未发表的书信和短文》（巴黎，1851年）第2卷，第262—263页。
- [12]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伦敦，1820年）。
- [13] R. E. 普罗瑟罗编：《书信与日记》（伦敦，1898—1901年）第5卷，第405—406页。
- [14] 约翰·默里编：《通信集》（伦敦，1922年）第2卷，第148页。
- [15] 《罗伯特·欧文生平自述》（伦敦，1857年）第1卷，第183页。
- [16] 《关于开办一所讲授一切有用的商业和农业知识的实业学院，以便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丰衣足食、使青年受到良好教育的建议书》（伦敦，1696年）。
- [17] J. L. 托尔蒙：《政治上的救世主降临说——浪漫主义阶段》（伦敦，1960年），第80—81页。
- [18] 《德意志农民战争》第3版补充序言（莱比锡，1875年）。
- [19] 参看A. 布杜《罗马教廷与俄国，1814—1847年》，2卷本（巴黎，1922—1925年）；里斯洛特·阿伦斯《拉梅内与德意志》（明斯特，1930年）；安德烈亚斯·波施《拉梅内与梅特涅》，载《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学报》（维也纳，1954年）。

第五章 科学和技术

在1793年革命和1830年革命之间的时期，科学技术界摆脱了启蒙运动的状况，呈现出19世纪的姿态，孔狄亚克和联想主义心理学的旧理论，发展成为孔德和实证主义的理论，认为认识是为了预见，而预见则为了掌握。18世纪法国革命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孔多塞，留下18世纪的圣约《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在他死后于1795年出版。在这本动人的小册子里，认为科学的作用是带来了进步，是教育人类认识自然之理的工具。但是，革命的一代与其说是自然主义的，倒不如说是以救世为己任的。它把这种仁慈的教育使命变成某种近乎工程技术的东西——建筑工程、社会工程，或许还有人类本身的工程。百科全书派已经因为把科学从玄学中解放出来而自豪。而现在，实证主义者将使这种解放臻于完美，甚至要把科学从本体论中，实际上是从一切谬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握观察、经验和行动以外的实在。孔德希望摒弃绝对的言论而赞成相对的言论。因此，他把人类历史而不是某种外部的实在看作经验的源泉。在他的哲学中，理性主义把注意力转向历史思想；到那时为止，历史思想一直是敌视精密科学的浪漫主义者的工具。历史上的人取代了运动着的物质，成为典型的自然进程，而在历史上兴起的科学也成为历史的动力，成为造成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一切差异的因素，并且由于逐渐认识到它自己的方法而具有了革新的希望。

法国革命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造成的极端政治化就这样改变了科学的发展前景。科学思想中的实证主义是法国革命合乎情理的产物。它不是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一党或那一党的产物，而是革命意识和行动——不管是左是右——的产物。这是革命和帝国两方面都加以攻击的哲学。在一个为了有利于发挥天才而改造世界的年代里，科学一定会在运用社会学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新的哲学不仅出现于言辞之中，还形成了种种机构。它给科学本身（而不是仅与自然有关的科学上的发现）命名并加以分类。它使培根的梦想差不多要实现。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民主梦想，期望科学使普通人的工艺技术变得崇高，并以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这种工艺技术繁荣发展。

法国人在文化方面依然处于领导地位，但为时不久。1815年后，法国终于失去了优势。在19世纪，法国各种机构的模式以及法国的学说的推动作用的存在时间要比法国科学的活力持久一些。因为科学事业也可以用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乃是旧政权下公民的各种倾向达到极点的观点来说明——共和二年之前它向内部爆发，此后便向外部爆发。拿破仑有时被描绘成一位开明的暴君。当你想到实际上管理科学和学术事务的那些人正是在行将覆灭的君主国的大臣兼哲学家杜尔哥的学派中形成的，这个说法就有了实际的内容。杜尔哥的计划预先设想出科学以及其他许多事物的革命变革。在18世纪90年代颇具影响的教育计划中，特别是塔列朗和孔多塞的教育计划，考虑到以科学为中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心灵手巧而又品行端正的公民将接受科学及各种实用技艺的训练，科学院将从一种荣誉和特权的机构，逐渐变成整个法国的共同教育领导，变成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

由于科学院在法人性质方面反而为特权分子和精神贵族付出了代价，有步骤地实行科学机构化的计划便失败了。1793年8月8日国民公会撤销了所有的科学机构，认为它们与一个共和国是不相容的。在恐怖时期，科学团体不复存在。它的成员或参战或退隐，反正都离开了科学工作。确实，革命时代的科学文化史给予革命各个阶段的价值，必然不同于政治的或军事的历史所给予的价值。按照18世纪9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看法，大革命的创造性时期并非始于攻占巴士底狱时或8月4日之夜，亦非始于10月的日子或共和二年那振奋人心的日子——他们认为这一些统统是狂热情绪最后一次大发作所引起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始于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和温和的、政治上受到蔑视的督政府的筹建时期。

知识分子——思想家——的重大建树是创办了法兰西国家研究院。这是旧科学院披着共和外衣的复活。它把国家保护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责任纳入新的秩序。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大君主政体时期，科学、艺术和文学原被认为是装饰品，而此时则成了市民福利的陪衬。研究院的存在为共和三年宪法明文规定。其体制受到公共教育管理法的制约。这样一来，科学和学术就要在两个主人手下效劳：一个是合作团体，对它来说，选举意味着能产生优秀人物，另一个是注定要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的教育体系。内部的部署反映了正在改变的价值标准。法兰西科学院是无可替代的。它过去是（复辟后也是）法国文化

特色的最高体现。与此不同，法兰西国家研究院由三个分部组成，科学为第一分部，有60名驻院院士；伦理学和政治学为第二分部，有36名驻院院士；文学和美术为第三分部，有48名驻院院士。每个分部根据学科——数学、机械、天文等，再分成若干个所。1799年4月4日，法兰西国家研究院在罗浮宫的女像柱大厅举行开幕典礼。此后，第一分部就恢复了旧科学院的作用，它成为科学界发展抱负的圣地，也是各类标准的监护者。它也为国家服务，作为技术方面的最高法庭。逐年编纂的《学术论文集》继承了旧政权时期大型学术丛书的工作，它与《哲学学报》并列为自然研究方面最佳成果的汇集。然而，在这两方面更起作用的早就是荣誉称号了。在19世纪，专门化使科学的各部门分开而不是结合，各专业的学会和学报急剧增加，已经超过任何机构独自集中体现全部工作的能力。

然而，百科全书派的意识形态在法兰西国家研究院开了花。遗憾的是，“意识形态”一词用来表示某种（不可信赖的？）政治事业的思想内容。对于本来的“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沃尔内、杜邦·德·内穆尔——来讲，这个词的意思完全是属于心理学的，即我们怎样通过思想而获得知识。依照他们的观点，思想是凭感觉得来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孔狄亚克的科学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人是由自己的经验造成的。如果这样，那么，改进人的方法就是赋予他更好的经验。他们以这种经验主义为依据创立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并获得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中谋求进步的科学思想。的确，他们没有能在思想史或哲学史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也许是根据他们的片言只语而不是成部的著作去评论他们的。但是，正如一位“活的百科全书”多努所说，他们是为研究院描绘蓝图的人。在他们身上，人的开明观点的科学灵感转化成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确实，意识形态的影响远远没有达到顶峰，它使整个科学机体恢复活力，并把科学的生命注入教育形式之中。1795年，法国有过许多教育计划，但自从四年前取缔各宗教基金会以来，就不曾有过学校。根据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在最高一级建立了法兰西国家研究院，而这项法律的主要目标则是实行普及教育制度。每省设一座中心学校，提供中等教育。这些学校是公立中学和大学预科学校的前驱；它们实际上都是在督政府时期开始创办的。科学是主要学科。教授科学并不是为了某种道德价值（如同思想家们常常希望的那样），而只是

因为它在一个忙于征服、忙于商业和工业，以及充满机会的现代国家的事务中具有实际的重要性。按照需求的次序排列，设计、数学、物理、化学和自然史都是受人欢迎的学科。

这样的次序是由各行业的前景所决定的，各职业学校都存在着这样的前景。在高一级的教育中，督政府遵循综合和实用的原则，把已经在旧政权下得到证明的东西应用于新政权对技术的需求。巴黎天文台从革命者手里收回，交还给天文学家。新成立的经度局接过编写天文历书《天文年历》的任务。古老的法兰西学院绝无仅有地度过了革命的岁月而原封未动，它由于热心于科学而名声大振。两个偏重实用而不重理论的学校恢复了，即矿业学校和桥梁道路学校。国立工艺博物馆收藏着从人民的敌人那里没收的、具有技术价值的物品。以此为中心，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博物馆，并给商人和手工艺者讲授技术课程。新的医科院校也在旧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的原址建立起来了。自然史博物馆的前身是皇家花园，在恐怖时期兴起并享有盛名。它的规章制度民族化了，也更合理了。它尤其得到卢梭主义者的喜爱和支持。卢梭主义者偏爱那些低下的、似乎比较民主的、有关田地和花卉、飞禽和走兽的科学。

最后，奄奄一息的国民公会批准创办两个培养19世纪法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摇篮，即后来的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工科学校。前者在草创初期即告失败。在准备培养教师的同时，显然必须建立一个学校的体系，但是共和三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却是全凭一股不切实际的热情搞起来的。将近1400名学生，从法国各地一下涌入仅有700个座位的博物馆礼堂。他们的资历参差不齐，有的近于文盲，有的，如傅立叶，已是高水平的青年物理学家。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学完四个月的课程之后成为教师。结果一塌糊涂，无法进行下去。专门来确立标准的师范学校直到1812年和拿破仑的统一时期才开学。这一行动虽受挫折，却集中了教员，譬如拉普拉斯和拉格朗热、贝托莱和蒙日，他们都是处于法国科学界领导地位的伟大人物。

暂时的失败并未使科学家们对教育撒手不管。虽然从机构上来说，这次失败把科学家和思想家分开了。这些思想家本来是可以教授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课程的，由于具有人道主义和心理学观点，他们从此就聚集在医药学校的周围了。而物理学家们则在创办最早，也一直是最严格的工艺学院之一的综合工艺学校（最初称公共工程学校）

里找到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这个著名的学校，这个一切工程科学的摇篮，于1794年12月21日开学授课。它立刻取得成功，因为它是建立在教育学经验的两块坚实的基础之上的。第一，在为全民入伍而开设的“革命课程”中，有一种民主的因素；第二，从以前设在梅齐埃尔军事工程学校又吸收了一种专业因素。在1793年的军事紧急时期，当局曾指望科学家们领导军工生产。这一指望并未落空。一个科学团体破天荒第一次动员起来，为准备战争的国家服务。军需、军械、交通工具、火药——整个法兰西变成一个为军队服务的国营工厂。尽管技术问题缺乏理论价值，但是理论科学家们都是最能了解和解决它们的人。特别是为了保证制造火药用的硝石的供应，需要让老百姓学会一种新的、简单的提取技术。在整个战争时期起指导作用的是拉扎尔·卡尔诺。技术上的领导人是加斯帕尔·蒙日。他们一个是梅齐埃尔军事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另一个是他过去的老师。两人都忍受过旧政权对有才能的人的轻蔑，两人都渴望维护，或者毋宁说保障技术人员的职业尊严。与那些徒有虚名的人不同，技术人员是懂得业务并从事某项工作的。

这样一来，综合工科学校就变成了一条渠道。通过它，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不满情绪和理想主义奔腾而出，变成狂热的行动。从整个法国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只算得上一条小小的支流；但若从它在种种重大的事件中，把科学文化带入19世纪来看，它却又是主流。这个学校长期带着它创建时的特点。它的体制是准军事性质的。该校人数不多，起初只有392名学生，都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的优秀分子。整个课程需要刻苦学习四年。学生们在这里第一次有系统地学习科学和数学课程，固然趋向于实践，但是指导他们的却是第一流的、全都是在严格的传统中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这种传统把一种笛卡儿精神、一种追求趋于秩序、统一和学说上的完美的数学规则灌输给法国的知识界。学生既能干又热诚。在他们生活在综合工科学校的日子，由于意识到将被带到科学的最前线而感到振奋，他们在那里得知人类的未来、共和国的未来，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他们在这种毫无掩蔽的情况下如何行动。而他们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头几班毕业生中有与19世纪科学中的基本函数和分析方法相联系的许多名字——柯西、科里奥利、彭赛列、泊松、盖-吕萨克、沙迪·卡尔诺、菲涅耳。在他们中间，还有富于幻想的青年工程师。他们在想象力方面与圣西门一起远远超出技术的范围而达到专家治国的境界，超出公

共工程的范围而达到公共事业的改革的境界；而他们在实际中则要修筑铁路和开挖运河，苏伊士运河便是其中之一。在1814年中有奥古斯特·孔德，他在实证主义中创立了最有影响的现代科学哲学，从而把该校的精神系统化了。

综合工科学校和其他学校对教师们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9世纪开头几十年的大批有系统的论文，吸引了科学史家的注意。此事可以这样解释：科学家们暂时不是与同事们交流信息，而是与自己的学生交流信息。他们出版自己的讲义，如拉格朗热的解析函数论，蒙日的画法几何学，拉普拉斯关于概率的论文，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和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与文献方面的这种合理化和概括化的运动相平行，为了教学而重新组织的必要性使科学变成这样一种行业，它立足于教育机构，又反过来向教育机构传授有益于科研和发现的准则。简言之，科学家成了教授。这种看来十分自然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这是在整个法国革命中，职能专业化的一个特殊例子。因为在那以前，科学还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犹如文学或哲学，全靠私人或公家赞助者的财力或青睐。

法国就这样几乎一下子拥有了一批现代科学机构，其教育方式、教师和质量，使法国成为欧洲的科学之首。或许正是这种过分的集中，即高等学术研究建立在一个城市而不是全国的基础上，使法国最终失去了在3/4世纪里无可争辩地领导科学的地位。因为法国的做法是造就一批尖子，而不是训练整个民族，是讲究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大概正是由于科学教育与巴黎和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在资产阶级一旦变得安全和能够自卫时，就使法国的科学失去了这个阶级的人才。科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大胆，而这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法国的特点了。

但是，如果说这些都是缺陷，那么，它们被巴黎发出的灿烂光芒所掩盖着。1830年8月2日，索雷在魏玛拜访了歌德。他听到巴黎的消息了吗？这位上了年纪的圣哲叫道：“啊，你对此伟大事件做何感想？是火山喷发了。”^[1]他并不是指的七月革命。他指的是科学院（复辟后又采用这个名字）发生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蒂莱尔二人在物种不变与物种变异问题上的公开决裂。1804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拉丁美洲的林莽和崇山峻岭中生活了四年之后回来了。他急急忙忙带着各种采集品和标本赶到巴黎。这些都是他在19世纪第二次大

航海的年代里，在进行前人未作的地理学、植物学和人类学的考察期间收集到的。在巴黎，他向法兰西研究院的人们展示了他的发现，把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并与作为派往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各国博物馆的代表随共和国军队出征的文化劫掠者所带回的资料进行比较。

1801年，亚历山德罗·伏打及其助手布鲁尼亚泰利被“召到法国”

（这是法兰西研究院的说法），要求他用电池的原型——伏打电池来产生电流。10月15日、21日和25日，伏打在第一分部演示了基本实验。拉普拉斯极细致地观察了每一个细节。11月7日，伏打开始宣读他的著名学术论文《论电流和伽伐尼流的一致性》，亦即电流和静电的一致性。当时，第一执政亲自参加。他是有权参加的，因为自1797年以来，他就是机械分科的院士。他还威严地出席了后来伏打通过论文所需要的两次会议。会后，拿破仑亲自动议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并设置奖金以鼓励与此新现象有关的进一步发现。1807年汉弗莱·戴维由于用电解法分离出碱金属钠和钾，获得这笔奖金。1813年他收到安全通行证渡海到达巴黎，在法兰西研究院接受给予他的荣誉。

1796年5月19日，波拿巴将军下令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某些手稿（还有其他物品）从米兰转移到巴黎，在这道命令中说：“一切有天才的人，文坛上的所有著名人物，都算是法国人，不管他们出生在哪个国家。”^[2]不过，拿破仑是要使巴黎成为科学界，而不是文学界的讲坛，是要它在文化领域内成为欧洲的首都。的确，拿破仑式的开明专制主义的变种将会以科学家取代哲学家。只要文人是那种在法国古往今来受尊敬的政治家和道德家，文学就被抛弃或者取缔。拿破仑开始对思想家表示轻蔑，尽管他们抱着自由主义的愿望，他们的声名却下降了。1803年，拿破仑改组第二分部，把它摒除于法兰西研究院之外，以压制思想家们，而这个研究院正是他们创建的。此后（正如以前一样），他便从科学家中挑选有学问的廷臣。贝托莱和蒙日是受宠者。卡尔诺曾是胜利的组织者，后一度重操创造性的数学研究，但在百日期间出任内务大臣。拉普拉斯一度担任内务大臣，后来荣任参议院议长。后来，夏普塔尔任内务大臣，居维叶任教育大臣。富尔克罗瓦任教育督察员，约瑟夫·傅立叶和拉蒙曾任省长。科学界的行为本是专业的和非政治性的，这证实了安德烈·马尔罗的一个论点，即一个有效率的政权必然使用它的技术专家。在帝国的余晖中，法兰西科学院继续独霸欧洲舞台，直到拿破仑的一代完全灭绝为止。复辟并未打断双重权力制，自从执政府时代以来，科学院就是在这种制度下

发展起来的。拉普拉斯和居维叶分别于1827年和1832年去世，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拥有新的头衔——数学侯爵和生物学男爵——的新人。而给他们颁发贵族证书的实际上是路易十八，而不是拿破仑。

他们是一等光度的双星，他们的引力和整个星座的引力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教育性的和社会事业性的。1823年，统计学这门分析性的而不是简单叙述性的科学的奠基人阿道夫·凯特勒到巴黎留学，以取得在布鲁塞尔天文馆工作的资格。他发觉自己对拉克鲁瓦的概率课比对天体力学更有兴趣，回国以后把他的天文馆变成统计学的而不是天文学的中心。年轻的德意志化学家迫不及待地寻求最新发明，他们一部分人去瑞典向贝采利乌斯学习，一部分去巴黎向盖-吕萨克求教，后来，他们为自己所在的大学赢得了19世纪化学的领导地位。他们的后继者不必离乡背井去求学了。1806年在布拉格、1815年在维也纳、1825年在卡尔斯鲁厄、1827年在慕尼黑、1828年在德累斯顿、1829年在斯图加特、1831年在汉诺威相继创立高等技术学校，整个德意志大概都仿效综合工科学校的样板。

除了英美等一小部分通用常衡制的地区外，在科学家和其他人的日常活动中，公制是法国革命的最实际的遗产。以大自然作为米的依据，取从敦刻尔克到巴塞罗那测量的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为单位，这个决定乃是革命初期的自然普遍论的产物。经过种种困难，其中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测地学上的，经过不少对选择任何单位制时的武断因素的妥协，到1799年，确定度量的工作始告完成。于是欧洲各国代表应召去参加首届公制大会，“从法国手中领取公制”。但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包括法国在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制。

从一开始，拿破仑就觉察到有可能把法兰西研究院当作一个使法国的普遍主义转变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不仅是军队的统帅，而且是研究院的院士，在一大群随军科学家的簇拥下，于1798年驾临埃及。这些科学家以蒙日、贝托莱和若弗鲁瓦·圣-蒂莱尔为首，包括一些矿物学家、考古学家、制图家和博物学家。到达以后，他们把自己组织在一个开罗研究院里。罗塞塔石碑是他们最著名的发现。埃及学是他们留下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的基础是他们的赞助人将他们丢弃

以后，经过了长久岁月才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英国博物馆后来成为遗产继承人）。

法国的研究机构，在意大利已经竞相仿效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797年宪法第297条规定，在米兰创办一所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院，设三个分部。这一机构于1802年变成意大利共和国研究院，将院址迁往波洛尼亚，1805年意大利成为一个王国后，又改名为帝国研究院。拿破仑曾经大力保护意大利的科学。在埃利萨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科学院恢复了。它把各种科学放在第一位，还负责保护托斯卡纳方言的纯洁性。在巴黎挂上勋章的伏打，到意大利成了一位伯爵。正是在拿破仑自己的倡议之下，欧仁于1810年分散他的研究院，而在威尼斯、帕多瓦和维罗纳建立分院，并把科学分部迁回米兰——意大利的进步和工业精神的策源地。在大帝国的其他地区，原本是各首都的科学机构已经下降为行省级的研究院。在巴黎的中心，居维叶以第一分部常务秘书的身份，经过通信联系，把西欧的科学囊括于中心周围。复辟以后，这些机构又各归合法的君主；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公共事业中对科学的极端重视都转化为19世纪的进步主义，技术工作在向有才能的年轻人招手。

整个这段时期中，在法兰西帝国的两翼，两个系统的科学机构，在来自巴黎的科学引力和政治斥力的影响下，都幸存下来了。柏林皇家科学院和围绕着它转的圣彼得堡的卫星，都是以法国为样板的。往东，法国的力量通过欧洲这个连续统一体施加于普鲁士和俄国。但是往西，在战争所造成的暂时真空，以及海洋和历史永远在盎格鲁—撒克逊制度和大陆制度之间造成的深沟巨壑的那一边，尚在襁褓中的费城和波士顿的学会都是唯伦敦皇家学会的马首是瞻，照搬它的模式，由私人自愿地组成在大陆上（至少从科尔贝尔以来）认为应该由国家创办的机构。

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最具有科学潜力的是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宣称：“国家在体力方面的消耗必须用智力取得补偿。”这话是在他受到创伤的1806年冬天说的，当时他的军队在耶拿溃败，他的都城成为法国人的猎物，他的世袭领地成为人家的战利品。^[3]的确，德意志的科学和学术在19世纪上升到领先地位，完全可以说是普鲁士这只长生鸟在向前飞翔时的一个光荣伴侣。在整个启蒙运动中，法语一直是普鲁士科学院的用语，也是普鲁士国王的用语。普鲁士科学院

的许多院士都是法国人（俄国科学院的许多院士则是德意志人）。德意志化运动勃发于文学自我认识的浪漫主义的黎明。从一开始，它就以德意志人对“科学”（Wissenschaft）的独特概念来表达对民族特点的追求。按照这种概念，艺术、学术、科学都是创造性和意识的最高能力的组成部分。

普鲁士科学院的重建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洪堡兄弟起了领导作用。在耶拿和提尔西特战役之后，这不仅是学术的问题，而且是通过学术消弭民族灾难的问题了。威廉·冯·洪堡是人文主义者，当时在柏林。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博物学家，当时在巴黎。他们的合作是哲学和科学在德意志文化中的伙伴关系的一个缩影。亚历山大·冯·洪堡熟悉法兰西研究院的工作，并亲身体验过该院由于强制实施标准而在精密分析上取得的成果。他要用同样的精密科学的精神和实践来改革普鲁士科学院。但是，这种眼光比思想家们的眼光远大得多。他和他的哥哥把他们的科学院嫁接在德意志大学传统粗壮的树干上。

柏林大学创立于1809—1810年，首先是代替已经失去的和十分令人惋惜的哈雷大学和埃尔兰根大学。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教师和学生的问题。必须把柏林的所有学术机构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应该将在天文台、植物园、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对真理的探索与通过老哲学家把这种探索传授给年轻的爱国者结合起来。而且，科学院的每个成员也是大学的当然成员，有资格并受鼓励在大学讲课。这种新转折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它把科学传授给全民族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因为德意志文化不像法国文化那样只用首都的腔调说话，而是在分散于全国各地和许多邦中的许多大学里，用成百个声音说话，这正是它的特点和力量所在。柏林大学从来没有压倒那些更古老、更小而更自豪的学术中心——海德堡和格廷根、马尔堡和吉森、柯尼斯堡和蒂宾根、莱比锡和维尔茨堡各大学。然而，撰写科学院历史的人写道：“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发出。”^[4]因为在这些大学里，科学是能够广泛地普及和传播的，如果采取法国的方式，把科学院的老爷架子与培养技术尖子的专门学校结合起来，就绝对办不到这一点。

这一传播不久以后就开花结果。语言和历史的研究在德意志复兴的学术中走在前列，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方面的收获远远超过科学

研究的范围。不过，基础已经打好。在此基础上，到19世纪中期，德意志将建立起它自己的科学的崇高殿堂。在德意志，科学、学术和大学的事业也就是在社会和政治中最开明最进步的那些人的事业。不管莱茵河以东政治自由主义的结局如何，其科学之家是德意志。采用研究班的方式，让高水平的学生通过科学研究本身受到教育，这是从德意志各大学里语言学、古典文学、古文书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发展而来的。科学实验室本身或许不能说成是德意志的发明。早在18世纪90年代，实验室就已经从由私人建立发展到由机构建立的阶段，它们通常不再是属于一个人——比如说拉瓦锡或者普里斯特利。综合工科学校、自然史博物馆以及伦敦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全都设置了实验室。但是，正是在德意志大学里，实验室适应于用研究班方式研究科学，成为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工具，成为博士学位的来源地。

第一批成果属于本章所讲述的时期。1826年尤斯图斯·李比希在巴黎师从盖-吕萨克学成之后回国。在吉森大学开办了科研和教学实验室。这所大学总是被恰当地用来象征化学领导地位从莱茵河西岸到东岸的转移。1828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完成了尿素的合成。这是在实验室通过实验重新制造出来的第一个新陈代谢的产品。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带着歌德所鼓动的一种理想主义（虽说不是神秘主义）的色彩繁荣起来。谢林为首的自然哲学学派以某种普遍变异的观点来思考自然的统一体，并把生物学引向研究原始的、几乎柏拉图式的形式。他们的基调是赫德尔的和历史循环论的，是黑格尔的和通过时间行进的意识。但是此时生物学同样受到了分析精神的锤炼和加强，并且投入了实验室。从歌德错误的而十分不科学的具有主观和唯心色彩的理论出发，约翰内斯·米勒建立起感觉力和感觉器官反射特性的生理学——眼睛不管睁开还是受到刺激都会报告有光的存在。德意志当时还没有适合于成立数学学校的气候。高斯是靠自学成名的，他有意识地在格廷根大学的孤寂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就像以前的欧拉一样，他是一位常常用拉丁文写作的欧洲人物。然而在1825年，卡尔·古斯塔夫·雅各比在柏林开办了一个研究班，探索法国学派的分析方法。从这个班中，他得到一批追随者。为了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摆脱对综合工科学校学报的依赖，他们于1826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报——《克雷勒学报》^[5]，这个杂志大概在当时各国为了满足各门学科与同行交流的需要而出版的专业期刊中是最杰出的一种。最后，在1827年5月12日，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巴黎生活了1/4世纪之后离开该地，他不平凡的

生涯中的后30年是在柏林度过的。那时候，柏林既是普鲁士的首都，又终于适合作为科学的首都了。

到1830年，英国在科学方面展现出另一番前景。英国的科学，如同它的公共生活一样，终于度过了姗姗来迟的它的旧制度的最后阶段。当然，它在实用的、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更不必说具有个人特征的风格上，总是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这种英国风格与法国人推理的缜密和德意志人玄学的深奥交相辉映。托马斯·杨和光的波动说，汉弗莱·戴维和电化学的诞生，约翰·道尔顿和化学组成的原子假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拿破仑时代的生气勃勃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样说明问题的还有：几乎是英国独家于1830年建立了地层地质学，法拉第发现了由磁产生电流。然而，即使详述起来，这也不过是一段与发明家的个人机遇分不开的、讲述科学家而不是讲述科学的插曲。也正是这些积极的、有批判力的头脑，一方面赞赏英国科学家的独创性，一方面认为英国科学正处于不健康的、对自己不利的状态。查尔斯·巴贝奇所写的《英国科学衰落之反思》于1830年发表。这篇论文号召把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贯彻到科学中去。但是，对此一号召有所反应则是改革时期及以后的事了。在英国，法国革命的影响对科学和对政治一样，来得较迟。

在英格兰，科学尚未成为职业，也没有任何领导科学事业的机构。（在苏格兰有几所大学，但规模小，质量差。）道尔顿是位大学校长，杨是个万事通，戴维则是追名逐利的人。地质学是教士们和有钱人的业余爱好。皇家学会与其说是英国科学的管理者，还不如说是个陈列馆。英国科学完全无人领导。不幸的是，皇家学会染上了追求地位的腐败毛病，这种毛病折磨着18世纪，教会的、市政的、大学的，以及议会的公共生活。到19世纪，赞助科学的贵族在那些他们的17世纪的祖宗们曾经以参加表示支持的协会里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荒谬可笑。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在1830年，巴黎科学院有院士75人，普鲁士科学院有38人，而皇家学会会员却有685人，其中大部分没有科学上的资格。学会依靠他们的捐款过日子，所以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写上F. R. S.（皇家学会会员）的字样。

科学和取得权力这二者之间的分裂，比皇家学会中科学会员与贵族会员之间的划分更加深入于社会结构。自从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科学的发展就完全在英国国教之外进行了。它处于不信国教者的保护

下，而不是处于信奉国教者的保护下了。在各公学中，既不讲授科学，也不讲授任何现代的学科。牛津大学也是如此，剑桥大学也几乎如此。剑桥大学仍然不如过去那样坚信数学。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导师们还是讲综合而不讲分析，并使用老掉牙的牛顿符号，以致毕业生看不懂从大陆来的论文。这样一来，英国的科学就依赖于那些在非国教派学院或者苏格兰各大学里就读的人以及那些自学者了。其恶果之一是英国数学成果的贫乏，简直等于一无所有。数学早就是理论的语言，是物理学上鉴别力的仲裁者。一般说来，英国的科学文献缺乏高雅的风格，这常常是那些完全靠自我教育成材的杰出人物所不能幸免的一种缺陷。在英格兰，当排斥不信国教者进入牛津和在剑桥取得学位后，思想上的活力实际上就与趣味上的高雅分了家。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英格兰还能取得那么多成就，与其说它有某种在科学上自立的优点，还不如说它在思想上的活力。很难想象，戴维、法拉第和杨如果经过数学上的训练，他们的成就不会更大一些。

与此同时，在欧洲文化范围的两个末端之外，俄国和美国则是把迥然不同的机构求助于同样迥异的科学机会和财力物力来源。实际上，受到保罗一世压制的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于1803年进行了改组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直到1815年以后才恢复它的元气。这时，它用法文出版刊物，而不再像18世纪那样用拉丁文了。俄罗斯人也开始替换在院士中占多数席位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和德意志人。俄国对科学一直实行欧洲大陆的那种国家干涉主义。另一方面，拿破仑战争使美国加剧了由于共同语言和共同度量衡而造成的主要依赖于英国科学机构以及采取自愿形式的倾向。费城和波士顿的医生、教授、开明的牧师以及公务人员，把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恢复成多少带有荣誉性的服务团体。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等大学宁愿以18世纪非国教派的学院或者苏格兰各大学为模式，而不以牛津和剑桥为榜样，并不断增加自然史和自然哲学的课程。然而不论是美国还是俄国，科学上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吸收。两国都念念不忘的文化伟人、18世纪的博学之士和哲学家——罗蒙诺索夫或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两国都不能形成基础科学深远而绵绵不断的水流。俄国和美国做出的大部分贡献均是依赖环境的那些方面，诸如地理和地质勘探，气象学和天文学的情报，地区性动植物的研究。

以上所述均属与科学的公共历史有关。对于个别科学史的讲述应该与自然而不是与社会联系起来。本章所讲述的时期中的科学本身的长时期的发展，将在评述数学和实验——把对世界的描述归结为精确的量的叙述的两个主要手段——是如何使人们对现象的认识逐渐加深和逐渐扩大时最明确地显示出来。一方面，科学在对传统的分析方法充满信心的金色光辉中从18世纪步入19世纪；另一方面，实验手段已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波义耳、一个拉瓦锡或一个普里斯特利手中的法宝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规律的工作程序。实验在已建立的实验室进行，把可以再现出来的结果在专门杂志上报道。这不仅是一种规模上的变化。因为在这一进展取得以前，实验一直被看成是一种培根式的，即分类科学的典型手段，而不是被看成在抽象的以数量计算的科学中对数学的补充。如果要找出这几十年的中心主题，那就是精确的、量的科学渗入了“自然史”，渗入了以前那种适合于搜集和标记世界上一切事物和奇迹的典型标本的情趣中了。

这是分析方法的黄金时代。18世纪的任务是把牛顿力学从几何术语转变为代数术语，确定适合于后一术语的量。科学描述了具有惯性质量的物体在径向力——引力或斥力——作用下的运动规律。太阳和行星是力学体系的巨大模型，而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则是这一科学思想的丰碑。这部五卷本的巨著收集了他从1808年到1823年间的优秀论文。拉普拉斯在论文中指出，对于牛顿引力定律的每一个明显的例外，事实上都是说明该定律正确的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一个一个解决了预言与观察之间的所有差异，证明了看起来异常的现象实际上是行星本身相互吸引的表现，并推测了经过修正的天体理论。实际上，“牛顿的世界机器”一语是个误称。真正的“世界机器”是由拉普拉斯计算出来的。

《世界体系》是篇很好的、可靠的通俗文章，它表达了拉普拉斯对决定论的和宇宙的科学信念，这种科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科学，符合于牛顿的定律。甚至连太阳系从某种原始的星云到现在的质的团聚这样一种历史发展也可以包括在这一思想之中。拉普拉斯的另一篇伟大著作，在数学上更具有独创性的《概率分析理论》，也并非与他高度的决定论无关。一个具有无穷智力、感觉无限精细的头脑可以明察世界上每一颗物质微粒的位置与速度，从而完全精确地预测未来。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头脑，也不存在这样的感觉。正是由于我们能力

有限，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犯错误，而不是因为事物结构的某些不完善，使科学回到可能性，犹如依赖拐杖一般。正是分析这门学科估计到并因此减少了错误的作用，限制了无知的作用。在高斯更为孤独的工作中，表现出恒星运动的完美与观察的不完美之间类似的联系。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是在19世纪的第一天夜晚由皮亚齐在巴勒莫天文台发现的。根据极少的几个要素计算它的轨道，使高斯想出一种新的、更一般的计算天体轨道的方法。高斯还提出了误差定律，即在一系列的不同观测中提取最大概率值的最小二乘法，或者说（像几何里的同样问题）在靶子上分散的弹洞中找到靶心的方法。

虽然牛顿对天体运行的解析证明是这门学科最重大的突破，然而，拉格朗热从宏观到微观，从彗星到质点，对一般力学加以抽象化，在代数学的严格性方面，可作为数学物理的机智和判断力的楷模，站在这一代人的前列。1788年出版的《分析力学》宣布了巴黎分析学派将向新的实验领域——热、光、电、化学挺进的方针。拉格朗热的书全是文字，没有任何几何图形，也没有任何图表或图画。在他的书里，从虚速度原理到整个统计学，从达朗伯原理到动力学，通篇都是方程式。

即便如此，约瑟夫·傅立叶在1822年的《热的解析理论》一书中还是避而不谈头脑比较实际的人们为之焦虑不安的一个问题：热是一种无重量的流体物质呢，还是物质微粒运动的一种表现？他写道：“关于热的本质，不确定的假设尽管可以形成，但支配着热的作用的数学定律的知识是不受任何假设影响的，只需细心地检查普通的观察所指出的，并受到精确的实验证实的主要事实就行了。”他解释说：“热的作用，是受到离开数学分析的帮助就发现不了的永恒的规律所支配的。我们要解释的理論的目的正是要揭示这些规律；这种理论把物理学对热的传导的所有研究都归结到由实验提供要素的积分学问题。”在另一处他说：“这些考虑提供了存在于抽象数字科学和自然原因之间的关系的唯一例证。”这也是各种关系中一个有启发性的例证，正是一个物理问题进行这样的分析，导致傅立叶想出用正弦和余弦级数来展开一个函数。他说：“深入研究自然是数学发现的最富饶的泉源。”^[6]这种从拉格朗热和傅立叶的所有模式中极度的抽象是非常卓越的。不过，这也许过了头。它不像热是物质还是运动这一比

较朴素的辩论，而是始终没有引导到一种能的科学。但它明显地符合纯理性力学的精神。

物理学有两大特点。它的序的模型是天文学的，它的技术是分析式的。这样，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作为力的定律的典范，运用到其他领域中。物理学家们努力用微分学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发现。他们建立的方程式往往以受力的作用的质点为元，这种力随着任意两点间距离的平方而急剧减小。早在18世纪80年代，库仑就用一架扭秤演示了平方反比关系决定着被看作物质的磁荷与静电荷间的相互作用。牛顿引力也是一样，在两力心间只得到了这种主要是几何的关系。理论认为，在两质点之间的空间没有物理的联结，没有力学的联系。1791年，伽伐尼产生出第一个人工电流，环绕包括青蛙腿部神经和金属电偶作基本元素的电路流动。从1800年开始，伏打学会用成对的银圆片和锌圆片组成的“堆”来保持电流。每一对圆片中间用一层湿的薄毡隔开。从1806年起，汉弗莱·戴维在分离新元素中使湿电池在化学上得到应用。然后在1820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忒的理想主义信念——一切自然力最终归于同一——得到了酬报，他发现通过导线的电流对有磁性的小针能发生作用。这一作用的消息传到巴黎以后，安培立即证实了电流间具有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安培是一位技术上的多面手。与他所受的训练相符，他把这新的学科称为“电动力学”，并着手研究微粒力学形式的电磁感应。这一工作要求高超的技巧。因为安培必须非常精细地研究每一电流微元，并需假设在任意两个运动着的电质点之间的作用力是径向的。他明确地说，在他看来，科学的解释就在于把现象分解成各对质点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相同和相反的力的量。安培起了极大的澄清作用。他取消了静电和动电之间类别的不同，把其中的差异纳入力学的范畴。在重力方程式里表现为高度的那一项，在电学方程式里就成了静电势。

同时，在这些年中，实验室通过另一条途径把定量法带到物理学中，不是用武断的抽象，而是具体地通过测量和通过简单的、系统的计数法。由于决定性地利用了拉瓦锡的物质不灭原理以及氧化和反应的思想，化学已经完成了它的革命，取得精密科学的地位。虽然这一理论工作是基本的，但拉瓦锡还是通过分类和命名，通过语言原则而非计量原则组织了这门科学。同时，原子假说最终把大量具有普遍意义的数字加在化学大家族的各个物质上。这不是简单的过程。约翰·

道尔顿往回沿着直接通向17世纪牛顿哲学和微粒哲学的渠道思考，一直上溯到古代和伊壁鸠鲁把自然界的变化看作各部分的重新排列而不是质的改变的方针的所有道路。他首先观察到气体扩散和溶解的物理现象。这使他想到粒子的相对重量问题，并从这一物理问题出发，进而达到这样一个化学思想，即化合物的各成分的百分比一定与组成它的原子的重量成比例。如果真是这样，则化合物的缜密结构应该是单个原子之间的结合。这里新的东西是关于原子的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思想}：第一，将原子在化学上按其重量（而不是形状）这一物理属性加以区分；第二，原子是属于化学元素的（而不是物理分法的最后点）。

就连道尔顿自己也不完全清楚他的优点在于利用重量尺度作为化学家的度量标准。使他更为高兴的是，原子总是以最简单的比率结合起来这一纯粹的（然而错误的）数字观念。在若干元素结合成为一种化合物时，比率是1：1，而在其次高一级的序列（如氮和氧），按不同比例形成一系列化合物时，比率则为1：2，或2：1。这样，在道尔顿看来，水应为H₂O。他也没有证明定比和倍比的两个经验定律。他只是设想了化学成分的不变性，然后提出原子假说作为一种解释。正是由于他喜欢最简单的比率，他才没有能从盖-吕萨克在综合工科学校的实验室里取得的了不起的发现里看到对原子模型本身的证实。1809年，盖-吕萨克证明：进行化学反应的气体的体积在反应时是按照某种小整数的比率进行的，但并不一定是最简单的比率。这样，一分氧与两分（不是一分）氢结合成两分水。相同体积的气体含有相同数量的^{粒子}就是最明了的解释。通过安培和阿伏伽德罗各自提出的假说，即分子可能是多原子的，这一论点就和道尔顿的重量比率相一致了。

此外，大量互相交叉的发现使这些本来清晰的关系模糊起来，并带来了原子假说所包容不下的知识。由汉弗莱·戴维开创的电解法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金属——钾、钠、钡、锶、钙和镁。在巴黎，盖-吕萨克鉴定了在相反电极上产生的气体元素——氯和碘。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化学家是贝采利乌斯。他规定了现在依然通用的元素符号，并以氧为一百作标准制成元素化合重量表。由于金属以及与金属结合的氧、氯或碘等具有相反的极性，他认为化学结合就是荷正电的原子与荷负电的原子之间的相互吸引。据此，他按照元素的带电性质进行元素的二元分类，并且不承认多原子分子。这些和另外一些成果所造成

的混乱，使原子假说的命运变幻无常。然而，它毕竟作为一种科学假说而不光是作为本体论的一种方法存在下来了。物质结合的科学对数学规则的这种依从，使化学成为一种精密的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现在，这种科学是与物理学而不是与自然史联系在一起的。

回过头来再稍微谈一下物理学。在19世纪的科学中，实验和理论两方面的结合，第一次给经典的微粒力学带来了阴影。19世纪光的波动说是托马斯·杨和奥古斯坦·菲涅尔的共同创造。杨是靠自学成功的奇才，带点英国式的天真，缺乏数学造诣。在1802年和1804年他公开演示实验，不太完美地显示了干涉现象，证明光的周波。菲涅尔是个技术上的多面手，他的短暂的科学生涯集中在19世纪20年代。起初他对杨的工作一无所知，而用二阶偏微分方程表达了与杨相同的结论。他们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奏起了一个不和谐的调子，因为他们用媒质而不是用真空中的粒子描述波的运动。此外，菲涅尔还认为媒质（即以太）具有自相矛盾的弹性和导磁性，这在以后将成为法拉第当时尚未想到的连续场的基础。

在19世纪，生物学是即将出现的科学，它受到实证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同样喜爱，比较解剖学统治了这一世纪的头三十几年。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伟大的技术专业——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以及细胞学和病理学的先声——正在实验室中形成。由于这几方面的研究，到19世纪中期，生物学将超出浅薄的自然史和摆脱对医学的依赖。从智力上来说，生物学的问题是一个在科学上自我了解的问题。这门科学的特征、本质和对象都需要予以确定。在过于简单化了的解释中，机械论和生机论作为可能的答案提了出来。生命现象可以归结为物理本质的规律，即力学吗？或者生命是另一回事吗？也许是无法解释的吧？它的界限甚至进入了化学领域，在化学中，人们对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不适当的区别还记忆犹新。人们或许认为，由于维勒于1828年合成尿素，这一问题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真正的问题要比生机论更为深刻、更为复杂，这个问题最多处于一种模糊的地位。生物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科学？虽然不是数学性质的。那么是什么呢？它要考虑哪一级的模式呢？是有机体的模式吗？如果这样，有机体便是它探求的终极目标，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或者是物理学的模式吗？如果这样，它的探求目标将是各部分的秩序和安排，如同在物理学里一样，而不会是整体的某种高级

智慧。对于上述有关范围、方法的种种问题，在这几十年中，四位主要的生物学家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却十分协调。这对于科学家的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教训。拉马克和居维叶尽管在理论问题上各执己见，态度坚定，却通过比较解剖学共同创建了生物分类学的基本分类。另一方面，比沙把自己看成是生命的研究者，而马让迪把自己看成是活机器的研究者，但他们却相继地站在19世纪实验生物学的伟大、深刻传统的前列。

组织学的创始人格扎维埃·比沙可以看作专业生物学家的一个原型。比沙把生命作为他的科学的对象，并在一个有名的公式中把它定义为“抵抗死亡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由于这个原因，他常常被称为生机论者。然而，比沙并不把生物学看作逃避决定论的避风港，也不认为它缺乏物理学的精确性。他的研究方法是最严格地把分析技术应用到有机体。他习惯于把有机体的研究分解为各种成分的知识。他在组织里发现这些成分每种类型都有一种专门的功能。以下就是他于1801年发表的《普通解剖学》的要旨：“一切动物都是各种不同的器官的集合体，每一个器官都发挥自己的功能，同时又联合起来保护整体。它们在组成个体的总机器中，是许许多多多个别的机器。但是，这些个别机器本身则是由十分不同类型的若干组织所组成，就是这些组织形成了器官的真正要素。化学有它的简单的物质……解剖学有它简单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结合……形成器官。”^[7]比沙关于动物和植物两种生命分别存在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器官中的学说，则不大走运。他在分析方面的向前冲刺，由他对解剖的热情而更加锐不可当。他在巴黎主宫医院的病房和陈尸室里练习解剖。就在那臭气熏人的角落里，他染上了热症，于1802年去世，年仅31岁，正是奋发有为之时，他鼓舞着所有认识他的人们。

实验生物学的实践在法兰西学院的弗朗索瓦·马让迪的生涯中得到发展和巩固。他在该学院设置了第一个实验室。马让迪既严厉又刻板，他认为有机体是化学和物理学中的复杂问题。他出版了比沙的一本经过修订的著作。作为编者，他在脚注里简略地指出他老师的美好成果和观点错误。马让迪由于严厉谴责一切一般性的观点，他本人只留下一系列美妙的发现，特别是在神经生理学方面，而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实验纪律和尊重事实的榜样。克洛德·贝尔纳是他的大弟子，在他的工作中，实验在精确、丰硕和

论证方面的确能与数学匹敌。法国的重理性体现于德意志的彻底精神，给德意志的科学带来了冷静和现实主义，并预示了生物科学与德意志文化的密不可分。1824年普雷沃和J. B. 杜马确定了青蛙卵受精过程中精子的作用，并观察了受精后的演变。1827年，卡尔·冯·贝尔验证了一只母狗卵巢里的卵子。这一发现宣告了细胞学和胚胎学的诞生。

这一实验主题为生物学在将来成为严密的科学做好了准备。然而，在它当时的状况，分类学方面较简陋的工具似乎仍然是在整个自然界的生物领域中排列一切事物的方法。拉马克的《无脊椎动物自然史》在1815年和1822年间出版。居维叶的《动物界》以4卷本出现在1817年，随后从1821年到1824年又陆续出版了7卷本的《骨化石研究》。在这些卷帙浩繁的力作中，自然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过渡到近代动物学的分类法。这门比较新的科学通过古生物学把古老的自然与生命联系起来。它通过比较解剖学严格的技术，确立了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种间的关系。调整的原则即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原则是居维叶提出的。他写道：“每一个有机体，组成一个集合体，一个单一的、紧密的体系，其所有部分都互相适应，并通过互惠关系在任何一定的行为中合作。其中任何一部分在其他部分不起变化时也不可能变化，因此，每一部分如果单独来看，都指示和反映着其他各部分。”^[8]这样，看到一颗牙齿，居维叶就可以断定蹄子是什么样的，或者消化系统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个办法，他把动物的结构与它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了。

拉马克把居维叶的方法运用于无脊椎动物的分类。他做这一工作非常精细而熟练。虽然居维叶和拉马克在实际工作中是互相补充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所推测的生物秩序模式却迥然不同：一个是自然主义的和变化的，另一个是神学的和天意的。拉马克于1809年出版了《动物哲学》一书。其他的论点后来作为进化论的先声非常有名，为自然选择的机械进程提供人道的和理想的角度的另外解释。拉马克的观点实际上是从狄德罗所开创、由歌德充实了的有机的和浪漫的自然哲学中演绎出来的。他的进化论是把这种观点运用于分类学，而这一理论自达尔文起才闻名于世。在他那个时代，拉马克关于物种变化的猜测被同事们视作一个有天才的观察家完全进入歪门邪道，必然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在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中，活的自然乃是一种塑造力，它

通过有机组织进一步的变异和完善而不断形成各种各样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但是，动物内在的趋于复杂化和专门化的倾向并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因素。与这种倾向形成对照，外界自然环境也在施加影响，使这种倾向受到约束，形成我们误认为不可改变的物种。环境的改变引起需要的改变。需要的改变产生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变成习惯，这些习惯最终改变各个器官甚至整个有机体。这样，外界环境就是有机物创造性地予以适应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情况和机会。

居维叶在说明生物的适应性，即有机体与其生命的经济学之间、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这一惊人的事实方面，远比拉马克更具特点，更为保守，也更有说服力。这其实不过是来自创世说的老观点。自从分类大师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这一观点一直受到尊重，并长期充当基督教自然神学的支柱。按照这个观点，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造的，每一个结果都是为了贯彻造物主的旨意而设计的。居维叶的科学思想是保守的、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另一种方式，就居维叶的著作对达尔文所具有的价值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与其说他是一位生物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在科学上把“普通物理学”和“特殊物理学”，即自然史加以区别。居维叶大概也会同意本章的论点：是定量化和实验造成二者的差异。“普通物理学”包括力学、动力学和化学，吸收定量化并使用实验手段。而研究个别事物，可以不顾抽象理论的自然史则不然，居维叶认为在自然史中，实验是行不通的，因为分解一个活着的整体就是毁掉研究的对象。应该由比较来代替实验，这样，博物学家就只能通过观察和敏锐的判断去搞清楚由物理学家所发现的规律在自己的领域内起作用的情况。

尽管居维叶坚信物种不变，但却是他的自然史的比较而不是拉马克的猜测为进化论生物学做好了准备。居维叶早就把动物的结构看成是它的生命方式的一种功能。达尔文要做的只不过是把创世说的论点颠倒过来，从自然的角度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适应性罢了。他要做的就是将分散种群的分类问题转化为历史性的门类学问题，寻找谱系和进行比较。居维叶本人提出了地球上种群的延续问题。在他的晚年，古生物学这门形式古老的新科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果说在一方面生物学由于逐渐掌握了实验手段而加入化学和物理学的行列；那么，在另一方面，它通过自然史渗透到地质学和对世界的描绘里去了。

由于古生物学提供了一把钥匙，19世纪初叶成了地质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它在这一时期初步掌握了本学科的材料。直到18世纪90年代，对地球的研究只不过是矿物学的模糊观念加上对此行星起源的一些猜测而已。1795年，詹姆斯·赫顿的《地球论》用历史学的语言宣布了自然的一致性的原则。赫顿是要把地质学家限制在从当前起作用的自然力的影响中得出来的归纳类比中。他需要近于无限的时间（“既无开始的痕迹，也无结束的前景”）。他所鼓吹的“火成论”学派主张原始形成物的火成起源。他们的观点不断受到“水成论”派学者的强烈反对，后者是19世纪初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在萨克森地区弗赖贝格矿业学校的追随者。他们赞成水成论，反对火成论。他们认为地层是经过一系列巨大洪水泛滥后沉积而成的。如果没有发现化石地层的技术的话，这些争论恐怕还不能得到解决。先驱者是威廉·史密斯。他是一位英国排水工程师。在1810年和1820年间，根据嵌在岩石里的有特征的化石群，他查清从东英吉利和英吉利海峡直到威尔士的煤层组的连续层。在巴黎盆地较新的地层里，居维叶和布隆尼亚尔使用类似的古生物学指示物进行了地质分类。

居维叶及其大多数英国同行于19世纪20年代根据地质灾变理论找到了证据。他们仍然是把这证据放在缩减到人类历史范围的时间表里。毫无疑问，神学的种种成见使他们倾向于赞成洪水论。然而，不管是对是错，这不是《圣经》上的简单问题，这是上帝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更为深刻的问题。地质学是首先触及自然的历史和结构的科学，因而它首先把上帝看作统治者而不单单是造物主。在这方面，科学也没有以绝对权威说话。跨过19世纪初叶科学的前沿，当我们穿越居维叶在生物学中新的实验性学科与旧的自然史的实践之间划定的分界线时，我们就为单纯叙述性的科学留下精确的和定量的领域。把生命的各种形式按其漫长的地质连续过程的秩序从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排列起来，古生物学就以进化论为工具，为给科学按历史年代排列准备了证据。但是还没做到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当活动的领域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从科学转移到工业时，英国，而不是法国，就成为欧洲技术的领路人和导师。蒸汽机的发展对工业化过程是真正的革命因素。动力的增长开始按指数沿着曲线无限上升，必然超过风力或下落的水力、人力或畜力利用滑轮、杠杆、齿轮和螺旋所产生的动力。在瓦特于1800年退休后，特里维西克改进了引

擎，使用更高的压力，双向活塞，减少了横梁。水平汽缸到1825年以后才出现。引擎不再局限于抽水或为高炉鼓风，它已经在机车上使用，并替代水轮向工厂提供动力。1807年，富尔顿的蒸汽船从纽约开到奥尔巴尼。特里维西克于1805年造出一台火车头。斯蒂芬森于1813年造了一台更好的火车头，在吉林沃思煤矿使用。1830年，斯蒂芬森的第一列火车从利物浦驶往曼彻斯特。但是，使当时的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的是蒸汽机在棉纺织业的使用，先用于纺纱，后用于织布。从水到蒸汽的改变，把工业从农村的溪流旁边转移到人口集中的地方。早期工业化时代简陋的工厂给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许多城市刻上一条条的面痕。到1830年，曼彻斯特的棉纺厂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了。但是，除了法国某些地方散在着几个大棉纺厂而外，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棉纺厂还没有一个超出实验工厂的阶段。

工业技术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与科学没有什么联系——除了詹姆斯·瓦特定名的“太阳和行星式齿轮”联动装置之外；他通过这一联动装置，使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成轮子的旋转运动。确实，提出证据，要大家相信科学是使技术产生丰硕成果的种子，是颇费脑筋的。科学和技术的密切合作带来硕果累累，那只不过是近百年来事。然而弗朗西斯·培根所作的预言早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在19世纪初实现这一信念的前夕，这种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定。理论科学对工业起的作用仍然很小。但是，如果把科学活动的概念加以扩大，使它不仅包括有条理的自然知识，而且包括贯穿于整个技术领域内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乃至机会的强制而构成的有系统的模式，那么，工程师和实业家的行为就会与科学家的行为合拍了。

理性——百科全书运动把狄德罗的夸张言论远远抛在后面，现在，它在两本巨著《技术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许多较小的技术词典中恰如其分地得到体现。这在原则上与系统的生物学的分类并无分歧。这应该被看作描述性科学在工业上的应用，是公开宣传实践中使用的最佳方法并使之标准化，而不是推广由理论引起的某种新鲜事物。公开宣传是由各工业促进协会对发明者进行奖励的条件之一，这种协会在英国是皇家技术学会，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技术促进协会。同样，专利权最终必定进入公共的领域。欧洲大陆的专利法始自法国革命。所以，系统的交流现在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普鲁士，甚至在奥地利的“改进技术的”地主中间，通过各种协会和有关

农业情况的出版物已经开始进行了。农艺学试图取消千百年来愚昧的常规，而代之以描述性的耕作科学，对于所有的生产者都是如此。经验让位给技术，秘密让位给公开，手工艺让位给机械化和劳动分工。在许多方面，理性就这样进入了工业，分析方法进入了各种元素。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伊莱·惠特尼即使不是通用零件的发明人，也是一个提倡者。把这场运动描绘成科学家关于自然统一体的假设所产生的理性的可能性进入了机械领域，是不是异想天开呢？从那时起，研究机械的人在分析机器结构时可以像解剖学学者一样指望得出一般的规律了。亨利·莫兹利把工程技术的实践重点放在切削统一的螺钉上。他的车床装上了滑动刀架以保证平面。这种车床是基本的工具机，而精密的工具机是工程技术的保证。莫兹利1829年制成的测微器使公差趋近于零。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者和他的学生詹姆斯·内史密斯在谈到感人的品质时曾经说：“莫兹利先生的特点是热爱真实和准确。”

[\[9\]](#)

物质的性质以及通过经验对物质的性质的认识，在一定的限度内决定最合理的技术能够从物质中得到什么东西。化学工业虽然并不是最惹人注目也不是规模最大的，但就其产品和潜力来讲，却是最新奇的。它的革新也不依赖于理论。原子假说对染色工厂或硫酸工厂没有帮助。甚至拉瓦锡围绕燃烧理论重新确定科学的方向，对制造商的需求也毫不相干。对实业家有利的是日益增多的介绍各种化学品的处理和变化的详细经验的书籍。商用纯碱和硫酸是主要的重化学品。生产纯碱和硫酸的有效而经济的操作法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采用。利物浦的詹姆斯·马斯普拉特于1823年用吕布兰法从海盐中提取纯碱获得利润。他不懂得其中进行的化学反应。直到19世纪90年代吕布兰法被取代为止，没有一个人弄清楚这件事。吕布兰法是使硫酸钠与木炭和石灰融合而产生纯碱。吕布兰本人当时所以想到这个方法，是与熔化矿石进行荒谬的类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于1791年在巴黎取得专利，而后来使他不能利用专利的因素则是政治的、个人的和经济的，而不是理论的。在整个工业界，机遇和运气在技术可能的范围之内确实起着决定性作用。铅室法制造硫酸依赖于铅的不渗透性，这样生产者就不再因为使用玻璃器皿而使生产规模受到限制。苏格兰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用这种方法生产，英格兰则稍晚一点。使这种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扩大的是纯碱贸易所开辟的市场。所有化学工业的情况均是如此。每一个新的出路，每一次降低价格，都会牵动酸、碱、肥料、漂

白剂、染料、玻璃、肥皂和火药之间整个的联系纽带，并且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主题，也许要用拉马克的用语而不能用达尔文的用语来理解。因为工业需要机会的强制。技术是艺术，不是自然，是受目的指导的。机器所获得的特点是继承得来的。只是一些演变来的公式才构成铁工业的发展。工业化中最主要的物质变换是用铁取代木和石作为基本结构材料。19世纪简直就是铁的世纪。然而，这并非某种重大发明产生的结果。由焦炭代替木炭不是引起生产的扩大，而是使这种扩大有了可能。到拿破仑战争末期，只有英国普遍采用焦炭作为燃料。铸造业在设计上作了改变以适应新的燃料，并扩大了规模以满足市场需求。铸铁和锻铁在钢产生前仍然起作用。当用蒸汽吹鼓风机的时候，炼铁炉就高了起来，尽量向上伸展，以取得像拉马克的“长颈鹿”那样的成效。一想到技术的重大组成部分的各个阶段的情况，就使人不禁想起进化论的比喻。举例来说，在运输上，运河和公路网适合于高度专门化和临时产生的情况，由于对廉价和稳定的运输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了。我们所讲述的这一短短的时期几乎包括整个运河时代。可以想象把这一时代用一种图显示出来的情景。在图上，各运河的宽度随年代的变化而不同，在某些出现沼泽的时期，运河可能很宽，只是在环境发生细微变化后，才变得很窄，像一条线一样。1830年以后，铁路取代了运河，其速度之快就像运河兴起时一样。

偶尔也会有一些呼声越过依然把科学和工业实践分开的界线。汉弗莱·戴维在人道主义者的呼吁下设计了矿工安全灯。约瑟夫·夫琅和费是个光学家。他发现了太阳光谱中的吸收谱线。按照科学委托人的严格要求，在制造精密仪器的过程中发展了技术，从而使工作母机大大受益。新元素得到了原来未曾预见的用途。伟大的化学家贝托莱使用氯发展了漂白技术，并用心研究染料的合理化。冒险家们用氢充灌气球，在1794年的弗勒吕斯战役中开始从空中观察炮火。菲涅尔在法国公路和港口管理部门任工程师谋生。他设计了透镜式灯塔，以取代常使船长们苦恼的光线微弱的火把和马灯。1799年在伦敦创立了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来改善穷人的生活。该会的赞助人朗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原是一个有发明天才的美国人，后背叛祖国，由巴伐利亚选帝侯封为贵族。他也是热力学实验的创始人，

暖气管的设计者，一度是拉瓦锡遗孀的丈夫。19世纪20年代，各技工学校进行了提高工人本身科学水平的运动。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按照存在时间很短的德意志这类协会的样子，准备把科学传授给人口中更有影响的那部分人，并且使全民族养成为进步而努力的精神。

在这些混杂的声音中，有两个表达了较为深刻的思想。萨迪·卡尔诺于1824年出版了《热动力论》。迈克尔·法拉第于1831年宣布了电流在磁场里的感应现象。这两个发现完全没有联系。它们实际上开始了两个新的学科——热力学和物理学中的场论，使物理学超越了古典的牛顿传统。看来更有意义的是它们在基础科学和合理技术之间建立了对话，从此没有中断过。从技术方面来说，它给理论家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而科学则以动力来武装技术作为回报，极大地增强技术能力，以致技术的使用决定了人类和国家的命运。两者的结合就这样成为文明的主宰。

卡尔诺的《热动力论》是一篇完全抽象的学术论文。然而，其论证则都是关于蒸汽机的，毫无疑问，L. J. 亨德森的著名论点——蒸汽机对科学的贡献大于科学对蒸汽机的贡献——就是受到他的论证的启发。把热转化为运动（如蒸汽机所做的那样）的最佳条件是什么呢？这是卡尔诺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是综合工科学校的分析精神通过他的口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想象出在一台理想蒸汽机里的可逆热循环。两个热库，一个温度较高，另一个较低。从前者放出的热使汽缸内气体膨胀，首先在恒温下，然后在恒压下推动活塞。不断地重复这些步骤，活塞就压缩气体，并使热进入第二个库。^[10]卡尔诺想用这个理想的引擎，从起动状态出发又回到起动状态，来代替实际使用的完全不可逆的引擎，因为这种引擎摩擦很大，漏热，活塞砰砰地来回移动。结果发现热的动力只决定于使用动力时的绝对温差。这一推理就建立了热力学这门科学。它是从蒸汽的嘶嘶声中抽象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热引擎”的普遍情况。

法拉第的发现使知识来自力量和力量来自知识得到相互印证。他对事实的审慎态度可以看作一个决定性的事例，说明实验已经能够达到历来属于数学的那种精确程度。对他来说，感应电流是给予一系列精明的和耐心的实验的酬报。在这些实验中，他寻求产生与奥斯忒效应相反的东西，从磁场里取得电流。他最初的一些尝试遇到了挫折。电流只在磁铁放入或抽出线圈的一刹那在电路中流动。但是，从失望

中取得经验而不是退缩，这就是法拉第的天才的特征。他发现保持电流的秘密就在于不断地通过力线（这是后来他起的名字）。一句话，他已经发现了发电机的原理。他本人是一位科学家，对事物本质的兴趣甚于实际的好处，求名甚于求利。然而，在整个科学的漫长历史中，电力工业在此以后的发展是破天荒第一次把基础研究（不只是合理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量运用于工业生产之中。从发电机源源流出的电力增强了蒸汽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再往前看，严格分析在电磁“力线”中的空间关系就是相对论以及相对论关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可转化性（不管是通过聚变还是裂变）这一预言的基础。

力量来自知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王念恩 译）

[1] 约翰·艾克曼：《与歌德谈话录》，H. H. 胡本编（莱比锡，1925年），第596页。

[2] 转引自爱德华·麦克迪编《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本》（纽约，1955年），第46页。

[3] A. 哈纳克：《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史》（两卷本，柏林，1900年）第2卷，第556页。

[4] A. 哈纳克：《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史》（两卷本，柏林，1900年），第2卷，第557页。

[5] 这个学报的全名为《纯粹和应用数学学报》，以主编人数学家克雷勒的姓氏简称《克雷勒学报》。——译者注

[6] 约瑟夫·傅立叶：《热的解析理论》，A. 弗里曼英译本（剑桥，1878年）。所引各段分别见第26、14、24和7各页。

[7] 《普通解剖学》（巴黎，1812年）第1卷，第79页。

[8] 乔治·居维叶：《骨化石研究》（新版，5卷6册；巴黎，1821—1824年），第1卷，第45页。

[9] 转引自弗里德里希·克莱姆《西方技术史》（纽约，1959年），第285页。

[10] 此处按原文译出。按卡尔诺热机的机制为：（一）绝热膨胀（对外做功）；（二）等温压缩（向低温热库放热）；（三）绝热压缩；（四）等温膨胀（从高温热库吸热）。参见王竹溪《热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74页。——译者注

第六章 宗教：欧洲和美洲的政教关系

到1793年年底，十字架和三色旗在欧洲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对立的象征了。在法国，由“教士公民组织法”大大加深了的教会与革命之间的严重分裂，这时看来已无法弥合（参阅第八卷第二十四章）。法国天主教会必须改组，同新法兰西的民主制度取得一致；高级圣职人员必须由人民选举，并独立自主，不受外国人的控制——在1790年对于制宪议会来说，这已经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这就引起了资格和权能的严重问题。即便是一个国民议会，它有什么权力如此大张旗鼓地改组天主教会的一个分支呢？不幸的是，法国革命的第一个原则，即人民主权，是与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传统相对立的，而罗马则认为这些教义和传统对于天主教这一宗教团体的精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庇护六世对公民组织法进行谴责已经为时过迟。那些拒绝对该法宣誓的教士被剥夺了公权，或被迫亡命异邦，或投奔地下教团，往往鬼鬼祟祟地去干挑衅性的反革命活动。紧接着，那些宣誓拥护“公民组织法”的“爱国教士”也同革命发生冲突，特别是在1792年8月10日革命向左摇摆以后。许多人痛恨对他们的良心所提出的无情要求，如实行身份登记、鼓励神职人员结婚、处决国王等。另一方面，革命的领导人对公民组织法所带来的结果越来越感到失望，它破坏了爱国事业，引起了教会分裂和社会秩序的混乱。1793年达到了破裂的关头。3月传来消息说，拒绝宣誓的教士们在旺代叛乱中发挥了作用；7月，许多拥护“公民组织法”的教士参与了联邦主义者的暴动。于是，在雅各宾党人的心目中，教士们统统不可信任，他们不是实际反对爱国事业的阴谋分子，就是潜在的阴谋分子。在内战和外国入侵的狂潮中，对拒绝宣誓拥护“公民组织法”的教士们的恐惧扩大了，变成对整个神职人员的猜疑，在许多地方竟发展为对基督教本身的攻击。

在1793年秋天开始有意进行的反基督教化，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动，而是往往由一个地方的爆炸性局势或

由某人的反复无常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运动或事件。它一反政治事件的常规，第一次组织的运动并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外省开始的。驻在外省的代表们，最著名的如驻在涅夫勒的富歇，开用暴力破坏圣像之先例。这些代表在军队和地方上的革命党人的协助下，禁止人们去做弥撒，把教堂充作俗用，处决被俘获的拒绝宣誓拥护“公民组织法”的教士，以高压手段强迫教士们背教或半背教地结婚。用一种对理性和共和国的崇拜取代了对基督的崇拜。在巴黎圣母院举行著名的理性节（1793年11月9日）之后，巴黎各区在公社的资产阶级反教权派的鼓励下掌握了运动。国民公会的非基督教化的立法像公社的猛烈非基督教化一样轰动了整个社会。自古以来教士垄断教育的情况被废除，1793年10月，当国民公会投票通过革命的最严厉的反基督教法案，用新的革命历法取代与整个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旧格里历的时候，法国断然与它信奉宗教的过去决裂（见原文第691—692页附录）。

在天主教历史学家们看来，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纯系破坏性的行动。确实，它的消极面在如下的情况中达到了极点，如：巴黎的无套裤汉任意胡闹，穿上抢来的祭袍在国民公会门前示威游行；埃贝尔的刊物《迪歇纳老爹报》极力鼓励他们，满纸是下流的言辞；地方议员对崇拜圣像的攻击，其中有些人过去是神甫，他们怀着叛教者的狂喜心情进行破坏。但是，即使就其破坏方面而言，非基督教化运动也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不敬神的恣意胡闹。它深深地植根于革命爱国主义这一集体心理，植根于法国受到外国军队的包围并害怕内部叛变这种被围困的心态。欧拉尔称早期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为“国防上的权宜之计”。^[1]大量的破坏活动是由沿着行军干线向前线推进的军队干的，或者是由企图用突然的引人注目的恐怖行动来威吓敌对的农村居民的那些非正规“革命军”的小部队干的。这种非基督教化运动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象征和教条的合乎理性的攻击，不如说是为了恢复公共秩序和对不顺从的反对派神甫的宣传作出的激烈反击。再者，发生一些渎圣行为的背景是军事和经济危机。教堂的装饰品不仅被当作“盲目信神的小玩意”而抢走，而且成为供应造币厂的宝贵物资。教堂里的钟被摘下送到铸造厂去冶炼为造炮的金属。1793年夏，爱国者正是为了搜寻这些钟才和愤怒的教徒发生冲突，并失去了他们对教堂这个神圣地方的敬畏感。

非基督教化运动除了破坏之外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雅各宾派领导人不仅要摧毁基督教，而且还要用一种更符合被包围的革命力量之需要的信仰而代之。自从马蒂埃的著作发表以来，人们对一系列的革命崇拜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这种崇拜代替了天主教，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同罗马教皇缔结了政教协定。^[2]贯穿这些崇拜的是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为爱国主义创造一个庄严的中心。同旧政权的人员一样，革命者也相信有必要建立一套国家信念，以维护统一，避免坠入邪恶的深渊。这些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地创造的。然而，马蒂埃声称，如果我们（与涂尔干一起）承认社会也和上帝一样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宗教崇拜的对象，那么这些崇拜的基础同样也是宗教性质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不是基督教那种先验论的宗教，而是将要在人世上实现公正和博爱的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正是18世纪的哲学家所追求而大革命力图在政治上将其变为现实的梦想。这种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是临时形成的，其目的是以人类世俗的宗教来取代天主教及其超自然的理论体系，而这种人类世俗的宗教以各种形式贯穿着此后的欧洲历史。自1790年的联盟以来，出现了一种自发的爱国主义崇拜，这种崇拜最初与旧有的信仰并立，后来却与之对立了。它的信条体现在《人权宣言》中，它的教士是那些立法者，它的洗礼仪式是在“爱国圣坛”举行的公民宣誓，它的象征是帽章、三色旗和自由帽，它的赞歌是游行和历法。1793—1802年间的各种革命崇拜就是由这种对爱国主义的崇拜的庆祝活动演变而来，它们是在合法教会黯然失色之后组织的。在理性崇拜（1793年11月至1794年春）中，对革命共和国的崇拜是首要的，哲学上的唯理论与对自然和理性的崇拜则居于第二位，如果说这些崇拜在巴黎开始产生时其特点是轻举妄动，在各省对这种崇拜的庆祝活动则往往是很严肃的。资产阶级的少女们扮成理性女神，或贝尚松的雅各宾派派出12名使徒传播新福音，并无嘲弄的意思。罗伯斯庇尔的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的报告所开始的对最高主宰的短暂崇拜，标志着对枯燥无味的理性崇拜和它的某些倡导者的暴力手段的反对，但基本上与它没有什么差别。罗伯斯庇尔企图创立一种更加统一的、能团结起灰心丧气的爱国者，并能沟通有神论者——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美学上令人满意的崇拜形式。在这种崇拜形式中，“各派别可以无拘无束地、不受迫害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自然宗教中”。尽管在牧月20日的盛大节日中受到崇拜的最高主宰类似卢梭的《萨瓦牧师的自白》中的神，但在他的新教皇的眼里，他还是

革命正义、公民道德和爱国义务的约束力。罗伯斯庇尔宣称，无神论是“贵族”性质的；对最高主宰的崇拜是“社会”和“共和”性质的。只有相信天命和永生的人才会有勇气“更加忠于祖国，并更敢于对抗暴政”。

热月政变之后，爱国信仰虽仍然存在，表现为官方对共和历每旬第十日的崇拜。然而，随着爱国热忱的下降，激情也消失了。忠于这种崇拜的人主要来自一小部分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员。各地的下层人民把旧宗教和新宗教融合为对烈士的崇拜，例如对萨尔特的佩兰·迪盖（一位乘三色翅膀升天的共和派烈士）或更有组织的对共和三烈士马拉、夏利埃和勒佩尔蒂埃的崇拜。但是，对未受教育者来说，民族崇拜的理性主义太冷淡，而那些说教和古典的象征主义又太抽象。只有偶尔举行的演讲会、节日和游行的盛况才能激起民众的想象力。但是，即使非基督教化运动未能提供取代旧有宗教的有组织的信仰，但它给予旧有宗教以沉重的打击。在那些失去了主持弥撒和教育儿童的神甫的教区里，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蔓延开来。对农民社会来说，打乱传统的习惯大概比新思想的冲击更为令人不安。过去只限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公开的怀疑，这时已在下层阶级中深深扎根。造成法国教会恢复缓慢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补充神甫的工作中止了。

热月政变以后，政府对基督教的敌视态度并没有停止。但是，舆论的压力造成广泛的缓和，在许多教区恢复了宗教生活。在西部，奉命安抚叛乱者的将军们和代表们不得不在当地同意实行宗教自由，这就开创了一个可以推广到法国全境的先例。国民公会通过从1794年9月到1795年9月之间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在法国实现了政教分离。国家不再为崇拜任何东西支付款项；信仰自由予以保持，尽管受到严格的控制；那些尚未让渡所有权的教堂（仍作为公社的财产）可以由公民的团体用作公开举行礼拜的场所；教士要宣誓服从共和国的法律。这时，宣誓效忠的教士、在共和历第十日举行宗教仪式的官员、愿意重新宣誓的天主教徒以及诸如有神博爱教这样一些小的折中教派可以心神不安地轮番使用教堂。

1794—1802年的政教分离标志着欧洲政教关系中的一次有趣的试验。它引起人们将它与几年前在美国建立的比较持久的制度进行比较。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禁止在任命联邦职务时进行宗教考试；同时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建立宗教的法律或禁

止自由信仰宗教的法律”。这两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宗教的不容忍性与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这一情况的影响，也受到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维持教义的一致这个问题的影响。但是，这两种制度的不同点也许比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更为明显，并表现出“政教分离”这一词是何等的灵活。在美国政教分离建立在政府和基督教各派之间的相互信任之上，实际上与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宽容地承认教会的权益有密切关系：例如，为随军牧师提供公共资金；对用于宗教事务的财产实行免税；各州制定禁止亵渎神明的法律等。然而，在法国，热月党人和督政府的态度常常是露骨地表现出敌意。鼓励政教分离的因素主要不是对政权归俗的早熟的热情，即主张国家完全不介入一切宗教信仰的许多19世纪自由派所珍视的那种思想。法国实际上自1789年以来就为实现政教分离采取了步骤，特别是在1792年实行的世俗结婚和离婚。这一措施反对天主教认为结婚是永久性的结合这种婚姻神圣观，而主张结婚是可废除的民事契约这种世俗婚姻观。但是总的来说，革命领袖们仍属于他们那一世纪的人，他们热衷于国家崇拜和国家在宗教事务方面握有无限权力这种老思想。政教分离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屈从政策”，用它的提倡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密切注视你所不能阻止的事情”。^[3]既然天主教不能（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实现革命化，又不能（通过非基督教化运动）加以消灭，那么，就必须对它采取容忍态度，但要很警惕地容忍它，不使它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它逐渐从民族的道德心中消失。从民法的观点来看，各教派不具有任何法人地位：它们不能接受捐赠，也不得组成有正式发言权的全国性组织。针对拒绝宣誓拥护“公民组织法”的人而制定的严厉法律仍保留在法令全书中，虽然实际应用时往往是较松弛的，特别当督政府实行“摇摆政策”，感觉有必要得到右派的支持时更是如此。但是，1797年的果月政变带来了类似大恐怖时期的一场迫害。此后便作出坚决的努力来恢复正在衰落的对每旬第十日的崇拜。政府强行规定第十日为休息日，宣布小学师生以及市政官员必须参加它冷冰冰的仪式，这些人身穿制服列队前进，而且往往有乐队伴奏。但是，这场运动很难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农村），并使督政府与宣誓效忠的教士发生冲突，后者在“礼拜日先生”和“第十日公民”的斗争中不愿抛弃前者。

如果说督政府不愿意本着冷静的中立精神实行政教分离，那么许多神职人员也是如此。多数未宣誓效忠者——在果月政变之前迫害缓

和时，数以千计的流亡者回国，从而使他们的队伍壮大了——不承认政教分离是可行的制度。许多人大肆鼓吹反革命，为王室祈祷，诅咒那些占有了被没收的外逃贵族财产和教会财产的人，还在一些农村地区实际上煽动白色恐怖。然而，以圣绪尔比斯会总修道院长、品德高尚的埃梅里长老为首的少数派试图把天主教的事业与波旁王室的事业分开。当天主教神职人员中这两派面对是否要服从一个革命的非基督教政府这一棘手问题时，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一个世纪后围绕保皇党人归顺第三共和国的问题发生的分裂差不多）。自然，争执是围绕不断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而产生的。宣誓效忠“公民组织法”曾受到罗马教廷正式的严厉谴责，但随后的各种宣誓情况与此不同。不妥协分子听命于他们的流亡主教，拒绝一切宣誓效忠。他们怎么能够支持篡位者或完全服从一个实施严重敌视天主教教义的法律的政治制度呢？最好是使法国成为传教国家，私下保持自己的信仰，这总比与异教徒和分裂教会者公开共用一个神坛为好。另一方面，妥协分子接受了后来提出的大部分宣誓（虽然许多人不肯作出果月政变后所要求的“仇恨王室”的宣誓）。如果不宣誓效忠，从而取得公开做弥撒的权利，那么怎么能够保持天主教的存在，又怎么能够保持罗马的传教士同宣誓效忠教士进行竞争呢？埃梅里对积极的效忠和消极的顺从加以区别，对赞成法律和仅只服从法律加以区别，就宗教而言，则仅限于保证不扰乱公共秩序。直到签订政教协定的前夕，天主教两派之间的争论达到教会分裂的边缘。原来的法国天主教会分裂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敌对的教派。

在1795年之前，大革命威胁到罗马天主教会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存在。当大革命波及意大利半岛后，它大有吞没这个天主教中心地之势。1797年2月，根据托伦蒂诺条约，法国关闭了教皇国派驻的公使馆：迪福将军于12月在罗马被害导致贝尔蒂埃将军于1798年2月占领该市，并宣布罗马共和国的成立。1799年，“公民教皇”庇护六世被送往法国监禁，他在瓦朗斯的去世似乎预示着罗马教廷的解体。

然而，使欧洲感到震惊的是，不到两年法国大革命便与罗马教廷和解，于1801年7月15日签订了法国政教协定。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巴黎和罗马的两位新领导人的掌权为此铺平了道路：拿破仑于1799年成为第一执政，基亚拉蒙蒂红衣主教于1800年3月14日在威尼斯秘密会议上当选为教皇，称庇护七世。基亚拉蒙蒂任伊莫拉主教时就已表示他

准备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合作。1797年圣诞节，他在著名的“雅各宾式”布道中对他的教徒说：“你们要做虔诚的基督徒，你们也就会成为很好的民主主义者。”作为教皇，他任命孔萨尔维红衣主教为国务卿，这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个新的、更为开明的教廷。然而，要求和解的主动建议却来自拿破仑。尽管拿破仑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弗雷德里克·马松写道：“他的整个信条局限于一种宿命的唯灵论，根据这种信念，他的司命星代替了上帝”——但是作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他赞赏传统宗教对民众的控制力，其价值观念可以保障社会秩序，使人们安于不平等的地位和顺从世俗统治。^[4]拿破仑为了达到绥靖与和解的目的，需要宗教方面的和睦，以便消除法国教士中的严重分裂，促使将莱茵河流域的天主教徒和强烈信奉教皇极权的比利时人纳入法国的边境地区，以及为法国在意大利称霸铺平道路。前10年的历史不祥地表明，不同教皇商量，企图单方面解决宗教问题总归要失败。为了外交上的目的，拿破仑可以发出威胁说要效法英王亨利八世。但是，拿破仑不可能创建一个信奉新教的法国，而重建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教会在群众中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反正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可以继续实行政教分离——但这无助于解决教士之间的争吵，也不符合他的独裁主义精神。法国基本上仍然信奉天主教。然而，如果说天主教是不可摧毁的，那么，大革命的长远成果也就是不可摧毁的。因此，必须迫使法国的教士承认他们已失去在旧秩序下享有的特权，承认国家世俗化所取得的不可抗拒的进步，例如离婚、世俗婚姻和宗教平等；他们必须承认已世俗化的教会财产不可变动：最主要的是他们必须与波旁王朝脱离关系。拿破仑从军事角度对局势作了明确的分析，他说“人民需要有一种宗教。这个宗教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今天由英国资助的50名流亡主教领导着法国的教士。我们必须清除他们的影响。为此，就有必要借助教皇的权威”^[5]。

马伦哥战役的胜利给拿破仑带来了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几天之内拿破仑便同罗马教廷开始了谈判。新教皇为了在教会的“长女”法国恢复天主教传教的自由，准备作出许多牺牲。尽管如此，经过几个月艰巨的讨价还价，经过几次外交危机并提出许多草案之后，才签订了政教协定。新的政教协定在几个方面与1516年的政教协定相似。但是，1516年的政教协定是在罗马教廷与领导着一个具有坚定共同信条

的国家的天主教君主之间缔结的；而新的政教协定则是在并没有真正的精神纽带的两个格格不入的政权之间所达成的交易。罗马教廷并不是想使大革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要限制它的成果。中世纪的那种政教关系已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在有关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的条款中表现得最为清楚。罗马竭尽全力要使天主教在法国得到“支配地位”（这意味着其他宗教在法律上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它不得不接受只承认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所信奉的宗教”。罗马教廷放弃了关于发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勉强接受了由国家支付主教和某些教士的俸给而不是由捐款支付，虽然由捐款支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他们原有的经济独立地位。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得到保证，但须遵守（根据一项极为含糊的条款）警察当局的规定。在拿破仑一方，他得到了提名主教的王室旧特权，教皇则保留了对主教的正式任命之权；法国的教区重新进行了划分；教士受命为政府祈祷并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政府。教区牧师将由主教提名，并需得到政府的批准，二者的俸给均由国家支付。为了便于重建教会，天主教和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者双方的主教管区都要保持空缺状态。教皇的《惩罚》（*Tam Multa*）通谕温和但坚定地要求天主教的主教们辞职。多数主教顺从了——但是有相当数目的少数主教拒绝这样做，于是罗马教廷宣布他们的主教教座处于空缺状态。法国天主教会传统认为，主教的职位是基督授予的神圣权利，而不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教皇所恩赐的可解除的职务，因此上述做法对法国教会的传统是一个可怕打击。这样大批罢黜主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这是教皇行使主权的一次行动，它标志着向1870年梵蒂冈公会议上教皇极权主义取得胜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颁布政教协定的共和十年芽月18日（1802年4月8日）的法令还包括一系列基本条款，即严格限制教会自由的详细规定。拿破仑希望通过这一法令来制止教皇极权主义的侵蚀，并重申旧政权在政治上限制教皇权力的主张。法国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并建立起从政府经主教管区到下层教士的一环套一环的控制系统，这时有许多下层教士可以由他们的主教随意撤职。基本条款也是针对归正派和路德派教会而颁布的，它们是在同罗马天主教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其资助和受其控制的。它们从一贯受迫害的反对派这一角色一变而成为政府的驯服的支持者。这样，大革命所宣布的宗教平等便被保持下来，但不是（像热月政变之后那样）通过

将各教派与国家分开，而是通过相反的办法，即对主要教派给予国家所确认的同等地位。教会的一致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必不可少这一信念公开被抛弃了。拿破仑的宗教事务发言人波塔利斯向立法会议发表讲话时，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具有统一信念的旧式基督教国家的死亡。只要各教派都严格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各种不同教派的存在会鼓励它们为国家效力而进行健康的竞争。“对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有同样的信仰，而是每一个人应热爱自己的信仰。”^[6]

在宗教事务部长的严密监视之下，法国各教派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平静状态。以前的拒绝宣誓效忠者和宣誓效忠者之间的联合在迅速实现。作为部长，波塔利斯尽最大努力在两派之间公平地划分教区，避免使原来的“爱国教士”受害。使罗马感到惊愕的是，为新主教管区任命的60名主教中，竟有12名是原来的宣誓效忠者，其中有几名还迟迟不愿正式承认教士公民组织法所造成的分裂。但是主教们很快就全神贯注于重建教区的紧急任务中。他们由于克尽职守而赢得了“紫衣地方长官”的绰号，接受了作为拿破仑政体支柱的地位。他们颂扬拨乱反正并恢复宗教活动的“新居鲁士”，“第二位君士坦丁”。1806年，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时接受了一本以夸张的言辞鼓励服从皇帝的教义问答手册，和一个新的圣日，即圣拿破仑节，这个拿破仑只不过是一位虚构的受戴克里先迫害的殉教者。这一圣日定为8月15日，也就是皇帝的生日和圣母升天节那天。

正当法国的宗教活动继续恢复的时候，德意志的天主教会——在1789年可能是最富有的教会——受到巨大的损失。到1803年雷蒂斯堡议会休会时，那些被法国剥夺了莱茵河左岸的领土的世俗诸侯们得到了赔偿，这种赔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帝国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邦的利益而作出的。在随后的世俗化运动中，一些古老的诸侯兼主教和大批修道院和修女院失去了独立地位，大部分被信奉新教的邦所吞并，虽然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也参加了这场掠夺。被世俗化的不仅是教会的土地。虽然教区教堂免遭于难，但宗教团体的财产却被大量没收，与此同时它们所资助的许多学校也关闭了。1789年共有15所天主教大学，到1815年只剩下5个天主教神学系。奥地利没有采取这种掠夺行动，但是巴伐利亚却相反，在那里，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当作干酪的包装纸按重量出售，弗赖辛大教堂一度被拍卖给当地一

个屠夫。1803年在德意志的政教关系上是划时代的一年。首先，老的信教的邦的教士们突然落入世俗政权的桎梏之下，发现自己受到独裁的新教诸侯们，或者受到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约瑟夫派官员们的控制，于是，他们与法国天主教徒一样，开始转向罗马寻求保护和指导。“费布朗尼乌主义”（德意志模式的主张主教统治限制教皇权力的运动）开始让位于教皇极权主义。其次，1803—1815年间德意志政治地理的简化进一步破坏了正在消失的“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像巴登、符腾堡、拿骚和黑森这些新教曾占主要地位的邦，成为各教派混合的邦。巴伐利亚由于吸收了许多新教徒也变得如此，这时新教徒占其总人口的1/4。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有统一信仰的邦。在这里，如过去在普鲁士一样，对信仰自由而言，宗教多元论大概是比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更为强有力的推动力。以前关于容忍不信奉国教者的辩论让位于各教派之间争取平等的斗争。在理论上，宗教平等原则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虽然在实际中并非总是如此。

在德意志发生的巨大变动要求同罗马教廷达成和解。然而制定一项内容广泛的德意志政教协定的努力失败了，后来为莱茵联盟订立一项政教协定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在意大利北部，恢复宗教和平的工作最初进行得较为顺利。1803年，罗马教廷和意大利共和国大致依照法国政教协定的精神签订了政教协定，但使孔萨尔维感到高兴的是，该协议对天主教会更为有利。然而，如果说拿破仑为与罗马教廷缔结协定树立了模式的话，那么，他也为逃避执行协定开创了先例。在公布政教协定的条文的同时，公布了梅尔齐法令，该法令比基本条款更加严厉，有些条款与协定的条款大相径庭。

在巴黎圣母院由教皇主持为拿破仑举行的隆重的皇帝加冕典礼（1804年12月2日）似乎确定了罗马和巴黎之间的和解。自8世纪以来还未曾有过对一个政权给予如此隆重的祝福。就连查理曼大帝也是亲自前往罗马接受加冕的。但是，和解徒有其表，其实并不牢靠。庇护七世出于无奈才接受赴巴黎的邀请，他还希望就教廷的某些紧迫的外交目的进行讨价还价：废除“基本条款”和梅尔齐法令，恢复教廷使团和天主教在法国的国教地位。然而几个月的紧张谈判没有得到什么成果。教廷感到受挫和沮丧，而拿破仑所获得的辉煌外交成就却促使他危险地认为教皇是会顺从的。

不出几个月，那不可靠的协议便破裂了。法国军队于1805年10月占领了教皇统辖下的安科纳港。这是一个粗暴行动。教皇怒气冲冲的谴责信——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前不久收到此信——扬言要断绝外交关系，而信中语气的明显突然变化被拿破仑理解为教皇想无耻地利用他的军事困境。随后双方在外交上进行了尖锐的交锋。1806年2月，拿破仑要求对法国的敌人关闭教皇管辖下的各港口，并把它们的公民驱逐出罗马。教皇拒绝了这些要求。双方的外交立场都强硬起来。1806年春，意大利的大部分国土被分割为大帝国的采邑时，教皇国的政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不过，只是到了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拿破仑才敢于肢解它们，而且是一个一个地肢解。1808年2月罗马被占领，接着边界地区被兼并；1809年5月，教皇国被纳入法兰西帝国，6月10日，教皇的旗帜从圣安杰洛城堡降下，升起三色旗。教皇坚强不屈地对帕卡说：“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国人想强迫我们讲拉丁语，那我们就讲拉丁语吧。”教皇在《每当想起》通谕中宣布将一切敢于亵渎彼得的遗产的人开除教籍。7月6日，拉德将军率领的突击队用斧头劈开了教皇宫殿的大门，把教皇塞进一辆马车，急忙解往萨沃纳软禁起来。

拿破仑把这场冲突说成是有关教会财产的分歧，它与教皇的精神领袖地位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在巴黎看来，这一解释有充分的说服力。意大利半岛——拿破仑说唯有他一人将与这位情妇共眠——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于他在地中海和东方的宏伟战略是如此，对于他在反对第三次反对联盟的战争中的直接军事安全亦如此，因为在威尼斯平原的奥地利军队或英国海军在沿海一带的登陆都可能包抄他的侧翼。^[7]教皇国的中立地位威胁着法国的防务体系：它们可以阻止军队向南方转移，它们漫长而防守单薄的海岸线易遭海上袭击，在它们的首府暗藏着敌人的间谍。因此，它们必须接受这位皇帝的天主教军队的保护，以防备信奉异端的英国人、闹分裂的俄国人和异教徒土耳其人。拿破仑坚持，“教皇陛下应当像我在宗教方面尊重你那样，在世俗方面尊重我……教皇陛下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而我是它的皇帝。我的所有敌人应该也是你的敌人”。如果教皇允许他的国家成为法国的保护国，那就无须发生冲突。

但是，教皇的观点完全不同。在拿破仑看来是政治调整的事情，罗马则认为是渎圣。拿破仑的主张是把教皇政府的世俗事务与宗教事

务严格区分开来；庇护七世的主张则是以坚信二者不可分离为基础。庇护七世同他的后任们一样，坚持认为世俗权力具有宗教功能。正如他在《每当想起》通谕中所说：“主教教区的自由……是与全球天主教会的自由和豁免权紧密相连的。”教皇国的领土完整是其宗教自由的保证，它的政治中立是它的宗教普遍性的象征。负有超国家使命的宗教领袖绝不能从属于单独一个国家，也不能把天主教会限制在单独一个帝国范围内，即使是所谓的西方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曾像世俗诸侯们那样进行战争，但庇护七世却认真对待他自称在人世间代表和平之神的说法。参加法兰西联盟将有损于罗马教廷同反对法国的那些国土上的千百万天主教徒的联系。再者，拿破仑本人由于提出带历史性的要求，自称为查理曼大帝的继承者——教皇就是从这位“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作为某种可收回的采邑的领地的——从而很早便把整个辩论从暂时的军事需要的水平提升到高度原则水平。罗马方面不能忽视随着法国在意大利的政治扩张而出现的宗教改革——延长政教协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民法典和允许不信国教者有信仰自由，甚至实行世俗结婚和离婚。在大革命的摇篮法国出现的可悲事情，在罗马教廷的特别领地意大利似乎被视为是不可容忍的。

随着教皇被绑架，冲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拿破仑心血来潮，企图把巴黎变成既是其帝国的世俗首都，又是宗教中心。几乎整个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被迁移到巴黎，许多枢机主教被安置在左岸的一些饭店里，并向他们提供了年金，大多数主教接受了。随后运来了大量的教皇档案，这些文件是在冬天艰难地运过塞尼山隘口的。为了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为教皇建造一座宫殿拨了一大笔专款。但是，教皇顽固地拒不接受为他安排的担任帝国牧师的角色。虽然他能够采取的手段无几，但绝不是束手无策。教皇国以及其由年迈的红衣主教们实行的过时的治理方法虽然表现出软弱无能，但罗马教廷却拥有巨大的道德影响，拿破仑对此作出了极为错误的估计。虽然教皇的罗马天主教最初对这位皇帝束手无策，因为正如法国天主教法学家和高级教士们所指出的那样，开除教籍时并没有点他的名。但是被监禁的教皇掌握着更有效的武器：他可以拒绝向皇帝提名的主教颁发授职令，从而使政教协定不起作用。1806年，他开始在意大利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并于1808年将其扩大到法国，到1811年帝国有27个主教教区没有主教，同时一种新形式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动摇了帝国教会的组织结构。教会秩序的混乱带来的损害相当之大，在容易受害的帝国边远地区最为明

显。数以百计的意大利神甫由于拒绝宣誓顺从皇帝而被流放；西班牙的教士掀起了游击运动（特别是在约瑟夫·波拿巴于1809年解散了托钵僧和修道士的各个教派之后）；比利时人则非常倔强，以致一位沮丧的地方长官建议将他们的神甫中的2/3驱逐出境，由来自法国南方的驯服的法国人替代。

然而，拿破仑相当牢固地控制着法国的僧侣统治集团。从签订政教协定到教皇被监禁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和平岁月给他们带来了好处。虽然一些秘密团体所煽起的教皇极权主义思想开始渗透到下级教士之中，主教们却不愿意由于公然反抗而破坏他们辛勤经营的教区重建工作。然而在大革命以后，法国教会自主运动是温和而有限制的，其特征是深刻地意识到罗马教廷作为维护天主教团结的纽带是有作用的，并担心再次回到像教士公民组织法引起的那样教会分裂。拿破仑于1809年和1811年就他与教皇的争执中提出的问题征求两个小型教会会议的意见时，这一点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们对拿破仑就这场冲突所作的解释给予有保留的支持。教皇没有提出任何教规上的理由来拒绝向那些在行为和教义方面无可非议的主教们授予圣职。世俗权力的丧失本身并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教皇国的逐渐扩大是人为的，而人所给予的东西，他们也能够收回去。如果教皇继续破坏帝国教会主教教区的话，必然会导致重新回到过去年代的传统——包括1438年的国事诏书——根据这种传统，选举结果不是由教皇敕令，而是由大主教教区或地方宗教会议批准。但是教会会议坚决表示他们对他们面对的效忠之争感到困惑不解，强调他们对罗马教廷忠诚不渝，并恳求恢复教皇的自由。

到1810年夏，拿破仑仍未能摆脱困境：他是否继续让他的教区主教空缺呢，还是让未按教规授予管辖权的教士去任职？如果采取后一种做法，怎么能够在不引起教会分裂的情况下做得到呢？他暂时可以——像路易十四在争取国王特权的斗争中那样——说服主教职区的教士团体拥立他所提名的主教为该区的代理主教。这样会赋予他们以行政权，尽管没有批准和任命圣职的权力。拿破仑的行动在重要的巴黎和佛罗伦萨主教职区遭到强烈的抵抗，它们由于得到教皇的秘密敕书而态度强硬，但不久便被镇压下去。皇帝的宗教事务顾问们建议在政教协定中增加一项条款，根据此款，教皇如拖延六个月，便可由大主教教区或最年长的副主教授职。但是，如何才能促使教皇同意呢？显

示法国天主教会的团结一致，采取诉诸宗教会议的权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也许能够使他屈服。1811年6月17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盛大的全国会议，帝国教会的95名“神父”（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出席了开幕式。但是，在秘密会议上主教们共同表现出勇敢精神，使皇帝的计划严重受挫。特鲁瓦教区主教在开幕式的讲道中富有感情地谈到会议对罗马教廷的依恋，脱离罗马教廷，主教管区就会成为从天主教的主干上砍下来的枯枝。与会者在皇帝的舅父费什红衣主教的带领下宣誓服从被监禁的教皇。使拿破仑愤怒的是，奉命研究主教授职问题的委员会宣布，不求助于教皇，全国会议便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全国会议被解散，固执己见的委员会领导人们被监禁在万森。然而，帝国的主教们在单独行事时并不那么大胆。如红衣主教莫里曾幽默地说，装在桶里并不好的酒，装到瓶子里也许就能变好。大多数主教在分别受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承认全国会议有资格在教皇拖延六个月之后改变授职权。全国会议在8月复会，以便将这一法令登记备案，他们这样做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应提请教皇批准。

于是，拿破仑被迫采取第二种办法来对付庇护七世。教皇由于被监禁并同他的顾问们隔绝而变得软弱了，或如拿破仑委婉的说法“变得成熟了”，因此他有可能在说服和威胁之下屈服或至少作出让步。教皇受到他的医生的监视，可能有时给他服麻醉剂，同时作出精心的安排使他无法了解外界的情况；他接连不断地受到外交使团的打扰，这些使团中的高级教士一再诉说他正在把教会投入混乱之中。但是，庇护七世所受的修道士训练使他在监禁中并不像皇帝所希望的那么脆弱，在萨沃纳他很快重新过起了他早期那种“贫僧基亚拉蒙蒂”的简朴日常生活：做弥撒、沉思、缝补衣服和洗涤他长袍上的鼻烟味。他意识到，所争执的问题超出了世俗权力和“六个月条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教会作为一个完善的团体（*societas perfecta*）自由存在的权利，它所服从的目的和遵循的法律是宗教性质的，与俗权统治的目的和法律截然不同。由于疾病和不安，他有时衰弱到危险的地步。1811年5月，他同意作出某些笼统的让步，但又立即反悔；同年9月，他在全国会议派出的高级教士组成的“神圣旅队”的压力之下签订了让步条款，拿破仑却鲁莽地加以拒绝；1813年他在枫丹白露同拿破仑举行一次非比寻常的单独密谈之后——奇怪的是他被拿破仑的魅力所吸引——他同意签订一项所谓的政教协定，但不久又加以否认。然而，正当庇护七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失败

使他摆脱了只身接受磨难的处境。在旷日持久的个人意志较量中，教皇顽固的教皇极权主义并没有被皇帝坚定的君主极权主义所征服。

到了1815年，欧洲许多地区出现了宗教信仰觉醒的迹象。在教义上，大部分宗教界的反应仍遵循带有强烈传统色彩的渠道。然而也出现几次重要的尝试，试图向欧洲知识界的精华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这一信仰。人们对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的老方法已无动于衷。如夏多勃里昂所说，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应付对正统观念的背离，而是如何对付由于怀疑而造成的冷漠态度。上帝启示人觉悟的传统概念——早期的大部分教义辩护曾以此为根据——似乎由于启蒙运动而受到广泛的怀疑。《圣经》的启示广泛地被认为是对于实际上或有可能通过理性而认识的事物的揭示，是有点作用的自然宗教的重现。一度作为基督教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各种奇迹，现在成为需要加以解释的难题，因为它们日益与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统一法则格格不入。同时，以前证实上帝存在的“证据”，例如本体论的证据，或精心构思出来的证据，被休谟，并且更加从根本上被康德所否定。显然有必要采用新的辩护方法，甚至需要对启示的作用作出新的解释。尽管夏多勃里昂、施莱艾尔马赫和拉梅内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每人都试图把浪漫主义的词汇应用于神学方面，用能够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新观点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并向知识阶层表明他们之所以拒绝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它的性质或它的价值。他们将迫使持冷漠态度者“认真考察他们迄今由于无知而加以鄙视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我们不是要他们相信，而是要他们考察”。^[8]新一代的辩护者由于受到对历史和发展的意义的发现，或由于受到由谢林和黑格尔所宣扬的上帝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思想的影响，力图表明教会不是野蛮状态僵死的遗物，而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宗教不是已经过时的迷信，而是生活的表现，它与人们的个人心灵和美好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教义不是新教的《圣经》或天主教的传统中一劳永逸地宣布的一套一成不变的永恒主张，而是在历史中前进和发展的启示。

通过浪漫主义，罗马天主教会在文艺界这个领域里找到了新的辩护者，而这个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一向是持敌对态度的。引人注目的是，教会的主要辩护者（也有一些重大的例外，如拉梅内和莫勒）不是教士而是世俗人，他们往往是放弃怀疑论或新教而皈依天主教的：

小说家如曼佐尼，政治作家如德·梅斯特尔，新闻记者如约瑟夫·格雷斯，艺术家如在罗马聚居的德意志的“拿撒勒画派”，他们摒弃了洛可可和巴洛克风格的古典异教造型艺术，而采纳中世纪大师们的宗教象征主义。许多浪漫主义者在天主教教义中找到了表达想象力的象征，也为启蒙运动所压抑而大革命的灾难所激发起来的感情找到了宣泄的出路。夏多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年）预示了以美学方法研究宗教，尽管这种方法还较肤浅，它却沟通了从情感出发的自然神论和从情感出发的天主教教义之间的鸿沟，促使有感情的人离开卢梭而转向罗马，离开模糊不清的心灵宗教转向天主教会的教义体系。他放弃斯多葛派的怀疑主义而改信宗教是出自感情而不是出自推理：“我痛哭后便相信了。”他为宗教辩解的目的是把天主教教义描绘成并非冰冷的法定信仰，而是神秘、美好、同情和富有诗意的活生生的宗教，是欧洲文明和艺术之源。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追随诺瓦利斯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学派当中，对社会统一的渴望导致将中世纪作为单纯信仰和精神统一的时代而加以理想化，把它描绘成在教会和帝国的温和的指导下由行会、教团和各等级构成的繁荣的合作社会结构。传统主义者——如博纳尔、德·梅斯特尔和拉梅内——也（以某些不同的方式）着意阐明宗教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它的真理。他们宣称天主教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世俗权威只能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天主教却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意志，在一个被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和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弄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中，天主教提供了道德和政治义务的基础。博纳尔仍然主张限制教皇权力，但德·梅斯特尔和拉梅内则把他们的传统主义同一种新的教皇极权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的根据主要在于社会秩序与统一的需要，而不在于教义方面的论据。他们争辩说，主教派所主张的限制教皇权力论，以及它宣扬的教会的最高权力在于贵族式的主教全体会议的理论会造成教会分立和不团结。德·梅斯特尔在《教皇论》（1819年）中通过比喻强调，精神方面的最高权力和世俗事务中的最高权力同样是绝对必要的：承认主教全体会议高于教皇同允许三级会议控制国王一样危险。拉梅内争辩说，政治上的限制教皇权力论以及它关于世俗政府与宗教指导分离的要求，会使诸侯们摆脱神圣法律的约束，因而将导致专制统治。在已经提出一些人们所渴望的有可能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欧洲联盟计划的时代，新教皇极权主义者可以表明，教皇是能够解决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基督教政体的基石。他是基督教世界合法而必要的仲裁者。拉梅内有一

句名言：“没有教皇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社会。”

到1815年，天主教神学研究处于低潮。大革命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神学院的生活；原有的经院哲学正在衰落；为笛卡儿哲学的新辩解虽然颇得人心，但似乎由于力图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对付理性主义而受到限制。拉梅内在他的《论对宗教的漠视》（1817—1823年）中把传统主义思想应用于神学，从而在思想上开辟了一条富有成果的新途径。他讥笑单凭个人的理性便可获得对宗教的确信这种说法：只有在具有权威性的人类普遍理性中，即通过传统——上帝给社会的最初启示——一代传给一代的共同感觉（*sensus communis*）中，才能找到这种确信。这种共同感觉哲学，由博坦这样的追随者们在神学方面加以发展，促成了一种类型的信仰主义，贬低理性在宗教中的作用，因而受到罗马的指责。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像浪漫的天主教信念一样，激烈反对启蒙运动的做法太过分了：对传统主义的夸大导致背离理性，就像浪漫的中世纪精神往往导致逃避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实返回到理想化的过去一样。在重建神学方面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的是德意志，在那里不得不应付新教学术成就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挑战。与传统主义者相比，受康德和费希特影响的波恩的格奥乐格·赫尔梅斯教授（1775—1831年）试图为罗马天主教提供一个更为牢固的思想基础。但是“赫尔梅斯主义”把“积极怀疑”作为宗教探索的起点，而把赞成信仰的真实性作为纯粹理性论证的必然结果。1835年罗马谴责它为半理性主义。比较正统的是在蒙斯特、兰茨胡特和慕尼黑大学的天主教浪漫主义者的团体，慕尼黑大学到1830年已拥有格雷斯为历史学教授，巴德尔为思辨神学教授，以及年轻的多林格尔为宗教法和教会史教授。对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未来发展趋向最有影响的也许是蒂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在那里，受谢林哲学影响的J. S. 德赖和《象征主义》（1832年）的作者J. A. 莫勒提出了有关教规和教义发展的一套理论，成为纽曼的理論的先驱。蒂宾根天主教学派认为他们的教会不是静止的而是能动的、具有生物形态的活的有机体，它不断发展并使自己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然而又总是通过其传统保存着原来的基督启示的本质。

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它们带来的民族耻辱与民族胜利在新教徒当中也至少短暂地激起了道德上的热情和精神上的需要。爱国和宗

教复兴是可以相互支持的：悔悟和再生是各自的词汇里所共有的概念。耶拿的惨败促使普鲁士的教士们热烈支持施泰因领导下的民族复兴。解放战争广泛地被宣扬为十字军东征，它的战场上回响着新教徒的赞美歌。军事上的惨败被解释为锻炼人民使其得到改造的烈火，军事上的胜利则被解释为神对正义事业的公正评判。时代的动乱似乎预示着上帝的启示，促使产生了种种奇怪的幻想家：英国预言家理查德·布拉泽斯；沙皇亚历山大的知己女友克吕德纳夫人；以及容-施蒂林，他的预言导致符腾堡那些相信太平盛世会到来的人成群结队前往里海和黑海之间去等候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19世纪初期，早已渗透到大部分新教教会中的基督教理性主义往往受到各种形式的福音派虔信主义的阻挠而被迫作出让步。虔信主义与神学自由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它往往带来的虔诚深度和学识深度之间的分离，以及传统的正统派与那些企图（往往是勇敢地，但有时是鲁莽地）使他们的信仰与当代文化和进步知识相协调的人们之间的分离，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仍拥有许多倡导者，并包括广泛范围的信仰。但是，有许多新教徒感到在精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方面只靠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是无法满足的，有关自然和理性的抽象概念也无法加以解释。传统的虔信形式恢复了。导致新教复兴的一个有利因素是一种保守的新忏悔主义，它以留恋的心情（有时透过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眼光）回顾宗教改革时期的英雄年代以及在18世纪被忽视、重新解释或丢弃的老教义的权威。1817年是宗教改革、1830年是《奥格斯堡信纲》的300周年纪念，这使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教会重新意识到他们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是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继承者。在39条信纲中对温和的加尔文派发出的呼吁早已是英国圣公会福音派教义辩护的中心内容：1801年约翰·奥弗顿在《确定真正的国教教徒》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教义辩护，该书以挑衅的口吻宣称，只有福音派教徒才具有英国国教的资格。

这种忏悔主义往往与各种类型的虔信主义纠缠在一起。有关19世纪福音派或虔信派的多次信仰复兴的比较史有待人们去撰写，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概括说明各种类型的新教精神并非易事。它们尽管有共同的特性却分为多种多样，从沉默的神秘主义直到宣扬可怕的地狱之火。有些信仰复兴教派被罗致于一个国教的范围之内，不致为害；另外一些教派如瑞典的“新读经师派”、日内瓦“信仰复兴派”

的一些团体或荷兰的基督教归正宗，由于对国教的不热心于宗教或教士鼓吹理性的现象感到失望而分化，倒向分离主义。有时候信仰复兴主义者会明确地发出社会的抗议的呼声，如在挪威，追随汉斯·尼尔森·豪盖的农村世俗传道士形成了反对挪威议会中政府官员的农民反对派的核心。在另一些地方信仰复兴主义者也许是贵族和保守分子，例如容克贵族中的一些虔诚阅读《圣经》的人；年轻时的俾斯麦曾在波美拉尼亚见到过这些人，并从他们当中挑选了自己的新娘。信仰复兴主义者中更具有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形式，则是一些在政治上清静无为，将精力投入严格的宗教生活中的派别。然而，大多数信仰复兴教派同样都强调保罗教义所阐明的罪恶与神恩、法律与福音的矛盾；强调必须通过对耶稣为人赎罪而流血的信仰来达到个人皈依宗教；强调由圣灵洗清罪孽；强调对《圣经》中神的教导要逐字逐句加以解释。他们对形成全面的形而上学体系几乎丝毫没有浓厚兴趣，而往往是像他们反对理性主义一样，引人注目地没有理智。在信仰复兴主义盛行的地方，它对情感信仰和福音主义的强调，往往不仅破坏了系统神学的教条主义，而且也破坏了它的明确性。特别是严格的加尔文派渐渐变得克制和温和了。悲观主义的加尔文派教义认为只有命中注定的上帝选民才能获得免罪，这与信仰复兴派充满自信地提出的拯救全人类的主张几乎是格格不入。在欧洲和北美洲的新教教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尝试，企图把上帝的绝对权力的学说同人的责任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及把神预定的命运同人对接受或拒绝拯救的能动作用结合起来。

新教信仰复兴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注重实际的虔信”的关心，这在教会办的各种志愿社团的庞大网络中显示出来，其规模往往是跨教派的，有时还是国际性的。各种《圣经》出版协会（詹姆斯·斯蒂芬称它们的英国团体为“伟大的新教宣传机构”）广为传播《圣经》的各种文本，从俄国直到南洋，宗教小册子出版会的出售宗教书刊的小贩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小册子，它们不仅进入农舍和经济公寓，而且还进入上流社会的客厅，这些客厅对手捧《圣经》的说教是闭门不纳的，但欢迎像汉纳·莫尔的《关于伟人风度对世风的重要性的遐想》之类的斯文的布道。在英国，从“伦敦城特拉斯孤独贫民救济会”到奴隶解放运动等许多慈善事业中，福音派说服了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和少数贵族为道德改革和建立“生气勃勃的基督教”的事业服务。浸礼宣教会于1792年建立后，在欧洲和北美洲成立了许多争取异

教徒改宗基督教的传教团体。虽然他们为19世纪新教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在国内激发虔诚精神方面，也许比在海外建立这种精神更为成功。传教和慈善团体提供了一种浪漫主义事业，它可以把理想主义和行善的模糊感情用来为宗教目的服务。它们在地方上和全国范围内同教会一起共同努力。例如，在法国的归正宗中，“大陆传教会”的巡回传教士传播信仰复兴派主张虔信的教义，同时，宗教小册子和《圣经》出版会的代理人们把零散的会众联系在一起，劝导他们摆脱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迫害而一直被禁锢其中的“精神樊篱”。[\[9\]](#)

虔信主义福音派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地方可能是英语世界。英国的新教各教派（特别是卫理公会）一般比英国国教更容易适应新兴工业城市的条件，而国教古老的教区制度往往被大量集结的人口所破坏。英国国教在老教区建造新教堂方面遇到许多法律上的困难，但不信奉国教者能够在繁华起来的街道上很快建起砖造的小教堂，通过他们的世俗支持者中的骨干分子渗透到教区牧师和助理牧师未曾访问过的角落。那些使人失去个性的工业城市中的工匠和手艺人、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渔民和矿工等处在有组织的文化的边缘的人们，在小教堂的和睦生活里找到一种集体感；在激情洋溢的信仰复兴活动和祷告会中，受束缚的感情和受压抑的心理得到解放。然而，不应夸大新教对劳动群众的吸引力。早在1830年以前，各主要教派，包括卫斯理会在内，明显地变得比较高雅和中产阶级化了。在许多小教堂里，收座位租金的办法把出钱租座位的较富裕的人与那些坐在比较阴暗和不大舒服的角落里的免费座位上的贫苦人分隔开来了。1851年的宗教普查表明，当时宗教对劳动群众是没有多少直接影响的。

18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北美洲的信仰复兴传统发展成为又一次大觉醒。它最初的几次大爆发是在东海岸的一些大学里发生的，特别是在耶鲁大学，该校校长蒂莫西·德怀特与他的追随者莱曼·比彻一样，认为信仰复兴运动是维护新英格兰已建立的秩序免受杰斐逊式的“雅各宾主义”和上帝一位论的侵蚀的一种手段，当时哈佛大学的人员似乎不幸倾向于上帝一位论。东部的觉醒与1800年以后席卷西部的觉醒相比，是守规矩和有节制的。随着越过阿勒格尼山脉向西流动的人口几乎蜂拥般地猛增，东部的教会日益深切关心那些不信教的边疆大众的基督教化问题，以及维护受到移居西部这股离心力威胁的这个

国家的文化统一问题。然而，最成功地跟随边疆居民的足迹的人，不是来自东部的有教养的长老会或公理会的传教士，而是来自那些经验并不丰富的教礼派的传教士，即那些与他们的会众过着同样原始的劳动生活的浸礼会农民传教士，或那些鞍囊里装着《圣经》和赞美诗集、乘马奔走于各个孤立的居民点的卫理公会巡回牧师。卫斯理的牧师巡回传教制度非常适合于边疆地区，到1844年，卫理公会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新教派。环境促使边疆的宗教充满激情、粗犷、民主气氛和不信任僧侣神权，这里的信仰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野营布道集会上，这种集会吸引了广大地区的移民，并给单调的小屋生活带来了受人欢迎的安慰。到1830年，西部的某些激情由查尔斯·G. 芬尼这位有魅力的人传播到东部，他是那一世纪最伟大的信仰复兴主义者（或许穆迪除外）。芬尼的办法表明，信仰复兴主义变得多么自觉和有效。一个世纪以前，乔纳森·爱德华兹将信仰复兴视为“上帝的惊人杰作”，对它要祈求和传播，然而要把它作为上天降下的神秘阵雨而等待其降临。芬尼著名的《信仰复兴演讲集》（1835年）满怀信心地提出了能够掀起信仰复兴的合乎人情的办法。他的新办法——诸如设立“急于忏悔的教徒席”，坐在这里的忏悔者在神职人员的指导下，在关键时刻与会众分开——表明他很懂得利用人的心理，这标志着近代大众福音传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但是，对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来说，教条地遵奉《圣经》或老教派布道的字面意义是越来越困难了。《圣经》是神灵的启示和绝对正确这种狭隘的概念一步步被推翻。基督教的辩护者们喜欢指出《圣经》的道德价值：这一主张日益受到像汤姆·潘恩那样勇敢的人们的反驳，他们使人注意许多《旧约》故事的内容是残酷而不道德的，或对某些最重要的基督教教义，如替代赎罪等，从道德上表示厌恶。同时，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及世界根据自身的机械规律可以越来越多地从内部得到解释，在自然秩序中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如《圣经》里的奇迹）似乎更不可能了。看来越来越不需要假设一位通过特殊的天意直接参与创世的上帝。随着地质学的发展，有自尊心的科学家必须对《创世记》作出更形象的解释。岩石表明地球不是仅仅经历了6000年而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创世也不是在六日之内完成而是经过了异常久远的时间。

像岩石一样，《圣经》也有其不同的地层，这些地层的揭开动摇了人们对《圣经》确定无疑的真实性的信心。多少世纪以来，《圣经》广泛地被认为是上帝直接给予的启示。不管《圣经》的启示是文字上的还是完全灵感的，它都是千真万确的神灵的启示，是教义、历史和精神教诲的有机整体的宝库，从中援引的任何经文都是权威性的。但是，在开始应用新的分析方法——已经应用于其他古代文献——对《圣经》进行剖析并探索它的不一致处时，人们的注意力也开始集中于《圣经》写作中的人的因素上，集中于其作者的复杂性，集中于其中所包含的传说、神话、圣史和原始诗歌。德意志的“高层次评论家”如格廷根大学的艾希霍恩和哈雷大学的德·韦特等人步泽姆勒的后尘，揭示了《旧约全书》首五卷的一些个别部分，通过对它们的文风、词汇和内容的比较，把它们加以区别并断定它们的写作时间。对《以赛亚书》和丹尼尔的“预言”也开始了类似的研究工作。评论家们对探讨《新约全书》则裹足不前，尽管他们在阐明“同观福音问题”（头三部福音书极为相似，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的不一致处同样令人迷惑不解）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艾希霍恩认为，这三部福音书的作者使用了同一个文献，即阿拉米语的《原始福音书》（*Urevange-Lium*）；另外一些评论家，如埃克曼和吉泽勒，则提出这三部福音书来源于口头传说，是在第一世纪末写下来的。“第四福音书”之谜也引起新的注意，布雷特施奈德的《或然说》（1820年）对它的真实性和出自约翰之手的说法提出当时存在的种种疑问。与此同时，对于神学中基督的原型——历史上的耶稣的探索仍在继续。在保卢斯等理性主义学者的手中，这种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巧妙地企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被福音书的作者所误解的奇迹。

然而，新教的正统派仍然常常认为，基督教真理的成立与否要根据《圣经》文字的真实性来确定。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如此，那里对德意志的高层次评论极不相信。康诺普·瑟沃尔在1825年说：“看来，在牛津大学似乎一位神学家通晓德文就会被怀疑为异端……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通晓希腊文被怀疑为异端一样。”^[10]然而，已经有一些人试图把他们的信条建立在不像“无谬误的”《圣经》那么易受攻击的基础之上。高层次评论家的工作不仅仅是破坏性的：由于产生了对启示的一种看法，认为它不是一种其真理是永恒和完整的、静止不变的教条，而是与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相适应的缓慢的演变过程。莱辛说，启示是上帝对人类的循序渐进的教育。随着在启示和记录启示

的文献之间划出明显的区别，对“灵感”和“启示”两词的限制性的解释逐渐被打破了。有人争论说，《圣经》本身不是上帝的启示，虽然其中包含了这种启示。反对《圣经》的文字并不损害它的正确性，因为它的真理是内在的和精神上的。《圣经》中的真理是象征性和道德方面的而不是文字上和历史方面的，这种概念得到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支持，这些哲学家对思辨神学的影响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二书问世到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是多方面和深远的。抱有希望的神学家在全部公开宣称笃信宗教的一系列唯心主义体系中看到了建立一种建设性有神论的材料，它可以将基督教置于不受唯物主义损害的基础之上，并解决哲学与宗教的对立。科学的进步并没有扰乱康德关于真实信仰的概念，因为这种进步既没有影响实践理性，也没有使内在的道德意识失效，而康德认为道德意识是他所设想的信仰的基础。黑格尔的宏伟体系把基督教描绘成积极的宗教，它最清楚地揭示了上帝，在历史和人类意识中呈现自己，并认为基督教的首要教义——如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是哲学真理的象征性表现。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和对手施莱艾尔马赫（1768—1834年）在他的神学中为新教作出最大的努力，促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基础。他的《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知识界人士》（1799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却在神学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所著的《基督教信仰阐明》（1821—1822年）一书中，他的思想发展成为有系统的形式，这表明他是16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开始，他给宗教下了简单但是基本的定义。他声称，宗教不是一套教条式的主张或某种道德准则，而是一种内在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直接的和直觉的，凭其本身的价值作为人类生活的中心部分而存在，忠于它自己内在的权威。他不是求助于老的外在的证据——《圣经》、预言、奇迹——而是求助于充满生气的宗教意识。宗教的核心和对其理解的准则是一种对超越我们自身的力量的完全依赖感，即“直接意识到一切有限事物普遍存在于无限的上帝之中”。宗教意识在艺术、科学以及全世界各种伟大的积极的宗教中找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但是它的最高、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在于基督教以及其通过基督本人而体现的赎罪经验。基督教教义，如同基督教的《圣经》一样，是宗教信仰社会的共同经验的具体表现——尽管它们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完整的表现。经验，而不是教义或文字，是首要的。如果接受施莱艾尔马赫重新下

的定义，那么有教养的人和信仰之间的许多障碍均可视为虚构的。

“奇迹”“启示”“灵感”“神恩”“预言”：这一切都是表达人们从根本上直觉地意识到上帝的存在，以及表达人类对上帝的需要的各种形式。

到1815年，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应利用宗教力量为社会复兴服务。拿破仑本人开创了先例：他签订的政教协定令人信服地说明世俗政府需要得到教会的支持，以及君主需要教会给予神的赐福。在外交方面，沙皇计划的基督徒君主之间的神圣同盟虽然仍是一种偏执的姿态，但是在各国内部却热烈主张君主和教会之间结成神圣同盟。不必阅读博纳尔或德梅斯特尔的著作也可看出法国大革命的宗教和政治革新之间存在一种联系。雅各宾派通过同时攻击教会和君主制强调说明了旧秩序的这两根支柱之间的团结一致。现在，甚至贵族中那些怀疑基督教的人也认识到教会作为防止未来革命的堡垒所具有的价值，而流亡和苦难给某些人带来了从怀疑转为信仰的忏悔反应。1789年以前，在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全盛时期，在政治舞台的最前面并不常见虔信宗教的人。事情起了变化：全俄罗斯的沙皇曾一度改信圣经神秘主义；法国的查理十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一个世纪以来历届国王中第一个树立基督教徒家庭生活的模范形象的人。在法国，有一个由宗教骑士组成的强大的政治—宗教秘密团体，其组织形式有一部分是模仿共济会，但其理想却模仿中世纪军事和骑士团体。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威尔伯福思的议会“圣人”当中，虔信主义颇为盛行。

教会的需要在1815年以后的政治复兴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经孔萨尔维在维也纳会议上进行巧妙的游说之后，教会的俗权几乎交还给庇护七世，虽然对“正统性”的关怀尚未能达到恢复德意志各教权公国的地步。新近扩张了权力的各邦，或业已世俗化的各邦，都需要同罗马教廷达成某种形式的外交协议，以便恢复行政秩序或划定教区的新界限。在德意志，罗马天主教会处境十分艰难，因为只有六名主教在世，而其中五名已年逾70。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协议，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重新建立起天主教教会。于是，通过谈判为下列地区达成了政教协定发布了划界通谕：巴伐利亚（1817年）、那不勒斯（1818年）、俄属波兰（1818年）、普鲁士（1821年）、尼德兰联合王国（1827年签订，但未执行）、巴登的上莱茵教会省、符腾堡、拿

骚和黑森（1821年和1827年）、瑞士（1828年）。随着主管区和教区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往往由于战争和革命而变得松弛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密切了。在重建工作中，耶稣会（由庇护七世于1814年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部分地区，宣告宗教信仰的各邦重新出现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原来的严格程度。宗教法庭又回到西班牙；撒丁再次宣布必须举行斋戒和复活节圣餐；在教皇国，犹太人重新被迫迁入犹太人居住区，接种牛痘和点路灯作为法国革新的危险遗留物而被清除。然而，在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地区，基督教的复兴同许多政治方面的复兴一样，具有与自由主义达成某种妥协的特征。即使在恢复天主教为国教时，政教协定也往往反映出1789年以来世俗主义所取得的进展。拿破仑的政教协定一度被罗马教廷看作对形势作出的特殊让步；到1815年，它已成为常常被仿效的范例，通过它对曾经一度同国家生活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天主教的领域加以限制并仔细地划定了界限。关于教士不受世俗管辖权的古老规定，他们的审查权和指控异端的权力，以及他们对教育的垄断都已废止。^[11]一个靠薪俸维持的教会缺少免受一个咄咄逼人的极权大国侵害的保障，而大革命以前的巨额捐款却提供了这种保障。世俗化以后一些教堂变得比较贫困，这使得天主教会追求名利的贵族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为有才能的人开辟了前程，但它也限制了这些教堂共同的独立性。更为甚者，罗马教廷沮丧地看到对天主教的冷漠和宗教自由在天主教仍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国家里蔓延开来。1824年，利奥十二世抗议在法国“异教崇拜和天主教信仰平起平坐”的做法，同时对治理比利时的根本法和1818年的巴伐利亚宗教法令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因为二者都对非天主教徒给予平等的公民权利。罗马教廷于1816年对比利时的主教们说，如果说容忍异端是可以允许的话，允诺保护异端教派及其错误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罗马教廷仍然信任君主们。由于受孔萨尔维的影响，庇护七世在受到压力时，明智地拒绝参加维也纳体系。既然他已摆脱了同拿破仑的联盟，他不愿再同梅特涅结盟。但是，“维护正统性”的事业则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教皇君主国坚决同情“君主家族”，并施加影响来反对日益高涨的立宪主义和民主浪潮。民主在以前意味着督政府军队的侵略和掠夺，现在则意味着烧炭党和秘密团体的阴谋诡计，这

些人使得各公使馆处于一种酝酿反叛的状态。而且，人民主权论，或者甚至议会制度的实践，怎么能够在教皇国得到承认呢？难道教皇主张在精神世界所拥有的绝对主权同他在世俗世界屈从于世俗的、选举产生的意大利议会不自相矛盾吗？把世俗权力普遍地强加于宗教领域，曾经迫使庇护七世反抗拿破仑，现在，这种倾向促使庇护七世的继承者们反抗他们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政治潮流，从而把他们拴在反动的车轮上。庇护七世于1823年去世和孔萨尔维随之倒台后，狂热派的影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利奥十二世发出了从教义上谴责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通谕中的第一道，不久又由格列高利十六世的《对你们感到惊异》（*Mirari Vos*）通谕（1832年）而得到加强，这个通谕谴责主张良心自由是“荒谬”，谴责新闻自由是“可恶”，并把那些鼓动臣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人称作“魔鬼的儿子”。然而，在罗马之外，世俗天主教徒，甚至教士，往往被迫采取与教皇的立场相矛盾的立场；被迫开展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公然支持自由主义，甚至进行反叛。

至少在南美洲，反对西班牙政府的历次革命很少采取反天主教的形式，甚至也很少采取真正反教士的形式。在西班牙出生的主教们大多是强烈的保皇派，但许多美洲出生的下级教士都支持革命。在墨西哥，总督贝内加斯尊奉洛斯雷梅迪奥斯的圣母为保皇军的女将军，而叛方的神甫伊达尔戈则宣称瓜达卢佩的圣母为叛方的庇护女神。革命领导人自称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新成立的各共和国的宪法像拥护君主制的巴西的宪法一样，依然规定天主教为唯一的国教，并禁止公开崇拜其他教派的权利。但是拉丁美洲的革命给罗马教廷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许多主教外逃或死亡（到1829年墨西哥连一个主教也没有）导致叛乱政府强烈要求罗马的承认并要求得到西班牙国王所行使的圣职授予权。然而，罗马教廷为南美洲的叛乱政府任命主教是公然冒犯“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的特权，也是冒犯正统原则。但是，拒绝授予圣职可能导致教会的分裂，而且在孔萨尔维看来，可能为改宗“卫理公会、长老会甚至太阳神教”打开方便之门。罗马犹豫了很久。在1816年和1824年，教皇发布通谕，敦促叛乱的各殖民地的教士支持他们马德里的合法君主。但是到了1827年，利奥十二世采取了批准为南美洲某些教区任命专职主教的重大步骤，格列高利十六世继承了这一方针。

在欧洲，一些天主教领导人也不得不对王权与教权统一的原则提出疑问。在革命的时代里，把教会同某一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危险的。难道这种做法没有驱使那些敌视政治反动的人成为教会的对立面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的倒台，如1820年西班牙的费迪南德或1830年法国的查理十世的倒台，使那些曾经出力支持他们的教士们信誉扫地。如果说1789年以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自然而然地得到默许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已打破了这种连续统一体，而它在经过几十年的世俗主义的蔓延后于1815年恢复时，似乎是政治反动的一种蓄意玩弄的策略。此外，正统的统治者为了保护教会所索取的代价往往是非常昂贵的。信奉约瑟夫主义、高卢主义或异教的君主们所认为的国家对教会的合法保护，在天主教徒看来也许是干涉教会内部的精神生活。国家对政教协定中令人讨厌的条款经常采取回避态度：答应给的捐款不是总能兑现，教会的自由可能受到模仿“基本条款”而制定的警察条例的限制。罗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喜欢采取教廷同大臣之间举行高级谈判，和发挥它传统的巧妙而机智的外交方法。一般说来，它对天主教徒特别是教士们为了宗教目的而采取直接政治行动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各种类型的立宪政府的出现使天主教徒有可能在议会范围内动员自己的力量。如果说反教权主义者能够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天主教徒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在1830年之前，当拉梅内的《前途报》宣传天主教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已经有人带头在天主教政治行动方面进行了几次成功的尝试；这些人或出于策略原因，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信仰，接受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新闻自由、辩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教会与国家分离。据辩称，这些可以用来为天主教的目的服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教会往往从主张自由的开明政权得到比处于贵族专制的束缚下更多的好处。

在教权掌握在天主教手中，但王位由不仅是异教徒，而且是外国人占据的国家——如爱尔兰、比利时、普属莱茵兰、俄属波兰——脱离国王和教会的政治的动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地方，争取民族独立或地方自治的斗争也许会成为争取教派自由或平等的斗争。爱尔兰的争取天主教解放运动提供了先例。奥康内尔旨在把天主教徒从他们在国内处于无权地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同时也是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的表现。他在1823年创立的天主教协会在某些方面是后来的欧洲天主教政治行动的先兆，它采取的手段是群众集会、请愿、报刊和讲道，以及呼吁实现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早在

拉梅内之前，奥康内尔已表现出他既是天主教徒，又是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他在1811年宣称：“我主张天主教解放……所遵循的原则不仅限于爱尔兰……它包括英国的不信仰国教者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地上的新教徒……我像憎恶贵族制度一样憎恨宗教法庭。”^[12]

然而，比利时的天主教领导人由于机会主义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迫趋向于政治自由主义。1815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同加尔文派教徒威廉国王统治下信奉新教的荷兰的合并，造成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第十七章[上]）。在性情暴躁的根特主教的领导下，比利时的僧侣集团对1815年的“根本法”中令人反感的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它保证了一切教会的平等地位，这样就把谬误与天主教真理置于同样的合法地位。然而，到了1828年天主教政治领导人的立场发生明显的大改变。由于对威廉的约瑟夫主义式地对待教会的做法感到厌恶——特别是他扩大国家对天主教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控制——他们决定同他们的反教权的自由派对手通力合作，要求政府建立保证新闻自由和教育自由的适当的议会政体。专制主义比自由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经过一番犹豫，每一方都暂时消除了对对方的诚意的怀疑，同意在自由主义宪法的范畴内继续他们的斗争，其办法不是过去那种强制手段，而是求助于辩论的力量和舆论。比利时的天主教徒参加了规模巨大的反政府请愿运动：下级教士（但不是他们的主教）给1830年的革命带来群众的支持。这一联盟的长远成果是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根据该宪法，教会享有受到整个欧洲羡慕的自由。教会和国家不是完全分离，因为三大教会的神职人员的薪俸都由国家支付。但是，天主教徒终于获得了管理他们自己的学校，成立宗教团体，任命主教，以及畅通无阻地同罗马教廷联系的自由。然而，罗马对这一系列事件感到不快。阿尔巴尼红衣主教称这个联盟是“荒谬的”，罗马教廷驻巴黎使节、后来的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痛斥那些帮助推翻合法君主并为制定一部“无神论”宪法铺平道路的教士们是不负责任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莱茵兰面临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同荷兰国王在比利时遇到的问题相似：这就是在一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如何同化那一部分具有强烈地方传统的天主教徒。普鲁士西部新省份的居民大多数信仰天主教，那里工业日益发展，而且早就同法国自由

主义有接触；东部较老的一些省份的居民主要是新教徒，他们从事农业，而且比较保守；新老两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导致革命。莱茵兰没有成为“普鲁士的爱尔兰”。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可以清楚地听到即将来临的“文化斗争”的隆隆响声。莱茵兰的普鲁士官员往往是专制和严厉的（其中一人检查了为但丁的《神曲》的翻译本所做的广告，理由是神圣的事不可能是喜剧）。同时，柏林企图把天主教纳入普鲁士国家制度之中，这有助于将主张莱茵兰政治独立的事业同莱茵兰天主教的事业结合起来，建立共同防御阵线。尽管莱茵兰8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但由于任命文武官员时偏袒新教徒，教派平等的原则被破坏了。许多教区当中，只有市长一人是新教徒。柏林担心普鲁士人的道德心受罗马的控制，因而设法支持天主教当中反对教皇极权主义的一派。于是科隆和特里尔的主教教区由两位“费布朗尼乌主义者”高级教士施皮格尔和霍梅尔任主教；而理性主义者赫尔梅斯教授则被任命领导波恩大学的天主教神学系。但是，事实证明，最具有挑衅性的是婚姻立法。从1803年开始，普鲁士的同异教徒通婚者的子女必须接受父亲所属宗教的教育。这个规定于1825年扩大到莱茵兰，它不仅违背天主教教规，而且似乎是意在促使人们改宗，因为许多这样的婚姻是新教徒官员与当地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之间的结合。1837年，这种不满在著名的“科隆事件”中爆发出来了，这是政府同新上任的不妥协的科隆大主教德罗斯特-菲舍林之间的正面冲突。这位大主教在同异教徒通婚问题上不肯让步，他禁止聆听“赫尔梅斯派”的讲课，这一做法很见效，不久课堂中便空无一人。德罗斯特-菲舍林的被捕，导致了显示天主教团结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导致了骚乱、骑兵队的冲击和小册子的宣传战，这一切标志着德意志天主教政治发展的前奏。

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王权与教权统一的政治，在那里，正统主义和天主教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一位怀疑论者说：“我认为上帝在800年前就为波旁家族死在绞架上了。”教会从极端保皇党人那里得到许多好处（第七章）。然而，教会的恢复依然是旧秩序的准则和大革命的成就之间明显的妥协。“最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对待教会的态度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他的宪法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然而却保证信仰自由。新教的教会仍然得到宗教预算的资助。旨在消除革命成果的努力几乎没有起作用。取代拿破仑的政教协定的尝试失败了，而这一协定给许多流亡教士带来不愉快的联想。拿破仑

的另一杰作、象征大革命带来的世俗政权对中等教育的控制的教育总署（Université）仍然存在，不过现在由一个教士担任教育总长。严厉的渎圣罪法依然是一纸空文。为恢复宗教团体的自由所做的事很少。再者，王权复辟政府的态度依然是坚决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基本条款”不但仍被收入法令全书，而且实际加以实行。拉梅内和他的主张教皇极权主义的支持者在憎恨之下宣称，历届保皇政府与恶魔般的大革命妥协到如此地步，以致法国不再是天主教国家，而成为世俗的、对宗教冷漠的、“无神论者”的国家。拉梅内由于对所谓的“王权与教权统一”感到失望，开始倾向于天主教自由主义，后来他成为天主教自由主义最大的鼓吹者。他的《革命的进程》（1829年）一书呼吁教会摆脱政治牵连，“使自己完全脱离一个政治上无神论的社会”。教会必须加强其队伍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密切把它与它的一切精神权威的中心罗马教廷连在一起的各个环节。现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团体不再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机体，再也不可能实行过去那种神权政治制度了。教会必须接受它在对之持冷漠态度的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大胆利用宪法声称保证给予的各种自由权利（第10卷，原文第77页）。

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可以看到政教关系的各种主要类型。一个极端是瑞典、丹麦和挪威这些路德宗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它们仍然是公开宣布信仰宗教的国家，脱离国教是非法的。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它在政教分离制度下，宗教生活的分裂不像在欧洲常见的那样表现在教会和教派的分裂，而是表现在众多教派之间的分裂，在联邦政府看来这些教派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各州根据非常不同的原则来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任公职须经过宗教甄别，在一些州（特别是在南方）一直保持到进入19世纪之后很久。尽管到1800年政教分离在州一级已被广泛接受，但各种形式的州教在康涅狄格州一直保留到1818年，在马萨诸塞州持续到1833年。但是，许多反对政教分离的人，像莱曼·比彻一样，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政教分离的结果激励那些被解除了官职的神职人员从事新的活动，“他们通过自愿的努力、结社、传教和信仰复兴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他们以前留辫子、穿带有扣环的鞋、歪戴帽子和手持金头手杖时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13]对许多欧洲人——不论是反对傲慢自大的国教的不信奉国教者还是对国家万能主义感到烦恼的国教信徒——来说，美国的制度似乎为宗教自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样板。托克维尔或

哈里特·马蒂诺等旅游者觉得自相矛盾的是：北美的宗教在自愿捐助的条件下，比受到保护和确认的欧洲宗教还要兴盛；在旧世界往往是严重对立的基督教和民主制度，在新世界却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

相对之下，国家万能主义在德意志仍很盛行。在普鲁士，对新教两个教派的指导权日益被置于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除行政上的集权之外，还企图实现教派的联合。1817年，在宗教改革300周年之际，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号召路德宗和归正宗自愿组成一个统一体的福音派基督教会。从许多方面来看，实现联合的条件似乎已成熟。以前各种教义上的隔阂（尽管有时由于新信仰的复兴而得到加强）在很大程度上被18世纪理性主义的潮流所淹没，对许多教士和受施莱艾尔马赫或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神职人员没有多大影响。但联合应当采取什么形式呢？采取以残存的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教义上的“思想上的联合”呢，还是采取在宗教仪式和组织方面的外表上的联合？又应如何实现这种联合呢？是依靠终于摆脱官僚机构控制的各教会本身的主动行动呢，还是依靠国王的特权和内阁的命令？当国王发挥他在教会方面的热情，制定出供两个教会使用的一种新礼拜仪式或程序的时候，争执就发生了。虽然它遭到了相当激烈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它在有些地方与做弥撒相似，并在礼拜活动中将唱赞美诗和讲道降到次要地位——但它经过一些修改后逐渐被推广到普鲁士各地，不过往往是通过粗暴的行政压力才得以推广的。正如施莱艾尔马赫所辛辣地讥讽的那样，像红鹰勋章这样的荣誉竟授予不应得到它的人，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程序。到1835年，在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反对行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但是保守的西里西亚路德派教徒的顽固态度是用武力镇压下去的，导致了可悲的教会分裂和大批人移居美国。在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也如法炮制的这种联合，有时进行得比较顺利，在普鲁士一直是各教派之间的联盟，它们保留了各自的教义特性，不过在礼拜仪式和行政管理方面是共同的。

到1830年，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已大为削弱。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以后，我们的“教会与国家的愉快组合”广泛地被视为我们赖以平安渡过那场淹没了许多不幸国家的大洪水的诺亚方舟。除了沃伯顿和佩利提出的有关政教联盟的实用主义论点之外，还有伯克的虽已过时却很雄辩的主张：英国仍然是一个基督教联邦，在这里，教会和国家是“同一回事，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政治家们，无论是

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同意克罗克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作“英国政体的一部分”的观点。在政治动乱时期，关于建立国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论点，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于是议会于1818年拨款100万英镑，1824年拨款50万英镑，以便在人口稠密地区建立新教堂。但是，对将英国圣公会定为国教的主张所持的异议——从1689年便已看得很清楚——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因为在英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仅仅容忍异教已无济于事，对宗教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难以抗拒。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给英国“新教体制”的观念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随着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人数增多，他们更加大声疾呼对他们的二等公民地位表示不满。1811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通过有力的游说来阻止西德默思企图限制他们的巡回牧师，即那些“裁缝、赶猪人、扫烟筒人等”的活动自由的做法，因为这些人粗鲁的讲道打破了英国圣公会各教区的沉闷空气。1828年，不信奉国教者争取到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但是，当他们实际上仍被排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由教区牧师主持葬礼和婚礼，并被迫向教会纳税的情况下，他们争取平等的运动并没有停止。教育越来越成为国教教徒和不信奉国教者之间争夺的战场。国教教徒认为，国教必须是国家的教育者。但是，英国圣公会全国贫民教育协会支持的教区学校受到不信奉国教者大力支持的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所属学校的挑战，后者讲授的是在非教派基础上精心归纳的基督教教义。在不信奉国教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支持下，世俗的伦敦大学于1828年成立，它的兴办使英国国教对英国大学教育的垄断出现了小小的但具有重要意义的缺口。1831年，当布里斯托尔主教的府邸在由于改革法案而引起的骚乱中被烧毁时，对国教的日益尖锐的攻击似乎达到顶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教区牧师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年迈的西德尼·史密斯大约在1835年对年轻的格莱斯顿说：“每当你遇到我这样年纪的牧师时，你可以十分肯定他是一位糟糕的牧师”——神职人员现在不如在18世纪沉睡的年代里那样得人心了。30年代，一支尽管由不同成分的人组成但却无比庞大的队伍站在反对国教的一边，他们是：愤愤不满的不信奉国教者；要求“多来几头猪，少来几个牧师”的宪章派；爱尔兰的不愿向外来教会缴纳什一税的天主教徒；痛斥滥用教会财产行为的功利主义者——J. S. 穆勒说，这些财产本来应用于“培养学识，传播教义和教育青年的”。托马斯·阿诺德大声疾呼：“现在的教会已到了人力无可挽救的地步。”这成了他的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正确

的。但是，由皮尔和布洛姆菲尔德开始的行政整顿，牛津大学的宗教复兴运动，以及阿诺德自己提倡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圣公会教义，都使牧师们适应了德意志学术界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这一切很快就为英国国教提供了恢复精神的新力量。

（陈秀珍 译）

[1] A. 欧拉尔：《基督教与法国革命》，英译本（伦敦，1927年），第122页。

[2] A. 马蒂埃：《革命崇拜的起源》（巴黎，1904年）。

[3] A. 马蒂埃：《热月党的反动》（巴黎，1929年），第181页。

[4] 转引自J. 勒弗隆《革命的危机》（巴黎，1949年），第175页。

[5] 布莱·德拉穆尔特：《政教协定谈判文件集》（巴黎，1891—1897年）第3卷，第50页。

[6] 布莱·德拉穆尔特：《政教协定谈判文件集》（巴黎，1891—1897年）第5卷，第387页。

[7] 参阅L. 拉特里耶《拿破仑与罗马教廷，1801—1808年》（巴黎，1935年）。

[8] 费利西泰·德·拉梅内：《论对宗教的漠视》（巴黎，1817—1823年），导言。

[9] D. 罗贝尔：《法国的新教教派，1800—1830年》（巴黎，1961年），第345—346页。

[10] F. D. 施莱艾尔马赫：《评路加福音》（伦敦，1825年），康·瑟沃尔译，前言，第9页。

[11] A. 拉特雷耶：《天主教会与法国革命》（巴黎，1946—1950年）第2卷，第260及以下各页。

[12] J. 奥康内尔编：《丹尼尔·奥康内尔议员的生平和演说》（都柏林，1846年）第1卷，第109页。

[13] 莱曼·比彻：《自传，通信及其他文献》，C. 比彻编（伦敦，1864—1865年），第1卷，第344页。

第七章 舆论与教育

法国革命和王政复辟时期，舆论初次在欧洲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首先，革命者们把他们的福音传播到整个欧洲。后来，反对法国霸权的人们既在战场上也通过报刊去进行反拿破仑的战争。当1814—1815年欧洲又恢复和平时，传统的统治者发现狂风暴雨是无法平息下去的。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通过报刊和结社，继续进行着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旧世界有财有势，但是它永远不能扼杀变革的恶魔。动力来自欧洲。亲希腊主义对于受过古典教育的欧洲人是富有感染力的，其目的在于援助希腊的爱国者；但也引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仅限于爱琴海沿岸地区呢？由于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天主教协会”的活动，新教的英格兰议会投票赞成爱尔兰信奉天主教；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对此十分羡慕，并且效法它去反对信仰新教的荷兰。报刊越来越成为宣传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工具，成为渴望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等阶级发表意见的主要手段。

由于欧洲所有国家的舆论日益自信和大胆，政府控制舆论的活动也随之加强起来。拿破仑看到了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梅特涅也是如此。甚至在英国和复辟时期的法国那样自由主义的国家中，政府也表现得十分活跃。因为，如果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充分显示民众意志的时期，那么，它也是国家权力日益增长的时期。凡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东西，法国革命都确立下来了。革命和变革所带来的主要好处，就是形成统一的国家权力。如果说各国政府注意控制舆论的表达方式，那么，它们更加注意的乃是控制舆论的形成途径。教育本来是教会关注的对象，它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的对象了。在1789年以前，这一过程就已经走过很长一段道路了。在拿破仑政权和复辟政权的统治下，这一过程稳步向前发展。政府之所以注重教育，首先是想要给它本身训练一些未来的官员，并创造一种有利于使它的权力维持下去的精神气质。这些职责是可以任意加以解释的，例如德意志诸邦一般来说眼界很宽，认为提倡民族文化对国家有利。也可像法国那样作狭义的解释，拿破仑就是在更为明确的功利主义基础上建立他的教育机构的。

不论广义也好，狭义也好，其实质是相同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把教育体系当作维护自己权力的主要堡垒之一。

这种所谓的“教育体系”是指进行文化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律师、教士、官吏的大学和文法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育人民的大问题。在英国，国家在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过问这件事。在法国，革命者们空话倒是说了不少，但是一直到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才干实际的事情。在这一时期，只有德意志诸邦曾经大踏步地前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瑞士理论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影响。甚至在这里，危险也悬在头上。从宗教的、人道主义的或者实践的立场出发，希望穷人能够受到教育。但是，他们如果利用自己的知识要求比神命所定更高的地位，那又如何是好呢？这个难题就远远超过民众教育的范围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所有教育机构日益由政府控制起来，要去完成政府给它们规定的任务。不过，人类的心灵并不理睬那些好心的牧人和朋友为他们划定的圈子。知识既可以使一个人成为良好的小官吏或者有能力的下级军官，也能够使他阅读合法或非法出版的报纸上的批评文章。所以，如果说国家的权力在不断增长，舆论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大。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再加上民族对抗或宗教对抗，像在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帝国所属地区或者波兰那样，问题就更加复杂严重了。某些有关国家的历史就反映出这种冲突的情况，但是，它们对于教育体系，以及对于舆论的社会组织，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在这一时期，报刊成为表达到处兴起的公众舆论的最重要手段。在英国，它已经达到最先进的阶段，尽管那里的报纸规模还比较小，报馆也很穷，总是向“钱”看，只有到了这个时期的最后，它才成为像19世纪中叶那样表达民意的伟大喉舌。虽然在18世纪，英国的报刊比其他国家的报刊更自由一些，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配。1792年福克斯提出的诽谤法使陪审团有权裁定哪一些是所谓的诽谤罪，哪一些是公布的事实，从而保护了报纸；但是在通过这一法案时，正赶上开始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斗争，正赶上政府开始取缔报纸的积极活动。1795年，埃尔登夸口说：“近两年对诽谤的检举超过以前的20年。”^[1]这些事实不仅表明政府十分积极，而且也表明报纸作为公众舆论的喉舌越来越重要了。1798年和1799年关于防止印刷和散发煽动性文字的法案，要求各种报纸、书籍和论文的印刷者和出版者登记姓名和住址。政府还发现了一种更加阴险然而同样有效的控制办

法，这就是增加报纸和广告的税额。1789年，报纸的印花税提高到2便士；1815年，又提高到4便士。1811年，纳税的报纸有24422000份，不过到1821年，这个数字变化很小。数字很高，但是没有大幅度上升。1821年，《泰晤士报》所缴纳的印花税比其主要竞争者《纪事晨报》和《信使报》的印花税总和略低一些。由于审判卡罗琳王后（1820年），该报的销售量从7000份增加到1.5万份以上。税收使报纸的发行量难以扩大，广告收入也很难为它提供一个真正稳定的财政基础。尽管政府采取这一切措施，尽管总检察长根据诽谤法具有广泛的权力，但是在战争年代中，并未实行书报检查制度。

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真正的书报检查基于报纸尚未能达到财政独立这样一个事实，报纸一向依赖政府或者政党。财政部筹集资金创办新的报刊。新闻记者索取酬金以压制闲话杂文，如果已经发表，就予以批驳。在法国革命的最初几年，政府每年用于报刊的开支将近5000英镑；譬如，《泰晤士报》在1789—1799年间，每年获得300英镑的津贴。与1807—1830年的托利党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报纸是《信使报》。坎宁说，为了使该报支持珀西瓦尔内阁，曾对其业主之一T. G. 斯特里特支付2000英镑。在19世纪20年代，政府往往只在友好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并且购买大批的报纸送人，以及散发自己的小册子。

报刊独立的新传统在慢慢地成长。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报纸，这就是詹姆斯·佩里在1789年买下来的《纪事晨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成为主要的政治性报纸。

《泰晤士报》创办于1785年，但在1803年约翰·沃尔特第二次接管之前，并没有很大影响。此报原来与阿丁顿家族有关，但在1806年以后，沃尔特使它独立于各个政治集团之外。他加强该报的经济地位，并于1814年采用柯尼希蒸汽印刷机。他雇用比较严格认真的记者。他抨击邮局维护局内职员의 私利而垄断外国邮件，结果获得更好和更快的新闻通讯服务。《泰晤士报》所奉行的独立批评的较高标准，在一些期刊上也得到反映，如约翰·亨特和利·亨特的《考察家报》（1808年）和两大季刊——辉格党的《爱丁堡季刊》（1802年）和托利党的《季度评论》（1809年）。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战争初期受到压制的激进批评的传统又开始复活了。1802年，激进派记者中的翘楚威廉·科贝特创办了《政治纪事周报》，用以批评政府的各项措施。1809年，科贝特因批评某些

民兵遭到鞭打一事而入狱两年。亨特兄弟也把改革和自由主义措施作为他们的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好几次处于危险境地，最后在1813年2月因攻击摄政王而各被罚款500英镑，各入狱两年。1816年，科贝特发行廉价版的《纪事报》，每份2便士；翌年，人身保护状暂时中止，他便逃往美国。在战后严酷的反动年代中，政府对激进派新闻记者和小册子作者采取严厉措施；例如，1819年的出版法使廉价的周报纳入1798年的新闻报纸法和印花税条例的范围之内，并要求期刊的出版者和印刷者具结。政府和私人团体都控告激进分子，如滑稽地模仿他人作品的威廉·霍恩，尤其是自然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理查德·卡莱尔，因狂热争取出版自由而受到长期监禁。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小册子作者，而不是比较富裕、可能遭到更大损失的报纸。卡莱尔终于在1825年获释，而1822年出任内政部大臣的皮尔也看出检举并没有什么好处；在1822—1829年间，几乎没有任何诽谤案件。

卡莱尔和霍恩都是激进的极端分子；政治性报刊的重大改革的出现，特别与《泰晤士报》的发展，以及与1817年接任主编的该报第一个伟大的编辑托马斯·巴恩斯的工作有关。该报在巴恩斯的领导下，力求和广大的中等阶级携手一致。该报以出色地报道国内新闻和准确地反映公众舆论驰名。关于巴恩斯，正如1830—1834年间给布鲁厄姆勋爵当秘书的德尼·勒·马尔尚后来所写的：“他在英国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有通讯员，他努力从这些通讯员那里了解公众舆论的情况。究竟是他指导舆论，还是他追随舆论，这对他说来几乎都是一样。因此，他的报纸赢得信誉，他一向自称是这种信誉的保护者。”

[\[2\]](#)《泰晤士报》抨击彼得卢，反对六法案。它支持王后，并引导由审判王后所产生的伟大的舆论运动。它支持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国王乔治四世逝世后，它对乔治进行批评。在争取议会和行政改革的运动中，通过《纪事晨报》的詹姆斯·布莱克和《考察家报》的奥尔巴尼·方布兰克这样一些记者的工作，报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报刊早先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此时在《利兹信使报》和《曼彻斯特卫报》（1821年创办）中也有了鼓吹改革的杰出人物。边沁派的意见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3年）及R. S. 林图尔的《旁观者报》（1828年）上发表。19世纪20年代托利主义的垮台，从当时托利党报刊的低劣质量中反映出来。托利党极端派报纸《晨报》（1828年）因为攻击威灵顿，1829年被威灵顿政府控告。“在这次事件中，

整个新闻界都联合起来了”，格雷维尔写道，“在几篇非常有力的文章中，对整个讼案进行最强烈的谴责，把这种谴责传遍全国的每个角落。”^[3]大约在同一时期，J. W. 克罗克认为，应该由一位内阁大臣控制报刊，因为“政治家可以安然无事地藐视报刊，或者只把它当作劣等机器来看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历届政府都认为控制报刊极为重要，可是做不到这一点。自1789年以后，英国报刊确实向前迈了很大的步子。方布兰克在《考察家报》发表文章说，1830年威灵顿的倒台是“对具有驾驭时代和控制舆论力量的天才的政治家们的一次警告”。^[5]这种变化大半应归功于报刊。

在法国，报刊的威力是1789年的革命冲力所释放出来的新的力量之一。它的潜力一旦显示出来，就通过德穆兰、马拉以及埃贝尔这样一些新闻记者的手，在促使君主制度崩溃中发挥巨大作用。出版自由本是三级会议《陈情书》中的共同要求之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也曾提到它；并在1791年和1793年的宪法中得到保证。然而，报刊像其他一切舆论喉舌一样，都落入革命法庭的手中，其后又处于督政府逐渐加强的控制之下。波拿巴花费更大的力气而且更有效地维护了这个传统。他高度意识到报刊的威力，而且高度赞赏1789年以来报刊作为舆论喉舌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他说：“四家敌对报纸所造成的损害超过10万大军在战场上所造成的伤亡。”他极欲阻止散发与政权敌对的消息，并想掌握一些报纸，以便发布官方对各种事件的说法，并嘲笑其他一切事情。实际上，他所遵循的是一条既积极又消极的新闻政策。在1796年战役期间，他和巴黎的新闻记者保持密切接触，利用报刊宣传来确立自己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位。1800年，官方报刊把他说成是马伦戈战役的英雄，其实他对这一次胜利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在后来的许多场合中，法国政策的真实目的或者法国军队的正确行动都被隐藏在以《政府通报》为根据的官方报刊的错误失实的报道的烟幕后面。在1799年雾月政变之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800年1月的一道法令查禁了塞纳省的所有政治性报纸，只保留了13家，而这13家必须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许可出版的报纸受警察部新闻局的严密监视，警方还密切注意着印刷商和书商。

此外，到这时候，法国的思想和法国对各国人民的舆论和意志的感染力，已经遍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各国的旧政府竭尽一切力量阻止新精神的蔓延。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报刊的作用，他们解释说，报

刊的任务只是报道事实，而对事实不加任何评论。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都在法国的威胁下加强了它们的规章制度。有时候，人们建议说：各国政府本身应该利用报刊，就像法国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各国政府最初没有积极的政策，似乎把报刊当作一种危险的武器。在德意志，似乎也不把报纸当作文明生活的一种真正不可缺少的东西。1798年，当科塔创办了德意志第一份政治性的大型日报《总汇报》时，有一个记者提醒他说，在伦敦或者巴黎，日报是一种便利群众的东西，有成千上万的人希望阅读；可是在德意志，日报仿佛是一种不必要的东西，因为邮局每周只投递两次。尽管如此，到18世纪末，报刊的重要性在德意志日益增大；本来是属于个人的言论自由的要求，现在却与出版自由的要求更加完全地统一起来了。

在法国人侵入的许多国家中，法国军队似乎带来了自由的新曙光。但是，如果谈到公开发表意见的话，这种曙光不过是海市蜃楼。无论在瑞士还是意大利，法国侵略者的来临都在粉碎旧的枷锁，使人民对报刊发生新的兴趣，新闻活动盛极一时。在瑞士，新的海尔维第共和国的宪法保证出版自由，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十分活跃。然而，自由的曙光犹如昙花一现，在拿破仑政权统治下，又恢复了严格的控制。1796年的意大利战役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法国人的报刊宣传非常活跃，在他们占领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一类的城镇中，出现了一些同情革命的报纸。新的活动以及比较广泛的言论自由是显而易见的，阅报的习惯普及起来了，可是，拿破仑的意大利王国也制定了严格的出版法，国家控制的绳索又拉得紧紧的，像1796年以前一样。

在法国本土，从雾月政变时期开始就已经严格起来的出版制度，这时更变本加厉了。共和八年宪法并未确认出版自由，在帝国时期尽管有个出版自由委员会，但只给人以十分渺茫的保证。在法国报纸中，最重要的是从1789年以后存在的贝尔坦兄弟的《辩论报》。它拥有1万—1.2万个订户。政府对它的控制逐渐加紧，1805年为它任命了一名特别检查员，并将其改名为《帝国报》。皇帝亲自指派一名编辑，并将它的部分利润用作文人们的年金，到1811年，该报的全部财产被国家没收。拿破仑一方面严格控制任何怀有敌意的评论，一方面亲自提供对他本人的事业有利的消息和意见；1810年，他写信给富歇，要他警告《政论家》的编辑，因为有一篇文章似乎在偏袒西班牙修道士；他还要求富歇组织一些文章，指出那些修道士确实愚蠢而无

知。1807年，他命令地方报刊只许刊登官方《通报》发布的政治消息。1809年，每一省只允许有一种政治性报纸继续存在，这条规定在整个法兰西帝国境内贯彻执行，乃至1811年，巴黎的报纸只准许以下四种发行：《通报》《帝国报》《法兰西报》《巴黎报》。1810年，印刷商的户数受到法律限制，实行普遍的书籍检查；政府对于在书籍中发表批评性意见的态度，从禁止刊印斯塔埃尔夫人的《论德意志》并命令她离开法国一事中已昭然若揭。随着局势的恶化，拿破仑的出版政策也越发严厉起来。

在拿破仑法国的所有藩属中，脖子被卡得最紧的大概是德意志，在法国兼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虽然法国革命激起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但法国人的控制是很严的；在帝国时期，莱茵联盟诸邦也保持同样的体制。科塔的《总汇报》移至巴伐利亚，最初到乌尔姆（1803年），继而到奥格斯堡（1810年）。它从1805年起受法国人的控制，只能原封不动地重复法国的命令；譬如，它把1811年法军准备远征俄国说成是旨在保卫德意志的海岸线，以防止英国的进攻。在萨克森，《莱比锡报》也同样奉萨克森政府的命令，避免刊载冒犯法兰西帝国朝廷的任何稿件，或发表对法国人有害或不快的任何消息，除非这一消息已在《通报》上报道过。1811年，德意志报纸只许转载《通报》上的政治新闻。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类幸存的国家中，拿破仑的支配地位使它们的政府处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它们的整个传统就是要避免任何形式在报刊上公开探讨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宣传范例又启发它们也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出版政策。这两种观点是难以调和的。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有一道敕令（1798年），命令各报纸极力避免发生可能触怒外国宫廷或政府，或者可能促进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任何事情。1809年，政论家亚当·米勒制订了一个由一家官方报纸引导和指挥舆论的计划，但是这个方案并未得到任何的结果。普鲁士大臣哈登贝格实际上赞同非常严格的控制，因为他不想引起法国人的怀疑；因此，诗人克莱斯特的《柏林晚报》（1810—1811年）很快就被禁止刊登政治性文章。在奥地利，根本没有政治讨论，因而不存在独立的报刊，尽管梅特涅根据自己担任驻巴黎大使的经验看到了报纸的重要性，希望利用报纸来支持政府的利益。他在控制报刊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此人曾建议梅特

涅创办一种政治性报纸。1810年开始发行的《奥地利观察家报》被接管过来，根茨为该报撰写了几篇最重要的文章；虽然人们认为该报有一定的独立性，实际上它是处于政府极严密的控制之下的。

在战争年代，德意志没有一种报纸在政治上具有任何真正的重要意义，尽管在期刊上浪漫主义者和反浪漫主义者笔战不休。民族主义和日耳曼主义已经从R. Z. 贝克尔和约瑟夫·格雷斯等人的言辞中隐约可闻，前者在戈塔出版了《德意志国民日报》，后者原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但早在1798—1799年就转而批评法国的制度，结果，他的出版物被查禁了。在解放战争期间，报刊首次获得为德意志舆论说话的权利，虽然得到政府勉强的和暂时的默许。柏林各家报纸自己决定不发表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在柏林，施莱艾尔马赫、尼布尔和阿希姆·冯·阿尔尼姆主持的《普鲁士通讯》（1813—1814年）表达了反抗法国人的新精神；政府对这家报纸确实颁发了许可证，但是相当害怕在柏林再增加出版一些报纸会造成的后果，因为原来存在的那些报纸就已经难以控制了。在拿破仑垮台的年代中，德意志舆论的最重要喉舌是格雷斯的《莱茵信使报》，该报于1814年在科布伦茨出版。格雷斯对拿破仑的抨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他反对完全由王公们决定德意志的命运，并主张普鲁士的宪法应该以人民为基础。他攻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反民族主义的态度，因此，他的报纸被这两个邦查禁；最后，普鲁士政府1816年1月终于取缔了这家报纸，当时，这家报纸处于莱茵兰的管辖之下。

一位德意志学者论断说：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在德意志，人们逐渐认为出版自由并不是著者或读者的个人权利，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一种集体自由，是他们的共同人格的自然表现。^[6]在战后的各国宪法中重新出现了对自由的保证，正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做的那样。1814年的挪威宪法在对生命和财产的一般保证中，也确认了出版自由。在1815年的荷兰宪法中，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赐给新波兰王国的宪法中，都确定了这种权利。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反动政府对公众舆论的一切表现都采取严厉手段。在法国，报刊和小册子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舆论问题，是复辟期间主要的内政问题之一，它与一些有关的问题，诸如教会的要求问题、各教派会众的权利问题、教皇在管理教会中的地位问题等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1814年的宪章规定有发

表和刊印“符合法律”的意见的自由，“如果滥用此种自由，法律可以给予约束”。这里所指的限制在不同的时期，是以不同的严格程度进行解释的，但是法律从来没有认真地去制止关于政治原则的大辩论，而这种辩论却是复辟时期法国历史的中心。它使法国人民在代议制政府的实践中受到了基本的训练。辩论的核心问题是1789年的大革命；它的挑战是无可回避的：究竟应该维护还是推翻大革命所建立的制度？议会上下两院辩论这些问题；报纸上报道这些问题。在1830年的危机越来越逼近时，自由派主张说：宪章是大革命的顶峰，它意味着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保王派则认为这是一种阴谋和一种罪行，并担心另一次暴动正在逼近。虽然双方的意见完全不同，但是基本问题则是很简单的：1789年究竟应该肯定还是否定？而报刊则处于这场大辩论的正中心。

在复辟的最初几年，法律对任何自由表现意见都是敌对的。1814年10月通过一项法律，其中规定：不经国王批准，任何报纸或其他出版物都不得问世，不经当局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刊印或出售书刊。

“百日”之后，极端保王派的无双议院通过了一项取缔煽动性著作的法律，这严重地打击了左翼的报纸。虽然出版法在实施，违法的新闻记者也受到了惩处，但是，非难的声浪逐渐地越来越高。1817年，基佐和鲁瓦耶-科拉尔创办《哲学文献》，它要求给予出版自由以及关于出版方面的犯罪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其他的期刊，如自由派的《智慧女神》，则采取不定期出版的办法，以逃避新闻检查。1819年通过了比较自由的出版法，要求报纸的所有主交纳相当数量的保证金，但是废除了检查制度，并规定由陪审团审判关于出版方面的犯罪行为，这种比较自由的出版政策只是昙花一现。在贝里公爵死后的保王反动时期，新闻检查制度一度恢复（1820年）。1822年，法院被授权带有危险倾向的报纸勒令暂时停刊，新闻犯罪的定义扩大了，这类案件不由陪审团审理。维莱尔内阁特别积极地把一些报纸和期刊送交法院审理；它开始策划购买反对派的报纸，将其置于内阁的控制之下；它甚至恢复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查理十世登基（1824年）后将这种制度废除了，它只维持了几个星期。

法国报纸像英国报纸一样，开销很大，而且担负着很重的印花税。法国报纸对人数不多的有政治觉悟的阶级有很大影响，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像《立宪报》和《辩论报》之类的反对派报纸占了优

势；这两家报纸是夏多勃里昂1824年被解除政府职务时带到反对派这一边的。1826年，它们在巴黎政治性报纸的5.6万个订户中，各约占2万个订户。内阁的报纸总共只有1.4万个订户。查理十世在位期间，报刊和公众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教权主义。自由派从1820年起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宗教问题，并力图破坏王位与教权的统一；他们的攻击目标特别集中在耶稣会士和教皇至上主义。1825年，《立宪报》被指控“凌辱国教”，结果法院宣判无罪，裁定说：凡是反对未经法律许可的社团，不构成凌辱。1826年，高卢派贵族蒙洛西埃伯爵发表著名小册子《略论打倒宗教、破坏社会和推翻王权的一种宗教和社会制度》，这只是攻击耶稣会士和教士的日益增长的势力的大批小册子中最突出的一种。

维莱尔所采取的主要的反措施之一是所谓的“公正与友爱法”，该法增加印花税和扩大印刷者和出版者的责任。这引起强烈的反对，而当贵族院看来不拟通过的时候，就将此法撤销了。1827年政府再次强行实施书报检查制度，但翌年就被马蒂尼亚克内阁废除了。在他的继任者波利尼亚克任内，梯也尔、米涅和卡雷尔创办了以推翻王朝为宗旨的《国民报》（1830年1月）；同年2月，《环球报》改为政治性日报，极力抨击国王的政策。“七月敕令”又规定报纸须经内阁批准。梯也尔和自由派新闻记者群起抗议，这时政府企图没收《环球报》《时报》和《国民报》，遂触发了七月革命。

在法国，自由派和反动派都结成社团，从完全遵守法律的到秘密组织，色色俱全，交织成一个伟大的时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在天主教和保王派一边，法国有宗教骑士团和圣母会，西班牙有除暴天使会，教皇国家有圣约会。在公开的自由派社团中，最成功和最重要的是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天主教协会。在法国，由于1827年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就出现了以夏多勃里昂为主席的“出版自由同志会”；其后不久，又成立了“天助自助”协会，该会实行消极抵抗，拒绝纳税，曾得到基佐和布罗格利等立宪党人的支持。更早些时候，成立了一个名叫“烧炭党”的秘密团体，它与意大利的烧炭党人有关，其目的在于推翻王朝。这个团体与杰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议员们有联系，在许多省设立分部，但是，它在1822年发动的几次起义都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和平鼓动和革命密谋之间的界限是很容易越过去的。在德意志，青年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最初都是和平性质的，但各邦政府却恐慌

万分，于是就爆发了一系列的事件，从1817年的瓦尔特堡节开始到大学生卡尔·赞德刺杀科策布，以及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法令。烧炭党人在意大利最有力量；西班牙1820年革命幕后是共济会分会在起作用。新潮流甚至遍及俄罗斯帝国。在波兰，维尔纽斯大学中学生团体发展壮大，既鼓吹民族主义又提倡浪漫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学社，成员中包括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1823年，爱学社的领导人被捕，并流放到俄国。波兰的这些团体都曾受到德意志大学生联谊会的影响。在俄国军队中，也是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像“幸福协会”之类的秘密团体，它们的主张导致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这是近代俄罗斯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如果说自由派和革命者的舆论是以这样的方式更高度地组织起来，那么，各君主独裁政府的秘密警察也相应地强大了。1815年以后，政府对于事态发展的敏感，远远超过18世纪的前届政府，而且对于所厌恶和恐惧的鼓动采取更有效得多的镇压手段。

1815年以后，德意志和意大利报刊的经历是这两个国家的骚乱和镇压的总的动态的一部分。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对于20印张以下的所有出版物加强了预先审查，并规定一切印刷物都要注明发行人的姓名，而各邦政府必须将它们执行决议所采取的措施通知邦联议会。在奥地利，本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所以法令的有无大概是无关紧要的。在普鲁士，政府在1815年以后曾经讨论比较开明的措施，但是毫无结果，1819年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检查条例。同年创办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以下简称《总汇报》）作为一种官方报纸，然而，它所起的作用很小。《总汇报》仍然是德意志最大的报纸，但是它处于梅特涅的直接影响之下，并且受到严格的检查，结果有些文章压了很久才得以刊出。巴伐利亚的书报检查使科塔遇到很大困难，他的抗议没有得到什么同情。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在像魏玛这样一些小邦中才可找到最大的自由。魏玛的《反对派报》（1817年）讨论制宪和经济问题，在科策布死后为大学和大学生申辩，抨击普鲁士的镇压行动，不过，这家报纸也像其他同类的日报一样，不久就关门大吉了。在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的报刊处境悲惨。报纸发行量很小，力量过于薄弱，赚不了什么钱。1816年，莱比锡的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写信给奥肯说，科塔所以使《总汇报》正常出版，是由于要保持他的名望，而不是由于报社给他相应的工资。1824年，这家报纸有3602个订户。虽然德意志出现一些能干的新闻记者，然而他们很少有用武之地，像博尔

内和海涅这样的人不得不到国外去。各报都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国外消息往往是整个从外国报刊剽窃来的。不过，编辑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因为各邦政府常常作出一些严格的规定，不准刊登可能使他们有意怀柔的某国政府感到不快的国外消息。尽管存在着重重障碍，但是报纸仍然一步步取得进展。随着工商业的日益自由，广告显得更加重要。新闻的传递开始快了起来，柏林和德意志西部、荷兰、法国之间建立了每日往返的邮政制度。这就使柏林的两家报纸——《福斯报》和《施彭纳报》在1824年得以每日出版；正如《福斯报》的编辑给国王的信中所说，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事务，通过每天的广告，贸易和商业得到了发展。1823年，《施彭纳报》把第一台蒸汽印刷机引进柏林。普鲁士的报纸总发行量，根据印花税统计表，在1823年为35516份，1830年则上升到41049份。

在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中，情况并不比德意志更好一些。在意大利，只能办文艺性的报刊。1818年米兰有一个主张建立强大的、统一的意大利的团体创办了《和解报》，但是翌年在奥地利政府的压力下，这家报纸只好停办，尽管它的许多主张在《世界统计年鉴》上重新出现。1821年在佛罗伦萨创办的《文萃》也很重要，它一直维持到1833年才停刊。在所有这些报刊以及类似的评论性刊物中，都强调需要对意大利的经济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在《文萃》和其他期刊的撰稿人中有年轻的马志尼。在镇压的力量较轻的其他国家里，报刊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瑞士，1815年以后一直进行严格控制；1823年巴塞尔甚至完全禁止报纸出版。然而，在20年代后期，通过像《阿彭策尔报》（1828年）及《新苏黎世报》（1821年）一类的报纸，大大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浪潮。在北方的一些国家里，也发生了冲突。虽然荷兰宪法保证出版自由，但这种权利却受到政府法令的限制，荷兰政府惩办了表达南方诸省的不满的一些比利时新闻记者。当以精干的新闻记者路易·德·波特为首的比利时自由主义者与天主教徒携手联合一致的时候，形势更加恶化了。1828年，比利时议员夏尔·德·布鲁凯尔争取废除1815年关于报刊的法令没有成功，同年，波特因在《低地国家信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而被科以罚金并且入狱。次年，王国的南方诸省积极进行请愿，出版自由是请愿者提出的要求之一。波特依然积极攻击政府，因此1830年4月，他由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成立一个支援那些抵抗政府的人们的协会而被放逐。报刊不断攻击荷兰的统治，而政府也不断予以惩办，终于在1830年8月

爆发了革命。在瑞典，政府在1812年也得到了取缔敌对性报刊的权力，而且恣意使用这种权力。可是，像《阿梅卡伦报》（1816—1820年）和《守卫报》（1820—1836年）一类的反对派报纸越来越重要了，它们鼓吹自由派的纲领，主张改革四院制的议会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思想的主要潮流之一，它通过欧洲思想和行动的渠道时起时落。1815年以后，自由派的流亡者在许多国家的人民中间结成了一条同情和理想的国际纽带，正如在上一个世代法国流亡贵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结成的那样。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国际性运动。以扩大发行《圣经》为宗旨的圣经会，从英格兰（在英格兰，1804年创立了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发展到其他许多国家，一度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热情鼓舞。在文学界和文化界，这正是浪漫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就整体来说，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同情保守派，它的理想是中世纪过去和谐的和僧侣统治的秩序。它遍及欧洲所有的国家，但是，它的真正中心却是德意志，它的胜利使德意志成为欧洲思想的真正中心。这个时期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伟大时代。从康德开始，相继传到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这些人物的信条。他们认为，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理性的个体，而是传统的群体的一员，是民族的一员，他所继承的感情的东西像理性的东西一样多。对于哲学家来说，真正的个性并不在于孤立，而在于承认人在伦理世界的地位并且尽到人在这一世界的本分，而黑格尔把伦理世界与世俗国家等同起来。18世纪是一个伟大个人的时代，19世纪则是集体和民族奋发的时代。对于人类大众来说，可能需要更大的自由和更平等的权利，然而，这是从一种社会背景（历史的、政治的或文化的）之中来观看的。对过去的尊重是要从对历史记录进行的更值得尊重的考察来观看的。在法国，1821年就创立了巴黎文献学校；德意志的大部头原始资料汇编《德意志历史文物》于1826年开始问世。在当代世界中，舆论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在政治方面，大家都知道，舆论的最重要表现是要通过报刊；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人们认为中小学和大学是通往新世界的关键，而新世界是以更深刻地了解人类个性为基础的。

最主要的是一个脉络，就是自由和精神自发性的脉络。社会和学校的职责应该是不使儿童学习无益的死知识，而是发挥独立生活的能

力和儿童内在的力量。这本是卢梭的思想，然而他却把这种思想主要用于个人的发展上。19世纪的任务是把他的思想不仅用于少数天才，而且用于全体人民群众。冯·施泰因男爵在他1807年的《拿骚备忘录》中谈到要鼓舞人民能够真正参加国家的工作。普鲁士的改革家们在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1746—1827年）的著作中找到他们可以采取的手段。裴斯泰洛齐早期屡遭失败，第一次获得成功是在斯坦兹教育一群在瑞士1798年革命的动乱中成为孤儿的儿童。后来他创办了几所学校，声誉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德意志），欧洲各地都有学生来他这里就学。他是一位实践家，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基本思想是：教育应该从儿童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最终希望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抽象理论出发。基本途径是依靠感觉印象；一旦开动机器，儿童就会自己教育自己，因为一切教育的最重要部分是自我发展。“对于人的一切教导”，他写道，“不过是帮助大自然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发展的艺术；这种艺术主要依靠儿童所获得的印象与其发展能力的精确程度之间的关系与协调一致。”^[7]卢梭在《爱弥尔》中所讨论的不过是个人的情况，而裴斯泰洛齐所关心的却是普通人民以及提高他们的一般生活水平。他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思想。整个人类的需要与单个儿童的需要是相同的，而穷人的孩子比富人的孩子需要更好的教育。

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采用了裴斯泰洛齐的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普鲁士制定教育政策的官员和必须执行这一政策的教师们。这些思想从根本上鼓舞人们相信：国家的责任是教育它的人民读书和写作，这不仅是出于功利主义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家有责任发挥它的公民们的新的力量，以便成为比他们以前更加完美、更加发达的人。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在英国是为人所知的（1827年出版了他的一些早期书信的英译本），即使我们不能证明有什么直接因果关系，反正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思想家当中，也怀抱着同样的关于自由、自发性和发挥力量的思想。边沁的教育思想比裴斯泰洛齐的更讲求实际，但是在功利主义学派中，尤其是在詹姆斯·穆勒的学说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自由和自我活动的观念。穆勒说，任何阶级都不应排除于教育之外，因为教育的存在是为了传播幸福的艺术。虽然知识、道德和幸福未必能够完全结合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肯定能够完全结合于各阶级和各民族之中。这一时期英国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罗伯特·欧文也具有同样的论调。他深信18世纪的关于人的性格皆由环

境造成的传统说法是正确的，认为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乃是最关心教育本国公民的国家。他觉得，这种教育必须教导公民成为有理性的人，这几乎是当时的平民教育制度并非想要完成的工作。问题是很实际的：“用理性教育任何人民，他们就会变得有理性。向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提供正当的和有益的职业，他们就会非常喜欢这种职业，而不喜欢不正当的或者有害的工作。”^[8]但是这种正当而有益的职业，没有文化的穷苦人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国家在这项工作中一定要担负主要的责任。英国平民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在1832年认为教育是解救曼彻斯特工人们的痛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没有文化的人正应该由国家关心。”^[9]

寻求自由与自我发展，对裴斯泰洛齐和欧文来说，主要是关心对人民的教育。德意志的思想家们，特别是威廉·冯·洪堡，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也追求同样的目标。在18世纪，德意志高等教育的传统大体上是讲求实际的；大学存在的目的是训练人才为国家服务。19世纪初叶，费希特和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等人开始计划在柏林开办一所新大学，其目的不是制造官僚，而是提高思想修养。耶拿战役的失败对他们的计划似乎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这次失败使普鲁士人更深刻地考虑自己国家的未来。显然必须创造一些新的资源；其中有些应该是物质的，另一些应该是精神的。国家必须挖掘新的精神潜力；它必须用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方面的损失。这些思想并不是在1809—1810年间担任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司长的洪堡所特有的，但是他比其他同代人阐述得更加全面。他亲自致力于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认为教育在其每个阶段都必须以尽可能最充分地发展个性为基础。他的思想中以及当时德意志文学界的伟大人物如赫德尔、歌德和席勒等人的思想中的巨大力量，乃是希腊人思想中的巨大力量。正是由于研究希腊世界，不仅是咬文嚼字、学究式地研究狭义的“古典教育”，而是鉴赏其全部语言、历史、文化和艺术，像伟大的语文学家F. A. 沃尔夫那样的人才找到了充分自我发展的关键。这是实现完全协调的途径，是认清人不是因其所知或所能，而是因其本身的存在才有价值的途径。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原来是少数贵族的理想，已被洪堡带入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流之中。他直接担任公职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的工作的效果却是永恒的。

对于洪堡和一些有同样想法的人来说，教育是启发国民精神力量的关键。1810年10月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就是旨在整个德意志推广普鲁士的影响，发扬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尽管它是一个国立的机构，却保持各学院的传统社团组织和某种自治权。在学术上，柏林大学的标准从一开始就很高。在其他各邦，许多古老的大学几乎都在同时进行改革。海德尔堡大学在1802—1803年间由巴登政府改组。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于1826年在慕尼黑建立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相当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的柏林大学。普鲁士政府在新获得的西部诸省境内于1818年创办了波恩大学。在这些大学以及德意志的其他大学里，制定了大学学习和研究的近代标准。教授们都是为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学者。强调独立学习和研究，而不是要求机械式的死记硬背。在每一个学术部门——在古典语文和历史中，在德意志研究中，在法学中，在哲学中，在历史中和在科学中，德意志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有许多来自异域的学生，其中有爱德华·埃弗雷特和乔治·蒂克纳，他们在1815年到达格廷根，是络绎前来的美国学者的第一批。

促使德意志各大学获得新生的精神因素也对中等学校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人文主义又再度成为最主要的力量，而真正起带头作用的乃是语言学家。从旧的拉丁学校演变而来的大学预科（中等学校）有为大学准备学生的权利。在普鲁士，1810年实行中学教师考试；逐渐形成一个脱离教士而独立存在的教师职业。始于1788年的最后毕业考试，1812年又重新进行，同年采用大学预科学习的标准方案，其基础是在10年期间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数学，旨在进行通才教育。1817年单独成立了教育部，1825年，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也脱离了主教会议。这种发展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在1819年，为中小学教育制定普通学校法的方案毫无结果；但是，到184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时，教育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及其助手约翰内斯·舒尔策已经改进和完成了普鲁士大学预科的学习和人员的组织工作。虽然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弗里德里希·蒂尔施的影响下，巴伐利亚的课程就比普鲁士的课程更具有纯古典精神，但是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发展情况大致是一样的。

在反动时期，如在1815—1830年间，各国政府对大学里的思想自由或言论自由自然是非常惴惴不安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所进行的改革的结果，使政府对大中小学的权力加大了。洪堡及同一时代

的其他一些人真诚地为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而奋斗，尽管他们认为政府的活动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继任者掌权的时候，就不是注重个人自由，而是倾向于国家控制了。洪堡曾经希望柏林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收入。他的继任者冯·舒克曼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就削弱了国家对这所大学的控制，因此这个主张遂被搁置一边。冯·阿尔滕施泰因宣称：大学不是国中之国，不应该干出有害于总的政治局势的任何事情。在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发布一系列法令，限制学童私下阅读书籍，命令他们学习“真正的”，而不是“肤浅的”哲学，并且指示班主任监督本班学生的活动，并报告学生们离校后的情况。政府的活动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是扶植和发展教育事业，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束缚和阻碍教育事业，这是不足为奇的。

革命时期的德意志作家们看到了民族在一种文学潮流或者一种世界潮流中担负的任务，而德意志在各民族的国际文化活动和友好活动中在发挥自己的作用。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年）是上升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主要文献之一，它就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费希特认为，重建国家的唯一道路是：要采取一种不仅能够培训有文化的阶级，而且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教育制度。他认为，他在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中已经找到了完成这项任务的方法。研究和实行这种方法是国家的责任，国家由于忽视宗教和道德已经落到目前的地步。国家在采取这一方针时，也可能遭到反对，但是绝不要推行比已经实施的义务兵役制更激进的东西。这种比拟是很有趣的。事实上，公民上学的义务是与他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有密切联系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确信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一方面又同样深信教育制度必须在道德和行为中产生一种固定不变的典型，一种被人独自认定是正确或健全的典型。1815年以后，学术界对德意志的见解多半是属于自由派的，不仅在学生中如此，在教授中也是如此；1819年，柏林大学教授德韦特在科策布死后被解聘，因为他与谋杀科策布的凶手赞德的家庭有交往。早期自由派的领袖就像是弗赖堡大学的罗特克以及基尔、格廷根和波恩大学的达尔曼这样的教授。不过，在德意志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持续不变的传统，即自由创造精神高于对一般政治的日常关心。1798年洪堡写信给歌德说：“我不为政治事务操心。”^[10]这种传统一直继续下来了。斯塔埃尔夫人很尖锐地指出：德意志思想家在知识活动中很敏捷，而对政治事务则很迟钝。民族的天才在哲学问题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也带来这样

一个后果：那些“不起来提高最轻率的概念”的人就没有真正的目的。“在德意志，一个不专心致志去理解整个宇宙的人，实际上就无事可做。”^[11]于是，国家就乘虚而入，所向披靡，完全占领了一切阵地。

不过，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可以见到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活动的最合乎逻辑的发展。不论是18世纪的思想家们，或是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们，都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一种主要职能，虽然革命的议会只不过提出一系列有趣的方案而已。当时第一执政正在恢复法国的各种制度，他当然对教育是关心的。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切都飘飘荡荡的革命潮流中，他是一个日益兴旺的帝国的主人，而这个帝国却没有各种帝国的制度。他希望学校培养出缔造一种新型社会的人才。他想要谆谆教诲的是秩序和忠于他的政权的精神。他很难指望他的同代人普遍接受这一点，但是他怀抱着去指导下一代人思想的希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非常乐于去利用天主教，但完全要按照他自己的主张。他永远当主宰者。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固定原则的教学实体。没有这种原则，国家就永远不能形成一个国家，就会不断地处于动乱和变革之中。必须找到一种指导政治舆论和道德舆论的方法。

他的计划花了一些时间炮制出来了。第一个步骤是共和十年花月11日（1802年5月1日）的法律，此法规定在每一个上诉法院所在地建立一所公立中学。它们主要是寄宿学校，并把大批奖学金发给军人和官员的子弟。这种学校取代了中心学校，在形式上类似陆军子弟学校。陆军子弟学校是巴黎的一所主要寄宿学校，也是由督政府建立的。此外，公社或私人均可兴办中学，虽然私人办学校需要当局的批准。初等教育实际上受到忽视，对它兴趣不大，又没有钱。如果各学校要按照拿破仑的意图完成自己的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完全依靠政府的全国性组织。大革命前的思想家们（如杜尔哥）和议会的雄辩家罗朗早就有这种想法。这是用世俗形式来体现的耶稣会士们的思想，对拿破仑肯定发生了影响，尽管男子教学公会由于依附于外部权威罗马，一般来说并不合乎他的心意。拿破仑看来是在1805年2月初次形成建立这样一种教学组合会的想法的。1806年他下令开办教育总署，1808年，教育总署正式成立。教育总署是一个世俗的教学组合，有等级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最高的领导者是听命于皇帝的总长和评议会。

在这一中央组织下面，法国被划分为若干“学区”，各个学区由学区长来领导。总长和评议会制定教育方案，每个教师只能按照政府计划所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私人办教育并不受压制，只是被纳入庞大的组织之中，这个组织旨在联系所有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以便使他们都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成员，从学校的最低位置直到政府的最高位置，都由一根链条拴到一起。根据1808年的法令，教学的基础是天主教教义，对皇帝和皇朝的忠诚，以及遵守教育总署的以造就“热爱宗教、热爱君主、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的公民为宗旨的规章。

这些新制度的精神在实际上是天主教和保守派的精神。富尔克罗瓦自1801年起就主管教育，但由于有过一段革命经历，未被任命为总长。这个职务落到信奉天主教的丰塔内的身上，评议会充满了强烈的反革命气氛。因此，天主教在学校中的势力当然很强，而且当然要竭力维护宗教的正统观念。不过私立学校（一般说是天主教学校）却在政权下面遭到很多的磨难。它们被迫拿出一部分学费充作教育总署的基金，而且他们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派遣学生到公立中学和社会办的中学去听课。1811年，更严格地管理私立学校的规定制定了，继而又采取了控制那些“小神学院”（即为主教管区神学院培养牧师的学校）的措施，而实际上这些“小神学院”招收了许多不准备担任圣职的学生。

在高等教育方面，拿破仑保留了在大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曾于1795年短时间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原为培养在中等教育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才，1808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除这些学校外，高等教育就掌握在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的手里，其目的完全是实用的，即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才，保证在需要时有训练好的官员。1808年规定的业士学位考试也具有同样目的，即为担任文职官员开辟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当德意志的大学教育正在向广度发展的时候，法国的大学教育主要追求纯功利主义的目的。拿破仑政府的确对科学显示了真正的兴趣。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法国在欧洲的科学思想中实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见第五章）。督政府创办的中心学校的课程都有很强的科学性。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拿破仑却在较新的思想和旧秩序的古典主义之间采取中间路线，教学纲领偏重于古代语言，而且也是以维护政权的安全为方针。这位皇帝对批判性思

想的仇恨，从他在1803年取缔法兰西研究院（1795年成立）的伦理学分部一事就暴露出来了。

在1814—1815年的动乱之后，这种由国家控制的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且由复辟的波旁君主政权继续推行下去。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主要问题皆与宗教和个人自由有关，在这个总题下最容易考察。在东欧和南欧诸国中，国家的控制甚至更加严厉。在意大利，法国行政当局曾对那不勒斯大学进行改革，并在比萨建立一所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1815年以后，这些改革均被废除，师范学院也关门了。在奥地利帝国，对教师 and 教学大纲的控制特别严密。1821年，皇帝在莱巴赫对大学预科学校的教授们说：“现在到处流行新思想，对这些，我永远不能也不愿意赞同。一定要铲除它，而坚持积极的东西。因为我不需要博学之士，只需要合格的公民。把青年造就成这样的公民是你们的任务。凡是我服务的人，就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进行教学。谁要是办不到这一点，或者是来传播新思想的，可以自动离校，否则我会辞掉他。”^[12]当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快要结束时，类似的思想在俄罗斯帝国日益有影响。他在位初期，曾对教育做了很多工作。教育经费大大增加，成立了教育部，在哈尔科夫和喀山创办了新的大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所教育学院，1819年改为大学。1804年公布了大学章程，给予大学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并把每个大学列为全国划分的各学区之首。在波兰王国也实施一种宽大的政策。1807年，在新的由法国控制的华沙公国就建立了一个教育厅，为小学和中学做了许多事情；1816—1817年又在华沙建立一所新大学。然而，在1815年以后，由于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这种良好的工作大多停止了。书报检查制度加紧了，把教育部并入圣主教公会，大学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些教授被解聘了。在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之后，维尔纽斯大学和华沙大学都被关闭了。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思想在1828年的一项规章中得到体现，它将地区学校和大学预科学校分开，并且指定后者只许招收贵族和官员的子弟。又说：如果不保持阶级的区别，教育就可能变成危险的东西——这一点今后必须更广泛地注意。

与所有这些国家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和文化上依然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把教育寄托给私人的首创精神或者是慈善活动。美国的新英格兰诸州有关心这些事务的老传统，但是在整个共和国发展一种小学体系，其进展必然是缓慢的。一些大学——哈佛、耶鲁以

及比它们年轻的姐妹学校——在人力、物力方面，以及办学目标方面，仍然是有限的。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中，只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既能深刻地考虑教育问题，又对这种问题有实际兴趣，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他在一生事业中，都希望在弗吉尼亚建立一个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的综合体系。他是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该大学是1819年由州议会批准建立的。杰斐逊制定了这所大学的蓝图；他费尽心机聘请有能力的教授，而且往往是从国外请来；他渴望以最开明的方针来管理大学，使学生得以自由选修当时在美洲还无人知道的课程。不过，美国教育的这种独特传统直到1830年才开始形成（见第10卷，原文第116—117页）。

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国家未能对它的教育机构进行任何真正的控制。1688年以后，它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人认为，应该让古老的独立社团，或者依靠私人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属于第一类的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旧式文法学校。这些学校都有许多弱点，虽然在1830年以前已经有了19世纪伟大改革的先兆。在牛津，1800年已经实行一种新的考试规程；而在剑桥，高标准的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为取得荣誉开辟了一条虽然狭窄但是严格的道路。批评的声浪越来越大，特别是来自那些拥护学费少而效率高的苏格兰各大学的人们。在中学里，伟大的一代公学校长的先驱者们已经在工作了。塞缪尔·巴特勒于1798年任施鲁斯伯里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于1828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旧的大学和文法学校在宗教上是信仰英国国教的，宗教甄别的存在是1828年建立非宗派主义的“伦敦大学”（现代伦敦大学的前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也开始施加更大的影响。功利主义者在为此而努力，因为正如边沁所说，教育“只是通过地方行政官来进行工作的政府”。1816年的贫民教育特别委员会揭露了在管理慈善信托方面的许多弊端，并且导致后来为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而制定立法。1827年派出一个委员会去访问苏格兰各大学，尽管在1858年以前没有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但它是后来对牛津和剑桥进行调查的先兆。在初等教育方面，1807年惠特布雷德就曾提出建立教区学校总体系，尽管在英格兰，1830年以前政府并未采取帮助初等教育的直接行动，而爱尔兰经常是试验国家活动的新方式的场所，在那里，早在1815年国家就向基德尔地区协会提供援助了。到19世纪初叶，英国人已经认清教育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国家本身不承担这项工作，唯一足以胜任的其他机构就是教会了。

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教会和教育之间的传统关系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并不像18世纪的德意志那样，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没有使这种关系消逝。在教育领域内，私人组织与由地方首创的中央组织相结合的这种典型的英国形式，可以追溯到1698年创建的基督教知识促进会，该会成立初年对建立慈善学校是十分积极的。也是由私人兴办的主日学校，在18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展起来。19世纪的英国人，除极少数外，全都认为教育应该以宗教为核心。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欧文和边沁，是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但分离思想对全国大多数人所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说大多数人认为宗教应为教育的基础，至于其内容如何，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最尖锐的分歧产生于信奉国教者和不信奉国教者之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不信奉国教者的势力正在增长。1828年，随着宗教考查法与市镇机关法的撤销，不信奉国教者终于获得政治和社会的平等。英国初等教育中的宗教问题也经常被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国教对不信奉国教者”，其实严格的教派观点和不严格的非教派观点之间的分歧，并非和信奉国教者与不信奉国教者之间的分歧完全一致。不过，英国圣公会教士安德鲁·贝尔鼓吹成立的全国贫民教育协会（1811年）和贵格会教士约瑟夫·兰开斯特鼓吹成立的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1814年）确实是对立的，一方主张比较严格地根据教义去教育人民，另一方则主张采取比较非宗派的态度。同样确实的是，随着这两个协会都在加紧活动，彼此的分歧就更加尖锐，而教派对峙问题也更加激化。1805年特里默夫人写信给贝尔说，兰开斯特的计划是一种有组织的企图，它要“教育全体老百姓，完全置本国宗教于不顾”。^[13]全国贫民教育协会本身的建立本来就是由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次慈善布道促成的，这次布道告诫国教信徒们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为国教谋福利。1830年，两个协会就已经扫除相当多的国内大量存在的文盲，尽管还有很多文盲有待于扫除。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宗教对立的阻碍，这是很难估计的。千真万确的是，当国家本身不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两个协会，则将一事无成。

在英国，宗教对立是由两个教会本身相互斗争，而国家只是在幕后当仲裁者。而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中，这种冲突把国家本身也卷了进去，形成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表明个人或团体与权力不断增大的国家机构之间的斗争的一个侧面。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已经明文规定天主教是教育的根本基础之一，但是，国家与宗教

观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谅解。信仰天主教的资产阶级虽然企图使学校天主教化，但他们一向把国立学校看作反对宗教的，国立中学充满了在反教权的气氛中成长、对宗教很少有用的文武官员的子弟。在复辟时期，天主教舆论的一般态度是：它不要求结束国家的垄断，也不要求独立于政府而经营天主教学校的权力，而是力图使现存的体系进一步接受天主教的控制。事实上，直至波旁王朝政权最后几年，人们对国家垄断和教育自由的问题是不大关心的。

在1815—1830年间，法国舆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在另外一节所述的，就是自由过少而教权主义过多。天主教反动势力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是在学校之中。1822年恢复教育总长一职，由埃尔穆波利斯的主教弗雷西努斯阁下担任，此人于1824年担任宗教事务大臣（公众教育归该部管辖）。1822年，高等师范学校受到取缔，基佐和维克托·库赞失去教授的席位。复辟政权对初等教育比拿破仑关心得多，1824年将初等教育置于主教们的控制之下。小神学院的数目和声望日益增长，耶稣会士们又慢慢回到教学的岗位上来。当维莱尔政府被马蒂尼亚克政府所取代的时候，1828年的敕令严格限制了教会在教育事务中的权力。主教失去了他们对小学的大部分控制权。禁止未经批准的修会的成员（实际指耶稣会士）担任教师。小神学院也受到限制。假如国家不支持教会的要求，天主教徒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一般来说，他们趋向于要求教育自由，以便使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他们感到合适的学校里去培养。教会的利益，正如天主教思想家拉梅内当时所主张的，就在于得到教育自由、信教自由和出版自由。本来可以期待自由派抱有同样的观点，但在实际上，他们非常害怕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影响，不敢完全坚持他们的自由主义。

在尼德兰联合王国，由于天主教会和新教政府之间的矛盾、荷兰语和法语之间的矛盾，以及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民族感情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政府在1806年通过了关于初等教育的一项十分全面而且有效的法律，其中按照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包括一种极为广阔的并非教条主义的宗教教育。荷兰政府在1815年以后虽然并未立即在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各省推行这一法律，但它对那里的初等教育的确很感兴趣，因而在教科书和教室使用的语言的问题上引起争论。在南方操佛兰芒语的诸省中，以荷兰语当作国语的官方政策也很不得人心。国王威廉一世为了有利于国家统一，急欲控

制天主教和新教，他的教会政策的精神实际上与拿破仑的政策一脉相承。荷兰政府一般是敌视天主教的，与教士统治集团发生过很多纠纷。政府想要控制对教士的培育，这显然是一个发生摩擦的领域之一。1825年，政府命令关闭小神学院，像在法国一样，小神学院是进入主教管区神学院前的教士预备学校。准备当教士的人必须先进国立学校，然后进入卢万的哲学院；他们从哲学院毕业才能进真正的修道院。政府进一步规定，在国外受教育的教士不得在王国内担任圣职。20年代后期，比利时人反对和荷兰联合的情绪高涨，教育问题是造成麻烦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自由，也像出版自由一样，是1829年南方诸省请愿者所提出的要求之一。1828年，比利时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派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自由派由于法国维莱尔内阁的倒台受到鼓舞。天主教徒受到爱尔兰的奥康内尔的榜样以及拉梅内思想的新转变的影响。1828—1830年间，比利时报刊抨击荷兰的政策，这在前面已经提到。1830年，政府停办哲学院，并对学校问题以及使用法语问题作了让步，但这些措施都太晚了，无法挽回南北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见第十七章，一）。

如果说不论在何地教会和政府都是死对头，那当然是夸大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德意志各邦中，两者紧密无间地合作。维克托·库赞在他关于德意志教育情况的报告（1833年）^[14]中，谈到德意志教派影响的力量，虽然他认为和其他各邦比较起来，在普鲁士，教士的精神比较弱，而政府的精神比较强，国家权力的概念本身就深受宗教法规的影响。普鲁士的思想家们认为上帝和祖国是相辅相成的力量，他们倾向于把正统观念和服从等同起来。库赞的报告表明，普鲁士的教士们在初等教育中积极合作，他认为这是普鲁士小学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其他原因中，他特别指出的是：国家和地方当局在学校管理上相互合作；1794年的“全国通用法律汇编”中重申强迫入学的原则，并对宗教问题作出开明的规定，即不强迫信仰不同的儿童都接受学校提供的宗教教育。在提高教师和学生们的教育水平方面，一项特别重要的办法是建立许多教师培训学院。在1808—1826年间，新建学院17所，它们确实是向前迈进的先锋队。根据1831年的统计，王国内7—14岁的儿童估计约为200万，而小学生则相当于其中的99%。奥地利所达到的水平要比德意志的许多邦低得多，但玛丽亚·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和弗兰茨二世都制定过关于学校的法令（弗兰茨二

世1805年制定《德意志人学校基本章程》)；在奥地利王室领地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儿童至少接受了一些教育。

政府狠抓教育并且取得成功的另外两个国家是荷兰和丹麦。前者在1789年以前的年代里，通过私人办学对改进人民教育作了相当的努力。1798年在新巴达维亚共和国设立了教育部。前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初等教育的法律形成荷兰教育制度的永久基础。除具备合格证件和一个特定学校的聘书外，任何人均不得任教。每个区有一个督学，全体督学组成公众教育地方委员会。内政部颁布了学校一般法规。1811年法国科学家居维叶访问荷兰时，发现几乎全部儿童都已入学（虽然并非义务教育），老师都很出色，而且薪金优厚，视察制度的效率也很高。在丹麦，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体系本来是重新组织丹麦农村社会的改革浪潮的一个支流。1789—1814年间存在的最高学校委员会草拟了一个乡村学校规程，于1806年在岛屿各主教区开始实施，1814年在整个王国推行。儿童从7岁到行坚信礼（一般为14岁）必须强迫入小学（见第十七章，二）。

英国对当时教育实践的主要贡献是以欧文为先驱的幼儿学校，以及互助制，或称兰开斯特制。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这种制度曾在丹麦产生过虽然短暂但是巨大的影响。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对此很感兴趣，在瑞士曾被多明我会的教育家、弗里堡的吉拉尔神父使用过，在美国也流传很广。互助制大概是由贝尔和兰开斯特各自独立采用的，虽然关于它的真正创始人有很多的争论。贝尔在马德拉斯的一个礼拜堂当牧师时，曾任儿童收容所监督。由于他发现老师们不能胜任，他就逐步让比较先进的孩子去教别的儿童。老师一旦掌握这种方法，就能够利用年长的孩子或者班长传达他的问题、检查答案、测验其他的孩子等，可以同时管理很多学生。约瑟夫·兰开斯特认为这种制度是他的发明，他说：“按照此种办法，任何能读的孩子就能教；而比较落后的孩子也可以按照共同的模式去做通常由教师去做的事情，因为能读的孩子就能教，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15]这个方法的优点当然在于它十分省财，能够以很少的财力而开始普遍建立学校。它的严重缺点是死板而做作，因此与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伟大的教育自由运动形成对立；再有，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当贝尔访问裴斯泰洛齐的时候，尽管贝尔对裴斯泰洛齐其人十分钦佩，却认为他应该辞退4/5的教师——这是不足为奇的。

兰开斯特制是一条死胡同，最后，到处都把它抛弃了。然而，它在法国却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初等教育的兴趣。1815年成立的初等教育改进会在创办学校方面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它赞成兰开斯特制；根据该会1821年的报告，它已在1500多所学校中采用这种制度，不过此后数字下降了。在各种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经营的学校中没有采用此制。一般说来，政府对初等教育相当关心。1816年政府拨款5万法郎，1829年增至10万法郎，1830年又增至30万法郎。在这时候，法国的市镇一半左右都有了某种类型的学校；1833年又制定了普通小学法。

到这时候，工业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移向欧洲，虽然过去只是笼罩着英国。贝尔—兰开斯特的方法已经带有一些工业文明的烙印。互助制本身就是一种在教育领域的大批生产。事实上，当时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教育中，都竭力强调劳动分工和工厂机械化之间的联系。贝尔说他的方法“像蒸汽机或者纺纱机，它减少劳动，使工作效率提高许多倍”^[16]。边沁的教育思想深受兰开斯特和贝尔的影响，他在《著作选》中写道：“利润达到最高，而费用减到最少。”^[17]欧文的思想则截然不同，这可以从他最初为工业社会条件下制定的教育理论看出来。他认为，如果要使教育产生效果，就不应以儿童为终止；他想要通过夜校为成人提供进一步的教育。19世纪2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技工学校，以及1827年在亨利·布鲁厄姆启示下建立的、以传播有益书刊为宗旨的实用知识促进会，都是以同样的思想为背景的。但是在这里，读书识字可能与政治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们能读，他们就可能进行批评；而在英国，也和欧洲的每个地方一样，正像凯尼恩勋爵所说，官方认为：任何批评都可能“使人民对约束他们生活的宪法感到不满”^[18]。1809年，有一个人写信给贝尔谈到这样的危险：不以确定的教义为基础的大众教育可能“在宗教和行政中都产生极端自由放任的原则”^[19]。值得注意的是，边沁本人也感到有必要在《著作选》中否认对人民进行较好的教育会导致社会差别的消灭，并且引用苏格兰和德意志作为相反的例证。

德意志人对自己的免疫力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对这一问题心存疑惧的。普鲁士教育大臣冯·阿尔滕施泰因不相信使老百姓得到比最低需要更多的知识的一种初等教育制度能够提高他们的原有地位。他的君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承认自己的思想十分混乱。大众教育

究竟有没有固定的界限？如果有，界限又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就根本无从约束了。使这位国王大费思索的问题影响着整个欧洲社会，远远超出了他对这个问题表述的范围。这个社会问题像是一只解开了缆绳、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向未知的目的地的、漂浮不定的小舟。自由派和反动派，浪漫派和古典派，教权派和世俗派——各种敌对势力在中小学和大学中，在团体和沙龙中，在报刊和议会中厮杀起来了。国家曾企图以教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按照自己的方针制造舆论。欧洲各国人民则在国家的监护下骚动不已，要求在更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

（沈国勋 译）

[1] H. R. 福克斯·伯恩：《英国报纸：新闻史中的几章》（伦敦，1887年）第1卷，第244页。

[2] 《泰晤士报》的历史：《“雷公”在形成中，1785—1841年》（伦敦，1935年），第458—459页。

[3] C. 格雷维尔：《国王乔治四世和国王威廉四世在位时期纪事》，H. 里夫编，第四版（伦敦，1875年），第1卷，第259页。

[4] A. 阿斯皮诺尔：《约1780—1850年的政治和报刊》（伦敦，1949年），第233页。

[5] H. R. 福克斯·伯恩：《英国报纸：新闻史中的几章》（伦敦，1887年）第2卷，第32—33页。

[6] O. 格罗特：《德国报学史：问题与方法》（慕尼黑，1948年），第110—111页。

[7] J. H. 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怎样教育她的孩子们》，L. E. 霍兰和F. C. 特纳译成英文，E. 库克编，第4版（伦敦，1907年），第26页。

[8] R. 欧文：《新社会观》第3版（伦敦，1817年），第65页。

[9] 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回顾民众教育的四个时期：1832—1839—1846—1862》（伦敦，1862年），第60页。

[10] F. 迈因克：《论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慕尼黑和柏林，1908年），第52页。

[11] 斯塔埃尔夫人：《德意志》，英译本，3卷（伦敦，1813年），第1卷，第172页。

[12] R. W. 塞顿-沃森：《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历史》（伦敦，1943年），第165页。

[13] R. 索塞、C. C. 索塞：《安德鲁·贝尔牧师的一生》（伦敦，1844年）第2卷，第136页。

[14] V. 库赞：《论德意志一些邦、特别是普鲁士的公共教育》，第3版（巴黎，1840年）。

[15] 《兰开斯特的“改进”和贝尔的“试验”的实践部分》，D. 萨尔蒙编（剑桥，1932年），第33页。

[16] 《兰开斯特的“改进”和贝尔的“试验”的实践部分》，D. 萨尔蒙编（剑桥，1932年），第69页。

[17] J. 鲍林编：《著作选》（爱丁堡，1843年）第8卷，第25页。

[18] W. H. 威克沃：《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819—1832年》（伦敦，1928年），第26页。

[19] R. 索塞、C. C. 索塞：《安德鲁·贝尔》第2卷，第599—600页。

第八章 欧洲艺术的几个方面

一 视觉艺术

这一时期虽然是欧洲艺术史上最辉煌、最多产的时期之一，但其成就并不在于表现单一的宗教的或哲学的原理。似乎没有一个时期，在其目的、个性和表现方式上如此充满矛盾；只要对比一下大卫与普吕东、透纳与康斯特布尔，或者德拉克洛瓦与安格尔的作品，这些矛盾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建筑艺术方面，卡尔顿王府或马尔梅松宫的极度典雅与部雷或勒杜的奇突蛮石之间也出现类似的鸿沟。标新立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层出不穷；雅克-路易·大卫在十年之间从一名国民公会时代的官方画家进而成为皇帝的首席画师。最初被斥为“哥特派”和“大胡子”的安格尔，后来被尊为学院派的大师，而博学多闻的、贵族气派的德拉克洛瓦却成为色彩、豪放和异国情调的卓越代表。

这一时期之初，这些复杂现象并不十分明显。18世纪最后20年中突出的艺术事件，是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的出现（1785年在巴黎展出）。在这幅画中，那种随着尼古拉·普桑而消亡的严谨的纪念碑式风格赫然复活，并主宰法国艺术达整整一个世代。这幅画的主题——典型的公民美德和不顾个人安危——预示了大卫个人作为革命者所起的作用。它的朴素、简洁的风格，它的极端明净的空间，以及有意地把主要人物组合在一侧另加上去的平面上，一扫残存了三个世代的洛可可遗风。只有画面右方使人产生美感的一群哀伤妇女使人想起大卫青年时曾与布歇接触，只有他那不饰艳色的粗犷笔法使人想起他终生对鲁本斯的尊崇。

《荷拉斯兄弟之誓》的重要意义，不因大卫借鉴前人而稍有减低。像温克尔曼那样的理论家早已在鼓吹回归淡泊与单纯，提出了类似大卫的构图原则。他的门徒拉斐尔·孟斯（1728—1779年）试图以油画来阐明这些原则，尽管他那比较单调的人物群像只不过是意大利巴洛克古典主义的残存形式的重现而已。狄德罗认为应该把道德价值

放在第一位，而把感官享受放在第二位，他赞扬大卫的老师维安的“巧夺天工”和“无比单纯”。这些艺术家和理论家仅仅开始了向新古典主义的温和转变；大卫的杰作则赋予这场运动以足够的势头去左右官方的审美观点达半个世纪之久。

虽然仅此一项成就就会使大卫名列大师，但这既不能解释为什么热里科对他的尊重，也不能说明德拉克洛瓦在1860年为什么说他是“整个现代派绘画和雕刻之父”。他的全部艺术力量最初表现于《圣罗克向圣母玛丽亚为瘟疫受难者说情》（1780年），在这幅画中，对角线式的紧张布局，以及在《荷拉斯兄弟之誓》绘成以前几年的泼辣笔法，清楚地显示出鲁本斯的影响。大卫艺术的进一步表现，是他毫不含糊地描绘出瘟疫受难者按捺不住的痛苦。唯有科学的现实主义与巴洛克的原则的这种结合才能解释热里科为什么尊重大卫。这种现实主义在1793年的《马拉之死》（布鲁塞尔）中达到顶峰。同时，在他的最大型的国事绘画中，是用大于实物的比例来描绘当代政治历史的情景的，这种比例以前专用于宗教的和寓言的题材。这些作品都是依据确切的文献来画成的，确切的文献本身即反映出一种新的科学观点，并为美国画家J. S. 科普利所引用。在这类作品中，《网球场宣誓》是大卫及许多门徒所作的一系列拿破仑绘画和后来的国事绘画的原型；这幅画系1791年由立宪会议订货，只完成了精细的草稿。

在1795—1814年这一时期，大卫的作品没有重大的革新；在督政府和拿破仑的赞助下，他的作品有了一定的柔和笔触和精细线条——这也许是研究了在革命年代没有发现的希腊雕刻的结果。由于他和他的画派日益受到官方的庇护，他终于被认为是死板的古典主义的保卫者。这一观点现在仍未完全消失，用之于大卫的那些学生们也是恰如其分的，他们承袭大卫的图案形式，而以纤弱的造型和机械的轮廓取代他那有力的笔触。另一方面，大卫的比较优秀的学生所显示出的才能多样性，正是大卫本人才能的多面性质的反映。大卫的天才的各个组成部分，为弟子们分别吸取并加以发挥，后来在法国绘画中形成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线。这些路线现在称为“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依然最为合适；它们的因素——在同一画家的作品中可能出现一种以上——对于整个法国19世纪的绘画是非常重要的。

介于大卫与德拉克洛瓦那一代间的主要画家之一是安托-万让·格罗（1771—1835年）。他虽然忠实于他的老师的古典主义原则，但是他25岁就在意大利开始充任拿破仑的各次战役的画师，从此一帆风顺。他的第一幅（也是最浪漫主义的）波拿巴肖像（现藏凡尔赛宫）记录了波拿巴在阿尔柯拉过桥的情况。格罗像他的老师一样钦佩鲁本斯，鲁本斯的狂热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新古典主义的框架。格罗在从大卫的艺术向浪漫主义艺术过渡中所占的地位的全部重要意义，从他的《拿破仑视察亚弗鼠疫病院》（1804年，罗浮宫）一画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这幅画的主题是附加于战争的一种恐怖；它还强调代替传统圣人的皇帝的奇异治病（和自己不受传染）的能力。伊斯兰的背景更为后来浪漫主义派的异国情调开了先河；尽管在画某些人物时，格罗采取希腊化时期的和米开朗琪罗晚期的形式，一种超越大卫的《圣罗克》的现实主义使超自然的英雄主题有了可信性。这种古典主义的、文艺复兴的、伊斯兰的和现实主义的因素的混合，为这一时期的错综复杂现象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答案。

我们现在不能讨论给格罗带来那么多荣誉的战争画，也不能讨论从他的一幅明快感人的20岁自画像（图兹卢）到上了年纪的雷卡米耶夫人像（约1824—1825年，萨格勒布）的一系列肖像画。

格罗主要关心的是拿破仑历史的外观和个性，而他的师兄安娜-路易·吉罗代（1757—1824年）则用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去表现想象的和传说的主题。他的《熟睡的恩底弥翁》（1792年，罗浮宫）表明古典主义的形式与浪漫主义的情调是可以相容的。吉罗代的主要技法是：不合理的光与影，以精确的、纤细的和拉长的轮廓勾画温柔但是没有血色的脸谱，大有舞台设计的意味。尽管如此，他的《莪相接见拿破仑的将领们》（1801年为马尔梅松宫所作）反映出拿破仑本人也爱好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埋葬阿塔拉》的情调却期待着王政复辟的宗教复兴。

吉罗代在这方面的成就，却为一位更为博学、更有创见的艺术家皮埃尔-保罗·普吕东（1758—1823年）的作品所压倒，普吕东在求学期间接受了教会人士以及让-雅克·卢梭的教导。在第戎，他在德瓦斯热的指导下学习，并于1784年获得“罗马奖”，同时已经开始了灾难性的婚姻生活。在意大利，他研究了达·芬奇、拉斐尔、柯勒乔和彼得罗·达·科尔托纳的绘画，还受委托复制了彼得罗·达·科尔托纳

所绘的巴尔贝里尼府邸的天花板。回国以后，他被迫从事书籍插图。他所画的插图精致迷人，这预示了后来出现在他的大部分绘画中的，并可与柯勒乔相比拟的柔和的明暗对比。对大卫的胜利不以为然的几乎只有普吕东（和上了年纪的格勒兹），但大卫却以谦恭的雅量把普吕东比作华托和布歇。尽管普吕东一直受到一个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十分热诚的小圈子的支持，但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之交，他才得到一点官方的垂青。然而，到了1796年，他在《乔治·安东尼》（第戎）和《安东尼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里昂）中创作了两幅浪漫主义时代最美好的肖像画。他对古典的和爱欲的题材所作的自由的和抒情的处理也开始受到注意。1799年他开始担任公职，受命对圣克卢的一处天花板绘画《智慧带着真理从天上降下》（罗浮宫）。他在意大利受到的训练使他有能力以18世纪以来几乎无出其右的全面性和说服力去处理伟大的寓言。在这些作品中，这位有魅力的装饰画家显示出是一位善于操纵活动人物形象的人。他的杰作也许是1808年为正义宫绘制的《复仇和正义追击罪恶》；在这幅作品中，普吕东独特地以该隐和亚伯的圣经题材作为一幅世俗作品的基础；而这一点，再加上其构图强烈的戏剧性质，就使此画远远超过许多空洞抽象的庄严寓言画。热里科临摹了这一作品，他以强烈的光与影对形态的简化，往往就是普吕东原作所暗示的。普吕东是波拿巴家族的一个宠儿，他画了皇后约瑟芬的肖像（罗浮宫），又给玛丽-路易丝当绘画教师，后者在1810年委托他画了《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华莱士收藏）。大概由于这些交往，他在复辟时期未能被委托去画重要的宗教作品；然而，恰恰是一幅宗教画，即1822年所作的伟大的《耶稣受难》（罗浮宫），结束了他有几分悲剧性的生涯。

泰奥多尔·热里科（1791—1824年）是生来就能自由运用先辈们的革新的那些艺术家之一。凡是拿破仑的学校和革命学校所能教导的东西，他都以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强有力的笔法，以观察事实的习惯发扬光大了。他若得享天年，很可能把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的英雄模式、浪漫主义艺术的火热感情、现实主义的新科学观熔于一炉；没有他，这些东西大都分道扬镳，虽然它们的汇合点在19世纪的艺术中往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跟第一位老师卡尔勒·韦尔内一样，是个赛马爱好者和英国狂。1810年，他加入了大卫最学院派的学生之一盖兰的画室；但在大卫的学生中，格罗显然是他真正的榜样。热里科的大型作品《禁卫军军官》（1812年美术展览会，现藏罗浮宫）在很多

方面都与格罗的《马背上的缪拉》相近，尽管热里科所绘的骑手的旋转动作、他的马匹的疯狂以及战场的荒凉，都是他比格罗对鲁本斯进行了更富有想象力的研究的结果。《受伤的重骑兵》（1814年，罗浮宫）对打仗具有更加独特的看法；它描绘的事件是消极的，而它的新的内省情调则是浪漫主义的真髓。热里科于1816年前往罗马，当大多数研究古代艺术的人在观摩花瓶、玉石和浮雕的线条的时候，热里科则像雕刻家一样，用强烈阴影分割整体的技法去研究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古代晚期的驯马者群像和各种投掷者。他像歌德一样，对科索河下游一年一度的种马竞赛十分着迷。具有特别意义的是，他对这一场面的大量习作成为他逗留罗马时期的主要纪念品。由于仔细地研究了西斯廷教堂的全部壁画，他对米开朗琪罗比对拉斐尔更为钦佩；他还像大卫一样，对卡拉瓦乔的自然主义产生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影响，加上精确考证的习惯，后来在他创作《梅杜萨之筏》的两年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梅杜萨之筏》是一幅在格罗的《亚弗鼠疫病院》启示下绘出的关于无名的英雄主义的作品。这一主题使热里科精确地绘制了死者、垂死者和疯狂者的素描，所有这些习作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绘画的里程碑。《梅杜萨之筏》是为了抗议官府在一场海上灾难之后所表现的无能，它引进一些浪漫主义的特征，例如一个得以保命的黑人和表现人类无力反抗自然的大海本身。这幅完美的作品在1819年的画展中并不成功，被运往英国巡回展览，热里科在1820年也随之而去，建立了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至关重要的英法两国艺术联系的环节之一。在英国，他作了一些充满动力的埃普索姆赛马的速写，还作了反映伦敦生活的石版画和素描，如《煤车》《阿代尔菲地窖》和《死刑》等。

在他回到巴黎后生活的三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作品是硝石场精神病患者的肖像，描绘精神错乱的各种状态（1821—1824年）。他完全没有强调这些精神病患者的恐怖，他的态度既是科学的又是人道的。1824年，他死于坠马事故，当时还满怀抱负，并且觉得他的工作几乎是刚刚开始。

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于1816年入盖兰的画室，成为热里科的亲密伙伴，并在某种程度上是热里科的精神继承人。有了他，法国的浪漫主义绘画达到了不用象征和抽象就不可能逾越的极限；但限于本章的范围，只能涉及他的40年活动中的头10年。德拉克

洛瓦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并且据说是塔列朗的儿子。他开始学画时，正值第一帝国的秩序业已崩溃，让位于一个新的信仰与教条的时代。如果人们记得这次政治反动——一次世界大动荡的后果——的气氛，那么，他在日记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复杂的个性就更容易理解了。由于他精通古典，他一直尊崇法国传统的条理和明彻。他不仅熟悉拜伦、司各脱和歌德，而且熟悉但丁、莎士比亚和塔索，他能从所有这些人的著作中寻找题材。

德拉克洛瓦于1822年以其《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一画初次参加巴黎画展；这幅画的题材虽出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但是由于作品的主人公对黑暗和神奇的情景所产生的肉体的和心理的反应，由于施以空前未有的明亮色彩，引起了当代人的兴趣。这幅画的折中主义表明，不管他的个性多么坚强，依然受到他所熟悉的各次大战役后罗浮宫所收藏的杰作的指引。尽管从整幅画中都看得出鲁本斯的影响，但是坠入18层地狱的魂灵的浮动形象则显然取自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在稍后的作品中，德拉克洛瓦表现出对威尼斯画派色彩的理解；而对他的艺术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英国画家，则首推波宁顿和康斯特布尔。德拉克洛瓦在看过康斯特布尔于1824年随同一批英国人的作品展出的《干草车》后，重画了他的《希阿岛的屠杀》（1824年巴黎画展）的若干部分，这个故事是19世纪绘画史上脍炙人口的逸闻之一。这幅作品不只丰富了无名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肖像画的宝库，还表达了艺术家个人对希腊人的志向和悲剧的同情。他所作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土耳其骑兵及其俘虏的肖像深受拜伦的影响。在这幅画里，德拉克洛瓦第一次运用单色（黄、粉和绿）的小点，使其在短距离内与活着的或垂死的受难者的肤色相融合。这一技法使此后几代的画家对他不能忘怀。德拉克洛瓦于1825年访问英国，会见了波宁顿、埃蒂、威尔基和劳伦斯。他在英国和法国都研究过中世纪的和拜占庭的珠宝首饰物、书籍装订、镶嵌工艺、墓葬和盔甲；这些素材出现在《萨丹纳帕路斯之死》（1827年）中，这幅画展示出动物、珠宝、贵重的织物、奴隶、妇女和横死；1826年受委托为行政法院所作的《查士丁尼法学汇编》，显示出他对古代世界最后一些阶段的迷恋。他跟热里科一样，采用了面版画这一新的手段；在他的19幅《浮士德》版画（1828年）中，极其出色地运用了这一手段的柔和的明暗对比。

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结束时，32岁的德拉克洛瓦已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领袖，学院派绘画已逐渐由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来主宰。安格尔12岁进入图卢兹美术学院，在那里，他逐步对拉斐尔产生了不可动摇的爱好。他于1796年前往巴黎，进入大卫的画室，大卫认识到他的绘画天才，雇用他参加绘画雷卡米耶夫人的肖像。然而，安格尔和以莫里斯·奎伊为首的一群被称为“大胡子”或“原始人”的学生们交游，大卫本人的革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拟古主义的趣味。他们的灵感来自介绍古物——玉石、花瓶和浮雕——的书籍，这些古物都是新近从南欧发掘出来的，它们的雕刻极力突出和加强线条的特色。在文学方面，这一集团偏爱荷马、莪相和《圣经》。年轻的安格尔除受他们的影响之外还受弗拉克斯曼的影响，后者为荷马、埃斯库罗斯和但丁的作品所作的版画在法国脍炙人口。这种对拟古主义与抽象纯洁的追求，与大卫对洛可可形式的道德主义—古典主义的净化毫无关系；安格尔就这样以疯狂的热忱追求线条的纯洁，虽则在他获得“罗马奖”的作品《阿喀琉斯迎接阿伽门农的使节》（1801年）中，这种“纯洁”多少有所减弱。初稿大概是在1805年完成的《朱庇特与忒提斯》，虽然是一幅早期作品，却显示出这种线条的抽象，其形式的完善达到他以逐渐结晶而著称的一生所达到的顶峰。同这一时期的几个创新者一样，安格尔基本色调是极高的。

在后期任何作品都难以超越的一组早期肖像画中，比如在里维埃家族成员的三幅肖像（1805年，罗浮宫）和1807年在罗马绘制的安格尔的同僚格拉内的肖像（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安格尔卓越地运用了同样的原则。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那些画得特别出色的肖像素描，这主要是他侨居意大利不下18年期间的作品。作为一个南方人，他觉得住在罗马比巴黎更为安适，但在那里，他的作品最初并未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一时期，他继续画出一些极好的肖像，还作了几幅绝妙的人物画，其中有1808年的瓦平松的《浴女》和1814年的《土耳其皇宫的女奴》（均藏罗浮宫）。由于经常参考拉斐尔和意大利的不朽艺术，他所擅长的对线条构图的技巧遂逐渐退步。他摆脱自己的早期拟古主义风格，也许正是略具拉斐尔风格的《路易十三宣誓》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他胜利地回到巴黎，被选入法兰西研究院，并开办一所重要的教授绘画的画室。在这一职位上，他成为学院派画家的鼻祖和反德拉克洛瓦样板的十字军。安格尔本人背离大卫的原则，基本上

走的是浪漫主义（亦即原始主义）的方向，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又感到自己是抵抗浪漫主义的领袖。如果少受一些压抑、多受一些人文教育，他的天才可能在毫无可疑的方向上发展。可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验已经过度以后，画家们终于又回到安格尔及其形式抽象的正格上来。

虽然庚斯博罗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于1788年和1792年相继去世，源出于提香和凡·戴克，却又经18世纪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修正的英国肖像画传统，似乎并未受到挑战。尽管英国第一位风景画大师理查德·威尔逊于1782年逝世，而历史绘画又引起大多数主要画家的注意，可是在1790年，差不多每一个有声望的画家都首先是肖像画家。威廉·比切（1753—1839年）和稍后的约翰·霍普纳（1758—1810年）依然接近雷诺兹的风格。乔治·罗姆尼（1734—1798年）继续作画，而约翰·奥佩（1761—1807年）和亨利·雷伯恩爵士（1756—1823年）均已出名；前者笔法有力而用色柔和，后者天资过人而失之肤浅。雷诺兹最有天赋的继承者托马斯·劳伦斯爵士（1769—1830年）于1789年在皇家艺术学院以夏洛特王后的全身像（国立美术馆）而一鸣惊人。在这幅画中，以浪漫主义的光亮部分增强师承于雷诺兹的单纯的贵族气派，这种与肖像画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浪漫主义的光亮部分正是他的非凡的成功的关键。劳伦斯后来所作的任何全身肖像画都没有超过他在18世纪90年代所作的全身画像，尽管后来的某些作品显示出惊人的深刻，例如《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皇家艺术学院，1816年）。劳伦斯的肖像画表明，到18世纪末，英国社会的成员虽然比过去更希望具有贵族风度，但是其中金融家和各行各业的首脑人物却与日俱增，他们经常请这位画家为自己画像；他最杰出的一幅皇室肖像（1822年，华莱士收藏）反而把乔治四世本人画成一个事务家，身穿黑色衣服，从文件堆中抬头看望。

这时，牛顿的科学和数学原理应用于工业和商业，已为物质财富开辟了无限的前景。当伦敦社会的画家们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功成名就时，诗人、版画家、空想家和思想家威廉·布莱克的独特天才对在他的早期抒情诗中和后来的象征的、预言的著作中所表现的科学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布莱克（1757—1827年）的艺术几乎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全部基本特征。他的《天真之歌》（1789年）和每首歌的插图表现了一种感受深刻而质朴无华的抒情风格，其重要性堪与1785年大卫

的更加惊人得多的另一种返璞归真相比拟。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勤奋的版画家，布莱克居然研究出一种恰恰与他早期诗歌的自发性相匹配的实验性技法。在出版他的那些诗歌时，正文与插图融为一个有机整体，仿佛在抗议文学全盛时期排字和拼版的机械式的压缩。布莱克对理性主义（甚至对法国革命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成分）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了，对压制创造力和感官能力的谬误加深了认识，这使他产生一种广博的象征主义体系，其中充满了一个物质主义世界中体现在人身上的种种罪恶。为了使这些概念得到视觉上的表达，布莱克不只凭借生动的想象，还运用各种各样的和非正统的视觉材料。哥特式的墓刻，仿米开朗琪罗早期和后期壁画的版画，某些新古典主义形式和莫蒂默与富塞利的当代作品，都被他吸收融会了。一种极无理性的空间感和比例感，一种激烈的明暗对比，和一种破碎的、火焰般的色彩体系，使布莱克的象征主义插图与他早期的抒情插图迥然不同。他的著名的素描《远古时代》（1794年）中所出现的这些特征，在《怜悯》（塔特美术馆）和1797年开始为《预言书》所作的插图中甚至更加有力地显现出来。布莱克这时已经完善了一种复杂的技术，即大幅彩色版画先用胶版印刷，然后用铜版（一般是凸蚀）压印，最后用手工着色。我们可以在令人惊恐的《尼布甲尼撒》（1795年，塔特美术馆）中看到这一点。

在苏塞克斯的费尔帕姆度过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1800—1803年）之后，布莱克返回伦敦，把以后1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反映人类赎罪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主题；这时他的许多素描都与耶稣受难有关，其中有为他的《耶路撒冷》所作的插图《站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面前的阿尔比恩》和《上帝拥抱的灵魂》（约1818年）。1821年他为维吉尔的《牧歌集》所作的17幅木刻版画问世。这些版画虽然尺寸小，却表现出一种崇高的哀歌情调，后来这种情调渗透了布莱克的追随者塞缪尔·帕尔默、爱德华·卡尔弗特和乔治·里奇蒙的作品。布莱克最为重要的后期作品，也许是为《约伯记》所作的一组插图（1823年）；他为但丁的《神曲》所作的一组纷乱而动人的插图，在他逝世时尚未完成。布莱克作为一位艺术家，虽曾受到罗赛蒂的赞赏，却有一个世纪之久几乎默默无闻。

虽然布莱克并未冲击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原则的最高权威，但是另一位出身同样微贱的伦敦人不久便在皇家艺术学院确立了一种艺

术，它违反几乎所有的艺术准则。约瑟夫·马劳德·威廉·透纳生于1775年，他在皇家艺术学会的古代艺术学校学习（并研究他所能借到的素描和图片）的时候，原是一位地形图画家。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受雇于托马斯·格廷（1775—1802年），复制和完成J. R. 科普斯的水彩画。透纳对这些画上显示的比例和高度想象力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重现了科普斯的省略前景、全面大气透视、加大比例等技法。他在1802年就已成为皇家艺术学院院士，但是直到同年游历巴黎和阿尔卑斯山以后，才开始显示出作为一个水彩画家的全部才能。他在罗浮宫对意大利的大师们（首先是提香）的精心研究，构成了此时有助于他的敏锐观察力的科学的基础。与布莱克不同，他的独创性没有使他丧失官方的赏识。他主张，英国风景画应与任何流派的任何题材处于同等地位，但这一要求受到顽固的压制，直到他经常以某个无可非议的早期画派为模式而绘制学院的巨幅作品时，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才得以确立。1801—1805年间，他创作的一些大型海洋画都竭力仿效——而且在某些地方超过——雅各布·雷斯达尔、贝克赫伊森、范·德·费尔德和C-J. 韦尔内的风格；而到1815年左右，他便开始创作意在与克劳德一比高低的壮观的组画。同时，他继续创作像板上油画《泰晤士河》（约1807年，塔特美术馆）之类的作品，这更清楚地表明他个人的兴趣——暖色与冷色的巧妙平衡，在强烈而有节制的基本色调内表现形式与距离的复杂性。这种风格的大型绘画有《萨默山》（1811年，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和《霜冻的早晨》（1813年，国立美术馆）。他继续刊印画册，到1814年又预约出售根据他的水彩画制成的版画；这样就确保了此后使他能与批评者相抗衡的独立性。

1819年，透纳在他的画家生涯中极重要的时刻访问了意大利。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他像青年学生那样勤勉地研究前辈大师和古代雕刻作品；作为一个时髦的旅游中心而取代罗马的威尼斯，成了他的素材的重要来源。他在19世纪20年代的许多大型油画都以地中海为主题，尽管其中有不少并不像他刊印的佳作诸如《英格兰的河流》（1821—1827年）和《英格兰的港口》（1826—1828年）等那么成功。19世纪20年代末，透纳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的真正富有想象力的热情重新出现于《尤利西斯嘲弄波吕斐摩斯》（1829年，国立美术馆）；而在佩特沃斯大厦所画的蓝色纸上的光彩夺目的水彩画（约1830年，不列颠博物馆），则标志了透纳的色块重要的简化和平涂，

这使他达到了以高山为题材的和其他后期水彩画的凝练和壮丽。透纳这时已经停止仿效过去的大师，充分发挥表现火、空气、水、大气层状况、雨、云、山脉和波涛的潜在能力。拉斯金认为，透纳通过解剖整个大自然，正向那些认为人体是艺术表现最高结构的人们提出挑战；从1830年至他的艺术生涯结束止，透纳绘制了许多可证明这一点的杰作。他的最优秀作品有《芬戈尔洞》（1832年）、《国会大厦的燃烧》（1835年）、《奴隶运输船》（1840年）、《驶离港口的轮船》（1842年）、《诺拉姆城堡》（约1840年）和19世纪40年代的一组海景画（国立美术馆和塔特美术馆）。在这组画中，透纳放弃了刻苦学得的正统画法，以前所未有的鲜明的基本色调，把他的画面效果，包括静态的和动态的，完全建立在大气和色彩的透视上。在这些作品中，透纳是以最大的浪漫主义画家出现的，但它们又受到许多水彩画（特别是以高山为主题的）的挑战，在水彩画中，他是不受皇家艺术学院的竞争条件制约的。

透纳于1851年逝世，这时他已经丰富了他自己和国家陈列馆的收藏，而且得到素来认为风景画在绘画中占次等地位的一代学院派画家的全面支持。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年）既缺乏透纳的艺术鉴赏力，也没有透纳处理世俗事务的技能，他那不谙事故的才干迟迟得不到人们的响应。他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惯于观察风向和天空，早年曾引起鉴赏家乔治·博蒙特爵士的兴趣，因而熟知克劳德和格廷的作品。康斯特布尔直到23岁才进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但是不久就开始临摹安尼巴莱·卡拉齐、加斯帕尔·普桑、雅各布·雷斯达尔和威尔逊的作品。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本杰明·韦斯特关于“光与影永远不是静止不动”的意见；然而，精确的地貌学和对庚斯博罗早期森林题材的爱好，奠定了他热爱地方的和独特的景物的基础，与透纳的僻远和朦胧形成强烈的对比。康斯特布尔开始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是在1802年，当时他画了一幅小小的德达姆风景画，虽是主要取法克劳德，却已具有直觉性，这是他本人的主要魅力。《内兰德附近的斯托克》（1807年，国立美术馆）也表现了这一特性，它说明康斯特布尔的兴趣不在于风景优美的地点，而在于随阳光而骤然变幻的熟悉的景物。这种以露水、阳光或云影使熟悉的景物改观的本领，是康斯特布尔对浪漫主义艺术的独特贡献。1810年以后，他的油画在规模和内容方面都变得更有雄心了，这也许是他研究几年前由乔治·博蒙特爵士购得的鲁本斯的大幅油画《斯蒂恩城堡》的结果。鲁本斯的技法影响

出现在《德达姆溪谷》（1811年，北安普敦郡，埃尔顿会堂）中；但是，从康斯特布尔这一时期的小幅油画素描来看，显而易见，除地点的直觉性外，他还着重于一种新的时间的直觉性。他此后15年的创作历史，就是在六英尺的画布上，为表现特定时刻的特定景色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他选用这样的尺寸并不是由于对工作适宜，而是为了确立风景画作为一种高尚手段的地位。透纳虽然早已取得这种成就，但他沿用前辈大师的模式而谨慎选择的史诗般的风景类型，远比康斯特布尔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乡村景色容易接受，因为这种绘画生动的暗绿色遭到了往往由于有意想不到的真实而产生的反感。康斯特布尔的抱负首先在《白马》（1819年，美国弗里克收藏）中得到实现。此后，他创作了《斯特拉特福德磨坊》（1820年）和名不虚传的《干草车》（1821年，国立美术馆），只有《跳马》（皇家艺术学院，1825年）才能与《干草车》相提并论。在这后两幅作品中，康斯特布尔的最大难题得到了胜利解决。这样的作品不可能重复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康斯特布尔在19世纪20年代的许多大型油画都很成功；他小幅的速写（许多画在纸上或卡片上），也属于整个世纪中最为令人喜爱的作品。

这一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德意志画家阿斯穆斯·雅可布·卡斯滕（1754—1798年）生于石勒苏益格。他曾在哥本哈根美术学院和吕贝克求学，然后于1783年前往意大利旅行。他未能到达罗马，只访问了米兰和曼图亚，在那里，他那高傲而略有进取性的心灵深为朱里奥·罗马诺的狂热的艺术所触动。他回到柏林后，执教于美术学院，1792年前往罗马，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去世。尽管他采取新古典主义的形式，他的画面的阴暗和忧郁，以及他自己的悲惨历史，却表明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先驱者。

在他的追随者中，有埃贝哈德·韦希特尔（1762—1862年）和戈特利布·席克（1776—1812年），这两个人在受到他的影响以前，已经在法国受过大卫的熏陶，而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席克的肖像画，就有几分法国的雄浑和博爱。约瑟夫·安东·科赫（1768—1839年）虽然主要以新古典主义风格风景画的代表人物知名，但在1795年到达罗马后，则受到卡斯滕的影响。他声称，卡斯滕的作品帮助他摆脱了他所接受的学院式训练的束缚。他的风景画虽然具有新古典主义的明晰

和层次，但是往往取材于高山和群岭，也经常描绘森林、薄雾和瀑布，这些内容在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的地貌画中占有很大比重。

在德意志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1774—1840年），他生于波罗的海海岸，求学于哥本哈根美术学院（1794—1798年），主要住在德累斯顿。他那与透纳和科曾斯有些类似的比例和距离的夸大，因用于创造无限恬静和辽阔感的光线和轮廓的效果而更见显著；他那些一向很微小的人物通常总是内省地凝视着画面的深处。弗里德里希的《群山中的大教堂》（杜塞尔多夫）、《海上生明月》（1823年，柏林）和《雪中墓地》（1819年）是他的高度个人风格的典范。在他的追随者中，应该提到挪威出生的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1788—1857年）。他的风景画因与荷兰的（或许也与英国的）艺术的接触而具有豁达和博爱的意味，是对早期外光派绘画的重要贡献。达尔对那不勒斯湾的油画素描虽与柯罗有共同之处，但他跟康斯特布尔一样，就云彩结构所画的习作表明，他与歌德同样对于分析气候现象深感兴趣。

德意志浪漫主义画家中最有抱负的菲利普·奥托·龙格（1777—1810年）的艺术，因为他的画面结构精细和繁杂而深受其累。由于深陷于雅各布·伯麦的神秘主义以及瓦肯罗德、诺瓦利斯、蒂克和荷尔德林的观念，他那基本上属于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技法，以及轮廓粗犷和色调刺眼，几乎不能适应于对无限空间作泛神论的表达。然而，在他著名的肖像画例如他的双亲和子女的肖像画（1806年，汉堡）中，他作为观察者和工艺师的才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所谓拿撒勒画派之所以未能在欧洲艺术史上取得高于学院派的重要地位，其原因还在于他们企图用一种最适于对逸事题材作唯物主义和文献式表达的语言，来表现真挚的、新发现的精神境界。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1828年）出生早于大卫，在远离当时艺术古都的地方工作。尽管如此，他不但毫无疑问地属于第一流画家，而且至少是一个跟大卫一样的道德家；他的现实主义只有热里科能与之媲美，而且在发挥层层深刻的想象力方面无与伦比，直至晚近在文学领域方有匹敌。他出生在阿拉贡的富恩特托多斯，在1771年访问帕尔马和罗马之前，曾在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学习。1771年他返回西班牙后，开始画宗教油画和壁画，并从1775年

起，为皇家挂毯作坊设计图案达17年之久，作坊的负责人是德意志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拉斐尔·孟斯。在他为挂毯所作的大都是洛可可风格主题的图案中，他的才能开始充分地显示出来了；1778年进入宫廷后，他发现了委拉斯开兹的艺术，这对于他的肖像画臻于高度真挚与纯朴大有裨益。到1780年，他成为国王的画家之一，虽然他在肖像画方面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发展缓慢，但他这时已成为自己所描绘的马德里社会中富裕的和被人争相结识的成员。甚至他的皇室画像（查理二世，1806年，马德里）也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他的全部肖像画所显示的多面性和纯朴性，都令人想起威尼斯画派和早期西班牙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们。1793年，在一场大病以后，戈雅不幸失聪；另外，由于他富有而摆脱了对委托者的屈从，遂开始描绘他所谓的能够充分表现幻想与创新的主题。他的调色板上也开始有了使他某些佳作因而生辉的暗灰色；1799年，他的重要的蚀刻组画的第一幅：《幻觉》问世。1808年，反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带来了新的危机；曾经培育他的社会崩溃了，他一度是法国改良主义的支持者，如今目睹了引起他的某些最可怕观念的恐怖场面（《战争的灾难》，1808—1815年）。1819年的又一次疾病和1823年法国重新占领西班牙的突变，加深了这位行将就木的艺术家的痛苦；他的充满恐怖感的蚀刻版画《谚语》（《奇想》）是在1820年以前完成的。这时，他创作了一些优秀而全然脱俗的肖像画，以及诸如《橄榄园》（1819年）等宗教画。他的某些杰出的风俗画是在他自愿流亡波尔多时所作，亦即从1824年直至他的逝世。

在新古典主义雕刻家中，以轮廓精美的浮雕和柔和的造型闻名于英国的约翰·弗拉克斯曼（1755—1826年），因其为但丁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所绘的插图而影响了世纪之交的欧洲艺术。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年）以严格的古典风格制作了拿破仑时期欧洲的领袖们的大型人物雕刻，但是某些墓葬纪念碑以及他的草稿和图案则表现出来源于巴洛克式的动力和戏剧性。伯泰尔·托瓦尔森（1770—1844年）像卡诺瓦一样，虽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并且颇著声望，但未能长久地影响欧洲艺术。虽然他受到的是早期古典希腊的而不是希腊化的雕刻的影响，但他的人物依然暴露出当代浪漫主义的比较肤浅的一面。

在欧洲雕刻艺术中比较歉收的新古典主义阶段之后，法国出现了一个与新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的、引人注目的力量。泰奥多尔·热里科的雕刻作品虽然很少，但他确实是这一流派的创始者。弗朗索瓦·吕德（1784—1855年）完成了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上辉煌的浮雕《1792年义勇军出征》，虽然这件作品和更有深度的《拿破仑的觉醒》（菲克辛，第戎附近）不是在本章所论及的时期以内完成的。安托万-路易斯·巴里（1796—1875年）到1830年才制作他那出色的青铜动物群像，而杜米埃的杰出的漫画也是从1830年以后不久开始的。大卫·德·昂热（1788—1856年）和让-雅克·普拉迪埃（1790—1852年）均属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雕塑家之列，他们现在重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这一时期在建筑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场方兴未艾的革命的开始。在从根本上突破风格连续性的同时，建筑物的功用和规模以及建筑科学本身发生了一系列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又经常为人口、贸易、工业和金融信贷等新的压力所加速。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建筑物包括索恩的英格兰银行以及法国的市场和证券交易所。

大多数上述变化现象，与其说发端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如说发端于科学方法的运用。最终导致传统破产的有关历史风格的确切文献，是在17世纪由狄戈德茨的《罗马古建筑》（1682年）开始的，他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帕拉弟奥、塞里奥和其他许多人在测量方面的差错。继而在整个18世纪出现了一系列精确的著作，先是论述罗马古迹的，后来则是探讨那不勒斯、西西里、达尔马提亚、希腊、埃及和近东的宏伟建筑的。这类著作不仅为背离维特鲁威的教条提供依据，而且通过这些著作，建筑师们学会了多立斯柱式、埃及无柱式大型建筑和近古的空间的（而非雕刻的）建筑艺术的巧妙重力安排。

在法国，这门复兴了的历史科学，是与人们对结构工程的兴趣相匹配的，这种工程对建筑艺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8世纪初成立的“桥梁道路协会”，以及该协会在1750年创办的学校，日益受到鼓吹恢复基本结构的建筑师们和理论家们的尊重。其中，洛吉埃神甫的《论建筑艺术》（1753年），主张使建筑要素还原到原始茅屋的水平，他嘲笑使用已经忘掉其结构目的的特征。理论家阿尔加罗蒂和米利齐亚采纳了一种相似的理性主义，若干建筑师也采用了这些原则，并以对结构和材料的科学研究来充实它们。在这群人中间，值得注意

的有桥梁道路学校校长J. R. 佩罗内（1708—1794年）和今先贤祠的建筑师、哥特式结构技术的初期研究家之一J. G. 苏夫洛（1713—1780年）。伟大的结构理论家隆德莱（1743—1829年）和迪朗（1760—1834年）则是这些先驱的后继者。

法国革命使结构科学和扩大了的风格表现手法之间的这种结合，推迟到世纪之交才开花结果。这一时期的最初几年主要是以C. L. 勒杜（1736—1806年）和E. L. 部雷（1728—1799年）的设计著称。勒杜在大革命前夕为包税商们在巴黎周围建造的35座岗楼既显示了纯形式的技巧，也显示了新古典主义的新风格的技巧。在为阿克-塞南（杜省）的盐矿所作的城镇规划中，他把这种技巧与巴洛克式的设计传统结合起来；某些建筑物（也许是受洛吉埃的启发）预示了蛮石立体与几何立体的融合，这种蛮石与几何立体出现于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作的设计里。虽然他的著作在1804年就已被发现，但他的门徒部雷的著作直至晚近才为人所知。他最为著名的设计之一，是装有桶状拱顶和饰有平顶镶板的宏大的皇家图书馆，而他为一座博物馆和圆形剧场所作的计划则预示了19世纪公共建筑的巨大规模。这些建筑的最主要的特点，大多是方块形式和夸大的、连续的水平线。部雷运用各种手段去加大他的作品尺寸，细心地以光与影产生感情的效果。这两位建筑师的任何大型象征主义的设计都没有付诸实施，但他们的影响却在星形广场凯旋门的巨大无柱块石上得到暗示，这座凯旋门是根据他们的同代人、拿破仑一世悉心庇护的封臣之一J. F. 查尔格林（1739—1811年）的设计，于1806年开始建造的。“桥梁道路协会”的赞助者拿破仑认为，公共工程、道路、供水干线、桥梁、码头和市场的庞大规划比建筑学著作更重要。他所施予的大量优遇终于落到由皮埃尔-弗朗索瓦·莱奥纳昂·方丹（1762—1853年）与夏尔·柏西埃（1764—1838年）的一个合伙公司的手里。他们为马尔梅松宫所做的工作（1799年以后），以及由柏西埃发表的设计图，是第一帝国装饰风格的一个概要，其中有粗大的直线形，孔雀石和青龙木，以及希腊罗马式和埃及式的纹饰。柏西埃和方丹在完成罗浮宫他们所担负的部分和精心装饰的骑兵竞技场凯旋门时，显示了他们的全部才能；方丹在获得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保护后，他在那座小巧的、引人沉思的赎罪小教堂（1816—1821年）中完成了自己的杰作，教堂呈正十字形，入口前是一个垫高的筑有回廊的墓场。

拿破仑时期修建的实用建筑物，出人意外地使才华横溢和多才多艺的弗朗索瓦·约瑟夫·贝朗热（1745—1818年）有了用武之地。他在1779年就设计了小型的巴加泰尔宫，后来又以帝国风格设计了许多建筑物。他为小麦市场（1813年）所安装的铸铁圆屋顶现已拆除，是以他在1782年绘制的图样为基础的，这说明法国建筑师在迅速吸收现时的技术。亚历山大-泰奥多尔·布隆尼亚尔设计的证券交易所（1826年）本来是一幢朴素的矩形大楼；它的巨大的科林斯式列柱上面是无饰纹的胸墙；它的内部是一个有走廊的大厅，每个柱间上方有一个钟形小阁。圣马德莱娜教堂动工于1764年，后来按照拿破仑的意愿，由皮埃尔-亚历山大·维尼翁重新设计，作为奉献给“大军”的庙堂，于1807年重新开始修建。这座庞大而不美观的建筑物最后终于在1842年落成，它有科林斯式列柱、顶部照明和半圆形结构。

在复辟时期，教堂建筑重新兴起，但除了赎罪小教堂和伊波利特·勒巴设计的学术性的洛雷泰圣母教堂（1823—1836年）而外，最初并未产生任何杰出的作品。拿破仑以后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师雅克·希托夫和亨利·拉布鲁斯特在1830年以前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品；但是希托夫的著作丰富了古典建筑艺术的文库。1823年柏西埃的学生P.M. 勒塔鲁伊利（1795—1855年）所著《近代罗马建筑》第一卷问世，这标志着对盛期文艺复兴建筑艺术的兴趣又已复活，并大大增加了可供采用的种种风格。然而，如果说18世纪的科学遗产范围广阔，使建筑师在选择式样时无所适从，以致这些风格仅仅成为他们的主体结构的附加物，那么，应用科学的其他分支（也是18世纪的产物）将会构成可用的结构技术，表明上述附加物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法国的建筑师不仅获得国家的积极赞助，而且政府鼓励他们与技术和理论并肩前进，而在英国，主要赞助者依然是地主个人和城市的投机商人。甚至摄政王也只有采纳投机商人的某些计划才能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规划。在技术方面，英国的建筑师比英国的土木工程师略逊一筹；这个时期最宏大的私人建筑——由詹姆斯·怀亚特为百万富翁贝克福德设计的芳特希尔的“修道院”于1795年动工——完工后不久便倒塌。这一时期的两座皇宫不久便全部或局部拆毁，而伦敦大火则不仅烧毁包括许多这一时期工程的议会大厦，还烧毁一些最著名的剧院。

法国的建筑理论取自18世纪的实验观点和卢梭式的原始主义的成分颇多，但英国的建筑师们多半得益于所谓“风景如画”派的理论家，其中理查德·佩恩·奈特和尤维代尔·普赖斯两人的观点在18世纪90年代由汉弗莱·雷普顿（1752—1812年）第一次作了系统阐述，并加以实际运用；雷普顿是一位时髦的风景园艺师，1795年左右成为当时尚未成名的建筑师约翰·纳什（1752—1835年）的合伙人。纳什曾经受教于泰勒，在他个人的建筑物中往往保有帕拉第奥的因素，但是由于采用他的合伙人的视觉技法而变得更重要得多了。雷普顿喜好别致的破格布局，断断续续的轮廓线，遮断光线的表面，以及掩映前景的通幽曲径。不规则的花木种植确保远景的时隐时现。纳什最初只为润色雷普顿的方案而设计小屋小舍和附属建筑，在这项工作中，他任意采用任何中意的建筑风格。在1800年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为威尔士亲王和宫廷工作，因而不久就能运用自己的方法修建各种风格的乡间别墅，有城堡式的、托斯卡纳式的、意大利式的、哥特式的、帕拉第奥式的和中国式的（例如在扩建布赖顿的皇家楼阁时）。这些建筑物虽因魅力和突破风格的连续性而著称，但很少显示他随机应变的即兴创作的才能，这种才能在他开辟摄政公园，以及设计公园同卡尔顿王府和圣詹姆斯宫之间壮观的连接工程中则是明显可见的。这种把商人的头脑、冒险家的眼光与审美家的思辨能力融为一体的特殊才能，使纳什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事，那就是提出一份伦敦的城市规划，这一规划足以同拿破仑一世的规划相比。他完成这一规划，不仅不像在法国那样依仗政府动用广泛的权力，而且还面对着一个空前嫉恨皇室开支的国会。摄政公园的规划公布于1812年大都市迅速扩展之时，因而又使雷普顿的原理运用于市郊发展的详尽方案。纳什的建筑设计包括一个很大的二重圆形广场，一座在波特兰广场轴线上的皇室楼阁（从未建造），和至今尚存的宏大的两侧阶梯形看台。从属于这些建筑的，还有两个“风景如画”派风格的村落，一条环形大道，以及一些商场和一条运河。虽然这些工程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但议会于1813年批准建造摄政街本身，它延长波特兰广场一线，并像莱普顿的花园小径一般弯弯曲曲，终于同卡尔顿王府的轴线相交接。这条曲线上有皮卡迪利圆形广场和牛津圆形广场，以纳什设计的圆形柱廊的万灵教堂与波特兰广场交会，它标志着“风景如画”原则对路易十四传统的轴对称规划的胜利。后来增建的有卡尔顿王府的露台，

特拉法尔加广场，西岸区的改建，秣草市剧场，灾难性的白金汉宫第一次规划，以及新的不列颠博物馆和国立美术馆。

纳什的外向风格跟他的同时代人约翰·索恩爵士（1753—1837年）的内向而敏感的个性适成强烈的对比。纳什以其壮丽的涂灰泥的建筑物正面和配景特别为人铭记，而索恩的名字则使人联想到迷宫般微妙的封闭空间。索恩是伯克郡一个营造商的儿子，在师事因设计1769年的新门监狱而著名的老乔治·丹斯和设计过卡尔顿王府和布鲁克斯俱乐部的要求严格的亨利·霍兰以后，于1778年前往意大利，逗留到1780年。他不但访问过罗马，还访问过帕埃斯图姆、西西里和马耳他；他很尊崇16世纪的某些建筑师，特别是佩鲁齐，这表明他是恪守天主教教义的。他的事业起步维艰，但于1788年任英格兰银行测量师时，终于打开了局面。没有任何建筑物比这座建筑物更适合于他的天才，由于地点的缘故，这座建筑物只能造成一系列松散的大厅和庭院，围以防御性的实墙。他1792年与丹斯合作的银行证券所的最初草图说明，在他们研究古代的宫殿、浴场和陵墓时，18世纪后期最有独创性的建筑师们是怎样注意古代建筑师对于内部空间的利用。皮拉内西出版的著作本身就显示出这一点，它们必定在激起索恩的想象力方面也起过作用。索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空间的严格造型，在于起拱时不用飞檐，在于以凹线和凹进的镶板做成精细的表面。他精于用天窗和弦月窗进行隐蔽照明，这使他名居少数几个浪漫主义高级建筑师之列。可是很清楚，他的原则不只来自古代建筑和英国典范，而且跟他的同时代人不同，他受了洛吉埃神甫在法国创始的原始主义理论的启发。^[1]这种原始主义在达利奇的用普通砖大胆地营造的绘画管和陵墓（1811—1814年）的细部中出现。在这里，习惯使用的柱式组成部分全都予以简化、代替、去掉或缩减到基本形态。这样一种建筑物，在风格上纯粹以结构与功用的要求为出发点，确实意义重大，因为在那个时代，公认的风格已经变得几乎只指外观了。索恩的独创性可以从1812年他开始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住宅和陈列室中管窥一斑。

假如我们只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建筑艺术中的突出人物，那么，纳什和索恩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如果我们考虑这一时期的新古典主义的或哥特式的风格，那就会发现几乎每个主要的建筑师都同时采用这两种风格。哥特式建筑艺术的发展，这时已超过草莓山的洛可可风格，

但尚未达到里克曼的教科书（1817年）和A.C. 普金的《哥特式建筑艺术典范》（1821—1823年）问世以后的那种科学的“精确性”。这时的哥特式建筑既没有18世纪哥特式的魅力，更缺乏奥古斯塔斯·韦尔比·普金和威廉·巴特菲尔德的作品中的信念。哥特式的优秀榜样也许要数巴思威克（平奇）的圣玛丽教堂和切尔西的圣路加教堂，后者是1818年重要的“教堂建筑法”的产物（萨维奇设计）。

希腊风格的复兴在苏格兰找到了比在英格兰更为肥沃的土壤，由A. 埃利奥特、爱丁堡中学的设计者T. 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W.H. 普莱费尔创立的一个学派，一直活动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在英格兰，这一学派的最佳产品大概是由威廉·英伍德和亨利·威廉·英伍德设计的圣潘克拉斯教堂（1818—1822年）。教堂的主要施工者威廉·威尔金斯（1778—1839年）和罗伯特·斯默克（1781—1867年）并不是有天赋的人。他们的建筑物，以及他们比较有天赋的晚辈查理·罗伯特·科克雷尔（1788—1863年）和查尔斯·巴里爵士（1795—1860年）的建筑物，显示了规模和功能的特点，倘若只研究他们的风格，这些特点是容易被忽略的。诸如威尔金斯的国立美术馆（1833年动工）和现已拆毁的斯默克的邮政总局（1824—1829年）等建筑物，尽管在风格上有一部分来自对18世纪古典主义作品的研究，但在功能方面却是崭新的；斯默克设计的规模宏伟的不列颠博物馆（1823—1847年）也同样与上一世纪的传统截然不同。前所未闻的大规模建筑类型——俱乐部、银行、博物馆，以及接踵而来的工业和商业建筑物，连同它们附带的一些问题，便是新建筑艺术的特点，这个特点远比建筑师所选择的风格形式更能给新建筑艺术打上19世纪的真正的烙印。在法国，建筑师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使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就能使用新的结构材料和适合他们的技术，有效地处理这些新的问题。在英国，建筑师的训练很少注重新的技术，纯粹的结构问题日益掌握在工程师手中，他们的某些工程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好的纪念碑。

二 音乐

在1790年到1830年间，音乐艺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从强调理性时代的严格形式转变到强调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和个性，甚至怪诞的模式。不敢逾越雷池一步的早期交响乐的狭小天地，已经逐渐让位于浪漫主义的富有魅力的奏鸣。作曲家们获得了社会解放——从权贵们的家庭侍从变成独立的艺术家，这种发展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

在1790年，乐师主要还是一种手艺人。埃斯特哈齐亲王常常被喻为海顿的保护人，而实际上是海顿的雇主。正如厨师所做的糕点必须适合王公的口味一样，作为府内用人之一，海顿也有他的职责，包括创作适合于各种用途的乐曲。莫扎特由于反对这种雇佣关系，决心成为自己的主人，结果陷于贫困，过度劳累，终于早逝。几年以后，贝多芬得以不靠任何固定的隶属而自立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对音乐的兴趣日益增大，在他们的积极支持下，不仅举办公开音乐会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对出版的乐谱的需求也多起来，从而使艺术家能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同时，对音乐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尊重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就连维也纳的贵族们也能够容忍贝多芬的直率的、有时只能认为是粗鲁的行为了。在社会上平等对待艺术家的同时，作曲家本身也日益自觉地关心自己的艺术，结果，许多人都乐于公开他们对音乐和美学的观点。舒曼、柏辽兹和瓦格纳都留下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迄今仍被人们阅读，以求领略其中固有的旨趣。他们的报纸杂志式的文章与过去以纯说教为宗旨的作曲家的著作截然不同。到1830年，浪漫主义的音乐哲学已经牢固地居于统治地位。

在本书的前几卷中，对公开音乐会在英国和法国的兴起已经作过概述。[\[2\]](#)在本章讨论的时期内，某些倾向变得更为显著，其中两种倾向最为重要：一是竭力摆脱季节的限制，比如赞成在四旬斋期间举行音乐会，因为歌剧院在那个期间概不营业；二是要求设立长年可以使用的较为固定的音乐厅，以取代咖啡馆和经常举行室外音乐会的公园。现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立的在音乐史上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团体名称列表如下：

表8-1

成立时间	地点	音乐团体名称
1771 年	维也纳	音乐家协会
1776 年	伦 敦	古代音乐演奏会
1781 年	莱比锡	莱比锡音乐厅演奏会
1791 年	柏 林	声乐学院
1812 年	维也纳	爱乐乐团
1813 年	伦 敦	皇家交响乐团
1826 年	柏 林	交响乐团
1828 年	巴 黎	音乐戏剧学院乐团

除伦敦的古代音乐演奏会（1776—1848年）和维也纳的音乐家协会（1771—1871年）以外，这些组织现在仍然存在。维也纳、柏林和莱比锡在上表中比较突出，这表明在19世纪，德语国家在器乐方面占有领导地位；在表8-1中没有意大利的城市，则反映出在这个国家的音乐生活中，歌剧占统治地位。在某几个团体的宗旨中，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1829年在门德尔松的主持下重新演出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是柏林声乐学院开办以来最值得注意的大事。阿贝内克领导的巴黎音乐戏剧学院乐团，在贝多芬已经定居维也纳30年的时候，在为确立贝多芬在法国因而也是在欧洲的地位方面，也许比其他任何团体都更重要。此外，伦敦古代音乐演奏会规定，要演奏的必须至少是20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赖夏特已于1784年在柏林采用印刷的音乐会节目单，但是在1800年前，这种节目单并未普遍使用。近代的独奏音乐会在1830年以后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这主要应归功于帕格尼尼和李斯特的精湛技巧和国际声誉。

1790年年末，随着尼古拉·埃斯特哈齐亲王的去世，海顿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转折。虽然海顿在埃斯特哈齐家族服务的那段岁月并不枯燥乏味，但他在那里的雇佣地位和他在外界所赢得的尊敬和声誉极不相称。现在安东亲王继位了。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爱好音乐，因而海顿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虽然名义上仍保持小乐队指挥的职务），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1790年1月，他接受了伦敦小提琴家和演奏会经理约翰·彼得·萨洛蒙要他访问英国的邀请（见第八卷第

四章）。正是由于1791—1792年的这次访英和随后在1794—1795年的第二次访英，我们才有了海顿的最后12部交响曲，而且比较间接地又有了两部伟大的声乐作品《创世纪》和《四季》。他的最后12部交响曲是为在伦敦公开演出而创作的，除了第九十九号交响曲是在两次访英的间隔期间写于维也纳之外，其余实际上全都是在英国创作的。另外，海顿在创作这些交响曲时显然试图迎合伦敦的音乐趣味，作为大都市的伦敦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使得维也纳和埃斯特哈齐宫廷的管弦乐队的设备相形见绌。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1788年创作的第九十一号交响曲的时候说：“为了适合英国人的趣味，必须做大量的改动。”伦敦交响曲之所以绚丽多彩，大概是由于这种取悦群众的需要，伦敦群众听到一成不变的老调就容易厌烦，乐于欣赏最新的器乐效果和革新。现在以别名行世的著名乐章，如《时钟》（即第一〇一号交响曲）、《惊愕》（即第九十四号交响曲）和《军队》（即第一〇〇号交响曲），显然是为了向广大听众提供新奇的东西而写作的。从旋律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他取悦听众的类似努力。这些旋律确实通俗而不低级。这种类似民歌和舞曲的曲调特征，使得海顿成为19世纪初期最受欢迎的器乐作曲家，19世纪是受广大听众的趣味支配而不是受鉴赏家们支配的一个世纪。

海顿这些作品的光辉完全不是表面上的。六十几岁的海顿没有失去大约20年前在为埃斯特哈齐亲王写作的作品中显示出来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新气息依然存在；不过，若非经过几十年的经验达到成熟的地步，伦敦交响曲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性质。事实上，这些作品无论在结构和音响方面都是18世纪交响曲的顶峰。海顿的青年时代曾偶尔尝试在首乐章中用缓慢的引子，如今已成为一个常有的特征。这样，旧政权时代的吕里的法国序曲的显著特征便得以保留；在从贝多芬到塞扎尔·弗兰克的19世纪交响曲作品中，这是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然而，老年的海顿及其后继者却又不像吕里那样，他们通常采用某个主题性的过渡把引子和乐章的主体结合起来。

海顿在安排他的首乐章主体部分时，最终决定采用克里斯蒂安·巴赫^[3]和莫扎特所喜爱的奏鸣曲形式，中间有一支优美如歌的旋律作为“第二”主题，与起始部分中较为强劲的男性起始主题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海顿的早期作品中，这样的对照经常仅用一个调，第二主题只是第一主题的装饰性换调而已。但是，在伦敦交响曲中，他用旋律的二重性补足音调的二重性，而旋律自古以来是容易辨别和记忆的。

海顿决定采用对照的主题，这使他的作品具有造型的清晰度，因而比过去更加通俗化。正是由于海顿的影响，莫扎特的模范曲式成为标准形式，贝多芬在他的九部交响曲中一概沿用这种形式。在管弦乐配器方面，海顿也表明愿意师承短命的莫扎特。当时世界各国并不仿效巴黎长期采用的在交响乐队中包括单簧管的做法。莫扎特在最后的一些作品中使这种乐器发挥音响的潜力，毫无疑问，这种创新的成功吸引了海顿。结果，在伦敦交响曲的配器中，单簧管的重要性不断增大。不过，海顿并不仅仅是依样画葫芦；他的总谱和曲式的广度表明，他所支配的大型管弦乐队不仅激励他去创作大型的音乐作品，而且激励他创作更伟大的音乐作品。

如果说在伦敦，海顿的交响曲创作达到了顶峰，那么，在他回到维也纳后，这两次访英的效果依然持续很长时间。在他的各种经验中，英国国歌《天佑我王》的朴素和庄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感动之余，为奥地利写了“皇帝颂歌”《上帝保佑皇帝弗兰茨！》，这也许是他最家喻户晓的乐章。然而，最重要的是，海顿在英国产生了对韩德尔的音乐（特别是清唱剧）的真正热情。

斯维滕男爵（见第八卷第四章）在任驻柏林大使时期（代表考尼茨与腓特烈大王就瓜分波兰问题进行谈判），对韩德尔的一些清唱剧已经有所了解。他于1777年回到维也纳后，就组织清唱剧的演出，促进对韩德尔音乐的广泛了解。莫扎特曾为几部清唱剧补写管弦乐部分。海顿无疑听过几场演出。所以，当他在英国发现听众对韩德尔的作品有普遍的传统和广泛的热情时，他的想象力活跃起来，使他创作了几部自己的清唱剧作品。

海顿从伦敦带回了相传是为请韩德尔谱曲而写的《创世纪》的歌词，韩德尔也许是拒绝了，也许是来不及谱曲便已去世。歌词的作者不确知，而认为出于托马斯·林利之手一说依然值得怀疑。作者很可能是纽伯格·汉密尔顿，他曾为韩德尔的《参孙》和《亚历山大的节日宴会》写过歌词。海顿返回维也纳以后，开始为斯维滕男爵所作的德文歌词谱曲，而斯维滕男爵对某些纯音乐效果也提出一些建议。

斯维滕男爵对图画形象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使《创世纪》如此迷人的朴实无华的音乐描述。因为海顿对歌词所作的想象处理使乐章具有一种自发的清新感。清唱剧的序章“开天辟地前的混沌情况”并不是如标题所示的混乱局面的表述，而是一连串黑暗和空虚

的画图。整个作品的画面既简单而又有效果。首章“黎明”中C大调的突然光亮对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

斯维滕男爵还根据詹姆士·汤姆森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写成《四季》的歌词。当时对英国文学的普遍兴趣影响着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海顿的两部清唱剧歌词来源于英国也是这个原因。斯维滕男爵在《四季》中所起的作用比在《创世纪》中要更大一些。他的手稿上附有大量对乐思的提示，其中大部分是海顿准备采用的。幸运的是，正如许多稿边小注的性质所显示的那样，这位艺术赞助人具有敏锐的音乐感。^[4]《四季》很少表露它是戏剧作品；它只是一系列的具有勃鲁盖尔绘画风格的乡村生活画面。无论描绘一个狩猎场面，还是描绘一次欢乐的营火晚会，海顿都使之浸透了一种很难令人想象出自一位老人手笔的色彩和生气。

就公演的情况而论，《创世纪》和《四季》是海顿一生最后10年最重要的作品，虽然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他最后的一些弥撒曲和弦乐四重奏的艺术完美性。19世纪初，除了海顿的两部清唱剧的普遍流行和人们对韩德尔作品的持续热情而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受难曲》也重新上演起来。这三位作曲家的合唱作品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清唱剧团体和合唱队的纷纷建立。在对艺术欣赏日益沉寂的时候，这些组织为积极参加音乐活动提供一个机会，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天来说要比在19世纪初更有实际意义。

毫无疑问，海顿定居维也纳也促使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到那里去。他的目的是向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学习。贝多芬于1770年出生于波恩，但是从1792年到1827年他逝世为止，他一直住在维也纳（见第八卷，第四章）。由于这个原因，一般认为他是一位维也纳作曲家。贝多芬受教于海顿并不十分成功，1794年海顿前往伦敦以后，课业便完全停止了；尽管如此，奥地利的首都还有许多使年轻的贝多芬留恋的东西。

当时的维也纳是一座受爱好音乐的贵族们保护的音樂城市。这些贵族有洛布科维茨、利希诺夫斯基和金斯基等亲王以及斯维滕男爵。1803年，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儿子鲁道夫大公成为贝多芬的门生，并同其他贵族一起成为贝多芬的赞助者。贵族的财政支持使贝多芬除了从演奏会和出版物得到的收入以外，又增加一大笔进款。180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杰罗姆·波拿巴在卡塞尔授予贝多芬一个宫廷官职。

然而，他在维也纳极受重视，以鲁道夫大公为首的一个贵族财团每年赠给贝多芬4000弗罗林（盾）。这是支持一位不作为私人仆从承担义务的独立艺术家的突出例子。^[5] 贵族家庭都乐意接待大有前途的青年音乐家，我们从资料中读到，贝多芬曾在斯维滕男爵家中演奏《平均律钢琴曲》中的赋格曲。这也是对J. S. 巴赫的音乐重感兴趣的许多例子之一。贝多芬的演奏技巧使许多人家都为他敞开大门，他的即兴演奏很有名声。他的早期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位伟大的先辈海顿和莫扎特的风格。然而，作为作曲家，他的声誉也在增长，到1800年，他已经写成几首钢琴奏鸣曲、最初的两部钢琴协奏曲、六首弦乐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和第一交响曲，最后这部作品是特意献给斯维滕男爵的。1804年，贝多芬的全部天才及其特质在《英雄》交响曲中显现出来。

这部交响曲完成以后，贝多芬写信给莱比锡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在信中说这是“实际题名为波拿巴”的“新型大交响曲”。法国的路易十四和英国的查理二世可能吹嘘说，由于他们的赞助，在他们的时代曾经直接产生一些受委托创作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但是，拿破仑从来不以音乐的保护人著称。在19世纪初叶的知识界中，他成为表达对专制主义不满的普遍象征。在音乐史上，贝多芬改变《英雄》交响曲的献题最能说明拿破仑共和政体的崇拜者们后来的失望情绪：1806年终于在维也纳出版的《英雄》交响曲删掉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名字，改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因而，这部交响曲是呈献给维也纳的贵族之一洛布科维茨亲王的。

这部降E调交响曲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实际上在整个交响曲的历史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单是它的长度就足以引起争论，毫无疑问，这是布赖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出版商拒绝刊印这部作品的理由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部交响曲的规模超出了海顿或莫扎特所写的任何作品。它的第一乐章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结构。它的主题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由于它们本身适应旋律，而是由于它们适于展开。开头几个音符引起这位作曲家结构最严谨的乐章之一，而在发展部分导入的一个新旋律实际上是乐章有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一个插入的枝节。在这部作品中，结尾也具有较大的意义。在过去的交响曲中，最后的结尾只是一种加强而已，而现在它变成了第二展开部分，在乐曲最后恢复到原调之前，使其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其余的乐章也有力量和创新，例如：葬礼进行曲调子缓慢，谐谑三重奏带

有浪漫主义的低音号声，最后的乐章有变奏曲。这些变奏曲基于一个简单的主题和取自贝多芬本人的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同样简单的旋律配合，如果没有处理素材的作曲技巧，它们是很容易变得平庸无奇的。

《英雄》所具有的特征——激情和节奏感，也是贝多芬绝大部分作品的突出点。在1808年完成的第五交响曲中，这种激情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果说整个第一乐章是由头四个音符发展起来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开头几个小节的节奏渗透这一乐章，并贯穿在整个交响曲中，这都是千真万确的。第一乐章表明贝多芬集中他的主题材料的能力。第二主旋律是由开头几个小节的变体而产生的，这一变体在乐章的进程中发展到最大的程度。贝多芬一贯把他的素材还原到它的基本音素，在这一乐章的发展部分，他最高度地运用了这一手法。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压缩主旋，最后留下单一的音符，由于经过调整，它仍然保有主题的意义。在慢板乐章较有抒情意味的曲调之后，是一个阴郁的谐谑曲，它不间断地过渡到末乐章。最后两个乐章间的过渡乐段，在贝多芬的任何作品中都是富有戏剧性的引人注意的部分之一；这是他在作曲过程的较晚阶段才插入的。五十小节音乐由于几乎从头到尾都“pp”（极弱地），又为坚定的鼓声所支持，使不断增强的紧张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这时突然进入充满胜利喜悦的C大调终曲而得到解脱。

在贝多芬的第五和第七交响曲中，节奏的首要作用再次明确表现出来。事实上，第七交响曲中那种近乎恶魔般的疯狂，曾引起当时的某些批评家对作曲家的神志提出疑问。托维认为，贝多芬的许多主题单凭它们的节奏形式便可辨认。在第五十九号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献给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第一套四重奏曲）中，可以发现节奏的支配达到极端的程度，它的第二乐章开始于一个音符上的适度的跳跃。正是这种节奏的而不是抒情的基础，使贝多芬的音乐甚至能向鉴赏能力最差的听众表达它那感情的力量和率直。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没有莫扎特或舒伯特的那种旋律美；它既无和声的纤巧，也没有配器的矫揉造作。但它却有一种能使任何听众产生即时兴趣的带强烈节奏的质朴表现手法。

第九交响曲自1824年首次演出后，便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题目。神秘的开始部分很清楚地预示着一部规模宏大的作品，确实，这部长

度超过一小时的交响曲（几乎二倍于海顿的任何交响曲）在贝多芬的同时代人中间曾经引起迷惑不解。第一主题的力度为两个乐章定了格调；在快板的序章之后是一首谐谑曲（而不是习惯的慢板乐章），这样一来，除了三重奏部分有短暂的牧歌式的松弛外，乐曲始终维持着一个紧张度，直到第三乐章的柔板为止。这个优美的慢板乐章（一个双主题自由变奏曲）本身，就驳斥了当时的流言：贝多芬在将近30岁时便患耳聋，此时已经全聋，因此对纯粹的声音之美已经失去了兴趣。

虽然对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的伟大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但合唱的末乐章迄今仍是引起议论的题目。它是代表贝多芬在交响曲形式方面所达到的顶峰呢，还是必须视为一个重大的失败？肯定地说，它对人的声音的要求，即使是专业合唱队也难以做到；它的主旋律与取材于它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相比，在深奥与和谐两方面都很欠缺。大家知道，贝多芬有一些时候打算为席勒的《欢乐颂》谱曲。经过仔细斟酌之后，他决定将这首诗歌并入第九交响曲，用以代替纯器乐的末乐章。在合唱前，以一个扩展的乐队前奏开始。前三乐章的素材得到利用，仿佛在寻找适当的旋律为合唱作伴奏。而每次尝试都因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那种犹如吐字清晰的滔滔雄辩而遭到失败。最后，“欢乐”的旋律受到热情的接纳，乐章得以顺利进行。尽管如此，主题仍有三次乐队变奏，继之以乐章开始部分的疯狂喧嚷，后来又为合唱所打断，“啊朋友们，不要这种声音！让我们对别人讲话时，更要使人喜悦和欢乐”。

在这一乐章（以及它的基本曲调）引起的许多评论中，我们可以引用瓦格纳的两段，因为这两段清楚地揭示了贝多芬风格的双重侧面。瓦格纳评论道：“这位音乐家觉得有必要投入诗人的怀抱，以创造真正的、永远富有效果的和弥补不足的旋律。”另一次，瓦格纳又说：“这个曲调的真诚简朴，在我们内心唤起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感，至高的艺术从来没有产生过在艺术上比这个曲调更简朴的东西。在作曲的过程中，这一曲调变成坚定的合唱，这是一次新型宗教集会的合唱，像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圣歌一样，由其他补充声部以对位的方法作为衬托。”^[6]确实，这个曲调以其至高无上的简朴代表着具有普遍性的旋律，卢梭曾为这种旋律而赞叹，海顿有时也曾取得这样的成就。音乐语言的这种在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中同样明白易懂的普遍性，就驳斥了那种把贝多芬晚年的音乐归结为彻底的浪漫主义音乐的

轻率的判断。另一方面，瓦格纳关于新出现的宗教集会应怀着“神圣的敬畏”倾听这一类似合唱的乐曲的想法，表明在浪漫主义音乐的作曲家中间的一种十分显著的态度。贝多芬的作品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着了先鞭，也就是说，一位作曲家不再是以娱乐甚至启迪听众为目标，他把自己看作社会的高级牧师，把听众看作宗教集会的与会者，把他的音乐视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与莫扎特或海顿相比，我们从贝多芬的作品中得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和浪漫主义的奇想在更大程度上的交融。

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歌词表明了当时的理想主义，即人类的博爱：“所有的人都成为兄弟。”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完全成为共济会崇拜的对象，并使海顿和莫扎特、维兰德和歌德这样的杰出人物加入他们的行列。贝多芬的末乐章完全适应当时的思潮，在它出现于共济会的歌本之后，此曲便广为流传。

席勒的《欢乐颂》只是贝多芬热衷于这位诗人的理想的一个事例而已。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席勒还写过关于尼德兰争取摆脱西班牙统治的早期斗争情况。这一主题象征着19世纪初期人们对政治自由的向往。结果，通过贝多芬为之配乐的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使当时的德国受到一大冲击。这两个人虽然在气质上并不一致，但是彼此都敏锐地领悟到对方的伟大之处。现有涉及他们实际交往的原始文件很少，但是它们本身即可说明问题。1811年4月，贝多芬委托业余音乐家冯·奥利瓦带给歌德一封信：

您不久即可收到从莱比锡寄上的《埃格蒙特》的乐谱……我热情地拜读了《埃格蒙特》这部奇书，也同样热情地从音乐角度思考它、体会它、表现它。我万分希望知道您对乐谱的意见，即使非难也将对我和我的艺术有所裨益。

整封信充满了谦恭。歌德的回信是亲切的；他计划在魏玛剧院演出这部音乐作品，并认为这样一次演出肯定会给他本人和贝多芬在当地的许多崇拜者带来极大的快慰。歌德一向措辞谨慎，但这次他在评价《埃格蒙特》的乐谱时，却用了很有力量而且异常坦率的语言：

当卫队的鼓声伴送埃格蒙特走向死亡时，[克勒尔兴的]幻象消失了。这的确是需要音乐的时刻，而贝多芬以神奇的天才表达了我的意图。

另一次评论说：

为歌谱曲往往背离原作精神：诗人很少觉得[他的全部意思已经真正]得到了深刻表达，我们领会到的往往只是作曲家的艺术和气质……贝多芬却在这里创造了奇迹。

贝多芬唯一的歌剧《菲岱里奥》在主题上与《埃格蒙特》相似，但在时间和背景方面有所不同。贝多芬寻找剧本花费好多年时间，因为他对自己的使命严肃认真，不愿考虑微不足道的主题。莱奥诺拉在面临极大危险时对弗罗列斯坦的爱情依然忠贞不渝的故事终于完全适合他的严格要求。几经变迁，《菲岱里奥》遂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式。虽然这是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但是它具有当时法国歌剧的许多特色，实际上，只有结合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歌剧历史才能完全理解它。

除了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和《魔笛》之外，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德意志歌剧作品很少。格鲁克作为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长期活动，往往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积极创作的晚年，他实质上是一位法国作曲家。格鲁克去世后，法国音乐中还长期存在他的精神。法文的《奥菲欧》和《阿尔塞斯特》，以及两部《依菲姬尼》歌剧，都曾在法国舞台上风靡一时，结果，格鲁克在法国取得了如同韩德尔在英国的地位。实际上，一种格鲁克风格主宰了法国歌剧。与此同时，法国革命造成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动荡也深深影响了法国的音乐生活。日常生活的动荡反映于戏剧高潮的急剧增长和以格雷特里的《狮心王理查》（1784年）为原型的“救难式歌剧”的广为风行。地牢和坟墓占主要地位、男女主人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得救的恐怖场景已经成为公认的戏剧公式。这类作品中比较著名的《罗多伊斯卡》（1791年）、《埃利沙》（1794年）、《梅迪亚》（1797年）和《二日》（1800年），赢得了国际声誉。它们是佛罗伦萨人凯鲁比尼创作的，他继吕里和格鲁克之后成为法国主要的音乐家，尽管他原是外国出生。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没有获得拿破仑的宠信，却也同样显赫一时，从1822年至1842年，他作为巴黎音乐戏剧学院院长巩固了在国内外的声誉。凯鲁比尼与他的著名的前辈一样，作曲方法也不同于意大利传统的歌剧作曲家，他扩大乐队和合唱团的作用（见第六卷第四章）。在为特殊事件所写的共和国颂歌中一般有老百姓参加，这很清楚地表明法国革命在集中人们对群众的注意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革命当局这类临时的委托使凯鲁比尼得到发展他自己的合唱与管弦乐风格的机会。这种作品通俗易懂，配乐极为轻松，因而有“壁画”（al

fresco) 之称。凯鲁比尼在居住维也纳期间(1805—1806年), 曾经监督他的一些“救难式歌剧”的演出, 从而得到海顿和贝多芬的尊敬。此外, 显而易见, 这些歌剧的主题以及凯鲁比尼对它们所作的音乐处理, 对贝多芬的《菲岱里奥》是极为重要的。

在建造大型歌剧院和音乐厅的世纪里, “壁画”技法日益重要起来。凯鲁比尼的作品和他的对手斯蓬蒂尼的作品(《贞女》, 1807年; 《斐尔南德·科尔特斯》, 1809年), 可以被认为是梅耶贝尔和瓦格纳早期的大型歌剧, 以及要求那种特别巨大演奏力量的柏辽兹的作品的先驱。

在当时流行的歌剧中, 贝多芬认为凯鲁比尼的《二日》和斯蓬蒂尼的《贞女》的歌词最为优美。因此, 《菲岱里奥》的歌词来自一个法国歌剧的脚本, 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脚本是《二日》歌词的作者让·尼克拉·布依所著《莱奥诺尔, 或夫妇之爱》的德文译本。所以, 就主题材料而言, 《菲岱里奥》属于革命后法国歌剧的一类, 它有救难、地牢情景、掘墓, 以及关于政治自由的说教。

尽管贝多芬迫切希望写出一部歌剧, 可是他缺乏莫扎特所具有的天生的戏剧感。《菲岱里奥》的第一稿在1805年演出三次, 然后即予撤销。第二稿经过精心删节, 把材料由三幕压缩为两幕, 一年后又遭到失败。1814年, 这部作品再度修改, 歌词由G. F. 特赖奇克改写。这个人在使法国救难式歌剧适应维也纳趣味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包括上面提到的《梅迪亚》和《二日》在内)。直到初次上演过了九年以后, 《菲岱里奥》才获得成功。先前几次的失败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演出是在法国人占领维也纳的困难时期进行的, 但是, 为使作品富有效果, 必须作若干的修改, 也确是事实。

《菲岱里奥》的最后定稿成功地占据歌剧舞台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尽管如此, 作为一部依靠纯音乐的创作来要求永垂不朽的作品来说, 《菲岱里奥》由于采取过多的交响乐成分而牺牲戏剧的完整性, 因而受到了普遍的批评。人们在作这种批评时往往以第一幕中著名的正规四重唱作为例证, 虽然就其本身来说, 这段四重唱是与上下一脉相承的。但是, 十分矛盾的是, 贝多芬由于运用主要与纯音乐有联系的形式(诸如两重唱和奏鸣曲的形式)来作他的戏剧表现, 由于把这些形式纳入歌剧的框架并形成整体, 才预示了未来的音乐进程。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中, 戏剧的和

标题的意旨与器乐的各种模式的融合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菲岱里奥》的第二幕中，话语声与管弦乐交织在一起的过渡段是特别生动的。这种过渡段源出卢梭和莫扎特（见第八卷，第四章），并为韦伯和瓦格纳指明了道路。

尽管《菲岱里奥》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永远未能与意大利和法国歌剧在维也纳的优势地位抗衡。19世纪初，意大利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罗西尼（1792—1868年）。《唐克雷迪》的成功（威尼斯，1813年）使它的作曲者居于在整个欧洲上演的意大利歌剧的领导地位。继《唐克雷迪》之后的是《塞维尔的理发师》（罗马，1816年），从1815年至1823年，罗西尼签订合同，每年要给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和维也纳的意大利歌剧院各写一部歌剧。当他在1822年到达维也纳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欢迎达到真正狂热的程度。他同贝多芬和舒伯特会面，贝多芬对他的“精彩的歌剧”（《理发师》）表示祝贺。没有一位专业音乐家会否定罗西尼的显著特点：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旋律，他那对于歌剧技法及其潜在力量的充分掌握，他那对于一出滑稽歌剧的成功绝对不可缺少的幽默感。应皇家剧院经理的邀请，罗西尼于1823年到达伦敦，受到宫廷的青睐。当他五个月后离开伦敦的时候，已经腰缠7000英镑了。随后他作为意大利剧院经理定居巴黎，1826年被任命为国王首席作曲家。《威廉·退尔》（巴黎，1829年）是他最后一次值得记忆的成功。他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把法国革命歌剧的特质搬到一个遥远的时代，同时又使其充满自己的意大利式旋律的生命力。后来，在他37岁时，罗西尼实际上已完全引退，究竟什么原因，从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从他以后出现的少量作品中，如1842年的《圣母悼歌》和1863年的《庄严的小弥撒曲》，就可以证明他的行动并非由于音乐创作力量衰竭。说也奇怪，《小弥撒曲》竟是威尔地《安魂曲》的先河。

罗西尼音乐的强大感染力会压倒贝多芬的声望，从一般听众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较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德意志的歌剧在宫廷和官府的支持下，从最初兴起的时代起就比意大利和法国的歌剧发展得慢呢？尽管有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可是皇帝约瑟夫二世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民族传统的努力却失败了；而且必须承认，后来的《魔笛》和《菲岱里奥》在德意志歌剧史上占有的地位，并非作为歌剧发展的主流，而是作为单独的杰作。最后还是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魔弹射手》促进了民族风格的发展。这部歌剧于

1821年在柏林剧院首次演出（通常演出歌剧的林登剧场当时被斯蓬蒂尼所经营的一个意大利剧团占用，斯蓬蒂尼是拿破仑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宠幸的作曲家）。

《魔弹射手》之所以成功，并不仅仅是由于韦伯选择民间传说和迷信，因为当时德意志浪漫主义题材的歌剧已经屡见不鲜。然而，韦伯的大胆想象力，再加上体现他的思想的高超的音乐技巧，像德意志文学作家在前几年一样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魔弹射手》具有一部成功的浪漫主义歌剧的一切要素：角色是农村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或神话人物；有一个白璧无瑕的女主人公与一个愚不可及的男主人公相对立；丑角邪恶透顶。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超自然场景，有以短小民歌式的语言描绘的乡村景象，合唱则具有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风格（第三幕中的女宾相合唱就标题为“民歌”）。歌剧的高潮出现在第二幕的“狼谷”一场，假扮成黑衣游骑兵的恶魔（用一段回复到情节剧传统的道白）正在制造魔弹。这一场令人想起浮士德与魔鬼之间的契约，它的力量在于巧妙运用管弦乐，管弦乐增加紧张感，并刻画出凶恶的气氛。在这地狱的一场中，与18世纪的特别是与意大利的歌剧场景相比，道白和歌词都很少。为了创造魔窟的可怕气氛，韦伯利用了单簧管、长笛等乐器的不同音域，而且他从来没有忽视圆号。以管弦乐作为他的歌剧的主要动力，这属于浪漫主义的系统，与咏叹调依然占主要地位的意大利风格相比，德意志歌剧走上了良好的道路。在这个世纪较晚一些时候，这种富有启发性的对管弦乐的处理，使瓦格纳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

韦伯的《欧利安特》是创作一部不用对话的、更为“严肃”的作品的尝试。不过，《欧利安特》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韦伯在1826年为伦敦所写的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奥伯龙》中，进一步发挥了有关管弦乐的作用的浪漫主义想法。大致在同时，早熟的门德尔松在他的《仲夏夜之梦序曲》中同样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地运用了管弦乐中的管乐部分。（门德尔松作为作曲家后来的生涯属于下一个时期。）《奥伯龙》的序曲和歌剧正文都由人们熟悉的法国号角声占主导地位。纵观18世纪启蒙运动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演变，很明显，早期的主旋律乐器就是发声较高而又清晰的小提琴。另一方面，法国号角如怨如诉的声音，更适合于新的看法和极力采取新的题材。就韦伯的《奥伯龙》而言，最显著的特点是主题本身极其简单，它的兴趣不在于旋律的性质，而在于洪亮的音响。

对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作曲家（和诗人）的分类是极其精细的工作，所依据的是他们所创作的艺术作品的性质，而不是他们的出生年月。一般认为韦伯是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可是他仅比贝多芬小16岁，并且在1826年先于贝多芬去世。贝多芬晚期的最著名作品，如《庄严弥撒曲》《第九交响曲》，以及最后一些四重奏曲，都是在韦伯的《魔弹射手》之后创作的。另一方面，在文学中，像施莱格尔和蒂克这样一些诗人，是在19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写作具有显著浪漫主义特征的作品。

在贝多芬和歌德的时代所进行的艺术论战中，浪漫主义和古典派的对比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古典音乐”一词具有严格的界限；不过，为了同浪漫主义风格作对比，还必须有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在贝多芬的成熟作品中，浪漫主义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强烈的个人和个性表现，这些作品占用相当长的时间，偶尔出现标题性的低声。由于这些特点，后来的作曲家们都很推崇贝多芬，并且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而过分夸大贝多芬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贝多芬不是正统结构的大师，而是通过他个人的情感使音乐升华的人。他们认为《第五交响曲》不是合乎逻辑的结构，而是隐藏在音符后面的狂怒。为了说明交响诗在19世纪广为流行，他们往往引用贝多芬的《田园（第六）交响曲》的标题作为这类作品的始祖。但是，当这部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完美地表现乡村场景的气氛时，音乐本身恪守交响曲形式的规范。的确，贝多芬的音乐从来没有失去严格的自我约束，而浪漫主义风格则规定作曲家有绝对的自由。甚至在贝多芬的最有个人特色的过渡乐段中，他也始终运用普通的语言，他的语汇是海顿继承者和歌德同代人的语汇。个人主义倾向和自行其乐（有时甚至是反常的），则属于贝多芬曾经给予深刻的影响，但他从未完全参加一个派别。

在他的最后几部作品中，贝多芬只喜欢弦乐四重奏。早在1798—1800年间，他就写了包括六个四重奏的组曲，即第十八号作品。这些四重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18世纪作品的特征。它们与海顿的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作为一组作品出版，而不是单首问世。的确，贝多芬所采用的作曲方法大多以海顿为样板。在1806—1807年，贝多芬写了第五十九号作品（包括三个四重奏的组曲），题献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安德烈·基里洛维奇·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此人从1793年起直到1836年去世一直住在维也纳。从1808年至1816年，这位伯爵维持著名的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乐团，他本人为第二小提琴手。后来，这个四重奏

乐团成为舒潘齐四重奏乐团，以西纳为第二小提琴手。在早期的职业弦乐四重奏乐团中，舒潘齐四重奏乐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于他的精湛演奏及其与贝多芬的密切关系，势必使它建立一种至今仍很风行的公开演奏的室内乐的传统。卡尔·默泽尔在柏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有影响的职业乐团，从1792年到1796年，这个人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人弦乐四重奏乐团中演奏。后来默泽尔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乐团，1813年在柏林定期公演。今天，默泽尔主要是作为贝多芬早期的拥护者而为人们所记忆，而贝多芬以及默泽尔和舒潘齐的四重奏从依靠王室或贵族的庇护转到依靠一般群众的支持，也是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的特点。

贝多芬题献给拉祖莫夫斯基的三首四重奏曲可以名为贝多芬室内音乐的“英雄奏鸣曲”，他成功地发展了用于这种音乐手段的自己的语言。1824年后所写的以所谓“最后的”四重奏曲为顶峰的晚期作品中，由于不断增加矫揉造作的成分而令人扼腕，日益不受群众的欢迎。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贝多芬的崇拜者感到莫名其妙，并得出结论说，他们这位作曲家已经越过为所欲为和精神错乱之间的界线。值得注意的是，当海顿的声誉随着每一部新作的问世而日益增长时，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人却自行其是地写作，完全不顾公众的期望。19世纪后半期人们忽视海顿，而把富有魅力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加以神化，其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三位作曲家各自对待听众的态度。与海顿是三人中的长者这一事实，当然也有关系。尽管如此，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曲也并非一概艰深或难懂。它们的广泛表现力是显而易见的。贝多芬的作品一三〇号中的《德国舞蹈风格》极其简朴，具有18世纪的风格。作品一三二号中的《进行曲风格》也是如此。这首简洁的进行曲之前是一个亲切而不平凡的乐章，标题为“一个康复者对上帝的感恩，利底亚调式”。这是贝多芬1825年重病康复后写成的作品。这一乐章使用一种古老的教会调式，并在旋律的处理上采取对位的手法，所以使音乐具有一种净界的意味；同时，这种处理标志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随着19世纪的推移而日益突出，可以用“历史主义”这一术语加以概括。16世纪的帕莱斯特里纳的对位技巧对于19世纪初期作曲家的魅力，同一个自以为颓唐和污浊的时代中向往纯洁的愿望结成了一体。格列高利圣咏及其调式也有类似的吸引力；在这里可以看出从贝多芬的利底亚调式的感恩乐章到柏辽兹的《末日记》引文，再到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所用的弗里吉亚调式，都是一脉相

承的。这些音乐现象与19世纪初哥特式建筑的魅力同出一源。这里应当提到布瓦塞雷埃和歌德努力筹集基金重修科隆大教堂的事情。另外，应该强调指出，后来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十分风行的迷恋过去的倾向，正是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一三二号）的一个要素，但绝不是主要的特征。这些最后的四重奏曲的另一个特征是为运用赋格技巧提供机会。赋格式的过渡乐段也出现于贝多芬的其他作品，尤其是《第三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对赋格的兴趣同海顿和莫扎特一样，是以他在斯维滕男爵家中所得到的对巴赫作品的熟悉程度为基础的。在1815年以后，赋格过渡乐段，甚至整个赋格乐章的增加是十分显著的。从作品一〇二号大提琴奏鸣曲直到作品一一〇号钢琴奏鸣曲都是如此，而在作品一三一号和一三三号两部四重奏中达到了高潮。这似乎表明，贝多芬希望用一种古老的、几乎非个人的作曲技巧来包罗他的表现力量。其结果对于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虽然深奥莫测，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听众中却唤起了由衷的敬佩。当1827年贝多芬逝世时，整个欧洲一致认为失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舒伯特仅在一年后逝世，却很少受到注意。

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归功于德意志人的倡导，正如歌剧的历史应该是意大利的光荣一样。在音乐厅里由专业演员为购票的听众演唱的并非歌剧的新的世俗歌曲，构成一个完全不同于古老的民歌和情歌的新范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求听众认真和专心地领悟；要求歌唱家具备一种不局限于歌剧的素养；要求钢琴家能作精湛的伴奏，这种伴奏是很复杂的，它像近代的交响乐，而不像吉他的乱弹。这些是浪漫主义歌曲的社会的和技巧的某些必要条件，但是新的德意志歌曲（lied）仍然需要有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使其生翼。维也纳学校教师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扮演了这个角色。舒伯特1815年所作的《魔王》如同蒙特威尔地1607年所作的《奥菲欧》一样惊人，因为前者所草创的艺术歌曲和后者所开始的歌剧一样具有权威性。由于舒伯特及其后继者舒曼、勃拉姆斯和沃尔夫的努力，使一个没有德意志歌曲的独唱音乐会就像一个没有意大利的咏叹调的歌剧演出会一样不够典范。

舒伯特的作曲方法的形成过程是很短的。所谓“第一柏林歌曲派”最早刊行的作品，是在18世纪50年代出现的。这些作曲家的革新虽然影响了下一代，但他们不久便被人遗忘，只有埃马努埃尔·巴赫是唯一的例外。第一柏林歌曲派抛弃了可能适合于流行歌曲的歌剧咏

叹调、小步舞曲及其他舞曲，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与卢梭的理想相一致的民歌和准民歌上，从而创作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思想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歌曲。

“第二柏林歌曲派”的重要出版物，大致是在1790—1810年之间出现的。J. A. P. 舒尔茨、J. F. 赖夏特、K. F. 策尔特尔和其他一些人从埃马努埃尔·巴赫的实验中吸取教益，开始创作适合于歌德和席勒所倡导的德意志新诗的旋律。不过，“旋律”一语本身就表明音乐的局限性。例如，钢琴伴奏即便不完全被认为起从属作用，也往往被当作可有可无：

任何一个不聋不哑的人都能唱的歌曲的旋律，必须能够独立而不依赖一切伴奏，并且必须……牢牢把握歌曲的基调，使人在听过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象没有歌词的旋律或没有旋律的歌词……这种旋律……因而既不要

求、实际上也不允许任何伴奏的和声。[\[7\]](#)

另外一个限制在于分节诗的特性。根据民歌中的规则，歌德和席勒强烈地感到，一首诗的每一节都应该用同一的旋律伴和。速度和力度的调节，以能表达必须有的感情上的细致差别为准。这些理性和诗歌方面的基本原则，受到第二柏林歌曲派作曲家们的充分尊重。

舒伯特推崇歌德的诗歌，但不能接受这位诗人的限制。他继续创作充满活力的音乐，使其随同诗歌的情绪或动作的发展而发展。结果，使舒伯特获得荣誉的歌曲，一种是自由体的，即不分节的，另一种是为只有一节的诗歌所谱的曲子，因而不使作曲家的灵感受到束缚。在舒伯特的660首歌曲中，约有1/10是为歌德的诗所谱的曲子。舒伯特于1815年作《魔王》时，年仅18岁。表现孩子痛苦的哭声所用的强烈的不协和音，是这首歌曲中最精彩的部分。舒伯特依次在每节诗中升高半音，加强了它的效果。在舒伯特的前辈们为分节诗歌谱曲时，就不可能运用这样一种累积效应的手段。[\[8\]](#)

《魔王》脱稿后两年，作家的朋友们把它交给莱比锡著名的布赖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出版公司。为了征求意见，出版商们将《魔王》交给了德意志作曲家德累斯顿的弗朗茨·舒伯特。这位不幸的同名者只是由于这段逸事而得以留名于后世，他断然说：“我从未写过这首清唱剧。”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调查“究竟是谁鲁莽地把这种无聊作品寄给你们，并且查出那个盗用我的名字的家伙”。这首歌曲终于在1821年由维也纳的卡皮-迪亚贝利出版公司出版了。然而，1817年的这

一“意外事件”使这位由浪漫主义产生的、生性豪放不羁，而其天才没有被人们正确理解的新型作曲家得以拨云见日。保守的出版商和批评家与他们认为格调太老或太新的作曲家之间的摩擦，当然并不仅限于舒伯特的作品；人们还会立刻想到巴赫的赋格曲和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曲的不受欢迎的情况。但是，这些早期作曲家有足够收入（而且有足够数量的被接受的作品作为后盾）使他们能够冒险去做一定数量的试验。在舒伯特的一代，艺术家不适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传统已经开始了。在马勒说的“我为子孙后代作曲”这句名言中，在长篇小说、音乐喜剧和电影剧本所反映的舒伯特、肖邦和李斯特的一般形象中，都体现了这种传统。

舒伯特最成功的单节诗作曲，是1822年为歌德的《群峰之巅皆宁静》谱写的一支。舒伯特用新的浓缩音乐表现手法配合简短的诗歌模式，用自由的音乐语句配合歌德的不等长的诗行；除这些成就外，还加上声线与钢琴伴奏之间强烈的旋律反变移。

最后，应该提一下舒伯特1818—1819年为施勒格尔兄弟的诗的谱曲。《来自慈悲的玛利亚》的歌词是19世纪的中世纪精神所确立的宗教方向的样板，而它的半音性则使人想起塞巴斯蒂安·巴赫，而且也可以说为兴德米特开了先河。另外，还有根据A. W. 施勒格尔的德文译本为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所谱的三首曲子。舒伯特对这些“发声”文学作品的爱好，使他的作品与柏林歌曲派迥然不同，正如对十四行诗的狂热成为浪漫主义诗人们反抗旧政体的标志一样。曾为莫里哀和布瓦洛所痛斥的十四行诗体，这时又被发掘出来，并为华兹华斯和A. W. 施勒格尔所模仿。这是欧洲采取不合理的发声模式的总趋势的另一个侧面。作为作曲家，舒伯特的创新态度后来受到门德尔松和李斯特的竞相仿效。

尽管舒伯特在非常年轻时便写出了优美的歌曲，但是他要找到自己的器乐语言还是需要时间的。舒伯特的早期交响曲中有前辈大师们的影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歌曲作曲家的天才似乎阻碍他创作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曲。死板的拍子和反复的旋律削弱了纯音乐的结构。在1820年左右，他的风格发生了变化；舒伯特从这一年起直至1828年逝世，即从23岁到31岁，写出了他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摆脱了18世纪的风格，在早期作品中只是隐约可见的个性这时完全发挥出来。舒伯特最成功的作品是1822年的《未完成交响曲》和1828年的“无限

长”《C大调交响曲》，这两部作品的题名和译名在用语上矛盾正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特点。

舒曼最先谈到这部伟大的《C大调交响曲》的无限长度。用不着说，这样的长度一旦为听众所觉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以时间为尺度的艺术中的一个不利条件。把时间尺度延伸到不合理的和闻所未闻的比例，就终于要产生四联歌剧和长篇大套的交响乐。舒伯特竟让他的《未完成交响曲》以这样两个乐章的形式存在，也是浪漫主义风格的特点。他不写完这部作品的原因，迄今仍不得知。然而，尽管这部交响乐曲从形式上讲可能未完成，但是事实上它却使倾向浪漫主义的听众感到完全满意。这两部交响曲和舒伯特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也充满另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特征，即交响乐形式和抒情曲形式的交织。把主题材料无情地压缩到两个和三个音符的群，甚至一个音符的群，似乎不符合抒情的气质。尽管如此，歌唱的主题从未像在舒伯特的最后作品里那样成功地组合成一种真正的交响音乐形式。而且，这些主题一旦表达出来，便以原有的旋律形式大量地重复。

这种不断的重复，如果出自一个较小的作曲家，是会令人厌倦的，而且，舒伯特的作品又特别冗长，然而，舒伯特创新地运用色彩来缓和这些情况。他创造新色彩的方法是：或是用不同的主调，或是用另外的总谱重复他的旋律，有时主调和总谱一起改变。作曲家通过他的音程和管弦可能达到的音响来取得各种色彩，于是就产生了在交响乐形式和室内乐形式中都是罕见的延伸现象。这也是舒伯特提倡采用比较暗淡和比较柔和的色彩的那个时代的特点。他不止一次呈现他的第二主题群，使听众对音程和音响的进展始终发生新的兴趣，这种方法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舒伯特最后的《C大调交响乐曲》是以圆号旋律在无伴奏情况下开始的，没有任何曲调能够更好地说明这种一心为色彩而色彩和为音响而音响的倾向。在这个又长又突出的过渡段中，比在韦伯的《奥伯龙》或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的《序曲》中，都更明显地表现出对小提琴在18世纪所起的作用的扬弃。浪漫主义对纯粹声响的迷恋在音乐艺术中能够达到它的最大效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这种热情所反映的创作态度，并不是音乐家所独有。实际上，诗人们在几十年前就表现出这种态度了。1778年，在托马斯·沃顿的《英国诗歌史》第二卷问世时，他已经从中世纪法国的《号角诗》中摘译了一

些。英译文在讲到神奇的号角时说：“号角上挂着一百只小铃……如果有人用手指轻轻一碰号角，这一百只小铃就发出悦耳的响声，不论是竖琴、提琴、处女的玩笑、海妖的歌唱，都不能发出这样甜蜜的乐声。”这一段文字，确实就像沃顿对过去的艺术怀有的奔放热情一样，给德意志浪漫主义者造成了深刻印象。1805年，当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准备出版他们重要的民歌集《儿童的神喇叭》时，沃顿对于魔术号角的描述为他们这个集子提供了标题以及标题版图。因而在学者和诗人对号角的魔术般声音赞美了若干时期之后，最终还得由韦伯和舒伯特的管弦艺术从现代交响乐队的实际音响来表达和解释它。

作者在编写这篇综述的过程中，承爱德华·奥勒森先生（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给予协助，谨表谢忱。

（周国珍 译）

[1] M. A. 洛吉埃：《论建筑艺术》（巴黎，1753年；英译本，1755年）。索恩熟知此书，他在去世时拥有五个手抄本。

[2] 第六卷第四章，叙述加尔默罗会修士音乐会（1672年创立）和宗教音乐会（1725年创立），附有从18世纪至现在的公开音乐会参考目录。第八卷第四章，讨论18世纪上半期由韩德尔主持的和18世纪下半叶由莫扎特主持的四旬斋的音乐会。

[3] 他是塞巴斯蒂安·巴赫最小的儿子，生于1735年，称“伦敦”巴赫。他与阿贝尔合作，在1765—1782年间指挥伦敦流行的“巴赫—阿贝尔音乐会”。

[4] 《皇家音乐协会会报》第89卷（伦敦，1962—1963年），第63—74页，特别是第71页。

[5] 盾在1811年“金融特许证”中的贬值（见第402页）是贝多芬的一大烦恼。参见E. 安德逊编《贝多芬书信集》，3卷本（伦敦，1961年），第1卷，第48页。

[6] 《全集》，9卷本（莱比锡，1871—1883年），第3卷，第385页；第9卷，第123页。

[7] J. F. 赖夏特，1781年语。全段摘自A. 爱因斯坦《舒伯特》（伦敦，1951年），第28页。

[8] 关于歌德反对这种自由处理分节诗的意见，参见爱因斯坦，上引书，第45页；另见《音乐季刊》第35卷（纽约，1949年），第511—527页。

第九章 1793—1814年战争时期的势力均衡

为抵抗法国在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所进行的扩张而相继组成的联盟，所采取的总的模式和政策，在欧洲外交史上都有完全确定的先例。自从中世纪结束以后，任何一个妄图称霸欧洲大陆的王朝或国家，都曾受到各邻国所组成的联盟的遏制。这种往往被表述为保持均势的政策的传统性反应，以间歇的方式起作用。它并不是一种始终一贯的政策，只不过是对于周期性的危险作出的集体反应而已。欧洲各国在间歇时期处于不稳定的平衡时，均势的原则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当某个强大而好战的国家由于大力扩张它的势力和领土而在欧洲体系中造成明显的不平衡的时候，其余国家才充分消除它们的分歧，进行合作以恢复平衡。这样的一些联盟是怎样的不稳定，在一次失败或一次胜利之后又是怎样容易瓦解，已经由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几度起伏一再予以证明。

在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欧洲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从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终于遏制了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取得的优势起，迄18世纪最后10年革命军的胜利再次使法国构成一种威胁为止，欧洲的均势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诚然，英国在海军、商业和殖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曾使18世纪成为英国占主宰地位的一个时期。但英国在其他大陆攫取殖民地，并没有打破欧洲内部的均势；相反，英国的利益需要保持这种平衡。然而，毫无疑问，在欧洲各国政府看来，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未免太过分了。当美洲13个殖民地于1776年起造反，而英国又未能迅速把叛乱镇压下去的时候，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便起来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推波助澜，以便对英国人从它们手中夺去殖民地一事进行报复。此外，欧洲其他六个国家也组成一个“武装中立同盟”，以抵抗英国人任意运用他们的海上优势。美国独立战争表明英国受到一次挫折，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再次肯定了平衡的理想。

不过，这种平衡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敏感，只要在某个地区稍微减少一点势力或威望，就会引起进一步的位移。由于英国一时的丢脸，以及法国由于政治腐败、经济破产和1789年以后发生国内革命而逐渐被削弱，剩下的三个强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就更加野心勃勃了。所有这三个国家通过1772年议定的第一次瓜分波兰，都获得了领土。1774年，俄国在损害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了自己的疆界。1779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为相互在德意志诸邦获得某些领土达成协议。1783年俄国兼并克里米亚，1792年俄军把土耳其人远远赶到德涅斯特河。很久以来，法国就把支持波兰和土耳其当作一项对外政策，而这些事件表明，法国在欧洲的势力下降到了何等程度。

由于法国拥有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强国都要多的战争资源，它的这种明显的衰弱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我们对18世纪末的人口总数不可能作出任何精确的计算。但是可以肯定，法国拥有2000万—2500万人口，是享有独特优势的。不错，从数字上看，神圣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大概要多一点，因为二者各自的人口都有可能达到2500万—3000万。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俄国的经济又停滞不前。西班牙拥有1000多万人口，已经成为二等强国。意大利拥有1500万人口，依然衰弱和四分五裂。唯有英国在气势、文明和人民的比较统一方面能与法国匹敌，但在1789年，它的人口总数还不到1000万——也就是说，不及法国人口的一半。如果加上爱尔兰，不列颠群岛当时的居民也才有大约1400万，只接近于法国国王统治下的居民人数的2/3。

革命前夕法国政策的软弱无力，既不能一概归罪于法国外交部，也不能一概归罪于法国的军事科学。宫廷的奢侈无度，财政的浪费和无效，王室会议的缺乏魄力和方针，这一切合起来削弱了法国的力量和威望。但是，正如包括阿尔贝·索雷尔和弗雷德里克·马松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旧政权的末期，外交部是法国官府中工作最有成效、消息最为灵通、办事最为勤勉的一个部门。外交部的传统及其部分工作人员都保留到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对于18世纪末法国的军事思想家，也应该给予同样的称赞。在大革命前夕，军事艺术中最重大的进展是炮兵的改进，1776年以后，在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的大力指导下，法国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另外一些军事评论家，特别是吉贝尔伯爵，都主张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并

强调在士兵中鼓励个人首创精神的好处。他还强调，有必要通过把军团分成几个师和减少它们的长长的辎重车队，以求得很大的机动性。他指出，罗马军团都驻扎在他们所侵略的国家外围，靠打仗获得战利品和赔款来养活自己。在这里可以从根本上看到使法国革命军与众不同的昂扬斗志、行军和调动迅速等新原则的主要部分。

如果法国人是由一个不像路易十六那样麻木不仁的君主来统治，如果大臣们不是为国内危机而如此分心，那么，法国本是可以获得与18世纪80年代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取得的利益相应的补偿的。1789年以后，骚乱的加剧、王权的衰微以及贵族（包括许多军官）的逃亡国外，更进一步损害了法国的威望。同时，一度被约瑟夫二世轻率的改革搞得乱七八糟的奥地利，在1790年1月约瑟夫死后迅速恢复了元气。仅在六个月内，约瑟夫的继承者利奥波德二世就与普鲁士人达成协议，取得了一次小小的外交转机。为了遏制奥地利，普鲁士曾与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并且鼓励匈牙利人和奥属尼德兰（比利时）人民反抗维也纳政府。利奥波德摆脱了普鲁士的阴谋以后，很快便与匈牙利贵族和解，并镇压了比利时的叛乱。到1791年，他又与土耳其人议和。英国政府一直敦促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奥俄联合对奥斯曼帝国作战如果胜利，就会危及君士坦丁堡。

在1790—1791年，当奥地利复原的时候，法国则日益混乱。1791年9月，国民议会宣布革命已经结束，它自动解散，由根据新宪法正式选出的立法议会取而代之。实际上，革命仍在聚集力量，不出半年，立法议会就投票通过对奥地利皇帝宣战。表面的不满没有隐蔽的动机来得重要。在阿尔萨斯也拥有土地的一些德意志王侯，不承认法国的一个议会有废除他们在那里的封建特权的权力。教皇庇护六世对没收教廷在法国的财产和兼并阿维尼翁提出抗议。而巴黎的革命者一方，却对利奥波德二世提出愈来愈多的反指控。他允许法国流亡贵族在法国边境组织武装匪帮；1791年7月6日，他邀请一些强国与他共同制止法国革命采取危险的极端措施；8月27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皮尔尼茨联合宣言中声称，他们认为路易十六的处境是与所有欧洲君主休戚相关的大事。

这些外交警告主要是一种恫吓，利奥波德二世希望通过这种恫吓威胁革命领袖们，并保护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这对国王夫妇曾经恳求他给予援救，并且给予酬谢的礼物，但

是礼物不够。那些希望看到革命被外国军队消灭的法国保王派，同样缺少一个足以动用军队的有力的支柱。然而，到1791年年末，法国立法议会的许多议员也开始赞成打仗了，虽然是出于相反的理由。乔治·库东在12月写信给他的选民说：“革命需要一次战争来巩固自己，这也许是一项正确而明智的政策。”^[1]1792年春，战争的狂热在巴黎迅速高涨，尽管利奥波德二世在3月1日猝然去世，立法议会仍然于4月20日投票表决进行战争，仅有7票反对。于是开始了一场由复杂的动机和矛盾的估计酿成的冲突，使欧洲遭受23年的灾难。

普鲁士支持奥地利，1792年夏，普奥联军进入法国。那些充满幻想的法国逃亡贵族向侵略者保证说，他们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事实恰恰相反，法国的农民们对待他们是怒目而视，充满敌意。9月，缓慢前进的联军到达了巴黎以东100英里的瓦尔米。在那里，在浓雾中进行的一场炮战，使联军的指挥官们的信心受挫，随即停止了这一年的侵略战争。维也纳的内阁和柏林的内阁一致认为，法国的问题可以等到不断加剧的混乱使法国更加脆弱的时候再去解决。当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在他们看来更为严重和更为迫切的波兰问题。

由于1772年的第一次瓜分而清醒过来的波兰人，企图组织起来保卫留给他们的那片缩小了的领土，但是俄国人不愿意让波兰复兴。1792年俄军袭击已经残缺不全的波兰国家，于是，必须阻止俄军前进的问题，不仅在维也纳和柏林，而且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君士坦丁堡，都成了当务之急。在圣彼得堡，女沙皇叶卡捷琳娜衡量了强硬的反对势力，决定作出让步。她撇开奥地利不管，以共同分赃为条件换取普鲁士的支持。1793年1月两个强国进行第二次瓜分波兰，波兰王国的领土只剩下1/3是独立的。对于波兰人来说，从第一次瓜分到第二次瓜分的间歇时间是短暂的而且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波兰危机所引起的骚乱却是天赐良机。

法国人在瓦尔米的“胜利”，同新的仓促选出的国民公会在巴黎举行开幕式恰好在同一时间。革命群众已经推翻了国王的宝座（1792年8月）。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是一个共和国，法国人愿向希望推翻他们的压迫者的一切民族提供援助，并决定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1793年1月）。之所以采取这些大胆挑战的行动，一部分是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在瓦尔米战役之后，联军便向后撤退，这时法国人反过头来变成了侵略者。在三个月之内，他们攻占了美因茨、斯

佩耶尔和布鲁塞尔，兼并了萨伏依和尼斯。判处国王死刑的国民公会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又为抗议处决路易十六的声浪所激怒，1793年2月对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宣战，3月对西班牙宣战。英国通过外交活动、海军压力和给予补贴的办法，迅速增加了它的盟国。葡萄牙、皮埃蒙特-撒丁、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均加入这个集团。普鲁士、奥地利、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和德意志一些较小的邦国都和伦敦谈判签订协约。俄国废除了与法国的通商条约，叶卡捷琳娜向英国人保证她将不与法国人达成任何协议，也不承认他们的征服，但是，她的价码是英国对波兰的命运要保持沉默。

联盟各国对法国展开多方面的攻击，迫使法军从莱茵河一带撤退，并被赶出奥属尼德兰。但联军缺乏统一指挥，而且法国本土的防卫十分森严。到1793年9月，当共和国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革命的将军们再度反守为攻，“共和二年的胜利”把侵略者完全赶出了法国。反革命的反抗在旺代依然余烬犹存，但到1794年夏天，使“恐怖时期”成为必要的那种危险局势已经过去。罗伯斯庇尔已被推翻（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的专政权力已被剥夺。然而，为保卫胜利成果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使革命军事化起来。得胜将军们的威望上升，立法机构的成员威望下降。在1794年以后，巴黎那些随风转舵的政客们越来越依赖于共和国军队的支持，依赖于从“被解放的”省份勒索来的款项。法国陈兵于它所侵略的地区的周围，当住在边境地带的比利时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冒着法军占领的危险而提出抗议时，他们被告诫说，付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可能买来自由。

在明显地看到法国不可能被轻易肢解或赔偿损失时，第一次联盟马上就瓦解了。普鲁士人担心叶卡捷琳娜夺取波兰剩余的领土，便于1795年3月媾和，把莱茵河左岸割给法国。三个月后，西班牙也与法国达成协议，将圣多明各割让给法国。面对法国节节胜利的局面，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在其他地区取得补偿。在第三次瓜分波兰时（1795年1月），三个邻国瓜分了波兰的残余领土。同时，这三个东欧强国还缔结了具有更深远意义的秘密协定。如果奥地利不能从法国手中夺回它的比利时各省份，它可以获得巴伐利亚或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作为补偿。而且，奥地利和俄国重申它们的意图，即当形势显然有利时，它们要按照叶卡捷琳娜和约瑟夫二世于1782年所提出的界线，瓜分土耳其苏丹在欧洲的领地。

意味深长的是，1795年的协定默认了法国的扩张，同时，又期望通过给予欧洲大陆其他强国以相应的补偿而恢复平衡。但是，这种排解办法有两大缺点：一是答应给奥地利的酬谢遥遥无期（除了分得波兰领土而外），二是英国既未从法国征服比利时省份得到补偿，也未从东欧三国瓜分波兰地区得到好处。因此，英国和奥地利就有理由继续同法国作战。到1795年年底，这些理由更加充分了，因为法国人在战胜荷兰共和国以后，把它改组为与法国结成亲密同盟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法国人的这一措施巩固了他们对比利时省份的控制。英国人则通过掠夺荷兰的海外属地进行报复。锡兰和开普敦已由英国人控制（1795—1796年），但是，以这些在遥远地方的所得与欧洲各强国的扩张相比，似乎小巫见大巫了。

1795年以后，法国人便把他们的军事矛头指向两个仍然拒绝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国家。他们不能直接进攻英国，因而他们就转向奥地利。1796年，波拿巴开始了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迫使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求和，并承认法国对尼斯和萨伏依的吞并。教皇不得不放弃罗马涅、波洛尼亚和弗拉拉。在意大利半岛，法国的统治取代了奥地利的优势；波拿巴用兵如神，把奥地利人连连击败，一直到1797年4月双方同意停战为止。根据同年10月所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奥地利获得了威尼斯、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另外，法国还应允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奥皇获得萨尔茨堡以及巴伐利亚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奥地利人把比利时省份和莱茵河左岸割给法国，并且承认在法国影响下成立的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

这时，第一次联盟已经彻底瓦解，但是英国仍然拒绝言和。自1795年以来在督政府领导下的法国，一直期待着它的常胜将军能促使英国签订和约。在波拿巴看来，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太冒险了（法国支援爱尔兰叛乱的远征已经屡遭失败）。于是，他就率领3.5万人从土伦港乘船（1798年5月）入侵埃及。他避开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在途中占领了马耳他，7月在亚历山大港登陆。纳尔逊在那里迅速堵截他，摧毁了他的舰只（尼罗河战役，1798年8月1日）。

当波拿巴渡海出征埃及的时候，法国的局势看起来很稳定。共和国完成了路易十四所未完成的事业，把法国边界推进到它的“天然”界线——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此外，为了加强这些边界，革命政府把荷属尼德兰变成一个仆从国家——巴达维亚共和国。

在南方，由于兼并尼斯和建立另一个仆从国家——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法国军队就控制了通往意大利的沿海航路，在那里，利古里亚共和国的边界与控制波河流域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边界相接。这些策略不仅孤立了皮埃蒙特和帕尔马，而且使奥地利的势力局限于阿迪杰河以北的地区。通往意大利半岛的钥匙掌握在法国人的手中，由于“解放”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可能获得的利益，对于共和国的将军们来说，这条路线几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

1798年2月，法国军队开进罗马，他们囚禁庇护六世，宣布成立共和国。4月，法军占领瑞士。年底，他们攻下皮埃蒙特；1799年年初，他们将那不勒斯王国改为帕特诺珀共和国，并把托斯卡纳大公逐出佛罗伦萨。由于法国人进入南意大利，由于他们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和马耳他，以及由于波拿巴进军叙利亚，法国主宰地中海东部地区就成为可能。革命军的屡次胜利，第一次威胁到俄国人十分关切的一个地区。1796年继承母亲叶卡捷琳娜王位的保罗一世，对伦敦所提出的由他带头组织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建议表示欢迎。

皮特在1798年11月送交圣彼得堡的建议提出了第二次联盟的纲领，并邀请沙皇保罗带头促进这一计划。不仅如此，这些建议比维也纳会议上精心拟订的解决办法要早16年出笼，这说明它具有了不起的预言性质。皮特建议说，法国必须退回到革命前的边界；荷兰共和国必须恢复独立，并与比利时各省联合起来，以增强抵抗法国未来侵略的力量；同样，瑞士也必须恢复它的领土和独立；奥地利将得到意大利的领土，作为失去比利时省份的补偿；普鲁士则将从德意志诸邦中得到补偿（作为促使它加入联盟的诱饵）。为了保卫从法国到意大利的通道，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应予恢复，并重新得到萨伏依以便加强其力量。对于皮特的希望来说，不幸的是，普鲁士没有加入第二次联盟；俄国、奥地利和英国也没有交换他所提出的三国相互保证决不单独媾和的誓约。

这三个国家制订了把法国人赶出德意志领土、尼德兰、意大利和瑞士的计划。到1799年夏天，法军被迫跨过莱茵河，并在意大利和瑞士几次惨遭败北。苏沃洛夫和科尔萨科夫统率的俄军在意大利战役和瑞士战役中担负繁重的作战任务，他们对英国和奥地利的盟军日益不满。10月，法军的抵抗开始加强。马塞纳把俄国人赶出瑞士，布律纳击败并赶走了企图入侵荷兰的英俄联军。沙皇保罗由于自己军队的失

利和损失而恼火，决定俄国退出联盟（1799年10月22日）。同一个星期，波拿巴把他的孤立无援的军队留在埃及，重新在巴黎露面。11月9日，雾月政变推翻了失去信任的督政府，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到1799年年底，波拿巴已经巩固了他作为第一执政和法兰西共和国元首的权威。

经过10年革命之后，法兰西民族渴望重新建立秩序和稳定。但是，其他强国政府经过八年的战争和几经改变的联盟，则希望得到与法兰西共和国获得的利益相当的补偿。如果波拿巴满足于在法国已经获得的“天然边界”之内巩固自己的国家，而允许其他强国进行相应的兼并，那么，此后15年的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他坚决要胜过它们，拒不承认其他强国的适当利益。换句话说，他企图加强和扩大法国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使欧洲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

因此，波拿巴必须对“拿破仑战争”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然而，研究一下其他国家首都在1800—1813年期间所考虑的外交对策，有助于说明在这13年中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什么未能组成四国反法联盟。在这四个强国中，唯有英国坚定不移地反对法国的扩张。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曾透露过只要给予足够的领土作为酬报，就愿意与法国结盟。四国政府相互之间的妒忌和猜疑，使波拿巴有大量的机会坐收渔利。如果说，他有任何一贯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他的外交政策就是至少同一个大国结盟，去对付其他几个国家。他所选择的扮演这一合作者角色的国家，首先是普鲁士，其次是俄国，最后是奥地利。不过，对于每一个合作者，他都不曾给予所许诺的全部诱饵，每一个强国都感到它同法国合作是一种屈辱并感到失望。不过，波拿巴直到最后还怀有这样的信心：每一个政府都有利用的价值，只要他抛出足够诱人的诱饵，他便会勾引任何一个强国（英国除外）回到自己一边来。

在1800年和1801年的谈判中，波拿巴表明了他在分化敌人方面是何等得心应手。当俄国在1799年年底退出第二次联盟时，他不能放过争取这位古怪的沙皇保罗的情谊的机会。法国人羁押7000名俄国俘虏，而奥地利和英国都不愿意作出牺牲使他们获释。波拿巴为了羞辱保罗以前的盟友，把这些俘虏装备齐全地交还俄国，不要任何补偿，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因为沙皇是爱兵如子的。在这一主动行动之后，

第一执政随即提出一项建议：因为保罗最近当选为马耳他骑士团首领，就应该把马耳他岛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1798年占领马耳他的法国军队被封锁在瓦莱塔，当时正在投降的边缘（他们于1800年9月5日向英军有条件地投降）。英国曾经在1798年答应把马耳他给予俄国，但是现在不出波拿巴所料，伦敦的内阁拒绝把它的新征服地交给沙皇管辖。保罗的对策是：恢复“北方武装中立”以对抗英国的海上力量，并制订派兵进攻驻印英军的计划。

波拿巴是怎样肆无忌惮地挑动保罗的虚荣心和为保罗的野心撑腰打气，可以从俄国首相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在1800年10月1日给他的主子草拟的方案中看得出来。他建议肢解奥斯曼帝国，使俄国得到摩尔多瓦、保加利亚，或许还有鲁梅利亚和君士坦丁堡。法国仍可保有埃及，而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去安抚奥地利。因为普鲁士并不垂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所以只要允许它吞并汉诺威、明斯特和帕德博恩，便可以换取它的同意。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加入（复活的）“武装中立同盟”，英国势必要表示同意（失去汉诺威而不要补偿）。

当一群宫廷阴谋分子将保罗勒死（1801年3月11日）并扶立他的儿子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后，这些宏大的计划随同法俄两国的“亲善”而成为泡影了。波拿巴宁可相信，这次使英国人感到宽慰的恰合时宜的政变是由伦敦暗中挑起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维也纳宫廷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希望1800年和1801年时而增大，时而消失。像俄国和普鲁士一样，倘若结果确实有利的话，奥地利是乐意跟波拿巴交朋友的。但是，保罗背弃第二次联盟使奥地利更加依赖于英国的支持，而英国人却并不准备支持奥地利。自从1793年以来，奥皇弗兰茨二世便委托图古特男爵主持外交，这位男爵玩弄一套不正当的策略。1799年在拉施塔特召开讨论德意志事务的会议，当这次会议失败后，两名法国代表在离开会场时被人刺杀，图古特是否参与其事，迄今未能肯定。但是，他的肆无忌惮，他的庶民出身，他的阴谋外交，都使他不得人心。他以奥地利在1801年2月28日以前不与法国签订单独和约为条件，又从英国得到200万英镑的津贴（1800年6月20日）。然而，就在这同一个星期内，波拿巴在马仑戈的胜利再次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带来了暂时的休战。9月，图古特辞职，首相科洛雷多伯爵和副首相路易·科本茨尔伯爵向拿破仑求和。

但拿破仑决定重启战端，莫罗在霍恩林登击败奥军（1800年12月3日），使这次战争结束。奥地利接受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2月9日签字。

吕内维尔和约的条款往往被人说成是四年前在坎波福米奥所缔结的条约中的条款的重申。实际上，吕内维尔和约的条款更为广泛，对奥地利来说，蒙受的耻辱也更大。在意大利，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再一次缩至阿迪杰河；在它庇护下的托斯卡纳大公丧失了自己的领地；弗兰茨二世不得不接受整个德意志帝国均承担义务的和约条款。波拿巴不仅利用这些条款再次肯定法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支配地位，而且将奥地利纳入重新安排德意志诸邦的计划之中。德意志较大的邦早就想要吞并它们较小的邻邦，包括300来个教会领地、自由市和小块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经支持将德意志分成许多邦。随着奥地利势力的削弱，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诸侯们都转向巴黎。他们送给狡诈而贪婪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的“礼物”成为塔列朗个人财富的基础。一个合并的过程开始了，德意志的300个邦合并到不足40个。

波拿巴在1802年4月3日致塔列朗的一个便笺中解释了他为德意志各邦拟定的发展计划：

我打算分别进行三项谈判：第一是与俄国以君子讨论的方式进行，使那个强国尽可能地对符合我们的目的所作的安排承担义务；其次是与柏林的宫廷谈判，以调整与它有关的事务，诸如有关奥伦治亲王、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巴登选帝侯的事务；第三是与奥地利谈判，以便商定有关托斯卡纳大公的安排问题。通过这些手段，德意志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分成两部分，因为它的事务将由两个不同的中心进行指挥。假若这些安排得以成功，德意志的政体还能存在吗？存在，也不存在。说它存在，是因为并未取消它；说它不存在，是因为它的事务将不再是统一指挥的，柏林与维也纳之间的对立必将比以往任何时候加剧。到那时候，时间和其他考虑将会决定我们的政策。[\[2\]](#)

波拿巴的外交斗争也如他的军事作战一样，力求压缩敌方的活动区域，而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他的论点是：其他每个大国都有一定的利益范围；当在某一大利国的利益范围之外发生变化的时候，都无须同这一大国进行磋商。根据他的理论，欧洲大陆在英国的利益范围之外。然而，他硬说法国可以有普遍的要求，他本人有权干预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问题。他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在他与西班牙进行秘密谈判时表现得很明显。根据在圣伊尔德丰索达成（1800年10月1日）、经

阿兰胡埃斯条约（1801年3月21日）确认的初步协议，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作为交换条件，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一个女儿和女婿在意大利建立了“埃特鲁里亚王国”。他还在西班牙的协助下使葡萄牙屈服。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小王国从1793年起与法国作战，它仰赖英国的援助和贸易。1801年春天，波拿巴发现他已无法击退英军保住埃及，于是回师攻击英国的盟友葡萄牙。在西法联军的进攻下，葡萄牙人屈服，将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西班牙，葡属圭亚那的一小块割让给法国（1801年6月6日）。

法国大有吞并整个葡萄牙之势，这促进了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当乔治三世拒绝批准小皮特关于取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限制，以小皮特为首的英国内阁于1801年2月5日宣告辞职。皮特和外交大臣威廉·格伦维尔很可能是由于预料到必将缔结一个和约，他们宁愿避免承担作出他们认为并不妥当的让步的责任。当然，数星期后上台的阿丁顿内阁则更加无能，更加优柔寡断。同第一执政折冲樽俎的艰巨任务落到了继格伦维尔勋爵任外交大臣的霍克斯伯里勋爵的身上。初步协议（1801年10月1日）规定：英国人所占领的所有殖民地（除了从西班牙夺取的特立尼达和从荷兰夺取的锡兰）必须恢复原状；英国人必须从马耳他撤走。

正式的亚眠和约（1802年3月27日）是由约瑟夫·波拿巴和康华理侯爵议定的。它肯定了初步协议的条款，并进一步规定：英国人必须在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从马耳他撤走，马耳他岛必须在所有大国的担保下归还马耳他骑士团。除了法国保有葡属圭亚那之外，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的权利和领土应予尊重。相互交换战俘，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共和国今后要和平友好。

在实际上，亚眠和约只能被看作一个停战协定，因为它没有触及英法两国分歧的最关键的问题。虽然波拿巴承认英国人有权干预某些海上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事务，而他却拒绝同英国人讨论比利时省份、萨伏依或瑞士的命运问题。在伦敦和巴黎，经过10年冲突之后出现的和平前景使人欢天喜地，群众纷纷游行，但是在英国，这种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当1802年春公开发表正式条约的条款时，英国议会内外的评论都带有一种怀疑和失望的调子，这对和平的持续是不吉利的预兆。在1802年期间，有三方面的发展愈演愈烈，使英国加强了重启战端的决心。

和约的一个后果是暴露了波拿巴的殖民野心，它震撼和惊醒了英国的舆论。波拿巴占有了路易斯安那以控制密西西比河河口，法属圭亚那也扩展到了亚马孙河口，他从而得以控制美洲最大的两条河流，为建立一个加勒比帝国据有了潜在的基础。法国在1795年得到西属海地的一半领土，在1800年重新获得路易斯安那，又根据亚眠条约得到了多巴哥。1801年11月，波拿巴趁海上停战之机，派遣勒克莱尔将军率远征军前去镇压海地的黑人起义。勒克莱尔和他的大部分军队都丧生于黄热病，海地计划的失败使波拿巴对征服新大陆的兴趣减低了。但是，他仍然加紧进行使英国政府同样感到惊恐不安的其他冒险。法国在印度的据点的恢复，使他有了向印度派遣军队和军舰的借口，驶往印度的军队数量之远远超出紧急形势的需要。1802年4月，一支法国考察队在澳大利亚南岸进行勘察，称该地为“拿破仑地”。同时，波拿巴还表示他决不放弃他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派能干而善于观察的军官弗朗索瓦·塞巴斯蒂亚尼前去促进贸易，实际上是调查从特里波利到叙利亚的防御情况。被任命为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布律纳将军，于1802年10月18日接到指示，要他千方百计地重新确立法国从16世纪以来就在那个首都保持的首要地位。

对于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来说，停止战斗不但未能使他们解忧，反而使他们更加不满。他们希望和平将会使1786年的商业条约重新生效，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伊登条约虽然有利于英国，但却有损于法国的工业家。波拿巴在条约中闭口不谈贸易关系，这一事实就应使英国的乐观情绪有所降低。可是，即使像明托伯爵那样见多识广的政治家，居然也大胆预言：“我们的商业将会深深打入法国本土，在巴黎兴旺起来。”^[3]然而，随着和平的恢复，英国的对外贸易非但没有扩大，反而下跌了。从1792年至1800年的八年战争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总值几乎增加了1倍；但当和平结束了海上封锁后，法国及其仆从国家的商船即恢复了同它们所收回的殖民地之间的交往。波拿巴要设法保护法国的工厂主，使他们排除比较先进的英国企业的竞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英国人非常恼火地发现，高额关税实际上也使英国货物不能向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输出。至1801年，即战争的最后一年，从联合王国驶出的商船总吨位将近200万吨。1802年，即和平的第一年，总吨位已有所下降，1803年就更下降了。

当波拿巴的行动很清楚地表明普遍的和平不是使法国在欧洲的扩张停止而是使其加快脚步的时候，英国商业界在失望之余，大大忧虑起来。根据塔列朗的看法，波拿巴在亚眠条约以后的行动第一次显示出他每胜利一次，就使自己放纵一分。甚至在条约签字以前，他就“接受”了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的职位（1802年1月26日）。1802年年底以前，他把皮埃蒙特并入法国，他的军队重新占领了瑞士。^[4]在同俄国取得默契之后（1801年10月10日），他便鼓励对德意志领土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表面上的借口是对由于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而被赶走的几个德意志诸侯，需要以莱茵河彼岸的土地给予补偿。主要的受惠者是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几个二等邦，如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等。被比较强大的邻邦兼并的有100多个小邦，其中包括45个自由城市，以及除一个以外的所有教会领地。参加雷根斯堡议会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接受了上述变化，奥地利屈服于压力，亦表示同意（1802年12月26日）。

伦敦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以及维也纳的愤恨和羞辱使新建立的和平紧张起来，但是波拿巴认为这并不足以妨碍他的进程。他成功地取得了和平，并同罗马教皇达成一项政教协定（在1802年4月18日复活节公布），使他在法国的威望上升到新的顶峰。在第二次公民投票中（1802年8月2日），他成为终身执政；在两年后举行的第三次公民投票中，他成了皇帝。如此的胜利足以使头脑极为清醒的人也会忘乎所以。这有助于说明他在1803年和1804年的飞扬跋扈态度如何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和平加速土崩瓦解。

英国报刊对波拿巴及其家族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使他怒不可遏，而英国驻法国大使惠特沃思勋爵的沉着冷静也未能使他息怒。当惠特沃思抗议法国不断扩展它的边境时，波拿巴干脆把皮埃蒙特和瑞士当作“不值钱的东西”予以放弃。他指出，英国人未按规定撤出马耳他和亚历山大，因而践踏了条约。在1803年3月13日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他猛烈谴责惠特沃思，声称英国人希望战争；5月2日，惠特沃思申请回国护照。尽管塔列朗和约瑟夫·波拿巴百般拖延谈判，惠特沃思还是在10天后离开巴黎，5月17日渡过英吉利海峡。第二天英国政府宣战。双方的破裂究竟应由波拿巴还是应由阿丁顿内阁负主要责任，迄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如果英国人再拖延一年或者更久，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会在更不利的条件下被迫恢复敌对状态。由于尼德兰、西班牙和北意大利已俯首听命，波拿巴便计划发展他的海军力量，以与英国的海军力量旗鼓相当。和平延长是否能使他做到这一点，这是个疑问，但是，战端的重启要比他所预料的快些，则是很清楚的事情。1803年3月6日，他命令德坎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布勒斯特驶往印度，他的指示没有认真地预料到在1804年9月以前会重开战局。10天以后，一艘快船赶上前去，通知德坎不要驶往印度，而要驶往毛里求斯。将路易斯安那匆匆卖给美国一事，也同样显示出他对紧急情况缺乏预见，因为谈判是在三星期内完成的（1803年4月12日至5月2日）。不管波拿巴如何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在海上与英国人相敌，但他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在1803年保持着二比一的优势，这就足以破坏他的殖民计划。从此以后，波拿巴的活动范围就只限于欧洲，这种限制对世界历史来说预示着很重要的意义。约翰·霍兰·罗斯得出结论说：“从种族扩张的观点来看，1803年的重启战端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5\]](#)

英国人的顽强态度打乱了波拿巴的计划，而这一结论由于波拿巴采取疯狂报复行为又进一步得到证明。5月22日，他下令把在法国的从18岁到60岁的英国男子一律作为战俘加以逮捕。这种对平民进行野蛮报复的行径，践踏了公认的惯例，尤其是连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和驻丹麦大使也成了不幸的牺牲品。在汉堡逮捕乔治·朗博尔德爵士，进一步破坏了外交豁免权的准则，甚至连普鲁士优柔寡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向巴黎提出强烈的抗议。英法关系的日益恶化还由于处理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的问题而为人们所大肆宣扬：1803年下半年他进入毛里求斯，当时并不知道和平状态已经结束。四年前，在敌对状态下，英国人曾经允许甚至协助一个法国科学探险队进入南太平洋，但是，毛里求斯当局却无视弗林德斯从法国政府领到的护照，他们不仅没收了他取得的资料，而且将他扣留七年。

1804年3月对当甘公爵的逮捕和处决，其残忍程度远远超过波拿巴其他所有暴行，因而值得在这里比较详细地加以记述。在大革命高潮中，对保王党阴谋的恐惧在法国已经变成一种病狂；对秘密回国的逃亡贵族，甚至对那些窝藏他们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在执政府期间，保王派数度策划除掉波拿巴。其中功败垂成的一次，是在波拿巴乘马车经过时，一颗“炸弹”爆炸了（1800年12月24日）。虽然这次暴力

行动立即归罪于雅各宾派恐怖分子，有许多人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但是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是保王分子派人干的勾当。1803年重启战端以后，新的阴谋又蠢动起来，保王派和雅各宾派的阴谋分子联合起来，还得到英国政府下级官员的援助。波拿巴的秘密警察向他报告的这些阴谋勾当，在审理当甘事件的时候势必要考虑在内。到1803年年底，他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英国的外交代表，包括驻巴伐利亚的使节和驻符腾堡的使节在内，参与了范围广大的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1804年1月至3月间，兜捕了为首的阴谋分子。共和国将军夏尔·皮什格吕于1803年8月秘密返回法国，打算把莫罗拉入阴谋活动，两人都在1804年2月被捕。勇猛无匹的布列塔尼人乔治·卡杜达尔被揭发后于3月初落入法网。但是，显然还有一个主要人物有待缉拿，因为一些被捕者招供，有一位法国亲王将会在适当时机前来参加他们的活动。警察起初错误地推测他们所期待的是阿图瓦伯爵；后来，波拿巴听信在莱茵河的法国特务的误报，把注意力集中到当甘公爵身上。这位波旁家族的年轻亲属正在巴登的埃登海姆过着平静的生活。

1804年3月15日夜，法国士兵和宪兵越境进入巴登，包围当甘公爵的住宅，把他解回法国。查不到任何把他与跟他有关的阴谋联系起来的证据。然而，波拿巴还是把他送上了特地在万森组成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判定他是一名武装反法的流亡贵族，将他枪决（1804年3月21日）。

欧洲大多数宫廷对当甘公爵的死讯感到恐怖，但未作出积极的反应。他在中立地区被捕，迅速而秘密地审讯后便仓促处决，这无疑说明波拿巴已经依靠有意采取恐怖和报复的行动，以杜绝日后的阴谋，恫吓波旁家族及其追随者。同时，他已爬上通向王位的最后阶梯。两个月后（1804年5月18日），奴颜媚骨的元老院向这位新恺撒奉上了一顶帝冕。死到临头的乔治·卡杜达尔向他致敬。据说这个大胆的囚徒曾这样讲：“我们所做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我们原想使法国有一个国王，而我们如今使它有了一个皇帝。”

5月，在波拿巴加上拿破仑一世的称号的同一个星期里，威廉·皮特出任一个临时内阁的首相，在英国再度掌权。他立即与外交大臣哈罗比勋爵一起开始筹划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工作。不幸的是，巴黎发布指控英国外交官参加最近的反拿破仑阴谋的文件，损害了英国的声

望；没有一个人相信信誉扫地的阿丁顿内阁所作的无力的否认声明。不过，皮特还能从沙皇亚历山大的态度中得到一些安慰——俄国为当甘公爵事件提出的抗议使拿破仑大为恼火，遂即从圣彼得堡召回了法国大使。作为报复，亚历山大拒绝承认拿破仑的帝号，尽管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已经承认。沙皇对于拿破仑插手地中海东部地区疑虑重重，从1804年1月起掌握俄国对外政策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则赞同结成新的反法联盟。皮特的重新上台颇合俄国人的心意，英国及时提供的津贴促使双方进行谈判。11月，亚历山大派遣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前往伦敦，授以全权缔结盟约，但是直到1805年4月11日才达成协议并签字。奥地利自从1804年11月以来就以一项秘密防御条约与俄国结盟，这时也加入了正在具体化的联盟，并于1805年8月9日得到英国的津贴。

第三次联盟的内在缺点，产生于三个盟国的同床异梦。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梦想他的祖国波兰在俄国保护下重新统一，而他的主子却希望除波兰外再获得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奥地利希望重新得到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事务中丧失了支配地位。英国政府则期望击败法国，使它退回到以前的边界。皮特并不相信亚历山大及其使节所声明的俄国只是要从拿破仑的桎梏下解放受压迫的民族的说法，但是他欢迎这个以在欧洲大陆上的新战争来转移法国注意力的机会。

至于拿破仑，他希望推迟到秋天再与奥地利决裂。在1805年夏天，他仍然希望他的海军能够长期控制英吉利海峡，以使驻扎在布洛涅的几个师入侵英国。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亲自前去布洛涅进行部署。但是他的海上计划失败了，月底前，他命令待命部队开往德意志诸邦。10月20日，他迫使在乌尔姆的一支奥地利军队投降，11月13日，法军进入维也纳。10天前，俄国和英国在柏林的外交使节就已经把弗里德里希·威廉拉到联盟的一方。普鲁士外交大臣冯·豪格维茨伯爵携带最后通牒前往布尔诺会见拿破仑（11月28日），但又放宽条件，使之成为一种和解的建议。拿破仑在12月2日（加冕一周年纪念日）在奥斯特利茨击败了奥俄联军。当豪格维茨下次在维也纳与法国皇帝会谈时（12月14日），他表示了祝贺。拿破仑并没有受骗，但他在第二天把汉诺威奉送给普鲁士，以离间普鲁士和英国的关系（申布龙条约）。

奥斯特利茨战役不仅使普鲁士保持中立，而且瓦解了第三次联盟。1805年年末纷至沓来的轰轰烈烈的事件，标志着拿破仑扮演的戏剧中的一个转折点。10月21日，拿破仑在他给“大军”的第9号通报中力促奥地利人不要为英国人作战，而要与他进行合作。“我希望欧洲大陆和平”，他坚持说，“我所想要的是舰船、殖民地、贸易，而这对于你们和对于我们是同样有利的。”^[6]他那种趁英国每况愈下之时扩大法国海外势力的愿望仍然引诱着他。自从1803年以来，他在海军建设上已经花费将近5亿法郎。但是，在这份第9号通报发表的同一天，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沿海一带进攻33艘法国和西班牙的军舰，击沉或俘获22艘，而英国连一艘军舰也没有损失。特拉法尔加海战迫使拿破仑只得把他的精力用于欧洲，别无选择。

在普莱斯堡强加于奥地利的苛刻条款（1805年12月26日）把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摒于意大利之外，缩小了他们在德意志各邦的势力及领土。弗兰茨二世同意承认拿破仑为意大利半岛的一个王国的元首，承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选帝侯具有国王地位。奥地利还被迫偿付4000万金法郎的赔款，但拿破仑也允许它兼并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作为小小的补偿。

在1802—1803年的变革以后，德意志诸邦的重建一直在进行着，到了1805—1806年，这项工作受到了一次有力的推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成了与法国结盟的主权国家。它们和12个较小的德意志邦都切断了过去束缚于哈布斯堡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纽带，并组成以拿破仑为保护人的莱茵联盟（1806年7月12日）。许多小公国和骑士领地，即在联盟地区内的外国领地，都并入较大的邦，它们作为回报，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即以8.8万名兵员支持法国。在拿破仑宣布他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后，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外交牌位的选帝称号，自立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

到1806年，拿破仑已据有法国的“天然”边界以及边界之外的领土。西班牙是屈从他的盟友。法国的势力遍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因为约瑟夫·波拿巴在同年2月取代了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国王费迪南德四世。6月，路易·波拿巴当了荷属尼德兰的国王。在从荷兰到瑞士的一段莱茵河畔的德意志各邦都与法国结盟，也包括瑞士本身在内。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外地区建立一系列仆从国的政策已经完全实现。

1806年的整个夏季，拿破仑一直在同英国和俄国谈判，这两大强国仍然拒绝承认他的帝号或他的征服地。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沙皇亚历山大已把他的军队撤到波兰。在伦敦，1806年1月皮特的去世导致内阁的改组。格伦维尔勋爵组成内阁，由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主持外交，但福克斯当时已在病中，于9月去世。在夏季结束以前，英国和俄国都拒绝接受拿破仑的建议。

与此同时，在柏林，外交大臣豪格维茨与法国进行谈判，而哈登贝格亲王和主战派则寻求俄国的援助。对普鲁士来说，10年中立（1795—1805年）除汉诺威之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1806年8月，柏林宫廷通过它驻巴黎的大使获悉，拿破仑已私下把汉诺威交还给乔治三世。普鲁士人没有等待俄国的军事支持，就向拿破仑发出一个最后通牒（1806年9月），而拿破仑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反击。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同时进行的两个战役中（10月14日），法军所向披靡。普鲁士的抵抗土崩瓦解，两星期后拿破仑已进入柏林。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把1806年对普鲁士的胜利看作第四次联盟的失败。实际上并未组成新的联盟，在本章中，“第四次联盟”一词将用于1813年组成的联盟。普鲁士被征服后，拿破仑挥师跨过维斯杜拉河，与俄国决一雌雄。柯尼斯堡附近艾劳^[7]一役（1807年2月8日）代价颇高而且胜负未决。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孤军作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他的积极的或默契的盟友。他向维也纳的宫廷提出建议以退还西里西亚作为奥法联盟的代价，这一提议被拒绝了。他转而又向普鲁士人提出，以重建普鲁士王国为双方合作的报酬，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回答却是跟亚历山大缔结更密切的联盟。当春季到来的时候，拿破仑出动他的军队，再度在柯尼斯堡附近寻找俄军作战；在弗里德兰战役（1807年6月14日）中，法军获胜，亚历山大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拿破仑决定观察一下能否以俄国取代普鲁士或奥地利来作为他控制欧洲的伙伴。

提尔西特和约使法国和俄国化敌为友，在欧洲平分秋色。为了顺从沙皇的愿望，拿破仑答应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保有缩小了的普鲁士邦的王位。拿破仑在秘密条款中同意帮助俄国“解放”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领土，而亚历山大则承诺，如果英国人拒绝他的调停，他就向英国宣战。瑞典、丹麦和葡萄牙也将被召唤来追随同样的方针。通过封锁与英国通商的整个欧洲海岸线，英国的繁荣必将遭到破坏。

旨在排斥英国贸易的大陆封锁或称“大陆体系”的设想，原是早已有之。提尔西特和约之后，这种设想已经有了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拿破仑急于孤注一掷。由于此举未能达到目的，并迫使他采取了加速他的垮台的一些措施，“大陆体系”往往被描述为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它表明拿破仑对经济的无知。但在另一方面，弗朗索瓦·克鲁泽新近对史料作了迄今最详尽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坚持认为封锁不能奏效是一种谬见。封锁的失败并非由于这一伟大的设想本身有缺陷，而是由于未能长期坚持到它发挥效力的程度。英国商人的坚毅和灵活，使他们能够在海外另行开拓市场，而在一些关键时刻，欧洲的意外事件就使大陆市场重新部分地开放，因而，英国从未连续两年以上蒙受大陆体系所给予的全部惩罚。[\[8\]](#)

在伦敦，由于福克斯去世，乔治·坎宁进入改组后的内阁担任外交大臣。1807年7月中旬得悉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正在讨论一项协议，坎宁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丹麦海军规模虽小，但能帮助法国和俄国封锁波罗的海。当丹麦人拒绝向英国出租他们的舰队时，英国的一支海军和陆军混合部队包围了哥本哈根（8月16日），并在两星期后夺走了丹麦的战舰。瑞典人由于惧怕俄国，仍与英国结盟，而俄国的海军力量本身还不足以单独封锁波罗的海。英国人继续从波罗的海获得沥青、木材和其他海军补给品，在应急时，他们还从美国购得更多的物资。虽然亚历山大履行提尔西特和约向英国宣战（1807年11月），但并未步步紧逼英国。英国人占领了丹麦的赫尔戈兰小岛作为仓库，继续把商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和北德意志海岸。

在欧洲的另一端，伊比利亚半岛具有另一条难以封锁的长长的海岸线。为了更严密地控制这条海岸线，拿破仑要求（1807年7月）葡萄牙与英国决裂，当里斯本政府表示拒绝后，一支法国陆军便侵入葡萄牙，葡萄牙王室逃往巴西。西班牙虽然10年来一直是法国的盟友，但也受到同样苛刻的对待。拿破仑把卡洛斯四世和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召到巴荣纳，逼迫他们退位（1808年5月5日），并且宣布自己的长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人民以出人意料的毅力奋起抵抗，英国人支援他们。因此从1808年起至1814年倒台，拿破仑一直觉得他的资源被“西班牙的溃疡”耗尽。

在此以前，拿破仑是同各国政府作战，而从1807年以后，他发现自己是在跟各民族作战了。因失败而变得坚强起来的普鲁士人和奥地

利人开始进行训练打一场解放战争，但他们像在1805—1806年一样，未能同心协力。拿破仑相信，只要亚历山大足够严厉地警告他们，他们就不敢向他发动进攻。他设法在埃尔福特与沙皇举行会谈（1808年9月27日—10月14日），但是，尽管亲善之辞溢于言表，结果却表明毫无结果。拿破仑赶往西班牙镇压反抗，但镇压尚未成功，他就因要事而于1月返回巴黎。奥地利人正在备战，并私下取得亚历山大的不介入的保证（拿破仑对此只能有所揣测）。到1809年4月，双方军队开始交战。奥地利人在巴伐利亚战败撤退，拿破仑于5月13日进占维也纳。然而，查理大公从屡屡败北中已经学习到一些东西；代价惨重的阿斯佩恩战役使法国人处境危急，直至拿破仑召来了援军方得解脱。他在瓦格拉姆的胜利（7月5日）结束了这场冲突。1805年起任奥地利内阁首相的施塔迪翁伯爵让位于代表奥地利进行和平谈判的梅特涅。

1809年的战争使拿破仑的高压手段在德意志爱国者中间激起的义愤和反抗精神加剧了。三年前，纽伦堡书商帕尔姆曾因散发反法小册子而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809年，图林根的一个青年试图行刺拿破仑以解放德意志，也被处死。1810年，勇敢的蒂罗尔人领袖安德烈亚斯·霍费尔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拿破仑要求普鲁士交出外交大臣冯·施泰因男爵，因为他图谋反法，施泰因如果不是逃往俄国，也会因此丧命。德意志爱国者敢于批评或反对法国皇帝，犹如犯了叛国罪，这种处置使得所有有头脑的德意志人都深思他们首先应忠于哪个国家。

奥地利人于1809年时机未成熟就发动一场解放战争，结果使奥地利遭到惨重的损失。梅特涅力图拖延和谈，拿破仑失去耐心，便在申布龙宫与弗兰茨一世仓促签订一个条约（1809年10月14日）。弗兰茨向莱茵联盟、萨克森和意大利王国割让土地。俄国已在1809年从瑞典夺取了芬兰，这时又分得奥属波兰的部分领土。出人意料的是，奥地利在作出如此丧权辱国的让步之后，竟然寻求与法国结成联盟。这时担任首相的梅特涅认为，奥地利必须有时间进行恢复和整顿。1810年3月9日，他签署了一份联姻条约，把弗兰茨一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女大公许配给拿破仑，后者已于上年12月与第一个妻子约瑟芬离婚。1810年3月11日在维也纳举行代理婚礼，[\[9\]](#)玛丽·路易丝到达巴黎后，于4月1日正式成婚。1811年4月20日生一子，赐罗马王的称号。

拿破仑跟奥地利人的婚姻，并不合俄国人的心意，1810年以后，亲英派又在沙皇宫廷中得势。亚历山大正如其他人已经认识到的一样，开始明了拿破仑可能是一个吝啬而多疑的朋友。法国得以腾出兵力去确保萨克森选帝侯的国王称号，并为热罗姆·波拿巴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但是，约定的对土耳其的瓜分并没有进行，而且沙皇的亲戚奥尔登堡公爵发现他的领地未经预先告知就为法国吞并。为了遏止英国商品的走私登陆，拿破仑在1810年决定占领从荷兰到波罗的海的海岸线。亚历山大抱怨这些都是违反提尔西特条约的行动，但他自己也规避了这项条约。他虽然拒绝英国商船进入俄国的港口，但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却由悬挂中立国旗帜但由英国战舰保护的船只运上岸去。这些商品的进口税增加了沙皇的财源，在1810年年底，他提高了由陆路运抵俄国的法国商品的关税。这些有意的冒犯，加上关于波兰的争执，以及圣彼得堡在法国陆军元帅贝纳多特被指定为瑞典王位继承人时产生的疑心，使法俄联盟在1811年解体。

在1812年的头几个月中，拿破仑与普鲁士缔结一项征召2万人的条约（2月24日），与奥地利缔结一项征召6万人的条约（3月12日），以便对俄国作战。到春天，他已有60多万部队待命。亚历山大方面为了迫在眉睫的冲突也做了迅速而切实的准备工作。1812年4月5日，他与瑞典结成攻守同盟。5月28日，与土耳其人媾和。他向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提出的秘密建议，使这位左右为难的君主向他保证（3月31日）：普鲁士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援助拿破仑。梅特涅从维也纳传来信息（4月25日），说奥地利军队在对俄国人作战时只是虚张声势。7月，俄国与英国媾和，并结成联盟。此外，还与在英国支援下骚扰驻西班牙的法国军队的西班牙起义者经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

对英国人来说，与俄国“亲善”是一场及时雨，因为农业歉收和对欧洲贸易的削减，使他们在1810年和1811年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1812年6月美国对英国宣战，又使英国人增加了困难。作为一个中立民族，美国人既受惠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和英国国王为对付这一体系而直接下达的敕令，同时也因之而受到损害。欧洲的事件掩盖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使这次战争的间接重要后果没有立即显示出来（参见第二十二章，原文第598、601、611页）。

拿破仑于1812年6月24日开始入侵俄国，9月占领并焚烧莫斯科，11月和12月大军灾难性地撤退，这些都加速了欧洲结盟关系的逆转。

1812年12月30日，在拿破仑麾下统率两万普鲁士军队的冯·约克将军单独与俄国人媾和。一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以为拿破仑征集军队为借口离开柏林（仍在供养一支法国驻军）前往布雷斯劳。实际上他去和亚历山大谈判一项协约，以求俄军与普军立即进行合作（卡利什条约，1813年2月28日）。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们的计划旨在把法国限制在莱茵河左岸。然而在4月，于一年前出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子爵提醒亚历山大，皮特在1805年曾建议法国应该退到大革命前的边界。自从1812年7月就与俄国结盟的英国，于1813年6月15日又以进一步的保证和100万英镑的津贴来加强这一关系。同时，英国和普鲁士也结为盟友，普鲁士人从英国获得60多万英镑，作为1813年的津贴。英国也已经诱使瑞典答应给予军事援助。

于是，到1813年夏，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第四次联盟业已形成，与拿破仑对垒。然而，奥地利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法国的盟友。弗兰茨及其首相梅特涅，都认为与法国决裂并不明智；相反，他们主动在拿破仑及其对手之间进行调停。1813年5月拿破仑发动进攻，2日在萨克森的卢岑和20日在鲍岑击败俄国和普军。俄国和普鲁士呼吁奥地利支援。联盟国家的政治家提出了他们知道拿破仑绝不会考虑接受的条款，即要求法兰西帝国退回到1789年法国的边界。作为调停者的梅特涅提出了缓和得多的三点解决办法。解散拿破仑在1807年建立、1809年作为复兴的波兰国家的核心又加以扩大的华沙公国。法国放弃在北德意志兼并的领土，伊利里亚转让给奥地利。拿破仑所作的这些小小的让步并不就是奥地利人想要提出的实际条款，与联盟各国的苛刻要求也很少有相似之处。拿破仑明白这一点，但是奥地利的建议使他进退维谷。如果拒绝这些建议，连他自己的臣民也会认为他完全不合道理。如果接受，则意味着联盟各国对他的让步还会得寸进尺。为了拖延时间，他于6月4日接受了普列斯维茨停战协定，因为他相信，他能比敌人更快地集结军队，充实兵力。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因为联盟各国知道，当停战协定期满时，奥地利军队必将同他们联合起来。根据1813年6月27日的赖兴巴赫条约，弗兰茨一世答应，如果拿破仑到7月20日仍不接受和平条件，他就对法国宣战。

拿破仑在这场外交战中已经失败。梅特涅6月26日至30日在德累斯顿访问他时就已看到这一点，还劝他派代表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会

议。虽然停战从7月20日延长到8月10日，但布拉格会谈并未取得进展。拿破仑拒绝了奥地利提出的温和的建议，虽然梅特涅警告法国谈判代表说，8月10日前接不到满意的答复，奥地利将在11日采取敌对行动。如果拿破仑接受这些条款，联盟各国的政治家们就打算宣布，这些建议不过是“初步”纲领，在以后的会谈中将提出苛刻的条件。拿破仑也许已经料到这些；总之，他没有表示同意。8月11日，奥地利宣战。

联盟各国不仅把拒绝那些似乎合理的条款的罪责推到法国皇帝身上，它们还争得时间来加强它们的兵力和协调军事计划。尽管如此，当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在德累斯顿一同扑向拿破仑时，拿破仑击退了它们（8月26—27日）。但是，他再也不能依赖莱茵联盟中的德意志盟友的忠诚了——10月14日，一支8000人的巴伐利亚分遣部队背叛了他。两天以后，他在莱比锡以寡敌众，对抗联军。双方都企图寻找增援；10万俄军和普军于17日到达；18日，这场“民族大战”以法军的惨败而告终。拿破仑最多不过4万人的残部于11月初撤过莱茵河。20多万死伤或被俘者留在德意志各地。

奥地利于1813年8月介入战争后，拿破仑首次面临四大强国组成的“大联盟”。他的敌人们这次实现了皮特在1799年和1805年徒然提出的誓约。自1813年6月起生效的英—俄以及俄—普的赖兴巴赫条约禁止各方单独与拿破仑谈判。奥地利在特普利茨与俄国（9月9日）和与英国（10月9日）签署的协议中也包括同样的规定。1814年1月29日，卡斯尔雷劝使四大联盟国同意，法国应退回到它在波旁王朝时所获得的边境。英国政府一再重申的观点，即必须消除法国的优势地位和恢复欧洲的均势，成了“大联盟”的官方政策。

由于拿破仑在1813年年末撤过了莱茵河，他的盟友背弃了他，他的帝国也崩溃了。他在西班牙的残缺不全的师团，也已在由威灵顿指挥的英西联军追赶下，越过比利牛斯山撤退。在意大利，由拿破仑立为那不勒斯国王的约阿基姆·缪拉正在与奥地利人谈判。到1814年年初，20年来法国企图获得和维持的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已经告终，均衡的原则又得到了巩固。因此，导致拿破仑退位的1814年的历次战役和谈判，以及1814—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议定的和平解决办法，将留在以后的一章（第二十四章）中叙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793年后法国势力的暂时扩张和拿破仑帝国的建立，总显得过分和反常。这两件事根本违反中世纪晚期以来便对欧洲社会形成起决定作用的那种主要政治倾向，即趋于建立一个各自分立的主权领土国家体系的倾向。到18世纪末，许多早期的君主制王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明确地理界线的有机的民族王国。革命时期的事件加速了这一转变。拿破仑在被分裂和被征服的民族中间，得以充分利用受到摧残的民族意识，大凡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中间，他都发现能够唤起热情和征得兵员。但是，他为迫使整个西欧统一于拿破仑王朝之下而作出的努力，却与欧洲主要民族的感情和愿望背道而驰。他企图通过把法国势力扩大到德意志和意大利来保障法国的安全，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这一事实具有一种历史嘲讽的成分。他鼓励较大的德意志邦吞并较小的德意志邦，以及他求助于意大利的爱国主义等政策，加速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发展和巩固，使之成为直逼法国边界的一等强国。在拿破仑死后的50年内，法国的相对势力衰落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使这个“大国”不再构成，也不能构成对欧洲均势的威胁。

关于瑞士的注释：

赫尔维蒂共和国系在法国于1798年4月占领后建立，曾两次痛苦地遭到暂时撤除（1798年和1802年）和一次突然重新占领（1802年10月），但终于根据拿破仑的“调解法”予以解散（1803年2月）。重新成立的瑞士联邦虽稍有声望，但仍系附庸，1815年方才恢复独立（参见原文第256—257、262、658各页）。

（周国珍 译）

[1] 《G. A. 库东通信集》，弗朗西斯克·梅热编（巴黎，1872年），第57页。

[2] 《拿破仑一世书信集》，32卷本（巴黎，1858—1870年），第7卷，第6019号。

[3] 《明托勋爵的生平和书信》第3卷，第209页。

[4] 参阅原文第274页注。

[5] 约翰·霍兰·罗斯：《拿破仑一世传》，第6版（伦敦，1913年），第1卷，第429页。

[6] 《拿破仑一世书信集》第11卷，第9408号。

[7] 苏联巴格拉季昂诺夫斯克。——译者注

[8] 弗朗索瓦·克鲁泽：《英国经济与大陆封锁，1806—1813年》，两卷本（巴黎，1958年），第2卷，第854—855页。

[9] 在婚礼的宗教仪式上，由查理大公代表拿破仑。——译者注

第十章 1793—1814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历史

法国革命的军队所取得的许多胜利中的第一次，是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米的大捷，这次战斗标志着欧洲的一次20年战争的起点，其间只有1802—1804年两年内勉强保持和平。对法国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政权——共和国——的开始。它始于民主，继而中等阶级当权，随后成立执政府，最后转为军事独裁，从1804年起采用“帝国”的名称。

这一新政权是从1789年以来发生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的巨大变革产生的。民主共和国在1793年和1794年打算实现大革命的抱负，它把经济平等与1789年所获得的公民权利的平等结合起来。它这样做，必然给全世界提供一个鼓舞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样板。但是，这些理想的寿命都不长。资产阶级共和国像军人专政一样，只要巩固1789年取得的成就就已心满意足，而现在这些成就已经确定不移，连1814年的反动也对之无可奈何。

如果法国不是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使此后22年间的国内政策为之所左右的话，1789—1792年行政和社会方面的成就，以及社会主义的实验，无疑会形成另外的情况。战争，以及在这场斗争的最初五个月期间（1792年4月至9月）法国由于节节败退而面临的危险，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对敌人入侵和封建领主复辟担心。大多数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面对着危险，都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而资产阶级只得对人民的要求暂时作出一些让步。

另外，革命党人认为，他们只有对反对者实行恐怖统治才能对付国内的危险。于是，战争就造成了恐怖统治。在1792年之前，革命只偶尔引起流血，如今却在血泊中打滚；暴力和残杀成为一种行政手段。

无套裤汉拥护暴力和恐怖，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一群相当混杂的工人、低微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只受过部分教育，

但是热烈爱国，很快以最原始的方式作出反应。当时国家正在危急之际，资产阶级虽然感到震惊，却对这些佯作不知，为的是挽救法国和革命。

自1789年秋天起执政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临时改变态度，承认短期内牺牲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是必要的。它同意把个人自由暂时束之高阁，首先增进财政和社会的平等。这样一来，战争就产生一种新政权，它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对在法国和欧洲日益增多的社会平等思想家却起了鼓舞作用。没有战争就不会有恐怖统治，但是没有恐怖统治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而没有胜利，一位将军也就不可能把共和国改变成军人专政或者建立一度拥有欧洲2/3以上土地的帝国，而当它在1814年最后崩溃时使世界变得面目全非。

瓦尔米战役结束时，立法议会由名为“国民公会”的新议会所取代，这一机构采取北美议会的名称，是因为它要为法国制定一部新宪法。[\[1\]](#)

国民公会不只是由有产者投票选举，而几乎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在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在巴黎、外省和边境地区举行选举的时候，那些不拥护革命的人都没有投票，以免引起注意。只有一小部分最革命的人——不到1/10——才去投票。国民公会几乎全部由资产阶级组成——大多数是律师，在750名代表中只有两名工人。它存在仅仅三年多一点，直到1795年10月31日。这一时期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吉伦特国民公会”阶段，结束于1793年6月2日；“革命政府”阶段，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告终；最后是“热月反动”阶段。

国民公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废除君主政体，在1792年8月10日早晨冲击杜伊勒里宫之后，根据起义的巴黎公社的要求逮捕了路易十六，这一政体便已经停止。中等阶级的国民公会要反对公社而坚持己见是有些困难的。它无意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更不愿恢复1789年废除的经济管制。但是它的某些成员，即山岳派，却认为无套裤汉曾经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为了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必须作出一些让步，至少暂时需要如此。另一个集团，即吉伦特派，与首都、各大港口以及各大城市的重要商人有联系。它对无套裤汉疑虑重重，不肯实行管制，认为这是对财产的侵犯，是决不能接受的。介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绝大

多数代表，像是一片未定的平原或沼泽。国民公会里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党”，更不用说整个国家了。尽管如此，所有的成员都是热忱的爱国者，他们决心击退入侵，取得和平，从而保护新的制度不受外国的干涉。起初，幸运似乎在向他们微笑。入侵者撤退了，革命军队进入比利时、德意志的莱茵兰、萨伏依和尼斯，这些地区都举行投票，赞成并入法国。国民公会表示同意，并在吉伦特派的压力下，甚至宣布将给予“一切想重新获得自由的人民以博爱和援助……”（1792年11月19日）。

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的命运问题却意见分歧。温和派以及许多吉伦特派满足于把他监禁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但是无套裤汉支持的山岳派决心要打击君主政体的根本，使之不可能复辟。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路易以叛国罪被判死刑，于1793年1月21日上了断头台。这一处决震撼了欧洲，也使得大多数投票赞成死刑的山岳派与基本上想保留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之间的鸿沟加宽了。另外，国王的下场以及国民公会的兼并政策使战火重新燃起。一个反对法国的强大联盟已经形成。在整个欧洲，只有土耳其、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依旧与它和平相处（参见第九章，原文第254页）。

这一联盟所集结的力量动摇了法国军队，只应征参加一次战役的许多志愿兵都还乡了。北方军总司令、瓦尔米战役的胜利者迪穆里埃，于1793年3月18日在比利时的内尔温敦被打败了。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政权，并与奥地利将军科堡谈判，企图率兵向巴黎进军。但是，士兵们表示拒绝之后，他就投向敌人，并且带走陆军部长博纳维尔和前去逮捕他的四个特派员。这次叛变使国防瓦解，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而冬季里经济情况的恶化使这一危机更加严重。由于一再大量发行，指券贬值50%以上；由于对谷物价格缺乏控制，整个生活费用不断上升。在1792年希望战争、在1793年希望兼并的吉伦特派疯狂反对一切对物价的控制。由于叛国分子迪穆里埃与他们有密切联系，这一事实使他们看来更应对危机负责。

像在1792年一样，这次危机产生了另外一批革命机构。监视委员会和革命营（非正规部队）又一次出现了。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无套裤汉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这些俱乐部在政治舞台上日益频繁而有效地进行干预。未经政府批准而擅自逮捕的事件增多。嫌疑分子的名单已经拟定。由无套裤汉控制的、公社领导的巴黎各区，指责吉伦特派

使国民公会陷于瘫痪，指责政府在促使革命垮台。5月31日无套裤汉起义，国民公会内部的斗争就像1792年8月一样，已达到了顶点，不过这次是反对国民公会的。武装的无套裤汉提出要求：开除吉伦特派领导人；解散5月8日建立的、显然敌视无套裤汉的十二人调查委员会；清洗官员；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控制面包价格；征收财产税；政府救济老人、病人和“共和国保卫者”的亲属。国民公会不肯让步，直到6月2日被8万名武装的无套裤汉团团围住，经过最后挣扎，才被迫接受他们的要求。29名代表和2名吉伦特派部长被捕了。

但是在许多省里，吉伦特派担任主要行政职务，他们发动叛乱反对巴黎的无套裤汉。这个叫作“地方的”或联邦的运动，在诺曼底、波尔多地区、里昂、罗讷河谷和普罗旺斯特别厉害。由于它是三个月前（3月10日）在旺代和毗邻各省发生猛烈叛乱之后接着出现的，所以显得分外严重。那一地区的农民的利益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他们在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另行征召30万人入伍时揭竿而起。1793年6月初，有60多个省反对或者公然起事反抗山岳派的国民公会。不是两种政治观念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是受到保皇党人支持的、对自己发动的革命的高涨感到惊慌的中等阶级上层分子；一方是得到无套裤汉支持的、决心使用极端措施来保证“公共安全”和击败法国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中等阶级下层分子。

紧接6月2日之后，取得胜利的山岳派随即通过一部将会表明其各项原则毫无令人惊惧之处的宪法，企图以此安抚全国，平息叛乱。此前，国民公会已经在讨论新宪法，但由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争吵不休，起草工作就耽搁下来。吉伦特派一旦被清除出去，这一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793年宪法比1791年宪法民主得多。它规定男子有普遍选举权和公民投票权；它宣布各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以及普天下的自由人的友爱关系。它的第一条宣布社会的目的是谋求“共同福利”；它确定了劳动的权利，享受国家救济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和罗伯斯庇尔的意愿相反，它保留了《人权宣言》中规定的私有财产权。它主张经济自由，它规定了造反的权利。这部宪法把立法权授予由选举产生的、任期仅为一年的立法议会，把行政权授予由立法议会以外人士中选出而实际上从属于立法议会的部长会议。这部宪法经公民投票通过（赞成者180万人），但是认为当时不宜实施，就放在一个杉木“柜”中，送交国民公会主席保存。尽管如此，它在历史上起了

重大的作用。它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提出社会民主的问题。它成了巴贝夫、布奥纳罗蒂和后来的路易·勃朗、巴尔贝和饶勒斯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指南，这些人都对它赞美不已。

由于宪法现在暂停实施，国民公会就在10月10日宣布，直到战争结束，法国政府依然是“革命的”，即非常的政府。这个革命政府在夏季里采取许多个别的措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虽然没有任何全盘的计划，但是得到无套裤汉的支持。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令把它以法律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在实际上，行政权由国民公会的两个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和全国治安委员会行使。前者已于1793年1月1日成立，在法英关系日趋紧张时叫作国防委员会。在迪穆里埃叛国后，经过改组，委员削减至9人，其职责为除财政和警务外，就一切事项向政府提出意见。清除吉伦特派以后，这一委员会又一次经过改组。在1793年7月和8月，国内外形势逐渐恶化而粮食又严重匮乏之际，该委员会（也叫作大委员会）发展成形，以便实行一年专政统治，挽救法国免遭敌人侵略。它由12个成员组成，然而他们没有形成一个融洽的集团。其中有军事和经济问题专家，如罗贝尔·兰代、拉扎尔·卡尔诺、普里厄·德拉科多尔等温和派；在“左翼”，有政治领域的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东。让·邦·圣安德烈和普里厄·德拉马恩处理海军事务。与无套裤汉有密切关系的比洛-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等“极端派”；中间派的有善于折中的巴雷尔；而在右翼，有前巴黎最高法院成员埃罗·德·塞谢勒。全国治安委员会的历史和国民公会本身一样久，其前身是立法议会的监视委员会，从1793年9月起，它也由12个委员组成，他们在任九个月，负责控制政治警察。这两个委员会对国民公会负责，国民公会每个月都能够把它们改组或者撤销。它们形成一种“代议制”政府，只要获得议会的信任，就拥有无限的权力。

全国治安委员会通过特派员（派往外省和军队的国民公会成员）和政府派到地方行政官员那里的“国民代表”来迅速执行它的决定。革命监视委员会已经合法化，受权在地方监视嫌疑分子；可是在实际上，它们常常越权。雅各宾俱乐部所起的作用已得到正式承认，作为对地方当局的一种民众监督。选举都已推迟，特派员在民众俱乐部的协助下，负责改组行政会议的工作。在另一方面，许多省自动组织起来逮捕嫌疑分子、征用粮食和供应市场的“革命军”，却被看作不服

从命令而予以取缔。法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在代替制宪议会首倡的权力极端分散。这些措施首先获得的效果是，制止了2/3的省有发动叛乱反对巴黎之虞的一场内战。7月13日，诺曼底暴动的联邦党人在厄尔河畔的帕西被击败了。大多数省都团结在国民公会周围，于是叛乱仅限于三个地区，即旺代、里昂、普罗旺斯以及暴动的城市马赛和土伦；国民公会派正规军前去镇压。

为了平定叛乱并防止他人效尤，无套裤汉在1793年9月4日和5日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公会采取过激措施，这些措施汇总在一起就形成了“恐怖统治”。早在1793年3月，已经开始把“嫌疑分子”投入监狱。9月17日的法令命令逮捕规定的几类嫌疑分子。迄今依然很难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法国人是作为嫌疑分子而身陷囹圄的，估计在30万—50万之间。为了审判这些人而建立了革命法庭。1792年8月17日已经在巴黎组成了第一个特别法庭，但是它审理程序之缓慢激起了9月大屠杀，并于11月29日予以撤销。迪穆里埃叛国后，又建立起一个革命法庭。在9月分成四部分，其中两个部分同时进行工作。在外省城市中建立起来一些法庭和军事法庭。至少有1.7万名嫌疑分子被判死刑；把立即处决和死于狱中的人也计算进去，受害者人数达3.5万或4万名。这一数字和16世纪的受害者人数一样多，虽然与20世纪俄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大规模屠杀还难以比拟。89%的死刑发生在叛乱地区（西部、罗纳河谷，以及北方和东方边境地区）。有6个省没有人被判处死刑；在另外31个省中，每个省的死刑都不到10起。受害者之中人数最多的是工人（31%）和农民（28%）。从总数来看，贵族和教士受害的并不多，但从他们本身的人数和重要性来看，比例却是很高的。

从1793年10月至1794年7月，“恐怖统治”盛行一时。它主要是政治性的和镇压性的，其目的绝非如有时人们所说的在于消灭一个社会阶级。它基本上是一种用以保护国家和革命的防御措施。这两个“政府委员会”，除了必须对付“国内敌人”而外，还必须在整个边境线上击退外国军队，在陆地和海洋上与欧洲联盟作战。在这场斗争中，法国如果利用它的全部人力，是能够克服众寡悬殊的问题的。法国约有2600万人口，是欧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确，如果把面积和资源考虑在内，它的人口实在过多了。由此产生的大批失业者是很容易吸收到军队里去的。

建立国民自卫军是走向征兵的第一步。早在1793年2月，国民公会就已下令征兵30万，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这触发了旺代的暴动。国民公会见到这一措施不够充分，又受到无套裤汉的压力，就宣布“普遍征兵”。它要求18岁至25岁的未婚男子应征入伍，并要求其余的人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取得战争的胜利。要把武器、粮食、装备供应这些人，是需要作出巨大努力的。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是唯一工业发达、足以迅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的国家。武器工厂成倍增加，所有纺织厂都改为军工生产，制造军服和皮鞋的作坊到处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通过征用，匮乏的情况改善了。他们请求科学家改进装备，发明新的作战武器。沙佩发明的信号机和孔泰改良的气球都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在入侵之后一年，即1794年春，救国委员会已经能够在各条战线上以优势兵力迎击敌军。

对于旧政权来说，要支付这样一次战争的费用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在这时候，指券使政府几乎拥有无限的基金，因为他们只要印刷钞票就行了。不过，这也带来一个新的至少在规模上空前的问题：通货膨胀及其直接后果——生活费用高涨。这不仅是滥发纸币的结果，也是由于征兵，从田地上夺走了主要劳动力生产有所下降的结果。同时，又加上连年的歉收。在1788—1789年的饥荒以后，从1791年至1793年一直粮食不足。由于此原因，以及由于农民不愿接受不断贬值的指券，市场存货极少。食品价格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影响到一切日用品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那些身受其苦的人感到革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各城市的，尤其是巴黎的无套裤汉持有这一观点。他们对于财产的想法和资产阶级的想法大相径庭。无套裤汉和农民一样，倾向于保持公社的习惯，本来赞成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财产，但是受到全体人民需要的限制。1793年9月2日，巴黎地区要求国民公会“一劳永逸地规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工资和工商业的利润”。他们补充说：“贵族、保皇党人、温和派和阴谋家无疑会这样说，‘这是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抵触的’……但是这些坏蛋难道不知道，私有财产权只以基本必需品为限吗？”他们以这么一种严格限制的私有财产的概念，反对那些革命资产阶级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反对国民公会的几乎全体成员的想法。简言之，他们不仅希望“权利”平等，还希望在工资上和必需品的分配上也同样平等。他们的理想是一个由独立

的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社会的理想。他们的政府理论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宁愿通过人民群众在基层议会中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来直接进行治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是埃贝尔、雅克·鲁和一个叫作“愤激派”的集团。不过，这些人并不是能够煽动群众的、有创见的思想家；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在小册子和报纸上，作为无套裤汉“响亮的应声虫”出现的。

为了和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作斗争，国民公会不得不大大地有违初衷，对供应品实施远比旧政权时代的任何一次限价更全面和更严格的控制价格。1793年9月29日，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之下，规定了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革命军”和各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强迫农民供应市场，在最高限价之内出售产品。1793年7月26日的法律规定对囤积者处死刑，但是实际上很少执行。不过，仅仅由于这项法律的威胁，再加上各革命机构的活动，就足以改善对市场和商店的供应。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里都发了定量供应卡。

改善粮食供应不过是无套裤汉的纲领中的一部分而已。他们还想增加对富人征税和均分土地，以此缩小不平等的差距。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些人甚至谴责温和主义的“宣誓效忠的”教士（以及拒绝宣誓的教士），因而攻击基督教本身。早在1790年，随着民众举行的示威游行和一年一度的节日（例如7月14日），已经发展了一种“革命的”宗教信仰；另外，无套裤汉还增添了一种对“自由烈士”的崇拜，旨在使法国“非基督教化”。救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罗伯斯庇尔本人在内，都反对这些可能使民众疏远革命、使国防陷于瘫痪的倾向。虽然该委员会促使国民公会采用革命历——这也许是革命时期最厉害的反基督教措施——却又放手让丹东一伙（宽容派）开始反对革命。与此同时，它下令把公认是“共和国敌人”的嫌疑分子的财产分给穷人，以此来安抚无套裤汉——这都是一些难以实行的措施，而且要在长期以后才能见效。该委员会一方面逮捕无套裤汉的代言人，因为他们猛烈抨击它的政策并计划举行新的起义；另一方面又逮捕了丹东一伙，先发制人地防止和平妥协和国王复辟。埃贝尔、愤激派和宽容派分子都被接连不断地迅速押上革命法庭，判处死刑（1794年3月24日、4月5日和13日）。

有四个月工夫，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救国委员会拥有全权，但是它把无套裤汉的领导人判处死刑，实际上失去了巴黎人民的支持。圣茹

斯特这样写道：“革命已经冻结了。”该委员会想以“美德”的名义，利用恐怖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弥补反基督教措施，并希望团结群众，它试图创立一种自然神宗教——对最高主宰的崇拜。它还实施社会保险政策，通过国民福利总登记，对身体强健的穷人给予失业津贴，对病人的家庭给以援助，对老年人进行救济。同时采取免费强迫初等教育的原则，在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但是这些革新由于缺乏经费而不得不推迟实施，而以后实现的希望看来也是渺茫的。

恐怖统治、对防务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经济和社会控制，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国内，一些叛乱已经平息。里昂和马赛于1793年10月9日和25日，土伦于12月18日先后收复。旺代人在12月23日被粉碎，虽然西部地区的叛乱还以游击战方式继续下去，但是这次朱安党叛乱与其说是危险，还不如说是麻烦罢了。1794年春天，法国军队的绝大部分都能用来迎击外来敌人。他们在进攻中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以后，于6月25日在弗勒吕斯取得辉煌的胜利，从而重新打开通往比利时的道路。内战结束和外敌入侵停止以后，恐怖统治及其一切限制已经令人再也不能忍受了。

然而，恰恰在弗勒吕斯大捷之际，恐怖统治加剧了。为了致力于中央集权，外省的绝大多数革命法庭和军事法庭已予废除，嫌疑分子在巴黎进行审判。面对着新的“贵族阴谋”（试图谋杀救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就是明证），罗伯斯庇尔的6月10日法令改变了革命法庭的程序，甚至取消被告所享有的极少保障，不许他们作任何的申诉。在巴黎，从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处死了1251人；从6月10日到7月27日该委员会垮台，处死了1376人。这一次新的恐怖统治发生于捷报频传，似乎没有必要实行恐怖的时候，它扩大了救国委员会与全国治安委员会之间的鸿沟，并且加深了救国委员会成员间的不团结。在胜利的影响下，雅各宾派资产阶级在过去一年中和无套裤汉的联系纽带也松弛了，前者的自由放任与后者的统制经济发生了冲突。大多数法国人转而反对恐怖统治，反对似乎应该对此负责的罗伯斯庇尔。在这时候，无套裤汉正越来越远地离开政府，因为政府在3月处死了他们的领袖。另外，巴黎公社在7月23日首次公布限制工资，这也使他们恼火；限制工资在实际上等于强制降低实际工资，因为当时尽管限价，生活费用依然在不断上升。

1794年7月27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国民公会推翻了“救国大委员会”，这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代表们以及民众的支持，从外省召回的恐怖分子由于受到罗伯斯庇尔的威胁而与温和的“平原派”联合起来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经过一番徒劳的挣扎以后，就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遭到逮捕，并于次日落得个身首异处。他们试图建立的平等和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也随着他们一起烟消云散。

罗伯斯庇尔垮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恐怖统治迅速结束。物价和工资限制不久也取消了（1794年12月），共和二年的社会立法只不过试图实施一次就完蛋了。一些幸存的吉伦特派被召回现在称为的“热月”国民公会。国民公会出于需要，曾经有一年工夫支持罗伯斯庇尔，因为要使1789年的那些原则保持下去，军事上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呢，大多数人重又捡起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1793年宪法被认为过分民主，不宜实施。革命政府依旧执政，但是其方式却收敛多了。由三个委员会代替以前的两个委员会分别掌握权力，救国委员会的许多权力转交给立法委员会。其他革命委员会的人数和范围也缩小了。在温和派（这时候民主党人已分裂为新埃贝尔派和雅各宾派）影响之下，也由于受到青年叛乱分子、逃兵和获释的嫌疑分子集团的压力，国民公会逐渐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它禁止民众俱乐部和团体的活动，并在11月12日封闭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12月24日，它取消了最高限价法令，恢复了经济自由。这一措施使物价更加猛烈上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发行指券。1795年5月，指券贬值68%，到7月，贬值97%；后来叫作“恶性循环”的东西开始了。投资者破产，工人几乎挨饿，只有暴发户、时髦妇女和花花公子穷奢极欲，任情作乐。由于前一年开设的大多数武器工厂关闭造成的失业，也由于1794年冬季的严寒（这是本世纪最冷的冬季之一，连河流都有几个星期冰冻），工人阶级的苦境更加恶化了。

1795年3月，人民的失望变成了愤怒。4月1日，一群不受约束的民众冲进国民公会，要求恢复1793年宪法和采取控制粮食短缺的措施。来自富人聚居区的国民自卫军轻而易举地驱散了示威群众，20个山岳派代表遭到逮捕，富于战斗性的无套裤汉被缴了械。但是这些措施远不足以平息巴黎穷人聚居区普遍存在的暴动情绪，反而火上浇油。5月20日，无套裤汉又一次冲击国民公会，杀死了一个代表，但是未能强迫实施他们的纲领。温和派控制的那些“政府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反

击。又有14个山岳派分子被逮捕，并在军队协助之下（这是革命时期第一次使用军队来对付民众示威者），使圣安托万区投降。许多无套裤汉被逮捕，40个人被处死，引起的反应遍及法国各地：这是白色恐怖。人民起义被粉碎了，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1793年宪法被宣布作废，国民公会开始起草一部新宪法。保皇党人认为这种局势正是夺权的良机；但是一支逃亡者组成的部队试图在基贝隆登陆（6月27日—7月21日），却惨遭击退，而1795年10月5日巴黎保皇党人的一次起事，也被1793年在围攻土伦时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波拿巴率领的政府军镇压下去。

政治的变迁不应抹杀热月党国民公会在宗教和教育方面完成的工作。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了结束1790年开始的宗教危机，它使政教分离。这种试验并没有消除宗教冲突，但却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努力，它的寿命比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试验的寿命长一些，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免费强迫初等教育并未付诸实施，但是建立一些“中心学校”恢复了中等教育，它打破了过去的传统，把科学、艺术和现代语言放在主要地位。高等教育得到改进，创立了综合工科学校和其他机构（参见第五章，原文第121—123页；第七章，第198—200页）。知识分子以这些成就而自豪：法国已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出现。国境以外的捷报频传也似乎证明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当1795年欧洲大陆恢复和平的时候（参见第九章，原文第255页），由革命产生的新政权似乎终于站稳脚跟，在法国内部得到巩固了。

行将结束的国民公会企图使法国具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而这是1791年的制宪议会以及1793年的国民公会本身都不曾办到的。如今它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并在1795年（共和三年）8月17日得到通过。它还得到公民投票的支持（100万票赞成，5000票反对）；600万选民中绝大多数弃权。这部宪法与1793年的宪法比较起来，甚至与1791年的宪法比较起来，在民主方面要差得多：选举权以财产资格为基础，以督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宣言（1789年）被权利和义务宣言所代替，删去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人人生而自由，具有平等权利。”正如朗热内代表在辩论时所说：“你如果说一切人权利平等，那你就是煽动所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或者为了全体公民的安全而暂停行使公民权的人起来反对宪法。”热月党人只愿意谨慎地这么说：

“在同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宣言并没有提到1793年宪法所包括的教育、劳动、社会救济或起义的权利；但是它保留了财产权的定义，即人人“享有并支配其财产、收入和劳动果实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明确允许经济的自由了。

1792年共和国实行的普选权，在1795年的共和国里已经消失不见。只有交纳直接税的法国人才能叫作“公民”和有权投票。选举似乎可能比1791年扩大一些，在1791年，纳税至少相当于三天工资的人才有选举权；但是不能确定，1795年乡村地区的选民是不是比1791年多。两级选举制继续保留；要成为第二级选举中有选举权的人，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拥有财产的收入要相当于当地200天的工资，或者出租土地或房屋，租金相当于当地50—200天的工资。总共约有3万名有选举权的人参加选举会议。

自从1789年以来，只有唯一一个议会拥有立法权；而如今在法国第一次有了两个议会：500人院和元老院，后者有250个成员，都已经结婚或者是鳏夫，年龄都在40岁以上。代表们并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每年改选1/3席位。行政权则授予五人组成的督政府——因此它就成为这一政权的名称。督政官由立法两院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每年更换一个督政官）。督政官拥有的权力要比1791年国王的权力大得多。他们任命部长，部长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控制行政机构、军队、警察和外交。只有财政单独由5个国库专员和来自财政部的5个人掌管，这些人像督政官一样，按照同样方式选举产生。1790年创设的行政管理机构大体上保留下来。各省一如既往，但是由选举产生的5个人来管理，而他们又受到督政府任命的一个中央专员控制——中央专员是帝国时期省督的前身。曾经在革命政府中起过重大作用的1790年设置的县已被取消，但是每个区由一个市政机构管理，这一有趣的试验的寿命并不比督政府长久。在另一方面，少于5000居民的市镇则撤销其镇议会，代之以选举产生的镇长和副镇长。一般来说，中央集权还不如1792—1793年厉害，但远远超过了1791年。特别是督政府有权废除行政法令，把任何官员暂时停职或撤职，并派人代替他直到下一年为止。司法机构的变化极少。每一区依旧只有一个地方法官，但是每一省现在只有一个民事法庭。

新宪法试图减少民众俱乐部和团体的活动。虽然新闻界已经受到控制，能够依法勒令报纸停刊长达一年，不过在督政府时期还是比国

民公会时期有更大的自由。教会和国家已经分离，可是依然想建立一个官方的宗教，先是自然神博爱教，随后是理性主义的“十日”教，两者都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宪法起草人竭力防止恢复不久以前的议会或委员会专政，预防军人的统治。他们尽可能分散政府的权力，规定选举产生的机构每年都有部分人员改选。但是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可能的，也无法预防，而且在紧急状态下，例如战时，也无法保证一定支持政府。这部宪法也恰恰就是在紧急状态下被抛弃的。

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巴黎的生活费用如果以1790年为100法郎，据说在1795年11月已经超过5000法郎。穷人阶级的境况到了危急的程度。民主派想通过批评新宪法来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现在他们最勇敢的发言人是巴贝夫。巴贝夫于11月6日在他的《人民论坛报》上写道：“一般说来，政治革命是什么呢？特别说来，法国革命是什么呢？就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场公开战争。”保皇党人也想利用当时的形势。虽然西部地区残余的朱安党匪帮已被打败，他们的头目被枪毙了，保皇党人在立法团中至少有200名代表，还可能争取过来同样数目的无所属的温和派。所以他们改变策略，想在立法机构中赢得多数，合法地取得政权，或者在一位将军及其部下的帮助下取得政权。他们所依靠的是莱茵和摩泽尔方面军司令皮什格吕。督政府并没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它只能依靠一部分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革命使他们的地位变得重要一些，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被没收的土地或者通过军需合同而发财的那种人；总而言之，就是那些上流人士和显要人物。由于权力过分分散，督政府和立法两院彼此能够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以致督政府求助于发动一系列的政变。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797年9月4日（共和五年果月18日），从而结束了两年来试图按照宪法统治法国的“第一届督政府”。

这个“第一届督政府”是由国民公会中巴拉斯、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勒波、卡尔诺、勒图尔纳这样一些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成员组成的。它当初想把那些真诚的共和派，特别是雅各宾派人士拉到自己的周围。但是，巴贝夫依然没有就范。1795年12月5日曾发出逮捕状要逮捕他，他就转入地下，并和意大利人布奥纳罗蒂以及国民公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密谋以一种共产主义政权来取代督政府。巴贝夫这样做，就成为大革命中想把迄今认为仅仅是哲学上的乌托邦变成现实的第一

个政治家。此外，他还抛弃了在法国到那时通常使用的造反方法，组织了由一小批人领导的平等派密谋，他以为自己可以依赖这些人，他们不会泄露密谋者的最终目标。

经济危机有利于巴贝夫支持者（巴贝夫派）的宣传鼓动。指券已经一文不值，另用土地券来代替，它不过是同样货色的一个新变种，初次发行后不久就贬值70%，而且在继续迅速贬值。必不可免地重新使用金属货币，等于是突然收缩通货，这对穷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督政府迟疑不决，内部发生分歧，最后在卡尔诺的压力之下，决定捉拿巴贝夫派。由于奸细的告密，巴贝夫派的领导人于1796年5月10日被捕。在最高法院出庭受审的这些人中间，巴贝夫和另一个人被判死刑并被处决。“平等派密谋”后来在19世纪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当时，它促使督政府向温和派靠拢。1797年（共和五年）春，立法两院改选1/3成员期间，温和派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督政官勒图尔纳落选，由温和派人士、巴塞尔条约的谈判者巴泰勒米继任。自从巴贝夫密谋发生以后，卡尔诺也向同一个阵营靠拢。由温和派（其间混进了很多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的立法两院希望早日和平，不再继续兼并。保皇党人指望和平将有利于路易十八的及早复位，虽然保皇党人中的立宪派与君主专制派在政权性质上是有分歧的。但是，共和派督政官们的意见却与立法两院相抵触，督政府的政策并不完全是谋求和平。事实上，它受到了那些想“解放”自己祖国的国外流亡者和“爱国者”的影响，也受到想让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那些军人的影响，这些军人或是想扩大共和派的宣传，或是出于野心勃勃或者贪图钱财。在法国的三支主要军队之中，有两支（在意大利由波拿巴率领的军队和在桑布尔和默兹由儒尔当率领的军队）都不断叫嚣要继续作战。只有一度由皮什格吕指挥，现在由莫罗指挥的驻莱茵和摩泽尔的军队，才不那么起劲。

1796年和1797年的历次战役有利于主战派，并且使共和派的力量得到加强。在意大利的军队取得的辉煌胜利，遮掩了法军在德意志的败绩（参见第九章，原文第255页）。波拿巴以对联盟的伟大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由于他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征收捐税，以致可能停止使用纸币，并部分地用以平衡预算，于是任何党派，甚至政府，都越来越难以反对他的政治观点。但在国内，财政形势依然不能令人满意。恢复硬币导致通货突然紧缩，而1796—1797年的大丰收又促使这一情况进

一步恶化。农产品价格下降。毫无疑问，城市贫民的境况由此得到了改善，但是农民的情况却更糟糕了，赋税收入令人失望。在克利希俱乐部里聚会的保皇党人和温和派——因此他们叫作克利希派——乘机强迫废除一系列制裁流亡者及其亲属和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法令。他们以为督政官已经有两个是他们的盟友，只要第五个督政官巴拉斯与他们合作，全体督政官就会接受他们的主张。如果相反，巴拉斯与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站在一起，他们还可依靠已经当选为五百人院议长的皮什格吕将军发动一场政变。碰巧巴拉斯从波拿巴那里收到了在意大利从一个保皇党代理人昂特雷格伯爵那里搜到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皮什格吕的叛国行为。巴拉斯于是站在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一方，共和派遂在督政府中占确实的多数。这一个多数派决定用计谋来击败克利希派；就求助于危险性显然最少的奥什将军——新任桑布尔和默兹军司令。奥什的部队借口开往西海岸为入侵英国做准备，打算在途经巴黎时逮捕克利希派的领导人。克利希派从内阁中被清除出去之后，由奥什本人出任陆军部长。督政府里的反对派揭露了这些准备工作，他们指出两点违反宪法：一是桑布尔和默兹军队未经立法机关同意，擅自进入宪法保护区（即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二是任命奥什当部长，他未达到法定年龄。督政府只得撤销前议，密谋没有奏效（1797年7月）。

保皇党人和温和派立即重新组织国民自卫军（把共和派排除在外），要求封闭经督政府同意设立的“宪政俱乐部”。可是他们既缺乏勇气，行动又不迅速。皮什格吕也迟迟不愿动手，督政府又一次先发制人挫败了他们。无套裤汉自从1795年5月以来受到了镇压，督政府不可能求助于他们，于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去找波拿巴。由于立法两院猛烈攻击过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他曾经通过属下各部队，向巴黎寄去几份谴责保皇党人和要求消灭克利希派的请愿书。他的部下奥热罗将军和别人一起，恰恰从意大利驻军那里休假到了巴黎。于是三个督政官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就向他们求助。1797年9月3日（共和五年果月17日）夜，这三个人就逮捕了克利希派的头目和督政官巴泰勒米；卡尔诺听到风声，得以逃脱。在立法两院的一次会议上（依法召开，但除共和派外别无他人出席），宣布198名代表的当选无效。其中33名被判处流放国外，另外还有12个人（包括巴泰勒米在内）也被流放。保皇党人于春季当选以来所通过的一切“反动”法令都予废除，以前惩治逃亡者和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法令重又生效。在宪

法允许的范围内，一条新的法律规定报刊要在一年之内接受警察局的审查。宪法或者政府机构都没有变动。督政府里加上了两个共和派，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和梅兰·德·杜埃，但它只满足于任命共和派人士去代替有“温和派”观点嫌疑的官员。可是在事实上，督政府和立法两院已经再也不能自由行动了。他们从属于驻意大利的军队及其领袖、前来拯救他们的波拿巴。波拿巴立刻把他对外交政策的主张硬塞给他们，特别是与奥地利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中的条款。他已经想让国内感觉到他的影响，但是当时形势还是对他不利。

果月18日政变实际上把督政府统一起来，使它能够集中力量改进现有的机构。在这方面，它在执政府和帝国的前期工作上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很少被人们承认。财政是它的第一个问题。政变后六天，在9月10日，财政部长拉梅尔提出一个法案，以实质上宣告破产的方式来减少国债；这样一来，督政府就可以摆脱和将军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财政监护制度。9月30日通过的法令使国债从2.5亿法郎减至8300万法郎（削减2/3）。每一张政府债券的1/3，即“1/3公债”，依旧记在公债的大账簿里。另外2/3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购买国有产业的价款的债券予以偿还。债券持有者因此受到了部分损失，但是国家的财政似乎好转一些。开征新税使岁入增加：除制宪议会已经开征的三种直接税之外，又加上了一种门窗税。这“四种老税”就成为法国财政制度的基础，一直到1914年。依靠由公务员组成的直接税局，税款能够更有效地收集起来，赤字减少，国家的财政状况比177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

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征兵问题。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征兵办法是招募志愿兵，以及把当时（1793年8月）18岁至25岁的男子“征召服役”或者作“战时总动员”。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征召过一个人。儒尔当将军和德尔布雷尔议员提出的征兵法长期确立了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法国人都是士兵，保卫祖国是他的义务。”所有市民只要到20岁就必须在征兵名册上登记——也就是“应征”。在和平时期，服役期规定五年；但是政府可能并不是将所有应征的人都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抽签的办法来挑选。从此以后，征兵就成了法国的一项基本制度。

虽然制定了几项重要法律，果月的政权却未能使政局稳定。雅各宾党人显然重又掌权，猛烈镇压——督政府恐怖——特别降临到已经

回国的流亡者身上（其中有160名被枪决）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身上（有263名教士被流放至圭亚那，那里的气候在当时是能置人于死地的，人称“旱断头台”）。另外有1500人左右被拘留到雷岛和奥莱龙岛。不过，督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是温和的共和派，他们像害怕保皇党人一样害怕无套裤汉（现在叫作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法国所占领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姊妹共和国中的“爱国者”联合起来，似乎显得更加勇不可当了。所以，“第二届督政府”不久就开始把雅各宾党人看作嫌疑分子。但是1798年（共和六年）4月的选举，政府虽然经过细心准备，结果还是雅各宾党人占了多数。不过，由于许多选举会议发生分裂，获得少数票的候选人也被宣布当选。这需要由立法两院按照1798年1月通过的一项法令，决定哪些代表当选有效。根据5月11日的法令，他们否决了106名新当选的人，其中有104名雅各宾党人，即排他分子，以及两名保皇党人。53名获得少数票的候选人却被认为当选，但是还有53个席位空缺。许多法官和其他正式当选的官员也被宣布当选无效。这件事叫作花月22日政变。

如果在国外保持和平的话，督政府也许可以依靠这个新形成的多数。但战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又在熊熊燃烧了。波拿巴和塔列朗不能入侵英国，就促使督政府派兵远征埃及。在邻近法国的地方，法军侵入了意大利和瑞士。隔不多久，法国就面临第二次反法联盟，到1799年春天（就像六年前一样），除了比利牛斯山以外，在各条战线上都受到了攻击（参见第九章，原文第256—257页）。法军不得不后退到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

这些失败使法国的爱国志士大为不安。军队把过错推到政府身上。自从花月（1798年5月）22日反对雅各宾党人的政变以来，雅各宾党人也在怪罪政府。1799年（共和七年）4月的选举以后，雅各宾党人在立法两院里又一次成了多数派；他们在将军们的怂恿下指责督政府应对灾难负责。1799年6月初，五百人院要求督政府解释它的政策，并宣布五百人院的成员之一在一年前的当选不符合宪法，因而无效。督政府有两个星期默不作声，以后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敷衍而已。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领导的反对派宣称督政府的复文不能令人满意；促使被认为应对花月22日政变负责的两名督政官辞职。虽然整个程序都是依法进行的，这件事还是被称为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政变。卸任的两名督政官由罗歇·迪科和穆兰将军接替，

这两个人都很圆滑，据说是雅各宾党人。他们和巴拉斯、西哀士、戈伊埃一起组成“第三届督政府”，挑选有雅各宾党名声的人当部长，例如富歇任警务部长，罗贝尔·兰代任财政部长，康巴塞雷斯任司法部长，贝纳多特（后由杜布瓦-克蘭塞）任陆军部长。

雅各宾党人似乎又一次在国内掌权了。他们像在1792—1793年那样，企图以“救国”的口号激励全国。在频繁发生政治暴乱和谋杀事件的各省里，地方当局于7月受权逮捕贵族和逃亡者的亲属以及嫌疑犯作为人质。此外，又在法律上规定，这些人质负责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并向拘捕人员支付酬金。富人按等级分摊1亿法郎贷款，以国有土地作为补偿，用以支付必不可少的军饷，以免再印声名狼藉的纸币（8月）。又采取立即实施征兵法的措施，任何人都不能免除。设立调查委员会，以确定谁应对军事上的失利负责和查究某些前督政官的行为。对新闻和俱乐部的管制撤销了，雅各宾党人又一次在马术厅聚会了。但是这些“救国”措施只是一时奏效，不久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人质法并没有一律实施，强制贷款触犯了整个富裕的资产阶级（现在的统治阶级），他们指责雅各宾党人恢复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的财产均等计划。不管是督政官也罢，部长们也罢，都不能失去扶持他们上台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在8月13日，西哀士和富歇决定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政府既然失去了雅各宾党人的支持，就只得转而谋求军队的支持了。

反法联盟本来预期8月初在法国西南部和西部会发生大规模暴动。西南部图卢兹周围的暴动，在8月中旬就被镇压下去了。西部的暴动互相配合得不好，在9月里爆发以后就平息了。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苏黎世对奥俄联军、在阿姆斯特丹以北对英俄联军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成功使督政府松了一口气。不过，它既然失去了雅各宾党人的支持，如果再得不到军队的支持，怎么能存在下去呢？它怎么能不逾越1795年宪法的范围呢？这部宪法是为和平时期制定的，对于战时的特殊情况没有作出规定；由于规定立法机构每年改选1/3代表，更造成了不稳定，促使掌握行政权的人为了长期政治计划而发动政变。

果月（1797年9月）18日政变发生以后，有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就想修改宪法。但是修改宪法的程序至少需要九年工夫，可是当时形势紧迫，延搁这样久是决不能容许的。因此必须借助于一次新的政变，对督政府的政治家们来说，现在政变已经是一种很熟悉的方法了，他

们不仅在法国运用了三次，而且还经常劝告“姊妹共和国”也运用它。在阿尔卑斯山南、利吉里亚、罗马、巴塔维亚和赫尔维蒂等共和国已经一再发生政变，其中大多数是由将军们（布律纳、儒贝尔等）进行的。执政的资产阶级想要稳定政府、修改宪法、挫败反革命，其策略是既维护“1789年的胜利果实”，又不致因恢复1792—1793年的体制而使本阶级的其余部分担惊受怕；这势必要求助于一位将军。1799年夏督政官西哀士声称：“我在找寻一把剑。”首先想到的似乎是莫罗，但是他与证据确凿的卖国贼皮什格吕有旧，这段历史令人惴惴不安，而且优柔寡断的天性也使他难以中选。于是就考虑到儒贝尔。他有搞政变的经验，但在军界缺少威望。为了让他有机会取得这种威望，就任命他为驻意大利军司令，但在1799年8月15日，他在诺维的第一次作战中就阵亡了。剩下的人选只有陆军部长贝纳多特，但是据传他跟雅各宾党人有勾搭。

这时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局面立即改观了。大家以为还在埃及的波拿巴，出人意料地于1799年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人们欢迎他，把他当作一位救星。法国人民并不知道他在远方遭到的败绩，依然认为他是意大利的神奇的胜利者，两年前曾使欧洲获得和平。他们以为他能使法国再一次得到光荣的和平。至于说计划中的政变，现在波拿巴既已回国，还有哪一个将军能比他更合适呢？波拿巴于10月14日抵达巴黎，西哀士一伙立刻向他进行游说，而且很容易就把他说服了。西哀士心想这次政变还会像以前的政变一样：一旦新宪法生效，波拿巴就会悄悄引退。哪知道波拿巴把他们的提议，当作取得他已经意大利和埃及取得的那种最高权力的敲门砖。

政变在11月初就已经策划好了。大多数成员都参与其事的元老院以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为借口，决定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把立法两院从巴黎迁至圣克卢。与此同时，它还打算任命波拿巴为驻巴黎军队的司令。第一幕于11月9日（雾月18日）毫无困难地完成了；第二幕却几乎遭到失败。必须敦促立法两院违反法律程序去修改宪法。元老院中少数成员表示反对，五百人院中的绝大多数代表显示出强烈的敌意，有些代表甚至要求宣布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幸亏他的兄弟吕西安是五百人院的议长。他在紧急关头上宣布暂时休会。他们共同调兵包围圣克卢城堡，以“保护”代表们。士兵们冲进五百人院，代表们纷纷跳窗而逃。与此同时，西哀士、罗歇·迪科和巴拉斯

共同辞职，使督政府归于瓦解，另外两名督政官却被关在卢森堡宫，由莫罗严加看管。

这样一来，就必须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当天晚上，西哀士和波拿巴召集了一批他们知道同情于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决定把政府委托给由两名前督政官（西哀士、罗歇·迪科）以及波拿巴组成的“执政委员会”。这个临时的“执政府”将在两个立法委员会（各由25名代表组成，其一是元老院成员，其二是五百人院成员）的协助下，负责起草一部新宪法。实际上，执政府拥有全部权力，而且违背西哀士的愿望，波拿巴立刻就取得了领导地位。

这种显然毫不间断地取得的成就成了波拿巴一生经历中的特征，也是执政府时期政治上稳定的关键，这种稳定使国内有希望恢复秩序，给国外带来和平。那时波拿巴才30岁。但是他天赋有过人的智慧和从事工作的无限能力。他的永远不会满足的野心使他不屈不挠地超越他的原定目标。他似乎正是革命的化身。可是甚至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位18世纪的人物——一位开明的暴君，也许是在所有暴君中最开明：伏尔泰的一位忠实儿子。他既不相信君权，也不相信人民的意志，更不相信议会的辩论。他信赖推理甚于理性，信赖“有才能的人”——尤其是数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哪怕是玩世不恭或者贪污受贿的）——甚于实际的技术人员。他认为毫不动摇的、目光敏锐的意志，以刺刀为后盾，其力量是无限的。他蔑视并害怕群众，但相信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和指导舆论。他被描绘为最“平民化”的将军，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士兵，也始终是一个士兵，无论服装或者头衔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波拿巴强加给法国的专政是一个军人专政。它的真面目最初被“共和八年宪法”伪装起来。这部宪法“简短而又含糊”，是自从全国三级会议以来就在这方面负有专家盛名的西哀士起草的。自从1789年以来，这部宪法第一次不包含对人权的宣言或者保证，也不提自由、平等或博爱。但是它明确地表示制裁流亡分子的法律和出售国有土地的法律决不改变，再度使革命者吃了个定心丸。

波拿巴作为第一执政，独自被赋予巨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他的两个同僚是只有咨询权的多余角色。他可以单独创制法律，任命部长、将军、官吏、地方行政官和参政院的成员。1799年，在任命三个

立法机构——元老院、立法院和保民院——的成员时，起主要影响的也是他。普选恢复了，但是采用了一些办法使它归于无效。西哀士发明了一种制度，即按照全体选民1/10的比例选出“名流”。用互选办法补足自己的成员的元老院必须从这些名流中选出立法院议员和保民官。但是这一制度从来没有实施过。1802年，波拿巴用普选来取代选举团，这些选举团原来是由选举产生的、成为终身职的富裕公民组成的，并由他们选出各个立法机构的候选人；然后元老院就从这些人中间进行挑选。在三个立法机构中间，只有元老院还有一点自主权，因为其成员是选举产生的终身职，而且作为宪法的维护者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很少行使自己的权力，它所颁布的“元老院决议案”把越来越大的权力授予第一执政。保民院的职权是审议政府提出的法案。但是它表现出了某些反对派的迹象；其中最有独立性的成员早在1802年就被清洗出去，它的权力在1804年就已经削弱，而在1807年它就被撤销了。立法院的职权是不经过辩论通过或者否决法案；但事实上，它几乎没有否决过任何法案。

这部宪法像以前两部宪法一样，也交付公民投票表决。毫无疑问，当时大多数公民是投赞成票的，但是应该指出，投票时间长达一个月，政府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来施加压力，甚至在投票的最后结果揭晓之前就已经颁布这部宪法了。投赞成票的超过300万人，可是弃权的有400万人。

比“共和八年宪法”重要得多的是执政府的行政工作，特别是这种工作所采取的精神。在最高一级，参议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从前的国王会议的翻版，由波拿巴指定他特别器重的“有才之士”组成。参议院有双重任务：起草法律和处理行政的争端。起初，波拿巴经常参加它的会议，以后也和它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行政依旧以省为基础，省以下则有一些变动。一大革新是由政府委派和撤换省和新建立的专区的首脑。这些省长和区长恢复了旧日总督的传统，而行政的集权更进一步发展了。协助省长工作的有省参议会（一种行政法案评议会）和省议会；后者由任命的一些可靠的人组成，任期15年，它不起什么妨碍作用。区长有一个专区参议会，更不妨碍他的工作。在人口不足5000的市镇中，市（镇）长由省长任命，其余的市（镇）长则由第一执政任命。市议会更不比上述各级议会可怕。只是在人口不足

5000的市镇里，议员是直接选举的，任期20年。其余的市（镇）议会的议员则由县议会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任。

司法制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除地方治安官外，法官不再由选举产生，而由政府任命，但是不能撤换；因此，他们的独立性得到保证，他们成为法官集团的核心。法院等级制度恢复了。每个专区设一个初审法院，初审法院上面有29个上诉法院。它们有几分像以前的高等法院，但它们的职能依然完全是司法性质的。对于刑事案件，每个省都有一些地方即决裁判法庭和一个重罪法庭；在这一方面，拿破仑撤销了“起诉陪审团”，但是勉强保留了裁决陪审团。居于最高地位的是最高法院。然而实际上却有一些反常的地方。在执政府和帝国统治期间，警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法庭成倍增加，任意逮捕案件不胜枚举，以及由于行政诉讼而拘留于国家监狱中等，使人们回想起了以前的国王下令监禁或放逐某人的密封信和巴士底狱。

由于设立了一大批专门官吏，其中包括国家任命的专职收集直接税的人，使财政制度得到了改善，而以前由地方当局征收直接税，效率很低。制宪议会听从经济学家派的意见，曾经废除了间接税，但如今作为综合消费税，重新加以恢复和巩固。波拿巴为了与英国经济进行竞争，想使法国的货币和信用具备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标准。1803年3月28日的法令构成了法国实施了125年的货币宪章。为了和英格兰银行相抗衡，波拿巴在雾月18日政变的财政支持者的协助下，建立了法兰西银行。它在以钞票形式贷款给国家和为巴黎大商贾的票据贴现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要到几十年后整个法国才感到它的好处。

教育变成了一种广阔的公共服务，教师由一个机构，即“教育总署”统一领导。公共救济也成为了一种国家的服务，医院和慈善机构都由政府管理起来。

军队当然是这个政权的宠儿。概括地说，它依旧像国民公会和督政府建立它时的那样：征兵入伍（但有替代的条款），把年轻的新兵和老兵混合编制，并且提供晋升到最高军阶的机会。可是，拿破仑创办了圣西尔军事学校来训练步兵军官，为资产阶级取得军官资格铺平了道路，同时，综合工科学学校日益军事化，为炮兵和工兵提供军官。

这种大规模的行政改组，包括政府任命大批高薪官员，使波拿巴有机会开始一种和解工作。督政府之所以垮台，部分原因是它的政治基础狭小。波拿巴对这一点完全心领神会，于是他既向右派也向左派寻求盟友，他赢得同情的最成功的方法，就是任命政界各派人士担任当时新设立的职务。议会中容纳了所有革命派的某些前议员，虽然显然是俯首听命的人。省长的人选也是这样，在第一批省长中有15名制宪会议员，16名立法会议员，19名国民公会议员和26名过去督政府立法两院的成员。有些过去是恐怖分子，另一些则属于贵族。波拿巴向流亡者大开门户，他们大多数都回国了。只有那些不肯妥协的人——一直认不讳是保王党和民主党的那些人——才照旧受到折磨，起初这些人似乎为数不多；但是当这一政权暴露出它的缺点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逐渐增多，而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更加严厉了。

波拿巴进行和解工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使野心勃勃的人感到满意。他还想要结束1790年以来分裂法国的教会分立，为他所希望建立的新社会提供持久不变的模型。与军队、司法、教育和行政机构一起，“民法典”和“政教协定”构成了波拿巴在上面建立他的政权的“中流砥柱”“花岗石块”。

波拿巴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像伏尔泰一样认为“人民需要一种宗教”。环境恰好有利于与罗马达成协议。教皇庇护六世逗留法国时，于1799年死在瓦朗斯。他的继任者庇护七世于1800年6月抵达罗马，正好听到波拿巴取得了新的胜利。谈判于9月开始，10个月后结束，签订了一项政教协定（参见第六章，原文第153—154页）。这样一来，分裂法国如此之深、毒化法国革命达10年之久的教会分立，终于结束了。新教教会和犹太教会也都置于控制之下。另一个“花岗石块”是“民法典”。从路易十四起，君主政权一直梦想使全体法国人遵循一部统一的法典，1789年以来，每一个议会都曾为此而努力。但是，决定性的推动力却是波拿巴于1804年3月21日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它包含了革命取得的一些伟大成就：个人自由、工作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国家的世俗性质。在平等方面，“民法典”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保障已经取得的财富，有许多条确定、保持和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地产。在另一方面，也很少提到工资或薪金劳动，仅仅禁止终身契约。它借口使经济“法则”自由发挥作用，给予雇主以完全自由。它甚至违反权利平等，规定在发生工资争端时，只

听取雇主的证词。在涉及妇女的时候，法典也置平等于不顾。与男人相比之下，妇女的合法权利极为有限，虽然并未废除离婚。最后，各殖民地（当时正发生公开叛乱）恢复了奴隶制。“民法典”像“政教协定”一样，是旧政权和革命之间的一种妥协。在两者之间的裂痕不太深的地方，它巩固了后者。这显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完成的速度则快得惊人。

如果要把这些“花岗石块”砌得很牢固，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在意大利（1800年6月14日马伦戈战役）和德意志（1800年12月3日霍恩林登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波拿巴于1801年2月在吕内维尔与奥地利签订和约，1802年3月27日在亚眠与英国签订和约。于是，10年以来欧洲第一次得到了和平。波拿巴似乎是遵守他的雾月诺言的，当时他说：“公民们，现在革命已经按照它开始时的原则予以解决了。它已经完成了。”的确，随着国内恢复秩序和国外恢复和平，革命和旧政权似乎已经完全调和一致了。对于取得这一非凡成就的英雄，不应该有“举国上下感恩戴德的表示”吗？如果自发地作出表示，确实是很宝贵的，但是，唆使制定一项对“拿破仑·波拿巴应该成为终身执政吗？”这一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的法律的，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朋友们。在类似的条件下举行的公民投票甚至使波拿巴获得了更多的票数。他的野心的这次暴露，表明媾和仅仅是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波拿巴和英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概念并不相同。对于前者来说，这是通过和平方法使法国甚至更加强大的一种手段；对于后者来说，这是它可能作出的最大让步。

因此，亚眠和约是建立在一种误解的基础之上的，随即就触发了危险的经济冲突。战争刚一结束，波拿巴就转而鼓励发展工业。棉纺织业迅速复兴；原棉进口从1789年的477万千克增至1803—1804年的1100万千克。对发明新机器的人给予竞赛奖。省长们奉命编制本省的财产统计清册。但是，为了保护这种发展中的工业和防止可能有害于新成立的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外流，拿破仑对一些物品实行极高的保护关税，使希望恢复1786年伊登条约的英国人大为失望。这样一来，包括比利时在内并且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畔的法国向英国货物关上了大门。荷兰、瑞士和阿尔卑斯山南的市场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由于英国再也不能在海上捕获船只大发横财，对它的贸易来说，和平反而不如战争更为有利可图。波拿巴的扩张政策似乎是漫无止境的（参见

第九章，原文第261—263页），如果不是这种政策使英国政府感到惊慌的话，英法两国的经济冲突也许还不足以重新挑起战争。

1803年5月对英战争重又爆发，使保王党人的活动死灰复燃，因卡杜达尔密谋案而更加显著。波拿巴决定给予狠狠打击，以威慑任何新的尝试。对当甘公爵的处决（参见第九章，原文264—265页）虽然引起旧贵族和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反对，但也成为重新加强警察的借口。警察头子和前恐怖分子富歇希望巩固自己日益增长的势力，开始向主子阿谀奉承，他献计说：防止未来的阴谋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终身执政改为世袭制的帝国。到那时候，暗杀也丝毫不能改变政府的形式！元老院在富歇授意之下致函波拿巴，建议采用一个世袭的头衔，但是没有指明采用皇帝的称号。波拿巴的胃口还要大一些。他要求元老院表明它的“全部意图”。可是，那个极为驯服的保民院已经在表明它的愿望：“应该拥戴波拿巴为法国的世袭皇帝。”（1804年5月3日）接着举行全民投票让人民表达他们的意见，其结果和1802年一样。于是再一次修改宪法，其中规定：“现在把共和国政府托付给一位皇帝。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国人的皇帝。”

政府的组织极少变动。然而拿破仑的权力却加强了，三个立法机构的独立性甚至变得更少，参议院的影响也削弱了。拿破仑迅速地着手建立类似旧君主政体那样的一种体制。他首先要让教皇亲自为他加冕，其仪式甚至比波旁王朝的国王加冕还要隆重。庇护七世犹豫不决，但是他为依然根基不稳的政教协定担忧，促使他终于接受了要求。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仪式极为隆重的加冕礼。像查理曼一样，皇帝从教皇手中接过皇冠，戴在自己头上。保王党人大为震惊。至于共和国的老战士们，他们的想法和德尔马将军一样：“一出多么可笑的哑剧！为推翻这一切而献出生命的几十万人竟白白牺牲了……”从此以后，罗马之鹰装饰在三色旗上，并且和金色蜜蜂一起画在新王朝的纹章上。1802年创制的荣誉勋章的装潢，很快就和以前的骑士勋章，特别是圣路易勋章一样，无论金牌的外形或者绶带的颜色都很相似。1804年对拿破仑的家族恢复了王公的称号；1808年创立了皇室贵族阶级，其中包括世袭的国王封地领主、亲王、公爵、伯爵和男爵。他们可以让长子继承，但是与旧贵族阶级有所不同，他们没有财政或者司法的特权。拿破仑想把旧贵族与新贵族混合在一起；但

是回国的逃亡者却瞧不起这些农民的儿子，说他们“装扮成爵爷的样子”，却保留儿时的谈吐和举止。

所有这一切既疏远了共和派，又没有像皇帝所希望的那样把保王党人安抚下来。皇帝从革命那里借来的一件新武器——宣传，作了精心的加工。定期刊物的检查更加严格，报纸的数量减少了。最后，1810年8月3日颁布敕令：除塞纳省外，每省只许有一个定期刊物。除转载官方的《政府通报》的文章而外，不许刊登政治论文。非定期刊物也受到检查。另一方面，拥护这一政权的作家得到了大量津贴。所有独创的或者个人的文艺思想都遭到禁止。斯塔埃尔夫人遭到流放，夏多勃里昂和邦雅曼·贡斯当都受到迫害。剧院当然受到严格的监督，剧团和戏剧的演出都得服从一种军事纪律。皇帝的宣传渗透到艺术、教育，甚至教会之中。尽管如此，反对者依然坚持不懈。国家监狱像以前一样挤得满满的：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皇帝或者政权的言论就要遭到逮捕。为了这么一行拙劣的诗句：“是的，伟大的拿破仑是一条大变色龙”，诗人德索盖斯于1804年被送进了一家疯人院。有时候，嫌疑分子在警察监视之下幽禁在特定地区或者堡垒里；也会强迫他们参加军队，或者把他们的儿子当作人质，比如说放在公立中学或者军事学校里。

这种独裁使拿破仑可以进行战争达11年之久，而不必过多担心法国的舆论。在欧洲大陆上，战争有时因停战（有几次停战时间很长）而中止，但在海上或者在殖民地，它从来没有停止。随着海上战争带来了封锁。随着对大陆的封锁于1806年开始，拿破仑则力图对英国封闭欧洲市场。为了这个目的，他使法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的核心和试图为法国的利益改变整个欧洲经济的“大陆体系”的中心。

从1807年起，拿破仑更把自己当作查理曼的继承者而不是革命的接班人。他以婚后无嗣为由而与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离了婚。1810年，他与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结婚，次年生一子，似乎使帝国的未来有了保证。

“大帝国”被设想为由法国统治的一种联邦，但是没有任何民族概念或者“天然”边界。法国本身包括130来个省，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彼岸和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1810年以保护海岸为名吞并了荷兰，不久以同样的理由，把德意志北部直至吕贝克的海岸划分成三个新的

“汉萨”省。在南方，意大利有1/3已经并入帝国，拿破仑的儿子刚一诞生就被授予“罗马王”的称号。1812年，拿破仑甚至仓促决定吞并整个加泰罗尼亚，把它划分成四个省。法兰西帝国周围全是由皇帝的亲属统治的臣藩国家，如他的兄弟热罗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路易为荷兰国王（迄1810年），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他的继子欧仁为意大利总督，他的妹夫缪拉为那不勒斯国王，他的妹妹埃利兹（意大利人巴乔基的妻子）比较温和地统治卢卡和皮昂比诺。与皇帝小圈子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其他地区也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其中有以拿破仑为它的监护人的赫尔维蒂联邦；在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组成莱茵联盟，由前美因茨大主教夏尔·泰奥多尔·德·达尔贝格领导；在东方，萨克森的华沙公国远达维斯杜拉河都是帝国的势力范围。被法国的卫星国包围的普鲁士已经变得不能为害了。

于是，在1796年之前那么错综复杂的中欧地图变得简单多了。不管拿破仑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会怎么说，他从来没有使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统一的意图。然而，由于减少国家数目，重新划定边界和使迄今分裂的居民合并起来，更加上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时，还引入了民族自由、主权和独立的革命思想，拿破仑就为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拿破仑在他亲手缔造的这些国家中强制推行革命的主要改革，即废除国内通行税，禁止农奴制，或多或少全面消灭封建主义，废除行会和大部分特权，思想和信仰自由，用教会财产资助新的行政机构，而最重要的是实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它似乎是最近一切社会成就的综合体。这些制度唤醒了人们的思想，它们并没有激励人们对新主子怀有深厚的感情，反而鼓励他们考虑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处境。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法国人那样变得统一和独立呢？结果就产生了对拿破仑政权的反抗，而由于不可避免的战时征税，由于军队征用物资和占据民宅，最后还由于大陆封锁所造成的经济衰落，这种反抗更加严重。对于波尔多、南特、勒阿弗尔、阿姆斯特丹、不来梅、汉堡、吕贝克、马赛、热那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这些大港口来说，封锁就意味着完全毁灭。即使打断了英国的竞争，工业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拿破仑的权力以法国为中心，他首先偏袒法国工厂，把一切可以到手的原料都运往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纺织业开工率不足，工资削减，失业现象严重。纺织业的劳资双方以及各大港口的商人，都开始带头反对帝国。只有鲁尔以及比利时和萨尔（当时是帝国的组成部分）的钢铁厂还有所发展，因为它们为战争

做出了贡献。至于拿破仑希望用来取代殖民地产品（例如甜菜制糖）的“代用品工业”，还刚在襁褓阶段。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到了1812年，在皇帝统治下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大帝国”是一个人为的实体，只要皇帝的运气稍有逆转，它就可能土崩瓦解。在1812年，虽然法国军队占领了欧洲的3/4，而通用法语的地区比1750年还要少。在帝国内部，拿破仑采用高压措施，在新兼并的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诸省强制推行法语，这只能使当地语言具有更大的抵抗力。在臣藩或者盟国中并没有大力推行法语，但是法国的军队和官员带来了法语的表现方法，这也引起了争取纯洁和发展民族语言的抵抗运动。随着法国军队的进驻，法国语言倒撤退了——自从德意志和意大利文学已经拥有60年前它们所缺少的杰作而现在能够与法国匹敌以后，情况更是如此。这些作品贯穿着浪漫主义的新风格，它利用民间传统和历史上的光荣事迹，充分显示出每个民族的独特性格，与帝国的千篇一律的古典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即使在法国，最好的文学作品不是避而不提拿破仑的权势，便是对它进行攻击。从1803年起，夏多勃里昂被认为是可疑分子。斯塔埃尔夫人更加遭到白眼，被流放到国外去了。在《高丽娜》和《论德意志》中，她强调指出这两个被拿破仑任意宰割、其最深切的愿望受到压抑的民族的独特性格。艺术像文学一样，也反对官方的古典主义（参见第八章，一）。大卫成为这个政权的艺术家，但是比较年轻的法国画家们群起反对传统。在国外，戈雅描绘西班牙战争的场面表示抗议；意大利雕刻家卡诺瓦虽然受到波拿巴家族的极大尊敬，依然谴责把意大利的艺术品搬到法国去。贝多芬拒绝把他的《英雄》交响乐章献给皇帝——共和理想的一个叛徒（参见第八章，二，原文第234页）。虽然法国在科学领域中占有优势（参见第五章），然而，甚至对政治波动在原则上不如文学艺术那么敏感的科学，在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也呈现出一些民族特征：科学家们抛弃了拉丁文或者法文，而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文章。

在那些岁月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帝国体系的有力辩护。政治和经济思想家们或者像让-巴蒂斯特·萨伊那样提倡自由主义，或者拥护重新恢复以前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崇拜伯克以及理论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路易·德·博纳尔（参见第四章，原文第105—106页）。拿破仑统一欧洲的企图，在知识分子中间得不到比在政治家或

者人民中间更多的支持。单凭一个人的意志，或者说得不到欧洲大多数居民全心全意的支持，不可能建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帝国”的脆弱结构出现得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它注定是要毁灭的，它也一定会很快垮台的。

正是拿破仑本人由于在1812年对俄国作战，想用武力把俄国保留在“大陆体系”之内，而加速了帝国的灭亡。1812年俄罗斯战役的惨败，激发了德意志、西班牙以及“大帝国”所有各地对他的反抗。1813年春，他在德意志打了几次胜仗，但在莱比锡战败（1813年10月16—19日）之后，法国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莱茵河。1814年1月，法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受到攻击。盟国巧妙地宣布说：它们并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只是同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宣言所提出的条件的那个人作战。在1814年前三个月里，皇帝率领人们称为“玛丽-路易丝”的由新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取得了几次辉煌的战略上的胜利，但也无济于事。他既不能击败占压倒优势的盟国军队，也不能把绝大多数法国人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一度是那么温顺的元老院和立法院要求和平，恢复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

3月9日，联盟国终于签订了它们自1793年以来非常不幸地未能达成的总条约：它们同意不单独进行谈判，而继续作战直到击败拿破仑为止。然后，联军的司令官们集中他们的兵力，毅然决然向巴黎进军。3月30日，他们抵达法国首都的大门口，而拿破仑却已经移师向东，去攻击他们的后方。法国当局既然用不着害怕皇帝，就赶紧进行谈判。元老院建立了以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塔列朗宣布皇帝倒台，并且也没有和人民协商，就请求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还朝，后者在联盟国中只有英国是坚决的支持者。拿破仑匆匆赶到枫丹白露，他的将军们强迫他放弃斗争并宣布退位。联盟国准许他退居于他的故乡科西嘉和意大利海岸之间的厄尔巴岛。

于是，法国的未来由巴黎条约确定下来。它保留1792年的国界，再加上萨伏依的西部、米卢兹和萨尔布鲁克。在它的殖民地中，它仅仅保有了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圭亚那、塞内加尔的几个贸易站和波旁岛。

法国被迫退回到1792年的国界线，但是保留了在1792年已经确实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的主要部分：废除封建制度，出售教士和逃

亡者的财产之后的土地再分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户籍不再由教会掌管，教育和行政的改组。所有这些变革都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得到巩固，在法国建立的任何政权，再也不可能不接受以“1789年原则”为基础的一切经济的、社会的、行政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制度。只有政治体制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1814年以立宪形式恢复的君主政体在1830年企图抛弃这些基本原则的时候，余烬未熄的革命火花再一次燃烧起来把它摧毁。18年后，革命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1789年胜利果实的主要内容。

（陈复庵 译）

[\[1\]](#) 国民公会最初几个月的事件（从1792年9月21日会议起，到1793年2月1日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止）在第八卷第二十四章中已有叙述。这里只重复一下主要的情节。

第十一章 拿破仑的冒险

拿破仑最后一次但并非最小的一次胜利，是在圣赫勒拿岛获得的。他在那里创造了拿破仑传奇；他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足以使他正确地剖视自己的一生经历，重新予以解释，以便适应后来决定19世纪欧洲进程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于是波拿巴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被保留下来，第二帝国的基础便奠定了。虽然他在流放中经常抱怨说，他的一生经历本应在莫斯科告终，但是“百日王朝”和圣赫勒拿岛上的“殉难”，却使他的经历平添了希腊悲剧的成分，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终于招致了应得的惩罚。就像莫扎特的乐曲《唐乔万尼》（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前不久听过这一乐曲，颇为让人意外的是，他竟表示赞赏）一样，他的性格和经历把典雅的成分和由浪漫的、疯狂的和无限野心所构成的粗犷曲调融为一体。

圣赫勒拿岛的扑朔迷离和传奇，依然使人们难以认识拿破仑的真面目。^[1]本章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作为一个既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又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人物，对他作一番介绍；并对他的性格与当时在欧洲起着作用的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分析。

拿破仑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的阿雅克肖，那正是法国占领该岛的一年。他的父亲卡洛·波拿巴抛弃了爱国领袖保利将军的事业，在法国行政当局中跃居高位。由于法国总督的从中帮助，他为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军校谋得一席之地，后来拿破仑便由此进入巴黎军校。这两所王家学校都是排他性的，需要有贵族出身的证明才得入学。

拿破仑在同学中间显然显得有点孤僻，因为他始终不平地认为自己在法国征服者中间是一个异族爱国者。他在数学方面的才能，很快就为人所瞩目。他在参加为选拔炮兵而举行的毕业考试中，名列全国第42名，并被授予中尉军衔。他像炮兵中大多数出身于小贵族、比正规团队的军官受过较好教育的青年军官一样，热情地欢迎革命的到来。他在1791年写了一篇得奖论文，反映出卢梭的精神。当制宪会议决定把科西嘉并入法国的时候，他在科西嘉的政治活动中支持法国人和雅各宾派，并且经陆军部批准，从正规军调职到科西嘉志愿营。他

的第一次作战经验，是1793年参加了对撒丁的贸然入侵。由于法国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保利将军，遂促使科西嘉发生内战和英国人占领该岛。

波拿巴家族作为亲法派的领袖，被迫流亡土伦。在土伦向英国舰队投降的危急关头，拿破仑有幸就在附近。他第一次获得了巨大机会，应召代替那个因指挥围攻土伦港的雅各宾派军队的炮兵而负伤的军官。他所拟定的攻击重要据点埃吉莱特堡的计划送到了巴黎，成为卡尔诺的命令中的基本内容。这一计划成功地付诸实施，并于1793年12月收复土伦，这使拿破仑晋升为准将。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在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连的一封信里，把拿破仑说成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炮兵将领”。

葡月危机时，他有幸恰恰又在巴黎。那时他已经受到过两次挫折，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在1794年热月（7月）罗伯斯庇尔派垮台并被处决之后所进行的整肃中，他由于和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有过交往而被逮捕，但经过一次审讯就开释了。随后政府怀疑科西嘉受英国影响，就把科西嘉军官调离意大利方面军，拿破仑被派到旺代前线。他抵达巴黎后就借口患病，避不接受这一命令。但就在葡月危机（1795年10月5日）爆发前两个星期，因为他拒绝向西部军报到，他的名字就从将领名册上勾销了。当巴黎各区起事反对新成立的督政府时，巴拉斯奉命指挥政府军。此人在土伦事件发生时曾作为代表，衔命前往南方。现在他召来拿破仑作为炮兵专家。因此，正是他的“葡萄弹的硝烟”摧毁了巴黎给予共和政府的最后一次威胁。

论功行赏，拿破仑晋升为少将，并受命担任内防军司令。人们往往这么传说，他在1796年3月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是他同巴拉斯遗弃的情妇约瑟芬·博阿尔内结婚时，巴拉斯送给他的结婚礼物。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督政官之一拉雷韦耶尔的说法，这是督政府严格根据军事方面的理由一致作出的决定。自从1794年以来，拿破仑就不断怂恿政府在意大利发动攻势，但卡尔诺认为，在普鲁士和西班牙于1795年退出战争之前，这是无法实行的。当谢雷奉命率领意大利方面军发动攻势时，他显得那么犹豫不决，于是督政府就决定以筹划并保证完成这次进攻战略的人来代替他。

不出一个月，拿破仑在蒙特诺特和芒多维附近连战皆捷，把皮埃蒙特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并在洛迪战役中迫使奥地利军队撤至曼图亚附近的四边筑有工事的堡垒中，然后于5月中旬进入米兰。他在圣赫勒拿回首往事时，认为洛迪是他的事业和他的观点中的一个里程碑。

“只是在洛迪战役以后的那天晚上，我才体会到自己是个杰出人物，开始抱有完成大事业的雄心，而在此之前，这在我的思想中只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这时候，他在一次和前途息息相关的较量中，迫使督政府作出让步。督政府并不打算征服伦巴第；他们只希望利用它，在全面和约中以它交换莱茵河边境地区。现在他们建议把意大利方面军的指挥权一分为二：克勒曼去占领伦巴第，拿破仑则挥师向南，去劫掠罗马和那不勒斯。由于拿破仑竭力反对，这一命令撤销了。拿破仑屡战屡胜的威望，以及因之而源源不断运往巴黎的金钱，已经使他能够左右政府了。

这时他写信给卡尔诺说：“不久我就可能进攻曼图亚。如果我占领该地，那就谁也无法阻止我深入巴伐利亚了。”但是，莫罗未能在莱茵河发动攻势，致使奥地利人使用内地交通线，发动猛烈反攻夺取布伦内罗山口，于是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拿破仑只得被迫采取防御战略。奥地利人在卡斯蒂利奥内（8月）、巴萨诺（9月）、阿尔科拉（11月）和里沃利（1797年1月）诸战役中，相继发动了不下四次反攻，但往往都是功亏一篑。

及至1797年3月，拿破仑得到了增援，得以取道乌迪内迅速向维也纳推进。在离维也纳不到100英里的莱奥本，他为签订和约进行初步谈判，根据这一和约，法国将保留比利时和伦巴第，而奥地利得到威尼斯作为补偿。巴黎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他造成的既成事实。在立法机构中，温和派和保王党人有可能居于多数，他们有可能在里尔谈判中与英国媾和，并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这种危险迫使雅各宾派督政官巴拉斯和勒贝尔与拿破仑采取一致行动，于是他把奥热罗派往巴黎，发动了反对立法机构的果月军事政变（1797年9月）。拿破仑兼并意大利的计划因而在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中得到了批准。在担任意大利总督的末期，他几乎毫不掩饰他对督政府的蔑视和在法国夺取权力的野心。他曾经对随从人员说：“你们以为我在意大利打胜仗，是为了让督政府中的那些律师占便宜吗？”

他在塔列朗支持下劝说督政府把入侵英国的计划改为远征埃及（参见第十九章）。他指责该入侵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而威胁印度则对于即将发生的激动人心的行动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他认识到，“在巴黎，什么事情都不会长久地为人们记忆的。如果我长时间仍然无所作为，我就将完蛋”。

远征的规模如此庞大，包括一个由各学科的科学家人组成的队伍，可以令人设想它的目标是要在埃及建立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如果情况顺利，就利用它作为踏脚石进而征服印度，在那里为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机会是多得很的。1797年，阿瑟·韦尔斯利就已预见到法国与土著王公接触的危险性。“他们不久即会运用他们从欧洲学到的新方法去训练人数众多的军队，对于东印度公司常备部队的少量战斗人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加可怕的了。”拿破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喜欢说他围攻阿克尔半途而废，这就“失之交臂没有掌握住他的命运”。但是在那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尼罗河战役已经打消了继续东进的任何希望，而他的远征叙利亚则是一次有限的附带行动，用来先发制人防止土耳其人的进攻而已。奇怪的是，尼罗河战役虽已决定了远征埃及的命运，却也给予拿破仑在法国夺取权力的机会。他居然能够把尼罗河的败绩归罪于他的海军将领，而在他返回法国之前，他在阿布基尔打败土耳其人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尼罗河战役使反法联盟死灰复燃。土耳其、那不勒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接连参战。由于儒尔当在莱茵河畔施托卡克战败（1799年3月），儒贝尔在诺维败北（1799年8月），整个意大利都丢掉了，法国似乎有再一次遭到入侵的危险。8月初，拿破仑收到了几份法国报纸，从而知道了欧洲的形势。三个星期后，他秘密乘船离开了亚历山大。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他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埃及远征军的命运取决于在欧洲获得的胜利，而且危急关头已经到来，他要么上台执掌最高权力，要么上断头台。

拿破仑抵达法国后，陆军部长贝纳多特提出：由于他没有接到命令就离开自己的军队，应该对他进行军法审判。但是，公众舆论的反应使政府一筹莫展。拿破仑从弗雷儒斯到巴黎的一路上，人们向他欢呼，把他当作唯一能使共和国重新取得胜利与和平的人物。雾月政变的重要意义已在第十章（原文第294—295页）中分析过了；显然，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拿破仑在这样一个时刻抓住了法国人民的心理，即他们正感到雅各宾恐怖统治和异国入侵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西哀士和

政治家们认为他们既能够利用他的声誉，也能够把他掌握在手中；结果呢，却是拿破仑压倒了那些政治家。但是执政府和拿破仑的专政能否存在下去，一直是个问题；直到获得马伦戈大捷，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和亚眠和约，在国内又签订了政教协定，它才具有极高的威信。

1796—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的各次战役几乎像是奇迹；一年中取得12次大捷，一经公告，就像晴天霹雳似的震撼了全世界。它揭示一种新型的“闪电战”，于是人们势必把它归功于司令官的天才和革命军队的锐不可当。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它似乎是七年战争以来形成的战争理论和条件发生变革的顶点。从拿破仑早期的军事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的职业军官，吸取了创立一种运动攻击战的学说的布尔塞、吉贝尔和迪泰尔等军事思想家的思想。但是要实现这些思想需要有一种能够从个人主动精神代替机械训练和军纪的新式军队。正如吉贝尔在1772年所预言的那样：“在帝国臣民成为共和国公民的国家里，建立战无不胜的军队将是容易的。”到1796年，革命已经创立了这样一支军队。革命时期大批正规军官移居国外，使普通军士出身的、如意大利方面军的马塞纳和奥热罗这样年富力强的青年将领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师级以上能够指挥作战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特别缺乏，这就令人不难理解，像具有拿破仑这样条件和经历的人，为什么能够在27岁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岁数时就当上了高级指挥官。

这样，拿破仑在他的第一次战役中（这是他以后历次战役的样板）就掌握了使新的理论变为事实的工具。然而，探讨拿破仑的作战方法的来源并不是要贬低他的军事天才。他本人说过：“一切事情都在于实行”，这是关于战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区别的至理名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一个愤慨的法国将军曾经叫嚷道：“拿破仑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他只不过是不得不对联盟军作战而已。”对于这种话，拿破仑可以像回答他的一位部长那样回答道：“你显然没有参加过瓦格拉姆战役”，在那里，光是奥地利军就是很难对付的敌人。在1796年之前，没有一个法国将军能够像拿破仑那样进行那么大规模的攻击战，在他那个时代中，没有一个将军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据说，拿破仑忽视战术上和技术上的革新。的确，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是1789年很久以前设计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设计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迟误不能仅仅归咎于军事

上的保守主义，人们不能指责革命政府或者拿破仑对科学缺少兴趣。拿破仑以自己成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而自豪，他和一些杰出的法国科学家关系密切，经常向他们请教技术问题。不错，他撤销了在弗勒吕斯战役（1794年）中初次使用的军事气球观测队，但在1802年，他曾经指示火炮专家马尔蒙重新设计野战火炮。战火的重起打断了这一计划，然而不论如何，它也只能是对3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格里博瓦尔的精妙图纸作一些加工而已。事实上，革新的停顿是当时技术上的普遍情况，即使在技术革命发展最为迅速的英国也是如此。在另一方面，工业已经发展到足以装备大批新兵的程度。瓦尔米战役（1792年）是迄今所知一次最大的炮战，法国在1793年生产了7000门大炮。军事领域中技术的迅速变化不利于军事天才的出现，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而技术上趋于稳定时期倒最能发挥拿破仑的指挥才能。

拿破仑很少干预小型战役的战术，因为他的职责是掌握作战的全局。但是，他在军队组织中进行革新的广度往往被人忽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扩充近卫军。1810年8月，他把一个很长的关于建立近卫军的备忘录送交贝西埃尔，决定把它扩充到100个营，或者说总数达8万人。有时候，人们把建立近卫军说成是一种应急措施，借以弥补拿破仑的部队不断降低的素质。但在1810年，他已经能够获得相当长的喘息时间，并不十分缺乏兵力。

近卫军的意义在于：它和其他军队的警卫队不同，是包括有各兵种的一支部队。它的精锐炮队由杰出的德鲁奥指挥，此人以“大军中的贤哲”著称。近卫军的士气和团结精神都极为旺盛。拿破仑对于他精心建立的近卫军如此重视，以致在鲍罗季诺战役中不肯牺牲它，但是，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却在冰天雪地中几乎覆灭。为了进行1813年的战役，只得依靠幸存的一点骨干重建近卫军。即使如此，它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的历次战役中依然是决定性的武器。1813年6月，拿破仑写道：“在大多数的战斗中，近卫军炮队总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它始终近在身边，在需要它的任何地方，我都能动用它。”他在报告蒙米赖大捷（1814年2月）时写道：“老近卫军超过了我对一支精锐部队所抱的一切期望。它就像美杜莎^[2]的脑袋一模一样！”如果作为政治家的拿破仑没有让作为将军的拿破仑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近卫军的大部分老兵没有在俄国丧失的话，他在战场上很可能仍然是无法打败的。

克劳塞维茨在试图分析拿破仑战争时承认说，战略不能归结为一个“体系”。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缅怀往事的时候，嘲笑战争的“准则”：“一个永远不能实施的，即便实施也不了解会给军队造成多大损失的准则，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不错，拿破仑在他的历次战役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以混成师为单位分散前进和集中作战。因此，他的笔下常有“重新集结部队”的词句。但是，他对这一原则应用得极为灵活，因而没有两次拿破仑战役或战斗是相同的。像奥斯特利茨、瓦格拉姆、鲍罗季诺和滑铁卢这样一些“按照固定形式进行的”战斗则是例外。在正常情况下，战斗总是一步一步进行的，而且是在混乱中进行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使新的师团赶到战场来扭转局面。如果说奥斯特利茨战役是拿破仑战术上的杰作，那么，他在乌尔姆的战斗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所采取的战略方案事先就决定了奥地利的麦克将军及其5万官兵的投降。拿破仑在战略上爱用的策略充其量可以说只有两种：一是从侧面威胁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如在马伦戈战役、乌尔姆、耶拿、弗里德兰、斯摩棱斯克（这一次没有奏效）和蒙米赖那样；二是攻击正面分散很宽的敌人的中央部分，以便逐一地将敌人击败。这就是他在皮埃蒙特第一次战役和滑铁卢的最后一次战役中使用的战略。

滑铁卢战役的构思依然是光芒四射的，但是被执行中的差错毁掉了。与1814年比较起来，拿破仑这时有一支由被释放的战俘组成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士气高昂，但很脆弱；有几个将军由于接受波旁王朝复辟而失去信任。作战前夕，布尔蒙将军带着参谋人员开了小差，使必胜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拿破仑未能把无可替代的参谋长贝尔蒂埃请回来，苏尔特的替代是不能胜任的，还不如留在巴黎当陆军部长的达武。内伊自从背叛了路易十八，带着军队投奔拿破仑以后，内疚使得他心绪纷乱。格鲁希是个很好的骑兵司令，但没有独立指挥的经验。缪拉在1814年背叛过拿破仑，因而已经失宠，最后以托伦蒂诺战役遭到惨败而告终。

1815年6月初，在比利时边界线上的联军大约是9万名比利时人、荷兰人、汉诺威人和英国人，由威灵顿统一指挥；另有12万普鲁士人由布吕歇尔指挥。拿破仑的计划是趁他们沿边界线分散驻扎时，突然发动袭击。到6月14日，他已经在边界线上的沙勒罗瓦集中了12万兵力，但这时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甚至对他要发动攻势毫无所悉。他向元

帅们说明，他打算分成两翼作战，留一个预备队，分别打击英国人和普鲁士人。15日，法军与一支孤立的普鲁士部队遭遇；16日，布吕歇尔便把9万人集中到林尼。拿破仑命令内伊在四臂村牵制英国人，并把能够抽调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派去攻击普鲁士军右翼，而他本人则进攻他们的中央。拿破仑击退了普鲁士人，但是决定性的包围运动却失败了，因为戴尔隆的部队所接到的拿破仑的命令和内伊的相互抵触，两个战场他都没有及时赶到。

要不是这次乱中出错，林尼战役可能就是决定性的胜利。结果，拿破仑在几小时之内就失去了战略的主动权。正如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所指出：“这次战役就是在16日下午9点到17日上午9点这12个小时之内输掉的。”^[3]布吕歇尔在夜色掩护下脱离接触，他大胆地决定朝北退向瓦弗，而不是向东退向他的基地。拿破仑由于过分疲劳，也由于过分自信，认为普鲁士人总得有好几天不能作战，于是直到17日中午才决定和内伊会师共同对付威灵顿，并派遣格鲁希率领3.3万人去追击普鲁士人。可是一直得不到指示的内伊在17日晨虽竭力作战，却不能把威灵顿牵制在四臂村。威灵顿退往蒙圣让的坚固防御阵地，而拿破仑在追击威灵顿的途中却为大雷雨所阻。

6月18日晨，拿破仑率领7.4万人面对着拥有6.7万人的威灵顿。决战的舞台已经部署就绪了，因为拿破仑以为普鲁士人已经失去战斗力或者已被格鲁希牵制住了，而威灵顿却接到布吕歇尔的通知说，至少有一个普鲁士军团在中午时分可与他会合。拿破仑麾下曾经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将军们警告说，英国部队轰击密集纵队的火力是极为可怕的，但是拿破仑对此置之不理。他已经决定向中央发动密集的正面攻击，并把战斗中战术的掌握交给内伊。可是这一次内伊却是英勇有余而智谋不足。炮兵专家德鲁奥劝拿破仑把开始作战的时间推迟到中午，以便让地面晒干。12点30分，有一个纵队接近他的右翼，查明是普鲁士人。这时拿破仑本来可以停止战斗，不过战机可能错过了，他宁愿冒险在普军可能介入之前先击溃威灵顿。

格鲁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拿破仑在6月17日中午给格鲁希的命令中，要他向冈布卢推进，并在那慕尔和列日的方向寻找普鲁士人。18日凌晨2点，拿破仑接到依旧停留在冈布卢的格鲁希的报告说，有一个普鲁士军团在瓦弗。直到上午10点，苏尔特才通知格鲁希“向瓦弗运动，向我们靠拢，与我们建立联系”。接着催他赶快行动的两个通

知直到下午4点和7点才送到他那里。这时候，格鲁希已经听到滑铁卢战役开始时的炮声，他正确地判断：这时要渡过迪勒河向炮声响处进军已经为时过晚。但是，如果他拿出更大的魄力在18日晨而不是在下午4点在瓦弗大举进攻的话，他完全可能阻止或决定性地推迟普鲁士人从瓦弗侧面进兵。即使格奈泽诺过分低估了格鲁希的兵力，在指挥普鲁士军向前推进时也是会有所踌躇的。

格鲁希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本身的处理失当，一方面是拿破仑的失误。在惨败以后，他为自己辩护说：“在战争中，只有总司令才可以凭灵机一动，突生妙计，他的副手只能严格执行命令。”这番话也揭示了格鲁希的个性。他未曾表现出主动精神、权威或者魄力：他以呆板的服从命令为借口来回避责任，而他接到的拿破仑的命令却是不够确切的，而且为时也太晚。他们都没有认真考虑布吕歇尔在林尼战役后能恢复元气，及时与威灵顿会合的可能性。如果拿破仑考虑到这一点，他就会在17日晨命令格鲁希以全速向瓦弗进军，夺取迪勒河的渡口。不管怎么说，在决战中让独立的一翼处于遥不可及的地方，这是和拿破仑的根本战略背道而驰的。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曾由于冒这种风险而几乎败北，只是因为道路不好行军缓慢，德塞能及时与他会师。

尽管有了这种失误，只要迅速击溃威灵顿，一切还能挽救过来。当内伊作出错误决定，先派出没有骑兵支援的步兵纵队，然后又派出没有步兵支援的骑兵的时候，已经失掉取得胜利的最好机会。在德鲁奥的猛烈炮火准备以后，各兵种谨慎协同进行攻击，就可能迫使敌人组成方阵，这时再由骑炮兵和分散的炮兵发射霰弹，就能使他们化为齑粉。牵制拿破仑1.5万名后备队的普鲁士军，此刻大批赶到；再加上近卫军在下午7点以后发动的最后的、势力已经减弱的攻击也告失败，最后终于使法军惊惶溃败。

这就表明，拿破仑在他的最后一次战役中已经精力不支，不能忍受战斗的疲劳，使战事顺利地发展下去，并作出明确的决定。他后来承认道：“我的内心里已经不再有稳操胜券的感觉。”

但是，尽管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他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年轻时就在激烈的科西嘉政治斗争的洪炉中学会了怎样判断人和对待人，他关心政治和文

学就像关心军事一样。仅仅作为一位将军是制服不了那些政客的，也不可能像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所能做到的那样，建立起一个全民复苏、举国一致的政府的。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这样说：“我并不是作为一位将军来统治法国；这是因为举国上下一致相信我具有一个统治者的治国才能。”作为第一执政，他有时一天工作18个小时。据估计，在他15年的统治期间，大约口授了8万封信函和命令，平均每天15件。罗德雷对他说，杜伊勒里宫中的生活是抑郁寡欢的。“是的”，拿破仑说，“伟大也是这样。权力是我的情妇，但我是像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权力。我爱它就像一位音乐家爱他的小提琴一样”。他自己有一次这样说：“我死了以后，他们会怎么说我呢？他们会‘喔唷’一声的。”1807年3月，他写信给约瑟芬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把我的一切——安宁、兴趣和幸福，都奉献给了我的命运。”

他传奇般的工作能力，似乎是出于他的意志力和高度紧张的神经活力，而不是因为特别强健的体魄。到最后，他不得不以早衰作为代价。甚至在1805年之前，他就已经两度出现类似癫痫的神经危机。夏普塔尔写道：“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见到他的人都注意到他的体质和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认出这个衰老、肥胖、时常昏昏欲睡的人，就是以前那个身材细小，精神抖擞、精力旺盛的第一执政。在1812年和1813年历次战役的关键时刻，他的精力和判断力都因为身体失调而有所衰退。

他手下的一个部长莫利昂证实道：“他在野外宿营以及进行军事行动时，不仅希望要亲自统治法国，而且要亲自治理法国，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不允许他的部长们集体负责，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国务秘书马雷来加以协调的。只有塔列朗和富歇能够与他当面对面。但是当塔列朗在1808年、富歇在1810年失去官职以后，夏普塔尔的这句评语就得到了证实，即拿破仑要的“只是奴才，而不是顾问”。甚至当皇帝的宫廷在豪华和繁文缛礼方面都超过波旁王朝宫廷的时候，拿破仑的私生活依然是简朴、勤劳，甚至是小市民式的。花花公子缪拉对他说，他的衣服不时髦。他的裁缝抱怨说，账单上的钱数太少了。他从来没有搞过波旁宫廷那种正式的朝觐。约瑟芬也好，玛丽-路易丝也好，或者他的哪一个情妇也好，都不允许施加任何政治影响。他粗暴地对待斯塔埃尔夫人，因为他既害怕又讨厌她自命为“女政治家”。他对雷米扎夫人说：“在他的宫廷里，他不允许由女人来统治；她们

毁了亨利第四和路易十四。”拿破仑经常对他的兄弟们讲授统治术。他对荷兰国王路易说：“一个君主在他统治的第一年里被人认为是和善的话，在第二年里就会受到嘲笑。”“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都只是靠我造成恐惧来进行统治的。”他告诉年轻时的朋友布尔里埃内说：“友谊只是一句空话，我对谁都不关心。”他向他的秘书A. J. 凡吐露真言说，他发脾气往往是假装的，为的是让人感到害怕，“否则，他们会恩将仇报”。

像这么一种残酷无情的暴君形象，远远不是拿破仑整个的真实写照。从他的出身和脾气来说，他是一个地中海人，热情而暴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爱交际，健谈，对人对各种思想都极感兴趣。他既懂得如何令人望而生畏，也懂得如何令人倾倒。他的亲密伙伴科兰古，当了10年的侍从长和外交大臣，科兰古这样记载说：“皇帝的感情是通过每一个汗毛孔表示出来的。只要他愿意，谁也不能有比他更大的魅力。”他超人的才智配上了惊人的仪表，尽管脑袋大，而且身材比较矮，只有五英尺六寸高。大卫所画的理想化的肖像以及拿破仑庞大的图片宣传机构出产的其他肖像画可能会使人怀疑，但是拿破仑死后用石膏制成的面形确实显示出了古典美的特色。雷米扎夫人是拿破仑倒台后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人，这样描绘了他的外貌：“他的前额、他眼睛的位置、他的鼻子的线条全都是美丽的，使人觉得像是古代的一个圆形浮雕。”

在军事思想上，拿破仑个性的影响是无可抗拒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一个将军最重要的品质是了解手下兵士的性格，获得他们的信任。”“军队就像是共济会，我就是他们的大长老。”他以空前精湛的手段玩弄军人荣誉、竞争和袍泽情谊等感情，即使灾难和杀戮都不能打破他们之间的联系。甚至在心惊胆寒地从莫斯科撤退之际，他的军队里的怨言也要比当时威灵顿的军队撤离布尔戈斯时的怨言少。威灵顿认为，拿破仑和军队在一起，对士气的影响相当于4万名士兵。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职业技巧和胜利带来的威信。马尔蒙解释说，这是因为“皇帝与士兵亲密无间，士兵因而崇拜他；但这只是杰出的常胜将军才能采用的一种方法；别的任何将军如要这么做，就会有损于他的名声”。拉纳元帅经常诉苦说，他自己“应该得到同情，因为他不幸热爱上了这个‘婊子’”。1815年拿破仑登上“伯雷勒芬”号的时候，身体肥胖，已届中年，而且已彻底失败，可是两三天之内，

他把官兵迷得神魂颠倒，连英国海军部都感到吃惊。“这个该死的家伙！”海军上将基思勋爵嚷道，“如果他有机会与国王陛下会见，不出半小时，他们俩就会在英国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拿破仑的个性是智慧和想象力的光辉结合。他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那时候，社会习俗的坚硬外壳已被冲破，对于头脑清楚、意志坚强的人来说，不可能做到的事似乎是没有的。启蒙运动的科学的唯理主义精神和卢梭的浪漫主义情感，这两种激发革命的强大力量塑造了他。他年轻时写的文章中的那种浪漫主义，很快由于强烈的利己主义而变质，正如他的文体已经改变，不再夸张地模仿卢梭的了。但是，他的性格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并未消失，反而转变为一种浪漫主义的野心，其所以说是浪漫主义的，是因为它漫无止境，充满完成远胜古人的伟大业绩的梦想。对于腓特烈大帝那种经过仔细盘算的有限野心，拿破仑已经感到不满足了。1804年他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我相信我的命运注定是要使世界的面貌改观。”“如果我成功了，我将成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人物。”作为拿破仑的协理专员之一一起家的莫莱，认为“他更多关心的是树立盖世无双的名声和无可超越的光荣，而很少关心身后留下一个‘家系’、一个王朝”。他热爱高乃依和平庸的莪相的诗歌，是因为它们的主题是歌颂英雄的光荣。他的异乎寻常的崛起应归功于他的想象力和智慧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但是，如果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如果想象力变得无法控制，而对于一些事实的现实评价又无法为人理解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莫斯科和圣赫勒拿岛，正如奥斯特利茨和帝国一样，在他的天性中似乎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他在革命时期的经历使他极端害怕暴民和“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自信心和内心的勇气曾经两度发生动摇，一是雾月在圣克卢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议员们的时候，一是前往厄尔巴岛的路上在普罗旺斯遇到保皇党暴民的时候。他打算在执政府的主要工具参政院里搜罗各党各派最有才能的人，不问其过去如何。夏普塔尔说：“波拿巴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捏合在一起，把10年来在性格上和意见上截然相反的人，互相憎恶的人，彼此曾经排斥的人，都肩并肩地放在同一个委员会里。波拿巴就是用这种方式集中了每个领域中的所有人才，使所有派系混杂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法国革命的历史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一样遥远。”1803年，他在参政院设置了协理专员的职

务。这是一些隶属各部的年轻人，可以列席参政院的会议，以便得到锻炼，担任较高级的文职官员。他们经常被派去执行特殊使命，并直接向拿破仑汇报。到1813年，拿破仑已经任命了300个协理专员，并给予他们以各种鼓励。他吹嘘说：“我能够无往而不胜，因为在我的士兵和我的协理专员协助下，我能够征服并统治整个世界。”拿破仑具有这样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想法，至少超越他的时代50年。他声称自己已经建立了“从未有过的最严密的政府，其运行最为迅速，其行动最为有力”。“人们愿意受到什么样的统治，我就怎么样去统治。”执政府完成的一些重大事项——民法典、政教协定、荣誉勋位和法兰西银行，其中有很多是正确合理、经久有效的，因为它们符合革命时期的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和希求。

拿破仑尽管绝顶聪明并有追求实事的热情，但他在政治洞察力方面却有着致命的局限性，在他的政策中有着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他所不能发现或者不愿解决的。他始终是他继承的传统和他所处的环境的俘虏。他在1794年离开科西嘉，但是他与自己的家族和追随者的关系，表明科西嘉宗族集团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这严重地妨碍了他的政策的推行。他对当甘事件的反应，显示了科西嘉人对家族间仇杀观念的一种基本想法。“他们没有谋杀我的权力！”当他获悉阿图瓦伯爵参与卡杜达尔密谋案时，这样大嚷道。他没有参加对路易十六的处决，如果波旁家族不顾这一事实而硬要谋害他，他就有权杀死对方家族集团的一名成员。拿破仑一直认为内伊元帅之被处死应该由威灵顿负责，于是在他的遗嘱中也出现了有关这种想法的一个古怪例子，即把他的一点遗物送给曾经试图暗杀威灵顿的一个人。他对年轻时的朋友毫不忘旧。曾是军校学生和尉官的他的密友德马齐，从逃亡国外返回法国后，就马上被任命为皇宫内掌管服饰的官员。老保皇党人马雷夏尔·德·塞居尔曾经签署授予拿破仑初次获得的中尉军衔，在杜伊勒里宫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把他的老保姆从科西嘉找来，参加他的加冕典礼。

他对于波拿巴家族的要求则更加无法抗拒了，虽然对他更为爱戴、更为忠诚的却是博阿尔内那一边的亲属。他的继子欧仁·博阿尔内在意大利是个忠心耿耿、很有办事能力的总督，但是拿破仑始终不敢立他为皇位继承人，唯恐这样会过分冒犯他的波拿巴亲属。1804年，富歇责骂拿破仑的兄弟们“无能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如果

说他们缺乏拿破仑的才干，却是异常任性和充满野心；不论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姐妹，都没有被他们杰出的弟兄压服。他们的抱怨、生气和自命不凡使拿破仑极为恼怒，以致诉苦道：“从他们说话的口气看来，别人会以为我把父亲的遗产处理失当了。”“我总是和那不勒斯王后吵得不可开交。”由于他觉得对家族具有一种责任感，于是在建立帝国的时候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让他的亲属担任各国的国王。约瑟夫，先是那不勒斯国王，随后是西班牙国王；路易是荷兰国王；热罗姆是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他们都不称职。如果拿破仑希望他们服从他的命令，那么他很快就感到了失望，因为他们希望他把他们当作独立的君王。拿破仑认为吕西安第二次结婚不是门当户对，可是吕西安拒绝解除婚约，在1802年以后总和他吵架。1807年年底，拿破仑希望让吕西安的女儿夏洛特和西班牙王位继承人费迪南德联姻；但是吕西安拒绝按照拿破仑的条件重新加入皇族。

拿破仑对待缪拉和贝纳多特的态度就越发奇怪了，这两个人都以最厚颜无耻的背叛来报答他。他知道缪拉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在政治上毫无用处；但是他依然让他当那不勒斯国王，因为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卡罗利娜。贝纳多特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在1804年的叛逆案中幸而没有被捕。拿破仑在1809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贝纳多特是我不能信任的阴谋家。他几乎使我的耶拿战役遭到失败，他在瓦格拉姆表现平平，他在奥斯特利茨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拿破仑却让他当上元帅，封他为亲王，默许他为瑞典王储，仅仅因为他的妻子德西雷·克拉莉是拿破仑最初想与之结婚的姑娘，而且是约瑟夫的小姨子。

拿破仑对于他手下将军们的品德的判断却是英明的。他认为德塞如果不是在马伦戈阵亡，将是“法兰西首屈一指的将军”；拉纳如果没有在埃斯林战死，也可能是这样。内伊和缪拉在战场上作为带兵的将领是盖世无双的，但不过仅此而已。贝尔蒂埃是个极好的参谋长，如果让他独自去干，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只有马塞纳、达武，可能还有苏尔特，才能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因此，1808年他让朱诺指挥葡萄牙方面军，1811年任命马尔蒙为司令去和威灵顿作战，仅仅因为他们是他年轻时的朋友和随从参谋，这都是违背他自己的正确判断的。与此类似的、付出重大代价的错误是：在1812年的俄国战役中，

让他的弟弟热罗姆去指挥一个军团，以及在撤离莫斯科的最后阶段中，当缪拉显然已经慌张失措的时候，还让他去指挥大军。

拿破仑在使他的将军们不过问政治方面是成功的，但其代价为不断赐给他们荣誉和财富。1808年设立拥有世袭称号和大片地产的皇室贵族，公然与革命的平等原则背道而驰。拿破仑为此辩解道：“我对某些人不问其出身如何，赐给他们称号，这并没有损害平等的原则，何况平等原则现在已经被推翻了。”他还说，必须消除旧王朝那些贵族的声望。他在1808年对约瑟夫说：“我的意图是让将军们成为如此富有，我就永远不会听到他们由于贪财好货而玷污最高尚的职业，或招致士兵们的轻视。”但是他鼓励元帅们奢侈过度，成了精神上的堕落，在帝国终于崩溃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只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不是为他们的恩主战斗到最后一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首先赐封为世袭公爵的勒费弗尔，当元帅们1814年在枫丹白露强迫拿破仑退位的时候，他脱口说了句真心话：“难道他以为我们有了称号、荣誉和土地以后，就会为他而杀掉我们自己吗？”

前雅各宾党人蒂博多警告拿破仑，不要恢复世袭君主政体，但是拿破仑却认为在革命造成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建立“法兰西第四王朝”。1804年加冕以后，尤其在和奥地利联姻并生下罗马王以后，他希望他的王朝已经获得了合法的承认。他娶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女以后，甚至养成了一种可笑的习惯，把路易十六叫作“我的姐夫”。他难以相信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会共谋摧毁自己的女婿和外孙，等到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亨利·贝尔（即作者司汤达）作为一名协理专员，有时和拿破仑接触密切，他说：“拿破仑犯了一切暴发户所犯的错误，把他自己跻身于其中的那个阶级估计过高。”他没有认识到，在法国，君主政体的原则已经随着路易十六而一起死亡。资产阶级也许准备承认暂时性的拿破仑专政，但是他们迟早会要求在政府中分享一杯羹。1812年10月的马莱阴谋案，只是宣告拿破仑已在俄国阵亡，政府就几乎被推翻，而且没有一个官员想到要拥立他的儿子为拿破仑二世，这件事使他极为震惊。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回来，在巴黎发现的舆论趋向甚至使他更为震惊。他不得不接受斯塔埃尔夫人的朋友、“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拟定的一部自由主义宪法，作为“帝国宪法补充条例”。在“五月校场”举行颁布新宪法的

隆重仪式时，拿破仑身穿加冕时穿的服装，上面有精工绣制的仿文艺复兴时期的图案，这和他的个性以及时代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拿破仑赞赏宗教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这很可能开始于他在科西嘉政治中以及1793年法国联盟派内战中的切身体会。在1793—1794年，他和雅各宾派最能干的特派员之一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密切接触，后者经常警告他的兄长马克西米连说，富于战斗性的雅各宾党人的无神论，有使旺代叛乱在各省蔓延之虞。在意大利，拿破仑意识到了教士和农民的宗教狂热一旦激发，对他这一支小小的军队是多么危险，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托伦蒂诺条约（1797年2月）中谨慎对待教皇的问题上。据传他在埃及的时候接受了穆斯林的信仰。1801年与教皇签订的政教协定显然是拿破仑个人的策略。“在宗教中，我没有看到上帝下凡化身为基督的奥秘，却看到了社会秩序的奥秘。”“人民需要一种宗教；这个宗教必须掌握在政府手里。”尽管他在圣赫勒拿立下的遗嘱中宣称：“我死时和50多年前我生时一样，信仰天主的、使徒的、罗马的宗教”，但是拿破仑始终是伏尔泰和启蒙运动传统的一个不可知论者，这简直是无可置疑的。他在圣赫勒拿对贝特朗将军说，“这使他感到烦恼，因为他无法相信宗教”。

他在政教协定中与教皇拼命讨价还价，其目的是要使教皇及主教们成为他的政策的工具，他的“精神上的长官”。18世纪的一些开明君主不是视教皇们为无足轻重的吗？教皇坚持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使得拿破仑大为愤怒，因为这和他想要建立一个西方帝国这个日益强烈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他在圣赫勒拿时说：“我应该像控制政治界那样控制宗教界，而且像君士坦丁那样召开教会会议。”1806年，他写信给教皇说：“陛下是罗马的君主，而我是罗马的皇帝。我的敌人也应该是你的敌人。”当教皇拒绝实行大陆封锁的时候，他就在1808年2月占领了各教皇国；1809年，在瓦格拉姆战役期间，他宣布把罗马并入法兰西帝国。在梵蒂冈逮捕教皇，可能超出他的指示，他的指示是要逮捕红衣主教帕卡。但是，拿破仑希望先把教皇幽禁在萨沃纳，后来幽禁在枫丹白露，把他孤立起来，不再抵抗。1815年他承认“我瞎了眼。我总以为教皇是个性格非常软弱的人”。但是，他对教皇的态度已经像启蒙运动一样不合时宜；天主教不再采取守势了。和浪漫主义运动以及反革命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的宗教复兴，即将在波旁王朝复辟期间达到极盛，梅斯特尔、博纳尔、夏多勃里昂和丰塔内等人的

文章已经预示了它的来临。政教协定本身鼓励了这一运动的发展。不过，人们很容易夸大拿破仑和教皇争吵的政治影响。不管拿破仑与教皇的关系如何，卡拉布里亚、西班牙和蒂罗尔的宗教狂热总是要爆发的。即使在逮捕教皇以后，莱茵兰、低地国家、波兰，甚至旺代的天主教舆论似乎并没有很大的骚动。

拿破仑在和英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成了他十分蔑视的革命“理论”的牺牲品。在他看来，正如国民公会的看法一样，英国坚持残酷的商业“寡头政治”，极力压制老百姓对法国革命原则的渴望。他对英国武装部队中仍然盛行的野蛮军纪感到吃惊。他是个饮酒有度的人，对于英国上层阶级的酒精消耗量也极感兴趣。英国军官的“酗酒”是他在圣赫勒拿岛上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英国报纸的言过其实，特别是当像《晨邮报》这样一家报纸竟然说他是“一个难以确定的人，一半是非洲人，一半是欧洲人，一个地中海的混血儿”的时候，使他大为恼怒。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指券”引起了疯狂的通货膨胀，在他的心目中是和他青年时代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对理财家们极不信任。他看到英国的债台高筑，自1797年以来就一直乞灵于纸币，因此他认为英国的财富是脆弱的和不堪一击的。

经济战的武器就是以这种设想为基础的，这一武器是他从国民公会继承下来，并在特拉发尔加战役之后发展成为大陆体系。拿破仑打算通过亚眠条约，在政治上和商业上把英国人排除于大陆之外；正是由于英国人同法国签订一项商约的希望破灭，以及拿破仑在大陆上的冷战进攻，条约终于未能谈成。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评论拿破仑不能维护和平的时候说：“不能说他的天才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但这确实不是他的性格所能胜任的。”[\[4\]](#)

1798年，拿破仑向督政府报告入侵英国的前景时是很悲观的。“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在许多年内我们仍将不能取得制海权……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时机也许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对海战技术的无知，使他不能理解或者不愿承认英国海军的优势是无法对抗的。他在圣赫勒拿岛时抱怨说：“这一行业太专了，闭塞了我的一切思路。我的思路总是归结到这么一点上：除非自幼培养，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水兵。”拿破仑和那个倒霉的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不同，并没有意识到自从革命以来，英法两国海军在航海技术和火炮射击的水准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两国海军以大

致相等的条件进行交战。但是，革命使法国海军失去了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解散了海军炮手队伍，败坏了军纪。英国采取持续不断地严密封锁法国各海港的战略，使法国海军得不到足够的训练，而持续不断地在海洋上艰苦地航行，却使英国人在驾驶、信号和射击的水平臻于完善。1782年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首先打破列队向前的战术，现在已由纳尔逊发展成为一种歼灭战，这等于是拿破仑的陆战在海上的翻版。特拉发尔加战役之前不久，维尔纳夫写道：“我们的海军战术已经过时；我们只懂得如何列队运动，这正中敌人的下怀。”

考虑到拿破仑曾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见第三章，二，原文第80页），他在1803—1805年之间当真打算入侵英国，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与此同时，筹组“英国方面军”使他在大陆和平时期能够集中训练他曾经指挥过的最精良的部队。如果他确曾认真考虑不使用作战舰队暂时控制海峡，就径自用驳船运送部队过海，那么，他也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每次涨潮时，显然只有一部分驳船能够出港。1804年春，拿破仑向土伦舰队司令拉图什-特雷维尔海军上将发出详细指示，要舰队和驳船队协同作战，要他绕过纳尔逊在地中海的封锁，和维尔纳夫的罗什福尔舰队会合，然后进入海峡。“让我们成为海峡的主人六个小时，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法国海军上将中最杰出的拉图什-特雷维尔在1804年8月死去，于是这一计划搁置了几个月。

1804年12月，由于西班牙参加对英国作战，形势顿时改观。法国驻马德里大使乐观地报告说，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西班牙就可以有30艘大战舰准备就绪。拿破仑这时想出了他的“宏伟计划”，即目前在土伦的司令官维尔纳夫要驶往马提尼克，与西班牙舰队会合后，再和冈托姆的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费罗尔联合舰队会师。这样迫使英国舰队分散兵力去防护西印度群岛，维尔纳夫就可以回来临时控制海峡，掩护船队横渡。维尔纳夫在1805年3月底起航，成功地躲过了纳尔逊，当时纳尔逊日夜思考的是对西西里、马耳他和埃及的威胁。他直到4月18日才确实知道维尔纳夫已经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5月中旬维尔纳夫到了马提尼克，而纳尔逊由于航行迅速，紧跟在他的后面。冈托姆未能突破封锁，维尔纳夫此时接到指示，如果冈托姆不能在40天之内和他会合，他就返回费罗尔。因此纳尔逊得以派出一条快船，把维尔纳夫离开西印度群岛一事通知海军部。停在乌尚特海面上的考尔

德的舰队奉命截击并阻止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维尔纳夫在和考尔德经过一次小冲突以后，就躲在科鲁尼亚避难。到了7月18日，纳尔逊回到直布罗陀，发现维尔纳夫并未重新进入地中海，遂北航去和考尔德会合。

拿破仑的计划开始时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他未能使英国舰队分散。当时接替邓达斯出任海军大臣的巴勒姆勋爵，坚定地遵循集中兵力的原则。拿破仑以为纳尔逊已经返回地中海。他在7月16日命令维尔纳夫到布雷斯特和冈托姆会合，但是允许他“如遇不测”可以便宜行事，退至加的斯。8月14日，维尔纳夫重又出海，可是一看到5条战舰就转而向南驶往加的斯。命运真是捉弄人，这些战舰并不是英国舰队的前卫，却是阿勒芒的罗什福尔舰队。拿破仑从8月3日起就在布洛涅等待，准备让军队上船。迟至8月23日，他还写信给塔列朗说：“还有时间——我是英国的主人。”不过，他的海军部长德克雷海军上将从来就不相信可能使英国舰队分散兵力，这时请求拿破仑不要命令维尔纳夫向北行驶，以免必遭覆灭。8月24日，拿破仑向贝尔蒂埃口授命令，要大军解散布洛涅大营，向多瑙河开拔。

英国舰队一旦集中，对于把自己封锁在加的斯的维尔纳夫来说，是足以致命的；他本来应该尽早驶往土伦。到9月底，纳尔逊在加的斯外的海面上以30艘战舰对抗法西舰队的33艘战舰；他唯一担心的是维尔纳夫不会上当而出战，于是把主力放在海上远处，以隐蔽实力。维尔纳夫的心情已处于绝望的境地，深感他的舰队在素质上处于劣势，也知道自己的指挥权即将由别人接替。最后他接到拿破仑的命令，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驶往那不勒斯，以反击威胁大军侧翼的英俄远征军。当维尔纳夫于10月20日从加的斯出现的时候，遇到的是必然的下场。纳尔逊在离开朴茨茅斯之前就拟定了作战方案，并且在与各舰长会议时作了充分的说明。“罗德尼在一点上突破他们的队列之后，我就要在两点上突破。”在得到进一步的增援以后，他将发动三路纵队的进攻。纳尔逊和科林伍德率领两个纵队突破了敌方队列，打垮了他们的中央和后卫。“战果若少于20艘战舰，我是不会满意的。”纳尔逊临死时，知道有18艘战舰已经沉没或者降旗投降；结果，在维尔纳夫的舰队中，只有10艘战舰驶回加的斯，其中只有3艘还能作战。

特拉发尔加一役在好多年以内消除了对英国制海权的任何威胁；但是拿破仑不承认这一决定是不可更改的。1808年西班牙之所以具有

魅力，部分是由于希望西班牙海军“再生”。1807年坎宁决定夺取丹麦舰队，以及1809年远征瓦尔赫伦岛，都表明英国政府对英国海军优势重新受到挑战是认真对待的。拿破仑的战舰在1807年减至35艘，他希望到1812年有102艘。可是到那时候，英国海军已经占有压倒性优势；1813年拿破仑只有71艘战舰，英国的战舰共计达235艘。

如果说特拉发尔加一役无限期地推迟了对英国发动直接的海陆军攻击，那么，经济战这个武器还有可能使它屈服。由于耶拿战役以后普鲁士崩溃，以及1807年与俄国签订提尔西特协定，拿破仑就控制了欧洲的整个北方海岸线，而英国大部分对欧洲的贸易，都得经过这些地方。1806年11月，拿破仑发布柏林敕令，宣布“英国各岛处于封锁状态”；禁止和它们进行一切贸易；凡属于或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一切货物均将予以没收。因此，大陆体系在开始时是以出口而不是进口为目标，事实上它是进行抵制而不是封锁。拿破仑对他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说：“我的意图是用陆地征服海洋。”1807年8月，他曾经预言英国的处境，说：“英国船只满载着毫无用处的财富在公海上徘徊，在那里，他们自称是统治海洋的独一无二的主宰，但是想从松德海峡到赫勒斯蓬特找一个对他们开放、能够接待他们的港口却不可得。”拿破仑对英国的财政结构已有固定的看法，他对于这种抵制能迅速收效是很乐观的。如果英国的出口受到抑制，它的脆弱的支付平衡就会失调，它将无力用金镑（“圣乔治的骑士”）去资助各大陆盟国。然后，失业会引起一场革命，至少会引起群众骚动，迫使政府媾和。

起初，英国的舆论嘲笑“柏林敕令”，一些漫画上画着“波尼”在封锁月亮。自从1803年起就已实施的海岸体系，证明收效很小；英国商品通过荷兰以及德意志的北部港口继续流入。而且，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可以用来代替欧洲。在1803—1805年间，英国商品输往欧洲的只占33%，输往美国的占27%，而有40%输往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是各殖民地和南美洲。与南美洲的走私贸易数量相当大，1806年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以后，希望大大增加了。但是在提尔西特会见以后，就开始感到压力了。拿破仑在他的1807年7月的《大军公报》中威胁道，“大陆体系可能将不是一句空话”。在1807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强行登上美国的快速炮舰“切萨皮克”号搜查逃兵，英国人担心会和美国发生战争。北欧和美国如果同时抵制英国商品，情况就会

变得极端严重，因为两者要占英国出口贸易的60%。再者，拿破仑歧视英国商船，可能使有利可图的对殖民地的贸易转移到中立国手中。英国政府于1807年11月和12月发出枢密院令，作为对柏林敕令的回答，要求中立国船只具有英国的港口许可证。拿破仑反过来也对中立国增强压力，于1807年10月发出枫丹白露敕令，12月发出米兰敕令，宣布凡遵照英国枢密院令办理的中立国船只将按英国船只处理。杰斐逊总统希望通过他在1807年12月的禁运法，迫使交战各方放松控制，但在实际上它只有害于美国利益，因而于1809年3月废除。

1807年英国的总出口量虽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数字掩盖了这样的事实：那一年下半年出口数量大大下降，在1808年整个上半年继续如此。对欧洲出口跌至1500万英镑，而1807年同期则为1950万英镑。这一危险局势却意外地由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爆发而得到解除。葡萄牙王族的出逃，以及西班牙殖民地拒绝承认约瑟夫国王，意味着英国和南美洲的贸易现在已经变成公开和正式的了。西班牙人的叛乱和法国在贝伦的败绩（1808年7月），反过来又鼓励奥地利向拿破仑发动进攻；而且，在1809年的瓦格拉姆战役中，拿破仑对北欧又失去了控制。英国的出口量在1809年达到创纪录的高峰。早在1809年3月，拿破仑就开始对他的严禁政策犹豫不决。“走私贩子”获利极大，以致他宁愿批准和英国在殖民地产品上进行有限的贸易，征收高额关税，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和丝绸。1810年的特里亚农敕令使许可证制度合法化，但是他至多只占英国出口量的一个零头。

瓦格拉姆战役后，拿破仑能够对欧洲加强控制了。荷兰、汉萨同盟各城市和奥尔登堡公国被并入法兰西帝国。冷酷无情的达武被任命为北德意志方面军司令。1810年10月的枫丹白露敕令指示没收英国的工业产品并予焚毁，建立特别法庭打击走私贸易。英国经济本已陷于重重困难之中，这些措施又使它受到了打击。伊比利亚半岛战役和瓦尔赫伦岛战役使英国的黄金储备和支付平衡达到极为紧张的程度。对南美洲市场能力估计过高了。殖民地和新大陆的市场可能抵消欧洲市场的损失，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市场只能以殖民地产品支付，而欧洲实际上是这些产品的唯一消费者。1810年，英国各港口堆积着过剩的殖民地产品。到了1810年9月，破产的浪潮预示着严重经济危机即将来临。1808年和1809年的农业歉收愈发使失业和贫困加重，政府被迫进口小麦。另外，拿破仑已经成功地使英国与美国发生纠纷。他提出，

如果英国也废除枢密院令，他就取消米兰敕令。1811年2月，麦迪逊总统未能说服英国政府撤销枢密院令，于是又实施禁运。拿破仑看出预料中的英国经济危机已经为期不远，就鼓励英国从法国和荷兰进口小麦，而用黄金支付货款。物价高涨和货物匮乏在1811年激发了卢德派骚乱，如果拿破仑禁止小麦出口，使物价高涨和货物匮乏现象更加严重，是不是会更有利呢？但是，从大陆进口的小麦未必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仅是1810年进口小麦总数的1/4，而且1810年农业获得中等收成也使形势得到缓和。1811年是英国出口最糟糕的一年，直到拿破仑退出莫斯科为止，前景依然是暗淡的。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于1812年6月向英国宣战，同月，那个令人反感的枢密院令终于废止了。

从经济战线上这种波动看来，大陆体系在严格执行的时候，似乎能对英国施加强大的压力。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就必须如此实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事实上，它只是在1807年中期到1808年中期，从1810年中期到1812年中期才正式生效的。对英国最危险的威胁是大陆体系加上和美国交战。1812年，拿破仑认为只要在俄国取得胜利就会决定英国的命运，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大大低估了英国经济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当金融和信贷制在法国还无人知晓时，在英国从戈多尔芬、沃波尔和小皮特的时代起就已经建立起来。拿破仑也没有考虑到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1785年，英国和法国在经济发展上大致相同。但是1785—1800年之间，法国由于革命大动荡而停滞不前，英国则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到1800年，博尔顿和瓦特已经制造和安装了几百台蒸汽机，特别是在重要的供出口的纺织工业里。

拿破仑为了进行大陆体系这一场赌博，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要这么干，不仅是把它作为经济战的一种方法，也是想把欧洲贸易的轴心决定性地从英国转移到法国。在1802年，法国工业先是欢迎能有机会来利用没有英国人竞争的欧洲市场。但是到了1810年年初，法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工业原料匮乏，由于法国向敌国和附庸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和捐税，大陆的购买力也降低了。自从1793年以来日益衰落的法国海外贸易，已经牺牲殆尽，像马赛和波尔多这样的大港口城市对现状不满的人、潜在的保王势力在在皆是。虽然拿破仑强烈关心工业的发展，并给予工厂主以大量津贴，但是1810—1812年的经济萧条仍然归咎于拿破仑的政策。拿破仑在执政府时期赢得的资产阶级

的支持，由于1810—1812年的危机而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拿破仑所优先考虑的农业，损失较少。再加上出口剩余的葡萄酒和小麦，以及发展甜菜糖和靛青来取代殖民地产品，也使农业获得了好处。

拿破仑在为大陆体系进行宣传时鼓吹说：欧洲必须忍受暂时的困难，以便从英国的“海上暴政”和商业控制下解放出来。如果他真正要在欧洲发展一个自由贸易区，就可能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1810年的特里亚农税率表明，只有法国可以免受这一体系的困苦，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则不在此列。1810年，拿破仑对他的驻意大利的总督欧仁说：“我的政策是法国先于一切。”梅特涅曾经预言道：“这样大量的法令和敕令将会使整个大陆的商人的地位遭到破坏，但对英国人来说却利多害少。”此外，尽管拿破仑努力发展公路和运河，但是在铁路尚未出现的时代里，陆上运输总是不可能和比较便宜的海上运输进行竞争的。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意大利、德意志和低地国家，对拿破仑关于拥护启蒙运动和平等的要求能作出响应的大多是资产阶级，但由于推行大陆体系，他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这个体系的必然结果，是他的欧洲政策——与西班牙发生纠纷、同教皇决裂以及对俄国交战——的致命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

有些历史学家想把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扩张，解释为他与英国进行斗争以及大陆体系的副产品。这种看法低估了拿破仑野心之大以及他的欧洲政策的根本性质。早在1805年，塔列朗就看出拿破仑的征服与他想参加欧洲合法君主俱乐部的愿望之间的根本矛盾了。如果法国的“自然边界”和拿破仑王朝得以维持下去，拿破仑就必须承认欧洲的势力平衡。因此塔列朗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想和奥地利保持一种“安静的和平”，而在提尔西特协定之后，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地把自己解脱出来，不再和拿破仑共命运，他还自以为这样做也是为了法国和欧洲的利益。但是，拿破仑在他所缔结的条约和联盟之中，只愿意承认附庸国，决不承认平等国。这种态度的含义是要求成为“万国之王”。但是，即便拿破仑能够击败那些君主，他怎样能够把各国人民镇压下去呢？按照1815年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拿破仑身为皇帝，竟会如此不注意民族主义的力量。他在圣赫勒拿岛上编造了一个传奇故事，把他的一生经历说成是代表各国人民反对各个王朝的斗争。可是，这不过是事后的编造和对事实的歪曲。拿破仑帝国否认民族，1810年以后就更变本加厉了。

拿破仑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接班人，具有世界主义的观点。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情况是，1809年奥地利爱国青年斯塔普斯打算在维也纳暗杀拿破仑，而拿破仑竟然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青年的心理。斯塔普斯被捕以后，拿破仑和他谈了一会儿话，结果认为他必然是个疯子。1789年，法国人拟订了《人权宣言》，并非单指法国人的人权。到1802年，欧洲的旧制度腐朽衰败，似乎将导致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具有一样开明的法律、行政机构和公民。拿破仑是《拿破仑法典》的热忱宣传者；这部法典是一只船，它把法国革命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原则输送出去，远达伊利里亚和波兰。他对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说：“在德意志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人民渴望平等和自由主义。《拿破仑法典》的恩泽、公开审判的司法程序、陪审团——这几点必须成为你的君主国的特点……你的臣民必须享有在德意志其余地区所没有的一种自由、一种平等。”

拿破仑并没有预见到：扫除旧制度的垃圾只会促使潜伏着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勃然萌发。等到他明白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不仅他一个人犯这种错误，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也都犯这种错误。直到1805年为止，道义的和思想的力量似乎都在拿破仑的一边。仅仅在1804年，贝多芬才把《英雄交响乐》删去奉献给拿破仑的字样；^[5]歌德始终钦佩这位皇帝，而对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则终其一生完全不感兴趣。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像拿破仑一样不关心民族的原则，但是他们的不关心却更没有理由，因为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必须承认，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下和混乱中，事态的进展和思想的演变非常迅速，人们的头脑是跟不上的。

拿破仑在其早期的经历中，对意大利的民族愿望似乎愿意给予鼓励。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于1802年成为意大利共和国，1805年又成为由欧仁总督管辖的意大利王国。但在1806年，两西西里王国赐给了约瑟夫，1808年又赐给了缪拉。为了使波拿巴家族和帝国的显贵人物获得好处，从意大利的领土中划分出好几个公国。1806年，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个公国并入法兰西帝国；1808年兼并了托斯卡纳，1809年又并吞了教皇国。1809年从奥地利割取的伊利里亚各省，依然通过一名总督直接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1811年，拿破仑封他的儿子为罗马王，预示着意大利将会并入一个欧洲帝国。罗马将成为“帝国的陪都”，并拟定了在卡皮托利尼山营造巨大皇宫的计划。拿破仑在意大

利实行的改革，虽然是部分的，而且并不一贯，却是意大利统一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法律和行政的统一，以及实行征兵制，有助于打破地方分立主义。意大利军队在自己组建的师团里善于作战；拿破仑的军官和文职官员将成为1815年以后统一运动的先锋。但是只有像阿尔菲耶里和福斯科洛这样的极少数知识分子转而公开反对拿破仑，因为他违背了他们要求意大利统一的希望。缪拉在1815年试图激发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去反对奥地利，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积极抗拒法国统治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教士和反动分子：在1806—1808年间，卡拉布里亚的游击战牵制住了相当大数量的法国部队。拿破仑似乎全然不顾政治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就像他不顾1806年迈达战役军事上的不祥之兆一样，那时候，斯图尔特将军指挥的英国步兵的火力，在几分钟之内就击败了雷尼埃将军的几个纵队。

在德意志，拿破仑继续执行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传统政策，即使德意志保持分裂，加强莱茵联盟内各仆从王国的地方分立主义。直到1806年，他希望普鲁士会继续作为臣藩留在他的体系之内；后来，他懊悔没有在耶拿战役之后，乘机把普鲁士彻底消灭掉。1807年建立萨克森华沙公国，似乎是为恢复波兰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但是，拿破仑对波兰实际感兴趣的，只是把它作为他的战略中的一个马前卒。在提尔西特会见时，他先是提议俄国应占有整个波兰，西里西亚应划归热罗姆·波拿巴——该公国是折中解决办法的产物。1812年，他对波兰独立发表了闪烁其词的声明，使波兰人大失所望。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在它政治发生影响之前很久，在知识界中就已出现了苗头。18世纪末，以歌德、康德和席勒这样一些伟大作家为首的德意志文化复兴，其观点最初是世界主义的。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使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世界主义发生变化：它感兴趣的是历史、习俗、传统、民众的语言和文学，其先驱为赫德尔，这对民族意识是一种强有力的兴奋剂。德意志知识界中当初对法国革命的热情，让位于保守的和宗教性的反动，它谴责恐怖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而赞扬一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德意志文化的精神优越性。但是，民族主义依然被认为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席勒在1802年写道：“德意志的伟大在于它的文化和民族性，它并不以德意志的政治命运为转移。”

1806年普鲁士的崩溃，是知识分子的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政治的民族主义的转折点。像费希特、阿恩特、克莱斯特和施勒格尔这样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爱国，反抗拿破仑。普鲁士政府的垮台使民族主义者有机会获得控制权：弗里德里希·威廉被迫于1807年任命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为大臣。哈登贝格在他关于改革的备忘录中（1807年9月）写道：“当前的各次战争只是法国革命的继续，而法国革命则使法国在血雨腥风中获得出人意料的力量。新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一个国家如果拒绝接受它们，就注定要屈服或者灭亡。”格奈泽诺曾经看见过美国民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动，他也写道：“革命调动了全体法国人民的民族力量……如果其他国家希望恢复力量的平衡，就必须开辟和利用同样的资源。”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容克贵族害怕和讨厌“雅各宾”政策，阻挠施泰因的大多数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不过，在1808年施泰因被免职以后，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诺却成功地对陆军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改革。由于废除奴役制度和降职处分，取消外国雇佣兵，以及对军官团进行严格的审查，军队的士气和战术都提高了；1813年采用征兵制，使军队得以迅速扩充起来（参见第八章）。

在奥地利，改革工作也只有像查理大公、施塔迪翁和霍尔迈尔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在搞，并且因为皇帝弗兰茨不信任“雅各宾主义”而受到阻碍。军队现代化了，1808年又建立了战时后备军。在瓦格拉姆战役败北以后，皇帝厌恶那些把他拖进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爱国者”。1813年4月，他写信给拿破仑说：“战争的每一次拖长，就使各国君主不能认真地致力于消灭日益蔓延的雅各宾派骚乱，不久将威胁到各国王位的存在。”1809年战争中兴起的爱国主义吸引了奥地利人和哈布斯堡王朝，而不是德意志人，霍费尔领导的在蒂罗尔的游击战，其矛头所向更多的是反对巴伐利亚人的反教权主义，而不是反对法国人。

无论是在1809年或1813年，中欧都没有出现像西班牙那样普遍的游击战抵抗运动。民族主义精神，在知识分子、改革派和军官的较小的圈子以外，几乎还没有兴起。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创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传奇，那时，他们把莱比锡战役称为“民族大战”。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如果简单地归因于民族意识的高涨而排除军事的和外交的因素，就会歪曲对欧洲历史的正确剖视。

因为西班牙是首先大规模抵抗拿破仑的范例，它就被当作欧洲的一种普遍性运动的不祥之兆。一提到拿破仑的两个师在贝伦向西班牙游击队投降（1808年7月），他就特别恼火。其实，杜邦的新兵是被西班牙正规军击败的，他签订了撤军协定，这个协定后来又遭到了破坏。拿破仑在宣告占领布尔戈斯（1808年11月）的通告中，试图消除这种大肆宣扬的说法。“如果像施泰因先生这样的人，连不能抵抗我们雄鹰、不能怀有武装群众的崇高理想的正规部队都没有，而能够看到随之而来的种种灾祸，以及这种兵力对正规军可能造成的阻碍如何微弱无力，那是一件好事情。”的确，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打败西班牙军队是毫不困难的；要是没有威灵顿的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就会很快瓦解。威灵顿在1809年8月写信给国内说：“西班牙军队是不会作战的；他们未经训练，没有军官，没有给养，没有任何种类的工具。”1809年10月，他又写道：“至于说到他们的热诚，连我们国内对此都在大肆渲染，我却深信全世界的人都把它的作用完全估计错了。”西班牙令人难以逆料的特点，在法国波旁王朝于1823年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历史中即已表现出来。威灵顿和大多数观察家们当时都以为法国将遇到1808年那样的麻烦。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法国人进行干涉，是代表国王和教会反对少数的自由主义改革派。西班牙的民族主义，与19世纪自由派中产阶级所产生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普遍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拿破仑从一开始起就把西班牙人民的脾气完全理解错了。在提尔西特会见以后，他的心情就变得极为固执和冷酷。当时任驻巴黎大使的梅特涅，于1807年10月说：“近来拿破仑的处事方法已完全改变。他似乎认为自己已经到达那么一种境界，以致节制已成为毫无用处的障碍。”1808年2月，拿破仑写信给科兰古说：“关于西班牙，我只能对你说，你能够理解到，必须大力改造这一个对普遍利益毫无用处的国家。”1808年4月，他写信给他在西班牙的代表缪拉说：“如果在西班牙出现运动的话，他们会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些运动一样。”即使在马德里人民于5月2日起来反抗法国人，并且必然受到缪拉野蛮镇压的时候，拿破仑还这样写道：“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没有一点区别。他们将乐于接受帝国的制度。”他在5月28日告西班牙国民书中写道：“我希望你们后代能够说：‘他是我们国家再造的恩人。’”

拿破仑对于西班牙的海军和经济潜力的看法也超过了实际。西班牙的海军和经济由于波旁国王卡洛斯四世、他的王后及其宠臣戈多伊这三个声名狼藉的、腐朽的统治者的无能而管理失当。戈多伊本人一心想把葡萄牙搞到手，就使西班牙和法国保持不即不离的联盟关系，但在耶拿战役期间，他已经显示出背叛这一联盟的迹象。1806年年底，拿破仑要求西班牙参加大陆体系，并派出一支军队占领了汉诺威。1807年10月，他派遣朱诺占领葡萄牙，答应戈多伊可把葡萄牙南部作为自己的公国。当朱诺的军队越过西班牙的时候，他的部队得以通过一些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卡洛斯四世的继承人费迪南德唯恐戈多伊在他的父亲去世后篡位，就和拿破仑商谈要把戈多伊推翻。于是拿破仑心里就有了想法，要用高效率的法国人的行政管理来改造西班牙，其办法或是让费迪南德和波拿巴的一位公主结婚，或者废黜腐败的波旁王族成员。一次反对国王和戈多伊的叛乱发生了，国王宣告退位。拿破仑在巴荣纳召集王族与他会晤，商谈的结果是国王和费迪南德都放弃王位，而拿破仑把它赐给了他的哥哥约瑟夫。

直到巴荣纳会谈为止，西班牙人民一直是安定的，因为他们以为拿破仑会支持费迪南德反对戈多伊。当马德里的最高贵族在巴荣纳接受拿破仑的开明宪法的时候，各省就如火如荼地出现了自发的起义。坎宁赶紧支持起义者的政务会；韦尔斯利在维米耶罗一战（1808年8月）获胜，迫使朱诺撤出葡萄牙。西班牙正规军主力在塞科河上的麦迪纳一触即溃（1808年7月）；杜邦奉命率领两个师南下去占领加的斯。他在这里被获得游击队支持的两万名西班牙正规军追及，被迫在贝伦投降（1808年7月）。拿破仑终于被迫认识到他是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于是下令把大部分大军从德意志调到西班牙。1808年年底，他亲自指挥在西班牙的军队，在拉科鲁尼亚战役中几乎追歼了穆尔的军队。以后拿破仑再也没有去过西班牙，但又不信任约瑟夫的能力，而宁愿从巴黎直接发命令给他的那些拒不服从又爱争吵的元帅们。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转折点发生于1810—1811年。拿破仑在1809年处理了奥地利问题以后，把他的10万名最精锐的部队交给马塞纳，命令他把“英国豹赶到海里去”。马塞纳被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上的防御战术所击败，同时也因为苏尔特出于妒忌没有从安达卢西亚赶来支援他。自此以后，威灵顿就能够采取攻势，并在萨拉曼

卡战役（1812年）和维多利亚战役（1813年）获胜后，把法国人赶出了西班牙。

在西班牙虽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亲法派，但是拿破仑的错误在于认为有足够能量的中产阶级会欢迎《拿破仑法典》中的种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教会财产的世俗化。事实上，西班牙主要是一个受教士控制的农民国家，为宗教狂热和反动的地方爱国主义所支配。在18世纪，卡洛斯三世的一些开明改革就曾受到人们愤怒的敌视。拿破仑把半岛战争描述为“一次僧侣战争”；而它的确像一场大规模的旺代战争。1810年在加的斯召开的西班牙议会颁布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和在拿破仑监视之下于巴荣纳制定的那部开明宪法相抗衡。但是，根据以后的历史看来，很难相信这就是大多数西班牙游击队奋斗的目标。费迪南德于1814年复位的时候，人民高呼“专制国王万岁”，“打倒宪法”。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法国人的干涉本身引起爆炸，尤其是如果拿破仑遵循他原来的支持费迪南德的意向的话。拿破仑一旦决定约瑟夫留在王位上，他就不能及时地在西班牙知难而退，使自己的威信不受到损害。他在1813年11月惊呼道：“我为了要使约瑟夫统治西班牙牺牲了几十万人。以为必须让我的哥哥来保障我的王朝，这是我的错误之一。”一些久经战斗的部队陷在西班牙不能脱身，他们本来很可能使1813年的德意志形势扭转过来，而拿破仑却直到1814年初才提出让费迪南德复位。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拿破仑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政策，与18世纪的一些开明君主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自称要成为“人民的国王”，这只能存在于传奇故事中，实际上则并非如此。在他加冕的第二天，他说了几句十分离奇的、也许是谏语式的话：“我来得太晚了，人们都太开明了。现在已不可能干大事情了。比比亚历山大吧。”他的力量和弱点，就在于他试图驾驭他所不能理解而且也不能控制的爆炸性的政治势力。

（陈复庵 译）

[1] P. 盖尔教授的《拿破仑——拥护和反对》（1949年）一书，对研究拿破仑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的结论是：“争论还在继续。”

[2] 美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被她的目光触及的人立即化为石头。——译者注

[3] A. F. 贝克：《拿破仑与滑铁卢》（伦敦，1936年）。

[4] A. 旺达尔：《波拿巴的即位》（巴黎，1905年）。

[5] 此处年代疑有误，应为1806年，见第九章，原文第234页。——译者注

第十二章 1814—1847年法国的政治情况^[1]

打败并废黜了拿破仑，并不就等于恢复了波旁王朝。这种解决办法得到了能对作出决定产生影响的人们——一方面为同盟者，另一方面为以元老院和塔列朗所领导的临时政府为代表的帝国政府中的首要人物——多少有点勉强的赞同。然而，即使如此，未来政体的确切性质依然未定。是君主制，这没有疑问，但是，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是1789年以前的那种君主制吗？国王以“君权神授”说进行统治，他可以随心所欲，只受到自己的良心以及国家的各种集团和团体的传统特权的限制。或者，是1791年的那种君主制吗？国王仅拥有国家授予他的权力，作为国家的主要公仆，要按照双方自由签订的契约进行统治。

元老院派，包括革命议会的残存议员，显然希望保证第二种办法获得胜利。他们得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支持，亚历山大已经宣布他的意图：要在法国保持一个符合时代的开明精神的政体。皇帝逊位的当天，元老院就通过了一部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宪法。宪法中说：已故国王之弟已被拥戴登上王位，“不附带任何条件”，而且，只要他宣誓遵守本宪法即可执政。这个条件是这位觊觎王位者不能接受的；在他不幸的侄子路易十七神秘地死去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唯一合法的君主，在关系到他的权力和尊严的问题上，他总是表示坚定不移的。不过，这位亲王相当机智，而且在患难中也成熟起来，他也愿意作出必要的让步。他巧妙地耍弄手腕，保持君权不受人民意志支配的原则。他并不匆忙离开1807年以来他所逗留的英国；而当他于4月24日到达法国的时候，受到北方人民的热烈欢迎，各种代议机构和陆军元帅们纷纷向他表示效忠，都加强了他讨价还价的地位。

他在进入首都的时候，发表了“圣多昂宣言”，其条款是由他的代表和元老院的代表联合制定的：以起草过于匆忙为口实，撤销了元老院通过的宪法；国王答应由议会两院组成一个委员会制定另一部宪

法，并且保证这将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此外还简单地叙述了这部宪法所要体现的一些原则，并为安慰那些在前政权下得到利益的人们而作了一些保证。

这部以《宪章》为人所知的新宪法是在1814年6月4日庄严颁布的，它规定了迄1848年革命为止的法兰西国家的框架（1830年稍有改动）。它在本质上是一部折中的宪法，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当时法国各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在一篇冗长的历史序言中，确认了王权来自王朝权力或者来自君权神授（又称正统原则）的理论，而把旧的专制主义所受到的一些限制说成是国王自觉自愿作出的“仁慈的让步”，^[2]因而无损于他的权威的原则。但在另一方面，许多条款中都确认了大革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胜利果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要纳税和服兵役，个人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但作出这样的新规定，即宣布罗马正教为国教，而并不像在拿破仑的1801年政教协定的体制下，它仅仅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而已。第一帝国的民法典原封不动；当初作为“属于国家”而出售的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仍归原买主所有。以前的政权所授予的称号、勋章、年金、品位继续有效，国家承认它的全部财政义务。最后，波拿巴执政府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也保持不变。

在《宪章》所确立的政治机构中，国王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国王之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行政权仅属于国王。”（第13条）“国王为国家最高元首，统率陆海军、宣布战争、缔结和约、与他国结盟、签订贸易协定、任命政府各部官员、制定执行法律以及保证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规章和法令。”（第14条）

大臣们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两院负责。国王还拥有部分立法权，因为只有国王能够创制法律；对于某些有争议的条文，未经国王的同意也不得附加修正案。两院代表国民的意志：一是由国王指定的贵族院，一是众议院。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方法，将由一项法律作出规定。但是，《宪章》规定，选举人必须是年满30岁并交纳300法郎直接税的人，而要取得候选人的资格，则必须年满40岁，并且交纳1000法郎的直接税。在制定法律方面，两院地位平等；但国家预算必须先由众议院投票表决。贵族院有时要起最高法院的作用，审理叛国的罪

行。国王有权召集两院开会，并决定会期的长短；国王可以解散众议院。法官要由国王任命，但不得予以罢免，以保证其独立性。

这种体制虽系仿效英国的模式，但不能称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议会制，因为政府并不依靠议会多数。只有在承认不到9万名因其财富而享有特权者（这是交纳300法郎直接税的选举人的人数）合法地代表全国人民的情况之下，才能说它是代议制。即便我们感到宪法对能够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人数限制得过严，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的法国在物质和社会条件方面，距离实现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还十分遥远。法兰西民族半数以上是文盲，只是通过街谈巷议了解国家大事。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地区，例如在布列塔尼，教士的意见就是法律。全国大约75%的人口住在小村庄里，从事农业劳动。除了拥有70多万居民的首都以外，只有两个城市（里昂和马赛）的人口超过10万，而人口超过5万的也只有波尔多、鲁昂、南特、里尔和图卢兹等五个城市而已。地方小镇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首都之间，通过由国家保养的约2万英里的王家道路网联系起来，保持畅通；但是许多村庄实际上仍然是孤立的，因为缺乏修路的手段——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徭役呢？至于主要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驿站，由于在旅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过多，大多数人都无法利用它，而且货物和思想的流通也显然受到限制。

一贯受拿破仑压制的报刊，在复辟后又要受到控制发行量的限制。1826年，首都的14家政治性报纸总共只有6.5万个订户，并且不零售。最后，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有助于扼杀地方的政治生活，而把政治生活集中于巴黎。邦雅曼·贡斯当在1812年写道，“这个国家今天只在首都存在”。

在“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即少数足够富裕而得到选举权的公民）当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社会集团。一是大地主：与通常所说的相反，这个阶级并不完全忠于保守派；除了在大革命期间设法保住自己土地的贵族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富”，他们由于购买“国家财产”而在大革命中得到利益，获得了地产。虽然前者可能倾向于反动，后者却必然拼命反对恢复旧制度的一切做法。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当中，我们甚至可以见到旧制度的贵族和地主，如拉法叶特和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二是工业巨头、商人和银行家，与英国的情况相反，这些经济活动过去是把贵族拒之于门外的。富有的资产阶级通过继承，占据着经济领域的这些统治地位。他们和那些购买“国

家财产”的人们完全一样，担心恢复旧制度和实行国家控制；而且，出于阶级的原因，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接受贵族的要求。三是重要的文职官吏，他们来自上述两类人，特别是来自第一类，按着名分，他们是当时内阁的支持者；如果他们想要忘记这一事实，立即免职会使他们马上清醒过来。

新政权的开始并不一帆风顺。路易十八回国还不到一年，就不得不在拿破仑的进军面前可耻地逃跑了。起初，整个国家好像很乐意接受这次革命，这可能是由于在一大部分舆论中充满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主要是由路易十八的政府无法控制的局面造成的。过去20年征服的领土，由于拿破仑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大家还是沉痛地感到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正是由于这次失败，国库必须紧缩开支：公共工程停建了；大批文官解雇了；拿破仑军队的许多军官只能发一半薪饷，因为他们已经派不了什么用场；最后，继续征收不得人心的间接税（消费税），尽管国王的兄弟在返回法国时曾经轻率地许诺废除这种税收。国王也无力平息以前的“流亡贵族”要求归还他们原来的财产的呼声，这些财产现时已在别人手里。他也同样无力平息一些教士和贵族要求重新建立旧秩序的呼声，尽管《宪章》已经清楚表明国王的意向。人们仍然指责路易十八，特别是指责波旁家族的亲王们，说由于宫廷恢复过时的制度、浪费钱财重建禁卫军仪仗队，由于明目张胆地对过去流亡时期的难友给予特殊的恩宠而更加促使他们提出这些要求；赎罪礼又唤醒人们对大革命时期的记忆；最后，公然采取过分公开袒护教会的政策，令一部分国民感到不平。直到今天，这些指责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如此，假如拿破仑安分守己地待在他的小岛上，这些错误显然还不足以酿成一场灾难。他奇迹般地轻易返回巴黎，这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希望恢复帝国专制主义。在就拿破仑所颁布的新宪法“补充法案”进行公民投票和选举新的立法机构时，大批公民和选举人都弃了权。

国王第二次回国时所处的情况，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滑铁卢战役以及拿破仑二次退位（1815年6月22日）的直接后果是，法国人之间已具备条件打一场内战。保王派在1814年几乎还不存在，现在却人数众多，而且对他们的对手充满仇恨。一年以前，所有为国家效劳的人都毫无困难地聚集到路易十八的身边，而现在，那

些决裂而去投奔拿破仑的人发现自己名誉扫地，不可能再回头了。皇帝只是让位给他的儿子，军队正如巴黎的一部分老百姓一样，热情地效忠于皇朝。由拉法叶特等自由主义者控制的立法院倾向于路易十八的堂弟奥尔良公爵。但是，就在这个立法院里，也有拿破仑二世的许多党羽。威灵顿率胜利之师正向巴黎挺进。他决心尽最大努力扶持波旁国王复位。但是，他将发现有10万人在拿破仑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的达武元帅指挥下在巴黎城下决心死守等待着他。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的胜负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设法避免了在国外继续打仗和在国内发生内战的双重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十分没有节操的人物的手腕。约瑟夫·富歇当过国民公会代表，在第一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第一次复辟时期作为弑君者被赶下台。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又让他重任警务大臣。富歇利用职权，与各派都有往来。滑铁卢战役以后，他的目的似乎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将国家引向一种解决办法，按照他对事物的现实主义观点，从长远来看，这一办法是不可避免的。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为国王服务，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以及在大革命中受益的阶级的利益，而富歇正是这个阶级最好的代表人物。

这一计划首先要求除掉拿破仑。当拿破仑退位后前往罗什福尔港的时候，这第一个目标就实现了。富歇任命一个临时政府委员会，自己任委员会的主席。他撵走了拉法叶特，委派后者去联军司令部执行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同时请求议会起草一部宪法，使其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说服了达武，如果仗再打下去，即使打赢了，也只会毫无意义地拖长战争，增加外国侵略的祸害。于是，7月3日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法国军队撤过卢瓦尔河，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部队则兵不血刃地占领首都。从那时起，拿破仑二世在巴黎的党羽就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了。路易十八已经跟随威灵顿的部队从比利时匆匆赶回法国。富歇偷偷去朝见国王，在圣但尼会见了。尽管路易十八对富歇深为反感，还是答应任命他为大臣之一。第二天，富歇不动声色地告诉他在临时政府的同僚们，他们的任务业已完成，万事俱备，只待国王回朝。只要用一小队国民自卫军，就足以封锁议员们进入立法院的道路。他们没有表示任何反抗，就回家去了。

路易十八于7月8日重新进入杜伊勒里宫。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而且是在比1814年不利得多的情况下进行。在1814年，联军虽然战

胜，但却有所节制，他们几乎立即撤离法国，没有索取任何赔款。这一回，他们下定决心要让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尝一下失败的苦头，赔偿最后一次战役的大部分费用。在缔结和约之前，有100万外国军队占领着法国的61个省，他们横征暴敛，骚扰捣乱，使居民苦不堪言。根据第二个巴黎条约（1815年11月20日），法国除再次割让一些领土外，还要支付大量赔款，允许外国军队暂时驻扎在边疆省份。这些灾难是与国王的还朝有关联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人民感到耻辱的爱国情绪，指责波旁家族是可耻地“装在外国人的提箱里回来的”。

全国截然分成两个阵营，这一事实对于前途也是同样严重的。在1814年复辟的时候，分不清谁是胜利者，谁是被征服者。可是这一次，气急败坏的保王派坚持要对那些带来1815年灾难的叛逆者实行报复；而皇帝的追随者，由于他们在“百日王朝”的行动，发现他们再也不能得势了，于是不得不在恐惧中生活并成为反对派。自由主义的革命思想与帝国的军事民族主义之间的不自然的而且极端危险的联盟，必然使这个反对派得到好处。

路易十八复位后，他的政府执政的头一年里发生了三件对于这个政权的前途十分重要的事情，即白色恐怖、保王派的不和，以及代议制政府的流产。

巴黎所发生的事态一经传出，南方的保王派的各省人民便作出了反应：皇帝的一些追随者遭到屠杀，特别是在加尔省和马赛；而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忍受各种苦难和耻辱。路易十八在还朝的时候宣布说，他要从轻处理那些在1815年3月由于参与其事而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军政要员；不久发表了57个人的名单。政府要实行温和政策的最好保证在于内阁本身的组成上；坐在塔列朗和富歇旁边的，几乎都是过去为拿破仑效劳的人。但是，这个内阁在一个新组成的众议院的会议上是通过不了的。由于第一次复辟时期的议会两院来不及就《宪章》规定的选举法进行投票表决，国王希望为1815年8月底举行的选举而扩大拿破仑时代的选举人团，即把选举人的最低年龄从30岁放宽到21岁，把候选人的最低年龄从40岁放宽到25岁，并把代表人数从262名增加到402名。结果，使政府大吃一惊：当选的大多数代表是比较年轻的和狂热的保王分子，他们很快就被人们称为“极端保王派”。正如路易十八所说，这是一个“无双议院”。

甚至在开会以前，代表们就已经公开表示，他们拒绝与一个有弑君者富歇参加的政府合作。塔列朗只得牺牲他的老伙伴，任命富歇为国王驻德累斯顿的代表，然后自己引退（9月22日）。路易十八任命阿尔芒-埃马纽埃尔·德·黎塞留公爵来接替塔列朗的位置。这是一个大领主，他慷慨无私的人品很受人们尊敬。他在流亡俄国的时候，曾为亚历山大一世效劳，任新从土耳其人手里赢得的南方省份的省长。由于沙皇对他友好，因此人们希望他将会取得比塔列朗所能取得的更好一点的和平条款；塔列朗由于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反俄举动而落得骂名。埃利·德卡兹是新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人物，他原是个年轻的法官，出生于波尔多地区，富歇曾经很不明智地任命他为巴黎警察局长，从而使他成为掌管全国警察的大臣。德卡兹灵活善变，具有极大的魅力以及搞阴谋的才能均属罕见，并且为人毫无节操。他成功地博得了老国王的欢心，不久就以他为宠臣，称他为“亲爱的儿子”。

在“无双议会”的压力下，内阁制定并实行了一些镇压措施，如允许不加审讯就可把嫌疑分子投入监狱；对发表反对当前政权的文章或声明的人严惩不贷，建立重罪法庭，按军法程序惩办企图造反的人，把在“百日王朝”期间支持拿破仑的那些过去的弑君者赶出国门。其中几个首要分子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内伊元帅。他在贵族面前受审而激起很大的义愤；处决这位英勇军人是波旁政权的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保王派的反动还表现在对行政机关和军队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至少有1/4的军政官员被撤职。

在1816年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政府试图制止反动分子的行动。就在这时期，众议院中极端保王派和温和（或内阁）保王派之间第一次发生分裂。结果温和派占少数；政府无法使选举法得到通过，预算也是在休会（1816年4月29日）前克服极大困难才得以通过的。

显而易见，当议会复会时，内阁将会发现它已经不能执政，因为多数派对宠臣德卡兹的敌视态度十分强烈。德卡兹如果辞职，他就会使极端保王派的发言人在议院中所鼓吹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国王必须选择多数派能够接受的人担任大臣；这就等于在《宪章》的范围内实施议会政治。在盟国再三劝告的鼓舞下，路易十八决定解散“无双议院”（1816年9月5日），通过这一行动表明国王高于国民代表；

具有奇妙的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姿态却受到那些装作是自由主义原则的捍卫者们的欢迎。

德卡兹精心准备的选举还是由原来的选举团进行，但是代表名额恢复到262人，他们的年龄也按《宪章》的规定提高到40岁。这样一来，就能够排除一大批极端保王派的代表，在新的议院中，内阁派就成了多数派。此后，由于三权——国王、内阁、议会协调一致，路易十八才能够尝试建立一种中间路线的政府，其目的方面是阻止极端保王派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使那些与大革命藕断丝连的人们重新回到君主制方面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而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因为尽管竭尽一切努力争取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结果只能使反对君主政体的各党派的力量加强了，并使政权本身陷入危险之中。这第二个目的没有得到足够的突出。

这次尝试进行了四年（从1816年到1820年），在这期间，国家的政治力量，像在议会中一样，分为三种倾向。

极端保王派（这是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的称呼，而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真正保王派”，或者简称“保王派”）不允许有任何企图去把君主制度建立在对革命原则或革命分子的让步上。有些人，例如哲学家路易·德博纳尔，认为路易十八的《宪章》是“一部愚蠢和黑暗的作品”；另外一些人，例如夏多勃里昂，表示愿意接受《宪章》，并希望根据《宪章》建立一个既是君主政体的又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秩序。他们摒弃酿成大革命的18世纪哲学家的那种意识形态，并且设法去恢复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当时，拉梅内是主张教会和君主实行联合这个理想最狂热的捍卫者。《日报》是拥护这种极端教权主义倾向的报纸；《辩论报》大概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它采取夏多勃里昂的路线。夏多勃里昂主编的杂志《保守党人》从1818年10月到1820年3月不定期地出版，曾出色地捍卫了该派的主张。极端保王派得到王储（国王的弟弟阿尔托瓦伯爵）的支持，而且总的来说，得到王族和宫廷的支持；以及教士们最有力的支持。该派的指令由一个叫作“宗教信仰骑士团”的秘密组织传达到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天主教和保王派反共济会的团体，它是第一帝国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对1814年君主制的恢复不无影响。这个组织在众议院内设有一个分部，这使得该派纪律严明和步调一致，局外人对此无不感到吃惊。

内阁派或就性质讲称为立宪派的人支持政府的中间道路政策。它控制着行政机构，可以通过国家官方报纸《政府通报》说话。一小群以“空论派”而知名的作家——鲁瓦耶-科拉尔、基佐、布罗伊公爵等，是其思想鼓舞的来源。他们真心实意地忠于君主制度和波旁王朝，用德卡兹使之家喻户晓的话来说，努力“使国王接近全民，全民接近国王”。

以独立派为人所知的集团，把所有反对现政权的人——自由派、共和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都包括在这个并不确切的名称之内。邦雅曼·贡斯当是这一派的智囊，拉法叶特是这一派的旗帜，银行家拉菲特是这一派的财东；国王的表弟奥尔良公爵则小心翼翼地与之来往。先是共济会的秘密社团，后是烧炭党（1821年左右从意大利传入），使这一派大为发展，并具有实力。经常变换旗号的报刊《立宪党人》，后来成为这一运动最有名的喉舌；但是，在德卡兹时代，该派的观点则发表在邦雅曼·贡斯当精心编辑的、不定期出版的评论杂志《智慧女神》上。立宪派利用它较多的人数，使搁置很久的选举法得到通过：按《宪章》所规定，选举人必须是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人，候选人则必须是缴纳1000法郎者；选举必须直接投票，所有选举人都要到省城去投票（这一规定有利于自由派，因为它的成员大多数是城里人）；最后，众议院每年要改选1/5的议员。右翼保王派竭力反对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军队的法律，因为它似乎过分有利于原第一帝国的军官。盟国也由于同样原因深感不安。然而，黎塞留于1818年设法结束了外国军队的占领；尽管1817年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农业危机，法国财政部还是依靠巴林家族（伦敦）和霍普家族（阿姆斯特丹）的贷款，付清了1815年条约规定的全部赔款。

黎塞留在亚琛谈判非常成功，于1818年年底返回法国，决心重新制定他的国内政策。盟国对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十分担心，希望看到国王的政府向右翼保王派靠拢。由于德卡兹本人决心坚持他的对左派和解的政策，内阁中遂发生严重的危机。结果黎塞留辞职，成立一个以德索尔将军为名义上的首相而以德卡兹为真正首脑的新内阁（1818年12月29日）。德卡兹请国王封了60名新贵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些新贵族在贵族院中形成对他有利的多数。在空论派的鼓动下通过一项给予新闻以较大自由的法律；主要的新内容是，对新

闻记者的起诉必须由陪审团审理，从而保障他们不受政府的武断制裁。

在选举中（1819年秋），独立派获得极大成功，德卡兹本人对此亦大吃一惊，他决定改弦易辙。然而，他的某些同僚拒绝跟着他如此完全改变阵线；结果发生一次新的危机，政府也重新改组，德卡兹不得已亲自出任首相（1819年11月）。正当他忙于和右派磋商修改选举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使他丢掉了权力。在1820年2月13—14日夜里，一名狂热分子暗杀了国王的侄子贝里公爵，而在亲王当中，只有这位公爵能够保证波旁家族长支的延续。当时夏多勃里昂写道：“真正杀人的并不是那个万恶的凶手。”实际上，保王派认为德卡兹负有教唆犯罪的责任。路易十八不得不听从意见将他的“亲爱的儿子”免职，召回黎塞留公爵领导政府。清除德卡兹就保证了走中间路线的立宪派的解体，该派其余的成员不是要去依附右翼就是要去依附左翼，而在“右翼中间派”和“左翼中间派”的标签下或多或少保留他们原来的一些色彩。

新闻又毫不迟延地重新被置于严格的检查制度下，并且像在1815年一样，政府有不加审讯就加以逮捕的权力。但是需要有一部新的选举法，以扭转看起来在近几年内就会由左派控制议会多数的倾向。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及首都街头的骚动，1820年6月末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两种选举团：一种是行政区选举团，包括全部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选举人，选出258名代表；另一种是省选举团（即大选举团），由各省1/4的选举人（即纳税最多的人）组成，它要选出另外的172名代表。这就意味着给予那些最有钱的人（因而推定是最保守的人）两个投票权。所以，1820年的这部选举法称为“双重投票法”。

有两件事情加大了由此预期的后果。一是自由派和波拿巴分子企图采取暴力行动，结果失败了。这次行动的后台是拉法叶特，它吓坏了那些真正希望安定的人们。二是贝里公爵的遗腹子出世，这是保证王朝得以延续的类似奇迹的意外事件（1820年9月29日）。1820年11月的选举相当大地加强了极端保王派在议院中的势力。然而，黎塞留对新的多数派的领袖们寸步不让，他打算与德卡兹遗留下来的大臣们共同治理下去。当两院在1821年年底复会的时候，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联合投票谴责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于国王年老体衰，没有决心给予有力的支持，黎塞留便辞职了（1821年12月12日）。

新内阁完全由国王的兄弟“殿下”可以接受的极端保王派的成员组成。的确，看来王储已经开始以其兄长的名义主持朝政。在这个新班子里，核心人物是财政大臣约瑟夫·德·维莱尔伯爵。1822年9月，当他成为首相的时候，他的一把手地位就确定了。维莱尔出身于图卢兹地区的小缙绅家庭，由于擅长辩论和精通政务，在众议院中是出类拔萃的。由于他的努力，法国的财政出现了一个在法国的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正规和繁荣的时期。作为政府首脑，他毫不疲倦地参加议会辩论，富有机谋，他的计划既是坚定的，又有弹性。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基本上注重实际问题，由于他那诡诈和多疑的天性，再加上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胆小怕事的和平主义，他的政府带有一种低三下四和实用主义的特征。对于一个已经为浪漫主义的春风所鼓舞、对第一帝国的壮丽事业念念不忘的民族来说，这种特征是令人不快的。他也不敢挺身而出反对反对他的一派提出的某些荒唐要求；由于他个人的恩怨，他使保王派更加四分五裂了。他认为他得到国王的信任和议院多数的支持，他是能够控制局势的，因此，不想去安抚反对派或者去掌握舆论。

当保王派政府上台的时候，反对派认为它很快就会由于无能而威信扫地。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维莱尔和他的同僚在其艰苦的斗争中取得许多胜利，以致在两年之后，这个政权似乎已经坚如磐石。在整个行政部门，凡是有同情左翼嫌疑的人，都为忠诚可靠的人取代了。烧炭党的新密谋都被警察粉碎，并遭到严厉的惩处。新闻被置于这样一种管理之下，即虽然没有恢复检查制度，但它的言论自由却被大大地剥夺了。根据1821年2月27日的法令，中等教育要受教士的监督；建立教会事务和国民教育部，这就确认由教会掌管教育了。这个部由弗雷西努斯主教阁下主持，实际上，他是个开明而温和的人，有19位大主教和主教被封为贵族。

政府地位得到强有力的巩固，是由于法国干预西班牙革命所取得的成功，而不是由于所有这些措施。这次干预是在大陆列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决定的，尽管自由派猛烈地反对。维莱尔本人只是在顾虑重重下，在1822年年底出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勃里昂的压力下才勉强同意。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挫折的惨痛教训，使这一计划显得过于冒险了。但是在实际上，这一计划的执行是完全成功的，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军队凯旋，士气大振，对君主政体忠心耿耿；西班牙自由派的

垮台使国内的敌人灰心丧气。法国自由派发现自己已经名誉扫地，因为他们曾经预言会发生许许多多的灾难，还因为他们见到一次使国家的自尊心得到某些满足的成功显得垂头丧气。夏多勃里昂可以吹嘘了：“八年的和平还不如二十天的战争使正统君主的地位得到加强。”政府迫不及待地从此一有利形势中捞取政治资本。1823年12月底解散了众议院。翌年2月26日和3月6日举行大选，内阁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自由主义分子反对派从110席锐减到19席。正如路易十八所说：这是个“重新恢复的议院”。胜利的一派打算获得时间，悄悄地重新进行在1816年9月中断的复旧工作：它首先做的事情是通过一项法律，停止每年改选众议院的1/5代表，并把议员的任期延长到七年。

然而，保王派在议会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本身，就构成了危害派内团结的条件。到1820年，已经出现一群极右翼的代表，他们指责维莱尔过于温和：如果消灭左派，他们就会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在1824年的“重新恢复的议院”里，这种“反反对派”的代表大约有70名。首相很不明智，他对批评他的政策的一些右翼人士采取报复手段，因而加剧了双方的争吵。他在这方面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将夏多勃里昂撤职。这位伟大作家的威望和自负由于西班牙远征的胜利而达到顶点，使首相极为难堪。1824年5月，夏多勃里昂在贵族院中拒绝支持维莱尔一心想实现的贷款折换计划，因此，他以最无礼的方式被免职了（1824年6月6日）。夏多勃里昂立即成为反反对派的首领，并把《辩论报》拉了过去。于是，《辩论报》便开始用激烈的言语痛斥政府的过失。“这个政府缺乏冒险精神，毫无光荣可言，充满诡诈狡猾，权欲熏心；它是一个为法兰西民族精神所不齿的政治制度，与《宪章》精神背道而驰；这是一种暗无天日的专制主义，把厚颜无耻当作力量；贪污腐化已经形成一种制度……”

路易十八的逝世（1824年9月16日）和他弟弟查理十世的继位，使事情暂时有了转机。新君主毫不困难地显然受到各派的欢迎，甚至是由衷的欢迎，这一事实着重说明了1816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1816年当时每一个人，包括盟国在内，都以为改朝换代将会在国内引起麻烦。查理十世虽然不如其兄聪明，但具有比较迷人和更为宽宏的性格。登基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要把工作做好，并赢得臣民的爱戴；因此，他很快就宣布自己恪守《宪章》，而且取消了维莱尔在路易十八去世前不久重新建立的新闻检查制度。

另外，政府的成员也原封不动。夏多勃里昂被免职以后，维莱尔无可争议地成为政府的首脑。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抵挡住他的多数派中要求采取反动措施的那部分人的压力；这不仅由于他需要这部分人去对付人数迅猛增加的右翼反对派，而且也由于新国王的观点使他倾向于极端保王主义的纲领，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

查理十世在位时期所通过的第一项重要措施是对流亡贵族给予赔偿，人们往往把它归因于查理的反动思想。其实，路易十八才是这一措施的倡议者，它所牵涉的也远远不是法国人中个别阶级的利益。只要那些在革命中被剥夺了土地的前地主不承认所发生的转让——他们怎么能承认呢？——这种财产就像沾染了一种道德污点，其价值就降低，买卖也就困难；尤其是新主人感到内疚，感到心里不踏实，因此就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君主政体。解决办法就是让前地主接受赔偿，取消他们的权利要求。困难在于寻求这笔大约10亿法郎的巨款。维莱尔曾经想过，如果以3厘公债形式来分派赔款，就有可能提供这笔款项；每年需要用来支付这项新的国债的钱，可来自5厘公债的兑现，当时这种公债的市价已经大大超过其票面价值。这一措施是在1824年5月提出的，但遭到贵族反对而未获通过。吃一堑长一智，维莱尔在1825年年初改变了他的策略；首先，他使议会通过了必须给予流亡贵族以赔偿的原则，然后使其接受挖掘必要财源的财政安排。但是，在两院和报刊上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又使人想起了大革命时期许多令人痛苦的往事。小投资者——多半是巴黎的资产阶级——由于利率下降和股票市场的普遍疲软而蒙受损失。而席卷全欧洲的经济危机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然而，如果人们指责内阁牺牲人民的利益去满足流亡贵族的贪婪，那么，至少法国从此不再存在两种财产，“国有财产”的问题就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与此同时，政府在加强它维护天主教的政策。其主要表现是：通过一项法律，对凡在教堂中渎圣者处以死刑。这项法律实际上是不能应用的，因为要证明所犯罪行的条件十分严格；但是，它的鼓吹者——其中包括博纳尔——想要以此表示反对国家世俗化的原则；而反对派也是从原则出发谴责它为神权政治开辟道路，因为它要求世俗权力进行干预，去维护一个纯属神学性质的真理。1825年5月29日，国王在兰斯加冕，典礼几乎完全按照古老的宗教仪式进行，仿佛表明国王已向教权屈服。

自从1820年起，政府的宗教政策更加坚决地对教会有利。如今，它在其他方面也开始显露出它的后果。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保持在拿破仑的政教协定的范围内：1816年和1817年黎塞留为改变协定而进行的商谈都失败了，因为议会的多数议员主张法国教会自主，而罗马教廷却寸步不让。尽管如此，新设立了30个主教管区，国家拨给教会的预算也比1815年增加了一倍。大力补充新的教士；允许主教开办教会学校或小修院，不受教育总署管辖；神学院（大修院）的学生人数在10年内几乎增加一倍。1825年，新就任圣职的青年教士的人数在很长时间中第一次超过入土的老教士的人数。各种教会团体也复活了，当时的法律本是不允许它们存在的，但是政府以宽大为怀，并不追究，1825年甚至通过一项承认修女会的合法地位的法律。至于修士会，除了少数的例外，它们只得满足于事实上的存在，而无权拥有集体的财产。其中之一是耶稣会：庇护七世已经重建耶稣会，1826年他们业已掌管七所中等学校，为了逃避教育总署当局的控制，都伪装为小修道院。我们已经看到，教育总署本身越来越受到教会的支配。正如大革命前一样，教育工作似乎要成为教士的天下了。世俗人受到鼓励协助教士进行虔敬和福利工作。由耶稣会士建立和赞助的著名的团体吸收贵族出身或地位显赫的人作为会员。它的会员还支持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其中包括“传教协会”，它为天主教国外布道团募集钱款。国内布道团则财源充足，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力图使在大革命时期脱教的人重新信教。虽然作了这些努力，据教皇驻巴黎的使节马基阁下在1826年的估计，全部人口中有半数以上对宗教漠不关心，巴黎只有1万人参加圣事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还有50万虽居少数但非常活跃的新教徒——任何一项也许只有在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才行得通的政策，或者要强迫人民百分之百地信奉天主教的政策，肯定会引起敌对的反应。的确，大约在这段时间里，反对派的论战似乎都是集中到宗教问题上。教士的主宰一切，政府对教会团体的屈从，教皇极权主义，教士的愚民政策，宗教裁判所的建立，重新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尤其是已经达到骇人听闻地步的耶稣会的阴谋活动——这些就是成千上万的小册子、报纸文章、漫画和歌曲传播的主题。不管是否巧妙地配合，这些战术给予自由派双重的好处；他们无须直接攻击国王或宪法，就能使这个政权威信扫地；他们还能分裂保王派，因为在保王派中有相

当多的一部分人依然留恋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或者18世纪议会中法国教会自主运动。

政府被这场斗争削弱了，在议会中遭受两次惨重的失败。内阁想防止由于代代继承所造成的地产的不断分割，以加强政权的中流砥柱——土地贵族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于1826年提议制定一项法律，修改拿破仑民法典中关于继承的部分，打算在能够纳税300法郎的富户中确立长子的优先权。自由主义反对派谴责这一措施，认为是在企图恢复旧制度的社会秩序及其长子继承权。贵族院摒弃了这一提案。在1827年议会再次开会时，维莱尔和他的司法大臣佩罗内对于日益敌对的潮流在鼓动舆论感到吃惊，他们企图进行反击，打击他们认为的祸根——报刊。由于国王不愿采取在出版前检查新闻的制度，由于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显得软弱无力，补救办法似乎只有制定一项新的法律，对报纸以及一般印刷物的发行给予相当的限制。法案在众议院中引起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的重大讨论；左翼和右翼反对派同心协力捍卫新闻自由。最后，代表们虽然终于通过了这一法案，但在贵族院的坚决反对下，政府不得不把它撤回。

这一反对势力必须予以粉碎。维莱尔劝说国王任命76名新的贵族院议员。同时解散众议院（1827年11月6日）。维莱尔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舆论越来越反对他，由于40名众议院代表升入上院，反正要举行部分选举以补充缺额代表，还不如干脆提前举行大选，给反对派来个措手不及。如果他能再次获得一个起作用的多数，他就可以继续左右议会的局势七年。这是一场赌博，但是失败了。因为1827年11月的大选证明，即使在当时，维莱尔也没有估计到自己在选民中是如此的不得人心：在新的议院里，只有170—180名代表支持政府，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数几乎相等，还有约70名右翼反对派。查理十世只得更换大臣，选择一个由次要人物组成的班子，其中有几个是上一届政府的成员。不设首相，一个名叫马蒂尼亚克的波尔多律师担任他的内政大臣，此人颇为可爱，有口才，是国王在议会两院中的喉舌。这届政府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国王希望继续执行维莱尔的政策，但为了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内阁却不得不向左派让步：更换行政人员，对新闻采取比较自由的新制度，建立选举人名册以防止政府的专制。然而，考虑到反对派运动的特殊性质，所作出的主要让步却要损害教士的利益。国民教育部从宗教事务部中分出

来了，由一名非宗教人士担任大臣；耶稣会会士不准当教师，小修院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得收容无意成为教士的学生；这样一来，教育总署就重新控制了中等教育（1828年6月敕令）。政府为了迎合舆论，还想执行一种比维莱尔的政策更为积极的政策。人们曾经指责维莱尔过于轻易地屈服于梅特涅或坎宁的要求。法国支持希腊的独立而进行干涉，使民族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并没有改善政府在议会中的处境。

查理十世对马蒂尼亚克执行的路线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与几个右翼保王派别——反反对派、维莱尔派、内阁派秘密商谈，准备组织一个完全合乎他口味的内阁。1829年8月8日，这个新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它的组成简直是有意使舆论大哗：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担任外交大臣，不久又出任首相，他的名字令人想起旧宫廷中最坏的恶习；此外，他过去是一个流亡贵族，又是教派的工具。德·拉·布尔东纳伯爵担任内政大臣，自1815年以来，他一贯在众议院里发表最反动的观点。最后是陆军大臣德·布尔蒙将军，人们认为他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出卖了拿破仑，并在1815年提供不利于内伊元帅的证词。《辩论报》总结了一般的印象：“科布伦茨，滑铁卢，1815年。这个政府有三条原则，三种人物……不管你怎么使劲压它、挤它，滴下来的只有耻辱、灾祸和危险。”

正当人们期待有所显示力量的时候，这个政府却按兵不动，使得反对派既感惊奇而又放心。政府只是尽可能长期地推迟召集议会，同时试图在外交政策方面赢得一些威信，这就是计划远征阿尔及尔的目的。1830年3月，在议会的开幕式上，终于炫耀了一下力量。查理十世从宝座上发表演说，宣称：“谁要耍罪恶的阴谋，给我的政府设置我不愿预见到的障碍，我会找到力量去粉碎它，因为我决心维持公共秩序，法兰西人民对自己的国王一贯表示的信任和爱戴是我的坚强支柱。”以221票赞成和182票反对通过的多数派答词是对国王的一种客气的非难：“《宪章》……确认全国人民有权参加有关群众福利的讨论。根据《宪章》，您的政府的政治观点要与您的臣民的愿望取得一致乃是正确处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条件。陛下，我们的忠诚和虔敬，使我们不得不告诉您，这种一致现在并不存在。”这一次，冲突的实质是很清楚的：政府究竟是代表国王的意志呢，还是代表众议院多数的意志？如果采取前一个解释，查理十世可以坚持说他依然忠于《宪

章》的条文。如果采取后一个解释，实际上必定是建立一种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国王下令众议院休会，接着又解散了它，宣布举行新的选举。选举是在7月的最初两个星期进行的。尽管政府做了一切努力，尽管国王亲自干预，结果反对派获得274个席位，内阁派只获得143个席位。限定的选民不买国王的账。然而，查理十世决心维护自己的特权。由于成功地占领了阿尔及尔（7月5日），也由于他想到在大革命时期他的兄长路易十六尽管作出让步也无济于事，他就更加鼓起勇气这样做了。

7月26日的《政府通报》公布了在绝密情况下草拟的四项敕令。

《宪章》第14条规定，国王有权制定保护国家所必需的任何规章和法令。上述四项敕令就是以这一条为依据改变了新闻管理法和选举法，而在正常情况下，这本来是议会的事情。期刊的出版要事先得到许可，而且每三个月要重新申请一次。7月选举的众议院还没有开过一次会就被解散了。新的选举要在一个打算阻止自由派参加投票的制度下进行。在宣布这次政变时完全没有军警的戒备，而为了对付肯定会发生的抗议活动，任何不像波利尼亚克政府那么愚昧的政府都会采取预防措施的。巴黎的三天骚乱和奥尔良公爵的追随者们的果断行动结束了查理十世的统治。他退位了（8月2日），然后去英国避难。

就这样，建立一个把旧君主制的传统与大革命所传播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制度的企图，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假如国王的手腕巧妙一点，他是否可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国民，使他的政变获得成功呢？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成功了也是不牢靠的。因为，从全面考虑，政治问题虽然是这场新革命的直接原因，却不是唯一有关的问题。贵族和教士等旧统治阶级想在国王的庇护下恢复他们过去的优势，而资产阶级则决心保护他们在1789年大革命中业已赢得的地位。这两个阶级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冲突更为深刻，也许更为根本。然而，对法国来说，这15个年头也并不是白过的。不仅仅是由于有一个出色的政府，国家恢复了稳定和繁荣；也不仅仅是在1814年和1815年两次失败以后，整个民族已经确确实实重新站起来了；除了所有这些而外，它还能够在有限的范围里，第一次对实行代议制政府进行了试验。

“光荣的三天”的胜利者——那些在街垒上开枪的人们——大多是共和派和波拿巴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当查理十世让了路，他们发现也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政治家们。拉法叶特是唯一

有足够的名气充当这一派领袖的人，而他像往常一样，表现出软弱无能和举棋不定。相反，奥尔良派的势力却很强大，一方面由于巴黎的中产阶级厌恶混乱和危险，从而支持他们；另一方面还由于那些挺身而出反对查理十世的代表很得人心。当时，革命是以“宪章万岁”作为战斗口号而风起云涌的，因此从道理上讲，胜利就不大可能导致宪法的变更。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市府大厦派”的要求，为了明确表达反对查理十世的自由派的意图，众议院还是匆匆忙忙对《宪章》作了星星点点的修改。因为“似乎真的要把本来就属于法兰西人民的权利给予他们”，遂将1814年的序言部分删掉，从而把国民主权的原则拐弯抹角地肯定下来。天主教不再是国教了，和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一样，再一次成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第14条的措辞作了修改，以防止产生查理十世所作的那种不正当的解释。永远废除了新闻检查和特别法庭。授予议会两院创制法律的权力。在表决已经宣布的新选举法之前，选举人和候选人的年龄条件分别放宽到25岁和30岁。新的君主（后来称路易-菲利普一世）要称为“法国人的国王”，而不再称“法国国王”。白色国徽将由三色国徽取而代之，传统的百合花图案也将改成高卢鸡。最后，在8月9日举行了授权仪式，这次仪式有意识地表明新的君主政体的契约性质。只是在亲王宣誓遵守经过修改的《宪章》之后，他才登上王位，从四个典礼官手里接过当政的标志。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通过了几项新的重要的基本法，这就完全表现出新政权的特征。首先，是组织国民自卫军（1831年3月22日）。

“其职责是保卫君主立宪制度、《宪章》以及《宪章》所确认的权利，保证服从法律，维持或重建秩序和社会治安，支援作战部队。”自卫军由选举产生的军官指挥，听从民政当局——市长和省长的调遣。实际上，它只是由缴纳若干直接税并买得起装备的公民组成的。因此，前来报名并拿起武器来保卫政权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中产阶级。随后几年，在与民众叛乱进行斗争时，这支资产阶级民兵往往是首当其冲。自卫军和小翼翼穿上自卫军制服的公民君主之间产生了一种感情的一致；只是在新政权的最后几年，这种一致才告破裂。

其次，是市政组织（1831年3月21日）。市政当局是由一个限定的选举团选举出来的；除了文职官员和某些中产阶级的各行职业的成员

而外，其中还包括按不同比例参加的纳税额最高的公民：在居民不足1000人的市镇为10%，在居民超过1.5万人的市镇为2%。后来又有一个类似的制度，使最富有的市民拥有派代表参加省议会的特权。

再次，根据1831年4月15日通过的选举法，取消了1820年的双重投票制度。取得候选权的纳税标准从1000法郎下降到500法郎，取得选举权的纳税标准从300法郎下降到200法郎。

最后，贵族阶级衰落了。1830年8月，由于断然地废除查理十世新封的爵位，贵族院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另一些贵族自动引退，以便不向新国王宣誓效忠。1831年12月29日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新贵族的爵位今后一律不得世袭，因而削弱了贵族院的贵族性质。

这样一来，已经垄断了财富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知识文化的法国资产阶级，又进一步垄断了政权。在政府里，由于贵族已被赶走，或者出于对查理十世的忠诚而自动离开，资产阶级控制了升官的一切途径。政府的人力物力均用来为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服务：例如，在复辟时期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和保护贸易制度（尽管布罗伊和基佐作了一些走向自由交流的努力），却依然排除外国的竞争并允许国内的陈规陋习继续存在。法律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利益。在一个人口增长速度比生产发展速度快的国家里，供求法则自由运转的结果必然是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明显对比：中产阶级商人日益富裕，而劳动人民则日益贫困。这种社会病症1831年11月在里昂市就表现得很清楚：丝织工人从省长那里得到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工厂主拒绝按规定办事；于是工人暴动，占领公共建筑物；政府罢免了那个省长，并派兵占领里昂，因为工人阶级的贫困不应扰乱资产阶级的秩序。

新政权的政治基础仍然狭窄而且不牢固。它既没有宗教的传统，也没有民众的赞同，前者是旧君主政体的力量所在，后者是共和制度的基础，甚至也是依靠公民投票的拿破仑制度的基础。七月王朝是在巴黎暴动者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在应该由430名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中，只有219名参加了这项工作。往最宽处说，在3500万法国人当中，资产阶级只有300万人。而在这些资产者当中，只有20万人左右特权人物参加政治生活。最后，在“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内部，由于矛盾重重，这就进一步缩减了政府的国民基础的程度，使其更难被称为全

民的了。因此，如果用图解的话，可以把这个政治制度画作倒置的金字塔形。

秩序和繁荣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也是新政权的理想。雄心壮志，以及过去和未来的精神力量，使反对派——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们低估了正统反对派（又称查理派）在最初是多么危险。只要路易-菲利普的地位不稳固，正统派就可得到军队内部和政府内部大量的秘密支持。巴黎的老百姓对垮台的君主无疑是敌视的，但他们对于新国王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为了推翻“篡位者”，就连共和派和正统派之间也出现了半成形的联盟，双方都希望在权威一旦倒台的时候捞到好处。旧王朝可以在外省搜集许多党羽，特别是在教士的势力依然很强的地方，如在西部，以及在南方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地方。正统派的报纸充分利用新闻自由，它们既不缺钱，也不缺人才；其中之一是夏多勃里昂，他对新政权狠狠打了几记耳光。最后，大陆上的毫无热情承认路易-菲利普的列强，全都期待着来一个第三次复辟。至少有两位君主——尼德兰的和皮埃蒙特的——提供了财政援助。

由于王公们及其谋士们的愚蠢，把所有这些王牌都丢光了。于是他们主张把年幼的波尔多公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推到前台来。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只要她在王国的某一选定的地点登陆，周围有许多忠心耿耿的党羽，派来讨伐她的军队就会倒戈，她就可以像1815年拿破仑经历的那样重新获得王位，假定这个计划（颇有点像出自沃尔特·司各特的手笔）有过一星半点成功希望的话，那也应该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即在路易-菲利普的政府还没有能控制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进行尝试。但是，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这个举动一再推迟。到1832年5月29日贝里公爵夫人真的在马赛附近登陆时，政府已经站稳脚跟，而且有所戒备了。即便如此，她还是一直推进到旺代。但是，6月3日发生的暴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公爵夫人躲在南特她的一些忠实追随者的家里。直到11月，路易-菲利普的警察才终于发现她的隐蔽所，将她捕获。她被监禁在波尔多附近的布莱城堡里。但是，一位公主身陷囹圄，这种浪漫主义简直无以复加了！还有一个情况，更加使人难堪。算是路易-菲利普走运，这位自1820年以来一直守寡的公爵夫人却怀了孕。她生下一个女孩，从此名誉扫地，于是马上让她恢复了自由。这一荒诞不经的灾难使正统派丧失了卷土重来的一切可能性。

他们只能在报刊上和议院里发表徒劳无益的反对意见。律师贝里耶是他们在议院里的发言人，大家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他们采取了一个包括普选和地方分权在内的貌似民主的纲领，想以此来赢得民心。

波拿巴分子能够利用拿破仑的传奇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向上增长这样一个有利条件，而政府却愚蠢地推波助澜。例如，它组织极其盛大的仪式，迎接皇帝的遗体返回法国（1840年12月）。但是，帝国英雄史诗中的幸存者们没有理由对新政权不满，因为新政权给了他们许多荣誉和物质利益。拿破仑的儿子在维也纳的夭折（1832年7月22日）完全打乱了这一派的计划。新的王位觊觎者路易-拿破仑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和布洛涅（1840年）两次企图发表政变宣言，只落得个可笑的下场。第一次失败后，他只是被撵到美国去了；第二次失败后，他被关进了汉姆城堡。

共和派显得更加活跃，也更加危险了。他们仇恨路易-菲利普，也仇恨在1830年7月窃取他们的胜利成果的资产阶级政客们。于是，他们经常采取暴力行动。在最初时期，实际上实现了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使得他们能够收罗一大批党羽——大学生、小职员，后来还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阶级的成员。一个叫作“人民之友”的团体把这一派内最活跃的分子团结到一起。他们想乘议会中一位最孚众望的人物拉马克将军的葬礼（1832年6月）之际，在巴黎发动一场革命。起义者在首都的部分地区设置了路障，经过两天血战之后才被击溃；在这次冲突中，国民自卫军十分勇猛。

经过另一次流血悲剧以后，政府完善了它的防御系统。1835年7月25日，当国王带着几个儿子正在检阅国民自卫军的时候，一阵机枪子弹像雨点一般扫射接受检阅的队伍，打死打伤41人，但没有打中国王。这件事是两个共和派狂热分子莫里和菲埃奇干的，他们把一挺土制机枪架在一扇百叶窗后面。由于群情骚然，政府乘机使“九月法”得到通过。这样一来，就使巡回法庭的诉讼程序中更加有力了，而在不真正恢复新闻检查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使新闻受到严格的监督；这种监督的措施也用于印刷品和其他的插图，反对派在攻击国王和那些官居高位的人的时候，过去一直非常有效地利用这些东西。

如此戒备起来之后，政府就能够制止革命思想的公开传播，不过，它还不能防范罪恶的阴谋。又发生了几起企图谋害国王生命的事件。共和派的理想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间接支持，其中有乔治·桑和欧仁·苏等小说家；有拉马丁等诗人；有路易·勃朗和朱尔·米什莱等历史学家。共和思想里充满了社会主义，因而拥有一大批工人阶级的听众；政治解放被看作社会解放的手段。因此，劳动的权利、工人管理工厂、工人分享利润等，都成了共和派纲领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如排山倒海，甚至通过路易-拿破仑在狱中所写的《消灭贫困》一书渗进了拿破仑党，还通过拉梅内和比歇渗入了某些天主教集团。

在1830年以前，天主教虽不能说是百依百顺，但一直是忠实地拥护当局的。而现在，它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反对派。七月革命以后，政府由于对宗教抱着敌视或鄙视的态度而疏远了教士。一小批受拉梅内影响的、有才华的年轻人进行了回击。他们在自己的《前途报》上宣称，他们要与法国国内以及国外的自由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并且决心使教会从国家的卑鄙控制下解放出来。1832年，当拉梅内受到罗马的谴责的时候，他的追随者们继续在资产阶级当中鼓吹天主教信仰的复兴。由于教士们接受了新政权这一既成事实，政府也比较优待他们。将近1840年时，这种和平相处的局面被打破了：天主教徒们开始要求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自由化，反对教育总署的垄断。在一位法兰西贵族、杰出的演说家夏尔·德·蒙塔朗贝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堂。这个党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促使天主教徒不再在道义上支持政府。

这些轰动社会的思想潮流几乎没有渗进政治生活，依照宪法的规定，政治生活依然局限于选民和议会两院的小圈子内。物质利益和钩心斗角是这个小组的日常生活内容。其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只能看到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先后支配各政党和内阁各集团的无聊表演。在革命刚刚结束后，成为问题的是：新政权本身能否存在，它应该执行什么路线；此后，到1832年年底，当新的君主政体已经度过初期的危机并明确维护它的保守主义的时候，政治活动是由国王硬要凌驾政府之上这一顽强意志支配的。最后，在1840年以后，当路易-菲利普已经达到他的目的后，反对派的努力集中于改革制度的问题。1830年8月11日新国王任命的第一个内阁班子反映出它是由发动革

命的各种人物组成的。有一派，即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基佐、莫莱、布罗利、卡西米尔·佩里埃——希望革命只是更换一下君主，允许更加真心诚意地执行《宪章》所规定的制度，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恢复正常”。另一些人——杜邦·德·勒尔、拉菲特、热拉尔元帅——认为革命是朝着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的出发点；他们的口号是“扩大七月的战果”。不久，这两种倾向分别被叫作“抵抗”和“运动”。这个第一届政府所能做的，不过是要赢得时间，减少损失，对舆论作某些让步，以及撤换有效忠查理十世嫌疑的文职官员。路易-菲利普非常积极，他花费大量时间接见代表团，发表爱国的和安抚的讲话。

10月底，“抵抗派”不愿再和投降政策发生关系，建议国王让“运动派”证明它的无能和罪行。这是雅克·拉菲特内阁的起点，时间是1830年11月28日。这位重要的银行家，软弱、虚荣、渴慕名望，实行阿尔芒·卡雷尔所说的“投降政治”。首都似乎每天都发生暴乱。1831年2月的民众暴力行动是针对教士的：圣日尔曼·洛塞瓦教堂、巴黎大主教宫和其他建筑物遭到抢劫；教士们不敢再在街头露面。“运动派”的外交政策不明智地鼓励自由主义革命，直接导致与大陆欧洲战争，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在军队几乎处于一片混乱的时候。

1831年3月，改变政策的舆论已经成熟，路易-菲利普把权力交给了卡西米尔·佩里埃。他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厌恶社会秩序的混乱，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几乎是狂热的意志和精神力量。他强迫他的同事和所有官员绝对服从。就是国王本人，在这位专横跋扈的大臣面前也得折腰，不再直接干预事务。卡西米尔·佩里埃在众议院宣布了他的纲领：“在国内要安定，但不要求自由作出任何牺牲；在国外要和平，但不损害荣誉……我们认为，暴乱既无权强迫我们参加战争，也无权推动我们革新政治。”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采取什么非常措施就实现了这个纲领，只是把“抵抗派”的力量重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自己的能量注入了国家机器里去。甚至在为保卫新政权而与左右双方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他还设法使一些根本性的法律得到通过，这些法律实际上构成了政权的体制。佩里埃的政府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就结束了，因为当时流行性霍乱正在大量吞噬巴黎人，而他也于1832年5月16日得此病死亡。但是，在一年时间里，他挽回了似

乎无可救药的局势，防止了欧洲战争，制止了无政府状态，真正为新政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佩里埃一死，国王得到了解放。从许多方面看，他在曾经登上宝座的人们当中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他出生于1773年，曾从著名的德·让利夫人受过特别良好的教育。他不但有广博的知识，还有非常实际的见解；他能流利地讲四种语言，在必要的时候还会下厨做饭；关于怎样理财，即便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对他也并没有什么可教导的。大革命开始时，他像他的父亲菲利普-埃加利泰一样，属于雅各宾派。他很幸运，由于年纪小而没有参加革命集会；他曾作为一个士兵为共和国服务。为了自我宣传，他参加过瓦尔米战役和热马普战役这一事实成为说不完道不尽的宝贵主题。他被他的上司迪穆里埃所连累，结果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因为革命者憎恨他，那些依然效忠波旁王朝的流亡贵族也讨厌他。几年后，他重新赢得了王族长支的堂兄弟们的好感，并和一个杰出和虔诚的女子——那不勒斯国王的公主玛丽-阿梅莉结了婚。复辟期间，他小心谨慎，对君主毕恭毕敬，君主对他也很宽宏。与此同时，他还讨好把他当作靠山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已经57岁了，他还是精力充沛，论长相颇似路易十四，只是长着很长的络腮胡子，不久以后，他的胡子大大出了名。在许多方面，他体现了扶他上台的资产阶级的缺点和美德：爱好家庭生活，喜欢跟自己的许多漂亮孩子在一起；生活简朴，作风民主；节俭到了贪婪的程度；天性温厚而善良；身临险境时也很勇敢。另一方面，他总是诡计多端，见风使舵，不喜欢单刀直入，痛痛快快；他说话和蔼可亲，滔滔不绝，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然而，他欺骗大家的结果，势必失去正直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在这种机会主义和随机应变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统治法国的决心。在复辟时期，国民的意志被宪法置于国王的意志之下，民众不得不奋起斗争，争取摆脱从属地位。1830年以后，情况倒过来了：既然革命已经确定人民至高无上，必须为确保自己的势力而斗争的乃是国王了；在修改后的宪法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只能通过暧昧的手段来取得胜利，而玩弄花招正是国王的拿手好戏。

由于政治家们野心勃勃的竞争，由于卡西米尔·佩里埃纠合到一起的人数众多的抵抗派意见分歧，使国王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左翼中间派在阿道夫·梯也尔的感召之下，高唱英国模式的代议制政府理

论：“国王为君，不管政务。”而拥有空论家和基佐的左翼中间派则满足于复辟时期的立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在政府中有积极的发言权。在这两派中间游离着一百来名议员——“第三派”，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同时又在批判这个政府的过程中得到好处。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王朝右派”，他们主张把忠君与共和派纳领的一部分调和起来。从卡西米尔·佩里埃逝世（1832年5月）到1840年10月，竟有10届内阁相继上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伊公爵的内阁（1835年3月到1836年2月）和莫莱伯爵的内阁（1836年9月到1839年3月）。前者是一位毫不通融的空论家，他不愿意仅仅按国王的旨意办事，因此被国王免了职。后者恰恰相反，他是个俯首帖耳的十足的廷臣，因此，众议院各派领袖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台。

1840年发生了外交危机，由于梯也尔缺乏深谋远虑，东方问题差一点导致一场欧洲战争。结果，组成了一个比较长命的内阁。名义上，苏尔特元帅是首相，而真正的政府首脑则是基佐。事实上他是外交大臣，只是到了1847年9月那位年迈的元帅满载荣誉和大量财富终于退休以后，他才得到首相的头衔。这届内阁一直到君主制本身垮台才告结束。它所以特别稳定，似乎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国王和他的首相之间存在着完全的谅解；基佐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始终心甘情愿地让国王在政府里运用他希望运用的那部分影响；基佐的人所共知的坚强性格使他的态度中不存在任何卑躬屈膝的缺点。第二，众议院里的各党派瓦解，政府就有可能以赐予个人恩惠的办法获得多数；内政大臣迪夏特尔擅长此道，因而专门委派他去干这项肮脏的勾当。第三，基佐本人的品格，当时他风华正茂，经验使他的才能成熟起来。在那个时代，具备如此突出的资质的政治家真是凤毛麟角：他头脑极为聪明，历史知识渊博；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具有提高辩论水平的才能；他有勇气，并且对自己的使命具有崇高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说，他蔑视舆论，无意争取舆论；他顽固地拒绝考虑他的对手们的愿望里可能包含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使得那些对手十分恼火。1847年，他宣称：“政府的责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很聪明地向前走；要坚持下去，但要规定界线。”新一代的代言人拉马丁回答他说：“假如这就是一位主持政府的政治家的杰出天才的话，那么我们不必用一个人，只用一块界石就可以了。”

受到国王鼓励，并且国王本人也具有的这种狭隘的保守主义，结果必然要导致这个政权的垮台。1846年年底，改革政治制度的问题变成了各个反对派的共同纲领。他们的要求涉及两件事情：一是代议制度的败坏，因为众议院里有文职官员，他们的投票非常明显地受到政府的控制；二是选举制度的破坏，政府可以通过贿赂或其他手段，随心所欲地左右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选民的投票。1831年的选举法把纳税标准从300法郎降为200法郎，使选民人数增加到16.6万人；从那以后，仅仅由于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很快，选民人数就达到了24.1万人（1846年）。但是，在一个拥有3500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数字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每75个男性居民中，只不过一个人有选举权而已。

1847年议会刚一开会，梯也尔和反对派的其他一些人士就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把纳税条件降低到100法郎，并且不作任何资历调查，只按照职业或工作，赋予各个阶层的人民以选举权。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约20万新选民。虽然所提出的改革这样有限，基佐却利用忠实于他的多数把它否决了，他宣称国民只希望在和平和繁荣中生活，如果让这种无益的政治煽动发展到群众中去，将会是有害的。

反对派决心去震撼一下国家的这种的确过于冷漠无情的状态。由于法律禁止政治性的集会，他们就想采用在英国行之有效的办法——举行政治宴会。谁能阻止可敬的市民们聚集到一起吃一点冷小牛肉和喝一两瓶酒呢，即便是在这种场合发表讲话或举杯祝酒？1847年在巴黎开始了宴会运动，接着发展到地方的主要城镇；最受欢迎的讲话人是拉马丁，另外还有共和派律师勒得律-罗兰。虽然一开始共和派在各委员会里只占少数，但是他们千方百计使这一运动成为对整个政权的真正进攻。促进这一运动的是从1846年年末开始的全国经济危机。危机首先影响的是农业；在一年的大歉收之后，食品价格随即猛涨，给贫苦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次，工业既缺少资金，也缺乏订货；极其宏伟的修筑铁路计划只好停了下来；许多工厂解雇工人；有一百来万人失业。

1848年两院刚一复会，议会中就表现出舆论已在反对政府了。在就开幕词进行首次辩论时，一部分保守派分子投票反对政府，使政府的多数降为33票。基佐似乎大为震惊。但是，国王对忠告听而不闻，对舆论视而不见，拒绝考虑对制度作任何丝毫的变动。他说：“决不进行改革，我不愿意改革。假如众议院通过这个提案，我就叫贵族院

否决它。假如贵族院也投票赞成，我还拥有否决权。”反对派认为，为了战胜这种顽固态度，必须展开新的宣传鼓动恫吓国王。于是决定重新开始^[1]在议会复会时业已停止的宴会运动，而且就在巴黎进行。1848年二月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从这里开始了。

夏尔·普塔说得很对：“从来没有一个事件如此不可避免，而又如此出人意料。”所以说“出人意料”，是因为在发起这场运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或者希望推翻这个政权；因为政府在过去粉碎了比这危险得多的有组织的企图。所以说“不可避免”，是因为在1830年建立这个制度、后来发展成的那种状况，最终在国民中间完全丧失了任何坚实的基础。不但政治生活为占少数的拥有特权的资产阶级所独霸，而更加糟糕的是，国王用狡猾的和收买的手段，甚至使得这个少数对公共事务也没有任何的实际控制权。在实际实施的制度和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国民主权原则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最后，正是路易-菲利普的政府的成功导致它自身的毁灭；因为，它给国民赢得的秩序和稳定使人们忘记了当初他们接受1830年篡位的迫切理由：害怕革命的混乱，害怕战争。

（严维明 译）

^[1] 关于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的发展情况，在第10卷里涉及很少，我们依照编者的要求，在本章作了扼要的介绍。

^[2] “我们按照皇上的意志，给予我们的臣民仁慈的让步……”

第十三章 1795—1830年德意志在体制和社会方面的发展

到18世纪的最后10年时，民族意识在德意志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已经发展起来。正如迈内克说的那样，这种民族意识“并未有意追求，而仿佛是偶然得到的”，其发展盖源于当时德意志诗人和思想家的杰出成就。但是这些在总人口中为数不多的人感到，他们属于一个文化民族，而不属于一个政治民族。歌德和席勒在他们的讽刺短诗（1796年）中就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

德意志？它坐落在何方？我的地图似乎没有一张是标明它的位置的。
文化的德意志在哪里开始，政治的德意志就在哪里结束。

18世纪即将结束时，在哈布斯堡领域以外的德意志，其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王建立了成为欧洲重要政治力量中心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二是一批多半住在普鲁士以外的作家创作出一批文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使法国人早些时候所作的关于德意志不能出现才子的断言成为无稽之谈；也正是这些著作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为德意志在欧洲赢得了知识界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历史上的这两个新因素在根源上几乎完全不同。它们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时而互相促进、时而互相制约的过程，以及大体说来顽固保守的统治阶级在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下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各种重大政治事件所作出的反应，必然成为阐明从1795年巴塞尔和约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这一时期中德意志社会和体制方面的主要内容。

德意志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在许多方面和30年战争，甚至和更早一些时候以来的情况没有多少变化。德意志是一个农业国。“上层阶级”保持着中世纪发展起来的、现在大半受到法律的保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各种特征；同时，在德意志，为数众多的实际上独立的政治力量统治着面积相差悬殊的各个领地。它们为了种种实际目的，把神圣罗马帝国看作根本不存在似的。这个没有定型的国家，起初只有许多小的文化中心，连一个首都也没有，直至本章涉及的30年中才开始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德意志民族无疑地有着朝气蓬勃

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却死气沉沉，乃至在法国人入侵和占领了广大的国土以后才激发起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而且也只是在军事失利的刺激下，普鲁士一批精明强干的高级官吏才决心努力倡导及进行社会改革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在德意志各邦中这个最先进的邦早该实行了。

首先关于农民问题。他们占人口的3/4以上。要对他们作一个简单扼要的描述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的条件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内，一个小的政治单位与另一个单位的差别也极大。在这个时期的最初几年里，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组织严密的农场和半个世纪以来大大改进的耕作技术的英国旅行者们来说，德国的农业显得很落后，几乎停滞在中世纪的水平上。这里占优势的还是旷野式土地耕作制，狭长形的份地零星分散，仍然沿用村社的耕种方法。结果个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因而不去仿效先进国家，也不引进人工牧草、作物轮种等改进的方法。当旅行者们从西往东走时，他们发现耕作的情况越来越糟，而农民也更为愚昧，社会地位也更低下。普鲁士东部省份的农民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上，与农奴毫无差别，他们要为庄园主担任各种各样、有时无尽无休的劳役。庄园主还自设法庭，对农民握有完全的裁判权。在易北河以东这片原来开拓的殖民地上，和北部的梅克伦堡一样，庄园都很大，它们主要由贵族地主本人来操持经营，部分劳动由农民承担，还有部分劳动从更早些时候起就由雇佣的无地劳工来担任。

在德意志中部，尤其严重的是在西部和西南部，它们是发生政治上最大分割的地区，庄园也大多是由分散的小单位组成，所以长期以来通常采用农民服劳役的方式来替代缴纳现金作为地租。但是，封建制度的某些残迹虽然经常受到一些开明人士的谴责，却几乎到处可见。迫于人道主义的压力，同时也是对英国的实际榜样和对法国重农主义理论的响应，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邦在普鲁士之前就废除了农奴制。奥地利是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废除农奴制的，巴登是在卡尔·弗里德里希执政时期，而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则是在丹麦之后废除的。腓特烈大王至少保护了普鲁士农民对他们的世袭土地的权利，阻止了贵族采用某种圈地的办法，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庄园。在这方面，梅克伦堡是臭名昭著的。然而，腓特烈大王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考虑军队的利益，因为根据邦

的制度，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健康的农民。出于同样的军事目的，他力图不干扰地主贵族的特权，因为他们给他提供军官和高级文职人员。国王和贵族之间逐步达成的部分谅解是，如果贵族放弃他们阶级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传统权利，同时正如他们逐渐被迫去做的那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那么，他们至少应当继续完全拥有自己的庄园和农民，免缴土地税，并且不受政府的干涉。即使在法国革命以后，东部的农民也很少给地主带来麻烦，而在莱茵河一带，农民甚至对于很小的从属地位都愤愤不平。因此，在普鲁士不是来自下层的压力，而是来自政府官吏与一个开明君主的努力，促使实行改革。他们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了地主的支持，这些地主从外国的经验中知道雇佣劳动可以给他们提供比现存的制度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收益。

在普鲁士境内，无论在威斯特伐利亚或东部的省份，属于皇室领地上的农民都获得了自由。在威斯特伐利亚，主要是由冯·施泰因男爵促成，而在东部各省，5万多富裕的农民曾用牲畜为皇室效劳，因为他们在耶拿战役前已经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改革热情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许多人不仅获得了个人自由，还享有对份地的世袭权。

在普鲁士衰亡以前，施泰因清楚地看到，如果这个国家要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在瓦解封建旧秩序中取得了那些小小的开端以后，一定要继续采取许多进一步的改革。但是，只是在1806年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才使施泰因获得机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此以前，普鲁士城镇中的工商业者阶层几乎和农民一样逆来顺受，毫无进取心。1792年赫尔德写道：德意志被罗马教廷授予“顺从的国土”这一光荣称号，确实当之无愧。由于需要有一个殷实发达的中产阶级以便课以重税，国家很久以前就大力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但是在普鲁士和在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小规模工商业在许多行业中仍占巨大优势。甚至在普鲁士的城镇中，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给自足经济的前资本主义理想是不足取的。在城镇中也没有要求自治的丝毫迹象，即便德意志西部和西南部的所谓自由城镇也是实行完全非民主的寡头统治，而普鲁士的城镇则驯服地屈从于由政府任命的虎视眈眈的地方长官的管辖。手工业行会中历史悠久的自治权也所剩无几了。譬如，在许多城镇中长期驻有军队，物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军事长官的控制。又如，谋求新工作的学徒和家庭仆人必须提交载有个人全部历史的“就业申请书”。商人和制造商的自由，根据腓特烈时代继承下来的

重商主义政策，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切货物进入城镇都要缴货物税，在每个邦的边界又要缴进口税。但是，商人、店主、工匠和他们的家属可免服兵役，而有别于学徒和农民。这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职能在于只是提供军费。

普鲁士城镇中的各种自由职业者、公务人员、文职官员以及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也免服兵役，而且被免除公民的种种负担。所以，文官政府完全由职业行政人员、挑选出来的商人、店主和在城镇议会中受政府任命的人掌握。在普鲁士之外，帝国的许多自由城镇实际上是一些小的共和国。它们在多数情况下都越出城墙，向外扩展了相当大的地盘。这些城镇中的议员享有尊敬的地位，而且常常收入优厚。不过他们几乎总是少数显要的名门望族的成员。仅仅在普鲁士，贵族才履行为国效劳的义务。这个传统是两个军人国王树立起来的。在其他地方，贵族享受特权而不尽义务。虽然很多庄园已被抵押出去，但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仍然包括所有的富人。他们的年轻子弟的职业像在法国一样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不像在英国不受限制。在大多数的邦里，高等法院和政府部门的职位都保留给当地的贵族。但是，还有许多人愿意或被迫出外去谋求职位，尤其愿意到某个更大的邦的军队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因为在那里比在自己的邦里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教会势力很大的邦给天主教徒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奥地利对于帝国的骑士和他们的后裔也给予特殊照顾，而普鲁士则通常录用具有突出才能和非凡精力的人，而不论他们出身是贵族还是平民。在这个大改革时期，普鲁士的一些主要内阁大臣如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及格奈泽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贵族让他们的子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不和平民子弟一起上学，与英国的贵族子弟一样，如果不进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贵族学校”，就聘请私人教授。这些贵族子弟不从事工商业，同时为了表明其区别于一般人的贵族身份，即便他们是家庭中的幼子，也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冯”（von）字。通常他们在一生中都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持这种高傲的地位。除非他们像一些行为古怪的人那样，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也许加入了旨在摧毁这种阶级障碍的组织——共济会。贵族的社会特权受到重要的法权的支持。对于这些法权却难以找到合情合理的辩解。最重要的一个特权就是免缴土地税。土地税是普鲁士和其他大多数邦中最普通的直接税形式。对于农民来说，这种赋税加上有关的其他捐税，在1800年前后的普鲁士约占一个农民土地净产量的40%。无怪乎歌德，这

位受到魏玛公爵宠爱并多年在这个小公国里担任繁重职务的诗人，都发现“农民经常被掠夺一空”。他曾把农民比喻为蚜虫，在玫瑰叶子上吮吸饱了以后，反过来却被蚂蚁捕食了。他又说，“现在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地步，上层社会一天的消耗已超过了下层群众一天的生产”。

令人吃惊的是，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如此严重的不调和，在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少数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对它至少进行一次持久的和公开的抗议，而这些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欧洲在这个理性时代的大众舆论的倾向是很熟悉的。在法国，在许多方面再也无法容忍的弊端经过几十年的抨击和哲学上的剖析之后，最后人们企图通过以暴力推翻现存的国家的办法来清除它们。在德意志，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得到热情的传诵，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社会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文学评论的水平上，或者只是引出一一般化的结论，与实际明显脱节，以致没有人会严肃地对待它们。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在18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了，显然充满了卢梭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戏剧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人道和不公正的特征进行了公开的嘲笑，但是歌德的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1773年）中班贝格主教的放荡不羁的谄媚者，或者伦茨的《家庭教师》（1776年）中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贵族雇主都是新颖的和独创的文学题材，表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彩世界中的某个特殊方面，而不是要求采取政治和社会行动的时弊。“狂飙突进运动”中另一些不甚突出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例如在诗歌和民歌方面，年轻的格廷根诗人们就谴责了暴政和农奴制，美化了简朴恬淡的生活。最伟大的理性主义作家莱辛在他的《爱米丽雅·伽洛蒂》（1772年）中，提出了比同类的作家更强有力的抗议，因为人们不可能看不出，他在那个现代化了的弗吉尼亚故事中刻画的表面上是一个意大利王子，实际上则是一个被权力和阿谀奉承所腐蚀的德意志小暴君。但是，莱辛故意回避主题的直接政治含义，把他的悲剧停留在一个家庭悲剧的水平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才能平庸的剧作家写出了一大批这类家庭戏剧，总的倾向是显示中产阶级的美德，以烘托贵族的罪恶。席勒的早期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是这类作品中的佳作。

这些最优秀的作家在其成熟时期都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能满足具有更高鉴赏力的读者，其中包括受到法国文学和思想熏陶的贵族阶级的

读者。他们当然力戒偏见，尽管他们的同情心仍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他们延续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传统，努力摆脱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偏见，竭力在他们严肃的作品中反映他们感到人性中基本的和永恒的特性——温克尔曼在希腊艺术中找到的崇高安详，以及赫尔德在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视为伟大文明特征的伦理探索，虽然他们各自根据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条件采取了独特的形式。

莱辛的《智者纳旦》、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席勒的《唐·卡洛斯》等在这10年中创作的作品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时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同一个信念的鼓舞。这个信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即相信人有能力在不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情况下，通过正确地使用人类的智慧和克制卑劣本能的途径而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作品时，会发现它们并不像当初作者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伟大作家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极端的自我意识和内心反省。原来时常受到虔信派很深影响的宗教态度和感情，在这个理性时代已经与教会脱离了关系，但是仍然表现得超凡脱俗。譬如，原来祈望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灵魂，现在这种愿望转变为对思想感情的渴求。在有些作家身上个人的自我修养更多的是伦理性的；在另一些作家身上则更多的是哲理性的或美学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往往是一种信念而已，就是认为，“尘世”所珍视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极不重要的；反之，一个人只依靠最低限度的物质帮助而能达到某种精神境界却要重要得多。

狄尔泰在总结他认为在莱辛与黑格尔之间的德意志文学和思想方面的主要特点时，曾指出当某一时代的人感到自己生活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的世界是令人厌恶的，但又不可能改变的时候，他们便努力通过内在的调整使自己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当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意志作家中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家屈指可数。最坦率的宣传家施洛策尔是哥廷根大学教授，该地位于隶属于英王的汉诺威这片实际是中立的土地上。默泽尔父子都来自符腾堡，该邦是在这个极权政府统治下唯一幸存的实行代议制的邦。法国革命爆发后在普鲁士和其他邦实行了更严厉的新闻检查，使得大多数作家根本不可能对于政治和宗教问题自由发表评论，甚至歌德认为一贯不很公正的一个戏剧评论家也被立即驱逐出魏玛。于是，对于一些可能被

认为危险的问题，在发表意见时一般都采取假设和想象的方式。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认为自己的意见会对行动产生任何作用。

因此，不难想象，法国攻占巴士底狱和国民议会的最后辩论的消息，如同早些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的消息一样，受到了德意志许多作家的热烈欢迎。他们对这些消息都抱有一种朦胧的进步的同情心，对法国的思想也持一种踊跃接受的态度，虽然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另一方面，宫廷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如歌德）则惊惶不安，从一开始，就不表示同情。在魏玛，维兰德和赫尔德坚持他们自己早先的理想，直至恐怖措施和国王的遭到处决使几乎全德意志的舆论都转而支持各邦的诸侯。广大的人民群众忠于本邦的王朝是有缘由的。在许多中小邦中，专制主义已变得真正宽大仁慈了。在普鲁士，那些最不喜欢腓特烈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勇气、无私和干练，虽然人们都庆幸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减轻了以前因争夺权力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压力，但对比之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既软弱无能又荒淫无耻。

179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在没有公众舆论的推动下，国王及其内阁顾问拜姆和海尼茨效法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政策，以期提高公众的福利，取消对工商业的限制。前面曾提及其主要结果——皇室领地上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国王原来还想把这个改革扩大到全体农民，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首先是因为遭到了几乎所有土地贵族的反对；其次是因为1803年以后国际形势日趋恶化，他要考虑其他事情。可是，有一些东普鲁士的地主确实仿效了国王的榜样。虽然国王的自由经商思想现在广泛地被许多有影响的官员所接受，但是在当时因英法之间的斗争而造成的十分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国王不愿冒险彻底改变普鲁士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1798年建立的财政委员会也只限于讨论废除贵族不缴土地税的特权，但是特权阶级至少要以较高的新税率缴税，而在过去有一部分是豁免的。

1804年10月，国王显然在拜姆的谏劝下，加强了他的内阁大臣中改革派的势力，让冯·施泰因男爵担任负责税务、关税和生产的行政总署成员。施泰因是莱茵兰的帝国骑士，他的家庭与帝国数百年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人从1780年以来一直忠心耿耿地为腓特烈大王创建的国家效劳。现在他把维护帝国的强烈愿望和对国家的忠贞二者结

合起来。他超人的才干和充沛的精力使他在1796年赢得了威斯特伐利亚议会高级议长的职位。通过议会，为普鲁士君主管理威斯特伐利亚省。但是同年在他经过提升担任了中央政府的工作后，由于他给拿骚-乌辛根公爵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公开信，他作为正在迅速衰亡的帝国骑士阶级的捍卫者的名声，在全德意志的知识分子中变得人人皆知了。拿骚-乌辛根公爵曾吞并了施泰因祖传的一些土地。这种强占土地的斗争在1803年开始后，德意志西南部和莱茵兰等地一些大的公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土地兼并。施泰因早已谨慎地把他自己在莱茵兰的大多数庄园变卖掉，而在普鲁士南部买进了大片土地。这一行动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普鲁士的信心。

施泰因以性格刚强而闻名，他有时甚至对人恫吓。他的朋友雷贝格说，“他最痛恨的是人们犹豫不决、窃窃私议和掩盖不愉快的真实真相”。然而，他乐于听取反对的意见，而且一再考虑。这位天生的行政官吏，也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他对经济学和历史的兴趣确实超过了他对富于想象力的文学的兴趣。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需要刚毅不屈的品质，而且必须能够借鉴历史上的伟大先例而对事物采取高瞻远瞩、豁达睿智的态度。他给国王聪颖过人却又放荡不羁的侄儿路易·斐迪南亲王着重推荐的作家是普卢塔克。他曾希望改造这位纨绔子弟。他写得最好的信件是给赫尔德和让·保尔的一位朋友冯·贝格的信，其中充满了魏玛的人文主义。但是，他在经过细致的了解后选中的妻子却是一位汉诺威将军、乔治二世的私生子的女儿。她既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淑女，又是一位名门闺秀，她的家庭地位足以满足他传统的门第观念的要求。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行动，而不是沉思冥想。他对冯·贝格夫人说，他最向往的品质是在艰难困苦中仍能保持积极主动和坚韧不拔。

施泰因从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时代起，就和他的朋友A. W. 雷贝格和恩斯特·布兰德斯一样，十分崇拜英国和英国的制度。他的这两位朋友都是汉诺威官员，他们对法国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雷贝格是伯克于1790年出版的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录》的第一位德国评论者，而布兰德斯在法国革命前几年就成为伯克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们三人都信仰一个有机的社会，认为国家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数量和空间上都应该持续连贯，但是他们是进步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像浪漫主义宣传家亚当·米勒那样的空谈理论家。施泰因十分崇尚实

际，对于建立在抽象原理上的任何政治行动都抱一种非德意志式的不信任态度，但是他通晓法国的政治著作，非常乐意学习法国的经验，尽管他对于法国的道德堕落和浮华轻佻十分厌恶。

1804年，施泰因成为行政总署成员时，他以极大的精力贯彻由财政委员会倡议的几项行政改革：简化对盐业专卖的管理；取消某些国内的关税；设立统计局；将各省的税务局和“军事和领地委员会”加以合并。他非常急切地希望通过充分的口头讨论，向改进各级政府的决策工作方面发展。他需要类似英国内阁那样的机构，即一个由有实权的大臣们组织的委员会，而不是当时德国存在的那种由国王及其大臣的顾问们所实行的个人统治制度。在腓特烈大王时期，所谓顾问只不过是秘书人物，但是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时，由于其能力和精力与腓特烈大王相差太远，而且性格怯弱，因此他最初依赖门肯，后来又依赖拜姆，每采取一个新步骤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使得像哈登贝格那样仅仅成为部门首长的内阁大臣们十分厌恶。施泰因在1796—1804年在威斯特伐利亚的省议会中任高级议长时，就曾经企图发扬省的三级议会制中还残存的一些比较悠久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不仅受到雷贝格的影响，而且在1786年他前往英国作了为期六个月的访问期间，亲自取得了关于英国制度的第一手材料。1807年年初，他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解除了职务。他在退休后写的《拿骚备忘录》中，发展了关于自治的思想，提出“振奋公众精神，恢复公民感情，发挥潜在的或未能正确的力量；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协调民众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精神、意见和需要；激发挥卫国家独立、民族荣誉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把它们树为奋斗的伟大目标。

在巴塞尔和约与耶拿战役之间，普鲁士政府的指导原则是维持和平，以便从事国内行政和军队的改革。1795年，国家的人力物力过早地遭到了巨大消耗，但也证明了进行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对增加国家兵力的新办法作了研究：减少根据邦的制度免服兵役的人数；组织民兵；对军队中施行的非人道的纪律予以放宽；除贵族外，普遍接受其他人士担任军官。但是在这次改革运动中至今尚缺乏一种紧迫感。人们很难相信腓特烈训练有素的军事机器会真正失去效率。国王往往对于那些掌握指挥权的老将过于心慈手软。再者，一种巨大的乐观主义情绪普遍存在着，尽管国王本人并没有这种情绪。1799年一位高级官员曾对法国使馆随员说，法国人自下而上的富有生气的革命在普鲁士

将缓慢地由上而下来完成，因为国王本人就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正在小心谨慎地仿效约瑟夫二世的方法，不断地努力削弱贵族特权。照此下去，不要几年，普鲁士就会不存在一个特权阶级了。确实，在耶拿战役以前，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造成的灾难与危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除。国债已经减少了近2/3；1700万银圆存放进了被战争弄得枯竭的国库。但是由于税收自腓特烈大王以来没有改变，因此尽管实行节约，仍不能应付急需。军事要塞和武器装备都没有恢复到原先最高的有效水平，对士兵们甚至在冬天不发大衣。鉴于经济和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原来的方针路线来指挥一支军队显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正如后来所发现的那样，参谋工作完全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腓特烈式的战术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已经证明，用它来对付拿破仑在应付新的形势时所显示的超人能力是绝对不够的。

在普鲁士失败后，一群势力强大的高级官吏决意立即实行改革，尽管他们深信要使普鲁士能够与革命的法国相抗衡，就一定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在法国，通过自愿的合作，国家的巨大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完成共同的事业。正如施泰因在危机发生前很早就意识到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各个阶级都要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但是在社会上的许多明显的弊端被肃清前，就不能期望实现这种团结。犹如在耶拿战役以前开始的改革一样，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民和农业的状况。施泰因在1807年10月重新担任首相以前，政府在实施废除私人庄园农奴制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在此以前，这个计划一直遭到大多数地主的强烈反对。在东普鲁士，大庄园主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非常适应，因此无须进行多少说服工作，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无地的劳动力。有一个时期，在农业庄园方面，交易十分兴旺，许多庄园易手了。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原来存在的世袭关系相对地变得罕见了。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施勒特尔和施泰因的同事舍恩，像当时政府所在地柯尼斯堡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都深受亚当·斯密思想的影响，主张对私人企业不加限制。必要时解除地主对农民所承担的义务，作为他们放弃对农民所有权的补偿。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是废除农奴制的优点之一。他们甚至赞成大规模地围圈农民土地，只要这种步骤有助于在和围圈土地相等的地区内形成大型的农民份地，比通常的份地大4—8倍。这些份地都免除劳役，并保持世袭的使用权而不论这些土地是租借来的还是长期保有的，以便发展一个

类似自由民的阶级。施泰因本人是赞同这一措施的，其意图是想借助经验来修改计划。他大胆地使1807年10月9日颁布的关于解放农奴的敕令适用于根据提尔西特和约留给普鲁士的各个省份，而不必和它们的三个等级的代表磋商。关于圈地的条款是在1808年2月14日的附录中增补的。这个重要的法令取消了当时存在的对买卖土地的一切限制。这样，中产阶级乃至农民中的买主也可以得到迄今为止一直为贵族所保留的地主庄园。反之，贵族也允许从事工商业。结果消除了现存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或阶级地位的法律基础。

那时可以充分预见到，为完成这一改革将颁发进一步的法令。但是，1808年下半年，施泰因在法国人的逼迫下辞职，而留下来的那些改革者就显得不够有力，无法对付地主们集体的自身利益。那些负责通过“十月敕令”的人们原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企图实现社会公正，但这一措施最终根本没有使这一目标实现。战争带来的困难时期一旦过去，地主立即获得自由，迅速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许多农民无力缴付现在要求他们必须缴纳的地租等款，因而地主获得了无地的劳动力的新来源。在1816年实行所谓“调整法”之后，这种惨状尤为严重，因为这些法律完全是为地主的利益服务的。1807年和1808年的法令确实使私人庄园的农民，同早些时候皇室领地的农民一样，成为国王的直接臣民，不再隶属于地主。地主不能作为中间的权威而限制农民的行动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农民获得了自由，但是像领地农民一样，他们并没有从他们自己的土地所承担的繁重劳役中解脱出来。1811年9月14日的法令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但是它只影响到农民中较富裕的那个阶层。根据1816年5月29日的法令，他们被迫放弃一大部分土地。有的放弃了1/3土地，有的竟达一半。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中，许多农民发现他们都陷于严重的贫困之中，致使不少人成为无地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关于鼓励农民扩大土地的条款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贵族仍然保持着许多特权：免缴土地税（直至1861年），警察权（直至1872年），在庄园内拥有裁判权和狩猎权（直至1848年）以及教会圣职的授予权（直至20世纪）。大约从1809年起还为他们建立了信贷银行，但是农民必须等到1849年才能得到这样的信贷援助。因此，在各个方面，施泰因的这一部分改革是代表当时个人主义倾向的胜利。尽管它表面上似乎是出于一种对农民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它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有产阶级。领地上的官吏首先发现，原来地主对农民承担义务所花的费用要比农民为

地主服劳役的价值大得多。但在实施这些改革后，经过严格的核算，证明地主是受益者。

在耶拿战役之后，迫切需要改革的第二件事是中央政府的行政组织问题。在战前，这个问题议而未决；战后到了1806年年底，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致使施泰因不得不提出辞职。当时国家已面临最大的危机，国王本来希望施泰因出任外交大臣。施泰因提出若要他接受这一职务，必须免去贝姆的职务。贝姆是国王手下大权独揽的内阁顾问。国王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对他严厉训斥。九个月后，经过劝说，他重新回到政府，被任为首相，可以直接晋见国王，但是贝姆仍留在朝廷，只是由于王后迫切地对他恳求，施泰因才没有再发脾气。他至少获准分配贝姆担任他认为贝姆可以胜任的工作。次年6月，贝姆最后成为最高法院院长，与此同时，政府的体制问题总算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1807年夏天，哈登贝格被法国人逼得辞职。9月，当时在里加的国王接到了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案。该方案是在阿尔滕施泰因和尼布尔的协助下制定的。它的主导思想是普鲁士必须下决心向敌人学习，向革命的、拿破仑的法国学习，学习他们如何采用在君主坚决控制下的民主制度来加强国家的统治。国王迅速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是主要由以前的行政总署成员舍恩、阿尔滕施泰因和尼布尔等人组成的“当前问题委员会”，负责处理文官制度的改革事宜。另一个是以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为首的“军事改革委员会”。施泰因重新入阁，提出了一个由他自己起草的全面计划，对政府的主要部门及其议事程序进行改革。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国王原则上的同意，虽然施泰因不得不同意推迟实施，即等到法国人从占领的普鲁士领土上撤走以后，财力上有可能时再予以实施。

施泰因要求同当时的法国一样，按合理要求设立五个部——财政部、内务部、外交部、陆军部和司法部——来代替传统的三个集体负责的委员会，即一个负责外交事务（内阁部），一个负责宗教和司法，另一个负责一般行政管理（统一管理地方的和专业的部门的行政总署）。五个部的大臣的工作由国务会议来统一协调。国务会议除了五个大臣之外还有几个枢密顾问参加，国王亲自主持会议。这些部都正式建立了。虽然起初财政部与内务部合并，由施泰因领导，但是建立国务会议的设想却没有得到国王的赞同，主要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

能胜任会议主席职务。哈登贝格在离职以前的一两个月中，担当了类似首相的角色，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国王和贝姆的合作下，协调了各个委员会的决定。施泰因不得不满足于一种类似的临时安排。当哈登贝格作为他的继任者回来时，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直至1810年，国王才接受哈登贝格的建议，称他为“国务总理”，并承认他为政府首脑，代表大臣们与国王保持联系或者至少控制这种关系。施泰因至少打破了过去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完全靠文牒的惯例。现在他和大臣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有关事务。国王由于认识到他个人能力不足，不再像以往那样摆脱他的内阁独断专行地统治国家。在哈登贝格成为国务总理时，他一如既往，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遇到来自贵族的反对，就越来越多地恢复原来的官僚主义统治办法。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灵活手腕胜于相信施泰因十分珍视的民主原则。在维也纳会议以后，他成功地抵制了威廉·冯·洪堡企图将某种程度的内阁责任制列入宪法的努力。直到去世，他始终独揽大权。从洪堡的信件中，我们对哈登贝格所获的印象与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对他的描述非常相似：

哈登贝格有着乐天派和追求享乐者身上常有的那种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性格。他思维敏捷，精明强干，还有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但是，他的性格中没有道义的和宗教的基础，缺乏远大的目标，缺乏巨大的动力和坚定性。他的理解力缺乏深度，知识博而不精。由此产生了他的弱点：浅薄轻浮，在顺境中过于自信，在逆境中怨天尤人。这些缺点又因为他耽于声色、骄傲自大和虚假伪善，危害更大。……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和做好事；他所追求的是这种事业可能带给他的荣耀。因此，他不能正确地予以理解，也从来没有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他去世时，没有受到人们的崇敬，同时也没有人为他感到哀痛。

施泰因的观点在1808年11月19日颁发的“市政改革法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但仍然只是部分的体现。他和哈登贝格、舍恩和阿尔滕施泰因一样，并未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行放任主义，他对早已消失了的乡村庄园制度显然过于理想化了，把自己对英国的地方自治所勾勒的图景描绘得也许过于美好。这些都导致他在一种合作制度中，而不在一种没有控制的私人企业中，去寻找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所具有的自然基础。一个公民不应当被一个遥远的中央政权的命令所摆布而且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他本人应当立足于当地的社会团体中，首先参加有组织的地区性自治活动，再由这些地区性的组织，通过区和省的各级组织，可能间接地影响中央政府。

“市政改革法令”要求第一个城镇对其全部行政管理工作负责，而不必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将主动权和决定权交给中央政府的代表——地方特派员。只有警察和法庭不受地方当局控制，因为维持治安仍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虽然为了方便起见，在一些小城镇里，可以将警察交给镇议会控制。城镇分成各个选区，其中有一些居民被称为“积极公民”，由他们选出一个代表会议，再由代表会议选出城镇执行委员会。但是并非人人都需要成为“积极公民”，除非他们想在城镇里购置房地产或从事某种职业。如果他像大多数居民那样，只是在别人家里租房居住，那么他仍是一个“合法公民”，既不享受“积极公民”的权利，也不尽其义务。实际上，没有人想要取得“积极公民”的资格。“这些人是奉命而不是让他们管理自己”（泽莱），而且新的镇议会主要是由店主和商人组成的。在“积极公民”中，只是那些最贫穷的、年收入低于150塔莱尔（大城镇为200塔莱尔）的人，即收入相当于一个学徒工资的人，才在代表会议的选举中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腓特烈大王在某些行业中曾企图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但是并未获得很大的进展。这些行业都是一些在他看来可以使普鲁士更少地依赖进口并增加税收的行业。但是普鲁士与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行业中传统的行会形式仍很盛行。任何希望从事某一行业的人都必须参加有关的行会。这些行会的规章制度违反常情地烦琐复杂。施泰因的部分目标就是要废除这种强制性。但是，当时只可能在屠宰和面包等行业中建立比较自由的行会形式，同时也只可能取消另一种中世纪式的垄断——强制佃户在指定的磨坊碾谷物，即研究英国采邑制度的学者们所熟悉的“碾磨特权”。然而，自由企业的原则在1808年12月16日的备忘录中终于得到了承认。后来哈登贝格又颁发了1810年11月2日的敕令和1811年9月7日的工业法，引进了全面的法国制度。这时，一个人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得到政府的许可，便可以自由地从事某一行业。政府对于诸如制药业（和扫烟囱业！）继续进行监督，因为事关公共福利，看来需要监督。行业组织作为一种自发组织延续下去，同时在普鲁士于1815年获得的新领土上，如同在德意志大多数其他的邦一样，旧的行业制度也获准继续存在。直到1845年，仍然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自由企业制度被引进普鲁士。施泰因也曾希望消除城乡在经济作用和行政管理形式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其中涉及限制城镇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第一步，他必须取消货物税，即一种专门对城镇抽的

税，同时还要寻找替代这种税收的办法。当时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偿费，急需现款，所以想要找到替代的办法颇难如愿。东普鲁士仿效英国进行了征收所得税的试验，结果很快归于失败，不敢再试。

施泰因离职后，按照他赞成的方针所制定的1808年12月26日法令，对省级政府机构进行了改组，但它们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军事和领地委员会”现在虽然也称为政府，却保留了原来的大部分职能。然而，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在地方政权中得到了系统的贯彻，行政部门失去了早先拥有的涉及邦财政或治安问题的管辖权。在普鲁士各省，如同当时德意志的大多数邦的情况一样，以前对于司法部门曾给予政府名称，而现在都改称为最高地方法院。这些法院把原来在宗教与教育事务以及有关主权问题上的行政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政府的工作第一次合理地划分给各个专业部门，但是共同负责的原则不变。政府主席只是政府工作的主持人，而不是独裁者。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替代旧的重商主义所达到的程度体现在关于政府主席职能的一项永久性的指示中，它坚决认为政府对自由企业的干涉必须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施泰因曾建议各个不同阶级的群众代表应当参与政府工作，在委员会中与常任的官员一起共事。这个建议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曾做了短暂的试验，但很快就被抛弃了。

贵族的这么多特权遭到废除，这对于普鲁士军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在军人国王领导下的普鲁士军队在其社会结构上恰恰反映了普鲁士农村的社会结构。贵族为军队提供军官，农民主要充当普通士兵，所以士兵们常常发现他们在军队中仍然受他们青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地主少爷们的控制。当社会阶级之间的障碍受到市政改革法令的冲击而被突破时，正在进行的军队改革必须对这个新的因素加以考虑。身为首相的施泰因兼管政府行政改革和军队改革。他全力支持沙恩霍斯特的激进思想。沙恩霍斯特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担任了军事改革委员会的常务主席。

提尔西特和约以后，许多高级军官纷纷辞职，军队大量裁员，因为法国最后只允许普鲁士保持一支至多拥有4.2万人的军队。这些都促进了改革工作的进行。国王指导军事改革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三个重点问题上：改革选拔军官的办法，取消在普鲁士之外招募士兵以及修改军队惩罚制度。沙恩霍斯特在炮兵中被擢升高位是凭借他自己的能力。他最初在汉诺威，后来在普鲁士，提出在新的军队中选拔军官

应该完全根据才干，在和平时期要挑选那些品行端正、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在战时要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为标准。经过多次讨论，他得以贯彻自己的主张。在军官候选人之间，不因出身关系而区别对待，人人都要通过同样的考试。但是沙恩霍斯特授予连级指挥官很大的选择权，让他们在面试应征者时考察应征者是否具备他本人所重视的那种正直人士所应有的品质。1808年8月6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正式宣布了这些新的原则。

沙恩霍斯特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使普鲁士实行他一开始就希望采用的作为唯一可能振兴国家基础的征兵形式——法国式的全国兵役制。可是国王三次拒绝接受他的建议，直至1813年年初才表示同意。普鲁士旧军队的部分士兵是根据邦的制度在自己的领土上征集的；部分是在邻近那些允许募兵活动的邦中招募来的；按上述方式征集的人数占一半以上。到了军事改革委员会开始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由于拿破仑战争而引起的政治形势的最新变化，堵塞了最佳的途径。于是，首次采用了军人休假制度，作为在法国强行限制军队人数以前对人员减少的一个补救办法。每一个连队每月都有一批士兵复员回家做后备兵，再把按照各邦的制度征来的新兵予以补充。这些新兵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又让另一批人来接替他们。这样，军队一方面保留了一支由长期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又有一支经过初步训练的源源不绝的后备力量，而军队的总人数却没有超过将要确定的编制的最大限额。

在旧军队里当兵的是农民和学徒工，还有外国的一些地痞流氓。现在为了准备征召他们之外的其他人员入伍，第一个步骤是需要改善服役条件。在战时，普鲁士军队的老问题之一是怎样使士兵尽量不开小差。一批士兵（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都是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被劝说参军的，其余的人是被强征入伍的。他们除了出于对军官的恐惧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动机。这样一批人必须被训练成为一支听从命令的部队，而且必须用鞭笞和其他最严厉的体罚来执行纪律。如果要把来自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人一起征召入伍，他们显然应该受到更人道的待遇。这是时代精神所要求进行的一项改革。尽管旧派军官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1808年8月3日还是颁布了一项体现这一改革的命令。在这一年的3月，沙恩霍斯特已经起草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张建立类似民兵的“地方部队”，目的是征

召以前免服兵役的那些阶级的人。他建议从他们中间征召年龄在19岁至31岁之间的所有合格的男子。他的这一主张甚至遭到了高级官员中最爱国的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将会给普鲁士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损害。即使撇开这点，国王也不可能同意，因为当时正在同法国谈判关于撤走占领军的问题。1808年9月8日与法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明确禁止建立这样一支民兵。

1808年年底，法国不得不放松对普鲁士的军事压力，因为拿破仑在其他地方急需增派兵力。但是，普鲁士不愿参加奥地利预谋在1809年进行的叛乱，虽然西班牙举行了起义，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抵抗拿破仑的迹象。弗里德里希·威廉再次拒绝了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报告。这个报告是1809年6月任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计划不但对沙恩霍斯特原来的建议根据某些批评意见作了修改，还考虑建立由上层阶级中的志愿人员组成的特别骑兵分队。这支骑兵部队，同吕措轻骑兵团一样，是后来解放战争中称为“自由军团”的雏形。特奥多尔·克尔纳曾在这支部队里服役，并且阵亡。1809年7月奥地利终于在瓦格拉姆失败了。

在以后三年中又实行了一连串进一步的改革，其中包括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制度的大整顿，虽然当时普鲁士必须向占领军缴纳特别税，财政负担很沉重。经常不能如期交款。这时担任首相的是哈登贝格。他是1810年6月经路易丝王后在弥留之际亲自推荐再次出任的。他担任此职直到1822年本人逝世时止。1811年，一群爱国的将军和高级文官第三次敦促国王与拿破仑断绝关系，因为他们预见到法俄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国王仍谨慎行事，在没有得到奥地利和俄国的支持以前拒绝采取行动。而在梅特涅领导下的奥地利不愿再冒另一次失败的风险。1812年春，普鲁士甚至不得不答应为拿破仑进攻俄国提供两万兵力。这支部队最后由约克将军统率，在波罗的海诸省活动，没有参加向莫斯科的进军以及嗣后的灾难性撤退。但是，约克未与政府商量，擅自与俄国人签订了陶洛根协定（1812年12月30日）。甚至在国王反对这个协定并解除他职务时，约克仍一意孤行，继续推进其计划。只是由于1812年冬法国人在俄国遭到了惨败和约克采取了这种大胆的决定，这才终于迫使国王采取了行动。这时担任俄国皇帝政治顾问的施泰因作为特使来到柯尼斯堡。在那里他和约克获得了东西普鲁士贵族的支持，准备举行反对拿破仑的起义。他们决定征集一支2万人

的民兵或战时后备军，同时决定靠当地的这种贵族的支持来承担它的经费。

现在沙恩霍斯特终于有可能来实现他的夙愿了。征召后备军使常备部队扩大到3倍。1813年2月3日发出了组建志愿轻骑兵支队的号召。2月9日撤销了邦体制中关于免服兵役的全部规定。这就意味着实行全民兵役制了。2月12日被定为动员日。原来在东普鲁士征兵中认为有必要作出的让步，即允许雇人代服兵役的做法也废除了。这个甚至在法国也准许享有的特权的最后一个陈迹终于消失了。

关于普鲁士反对拿破仑的起义终于获得成功一节，在叙述其漫长的准备过程时，这里必须将其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情况省略不谈。国王本人的行动没有导致任何堪称英勇的业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一直坚决认为国王采取的谨慎的政策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如果过早地举行起义则注定要遭到失败。国王行动迟缓的原因是由于在宪法上他没有作出果断决定的能力，尤其是所作的决定将会对他的王朝带来风险时，他更是犹豫不决。弗里德里希·威廉只能以一个普鲁士人的地位来思考问题，而大多数爱国者，包括他的王后在内，现在都以德意志人的地位来思考问题。即使普鲁士独特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出于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自尊心也急切地希望确保独立。

关于这种民族自尊的感情，从1795年以来在德意志毫无疑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原因只是由于大规模的外来侵略以及伴随而来的混乱和灾难。但是以前当德意志遭受外来的侵略或者外国将其国土当作战场时，几乎没有任何德意志人具有这种国家遭受蹂躏的意识，因为直到1800年他们中间任何人都确实很少认为“德意志”是他们的祖国，而只是想到在德意志历史著名王朝治下的他们自己的小邦。这个新的因素看来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一种新文化的出现已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存在着。他们十分珍视这种新文化，把它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而不是地方性的东西。新文化主要是指文学和哲学方面，即语言方面的创作。这就是许多有才能的作家为了这一目的逐渐形成的统一的文学语言，它脱胎于目前仍在家庭中或熟识的朋友之间使用的方言，正如今天瑞士使用的德语那样。真的，在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家中，这种对于本民族所取得的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有所削弱，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忠诚于人类，认为它是唯

一值得给以最大尊敬的对象。甚至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中也具有很大成分的世界主义。他和许多浪漫主义的同时代的人们认为德意志注定要领导全人类走向最崇高的理想。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态度中存在着一种无视其他国家文化的危险。这在过于肯定德意志文化的优点中有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假如没有受到这种世界性的理想的激励，普鲁士的伟大改革者，特别像施泰因和洪堡等人，显然不会如此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他们自己的使命。

虽然行政和军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普鲁士人民中创造一种新的精神，但是最直接产生这种效果的改革还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参阅本书第七章，原文第193—196页）。在奥地利遭到失败后的黑暗岁月中，尽管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但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还是得到大力的推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08年施泰因辞职前，曾向国王推荐威廉·冯·洪堡担任内务部中负责宗教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但是非常合适。威廉是才干出众的洪堡两兄弟中的兄长，早年通过在柏林的犹太人接触到知识界的复兴。他25岁时和一位志同道合而且同样富裕的女子结了婚，离开了文官职务，以便和她在一起完全为了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内在的力量而生活。他写了一篇论文，论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篇论文成为阐述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耶拿居住了一两年，与席勒和歌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又在巴黎度过了几年。最后，在普鲁士驻罗马的外交机构中谋得了一个实际上挂名的职务，以便在那里纵情玩乐。他对于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直接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是由家庭教师教育的。他对宗教也毫无兴趣，把教会的事务完全交给他的助手、歌德的侄子尼古洛维斯去处理。但是，他在法兰克福和哥廷根大学学习过，认识海涅和沃尔夫，本人还翻译过希腊文。和他的魏玛朋友们相比，他甚至是一位更热心的人文主义者和文化的倡导者。他在1809年3月至1810年6月短暂的任职期间，对于普鲁士和以后德意志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制度都留下了他个人的印记。

费希特在1807—1808年之交的冬天，向当时在占领下的柏林的广大听众作了题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公开讲演，呼吁实现民族自我复兴。他十分强调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的必要性，以便培养各个阶级的独立自主的人才。这些人虔诚地献身于他们的国家，视国家为唯一永恒的现实。他热烈地颂扬裴斯泰洛齐及其在瑞士的工作。洪

堡和他的助手们在对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针作了修改后，制订了关于普及初级教育制度和建立师范学校培训师资的计划。洪堡本人对于改进普通中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当然赞成普通中学，而反对那些注重实用知识、崇尚启蒙教育的现代学校。他主张中学要通过深入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通过广泛的辅助课程给学生灌输一般的文化知识。这个教育制度在洪堡离职后由居维恩加以全部实现。事实证明它是非常成功的，为全德意志树立了榜样。早在1812年就建立了中学毕业考试制度，规定男孩必须通过考试方可升入大学（对女孩尚未作出规定）。

洪堡的最大成就是他给新建的柏林大学制定了规划并配备了师资。这座与当时的科学院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取代了在占领区的哈勒大学。柏林大学正式成立于1810年，也就是在洪堡离开柏林出任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之后不久。同嗣后的纽曼一样，洪堡认为大学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智力、判断力以及道德修养。这样，学生能很快地获得任何一项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在从事工作时有哲学作指导。他与当时杰出的学者如费希特、施莱艾尔马赫、尼布尔和萨维尼等观点完全一致。这些学者也正是他为柏林大学挑选的第一批教授。他给予这个典型的德意志大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强调追求新的知识。虽然绝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学生都能达到这个很高的理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困难，但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关于大学教育的新概念也由此介绍给了全世界（参阅本书第五章，原文第127—128页）。然而，尽管柏林大学自诩享有“教学自由”，实际上，它在财政上几乎完全依赖国家，而且它不同于科学院，在聘请教师时，学校不享有自主权。

至此，在我们了解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普鲁士在德意志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后，我们一定会认为战争期间在普鲁士发生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化比在德意志其他地方发生的变化要重要得多。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情况是不同的。帝国本身很快证明没有力量来承受法国革命及其后果所带来的巨大震动。1792年居斯蒂纳军队的第一次进攻就表明在这样一场危机中德意志西南部的那些小邦是多么软弱无能，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暂时拯救了它们。普鲁士不久便忙于处理波兰发生的事件，因为俄国和奥地利正在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而且它们都企图尽量少分给普鲁士土地。在普鲁士匆忙退出与法国的斗争

并于1795年签订巴塞尔和约的时候，莱茵河以北的德意志从此获得了十年左右的不稳定的喘息时期。正是在这些年代中，在魏玛和耶拿的歌德和席勒创作了他们的最佳著作。正如席勒1794年在宣布他们新的文学期刊《时序》创刊时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有意识地要“重新赋予人们思想自由，在真理和美的旗帜下，通过培养人们对于纯粹人性的和超越时代影响的事物所产生的那种更广泛和更高尚的兴趣，把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世界团结起来。”

魏玛是德意志中部的萨克森小公国之一。在革命以前，选帝侯领地萨克森在德意志各邦中，面积占第4位。由于它在工业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非常幽美。它所收藏的艺术珍品仅次于维也纳。许多浪漫主义作家从德累斯顿的这些艺术珍品中吸取了灵感；莱比锡仍然是书籍出版业的中心。1765年建立的弗赖堡矿业学院这一时期在促进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德意志的第一所林业学院迟至1811年才在塔兰特开办。在这些学术机构中要求学术研究结合实际强烈倾向在许多小规模，而在当时却是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中十分明显。在萨克森境内的一块普鲁士飞地上，人们从1785年起在梅泽堡附近就可以看到德意志的第一台蒸汽机把水从矿坑中抽出来。但是即便在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地区，现代化工业的进展仍十分缓慢。交通不便和行会控制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直到1830年以后很久，从总体上来说，在德意志境内资本主义的迹象极少，只有一些家庭工业，而且专门生产纺织品。这些家庭工业分布在如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高原地区的一些土地贫瘠的村子里，因为那里的人民特别需要这样的副业。

在普鲁士退出联盟后，奥地利在1795年和1796年继续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虽然巴登和符腾堡很快被迫放弃了联盟，向法国纳贡。1797年，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被拿破仑击败以后，奥地利也和拿破仑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在秘密条款中奥地利同意莱茵河左岸最后将并入法国。次年，法国在拉什塔特大会上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最后代表帝国国会的多数代表予以接受。同时，也商定了一个计划：把莱茵河右岸的教会土地归还给世俗，以补偿德意志诸侯由于这一合并而损失的领地。但是，两国再次发生了冲突，直至1801年2月签订吕内维尔和约，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结束以后，这个计划才付诸实施。

德意志西南部的人们生活，现在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德意志大小诸侯和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之间无耻的交易造成的。他们牺牲了帝国思想的最后支持者——信奉教会的王公、自由城镇和帝国骑士的利益。在德意志南部建立傀儡公国符合法国的战略要求，因为法国惧怕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都欢迎这个为它们扩张领土提供的机会。1803年2月25日与帝国国会的代表达成的协定企图拯救帝国宪法的某些部分，但是未获成功。在1805年战争中，德意志南部各邦被迫支持法国时，帝国本身实际上不再存在了。德意志南部的最后一批自由城镇、帝国骑士和许多伯爵的领地都被并吞了它们的土地进一步扩大了巴伐利亚和其他归于法国的那些邦的领土，而且这些邦现在都宣布为主权国家。它们在1806年7月12日都加入了莱茵联盟，接受法国的保护，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授予它们的称号。一个月后，弗兰茨二世放弃了由选举产生的皇帝称号，成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这样造成的领土变化，包括德意志各邦数目上的锐减，与因1815年和约而造成的变化比较起来是很小的。1815年和约使在以前的德意志能够予以区别的300多个独立领地缩减至39个邦。法国的占领在德意志各地激起了新的民族感情，它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关于这种感情的出现，我们前面已作了叙述）。要求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开始变得明显，与各个邦维持本身独立自主的情绪相抗衡。而且，革命时代的思想激发了各个邦制定宪法和消除阶级特权的要求。

正当莱茵联盟已经建立、在普鲁士实行许多重要改革的时候，在其余的德意志的邦中发生了许多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但是其中多数变化证明只是暂时的。另外，仍然保持着旧边界的那些邦，例如萨克森（现在是一个王国）、梅克伦堡和德意志北部的一些小邦根本没有受到影响。由于法国的长期占领，法国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莱茵河左岸的一些邦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此在1815年以后的很长时期内还可以感到它们的影响，拿破仑法典直到1900年仍继续有效。在拿破仑创立的那些邦里——威斯特伐利亚、贝格和法兰克福——尽管根据法国的概念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几乎没有一项是完成的，在签订和约后可能会重新开始。另一方面，在南部和西南部大大扩张了的纯粹的德意志各邦，如巴伐利亚和其余的一些邦，扩张的进程本身就有必要对行政管理进行一些深刻的变革，因为被兼并的一些领地具有异族的

性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被认为是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和理性的极权主义的典范。

虽然拿破仑的帝国没有再持续多少年就土崩瓦解，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不仅改变了德意志的政治地图，而且通过附庸于他的国王及其政治家，以自上而下的革命，给德意志引进了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做法。在法国，当一个天才的组织者驾驭群众的力量使之为加强他自己的权威而效劳的时候，这些实践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民主运动带来的最后结果。德意志的统治者乐意接受这些思想，因为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的政治制度只会把腓特烈大王和其他开明君主已在追求的目标引向必然的结局。德意志的统治者一方面吸取了法国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其他一些具有真正革命新内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这些思想同贵族与教会已得到公认的特权的持续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思想也使一般保守的公民迷惑不解，而且对于它们的最后结果往往几十年都不能作出决断，但是不久事实变得十分清楚，旧的政权在德意志与在法国一样，不可能再恢复了。

表面上，在德意志南部各邦中负责这些改革的政府相互间的差别很大，有着很不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地方环境需要对付，然而同一巨大的潮流推动着它们前进。在巴伐利亚，从18世纪中叶以来，赞赏信奉新教的北部在文化方面所获成就的人们一直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教士进行某些抵抗。在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的支持下，1759年建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其宗旨是鼓励传播符合公众普遍利益的有用知识，并且同当时在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迷信和懒惰思想进行斗争。独创性的科学研究在科学院活动中只占次要的地位，而巴伐利亚在文化和启蒙思想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北部。科学院在纵情享乐的卡尔·特奥多尔（1777—1799年）的领导下，遭到了挫折，尽管1783年当耶稣会被停止活动后，科学院接管了慕尼黑耶稣会学院的校舍，法国革命引起了对任何形式的启蒙思想的强烈反对，但是1799年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二世即位后，放手让外交大臣马克西米连·冯·蒙特格拉斯处理一切。蒙特格拉斯是“先觉社”秘密团体的成员，为了逃避追捕，曾于1785年离开巴伐利亚，但在流亡期间一直与这位未来的选帝侯保持着联系。他一贯是法国激进思想的崇拜者。他无须法国人的劝导，便主动对巴伐利亚的财政、行政和文化生活进行改革。他采取了严厉的、有时考虑欠周的措施，匆促地企图让教会屈从于政府，剥夺

教会对修道院的所有权，努力建立现代的行政机构。为了帮助完成这些改革，他召见了基督教一些重要学者，要求安泽尔姆·费尔巴哈协助改革法律，委派F.H. 雅各比和F.W. 蒂埃尔施去加强科学院，让谢林、尼特哈默尔和萨维尼在大学里树立榜样，同时让黑格尔担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

西吉斯蒙德·冯·赖岑施泰因在巴登以同样的方法把领土扩张政策与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强有力措施结合起来。关于前者，他得到了法国的赞许，并牺牲了许多衰弱的德意志小邦的利益；关于后者，则是按照法国的做法，使领土扩张后的政府行政工作变得现代化。巴登充分利用了拿破仑希望使法国军队保证能够随时进入德意志南部的愿望，因而能把边界延伸出去，直到占据了上莱茵河的全部河岸。善良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大公爵于1811年83岁逝世时，他所统治的地区比他在1738年作为侯爵继承的领地几乎大了9倍，巴登也十分重视改善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工作。巴登迟至1803年才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对这座衰败不堪的大学进行了彻底重建。只有到这时，它才成为德意志的重要大学之一，后来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

在符腾堡，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797年成为公爵。当时他已中年，到许多地方旅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决心不和任何人共享他得之较晚的权力。他是一个刚愎自用、荒淫无耻、大腹便便的专制暴君，继承了他祖父卡尔·欧根最坏的传统：挥霍浪费，讲究浮华虚饰，大肆屠宰（美其名曰狩猎），根本无视那些谦恭的代表机构的意见，对他的施瓦本臣民十分珍视的独立教会也完全置之不顾。他把在1803年获得的新领地称为“新符腾堡”，并完全当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来对待。1806年，拿破仑使他成为国王，他和邦议会进行了一番斗争后，中止了旧宪法留给它的权力，并要求它全都无条件地服从。几个世纪以来，组织健全的路德教会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基金，它明智地、慷慨地用这笔基金来维持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由于国王的臣民中约有1/3的人现在是天主教教徒，天主教会和基督教路德教会都享受平等的权利，并都受内务部宗教局的管辖。路德教的财产由国家接管，国家也承担在此以前由路德教会资助的各项事业。学校实行了国有化，但蒂宾根大学却丧失了捐赠的基金和自治权。尽管所有这些措施都很不得人心，但臣民们也不

得不承认国王整顿了财政，并使国家在付出遭受许多苦难的代价后，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当然，这支部队是为拿破仑效劳的。

在德意志南部各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改革使它们在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理想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只有巴登完整地采用了拿破仑法典。基督教的各个教派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每一个体格健康的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当然，如同在法国那样，给有钱的人留有余地，可以让他们找人替代。所有的臣民一律要根据其财力纳税，原先的赦免规定被废除了。在其他方面，贵族的特权经过严厉的削减后由法律加以管制，而且随时可以修正。经济改革还包括废除国内关税，虽然保护关税，在一些由于特殊需要似乎需要保留的邦中加以保留。度量衡制实行了标准化；农奴制已被废除，但是农民并没有免除地租和劳役，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够赎买豁免权的农民才被豁免。同时，地主仍保留了裁判权。许多改革因缺乏可靠的官员而没有完全实行。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新的邦在统一行政工作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以甚至1813年的危机也没有抵消改革者们的工作。

1815年以后，德意志南北之间自1806年开始产生的大部分分歧依然存在，并持续了好几十年。在南部各邦，政策上没有发生反复，而在北部，边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些小邦，则感到它不必进行激烈的改革，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作了一种保守的变革。在南部和北部，政府制度都保持了独裁主义，因为在1814—1820年期间南部各邦得到批准的宪法并不是对民众要求的让步，而是依据法国在君主制复辟后的1814年宪章的方针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虽然口头上承诺要实行“人权”，实际上有效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甚至对预算的真正控制也没有交给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统治者一方面保留了全部主权，另一方面在取得负责大臣们的合作下进行工作。对于这些大臣们的职责，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有大量财产的中产阶级、商人、工厂主和自由职业者都不满意这种状况。关于这一点，他们转而支持在巴登由卡尔·冯·罗特克领导的自由运动便是证明。这个运动不断坚持由人民来实行统治的激烈要求。正是在争取实行代议制宪法的斗争中，政党首次在德意志开始形成。

在北部，当法国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还存在时，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选帝侯领地黑森所实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于1815年被迅速取消了，并企图尽可能在最大的程度上恢复到旧的邦议会制。萨克森地区虽然依附于莱茵联盟，但是在弗里德里希一世国王的领导下，却保持了该地区原先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尽可能地不作变更，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27年他逝世时为止。汉诺威1814年又恢复了以前的寡头政治制度。1819年在创立了一个两院制的邦议会中央代表会议，对它也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在不伦瑞克，尤其在黑森，统治者的独裁行为甚至失去了贵族的同情。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当然在这两个邦里引起了骚乱，结果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南部各邦的宪法的产生。另外，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在萨克森也引起一场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在大臣们中间增强了革新派的力量，因此现在有可能实现一个依据德意志南部的方针路线制定的宪法。不久，汉诺威在1833年获得了一部现代宪法。在德意志中部的一些小邦（魏玛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和平后不久，统治者也同意制定宪法，把原先的邦议会制稍加现代化，但是旧的独裁主义的秩序并没有多少改变。

与此同时，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早先曾作过保证，普鲁士仍然没有宪法，而且像奥地利一样，直到1848年才有了宪法。普鲁士的统治者一贯憎恶法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所代表的一切事物，虽然如前所述，他们曾吸收了法国的一些重要思想，对军队和行政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一制度在普鲁士于1814年被确立为永久性的制度。在德意志各地，人们经过了战争年代的苦难和惨重损失以后，自然渴望和平与安宁，这种情绪清楚地体现在所谓“比德迈尔”时期的文学中。由于即便是普鲁士的经济生活也只是缓慢地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它的人民和一般的德意志人一样，把简朴的生活和密切的监督当作不可避免的东西予以接受，因此政府表面上以恢复一个更美好的过去作为目标，便有可能成功地抵制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及言论自由等革命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播无疑会威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生存。奥地利由于同样的考虑，所受的影响更为强烈。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三国君主于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他们签署并批准了一项共同的反动策略。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各地蔓延，他们美化他们心目中的中世纪——一个没有现时代那种猜疑和分歧的时期，那时候教会和国家确保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机社会的基督教秩序。在德意志的大学里，许多青年有着大量的激进主义思

想，但是在这种思想刚刚公开显示出来时，梅特涅就与普鲁士政府一起商定镇压性的卡尔斯巴德决议。由奥地利和普鲁士所支配的德意志邦联很容易地被说服来批准这些法令。对民众代表制的理想所作出的唯一让步是普鲁士在其各个省中产生了建立在严格保守基础之上的议会。甚至不关心政治的歌德在其晚年（1828年10月23日）给埃克曼的信中也宣称，德意志的统一定会来到，虽然他强烈地希望在实现统一时不要抹杀许多地方的文化中心。但是坚决主张德意志统一的，只是西南部的德意志邦中的一些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者，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唯一能促成德意志统一的强国却继续推行着各自王朝的政策，只是在抵制改革的时候才联合起来。

（姚乃强 译）

第十四章 1792—1847年的奥地利君主国^[1]

这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奇特的命运：在经过它的整个历史上变化最多（内政方面）的、从1780—1792年的12年之后，要在几乎各方面，在它的统治者们的相当精明的头脑所能设想的将近完全昏厥的状态中，度过其后的56年。毫无疑问，这种局面主要归因于它的君主弗兰茨。1792年3月1日，利奥波德皇帝意外地过早去世，使年仅24岁尚未成熟的弗兰茨登上宝座，他亲身占据皇位43年，他的幽灵占据皇位13年。弗兰茨丝毫也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宪法信念。同那位在他少年时代把他带到维也纳、并在那里培育他将来当政的叔父约瑟夫一样，他在信念方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应该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表现君主意志的正常手段就是接受和执行君主命令的一个官僚机构。在他统治之下的人们的最高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公民职责就是做他的良民，衡量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的标准乃是它们产生此种效果的能力。

的确，假如否认在他的专制主义中还存在一种消极的仁慈，那是不公平的。他秉性善良，礼贤下士，具有一种高度的正义感。他认为，一个君主对于臣民也负有一种义务，也就是要以正义对待他们，并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正义；君义不应为一种贪得无厌的对外政策而牺牲臣民的生命，也不应为了个人的享乐而挥霍臣民的财产。然而，他恰恰是与开明相反的人物。虽然他完全不是一个笨蛋，也算不上是一个坏人，他的头脑超过一般的水平，而且具有从任何情况中引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的分辨能力，但是，他鼠目寸光，缺乏想象力，对于不知晓的事物疑虑重重，胆战心惊；他没有一丁点儿他叔父的那种社会远见、想象能力，以及不断克服不足的急切心情。再者，约瑟夫具有同对手较量，甚至挑动对手的战斗准备，而弗兰茨恰恰相反，不论遇到什么争论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总是退缩不前。这些弱点使他没有任何可能为了改革去努力推行约瑟夫的改革政策，也使他甘心接受一种在形式上，甚至在实质上不像约瑟夫那样完全的专制主义，因为

他完全能够把利奥波德避免树敌而达到真正和解与约瑟夫由于树敌过多而给家族惹来的麻烦作出比较。因此，不管他的极权欲受到多大的非难，但是常识却告诉他说，在他即位时所面临的危险局势中，只有确认利奥波德所作出的让步，并保持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才能渡过难关。然后，也许就有可能向后倒退一步，达到更完全的专制主义。而在他的各行省中，几乎所有的议会除了希望完全地、真正地实行约瑟夫二世的遗愿而外，并无什么更大的要求，只有匈牙利人利用这个机会，另外还要求撤销伊里利亚行署和允许更广泛地使用“民族语言”。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弗兰茨于6月6日在布达加冕，8月8日在布拉格加冕，然后他便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已经爆发的对法国的战争了。

结果，奥地利直至1815年才获得了真正的和平；因为在此以前，甚至在它并未积极交战的间隙期间，它主要是医治前一次战役所造成的创伤，或者准备下一次的战役。在这些年代里，弗兰茨的哲学以及体现其哲学的“体系”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看起来，这多半是两个事件冲击的结果，一是巴黎的革命法庭处决了他的姑母及其丈夫；二是1794年他自己的警察分别在维也纳和匈牙利发现了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雅各宾密谋”。维也纳的“密谋”反映了对普遍不得人心的战争的真正不满情绪，只有一两个参加者持有真正图谋不轨的观点；但是，除了这极少数人而外，维也纳的“密谋”几乎是由一小撮只会喊喊赞美自由的歪口号的分子搞起来的幼稚可笑的事件。在匈牙利，有更多的人受到法办，在他们之中，确实有些人曾经大胆地空谈，但是那里的情况并不比维也纳严重，而且有一件事实使人对整个案件感到可疑：自己承认为密谋集团领袖的一个叫作马蒂诺维茨的神父原来是利奥波德的警探。但是，对于弗兰茨来说，这两次被警察充分利用的事件，竟成为任何人都不可信任的证明。他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并严加惩办，以儆效尤。从此，他的体制变成以无为和压制为主的制度。但是，这不等于缺乏行政管理；中央各部在这些年里抛出的法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其中包括几篇重要的文件，特别是1803年的刑法典和1811年的民法典。弗兰茨统治下的奥地利，即使在其最坏的时期，警察恐怖也远远比不上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

弗兰茨不无理由地认为秘密社团是颠覆思想的主要温床，加入任何这种社团的人实际上都是危险的；共济会员特别靠不住。但是一般说来，控制的作用在于预防，而不是在于惩罚。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人数相对来说是很少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定罪也很轻，显著的例外是1794年所作的判决，以及另外几件为杀一儆百而作的判决，特别是1820—1821年在伦巴第所作的判决。弗兰茨本人对警察的报告很感兴趣，他甚至有自己的情报人员，并鼓励告发人直接给他写信，以此作为主要的消息来源。许多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虽然长期受到最严密的监视，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些年。然而，控制是非常普遍和无孔不入的，尤其对专业阶级和“文化”阶级，弗兰茨根据他从法国革命事件中引出的结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危险；他对文职官吏和军官的控制也很严，因为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在这些人中，从最渺小的到最高级的人物，大都生活在这种控制的阴影之下，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制度，如果说不是异常野蛮的话，那么，即使在当时来说，也是特别蒙昧落后的。弗兰茨在这件事情上同在其他所有事情上一样，是有逻辑性的，他追寻颠覆活动的根源，而在抽象和推理思维中找到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去砍；真是有条不紊。在马蒂诺维茨密谋之后，当时担任匈牙利总督的亚历山大大公曾上书要求取消一切形式的教育，只培养未来的官僚。弗兰茨的观点比较积极，认为教育很有作用，他大大增加了小学和中学的数目，后来又创办了几所新的技术学校。但是教学内容受到严格的控制，要符合他认为正当的目的，即培养“具有高尚情操、笃信宗教和热爱祖国的公民”。因此，教育主要委托给教会来办，拨给教会的教育基金也大大增加了。同时，教会本身完全隶属于国家，因为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弗兰茨毫不妥协地坚持约瑟夫的传统。另一个“压制思想”的武器是书报检查制度。规章订得更加严格了，工作转到了警察的手中。不久，在奥地利既不可能出版也不可能输入任何哪怕有一丁点儿非正统思想或有批评政权嫌疑的东西。一个特设的“重审委员会”对在1780—1792年的缓和年代中批准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新作了审查，有2500多种著作遭到查禁。

所有这些工作，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压制性的，都是在君主国的西半部（包括在相应年代中的加里西亚和威尼斯），由遵从中央各部发出的命令（往往最后由弗兰茨本人发出）的官僚机构贯彻执行。各邦^[2]的邦议会完全形同虚设。在这个意义上，弗兰茨统治下的奥地

利毕竟回到了约瑟夫二世时代，特别是自从中下级官员大部分要从中产阶级甚至寒微门第选拔之后。贵族出身的作家痛心疾首地抱怨说：国家被这样一群拿薪水的刀笔师爷侵占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作家们又认为奥地利仍然是贵族阶级的禁猎场。大贵族像在军队甚至社会中一样，几乎垄断了较高的文官职位，只有司法领域是例外。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主宰地位没有受到挑战。当约瑟夫的土地税最终取消后，利奥波德逝世时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最重要社会问题是要不要强制废除徭役。^[3]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在1796年提出报告说，它赞成保留徭役，因为这是“培养服从和谦逊的一所良好的学校”。结果，同年颁布了一个特许令，其中规定只有与地主达成协议才能批准减轻徭役。这是迄1848年为止在匈牙利以外发布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最后一项立法，除此而外，那一时期有为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发布的“徭役特许令”，使这两个邦与波希米亚邦和德意志—奥地利邦划一；还有一个法规要求许多邦的地主自己出钱雇用合格的律师去主持世袭法庭。世袭制度本身在中下级法官间是依然存在的，因为这比发给薪金的工作人员要便宜一些。

一个有影响的思想流派还反对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力依然十分短缺，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农业的利益要求把一切可用的劳动力留在土地上；教士们和保守派异口同声地叫嚷：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尤其是如果允许他们集中在城镇的话，就会给社会带来种种的危险。与此相反的一个思想流派，即老的重商主义派，为了保持奥地利收支平衡而采取完全不同的观点；另外，由于不断进行战争，奥地利就有绝对的必要去扩大自己的工业生产。但是，甚至在这个领域内，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来说并没有解冻，所以，弗兰茨在位的前15年中，工业发展极为缓慢，企业主要是小型的，而且多数在农村地区。此后，大陆封锁带来了突然的兴隆，但是它并没有使所用的工业部门得到好处，主要的得利者是纺织业。

从全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本人取得更多的经验和对治理国事尝到更多的甜头，以及在他手头形成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弗兰茨的“体制”变得更加有系统了，而且更确切地反映出他自己的思想。君主国的西半部对这个制度没有进行抵抗。邦议会的成员完全赞成议会的保守主义。接受分配给它们的非实质性的任务，只是言不由衷地提出一些抗议而已。中产阶级满意地发现他们在迅速扩大的官僚

机构中所占的地位。农民本来希望得到进一步改革，因而曾经表现出相当的不稳，而现在又恢复昔日那种“卑躬和顺从”了。在维也纳只是偶然地发生示威游行，而且反对的是不得人心的战争、物价暴涨或物资短缺，并不是反对政治压迫。对弗兰茨处理国务能够提出严肃批评的，只有他自己内部的一小撮顾问。在这些年间，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过去的导师科洛雷多伯爵（他有几年负责领导弗兰茨的办公厅，即其私人秘书，每个问题都咨询他），他自己的兄弟查理、约翰和赖纳，还有几个不大出名的亲信，有一个叫作巴尔达齐的亲信好多年间一直极有势力。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对弗兰茨的绝对权威提出疑问，但是他们经常批评他用以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器的效率以及他对大臣的人选。弗兰茨在有时间听取的时候，是非常乐意去听各种建议的。他不断调整国家机器，频繁地撤换大臣，但是他从来不放弃他本人的控制，因而数不尽的调整只产生很小的实际效果。

只有一个短暂时期，他听别人谏劝，对自己的臣民要求比消极服从更多的东西。这是在1806年，也就是在奥地利被迫签订普雷斯堡和约（1805年12月26日）之后，这个条约非常苛刻（有效时期长），仿佛给整个君主国猛烈一击，群情骚然。那个时候，正当他采用奥地利皇帝称号两年之后，他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时，他把对外政策交给了菲利普·施塔迪翁伯爵掌管。这位伯爵是莱茵兰人，他认为：他负责准备的复仇战争，如果人民不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就不可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制订了一个旨在唤醒日耳曼民族感情的改革方案（因为他所指望的主要还是奥地利境内和境外的日耳曼人）。弗兰茨不同意施塔迪翁提出的有关社会或政治改革的任何建议，但是他批准开展一次宣传运动。这次运动在当时的皇后玛丽亚·卢多维卡、查理大公和约翰大公的赞助下，大大激发了日耳曼族奥地利人（虽然不是君主国的其他民族）的民族热情。但是，这种堕入异端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它倒成为恢复一种加强的正教的原因。查理大公由于在阿斯佩恩打败拿破仑激起了人们的希望。此后，1809年的战役却同1806年的战役一样以惨败而告终。结果签订的申布伦（维也纳）条约比普雷斯堡和约还要苛刻得多。弗兰茨将施塔迪翁免职，与人民携手合作的思想也随同提出这个思想的人一起消亡了。查理大公和约翰大公也相继失宠。弗兰茨不再听信他们，现在主要是听信他新任命的外交大臣梅特涅；梅特涅原先就具有皇帝的一大部分盲点和偏见，不久又把其余的绝大部分化为已有了。

直到此时，匈牙利至少在形式上受到与君主国其他部分不同的待遇。弗兰茨虽然反对一切宪法，但他始终认为：匈牙利宪法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保证，把它作废或者公开破坏它都是不明智的。而匈牙利议会一方，1792年由于发现他们的新国王准备重申放弃约瑟夫主义而非常高兴，因而很爽快地接受了新国王关于与法国立即开战的呼吁，而新国王则以此作为推迟考虑议会的陈情书的借口，马蒂诺维茨密谋动摇了弗兰茨对匈牙利人的善意的信心，但是由于此案而进行的逮捕除了使匈牙利的领导者们坚持像弗兰茨本人那样严格的保守主义而外，也使匈牙利的人民大吃一惊。许多年来，双方的关系是在一种彼此都不满意的基础上维持着，但是这种不满意还没有达到促使哪一方去冒风险进行正面冲突的地步。弗兰茨按照宪法程序请求国会同意他所提出的增加兵员和军需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总是定期地召开国会（1792年之后，曾于1796年、1802年、1805年、1807年和1808年召开），因此，他不得不满足于他能够从匈牙利人身上榨取的东西，而他得到的东西总是比他的需求少得多。然而，他毕竟捞到了一些油水，而且，尽管有些担惊受怕，特别是在1805年，但是从来不需要认真去对付叛乱的威胁。

匈牙利人堪以自慰的是能够看到国会几乎定期地召开，而且由于这个机构在谈判时不屈不挠，匈牙利对战争的负担额，不论是人力方面还是金钱方面，都比较小。贵族们继续享有他们的免税权，他们仍然对农民进行几乎毫不受到限制的统治，他们依旧通过县评议会控制地方的各种事务，总的来说，政权对匈牙利的管理要比对西部各邦松一些。警察并非无所不在，书报检查也不甚严格，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享有较大的自由，因此，一场相当大规模的语言与文化复兴运动能够一帆风顺地发展。另外，战争给匈牙利的小麦生产者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他们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随意高价出售。

另一方面，弗兰茨在每届议会召开时，总是坚持（按宪法的规定）首先讨论他本人的提案，而且一俟他的提案讨论完毕，他就立即解散国会。因此，匈牙利人的陈情书始终没有达到在国会里开展辩论的阶段；只是在对弗兰茨的提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安抚一下偶然的诉苦而已。匈牙利人最主要的要求，一是在公共生活中扩大使用马扎尔语（替代拉丁语），作为准备阶段，首先在中等教育中使用马扎尔语（替代德语）；二是改变单方面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实际上是

强迫匈牙利从奥地利进口它所需要的工业品（按出厂价格加上高额进口税）和向奥地利提供它的全部农产品（按奥地利规定的价格）。弗兰茨并没有痛快答应这两点要求。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于1805年和1808年在语言问题上作了一些微小的让步，而对经济问题则寸步不让。

一次次的冲突之所以平息下去，几乎完全是由于约瑟夫大公的努力。1796年亚历山大在一次事故中身亡后，由约瑟夫继任总督，他以非凡的机智在国王和民族之间进行斡旋。即令如此，双方的积愤还是愈演愈烈。1807年匈牙利人非常坚决地表示不愿对一次显然以加强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为目标的战争出人出钱，以致使国会得到在历史上有名的“可恶国会”的诨名。1808年的国会则完全相反，得到一个“慷慨国会”的绰号，这主要是由于在它召开之前已经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和贿赂。

在申布龙和约签订以后，一场危机似乎是难以避免的，除非君主国的整个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实际上，情况一开始就趋向恶化。侵略、失败和残酷的领土分割，件件都够令人痛心的，而它们又合在一起，使得弗兰茨已经无法制止的一种内部过程发展到了危急的关头。许多年来，政府已经入不敷出，一部分靠借款、一部分靠发行纸券（国库券）来填补财政赤字。政府用这种纸券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金（以及征收赋税），仿佛它与银币具有同等的票面价值，但是在实际上，随着纸券流通量的增多，纸券在奥格斯堡贴现时的折扣不断加大，1810年已经猛增到极大的程度，以致到了1811年，金、银币的开价已为其面值的1/10。内地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在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全都失败之后，财政大臣沃利斯伯爵于1811年2月20日颁布了一项特权令，把当时流通的10.6亿（古尔登）的纸券全部回收，持有者以每5张纸券兑换1张新发行的具有同样面值的补偿券。又宣布：新币与旧币一样，与完全等量的银币同值，要求人们这样通用。政府的一切支出以及税收都以新币进行，然而政府公债的利息却削减了一半。政府保证补偿券的发行量不超过2.12亿的新数字，这个数字与纸券最后开价的票面价值相等。在通货膨胀期间的私人债务一律按照签订借款合同那个月奥格斯堡的纸券开价为基础进行偿还。

虽然阻止通货膨胀很必要，但是这个激烈措施给许多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也引起了广泛的混乱。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君主国的居

民对“国家破产”一直记忆犹新，成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父辈的一生中最惨痛的经历；正是这种记忆，甚于其他任何一个因素，触发了维也纳和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而且，上述措施只是奏效一时，连本身的目的都没有达到。有几年物价稳定在1811年的水平上（按新币计算），但是在1812年，政府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发行新的纸币，结果通货膨胀又开始了，使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各阶层人的生活条件同颁布特权令之前一样痛苦。

此外，特权令引起了与匈牙利之间的险恶的危机。1811年召开的议会断然否定把特权令应用于匈牙利的合法性。议会承认发行货币是君主的权力之一，但争辩说：印刷无担保的纸币是对这种权力的滥用，只不过是一种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间接提高税收的办法而已。因此，它拒绝接受分派给匈牙利的那一部分新币，也拒绝提供分期摊还的基金。1812年5月18日，弗兰茨突然解散了议会（13年后才重新召开）并且以敕令的方式颁布了特权令。

然而在1815年，奥地利终于恢复了和平。这一次，和平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呈现的景象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奥地利终于成为得胜的一方。它收复了自1792年以来丧失的所有旧领土（除尼德兰和德意志西部边陲的领地以外），也在实际上收复了1792年以后任何时期夺取的全部土地（除克拉科夫现为自由市以外）。它还取得了伦巴第。它在德意志的地位可以说比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前更具有实际影响。它通过直接占领和对意大利的其他宫廷施加影响而主宰了意大利。现在它是接受战争赔款，而不是支付战争赔款了。

尽管如此，此后的10年依然是非常艰苦的岁月。首先，通货膨胀依然严重。1816年7月1日，国家实际上再次拒付很大一部分（这次为60%）国债；而且又过了几年之后，在一家新成立的国家银行的帮助下，它才有可能稳定住纸币的行市，最后恢复硬币制。国家的财政就这样表面上恢复了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却仅仅是表面上的。厉行节约，尤其紧缩军费，使每年的赤字减少了，但是始终未能消除。国家年年要靠借债过日子，通常要为贷款付出很高的利息，这笔钱成为国家预算中很大的一个项目。只要国家的纸币按其票面价值开价，似乎就没有人注意这一点。历任的财政大臣都设法在银行家朋友们的帮助下做到这一点。但是，事情很清楚：一旦债台高筑，总有一天要加倍还钱。

对于穷人来说，1815年和1816年是黑暗的岁月，农业歉收，物价暴涨，饿殍遍野。此后，随着通货收缩，战争刺激的中止，以及英国工业品和俄国、罗马尼亚小麦的重新充斥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在大陆封锁时期兴起的工业以及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小麦种植者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有大批的失业者，由于作战军队的复员，失业情况更加严重。直到20年代后期，生产才开始复苏，整个经济才开始接近与“和平”这个字眼相适应的状况。

同时，弗兰茨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并没有白白丧失一块土地，国内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困难（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他停止采纳他的两个弟弟的谏劝之后取得的），这一个事实使他深信自己的治国方针的正确性，他继续应用这些原则，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过去更加严格了。在这方面，他受到梅特涅的怂恿和鼓励。梅特涅如果说不是这个“体制”的制定者，他肯定是拥护这一“体制”的帮手。在政治空气中唯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梅特涅和弗兰茨的第四个妻子、虔诚的卡罗琳娜·奥古斯塔的影响，同天主教教会的联盟变得更为亲密无间了。在梅特涅和新任警察头目塞德尔尼茨基（此人比任何前任都更不开明）的管辖下，对报刊、大学以及一般文化生活的控制更加严厉了。收复的或新夺取的行省，都根据现在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原则组织起来。不错，伦巴第和威尼斯在名义上是王国，驻有一名总督（赖纳大公），有一些单独的制度，以意大利语为行政、司法、教育的正式语言，但是，他们并没有享有比弗兰茨的其他领地更多的实际自治权。只是匈牙利有一点儿例外。在1820年与1821年，匈牙利各县反对提供梅特涅为扑灭意大利的革命火焰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于是，政府向各县派去“行政官”，用主力军队去搜括政府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这种活动实际上非常困难，而且耗费太大，1825年弗兰茨终于找到了一个权宜办法：重新召开议会，对于过去侵犯议会的权力表示歉意，并保证今后尊重议会的权力。然而，这一切无非是表明他将运用合法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与在战争年代一样，在随后的15年中，全体国民似乎并不比他们的统治者有丝毫的进步。在1820年和1821年，伦巴第—威尼斯发生许多骚动，这些骚动与其说是反抗奥地利的统治，还不如说是意大利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反映。在逮捕了相对的少数人之后，“王国”俯首帖耳了。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邦，局势完全平静，加利西亚也是

如此。这个时期温和的却因而具有其魅力的“比德迈”文化，基本上是被接受的。

只有匈牙利螳臂挡车，匈牙利议会迟至1825年还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它捍卫中世纪的政体，而不去探索一种新的生活。甚至弗兰茨在1830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在这个时候，西欧、俄属波兰和意大利都出现了革命形势，梅特涅似乎又感到有动员防卫工作的必要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与梅特涅一样，急切地希望防止革命传染病菌的蔓延，他们毫不犹豫地投票赞同提供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弗兰茨要求议会在他生前为他的长子斐迪南加冕。按照匈牙利的传统，在加冕时要重新宣布民族的权利，君主一一表示同意之后，宣誓尊重这些权利。因此，他们坚持要求弗兰茨最后要正式听取他们的长期受到忽视的陈情书；弗兰茨答应在翌年召开的议会中这样做。

事实上，议会迟至1832年才召开，推迟的口实是1831年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发生了霍乱病，但是实际上是害怕政治的传染病。在那时候，西欧自由主义的胜利已经在整个君主国内引起广泛的反响。改革的思想突然风靡各地。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匈牙利境外鼓吹改革是不无危险的，而在匈牙利，伊斯特万·塞切尼伯爵的活跃才能却使政治空气发生了几乎神奇的变化。塞切尼是一个贵族青年，他在西欧旅行时，对于西欧和本国之间情况的差异感到十分震惊。回国以后，他创办各种实业，包括多瑙河轮船公司在内；他的文章震动了公众舆论：根据他的革命学说，一贯受人尊敬的匈牙利宪法与其说是保卫匈牙利不受外国压迫的堡垒，还不如说是一座监狱，把匈牙利禁锢在贫穷落后之中，因为正是这个宪法规定了一系列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如贵族免交赋税，他们的土地不可剥夺，他们几乎是自己农民的暴君。

塞切尼的提案在议会很少取得实际的进展；的确，他也没有能够为匈牙利的改革运动指明他所希望的由上而下、有秩序地前进的方向。但是，他鼓动了改革运动的浪潮。在历时四年的议会闭幕之前，弗兰茨的体制由于他于1835年3月2日驾崩而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斐迪南是一个头脑单纯的人，显然除了挂名而外，没有亲临朝政的能力。弗兰茨留下一个政治遗嘱，吩咐他的儿子“不要移动国家机构的任何基础，要进行统治，不要去变革”，并且接受最小的叔父路德维希大公以及梅特涅的监护。但是，梅特涅的大批敌人拥戴斐迪南的兄

弟弗兰茨·卡尔以及波希米亚贵族，在过去几年实际上主管君主国内政和财政的弗兰茨·科洛拉特伯爵加进了这个摄政委员会（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机构，虽然其正式名称为国务会议）。路德维希大公参加摄政委员会主要是代表未来，即代表他的儿子王储弗兰茨·约瑟夫（因为斐迪南已不可能有后嗣）。但是，科洛拉特则是梅特涅势不两立的手，他的自由主义虽然远远不是出自真心，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成为维也纳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希望，也成为由于其他任何理由而不喜欢梅特涅的所有人的希望。其实，新政权并不比旧政权更进步多少，尤其是像路德维希这样一个鼠目寸光、能力有限的人，仅仅出于一个忠字，试图实现弗兰茨在临终前的教诲。但是，新政权的工作效率无比地低，它本身的停摆主要是由梅特涅和科洛拉特两派势均力敌、相互牵制造成的。这时郁积已久的民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像波浪一样滚滚冲向新政权的前后左右，它冲垮新政权的基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1848年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ärz）的君主国与18世纪90年代的君主国是迥然不同的。人口增长大致为40%，各邦之间、邦内各地之间的增长率有所不同。国家大部分仍旧是农业地区，但是以维也纳为首的较大城镇在迅速成长，工业在长期停滞之后再次向前发展，它的性质也有了改变。广泛采用机器，以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纺织工业为先导，许多工业都从手工业操作走向工厂生产。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是紧跟着铁路建设开始的。建设铁路不仅需要发展许多与工程和设备有关的新工业，而且第一次使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和采矿业有了可能。在君主国的阶级构成中，现在又增加了代表新的金融利益和工业利益的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企业主阶级，以及为数不少的（虽然集中在地方）工业无产阶级。农村本身，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在变化。地主，特别是比较先进的邦中的大庄园主（开路先锋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大地主）拼命为获取利润而生产。这一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正在改变农民与地主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各种因素并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一齐起作用。

所有这些进展在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君主国的所有各邦，虽然并不是同等程度。到1847年，几乎所有各地的农奴都有取得斗争胜利的希望，由于农奴们勉强去完成地主的徭役，由于他们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租，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已经显然不如自由雇佣

劳动。因此，比较开明的地主们就自动申请“解放”这个阶级；主要的、突出的大问题是地主们的赔偿问题。除了其庄园坐落在边远地区或者缺少资本的那些地主依然对前资本主义经济恋恋不舍而外，改革的主要反对者是政府，它宣布公家不能为改革提供资金，甚至反对由私人企业去实现改革的建议，因为它们企图在信贷市场上与政府相竞争。事实上，那个农民阶级的地位比自耕农的地位糟糕得多，在大多数的行省里，他们的人数现在超过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自耕农难以靠占有的一小块土地维持生计，有的沦为无地农民。在19世纪40年代，接二连三地发生沉重的灾难，1846年和1847年的两年大歉收使灾难几乎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在这两年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纯粹由于饥饿而死。食品价格再次飞涨，比1844年上涨1倍至2倍，乃至4倍。另外，迅猛发展的纺织工业突然进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受剥削的工厂工人领到的工资少得可怜，仅能使他们保持不致饿死而已，而现在呢，许多工人连这一点工资也领不到了，只能依靠组织得很糟糕的公共工程，或者依靠慈善团体的救济。于是发生暴乱和捣毁机器的事件，在维也纳、布拉格和其他工业中心的郊区充满在饥饿中挣扎的乞丐。

然而，穷人的苦难并没有威胁到君主国的统一或者它的制度的稳定。构成威胁的是君主国内各民族的愿望，不过各民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经常发生的相互对抗也为利用一个民族作为盟友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提供了机会。三月革命前时期的最初几年，在这些民族运动中，最强大的依然是匈牙利的民族运动，它发展得异常迅速。塞切尼在1830年是个先驱者，到1836年已经被年青的一代推开了。这一代人的喉舌是狂热的和激进的路易·科苏特，他是一个放纵的但是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人，拥护每一种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改革；与那个愿意跟维也纳合作的塞切尼不同，他告诉全国人民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与维也纳的联系降低到国事诏书所确定的限度，一方面作为争取民族独立权利的起码条件，一方面作为任何进一步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革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国务会议起初采取镇压的手段：1837年，科苏特和其他一些人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全国实行半独裁的统治。但是，1840年东部问题的爆发迫使国家再次采取绥靖政策。科苏特被释放了，并且成了民族的偶像，他的自由主义和反奥地利的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

下，以格奥尔吉·阿波尼伯爵为首的一群自称为“进步保守派”的大贵族聚集到一起，炮制了一个包括人民群众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多迫切要求在内的纲领；但是其中规定：改革要在周密的保安措施之下、自上而下地进行，同时要加强政治控制，确保与奥地利的联系。1843年，这个集团要求梅特涅让他们去管理匈牙利。反对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击，1847年，他们之中头脑最清楚的费伦茨·戴阿克为他们制定了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改革纲领，其中包括成立一个负责内部事务的部和以扩大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彻底解放农民，贵族也要纳税，以及与特兰西瓦尼亚合并。“政府派”本身采纳了许多内政改革的方案，因而在1847年11月召开议会时，这些方案大多得到通过，虽然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个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然而，匈牙利的运动是一个阶级的行动，不要说血统，就是在感情上，也几乎完全是马扎尔人的。在他们（至少是上层）看来，匈牙利应该是一个马扎尔民族的国家，这时，运动的发展遭到了占人口一半以上的非马扎尔人日益强烈的反对。马扎尔和非马扎尔人的第一个冲突主要是关于前者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扩大使用马扎尔语的问题。在利奥波德时代的议会就已经开始的长期斗争中，匈牙利人起初只不过要求在他们本邦与中央政府的联络中使用大多数居民的本族语言，以及在小学以上的学校使用本族语言授课。但是，就连前一项要求也遭到克罗地亚人的反对，因为用马扎尔语代替中立的拉丁语会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匈牙利人反驳说，为了一小撮克罗地亚贵族的缘故去牺牲他们的方便和民族尊严是不合理的。

然而不久以后，冲突就向广深方面发展了。沙文主义的马扎尔青年一代完全不听取克罗地亚族的反对意见，并且通过立法，强令内匈牙利对非马扎尔语的使用在各个领域里都缩小到异常狭小的范围之内；极端分子要求用强制手段使全体居民都变为马扎尔人。与此同时，非马扎尔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有几个民族在发展民族的雄心，这些雄心甚至与匈牙利—马扎尔理想的比较克制的形式也是完全势不两立的。带头的是克罗地亚人，法国人在拿破仑的“伊利里亚王国”中的统治有力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感。在30年代初期，克罗地亚贵族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中解脱出来，转向顽固的民族主义。他们近乎病态地反对马扎尔人，梦想建立一个包括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有争议的一些县份的大克罗地亚，并与匈牙利分离，直接

效忠于皇帝。这个新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思想豁达的留德维特·加伊，他怀着一个更大的梦想——建立包括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伊利里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竭力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塞尔维亚人取得联系。维也纳对这一切欣喜万分，尤其科洛拉特，他发现可以利用克罗地亚人作为武器去反对叛逆的马扎尔人。过了一些时候，政府确实醒悟过来了，看到“伊利里亚”主义所包含的危险性，于是就将它压制下去，但是继续鼓励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而在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又是用不着去加以刺激的。

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也背弃了匈牙利；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心是寄托在贝尔格莱德的，只是暂时用眼睛盯着维也纳，在维也纳的直接指使下，那些居住在军事边界线的塞尔维亚人同处于相似地位的那一半克罗地亚人一起活动起来了。他们对“伊利里亚主义”并没有多少热情，认为那只是天主教徒设的一个圈套；不过，他们还是乐于同克罗地亚人携起手来反对布达佩斯。有一些斯洛伐克人也把眼光转向布拉格，甚至转向俄国，梦想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实体或者一个伟大的泛斯拉夫国家。另一些斯洛伐克人则说，他们宁肯当匈牙利的良民，但是决不当马扎尔人。还有一些斯洛伐克人，实际上连同内匈牙利的很多德意志人和绝大部分犹太人，是支持匈牙利人的，他们不但不抗拒马扎尔化，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良好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匈牙利的大戏在特兰西瓦尼亚重新开锣了。由于排他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作怪，起步比较晚，随后这个大公国的贵族就热烈支持与匈牙利的联合。在这时候，他们企图按匈牙利的模式制定立法，而这一立法触犯了“萨克森人”的民族感情和传统权利，驱使他们更靠拢维也纳了。与此同时，当时占人口足有一半的、毫无特权的罗马尼亚人则鼓吹社会解放和民族自由。他们许多人的最终理想是与喀尔巴阡山外的弟兄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只要多瑙河诸公国仍在土耳其的统治下，他们就不得不寄希望于维也纳。

在西部，自从国家统一的愿望占据意大利全体人民的心灵以后，意大利诸行省在精神上已经不依附于君主国了。就伦巴第和威尼斯本身来说，民族运动更多的是感情上的表现，并不令人生畏（在意大利的所有大城市中，威尼斯被认为是最不革命的）。然而，皮埃蒙特的查理·阿尔贝特正在伺机促使这两个行省摆脱奥地利的控制，这已是

路人皆知的事实。这种前景，以及保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其他代理人的义务，都使奥地利有必要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减少驻在其他危险地区的兵力。

在这些危险地区中，仅次于匈牙利的是加利西亚，但是仅在一个时期发生过危险，在“三月革命前时期”结束以前这个行省的最危险期已过去。1846年2月，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显然错估了形势，企图在克拉科夫和加利西亚的基地发动一场革命。他们希望以应允自由和土地为酬报，那里的农民就会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农民却用发给他们的枪支举行了反对他们的地主的起义。这个不幸事件带来的主要正面结果，是列强允许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这次失败使奥地利的波兰人十分沮丧和愤恨，但是，除了少数急性的人以外，他们都认识到，在实行瓜分的列强所组成的反对他们的共同阵线面前，再加上本国农民对他们所抱的敌视态度，不可能重新开展斗争。帝国当局在刚萌发民族情绪的罗塞尼亚人身上又找到了一个同盟者，东加利西亚的罗塞尼亚人是一个落后、贫穷和几乎没有语言的民族，积极欢迎奥地利官僚们的领导，以回答他们所给予的免受波兰地主盘剥的保护。

在君主国的核心部分，为恢复行省自治、反对中央官僚专制主义的斗争是由波希米亚的议会领导的，它在40年代就已经大露锋芒了。这次斗争与匈牙利的运动和克罗地亚的运动的早期阶段一样，实质上是一个地方自治运动，在许多方面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运动的支持者们奉为圭臬的1627年的“修订土地条例”与匈牙利宪法并无二致，实质上是一部阶级特权的宪章；虽然议会里包括一个维新党，但是迟至1848年，它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还是极少的。然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轰轰烈烈搞起了捷克民族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自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一运动的直接目标只是争取捷克语言在教育、司法和行政中与德语具有同等的权利，然而在这一目标的背后，却是幻想建立一个捷克民族国家（在君主国内部），其领土不仅包括波希米亚王国诸邦，而且包括北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地区。许多年轻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也怀抱着极为激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尽管如此，捷克的贵族们却支持和赞助捷克民族运动，作为反对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官僚政治的盟友。

君主国的德意志人，在君主国的所有民族成员中，从政治上讲是最多种多样的。除了大学生而外，德意志人只有极少数受到正在使马

扎尔人、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心醉神迷的浪漫民族主义的影响。除了蒂罗尔而外，也没有任何非常强烈的地方主义。整个的奥地利体制，虽然像反对捷克或马扎尔民族主义一样地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却主要依靠于大部分由德意志人（出生或过嗣）组成的官僚机构和军官团。另一方面，又有很大一部分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靠为皇帝服务维持生活。因此，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忠于君主国，也有不少拥护君主国的体制的中央集权性质，这是因为德意志人的地位受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正在兴起的捷克民族主义的威胁，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受到可与之相匹敌（虽然还弱得多）的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的威胁。他们希望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成为最好的保障。

另一方面，在君主国（伦巴第一威尼斯除外）的企业家和专业阶级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德意志人或者操德语的犹太人（当时，犹太人一般都自认为是德意志人）。起来反对官僚政治的高压政策的主要是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认定书报检查制度是一个累赘的是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结果，特别是维也纳变成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中心，这一运动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严厉地批评政权，而由于参加运动的人的社会地位和财政状况，其重要性与其人数的比例是非常不相称的。运动的弱点在于不能调和自由主义与各民族的相互冲突的要求，这一点不久就很显然了。

于是，在1847年和1848年之交，君主国中的几乎每个社会阶级和几乎每个民族都对体制不满和要求变革。只要像巴黎的革命事件那样稍一触动，就足以摧垮旧的结构，但是继之而来的是什么，当时还没有人讲得出来。

（姚乃强 译）

[1] 根据编者的要求，本章涉及的历史时期延续至1847年，因为在奥地利历史上，1830年不是一个里程碑。

[2] 这里像在德语中一样使用“邦”（Land）一词，因为用任何其他的词（如“行省”）在某些场合就法律意义上说是不正确的。在君主国中具有“王国”性质的那些部分认为“行省”一词降低了它们的地位。

[3] 指佃农在地主的土地上所完成的强迫劳动或劳役，在奥地利君主国，甚至在非斯拉夫区居住区，通称“徭役”（robot），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工作。

第十五章 1793—1830年的意大利

以1793年和1830年为上下限，并没有很大用处。在此期间，意大利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1793年刚刚开始，法国驻罗马的代表就被谋杀（1月13日），可是，这件事不足以标志一个时代。那时，意大利虽已卷入欧洲外交和军事的斗争，但是，它的历史进程到1796年才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那一年，可以说18世纪已告结束，法国革命进入了这个半岛；意大利的近代史是从法国军队的进驻开始的。下一次的重大变化是在拿破仑体制崩溃时发生的，1799—1800年间的复辟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本章大致可以1814年为分界线。在拿破仑体制崩溃之前，整个半岛逐渐接受共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影响，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814年后，虽然所有的复辟政权不得不考虑奥地利的支配地位，但半岛却再一次分崩离析。1830年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要作这样的评价，首先必须从意大利在1793年的结构谈起。当时，意大利根本不是一个整体，它的组成部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付革命的冲击。意大利的各个部分基本上是按地形划分的，在由山脉和气候划分开的各地区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社会，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政治界线加固了它们的地方主义。意大利包括一大堆国家，其中撒丁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1]托斯卡纳大公国，较小的马萨和卡拉拉公国，帕尔马公国和摩德纳公国，以及比翁比诺公国，都是君主政体。共和国有三个：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在圣马力诺，还有小小的第四个共和国。在波河流域，奥地利所属的伦巴第包括古老的米兰公国和曼图亚公国。最后，教皇国横跨在半岛的中部。^[2]在这个大杂烩中，各个政府虽然表面上相差无几，却是在极其不同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有几个政府受到“开明专制主义”的影响，不过，尽管试图搞合理化，它们的结构往往并不比整个半岛的结构更有条理。地方主义、特权和法规，其寿命都比实行改革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文官们更长。要选择一个1793年意大利“典型”国家是不可能的；各个国家像它们的景观一样千差万别。

只是在非常普遍的一点上，意大利才显示一定的同一性来。虽然生活条件相差悬殊，财富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是，除了大海港以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以农业为主。结果，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都是由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的农民所形成的，而它们的社会结构相互不同，也恰恰是由于农民人数比重的不同而产生的。在那个世纪内，人口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很可能下降了；他们大多数很穷，也有许多人贫无立锥之地。城市生活也深深嵌入了这一背景，它严重贫血，无法产生另外一个能与地主们争夺社会权力的阶级。只有教士能与贵族的势力相匹敌，但是他们同是土地占有者，两个集团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还缺乏产生资本主义心理状态的社会先决条件；大规模的工业很少，各种特权、陈腐的重商主义思想以及地方主义等都大大阻碍它的出现。18世纪的意大利是这样一种社会的集合体，特权阶级人数很少，但享有财富和权力，他们抗拒君主和官吏为了普遍福利而对他们展开的进攻。农民们在一旁观看，不了解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的利益究竟在哪一边。不过，这种图景却由于地点的不同和时间的差异，有很多点是模糊不清的。

在法国入侵之前，这些社会就受到法国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意大利半岛对外国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是自由开放的，即便仅仅来自知识分子，也必定会引起反响。有些人兴高采烈，例如米兰人戈拉尼，他变成了法国公民，并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其他人则比较犹豫，即便他们在为普遍启蒙的可能性而兴奋的时候。伦巴第的经济学家彼得罗·韦里认为，意大利人太不成熟，还不配靠美德来进行统治。在意大利人中间，最初就有如此远见的为数寥寥。在他们看来，法国革命只不过是意大利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的一种外交上的花样而已。

（关于罗马教廷的特殊反应，参见第六章。）然后，在法国流亡贵族所口述的经历和君主政体的崩溃的影响下，统治者们的看法开始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革命在意大利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就是王公们不再庇护正在从事改革的文官；现在，特权阶级能够进行反击了。有些知识分子也惊慌失措；戈拉尼在恐怖时期放弃了革命。1793年以后，这种变化又因战争而加速了。最后的结果是：意大利的众多的国家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与他国结盟，一个集团保持中立。

在前者中间，撒丁王国的立场是最容易理解的。在法国侵略者吞并了萨伏依和尼斯后，它与奥地利和英国结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种联盟几乎用不着在都灵的法国流亡贵族的影响。无论如何，战争似乎向撒丁国王提供一个机会，使他得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恢复传统的扩张政策。那不勒斯变成一个交战国，这不仅因为它的女王是奥地利人，而且因为它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具有特殊的利益——这既是它的弱点所在，也是它与法国和英国打交道的力量源泉。伦巴第是奥地利的领地，不管是否愿意，它还是被拖入了战争，而托斯卡纳、热那亚、威尼斯和摩德纳则是在半自愿的情况下保持中立的。热那亚对撒丁极不信任，又充分认识到与法国保持商业联系的重要性，它在1792年就宣告中立了。威尼斯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但是还保持中立。摩德纳的赫尔克里斯三世也是如此。在英国施加一些外交的和海军的威吓以后，托斯卡纳被迫赶走了法国公使，但是在1795年，它重新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并与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

在政府一级以下，意大利人的态度在紧张的战斗中慢慢明确了起来。有些人被法国流亡贵族所讲的故事吓破了胆，但是另外一些人开始对成立新的共和国抱有更大的希望。在这些年间，政治发展中最有趣的现象是对法国和对革命原则表示同情，这种同情逐渐将一股股差别很大的思潮拉到一起，它们的唯一的共同特征是对现政府不满。那些失去发言机会的改良主义者，那些教会里的反教廷分子和詹森派，那些共济会员，以及那些憎恨文化落后和顽固思想的先觉社分子，全都能在共和主义与人权中找到他们的希望的共同焦点。1793年，有几个意大利流亡者向国民公会请愿，他们已经很有信心地宣布说：“意大利人在等待你们。”这话是不真实的，而且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这话永远是不真实的，不过，它倒是重新恢复的意大利政治生活所表露的第一个姿态。

关于这种新的政治异见的起源和性质，已经有过很多的研究了。这种异见是随着革命的进展，在某些国家中出现的恐慌所引起的。奥地利人虽然并不像某些统治者那样惊慌，但是，就连他们也开始对于约瑟夫二世所鼓励的改良主义者投以怀疑的目光。像彼得罗·韦里那样一度受政府重用的人，现在发现自己不被信任了。然而，不管当时的难民和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断言，伦巴第在1796年以前还是产生了几十个“雅各宾派”^[3]，而在其他国家里，政府首先促使不满转为叛

乱。在那不勒斯，镇压是迅速而残酷的。1794年处决和流放了一批人；次年西西里发生起义的时候，情况就更为恶化了。1794年，都灵也处决了一些人。法国驻在半岛的代理人当然要利用这样一种事态。在热那亚的蒂利和他的继任者卡库尔（他还曾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任职）从事宣传和谍报活动，帮助不满分子到中立国家或法国去避难。他们能够以国民公会1792年11月19日的法令为依据，其中保证“对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人民给予友爱和支援”。迫害是他们最好的盟友；流亡的共同经验是使政治异见在意大利异花受精的决定性因素。流亡者从意大利所有各国前往法国，其中以撒丁和那不勒斯的人为最多。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他们在意大利曾经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但这并不影响后来编造出有关他们的传奇。流亡开始使法国革命的共和民主思想与意大利的民族意识结合到一起。避难者们发现把他们赶出来的政府乃是共同的敌人；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只要与法国结盟，意大利很快就会成为统一的国家。在鼓吹这种观点的人们中，最主要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派驻奥内利亚（1794年被占领）的专员布奥纳罗蒂。他变成了意大利流亡者敦促法国政府采取支持意大利革命的明智政策的主要渠道。可是，要培育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还要求比流放更多的东西；在下一步的过程中，只能由占领和革命来提供这些东西了。

1796年的入侵结束了阿尔卑斯战争，革命进入了意大利。波拿巴不仅是改变那里的外交格局，而且摧毁了反法联盟，改变了欧洲的面貌。4月的几次战役迫使撒丁接受停战协定，随后是在波河流域的一次战役，结果很快就使米兰陷落（5月15日）、摩德纳降服（5月17日）和奥地利人撤出伦巴第。曼图亚还有一批被围困的驻军。那不勒斯人仓促地达成协议（10月正式讲和），教皇得到一个停战协定。一次秋季战役粉碎了奥地利人解救曼图亚和收复伦巴第的企图，同年年底，反法联盟完全崩溃了。热那亚同意关闭它对英国人开放的港口。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8月19日）迫使英国撤走舰队和放弃科西嘉岛，摧毁了英国人在意大利舞台上采取有效活动的任何希望。到1797年年初，只有曼图亚还站在归降波拿巴和继续战斗的歧路之间；当它陷落的时候，联合局面开始经历它最后的痛苦过程。波拿巴又进逼卡林西亚，并于4月18日签订了莱奥本草约。^[4]

半个世纪以来，奥地利第一次不再是意大利的支配力量。法国现在是它的伙伴和对手，它将怎样运用自己的优势还不得而知。由于有

秘密的草约，法国督政府还不能明目张胆地增添新的财产，用意大利的领土换取把国境推进到莱茵河畔。不管督政官们如何想望，波拿巴的威望与权力都使他们不能这样做。而且，另外的一些政策在巴黎也有它们的支持者。1796年给予波拿巴的指示已经超额完成了。联合局面已经打破，热那亚的臣服已经确定，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已经失去。此外还征服了大片土地。这里出现了难题：要想用它们去做交易的筹码，就必须去组织它们——但是怎样去组织呢？对于建立卫星式的共和国，曾经有许多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论据，但是有些随着法国军队回到意大利的流亡者却要求更多的东西。他们想要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他们应该早已知道，法国人是不能容忍这一点的。1795年督政府满怀希望地与撒丁的“暴君”进行谈判，准备让他留在王位上；督政府已经把所征服的奥内利亚周围地区作为法国领土对待了；波拿巴本人也公开宣布他在最近的将来直接管理他所征服的地域的意图。另外，意大利人不知道这样一点：早在1796年5月，法国驻意大利的外交代表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向督政府汇报情况，这些报告使督政府更加不愿意采取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共和主义的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办法。督政府告诉它的外交部长说，意大利人已被专制主义完全浸透，他们不愿意得到自由。

意大利流亡者企图影响法国政策的希望，比法军入侵开始时的确更加渺茫了。他们与布奥纳罗蒂的联系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布奥纳罗蒂因与巴贝夫的密谋有牵连而被捕后，便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和令人为难的盟友。现在，督政府认为他的意大利朋友们有间谍之罪，然后根据极端错误的假定进行起诉，指控意大利爱国志士是巴贝夫社会革命党人。这种假定给意大利人带来巨大的和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它的重要意义立即显现出来：法国人鄙弃了流亡者们于法军入侵后在皮埃蒙特建立的那个小小的阿尔巴共和国，并且命令意大利革命者不要去扰乱撒丁政府。统一论者的思想在意大利也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当1796年9月在米兰举行以组织意大利的最佳方案为题的征文竞赛时，只有1/3的意大利应征者主张统一。

在这个关键时刻，波拿巴的意见是最要紧的。他可以任意而为，因为他的政府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依赖于他。在意大利，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7日）的实质是对奥地利作些让步，以换取奥地利默许波拿巴的造物——意大利诸卫星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这些情况

在1796年已经开始出现了。最初，为了法国军队的方便，把伦巴第交给一个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叫作“中央行政公署”的机构。随后是勒佐和摩德纳发生革命；波拿巴不顾他的政府的意愿，纵容造反者，允许由摩德纳以及波洛尼亚和弗拉拉两个教皇使节管辖区合成波河南共和国（1796年10月）。1797年6月，利古里亚共和国的建立确定了热那亚的未来。7月15日，波河南共和国又与伦巴第合并，组成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当阿迪杰河与瓦尔泰连河以西的原威尼斯领土并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后，这个共和国居然成为意大利团结的第一次伟大的试验。波拿巴对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国民自卫军夸口说：“创立共和国的是军人”，接着又警告他们说：“保卫它们的也是军人。”

督政府无可奈何地批准了坎波福米奥条约，随后又立即任命波拿巴为出征英格兰军司令。对于一个野心太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容易招致失败的职位。但他在意大利任总督期间的伟大成就依然作为政治现实而存在：威尼斯共和国消灭了，意大利北部统一为一个共和国的形式。法国军队依然驻在意大利。所以，革命的影响并没有以波拿巴的调任而结束。此后对法国统治的体验，对意大利人观点的形成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们所苦恼的是：摸不清督政府在意大利的真正目的；督政府频繁调动司令官并且没有控制他们的能力；根据已经开始出现的迹象，坎波福米奥条约并不是最后的解决，还可能开始战争。

最重要的危险信号是：一个条件更苛刻的新的同盟条约使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更牢固地依附法国；1798年2月，罗马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的卫星国出现。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显然违反坎波福米奥的决定，1798年12月法国兼并皮埃蒙特也是如此。随着1799年1月在那不勒斯建立帕特诺珀共和国，几乎使整个意大利都从属于共和制度；甚至寡头政治的卢卡也进行了清洗，按民主路线作了改组（1799年2月2—4日）。各共和国的宪法虽然在细节和名称方面可以因地制宜，但大体上与共和三年的法国宪法相似。^[5]几乎所有的宪法开头都有一个关于权利的宣言，内容包括对财产的特殊保证。对公民资格的规定虽有不同，但说明主权存在于全体公民的意志。这个主权批准设立两院制的议会，而议会则选举一个执行机构——政务院（虽然其成员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称执政官）。地方行政设省，省下分县或区，县地区下又分为乡。这些共和国的政策，正像它们的结构一样，没有什么差异；虽然大谈革

命的立法，但是实行的并不很多。取消贵族，取消有利于贵族的诸如限定继承权之类的法规，将教会财产世俗化和保障购买者的权益，废除教会对教育的垄断，采用共和历——这一切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来不想使社会革命走得太远，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意大利的某些部分，这类革新还没有实行，就已经由开明的专制主义者进行统治了。

另外，新建立的国家缺乏权力。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里，共和主义的社会基础太窄，无法实行真正的革新；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尽管不是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大概也是得到最广泛的承认的，但是斯塔埃尔夫人却指出，在罗马，只有雕像是共和主义的。那不勒斯的农民和无业游民忠于拿破仑式的波旁王朝，固然声名狼藉，但不论在什么地方，群众也都不支持新政权。缺乏群众的支持，正是各共和国在1799年被推翻时没有力量进行抵抗的原因。它们之所以缺乏群众的支持，则是因为与法国人关系暧昧；这些共和国毕竟是仰仗法国军队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的，而保护者又利用它们作为剥削它们的居民的工具。新国家只实行了征税和引进一种对异教徒难以理解并肆意侮辱的历法；以专利法保护发明或对有10个孩子的父亲给予津贴，只不过拙劣地满足一下意大利社会的潜在要求而已。^[6]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对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做出什么贡献；雅各宾派的宣传从来没有比教区祭司的布道更能打动一个农民的心。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在意大利人中永远是一个没有代表权的少数。那些在共和制度或法国剥削的影响下成为统一论者的人就更没有典型性了。意大利共和主义者即便当了官，也没有实权。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得独自做主，他们要受到法国将军们和外交使节们的牵制和阻挠，那些将军和使节唆使其他的意大利人反对他们，如有需要，就用政变教训他们一番。巴黎的督政府虽有时不同意它的使节们的个别行动，但对他们的一般业务则是坚决支持的。它要求驻意大利的大使们以监督者自居，监视各该驻在国政府的行动。意大利人在这样的困扰之下，只得去为法国军队征收贡赋，因此又必然招致人们对为“大国”的利益而收税者的憎恶。由于不能补救自己在国家财政上和经济上的弱点，他们就无法赢得法国人的信任；法国征服者在他们之间神经紧张地挑来选去，常常误把维护独立与完整的意图当作反法的或统一主义的情绪。几乎从一开始，这些共和国就注定要失败的。

事实上，法国人过分地神经紧张了。他们在这些年的通信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统一论的危险，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也确实收留了许多反对法国的爱国者，因为整个意大利流亡者都被吸引到米兰，尤其是威尼斯的流亡者，他们对把家园拱手让给奥地利人极为愤懑。但是归根结底，意大利革命者们还是不能丢开他们的暴虐的保护者。法国人毕竟是伟大的共和国的代表，这个共和国是拥护反对旧制度的各种势力的大革命的。当法国的占领终于在1799年垮台后，在意大利的统一论者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参加反对法国人的联军，这就是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将军拉赫兹。意大利其他“雅各宾派”，虽然他们可能吃过苦头，也可能属于光明党之类的秘密组织，但是仍支持法国军队所代表的共和事业。向撤退中的法国人进行攻击的群众是由教士和贵族领导的，不是由意大利的雅各宾派带头的。

当最后一个卫星共和国——帕特诺珀共和国出现时，第二次反法联盟已经形成。那不勒斯政府受到英国人在阿布基尔和马翁港的胜利的影响，偷偷与奥地利结盟（随后与英国和俄国结盟），它不顾英国的担心，侵入了罗马共和国。法国人在罗马遭到攻击后宣战，尚皮奥内将军于1月23日开进那不勒斯。王室逃往西西里岛，尚皮奥内企图效法波拿巴，建立新的共和国。但是好景不长，到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时，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地位很快就动摇了。到4月底，莫罗不得不把米兰丢给苏沃洛夫。都灵失陷了，1800年年初马塞纳退守热那亚。法国人很快就放弃了南方，他们一走，帕特诺珀共和国葬送在枢机主教鲁福的农民军手中，结束了这场悲剧。1799年10月，当波拿巴在弗雷儒斯登陆时，法国军队业已被分割或包围，意大利人在阿雷佐和科托纳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昔日征服者的同仇敌忾，所有的卫星共和国全都崩溃了。对皮埃蒙特的短期吞并，在当地引起一场反对法国人的起义。现在，对于那些能够逃出的意大利人来说，开始了一个新的流亡时期。

1799—1800年复辟的最重要结果是：流亡者相互团结起来了，而且勉强接受了对法国的依赖关系。盟国占领军很快就如先前的法国人一样不受欢迎，但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人想恢复卫星共和国。看来，意大利人非到不得已时，是不想更迭政权的。意大利人民在这些年里的反应是很难看到的，除非是在他们被军役和苛捐杂税激怒起来反抗的时候，或者是被教士们逼得投奔共和主义者同胞的时候。

无论如何，这次复辟只不过是一个插曲。1800年5月，第一执政在第戎集结他的军队，然后穿过大圣伯纳德山口。他不久就到达米兰，在6月14日，马伦戈一战重新确立了法国在波河流域的霸权。双方达成了五个月的停战协定，奥地利人退回明乔河北岸。使许多意大利爱国者大失所望的是：波拿巴在米兰和都灵建立了傀儡政府委员会，并将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置于法国将军的严密控制之下。他对意大利的政策究竟如何，或者他是否有过一种政策，这些问题已经讨论过千百遍了。他原来谈论自己对意大利的计划时的处境，使人不能不有所怀疑。最稳妥的办法是来看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

军事胜利后，随即是征收赋税和进行外交的改组。最后，在吕内维尔与奥地利人讲和（1801年2月9日），条件大体与坎波福米奥条约相似。除了在波拿巴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新教皇庇护七世的罗马，以及在因距离太远未能直接干涉的那不勒斯以外，都建立了新的傀儡政权。法国统治的新体系核心是在北部的巨大的意大利共和国以及并入法国本土的皮埃蒙特，这是进入半岛的入口。随后的一系列疆域变更全都是为了加强法国的直接统治。

到1803年，战争又开始了。次年建立了帝国。意大利共和国变成意大利王国，1805年5月26日拿破仑在米兰加冕，背诵了传统的誓言：“上帝赐之于我，谁敢染指，必遭天祸。”欧仁·博阿尔内被任命为新王国的总督，而一直作为波拿巴最主要副手的前共和国副总统、伦巴第贵族梅尔齐·戴里尔则退休了。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带来更多的变化，到1811年，整个意大利已经重新组合了。

整个半岛，有些地区已作为帝国的一部分，直接由皇帝或者他委派的总督统治，其余的则为半独立的地方长官辖区。这次改组，从地域上看，一直伸展到伊利里亚。只有在西西里岛（波旁王朝的人在那里策划复国阴谋）和撒丁岛，旧制度的政府依然存在。在这次改组中，除权宜行事外，很难看出其他的任何东西。如果拿破仑果真为意大利想出一个特殊政策的话，他必然会付诸实施的。他享有一种真正完全的自由，可以对半岛任意发号施令。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他是能把意大利统一起来的。结果并非如此，意大利的命运是由相互冲突的策略的压力、家族的野心、贪婪、疯狂和法兰西的利益来决定的。

然而在这些年里，革命闯入了意大利的历史。关于这些年的意义，已经有过很多的争论。多年以后，拿破仑的一位文官写道：“我们的政治历史是到1802年才开始的。”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在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最长久的影响可能是在意大利王国境内，这是半岛上还没有普及的各种学说和制度开始传播的最大的国家。但在整个意大利，无论在帝国属下的王国或者行省，法国革命的制度一帆风顺地流行了几年。这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明专制主义的复辟；拿破仑的行政管理为18世纪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提供了适宜的活动场所。缪拉的内政部长祖洛过去是波旁王朝的财政部长；意大利王国的财政部长普里纳过去是皮埃蒙特的官僚。法律改革家罗马尼奥西被博阿尔内的政府聘为立法和司法问题的顾问。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各革命共和国的官员也为拿破仑工作，只是统一论者不在此列。

拿破仑改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另一个成果，是引进了《法典》。引进《法典》后，就按法国的方针改组司法制度。1806年封建主义在那不勒斯正式宣告结束，意大利开始具有新的行政和法律形式，这些形式来自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现代化和高效率的样板的法国的复杂官吏制度。征兵本是一个极不得人心的制度，却往往被说成是培养意大利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事实也很可能是这样，但历史学家们却忽视了对这个问题作学术研究。一个比较明显的值得称赞的革新是推行法国执政府时期常常进行的统计调查。这些调查反映出对物质进步的重新关注，令人们再度追怀上一个世纪的改革者们。意大利王国在1807年开始一次调查，缪拉在1811年开始搞了一次。被波旁政府搁置多年的地籍测量，终于在1807年开始进行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在1801—1814年获得了从事行政和军事工作的经验，直到复辟后（见本书原文第431页），这些经验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观点。许多拿破仑时期的官吏在1815年以后继续从事行政工作。同时，他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也多少缓和了意大利政府从巴黎或从皇帝的军帐中听命而来的专政。拿破仑的控制始终很紧；共和国宪法和意大利王国宪法只给予代表机构很可笑的一点权力。缪拉在那不勒斯享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这只是因为他离法国较远。

有时候人们说，意大利的经济历史是意大利利益完全屈从于法国利益的最好的明证。的确，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在1814年时处于低潮。

但是，要弄清拿破仑政权对此究竟负有多少责任，却也并不容易。在18世纪，政治上的分割，对地方小市场的依赖，货物的通行税，货币的多种多样，信贷机构的缺乏，以及残存的特权和特殊利益，都窒息了经济的发展。1796年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已有的工业。因此，可以推断，拿破仑进行的改革是会产生良好效果的。他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是为意大利王国的650万人口巩固一个单一的市场。在王国境外的地区，也有类似的法律制度、商业法规、十进制货币和改善的交通设备，这一切都有助于促进经济生活。某些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尤其是在伦巴第，由于在革命时代出卖土地，中小地产的数目增加了。有人断定说，由于革命战争的扩大，原有的阶级结构被打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时机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史实，现在依然难以发现，但是也有一些例证，如在皮埃蒙特，由于贵族们为了缴纳法国人的征税，不得不出卖土地，因而大地产分成了小块。这些土地，以及从王室和教会没收的土地，却到了由别的途径发财致富的人们的手里。拿破仑将意大利共和国的三个选举团之一分配给商人们（其余两个分别给土地所有者和行会成员），而在那不勒斯新的立法机构的100个席位中，留给商人有20个，这些可能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说，尽管这些迹象表明注意到了新的社会要求，但是很难相信商人或制造商已成为人数众多或地位重要的阶层。据不完全统计，在1811年，商业人口仅占意大利王国总人口的3.5%左右。这是意大利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地区的情况。由于缺乏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我们很难相信这么小的一个职业团体能够支撑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中产阶级。从税收依靠农业这一点，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推论来。即使在那不勒斯这个最突出的地区，也很难看出土地的易手达到可估计的程度；缪拉不久就抱怨说：废除封建主义的结果只是使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前贵族的手里。

那么，看来很可能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夸大了在他统治时期意大利半岛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不过这种崇拜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复辟时期。有几点明显的评价是有把握的。首先，对半岛的改组虽然克服了一些破坏力量，但是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破坏。法国将皮埃蒙特吞并，切断了伦巴第丝织工人与早先向他们供应原料的纺纱工的联系。帕尔马与勒佐的葡萄酒贸易被隔绝了，伦巴第至帕尔马的自古以来的交通路线被改变了。改组甚至还给远离意大利的地区带来不幸的结果；1810年汉萨同盟的城市被吞并，它们从伦巴第进口货物的大门也

关上了。这种封锁具有摧毁的力量；意大利由于封锁不仅失去了在18世纪期间泛滥一时的英国进口货，还丢掉了生丝的巨大市场。对其后果，在意大利王国已经作过最仔细的研究，那里的商业和工业生活不但为法国对英国进行经济战的利益所制约，而且还为拿破仑帮助法国工业家的愿望所左右。进口机械是不受鼓励的。这样一来，意大利就可以不作为竞争的制造者，而作为农业原料的供应者参加法国的体系了。另一方面，工业制成品如果不是来自帝国，就不允许进入意大利王国。1808年的商业条约规定帝国和王国相互有50%的关税优惠，这正符合法国制造商的利益。他们的产品逐渐代替了英国货，虽然由于有马耳他，始终未能全部代替。

由于这些政策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失调，又因法国人的直接征税而更为恶化了。例如，为了维持驻扎在半岛的法国军队而需要费用，同时还有米兰和那不勒斯实行自卫的军备负担。意大利王国还要每月向帝国纳贡250万里拉。这些支出对业已负担过重的经济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与法国联合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中，还可以加上征兵、突然单方面改变海关税则等其他的项目。

高利率的证据似乎表明，由于局势不稳和横征暴敛，很难筹集发展工商业所需要的资金。确切的数据是更难以找到了。也有一些良好的迹象，1810年和1812年，意大利王国的贸易有顺差，但这主要是倚仗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其他一些数字则令人得出相反的结论。1808年以后，丝织工人的数目减少了；毛纺工人虽未减少，但这无关大局，因为毛纺业历来不是以出口为主的行业。布雷西亚的军火工业当然由于官方的需求而稍为有利可图。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当1812年威尼斯商人为他们不能在贸易中运用的钱寻找投资场所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土地，这在意大利经济中，几乎是唯一能够从拿破仑的政策中获得很多利润的部门。各港口也是灾难性地衰落了。热那亚本来就被早先的几次入侵和英国封锁毁坏，当帝国的海关制度切断它与伦巴第的联系的时候，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1809年以后，里窝那只靠与法国的海岸交易而勉强维持下去。1808年，当安科纳和马切拉塔并入意大利王国的时候，它们与的里雅斯特（这个港口已并入帝国）的贸易立即下降了。它们与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生意被封锁打断了。那不勒斯也因此蒙受损失；但是它仍然能进行18世纪的出口

贸易，将农产品输往法国。只是在1811—1813年间，在它的这种贸易中出现了逆差。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障碍，这在拿破仑时期几乎未加以克服。如果意大利不能从外国进口机器和聘请教导使用机器的人员，那么，要搞工业化，它在技术方面实在太落后了。1811年，在萨莱诺地区的工厂里还不知道有织布的梭子。即使没有封锁，我们也弄不清楚当时意大利是否有能够投入大工业的资本和足够的举办实业的想象力。最后，1813年米兰的灾难性的破产浪潮乃是拿破仑时期对意大利经济的最有破坏性的影响之一。这时在意大利境内打起仗来，抗议的声浪自然也就大了。11月11日，缪拉废除了所有的现行保护性法令，代之以低的关税。米兰总商会虽然只能就经济政策向欧仁提出抗议，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到拿破仑时代末期，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奄奄一息，很少进展，没有任何要积聚力量发展工业的势头，商业萧条，只有农业在拿破仑的战略和行政管理的影响下还有利可图。

关于拿破仑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在前面已经捎带提了一下。不管对它评价如何，必须简略地探讨一下拿破仑与教会的关系。他忘不了1796年和1799年教士领导的农民群众对他的敌对态度。1800年米兰大教堂举行庆祝意大利从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手中解放的仪式，一篇《赞美颂》就把拿破仑的意图表现了出来，他绝不允许教士扰乱第一次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情况再次出现。如果他能在法国一切如愿的话，他随时都准备对意大利的教廷作出巨大的让步；他默许废除利奥波德在托斯卡纳进行的改革。当讨论意大利共和国与罗马缔结政教协定的问题时，他所委派的副总统梅尔齐·戴里尔感到自己不得不作出让步，而作为身受启蒙运动熏陶的人，他又意识到这种让步是很危险的。后来，当与教廷的争吵又发展到劫持教皇的时候，拿破仑才勉强放弃了优待教士的政策。^[7]这对于政权的威望很有关系。1814年，农民们再一次表明他们对于政府的更迭是漠不关心的或者近乎漠不关心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起来保卫摇摇欲坠的政权，只有中部和南部土匪横行的地区是例外，自从1801年以后，就连那些土匪也不像他们以前那样激烈地反对法国人了。对正在撤退的法国人进行了很少几次袭击，如此而已。对教士的安抚政策可能是成功的。为什么原来的统治阶级不反对拿破仑政权，这是更难加以解释的问题。个人利益，地方情况，以及真正的理想主义，肯定比阶级的团结一致更起

作用的因素。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感到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出钱卖命是不合理的，那些注意到自己必须看着巴黎的眼色行事的文武官吏可能比大多数集团更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还是效劳了，而且接受了拿破仑赐给的封号。

要想简要地评价1793—1841年这段时间对以后的意大利历史和复兴运动所做的贡献，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拿破仑统治下，政治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会有时间去巩固新的风尚，而在1799年以前，这是有点不可能的。军队、官吏和新的法典在整个意大利起调节的作用。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分子，除少数人而外，在拿破仑为了表示控制他们的决心而采取了几次行动之后，都逐渐地与政权合作了。不过，人们还是不喜欢法国人当太上皇，其根源要追溯到1797年和1798年的幻想破灭。有些人依然渴求统一，虽然在1814年已经表明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后来有人说复兴运动的根源是1814年以前就已经燃起的民族觉悟，这种神话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民族主义的文献有过一些，但并不多；库欧科讲述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那本书是其中最大的成就。还有一些秘密团体，它们追怀1798—1799年统一论者，但往往局限于单纯作出反对法国人的姿态，没有能力制定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纲领。

只有两个地区不同于这些年的共同经验，这就是西西里和撒丁。后者确是未动一根毫毛而从旧制度下幸存下来的，这表现在它对查理·埃马纽埃尔在皮埃蒙特的仆从们持敌对态度。西西里的经验与此不同，而且对它后来的历史也很重要。这个岛始终具有分裂的倾向，1806年以后，由于有一个流亡的宫廷，独立情绪加强起来。这个宫廷鼓舞西西里的显贵们要求立宪，他们依然记得上个世纪那不勒斯的总督曾经企图抑制他们的特权。结果，由于玛丽娅·卡罗琳娜怀疑议会中的贵族派与英国人在搞阴谋，使那不勒斯的宫廷十分苦恼。议会的这些人受到地方爱国主义、阶级利益、肤浅的立宪思想和自由思想，以及搞阴谋的嗜好这样一种混合物的刺激，只是由于英国人的到来才使他们纠集到一起，显出好像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样子。至于在当地驻扎的英国军人，他们根本不信任玛丽娅·卡罗琳娜。当他们在1811年派遣本廷克去向波旁王朝提出忠告时，事情变得更糟糕了。英国政府只是希望西西里有足够的平静，以便作为英军作战的根据地，因此，派本廷克去警告那里的宫廷，如果它不明智地坚持拒绝实行宪法

改革，就不要再指望英国人会支持它去镇压西西里人民了。本廷克还被授权控制对西西里宫廷的津贴，并作为最后手段，有权以撤走英国驻军相威胁。由于玛丽娅·卡罗琳娜制造麻烦，使本廷克终于运用他的权力，把她驱逐出岛。这时，国王颁布了一部按照英国模式起草的宪法，其中还包含着1812年西班牙宪法的某些成分。本来指望这样做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不幸的是，立宪运动现在已经瓦解了，本廷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从而具有讽刺意味地继承了18世纪总督们的衣钵。

英国在西西里岛上进行的宪法酝酿和有利于改革的宣传使人感到，1813年有机会从这个岛上发起一场意大利解放运动。本廷克本来希望这样做。不幸的是，到1814年年初，这场游戏就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莫斯科战役失败后，欧仁就班师跨过易北河，然后返回意大利。他拒绝了缪拉所提出的两人共同去与盟军讲和的建议，而是做好了防御半岛的准备。莱比锡战役后，奥地利已能调动大批部队去意大利，到1814年2月，欧仁被迫跨过明乔河撤回来。与此同时，缪拉与他的敌人达成了谅解。即使在那个时候，意大利似乎还有可能不受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影响，而保留它的新制度以及不再受外国干涉的独立性。甚至欧仁本人有可能成为以拿破仑的王国为基础的一个新的北意大利国家的国王。至少在缪拉投靠他们而参战前，奥地利人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当缪拉终于向他进攻时，欧仁不得不在斯基亚里诺里齐诺停战协定上签字（4月16日）。条款之一是必须派一个意大利代表团去巴黎陈述关于王国前途的意见。不幸的是，以孔法洛涅里为首的伦巴第的自由主义者偏偏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致命的错误——支持米兰的起义。这次起事的确实原因不清楚，但是欧仁的一个部长被私刑处死，他本人也退到巴伐利亚。有几个参与者肯定是想要把缪拉拥上王位，另外一些人则幻想得到英国的支持。尽管在米兰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临时政府，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使这场游戏牢牢地掌握在奥地利人的手中。米兰被占领了，当孔法洛涅里和他的朋友们到达巴黎时，人们告诉他们说伦巴第是要归奥地利人的。

错误估计形势的不只是米兰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受到本廷克的煽动，本廷克希望他们能在为意大利制订的计划中起些作用。他刚一踏上里窝那的土地（3月9日），就鼓吹将意大利建成一个独立的宪政国家，他与已经占领托斯卡纳的缪拉激烈争吵，并且宣称

要重建热那亚共和国，虽然他的指示是以撒丁国王的名义去占领它。

“交给意大利人”，他极力主张说，他的言语使本国政府感到震惊。

“看起来，他是想把整个意大利放松不管。”卡斯尔雷写道。这种不赞成的口气意味着本廷克必定要失败，他的意大利朋友们必将孤立无援。英国对自由和民族运动的政策到1814年春天很快冷了下来。卡斯尔雷被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吓破了胆，并按照他所认为的欧洲秩序的利益行事，完全准备支持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的行动，而且不管本廷克怎么说，都丝毫不超出这一原则。为米兰起义所震动的奥地利人，改变了原来只收复明乔河以东土地的克制态度，这样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对付缪拉了。

缪拉在1月跟他们议和。作为对他进攻欧仁的回报，奥地利人保证缪拉的王位，并且使他又得到原教皇国约有50万居民的地区。这个协议是他在3月和4月行动的基础，他完成了契约的义务。但是，他做得太匆促，也不热心。而且，在向意大利北半部进军期间，他还容许自己的军官去煽动人们支持一个民族主义的纲领。他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意大利后，他的地位也似乎牢固了；就连卡斯尔雷都准备默认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如果能够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捞到一些相当的补偿的话。不幸的是，缪拉并不相信这就是英国的政策，他只能看到本廷克反对他本人的行动似乎跟反对欧仁的行动一样强烈。因此，他又与欧仁勾搭起来共同搞密谋，这样一来，当刚刚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在维也纳开始想起本家族那不勒斯的一支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削弱了。在议会中，缪拉的密使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实际上，由于英国人不能反对奥地利的意大利政策，他只能仰仗于奥地利的善心了。即便在这时候，如果他在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时不放弃自己的计划的话，他还是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的。缪拉急于求成，遂侵入教皇国，赶走了托斯卡纳大公。1815年3月30日在里米尼发表了著名的宣言，他号召保卫意大利的自由事业，得到极小的反应。事情还不止于此。他没有能渡过波河，只好再次折向南方，终于在5月被击溃。在这以后，奥地利对他再也不施予恩典了。他在5月19日离开意大利，以意大利方式解决意大利问题的最后机会也随之消失了。

这些失败决定了复辟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是奥地利在半岛上的支配地位的加强。此种霸权的拱心石是新的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于是奥地利得到了空前牢固的战略地位。在它的各省，一批迂腐的但

是忠实可靠的（人数比拿破仑时期少些）官僚在军队的支持下统治着国家。拿破仑时期的许多官吏都撤了职。再一次引进奥地利的司法程序，但是法国的商业法规大体上没有改动，在前政权时代所进行的一切财产转让立即得到法律上的承认（1815年5月11日）。正如约瑟夫二世治下的伦巴第那样，各行省享有极少的自治权，以明乔河为界的税卡又将它们分开。总督很少过问构成行省和各地区行政机关的主要纳税人。他执行由维也纳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对奥地利实行优惠关税，为维持精干的警察和书刊检查制度而加征重税。

在半岛的其他地区，奥地利的支配权是由奥地利驻军和王朝联系来表现的。有两个国家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直接统治。在帕尔马，玛丽-路易丝被拥上宝座，她的情夫奈珀克充当枢密官。她死后，这个公国归属帕尔马的波旁家族。托斯卡纳由斐迪南三世统治，如波旁家族离开卢卡回到帕尔马，他也有对卢卡的继承权。小小的圣马力诺是仅存的共和国。教皇国都复辟了；那不勒斯王国作为两西西里王国重新出现。撒丁王国吞并了热那亚和前利古里亚共和国的其余部分，还重新得到尼斯、萨伏依和皮埃蒙特。在摩德纳，弗朗西斯四世复位，根据安排，在马萨-卡拉拉公国的统治者——他的母亲死后，马萨-卡拉拉也要并入他的领土。

要概括这些政策是不容易的。每个制度都反映出地方因素的相互作用，拿破仑的各种成就的力量或弱点，流亡的教训或痛苦。没有两个制度是完全一样的，所有的制度均由一个奥地利政府严密监视，生怕产生敌对情绪，一旦发生，便要立即扑灭。虽然没有一个制度能够随意向改革的方向前进，但是每一个制度都能够自己决定在返回旧制度的道路上走多么远，而未发现拿破仑体制有某一部分可以保留的，则寥寥无几。在两西西里王国，梅特涅就复辟的性质给斐迪南一世作了如下的规定：不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不拒付公债，不取消缪拉的年金和称号。另外还有一项秘密条约，其中规定未经奥地利批准，不得改变宪法。在那不勒斯的民众中，由于忠君者多而支持缪拉者少，复辟政权的明智和克制最初取得成功。拿破仑法典保留下来，封建主义没有恢复。拿破仑时代的官吏依然留职，西西里的独立受到尊重。缪拉自从入侵王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并于1815年10月被处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警务大臣卡诺萨采取一系列镇压自由主义者和缪拉的追随者的措施。1816年12月，两个王国又重新合并，所有独立的西西里制

度都被摧毁；英国人的存在曾经使西西里的立宪党人骄横一时，但是英国驻军已经在1815年撤走了。政府反自由主义倾向最突出的证据之一是1818年的政教协定，这一协定对罗马教廷作出了在18世纪的那不勒斯难以想象的让步。但是，1819年的新法典还保存了拿破仑的司法改革。

在教皇国，枢机主教孔萨尔维曾经希望：在教皇特使管辖区和边疆地区收复后，就有可能对政府机构进行一些改革。他的目标是中央集权和使更多的世俗人参加政府。虽然复辟的政权并不严厉，1816年7月6日的《教皇自动诏书》也并未清除拿破仑时代的所有创新，但是孔萨尔维的希望破灭了。托斯卡纳截然不同，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绿洲。在斐迪南三世治下重新采用利奥波德一世的法律，这些法律与拿破仑的法律一样开明而有效果。自由贸易在托斯卡纳得到官方的嘉许，而当时在其他地区则被当作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受到鄙弃。托斯卡纳是唯一在其境内不准恢复耶稣会的国家。在佛罗伦萨开始出现一群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对复兴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帕尔马也避免了倒退，保存了拿破仑时期的法典和行政机关。在摩德纳，弗朗西斯四世虽然很快博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吝啬的反动分子的名声，并且取缔了法国人的许多创新，但也没有恢复封建法律或委托赠与权。在撒丁王国，反动是正式完成的，国王和宫廷人员带着上一世纪的辫子和三角帽重新进入都灵。政府回到“干净人”（巴尔博后来这样称呼）的手里，所谓“干净人”，就是那些在15年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干的人。现在，庸庸碌碌之辈上了台，而那些在拿破仑时代显示出才干的人则被当作道德败坏的瘟神敬而远之。但是，由于君主制很得人心，还有地方爱国主义可依靠，也就无须太苛刻了。实际上，也不能把撒丁当作一个纯粹的意大利国家；在任何制度下，那里都必然感到法国文化的影响。稍经犹豫之后，拿破仑的货币保留了下来，尽管没有保留法典。另外，维克托·埃马纽埃尔不信任奥地利处理皮埃蒙特领土的计划。他的意图是在复辟时建立一个不受或几乎不受奥地利左右的国家。

这样的千差万别就使我们难以对各地区的复辟作一个总的概括。任何地区都没有完全的反动，任何地区都没有任何暴力的抵抗；应该这样推定：受到很大骚乱的只有极少数的意大利人。地方主义和重商主义再次流行。不过，复辟虽然未经多少困难即告完成，但不满的迹

象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可以看出，复辟时期的自由运动与革命时期光明党之类的反法运动是有某些联系的。在拿破仑时期，从事反法运动的还有另外一些秘密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烧炭党。这个组织是在那不勒斯作为一个反波旁王朝的运动开始的，在制度改变时期反对缪拉，然后到复辟时期又恢复反波旁家族的活动。在镇压匪帮时期，它的组织扩展到整个南方，而在1814年，缪拉的入侵又使它打进了罗马涅。它要掌握意大利复兴密谋的领导权，并且促使另外一些秘密团体（如皮埃蒙特联邦党）建立起来。它在各地的分部，其目标和社会构成皆因地而异。在那不勒斯，越来越多地从富裕阶层吸收党员。在教皇国，它是世俗的和反神权的。在皮埃蒙特，密谋者们幻想通过一个皮埃蒙特皇室成员进行活动。各地分部是自行其是；在那不勒斯，讹诈、恐吓或“保护”是家常便饭。关于这些秘密会社的情况依然很不清楚；许多史实还有待发现。而像“锅匠党”这样一些反自由主义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

另外出现一些激起不满的动力，这不是来自秘密会社的多年策划，而只是来自对于复辟的失望。在伦巴第首先是如此，那里有一群聚集在孔法洛涅里及其报纸《和解报》周围的青年人，将自由派的宪政要求与教育和经济改进计划联系起来；孔法洛涅里本人曾试办兰开斯特式的学校，并且使波河上出现第一艘汽艇，与此同时，又与烧炭党人共同搞密谋。他的报纸于1817年创刊，只维持了一年，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它成为发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的主要场所。在其他地区，不满还有其他特殊的和地方的原因。在教皇国，罗马涅感到了卷土重来的教皇特使的统治与拿破仑行政官吏的统治有显著的不同。在南方，由于废弃1814年的宪法解决办法，西西里的分裂主义又复活了。在整个意大利都有因被迫闲散而大为不满的军人。而且，还有掌握了“职位向有才能者开放”的思想的新的一代，即意大利的朱利昂·索雷尔正在成长。对于这些压力没有可以节制的安全阀，奥地利人取缔了《和解报》，卡诺萨压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因为没有制度可以使人们通过其表达不满，1812年西班牙宪法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1820年掀起不稳的浪潮时，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那不勒斯的革命是由军人领导的。虽然他们的利益在1815年已经得到保证，但是缪拉的许多军官感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歧视，难以晋

级。烧炭党人与锅匠党人的对立在某些地区几乎酿成内战，这更加深了士兵们的忧虑情绪。烧炭党的地方支部与中等地主建立了联系，大多数支部由这些地主领导。烧炭党人自己所确定的目标是：限制君权，改革行政，继续向封建主义进攻和废除重商主义。至于烧炭党人更积极的对于土地改革的兴趣，偶尔也有所流露。1820年，军人们和烧炭党人突然站到一起，这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从长远看，这是力量薄弱的根源，但是却形成了那不勒斯的革命。

那不勒斯政权的镇压措施在1820年5月和6月达到了顶点。同年1月，西班牙发生一次革命，而且取得了成功。当时看起来，并不要去进行干涉；可能由此认为，如果在那不勒斯举行起义，它们也是不会进行干涉的。另外，通过斐迪南，西班牙也与那不勒斯有连带关系。斐迪南曾要求继承西班牙的王位；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曾宣誓遵守1812年宪法，既然他在西班牙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不也宣誓支持那不勒斯的宪法呢？7月2日，诺拉的驻军哗变，当地的烧炭党给予支持。第二天，卡普亚的驻军也举事，由佩佩将军领导叛乱者。政府立即屈服，答应制定西班牙式的宪法。由过去同情缪拉的人组成了新内阁，但是不包括烧炭党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自由派只能从烧炭党的地方支部得到公开或半公开的有效支持。佩佩成为内阁与烧炭党之间唯一真正的联系人。

那不勒斯革命发生一周后，西西里分离主义者也接着起义，这是不足为奇的。西西里的混乱很快就使有产者震惊，整个夏天全岛都处于瘫痪状态，而革命则受到贵族阶级和行会成员的掣肘。叛乱者还因起义发祥地巴勒莫与墨西拿之间的敌对而遭到削弱，他们终于在9月投降了。10月1日在那不勒斯召开新的议会时，没有西西里的代表参加。新的议会支持烧炭党人的内阁，这个内阁盲目相信英国会在必要时前来保护那不勒斯的立宪派，同时，错误地相信了斐迪南的诺言。

不幸的是，英国对于干涉所抱的态度是：如果奥地利单独行动，它并无异议。在特罗保签草约（参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原文第676—677页）之后，斐迪南假装允许把那不勒斯事件提交盟国处理，一当他在热那亚平安地踏上英国的巡洋舰，他就否认了他所有的让步。他在莱巴赫正式要求援助。那不勒斯政府已经大为削弱，在军事上是因为许多部队调到西西里，在士气上是因为缪拉的军官们跟烧炭党的政治家们现在闹分裂。一支奥地利军队击败佩佩将军，于3月23日进入首

都。很快就完成了复辟，流血不算太多。后来流放了很多，但只处决了两个自由主义者。5月实行大赦，只有原来发动兵变者除外。这次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革命者内部的分裂，由于西西里岛叛乱（1821年3月在墨西拿作最后一次反冲）分散了力量，由于缺乏一致的目标，由于斐迪南耍两面派，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列强默许奥地利动用军队来进行镇压。如果这次革命成功，就可能产生一个对过去遗留的东西具有特殊兴趣的宪政国家，从而切断统一的道路。现在失败了，它对复兴运动的神话和流亡人数的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它清楚地表明奥地利不仅要维护分裂的意大利，而且维护反自由主义的政府。奥地利军队迄至1827年一直驻在那不勒斯。

1821年，皮埃蒙特也发生一次具有强烈军事性质的革命。领导者是军官和宫廷中的人员；这次革命与其说是民众起义，不如说是军事政变。革命者有与联邦党合作的打算，因为在那不勒斯，只有通过秘密团体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这样一来，革命就普遍地倾向于自由宪政主义，不管其策划者是否同意自由宪政主义者的特殊目标。那不勒斯的革命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这次运动发展到危急的关头，也使它具有了爱国的和反奥地利的色彩；这意味着国王的态度是犹豫不定的。一位王室成员——卡里尼亚诺亲王查理·阿尔贝特知道这次密谋：即便不能立即得到国王的积极支持，也希望他能成为国王与密谋者之间的协调人。

1月，都灵学生的骚动引起报复行为，这加强了对宪法改革的要求。在查理·阿尔贝特与密谋者作了两三天含糊不清的讨论之后，事件于3月10日爆发了。驻军军官控制了亚历山大里亚。在都灵，从莱巴赫传来会议决定的消息时，王室会议于当晚即准备批准宪法改革。几天以后，革命者占领了都灵的城堡，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无法扑灭这次叛乱，只好逊位。王储查理·费利克斯还在摩德纳；查理·阿尔贝特认为自己有权当摄政王，并宣誓忠于西班牙宪法（3月15日），其目的如他后来所说，是维护秩序。3月20日，查理·费利克斯命令他去诺瓦拉，他在那里被捕。随后是奥地利军队的干涉，动乱即告结束。奥地利人再次成为决定性的力量，革命者又因内部分裂和最终目标不定而大吃苦头。如同在那不勒斯一样，这次运动的失败在于根本缺乏群众的支持。巴尔博曾经写道：舆论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梅

特涅说这次造反是“一次可怕的混乱”，亦不算大错。哗变的想法本身就违反皮埃蒙特军队的传统。

这次失败对皮埃蒙特的未来并没有产生长远的严重后果。奥地利的占领即意味着反奥地利情绪的增长，尽管查理·费利克斯一度感到比过去更加信任他在提契诺河对岸的邻国。查理·阿尔贝特的身败名裂是对意大利后来的历史起重要作用的副产品。行政机构和警察遭到清洗。但是最重要的后果可能是关于运动的神话和造就的人才。马志尼在1821年目睹通过热那亚出走的皮埃蒙特流亡者之后变成了一个爱国者。

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的事态引起了其他地区的镇压行动。在教皇国，虽然教皇特使管辖区是秘密团体的一个温床，但是没有发生变乱（这可能要归功于孔萨尔维的智慧），直到1823年底护七世去世和疯狂的反动分子利奥十二世继位，并没有太多的活动。此后的一些改革是悲剧性的，如犹太人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利；也有些改革是荒唐的，如解散预防种痘监督署。孔萨尔维被撤掉了国务大臣的职务；枢机主教里瓦罗拉被派到教皇特使管辖区去使他们驯服，并铲除秘密团体。1825年有人企图谋害他的生命，接着是处决许多人，但是直到另一个狂热分子庇护八世于1829年继教皇位时为止，情况并没有好转。与此同时，在两西西里，弗朗西斯一世在1825年成为国王，尽管奥地利政府终于解除了卡诺萨的职务，依然进行残酷无情的审讯和追查。不过，秘密团体还是继续存在。

在其他地区，政府是比较宽大的。不过在伦巴第，革命的危机暴露了自由党人与行省外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于是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审讯。首先是对被发现与烧炭党人有关系的八个人判处了死刑，但是一个也没有执行，只是在那不勒斯爆发革命后，这些犯人的监禁条件变得更为严酷了。然后是对包括《和解报》前主编西尔维奥·佩利科在内的一群人进行审讯。接着是更多的逮捕和审讯。最后，在皮埃蒙特革命之后又有一次审讯，孔法洛涅里本人也成为被告中的一员；他本来是希望以伦巴第的起义来支援皮埃蒙特人的。一个受审的囚徒又泄露了伦巴第的密谋与热那亚的运动之间的联系。这些审讯在几年内有效地摧毁了密谋和伦巴第的秘密组织。审讯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孔法洛涅里和阿里瓦贝内等贵族的社会地位表明伦巴第的上层阶级对奥地利统治的幻想破灭得有多么快。这些囚徒成了民族的殉难

者。对他们似乎过重的判决，后来对为贝尔歇的诗篇和佩利科的《我的监狱生活》中关于复兴运动的神话提供了重要内容。但是，尽管有这些活生生的暴政的证据存在，镇压在其他地区却逐渐松弛了。1824年，查理·阿尔贝特重新获得对皮埃蒙特的继承权。在帕尔马，虽然为了取悦梅特涅而进行了几次审讯，但玛丽-路易丝不是宽恕了每一个人，就是减轻对他们的判刑。就是吓破了胆的摩德纳国王弗朗西斯四世，尽管他的法庭宣判40人死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执行。托斯卡纳在利奥波德二世于1842年即位之后比过去更为温和，梅特涅一再抗议那里对自由党人的宽容。这种宽容的象征之一是维瑟的《文萃》的问世。《文萃》开始出版于1820年，是爱国主义在文艺和学术上的集中反映；其中辑录了卡塔内奥的处女作和罗马尼奥西的几乎全部晚期作品。

由于1793年和1830年是人为划定的时间界限，由于在这段时期结束时半岛的情况依然错综复杂，所以很难指出意大利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的普遍意义。经济的变化并不显著。工业格局在1815年以后才开始有点变化；直到1817年，比埃拉才有第一批动力织布机。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经济生活依然意味着农业；只是由于拿破仑的立法和土地的出售，它的形式才稍有改变。在1830年，半岛的交通闭塞依然在扼杀农业；在那不勒斯，每百升谷物能卖30里拉，而在巴西里卡塔连8里拉也卖不掉。农村的贫困状态丝毫没有改善，而那不勒斯的乞丐人数却足以表明这种情况正在日益恶化。北方也是如此，在普列塞研究韦尔切利人的巨著^[8]中已经注意到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这将是意大利在19世纪的特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消这种农村贫困的日益加重的负担。对新的经济形式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兴趣——早在1816年，库斯托迪的50卷本《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后一卷已经问世——但是，这还不是在改变社会结构。保险公司和储蓄银行的创立是一个开端，对新农业技术的关心也很显著，但是，新的领导阶级还没有出现，传统的统治者们还在掌权。土地所有形式虽然稍有改变，但贵族们依然处于支配地位，他们不得不趋附于他们的集团之外兴起的一个拿破仑贵族阶级，这个新贵族阶级的地位是由新的限定继承制度巩固下来的；其他的阶级就无足轻重了。广大群众并不具有已经存在的那种民族觉悟和政治觉悟，虽然在1793—1830年间，有文化的行政官吏阶级的扩大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阶级一心要在复辟的政权中钻营个职位，竭力适应复辟的政权。

当我们探索这些年间的政治和法律的改革的效果时，就会回想起意大利历史学家耿耿于怀的问题：“这个时期与复兴运动有怎样的关系呢？”因为意大利的政治与历史神话有连带关系，这个问题依然有某种重要性。最近研究复兴运动晚期阶段的著作强调皮埃蒙特人的野心与外交环境的作用，使人感到仿佛早期阶段的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其主要特征是某些意大利人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外国人而日益自我觉醒。这一点有足够的政治方面的证据，起初是布奥纳罗蒂及其亲密的伙伴们，后来是1815年以后反奥地利的情绪。但是，像这样从民族主义观点理解纯政治的证据，必定会产生很大的漏洞。比如，地方一向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与争取民族自由是毫不相干的；西西里是很突出的例子。另外，有许多意大利人自愿为外国政权服务。他们坚持为有效率的政府效忠的世界主义传统，18世纪的改革家们就是这样。梅尔齐和普里纳是意大利社会中最开明和最进步的人，他们对本国同胞的真正利益所在是很少怀疑的。

然而，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排外的证据。围绕着这一点，很快就形成了神话。而排外本身则成为形成复兴运动的第一代人的观点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之一。这一神话的实质是把民族主义的要求与自由主义的要求等同起来，它有各种不同的来源，如雅各宾党人的宣传，拿破仑的行政机构，贝尔歇和福斯科洛的诗歌，焦亚和孔法洛涅里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确，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最伟大的意大利作家曼佐尼尽管从他个人和从政治上对伦巴第的自由主义者表示同情，但他的政治活动却仅限于在1815年缪拉的企图流产之后写出《里米尼宣言》，以及在听到拿破仑逝世之后写出《五月五日》。同样确实的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米兰人，他只是在去巴黎之后很久才访问托斯卡纳，他根本没有到过佛罗伦萨以南的地区。尽管如此，就连他也未能摆脱当时流行的思想潮流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论断说，他把托斯卡纳语的惯用法应用于意大利语的演说和文章中，这对意大利民族性的贡献不次于任何一个烧炭党的密谋者。

这个时期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还与它的长度有关系。这个时期終了后，18世纪那一代革命家几乎完全谢世了。一个在1793年是20岁的人，到1830年就将近花甲了。那些在法国人占领时期成长的人，后来成为复兴运动的第一批领导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拿破仑官僚政治和复辟官僚政治的两朝元老。到1820年，有许多1792年和1793年的风

云人物变成了谨慎小心的保守派。另外一些人则不是这样：皮埃蒙特的革命英雄桑托雷·迪·桑塔罗萨过去是帝国的专区区长；佩佩过去是拿破仑的一个旅长。在那些依然比较年轻的人们中间，1789年出生的巴尔博最初是拿破仑的一名文官，查理·阿尔贝特曾当过法国骑兵军团的军官。

如果不考虑无法估计的意识形态的和神话的影响，那么很清楚，意大利在1830年还不具备民族国家的客观条件。各种各样的观察家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如下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人民不再是一批迷惘的和消极的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的期待和愿望不久就会变成要求。”^[9]在后来的整个复兴运动中，就没有群众登上舞台；由此可见，在1830年以前，他们肯定没有参加一种民族运动。南方的匪帮，1799年或1814年袭击法国士兵的暴徒，或者对普里纳处以私刑，虽然有人认为他们集中反映了民族问题，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民族运动。1830年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年头，如同以1793年划分18世纪一样，只是武断地以它来划分19世纪的意大利而已，如果能够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那也只是因为这一年在法国历史中有一些意义，它使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看到法国成为国际革命中的“大国”。新一代年纪很轻，他们忘掉了第一次入侵带来的失望。佩佩在1830年与拉法叶特不断接触；在摩德纳，齐洛·梅诺蒂能够利用弗朗西斯四世对法国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疑惧，使这位君主卷入自己的密谋。他们的希望表明了革命的几十年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也表明意大利在产生一个自主的民族运动之前还要走多么远的路程。

关于1793—1814年意大利的主要领土变化的注释

在莱奥本草约（1797年4月18日）中，双方公开同意将奥属尼德兰划归法国，并秘密商定皇帝也要放弃伦巴第。伦巴第再加上原威尼斯在奥利奥河与阿达河之间的领土，形成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核心。皇帝得到达尔马提亚、伊斯特里亚，以及威尼斯的一些陆地。威尼斯人一度得到教皇特使管辖区，后来依照托伦蒂诺和约（1797年2月19日）又归属法国；但是皇帝根据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7日）得到了在阿迪杰河以东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其余部分。此后是一些卫星共和国的建立和崩溃。在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2月9日）中，实际上重复了坎波福米奥和约的条款。重建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得到了奥

地利人的承认，不久即成为意大利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和卢卡共和国得以恢复。托斯卡纳被赐给帕尔马公爵的儿子，成为埃特鲁里亚王国，并且由于得到小的普雷西迪国（1801年7月28日）而扩大了版图。在斐迪南死后，法国人根据阿兰胡埃斯条约占领了帕尔马。法兰西帝国建立以后，热那亚、帕尔马和皮亚琴察都并入帝国，拿破仑的妹妹埃利兹·巴乔基被立为卢卡女王。根据普雷斯堡条约（1805年12月26日），奥地利放弃了其威尼斯属地。意大利王国扩展到伊松佐河，后来又得到特兰蒂诺。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成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约瑟夫·波拿巴到那不勒斯当国王，1808年被缪拉取代。1807年，埃特鲁里亚王国成为埃利兹的一个大公爵领地。1808年4月，教皇的安科纳边区被并入意大利王国，1809年又兼并了教皇国。关于1814—1815年的变迁，参阅本书第二十四章，原文第657—658页。

（徐烈成 译）

[1] 撒丁王国包括萨伏依、皮埃蒙德、尼斯领地和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包括西西里岛。

[2] 关于1793年以前意大利的结构，在第8卷第十三章第二部分中有更详细的叙述，请参阅。

[3] 此词因被当时的宣传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滥用，意义含糊不清。它既不是指一般的积极政策，往往也不是指比旧政权有更多敌意的东西。

[4] 本章最后一个附注，简要说明从此时以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领土变化。

[5] 在A. 阿夸罗内、M. 达迪奥和G. 内格里编《意大利宪法》（米兰，1958年）中刊出八部宪法。

[6] 例如，那不勒斯宪法的第401款和利吉古里亚宪法的第379款。

[7] 1809年5月17日，拿破仑废除了教皇在世俗中的权力。当教皇颁布通谕《每当想起》来革除劫持教士者的教籍后，他马上就兼并了教皇国家。

[8] S. 普列塞：《两个世纪的农业生活》（都灵，1908年）。

[9] 塞格雷教授语，见《剑桥近代史》（1907年）第10卷，第104页。

第十六章 1793—1840年左右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如何改革正在江河日下的社会问题上，伊比利亚自由主义标榜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理想：一是在传统的宪法范围内，由少数开明人士进行改革；一是以人民主权作为政治理论，进行激进的革命。这两种纲领的起源必须上溯到18世纪后半叶，那些诊断社会衰败症的早期医师的传统带有外国的影响。伊比利亚启蒙运动虽然使思想生活得到复苏，但是依照欧洲标准，却是衍生的和次要的：其意义在于它对在卡洛斯三世晚年控制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那些锐意改革的文官们发生了影响。不管他们是吸收了业已过时的重商主义，还是受到比较现代的重农主义的影响，或者在后来接受亚当·斯密的思想，他们总怀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公民社会并不是万世不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结构，而是可以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用立法手段合理地改进的。他们的目标是使国家进一步繁荣昌盛，因而强调有用的技艺和实际的改革，主张取消无用的阶级制度、无用的烦琐教育和对经济有害的慈善团体。与西班牙的改革家们相比，庞巴尔为增加税收而由一位过度劳累的大臣单独加紧对国家有效控制的做法，乃是在科尔贝尔的启发下产生的一个过了时的纲领。尽管如此，在葡萄牙自由主义者的眼里，这位多疑的独裁者却成为开明改革者的化身。

改革纲领由政府所发起的爱国团体传播到西班牙的各个地方。这些团体的活动往往是很幼稚的，仅仅炫耀从外国报刊上得来的一鳞半爪的科学知识。尽管如此，这些政府官员和他们在当地的支持者坚决提出一个纲领：根据国家的王权要求而确定的方针改革大学教育；发展公共工程，以改变某些省会的面貌；修建以马德里为起点的公路网；合理地划分行政区，扫除由于市政的怠惰与腐化和由于地方的特权所造成的对有效管理的障碍。除少数自然神论者以外，他们都不是异教分子，更谈不到是革命者了。君主政体是他们的工具，是“改革的神经中枢”，只要它的效用确切无疑，它历来所拥有的权力就不会受到挑战。到180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808年的危机中，君

主政体和传统机构的软弱性引起了尽管还不明确但是已很普遍的制定一部宪法的要求。更加危险的是，尽管佛罗里达布兰卡（和葡萄牙的马尼克）竭力阻止跟法国进行文化交流，但出现了一个激进传统的萌芽。^[1]我们从萨拉曼卡大学中的激进分子小组的自发的和互不协调的活动中，从比科内利在马德里策划的共和派密谋活动（1795年）中，从宗教裁判所在地方城镇偶然获得的奇怪的小册子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萌芽。战争造成了一个和平派，戈多伊认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一派甚至会向法国大使欢呼“自由万岁”。1800年，骚塞发现没有薪饷的葡萄牙水兵在为自由和波拿巴而举行暴动。后来，这些激进分子把对改革的模糊要求在西班牙转化为加的斯议会的明确的自由主义纲领（1810年），在葡萄牙转化为1820年的各种事件。

就一个以启蒙运动和后来的自由主义为模式的现代社会来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存在着什么因素呢？西班牙的贵族阶级显然是一个正在没落的阶级。它的经济地位正在受到打击，它的政治影响正在逐渐消失，它的价值尺度也受到了挑战。除了宫廷以外，高级贵族阶级已经丧失了政治权力。在葡萄牙，这是由于庞巴尔对各古老家族进行猛烈的打击；在西班牙，这是由于他们懒惰和清高，而由低级贵族出身的受过正式训练的文职官吏担当繁杂的行政工作。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与法国的君主政体不同，拒绝改变这种做法的一切企图。^[2]虽然贵族们在学术振兴中占主要地位，但其一般趋势则与贵族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在文字上对一个无用的贵族阶级进行的猛烈攻击，乃是法国的论战的反响，或者是低级贵族出身的政客所为，并非被排斥在外的资产阶级的攻击。限定继承权是作为发展经济的“障碍”，而不是作为阶级特权而受到攻击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论证说，限定继承权是繁荣农业的唯一最大的障碍物，因为土地不能买卖，就不可能对农业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贵族操纵市政以及他们的庄园拥有裁判权，被认为是妨碍行政管理而受到抨击，而在封建捐税繁重的巴伦西亚和阿拉贡则作为社会不公正而受到批判。没有明确规定拥有财产的权利，以保护贵族的利益。在北方，贵族的观念含糊不清，几乎包括巴斯克诸省的全部居民。^[3]由于贵族的观念越来越模糊，在19世纪，自由主义派的军人、银行家和律师都被授予贵族的称号。这种扩大化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因此，尽管在1809年的环境下难以想象能成立贵族院，但在后来的几部保守—自由主义宪法中，总是规定设立一个包括世袭贵族在内的上议院。

威灵顿写道：“在西班牙，掌握实权的是教士。”他们拥有这种权力是理所当然的。西班牙教会是一个民主机构：有一位大主教是烧炭工人的儿子，主教团是受人尊敬的好善乐施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和作为一个劳动力的雇佣者，教会直接控制着贫苦阶级。不过，它的深远影响则来自同各种方式的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在较大的城镇中，这种威望就下降了，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和1834—1836年间曾经发生反教士的暴乱和焚烧教堂的事件，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奥利维拉·马丁斯认为，由于世代受耶稣会的教育，葡萄牙人不得不陷入迷信和伪善，而由于经济上的苦难，就更加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庞巴尔反耶稣会士的攻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群众的信仰，从而助长了米格尔主义的“白色蛊惑宣传”。把教会作为维护国王利益的政治机构而加以攻击，就产生了西班牙的“詹森主义”，产生了涉及1800年教会分裂的关于王权的论争，并引起对教会控制教育的攻击；而由于教会作为一个经济机构的地位，又引起了对永久管业权、“不劳而食”的修道士和修女的恶劣境况的攻击。然而，自由派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并非仅仅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由于教会激烈反对新思想，由于奄奄一息的经院制度不吸收任何新的东西，由于任何意见都一定会被否决，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如果自由主义者想要得到任何的进步社会，他们就不能不采取保卫行动；就连虔诚的天主教徒霍韦利亚诺斯，也因宗教裁判所企图摧毁他的教育改革而感到愤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有少数激进分子乐于参加战斗，尽管在1822年，葡萄牙的民主主义者曾公开呼吁学习革命法国的榜样。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不管是由于深信还是害怕自由主义会被当作少数派纲领来谴责，都以历史上的原因为借口，极力避免公开的战斗。在加的斯议会中对宗教裁判所的攻击，是作为西哥特法的复活而提出的，当时是争取新闻自由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要求。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与18世纪的文官们是有分歧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实现了王权派的纲领，但他们不是为国王的权力，而是为一个自由社会进行奋斗。

改革派认为，只有发挥资产阶级的力量，才能使国家富起来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西班牙资产阶级只是在逐渐地使自己适应这一使命：除高级文职官员外，专业阶级的报酬低得可怜，不受人们尊敬——律师享有崇高威望完全是19世纪的事情。商人阶级往往是保守的；那个典型的卡斯蒂利亚城市依然是一个地方贸易中心，一个经济落后的行政首都。在西班牙的边缘地区，人口的增长促使经济开始复苏。按照欧洲标准来看，人口的增长幅度是很小的，但由于西班牙的人口一直不增不减，这种增长还是很了不起的。经济复苏的原因是美洲市场向整个西班牙开放（1768年）以及工资和物价之间的差距有利于投资和扩张。经济复苏在巴伦西亚、巴斯克诸省和加泰罗尼亚最为显著，结果造成一种后来在19世纪发生巨大政治影响的新的力量均衡。^[4]加泰罗尼亚是以棉花为基础的一个真正工业革命的中心，到1805年，在工业中已有一万名雇佣工人。加泰罗尼亚的软木塞和白兰地畅销起来。加泰罗尼亚人向西班牙展示了崭新的商业前景。在葡萄牙，庞巴尔和他的继任者面临着丧失以宏伟的马夫拉宫为象征的巴西繁荣。他的对策是采用垄断商业和开办皇家工厂等老药方。葡萄牙的贸易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虽然也有本地人正在东山再起的明显迹象。到19世纪20年代，里斯本商人试图迫使自由主义的制宪会议接受他们建立真正民族经济的计划。^[5]

这样，在西、葡两国，自由主义者不能从一个强大的工商业阶级那里吸取自己的力量，而没有这样一个阶级正好可以说明伊比利亚自由主义的软弱。西班牙的中产阶级人数虽多，力量也强大，但是它的构成却与西欧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它包括城市里的中等土地所有者，这部分人后来是自由主义土地立法——剥夺教俗限定继承权和没收城市公有地——的得益者，并在地方显贵的影响下赋予选举机器以自由主义性质。尤其重要的是，中产阶级还包括军官团，这些人赋予它以特殊的力量。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民基本上仍然从事农业，情况极其复杂，无法进行概括。大致说来，农民占有土地的地区信奉天主教，富于保守性。卡洛斯主义和米格尔主义在巴斯克诸省和葡萄牙北部是根深蒂固的。1822年，葡萄牙的守旧派企图动员北方来反对自由主义的南方。这种农业制度虽然没有对爱国团体所宣传的改革信念作出反应，但是既不像所想象的那样稳固，也不像所想象的那样技术落后。传统的制

度尽管极端缺乏资本，却还能根据市场情况，把重点放在绵羊、小麦和橄榄上，甚至栽培茜草之类的新作物。因此，19世纪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基本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方面都有确实明显的增长。

[6]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由于排水和灌溉，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增长也都是显而易见的。

西班牙的农业问题是：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庄园中无地的农业工人的悲惨处境，以及在中部的小农和佃农的贫困不堪。在1760年，政府对于可以把过剩劳动力与过剩土地结合起来的农业改革发生了兴趣。在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一派主张政府支持农民拥有土地，并且限制地租。而自由派则反对这种解决办法，赞成公开拍卖教会的土地和市政公有地，由新所有者去加以改进。在霍韦利亚诺斯的《备忘录》[7]中极力鼓吹实行这种解决办法。这种自由出售政策必然有利于经济实力雄厚的人，而那些主张实行这一政策的人，肯定忽视了自由买卖土地将会给收入仅敷支出的农民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在1789—1808年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交政策是软弱无力的，这在葡萄牙归咎于恢复唯宫廷之命是从的制度，在西班牙则归咎于王后的宠臣戈多伊把持朝政。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是二等强国，无法采取中立的方式去摆脱法国依靠传统联盟的结构进行历次战争而强加给它们的无法忍受的压力。1793—1795年的战争暴露了西班牙的软弱性。戈多伊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和法国结盟，以此来对付他的宫廷敌人，以及防止出现他的敌人卡洛斯四世死后一旦得逞，在葡萄牙建立一个公国的前景。他企图改变他的制度，但是为时已经太晚，因为拿破仑这时已不再确保他的地位，法兰西军队正在涌入西班牙，这加速了他的垮台。戈多伊才二十几岁，是个没有经验的禁卫军军官。他赞助文学，在教育问题上是个进步的温和派，而在攻击教会占有土地方面则是个激进的改革者（这项政策使教士们赞成制定一部限制君权的宪法）。他的主要弱点是，在政策方面随着宫廷的喜怒左摇右摆；他的权力来得很不光彩，而他又往往利用自己的后台，这样就树立了许多敌人。王储费迪南德的党羽与仇恨一个地方小贵族出身的宠臣的宫廷贵族互相勾结，促使他垮了台。费迪南德的爪牙组织了阿兰胡埃斯暴乱（1808年3月），迫使惊慌失措的卡洛斯四世退位。国王向暴民屈服。在这次阴谋得逞之后，王储便与态度暧昧的贵族立宪主义，也许还与——虽然证据不足——全国范围的反对“哈里发”戈多

伊的“自由派”密谋结合起来，不断企图败坏他母亲的名声并使他父亲的大臣名誉扫地。^[8]尤其重要的是，当戈多伊终于看到法国联盟的危险性，特别是对于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的危险性的时候，费迪南德七世却正在以法国联盟为靠山。自从1806年起，太子的一派就谋求法国人的支持，费迪南德希望作为法国承认的被保护者来进行统治。因此，费迪南德是天字第一号的亲法分子，只是在巴荣纳遭到拿破仑拒绝以后，他才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抗法运动的象征。

这次抵抗对于发扬西班牙民族主义的意义，正如德国的解放战争一样重要；在这场抵抗运动中，西班牙官方举棋不定，对能否战胜法军缺乏把握，又害怕对一个已经合法地从费迪南德那里接过权力的政府采取革命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要对约瑟夫·波拿巴的权力提出异议，就必须求助于这样一种理论：主权不在于国王，而在于国民。费迪南德在马德里留下的卡斯蒂利亚王政会议和政务会只是奉命同法国人和解；首都被法军进驻，无法考虑抵抗，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维持秩序，避免正式从法律上废除费迪南德的任何权力。^[9]在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与法国将军实行合作，因为只有求助于一个法国军官所谓的“巴塞罗那的大批下等人”，才能够抗击法国人。可是，怎么能指望七十高龄的军事长官埃斯佩莱塔发出这样的号召呢？在占领的最初阶段里，官方的合作迷惑了法国人。

迫使合法当局进行抵抗的是下层人民；如果说“人民揭竿而起”这个由来已久的说法说明革命组织者的活动的话，它也正确地表达了革命的群众性质。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起义乃是因与占领军发生摩擦而使仇外情绪加深的结果。5月中旬，运动席卷各省：敌人的屠杀和群众的压力迫使军事长官和地方当局把人民武装起来，并且批准自动成立的地方政务会。运动不仅是针对法国人在马德里的屠杀，也是反对由法国人保护的戈多伊的最后一次拼死的斗争。西班牙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政务会，正表明地方上的贵族已经接受了革命。这些政务会是革命的产儿，经常与旧政权的官员发生冲突。它们往往犯狭隘地方主义的错误；有时只不过是名不副实，连办公用的墨水和纸张都没有；在自己管辖的地区，收税和征兵都办得不力。但他们拥有足够的负责责任的爱国者，推动建立“中央政务会”，这是形成西班牙政府的一个庞大的代表机构。作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即作为重新行使宪法权力的国家合法代表，它的地位遭到卡斯蒂利亚王政会议的反反对，该会议主

张旧的法制依然有效。而各个地方的政务会则谴责它保守。到1811年，通过一系列的地方“雾月政变”，各地的政务会都由将军们控制起来了。将军们不理睬文职官员，他们认定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都是由于文职官员的无能，没有充分供应军队的给养。^[10]罗马纳出动50名掷弹兵驱逐了阿斯图里亚斯政务会；将军们跟保守派勾结在一起，阴谋反对在加的斯的中央当局。这些最初的武装暴动对自由派文官政府来说，乃是不祥之兆。

议会的召开使人民主权合法化了，这样就提供一种政治理论，足以使约瑟夫的合法性失效。保守派认为旧法律依然生效，这种观点不能适应1808年革命的现实；上自国王起，旧制度的各级组织的失败，已葬送了君主政体的旧“体制”，群众的抵抗使本来交给国王的权力又归还了国民。无论是人民主权论本身，或者是普遍的改革愿望，都不需要极度限制行政权力的1812年宪法。国王“像一只被关入宪法牢笼的野兽”；这样一来，19世纪初自由主义的命运就和一部极其神圣的、不可变更的宪法联结在一起。这部宪法使有效的议会政治无法推行，也是任何国王所不能接受的。自由主义者把自己这个杰作说成是被哈布斯堡专制主义掩盖了的传统宪法的复活，企图掩盖人民主权的原则已经大打折扣这一事实。但是，阿圭列斯承认：一部“继承下来的”宪法如果不再“体现国民幸福这个首要的原则”，它就不能限制国民的合法权利。这就揭露了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是一种诡辩。

加的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理论方面本来已与18世纪的政治改革家背道而驰，但是，自由派的纲领却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些改革家那里继承下来的，再用从国外输入的以阶级、财产和契约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设想加以补充和发展，而这种设想超出了国王的行政和财政权力。革命西班牙的联邦结构掩盖了加的斯的立法者怀抱的国家团结统一、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取消行会，取消地方管辖的飞地，消灭由庄园主掌握裁判权的庄园社会的残余，走上法律平等和按比例纳税的自由全民国家的康庄大道。自由主义者在经济立法方面，关心的不是合乎社会需要的重新分配土地，而是建立明确的和绝对的财产权，澄清旧制度混乱不堪的概念。因此主张圈地自由以反对牧主光荣会的放牧权；主张废除庄园，这一措施的意图是在可以接受的契约基础上建立财产权，而不是为了解除农民的沉重负担；因此主张将市有

公地转归个人所有，而不进行可能与财产权相抵触的土地改革。19世纪的解放纲领就这样拟制出来了，虽然战争阻碍了它的实施。

自由主义者被卷入对教会的攻击，这违反他们的政治利益。如果再加上有关王权主义的议论，攻击的目标就远远超出原来的范围。在对宗教裁判所的攻击中，进步的西班牙和传统的西班牙之间的辩论采取了现代的形式。在废除教会的司法权的问题上，在拟议中的攻击把永久管业权作为偿付国债的手段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接受约瑟夫对修道院的镇压的问题上，保守分子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分歧，而使修道会的教士们加入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反改革运动。这样，由于贵族十分软弱无力而无法组织的反击，现在就由受到威胁的教会来领导了；教士们拉选票的活动对产生1813—1814年的更加保守的普通议会起了作用。[\[11\]](#)

我们怎样估计西班牙军队在西班牙解放运动中的贡献呢？正规军接连败北。1809年以后，西班牙的抗法战争以游击队为中心。游击队有3万人左右，他们的战术也不可能产生辉煌的战绩。但他们的确产生了由卡洛斯派和极左派双方继承的威力巨大的神话。游击队的抵抗成为爱国者的信念中和1822年突出表现出的用各种美好的言辞加以渲染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把革命，把地方反对腐败的中央政府的自发起义浪漫化了。战争给自由派留下的最头痛的遗产是通敌分子，即亲法分子的问题。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许多人由于贪图私利和迷恋官职而为法国人效劳；还有像卡萨诺瓦那样的政治冒险家，他在巴塞罗那由于掌管警察而大发横财。真正的亲法分子是那些出于信仰为法国效劳的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西班牙作为一个单独的王国的独立地位可以由约瑟夫的君主政体来最好地加以维护；爱国者的抵抗必然导致军事征服，最后丧失政治独立。而且，费迪南德的退位并没有为抗法运动提供合法依据，所以爱国主义就意味着求助于“共和”学说，而国王本身对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各种群众性委员会、激进的议会和服装褴褛的革命军队，都代表着无政府主义。亲法分子的悲剧是，他们押宝押错了。拿破仑对埃布罗河流域诸省提出了军事要求，并且把他哥哥实行的赢得民心的政策置之脑后，这就使亲法分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们并不是卑鄙的卖国贼和通敌分子，他们往往是西班牙社会的进步因素，是怀抱自由思想的文官，他们从约瑟夫的君主政体中看到了改革西班牙的希望。

在葡萄牙，1808年自由派起义一无所获；在西班牙，自由主义试验随着费迪南德七世在1814年复位而告终。当费迪南德确信军队在支持自己，而且右翼的“波斯人代表团”在议会（这时已在马德里）中显示出反雅各宾情绪的力量之后，他对废除宪法就不再有任何犹豫了。最近以来，人们非常重视那个主张传统君主政体的波斯人纲领，它提供一条介于教条的自由主义和18世纪内阁专制主义（这两者都被认为是舶来品）之间的中间道路。^[12]波斯人纲领不合时代、没有明确的体制，根本无法实行，只能作为废除自由主义及其一切法规（1814年5月4日）和恢复内阁专制主义（这是波旁王朝和布拉干萨王朝的君主们所熟知而且能够实行的唯一制度）的借口。民众的尊王主义为唐·卡洛斯提供了借口；只有唐·米格尔后来认为它是个蛊惑民心的农民运动。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复旧行动是无效的、不牢靠的和独断专行的，它经常受到军队的暴动、秘密社团以及流亡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敌对行为的威胁。费迪南德需要像加拉伊和巴列斯特罗斯那样的与自由派有联系的财政方面的能人，因而鼓励建立一个比较温和的政府的试验性步骤，但遇到的是反叛和旧制度的恢复。自由派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反映诗人金塔纳的论点：凡是在自由社会里生活的人，谁也想象不出不自由社会是什么样子。往最坏处说，他们的要求证明，政治生活乃是夺取有限的恩赐官职的斗争。由于官职有限，自由派的官位追求者只能设法实行接管，不能和旁人分享。这种情况是形成军事自由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

费迪南德的政权和葡萄牙的摄政会议只有偿付债务和繁荣经济，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恢复美洲殖民帝国，恢复18世纪时同巴西的那种贸易关系，而两者都是超越所谓“二等朝廷”的财力的。西班牙拒绝让步或让英国人调停，“坚强不屈，仿佛欧洲就在它的脚下”；英国的外交在对待没落的帝国主义的感情方面表现得毫不老练，它在南美洲的贸易利益也损害了与西班牙的关系。最后，西班牙就企图孤注一掷，拒绝对不可避免的命运让步。这给西班牙的政策注入了一种疯狂的光荣感。费迪南德的西班牙无力建立一支军队来避免在美洲的失败：安达鲁西亚远征军摧毁的不是美洲的叛乱分子，而是君主政体本身。葡萄牙摄政会议和费迪南德七世都冒了很大风险，离间军队中的各派。在葡萄牙，军队各派不和乃是贝雷斯福德的统治和高级军职一概由英国人垄断的结果。在西班牙，由于加强经济管制和害怕残留的自由主义情绪，政府只给在战争中急忙派赴战场的新军官

阶层以低微的职位。在他们的敌手看来，这些军官是战争中的暴发户，被连连晋升弄得晕头转向，做着发动西班牙“雾月政变”的美梦。他们起来反叛了。同后来几代把革命看作一桩生意的将军们相比，这些军官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理应在自由主义的烈士名册中占有其地位。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由派革命的工具是秘密团体（它们在1815—1820年间的成功活动是由于伊比利亚的教士们迷恋于共济会的纲领）和武装起义，后者是一种军官的叛乱，其很不成熟的政治理论是，当一位君主的奸臣们或腐化的议会机构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意志的时候，就要到军官团中去寻求这种意志的表现。武装起义总是采取一种死板的形式，并总带有一个弱点：由于担心周密的磋商会使计划败露，大多数武装起义都是仓促行事。但是，这个弱点由于政府的侦察不力和监禁不严而抵消了。1820年，被推选出来的领袖基罗加虽然身在囹圄，却被允许有进行密谋活动的完全自由。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鼓励了革命者任意行事。^[13]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武装起义只不过造成了一些殉难者，如葡萄牙的戈麦斯·弗莱雷·德·安德拉德和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拉西。平民的支持虽然不断增加，但毕竟是有限的，士兵们对于他们的军官们的自由主义则漠不关心。即使说在1817年有过一次共济会的即平民的大规模密谋行动，那也无济于事。1820年，在一些高级军官和加的斯共济会的一些著名人物由于被奥唐奈出卖了1819年的“值得敬佩的”密谋而感到恐惧之后，实际上由一批青年军官和毫无经验的鲁莽行事的文职人员领导的加的斯革命为什么会成功呢？使革命获得力量的是“士兵厌恶乘船前往美洲”，这种厌恶心情第一次引起军士和士兵们对革命的直接兴趣。英国领事认为这次叛乱“将会自生自灭”；它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政府软弱无力，未能集结一支力量去与之战斗。^[14]3月，革命扩展到了萨拉戈萨、科鲁尼亚和巴塞罗那等大城镇。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和奥唐奈向革命投降；国王被迫接受1812年宪法（列戈马上就接受了这部宪法），这并不是由于马德里的示威游行所显示出来的舆论力量，而是由于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军队了。

1820—1823年的革命确定了伊比利亚自由派的以及其敌人的纲领和步骤，在西班牙，1812年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场彩排；在葡萄牙，

1808年革命没有达到目的。1820年革命中新的党派组合是持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自由派都分裂成温和与激进两翼。

激进派的力量在于迄至6—7月为止统治西班牙的各个政务会的地方极端主义，在于列戈的革命军队。由此形成了革命的途径：在军事方面，实行武装政变；在民政方面，由各地的政务会接管政权。这些地方政务会的极端要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和南方）是建立联邦制度，即拥有统治权的地方政务会控制新建立的城市民兵，彼此直接发生联系。虽然这些热心家进行了革命，但他们没有明确地分享到高级官职。由“1812年人”组成的政府，把新的革命者看作“一群可怜虫”。在首都，激进派能够煽动暴民的压力，但是，在人们看来这与其说是出现加尔多斯所描述的地狱般的恐怖，不如说像是节日的狂欢。从内阁力图重新控制军队和激进派利用马德里群众保卫列戈的军队之日起，爱国者的团结开始破裂，这种破裂使革命陷入瘫痪状态（1821年9月）。在一个充分就业的首都，激进派是很软弱的；而在各省，政府则没有力量。迄至1874年为止，革命政治始终具有这种两重性。

“囚徒”内阁（1820年3月）^[15]的那些流亡者企图控制在各个政务会和俱乐部中被奉为神圣的革命的委员会舞台，并对1812年宪法作保守性的修改，以满足国王的要求。在流亡期间，像马丁内斯·德·拉·罗萨这样的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实行有限的选举权，建立上议院和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在政治方面最有能力的一个集团是获得大赦的亲法分子，他们本来是流亡分子的天然盟友，但是这些人由于有叛国嫌疑而难登仕途，变成现政权的职业批评家了。温和的纲领只有得到国王的坚决支持才能实现。可是，朝廷阴谋反对任何的宪法，甚至不惜与激进派携手。革命的最大弱点是：没有国王，宪法就无法实行，而国王的唯一目标却是破坏宪法。

国王的敌对态度促使大臣们去与“九月的受害者”结盟；这个与激进派的同盟是暂时性的，在1821年夏天，比较温和的内容碰到了各省重新掀起激进革命的局面。西班牙全境都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失业和不断的征税助长了城市的激进主义，废除苛捐杂税成为“自由的晴雨表”。在加的斯，极端主义分子扬言要建立一个汉萨共和国；在科鲁尼亚，激进派宣布他们“拒绝服从一个令人憎恶的内阁的命令”。政府控制着首都；它在普拉特里亚斯的滑稽歌剧式的战斗

（1821年9月）中击败了列戈的支持者，把议会中的“平原派”争取过来。马丁内斯·德·拉·罗萨的新内阁企图修改宪法，业已取得外国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国王的背叛，这些希望都成了泡影。国王始终没有领悟，在温和自由派的支持下修改宪法是有可能恢复王权的。^[16]他的拙劣阴谋活动造成了1822年7月的事件，成为革命的分水岭。民兵和炮兵联合起来对付近卫军的叛乱。在近卫军的军官当中，有些是右翼立宪派，其余的是专制主义者。国王不但与革命决裂——激进派这时谈论设立摄政会议——而且失去了他的保皇派盟友。他们“对国王的行为怒不可遏”，这是卡洛斯主义的起因。由于宫廷反革命已经威信扫地，保皇派遂寄希望于农村。

保皇派的反应是，由极右派恢复游击传统：由小股队伍到孤立的地区强征捐税，并在塞奥-德-乌赫尔以被俘国王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摄政会议（1822年8月）。近代历史学家们夸大了这种地方保皇主义的力量。^[17]塞奥被攻克了，“现代的卡利古拉”^[18]米纳摧毁了加泰罗尼亚的保皇主义。由于保皇派方面唯一的重要军人埃罗莱斯男爵未能颠覆自由派的军队，反革命只有使用法国武器才能获胜，这是后来的卡洛斯主义的历史所证实的一个教训。大多数保皇分子准备接受法国的条件：制定一部温和的尊王宪法。“纯粹的”保皇派分子在胜利之后可能会忘记这些诺言。政府现在掌握在1820年秘密社团的爱国者手里，在废黜国王之后，它丝毫没有去抵抗昂古莱姆军队的前进，革命以军队的背叛开始，现在又以军队的背叛结束。将军们企图通过谈判，求得一个保住他们的“工作和荣誉，使他们能够像在另一种制度下一样身居高位”的解决办法。^[19]文职官吏希望靠牺牲神圣的法典求得苟存。这是徒劳无益的。国王拒绝了昂古莱姆的和解建议。维莱尔预言将要爆发内战，放弃了法国所希望的通过宪法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次内战以剥夺公权、建立清洗委员会，以及地方上的报复行为而告结束，只是由于法国占领军的存在才收敛了一点。

革命虽然是被外国武装击败的，但是到1823年，它已成为一个非常不得人心的集团的专政：温和派和亲法分子已于1822年7月退出政治舞台。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是1812年关于废除限定继承权、出卖公地和教会财产的纲领，它除了煽动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外，对下层阶级是很少有吸引力的。而且，革命与教会发生了冲突。在早期，爱国者曾强调由宪法规定天主教为唯一的宗教，教士们也鼓吹接受革命；但

是，由于政府不能控制报刊对人所共知的18世纪路线的攻击，而且发展到攻击正规修会的财产，其中立立场便削弱了。在最后的挣扎中，革命终于成为迫害者。1823年，西班牙教会有许多人成为殉教者。

[\[20\]](#)

1820年春天，法国驻里斯本领事德莱塞普斯确信，西班牙的榜样将在葡萄牙触发一场革命；但是，特殊的不满情绪（国王不在国内，英国派占统治地位）使葡萄牙革命具有它自己的爱国主义的标志，既仿效大革命的法兰西，又仿效列戈的西班牙。[\[21\]](#)所期待的“绅士革命”（德莱塞普斯语）是与波尔图驻军和里斯本下级军官的叛乱一起来临的，政府既没有精神力量也没有物质力量去对付1820年激进派的安逸思想。像在西班牙一样，革命发生了内讧，通过制定一部温和宪法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了，因为民主派认为，温和派致力于制定一部国王和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宪法，乃是他们的反动阴谋的证据。国王具有“必定会使他成为暴君的感情”，于是就被作为暴君来对待。若奥六世不喜欢宪法，但也不愿意支持专制主义的反动。后者以他的王后和次子唐·米格尔为首，以煽动人心来取得力量。他的最后解决办法是支持帕尔梅拉的主张，实行贵族宪政，体现在一部钦赐宪法里，但是这个办法始终没有付诸实施。葡萄牙革命留下一个历经磨难的激进传统，而受到革命立法威胁的那些阶级——教士、文职官吏和地方贵族则抱着敌对态度。面对这些阶级，萨尔达尼亚看到，若奥六世的长子佩德罗于1826年颁布的宪章必须靠武力来强制施行。如在西班牙一样，这个问题不是两三个政党经过斗争就可以在宪法范围里解决的。它牵涉到一部专制主义者不可能接受的宪法本身的存在问题。这些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西班牙的“不吉利的十年”（1823—1833年）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动时期。与卡洛马德联系在一起的卑鄙的内阁专政主义相对立，有1823年兴起的人民中间的“纯粹”保皇主义和温和改革派坚持不懈的努力。只有费迪南德七世能够在宫廷各派系之间进行仲裁，阻止内战爆发；正是这一点使他继续得到民众的拥护，并给了这位多病的专制君主以米拉弗洛雷斯所谓的“道德力量”。人民中间的保皇主义对君主政体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敌视革命及其一切所作所为；但它也很危险，因为它决心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君主政体，必要时通过叛乱来实现。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在1827年提出来的这些条

件，除特权问题外，成为卡洛斯主义的基本纲领，其中包括：解散自由派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废除警察和教育，恢复宗教裁判所，建立一个没有现代新花样的宗法式的君主体制。^[22]他们的力量在于教会和保皇志愿军。我们对这支反动的民兵了解甚少。用支持唐·卡洛斯继位要求的阿丁顿的话来说，这是一群“可恶的暴徒”，他们只能驱使正规军去支持伊莎贝拉，而破坏唐·卡洛斯的登位机会。^[23]这支民兵既不受陆军部控制，也不受财政部控制，它所进行的迫害活动产生了关于这些年代暗无天日情况的传说。志愿军体现了群众的保皇主义，“一种保皇主义的民主”，巴尔梅斯写道，“这是一支真正的市民军队，它简直就是人民主权的象征。”这支队伍起源于富有战斗性的卡洛斯主义。对自由派的事业来说，幸运的是，卡洛斯战争开始之前，这支队伍已经解体了。

1827年叛乱之后，费迪南德七世竭力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政策受到新王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鼓舞，她的孩子将不得不与宫廷中的卡洛斯主义作斗争。这个政策使一批文职官吏和宫廷贵族居于显著的地位，他们是克里斯蒂娜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向一个破产了的国王作出保证，去粉碎银行家们的抵制活动。由于费迪南德拒付1820—1823年间自由派的借款，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曾以抵制活动来惩罚他。贵族中的典型人物是米拉弗洛雷斯；文官中的典型人物是巴列斯特罗斯和哈维尔·德·布尔戈斯。巴列斯特罗斯（1823—1833年的财政大臣）系加利西亚一个小贵族，是一位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财政专家，由于庇护亲法派的知名人士，被人认为是个自由主义分子。毫无疑问，他的自由主义是被人夸大了，不过，他能够在那不吉利的10年中始终保持官职，这就是对那个时代最好不过的说明。布尔戈斯则表现出他的最纯粹不过的一种温和改良派。他是个亲法分子，始终不渝地赞赏18世纪的改良主义派和法国的行政管理方法。他论断说，只有改变制度，实行大赦以防止流亡者向“破坏信贷的来源”，“银行家联合会”才会提供贷款。像许多在1820年要求制定一部温和宪法的亲法分子一样，他现在认为，在一位开明君主领导下进行行政改革，将会满足自由派的愿望。如果用现代的内政部代替老的、臃肿的卡斯蒂利亚王政会议，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使埃布罗河下游地区繁荣起来”。在整个后来的那些年，明显的特征是有许多悔过自新的亲法分子，他们希望作为仆人为一个正在从事改革的君

主政体效劳，以谋生计。诗人利斯塔作为一个宣传家，为能够修筑公路、发展工业以及保护有用的艺术的“强有力的合法政府”进行宣传。[\[24\]](#)

对于那些在萨默斯顿和巴黎受苦受难的自由派流亡者来说，葡萄牙的若奥六世之死（1826年），唐·卡洛斯与后党的宫廷斗争，以及1830年7月的法国革命，重新揭开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争端。正如1820年一样，自由主义和保守反动成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独特现象。葡萄牙的王位继承左右着西班牙的政局，与唐·米格尔和唐·卡洛斯的反动的勾结相对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联合这一激进的前景。葡萄牙的自由主义者萨尔达尼亚准备参加对安达鲁西亚的一次袭击，而米纳则打算帮助葡萄牙的爱国者。这些企图只不过暴露了流亡者之间的小小分歧，并使费迪南德对后党和鼓吹温和行动的人们感到厌恶。

巴西皇帝唐·佩德罗希望通过他的女儿、未来的玛丽亚二世与唐·米格尔联姻来解决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条件是米格尔必须接受1826年的宪章。当唐·米格尔被宣布为绝对的国王后，这种解决办法便宣告失败了。帕尔梅拉企图借助外国干涉谋求和解，而萨尔达尼亚认为，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迫使保守的葡萄牙人接受由一位“窃取了”巴西的皇帝所制定的这部宪法。只有米纽省的自由主义为自由派的革命提供了基础。这次革命在1828年失败了，里斯本大搞恐怖活动，由于这场腥风血雨，就失去了欧洲的同情，削弱了米格尔事业本来非常牢固的国际地位。

唐·佩德罗失去巴西帝位，使他的犹豫不决、自由主义左派的绝望宣告结束。现在，唐·佩德罗把自己看作他女儿的英勇无私的卫士，看作统一葡萄牙自由派的领袖。他具有矛盾的性格，是能够作出非常果断的决定的。他率领一支靠西班牙自由主义者门迪萨瓦尔筹款来维持的雇佣军，长期围困波尔图，在纳皮尔取得惊人的海战胜利后占领了里斯本，并且在一个西班牙军团的协助下，通过签订埃武拉山条约（1834年5月）迫使唐·米格尔放弃他的王位要求。

虽然这次胜利始终再没有发生相反的变化，但是自由主义和葡萄牙却经常无力偿债，经常不稳定。像在西班牙一样，只有在维护王位继承时，自由派的人们才能够共同战斗。派别的分歧已经个人化了。帕尔梅拉是一位不相信自由主义革命的外交家，他原来赞成英国式的

贵族立宪制度，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借助外国势力来强制推行。他的对手萨尔达尼亚则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但又是深受士兵爱戴的英勇军人，他的信条是宪章，而且只有宪章，随时准备同激进派（帕索斯·曼努埃尔，以及他主张的“玛丽亚二世的王位和1791年的原则”）联合。虽然认为葡萄牙自由派只有少数人，议会主义的外表掩盖着政党分赃制，这无疑是一种夸大的说法。然而，米格尔主义是一个群众性的信念，人们就像热爱唐·塞巴斯蒂安（天使们在里斯本的上空齐唱赞歌宣布他的重新出现）^[25]一样爱唐·米格尔。米格尔求助于葡萄牙的农民、求助于里斯本的暴民、求助于被奥利维拉·马丁斯尖刻地描绘为“狂热、凶暴、无情、欺凌弱小者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流亡的哲学，即一个在暴政下呻吟而欢迎解放者的民族所抱的愿望，都由于自由派的军队在道义上陷于孤立而幻灭了。“不要让我为了解放你们而使用武力。”（1832年8月唐·佩德罗登陆时的宣言）然而，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推行自由主义。反雅各宾派的边沁主义者莫西尼奥企图通过法令来建立一个能够保持自由主义制度的自由社会。在他看来，能够使自由主义存在下去的东西并不是宪法，而是不断增长的财富，是摆脱自古以来存在的束缚的商业，是免去什一税负担的土地。但是，国内的繁荣并不会因此而实现；一旦失去了巴西的财富，葡萄牙的收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赤字。自由主义势必要遇到不可解决的债务问题，势必要以灾难性的利率向外国贷款，势必要受到那些在原则上受到攻击、在钱财上受到损失的人的敌视。

在西班牙，宫廷各派政治力量由于“拉格朗哈事件”（1832年9月）而壁垒分明，国王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玛丽亚·克里斯蒂娜通过颁布国事诏书，已经使得公众承认她的女儿的王位要求。这样把唐·卡洛斯排除在外，是否合法是可疑的；在国王患病期间，趁王后住在拉格朗哈夏宫而与内阁脱离接触之际，宫廷中的唐·卡洛斯支持者迫使撤回了诏书。^[26]王后把首都的温和自由主义者团结到她的周围，从而建立起一个克里斯蒂娜派的核心，重新确认诏书，并以由外交家塞亚·贝穆德斯领导的半自由主义内阁取代现有的大臣们。卡洛斯不能再指望来一次有利于自己的宫廷革命；他们的唯一机会在于进行一次这位合法争取王位者所避免的叛乱，公开求助于人们对教会和国王的根深蒂固的忠诚，求助于北方诸省的割据状态和农村对城市的仇恨。

与自由派联合的第一步是非常谨慎的。塞亚所进行的是老式的行政改革，但是他的内阁加强了自由派的力量：保皇志愿军被解散了，地方军事长官们清洗了地方行政机构（以议会民主制代替政党分赃制），颁布了有限度的大赦，开办了一些大学，设立了自由派促进繁荣的灵丹妙药内政部。然而，塞亚顽固地支持唐·米格尔，坚决反对立宪派盲目地让议会承认伊莎贝拉的王位要求。行政改革已经足够了；任何形式的宪法都只会激怒卡洛斯派。

国王之死（1833年9月）和卡洛斯派开始叛乱使得塞亚的有限纲领无法推行。国王去世的第二天，米拉弗洛雷斯提出严格以财产资格为基础召集议会并且实行全面的大赦，以期加强克里斯蒂娜的事业。反对塞亚的声浪从聚集在摄政会议里的宫廷小圈子扩大到自由派的舆论界，自从1823年以来，自由派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是第一次。哈维尔·德·布尔戈斯以及反对任何体制改革的其他一些人都认识到战争需要议会作出某些牺牲，以求得阿丁顿所谓的“国内温和人士”的支持。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国王和议会中最保守的自由派携起手来了。国王永远不能破坏这种契约，直接受益者也不能永远把1820年激进派的继承人排除在外。塞亚的反对者无法搬掉他这个大臣，就在10月请来了将军们。利奥德尔一直在加泰罗尼亚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同保皇志愿军斗争中得到第一次成为政治中的一个因素的巴塞罗那资产阶级的支持。当他和克萨达将军要求解除塞亚的职务并在“王国古代立法”的基础上召集议会的时候，保守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当一个政党无法用行政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时，就求助于军队的仲裁了。

塞亚倒台以后，由以马丁内斯·德·拉·罗萨为首的自由派内阁执政，在1834年的国王法令中对自由派作了最低限度的让步。国王法令是一部保守的钦赐宪法，却被打扮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西班牙宪法。反对派拒绝接受这一法令，企图迫使议会控制内阁。内阁由于在北方进行战争而受到严厉的抨击。因为在那里苏马拉卡雷吉以他的指挥天才打败了派去讨伐他的每一个将军。由于法国拒绝给予援助，政府无力对付南方日益扩大的无政府状态。进步派被推上了台，不是通过议会中的胜利，而是由于1835年夏席卷加泰罗尼亚和南方的地方革命。各个城镇的情况彼此不同，但是各地政务会有效地统治着西班牙，其纲领包括改组内阁，实行1812年宪法，为爱国者创造就业机会，废除

苛捐杂税，解散修道院，实行新闻自由，等等。王太后根据维利尔斯的忠告，在风暴面前屈服，召门迪萨瓦尔组织政府。

正是门迪萨瓦尔，在这时候以及在1836年8月革命以后，实施了1820年革命从加的斯议会继承过来的纲领。由于财政上的需要，不得不向教会的土地展开决定性的进攻，虽然在议会辩论中暴露出自由派左翼所特有的反教权主义的暗流。^[27]1820年的废除民间限定继承权的法律生效了。在整个19世纪，人们都把“解放”土地以使资本获得利润看作自由派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在1813—1855年间，曾通过一系列法案，使国家和城市公地中的可耕部分归私人所有。到1844年，教会土地已经有一半以上被出售，大部分是卖给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同时，大概至少有同等价值的世袭地产从低级贵族转到新所有者的手里。正如改革者所宣称的那样，这一大规模的土地易手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的问题。虽然自由派的立法中包含一些旨在保护小耕作者的条款，但是几乎无可怀疑，公地的出售恶化了贫苦农民的命运，而其他土地的出售则加强了较大地主的势力，以及如最近的研究所证实的，也加强了最富裕农民的地位。^[28]

在反对这种激进主义新浪潮的斗争中，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介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温和派，一个是激进的进步派，它们要在政坛上平分秋色。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围绕各自的宪政理论形成的：一方面是国王和议会联合主权论，这种历史上的“国内体制”体现在1834年和1845年两部温和的宪法中；另一方面是包含在1837年进步宪法中的人民主权论。

温和派是一批著名人物，其中有杰出的、现已改悔的前激进分子；有业已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代替旧贵族的官僚贵族；有加泰罗尼亚的担心群众暴乱的富裕资产阶级；有惧怕圣塞巴斯蒂安商人的要求的比斯开地主。他们在精神方面同法国的教条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的政治理论是为他们的阶级的权力要求服务的：主张“智力统治”，反对激进派的“抽象空谈”，拥护符合“社会力量平衡”的宪政结构。他们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国王，也得到国王的支持。这一联盟使王室成为温和派的机构，使温和派变成大权独揽的寡头统治集团，结果使国王和温和派的人一道灭亡。如果始终依靠国王任命大臣和解散议会的特权，那么，只要温和派能够控制地方政府和选举，他

们就能够长久掌权。因此，对于进步派来说，击败温和派的地方政府法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与温和派的“大权独揽”相对立，进步派代表了城市激进派那种激起狂热传统的要求。进步派得不到国王的特权的支持，他们没有别的抉择，只能通过革命强行夺取政权；他们在1835—1836年，在1840年，在1854年和1868年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每次上台都是利用由经济困难（1836—1837年的谷物价格达到19世纪除1867年以外的最高点）触发的地方革命，并在每一次或多或少得到军队的支持。每当发生地方革命之后，当地的进步派著名人物就组成政务会，最后由于马德里的政府更替而得到承认。这一最后步骤使马德里的领袖们与地方上的活动分子之间产生不和，这是进步派最严重的弱点。因此，进步派的宪政学说的主旨——人民主权论——乃是他们需要革命的表现，而温和派则认为这很可能出现“由鞋匠统治市府，面包师指挥民兵”的局面。^[29]用米纳的话来说，如果一个政府破坏宪法（例如立宪议会所制定的1837年宪法），对该政府就有“造反的合法权利”；这就是进步派在1840年为反对温和派修改地方政府法规的企图而掀起革命的理论根据。

当摄政王后抛弃门迪萨瓦尔的时候，是地方的极端主义分子拯救了进步派的领袖们。军队遭到反对派代理人的暗中破坏，未能抵御安达鲁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马德里，政府虽然保住了地位，但是，1836年8月，一些军士在拉格朗哈叛乱，迫使太后接受1812年宪法和建立激进的内阁，同时还对她的丈夫进行威胁和侮辱，因此，太后在余生中一直与进步派的政治家不和。最后的结果是发生1868年的革命，使她的女儿失去了王位。

由于温和派和王后受到严重打击，这一危机使卡洛斯派在政治上得到一个大好机会。但是，王位追求者的顾问们都把这个机会放过去了。在另一方面，由于进步派的1837年宪法没有采取一院制，也不反对1812年宪法所确定的国王特权，这就产生了以“合法的”进步派放弃激进的传统为代价，建立一个自由派联盟的可能性。温和派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拒绝任何妥协，他们利用王权以便通过恢复国王对各市镇政府的控制来修改1837年的宪法。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山穷水尽；将军们当权的大门已经敞开，这是卡洛斯战争最后几年的重大发展。1840年9月，由于一次地方革命和一次军事政变逐步交织在一起，

进步派再度掌权。在1836年，进步派所依靠的是军士，而在1840年，他们依靠的乃是一位将军。

当政治家们不能向将军们提供金钱以支付军饷的时候，当政治家们指责将军们把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这种指责引起1837年夏天的兵变）的时候，将军们就介入了政治。一个军团司令只有通过同情该军团的要求的陆军大臣，才能保持对该军团的有效指挥。将军执政与其说是军人权欲熏心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官政府软弱无能的结果和出于政治家们党派斗争的需要。政治家们希望军人的胜利将会提高其支持者的信誉，每个党派都想得到结束战争而取得的威望。军队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保卫自由主义免遭卡洛斯派的破坏，它还是自由主义国家中唯一稳定的集体。1837年以后，各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发现只有求助于军队，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对手以及强加给国家。埃斯帕特罗成为进步派的“利剑”，纳瓦埃斯则成为温和派的“利剑”。出于文官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军人政治家这类新的人物，他们一直主宰西班牙政坛，直到1875年卡诺瓦斯恢复文官政治为止。在西班牙，军界和文官界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鲜明。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军人当政制度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军官团与其说是一个军人等级，不如说是代表官僚利益的低薪职员阶级的一部分。军队的官僚们看待军事叛乱就像文官看待更换大臣一样——一位将军成功之后，支持他的人们自然都加官晋级。干预政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所采取的总是武装起义那一套固定形式，最初是从兵营里大叫大嚷，最后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提出战斗口号。文官们尽管可能会威胁说要用将军自己的绶带来绞死将军，但离开将军们维持政治秩序就不堪设想。尽管将军们扬言看不起那些腐败的政客和廷臣，但是，他们的一切行动始终离不开文官的支持。这种相依为命的制度与军人独裁有很大的区别。在这种制度下，军人革命被看作政治机器的一部分，一种推翻一个由于博得国王信任和操纵选举机器而使正常的政党轮流当政成为不可能的统治集团的合法途径。

军人野心和党派政治的一致，反映在胜利公爵埃斯帕特罗的生涯中，他曾在贝尔加拉迫使卡洛斯派让步（1839年8月）。他以军事政治理论来掩盖自己的野心，即军队和军官团的职能是体现全体国民的意志。他以很难弄清此种意志为借口来为自己举棋不定辩护。虽然他在1837年对一个钦佩他的英国人说，“废除议会政府衰落而腐败的形

式”的时刻已经到来，但他并没有毅然决然地去扮演克伦威尔的角色。从1838年到1840年，每届内阁都探询他的意图，而他似乎在待价而沽。^[30]一旦他决定支持进步派，巴塞罗那的激进暴民就起来示威游行，迫使摄政王后解散她的软弱的温和派内阁。这是埃斯帕特罗体现国民意志生涯的顶峰。在他作为唯一的摄政进行统治时（1840—1843年），他失去了大多数进步派政治家以及巴塞罗那的支持，暴露出他是一个军人小集团和一小撮“无条件服从”的文官的考迪略。埃斯帕特罗和他那取得胜利的对手纳瓦埃斯，都只能作为政党领袖进行活动。一旦他们仅仅作为将军，他们就垮台了。

自由派尽管四分五裂和威信扫地，还是击败了卡洛斯派和米格尔派。令人惊讶的并不是卡洛斯派的最后失败，而是他们的初期胜利。这些胜利都是一个具有领导天才的退役上校苏马拉卡雷吉取得的：他利用巴斯克诸省的有利地形，从最初的几百个人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3万的军队，还有一个用缴获的大炮和熔化的铁锅制成的炮弹装备起来的炮兵团，一所工兵学校和几家兵工厂。他们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受到训练，后来敢于同自由派军队作战，并围攻毕尔巴鄂。^[31]这一大有希望的开端被分裂与不和断送了。“卡洛斯派需要人才，而由于分裂与不和，他们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唐·卡洛斯是个虔信宗教、平庸无能的人，他无法控制一个在主要领导人与卡洛斯派激进分子、使徒派“暴徒”或纳瓦拉派之间分裂的宫廷。马罗托和纳瓦拉的将军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派别斗争，导致缔结贝尔加拉和约，这使主战的卡洛斯派陷于绝境，退守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山区。

派系斗争只不过是断送了一个行将失败的事业。西班牙的极右教权派失败的深刻原因，在于它未能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巴斯克诸省和纳瓦拉的家园以外，一旦自由派解决了招募和供养一支庞大军队的问题，这些地方就无力支持一场正规的战争。唐·卡洛斯的直逼马德里城下的远征乃是一次代价极大的失败；戈麦斯横扫整个西班牙，既没有引起抵抗，也没有得到支持。北方诸省只希望维护他们的独立以及他们用以对抗自由派中央集权主义的地方特权，而卡洛斯主义则不仅如此。卡洛斯主义的力量来源于纯朴的保皇主义，来源于宗教狂热，来源于阿拉贡省萧条的小城镇对经济的不满，来源于农民对城市文明的不信任（因此，受山谷里的人们欢迎的是夺取省会及其行政机构，战胜一个复杂而敌对的世界）。不管对后来的卡洛斯派评价如何，上

述的原始纲领无论在地理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无法使运动向外开展。^[32]因此，它永远不能吸引保守的贵族或将军们。巴斯克的卡洛斯派的显要人物为了缔结一项和约而抛弃了事业，以便维护他们赖以割据一方的地方特权。贝尔加拉和约之后，卡洛斯主义作为一个神圣的家族传统，一个毫无作用地被奉为高贵，并自己把自己与实行宪政的西班牙隔绝开来的信念而存在下来。

葡萄牙的自由派步西班牙自由派的后尘。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者分裂成激进的一翼和保守的一翼，前者念念不忘1822年的光荣业绩，认为在城市进行蛊惑群众的宣传就会具有战斗的力量，后者所指望的则是朝廷和外交上的同情。两派都希望将军们给予决定性的支持；保守派先是指望特尔塞拉，后又指望萨尔达尼亚。萨尔达尼亚原来充当调停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他支持宪章而扮演了保守派的首领和总裁的角色，保护进步派的任务转而落到了另一把“利剑”——萨·德·班德拉身上。像在西班牙一样，介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宪章派得到王后的支持，他们的势力只有通过一次革命才能打破，因而这次革命使革命的政治家们面临着极端主义盟友的要求。九月派叛乱（1836年）是西班牙1836年革命的翻版。它向科斯塔·卡布拉尔领导下的保守的宪章派作了让步。而卡布拉尔像西班牙的温和派一样，拒绝在1838年妥协的宪法范围内工作，虽然宪法规定了间接选举制和世袭贵族制。科斯塔·卡布拉尔过去是个激进分子，他希望采取靠葡萄牙的资本来发展经济的英明政策，创立自己牌号的保守自由主义，这是他过去作为爱国者而继承下来的奇妙遗产。正如在西班牙一样，由于国王始终支持保守派政治家，就使得反对派比他们的思想和原有的要求更进一步向左转了。

在一些抱敌对态度的批评家看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立宪政体似乎是掌握在职业政治家和地方首脑人物手中的一种新的封建主义。尽管有着种种缺点，但它仍然是近代社会的结构。传统的社会已经日暮途穷，无力再向前发展。它只能求助于过去。一切要把卡洛斯主义作为在19世纪决定西班牙命运的信条而进行的尝试（曾经有过多次这种尝试）都无法掩盖其彻头彻尾的反动性质。西班牙社会本身发生变化，使卡洛斯主义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自由主义的立法摧毁了旧制度在农村的司法的和经济的基础。在加泰罗尼亚，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正在出现，它倾向自由主义。整个西班牙的商业

阶级都把贸易不振归咎于君主专制。^[33]但是，一些显要人物从城市激进派那里察觉到了社会革命的来临，感到恐惧，已经使自由派阵营发生了分裂。

（严维明 译）

[1] R. 赫尔：《十八世纪的西班牙革命》（普林斯顿，1958年），第239—376页。

[2] V. 罗德里格斯·卡萨多：《卡洛斯三世的内政》（巴利阿多里德，1950年），第24—36页。

[3] A. 多明格斯·奥尔蒂斯：《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社会》（马德里，1955年），第77—123页。

[4] P. 维拉尔：《十八世纪的巴塞罗那》，见《外交文书档案的历史研究》第2卷（巴塞罗那，1950年）。

[5] F. 皮泰拉·桑托斯：《里斯本的商业资产阶级》，见《经济评论》第4卷（里斯本，1951年），第22—25页。

[6] A. 莫罗·德·霍内斯：《西班牙统计资料》（巴黎，1834年），第106—109页。A. 希尔韦特的文章，见《经济评论》第6卷（里斯本，1953年），第65—80页。

[7] 即霍韦利亚诺斯《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卡斯蒂利亚最高王政会议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译者注

[8] C. 科罗纳：《卡洛斯四世在位时期的革命与反动》（马德里，1957年），第312—388页。

[9] 参阅阿桑萨-奥法里尔《辩护书》（《西班牙作家丛书》，第97集，马德里，1957年）第1卷，第288页。D. 杜·德塞尔特《西班牙评论》第17卷（巴黎，1907年），第66—378页。J. R. 梅卡德尔《法国占领时期的巴塞罗那》（马德里，1949年）。

[10] 关于阿拉贡军区的不满和野心，参看阿耶韦侯爵的《回忆录》（《西班牙作家丛书》，第97集，第258—266页）。

[11] M. 阿尔托拉：《现代西班牙的起源》（马德里，1959年），第610—615页。

[12] 例如F. 苏亚雷斯·贝德格尔《旧制度的政治危机，1800—1840年》（马德里，1950年）。

[13] J. L. 科梅利亚斯：《西班牙早期的武装起义》（马德里，1958年）。R. 卡尔的文章，收在M. 霍华德编《军人与政府》（1957年）中，第135—148页。

[14] 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73（西班牙）。韦尔斯利1820年1—3月的报告文件。

[15] 这个政府的成员都是1814年费迪南德七世复辟后曾被监禁或流亡的自由派，故称“囚徒”内阁。——译者注

[16] 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73（西班牙）。1822年3月10日赫维的报告。

[17] 例如J. L. 科梅利亚斯《三年立宪时期的保皇派》（潘普洛纳，1958年）。

[18] 卡利古拉（12—41年），罗马皇帝，以专制暴虐著称。——译者注

[19] M. J. 金塔纳：《西班牙作家丛书》第19卷（马德里，1946年），第581页。

[20] J. 卡雷拉·普哈尔：《十九世纪加泰罗尼亚政治史》（巴塞罗那，1957年）第2卷，第115页以下。

[21] 巴黎，外交部档案。《关于葡萄牙的政治通信》。德莱塞普斯的报告。

[22] A. 皮拉拉：《内战史》（马德里，1889年）第1卷，第57页。特权问题指巴斯克诸省享有的自治权（fueros）。广义地说，这个名词用来指加泰罗尼亚的特权。

[23] 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73（西班牙）。阿丁顿，1832年11月17日。

[24] H. 尤里施克：《阿尔贝托·利斯塔的生平、创作及思想》（马德里，1951年）。

[25] 唐·塞巴斯蒂昂（1554—1578年），葡萄牙国王（1557—1578年在位）。1578年率军远征摩洛哥时阵亡。国内谣传他被俘，因此盼望他重返葡萄牙，引起种种传说和数起冒充他回国的骗案。——译者注

[26] F. 苏亚雷斯最近在《拉格朗哈事件始末》（马德里，1953年）一书中批判了自由派所讲的这些事件的细节，但它们的政治意义依然未变。

[27] 《议会日志》，1837年5月。

[28] 如希门尼斯·德·格雷戈里奥《哈拉托莱达诺的人口》，载《地理研究》（1954年）第14卷，第214页。

[29] 参阅J. 德·布尔戈斯《伊莎贝拉二世在位时期编年史》（马德里，1950年）。

[30] 外交部档案，巴黎。《政治通信（西班牙）》。1840年3月28日鲁米尼的报告表明，政治家对埃斯帕特罗的政治意图毫无了解。

[31] C. F. 亨宁逊的《跟苏马拉卡雷吉作战十二个月》（伦敦，1836年）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苏马拉卡雷吉军事生涯的精彩描述。

[32] C. 塞科：《一位卡洛斯派国王的小传》，载《马德里大学学报》第19卷，第339页；J. 穆希卡：《卡洛斯派、温和派和进步派》（马德里，1950年）。

[33] R. 奥尔特加·卡南戴尔：《1832—1833年的西班牙政治危机》，载《近代史研究》第5卷（巴塞罗那，1955年），第351—384页；J. 比森斯-比韦斯：《十九世纪的加泰罗马亚人》（巴塞罗那，1958年），第48—52、227—243页。

第十七章 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一 低地国家

18世纪末，政治动乱波及欧洲，低地国家亦未能幸免。18世纪80年代，低地国家的两半部分都卷入了改革运动，其中某些方面乃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先驱。

荷兰介入美国独立战争（1780—1784年），只是使联合省蒙受经济损失，并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把海军的败北归罪于执政威廉五世的疏忽，这就使反对1747年恢复的世袭执政制的势力增添了新的力量。同时，有些地区在启蒙运动思想鼓励下，也日益激烈地批判整个省和联省议会制度的基础——自私自利的城市寡头统治的无能，要求由富有的公民进行实际选举，而不是事实上指派地方行政长官。因此，“爱国”运动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两派：一为保守派，其唯一目的是打倒执政，把全部政权重新交给贵族寡头统治集团；一为民主派，企图使政权进行有限的进步改革。后者比较活跃，甚至组织民兵以便在必要时抗击执政的驻军。保守派起初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民主派作为反对执政的压力集团。然而，这种貌合神离的联盟是不能持久的。1785年，民主派在乌得勒支夺取政权，并到处加强自己的势力以便与保守派相抗衡，此后，联盟遂告破裂。这使保守派觉得，执政对于他们要比伙伴兼对手的危险性更小一些，因而就和执政言归于好。下层人民也照例站在威廉一边。及至奥伦治党形成之际，它和民主爱国派之间的内战已迫在眉睫。最后，普鲁士在英国政府的唆使之下，派兵于1787年9月13日越过了边境。民主派向法国求援而没有得到回音。随着阿姆斯特丹的降服（10月10日），爱国运动就暂时告一段落。

很多支持者逃往奥属尼德兰避难。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在位）在这里顺利地开始执政。他利用英国、法国、荷兰交战带来的繁荣，得以像在他的其他领地一样进行一连串改革，开始主要是宗教性质的改革，例如允许信仰自由，取消“无用”的东西，即忏悔祈祷、

女修道院以及把训练教士的神学总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些措施起初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对。然而战争结束后，繁荣逐渐变为严重的萧条，再加上歉收和饥谨，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皇帝发出的1787年元旦敕令，本意是使过时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彻底现代化，结果却伤害了许多人，这些改革剥夺了他们的司法权或政治权力。这些人先是用合法手段进行抵制，省议会拒绝对征税进行表决以示抗议；但是约瑟夫寸步不让，继续推行其计划，并且显然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保证计划的实施。在比利时，“爱国”反对派实际上也是双重的。保守派，纠集各特权阶层、教士以及手工艺者行会，一心想要废除皇帝的改革，首先是恢复议会，保持他们原有的权力，因此他们被称为议会派。另一方面是由职工组成的民主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它与皇帝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反对约瑟夫的专制，正如法国革命前的第三等级一样，要求建立一种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法国和列日爆发革命。1789年8月，那位君主兼主教被民众暴动逐出了列日。这促使流亡国外的爱国者的一支小小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反对君主，离开了他们在荷兰领土上的庇护所，入侵布拉邦特和佛兰德。奥地利人只得撤至卢森堡。比利时各省“代表大会”显然受到美国样板的鼓舞，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1790年1月）。这个合众国的寿命并不长。保守派和民主派不久便放弃合作，为制定新国家的宪法而进行激烈的斗争。受议会派煽动的暴民迫使民主派逃往他们的理想正在取得胜利的法国。与此同时，约瑟夫的继承者、比较温顺的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签订赖兴巴赫协定（1790年7月），与普鲁士修好，而在此之前，普鲁士为了削弱哈布斯堡的势力，一直煽动比利时人的骚乱。同年年末，奥地利军重新占领了比利时各省，让列日的君主兼主教重掌大权（1791年1月）。尽管在奥属尼德兰没有发生报复行动，甚至约瑟夫的改革大都已经废除，然而许多民主派人士依然留居法国。列日的很多革命者由于主教推行镇压政策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全都把希望寄托于法军入侵他们各自的国家。

1792年4月20日，战争果真爆发了，迪穆里埃在热马普告捷（1792年11月6日）之后，比利时人和列日人联合派充当了他的顾问和助手。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共和国，组成吉伦特派的政府；迪穆里埃认为，这应该是兼并的第一步。然而，吉伦特主义正在衰

落，国民公会于12月15日决定在1793年2月举行公民投票，由精选出来的同情雅各宾主义的选举团表决这一国家是否立即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只有在列日主教管区的某些部分，具有强烈激进思想的工人们才投票赞成合并。在其他地方，只不过是一出闹剧而已。公民投票刚刚结束，奥地利人在内尔温登获胜（1793年3月18日），把法军赶出了比利时，于是在奥属尼德兰和列日，旧政权东山再起。这一次比前一次还要短命：1794年6月26日，弗勒吕斯战役把此后20年比利时的命运与法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法国人想要吞并他们征服的领土。不过，在实施兼并以前，国民公会想要利用这个国家，以缓和法国财政的严重枯竭和供应匮乏，办法是逼它大量纳贡，强行征用物品，付给它的则是大大贬值的指券。此外，无数艺术品被运往巴黎或法国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征服者的掠夺，加上他们的反宗教措施，几乎使举国上下都感到愤恨。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些倒霉的月份里，这个国家的机构都按照法国盛行的行政统一和等级制原则进行了改革。建立起市和区，不久又改为省，并引进法国高效率的司法、财政、邮政等组织体制，于是国民公会完成了约瑟夫二世所未能实现的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列日主教管区经过8个世纪的独立之后，如今也永远与这个前奥地利领地合并了。1795年10月1日（共和四年葡月9日），比利时各省正式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许多法律，例如压制封建主义、显贵权利、贵族和行会的法律，立即实施了；其他一些法律，例如取缔不从事教育和保育工作的女修道院的法律，也逐步实施了。最后，在1796年12月6日，全部实施了法国的立法。当局并非按照共和三年宪法的规定，允许大多数行政和司法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主要是按照当时风靡巴黎的时尚，挑选温和的民主派加以委任，若人数不足时，甚至挑选温和的保守派加以委任。

爱国运动被粉碎后，联合省通过保障法决定原封不动地保持他们的执政统辖下的过时的机构。议长范·德·斯皮格尔作出巨大努力以根绝臭名昭著的滥用权力，但由于各省和个人的自私自利，由于笨拙的威廉五世漠不关心而归于失败，甚至在东印度公司一事中也是如此；只有奄奄一息的西印度公司才在1791年被撤销，其领地交由政府直接管辖。一个更为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荷兰人对法国国内发展状况的态度问题。流亡国外的爱国者组成一个巴达维亚军团，法国国民公会

于1793年2月向英国的忠实盟友荷兰执政宣战后，这支军团也参加作战。不久，在内尔温登战败，这支部队被迫撤退；弗勒吕斯战役后他们又卷土重来。1795年1月，在荷兰行将被占领之际，执政携眷逃往英国。随着法军向前推进，爱国派就得势了：他们或是奉命或是自行夺取城市行政权，从而能够在议会里发号施令。他们宣布民众自主权、人权和公民权，废除一切爵位和官职的继承权，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主要只限于把现有机构换上新的名称。诚然，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和法国的关系，他们希望法国宽宏大量，结果成了泡影。最突出的是，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不得不交纳大宗战争特别税；它已经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这就使它长期背上了财政的重担；最后，它不但没有得到垂涎已久的比利时领土，反而要将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和斯凯尔特河左岸割让给法国，1648年蒙斯特条约中强行规定禁止在斯凯尔特河上自由航行的条款被废除（1795年5月16日海牙条约）。

及至1795年秋，英国对荷兰的商战促使后者经济衰退，同时由于缺乏深入的改革，特别是由于缺乏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政府，这就使急躁情绪日益加剧。在一些激进的民众俱乐部的压力下，举行了一次选举。选出国民议会，准备起草一部新宪法。选举权几乎人人都有，但是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又把它抵消了。绝大多数温和派都已回国。1796年3月7日召开的议会在宗教问题上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政治地位在1787年就已得到改善的天主教徒以及犹太教徒都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政府对归正会不再给予支持。比较棘手的是难以在单一政府还是联邦制度之间作出抉择。在代表们的心目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把原先各省的债务合并起来是否有利的问题。在债台高筑的省份中，主要是人口众多的荷兰，大多数赞成单一政府。关于民众参政的程度问题，决定继续实行间接选举，只限于相当富裕的公民有选举权。东印度公司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后来于1798年被撤销。宪法由议会通过前，还得经过公民投票批准。凡是选民都必须宣布自己反对继承原则，因而奥伦治党人被排除在公民投票之外，但是联邦制拥护者和新教徒表示反对，这就足以使宪法于1797年8月8日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否决（108761票对29755票）。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就成了一个月前选出的第二届国民议会的任务。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巴黎果月政变的榜样以及海军在坎珀多因的惨败（1797年10月11日），使新议会里的激进派舆论哗然，保守派的反对愈烈。关于宪法的讨论进展甚微，这样一直到1798年1月22日激进派发动政变，将议会清洗，于是议会通过

了新宪法，强烈地主张单一政府，其他方面则大抵受共和三年法国宪法的影响，规定成立两院和五人执政委员会。宪法提交给严格清洗过的全体选民，这次都获得通过（1798年4月），赞成票甚至超过了去年夏天的反对票（153913票对11597票）。但是，温和派坚决不愿忍受激进派的统治。巴黎的花月政变也清除了激进派的势力，此后不久，丹代尔斯将军在海牙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798年6月12日），此人于1787年移居国外，1795年成为巴达维亚军团的一员。第三届议会选举产生，并且成立了执政委员会，两者皆持有温和观点。

法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比利时各州自然有更重大影响。共和五年芽月（1797年3月）这里的选举和法国本土的选举一样保守。很多人放弃了观望态度或者不再反对该原则，转而帮助右派候选人重返五百人院，甚至用更为保守的本国人来替换先前由法国当局指派的官员。这些人在关于宗教的法律废除之前就重新开放已经关闭的教堂，并和虽拒绝宣誓仇恨王朝但继续发挥教士作用的教士取得默契，这种道义上的赞许从一开始就使比利时的教士发生深刻的分歧。他们希望发生的变化没有来临，却发生了果月18日（9月4日）政变。大多数新当选的官员被革职，他们的前任重又掌权。由于共和六年的选举即将来临，选民名单经过审慎的清洗，余下的选民也受到重大的压力。首先是宗教界形势急剧恶化，政府严格要求举行仇恨王朝宣誓；拒绝者遭到逮捕并驱逐出境，梅克林红衣大主教弗朗肯贝格被赶出国门。少数几个教区的教士宣了誓，可以公开举行礼拜仪式，但是遭到绝大多数信徒的抵制。由于受到日益强大的压力，没收的教堂财产遂作价出售，这也严重地触犯了虔诚的信徒。同时，贸易的停滞、失业、歉收和牛瘟使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实行征兵（1798年9月）成了最后一个诱因。根特附近发生暴动；在英国和奥地利特务煽动之下，暴动像野火一样席卷整个佛兰德。但是，这一次“农民战争”和以类似方式在卢森堡森林里发展起来的“棍棒战争”，都缺乏组织性和武器，结果除了乱伐无主树木，销毁征兵和纳税人名册外一事无成。到了12月，就为法国人的讨伐镇压下去。数以百计的起义者被处死，几千名教士遭到迫害，大部分教士潜逃他乡。

在1797—1798年事态发展以前，比利时人在变化无常的政治中一直处之泰然。约瑟夫二世的政策破坏了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天然的忠诚；以致有些地方甚至期待着法国人来征服。1795年掠夺事件结束以

后，许多人依旧认为新政权和其他政权不过是半斤八两。果月政变公然违反选举结果，督政府的反宗教政策，最后还有征兵，使比利时人完全丢掉了幻想，几乎一致仇视法国的统治。与此同时，起义的彻底失败，欧洲列强的消极态度，越发使比利时人感到无力反抗他们的主子。在法国人统治的其余时间里随着战争的胜败无常，他们一会儿意志消沉地俯首听命，一会儿又希望得到解放。他们对自己一旦获得解放后的命运感到捉摸不定，拥护奥地利人复辟的人极少；比利时和荷兰旧政府人员曾经讨论过在奥伦治王室统治下低地国家重新联合的问题，但比利时人对此更不感兴趣。

比利时人冷漠的敌视态度，在他们并不踊跃参加1799年12月的公民投票（批准波拿巴的雾月政变）、1802年的公民投票（赞成波拿巴为终身执政）以及1804年的公民投票（批准皇位世袭）中都表现出来了：每次都比法国本土参加投票的人少得多。新统治者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来消除天主教徒对前政府的怨恨。在仇恨旧王朝的宣誓废除后，很多未宣誓的教士可以离开藏匿处，重开教堂，尽管流放国外的主教们毫不妥协，连平常谈过忠于共和国的话都受到他们的谴责。政教协定在缓和紧张关系方面起了作用，但是教会放弃自己的财产和权力，尤其是“基本条款”在某些教士中间引起了反对，并由此造成了两个分裂。拿破仑和罗马教廷重新发生争吵，使整个教会再度成为反对派。另一方面，皇帝致力于建立国家和社会，也许能博得当时的法学家和后来历史学家的钦佩。然而，对皇帝属下广大的臣民说来，政府体制的完善可能主要表现在收税人员极其精明和能干。我们也许会对拿破仑的惊人军事成就叹服不已，当时他的许多比利时士兵无疑也是这样的；然而，由于战争中士兵伤亡增多，而拿破仑的野心又越来越大，于是益发加紧征兵，青年们都企图逃避服役或者开小差，结果是盗匪蜂起。正如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知识分子对压制任何代议制政府的做法和好疑的警察到处横行感到愤恨。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升任县长之类的高位而得到安抚，这种情况在比利时比在法国本土少。不过，比利时各州虽然总是由法国人统治，他们的下属，如副县长、镇长等，现在则照例都是比利时人。即使这些人也不是始终如一地积极拥护这个政权的，但是多数属逆来顺受之辈。由于别无他法，他们准备接受唯一能任用他们的政权所赐给的荣誉和工作。

在真诚拥护帝国的人之中，大多是“黑”产业（即教堂产业）的买主，他们认为该政权是防止旧秩序复辟和保住他们新近获得的房地产的最坚强的保证。其中有些人是比利时工业革命的先驱：在这几年中，比利时真的成了欧洲新工业的发祥地。以古老的传统工艺和因近来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基础，比利时制造商控制了整个帝国及其卫星国，以它们作为市场，有效地防止英国的竞争。自从根特的利文·鲍温斯于1798年得以把新式棉纺设备和操作技工偷运出英国以来，他的家乡成了欧洲纺织工业最兴旺的城市。从1799年起，兰开夏的工程师威廉·科克里尔在韦尔维埃造出了纺织设备；1807年以后，他使列日成了法国经济势力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引擎制造中心。贸易兴旺，实业家们（而不是劳工阶级）财源茂盛，直到1810年，由于市场临时饱和引起的大跌价使很多实业家破了产。至于安特卫普，英国的制海权阻碍了它充分利用斯凯尔特河的自由通航；已经改善了的安特卫普港口主要由海军利用，这也使造船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1799年起，政府已在比利时站稳了脚跟，但是它在荷兰要先经历几番变革才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并入法兰西帝国。拿破仑作为执政官，最感兴趣的是从荷兰人那里得到日益增多的财政支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拿破仑赞成和原先的商人阶级和好，并恢复其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由于这一贵族阶级仍然坚持传统的地方主义，1801年9月的一场新政变大大恢复了各省原有的自治权。立法议会只能由富人选举产生，而后议会以地区为基础任命由12人组成的执政委员会。拿破仑与旧社会势力和解也是意在抚慰英国，诱使英国同意议和。新政权照例将由公民投票来批准。以往的骚动尽管滴血未流，但确实已使荷兰人对政治感到十分厌倦。他们对1799年英俄联军在赫尔德附近登陆毫无反应，就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又是如此，只有极少数人参加公民投票：40多万选民中，只有6.9万人参加，而且其中3/4投的是反对票。但是，“法国的算法”将弃权票算作赞成票，于是宣布通过了新宪法。很多奥伦治党人经过威廉五世批准当了官，由于考虑到奥伦治党人的情况，早先仇恨执政制的誓言业已作废：威廉似乎已放弃恢复荷兰人尊严的一切希望，实际上是在抛弃尊严。新政权唯法国之命是从，为战争出钱出人，但尚未奴颜婢膝到不顾本国的长远利益。他们确实是想争取中立地位，以便恢复贸易和繁荣。亚眠和约签订后，荷兰人失去了锡兰、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等领地，英国有几分赞成这一

计划，但拿破仑极力反对，而且每一次试图讨论这一问题，结果都会提出新的要求和巴达维亚独立的新威胁。

但是，1801年的政权更迭，并非完全由于法国意欲反对荷兰中立而引起的；法国的目的毋宁是要使卫星国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与它的独夫政府协调起来。新宪法再一次提交公民投票（但是35万多选民中只有1.4万人投赞成票，136票反对），这以后，路特格·扬·希默尔彭宁克出任政府首脑（1805年4月29日），恢复议长的称号，实际上拥有独裁权力。此人在18世纪80年代是温和的爱国派，他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曾作为荷兰驻巴黎公使策划了最近一次改革。独裁权力的恢复使他得以乘机在能干的部长辅佐下，不遗余力地开始行政和财政改革，使荷兰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对法关系中，希默尔彭宁克尽量设法保持巴达维亚的自治权，逐步阻挠法国海关在荷兰沿海对英国货物的控制。但是，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拿破仑为了加紧对英国进行经济战，决定将巴达维亚共和国和他的政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认为不宜直接吞并，因为这将过于伤害普鲁士人的感情。于是，他将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由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去进行统治。后者在希默尔彭宁克体面地辞职以后，就于1806年6月称“荷兰国王”。全国大多数人又一次以听之任之的冷淡态度接受了这一新变化。所有公职人员都获准留任原职，便对新统治者有了好感。很多天主教徒希望在他们同一信仰的国王的统治之下，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不是在法律上）依然受到的歧视将会一扫而光。最欢欣鼓舞的则是奥伦治党人：威廉五世去世（1806年4月9日）后，他们的正统主义已经进一步削弱，现在他们至少可以向一位君主致敬了，尽管他不是奥伦治家族的王子。

在此以前路易是温顺听话的，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则都是一个废物，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当上国王却非常认真。他的政府继续执行希默尔彭宁克的改革，而同时他又想使自己对被人羡慕的哥哥和宗主的忠诚与他对臣民的责任并行不悖。因此，他在为皇上征兵和实行大陆体系方面采取不合作态度。1809年，他甚至允许美国船只驶入荷兰港口。同年，由于荷兰人无力对付英军在瓦尔赫伦岛登陆，致使拿破仑着手肢解该王国。荷兰只得割让那个岛屿，不久以后（1810年3月）又割让了莱茵河以南的全部领土，据认为那地方极难防范走私商人和英国贸易。法军还占领了荷兰的其余领土。路易不愿仅仅当傀儡，遂

于1810年7月1日退位。同月13日，荷兰并入法国，接着一位法国总督就派到了阿姆斯特丹。

起初，人们轻易地接受法国人的统治，就像在以往15年中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样，商界人士甚至指望取消边界上的法国海关关卡而带来经济复苏，不幸的是，这一措施直到1812年才实行，那时正当极度萧条之际，即使这样做也不可能带来很大好处。但是，民众的漠不关心不久就一变而为厌恶，尤其是在1811年2月3日下令实行路易国王曾经拒不实行的征兵的时候。叛乱接连爆发，特别是在俄国遭到惨败的消息传来之后：在这场大灾难中，参战的1.5万名荷兰人只有几百人生还。在一段时间里，发出强烈抗议的只限于庶民，因为他们是军事机器的唯一实际受害者。仪仗队的建立（1813年4月）也使有产人士深感苦恼，从而滋长不满情绪。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后，局势告急。从11月12日起，哥萨克先头部队进入荷兰境内，法军留下卫戍部队以便迎击，而法军军官却准备撤退，这时谣言四起，掩盖了实际情况。11月15日阿姆斯特丹人民起义，在路易手下原来的一名高级官员A. R. 福尔克领导下组成临时政府，其唯一目的是恢复秩序。在海牙，人民也于17日起义，但那里的事态发展却迥然不同，因为G. K. 范·霍亨多普和L. 范·林堡·斯蒂伦坚决要将它纳入奥伦治主义的轨道。这两个人都是奥伦治党人，自1795年以来，他俩一直采取超然态度。

叛乱期间，从1811年起，民众经常戴着橘红色的帽徽，这在巴达维亚革命前，原是属于执政的帽徽，他们动辄把目前的苦难和想象中的旧时代的美好光景作对比。像霍亨多普和林堡·斯蒂伦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顽固的正统思想，看来早就行不通了，因为威廉五世和他的儿子兼王储威廉六世已经将他们的活动集中在他们的德意志领地。只是在拿破仑占领了那些地区（1806年）后，奥伦治新王子才重新表现出对荷兰事务感兴趣。1813年，他察觉到帝国行将垮台，就在英国定居，准备一有机会就插手荷兰。可是他并没有在那里组织起一个党派，因此在11月间，霍亨多普甚至不知道在德国还是在英国才能找到他。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霍亨多普向全国各地派出专员，以王子的名义接管政权，并徒劳地试图说服1795年前各派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宣布拥护威廉。然而在11月30日，王子在斯赫维宁根登陆，两天以后，即公开采用威廉一世的名字和尼德兰君王的称号。

新国家的建立多半也应归功于霍亨洛he。霍亨洛he和王子都清楚地知道，若对以前与法国政权合作的人或反对奥伦治王室的人采取报复政策，就会断送新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自1806年起，大多数前爱国派人士已经习惯于君主政府，他们准备接受威廉的君主政府，只要它不是专制政府就行了。因此，由这位王子指派的制宪委员会——霍亨洛he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决定，国王应受选举产生的议会控制，而议会则按照传统由贵族、城镇和乡村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但是，霍亨洛he关于议长权力应仅次于国王的建议却遭到失败，因为制宪委员会唯恐以前多次分裂旧共和国的对抗情绪再次出现。人们宁愿你中央集权而不要地方主义，中央集权的优越性从1805年起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又恰恰违背了他的意愿。对各教派将一视同仁。照此起草的宪法提交给王子召集的600个知名人士讨论，1814年3月28日获得通过。

威廉和霍亨洛he都认为，新国家若要在未来的欧洲平衡中起某些作用，就必须成为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壁垒。这就意味着需要扩充领土和人口。可是照当时情况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是和比利时联合。

法军在1812—1813年屡遭挫折，也使比利时各州自17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动乱迹象。1813年12月至1814年5月盟国占领时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虽然不久就证明了，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作为主人，并不比法国人更讨人喜欢。对于该国前途，大多数贵族和教士也许得到广大虔诚教徒的支持，要求恢复旧政权，并以恢复哈布斯堡的统治作为实现复辟旧政权的手段。他们的代表向肖蒙的联军司令部转达了他们的愿望（1814年1月），但是失望而归；弗兰茨一世对比利时已不感兴趣。可是盟国任命了一个极端保守的临时政府，似乎预示行将恢复旧的社会秩序。进步的专业人员和企业主反对那种前途，认为唯一的替代办法是与荷兰联合，荷兰的新制度似乎相当自由，荷兰连同其殖民地可代替失去的法国，作为比利时工业的市场。这种解决办法不但是威廉所希望的，而且正中英国政府的下怀。1814年6月，卡斯尔雷劝说列强支持他的计划，将低地国家联合成“一个最完善的联合体”^[1]，并将由威廉一世立即接管其临时政府。王子和伦敦内阁之间，除其他事项外，还对年轻的奥伦治王子和摄政王的女儿夏洛特的婚事破裂，以及关于解决殖民地的问题都发生了分歧。这使威廉迟至7月31日在布

鲁塞尔就位。两周以后对海外领地达成了协议：除了因亚眠条约失去的领地外，好望角和伯比斯仍由英国管辖。

威廉“扩大领土”^[2]的确切限度要从平衡和补偿的角度考虑决定。默兹河以东的比利时领土连同整个萨克森将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而尼德兰则兼并北莱茵兰的大部吗？最后，萨克森州保住了，但因此把德意志的下莱茵划归普鲁士，而尼德兰得到了默兹河右岸地区远至现在荷兰东部边界、比利时（不包括1919年凡尔赛条约将从普鲁士收复的欧本、马尔梅迪和圣维特这几个地区）和卢森堡。卢森堡的剩余部分，作为前奥属尼德兰的一个省，将成为一个大公国，与尼德兰联姻，并参加德意志邦联；卢森堡城要塞由普鲁士军队守卫（1815年1月）。威廉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回国的消息，即采用尼德兰国王的称号，他那支小小的军队和盟军一起在滑铁卢作战。

荷兰和比利时合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宗教战争使勃艮第遗产归于分裂，荷兰人一直自恃繁荣和文化发达，蔑视贫穷落后的南方邻国，而后者则厌恶北方那些自私自利的异教徒。现在首先要把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体，办法是修订1814年的荷兰宪法以适应新形势。1815年4月，这个任务交由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各半组成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承办，它必须认真考虑列强于1814年6月21日强加于新生的尼德兰的八项条款。其中包括将荷兰的巨额公债和比利时各省微不足道的公债合并起来，还有宗教自由，这使虔诚天主教徒的大多数比利时委员极为反感。但是委员会不得不遵守那些原则，主要讨论了议会的代表及组成问题。比利时人成功地挫败了荷兰人的反对意见，强行设置了两院制，第一议院由国王任命，作为保守派用以抵消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而荷兰人则坚决反对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比利时各省有300万人口，荷兰只有200万，110名委员中双方各选举一半。由于社会保守主义，比利时委员接受了这部宪法（1815年7月），但它还得由比利时的名人会议批准。

以根特的顽固不化的主教德·布罗格利为首的主教团，立即严厉谴责宪法中所载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原则为异端邪说，在他们的煽动之下，名人会议否决了这些原则（796票对592票）。只是把280名缺席者算成赞成票，把投票时明确声明出于宗教原因而投反对票的126票宣布无效，“荷兰算法”才变魔术似的算出了多数：八项条款未经讨论就获通过。但是，教会继续进行斗争，不许信徒举行任

何涉及宪法的宣誓，这就使他们不能担任大多数官职。同时，温和的天主教徒不愿让整个政府都落在新教徒手中，想寻求一种折中办法。梅赫伦大主教德·梅昂原是旧政权时代的一个高级教士，在法国征服前是列日的君主兼主教，他于1817年宣布宣誓并不表示在教义上作出让步，只不过是保护不同信仰的公民。布罗格利在流亡中去世（1812年）以后，这种解释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谈判缔结一个新的政教协定，以代替拿破仑缔结的那一个。罗马教廷当然不肯让一个新教徒国王和拿破仑一样拥有特权去挑选主教，但是在许多方面来看，威廉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一个后起代表，却决心保留这些特权。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1827年达成协议。在选定候选人之前，主教座堂的教士会议应该征询国王的意见，是否接受这些人；作为交换的是恢复宗教战争后在荷兰已经废止的主教等级制度。荷兰新教徒强烈反对后面一条，威廉则屈从于他们的鼓动。在另一方面，威廉认为自己有权责成教士会议征求他对提名的意见，而教皇却认为这太过分了，于是政教协定始终没有贯彻执行。国王一度考虑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天主教会，就像他已经准许大多数新教徒派别有全国性机构一样（1816年），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

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这是与天主教徒发生冲突的另一件事情。在法国革命前，联合省的很多学校是由地区或城镇当局主办的，在奥属尼德兰，学校则完全由教会控制。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督政府曾努力建立国立中学，结果收效甚微，在拿破仑时代，宗教学院和帝国公立中学同时纷纷建立。至于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的卢万大学已于1797年解散。威廉认为教会的教义是和现代国家极不相容的，国家教育的任务不但要减轻教会的过分影响，而且要让精心挑选的教师在青年中唤起尼德兰民族感情以有利于合并。按照不久前（1809年）使洪堡誉满柏林的办学方针，把联合省原先的高级中学中的三所于1815年改建为国立大学。1817年，在比利时的根特、卢万和列日也开办了三所大学，同时在大城镇设立国立“书院”，进行古典文学教育。最后，在普及教育方面，比利时和荷兰的文化水平不啻有天壤之别。荷兰是个新教徒国家，爱好诵读圣经，自古以来形成了基础知识的传统。这和比利时的初级小学较少，大多数负责教师又不称职，是不能相比的。如果说国家无力建立全面的基础教育制度，那么它至少在哈勒姆和列尔（安特卫普附近）举办了训练班来提高师资。

看来这些措施对比利时学校里教会占统治地位并不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初级小学是由修士或修女负责的，其他则一般在神父监督之下，而多数学院也是由神父开办的。自1824年起，教徒必须得到官方批准方能任教，其他教师则在1822年就必须履行这一手续了。此外，开办新的初级中学须由部批准并接受部的领导，不是国内大学毕业的人不得在这些中学任教（1825年）。但是，只有国家直接干预训练教士工作，使教士驯服听话，天主教学校和教区才会停止向小学生或教徒灌输天主教所固有的反对精神。1825年在卢万创立了哲学院，它和约瑟夫二世的神学总院显然类似。所有未来的教士，在神学院学习神学之前，必须到那里去听课，讲课的教授则由国王和梅赫伦大主教协商任命。天主教徒一致反对这一制度，哲学院的学生一直寥寥无几。这一失败使威廉认识到必须和教皇谈判。他保证不是非这个学院不可（1827年），但是由于谈判破裂，他的诺言在1829年前并未兑现；即使在那时，他仍想处罚在国外而不是在卢万学习的神学院学生。这个学院一旦并不是非进不可，就变成多余的了，遂于1830年1月关闭。

除了和比利时教会进行斗争外，另一个冲突也削弱了这个王国的生命力。它作为抗法堡垒的想法并未实现，因为威廉认为仅仅在南部边界构筑一些要塞就行了。在佛兰芒各省法国化的成果，确实较诸在启蒙运动时代这一过程的全盛时期在欧洲其他地方取得的成果更为持久。在其他国家，富有浪漫色彩的本民族语言的复兴，把法语的使用一扫而空。在佛兰德则恰恰相反，两个世纪来由于政治和宗教偏见使它和尼德兰语中心地区割断了联系，民间方言彼此很难理解，因此无法替代受过教育的人继续沿用的法语。这使国王极为反感，因为对他的佛兰芒臣民几乎像对他的瓦伦臣民一样，荷兰语依然是陌生的。如果王国的这一半和另一半在文化上完全脱离，合并怎么可能有效呢？必须进一步与法国的影响作斗争，因为在此复辟时期，有那么多法国书籍和报纸激发了比利时天主教徒的教皇极权主义精神。因此，威廉决定把比利时各省彻底荷兰化。他于1819年颁布法令，最迟到1823年，在佛兰德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只许使用荷兰语；从1823年起，荷兰语就将逐步推广到初级中学。不会说荷兰语的资产阶级提出抗议，但是更加激烈反对的则是教会。因为在佛兰德几乎没有人通晓荷兰文，唯恐因此从荷兰调来很多官员、法官和教师，在天主教徒中形成新教徒的核心而对正统宗教造成威胁。人们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远非全部都是教士，再加上教士们使徒般的狂热情绪，国王只得让步了，在

1829年，国王允许在公证文件上可以使用法语，并答应重新考虑有关学校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一有可能早就违反该项法律或者干脆置之不顾。只有极少数学者赞成这一法律。他们知道佛兰芒方言属于荷兰语系。这些人后来在王国瓦解以后，促成了佛兰芒语运动的兴起。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项法律反而使政府和职业界中很多人和威廉离心离德，这些人拥护约瑟夫的世俗国家传统，并且支持他的政策，反对教会占统治地位。

国王的其他比利时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实业家和企业主，这些人欢迎建立新国家，看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合并的头几年困难重重，英国的竞争势不可当，又加上丧失了法国市场。此外，王国内部也发生了利害冲突。传统上在荷兰最占优势的商人利益集团要求恢复自由贸易，而比利时人却比以前更加坚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以来一直享有的保护工农业政策。威廉在两种对立倾向之间采取的调和办法，引起很多人不满。农民和地主觉得难以抵挡俄国小麦的竞争，比利时的情况比荷兰更糟，因为荷兰的农业侧重于养牛业和奶制品生产；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商人忧心忡忡地发现，由于保护贸易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尽管有维也纳条约但还是对莱茵河上运输货物征收重税，就加速了18世纪中叶已经开始的大宗货物市场的衰落。但是，威廉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工业，他从关税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来补贴新工厂。这一政策除了产生其他结果外，还导致荷兰开始工业革命，G.M. 伦琴在鹿特丹革新了造船业（1825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安斯沃思把现代化的棉纺工业引入特文特地区。不过由于比利时工业发展较早，只有它才能在世界市场上成功地进行竞争。比利时工业的繁荣反过来又使安特卫普港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该港比荷兰港口的发展快得多。因此，荷兰臣民妒忌地指责国王使比利时人享有特权。

无论如何，经济政策多半应归功于威廉本人的首创精神，因此“商人国王”的绰号对他完全是当之无愧的。用陈旧的重商主义的术语来说，他是把兴盛的工业当作国家昌盛的基础。和英国的成就相比较，资金不足成了它相形见绌的原因。早在1814年，他就创办了尼德兰银行以加强通货的地位。1822年在布鲁塞尔建立的低地国家民族工业促进总会向工业提供所需资金。这个银行的4/5的资本属于国王个人，它实际上是1852年佩雷尔兄弟创办的动产信贷银行的先驱，并且迄今始终左右着比利时的信贷市场。贸易组织同样令人不满意。为了

促进推销本国产品，威廉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了尼德兰贸易公司（1824年），他本人再次投入大量股金。这家公司确实为比利时的棉纺织品逐渐打开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公司的活动不久就仅限于这一地区。其他公司也相继成立，但其抱负就较小了。

商人们只是竭力经营，并不关心政治冲突方面的琐事，但是政治冲突却日见尖锐。到那时为止，为数有限的选民对选举第二院议员一事没有什么兴趣，议会里的辩论也使人颇为厌烦。当比利时的天主教徒正有组织地进行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自由派同胞却支持政府的世俗主义，只是偶尔批评政府偏袒荷兰人而已，正像荷兰人议员进行相反的批评一样。然而，从1824年起，列日大学毕业的一些青年法学家开始拥护一种新自由主义。他们受到列日大学两个坚决拥护人民主权的人的说教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时法国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的自由思想发展的影响。他们之中有些人，如勒博、德沃和罗吉埃兄弟，是独立比利时的缔造者。他们要求用直接选举代替间接选举；议员不得兼任公职；有效地控制政府预算；内阁负责。与此同时，国王的教育政策出乎意料地使比利时天主教徒接受自由教育原则，这一原则他们本来是一直强烈反对的。老一代人也许把这仅仅看作策略性的活动，年青一代却从而使它发展成为自由天主教，真诚地相信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有利于宗教，而且很快使拉梅内也信服这一教义。在法国，马蒂尼亚克内阁似乎已从教权主义后退，这两种新思潮按照法国的榜样便很容易获得了和解。这反过来又促使年轻的自由派消除了对教育自由的犹豫态度。自1828年起，他们和年轻的天主教徒一起反对君主专制。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激烈的批判文章，不仅使知识分子选民，而且也使普通民众第一次对政治发生了广泛的兴趣，普通民众由于经济衰退特别容易接受反政府宣传。在1828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发起了要求教育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一场请愿运动，教士在其中成了出类拔萃的宣传家。

的确，早在1816年，由于政教冲突，新闻自由就受到了严格限制，现在有影响的反对派记者经常受到控告；对有才干的自由派路易·德·波特的判罪（1828年11月）反而使他成了民族英雄。即使在第二院，辩论也越来越活跃，使国王十分气愤的是，10年预算于1829年5月遭到否决。威廉对这些事态的发展十分关注，认为需要作出某些让步：他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决定哲学院并不是非进不可，同时修正

了有关语言的法令；此外还实行了比较自由的新闻法。这反而鼓励了而不是消除了反对派的气焰。一张新请愿书上有30万人签了名。这一次讨论的是国家结构问题：1828年年底，一家天主教自由派报纸^[3]建议，在同一国王领导下实行比利时和荷兰分治，这一观点在德·波特在狱中所写的《人民之友致国王书》中也令人信服地加以鼓吹。究竟是在语言使用等方面作更大的让步呢，还是对新闻运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威廉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1830年的上半年和前一年相比，动荡的状况虽有所缓和，但仍在继续，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一触即发的导火线。这要到法国七月革命时才一起爆发，使比利时获得独立（见第10卷，原文第247页及以后）。

1815—1830年间尼德兰王国的历史，基本上是荷兰和比利时未能真正合并的失败史。在前几段中极少提到荷兰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争端中其实没有起什么作用。在议会里，反对派中一般只有两三个特别独立的荷兰议员，而绝大多数比利时代表，最后甚至是全部比利时代表，通常都投票反对政府。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核心始终是荷兰人，比利时臣民总是觉得自己在其中不过是陌生人而已。他们除了对宪法宣誓表现出教皇极权主义的疑虑外，由于对荷兰文一窍不通不能担任很多公职。委派比利时人在荷兰任职几乎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语言法甚至使他们在本乡本土都不宜担任公职。至于低级工作，官方也宁愿录用荷兰人，因为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例如在1830年，陆军的119名将领和参谋人员中只有18名是比利时人。这主要不能责怪国王威廉，虽然他的自负促使比利时臣民和他疏远：但是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的身世和权力之由来。他的家族和荷兰历史结合了两个多世纪之后，他在荷兰的追随者把他从流放中请了回来；可是在比利时，列强虽然给了他一块领土，但他找不到相同的追随者。他在那里的支持者屈指可数，其中大多数企业家都不愿涉足政治或参加政府。他只有采取非同寻常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才摆脱了过去和现在的羁绊。在这种情况下，这就难怪荷兰人对比利时人的优越感始终存在而且有增无减。1830年，查理·罗吉埃抱怨得对：比利时不是荷兰的殖民地；^[4]而在荷兰，人们确实经常认为是如此。1829年，有一个荷兰人说，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对比利时的情况就像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一样毫无所知。^[5]1814年两国人民合并时，互相都觉得对方是外国人。当他们于1830年散伙时，如果可能的话，这种情绪就益发强烈了。

二 斯堪的纳维亚

在法国革命前大约30年中，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及其附属国——冰岛除外，1783年火山大爆发后，它的人口已减至4万——继续保持1721年北方大战结束后的相对平静和繁荣。哥本哈根作为丹麦和挪威“孪生王国”的政治和经济首都，非常繁荣，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松散地但（1773年以后）完全地附属于丹麦王国。斯德哥尔摩虽然不能和圣彼得堡相媲美，但也许依然是欧洲最重要的二等强国的中心，该国向东跨越芬兰大公国，在波罗的海南岸占有一个立足点，即皮内河以西的波美拉尼亚，另外还有吕根岛。

自从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去世后，斯堪的纳维亚两国都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欧洲其他国家奉行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外交政策。但是在任何重要的联合中，它们又被看作有用的资本。因此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65年3月与丹麦结成联盟，40多年没有严重中断过，联盟的初衷之一是要保持瑞典的自由政体，即党派政治和外国津贴得以自由活动的四等级会议制政府形式。叶卡捷琳娜也将瑞典置于她的“北方体系”之中达10年之久（1762—1772年），瑞典人由此可以继续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而和法国则不能。但是瓜分波兰分散了叶卡捷琳娜的注意力，这就为1772年8月19日的政变提供了机会，年轻的古斯塔夫三世打破了四等级会议的权力。在法国的支持下发生的这一事件，开始了法国影响时期，一直持续到法国革命，而与俄国和丹麦的关系则继续紧张。

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济利益使波罗的海三国在北方武装中立中共同反英。这一联盟支持丹麦国际法学家马丁·许布内早在1759年宣布的原则：敌船上的中立国货物和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应有豁免权，战时禁运品除外；其次是有权保持有效封锁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封锁。但是丹麦人在签订联盟条约的同月（1780年7月）的稍早时候，就和英国单独签订了一个条约，从而得到了好处。条约规定食品不作为禁运品处理。可是这根本解决不了海军补给品的问题，这和俄国、瑞典的利益更为有关，但俄国并不打算把对英的强硬言论变成强

硬的行动，瑞典力图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制定中立法规，但是徒劳无功。

另外参加联盟的只有四个国家，1783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后，联盟遂即告终。五年以后互不信任达于顶点。结果瑞典进攻俄国，意欲占领圣彼得堡。当时俄国人正深深地陷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但是瑞典海军未能支持部队前进，于是陆军里的叛变分子发动了以安亚拉同盟著称的一次可怕的贵族阴谋案。该组织要求芬兰独立，而芬兰境内的瑞典地主希望在俄国保护下实现寡头政治自治。在丹麦作为俄国的盟国派出挪威军队围攻哥德堡之前，古斯塔夫似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后来，古斯塔夫以他特有的机智，在群众中煽起了反对丹麦人的情绪；英国的调停保住了他的第二座城市，于是丹麦甘愿讲和。因此，次年国王就彻底战胜了军内阴谋分子。瑞典虽然在作战中几乎损失了一半战船，但它的海军最后在斯文斯克松德取得了大胜（1790年7月9日）。8月间，受到土耳其人强大压力的俄国人同意不改变领土而媾和，在和约中，俄国人默然放弃了利用以前的条约作为借口来干涉瑞典内政的任何要求。

由于战争的主要结果是瑞典的政体进一步发生变革，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追述一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革命时代前夕的内部发展。在丹麦，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不久前经历了改革和反改革。1770年9月至1772年1月间，阿尔托纳的德籍内科医生J. F. 施特鲁恩泽发布的1880条法令，带来了欧洲启蒙运动影响和“孪生王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全部最自由的思想。但是只有哥本哈根法院的改组以便对不同阶级一视同仁，和比较人道的济贫法制度才是施特鲁恩泽死后仍实行的重要措施，虽然他被处死和王后被流放使他名扬欧洲；王后原是乔治三世的妹妹，她喜欢这位宫廷医生，曾经协助他掌权，而不喜欢她的堕落的丈夫。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一直持续到1784年，那一年16岁的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地位上升，超过了当时已变得无能的父亲克里斯蒂安七世，丹麦在A. P. 伯恩斯托夫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比较持久的改革时期。此人出生于汉诺威，是前外交大臣的侄子，他机敏地对外交事务施加影响——1780年实施武装中立就和他有密切关系——但也支持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直到18世纪末使丹麦农民和丹麦经济享有比欧洲任何其他君主国更多的自由。

丹麦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改革首先从圈地法开始，最早始于1781年，到1807年有一半农田根据圈地法被圈。1787年，新政府给予佃农以充分的法律保护，使其免受庄园主的欺压，翌年，终于正式废除了农奴身份，即根据契约而和土地拴在一起的人。其他措施则调整了佃农的劳役，使他们较易购置土地，并取消庄园主垄断育肥菜牛贸易等特权。到1807年，农作物收获量为18世纪中叶的3倍，只有无地的雇农阶级仍遭受残酷的剥削，为他人耕种。

商业上也采取自由政策。哥本哈根失去了特权，因为它曾阻碍了该省各港口的发展；所有丹麦臣民都可以和冰岛进行贸易；实际上谷物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对挪威南部关系极为重大，因为丹麦人在那里长期进行垄断，牟取暴利。到1797年伯恩斯托夫去世时，原料的关税率最高为5%，即使是工厂制作的成品的关税率也不超过24%。在另一种贸易即奴隶贸易方面，政府显得极为开明，它于1792年废止此项贸易，1803年开始生效。这一切措施的总的结果是巩固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地位：在法兰西共和国于巴黎宣告成立的那一年，感恩戴德的臣民在哥本哈根建立了自由柱。

诗人泰格奈尔将古斯塔夫三世称作“御座上的巫士”，他在瑞典的统治取得了难以评价的成就。1772年，他按照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全盛时期的办法，恢复国王的行政权，并规定召开议会要由国王决定，从而平息了党派冲突。对国王权力唯一明确的限制是，他不能在议会确定征税日期之后继续收税，以及除自卫外不能宣战。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法国的影响在上升，行政上大有改善——改革货币，改变司法程序，加强海军，日益重视芬兰的需求——这些都曾长期受到党派斗争的阻挠。但是支持政变的贵族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报答，于是如前所述，在1788年抓住了机会。召开议会是安亚拉同盟的要求之一，它在16年内只召开过两次；但于1789年2月开会时，教士、平民和农民支持国王而反对贵族，贵族被迫接受了联合与安全法。

这一措施几乎使贵族的特权丧失殆尽，大多数政府官职可由没有特权的阶级担任，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可以用相同的代价获得大多数种类的土地，在当时，这是一个极重大的让步。作为交换条件，国王的权力也不受议会干预的束缚。议会不再有特权制定法律，在下次召开议会前各项税收无限期地有效——这一条是由国王傲慢地亲自宣布

的，并在贵族院无视其中大多数成员的情况下获得通过。三年以后，国王被人仇杀；他的儿子继位，年方十三，但宪法原封未动。

法国革命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直接影响甚微。古斯塔夫三世狂热地同情路易十六；早在1790年2月，他就封锁了法国传来的一切消息。不错，古斯塔夫三世死后，摄政团曾企图寻求国民公会的支持，但其目的是取得津贴和抵消俄国的影响：所谓瑞典的雅各宾分子不过是贵族中的少数派集团，他们在1800年举行的下一次议会中反对专制制度，可是徒劳无功。哥本哈根平静无事，只有在1794年木匠举行过一次罢工。芬兰的活动分子不是向西而是向东寻求鼓励。丹麦在挪威的官僚统治一直引起某种程度的不满，但即使在挪威，也只有和法国进行大量的渔业贸易的西部沿海城镇才具有强烈的同情。但是那里的骚动只要求改善当地政府，并对外采取措施不让英国海军干预他们的合法贸易。因为欧洲的冲突使中立国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大宗出口国。瑞典铁条的年出口量大约为5万吨，一半输往英国。丹麦的谷物，波罗的海沿岸和挪威南部的木材，瑞典的铜以及其他海军补给品，如沥青、柏油、大麻、帆布、兽皮和牛脂，在战时都日益有利可图。斯堪的纳维亚各中立国作为托运人、经纪人和货栈市场供应者的活动也大获其利。到1850年，丹麦和挪威的商船队比40年前扩大了8倍，哥本哈根的贸易成交额直到1870年都无出其右的。有些船只是英国投资在挪威制造的，其他船只则是低价购进的法国战利品：远东、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的航线像国内航线一样，挂着中立国旗帜航行都大为有利可图。

在政治上，其结果是产生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共同观点，它也许会发生持久的影响：1793年，一位丹麦历史学家访问伦敦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危害结成同盟的斯堪的纳维亚？”在战争的最初六个半月，英国人无视1780年签订的协议，捕获了189艘丹麦和挪威的船只。但在1794年3月，丹麦—瑞典中立协定签字，缔约双方各提供八艘军舰保护贸易，波罗的海宣布为中立水域。那时英国的态度稍为软化，接着在1796—1798年皇家海军不得不撤离地中海的时候，就鼓励中立国船队接管该地区的贸易，包括把西班牙羊毛输入英国。法国的态度恰恰相反，变得更强硬起来；这导致1798年1月（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大捷的七个月以前）开始实行护航制度，使英国又一次实施更为严厉的规定。

当丹麦负责护航的军舰拒绝英国的搜查权时，双方发生了一系列小冲突。在第三次发生这种事件以后，英国派遣海军分遣舰队至哥本哈根，强迫该国政府放弃护航。但是新沙皇保罗已转而反对英国，丹麦于1800年8月受辱之后，同年12月签订了第二个武装中立条约，还是那三个国家在其中提出了和过去相同的要求。次月，他们停泊在英国港口的所有商船都被扣留；丹麦所属西印度群岛被占领；3月12日，帕克和纳尔逊率舰队驶往哥本哈根。他们的行动极为神速，以便在俄国舰队仍被冰困在波罗的海的时候就迫使丹麦舰队中立。但是纳尔逊的轻易成功也是由于另外两个对手之间缺乏合作：丹麦拒绝瑞典提出的在松德海峡东岸设防的建议，英国舰队沿着松德海峡到了丹麦的要塞的射程之外，瑞典舰队则因舰只不多（再加上逆风）而受阻于卡尔斯克鲁纳。英国舰队在那里找到了它们，瑞典人不战而降，这是在哥本哈根之战三周以后，也是那两位海军元帅获悉沙皇保罗被刺这一迟到的消息之前不久。沙皇亚历山大不愿意继续冲突下去，英国也向亚历山大作出了让步，因而丹麦和瑞典有幸分享到了好处，其中包括对它极为重要的在交战国一方沿海进行港对港贸易的权利。

1803年5月，英法重新开战使丹麦、瑞典两国得到了更宝贵的良机。到1805年，保持一个共同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策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因为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具有庞大商船队和以海上交通为生命线的丹麦和挪威有最充分的理由不与英国交恶。只是由于普鲁士举棋不定，才促使这两个王国迟迟不加入联盟，而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在纳尔逊得胜的那个月里已经正式参加。古斯塔夫的这一行动，部分是他个人对拿破仑的挑战，是长期访问德意志的结果，也是当甘公爵遭到绑架给他造成的影响。但是古斯塔夫不是军人，德意志西北部战役失败，结果是吕贝克于1806年11月陷落；1000名瑞典人向贝纳多特元帅投降。不过由古斯塔夫废除农奴制并建立政体的波美拉尼亚仍可能是和英国贸易的一个重要基地。同时，在瑞典国土以西，王储弗里德里希统率各公国的2万名丹麦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使他宣布荷尔斯泰因为“君主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06年9月9日特许状），并提倡在那里使用丹麦语，但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后果；然而，他立即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在极不利的关头被过迟地拖入战争。

1806年12月的柏林敕令，是次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形成分裂的序曲，造成长远的后果。6月，俄国在弗里德兰战败，无论如何都使瑞典

处于尴尬的境地，但在7月16日，国王的德意志军团的8000名英军及时从吕根赶到，劝说古斯塔夫谴责新近和法国人停火一事，以便参加盟国的新攻势。但是一星期前在提尔西特签订的条约使这件事不可能办成，于是，英国远征军很快找到了借口，在丹麦登陆。瑞典人失去了施特拉尔松和吕根，好不容易才撤过了波罗的海。同时，他们与俄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古斯塔夫拒绝了他也应与拿破仑达成协议的建议。但是瑞典也有感到宽慰的事，和英国结盟既可以保护瑞典的铁出口，又可以将英国的贸易集中在瑞典的西海岸：1808年，哥德堡的进口额增长一倍，当时这个港口里的船只极为拥挤，多达1200艘，等着驶入波罗的海。

丹麦的处境则截然相反，没有这种收之桑榆的机会。1807年1月7日英国枢密院的敕令停止了地中海的港口对港口的贸易，这使反对英国封锁规定的抗议益发强烈，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拿破仑不将大陆体系应用于中立国，丹麦—法国关系中就不存在这种痛苦的事情。认为丹麦的政策现在偏袒法国，使坎宁容易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有一份错误的报告称丹麦舰队正准备出海，在汉堡至阿尔托纳有一些可疑的迹象，表明法国人即将进入该公国。但是坎宁主要是由于意识到英国在这场危机中极为紧迫的需要，才促使他决定（7月18日）在假设的法国人进攻丹麦之前先下手。那时伦敦对俄法7月7日的秘密条约一无所知：其中一些条款使坎宁追溯到道德问题作为借口，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难道比较温和的外交手段就不能确保丹麦和英国合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欧洲大陆上并非不重要的友好关系吗？因为坎宁要求控制丹麦的舰队作为它今后行动的保证，使王储实际上不可能像他的驻巴黎公使所说的那样，在“使我们的大陆领地遭到暂时危险与使我们不再成为海上强国的危险”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事实上，3万名士兵（包括来自吕根的军队）的登陆和对哥本哈根的三夜炮轰——炸死2000人，炸毁大教堂和大学校舍——迫使丹麦人缴出他们的17艘战舰和价值200万英镑的海军补给品。但是这些事件也使丹麦与拿破仑长期结盟成为既能保住荣誉又有利的事：因为丹麦人失去了舰队，甚至连保卫西兰岛对付拿破仑进攻的力量也没有了。

后果之一是发生了丹麦—瑞典战争（1808年3月—1809年12月）。一支法军在贝纳多特指挥下进入日德兰半岛，企图在斯科纳登陆；一

支英国部队，其人数约为法军的一半，由约翰·穆尔爵士率领抵达哥德堡。由于穆尔对瑞典的意图存有怀疑，他的部队始终没有登陆；但是由詹姆斯·索马里兹爵士率领的英国舰队却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掩护瑞典的海岸，还使贝纳多特部队中的7600名西班牙人去支援日德兰半岛上他们的同胞的暴动。贝纳多特的军队除去占领了12个月的空营房以外，其他一无所获。在由于瑞典小规模入侵挪威东部而开始的瑞典—挪威边界战斗中，挪威军获得的胜利则足以引以自豪，并且使它的丹麦指挥官奥古斯特堡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亲王深孚众望。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未引起领土变化，瑞典的损失都在东方战线。

1808年2月，俄军在拿破仑的赞助下，发动了征服芬兰的战役。大约2万名守军向北撤退，认为只要保住赫尔辛福斯港的坚固要塞斯维堡，待夏天一到，他们就可以收复失地；但是，斯维堡于5月3日不战而降。夏季确实收复了部分失地，守军的英勇行为有助于激发芬兰人的民族主义，但俄军增至5.8万人，那一年年底，就将瑞军赶出芬兰。1809年3月，芬兰人和俄国谈判；5月，俄军到达奥兰群岛，摆出了进攻斯德哥尔摩的架势。英国是瑞典的唯一盟国，在每年解冻期间总是派海军上将索马里兹控制波罗的海，现在英国人建议媾和。9月，腓特烈港条约将芬兰连同奥兰群岛以及边境省份西波的尼亚的一部分割让给俄国，这样就有效地结束了12、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开始的斯堪的纳维亚势力和文化的向东扩张。

但是，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瑞典得到了一些补偿。外交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失败都不无理由地归罪于国王；正当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军队里的阴谋分子将他废黜了。他们召开议会，为新国王制定新宪法，于是，王位由古斯塔夫四世传给前摄政，即古斯塔夫三世的弟弟。查理十三世年事已高又无后嗣，选定王储显然是当务之急。议会看不中已废黜的国王的年轻儿子，同时两次否决了本该统一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个候选人，即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六世，他的专制主义原则使他失去了这一机会。自从他的父亲于1808年逝世后，他比以往更加独裁，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中断内阁会议，主要依靠他的军官进行统治。因此就选中了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亲王，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取得挪威人的同情，但他于1810年5月暴卒，曾经考虑由他的哥哥或者再度由弗里德里希国王继位。这两个候选人都能为拿破仑所接受。1月间，瑞典和拿破仑签订了和约。

贵族出身的瑞典中尉C. O. 默尔纳的倡议使贝纳多特登上了王位，但是决定性因素还是拿破仑的态度，这位皇帝赞成提出一个法国候选人，他的本意是希望提出欧仁·德·博阿尔内。但是他的示意含糊不清，反而被理解为他直接下令推选贝纳多特。议会所考虑的，肯定是认为选中一位法国元帅将能保证国内安定，而且可以挽回对芬兰的地位。他们依旧记得贝纳多特在吕克贝和其他地方对付他们的同胞颇有策略。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他们正在建立的是拿破仑王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王国。病魔缠身的国王又活了八年，不过查理·约翰（此刻应称为新王储了）自1810年10月到达瑞典后，就成了实际上的摄政，全面负责瑞典有关国际冲突的政策，这场冲突已使他的第二祖国失去了芬兰。

在这段时期里，丹麦人被迫和最大的海上强国对抗，实际上输得一干二净，他们的最后一艘军舰于1808年被击沉。到1814年，丹麦商船总吨位的一半以上——大约1560艘船，价值800万英镑——被俘或被毁。甚至连冰岛这样的穷地方，也沦为一位放荡的冒险家“国王约根”的猎获物，一艘英国军舰的到达才结束了他的短暂统治；1813年1月，当局不得不正式宣告破产。但是丹麦原有的经济的崩溃，长远看来还不如对丹麦和挪威关系的影响严重。挪威不但切断了与行政中心的联系，而且失去了1/4谷物供应来源。英国最初实行严格封锁，最后连阿尔汉格尔来的少量谷物也不许输入，为的是逼挪威人不顾大陆体系而出口他们的木材。后来大约有两年时间，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允许下，使用英国进出口许可证，于是贸易大为发展。但在1812—1813年，英国得到俄国和瑞典的支援，对挪威木材的需求减少，就又加强封锁。可是，挪威的农作物空前歉收，因此挪威人民只得用树皮充饥或者眼睁睁挨饿。可是使挪威人和丹麦人感到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私掠船使英国航运遭到了重大损失。

19世纪初，挪威和丹麦在人口和财力上大致相等，挪威有自己的陆军，而且是主要由它为联合海军提供人力和物力。住在偏僻山沟里的农民在政治上大多是很不活跃的，偶尔爆发的反对丹麦官吏的骚乱也能很快镇压下去。但是在1796—1804年间，一个名叫H. N. 豪奇的以在俗身份传教的农民是很有影响的福音传教士，而且为他称之为“弟兄”的人组织了赚钱的经济活动，他的到处传教使本国宗教开始复兴，结果使庶民受到很大影响，也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决心。与此同

时，城镇里的上层阶级要求建立某些国立机构，特别是一家银行和一所大学。1807年以后，战争形势促使丹麦人为挪威指派了一个政务会，最后还任命一个总督；颁发了大学特许状。但是经过多年实际上的分立，就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挪威借助于英国的牢固贸易关系，也许是能够自立的。另一种办法是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合起来，这也不失为良策，特别是受人爱戴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王子能够继续成为领导人的话。最后，还有那么一小批人，但是颇有影响，已经赞成和瑞典合并而不和丹麦合并。

1810年10月，拿破仑胁迫瑞典对英宣战。从这时起，瑞典的前途似乎一度并不比丹麦光明。只是因为英国要利用瑞典的海军不向它们进攻，而是让它的护航队可以进出哥德堡和波罗的海，所以在拿破仑转而进攻俄国以前这一段动乱时期，瑞典的经济才没有崩溃。但是查理·约翰对事物发展的看法比瑞典本地人更为客观，他已经断定，在英国控制着波罗的海期间，企图重新征服芬兰是很危险的，尽管此举可以满足民族自豪感；如果成功，也将和俄国结为世仇。另一个办法是从丹麦手中夺取挪威，这将使瑞典具有天然边界，而且只要让对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就能办到，主张来一场革命的人也许是乐于允准的。此外，对拿破仑的敌人来说，这可以作为弗里德里希支持拿破仑而应该受到的合理惩罚。

1812年1月，拿破仑占领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他的意图是迫使更加严格地实施大陆体系，结果却激怒了瑞典国内亲法的军界人士，这就使查理·约翰更易于实行自己的计划，要作为俄国的盟友来反对以前的主子。4月，俄国接受了在西兰岛联合登陆的计划，将从丹麦手中夺取挪威，接着由瑞典出兵牵制拿破仑在德意志的侧翼。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但是8月间，亚历山大在阿博向查理·约翰提出更为有利的条件，要他在9月——法军进入莫斯科的那个月——开始同样的行动。于是瑞典的参战一直推迟到冬天过后，那时英国根据斯德哥尔摩条约（1813年3月3日）成了缔约国，条件是英国将为夺取挪威提供大量津贴和海军援助，瑞典则出兵3万名，“直接在大陆作战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个措辞含糊的条约签订以后，查理·约翰就把他的军队部署在波美拉尼亚，以威胁荷尔斯泰因，而他的盟国则要求他向在德意志境内的拿破仑军队进攻。查理·约翰非但不这么办，反而把一个瑞典将

军处死，因为后者违抗他的命令，不是坚守盟国在汉堡的阵地。由于他不能调动盟军夺取挪威，因而在5月，他提出了愿意接受以特隆赫姆主教管区（包括挪威北部所有地区）以及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作为补偿，但弗里德里希国王断然拒绝了。然而到最后，军事形势迫使拿破仑的敌人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支16万人的军队交由查理·约翰指挥，其中只有3万名是瑞典人，他将负责首先向法军进攻。他在格罗斯贝伦击败乌迪诺（8月23日），在登尼维茨击败内伊（9月6日），几次交战都经过精心策划，这为盟军在莱比锡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但在这三次战役中，查理·约翰都审慎地把他的瑞典兵留作后备队。莱比锡战役后，他同意一起向莱茵河推进，可是他向北突破，而不是进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丹麦军队。那里并没有重大的战斗：查理·约翰差不多拥有4：1的优势兵力，加上公国中德意志人的同情，这就保证了他的军队的胜利。

但是基尔条约（1814年1月14日）的谈判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梅特涅力图限制俄国的盟友得到的好处。英国从丹麦人手中夺得赫尔戈兰岛的同时，对查理·约翰的要求特别冷淡，因为他没有向莱茵方面行动；只是在亚历山大的支持之下，查理·约翰才达到他的主要目标，对此他始终没有忘怀。在这种情况下，就难怪挪威的属地冰岛、格陵兰岛、费罗群岛都落入了丹麦人手中；丹麦人还将获得波美拉尼亚和吕根作为补偿，并按比例免去国债中挪威那一份，挪威也不必支付他们的部队为和拿破仑作战而必须增添装备的费用。

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瑞典王储就离开了基尔，但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中，他的军队只前进到比利时，而法国的前途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直到他晋升的希望终于落空后，他才到巴黎与亚历山大以及其他领导人相会，以便得到保证，使英国重新开始海上封锁，并出兵支持他得到挪威；现在他的这一意图已经遭到了责难。

挪威人民拒绝接受基尔条约的约束，在短时期内尝到了独立的滋味。1813年5月以后，他们的总督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亲王，他是丹麦国王的年轻的堂弟和假定继承人。放弃挪威显然于他无益，因此他很容易就被人说服，出任临时摄政，直到选出农民、城镇和军队代表在艾兹沃尔德组成议会。一个月以后，官员阶级议员（他们占多数）就在议会里制定了一部宪法。此后，在5月17日，摄政同意作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挪威的国王。这些事件使英国的反对党辉格党和商人

阶级对挪威颇为同情。卡斯尔雷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国际法承认被割让省的人民的反抗权。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把挪威人的起义归罪于丹麦人的幕后策划，并正式向哥本哈根施加压力。但是查理·约翰十分清楚，欧洲的危险显然已近尾声，除俄国外列强都欢迎找一借口，抢走暴发户从一个合法君主那里捞来的横财。

因此，当挪威人拒绝盟国特派员的要求而诉诸武力时，查理·约翰立即应战，这是他的所有战斗中流血最少，时间最短的一次——只在挪威东南部进行一星期的接触——然后提出了条件，其中包括他接受宪法。11月4日，瑞典国王被选为挪威国王，接替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留下的空位，条件是建立一个享有主权的联盟，而不是批准以基尔条约为基础的领土割让。那时维也纳会议已经召开，对此并未表示反对：丹麦对长期由俄军驻守的荷尔斯泰因，已不愁保不住了，但是被迫将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卖给普鲁士。

对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战后时期是贫穷而失望的时期。丹麦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它的谷物贸易在挪威市场上失去了立足点，又因为1815年的法律而进不了英国；受到打击的哥本哈根只得放弃它在汉堡以北的商业领导地位。挪威南部的主要工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也垮了台，因为英国宁愿要加拿大的木材；瑞典的工业发展也落在后面。各国政府迫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商业衰退，无论如何只得挣扎着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

然而和其他许多国家受压抑的情况相比较，这些国家在恢复时期的情况是突出的。丹麦的艰难处境似乎使国王和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不是促使反对专制政体。该政体在1800年已经合乎逻辑地臻于完善，就在那一年正式取消了冰岛的议会。甚至1830年的革命在丹麦人中也未引起什么反响，在公国，只有受到外部德意志人支持的一次骚动，才导致成立地方协商议会。芬兰人也觉得在沙皇统治下并没有什么不好，1809年，沙皇曾亲口答应他们这个新的大公国将按照1772年和1789年瑞典宪法的规定办事。虽然他们的议会直到1863年才再一次召开，但是允许芬兰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阁；保持自己的法律、财政和军事机构；收复了1721年失去的领土，从而扩大了疆域。

然而，瑞典和挪威的代议制是很出色的，这在当时是个新式事物，它经历了以后的历次动乱而保存下来。1809年瑞典政府文件规

定，议会可以绝对控制税收，参与立法，有权责成国王的顾问对自己提出的建议负责。这种制度是瑞典的历史传统和孟德斯鸠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之间的折中，使国王和官吏具有很大权力，特别是因为议会只需五年召开一次，而他们的狭隘阶级基础在1867年以前并未经过认真的改造。另一方面，挪威的宪法受法国1791年宪法的影响殊深，虽然其中一致采用的、作为宪法基础的10项自由原则也反映出了对英、美实践的认识。立法权和财政权集中于单一议院（分两个部分进行工作），国王的否决权只有在两部分议会开会期间才有效，议会至少三年举行一次。由于从一开始起就让全体自耕农和五年佃农都有选举权，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日益强烈，1814年宣布的人民主权论原则自然而然地促使于1905年出现高度民主的、独立的挪威君主国。

瑞典和挪威不能在其自然疆界内共同形成查理·约翰所希望的大国是有许多因素的，而宪法的不同乃是其中之一。即使在战后恢复时期，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后，一些小国都力图避免引起邻国的恶意关注。1818年，查理·约翰就任两国国王，由于他对基尔条约中偿还丹麦债务一事是否合法提出质疑，而且他的挪威臣民也拒绝承认，因而受到了亚琛会议的严厉谴责。他知道这是无可回避的，于是进行谈判，为挪威争取十分有利的条件，结果却遭到挪威议会无理而且最后造成危险的拖延。1821年7月最后勉强批准偿还时，瑞典和挪威在挪威东部联合进行军事演习。人们至今仍不能肯定，国王之下令演习，究竟是想使那一年忙于应付意大利的列强少进行干涉呢，还是以此作为最后一招，以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挪威人。危机过去了，但挪威和瑞典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

最后，我们要简单地提一下各国文化的发展。在古斯塔夫三世执政时期，斯德哥尔摩是赫赫有名的艺术之乡，那里有国家剧院（1773年）、歌剧院（1782年）、科学院（1786年）。国王本人创作的散文剧一直流传后世。他的宫廷中有许多才华横溢之士。瑞典和挪威共同有着灿烂的农民艺术，其作品装饰着教堂和农村的家园。但是只有这一点是例外，瑞典一直摆脱不了占压倒性优势的法国的影响，直到浪漫主义运动和德意志样板带来了斯堪的纳维亚过去文化的直接鼓舞。著名的哥特学会会员及其杂志《伊杜那》（1811—1824年）的撰稿人，不但包括瑞典的民族诗人埃塞阿斯·泰格奈尔和瑞典的第一个近

代历史学家E. G. 耶伊尔，甚至还包括瑞典体操之父P. H. 林格，他作为一个平庸的诗人，企图使斯堪的纳维亚英雄栩栩如生地重现。

丹麦和挪威只有一种文字，有意思的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文字的作家路德维格·霍尔堡也是仅属于一人之下的最伟大作家——虽然是出生于挪威的人，他的许多戏剧、历史和哲学著作却都是在哥本哈根出版的。但他于1754年逝世后，德语重又独霸丹麦文学，直到新世纪最初几年，那时祖国的多灾多难激励了丹麦的浪漫主义者，甚至比他们的瑞典同伙更加努力地往昔的荣耀中寻求灵感。亚当·欧伦施莱厄的情况就是如此。在1829年于隆德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泰格奈尔称他为“斯堪的纳维亚歌手之王”。格伦特维主教更是如此，他早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后来以诗人、赞美诗作者和传教士而著名，但是首先是以爱国者著名。他被称为丹麦的卡莱尔，但是早在1814年就依法建立了完整的小学教育网的这个国家里，这样一位哲人对广大群众的影响远为直接得多。因为这些小学的存在，使后来建立民众高级中学成为可能，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的农民阶级的男女青年来到这里，根据格伦特维“活的语言”的学说对他们进行教育。

但是，1844年和1850年建立第一批民众高级中学，却属于以后年代的历史。下列诸事也是同样情况：1830年亨里克·韦格兰的第一部巨著标志着独特的挪威文学的出现；1847年伊瓦尔·奥森的《挪威方言语法》一书开创了一种独立的、经过加工的挪威语；从丹麦语中清除冰岛习惯用法则比较容易，这是在1835年由《菲厄尼尔》杂志开始的；同年，许多版本中的第一本民间史诗《卡勒瓦拉》的出版，标志着芬兰民族主义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加快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不亚于七月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和议会改革法案时期的英国人。

（高志冲 译）

[1] 这句话出自1814年6月21日列强协定的议定书（“以便进行最完善的合并”），见H. T. 科伦布兰德编《宪法的起源》第2卷（海牙，1909年），第33页。根据这一协定而起草的“八项条款”称（第一条）：“这一联合（即指荷兰和比利时）应是亲密无间的，使该两国成为单一的统一国家。”见G. F. 德·马唐斯编《主要条约汇编补编》第6卷（格廷根，1818年），第38页。

[2] “荷兰……的领土将得到扩大”，1814年5月30日的巴黎条约中是这样写的，见G. F. 马顿，同前引书，第6卷，第6页。1805年的英俄条约已经规定“为荷兰取

得合适的地区，如上述奥属低地国家的全部或部分”（第3条）。见F. 德·马唐斯《俄国缔结的条约和协约汇编》第2卷（圣彼得堡，1876年），第433页。

[3] 《低地国家天主教报》（根特），1828年12月30日。

[4] 见《政治报》（列日），1830年1月24日。

[5] H. T. 科伦布兰德编：《1795—1840年尼德兰通史资料》第9卷（1825—1830年），第2册（海牙，1917年），第531页，注1。

第十八章 1798—1825年的俄国^[1]

在俄国，18世纪末是卓有成就的时代，尽管沙俄政府的种种弊端正在变得积重难返，就像它对取得胜利已经习以为常一样。彼得大帝的梦想是尽可能地通过仿效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筑，而不是通过对俄国进行基本改造来实现的。比较富有的贵族已经完全西欧化了。由于已经有了现代战争所需要的狭窄的工业基础，由于采取虽然浪费但是有效的征用人力的方法，已经可以利用“以国家利益为理由”这个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工具了。甚至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象征民族伟大的标志。随着波兰在最后两次（1793年和1795年）被瓜分，俄罗斯帝国的西境达到了极限，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所扩展。在南方的黑海沿岸，它取得了从德涅斯特河到亚速海以及到高加索北部各河流的地带。1796年建立敖德萨，在高加索以东，基督教的格鲁吉亚王国自愿成为被保护国。从里海到中国辖区的边境，中亚的游牧民族越来越接受俄国军事、贸易，甚至文化带来的政治影响。

从出于财政和军事目的对男性人口所做的定期而粗略的普查可以推知，1800年，按照新疆域计算，俄国的人口约为3700万。俄国虽然与中欧和西欧的条件不同，但是人口开始猛增却是类似的现象。1812年，加上外高加索的若干居民在内，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已经接近4500万；战争曾使这一数字略微减少。1825年，算上比萨拉比亚，但还不包括芬兰和新波兰，人口几乎达到5500万。在1800年的大约3700万人口中，俄国的亚洲部分（即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土著、囚犯、流放者和移民在内，最多只有200万人。在乌拉尔山以东，有一些产业工人，但在实际上没有农奴制。^[2]在俄国的欧洲部分，1800年有90%以上的人口应该是农业人口，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固定在土地上而肉体属贵族个人所有的农奴。^[3]在剩余的农业人口中，大部分是所谓国有农民，他们附属于公家的或皇室的领地，必须缴纳各种花样的租税，这与施加在农奴身上的地役权有所不同。俄罗斯帝国是个法定的有阶级的国家，界限分明的阶级之间的比例颇能说明问题。按当时的估计数字折中计算，除了农民之外，大约有150万城市工人和依靠他们

吃饭的人，这些人像农民一样，必须缴纳人头税和服兵役，大多数居住在500个“城镇”（凡拥有1000居民者都称为“城镇”）中。此外，还有25万左右“商人”和非贵族出身的实业家（包括他们的家眷），他们都参加行会，享有自由的地位。所有这些阶级都被当时的一位统计学家阿尔谢尼耶夫定义为“生产性的”，而“非生产性的”阶级则指世袭贵族（在19世纪最初10年，我们可以估计为50万）、官员（包括终身贵族在内，计有25万），教士（50万）和军队及其从属人员（远远超过100万）。^[4]

在18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民不顾人头税的压力，或者正是为了缴纳人头税的缘故，努力扩大全国的播种面积。虽然当时的人们开始抱怨说，人口流向工业和城镇是在损害农业，^[5]但是统计表明，这只是一种次要的迁徙。具有更大意义的是向乌克兰和伏尔加河彼岸的移民。这两种迁徙都不是没有控制的。逃路的农奴只是少数。大多数移民是由主人指挥迁往他们的新庄园，作为奴仆被带进城市，或者付清代役租才允许移动，这种代役租实际上是一种赎金，可以代替“周役”^[6]不断偿还。赎金的数额是根据农奴的工资或收益（因为他们有时自行经商）而任意确定的。除交纳代役租之外，完全不能解除奴役。在古典经济学和人道主义使俄国确立自由劳动之前，这种奴役的严酷可以说达到了它的顶点。

即使拿美国黑奴作尺度来衡量，俄国的农奴，特别是没有土地的奴仆，也完全有理由被称作奴隶，尽管叶卡捷琳娜禁止使用“拉勃”（奴隶）这个字眼。农奴没有反驳主人的权利，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农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发配他去充军25年，或者将他公开出售。农奴除了在村社公地中有不可转让的一小块之外，不能拥有土地。根据法律，他的动产一律属于自己的主人。法律对主人的残暴规定了一个限度，即不准主人危害他的农奴的性命，但是这唯一的限制只不过是遭到其他地主的责难而已，因为叶卡捷琳娜女皇规定，凡是为此目的而采取旧方式向君主请愿者，可处以流放。不但如此，君主还可以把这样一种奴役条件任意扩展到处于半自由地位的国有农民身上，于是将近100万连同土地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一世赐给宠臣的农民也陷入同样的命运。另外，尽管叶卡捷琳娜在她著名的1765年敕令中宣布说：“除非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绝对的必要之外，不得将人变为奴隶”，但是，农奴的枷锁此时却又套到乌克兰（甚至包括一些哥

萨克边疆部落）与新获得的波兰诸省迄今自由的农民身上。至于保罗，他抱住俄国保守派的典型论点不放，认为农民在家长似的农奴主的管辖下，比在没有灵魂的国库的管辖下，会生活得更好一些。的确，保罗本人作为一个地主，比作为一个君主或军需总监，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不过，说来矛盾，农奴制度却是更多地推动而不是阻碍了国运的兴隆。无论是国有农民还是私有农民，都应征入伍，提供炮灰；都缴纳人头税，每年虽然只有几个先令，在1805年却构成正常岁收的2/5弱。国有农民也被拉去从事重要的工作——修建哨所和公路。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其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还未纳入开始萌芽的交换经济。城镇的给养，工业和出口所需的原料，对免税地主贵族进行文化改造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是由私有土地上的农奴劳动的产品来提供——这些私有土地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情况下，已经发展成为大庄园。

就连工业也还没有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彼得大帝所创立的冶金工业仍然依赖农民的劳动。虽然非贵族的业主们不能拥有农奴，但是他们的矿山和铁厂具有法人资格，可以雇用农奴。因而，在1812年，除冶金和采矿外，其他“制造业”拥有的12万名工人中，只有半数左右是自由人。当时，俄国的炼铁工业已经处于相对的衰落之中。在前一世纪头30年中，在乌拉尔山以东建立了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巨大的铸造厂，而在叶卡捷琳娜执政期间，它们的生产效率比较小的工厂低。苏联历史学家声称，在小工厂里，10—13米高的炼焦炉的单位产量比英国的新式炼焦炉还高，虽然在1800年进口了英国的新式设备。当时，俄国的铁产量在世界上居于首位——直至1806年以前，每年为1200万普特，即略低于10万吨；1806年，法俄联盟切断了对英国的出口需求，这种需求占全部产量的一半。^[7]俄国能将其余部分就地吸收，这表明在18世纪后半叶它的工业和国内贸易都有所增长。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额在叶卡捷琳娜开始执政时约为2100万卢布，而在她的统治结束时则为1.1亿卢布。1796年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是亚麻和大麻制品，总额为1300万卢布，其次是铁，为500万卢布；在进口商品中，糖居首位，约为550万卢布，其次是呢绒，为400万卢布。^[8]就当时贵族生活的实际水平而言，有关进口葡萄酒之类奢侈品

的官方数字比较低，这或许由于走私规模很大，缩小了表面上的贸易额。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几乎没有改变俄国农村的贫困状态；在人数不多的受益者中有商人阶级，这是得到1775年和1785年立法认可的三个城市阶级中的最高阶级，在19世纪头10年里产生了不少收入高达10万卢布的大富翁；另外还有同样多的贵族，他们比西欧和中欧的相应阶级更多地参加贸易和实业活动，拥有很大一部分工业企业，而作为“自由”工资劳动者雇用来的人实际上大多是他们的农奴。为了得到在商人阶级开办的工厂中做工的许可，这些农奴要向他们缴纳代役租。他们可以加入商人的最高行会，有利可图的烟酒垄断企业通常由他们经营，尤其重要的是，贵族作为土地所有者，从城镇与日俱增的食品需求中大发其财。

这时，俄国贵族已经没有世袭等级制度；地位视军阶或官阶而定，文武官员皆分14等；在得不到女皇私人恩宠的地方，官员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与宫廷的社会联系，其晋升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联系。比较高的职位授予资历很深的将军和文臣，比较低的职位授予来自世界各地富有家族的成员，其中有些家族（如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最近被封为贵族的；还有一些低级职位授予极少数来自俄国在18世纪兼并的波罗的海诸省的德意志人。这种让异族跻身贵族的做法虽很不得人心，但是持续不断——甚至一直持续到1914年。虽然自从1785年的特许状颁布以后，地方贵族享有可以任命某些地方官员的权力，但是在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却不能行使这种权力，甚至在农村中，他们也要服从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及其僚属。在两个首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一向按农奴的数量，而不是按面积大小来表示）被人们当作有钱，而不是当作有势。上层贵族已经完全西欧化了，法语不仅成为他们的社交语言，而且成为另一种官方语言；直至1914年，沙皇外交部的信函中一直通用法语。这是彼得大帝极力鼓励国外旅行和国内教育的结果。与其他国家一样，贵族子女大多数接受私人教育，尽管不那么完美。当时有一两所时髦的私立学校，国家开办一些士官学校、见习骑士团，后来又创立斯莫尔尼女子学院。莫斯科大学（这是唯一俄国人的大学，因为多尔帕特大学是德意志人开办的）水平很低；如果在按常规进入军界或政界之前需要接受一点高等教育的话，这种教育通常是在德意志取得的。

19世纪的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喜欢这样述说：“俄国贵族由于在1762年摆脱彼得大帝强加给他们的服役，由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1785年特许状确认他们的权利，他们靠缩小君权而获得了权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特许状第18段确认贵族享有“得以免除服兵役”的权利，但是第20段又提醒他们，一旦君主号召，他们有“为国事不辞辛苦、不惜生命”的义务。其实，至少在此后的75年间，服几年兵役依然是在受教育的贵族家庭中间具有社会威望的一个条件；的确，人们会把逃避服兵役当作没有行使贵族特权的能力的证据。尽管有1785年的特许状，但只要沙皇下一道命令，就能够取消贵族的特权；沙皇保罗曾将几百名贵族贬为罪犯（大多数罪有应得），其中有一些人受到体罚。甚至在保罗一世刚刚被主要贵族和军官们暗杀之后的时期，斯佩兰斯基就写道：“我发现俄国只有两个等级：地主的奴隶和沙皇的奴隶。”^[9]

不过，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晚年，贵族对君主的俯首帖耳主要应归因于她个人的威风。波兰贵族青年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祖国最后一次被瓜分之后，和他的兄弟一起来到俄国。他曾经描写这位女皇令人敬畏的情景：“一提到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所有的面孔立即出现一种严肃和恭顺的表情……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小声说一句抱怨或责难的话；仿佛……她所干的最荒唐的事都具有那么多的天意……”但是，就俄国政治的演变来说，叶卡捷琳娜在位的最后10年是一个突然衰落的时期。过去赞助启蒙哲学家的女皇，在俄国的国家利益胜过人民利益的时候，她的幻想就已经开始破灭，而法国革命则使她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她思想上的这种急剧变化从她与德意志学者格林的通信中反映出来。格林是她多年来接触最频繁的学术界人士。1793年弑君事件的震动，使她失去了沉着冷静，并导致在俄国采取示威性甚至预防性的措施，例如不准在舞台剧本中有“共和国”一词，将有政治嫌疑的启蒙哲学家的画像从皇家收藏室中除掉，禁止某些共和国式样的时装。然而，她似乎指望法国解决自己的问题，早在1791年就预见将有一位“恺撒”降临；在王朝之间的反革命事业中，她并非是个积极分子，尽管她在1792年就乐观地为此制订了计划。她在不失体面的条件下给予法国流亡贵族以尽可能少的现金——10万法郎。她答应派1.8万人给在科布伦茨的国际军，但这支部队到波兰后就不再前进了。她说波兰的反俄爱国者是不亚于巴黎的共和党人的雅各宾分子。

革命对两位文人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著名诉讼案件究竟有多大影响，已经完全弄不清楚了。今天看来，对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年）的长期容忍也许比对他的最后判罪更加引人注目。他作为慈善家和政论家的非凡生涯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他干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从创办一所孤儿学校起，一直到组织和宣传对1787年大饥荒的救济——这与托尔斯泰1891年的类似活动一样，是对政府极大的挑战。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出版。整个俄国的图书年出版量，在他开始经营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时为166种，在1791年他的出版社关闭时则增加到366种，而在此后的10年中又下降到233种。虽然叶卡捷琳娜作为仁慈专制主义的捍卫者，亲自发表匿名文章抨击诺维科夫的讽刺作品，但是她显然不想让诺维科夫成为一个为政治理性主义捐躯的殉道者；然而，来自法国的反对君主制度的国际挑战，使局势变得不利于诺维科夫。1792年，女皇下令将他逮捕，他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有犯罪意图，被判处15年徒刑。叶卡捷琳娜迟迟没有批准对诺维科夫的判决，她的继承人保罗把这个判决撤销了。保罗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想要把前任的决定一概推翻。诺维科夫的真正罪过是与共济会有牵连。在18世纪末的圣彼得堡，共济会被视为圣马丁主义运动（当时法国作家圣马丁的信徒）的一个神秘派别。共济会同不信奉国教者的宗教狂有联系，一开始就同情革命和世界主义，这一切都表明是对正教和专制政府的挑战。一位信奉伏尔泰主义的统治者可能会给予理性主义异端——甚至共和主义异端以某些特权，但是，共济会则由于它的仪式和迷信而失去这种资格。

叶卡捷琳娜女皇为俄国自由主义的圣徒传记文学提供的第二位殉道者是亚·尼·拉季谢夫。根据彼得大帝制定的教育政策，拉季谢夫曾在青年时代到国外求学。他带回了某些启蒙哲学家（特别是马布利和雷纳尔）的平均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虽然他对马布利的一部著作的相当大胆的解说已由诺维科夫出版，但是在他作为文官的仕途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1790年，他毫无顾忌地自行刊印《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书连同一首《自由颂》，后来成为俄国文学和社会史的经典著作。^[10]《旅行记》采取一个旅行者的日记的形式，是抨击农村的生活状况，农奴制度的悲惨，以及地主阶级和受益于它的政府的罪恶行径的长篇论述。女皇自己写道，她“从头至尾细读了他的书”，她的谨慎的评论很奇妙，一方面承认事实细节，同时

又谴责作者的结论和动机。^[11]拉季谢夫以扰乱和平、煽动不满和冒犯女皇等多种罪名被判处死刑。可是，叶卡捷琳娜却予以减刑，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保罗像处理诺维科夫的问题时一样，把他召回了。拉季谢夫甚至在1801年恢复了官职，但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新政的种种缺陷使他大失所望，他于一年后自杀了。

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案件表现出俄国社会的征兆，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它具有极大的对抗性质，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它同12月党人起义之间隔着亚历山大改革失败的整个时代。有些历史学家急于建立革命传统的连续性，但只有微不足道的证据支持他们。虽然拉季谢夫的著作在被查禁以前曾经流传，但是它的教训却长期没有发生作用。

这一类的偶然事件丝毫没有使沙俄政权丧失勇气。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胜利唤起了官僚阶级、军队，甚至下层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从法国革命以来，俄国在瑞典战争和土耳其战争中连连取得胜利，并且最后消灭波兰以报多年的民族仇恨，这一切当然与那位世界主义的君主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普希金前一代最主要的俄国诗人、后来任司法大臣的杰尔查文在一首赞歌中称她为“费丽察”，这在俄文中相当于“光荣女王”之意。^[12]叶卡捷琳娜极力表现她像自己的臣民一样，是俄罗斯人，强调继承彼得大帝的遗志。“我在一天中每时每刻都在自问，”她写道，“如果他处在我的情况下，他会禁止什么呢？他会做些什么呢？”她一直过着糜烂的私生活，却丝毫不玩忽政务，这是尽人皆知的。“她可以随心所欲，”人们可以这样说，“她的放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确，从波将金的时候起，她的宠臣的行政权力比过去减少了。普拉东·祖博夫一走出女皇的私室就举行他的早朝，除国家最高级的官员以外，由他分授一切官职，但是决策权不在他的手中。叶卡捷琳娜仍然通过她的国务大臣，陆军、海军和外交联合委员会的最高成员，以及比较间接地通过参政院长管理朝政。原先实行的集体管理行政的委员会制日益废弃，到保罗一世在位时期就更加衰落了。帝国会议（叶卡捷琳娜改组为“女皇御前会议”）很少召开。所谓起“指导”作用的参政院，实际上除了颁布帝国法令和充当最高上诉法院（此法院以办事拖拉而声名狼藉）外，已经失去一切职能。在那些从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出发而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的消极不满分子中，包括沙皇太子保罗和他的儿子、未来的亚历山大一世。保罗是彼

得三世的儿子，但由于他母亲发动的政变，他被剥夺了皇位继承权。女皇使他不能过问朝政，从他身边夺走了他的孩子们。她与宠臣波将金共同治理天下，将她那忧郁而失宠的儿子置于同哈姆雷特一样的境地。后来，保罗被允许住进圣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庄园，在那里操练允许他保有的2000名私人军队，这支军队从训练到服装，都是陈旧的仿普鲁士式的。

亚历山大在少年时代就深深卷入这种家庭的和王朝的倾轧之中。他父亲悲剧性的一生无疑通过他而对俄国的历史产生了间接但有力的影响。他的思想是在两种影响下形成的，也可以说在两种影响下终生相互矛盾：一种是在加特契纳受到影响，女皇越来越放任他，允许他接近那里；另一种影响是正式教育，女皇于1784年任命瑞士人弗雷德里克·拉阿尔普为他的导师。拉阿尔普的见解属于启蒙运动左翼；同时，他原籍瑞士沃州，对伯尔尼的称霸感到愤懑，同情法国革命和法国对他的国家的干涉。不过，他还是一直任职到1794年年底，在教育中遵循卢梭的教育原理，和他的学生一起阅读古代和当代的共和主义的经典著作。出于双方的信任，他与亚历山大保持终生的友情。叶卡捷琳娜的腐败政权，与拉阿尔普的原始浪漫激进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尽管该政权在战争中获胜，但它对于加特契纳所代表的和亚历山大所继承的兵营和操场上（而不是战场上）的尚武精神，也同样难以相容。因此，在1796年，18岁的未来皇帝就写信给他的朋友、未来的宰相维克托·科楚别伊说，他想要放弃他的继承权，和他的妻子（巴登的伊丽莎白，两人于前一年结婚）“到莱茵河畔”过私人生活。他指名道姓地提到祖母宫廷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说这些人连“给他当奴仆他都不要”，抱怨说，“我们的国家事务乱七八糟，人们到处窃取权力……帝国除了扩张领土之外，什么也不干……”这种表白在亚历山大的个性发展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随后不久，他向恰尔托雷斯基透露了同样的心情。他向恰尔托雷斯基倾吐了他对被瓜分的波兰的真挚同情，甚至显示了他对法国革命的动机和成就（虽然不是对于暴力）持开明的敬意。可以认为，他们的长期友谊，实际上还有亚历山大对波兰的承诺，都是从这次引人注目的会晤开始的。

很可能，叶卡捷琳娜早就打算指定亚历山大而不是保罗做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1796年9月给女皇的一封信，可以理解为他勉强接受了女皇的意旨。^[13]但是，当叶卡捷琳娜于11月16（新历27）日逝世

时，并未采取正式的步骤，亚历山大已派人去请他的父亲。保罗毫不迟疑地继承了帝位，但是颇能表明沙皇政权的特点的是，当第一个使者（祖博夫家族的一员）到达加特契纳的时候，保罗以为这又是来送催命符，于是对他的妻子喊道：“我们完蛋啦！”看不出新沙皇会实行重大的改革，就连他那些主要是做做样子的小改革也被当时的人们和历史学家们夸大了。在沙皇统治的历史上经常出现对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的仇恨，而到保罗的时候，由于他嫉妒贵族与他母亲异常密切地勾结，由于他在加特契纳被排斥于贵族统治之外，就更加深了上述仇恨。但是，他所仇视的是象征他母亲统治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它的制度或者是次要的人物。因此，在举行被公认为保罗的父亲的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合葬仪式时，就叫为叶卡捷琳娜的利益而刺杀彼得三世的年迈的奥尔洛夫手捧他的受害者的皇冠，而波将金的坟墓则被捣毁，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过，在1796年，大多数高级官员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职位，甚至连为人们所十分痛恨的来自加特契纳的人员，虽然打入了军队，但并未能跻身于最高层。值得一提的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即采用了加特契纳的军装。

参与谋杀保罗的人员之一本尼格森将军承认，保罗最初显示一些“统治者的才能”。德意志人格勒本曾发现俄国的官吏们经常旷工，“在各部门庞大的办公室里，只有大小老鼠出没”。因此他称颂保罗给作为上诉法院的参议院带来了生气。在他即位后的头一年，就办理了1.1万起悬而未决的案件。他还称赞正规发放军饷的新情况，虽然对新的军装表示反对。保罗利用专制权力还有一些不大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例如他批准进口英国的纺织机器，指示彻底研究一位莫斯科药剂师关于甜菜糖制作法的报告——这样，即便不是开创，也是促进了俄国工业中这两个主要行业的发展。保罗在他的加冕宣言中为农奴对其主人的劳动义务作出了著名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并不像一般设想的那样行之有效。虽然绝对禁止了在星期日和各个节日服役，但是限制每周服役三天则不过是说梦话而已。^[14]除了行不通之外，这个规定还激起极普遍的要求解放的愿望，导致一起起的农民骚乱，保罗又对这些骚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如果说这个和类似的禁令在实质上并非真正自由主义的表现，它们的意图就更谈不上是在向贵族的权利和利益进行挑战了。保罗以前的几代沙皇没有一个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把如此众多的国有农民变为私有农奴，而且，在他发布关于每周服役日数的敕令的那一年，保罗批准创立一家贵族土地银行，以便制止

高利抵押的丑行，这表明他对贵族阶级的关切。事实上，他对前朝统治的积怨，使他不再恪守先例或保持现状，他的一些保守主义的禁令都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在波兰问题上，他反对实行最后瓜分，并且宣布说，如果事情不是已经不可挽回，他本来会恢复原状的。他召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参加他的加冕典礼，并以王礼相待，不过没有亲自给予关照。保罗如此尊重波兰，真正从中得益，地位和荣誉双收的，倒是他的母亲的人质恰尔托雷斯基。

暴虐恣肆是保罗失败的原因，这开始于他下令禁止反映法国革命风尚的服装。根据同一精神，他不仅把俄国陆军切合实用的军装改成普鲁士老式样的不实用的新军装，而且重新采取辫子和香粉作为旧政权的纪律的象征。当苏沃洛夫陆军大元帅对此提出批评时，便被贬斥到自己的庄园，直到重召他服役，去指挥他1799年著名的意大利战役为止。在首都，保罗感到草木皆兵，迷信纪律，使得群众生活在难以忍受的律令之下。1785年特许状关于贵族通过省自治机关实行自治的规定被践踏了；贵族的地位被剥夺了，对他们也可以施加肉刑，而整个低级教士被剥夺了免受鞭挞的权利。由于害怕革命，俄国所有的私营印刷所再一次被关闭，最后并禁止从国外进口任何印刷的或手写的作品。然而，造成危机的关键是保罗对待陆军军官的态度。调动、降级、征召在文职部门和宫廷中任职的军官重新服役，这一切并不是什么重大改革，而是施行暴政。首都的卫戍部队生活在一种练兵场恐惧症之中。军官们在阅兵之前，总是先了结一下自己的事务，并随身带上一笔现款，以防从练兵场上直接流放西伯利亚。

早在1797年，亚历山大就对拉阿尔普抱怨说：“一切事情都颠倒过来了，这只能增加混乱”，他要求“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得到指示，即恩赐俄国一部自由的宪法”。历史学家们附和亚历山大的朋友和同时代人的看法，往往忽略这封信里的妥协成分。当时亚历山大的父亲正在43岁的壮年，亚历山大什么时候，又怎能设想进行这种根本改革呢？据我们所知，虽然在这一阶段，亚历山大不可能，更不要说打算参与搞什么密谋活动，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也许反映出保罗的那种精神失常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正如亚历山大对拉阿尔普所说的那样，他这时已经聚集了一帮意气相投的政治朋友。这些人后来在他自己在位的头三年，有的帮助他制定了国内政策，有的没有做，而作为个人，他们长期得到他的宠信，同他亲如手足。首先是亚当·恰尔

托雷斯基亲王，其次是恰尔托雷斯基的朋友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此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著名家族，但是较晚才跻身贵族，他在不久前的少年时代，是个空谈的雅各宾派。再其次是斯特罗加诺夫的表兄弟诺沃西利采夫；最后是维克托·科楚别伊伯爵，此人是总理大臣别兹博罗德科的外甥，当时已经是一个富有外交和行政经验的人。忠诚于亚历山大的还不止这几个人。有一个人堪称是加特契纳式练兵场纪律的代表，保罗将他从默默无闻中提拔上来，他也成了保罗之子的朋友。这就是阿·阿拉克切耶夫。此人实际上遭到所有历史学家的唾骂。他虽然残忍不仁，是一个蒙昧主义者，但为官清廉；虽然作为军人打仗不行，但是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很有效率的。亚历山大在位时期，不断地增大他的权力，以致最后非正式地操持着帝国的全部日常工作。在俄国历史上以他的名字称呼一个时代，即短暂的“阿拉克切耶夫暴政”。

把谋害保罗的阴谋归罪于英国大使惠特沃思，是有某些根据的。密谋的首领尼·帕·帕宁伯爵是这位大使的朋友，他支持亲英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至1799年后半年才彻底改变。事情似乎是，惠特沃思曾经建议设立一种英国式的摄政制度，这种方式很可能被皇储亚历山大接受。但是，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日趋恶化，而且，由于惠特沃思与他的使团是在1800年5月离开俄国的，因此不可能证明苏联教科书中所说英国人的阴谋活动与实际上在10个月之后发生的保罗被暗杀事件有关的话是正确的。在此时期，帕宁丢掉了副总理大臣的职务和接近保罗的机会，于是密谋的领导权就转到莫斯科督军P. 冯·德·帕伦的手中了。计划的拖延很可能是由于亚历山大迟迟没有同意。帕宁曾向亚历山大提出建议，但是亚历山大如何以及何时同意逼迫保罗退位则不得而知，至于说他曾经同意暗杀，这是绝不可能令人相信的话。正当密谋逐步进行的时候，可能与保罗最密切合作而且有可能救他性命的两个最有才干的人——阿拉克切耶夫和罗斯托普钦一时失宠，离开了首都。亚历山大的三个亲信恰尔托雷斯基、诺沃西利采夫和科楚别伊也是如此。不过由于免受嫌疑，这对他们未来的影响倒很有利。在1801年头几个月，保罗显得更心慌意乱，行动失常。当帕伦于3月11日（新历23日）夜间下手的时候，有些（虽然不充分的）迹象表明，保罗对他自己的家族已经采取防范措施，例如他与妻子疏远了，并对亚历山大存有戒心。这次政变采取俄国方式，即由高级军官和被收买的卫士下手。玛丽亚·费多罗芙娜皇后怀疑她的儿子参与密谋，企图亲

自接替王位，但禁卫军按兵不动，本尼格森置之不理。于是派人去请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噙着眼泪登基。“别像小孩子那样了，”据说帕伦当时这样讲：“马上去登基吧；在军队面前露面。”

这次密谋的成功使俄国的以暗杀方式实行改革的政治传统长期保持了下去，在十二月党人的兵变中，在后来的革命恐怖中，人们可以再次发现这样一种传统。据恰尔托雷斯基说，亚历山大本人终生为他登基时受到的精神创伤所折磨。他对弑君应负的责任尽管微不足道，却使他灵敏的天性走向犬儒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这是无可补救的”，他对恰尔托雷斯基说，“我必须忍受痛苦，这是无法改变的”。另外，这次暗杀重新造成了君主与贵族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叶卡捷琳娜二世差不多已经弥合，但是以后又成为王朝的特征，阻碍它甚至与各特权阶级分享王朝的权力。

人们对政权的更迭普遍感到欣喜，这在两个首都、在担任文武官职的贵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位奥地利外交官说，这是对每位俄国沙皇（包括叶卡捷琳娜在内）的逝世的正常反应。然而，一场政治生活而不是民族生活中的革命已迫在眉睫。亚历山大把行政大权交到他祖母的两位国家重臣手中，任命已经退役的别克列舍夫将军为参政院院长，即实际上的首席大臣，并召回曾担任上述职务的D. P. 特罗辛斯基担任他所说的“我的导师”。后者为他起草了即位宣言，宣言里丝毫没有亚历山大当皇储时同他的政友所讨论的革命自由主义的痕迹。现在，他许诺“遵循我们可敬的已故祖母的法律和精神来统治上帝托付于我们的人民”。这是那些密谋者的政策，而且亚历山大确实留用了帕伦，并且召回帕宁，一见面便对他说：“唉，事情出乎我们的想象。”这两人都留用了几个月，直至这位年轻的皇帝立稳了脚跟，不知是出于轻率还是傲慢，将这两个人革职，永不录用。在废除他父亲的各种轻率措施时，最紧急的行动似乎是亚历山大本人在谋杀那天夜里想到的一件事。这就是召回一支给养不足的哥萨克部队。保罗派遣这支部队不顾一切危险穿过中亚对印度发动进攻，发疯似的表示他与拿破仑结成反英统一战线。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一般都恢复正常了。各种商品的进口，从面包、酒类到书籍、乐曲，都畅通无阻；边境向旅游者重新开放；私人印刷业重新得到许可；叶卡捷琳娜颁给贵族和城镇的“特许状”重新生效；教士再度被免除肉刑。“秘密发配”，

即根据行政命令将人流放的办法，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不过实际上还以别的名目存在。

这一切都是老一派行政官员的成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把保罗所遣散的他未成年时的政友科楚别伊、恰尔托雷斯基和诺沃西利采夫召回俄国，与已在圣彼得堡的斯特罗加诺夫组成“少壮派”（保守的批评家们开始这样称呼他们）。如今，他们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智囊团，聚会更加经常。不过，他们仍以“非正式”委员会的名义，不但讨论各种宪法方案和改革农奴制度的办法，而且研究官方颁布的立法的草案是否切实可行。除了这老少两派外，阿拉克切耶夫（两派人都讨厌他）尚未被召回帝国会议；但是，亚历山大还是受到他的文武助手，特别是恰尔托雷斯基的野心勃勃的敌手、反波兰的P. P. 多尔戈鲁科夫亲王的影响。另外还有刚刚参加过瑞士体制改革的拉阿尔普，他继续为亚历山大献策进谏，而不会受到惩罚。

亚历山大能与相互毫不同情，甚至水火不相容的各派共事，这大概完全符合他不稳定的性情。由于他无意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而遇事往往犹豫不决，这使他失去政治上对他的忠诚和知识界的尊敬。也许除了阿拉克切耶夫之外，谁也没有得到他的充分信任。亚历山大在位末期，在政治上与阿拉克切耶夫一样鼠目寸光。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因为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难以解释的意图——但是，亚历山大在俄国的朋友们，甚至当着他在欧洲的对手的面，都正确地称他为两面派。在政治上，他表现出是一个犬儒式的实干家，尽管他的原则和情感都是罗曼蒂克式的自由主义、福音主义或者神秘主义的东西。在私生活上，他是一个不拘小节、温柔体贴的丈夫，由于仔细化装而长久保持风采，甚至被家人称为“我们的天使”。

通过亚历山大的传记来研究他在位的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做法了。托尔斯泰曾经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又不能用别的来代替。苏联历史学家们尽管对亚历山大在位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宝贵的研究，但是他们执意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零星冲突说成是一种连续的发展，没有适当地将其与经济事业联系起来，更不要说与政府的政策联系起来了。后来同时出现两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保守主义者说他不负责任地激发了革命，自由主义者则说俄国错过了进入西方历史主流的机会，这些大概只能从亚历山大的个性中找到解释。

亚历山大一度曾对俄国爱国主义的发展起主宰作用，这种爱国主义的社会基础还有待加以分析。

在“非正式委员会”活动的初期，这位沙皇赞同委员会秘书斯特罗加诺夫对他意旨的记录。“改革要从行政开始”，但是委员会显然要“确定人权”和起草宪法。宪法是为了防止“独断专权”，而人权则被定义为自由、财产权（只要“不损害他人”）和机会均等。可是这些方针一直没有取得进展。激进派斯特罗加诺夫和保守派科楚别伊都认为，沙皇的正式顾问们的意见水火不相容，沙皇又毫无系统的主张。^[15]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允许他的“非正式委员会”进行自由辩论。恰尔托雷斯基声称：“亚历山大在位时期的一切有益的改革，无不来自这些秘密交谈。”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亚历山大的第一次行政改革，即设立一个“常设会议”，是在1801年4月施行的，当时非正式委员会还没有出现。保罗像前几代沙皇一样，对“帝国会议”的利用反复无常，这次新改革的目标在于降低而不是提高它们的地位。常设会议的职能被局限于对立法提供意见，而这时已把兴趣集中到参政院了。

“指导性的”参政院——这是人们强调其行政职能而不是强调其更起作用的司法职能时对它的称呼——在名义上监督各院和其他行政部门，但是，参政院院长的权威并不来自该院的权力，因皇帝与各院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俄国的职位不是世袭的，参政院的人选大多从退役将军和显要官员中指定；而且，该院没有明确的职能，更不用说权利了。虽然它是俄国最古老的机构，但它仅仅是彼得大帝的创造物，他是照抄了外国的模式。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温和的保守派把它看成仿佛是民族的历史上牢牢扎根的东西，认为它是政治团结，而不是进行改革的基础。然而，所谓“参政院派”既缺乏组织，又缺乏独裁精神，不管怎么说，像帕伦和帕宁这样有权势的人物一度曾被革过职。

“参政院派”的代言人站在该“派”的左翼，特别是沃龙佐夫兄弟，即西梅翁和亚历山大，前者是驻伦敦大使，后者不久成为帝国总理大臣，被改革派视为“非正式委员会”和官方之间的桥梁。沃龙佐夫兄弟在幕后，为亚历山大起草他在1801年9月加冕时颁布的所谓“给俄罗斯人民的特许状”。这个“特许状”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东西，将人身保护权和参政院的牢固地位结合在一起。尽管如此，“非正式委员会”显然还是根据“好总不如更好”的原则，而拒绝加以接受。

沙皇请参政院对它的未来提出建议，可是建议还未提出，他便发布了他自己就参政院在解决立法问题和在行政活动方面的职能所作的决定。参政院把这解释为有向沙皇进谏的权利，这时，便对违反1762年“特许状”的一项法令提出了抗议。根据这项法令，没有军衔的贵族必须服役21年，而这是除军官以外的所有人的普遍义务。这项抗议由斯特罗加诺夫的父亲呈交，结果被严厉驳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正式委员会”的另一成员诺沃西利采夫奉命传达这位专制君主的指示说：参政院的任务只是解决现有法律的矛盾。不过，尽管参政院的活动遭到如此悲惨的失败，但贵族反对派的主张，犹如另外一种鼓吹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神话一样，后来长时期产生了有力的政治影响。

比起亚历山大关于参政院的权利的模棱两可的定义来，较为成功的是在同一时期的1802年9月8（20）日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撤销了主管国家各部门工作的“院”而改设“部”。这是“非正式委员会”的作品，也是它为时最持久的改革。保罗已经建立过两个这样的部——商业部和皇室土地部，现在又增设了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和教育部。同院一样，这些部应向参政院报告工作，可是在实际上，参政院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按照上述法令建立的“大臣委员会”。迄至1807年或1808年，亚历山大经常参加大臣委员会会议。大臣委员会自从成立以后，一直是主要的行政机构，直至尼古拉一世才开始将它的权力转移到沙皇个人的办公厅手中。新的部一般受到政界贵族的仇视，这些贵族把它们称为“维齐拉特”^[16]，并说亚历山大关于政府的理想是“土耳其式的”^[17]。保守派哀悼各“院”的消失（其实它们与参政院一样，是彼得前些年从外国搬来的新东西），把它们看成是民族天才的体现。实际上，贵族也只是刚刚对这些机构感到适合自己的口味，尽管这些机构也偶尔表现出一种俄罗斯的特征——在独裁统治下面宁愿集体负责。而且，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甚至在此之后，“院”依然是国家部门内的机构。

一位批评参政院的人称“非正式委员会”委员为“年轻的马屁精”^[18]，人们指责他们把改革当作升官的手段。实际上，科楚别伊已经主管一个国务部门，其他的人只捞到次要大臣的职位。委员会继续聚会，并于1803年取得了它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立法方面的成功。这是一项教育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帝1776年法令提出的纲领是

要在所有各省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而且俄国农村条件差，缺少教师和用俄语写的教科书，这项纲领迟迟没有执行。新的改革是要建立42所英国语法学校式的文科中学，405所其他形式的中等学校，但与叶卡捷琳娜的纲领几乎同样不成功，在每个教区设立小学的计划也失败了。诺夫哥罗德省1806年登记的100所学校，两年后无一幸存。但是，把全国教育集中在几个大学区的新办法，却是有良好前景的，后来拿破仑在法国按同样方式进行了改革。在喀山和哈尔科夫创办了新的大学，恰尔托雷斯基被指派去主管维尔纳地区的大学和中小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波兰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

亚历山大没有通过“非正式委员会”对农奴制实行改革，这并非完全由于他本人对外界舆论十分敏感；其他成员似乎也丧失了勇气。它之所以遭到反对，不仅基于财产利益，而且出自社会和经济的考虑。虽然自由放任主义越来越占上风，但是，即使像亲英分子莫尔德维诺夫之类的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也无法对付没有土地的流动农业无产阶级可能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斯佩兰斯基怀有同样的恐惧心理，所以，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们对农奴制度的反感，只形成了一项法令，允许农奴主通过订立个人契约解放自己的农奴。到1816年，只有大约25万的农民及其家属受益于这一措施。农民改革的主张并未丢弃。就连阿拉克切耶夫也曾制定一项解放农奴的方案，但只是在1816年和1817年，才零星地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当时，波罗的海诸省的德意志人地主获准仿效毗邻的普鲁士的做法，解放没有土地的农民，在普鲁士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有利的。对于改变既定的制度，没有一种尝试是贯彻到底的。亚历山大禁止不带土地登广告拍卖农奴，也禁止以出卖农奴偿还债务。但是，并没有禁止农奴主不经过法律手续对农奴施行惩罚性放逐，虽然这个问题曾于1803年提出，但1811年再次提出过。1822年明白确认皇家财产管理人有权放逐国有农民。

“非正式委员会”虽然未被解散，但已逐渐消失，进行国内改革的劲头也越来越小了，这主要是由于拿破仑法国的扩张迫使沙皇日益忙于处理外交军事事务，而不是由于委员们当了大臣之后忙于工作。把皇帝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外交事务联结在一起的主要是波兰问题；1804年亚·沃龙佐夫退休后，沙皇任命波兰人恰尔托雷斯基为俄国外交大臣，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自从1795年最后瓜分波兰以来，波兰心脏地区的大部分，包括首都华沙，都已并入普鲁士。俄国

的边界比1919年按种族划分提出的寇松线，即1945年的边界向西超出不远，只是现今苏维埃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当时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因此，普鲁士是波兰人的主要敌人。波兰人中，有些人，如恰尔托雷斯基，向亚历山大的俄国求援，另外一些人则向法国求援。甚至成立了一个波兰军团，参加法兰西共和军的战斗。亚历山大访问梅梅尔，并与路易丝王后产生精神上的爱慕关系之后，对普鲁士日益表示同情，这时，恰尔托雷斯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坚持要恰尔托雷斯基接受外交大臣的职务，而后者则希望普鲁士在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中保持中立将对波兰有利；正是他的敌人多尔戈鲁科夫，在俄奥盟军开赴奥斯特利茨吃败仗的途中，使得普鲁士做出对俄奥联盟有利的让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溃败之后，恰尔托雷斯基立即建议亚历山大宣告自己是波兰国王，以期遏制拿破仑，可是未被采纳。到弗里德兰战役之后，已经为时过晚。在提尔西特条约生效期间，俄国的庇护似乎已使波兰人感到绝望，不过亚历山大与恰尔托雷斯基之间还保持着坦率的书信来往。1813年，当俄国皇帝以波兰命运的主宰者的姿态出现时，他又去求这位波兰朋友给予指导。

在俄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舆论都把在提尔西特会议上的投降视为国耻。法国随后对俄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太明显了，以致人们往往把其他领域的政策行动归因于法国的影响，归咎于卑躬屈节、崇洋媚外，甚至生搬硬套。1808年对瑞典的战争被理所当然地归咎于法国的诱惑与压力，因而爱国军官都避免参加这场战争以及后来对付芬兰民族抵抗运动的更加非正义的战争。其次，在对内政策上，由于归咎于一味仿效世界、实际上是法国，这就增强了贵族阶级的自身利益，有助于他们抵制亚历山大下一轮的改革试验。沙皇在这些试验中的代理人，实际上是试验的主要倡导人，是米·斯佩兰斯基（1772—1839年）。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曾在圣彼得堡的神学院受过教育，由于在内务部表现突出，1807年博得亚历山大皇帝的赏识。作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有力人物，斯佩兰斯基很可能被人估价过高了。不错，他变成了一个独夫委员会，除战争和外交领域以外，对极其广泛的根本问题和当前的问题提出报告和拟订解决办法。但是，无论是他那些长篇报告的性质，也无论是他实际上作为皇帝内阁总理大臣的不牢靠的权威，既未产生社会影响，甚至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没有威信，都不足以表明他将俄国带到了自由主义革命的边缘。他的内容最广泛的作品是1809年的宪法草案。它像1819年诺沃西利采夫起草的宪法一

样，始终没有颁布。尽管其中振振有词地谈论公民权利，但对解放农奴却只字未提。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乃是官僚思想家斯佩兰斯基的典型特征，他总是在他的西方思想与俄国历史和俄国社会的现实之间寻求平衡。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的信徒，却提倡保护新生的工业；他是自由主义者，却又主张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保留农奴制。

1808年，俄、法两国皇帝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斯佩兰斯基给拿破仑的印象很深，拿破仑说他是“俄国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从埃尔富特归来以后，斯佩兰斯基在亚历山大左右居于主要地位。这一年，他奉命负责改革教会教育和编纂俄罗斯法典。1809年他起草两个法令，这两个法令使他作为一位改革家在当时被人们极端憎恶，而后来又被人们大加赞扬，其一为“宫廷高级侍从”法，反对宫廷中只是挂名而无具体责任的职位。另一项法令则规定：高级文官的提升必须通过考试或有大学毕业资格。由于遭到激烈反对，两项法令均未实施。不过，这两项法令使斯佩兰斯基仿佛成为贵族的死对头，其实他并不是。

同年，他向亚历山大提出了他的主要立法计划，即未被采纳的宪法草案。这个草案模仿1799年法国的执政宪法，对俄国政府的影响微乎其微。依照这个草案，沙皇政权建立在行政、司法、立法（或代议）这三个支柱上。这些支柱建立在各层次的基础上，从乡（几个村庄联合而成）一级开始，直到省政府一级为止。然后在中央达到顶点，由各个部与指导性的参议院合作，作为行政机构。参议院在司法方面作为最高和上诉法院；杜马（即议会）则作为代议制的立法机构。所有三权都直接从属于沙皇，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从属于为沙皇出谋划策的最高会议。在这一整套计划中，后来实行的只有一项建议，即重新设立了国务会议。斯佩兰斯基成为国务会议秘书，鲁缅采夫任会议主席兼帝国总理大臣。新形式的国务会议由于有沙皇亲自参加，一时似乎很有权威，而实际上，与之分庭抗礼的参议院、大臣委员会和各部本身，不久就重新获得优势。斯佩兰斯基在1811年改组各部（这时各部中包括一个警察部和一个外国宗教信仰部），实际上是他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就；其模式一直延续到1905的未成功的革命。

与此同时，斯佩兰斯基曾奉命准备进行财政和法律改革。他为此拟定的计划全都失败了。财政问题是与通货膨胀有关的预算赤字问题。整个欧洲的动乱不安，也使俄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提尔西

特体系并未带来安全，而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大陆封锁则同样地消耗国家资源。纸卢布的价值在1806年相当于银卢布的67%，而到1810年下降为25%。斯佩兰斯基曾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停发纸卢布无法坚持下去；发行国内公债和出卖未占用的公地的收入十分可怜；营业税和临时性的自估土地税的所得，与它们激起的怨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像俄国通常的情况一样，只有增加人头税和专卖伏特加的利润，使农民承受额外的负担，才在财政上得到成功。斯佩兰斯基编纂俄罗斯法典的初步尝试更没有使他增添什么名声。尽管他的草案充满拿破仑的思想，国务会议还是在1812年批准了它，但是它也始终没有得到公布。不过到了下一代皇帝在位时期，他付出巨大努力对繁杂的俄国法律进行整理、编制索引和摘要的工作，总算取得了胜利。

在保守的或者仅仅具有爱国热忱的俄国人看来，斯佩兰斯基实际进行和计划进行的，被说成是受法国人影响的改革，是提尔西特体系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沙皇指责他在高级官员中玩弄阴谋，言行不慎，或为人不忠，使他垮了台。早在1811年，卡拉姆津关于《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的著名论文代表了这种反应。这篇论文是专为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撰写的，几乎可以肯定，亚历山大曾经过目。^[19]对斯佩兰斯基的攻击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无疑可以看出，卡拉姆津指责沙皇从执政一开始就赞助的政策，就是斯佩兰斯基所持续推行的。卡拉姆津认为，叶卡捷琳娜的专制主义是尽善尽美的，因而要求保留和巩固她那个时代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他否定了为她的统治时代增添光彩的对外冒险活动，鼓吹孤立主义。真正使他不满意的，是以斯佩兰斯基为代表的政府官僚主义化；但是，只要俄国存在着一味仿效外国而无所事事的贵族阶级和半数以上受奴役的落后农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卡拉姆津之类的人就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其他好办法。俄国社会对与法国的联系越来越反感，这就需要有一个替罪羊；显然，俄国的政治舆论认为，1812年3月，斯佩兰斯基正是作为替罪羊而遭到革职、拘捕和放逐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在欧洲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在集结军队，俄国人想要伺机尽快打赢土耳其战争，以腾出部队投入西线。战争的直接原因与其说在意识形态，甚至战略方面，不如说在于贸易方面，这表明俄国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亚历山大在1812年4月写给恰尔托雷斯基的信中抱怨说：拿破仑要求我们中断“与中立国的一切贸易”，而自由进口“由于我们付不起钱而加以禁止的法国奢侈品”。在信的结尾说：“因为我不

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战争将要来临。”^[20]直到最后时刻，俄国人还对正在集结兵力的侵略者以礼相待，甚至在法军已经跨过俄国边境之后，还提议要举行谈判，求得妥协。当时，亚历山大已由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皇帝转变成一个俄国爱国者，在他心里，民族和自由的观念完全交织在一起，因而在写信给英国摄政王时，他把保卫受农奴制度束缚的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思想反对专制制度的……最后斗争”。

法国人的入侵增强了各个阶级的民族观念，可是并未促成全国的团结。在为时不久的战役中，无论是经验还是信念，均无团结可言。撤退战略是很高明的，对此，作为莫斯科地方长官一直鼓舞守城军队士气的罗斯托普钦在开始时就做了精辟的概括：“沙皇如在莫斯科，将会永远令人生畏；如在喀山，将会永远令人胆战，如在托博尔斯克，将永远不可战胜。”沙皇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人们并不欢迎；但是，当他离开军队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人们又认为这是玩忽职守。因为莫斯科是俄国牵动人心的首都，也是拿破仑明确的攻击目标，因此，当沙皇在斯摩棱斯克失陷以后驾临该地时，一时之间深得人心。在他召开的会议上，地方贵族献出300万卢布和8万名新兵，市民则捐献了1000万卢布现金，就连爱讽刺人的罗斯托普钦也记载说：“俄国人这一次……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介匹夫，想到他们受到外国桎梏的威胁，因此奋身而起了。”亚历山大赞同他的第一任指挥官巴克莱·德·托利的撤退理论，但是由于下面的将军们的抗议和公众的愤懑，他不得不让土耳其战争的胜利者、年迈迟缓的库图佐夫接替巴克莱的职务。库图佐夫被迫坚守鲍罗季诺虽然被后代子孙们看成是这场战争的巨大光荣，可是并未改变力量的对比，于是，他放弃了莫斯科。全市约25万人口，大概有不到1/5的人留在该城，不过并不是留下战斗；监狱被打开了，许多人已毫无气力。几乎可以肯定，放火烧城是罗斯托普钦所为；这是一个作战决策，它使拿破仑无法扎下冬营等候援军的到来。

莫斯科的灾难被舆论界视为耻辱，沙皇被某些人士指控为背叛。然而，那些怀疑亚历山大动摇或更坏的人，很可能是不公正的。亚历山大甚至申斥库图佐夫不该禀报拿破仑提出的条件，并且公开声称：“我宁肯到乡下去与我的最后一个农民一起吃土豆，也不能批准有辱祖国的条件。”10月7（新历19）日撤退刚开始，尽管库图佐夫不光

彩的追击办法抑制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结果还是可以预料的。俄国正规军伤亡惨重，因为他们几乎同法国人一样，并不习惯冬天作战。游击队员经常是在像《战争与和平》中的杰尼索夫那样的正规兵的指挥下奋勇作战，但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随着胜利的反攻，就连俄国没有文化的民众也产生了一种自豪和期望的心情。被沙皇誉为欧洲解放者的士兵们，期望在他们凯旋归来时得到社会的奖赏；在其他阶级中，也有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国家和沙皇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容易接受改革。但是，亚历山大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福音派的保守分子了。他后来说是莫斯科大火“照亮了他的灵魂”。1812年12月，他按照英国的模式创立了俄国圣经会；接着又与圣主教公会牧首戈利岑和另一个改变信仰的廷臣科舍廖夫组成一个虔诚的三人小组，假借共济会烦琐说教作指导。这些说教逐渐被吸收到这位沙皇最后阶段宗教信仰的东正教义中。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甚至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位强硬的维护王朝利益的政治家，能与梅特涅、塔列朗或卡斯尔雷以平等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在外交和享乐之余，他又往往沉溺于克吕德纳男爵夫人之类热心者的赞美声中，或者陶醉于容·施蒂林和巴德尔之类的德意志道德家的空想国际主义。这种精神状态造成的有形后果，是神圣同盟条约，条约的文本写进了一份帝国宣言，在教堂中宣读。

沙皇准备向波兰人做出让步，这使俄国民众更加感到希望破灭。1809年吞并芬兰以后，俄国的主张是让芬兰继续保留一些权利——赫尔幸福的不起作用的名人会议，或者几乎纯属礼仪性的议会偶尔开几次会。但是，在那时候，与波兰人不同，芬兰人不是帮助拿破仑蹂躏俄国大地的传统敌人。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拿破仑的华沙公国几乎完整无缺地交给了俄国，而就亚历山大来说，赐给波兰一部宪法，则是象征性地履行了他青年时代的一项许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人可能认为，这也许把他从别的承诺的压力下解脱了出来。依照这部宪法，通过把两国君主合为一人，波兰国家将与俄国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虽然恰尔托雷斯基曾经帮助起草这部宪法，并且领导过临时政府，但是第一位总督却是18世纪90年代波兰抗俄运动的一位老战士——扎亚切克。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成为波兰的独立军队的总司令，诺沃西利采夫则成为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高级专员。这

部宪法本身，像欧洲的所有宪法一样，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不过，从代表产生的方式来看，即使下院也将大部分席位留给了贵族。大臣在名义上对议会负责，议会可以请求总督立法，也可以延缓实施提交它的各种措施，而且确实也这样做了。宗教规定为天主教；官方语言为波兰语；所有官员都是波兰人；但是波兰农民如同俄国农民一样，依然是农奴。

在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会议波兰”体制步履维艰，但没有垮台。在亚历山大亲临议会的那些年，应该说是有成效的。麻烦在于民族的反感。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导致了监管波兰教育的恰尔托雷斯基与诺沃西利采夫之间的摩擦。更为严重的是爱国密谋活动，其中包括有军官，并联合了在俄国和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人，虽然规模都很小。其他集团与俄国密谋分子——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联系虽一无所成，但陆军的密谋活动却产生了它们的殉道者，并继续抵抗，一直持续到1831年的大爆发。波兰人的公民权引起俄国方面的嫉妒。1818年，亚历山大利用波兰议会开幕的机会，宣称波兰宪法是一个试验，他要将其推广到俄国，这更加激起了这种嫉妒情绪。另外，俄国人又不无道理地怀疑亚历山大抱有一种意图（始终未曾实现），即把立陶宛诸省分割给波兰，建成一个规模大的波兰，就像他把一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从瑞典获得的芬兰诸省割让给新的芬兰那样。总之，人们认为皇帝偏袒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外国人，这就加深了对于王朝的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然而，硬说亚历山大“仇恨俄国人”则是毫无根据的。他只不过是喜欢倾听众人发表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不喜欢有一批抱成一团的、唯唯诺诺的幕僚。

亚历山大回到俄国后，阿拉克切耶夫成为他最亲密的政治助手，虽然他在和平解决中并未发挥作用。当时的人由于对他仇恨而把他后来的权力和所负的责任夸大了，以致俄国人在编纂历史时也持此看法。他廉洁、专横而沉默寡言，被人们深恶痛绝，宫廷贵族把他视为恃强凌弱的暴发户，自由主义者把他看成肆意进行报复的反动分子。但是，俄国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事无巨细均由沙皇亲自掌握，即使在其他方面，也没有证据表明阿拉克切耶夫对亚历山大有什么影响；他仅仅被亚历山大所利用，日益成为沙皇与大臣们联系的中间人。

亚历山大与阿拉克切耶夫合作的历史象征，是建立军垦区制度。它似乎以土耳其边境上的奥匈定居地为样板，但任何一个俄国行政官

员都会想到这无异于哥萨克人的社会组织。1821年，斯佩兰斯基在一次答辩中，阐述了将团队与国有农民的村庄结合成一体种种好处。这会简化农民的财政义务，免除安顿军队宿营的负担，使家庭团聚，为农民提供劳力，使退伍士兵的生活有保障。这种制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第一次试验就导致放逐农民这一灾难性行动，因而遭到彻底失败。接着，在1817年，开始将部队与已有村庄合并，最多时曾涉及将近100万俄国男女老少。村民必须遵守军事纪律，一度甚至硬性规定年度生育数额，违者罚款；而军队除了训练之外，还应参加田间劳动，往往像农民一样怨声载道。1819年在楚古耶夫发生了叛乱，不得不加以镇压，阿拉克切耶夫以其一贯的残忍彻底执行了这一任务。然而，亚历山大对军垦区仍然很感兴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建议建立新的军垦区，并且提议禁止开设酒馆以便有所改进。尽管如此，军垦区受到人们的普遍谴责，在亚历山大的不像他那样空谈和空想的继任者统治时期，便逐渐衰落了。

军垦区制是对一种政治改革的拙劣模仿，这种改革在神圣同盟实行家长式的专制主义时似乎可以行得通。此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改革可言，沙皇的宗教也逐渐成为教权主义的东西，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具有代表性的是1816年的决定：戈利岑将圣主教公会牧首的职务与教育大臣的职务合二而一。1818年戈利岑发布的教育指示预示着整个俄罗斯蒙昧主义时代的到来。在各种科学中要优先发展应用科学，人文科学则要以争取民族更大的光荣为首要目标——与18世纪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也是彼得时代俄国教育思想的老调。但是，比较不一般的是，戈利岑坚决要求在科学教学中取消“关于地球起源和进化的徒劳无益的推测”。更引人注意的是，任命两个臭名昭著的官僚投机分子鲁尼奇和马格尼茨基分别为圣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的总监。这种越轨行径必然激怒贵族知识分子，为日后尼古拉进行更加不受宗教约束的镇压活动开创了先例。

由于沙皇把军队视为全国安定、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基石，因而当三个近卫步兵团之一的谢苗诺夫团于1820年发生兵变时，他的政治信心发生了极大的动摇。俄国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那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上校的胡作非为。这次事件表明军队中这两种成分之间的分裂。政治上的不满与其说是分裂的原因，不如说是它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当时有大批各种级别的军官被调到没有名气的部队，在其中某些部队

中，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趁机煽动不满情绪。另外还有来自外界的鼓动，这一事实使亚历山大重新部署他的政治和宗教防线，以对付“邪恶势力”。他竟将民族主义与革命的自由主义混同起来，1822年把亲希腊的外交大臣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免职。亚历山大向夏多勃里昂解释说，他已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上空看见了“革命的征兆”。与此同时，他进入了更加相信教士神权的宗教的最后阶段，这主要是受到修士大牧首佛提乌的影响，此人是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教士，阿拉克切耶夫的同伙。1822年，除亚历山大亲自创建的圣经会以外，所有秘密的和半宗教性的团体全被解散，亚历山大两个最老的朋友沃尔孔斯基和戈利岑被撤职，这都是阿拉克切耶夫和佛提乌两个人所为。

但是，尽管亚历山大已越来越适应当时通行的“王权与教权统一”的君主专制原则，但他在思想上仍然在改革阵营（毋宁说是已遗弃的营址）中坚守最后防线。从1816年以来，他似乎就已经知道在军官和其他年轻贵族中间正形成一些煽动叛乱的政治集团，最后导致十二月党人的兵变。但他似乎是这样对待策划中的密谋活动的证据的，即告诉瓦西里奇科夫将军说：“我一向助长这样的错误；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甚至迟至1819年，亚历山大还委任诺沃西利采夫起草一部宪法。结果，这部宪法比斯佩兰斯基10年前起草的那部还缺乏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引人注目之处是建立半联邦性的联省制。这样的权力代表制度曾经在某个地区的行政机构试行，但是整个宪法却迟迟未获准实施。另外，沙皇仍然打算废除农奴制，他不仅授意阿拉克切耶夫草拟解放农奴的计划，而且还审阅了颇有影响的《税收原理》的作者尼·屠格涅夫呈递的一项方案。

无怪乎屠格涅夫在同年加入了一个主要的革命团体，其中的贵族成员大多是机会主义改良派，既没有一定的策略，也没有一定的思想。这个团体是继1816年在首都近卫军军官中形成，最后联合成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发动十二月党人叛乱的那些集团而成立的团体之一。毫无疑问，正如俄国的共济会以及沙皇本人的宗教团体一样，这一运动反映了当代人喜欢结成秘密团体的风气。参加该运动的人包括俄国两个最有名的家族——特鲁别茨科伊和奥博连斯基——的成员。诗人雷列耶夫是其成员。普希金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是他的政治反叛诗却鼓舞了密谋分子们。

鼓舞这一运动的，似乎还有以下事实：如一位十二月党人说的：“从将军到士兵的各级官兵”，在战争期间目睹欧洲的自由与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导人之一的别斯图热夫对俄国状况的批评很能代表该运动右翼的观点。他谴责钳制言论自由，国内特务横行，对教育施加限制，司法和行政腐败，官吏压榨农民，以及他们对人力物力的浪费，酒类专卖以及可以想象到的其他财政错误，忽视产业阶级，教士愚昧无知，贵族阶级昏庸无能或腐化堕落（只有在军队和官衙中供职的优秀分子除外，而这些人也感到沮丧）。其右翼，大致也就是北方协会，支持尼基塔·穆拉维约夫所拟定的一个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受美国联邦主义者的影响，几乎没有创造性地反映出俄国的情况，尽管穆拉维约夫主张俄国独立于欧洲，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一个新的首都。草案规定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不拥有土地，因而享受不到与财产相关联的政治权利。保留皇帝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不过，之所以采取这种违背共和主义的措施，似乎是希望进行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具有更加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左翼的纲领性文件，虽然这个文件因为被查禁，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文件的起草者是一位年轻的上校团长、臭名昭著的不在任的西伯利亚总督的儿子保罗·彼斯捷尔。它以俄国最古老的法典命名，称为《俄国法典》。但实际上，与其说它具有历史性质，不如说它更具有原始法西斯的特征。它规定实行普遍选举权和每年进行直接选举，这就给人以一种民主的假象，但它规定把一个扩张中的帝国完全俄罗斯化，波兰人在某些条件下才能获得自由，将犹太人放逐，明文规定设立政治警察，禁止组织政党，把教士纳入一个“行政部门”——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国社会专制主义的东西。佩斯捷利认识到俄国在兴起一个“财富贵族阶级，这个阶级比封建贵族阶级有害得多”，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先兆。

在这两个团体中，都有一些成员大胆采取俄国的传统手段——暗杀沙皇。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在1825年12月1日（新历）逝世，他们认为转移权力的机会已经到来。在亚历山大临终之前，本来已经了解密谋分子即将采取行动，然而，阿拉克切耶夫因一场家庭悲剧而无暇他顾，没有采取对策。于是，密谋者得以利用亚历山大死后的三周空位期。这次空位期是由于亚历山大秘密指定继承人造成的。王储康斯坦丁在与一个波兰平民女子结婚后，放弃了他的皇位要求；1823年，亚历山大临时指定他的弟弟尼古拉为继承人，而委托最高行政机关和教

会机构执行上述指示。可是，当他的死讯传到首都后，没有一个人敢去执行这一委托事项。尼古拉大公因为没有与康斯坦丁预先商定，为了慎重起见，他宣布后者继位。可是康斯坦丁不承认这一步骤，不愿离开华沙。最后，尼古拉决定宣告自己即位，于是，已经向康斯坦丁宣过誓的军队又重新宣誓。北方协会的“青年校官们”看到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机会，12月14（新历26）日，这些“十二月党人”把他们的近卫军带到皇帝阅兵的海军部广场^[21]，举行兵变。在那里，他们与忠于皇帝的部队面对面地相持着，几乎未放一枪（只是开枪打死了正在谈判的首都军事长官）。后来，尼古拉调来大炮用圆形炮弹进行轰击，把广场上的人们驱散。实际形势比看上去更为间不容发。旁观的人群都站在起义者一边，忠于皇帝的军队稍有动摇，十二月党人就会赢得胜利。另一方面，南方的激进分子接着也单独举行毫无成功希望的兵变，结果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因此，这次不成功政变的影响，只不过是阻碍了俄国历史的进程而已。

十二月党人起义，无论在动机或纲领中，自由意志论都不占支配的地位。相反，它与20世纪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地区所发生的军界知识阶层的起义相似。他们对国家复兴的要求倾向于民主形式和扩大公民权利，这与其说是为了争取天赋的正义，不如说是顺从当时风行的各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理论。他们抗议种种社会罪恶，普遍抱怨的基本上是俄国停滞不前。根据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水平、公共道德和发展情况，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并非拿所有欧洲人的水平来看都是如此——即使人们忽视（俄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普希金却没有忽视）这样的问题：一个俄国农奴的日常生活命运和人的尊严是否就不如一个英国的磨坊工人？因为当时有一些居于领先地位的成就，从普希金在文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到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罗夫机器和纺织工厂的成功，都说明俄国发展中始终存在着悬殊的差别。另外，俄国在与西方角逐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军事和外交上的重要地位，十二月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由于他们作为士兵，了解到国家的荣誉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应征入伍的农奴，而他们深以为憾的是，这些农奴是用他们所痛恨的德意志方式加以训练的。

其实，在过去25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帝国与其说扩大了疆域，不如说提高了威望。在欧洲，除了把沙皇的主权扩展到芬兰和内波兰以外，俄国只是根据1812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取得了比

萨拉比亚。在亚洲，沙皇保罗于1801年兼并了格鲁吉亚，取代了原来的保护国关系。由此，俄国把高加索的悍勇部落囊括在它的管辖之下，从而激起了一场游击战争，到了下一代君主统治时期，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抵抗运动，牵制俄国军队达25年之久。提尔西特时代，在格鲁吉亚以南爆发了与波斯和土耳其的零星战争，使俄国取得了直到纳希切万以东的阿拉河边界的大多数小汗国，其中包括巴库。另外，根据1813年的古利斯坦和约，俄国取得了对里海的控制权和贸易地盘，这种贸易地盘后来根据1828年的土库曼查伊条约加以扩大，使俄国支配波斯北部的经济和政治达一个世纪之久。在帝国的亚洲疆域内，由于斯佩兰斯基进行“修正”的结果，西伯利亚开始进行行政改革。1819—1822年，他被派去担任总督和巡阅使，这既是他继续受宠，又是他继续失意的标志。他的条陈被纳入1822年的三项法令，直至1917年，这些法令一直主宰着西伯利亚的命运。

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正常标志，而且有官方记录可查。^[22]虽然考虑到使用农奴的农村庄园工场和家庭工业相互重叠，因此工厂劳动力的分类有武断之处，但是这些数字相对来说是很重要的。^[23]制造业（工厂），即不包括采矿和冶金，雇佣工人从1804年的约10万人（1799年为8.2万人）上升到1825年的21万人左右。增长主要在纺织业方面，1814年，纺织工人占工厂工人的75%。棉纺织业的雇佣工人从1804年的8000人增加到1830年的7.6万人；毛纺织工人在同一时期从2.9万人增加到6.7万人，亚麻纺织业（大陆封锁期间，由于停止进口，它未得到任何益处）的工人在同一时期从2.4万人只增加到2.7万人。正如暂时禁止从英国进口纺织品促进了新生的国内工业的发展一样，中止向英国出口铜和铁却使采矿和冶金业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在这期间，由于长期失去了英国市场，雇佣工人一直保持在12万人左右，几乎没有增减。

从各方面看，棉纺织业都是最先进的工业。自由雇佣工人的比例，与总平均占50%左右相比，棉纺织业最高（1825年达95%），不过其中许多人是农奴，以代役租的方式（见原文第496页）出去做工，特别是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雇主中的某些人和大多数的雇佣工人似乎都是舍列梅季耶夫家族的农奴。棉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也最高；1828年，9家工厂共有3万个纱锭。雇用4000名工人的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罗夫工厂，18世纪90年代进口了英国机器，1805年引进

了蒸汽机，1825年全国共使用大约2000马力，而该厂一家就使用170马力，1828年，《贸易与制造业杂志》声称，亚历山德罗夫工厂“无疑可以与英国最好的同类工厂相匹敌”，^[24]这种对民族工业的自豪感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一些守旧复古的民族主义者和商品出产者害怕劳动力的流动，因而反对工业化，他们的反对有一定影响。但是，他们遇到的是像《俄国人——十足的制造商和工厂主》的作者所提出的那样的告诫：“难道英国的勋爵们，英国的贵族阶级不如你们高尚？可是，他们经营商业……”^[25]

官方的政策是进步的；比如，颇有影响的莫尔德维诺夫说，农业的进步取决于工业的发展。丝毫没有人像梅特涅那样害怕工业会产生一个具有新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标准的资产阶级。政府开设了一家商业银行，虽然俄国的信贷银行（接受农奴为抵押品）仍然为贵族所独占。政府从事工业宣传，发起建立工业和商业协会，创办技术学校和商业学校，举行全俄工业展览会，并且发起组成1818年的帝国农业协会，有力地加强了叶卡捷琳娜大帝1765年建立的“自由”经济协会。

但是，在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领域，如对外贸易和国家税收，发展并不显著。政府也许过于担心纸卢布的贬值。在1814年，纸卢布的价值为银卢布的20%，从1816年直至1840年卢布重新正式得到稳定，始终停留在25%左右。即使将浮动因素考虑在内，从1807年至19世纪30年代，尽管发生战争，预算收入的变化很小（1829年为4.19亿卢布）。这些收入主要依靠缴纳人头税和销售伏特加而从农民那里征收的钱。在同一时期，对外贸易成交额总是有很大的顺差，每三年平均增长约25%（1814年为3.07亿卢布，1826年为3.84亿卢布）。1819年实行十分自由的关税，此后连年出现大量的赤字；1822年有意加以调整，转而实行高额保护关税。

19世纪头25年的经济发展，当然只是触及俄国农村的皮毛，就全国人口的统计情况来看实际上并无变化。1807年，由于铁矿和铸造业不景气，大部分有归属的劳动力被遣散，但是这些工人又回复到当地农民的地位，并没有迁徙他处。在像莫斯科省那样的先进地区，18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流动现象开始显示出来；无论工业还是农业中，散工大量增加，城市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农民”登记的（19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占40%）。罢工和工人暴动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苏联的历史学家们对此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与农民起

义一样，从起因到事件的发生，几乎全是地方性的。似乎可以相信的结论是：两种现象基本上相似，而工人呢，正如列宁所说，“尝到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不适当发展的最大的苦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实际上属于农业史的范畴，而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史前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月党人的意识形态中，产业工人的问题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随后的两代的革命的和改良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宣传运动也毫无关系。他们一心想着的是俄国群众中的农奴制度，这与他们自己的西方化思想形成鲜明对照，使他们在文化方面的精神分裂症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孔致礼 译）

[1] 编者和作者感谢J. 弗兰克尔博士对本章做了某些删节。将日期从旧（儒略）历换算成新（格列）历，18世纪需加11天，19世纪需加12天。例如：1796年11月16（27）日；1801年3月11（23）日。

[2] 这些数字以及下边的数字都很武断，但与当时人和最近的历史学家们根据缴纳人头税的统计数字而作出的分析相吻合。

[3] 应该指出，强逼为妾的事情虽然司空见惯，但始终是不合法的，为社会所不容。

[4] A. G. 拉辛：《一百年间的俄罗斯居民》（莫斯科，1956年），第25、28—29页。P. A. 赫罗莫夫：《十九至二十世纪俄国经济发展史》（苏联，1950年），第79—84页。

[5] P. I. 利亚先科：《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经济史》（1952年）第1卷，第362、402页。

[6] 本文作者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371页曾把“周役”（barshchina, week-work）误译为“恩役”（boon work）。

[7] R. 波塔尔：《十八世纪的乌拉尔》（巴黎，1950年），第374—376页。

[8] P. I. 利亚先科：《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经济史》（1952年）第1卷，第415页。

[9] M. 拉耶夫：《帝俄的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海牙，1957年），第121页。

[10] 亚·尼·拉季谢夫：《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R. P. 塞耶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1年）。

[11] V. A. 米亚科京：《俄国社会史片断》（圣彼得堡，1902年），第221页。

[12] 杰尔查文的长诗《费丽察颂》是赞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英国诗人斯宾塞的长诗《仙女王》中的主人公格洛里阿娜（意为“光荣女王”），是赞颂伊丽莎白女王的。——译者注

[13] N. K. 希德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圣彼得堡，1904年）第1卷，第279页（附录）。希德尔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的大量推测与假想都是十分武断的。

[14] 《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圣彼得堡，1839—1843年）第24卷，第17909号。

[15] 1801年5月9日谈话笔记。希德尔：《亚历山大一世》第2卷，第343页。

[16] 维齐拉特（Vizirates），土耳其政府的“部”。——译者注

[17] F. F. 维格尔：《回忆录》（莫斯科，1928年）第1卷，第298页。

[18] 季沃夫为皇帝写的备忘录，见T. 席曼《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史》（柏林，1904年）第1卷，附录2。

[19] 尼·米·卡拉姆津：《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R. 派普斯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

[20]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圣彼得堡，1912年）第1卷附录，第363页。

[21] 原文如此，按一般史料应为参议院广场。——译者注

[22] 例如赫罗莫夫的《经济发展》中作为注释引用的内政部和财政部1804—1822年的报告。《经济发展》，第49页，注1；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杂志》的各期。

[23] 最近J. 布卢姆做了修正，见《俄国的地主与农民》（普林斯顿，1961年），第323—324页。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莫斯科，1956年）第496页及以后各页的评论适用于更晚的年代。

[24] P. A. 赫罗莫夫：《十九至二十世纪俄国经济发展史》（苏联，1950年），第52页，注1。

[25] 引自1812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德文书。转引自V. 吉特曼所著三卷本《俄国历史》（苏黎世，1944—1949年）第2卷附录，第528页。

第十九章 1798—1830年的近东和奥斯曼帝国

“近东”一词有时仅指介于地中海和各种定义的“中东”诸国之间的伊斯兰土地。在本章内，该词用以泛指所有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大致为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通称“利凡特”的地区；每当论述欧洲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时，都必然涉及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一些部分及其亚洲的近邻。这个正在衰微但实力依然很强的帝国，其各个部分的命运均有异常紧密之联系，以致难以把埃及的事务与希腊的、巴尔干的、多瑙河下游的事务，或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事务截然分开。欧洲强国的贸易和战略活动渗透了所有这些地区——有主要为了地中海海上利益而来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有主要活动在土耳其陆地边缘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但是在每个方位都有许多相互的接触和对抗。最后，当代欧洲人的技术、习惯和思想对整个近东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产生瓦解或恢复的影响，这种影响起源于（甚或也多少激发着）上述的渗透，反过来又使渗透加速。

在这一缓慢的过程中，欧洲各国在对伊斯兰的关系上，同多而异少。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国使节虽然互相竞争，甚至公开敌对，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总比与土耳其扑朔迷离的宫廷官员之间有更多共同的东西；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的西方领事和商人们，在土耳其的帕夏们看来，甚至在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商人看来，依然都是“法兰克人”；在1800年左右，埃及麦木鲁克王朝的贝伊们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只不过是完全一样的外国药品的两种不同牌号而已。1827年发生了这样的情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军舰一起驶入纳瓦里诺湾进行挑衅，未经宣战就摧毁了停泊在那里的由玩忽职守的司令官和几个欧洲技术顾问所指挥的、处于消极防御状态的土耳其—埃及舰队。这一事件虽然错综复杂，但是比起1800年俄国和土耳其联合保护爱奥尼亚群岛，或者50年后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联盟关系来，更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情况。纳瓦里诺海战（见本书原文第549页）是政治上的一个反常现象，但却是19世纪上半叶的时势所趋的一个象征性标志。

不能以强国之间在政治和商业上的冲突的枝节问题来掩盖欧洲向近东冲击这个共同因素。从政治上讲，列强相互之间的敌对比对伊斯兰的敌对更甚；可是，从更为深刻、更为长远的意义来看，它们的联合行动引起一场缓慢的革命，多年以后，这场革命促使这些地区从阿尔及尔到阿富汗、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到喀土穆起来反对欧洲的政治统治，并且部分地使用从欧洲借用的方法和原则来这样做。

其次，应该记得，欧洲只有极少数人熟悉近东，而访问过那些国家的人就更少了。直到1789年，关于土耳其的书大多描述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它也许易于受到可能的进攻，容易从内部崩溃，但静止不变、自我克制、对外来的影响不太敏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以后，类似的书籍反映出一种更为大胆的侵略腔调，把土耳其说成是欧洲战争和外交的又一个舞台，说成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积极的变革之风不只从外部吹来，而且从内部刮起（塞里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对古老的奇闻逸事的讲述继续存在，但掺杂着更多的军事、政治和商业的构想。在直到1830年左右，在轮船、铁路和电话的时代到来之前，为了好奇和玩乐而前往旅行的人很少，而且往往带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外交家以及陆海军的人员通常靠译员去了解人物和事件。公文和各种消息只是很缓慢地向各个方向传播；新闻往往在途中受到歪曲，命令或者报告不等到相应的决定生效，事情很可能已发生变化。

在动荡不定和重新形成的近东，战争的长远影响无论怎么说都不算过分。在欧洲，谈论奥斯曼帝国的衰败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文案柜里充满了瓜分它的计划——有些空想成分多，有些空想成分少一点；不过，它们大多只是吞并若干省份的计划，很少或根本不考虑那里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或者那里的居民，甚至那里的地方政府可以起重要作用，或者如何形成他们对自己前途的主张。富裕的希腊人中间的文艺和教育的复兴（见本书原文第545—546页）起初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在人民中间也没有引起反响，也许只是朦胧地希望，有朝一日东正教会可能以十字架取代大清真寺圆顶上的新月形，这个清真寺原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许，这种事要由东正教俄国的代理人来实现，如果俄国愿意的话；但是，俄国的主要兴趣必然在于同它那向前推移的边界毗邻的土耳其省份——亚洲的亚美尼亚，欧洲的多瑙河各公国（大致相当于“罗马尼亚”）和位于巴尔干山脉南北两

面的鲁梅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保加利亚”）。这些省份都毗邻黑海；18世纪80年代，俄国人已经控制库班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北岸；20年后，由于征服了高加索，俄国人又控制了黑海东岸的大部分地区。1796年建立的敖德萨新港，在担任总督的法国流亡贵族黎塞留公爵（不久即成为路易十八的大臣）的有效统治下（1803—1814年）迅速发展起来，在俄土战争（1806—18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黎塞留使敖德萨与土耳其一直保持着兴旺的贸易关系。到1814年，敖德萨已经有来自各国的4万居民，在黎塞留兼任总督的黑海沿岸地区，俄国人、德意志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混合定居，人数相仿。^[1]但这些地区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多半是打着中立国的旗帜进行的，而相对来说，俄国在黑海中的海军力量此后多年一直处于初创阶段。

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非常少，跟基督教徒一样，穆斯林在每个地方都由他们的信仰联结在一起，而不拘教派的分歧。直到晚近，对于土耳其人来讲，正如很早以前对于阿拉伯人来讲一样，伊斯兰教依然是献身于扩展他们的疆土的武士们的信仰。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律》里所包含的信仰及其道德准则，由谢赫·乌尔·伊斯兰领导下的教律权威们加以阐释。土耳其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种族，他们只不过是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讲土耳其语的非穆斯林并非土耳其人。在20世纪以前，土耳其人从来不用欧洲人笔下的“Turkey”（土耳其）字样。“奥斯曼”指的是一个王朝，在奥斯曼帝国内，苏丹的臣民包括属于上等的穆斯林群体（米列特）和属于次等的但是有用的、容许其保持自己信仰的非穆斯林群体——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和犹太人的群体。一个非穆斯林户主一般要缴纳人头税，并按传统献出一个儿子为苏丹服役，这项贡奉在1700年以前已用纳税来代替。在帝国中，以伊斯兰为国教，可以皈依，但永久不能背弃。《伊斯兰教律》还有两条原则限制土耳其人政府和对西方的外交关系：第一，在处理反叛者时无须法律程序；第二，在伊斯兰统治下的土地，只能在战败时割让，不能在谈判中送给别人。

土耳其很早就有了印刷机，这是犹太人（1493年）、亚美尼亚人（1567年）和正教徒（1627年）为了自己使用而引进的。可是获准用土耳其文印刷的第一个印刷所（1727年）拒绝印刷宗教和法律书籍，

它只印了不到20种书，就在1742年被封闭达40年之久。抵制西方思想的主要是教律权威和禁卫军，禁卫军原来是苏丹从基督教臣民中精选出来的少年护卫，但是这时已是一群超特权的世袭寄生虫，很少或者全无军队纪律。禁卫军无论在宗教方面或世俗方面都有感到惶恐的理由，因为18世纪的苏丹们和他们的大臣开始认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而法国顾问们也要求他们这样做。陆军和海军技术学校有时开办，有时关闭；第一个认真尝试进行激进改革的是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但受到反对派的阻挠，结果他本人被废黜，主要的改革者被处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只得等待时机，后来他认为自己在国内已经足够强大，终于可以镇压禁卫军（1826年）和再次进行陆军的改革了。但为了镇压希腊人的叛乱，他的改革已经为时太晚，而为了复兴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帝国，那就更嫌太迟了。因此，在他死后，他所期望的军事改革与技术改革，只得在1839年开始的改革（坦志麦特）时期，与更加不合味的一服苦药——西方立法混合到一起。然而，19世纪技术改革的成功未必能长期阻挡1789年以后西方其他影响的浪潮。帝国依然是中世纪的封建结构，所受官僚制度之累甚于任何中世纪的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加重了负担，农业受到捐税的阻碍，工业也为经济萧条和欧洲人豁免权所拖累。从亚洲和西巴尔干征召的穆斯林士兵从来不太缺乏；但是苏丹们已经不再是战场上的领袖，而成了官僚政治的囚徒。帝国中最富有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还是希腊银行家和首都的官员也好都是非穆斯林，因而都是二等臣民。正教在帝国中虽已被驯化，但不算大家庭的成员，它的教士几乎跟伊斯兰教学者一样，对西方一向抱怀疑态度。

大多数省份都完全不像一个统一的帝国的组成部分。有些地区久已脱离，徒有省份的虚名而已；苏丹对于1783年丢失克里米亚只能作微弱的反应，而在1830年丢失阿尔及尔的时候已经毫无还手之力（见第十卷第十六章）。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之间，其他一些地区的隶属关系被打破或削弱了。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忠心耿耿，但这并不意味着服从中央政府，尤其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中央政府。马哈茂德二世曾力图恢复他对尚未分裂的各省省长的控制；但在欧洲，即使穆斯林更占优势的地区，如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也由于山多地荒而不易统治；在亚洲，即使是安纳托利亚这一最土耳其化的和最可靠的地区，也有它自己的麻烦。安纳托利亚几乎未受欧洲的直接干预，但是它受到东方的库尔德部族的干扰，并受到征服高加索和土耳其亚美尼亚的俄国

人的远距离威胁。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波斯人，一向与正统的逊尼派土耳其人不和，而且经常由于更多的政治原因同他们打仗。在这一时期，波斯因受俄国的沉重压迫，对土耳其不可能有任何的危险性；在两次战败之后，它不得不在古利斯坦条约（1813年）和土库曼查伊条约（1828年）中向俄国作出许多牺牲。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与英国在波斯进行对抗，波斯国王坐收渔利，他从双方接受大批津贴，而未对任何一方承担义务；但是，两个敌对的巨大代表团在德黑兰出现了，它们以缔结排他性政治同盟为条件，给予波斯国王金钱和军事援助，这标志着西方在中东和中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见本书原文第532页）。由于法英两国的活动是反对俄国的，所以苏丹不是不欢迎的，但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即便是他的那些亚洲省份，也将因为接近欧洲强国在亚洲的“大竞赛”而危险万分。^[2]

法国对埃及的一次入侵，虽然在以后的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符合过去30年所兜售的思想，但是完全切断了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各项传统政策——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根据关于外侨权利的协定，在拉丁基督教徒的庇护下保护法国商人，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法国虽然有其商业上的优势，但1789年，它在土耳其的威信是很低的；法国人对他们的老盟友的价值日益怀疑起来，丝毫也不去阻止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侵略行动，只要他们的另一个名义上的盟友奥地利不成为赔偿的东西就行。^[3]促使法国重新考虑对东方贸易的是雷纳尔和沃尔内一类的作家，以及马加隆和在开罗的其他马赛商人的请愿书（1790年起），那些商人详陈这样的前景：如果使埃及成为法国东方贸易的货栈，就可以推翻英国在印度的霸权。也有一些英国人鼓吹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以粉碎法国人的计谋。但是这些热心人士的活动和警告，由于两国政府不肯或者反对承担任何重大的风险，由于两家东印度公司害怕通向印度的捷径会损害它们的利益，就都被压下去了。1794年，英国驻埃及领事与麦木鲁克王朝的贝伊们议定一项条约，但是外交部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被召回国，而且枢密院已于1790年决定，无论如何要反对取道苏伊士发展贸易的企图。巴黎的革命政府起初打算维持原有的政策。1793年，年轻的波拿巴自愿以炮兵专家的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对方没有批准；但是，那里非正式地接受了一个法国使节，两年后，苏丹仿效普鲁士的榜样，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并派遣一个使节前去巴黎，请来几名法国军事教官。在他的

土耳其顾问中，有少数人已经力主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和国库，以及与欧洲国家结盟，简言之，就是在1801年新法令中所体现，并在此后多年不断追求的“新面貌”^[4]。

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连连胜利（1796年），使他和督政府的几个成员把视线转向东方的希腊和埃及。他的未来的两位元帅奥热罗和朱诺都娶了希腊女子为妻，所以当他派遣一个科西嘉希腊人到迈诺特人（“斯巴达人”）中间去宣扬他的威名时，这两位也都参加了。波拿巴称赞爱国诗人里加斯（见本书原文第545页），并安排在伯罗奔尼撒散发一份宣言，而且提供武器。他还派了一个代表到伊皮鲁斯，去见亚尼纳的狡诈而有野心的阿里帕夏，不久，法国人就出现于邻近的爱奥尼亚群岛（见本书原文第535页）。纵然督政府看到波拿巴扬威海外也许感到高兴，但是敦促督政府远征埃及的也还是他；塔列朗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的关于新殖民地（其中指明埃及）的益处的论文（1797年7月）鼓舞了他。波拿巴回到巴黎，就于1798年1月开始制订详细的计划；他和塔列朗（这时任外交部长）逐渐说服了督政府。集结在土伦的远征军伪装成“征英格兰军的左翼”。4月12日，波拿巴奉命占领埃及，以“确保共和国独占红海，在红海中自由航行”，并去调查开凿一条把红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的运河的可能性。

5月，舰队起航（其时正值爱尔兰发生叛乱），但是塔列朗认为土耳其可能默许，实属错误。的确，当法军占领马耳他、亚历山大和开罗的时候，除了英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各国政府尚在犹豫之中；然而，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得胜（8月1日）的消息促使苏丹准许俄国的一支海军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向法国宣战，并与俄国和英国缔结盟约，同时俄国也与英国结盟。奥地利由于害怕失去它在意大利的最后立足点，也于1799年1月被拉过去了。波拿巴的埃及冒险由于特别危害所有上述国家的利益，因而就产生了一个终于把法国排挤出东地中海区的联盟——这可以说是1840年事件（见第十卷原文第254—258、429页）的一次演习。即使同俄国结盟（1807年），也无法挽救拿破仑在东方的挫折。阿布基尔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失败不能归罪于拿破仑和他的舰队司令，而是由于海军处于无准备状态，由于纳尔逊好运当头和勇敢过人。^[5]督政府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不到一个月便拒绝派遣援军。不错，由于法国军队这时已经回不了国，督政府曾经建议（11月4日）他们开往印度或者君

士坦丁堡；但是，它不曾提出计划或者进行援助，连援助的希望也没有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拿破仑在未经与巴黎磋商而率军进入叙利亚时（1799年3—6月），就曾打算进行这样的冒险。督政府的建议到达时，他已经兵临阿克，并且早在2月，他就已经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即切断英国舰队的补给线，保障埃及的安全，迫使苏丹默许。占有埃及的强国也渴望获得叙利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即使阿克已经陷落，拿破仑知道，扩大版图的迷梦和他的随员的故弄玄虚，都与实现他力所能及的事业的具体计划不尽相同。在从叙利亚回师时（1799年7月），他击败了一支土耳其舰队和陆军，他忙于整顿上埃及和下埃及，对当时督政府的减少损失的意图不以为然；然而总的前景是暗淡的——科孚岛已于3月沦于俄土联合舰队，法军几乎被逐出意大利。他于8月秘密启程返回巴黎时留下命令说，如在5月以前不见增援，则与土耳其（不是与英国）谈判撤退问题；然而，他的缺乏斗志的继承人克莱贝尔早在1800年1月便接受了谈判条件，旋因战争重起，这些条件遂告失效；克莱贝尔去世时，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梅努将军对于使埃及成为法国殖民地的前景较有信心，并抱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信念，即认为英国可能默许。与此同时，法国在欧洲的希望也正在复活，当时已是第一执政的拿破仑同意梅努的看法。他立即着手同俄国就瓜分土耳其帝国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谈判拖延了好几个月。变化无常的沙皇保罗一世实际上退出了反法战争，同意实行针对英国的武装中立（1800年12月），甚至轻率地派遣俄国分遣舰队参加俄法联合对印度的入侵。连奥地利也似乎对瓜分土耳其感兴趣。可是保罗一世从未同意让法军留在埃及，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因他的遇刺（1801年3月）而破产。拿破仑又立即开始同英国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心先把法国人逐出埃及，并责成土耳其为他们火中取栗。梅努阻挡不住英国人在3月的登陆，遂于9月被迫投降和撤走。10月初，英国、土耳其和俄国分别与拿破仑达成协议（前两者系初步协议，直至1802年3月和6月才分别达成正式协议）。埃及将重归苏丹手中，但这并不妨碍苏丹请求英国人帮助它重振自己的权威，并留驻英军以便保护它不受法国的欺凌。在此期间，英国司令官也大力支持麦木鲁克贝伊们旧有的统治秩序（或者可以说是混乱），英国军队既无法与苏丹达成妥协，又无法保证有效地取代法国人的行政管理，遂于1803年3月撤走，此后不过两个月，英国和法

国重新开战了。土耳其人和贝伊们毕竟都没有统治的能力，埃及的未来有待于穆罕默德·阿里来主宰。

直到1798年为止，英国政府对埃及没有表示多大兴趣。法国的征服改变了这一切，而在英国当局，除了邓达斯和他的几个“伦敦—印度”顾问以外，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征服。邓达斯立即下令派遣一支印度部队前往丕林岛（不久转移到气候比较适宜的亚丁），叫他们封锁住红海口。他们与当地苏丹签订的条约（1802年）成为日后吞并亚丁作为加煤港口（1838—1839年）的口实。1801年，一支印度分遣舰队开到红海西岸的库塞尔，但为时已晚，未能参加把法国人赶出埃及的战争，不过也在表明，如果从埃及入侵印度的话，法国的失败可能更惨。英国海军一直监视着法兰西岛（毛里求斯），1810年把它占领。在波斯湾，东印度公司通过条约把法国人逐出阿曼，并在马斯喀特留一个驻扎官。他们在巴格达的驻扎官公署（从1798年起）变为永久性的（1802年），不久（1802年）又兼管过去在巴士拉设立的领事的工作，新官衔是“驻土耳其阿拉比亚政治代表”。马尔科姆率使团去德黑兰（1800年）缔结几项条约，波斯不很确实地答应拒绝接纳法国人（见本书原文第529页）。伦敦和印度之间建立通过阿勒颇和巴格达的正常邮务（1802年起），过去递送重要公文偶尔用过这条路线。1809年与阿富汗国王签订了一项条约。这些有力的措施，再加上提普·苏丹在迈索尔的战败和阵亡（1799年5月），就使英国人有信心去反对法国人染指印度的任何企图或者接近印度。实际上，英国的恐惧和法国的期望并不完全集中于这种史诗般的功业，而是集中于法国对埃及加强控制所产生的长期后果。因此，法国人在1798年的冒险就不只是从沉睡中唤醒埃及，而且还激发英国人采取更为积极的、从马耳他向东发展的前进政策。

法国学者在埃及的活动受到普遍赞扬，而且后来都收录到卷帙浩繁的《埃及纪实》^[6]里。其中包括工程师勒佩尔关于开凿一条运河的著名《研究报告》，^[7]他根据一次草率的勘察，似乎证实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红海海平面高于地中海海平面的论断，于是主张以最低代价开凿两条带水闸的运河（苏伊士—尼罗河、尼罗河—亚历山大），这样便能使通往本地治里的路程缩短一半，时间减少25%，只要这条路线能为欧洲在埃及的殖民地所保有。当时，埃及人颇为拿破仑坚持向伊斯兰教表明敬重所感动（这并不为他的某些幕僚所欢迎），而且最打

动埃及人的是，拿破仑不倦地宣传这样一种想法：土耳其人是堕落不堪的暴君，而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教律和传统的真正宝库。这是一种埃及民族主义的萌芽，到许久以后才开花结果。英国占领（1801—1803年）的主要目的不外是在战争期间把法国人赶走，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法国人的威望并未被忘记。在1803—1807年的内战期间，法国和英国的领事都在积极活动，但唯一的受益者却是穆罕默德·阿里（1769年出生在马其顿，与拿破仑和威灵顿同年）。他控制了苏丹的一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这使他能以巧妙的手段自立为开罗的帕夏（1805年5月），后来又被苏丹承认为埃及的帕夏（1806年10月）。苏丹承认拿破仑为皇帝（1806年），而且当时拿破仑显然已是欧洲的霸主，这促使英国内阁唯恐法国卷土重来而下令重新占领亚历山大（1807年3月）；但是远征军指挥无方，拿破仑与俄国结盟（7月）又暂时破坏了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而穆罕默德·阿里却深谋远虑，以留有和解余地的条件，通过谈判使英军撤退（9月）。

现在，这位帕夏第一次成为亚历山大的主人，他知道英国人控制着地中海，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在地中海为英国船只和军队提供给养，做了一笔好生意，而且取得了谷物的垄断权（不久又垄断其他商品），使他的财库收益很大。他没收或再度征收了地主和寺院的财产，建立一支由于定期发饷而颇为可靠的军队。在以背信弃义的大屠杀（1811年）粉碎了麦木鲁克的贝伊们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当时，穆斯林的清教派——瓦哈比派已经控制了麦地那、麦加和汉志，并在阻挡一年一度的朝圣。他向瓦哈比派发动进攻，既是执行苏丹的命令，又为自己捞到宗教的和政治的威望。经过野蛮而代价高昂的斗争（1811—1818年）之后，他（和法国顾问们）取得胜利，为他尚武的儿子易卜拉欣弄来苏丹的任命状，使易卜拉欣成为汉志甚至阿比西尼亚的名义领主；这至少意味着他能够要求委派红海两岸某些港口的地方长官，对阿拉伯半岛和苏丹运往印度的产品征收税金。接着（1820年），他从埃及直接进入苏丹去搜寻奴隶和黄金，但奴隶不能当兵，黄金也大失所望。然而，他对苏丹保持着一种不甚稳定的控制，包括尼罗河东西两岸，直至喀土穆以南300英里左右。苏丹尽管统治腐败、残酷而且长期骚乱，但也断断续续得到发展，并开始把开罗看作它的文化上的麦加。喀土穆在1820年还是一个小村庄，到1883年已有约5万人（2/3以上是奴隶）；在英国占领期间，到20世纪50年代，其人口增长到50万。

穆罕默德·阿里的成就首先受到英国人的欢迎，因为英国人的印度贸易在红海上受到瓦哈比派海盗的骚扰。据总领事亨利·索尔特的看法（1816年），“帕夏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商人，他完全依赖我们的仁慈，他的税收现在主要仰仗贸易……”这种贸易随时会因封锁亚历山大或者他的红海港口而中断。但是，他偏爱法国顾问们，他的野心不断增大，这引起了伦敦和君士坦丁堡的不安。他从1819年起就聘用法国上校塞韦，此人化名苏莱曼帕夏，在阿斯旺训练一支新模范军，先是从苏丹，然后又从在此以前并不好战的埃及农民中征兵。他已经在红海集结一支有用的舰队，从1821年起，他在地中海开始拥有一个海军中队。至于工程师、考古学家和教师，他也优先雇用法国人，他挑拨法国反对英国，又挑拨法英两国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干涉。他与大多数征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现实主义的克制精神，知道如果英国与他为敌，他便无法与苏丹公开决裂或把苏丹作为攻击目标；他企图安抚所有三个方面，因而不情愿地去插手希腊（见本书原文第548页）和后来插手叙利亚（第十卷原书第428页），但是，他从两次挫折中恢复过来了，而且创立了一个王朝，在他于1849年去世后，这个王朝又存在了100余年。

如果说穆罕默德·阿里使埃及的历史得到一定的连贯发展，那么，战争的命运则比较变幻莫测地为东地中海的几乎每一个地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当威尼斯连同它在北亚得里亚海的属国在坎波福米奥被割让给奥地利的时候（1797年），它那些一向被忽视的南方属国也归属了法国，其中包括爱奥尼亚群岛及其对面大陆上的前哨阵地。4个月前，这些地方就为法国远征军以短时“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名义占领了。自由和法国原则的树木已经栽上了，它以不同的方式骚扰着意大利的天主教贵族和正教希腊居民。法国的第一次占领于1799年3月因奇怪的俄土联合而告结束，这次联合创立了一个爱奥尼亚共和国（1800年3月），它在名义上是受俄土联合保护，但在实际上是受俄国单方面保护，有俄国的驻军。草拟和修改了一部贵族宪法，在俄国公使莫申尼戈的监视下实施，这部宪法比过去注意到人民信奉正教而使用希腊语言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1807年7月）把爱奥尼亚群岛交给了拿破仑，但是，较小的岛屿无法长期抵御英国的海上力量，科孚岛本身在拿破仑失败之后也投降了。随着这些统治者的更替，一种新的希腊民族感在这个以前属于意大利的群岛占了上风；俄国的占领左右了科孚岛人约翰·卡波·迪斯特里亚（卡波迪斯特里亚

斯)的前程,使他为沙皇服务(1809年);尽管他在1815年对亚历山大一世有其个人影响,但他仍然不能取得这些岛屿的真正独立;他懂得,这样一个小国充其量只能取得一种虚幻的独立,而且英国也不会容忍俄国人在那里久存,所以他宁愿让英国保护和占领,不愿接受英国内阁一度提出的由奥地利占领的建议。英国实际上把群岛当作直辖殖民地,这很快就使他确信,正教的希腊人应该依赖正教的沙皇得救,但不是屈从。在俄国占领时期,他作为莫申尼戈的得力助手,在准备捍卫群岛抵抗阿里帕夏时(1807年),就结识了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希腊人酋长,并与阿尔塔教区大主教伊格那修斯保持密切联系,伊格那修斯在希腊人中间颇孚众望,是个活跃分子,后来(退隐比萨时)成为亲希腊集团的中心人物。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对英国统治的厌恶,在他于1819年访问科孚岛期间更趋坚决,当时掀起的舆论使一大批爱奥尼亚人加入了“友谊社”,也许这并不为他所知(见本书原文第538—539、546—547页)。群岛从此动乱不已,直至1864年与希腊合并方告平定(见第十卷原书第426页)。

在科孚岛以北,战争给亚得里亚海东岸带来一些新的主人以及几场战斗。拿破仑虽然以鲸吞骄傲的威尼斯而使奥地利蒙辱(1797年),但他或许不过视此为权宜之计;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12月)之后,他兼并了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沿海地区,以及孤立的卡塔罗港,这个港口与达尔马提亚南端之间,相隔着古代的拉古萨共和国(今杜布罗夫尼克),但它提供一条通过半独立的黑山而进入荒凉内地的通道。俄国先发制人,在卡塔罗挫败法国人,但又在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7月)中把这个港口割让给拿破仑,与此同时,拿破仑却占领了拉古萨,并保有之。瓦格拉姆战役(1809年)之后,奥地利也被迫割让了它在波斯尼亚以北的内地省份;这些地方以及亚得里亚海的沿岸地区变成了法国的伊利里亚省,1815年全部归还奥地利,并被马尔蒙元帅打上了拿破仑统治的通常印记——雷厉风行的行政改革和维新,敲诈勒索的税收和对征服者意旨的顺从。到最后,法国人并不受欢迎,但伊利里亚这一古老名称的复活,却勾起了某些南部斯拉夫人的幻想。俄国人占领卡塔罗时(1806—1807年),曾传闻要派一支军队从多瑙河下游开往亚得里亚海,去挑起西巴尔干诸族的叛乱。五年后,俄国在多瑙河下游的司令官奇恰戈夫所制订的一个类似的计划又告破产,因为当时俄国必须赶快在布加勒斯特与土耳其媾和(1812年5月),率俄国的多瑙河军北上,去抵抗拿破仑的大军;但

是，这也留下了一些影响。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认为，“俄国人被迫第四次抛弃给土耳其人任其报复的那些民族，需要得到某种抚慰”；他和奇恰戈夫迫切要求在土耳其欧洲部分增加俄国领事的人数，这些领事的首要目的不在于贸易，而在于使“被压迫者有精神准备，以便万一俄土结盟时，让他们以其热忱促成土耳其政府的良好意愿，或者将来有一天决定粉碎土耳其政府的反抗时，让他们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公开声明”。这虽然不是一个新的建议，但在此后几年中是颇见成效的。“粉碎土耳其政府反抗”的决定在1812年未能作出，在1815年也未能作出，单是俄国人和巴尔干诸民族，永远也无法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如19世纪所表明的）。然而，俄国差不多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俄国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也许需要在此予以评述。

在臣服苏丹并被迫向君士坦丁堡供应粮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多瑙河公国，有大批富有的波雅尔（受封地主）。他们的文化，以及包括修道院在内的正教高级教士的文化，自17世纪以来大体都是希腊的东西，而那些大波雅尔的文化这时已与西方的影响相混杂。他们大多数集中在两个首府：一个是瓦拉几亚的布加勒斯特，一个约有7万人口的城市，人称“新雅典”；另一个是小得多的摩尔多瓦的雅西。它们各自都有科学院，希腊文书籍来自维也纳和莱比锡，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则由法国的教师和医生传入。两地执政的总督各有宫廷，国君通常是富有的法纳尔希腊人，往往由于曾在土耳其政府与欧洲使馆之间充当译员而通法语。

国君的职务极不稳定。在18世纪，这些官职和其他肥缺通常都为法纳尔希腊人购得，他们担任这种公职而成为苏丹的唯一代表。由于他们与波雅尔家族联姻，希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购买官职的价格甚高，所以在三四年短暂的任职期间，迅速谋利势所必然，这对苏丹的财库颇为相宜。国君们虽然无权处理对外关系，但实际上却能够通过支持或阻碍奥地利或俄国对土耳其进行战争的政策取得酬报。这两个强国都提供了一些促成变革的因素：奥地利提供一个谷物市场，并在特兰西瓦尼亚、“小瓦拉几亚”（1718—1739年占领），以及后来在布科维纳（1775年吞并）建立较好的地方政府作为典范；俄国则坚持控制有关国君的任免和行使特权的条例。这些一再强化或扩大的条例和特权虽然往往受到随意的忽视，但在有利时机却为俄国干涉提供了条约的根据。^[8]从1782年起，俄国驻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领事便充当

条约权益的监视人，并很快又成为亲俄派的中心。在1806—1812年占领期间，俄国司令官下令要把沙皇奉为统治者而为之祷告，任命一位大主教管理莫斯科教区的神职人员，并把这两个省实际上作为俄国省份来看待。然而，习惯于在敌对强国之间投机取巧的统治阶级也发现，这种占领空前难忍，并对1812年俄国放弃其他地方而吞并比萨拉比亚（瓦拉几亚的一部分）心怀不满。在波雅尔中滋长着这样一种愿望：政府比较稳定，少屈从外国的压力，比较努力谋取本地方利益。大约40年来，由于需要更多的劳力，他们逐渐加重农民的实际负担，特别是扩大徭役，尽管在1750年以前就已经废除了人身农奴制。他们力求不受阻碍地从商业化农业取代传统农业这一过程中获得利益。[\[9\]](#)

在一小撮希腊化上层阶级的下面，斯拉夫人做礼拜仪式和使用的宗教书都逐渐改用罗马尼亚语，这对于希腊影响而言，并不足以构成威胁；民族语言也用于其他一些书籍中，主要用在编年史上。但是，作为一种实际力量的罗马尼亚民族感情几乎不是当地所产生，而是来自奥地利的特兰西瓦尼亚，那里的人操罗马尼亚语，学校也用罗马尼亚语，而且正教教士不受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牧首的监督。在约瑟夫二世的鼓励下，他们拒绝被视为在罗马控制下的东仪天主教徒，而且终于（1810年）接受奥地利—塞尔维亚正教主教的监护。特兰西瓦尼亚人乔治·拉扎尔（农民出身，有维也纳博士衔）把一种罗马尼亚语调引进他在布加勒斯特开办的学校，并以人民的语言及其罗马祖先的故事灌输自豪感。

这种新精神的果实成熟得很慢，但在1815—1821年间，布加勒斯特的希腊友谊社的大量活动，却是与图谋暴动但动机不同于希腊人的某些个人的活动有联系。有一个友谊社的协调人受雇于俄国领事馆。他所交往的驻比萨拉比亚的俄国军官后来都是杰出的十二月党人；他所接触的不但有卡拉·乔治和其他在俄国的塞尔维亚流亡者（见本书原文第542—543页），还有罗马尼亚职业军人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此人曾在俄军服役，这时正试图把反抗波雅尔地主的农民起义同一项摆脱土耳其枷锁的更广泛的计划结合起来。看来图多尔并非友谊社的敌人，只是想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即将到来的起义而已。一些俄国军官和领事馆官员希望使沙皇卷入对土耳其的战争，这也许会给俄国内部带来一些变革。他们的活动反过来唤起了塞尔维亚流亡者的希望，反对波雅尔特权的罗马尼亚人的不满，以及无处不在的希腊人的

野心。大多数大波雅尔和法纳尔希腊人都对武装起义的后果怕得要死，但其中也有人对于沙皇顾问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地位和亚历山大·希普西伦特斯所取得的信任印象很深。

希普西伦特斯于1820年当选为友谊社的领袖，是亲俄的一个希腊人国君的儿子；他曾任沙皇的侍从武官，在俄国宫廷中颇受欢迎，并且在俄国的1813年战役中失去一只胳膊。1812年年初，他越过普鲁特河入侵摩尔多瓦，但雅西的波雅尔对他很少支持，因此他几乎不敢继续向布加勒斯特进军，而自己发动起义的图多尔似乎正在把一场普遍反对波雅尔的社会运动转变为与小波雅尔结成反对法纳尔人的联盟。不管图多尔在布加勒斯特的真正意图何在，九天以后希普西伦特斯一到那里，便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两个目的各异的人物的决裂。^[10]图多尔手下的几个将领倒戈了，他被希普西伦特斯逮捕处死，希普西伦特斯业已知道，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在3月就已不得不在莱巴赫请求沙皇谴责这次冒险。这就断送了一切希望，已没有可能迫使亚历山大一世尽管在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情况下立即向土耳其宣战，以挽救俄国在巴尔干的威望。

这次计划不周的起义不久便告终，但是它激发了伯罗奔尼撒的一次较有希望的运动（见本书原文第547页）。这恰恰是起义的目标之一，而且不管怎样，1821年也成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起义开始后，两位国君感到必须给予一些支持。苏丹先是任命两个希腊法纳尔人去接替他们的职务，但是不久又决定委派可能帮助他抵御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当地统治者。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土耳其军队进驻恢复秩序时，大多数最富有的波雅尔逃往俄国或奥地利，有些人甚至希望通过俄国的吞并而得救。许多较小的波雅尔至少已打算取得永久的保护关系，但是他们对希腊的影响却怀有更深的敌意；摩尔多瓦的小波雅尔在1822年坚决要求制定一部地方贵族的宪法。他们只好熬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踌躇不定的最后几年，等候尼古拉一世新的前进政策；但是这一次，俄国在战时及战后的占领（1828—1834年）就不仅是一个插曲了。俄国总督基谢列夫伯爵是个颇有教养而又明智的人，他在1831年的“建制条例”中体现出一套井井有条的制度。早该实行的行政改革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且为后世的评论家所赞赏；然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处理办法几乎是对希腊的或当地的波雅尔贵族阶级的彻底投降。国君不仅在宪法上受到波雅尔们的议会的限制，而且受

到那些确保俄国优势的条款的限制。农民最低限度的保有地减少了，强制性劳动实际上又增加了，而且不经许可便几乎不能移动。这个条例在基谢列夫到任之前已大半拟定，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保护农民抵抗贪婪和疯狂的寡头统治”，因为波雅尔们知道，俄国政府需要他们的支持。^[11]这些公国就这样开始了它们历史上的现代时期，其条件较适于经济开发，不甚适于政治或社会的安定。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是无可挽回地从土耳其分离出来，并在100年间能够倚仗西方强国抵制俄国对它们的垄断性影响。

“保加利亚”（Bulgaria）甚至不是一个通用的地理名词，而“鲁梅利亚”（Roumelia，一个不确切的用语）则包括操保加利亚语的全体坚强的农民和手工艺者，他们对过去伟大时代的回忆，在民谣和传说中，以及在“哈伊杜克”（在山区结成帮伙的爱国者）的功勋中依稀可见。这里也在发生变革和动乱。土耳其人的军事封建主义已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进一步的财富分化。在历次俄土战争或奥土战争之后，保加利亚退役军人不是在国内参加打家劫舍的流寇集团，就是跟随反叛的土耳其显贵当兵。其他军人和工匠则流落异邦以躲避国内的暴力，逃到多瑙河诸公国，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或者南俄罗斯（1812年以后还包括比萨拉比亚）。在此时期，俄国所能提供的确实只是一个庇护所；较大的希望在1812年和1829年两度彻底破灭。

虽然教会（除少数几个修道院）和许多有文化的城镇居民几乎完全希腊化了，但保加利亚人却从来没有被希腊人同化。保加利亚文的书籍以手抄本形式已经流传很久，尤其是阿索斯山修道士佩西于1762年（访问奥地利之后）根据编年史撰写的通俗爱国史话。西方影响的潜移默化来自拉古萨的商人们和受过奥地利教育的塞尔维亚人，例如约万·拉伊奇，他在维也纳出版4卷本的《斯拉夫各民族，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历史》（1794—1795年）。大致在1840年以前，保加利亚似乎没有印行过任何书籍，但佩西的门徒之一索夫罗涅主教用保加利亚语布道，他定居布加勒斯特（1803年），并与侨民和寄希望于俄国的人们同样怀有激越之情。他的一个门生在1814年以后创办了几所保加利亚教会学校，作为抵制希腊影响的武器。后来，伦贝格（利沃夫）大学毕业的罗塞尼亚青年尤里·韦涅林，因在比萨拉比亚进行研究而对斯拉夫民族具有更坚定的浪漫主义

热情。他在莫斯科受到阿克萨科夫和其他亲斯拉夫分子的鼓励，开始研究保加利亚的历史，1829年写出几部政论性作品^[12]的第一部，它很少历史价值，但是推动了语言的复兴，从而自1835年起创办一些宗教色彩不浓、民族主义目的较为鲜明的保加利亚语学校。然而，这些人和其他人们的努力，这时还没有促成一次文化复兴。

当时，在塞尔维亚的山区和森林中，一个不算不富裕的武士和养猪农民的群体，已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新压力。首先，哈布斯堡人帮助许多来自土耳其塞尔维亚的家庭在匈牙利南部（1686年收复）的其他斯拉夫人中间安家落户；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时期（1719—1739年），使多瑙河南北的塞尔维亚人接触更多；后来，特别是在教育和宗教事务中，约瑟夫二世给予他的南部斯拉夫人一些特权，借以抵消马扎尔人的支配地位。这就使得苏丹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转而寄希望于北方。同时，他们的曾经是可以忍受的处境，逐渐变得不可忍受。苏丹希望通过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代表促进希腊化，使他们摆脱对奥地利的依从，在18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差不多就是苏丹的代理人。不过，苏丹又把难以驾驭的禁卫军从首都驱散到外省去，并把其中几个最坏的分子流放到塞尔维亚——这是一个原始地区，但也足够他们逞强肆虐，掠夺财富。许多塞尔维亚人都曾在奥土战争和奥德战争中为奥地利打过仗，可是奥地利于1791年缔结西斯托瓦和约撤出对土耳其的战争，使他们大失所望。另一些塞尔维亚人曾为彼得大帝的帮助所鼓舞，参加门的内哥罗起义（1711年），如今又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侵略政策的鼓舞下，开始仰仗俄国，有许多塞尔维亚人早已定居俄国，以逃避匈牙利马扎尔人的压迫。塞里姆三世的改革排除了禁卫军，使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得到好处，但是，他的受人爱戴的贝尔格莱德帕夏受到禁卫军的牵制，终于被杀害（1801年），禁卫军卷土重来以后，把七八十个知名的塞尔维亚人士斩首复仇。

这就是卡拉·乔治从1804年开始组织抵抗运动的起因，他在最初曾得到奥地利和俄国的一些援助和慰藉；但是，这时两大强国更关心的则是使土耳其人大力抵抗法国。一个派往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人代表团被告知说，尽管俄国不能支持起义，但是可以派一个领事去贝尔格莱德，作为他们的自治的保证人。这一点，以及在战场上的几次最初的胜利，促使塞尔维亚人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组成一个国民议会（斯库普什丁纳），并根据一位奥地利塞尔维亚人（当时在俄国哈尔

科夫大学当教授）起草的宪法，要选出由六个人组成的参议院。苏丹则坚持说，由于他们已经不是请愿者而是反叛者，他们首先必须放下武器，服从命令。他们不听这一套，连连击败来自西方和南方的土耳其军队（1806年8月）；而且，当苏丹向俄国宣战时（12月），他们立即作为公开的反叛者出现，尽管土耳其已经作出很大让步（1807年1月25日的条约）。卡拉·乔治以为俄国人会胜利，甚至提出要接受一位俄国总督和驻军；但是，在接到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达成和解的消息以后，他转而相当认真地面向奥地利人，建议组成一个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大塞尔维亚，但要求不被当作匈牙利的一部分。当卡拉·乔治继续挑拨奥地利反对俄国时，沙皇则在两个计划之间举棋不定：是听从拿破仑三心二意的瓜分塞尔维亚之说呢，还是寄希望于从内部获得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潜在同盟者的信任，以便在不依靠法国帮助的情况下扩大他在土耳其的影响。在圣彼得堡，鲁缅采夫和科兰古继续为未来的瓜分进行辩护，但沙皇和拿破仑于1808年10月在埃尔富特会谈时，看来并未提及塞尔维亚。亚历山大不曾承认塞尔维亚宪法，而他的代理人的口头热情似乎也因他们在对付新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时是否需要塞尔维亚人帮助而时有改变。卡拉·乔治先发制人，使他那个新的参议院本身宣布他是世袭亲王（1808年12月）；他进一步徒劳地求助于拿破仑，并再次求助于奥地利，都曾遭到议会的否决，而六个月前离开贝尔格莱德的一位俄国驻扎官，又于1810年年初卷土重来，此次随带军队，以确保俄国的影响。

1810年12月，拿破仑终于默许俄国人控制这些公国（俄国人从未撤离过），同时表示希望由奥地利控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相信，这些强国中总有一个最终会先于其他国家出来充当塞尔维亚自治的保证人，而苏丹也同样以为，其他强国的妒忌足以把俄国限制于多瑙河以北。沙皇急需与土耳其媾和，于是就匆匆草就了布加勒斯特条约（1812年5月28日签字，见本书原文第536页），对此条约的解释成为此后15年中无穷无尽的争辩的主题。根据第8条，塞尔维亚人应同爱琴海诸岛岛民一样拥有自治地位，能自行征集给苏丹的贡品，但允许有限的土耳其军队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要塞驻扎。然而，他们在三方面受骗了。第一，奇恰戈夫对条约不满，梦想穿越塞尔维亚进军亚得里亚海，所以向塞尔维亚人隐瞒，甚至否认第8条的存在，直到他奉命（1812年8月）挥师北上抗击拿破仑为止。第二，苏丹正期待俄国的败

北，无意使这一条见诸实施。第三，卡拉·乔治本人也拒绝服从这些条款，并伪称复仇的土耳其侵略军的行动与苏丹的意旨背道而驰。

结果是土耳其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813年10月），成千上万的人家逃入奥地利；卡拉·乔治本人及大多数反叛首领一年后应沙皇个人的邀请，离开奥地利前去俄国。未流亡的一位领袖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在新帕夏的抚慰下归顺，接受了一个地区的领导职位。然而，一位塞尔维亚使节很快就向维也纳的君主提出证据，说明压迫又在重演；他数次获准会见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两次会见哈布斯堡皇帝本人。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也许就是俄国致各列强书（1813年2月2日）的作者，其中对他们进行干涉的权利提出了新奇的根据，即尽管穆斯林是苏丹的臣民，但基督徒只不过是他的进贡者，既无须忠诚于他，也有权接受任何欧洲强国的保护。这原是希望取得一种集体保证的要求，它不是苏丹而是土耳其的基督教徒提出的，所以根本没有提交国会，但其论点却是激进而又影响深远的。在一次重新组织的起义获得一些局部胜利之后，米洛什暂且直接从苏丹那里接受了经过修改的条款（1815年12月）：土耳其人只驻扎在要塞内或要塞附近；塞尔维亚人自行征集固定的贡金，享有宗教信仰、受教育和在整个帝国经商的自由，有在君士坦丁堡留驻一名代表的权利。

米洛什的统治在贪婪和暴戾方面与许多帕夏不相上下。俄国人允许某些流亡者溜回塞尔维亚后，他们的头颅被米洛什割下来送往君士坦丁堡。他的政敌，那位不久前在雅西加入希腊人友谊社的卡拉·乔治，也是牺牲者之一（1817年7月）；九年后，乔治的儿子因参与友谊社动员塞尔维亚人的计划而惨遭截肢的酷刑。在俄国对布加勒斯特条约发生争执期间（1816—1821年），米洛什很少注意俄国在塞尔维亚人中间的利益；这些争执因希腊人的起义而中断。米洛什拒绝了希普西伦特斯的求援，并使塞尔维亚置身于希腊人的长期斗争和俄土战争之外（1828—1829年），尽管他的自治权对土耳其人的潜在威胁终于间接帮助了俄国人。他的有条件地效忠苏丹的政策并非没有收获。在阿德里安堡和约时（1829年9月），他公开要求土耳其按照阿克曼条约（1826年10月）的解释，确认布加勒斯特条约第八条中允诺给塞尔维亚人的特权，另外把1813年瓜分去的六个地区归还给塞尔维亚。最后，在1830年10月，米洛什获得了他长期寻求的苏丹对他的世袭地位的承认，议会对此业已多次批准。他在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为塞尔

维亚取得了真正的自治。虽在粗暴和腐败的统治之下，但此时这个国家总算有了学校、印刷厂和报纸，也有了初具规模的正规军。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不是一味仰仗俄国或其他任何强国，都不是采纳卡拉·乔治的那些轻举妄动的先后向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完全臣服的建议的结果。时间将向奥布廉诺维奇家族进行报复，因为卡拉·乔治的英雄主义比米洛什的残忍奸诈有更大的号召力；但是，我们很难理解，像这样一个其命运很可能为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帝国所左右的国家，在1815年以后对土耳其采取一种比较不妥协的政策，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成果。

希腊人的处境有所不同。他们虽然没有通过陆地边界与奥地利和俄国有直接接触而受其影响，但遭受的战争灾祸也比较少。沿海和岛屿上的人们与大海接触，因而接受了较多的外部世界的知识。他们能够使用他们的航海技能和资源，以致终于不但能够使俄国，而且能够使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和法国对解决他们与土耳其的争端一事感兴趣。

在地峡北部的山区，生活多半原始而无保障，但贸易和学校却使某些地区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在伯罗奔尼撒，威尼斯人在1687—1715年间（条约规定为1699—1718年）的占领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有益于农业的，但是那些有利于罗马和威尼斯的规定却妨碍了希腊教会和希腊商人，因此他们对于占领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2/3的土地为穆斯林所有，而他们不足人口的1/10。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具有一种地方自治的特殊地位，自治政府通过选举知名人士和教士来组成；最高的是元老院，它确定税收，与土耳其总督谈判，能够通过驻在首都的代表向苏丹直接提出要求。虽然这一体制并未排除行贿受贿、反复无常和暴力行为，但它使知名人士取得了政治的经验，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享受地方特权转而要求更多的东西。各个岛屿甚至享有更大的自治权，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土耳其人驻扎官。

俄国在1737—1739年的战争中没有求助于巴尔干的基督教徒；在下一场战争中，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70年派遣奥尔洛夫弟兄前去伯罗奔尼撒组织牵制性的起义，但是他们不久便无法使希腊人相信这支小小的俄国军队心怀诚意，唯一的结果是向当地人民进行报复，不管反叛与否。尽管如此，俄国在希腊人中间的威望，还是通过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年）和雅西条约（1792年）而提高了，条约中包括一

些含糊其词有利于苏丹的正教臣民的条款；还有，俄国在1783年给予希腊船只悬挂俄国国旗进行贸易的特权。商人们能够凭借欧洲领事们的特许购得豁免权：当塞里姆三世试图通过亲自出售特权来补救滥用条款的弊病时，他不过是创立了一个受到公开承认的富裕的特许商人阶级。另外，派往国外学习或经商的商人子弟，在回国时也可能取得欧洲人的特权。希腊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战争未使希腊遭受蹂躏，希腊比以前人口增多，也更为繁荣昌盛了，岛屿上的商人从事转运或走私，获利尤多。富裕的希腊人慷慨捐资创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由于法纳尔人在首都的影响再加上各阶层的人到处进行活动，希腊人似乎能够及时地从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内部大获其利。另一个办法是公开反叛一个以其伊斯兰国家的号召力为强大后盾的帝国，这样做前景可怖，且难以预料，虽然有个别的法纳尔人在外来影响的诱惑下要冒险来个双管齐下。

文化复兴的重要性是很难加以评价的。其根源有些出自希腊内部，但出自外部的居多。比如，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在1750年各有一个正教教堂，不久又有一个兴旺的希腊学校。在1786—1820年间，维也纳的“希腊人”（即正教徒）从500多人增加到3000人以上，其中包括许多大学生。许多希腊文书籍在维也纳和莱比锡（除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之外）出版，大多是有关教育和实用艺术的。^[13]有文化的希腊人已经有了一种从共同语言演化而来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曾是拜占庭世界的混合语，但早已让位给各种流行的方言。意大利语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用语，但在18世纪，仿古希腊语的写作在法纳尔人和富商的家庭中已经成为一种高雅的才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帝国的自由散漫的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机会，因而出现了任何以暴力推翻土耳其帝国的政治计划是法国革命给予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出生在塞萨利的韦莱斯蒂诺（古代的菲拉耶）的瓦拉几亚人里加斯·费奥斯（约1757—1798年），不完全是一个希腊民族主义者。18世纪80年代，他在多瑙河公国的国君府中供职，以后定居维也纳，他翻译了许多振奋人心的作品，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例如他的著名的用希腊文改写的《马赛曲》，通过各地的友谊社散发出去。关于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他还编绘了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型地图。他公开声称的目的，是在法国人所宣告的自由与平等的旗帜下，同土耳其全体居民进行和解，不论他们的信仰和语言如何。他跟著名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接触过，也许还跟亚尼纳的阿里帕夏接触过，但他交往的

大多数是希腊人。后来，在1797年，当法国人在使爱奥尼亚群岛革命化时，里加斯动身前往伯罗奔尼撒，计划在那里发动一次起义，但是，他在的里雅斯特携带着12箱宣言被查获，在维也纳被定罪，并与几位同伙被押解到贝尔格莱德的帕夏处决。

阿达曼蒂奥斯·科拉伊斯（1748—1833年）从30岁最后离开他在士麦那的家以后，从未重返地中海地区。他在蒙彼利埃学过医，1788年定居巴黎，后参加法国革命，以后毕其余生致力于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工作，即教育希腊语世界使用一种既非盲目模仿古希腊语，又非单纯采取口语方言的书写形式。最终创造的纯洁化形式是人为的，如今已不太通行；然而，科拉伊斯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书面语言的缔造者，这种文字普遍使用了100余年，并依然与通俗文字相竞争；源于方言的富有想象的文学作品已使通俗文学丰富起来。他的爱国的、共和主义的、反教权的主张，在他所编辑的古希腊经典作品的绪论对话中显而易见，这些作品的出版和发行（1805—1817年）是由希俄斯的一位富商资助的。科拉伊斯在起义前夕声称，暴力解决尚不成熟，需要再等一个世代，而且也许最终并不必要；但是，他的匿名即兴诗和短文实际上却在号召起义，而且，起义刚开始，他就予以支持。他是一位学者，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一方面低估正教在希腊民族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为新希腊制定一部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宪法的大好时机。他早期对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颇为敬重，后来却把他对希腊的统治当作暴政进行极其辛辣和毫不留情的谴责。

科拉伊斯是受多瑙河公国国君们资助在维也纳出版的一份希腊文艺和爱国杂志（1811—1821年）的创办人之一。这一杂志又与1814—1815年间维也纳的诗友社发生联系，该社受到沙皇和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赞助，而且成为一个行时的慈善团体，把进款用于派送希腊青年到欧洲留学。科拉伊斯的杂志与政治团体友谊社是否有关系无法确定，后者原是秘密社团，其领导人物及外出联络人员既非上流人士，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1814年夏天在敖德萨创立友谊社的三个人与阿里帕夏统治的伊皮鲁斯也有联系，而这一地区在法国人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和更北的亚得里亚海岸期间，又与法国人发生了联系。大主教伊格那修斯（见本书原文第535页）也许就是这两个团体之间的纽带。

^[14] 现存的约550名友谊社社员的登记册表明，社员的发展在1818年以前十分缓慢，此后才从多瑙河下游迅速扩展到希腊，特别是在那些经

商或航海的人们中间发展很快。这本登记册至迟从1819年年底起便不可靠；因为细流变成了小河，小河又很快变成了洪水。友谊社的存在几乎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到1821年，它便融合到总的运动之中了。这个团体由于发端隐秘，而且只是革命趋势的征兆而不是起因，所以它吸引人们的手段有二，一是向人们确保俄国的武装支援，二是采用共济会俱乐部那样的戏剧性秘密程式。领导者们（阿什）的名字不得为外出联络员和他们吸收的成员所知，这些人模糊地认为他们的最高领导是俄国人和高贵的人。许多人错误地相信，沙皇的公使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是这个团体的领袖。当他明确拒绝介入后，坚持以单独指挥为条件的亚历山大·希普西伦特斯（见本书原文第538—539页）就接受了领导权（1820年6月）。他不听劝告，并且，由于不断改变计划而失去人们的信任；他错误地把各公国作为自己主要攻击的目标，而让其他代理人去煽动伯罗奔尼撒和爱奥尼亚群岛。希普西伦特斯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鼓励，便自以为亚历山大一世只是等待一次自发的起义行动，或者，至少在行动开始后，他必然会插手，使起义免于失败。从长远看，他虽没有铸成大错，但这不是由于他的鲁莽之举为沙皇所公开否定，而是由于伯罗奔尼撒的某些酋长和教士采取的决定性行动，由于土耳其人的愚蠢，以及由于他们专心对付已经公开反叛的阿里帕夏。

1812年4月，一次蔓延很广但缺乏协调行动的起义在伯罗奔尼撒发难了，最初尚举棋不定，但不久就杀掉了大批的土耳其人。这一消息，再加上希普西伦特斯在北方的冒险，加剧了土耳其人的报复行为，包括处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在内。这又导致俄国大使的离任和两国关系的正式断绝。此后四年，其他强国竭力防止希腊的起义演变成俄国对土耳其进行总攻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样，就可能引起整个欧洲的动乱。起初，它们是成功的。这时已成为沙皇累赘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退隐日内瓦（1822年7月），此后五年，他的活动只限于救济工作，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英国和奥地利相仿，迫切希望使沙皇保持沉默；但是，梅特涅最初希望看到起义受镇压，而坎宁却开始注意到一个机会，即要么为英国的利益单独进行干预，要么与沙皇携手去保持对局面的一定控制。随便发生哪一种情况，希腊人都可能得到利益。尽管有个人的、宗派的、地区性的纷争，以及极端的野蛮残酷和严重地缺乏纪律，但希腊人拥有勇敢的士兵和熟练的水手。土耳其人重新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兵员缺乏（由于在其他地方

承担义务）、指挥官之间的猜忌，以及他们在海上无法对付安德烈斯·米亚乌利斯率领的希腊船队，在陆地上也无法对付游击队对各关隘的骚扰，因而把守不住自己的交通线。每次暂歇期间，希腊的领袖们都互相争吵，有两次几乎酿成内战。一个不曾得到各敌对团体承认的议会公布了一部不受注意的“埃皮达鲁斯宪法”，并选举君士坦丁堡法纳尔人亚历山大·马夫罗科扎托斯为总统。战士们不同意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府，但是“欧洲的”希腊人得到富裕的岛民、正在征集资金（在英国主要是通过拜伦的影响和边沁派的主持）的欧洲各委员会，以及大多数在希腊的亲希腊派外国人的支持。这些团体财权在握，至1824年年末，他们的势力看来已经完全确立。

与此同时，苏丹收买其名义上的藩臣——埃及帕夏（见本书原文第534页），允许帕夏征服和占领克里特岛，而且答应在征服伯罗奔尼撒之后另给酬报。米亚乌利斯已阻挡不住土埃联合舰队的海上通道。1825年年初，帕夏的儿子易卜拉欣率阿拉伯军1万多人登陆，不久便踏遍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但没有足够的（或许相信将来会有足够的）力量将其系统地加以制服。希腊的临时首都纳夫普利亚未失守；希德拉和斯培西亚（最为富庶和活跃的岛屿）附近的各岛仍未被征服；在西部，地峡以北的梅索朗吉昂坚守到1826年4月，亦即拜伦在此逝世以后两年多的时候；在阿蒂卡地区，法国亲希腊人士法布维埃的到来使得阿克罗波利斯一直抵抗到1827年6月方才投降。正在危急的时候，临时政府才同意（1827年4月）各派别之间的和解：使科洛科特罗尼斯的“俄国派”和其他地方首领感到满意的是，大家一致同意选举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为任期七年的总统；选择亲希腊派军人理查德·丘奇爵士和刚愎自用的海军上将科克伦勋爵分别指挥希腊的陆海军，乃是向岛民和某些显贵的“英国派”作出的让步；主要受到地峡以北支持的科莱泰斯的“法国派”，则由于5月公布了极端民主的“特里增宪法”而得到抚慰。至此，外国干预的局势终于形成。

没有外国的干预，希腊人的独立战争不会取胜；但同样的是，如果各强国袖手旁观，这场运动也很难被镇压下去。导致外国干预的原因之一是爱琴海上势将演成长期动乱和海盗出没的那种僵局；原因之二是先发制人挫败俄国的愿望；而更难以确切说明的则是受过古典教育的欧洲人，甚至包括对希腊有好感的评论家的关切，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是他们所熟悉的，至于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便另当别论。沙

皇亚历山大一世在1825年12月去世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与其欧洲大陆的盟友就东方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并倾向于采取主动的俄国政策，他的继承人尼古拉一世后来更坚定地奉行了这种政策。坎宁不喜欢埃及人统治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上希腊人海盗出没这两个前景，但他几乎没有能力对某些希腊领袖向英国呼吁保护一事（1825年6月）单独作出反应。结果是威灵顿公爵于1826年4月4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议定书。双方政府同意通过联合或分别谈判对两派施加影响，达成和解，在不明确的边界范围内给予希腊人一种既自治而又附庸的地位，但须对土耳其领主作出报偿。4月29日，在梅索朗吉昂沦陷后，希腊议会正式提出以此为基础进行调停，但坚持要求包括许多在起义期间几乎没有拿起过武器的地区。甚至在议定书签订之前，新沙皇还送给苏丹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就俄土两国之间的重大争端进行谈判；由此产生的阿克曼条约（1826年10月）是俄国的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并没有为希腊人达成像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所取得的那种条款。希腊人的一派曾向法国的波旁王朝政府求援，波旁王朝政府也希望染指，但要参与的不是一次革命，而是一次十字军。这就拖延并扩大了谈判。

在坎宁担任首相的短暂时期，三方签署的伦敦条约（1827年7月6日），实质与上述议定书相差无几，但是有一个附加条款，其中规定要派一支联合舰队进驻希腊水域，强迫两派停战，“但不参加任何敌对行动”。双方都接受了停战协定，但都没有完全遵守。乔治·坎宁于8月去世，但他的堂弟、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早在18个月以前就会见过马夫罗科扎托斯，这时他稍微背离了乔治·坎宁的指令，竟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称炮弹为最后的仲裁人；海军上将科德林顿又把这一点向他的舰长们作了重述。这样，当土埃舰队于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海湾为英俄法三国海军歼灭后，各国内阁都规避对这一决定性冲突负直接责任；梅特涅可以把它说成一次“可怕的大灾难”，而于1828年1月就任的威灵顿首相则说成是“不幸的事件”；然而，三国大使业已离开君士坦丁堡，而英国却未履行条约中的义务，即使是俄国单独把同土耳其的争端推向战争。埃及人对法国军队略事抵抗，便撤出伯罗奔尼撒，法军以三个强国的名义到达那里以后，留驻了五年（1828—1833年）。可是，苏丹不肯屈服。他废除阿克曼条约，几乎招致俄国宣战（1828年4月）；只是灾难性的第二次战役才迫使他同意了伦敦条约，作为在俄国刺刀下签署的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9月14日）的一部分。[\[15\]](#)

希腊未来的地位和边界仍未确定。像梅特涅一样，威灵顿认为，一个在欧洲君主统治下的独立小国，不像较大的但却是附庸的地区那样易受俄国的影响。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作为总统，被英国和法国不公正地怀疑为沙皇的工具。他对希腊的贡献过去是被低估了，而最近也许又被希腊人过分理想化了。他的不幸在于，当他试图开创一个必要的个人统治时期时，他没有足够的办法加强这种统治，而且过分轻视地方精神：内讧以他的遇刺（1831年10月）达到顶点，接踵而来的是准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即将成为第一个比利时人的国王的萨克森-科堡亲王利奥波德原来接受，然后又拒绝了希腊王位（1830年2—5月）；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是个热情的亲希腊分子，他很乐意地把王位接过来给了他17岁的次子奥托。威灵顿最初要做的只是解放伯罗奔尼撒和较小的岛屿，但是，撤离君士坦丁堡之后正在俄罗斯会谈的三国大使，推荐了一个更为慷慨的解决办法（1828年12月），而且欧洲人认为，至少没有雅典的希腊是不堪设想的。1832年，帕默斯顿把西部的阿卡纳尼亚包括进来，为奥托扩展了1830年向利奥波德提出的北部疆界。三国大使提议把萨摩斯岛和克里特岛也包括在这些岛屿内，但是，当政的帕默斯顿不能够或不愿意逆转与此相反的1830年的决定，他当初还批评过这一决定。萨摩斯岛取得了、希俄斯岛恢复了尚称可取的自治地位，直到1913年它们与希腊合并为止。克里特岛在埃及统治15年后，又于1840年归还苏丹；周期性起义持续两个世代之久，土耳其驻军终于在1898年撤离，该岛于1912年完全与希腊合并。

阿德里安堡和约的消息在西方政府中引起了短暂的惊恐，但在实际上，其条款并不可怕，只是对未来似有一种不祥之兆而已。俄国军队疲惫不堪，几乎无力攻占首都，而沙皇也无意于此。他已批准他的枢密院中一个有权力的委员会的报告，实际上重申25年前由恰尔托雷斯基提出的政策，亦即对苏丹继续施加压力，促进俄国利益，同时保存土耳其政权的一般结构，以避免或推迟极难解决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前途问题。这与英国、法国或奥地利关于土耳其“独立完整”的概念相差无几，最大的不同点是俄国希望扩张到亚洲，打开通往地中海的大门，做一些无愧于正教帝国声誉的盛举，这些欲望必然会损伤原封不动的原则，并且可能在某一重大时机彻底摧毁这一原则。无论俄国的意图如何，它在1829年，甚至1878年，都没有力量单独寻求一个根本解决办法，而且在1918年，土耳其在欧洲的残余部分，也并非在俄国的压力之下被瓜分的。然而，1829年俄国在阿德里安堡能够强

加于人的条款，不仅在希腊，而且在日后罗马尼亚的历史上标志了无可逆转的一步。希腊的起义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榜样还激发土耳其向国内复兴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1826年6月马哈茂德消灭禁卫军，在土耳其视为“吉利事件”。“希腊民族主义的首次爆炸燃起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火光。”^[16]可是直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土耳其人失去在欧洲的立足点时，他们才被别人，甚至被自己认为是一个“正当地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在1830年，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以及亲近这种主义的人，对于苏丹似乎跟对于梅特涅一样危险；从欧洲的观点来看，苏丹若非一个不值得同情的粗野而残忍的暴君，便是一个冷漠得使人恼怒的盟友。

（周国珍 译）

[1] 《俄罗斯帝国历史学会学报》第54卷（圣彼得堡，1886年），第25—78页；《黎塞留公爵在敖德萨……概述》（西卡尔在1827年所写，此人从1804年起定居于敖德萨）。

[2] H. W. C. 戴维斯：《在亚洲的大竞赛，1800—1844年》，载《英国科学院刊》（伦敦，1926年）。

[3] M. S. 安德森：《列强与俄国的兼并克里米亚》，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38卷（伦敦，1958年），第17—42页。

[4] E. O. 西拉根：《拿破仑战争时期奥斯曼的政治》（奥里亚克，1952年）。

[5] G. 杜因：《在埃及海岸的波拿巴舰队》（开罗，1922年）。

[6] 《埃及纪实》，共24卷（巴黎，1809—1822年），包括《历史序言》，《古代文化》（4卷），《近代国家》（3卷），《自然史》（2卷），《农业与商业》（1卷），《图集》（11卷），《地形图》（2卷）。

[7] 《近代国家》（1809年）第1卷，第21—186页。

[8] 欧洲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1699—1812年），其要点大都见于C. G. 德科什和M. S. F. 肖尔《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以后的和平条约简史》（巴黎，1818年）第16卷，第229—542页；修订版（布鲁塞尔，1838年），第4卷，第339—441页。1814年之后的条约，见于E. 赫兹莱特爵士《欧洲条约地图》，3卷本（伦敦，1875年）。F. 马唐斯：《俄国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汇编》，15卷本（圣彼得堡，1874—1909年），仅述及与奥地利、德国、英国和法国。

[9] 奥特提亚：《罗马尼亚农民的第二次奴役（1746—1821年）》，载《在第十届历史科学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历史的新研究》（布加勒斯特，1955年），第299—312页。

[10] S. 斯特布：《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与解放运动》，载《第十届历史科学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历史的新研究》（1955年），文中收集的证据说明，图多尔早在起义之前便与友谊社有过密切接触，而且并不反对友谊社的反土耳其宗旨。

[11] A. D. 塞诺波尔：《罗马尼亚史》（巴黎，1896年）第2卷，第407—419页。

[12] Y. I. 韦涅林（1802—1839年）：《古代和近代保加利亚人同俄罗斯人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关系》第1卷（莫斯科，1829年）；第2卷，死后出版（1841年）；及其他用俄语写的文章，均系驳斥当时流行的保加利亚人源于鞑靼—土耳其人的学说。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次访问保加利亚。见《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49—1957年）中的“韦涅林”条。

[13] E. 图尔辛斯基：《奥托大帝即位前德国与希腊的文化交流》（慕尼黑，1959年）。F. 瓦尔杰维奇：《德国与欧洲东南部文化交流史》（慕尼黑，1953年）。

[14] 更详细的情节和参考书，见本章作者《1821年前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与希腊人》一文，载《剑桥历史杂志》第13卷，第2期（1957年）。

[15] 关于希腊问题的国际方面，详见第二十五章，原文第673—674、677—679、685—689页。

[16] A. J. 汤因比：《历史研究》（节本），第132页。

第二十章 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

本卷所述年代是英国统治地域扩大和它的影响加强的年代。在印度和印度以外都获得了新的领土，政府的活动超出维护秩序和征收赋税，进而采取与欧洲人的功利思想和道德观念相一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起初，这种领土扩张是由于过分害怕法国在亚洲的势力增大，而英国人容许荷兰人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回到东南亚，其主要原因则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盟国共同对抗气势汹汹的法国，但是在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关心的事情是树立自己的威信，掌握印度的最高权力。1707年最后一个伟大皇帝奥朗则布去世后，莫卧儿的霸主地位已名存实亡，而马拉塔联盟既没有统一的方针，也没有统治次大陆所必需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在印度中部，直至英国领地的边缘，普遍存在着混乱和掠夺，这表明需要有一个最高权威者出现。为了印度的理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拉塔人冲突起来了。此后，除对俄国人的意图偶尔有所猜疑外，欧洲的政治在制定其对外政策时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另一方面，欧洲思想对开展国内政策的重要性却日益增长。的确，康华理勋爵在孟加拉建立的行政制度中出现的缺点表明他太不注意印度人的思想和环境，而在其他地方准备进行的改革则较多地利用地方经验，即改变康华理的分权制的死板，使本地官员担负更多的责任，与村庄和个体农民而不是与大土地所有者协商解决土地税问题。但是，这些新的解决办法也完全符合欧洲人的经济观念。在东印度署的詹姆斯·穆勒、在马德拉斯的芒罗、在锡兰的科尔布鲁克、在爪哇的范·霍亨多普和莱佛士——全部认为他们是把传统的农奴转化为勤劳的农民，能够激励农民的是经济因素而不是“封建”因素。其实，推行用现金交纳地租和土地私有的直接结果，往往是将农民送到放债人的手里。对内和对外都建立比较自由的贸易，其受益者同样是商人，而不是感到难以和欧洲的机器竞争的地方手工艺者。但是，在加尔各答和孟买这样的城市里，这个商人阶级，再加上由新政府机构培育出来的律师和官吏，对欧洲思想以及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社会改革特别怀好感。受欧洲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社会政策，因为英国人

鼓励传播“有用的”知识，阻止殉夫自焚一类的习俗。另外，凡是由英国人统治的地区，都废除拷打和断肢之类的刑罚，并试图制止行贿和贪污。官吏中间有一种进步的感情，他们相信欧洲思想的力量可以把亚洲的人民从旧习俗和迷信中解脱出来。沃伦·黑斯廷斯及其同僚认为很值得研究的印度人思想，如今被福音派教徒斥之为邪恶，被功利主义者鄙视为没有效能。由威廉·琼斯爵士、查尔斯·威尔金斯以及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其他先驱者们所作的翻译和研究，现在在德意志似乎比在英国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期望研究印度文学会在欧洲激发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而在另一方面，麦考利认为英国的教育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文艺复兴。

韦尔斯利于1798年就任印度总督。在他统治期间，害怕法国势力在印度重新抬头是支配英国扩张最明显的一个因素。伦敦的督察委员会主席邓达斯也和他同样怀着忧虑的心情，一听到拿破仑率兵远征埃及，就向印度派去增援部队。韦尔斯利不仅关心法国人可能入侵，而且还关心法国人与地方统治者秘密勾结的现实情况。他知道迈索尔的蒂普苏丹派人去毛里求斯请求军援，法国总督已在征召志愿兵，有些人已经报名。鉴于阿富汗国王扎曼有从西北入侵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就显得更加不是好兆头了，韦尔斯利认为蒂普与扎曼已经达成某种谅解。许多法国冒险家仍在为印度不同的统治者服务，韦尔斯利认为这也是一种危险。他特别提防海德拉巴的尼扎姆的受过法国人训练的军队，不久就劝说尼扎姆缔结了反对蒂普的同盟条约，依约，尼扎姆同意解散自己的军队，由公司的一支部队取而代之，他承担这支部队的军饷。当时还要求蒂普本人拒绝法国的援助，但他似乎不愿照办。经过几次毫无成果的通信之后，英国军队开进了迈索尔。这是一次速战速决的战争。在占领首都塞林加帕坦时，蒂普阵亡了，他的王国便落到韦尔斯利的手里。王国的部分领土，包括海岸地区，归公司所有，另一部分作为同盟报酬，交给了尼扎姆，虽然他实际上是无功受禄，其余部分是蒂普的父亲海达尔·阿里从古印度王朝夺取来的，因此物归原主。与此同时，新统治者被置于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下，结成资助同盟：新统治者同意接受公司的一支部队，每年为此付给一笔津贴，并答应未经公司批准不与任何其他土邦发生关系。

这种资助同盟成为英国对其他土邦扩大控制，最终在整个印度次大陆确立英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各地统治者一有困难，公司就提

供保护，以抵御外来的敌人或镇压国内的叛乱分子，作为报答，就得允许公司的部队驻扎在他们的地区，每年交纳一笔津贴，并放弃任何独立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每年支付津贴有时拖延，从而多次引起争吵。另外还有一个变通办法，那就是可以不付津贴而割让领土。在1800年与尼扎姆缔结的资助同盟中，就可以看出这些花样，当时，他不得不把新近从迈索尔获得的领土割让给公司。

奥德已经和公司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以致在阿富汗有可能入侵时，韦尔斯利就要求增加领受津贴的部队的人数，为了补偿这笔费用，纳瓦布不得不割让大片的领土。这些割让的结果是：除了与尼泊尔接壤的一段边界外，奥德已经被英国领土包围，因此就没有必要增加领受津贴的部队。此外，当这种旷日持久的苛刻谈判结束的时候，阿富汗入侵的危险已不复存在，因为锡克人的敌意以及自己财力不足，扎曼已经被迫撤退了。现在，增大英国在印度的权力，与保护公司领地防止外国入侵相比，已是更为重要的目标了。

马拉塔联盟始终是公司所面对的唯一可怕的力量。这个联盟的组织一直很松散，现在呢，由于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它的结构似乎有崩溃的危险。帕什瓦篡夺了萨塔拉土王的权力，虽然依旧承认自己是土王的首席大臣；他对一些主要将领（如辛地亚和霍尔卡）失去控制，他们逐渐变成了独立的诸侯。这种形势招来了英国人的干涉。韦尔斯利对法国势力的疑虑，也促使他这样行动。军事冒险家德·布瓦内为马哈吉·辛地亚招募的军队，对辛地亚在印度北部树立政权帮了大忙，这种权力一直扩展到控制莫卧儿皇帝的都城德里。作为报答，辛地亚把以亚格拉为中心的大片领土送给德·布瓦内，德·布瓦内于1795年回国后，他的军队和领土委托给另一个军事冒险家佩隆将军。八年后，关于德·布瓦内对拿破仑发生影响的报告使韦尔斯利更加烦恼。此外，霍尔卡按照辛地亚的先例，雇用了另外一个法国军事冒险家。如果说马拉塔政治上的不稳定给英国的干预提供了充分的机会，那么，法国影响的这些迹象也使韦尔斯利的干预有了充分的理由。

就在同一个10年内，有三个轻举妄动的和没有经验的统治者相继即位，这就使不稳定状态更加严重了。马哈吉于1794年死去，由杜拉特·劳·辛地亚继位。1796年，一位新的帕什瓦——巴吉·劳开始执政，他不久就对大臣那那·法德尼斯处处掣肘感到不耐烦，后者在18世纪后25年间操纵浦那的政治，于1800年死去。最后，1797年图科吉

·霍尔卡死去后，立即发生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年轻的贾斯旺·劳·霍尔卡脱颖而出，显示出他是该家族中最能干又最不安分的一员。当马哈吉·辛地亚来到南方加强对浦那的影响时，那那却怂恿霍尔卡在北方给他制造麻烦。另一方面，巴吉·劳允许年轻的杜拉特·劳·辛地亚在浦那任意行动，于是挑起了贾斯旺·劳·霍尔卡的敌意。但是，杜拉特表明是马哈吉·辛地亚的一个不肖继承人，不能保护帕什瓦免受霍尔卡的报复。1802年12月，巴吉·劳逃往巴塞因求援，韦尔斯利巴不得提供这样的援助。为了报答英国保护他去抵御外敌和镇压国内叛乱分子，巴吉·劳答应未经公司认可同其他强国发生关系，并允许驻扎一支部队，由他给予津贴。为了偿付这笔费用，他不得不割让一部分领土。1803年5月，他正式在浦那复位，但是辛地亚不愿英国人在浦那得到那么大的势力，8月就和英国人开了战。不久就表明，法国人的危险又一次被夸大了。当英国人占领阿利加尔，夺得它的军械库和仓库后，佩隆并没有进行抵抗；接着他接受了英国人发给的安全通行证，腰缠万贯回到法国去了。当英国人向德里推进时，他的继承者布尔坎只微弱地抵抗了一下。英国人占领该城以后，莫卧儿皇帝就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了。不过这是韦尔斯利的看法，而皇帝则认为公司现在又完全归顺于他了。辛地亚也对拉杰普塔纳的王公们失去了控制，这些王公都已经处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此外，他被迫割让北部和西部的大片领土，遣散他的法国雇员。最后，英国人要求他接受一支部队，由他支付津贴，开始他拒绝了。然而，由于对霍尔卡的猜疑，他迅速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于1804年2月接受支付津贴的一支部队的保护，答应未得公司的认可，决不与“任何大邦或强国”发生关系。^[1]英国人又一次从马拉塔人的内讧中收到渔人之利。

当时，霍尔卡已经准备和公司较量一番，要求辛地亚和他合作。辛地亚及时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人，英国人随即同霍尔卡打起仗来。英国人也许充分体会到了，要对付联合一致的马拉塔联盟是很困难的。但在事实上，他们已经能够逐一对付自己的敌人。即便如此，霍尔卡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与此同时，韦尔斯利使公司不断地卷入战争，在英国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而他对于批评者们并不试图加以抚慰，甚至不隐瞒对他们的轻蔑。他很少把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本国当局。他相信会得到督察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邓达斯的支持，因

为他了解邓达斯“对土地和要塞是贪得无厌的”。^[2]但是，1802年就任委员会主席的卡斯尔雷对领土扩张并不是那么热心，而更多地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此外，公司的财政状况早就令人担心，这时似乎又受到韦尔斯利的政策的损害。公司在印度入不敷出，它的买卖也亏本。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果，公司的一些欧洲竞争对手已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公司得到了从印度增加出口的机会。因此，公司董事会每年至少给韦尔斯利100万英镑，但他不是用这笔钱去做生意，而是去支付战争的费用。他不仅由于忽视董事会的管辖权及其商业政策而得罪了一般董事；他还由于准许印度建造的轮船把公司的货物运送回国而疏远了强大的航运业者。最后，似乎是他对马拉塔的政策使公司卷入了先是以辛地亚为对手、现在又以霍尔卡为对手的战斗，而英国军队已经遭到了惨败。政府再也顶不住公司董事们要求把韦尔斯利召回的压力。因此，他在获悉不辞职便要撤职之后，就在1805年辞职了。

在随之而来的和平和收缩开支的岁月中，公司有意放弃了一些新近获得的领土，向辛地亚和霍尔卡提出了和解的条件。并且撤销了答应给予拉杰普特诸邦的保护。这些邦实际上成了马拉塔首领们任意宰割的对象，听任他们的平达里辅助部队大肆劫掠。这些人是一群土匪，他们在战时也许有用处，但在平时，就成了中印度苦难的根源。在比较正规的军队人数减少时，他们的人数就随之增多。他们现在无法无天，远出四处抢劫掠夺。公司作为莫卧儿人的后继者，如果畏缩不前，不敢维护它的权力，那就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可言了。这一片土地将遭到强盗们的蹂躏，或者由于小王公之间的战争而陷于贫困。就连在旁遮普建立锡克族政权的兰吉特·辛格也为公司的消极态度所鼓舞，越过苏特里杰河去干预地方酋长之间的争端。当英国人对法国人在印度的意图疑虑重重时，辛格能够指望得到英国人的抚慰。但在1809年，当这种疑虑已经消除后，公司就决定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显示一次力量就足以说服辛格把他的精力用到别的地方去。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资助同盟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既扩大英国的影响，又不增加英国在印度的领地。但是许多官员认为，缔结这种同盟的土邦未必能繁荣起来。托马斯·芒罗的意见就是这样：

在反对使用接受津贴的部队的意见中，有许多是很有分量的。它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趋势，使驻扎这种部队的每个国家的政府变得虚弱和暴虐，使社会的上层阶级失去一切荣誉感，使全体人民降低一等和贫困化。

在印度，对一个坏政府的通常补救办法是搞静悄悄的宫廷革命，或者实行造反搞暴力革命，或者是外来的征服。但是英国部队支持在位的王公，反对内外的一切敌人，他们的驻扎排除了补救的一切机会。这种情况教导王公为了自身安全而相信外国人，使得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种情况又向他表明完全不必害怕臣民的仇恨，因而他变得残忍凶狠和贪得无厌。^[3]

统治者们的也觉得难以忍受资助同盟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约束。根据巴塞因条约，帕什瓦巴吉·劳不得背着公司同其他列强发生任何关系。不久以后公司通知他说，这些列强应包括马拉塔联盟的其他统治者，例如辛地亚和霍尔卡，而帕什瓦在名义上却是他们的宗主。公司认为在签订巴塞因条约之后，马拉塔联盟已经“解散”了。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是，资助同盟使公司的常驻代表能够干涉所驻土邦的内部事务。由于巴吉·劳再三要求使用支付津贴的部队去镇压他的过分强大的臣民——大的扎吉尔达尔（即大地主），蒙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1812年在潘达尔普尔商定了一项解决办法，大地主们答应按照惯例为帕什瓦效劳，只要他也尊重他们的传统权利，英国政府居间作为仲裁人。这位常驻代表实际上是在保护大地主反对他们自己的君主。当巴吉·劳在1817年终于对公司翻脸时，埃尔芬斯通很快就能使大部分地主脱离他的事业，次年英国人兼并了他的领土以后，对大地主们表示特别的关照。

巴吉·劳发动进攻的时候，正是公司到处在和平达里人作战的时候，后者的活动威胁着某些公司领地的繁荣。作战行动迫使公司重新考虑它和马拉塔其他大邦之间的关系，后者对于平达里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纵容的。公司曾请求马拉塔其他大邦予以支援，但是霍尔卡却效法巴吉·劳的榜样，他很快被击败，不得不签署一项资助条约。1805年，英国人为了讨好辛地亚而放弃了与拉杰普特各邦签订条约的权利，现在却要求辛地亚通知拉杰普特各邦不必遵守这一保证，并且答应与那些土邦充分合作以反对平达里。平达里的威胁不久就消除了。拉杰普特各邦过去深受平达里和马拉塔人之害，而今和公司结成了同盟，承认公司的至高权力，并答应永远作为“下属”与公司“联合”行动。公司显然成了印度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印度以外，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向前推进。它首先担心的也是法国人搞阴谋。的确，英国人对待当地的统治者往往要比对待欧洲的敌手们谨慎得多。法国人于1795年控制荷兰之后，英国人随即迅速征服了海上的锡兰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荷属领地。爪哇暂时仍然留在

荷兰人手里，但对英国公司来说，它似乎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法国入侵埃及以后，英国把准备用于夺取爪哇的兵力也调到红海去了。然而，当拿破仑的忠实走狗H. W. 丹德尔斯元帅的改革增强了爪哇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当1810年英国占领毛里求斯之后，爪哇成为法国快速战舰和私掠船在亚洲水域搜捕英国商船的唯一基地的时候，夺取爪哇就似乎更必要了。英国人于次年占领爪哇，曾在代理总督T. S. 莱佛士的鼓舞下制订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但是，英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荷兰作为盟友，以反对气势汹汹的法国，因此，在1816年，就让爪哇重归荷兰人统治。莱佛士不希望英国人放弃在东南亚的前程，于是给柔佛的苏丹树立一个竞争对手，在新加坡建立了英国公司，而且还得到他的正式同意。1824年，作为全面解决分歧的部分内容，荷兰人承认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交出马六甲，并答应不干涉马来亚，而英国人则交出在苏门答腊建立的机构，并答应不干涉新加坡海峡以南的事务。英国人能够从新加坡和槟榔屿控制马六甲海峡，保护通往中国的海上航路。英国人在这个地区的目标是商业，不是领土。不过，他们神经过敏地尽量避免和当地统治者发生纠纷的企图则是失败的。当他们在吉打的苏丹那里获得槟榔屿时，是根据这样一种谅解，即他们要保护苏丹不受暹罗的侵犯，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1821年苏丹的国家遭到蹂躏时，他们只不过容许苏丹在槟榔屿避难而已。然而，罗伯特·富勒顿在1824年当了槟榔屿总督，他发现在威胁来临时，只要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保护雪兰峨邦和霹雳邦免受暹罗的侵犯。尽管加尔各答政府不愿承担新的责任，马来亚各邦还是逐渐把英国人看成最高权威，在一个统治者继承另一个统治者的时候就向英国人报告，并在必要时仰仗英国人的保护。古老的柔佛帝国已经重蹈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覆辙。新加坡唯一一位苏丹的权威在英国人面前黯然失色，他在廖内的对手的权威则在荷兰人面前相形见绌。

尽管公司不愿增加它在东南亚的领地，但在邻近印度边境地区，为了对地方压力作出反应，却有丰富的收获。在锡兰，由于公司占有滨海地区，康提王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形势非常微妙，双方都有大量挑衅性行为。像在印度一样，同觊觎王位的竞争者私相勾结，看来是左右地方政府的最有效办法。1802年，英国军队正式扶植了一名傀儡当国王，但只留下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小部队作为国王的未来支柱，结果国王连同部队都被立即消灭掉了。然而，那位合法的统治者非常粗暴，使康提的主要酋长们敬而远之；他又十分轻率，使英国人得到进

一步干预的充分理由，因此，在1815年，在桀骜不驯的首长们的默许之下，一支英国军队得以将他废黜，兼并了他的王国。这时，整个锡兰都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公司于1802年把滨海各省转交英国政府统治。）1785年缅甸人征服若开以后，在印度的东北边界上，英国人又遇到了另一个好斗尚武和不安分的邻居。缅甸政府不了解公司的实力，但决定对公司推行强硬的政策。在随后几年里，双方关系中出现了纠纷，这是由于缅甸人抗议英国人让若开的叛乱分子和难民在其领土中避难；由于缅甸人屡次入侵阿萨姆和曼尼普尔，引起更多的难民逃亡；由于缅甸人威胁要进攻卡恰尔，并谣传缅甸对孟加拉有所企图。宣布卡恰尔为英国保护地并未能阻止缅甸人的进攻，随后发生的战争却一劳永逸地挡住了缅甸人，使英国人获得若开、丹那沙林以及阿萨姆等重要的沿海省份。

然而，上述的种种征服活动却带来了行政管理的新问题。韦尔斯利和孟加拉的许多官员认为，康华理勋爵在孟加拉建立的体制应当推广到公司所属的其他领地。1793年，康华理批准政府和富裕地主即“柴明达尔”（此词包括从包税人到土王后裔各色人等）达成的永久性税收解决方案。从此，柴明达尔全都成了按不变租金交租的世袭地主。这种做法是为了使他们知道提高生产率只会对自己有利，而不会引起政府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鼓励他们采取改进的措施。与此同时，收税员和法官的权力严格加以分开，这是防止非法勒索的保证。有了详细的规章制度，这就意味着准备建立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这也是一个欧洲人的政府，因为印度人只限于低级的和工资少的职位。但是，康华理体制的这些特点现在都受到了攻击。

实际上，提出最严厉批评的是那些奉命在公司的新领地上从事建立此种制度的工作的官员。例如，在印度北部割让和征服的省份里，他们就抗议说：由于对土地的资源及其原主不够了解，无从作出任何永久性的安排。此外，一旦土地的生产率上升或者货币贬值，永久性解决办法对公司没有好处。反对税收不变的这些理由足以使英国政府相信，未来的解决方案必须允许定期地修改。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解决方案是否要和柴明达尔共同制定。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康华理体制已经使他们成为力求改进的地主。恰恰相反，这个严格的制度似乎使他们对佃户更加残酷，而不是更有效地改进耕种方法。他们发现，公司的税收额即使不提高，它也不会降低或者延期缴纳；某些古老家

族被别人取代之后，其他家族就索取额外租金或者转租。土地一旦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土地的所有权似乎就要发生很大变化。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印度其他地方，由于定期修正税收方案，这种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大量土地必然转移到商人、放债者以及新政权的法院官员和税收机关的手中。公司的法官们对目不识丁而又轻信不疑的土地所有者画过押的抵押契据和债券上的条款是严格的，但这很快会给上述人员以可乘之机。然而，虽说公司法庭手续太复杂，收费太昂贵，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但地方司法代理者（像村长和仲裁法庭）又太不正规，过于紊乱，不宜成为康华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些具有实用主义思想的官员怀疑英国人的统治是在培育一个收租者寄生阶级，那些目睹古老印度村落中生气勃勃和朴素美德的人，则害怕在一个改革和调整的时期，这种风尚会趋于没落。

在印度北部，税收解决方案是和村庄协商制定的，通常是与一群土地所有主，有时则是和村里的头人；而在印度南部，在托马斯·芒罗的影响下，解决方案是和个体“莱雅特”（即耕作者）协商制定的，更多的权力给了印度人，其中包括下级法官、村里的头人和法庭。在印度西部，由于蒙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的影响，更多地注意维护社会特权。埃尔芬斯通和在解决税收和了解农民问题方面有着长期经验的芒罗不同，他充当驻浦那的代表，与马拉塔帝国的统治阶级有密切的交往，并且洞悉他们建立英国统治的种种困难。他不仅认识到贵族在人民中间仍有影响，安抚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而且他还根据原则反对“平等”的倾向。他觉察到康华理体制中司法和行政措施有这种倾向，并且觉察到芒罗决心要和农民一道制定税收解决方案和轻视其他阶级的权利，也有这种倾向。因此，他制定特别条款，以维护古老的马拉塔帝国的统治阶级的感情。萨达尔（即重要人物）分成三个等级，公司的法庭对每个等级都给予相应的优待，而最大的地主（贾吉达尔）在自己庄园内有自由处置的权力。考虑到婆罗门随着印度政府的垮台而丧失了各种特权，以及他们依然能够操纵舆论，于是也设法安抚这些人。村里的头人和仲裁法庭允许担负一定程度的司法责任。在有前例可援的地方，例如在古吉拉特和孔坎的部分地区，税收解决方案也是和村里的头人或者业主们共同制定的，尽管在别的地方是和农民本身协商制定。但是，芒罗和埃尔芬斯通都发现，起诉人似乎喜欢公司的印度法官迅速审理，而不喜欢仲裁法庭拖拖拉拉的诉讼程序。村里的头人不能超越公司法规对他们权力规定的界限

和范围，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躲不过公司的税务人员疑神疑鬼的监视。在普遍反对康华理体制及其所依赖的分权制的情况下，税务人员成了强有力的、家长式的人物，同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控制警察，在税收问题没有永久解决的地区，他还有权分派土地税额。

即使埃尔芬斯通在任时期，公司的统治方式也比他的前任更加有条理，更加制度化得多。权力的划定和限制似乎不祥地威胁着地方势力和威望；高级职位不是由印度高级种姓的人物担任，而是由经常调换的外国人担任，也威胁到地方势力。接替埃尔芬斯通任孟买总督的约翰·马尔科姆勋爵，于1827年在浦那接见大地主时，发现他们对“我们的统治制度有摧毁他们所珍视的一切优越地位的趋势”而感到惊慌，虽然他认为“在印度的这一地区保留的本地贵族的前景，比我们领地中的任何其他地区好得多”。^[4]但是，在孟买司法体制中所确立的贵族特权只是由公司董事会非常勉强地批准的，而詹姆斯·穆勒等功利主义者们早就争辩说，公司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地主，在经济上占用全部地租，以致寄生的地主阶级无法生存下去。这一原则虽然从未认真执行过，却用来为繁重的税额作辩护，这类税额相当于预估净产量的一半，甚至2/3。在西北各省的税收解决方案，在存在贵族特权的地方，也企图用支持村社的办法来代替贵族特权。曾在孟加拉工作，后来担任西北各省代理总督的T.C. 罗伯逊对这种“可怕的试验”感到震惊，这一试验威胁着“要把整个社会的表面弄平，最终使统治力量和土地耕种者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5]但是，这种政策并不能阻止抵押的土地从贫困农民那里逐渐转移到精明的放债者手中。与此同时，废除多如牛毛的国内贸易税和通行税，进一步有利于商业阶级。所有这一切似乎与最佳的经济原则是一致的。

詹姆斯·穆勒主张，在这样一种体制下，“邦的需要其实无须依靠征税来提供，只要把懒惰的地主阶级所得地租转移到公司名下就行了”。^[6]然而，在实际上，高税额是公司定期税收解决方案中的通病。在实行永久性柴明达尔解决方案的地区，农民的境遇并不见得更妙。康华理根据自己在孟加拉看到该地由于饥荒影响而仍处于恢复阶段的情况，设想柴明达尔离不开佃户，必然会慷慨地对待他们；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政府走上轨道，这种理由不再发生作用了，而按照习惯要施给的恩惠，公司法庭又难以强制执行，因而也就难得有人这样做了。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其他地区里，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必

定带来生产的增长，使最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好处；但是商人和放债者看来却成了实际上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和柴明达尔一样，不可能提倡改良农业。

英国在锡兰沿海各省建立了统治权以后不久，就剥夺了酋长和头人们的特权和权力。但是，在征服康提以后，对协助这次行动的地方首领给予特殊照顾，直到他们在1818年发动叛乱，政府才决定限制他们的权力。即使如此，康提各省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在司法行政中，还给他们保留一种特权地位，但在1832年科尔布鲁克-卡梅伦委员会提出边沁主义的建议之后，就推行了更加一致的原则。当政府对某些种姓放弃征用强迫劳役的权力时，这就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前进了一步。科尔布鲁克在提出这项改革时指出，头人们不仅会利用这种劳役为他们私人的目的服务，而且会收受钱财免除个别人的劳役。这一项措施的背后，以及废除因服役占有土地和征收现金地租而不是实物地租的政策背后，也都包含着对经济刺激的信念。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苟延残喘的最后10年里，爪哇也谈论着同样的改革问题。德克·范·霍亨多普在巴特那的荷兰人工厂中工作时，已经了解康华理体制的种种动机。他认为强迫向公司交纳实物和通过地方统治者（即酋长）进行统治的政策，使人民得不到物质刺激，也不能保证免受压迫，而这两者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需的。但是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甚至对许多新思想表示同情的丹德尔斯也认为人民太懒惰，不宜搞自由经济。他推行强迫交付产品的办法，结果由于封锁，政府仓库里装满了咖啡却不能外销。这时候，他希望有个真正拿破仑式的中央集权政府，他想使地方统治者变为政府官员，对王公们更坚决地实行荷兰的霸权。莱佛士继续执行这些中央集权政策，他认为“每一个当地权力机构都天生爱好滥用它的影响和任意压迫人民”。^[7]但是如果说他不信任“特权阶级”，他却在农民阶级身上发现了芒罗派的行政官员们所赞许的纯朴美德。H. W. 蒙廷格是受范·霍亨多普影响的一个荷兰官员，在他的协助下，莱佛士采用了一种土地税收制度，起初是和村里的头人协商制定，后来是和个体农民协商制定。可以指望这种办法会促进现金经济的发展。现金经济更适合于寻求出口市场的英国工业家的需要，而不适合于寻求殖民地农产品的荷兰商人的需要。尽管如此，荷兰人回到爪哇以后，还是继续实行地租制。但是结果证明，这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财政需要，1825—1830年

间爪哇战争的费用使他们的财政需要加大了，这次战争是本地王公蒂博尼哥罗领导的叛乱引起的，他认为荷兰人骗取了他的世袭权。荷兰人的贸易也竞争不过英国人，尽管他们在1825年建立了一个国营贸易公司——荷兰贸易公司。约翰内斯·范·登·博斯于1830年出任总督，因此奉命进行经济改革工作。如果说他并不认为农民太懒而不能有自主权，但他也并不认为一定要有自主权，才能使他们懂得怎么样劳动最好。他的结论是需要用指导或者强制的办法去开导他们，并明令规定国家要求在特定地区进行耕种，用指定的作物代替现金地租。这种所谓“定植制度”包含一定程度的家长式统治，这和公司不问如何耕种，只迫使交付产品的制度是不同的。取得地方统治者的合作对定植制度的成功就愈发必要了，因此就恢复了地方统治者的许多旧日的权力。不过并不是全部恢复，因为丹代尔斯和莱佛士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消失。定植制也不是单纯恢复以前公司的政策，虽然富有成果的出口工作交给了新的国家贸易公司。方法改进了，新的作物引进了，生产率一般都提高了。不过指导变成了控制，政府愈加关心爪哇，而忽视其他的荷属领地。

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它的商业特权正在打一场无法取胜的仗。在英国对亚洲贸易的变化多端的潮流的后面，有公司对付不了的各种强大的力量。许多人在1793年反对延长公司的特许状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一向害怕它所输出的印度丝织品、细布和棉花的竞争。可是，英国的机织棉布已经侵入公司在欧洲的市场，而当1813年需要再次考虑延长公司的经营特许状时，反对派更关心的是公司垄断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阻碍了英国货物的亚洲市场的发展。因此，1813年剥夺了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1833年又剥夺了它对中国的垄断权。公司不久发现它无法和私营商人竞争，而印度的手工艺品一遇到英国工厂生产的商品同样是无法抗拒。但是，公司鼓励生产原料，同时在私营商人协助下，印度继续大量出口棉花、丝绸、硝石和靛蓝之类的商品。槟榔屿证明是一条有用的渠道，印度商品可以由此源源流入东南亚。它邻近科罗曼德尔海岸，这也激发了印度商人的进取心。新加坡的建立使英国布匹在同一地区易于推销，可是印度贸易也在继续稳步增长。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还得从英国和孟加拉输出白银以偿付公司不断增加的从中国出口的茶叶。但是由于印度输出的鸦片和棉花数量不断增加，这个差额不久就弥补上了。结果，到19世纪第二个10年，贸易条件颠倒过来了，中国不得不输出金银来补偿它的收支逆

差。在锡兰和爪哇，栽培外销作物也受到官方的鼓励。在锡兰，继1815年征服康提和19世纪20年代大规模修筑公路之后，以原有种植园为基础的咖啡种植业得到发展；而在爪哇，定植制使荷兰人有可能大力提高靛蓝、棉花和糖之类商品的生产。

英国公司就是这样在丧失它的经商职能，它不得不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改革。1813年的特许状法案结束了它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使传教士能够比较自由地前来传教，并促使教育得到发展。公司一直小心翼翼地怀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以致浸礼会传教士威廉·凯里和他的同事被迫到塞兰普尔的丹麦殖民区避难。在公司董事当中，有像查尔斯·格兰特那样的福音派信徒，但是他们至多只能设法任命一些志趣相投的教士去填补公司编制中牧师的空额而已。反对他们的人曾引用1806年韦洛尔兵变作为需要审慎的例证，当时拟定了一些条例，使服装和外表一律化，这引起了印度雇佣兵的愤恨，认为是冒犯了他们的宗教。但是，以前那么有效地用来煽动反对奴隶贸易的方法，现在又被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了；他们举行集会，写请愿书，威尔伯福斯及其克拉珀姆教派的同僚们则向有影响的人士发出呼吁。因此作出这样的规定：如果董事会不批准去印度旅行的申请，那么，督察委员会有驳回的权力。此后对传教士去印度任何地方都很少加以限制了，不过公司依旧打算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公司官员继续对印度的各种宗教表示尊重，并对香客征收传统的捐税。然而，在传教士和福音派新教徒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833年发表声明，要求公司取消与宗教的所有这一切联系。自从废除香客税以后，去印度教圣地的香客数量似乎增加了。这根本不符合传教士们的期望，他们本来以为这些圣地是由于和政府有关系才获得声誉和名望的。要使政府不再管理用于宗教目的的土地和财产看来更加困难了。在此后10年，这个问题在锡兰变得特别尖锐，那里的传教士发起一场反对政府和“偶像崇拜”有联系的运动，迫使总督放弃了任命佛教僧侣和管理康提的佛牙庙之类的职责。传教士的运动还反对其他一些事情，主要的如要在英属印度废除殉夫自焚。他们搜集统计数据，公布举行仪式时的可怕情况，查阅印度教经文中的有关语句，以证明并不是非自焚不可。政府唯恐引起群众的愤怒，特别是唯恐孟加拉军中的高种姓印度兵的愤怒，起初只打算实行印度教经文中写明的一些限制。每当宣布举行殉夫自焚仪式的时候，公司官员就要查明那个寡妇是否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走上火葬柴堆的。但是不久就有人提出，公司

官员到场只会对殉夫自焚起鼓励作用；而且公司官员中也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禁止殉夫自焚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危险。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经过认真调查之后相信，这种看法是对的。1829年，在孟加拉政府辖区内就依法禁止殉夫自焚。^[8]

传教士在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大家都认为，传播西方知识会削弱对印度教的信仰，于是也就为传播基督教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铺平道路。1813年的特许状法令规定：从公司领地的盈余赋税中，每年至少应拨出10万卢比，“用以复兴和促进文艺，鼓励印度本地知识分子在英属印度的居民中介绍和宣传各种科学知识”。^[9]但是，上述的规定引起了争论。有些官员认为，公司应该提倡复兴印度的传统学术。这种观点遭到传教士和福音派教徒的反对，因为它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同时也遭到功利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它和宗教本身相联系。詹姆斯·穆勒与1824年草拟的一份紧急文书大有关系，这份文书宣布：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讲授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学术，而是讲授“有用的学术”——换言之，也就是西方知识。^[10]用什么语言讲授也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梵语是印度教学术的传统语言，似乎是使不得的，因为它是一种死了的语言、难学的语言和印度教的神圣语言。波斯语是古老的莫卧儿政府的语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熟悉。口语种类很多，而且是地方性的。要把英语书籍译成所有的方言，那将是一件花费极大、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教印度人阅读英语书籍似乎比较经济一些。本廷克本人认为，“英语”是“一切改进措施的关键”。麦考利在一份讽刺性的备忘录中嘲笑一般关于印度语言和东方学术的主张，他认为教印度人民学习英语的结果很可能是使印度发生一次文艺复兴：“印度人民需要我们的语言，就像莫尔和阿谢姆的同时代人需要希腊语和拉丁文一样。”^[11]因此，总督在1835年作出这样的决定：“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提倡欧洲文艺和科学；所拨出的一切教育经费最好完全用在英语教育上。”^[12]这是一种极端的立场，不久以后，官方对印度学术又给予一定的支持。不过，在以后10年中，政府任用公职人员时决定优先考虑懂得英语的候选人，因此，英语教育的至高地位得到了加强。1832年，根据科尔布鲁克委员会的建议，英国政府在锡兰同样推行英语教育。荷兰政府则在1819年就已宣布，它在爪哇的基本政策是推行荷兰语教育。

这是只适合少数人的一种教育，用麦考利的话来说，这是“可以在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方面，却是英国人”。这样一个阶层的核心似乎已经在孟加拉形成：在加尔各答居住的富有的印度教徒——不少地主、商人、律师、公司官员——都爱好欧洲的奢侈品和欧洲的思想。1817年，这些人在加尔各答发起创办印度教学院，那里用英语讲课。正像传教士们所预料的那样，许多正统的印度教徒发现新思想扰乱人心。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发现，这些思想在引人走向基督教。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加尔各答的文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书店里，伏尔泰、休谟和托马斯·潘恩的著作大为畅销；新创办了许多孟加拉文和英文的报纸杂志；文学会和讨论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青年人吃牛肉、喝葡萄酒，使长辈愤慨万分。但是，这种激情仅限于极少数人。在印度教内部掀起了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孟加拉出现文艺复兴之后，必然会出现印度教的革新。拉姆·摩罕·罗易是婆罗门种姓，也是公司的一位老雇员，他率先提倡英国教育。当政府提议在加尔各答建立一所梵语学院时，他表示反对说，梵语很困难，因而“长期以来可悲地阻碍了知识的传播”。他还论断说，讲授欧洲的“实用科学”更有助于人民的“进步”。^[13]他本人学过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研究过新学术，曾把基督教教义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作过对比。他甚至经过批准出版一部基督名言的选集，书名是《耶稣箴言——和平与幸福指南》。但是他拒绝接受基督教的神学，而且确实使一位著名的浸礼会传教士威廉·亚当牧师——“第二个降世的亚当”改信了唯一神教派。1828年罗易创立梵社，此社规模不大，但它的影响远远超过它的社会人数。它根据精选的印度教经文，编成有系统的信仰一神教的书籍，供给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它的第一个聚会所的信托书上特别规定不设“偶像”或牲畜祭品，因为这种形式的印度教能够防止新教传教士更公开的批评。另外，它和新思想也没有矛盾，因为它的创始人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一位反对殉夫自焚的人，一位西方教育的鼓吹者，甚至与边沁有书信往来。

在此期间，欧洲人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印度似乎比对中国更感兴趣了。在英国，这部分是绝对统治权造成的结果。议会辩论达到高潮时对沃伦·黑斯廷斯提出弹劾，使公众对一个受公司任意宰割的文明民族表示同情。更重要的是，孟加拉亚洲学会已在1784

年成立，公司的一些职员开始认真研究印度的学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威尔金斯翻译的《薄伽梵歌》和琼斯翻译的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以上述作品为例，论证古代印度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14]接着，德意志很快就开始认真研究印度的学术。1791年福尔斯特把琼斯翻译的《沙恭达罗》转译成德文，很快博得赫尔德和歌德的赞扬。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学习梵文，后者是孟加拉亚洲学会创始人之一，由于英法战争爆发成了俘虏，假释期间（1803—1804年）留在法国。1818年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奥古斯特·威廉成为波恩大学教授，在那里专门研究梵文文学。不久，德意志又指派一些人做同样的工作。法国也重视印度学术了：1786年昂克蒂尔-迪佩隆把四部《奥义书》从波斯文译本转译成法文，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梵文讲座，1821年在巴黎创办了亚洲学会。然而，受印度学术影响最大的却是德意志思想界。诚然，歌德对印度学术是有保留的，例如，他不喜欢在他看来是印度教比较荒唐的那些方面。^[15]可是，印度有许多东西使参加浪漫主义运动的德意志人——特别是探求人类原始语言、诗歌或人类宗教的人——神魂颠倒。也许印度会使欧洲获得新生。1808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认为印度文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会像15世纪希腊和拉丁文学的影响一样重要。德意志的唯心主义对于印度的影响也是很敏感的，从谢林到叔本华，哲学家们都急切地表示他们的赞赏。早在1823年，克拉普罗特就把印欧诸语言称为印度—德意志诸语言，有时人们说，这类语言比源自拉丁文的那些语言（特别是法语）更为纯正。此种比较并非始终局限于语言的研究，而且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种族方面的论断。

海涅把德意志人对印度的精神财富的渴求，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对印度的物质资源的贪欲作了对比。在功利主义者和福音派教徒的压力下，英国人对于印度文明的确似乎在失去他们的一些敬意。詹姆斯·穆勒在他那本有影响的《英属印度史》（1817年）中，批评了琼斯等赞扬印度文化成就的东方学学者。他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指出印度社会、道德 and 知识方面的缺陷，表明印度（也指英国）多么需要边沁主义者的改革。在为传教士自由进入印度进行斗争时，福音派教徒同样强调印度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弊病，认为这些都是印度教带来的后果。格兰特专门攻击罗伯逊维护印度教的种姓之类的制度，

[16] 威尔伯福斯则把印度的“宗教体系”斥之为“卑鄙、残酷和无法无天”。[17] 在争取禁止殉夫自焚和废除香客税的斗争中，也曾出现对印度教的类似攻击。关于英国教育问题的争论，也同样导致对印度学术的狂妄谴责。由于联想到欧洲的宗教争端，这场论战中的许多言论更为尖刻，例如在功利主义者和福音派教徒的文章中，都把印度教和天主教士的权术以及蒙昧主义作了对比。

对印度学术和文化的这类批评，在受过英国教育的某些印度人中间引起了反响。但是，英国教育决不鼓励奴性，早在1828年，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的一位早期学员卡辛纳特·高斯就对詹姆斯·穆勒对印度文明的批评作了回答。他的一些论据很受重视，得以发表在加尔各答的一家大报上，但是大多数论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英国官员鼓吹研究古老传统的东方学。埃尔芬斯通在孟买鼓吹过，莱佛士在马六甲和爪哇鼓吹过；1823年在伦敦建立了皇家亚洲学会，1832年H. H. 威尔逊被选为牛津大学第一位梵文教授。他试图回击穆勒的批评，但是他回击的办法是把后者的《英属印度史》当作梵文经典那样来进行注释，因此，他的论点也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埃尔芬斯通本人所著的一部《印度史》，以赞美的笔调描绘了这个国家的文明。但是，他所传达的总的印象是衰落的情景，他把印度人民表述为缺乏“诚实”“大丈夫气”和“民族精神”。这种概括的论断不仅可以用于说明为什么存在外国人的统治，而且用于解释外国人统治的正确性，官员们也 and 功利主义者与福音主义者一样，全都是如此信笔而书的。政府原来是刺激英国人研究印度的兴趣，现在的工作却是压抑这种兴趣了，因为在一个改革的时代里，英国人到印度去是为了教导，而不是去学习。但是，必然的结果是：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他们就必须离开，埃尔芬斯通像麦考利一样乐于承认：民族独立乃是西方教育应有的结果。早在1829年，本廷克就已经公开邀请“所有当地的绅士、土地所有者、商人以及其他人士”对政府所要实施的改革发表意见。在锡兰，科尔布鲁克在公布他的委员会的文件时，除用英文外，还用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并且十分注意这些文件所引起的当地人的请愿书。另外，在1833年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法案中包含着一项宣言，即不得以种族或宗教原因阻止当地人担任任何职务，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至少是对于未来。

（陈云程 译）

第二十一章 欧洲与热带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1]

自从15世纪以来，欧洲的扩张浪潮一直冲击着非洲海岸。但到18世纪末，对这个大陆及其各民族的情况依然所知无几。即使有所知道，自从15、16世纪葡萄牙的发现和扩张达到全盛时期以后，欧洲对非洲的了解和兴趣也已减弱。人们对非洲海岸线比较熟悉，可是，对它进行科学考察主要还是19世纪初期的事情，当时的欧洲海员很少有登上东部海岸的。不过葡萄牙人却把他们一度获得的有关内陆的知识毫不在乎地告诉了其他欧洲人，或者说是被那些欧洲人暗暗印入了头脑。作为海外帝国的缔造者，他们已经超过了葡萄牙人。法国商人兼探险家沿着已被遗忘的葡萄牙使节开辟的路线，把塞内加尔河变成直达苏丹西部一些帝国和金矿的通途。他们从中世纪某些阿拉伯作家的著作中知道一点那里的情况，虽然那些作家所描述的并非总是最正确的东西。然而他们的野心受到了挫折，这部分是因为在法国缺乏坚强的商业后盾，部分是因为苏丹各族人民和英国海上力量都对他们怀有敌意。在几内亚，欧洲人满足于向美洲贩卖黑奴。黑奴可以很容易地从沿海地区的非洲商人和统治者手中购得。因此，欧洲人缺乏渗入内陆的任何刺激物，与此同时，已经树立起的非洲的各种势力在堵塞着任何这类渗入的途径。再往南，由于葡萄牙的商人们同样热衷于奴隶贸易，下刚果和安哥拉的非洲人王国，以及葡萄牙一度谋求建立的保护领地，都遭到很大的破坏。葡萄牙人曾经准备使东非成为庞大的东方贸易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17世纪初荷兰人闯入印度洋，以及随后阿拉伯势力和贸易在东海岸的复苏，伟大的计划化成了泡影。随着罗得西亚高地上的莫诺莫塔帕文明的崩溃和金矿开采业的衰落，葡萄牙人沿着莫桑比克海岸，以及溯赞比西河而上远至太特的一小条殖民地，仅仅成为一小撮葡萄牙的社会渣滓和混血儿的避难所，他们从事一点种植业和贩卖奴隶。虽然在16世纪，葡萄牙火枪手和耶稣会传教士的勇气曾经使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君主国得以幸存，但不久以后，它就在伊斯兰的帘幕后面被孤立起来了。迄1868年内皮尔的远征

队深入幕后为止，塞缪尔·约翰逊的《拉塞勒斯》也许是比鲁多尔弗斯的《历史》（1681年），甚至比他自己所翻译的洛博的《阿比西尼亚之行》（1735年）更好的一部回忆录。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在非洲的实际利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战略上的利益，一是商业上的利益。两者的范围都很狭小，无须了解内地情况，或者使海岸线以外地区感觉到欧洲人的力量。所以出现战略上的利益，是由于非洲是这样一大块土地，它横在当时商业帝国的主要海上航道上，或者紧贴着那些航道。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连做梦都思念着西印度产糖的岛屿对本国经济和力量的重要性。在整个18世纪里，他们的士兵也都在为控制北美大陆而战斗。如果说，对于欧洲人在美洲的冒险事业，非洲的最大意义永远是一个劳动力的泉源，那么，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和运送开往美洲大陆的军队的远洋航道，都从非洲西端的海岸通过，这也同样是很重要的。1677年，法国人在这里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佛得角半岛背风面的小小的戈雷岛（荷兰人首先看出这个地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在1756—1763年、1778—1783年和1793—1815年的每一次战争期间，为了占领这个小岛（往往也包括附近大陆上的一些商站，其中主要的是塞内加尔河口的圣路易），荷兰人与法国人的海上斗争都必然把英国人卷了进去。回顾往事是有点儿令人惊奇的，英国人竟然没有长期占领这一地区。在1763—1783年间，英国的确想这么办，当时英国人把在冈比亚早就建立的贸易点同在塞内加尔的征服地区合并成“塞内冈比亚省”，这是英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直辖殖民地。但是，殖民地的行政机构设想错误，再加上处理不当，它的商业目标由于戈雷（1763年错误地把戈雷归还法国）的法国商人的竞争而受到挫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虽然夺回了戈雷，却失去了塞内加尔的殖民地。即使说在1783年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办法（那时戈雷又交给了法国人），但是已没有什么动力使英国人继续保留塞内冈比亚殖民地了。看来用直辖殖民地政府来维护英国人在非洲的利益，是一项花钱多而收效少的办法，这确实是一条重要的教训。只要英国保持制海权，像戈雷这样的战略要地，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占领。至于其他地方，英国人的利益是在商业方面，最好应让商人们自己去处理，就像在黄金海岸那样。18世纪末叶，在黄金海岸的英国商人为了维持他们的贸易站，每年只从本国政府领取小量津贴，但是所吸引来的当地贸易额却大大超过他们的荷兰和丹麦竞争者的商站。

然而，战时对塞内冈比亚的关切终于使英国政府与西非产生更密切的关系。早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甚至准备任命一名领事常驻内地贸易区，以便把横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路线上的苏丹西部贸易拉到在冈比亚的英国商人的手里。^[2]这一计划毫无成果，只是为后来政府支持考察西非腹地以便发展英国贸易开创了先例。此外，由于戈雷的政治前途难以逆料，因而注意到了稍稍靠南的塞拉利昂河的优点，这里可以成为英国海军有巨大潜在价值的天然停泊场。

通往印度进而通往亚洲的航线，是18世纪欧洲各帝国角逐的另一重要场所，它们比通往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航线与非洲有更直接的关系。起初主要的焦点是南非。葡萄牙人多半忽视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南非的海岸线险恶难测，其内地也没有发展前途。西部降雨量少，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在水利条件较好的东部，班图人部落没有什么吸引贸易者的东西，同时力量强大，足以制止欧洲人的渗透。南非的这种与世隔离的状态，只有在荷兰人认识到南纬40°以南贸易风对往来于东印度群岛的船只有利时才告结束。东非沿海港口原来是葡萄牙人用作去印度的歇脚石，现在已弃而不顾，把注意力转向非洲的最南端了。在这里建立船只停靠的港口可以有双重用途，一是可以作为往东和往北在公海上长期航行的船只的补给站，一是可以在战时作为基地，使海军舰只能够由此保护友方船只并防止敌人进入印度洋。因此，在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附近比较满意的停泊场桌湾开辟了一个居留地，这就是未来的开普敦。它的实力较弱的英国和法国的竞争对手暂时只能满足于分别利用两侧的圣赫勒拿岛和毛里求斯岛。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海军越发利用起开普敦来了。由于1793年战火重起，随后法国人占领了尼德兰，英国也就向开普敦下手了。1795—1803年暂时军事占领之后，1806年又第二次占领，最后在1814年把开普敦割让给了英国。

这一块殖民地就这样落入英国人的手中，现在它要比以前作为战略据点时期大得多。荷兰公司为了有效地防守开普敦和提供食品，曾经鼓励欧洲人在那里定居。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成功的，在完全改变这一政策以前，一个欧洲人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普发展起来，它所生产的东西大大超过公司的船只和驻军的需求，同时公司的经济垄断和独裁政府之下，它也越来越不安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由于与本地的霍屯督人以及与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其实徒劳无益）从

马来半岛和班图部落输入的奴隶通婚杂居，这一居留地在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的移民由于开普的生活限制多而就业机会少都折了回去。他们开始在内地广阔草原上经商和养畜，为自己谋求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向班图人占据的灌溉条件较好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扩张。在英国人到来的时候，一个特殊的、游牧的布尔人社会已经赫然存在。这是由顽强的、具有独特个性和开拓精神的家族组成的社会，17世纪加尔文教派激励着他们，使他们把自己看成上帝的选民，去开辟洪荒，做有色人种异教徒的主人。游牧的布尔人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对开普发生影响的当代欧洲文明的潮流，他们憎恨开普敦当局的控制或干涉。的确，在1795年，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在各自的共和国里宣布正式独立。同样意义重大的，他们为了争夺土地和牲口，已在开普敦以东约500英里的大鱼河沿岸边界线上同班图部落进行战斗。

直到1825年左右，英国对于卷入南非内地这一并非需要的遗产而引起的各种问题，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它首先关心的是在开普敦的基地。因此，它对内地的政策是控制游牧的布尔人和守卫边界——部分利用军队，部分利用本国退役军人移民，目的是防止班图人扰乱，以免损害开普敦的安全。在布尔人看来，这种积极的边界政策有助于抵消比较严格和比较有效的司法和行政控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可是，南非的局势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不断发展的布尔社会总是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如今这只有牺牲密密麻麻地聚居在大鱼河以北和东北方的班图部落的利益才能实现。只有把边界不断往前推进，使班图部落民降低到奴隶地位，才能真正保证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平静关系。英国人如采取相反的行动，就必然会导致布尔人摆脱英国的控制，进一步迁往内地深处。不管怎么办，英国都将卷入布尔人和班图人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几乎会无限期地深入内地，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土地最富饶、班图人口最稠密的居留地纳塔尔。

纳塔尔是与英国有某种利益关系的一个地区，因为纳塔尔港（今德班）可能是东非海岸南端最良的海港之一。18世纪即将结束时，这一带海岸开始再一次进入欧洲海上战略的范围之内。法国人在为控制欧洲贸易和帝国海上生命线的海上斗争中败给了英国人，他们对于经地中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前往亚洲的旧路线又发生了兴趣。由于1798年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取得胜利，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受到了挫折，法国要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一条运河的计划推迟了将近70年之久（见本

书原文第533页)。尽管如此,法国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兴趣依然使英国人忧心忡忡。特别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逐渐转变为地方政府,为了快速运送往返于印度的紧急公文和官员,地中海和红海路线的有利之处受到注意。于是,以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政府为一方,法国为另一方,在红海和波斯湾沿岸阿拉伯诸国以及地中海东部地区展开了一场外交阴谋和反阴谋的冷战。就战略上而言,东非海岸是绝不可能和这些阴谋无关的。事实上,从外交和商业方面来说,都有它为什么必然卷入的理由。1798年,东印度公司与波斯湾口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马斯喀特的统治者缔结了第一个英国条约。17世纪后期,随着葡萄牙的势力由于荷兰人进入印度洋而削弱,马斯喀特的阿曼人就率先把葡萄牙人从莫桑比克以北的东非海岸赶走。阿曼人的统治者们一直坚持对德尔加杜角以北阿拉伯人沿海居留地的宗主权,尽管其有效地区仅在桑给巴尔岛上。但桑给巴尔岛的重要性,在于这个地方的印度商人(其中有些现已成为英国臣民)正逐渐成为东非阿拉伯人贸易不可缺少的商人兼银行家。此外,在英国海上力量的庇护下,一位能干的苏丹——赛义德·赛德(1806—1856年)看到,发展马斯喀特的非洲贸易和建立他自己的海军以控制大陆的港口,对他本人和他的人民都有好处。

法国人虽然在争取马斯喀特宫廷的好感和在印度洋的海上斗争中最后都败在英国人手下,但是他们还是保住了在东非的利益。他们按照西印度群岛的样板,依靠黑奴劳动,已经开发马斯卡林群岛,建立了甘蔗种植园。最初,黑奴大部分是从马达加斯加弄来的,但是也有阿拉伯奴隶贩子经由科摩罗群岛,从大陆运来黑奴供应这里的市场。在马斯卡林群岛中,唯一拥有可用的海港的是毛里求斯,它已于1810年属于英国人,不过,留尼汪岛(波旁岛)依然在法国人手中。由于缺乏劳动力,再加上迫切需要抑制英国人在印度洋上日益增长的势力,法国人不仅向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靠近,而且和东海岸基尔瓦和蒙巴萨这样一些海港的统治者们联合起来,这些统治者对阿曼人势力的增长自然是怀有敌意的。

迟至19世纪60年代,战略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和非洲关系的基础,这时候,老式的海上战略被各种因素打乱了,如西印度群岛殖民经济的衰退,轮船采用复式蒸汽机,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尽管如此,在18世纪末来说,热带非洲对欧洲的头等重要意义是在商业

上。例如，利物浦和南特这样的城市，主要是由于与“非洲贸易”有关而分别成为英国和法国最大的港口。在实际上，所谓“非洲贸易”就是在从塞内加尔河口到刚果河口之间的西非沿海地区做生意。虽然对其他产品，主要是对黄金（来自黄金海岸）、橡胶（来自塞内冈比亚）和象牙^[3]的兴趣从未衰退过，可是在当时，“非洲贸易”实际上是向美洲贩卖黑奴的同义语。

尽管1778—1783年和1793—1815年的历次海战使大西洋的航运受到干扰，奴隶贸易却在继续扩大。到18世纪末，活着运抵美洲的非洲奴隶每年至少有7.5万人。他们的市场价格大约为400万英镑，为了在非洲购买这些奴隶，欧洲每年可能要输出大约200万英镑的货物。不错，这些货物并非全都产自欧洲，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例外只有印度棉花，其价值每年至多为30万英镑。因此，对欧洲工厂制品——锻制金属和金属器具、酒精、枪炮和火药、念珠和小件装饰品——来说，西非显然是一个绝不容忽视的市场。就英国而言，它占英国出口额的5%，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尤其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那里作为一个市场，有希望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在非洲购买奴隶，然后到美洲卖出，这是非常赚钱的生意。当然，这种生意冒的风险也很大，特别是疾病，或者由于意想不到的长期航行而缺乏淡水和食物，可能失去一部分，甚至全部人类货品。不过，从非洲买来而在欧洲有销路的其他货物的利润，以及从美洲带回的货物的利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这些风险，虽然在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已不再用运载黑奴的船只运往欧洲。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种植园的产品至少占英国进口额的1/4，所有的种植园依靠非洲经常供应的劳动力。即使撇开这一事实不谈，奴隶贸易也是殖民强国和海上强国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例如，每年有100—150艘英国船只驶往西非，其中光从利物浦一个港口开出的即占2/3左右。根据现存的当时的一些估计数字，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新兴工业城镇中，至少有1/5，有时也许接近50%的工人是生产对非洲贸易的货物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奴隶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超过对于法国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首先，到18世纪末，英国商人获得了这种贸易的最大份额：到达新世界的奴隶至少有一半是由英国船运送的。法国人是最逼近的竞争者，在18世纪80年代，约占这种贸易的1/4，虽然此后在1793—1815年战争时期，由于英国制海权的影响，法国的份额大大

减少。唯一勉强能够并驾齐驱大搞这类买卖的另一个欧洲国家是葡萄牙，葡萄牙商人在安哥拉和巴西之间有着他们独特的南大西洋贸易。在英国占有突出地位的这一背景下，英国1807年根据议会法案决定停止奴隶贸易，这对确立欧洲和热带非洲之间的关系的未来模式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英国既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认识到奴隶贸易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的欧洲人血统的国家。丹麦在1804年即认为奴隶贸易为非法，美国在1808年、尼德兰在1814年宣告贩卖奴隶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荷兰和丹麦在当时奴隶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分别为4000个和2000个左右奴隶），而在美国，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联邦州在经济上依靠奴隶制，并能阻挠联邦法律的有效实施，关于奴隶贸易的禁令就难以生效。然而，英国不仅在贩卖奴隶中获得巨大利益，而且也有决心和海军力量来有效地实施停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是英国采取行动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或者说实际上主要在于——一举废除了古老的18世纪奴隶贸易的一半。在1807年以后的年代里，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的数量实际上在大量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古巴和巴西处女地的种植园经济发展了，美国南部种植棉花的面积显著扩大，从而使美洲对奴隶的需求大大增加。其他各国商人迅速填补了英国人留下的空缺。其中有些是欧洲人，^[4]但是大部分是南北美洲商人（因为新世界越来越不依附旧世界了），他们不仅补足欧洲人减少供应的差额，而且为他们扩展的经济弄来更多的奴隶。1810年左右，据推测，每年运抵美洲的奴隶人数已经超过18世纪的最高数额。20年后，输入的奴隶每年大约为12.5万人。迟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这种贸易达到最高顶峰，估计每年约有13.5万名奴隶。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他方面。首先，由于英国在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居领先地位，它在西非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具有更大的既得利益。它不能像丹麦人和荷兰人最后所干的那样，把它在西非的利益一笔勾销。英国商人要在非洲贸易中为海运、人力、资本和友好等寻求新的机会，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寻找新的贸易来代替贩卖奴隶。这件事谈何容易。在西非海岸，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现存关系几乎以出口奴隶的生意为先决条件。欧洲人不知道还有其他非洲产品可望提供类似的利润。至于非洲人呢，他们通常都没有组织起来，生产一些有价值的、数量稳定的其他产品，以便在沿海地区出售。19

世纪初，在代替奴隶贸易的四种主要产品中，只有一种可能发展到与奴隶贸易完全相等的水平。在西非，象牙已经越来越少，而橡胶和黄金的输出额也都不可能扩大，因为欧洲对橡胶的需要有限，而在欧洲技术传入黄金海岸内地以加强传统开采方法之前，黄金的产量也不可能增加。在欧洲，只有对棕榈油的需求稳步增加。而非洲的生产者和出口商也能够相应地予以满足。这在当时以“油河”著称的尼日尔三角洲最为突出。这里还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但是，有一些商业城邦应运而生，它们越来越依靠努力垄断邻近内陆地区的棕榈油输出发财致富。在1800年以前，英国对棕榈油的进口是微不足道的，到19世纪60年代，每年进口高达150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油河”。

但是，除棕榈油这一主要贸易外，大多数非洲商人发现继续输出奴隶比较容易，也更为有利可图，特别由于美洲对奴隶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试图发展“合法”贸易的英国商人往往觉得工作难以进行。塞拉利昂公司的经验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公司是鼓动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一些英国人于1791年创办的。1772年，他们说服英国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作出他的著名的判决：在英格兰的法律中没有奴隶制度的地位。结果，那些种植园主从西印度群岛带回英格兰的奴隶们便成了自由人。其中有些人觉得很难适应自由社会。在英属北美洲，英国于1783年失去的13个殖民地，那里的黑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站在英国人一边作战，很快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废奴主义者从而想出一个计划，要把这些以前的奴隶中的一部分重新送回非洲定居。他们选择塞拉利昂进行实验。几经周折之后成立了塞拉利昂公司，来管理在弗里敦建立的居留地。公司指望从与内地进行合法贸易中得到利润，作为支付行政管理费的来源，在这一殖民地的头几年里，这种开支必然是很多的。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地看出，在奴隶贸易还很活跃的地区，合法贸易是不可能兴旺的。从1800年起，这块殖民地只能依靠英国政府每年发给的津贴来维持。最后，随着英国奴隶贸易的废除，英国殖民部直接接管了这块殖民地的管理责任。

其次，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重大意义在于：英国废奴主义者劝导本国政府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还促使政府运用其影响和力量，把禁止奴隶贸易扩大到自己的王国之外。英国合法贸易不能同奴隶贸易竞争而获胜，这种物质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成了它的道义上论据的后盾。拿破仑战争停止后，英国政府开始敦促其他各国政府禁止本

国臣民从事奴隶贸易。到1835年，西欧沿海各国以及新独立的美洲国家都已采取立法行动禁止这种贸易，其中许多是出于自愿，但也有些是英国直接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制定法令禁止奴隶贸易是一回事，保证该项法律有效实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其他一些从事奴隶贸易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法国具有和英国相类似的动机来实施这些法律。多数国家却苦于缺乏海军力量，不能确保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遵守法律。法国和美国的海军偶尔也采取反对奴隶贸易的行动，只有英国始终坚持海上巡逻，其唯一目的是拦截运奴船只。弗里敦因此成了一个重要基地，英国西非海军分遣队的舰船一度也利用几内亚海岸另一端的西属费尔南多波岛。其他各国海军力量的微薄，使英国人采取第二轮外交活动，即通过谈判，要求使它的战舰有权拘留别国运奴船，并送交混合委员会法庭，此类法庭在弗里敦以及其他地方都是和英国的海员法庭并存的。

但是，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单凭外交和海军措施，显然不能完全禁绝从西非输出奴隶。只要南北美洲对奴隶的需求还是合法的话——美国迄至1863年，古巴和巴西迄至19世纪80年代还是这样——就会有不法之徒，甘愿在海上冒遭受拦截和拘捕的风险。要任何国家的海军一直全面监视可能输出奴隶的全部海岸线，那是不切实际的。何况英国海军的宿敌，如法国和美国，绝不会容许英国海军得到英国政府所企求的充分权力，来搜查和拘捕它们的商船。

于是，英国废奴主义者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非洲本土，试图在非洲海岸防止出售奴隶。这就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其一是以前曾经和欧美各国政府议订过一套缉私条约，现在理所当然地要把它推广到非洲的统治者那里。但在大力开展这项工作之前，要在非洲各民族中间创造经济和道德方面的新风气，以期鼓励用不断增长的合法贸易来代替作为财富和权力来源的奴隶贸易。

显然，这首先需要到非洲内地进行考察，到这时为止，非洲内地还是隐藏在沿海奴隶贸易的屏障背后。他们想要发现：内地除奴隶外还能向欧洲提供什么商品，非洲的村社能在多大范围内组织起来生产和出售这类商品，以及有什么（如果有的话）运输工具能把商品运往海岸，再把作为交换的欧洲商品运往内地。在1788—1855年间，一批批欧洲探险家或者从海岸，或者从北非沿着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传统商路进入内地，从而揭示了西非腹地地理上的一些交通要道。在这一考

察活动中，英国起了突出的作用。芒戈·帕克和兰德兄弟最早负责绘制大尼日尔河3000英里的流程图，这条河起自西边的塞内加尔河或冈比亚河，从东南经过它自己的三角洲（油河），这都为进入西苏丹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天然通道。把苏丹本身的古老文明和商业揭示给外部世界的主要拓荒者，是德纳姆和克拉伯顿、勒内·卡耶，特别是海因里希·巴尔特。在这些探险家当中，只有卡耶独自行动，和英国无关；德国人巴尔特，像第二次探险的帕克，以及德纳姆、克拉伯顿和兰德兄弟一样，都是英国政府雇用的。

促使英国官方注意于考察西非，无疑应归功于1788年在伦敦创立的非洲内地发现促进协会。该协会曾经发起最早的几次尼日尔考察旅行，从而导致1795—1797年帕克的第一次旅行。然而，有人论证说，非洲协会的目的并非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和英国反对奴隶贸易运动，或者一般人道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毋宁说它的着眼点首先是科学的，其次是商业的。^[5]英国政府似乎曾经指示克拉伯顿在其第二次旅行时（1825—1827年）要和苏丹统治者谈判一项禁止奴隶买卖的友好条约，这使考察活动第一次涂上了一种反对奴隶贸易的华丽色彩。^[6]其实把废奴主义事业首先引入非洲的，似乎不是那些探险家，而是新教传教会的传教士。18世纪末，欧洲新教传教会的数量成倍增加，在英国也不少。但是，即使在新教传教会里，触及奴隶贸易问题最初还是间接的。头一个去非洲的新教传教团是莫拉维亚弟兄会传教团。早在1737年，该会就派一个先驱者，前去劝说南非霍屯督人改变信仰。但是不出几年，他就感觉到开普的社会环境中的敌对情绪，因此回到了欧洲。隔了两代人之后，福音宣传运动重新开始（这次是英国发起的），他们把塞拉利昂作为最初的奋斗目标是很自然的。但是，最先来到塞拉利昂的英国圣公会传教会（1806年）和卫斯理会（1811年）的传教团并不打算改变非洲人的信仰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废除贩卖人这类的野蛮行为。他们主要是帮助弗里敦获得解放的奴隶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英国已负责接管弗里敦，而弗里敦也受到了欧洲的影响。传教士的活动扩大到西非真正土著中间主要是英国官方赞助反对奴隶贸易的结果，特别是由于英国西非海军分遣队活动的结果。

正是这些活动使塞拉利昂在西非与欧洲的关系中占有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了另外两个仿效它而为己获得解放的黑人建立起来的滨海殖民地。由美洲移植到非洲的黑人组成的利比里亚共和国于1847年宣告

独立，由于它原来是美国殖民协会的私人事业（1821年），经常遇到重重阻碍。它得不到一个公认的政府才能提供的足够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1849年法国人在加蓬建立的利伯维尔，并没有发展得像弗里敦和塞拉利昂那样，这主要因为法国海军对禁止奴隶贸易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卖力或者始终如一。但是在1807年以后的60年间，有7万个黑人从捕获的运奴船上获得自由，被安置在塞拉利昂定居。其中多数都被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同化，他们除了使塞拉利昂当地的克里奥耳人人口大增外，还对西非沿海其他地区的文化适应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有些人在海岸贸易中已成为相当富有的商人。更多的人则受雇于英国商人或传教士，而且并非全是职位低下，因为1827年建立的福拉湾学院的传教基金会已经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使他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不久以后，塞拉利昂培养和输送出去的不仅有办事员，而且有小学教师和牧师，最后还有律师和医生。它也培训从其他地区来的非洲人。塞拉利昂的某些克里奥耳人还在滨海地区的商界或者其他行业中取得成就。原来由拉各斯及其内地贩来的奴隶，得到自由后重返故土，这一著名的大迁移使欧洲的影响在那里开始大有增长，并且使传教团初次进入约鲁巴兰。在1827—1834年间，英国海军占领费尔南多波岛，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在更东的地区，特别是喀麦隆，产生了同样的结果。

如果说塞拉利昂就此成为一个主要的温床，借以传播一种非正式的欧洲和基督教的影响，一种不可避免地带有英国色彩的影响，那么，这一殖民地的存在也有助于正式的英国势力在西非海岸地区得到加强。英国政府自从1783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对西非领土的一个区域承担了行政管理责任。不错，与塞内冈比亚的雄图大略相比，塞拉利昂的领土概念是很有限的，尽管由于有更多被解放的奴隶前来登陆，这块殖民地的疆域也自然扩大了一点点。但是，英国政府现在致力的是消灭奴隶贸易，这样一个政府的官员在海岸上的实际的和继续的存在就容易带来一些重大的后果。不久以前，塞拉利昂的一位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得出结论说：禁止从海岸输出奴隶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它置于英国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他吞并了许多新的领土，在1822年，英国商人在黄金海岸和冈比亚的贸易站都由他的政府来管理。这样一来，麦卡锡就与阿散蒂人的军队发生严重的冲突，阿散蒂人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内陆势力，已经有一些时候在谋求主宰黄金海岸沿海地区的一些小国了。英国政府认识到它对西非的行政管理使英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日益增大，而大西洋奴隶贸易额依然不断增

长，这就导致它于1828年改弦易辙，把它在西非直接承担的义务压缩到最低限度。

尽管英国对西非的兴趣是经商而不是殖民，这种传统态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并且在1865年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作出了也许是最明确的反映，^[7]但是，在实践中要保持这种态度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弗里敦，无论作为克里奥耳人的家乡或是作为一个重要海军基地，都是不能放弃的，而继续进行反对奴隶贸易的巡逻又造成无数紧张局势，因此，英国政府就几乎无法避免对西非进行干预。另外，英国商人的活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传教士的活动，继续使他们的政府对西非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首先见于黄金海岸。1828年英国官员撤走以后，这里的商人们以为最好为他们的商站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他们选了一个代理人乔治·麦克莱恩来领导这个政府。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认为英国人与阿散蒂人建立稳定的和平，并对阿散蒂人和大海之间的一些弱小国家拥有某种程度的管辖权，就能够最好地促进英国人在黄金海岸的商业利益。到1842—1844年，他走在官方政策的前面，大大扩展了英国的势力，以致使政府认为，最好还是重返黄金海岸，直接控制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些非正式的保护地。不过，政府的代理人在同阿散蒂人或者和滨海各国日益接受西方影响的村社打交道时，一般都不像麦克莱恩那样成功，这到头来只能使英国殖民部更加深深地陷入黄金海岸事务的泥潭。最后，在1873—1874年，英国派兵讨伐阿散蒂人，并且兼并了黄金海岸。

在更东的地区也是如此。英国反对奴隶贸易的海军分遣队以及英国商人和传教士的联合行动导致了同样的结果。1849年，外交部认为有必要开始派几个领事去几内亚湾。这样做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监视奴隶贸易，并同非洲的一些统治者谈判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二是保护英国合法商人和传教士在同为数众多的非洲当局打交道时的利益。第一个领事是约翰·比克罗夫特，他在费尔南多波岛管理过获得解放的奴隶，也研究过兰德兄弟发现油河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之后发展商业的可能性；他上任后，很快就推行依靠英国军舰的威力来扩大英国影响的办法。结果占领（1851年）和最后吞并（1861年）了拉各斯，在此以前，拉各斯是从内战频仍的约鲁巴兰输出奴隶的主要港口；另一个结果是英国人对三角洲以及该地各互相对抗的国家的非正式的管辖权增大了。

英国致力于对奴隶贸易进行斗争，并提倡代之以合法的贸易，意味着到19世纪70年代和欧洲瓜分非洲的前夕，它在西非沿海已经拥有广泛的利益，并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可靠的立足点。法国是在西非具有相当利害关系的唯一另外的欧洲国家。但是，法国的处境大不相同。在沿海地区，法国商人（还有法国海军和传教士）的活动一般是断断续续的，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法国的利益集中在它传统的势力范围塞内加尔。在这里，法国军人兼行政官费德尔布将军试行了许多方案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代替过时的橡胶和奴隶贸易的利益。在1854—1865年，他有计划地征服了塞内加尔河谷，使那里的人民成为种植花生的农民，花生对于欧洲经济，特别是对于法国经济是另一种宝贵的油料作物。正当费德尔布要进展到尼日尔河上游和整个苏丹的时候，他的征服工作停顿下来了，这部分是由于法国国内灾祸横生，部分是由于苏丹人民顽强抵抗，他们在19世纪期间正在经历一场了不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尽管如此，创造了欧洲势力日后在西非扩展模式的，乃是费德尔布的这种领土推进，而不是英国商人、传教士、海军官员和领事们在沿海地区的渗透活动。

不论是英国探险家，还是英国反对奴隶贸易的斗士，都不满足于他们在西非的成就。他们勇敢地进入其他地区，特别是进入东非和中非内地，在那里，由于桑给巴尔的阿曼人政府的势力和财富的增长，正在产生阿拉伯人兼营奴隶和象牙的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趋势。这些冒险行动之所以一涌而出，部分由于英国以及英属印度与桑给巴尔已经发生联系，但它也是开发南非带来的后果。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中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在这里造成爆炸性的局势。英国人的占领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在开普的非欧洲人居民中蓬勃展开。大约从1825年起，传教士们鼓吹说：殖民地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有害于有色人种的权利和利益，而负责指导英国政策的那些人对此则开始听得入耳了。1825年以后开普的体制和法律的自由主义化，以及英国政府不愿付出高昂的代价将白人居留地的边界继续向前推进，这两个因素在1836年以后不得不促使边界上的许多布尔人由开普殖民地成群出走，进行著名的大迁徙。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已经不得不承认内陆高原上几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但不承认印度洋沿岸的布尔人共和国，并于1845年兼并了纳塔尔。然而，由于一些小而孤立的移民群的贫困（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英国殖民地边界的局限性），就必不可免地导致更多的介入。布尔人不断要求土地，并在某

种程度上要求奴役劳动，这就给非洲各族人民套上了难以忍受的枷锁，他们的政治凝聚力必然由于欧洲人居留地向前推进而受到威胁。布尔人共和国装备很差，不足以对付种族间的动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发现内陆盛产钻石和黄金，经济状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英国政策中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也开始减弱。因此，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就进一步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占大多数的非欧洲人的利益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

在种族上排他的布尔社会向南非内地扩展的影响之一是：在开普殖民地边界外可供传教活动的领域缩小了。只是在英属纳塔尔和像巴苏陀兰这样一些地区的班图部落中可以进行传教，这些地区人口非常密集，就像是白人居留地的洪水中的一些黑人小岛。但是，传教团从开普往北深入内地，主要是集中于各个布尔共和国和贫瘠的卡拉哈里沙漠之间的贝专纳狭窄走廊地带。在1849—1851年间，传教士中最伟大的先驱者戴维·利文斯敦穿过这条走廊，进入赞比西河中游比较肥沃的地区。但是要进入这个地区就得从开普往北，越过200多英里的羊肠小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1853—1856年间，利文斯敦开始作横越大陆的伟大旅行，他首先到达安哥拉的罗安达，然后到了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这次旅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结果。利文斯敦开始把气候宜人的中非和东非辽阔的高地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外部世界。这些高地的土著居民，没有受到布尔人扩张的侵扰，似乎是可以进行传教活动的一片沃土。葡萄牙要求得到这里的大片领土，理由是该地处于它早已建立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两块殖民地之间；但是据利文斯敦发现，在内地唯一有实际影响的葡萄牙人是混血商人，他们寻找奴隶和象牙的探险队正在逐步摧毁非洲人的生活。利文斯敦极其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必须制止这种毁灭性行动，最好的办法是使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对高原地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榜样会使非洲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新生。他的宣传引起国内公众的注意，在1858—1864年间，他受英国政府委托勘探和开拓从东海岸进入内陆的通路。实际证明赞比西河并不是一条可以通航的有用航道，于是，利文斯敦就北上进入尼亚萨兰高地。可是，他在这里亲眼看到非洲社会遭到的破坏，甚至比葡萄牙商人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因为在尼亚萨兰，他所进入的正是来自桑给巴尔的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经营的贸易帝国的南部边缘。东非和中非需要基督教和合法贸易已经变得更为明显。

利文斯敦呼吁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前往中非，把它从野蛮中解救出来，但是直接的反应很小，而且不起作用；1873年他在第三次伟大的考察旅行中去世时，他形单影只，一切皆成画饼。但是，他本人的魅力和他的发现的浪漫色彩，却使其他探险者纷纷涌入非洲的心脏地区。在1857—1877年间，理查德·伯顿、J. H. 斯皮克、詹姆斯·格兰特、塞缪尔·怀特·贝克和H. M. 斯坦利先后把利文斯敦在最后一次旅行中零星研究过的非洲内陆流域系统中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尼亚萨湖、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尼安萨湖和艾伯特湖全都标明在地图上。大刚果河的全部流程都已勘探清楚，古老的尼罗河源之谜终于揭开。这就为以后欧洲的渗透奠定了基础。1874—1877年斯坦利顺刚果河而下，揭示了这种渗透活动的一条交通要道。不久他就作为欧洲渗透的最初代理人之一的身份出现，因为当他第二次来到刚果时，他已受雇于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参加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工作。

但是，利文斯敦的历次旅行，他为报告他的旅行和自己思想而对日益关心非洲的欧洲公众所发表的书籍和演说，都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后果，使英国人更加敌视东非的奴隶贸易。这里的奴隶贸易，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人为之斗争的，并开始加以战胜的西非奴隶贸易大不相同。东非各国之间没有贸易网，只是由非洲沿海的商人提供奴隶卖给欧洲人。居住在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非洲人经营贩卖奴隶的商队，深入腹地，到19世纪60年代，实际上已经远达上刚果。这些人都是穆斯林，对于他们来说，奴隶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点不同，他们不仅要经营奴隶，而且要同样地提供象牙。不错，大量的奴隶被输往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市场以及西亚的其他地方，同时也送到赛义德·赛德在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创办的有利可图的丁香种植园从事劳动；但是，从内陆收购许多奴隶的首要意图是为了把象牙运往海岸，因为欧洲和亚洲都有大量的需求。在缺乏其他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头顶搬运便成了把货物运进和运出内陆的唯一手段。代价当然是高昂的，但是如果雇用搬运工人，既要付工资，又得供应伙食，代价之高就无人敢于问津了。因此，东非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两方面都存在巨大的既得利益，这是任何基督教的力量所难以动摇的，同时也是发展其他合法贸易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英国在东非却具备有利条件，它无须同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官方当局打交道，而主要地只与桑给巴尔政府打交道就行了。东非的整个贸易都由桑给巴

尔提供资金，并由它来控制，而英国已经与桑给巴尔的阿曼人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

早在1822年，当赛德仍在马斯喀特的时候，英国急于制止奴隶输入英属印度，就运用它在阿曼的影响，签订了莫尔斯比条约，从法律上限制阿拉伯运奴船只进入东非和阿拉伯半岛的近海水域。这个条约使赛德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因为它含蓄地承认他对德尔加杜角以北的东非海岸的宗主权要求，因此他忠实地和英国海军合作，严格执行这项条约。当他采取步骤，在阿拉伯沿海城镇实施宗主权时，得到英国的同意这一项保护伞也帮了他的忙。于是，他几乎毫不费力地签订了第二个条约（1845年）。这一条约把阿拉伯的奴隶贸易进一步限制在赛德的非洲领土以内，有助于制止把奴隶偷运进印度。

但是，这些条约对于奴隶贩子在内陆的破坏性活动并无影响。恰恰相反，随着桑给巴尔的力量和财富的增长，就可能组织更加强大的商队，深入更远的内地，去寻求象牙和奴隶没有枯竭的泉源。人们对贸易的这一方面的注意，正是利文斯敦探险的一个结果。但是要反对这种贸易，就会使英国与被桑给巴尔的友好穆斯林政府和社会当作最根本的合法利益的东西发生正面冲突。然而，从1869年起，英国在桑给巴尔已经有了一位领事，即利文斯敦的老伙伴约翰·柯克爵士。他向赛德（1856年卒）的继承者们提出这样的论点：桑给巴尔政府和人民的继续独立和繁荣非常需要英国的支持和保护，他们不能与英国作对。这一论点发生了作用。到19世纪60年代，在桑给巴尔日益增长的合法贸易中，英国和英属印度占有一种支配的地位。此外，1862年英国和法国签署尊重桑给巴尔苏丹国独立的共同宣言，终于消除了法国人干涉东非的危险（由此而默许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有行动自由）。但是即使这样，也只有当英国扬言要对桑给巴尔实行封锁的时候，才终于使苏丹巴尔加什于1873年同意宣布：在他的国土内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这一条约有效地制止了桑给巴尔本土上奴隶的输入和输出，但是像以前签订的条约一样，对内地的奴隶贸易并不发生作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虽然承认苏丹的最高君权，却在远离他的有效管辖范围以外活动。这个条约的主要实际效果是双重的：首先，从此以后苏丹的政府，甚至在桑给巴尔本身主要依靠英国的支持来维持；其次，英国实际上是执行一种帮助苏丹在东非大陆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的政策。

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东非和西非的形势已大致相同。除非洲最南端外，欧洲人没有给非洲大陆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绝大多数非洲人仍然在当地政府的管理下，虽然这些政府的力量和意图由于奴隶贸易活动（或者在南非，由于欧洲人居留地的扩展）而受到很大损害或破坏。因此，正式进入热带非洲的欧洲势力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在东非和西非（还有南非，虽然方式不同），占主导地位的外来影响是英国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和领事们勇往直前的活动造成的。这对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决定欧洲瓜分非洲的进程不无重大意义。

（陈云程 译）

[1] 根据编者要求，本章某些方面要叙述到19世纪70年代，以便和第十一卷第二十二章相衔接。

[2] 殖民部267/10。1795年12月，给陛下驻塞内冈比亚的代办兼总领事詹姆斯·威利斯先生的指示记录。

[3] “象牙海岸”位于帕尔马斯角和黄金海岸之间，因象牙贸易而得名，可是到1800年，即使在这个人口相当稀少的地区，大象的数量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4] 特别是西班牙人，因为当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力量正趋向于拟订反奴隶贸易法时，在西班牙的这两种势力却致力于清除教会禁止奴隶贸易的旧禁令。

[5] 例如，可参阅A. 阿杜·博亨《1788—1805年的非洲协会》，载于《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6卷（阿基莫塔，1961年），第43—64页。

[6] 殖民部2/16。巴瑟斯特致克拉伯顿书，1825年7月30日。

[7] 1865年，V（412）：《特别委员会关于非洲西海岸英国人居留地情况的报告》。

第二十二章 1794—1828年的美国与旧世界

1823年8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异常和蔼地向美国驻伦敦公使建议，两国可以携手合作，共同反对法国干预西属美洲的独立，这时候他是为了尊重自由派托利党人所说的关于英国利益的逻辑，而强制抑制自己对共和原则的厌恶心情。作出这种姿态的动机是由于正统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也因为意识到英国的工业主义需要美国的市场和原料。在华盛顿，门罗总统对这一建议的最初反应是效法杰斐逊和麦迪逊，鼓励同英国恢复友好关系，认为这将有利于美国在大西洋的利益。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务卿的主张。约翰·昆西·亚当斯置坎宁的建议于不顾，起草了那份不受约束的宣言，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干涉西半球事务，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门罗主义。

（门罗向国会提出的咨文写道：）今后欧洲任何强国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取得并维护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

.....

同盟各国^[1]的政治制度在这方面与合众国是基本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有各不相同的政府而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政府是由许多鲜血和财富的牺牲换来的，它是由其最开明的公民的智慧造成的，在它的下面，我们享受了无比的幸福，所以全国人民为了保卫它是可以牺牲一切的。为着开诚相见，为着合众国与列强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我们应当声明：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危险的。

亚当斯是曾在圣詹姆斯宫^[2]拒绝穿朝服的那位公使^[3]的儿子，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共和国正确的态度。富有外交经验，并在亚当斯家族顽固的清教徒习俗中长大的约翰·昆西，是比他的同僚们更加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美国自由行动的可能性，以及需要重申共和国摆脱欧洲列强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尽管它能否奏效要取决于英国的海军，但是门罗的咨文毕竟不是一纸空文。它向全世界表明了，建立在革命原则之上并显示出独特国格的美利坚共和国，是不会默许自己成为欧洲制度附庸这样一个角色的。共和制乃是美国的至高

无上的利益；在成功地表明了这一点之后，美国就显示出了它已经发现自己是一个国家了。

在独立以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对于能否成立一个共和国始终感到怀疑；然而背离美国革命走回头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13个前殖民地应该建立一套共同的政府体制，它应符合已证明武装斗争是必要的那些原则，否则就会沦为无政府主义或者外国统治的牺牲品。美国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一个建立在天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在能在大陆上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实现充分统一的联邦制度之上，建立在由一部成文宪法明确规定的有限权力的原则之上的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共和国，否认帝国、王朝扩张以及旧世界民族主义的道德规范的共和国，其本性如果不是和平主义的，至少也是孤立主义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凡是拥护共和原则的人，不论原来是什么民族和种族，都享有公民权，在这里，政府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维护个人的私有物质利益——这便是19世纪初日趋成熟的那一代人所能体会到的意义。对这些人来说，在潮湿的波托马克河畔兴建的国会大厦尚未竣工的门廊和穹形的屋顶，镌刻着以玉蜀黍花纹为主题的浮雕的槽形柱子，就象征着一一次崇高的政府体制的试验，尽管根基尚不稳固。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其粗犷的性格而挡住欧洲世界的缓慢侵蚀的话，这种实验是有可能成功的。

然而，孤立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状况，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忧心忡忡的美国人不得不在一个纷乱的外部世界的多方干扰下，摸索着走向他们新的社会组合。弗吉尼亚人、新英格兰人和宾夕法尼亚人开始意识到了，由于共同抵抗外界压力的结果，他们除了共同享有共和制度之外，还享有共同的特别是美国的国家特性。1794年，共和国的自然边界仍不得不在英、法、西各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情况下来确定。虽然杰斐逊的理想也许是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共和国，但是美国没有海外商业关系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发展了，这种商业联系使美国能够用原料换取工业制品，并吸引欧洲的资本和劳力用于美国国内的发展，正是为了这些目的，美国人才习惯于在西部各边境据点团结在合众国旗帜下，在公海上不仅保护他们的贸易，而且维护公民的归化权，后者对他们的国家特性来说是独一无二的。1794年^[4]华盛顿离开总统职位时，建议不要采取绝对的孤立态度，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避免永久结盟，否则会使共和国卷进欧洲列强那种

格格不入的体系中去，从那时起直到坎宁在1823年表示承认美国真正的利益范围为止，美国人一直在国际政治旋涡中为保持其独立存在而奋斗。

共和国首先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块土地或者一个民族；而且由于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及其人口构成，更使它变得非常抽象。向西移动的开放的边界和移民不断到来，激励美国人生气勃勃地想到变动、发展和前途，激励他们和欧洲的过去一刀两断，采取了命定要向西扩张的观点，而欧洲列强不断的侵扰对此是一种挑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新拓居地，对形成年轻的共和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和欧洲恢复关系确定了条件，而且由于造成了一种新的、巨大的地方性利益集团，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

1790年进行的一次表明共和国特性的早期行动是人口普查。从这一次和以后每10年一次的普查中，我们知道人口从1790年到1830年之间增长了两倍以上，从390万增至1280万，这大部分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因为那时移民还很少。沿海较老地区里的人口越来越密，人们特别对一些较大的港口感兴趣，最明显的例子是纽约，它的人口在1790年为33131人，而在以后30年内几乎增加了3倍；但是，人们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峡谷和隘口，向南、向西扩展，移民大军的先锋队越出州界，进入俄亥俄和田纳西地区，无论自然界的危险、印第安人、欧洲列强或者合众国政府最终都阻挡不住，也无法控制。

继丹尼尔·布恩^[5]这样的游牧人之后，个人或者家族，骑马或驾车沿坎伯兰大道和威尔德内斯大道络绎不绝地顺俄亥俄河各支流而下，聚集在森林茂密的河边低地，以及带着钢枪和利斧在荒原上定居。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被一小部分合众国军队挡住了，从1794年的“鹿寨战役”，^[6]直到1812年战争，通过历次或多或少不光彩的条约，使印第安人割让土地，并在1825年根据联邦政府的政策将剩余的印第安部落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终于获得了旧西北地区。早在1784年，外阿勒格尼的新拓居地就叫嚣着要作为富兰克林州加入合众国；1787年西北土地法规定了如下程序：各州划给联邦政府的西部土地，应该作为“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直到其人口达到足以被接纳为正式州为止，像1792年的肯塔基、1796年的田纳西和1803年的俄亥俄那样。

移民者认为他们开拓的土地的所有权自然是属于他们的，这使联邦政府实行的主张由有钱的利益集团有计划地进行开发的土地政策受到挫折。1796年法令规定每英亩土地最低售价2美元，一次可购640英亩，它吸引了好投机的投资者。这一法令历经修改，直到1820年法令规定将售价降至1.25美元，一次可购80英亩，不久以后又授予先买权。在18世纪90年代，1816—1819年之间以及20年代中期购买土地成风的时候，比较优越的条件吸引移居者涌向西部。靠近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居住着未开化的人群，人口稀少，那儿有剩余的玉米、腌肉、钾碱和木材，可以用木筏顺流运往新奥尔良市场。19世纪20年代初期，汽船使整个密西西比—俄亥俄地区形成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拥有内陆港口如纳什维尔、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海湾港口新奥尔良。拓荒者定居在俄亥俄、印第安纳（1816年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和伊利诺伊（1818年加入联邦）的森林地区；种植园主则定居在密西西比（1817年加入联邦）和亚拉巴马（1819年加入联邦）的肥沃冲积层植棉区。

到了1828年，密西西比河以东大部分肥沃的森林地区都被占据了，另外有两个地区向西跨过密西西比河——1812年成为州的路易斯安那和1821年成为州的密苏里。除了远在得克萨斯的斯蒂芬·奥斯汀^[7]的移居地仍在向人们召唤外，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继续扩展似乎已经很难了。向着大湖区绵延而去的空旷大草原可以生长小麦，但是习惯于采伐森林的拓荒者一直避而不去，至于再向西北的“密歇根地区”，在学校用的地图上仍被描述为“无边无际的沼泽地”。在国会于1825年规定的“印第安永久边界线”以外，密苏里的大本德和雷德河之间，横亘着一个由印第安人保留地构成的庞大的屏障；再过去则是高原地带，不宜居住，被描述为“美洲大沙漠”。只有捕兽者，偶尔还有传教士从密苏里的因德彭登斯出发，沿着皮毛公司和刘易斯和克拉克、派克、朗、英国植物学家托马斯·纳托尔等探险家开辟的小道前往落基山。共和国似乎已经到达它的自然边界线了。

这些边界并不是毫无冲突而确立的。在沃巴什荒原里，在密西西比河静寂的水上，在佛罗里达沼泽地，闯进去的美国人都发现欧洲人活动的迹象；美国人的权利只是依靠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干预才确定下来的，在拿破仑动乱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里，各国正忙于应付，美国政府就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尽管英国人在1794年根据杰伊

条约的条款撤出旧西北地区的军事据点，但是加拿大的省督们被怀疑勾结印第安部落，直至1812年的流血战争才使加拿大—美国关系缓和下来。自此以后，1817年拉什和巴戈特才得以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使大湖区实际上非军事化——这是裁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翌年，拉什和加勒廷也才得以在伦敦商定，美加两国的西北边界线划在伍兹湖到落基山之间的北纬49°。根据1795年的平克尼条约，西班牙承认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还给予美国人在新奥尔良的存栈权；然而共和国在大陆上的前途只是趁拿破仑无暇他顾的时候取得不受约束的好处才得到保证的。1803年，杰斐逊以300万美元^[8]从拿破仑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这一笔交易不仅包括新奥尔良，而且包括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全部领土。1813年美国占领西佛罗里达，1819年与西班牙签订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获得了东佛罗里达，于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领土就此扩大了。

西部各地居民如果要想改善仅足糊口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有剩余商品进行交易，还要有交通工具和市场。除了玉米酿的威士忌酒以及毛皮外，把林业经济产品越过山脉输往东部成本太高；把粮食和木材制品运往下游出售，则由于距离太远，没有把握和无人需要而受到限制。西部所需要的是成本低、销路稳定、能在欧洲市场出售的商品，就像过去南方种植的烟草那样。通过这种办法，这个未开发的地区就可以获得专业化的好处，也可以和欧洲先进经济结合起来而获利。密西西比河下游特别适宜种植商品作物，而开放这一地区时幸好大量需要这种作物。1793年伊莱·惠特尼的著名发明——轧棉机，使到处都能生长的短绒棉得到利用，这样就有可能重新部署以黑人奴隶为基础的旧种植园经济，以便利用兰开夏无止境的对棉花的需求；到了19世纪20年代，沿墨西哥湾的处女地具有成本低廉的有利条件，而且商品易于顺河运往新奥尔良和莫比尔，使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成为初级产品工业中心，每年用船运往欧洲6000万磅原棉。

棉花在西部以及在整个美国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纺织大革命使兰开夏成为早期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棉花王国是这次革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美国也从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中得到了好处。棉花使英国和一度属于它的各殖民地在商业上互相和解，但外交上的摩擦记录使人们看不清商业上和解的真心诚意。到1820年，英国和美国彼此又一次成为最好的主顾，在它们的要

求平衡中，棉花是最主要的因素。1830年，原棉几乎占美国出口值的50%，其中大部分运往英国，而在运往英国的原棉中，76%来自美国南方各州；棉织品一般占英国出口的48%，其中运往美国的占33%。就产品和市场而言，初级商品生产者和制造商之间的关系相互补充到了最密切的程度。棉花将美英两国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可以说它们不是两种各自独立的经济，而是单一的大西洋经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殖民地”，另一个是“宗主国”。

在美国，棉花的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新奥尔良、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甚至波及东部各港口，尤其是纽约，它在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使它得以控制这项贸易，这和它作为美国对利物浦进行贸易的终点站这一优越地位大有关系。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的商行，已经在商业体系中同利物浦和伦敦的商行联系起来，其目标不仅是以英国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其他制品交换美国的原棉、面粉和木料，而且还着眼于美国国内的长期发展。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英国的商业银行家开始把北美看作投资的目标，不仅对18世纪90年代以来使亚历山大·巴林等少数人感兴趣的政府债券和土地所有权感兴趣，而且也对使土地向市场开放的手段（种植园主银行、公路、运河甚至铁路）感兴趣；少数更加精明的英裔美国人的商行，诸如巴尔的摩和利物浦的布朗兄弟公司，作为商业银行家正积累经验，在以后10年内放弃纺织物和谷物买卖而改营商业贷款，以及将美国债券卖给英国投资者。通过将英国所得利润向美国商业再投资，伦敦的金融界保护了美国，使之摆脱了在国际收支中的困难，并为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不仅提供资金，还同样提供劳动力。西行的空船可运输移民，这是使船主大获其利的一种商品，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源源不断供应劳动力的源泉。货物、资本和劳动力轻易地越过大西洋。到了1830年，英美商业关系已经变成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独一无二的重要事情。这就难怪乔治·坎宁支持恢复邦交了。

这一种新的平衡，使这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大西洋商业中恢复了一种具有殖民地时代绝大多数有利条件而几乎没有那时的不利条件的地位，这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紧张关系并最后导致战争之后才得到的。

1783年，美国人依旧面临着英国殖民制度的问题，只是这时不再是置身其中向外看，而是置身其外向内看了。特别是这时不是被拒之于法属西印度群岛之外，而是被拒之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外了。英国

政府正确地断定美国人需要与英国人往来，因此采取谢菲尔德勋爵在他的《关于美国商业的观察报告》中鼓吹的政策，即拒绝在商业上向共和国让步。因为英国制造品物美价廉，英国的信贷慷慨大方，美国人继续从联合王国进口货物，1784年进口总值达1850万美元，而美国人只能向英国输出375万美元的原料。造成的赤字只能东拼西凑，用别处赚来的钱弥补。

同西欧的贸易虽然令人失望，但是幸好同俄国、远东，后来又同南美建立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在远洋上，新英格兰造的船舶行驶得快，美国佬船长驾驶得好，船上美国佬商务代理人比他们的敌手更会做买卖；由于鱼、酒、木材和皮毛买卖没有什么前途，他们熟练地操纵着一个复杂的贸易系统，使货栈里以及家家户户都堆满了大量进口货，富有外国情调而实用，给新英格兰的许多小港口带来了财富，并提供了硬币和汇票来清偿英国的账目。但是局势仍然是不稳定，一直到法国革命战争爆发，破坏了正常渠道，才使中立国商人得到了天赐良机。英国不得不仰仗北美的木材、面粉，并且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发展，棉花和其他原料的需要量日增，也更需要推销它的制成品；受到围困的欧洲国家的运输业大多落到美国人手中。从1790年到1807年，美国出口额从2000万美元增至1.08亿美元，其中再出口从几乎是零跃增至一半以上。美国商船吨位超过了100万吨。这一段繁荣时期使美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国家。

然而这种人为的、战争副产品的繁荣，又因为战争而陷于危境。特拉巴尔加海战之后，封锁和反封锁使挂着美国旗的船只受到日益苛刻的管制；由于英国拥有制海权，因此与美国人冲突最严重的正是英国的制度。缴获美国船只和货物，在海上强迫英裔美国公民为皇家海军服役，大大触怒了美国舆论（虽然商人们是能容忍的，因为尽管冒风险，却能从贸易中赚钱），以致杰斐逊政府设法采取报复措施。1807年以后所采取的禁止通商政策，破坏了贸易，使美国船只遭受到英法两国毁灭性的劫掠，不过也使英国工业急于获得市场和原料，相当成功地迫使英国在1812年战争前夕重新考虑枢密院敕令。

尽管结束1812年战争的根特条约（1814年12月24日）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但是美国同英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有着新的重要意义这一教训，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政府都不会忘记。和平一恢复，美国在约翰·昆西·亚当斯领导下，就从更加强大的实力地位出发，继续推行适

宜于初级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国家政策，即在互惠基础上打破美国海外贸易的障碍。就同联合王国的直接贸易而言，对于货物和船只的歧视税率虽在1815年废除；但是“航海法规”的苛刻规定依然有效，不准美国进入加拿大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直到1820年美国禁止英国船只上的货物进入美国港口作为报复之后，英国才开始重新考虑它的政策。1822年，由于西印度群岛的利益集团以及英国制造商为新开辟的美国重要市场感到焦虑而形成的压力，使利物浦勋爵和自由派托利党人考虑商业自由化政策，1823年坎宁主动接近美国就是以这一政策为基础的。美国自由进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谈判漫长地拖延下去；但是1830年谈判成功，标志着两国自由贸易利益集团的胜利，在英国是制造商，在美国则是南部种植园主，以及纽约、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商人们，这些人都意识到了大西洋经济的潜力。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美国经济实力终于迫使英国承认大西洋贸易自由的好处时，美国内部却有些人鼓吹与此相反的政策。门罗向国会发表著名的咨文后不到6个月，就签署了一项关税法案，大大增加进口纺织品的关税；这甚至还是一种更加严厉的保护关税法案的先声，这项保护关税法案于1828年，即西印度群岛开放之前两年通过。

兰开夏是墨西哥湾各州发展的关键；然而对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来说，却不容易解决市场问题。有些粮食可以出售给下游，供给各种植园；但是任何规模的商业性农业都有待于运输小麦、面粉、腌肉和木材产品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使肯塔基和俄亥俄也能利用东部沿海城市的市场。西部的政治家们大声疾呼促进这样的“国内改进”。在他们看来，互相竞争的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各港口的商人们展开各种运输计划的竞争，为的是将西部并入他们的贸易物资供应地区之内。由联邦政府修筑的穿越阿勒格尼山脉达到俄亥俄河畔的惠林的国家公路，承担不了大批运货。在布林德利和布里奇沃特的时代，^[9]解决方法似乎是在俄亥俄河或者大湖区与流入大西洋的河流之间开凿运河，打通分水岭。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及其朋友们提出开凿运河，把波托马克河与卡纳华河连接起来，以后曾经试图提出过许多计划；但是最终成功的是纽约州，它在1817—1825年间，修成了伊利运河，穿越伊利湖和赫德森河之间比较平坦的地区。这一条大水道将布法罗到奥尔巴尼之间每蒲式耳小麦的运价从108美元降至7美元，不仅使纽

约西部可种植小麦的土地立即吸引了新拓居者，而且使整个大湖区盆地连同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北部肥沃地区纳入东北部经济之内。波士顿市场上的廉价西部面粉挤垮了佛蒙特的农民，迫使他们乘着运河驳船或帆船同欧洲移民一起西移，到西北地区定居，那里的商业前途现在已经有了保证。

然而西北地区的目标却和产棉各州不同，着重于国内市场而不是海外市场。正如它的主要代言人亨利·克莱很快就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战争中欧洲对美国面粉的需求不断增长，恢复和平以后未必会继续如此。这一预言于1815年由英国颁布的谷物法所证实，该法实际上排斥一切外来谷物，除非国产谷物达到饥荒年代的价格。但对西北地区来说，幸亏海港城市和少数内地城镇人口剧增，就有了风险较小的、可以作为替代的现成市场。它还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政治纲领。必须鼓励东北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为西部产品提供市场，并成为制造品的国内基地。廉价的土地，运输方面的“国内改进”，国家银行提供贷款，为制造品确立保护性关税：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的这四个重要点，构成了一项旨在有条不紊地发展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纲领。

“美国体系”取决于能否使新英格兰迅速工业化。克莱在提倡这一计划时，只不过是建立在他的杰出的前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想的经济政策基础之上。汉密尔顿的抱负是效法英国的榜样，将共和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家。

开国元勋们早已在费城做出保证，必须限制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大陆经济。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由法庭按照共同的商业法监督执行合约，并有一个共同的财政制度和币制。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用一系列激进措施来规定并加强了这些条件。他强制实施国内税，按照票面价值将联邦和州的公债转为长期公债，并建立国家银行（他对宪法中控制商业的权力作了新的、扩大的解释，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从而将商业利益与宪法结合在一起，扩大信贷，欢迎欧洲投资的利润再投资于美国企业，这对资本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极力主张通过杰伊条约，竭尽全力重新建立同英国的商业关系。

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初级商品生产和商业国家都是极为有利的。不过汉密尔顿虽然是亚当·斯密的信徒，却依旧是一个十足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共和国若要富强，就必须同时效法英国，建立大规模的制造业。他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反驳农业主义者，认为工业的优越性在于从劳动分工、使用机器、资本，乃至动员妇女和儿童来提高生产力，他主张实行保护性关税，以便新的制造业赖以建立起来。汉密尔顿过分乐观自信了。农业的和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结合起来，挫败了他的关税方案。这些人更加现实一些，他们估计到用美国初级产品换取英国廉价制成品的的好处。“实用工业品生产协会”曾打算在新泽西州帕塞伊克河的瀑布上制造各种产品，但归于失败。这说明美国人必须先引进技术和技术人员，大规模积累资本，并提高关税以防止英国廉价制成品的倾销，然后才能使新兴工业在国内立足。

然而汉密尔顿死后不久，他的时代就来临了。他死于1803年，[\[10\]](#)过了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所有三个条件就已经部分具备了。早在1790年，在罗得艾兰的普罗维登斯，塞缪尔·斯莱特设法凭记忆造成了精纺机，他以前在德比郡曾为杰德第亚·斯特拉特操纵过这种机器。此后，就有大批纺纱工和织布工不断偷偷地从彭奈恩山脉渡过大西洋，在罗得艾兰的水力驱动工厂中搞成了纺织品的一些基本制造方法。从一开始起，美国的发明创造就是效法英国而加以改进的，正如装有高压蒸汽引擎、性能良好的密西西比河汽船的情况一样。此外还有一些迹象显示出独特的美国制造方法。在一个拥有大量农地的国家里，缺乏技术，“帮工”的代价又高，这就鼓励将大量资本用于机器，因为机器可以由没有技术的人来照管。1785年奥利弗·埃文斯的自动化面粉厂就将用于劳动力的开支降低了一半；1800年，天才的美国康涅狄格人伊莱·惠特尼改进技术，用装配需要由机床加工的通用零件制造滑膛枪，从而指明了批量生产的道路；1813年，在战争带来的繁荣时期里，波士顿一个商人家庭里的幼子弗朗西斯·洛厄尔设计出第一家大规模合理安排的工厂，穿着围裙的农村姑娘们住的是供应伙食的模范宿舍，由她们完成制作农民服装用的标准粗布的全部生产过程。资本是由利润艰苦地积累起来的；但是到了1830年，洛厄尔的波士顿联合公司不仅控制了纺织厂，而且还控制了市场上的批发商店、房地产、水力和保险公司，成为比兰开夏的任何企业都先进而且有实力的单位。这虽然是个特殊的事例，但也表明了棉纺工业已在大

西洋西岸，靠近原料产地和美国市场的地方站稳了脚跟。“拿鞭子的老爷和拥有织机的老爷”已经成了工作的伙伴。

若不是在拿破仑封锁时期贸易遭到破坏，国内市场几乎是无意中受到了保护，否则上述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杰斐逊的不通商政策及随后的1812年战争，摧毁了海外贸易，但是也将英国制造品拒之门外。结果造成的消费品短缺，不仅使面粉厂、家庭手工业和铸造业迅速发展，而且使新兴的纺织工业骤然繁荣起来。在根特条约签订之后，廉价的英国货又像潮水般涌来，前一段时间里蓬勃发展的大部分工业都夭折了；但是还保留了足够的纺织、铁器和其他商品制造业中产品比较粗陋的行业，形成一个要求国会加以保护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核心。其结果是于1816年、1818年、1824年和1829年颁布一系列关税税率，将税率按价提高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5%。1829年的“可憎的关税税率”是一种反常的税率，但也显示出强有力的制造业利益集团正在兴起。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态度的转变，他一度是新英格兰船运业利益集团最善于雄辩的代言人，当意识到该州的主要利益在发生变化时，就改而拥护保护贸易制度，热烈支持1828年税则。到了1828年，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已成为切实可行的、经济国家主义的纲领，与共和国拟订的各种计划中的农业自由贸易相抗衡。

密西西比河流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平衡，突出了地区性。建立一个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方面的地理偏见。共和国初期，在不得不对付西部问题之前，政治上的效忠大致上以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为分野，以航海和商业利益集团与边疆和种植业利益集团为分野，以大西洋与大陆，商业与农业为分野，另外交叉的界线把北方内地的农场主和港口的普通民众划归南方，而把大种植园主划归北方商业巨头的行列。汉密尔顿和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与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各种主要的声音都可以从这两党中听到。在内政方面，联邦党人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商业而鼓吹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共和党人则为了使农村地区自给自足而主张各州自治。

1795年以后，外交开始左右国内政治，它激化了党派之间的争论，突出了种植业界和商业界之间极其敏感的深刻差别。两个政党都深深相信共和国必须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但是自给自足的农场主和

初级产品生产者本来可以把烟草，后来还有棉花，在码头旁出售给外国商船，他们和依靠运输业为生的海外商人不同，更满足于商业的瓦解，对孤立主义更加视为当然。受到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文化教育的弗吉尼亚士绅们，比起东北地区比较倾向于加尔文教派和托利党的商人、律师和教士来，则更同情法国革命的原则，在后面这些人看来，在法国革命恐怖时期以后，英国乃是反对暴民肆虐、保护宗教和道德、自由和财产的卫士。双方的这种激动心情产生出痛苦的结果，促使联邦党人于1798年通过了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以对付所谓有煽动叛乱活动的避难者，他们之中有几个是共和党的宣传家；因此，当杰斐逊总统设法保护美国商业，免受驾驶武器低劣的炮船的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抢劫，以及在1806年转而对英国进行经济制裁时，联邦党人就认为这是无端牺牲他们的生计，于是也就无心团结爱国，共同对敌了。英国强制美国海员服役，深受其苦的是东北部，而不是南部或西部，但是战争在1812年爆发时，新英格兰却拼命反对；1815年，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在哈特福德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坚持州权，反对联邦政府进行战争，致使他们被指控为煽动叛乱。

联邦党人在1812年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使这个对国内政治一步一步失去控制的政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在汉密尔顿领导下，联邦党人以一个英国模式的政党处理事务，有一个建立在一致原则之上的条理清楚的立法纲领，并追求始终一贯的利益。虽然共和国在其形成时期，在政治习尚方面幸而得到了这样坚定的方针，但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政治不适合于旨在表达各种各样根本不同要求的联邦制度。联邦党人的行为在大陆上到处引起反对，而不是那么一成不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而且往往善于变化的杰斐逊，从性格上讲很适宜于促使这种反对意见激化成为政治行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州权主义者、内地农场主、城市的技工，以及克林顿和伯尔的慈善团体纽约圣坦慕尼协会（该协会是杰斐逊从1791年溯赫德森河而上进行那次著名的考察植物旅行以后拼凑而成的）组成的反联邦党联盟，就像民主共和党那样，不仅能在1800年大选中从联邦党人手中夺取政权，而且后来成为赢得全大陆广泛支持的第一个基本上是美国全国性的政党。1800年以后，联邦党人为了夺得行政权而争取大陆上的支持时，做法中过于一贯偏重商业利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发生分歧，后者又在1803年^[11]和伯尔的一场因政治原因而进行的决斗中身亡，从此该党就变得只不过是新英格兰的残余势力了。和平恢复后，前联邦党人如约翰·昆西

• 亚当斯等人希望共和党能够反映全国性的意见；该党在吸收这些人后改名为国家共和党，在门罗总统任内，成为唯一有力的全国性政党。此后三届政府，联邦政府都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以致人们把直到1828年的这段时间称作“和睦时期”这样一个令人误解的名称。实际上国家共和党仅仅起了维持作用，直到组成该党的各利益集团联盟解体，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为止。这种结合是新的西部脱离旧的南部地区的结果。

亨利·克莱、约翰·C. 卡尔霍恩和安德鲁·杰克逊都出生于边疆地区家庭，其中两位的祖先原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居住在南阿巴拉契亚山坡地带。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三人都成为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杰克逊在新奥尔良光荣地战胜英军，克莱和卡尔霍恩都是国会中的“鹰派”，克莱还是根特和谈时美方的特派代表之一；但是移民的浪潮汹涌地冲过整个阿巴拉契亚山峡谷，使他们在极不相同的领域里发迹并取得领导地位。杰克逊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西部拓荒者的骄子；克莱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西北地区商业利益的代言人；而移居东南沿海地区的卡尔霍恩则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南方产棉区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的经历集中反映出原来的西南部分裂成为三个地区，各自在国家事务中都有明显不同的主张。

1812年战争后的繁荣时期，使棉花种植成为南部政治中的首要利益所在。杰斐逊时期的老一代，对烟草种植的前途感到悲观，在他们的遗嘱中解放了奴隶，并且指望一种与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无大差别经济前途（连卡尔霍恩也投票赞成1816年的关税率），而年青的一代却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种植业，坚持蓄奴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特有生活方式。领导权从具有自由主义和全国观点的弗吉尼亚王朝，转移至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植棉寡头政治集团手中，后者以狭隘的、比较遵纪守法的观点看待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意味着在联邦政策中要保护奴隶制和推动植棉业。到1820年，植棉的南方地区顽固地反对实行关税率、建立国家银行、修筑国家公路、开凿运河和廉价出售土地政策，他们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牺牲他们而使北部和西部得到好处。尤其是南部刚刚开始意识到，需要对它的独特体制加强宪法保护。随着各自由州的人口超过了南部，这就更有必要在参议院里保持蓄奴州与自由州享有平等地位。1820年，北部提议批准密苏里作为禁奴州加入联邦，这在国会中引起了一场严重危机，只是通过一项妥协方案才得

到解决，根据该方案，缅因作为自由州，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并规定路易斯安那地区北纬36° 30' 以北禁止蓄奴。这一妥协案使这项争执得到平息有25年之久；但这也向全国提出了警告，南部要求对它的特殊利益给予特别的照顾。正如年迈的杰斐逊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夜里传报火警的钟声”。

南方沿海地区的背叛突出表现出密西西比河流域作为一支单独的势力在国内出现。眼光向西看的边远地区的公众在华盛顿只有很少的简单要求：由联邦政府保护免受印第安部落的侵犯，并将这些部落迁走；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公地的所有权，以及由联邦政府资助改善交通运输；此外，他们希望让他们单独地与国家一起发展，不受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各种限制，例如合众国银行从费城开始实行的对信贷膨胀的控制。即使如此，在繁荣的20年代，这个将杰克逊选入参议院的旧的西部边疆地区，正在迅速发展起来。棉花和蔗糖的生产发展到密西西比河下游，使墨西哥湾各州和老南方地区一样，成为种植业利益的一部分；在俄亥俄河以北则有可能从事商业性种植，使西北部转而支持亨利·克莱，支持与东北部联合的建议，这些建议与新英格兰前联邦党人（他们不久就称为辉格党人）的建议完全一致。这两种倾向都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主张，足以贬低杰克逊作为边疆英雄的形象而具有的力量，于是他在182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的票数比约翰·昆西·亚当斯、克莱或克劳福德都略多一点（卡尔霍恩当选为副总统）；但是这次他并没有当选为总统，因为克莱劝说众议院里的肯塔基的议员投了亚当斯的票，后者就成了国家共和党王朝的最后一任总统。直到人们感觉到西部地区不仅成为一个新的派系，而且成为一股渗透到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势力之后，杰克逊才接任了总统。

到这时为止，尽管《独立宣言》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但共和主义绝不是民主的同义词。曾经使新宪法得以通过的联邦党人一直活动着，以便恢复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使之有利于产权和寡头政治的各方利益，而反对平均趋势。虽然很少有人像法学家詹姆斯·肯特和“埃塞克斯帮会”（就共和主义者来说，这些人是最保守不过的）那么保守，但是大多数人都希望政权掌握在出身高贵而有教养的可靠的人手中。甚至连杰斐逊，尽管他与汉密尔顿不同，主张把土地而不是把金钱作为理想共和国的基础，也同样认为政治权利必须取决于财产的多寡，并因此而确定：他的那所有着圆形屋顶的图书馆和带壁柱的房

间，并且两侧有奴隶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办学宗旨，虽然是培养有才华然而并非高贵出身的年轻绅士，但这些人将成为贵族精英的成员。大多数州规定担任公职的人须拥有相当多的财产，像南卡罗来纳州，需要高达1万英镑的财产才能当选为州长，而且在绝大多数州中，财产始终是选举的基础。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特别是由坦慕尼厅控制的有平民主义倾向的纽约市，政治是以18世纪的方式为有产者各派系所垄断。头戴假发，彼此默契的绅士们在秘密会议中操纵一切事务。这个时期之所以看来像是一个和睦时期，部分原因是人们的风度十分高雅。

密西西比河流域改变了这种状况。移居西部的美国人在性格上就拒绝接受祖传的生活方式的束缚，指望西方地平线上出现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边远地区往往是很严酷的环境，使社会关系具有一种新的、带有危机的性质。法官和牧师停留在山脉以东；在争取生存的情况下，家庭关系和信用状况都不如直接的人的品质更加重要。虽然移民们在行李中带有《圣经》以及布莱克斯通、莎士比亚和诺亚·韦伯斯特^[12]的著作，并有参加祈祷和市镇集会的习惯，但不得不随遇而安，适应环境。社会意味着邻里关系，虽然几乎没有大富豪，可是多数人拥有土地、一家锯木厂或者一家小酒店，财产不再是测验能否担任公职的标准。在边远地区，平等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因此新成立的各州实际上是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而加入联邦，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种平等主义的情绪直接影响了沿海各州拓殖较晚的地区，例如纽约州，它由于开凿了伊利运河而开发了指湖地区，^[13]而突然繁荣的指湖地区就是纽约州自己的西部。这种平等主义的情绪也间接鼓舞了工匠、店主和一般下层人士去争取选举权。沿海地区的各界居民，特别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港口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开始出现骚动的迹象，对把持城市和州的事务的一些寡头们奉行的政策表示不满。因为，如果说各州的利益集团反对联邦在经济事务方面的干涉，而这种偏见并没有扩大到内政方面，这方面仍然由严格的重商主义原则所支配。要求迅速发展经济，实际上意味着改善交通运输，而在资金匮乏的地区，只能靠各州的直接行动去解决。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公路、桥梁、运河和其他工程，不是由政府直接修建，便是由持有特许状的垄断集团修建；人们怀疑各商业辛迪加通过对州议会施加影响才

得到了那么多特权，特别是在贸易萧条时期，失业的工匠们试图联合起来，但法院偏袒有产者，根据有关密谋活动的不成文法，使他们遭到失败。为了打破这种被信以为真的控制经济生活的特权，技工、商贩和神通广大的商业家族集团圈子之外的“制造商们”（他们依靠这些家族集团获得信贷），转而求助于选举权这一新武器。在群众压力下，东部各州放宽了宪法规定，取消了财产资格规定（如马萨诸塞州在1820年，纽约州在1821年），废除了宗教甄别，使各选区的选民人数更接近人口数。政治家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大大增加的新选民，这些人具有民主的倾向，对幕后操纵政治深为痛恨，指望将来能通过投票的手段来消除不满。这位民族英雄杰克逊正符合了这些受教育不多的、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选民的不可抗拒的愿望；他在1828年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为总统，不仅象征着西部取得了胜利，而且象征着对共和党旧政权的严格控制已忍无可忍的、民主的新美国的胜利。这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

政治利益的这种转变，得以在宪法范围内保持平衡，宪法从一开始就博得人们明显的拥护，但它在联邦政府和各州的权限范围方面却含混不清。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主张受到了关心州权者的反对，后者曾经使弗吉尼亚坚持将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附加部分。汉密尔顿对商业权力作出广义的解释，为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作辩护，在当时及以后都遭到那些唯恐削弱州权的人们的激烈反对。这一冲突不仅涉及对权力下明确的定义，而且也涉及主权的根本理论问题。共和国是全体美国人民创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合众国”呢，或者仅仅是各州之间一种契约？每当一个州或几个州感到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联邦政策的威胁时，这种定义上的模糊就引起公开的争执。1798年，针对共和党人而通过的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在拥护杰斐逊主义的各州就曾被斥为违反宪法。反对这些法令的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就是以契约论为根据，主张各州有权判断是否违宪的问题；第二次肯塔基决议案宣称“拒绝承认这样的主权，拒绝执行在该文件幌子下炮制的一切未经授权的法令，乃是正当的矫正办法”。同样，在不同的情况下，联邦党人在哈特福德代表大会上认为新英格兰的根本利益由于进行战争而受到威胁，宣称“在故意、危险而明显地违背宪法、影响一州的主权和人民的自由的情况下，则该州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行使其权力以保护上述主权和自由……”在每次事件中，危机都平安度过了；但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各州有权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

理论，在1832年危机中被坚持用来证明保卫至高无上的利益——棉花，言外之意也就是保卫奴隶制——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是正确的。各州有权拒绝执行国会法令是一种极端的、值得怀疑的理论；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鼓吹州权的人一直强烈抵制联邦政府扩大其权威的努力。

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把最高裁判权的权力扩大到裁决公民个人、各州或联邦政府本身的行动是否符合宪法，从而有权解释宪法本身的性质。美国最高法院在其成立的最初10年里扮演的是一种从属的、多半没有什么作用的角色；但是在1801年联邦党人任职的最后几个月进行的改组，主要通过任命弗吉尼亚人、联邦党人和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首席法官，让即将离职的联邦党人加强了法院的权力和联邦主义性质。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策略，立即遭到继任的共和党人的非难；然而，尽管杰斐逊使蔡斯法官受到弹劾，但是在反对法院本身，特别是反对那位杰出的首席法官方面却未能取得进展，这位首席法官的任命是联邦党人在失去权力之际留在华盛顿维护中央权力的一名勇猛的斗士。法院在马歇尔领导下承担了它从那时以后在宪法范围内一直拥有的中心的和支配的地位。马歇尔虽然不是一位精通法律的法学家，但其在任的30年中，在20余件重要案件中发展了司法复审权的理论，扩大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最高权力，并认为宪法是不可分割的联邦的体现，联邦的最高权力则来自全体人民。

马歇尔的法院从一开始就将宪法的根本性质解释得非常明确。法官斯托里认为，“美国宪法不是由各州根据它们的主权地位草拟和制定的，而是应强调指出，正如宪法的序言部分所宣称的，是由‘美国的人民’草拟和制定的”。马歇尔本人则认为：

迄今无人否认，合众国乃是为了多种目的，而且是为了许多最重要的目的而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的。在作战时，我们是一个民族。在媾和时，我们是一个民族。在一切商业条例中，我们是一个同一的民族。其他许多方面，美国民族是一个；唯一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统辖和管理他们利益的政府，就是联邦政府。

马歇尔以这些前提为基础，加强了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的权威。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中，他宣布一项国会法案违宪，由此确定了法院的司法复审权；在科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1821年）中，他坚持州法院的判决须受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

州案（1819年）中，他根据汉密尔顿的默许权力论，坚持认为合众国银行是符合宪法的。在吉本斯控奥格登案（1824年）中，他否认一个领有州颁执照的轮船运输垄断企业在纽约州到新泽西州之间的赫德森河上专营的合法性，从而彻底改变了国会管理州际商业的权力。在弗莱彻诉佩克案（1810年）中，他坚持契约的权利，即使当事一方是州议会亦应如此。在达特默思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年）中，他坚持学院的特许状是一种契约，因此立法机构不能加以破坏，这一判决对以后的商业公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歇尔在职期间所作的判决是不得人心的，遭到了法学家和政治家的一致反对，特别遭到杰斐逊派共和党人和州权论者的反对；但是一般来说，对他所建立的司法体系的挑战，从未能得逞。

美国革命者在坚持英国人的并无实际权利的主张时，曾不得不抵制把他们束缚于英国社会的那种本能的、类似部落式的忠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企图摆脱同暴政无异的欧洲民族主义。共和国的体制引起了强烈的自豪感和一种信念，认为美国代表着美好的未来，而欧洲则代表着腐朽的过去。各州议会大厦的雕刻、合众国银行、费城的供水系统、奥本的州模范监狱和伊利运河，都骄傲地代表着共和国的成就，它们可以和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伦敦塔相媲美；从费城到纽约州文明地区边缘的罗彻斯特，银行、交易所和别墅都按照作为建筑师的杰斐逊引进的希腊复兴式的风格建成，杰斐逊喜欢这种风格而不喜欢英国殖民地的风格，这正像用罗马、锡拉丘兹、伊萨卡和雅典作为城镇名字^[14]一样，表示美国人的事业与希腊的独立事业相同，并在新世界的荒野上，使共和原则具有古典的高尚标志。

然而，建立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毕竟是爱国热忱的抽象目标，它虽能激起隐居在萨斯奎哈纳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样的哲学家胸中的热情，但几乎无法使一般平民产生亲切的世俗感情。所以美国人不是把他们最深切的忠心献给遥远的联邦政府，而是献给本州或本地区。即使对杰斐逊来说，“我的国家”指的也是弗吉尼亚；当代表新英格兰的国会议员经过数星期的艰苦跋涉来到华盛顿时，他们以猜疑的眼光把那些时髦的、说话慢条斯理的来自种植园的同僚看成像是外国人一样。

如果说文化具有区域性质，它也依旧是地方性的，甚至带有殖民地的色彩。新英格兰人虽憎恨英国的政治，但是把英格兰称作“老家”，经营商业时还是用英镑、先令和便士。举止行动是共和党人的。但是服装和家具陈设呢，则如果不是去中国贸易的航行中掠夺来的话，便是联邦党人的，也就是说英帝国式的或摄政时期^[15]的风尚在国内的变种。虽然1800年和1826年的宗教大“觉醒”像草原野火般席卷内地，使野营布道会加强了福音传道，但各教会以克拉彭派^[16]和英国剑桥大学为榜样，按照英国精神帝国主义的模式，建立起圣经会、宗教小册子出版会、禁酒会与和平会等一整套组织。美国人对他们所受的公费教育，对他们在大量新闻出版物中表达的出色演说和写作能力，对诺亚·韦伯斯特的辞典编纂原则都引为自豪；但他们也阅读非法翻印的司各特、拜伦、华兹华斯和珍妮·奥斯汀的作品，非法翻印书籍似乎是共和国的一种特权，乔尔·巴洛写的一部共和国史诗，也是用苍白无力的、旧式两行史诗体的变体写成的。

然而，在巴洛写成《哥伦比亚德》以后不到20年，费尼莫尔·库珀和华盛顿·欧文就用明显的美国风格写作了。这种新的美国意识大抵应归功于从土地本身散发出来的东西。欧文重现了赫德森河上的荷兰人的灵魂，该河上游被赫德森河画派的画家们描绘得金光灿烂，尤其是库珀刻画的森林生活和美国人的性格，成功地将浪漫主义运动的情调变为美国人的感受。由于气候恶劣，大陆上距离遥远，以及来自人和野兽的潜在危险，大自然绝不会使莱克兰的诗人们体验到那种亲切的感受；但是当美国人转向内地的时候，他们把阿巴拉契亚山峰峦起伏的荒莽，把河流、森林和远处的大草原说得那样宏伟而崇高，把他们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时，那些西去的人们变得更加自我意识到是美国人了。

西部用另外一些方法培养民族意识。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生活的经历，使人们的习俗变得简单了，也使宾夕法尼亚人和弗吉尼亚人失去了原有的锋芒，使他们首先把自己当作美国人然后才是本州的公民。各个地区盼望华盛顿来治理它们，当它们成为正式的州以后，星条旗继续激发起新设计的州旗所不能激起的感情。边疆性格的那种桀骜不驯、精力充沛而又不受约束的特点，使西部人在发现外国人挡住他们前进的道路时，就会表现出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特别在移民们沿森林、躲开陌生的空旷大草原向西北方大湖区前进时，他们越

来越对上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感到愤恨。加拿大在美国的命运中已成为绊脚石，必须把它兼并掉，如果必要的话就用武力。

对英国的憎恨是形成美国民族主义的最早和最基本的动力。在那令人沮丧的长期革命战争中的战友情谊，引起了激荡人心的回忆，使美国人具有勇往直前的传统，在1783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加拿大的存在，始终保持了这种传统。并且使他们忧虑不安地确信：与这个宿敌的账还没有算清。按照杰伊条约，为了要求撤出西部的据点而付出了蒙受耻辱的代价，这对美国是一种蛮横的公开侮辱。英国多年来的大陆封锁一直使人们神经紧张，美国商人们被迫进入英国港口，而英王陛下的快速帆船在长岛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巡弋；皇家海军的舰长们无视英裔公民归化证书，在公海上强征他们服役，公然蔑视美国国籍这个独特的概念，从而促使以前的革命爱国主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强烈的感情使共和国于1812年向英国开战，而这却正是英国放松对美国商业的压力的时候，这表明一种呼声强烈的新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眼前有关的事件所能影响的。新英格兰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响应最小，受到的损失却最大。战争的叫嚣并非来自沿海地区，而是来自大陆，在国会中喊出这种呼声的是代表南部的卡尔霍恩这样的鹰派人物，而更加突出的是一心想兼并加拿大的西北地区的代表人亨利·克莱。

1812年战争对引起战争的具体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连谁打赢了都很难说。但在心理上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段胜利的经历。种种屈辱，皇家海军的登陆，总统府被焚等，在美国人心目中，都由于在大湖区打了胜仗，特别是杰克逊的军队于1815年在新奥尔良大胜帕克南率领的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老兵而一笔勾销了。如果认为这次战争是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最后阶段，那是错误的；但是同宿敌的这最后一次流血战争，在从墨西哥湾直到大湖区的大陆战线上不管打得多么杂乱无章，却使美国人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民族。当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目睹英军连续炮轰后在麦克亨利要塞幸存下来的那面联邦旗帜时，在他的诗句中出现了新的基调，这首诗由一个英国作曲家作谱，使这个共和制的国家有了国歌。

（张大星 译）

[1] 指神圣同盟诸国。——译者注

- [2] 圣詹姆斯宫为当时英国宫廷所在地，亦作为对英国宫廷的称谓。——译者注
- [3] 即约翰·亚当斯，1785—1788年曾任美国驻英公使。——译者注
- [4] 原文如此。应为1796年。——译者注
- [5] 丹尼尔·布恩（1734—1820年），美国著名边疆开拓者，肯塔基等地区的开发者。——译者注
- [6] 这次战役在俄亥俄西北莫米河滩进行，印第安人以许多伐倒在地上的大树作为屏障，故名“鹿寨战役”。——译者注
- [7] 斯蒂芬·奥斯汀（1793—1836年），美国得克萨斯殖民领袖。——译者注
- [8] 原文如此。——译者注
- [9] 布林德利（1716—1772年），英国开凿运河的先驱。布里奇沃特（1736—1803年），英国内河航运事业创始人和运河开凿者。——译者注
- [10] 原文如此，应为1804年。——译者注
- [11] 原文如此，应为1804年。——译者注
- [12] 布莱克斯通（1723—1780年），英国法学家。诺亚·韦伯斯特（1758—1843年），美国词典编纂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 [13] 指湖是纽约州西部11个狭长湖泊的总称。——译者注
- [14] 前两个地名源于意大利，“罗马”在美国的地名译为罗姆；后两个地名源于希腊，“雅典”在美国的地名译为阿森斯。——译者注
- [15] 指英国1810—1820年那一段时期。——译者注
- [16] 大约1790—1830年间活跃在英国的一批社会改革家，以其活动中心在伦敦的克拉彭而得名。——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拉丁美洲的解放

1807年11月下旬，一支法国军队在朱诺将军率领下越过葡萄牙边界。29日清晨，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国王若奥六世，他的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玛丽亚一世王后，他的悍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女儿卡洛塔·若阿金娜和王室其他成员以及大批随从，乘船从塔古斯河设法逃往巴西。这支船队携带大批财宝，由英国战舰护送，途中被暴风吹散。有些船只于1月15日抵达里约热内卢。摄政王本人则在六天以后才在巴伊亚踏上巴西国土，28日他在那里颁布了著名的敕令，宣布开放巴西各港口，与一切友好国家通商。他又乘船于3月7日到达里约热内卢。第二天在异常热烈的欢迎中登岸。

这一次王室的逃亡、朝廷的到来和港口的开放，立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给整个这一片殖民地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机，“输入了新人、新资本和新思想”。^[1]随后创办了一家银行，买来了一部印刷机，开办了一所皇家图书馆，创刊了一份报纸。欢迎外国人到这个国家来，工业受到鼓励。欧洲的外交官，英国商人，德意志科学家，甚至还有一批中国的茶叶种植者都来到了里约热内卢，现在这个地方既是政府的所在地，又是英国在南美的海军基地。土生的巴西人和葡萄牙移民之间由于宿怨造成的激烈的敌对情绪，很快就变得明显可见。这时巴西人无论是在自己心目中还是在全世界的心目中，都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这终于在1815年12月得到了正式承认，巴西升格为王国，和葡萄牙王国地位平等。

布拉干萨王室从里斯本逃往里约热内卢，结果导致14年后巴西几乎以不流血的方式脱离了葡萄牙。正如拿破仑入侵葡萄牙最终使美洲的葡萄牙殖民帝国以和平方式瓦解一样，拿破仑之入侵西班牙，使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加速以暴力方式瓦解。

葡萄牙处于海上强国英国和陆上强国法国之间；西班牙是支持法国的。根据枫丹白露条约（1807年10月27日），卡洛斯四世和拿破仑实际上已达成协议，双方瓜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属地。但是葡萄牙遭蹂躏后，下一个遭殃的就该轮到西班牙了。葡萄牙国王连同葡萄牙舰

队都逃出了拿破仑的魔掌，西班牙国王却落入了他的手心。3月19日，卡洛斯四世让位给他的儿子费迪南德七世。四天以后，缪拉率领的法国军队开进马德里。5月，卡洛斯和费迪南德被拿破仑诱往巴荣纳，在那里被迫宣布放弃权利。6月6日，根据拿破仑敕令，经在巴荣纳召开的“显贵会议”仓促批准，宣布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国王”。

可是拿破仑没有想到西班牙人热爱独立。在1808年5月2日这著名的日子，马德里人民起来反抗法国军队。这是全国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序幕。一省接着一省的抵抗委员会（洪达）^[2]纷纷涌现。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于5月，加利西亚委员会和塞维利亚委员会（傲慢地自称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最高政务会”）于6月对法国宣战，并派代表到英国。7月4日，伦敦正式宣布英国同西班牙讲和，八天以后，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原为入侵南美北部而在科克训练的一支远征军乘船出发，此去不是为了解放西班牙统治下的西属美洲，而是解放法国统治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卡斯尔雷在6月20日写道，“由于在阿斯图里亚斯发生起义，西班牙君主国的复辟有了可能……但愿任何旨在瓜分从而削弱该君主国的措施都暂时停止”^[3]。从此以后，就英国而言，解放西属美洲的想法就像征服其他地方的想法一样，都正式放弃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成了英国的盟国，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在一起。卡斯尔雷在8月写道，如果西班牙拱手称臣，英国的“意图也仅局限于同西属南美领地建立一种可能最适合于保护它们的独立和资源免受共同敌人的阴谋侵犯的联系”^[4]；9月，坎宁在外交部确定，英国不能支持敌视西属殖民地的任何意图。^[5]

对母国的入侵、王国覆灭和西班牙人大规模起义的消息在7月传到南美北部，8月传到新西班牙和拉普拉塔河地区，使得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效忠。人们捐款支持爱国事业。拿破仑的代表很快就来了：萨塞内侯爵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保罗·德·拉马农副长官到了加拉加斯，但都受到了冷落，而且很快就把他们驱逐出去。萨塞内被监禁在蒙得维的亚，拉马农则落入了英国快速战舰“阿卡斯塔”号舰长的手中。夏洛塔·若阿金娜公主在里约热内卢大声呼吁，要求承认她是西班牙王室的合法代表，同样也无人理睬。在西属美洲人的心目中，里约热内卢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夏洛塔虽然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确实获得一些追随者，她的阴谋活动也激发而不是削弱了革命精神，但在那里

就像在西属美洲其他地方——从新西班牙到智利——一样，人们纷纷宣布效忠于被监禁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

然而费迪南德是没有王冠的国王，在美洲的王家官员——构成殖民帝国文官的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官僚——群龙无首。在西班牙本土，1808年9月以国王的名义勉强在阿兰胡埃斯组成了中央政务会，只是在两个月后才被迫逃往塞维利亚。1809年1月它在那里发出一个国王敕令，宣布在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领地不是殖民地，而是西班牙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有权派代表参加政务会。但是政务会的寿命不长。1810年1月由于法军侵占安达卢西亚，它又逃走了，这一次是逃到莱昂岛，政务会在这里解散，让位给五人摄政团，它受命召开一个能够同时代表西班牙和美洲的议会。

与此同时，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已受到严峻考验（这是波旁王朝进行行政改革所未能预料到的结果）的殖民地政府结构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某些王家官员认为不管什么样的国王总比没有好，人们怀疑这些人和非法的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勾结一起。在这一场权力危机中，西班牙人互相猜疑，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即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即半岛人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爆发为公开的冲突。在新西班牙，代表克里奥尔人的墨西哥城市政会议和代表半岛人的检审法院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总督。在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由于1806—1807年英国入侵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肥沃了土壤，蒙得维的亚总督埃利奥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利涅尔斯彼此不和，再加上这两个城市互相妒忌，终于导致了蒙得维的亚暂时脱离了总督辖区，而布宜诺斯艾利斯本身于1808—1809年间也发生了西班牙人反对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反对克里奥尔人的斗争。在上秘鲁，查尔卡斯检审法院长期与该院院长（兼任拉普拉塔地方行政长官）不和，于1809年5月把他罢黜并监禁起来。在同一总督区的拉巴斯，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6]于7月推翻当地的主教和地方行政长官，宣布“组织新的政府体制”并“在这些不幸的殖民地竖起自由的旗帜”^[7]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基多，克里奥尔人贵族于8月叛乱，反对西班牙人总督，虽然他们热情地表示依然效忠于国王。

殖民地政府结构方面的这些裂缝暂时得到了弥补。西班牙中央政务会派了一位新总督到达拉普拉塔河地区，蒙得维的亚重又表示效忠。一位新的院长兼地方行政长官被派往查尔卡斯。从秘鲁开来的军

队镇压了拉巴斯的叛乱。基多的克里奥尔人也屈服了。在中央政务会本身垮台之前，帝国体制上的危机，同时还有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危机，都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1809年1月，中央政务会宣布海外属地是西班牙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推理，那就是它们必须服从在西班牙的临时当局。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对殖民帝国性质的看法并非如此，这也不是美洲人的看法。“这些王国和那些王国”是一句用来描述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王家领地的名言。新世界的那些王国从来就不是属于西班牙的。它们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遗产，仅仅由王朝纽带把它们和西班牙的各个王国联结在一起。波旁王朝想使殖民地政府合理化、体系化和中央集权化，因此却忘记了，或者说忽略了哈布斯堡的看法，西班牙人也是这样。但是克里奥尔人却还记得，正如18世纪的英国殖民地以王家特权作为工具，拒绝服从议会的主权，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一样，西班牙殖民地在一旦没有国王之后，也同样拒绝服从半岛上的西班牙人。

1809年在基多和丘基萨卡，以及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就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论点，即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一样，都是国王权力的维护者或剩余财产继承人；美洲的一些地区和西班牙的一些省份一样，有权成立自己的临时政府。由此不难进一步提出另一个论点，即自从国王成为阶下之囚，合法政府不复存在以后，统治权就已归之于人民，虽然所谓“人民”实际上只不过是指少数活跃的克里奥尔人而已；这种“人民主政”论，起初是一种既保守又革命的论点，在西班牙中央政务会解散，半岛显然已被征服的消息传来以后，给它增加了新的力量。“王国已崩溃，西班牙已丧失”，新格拉纳达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卡米洛·托雷斯写道，“我们的地位难道不像家庭中父亲死时已经成年的孩子们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享有各自的权利，建立新的家庭，自己当家做主”。[\[8\]](#)

随后在南美发生的起义运动，是从城市起义开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市政会议的起义开始的。这种市政机构在18世纪末期至少在帝国的某些地区激起新的活动。在这些机构里，一般不能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克里奥尔人贵族和专业阶层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和权威。和两年前席卷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的起义相比较，南美的起义是半民族主义和半君主主义性质的，它主要是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大抵由各个首府带头起义，各省有的响应，有的抵制；运动一开始就

显示出令人惊异的行动一致。其开端是1810年4月19日加拉加斯市政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罢黜了委内瑞拉的将军，于是各地政务会和市政会议接管了总督、都督和将军们的权力：布宜诺斯艾利斯于5月25日；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卡塔赫纳于6月初；总督辖区首府波哥大的圣菲于7月20日；智利的圣地亚哥于9月。这些新的当局无一例外都宣布效忠国王。委内瑞拉实际上直到1811年7月才宣布独立，拉普拉塔河地区诸省直到1816年7月才采取同样步骤。但是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就像1810年4月19日加拉加斯的革命一样，即使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已等于是宣布独立。它以在法律上声称服从一个被俘的国王为幌子，开始时是摆脱法国统治的运动，一变而为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殖民地当局本身昏庸无能，部分是由于少数有知识的克里奥尔人在一些梅斯蒂索人的支持下精心策划，决心“要在政府和贸易上取代半岛的西班牙人，在他们控制下，各愚昧无知的阶层成为他们用来达到目的的现成工具”。^[9]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西班牙历届政府坚持敌对态度造成的后果。因为尽管君主政体已崩溃，半岛已遭蹂躏，而西班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却仍然坚持帝国垄断和殖民地俯首听命的原则。摄政会议对委内瑞拉实行封锁。1810年9月，在加的斯附近的莱昂岛召开了议会，并在1812年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是这个议会宣布两半球的西班牙属地组成一个单一的君主政权，一个单一的国家，一个单一的大家庭，美洲人享有和欧洲人同样的权利。但是殖民地要求在议会里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拒绝。在有关海外属地的一切问题上，以美洲人和菲律宾人一方——最初他们在加的斯有30名代表——以半岛的代表为另一方，经常处于敌对立场。议会两次拒绝英国在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实际上，它所寻求的与其说是与反叛的诸省和解，倒不如说是要“凭借武力使它们无条件屈服”^[10]。西班牙不可能像英国一样设想建立一个对国王效忠而结合在一起的联邦国家。它不需要1814年费迪南德和专制主义的复辟，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西属美洲的独立最后成为必然的事。

除了墨西哥以外（参阅下面原书第634页），1810年爆发的革命都是政治革命。其目的不是改组社会而是把权力从西班牙人转到克里奥尔人手里的再分配。它们还指望打破西班牙的商业垄断，使本大陆向

世界贸易开放。南美革命运动起源于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从那里汲取力量，而这两个城市是对外贸易和外国影响渗透得最深的地方。在这些革命运动完成这一转变过程中（开始时只有和西班牙秘密的或公开的殖民竞争者进行非法贸易），逐渐形成了一场经济革命。但是在它们可能造成社会革命的时候，便停步不前了。它们使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的眼界大开。梅斯蒂索人，也就是混血人种，也有所得，虽然美洲印第安人一无所得；黑奴制和奴隶贸易到处都受到限制或取缔。尽管克里奥尔人取代了西班牙人，尽管大部分地区的政治体制面目一新，但在独立战争结束时，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印第安人地区，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却没有什麼变化，这显示出了传统制度的强大力量。

在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经济组织和它的行政组织一样，都已经彻底崩溃。独立战争是内战。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作战，但是西属美洲人也彼此交战。分离派和保王派——后者的人数在比例上大大超过北美独立战争时英国在北美大陆殖民地中的保王派——同样利用愚昧无知的群众，凶猛激烈的斗争一经开展，就发挥出无比威力，所到之处，均夷为废墟。它那毁灭性的烈火蔓延遍及整个大陆，在南美的某些地区，这样的灾难持续了15年之久。少数地区——巴拉圭是其中之一，中美洲是另一个——幸而受害较轻。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和它同名的辽阔省份，迅速对对外贸易的新潮流作出了反应。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是革命的产物。但是东岸地带^[11]和以后成为阿根廷的一些内陆省份则受害很重。上秘鲁的高原地区，即现代的玻利维亚，一直是个战场。委内瑞拉也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刀剑之下。虽然受害程度各个地区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南美的经济生活遭到破坏，殖民时代最后几年的繁荣也被摧毁了。通商路线废置，矿山荒芜，庄稼无人收割，牲畜无人放牧，劳动力的提供已被打乱，资金外流。

殖民帝国随着行政和司法方面的主要分裂而逐渐解体。英国在大陆上的13个殖民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13个国家替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但是除了拉普拉塔河一个地区以外，早期的革命运动由于个人之间和地区之间复杂激烈的竞争，以及由于目标和意见的分歧，均遭失败。在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取得的成功是不稳定的，胜利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在美洲四个总督辖区中最后建立的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不仅包括现在阿根廷的几个省，而且包括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现代国家。1810年5月25日在辖区首府废黜总督并成立政务会的事件，使准备已久的运动达到高潮（参阅前面原书第614、616页）。但是革命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起的。如果说它是克里奥尔人的革命，那么它也是“港口人”^[12]的革命；这种革命绝不是任何地方都愿意接受的。例如巴拉圭河上游亚松森的克里奥尔人就不愿意由西班牙的统治改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统治。他们生来与世隔绝，遵守古老传统，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巴拉圭的贸易征收苛捐杂税，因而本能地不喜欢港口人。港口人想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身上，但是没有效果。他们的军队在1811年两次败北，同年，巴拉圭都督辖区本身爆发革命，废黜了都督兼行政长官，建立了独立的政务会。其中有一个成员是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他是民法博士和宗教法博士。1813年他成了这个国家的两个执政官之一，1814年成为独裁者，直到1840年去世为止。在弗朗西亚统治下的巴拉圭，要进去还勉强可以，要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各省永远丧失了这一地区。

和巴拉圭一样，拉普拉塔河对岸新兴城市、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蒙得维的亚，也拒绝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统治。蒙得维的亚像亚松森一样，憎恨首都表现出的垄断倾向，并且驻扎着西班牙军队，所以拥护西班牙的摄政会议。1814年以前它一直是西班牙政权的前哨。不过它是孤立的。1811年东岸地带周围人民在高卓人^[13]游击队首领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阿蒂加斯首先在蒙得维的亚和保王派作战，后来在1813年，又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里奥尔人作战。开始时蒙得维的亚打算从海上或河上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1814年它自己最后却从陆地上受到围攻，向港口人投降，第二年被港口人抛弃，交给了东岸地带人。西班牙和葡萄牙长期以来都在争夺拉普拉塔河北部地区，在这一片有争议的土地上的三角斗争，对毗邻的巴西总督辖区的葡萄牙王室来说是不能失去的大好机会。葡萄牙人表面上站在蒙得维的亚的保王派一边进行干涉，先是被英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调停人斯特兰福德勋爵制止了，他同时也设法遏制港口人的野心。但是到了1816年，就再也遏制不住了。葡萄牙人重又入侵，这一次至少得到了港口人的默许，因为他们对阿蒂

加斯恨之入骨。蒙得维的亚随即被占，巴西的边界又一次向南延伸到拉普拉塔河流域。

巴拉圭已经取得独立。东岸地带已落入巴西之手。上秘鲁重新并入效忠国王的旧秘鲁总督辖区，它原是在1776年建立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时才划分出来的。1811年，前去解放这几个山区省份的一支港口人军队到达的喀喀湖上游，后来来自秘鲁的保王派军队才把他们歼灭。虽然在1813年和1815年，一支阿根廷军队两度突袭这一带山区，但每次都失败而回。拉普拉塔河各省永远丧失了上秘鲁，如同它永远丧失了巴拉圭和东岸地带一样。

因此，对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来说，1810年5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意味着肢解。外围瓦解，中央又处于无政府状态。在1810年以后许多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届政府都是交战的政府，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作战，一条是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另一条是在上秘鲁的边界线上，而且各行政机构——政务会（洪达），三人执政委员会，国会，执政府——都是和战争共命运，随着作战部队的兴亡而兴亡。1813年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中央政府统一在一个最高执政官手中，并采取一切步骤向全世界表明阿根廷的独立，只是没有公然宣布而已。但是制宪会议未能制定一部宪法，而且拒绝承认阿蒂加斯控制下的东岸地带农村地区派来的代表，这些代表奉命前来要求立即宣布独立，建立各省都有自治权的联邦制政府。

迄至这时为止，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现在这一领导权受到了挑战。阿蒂加斯作为“自由人民的保护者”、农民群众的原始民主和反对港口人的地方利益的战士，很快就不仅控制了东岸地带，而且还控制了毗邻的科连特斯、恩特雷奥斯和圣菲各省；当原来的总督辖区的领土似乎要进一步受到肢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本身就发生了暴动和兵变，推翻了“全国”政府。到1815年，联合省已经变成半独立的、组织不完善的，甚至半带敌意的各地区的联盟了。然而分裂的趋势暂时制止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会议的推动下，1816年3月在内地城市图库曼召开了新的国会会议，虽然阿蒂加斯控制的地区没有派代表出席，其他各省都派了代表。正是这一个机构恢复了全国政府，并于1816年7月9日宣布阿根廷各省独立。

有些阿根廷领袖一再对共和国感到失望，就想建立以欧洲的一位王子为首的君主立宪国。图库曼国会甚至考虑重建印加王朝。但是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革命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在智利，克里奥尔人贵族于1810年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式，在圣地亚哥建立了政务会。由于贵族内部各阶层分裂，地区之间相互妒忌和个人之间彼此敌对，最后加上保王派从秘鲁入侵，自治运动就此遭到毁灭。保王派渴望为西班牙势力保存这一个据点。1814年10月兰卡瓜战役标志着智利政务会的覆灭。在南美北部的委内瑞拉将军辖区，曾两次建立共和国政权，但两次都被推翻。在毗邻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1810年被推翻的总督政权，六年后又被由伊比利亚半岛的老兵组成的一支军队重新建立起来。

在早期革命运动中，南美最北部这两个地区遭到的灾难性后果是最严重的了。在委内瑞拉，1810年4月在加拉加斯建立的政务会驱逐了殖民地的主要官员，向国外派出代表——其中派往伦敦的有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后来是半个大陆的解放者——并召开了国会。国会于1811年7月宣布委内瑞拉独立，12月通过了以美国联邦宪法为蓝本的一部宪法。但是克里奥尔人的领导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国家不久就面临着经济危机，保王派的反扑也迅即开始。1812年耶稣升天节的一场地震使爱国者的据点成为废墟，而保王派的中心却并未触动，自然界的威力加强了反动派的力量。在这一危急存亡之际，最近刚刚回国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被推为独裁者。米兰达长期在欧洲和美洲企图推动西属美洲的独立，在他的令人惊讶的生涯中曾经任法国革命中的将军以及其他许多职务。但是米兰达失去了信心，与保王派领导人签订了投降书。当他企图逃离该国时，被手下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玻利瓦尔所出卖，1816年惨死在西班牙的监狱里。

委内瑞拉的第一个共和国就此告终。第二个共和国也和第一个共和国一样短命。玻利瓦尔经海路逃到新格拉纳达，找到一个基地，就由此率领一支解放军重返加拉加斯，进军中宣布要和西班牙人“决一死战”。但是他取得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奥里诺科河流域一帮半裸体的平原游牧部落人，追随野蛮的西班牙人何塞·托马斯·博维斯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14年7月，加拉加斯再度被放弃，居民仓皇逃离城市，玻利瓦尔在9月末又逃到新格拉纳达。

然而新格拉纳达本身已经注定要覆灭的。从1810年以来，新格拉纳达人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宪法上。“人们广泛认为联邦制是完善的政体；因此每一个省或者往往只是一个省的一个地区都是一个主权州；每一个主权州，更不用说由各主权州组成的每一个邦联了，都制定了一部或者一部以上宪法。”^[14]在这种教条主义的狂热中，新格拉纳达到了1815年1月依然是一个既无组织又不统一，处于断断续续的内战状态的国家。同时，在1814年7月，西班牙决定要重新征服它的殖民地。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率领的1万名远征军在加的斯集中。它原来准备开往拉普拉塔河地区，但是考虑到平定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更为紧迫，因而改变了目的地。1815年4月远征军到达委内瑞拉沿海地区附近，莫里略不久就向新格拉纳达推进。卡塔赫纳被围困100多天后首先陷落，首府波哥大的圣菲也随即失守。到1816年年中，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重又建立，南美北部的革命似乎即将死亡或者已经气息奄奄。只有委内瑞拉东部地区的革命还不时显现一点生气。

这一年是革命战争的关键。1816年反动势力达到顶点，革命事业成败未定。但是革命现在以双倍的力量东山再起。在南方，在分隔阿根廷和智利的大山脚下的门多萨，何塞·德·圣马丁正悄悄地组织他的安第斯军。“门多萨是通往智利的大门，智利是通往秘鲁的大门。”^[15]就在12月圣马丁准备出发时，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作最后一次登陆，重新发动解放祖国的斗争，这成为西属美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巧合事件之一；玻利瓦尔也和圣马丁一样高瞻远瞩。“是的，是的，”他告诉同伴们说，“你们将同我一起奔向富饶的秘鲁。我们的命运召唤我们到美洲大陆最远的地方去。”^[16]

圣马丁生于乌拉圭河上游一个偏僻的传教站。他在西班牙求学，1812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是个职业军人、战略家和战术家。他的假道智利而不是经过上秘鲁的漫漫长途把革命进行到秘鲁的著名计划，是在两年以后拟定的。他的组织天才于是就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建立和装备一支军队，通过巍巍安第斯山的关隘进入智利。其中有一个关口是在阿空加瓜和图奔加托两座高峰之间，海拔1.26万英尺。1817年1月一切准备就绪。每条道路都经过周密调查；为了掩饰圣马丁的真实意图和进军路线费尽了心机；制定了精确的进军时间表；虽然地形条件极其恶劣，夜间严寒，高山病以及同小股敌军遭遇战，但穿越500来英里战线的整个行动都极其精确地顺利完成。2月初，圣马丁

的每一个指挥官都准时到达指定地点。2月12日，两支主力纵队会师后，向查卡布科的保王军突然发动袭击，两天后圣马丁进入圣地亚哥。圣马丁本人拒绝上台执政，圣地亚哥市政会议因而任命早期起义领袖、随圣马丁一起越过安第斯山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为智利最高执政官。奥希金斯的父亲是为西班牙服务的爱尔兰人，曾先后担任智利将军和秘鲁总督。

查卡布科战役是南美的重大战役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战役。直到1818年4月，保王军在圣地亚哥以南的马伊普再一次败北，智利的独立才算确定无疑，并为实现圣马丁宏伟计划的第二阶段——从海上入侵秘鲁——铺平了道路。同时，奥希金斯开始建立一支海军，由一些英、美商船和私掠船、以前用于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商船、一艘掳获的西班牙快速帆船和另外几艘小战舰组成，最后由英国海员、后来的邓唐纳德伯爵托马斯·科克伦指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但又极不可靠的人，曾私自同英国政府作战，后来接受劝告为智利服务。这支舰队的官兵都是英国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美国人和智利人，于1820年8月载着圣马丁的军队驶离瓦尔帕莱索湾（圣马丁拒绝服从命令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首先在往北1000英里的皮斯科登陆，由此向高原地区派出一支远征军，接着舰队载着军队驶向利马以北，封锁首都及其海港卡亚俄。鉴于保王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圣马丁就采取了观望、等待和谈判的政策，这使科克伦大为不满，不久就失去了耐心，结果保王军于1821年7月和平撤离利马。28日庄严宣告秘鲁独立，六天后，圣马丁被授予“护国公”的称号。

正如1817年圣马丁跨越安第斯山向南进军，最后又从海上入侵西班牙在南美的堡垒秘鲁一样，1819年玻利瓦尔也作了一次同样英勇的进军，跨越安第斯山向北进军，最后从陆路入侵秘鲁。玻利瓦尔具有特殊的禀赋，几近天才，1783年生于加拉加斯。他年轻时广泛阅读卢梭和雷纳尔、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洛克和霍布斯的著作。玻利瓦尔在巴黎见过拿破仑并且崇拜他，把他当作“光荣的明星，自由的天才”[\[17\]](#)，那就是说，他崇拜拿破仑直到拿破仑登上王位为止。他还不满22岁的时候，曾站在罗马郊外的萨克罗山上发誓要把他的祖国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在他作为军人的早期生涯中（参阅前面原书第621—622页），既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悲惨的失败，后来流亡到牙买加（1815年5月），最后流亡到海地。玻利瓦尔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也

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和事业丧失信心。当1812年的一次地震把加拉加斯夷为废墟时，他说：“如果老天爷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就要向他开战，让他俯首听命。”^[18]1815年当一切似乎都已绝望时，他从牙买加发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信心：“美洲的命运已经无可改变地确定了。与西班牙连在一起的纽带已经切断……使这两个国家的精神调和一致，要比统一美洲大陆更困难一些。”^[19]

1816年的最后一天，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海岸的巴塞罗那登陆。三个月后他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离开沿岸深入腹地，在那里他可以通过奥里诺科河直接和外界交往；他的权威也逐渐巩固了。他开始以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城）为基地，计划建立一个新国家：他设想，这个国家是个“保守的共和国”，包括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使英国宪法中至少他认为是特别好的某些方面得到再现。^[20]他在这里招收了大批外国退伍军人，都是从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招募来的，其中许多人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遣散士兵。最后，他率领3000人于1819年5月下旬从这里出发，开始了著名的大进军，穿越奥里诺科河炎热的遍地沼泽的平原，从海拔1.3万英尺的寸草不生的皮斯瓦荒岭翻过安第斯山，在博亚卡击败西班牙的主力部队（8月7日），四天以后胜利地进入新格拉纳达首府波哥大的圣菲，不久以后，随即宣告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联合成为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在库库塔为新建立的共和国起草宪法，玻利瓦尔对这部宪法其实并不完全满意。玻利瓦尔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为副总统，在玻利瓦尔离职期间代理民政事务。

即使在博亚卡战役之后，如果从欧洲派一支军队去增援西班牙的总司令莫里略将军的话，战局还是可能扭转过来而不利于玻利瓦尔的。它肯定能够拖长战争的时间。1819年，这样一支军队已经在加的斯集结。但是西班牙的事态又一次深深影响了西属美洲的事态。1820年1月1日，拉斐尔·列戈上校竖起了起义大旗，反对费迪南德七世的独裁政权，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起义迅速扩展，国王被迫让步；于是派往美洲的不是军队，而是谋求和平与和解的代表。莫里略奉命同玻利瓦尔谈判，1820年11月签订了停战协定后就返回欧洲。然而，现在即使是与立宪制的西班牙实行和解也已经不可能了。胜利的浪潮迅速涌来。停战协定满期以后，玻利瓦尔再度跨过安第斯山，在第二次卡拉博博战役（1821年6月24日）中把除卡贝略港堡垒以外的委内瑞拉

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次战役中，英国军团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以后玻利瓦尔才能把注意力从以前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转向西部和南部地区，亦即保王派势力雄厚的帕斯托省和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

帕斯托是新格拉纳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则不是。不过它原来附属于这个总督辖区，因此玻利瓦尔很自然地把它看作他新建立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瓜亚基尔港和瓜亚基尔省以外，它仍忠于西班牙。但是瓜亚基尔于1820年12月宣布独立后，声明它有权参加南美最符合它本身利益的任何联盟，这就是说，它可以和圣马丁最近登陆的秘鲁结盟，也可以和玻利瓦尔最近宣布独立的哥伦比亚结盟。这两位伟大的解放者都希望瓜亚基尔并入他们控制的地区里来。他们都派代表到瓜亚基尔。1821年玻利瓦尔派遣他最杰出的副手、29岁的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从海上到达瓜亚基尔，在秘鲁和哥伦比亚军队的支援下，1822年5月在皮钦查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结束了西班牙在基多的统治。与此同时，玻利瓦尔本人也开始进行艰苦的长征，从帕斯托到达基多。不管圣马丁有什么想法，玻利瓦尔肯定不打算让瓜亚基尔有多大的选择自由。他在6月中旬到达基多，就急忙赶到港口，从那时起，就瓜亚基尔人而言，自决已经成了空谈的问题。瓜亚基尔和基多一样并入了哥伦比亚。

这简直是一次强行占领，就在这种情况下，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于1822年7月26日举行会晤。他们是以平等身份见面的。但是当时玻利瓦尔依然在吉星高照之际，而圣马丁的命运已开始走下坡路。精力充沛、一心追求“荣誉”、声望的玻利瓦尔是在取得一连串巨大胜利之后来到瓜亚基尔的。他是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解放者；他刚刚在基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瓜亚基尔也落入了他的手里。另一方面，圣马丁却是病魔缠身，疲惫不堪。在秘鲁，他除了痛苦和误解以外几乎一无所获。他的手下人中间也出现了不满的迹象。科克伦同他发生了争吵，弃他而去。最主要的是秘鲁还没有获得自由。他解放了滨海地区，但并未到达高原，那里的总督势力仍然没有触动。要消灭这种势力，圣马丁需要玻利瓦尔的支援，但是又没有得到。两个人的会见是在私下举行的。没有第三者参加。但是从各自声明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对于将来秘鲁的政体（圣马丁主张以一个欧洲的王子为首的君主政体），以及在秘鲁进行作战和结束战争的方法都没有取得一致

意见。玻利瓦尔答应提供帮助，圣马丁却认为不够；圣马丁主动提出要在玻利瓦尔领导下效劳，玻利瓦尔却又不能接受。^[21]

对圣马丁来说，这是他的结局。他非常失望地回到利马。在他离开秘鲁前甚至就有过辞退的念头。这时他作出了决定。9月20日，他辞去护国公之职，移交给新成立的制宪议会，第二天就乘船去智利。

“我对自己曾经为之战斗的那些国家作出的诺言已经实现了”，他宣布说，“那就是使它们获得独立，让它们自己去选择政府。一个幸运的军人留而不去，不管他是多么大公无私，对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危险的”。^[22]他从智利迁居阿根廷，后来又回到欧洲，待了25年多后在欧洲去世。

解放秘鲁的工作有待玻利瓦尔去完成。但是他不可能立即离开哥伦比亚，因为他需要处理的当务之急太多，何况他在秘鲁也不会立即受到欢迎。后来他应秘鲁人姗姗来迟但是日益急迫的请求，于1823年9月终于到达利马，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北面的特鲁希略城有一个总统，在首府也有一个，高原地区还有一个尚未战败的总督。1824年2月，卡亚俄的卫戍部队叛变投奔保王派。正当绝望的议会把独裁权力授予玻利瓦尔的时候，总督的军队从山区袭来，重新占领了利马。不过战争的最后阶段已经临近了。玻利瓦尔总是处逆境而表现得非常出色。他重整部队，征募新兵，8月6日在安第斯高原的胡宁大败敌军。夜间奇寒，“双方的伤员几乎全部冻死”；^[23]这次战役就是战争行将结束的开端。12月9日，苏克雷在阿亚库乔获胜，最后一个西班牙总督放下了武器，战争才宣告结束。保王派的几个据点——卡亚俄要塞，智利沿海的奇洛埃岛——坚持到1826年。阿亚库乔之于南美的西班牙帝国，正如约克敦之于北美的英帝国一样。整个秘鲁，直到秘鲁和上秘鲁的边界线德萨瓜德罗河，即查尔卡斯检审法院院长辖区，现在都落到了爱国者手中。只要把上秘鲁负隅顽抗的保王军消灭就行了，上秘鲁是西班牙殖民帝国中最先起义（参阅前面原书第615页）而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一项工作不久就完成了。当苏克雷向前推进时，上秘鲁人民都起而欢迎他。他召开议会，议会宣布拥护独立。于是1825年8月玻利维亚共和国诞生了。为了向玻利瓦尔表示敬意，共和国采用了他的名字，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国家都拥有行政大权，不久以后他就这样做了，共和国并请他制定一部宪法。

作为哥伦比亚的解放者、秘鲁的独裁者和玻利维亚的总统，玻利瓦尔的权力和威望在1825年年末达到了顶峰。这时他梦想建立一个西属美洲国家联盟，总部设在巴拿马。他还梦想把他帮助创立的那些国家建成一个更加紧密的联邦。但是无政府状态的浪潮正在兴起。他为玻利维亚草拟了一部宪法，并希望别的国家也会采用。他把这部宪法看作诺亚方舟，可以拯救一切行将灭顶的人。^[24]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伪装之下的君主制——共和国有一个终身总统，他可以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立法机构远非人民所能控制；还有一个监察院，监察官为终身职，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我从骨子里相信，”他在这一年写道，“我们的美洲只能通过强有力的专制主义来进行统治。”^[25]

结局是悲剧性的。他的一切计划，一切希望全部破灭了。1826年6月召开了巴拿马会议，参加大会的只有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代表（参阅下面原书第635页）。这次大会除了对遥远的未来起到鼓舞作用外，是一次失败。安第斯联盟始终是个梦想。玻利维亚转而反对玻利瓦尔留下来担任总统的苏克雷。秘鲁当玻利瓦尔在的时候采用了他制定的宪法，但他刚一离开就废除了它，接着就入侵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则发生了内讧。这位解放者变成了独裁者。有人企图谋杀他，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他感到绝望。1829年他写道：“美洲没有信义，美洲国家之间也没有信义可言。条约形同具文；宪法等于书本；选举等于战斗；自由等于无政府状态；生命等于痛苦。”^[26]最后他踏上了流亡的道路，1830年12月死于流亡之中。他的死同时是一种制度的消失。委内瑞拉在其伟大的游击战士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领导下，已经从哥伦比亚分离出去，原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也以厄瓜多尔的新名称脱离哥伦比亚。

像大哥伦比亚那么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地区分割的一个国家，也许绝不会有几个国家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整个西属美洲，原来帝国的行政制度十分注意排斥土生美洲人担任政府的技术性工作，因此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哥伦比亚，阿根廷还是秘鲁，要在这种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能存在的和稳定的国家是极端困难的。在19世纪30年代，智利确曾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1823年奥希金斯（参阅前面原书第623页）在那里垮台，他成了智利土地贵族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敌视他的社会政策，也敌视他的个人统治。他流亡后，接着经过七年的政治试验和争论——1823—1829年之间曾经有过三部宪法——以及日

益严重的混乱和骚动。然而保守派势力在1830年内战中取得的胜利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在1833年制定的贵族宪法下，智利成了一个骚乱的大陆上的一块和平的绿洲。

阿根廷就没有那么幸运。图库曼国会（参阅前面原书第620页）于1816年宣布“南美洲联合省”独立。它重新建立了最高执政府，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于1819年颁布宪法。这就为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创造了条件。它无视各省实现地方自治的主张和对一个城市、一个港口或者一个省份拥有经济霸权的担心。它也无视许多省份事实上已经落到军事首领、平原地区的“考迪略”，以及像圣菲的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和恩特雷里奥斯的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他不久就把他的老盟友和实际上的主子何塞·阿蒂加斯^[27]放逐到巴拉圭）这样的人的手里，未必会驯服地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命令。最后，发现至少有几个制定宪法的人参与了企图把共和国变为君主国的计划。其结果就是“1820年的无政府状态”。洛佩斯和拉米雷斯率领他们的牧民骑兵进攻首都；议会和执政府均告消灭；全国政府不复存在，只剩下了联邦的幻影。

在国家解体的过程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第一次混乱的冲击后迅速恢复稳定。1820年9月，一个代表委员会要求马丁·罗德里格斯担任省长（1820—1824年）。罗德里格斯任命刚从欧洲回国的41岁的港口人政治家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做他的政府和外交事务秘书。里瓦达维亚在三年之内在改善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在英国驻阿根廷第一任总领事看来，要比所有他的前任的工作的总和还要多。^[28]建立了一个代表会议，创办了一家银行和一所大学，扩大了省界，改组了财政工作，改革了警察和司法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这样多方面的意义深远的立法和行政活动的舞台，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很少见。”^[29]最后在1824年12月再次召开制宪会议。这个机构于1825年1月颁布了一项“基本法”，规定在全国宪法通过以前，各省可以自治，但是外交事务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来处理。根据这一法令，才使得有可能于2月间签订了英国与联合省之间的商务条约。最后，一年以后，即1826年2月，制宪会议任命因再次出使欧洲而不在国内的里瓦达维亚为共和国总统，12月，制宪会议终于颁布了宪法。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制定宪法的人几乎没有接受经验教训。1826年的宪法和1819年的宪法一样，势必会建立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

的统一的国家，从而无视全国范围内的联邦主义情绪，因此不可能存在下去。一省接着一省地拒绝接受。总统提出辞职，制宪会议解散。这时，在里瓦达维亚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不是联邦式的国家组织，而是阿根廷最大的“考迪略”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专制统治。

这时候，阿根廷已对巴西开战，因为1816年巴西入侵东岸地带——后来的乌拉圭——（参阅前面原书第619—620页），并于1821年将它建成内普拉蒂诺省。但是，无论是东岸地带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不甘心让葡萄牙或者巴西统治拉普拉塔河地区。1825年4月，从东岸地带逃亡出来的胡安·安东尼奥·德·拉瓦列哈率领“三十三名不朽战士”的解放远征军越过拉普拉塔河。东岸地带的农村居民也揭竿而起。在小城镇拉佛罗里达召开了议会，宣布赞成同阿根廷其他各省联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同意接纳，于是随即同巴西开战。战争延续了三年，陆上或海上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只是使英国商业大受其害，最后，通过英国的调停结束了这场战争。早在1826年2月，坎宁就提议“蒙得维的亚的城市和领土”应当“成为并保持独立”；^[30]在英国先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驻里约热内卢的公使庞森比子爵长期施加压力之下，敌对双方终于在1828年8月签订和约，承认并保证独立的乌拉圭共和国的存在，作为双方之间的缓冲国。

争夺东岸地带的战争导致了里瓦达维亚在阿根廷的垮台。它还严重损害了巴西年轻的唐·佩德罗一世的威信。巴西在1807年是殖民地，1815年成为王国（参阅前面原书第612页），到了1822年已成为独立的帝国；最后一次转变完全是葡萄牙国内的事态造成的。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在1820年经历了一次革命。1821年1月召开了议会，一部宪法的基本内容已经准备就绪，使1816年即位的国王若奥六世陷于进退维谷的痛苦境地。13年前他为了逃避拿破仑的毒手而逃到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顶住了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要他返回里斯本的压力。但是就连他也不能不看到，布拉干萨王室的前途正处于危急关头。他不愿意留下来，唯恐也许会失去葡萄牙王位；他又害怕离开，唯恐也许会失去巴西。经过剧烈的摇摆并看到里约热内卢的混乱局面，他终于在1821年4月26日乘船离去，随身带着大约3000葡萄牙人和几乎是巴西银行的全部财产，只把24岁的儿子和继承人唐·佩德罗留下来做摄政王。

到这时为止，巴西人都热情地拥护立宪主义的事业。现在他们觉得幻想破灭了。因为里斯本的议会发现，要使国内的自由主义和海外的专制主义协调一致是并不困难的。它打算把巴西降低到以前殖民地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里约热内卢的政府应予推翻，各省都应依附于里斯本，并命令唐·佩德罗回国。这位急躁、热情的年轻王子，一向放荡、举止轻浮，现在成了巴西团结的象征和当地贵族的希望。1822年1月9日，他答应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请愿和呼吁，同意留下来。他选中圣保罗人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埃·席尔瓦为首席顾问，此人曾任科英布拉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矿物学家和巴西独立的天才指挥者。5月，唐·佩德罗接受了里约热内卢市加给他的“巴西的永久保护者和捍卫者”的称号。6月，他召开了制宪议会，8月，访问圣保罗。9月7日，他在伊皮兰加小溪边接到葡萄牙的咨文，宣布他的一切活动都属无效。他宣布：“时机已经到了！不独立，毋宁死！”随即赶回里约热内卢。10月12日宣布他为巴西宪政皇帝，12月1日加冕。这时仍须将葡萄牙军队从巴伊亚、马拉尼翁和帕拉等北方省份赶走，就像以前把他们赶出里约热内卢一样；在原为智利共和国海军服务、现改为巴西帝国海军服务的科克伦勋爵的帮助下，这个目的达到了。在南方的“内普拉蒂诺省”，驻蒙得维的亚的葡萄牙士兵长期以来就蔑视巴西人。但到1823年年末，巴西的独立已经完成。内战得以避免，分离主义倾向受到了抵制，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得以保持。

但是制宪议会召开以后不到七个月，就被唐·佩德罗强行解散，因为它过高估计自己的权力，又明显地敌视巴西的葡萄牙人，这使他大为愤怒。他也与若泽·博尼法西奥决裂了。后者作为皇帝的首席大臣，不管其举动如何傲慢，却是巴西帝国的真正缔造者。若泽·博尼法西奥和他的两个兄弟由于在议会内外担任反葡萄牙派的领袖，被驱逐到法国去了。唐·佩德罗虽有自由主义的意向，但又有专制君王的本性，最后他下令制定一部新的或者经过修订的宪法，来代替议会原来起草的那一部。1824年3月，根据皇帝的敕令，颁布了新宪法。这使巴西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君主国，后来存在了65年。虽然它在形式上把广泛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但在实质上也许具有足够的自由主义色彩。但是议会被解散了。宪法是皇帝赐给全国的，而不是议会提交给皇帝的，因此巴西人民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在强大的地方保皇派势力中心和1817年共和派起义的地方伯南布哥，不满情绪于

1824年达到顶点，人们谴责皇帝，拒绝接受宪法，并企图建立一个新国家：“厄瓜多尔邦联。”为了镇压这一运动，唐·佩德罗不得不再一次求助于科克伦勋爵，并暂停实行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各项条款。

1824年伯南布哥反叛之后，接着发生了1825年的内普拉蒂诺省反叛，从而导致和阿根廷进行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和不得人心的战争，1828年又签订了一项更加不得人心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巴西帝国最南边的一个省成为独立国家乌拉圭（参阅前面原书第630页）。在这段时间里，唐·佩德罗和葡萄牙、英国都签订了条约，后者非常关心唐·佩德罗和国王若奥取得和解。葡萄牙是英国最老的盟国。在坎宁看来，巴西帝国是共和主义的美洲和君主政体的欧洲之间的纽带，英国在南美任何地方的商业利益都不如巴西这样广泛。然而只是经过极其复杂的谈判，坎宁使尽了他的全部手腕和精力，葡萄牙才终于在1825年8月同它的前殖民地巴西签署条约承认了它，国王若奥在形式上拥有巴西皇帝的称号，而后就让位给他的儿子。但是巴西人民也充分注意到，在这个条约中，葡萄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还是悬而未决，而且更糟糕的是，根据一条先是保密的附加条款，唐·佩德罗同意补偿他父亲在巴西的损失，并负责偿还葡萄牙拖欠英国的债务。此后，又同英国签订了两个条约。一是1827年签署的商务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把英国同葡萄牙通商中在巴西长期享有的特权重复了一遍。二是到1830年废除奴隶贸易的协定（1826年11月），对此唐·佩德罗同样无力抗拒。这两个条约都不受欢迎。但是第二个条约似乎威胁着巴西依靠奴隶劳动和种植园制度获得繁荣的根本基础，深深触犯了众怒，并且证明是无法实施的。进口奴隶的数额迅速增长一事就说明了问题。

巴西皇帝和扶持他登上帝位的巴西人之间的隔阂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了。1826年唐·佩德罗的父亲逝世，他即葡萄牙王位，接着就予以放弃。但是正如巴西人想象的一样，他仍旧过分关心葡萄牙的事务。他的专制倾向愈发明显，他的私生活更加声名狼藉，而且也更加露骨地依赖他那些葡萄牙朋友和支持者。他同议会（1826年以前从未召开过）的关系变得极端紧张，最严重的是国家的财政状况混乱不堪。这一切到1831年才结束，那时国家已处于革命的边缘，皇帝已再也不能

依赖他自己的军队。他于4月7日逊位给他的年幼的儿子，自己乘上一艘英国战舰前往欧洲。从此巴西才掌握在巴西人手中。

另外两个国家试验实行君主政体。一个是占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1/3土地的海地，另一个是墨西哥。海地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圣多明各，1804年1月成为近代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同年10月，来自刚果的一个残暴的野蛮人让-雅克·德萨利讷称帝，成为雅克一世两年后遭到暗杀。18世纪最后10年里在本岛法国人地区发生了种种恐怖事件后幸存下来的白种人，几乎被他杀光。他的帝国的北部落到另一个更加非同寻常的领袖亨利·克里斯托夫手里。此人以前也是奴隶，1811年加冕为亨利一世，精力充沛、残酷而成功地统治着他的小王国。南部落到了另一个念过书的黑白混血人亚历山大·佩提翁手里，他作为终身总统，实行着比较温和但不是很有效的统治。接替他的是另一个黑白混血种的让-皮埃尔·布瓦耶（1818—1843年）。1820年克里斯托夫自杀，布瓦耶吞并了他的王国，随后又吞并了西属殖民地圣多明各，把整个岛屿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圣多明各这个不幸的国家，1795年名义上割让给法国，1801年曾暂时被海地军队占领，后来又被法国费朗将军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占领，1808—1809年在英国舰只和西班牙军队的支持下发生暴动，结果重又归属西班牙。1821年11月圣多明各再次起义，打算以独立国家的地位与哥伦比亚合并。结果在1822年年初重又落入海地的统治之下，此后22年一直为海地所控制。

西班牙之所以失去圣多明各，既由于外来征服也由于人民起义。西属其他岛屿中，古巴和波多黎各继续忠于母国。对它们的统治比较牢固，国内也比较繁荣。此外，古巴既是可以对大陆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又是保皇分子的避难所。尽管有些由于不满而引起的骚动，但是西班牙人也罢，克里奥尔人也罢，都不愿冒险惹起海地那样的奴隶暴动的恐怖局面。然而，在北美大陆上，18世纪末西班牙属地中面积大而且富庶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和毗邻的危地马拉将军辖区都在19世纪20年代宣布独立，不过这两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和南美不同。

在新西班牙，就像在殖民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1808年半岛上的事态发展加速了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主要发生在墨西哥城（参阅前面原书第614页）。不过欧洲西班牙人在这里通过非法废黜总督而掌握了控制权，克里奥尔人的野心遭到挫败。新西班牙的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从首都开

始，而是从各省开始的。它与其说是政治运动还不如说是社会运动，是无产业阶级反对有产业阶级的一次反叛。它开始于1810年9月16日。当时瓜纳华托市多洛雷斯教区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号召他的印第安人教徒拿起武器。伊达尔戈是邻近的克雷塔罗城一个密谋团体的成员，原打算于12月举行克里奥尔人的起义，但计划泄露，被迫改为立即发动印第安人起义。事先既无计划，也没有组织。但是正如墨西哥检审法院所抱怨的那样，这次起义像瘟疫似的迅速蔓延。^[31]伊达尔戈只有少数几个克里奥尔人军官（都是克雷塔罗密谋团体的成员）和少数受过训练的军队。但是不久以后，他们手下就有5万名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暴徒，非常野蛮地攻打并洗劫了省城瓜纳华托。那时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就进而威胁墨西哥城。但是到达该城时，这位当时自称为“美洲总司令”的伊达尔戈却停止不前了，他的那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向后转，1811年1月在离瓜达拉哈拉不远的莱尔马河岸溃散。六星期后伊达尔戈被俘，先在宗教法庭受审，后宣誓放弃起义并对自己参与其事表示忏悔，7月被枪决。

但是他点燃的火焰不是那么容易扑灭的。起义虽在北方失败，却在南方兴起。另一个神父，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物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继承了他的衣钵。他控制了墨西哥南方大部地区达四年之久，召开了议会并颁布了一部宪法，直到他也被捕并于1815年被枪决。以后，议会没有存在多久；在农村流窜的武装团伙逐渐减少；到1820年西班牙发生自由派革命时，这里只剩下少数几个拒不妥协分子，东南地区有维森特·格雷罗及其追随者。瓜达卢佩·维多利亚（费利克斯·费尔南德斯）则绝望地在维拉克鲁斯山区和森林中孤立地游荡，但是命运注定他要成为墨西哥的第一任总统。

由于自由主义于1820年在西班牙获得胜利，尽管是昙花一现，墨西哥的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在一些克里奥尔人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革命。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决心要使新西班牙不受老西班牙危险变革的影响，他们完成了这场革命。他们找到了一个克里奥尔青年军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伊图尔维德原是总督派来镇压格雷罗的，但他反而向洛雷罗提出了个所谓的“伊瓜拉计划”（1821年2月），向这个受到战争折磨的国家的几乎所有各派都作出一些让步；同意墨西哥独立，墨西哥人和欧洲人一律平等，以及罗马天主教会享有至高地位。计划中还规定建立

一个君主国，最好是由西班牙王室的一个王子来统治。格雷罗和他的部队接受了这个计划。总督辖区当局被迫默认。于是伊图尔维德于9月进入墨西哥城，建立摄政机构，召开议会，而后在1822年5月，在他的军队的欢呼声中登上了墨西哥皇位。7月，他加冕为阿古斯丁一世皇帝。但伊图尔维德虽然能夺得皇位，却不能保住它。他的野心和无能，无力支付军饷和别人的妒忌等都加速了他的垮台。12月，维拉克鲁斯港司令官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那“宣布”反对他，1823年2月他被迫退位。1824年8月宣布成立共和国，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墨西哥发生的事件必然会影响毗邻的危地马拉将军辖区，亦即危地马拉王国。这个国家尽管在1811年至1814年间偶然发生过几次骚乱，至今却一直是效忠西班牙的。1821年9月，恰帕斯省决定与墨西哥共命运，同月，主要官员在危地马拉城召开政务会，宣布赞成独立。但是伊图尔维德却另有打算。1822年6月，一支墨西哥军队开进首都，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伊图尔维德得以统治这个古老的王国。然而在他垮台以后，一个“全国制宪议会”于1823年7月宣布，这个王国的所有各省都获得自由和独立，既不属于老西班牙，也不属于新西班牙，它们联合组成中美洲联合省——这个联邦只存在到1838年，以后各组成部分就分成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

在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中，并没有得到外部国家的正式援助，就像法国和西班牙援助英国在大陆上的殖民地那样。但是外国士兵和水手，特别是在玻利瓦尔麾下作战的英国和爱尔兰士兵，以及随科克伦航行的英国和爱尔兰水手，都对起义者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英国商人和银行家的效劳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效劳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但是他们提供了起义政府所需要的东西——金钱、贷款和物资。英国的资金需要输出。西属美洲的英国经纪人和商业代理人都殷切期待着开放西属美洲的市场，不管西班牙是否允许。他们在一个接一个的获得自由的地区开始营业，他们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皇家海军舰只的保护，而那些舰长也把大量硬币运回英国。1824—1825年间，当西属美洲大陆到处充斥着英国货物，并在西裔美洲人的矿山大肆进行投机活动时，这使人想起了南海公司骗局的那些日子，一个个革命政府都在伦敦成功地借到更多的借款。1825

年年末幻想破灭，采矿计划的失败，成了拖欠债务的先声。但是到这时候，英国以各种方式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已达2000多万英镑，等于在美国投资总和的3倍以上。

没有一个英国政治家能够无视英国的商业利益。谁也不愿意放弃对西属美洲的贸易。但是只要拿破仑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根本不希望西班牙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的英国政府，宁愿集中全部力量和资源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参阅前面原书第613页）。卡斯尔雷甚至殷切地希望促成西班牙同它的殖民地和解。但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除非母国准备“使美洲居民和欧洲西班牙居民一样在贸易上享有相应的利益”，除非它认识到，再也不能把“这么辽阔的省份仅仅当作殖民地来对待”，否则它们之“脱离母国是势所必然的，而且已迫在眉睫”。

[\[32\]](#)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才准备进行调解。他不仅拒绝用武力支援西班牙，而且在1817年还明确表示，欧洲列强也不应随意这样做。

[\[33\]](#)到了1820年，他本人也已相信，承认西属美洲大部地区的独立，只是时间问题和方式问题了。然而直到1822年，英国才承认南美船只所挂的旗帜，这其实就是事实上的承认；到1823年年末，它才向西属美洲新成立的国家派遣领事和调查团；到1825年通过谈判商务条约，才在法律上承认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拉普拉塔河联合省。

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比较早，于1817年向南美派出专员；1819年同西班牙签订割让佛罗里达的条约，1822年承认哥伦比亚和墨西哥，1823年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智利。在签订佛罗里达条约以前，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承认问题上原打算（尽管很勉强）和英国执行一致的政策，但那时卡斯尔雷却另有考虑；1823年，当法国军队在西班牙恢复独裁政权以后，坎宁谋求美国合作，发表联合政策声明，警告欧洲和法国，这一次亚当斯却裹足不前了。正如亚当斯对这位英国大臣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欧洲对西属美洲进行任何“积极而重大的干涉”的想法都是“十分荒谬，难以令人接受的”。

[\[34\]](#)他还认为，正如他对内阁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看来，“直截了当地”表明它的原则，比“像是尾随英国军舰之后的一条小船那样行事，更正当，也更加体面”。[\[35\]](#)

因此，1823年美国单独采取行动。12月2日门罗总统向国会提出的著名的咨文，[\[36\]](#)部分是向南方各年轻的共和国表示同情的一种姿

态。其意图则一部分是为了美国安全的利益，一部分也是在损害欧洲和英国的情况下提高美国在西半球的政治威信。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在一个共同目标范围内的利害冲突，再没有比这表现得更清楚了。英国和美国都反对欧洲干涉西属美洲，尽管发生这种干涉的危险始终是遥远的。它们都决心保持同西属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权，除了要像英国在葡萄牙享有的特权那样在巴西也同样享有或接近同样享有外，两国都不谋求独立商业上的利益。但是他们之间的竞争只不过稍加掩饰而已。卡斯尔雷宁愿看到波旁家族的王子在西属美洲新建立的国家里掌权。坎宁则认为在巴西保持君主政体的原则是他把拉丁美洲同欧洲连在一起的宏伟计划中的关键（参阅前面原书第632页）。但是美国顽固地反对这些想法。它希望看到一种美洲的体制和美洲的政策占统治地位。此外，两国都害怕对方有领土野心。美国在西班牙的边疆地区的扩张，确实促使西班牙的统治垮台。坎宁和亚当斯还互相猜疑对方对古巴的意图，虽然是什么理由的。最后，除了政治上的竞争以外，又加上了商业上的敌对情绪。

但是门罗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发展的结果。就坎宁而言，他在破坏美国已取得的任何暂时利益方面行动是迅速的。1823年10月他同法国驻伦敦大使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公爵会谈（在会谈中波利尼亚克代表法国声明放弃武装干涉西属美洲的任何意图）的备忘录，被广泛用来表明英国“多么早、多么急于声明，它反对在外国帮助下把西班牙前殖民地重新置于母国的统治之下的任何计划”；^[37]除了这样加以反击之外，又加上1825年签订的商务条约使英国和美国之间在力量上产生很大差距，这对于那些新成立的西属美洲共和国来说，必然比得到美国承认更为重要。在欧洲，它们的影响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东方大国虽然提出了抗议，但主要是走走形式，法国和英国这时试图劝导西班牙同这些新国家妥协。法国自己在1830年承认了它们。罗马教皇1835年也这样做了。然而，直到1836年西班牙才开始承认它的这些前殖民地，这一过程直到1895年才完成。

（张鸿良 译）

^[1] A. K. 曼彻斯特：《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及其盛衰》（查佩尔希尔，1933年），第72页。

- [2] 原文为Junta，亦译为政务会、执政团等。——译者注
- [3] 伦敦德里侯爵查尔斯·万恩：《卡斯尔雷子爵回忆录和通信集》（12卷本，伦敦，1848—1853年）第6卷，第375页。
- [4] 卡斯尔雷致海军上将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信，1808年8月4日。伦敦档案局，外交部72/91。
- [5] 坎宁致斯特兰福德信，1808年9月2日，外交部63/59。
- [6] 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译者注
- [7] 里卡尔·莱韦内：《关于五月革命和马里亚诺·莫雷诺历史论文集》（3卷本，第2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年）第1卷，第303页。
- [8] 胡莱斯·曼西尼：《玻利瓦尔与从开始到一八一五年的西班牙殖民地解放运动》（巴黎，1912年），第271页。
- [9] C. H. 哈林：《美洲的西班牙帝国》（纽约，1947年），第346页。
- [10] 亨利·韦尔斯利爵士致卡斯尔雷信，加的斯，1812年7月5日。查尔斯·K. 韦伯斯特爵士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12—1830年。外交部档案文件选编》（两卷本，伦敦，1938年）第2卷，第330页。
- [11] 拉普拉塔河以北，乌拉圭河以东地区的通称，以后成为乌拉圭共和国。
- [12] 习惯上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叫作“港口人”。
- [13] 意为“骑马的人”，或骑马牧民，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最早是私贩牛皮的人。
- [14] 戴维·布什内尔：《大哥伦比亚的桑坦德政权》（特拉华州纽瓦克，1954年），第6—7页。
- [15] J. P. 奥特罗：《解放者唐·何塞·德·圣马丁传》（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32年）第1卷，第278页。
- [16] 《西蒙·玻利瓦尔全集》（比森特·莱库纳和埃斯特尔·巴雷特·德·纳萨雷斯编，2卷本，古巴，哈瓦那，1947年）第1卷，第223—224页。
- [17] 玻利瓦尔的这些话，系根据他的副官、爱尔兰人丹尼尔·奥利里所说。《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将军回忆录·叙事》（3卷集，加拉加斯，1852年）第1卷，第61页。
- [18] 《玻利瓦尔全集》第2卷，第994页。
- [19] 《一个南美人答本岛一位骑士问》，金斯敦，1815年9月6日。《全集》第1卷，第160页。
- [20] 《解放者在安戈斯图拉议会发表的讲话》，1819年2月15日。《全集》第2卷，第1132—1155页。

[21] 对主动提出在玻利瓦尔领导下效劳一事的证据是有争论的。参阅格哈特·马苏尔在《瓜亚基尔会议》一文中的论述，《拉丁美洲历史评论》31卷（1951年），第189—229页。

[22] 《圣马丁档案文件》（1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1911年）第10卷，第356页。

[23] 约翰·米勒：《威廉·米勒将军在秘鲁共和国服役期间回忆录》（2卷集，伦敦，1828年）第2卷，第134页。

[24] 玻利瓦尔致古铁雷斯·德·拉富恩特信，1826年5月12日。《全集》第1卷，第1326页。

[25] 玻利瓦尔致桑坦德信，1826年7月8日。《全集》第1卷，第1390页。

[26] 《西属美洲一瞥》，据认为是玻利瓦尔所写。《全集》第2卷，第1304页。

[27] 参阅前面原书第619、620页。阿蒂加斯于1820年逃至巴拉圭，1850年死于该地，同年，圣马丁死于法国滨海布洛涅。

[28] 伍德拜因·帕里什致坎宁信，1824年4月27日。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6/3。

[29] 迈伦·伯金：《1820—1852年阿根廷联邦制经济面面观》（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6年），第87页。

[30] 坎宁致庞森比信，1826年2月28日。查尔斯·K. 韦伯斯特爵士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12—1830年。外交部档案文件选编》（两卷本，伦敦，1938年）（见前面原书第617页），第1卷，第138页。

[31] H. G. 沃德：《一八二七年的墨西哥》（两卷本，伦敦，1828年）第1卷，第497页。

[32] 卡斯尔雷致亨利·韦尔斯利爵士信，1812年4月1日。查尔斯·K. 韦伯斯特爵士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12—1830年。外交部档案文件选编》（两卷本，伦敦，1938年），第2卷，第311页。

[33] 参阅1817年8月20日他的通告备忘录。查尔斯·K. 韦伯斯特爵士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12—1830年。外交部档案文件选编》（两卷本，伦敦，1938年）第1卷，第14页；第2卷，第352—358页。

[34] 布雷德福·珀金斯编：《H. U. 阿丁顿的一份被扣压的公文，1823年11月3日，华盛顿》，《拉丁美洲历史评论》37卷（1957年），第485页。

[35] 德克斯特·珀金斯：《门罗主义，1823—182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27年），第74页。

[36] 参阅本书第二十二章，原书第591页，和第二十五章，原书第682页。

[37] 普兰塔致伍德拜因·帕里什信，1823年12月30日。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118/1。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法联盟与维也纳会议（1813—1815年）

由于拿破仑的命运不济，因而他的敌人时来运转。于是，一个注定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反法联盟就在1812年与1813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冬天开始形成了。当大军的残余部队从俄国仓皇西撤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越过俄国国境，跨越欧洲追击拿破仑；并在俄军推进时寻找盟友。普鲁士根据1813年2月的卡利什条约成了第一个盟国。该条约规定提供明显的战争需要，并许诺恢复普鲁士原有的版图。奥地利对于俄军的推进的反应比较缓慢，但英国则于6月间在赖兴巴赫与普、俄两国都签订了结盟和提供津贴的条约。在停战未成和在布拉格举行的“和平”会议毫无结果之后，它们遂于8月重新对拿破仑作战。这一次是在德意志境内作战，而且奥地利终于参加了联盟。经过几次小规模交锋后，1813年10月16—18日的莱比锡战役粉碎了拿破仑在中欧的阵地，显示了联盟的令人难忘的力量。拿破仑最后的德意志盟友背弃了他，他的近20万军队彻底溃败，其中死、伤、病、俘者达2/3。不到年底，法军从1805年发动战争以来第一次被限制在莱茵河以西领土之内。

1813年秋天，同盟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之日，却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屡遭挫败之时。虽然他的国家多年来一直不断积极地反对拿破仑，虽然英国已把敌人赶出西班牙，使它的舰队变得毫无用处，并且给予盟国以资助，但是在中欧忙于对付拿破仑的盟友，对于英国的忠告却不大理会。此外，尤其使卡斯尔雷感到沮丧的是，驻维也纳大使阿伯丁和梅特涅一道提出1813年11月的“法兰克福建议”，企图向拿破仑提出以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为界，以此谈判结束战争。这个最后建议显然违背英国的外交原则之一，是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英国外交大臣所不能原宥的。卡斯尔雷认为通过不称职的大使们同那些满不在乎的盟国打交道总不能够得心应手，于是便决定亲自前往欧洲。

卡斯尔雷的各项指示都是由他亲自起草并得到内阁批准的。^[1]这些指示构成了媾和时期的重要文件之一，使我们能够从中清楚地了解他的计划的结构。他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法国在斯凯尔特河，“特别是在安特卫普”，建立一个海军据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建议在荷兰的领导下把大多数低地国家联合起来。为了做到这重要的一步，他打算拿英国在战争期间新夺取的某些岛屿作为交易。他还希望建立巩固的联盟，以便使联盟的各色各样的行动和协议具有比较完善的形式。这个联盟将“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要存在下去，以便阻止“法国向任何一个缔约国的欧洲领土发动进攻”。在解决领土问题方面，他要普鲁士向西稍稍扩展，希望重新建立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安全与独立”，恢复罗马教廷，而且使撒丁得到加强。他在同一时期另外单独提出的“关于海上和平的备忘录”中，要求法国退回到原有的疆界。备忘录还要求建立一支海军以及军事均势。但在这方面，他不过是空谈平衡主义的理想而已。不论均势在军事上对英国能有多大好处，但它明显地威胁了英国在海军事务中明显的领导地位。所有这些观点他显然大都取自早先皮特的精辟分析。他原是皮特的信徒，皮特的遗训在1805年1月19日的“致沃龙佐夫的草案”中可见一斑。皮特当时曾与卡斯尔雷讨论过这个著名的政策声明，而且后者甚至可能在制定这一政策声明时曾经出过一臂之力。

如今卡斯尔雷离开浓雾重重的伦敦，前往严霜遍地的欧洲大陆时，年已45岁，与其说他才智过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有勇气、有性格的领袖人物；他具有坚强的克制自己的能力，坚定、坦率、超然而冷漠，对法语虽然不精通，但却熟谙外交政策。他于1814年年初抵达当时已迁到法国东部的联军总部。他在这里几乎每天都与沙皇亚历山大、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商谈。后二人同意他把安特卫普交给荷兰的意见。他向他们说明他要让普鲁士在德意志西部向前推进的计划，并且关于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是否可取一事，他和梅特涅的意见是非常接近的。

所有这一切都可作为在会议上与法国进行谈判的有用的准备工作；这个会议主要是毫无用处的“法兰克福建议”促使召开的。这次会议于1814年2月初在风景如画、人烟稀少的村庄塞纳河畔的夏蒂荣召开；联军决心要把法国限制在1792年的疆界以内。代表拿破仑与会的是对他一贯忠诚、效劳多年的前驻莫斯科大使科兰古。这次会议是在

没有停战的情况下举行的，由于2月间军事行动变化不定，会议的气氛也随之迅速变化。2月初，拿破仑似已陷入毫无希望的困境，最后一个盟友缪拉最近抛弃了他，联军在四个星期内又前进了250英里，占领了法国领土的1/3，部队循着马恩河和塞纳河而下，直指巴黎，哥萨克的巡逻队甚至远达奥尔良。然而此时，拿破仑却在五天之内连打四个胜仗。

盟国在2月17日送教科兰古一个文件，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条件；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特鲁瓦基本原则”。卡斯尔雷在这个文件中谨慎从事，不让重提给予莱茵河左岸的问题。假使波拿巴愿意接受法国1792年的疆界，重建保持平衡的国家体制，放弃其大部分头衔，他当时本来可以结束战争的。这本是他挽救皇位的最后良机。但是他的王朝历时不久未能得以神圣化，他作为一国君主立足尚未稳固，即贸然同意让法国的疆土大减，这未免是一种耻辱，因而错过了这一机会。

尽管联盟总的来说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由于法国打了几次胜仗所引起的慌乱，由于亚历山大在夏蒂荣不愿合作，以及他同梅特涅的关系很糟，因此联盟的许多分歧加深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消除总部的不良倾向、忧郁甚至惊恐情绪，卡斯尔雷提出了他长期主张的建立一个巩固联盟的计划。他的建议使各盟国很好地重新团结起来，并且迅速地被采纳，于1814年3月9日签署，而倒填日期为3月1日。这一联盟为各盟国的行动规定了明确的条件，规定四强各提供15万军队，英国则提供500万英镑津贴以便继续作战。此外还通过秘密条款，确认早先达成的关于重建国家体系的大部分协议。联盟因此得到加强，还接受了第5—16条中规定的一些重要义务，即四强一致同意各出6万名士兵（英国则提供相当的经费）共同作战，互相保卫，以对付法国将要发动的任何进攻，这支援军将由需要援助的国家指挥。对支援性的安排也作了详尽的规定；协议将持续20年。这个条约体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主张保持均势的作者们所一直阐述的想法，但过去从未将这些想法如此实际地写进一项国际协定之中。它标志着一种相当高明形式的保持均势的政治手段的出现。当然，它还将在和平的最初几年中经受考验。

由于拿破仑坚持不接受“特鲁瓦基本原则”，夏蒂荣会议遂于3月19日散会，盟国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开始直接向巴黎进军。他们甘愿冒非同寻常的风险，把拿破仑抛在自己的后方，这一战略奏效了。

在普俄军队攻下了蒙马特，他们的大炮从那里的山坡上可以控制巴黎城时，颇为消沉的巴黎便于1814年3月30日陷落了。巴黎一经占领，法国的政治继承权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曾经出现过五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梅特涅屡次表示，他对有一半哈布斯堡血统的玛丽·路易丝当拿破仑儿子的摄政，颇感兴趣。梅特涅还认为让拿破仑继续保留皇位也有好处，因为正是他才使法国革命走上了正道。卡斯尔雷从1月起就竭力争辩要恢复波旁王朝，只要法国人民乐意接受就行。亚历山大则三番五次敦促让瑞典王储、前法国元帅贝纳多特继位，或者甚至让法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

从在战争结束时重新建立均势这一观点看，恢复波旁王朝是一个既省力而又最可取的办法。其优点是，他们具有正统性，他们重新上台对于任何一个外国支持者都不产生厚此薄彼的问题；他们登上王位后所采取的保守政策，将有利于消除法国的那种带有危险性的活动。他们可以接受旧日的疆界而不失体面，因为那显然就是他们原有的疆界。此外，3月份在波尔多已有公众表示支持，而且巴黎也有一批人准备为路易十八建立政权。在占领巴黎前几天，几个主要盟国在对波旁王室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从各国外交官于3月28日在第戎举行的盛大集会上为波旁王室祝酒一事，就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卡斯尔雷认为保证自己极力奉行的政策得以实现，无须立即赶到巴黎去。他和梅特涅都放手让沙皇去执行。

在巴黎，亚历山大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3月31日他在军队开进巴黎的凯歌声中来到巴黎。他听说爱丽舍宫布有地雷，就下榻位于巴黎圣弗洛朗坦路上的塔列朗的宅邸里，该处位于市中心，非常方便。现在尽管沙皇心有未甘，他已倾向于支持恢复波旁王朝，自从他同巴黎城内极力主张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塔列朗经常接触以来尤其明显。塔列朗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误解为是复辟的主要建筑师，其实他只不过是盟国的既定政策狡猾地推波助澜而已。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他的比较显著和积极的贡献在于引导临时政府度过了最初那些变化不定的日子——4月1日他召集残存的元老院开会，通过取得全国人民信任的紧急措施，其中有保障公民自由，保证军官、债券持有者和业主的权益；他设法使自己成为继续进行行政工作的5名成员之一，并提出了一个宪法草案；他使元老院投票表决，解除国民对拿破仑的效忠，并进而对提出的宪法投票表决。这样使国王的权力有了明确的限度。

此外，还明确规定逃亡者不能重新获得其土地，教会也不能重新获得其原有的地位。4月6日元老院召回法兰西的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即王位。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一个饕餮之徒，在流亡中一直躲在白金汉郡他的住宅里，患上了历史上最不合时宜的痛风病。

与此同时，拿破仑坐立不安地在枫丹白露皇家别墅等待着，不时想出对策，随即又把它抛弃。4月上旬，他同亚历山大反复谈判，希望在皇后摄政下保住儿子的王位。亚历山大决心用基督徒的容忍精神来说明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和他自己进入巴黎大不相同，提出要让拿破仑拥有自己的一个王国以减轻他的厄运。拿破仑的使节们由于大部分要求都遭到拒绝，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起劲地讨价还价。他们从沙皇那里获得了可以给予厄尔巴岛的许诺。如果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早一步到达巴黎，这项许诺就可能避免。退位条约已经拟就并且签了字。它体现了厄尔巴岛安排：拿破仑本人及其家族放弃法国的皇位，但他和皇后可保留其地位和称号；把帕尔马公爵领地交给皇后；每年由法国给拿破仑200万法郎，另拨津贴给予其家属和约瑟芬（她在几个星期后即去世）。尽管这些条件非常宽厚，但拿破仑面对着失败、退位和他的儿子未能保住王位，还是吞服了1812年起就一直挂在脖子上的一小包毒药。结果只是使他痛苦地折腾一宿。第二天，4月13日，他鼓足勇气批准了枫丹白露条约。一星期后，他在别墅前的庭院里向禁卫军讲了话，就在外国军官护送下动身前往南方。他有时穿一件俄国式的斗篷，有时戴着有白色花结的帽子，有时穿一身奥地利军服，以免遭到昔日臣民们的侮辱和攻击。他从来没有那种浪漫色彩的冲动，要身先士卒手持宝剑战死在疆场。沃尔特·司各脱爵士多年来一直把拿破仑看成是极恶元凶，结果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魔鬼。

拿破仑既已退伍，波旁王朝开始顺利复辟，盟国政治家从而能够同法国开始谈判和平条件。他们希望先确定条件，然后再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堆积如山的法国以外的问题。通过表面上看来是友好的协商，很快同塔列朗谈妥了条件并于5月30日签订了所谓的“第一个巴黎和约”。这个称得上著名的文件包括一个序言部分和33条正式条款以及一定数量的补充的、单独的和秘密的条款。它规定法国大致恢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疆界。但实际上作了大量的调整，包括失去两个很小的地区；给法国增加了10多个革命前“孤立的属地”（其中一个最大的飞地为阿维尼翁及其周围地区），以及边界线上6个单独的地区，其

中有两块比较大，一个跨越默兹河谷地，另一个就在日内瓦以南位于美丽的有湖有山的地区。（由于法国在1815年的所作所为，这些边境地区并未能保住。）根据条约，法国同意莱茵河自由通航，扩大荷兰领土，德意志各邦联合，瑞士独立和把意大利的属地让与奥地利以及英国保留马耳他岛。两个月内，各国派出全权代表前往维也纳参加欧洲和平全体会议。总的来说，条件还是夏蒂荣会议上提出的“特鲁瓦基本原则”中的那些条件，在这次会议上写进了国际法。根据秘密条款，法国同意服从盟国要在维也纳会议上对重新分配领土问题新作的决议。斯凯尔特河将实行自由通航，大部分原奥属尼德兰土地将由荷兰管辖，莱茵河左岸地区由荷兰、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几个邦分辖。这样一来，法国东部边界上就设计出了一大片缓冲地区。

通过这“第一个巴黎和约”，盟国在恢复平衡的国家体系这一艰难历程上走完了第一阶段。不过三个月时间，他们签订了约束自己的肖蒙条约，占领了拿破仑的首都，把他遣送到他的厄尔巴岛王国去，恢复了波旁王朝，为法国制定了没有赔款、占领和屈辱的和平条约。塔列朗自己就把这个和约说成是罕有的照顾。总而言之，这件事干得非常出色，美中不足的只是在厄尔巴问题上犯了大错。即使如此，它为退位铺平道路从而减少法国发生内战的危险方面也起了作用。

6月初，大多数主要的政治家和君主体会前往伦敦，作为英国政府的客人庆祝恢复和平。人们把他们当作英雄来欢迎，特别是沙皇亚历山大和陆军元帅冯·布吕歇尔。这位俄国领袖开始时大受欢迎，但由于没有警察保护有点神经紧张，以致举止失当，对他的欢迎也就很快冷淡下来。像他这样文质彬彬而又机敏的人竟然会举止失措，这确实是令人惊愕的，而且这也使他失去了英国政府对他的同情。他的轻率举止，只有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比他先期到达伦敦。由于她任性胡为，而且由于她干预夏洛特公主新近同奥伦治的威廉订婚的联姻计划而使大家感到震惊。那些显贵人物把大量时间花在欢宴上，以致有关同盟的事务成就很少，甚至根本不打算干。6月14日，四强曾经商定根据最近在巴黎达成的协议将比利时地区交由奥伦治家族临时管辖。他们重订肖蒙条约，将各国承担派遣军队的数量改为7.5万名，并决定他们必须把维也纳会议延期到9月，因为亚历山大坚持要先回俄国一趟。

这年夏天给人印象最深的成就是卡斯尔雷同亨德里克·法格尔谈判解决了英荷问题。他们一致同意，英国应保留战时夺得的圭亚那的一些地区；英国要为瓜德罗普岛偿付瑞典100万英镑，该岛于1813年原已答应归瑞典，但在“第一个巴黎和约”中又转归法国；英国要承担荷兰欠俄国债务的1/2（300万英镑）；英国要为开普殖民地偿付荷兰200万英镑，该殖民地在战时被英国占领，现仍在英国手中。荷兰同意把这最后一笔款项用于修建防御工事以对付法国。新成立的荷兰其边界的最后具体划法留待维也纳会议去确定。

人们对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外交姿态未免会感到大为惊讶。它的外交大臣在维也纳和会召开前几个月就已经把他认为对本国利益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在肖蒙巩固了联盟并且一直维持到战后时期；在法国恢复了波旁王朝；将安特卫普及附近的比利时地区置于友好的奥伦治王室管辖之下；作为英国的一部分胜利果实在海外取得了适当的领土补偿；最近同荷兰解决了财政问题，并在重建平衡的国家体系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毋庸置疑，卡斯尔雷在为和平会议进行准备时满怀信心，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

卡斯尔雷取得这样出色的成就是很幸运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困难重重。多年来，法国的军队把欧洲践踏得不成样子，在征服的神秘魅力背后是满目疮痍：被洗劫一空的农庄，遭受亵渎的教堂，以及散发着腐臭气息的医院。法国也自食其果，1814年，有将近75万的敌军进入了法国的国土，从而使它遭受同样的厄运。根据某些观察家的说法，在敌军面前，一股一股溃散的法军劫掠本国的农村，而且比入侵者还要厉害。在入侵者之中，西班牙军队最为凶残，因为他们对法国的残酷占领记忆犹新，但不久他们即被遣送回国了。剩下的普鲁士正规军在城市和庄园里大肆掠夺；而非正规军的哥萨克则挥舞长矛、跨着脏马，在农村中到处制造恐怖。此外，形形色色的士兵、逃兵和释放的战俘沿村乞讨，颠沛流离地往家乡走去。工商业停滞了，商船受到损失，又进一步增加了混乱。

同时欧洲有待其政治家们解决的问题也不计其数；需要恢复国家体制，决定各国的幅员、形式和疆界，为欧洲水道建立适当制度，创造条件，以利重建欧洲经济生活，为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制定一部有效的宪法，确立瑞士各州之间以及和欧洲其他各国的关系，彻底废除奴隶贩卖，处理教皇和苏丹这些特别问题，以及建立一种体系以保护

欧洲免受法国的经常威胁和新产生的俄国威胁。一个虽不是最重要但却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解决旷日持久争执不休的外交上的席次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积累起来的问题，9月各外交团云集一堂。作为奥地利弗兰茨一世客人前往维也纳的，有符腾堡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黑森的选帝侯威廉、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世袭大公乔治、巴伐利亚国王约瑟夫·马克西米连一世、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六世和歌德的朋友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普鲁士国王在他的白发苍苍的首相哈登贝格亲王陪同下，亲自莅临，其助手还有学识渊博的洪堡和一批专家，其中有著名统计学家霍夫曼。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在霍夫堡一套漂亮的房间里下榻，助手是维也纳会议中一批最具有国际性的顾问：俄国人拉祖莫夫斯基；他的日耳曼血统的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杰；从普鲁士逃亡出来的著名改革家施泰因；波兰的恰尔托雷斯基，波拿巴的仇敌科西嘉人波佐·迪·博尔戈。很明显，尽管有这些人与会，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沙皇打算由他亲自处理。

路易十八未敢前往维也纳。塔列朗任法国代表团团长。他在约翰内斯街的考尼茨宫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侄女德·佩里戈伯爵夫人作为女主人操持家务，不久就以精美的烹调而闻名。塔列朗有两名主要助手，一个是达尔贝格公爵，他是一位老练的职业官员，现在作为第二全权代表；另一个是拉贝纳尔迪埃伯爵，为人精明、勤恳，在夏蒂荣时曾任科兰古的助手。协助他们工作的还有一大批名流。随同卡斯尔雷前来的有三位驻欧洲的主要大使：一位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斯图尔特，为人乖僻而愚蠢，然而卡斯尔雷却十分喜欢他；另一位是亚历山大的朋友、驻圣彼得堡大使卡思卡特；再一位是克兰卡蒂，这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官员，在海牙任大使时工作很有成效，忠于外交大臣，是他的主要助手。卡斯尔雷还雇用本国大使馆里的人员，以防备当时欧洲效率最高的奥地利谍报系统。奥地利代表团团长是梅特涅，其助手为冯·韦森贝格，这又是一位勤谨的职业官员；协助梅特涅的还有一大批助理和专家，其中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一位很有趣的知识分子和政论家，他既是梅特涅的秘书，也是维也纳会议的非正式的秘书长。在其次的政治家中突出的人物有巴伐利亚的首席外交官符雷德；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孔萨尔维；以及汉诺威的能干而老练的代表蒙斯特。

维也纳会议还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盛大节日，是贵族和王族试图恢复他们记忆中的18世纪那种豪华场面而举行的庆祝会。因此，形形色色的亲王、贵族、旅游者、乞丐、间谍和小偷都被吸引到维也纳来。三教九流全都麋集到这个欧洲各国首都中最富有音乐色彩的都城；海顿和莫扎特不久前刚在这里逝世，而贝多芬则仍然健在。谨慎、保守而且颇为平庸的奥皇弗兰茨一世是个异常慷慨的主人，虽然奥国的国库由于这次活动而元气大伤。宫廷的庆祝委员会为众多的宾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舞会、滑雪、溜冰、打猎、狂欢会、赛马、音乐会，以及多次盛大的宴会。在这些社交活动中，虽然也迫不得已做了不少工作，但结果会议却落下了一个不干正事、不负责任的名声。

卡斯尔雷于9月13日到达维也纳，几天之内其他各国的主要使节也相继到达。到了22日，四位主要代言人在其预备会议中便悄悄地决定：“各项事务实际上必须由几个首要大国来处理。”^[2]他们不仅想大权独揽，在做法上又不想触犯与会的其他各国代表，而且还想避免召开全会解决。这种狭隘的意图，由于塔列朗以及其他代表们机敏而又引人注目的反对稍稍开放了一些，组成了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大会机构。四大国（后为五大国）把持着领土问题不放手，而且一直是会议的神经中枢。由于第一个巴黎和约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因此条约的签字国（四大国外再加上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法国）组成了一个八国委员会。八国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对会议事项均有正式记录。10月末，八国委员会成立了全权证书委员会接受各国代表的证书。维也纳会议的正式机构也经过审慎研究，成立了瑞士问题、意大利问题、河流、席次、奴隶贸易和统计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德意志宪法委员会，但一直不是会议的正式机构的一个部分。全体会议一直避不举行；根茨的挖苦话说得对，他说，在签署最后文件之前维也纳会议一直没有举行过正式会议。

俄国人对他们的具体目标一直保密。当他们把在8月份拟订的、以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赔偿为主导的计划开始透露出来时，外交上的激烈争吵就开始了。这个计划反对德意志统一；主张把华沙公国的大部分给予俄国；把波森、库姆和萨克森给予普鲁士；把南德意志部分地区、意大利北部、伊利里亚几个省和达尔马提亚给予奥地利。会议中争执得最厉害、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波兰和萨克森的问题，而上面提出的这些条件却是问题的中心。尽管这两个地方并不毗

连，但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主要是因为沙皇坚持俄国的基本公式——波兰应归于俄国，萨克森则应归于普鲁士。由于俄国占领着这两个地方，因此，沙皇只要稍露声色，人们就会大惊失色。他的公式着重于俄国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会议的早期活动主要涉及公式中波兰部分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背景是复杂的。由于波兰三次被瓜分的结果，俄国人从1795年以后就一直在原来的天主教波兰的边界上跃跃欲试。天主教波兰是1793年和1795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所获得的利益的主要部分。随后拿破仑乘1805—1806年的胜利之威占领了这个地区，建立了新的华沙公国，作为他在东欧的卫星前哨。这一地区对于波兰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从地理上讲它位于波兰的文化中心。哥白尼曾在这里生活过，克拉科夫和华沙也在这里，这里有大教堂和最好的土地，波兰的历代国王都在克拉科夫加冕，也埋葬在那里。虽然这个公国的领土对于俄国人显然具有吸引力，但这块地方对于俄国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又向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地区前进了一步。不仅如此，俄国人占领了这个地区，奥、普两国由此就失去其原有的波兰土地，则又意味着这两国势必要在别处谋求适当的补偿。

亚历山大其人无疑是当时最令人费解、难以捉摸和有趣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最初被培养成为一个法国派的无神论者，以后又改变笃信基督教。他是一位敏感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对自己不得不做出的严峻决定不满，而且往往又无法对付。他是一个伦理主义者，由于他意识到自己默许谋杀他的父亲而受到良心上的折磨。他在冷酷无情的势力均衡手段和理想主义的遐想之间摇摆：前者要求他在适当程度上维持总的平衡；后者则难以让人相信，如他说自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使波兰人幸福。波兰人应该在与俄国有联系的、独立的波兰王国中享有某种民族生存权。

对梅特涅来说，与这种类型的人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那些模糊不清、出于感情冲动的政策应该受到诅咒。这位奥国首相把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看作那个时代对许多民族的松散结构的哈布斯堡王室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个主张彻底保持均势的政治家，愿意按照这种体制下的严格而机械的规定和惯例行事，他支持卡斯尔雷的总的想法：将原属荷兰的土地并入荷兰使之扩大，奥地利同时放弃其对莱茵河的传统防卫，而由普鲁士填补真空；德意志各邦在保守的奥地利

管辖下进行联合。他谋求重建奥地利的权力，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蒂罗尔和意大利各地区，并且阻止占优势的俄国新威胁向西扩张。为了抑制俄国的威胁，他希望普鲁士和奥地利能重新得到他们的波兰土地。然而，当梅特涅面对着俄国的图谋，他明白了，如把华沙公国的土地割让予俄国，俄国的边界就会推进到离维也纳不到175英里的地方。如果同时将萨克森并入普鲁士，那么普鲁士现有的250英里奥、普两国共有的边界就要增加200英里。俄、普集团本来已经使奥地利不安，在这种新的情势下，就肯定会对它构成威胁。因此，梅特涅打算把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简化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则，只能在俄国公式的一半上冒险，而不能同时在两半上冒险：如果俄国得到这个公国，普鲁士就不能占有萨克森；反之，如果普鲁士得到萨克森，俄国就不能占有该公国。

秋天里有一段时期，本来有可能采取后一个方案，阻止俄国攫取该公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卡斯尔雷如何处理。第一个巴黎和约使他不再寻求英国的特定的目的。现在，他寻求的是一种公正的平衡，其办法就是沿着法国东部边界建立屏障系统；充分加强中欧，使它能抵抗将来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侵犯；此外，对战胜拿破仑的各大国给予适当的报偿。他在1814年10月25日给威灵顿的一封著名信件^[3]中这样概括地提出了他的论据：

只有两种方案可供考虑：两个德意志大国在英国支持下结成联盟，从而使德意志各小邦联合起来，与荷兰一道在俄、法之间构成一个中间体系；或者，奥地利、法国和南方诸国结成联盟以对抗由俄、普两国结成紧密联盟的北方大国。

卡斯尔雷非常赞同第一种方案，虽然这个方案由于这两个德意志大国暗中抗衡显然有些削弱，而这个方案却有赖于两大国的合作。他认为，俄国占有波兰就是“企图恢复我们大家曾协力摧毁的那种体制，即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使另外两个强有力的国家处于某种依附和屈从的地位”。^[4]虽然他支持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这种想法，但又认为未必能够实现。因此，他真的希望重新瓜分该公国，使普鲁士和奥地利重新获得它们原有的土地，而俄国的边界则仍然相去甚远。为了促成这一总的反俄立场，如有必要，他准备牺牲萨克森，以服从于遏制俄国这个更大的需要。

从9月中旬最早的一次会晤来看，卡斯尔雷显然会反对沙皇夺取公国的计划。他们的论点在10月和11月相互交换的信件和备忘录中都已详细地加以阐述；英国外交大臣企图让亚历山大恪守1813年赖兴巴赫条约中重新瓜分华沙公国的协议。但是沙皇争辩说，一则该条约已不再具有约束力，二则俄国方案可以保持均势。由于亚历山大亲自出马，仿佛自任为首相，因此卡斯尔雷处境尴尬就像是一个平民同皇室对阵一样。他并非不熟悉此道，因为就在前一个冬天里，他在总部曾经同沙皇坦率地充分地交换过意见，他们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会谈不过是维也纳会议日常例行公事的补充而已。虽然在处置公国的问题上，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反对亚历山大，但是俄国占有公国这一铁的事实使他们的反对没有什么分量了。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哈登贝格就大有举足轻重之势，或此或彼，都具有决定意义。他来到维也纳时，已经同意卡斯尔雷关于建立一系列壁垒以遏制法国未来侵略的方案，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要让普鲁士在莱茵河立定脚跟，他要求建立一个在奥、普双重领导下的德意志联盟，波兰的部分地区归还奥地利与普鲁士；俄国获得公国的土地；德意志的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归普鲁士，再加上萨克森的全部。他自然赞成扩大普鲁士，因为普鲁士在拿破仑时代受到了最大的屈辱。但是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非要这些地区不可。恢复的意思既可能是要恢复它原来的领地，也可能主要看有多少领地不能还给，那么它也可以接受别的领土。哈登贝格居然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到问题的重点所在，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正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是在波兰领土上实现恢复，普鲁士的目光就会落到异国土地上，它的政策就会使它易于同俄国发生冲突；如果恢复和补偿基本上是在德意志境内，那么它的将来就会与它自己的文化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政策就会使它同奥地利发生冲突。

哈登贝格和梅特涅事先都曾考虑过，如果普鲁士能协助挫败俄国对波兰的图谋，梅特涅就有支持将萨克森割让予普鲁士的可能。这种可能性符合奥地利的原则，当哈登贝格10月间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密信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在维也纳便有了实质性内容。信中答应以反对沙皇作为决定把萨克森割让给普鲁士的条件。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对这个诺言虽然深表怀疑，但还是决定接受它，梅特涅于10月22日写信给哈登贝格表明了这一点。在这封信中——据根茨说这封信使梅特涅“在三个月中所受的苦恼比他一生中所受的苦恼还要多”[\[5\]](#)——他表示奥

地利支持将萨克森交给普鲁士，只要普鲁士能够成功地反对俄国有关波兰的计划。

对于卡斯尔雷来说，这是向实现他所希望的建立一个以奥地利和普鲁士合作为基础的坚强中心的计划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必须尽快着手，因为亚历山大即将动身去匈牙利，因此三个“密谋者”遂于10月24日会晤讨论他们的立场，并起草了一个联合备忘录，提出以维斯杜拉河为俄国的边界。沙皇面对着三国的联合反对，大发雷霆，并且在哈登贝格和梅特涅的两国君主面前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他的愤怒并未使弗兰茨动摇，但是使意志消沉而顺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放弃了这种联合行动。三国的联合行动实际消失了，虽然哈登贝格直到11月5日才接到其君主让他退出联合的具体命令。卡斯尔雷让他们乘他不在时把联合反对沙皇的事情泄露了，这是一个大错误。沙皇取得了胜利。在随后几个星期里，卡斯尔雷和梅特涅仍然集中精力研究俄国公式中的关于波兰的部分。但是，由于没有更多的理由指望沙皇会作出适当的让步，他们被迫转向公式的另一个部分，即阻止将萨克森割让予普鲁士，尽管他们在10月间即已有条件地向哈登贝格作出过许诺。大家的兴趣就随之从波兰转移到萨克森问题上。

大家认为，目前引起激烈争论的萨克森地区问题，应由会议处理，因为萨克森支持过拿破仑，而且它的统治者迟迟不肯转向联盟。这简直没有什么道理。那么多的君主在那么多的场合都曾经以支持拿破仑为得计，因此，用塔列朗的一句名言来说，那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争议中的领土大体上是个长方形，朝西向莱茵河方向有一个不规则的突出部分；它横亘于勃兰登堡与波希米亚之间，被易北河一分两段，几乎整个北部与东部边界都与普鲁士接壤。萨克森比较富饶，北部宜于种麦，有牧草丰美的牧场，南部有古老的矿山和风景秀丽的群山。所有城市中德累斯顿远在南方，即使萨克森被瓜分，普鲁士也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莱比锡位于萨克森中西部，比较容易受到攻击。

兴趣的转移，由于梅特涅于1814年12月10日正式致函哈登贝格，拒绝把萨克森给予普鲁士而引人注目了。结果引起了疯狂的互相指责，致使卡斯尔雷再三向政府提出有爆发战争危险的警告。英国要同它的新近盟友发生冲突，看来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直到圣诞节之后很久这种骇人听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由于哈登贝格和梅特涅得到了卡斯尔雷同意对萨克森问题进行干预，会议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这是最无所作为和令人沮丧的时刻，而且使卡斯尔雷卷入了英国内阁曾明确指示他要避免的，可能使本国陷入战争的一些事件之中。他本人原是内阁中最关心欧洲的成员，比其他同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欧洲大陆建立有效的领土均势具有何种价值，因而在谈判的紧急关头，他就准备对于这种官方指示置之不理。这年秋季，令人烦恼的难题之一是谈判者对讨论中问题的统计数字方面固执地各持己见。卡斯尔雷建议另行成立一个统计委员会，以便在普鲁士杰出的统计学家霍夫曼的协助下，对那些地区及其居住的“人”数制定出一套同意的一套数字来。该委员会从12月24日到1月19日开了六次会，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助益。

对于塔列朗来说，时机终于来到了。他于9月间作为战败国代表团团长来到维也纳。他由于签署了第一个巴黎和约的秘密条款，所以理所当然地不得参与内部决定；而且实际上由于各主要大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被排斥在外。他拥护“神圣的正统原则”^[6]并大肆渲染。这一原则经常而又错误地被说成是这次和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题。塔列朗本人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在所有与会的政治家当中，他接受的指示是最为明确的，就是详尽的“国王训令”。这一训令的内容是由他自己设想的，也许是由拉贝纳尔迪埃草拟的。他在训令中认为正统性是稳定国家体制中各个实体的最佳手段。但他发现，建立一种健全的均势很可能是整个欧洲的指导思想。他依据国王训令，同意瑞士永久中立，他设法限制普鲁士在德意志的西部所取得的利益，抑制它在新联盟中的势力（至于联盟本身也不应强大），阻止它重新获得提尔西特和约前所具有的力量。他要限制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渗透，通过恢复波兰独立或使之恢复到最后一次瓜分时的状况来遏制俄国的扩张。这显然是法国奉行均势的传统立场，其目的是要把对联盟各成员国的补偿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同样是明显的。

塔列朗在维也纳显露出非凡的手腕。他反对把法国永久排除在和会的核心会议之外，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跻身于这个核心会议方面。他提出让中小国家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代表来掌握领导权，就把几个为首的大国的政治家弄得心神不安。他极力主张限制对普鲁士的补偿，反对把萨克森给予普鲁士，以致到了10月便把当时正热衷于他们的联合事业的卡斯尔雷、哈登贝格和梅特涅惹恼了。卡斯尔雷认为塔列朗应该首先协力遏制俄国；塔列朗由于预见到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

波兰问题上要失败而常受到称赞。如果他在10月间同他们一起反对沙皇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失败。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但在秋天里不论人们对他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到了冬季他的声望已明显地提高了。

12月初，卡斯尔雷把可能发生战争这一特别糟糕的消息写信告诉利物浦伯爵时，他曾建议英国最好与法国一道共同进行干预或用武力进行斡旋。12日，塔列朗送交梅特涅一份书面建议提出缔结同盟；由于得到了后者的鼓励，一星期后他又重复提出。此后不久，成立统计委员会一事无意中成了塔列朗能够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会议的突破口。当他初次参加会议而不受欢迎时，他威胁说法国代表团要退出维也纳会议，从而成功地顶住了他们的排斥。他不仅登堂，而且还要入室，要打进四强的核心中去。现在这一时机也已经唾手可得了。

卡斯尔雷虽然意识到塔列朗同梅特涅之间已经和解，但直到圣诞节为止，他都不敢向他们明确表示对联盟感兴趣。但是由于四大国在如何处置萨克森的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他的态度终于和缓下来，表示准备建立条约的关系，并极力主张让塔列朗参加外长核心组。四大国于12月29日开会，卡斯尔雷和梅特涅要求让塔列朗参加高级外长会议。于是四大国扩大为五大国。他们的要求引起了哈登贝格和涅谢尔罗杰的激烈反对，因为在萨克森问题上，他们当然要设法避免三票对他们的两票这种局面。普鲁士的首相一向为人谨慎，平日由于耳聋，对于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可以充耳不闻，然而这一次不仅听见了这个提议，而且激动得在12月31日的会议上声称：不把萨克森割让予普鲁士就等于战争。卡斯尔雷的内心深处也不能保持平静，他极力要求最好放弃召开维也纳会议。旧的一年在愤怒、怨恨和失败的气氛中过去，昔日的盟友这时都面临着战争的黑暗深渊。

新年元旦那一天，卡斯尔雷担心普鲁士会突然采取战争行动，便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向梅特涅和塔列朗提出了结盟草案。他们很快即讨论就绪，于1815年1月3日签署了“三国同盟”，保证互相支援以反对他人进犯，规定法、奥两国提供15万军队，英国也提供同等数量的军队；并规定邀请巴伐利亚、汉诺威和荷兰一道行动，后来它们都这样做了。同一天，涅谢尔罗杰和哈登贝格企图在法国进入五强行列之前在萨克森问题上求得妥协。当哈登贝格看不到有任何进展时，他便通知卡斯尔雷说，他要亲自提出让法国全权代表进入五强。于是，这些政治家便在萨克森问题上艰难地度过了冬季危机的最危险的阶

段。维也纳会议最困难的阶段即告结束。塔列朗兴高采烈地向路易十八报告说：“陛下，联盟现已瓦解，而且永远不复存在。法国在欧洲不再是孤立的了，而且……法国与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以及三个二等国家协调一致了。”^[7]

现在已经很清楚，妥协是可以达到的，尽管取得妥协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哈登贝格虽曾经表示调解是可能的，但是为了讨价还价，他依然声称要得到整个萨克森。梅特涅一想到可以遏制普鲁士这一诱人的前景便感到振奋，于是就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不同意将萨克森的任何一部分给予普鲁士。于是只好由穷于应付、孜孜工作的卡斯尔雷把他们引导到一个适当的折中方案上来。1月3日梅特涅把奥地利针对俄国12月30日的正式建议而提出的反建议送交“四国君主会议”审议时，波兰西部的新边界实际上已在这一天得到解决。这件事大大帮助了卡斯尔雷。奥国的反建议揭示出奥地利在萨克森问题上与俄国的分歧仍然很大，但在波兰西部的边界问题上，意见则完全一致。它们的一致意见，实际上决定了这个边界线，并于6月写入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中去。这就削弱了哈登贝格在萨克森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地位，因为俄国人已经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现在就不大愿意为了盟友普鲁士的利益而去承担战争的风险了。卡斯尔雷就利用这一点，争取沙皇支持在萨克森问题上的妥协，从而1月份其余的时间便可用来和缓梅特涅与哈登贝格之间的僵持局面。

卡斯尔雷和塔列朗站在中间立场上，首先劝梅特涅降低并限制奥地利的要求。卡斯尔雷发现弗兰茨一世好战成性，但在蒙斯特的协助下，取得了满意的进展。作为答复，梅特涅于1月28日正式向五国提出，把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不包括莱比锡在内）让予普鲁士。接着，卡斯尔雷开始同普鲁士协商，特别是关于莱比锡问题。同哈登贝格磋商失败后，他就去找这位首相的顶头上司弗里德里希·威廉，但这次会谈极其艰难，他便转而求助于沙皇，后者同意将控制着维斯杜拉河中段的托恩及其周围地区让予普鲁士。普鲁士在莱比锡问题上一经让步，他就逼着他们减少对萨克森剩余部分的要求，劝汉诺威将德意志中部的一点地方给予普鲁士，以利谈判。接着，他主动提出再加上新荷兰的一部分，哈登贝格再次试图获得莱比锡失败之后，最后于2月6日同意接受不包括莱比锡在内、稍稍多于一半的萨克森土地和稍稍少于一半的萨克森“人口”。梅特涅马上表示同意，长久以来以萨克

森人的护卫者自居的塔列朗也表示同意。萨克森危机过去了，剩下的棘手问题就是把瓜分的细节向这块不幸国土的国王呈报了。这项任务3月间由梅特涅、塔列朗和威灵顿去完成。

普鲁士获得的全部土地还包括其他两个主要地区：在西部的一块土地和在波兰的一块土地。普鲁士势力在莱茵河卷土重来有着重大的意义，这表示普鲁士已脱颖而出，具有明显可见的威力，其意义非同寻常。在波兰据有的那部分土地虽然只占这个公国的1/6，比普鲁士原来在那里所拥有的地盘小得多，但也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比它在萨克森所得到的地方还大，包括一段很有用的维斯杜拉河，以及瓦尔塔的一半以上。加上亚历山大原来同意把波兰的一部分归还奥地利，这就使去年秋天俄国提出的毫无妥协余地的要求缩减了很多。卡斯尔雷在波兰问题上明显遭到惨败之后确实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萨克森问题的解决，使与之有关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作出决定。巴伐利亚在恢复1805年和1809年失去的某些地区问题上，长期与奥地利意见分歧，最后它也终于让步，并得到维尔茨堡和巴拉丁的部分领地作为补偿。巴伐利亚和普鲁士都为之垂涎的美因茨成了黑森大公国管辖下结成同盟的要塞。前汉诺威选帝侯的领地原是英国在欧洲的前哨，后来成了拿破仑的牺牲品，这时成了一个王国，扩大了边界，特别在西部荷兰边界与奥尔登堡公国之间。汉诺威在易北河和威悉河已有一些强大的据点，获得了上述的这些土地后，它又控制了埃姆斯河下游。英国由于是荷兰的保护国，又由于在汉诺威的地位得到恢复和保留了赫尔戈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居于控制法国与丹麦之间所有河流的优越地位。

关于建立新德意志邦联达成协议的问题，实际上进展特别缓慢，而且困难重重。1814年春天一再取得的协议均表示，建立邦联是各大国可以接受的。这一想法遭到一些爱国者的反对，其中有施泰因。他们谋求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但是维也纳会议召开后，他们的美梦也就消失。各大国在维也纳最初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让德意志人自己起草一部新的德意志宪法。在1814年10月和11月的两次会议中，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自行组成的德意志委员会讨论了各种宪法草案，但不久就像四大国在萨克森问题上的情况一样，陷于僵局。它们各执己见，以致会议中断了五个月。1815年春天复会后，奥地利提出一项草案，首先在取得妥协方面有了进展，最后终于

在6月初达成了协议，虽然是在大部分细节上，但并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由34个邦的君主和四个自由城市组成的新德意志邦联将成立一个议会，由奥地利人担任议长，各成员邦都派代表参加，但在投票表决方面有差别。宪法中规定，各邦君主在战争时不得单独谈判，也不得缔结危及邦联整体利益的联盟。在邦联组织方面没有安排，没有共同的货币或行之有效的行政长官，也没有保证民众自由的条款。虽然由此建立的只是一个脆弱的联盟，但它毕竟给德意志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带来了一点秩序，而且由于把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拉进了同一个结构中来，从而使卡斯尔雷的关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心的梦想得以部分实现。

在前一年夏天大体上已经确定、不久前又作了调整的荷兰边界线，现在已审慎地划定。除了比利时人居住的几个省份外，这个荷兰新王国又增加了列日和林堡公国。国王还得到了卢森堡公国，不过它仍然不在荷兰管辖之内，而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一员，并且就在卢森堡城内驻有普鲁士的卫戍部队。

维也纳会议在普鲁士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问题上又陷入了另一个僵局。这是因为贝纳多特未能执行前一年基尔条约中的财政条款而引起的。根据该条约，他必须因丹麦把挪威割让予瑞典而赔偿丹麦所受到的损失。英国在1815年春天为了瓜德罗普岛（已归还法国）付款给瑞典，从而打开了僵局，推动了有关三方转让地盘；普鲁士遂将劳恩堡让予丹麦，丹麦将挪威给予瑞典，而瑞典则把它的那一部分波美拉尼亚让给普鲁士。这些变更使挪威人十分反感，但对瑞典却特别重要。确实，对于瑞典来说，它在欧洲大陆上的帝国的最后余迹于1814—1815年不复存在，以后它也就不必卷入欧洲事务中去，不再参与欧洲的战争和联盟了。

意大利问题的解决主要决定于梅特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僵持了数月，一直到1815年5月才得到解决。复杂的中心问题是1814年1月奥地利同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基姆·缪拉之间订立的联盟。缪拉是拿破仑最小的妹妹的丈夫，为人粗鲁但是一位很出色的骑兵指挥官。缪拉以他倒向联盟为条件换取奥地利对其王位的支持。缪拉1814年的这一大胆的策略很是成功。但是，梅特涅承担这一义务后，发现自己同塔列朗发生了纠葛，因为塔列朗要把缪拉赶走并且恢复合法的西班牙波旁君主。梅特涅只好采取回避与拖延的方法。即使在维也纳会议上

形势迫使英国、法国和奥国团结一致，而且法、奥两国之间又特别需要意见一致之际，梅特涅仍极力作进一步的拖延。问题一直到激动人心的“百日帝位”期间才由缪拉自己解决。他想进一步投机，摇身一变又投靠拿破仑，并企图号召意大利起来反对奥地利。我们现在才了解到，他显然别无选择，因为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已经秘密商定要赶他下台。总之，他很快便失败，逃往法国，后来回到意大利南部，在那里被逮捕枪决。“百日帝位”大大地加速了意大利问题的解决，缪拉同奥地利的复杂关系变成了单纯的敌对关系，也缓和了法国对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政策的对立情绪，从而证明了梅特涅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的拖延手段是那么成功。

意大利僵局突然迎刃而解。那不勒斯归属波旁王朝，遗留地区的边界很快就标定了，半岛上八个单位建立了国家体制，其中四个是在哈布斯堡统辖之下。奥皇直接统治新的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他的兄弟回到托斯卡纳大公国，他的女儿获得帕尔马公国，他的孙子则获得摩德纳公国。教皇的权势在意大利中部重新确立。西北部的撒丁王国得到加强，还收复了撒丁岛、皮埃蒙特、萨伏依和尼斯，再加上利古里亚（热那亚）。卢卡归属于帕尔马波旁王室（参见第十五章，原书第429、438页）。

瑞士的边界、宪法和对外关系这些复杂问题，到3月间大体上已由专设的特别委员会解决。解决方案规定22个州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边界加以调整。各大国许诺保证瑞士的中立，这是由瑞士首先提出，11月间正式实施的一项正确而有政治远见的建议。

达成的各项协议，通常都是分别签订的；而且理解为这些协定以后将合并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条约。最后共有121个条款，再加上许多附件和议定书，作为“最后文件”由与会的各大小国家的全权代表于1815年6月9日签署。签署仪式在宏伟的申布龙宫举行，这所宫殿当时坐落在维也纳城外。条约除对领土问题作出安排外，还包括许多别的项目，其中有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称号、一国对另一国的赔款、在规定的公路上征收（或减免）通行税，已经改变了归属关系的地区牲畜贩子和牧羊人的特权，在流经各国的河流上的航行权，以及对欧洲经济很重要的靠河川谋生的人所走纤路的维修。条约还包括一项解决外交席次这么一个棘手的老问题的办法，即今后席次首先要由等级确定（一等：大使、教皇所派特使和使节；二等：特使、公使；三等：代

办），然后考虑任职时间的长短。按照这种简单的安排，欧洲的外交家们得以体面地避免了那些荒谬而又使人难堪的困境。

在企图对奴隶贸易采取国际行动方面却并不是那么成功。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在西非和新大陆之间从事奴隶买卖而发财致富的英国，近来却禁止这种买卖，并打算彻底查禁这种贸易。就像当年禁运鸦片一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鸦片贸易的开展主要是由英国带头的），奴隶买卖也只有通过国际协定才能有效地禁止。卡斯尔雷由于未能将这一问题作为明确的条文写进第一个巴黎和约，他的党受到了威尔伯福斯和强大的反奴隶制运动的攻击，因而，这位外交大臣在维也纳就更加热衷于签订一项实质性协议。他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政治压力，倒不如说是由于受到自己情感的驱使。许多一、二流国家虽然同意作出实际规定，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不同意。由于拉丁语系诸国代表纠缠不休，卡斯尔雷设法使各大国发表二月宣言，宣布奴隶贸易“和人类的及一般的道德原则相违背”，他们一致同意“愿意结束长期以来使非洲荒芜，使欧洲堕落和使人类遭受痛苦的这一灾难”。葡萄牙同意在赤道以北废除奴隶贸易，但卡斯尔雷未取得更多进展。尽管成绩不大，但也为战后达成协议迈出了第一步。说也奇怪，不久“百日帝制”却在这个问题上助了英国一臂之力，因为拿破仑宣布法国人进行这种贸易为非法，而路易十八也只得重申他的决定。

正当维也纳会议缓慢而艰难地走向结束时，一些具有重大后果的事件引起了欧洲人的密切关注。1815年3月6日至7日夜间，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这时，他已经在昂蒂布登陆，开始他那富有魅力的归来，从格勒诺布尔起沿途的法国军队再一次集合到他的旗帜之下。他离开厄尔巴岛不到两星期，就住进了杜伊勒里宫，迅速组织成一个新政府。路易十八灰溜溜地逃到了根特。

在维也纳，人们几乎自发地一致认为，拿破仑重返法国是与欧洲的和平不相容的。因此，3月13日，第一个巴黎和约的八个签字国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因为他已置身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之外，并且……成为公众仇恨的对象”。为防止法国重开战端，迅速作了如下部署：威灵顿统率的英国和汉诺威的部队守卫莱茵河下游，普鲁士军队作为那里的预备队并守卫莱茵河中段，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开往南方。

由于又一次面对着法国的威胁，在维也纳的政治家们很快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同盟伙伴关系。3月25日，他们通过了一个有九项条款的文件，表明他们回到了肖蒙原则。在这一文件中，他们重申第一个巴黎和约，一致同意四大国各提供一支15万人的军队，各国不得单独媾和，等到战争危机过去后肖蒙条约继续有效。英国还另外同意提供500万英镑的津贴。许多小国都团结在联盟的周围，不久汉诺威、巴伐利亚、撒丁、葡萄牙、荷兰、巴登、萨克森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包括进来。于是重新组成了联盟，并开始工作，其速度与效率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际上，这样高的效率是因为具备了理想的条件：政治家和将领们都聚集在维也纳，军队就在近旁，津贴很快有了着落。波拿巴重返法国戏剧性地构成了一种共同的威胁。

拿破仑眼见其宿敌紧密团结，就企图破坏这一新的联盟，特别是他派人把他在杜伊勒里宫找到的1815年1月3日秘密条约的法文副本送交亚历山大。这一次计谋失败后，他就利用自己东山再起所造成的紧急危机。他在外交上几乎是孤立的，只有那不勒斯的缪拉支持他的事业。此外，路易十八只做过几件得人心的事，而其中之一就是取消征兵，于是留给拿破仑的军队大概不过20万。但是他从前的许多军官回来了，这位皇帝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迅速地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同时，为了迎合法国目前比较强烈的自由主义情绪，答应颁布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然后准备进攻反法联盟。他希望不给敌人以聚集的时间就将它们各个击破。他首先进入荷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随后却又莫名其妙地浪费掉了。威灵顿因普鲁士保证在左翼给予支持，就选择在圣让山进行抵抗；拿破仑的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一战中差点儿打垮了威灵顿的军队，但后者在普鲁士军队的支援下，最后终于打得拿破仑溃不成军。普鲁士军队因路途泥泞来得晚了，几乎贻误大事。成千上万的法国、普鲁士、汉诺威、荷兰、英国军队的伤亡，都是沙皇慷慨地把厄尔巴岛奉送给拿破仑铸成的大错所产生的直接后果。

巴黎新产生的元老院和立法院无所顾忌地不断举行会议。拿破仑逃离战场之后，开始考虑要建立一种严格的独裁制度并无情地清洗敌人。但他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不得不逊位让他的儿子继位。他意识到，他的儿子将不可能真正有机会登上皇位的。路易十八这时不患痛风病了，他在威灵顿的敦促下，于6月25日重新踏上法国的土地。四天

以后，第一批普鲁士军队便在巴黎城郊出现，布吕歇尔已决定向该城提出两种方式听凭选择：一是无条件投降，一是受到攻击。但是他经过威灵顿的劝说后，态度有所缓和。威灵顿是一向坚决主张对法国提出宽厚的条件的。在警方的富歇和军方的达武共同努力下，巴黎很快就投降了。两人配合威灵顿在恢复波旁王朝一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联盟各国于7月7日又第二次凯旋进入巴黎，次日，路易十八又回到了杜伊勒里宫。

6月底，拿破仑在马尔梅松险些被普鲁士人抓获。布吕歇尔本来会高兴地把他枪决，但是联盟军有10天工夫没有找到他。在此期间，他到了西海岸港口罗什福尔，打算从那里搭一条法国船逃往美国。但由于西风劲吹，加上英国的封锁而无法成行，只得向“贝雷勒芬”号的梅特兰舰长投降。他在给摄政王的信中说，他“就像特弥斯托克利斯^[8]一样，只能寄希望于英国人民的热情好客”。^[9]他被押送到普利茅斯港，因为好奇的群众挤满港口，使他被阻于船上，但不久即被押送到他的目的地圣赫勒拿岛。

由于许多政治家都把“百日帝位”看作第一个巴黎和约对法国采取的温和政策遭到失败的佐证，因而企图通过瓜分从而削弱法国的这一昔日的要求又油然而生。作出某些改变显然是必要的。7月中，各盟国成立了四国委员会，夏秋两季一再举行会议，制定对法国的新条款。虽然四大国对削弱法国力量这一目标意见一致，但在夏季的历次会议上，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则产生分歧。在普鲁士将军们的压力之下的哈登贝格代表着一个极端，坚持要把沃邦建筑的三个历史性的连锁要塞分别交给瑞士、德意志各邦和荷兰，并且割让整个萨伏依和阿尔萨斯-洛林，以此来削弱法国力量。卡斯尔雷坚持温和路线。他一直希望而且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失败和路易十八的复位。现在，尽管英国内阁中有不同意见，他仍设法避免出现报复性的和平。虽然利物浦伯爵并不热衷于采取严厉的做法，却也坚持要他对战犯予以制裁。“目前表现出的忍让做法只能被看作软弱而绝不是什么仁慈……只有对策划波拿巴复辟的阴谋家们从严惩处以儆效尤，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10]卡斯尔雷不赞成这样做，只是装模作样地执行给他的指示，希望那些战犯会谨慎地自己躲开去。他也不赞成瓜分法国，因为那样就会使新政府丢脸而遭到削弱，从而使这个国家在欧洲的平衡中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单位。但他同意采取某些临时措施来遏制法国的

势力，希望积极依靠原则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他的这些方针得到了威灵顿坚决而宝贵的支持。

梅特涅的立场似乎接近卡斯尔雷，而不是哈登贝格。他认为盟国应坚持占领、赔款和割让有限的领土，使法国从一个进攻性的国家成为一个稳定的、防守性国家。他尤其认为法国的第一线要塞必须予以摧毁或交给邻国。亚历山大这次回到巴黎后态度极为宽厚，这使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大为宽慰。只要不直接牵涉到俄国的利益，这位沙皇总是赞成他们的温和政策，而不支持他的普鲁士盟国的严厉计划。他强调联盟应团结一致，希望重申肖蒙的原则。他从1812年以来日益信仰基督教，1815年春天还经历了一次非常强烈的心灵感受，这使那一年俄国的政策受到极大影响。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温和态度无疑也是多半由于这个原因。

由于亚历山大、卡斯尔雷和威灵顿意见一致，梅特涅的看法亦相去不远，温和政策明显地占了优势。哈登贝格在取得内阁支持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最后只得派他的异母兄弟去伦敦要求得到必要的支持。哈登贝格于8月28日表示他将缓和自己的立场，亚历山大也急于使普鲁士避免受到屈辱性的挫折，表示他赞成法国割让一点领土。到9月初，四国委员会基本上达成了协议。他们于9月20日提交给法国的条款遭到即将由人接替的塔列朗的拒绝，使他们感到十分为难，但不久塔列朗的继任者黎塞留公爵接受了稍加修改的文件。

经过几个星期的最后定稿，各国最后终于在1815年11月20日签署了构成“第二个巴黎和约”的几个文件，其中保证瑞士的中立和建立新的四国同盟。法国接受了稍加修改的1790年的疆界，但未能保持“第一个巴黎和约”中慷慨得多的边界线。最重要的改变是把萨尔交给了普鲁士，虽然当时人们并不充分理解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和约还规定拆毁于南冈要塞，由一支不超过15万人的军队占领法国3—5年，以及法国赔款7亿法郎。早些时候，还要求法国交出它在欧洲其他地方掠夺来的大部分艺术珍品。

在新的四国同盟中，各盟国一致同意维持第二个巴黎和约，防止拿破仑东山再起，坚决支持占领部队，每个签字国同意额外提供6万名士兵，如有必要，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兵力。按照肖蒙精神，第6条规定各国君主或大臣定期举行会议，“以保证顺利实施本条约”，考虑

“对于各国的繁荣与安定以及维护欧洲和平最有利的措施”。第6条对战后年代通过会议从事外交活动确立了法律基础，这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有趣实验。这是一种尝试，特别是卡斯尔雷的尝试，为的是把各大国在联盟方面的某些经验运用到战后世界事务之中，这也明确地标志着大国的支配地位和“欧洲一致”的原则。^[11]

沙皇的神圣同盟条约是支持和平解决的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办法。他希望其他国家的君主会共同签署，从而他们之间可以结成“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决心重在外交事务中遵行“神圣宗教的戒律，即正义、基督的仁慈与和平的戒律。这些戒律绝不只是适用于私人事务，对于各国君主的会议也必然具有直接的影响”。尽管沙皇把神圣同盟的缘起归于2月份同卡斯尔雷的一次谈话，但其实他之所以产生这么一种想法，主要是由于他以往对《新约》感兴趣，也由于受到了克吕德纳夫人的一些影响。此人在1815年夏曾作为宗教导师帮助过他。亚历山大无疑是十分认真的，可是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只是对此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卡斯尔雷在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把它说成“异常玄妙而荒谬绝伦”。^[12]各国君主由于惧怕亚历山大的权势，为了迎合他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在由梅特涅在文字上作出某些重大修改之后，于1815年9月26日在这个同盟条约上签了字。但是就他们而言，这不是一种认真的政治行为，在1815年的外交上也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

看一看维也纳会议最后文件和第二个巴黎和约中有关领土的条款，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它们遵循着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则，即遏制与互相补偿。前者针对法国，后者针对它的敌人。现在，虽然是按照皮特和卡斯尔雷的某些重要建议，在法国东部边界形成了一条遏制它的弧形地带，其主要内容似乎是新设想的而且带有某种试验性质的。领土扩大了荷兰，扼守北方；扩大普鲁士在西部的地盘；用普鲁士代替奥地利防守莱茵河；加强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国际保证瑞士中立；扩大撒丁王国以驻守南端。英国通过汉诺威可与普鲁士连接起来以为北方后盾，奥地利则通过意大利北部属地可以为南部的后盾。这样的布局就可牢靠地防止法国今后打乱均势。

法国本身的边界线虽然几乎完全恢复到1790年的情况，但是在它的东方普遍出现了新边界：瑞典取得了挪威；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大片土地；俄国获得了波兰的大部分（1814—1815年的和约以前它还占有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以及萨克森、波兰和德

意志西部的一部分给了普鲁士。英国保留了重要的海外地区，扩大了它的荷兰保护国，并且使汉诺威也扩大了。令人失望的是，花了很长时间逐步做出的许多安排却不是永久性的。不到15年，扩大了荷兰就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波旁王朝的复辟在法国宣告结束；两年以后，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宪法；不久，汉诺威同英国的联系也告断绝；在维也纳条约中确定的克拉科夫中立自由城的地位被推翻了。在1859—1871年之间，有关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所有的解决办法都废除了；另外，取消了奥地利在意大利所得到的补偿；德意志邦联解体，奥地利随之失去了对该邦联的管辖权；德意志各小邦在俾斯麦统治下按新的制度改变了组合。法国的疆界在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之间的安排下得到扩大，但后来由于德国夺取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又缩小了。总而言之，1814—1815年和约的各项条款，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乌得勒支条约的条款修改得更快，更经常，也更深刻。

与上述变化相比较，在克拉科夫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德意志东部疆界，是1814—1815年解决方案中比较稳定的一部分，虽然边界线两边后来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到了1914年连边界线本身也不存在了。挪威和瑞典的合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以后，如同英国取得的锡兰和开普殖民地一样。保持的时间更久的还有：法国在梅斯和海峡之间的疆界，但边界线的东侧不久就由荷兰改为比利时控制，关于瑞士的领土和其他问题的安排都一直延续到今天。关于外交席次的协定至今仍然有效，只不过更为详尽罢了。此外，英国至今仍保留马耳他。

整个解决方案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尽公平，在许多具体做法上也不尽完善，因而注定要经过无休止的修改，但总的说来和在欧洲重新建立一个平衡的国家体制的理想非常一致。它实际上代表着欧洲最后一次有意识地根据均势而实行的伟大的和平解决方案。这些原则在18世纪中曾经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应用，但在1792—1814年这一代里，却受到了大规模的谴责，到了19世纪则被自由主义批评家们说得一钱不值。只是到了最近，这些原则才重新受到推崇，认为有益于处理欧洲事务。这从调解过程中作出的重大决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波旁王朝复辟，第一个巴黎和约的温和适度；在维也纳按互惠补偿分配胜利果实；卡斯尔雷关于建立一个坚强中心的设想；梅特涅对俄普共同获得土地的态度以及第二个巴黎和约谨慎而有节制。一再重申肖蒙原则以及最后出现四国同盟，突出说明了一种想法，它来自平

衡论者的实践并且设想出保持均势的改进办法。确实，1814—1815年时期是欧洲传统的势力均衡发挥作用的最好范例之一。这段时间里的无数文件使用它的术语，各种各样文件都使用平衡论者的用语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各种计划通常体现出它的概念与目的。

平衡论虽然在和平解决方案中显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并非无所不在，以致排除其他别的思想。正统性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就连塔列朗，维也纳会议上的这一位高级传教士，也只把它看作更为全面的均势论中的次要成分。民族原则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强烈而搅动人心的产物虽有其追随者，这在施泰因的对德意志的政策和亚历山大对波兰问题的计划中表现得很突出，但此外就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国家利益，显然是各大国在维也纳会议中的动力之一，始终吸引着各个政治家。然而，它一般都从属于均势，因为个别人的过高要求都会遇到其他主要政治家们的集体抵制，特别是因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基本事实乃是五大国的势力相对平衡，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控制其他国家。

如何估价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各个重要人物的相对重要性，乃是阐述1814—1815年这段历史时期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尽管以前的几代人们满足于把最高荣誉归之于梅特涅，但今天很难说是哪一个人主宰了一切；不过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都有其举足轻重的时刻，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亚历山大肩负着1814年直接进军巴黎的重任，接着又一道及时地支持对法国采取温和态度；而且，由于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波兰问题取得了胜利，因而实际上对整个会议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得俄国向西扩张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哈登贝格取得了大量的补偿，使普鲁士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势力，并取代奥地利负责保卫德意志的西部边界。梅特涅成功地挫败了俄国的原来方案，在不让普鲁士获得整个萨克森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有关德意志的其他决定也施加了影响。他以高人一筹的手法，谋划意大利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在那里重建奥国的势力。卡斯尔雷是肖蒙条约的缔造者，在恢复波旁王朝并使这一新政府取得温和的和约方面，其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他作为皮特的继任者，首先提出了在法国东部边界形成弧形遏制圈的做法；在维也纳会议的外交活动遇到重重困难的那个冬天，普鲁士同奥地利为了萨克森问题发生危机时，他从中斡旋比任何人都更有成效。此外，他是1815年11月20日的那个重要的四国同盟的创造者，

这成了战后外交真正的新起点，一些人诋毁他，许多人误解他，但是对这个世纪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表明，他是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物。

由此看来，除塔列朗外，每个人都为本国取得了一片领土。而塔列朗则及时协助恢复了波旁王朝，机敏地打进会议的核心审议会议，萨克森的一部之所以能够保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功劳。对他们各人的贡献不论给予何种评价，人们都应该看到，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把欧洲的问题看作整个国际事务的一部分，而这是与1919年他们的那些继承人大不相同的地方。他们是一些足智多谋的卓越政治家。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偶尔因为它们确立了一个世纪的和平而受到称赞，但也常常因为没有更勇敢地接受民族主义这个新原则而受到抨击。对于前者，人们可以说，这个世纪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规模较小却是重要的战争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欧洲虽然没有发生大战，但不能就此理所当然地归功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巴黎会议的安排，因为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安排不久就改变了。至于第二点，主宰这一过渡时代的那些政治家们还不可能理解新兴的民主制度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在波兰会议王国，^[13]那里在众所公认的一定程度上使用民族主义原则，不久就把维也纳会议的那些安排推翻了。

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转而奉行比较熟悉的均势原则。他们在这一概念范围之内进行了一系列熟练的活动，在结束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使欧洲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及使法国保持合理的疆界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创建以会议方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一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试验往往是毫无用处，很快就被摒弃，或者对下一代有危险性，除了沙皇亚历山大外，他们的思想都不能超脱正统观念，在领导艺术上没有惊人之处，对于未来没有作出永恒的具有创造性的贡献。正如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不久就显示出的那样，这些有趣的人对欧洲的贡献不过平平而已。

（王泽槐 译）

^[1] C. K. 韦伯斯特：《英国的外交，1813—1815年》（1921年），第123—126页。

^[2] C. K. 韦伯斯特：《英国的外交，1813—1815年》（1921年），第193页。

- [3] C. K. 韦伯斯特：《英国的外交，1813—1815年》（1921年），第218页。
- [4] C. K. 韦伯斯特：《英国的外交，1813—1815年》（1921年），第200页。
- [5] 里夏德·梅特涅亲王编：《梅特涅亲王回忆录，1773—1815年》，“维也纳会议”部分（伦敦，1881年），第2卷，第570页。
- [6] 德布罗格利公爵编：《塔列朗亲王回忆录》（伦敦，1891—1892年）第2卷，第203页。
- [7] G. 帕莱恩编：《塔列朗亲王与国王路易十八书信集》（伦敦，1881年）第1卷，第242页。
- [8] 特弥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公元前507？—前460年？），雅典将军和政治家。——译者注
- [9] J. 霍兰·罗斯：《拿破仑一世生平》，第6版（伦敦，1913年），第2卷，第520页。
- [10] 韦伯斯特：《英国的外交》，第345—346页。
- [11] 韦伯斯特：《维也纳会议》（伦敦，1918年），第143页。
- [12] 《英国的外交》，第383页。
- [13] 亦称会议波兰，指根据1815年5月3日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波兰国家。——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1815—1830年的国际关系

第一章里（原书第7—11页）曾经试图说明1830年欧洲国家制度的一般模式与1790年相比有哪些不同。战争期间千变万化的情景和1815年达成和平解决的谈判情况，则分别在第九章和第二十四章作了叙述。本章打算概略说明那一解决办法造成的形势中潜藏着的，或在其后相对平静的年代里暴露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在有关个别地区的各章中已经涉及了，但是现在需要把它们当作呈现在君主、总理和外交大臣面前的、发展中总的形势中的要素来加以回顾。亚历山大一世注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西班牙与德意志；梅特涅与坎宁对拉丁美洲采取某个行动之时，也不能不注视着爱琴海。此外，关于1815年以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活动也出现了某些普遍性的问题。开始时，这和制定这次解决办法的政治家们的经验甚至个性有密切关系；除塔列朗外，所有这些人以后又继续掌权若干年——卡斯尔雷和亚历山大一世分别掌权到1822年和1825年去世，梅特涅掌权的时间在1830年以后和以前几乎是一样长。

但是渐渐地这些问题同这些主要角色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到了1831—1832年，不仅一位奥地利政治家，就连英国、俄国甚至法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最可能遵循什么样的基本政策方针，都不难预料了。帕默斯顿式的姿态在伦敦占主导地位达一代人之久；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中所表明的也就是两年以后在波兰所表明的真实意图；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虽然对如何行动才算谨慎各有不同的想法，但是除了1840年那个桀骜不驯的梯也尔外，他们都坚决支持和西方结盟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旨在避免同英国发生任何重大冲突，同时又不放弃某种回旋余地。普鲁士政府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仍避免摆脱维也纳而采取主动果断的外交政策。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采取的是机敏的行动方针，这使他在各君主中间的影响大大超过他这么一个蕞尔小国所能发挥的影响。国务卿亚当斯和门罗总统于1823

年12月明确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围和界限，不过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那个“主义”在那些年中运用时还是极其灵活的。

是不是曾经实行过什么“会议制度”呢？^[1]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君主们和大臣们只举行过三次会议，其中第一次（1818年秋在亚琛举行）不过是为了结束对法国的军事占领，清理法国的债务和重新承认（带有某种保留）它为大国而事先安排好的一种仪式。第二次会议（1820年冬在特罗保和莱巴赫举行）和第三次会议（1822年秋在维罗纳举行）都是集中注意盟国间的分歧，而不是解决这些分歧或制定某种制度。之后，在巴黎会议（1856年）和柏林会议（1878年）以前，一直没有开过多少会，而且这两次会议都是战后的和平会议，牵涉（或几乎牵涉）的大国不止两个，它们都不是在和平时期防止或解决困难的任何制度的典范。在这两次会议之间，1860年、1866年和1871年的大变革都是在没有召开任何大会的情况下发生的。甚至在1815年后的七年里，也没有为召开会议或大会设置任何正式机构。1815年11月20日四国同盟最后文件第6条（参阅第二十四章，原书第663页）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像现代人所期望的各盟国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议”那样的工作制度罢了。其用意无非起同样的欺骗作用而已。原来设想在1818年秋天再召开一次会议，但第6条中“定期”的意义从未加以说明。前五条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即对法国实行遏制。在以后三年里，比较有效的工作“制度”是四大国驻巴黎大使不断地举行会议。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初曾经有过某种设想，它本来可能成为各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制度，或者至少不失为一种方法。1818年议事日程上的那些问题，如果各国首脑不是迫切希望开会的话，本来是可以
通过外交函件来解决的。在1820—1822年，他们想必认为某些具体问题通过会议的办法来达成协议，至少比通过不大能引人重视的手段去解决要好一些。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忘记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为建立国际法新体系向英国提出的含糊建议，其中规定各国都承担义务，应先请求第三国调查争端原因并进行斡旋，否则不得发动战争。卡斯尔雷尽管思想偏狭，却没有忘记自己参与制定1805年皮特的指示，它的语气虽则极端注重实际，但也提到了“订立一个总的协定，保证欧洲各大国互保安全和重新制定总的公法体制”这么一种想法。^[2]卡斯尔雷现在打算放弃关于总的保证这个设想，但要充分利用其余部分。他相信在最高一级由本人参加讨论是有益的，这些人共同参加过一些重大

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个共同目标，即经过一代人的战争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安宁。维也纳会议上的摩擦和浅薄的无聊活动并没有使他完全失望。从他在亚琛写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充满了信心：“……我真的觉得，这是欧洲政治中的一种新发现，一下子扫除了外交方面模糊人们眼界的那些陈腐的污垢……使各大国的协商富有成效，几乎像处理一个国家的事务那样单纯。”^[3]然而他的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他成功地严格限制会议的范围和目标，反对俄国人把它无限扩大。由于英国内阁担心受到牵连，在它的敦促下，他已经发出警告，称英国不会参与各大国未经邀请就干涉别国内政的体系，他在18个月以后的一份著名国家文件中（见本书原文第674页）更加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在1818年批评一种不举行最高级会议也同样会出现的弊端，同时他在原则上并不否定，这种会议由于与会者互相了解能够作有效的决定，所以是有益的。在这样一次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能够重温1814—1815年那种令人陶醉的感觉，即他的责任是做欧洲的带头人。其次，梅特涅醉心于这种方法也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与其发公文给也许不大顺从的大使，还不如他亲自出马谈判，也许使他的坚定原则更容易随机应变；其二，在这样的场合下，亚历山大可能比他觉得自己是俄国人在国内办事时更加通情达理一些；其三，君主们的一次会议可能成为保守派同盟给人们深刻印象的表现，以防止来自法国的危险，防止来自“各运动党派”即“雅各宾派”“分裂派”“自由派”的危险，甚至来自轻率的统治者本身的危险。

历次会议都没有设立一种新的常设国际机构，甚至对维也纳会议直接产生的特殊问题也没有提出唯一可能的处理方法。君主们会议只是维持和重新确认这种保守派同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特殊方式已经停止使用后，欧洲大陆依然有人希望重新宣布这种同盟的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自由派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讥讽地用“神圣同盟”这一名称来说明保守派君主们的总的态度。代沙皇草拟的并于1815年9月26日由沙皇本人、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签署的这一文件于1816年1月公布，不久即为大多数政府所采纳。应邀参加的不仅是各国君主。瑞士也参加了；美国报纸起初赞扬它的宗教口吻，但后来美国终于拒绝参加，不过也未表示非常厌恶。从技术上来讲，它与欧洲君主们在随后年代里外交政策上所实际追求的目的很少有共同之处。由于该文件不仅仅是一纸宣言，它还提出了“总同盟”的主张，即各国统治者比较广泛而松散的联合，而不是几个战胜国之间的严格限制的

联盟，“总同盟”的目的也许是使俄国可以在全世界更大范围内施展它的影响。^[4]确实，在后来数年内，俄国政府一直尽力吸收更多的国家参加总谈判，^[5]甚至企图把美国也拉进来以抗衡英国的海上势力。在1812—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沙皇自愿做调停人；卡斯尔雷设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他为了腾出手来参加维也纳会议，不得不甘心让这次战争以失败而告终（1814年12月28日根特条约）。后来，他比亚历山大更加成功地解决了与美国产生摩擦的一些问题。当时美国舆论反对俄国企图干涉西班牙和西属美洲，并坚持要求获得太平洋西北部沿岸土地。在诸如此类问题上，决定俄国人政策的是利害关系而不是原则，这同其他君主的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各国政府之间尚存在着另一个“神圣同盟”，设法在贵族或显贵人物的社会秩序受到任何激进分子捣乱时给予传统的和宗教的制裁。

俄国的军事力量在1813—1814年已经显示出来，在和平解决之后并未削弱。沙皇对这一力量的信心和引以为自豪的心情并未怎么动摇，因之在欧洲引起的恐惧也未怎么减轻，虽然它的某些精锐团队里的军官中间出现不满的迹象，而野蛮粗暴的征兵制度效率之低下，即使是军垦区的试验也未能使之有所改善（见第十八章，原书第518页）。1828—1829年俄国对土耳其的历次战役表明，它要在国土之外增派和保持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是何等困难。但在1815年后的最初几年里，似乎沙皇一人手里掌握着一支数不清的部队。相形之下，奥地利显然至多只敢派出一支讨伐队进入意大利，绝不敢在土耳其造成一次危机；普鲁士还没有重新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法国对西班牙的干预只是一次几乎不流血的游行，否则它在1823年就会很快陷于困境。

英国在参加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前就已经拥有海上优势，取得了一些殖民地和可望开发的地区。^[6]卡斯尔雷在讨论解决欧洲问题时这些都成功地回避开了。因此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除了上苍业已赐给大英帝国的东西之外，摄政王为帝国已无所企求了；他的唯一愿望是，也必然是保持他同盟国一起协力赢得的和平。”^[7]梅特涅基本默然同意卡斯尔雷的这一立场，但亚历山大一世对此并不是真心赞同，俄国在1780年，其后又在1800年首创对英国海上势力保持武装中立的体制。尽管它自身在海上的力量虚弱，但它可能希望有朝一日把正在恢复中的法国和西班牙，也许还有荷兰，甚至也把美国拉到一

起，建立一种全球性均势，就像英国当然希望只限于在欧洲大陆建立的那种均势一样。这一计划使俄国在理论上陷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支持各不相同的政权，诸如西班牙的专制政权、法国与尼德兰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共和爱国主义。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能加强英国以外的这些海上强国发挥它们的作用。他采取这样一种既明确又始终如一的“现实主义的”政策的证据很难说是充分的。亚历山大本人于1818年指责他的驻巴黎大使波佐·迪·博尔戈，因为后者主张同法国和西班牙明确结盟，以反对英国和奥地利。但他的“总联盟”想法不仅是一种模糊的宗教情绪，正如他的大臣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总联盟”是要把均势转移到更加广阔的范围。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亚历山大之所以把他的妹妹嫁给荷兰王储（1815年12月）来争取荷兰；所以会提出裁军建议（1815年4月），旨在表明削减欧洲大陆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必须削减英国海军；所以会把一些旧战舰转让给西班牙——这同谣传中一些过分热心的大使们替俄国攫取米诺卡的一次流产阴谋有关（1816—1817年）；所以会建议要对北非海盗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由英国单独行动（1818年5月）；以及广而言之，所有较大的海上强国之所以会憎恨英国海军在查禁奴隶贸易中扩大使用登船搜索的权利（1815—1819年）。

由于1819年德意志和意大利发生骚乱，由于左翼在法国选举中获胜，亚历山大对建立“总联盟”来调整均势一事的兴趣已经减退，而对建立一个反对革命的连带联盟的兴趣则增加了。从1816年1月起一直作为他的两个主要外交顾问之一的涅谢尔罗杰现正促使梅特涅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他没有亚历山大那种神秘的色彩）；但是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变化不定的影响只是由于1819—1821年的事态发展才逐步减弱。^[8]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有点同情“运动党派”，他想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像他那样的维护秩序者。他钦佩10年前开始为之服务的那个亚历山大。他感到奥地利的的影响无所不在令人难受，而英国则成了他对地中海东部地区所抱希望的障碍。他在和奥地利的捣乱分子接触之中恐怕并不完全是局外人。梅特涅于1819年春陪同他的皇帝巡视意大利时，曾搜集沙皇矢口否认的俄国的代理人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新近去科孚时途经意大利，谈到了对奥地利统治意大利北部和对英国统治爱奥尼亚群岛表示不满。对德意志的事务如同对意大利的事务一样，如果可能，梅特涅宁愿单独或同普鲁士一起处理，至于其他盟国，假如他能得到的话，也希望它们给予道义上

的支持，但不请求他们出面协助。在这点上，他得到了英国内阁的完全赞同，后者正在和国内的严重不安作斗争，不愿公开参与反对国外的骚动。对于这一问题，梅特涅也怀疑俄国的政策是混乱的，或者是表里不一的。科策布被一个德意志学生杀害，因为（据说）他为俄国收买，写文章反对德意志的自由派。亚历山大完全像梅特涅所希望的那样强烈谴责这些自由派，但是梅特涅对亚历山大在一些德意志宫廷中的影响却感到妒忌，^[9]而当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以沙皇的名义严厉批评对自由派的镇压方式时，梅特涅则又感到愤怒，因为这种镇压方式正是九个德意志邦在8月份的卡尔斯巴德会议上和三个月后在维也纳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根据梅特涅的建议通过的。^[10]

关于土耳其问题，亚历山大不愿意在将来捆住自己的手脚，至少在对贝尔格莱德条约（1812年5月）的分歧没有解决之前是如此。他曾极力否认他的神圣同盟会对苏丹造成任何威胁。^[11]但是处理巴尔干事务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手中，他不见得会去扑灭那里的烈火，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至少是通过外交手段专门为希腊人做一次新的交易（参阅第十九章，原书第535页）。在这一地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边界线和土耳其欧洲部分边界相接壤的地方，沙皇一直觉得哈布斯堡君主国到处在掣肘，而英国由于在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战略和商业利益，虽不能说始终妨碍俄国从另一边向苏丹施加压力，但也经常起到了阻碍作用。有证据表明，1821年的事态发展使俄国政府遇到了既不在计划之中也没有预料到的局面，而且它事先也没有严厉指责某些过分热心的代理人来阻止出现这种局面。

尽管梅特涅希望不要为了德意志和意大利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但他需要盟国在道义上的支持，因而在1819年夏竭力要求设立各国大使固定的“道义联络点”，如果不设在伦敦，那么比如说就设在维也纳（他无疑希望设在那里）。英国内阁在进行涉及条约义务的任何“公开行动”之前，拒绝采取任何诸如此类的预防性措施。从不久后的公开行动看来，各国对条约义务的理解是多么不同。1820年1月1日在西班牙加的斯，没有拿到军饷的部队哗变，使拥护1812年宪法的人乘机于3月在马德里夺取政权，并公布该宪法（参阅第十六章，原书第448—450页）。俄国希望联合干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认为，目的是让国王和起义者一样都接受一部温和的宪章）；法国想由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有些人则希望达到同一目标，总之想以此表示自己不受英国支

配。普鲁士倾向于支持俄国的建议，但是梅特涅认为英国的反应要比沙皇的反应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表现得极其谨慎。这就是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的政府报告产生的背景情况。^[12]这一文件直截了当地拒绝集体干预，认为既没有直接的军事危险需要这么办，而且这也可能使西班牙人恼火。本同盟“从未打算作为全世界政府的联合体，或者监督其他国家的内政……任何一个代议制政府的国家都不能根据（这种一般性的原则）而采取行动……如果欧洲体制真正受到威胁的话，我们将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因为抽象的、冒险的预防原则而采取行动。现在的这一同盟在当初组成时并未考虑到这样一种作用”。

这一文件立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法国默然同意了，梅特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孤立俄国，也勉强接受了文件的总的理论。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的措辞之所以尖锐，部分原因可能是英国特别不喜欢其他列强干涉伊比利亚半岛事务；不过在这一文件中首次清楚地说明政府的形式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外政策这样一个论点。三年后，坎宁（这个文件可能是他和内阁的其他成员一起拟订的）在另一场合发表了文件的更详尽的摘录，为的是摆出反对“神圣同盟”的姿态。因为在此期间，另有一些事件已经使分裂公开化了。

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因法国人入侵逃往巴西已经12年了，他还在巴西迟迟不归，可是1820年8月在波尔图发生的一场革命运动，10月初就在里斯本宣告完成了（参阅第十六章，原书第451—452页）。卡斯尔雷这时提出的警告，与其说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真正干预，还不如说是针对国王对集体干预所抱的希望；此外，他先告诉君主主义者，随后又告诉获胜的自由派：他们不能指望英国这个老盟友重申其保证反对西班牙或同盟，以此作为支持葡萄牙的任何极端主义政党的手段。1821年夏若奥国王回国，他不得不服从新的议会，一年后，他的儿子唐·佩德罗在巴西自任为完全独立的统治者（1822年8月15日）。葡萄牙和巴西的革命于是就暂时避免了神圣同盟的一切干涉。

与此同时，如果说梅特涅在西班牙问题上的屈从是为了报答英国在德意志问题上没有给奥地利制造麻烦，那么卡斯尔雷反过来也对梅特涅投桃报李，积极支持奥地利镇压那不勒斯的叛乱，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让苏丹在希腊随意进行镇压。这四个地区内的问题各不相同；英国和奥地利对每一个问题的反应都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有一个

共同点——唯恐俄国进行干预。加的斯兵变之后六个月（1820年7月）发生的那不勒斯起义和前者不同，它是出乎意料的，因为波旁王朝在那里复辟后，那里的反应并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强烈，而且这个国家似乎比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更加安定（参阅第十五章，原书第429—430页）。然而缪拉手下的军官对在奥地利指挥官麾下服役感到不满，就发起一次运动，这个运动被烧炭党接了过来，强迫国王宣誓效忠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西西里人照例又起来反抗那不勒斯的统治，遭到了血腥镇压。在梅特涅看来，西班牙只不过是个坏榜样，而那不勒斯却对奥地利控制意大利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卡斯尔雷明确地鼓励他单独采取步骤，这样既能防止俄国建议集体干涉，又免得英国为难，不至于非按照不久前就西班牙问题宣布的原则办事，站在一旁不参加集体干涉不可。但是不久以后，梅特涅就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俄国在法国的一些支持下，坚持召开正式的全体盟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也将考虑整个革命问题。他不能像对西班牙问题那样毫无行动，也不能单独行动而和俄国决裂。他策划出使俄国和英国都可能满意的折中办法之后，就不得不同意召开各国君主会议，英国派它驻维也纳大使仅仅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他既没有全权，又奉命不得赞同任何集体声明。法国的立场虽模棱两可，不过最终还是比较接近英国的立场。

因此，1820年10月23日在特罗保召开的会议不符合梅特涅的要求，而且使卡斯尔雷要保持同盟形式上团结的希望也遭到了打击，虽然还没有完全绝望。会议成了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和梅特涅为争取沙皇而进行决斗的场所，前者希望（像在西班牙一样）使那不勒斯的双方都接受一个温和的宪章，后者却认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梅特涅为了防止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把干涉作为在一位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进行调停的想法，不得不利用沙皇的以宗教十字军消灭革命幽灵的主张。由此制定的“初步议定书”（11月19日）宣称，凡经历革命变革威胁他国的国家，应排斥于欧洲同盟之外，直到法律秩序和安定有了保障；同盟国将拒绝承认以非法方式造成的变革；凡出现对邻国立即形成威胁的危险时，如有必要，它们将提出友好的抗议，直到采用强制措施，使肇事国重新回到同盟的怀抱。梅特涅不得不同意奥地利对那不勒斯的干预应以同盟的名义进行，并邀请国王翌年到莱巴赫参加现已休会的会议；但对调解一事则一字未提。结果烧炭党拒绝任何妥协，并强迫国王在起航前宣誓效忠1812年不切实际的宪法，这样反而使梅

特涅有可乘之机。虽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已在这个议定书上签了字，但在英国观察员的抗议下，同意只把它作为向其他两国的建议；可是在卡斯尔雷的断然拒绝传到特罗保之前，它们已经向各外交代表发出了机密通函（12月8日），报告它们对那不勒斯问题的决定，并对同盟的性质重复阐述许多无法接受的论点，好像五个国家全都一致同意这些论点似的。文件还间接提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份通函的要点不久传到了其他国家的首都，并于1821年1月15日泄露给了《纪事晨报》。英国内阁在国内强烈指责下本已决定公开提出抗议；它的答复性的通函（1月19日）连同补充文件一起交给国会，于2月进行辩论。内阁赞成奥地利有权干预那不勒斯，并重申该同盟在“条约真正包括在内的各点”上完全协调一致，而且积极实施。这两件事都受到了反对派的嘲笑；不过它公开不同意三国宫廷的做法，不仅使英国对以后的政策承担责任，并且也使国外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1821年1月12日会议在莱巴赫复会，三国宫廷坚持重申“同盟国的团结一致”。法国人还算买他们的账，但是英国观察员拒绝把英国的不同意见向那不勒斯人保密。国王还没有抵达莱巴赫，就已经否认曾经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当奥地利军队于3月24日又让他在那不勒斯复位时，他不管是在那不勒斯还是在西西里，都没有听从梅特涅当时的劝告，表现出一点节制的样子来。卡斯尔雷又和梅特涅一样反对调解。他反对把集体干涉作为解决的办法是真诚的，即使国内气势汹汹的反对派无须再特别加以安抚的时候，他仍然反对集体干涉；但在干涉取得结果时他同样感到安慰。他对梅特涅说，在那不勒斯“你本该干了再说”。3月10日都灵发生意外的暴动，导致国王维克托·埃曼努埃尔让位给他的兄弟（参阅第十五章，原书第433—434页），卡斯尔雷也同样反对在皮埃蒙特进行调解。这时，卡斯尔雷特别害怕法国干涉，因此当奥地利军队前去帮助新国王恢复秩序时，他并未表示反对。不过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沙皇仍想干涉西班牙，或者让法国去插手干涉。他也不能忽视各国君主在莱巴赫发表的最后宣言（5月12日），该宣言重申特罗保会议的论点，并宣布翌年复会以汇报在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取得的进展。三国原则上把西班牙和葡萄牙逐出同盟。虽然它们驻马德里的代表暂时没有撤回。6月，卡斯尔雷在国会中重申了他的1月19日通函中的原则，但没有进一步直接提出抗议。

在此期间，希普西伦特斯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冒险活动，而后又是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起义（参阅第十九章，原书第538—539、547页）的消息，在会议结束前传到了莱巴赫。沙皇要公开否认俄国支持希普西伦特斯，起草这个声明的苦差便落到了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身上，但是他的处境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亚历山大在特罗保时已经谈到了革命的“恶魔”以“神秘方式”到处活动，要建立“邪恶的统治”，而同盟则是和它相抗衡的唯一堡垒。1821年6月他回到俄国，就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以及现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骚乱统统归咎于巴黎的自由主义者，还说无论过去历史和公众舆论如何，它们都不会得到他的支持。他将忠于和苏丹签订的条约，忠于同盟。然而苏丹在君士坦丁堡不分青红皂白对希腊人的报复行动以及违反条约权利的其他措施，使他不得不提出抗议。他的大使斯特罗加诺夫在6月初已经中断外交往来，却兴致勃勃地执行了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起草，他在7月收到的6月28日指令。指令要求他在8天内完成任务。他为了自身安全就居住在一艘俄国快速战舰上，8月10日一有顺风就启程离开了。

此后两年里，梅特涅集中力量把希腊问题和俄、土关于条约权利的争议分开来，劝告苏丹在希腊问题上要有节制，对有关条约权利事项要严格执行，以此来防止战争。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的很好支持，可是在亲希腊派的心目中，斯特兰福德的真正贡献，却由于他在感情上极端亲土而显得黯然失色。卡斯尔雷不得不屡次指责他，然而他自己的观点只有两方面和梅特涅不同。第一，他对于向“奥斯曼政府派驻联合代表是比较怀疑的：他们始终未能产生有益的效果。土耳其政府一直把欧洲同盟看作宗教上和政治上不堪信任的联盟”。其次，英国对俄国的义务少于奥地利对俄国的义务，因此，甚至不愿讨论俄土战争对土耳其欧洲部分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后果。然而尽管在问题的看法上存在这些分歧，1821年10月卡斯尔雷在汉诺威和梅特涅（他和国王一起访问期间）会晤时，还是取得了接近的一致意见，要对沙皇和苏丹，尤其在消除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影响方面，实行并行不悖的但是并不相同的政策。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关系是使那里的英国高级专员感到特别焦虑的根源。

[\[13\]](#) 俄国人不会在春天以前发动战争；在这一段时期里充满了紧张的外交活动，直到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退隐到瑞士（1822年7月），沙皇的原则终于战胜了他的感情。或者说似乎是这样，然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都放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再讨论。卡斯尔雷死前写出“希腊人

在组织政府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并预见到将来他们作为交战一方将会得到承认，甚至可能“创建一个合格的希腊政府”，但英国并没有给予任何保证。

由于两个危险增长，盟国曾劝沙皇不要强求解决东部的问题，可是现在亚历山大建议，要代表西班牙国王集体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这使各盟国很不安。他提出立即派遣一支俄国部队，大家对这一建议并没有认真对待，但是法国宫廷和内阁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却乘机打算以同盟的名义或单独以法国的名义进行干涉。武器和军需品已源源运给西班牙的反革命政党。1822年夏法国沿边界线设立的封锁线，到秋季就成了“监视部队”。对奥地利来说，这还不如俄国的计划那么令人吃惊，但是英国却大为惊慌，因为这一危险更可能成为事实。于是搁置两年的西班牙问题又变得引人注目——这时正好南美独立问题也处于紧急关头。

在1822年前，除西班牙以外，大家已经预料大部分南美国家会取得实际上的独立或者完全独立（参阅第二十三章）。欧洲其他各国宫廷关心的是，不管怎么安排都不应是革命取得胜利，这对各国国王是一种耻辱，对全世界也是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外在1818年，亚历山大依然希望使西班牙保存足够力量，以便和法国一起，与英国的海上力量相抗衡。法国关心的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旧波旁王室和西班牙的“家族盟约”。而英国关心的是：第一，南美各港口应对一切前来者开放，不论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但必要时容许西班牙拥有“公正的特惠”。第二，在西班牙及其前殖民地间进行任何调解时，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812年5月英国内阁提出的条件中就包括了这两条，在1817年7月又提了一次。可是1820年西班牙本国发生革命之前或之后，西班牙政府都没有接受这两条。因此，1818年会议或者1820—1821年会议中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至于其他方面，卡斯尔雷和坎宁都认为，如能像巴西那样建立新君主国的话，那么新的共和国还不如新君主政体更合乎英国的传统，而且后者也会更稳定一些。卡斯尔雷本来宁愿选立西班牙王子，但是法国打算另立法国波旁家族成员，这一不受欢迎的迹象使他对哥伦比亚驻伦敦的代表说（1820年7月），英国将承认任何本国人统治的君主国。

卡斯尔雷也好，坎宁也好，都不愿让承认新国家的功劳归于美国。美国国会内外的共和党人早就要求公开承认了；他们由于同盟国

在欧洲的行径，以及1821年9月28日俄国发布的敕令而大为恼火，该敕令规定对外国船只封闭整个太平洋海岸，直到北纬51°（几乎到达温哥华）。国务卿亚当斯的行动是谨慎的；但在1821年12月总统预先表示要单独承认，1822年5月，国会批准由他决定是否派遣代表团，6月，他正式接见哥伦比亚的一位代表。与此同时，英国修改了它的航海法，以便接待包括南美船只在内的外国船只。卡斯尔雷于5月向法国提出建议而未见成效，又向西班牙和其他强国提出警告，而后为了即将召开的会议拟就他的指示（7月），在对斗争已经结束的有关地区的关系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给予事实上已经生效的商业承认；派遣外交代表；最后是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这种承认将否认以前君主的权利。在以后的实践中几乎无法这样细微地区别对待，至少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间是这样，但卡斯尔雷看到局势依然十分动荡。英国将设法和盟国的步调一致，甚至也要同恢复了理性的西班牙取得一致的步调，但是要保留“根据情况采取独立行动的权利”。

直到7月底，卡斯尔雷才决定亲自参加最初计划在维也纳而现在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1822年8月12日他自杀身亡。过了五个星期，乔治·坎宁才得以继任；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宫廷里和托利党内同僚中的敌人都怕他，这班人都被他尖锐地挖苦过，而且由于他够不上贵族出身，野心勃勃又多才多艺，而不信任他。威灵顿公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本来已经被任命接替卡斯尔雷参加维罗纳会议，他是在任命坎宁之后一两天带着一字不变的原来指示离开的。威灵顿是个忠诚的公仆，政策的连续性是保持了；但是由于受到海军和贸易力量的影响，英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于关键地位，以致外交部的风格哪怕稍有改变都会成为欧洲的一件大事。在谈话、文件、国会和公开演说中，凡是卡斯尔雷只是谨慎地发出信号的地方，坎宁却是摇旗呐喊。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使卡斯尔雷相形见绌：他的政治经验不比卡斯尔雷差，对外交业务一样熟悉，但是由于他缺乏只有共同经历才能产生的亲密交往，他并不认为也不愿成为这样的欧洲人：“对同盟来说，只要了解英国，你就能找到我的政策的线索”；“每一个国家都只顾自己，只有上帝才照顾我们大家”（1823年）。

卡斯尔雷原来认为在维罗纳会议上，土耳其和西属美洲问题要比西班牙或者意大利问题更加紧迫，但是7月里西班牙保皇派政变失败，以及法国决定坚持自己在西班牙的权利，致使其他问题退居次要地

位。坎宁在一个补充指示（9月27日）中宣布：“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也决不参加集体干涉西班牙。对蒙莫朗西提出的问题，只有俄国才全力支持法国。奥、普两国一致同意，如果法国撤回驻西班牙大使，它们也照办；如果法、西两国发生战争，它们将对法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援，但实际上却避不作出提供物质支援的诺言。最后，这三个大国只是将采取行动的口实局限于西班牙武装进攻法国，或通过西班牙驻法国代表的宣传进行直接挑衅，或者粗暴对待国王、王室或他们的继承权。威灵顿在11月30日离开维罗纳之前10天，宣布英国和这些行动无关，并说英国驻马德里的公使（新近任命公使一事就使三国宫廷大为不快）的职责只限于“缓和这些行动必然会引起骚动”。结果是坎宁遭到了外交上的一次失败。法国政府宣布（12月25日）它打算单独行动，否认蒙莫朗西对同盟承担的义务。急性子的夏多勃里昂如今当上了外交部长，他对左派预言会发生哗变或军事灾难，以及对英国的反对都一概置之不理。坎宁对法国国王的施政演说（1823年1月28日），于2月11日在国会中作了回答，他宣布要增加舰只，暂时停止对西班牙和西属美洲的武器禁运以此威胁法国。但是到3月底，法国人知道英国内阁无意作战，除非法国进攻葡萄牙或者帮助西班牙收复其殖民地。于是法国将10万大军开进马德里，最后进入加的斯，几乎没有流血就扑灭了革命（1823年4—9月）。然而法国军队虽然在西班牙停留了五年，法国却无力阻止国王的残暴报复，或者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让他按照法国的模式拟订一部宪章（参阅第十六章，原书第450—451页）。

众所周知，坎宁的某些同僚和国王本人对他抱敌视态度。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坎宁对这次挫败毫不在乎的反应，也可以说明他在国内是颇得人心的。他蔑视地拒绝欧洲同盟的建议，说出了许多英国人爱听的话：这个同盟就像“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之类的东西”。然而，由于“最高首脑”会议上亚历山大刚愎自用，夏多勃里昂一意孤行，而英国又逐渐从卡斯尔雷“事实上”不同意同盟的做法，发展为坎宁从“法律上”否定它的原则，它所采取的办法已被破坏无遗。再者在今后的几年里，欧洲心脏地区的“运动党派”似乎已受到控制。坎宁便在无论如何没有希望成立一个团结一致的同盟的领域寻机报复：先是在美洲和葡萄牙，而后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谣传法国对西属美洲心怀叵测，坎宁最初对此事的反应是试探美国的态度，以便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它们对西属美洲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而后联合警告有这样野心的任何国家（1823年8—9月）。美国公使理查德·拉什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条件是英国得首先正式承认已经独立的殖民地——这个条件是美国舆论的要求，然而却是坎宁既不愿也不能满足的要求，因为他还不甘心放弃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主动解决问题的希望，何况他怎么也不能说服国王和内阁立即予以承认。接着，在加的斯沦陷的消息传到伦敦之前的一周内（10月3—9日），坎宁力促法国大使波利尼亚克否认法国想获得领土或独占利益，也不对殖民地使用任何武力。波利尼亚克虽然尚指望同盟再一次召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他个人并没有拒绝坎宁提出的应同美国协商的建议。^[14]同盟国在11月已经知道这些谈话，但是国务卿亚当斯还不知道，那时他还在劝说门罗总统采取大胆的行动。

亚当斯看出英国既能够也会阻止同盟国的干涉，因而总统单独向本国人民作出有深远影响的政策宣言是没有危险的。实质上，1823年12月2日的国情咨文声明，既然共和国的政策是承认欧洲一切事实上的政府为合法政府，不干涉它们的内政，那么它也不会干涉欧洲列强在美洲的现有殖民地或附属国，但是也不允许欧洲的任何大国把各盟国的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美国所承认的独立政府——这种制度，如果让“我们的南方兄弟”自行选择的话，是绝对不会采纳的。这样一来，共和政体似乎即使不是美洲大陆的常规政体，也应该是个标准；然而咨文中尖锐之处是提到俄国1821年的敕令的那一段，接着又宣布任何欧洲列强今后不得再开拓殖民地（参阅第二十二章，原书第591—592页和第二十三章，原书第637—638页）。这诚然是个大胆的主张，当时这个共和国有效占有的地方几乎仅仅跨越密西西比河，而在落基山脉以西与加拿大的边界线还没有达成协议。坎宁对这种主张不得不提出疑问，况且他不喜欢美洲的一切独立国家必须是共和政体的设想，也同样不喜欢盟国君主们认为其政体应该与此相反的主张。但是他欢迎这篇咨文，因为它对同盟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在议会上虽然谨小慎微，但是私下里却这样写道：“该会议以前曾受重创，然而总统的咨文给了它致命打击。”亚历山大的敕令本想利用美国来平衡英国的势力，而今则变成了废话。

整个1824年间，坎宁拒不参加其他列强继续召开的会议。3月，他公布了自己1月30日正式拒绝参加会议的讲话，同时公布他与波利尼亚克的谈话记录。当西班牙为时过晚地将殖民地贸易（它仍然这样认为）对外国船只开放时（2月），坎宁采用了值得怀疑的权宜之计，向西班牙提出英国保证不染指古巴（4月），为和平分离进行了又一次徒劳无功的谈判。但是在7月里，他告诉梅特涅，欧洲大陆列强的势力只限于欧洲的范围——这本是1814年以来英国政策中暗含的原则，如今却直言不讳了。就在这一个月，他说服内阁提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商务条约。但他延期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而是在原西班牙殖民地收集情报，同时在国内争取支持，与坚决要使他丢脸的活动作斗争。经过尖锐的斗争之后，国王的演说（1825年2月7日）终于公布了已于12月底通知西班牙的一项决定，即通过商务条约给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以事实上的外交承认。[\[15\]](#)

亚当斯和坎宁都理解本国人民的感情，不过亚当斯是否比坎宁更了解“南方兄弟”的感情是值得怀疑的。这两个人在评价这些前殖民地时是敌对的。两人都否定欧洲君主们的“神圣同盟”；但是咨文呼吁共和政体的南北美洲同样建成“神圣同盟”之类的组织，而坎宁则求助于国家利益和国内人民的感情，在拉丁美洲诸国人民中间则求助于他们这样的认识：英国有力量也有理由来保护它们不受同盟的干涉，甚至不受北美的干涉。干涉的实际危险可能是被夸大了：咨文中夸大了俄国1821年敕令的作用；坎宁则总是夸大法国的阴谋。但是干涉的危险也不是虚构的。门罗先前给予的承认和他的咨文的道义影响，在此后几年中由于坎宁的外交政策切实有效和英国海上势力强盛而显得黯然失色。再者，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明确宣布不要求获得任何领土；虽然两国彼此猜疑对古巴感兴趣，但坎宁向西班牙提出保证不染指古巴。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以惨败告终；新独立的国家中只有四国派代表出席，玻利瓦尔建立联邦的梦想就此粉碎无遗；然而当时英国在南美的威望似乎高于美国。坎宁唯恐大西洋这一边的君主制大陆和另一边的共和制大陆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裂。他希望英国为两者之间搭桥铺路。他的担心和希望尽管最后都消失了，却都是可以理解的。

巴西独立，其君主是葡萄牙的王室成员，这对欧洲各国宫廷来说并不是那么讨厌；坎宁急于取得葡萄牙的同意，使巴西的地位合法

化。在安排1825年11月20日批准的条约一事中，英国外交起了主要作用。通过这一条约，里斯本的国王若奥承认他的儿子唐·佩德罗统治下的巴西为独立帝国。欧洲同盟无法反对，但不久它又遭到了一次新的打击，坎宁在单独和俄国就希腊问题达成谅解时使这个打击成了定局。若奥国王在里斯本去世（1826年3月），唐·佩德罗放弃继承权，让位给他的幼女玛丽亚，将在里约拟订的一部宪法赠给葡萄牙（4月29日）。这部宪法虽由英国驻里约的公使带到里斯本，不过并非出于他的手笔。坎宁不大喜欢这部宪法，但他支持萨尔达尼亚将军（庞巴尔的孙子）强迫摄政会议宣誓接受它。对于同盟提出的西班牙不得影响葡萄牙的警告，他的答复是更坚决地警告西班牙不得干涉葡萄牙。在俄国背信弃义、法国感到为难的情况下，梅特涅无法反对坎宁得意扬扬地提出的论点：应尊重一位合法君主自愿颁发的宪法。在维也纳的唐·米格尔勉强服从他的哥哥唐·佩德罗从巴西发来的命令，宣誓效忠宪法，并答应和侄女、未成年的女王结婚。坎宁保证此项消息按时到达里斯本，正好在摄政王向新议会致开幕词时（10月30日）予以宣布。可是敌视新政权、坚决支持唐·米格尔真正观点的葡萄牙军官们，带着一支叛兵进入西班牙，不久，就在西班牙政府（以及还留驻西班牙的法国军队）的眼皮底下组织起来，准备在葡萄牙进行反革命活动。一当坎宁发表声明说，这一公开行动使英国有权履行条约保证，使葡萄牙不受西班牙的侵犯，他就宣布派遣一支海军去塔古斯。在一篇言过其实的讲话中，他最后那句著名的大话：“我的眼睛看着西印度群岛，召来新世界以调整旧世界的平衡”。^[16]在下院中，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坎宁的地中海政策所选择的时间是和他的大西洋外交紧密配合的。这个政策甚至更加大胆，因为他掌握的王牌更少，而且在他去世时，这一政策是否成功还在未定之天。三年来，他一直回避希腊问题。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在维罗纳会议之前就已经下了台，一个希腊代表团甚至不许靠近会址。坎宁于1823年3月承认希腊为交战国，其作用只不过是批准已在实行中的这么一个权宜之计，以便在土耳其人没有有效制海权的地区保护通商。奥地利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暂时得以将俄土争端和希腊问题区分开；亚历山大10月在切尔诺夫策与梅特涅会晤后，同意为了通商而和土耳其恢复关系，并同意未经全体同盟国协商不对希腊采取任何行动。他邀请盟国参加春天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会议，讨论他答应提出的关于希腊问题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

（1824年1月）建议将希腊划分为三个公国，其地位和多瑙河两公国相同；土耳其人每年可以得到贡金，并在指定的要塞中驻军。对同盟国来说，这个计划似乎仅仅是一种花招，以保证俄国占统治地位；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使他们进行自治地区的面积要比他们可望征服的地区大得多，但是他们的1822年宪法规定他们非独立不可。当5月底巴黎的一家报社探听到此项计划时，这一计划其实已经寿终正寝了。

坎宁像拒绝参加其他会议一样拒绝参加这次会议，部分是根据卡斯尔雷已经使用过的论点：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土耳其人是不会把集体压力放在眼里的。部分原因是他和梅特涅之间相互都抱有很大的恶感。然而已经有迹象表明，英国的中立正在变得对希腊人越来越仁慈。其实在1823年年初，希腊的希望和梅特涅的猜疑都是没有根据的，那时候英国的海军军官曾和某些希腊领导人谈话，而这次谈话是由并非亲希腊的爱奥尼亚群岛高级专员发起的，为的是探明他们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屈服；另外，在土耳其和在南美洲不同，英国商人大都敌视起义者。但是4月里，坎宁指责利凡特公司倾向于土耳其的中立思想；8月，他这样写道（诚然他是私下里这么写的）：如果必须给俄国军队找个出气的地方，他宁愿是在土耳其而不是在西班牙；1824年1月，边沁主义者、伦敦亲希腊的希腊委员会的组织者约翰·鲍林爵士访问了他，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7]此外，那位苏丹不能理解，如果英国政府真的像它依然口口声声说的那样对土耳其友好的话，伦敦商业界怎么会投票赞成拨款给希腊，而英国的贵族拜伦勋爵，怎么会去希腊花这笔钱，还在那里送了命。

圣彼得堡会议于1824年6月间就流产了。第二次召开的一系列会议（1825年2—6月）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梅特涅突然建议放弃调停，并反而威胁土耳其人要最终承认希腊独立，以“作为事实上必需的措施”，其目的只是把这作为最后一招表示他不喜欢俄国的计划，同时强迫苏丹要么自己提出条件，要么迫使希腊人及早屈服。在会议开幕的那天（2月24日），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派他的第1师的1万名埃及兵在伯罗奔尼撒登陆，看来希腊人似乎再也抵挡不住了。英国置身于会议之外，这并不能排除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抵抗俄国的征服，也不能阻止它站在希腊人一边单独进行干涉。后一种想法很有吸引力，而且并非不切实际；可是在这一阶段里，内阁是绝不会同意的，而且希腊人已经拒绝作任何妥协。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和俄国一起进行干涉，而不是和同盟国一起，这在两年以前可能已有预兆，当时坎宁建议（又是在私下里），一旦沙皇与土耳其完全恢复外交关系，“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一定跟他谈希腊问题”。^[18]现在，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亚历山大于1825年8月停止和盟国讨论这个问题。坎宁提出“跟他谈希腊问题”的两个条件——俄国派一个大使去君士坦丁堡和放弃使用武力——第一个条件尚未做到，第二个条件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苏丹使用埃及人去平息暴乱，而且希腊的一个强大的亲英政党最近派代表前往伦敦，带去了呼吁英国保护的所谓“归顺法案”。坎宁只能告诉他们，“在争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时刻，那时英国将可能促成一个公平而可靠的妥协办法”，接着他发表新的中立宣言（9月29—30日）。但在10月初，列文夫人，“一封活信”，带着亚历山大的“一张便条”从圣彼得堡来了。坎宁派斯特兰福德带着他的指示去俄国（10月14日），“以信任还报信任”；25日，列文告诉他，易卜拉欣“处置征服地区的计划是……运走全部希腊居民，去埃及或其他地方当奴隶，另把埃及人和伊斯兰教的其他教徒移居希腊”。

坎宁还是宁愿单独介入，刚刚派他的堂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去君士坦丁堡，指令他途中和希腊领导人联系。可是亚历山大在12月1日逝世前正准备发动战争的种种迹象，他的继承人可能会仅仅考虑到俄国利益，以及极端严重的希腊局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再也不能丧失时机了。威灵顿被派往圣彼得堡祝贺新沙皇登基并进一步了解新的政策。至于易卜拉欣的计划，其证据是可疑的，但是坎宁乐于利用它作为影响国内舆论的手段，这种做法和他以前强调法国对南美心怀叵测，以及不久后强调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威胁不无类似之处。1826年4月4日英俄议定书的立足点不是易卜拉欣的计划，而是希腊请求英国调停。这一请求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1月即预料到，但到4月底才予以证实。议定书并未暗示英国将使用武力，但其中却暗示俄国有使用武力的危险。威灵顿对此却几乎没有觉察到。5月初，议定书全文在《泰晤士报》发表，它即受到梅特涅的谴责，也同样地受到希腊朋友们的欢迎。坎宁本人批评它“草拟得不太高明”，但由于内阁疑虑重重，他反正必须谨慎从事。他的目标是“借助于土耳其畏惧俄国，不战而拯救希腊”。可是他发现，俄国以战争相威胁解决了它与土耳其的其他纠纷后，立即又在阿克曼（1826年10月）重提希腊问题。他为了避

免别人指责他被俄国捆住手脚，就在秋天去巴黎待了六个星期，说服波旁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拟订三方条约的第一个草案（1827年1月）。

2月，利物浦勋爵患病退休，引起了一次内阁危机。5月以前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4月在威灵顿和另外几个托利党员辞职后，坎宁与一些辉格党人，组织一个联合内阁。伦敦条约（1827年7月6日）在俄国急于求成和法国故意拖延之间经过一番斗争之后，草案终于拟定了，其中删去了撤回大使之类的任何直接威胁和英国保证解决的一切诺言；但它附加了一条秘密条款：如果一个月（后减为两周）内不接受停战建议，三个大国就保证向希腊派出领事，并防止交战双方进一步冲突，但它们本身决不参加战争行动。一星期后发给大使和舰队司令们的训令几乎没有说明这一条款的模糊含义；但是海军上将科德林顿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处得到的对条款的解释，使他毫不怀疑必要时用武力也得迫使土耳其和解，他觉得这个任务很合他的胃口。大使们给舰队司令们的最后指令规定，“和平封锁”伯罗奔尼撒、希腊北部部分地区和“邻近”岛屿以及萨摩斯，最初还包括克里特。与此同时，《泰晤士报》未经许可就在7月12日公布了条约的全文，使舆论深信希腊已经获救。

坎宁的最后步骤是企图说服穆罕默德·阿里单独撤退埃及舰队和部队，从而消除战争的根源；但是在这次尝试失败之前，他已于8月8日去世了。希腊人同意停战，但在海上却没有遵行；正在等候君士坦丁堡命令的埃及和土耳其指挥官们就在陆地上大肆掳掠作为报复，并在他们舰只集结的纳瓦里诺湾设法突破封锁线，但未成功。法国的舰队司令想避免和埃及舰队发生冲突，因为有他的许多同胞在埃及舰队里服役，但是和易卜拉欣的一次会议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俄国的分遣舰队于6月离开喀琅施塔得，最后一个赶到那里，但是舰队司令告诉科德林顿，他认为沙皇已经宣战。科德林顿作为舰队最高司令，下令三支分遣舰队进入海湾，命令它们做好战斗准备，但不要首先开火。他个人的看法很简单：“这位殿下的舰队将在那儿结束它的战斗生涯。”10月2日随之发生的“战斗”击毁了大部分穆斯林的舰只。12天后当这一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大使们既没有奉命承认处于战争状态，甚至也没有接到离开的命令。土耳其人提出了怎么办都行，只要不公开承认“和希腊有任何联系的耻辱”，但是他们拒绝承认阿克曼协定，并宣布外国干涉违反穆罕默德的法典。于是三国大使在12月初

离开那里，俄国就在1828年春处于战争状态。其余两国大使1829年6月又回到那里，和奥地利、普鲁士一起设法挽救土耳其免遭意料中的崩溃；不过阿德里安堡和约中的那些宽厚条款是由沙皇的兵力枯竭而作出的决策。

如果坎宁不是首相，签订的伦敦条约就不会是那种形式；如果他还活着，那就很难设想他怎么能防止俄土战争，除非他使用英国舰队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压服土耳其同时又保护它。这个问题是他去世后的临时政府，和1828年1月任职的威灵顿所应付不了的。俄国人建议暂时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封锁海峡的两端，或者由于三个强国都和土耳其作战，就干脆“甚至侵入君士坦丁堡，在那儿结城下之盟”。这些措施的第一条，俄国能单独实行而且也做到了，它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达六年之久；至于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一事，由于英国坚持条约不准俄国在爱琴海作战而取消了；对于最后一条，他们单独进行，经过两次战役后几乎实现了。

威灵顿被人指责为优柔寡断，因为他签署了议定书而没有预见到其一切后果；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参与签订条约，而且，英国除非准备参加攻打土耳其的十字军（要不就是向俄国宣战），否则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实行拖延战术：履行条约中对待俄国的条款，仅此而已，然后解决希腊问题而又不显得一贯与土耳其作对。梅特涅赞同他的意见，认为一个独立的小希腊比一个也许会从属于俄国的大希腊好。他们的打算也许是气量狭小的，带有厌恶这个新国家的革命根源的色彩；驻在伯罗奔尼撒的法国军队（1828—1833年）虽能保证这一条约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贯彻，但是只有俄国的武力才能迫使苏丹默认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9月14日）的第10条。^[19]然而希腊人应该大大感谢坎宁在1826—1827年的大胆主动行动，它结束了地中海东部的六年混乱和海上私掠活动，对英国的利益也有好处。

对哈布斯堡君主国来说，其灾难性后果并没有像梅特涅预料的那么严重。不出四年它和俄国在明亨格列兹（1833年9月）就巴尔干半岛问题达成谅解，在此以后20年内部分恢复了保守同盟的核心地位。本章对普鲁士的情况几乎没有论及，因为它一般似乎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奥地利。柏林和维也纳一样渴望不和俄国公开争吵，它们甚至有更加重大的共同利益要使波兰人保持平静。至于在其他方面，普鲁士正忙于消化它最近获得的几个省份，悄悄地巩固它在德意志北部的势力。

自从1815年以来，主要发生纠纷的地区是地中海或者大西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对此是不会直接感兴趣的。但是在1829年8月，当欧洲认为俄国人可能即将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普鲁士政府采取了一次少有的主动行动，派一位将军做调解人，帮助沙皇在阿德里安堡与苏丹达成协议，它这样做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法国波旁政府对1829年的东方危机并没有导致全面修改维也纳的解决办法颇感失望，但不能说外交政策是查理十世在1830年倒台的原因。在15年内，法国恢复了它在大陆列强中的地位，曾经得到列强的同意（虽然不是用列强的名义）进军西班牙。它随同英、俄两国为了希腊而参加了纳瓦里诺海湾的封锁，并以这一“分裂派”同盟的名义占领伯罗奔尼撒；最后，在国内革命前夕，虽遇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参阅第十卷第427页），已经开始独自征服阿尔及利亚。这并不足以挽救旧制度，但是路易·菲利普和路易十八不同，一开始并没有因为有失败的兆头而受到阻碍：他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一意孤行和克制之间在欧洲找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来。

从1815年起，列强的“保守同盟”活跃了四年光景，又瘫痪了同样长的时间，到1825年已经濒临死亡；从1826—1827年起，要使怀有特殊目的、分离出来的三国同盟完全恢复已不可能。“神圣同盟”（不论是国王们的还是人民的），在19世纪初要比1789年前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各种思想的传播也更快和更广泛；但在实际上，各国政府并非全都是那么保守，人民也并非全都是那么革命，无法用那么简单的字眼来评断某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政治家们继续乞灵于“欧洲协约体”，用它不战而解决1830—1832年的比利时问题和1839—1841年地中海东部的问题。1830年后，这个“协约体”就像1814—1820年的同盟一样，起了保持力量平衡的作用，但不再那么敌视内部变革，而且比较乐于承认一些既成事实。它和同盟一样，不是一种超国家的指导欧洲的计划。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问题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不是能用一个单一的公式解决得了的。要保持和平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只要各国人民的发展阶段互相差异极大，或者只要一般战争的前景并非都是毁灭性的，那么一个以保持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组织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黄兰林 译）

[1] 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1815—1822年》（伦敦，1925年），第56页注中说明了在1815年以后人们喜欢采用“Conference”一词的理由，虽然现代人混用“Congress”和“Conference”两词，使二者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区别。大陆的历史学家们依然把这一时期各国君主参加的会议称为“Congress”，而且这种用法有某些方便之处。本章显然借重韦伯斯特的大著和H. W. V. 坦珀利的《坎宁的外交政策，1822—1827年》（伦敦，1925年），除个别场合外，不一一注明引用上述两书。

[2] 韦伯斯特：《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1812—1815年》（伦敦，1931年），第58页。

[3] 韦伯斯特：《卡斯尔雷，1815—1822年》，第153页。卡斯尔雷致利物浦函，1818年10月20日。

[4] 俄文草案中还提到“各国人民”，签署前经梅特涅提议，已加以修正。M. 布尔金：《神圣同盟史》（日内瓦，1954年），第134—135页。H. G. 申克：《拿破仑战争的后果》（伦敦，1947年），第37—38页。G. 德贝尔蒂埃·德索维尼在他的英文版《梅特涅和他的时代》（伦敦，1962年）第129—154页中，对使用“神圣同盟”一词和滥用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5] 例如可参阅《1814—1818年波佐·迪·博尔戈……和……涅谢尔罗杰的通信》，两卷集（巴黎，1890年）和1818年10月8日的俄国备忘录。有关文字转引自M. 布尔金：《神圣同盟史》（日内瓦，1954年），第11—12章。

[6] 与葡萄牙（1810年2月19日）和西班牙（1814年7月5日）签订的条约使英国在南美的贸易获得最优惠的待遇，并且排除了恢复以前的法—西旧“家族盟约”的任何可能性。与尼德兰（1814年8月13日）签订的条约，使英国拥有好望角和锡兰。

[7] 1816年1月1日给国外英国传教团的通函，全文见韦伯斯特：《卡斯尔雷，1815—1822年》，第509—512页。

[8] 1819年9月7日梅特涅已经私下里要求涅谢尔罗杰抵消他这位同僚的反奥影响。参阅韦伯斯特：《卡斯尔雷，1815—1822年》，第190页。

[9] 亚历山大的妻子是巴登大公的妹妹（巴登大公对某些有利于奥地利的决定感到不满）；亚历山大的妹妹原是奥尔登堡大公的遗孀，这时嫁给了符腾堡国王。

[10]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1819年11月21日递交英国的“皇帝对于德意志事务的旨意纲要”，见韦伯斯特：《卡斯尔雷，1815—1822年》，第193页。

[11] 1816年3月30日致其他四国通函，转引自J. H. 皮雷纳《神圣同盟史》，2卷集（纳沙特尔，1945年），第2卷，第87—88页。

[12] 全文见《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剑桥，1923年）第2卷，附录A，第622—633页。

[13] 然而1821年8月8日约瑟夫·普兰塔给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信里（见韦伯斯特：《卡斯尔雷，1815—1822年》，第582—584页）表明即使在外交部里，已经有人高兴地期待着俄国的胜利以及在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统治下包括爱奥尼亚群岛在内的独立的希腊王国了。

[14] 全文已由坦珀利在《坎宁的外交政策》中公之于世，见该书第114—118页。

[15] 过去10年间，英国和南美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贸易已增加到10倍，但是非常需要条约来加以保护和使之合法化。这时英国对南美的出口已不亚于对北美的出口了。

[16] 这篇演说第二天在《星报》（与坎宁的朋友有密切关系）上发表了，见坦珀利在《坎宁的外交政策》中公之于世，第579—585页，同时附有《坎宁演说集》（伦敦，1836年）中的修订稿，其中使用更夸张的词句：“我唤来新世界的出现以调整旧世界的平衡。”

[17] 1823年8月20日坎宁给巴戈特的信，鲍林的询问是在1824年1月10日。详见C. W. 克劳利《希腊独立问题》（剑桥，1930年），第30、35页。

[18] 1823年8月20日致巴戈特的信。C. W. 克劳利《希腊独立问题》（剑桥，1930年），第30页。

[19] 关于1832年以前希腊问题解决办法的概况，以及和约的一般影响，请参阅第十九章，原书第550—551页。关于威灵顿的政策，请参阅C. W. 克劳利《希腊独立问题》（剑桥，1930年），第8—12章。

附录 法兰西共和历说明

共和历于1793年9月20日提出，10月5日通过（11月24日作了某些修正）。该历法追溯到1792年9月22日，即共和国创建之日算起；由于这个原因，从未使用于元年。每月有30日，分为3旬（décades），每旬10日，分别为1日（Primedi）、2日（Duodi）、3日（Tridi）、4日（Quartidi）、5日（Quintidi）、6日（Sextidi）、7日（Septidi）、8日（Octidi）、9日（Novidi）、10日（Décadi），最后一日为休息日。每年年终增加5天，称为“补充日”（jours complémentaires），或称“无套裤汉日”（sansculottides）。每逢闰年（包括1800年前一年的共和七年，这年按格里历不是闰年）的前一年再加一个第6天，称为“革命日”（jour de la Révolution）。这样，按格里历算，共和历的年份开始于9月的不同日子，以下各月亦如此。因此，要想简要地列出完整的统一对照年表是不可能的，但在P. 卡隆编纂的《法国革命研究实用手册》（1912年版）第221—269页，或1947年版第281—286页（只适用于共和二年到八年）可以查到有关说明。下文列出每年的日期以及月份的顺序。月份开始的日期从格里历18日到24日各异。

年 份

〔元年	1792年9月22日—1793年9月21日〕
二年	1793年9月22日—1794年9月21日
三年	1794年9月22日—1795年9月22日
四年	1795年9月23日—1796年9月21日
五年	1796年9月22日—1797年9月21日
六年	1797年9月22日—1798年9月21日
七年	1798年9月22日—1799年9月22日
八年	1799年9月23日—1800年9月22日

九年	1800年9月23日—1801年9月22日
十年	1801年9月23日—1802年9月22日
十一年	1802年9月23日—1803年9月23日
十二年	1803年9月24日—1804年9月22日
十三年	1804年9月23日—1805年9月22日
十四年	1805年9月23日—

月 份

葡月	9—10月
雾月	10—11月
霜月	11—12月
雪月	12—1月
雨月	1—2月
风月	2—3月
芽月	3—4月
花月	4—5月
牧月	5—6月
获月（或穡月）	6—7月
热月	7—8月
果月	8—9月

每日也都有各自的名称，以对人有用的植物和水果、家畜、农具或农产品命名。法令第十一条规定每日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每分100“秒”。赠给国民公会一座“十进制时钟”，装在讲坛正下方马拉半身塑像的下面。但法令的这一部分始终未付诸实施。这个历法不仅具有平民和共和的特色，而且具有说教目的（作为“非基督教化”计划的一部分），这可以从《议会档案》中记录的1793年9月20日；10月5、6、18、24日；11月5、7、24日的讲话中明显地看出。这

些讲话指出共和国创建（1792年9月22日）和平等时代开始的时间正好是秋分，即阳光均等地照射两极的时候。1793年11月10日，国民公会在门前接待了一个无套裤汉代表团，要求废除国家发给教士的薪俸；代表团还带来一位身着古装的女演员，象征自由。国民公会成员随代表团的行列返回以前的圣母院教堂，以表示他们支持人民，并在该教堂高唱赞美自由的圣歌。

根据1802年4月的政教协定，正式恢复礼拜日为休息日；1806年1月1日（共和十四年雪月11日）法律规定恢复格里历时，共和历已经有很长时间停止通用。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aland Islands, 奥兰群岛, 1809年由瑞典割让给俄国, 487

Aasen, Ivar, 奥森, 伊瓦尔, 语言学家, 494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Earl of,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 国务活动家, 639

Abo (now Turku), 阿博(今图尔库), 俄国沙皇和瑞典国王在此会晤(1812年), 489

Aboukir, 阿布基尔, 1799年法国在此战胜土耳其人, 310

Aboukir Bay, battle of, 阿布基尔湾战役, 见Nile, battle of the条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见Ethiopia条

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科学院, 120

Academies, 研究院, 法国国民公会取消各研究院, 119 参见 Sciences, Academies of 条

Acre, 阿克尔, 1799年被拿破仑包围, 310, 531

Acte finale of Congress of Vienna (1815年), 维也纳会议最后文件, 648, 655, 658, 664

Adam, Rev. William, 亚当牧师, 威廉, 在印度的传教士, 568

Adams, John Quincy, 亚当斯, 约翰·昆西, 美国国务活动家

联邦党人, 后为国家共和派, 602, 603

任门罗总统政府的国务卿, 88, 591, 595, 637, 668, 682

任总统, 598, 605

Adams-Onís Treaty, 亚当斯-奥尼斯条约, 西班牙将东佛罗里达转让给美国 (1819年), 595

Addington, Henry, Viscount Sidmouth, 阿丁顿, 亨利, 西德默思子爵, 国务活动家, 177, 261, 263

对西班牙的看法, 452, 455

Aden, 阿登, 被美国兼并 (1838—1839年), 10, 532

Admiralty Board of, 海军部, 80

Adrianople, Treaty of, 俄土阿德里安堡和约 (1829年), 550, 668, 688—690

涉及巴尔干国家的条款, 9, 543, 689

advertisements, and growth of press, 广告与新闻事业的发展, 191

Afghanistan, 阿富汗, 入侵印度的威胁, 553, 554

Afrancesados, 亲法派 (西班牙主张与法国合作的分子)

费迪南国王是第一个亲法派, 444

往往是自由主义者, 446, 447, 453

以后均被排除任职, 449, 451

Afric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urope with, 欧洲与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572—590

Africa, 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on British Settlements on the West Coast of (1865年), 下院小型特别委员会关于英国在非洲西海岸殖民地的报告 (1865年), 584

African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非洲协会 (非洲内地发现促进协会), 582

Agenda, “礼拜仪式”,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为宗教仪式制定的程序, 177

agriculture, 农业, 31, 33—37

在澳大利亚, 51, 403, 406

在比利时, 54

在英国, 6, 43, 44

在法国, 56, 329

在荷兰, 56

在匈牙利, 35, 51, 403

在意大利, 48, 413, 435—436

在葡萄牙, 442—443

在普鲁士, 368—369, 376—378

在俄国, 50

在斯堪的纳维亚, 51—52

在西班牙, 49, 442—443

“Aid thyself and Heaven will aid thee” Society, “天助自助者”协会（法国）, 189

Ainsworth, Thomas, 安斯沃思, 托马斯, 工程师, 477

Aix-la-Chapelle, Congress of Allies at, 反法联盟国家亚琛会议（1818年）, 492, 669, 670

罗伯特·欧文在亚琛会议上, 111

Akkerman, Convention of, 俄土阿克曼协定（1826年）, 543, 549, 687

土耳其拒绝履行协定, 550, 688

Aksakov, S. T., 阿克萨科夫, 谢·季, 斯拉夫派, 540

Alabama, cotton lands of, 亚拉巴马的棉田, 594, 596

Alaska, Russian-American Company in, 在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

Alba, 阿尔巴, 在皮埃蒙特的共和国, 416

Albani, J., 阿尔巴尼, 红衣主教, 174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省份, 529;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雇佣军, 533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俄国沙皇

即位以前, 502, 503, 505

即位, 259, 506

在位期间, 18, 19, 506—521各处

与拿破仑的关系, 21—22, 265

同情波兰, 503, 512, 516, 649, 665

对兰开斯特的教育制度感兴趣, 206

改信圣经神秘主义, 169, 192, 516

最后参加反拿破仑的联盟, 639—645各处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667各处

在国际关系方面(1815—1825年), 21, 268, 668—674各处

Alexander, 亚历山大, 奥地利大公, 匈牙利总督, 397, 401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被法国人占领(1797年), 530

被英国占领(1801—1803年), 263, 533

暂时被英国重占(1807年), 533

Alexandrov Factory, 亚历山德罗夫工厂(圣彼得堡), 521, 523

Alfieri, Count Vittorio, 阿尔菲耶里伯爵, 维托里奥, 剧作家, 92, 332

al fresco technique in music, 音乐中的露天方式, 239

Algarotti, Francesco, 阿尔加罗蒂, 弗朗切斯科, 建筑家, 223

Algiers, 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的海盗, 89, 603, 673

 法国征服阿尔及尔, 354, 355, 528, 690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 (美国, 1798年), 602—603, 607

Aligarh, 阿利加尔, 被英国人占领, 555

Ali, 阿里, 亚尼纳帕夏, 530, 535, 545, 546, 547

Allemand, Z. J., T, 阿勒芒, 法国海军上将, 325

Allgemeine Preussische Staatszeitung,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190

Allgemeine Zeitung, 《总汇报》, 184, 186, 190, 191

Alsace, 阿尔萨斯, 德意志王公在阿尔萨斯的领地, 252

Altenstein, Karl von Stein zum, 阿尔滕施泰因, 卡尔·冯·施泰因·楚姆,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教育部长, 196, 207—208

 在改革文官制度的委员会中, 378, 380

amalgam, “合并”, 比利时与荷兰联合 (1814年) 的目的, 473

amalgame, “混编”, 1793—1794年法国旧军队与新军队的合并, 63

American Colonisation Society, 美国殖民协会, 583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学会, 161

“American System” of Henry Clay, 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 600, 602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美国独立战争, 71, 76, 333, 611

独立战争中北方的武装中立，250—258，481，482，672

荷兰的干预，462

Amiens, Treaty of, 英法亚眠条约（1802年），21，261，299，300，311，323，469

Amis du Peuple, “人民之友社”，19世纪30年代法国共和派团体，359

Ampère, A. M., 安培，安德烈·玛丽，物理学家，28，134，135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金融中心，46

由于大陆封锁而衰败，303

在尼德兰联合王国中，477

人口，32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115；“无套裤汉”的无政府主义，282，29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地区的大部分，529

Ancona, 安科纳

教皇管辖的港口，1805年被法国人占领，156

教皇管辖的边境城市，1808年并入意大利王国，424，438

Andrada y Silva, J. B. de, 安德拉达·埃·席尔瓦，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的顾问，631

Andrade, Gomes Freire d', 安德拉德，戈麦斯·弗莱雷·德，葡萄牙自由主义殉道者，448

Angers, David d', 昂热，大卫·德，雕塑家，222

Anglo-Russian Protocol, 英俄议定书，1826年关于解决希腊问题的计划，549，687

Angostura (Ciudad Bolival), 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城), 玻利瓦尔在此的基地, 624

Angoulême, Louis Antoine de Bourbon, Duc, d', 昂古莱姆公爵, 路易·安托万·德·波旁(查理十世之子), 法国将军, 450, 451

Anjala, League of, 安亚拉同盟, 1788年瑞典贵族的阴谋活动, 481, 483

Anmärkaren, 《阿梅卡伦报》, 瑞典自由主义报纸, 192

Annali Universali di Statistica, 《世界统计年鉴》, 191

Angola, 安哥拉, 葡萄牙殖民地, 572, 578, 587

Anquetil-Duperron, A.H., 昂克蒂尔-迪佩隆, 亚伯拉罕·亚森特, 《奥义书》的译者, 569

Antologia, 《文萃》, 意大利期刊, 191

Antwerp, 安特卫普

商业和金融中心, 54, 56

港口, 56, 469

在荷兰统治下, 477, 640, 645

Appenzeller Zeitung, 《阿彭策尔报》, 瑞士自由主义报纸, 191

Apponyi, Count George, 阿波尼伯爵, 格奥尔吉, 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407

Arab power on East Coast of Africa, 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势力, 572, 576—577

奴隶和象牙贸易, 586, 588—590

Aragon, feudalism in, 阿拉贡的封建主义, 440

Arakan, 若开, 被缅甸征服, 559; 被英国征服, 560

Arakcheev, Count A. A. , 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阿·安,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508, 511, 518, 519, 520

他的品格, 19, 505—506, 517

Aranjuez, Treaty of, 法西阿兰胡埃斯条约(1801年), 260, 438

阿兰胡埃斯暴动(1808年), 443

阿兰胡埃斯中央洪达(1808年), 614

architecture, 建筑, 222—228

Archives philosophiques, 《哲学文献》, 188

Argentina, 阿根廷, 见Rio de la Plata条

Argüelles, Agustin, 阿圭列斯, 阿古斯丁, 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445

Argus, 《守卫报》, 瑞典自由主义报纸, 192

Armed Neutrality of the North, 北方的武装中立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250, 481, 482, 672

1800年再次出现, 258, 484, 531, 672

Armenia, 亚美尼亚, 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利益, 527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 527, 528

armies, 陆军, 60—70

奥地利的, 333

英国的, 73

埃及的, 534

法国的, 61—65, 73, 312, 341, 346

普鲁士的, 65—66, 76, 333, 368—369, 375, 382

俄国的, 504—505, 671—672

Arndt, E.M., 阿恩特, 恩·莫, 时事评论家和诗人, 91, 332

Arnim, Achim von, 阿尔尼姆, 阿希姆·冯, 德国作家, 187, 249

Arnold, Thomas, 阿诺德, 托马斯, 拉格比公学校长, 178, 201

Arrivabene, Giovanni, 阿里瓦贝内, 乔瓦尼, 意大利自由主义政治家, 435

Arseniev, K.I., 阿尔谢尼耶夫, 康·伊, 俄国统计学家, 496

Artigas, J.G., 阿蒂加斯, 何·赫, 东岸地带游击战争领袖, 619, 620, 629

artillery, 火炮, 67—69; 法国的火炮, 252, 312; 海军炮, 83

Ascension Island, 阿森松岛, 英国通向东方道路上的基地, 10, 90

arts in Europe, 欧洲的艺术, 209—249

Ashanti, 阿散蒂, 非洲内陆强国, 584, 585

Asia, South and South-East, 南亚和东南亚, 欧洲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 552—571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加拉亚洲学会, 553, 569

Aspern, 阿斯佩恩, 1809年奥地利在此战胜法国人, 207, 400

Assam, 阿萨姆, 英国在缅甸战争中获得阿萨姆, 560

assassination, 暗杀活动, 俄国进行改革的方式, 506, 520

assignats, 指券

 法国的指券, 281; 指券的贬值, 13, 282, 285, 289, 464

 俄国的指券, 514, 523

Asturias, Junta of, 阿斯图里亚斯政务会(洪达), 445

Asunción, 亚松森, 拒绝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力, 619

audiencia, 检审法院, 查尔卡斯的检审法院, 615; 墨西哥城的检审法院, 614, 634

auditeurs, 协理专员, 拿破仑任命的协理专员, 318, 319, 321

Auerstadt, 奥尔施泰特, 1806年法国在此战胜普鲁士人, 268, 376

Augereau, P. E. C., 奥热罗, 皮埃尔·弗朗索瓦·夏尔, 法国元帅, 309, 311

他的希腊妻子, 530

Augsburg, 奥格斯堡, 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186

Austerlitz, 奥斯特利茨, 1805年法国在奥斯特利茨战胜奥俄联军, 75, 266, 313

Austin, Stephen, 奥斯丁, 斯蒂芬, 在得克萨斯的殖民活动, 594

Australia, 澳大利亚

英国人在澳大利亚, 10

法国人在澳大利亚南海岸的探险, 261—262

Austria, 奥地利, 395—411

占领贝尔格莱德 (1719—1739年), 541

参与瓜分波兰 (1772年以后), 见Poland条

在德意志各邦获得领土 (1779年), 251

约瑟夫二世 (1780—1790年) 和利奥波德二世 (1790—1792年) 两皇帝在位期间, 252, 395—396

与普鲁士达成协议 (1790年), 252

与土耳其媾和 (1791年), 252, 541

与普鲁士一起宣称路易十六治下的形势与欧洲各国的利益攸关; 入侵法国; 在瓦尔米败北 (1792年), 253

弗兰茨皇帝在位期间（1792—1835年），395—405

参加第一次反法联盟；丧失尼德兰（1793年），254—255

“雅各宾党人”在奥地利的阴谋活动（1794年），396

在意大利被拿破仑击败（1796—1797年）；坎波福米奥和约，255，309，388，415—416

参加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年）；在瑞士和意大利败北，294

从英国获得补助（1800年），259

在马伦戈和霍恩林登被法国人击败（1800年）；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259，299，388，420，438

同意德意志各邦重新调整（1802年），263

与俄国签订防御条约（1804年），266

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在奥斯特利茨和乌尔姆败北；法军进入维也纳（1805年），266—267；普雷斯堡和约，267，399

企图发动反对法国的解放战争；在瓦格拉姆败北；申布龙和约（1809年），270，400

割让领土；成为法国的同盟国（1810年），270—271

财政困难（1811年），401—402

同意派军队与俄国作战（1812年），271

试图在拿破仑与联盟军之间进行斡旋（1813年），272—273

参加第四次反法联盟；向法国宣战（1813年），273，639

在维也纳会议上，402—403，640，643，646—647，664；关于赔偿的谈判，648—658；在意大利重新建立统治，8，657—658，664；在滑铁卢战役中，660

在意大利的统治（1815—1830年），8，17，403，404，409，428—429，434—435

干涉那不勒斯，16，432—433，675—677

斐迪南皇帝由摄政会议辅佐（1835年），405—406

社会问题，406—407

奥地利版图内的民族运动（1830—1848年），16，407—411

人口，32，406

Austrian Netherlands，奥属尼德兰，252，254—255，462—464，参见Belgium条

Avenir, L'，《前途报》，法国天主教自由派报纸，173，360

Avignon，阿维尼翁，被法国兼并，252；继续保持（1814年），644

Avogadro, Americo，阿伏伽德罗，阿梅里科，物理学家，135

Ayacucho，阿亚库乔，西班牙驻南美的最后一位总督在阿亚库乔的失败（1824年），627

Baader, F.X.von，巴德尔，F.X.冯，神学教授，110，162—163，516

Babbage, Charles，巴贝奇，查尔斯，数学家，129

Babeuf, F.N.，巴贝夫，F.N.，新闻记者和政治鼓动家，59，279，416

平均主义者，95，115，288—289

Bacciochi, Elisa (*née* Bonaparte)，巴乔基，埃利兹（娘家姓波拿巴），126，302，438

Bach family，巴赫家族，作曲家，231，233，236，245，246

Bacon, Francis，培根，弗朗西斯，哲学家，141

Baden, Margrvate，巴登侯爵领地，后为大公国（1803年）

参加反法联盟（1793年），254

被迫撤退并纳贡（1796年），388

在法国帮助下，从教会诸邦获得土地（1803年），155，260，262，388；获得并改组海得尔堡大学，195，391；使行政管理现代化，390—391

当甘公爵在巴登被捕（1804年），265

成为与法国联盟的主权国家（1806年），267

因巴黎和约而增强（1814年），664

宪法（1818年），16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821年），170；同俄国的王朝联系，673页注

Baer, Karl von, 贝尔，卡尔·冯，生物学家，138

Bagdad, 巴格达，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532

Baggesen, Jens, 巴格森，扬斯，诗人，100

Bagot, Sir Charles, 巴戈特爵士，查尔斯，驻美大使，595

Baji Rao, 巴吉·劳，帕什瓦，555

Baker, Samuel W., 贝克，塞缪尔，非洲探险家，588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11，250—274

卡斯尔雷和势力均衡，652

塔列朗和势力均衡，330，653

在肖蒙条约中，641，642，665

1830年以后，690

Balbo, Count Cesare, 巴尔博伯爵，切萨雷，皮埃蒙特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家，434，437

Baldacci, 巴尔达齐，皇帝弗兰茨一世的顾问，399

Bale Peace of, 巴塞尔和约，法国和普鲁士签订（1795年），255，367，387

Balkans, 巴尔干国家，535—551见各有关国家条

Ballesteros, Francisco, 巴列斯特罗斯, 弗朗西斯科, 西班牙政治家, 447, 449, 452

ballon corps, 法国陆军的气球队, 144, 281, 312

Baltic provinces of Russia, Germans of, 俄国波罗的各省的日耳曼人, 498, 511, 517, 518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要求波罗的海中立 (1794年), 484

拿破仑企图封锁, 82

Banda Oriental, 东部地带 (一度成为巴西的内普拉蒂诺省; 后为乌拉圭), 618, 630, 632

banks and banking, 银行和银行业, 6, 46—47

奥地利的, 403

比利时的, 55

巴西的, 612, 631

英国的, 42, 329; 与北美的关系, 596; 与南美的关系, 636;
与西班牙的关系, 452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629

法国的, 298, 300, 319, 452

意大利的, 436

尼德兰王国的, 477

普鲁士的, 378

俄国的, 504, 523

美国的, 600, 605, 607, 609

桑给巴尔的, 576—577

Bankozettel (奥地利) 纸券 (国库券), 401—402

“banquet campaign” in France (1847—1848年)，法国的“宴会运动” (1847—1848年)，365

Bantu people, 班图人, 575, 576, 587

Barbary pirates, 北非海盗, 673

参见Algiers条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浸礼会, 165

Baptist preachers in United States, 美国的浸礼会传教士, 166

Barbès, Armand, 巴尔贝, 阿芒, 社会主义者, 279

Barcelona, 巴塞罗那

人口, 32

工业, 50

暴民, 444, 459

资产阶级, 455

Barclay de Tolly, Prince M.B., 巴克莱·德·托利亲王, M.B., 俄国陆军元帅, 515

Barère de Vieuzac, Bertrand, 巴雷尔·德·维厄扎克, 贝特朗,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委员, 100, 279

Bargash, 巴尔加什, 桑给巴尔苏丹, 590

Barham, Lord (Charles Middleton), 巴勒姆勋爵 (查理·米德尔顿), 英国海军上将, 80, 81, 325

Barhampur, Treaty of, 布尔汉普尔条约, 英国和辛地亚签订, 556

Baring, Alexander, 巴林, 亚历山大, 商人银行家, 596

Baring, house of, 巴林家族, 伦敦银行家, 346

Barlow, Joel, 巴洛, 乔尔, 《哥伦比亚德》作者, 610

Barnes, Thomas, 巴恩斯, 托马斯, 《泰晤士报》编辑, 182

Barras, Comte P.F.N. de, 巴拉斯伯爵, P.F.N. de, 法国第一届督政府督政官, 288, 290

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293, 295

与拿破仑, 308, 309

Barry, Sir Charles, 巴里爵士, 查尔斯, 建筑家, 228

Barth, Heinrich, 巴尔特, 海因里希, 去苏丹的探险家, 582

Barthélemy, Marquis F. de, 巴泰勒米侯爵, 法国督政府督政官, 289

Barye, A.L., 巴里, A.L., 雕塑家, 222

Basque provinces of Spain, 西班牙的巴斯克诸省

贵族人数增加, 440

以工业发展和王室正统主义政治活动著称, 442

自治的权利, 452, 460

Basra, 巴士拉, 英国驻巴士拉领事, 532

Bassein, Treaty of, 伯塞恩条约, 帕什瓦巴吉·劳与英国签订(1802年), 555, 557

Basutoland, 巴苏陀兰, 向传教活动开放, 587

Bat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

法国保护国, 255, 256, 465

政变, 294

宪法, 466

参看Holland条

Bautain, L.E.M., 博坦, L.E.M., 拉梅内的弟子, 162

Bautzen, 鲍岑, 法国在此战胜普鲁士人和俄国人(1813年),

Bauwens, Lievin, 鲍温斯, 利文, 棉纺厂主, 468

Bavaria, 巴伐利亚, 选帝侯领地, 后为王国 (1806年)

建立科学院 (1759年), 390

参加反法联盟 (1793年), 254

改革, 在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二世和冯·蒙特格拉斯领导下 (1799年), 390

拿破仑与巴伐利亚 (1802年), 260作为法国保护国, 从教会诸邦获得领土 (1802年), 155, 262, 388, 389

该地的《总汇报》 (1803年), 186, 190

成为主权国家, 与法国联盟 (1806年), 267

国王的女儿嫁给欧仁·博阿尔内 (1806年), 21

军队抛弃拿破仑 (1813年), 273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 654, 664

《莱茵报道》遭禁止 (1815年), 187;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 (1817年), 170; 宪法 (1818年), 16

给予非天主教徒平等公民权利的法令 (1818年), 171

慕尼黑的大学 (1826年), 195

中小学里的古典课程, 196

Baxter, Richard, 巴克斯特, 理查德, 神学家, 98

Baylen, 贝伦, 西班牙在此战胜法国 (1808年), 327, 334, 335

Bayonne, 巴荣纳, 拿破仑在此会晤西班牙王族 (1808年), 335, 444

Bazard, Saint-Amand, 巴扎尔, 圣阿芒, 社会主义改革家, 114

Beauharnais, Eugene de, 博阿尔内, 欧仁·德, 拿破仑的继子

意大利王国总督, 302, 320, 331, 421

改组意大利研究院, 126

被奥地利人击败（1814年），427，428

Beccaria, Cesare, 贝卡里亚, 切萨雷, 经济学家和法律改革家, 12

Bechuanaland, 贝专纳兰, 布尔共和国与卡拉哈里沙漠之间的走廊, 587

Becker, R. Z., 贝克尔, R. Z., 《德意志国民日报》编辑, 186

Beecher, Lyman, 比彻, 莱曼, 德怀特的朋友, 166, 176

Beechey, William, 比切, 威廉, 画家, 216

Beecroft, John, 比克罗夫特, 约翰, 驻几内亚湾领事, 585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 作曲家, 30, 228—244各处, 246, 647

拒绝将交响曲献给拿破仑, 234, 304, 331

Bekleshev, A. A., 别克列舍夫, 俄国政治家, 507

Bélangier, F. J., 贝朗热, F. J., 建筑师, 224

Belgium, 比利时

反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1780—1790年），462—463, 467

成立比利时合众国；被奥地利人推翻（1790年），252, 463

在法军进入后投票表决加入法国（1792年），277, 464

并入法国（1795年），309, 464

在法国统治下, 158, 464—465, 466—469

反对法国统治的暴乱被镇压（1798年），467

拿破仑拒绝同英国讨论（1802年），261

联盟国占领；保守的临时政府（1813—1814年），472

同荷兰联合成为尼德兰王国（1814年），18, 54, 473, 640, 644, 645, 664；在荷兰国王统治下, 474—479

独立（1830年），479, 690

参看Austrian Netherlands条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首都, 409

被奥地利占领（1719—1739年），541；被土耳其占领（1813年），542

Belgrade, Treaty of, 贝尔格莱德条约，俄国和土耳其签订（1812年），674

Bell, Andrew, 贝尔，安德鲁，教育家，27，202，206，207

Benezet, Anthony, 贝内泽，安东尼，慈善家，98

Bennigsen, Count L.A.von, 本尼格森伯爵，L.A. 冯，俄国将军，504

Bentham, Jeremy, 边沁，杰里米，功利主义哲学家，12

他的书信，24，569

提倡妇女解放，96

教育思想，194，201，207

Bentham, Sir Samuel, 边沁爵士，塞缪尔，海军工程监督，81—82

Bentinck, Lord William Cavendish, 本廷克勋爵，威廉·卡文迪什

在西西里，426—427，428

在印度，26，567，571

Beratlis, 希腊的特权购买者，545

Berbice, 伯比斯，荷兰让与英国（1814年），473

Berchet, Giovanni, 贝尔歇，乔瓦尼，诗人，435，436

Beresford, William Carr, Viscount, 贝雷斯福德子爵，威廉·卡尔驻葡萄牙的将军，448

Berg, 贝格, 拿破仑建立的德意志邦, 389

Berlin, 柏林

音乐中心, 229, 245

拿破仑在柏林 (1806年), 127, 268

人口, 32

柏林大学, 28, 127—129, 195, 386—387

Berlin, Congress of (1878年), 柏林会议 (1878年), 669

Berlin Decree, 柏林敕令, 宣布大陆“封锁” (1806年), 326, 327, 485

Berliner Abendblätter, 《柏林晚报》, 186

Berlioz, Hector, 柏辽兹, 赫克托, 作曲家, 229, 244

Bernadotte, J. B., 贝纳多特, J. B., 法国元帅, 320

第三届督政府陆军部长, 293, 294, 310

在吕贝克 (1806年), 485; 在日德兰 (1808年), 486

任瑞典王储和国王, 参看Charles XIV John条

Bernard, Claude, 贝尔纳, 克洛德, 生理学家, 138

Bernstorff, A. P., 贝恩斯托夫, A. P., 丹麦政治家, 482

Berr, Cerf, 贝尔, 塞尔夫, 犹太时事评论家, 97

Berry, Charles Ferdinand d' Artois, Duc de, 贝里公爵, 查理·费迪南德·达尔特瓦, 查理十世之子

遭暗杀, 347

遗腹子, 348

遗孀, 358—359

Berryer, A. P., 贝里耶, A. P., 法国保王派演说家, 359

Berthier, L.A. , 贝尔蒂埃, L.A. , 法国元帅, 拿破仑的参谋长, 151, 313, 320, 325

Berthollet, Comte C.L. , 贝托莱伯爵, 化学家, 121, 125, 126, 144

Bertin brothers, 贝尔坦兄弟, 《辩论报》编辑, 185

Berzelius, J.J. , 贝采利乌斯, J.J. , 化学家, 28, 125, 135—136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被俄国兼并 (1812年) , 9, 495, 522, 537, 664

Bestuzhev, A.A. , 别斯图热夫, A.A. , 俄国十二月党人, 520

Beurnonville, Pierre de Ruel, Marquis de, 博浓维尔侯爵, 皮埃尔·德·吕埃尔, 法国将军, 277

Beyle, Marie Henri (Stendhal) , 贝尔, 玛丽·亨利 (司汤达) , 作家, 24, 91, 103, 321

Beyme, K.F.von, 拜姆, 普鲁士政治家, 373, 375, 378, 379

Bezborodko, Prince A.A. , 别兹博罗德科亲王, A.A. , 俄国国务大臣, 505

Bible Societies, 圣经会, 164—165, 192

biblical criticism, 圣经评论, 167—168, 178

Bichat, M.F.X. , 比沙, M.F.X. , 生物学家, 28, 137

“Biedermeier” period, “比德迈风格”时期, 393, 404

Billaud-Varenne, J.N. , 比洛-瓦雷纳,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biology, 生物学, 128—129, 136—139

Birmingham, 伯明翰, 和非洲的贸易, 578

bishops, 主教

主教的任命，在法国，153，154；在德意志，158—159；在南
美，172；在尼德兰联合省，474

逃亡者，151，152，468

在法国被封为贵族，349

参看prince-bishops条

Bismarck-Schönausen, Prince Otto von, 俾斯麦-舍恩豪森亲
王，奥托·冯，164，664

Black, James, 布莱克，詹姆斯，新闻记者，183

Blake, William, 布莱克，威廉，诗人和画家，216—217

Blanc, Louis, 勃朗，路易，历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115，
279，360

Blane, Sir Gilbert, 布兰爵士，吉尔伯特，海军军医，87

Blanqui, L. A. , 布朗基，L. A. , 革命家，40，115

blockade, 封锁，英国对法国港口的封锁，77，324；对斯堪的纳
维亚的封锁，488；对美国的影响，611

blockade, continental, 大陆封锁，见Continental System条

Blücher, G. L. von, 布吕歇尔，G. L. 冯，普鲁士将军

在滑铁卢战役中，313，314，315

在巴黎，342，661

在伦敦，644

Boers, 布尔人，布尔共和国，575—576，586，587

Bohe mia, 波希米亚，51，406，410，411

Boigne, Comte Benoît de, 布瓦内伯爵，贝努瓦·德，在印度进
行冒险活动的法国军人，555

Bolivar, Simón, 玻利瓦尔，西蒙，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解放者，
621，622，624—628

旨在建立南美联邦，20，684

Bolivia, Republic, 玻利维亚共和国，627

Bolzano, Bernard, 博尔扎诺，贝尔纳德，天主教哲学家，116

Bombay, 孟买，商人阶级，553

Bonald, Comte L. G. A. de, 博纳尔伯爵，L. G. A. 德，天主教正统主义者

在18世纪90年代，11

在帝国时期，106，304

复辟以后，161，323，345

Bonaparte, Caroline, 波拿巴，卡罗利娜（缪拉之妻），拿破仑之妹，320

Bonaparte, Charlotte, 波拿巴，夏洛特，吕西安之女，320

Bonaparte, Elisa, 波拿巴，埃利兹（巴乔基之妻），拿破仑之妹，卢卡和皮昂比诺的统治者，126，302，438

Bonaparte, Jerome, 波拿巴，热罗姆，拿破仑之弟，威斯特法利亚国王，271，302，320，331

军团司令，321

Bonaparte, Joseph, 波拿巴，约瑟夫，拿破仑之兄

谈判亚眠条约（1802年），261

那不勒斯国王（1806年），267，320，331，438

西班牙国王（1808年），269，302，320，335，336，613；西班牙人对他的态度，444，447；南美殖民地对他的态度，327，614；解散各种修会（1809年），158

Bonaparte, Louis, 波拿巴，路易，拿破仑之弟，荷兰国王（1806年），267，302，317，320

不同拿破仑合作；退位（1810年），470—471

Bonaparte, Lucien, 波拿巴, 吕西安, 拿破仑之弟, 293, 295, 320

Bonaparte, Napoleon, 波拿巴, 拿破仑, 见 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条

Bonn university of, 波恩大学, 174, 195

Bordeaux, 波尔多

为大陆封锁所毁, 303, 329

人口, 339

Börne, Ludwig, 博尔内, 路德维希, 德意志新闻记者, 191

Borodino, 博罗季诺, 俄国人在此坚守抗击法军 (1812年), 312, 313, 515

Bosch, Johannes van den, 博斯, 约翰内斯·范·登, 爪哇总督, 564

Bosnia, 波斯尼亚, 土耳其省份, 258, 528

Boston, 波士顿, 127, 606

Boston Associates, 波士顿联合公司, 弗朗西斯·洛厄尔的公司, 601

Bothnia, West, 西波的尼亚, 瑞典让与俄国 (1809年), 487

Bouilly, J.N., 布伊, J.N., 歌词作者, 239

Boullée, E.L., 部雷, E.L., 建筑师, 223, 224

Boulton and Watt, 博尔顿和瓦特蒸汽机, 329

Bourbon, house of, 波旁王室

在法国, 复辟; 6, 175, 428, 640—643, 665, 666

在那不勒斯, 418, 426, 428, 657, 658

在帕尔马, 479

在西班牙, 335, 440

在南美的计划，615，679—680

Bourcet, P. J. , 布尔塞, P. J. , 军事思想家, 311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15

奥地利的, 398

法国的, 在大革命时期, 275, 319; 在国民公会时期, 276, 278, 285; 在督政府时期, 288, 293, 294; 在拿破仑时期, 321, 330; 在路易十八时期, 340; 在查理十世时期, 355; 在路易·菲利普时期, 357—358

德意志的, 392; 在德意志作家的作品中, 371—372

意大利的, 422—423

资产阶级与音乐, 228

资产阶级与报纸, 179, 182

普鲁士的, 369

俄国的, 494

西班牙的, 49, 336, 441—442, 455, 457

Bourmont, L. A. V. , Comte de Ghaisne de, 布尔蒙, L. A. V. 盖斯纳伯爵, 法国将军, 313, 354

Bourquin, Louis, 布尔坎, 路易, 在印度的法国军官, 555

Bourrienne, L. A. F. de, 布尔里埃内, L. A. F. 德, 法国外交家, 317

Boves, J. T. , 博维斯, J. T. , 保王派平原部落人的领袖 (1814年), 622

Bowring, Sir John, 鲍林爵士, 约翰, 作家和旅行家, 48, 686

Boyaca, 博亚卡, 玻利瓦尔于此战胜西班牙军 (1819年), 625

boyars, 多瑙河两公国受封的地主, 536, 537, 538, 539

Boyer, J.P., 布瓦耶, J.P., 海地和圣多明各的混血儿统治者, 633

Braganza, house of, 布拉干萨王室, 612, 631

Brahmans, 波罗门, 561

Brahmo Samaj (Divine Society) of Ram Mohan Roy, 拉姆·摩罕·罗易创立的梵社, 568—569

Brandes, Ernst, 布兰德斯, 恩斯特, 汉诺威官员, 374

Brazil, 巴西

葡萄牙王室逃往巴西 (1807—1808年), 269, 327, 612

建立与葡萄牙相等的王国 (1815年), 612

征服东部地带 (1816年), 619—620

脱离葡萄牙 (1822年), 612, 675, 684; 并建立帝国, 630—632, 675

为争夺东部地带与拉普拉塔河联合省交战 (1825—1828年), 630, 632

对葡贸易, 442, 448; 对安哥拉贸易, 578

英巴条约 (1826、1827年), 632, 638

奴隶贸易和巴西, 579, 581, 632

Breitkopf and Haertel of Leipzig, 莱比锡的布顿特科普夫和黑特尔, 乐谱出版商, 234, 246

Brentano, Clemens, 布伦坦诺, 克莱门斯, 德意志民歌搜集家, 249

Brescia, 布里西亚, 军火工业, 424

Brethren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France), 基督教学校兄弟会 (法国), 207

Bretschneider, K.G., 布雷特施奈德, 圣经评论家, 167

Britain, 英国

人口, 32, 251

工业发展, 39—40, 40—47

英丹(麦)条约(1780年), 481

英法商务(伊登)条约(1786年), 262

法国对英宣战(1793年), 254; 第一次联盟, 277

夺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船只(1793—1794年), 484

夺取荷兰海外领地(1795—1796年), 225, 575

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受到损害(1796年), 415, 416

反丹麦活动(1798年), 484; 第二次联盟, 256—258, 530

尼罗河战役(1799年), 310; 企图入侵荷兰(伙同俄国),
257, 294

始终单独反对法国扩张(1800—1801年), 258

把法国人逐出埃及(1801—1802年), 531—532

英法亚眠条约(1802年), 261; 贸易下降, 262, 300

对法国宣战(1803年), 263, 264, 485

第三次联盟(1805年), 265—266, 485

特拉发尔加海战; 消除拿破仑入侵的可能性(1805年), 77,
80, 267, 326

同拿破仑谈判(1806年), 267

拿破仑与英国, 323—326; 反英的大陆体系, 326—330

反丹麦的行动; 夺取赫尔戈兰岛(1807年), 269, 486

废除奴隶贸易(1807年), 98—99, 578

协助西班牙反拿破仑(1808—1814年), 269, 334, 335,
613, 639

瑞典被迫对英宣战（1810年），489

经济困难（1810—1811年），328

与美国的战争（1812—1814年），10，20，89，271，328，611，671

与俄国恢复友好关系（1812年），271，272

英普同盟（1813年），272

第四次联盟，272，305，639—646各处；维也纳会议，646—667各处

最富有和最稳定的大国（1815年），6—7

国际关系（1815—1830年），668—690各处

与南美各共和国的关系，629，630，632，637；士兵和水手为南美战斗，625，636

英国与对西西里暴动的镇压（1820年），432，676，677

对希腊的政策，547—551，685—690

协助击败葡萄牙的米格尔派（1834年），454

在印度，552—571各处

在非洲，572—590各处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英国科学促进会，29，144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non-Anglican），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非国教的），178，202

Broglie，A.C.L.V.，Duc de，布洛伊公爵，法国政治家，357，363

空论派作家，189，346，361

Broglie，Maurice de，布罗格利，莫里斯·德，根特主教，474

Broke, Sir Philip, 布罗克爵士, 菲利普, “香农”号战舰舰长, 83

Brongniart, A.T., 布隆尼亚尔, 建筑师, 140, 224

Brothers, Richard, 布拉泽斯, 理查德, 预言家, 163

Brouckère, Charles de, 布鲁凯尔, 夏尔·德, 比利时议员, 192

Brougham, Henry, 布鲁厄姆, 亨利, 英国大法官, 207

Brown Bros., 布朗兄弟, 巴尔的摩和利物浦商业银行家, 596

Brueys d' Aigalliers, F.P., 布律埃斯, 戴加里埃, 法国海军上将, 79

Brugnatelli, L.V., 布鲁尼亚泰利, L.V., 化学家, 124

Brumaire, 雾月18日(1799年)政变, 257, 295, 310, 318

Brune, C.M.A., 布律纳, G.M.A., 法国元帅, 257, 262, 294

Brunel, Sir Marc I., 布鲁内尔爵士, 马克, 工程师, 82

Brunswick, 布伦瑞克, 一度属威斯特法利亚王国, 392—393

Brussels, 布鲁塞尔, 被法国人占领(1793年), 254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瓦拉几亚的首都, 536, 537

Bucharest, Peace of, 布加勒斯特和约, 俄国和土耳其签订(1812年), 23, 522, 536, 542, 543

Buchez, P.J.B., 比歇, P.J.B., 法国合作运动创始人, 116, 360

Budapest, 布达佩斯, 人口, 32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起义(1808, 1809年), 614—615

革命(1810年), 616, 618—619, 620

贸易, 618

与各省间纠纷, 619—621, 629—630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618, 629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R., 比若·德拉皮孔内里, 托·罗, 论英国军队, 73

Bukovina, 布科维纳, 在奥地利统治下, 398, 537

Bulgaria (Roumelia), 保加利亚 (鲁梅利亚), 527, 540—541

Buonaparte, Carlo, 波拿巴, 卡洛, 拿破仑之父, 307

Buonarroti, P.M., 布奥纳罗蒂, 法国革命派巴贝夫分子, 115, 288, 416

在意大利, 415, 416, 436

Bureau des Longitudes, 经度局, 121

Burgos, Xavier de, 布尔戈斯, 哈维尔·德, 西班牙政治家, 453, 455

Burke, Edmund, 伯克, 埃德蒙, 政治家, 98, 99, 177, 374

论法国革命, 91, 101—102, 104, 105

Burma, 缅甸, 与英国, 84, 559—560

Burns, Robert, 彭斯, 罗伯特, 诗人, 95

Burr, Aaron, 伯尔, 阿伦, 美国政治领袖, 603

Burschenschaften, 德国青年协会, 190

Burton, Richard, 伯顿, 理查德, 非洲探险家, 588

Butler, Samuel, 巴特勒, 塞缪尔, 主教和校长, 201

Butterfield, William, 巴特菲尔德, 威廉, 建筑师, 227

Byron, George Gordon, Lord, 拜伦勋爵, 乔治·戈登, 诗人和亲希腊分子, 103, 108, 548, 686

Cabanis, P.J.G., 卡巴尼斯, P.J.G., 科学家, 120

Cabet, Etienne, 卡贝, 艾蒂安, 乌托邦改革者, 115

cabildos, 市政会议, 西属南美洲的市政机构, 614, 616

Cabral, Costa, 卡布拉尔, 科斯塔, 葡萄牙自由主义者, 461

Cacault, Francois, 卡库尔, 弗朗索瓦, 法国在意大利的代理人, 415

Cachar, 卡恰尔, 英国的保护领地, 560

Cadiz, 加的斯

 外国人控制的商业, 49

 未领得军饷的军队哗变 (1820年), 448, 674, 675

Cadoudal, Georges Breton, 卡杜达尔, 乔治·布雷东, 反拿破仑阴谋 (1803年) 的领导人, 265, 300, 319

cahiers des doléances, 陈情书, 61, 183

Caillié, René, 卡耶, 勒内, 去苏丹的探险家, 582

Cairo, 开罗, 533, 534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此地的反拿破仑游击战争, 323, 332

Calcutta, 加尔各答, 此地的同情欧洲的思想, 553, 568

Calder, Sir Robert, 考尔德爵士, 罗伯特, 海军上将, 325

Calderari, “锅匠党”, 意大利秘密团体, 431, 432

calendar, 历法, 法国共和历, 147, 283, 418, 691—692

Calhoun, John C., 卡尔霍恩, 约翰, 美国政治家, 604, 605, 611

Callao, 卡亚俄, 被科克伦封锁, 624; 保皇派的据点, 627

Calomarde, F.T., 卡洛马德, F.T., 西班牙政治家, 452

Calvert, Edward, 卡尔弗特, 爱德华, 艺术家, 217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三十九条信纲, 164

大迁移的布尔人的信仰, 575

在美国, 602

Cambacérès, J. J. R. de, 康巴塞雷斯, J. J. R. 德, 法国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第二执政, 293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剑桥大学, 27, 178, 201, 202

Cameroons, 喀麦隆, 英国占领费尔南多波岛的影响, 584

Camperdown, 坎珀多因, 荷兰海军在此被英国击败(1797年), 466

Campo Formio, Peace of, 坎波福米奥和约, 法国与奥地利签订(1797年), 255, 309

和约条件, 291, 388, 438, 534

毁约, 417

Canada, 加拿大

美国人要求征服, 89, 610, 611

同美国的边界, 10, 595, 682

同美国的贸易, 598

canals, 运河, 3, 143—144

在英国, 38

在法国, 38, 330

在低地国家, 38, 54, 55

在瑞典, 52

在美国, 599

提议修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 114, 533, 576, 577

Canning, George, 坎宁, 乔治, 政治家, 23, 181, 269

他的对外政策, 675, 679—689各处

他和丹麦，326，486

他和希腊，10，547，549

他和南美，613，630，632，637，638

他和西班牙，335

他和美国，591，593，597，598

Canning, Stratford, 坎宁，斯特拉特福德，驻君士坦丁堡大使，549，687

Caosa, A.C.M., Prince of, 卡诺萨亲王，那不勒斯警务大臣，429，431，431

Canova, Antonio, 卡诺瓦，安东尼奥，雕刻家，340

Cape of Good Hope, Cape Colony, 好望角，开普殖民地

荷兰人的拓居地，574—575

被英国占领（1795—1803年，从1806年起），77，255，575

英国付出200万英镑，10，90，473，645，665

宪法和法律的自由化（1825年），586

Capodistrias (Capo d' Istria), Count John,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伯爵，约翰

科孚岛出身，535，678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18，672，673，676，679

免职（1822年），23，519，547，679

他和巴尔干诸国，536，538，539，543，674

希腊总统（1827年），546，548

被刺（1831年），550

Carabobo, 卡拉博博，玻利瓦尔在此战胜西班牙人（1821年），625

Caracas, 加拉加斯

宣布独立（1810年），616

南美革命中心，617

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621—622

地震（1812年），621，624

Carbonari，烧炭党，意大利秘密团体，114，117，190，431

在伦巴第，434

在那不勒斯，432，433，675，676

Carey, William, 凯里，威廉，在印度的传教士，566

Carlile, Richard, 卡莱尔，理查德，自然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182

Carlism in Spain, 西班牙的卡洛斯主义，422，455，458—460；起源，450，452

Carlo Alberto, 卡洛·阿尔贝托，见Charles Albert条

Carlos, Don, 卡洛斯，唐，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次子，453，455，460，参看Carlism条

Carlota Joaquina, 卡洛塔，若阿金娜，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之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女，612，614

Carlsbad Decrees, 卡尔斯巴德决议，实施书报审查制度（1819年），190，393

Carnot, L. N. M. , 卡尔诺，L. N. M. , 法国将军，62，100，122

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279

第一届督政府督政官，288，289，291，308

Carnot, N. L. Sadi, 卡尔诺，萨迪，物理学家，29，123，144，145

Carolina Augusta, 卡罗琳娜·奥古斯塔，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之妻，404

Caroline, 卡罗琳, 摄政王 (乔治四世) 之妻, 181, 183

Carrara, Duchy of, 卡拉拉公国, 412, 419

Carrel, N. A., 卡雷尔, N. A., 《国民报》的创办者, 189

carronades, 大口径短身炮, 82, 83, 89

Carstens, A. J., 卡斯滕, 画家, 220

Cartagena, 卡塔赫纳暴动 (1810年), 616
被西班牙再征服 (1815年), 622

Carta Regia, 敕令, 葡萄牙摄政王在巴伊亚发布 (1808年),
612

Cartistas, 葡萄牙的宪章派, 461

Casanova, 卡萨诺瓦, 巴塞罗那警察总监, 446

Caspian sea, 里海, 俄国得到控制权 (1813年), 522

Castiglione, 卡斯蒂利奥内, 法国在此胜利 (1796年), 69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新大陆一些王国作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遗产, 615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卡斯尔雷子爵, 罗伯特·斯图尔特, 政治家
与反拿破仑的最后联盟, 639—646各处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7—667各处
在国际关系中 (1815—1822年), 669—681各处
他和印度, 556
他和意大利, 427, 428
他和低地国家, 472
他和斯堪的纳维亚, 491
他和南美洲, 613, 636, 637, 638

他和西班牙， 613

他和法国的领土范围， 272， 273

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22， 23

逝世（1822年）， 680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和法国人合作， 444

工业， 50， 442， 461

叛乱（1827年）， 452

资产阶级， 457

Catechism, Imperial, 帝国教义问答（在法国， 1806年）， 154

Cathcart, Sir William, 卡思卡特爵士， 威廉， 驻俄国大使，
647

Catherine II (“the Great”) , 叶卡捷琳娜二世 (“大帝”) , 俄国女皇， 19， 496—503

垂涎巴尔干， 541， 544

参加瓜分波兰， 21， 253—254

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 480

Catherine, Grand Duches, 叶卡捷琳娜女大公，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妹， 514， 645

Catholic Association, of Daniel O’ Connell, 天主教协会，
丹尼尔·奥康内尔的， 173， 179， 189

Catholic emancipation in Britain, 英国天主教解放运动，
10， 26， 99， 107， 173， 177， 179， 183， 260

Cattaneo, Carlo, 卡塔内奥， 卡洛， 意大利哲学家和共和主义者， 435

Cattaro, 卡塔罗， 俄国人占领， 后为法国兼并（1807年）， 535
—536

Caucasus, 高加索

被俄国包围和征服, 9, 52

殖民地化, 34

游击战争, 522

Cauchy, Augustin, 柯希, 奥古斯坦, 数学家, 123

Caulaincourt, A.A.L., Marquis de, 科兰古侯爵, A.A.L., 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拿破仑之友, 317, 334

在圣彼得堡, 542

在夏蒂荣会议上, 640, 641

cavalry, of French armies, 法国骑兵, 69—70

Cea Bermúdez, Francisco, 塞亚·贝穆德斯, 弗朗西斯科, 西班牙政治家, 455

censorship, 书报检查, 参看Press条

Census, 人口调查

在美国(1790年), 593

宗教的, 在英国(1815年), 166

Central America, United Provinces of, 中美洲联合省(1823—1838年), 635—636

Ceylon, 锡兰

英国夺自荷兰(1796年), 77, 255, 558

英国占有(1802年), 261, 469; (1815年), 10, 90, 665

康提王国, 被英国兼并(1815年), 559

英国的统治, 552, 553, 565, 568, 571

Chacabuco, 查卡布科, 圣马丁在此战胜智利的保皇派(1817年), 623

Chalgrin, J.F., 查尔格林, J.F., 建筑师, 224

Chalier, M.J., 夏利埃, M.J., 法国共和派, 149

Chamber of Deputies (France), 法国众议院 (1814年), 339; (1815年), 343, 344, 365

Chamber of Peers (France), 法国, 贵族院 (1814年), 339, 347, 353, 365; (1830年), 357

Chambre introuvable (France), 法国无双议院 (1815年), 188, 343—344

Chambre retrouvée (France), 法国“重新恢复的议院” (1824年), 349

Championnet, J.E., 尚皮奥内, J.E., 法国将军, 419

Chaptal, J.A.C., 夏普塔尔, J.A.C., 化学家和行政官员, 125, 316, 318

Charbonnerie (French variant of *Carbonari*), 法国烧炭党, 189, 346, 348

Charcas (Upper Peru), 查尔卡斯 (上秘鲁), 反西班牙暴动, 615; 终于解放, 627

Charles III, 卡洛斯三世, 西班牙国王, 49, 336

Charles IV, 卡洛斯四世, 西班牙国王, 221, 335, 612

退位, 269, 443, 613

Charles X, 查理十世, 法国国王王储时期 (阿图瓦公爵), 17, 348

在位时期 (1824—1830年), 169, 350—355

Charles XIII, 查理十三世, 瑞典国王, 487

Charles XIV John, 查理十四世, 约翰, 瑞典国王, (其早期历史见Bernadotte, J.B. 条)

提名为王储 (摄政) (1810年), 271, 487—488

以军队抗击拿破仑（1813年），489，490

被提名为法国的统治者（1814年），642

成为瑞典和挪威国王（1818年），492

Charles, Archduke, 查理大公，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之弟，270，333

Charles Albert of Piedmont-Sardinia, 查理·阿尔贝，皮埃蒙特-撒丁的，卡里尼亚诺亲王，433，434，435，437

Charles Felix, 查理·费利克斯，皮埃蒙特-撒丁的王储，434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当地的棉花垄断组织，604

Charlotte, 夏洛特，摄政王（乔治四世）之女，议婚，与奥伦治亲王结婚，473，645

Charter (France), 法国宪章（1814年），见Constitutions条

Charter (Portugal), 葡萄牙宪章（1826年），见Constitutions条

Charter Act (1813年)，特许状法（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垄断权的终止，565，567

Chartists, 宪章运动者，178

Chase, Semual, 蔡斯，塞缪尔，美国法官，608

chasseurs, 轻步兵，70

Chateaubriand, F.R., Vicomte de, 夏多勃里昂子爵，著作家和政治家

政治观点，31，95，103，104

宗教著作，160，161，323

受拿破仑政府的迫害，301，304

外交部长（1822年），349，519，681

站在反对派一边，188，350，358

Châtillon-sur-Seine，塞纳河畔夏蒂荣，盟国在此开会（1814年），640—641

Chaumont, Treaty of，肖蒙条约，加强反拿破仑的最后一次联盟（1814年），641，644，645，662，666

条约的展期，660，665

chemical industry，化学工业，143

chemistry，化学，134—135，136

Cherubini, M.L.，凯鲁比尼，M.L.，作曲家，238—239

Chesapeake，“切萨皮克”号，美国海军快速炮舰，83，89，327

Chevaliers de la Foi，宗教骑士团，政治性宗教秘密团体，170，189，345

Chichagov, P.V.，奇恰戈夫，P.V.，俄国海军上将，536，542

Chile，智利

洪达（1810年），621

秘鲁保皇党人的入侵（1814年），621

被圣马丁军队解放（1817—1818年），622—623

海军，623

美国的承认（1823年），637

内战（1830年），623

贵族宪法下的和平，629

China，中国，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的贸易，565

Chios，希俄斯岛，自治（自1832年），550

Christian VII，克里斯蒂安七世，丹麦国王，482

Christian August of Augustenberg，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奥古斯腾堡的），丹麦王子，意图成为瑞典王储，487，489

Christian Frederick,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丹麦王子, 挪威执政, 曾任挪威国王数月 (1814年), 491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基督教归正会 (荷兰), 164

Christian Socialist Parties, 基督教社会党, 117

Christophe, Henri, 克里斯托夫, 亨利, 海地的黑人皇帝, 633

Church, Sir Richard, 丘奇爵士, 理查德, 希腊军队中的英国将军, 548

church and education, 教会与教育

在奥地利, 397

在英国, 27—28, 178

在法国, 203—204, 349

在德意志诸邦, 205

在尼德兰, 204, 475—476

church and state, 教会与国家, 29, 146—178

在奥地利, 155, 397, 404

在巴达维亚共和国, 465

在比利时, 奥地利统治下, 463; 法国统治下, 158, 466—467, 468; 荷兰统治下, 171, 173—174, 474—476, 478; 关于独立, 18

在英国, 177—178

在法国, 政教分离 (1794—1802年), 13, 146—152, 283, 287; 政教协定及其以后 (1802年以后), 153—154, 155—160, 299; 在1814年的宪章中, 175—176, 338; 在查理十世时代, 351—352; 在路易·菲利普时代, 356

在德意志, 154—155

在荷兰, 164, 465

在印度, 566

在爱尔兰, 10, 173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 155, 156, 157, 424

在普鲁士, 8, 170, 174—175, 176—177

在斯堪的纳维亚, 164, 176

在美国, 149—150, 176, 610

1815年以后的天主教, 160—163, 170—173; 新教, 163—170

Church Affairs and Public Instruction, Ministry of, 教会事务和国民教育部(法国), 349, 35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圣公会传教会, 583

church property, 教会财产

被法国革命政府没收, 252

被拿破仑变成非教会所有, 303

出售, 在比利时, 467; 在西班牙, 456

Cisalpine Republic (Lombardy.etc.)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伦巴第等)

建国(1797年), 152, 438

宪法, 126

政变, 294

与法国合并, 255, 417, 419

成为意大利共和国(1802年), 331

Cispadane Republic, 波河南共和国, 建国(1796年); 和伦巴第联合成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797年), 417

cities, 城市, 其规模和发展, 31—32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France, 1790年), 教士公民组织法(法国, 1790年), 13, 146, 150, 151, 154

Clancarty, William S. Trench, Viscount, 克兰卡蒂子爵, 威廉
• S. 特伦奇, 卡斯尔雷参加维也纳会议时的助手, 647

Clapham Sect, 克拉珀姆教派, 98, 566, 610

参看Evangelicals条

Clapperton, Hugh, 克拉伯顿, 休, 去苏丹的探险家, 582

Clark, William, 克拉克, 威廉, 美国探险家, 594

Clarkson, Thomas, 克拉克森, 托马斯, 与废除奴隶制, 98, 99

Clary, Désirée, 克拉莉, 德西雷, 贝纳多特元帅之妻, 320

classes (Stände), 阶级, 在德意志, 367, 377; 在俄国, 496

classicism, 古典主义

(与新古典主义) 在艺术方面, 210, 211

在建筑方面, 223, 227

官方的古典主义, 拿破仑时代, 304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27, 29, 242—243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普鲁士将军和
军事著作家, 60—61, 75, 313

Clay, Henry, 克莱, 亨利, 美国政治家

西北部商业的代言人, 599, 605, 611

“美国体系”的鼓吹者, 600, 602

在根特和谈的特派员(1814年), 604

clergy, 教士

教士教育, 在比利时, 463; 在法国(1811年), 199, (1815
年以后), 203, 351, 352, 354; 在尼德兰, 204

反教士的情绪, 24, 25; 在巴伐利亚, 333; 戈德温和雪莱的,
107; 巴黎公社的(1793年), 147; 在复辟后的法国, 189; 在西班牙,
441

教士的权力，因政教协定而缩小，152，153，170。参看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条

Clermont (1807年)， “克莱蒙”号，第一艘商业汽船，84

Clichyens，克利希派（保皇派和温和派，法国督政府时期），290，291

Clinton, George, 克林顿，乔治，美国军人和政治领袖，603

clove plantations, 丁香种植园，在桑给巴尔和奔巴，588

co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煤炭和工业发展

在比利时，38，54—55

在英国，32，38，40，44

在法国，56—57

在德意志，53

coalitions against France, 反法联盟，250

第一次（1793年），277；瓦解（1795年），254—255，256

第二次（1798年），256—258，292，310，419，530

第三次（1805年），265—266，485

第四次（1813年），272，305，639—646各处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威廉，成为政府的批评者，81，182

Cobenzl, Count Louis, 科本茨尔伯爵，路易，奥地利政治家，259

Coblentz, 科布伦茨，在该地的流亡者，61

Coburg-Saalfeld, Prince F. J., 科堡-扎尔费尔尔德亲王，奥地利将军，277

Cochrane, Thomas, Lord Dundonald, 科克伦，托马斯，邓唐纳德勋爵

快速舰舰长，激进派下院议员，81

智利海军司令（1817—1822年），623，624，626

巴西海军上将（1823—1825年），631，632

希腊海军上将（1827—1828年），84，548

Cockerell, C.R.，科克雷尔，建筑师，228

Cockerill, John, 科克里尔，约翰，炼铁厂主，在比利时塞兰，40，54，55，469

Cockerill, William, 科克里尔，威廉（约翰之父），纺织机械制造者，在比利时的韦尔维埃和列日，469

Code Napoléon (Civil Code)，拿破仑法典（民法典），298，299，319

强加于被占领国，303，331，336，421

1815年后保留，在法国，338，353；在德意志，389，391；在意大利部分地区，430

Codrington, Sir Edward, 科德林顿爵士，爱德华，海军上将，在纳瓦里诺，549，688

coffee, 咖啡，在锡兰种植，565

Colebrooke, Sir William, 科尔布鲁克爵士，威廉，军人和殖民地总督，在锡兰，552，563，571

Colebrooke-Cameron Commission (1832年)，科尔布鲁克-卡梅伦委员会（1832年），563，568，58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尔律治，塞缪尔·泰勒，诗人和哲学家，91，103，109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121，137，569

collèges, 中学，199

collegium philosophicum, （卢万）哲学院，培养教士，204，475—476

Collingwood, Cuthbert, Baron, 科林伍德男爵, 卡思伯特, 海军司令, 77, 86, 326

Colloredo-Mansfeld, Franz, Prince of, 科洛雷多-曼斯菲尔德亲王, 弗兰茨,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的导师, 259

首相, 399

Collot d' Herbois, J.M., 科洛·德布瓦, J.M.,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Cologne (Koln), 科隆

教会的公国, 被法国人世俗化, 8

费布朗尼乌派大主教, 174

“Cologne affair”, “科隆事件”, 与异教徒通婚问题 (1837年), 175

Colombia, Republic of, 哥伦比亚共和国

新格拉纳达与委内瑞拉联合成立, 625

分裂, 628

为美国 (1822年) 和英国 (1825年) 承认, 637, 680, 683

colombiad, 美国海军哥伦比亚士大炮, 83

commerce, 贸易, 见trade条

Committee for General Defence (France), 国防委员会 (法国), 后为救国委员会 (大委员会), 279

Committee for General Security (France), 全国治安委员会 (法国), 前身为监视委员会, 279, 280, 281, 284

Committee of Legislation (France), 立法委员会 (法国), 救国委员会大部分权力的继承者, 285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France), 救国委员会 (法国), 前身为国防委员会, 279, 281, 283

被国民议会推翻 (1794年), 254, 284

communications, 交通, 3—4, 37—39, 43, 435

参看railways, roads, semaphore system, ships条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年), 《共产党宣言》(1848年), 117

Comoro Islands, 科摩罗群岛, 法国人在该地, 577, 589

Comte, Auguste, 孔德, 奥古斯特, 哲学家, 15, 113, 118, 123

“Concert of Europe”, “欧洲协同体”, 663, 690

concert societies, 音乐团体, 229—230

Conciliatore, 《和解报》, 伦巴第自由派团体的报纸(米兰), 191, 431, 435

Concordats, 政教协定, 教皇和法国签订(1802年), 11, 13, 153—154, 263, 298—299, 301, 319, 322, 323, 468; 1815年后, 27, 169, 175, 351

德意志诸邦, 155, 170

意大利共和国(1803年), 155, 425

那不勒斯(1818年), 170, 430

尼德兰王国(1827年), 170, 474

俄属波兰(1818年), 170

瑞士(1828年), 170

各国政府规避执行, 172

Condillac, E. B. de, 孔狄亚克, E. B. 德, 哲学家, 120

Condorcet, M. J. A. N. Caritat, Marquis de, 孔多塞侯爵, 卡里塔特, 哲学家

鼓吹人类创造进步的思想, 92, 93, 111, 118

鼓吹妇女解放, 96

希望以科学为教育的基础, 119

Confalonieri, Count Federigo, 孔法洛涅里伯爵, 费德里戈, 伦巴第自由派领袖, 427, 431, 435, 436

Congo River, 刚果河, 刚果自由国, 588

Congrégation, 修会, 受到耶稣会士的鼓励, 352, 354

Congrégation de la Vierge, 圣母会, 法国天主教秘密团体, 189

Congreve, Sir William, 康格里夫爵士, 威廉, 燃烧火箭的发明者, 84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英国国教在此残存, 176

Consalvi, Ercole, 孔萨尔维, 埃尔科莱, 红衣主教和政治家
教皇庇护七世的国务卿, 17, 152

他和政教关系, 155, 172, 430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7

庇护逝世后退休, 171, 434

conscription, 征兵

在比利时, 467, 468

在法国, 61—64, 291—292, 293

路易十八废除征兵, 660

在荷兰, 471

在意大利, 拿破仑统治下, 331, 421—422

在普鲁士, 65—66, 333, 382—383, 384, 393

在俄国, 495, 497, 521—522

在德意志南方各邦, 391

Conservateur, 《保守党人》, 夏多勃里昂主编的报纸, 345

Conservatives, Conservatism, 保守党人, 保守主义, 12, 23, 26, 100

-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国立工艺博物馆, 121
- Constable, John, 康斯特布尔, 约翰, 画家, 209, 214, 219—220
- Constant, Benjamin, 贡斯当, 邦雅曼, 著作家和政治家
- 自由派观点, 103, 340, 478
 - 受拿破仑政府迫害, 301
 - 为拿破仑拟订1815年宪法, 322
 - 路易十八时代的独立派领袖, 346
-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弟
- 波兰军队总司令, 516
 - 放弃继承王位, 521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粮食供应, 536
- 各国驻该地大使馆, 525
 - 法纳尔希腊人在该地, 528, 545
 - 俄国人垂涎, 258, 266, 551, 689
 - 人口, 32
- Cnstituent Assembly (France), 制宪议会 (法国), 13, 252, 280
- 保留志愿兵, 62
 - 拒绝妇女有选举权的要求, 96
 - 废除奴隶制, 98
 - 拟订教士公民组织法, 13, 146
 - 废除间接税, 297
 - 将科西嘉并入法国, 307—308

Constitutional Church and clergy, 法国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会和教士, 146, 150—154各处

Constitutionnel, 《立宪党人》, 法国独立派(19世纪20年代)的报纸, 188, 189, 346

constitutions, 宪法

巴达维亚共和国(1797、1798年), 466

比利时(1831年), 17, 174

玻利维亚(1826年), 627—628

巴西(1824年), 632, 684

开普殖民地(1825年), 586

智利(1823—1829, 1833年), 628—629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797年), 126

哥伦比亚(1821年), 625

法国(1791年), 183; (1793年), 13, 183, 278—279, 285; (1795年), 286—287, 294; (1799年), 185, 296; (1814年: 宪章), 14, 187—188, 338, 345, 354; 沙皇与宪法, 22, 337; 修改宪法(1830年), 356; (1815年: 补充条例), 322, 341

德意志南部中部各邦, 16, 393

希腊, 548

荷兰(1798年), 466; (1814年), 472; 修改宪法(1815年), 473—474

匈牙利, 16, 405

意大利各共和国(18世纪90年代), 126, 418; (19世纪初), 422

尼德兰王国(1815年), 187, 473—474

新格拉纳达, 622

挪威（1814年），18，187，491，492

秘鲁，627—628

波兰，亚历山大一世赐予，187，576—577；尼古拉一世废除，
664

波美拉尼亚，古斯塔夫四世赐予，485

葡萄牙（1826年），684；（1838年），461

拉普拉塔河联合省（1819年），629；（1826年），630

俄国，宪法草案，512，516，519，520

塞尔维亚（1805年），541

西西里，426

西班牙（1808年，来自拿破仑），335；（1810年），336；
（1812年），17，445，449，458；在意大利推行，431；在西西里，
426；在那不勒斯，432，675，676；（1821年），630；（1843，
1837，1845年），457，458

瑞典（1789年：联合与安全法），483；（1809年：政府条
例），17，492

美国，149—150，605，607，608

委内瑞拉（1811年），621

Consulate（France，1799年），执政府（法国，1799年），
257，295—301，311；（1802年），263，300

“Continental System”（Continental Blockade）of
Napoleon，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大陆封锁），对英国封闭欧洲各
港口，77，268—269，302，323，326—327

对英国的影响，78，327—329；对法国的影响，57；对欧洲的影响，
303，329—330，399，423，513；对美国的影响，271

推行时种种困难，在荷兰，470；在教皇国，322；在俄国，304
—305；在斯堪的纳维亚，488，489

Convention, 法国国民公会, 13, 276; “吉伦特派” (1792—1793年), 276—278; “革命党”或山岳党 (1793—1794年), 278—284; “热月党” (1794—1795年), 284—286

国民公会与军队, 62, 64

取缔妇女俱乐部, 96

废除科学机构, 119

非基督教化政策, 147

谴责路易十六, 254

convoy for ships, 对船只护航, 英国强制进行 (1798年), 78, 90, 484

Cooper, James Fenimore, 库珀, 詹姆斯·费尼莫尔, 美国作家, 610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贸易, 52, 484, 491

英国海军在该地 (1801年: 哥本哈根海战), 484; (1807年: 炮击), 269, 486

Copley, J. S., 科普利, 画家, 210

Corfu, 科孚岛, 俄土舰队从法国人手中夺取 (1799年), 531, 535, 参看Ionian Islands条

Coriolis, G. G. de, 科里奥利, G. G. 德, 化学家, 123

Corn Laws (1815年), 谷物法, (1815年), 599

Cornwallis, Charles, Lord, 康华理勋爵, 查尔斯, 军人和政治家在孟加拉, 552, 560, 563

谈判亚眠和约 (1802年), 261

Cornwallis, Sir William, 康华理爵士, 威廉, 海军上将, 77

Corrientes, 科连特斯, 阿根廷省, 620

Corsica, 科西嘉岛

被制宪议会并入法国, 307—308

内战, 继而为英军占领 (1793年), 308

英国舰队撤走 (1796年), 415

拿破仑和科西嘉, 307—308, 310

Cortes, 议会

葡萄牙的 (1821年), 630, 631, 675

西班牙的 (1810年, 在加的斯), 336, 440, 614, 617;
(1813—1814年), 446

Cossacks, 哥萨克, 在法国 (1814年), 646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中美洲联合省的一部分 (1828—1838
年), 636

Cotta, J.F., 科塔, 《总汇报》的创办人, 184, 190, 191

cotton gin, 轧棉机的发明, 5, 595

cotton industry, 棉纺工业

在比利时, 54, 468—469, 478

在英国, 44, 141, 565

在法国, 57, 300

在德意志, 53

在荷兰, 477

在印度, 565, 578

在俄国, 522, 523

在美国, 601

cotton planting in United States, 美国的棉花种植, 595—
597, 604, 605

奴隶贸易和植棉, 579, 595

Coulomb, C. A., 库仑, C. A., 物理学家, 133—134

Council of Elders (Ancients) and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元老院和五百人院, 法国的立法两院 (1795年), 287, 288, 291, 292, 293, 295

Council of State (France, 1799年), 参议院 (法国, 1799年), 297, 301, 318—319; 推荐给普鲁士, 379

coups d' état, 政变, 法国修改宪法的一种手段, 294; 在法国统治的国家中, 294, 419

Courier, P. L., 库里埃, 反教士的作家, 24

Courier, The, 《信使报》, 与托利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 181

Courrier des Pays Bas, 《低地国家信使报》, 192

Cousin, Victor, 库赞, 维克托, 哲学家, 203, 205

Couthon, Georges, 库东, 乔治,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53, 279

Cowper, William, 考珀, 威廉, 诗人, 98

Cozens, J. R., 科曾斯, 风景画家, 217—218

Cracow, 克拉科夫

波兰文化中心, 648

自由市 (1815年), 403, 664

被奥地利兼并 (1846年), 410

Crédit Mobilier (1852年), 动产信贷银行 (1852年), 477

Crete, 克里特岛

被埃及的帕夏占领 (1824年), 548

交还苏丹 (1840年), 550

Crimea, 克里米亚, 被俄国兼并 (1783年), 251, 527, 528

Croats, 克罗地亚人, 408, 409

在奥地利军队中充当散兵, 71

Croker, J. W., 克罗克, J. W., 政治家和散文家, 177, 183

Cuba, 古巴

奴隶制, 579, 581

忠于西班牙, 633—634

英国保证古巴归西班牙, 683, 684

坎宁和亚当斯相互猜疑对古巴的企图, 638

cuirassiers, 重骑兵, 70

cults, 宗教信仰, 革命的宗教信仰, 在法国, 148—149

“Culture System” of Dutch in Java, 荷兰人在爪哇的“定植制度”, 564, 565

Cuoco, Vincenzo, 库欧科, 温琴佐, 那不勒斯作家和政治家, 426

currency, 通货

法国的通货紧缩（1796—1797年）, 289, 290

通货膨胀, 47

在奥地利（1811, 1812年）, 233注, 402, 403

在法国（18世纪90年代）, 282, 285

在俄国（1814年）, 513, 523

在斯堪的纳维亚（1815年以后）, 491

在西班牙（1770—1800年）, 49—50

Custine, Comte A. P. de, 居斯蒂纳伯爵, 法国将军, 387

Custodi, Pietro, Baron, 库斯托迪男爵, 彼得罗, 米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436

Cuvier, G. L. C., 居维叶, 乔治

博物学家, 28, 139

比较解剖学家, 123, 137, 138

古生物学家, 138, 140

在法国科学院, 124, 125, 126

访问荷兰, 206

Czartoryski, Pirnce Adam, 恰尔托雷斯基亲王, 亚当,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波兰天主教徒, 18, 503, 505, 506, 507

亚历山大的“非正式委员会”成员, 509

外交大臣（自1804年）, 265, 266, 511, 512

提出国际法新体系（1804年）, 669

论叶卡捷琳娜二世, 499

在会议波兰, 516, 517

对土耳其的政策, 551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

Czechs, 捷克人, 410, 411

Daendels, H. W., 丹德尔斯, H. W., 荷兰元帅

在海牙（1798年）, 466

在爪哇, 558, 564

Dahl, J. C., 达尔, J. C., 画家, 220—221

Dahlmann, F. C., 达尔曼, 德意志自由派领袖, 197

Dalberg, C. T. de, 达尔贝格, 美因茨大主教, 莱茵联盟首脑,
302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划归奥地利（1797年）, 438

为法国兼并（1805年），535

维也纳会议上讨论达尔马提亚问题，646—647

Dalton, John, 道尔顿, 约翰, 化学家, 28, 129, 130, 134—135

Dance, George, sen., 丹斯（老）, 乔治, 建筑师, 226, 227

Danish language, 丹麦语, 在荷尔斯泰因, 485

Danton, Georges, 丹东, 乔治, 革命家, 99, 283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多瑙河两公国, 527, 536—540, 677, 689

俄国占领（1806—1812年）, 537, 542; （1828—1834年）, 9, 539

参看Roumania, Moldavia, Wallachia条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其先驱者, 139—140

Daumier, Honoré, 杜米埃, 奥诺雷, 漫画家, 222

Daunou, P. C. F., 多努, P. C. F., 法国学者, 120

David, J. L., 大卫, J. L., 画家, 200—211, 304, 317

其继承人, 212, 215

Davout, L. N., 达武, L. N., 法国元帅, 320

指挥北德意志方面军（1809年）, 328

在“百日”时期, 313, 341, 342, 661

Davy, Humphrey, 戴维, 汉弗莱, 自然哲学家, 124, 129, 130, 135

设计矿灯, 144

Déak, Francis, 戴阿克, 费伦茨, 匈牙利政治家, 408

Décadi, 第10日, 休息日（法国, 18世纪90年代）, 149, 150—151

Decazes, Elie, 德卡兹, 埃利, 法国政治家, 344, 345, 346, 347

Decembrist mutiny in Russia (1825年), 俄国十二月党人叛乱 (1825年), 18, 517, 519, 520—521, 524, 538

普希金的影响, 108; 俄军中“幸福协会”秘密团体的影响, 190

dechristianisation, 法国非基督教化运动, 146—147

Decrès, Denis, 德克雷, 德尼, 法国海军上将, 79, 325

Delacroix, F.V.E., 德拉克洛瓦, 国家, 209, 210, 213—214

Delhi, 德里, 英国人在德里, 555

Delmas, A.G., 德尔马, A.G., 法国将军, 301

Demerara, 德梅拉拉, 被荷兰人丧失 (1802年), 469

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 美国民主共和党, 602, 603

Demologos, “德莫洛戈斯”号, 第一艘用蒸汽机的战舰 (1814年建造), 84

Denham, Dixon, 德纳姆, 狄克逊, 去苏丹的探险家, 582

Denmark (with Norway until 1814年), 丹麦 (同挪威联合至 1814年), 480—494各处

废除奴隶贸易 (1804年), 99, 482, 579

同拿破仑联盟; 英国人的反丹麦活动 (1807年), 269, 326, 486

基尔条约; 挪威划归瑞典, 但依然保持领地 (1814年), 7, 489—491, 657, 664

1815年后, 17, 491—492

départements, (法国的)省 (1790年), 13, 287, 297

Derzhavin, G.R., 杰尔查文, G.R., 诗人, 502

Desaix de Veygoux, L.C.A. , 德塞·德·韦古, 法国将军, 315, 320

Desgodetz, Antoine B. , 狄戈德茨, 安托万, 建筑学著作家, 223

des Mazis, Alexandre, 德马齐, 亚历山大, 拿破仑早年的朋友, 319

Desmoulins, Camille, 德穆兰, 卡米耶, 法国革命新闻记者, 183

Desorgues, Théodore, 德索盖斯, 泰奥多尔, 诗人, 302

Dessalines, J.J. , 德萨利讷, J.J. , 海地的黑人皇帝, 633

Dessolles, J.J.P.A. , 德索尔, J.J.P.A. , 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347

Destutt de Tracy, A.L.C.D. , Comte de, 德斯蒂, 德·特拉西, 伯爵, 观念派学者, 120

Devaux, Paul, 德沃, 保罗, 比利时记者, 478

De Wette, W.M.L. , 德·韦特, W.M.L. , 圣经评论家, 167

diamonds, 钻石, 南非的, 587

Diana, “黛安娜”号, 第一艘用于作战的蒸汽机战舰（1824年）, 84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百科全书派, 19, 24, 210, 371

Diets, 议会

德意志联邦的, 16, 656

匈牙利的, 16, 400—401, 402, 404—405, 408

波兰的（即Sejm）, 517

普鲁士省议会, 16

Dipa Nigara, 蒂博尼哥罗, 爪哇起义领袖, 564

diplomacy by conference, 会议外交, 662, 667, 669—670, 681—682

diplomatic immunity, principle of, 外交豁免权的准则, 受到拿破仑的藐视 (1803年), 264

diplomatic precedence, 外交席次问题, 658—659, 665

Directory, 法国督政府, 286

第一届 (1795年), 287—288

第二届 (1797年), 288—293

第三届 (1799年), 293—295

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13, 63, 64

督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 150—151

督政府时期的教育和科学, 119—121, 199

督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 183

巴黎各区的反督政府暴动, 308

拿破仑和督政府, 309

因雾月政变而告终 (1799年), 257, 295

disarmament, 裁军, 沙皇亚历山大的裁军提议, 672

Dissenters, 不信奉国教者

获得政治和社会的平等, 26, 202

受其影响的领域, 165—166

divorce, 离婚, 法国民间的, 150, 152, 157

doctrinaires, the, 空论派, 346, 347, 363

Dohm, C. W., 多姆, C. W., 论改善犹太人的地位, 97

Dolgorukov, Count P. P., 多尔戈鲁科夫伯爵, 俄国政治家, 508, 512

Döllinger, J. J. I. von, 多林格尔, J. J. I. 冯, 教会史家, 163

Dorpat, university of, 多尔帕特大学, 499

Douglas, Sir Howard, 道格拉斯爵士, 霍华德, 海军炮术论的作者, 83

dragoons, 龙骑兵, 70

Dresden, 德累斯顿, 387, 652

拿破仑在此战胜联盟军 (1813年), 273

高等技术学校, 125

Drey, J. S., 德赖, J. S., 德意志神学家, 163

droits réunis (indirect taxes), 综合消费税 (间接税), 297, 340

Drsote-Vischering, Clemens A., Baron von,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 克莱门斯, 科隆大主教, 175

Drouot, J. B., 德鲁奥, 法国炮兵司令, 312, 315

Dublin, 都柏林, 人口, 32

Dubois-Crancé, E. L. A., 杜布瓦-克朗塞, 法国督政府时代的陆军部长, 62, 293

Duchâtel, C. M. T., 迪夏特尔, C. M. T., 法国政治家, 364

Ducos, P. R., 迪科, P. R., 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执政府成员, 293, 295

Dugué, Perrine, 迪盖, 佩兰, 法国共和派, 149

Dumas, J. B., 杜马, J. B., 生物学家, 138

Dumouriez, C. F. du P., 迪穆里埃, C. F. du P., 法国将军, 277, 362, 464

Dundas, Henry, Viscount Melville, 邓达斯, 亨利, 梅尔维尔子爵

陆军大臣，77，532

海军财务局长，81

东印度公司督察委员会主席，553，556

Duphot, Léonard, 迪福，莱奥纳尔，法国将军，在罗马被谋杀，
151

Dupont de l' Etang, Comte P.A.，杜邦·德·莱当伯爵，法国
将军，334，335

Dupont de l' Eure, J.C.，杜邦·德·勒尔，法国律师和政治
家，361

Dupont de Nemours, Pierre, 杜邦·德·内穆尔，皮埃尔，观念
派学者，120

Durand, J.N.L.，迪朗，J.N.L.，建筑师，223

Dutch language, 荷兰语

在尼德兰联合王国，204，476，479

在爪哇，568

du Teil, Chevalier Jean, 迪泰尔，谢瓦利埃·让，军事思想
家，68，311

Dwight, Timothy, 德怀特，蒂莫西，耶鲁大学校长，166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荷兰东印度公司，465，563—
565，574

被取缔（1798年），466

East India Company, English, 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印度，552，553—558

在印度以外各国，558—560

在阿拉伯国家，576

行政管理问题，560—563

失去垄断特权（1813，1833年），565

被迫参加社会改革，565—568

East Indies, Dutch, 荷属东印度群岛，比利时的棉纺织品市场，478

Eckermann, J. C. R.，埃克曼，J. C. R.，德国圣经评论家，167

École des Chartes, 巴黎文献学院，193

École des Mines, 矿业学校，121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高等师范学校，121, 199, 203

École polytechnique, 综合工科学学校（起初为公共工程学校），121, 122—123, 128, 286

拿破仑时代军事化，298

推动德意志的发展，28, 125

écoles centrales, 中心学校，法国督政府建立，120, 199

Ecuador, 厄瓜多尔（前身为基多总督管辖区）

与哥伦比亚分离，628

Eden Treaty (commercial), 伊登条约（商业），英法两国签订（1786年），262

Edinburgh Review, 《爱丁堡评论》，辉格党的季刊，182

education, 教育，193—208

在奥地利，200, 205, 397

在比利时，奥地利人统治下，475；荷兰人统治下，173—174, 204, 475—476

在锡兰，568

在丹麦，206, 493

在英国，27—28, 130, 178, 194, 201—203, 206, 207

在法国, 120—126, 286; 拿破仑时代, 180, 198—200, 298;
1815年后, 203—204, 206—207, 349

在德意志, 179, 193—197, 205, 207—208, 385—387

在荷兰, 205, 205—206, 475

在印度, 26, 567—568

在爱尔兰, 202

在意大利, 200

在爪哇, 568

在俄国, 200, 499, 510—511, 513, 518

在苏格兰, 129—130, 201

在塞尔维亚, 543

在美国, 201, 206, 610

教育理论, 27, 30, 119, 193—194

参看schools, universities条

Égaux, 平等派(巴贝夫分子)密谋, 289

Egypt, 埃及

麦木鲁克贝伊, 525, 529, 532, 533

法国远征军(1798—1801年), 256, 292, 310, 529—531,
576

英国占领(1801—1803年), 531—532; (1807年3—9月),
533

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 4—5, 532, 533—534

埃及军队在希腊, 548, 550, 686, 688

Eichendorff, J.F.von, 艾兴多夫, J.F.冯, 诗人, 103

Eichhorn, Hermann von, 艾希霍恩, 赫尔曼·冯, 圣经评论家,
167

Elba, 厄尔巴岛, 拿破仑在厄尔巴 (1814—1815年), 305, 643, 660

Eldon, John Scott, Earl of, 埃尔登伯爵, 约翰·斯科特, 大法官, 180—181

Elio, F. X., 埃利奥, F. X., 驻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人总督, 614

Elliott, A., 埃利奥特, A., 建筑师, 227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埃尔芬斯通, 蒙斯图尔特, 孟买总督, 558, 561, 562

鼓励东方学研究, 570, 571

Embargo Act of President Jefferson (1807年), 杰斐逊总统的禁运法 (1807年), 327

麦迪逊总统重新实施 (1811年), 328

Emery, J. A., 埃梅里, J. A., 圣绪尔比斯会修道院长, 151

emigration, 移民

英国移出人员和资本, 31

移往美国, 177, 597

émigrés, 法国流亡贵族

军官, 61, 62, 69, 311; 主教, 151, 152, 468; 作家, 104—106

在奥地利, 253; 在意大利, 413—414; 在俄国, 500

反对流亡贵族的法律, 264, 290, 291, 292, 293, 296

回国, 在拿破仑时期, 11, 298, 301

在路易十八时代, 340—341, 350

赔偿 (1824—1825年), 350—351

enclosures of land, 圈地

在丹麦, 482

在英国，34

在普鲁士，377

在西班牙，446

Encyclopaedists, 百科全书派, 118, 120, 141—142

Enfantin, Barthélemy P., 昂方坦, 巴泰勒米, 圣西门的主要门徒, 114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马克思的追随者, 113, 114—115, 117

Enghien, L. A. H. de Bourbon Condé, Duc d', 当甘公爵, 被处决 (1804年), 264—265, 300, 485

engineering, 工程学, 122, 141, 142

工程学与建筑学, 228

England, 英格兰, 见Britain条

English language, 英语, 在印度, 567

enragés, the, 愤激派, 282, 283

entail of lands, 土地限定继承权, 在匈牙利, 51; 在意大利, 418, 436; 在西班牙, 440, 442, 456

Entre Ríos, 恩特雷里奥斯, 阿根廷省, 620

equality, 平等

基督教和平等, 116

法国革命和平等, 275

为平等而牺牲自由, 115—116

拿破仑和平等, 321

浪漫派批评平等, 103

席勒和平等, 100

争取平等, 95—99

“Equator, Confederation of the”，“赤道邦联”，632

Erastianism, 埃拉斯都主义（国家万能主义），176

Erfurt, 埃尔富特，沙皇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此会晤（1808年），269, 542

Erie Canal, 伊利运河（从伊利湖至赫德森河），599, 606

Eril, Melzi d’，参看Melzi d’ Eril条

Erlangen, university of, 埃尔兰根大学，127

Erlon, J.B.Drouet, Comte d’，戴尔隆伯爵，德鲁埃，法国元帅，314

Eroles, Baron, 埃罗莱斯，男爵，西班牙将军，450

Espartero, Baldomero,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西班牙军人和政治家，458, 459

Essequibo, 埃塞奎博，荷兰人在亚眠和约中丧失（1802年），469

Estado Cisplatino, 内普拉蒂诺省，巴西的临时省份（前为东部地带，后为乌拉圭），630, 631, 632

Estates, 议会

 奥地利的，398

 波希米亚的，410

 在丹麦（省协商议会），492

 芬兰的，492

 德意志诸邦的，392, 393

 瑞典的，17, 80, 483, 489, 492

 威斯特伐利亚的，375

 符腾堡的，372, 391

 参看Constitutions条

Esterhazy family, 埃斯特哈齐家族, 与海顿, 228, 230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基督教君主政体, 573

埃及名义上的领地, 534

Etruria, Kingdom of (Tuscany), 埃特鲁里亚王国 (托斯卡纳), 拿破仑建立 (1801年), 260, 438

Evangelicals, 福音派教徒, 164, 165与印度, 553, 566, 567, 570

Evans, Oliver, 埃文斯, 奥利弗, 他的自动化面粉厂, 601

Everett, Edward, 埃弗雷特, 爱德华, 美国学者, 在格廷根, 196

Evora Montes, Treaty of, 埃武拉山条约, 唐·佩德罗和唐·米格尔签订 (1834年), 454

Exaltados in Spanish Politics, 西班牙政治中的激进派, 449, 450

Examiner, The, 《考察家报》, 约翰和利·亨特的报纸, 182

Excellent, H. M. S., “优秀”号军舰, 炮术学校, 83

Exmouth, Edward Pellew, Viscount, 埃克斯默思子爵, 爱德华·佩鲁, 海军上将, 85

expectation of life, 寿命的增长, 33

Exterminating Angel, Society of the, 除暴天使会, 西班牙天主教秘密团体, 189

Eylau, battle of, 法俄艾劳战役 (1807年), 268

Ezpeletay Veire de Galdeano, José de, 埃斯佩莱塔·伊·贝雷·德加尔迪亚诺, 何塞·德, 西班牙将军, 444

Fabvier, C. N., Baron, 法布维埃男爵, 法国的亲希腊军官, 548

Facfory Acts, 工厂法, 在英国, 5, 59, 111

Faeroe Is., 费罗群岛, 挪威属地, 为丹麦所保留, 490

Fagel, Hendrik, 法格尔, 亨德里克, 荷兰政治家, 645

Faideherbe, L.L.C., 费德尔布, L.L.C., 法国军人兼非洲行政官员, 586

Fain, A.J.F., 凡, A.J.F., 拿破仑的秘书, 317

Falck, A.R., 福尔克, A.R., 荷兰政治家, 471

Fallen Timbers, battle of, 鹿寨战役, 美国军队和印第安人之间 (1794年), 593

famine, 饥荒, 33

 在奥地利 (1815—1816年), 403; (1847—1848年), 407

 在法国 (1788—1789年), 282

 在挪威 (1812—1813年), 因英国封锁而加剧, 488

 在俄国 (1787年), 500

Faraday, Michael, 法拉第, 迈克尔, 自然哲学家, 29, 129

 发现发电机原理, 144, 154

Febronianism, 费布朗尼乌主义, 德意志的主张主教制的高卢派, 155, 174

Federalist Party, United States, 美国联邦党 (主张中央集权), 602, 603, 605

 联邦党和最高法院, 608

Federati, 联邦党, 皮埃蒙特的秘密团体, 431, 433

Ferdinand I, 斐迪南一世, 奥地利皇帝, 404, 405

Ferdinand III, 斐迪南三世, 托斯卡纳国王, 429, 430

Ferdinand IV, 斐迪南四世, 那不勒斯国王

 为约瑟夫·波拿巴取代 (1806—1808年), 267

 复位 (1814年), 16—17, 432, 433

Ferdinand VII, 斐迪南德七世, 西班牙国王

作为王储, 被拟定与拿破仑的侄女结婚, 320

卡洛斯四世退位后即位(1808年), 443, 613

依赖和法国的联盟, 444

拿破仑强迫他逊位(1808年), 269, 335, 444, 613

复位(1814年), 336, 447, 617

其统治, 448, 452, 453

Fernando Po, 费尔南多波岛, 英国海军禁止奴隶贸易的基地
(1827—1834年), 581, 584, 585

Ferrand, Jacques, 费朗, 雅克, 法国将军, 633

Fesch, Cardinal J., 费什, 红衣主教, 拿破仑之舅父, 159

feudal rights, 封建权利, 35, 36

在奥地利, 51

在法国及其领地, 35, 56, 303

在德意志, 368—369

在意大利, 48, 421

Feuerbach, P. J. Anselm, 费尔巴哈, 安泽尔姆, 刑法的改革者,
390

Fichte, J. G., 费希特, J. G., 哲学家, 94, 192

其民族主义, 100, 332, 385, 386

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91, 94, 100; 对教育的看法, 193, 194,
197, 386

Fieschi, G. M., 菲埃奇, G. M., 科西嘉的冒险家, 360

finances, 财政

国际的, 6, 47, 636

各国的：

奥地利，401—403

英国，42

法国，281—282，289—290，291，293，297—298，351

普鲁士，373，375，376

俄国，513—514，523—524

参看banks and banking, taxation条

Finland, 芬兰

在瑞典统治下，480

瑞典贵族要求芬兰独立（1788年），481，483

为俄国征服和兼并（1808—1809年），7，487

瑞典未再征服，489

在俄国统治下，512，516，517

Finney, Charles G., 芬尼，查尔斯，信仰复兴派，166

Fjölnir, 《菲厄尼尔》，冰岛杂志，494

Flanders, 佛兰德

（比利时），18，54，476

（法国），35，56

flax, 亚麻，俄国出口，50，498

Flaxman, John, 弗拉克斯曼，约翰，雕刻家，215，222

Flemish movement, 佛兰芒语运动，18，476—477

Fleurus, 弗勒吕斯，法国在此战胜奥地利人（1794年），284，
464

Flinders, Matthew, 弗林德斯，马修，科学家和探险家，264

Floréal, 花月，22日政变（1798年），292，293

Florence, 佛罗伦萨, 法国人进入 (1799年), 256

Florentine Academy, 佛罗伦萨学园, 126

Florida, 佛罗里达, 归属美国 (1813, 1819年), 595, 637

Floridablanca, J.M.Monino y Redondo, Count of, 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 莫尼诺-雷东多, 西班牙政治家, 440

Folk High Schools, 民众高级中学, 丹麦, 493

Fonblanque, Albany, 方布兰克, 奥尔巴尼, 激进的新闻记者, 183

Fontaine, P.F.L., 方丹, P.F.L., 建筑师, 224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

 政教协定 (1813年), 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 160

 枫丹白露敕令, 关于中立国船只 (1807年), 327; 关于英国船只 (1810年), 328

 枫丹白露条约 (1807年), 法国和西班牙签订, 613

 枫丹白露条约 (1814年), 拿破仑退位的条件, 321, 643

Fontanes, Louis, Marquis de, 丰塔内侯爵, 路易, 法国教育总长, 27, 199, 323

Forestry, Academy of, 林业学院, 在萨克森的塔兰特, 388

fortresses, 要塞, 法国边界, 661, 662

Forty-Ninty Parallel, 北纬49°,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 595

Foscolo, Ugo, 福斯科洛, 乌戈, 意大利作家, 332, 436

Fouché, Joseph, 富歇, 约瑟夫, 法国政治家

 第三届督政府警务部长, 293

 积极参与非基督教化运动, 146

 在拿破仑时代, 185, 300, 320

 失去官职 (1810年), 316

因弑君在王朝复辟后被排斥，341

拿破仑重新起用（1815年），342

安排路易十八归来，342—343，661

Fourah Bay College，福拉湾学院，塞拉利昂，583

Fourcroy, Comte, A. F. de，富尔克罗瓦伯爵，化学家和教育家，125，199

Fourier, Charles，傅立叶，夏尔，改革家，7，24，59，110—111

恩格斯论傅立叶，115

Fourier, Joseph，傅立叶，约瑟夫，数学家，28，121，133

省长，125

Fox, Charles James，福克斯，查尔斯·詹姆斯，辉格党政治家，81，180，267

France，法国，275—306，307—336，337—366

明显软弱的时期（18世纪80年代），251—252

法英商务条约（1786年），262

制宪议会（1789—1791年），13，252，280

立法议会（1791—1792年），252；在瓦尔米击退奥普联军的入侵（1792年），253，275

国民公会（1792—1795年），275—276；废除君主政体，处决国王，邻国入侵（1792—1793年），254，276—277；恐怖统治（1793—1794年），279—281；在弗勒吕斯战胜（1794年），284，464；与普鲁士和西班牙媾和（1795年），71，255，286；击败民众起义；拿破仑击败保王党人暴动（1795年），286，308；国民公会的积极性工作，286

督政府（1795—1799年），286—295；在意大利的胜利，75，255，289，309，311，415—416；在德意志的失败（1796—1797年），289；坎波福米奥和约，255，309；果月政变（1797年），

291, 309; 花月政变, 292; 入侵埃及 (1798年), 256, 292, 310, 529—531, 576; 牧月政变, 293; 第二次反法联盟; 在意大利、瑞士战败 (1799年), 257, 310; 督政府以雾月政变告终 (1799年), 257, 295, 310

拿破仑任执政 (1799—1804年), 295—301, 311; 拿破仑努力分化盟国 (1800—1801年), 258; 在意大利战胜, 和奥地利作战; 吕内维尔和约 (1801年), 259, 299, 420; 进攻葡萄牙 (1801年), 260; 与英国签订亚眠条约 (1802年), 261, 299, 300; 对德意志重作安排 (1802年), 259, 262—263;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 (1802年), 153—154, 263; 拿破仑任终身执政 (1802年), 263, 300; 战争重又爆发 (1803年), 263, 264; 处决当甘公爵 (1804年), 264—265, 300

拿破仑成为皇帝 (1804年), 301; 他的帝国, 301—304; 第三次反法联盟; 奥地利战败 (1805年), 266—267; 普雷斯堡和约, 267, 399; 普鲁士在耶拿战败 (1806年), 268; 俄国在弗里德兰战败 (1807年), 268, 485; 提尔西特和约, 268, 512; 与俄国联盟, 486; 大陆体系 (1806年), 268—269, 302, 326—327; 入侵葡萄牙 (1807年), 269; 西班牙抵抗 (1808年), 得到英国援助, 333—336, 444—446; 奥地利在瓦格拉姆战败 (1809年), 270—271, 400; 经济衰退 (1810—1812年), 303; 与俄国破裂, 入侵, 撤退 (1812年), 271, 304—305, 515; 第四次反法联盟; 拿破仑战败 (1813—1814年), 272—274, 305; 巴黎陷入联盟军之手 (1814年), 642

波旁王朝复辟, 305, 643; 巴黎和约 (1814年), 305, 644; 维也纳会议, 646—647, 652—655

百日, 14, 658, 659—661; 第二个巴黎和约 (1815年), 342, 661—665

第二次王朝复辟 (1815年), 341—342, 661; 宪章时期的政治, 337—343; “无双议院” (1815—1816年), 343—344; 中间道路政府 (1816—1820年), 344—347; 极端保王派政府 (1820—1824年), 347—349; “重新恢复的议院” (1824年), 349

查理十世的统治（1824—1830年），350—355；干涉西班牙（1823—1828年），16，334，349，450，451，672，679，681，690；干涉希腊（1827—1833年），354，550，689，690；与俄国人和英国人在纳瓦里诺（1827年），549，690

路易·菲利普的统治（1830—1848年），356—366；承认南美各共和国（1830年），638

在非洲，573，577，585—586，589

在印度，552—558各处

人口，32，251，281

franchise，公民权，参看suffrage条

Francia，J.G.R.de，弗朗西亚，巴拉圭独裁者，619

Francis，Sir Philip，弗朗西斯爵士，菲利普，时事评论家，102

Francis I，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弗兰茨二世）

其统治，395—400，403，472

惧怕“雅各宾主义”，333

在他治下的教育，200，205

神圣罗马帝国崩溃（1806年）后放弃选帝称号，267，389

拿破仑的岳父，21，270，321

维也纳会议的东道主，647，651，655

Francis I，弗朗西斯一世，那不勒斯国王，434

Francis IV，弗朗西斯四世，摩德纳国王，429，430，435，437

Francis Joseph，弗兰茨·约瑟夫，奥地利帝位假定继承人（1835年），405

Frankenberg，Comte J.H.de，弗朗肯贝格伯爵，梅克林红衣大主教，467

Frankfurt, 法兰克福, 拿破仑建立的邦, 389

Frankfurt Proposals, 法兰克福建议, 提出以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为拿破仑的国界线(1813年), 272, 305, 639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作为美国的“文化英雄”, 131

fraternity, 博爱, 92—93

Fraunhofer, Joseph von, 夫琅和费, 约瑟夫·冯, 物理学家, 144

Frayssinous, Comte D.A.L., 弗雷西努斯伯爵, 法国高级教士和政治家, 203, 349

Frederick, 弗里德里希, 丹麦王储, 482, 485

Frederick VI, 弗里德里希六世, 丹麦国王, 487, 488, 490, 646

Frederick II (“the Great”), 腓特烈二世(大王), 普鲁士国王, 373, 375

Frederick William 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普鲁士国王, 243, 373, 376

Frederick William I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普鲁士国王, 169

即位(1797年), 373

对军队改革表示怀疑, 65, 383

对教育的看法, 127, 208

其统治时期的改革, 333, 369, 373, 375

破坏外交豁免权, 264

在解放战争中(1813年), 384, 385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 651

和宗教事务(1817年), 176—177

Frederick I，弗里德里希一世，萨克森国王，392

Frederick I，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公，后为符腾堡国王，391，
646

Fredrikshamn, Treaty of，腓特烈港条约，俄国和瑞典签订
(1809年)，487

freemasons，共济会员，24

在奥地利，397；在法国，346；在意大利，414；在音乐家中
间，237；在俄国，500—501，519；在西班牙，190

Freetown，弗里敦，塞拉利昂

以前的奴隶在此定居，580，583，584

查禁奴隶贸易的海军基地，581，584

Free trade，自由贸易

大西洋，598

商人希望自由贸易，58，477

在斯堪的纳维亚（谷物），482

在托斯卡纳，430

Ereikorps (mounted volunteers)，自由军团（志愿骑兵团），
在普鲁士军队中，384

Fresnel, Augustin，菲涅耳，奥古斯坦，工程师，123，136

Freiberg-im-Sachsen，萨克森的弗赖堡，该地的矿业学院，
140，388

French Revolution，法国革命，11—14，31，57，275—294各处

巴贝夫论法国革命，288

哈登贝格和格奈泽诺论法国革命，333

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看法，119

法国革命的影响，对意大利，413—415；对俄国，500；对作家们，91—106

拿破仑宣布革命完成，299

法国革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胜利得到巩固，275；进一步确定（在1814年宪章中），187—188，305，338；重申（1830，1848年），306

Friedland, battle of (1807)，弗里德兰战役（1807年），268，313，485，512

Friedrich, C.D.，弗里德里希，C.D.，画家，220

Friends of the Country，国家之友社，西班牙经济团体，49

Friends of the Muses，诗友社（维也纳），546

Fructidor，果月政变及其政权（1797年），291，292，309

fueros，自治权，452，460

Fullerton, Robert，富勒顿，罗伯特，槟榔屿总督，559

Fulton, Robert，富尔顿，罗伯特，轮船工程师，84，141

Gachina，加特契纳，沙皇太子保罗在该地的生活，502—504

Gaj, Ljudevit，加伊，留德维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409

Galicia (Austrian)，加利西亚（奥地利的），398，404，410，511

Galicia (Spanish)，加利西亚（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的洪达，449

Gallatin, Albert，加勒廷，艾伯特，美国政治家，595

Gallican Church, Gallicanism，高卢教会，高卢派，13，146，151，153，158，159，161

Galvani, Luigi，伽伐尼，路易吉，物理学家，134

Gambia river，冈比亚河，英国的贸易，573，574

Ganteaume, Comte H. J. A. de, 冈托姆伯爵, 法国海军上将, 79, 325

Garay, Martin de, 加拉伊, 马丁·德, 西班牙政治家, 447

Gast, John, 加斯特, 约翰, 造船工人罢工的领袖, 81

Gauss, K. G., 高斯, 数学家, 129, 132

Gay-Lussac, J. L., 盖-吕萨克, 化学家, 123, 125, 128

Gazette de France, 《法兰西报》, 185

Geijer, E. G., 耶伊尔, E. G., 瑞典历史学家, 493

Genlis, S. F., Comtesse de, 让利伯爵夫人, 362

Genoa, 热亚那, 7

 中立(1792年), 414

 港口对英国封闭(1796年), 415, 416

 在利古里亚共和国, 417; 在撒丁王国, 429; 在法兰西帝国, 424, 438

 为大陆封锁所毁, 303, 424

 本廷克关于热亚那的计划(1814年), 427

 划归撒丁王国(1815年), 7, 658

Gentz, Friedrich von, 根茨, 弗里德里希·冯, 时事评论家, 102, 186

 参加维也纳会议, 647, 648, 651

Geoffroy Saint-Hilaire, Étienne, 若弗鲁瓦·圣-蒂莱尔, 艾蒂安, 博物学家, 124, 126

geology, 地质学, 129, 140—141, 167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英国国王, 102, 260

George, Grand Duke of Hesse-Darmstadt, 乔治,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 646

Georgia, 格鲁吉亚, 俄国的保护国, 495; 被兼并 (1801年), 522

Gérard, E. M., 热拉尔, E. M., 法国将军, 361

Géricault, Theodore, 热里科, 泰奥多尔, 法国画家和雕刻家, 210, 212—213, 214

Germanic Confederation, 德意志邦联, 8, 16, 393, 644, 649, 664

Germany, 德意志, 367—394

人口, 32

民族主义, 186, 332, 389; 主要在文化方面, 367, 385

在拿破仑统治下, 185—186, 302, 303, 332—333

领土, 再分配 (1802年), 18, 259, 262—263; (1805年), 267, 388—389

德意志的统一, 拿破仑和德意志, 7—8, 99, 260, 274, 303

参看有关各邦条

Ghent, 根特

棉纺工业, 468—469

大学, 475

Ghent, Treaty of, 根特条约, 英美两国签订 (1814年), 598, 601, 671

Ghose, Kasinath, 高斯, 卡辛纳特, 反击詹姆斯·穆勒, 为印度文化辩护, 570

Gibbon, Edward, 吉本, 爱德华, 历史学家, 24, 76

Gieseler, Johann K. L., 吉泽勒, 约翰, 圣经评论家, 167

Giessen, university of, 吉森大学, 128

Gioia, Melchiorre, 焦亚, 梅尔基奥里, 伦巴第经济学家, 436

- Girard, J.B. , 吉拉尔, J.B. , 天主教多明我会教育家, 206
- Girodet, A.L. , 吉罗代, A.L. , 画家, 211
- Girondins, 吉伦特派, 276, 277, 278, 284
- Girtin, Thomas, 格廷, 托马斯, 水彩画家, 217, 219
- Gladstone, W.E. , 格莱斯顿, W.E. , 政治家, 178
- Globe*, 《环球报》, 法国反保王派报纸, 189
- Gluck, C.W. , 格鲁克, C.W. , 作曲家, 238
- Gneisenau, A.W.A. , Count N.von, 格奈泽诺伯爵, 普鲁士陆军元帅
- 军事和政治改革家, 22, 333, 370, 378
- 在滑铁卢, 315
- Godoy, Manuel de, 戈多伊, 曼努埃尔·德, 西班牙权臣和政治家, 335, 440, 443, 444
- Godwin, William, 戈德温, 威廉, 理性主义作家, 93, 97, 108, 111
- 所著《关于政治正义的研究》, 92, 107
- Goethe, J.W.von, 歌德, J.W.冯, 诗人和哲学家
- 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102—103, 373; 论社会状况, 37, 371; 论印度文明, 569
- 拿破仑的崇拜者, 331
- 对科学感兴趣, 123—124, 139, 221
- 歌德与德意志的统一, 393—394
- 歌德与音乐家的关系, 237—238, 245—246, 247
- 著作, 332, 387; 《葛兹·封·贝利欣根》, 103, 371; 讽刺短诗, 367; 《伊菲格涅亚》, 372
- Gohier, L.J. , 戈伊埃, L.J. , 法国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293

gold, 黄金, 来自东非, 572; 来自南非, 587; 来自黄金海岸, 577, 580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英国商人的活动, 574, 577, 585

为英国兼并(1873—1874年), 585

Golitsyn, Prince A.W., 戈利岑亲王, 俄国圣主教公会牧首, 516, 518, 519

Gomez, Miguel, 戈麦斯, 米格尔, 西班牙卡洛斯派的将军, 460

Goree Island, 戈雷岛, 荷兰人和法国人在该岛, 573, 574

Gorani, Giuseppe, 戈拉尼, 朱塞佩, 米兰雅各宾派贵族, 413

Görres, Joseph von, 格雷, 约瑟夫·冯,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103, 161, 162, 186, 187

Gothic Society, 哥特学会, 瑞典, 493

Gothic style in architecture, 建筑中的哥特式风格, 227

Gottingen, university of, 格廷根大学, 128, 196, 372

Gouges, Olympe de, 古日, 奥林佩·德, 男女平等主义者, 96

Goya y Lucientes, F.J.de, 戈雅-吕西恩特斯, 画家, 221—222, 304

Grand Comité of French Convention,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治安委员会, 后为救国委员会), 279, 281, 283

Grant, Charles, 格兰特, 查尔斯, 东印度公司董事, 566, 570

Grant, James, 格兰特, 詹姆斯, 非洲探险家, 588

Great Lakes, 大湖区, 非军事化(1817年), 595; 开放通商, 599

Greece, 希腊

文学和教育的复兴, 526, 545—546

俄国和希腊, 16, 23, 544

反土耳其起义 (19世纪20年代), 25, 528, 547—548, 677—678, 679, 685—686

埃及军队在希腊, 548, 550, 686, 688

法国的干涉, 354, 689, 690

起义后的和解 (1830年), 10, 549—551

Greek language, 希腊语, 545, 546

Greek Revival style of architecture, 希腊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 227—228, 609

Greenland, 格陵兰, 挪威属地, 丹麦保留, 490

Greenwich, 格林尼治, 皇家水兵收养院, 87

Grégoire, Abbé Henri, 格雷古瓦神甫, 亨利, 法国立宪派主教, 97

Gregorian chant, 格列高利圣歌, 244

Gregory XVI (Mauro Gapellari), 格列高利十六世 (毛罗·卡佩拉里), 教皇 (1831—1846年), 26, 116, 171, 172

Grenville, William, Lord, 格伦维尔勋爵, 威廉

外交大臣, 260, 261

首相, 267

Grétry, A. E. M., 格雷特里, A. E. M., 作曲家, 238

Greville, C. C. F., 格雷维尔, C. C. F., 日记作者, 183

Gribeauval, J. R., 格里博瓦尔, J. R., 火炮改革者, 68, 252

Grimm, Baron F. M., 格林男爵, 学者, 500

Gros, A. J., 格罗, A. J., 画家, 211

Grouchy, Emmanuel de, 格鲁希, 埃马纽埃尔·德, 法国元帅, 313, 314, 315

groundnuts, 落花生, 非洲油料作物, 586

Grundtvig, N.F.S., 格伦特维, N.F.S., 丹麦主教和作家, 493

Guadeloupe Island, 瓜德罗普岛, 划归法国 (1814年), 645, 657

Guadeloupe Victoria, F.F., 瓜达卢佩·维多利亚, 墨西哥起义者, 后为总统, 635

Guanajuato, 瓜纳华托, 遭伊达尔戈部队的洗劫 (1810年), 634

Guards of Honour in Holland (1813), 荷兰仪仗队 (1813年), 471

Guatemala, 危地马拉, 将军辖区, 宣布独立, 634

 中美洲联合省的一部分 (1823—1838年), 635—636

Guayaquil, 瓜亚基尔

 宣布独立 (1820年), 625

 为哥伦比亚兼并 (1822年), 626

 玻利瓦尔与圣马丁于此会晤 (1822年), 626

Guerrero, Vicente, 格雷罗, 维森特, 墨西哥起义领袖, 635

Guiana, 圭亚那, 英属, 10, 645; 荷属, 10; 法属, 305; 葡属, 161, 260

Guibert, Comte J.A.H. de, 吉贝尔伯爵, 法国将军和军事作家, 61, 70—71, 75, 252, 311

Guilds, 行会, 在法国, 56; 在德意志, 52, 53, 369, 380—381; 在西班牙, 49; 行会的没落, 58

Guizot, F.P.G., 基佐, 弗·皮·纪, 法国政治家, 24, 188

 参加自由反对派, 26, 189

 解除教授职务, 203

 与空论派在一起, 346, 363

路易·菲利普时代任部长, 357, 361

政府首脑, 364, 365

Gulistan, Treaty of, 古利斯坦条约, 俄国和波斯签订 (1813年), 9, 522, 529

gum, 树胶, 从塞内冈比亚出口, 577, 580

gunnery, 大炮, 海军炮, 83

参看artillery条

Gusstavus III, 古斯塔夫三世, 瑞典国王, 480, 481, 482—483, 493

Gustavus IV, 古斯塔夫四世, 瑞典国王, 485, 487

gymnasia (Secondary schools), 大学预科 (中学), 在德意志, 27, 121, 196, 386; 在俄国, 200, 510

Habsburg dynasty, 哈布斯堡王朝, 445, 615

在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复位 (1815年), 429, 658

Hague, The, Treaty of, 海牙条约, 法国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 (1795年), 465

Haidar Ali, 海达尔·阿里, 迈索尔的, 554

Haiti, 海地, 西印度群岛中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部分, 1804—1844年为黑人共和国和王国, 633

参看Saint Domingue, Santo Domingo条

Halle, university of, 哈勒大学, 127

Haller, K.L.von, 哈勒, 反革命作家, 106—107

Hamburg, 汉堡, 55, 491

遭受大陆封锁的破坏, 303

人口, 32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 美国政治家, 600, 602, 605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 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创始人, 569

Hamilton, Thomas, 汉密尔顿, 托马斯, 建筑师, 227

Handel, George F., 韩德尔, 乔治, 作曲家, 232

Hanover, 汉诺威, 选帝侯领地, 后为王国 (1815年)

建议让与普鲁士 (1800年), 258, 拿破仑使之实现 (1805年), 266

拿破仑提出改归英国 (1806年), 268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7, 654, 656, 664

反动政府, 16, 392

高等技术学校, 125

新宪法 (1833年), 393

Hanse cities, 汉萨同盟城市

为法兰西帝国兼并 (1810年), 302, 328, 423

参加神圣同盟 (1817年), 22

Hardenberg, Charles A., Prince of, 哈登贝格亲王, 查理, 普鲁士政治家

主张改革的大臣, 333, 370, 375

被法国人强迫辞职 (1807年), 378

政府首脑, 379—380, 381, 384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0, 646, 650—654各处, 661, 666

Harrowby, Dudley Ryder, Earl of, 哈罗比伯爵, 杜德利·赖德, 政治家, 265

Hartford Convention, 哈特福德大会, 新英格兰代表的 (1813—1814年), 607

Hartley, David, 哈特利, 戴维, 反对奴隶制的作家, 98

Hastings, Abney, 黑斯廷斯, 阿布尼, 海军军官, 84

Hastings, Warren, 黑斯廷斯, 沃伦, 印度总督, 553, 569

Hauge, H. N., 豪盖, H. N., 挪威的以在俗身份传教的福音派教徒, 164, 488

Haugwitz, Count C. A. H. K. von, 豪格维茨伯爵, 奥地利政治家, 266, 268

Hawkesbury, Lord, 霍克斯伯里勋爵

参看Liverpool, Earl of条

Haydn, F. J., 海顿, F. J., 作曲家, 228, 230—233, 237, 243—244

Hébert, J. R., 埃贝尔, J. R., 法国革命新闻记者, 147, 183, 282, 283

Hegel, G. W. F., 黑格尔, G. W. F., 唯心主义哲学家, 168, 192

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91, 93

对当代思想的影响, 100, 129, 161

担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 390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海德尔堡大学, 128, 195, 391

Heine, Heinrich, 海涅, 海因里希, 诗人, 191, 570

Heinitz, A. F. von, 海尼茨, A. F. 冯, 普鲁士政治家, 373

Heligoland Island, 赫尔戈兰岛

英国从丹麦人手中夺取 (1807年), 78, 269, 490

保留 (1815年), 10, 656

Helvetic Confederation, 赫尔维蒂联邦, 拿破仑作为调停人,
302

Helvetic Republic, 赫尔维蒂共和国, 185, 294

参看Switzerland条

hemp, 大麻, 俄国出口, 50, 498

Hérault de Seychelles, M. J., 埃罗·德·塞谢勒,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Hercules III, 赫尔克里斯三世, 摩德纳公爵, 414

Herder, J. G. von, 赫尔德, J. G. 冯, 历史学家, 129, 369 372,
569

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91, 373

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先驱, 332

Hermes, Georg, 赫尔梅斯, 格奥尔格, 德意志神学家, 162, 174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 选帝侯领地 (1803年)

选帝侯参加维也纳会议 (1814年), 646

宪法, 16, 392—393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 170

Hesse-Darmstadt, Grand Duchy (1806),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
国 (1806年)

获得领土 (1803年), 155, 262, 388

名义上对美因茨要塞拥有统治权 (1815年), 656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 170

Hidalgo y Costilla, Father Miguel, 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
亚神父, 米格尔, 墨西哥起义领袖, 172, 634

Hindu College, 印度教学院, 加尔各答, 568, 570

Hinduism, 印度教, 566, 567, 570

Hippel, T.G.von, 希佩尔, 特·戈·冯, 德意志男女平等主义者, 96

Hispaniola Island, 伊斯帕尼奥拉岛, 在西印度群岛, 633

参看Haiti, Saint Domingue, Santo Domingo条

Hittorff, Jacques, 希托夫, 雅克, 建筑师, 225

Hoche, Lazare, 奥什, 拉扎尔, 法国将军, 80, 290

Hoesch, Wilhelm and Eberhard, 赫施, 威廉和埃贝哈德, 德意志铁器制造商, 40

Hofer, Andreas, 霍费尔, 安德烈亚斯, 蒂罗尔起义领袖, 270, 333

Hoffmann, J.G., 霍夫曼, J.G., 统计学家, 646, 652

Hogendorp, Dirk van, 霍亨多普, 德克·范, 荷兰驻爪哇官员, 552, 563—564

Hogendorp, Dirk van, 霍亨多普, G.K. 范, 海牙奥伦治党领导人 (1813年), 471, 472

Hohenlinden, battle of (1800年), 霍恩林登战役 (1800年), 259, 299

Holberg, Ludvig, 霍尔堡, 路德维格, 挪威作家, 493

Holcroft, Thomas, 霍尔克罗夫特, 托马斯, 戏剧家, 91

Hölderlin, Friedrich, 荷尔德林, 弗里德里希, 诗人, 91, 101, 103

Holkar, 霍尔卡, 马拉塔土王, 554

Holkar, Tukoji, 霍尔卡, 图科吉, 他的逝世, 555

Holkar, Jaswant Rao, 霍尔卡, 贾斯旺·劳, 对英作战, 555, 556, 557

Holland, Henry, 霍兰, 亨利, 建筑师, 226

Holland, 荷兰

爱国运动（18世纪80年代），462，463

对法国作战（1793年），254；在“爱国者”协助下被侵略，465

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1795年），255，465；英国夺取荷兰的殖民地，255，558

国民议会和新宪法（1796年），465，466

法国从荷兰驱除英俄军队（1799年），257，294，469

在法国统治下，469—472

路易·波拿巴成为国王（1806年），267，470；并入法国（1810年），302，328，470；暴动（1811年），471；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时，许多荷兰士兵丧生（1812年），471

奥伦治的威廉复位（1813年），471；通过温和的宪法，187；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579

英国承担荷兰欠俄国的一半债款，645；英荷条约（1814年），642注

与比利时合并成为尼德兰王国（1814年），18，54，473，640，644，645，664；制定宪法（1815年），473—474

荷军和盟国一起在滑铁卢，473

统治比利时（1815—1830年），479—480

王储的婚姻（1815年），672

在东南亚的殖民地，552，558—559，568，572；在开普敦，574—575；在戈雷岛（佛得角），573

参见Batavian Republic, Netherlands (Kingdom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条

Holstein, Duchy of, 荷尔斯泰因大公国，485，491

参看Schleswig and Holstein条

“Holy Alliance” of Tsar Alexander I,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
“神圣同盟”, 169

保守派统治者的联盟, 393, 670—671

沙皇在宗教方面的成果, 516, 663

不是针对土耳其, 22, 674

英国对神圣同盟的态度, 675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衰亡, 8, 267, 367, 388,
389, 403, 485

Holy Synod, 圣主教公会, 在俄国, 200

Hommer, J. C. A. von, 霍梅尔, J. C. A. 冯, 特里尔大主教, 费布朗
尼乌主义者, 174

Hondeschoote, 洪得夏乌特, 法军在该地战胜 (1793年), 72

Honduras, 洪都拉斯, 中美洲联合省的一部分 (1823—1838
年), 636

Hone, William, 霍恩, 威廉, 著作家和书商, 182

Hood, Samuel, Viscount Hood, 胡德, 塞缪尔, 胡德子爵, 海军
上将, 79

Hope, house of, 霍普家族, 阿姆斯特丹银行家, 346

Hoppner, John, 霍普纳, 约翰, 肖像画家, 216

Hormayr, Baron Joseph von, 霍尔迈尔男爵, 约瑟夫·冯, 奥地
利政治家, 333

Howe, Richard, Earl Howe, 豪伯爵, 理查德, 豪, 英国海军上
将, 77

Hübner, Martin, 许布内, 马丁, 丹麦国际法学家, 481

Humboldt, Baron Alexander von, 洪堡男爵, 亚历山大·冯, 地
理学家, 28, 124, 127, 129

Humboldt, Baron Wilhelm von, 洪堡男爵, 威廉·冯, 普鲁士政治家

人文主义者, 127

教育大臣, 194, 195, 385

计划成立柏林大学, 28, 196, 386—387

论哈登贝格, 379

Hume, David, 休谟, 戴维, 哲学家和历史家, 160, 568

Humphreys, Joshua, 汉弗莱斯, 乔舒亚, 美国海军建筑师, 89

Hundred Days (1815), “百日” (1815年), 14, 658, 659—661

参看Waterloo campaign条

Hungary, 匈牙利

与奥地利的关系, 16, 252, 396, 400—401, 402, 404—405

改革运动, 405, 407—408

Huninguen, 于南冈, 拆毁该地的法国要塞, 663

Hunt, John and Leigh, 亨特, 约翰和利, 激进新闻记者, 182

Hurwitz, Salkind, 胡尔维茨, 萨尔金德, 犹太时事评论家, 97

hussars, 轻骑兵, 70

Hutton, James, 赫顿, 詹姆斯, 地质学家, 28, 140

Hyderabad, Nizam of, 海得拉巴, 该土邦的君主, 553—554

Hypsilantes, Alexander, 希普西伦特斯, 亚历山大, 希腊友谊社领导人, 538—539, 543, 547, 677—678

Ibrahim, 易卜拉欣, 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之子, 534

在希腊, 548, 686, 687, 688

Iceland, 冰岛

人口的减少，480

取消冰岛议会（1800年），492

与冰岛的贸易，482

沦为冒险家“耶根国王”的猎获物，488

挪威的属地，由丹麦保留（1814年），490

语言，494

idéologues, the, 观念学派，120—124各处

ideology, 思想，120；拿破仑对思想的恐惧，318

Iduna, 《伊杜那》，瑞典哥特学会的杂志，493

Ignatius, 伊格那修斯，阿尔塔教区大主教，535, 546

Iguala, Plan of, 伊瓜拉计划，在墨西哥（1821年），635

Illinois, 伊利诺伊，并入美国（1818年），594

Illuminati, 先觉社，巴伐利亚秘密团体，390

Illyria, 伊利里亚

在法国统治下（自1809年），331, 408

对前途的讨论（1813年），272

重归奥地利，536, 648

在奥地利统治下，396, 409

Imperial Guard (France), 禁卫军（法国），312, 315, 643

impressment, 强迫为英国海军服役，86, 88；从美国船只上，
89, 596, 603, 611

income (real) per capita, 按人口计算的（实际）收入，43—
44

indemnity, 赔款，奥地利支付（1805年），267；法国支付
（1815年），342, 346, 663；付给流亡贵族（1824—1825年），350
—351

Indépendants, 独立派, 路易十八政权的反对党, 346, 347

India, 印度

英国人在印度, 552—563

英国人害怕法国在印度的影响, 552, 553, 554—555

社会改革, 565—567

文化, 567—571

教育, 26, 567—568

Indiana, 印第安纳, 成为美国的州(1816年), 594

Indians, 印第安人, 美国的印第安人, 593, 595; 在南美革命中, 617

indigo, 靛蓝, 印度和锡兰出口, 565

indulgents, the, 宽容派, 国民公会中的一个党派, 283

Industrial Law, 工业法, 在普鲁士(1811年), 381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40—41, 57, 329

对工业革命的批评者, 109—111

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41, 42, 141

对战争的技术方面影响甚小, 67

受到圣西门的欢迎, 112—113

industry, 工业, 31, 37—38, 47—48

在奥地利, 4, 51, 398—399, 403, 406

在比利时, 4, 18, 31, 40, 52, 54—55, 468—469, 477

在英国, 4, 38, 39—40, 40—47, 57, 329

在法国, 40, 56—57, 281, 329

在德意志, 40, 52—53, 369, 380—381, 388

在荷兰, 477

在意大利, 4, 48, 413, 423, 424, 435

在俄国, 50, 497, 522—523

在西班牙, 49, 50, 442, 461

在瑞典, 51, 484, 486

在美国, 600—601

参看coal, iron industry, and cotton, linen, and woolen industries 各条

infantry, 步兵, 70—74

Ingres, J. A. D., 安格尔, J. A. D., 画家, 209, 214—216

inheritance, law of, 继承法, 在拿破仑法典中, 修改的尝试(1826年), 353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在西班牙, 170, 440

受到自由派的攻击, 441, 446

Institut national de France, 法兰西国家研究院, 28, 119—120, 127, 200

拿破仑和法兰西国家研究院, 124, 126, 312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42, 424

intervention of Great Powers in affairs of other states, 大国干涉别国事务, 英国的观点, 670, 674—675, 681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授职权的争论, 158—159

Inwood, W. and H. W., 英伍德, W. 和H. W., 建筑师, 228

Ionian Islands, 爱奥尼亚群岛

被法国占领(1797—1799年), 256, 530, 535, 546; (1807年), 535

在俄国保护下成为爱奥尼亚共和国(1800—1807年), 535

英国人在该地(1814—1864年), 10, 535, 673, 678, 685

Ireland, 爱尔兰

与大不列颠的立法联合（1801年），10

法国远征爱尔兰，80，256

iron industry, 制铁工业

在比利时，40，54，55，469

在英国，40，44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国家，303

在德意志，53

在俄国，50，497，524

在瑞典，51，484，486

Irving, Washington, 欧文，华盛顿，美国作家，610

Isabella II, 伊莎贝拉二世，西班牙女王，455

Islam, 伊斯兰教

在地中海东部诸国，525—526，527—528；拿破仑尊重伊斯兰教，533

在非洲，586，588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在美国，592，620

Istria, 伊斯特拉，划归奥地利，（1797年），438；为法国兼并（1805年），535

Italy, 意大利，412—438

人口，32，251

分裂，7，48，412

法国入侵（1796年），75，255，289，309，311，415—416

法国战败（1799年），257，310，419

法国卷土重来（1800年），259，420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 157, 158, 303, 331—332, 420—426; 巩固, 99, 274, 331

在维也纳会议上, 427—428, 648, 649, 657—658

1815年后, 429—435

奥地利在意大利, 8, 16—17, 403, 404, 409, 428—429, 432—433, 434—435

参看意大利内各国和risorgimento条

Italy, Kingdom of (northern), 意大利王国(北部), 7, 185

意大利共和国变为王国(1805年), 420

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欧仁·博阿尔内成为总督(1805年), 331, 421

从奥地利获得领土(1809年), 270

Italian Republic, 意大利共和国

山南共和国成为意大利共和国(1802年), 331, 420

拿破仑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的职务, 262

成为意大利王国(1802年), 420

Iturbide, Agustin de, 伊图尔维德, 阿古斯丁·德, 墨西哥皇帝(1822—1823年), 635

Ivanovo, 伊凡诺沃, 俄国在该地的棉纺厂, 523

ivory, 象牙, 象牙贸易, 577, 580; 运送象牙的奴隶, 588—589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577注

Jackson, Andrew, 杰克逊, 安德鲁, 美国总统, 26, 604, 605, 607, 611

Jacobi, C.G., 雅各比, C.G., 数学家, 129

Jacobi, F.H., 雅各比, F.H., 哲学家, 390

Jacobin clubs, 雅各宾俱乐部, 278, 280, 293

“Jacobinism”，雅各宾主义，23，101，333；在奥地利和匈牙利，396；在意大利，414，419

Jacobins，雅各宾党人，在法国政治中，292，293，294

jagirdars，贾吉达尔，印度的地主，558，561

Janissaries，禁卫军，土耳其的，528，541，551

Jassy，雅西，摩尔多瓦首都，536，537

Jassy，Treaty of，雅西条约，俄国和土耳其签订（1792年），544

Jaurès，Jean，饶勒斯，让，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279

Java，爪哇

荷兰人在爪哇，552，563，568；反荷暴动，564

英国占领（1811—1816年），558

Jay's Treaty，杰伊条约，英美两国签订（1794年），595，600，611

Jefferson，Thomas，杰斐逊，托马斯，美国总统，592，595，603，604

不同英国交往的政策，327，598，601

在弗吉尼亚，201，605，609

Jemappes，热马普，法国在此战胜（1792年），72，464

Jena，battle of（1806），耶拿战役（1806年），268，326，376

这一战役的军事方面，66，70，75，313

Jerome，热罗姆，威斯特法利亚国王，见Bonaparte Jerome条

Jesuits，耶稣会士

在慕尼黑被取缔（1783年），390

1815年后重建，170

不准重入托斯卡纳，430

在法国，189，203，352，353

在葡萄牙，441

Jews，犹太人

在奥地利，409，411

在巴达维亚共和国，465

在柏林，386

在法国，97，299；在圣西门的追随者中间，144

在法兰克福，6

在教皇国，170，434

在土耳其，527，528

在美国，97

John VI，若奥六世，葡萄牙国王，451，684

作为摄政王到巴西避难（1807—1808年），269，327，612

返回葡萄牙，630—631，675

Johnson, Samuel，约翰逊，塞缪尔，对非洲感兴趣，98，573

Johore，柔佛，该地苏丹，559

Jones, Sir William，琼斯爵士，威廉，孟加拉亚洲学会成员，552，569，570

Joseph，约瑟夫，奥地利大公，匈牙利总督，401

Joseph II，约瑟夫二世，哈布斯堡皇帝

改革，252，373，376，395—396，398；在奥属尼德兰遭到反对，462—463，467

音乐的赞助人，241

给予南部斯拉夫人特权，541

Joseph, 约瑟夫, 那不勒斯国王, 后为西班牙国王, 见 Bonaparte, Joseph 条

Josephine, 约瑟芬 (娘家姓名为塔谢·德拉·帕热里, 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子爵之遗孀), 拿破仑之妻, 212, 308, 316, 317

离婚, 270, 302

拨给津贴 (1814年), 643

Joubert, B. C., 儒贝尔, B. C., 法国将军, 294, 310

Jourdan, J. B., 儒尔当, J. B., 法国元帅, 291, 310

Journal des Débats, 《辩论报》, 185, 188, 345, 350, 354

Journal de l' Empire, 《帝国报》 (由《辩论报》改名, 1805年), 185

Journal de Paris, 《巴黎报》, 185

Jovellanos, G. M. de, 霍韦利亚诺斯, 西班牙政治家和著作家, 441, 443

Joyce, Valentine, 乔伊斯, 瓦伦丁, 斯皮特黑德海军哗变领袖 (1797年), 87

judicial system, 司法制度

丹麦, 482

法国 (1799年), 297; (1814年), 339

意大利 (1806年), 421

普鲁士 (1808年), 381

Jung-Stilling, J. H., 容-施蒂林, 德意志伦理学家, 163, 516

Junín, 胡宁, 玻利瓦尔在此战胜 (1824年), 627

Junkers, 容克, 他们中的虔信派, 164, 170

Junot, Andache, 朱诺, 安达谢, 法国将军, 320, 335

在葡萄牙, 335, 612

他的希腊妻子, 530

Juntas, 洪达(政务会)

在西班牙, 444—445, 449, 456, 613; 中央洪达, 在阿兰胡埃斯, 614, 615, 616

在南美洲, 616, 619, 620, 621

Kalevala, 《卡勒瓦拉》, 芬兰民间史诗, 494

Kalisch, Treaty of, 卡利什条约, 普鲁士与俄国签订(1813年), 272, 639

Kandy (Ceylon), 康提(锡兰), 英国人在该地, 565, 566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纽尔, 哲学家, 160, 168, 332

对革命的看法, 91, 92, 93, 95, 100

他的继承人, 192

Kara George, 卡拉·乔治, 塞尔维亚民族领袖, 541, 542, 543

Karamzin, N.M., 卡拉姆津, N.M., 俄国历史学家, 19, 514

Karl August, 卡尔·奥古斯特, 魏玛公爵, 646

Karl Friedrich, 卡尔·弗里德里希, 巴登的总督(后为大公), 391

Karlsruhe, 卡尔斯鲁厄, 高等技术学校, 125

Karl Theodor, 卡尔·特奥多尔, 巴伐利亚选帝侯, 390

Karteria, “卡尔特里亚”号, 蒸汽机战舰, 在希腊海战中, 84

Kay-Shuttleworth, Sir James, 凯-沙特尔沃斯爵士, 詹姆斯, 平民教育的提倡者, 194

Kazan, university of, 喀山大学, 511, 518, 200

Kedah, 吉打, 该地的苏丹, 559

Keith, G.K.Elphinstone, Viscount, 基思子爵, 埃尔芬斯通, 海军上将, 85, 318

Kellerman, F.C. de, 克勒曼, F.C. 德, 法国元帅, 309

Kentucky, 肯塔基, 599, 607; 成为美国的州 (1792年), 594

Key, Francis Scott, 基, 弗朗西斯·斯科特, 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的作者, 611

Kharkov, university of, 哈尔科夫大学, 200, 511, 541

Khartum, 喀土穆, 人口, 534

Kiel, Treaty of (1814), 基尔条约 (1814年), 490, 491; 依约向丹麦赔款, 492, 657

Kildare Place Society, 基德尔地区协会, 有关爱尔兰小学的, 202

Kilwa, 基尔瓦, 法国与该地统治者的关系, 577

Kirk, Sir John, 柯克爵士, 约翰, 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 589

Kisselew, Count Paul, 基谢列夫伯爵, 保罗, 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国人总督, 539

Klaproth, H. J., 克拉普罗特, H. J., 语言学家, 570

Kléber, J. B., 克莱贝尔, J. B., 法国将军, 531

Kleist, Heinrich von, 克莱斯特, 海因里希·冯, 诗人, 186, 332

Klopstock, F. G., 克洛普施托克, 诗人和哲学家, 91

Kluppelkrieg against French in Luxembourg (1798), 卢森堡反法的棍棒战争 (1798年), 467

Knight, Richard, 奈特, 理查德, “风景如画”派理论家, 225

Knights, Imperial, 皇家骑士团, 370, 374, 388

Knights of Malta, 马耳他骑士团, 261

Koch, J. A., 科赫, J. A., 画家, 220

Kochubei, Count Viktor, 科楚别伊伯爵, 维克托,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友, 503, 505, 506, 508, 510

Kolettes, John, 科勒蒂斯, 约翰, 希腊“法国派”领袖, 548

Köln, 科隆, 见Cologne条

Kolokotrónes, Theodore, 科洛科特罗尼斯, 塞奥多尔, 希腊“俄国派”领袖, 548

Kolowrat, Count Franz, 科洛拉特伯爵, 弗朗茨, 波希米亚政治家, 405, 406, 409

Königsberg, university of, 柯尼斯堡大学, 128

Koraés, Adamantios, 科腊伊斯, 阿达曼提俄斯, 希腊学者, 546

Korsakov, Alexander, 科尔萨科夫, 亚历山大, 俄国将军, 257

Koshelev, R. A., 科舍廖夫, R. A.,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忠实的朋友, 516

Kossuth, Louis, 科苏特, 路易, 马扎尔民族主义者, 407

Kotzebue, A. F. F. von, 科策布, 戏剧家, 遇害, 190, 673

Krudener, Baroness B. J. von, 克吕德纳男爵夫人,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宗教方面的密友, 163, 516, 663

Krümper (furlough) System, 普鲁士军队中的后备役制度, 65, 383, 384

Kulturkampf, 文化斗争, 方法, 174

Kutchuk-Kainardji, Treaty of,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 俄土两国签订(1774年), 544

Kutusov, Prince Mikhail, 库图佐夫公爵, 米哈伊尔, 俄国陆军元帅, 515, 516

La Besnardière, J. B. de G., Comte de, 拉贝纳尔迪埃伯爵, 塔列朗参加维也纳会议时的助手, 647, 653

Laboratories, 科学实验室, 进入机构建立阶段, 128, 131

La Bourdonnaye, Comte F.P.de, 拉布尔东纳伯爵, 法国保王派, 354

labour services, 劳役 (强迫劳动)

在奥地利 (徭役), 398

在锡兰, 563

在多瑙河两公国, 537, 539

在丹麦, 482

在法国, 筑路, 339

在普鲁士, 368

Labrouste, Henri, 拉布鲁斯特, 亨利, 建筑师, 225

Lacroix, S.F., 拉克鲁瓦, S.F., 数学家, 125

Lacy, Luis de, 拉西, 路易·德, 加泰罗尼亚自由派分子, 448

Lafayette, Gilbert de Motier, Marquis de, 拉法耶特侯爵, 吉尔贝·德·莫蒂埃, 法国军人和政治家

路易十八时期自由反对派领导人, 340, 341, 342

在“独立派”集团中, 346, 348

在1830年革命中, 356, 437

Laffitte, Jacques, 拉菲特, 雅克, 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346, 361

Lagos, 拉各斯, 来自该处的奴隶, 584; 英国占领 (1851年) 和兼并 (1861年), 585

Lagrange, J.L., 拉格朗热, J.L., 数学家, 28, 121, 123, 132—133

La Granja, “events of” (1832), “拉格朗哈事件” (1832年), 454—455; 拉格朗哈叛乱 (1836年), 456

La Harpe, Frédéric, 拉阿尔普, 弗雷德里克,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瑞士籍导师, 18, 502—503, 505, 508

La Hoz, P. de, 拉赫兹, P. 德, 意大利将军, 419

Laibach, 莱巴赫, 联盟各国在此举行会议 (1821年), 433, 669, 677

莱巴赫大学预科, 200

Laisser faire, 自由放任主义, 从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放任主义, 41, 42, 58, 382

Lamanon, Lieut. Paul de, 拉马农, 保罗·德, 副长官, 拿破仑在南美的代理人, 614

Lamarck, J.B.R.A. de Monet, Chevalier de, 拉马克, 德莫奈, 谢瓦利埃, 生物学家, 28, 123, 137, 138—139

Lamarque, Comte Maximilien, 拉马格伯爵, 马克西米连, 法国将军, 在他葬礼时的暴动 (1832年), 360

Lamartine, A.M.L. de, Prat de, 拉马丁, 德·普拉·德, 诗人和政治家, 59, 103, 360, 364, 365

Lambruschini, Luigi, 兰布鲁斯基尼, 路易吉, 枢机主教, 174

Lamennais, (de la mennais), H.F.R., 拉梅内 (德拉·梅内), 天主教神父和时事评论家, 116—117, 204, 345, 360

所著《论对宗教的漠视》, 27, 116, 160, 161, 162

《前途报》, 天主教自由派报纸, 173

所著《论革命的进程》, 175

Lancaster, Joseph, 兰开斯特, 约瑟夫, 贵格会教育家, 27, 202, 206, 207

Lander, John and Richard, 兰德, 约翰和理查德, 非洲探险家, 582, 583

land tenures, 土地所有权, 35—36

在法国， 56

在德意志， 368， 377

在印度， 560—563

在普鲁士， 367

在西班牙， 456

在瑞典， 483

在美国， 594

Landshut， 兰茨胡特， 该地的天主教浪漫主义162

Landwehr (militia)， 后备军（民兵）， 奥地利的（1808年），
33； 普鲁士的（1813年）， 65—66， 384

language， 语言

丹麦语，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485

荷兰语， 在比利时， 204， 476， 479； 在爪哇， 568

英语， 在印度教育中， 567—568

德语， 统一的文学语言， 385

希腊语， 545， 546

冰岛语， 494

马扎尔语（匈牙利语）， 401， 408

挪威语， 494

梵文， 567， 568， 569

印欧语系， 印-日耳曼语系， 570

地方语言， 浪漫主义的复兴， 304， 476

Lannes， Jean， 拉内， 让， 法国元帅， 318， 320

La， Paz， 拉巴斯， 反西班牙起义（1809年）， 615

Laplace, Pierre S., Marquis de, 拉普拉斯侯爵, 皮埃尔, 数学家, 28, 121, 123, 124, 132

内政部长, 参议院议长, 125

La Révellière-Lipéaux, L.M.de, 拉雷韦耶尔-勒波, 法国第一届督政府督政官, 288, 290, 308

latifundia, 大庄园, 37; 俄国的, 497; 西班牙的, 49, 443

Latin, 拉丁语, 在科学中让位于本国语, 304

Latouche-Tréville, Louis de, 拉图什-特雷维尔, 路易·德, 法国海军上将, 324

Lauenberg, 劳恩堡, 普鲁士转让给丹麦(1814年), 657

Laugier, Abbé, M.A., 洛吉埃神甫, 所著《论建筑艺术》, 223, 227

Lavalleja, Antoino de, 拉瓦列哈, 安东尼奥·德, 乌拉圭的解放者(1825年), 630

Lavoister, A.L., 拉瓦锡, A.L., 科学家, 95, 134, 142

law, 法律

编纂法典, 在奥地利(1803年), 396; 在普鲁士(1794, 1845年), 15; 在俄国(1809年), 513, 514

国际法, 481, 669

Lawrence, Sir Thomas, 劳伦斯爵士, 托马斯, 肖像画家, 216

Lazar, George, 拉扎尔, 乔治, 罗马尼亚教师, 538

Lebas, Hippolyte, 勒巴, 伊波利特, 建筑师, 225

Lebeau, Joseph, 勒博, 约瑟夫, 比利时自由派法学家, 478

Leblanc, Nicolas, 吕布兰, 尼古拉, 化学家, 143

Leclerc, V.E., 勒克莱尔, V.E., 法国将军, 261

Ledoux, C.L., 勒杜, C.L., 建筑师, 223—224

Ledru-Rollin, A. A., 勒德律-洛兰,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家, 365

Leeds Mercury, 《利兹信使报》, 鼓吹改革, 183

Lefebvre, P. F. J., 勒费弗尔, P. F. J., 法国元帅, 321

Legations, Papal, 教皇管区

 从教皇国分出 (1797年), 151, 156, 255

 回归教皇国 (1815年), 430

 秘密组织的温床, 434

Legislation, Committee of, 立法委员会 (法国, 1794年), 285

Legislative Assembly (France, 1791—1792), 立法议会 (法国, 1791—1792年), 13, 62, 68, 252, 253

Legislative Body (Corps legislatif) in France (1799), 法国立法院 (1799年), 296; “百日”期间, 341, 342, 660

Legislative Councils (France, 1795), 立法两院 (法国, 1795年), 287, 288, 291, 292, 293, 295

Leghorn, trade of, 里窝那的贸易, 424

Legion of Honour, 荣誉勋位团, 301, 319

Legitimacy, principle of, 正统原则, 22, 338, 665; 教皇的支持, 171; 塔列朗和正统原则, 653

Leipzig, 莱比锡, 128, 229, 388

 莱比锡战役 (1813年), 273, 305, 333, 490, 639

 对莱比锡的处理 (1814—1815年), 652, 655

Leipziger Zeitung, 《莱比锡报》, 186

Lenz, J. M. R., 伦茨, J. M. R., 戏剧家, 371

Leo X II (Annibale della Genga), 利奥十二世 (安尼巴莱·德拉·真加), 教皇 (1823—1829年), 171, 172, 434

Leoben, 莱奥本草约（1797年），309, 416, 438

Leopard, H. M. S., 英国军舰“豹号”，89

Leopardi, Giacomo, 莱奥帕尔迪, 贾科莫, 诗人, 103

Leopold, 利奥波德, 萨克森-科堡君主

授予希腊王位, 550

比利时国王, 18, 668

Leopold II, 利奥波尔德二世, 哈布斯堡皇帝（1790—1792年）

与俄国签订赖兴巴赫条约（1790年），252，463

在其统治时期的和解，396

逝世（1792年），253，395

Leopold I，利奥波德一世，托斯卡纳大公（后为皇帝，称利奥波德二世，见上条）

其改革，在托斯卡纳，425，430

Leopold II，利奥波德二世，托斯卡纳大公，435

Lepelletier, L.M.，勒佩尔蒂埃，L.M.，法国共和派，149

Le Père, J.M.，勒佩尔，J.M.，法国工程师，533

Lermontov, M.Y.，莱蒙托夫，M.Y.，诗人和小说家，108

Leroux, Pierre，勒鲁，皮埃尔，社会主义改革家，114

lesseps, Vicomte Ferdinand de，德莱塞普斯子爵，费迪南德，法国驻里斯本副领事，451

Lessing, G.E.，莱辛，G.E.，评论家和戏剧家，97，168，371，372

Letarouilly, P.M.，勒塔鲁伊利，P.M.，建筑师，225

Letourneur, C.L.F.H.，勒图尔纳，法国第一届督政府督政官，288，289

Levant, the，利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525—534

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532—534，674，689

法国可能统治该地区（1799年），256，265，529—533，576

“欧洲协约国”与该地区（1839—1841年），690

参看Turkey等条

Levant Company，利凡特公司，685

levée en masse，“全民皆兵”，62，122，291

参看conscription条

Lewis, Frankland, 刘易斯, 弗兰克兰, 国会议员, 42

Lewis, Meriwether, 刘易斯, 梅里韦瑟, 美国探险家, 594

Libel Act (1792), 诽谤法 (1792年), 180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2, 31, 58, 192

经济上的, 31, 35, 58

政治上的, 在比利时, 478; 在德意志, 16; 在葡萄牙, 454—456; 在西班牙, 17, 439, 441, 445—446; 自由主义与天主教会, 173—176, 204

科学上的, 在德意志, 128

神学上的, 163

Liberia, 利比里亚, 独立的美裔非洲人共和国, 583

liberty, 自由, 100, 112, 115

革命者与浪漫主义者共同追求的, 94, 103

Liberty of the Press,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France), 出版自由同志会 (法国), 189

Libreville, 利伯维尔, 在加蓬的法国人居留地 (1849年), 583

Liebig, Baron Justus von, 李比希男爵, 尤斯图斯·冯, 化学家, 128

Liège, 列日

君主—主教辖区, 54, 463, 464

机器制造中心, 469

划归尼德兰王国, 657

列日高级中学, 475

Lieven, Dorothy (*née* von Benckendorff), 列文, 多萝西 (娘家姓冯·本肯道夫), 公爵夫人, 686

Ligny, battle of (1815), 林尼战役 (1815年), 314

Ligurian Republic (Genoa), 利古里亚共和国 (热那亚) 法国建立 (1797年), 255, 256, 417; 奥地利承认, 255; 政变, 294; 重建 (1801年), 438

划归撒丁王国 (1815年), 427, 429, 658

Lima, 利马, 被封锁 (1820年), 623; 西班牙人撤出, 624; 西班牙人重新占领, 627

Limburg, Duchy of, 林堡公国划归尼德兰王国 (1815年), 657

Limburg Stirum, L. van, 林堡·斯蒂伦, 范, 海牙奥伦治党人领袖 (1813年), 471

Lind, James, 林德, 詹姆斯, 海军医生, 87

Lindet, Robert, 兰代, 罗贝尔,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293

linen industry, 亚麻工业, 在德意志, 52, 53; 在俄国, 522

Ling, P.H., 林格, P.H., 瑞典体操的创始人, 493

Liniers y de Bremond, S. de, 利涅尔斯·伊·德布莱蒙德, 德, 西班牙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 614

Lisbon, 里斯本

商人, 422

米格尔分子的恐怖行为 (1828年), 453—454

被唐·佩德罗占领, 454

Lista y Aragón, Alberto, 利斯塔·伊·阿拉贡, 阿尔贝托, 诗人, 453

Liszt, Franz, 李斯特, 弗朗茨, 作曲家, 230

Liverpool, R.B. Jenkinson, Earl of, 利物浦伯爵, 詹金森, 政治家, 261, 598, 661, 687

Liverpool, 利物浦, 与奴隶贸易, 577, 578

Livingstons, David, 利文斯敦, 戴维, 传教士去非洲的先驱, 587, 588, 589

Llauder, Manuel, 利奥德尔, 曼努埃尔, 西班牙将军, 455

Lloyd' s, underwriters of, 劳埃德保险社, 78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在法国, 制宪议会时期, 13; 国民公会时期, 280; 督政府时期, 287; 拿破仑时期, 13, 297; 1830年以后, 357

在德意志 (1795年), 369—370; (1808年), 380, 382

在匈牙利, 400—401

在西班牙, 457

Locke, John, 洛克·约翰, 哲学家, 97, 624

Lodi, battle of, 洛迪战役 (1796年), 309

Lombardy, 伦巴第

卷入对法战争 (1792年), 414

奥地利人撤出 (1796年), 415

在法国统治下, 309, 420; 自由派起义 (1814年), 427

重归奥地利 (1815年), 403, 658

动乱, 397, 404, 409, 435

Lomonosov, Mikhail, 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 俄国的“文化英雄”, 131

London, 伦敦

音乐会, 229—230

庆祝和平 (1814年), 644—645

欧洲商业金融中心, 46

伦敦大学, 178, 201

人口，31

London, Treaty of (1827)，伦敦条约（1827年），英、法、俄三国为希腊签订，23，549，550，687—689

Lopez, Estanislao, 洛佩斯，埃斯塔尼斯劳，阿根廷圣菲的，629

Long, S. H.，朗，S. H.，美国探险家，594

Louis I，路易一世，巴伐利亚国王，见Ludwig I条

Louis XVI，路易十六，法国国王，253；被处决，254，277；拿破仑和路易十六，321

Louis XVII，路易十七，逝世，337

Louis XVIII，路易十八，法国国王，5，14，21

第一次复辟（1814年），305，337—340，643

逃亡和第二次回国（1815年），340—342，659，661

统治，343—350

Louis，路易，荷兰国王，见Bonaparte, Louis条

Louis Ferdinand，路易·斐迪南，普鲁士亲王，374

Louis Napoleon，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分子觊觎王位者（19世纪30年代），359，360

Louis Philippe I，路易-菲利普一世，法国国王，16，356—366，690

作为奥尔良公爵，341，346，355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

西班牙割让给法国（1801年），260，261

拿破仑卖给美国（1803年），20，263，595

成为美国的州（1812年），594

北方废除奴隶制，664

Louvain, university of, 卢万大学, 475; 哲学院, 204, 475—476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参看Austrian Netherlands, Belgium;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Batavian Republic, Holland; Netherlands (Kingdom of the) 条

Lowell, Francis, 洛厄尔, 弗朗西斯, 棉纺厂主, 601

Lucca, 卢卡

法国统治下的共和国 (1799年), 418

共和国恢复 (1801年), 438

赐予拿破仑之妹埃利兹 (1805年), 302, 438

划归帕尔马波旁王室, 复归托斯卡纳 (1815年), 429, 658

Luddite disturbances (1811年), 卢德派骚乱 (1811年), 5, 328

Ludwig, 路德维希, 奥地利大公, 405, 406

Ludwig I, 路德维希一世, 巴伐利亚国王, 195, 550

Luise, 路易丝,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妻, 384, 385, 512

Lunéville, Peace of, 吕内维尔和约, 奥法两国签订 (1801年), 299, 311

结束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争, 388

和约条款, 259, 420, 438

Lutheran Churches, 路德会 (信义会), 164, 176, 177

在法国, 按照基本条款 (1802年), 154

在普鲁士, 与卡尔文宗联合 (1817年), 176—177

在符腾堡, 391

Lützen, battle of (1813), 吕岑战役 (1813年), 272

Luxemb (o) urg, Duchy of, 卢森堡公国, 1815年商定的安排办法, 473, 657

lycées, 法国公立中学, 121, 198, 199, 203

Lyons, 里昂

起义反对国民公会 (1793年), 280, 283

暴乱 (1831年), 358

人口, 32, 339

Mably, Abbé G. B. de, 马布利神甫, 哲学家, 501

McAdam, J. L., 麦克亚当, 公路工程师, 39

Macaulay, T. B., 麦考利, 历史学家

对印度的看法, 553, 567, 571

论英格兰财富的增加, 59

Macaulay, Zachary, 麦考利, 扎卡里, 慈善家, 98

MacCarthy, Sir Charles, 麦卡锡爵士, 查尔斯, 塞拉利昂总督, 584

Macchi, Vincenzo, 马基, 温琴佐, 枢机主教, 罗马教皇驻巴黎的使节, 352

Macerata, 马切拉塔, 与意大利王国合并 (1808年), 424

machines, 机器, 采用, 5, 42; 害怕机器, 59; 通用零件, 29, 142, 601

Mack von Leiberich, Karl, 麦克·冯·莱布里希, 卡尔, 奥地利将军, 313

Mackintosh, Sir James, 麦金托什爵士, 詹姆斯, 为法国革命辩护, 91, 102

Maclean, George, 麦克莱恩, 乔治, 在黄金海岸的商人代理人,
585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该地的法国人, 577, 589

Madison, James, 麦迪逊, 詹姆斯, 美国总统, 602

Madrid, 马德里

起义反抗法军 (1808年), 334, 444, 613

人口, 32

Magendie, François, 马让迪, 弗朗索瓦, 生物学家, 28

Magnitskii, M.L., 马格尼茨基, 喀山大学学监, 518

Magyar, language, 马扎尔语, 401, 408

Mahmud II, 马哈茂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528, 542, 551

Maida, 迈达, 英军于此战胜法国人 (1806年), 332

Maine, 缅因, 成为美国的州 (1821年), 604

Mainz (Mayence), 美茵茨, 教会公国

法国占领 (1793年), 254; 其世俗化, 8

作为德意志邦联要塞 (1815年), 656

Maipù, 迈普, 智利保皇派最后战败于此 (1818年), 623

Maistre, Comte J.M.de, 德·梅斯特尔伯爵, 权力主义的理论家, 161, 162, 304, 323

受法国革命的影响, 11, 105—106所著《圣彼得堡之夜》, 19

Malacca, 马六甲, 荷兰让与英国 (1824年), 559

Malaya, 马来亚

荷兰人许诺不予干涉 (1824年), 559; 开普殖民地来自马来亚的奴隶, 575

Malclom, Sir John, 马尔科姆爵士, 约翰, 孟买总督, 563; 出使德黑兰 (1800年), 532

Malet, 马莱, 反拿破仑的密谋 (1812年), 321

Mallet du Pan, Jacques, 马莱·迪庞, 雅克, 时事评论家, 104

Malta, 马耳他

法国占领 (1798年), 256, 530

沙皇保罗垂涎, 21, 258

投降英国 (1800年), 258

虽有亚眠和约仍由英国保留 (1802年), 10, 261, 263, 423;
割让给英国 (1814年), 644, 665

Malthus, T.R., 马尔萨斯, T.R., 政治经济学家, 33, 58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与非洲的贸易, 578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鼓吹改革, 183

mandats territorials, 土地券, 纸币的一种, 289

Manipur, 曼尼普尔, 缅甸人入侵, 560

Manique, D.I.P.de, 马尼克, 葡萄牙警察总监, 440

Mansfield, William Murray, Earl of, 曼斯菲尔德伯爵, 威廉·默里, 首席法官, 对奴隶制的判决 (1772年), 580

Mantua, Duchy of, 曼图亚公爵领地, 在奥地利统治时期, 412;
受法国人围攻, 415

Manuel, Passos, 曼努埃尔, 帕索斯, 葡萄牙激进派, 454

Manzoni, Alessandro, 曼佐尼, 亚历山德罗, 小说家, 161, 436—437

Marat, J.P., 马拉, J.P., 革命领袖, 149, 183

Masatha confederacy, 马拉塔联盟

使东印度公司感到棘手, 552, 554

其零星败绩, 556, 557, 558

统治阶级, 561

Marburg, university of, 马尔堡大学, 128

Marchena Ruiz de Castro, José, 马尔切纳·鲁伊斯·德·卡斯特罗, 何塞, 作家, 92

Marengo, battle of (1800), 马伦戈战役 (1800年), 153, 259, 299, 420

报纸的报道, 184

战役的军事方面, 66, 313, 315

Maret, H.B., 马雷, H.B., 拿破仑的国务秘书, 316

Maria II, 玛丽亚二世, 葡萄牙女王, 453, 684

Maria Carolina, 玛丽亚·卡罗利娜,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之妻, 426

Maria Christina,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之妻, 452, 454—455

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摄政, 458

Maria Federovna, 玛丽亚·费多罗芙娜, 俄国沙皇保罗之妻, 506

Maria Ludovica, 玛丽亚·卢多维卡,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之妻, 400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雷西亚, 哈布斯堡皇后, 205

Maric Amélie, 玛丽·阿梅莉,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之妻, 363

Marie Antoinette, 玛丽·安托瓦内特,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妻, 96, 253

Marie Louise of Austria, 玛丽·路易丝 (奥地利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女, 321

拿破仑之妻, 21, 212, 270, 302, 317

提议由她摄政 (1814年), 642

帕尔马女公爵, 429, 435, 643, 658

Marine Artillery Corps, 海军炮兵队, 83

Marine Corps, United States, 美国海军陆战队, 89

Marines Royal, 皇家海军, 86

Marmont, A. F. L. V. de, 马尔蒙, 法国元帅, 317, 320

 火炮专家, 69, 312

 伊利里亚的统治者, 536

Marriage, 婚姻

 法国实行世俗婚姻, 150, 152, 157

 异教通婚（“科隆事件”），175；改革家对婚姻的看法，107, 110—111

Marseilles, 马赛

 起义反对国民公会（1793年），280, 283

 毁于大陆封锁, 303, 329

 屠杀拿破仑的追随者, 343

 人口, 32, 339

Marshall, John, 马歇尔, 约翰,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608—609

Martello towers, 海岸圆形石碉堡, 88

Martignac, J. B. S. G., Vicomte de, 马蒂尼亚克子爵, 法国政治家

 内政部长, 353, 354

 总理, 203, 478

Martin, John, 马丁, 约翰, 画家, 109

Martineau, Harriet, 马蒂诺, 哈里特, 作家, 176

Martinist movement, 马丁主义运动（圣马丁的门徒），500—501

Martinovics, Abbé I. J., 马蒂诺维茨神甫, 匈牙利密谋分子, 396, 400

Martins, Oliveira, 马丁斯, 奥利维拉, 葡萄牙作家, 441, 454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26

青年时代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110

马克思的先驱, 58, 113, 115, 117

Mascarene Islands, 马斯卡林群岛, 法国人在该岛, 577

masonic lodges, 共济会, 见freemasons条

Massa-Garrara, Duchies of, 马萨-卡拉拉公国, 412, 419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英国国教在该地继续存在, 176; 实行普选(1820年), 607

Masséna, André, 马塞纳, 安德烈, 法国元帅, 257, 311, 320, 335, 430

mathematics, 数学, 130—133; 在综合工科学校, 122; 在德意志, 129

Maudslay, Henry, 莫兹利, 亨利, 工程师, 142

Mauritius, 毛里求斯

法国远征军转向该地(1803年), 263, 264

英国人占领(1810年), 532, 558, 577; 并保留(1815年), 10, 90

Maury, J. S., 莫里, J. S., 枢机主教, 159

Mavrocordátos, Alexander, 马夫罗科扎托斯, 亚历山大, 当选为希腊总统, 548, 549

Maximilian I Joseph, 马克西米连一世·约瑟夫, 巴伐利亚国王, 646

Max Joseph, 马克斯·约瑟夫, 巴登的选帝侯, 390

Max Joseph II, 马克斯·约瑟夫二世, 巴登的选帝侯, 390

Mayence, 美茵茨, 见Mainz条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朱塞佩, 预言意大利统一, 24, 108, 116, 191, 434

Méan, Comte F.A.de, 梅昂伯爵(原列日的君主兼主教), 梅赫伦大主教, 474

Mechanics' Institutes, 技工学校, 29, 144, 207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368, 389

Medina del Rio Seco, 塞科河上的麦迪纳战役, 法国于此战胜西班牙人(1808年), 335

Melzi d' Eril, Francis (Duke of Lodi), 梅尔齐·戴里尔, 弗朗西斯(洛迪公爵), 意大利共和国副总统, 421, 425, 436

Melzi Decrees, 梅尔齐法令, 对意大利共和国政教协定进行了修改, 155, 156

Mencken, A.L.M., 门肯, A.L.M., 普鲁士政治家, 375

Mendelssohn-Bartholdy, J.L.F., 门德尔松-巴特霍尔德, 作曲家, 230, 242, 248

Mendelssohn, Moses, 门德尔松, 摩西, 哲学家, 97

Mendizábal, J.A., 门迪萨瓦尔, 西班牙政治家, 454, 456, 458

Mendoza, 门多萨, 圣马丁在该地, 622

Mengs, Raphael, 孟斯, 拉斐尔, 画家, 209—210, 221

Menotti, Ciro, 梅诺蒂, 齐洛, 意大利的密谋者, 437

Menou, Baron J.F.de, 梅努男爵, 法国将军, 531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41, 42, 58, 382

在奥地利, 398

在荷兰, 477

在意大利, 431, 430

在普鲁士, 370, 373

在西班牙帝国, 49

在美国, 603, 606

Merino sheep, 美利奴绵羊, 37, 53

Merlin de Douai, P.A., 梅兰·德·杜埃, 法国督政府督政官,
291

Mesta, 牧民光荣会, 特权, 在西班牙, 49

métayage, 土地收益分成制, 36

metric system, 度量衡公制, 29, 125—126

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N. L., Prince of, 梅特涅-
温内堡, 克莱门斯, 亲王, 奥地利政治家

首相; 与法国和谈(1809年), 270

弗兰茨一世顾问, 400; 控制报刊, 186

和平建议(1813年), 272—273, 639

最后一次反拿破仑联盟, 639—642各处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7, 649—659各处, 662—665各处

梅特涅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18, 22, 23, 516, 649, 650,
663, 670, 673

梅特涅与塔列朗, 653, 654

梅特涅与意大利问题的解决, 657—658; 鼓吹在那不勒斯采取
温和政策, 16—17, 429

致力于反俄, 490, 649, 651, 665, 666

镇压行动, 11, 190, 393, 403—404, 435, 523, 547

在国际关系中(1815—1830年), 16, 668—678各处

梅特涅与路特希尔德兄弟(1817, 1822年), 6

在摄政会议里（1835年），405，406，408

论大陆体系，330；论拿破仑，334；

论皮埃蒙特的叛乱，434；论纳瓦里诺，549；论爱尔兰，10；
论俄国，19；他和南美洲，25；他和希腊，25

Mexico (New Spain)，墨西哥（新西班牙），614

1810年革命，617，634，635

美国的承认（1822年），637；英国的承认（1825年），683

墨西哥没有主教（1829年），172

Mexico City，墨西哥城，市政会议和高等法院，614

Meyerbeer, Giacomo，梅耶贝尔，贾科莫，作曲家，239

Miaoules, Andreas，米亚乌利斯，安德烈斯，希腊海军上将，
548

Michelet, Jules，米什莱，朱尔，历史学家，360

Michigan，密歇根，领地，594

Mickiewicz, Adam，密茨凯维奇，亚当，诗人，103，190

middle class，中等阶级，见bourgeoisie条

Middleton, Sir Charles，米德尔顿爵士，查尔斯，后为巴勒姆
勋爵，海军上将，80，81，325

Mignet, F.A.M.，米涅，F.A.M.，《国民报》的创始人，189

Miguel, Dom，米格尔，唐，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次子

专制反动统治代表人物，441，442，451，454，455，459，684

宣布为国王米格尔一世（1828年），453

被迫放弃王位要求（1834年），454

Milan Decrees of Napoleon，拿破仑的米兰敕令，关于中立国船
只（1807年），327，328

Milan, Duchy of，米兰公国，412

落入法国人手中（1796年），309，415；（1800年），420

拿破仑在此加冕为意大利国王（1805年），421

米兰的破产（1813年），424—425

被奥地利人占领（1814年），427，428

米兰科学院，126

人口，32

military colonies in Russia, 俄国的军垦区，518，671

Milizia, Francesco, 米利齐亚，弗朗西斯科，建筑师，223

Mill, James, 穆勒，詹姆斯，功利主义者

论教育，194

在东印度署，552，562，563，567

所著《英属印度史》，570，571

Mill, John Stuart, 穆勒，约翰·斯图尔特，政治哲学家，178

Milosh Obrenovich, 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塞尔维亚的统治者，543，544

Mina, Francesco, Espoz y, 米纳，弗朗西斯科·埃斯波斯·伊，西班牙游击队领袖，450，453，457

Minerve, La, 《智慧女神》，邦雅曼·贡斯当主编的评论性刊物，188，346

Mines, École de, 矿业学校，121

Minho Province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米纽省，自由主义在该省，453

mining, Academy of, 萨克森的弗赖堡矿业学院，140，388

Mining, 采矿业，在南美洲，636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industrices, 采矿与冶金工业，在俄国，497，522，524

Minorca, 米诺卡, 谣传俄国阴谋攫取该地, 673

Minto, Gilbert Elloit, Earl of, 明托伯爵, 吉尔伯特, 埃利奥特, 262

Mirabeau, H.G.de Rigueti, Comte de, 米拉波伯爵, 法国政治家, 97

Miraflores, Manuel de pando, Marquis of, 米拉弗洛雷斯侯爵, 曼纽埃尔·德潘多, 西班牙政治家, 453, 455

Miranda, Francisco de, 米兰达, 弗朗西斯科·德, 西属美洲的军人, 委内瑞拉独裁者(1812年), 621

missionaries, 传教士, 在非洲, 583, 587, 588; 在印度, 565—567, 570

Mississippi valley, 密西西比河流域, 棉田, 594, 596; 在美国政治中, 602, 605, 606

Missouri, 密苏里, 被美国接纳为蓄奴州(1821年), 594, 604

Mocenigo, Count G., 莫申尼戈公爵, 俄国驻爱奥尼亚群岛公使(1800—1807年), 535

Modena, Duchy of, 摩德纳公国, 412, 414

归顺法国(1796年), 415

成为河南(后为山南)共和国的一部分, 417

波旁公爵(弗朗西斯四世)复位, 429, 430, 658

Moderates (conservative-liberals) in Spain, 西班牙的温和派(保守的自由派), 457—458

Möhler, J.A., 莫勒, J.A., 宗教问题作家, 161, 163

Moldavia, 摩尔多瓦, 多瑙河公国

土耳其苏丹的附庸国, 9, 258, 536—539

俄国人占领, 539—540

参看Roumania条

Molé, Comte L.M., 莫莱伯爵, L.M., 法国政治家, 318, 361, 363

Mollien, Comte N.F., 莫里昂伯爵, N.F., 法国行政官员, 316

Mombasa, 蒙巴萨, 法国和它的关系, 577

Monge, Gaspard, 蒙日, 加斯帕尔, 数学家, 121, 122, 123; 拿破仑的宠臣, 124, 126

Moniteur officiel, 《政府通报》在督政府和拿破仑时期, 其他报纸的强制性消息的来源, 184, 185, 186

复辟以后, 346, 355

Monomotapa civilisation, 莫诺莫帕塔文明, 572

Monroe, James, 门罗, 詹姆斯, 美国总统, 591, 599, 603

Monroe Doctrine (1823年), 门罗主义 (1823年), 20, 591, 637, 638, 668

门罗与1821年的俄国敕令, 682—683

Montagnards, 山岳派, 法国国民公会中的派别, 276, 277, 278; 逮捕山岳派, 285

Montalembert, C.F.R. de, 蒙塔朗贝尔, 法国天主教保王派, 361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 536, 541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孟德斯鸠, 哲学家, 41, 93, 371, 624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脱离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 614

被巴西征服, 619—620

地区独立, 成为乌拉圭 (1828年), 630

葡萄牙士兵在此抗命, 631

Montgelas, Maximilian von, 蒙特格拉斯, 马克西米连·冯, 巴伐利亚政治家, 390

Montiosier, F.D.de R., Comte de, 蒙洛西埃伯爵, 高卢派小册子作者, 189

Montmirail, 蒙米赖, 法国于此获胜(1814年), 312, 313

Montmorency, Matthieu, Duc de, 蒙莫朗西公爵, 马蒂厄, 法国政治家, 681

Montpellier, university of, 蒙彼利埃大学, 121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826年), 《德意志历史文物》(1826年出版), 193

Moore, Sir John, 穆尔爵士, 约翰, 将军, 335, 486

Morard de Galle, J.B., 莫拉·德·加尔, 法国海军上将, 78, 79

Moravia, 摩拉维亚, 406

Moravian Brethren, 摩拉维亚弟兄会, 去霍屯督人中传教, 583

Mordvinov, N.S., 莫尔德维诺夫, N.S., 俄国海军上将, 511, 523

More, Hannah, 莫尔, 汉纳, 宗教作家, 165

Morea, 摩里亚; 见Peloponnese条

Moreau, J.V.M., 莫罗, J.V.M., 法国将军, 289, 309, 419

可能替代拿破仑(1799年), 294, 295

在霍恩林登获胜(1801年), 259

卡林达尔阴谋分子的试探(1803年), 265

Morelos, Father J.M., 莫雷洛斯神父, 墨西哥南方起义领袖, 634

Moresby Treaty (1822年), 莫尔斯比条约(1822年), 英国和马斯喀特苏丹签订(关于贩卖奴隶), 589

Morey, 莫雷, 法国狂热的共和党人, 360

Morillo, pablo, 莫里略, 巴勃罗, 在南美的西班牙将军, 622, 625

Mörner, C.O., 默尔纳, C.O., 瑞典军官, 487

Morning Chronicle The, 《纪事晨报》, 181, 183

Morning Journal, The, 《晨报》, 托利党极端派报纸, 183

mortmain, 永久管业权, 在西班牙, 441

Moscow, 莫斯科

 法军进入(1812年), 69, 271, 515

 法军撤出, 312, 317, 321, 328

 莫斯科大学, 499

 人口, 32

Moser, J.J., 莫泽尔, J.J., 德国学者, 372

Möser, Karl, 默泽尔, 卡尔, 音乐家, 243

Moulin, J.F.A., 穆兰, J.F.A., 法国将军, 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293

Mousinho da Silveira, J.J., 莫西尼奥·达·西尔维拉, 葡萄牙法学家, 454

Movement, party of, “运动派”, 在1830年以后的法国政治中, 361, 362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葡萄牙殖民地, 587

Mozart, W.A., 莫扎特, W.A., 作曲家, 231, 232, 238—244各处

 共济会员, 237

Mughal emperors in India,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 552, 555, 557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的帕夏

统治埃及, 4—5, 24, 532, 533—534

派兵去希腊, 548, 550, 686, 688

Müller, Adam, 米勒, 亚当, 浪漫派时事评论家, 186, 375

Müller, Johannes P., 米勒, 约翰内斯, 生理学家, 129

Müller Johannes von, 弥勒, 约翰内斯·冯, 瑞士历史家, 91

Münchengrätz, 明亨格列兹, 奥俄两国于此签订巴尔干协议 (1833年), 689

Munich, university of, 慕尼黑大学, 162, 195; 高等技术学校, 125

municipal organisation, 市政机构, 见local government 条

Municipal Reform Edict, 市政改革法令, 普鲁士 (1808年), 380, 382

Munro, Sir Thomas, 孟罗爵士, 托马斯, 马德拉斯总督, 552, 557, 561, 562

Münster, Count E. F. H. von, 蒙斯特伯爵, 代表汉诺威出席维也纳会议, 647, 655

Münster, 蒙斯特, 该地的天主教浪漫主义, 162

Muntinghe, H. W., 蒙廷格, 在爪哇的荷兰官员, 564

Murat, Joachim, 缪拉, 若阿基姆, 法国元帅, 拿破仑的妹夫, 316, 320

镇压马德里起义 (1808年), 334

那不勒斯国王 (1808年), 302, 331, 438; 改革, 17, 422, 423, 425

自莫斯科撤退时的行动, 321

抛弃拿破仑 (1814年), 313, 641; 与奥地利联盟, 273, 427, 428, 657

在“百日”时期，企图发动意大利人反对奥地利人（1815年），332，658，660；入侵教皇国和托斯卡纳，428；被奥地利人战败，313；离开意大利，428

企图入侵那不勒斯；战败并被处决（1815年），429，658

Muraviev, N. M.，穆拉维约夫，N. M.，十二月党人，520

Muscat, Omani of, 马斯喀特，阿曼人，576，577；东印度公司派驻该地的代表，532

Muséum d' histoire naturelle, 自然史博物馆，121，124，128

music, 音乐，228—249

muskets, flintlock, 滑膛枪，燧发枪，67

musketeers, 滑膛枪手，70，73

Muspratt, James, 马斯普拉特，詹姆斯，化学工厂主，143

Musset, Alfred de, 缪塞，阿尔弗雷德·德，诗人，103

Mysore, 迈索尔，553—554

Nana Phadris, 那那·法德里斯，浦那掌权的大臣，555

Nantes, 南特，303，577；人口，339

Napier, Sir Charles, 内皮尔爵士，查尔斯，海军上将，454

Naples, 那不勒斯，48，303；那不勒斯大学，200；人口，32

Naples, Kingdom of, 那不勒斯王国，412

参加反法联盟（1793年），254，414

镇压，415

入侵罗马共和国（1799年），310，419

被法国人战败，建立帕特诺珀共和国（1799年），256，419

鲁福红衣主教推翻共和国，420

法国人建立新傀儡政权（1801年），420

约瑟夫·波拿巴成为国王（1806年），267，331，438

缪拉成为国王（1808年），302，331，438；改革，17，422，423，425

贸易，424

重归波旁王朝（1814年），429，658

梅特涅建议在那不勒斯采取温和政策，16—17，429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818年），170，430

秘密团体，431

起义，被奥地利粉碎（1820—1821年），16—17，432，675—677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

早年历史，307—308

性格，11，295—296，316—323

作为将军，75—76，311—313；他指挥的军队，63—65，69—75；他指挥的炮兵，68—69

积极围攻土伦（1793年），在巴黎（1795年），286，308

意大利战役（1796—1797年），309，311

远征埃及（1798年），256，310，529—531，576

果月政变（1797年），291

雾月政变（1799年）；成为第一执政，257，296，316

终身执政（1802年），263，300

皇帝（1804年），21，301；加冕典礼，155—156，301

他与教会和庇护七世的关系，152—160

与约瑟芬·博阿尔内结婚，308，316，317；离婚，270，302

与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结婚，21，212，270，302，317，321

统一欧洲的努力，274，302—305

唤起民族情绪，330—334

他与英国，323—326；“大陆体系”反对英国，326—330

西班牙的抵抗，333—336，444—446

俄国战役（1812年），271，304—305，321，515

战败（1813—1814年），272—274，305，639—642；在厄尔巴，305，643，660

“百日”（1815年），14，658，659—661；滑铁卢战役，313—316

让位其子，305，321，341，342

在“贝雷勒芬”号上，318；在圣赫勒拿，307，661

葬礼，359

拿破仑时期的教育和学术，119，124—125，198，199

法兰西研究院与拿破仑，124，126，312

他的时代的报刊，183—184

贝多芬与拿破仑，234，304，331

艺术的保护人，210，211，224

Napier, Robert C., Lord, 内皮尔勋爵，罗伯特，指挥远征埃塞俄比亚的军队，573

Narváez, R. M., 纳瓦埃斯，西班牙军人和政治家，458，459

Nash, John, 纳什，约翰，建筑师，225—226

Nasmyth, James, 内史密斯，詹姆斯，工程师，142

Nassau, 拿骚

扩充疆土（1802年），155

被法国人占领（1806年），471

宪法, 16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 170

Natal, 纳塔尔, 英国人在纳塔尔, 576, 586

National, Le, 《国民报》, 法国反保皇派报纸, 189

National Assembly, 法国国民议会, 见Constituent Assembly条

National Convention, France, 法国国民公会, 见Convention条

National Guards, 国民自卫军

法国的, 61, 281, 285; 改组(1797年), 290; (1815年), 342; (1831年), 356; (1832年), 360

山南共和国的, 417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同浪漫主义结合, 94, 99, 190, 332, 410

不同于爱国主义, 100

民族主义与战争, 60—61

奥地利统治下的, 407—411

德意志的, 186, 332, 389

意大利的, 436—437

西班牙的, 333—334

拿破仑唤起的, 330—334

nationality, Principle of, 民族的原则, 665

National Road, 国家公路, 通过阿勒格尼山脉到俄亥俄, 599

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 美国国民共和党, 603, 604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Anglican), 全国贫民教育协会(英国圣公会的), 178, 202

National-Zeitung der Deutschen, 《德意志国民日报》, 186

natural history, 自然史, 精确科学进入自然史领域, 131, 136

Naturphilosophie, school of, 自然哲学派, 128

Nautilus, “鹦鹉螺”号, “潜水船”(1803年), 84

Nauvoo, Illinois, 脑武, 伊利诺伊, 该地的伊卡里亚移民地, 115

Naval Academy, 海军学院(后为皇家海军学院), 85

naval constructors, corps of, 海军造船队, 82

Naval Enquiry, Commissions of, 海军调查团, 81

Navarino, 纳瓦里诺, 英法俄三国海军分遣队于此战胜土埃两国舰队(1827年), 84, 525, 549, 688, 690

Navarre, 纳瓦拉, 该地的卡洛斯派, 460

navies, 海军

 英国的, 76—78, 80—88, 324, 326; 英国海军霸权, 6, 77, 90, 672; 与奴隶贸易, 99, 581, 673

 智利的, 623

 法国的, 78—80

 西班牙的, 323, 324

 马斯喀特苏丹的, 577

 美国的, 89—90

Navigation Acts, 英国航海条例, 修改(1822年), 680

Navigation Code, 航海法规, 598

Navy Board, 海军部, 80, 83

Navy Department, 美国海军部, 89

“Nazarenes”, “拿撒勒画派”, 他们在罗马的聚居地, 161, 221

Near East and Ottoman Empire, 近东与奥斯曼帝国, 525—551

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 尼德兰贸易公司, 55, 478, 564

Neerwinden, 内尔温登, 奥地利人于此战胜法国人(1793年), 464, 465

Neipperg, Count Adam A. von, 奈珀克伯爵, 亚当·冯, 奥地利将军, 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丝的第二个丈夫, 429

Nelson, Horatio, Viscount, 纳尔逊子爵, 霍雷肖, 海军上将, 76, 83, 87, 325

他的“公海”封锁体系, 77

突破敌舰队列的战术, 324, 326

在尼罗河海战中, 256, 531

在哥本哈根, 484

在特拉发尔加, 267, 326, 485

Nesselrode, Karl R., Graf von, 涅谢尔罗杰伯爵, 卡尔,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18, 673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 654

Netherlands, 尼德兰, 见 Austrian Netherlands, Holland, Netherlands (Kingdom of the) 条

Netherlands, Kingdom of the, 尼德兰王国(荷兰和比利时)

皮特建议成立(1798年), 256—257

建立(1814年), 54, 473; 一心想遏制法国, 18, 640, 644

参加三国联盟(1815年), 654

宪法(1815年), 473—474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827年, 未执行), 170

分裂(1830—1831年), 7, 664

参看 Belgium, Holland 条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191

Neufchateau, Francois de, 纳夫夏托, 弗朗索瓦·德, 法国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 291

New Granada, Viceroyalty of, 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

起义(1809年), 废黜总督(1810年), 615—616

西班牙军队重设总督(1816年), 621, 622

联合委内瑞拉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1819年), 625

New Harmony, 新和谐公社, 欧文在印第安纳州创建的定局点, 111—112

New Lanark, 新拉纳克, 欧文在该地的纺织厂, 7, 42—43, 111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美军于此战胜英军(1815年), 611

“New Readers” sect in Sweden, 瑞典“新读经师”派, 164

New Spain, 新西班牙, 见Mexico条

Newspaper Act (1798年), 报刊法(1798年), 181, 182

newspapers, 报纸, 见Press条

newspapers, circulation of, 报纸的发行

在英国, 181

在巴黎(1826年), 188—189, 340

在普鲁士(1823, 1830年), 191

Newtonian laws, 牛顿定律, 131—132, 133—134

New York, 纽约

作为利物浦贸易的终点站, 596

政治, 606; 普选权(1821年), 607

人口, 593, 606

Ney, Michel, 内伊, 米歇尔, 法国元帅, 320, 490

在滑铁卢，70，313，314

被处决，在路易十八时期，319，344，354

Nicaragua，尼加拉瓜，中美洲联合省的一部分（1823—1838年），636

Nice，尼斯

撒丁王国的一部分，412注

革命军进入；投票赞成并入法国（1792年），277

被法国兼并（1793年），254，255，256，414

重归撒丁（1815年），429，658

Nicolas I，尼古拉一世，俄国沙皇

即位时十二月党人兵变（1825年），521

对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施加压力，116

在波兰采取镇压行动，200，664，668

Nicolovius，G. H. L. N.，尼古洛维斯，歌德之侄，386

Niebuhr，B. G.，尼布尔，普鲁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7，378，387

Nielly，J. M.，尼埃里，法国海军上将，79

Niethammer，F. I. N.，尼特哈默尔，F. I. N.，学者，390

Niger river，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河”），580，582，585；考察，582

Nile，Battle of the（Aboukir Bay）（1798年），尼罗河海战（阿布基尔湾）（1798年），256，310，419，484，530，531，576

Nile，sources of the，尼罗河之源，588

Nizam-i-Djedid（New ordinance），新法令，土耳其的（1801年），530

Nizam of Hyderabad，海德拉巴的尼扎姆，英国盟友，553—554

nobility, Napoleon' s new, 拿破仑的新贵族, 301, 321

得到路易十八的承认, 338

Norway, 挪威, 480—494各处

对丹麦官僚统治不满, 483, 488

同情法国革命, 483

被英国封锁, 488

丹麦的让步, 489

瑞典入侵（1808—1809年）, 486

瑞典和俄国的征服计划, 489

短暂的独立（1814年）, 490

转让给瑞典（1814年）, 7, 489, 637, 664

宪法（1814年）, 18, 187, 491, 492

属地（冰岛, 格陵兰, 费罗群岛）归丹麦, 490

因偿还丹麦欠款发生争执（1818—1821年）, 492—493

Novalis, (F.L.Hardenberg), 诺瓦利斯, (F.L.哈登贝格),
诗人和哲学家, 102, 161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 该地的私掠船, 90

Novi, 诺维, 法国人于此战败（1799年）, 294, 310

Novikov, N. I., 诺维科夫, 俄国自由派政论家, 500

Novosiltsev, Count N. N., 诺沃西利采夫伯爵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505, 506, 507, 509

派往伦敦谈判联盟问题（1804年）, 266

驻波兰高级专员, 517

起草俄国宪法（1819年）, 512, 519

nullification, doctrine of, 美国的否认原则, 607

Nuttall, Thomas, 纳托尔, 托马斯, 博物学家和探险家, 594

Nyasaland, 尼亚萨兰, 利文斯敦在该地, 587, 588

obrók (body-rent) in Russia, 俄国的代役租, 496, 498

Observatoire de Parsi, 《巴黎观察家报》, 121

O' Connell, Daniel, 奥康内尔, 丹尼尔, 爱尔兰领袖
其天主教协会, 173, 179, 189
比利时天主教徒采用他的方法, 10, 179, 204

O' Connor, Arthur, 奥康纳, 阿瑟, 爱尔兰政治家和叛乱者, 92

Odessa, 敖德萨, 建立 (18世纪90年代), 495, 527

O' Donnell, Leopold, 奥唐奈, 利奥波德,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 448, 449

Oehlenschläger, Adam, 欧伦施莱厄, 亚当, 丹麦诗人, 493

Oersted, H. C., 奥斯忒, 物理学家, 134, 145

Oesterreichische Beobachter, 《奥地利观察家报》, 186

officers, 军官
英国海军的, 84—85, 86
法国陆军的, 61, 62, 64; 法国海军的, 78—79
德意志军队的, 66, 382

O' Higgins, Bernardo, 奥希金斯, 贝尔纳多, 智利最高执政, 623, 628

Ohio, 俄亥俄, 594, 599; 成为美国的州 (1803年), 594

“Oil Rivers” (Niger delta), “油河” (尼日尔河三角洲), 580, 582, 585

Oldenburg, Duchy of, 奥尔登堡公国
并入法国 (1810年), 21, 271, 328

与俄国的王朝联系, 21, 271, 673注

Oman (persian Gulf), 阿曼(波斯湾), 法国人被驱逐, 532

Oneglia, 奥内利亚, 被法国人占领(1794年), 415, 416

opera, 歌剧, 238—242

Opie, John, 奥佩, 约翰, 画家, 216

opium, trade in, 鸦片贸易, 565, 659

Oporto, 波尔图, 卫戍部队叛变(1820年), 451, 675

唐·佩德罗被困于该地(1824年), 454

Oppositionsblatt (Weimar), 《反对派报》(魏玛), 190

Orangist Party in Holland, 荷兰的奥伦治党, 462, 466

其成员, 在拿破仑统治下接受官职, 469; 承认路易·波拿巴为王, 470

筹划威廉六世复位(1813年), 471

Orban family, 奥尔邦家族, 比利时格里文日的炼铁厂主, 55

Orders in Council, 枢密院令, 向中立船只颁发许可证(1807年), 327, 486

美国和枢密院令, 271, 328

废除(1812年), 89, 328, 598

Ordnance Board of navy, 海军军械署, 83

Organic Articles, 基本条款, 限制教会自由的法律

在法国, 153, 154, 156; 在法国统治下的比利时, 468

在意大利共和国(梅尔齐法令), 155, 156

Orléans, Duc d', 奥尔良公爵, 见Louis Philippe, King the French条

Orlov, Counts Alexis and Gregory, 奥尔洛夫伯爵, 阿列克西斯和格雷戈里, 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 503, 544

Orthodox Church (Creek)，正教（希腊），在奥地利的特兰西瓦尼亚，538；在希腊，546；在奥斯曼帝国，527，528；在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545

Otho of Bavaria，巴伐利亚的奥托，成为希腊国王（1832年），550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10，525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527

各省，528—529

瓜分计划，258，526

参见Turkey条

Oudh，奥德，和东印度公司结成联盟，554

Oudinot，C.N.，乌迪诺，C.N.，法国元帅，490

output，产值，总产值和按人口平均产值，在英国，43—44

Ouvrard，G.J.，乌弗拉尔，G.J.，法国军事工程承包商，6

Ouvrard-Baring-Hope，乌弗拉尔-巴林-霍普，银行家，47

Overton，John，奥弗顿，约翰，福音派作者，164

Owen Robert，欧文，罗伯特，社会主义革新家

教育思想，27，194，206

新拉纳克工厂，7，42—43，111

创建新和谐公社，111—112

Oxford，University of，牛津大学，27，178，201，202

Oxford Movement，牛津运动，178

Pacca，Bartholomeo，帕卡，巴尔托洛梅奥，枢机主教，教皇的国务卿，8，322

Pacific coast of N.America，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俄国关于它的敕令（1821年），680，683

Páez, J. A. , 派斯, J. A. , 委内瑞拉游击战士, 628

Paganini, Nicolo, 帕加尼尼, 尼科洛, 小提琴家, 230

Paylen, Count P.von, 帕伦伯爵, 策划谋杀沙皇保罗一世, 506, 507, 509

Paine, Thomas, 潘恩, 托马斯, 共和主义作家, 99, 167, 568
 欢迎法国革命, 91, 102
 所著《人的权利》, 95

Painting, 绘画, 在英国, 216—220; 在法国, 209—216; 在德意志, 220—221; 在西班牙, 221—222

Paissii, Ch. , 佩西, 阿索斯山修道院修士, 540

Pakenham, Sir Edward, 帕克南爵士, 爱德华, 陆军少将, 在新奥尔良被击毙, 611

Palaeontology, 古生物学, 138, 140

Palermo, 巴勒莫, 人口, 32

Palestrina, G.P.de, 帕莱斯特里纳, G.P. 德, 作曲家, 244

Paley, William, 培利, 威廉, 《论基督教的证据》的著者, 177

Palm, J.P. , 帕尔姆, 纽伦堡书商, 1806年被处决, 270

Palmella, Dom Pedro Count of, 帕尔梅拉伯爵, 唐·佩德罗, 葡萄牙政治家, 451, 453, 454

Palmer, Samuel, 帕尔默, 塞缪尔, 风景画家, 217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10, 550

Palm oil, 棕榈油, 非洲出口, 580

Panama, Congress of (1826年), 巴拿马会议 (1826年), 628, 684

Panin, Count N.P., 帕宁伯爵, 策划谋杀沙皇保罗一世, 506, 507, 509

Paoli, Pasquale, 保利, 帕斯卡尔, 科西嘉将军, 307, 308

Papal bulls and encyclicals, 教皇的诏书和通谕

《如此惩罚》, 签订政教协定后 (1802年), 153

《每当想起》 (1809年), 关于入侵教皇国, 156, 157, 425注

《自动诏书》 (1816年), 关于恢复教皇国, 430

致南美教士 (1816, 1824年), 172

《对你们感到惊异》 (1832年), 驳斥良心自由说, 171

《我们独特的》, 谴责拉梅内的《一个信徒的话》, 116

Papal States, 教皇国, 9, 17, 171, 142

参加反法联盟 (1793年), 254

把罗马涅、波洛尼亚和弗拉拉让与拿破仑, 255

法国人占领安科纳港 (1805年), 156

法国人占领; 边境地带被兼并 (1808年), 156, 322

使之与帝国同化 (1809年), 156, 322, 331, 425注, 438

还给教皇 (1814年), 170, 429, 430, 434, 658

缪拉入侵 (1815年), 428

承认南美各共和国 (1835年), 638

参见Legations, Papal条

Paraguay, 巴拉圭, 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一个省, 成为独立的国家 (1811年), 618, 619

Paris, 巴黎

巴黎公社, 在大革命时期, 147, 276, 278, 284

起义, 被拿破仑粉碎 (1795年), 286, 308

法兰西民族国家的中心, 123, 340
计划将教皇移往巴黎, 157
为联军占领(1814年), 642; (1815年), 661
金融中心, 46
人口, 31
Paris, Congress of, 巴黎会议(1856年), 669
Paris, Convention of, 巴黎协定, 与普鲁士(1808年), 65
Paris, Peace of, 巴黎和约(1814年), 305, 644; (1815年), 342, 661—665
Park, Mungo, 帕克, 芒戈, 非洲探险家, 582
Parker, Richard, 帕克, 理查德, 诺雷兵变(1797年)的领袖,
87
Parker, Sir Hyde, 帕克爵士, 海德, 海军上将, 85
Parma, Duchies of, 帕尔马公国, 256, 412
并入法兰西帝国(1808年), 331, 423, 438
赐予玛丽·路易丝皇后(1814年), 429, 435, 643, 658
保留法国法典, 430
Parthenopaeian Republic (Kingdom of Naples), 帕特诺珀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 256, 417, 420
Pasto, 帕斯托, 新格拉纳达保皇派控制的省份, 625, 626
Patent Legislation, 专利法案, 29, 142
“Patriot” movement in Holland (1780s), 荷兰的“爱国”运动(18世纪80年代), 462, 463, 465
Patriotic Societies in Spain, 西班牙的爱国团体, 439, 442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61, 100, 148
Paul I, 保罗一世, 俄国沙皇, 21, 499, 502

作为统治者，503—506；撤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决定，500，

参加第二次反法联盟，256—257；撤退，257

恢复对英武装中立，258，484，531

被刺，259，485

Paulus, H. E. G. , 保罗, H. E. G. , 圣经评论家, 168

Peasant Proprietors, 自耕农, 法国的, 319; 西班牙的, 442

Peasantry, 农民

在奥地利, 406—407, 410

在德意志, 368—369, 373, 376

在印度, 552

在意大利, 413, 435

在爪哇, 564

在俄国, 496—497

见serfdom条

“Peasants, War”, “农民战争”, 在佛兰德反抗法国人（1798年）, 467

Pecqueur, Constantin, 佩克尔, 康斯坦丁, 改革家, 116

Pedro I, 佩德罗一世, 巴西皇帝（1822—1831年）

他的统治, 631—632, 684

继承和放弃葡萄牙王位（1826年）, 452, 453, 633, 684

放弃巴西帝位（1831年）, 454, 633; 得到英国帮助在葡萄牙打败米格尔派（1834年）, 454

Peel, Sir Robert, 皮尔爵士, 罗伯特, 政治家, 182

Peloponnese (Morea), 伯罗奔尼撒（摩里亚）

被威尼斯占领（1687—1715年），544

反土耳其起义（1821年），539，547—548，677

Pellico, Silvio, 佩利科，西尔维奥，《和解报》的编辑，435

Penang, 槟榔屿，英国人在该地，559，565

Peninsular War,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327，333—336；为之筹措资金，328

Pepe, Guglielmo, 佩佩，古列尔莫，将军，那不勒斯起义领袖（1820年），432，433，437

Percier, Charles, 柏西埃，夏尔，建筑师，224，225

père Duchesne, 《迪歇纳老爹报》，埃贝尔的报纸，147

Pereire, Emile and Isaac, 佩雷尔，埃米尔和伊萨克兄弟，动产信贷银行创办人，114

Périer, Casimir P., 佩里埃，卡西米尔，法国政治家，361，362，363

Perim, 丕林岛，英国人在该地，532

Pernambuco, 伯南布哥，共和派在此起义（1817—1824年），632

Perron (Cuellier), Pierre, 佩隆（居里埃），皮埃尔，在印度的法国军事冒险家，555

Perronet, J. R., 佩罗内，J. R., 建筑师，223

Perry, James, 佩里，詹姆斯，新闻记者，181

Persia, 波斯

割地给俄国（1813，1828年），9，522，529

英国垂涎，10，529，532，674

Persian language, 波斯语，在印度，567

Peru, Upper, 上秘鲁（今玻利维亚），618

叛乱（1809年），613

重又并入秘鲁总督辖区， 620

玻利瓦尔消灭保皇派的抵抗（1825年）， 626

建立玻利维亚共和国， 627

Peru, Viceroyalty of, 秘鲁总督辖区

来自秘鲁总督辖区的军队，平息上秘鲁的叛乱（1809年）， 613

圣马丁自海上入侵（1820年）， 623

宣布独立（1821年）， 624

玻利瓦尔最后打败总督的军队（1824年）， 626, 627

Peshwa, 帕什瓦，马拉塔联盟的首席大臣， 554

巴吉·劳接替执政（1796年）， 555

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 557, 558

Pestalozzi, J.H., 裴斯泰洛齐，约翰·海因里希，教育改革家， 27, 206

费希特对他的影响， 193—194, 197, 386

欢迎法国革命， 92

Pestel, Paul, 彼斯捷尔，帕维尔，十二月党人， 520

Peter III, 彼得三世，俄国沙皇， 502, 503

Pétion. Alexandre, 佩蒂翁，亚历山大，南海地的混血儿统治者， 633

Peyronnet, Comte, C. I. de, 佩罗内伯爵，法国政治家， 353

Phanariot Greeks, 法纳尔，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 528, 545

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者， 537, 538, 539

Philadelphia, 费拉德尔菲亚科学， 127

合众国银行， 605

选举改革， 606

“Philikè Hetairía”，“菲力克·希特里亚”（友谊社），希腊爱国团体，535，538，548

Philomathians，爱学社，波兰学生团体，190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哲学和语言学，在德意志，14—15

Photius，佛提乌，俄国修士大牧首，519

physics，物理学，133—134，136

Physiocrats，重农主义者，56

Piacenza, Duchy of，皮亚琴察公国，并入法兰西帝国（1808年），331，438

Piazzi.Giuseppe，皮亚齐，朱塞佩，天文学家，132

Pichegru, Charles，皮什格吕，夏尔，法国将军，288，290

当选为五百人院议长（1797年），290

卷入保皇党的阴谋，反督政府，290，294；反拿破仑，265

Pichincha，皮钦查，西班牙人被苏克雷击败于此（1822年），626

Picornell, J.，比科内利，西班牙共和派密谋分子，440

Piedmont，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一部分，412注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1794年），415

被法国吞并（1798年），417

联军占领（1799年），但被法国人重占（1800年），309，420

法国兼并（1802年），262，263；法国的统治，422

重归撒丁王国（1814年），429，658；秘密团体，431

军事叛乱（1821年），17，433—434，677

pietism，虔信主义，163，164，170

Pike, Z.M.，派克，Z.M.，美国探险家，594

Pillnitz, Declaration of, 皮尔尼茨宣言, 奥普两国发表, 关于路易十六的处境 (1791年), 253

Pinckney Treaty, 平克尼条约, 西班牙和美国签订 (1795年), 595

Pindaris, 平达里, 马拉塔资助的部队, 557, 558

Pisa, 比萨, 该地的师范学校, 200

Pitt, William, 皮特, 威廉, 政治家

向俄国提出建立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建议 (1798年), 256—257

辞职 (1801年), 260

复职; 策划第三次反法联盟 (1805年), 265—266, 640

Pius VI (Giovanni Angelo Braschi), 庇护六世 (焦万-安杰洛·布拉斯基), 教皇 (1775—1799年)

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146

抗议法国革命者的行动, 252

成为囚犯 (1798年), 256; 在法国流放中逝世 (1799年), 151, 299

Pius VII (Gregorio Chiaramonte), 庇护七世 (格雷戈里奥·基亚拉蒙蒂), 教皇 (1800—1823年)

当选 (1800年), 152

在意大利战争 (1800—1801年) 中未受拿破仑骚扰, 420

与拿破仑签订政教协定 (1801年), 299

在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上 (1804年), 155—156, 301

被捕并劫持到萨沃纳 (1809年), 156—160, 322—323

在枫丹白露受到压力 (1813年), 160

返回罗马 (1814年), 160

在维也纳会议时期保持中立, 171

重建耶稣会， 352

逝世（1823年）， 17

Pius VIII (Francesco Castiglione)， 庇护八世（弗朗切斯科·卡斯蒂廖内）， 教皇（1829—1831年）， 434

Pius IX (G.M.Mastai-Ferretti)， 庇护九世（马斯泰-费雷蒂）， 教皇（1846—1878年）， 他的当选为自由派天主教徒带来希望， 26

Playfair, W.H.， 普莱费尔， W.H.， 建筑师， 227

Pleiswitz, Armistice of, 普列斯维茨停战协定， 拿破仑和联军签订（1813年）， 272

Poisson, S.D.， 泊松， S.D.， 数学家， 123

Poland, 波兰

瓜分， 495， 648

第一次瓜分（奥、普、俄， 1772年）， 251， 480

第二次瓜分（普、俄， 1793年）， 253—254

第三次瓜分（奥、普、俄， 1795年）， 21， 255， 387， 500， 501， 511

在法国共和军中的波兰军团， 512

拿破仑建立华沙公国（1807年）， 332， 648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同情， 503， 512， 516， 649， 665

维也纳会议中的讨价还价， 648—656各处

在俄国统治下（波兰会议王国）， 9， 667； 教会和政府， 173；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818年）， 170； 学生团体， 190， 517； 教育， 200； 宪法， 187， 516—517； 废除宪法， 664

奥地利兼并克拉科夫（1846年）， 410

police, 警察

专制政府的，190

在奥地利，396—397

在意大利，17

在拿破仑时期，297

Polignac, Prince Jules de, 波利尼亚克公爵，朱尔

法国驻伦敦大使（19世纪20年代），638

查理十世的大臣（1829—1830年），354，682，683

Polish language, 波兰语，511

poll-tax, 人头税，在俄国，497，523

Pombal, S. J. de Carvalho, Marquis of, 庞巴尔侯爵，德·卡瓦略，葡萄牙政治家，439—442

Pomerania (West), 波美拉尼亚（西部）

在瑞典统治下，480，485

被拿破仑侵占（1812年），489

瑞典军队在该地（1813年），490

基尔条约规定归属丹麦（1814年），490

卖与普鲁士（1815年），7，491，657，664

Poncelet, J. V., 彭赛列，J. V., 数学家和工程师，123

Ponsonby, John, Viscount, 庞森比子爵，约翰，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的公使，630

Ponts et Chaussées, Corps des, 桥梁道路协会，223，224

Ponts et Chaussées, École des, 桥梁道路学校，121，223

Poona, 浦那，英国人在该地，554

Popes, 教皇，见Pius VI, Pius VII, Leo XII, Pius VIII, Gregory XVI, Pius IX条

Popham. Sir Home, 波帕姆爵士, 霍姆, 所著《航海词汇》, 76

population, 人口, 3, 31—33, 251

在奥地利, 32, 406

在比利时, 32, 38, 54, 468

在英国, 31, 32, 251

在法国, 32, 251, 281

在冰岛, 480

在意大利, 31, 32, 251

在喀土穆, 534

在俄国, 31, 32, 50, 251, 495—496

在斯堪的纳维亚, 491

在西班牙, 31, 32, 251, 442

在美国, 593

Portalis, J.E.M., 波塔利斯, J.E.M., 拿破仑的宗教事务发言人, 154

Porter, George R., 波特, 乔治, 统计学家, 所著《国家的进步》, 7, 44

Port Mahon, 马翁港, 英国人于此获胜(1798年), 419

Portugal, 葡萄牙, 7, 439—461各处

庞巴尔的改革, 439—442

参加反法联盟(1793年), 254

未领到工资的水手暴动(1800年), 440

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入侵; 对西班牙和(在圭亚那)对法国的割让(1801年), 260

法国人入侵; 王室逃往巴西(1807年), 269, 327, 612

自由派暴动失败（1808年），447；英国人赶走法国人，335

与英国签订条约（1801年），672注

参加第四次反法联盟（1813年），272

在维也纳会议上，648

革命；拟定宪法（1820年），451，630，675

若奥六世自巴西回国（1821年），630—631，675；顺从议会，675；巴西独立，630—632，675

唐·佩德罗继承和放弃王位（1826年），452，453，633，684

自由派革命失败；唐·米格尔成为国王（1828年），453—454

唐·佩德罗在英国帮助下击败米格尔派（1834年），454

九月党人起义（1836年），461

折中宪法（1838年），461

在东非，572，573，574，576，587

在西非，578，587

在巴西，612；贸易，442，448

葡萄牙与奴隶贸易，659

positivism, 实证主义，30；在科学思想中，118；孔德的实证主义，123

Potemkin, Prince P.A.，波将金，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宠臣，502，503

Potter, Louis de, 波特，路易·德，比利时自由派记者，26，192，479

poverty, 贫困

救济贫困，在奥地利，407；在英国，5；在法国，5，283，298

农村的贫困，在意大利，48，435

Pozzo di Borgo, Count C.A., 波佐·迪·博尔戈伯爵, 在俄国外交界服务的科西嘉人, 646, 672

Priadier, J.J., 普拉迪埃, J.J., 雕刻家, 222

Prague, 布拉格, 法国与联盟国在此开会 (1813年), 273, 639
高等技术学校, 125

Prairial, coup d' état of (1799年), 牧月政变 (1799年), 293

precedence, 排列顺序, 外交席次, 658—659, 665; 海军官阶顺序, 85

préfets, sous-préfets (France, 1799年), 省长, 区长 (法国, 1799年), 13, 297, 298; 其前身, 287

press, the (newspapers), 报刊, 26—27, 179—192

在奥地利, 184, 186, 190, 397

在比利时, 192

在英国, 180—183, 263

在法国, 革命时期和督政府时期, 183, 287; 拿破仑时期, 183—184, 185, 301; 复辟以后, 187—189, 339, 347, 350, 353, 355

在德意志, 185—187, 190—191, 393

在意大利, 185, 191, 429

在尼德兰王国, 191—192, 478—479

在瑞典, 192

在瑞士, 185, 191

参见printing-presses条

Pressburg, Treaty of, 普雷斯堡条约, 法奥两国签订 (1806年), 267, 399, 438

Preussische Korrespondent, 《普鲁士通讯》（柏林, 1813—1814年）, 187

Piévost, Bénédict, 普雷沃, 贝内迪克特, 生物学家, 138

Price, Uvedale, 普赖斯, 乌维戴尔, “风景如画”派理论家, 225

prices, rise of, 物价上涨, 3, 34

在奥地利（1847—1848年）, 407

在法国（1791—1794年）, 282, 284; （1795年）, 285, 288

在西班牙（1770—1800年）, 49

Priestley, Joseph, 普里斯特利, 约瑟夫, 自然哲学家, 609

Prieur (de la Marne), P.L., 普里厄（德拉马恩）,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Prieur-Duvernois (de la Côte d' Or), Comte C.A., 普里厄-迪韦尔努瓦伯爵（科多尔的）,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279

Prina, Giuseppe, 普里纳, 朱塞佩, 意大利王国政治家, 421, 436, 437

prince-bishoprics, 君主—主教辖区, 世俗化, 8; 被新教邦所吞没（1803年）, 154—155

Principalities, 公国, 见Danubian Principalities条

Printing-presses, 印刷机

在巴西, 612

在俄国, 500; 沙皇保罗查禁, 505;

沙皇亚历山大重发许可证, 507

在塞尔维亚, 543

在土耳其, 527—528

用蒸汽动力开动, 182, 191

privateering, 私掠巡航, 78, 88, 90

prize money, 奖金, 给海军军官, 84—85

progress, idea of, 关于人类进步思想的, 2, 92

Progressives, 进步党人, 西班牙的政党, 457—458

pronunciamientos (officers' revolts), 西班牙军官的暴动, 445, 448, 459

property, right to, 财产权, 在法国宪法 (1793, 1795年) 中, 279, 286; 按照拿破仑法典, 299

protection, 保护关税, 见tariffs条

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es, 新教 (归正宗), 162—169

 在法国, 154, 299, 352; 在普鲁士, 176—177

Proudhon, P. J., 蒲鲁东, 改革家和无政府主义者, 26, 115—116

Prud' hon, P. P., 普吕东, 画家, 209, 211

Prussia, 普鲁士, 373—387

 建成强国 (18世纪), 367

 瓜分波兰所得 (1772年以后), 见Poland条

 从德意志获得土地 (1779年), 251

 派军镇压荷兰的“爱国”运动 (1787年), 462

 皮尔尼茨声明, 与奥地利 (1791年), 253

 反法战争 (1792年), 254

 与法国媾和, 割让莱茵河左岸 (1795年), 21, 255

 十年中立 (1795—1805年), 257, 260, 268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 改革的尝试, 373—374

 第三次反法联盟; 在奥斯特里茨战败 (1805年), 266; 获得汉诺威 (从英国分出), 266

在获悉拿破仑提出将汉诺威复归英国后，给法国的最后通牒；
在耶拿战败（1806年），268

失去波兰的土地（1807年），8，65

法国占领，379，383；拿破仑和普鲁士，332

积极改革时期（1807年以后），15，332—333，318，376—384

被法国的卫星国包围（1810年），303

普法反俄条约（1812年），271；提供2万军队，384

普俄陶洛格协定（1812年），271，384

普俄卡利什条约，第四次反法联盟中与英国结盟（1813年），
272，639

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1813年），273，639

反拿破仑起义（解放战争），186—187，384

普军在法国（1814年），642，646

在维也纳会议上，640，646；争夺领土的斗争，644，648—
653，655—657；获得萨克森、波兰、波美拉尼亚、莱茵兰的部分土
地，8，656—657，664；获得萨尔，662—663

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313—315，660—661

1815年后，8，15—16，689；经济衰退，52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70

派遣将军到阿德里安堡进行调停（1829年），690

Prytanée，陆军子弟学校，巴黎的寄宿学校（18世纪90年代），
198

Publiciste，《政论家报》，185

Puerto Rico，波多黎各，忠于西班牙，612，633

Pugin, A. C. and A. W.，普金，A. C. 和A. W.，建筑师，227

Pushkin A. S.，普希金，诗人，108，520，521

Quadruple Alliance, 奥、英、普、俄四国同盟（1815年），22—23, 662, 663, 665, 666, 669

解体, 690

Quakers, 贵格派, 攻击奴隶贸易, 98

Quai, Maurice, 奎伊, 莫里斯, 画家, 215

Quarterly Review (Tory), 《季度评论》（托利党）, 182

Quatre Bras, battle of (1815), 四臂村战役（1815年）, 314

Quesada, V. J. de, 克萨达, V. J. 德, 西班牙将军, 455

Quetelet, Adolphe, 凯特勒, 阿道夫, 统计学家, 125

Quintana, M. J., 金塔纳, M. J., 西班牙诗人, 447

Quiroga, Antonio, 基罗加, 安东尼奥, 西班牙自由派军官, 448

Quito, 基多, 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检审法院院长辖区

起义反抗西班牙总督（1809年）, 615

忠于西班牙（1820年）, 625

并入哥伦比亚共和国, 626

分离（成为厄瓜多尔）, 628

Quota Acts (1795年), 征兵定额法（1795年）, 向海军提供人员, 86

Quotidienne, La, 《日报》, 法国极端教权主义派报纸, 345

Radet, Étienne, 拉德, 艾蒂安, 法国将军, 165

Radishchev, A. N., 拉季谢夫, 俄国状况的批评者, 501

Raeburn, Sir Henry, 雷伯恩爵士, 亨利, 肖像画家, 216

Raffles, T. S., 莱佛士, T. S., 在爪哇, 社会与经济改革计划, 552, 558, 564; 鼓励研究东方学, 570

在新加坡, 559

Raggi, 光明党, 意大利秘密团体, 419, 431

Ragusa (Dubrovnik), 拉古萨 (杜布罗夫尼克), 536

railways, 铁路, 3—4, 414, 406

Rainer, Austrian Archduke, 赖纳, 奥地利大公, 399, 404

Rajić, Jovan, 拉伊奇, 约万, 塞尔维亚作家, 540

Rajput states, 拉杰普塔各邦, 555, 557, 558

Ramel de Nogaret, Jacques, 拉梅尔·德·诺加莱, 雅克, 法国财政部长, 291

Ramirez, Francis, 拉米雷斯, 弗朗西斯, 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首领, 629

Ram Mohan Roy, 拉姆·摩罕·罗易, 婆罗门, 东印度公司的雇员, 568

Ramond (de Carbonnières), L.F.E., 拉蒙 (德·卡蓬尼埃尔), 科学家, 126

Rancagua, 兰卡瓜, 1814年智利政务会在此被从秘鲁入侵的保王派击败, 621

Rangers, 巡逻骑兵团, 71

Ranjit Singh, 兰吉特·辛格, 与东印度公司, 557

Rappites, 拉普派, 宗教团体, 111

Rastatt, Congress of, 拉施塔特会议, 关于德意志问题的 (1798—1799年), 259, 388

Ratisbon, Diet of, 雷根斯堡议会 (德意志各邦代表, 1802年), 263; 休会 (1803年), 154

Baynal, Abbé G.T.F., 雷纳尔神甫, 法国启蒙哲学家, 501, 529, 624

Razumovski, Count A.K., 拉祖莫夫斯基伯爵, 音乐赞助人, 243; 随沙皇出席维也纳会议, 646

realism, 现实主义, 在绘画中, 210, 212, 213

Realschulen (modern schools), 实科中学, 普鲁士的, 386

reason, 理性, 理性时代, 93; 理性崇拜, 147, 148; 理性节, 147; 背离理性, 162

Red Sea, 红海, 法国人入侵埃及时英国人封锁红海, 532; 穆罕默德·阿里提出对红海的要求, 534

regalian controversy in Spain, 西班牙的王权之争, 441, 446

Reggio, 勒佐, 该地的革命(1796年), 417; 酒类贸易, 423

Règlement Organique, 《建制条例》, 多瑙河两公国的行政改革(1831年), 539

Rehberg, A.W., 雷贝格, A.W., 汉诺威官员, 374, 375

Reichardt, J.F., 赖夏特, J.F., 作曲家, 245

Reichenbach, Convention of, 赖兴巴赫协定, 奥、普两国签订(1790年), 463

Reichenbach, Treaty of, 赖兴巴赫条约, 奥、普、英三国签订(1813年), 272, 273, 639, 650

Reitzenstein, Sigismund von, 赖岑施泰因, 西吉斯蒙德·冯, 巴登政治家, 390

religion, 宗教, 25, 146—178各处

在教育中, 27, 201—215

具有宗教性质的革命崇拜, 104

其社会功能, 105—106

作为统治工具(冯·哈勒), 107

拿破仑的看法, 152, 299, 322

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322

Religious Census, 宗教人口调查, 在英国(1851年), 166

religious orders, 教派

破坏或取缔教派, 在比利时, 463, 464; 在法国, 120; 在德意志, 155; 在西班牙, 158, 446, 451

在复辟后的法国, 5, 187, 203, 207, 252

Rémusat, Claire, Comtesse de, 雷米扎公爵夫人, 克莱尔, 论拿破仑, 317

Remy, Christian and Ferdinand, 雷米, 克里斯琴和费迪南, 德意志铁器制造商, 40

Rennie, John, 伦尼, 约翰, 工程师, 82

Repton, Humphrey, 雷普顿, 汉弗莱, 风景园艺师, 225

Republican Party, 美国共和党(主张州自治), 民主共和党, 602, 603; 国民共和党, 603, 604

参看Federalist Party条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美国的最高利益, 592

共和主义不是民主主义的同义语, 605

在南美洲, 20, 679—680, 683

Resistance, party of, 抵制派, 在1830年以后的法国政治中, 361, 362, 363

Reubell, J.F., 勒贝尔, J.F., 法国第一届和第二届督政府督政官, 288, 290, 309

Réunion (Ile de Bourbon), 留尼旺岛(波旁岛), 法国人在该地, 577

Réveil, 信仰复兴派, 日内瓦的虔敬派, 164, 165

Revolutionary Tribunals (France), 革命法庭(法国), 183, 280, 283, 284

Reynier, J.L.E., 雷尼埃, J.L.E., 法国将军, 332

Rheinische Merkur, 《莱茵信使报》, 187

Rhigas Pheraios, 里加斯·费雷奥斯, 希腊爱国诗人, 530, 545—546

Rhine, navigation of the, 莱茵河的航行, 477, 644

Rhine, Confederation of the, 莱茵联盟

建成, 以拿破仑为保护人 (1806年), 267

在法国统治下, 185—186, 302, 332, 389

从奥地利获得土地 (1809年), 270

不再忠于拿破仑 (1813年), 273

消亡 (1814年), 7

Rhineland, 莱茵兰

1792年法军进入后, 投票并入法国, 277

在法国统治下, 152, 185

普鲁士进入 (1815年), 644, 649, 656, 664, 666

教会和政府, 8, 173, 174—175, 177

工业, 53

议会 (在普鲁士统治下), 16

Rhode Island, 罗得岛, 该地的纺织厂, 601

Riau (Malaya), 廖内 (马来亚), 其苏丹, 559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经济学家, 58, 109

Richelieu, A.E. du Plessis, Duc de, 黎塞留公爵, 法国政治家

作为逃亡贵族, 治理敖德萨地区 (1803—1814年), 527

与沙皇亚历山大的友谊, 344

首相; 继塔列朗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5年), 343—344, 662;
在国内事务中, 346, 347, 348

谈判修改政教协定 (1816, 1817年), 351

Richmond, George, 里奇蒙, 乔治, 肖像画家, 217

Rickman, Thomas, 里克曼, 托马斯, 建筑师, 227

Riego y Núñez, Rafael del, 列戈·伊·努涅斯, 拉斐尔·德尔, 西班牙起义领袖(1820年), 449, 450, 451, 625

Rifle Brigade, 步枪旅, 71

riflemen, 步兵, 67, 71

Rights of Man, declarations of, 人权宣言

 在法国, 95, 148, 183, 187, 330

 在荷兰, 465

 在意大利共和国, 418

 在美国, 95

Rights of Man, The, 《人的权利》, 托马斯·潘恩著, 95

Rintoul, R. S., 林图尔, R. S., 自由派新闻记者, 183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葡萄牙王室在该地(1808年), 612

Rio de la Plata, United Provinces of, 拉普拉塔河联合省(先为总督辖区, 后为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1810年), 616, 618—619, 620

 巴拉圭分离出去(1811年), 619

 其军队, 企图解放上秘鲁(1811, 1813, 1815年), 620

 分裂(1815年), 620

 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1816年), 616, 621

 美国承认(1823年), 637; 英国承认(1825年), 629, 637, 683

 为东部地带和巴西作战(1825—1828年), 630, 632

 参看Buenos Aires条

Rio de la Plata, Viceroyalty of, 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1776年建立），614, 615, 616

英国入侵（1806—1807年），614

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而解体（1810年），618—619, 620

risorgimento, 意大利复兴运动

起源, 436—437

拿破仑的改革与复兴运动, 331—332, 425—426

佛罗伦萨的自由派与复兴运动, 430

那不勒斯起义对复兴运动的贡献, 433

Rivadavia, Bernardino, 里瓦达维亚, 贝尔纳迪诺, 阿根廷政治家, 629, 630

Rivarol, Antoine, 里瓦罗尔, 安托万, 保守派政治讽刺作家, 104—105

Rivarola, A., Cardinal, 里瓦罗拉, 枢机主教, 与教皇国的秘密团体, 434

roads, improvement of, 公路的改进, 3, 38—39

在锡兰, 565

在法国, 330, 339

在尼德兰王国, 55

在普鲁士, 15—16

在西班牙, 439

在美国, 599

Robertson, T.C., 罗伯逊, T.C., 印度西北各省代理总督, 562, 570

Robertson, William, 罗伯逊, 威廉, 历史学家, 569

Robespierre, Augustin, 罗伯斯庇尔, 奥古斯坦, 雅各宾派, 他和拿破仑, 308, 322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连, 革命领袖, 13, 96, 279, 297

倡导崇拜最高主宰 (1794年), 148

救国委员会 (1794年) 领导人, 283, 285

被处决 (1794年), 254, 284

robot, 徭役, 在奥地利, 398, 406

Rochefoucauld-Liancourt, Duc de,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 法国自由主义者, 340

rocket, incendiary, 燃烧火箭, 84

Rodrigues Olinde, 罗德里格, 奥兰德, 社会主义改革家, 114

Rodríguez, Martín, 罗德里格, 马丁,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 629

Roederer, Comte P.L., 罗德雷伯爵, 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316

Roentgen, G.M., 伦琴, G.M., 造船家, 477

Rogier, C.L., 罗吉埃, C.L., 比利时政治家, 478, 480

Rogier, Firmin, 罗什埃, 菲尔曼, 列日大学教授, 478

Rolland (d' Erceville), B.G., 罗兰 (戴塞维尔), 法国议会学家, 198

Romagnosi, G.D., 罗马尼奥西, G.D., 意大利法律改革者, 421, 435

Romana, P. Caro y Sureda, Marquis de la, 罗马纳侯爵, 卡罗-苏雷达, 西班牙将军, 444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国宣布成立 (1798年), 151, 256, 417

政变，294

那不勒斯入侵（1799年），419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与天主教，160，161，162，323

在德意志，192，569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27，29，242—243

对马克思的影响，110；对拿破仑的影响，318

在文学中，103—104，108，186，192，375

在音乐中，229，240，242，247—248

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94，99，190，332，410；与民族语言，304，476

在绘画中，211，213，214，219，220—221

浪漫主义与新教，160，163，169

浪漫主义与要求自由，94，103

作为贵族阶级的最后哀鸣，103

Rome, 罗马，被法国人占领（1798年），256；（1808年），156；计划为拿破仑建筑宫殿，331；人口，32

Rome, King of (Napoleon's son), 罗马国王（拿破仑之子），270，302，321，341

逝世（1832年），359

Romney, George, 罗姆尼，乔治，肖像画家，216

Rondelet, Jean, 隆德莱，让，建筑师，223

Rosa, Martínez de la, 罗萨，马丁内斯·德拉，西班牙自由派政治家，449，450，456

Rosas, J.M. de, 罗萨斯，J.M. 德，阿根廷的首领，630

Rosetta Stone, 罗塞塔石碑，126

Rossini, Gioacchino, 罗西尼, 焦阿基诺, 作曲家, 240

Rostopchin, Count F.V., 罗斯托普钦伯爵, 俄国将军
沙皇保罗的首相 (1800年), 258
失宠 (1801年), 506
莫斯科地方长官 (1812年), 515

Rothschild, house of, 路特希尔德家族, 6, 46, 47

Rotteck, Karl von, 罗特克, 卡尔·冯, 巴登的自由派领袖,
197, 392

Rotterdam, 鹿特丹, 造船业, 477

Roumania, 罗马尼亚, 35
参看Danubian Principality, Moldavia, Wallachia条

Roumanians, 罗马尼亚人, 在奥地利统治下, 409, 538; 在土耳其统治下, 10, 538

Roumelia, 鲁梅利亚 (后为保加利亚), 258, 527, 540—541

Rousseau, J.J., 卢梭, J.J., 61, 148, 211, 624
对教育的影响, 27, 193, 502; 对拿破仑的影响, 307, 318;
对德意志的影响, 371; 对音乐的影响, 240, 245

Roux, Jacques, 鲁, 雅克, 无套裤汉的代言人, 282

Royal Guard (French), 禁卫军 (法国), 路易十八重建, 341

Royal Institution, 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 伦敦, 128

Royal Naval Academy, 皇家海军学院, 朴茨茅斯, 85

Royalist Volunteers (Spain), 保皇志愿军 (西班牙), 452,
455

royalists (French), 保皇党人 (法国)
企图入侵 (1795年), 285—286
在巴黎起事, 被拿破仑镇压 (1795年), 286

在法国立法两院中（1795—1797年），288，289，292

反拿破仑的密谋，264—265

内部分歧（1815—1820年），343，344，345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127, 130

Royal Statute (Spain, 1834年), 国王法令（西班牙, 1834年）, 456

Royer-Collard, P.P., 鲁瓦耶-科拉尔, 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188, 346

Rude, François, 吕德, 弗朗索瓦, 雕刻家, 222

Rudolph, 鲁道夫, 奥地利大公, 233

Ruffo, 鲁福, 枢机主教, 其农民军, 420

Rügen Island, 吕根岛

法国夺自瑞典（1807年），485

根据基尔条约割让丹麦（1814年），490

卖给普鲁士（1814年），491

Ruhr coalfield, 鲁尔煤田, 53; 钢厂, 303

Rumbold, Sir George, 朗博尔德爵士, 乔治, 外交家, 在汉堡被法国人逮捕（1803年），264

Rumyantsev, Count N.P., 鲁缅采夫伯爵, 俄国国务会议主席, 513, 542

Runge, P.O., 龙格, P.O., 画家, 221

Runich, D.P., 鲁尼奇, D.P., 圣彼得堡大学学监, 518

Rush, Richard, 拉什, 理查德, 美国政治家, 595, 682

Ruskin, John, 拉斯金, 约翰, 艺术批评家和作家, 218

Russia, 俄国, 495—524

人口, 32, 50, 251, 495—496

瓜分波兰所得（1772年以后），见Poland条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1762—1796年），499—503

与丹麦联盟（1765年），480，481

与土耳其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年），544

发起对英武装中立（1780年），250，481，482，672

吞并克里米亚（1783年），251，527，528

击退瑞典进攻（1788—1790年），251，481

镇压自由派（1790，1792年），500—501

与土耳其签订雅西条约（1792年），544

沙皇保罗在位时期（1796—1801年），503—506

参加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年），256—257；在意大利和瑞士的战役，21，257，294；退出联盟（1799年），257

恢复对英武装中立（1800年），258，484，531，672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这时期（1805—1825年），18—19，506—520

征服高加索（1801年），9，52

和法国的和解破裂（1801年），259

俄奥条约；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1805年），266

拒绝拿破仑的建议，267

在弗里德兰战败（1807年），268，485；提尔西特和约，268，512；与法国联盟，486

俄土战争（1806—1812年），513，514，527；占领多瑙河两公国，537，542

对瑞典作战（1808年），512；征服芬兰，487

对英宣战（1808年），因在提尔西特表示同意，269

获得奥属波兰的部分土地（1809年），270

和法国的联盟破裂，271；与英国和解（1812年），271，272
吞并比萨拉比亚，5，495，522，537，664
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1812年），23，624，678
拿破仑入侵（1812年），21，75，76，271，304—305，515
与瑞典、英国和西班牙起义者联盟（1812年），271
在第四次反法联盟中，英国的津贴，9，272，639
俄军横扫欧洲（1813—1814年），19，471，472
第一个巴黎和约（1814年），645
在维也纳会议上，640—643，648—655各处
得到“会议波兰”，655，664，666，671—672
敕令，保留北太平洋沿岸（1821年），680，682，683
十二月党人叛乱（1825年），520—521
俄土签订阿克曼条约（1826年），549
俄国的希腊政策（1821—1829年），549—550，677—679，685—690
俄土战争（1828—1829年），9，18，23，543，550，671—672，688；占领多瑙河两公国（1824—1834年），539
俄土签订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550，668，688—690
蚕食波斯；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查伊条约（1813，1828年），9，522，529
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1867年），9
Russian-American Company，俄美公司，9
Russian Bible Society，俄国圣经会，516，519
Russkaya Pravda，《俄国法典》，十二月党人的文件，520
Ruthenes，罗塞尼亚人，开始形成民族感情，410

Ryleev, K.F., 雷列耶夫, K.F., 诗人, 520

Sá de Bandeira B., 萨·德·班德拉, 葡萄牙自由派将军, 460

Saar, 萨尔, 属法兰西帝国, 303; 转让普鲁士(1815年), 662—663

Sade, Comte D.A.F.de, 萨德伯爵, 论征兵, 61

Saint-André, Jeanbon, 圣安德烈, 让邦, 法国国民公会大委员会成员, 海军的组建者, 78—79, 279

Saint-Cyr, *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圣西尔军校, 298

Saint Domingue, 圣多明各, 西印度群岛中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法国部分, 成为黑人国家(1804年), 633

参看Haiti, Santo Domingo条

Sainte-Beuve, C.A., 圣伯夫, C.A., 批评家, 105

St Helena, 圣赫勒拿岛, 作为英国岛屿基地, 90, 574; 拿破仑流放地, 307, 661

Saint-Hilaire, 圣-蒂莱, 见Geoffroy Saint-Hilaire条

Saint-Just, A.L.L.de, 圣茹斯特, A.L.L. 德, 法国革命领袖, 279, 283

Satui Martin, L.C., Marquis de, 圣马丹, 侯爵, 哲学家, 500

St Napoleon, festival of, 圣拿破仑节, 154

Saint-Ouen, Declaration of, 圣多昂宣言, 路易十八发表(1814年), 338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亚历山大罗夫工厂, 521, 523

圣彼得堡大学, 200, 518

联盟国圣彼得堡会议(1824, 1825年), 685, 686

人口, 32

Saint-Simon, Comte C.H. de, 圣西门伯爵, 社会主义改革家, 15, 59, 112—115

St Vincent, John Jarvis, Earl of, 圣文森特伯爵, 约翰·贾维斯, 海军上将, 76, 77

海军大臣, 80—81, 83

Salamanca, 萨拉曼卡, 法国于此战败 (1812年), 335

萨拉曼卡大学, 440

Saldanha Oliveira e Daun, J.G., Duke of, 萨尔达尼亚公爵·奥利维拉·埃·达乌恩, 葡萄牙将军

准备以武力推行宪章 (1826年), 452, 453, 454

得到坎宁的支持, 684

保守派企求获得他的支持, 460

Salomon, J.P., 萨洛蒙, J.P., 提琴家和乐团经理, 230

Salt, Henry, 索尔特, 亨利, 英国驻埃及总领事, 536

salt monopoly, 食盐专卖, 在普鲁士, 375

saltpetre, 硝酸钾, 来自印度, 565; 制造, 在法国, 122

Salvador, 萨尔瓦多, 中美洲联合省的一部分 (1823—1838年), 636

Samos, 萨摩斯岛, 自治 (自1832年), 550

Sand, George (Baronne Dudevant, née Amandine Dupin), 乔治·桑 (迪德旺男爵夫人, 娘家姓名阿芒迪娜·迪潘), 小说家, 107, 360

Sand, Karl, 赞德, 卡尔, 大学生, 刺杀科策布的凶手, 190, 197

Sané, Baron J.N., 萨内男爵, 舰艇设计师, 78

San Fedists, 圣约会, 教皇国的天主教团体, 189

San Ildefonso, Treaty of, 圣伊尔德丰索条约, 法西两国签订 (1796年), 260, 415

San Marino, Republic of, 圣马力诺共和国, 412, 429

San Martín, José de, 圣马丁, 何塞·德, 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 622—624, 625, 626—627

sans-culottes, 无套裤汉, 巴黎平民中的革命分子, 275—285各处, 290

Sanskrit language, 梵语, 567, 568, 569

Santa Anna, A.L.de, 圣安娜, A.L. 德, 维拉克鲁斯港司令官, 635

Santa Fe, 圣菲, 阿根廷的省, 620

Santa Fe de Bogotá, 波哥大的圣菲, 新格拉纳达首都

反西班牙起义 (1810年), 616

西班牙重新占领 (1815年), 622

玻利瓦尔占领 (1819年), 625

Santander, Francisco de P., 桑坦德, 弗朗西斯科·德, 哥伦比亚副总统, 641

Santarosa, A.S.di Rossi, Count of, 桑塔罗萨伯爵, 迪·罗西, 皮埃蒙特革命领袖, 437

Santiago de Chile, 智利的圣地亚哥

政务会 (1810—1814年), 616, 621

圣马丁进入 (1817年), 623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西印度群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班牙所属的部分

割让给法国 (1795年), 255, 633

重归西班牙 (1808—1809年); 被海地共和国兼并 (1822年), 633

参看Haiti, Saint Domingue条

Sardinia, island of, 撒丁岛, 308, 426

Sardinia (Piedmont-Sardinia), Kingdom of, 撒丁(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包括撒丁、皮埃蒙特、萨伏依、尼斯, 412注

参加反法联盟(1793—1796年), 254, 414, 416

被迫承认法国兼并萨伏依和尼斯(1796年), 255

重新获得皮埃蒙特、萨伏依、尼斯, 并获得热那亚(1815年), 429, 658, 664

复辟, 430

军事叛变(1821年), 433—434, 677

参看Piedmont, Savoy, Nice条

Sassenay, Marquis of, 萨塞内侯爵, 拿破仑在南美洲的代表, 614

Satara, Raja of, 萨塔拉土王, 554

Saumarez, Sir James, 索马里兹爵士, 詹姆斯, 海军上将, 486, 487

Savage, James, 萨维奇, 詹姆斯, 建筑师, 227

Savigny, F.J. von, 萨维尼, F.J. 冯, 德意志法学家, 387, 390

Savoy, 萨伏依, 撒丁王国的一部, 412注

在法军进入后投票赞成并入法国(1792年), 277

被法国兼并(1793年), 254, 255, 414

拿破仑拒绝讨论萨伏依问题(与英国, 1802年), 261

重归撒丁王国(1815年), 429, 658

Saxe, Comte Maurice de, 萨克森伯爵, 莫里斯·德, 法国元帅, 71

Saxony, 萨克森, 387—388

将奥地利的领地并入（1809年），270

选帝侯成为国王，271，389，392

在维也纳会议上为把萨克森割让给普鲁士而争论，648—655各处，666；部分领土被划出，8，655，664

宪法，393

Say, J. B. , 萨伊，经济学家，58，110，304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480—494

参看Denmark, Norway, Sweden条

Scharnhorst, G. J. D. von, 沙恩霍斯特，普鲁士将军和行政官员
非普鲁士人出身，370

计划并实行军队改革（1809年起），65，66，378，382，383

组织反拿破仑起义，384

Scheldt, 斯凯尔特河，自由航行，54，465，469，644

英国想把法国赶出该河，640

Schelling, F. W. J. von, 谢林，F. W. J. 冯，哲学家，128，192

欢迎法国革命，91；哀叹平等主义，103

对宗教思想的影响，161，163

大学的职位，390

Schick, Gottlieb, 席克，戈特利布，画家，220

Schiller, J. C. F. von, 席勒，J. C. F. 冯，诗人和戏剧家

对法国革命的态度，100—101

为席勒的诗配乐曲，236，237，245—246

席勒与德意志的文化复兴，322，367

其著作，371—372，387

Schimmelpenninck, R. J. , 希默尔彭宁克, R. J. , 巴达维亚共和国议长, 470

Schirer, B. L. J. , 谢雷, B. L. J. , 法国将军, 308

Schlegel, August W. , 施勒格尔, 奥古斯特, 评论家和诗人
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 94, 332

他的诗, 242, 247

在波恩任教授(1818年), 569

Schlegel, Friedrich, 施勒格尔, 弗里德里希, 评论家和诗人
提倡妇女解放, 96

哀叹平等主义, 103

他的诗, 247

对研究印度感兴趣, 553, 569

Schleiermacher, F. D. E. , 施莱艾尔马赫, 新教神学家
其著作, 29, 160, 168—169, 176, 177

主办《普鲁士通讯》, 187

在柏林大学, 194, 387

Schleswig and Holstein, Duchies of,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

松散地附属于丹麦, 480

废除农奴制, 368

瑞典于此战胜丹麦(1813年), 490

问题, 17

参看Holstein条

Schlözer, A. L. von, 施洛策尔, A. L. 冯, 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 91, 372

Schön, Teodor von, 舍恩, 特奥多尔·冯, 普鲁士政治家, 376—377, 378, 380

Schönbrunn, Treaties of, 申布龙条约, 法奥两国签订 (1805年), 266; (1806年), 270, 400

schools, 学校

中心学校, 在法国, 286

地区学校, 在俄国, 200

文法学校, 在英国, 201

兰开斯特制学校, 206—207, 431

实科中学, 在普鲁士, 386

欧文的学校, 在新拉纳克, 111, 206

教区学校 (建议成立的), 在英国, 178, 202

裴斯泰洛齐的学校, 193

小学, 在丹麦, 206, 492; 在英国, 27, 202; 在法国, 国民公会的打算, 283, 286; 在拿破仑时期受到忽视, 198; 复辟时期, 203, 207; 在荷兰, 205—206; 在普鲁士, 205, 386—387; 在美国, 201

私立学校, 在拿破仑时期, 199, 在俄国, 499

陆军子弟学校, 寄宿学校, 198

斯莫尔尼女子学院, 499

主日学校, 202

技术学校, 在德意志, 125

师范学校, 在法国, 121, 199; 在意大利, 200; 在尼德兰王国, 475; 在普鲁士, 205

参看collèges, gymnasia, lycées, education条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阿瑟, 哲学家, 570

Schrötter, F.L. von, 施勒特尔, 普鲁士政治家, 376—377

Schubert, Franz, 舒伯特, 弗朗茨, 作曲家, 245—249

Schuckmann, K.F. von, 舒克曼, K.F. 冯, 在柏林大学, 196

Schultz, J.A.P., 舒尔茨, J.A.P., 作曲家, 245

Schultze, Johannes, 舒尔策, 约翰内斯, 普鲁士教育家, 196

Schumann, R.A., 舒曼, R.A., 作曲家, 229, 24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和技术, 14, 28—29, 118—145
 增添上民族特征, 304

Sciences, Academies of, 科学院
 美国的, 131
 巴伐利亚的, 390
 法国的, 119, 124, 125
 意大利的, 126
 普鲁士的, 28, 126, 127
 俄国的, 126, 130—131

Scotland, 苏格兰
 教育, 129—130, 201, 207
 来自苏格兰的海军军官, 85
 公路, 39
 希腊复兴式建筑艺术在苏格兰, 227

Scott, Sir Walter, 司各特爵士, 华尔特, 历史小说家, 103—104, 314

Sculpture, 雕刻, 222

Scurvy, 坏血病, 在海军中消灭, 88

Sea Fencibles, 海防民团, 88

Sebastiani, François, 塞巴斯蒂亚尼, 弗朗索瓦, 法国将军, 派往土耳其的使节 (1802年), 262

secret societies, 秘密团体, 24

法国的, 170, 189

意大利的, 171, 431

俄国的, 519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189, 190, 448

Sedlnitsky, Count Josef, 塞德尔尼茨基伯爵, 约瑟夫, 奥地利警察头目, 404

Ségur, P.H., 塞居尔, P.H., 法国元帅, 319

Sejm (Polish Diet), 波兰议会, 517

Selim III, 塞里姆三世, 土耳其苏丹, 528, 541, 544

Semaphore System, 信号装置系统, 3, 281

Semenov Guard, mutiny of (1820), 谢苗诺夫近卫团哗变 (1820年), 23, 518

Seminar, 研究班, 教学方法, 128

Senate, 元老院, 法国的 (1799年), 296, 305, 337, (1815年), 660; 希腊的, 544; 俄国的, 502, 509—510

Senegal river, 塞内加尔河, 572, 582; 法国势力范围, 586

Senegambia, Province of, 塞内冈比亚省, 英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直辖殖民地 (1763—1783年), 573

Senior, Nassau, 西尼尔, 纳索, 经济学家, 5

señorios (powers of nobles), 采邑 (贵族的权力), 在西班牙, 440, 446

Seo de Urgel, 塞奥·德·乌赫尔, 在该地成立代理被囚禁的西班牙国王的摄政会议 (1822年), 450

Seppings, Sir William, 塞宾斯爵士, 威廉, 海军工程监督, 82

Serampur, 塞兰普尔, 该地的丹麦居民点, 566

Serbia, 塞尔维亚, 反土耳其叛乱 (1804—1813年); 获得自治 (1817年), 541—544

Serbs, status of, 塞尔维亚人的地位, 在奥地利, 409, 541;
在土耳其, 10, 541

Serfdom, 农奴制

在多瑙河两公国, 537

在丹麦, 482

在德意志, 52, 53, 368, 392

拿破仑时期, 303

在波兰, 497, 517

在波美拉尼亚, 485

在普鲁士, 15, 333, 368, 373, 376—377

在罗马尼亚, 35

在俄国, 35, 50, 108, 496—497, 504, 511; 在其亚洲部分,
495

参看peasantry条

Senigapatam, 塞林加帕坦, 被英国人占领, 554

Sève, 塞韦·上校 (苏莱曼帕夏), 534

Shannon, H. M. S., “香农”号 (英国军舰), 83

Shariah, 舍利阿 (伊斯兰教律), 527

Sharp, Granville, 夏普, 格兰维尔, 慈善家, 98

Sheffield, J. B. Holroyd, Earl of, 谢菲尔德伯爵, 霍尔罗伊德, 所著《关于美国商业的报告》, 597

Shelley, P. B., 雪莱, P. B., 诗人, 97, 107—108

Ships, 船只

英国的, 45, 80

丹麦的, 52, 488; 丹麦和挪威的, 484

荷兰的, 55

法国的, 80

希腊的, 挂俄国旗航行 (1793年), 544

轮船, 3, 39, 84, 576, 594; 在多瑙河上, 405; 在波河上, 431; 在密西西比河上, 401

美国的, 597—598

参看navies条

Shipbuilding, 造船业

在安特卫普, 469

在英国, 39, 82—83

在印度, 82, 556

拿破仑造船, 79—80, 267, 326

在挪威, 484

在鹿特丹, 477

在美国, 597

Shrapnel, Henry, 施拉普内尔, 亨利, 榴霰弹的发明者 (1787年), 83

Siam, 暹罗, 保护马来亚各邦防止暹罗人入侵, 559

Siberia, 西伯利亚, 9, 495, 522

Sicily, 西西里

那不勒斯王国的一部分, 412注; 起义 (1795年), 415

那不勒斯宫廷于此避难 (1806年), 426

英国人在该地，为西西里制定宪法，426—427

重归那不勒斯（1815年），429

废除独立机构（1816年），429—430

分离主义者起事（1820年），432，433，675，677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政治家，177，261，263；对西班牙的看法，452，455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获得自由的奴隶于此定居，580—581；教育，583—584

Sierra Leone Company, 塞拉利昂公司，580

Siéyès, Abbé, E. J., 西哀士神甫，法国第三届督政府督政官，293；执政官，295

拿破仑与西哀士，294，295，296，311

Sikhs, 锡克人，554，557

Silesia, 西里西亚，在普鲁士统治下，8，177；拿破仑和西里西亚，268，332；该地的工业，37，53，388

silk industry, 丝织工业，在印度，565；在意大利，423，424

Sindia, Mahadji, 辛地亚，马哈吉，马拉塔联盟军事首领，554—555

Sindia, Daulat Rao, 辛地亚，杜拉特·劳，马哈吉的继任者，555—557

Singapore, 新加坡，英国人在该地，10，559，565

Sismondi, J.C.L.Simonde de, 西斯蒙迪，西蒙德·德，瑞士社会史学家，109—110

Sistova, Peace of, 西斯托瓦和约，奥土两国签订（1791年），252，541

skirmishers, 散兵，在军队组织中，71，72，74

Skuptchina (Serbian Assembly), 斯库普什丁纳 (塞尔维亚议会), 541, 542, 543

Slater, Samuel, 斯莱特, 塞缪尔, 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纺织工, 601

slavery, 奴隶制

在巴西, 579, 581, 632

在古巴, 581

在法国殖民地, 被国民公会废除, 283; 《拿破仑法典》重新规定, 299

在喀土穆, 534

在南美, 革命后受到限制或废除, 618

在美国, 5, 581, 604

slave-trade, 奴隶贸易

废除, 98—99, 482, 578—579; 英国海军和奴隶贸易, 99, 581, 673; 维也纳会议讨论, 659

在非洲, 512, 577—581; 禁止奴隶贸易的努力, 581—590

在西班牙, 579注

Slavs, 斯拉夫人, 奥地利和斯拉夫人, 541

Slovaks, 斯洛伐克人, 409, 410

Slovenes, 斯洛文尼亚人, 411

Smirke, Robert, 斯默克, 罗伯特, 建筑师, 228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

论农业, 33

提倡自由放任主义, 41, 42, 58

谴责奴隶贸易, 98

他的门徒, 110, 377, 439, 511, 600

Smith, Sydney, 史密斯, 西德尼, 作家和教士, 178

Smith, William, 史密斯, 威廉, 排灌工程师和地质学家, 28, 140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法国占领 (1812年), 313, 515

Soane, Sir John, 索恩爵士, 约翰, 建筑师, 226—227

Socialism, Socialists,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 12, 110, 114, 115, 295, 360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黑人之友协会, 98

Société Pour l'amélioration de l'enseignement élémentaire (1815), 初等教育改进会 (1815年), 206—207

Société Asiatique, 亚洲学会, 巴黎, 569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Pays Bas pour favoriser l'industrie nationale, 低地国家民族工业促进总公司, 55, 477

Société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传教协会, 352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基督教知识促进会, 202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ful knowledge, 实用知识促进会, 207

Society for Useful Manufacture, 实用工业品生产协会, 600

Sociology, 社会学, 113, 118

Sofronie, S., 索夫罗涅, (保加利亚) 弗拉查主教, 540

Sonnenfels, Joseph von, 宗南费尔斯, 约瑟夫·冯, 改革家, 92

Soufflot, J.G., 苏夫洛, J.G., 建筑师, 223

Soult, N.J. de D., 苏尔特, N.J. 德·D., 法国元帅, 313, 315, 320, 335, 首相, 364

South America, United Provinces of, 南美洲联合省

见Rio de la Plata, United Provinces of条
South American republics, 南美洲各共和国
解放, 20, 25, 612—638, 678
英国和南美洲各共和国的贸易, 327, 328, 636
给予贷款, 647
美国和南美洲各共和国, 591
参看各共和国专条

Southey, Robert, 骚塞, 罗伯特, 诗人
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91, 101
论工业革命, 109, 111
在葡萄牙, 440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doctrine of, 人民主权论
在法国, 99, 146; 被圣西门否定, 113
在荷兰, 465
在南美, 616
在西班牙, 439, 457, 613
在美国, 608

Spain, 西班牙, 439—461各处
人口, 32, 251, 442
卡洛斯三世在位时期, 对文官制度的改革 (1759—1788年),
439
卡洛斯四世即位; 激进运动开始 (1788年), 440—443
西法战争 (1793年), 254, 255, 443; 媾和 (1795年), 21,
255
戈多伊的权力, 335, 443, 444

同法国签订圣伊尔德丰索条约和阿兰胡埃斯条约；割让路易斯安那（1800年），260，415，438

伙同法国入侵葡萄牙，葡萄牙割让土地（1801年），260

拿破仑的顺从盟国（1807年），267，324—325；卡洛斯四世和拿破仑同意瓜分葡萄牙及其属地，613

卡洛斯退位；拿破仑迫使费迪南德放弃王位；约瑟夫·波拿巴成为国王（1808年），269，335，433—434，613

抵抗运动；马德里起义；建立洪达；英国派远征军相助，333—336，444—446

加的斯议会（1810年），386，440，617；颁布宪法（1812年），445，449，617

法国人战败并被逐（1812—1813年），272，335

费迪南德复位（1814年），447，617；在法国的军队，646；在维也纳会议上，648；西英条约，672注

向美国出售佛罗里达（1819年），595，637

加的斯兵变，革命（1820年），432，449—451，674

法国的干涉（1823年），16，324，349，672，679，681

“不吉利的十年”（1823—1833年），452—456

坎宁对干预葡萄牙的警告（1826年），684

在政治上进步派和温和派的对抗（1838—1860年），457—461

和殖民地的关系，327，614—615

西班牙与奴隶贸易，579注，659

Spectator，《旁观者报》，边沁主义者的报纸，183

Speier，斯佩埃，被法国人占领（1793年），254

Speke，J. H.，斯皮克，J. H.，非洲探险家，588

Spenerische Zeitung，《施彭纳报》，柏林，191

Speranskii, M.M.，斯佩兰斯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其行政管理主张，19，512—513

编纂俄国法律，514

发展军事屯垦区，518

任西伯利亚总督，522

Spiegel, Ferdinand von, 施皮格尔，费迪南德·冯，科隆大主教，费布朗尼乌主义者，174

Speigel, L.P.van de, 斯皮格尔，范·德，荷兰议会议长，465

Spontini, G.L.P.，斯蓬蒂尼，G.L.P.，作曲家，239，241

Sprimont, battle of (1794年)，斯普里蒙战役（1794年），72

Stadion, Count J.P.K.J.，施塔迪翁伯爵，奥地利政治家

建议改革，333，399—400

被梅特涅取代（1809年），270，400

Staël, Germaine, Baroness de (née Necker)，斯塔埃尔男爵夫人，热尔梅娜（娘家姓内克尔），作家

批评平等主义，103

所著《论德意志》，185，197

被拿破仑放逐，185，301，304，317

论罗马共和国，418

Stamp-duty on newspapers, 报纸的印花税，在英国，181；在法国，188，189

Stanislas II Augustus, 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波兰末代国王，102，504

Stanley, H.M.，斯坦利，H.M.，非洲探险家，588

Staps, Friedrich, 斯塔普斯，弗里德里希，奥地利爱国者，预谋刺杀拿破仑，330

Stars and Stripes, 星条旗, 610, 611

State, the, 国家

与建筑, 225

在美国的发展中, 606

与教育, 27, 179—180, 194, 196—202, 208, 387, 475

圣西门的看法, 113; 卡贝和勃朗的看法, 115

与工业, 在法国, 40—41; 在德意志, 53; 在尼德兰联合王国, 54

与革命, 179

与科学, 127

与战争, 60

参看church and state条

states of United States, rights of, 美国各州的州权, 600, 607—609

Statistical Bureau, 统计局, 在普鲁士, 375

Statistical Committee, 统计委员会, 维也纳会议, 652, 653—654

Statistical enquiries, 统计调查, 在法国, 300; 在意大利, 422

Steam-engines, 蒸汽机, 3—4, 28, 144—145

在英国, 42, 44, 57, 141; 在造船厂, 82; 在印刷业, 182, 191

在法国, 57

在德意志, 388

在俄国, 523

在美国, 141

steam-ships, 轮船, 见Ships条

Stein, H.F.K., Freiherr vom and zum, 施泰因男爵, 冯, 普鲁士政治家, 374—375

任命为大臣(1807年), 333

他所实行的改革, 65, 193, 369, 370, 376—377, 378—382

被法国人强迫辞职(1808年), 377

拿破仑与施泰因, 270, 334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顾问, 384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6, 656, 665

Stendhal (M.H.Beyle), 司汤达(贝尔), 作家, 24, 91, 103, 321

Stephenson, George, 斯蒂芬森, 乔治, 工程师, 141

Stewart, Charles W., 斯图尔特, 查尔斯, 伦敦德里侯爵,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 647, 662

Stockach, 施托卡克, 法国于此战败(1799年), 310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480, 493

Stockholm, Treaty of, 斯德哥尔摩条约, 英国、瑞典、俄国签订(1813年), 489

“Storm and Stress” movement in literature, 文学中的“狂飙突进”运动, 103, 371

Story, Joseph, 斯托里, 约瑟夫,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608

Stowell, William Scott, Lord, 斯托厄尔勋爵, 威廉·斯科特, 论海事法, 89

Straits Settlements (1819年), 海峡殖民地(1819年), 10, 559

Stralsund, 施特拉尔松, 瑞典丧失该地(1807年), 485

Strangford, P.C.Smythe, Viscount, 斯特兰福德子爵, 斯迈思, 驻里约热内卢大使, 619; 在君士坦丁堡, 678; 在俄国, 687

Strasbourg, university of, 斯特拉斯堡大学, 121

Street, T.G., 斯特里特, T.G., 《信使报》业主, 181

Stroganov, Count Paul, 斯特罗加诺夫伯爵, 保罗,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505, 507, 508; 驻土耳其大使, 678

Stroganov family,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498

Struensee, J.F., 施特鲁恩泽, 在丹麦的改革 (1770—1772 年), 481

Stuart, James, 斯图尔特, 詹姆斯, 将军, 332

Student Societies, 学生团体, 190

Stuttgart, 斯图加特, 高等技术学校, 125

submarines, 潜艇, 84

substitutes for military service, 兵役义务的替代办法, 在巴登, 391; 在法国, 63, 64; 在普鲁士, 384

Sucre, A. J. de, 苏克雷, A. J. 德, 玻利瓦尔的副手, 626, 627, 628

Sudan, 苏丹

穆罕默德·阿里在苏丹, 534

苏丹的伊斯兰教复兴, 586

与苏丹的贸易, 572, 574

Sue, Eugène, 苏, 欧仁, 法国小说家, 360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114, 533, 576, 577

suffrage, 选举权

在巴达维亚共和国 (1795年), 465

在法国（1792年），276；（1793年），278；（1795年），286—287；（1799年），296；（1814年），339；（1815年），343，346；（1820年），347；（1830年），356，357；（1846年），364—365

在意大利王国，423

在挪威（1814年），492

在普鲁士（1808年），380

在美国，605，606—607

普选的思想，115

sugar-beet, 甜菜, 37, 303, 498, 504

sugar-cane, 甘蔗, 565, 578, 605

Sumatra, 苏门答腊, 英国和荷兰关于苏门答腊的协定（1824年），559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美国, 608—609

survey, cadastral, 地籍测量, 意大利的（1807年），422

suttee, 寡妇自焚殉夫, 印度禁止, 566—567, 570

Suvorov, Prince Alexander, 苏沃洛夫公爵, 亚历山大, 俄国元帅, 257, 419, 505

Süvern J. W., 居维恩, J. W., 普鲁士教育家, 386

Sveaborg fortress, 斯维堡要塞, 芬兰, 俄国人攻陷（1808年），487

Svenskund, 斯文斯克松德, 瑞典海军于此战胜俄国（1790年），481

Sweden, 瑞典, 480—494各处

包括芬兰、西波美拉尼亚、吕根（18世纪），480

北方武装中立（1780年），481

古斯塔夫三世在位时期（1771—1792年），482

古斯塔夫四世在位时期（1792—1809年）；从英国获得让步，

与丹麦签订中立协定（1794年），484

第二次武装中立（1800年），484

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失去施特拉尔松和吕根（1805年），485

瑞丹战争；俄国征服芬兰（1808—1809年），486—487

古斯塔夫四世被废；其叔查理十三世继位（1809年）；贝纳多特被立为王储（1810年），271，487—488

与法国媾和（1810年），487

拿破仑占领波美拉尼亚（1812年），489；与俄国联盟（1812年），271；英国参加协定，272，489

反丹麦运动，490—491

在第四次反法联盟中，490—491

挪威划归瑞典（1813—1814年），7，489，491，657，664

波美拉尼亚割给普鲁士（1814年），7，491，657

贝纳多特继承查理十三世（1818年），488，492

向丹麦付款有困难（1821年），492—493

Swieten, Baron Gottfried von, 斯维滕男爵，戈特弗雷德·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音乐赞助人，歌词作者，232，233，244

Switzerland (Swiss Confederation), 瑞士（瑞士联邦）

被法国人占领（1798年），184，193，256，257；建立赫尔维蒂共和国，185

法国于此战败，但不久即赶走俄军（1799年），257

法军占领（1802年），261，262，263，267

联邦，根据拿破仑的调解法（1803年），262注，274，302

维也纳会议保证其中立，18，653，658，664，665

参加神圣同盟（1817年），22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828年），170

Syria，叙利亚，法军在叙利亚（1799年），256，531

Széchenyi，Count István，塞切尼伯爵，伊斯特万，匈牙利政治家，405，407

Talleyrand-Périgord，G.M.de，Prince，塔列朗-佩里戈尔，公爵，法国外交家和政治家

教育计划（18世纪90年代），119

支持派远征军去埃及（1799年），292，310，530

德意志诸侯与塔列朗，259，388

想同英国一起拯救和平（1803年），263

解职（1808年），316

塔列朗与拿破仑，262，330；与沙皇亚历山大，516，642

主持临时政府（1814年），305，337；论第一个巴黎和约，644；在维也纳会议上，646，652—655，665

从短暂的内阁引退（1815年），343，662

Tanzimat (reorganisation)，坦志麦特（改革），1839年以后土耳其进行的改革，528

Tammany，Society of St，纽约圣坦慕尼协会，603，606

Tariff of Abominations，可恶的关税率（美国，1828年），602

tariff union，关税同盟，普鲁士建议，15，26，52，53

tariffs，关税

在丹麦，52，482

在法国（1802年），262，300；（1810年），329；（1830年），357

在意大利, 423, 425; 奥地利统治时期, 429

在尼德兰王国, 54, 477

在俄国, 524

在美国, 599, 601—602

Tauroggen, Convention of, 陶洛根协定, 普俄两国签订 (1812 年), 384

taxation, 税收

在奥地利, 398, 400

在法国, 56, 291, 297; 在法国统治下的国家, 289, 464

在匈牙利, 405

在印度, 对香客, 566, 570

在意大利, 法国统治时期, 418, 419, 424; 奥地利统治时期, 429

在普鲁士, 376; 土地税, 371, 373, 378; 所得税的试验, 381

在俄国, 496, 497, 514, 523

在瑞典, 议会控制税收, 492

technical high schools, 高等技术学校, 在德意志, 125

technology, 技术

工业革命的基础, 41, 42, 141

科学与技术, 118—145

战争与技术, 312

Tegnér, Esias, 泰格奈尔, 埃西亚斯, 诗人, 482, 493

Tehran, 德黑兰,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该地, 532

Telford, Thomas, 特尔福德, 托马斯, 工程师, 39

Temps, Le, 《时报》, 189

Tenasserim, 丹那沙林, 被英国人征服, 560

Tennessee, 田纳西, 成为美国的州 (1796年), 594

Teplitz, Conventions of, 特普利策协定, 奥俄两国, 奥英两国分别签订 (1813年), 273

Terceira, A. J. de Sousa M., Duke of, 特尔塞拉公爵, 德·索萨, 葡萄牙将军, 460

Terror, 恐怖统治

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时期 (1793—1794年), 254, 275, 276, 280—284各处; 对自由派的影响, 100, 332; 里瓦罗尔对恐怖的批判, 105; 恐怖时期的科学家, 119; 对恐怖的回顾, 23

督政府的宗教政策 (1797年) 与恐怖时期相比, 150, 292

“白色恐怖”, 在法国 (1795年), 151, 285; (1816年), 343

米格尔分子恐怖统治在里斯本 (1828年), 453—454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 废除, 178, 202

Texas, 得克萨斯, 斯蒂芬·奥斯丁在得克萨斯的定居地, 594

textiles, 纺织, 见cotton, linen, and woollen industries条

Tharandt, Saxony, 塔兰特, 萨克森, 该地的林业学院, 388

theatre, 剧院, 拿破仑统治时期由国家监督, 301—302

thermodynamics, 热力学, 其创立, 144—145

Thibaudeau, Comte A. C. de, 蒂博多伯爵, 前雅各宾党人, 321

Thiers, L. A., 梯也尔, L. A., 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363, 364, 365, 668

《国民报》的创始人, 189

Thiersch, Friedrich, 蒂埃尔施, 弗里德里希, 巴伐利亚教育家, 196, 390

Thirlwall, Connop, 瑟沃尔, 康诺普, 历史学家, 168

Thompson Benjamin, Count Rumford, 汤普森, 本杰明, 朗福德伯爵, 144

Thomson, James, 汤姆森, 詹姆斯, 诗人, 98, 232

Thorild, Thomas, 托里尔德, 托马斯, 诗人和哲学家, 92

Thorn, 托恩 (1793年归属普鲁士), 重归普鲁士 (1815年), 655

Thornton. Henry, 桑顿, 亨利, 慈善家和经济学家, 98

Thorwaldsen, Bertel, 托瓦尔森, 伯泰尔, 雕刻家, 222

Thugut, J. A. F. de Paula, Baron, 图古特男爵, 奥地利外交家, 259

Ticknor, George, 蒂克纳, 乔治, 作家, 109, 196

Tieck, J. L., 蒂克, J. L., 诗人, 242

Tilly, J. L. F., Comte de, 蒂利伯爵, 在热那亚的法国代理人, 415

Tilsit, Peace of, 提尔西特和约, 法俄两国签订 (1807年), 326, 332, 485

 俄国对此和约的态度, 21, 512

 和约中的秘密条款, 268

timber for British navy, 英国海军需用的木材

 波罗的海沿岸的, 51, 269, 484, 488, 491

 印度的, 82

 北美洲的, 51, 82, 491, 597

timber merchants in Britain, 英国的木材商, 停止向海军供应, 81, 83

Times, The, 《泰晤士报》, 181, 183

Tipu Sultan (Tippoo Sahib), 迈索尔的提普·苏丹, 532, 553, 554

Tobago, 多巴哥, 法国重又获得 (1802年), 261

Tocqueville, Comte Alexis de, 托克维尔伯爵, 亚历克西·德, 政治思想家, 25, 119

论美洲, 26, 176

Toland, John, 托兰德, 约翰, 自然神论者, 恳请宽容犹太人, 97

Tolentino, 托伦蒂诺, 奥地利人于此击败缪拉 (1814年), 313

Tolentino, Peace of, 托伦蒂诺和约, 法国和教廷签订 (1797年), 151, 322, 438

tolerance, religious, 宗教宽容

天主教徒的看法, 171, 173

在国民公会时期, 149

在政教协定中, 154

在德意志, 155

tolls, 国内通行税, 印度废除, 563;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 303; 在普鲁士, 370, 375; 在南德意志诸邦, 391—392

Tone, Theobald Wolfe, 托恩,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 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 99

Torres, Camilo, 托雷斯, 卡米洛, 新格拉纳达的革命领袖, 616

Torres Vedras, lines of, 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 335

Toulon, 土伦, 起事反对国民公会, 280, 284; 向英军投降, 308; 法国舰队于此失败, 78—79; 重占土伦 (1793年), 308

trade, international, 国际贸易, 4, 31, 44, 47—48

农产品, 37

英国的国际贸易，37，45—46，57；在拿破仑战争时期，78，271，327，328；同非洲的贸易，578，579—580；同美国的贸易，11，596，597；同南美，11，636

俄国的，498，514—515，523—524

荷兰的，55—56

斯堪的纳维亚的，482，484

美国的，46，596，597—598

参看free trade, slave-trade条

Trafalgar, campaign and battle of (1805年)，特拉发尔加战役和特拉发尔加海战（1805年），324—326

伤亡，83

消除拿破仑入侵英国的机会，77，80，267，326

使丹挪参加反法联盟，485

Transcaucasia, 外高加索，成为俄国殖民地，34

Transylvania, Grand Principality of,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在奥地利统治下，409，537，538

Treitschke, G.F., 特赖奇克, G.F., 歌词作者，239

trek-Boers, 迁居的布尔人，575，586

Trèves, 特里夫斯，见Trier条

Trevithick Richard, 特里维西克，理查德，工程师，141

Trianon Decree, 特里亚农法令，准许对英国进行有限贸易（1810年），328；根据该敕令所规定的关税率（1810年），329

Tribunals, Revolutionary, 革命法庭，183，280，283，284

Tribunate (France, 1799), 保民院（法国，1799年），296，300

tricolour flag, 三色旗

在法国海军（1794年），79

与十字架对立的标志，29，146，148

在罗马，156

代替波旁王朝的白旗（1830年），356

Trier (Tréves)，特里尔（特里夫斯）

被法国人世俗化，8

在该地的逃亡贵族，61

该地的费布朗尼乌派大主教，174

Trieste，的里亚斯特，在奥地利帝国（1808年），424

Trimmer, Mrs Sarah，特里默夫人，萨拉，作家，202

Trinidad，特立尼达，英国夺自西班牙，261

Triple Alliance，三国同盟，英、奥、法三国的（1815年1月），654

Tristan, Flora，特里斯坦，弗洛拉，男女平等主义者和革命者，114

Troppau，特罗保，联盟各国会议（1820年），23，669，676—677；议定书，433，676

Troshchinskii, D.P.，特罗辛斯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导师”，507

Trotter, Dr Thomas，特罗特博士，托马斯，海军医生，87

Troyes, bases de，特鲁瓦基本原则，联盟国的和平条件（1814年），641，644

Tübingen, university of，蒂宾根大学，128，163，391

Tucumán，图库曼，拉普拉塔河联合省代表大会于此召开（1816年），620—621，629

Turgenev, N.L.，屠格涅夫，《税收论》，著者，519

Turgot, A. R. J. , 杜尔哥, A. R. J. , 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119, 198

Turin, 都灵

在该地的镇压, 415

法国人失去都灵(1799年), 420; 收复(1800年), 420

起义(1831年), 433—434, 677

Turkey, 土耳其, 525—529

被俄国夺去的土地(1774, 1783, 1792年), 251;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年)和雅西条约(1792年), 544

奥地利与土耳其媾和(1791年), 252, 541

奥俄仍企图瓜分土耳其(1795年), 255

对法宣战(1798年), 530

拿破仑对土耳其的态度, 533

和法国达成协议(1801年), 532

和俄国一起成为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国, 525, 535

俄国兼并高加索(1801年), 9, 52

新法令(1801年), 530

土俄战争(1806—1812年), 513, 514, 527

土俄媾和(1812年); 为布加勒斯特条约争论, 23, 674, 678

与各省的关系, 9—10; 与多瑙河两公国的关系, 536—540; 与鲁梅利亚的关系, 540—541; 与塞尔维亚的关系, 541—544; 与希腊的关系, 544—547

在希腊的反土耳其起义, 25, 528, 547—550, 677—678, 679, 685

在纳瓦里诺丧失舰队, 随后为解决希腊问题签订伦敦条约(1827年), 525, 549—550, 557—558

坦志麦特的改革（1836年开始）， 528

参看Ottoman Empire, Egypt条

Turkmanchai, Treaty of, 土库曼查伊条约，俄国与波斯签订（1828年）， 9, 522, 529

Turner, J.M.W., 透纳, J.M.W., 风景画家, 209, 217—219

Turnvereine, 德意志的体育俱乐部, 190

Tuscany, 托斯卡纳, 35, 412

利奥波德一世统治下自由派的“绿洲”， 17, 425, 430

法国和联盟国战争（1792—1795年）中保持中立, 414

成为埃特鲁里亚王国（1801年）， 259, 260, 438

并入法兰西帝国（1808年）， 351, 425

费迪南德三世复位（1814年）；继续执行利奥波德的政策，
429, 430, 658

利奥波德二世的自由主义政策（1824年）， 435

Two Sicilies, Kingdom of the, 两西西里王国, 331, 429—430

参看Naples, Kingdom of和Sicily条

Tyrol, 蒂罗尔

反法和宗教骚动, 270, 323, 333

地方感情, 411

拟将奥地利的势力扩及该地, 649

Ukraine, 乌克兰, 被俄国殖民地化, 34, 496; 实行农奴制, 497

Ulemas, 伊斯兰教法律博士, 527, 528

Ulm, 乌尔姆

该地的《总汇报》， 186

法国在该地战胜奥地利（1805年），266；其军事方面，66，70，75，315

ultramontanism, 教皇权力至上主义

在比利时，152

在拿破仑时代，153，158

在德意志，155，174

教皇的，160

新形式（梅斯特尔和拉梅内），161

受到自由派的攻击，189

unemployment, 失业

在奥地利（1815—1816年），403

在英国（1810年），328

在法国（1793年），281；（1794—1795年），285；（1846—1847年），365

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在大陆封锁时期，303

西斯蒙迪解决失业的建议，110

Union and Security, Act of, 联合与安全法（瑞典，1789年），483

Union of Welfare, “幸福协会”，俄国军队中的秘密团体，190

United Belgian States (1790), 比利时合众国（1790年），463

United Irishmen, 爱尔兰人联合会，99

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联合省，635—636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尼德兰联合省，54

参看Holland条

United Provinces of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联合省

参看Rio de la Plata条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591—611

为保持独立地位而斗争, 592—593

向西扩张, 593—596

棉花, 596—597, 604

国家政治, 602—606; 联邦政府和各州, 607—610

民族意识的形成, 610—611

同欧洲的关系, 19—20

禁运法令, 强迫交战国放松控制(1807年), 327, 328

美英战争(1812—1814年), 10, 20, 89, 271, 328, 611,
671

拒绝参加神圣同盟的邀请(1819年), 22, 671

同南美洲的关系, 637, 680, 682—684

门罗总统关于西半球的咨文(1823年), 20, 591—592, 637,
638, 682—683

关于北太平洋海岸的俄国敕令(1821年), 680, 682, 683; 美
俄协定(1824年), 9; 购买阿拉斯加(1867年), 9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大学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629

在英国, 27, 130

在法国, 27, 121, 198, 352

在德意志, 15, 27, 127—128, 194—195, 386—387

在尼德兰王国, 475

在挪威, 489

在俄国, 200, 499, 511

在苏格兰, 129—130

在美国, 629

Urban Militia, “城市民兵”, 在西班牙, 449

Uruguay, 乌拉圭, 从东岸地带的—一个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1828年), 630, 632

Utilitarians,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者, 功利主义, 12—13

与教会财产, 178

与教育, 194, 201

与印度, 553, 567

Vaccination against small pox, 种牛痘防治天花, 在海军中, 88; 在教皇国, 170, 434

Valencia, 巴伦西亚, 440, 442

Valmy, battle of (1792), 瓦尔米战役 (1792年), 72, 253, 275, 312

Valparaíso, 瓦尔帕莱索, 618

Van Stabel, P. J., 范·斯塔贝尔, P. J., 法国海军上将, 79

Vasilchikov, Prince I. V., 瓦西里奇科夫公爵, 俄国将军, 519

Vellore mutiny, 韦洛尔兵变, 东印度公司军队的 (1806年), 566

Vendée, 旺代, 暴动反对国民公会, 146, 254, 278, 280, 281, 284

Vendémiaire, crisis of (1795), 葡月危机 (1795年), 286, 308

Venegas, F. J., 贝内加斯, F. J., 墨西哥总督, 172

Venelin, Yuri, 韦涅林, 尤里, 保加利亚史的作者, 540

Venezuela,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将军, 被罢免 (1810年), 宣布独立, 616

被西班牙封锁, 617

南美革命的战场, 618

共和政权两度建立和被推翻, 621—622

和新格拉纳达合并成为哥伦比亚共和国, 625

退出, 628

Venice, Venetia, 威尼斯, 7

在法国与联盟国作战中中立 (1793—1795年), 414

威尼斯的遗产, 在爱奥尼亚群岛, 535

一部分割让给奥地利, 一部分割让给山南共和国 (1797年),
185, 209, 438, 534, 535

毁于大陆封锁, 303

威尼斯科学院 (在欧仁·博阿尔内统治时代), 126

重归奥地利 (1814年), 658

反奥地利统治的骚乱, 404, 409

人口, 32

Vergara, Peace of, 贝尔加拉和约, 迫使西班牙卡洛斯派接受
(1839年), 459, 460

Vermont, 佛蒙特, 修建伊利运河产生的后果, 598

Verona, 维罗纳, 联盟国会议 (1822年), 669, 680—681

维罗纳科学院, 126

Verri, Pietro, 韦里, 彼得罗, 伦巴第经济学家, 413, 414

Versailles, Peace of (1783), 凡尔赛和约 (1783年), 481

- Vico, Giambattista, 维科, 詹巴蒂斯塔, 法学家和哲学家, 100
- Victor Emmanuel,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皮埃蒙特-撒丁国王, 430
- 让位给他的兄弟, 433—434, 677
- Vienna, 维也纳
- 建设工厂, 受到限制, 51
- 音乐中心, 229, 233
- 法军进入(1805年), 266
- 高等技术学校, 125
- 希腊人在维也纳大学, 545
- 奥地利的改革运动中心(1847—1848年), 411
- 人口, 32, 406
- Vienna Congress of (1814—1815), 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 646—667; 其最后文件, 648, 655, 658, 664
- Vieusseux, Pietro, 维瑟, 彼得罗, 《文萃》编辑人, 435
- Vignon, P.A., 维尼翁, P.A., 建筑师, 224
- Vigny, Alfred de, 维尼, 阿尔弗雷德·德, 诗人, 130
- Villaret de Joyeuse, Comte L.T., 维拉雷·德·儒瓦斯, 伯爵, 法国海军上将, 79
- Villèle, Comte Joseph de, 维莱尔伯爵, 约瑟夫·德, 法国政治家, 内阁首相, 348—354各处
- 压制报刊, 189, 348, 353
- 维莱尔与干预西班牙, 349, 451
- Villeneuve, P.C.J.B.S., 维尔纳夫, 法国海军上将, 79, 324, 325, 326

Villeneuve-Bargemont, F.P.A. de, 维尔纳夫-巴热蒙, 省长, 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 5

Villiers, G.W.F., 维利尔斯, 英国驻马德里大使, 456

Vilna, university of, 维尔纽斯大学, 190, 200

Vimiero, 维米耶罗, 法国于此战败(1808年), 335

Vilginia, 弗吉尼亚

权利宣言(1776年), 97

弗吉尼亚大学, 201, 605

弗吉尼亚的绅士们, 602, 603

弗吉尼亚和宪法, 607

Vitoria, 维多利亚, 法国于此战败(1813年), 335

Vladimirescu, Tudor, 弗拉迪米列斯库, 图多尔, 罗马尼亚军人, 反土耳其起义的领袖, 538, 539

Volkonskii, Prince P.M., 沃尔孔斯基公爵,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友, 519

Volney, Comte C.F.C. de, 沃尔内伯爵, 法国学者, 120, 529

Volta, Alessandro, 伏打, 亚历山德罗, 物理学家, 28, 124, 126, 134

Voltaire (F.M.Arouet), 伏尔泰(阿鲁埃), 24, 52

拿破仑和伏尔泰, 295, 299, 322

他的读者, 371, 568, 624

Vormärz, 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奥地利1848年革命前的几年), 406, 407

Vorontsov brothers, Simeon and Alexander, 沃龙佐夫兄弟, 西梅翁和亚历山大, 509, 511

Vorontsov, Pitt' s "Draft to" , 沃隆佐夫, 皮特 "致沃龙佐夫的草案" (1805年), 640

Vossische Zeitung, 《福斯报》, 柏林, 191

Wächter, Eberhard, 韦希特尔, 埃伯哈德, 画家, 220

wages, 工资

巴黎公社对工资的限制 (1794年), 284

最低工资, 在里昂 (1831年), 358

实际工资, 在英国, 59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里夏德, 作曲家, 229, 236, 237, 239

Wagram, battle of (1809), 瓦格拉姆战役 (1809年), 270, 328, 333, 384, 400

其军事方面, 66, 69, 311, 313

Wahabis, 瓦哈比派, 穆斯林清教派, 被穆罕默德·阿里击败, 533—534

Walcheren expedition (1809), 远征瓦尔赫伦岛 (1809年), 326, 328, 470

Wallachia, 瓦拉几亚 (后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9, 258, 536—540

Willis, Count Joseph, 沃利斯伯爵, 约瑟夫, 奥地利政治家, 402

Wallmoden, Count J.L., 沃尔莫顿伯爵, 汉诺威的将军, 72

Walloons, 瓦伦人, 在尼德兰王国, 476

Walter, John, 沃尔特, 约翰, 《泰晤士报》的, 181

war, 战争, 军队与战争, 60—76; 革命与战争, 92—93

Warburton, William, 沃伯顿, 威廉, 神学作家, 177

Warsaw, 华沙, 波兰文化中心, 648; 人口, 32

Warsaw, Duchy of, 华沙公国

拿破仑建立, 在萨克森国王统治下 (1807年), 7, 303, 332,
648

教育, 200

联盟国企图肢解华沙公国 (1813年), 272

成为“会议波兰”的一部分 (1815年), 516

Warton, Thomas, 沃顿, 托马斯, 所著《英国诗歌史》, 248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美国第一任总统, 593

Waterloo campaign, 滑铁卢战役, 67, 69, 70, 75—76, 313—
314, 660

参看Hundred Days条

Watt, James, 瓦特, 詹姆斯, 工程师, 141

Weber, C.M. von, 韦伯, C.M. 冯, 作曲家, 241—242, 248, 249

Webster, Daniel, 韦伯斯特, 丹尼尔, 马萨诸塞的参议员, 602

Webster, Noah, 韦伯斯特, 诺亚, 辞典编纂家, 606, 610

Wedgwood, Josiah, 韦奇伍德, 乔赛亚, 陶工, 6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政治纪事周报》, 科贝特所办的
报纸, 182

Weimar, 魏玛, 16, 102, 387, 393

Wellesley, Arthur, 韦尔斯利, 阿瑟, 见Wellington, Duke of
条

Wellesley, Richard C., Marquis, 韦尔斯利侯爵, 理查德, 印
度总督, 553, 544, 555, 556, 560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威灵顿公爵, 阿瑟·
韦尔斯利

在印度（1797年），310

在西班牙（1808年以后），72，334，335，613；论西班牙，334，441；论海军，77

在维也纳会议上，655，662

在“百日”，73，313—314，315，341，342，659—661

论拿破仑，317

在维罗纳会议上（1822年），680

与希腊，549，550，687，689

受到托利党极端派《晨报》的攻击（1828年），183

Wergeland, Henrik, 韦格兰，亨里克，挪威作家，493

Werner, A. C., 维尔纳，A. C.，地质学家，140

Wesley, John, 卫斯理，约翰，卫理公会的创始人，98

Wesleyans, 卫斯理派，与工人群众，165—166；在美国，166；在塞拉利昂，583

Wessenberg, Bishop I. H. C. von, 韦森贝格主教，在维也纳会议上任梅特涅助手，647

West, Benjamin, 韦斯特，本杰明，历史画家，219

West India Company, Dutch, 荷兰西印度公司，被取缔（1791年），465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非洲与西印度群岛，573，577

对英法的重要性，11，573

丹麦所属，为英国占领，484

美国进入，11，597，598

参看各岛屿条

Westminster Review, 《威斯敏斯特评论》, 边沁主义者的季刊, 183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为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国, 271, 331, 389

普鲁士的统治, 177, 374, 375

Whitney, Eli, 惠特尼, 伊莱, 康涅狄格州人, 轧棉机发明人, 5, 595; 滑膛枪工厂, 142, 601

Whitworth, Charles, Earl, 惠特沃斯伯爵, 查尔斯, 英国驻俄国大使, 506; 在巴黎, 263

Wieland, C.M., 维兰德, C.M., 诗人, 91, 237, 373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 威廉, 与废除奴隶制, 98, 170, 659; 与准许传教士

进入印度, 566, 570

Wilkins, Charles, 威尔金斯, 查尔斯, 孟加拉亚洲学会成员, 553, 569

Wilkins, William, 威尔金斯, 威廉, 建筑师, 228

Willism, 威廉, 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 646

William V, 威廉五世, 荷兰执政, 462, 465, 469, 470

William VI, 威廉六世, 荷兰执政, 后为尼德兰国王 (1814年)

继父亲之位 (在流亡中, 1806年), 470

定居英国 (1813年), 471

作为君主重返荷兰 (1813年), 471

接受国王称号 (1814年), 473

William I, 威廉一世, 尼德兰国王, 54, 473, 645

统治时的困难, 宗教上的, 173, 204, 474—476, 478—479; 经济上的, 55, 477—478; 语言上的, 476—477, 479

参看William VI, Stadholder条

Wilson, H. H., 威尔逊, H. H., 牛津大学梵文教授, 570—571

Winckelmann, J. J., 温克尔曼, J. J., 考古学家, 209, 372

Wohler, Friedrich, 维勒, 弗里德里希, 化学家, 128, 136

Wolk, F. A., 沃尔克, F. A., 语言学家, 195

Wollstonecraft, Mary, 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 男女平等主义者, 96—97, 102

women, 妇女

妇女解放, 96, 107

妇女和宗教, 25

在《拿破仑法典》中, 299

wool, 羊毛

增加生产, 37

从德意志向英国出口, 53; 从西班牙向英国出口, 484

woollen industry, 毛纺工业, 在英国, 37; 在德意志, 53; 在俄国, 498, 522

Woolman, John, 伍尔曼, 约翰, 贵格派散文家, 98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威廉, 诗人, 91, 101, 247

Wrede, Prince K. T., 符雷德亲王, 巴伐利亚外交家, 在维也纳会议上, 647

Württemberg, Dukedom, 符腾堡公国, 后为王国 (1806年)

参加反法联盟 (1793年), 254

被迫退出和纳贡 (1796年), 388

在法国支持下从教皇国获得领土 (1802年), 155, 262, 388

成为主权国, 和法国联盟; 弗里德里希公爵成为国王; 中止召开议会 (1805—1806年), 267, 391

在关于德意志联邦的讨论中（1814年），656

“百日”后得到加强（1815年），664

《莱茵信使报》在该地遭到禁止，187

宪法（1819年），16

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170

同俄国王朝的联系，673注

Würzburg, 维尔茨堡, 128, 656

Wyatt, James, 怀亚特, 詹姆斯, 建筑师, 255

Yorck von Wartenburg, Count H.D.L.,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普鲁士陆军元帅, 271, 384

Yorubaland, 约鲁巴兰, 传教团进入该地, 584; 从该地出口奴隶, 585

Young, Thomas, 杨, 托马斯, 医生和物理学家, 129, 130, 136

Zajaczek, Joseph, 扎亚切克, 约瑟夫, 波兰第一任总督, 516

Zaman Shah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国王扎曼, 553, 554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 证明不能航行, 587

zamindars, 柴明达尔, 印度的地主, 560, 563

Zanzibar, 桑给巴尔, 576—577

奴隶和象牙贸易, 586, 588—589, 590

Zea Bermudez, Francisco, 塞亚·贝穆德斯, 弗朗西斯科, 见 Cea, Bermudez 条

Zelter, K.F., 策尔特尔, K.F., 作曲家, 245

Zollverein, 关税同盟, 15, 26, 52, 53

Zubov, Count Platon, 祖博夫伯爵, 普拉东,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502

Zumalcárregui, Tomás, 苏马拉卡雷吉, 托马斯, 卡洛斯派将军, 456, 459—460

Zurlo, Giuseppe, 祖洛, 朱塞佩, 那不勒斯政治家, 421

10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年

[英] J.P.T.伯里 (J.P.T.Bur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0: 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1870

10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年

[英] J. P. T. 伯里 (J. P. T. Bur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0卷, 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年/
(英) J. P. T. 伯里 (J. P. T. Bur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0, 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1870

ISBN 978-7-5203-2599-8

I. ①新… II. ①J…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830-1870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4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56.25

字数 891千字

纸书定价 19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0: 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1870

ISBN 978-0521045483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编著按

法国七月王朝和1848年3月以前的奥地利帝国的情况虽在本卷各处述及，但敬告读者，在本书第九卷中将有专章对之详细加以论述。同样，1840—1905年的印度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和各种社会学说的发展情况在本书第十一卷中加以论述。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经济的变化与增长

第三章 科学进步及其对思想和物质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宗教和政教关系

第五章 教育和新闻事业

第六章 艺术与建筑

第七章 想象文学

第八章 自由主义与宪政的发展

第九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十章 联盟体系与力量均势

第十一章 武装力量和军事艺术：海军

第十二章 武装力量和军事艺术：陆军

第十三章 联合王国及其全球利益

第十四章 俄国在欧洲和亚洲

第十五章 1848年的革命

第十六章 地中海

第十七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

第十八章 克里米亚战争

第十九章 普鲁士与德意志问题，1830—1866年

第二十章 奥地利帝国及其问题，1848—1867年

第二十一章 意大利

第二十二章 普法战争的起因与德意志的再造

第二十三章 美国的国家力量与地方力量

第二十四章 美国南北战争

第二十五章 拉丁美洲国家

第二十六章 远东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欧洲各民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挥了创造性才能，进行不懈的努力，陆续发现并利用了各种巨大的力量，19世纪中叶似乎是欧洲各民族力量的鼎盛时期。诚然，欧洲各国日后所管辖的疆土比这一时期更加辽阔，所拥有的军队更加庞大，所掌握的武器的杀伤力更加可怕，但欧洲各民族日后所享有的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日益受到其他各大洲人民的挑战；而在1830—1870年这段时期中，这种优势却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时期中，欧洲各国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担心会有哪个欧洲国家会在政治上称霸而造成严重威胁，尽管它们彼此间难免也不时发生冲突，却并未长期分裂为敌对的军事营垒。它们所进行的战争历时都较短暂，伤亡也较小。它们之间的冲突也还没有达到像1914—1918年那样你死我活的程度；因而虽然也有像托克维尔和焦贝蒂那样有远见的人士能预见到美国或俄国日后将发挥巨大的力量，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未曾有过哪一位欧洲政治家在其论述中提出欧洲已经衰败，也没有哪一位欧洲思想家提出西方已经没落。

欧洲各民族之所以能占有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凡是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技术和新机器，几乎无一不是由他们发明创造的；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的人口同时都有了惊人的增长。远至18世纪，这种现象即已很明显，以至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其重要作用的深思。马尔萨斯早在1799年即已在其《人口论》中表达了他对人类生计的忧虑，紧接着，五年后，布莱克就在其《弥尔顿》一诗中谴责了“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工厂”。然而这种趋势当时正方兴未艾，无论是诗人的谴责或是政治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均无法使之停止。及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中，这种趋势的势头有增无减。欧洲各国人口增长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1830—1870年的40年中，更进一步增加了1/4以上，即30%。人口增加的顶峰，出现于这40年中的后20年，在这20年中，从城市到乡村，从欧洲东部到欧洲西部，无论是在巴黎或布列塔尼，在联合王国或俄国，人口都一直有增无减。在迪斯累里的《西比尔》（1845年）一书中，杰勒德惊呼：“堂堂罗马帝国的衰亡又算得了什么？如今时常有二三十万外方人走出森林，跋山

涉水，向我们蜂拥而来，年年如此，有增无减。和我们的人口回升相比，什么蛮族入侵，什么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什么伦巴底人和匈奴人，又算得了什么！”

正如蛮族入侵每次都引起了人口大流动一样，欧洲各国大量婴儿的出生也是如此。人类历来就处于流动状态，或是为了朝圣，或是为了征战，或是为了经商，或是为了谋生——不论是季节性的还是长期性的；但如今由于这么多的“外来人”需要住房、穿衣、吃饭，给生活手段带来的压力之大实为前所未有；这样，尽管这次人口流动也和以往一样错综复杂，在某一地点或行业几乎觉察不到，而在另一地点或行业则势如滚滚洪流。但大潮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在欧洲大陆内部，由乡村流入城市，举家迁至城市，到新的工厂做工，操作新机器。这种流动一直持续至今，几乎从未中断过，导致近代社会变化中最巨大的变化之一，即城乡分离和大量人口麋集于城市。另一方面，由于不堪徭役之苦，或土地不足、工资低微、就业无保证，人口由旧世界流向广袤的未开拓的西方和东方地区，即大批人口从北欧和西欧横渡大西洋；而俄国农民和其他人则长途跋涉向东迁往西伯利亚。后者迁移速度虽较慢，但其最终的影响却绝不亚于前者。大量人口横渡大西洋，尤其有助于缓和旧世界的紧张局面，使之不致再发生贫困和社会动乱。但甚至比这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它以空前的速度促使新世界的出现，从而改变了旧世界的均势。由于“移民源源不断地抵达和登陆”，大大加快了北美开发的速度。1830—1870年，北美的人口增加了两倍，生产也得到惊人的增长。这一切到20世纪对旧世界会有何巨大影响，是无须加以强调的。另一方面，欧洲过剩人口的这种外流，给新世界打上了欧洲人的后裔这个永远抹不掉的烙印。这件事本身就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欧洲的强盛。此外，欧美两大陆之间的交流还说明，不管美国怎样标榜其政治上的孤立主义，20世纪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一种“大西洋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沃尔特·惠特曼在他的诗中不是就感觉到“通过深深的大西洋，美国的脉搏传到欧洲，欧洲的脉搏又传回美国”吗？

然而，涌现出这么多的人力，并使欧洲，当然同时还有北美，具有如此雄厚的物质力量的原因是工业革命（第2章）。因为人口即便再多，倘若社会无处安插，也是枉然。爱尔兰的悲惨遭遇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爱尔兰没有工业，对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来说，如果不离

乡背井外出谋生，就只能挨饿。而在那些既拥有丰富的资金和原料，又不乏技术和创造发明的地方，则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尽管这种需求时有波动。这些国家的生产也相应地增加了。最早发展社会管理学说的法国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家们曾正确地强调说，在工业时代，生产的增加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些人，最早提出了工程师、银行家、金融家才是一个自然会太平无事的新社会的缔造者（原文第434页）。正是这些人，在欧洲大陆上提倡修筑铁路并向19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些大型的信贷银行提供了资金。正是这些人，最早（而且也最形象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路特希尔德家族将其金融帝国一直扩展到南美；实业家、商人和金融家除了控制新的经济外，还日益开始直接插手政治，在欧洲各国议会中占有席位，并在巴西打破了地主的垄断势力。在这些新时代的主人公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后来创造出何等的丰功伟绩啊！这是“远远超过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人的引水工程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以至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那篇辛辣地赞扬“资产阶级”成就的文章中就提到“世界市场”，提到“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提到在过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在这些革命性变化的发展中，英国一直处于突出地位。1830—1870年，英国的工业和贸易一直不断发展，有增无减。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煤和铁；由于拥有举世无敌的海军从而控制了通往全球各地的航道，到了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场，以及其航运商、贸易商和银行家”（原文第333页）。在促进技术的发展方面，英国也有很大的贡献。主要由于技术发展，在这40年中它的铁产量竟增加了7倍。19世纪中叶是前所未有的“铁的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铁器制造业已成为机器使用者和制造者的支柱；在这一时期中，桥梁、公共建筑、工厂和最早建成的多层大厦无一不是用铁建造的；海军的木船也为铁制战舰所取代，从而使海战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11章）。正是英国人贝西默发明的转炉炼钢法（1856年），宣

告了钢铁时代的来临，在此以前，钢几乎是一种贵金属。然而在英国享有领先地位的这40年中，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工业——常常是在熟练的英国工人和企业家的指导下——也日益迅速普及。哪里出现了这种工厂工业，哪里的家庭工业就一蹶不振，最后被取而代之。这一转变尤以纺织业最为明显，由于产品销路大，雇佣工人数目多，技术改进迅速，并且在美内战以前廉价的原棉供应充足，因此到处——从诺曼底直到大俄罗斯，都兴办了纺织工业。由家庭工业过渡到工厂工业往往是一个痛苦的，然而却是普遍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各国的转变速度因是否可以得到煤和是否有低廉的运煤手段而异。因此最早实现这种转变的是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拥有煤田，就是距煤田较近，并且早已建成了良好的交通——最初是水路，后来是铁路。

早在1830年以前，轮船即已证明可行驶于河流和湖泊。到了这一时期，它已开始远渡重洋，取代了帆船，为旧式海军的“木制壁垒”敲响了丧钟。此外，由于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轮船已开始提供安全、迅速、定期和低廉的服务。轮船的问世，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欧洲北部的汉堡和不来梅、南部的马赛再度繁荣起来，使得整个地中海恢复了生气，并使一个古老的梦想——修建苏伊士运河——得以早日实现（第16章）。

比这更具有革命性的是铁路时代的到来。在此以前，旅客和货物一直都由水路运输，因为这样不但最方便也最经济。现在，一种迅速可靠的远程交通工具便以人们以前梦想不到的方式贯穿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是在1830—1870年这40年中完成的——及至1870年，丁尼生笔下的这个“沿着变革的轨道隆隆向前”的伟大世界已经建成了第六条最重要的铁路。这些铁路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北美（原文第34页）。

于是，速度成为人类经验中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因素——发展速度的空前加快，固然原来早就想到了，但在这40年中它终于实现了。它不但缩短了距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从而大大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以至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尔·凡尔纳在那时已能够写出书名为《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八十天环游世界》（1873年）那样的作品。同时，人类不但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到各地经商，还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方式到各地游览，手持旅游指南的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登山爱好者、冬季运动业余爱好者代替了原来那些进行“大陆旅行”的有闲阶级。农民的天地也扩大了，蒸汽动力扩大了他们的市场，使他们得以在1850—1873年这一时期享受了一阵新的繁荣，直到后来才发现蒸汽动力还会使他们比过去更易受到国外竞争者之害。在美国，由于迅速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把北部和西部进一步连接起来，加深了美国北部和西部的社会与美国南部社会之间的差异，并使美国国内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畅通无阻的商业角逐领域（原文第612页）。海底电缆的问世不仅带来了一个世界市场，而且，由于可用有线电报指挥不定期货轮驶往某一停靠港，还带来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远洋运输业（原文第37页）。有线电报还使消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需要好些天才能将消息送到目的地，如今只消几分钟就行了。三大家通讯社：哈瓦斯、沃尔夫和路透社应运而生，不仅对银行家和贸易商，而且对新闻界来说，世界正在合而为一。历史本身的进程也加快了；政治家和军事家原来所惯用的一切衡量时间的尺度，如今也发生了变化。

上述这些物质文明的巨大和迅速进展，只有一小部分可直接归功于当代科学的进展（第3章）。诚然，到1870年，有机化学的某些技术已被应用于医学（如麻醉剂和消毒剂）、农业（如化肥）、制造业和军事（如火药棉），因而对人类社会确有种种影响。但就铁路业、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而言，多数工程人员大都还是通过实验和实践经验培养出来的；他们“汲取了17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知识，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这个时代的技术大都与理论知识无关。工程人员一般都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不论他们遇到的问题多么不同，但在他们看来科学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尽管如此，到了1830年，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已有了真正独立的地位。业余科学家业已或正在变成专业科学家，尤其是在教育进展方面遥遥领先的德国，他们已享有大学教授的地位，不仅拥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往往还拥有昂贵的设备。科学家已将他们的领域扩大到外层空间，“他们所论述的范围，概括了千百万年”（原文第49页），并且几乎是顽固地声称他们的发现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理论数学已具有其现代性质，新的天文学已经建立，电学的基础已经奠定，物理学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仅如此，在西欧还形成了一些概念，对人

类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导致热力学发展的新能量学说、分子学说以及有关细菌和进化的学说。无怪乎科学家已经赢得和享有极高的声望，这由下列种种事实就可看出：人们对科学家的工作和发现日益广泛重视；对“现代”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教育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现代语言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功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士越来越相信科学的推理方法可有效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从此人们开始谈论政治经济“科学”，圣西门派鼓吹“生产科学”，哲学则被改称为“伦理科学”。这种企图用本来属于机械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论出的经济法则，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法则决定着整个历史。

在这个多事的、有时是动乱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有其极为广阔的背景，以上所述，仅是极其概略地介绍了这背景的一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由于观察家们着眼于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所以似乎证明当时人们满怀信心、充满乐观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看到，人们自以为自己是灵魂和命运的主宰，在进步的旗帜下稳步前进。事实上，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大博览会就公开宣称其宗旨是向人们“展示用人类智慧所不断取得的全部成就写成的人类进步的生动记录”。此后相继举办了多次这种炫耀当代物质进步的博览会。在1851年，人们想必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贝特亲王抱有同感，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空前美好的过渡时期，因为整个历史所向往的宏伟目标——实现人类的团结，即将迅速达到”。

使人们满以为即将实现世界大同，即将进入“人类议会，即世界联邦”的也许还远不止于此。17世纪的思想革命和18世纪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博爱的思想影响，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空前强有力的因素，使社会的良知日益受到激发，从而使社会变得比以前更自由、更人道一些。所以正是在这40年中，世界许多地方对奴隶贩卖进一步加以限制，蓄奴制本身也被废除，不过美国为了废除蓄奴制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内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地，立法者不得不着手改善工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哈布斯堡帝国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俄国千百万农奴也获得解放，允许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变得平等一些，法律也随之变得人道一些，因此许多国家都修改了刑法。同

时，随着选举的普及，在瑞士、法国和普鲁士甚至实行了成年男子的普选，人们在选票坛和选票箱前也变得几乎更加平等了。关税壁垒逐步降低，鼓吹消除关税壁垒的人士声称，自由贸易也可以促进国际团结，从而消除战争的根源（原文第349页）。此外，尽管人类仍在征战中自相残杀，但战争规则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概念，中立的主张已经抬头，并适用于像比利时那样的国家和黑海那样的海洋；红十字运动已经创立，救死扶伤，而不问其国籍为何。红十字会成为国际性组织；“国际”一词（首先使用者为杰里米·边沁）的使用范围日益广泛，竟超过了原来的法律的含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象征着一种新的追求。就在这个时期，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改善多瑙河航运的工作交付给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在经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后，1874年成立了万国邮政联盟。确实，当时有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甚至把国别视作仅仅是过渡到欧洲合众国的踏脚石（第9章）。

由此可见，文明就其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言，必然强调人类的博爱和人的尊严，与此同时，文明的边界也空前地向更远的地方扩张，有时通过武力，有时则通过和平的渗透和劝导。因此法国在1830年通过稳步地巩固并扩大其在阿尔及尔的征服行动，做到了西班牙在其鼎盛时期也未能做到的事；开始了一项后来终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北非帝国，从而抵消其在欧洲的相对衰落的事业（原文第427页）。因此在远东，中国和日本的那种实际上闭关锁国的状态被强行打破了，从而给这两个国家以至整个远东地区带来了革命性的后果（原文第26章）。远东传统的最高势力与世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了；俄国乘机将自己的疆界推进到阿穆尔河，并越过乌苏里江而推进到朝鲜边境；上海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该地设立了国际租界，它“实际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司法和行政权的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由于发生了这些变化，不久日本和暹罗也不得不“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允许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自由进入”它们的一切领土，法国也随即在交趾支那获得了立足点，从而为日后统治印度支那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来说，问题已不再是其“统治者能否制止西方势力的入侵，而是他们如何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在日本，虽然总的说来他们“仍在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再也不敢公开反对的势力”，但西方“野蛮人”的要求却引起了一场革命，新涌现出来的人士“决心进行激烈的革新，以求增强国家实力和维护国家独立”。事实告诉他们，若要抵制西方势

力，只有先掌握西方势力成功的秘诀，因此他们转而大力提倡同西方交往而不加任何限制，并愿意从全世界各国汲取知识。他们在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为本国目的服务方面所取得的空前成功，成为以后半个世纪亚洲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另一同样引人注目的发展是：由于英国对印度、锡兰和缅甸的贸易和统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它的帝国利益重心已由西方转到东方，从大西洋转向印度洋，中国的门户开放便是这一发展的一个侧面（原文第350页）。英帝国的统治得到巩固一事，体现为其在印度的领地不断扩大；并在1857年兵变后撤销东印度公司，改由一名总督直接统治。此外，还于1835年作出一项日后遭到非议的重大决定，即资助一项按照西方的方针制定的教育制度，认为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将被西方同化，并通过他们将西方的思想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原文第118页）。英帝国贸易的巩固，促使它的殖民帝国有了空前的扩大，因为它势必需要在从南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通往印度及其邻近地区的航路沿线取得新的或扩大原有的领地、商站，承担新的或扩大原有的种种义务。及至1870年，英国在西非和南非的贸易港口业已成为大型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已远非原来的犯人流放地，新西兰也已成为英帝国的属地，由白人移民和当地的毛利族土著一起居住着。

在上述欧洲势力的空前扩张中，除了军人、行政官员和商人外，传教士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漫长的传教成就史上，这个时期是最伟大的时期之一，许许多多欧洲的、美国的传教士第一次主要在新教领导下把福音传播到了当时以为是世界最边远的地方：东方的美拉尼西亚，以及前所未知的非洲腹地。这些传教士往往历尽艰险，不时与怀有戒心的当地统治者发生摩擦，在中国，据说他们曾鼓励了太平天国起义，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方式与军人、行政官员和商人这些往往带有西方文明中一些引人怀疑的东西的人一道推动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使得讲不同语言、居住在不同地区、分属于组织形式和思想方式都不相同的各个社会的人们彼此更加互相依靠。对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以及一切坚信人类能使自己不断完善，并能控制其客观环境的人们来说，不断走向人类和睦相处的日子的前景是美好的、明朗的、无限动人的。

但就造成19世纪中叶美景的背景来说，也有其阴影；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正是这些阴影值得人们注意，正是这些阴影深深地笼罩

着、暗藏着不祥之兆。他们看到，在这些阴影之中，隐藏着邪恶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势力。这些势力会破坏人们的信仰，打乱政治秩序，使社会分裂为二。这些人士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大堆弊病和一种永无宁日的、起着破坏作用的“革新精神”；而工业革命则带来了一个丑恶的、无情的社会。人类的创造能力空前地超过了他们的道德素质。他们看到，他们的同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于攫取和挥霍。他们看到，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富人，这些人根本无暇培育精神生活，只不过是一些“工作日时代心力交瘁的人”，而他们却成为艺术的保护者和新兴的工业文明的领袖（原文第137页）。他们还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充满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的时代，又是一个使人们产生怀疑的时代。宗教信仰的基础早已遭到18世纪理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的攻讦，维护信仰的各种体制也早已受到反教权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嘲讽或抨击。如今，不仅不可知论已渗入古老的学术领域，连科学本身也加入了这场攻击的行列：地质学家莱尔以其关于地球年代和古人类的学说，推翻了《圣经》的纪年；达尔文以自然淘汰为基础提出的进化论，取代了《圣经》中的创世说；以德国为主体的、新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直接把《圣经》的原文置于受批评性检验的地位；就连基督的神性也重新遭到像勒南这样的权威作家的质疑。欧洲各国的教会，虽然在海外传教方面颇有作为，但“面临着从13世纪以来对基督教教旨最严重、最深远的挑战”（原文第102页）。教会对这一挑战奋起还击，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发表了其著名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不仅驳斥某些当代科学学说，而且直接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原文第92页）。然而，这场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一方面既激励了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蒙昧主义。此外，当社会变化如此迅速，时或令人感到不安时，难免会有许多人或不知该信仰什么是好，或虽想有信仰，却又无可信仰；难免有一些这时正逢大好时机的小小说家和其他一些作家致力于描写灵魂的困惑，探求似乎更难以捉摸的真理和现实。在迪斯累里的小说《坦克雷德》中，蒙塔丘特勋爵问道：“我究竟该怎么办？我究竟该信仰什么？”而流亡国外的伟大浪漫主义作家赫尔岑则在其著名的对话录《暴风雨来临之前》中宣称：“我们时代的最大特征‘乃是’普遍的苦难。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压在当代人的心灵上；他们由于自己在道德上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由于没有任何信仰而使他们未老先衰。”如果说，一方面是无限乐观，那么，另一方面却是同样深沉的悲观。

人们感到忧伤和焦虑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如卡莱尔所说，在新生的工业社会中，“随着无休止的阵痛”，那些黑暗的角落阴暗而丑恶到往往令人咋舌的地步。在那些由不关心社会问题和不考虑城市规划的建筑师们建立起来的建筑物正面的背后，是一处处的贫民窟；与“工业宫”比邻的是托克维尔在1833年称之曼彻斯特的“新地狱”的简陋房屋，据说从那里延伸出来的最近的道路就是通往酗酒。在这些地方——如堪与曼彻斯特相比的里尔——居住着被冠之以“无产者”新称号的人群；而且人们悲伤地发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使他们在身体和道德方面每况愈下，思想陷于空虚。尽管在疾病丛生和环境污秽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也许会增加，但种族的素质则在下降。此外，这些“无产者”的增加令人十分担心，在以前只有一个民族的地方将会出现“两个民族”——如迪斯累里在《西比尔》一书中的名句所说的“他们相互之间毫无同情，对彼此的习俗毫不了解，犹如居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星球上一样。……”多年来贫者反对富者的无声斗争，这时大有变成劳动反对资本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之势。居住在城市的产业工人，现在有可能成为图谋不轨的人，而一度动辄造反的农民，自从获得解放后已不大再想反叛。有些对新兴工业社会的这些祸患忧心忡忡的人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自觉地建立新的社会，以重新分配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公有制——于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便作为这个时代奇特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产物出现了。另外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则希冀并致力于逐步消除各种祸患和通过国家干预或组织工会来调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还有一些人，以马克思为首，则鼓吹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进行无情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这样做就给社会仇恨又注入了新的毒素——后来，这些新教条主义者的过激教义使社会的创伤公开暴露出来并愈加扩大了。

《共产党宣言》声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正是在这时，人们方才开始谈论“群众”，沃尔特·惠特曼吟唱出“我的诗句是现代‘群众’的”，而且为了让这些群众有吃有穿，进行着“大规模生产”。西方社会大约是在200年前开始养成从数量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现在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比起以前来都更加根据数字办事。早在1833年，托克维尔便在他的一本笔记本上写道：“本世纪首先是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正在上涨的潮水；它退去后以更大的力

量涨回，而且人们很快就看到，它随着不断的涨落而日益壮大。在不久的将来，欧洲社会将完全变成民主的社会。”^[1]民主还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而工业发展将进一步给民主潮流以强有力的推动。它使财富更加容易流动，为新的阶级取得权力、提供便利，并以各种方式起着平衡的作用——就连铁路也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盲目的平等工具。这样，尽管人们也许还没有使用“平民的时代”这种说法，但这样的时代似乎已近在眼前。这个从1815年开始的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充满历史意识，在这个时代中就连建筑也弥漫着历史主义，以至人们在建筑自己的房屋时也要选择过去某一时代的某种风格（原文第138页），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历史本身的变化。早在1820年，法国的梯叶里就要求写“一部公民的历史，臣民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考虑“像我们这样生活和感受过的人民大众的命运”。^[2]1846年，米什莱在他的《论人民》一书中响应了这一要求，就像卡莱尔通过他的《法国革命》一书作出响应一样，卡莱尔预见到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历史将追求迥然不同的原则；宫廷、参议院和战场将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教堂、车间和社会家庭将愈来愈占有突出地位”。^[3]在文学中，比较普通的，且没有多少英雄事迹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除狄更斯外，盖斯凯尔夫人、乔治桑和其他许多作家也都写出同样有力地控诉社会不公和揭露穷人冤屈的小说。此外，尽管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几乎没有给艺术家们带来任何灵感，但米勒和库尔贝等画家仍然选择农场工人和碎石工为主题，而以往那些寓言画、经典画，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圣经画则趋于过时。19世纪中叶以后，现实主义在艺术、文学和人类活动的其他许多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第6、7章）。

在所有这些方面，思想家们褒贬不一，各执己见。尽管由于在许多国家实行了初等教育，使人们的文化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并且在扩大受教育的基础和机会方面，个人和国家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启蒙与受教育的人数众多显然是两回事——甚至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样的进步思想家都担心不文明的多数会实行暴政。许多人把人民的崛起与野蛮人的入侵相提并论。他们从中看到一种力量，它一方面是猛烈而出人意料的，另一方面则会为保证躯体的舒适而将心灵的东西粗暴地统统弃之一旁。有一位持反对态度的观察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写道：“社会上大部分人将会为了乘坐直达卧车而随时准备

全部放弃他们个人的文学和国籍，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4]另一位瑞士作家阿米尔或许最深刻不过地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悲观情绪。1851年，他在读了托克维尔的知名之作《美国的民主》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下面的话：

托克维尔的书虽然从整个来说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它给人留下某种厌恶感。它使人们了解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论在任何方面平庸的时代已经开始，而平庸窒息了一切愿望，平等导致了一致，我们是通过牺牲那些优秀、卓越和非凡的东西才摆脱了丑恶的东西的。整个说来变得不像从前那么野蛮了，而同时却更加庸俗了。

伟人的时代正在消逝；蚁民的时代……正在开始……由于劳动不断趋于平等和分工，社会将变得重于一切，而人则变得无足轻重……

统计学家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而道德家的地位将不断下降……实用将取代美，工业将取代艺术，政治经济学将取代宗教，算术将取代诗。怨恨将成为平等时代的弊病。

最后，这个时期另一个被库尔诺称之为“出于本能而且影响深远”的最伟大的运动，尽管构成了历史画卷的主要部分，并以其最激动人心和可泣可歌的场面显示了突出的地位，但却使不止一个比较公正的有识之士有理由感到忧虑。民族独立的原则，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但仍然具有破坏性质，而且似乎只有用刀剑才能获胜。此外，民族意识也很容易蜕变为民族主义，给民族之间的抗衡注入新的仇恨和冲突的因素。因此就连阿克顿和赫尔岑这样完全不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民族意识与权利和自由水火不容，蒲鲁东则把它看成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原文第245页）。

除了出现铁路之外，本卷所叙述的时期（大致为1830年到1870年）在人口的流动或产业革命的进展方面并不标志着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或转折点。但这些年份在两大运动的发展方面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两大运动将决定19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历史，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也具有其重要意义。1830年是一个政治变革新时期的开端，不断增加的民族力量显示了出来，“自由主义”的大门打开，而“自由主义”这个词人们天天使用却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含义。1870年标志着欧洲民族主义第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全部实现了其统一的愿望和目的，这一年在欧洲力量对比上出现了不利于法国的剧烈变化。1830年，西欧各国一些人数虽少但勇气可嘉的团体还加快了使罗

马天主教会自由化这一伟大但结果徒劳的运动的步子。在1870年，可以看出他们最后失败的程度；这一年，一方面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理论；另一方面，明确地废除了教皇除单纯象征性的统治权之外的世俗权力。诚然，这些主要是欧洲的运动和事件，但是，从欧洲力量对比的每一次重大的转变和欧洲思想的每一次强有力的吹拂中，人们都越来越感到它最终对全世界的历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最初似乎是并肩前进的——的道路既不是平坦的，也不是安宁的。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1830年革命半途而废。保守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足以进行阻挡和制造分裂。意大利的市政革命很快就遭到破坏；亚平宁半岛的未来系于“法奥对抗的一缕细线之上”（原文第554页）。德意志的自由意志被梅特涅的“六条法令”所窒息（原文第493页）。波兰的民族主义起义被俄国的武力残酷镇压下去（原文第362页）。通过签订明亨格列兹条约，东欧三大国似乎再次成为坚定不移的堡垒，反对任何进一步破坏现状的企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革命的发祥地法国，七月王朝则越来越显示出保守的色彩。于是，1830年出现的种种希望，许多已经化为泡影，甚至连1815年作出的某些允诺也仍未实现。在西欧各城市，政治流亡者再次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不仅在华沙，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秩序似乎已经恢复，随后有十多年（1833—1846年）局势明显地，但表面地出现平静。说它是表面地，是因为在表面掩盖下面实际上进行着大量活动和大量的准备工作，狂热地策划密谋和交流各种主张。各国的保守政府设立了审查机构，竭力设法压制危险的思想，但思想是无法永远加以束缚的，即使在俄国也不例外。于是，在这些年，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扩散，自由派和民族派政党和运动大量出现，甚至连波拿巴主义的准独裁政权也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帝国。在这些年中，比起1790年到1910—1920年之间任何其他时期来，宪政的实验和政体的改变都更加频繁（原文第185页）。在这些年中，许多国家，西起美、英，东至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开明改革，有些是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通过立法行动进行的，有些则是由于专制君主们害怕革命的威胁而被迫进行的。不管进行这些改革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它们都反映出公众舆论的力量在日益强大（第5章）。在这些年中，新闻和宣传显示出空前未有的力量。在法国，报界人士促使查理十世于1830年逊位；1848年他们自己被拥上政府的座位。在这些年中，《泰

晤士报》被称为“雷神”，当时战地记者从克里米亚战场上发回的报道竟能促使英国陆军进行改革；当时甚至在保守的普鲁士，一些政党也以《周报》和《十字架报》命名；当时圣彼得堡的全俄沙皇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俄国流亡者在伦敦出版的一份报纸的权威性（原文第370页）。所以，大约在1870年一位法国思想家公正地写道：“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依靠舆论，不感到必须考虑把它的行为公之于世，并表明它们是如何紧密地适应国家的利益，或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增加其任何特权的理由。”^[5]

所以，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正酝酿着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将打破平静局面，最初是1846年和1847年的小小的震动，后来就是1848—1849年的大爆炸，这标志着这40年历史的大分界，一时间似乎将迎来人民的春天——“在文明世界从来还没有焕发出比这更高尚的激情，从来还没有像这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爆发出心灵的普遍冲动（élan）。”^[6]但是，1848年的这些革命（第15章）——虽然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各有特色——主要是知识界的革命，如奥迪隆·巴罗接下来所说的，“所有的革命结果都失败了，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已”。那些突然被推上当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毫无从政经验，处理不了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的动乱方面遇到的复杂问题和40年代经济混乱和萧条带来的苦难。他们把目标定得太高，却又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他们被内部的分裂所削弱；而现在又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愿望既相互一致又可能彼此冲突的局面。因此，恢复秩序的力量由于人们害怕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能够团结起来，削弱和打倒对方。反动局面一旦出现，往往会迅雷不及掩耳，像五月的风雪一样寒冷而肆虐。共和主义现在既然又与革命结了解之缘，在一个基本上是君主专制的欧洲，其存在就注定是短命的，而社会主义则引起了惊恐，以致它那些更加好斗的追随者遭到坚决的镇压。

大分裂之前的年代与大分裂之后的年代相差何其悬殊：在许多方面，革命的年代及其接踵而至的余波，既是旧时代的结束，又是新时代的开始。这时，许多在几十年统治欧洲的人物已成过去，墨尔本和皮尔、梅特涅、基佐，以及路易·菲利普这些人或已作古，或已无可挽回地失势。以前大国之间都接受均势原则，而且尽管互相敌对和猜忌，但一般尚能为了维护条约和遏制侵略而协力行动，从而保持了长

期的和平，现在这种和平局面已告终结（原文第266—267页）。1848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社会基本上仍是等级森严而且相对说来停滞不前，在德意志社会中农民仍然大部分处于封建赋税的盘剥和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之下；选举权即使赋予也受到限制；修筑铁路和制造汽轮究竟在民用和军事上有什么作用，也仍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革命的失败也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充满幻想的时代，即献身于这些运动的人大都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鼓舞的时代告一段落。尽管革命仍有一些反响，但它现在实际上已如强弩之末，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是在不同的思想影响下造成的。

对比之下，革命失败后的20年更加错综复杂，更加瞬息万变。紧接着出现的反动之后，出现了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巨大繁荣和发展的时期，其间主要的动乱事件是克里米亚战争（第18章）。这次战争是俄国与土耳其一系列长期冲突中的第9次，但与以前的历次冲突大不相同。它之所以重要有许多原因。它不仅仅是一次地区性战争。它再次表明1840—1841年危机早已清楚显示出来的情况，即近东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已是各大国共同关心的事，而不是某一个过于强大的藩属或俄国可以单独决定的。它显示出新式武器的威力，并且打破了欧洲关系的现存格局。在欧洲大陆新崭露头角的政治家——拿破仑三世、加富尔、戈尔恰科夫、俾斯麦——与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无关，因此对维护这些决定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目的，随时准备从这些决定的失败中捞取好处，或者恨不得看到它们的失败。当此欧洲旧的结盟关系更加不稳定，更加变幻莫测之际，外交家和军人的作用就更加重要。错综复杂的外交折冲，是克里米亚战争过程中及其以后富于戏剧性的年代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军队的改革，以及由于检查军队而引起的议会的抵制，也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30—1854年，联盟一般是防御性的，现在则具有进攻的目的，如1858年拿破仑三世与加富尔之间缔结的著名的普隆比埃密约或1866年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签订的条约。所有这些联盟不久都导致了战争这一“激动人心的戏剧”。陆上战争的手段，这时出现了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巨大变化（第12章）。由于有了铁路，战略调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火力的射程和准确性大大地增加了；征兵制加强了，由于普鲁士陆军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使征兵制获得了新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名望。

具有重要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是，在普鲁士，有关陆军问题的争论占据了威廉一世在位之初的主要年月，并使俾斯麦掌握了权力。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和预示未来的是，拿破仑三世也清楚地看到必须改革他的军队，但未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在短短的16年中，欧洲发生了五次战争，其中四次是大国之间相互征伐，第五次也有大国卷入。其结果是除1830年比利时和小小的希腊王国的出现，以及1846年克拉科夫自由市的消失外，从1815年以来基本上未改变的欧洲地图，现在已大大改观。意大利统一的“奇迹”已经实现，在1830年仍然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方，现在已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成为政治实体，要求跻身于强国之列，即使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第21章）。虽然当时也许不为人所注意，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至关重要的“在德意志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普鲁士取得了胜利，而牺牲了丹麦和奥地利（第19章）。不久，1870年就爆发了普法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是外交史上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之一，在本卷中对之重新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22章）。以前松散的联邦已经由于普鲁士1866年的胜利而遭到破坏的德国，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战败的法国被迫将其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这个新兴的强国。由于英、俄两国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相对来说态度冷淡并无暇他顾——由于这个因素，俾斯麦的成就其实并不像有时看起来那么卓越——而法国这时又由于受到战败的打击而摇摇欲倒，由来已久的均势原则已被抛弃。在德国统一这件事上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新帝国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欧洲大陆上居于霸权地位。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标志着民族主义的胜利（第9章），而它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自由主义。1848—1849年以后出现的大反动时期，自由党人的力量和信仰被削弱了。有些人被监禁或被流放，有些人自愿移居国外，而留下来的人中有许多人深信，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采取别的方法。他们受到“现实政治”的引诱，这个词最初显然是在1853年创造出来的。至少在德国，他们“已对各种原则和理论感到厌烦”，渴望取得权力，而这种权力应体现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原文第504页）。这样，他们最终将会甘心屈从并赞扬一个曾在议会中粗暴对待他们的人，因为这个人通过铁血手段给他们带来了能够用军事胜利取得的权力。

所有这些虽都是老生常谈，但历史学家们在20世纪中叶对之加以重新探讨和重新叙述时，不仅会意识到耐心的研究工作已经修改了它的许多细节，而且可能还会有理由采取不同于他们的先辈在1900年或1910年的看法。通过回忆或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带来的不计其数的、有时是不可言状的恐怖，他们也许会更加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那些造成这样互相厮杀、野心勃勃和惨无人道的结局的各种运动。在思考德国历史时，他们不会不考虑到德国各种思想和哲学学派发展的惊人后果：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西方的主流，而且是与之针锋相对的。他们会想起早在1834年海涅就写道：“事实将证明德国革命丝毫也不是温文尔雅的，因为它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费希特的先验论，甚至是以自然哲学为先导的。这些理论起了发展革命力量的作用，这些革命力量只要时机成熟就会迸发出来，使世界充满恐怖和畏惧。”^[7]他们的确不会不看出在整个19世纪茁壮成长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同样，意大利复兴的过程也许是以不同的前景而出现的，整个说来不那么富于浪漫色彩和英雄气概；考虑到后来法西斯专政的抬头，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既看到加富尔的政治家才能的光辉，又看到议会中左右翼的联盟（connubio）从长远看存在着缺陷，而且一个原来完全靠一个鲁莽从事的人加以巧妙控制的议会也是不健全的。他们也会记得，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和俄国农奴解放带来大量重建问题一样，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奇迹”也产生了一个十分困难和痛苦的调整任务，结果导致了四年内战，伤亡人数超过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次战斗中伤亡人数的总和”（原文第576页）。另一方面，对俄国十二月党人或对哈布斯堡王朝反叛臣民（除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之外）的惩罚，虽然一度受到严厉谴责，但现在比起中欧和东欧某些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轻率地加给人们的惩罚来，实际上也许算是温和的。任何对共产党统治40年后的俄国历史进行研究，大都会强调指出这种一脉相传的因素，指明“沙皇专制制度和反对这种制度的各种运动为革命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提供了大部分模型”（第14章，原文第357页），并在详细论述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同时，指出它是与所谓的传统集体主义共存的。人们也许会对19世纪的旅行家居斯蒂纳和哈克斯陶森的敏锐观察力给予高度评价，因为他们看到“政治权力是与官阶和军阶，而不是与个人的、地方的或世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普遍对西方的自由观念漠不关心……迷恋于俄国的历史地位；民族排外主义意识与一种超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全球使命感结合在一起”，

“一种与老的海上贸易帝国不同的新天命观，使它自信命中注定要在亚洲称霸”（原文第357页）。任何对奥匈帝国垮台后的40年的奥地利史的研究（第20章），在不掩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种种缺陷和错误的同时，都会回顾到在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它在意大利实行了最开明和最昌盛的统治；在紧接着革命以后的几个月，它进行了解放农民这一最复杂的工作，而且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有效；随后，部分是由于解放了农民，尽管未被接纳加入普鲁士的关税联盟，在它的领导下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得到了发展，在此期间的里雅斯特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维也纳则像当时的巴黎一样，开始被新建的一些帝国纪念碑式的巨大建筑装点得熠熠生辉。人们也许还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受到多方面攻击的妥协”，即1867年的奥匈协约，“由于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在中欧的任何解决方案能维持这样长的寿命是引人注目的——而被历史证明它是合理的：因为它满足了最强大的较量者的要求”（原文第534页）。

至于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实际上灭亡20年、第四共和国废除一年后，那里的情况似乎也已改观。七月王朝是勉强维持其存在的，第二共和国则具有不切实际的特点并出现了骚乱，在此以后第二帝国（第17章）尽管在许多方面徒有其表，但却是一个进行了大量而有成果的活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社会不像以前那么僵化，法国经济也比以后的年代灵活。这种灵活性由皇帝本人表现出来。这个遇事总是遮遮掩掩的人，始终让人摸不透；但是，不管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犹豫不决和两面三刀最终招致了多大的灾难，他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赞扬，因为他显然在政治活动方面建立了最艰难的功绩，使独裁统治转变成开明统治。

温和善良的拿破仑三世，在欧洲从1848年到1871年四次大战中，有三次充当了主角。他在墨西哥的冒险事业中，也设法利用了在一个大陆上进行的一次战争的机会，这次战争的起源虽完全不同，但具有巨大的意义。美国南北战争（第24章）就造成的破坏和伤亡的人数来讲，是19世纪中叶所有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次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中的第一次，因为交战双方使用了新的通信工具和新武器，而且它对社会的要求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关于这次同胞之间自相残杀，而且也许并非完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起因，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现

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不看到它不仅对美国的未来，而且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未来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美国继续保持一个国家”而不会分裂成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它使那个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使它走上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所以，它是美国全国统一的主张对地方分裂主义的胜利（第23章）；但它也是美国自由主义和整个自由主义的胜利，这正是它倍加重要之所在。“通过摧毁奴隶制并表明一个深得人心的政府能够在国内冲突中维护自由”，它表明它“在一切地方证明了民主概念的正确，并赋予其以活力”（原文第657页）。“最重要的不在于一个国家总算存在了下来，而在于一个奉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会从地球上消灭这一原则的国家存在了下来。”（原文第629页）

在此以前，毗邻的加拿大也发生了内战，不过其场面与可怕程度要小得多；这次内战的成果也是令人惊叹和出人意料的。英国在1832年和1848年避免了当时人们认为已经成熟的革命，从而使人们感到惊讶；是什么原因使它那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得以在没有大的压力和动乱的情况下取得发展？成为历史学家始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当时人们不太注意但与美国争取民主的胜利同等重要的是那种政治上的明智和观点上的灵活性，它使德拉姆勋爵及其助手们得以提出、并使英国政府采纳了一种发展海外体制的新体系。1839年《德拉姆报告》所鼓励的“在各自治领建立自治政府并产生了英帝国和英联邦新概念的殖民地政策的各种变化”，实际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增长促成的，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及于世界各地，以至它们似乎与普遍的航海自由和贸易自由，以及与全球的进步是协调一致的”（原文第349页）。这些变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广泛传播开来。按照这种新概念的原则，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大陆上的人们都会走上建立有责任的自治政府的道路，而不必割断他们对母国的忠诚和感情联系。到19世纪70年代初，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遵循这一路线。

在这个欧洲势力全盛时期，除“民主”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字眼也必然会被历史学家所经常使用。这些都是应运而生的口号，它们随之带来各种各样最强有力的思想，它们成为当代人的口头禅。但不能让它们掩盖即使欧洲本身狭窄范围内生活和思想的无限丰富多彩。不管人们对以后各时期的看法如何，1830—1870年这一时期绝不是事

事完全一致的。在欧洲文明的总的结构内，有许许多多领域构成了其主要模式或者对之起陪衬作用，这些领域都是并存、混合并交叠在一起的。在社会领域，有老贵族和新贵族，有上流阶层和下层社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不是单一的，中产阶级在财富和地位上已千差万别，并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熟练工人用各种各样的原料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受雇于垄断资本家开办的大工厂，而是受雇于千千万万的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条件各不相同，地区性的传统和准则依然起很大作用；有非熟练工人、粗工和家仆；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免费所有、租赁、分益耕种以及其他各种所有权形式持有土地的农民，有农业工人、农奴和以前的农奴，所有这些人保持着形形色色的习俗，穿着各不相同的服装，说着各式各样的方言。在宗教信仰领域，有新教及其无数的教会和派别，有罗马天主教及其统一的正统结构，有伊斯兰教徒，还有广泛分散居住在从西欧的银行大厦到东欧的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教徒。在文学领域（第7章），不仅有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巨匠，而且有卡莱尔·拉马丁和米什莱那样的罗曼蒂克式的预言家和诗人，有纽曼或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才，以及那些“创造并热情实践”“纯粹的诗”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理论的人。在国家制度领域内，有西欧的海上大国和它们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帝国及其传统遗产；有中欧的日耳曼人以及他们对帝国的怀念、他们的排他主义、他们遭受的挫折，以及现在他们自己特有的世界观；有东南欧的日益衰落和亚洲化的土耳其人；有东欧的“强大而仍然难以理解的”俄国人，他们不知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他们的知识分子，主张西方化的和认为斯拉夫文化优越的人，甚至现在仍就他们在欧洲的地位进行着历史性的争论，即究竟他们属于欧洲呢，抑或有别于欧洲，完全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化和使命的民族；最后，在所有上述领域中，有“历史形成的”和“非历史形成的”被奴役民族，有“受苦难的国家”波兰，它那充满动乱的历史与欧洲的主流完全相反，1831年和1863年它无畏地试图恢复独立，但又一次难逃失败的命运。还有许多被遗忘的民族，从西欧的普罗旺斯人到东欧的爱沙尼亚人；在这个人们关心历史的时代，学者们和诗人们开始重新发掘他们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最后，在每个国家内部，许多地方的人们仍然固执地墨守着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在这些地方，地理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历史和种族的怀念可追溯到很远很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历史学家们设法重新

发掘和重新解释人类在国家范围内行动的动机，说明为什么人们在选举中这样投票而不是那样投票，为什么经济变革在这个地方受到欢迎而在那个地区受到阻挠，所以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地区之间的差异和根深蒂固的地方的甚至家族的传统和忠诚。审视这个更加瞬息万变的历史舞台的无限错综复杂，考虑19世纪中叶人们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各民族无限充沛的精力激励下，为改造自己的世界或使之免于动荡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读者能不为他们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和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弥足重要的时代中上演的一幕幕喜剧和悲剧所感动吗？

（罗式刚、郭健 译）

[1] 《英格兰和爱尔兰游记》（乔治·劳伦斯和K. P. 迈耶译，J. P. 迈耶编，伦敦，1958年），第67页。

[2] 引自斯坦利·梅隆《历史的政治作用》（斯坦福，1958年），第10—11页。

[3] 《文集》，第4卷，第84—85页，引自G. M. 特里维廉《卡莱尔选集》（伦敦，1953年）。

[4]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书信集》（亚历山大·德鲁翻译并编辑，伦敦，1955年），第143页（1870年7月20日）。

[5] A. 库尔诺：《论思想之发展……》（F. 芒特雷编，巴黎，1934年），第2卷，第234—235页。

[6] 《奥迪隆·巴罗死后发表的回忆录》（巴黎，1875年），第2卷，第83页（引自L. B. 纳米尔：《知识界的革命》，第4页。我对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译文作了修正）。

[7]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文集》，汉堡，1876年，第5卷，第264—265页），引自R. d' O. 巴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1783—1933年》（伦敦，1941年），第286页。

第二章 经济的变化与增长

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到1830年也尚未全部完成；农业和运输的革命同样也未完成。商品的增长、制造和运送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堪称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法国人所作的变革更是如此。资本积累、劳动大军的组合与管理，日益增加的产品的销售，银行与商业活动，以及在20年代中期发生的繁荣和萧条所暴露出来的诸如商业周期现象如何应付等问题，都要求在组织、方法、自愿结合和国家政策方面作出变革。因此，如果在适当的地方，特别是在英国进行观察，未来的经济形式就显然可见了。然而，即使在英国，一切都尚未完结；就全局来说，其余部分则呈现出一派运动缓慢，甚至静止的景象。

除铁路外，1830年并不是重大的分水岭。在随后的40年间，业已发展的方法和组织，由于重大的革新而得到改善、补充和替换，在西欧和北美更加广泛推广。在最初20年，扩展和变化的速度有时过于迅速，无法长期维持，结果引起深刻而持久的萧条，给那些在这一过渡时期技术上落后过时的人们带来灾难。然而，在1850年以后，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形势经过1848年的骚乱已经缓和下来，同时新的体制或经过改造的体制运转较顺利，自然资源和新技术开拓了广泛的新领域。到1870年，欧洲人口比1830年增加30%；北美人口则增加了两倍；能够从生产、运输和贸易的改革中获利的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

到1830年，欧洲最大的一种行业——农业正在摆脱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痛苦时期的最恶劣影响。价格有所回升，成本则由于租金和利率降低而稍有下降；难于耕作或产量过低的土地改为牧场或成为荒地。通过考察三个方面，或许可以最好地说明。随后40年的复杂情况这三个方面是：农业的日益商业化、方法的改善和对资本的更加依赖。

市场的吸引力变得更强大了，这是由于在40年间消费者的数目在英国差不多增加了1/3，东西欧（不包括法国）大概增加了1/4；而其中城镇居民所占的百分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46%增到55%（以拥有2000居民作为城镇与乡村的分界线），在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奥

地利、瑞典和瑞士则增加到30%或者更多；而且由于运输设施的改善，再加上降低或者取消关税，就使农场主更便于与国内或国外市场进行交易。直到1850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欧洲的农场主几乎独享欧洲市场，从其他各洲进口的商品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作为补充。通常他们不仅是被吸引到市场去，他们是由于需要而被推到那里去：他们需要获得金钱去纳税，或者在实行租佃制的地方（例如在不列颠各岛）去交租，或者为了把自己的农奴身份改变为获得解放的有地农民（例如在丹麦、德国西南部以及1861年以后的俄国）而按年缴纳赎金。

农产品的供应增加了，因而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俄国南部的平原上扩大了移民和垦殖；在欧洲大陆西部的许多地方，广袤的荒地变成了沃土；但主要则是因为已经充分利用的农场提高了生产率。在上述后两项发展中，英国的地主和富有事业心的农场主起了积极的作用。前者拿出大量的钱来改善庄园或者经营模范农场。他们通过皇家农业协会（成立于1838年）和所属的各郡的协会的会议或刊物或者其他报道“科学与实践”相结合取得进展的出版物来交换情报。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主，以及丹麦、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大地主，是值得注意的改革家。这些人在原来是或者类似庄园领地的土地上，生产谷物、牲畜和细羊毛等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战后的萧条使他们受到沉重打击，使4/5的普鲁士容克地主至少失去了他们的一部分地产；但是，当萧条过去之后，他们又重新研究和仿效英国的改进办法，而且他们有时不是追随者而是先驱。

对农民，不能期望他们作出什么改革，他们仅仅是缓慢地模仿。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太分散，无法实行机械耕种。他们的收入中剩不下什么钱来用作资本积累，即使能有节余也储藏起来或用以添购土地，而不是改良原有土地。由于重利盘剥，农民极不愿意借款，这种情况直到1862年才找到一条出路，当时赖菲森在莱茵州一个村庄首先创建了一家合作银行。由于具有明显的好处而且所费不多，小人物就可能在他们所从事的小规模耕作或牲畜饲养以及家庭农场劳力不付工资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方式。这种变化可能比书面记载的数字为多，然而，只是在较大的农场才采取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步骤来改善农业的方法。

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英国完成、在德国大大扩展的霸占无主耕地、公共牧场和荒地的圈地运动。在1830年以前，英国值得圈占的多数土地已经处理完毕，到1870年，重绘农村地图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当时有25万个人口集中的农场，其中有9/10的人口是佃农，有一半以上规模较大，共雇佣劳力达100万人，每个农场平均雇佣7人。在普鲁士，1821—1870年，将近4000万英亩土地被从公用土地中“分离”、合并和抽出，其中多数位于存在着大庄园的东部地区。

第二个步骤就是增加和保持土地的肥力，采用深沟排灌的有效新方法，并根据对肥料作用更清楚的认识来施肥。排水把旧农场和荒地一样都排干。在旧农场早春排干积水，立即可以翻耕、下种，肥料不致被冲走。至于荒地，林肯郡和东英吉利亚的沼泽，兰开夏南部和苏格兰的泥沼地，荷兰北部或德国沿海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泥炭沼泽地和低温地带，一旦有了排水设施，整片地区就不再荒芜无用了。在荒地上进行深耕、大量施肥、种植庄稼，这种“第二次创造土地”，成本固然很高，但是丰收的谷物、块根和牧草证明投资是合算的，而特别是位于兰开夏、苏格兰南部或伦敦等人口稠密地区附近的土地就更是合算。

在这种开辟新耕地和改善原有耕地的活动中，施肥成了应用科学的具体运用（见原文第3章第65页）。甚至在李比希1840年出版他的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和植物生理学中的应用》之前，有些农场主已在施用骨粉、秘鲁海鸟粪、智利硝石或者“新改良的人工肥料”了。李比希的动植物体内化学成分表，亦即土壤基本成分表，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而且如罗萨姆斯特德实验站的劳斯和吉尔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通过实验室或试验田所做的实验表明的那样，它也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它却推动人们采用化学肥料和大力寻求供应来源。硝石和鸟粪的进口激增，同时在哈尔茨山脉（1852年）、阿尔萨斯和欧洲其他地方发现了钾盐矿藏，使许多地区，特别是德国的贫瘠土地肥沃起来。

科学在解决农药方面则并未如此成功。农场主在1870年时对于羊的烂脚病、口蹄疫、猪瘟和其他牲畜传染病仍然束手无策。在19世纪30年代和随后的一段时间，苍蝇使萝卜收成全部毁掉；40年代马铃薯枯萎病到处发生，爱尔兰则更为严重；50年代粉孢子使法国葡萄酒产量减少了2/3；60年代木虱开始猖獗。在达瓦纳、巴斯德、利斯特和科

赫创建细菌学说之前，兽医学并未取得切实进展，直到1870年以后，才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实际效益（见原文第3章第65—66页）。对植物病害原因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

第三个步骤，改善农业设备，主要在英国和北美推行，那些地方劳动力相当短缺或者昂贵，土地广阔可用机器耕作，而且工业方面的发明创造精神也传到了农业方面。苏格兰热心农业的人士在宴会上为纪念“伟大哲学家和超凡出众的詹姆斯·瓦特”而干杯。其中有些人使用蒸汽机拉犁。苏格兰的打谷机向南传播，在1830年英国农业劳动者暴动中成了破坏的目标。苏格兰的收割机虽然在国内不受欢迎，但运到美国的4台样机却得到了美国人的青睐，他们当时正在寻求较好的工具取代镰刀、长柄大镰刀或带摇篮架的大镰刀。麦考密克在1834年为自己的收割机取得专利权，1846年开始大量生产，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展出，而且通过在农田上的表演使英国农场主相信使用这种机器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随后20年间，欧洲和美洲的农具制造商提供了经过改进的工具和机器，用于每一种农活。

这种种改进多数都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金或流动资金。例如，英国的排灌计划每英亩平均费用为4英镑；把荒地完全变为肥沃的农场所费为此数的3倍；估计1850年承租土地的农场主每英亩流动资金需要4—8英镑。这笔资金来自何处，有多少是来自地主和农场主的钱包，或者是由他们的收入中拨作再投资之用，有多少是来自借贷，现在已无法估计。排灌计划可以从政府或从经营这项事业的公司取得长期贷款作为资金；但是一般说来，当时没有出现任何英国机构专门提供农业贷款；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的土地信贷银行继续向那些借贷人合作团体的地主成员提供抵押贷款。他们出售债券以取得经费，这种债券由于有全体社员的全部财产作为后盾，得以享有头等证券的低利率。在1830年以后，其他中欧国家也仿效这种办法，而在法国则加以发展，在1852年创立了受国家资助的合股组织土地信贷银行。但是对于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资助。

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改善和关税壁垒的降低，农场主的市场扩大了，从一张早期的铁路货车图（1833年）上可以看出车上装满了牛、羊和猪。到1840年几乎每天都有80艘轮船川流不息地把爱尔兰的牲畜、肉类、禽蛋运往英国各港口。比利时的农场主紧跟英国的农场主之后，也得到良好的铁路运输，而法国的农场主则不得不耐心等待，

在有些地区差不多直等到1870年。只有在运送牛奶供应远地顾客方面，农场主做得较慢。铁路方面认为长途运输牛奶太麻烦，不值得注意，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大约1870年。同时，在德国成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关税改革的效果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英国，1842年、1846年、1853年和1860年的关税修正案先是废除了对外国畜产品的禁令，后来又取消了对它的关税，这种效果也显而易见。1870年这类食品每人平均进口量大约为1840年的4倍。早期供应大都来自欧洲大陆，美国到1842年才打入市场，随后不断扩大输出数量，消除了早期质量上的缺点，到1870年就在英国的咸肉、火腿和奶酪进口贸易中占了统治地位。

畜牧业的显著扩大并未减少欧洲对制造面包和啤酒所需的谷物的依赖。例如，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都用了1/3以上的耕地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每个国家都力图自给自足，或者采取措施以保证进口不会过分压低国内价格。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谷物法都具有共同的模式：关税都可作相应的增减。国内价格上涨时，关税就降低，降低到虚有其名的数目，而当有灾荒之虞时就甚至取消关税。反之，价格下跌时就增加关税，早在谷价达到无利可图的水平之前就把关税增到接近禁止进口的程度。

因此，国际谷物贸易主要是用于供应某些国家正常的短缺以及其他国家偶见的奇缺。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是净输入国，丹麦和普鲁士通常是净输出国，而法国则根据收成的多少时而为输入国，时而为输出国。在英国，由于耕作改良，在1833—1836年气候条件有利时，事实上达到自给自足，价格平稳，而在1838—1842年那些歉收年份，面包缺乏，在1845—1847年时，连马铃薯也缺乏。在“饥饿的40年代”，国内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太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在1842年实行了皮尔所提出的更加自由的浮动关税制，在1846年他又废除了谷物法（见原文第13章第342—344页）。

当英国农场主维护他们的成本和谷物法时，他们质问自由贸易派是否希望把成本压低到“相当于调整付给德国农民、波兰农奴和俄国奴隶的工资的标准”。^[1]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谷物多半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工人生产的，易北河盆地农场的产品以汉堡为主要出口港，维斯杜拉河流域的大量收成以但泽为主要出口港，而南俄农作地带迅速增长的小麦、羊毛、皮革和咸牛肉，则以敖德萨为主要出口港，以塔甘

罗格为辅。到1840年，黑海沿岸各港口输出的谷物几乎和但泽相等，主要是卖给地中海沿岸的消费者。在随后30年间，俄国的总出口增加了2倍以上，在欧洲内部贸易中已稳执牛耳。

所有关于谷物法的讨论，都道出了人们对从北美源源而来的廉价谷物的希望或恐惧。当饥荒到来，物价涨到很高的程度，足以补偿昂贵的陆上和海上运费以及低关税时，北美大陆就来援助欧洲；但是，每当较好的收成使价格降低、关税提高时，进口浪潮很快又都平静下来。1846年废除了关税，但直到1870年一直都未能对这种剧烈的波动产生什么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浪潮越来越高，而下降则是逐步的，不过，也还是落到和以前一样低的程度。美国小麦尚未达到总是那么丰富和低廉。诚然，当时也有种种力量在争取做到这两点，但是，尚未完全具备必需的条件：既能在廉价或免费的处女地上生产出大量产品，同时又只付出低廉的内陆和海上运费。

因此，西欧农场主虽然付出了高额的经营管理费用，仍然能够从1850年至1873年席卷农村的高价格和繁荣的浪潮中获得好处。尽管谷物价格远不如畜产品价格涨得高，但是每英亩平均产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仍然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纯收入。肉类和奶制品的价格上涨了1/4到1/2；尽管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南美的羊毛供应增加了5倍，羊毛价格还是上涨了大约3/4。在1870年，欧洲农场主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必害怕来自其他大陆的破坏性竞争。他们在食糖市场上倒成了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甜菜糖生产的扩大使世界甘蔗糖产区受到了严重挑战。1850年，甜菜种植和榨糖从法国北部扩展到俄国，可能使甜菜糖产量达到世界食糖总产量的1/7。到1870年，甜菜糖产量增加了3倍，所占比例达到总产量的1/3，这两个数字都在迅速增加。食糖价格略有下跌，而其他价格则看涨。除了非常贫穷的人以外，食糖成为大家的必需品，英国每人食糖平均消费量在30年间增加了2倍，几乎达到每星期一磅。

“到19世纪20年代，棉纺业是真正深刻地受到工业革命损害的唯一工业。”^[2]在随后的40年间，影响变得更为深广，因为西欧和北美有更多工业由于采用或改进机器、利用水力或蒸汽、提高冶炼金属的能力、使用煤炭和应用物理或化学而受到影响。在生产资本货物的重工业——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中的新发展比在那些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中的新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然而，纺织工业却仍然占有

重要地位，因为人们大量需要它的产品，而且生产这种产品雇用了大量人力。因此纺织厂无论在何处都成了新的工业化的首要证据。

通常在一个棉纺厂里安装着靳尼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或走锭精纺机，这些机器在183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革新了纺纱方法，此后，走锭精纺机变成了自动的，纱锭转得更快，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几乎增加了2倍，而每磅纱的劳动成本却至少减了一半。1825年发明的亚麻湿纺法很快就为贝尔法斯特的亚麻布制造商所采用；梳羊毛在50年代已不再用人力操作；到1860年废蚕丝能够纺成好丝了。同时，动力织布机逐渐取代了手工织布机。动力织布机在1830年只有在织粗棉布时才是有效而经济的。到1850年它就可以织出细得多的纺织品，并且强有力地进入了毛纺厂，不过在70年代以前还不能完全占领高级毛织品的生产。

在1824年取消关于技术工人向外移民的禁令和1843年取消出口机器的禁令之前，英国的技术就扩散了。到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有些纺纱厂已经有了很好的设备，在阿尔萨斯和诺曼底已使用水力，在生产煤炭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使用小型发动机。欧洲大陆纺织地区中最先进的地方阿尔萨斯，动力织布机到1860年已把手工织布机差不多完全排挤出去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瑞士、德国和俄国，也同样采用了纺纱机，并且进口廉价的英国棉纱，一直到当地有了足够的产品为止。美国实行保护关税，把廉价纺织品拒之门外，它的棉纺工业在1830—1860年增加了4倍。它在1860年把全国棉花产量的大约1/5织成了较粗的和中等质量的布匹。

各地棉纺工业的增长速度和技术改革的速度都格外之快，而且由于美国棉花产量由1830年的100万包增加到1860年的将近500万包，加上印度和埃及也已成为较小的棉花出口国，因而廉价原料供应增加的速度也特别快。其他纺织品都感受到廉价棉织品的激烈竞争，但是毛织品制造商反击得很巧妙。他们把棉纱作经线，用精梳羊毛纺成“混纺品”，质地轻而花色新鲜，价格接近上等棉织品，而外观却像丝织品。

对其他工业的变化作一番综述可以列出一长串目录。如果说革新表现在机械方面，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缺乏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劳动力，也由于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的需求。革新有时是一台别出心裁的机器，或者是一整套机器，都是为了能制造诸如左轮枪、钟、锁、收

割机、缝纫机、门框或窗架上的标准零件。英国的观察家在1853—1854年指出：美国人“在任何地方只要能使用机器就热衷于用机器”；在某些工业中盛行的办法是开工厂，而在英国，这些工业则仍然主要由厂外工人或手工业工人进行工作，用“专用机器”制造木制的或金属的零件。^[3]当时德国、法国和瑞士则致力于化学工业。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的英国裁判对这种情况像对外国机器和毛织品的“精彩展出”一样获得深刻印象和感到震惊。

机器使用者的后盾是制造机器的人。到了19世纪30年代，机械工程师已能制造重型和轻型工作母机，这些机器使金属加工达到了更高的速度和精密度。伦敦和伯明翰制造品种繁多的机器，曼彻斯特是纺织设备的主要产地，纽卡斯尔是蒸汽机车的主要产地，格拉斯哥则是航海机械的主要产地。在比利时，位于塞兰的科克里尔工厂是一个联合企业，包括煤矿、鼓风炉、轧钢厂以及生产发动机和多种设备的车间。法国的勒克勒索仅次于塞兰，但是德国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甚至还没有堪称第三流的塞兰。1850年以后，由于各种润滑剂的供应日益增加，加上更好的保证精密度的方法，而且又受到美国崇尚标准化的影响，工业大踏步前进。

作为机器制造后盾的是炼铁厂。下列表格，其中前两行虽是根据估计制成，仍可粗略看出它们取得的成就。

1830—1870年铁产量

单位：吨

	联合王国	法 国	德 国	美 国	全世界
1830 年	680000	270000	46000	180000	1600000
1850 年	2250000	400000	215000	560000	4470000
1870 年	5960000	1180000	1400000	1690000	12260000

上述产量每10年约增加70%，反映出法国人称之为“英国模式”所带来的改进和传播的结果。这种模式包括采用焦炭代替木炭熔炼矿石，以生产适于铸造的脆性铁；然后搅炼液态铸铁使之成为韧性较强能够弯曲而不致折断的熟铁。英国工业有了这种技术装备，1800—1830年产量增加了3倍，它的产品成为欧洲最廉价的产品。克莱德赛德炼铁工人尼尔森在1828年发明用热风而不用冷风吹入炼铁炉，使燃料开支降

低了1/3。采用这项节约措施，再加上使用更大的炼铁炉，以及在坎伯兰和在米德尔斯布勒周围勘探出铁矿，使得铁产量在1830—1870年增加了8倍。虽然铁价随商业的起伏以及战争和铁路的需求而有涨落，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由1825年的每吨10英镑下降到1866年的每吨3英镑。

这些方法传到欧洲大陆后，在那些可以同时廉价取得煤和矿石的地方十分有用，例如在塞兰和勒克勒索。在法国有许多地区，矿石和煤的产地相距很远，而且远离市场，这项工业的发展只好等待运费较低的交通工具出现。1850年前后，这些条件实现了，于是法国的产量在20年间增加了2倍，然而依然不能满足全部需求。同样，在这20年间，德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迎头赶上，这是由于从鲁尔的一些新矿可以得到大量廉价煤炭以及铁路需要用铁。美国改用焦炭，因而能在1830—1850年把铁的产量增加2倍，随后到1870年又增加了2倍。

在那些年代的后期，突然出现了光明的前景，能廉价取得大量的钢。在1850年，钢几乎还是一种半贵重金属。钢的生产燃料消耗量极大，过程缓慢，规模很小；因此钢仅用于制造刀剑、工具、珠宝饰物和其他小件物品。当时全世界产量估计为8万吨，其中一半产在英国。贝西默转炉炼钢法（1856年）提供了大量廉价生产的方法。把空气吹送到装有液态铁的转炉中，一吨（或者更多）铁可以在一刻钟内变成钢，而不必使用任何燃料。炼铁厂商积极采用了这一方法，然而发现含有微量磷的铁无法进行这种处理，而且直到1878年，为消除这种不利元素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不过，由于有足够的可用贝氏法炼钢的矿石，使钢产量在60年代得以迅速增长。1870年的产量至少为1850年估计产量的8倍；而制造商把这种新的金属投入各种各样的用途，从铁路和轮船到牛奶桶和平底锅，这时钢铁时代就隐约出现了。

1830年世界煤炭产量大概有3000万吨，其中4/5产自英国煤矿。1870年煤产数字为2.2亿吨，其中英国占一半，美国占1/5，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共占1/4。煤产量增加6倍，这和铁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即每10年增加60%—70%。到1870年，销售市场的格局也已清楚。炼铁厂商用去英国产量的1/3，制造商用去1/4。煤气工厂和家用火炉烧掉另外1/4，出口1/8，1/20则用作铁路和轮船的燃料。独有英国采煤业拥有5个沿海煤田，能够几乎直接把产品装船，运往伦敦等处的国内市场，或者作为压舱物和补充装载量出口。因此，出口量由1830年的50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将近1400万吨。

开采内陆煤层要依靠廉价的水运，后来又靠铁路，来把煤运到市场或者是把原料运送到最适宜于设在煤矿附近的各种工业。1830年英国和比利时拥有最良好的水路，到1850年则拥有最良好的铁路。法国在提供水运和铁路运输方面有较多困难，因此法国在1870年的消费量中有1/3还是外国煤炭，对买主来说外国煤炭价格仍然比较便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田，直到一些“煤炭和航运公司”在1830年前后建成连接沿海城市的运河以前，一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在俄亥俄河各支流两岸的高坡上，烟煤矿脉露头了，不仅容易开采，而且可以装船顺流而下，直达密西西比河流域日益扩大的市场，或者和当地产的矿石和石灰石一道用于在匹兹堡地区炼铁。

在一些老矿区如比利时和英格兰东北部，有了易于接近的市场，因而煤矿激增。有些地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和顿涅茨盆地还发现了新的煤矿床。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采用了一种通过透水地层开掘竖井的方法，得以探出深得多的矿脉。在英国、在法国的诺尔省和加来海峡、在比利时和鲁尔地区，这种探矿法获得成功；在鲁尔地区，1841年在埃森附近开掘了第一口矿井。采矿工程师虽然没有做多少工作来把采煤从一镐一锹的办法变成机械操作，他们却要解决大量其他的问题：如何使井下不受到水淹、窒息、爆炸和塌顶的威胁，如何采出较大部分的煤炭，以及如何改进把煤炭运上地面的办法。

他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得这项工业相对说来产量增加而危险减少，因为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英国伤亡人数保持稳定，而产量增加了4/5，矿工人数增加了3/5，但是资本和经营成本却随着矿井加深而增高，与此同时，在繁荣时代需求也迅速增长。结果在1850—1875年这25年间，煤价比一般物价水平涨得多，而在1869—1873年的繁荣引起煤荒期间，煤价涨了一倍多。在那些年头，煤炭生产能力急剧扩大，正如在炼铁和其他重工业部门一样。到新矿可以开采时，繁荣却已消失，煤炭工业苦于生产能力过剩而面临严重的萧条。

到1830年，西方世界懂得了改良道路、河道、运河和内河轮船的好处，以及它们高昂的费用。在英国的主要大道上，当时多数都铺上了碎石路面，旅客、邮件和包裹运行的速度几乎达到每小时10英里。虽然马车仍然只能以马走的速度前进，但是除了在地方上的低级道路

上以外，行进总是轻快了一些。法国、萨克森、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北部，除了低劣的二等和三等道路外，也有了良好的主要大道。

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没有多少地方是远离运河或通航河道的，重型物资的运费降低了一半，运输量大大增加，各地区之间的价格趋向平衡。法国力图完成北部的河道网以及中部用于沟通主要河流的支流和上游的各种连接工程，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地形困难、河道欠佳、成本高昂和资金缺乏，只取得缓慢的进展和差强人意的结果。在北美，伊利运河于1825年完成，规模较小的加拿大各运河环绕圣劳伦斯急流，穿越尼亚加拉半岛，这些运河提供了由大西洋到达大湖区的连续在一起的通道。

最后，轮船显示出了它的能力，可以在湖上行驶，在河上运送乘客、邮件和精细的货物，甚至还可逆流而上，因此轮船使莱茵河、易北河、维斯杜拉河和多瑙河中游有了新的价值，然而，它为蜂拥到达长达1.6万英里的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广大地区的移民提供的服务，却是最有前途的。

在随后二三十年中，继续修筑道路、疏通河道。德国工程人员延伸了河流通航距离，因而到1840年轮船可以从鹿特丹通航到巴塞尔；采用蒸汽拖船拖带重载驳船；用运河沟通各条河流，从而使贯通南北的天然航道又辅之以连接东西的通道。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着手疏浚多瑙河，改善河口，调整交通。法国的河道受到较多注意，不过许多工作却到1871年才完成。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汽轮从1830年的200艘增加到1860年的一千多艘，因而加强了南北的货物交流。

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通车，机车在铁轨上行驶，其结果在某些方面是出人意料的，但在许多方面是令人鼓舞的。客运异常繁忙，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使人几乎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煤炭和其他货物在3小时之内就可从起点站运到终点站，而走水路则需要36个小时。尽管资金付出很大，超过80万英镑，而且早期的机车消耗磨损很严重，但仍然可以稳定地产生8%—10%的盈利。

以此为先导，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竞相仿效，事实上在1835—1837年的铁路小繁荣和1845—1847年的大繁荣期间出现了过多现象。在40年间铁路营业里程增长情况如下表：

1830—1870年铁路营业增长表

单位：英里

	1830 年	1840 年	1850 年	1870 年
欧 洲	60	1800	14000	65000
北美洲	—	2800	9000	56000
亚 洲	—	—	200	5100
南美洲	—	—	—	1800
非 洲	—	—	—	1100
澳 洲	—	—	—	1000
全世界总计	60	4600	23200	130000

英国到1850年已经拥有若干主要铁路线和次要铁路线。比利时在1844年完成了铁路计划的核心部分，一条铁路从奥斯坦德通到普鲁士边界，另一条从安特卫普通到法国边境，中途在马利纳与前一条铁路相交。法国1842年通过的基本法批准兴建9条干线，到1850年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建成。在德意志各邦有5000英里左右的铁路线在营业。在美国，30年代中期的繁荣时期里铁路把某些沿海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还向内路稍有延伸，随后分担了“内陆交通改善”计划普遍失败的后果。由于国家在40年代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修复它遭到损害的信誉，铁路修建大致限于新英格兰。

在那20年间，铁路表明了它作为普通运载工具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同时也显出了必须加以正视的关于修建、经营和成本等问题。客运立即大受欢迎，以至英国铁路线2/3的收入来自客运。这种营业情况使它们不得不提高速度，到1850年最好的火车达到时速35英里至40英里；扩大并改进最低廉的车厢；研制更有效的车闸、信号等安全装置；建设车站，其中有些是“造价高昂的装饰性建筑”；开设茶点部，在那些熟悉车马店的人看来，真是“宏伟的大厅，陈设豪华、温暖而敞亮”。到1850年铁路票价不及马车以前所收票价的2/5，而旅途所需时间则减少了2/3。同时，火车发展了迅速运送邮件、包裹、牲畜和鱼类等业务，而且运送重型物资，运费之低不仅使马车陷于破产，并且堪与水路竞争。

到1850年，铁路界已经探索过各种方式来修建和经营铁路线：私营、公营、公私合营。英国的办法是私营企业，一是因为这种办法是

资助革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二是因为：尽管在几次繁荣时期有过投机过多的情况，早期建立的各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是吸引了足够的投资，保证资金可以源源来到。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几乎不适于实行私人经营。也许是因为距离太长，运输量太少，资金太缺。战略道路可能与贸易通道无法吻合，而在新大陆，铁路建设也许不得不先于移民定居，于是要等很长一段时期交通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必须决定：是否自己来修建铁路并经营管理，借钱修路并且用公共税收来弥补赤字，或者津贴私人企业，或者两者并举。

比利时在1834年采用了公有制，奥地利随后不久也采取同样办法。法国在1842年决定实行合营制。国家提供土地，准备路基，把它租给公司三四十年。公司筹措修建和经营资金，经营业务，收入不足以支付债券利息则向政府借款，租约期满后以合理估价将铁路线转让给国家。北美试行过各种政策。有几个州，主要是南方几个州，自己修建并经营铁路。弗吉尼亚州提供2/5的资金，后来又增到3/5，并且在董事会占有同样比例的席位。但是更为普遍的办法是购买州、市或者甚至县发行的铁路证券。例如马萨诸塞州投资500万美元修建一条铁路，连接波士顿和奥尔巴尼以及以西的一些地方。后来在1850年，国会第一次通过铁路授地法，从而为以后用公地给予大量津贴打开了道路。

在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和北美加速铁路建设，并扩展到其他各洲。在联合王国，铁路资金、里程和纯收入都增加了一倍多。法国在1859年完成了几条干线后，又计划修建支线网。德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两倍，奥匈帝国的里程也有所增长。意大利、荷兰、瑞士、西班牙和俄国也参加了这个行列。这一发展，部分是受到一家法国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的推动，该行于1852年创立，筹集资金在国内外开办铁路、银行和其他耗资巨大的事业。该行从那些希望修建铁路但苦于缺乏经费的政府取得特许权，其中包括独家经营以及收入不足时得到津贴的权利。该行在法国和奥地利早期的成就促使路特希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建立工商信贷银行（参见原文第20章第535页），其他一些竞争者也跨入了这个显然有利可图的领域。

在美国，铁路越过了密西西比河，并在1869年建成横贯大陆的一条线路。于是东部和西部可以进行贸易交流。加拿大建成了它自己的大干线，从魁北克东部到安大略西部，并且把蒙特利尔和缅因州的不

冻港波特兰连接了起来。澳大利亚在19世纪60年代建成了最先的1000英里铁路，主要是从各州首府通往牧场或产粮区的铁路。在亚洲，印度首先修建了铁路，直到1870年几乎还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全世界已经建成它最终将拥有的铁路的1/6。这1/6是最重要的1/6，因为它改变了旧世界人口稠密地区的交通体系，表明了铁路能使大陆上广大的内陆地区得到多大的好处。它加强了旧有的贸易路线，同时又打开了新的路线，把一向没有联系的地区连成更大的市场区，它强调应把工业集中于有利地点，推动了从铁路中枢——不管是像伦敦这样古老的中心还是像芝加哥这样一些新的中心——向外作长距离的运送。铁路建造对资金市场以及商业周期的运动起了主要影响。铁路在私人手中发展了当时还“不完善”的垄断或竞争的特征。当时铁路的一些做法在萧条时期引起了极大的喧嚷，反对似乎过高的费用，对顾客的歧视性待遇，不安全或不能令人满意的服务，以致必然要求由国家管理。在公共手中，铁路规划和营业则受到战略考虑，国家发展和福利的概念，派系或阶级利益的压力，新兴国家的乐观主义和债券购买人的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它也使得国家债台高筑。

1830年，汽轮已定期航行于河上、湖上或沿海航线上，或者越过海峡和窄海。造船厂在建造更大的船只，并改进航海引擎，以便增加航行的速度和可靠性，降低经营成本，减少船身中动力和燃料部分所占的比例，增加乘客和载货部分的比例。19世纪中叶，轮船从短途航线上排挤帆船，特别是在运送旅客、牲畜和其他一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方面。到1870年，轮船也包揽了笨重货物的短途运输。

在长途海洋航线上，轮船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它必须和帆船一样安全——标准并不很高；携带足够的燃料；具有足够的用以赚钱的空间来偿付高昂的造价和用高价“买来的动力”；而且要在面临英国和美国日益改进和扩大商业帆船队的时候做到这一切。

美国帆船队特别强大。由于获得大量廉价木材的供应，美国船的造价远远低于英国船的造价。美国船队拥有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船只。定期邮船全年都保持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载运客轮乘客每人“30个金币，酒费在内”；精细的货物两英镑一吨；还载运邮件、金条银条，但几乎不载统舱乘客。其次是“定期商船”，往返航行载运一般货物，向西航行时常常挤满移民；船头垂直、甲板平直的巨大货船，专门设计用以运载棉花；还有成百艘不定期货船，随时可开往任何地

方。1845年又增添了快速帆船，流线型、速度高，哪里需要快速运输就欢迎它到哪里去。1849年去运输加利福尼亚的黄金；1851年去运输澳大利亚的黄金；后来在战争年代又到克里米亚。它是美国木帆船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产品，从1830年至1860年总吨数增加了三倍。

它也是最后的产品，因为黄金时代正在结束。廉价木材的有利条件随着沿海森林伐尽而消失；某些劳工、经营和管理费用上涨了；几乎没有几艘快速帆船能赚钱。与此同时，魁北克和加拿大沿海各省也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廉价木材来制造可用的船只。欧洲的造船厂改进了设计，其中有些厂采用廉价的铁作船体的骨架，后来又用来作船壳。最后，轮船冲破了它原来较短的航行范围。到了1838年，问题已经不再是轮船能否一跃横渡北大西洋，而是哪些船将首航成功了。4月23日，“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航抵纽约；到年底就有10艘船到达纽约；而且全部都只用了最好的定期邮轮所花时间的一半左右。

然而，这些航行也还仅仅是刚开了个头。因为至少有10年时间，汽轮的安全记录是很差的。船员人数很多，赚钱的空间很小。它的造价可能相当于三条或四条大型邮船，然而它完成的业务——如果万事顺利，往返横渡大西洋六次——却只等于两条邮船。结果，即使只维持两周通航一次的航班，也至少需要四条船。丘纳德轮船公司只是由于得到大量邮件津贴，才得以在1840年开辟了一条利物浦、哈利法克斯和波士顿之间的航线。在它于1848年开辟从利物浦到纽约的第二条航线之前，仍然只有定期邮船按时驶往该港。在1856年乘汽轮到达该地的乘客还不到乘客总数的4%。

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汽轮才较为安全、有效而经济。由于铁制船体受到普遍欢迎，才可能建造更大的船只。起初以螺旋推进器辅助明轮推进器，后来又用它取代了明轮推进器。复式蒸汽机把煤耗减少了一半，因而增加了装货的空间，使得远洋货运汽轮有可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同时，客轮在大小以及马力、速度、装货能力、客轮和统舱设备等各方面都得到改进。因此到1870年木帆船已丧失了在大西洋交通中的有利地位，而且除了澳大利亚航线以外，在所有其他海运航线上都在失去地盘。它在长距离运输粗重货物方面仍然居统治地位，由于这类货物的运输量很大，因此直到1880年前后，全世界木帆船运输吨数并未开始下降。

交通运输方面的种种进展使邮政递送更趋迅速，同时政府的行动又使邮费降低。英国在1840年实行的改革为全世界作出了范例：在全国各地投送邮件统一收费，费用低廉，通过购买邮票由寄件人付款而不再由收件人付款。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多数国家都接踵仿效，随后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终于成立了国际邮政联盟（1874年）。与此同时，以英国和北美的一些铁路和电报公司在40年代的工作为滥觞，国内和国际电报业务发展起来。1851年从多佛铺设到加来的海底电缆提供了连接大陆的第一条电线，私营或国营的电报业务在大陆上迅速扩展，达到莫斯科和地中海。1861年架起一条横贯北美的电缆。海底电缆于1866年接通纽约，1870年接通加尔各答，1871年接通澳大利亚。

电信交通改善的经济后果是深远的。联合王国信件投递数字在开头有了巨大增长，以后逐年递增5%。在远地从事商业者，以往由于长期等待信件迟迟不能作出决定，铁路和轮船的兴起把等待时间缩短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而一旦有了电报，则几乎不必等待了。轮船班期、需求、供应、价格和前景几乎瞬息可知。多佛—加来海底电缆可使伦敦和巴黎股票交易所每小时都能对比股票价格。利物浦可获悉孟买、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情况，它们也可以了解利物浦的情况。股票和主要商品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一旦可以用电报指挥不定期货轮开往下一个停泊港后，世界海运市场也同样开始形成了。

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的改进，总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性，同时，各国政策的总趋向是降低或取消妨害国际贸易的种种障碍。在美国国内，联邦宪法保证各州之间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的拓殖与贸易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裨益。在德国，关税同盟把17个邦和2000多万居民组合在一个关税联盟体系之内，这时，各邦间自由贸易的好处很快就显示出来。在导致1867年成立加拿大邦联的讨论中，也没有忽视自由贸易的吸引力。

国际贸易政策的命运掌握在下列三个国家的手中：在1840年估计占全世界进出口额1/3的联合王国；大约占10%的法国和占8%的美国。^[4]它们的政策自由化的每一行动都有赖于在政治上有压倒优势的意志给予支持，同时又有能力应付关税税收上的损失或者能找到替代的财源，法国缺少这种意志，大概也缺少这种能力。制造商和农场主联

合起来反对制定法律以降低关税的一切尝试，而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缔结英法商业条约，完全是由于他在秘密谈判中使用了他的缔约权。

在美国，北方各州想提高保护关税，制定了“可憎的税率”（1828年），结果适得其反。1833年制定了“折中关税”，从而开始了时起时伏的降低关税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内战。由于国家收入，特别是出售土地收入的迅速增长，关税收入就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了。在繁荣的50年代，保护主义情绪十分消沉，要求达成互惠条约的少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达到了他们的目的（1854年）。随后十余年，林产品、农产品、渔产品和矿产品自由通过边界，畅通无阻。

对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策上的改变。英国公众意见有深刻分歧，特别在1837—1842年萧条时期，人们被逼得分别加入有组织的进攻性的或防守性的运动。商人和许多制造商要求自由贸易，而农场主则坚持保护主义——虽然有些地主不支持他们——船主坚持航海法，殖民利益阶层坚持谷物、木材和食糖得到优惠。政府由于国债债台高筑，加上在28年（1815—1842年）中有17个赤字年度，无力采取果敢行动削减关税（关税占税收的38%），或削减国内产品的商品税（占税收的37%）。

撤销一种将保护关税、税收和优惠制融为一体的制度，势必分期逐步执行（见原文第13章第342—345页）。赫斯基森在20年代作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其余的工作不得不留待皮尔和格莱斯顿来完成。皮尔发现所得税（1842年）可以作为一项收入来源，部分弥补由于降低关税而损失的款项。爱尔兰的饥荒使他不得不放松谷物法，航海法也暂停执行，以便外国船只能运入救急谷物。1849年，这一暂停改为永久性的终止，仅沿海航行例外，但到1854年，沿海航行也开放了。格莱斯顿继续大刀阔斧进行删减，到1870年进口货物中只剩下17种需要纳关税，其中5种（糖、茶叶、葡萄酒、烈性酒和烟草）占关税收入的9/10，正如在30年代一样。进口净值总数以30年代初期以来增加大约400%，但关税收入仅增加30%。早期征税约为进口值的35%，后期则低于10%。

其他国家虽未达到如此程度，但也沿着同一方向大步前进。有些行动还是单方面的；例如比利时在1850年废除了谷物法，荷兰和德意志关税同盟在1845年以后削减了关税。其他国家则在贸易协定中作了相互让步，如1860年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根据这一条

约，英国实际上允许法国一切货物免税进口，对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进口税大大削减。法国则对某些英国商品取消禁令，降低税率。此外，缔约国一方给予另一方“最惠国”待遇。如果法国根据条约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布登未曾取得的更为优惠的条件，则英国商品将立即享有同样待遇。由于法国与另外10个欧洲国家缔结的条约和英国与另外7个国家缔结的条约都包括某些更低的关税，因而关税降低的范围随着每个条约的签订而不断扩大。

即使没有这种关税方面的改变，国际贸易也会大大发展，这是因为铁路建设的范围扩大，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取得进展，资本和劳工流入新大陆，势如潮涌，在太平洋两岸都开辟了投资和经营企业的新天地。世界范围的国际经济在形成中。根据现有的虽然并不完善的统计，世界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增长40%，在40年代增长大体相当，然后在50年代猛增80%（部分由于价格显著上涨），在60年代增长将近50%。在1850年以前，英国出口商品每十年增加25%，在随后的两个十年则各猛增90%和60%。进口也大致相同，常是超过出口，逆差甚至越来越大。但是无形出口如航运、商业与银行业务、海外投资的收入，弥补了入超的赤字而有余。这项盈余在50年代初期以前每年为700万英镑或略低，但随后在60年代末期则迅速增加到将近4000万英镑，而在1868—1873年的繁荣时期则比这个数字差不多增加一倍。将这笔巨款投放在国外，英国海外投资大概从1830年的1.1亿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7亿英镑。[\[5\]](#)

制造和运送商品采用新的方式，除了需要更多“流动资金”外，还需要在建筑和设备方面投入比以往多得多的资金。有些企业创办费用比较小而随后又能够积累资金，就能够保持独资经营、独家经营或保持在合股公司手中。在制造业、采矿、航运、批发与零售商业的发展中，这样的单位居多，而在银行业，它们则进行了长期而往往归于失败的斗争。当时动员了家族的财力物力，寻找积极参与的合伙人和不参加具体经营管理的合伙人，并把利润和股息再投入企业。经营企业并不容易，因为每十年就有一次大萧条，中间还夹着一些小萧条。破产的代价很高，因为在英国和北美，所有股东的全部财产都有可能被债权人所依法占有，不过在法国只能占有积极参加经营的股东的财产。

另一种办法，举办联合企业，到1830年即已显示出它的好处，它能筹集所需的大笔资金在国内修建道路、运河、船坞，创办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银行、保险等企业和开拓铁路，以及开发各种在遥远地方的资源，如在澳大利亚移民垦荒和进行畜牧生产。在随后的40年间，继续沿着这种路线发展。推动成立股份公司，认购它们的证券，成了投资银行的专门业务。政府给公司以法人地位，在法国和比利时是颁布法令，在英国是制定私法，在美国是立法给予特许证。1840年以后，在组织私人公司方面又补充了一些一般法律，规定任何集团只需登记名称、地址、宗旨、资本构成、董事姓名和其他有关情况即可成立公司。随后，例如英国，在1856—1862年制定法律，规定任何公司如果愿意公布某些财政报告即可获准仅仅承担有限责任。

每当商业周期处于高涨时，就会掀起兴办股份公司的浪潮，而当处于低潮时，就低落下去，使许多人破产，信誉扫地。1856—1865年在伦敦登记的5000家股份有限公司中，有1/3未能开张营业；剩下的有1/3没有熬过5年，一半以上不到10年就销声匿迹了。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大陆上建立的公司情况大体相同。

当时新型的银行关心的是长期投资，而旧式的银行则继续接受存款，办理个人之间的转汇，从事短期商业贷款，主要是通过汇票贴现。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中或时期内，19世纪初叶建立的许多商业银行已经远不足以承担它们的任务。寻求更有实力的银行，执行谨慎的政策，或设法限制考虑不周的政策，就同样是银行家和政府的关心所在了。

在1832年，英国的一位路特希尔德家族成员宣称：“我国总的说来是全世界的银行。我的意思是说，在印度、在中国、在德国、在俄国以及在全世界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全都是在此地接受指导，通过我国来进行结算的。”^[6]然而，在随后的10年内，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用了6年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英国的银行制度。英国银行制度的基础是由伦敦和各个地方的几百家私人银行组成的，由于1815年和1825年的广泛破产，这个基础遭到削弱，后来在1826年和1833年通过的法令准许成立那种在苏格兰兴旺发展的合股银行，从而又得到加强。到184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成立了一百多家合股银行，其中有些拥有充足的资金和苏格兰经理人员。还有三百多家私人银行，其中包括那些老字号如蔡尔德或霍尔，以及新近才崛起的路特希尔德或巴林；此外

仿照苏格兰方式建立的分行则如雨后春笋。在随后的30年间，分行成倍增长，因而增加了财源和多种多样的保险业务，加强了储备金的集中管理，也增加了并不总是很有道理的那种信念：银行越大越有实力。

这种银行“制度”之首是英格兰银行，该行在1826年获准建立地方分行。尽管在这方面，如同在伦敦一样，它也同那些老字号的私人银行或新设的合股银行展开了竞争，但它的地位不能和其他银行同日而语。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央银行，其他银行都在它这里存款，当提款超过它们的资金时又向它贷款。在危机来到时，它们需款可能万分紧迫，英格兰银行就成了它们最后的依靠。在这种时刻，英格兰银行就可能给存户分配贷款数额，区分高级的或低级的抵押担保物，或者拒绝给予资助。在40年代，它试行过另一种办法。它提高银行贷款利率，例如，在1847年年初利率为3.5%，它分五步把利率提高到10月份的8%，后来在1857年和1866年两次危机期间提高到10%。任何非季节性的提高利率都是一种警告，而连续提高则等于是刹车和后退。正因为英格兰银行并不能垄断全部存款，也不能控制农业收成或控制国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总动向，所以在“通常每五年或七年就有一次可能造成损失的破产和灾难时期”的世界上，它就不得不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付这种“任何绝顶聪明的人也无法预见，即使时时刻刻加以注意也无法防止的危害”。[\[7\]](#)

在欧洲大陆上，商业信贷或者由几家中央银行提供，其中以法兰西银行为主，或者由纯地方机构提供，或者由少数几家有实力的家族银行提供，比如霍普、路特希尔德、马莱兄弟、霍廷格尔、奥本海姆、富尔德等家族。他们从他们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或维也纳的大本营经营贴现、商品交易，并且认购政府公债。1848年的动乱使许多实力不强或野心过大的银行倒闭，于是需要更有效的机构取而代之，随后又需要投资银行，因而新的合股银行就应运而生，在法国更是纷纷兴起。与法国的动产信贷银行和它的竞争对手相类似的银行遍布欧洲大陆；例如1853年在达姆施塔特创立的工商银行，在德国的工业和铁路的迅猛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北美，国会在1836年拒绝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证，从而破坏了出现一个中央银行的前景。在1863年以前，国会一直未就制定全国银行政策或钞票发行作出规定，因此只能由私人银行家和商业银行

家，或者由根据各州法律（这些法律通常禁止设立分行）成立的银行代行此项业务。这种“单一体”银行对于提供短期商业贷款和长期抵押贷款都无能为力。如果它们不提供这两种贷款，它们就受到诅咒；而如果它们这样做，就得冒破产的风险。在情绪上和在政治上敌视“垄断”“金钱势力”“纸币贵族”和“夏洛克”，^[8]这种态度使得要在繁荣与萧条猛烈更迭因而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良好的银行制度，成为一种漫长的悲伤痛苦的奋斗。

银行在繁荣时期用贷款的方式发行过多的钞票，在西方的每一个国家，人们都对这种倾向表示不安。痛苦的经验 and 争论的结果终于导致这样一个决定：发行钞票应当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并应受到严格管理。1848年法兰西银行重新得到这种垄断权，同时规定发行钞票的最高限额。荷兰和俄国从未背离过受到控制的垄断做法。1844年的银行特许证法令体现了英国的政策。除英格兰银行外，所有其他银行的钞票发行额都冻结在现有数字上，如果银行地位改变即予取消，与此同时，新银行一律不得发行钞票。英格兰银行因而最终将成为唯一发行钞票的银行。它可以用向国家的贷款为保证发行总额约为1400万英镑的“信用”纸币；并可发行若干钞票取代其他银行被剥夺发行的部分钞票；但是除了这项可能发行的2000万英镑之外，每一张钞票都必须有足够的贵金属作为后盾。

这个计划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它坚实可靠，但没有伸缩余地。有三次，即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仅仅提高银行利率还是阻止不了，或控制不住危机。而且也帮助不了惊慌失措的客户，除非政府准许银行违犯法律，发行没有贵金属作后盾的钞票。在1847年和1866年，仅仅一条批准发行钞票的消息就足以打消恐慌。但是1857年的危机来得如此突然，打击如此沉重，同时又传来印度发生兵变、美国实际上所有银行都关闭以及几乎到处都发生灾难的消息，因而不得不使用不合法规定的钞票，总数不超过100万英镑，这种情有可原的罪过，拯救了某些公司，或者推迟了它们的破产。“在欧洲经历繁荣兴旺和在信贷方面从事各种试验的五年中所出现的种种尔虞我诈、轻举妄动现象都在接受检验或被揭露”^[9]的时刻，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就很不错了。

当实业界正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劳工则力图使自己适应在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方面发生的变化。其中最应注意的是把原来在家庭

中或围绕着家庭从事的一些工作转到工厂。纺织工业是突出的例证，因为它雇用大量的男女和儿童。在英国，大概也像在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一样，纺织业属于第三个最大的职业，仅次于农业雇工和家庭仆役，在1841年和1851年占劳动人口的10%以上。在1830年，纺纱工、少数织布工和多数整布工由工厂雇用。在随后的40年间，仍然在家庭中加工的部分，在英国都已转移到工厂，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很多地方，这种转移实现得较晚。

由于只注意纺织业，使人们看不清劳工情况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即使在英国，许多职业也并未远离家庭或小作坊。伦敦、巴黎和其他各大城市都有大批各式各样的小生产单位和厂外工人。成衣、鞋袜、烤面包、小五金器皿和奢侈品制造业是他们的据点。伯明翰、谢菲尔德、佐林根，以及里昂的丝织区和瑞士的钟表区是他们占有优势的地方。在1843年，普鲁士的学徒工和短工还少于师傅；1850年法国的500万产业工人中有3/4仍然不是在所谓大工业之中。如果说在1848年“全世界无产者”响应了马克思发出的联合起来的号召，那么也仅仅只有一个很小的部分是来自工厂的无产者。在欧洲大陆上，直到1870年依然大体上如此。

其次，采矿、冶炼、建筑、造船和其他一些产业，它们的蒸馏器、锅炉、大缸、大槽要用很多电力、燃料或空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家范围内操作。这时它们集中化的生产单位规模大了，数目多了；由于制造机器、发动机、铁船、煤气、肥料、水泥、橡胶、纸张和重化学品的新工业不断涌现、种类也增多了。作为雇主，这些职业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在1841年到1871年间，英国煤矿工人增加了将近两倍，炼铁工人将近五倍，机器和发动机制造工人增加九倍。到1871年，采矿、采石、金属生产、机器制造和造船工人的人数加在一起几乎和纺织工人的人数相等。这些行业实际上由男工独占，它们既要求老技术也要求新技术，比其他行业工资高，不过由于对它们产品的需求剧烈波动，比较易于失业。

工资劳动者不管在何处工作，决定他的物质福利的总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工资的多少，是否能正常拿到和购买力如何。关于第一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不管他们是留在家乡还是加入移民的行列，从村庄或农场走向城镇，从农业区移往采矿区和制造业地区，从这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欧洲移居

美洲和安蒂波德斯群岛，均是一样。英格兰10个工业郡在1831年到1841年间人口增加了16%，而移民则占了其中将近一半。1851年在伦敦和谢菲尔德居住的成年人当中，只有一半是在当地出生的，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或布雷德福，则只有1/4。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爱尔兰人名列前茅，在1851年占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0。在欧洲大陆上，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也很引人注目：农村的织布工迁往里尔或里昂；瑞士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迁往米卢兹的工场；德国农民或手工业工人迁往柏林或萨克森、莱茵兰和西里西亚的城镇。此外还有横渡大西洋的大规模集体移民，主要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直延续到70年代。

没有一个国家把提供住房看作公家的义务，也没有几个雇主认为有责任给工人提供房屋。于是私营建筑商就承办这件工作，他们一只眼盯着看房客出得起多少钱，另一只眼盯着建造和维修费用、捐税、利率和地租。零星的证据说明英国工业城镇工人家庭的房租在二先令到四先令六便士之间。要从这样的租金获取说得过去的纯利，一套住房的成本就不能超过100英镑。鉴于这样一个限度，并且也鉴于地皮供应有限，而建筑业又无法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经济利益，缺乏低利贷款和公家的津贴，能够提供一排排背靠背的房子、大杂院和简易公寓，就算再好不过了。

更大的问题如街道、下水道、供水和公共卫生更难解决。一般说来，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害死的人要比养活的人多。这时已经出现了更多的城镇，其中有些还是大得多的城市。烟雾更浓，更带酸性，河流和水井受到更多污染，污水渗井和厕所更多，污水的聚积和处理更加困难。连年夏季发生斑疹伤寒、痢疾和其他疾病，死亡率增高，正如1831—1832年、1848年和随后一些年份霍乱流行时一样。

热心于卫生改革的人振振有词。但是，私人组织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集中各方力量综合治理，如公众的关心，新创或改进的办法，大量固定资金，国家的政策，以及授权地方当局制订计划、收税和投资。结果，公共卫生不得不与其他许多问题展开竞争，以争取立法机构的重视，问题的处理也就时冷时热。尽管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步骤，除了在少数几个特别注意卫生的城镇外，1870年以前进展甚微。死亡率与1840年大体相同，有些城镇的死亡率约为一般农村的两倍，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相上下，改善甚

为缓慢。在新世界也和旧世界一样，人们修建了城市，却发现很难把它们管理好。

至于影响工资劳动者福利的第二种因素——工作条件，在1830年成为一场剧烈争论的中心。当时理查德·奥斯特勒写信给《利兹信使报》，谴责雇用童工从事长时间工作，从而展开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活动。这种要求促使在1802年、1819年和1825年的几项初步的工厂法的基础之上又迈出一步。1833年的法律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纺织厂，禁止雇用不满9岁的童工，限制年龄在9岁到13岁的童工每星期的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并且还要求让他们能上点学；限制年龄在13岁到18岁的童工每周最多只工作69小时，不得上夜班；此外还包括某些保健和安全规定；并且任命了四个专职的工厂视察员。

以后每十年，法规都有改进，法规范围也扩大了（见第13章）。到1870年，在有关最低年龄、年龄不满18岁的工人和所有女工最高劳动时数，以及保健和安全条款等方面，没有受到视察员监督执行的工业企业已寥寥无几。虽然法律并未涉及男工，但是，在他们的工作须依靠女工或者少年给予合作的场合，以及由于日益加紧坚持安全措施，男工还是受到间接影响。至于商店雇员、农场雇工、工厂厂外工人、家庭仆役和机关职员，则在1870年以后还长期处于法律范围之外。

在1870年，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多数工人都处于这种状态。30年代英国的骚动曾经激起人们的一些注意，使他们采取了一点行动。1839年普鲁士颁布一项法令，禁止矿山和工厂雇用童工，并给青年工人规定每天工作10小时，但在1853年以前一直未任命视察员。法国在1883年以前也一直没有视察员。在美国，50年代初东部六个州规定了最低年龄和最高工作时数，其中包括男工每天工作10小时；但这些法律很容易加以逃避，或者没有机构来执行，只有在南北战争以后，马萨诸塞州才在1866年首先订出了较合理的规定。

工厂法的目的是关心妇女和年轻人，因为他们照顾不了自己。一般认为成年男工才能够在出卖自己的劳力时保护并且改进自己的福利。他们作为工会的会员可能做到这一点。到1830年，在英国人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令人遗憾的，或许还是危险的。结社法的废除（1824年）和1825年的修正案，承认工会不是非法的；但它们还不是有权拥有财产（包括基金）的法人，它们的某些行动，如干扰、阻碍

和诱导破坏合同的活动，仍然是非法的。过了将近半个世纪，1867—1876年的法律才给予它们法人的地位，授权它们可以集体做一些事情，而这种事情如果是个人做本来就是合法的。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取消了对劳工结社的禁令：马萨诸塞州在1842年，萨克森、北德意志联邦、法国和比利时则在60年代；但是法律承认组织和平纠察线的权利，或者甚至罢工的权利，仍然姗姗来迟。

不管法律如何，1830年已经有了技术工人组织的地方协会、俱乐部或工会，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当那些“救世主们”在西方世界扬扬得意地鼓吹摆脱长时间的劳动，建立中产阶级政府、维护私有财产、鼓励竞争和饮酒的时候，在英国已经计划成立包括所有工种和行业的全国性工会；但是，由于纲领不切实际，领导不善，内部缺乏团结和纪律，雇主加以抵制，以及1836—1842年的萧条，这些计划遭到失败（见第13章）。

喧嚣沉寂之后，1851年工程人员联合会作为“新模型”而出现。它是由技师、机械师和其他受过训练的熟练五金工人所组成的一百多个地方工会或分会的全国性联合体。财务管理和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工会职员主要是行政人员和组织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只要可能就和平解决纠纷。工会也是友谊团体，在患病、失业和劳资斗争时提供援助。它避免采取早期许多工会采用的那种秘密社团的办法，欢迎公开宣传，并且再三再四向社会公众表明它是一个和平团体，无意追求乌托邦或从事阶级战争。

“新模型”颇有成效，其他技术性行业起而仿效，并且消除了中产阶级的某些不信任，得到雇主的某些承认。到1870年，在少数情况下，居然达到利用调解和仲裁机构来进行集体谈判的地步。由于1850—1873年这些年经济比较繁荣，英国工会会员人数从40年代约10万人跃增到1873年可能已超过100万。在60年代，由马克斯·希尔施组织的德国“激进”工会（1863年）吸收了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奉行与英国工会相类似的政策，同时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会也已出现，它们受到拉萨尔或马克思的鼓舞，致力于更加激动人心的纲领。在美国，早已遍布各工业中心的行业工会，增强了力量，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实现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要求，并且在工会会员制作的商品上使用工会的标记。但是，繁荣的消失使进展一下转为后退，这在美国比在欧洲严重得多。

因此，到1870年，工资劳动者已经走上了正轨，作为依靠工资开销生活支出的人，他们也走上正确的方向。1844年成立了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它的目标中还保留着一些乌托邦思想的痕迹；但是它的工作原则却不存在任何乌托邦主义，这些原则有：由社员根据固定利率提供资金，根据市场价格现金出售食物，如果获得纯利即还给购货人作为购货红利等。这第二个“新模型”也颇有成效，它从零售杂货扩大到磨面粉、缝衣服，并且还成立了一个批发合作社（1863年），向北部工业地区一百多家零售合作社供应货物。到1870年，这些合作社的社员达到8万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

产业工人就这样逐步发展保护自己的一些机构。但是在1870年，即使在英国，这种机构的范围、规模和地区分布仍然是很小的，还没有触及非熟练和低工资工人；至于在欧洲大陆上，它们的影响则微不足道。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个人的能力和行为，生产和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以及工业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他们的货币工资和物价水平等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会、“合作社”，甚至政府为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两者相比，前者对他们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

虽然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性质已经作了论述，然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数字，对于它们的效果却很难作出估计。不过，还是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第一，在西欧还无法依赖俄国和北美的大量粮食供应以前，收成的丰歉或直接通过粮价的波动或间接由于对商业周期的影响而影响一般人的福利。年景好、食物价格低有助于使经济摆脱萧条，年景不好则会促使经济大大倒退。在1870年，这个因素的影响还远未消失。

第二，积累和保持空前数量的固定资本设备的任务，给如何分配和使用收入增加了一个比较新的因素。在一个尚不知计划投资为何物的时代，“资本家阶级”，正如凯恩斯勋爵一度评述的那样，“能够把最大的那一份（收入）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并且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消费，但不言而喻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实际上他们只消费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节约’几乎成了唯一的美德，增加收入成为虔诚追求的真正目标”。^[10]如果说工人得到的一份少于他们本来能够消费的份额，那么资本就会将其所取得的那一份多半用于进一步的投资。这就增加了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首先是建造和装备工厂、铁路和轮

船，然后是经营这些项目。因此，日益增加的人口得到就业的机会，而且如果新工厂装备较好或组织得较好，那么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迟早就会反映在物价下跌或工资上升方面，或同时反映在这两个方面。

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痛苦的。它破坏了那些墨守陈旧的方法、组织或设备的企业，正如手摇织布工人和马车夫早已领教过的那样。发展过程也不是稳定的，由于投资产生了大力竞争的过分热情，接踵而来的就是过分悲观，死气沉沉和生产力过剩。1836—1842年的萧条在强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均与后来的几次萧条不相上下，都可称之“大萧条”。这些和其他一些阴暗年头所带来的悲痛，使19世纪第二个25年声誉扫地。然而，根据可以计量的成就来衡量，这一时期总起来看是“取得非凡发展的时期之一，在整个英国经济史上国内资源发展方面达到了或许是最高的速度”。^[11]对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也可能得出类似的评价。生产率的提高也使1830—1850年的英国实际工资提高，虽然可能更多是由于物价降低而不是由于货币工资增加。

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声誉要好得多，也许过于良好，对消费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对资本货物的需求增加得更多。在淘金热和新金矿初次出现时，需求大大超过供应，使得物价远远跑在工资前面，直到1857年繁荣消失时才得以制止。此后，批发价以比1850年的水平高出大约25%的幅度来回波动，零售物价则高出13%左右。工资在1860年赶上了物价，然后继续上升，一直到1873年。因此，实际工资在1860年以后显著增加：在英国充分就业者的实际工资在1870年增加了15%，在1873年增加了25%；法国在1870年增加了18%。

《笨拙》周刊的漫画显示煤矿工人在1871—1873年喝香槟酒，尽管这可能并不是真实情况；但是许多工资劳动者肯定得到更大的份额，以及得到更多的茶、可可、肉、糖、大米和脂肪。他们能够早一点回家吃晚饭，因为工会施加压力使工作周从60小时（或者更长）减到55小时，星期六半天休息。如果他们是生活在英国，那么公共保健开始使他们的生活环境略有改善；工厂视察员取得了较多的经验，使他们的工作现场有害健康的情况减轻了一些；议会在1867年赋予他们以投票权，在1870年又终于坚持儿童必须上学，而在此以前已规定工厂不得雇用童工。自从“饥饿的40年代”以来，事物前进了。

（张扬 译）

-
- [1] 保护主义派刊物《农场主杂志》（1842年10月号）上的论点，第308页。
- [2] J. H. 克拉彭：《近代英国经济史》（剑桥，1926年），第1卷，第41页。
- [3] D. L. 伯恩：《美国工程竞争的起源，1850—1870年》，《经济史》，1931年1月，第2卷，第292—311页。
- [4]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2年），第8卷，第194页。
- [5] 参见艾伯特·H. 伊姆拉《英国对外贸易实值》，《经济史杂志》，第8卷，第148—151页；《联合王国贸易条件》，《经济史杂志》，第10卷，第170—194页；《英国支付平衡与资本输出》，《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5卷，第234—237页。
- [6] 转引自《便士杂志》，1837年，第185页。
- [7] 巴林银行对商业周期的一种看法，转引自R. W. 希迪《巴林家族在美国贸易和金融中的活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9年），第130页。
- [8] 即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敲诈勒索的放债人。——译者
- [9] J. H. 克拉彭：《近代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370页。
- [10] J. M. 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伦敦，1919年），第17页。
- [11] W. W. 罗斯托：《19世纪的英国经济》（牛津，1848年），第19页。

第三章 科学进步及其对思想和物质发展的影响

在19世纪中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作为一种以实验和观察为其准则并以数学为其逻辑的始终如一的学科而出现的科学，[\[1\]](#)将其领域扩展到遥远的宇宙空间，将千百万年纳入其探讨的时间范围之内。摆脱了形式的推理和教条式的神学所施加的局限性之后，一种确定无疑的必然力量被声称科学真理，而在以前从来还没有任何形式的智力产物被这样认为过；尽管这个时期所取得的物质文明的飞速进展仅有一小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于当代科学的进步，但是潜在力量正在极大地增强。其特点、方法以及面临的问题均已确定的近代科学，其形成时期可以说大约在1830年已告结束；科学上具有技术优势的现代时期，可以说是大约在1870年开始的。其间隔期间既具有古典特色，因为早先开创的许多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完成，也具有过渡性质，因为近期科学在此期间发轫。其间并没有突然的中断，而是有其他人重新开展科学活动，更换科学思想的某些指导概念。有的人，例如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也许在一项研究中给牛顿天体力学的建筑物顶上增添了一块盖石，而在另一项研究中，他又帮助奠定了新的理论物理学的基础。万有引力说于1845—1846年因发现海王星这颗行星与理论上的断言一致而得到它最充分的证据，而当时牛顿的光学理论却已被新的理论——波动说所动摇。甚至达尔文主义，以其对生物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也并非缩小而是扩大了对较早时期的博物学家寻求解决的问题的应用。

科学的不断增长的权威性以多种方式反映出来，而对于科学进步本身的结构也并非没有产生结果。在较先进的欧洲国家，要求对教育制度，尤其是对大学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意大利，科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在文艺复兴之后并未完全失去；在德国，拿破仑失败之后，进行了精心的再造；法国和英国则缓慢地步德国改革范例之后尘。随着研究工作的分支与复杂性的增加，科学业余爱好者不自觉地成为专业人员，而大型实验室、昂贵的仪器和长时间的劳动也随着严谨的工作

而出现。实验室培训与研究指导已成为高等科学教育工作的正常特点。一个典型的研究机构，例如设在德国吉森的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化学实验室，被那些因学术机构不充分赞助威廉·汤姆孙或克洛德·贝尔纳的杰出实验天才而对之提出抗议的人奉为样板。人们自然就要求国家改革教育并提供财政资助兴办一个比较慷慨的科学机构。早在1809年，柏林科学院已并入柏林大学；新的伦敦大学的建立和1850年皇家委员会成立后开始进行的英国旧大学的改革，为科学课程的教学提供了新的天地；拿破仑三世由于受到巴斯德的成就的激励而承认科学有更多的需要。随着国家成为新研究机构的赞助者和建立者，17世纪成立的规模庞大的全国性科学院的重要性相应地减小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机构——科学协会所取代。最早的科学协会有德国科学协会，于1822年由洛伦茨·奥肯创立；英国科学促进会，于1831年在约克郡召开第一次大会。科学协会一方面是在受产业革命影响的国家中对科学知识更加实用的方面广泛感兴趣的一种响应，另一方面旨在将科学进步置于理解与善意的更广阔的基础上而加以增强。大约在1830年，英国科学受到冷遇并自感地位低下；1871年战争失败之后，这种感觉在法国也普遍存在，在那里也成立了一个全国协会。

科学进步仍然主要是掌握在西欧四大国的手中，它们各自与那个时期的伟大理论成就相关联——细菌理论（法国）、热力学（德国）、进化论（英国）和分子理论（意大利）。东欧也做出了突出但分散的贡献。圣彼得堡科学院只有数目有限的俄国学者与西方保持接触。但除西欧外，最有希望的科学活动基地在美国，那里的大学逐渐采用德国的模式，由于年轻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人才济济，这些学生都获益于只有在欧洲实验室里才能获得的经验。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哈佛大学的路易斯·阿加西斯是一位瑞士移民，但最初的麻醉实验（1844年）和30年后威拉德·吉布斯的热力学理论研究则是美国献给欧洲的礼物。

同样，科学兴趣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1830年以后，法国科学已经丧失了其在拉瓦锡、拉普拉斯和居维叶时期所占据的学术支配地位。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英国在实验方面显示的天才虽然重新表现出活力，但更加突出的是德国科学自始至终显示出的高水平和丰富的成就。通过它的努力，没有一个领域没有得到改进；德国的各大学吸引

了各国的人，德语成为科学交流的主要工具，而克劳修斯、亥姆霍兹、李比希和路德维希通过理论研究确定了他们各自的科学道路。

德国在克服了它最初的落后、缺乏殖民地和商船的状态之后，于1870年上升为第一流的制造业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在理论科学以及技术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一般说来，实验室与工厂和田野之间仍然远远脱节，以致科学与生产之间仍然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1830年以来，人口增多，通信联络更加便利，以及贸易量的增加，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科学只是其中之一。斯迈尔斯所赞扬的那些先驱们所掌握的技术，与抽象科学知识几乎无关。这种新文明所依赖的铁道工程师、船舶制造师和机器制造师都是从实际操作和经验中培养出来的，这些经验来自17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究竟来自哪一方面，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于这时正在采用精确的测量方法为道路选线，为完善螺旋桨的设计而进行流体动力学研究，或者为了改进大炮而采用巴什福思电计时器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人员来说，科学是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一种系统研究的东西。虽然科学正在加快利用发明成果的速度，但它并没有直接提供什么发明，甚至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的新型科学发明家——贝塞麦、西门子或阿姆斯特朗——也仅仅是开始进入基础科学领域。利用精确计时器、高温计和采量装置等工具对操作进行精确控制，仍然是一种新颖技术。炼焦炉和煤气工厂，高炉和制酸塔排出的废料污染着工业中心的毗邻地区，操作费用则因地区不同而相去甚远。与此相反，科学家们的思想自然更多地转向科学本身的演进规律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法拉第的冶金术研究是少见的相反例子，而后来巴斯德毕生所从事的事业——消灭危害葡萄藤、家畜和人类的传染病——则具有直接的实用意义。在这个领域中科学与工艺之间的接触范围已经很广。在另外的研究领域里，却缺乏使工业得益于科学进步的机构，尽管在一些技术专科学校中已有这样的机构，例如著名的法国综合工科大学，一些矿业学校和许多私立机构。1850年，阿尔贝特亲王仿效培根将科学说成是发现动力、运动和转换的规律，上帝就是利用这些规律支配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把工业说成是将这些规律应用于只有知识才能使之具有价值的丰富的原料；对于下一代人来说，1851年的大博览会作为实验技术的最高成就而引人注目。科学似乎那时还只是进入了重化学工业（当时还没有合成工业）、大量植物产品（包括橡胶和胶棉）的制备技术以及摄影和电报这两门新技术；发电机和弧

光灯还是新奇的产品。在1851年的制造业中，以油和钢代替煤和铁甚至连一点迹象还没有。

然而，到了1870年，在较小的程度上，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正在显示出科学思想的影响。卫生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减少婴幼儿死亡率和传染病的发生；从1831年一直到1893年，霍乱的蔓延危害着欧洲，更加明显地说明了净水供给以及合理的卫生法规这些措施对社会和医学的重要性。土壤肥力问题的解决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使农业科学进入耕作领域。科学发现导致了一些新的商业冒险事业的出现，或者由于直接采用科学原理而使这些新的冒险事业获得成功。传统的化学工业由于更多地需要碱、无机酸和染料而发生了变化，因为只有采用新方法和新材料才能使之满足需要。此外，新的化学制剂逐渐投入使用：化肥、苯胺染料、硝基炸药、氯仿和苯酚都是实验室的实验成果，这进一步表明，在科学发现与有效地应用这些发明之间长期普遍脱节的间隔期间，研究工作仍在独立地进行。第一批苯胺染料的发现者珀金和他的老师霍夫曼（阿尔贝特亲王把他从德国请来教授新的有机化学）所从事的合成化学工业，从一开始就要求科学的管理方法。有机化学中不抱偏见的研究已形成一些环节，把这些新制造业同19世纪初以旧的经验方式建立起来的煤气照明工业结合起来。1830年至1870年，在实验室创造出了一些方法，可以使煤气获得最高的发光值，消除杂质并将这些副产品用于其他工业。氨和苯以及煤焦油的其他成分，成为重要的商品，但是德国以外的地方，实践还远远落后于理论。^[2]橡胶制品、杜仲胶和水凝水泥也是在1851年的博览会上被视为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制造品，是基础科学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成果。电报业是奥斯特和法拉第的发现的产物，并由著名的科学家，如惠斯通、西门子和汤姆孙等加以发展，他们也具有非凡的实际才能。需要有高超的技术能力以克服随线路长度的延伸而增加的困难，并设计出只有科学仪器制造公司才能制造出来的精密仪器。这些公司的业务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不久就扩大了，因为那时各种测量和分析设备得到开发和有效利用——也许这充分肯定地表明科学开始推广到工业中。在还未牢固树立坚实的技术传统的地区，科学将为那些有远见卓识，意识到这种传统的潜在力量的企业家们的需要服务。然而，使科学原理得以为有用的目的服务而进行详细研究的机会仍然是有限的，虽然德国的情况比别的国家要好些。

工业中的合理化已经开始。哲学上的唯理论具有赞赏和仿效科学工作的明显倾向，这一古老的运动可追溯到爱尔维修、洛克和笛卡儿。这一思潮已由19世纪功利主义学派哲学家边沁以及穆勒父子加以扩大和深化。唯理论者对机械科学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获得的成功有着深刻印象（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当时哲学家们一般没有因受公认的宗教和道德的准则而被歪曲的自然），他们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理论，似乎思想依存于人们感觉到的自然，而且，尽管从精确科学有效地获得的大多数事实和例证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但他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他们那套科学推理的方式。功利主义者，像科学家一样，不再注意最终目标，以便使自己适应直接关切的事——人类行为的性质以及如何从社会组织获得最大的利益。边沁的功利学说像爱尔维修的享乐主义一样，要求把衡量效率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个人。社会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证大众和个人的幸福呢？这个问题具有科学的味道。意味深长的是，功利主义者自己所发展的主题——政治经济学——被人们认为是一门“科学”；社会活动过程也服从于同一类型的精确的（越来越成为数学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是在物理研究中取得成果的。于是马尔萨斯以一种精确的数字形式陈述了他著名的命题（1798年）；他不满足于仅仅宣称人口增加的趋势快于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增加。这位讲求实际而不是追求理想的学者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自己的见解，以及那些负责治理国家的人所奉行的政策只能是在对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收集的有关人口、贸易或司法方面的大量事实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治理国家实际上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科学。我们这里不谈这些学说在19世纪中叶（当时这些学说已为人们所普遍意识到并成为政治上争论的题目）对政府工作有何影响，以及用什么样的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财政和经济政策。如果说正在变化的社会结构是促使政府工作的性质变化的深刻原因，那么，反过来受科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政治哲学的演变，则表明社会压力是以什么方式起作用的。

把科学尊之为纯粹的思想产物，是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中明确提出的。在孔德看来，科学是真知的唯一标志。孔德认为，自然科学已上升到人类知识的第三阶段，即实证阶段，脱离了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在这个阶段，理解一种现象意味着一种有关这一现象在普遍规律下与所有其他现象的关系的知识。孔德敦促人们进行科

学史的研究，以便揭示唯一的真实知识的发展情况，与科学史相比，哲学史只不过是人类梦想与心理变态的记录。他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一切思想成就纳入一个复杂的顺序上升的单一知识体中——更复杂的科学定律乃是建立在不太复杂的科学定律的基础之上，从最一般的和抽象的数学定理到生物学，最后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自己的努力是为了将社会学提高到实证阶段，为了通过在历史和心理学方面所证实的事实推断出人类行为的规律，并利用自然科学中已确定的那些方法来使人类的自然史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像孔德一样，认为将这一完善的思维与研究体系应用于哲学或“道德学”，并不会由于其问题和目的的迥异而受到限制。“许多较简单的现象的规律由于普遍认识到而被认定不再有争论，如果这个过程……被自觉而周密地应用于那些更加困难的研究”，^[3]那么，“对人类本身进行的研究”，就可能成为实证主义的，形成普遍而可论证的真理。类似他据以相信自然科学肯定已被引入的那个研究方向，穆勒追随孔德开拓社会学研究的新方向，他设法在道德和社会思想领域画出科学推理逻辑的广阔路线。

在实证主义哲学范围内，孔德创立人文宗教，主张以崇拜物质施恩于人类取代崇拜僧侣制度，强调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另外一些思想家则期望通过多方面应用技术和机械地调整社会而开创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在社会领域如同在科学领域一样，进化是这个时期后半期占主导地位的概念。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加速他们所相信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也提出了一套关于历史发展大致进程的进化解释。在其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具有从法国大革命继承而来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尽管仍继承了黑格尔的遗产，社会主义却变成了最极端的理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更确切地说实证主义）的影响在那些支持广泛的辩证观点的论文中得到最明显的反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推论出决定现存经济秩序发展，并将同样导致其解体的法则。在以经济解释历史方面——与科学影响的另一方面所促成的严谨的史学完全不同——上述法则被更广泛地加以运用，恩格斯则利用人类学方面的新发现来证明社会主义关于古代社会从其原始组织即家庭逐渐演变的理论。在人类事务中，马克思的决定论法则类似于牛顿的运动定律；如果这些法则和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就不会承认偶然性和天才的作用。拉普拉斯曾鼓吹说，只要宇宙中存在着粒子的质量和运动，其命运就是完全可以预测

的；马克思以同样精神坚持认为，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社会的全部历史和结构，甚至包括它的艺术和科学，都是已经决定了的。机械论的社会学贯串着机械论的科学。

当哲学家们在解释科学方面以各种方式取得惊人的胜利时，自然知识的有机增长也在继续，其发展阶段并不总是证实那些试图提取科学思想的精髓而用于其他学科的人的主张。一些基本的设想受到了怀疑，更多的是倾向于否定而不是支持决定论。大自然的复杂性与前一个时期那些比较教条式的说法并不符合。一个没有考虑到的领域——时间——的出乎意料的重要作用开始影响物理学和生物学理论的结构，尤其是重新给予后者以新的兴趣和力量。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依存（孔德曾准确地看出）变得逐年明显，其结果是研究工作分得更加细而不是减少分支。各学科间边沿课题的研究，在理论物理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由于更加深入地发掘，使同一的概念（例如热力学或原子论的概念）在所有学科或多数学科中占据主要地位，从而加强了科学的内在一致性。

数学分析的进一步运用是这个过程的主要例子。理论数学在这个时期显现出它的现代特点。虽然现有的数学思维模式被推广了——较早时期的大师们（法国的柯西、德国的高斯）一直到50年代仍很活跃——但深刻的创新同样有重大意义。都柏林的哈密顿奠定了算子和矢量理论的基础，俄国的罗巴切夫斯基、匈牙利的鲍耶父子和德国的黎曼创始了以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几何学研究；哈密顿、格拉斯曼和布尔是非交换代数的先驱。布尔在《思维规律》（1854年）一书中自称为“近代符号逻辑之父”。这些都是数学主干的异端分枝，相对而言未受到重视，但显然具有极高的推理性。然而，在19世纪末，理论物理正是这种类型的数学的产物。与此同时，当时的物理学正把数学分析从它已经得到应用的力学和光学等学科引入气体和电学的研究。从天体力学的宏观物理问题到物质结构的微观物理问题的研究这一重大发展趋向，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数学工具，这种工具是应用统计学方法并使它具有高斯在概率研究（约1800年）中的精确形式而创造出来的。例如，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和其他人在研究气体运动理论时，不可能观察到或计算出单一分子的运动，但如果采用综合统计算法就可能从物质的已知特性推断出其运动的概率。非物理科学从单纯的说明阶段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采用

了类似的方法。孟德尔关于植物杂交实验的说明（1869年发表，但1900年以前一直遭到忽视）确立了遗传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实际上属于统计学类型，不过涉及的数学是初级的；不十分准确地说，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假说也是如此。

在探讨理论物理的进展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由实验而产生的一些发现。法拉第是19世纪一位出类拔萃无人超过的天才实验家。继奥斯特观察到导电线周围产生磁场的现象（1820年）之后，法拉第终于在1831年发现了逆效应，当时他检测到横切在一个变化着的磁场上面的一个导体其电动力也在变化。此后，另外一些主要的感应现象很快也被揭示出来，他的名声也牢固地确立。到1850年，电学的基础已经确立；电势、电容量和电阻等新概念也已明确形成，尽管当时还缺乏精密仪器和计量学，这在法拉第于1867年去世后很久才出现。大部分艰辛的研究是在德国进行的，它与欧姆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在电可用于工业的各种特性中，加热和电解这两种用途自19世纪初即已被人们所知。电能与机械能的互相转换也已显示出来。有了这种互相转换，人们长期以来研究的电报术成为现实，在1850年以前就已很快被铁路所采用，不久后即推广应用。到1858年，试行了首次横跨大西洋的通信联系，但未成功。由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有效设计未能根据最初原理实现，电能消耗量在1870年仍然很小。电能够分配使用和电在工业上的其他技术优点并不明显。对许多人，包括曼彻斯特的焦耳（他在1840—1850年进行的实验确定了电与其他形式的能之间的量的关系）来说热机似乎经济得多。

不论就纯粹的科学意义上讲还是就源于纯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来讲，在电学方面对实际经验进行理论的阐述，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法拉第并不是伟大的数学家；他对电—磁力的作用作出了生动的构想。他的设想中需要有一种媒质，即可以把“力线”转变成应变线（lines of strain）的弹性媒质。尽管以太的假说自古以来就有，但物理学家们还是倾向于把力（例如重力）的作用说成是在一个跨越真空的距离中进行的。牛顿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一直保持谨慎的沉默。光的波动理论的胜利更加敏锐地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约1820年），因为难以假定在真空中产生波动。然而，法拉第所设想的媒质似乎不能测出其必要的量，也不可能普遍应用于人们已发现的磁、电和光的各种现象。[\[4\]](#)比较传统的数学假设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最后，克拉克

- 麦克斯韦从法拉第的想法出发，向皇家学会承认，法拉第的理论“在结构上同我已开始创立的理论相同”，在他于1864—1868年发表的论文中以数学方式表述，当一条力线从一个干扰中心向外扩展时，它像一个电磁波那样运动，电分量和磁分量的传播如在导体中一样是互相垂直的，其速度与光速相等。麦克斯韦得出结论说，光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电磁波，因此具有某些已知特性的单独一个媒质就能够在它的方程中用于说明所有这样的力的传播。某些结果来自可以证实而且已在实验中证实的理论；最后在1887年，赫兹检测出了火花放电产生的电磁波。

当人们弄清造成对光和热的生理感觉的原因其物理性能是一样的之后，辐射研究便成为物理学的一个已确立的部门。可见光谱以外的辐射也可以置于麦克斯韦理论的范围之内。法拉第和其他一些人当时正在进行高电位下真空管内放电实验——迈向原子物理学的第一步。但这个时期的主要进展是使光谱分析臻于完善。观察到白炽元素在它们的光谱中射出具有特征的亮线大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本生和基尔霍夫（大约于1855年）才使光谱学在分析技术中占有了牢固的地位。傅科因鉴别出（1849年）元素光谱中的某些亮线就是太阳光谱中的夫琅和费暗线而揭示出某些更大的可能性。这两种线的一致，10年后由基尔霍夫和其他人在一个根据热力学而推论出的假设中做了说明（后由电子理论所证实），证实一定频率的光被存在于太阳周围的元素所吸收。像在实验室里分光镜与天平同样重要一样，它在天文台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精密仪器。在近代，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巨型反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的原型装有72英寸的金属镜，于1845年由罗斯爵士在爱尔兰帕森斯城建造。光谱学揭示出太阳以及许多恒星的构造，它们的温度及它们的正常运动。大型望远镜及其附件产生了新的天文学，其创始者们对自己有关宇宙的去和未来的观点越来越抱有信心。在宇宙研究方面，天体物理学同样遇到有关物质的性质和历史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物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

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以及下面将提到的其他方式引导科学宣布自己的宇宙年龄研究。无论有什么样的假说，假定宇宙产生于某种伟大的创世行动也好，或者按照星云假说的某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说法假定宇宙是机械地演变而来也好，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着稳定的能量均匀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以一种恒温的静

止状态而结束。早在1852年汤姆孙就已将最终静止状态称为热力学定律工作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理论对于宗教信仰来说是可以同意而不会反对的。当时采用的物理学时间度标（明显地忽视了放射现象）太简单，不可能适应进化论生物学（地质学家也无意否定）的物种缓慢变化的漫长时期的需要，这些分歧仍然在争论不休。但是，不论采用什么手段来计算太阳系存在的时间，试图这样做本身对于认识科学的限度，即单向过程的不可逆性就是重要的。另外还发现一些并非由于逻辑上或实验上的不足，而是由于自然模式造成的其他限度，人们首先清楚地认识到的就是绝对零度，即冷的极限（1848年）。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则是能量的极限即能量守恒。

“能量”一词已经用于某些方面，但严格来说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在1851年以前，什么是能量尚无确定的概念。在本时期开始时，热物理学处于混乱状态。因为传统的观点，包括影响很大的法国学派的观点，赞成物质论，即认为热是一种感触不到的、沿着温度梯度往下流的流体；分子运动论（其最明显的证据是机械摩擦产生的无限量的热）则未获得普遍的赞同。在1840—1850年的10年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热力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必须将能量守恒原理的产生与一般的分子运动论的产生加以区别。1824年，法国工程师萨迪·卡诺观察了从热源获取动力的效率，以此作为完善的热机的样板，这种热机利用气体膨胀和收缩做功而不受损失。通过证明有限的热量本可以做无限的功，卡诺指出，从热获得的“动力”与所有其他条件无关，仅仅取决于热传递于其间的两种物体——例如蒸汽机的锅炉和冷凝器——的温度。卡诺的原理并没有使他成为分子运动论者，在他未发表的1830年笔记中尽管阐明了分子运动论，但他的原理后来是以物质论的方式为人们所熟知。物质论无法解释气体膨胀是怎样做功的；分子运动论直到证明气体损失的热并非消失而是转换为机械能后才确立起来。能量永远是等值转换这一点是由迈尔（于1842年）和焦耳（从1843年起）通过实验而研究出来的。在亥姆霍兹于1847年首次完整而令人满意地对热力学进行阐述之后，克劳修斯、兰金和汤姆孙研究出数学方程框架，这些方程牢固地体现于物理学中。这两个所谓的“热力学定律”实际上可以从卡诺的原理推论出来（实际上也可以从永恒运动的反证推论出来）：在一个密封系统中能量是

恒定的，而当这个系统达到平衡时就不可能得到能量，而且不可能通过任何将自然热流从一个热体倒流到一个冷体的方式而使能量守恒。

通过对运转着的蒸汽机的研究，热力学已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但在这个时期结束之前，热力学还没有开始返回来对技术产生作用。此外，有意义的是，尽管有这种联系，但大部分工作应归功于两个基本上是生理学家的德国人——迈尔和亥姆霍兹。一种新的能量理论已广为人知，而且对科学的某些领域的进展来说是必要的。即使如此，热力学的先驱者们在1847年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他们之所以被漠视大概部分是由于这种新奇的能量总概念在逻辑上引起一些难题（在当时的科学词汇中还没有这个名称）和两种热理论之间的混乱；部分则是由于表示精确的当量在实验技术上还有困难。但是，到1870年，物理学已变成一门整体的学科，即专门研究大自然中物力论的学问，在这种理论中，力、电、热和光各种现象都是单一的二重性，即物质和能量的平行表现形式。如果说宇宙是一个密闭系统——这就是假说——那么必然会对单一的不可逆顺序和对通过能量均分而使自然过程停止的最后状态作出一般的推论。物理学似乎能够预言天地万物的命运。

通过热力学（很快就应用于研究化学反应）、电化学和其他接触点，对大自然进行的物理学的或分子运动论的以及化学的或原子论的研究互相交叉并逐渐合为一体。道尔顿于1808年以定量方式使原子学说重新获得活力，但对物理学没有马上产生影响，甚至在这个时期开始时许多化学家还怀疑它是否只不过是适合一时需要而虚构的东西。数学物理学家逐渐受到影响，采纳了物质的粒子观，根据波义耳和查理通过实验而得出的定律，研究诸如某种气体的特性；热力学思想也促使人们重新回到伯努利早期的气体分子运动论（1738年）。在其后的10年，实验研究对其进一步进行了证实。数学中的统计方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适当的技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到1862年，如麦克斯韦所说的“气体是到处飞扬的微小物体的理论”至少已被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亥姆霍兹及克劳修斯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一种很可能被证实的假说的水平。但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和化学的原子论要充分发挥效用必须使二者统一，而能够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独立测定的某些常数仍然令人迷惑地不一致，从而妨碍了二者的统一。1860年以后，当化学家们接受了阿伏伽德罗的分子假说时，这种不一

致才被消除。从1845年起，人们曾多次试图计算出气体的单个“原子”（实为分子）的概率速度和质量，但没有受到重视。1860—1870年，事态的发展使人们确信，在科学的下一个时期，化学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将基本粒子结合到复合物质的构成单元——分子中去的进程，而物理学则将从事于检查它们的特性和变化过程。

使原子学说具有牢固的基础，是1830年以来无机化学家们主要关注的事。那时普通元素表已经完整。分析化学已经相当先进，并一步步精密，因此通常已可能测定化合物中元素的比例；问题在于去发现就原子的相对数目来说，这种比例意味着什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具有原子的相对量的知识。此外，不久就认识到，化合物中一个元素的原子不一定都包含在单独一个原子团中，也许会分成两个或更多个与该组合中其他元素有独立联系的原子团，因此这种联系的形式就变得重要了。由于道尔顿的理论把原子想象为物质的正常的自由单元，当元素在气体状态下并在组合中时对其进行研究，实验结果变得相互抵触，因为大多数气体的粒子并非原子，而是分子；道尔顿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的方法足以证明原子结合究竟是简单的（一对一）还是复杂的（一对二、二对二，等等）。在这些困难当中，测定原子量和确定原子结构式的二作类似一组复杂的密码，谁也没有把握能够解决。然而，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编制了一个原子量表，与现今公认的原子量大致相同；他还提出了近代化学符号体系并正确地推导出许多较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式。他还传播一种电化学假说，显示出当时物理学的影响。这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元素的原子（和原子团，或基）都带有独特的电荷，因此它们的化合力的差别是极性不同的结果。但采用的方法则是不正确的，大部分依靠与最简单的化合物进行类比。许多化学家把整个原子量看成纯属是推测，不相信数字公式，因为它们根据使用者的意见而异。甚至快到20世纪中期时，也无法肯定整个原子理论不致由于本身的自相矛盾而陷于失败。

就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来说，混乱自然就越发严重，因为在这些化合物中，分子是由许多不同元素的原子组成的。早期有机分析是拉瓦锡进行的，道尔顿曾试图把他的理论应用于有机物质。人们已认识到，这些有机物质大体上是由碳、氢、氮和氧四种元素组成；计算这些元素组成比例的方法由贝采利乌斯和李比希做了改进，同构现象

和同分异构现象^[5]才为人们所知。由于其中三种气体的分子都是双原子的，因此使用的原子量以二倍的关系而互异（碳=6或12；氧=8或16）。电化学的两重性产生了一种多少是任意的模式，使那种认为在实验室中比较复杂的化合物由不太复杂的化合物合成的概念受到了影响。虽然理论受到怀疑，实验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第一次重大胜利是韦勒于1828年合成了尿素（一种排泄物）。这似乎是给了生机论者关于生物物质绝不能用人工制成的主张以一次有力的打击。从理论角度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其后10年间发现了化合物链，在这种链中，一个稳定基像栓钉一样，可以使其他原子或原子团附在其上。一种模式出现了：似乎是“在无机化学中，基是简单的；在有机化学中，基是化合物，这是唯一的差别”。（杜马和李比希，1837年）合成物的数目大量增加；其中有一些后来证明是有用的。

在其后20年间，详细的研究大大超过化学理论所能够作出的一般性推断。事实证明两重性和简单的基因理论已经不够。对后者进行详细阐述的，一方面是法国学派（杜马、热拉尔、洛朗），另一方面是德国学派（李比希、韦勒、维尔兹、霍夫曼），英国有机化学与德国学派有密切联系。但这些阐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组合理论令人困惑的嬗替和在原子量问题上的混乱，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这些争论的问题——分子中的原子结构形式和为什么只有某些排列方式才有可能，即才能稳定——越辩越明。原子价学说由英国化学家弗兰克兰于1852年首次提出，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凯库勒（曾一度在伦敦工作过的德国人）加以完善。这个理论到1865年已可根据元素的组合力，即根据元素的一个原子结合时所带之氢原子数，对元素按数字进行分类。在那一年，凯库勒还提出了著名的苯的环状结构式，表明分子中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之间的重键。“分子结构”的第一步很快就扩展到其他所谓“芳香族”化合物。

原子价为测定原子量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标准。在1860年的卡尔斯鲁厄会议上（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消除仍然使化学理论的这一基本原理模糊不清的怀疑），虽然不可能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但意大利人坎尼扎罗给他的同胞阿伏伽德罗的分子假说注入新的活力，使之重新流行起来，迈尔在1864年的一项重要研究，又使这一假说进一步得到传播。以分子概念而不是以原子概念作为物质的最小自由粒子，从而消除了分歧，原子学说也得以建立在牢固的定量基础上。以

无机方法推导出的原子量，现在可以同有机化学家已接受的原子量一致起来，而且，如上所述，化学原子论通过同样的调整，也同物理学的分子运动论一致起来。

由勒贝尔和范托夫研究出的第一批三维结构的分子式，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之后，不过追溯其历史则始于1848年巴斯德发现旋光性的同分异构体（两种物质具有相同的成分但性能不同，并构成互为镜像的晶体）。巴斯德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原子排列的不对称性。立体化学的概念并未得到人们的赞同，为判定元素周期表中的某种合乎逻辑的排列次序而进行的努力，同样要等到1870年以后才得到充分证实。最初，由于同族元素具有某些明显的相似性而鼓励人们对其特性和原子量的相互关系进行的研究，如纽兰兹于1865年所作的努力，遭到了人们的蔑视。门捷列夫和迈尔（1869—1871年）所作的关于周期律的经过推理和论证的说明，打破了怀疑论，而分离出门捷列夫曾预言其存在的那些元素，终于彻底克服了怀疑论。对周期律的理论说明在又过了三十多年后才作出，是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正如上面最后所列举的这些实例所表明的，实用主义甚至在当时的化学理论家们当中也是很严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为人们不无理由地不愿再提出各种假设，因为已有许许多多的有关组合的“定律”和“型式”提出后又被否定了，这实际上是由于人们过分专注于化学合成技术而造成的。有机化学已成为这门科学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分支，但是一方面有机化学家们在改变物质和构成分子方面正在取得更大的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却有忽视物质的基础研究的危险，而只有通过物质的基础研究才能在学术上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正确的。

有机化学的新技术在应用于医学、制造业和战争方面已对社会产生着影响。旧化学工业的原料是盐、明矾、硫酸盐，以及用于制备染料及药物的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机化学用木材、煤、硝酸盐和硫制造出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产品。尽管某些大工业，例如制革业和制陶业，继续采用未被科学触动过的传统工艺方法，但是从化学方面吸收技术已愈来愈普遍。1807年，戴维发现了电解作用，促成了制版业的发展；1836年，贝采利乌斯发现了催化作用，加速了工业反应从而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基因理论的提出，现代的实验室合成和商业利用的模式开始出现，不过初期的研究工作者们对他们研究的成千上万种物质的用途并不十分感兴趣。应用方面的落后状态主要并不是由于

上述因素，而是由于那些本来应该热情支持改进的人们却持漠不关心和保守的态度。氯仿在1831年即已被发现，而16年以后才由辛普森在爱丁堡将之用作麻醉剂。1834年就发现了苯酚，其防腐作用亦略为人们所知，但将之系统地用作防腐剂则是30年以后的事。水杨酸钠在1860年即已制出，但有效的药剂阿司匹林在1899年才投入市场。总之，最有用的科学制成品只是那些给某些发明人和某项专利带来巨大好处的东西。所以，对纤维素的和平利用是从棉花的丝光处理（1857年）和赛璐珞的发明（1869年）开始的。火药棉在1846年即已发现。通过工业上的应用，科学为下层中产阶级（他们在制造品方面的购买力已变得越来越大）提供了一些商品的代用品，如大自然不可能大量提供的丝的代用品；用木浆代替破布造纸（约1860年），使得大量印刷报纸成为可能；用人造黄油代替黄油（这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成为一种制造品）。这些都是新物品，在市场上向穷人销售，还有其他新物品，它们的销售情况证明利用科学制造物品的好处，例如啤酒的酿造。如果人们的爱好和习惯不停留在低水平的要求上的话，在制造方法和产品方面加以改进是大有可为的。例如肥皂业，还仅仅发展到应付家庭需要和对卫生采取新态度的规模。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格利高里粉和黑色泻药^[6]继续作为家庭备用药物时，化学工业中的制药部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制药控制在少数制药房手中，这些药房自然唯医疗业的马首是瞻。但主要由于这个时期化学研究的发展，药品的项目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一次合成奎宁的失败的尝试中，珀金偶然发现了第一批苯胺染料——苯胺紫（1856年）。不久，苯胺染料业大为发展，此后它的业务活动鼓励人们重新对此进行研究。随之，其他合成染料很快制造出来。茜素，即茜草属植物的色素，于1869年合成；靛蓝于1870年合成。植物染料容易变色，价格昂贵而且产量有限，因此，它们的种植很快就被舍弃。合成染料色彩多种多样，容易精确地配色，为纺织业提供了机会，不过最初利用这种机会主要不是出于审美，而是由于看准了其发展前景。

到这个时期的中期，已有可能推广一个世纪以前已在英国开始的把化学和生理学知识应用于植物栽培而进行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农业技术革命。氮的循环和糖的光合作用形成已经部分地为人们所了解。维格曼、施普伦格尔和布森戈等先驱者已认识到恢复土壤中为植物所吸收的矿物成分的必要性；李比希关于农业化学的一些比较通俗的著作推广了这一学说。首批使用的人造肥料是磷，1842年开始投入生产，

但后来在酸性转炉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中使用的磷铁矿的“碱性渣”中发现含磷。在把煤气厂产生的氨水出售给染料厂之前，也曾将之用于田地里，但广为人知的理论对于土壤中存在氮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智利矿床出产的硝酸盐到1870年后才大量采用。幸运的是，供养众多人口的负担并不是完全落到农业科学上，因为欧洲多年来以食用谷物为主，现在则食用从美洲大陆运来的其他食物。在美洲大陆，耕作方法在机械方面是进步的，而在科学上则是原始的。

有关植物营养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从大气中固氮的问题，只是通过微生物学的进展才为人们所理解。微生物学开始时是一门与有机化学和化学工业密切相关的学科。巴斯德的天才导致了这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所有的进展。他将酒石酸的研究转向整个发酵过程的研究，可以将之看作一系列化学反应；这时，糖、酒精和醋酸的成分也已为人们所知。由于他对酵素的研究和利用适中的热度防止变质的方法（巴氏灭菌消毒法）使葡萄酒酿造者和啤酒酿造者减少了许多损失。巴斯德在科学上是一位坚定的生机论者，实际上，他与他的朋友克洛德·贝尔纳的唯一不同之处就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决定了他的工作性质及其惊人的影响。用酵母才能发酵。1838年以后，人们知道酵母由许多极小的植物细胞组成。巴斯德强烈反对贝采利乌斯和李比希提出的酵素作用的机械的或无机的假说（自从发现酶以后人们所采取的学说的原始形式）；他认为酒精的合成与酵母的生命过程是分不开的。从这一点出发，他继续进行研究，把发酵与腐烂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类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烂是在已死的有机物质中自然发生的。巴斯德坚持认为，除非有生命物质介入，否则任何东西都不会腐烂。这一主张引起了尖锐的争论。1859年以后，他的主张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在这些实验中，把会腐烂的物质放在不受空中尘埃污染的经过热消毒的容器中可保持不腐。

1865年前后，巴斯德在与蚕病和葡萄园的葡萄蚜作斗争中取得实际成功，这加速了他的胜利，但1870年后开始了科赫与巴斯德齐名的细菌学的伟大时代。通过巴斯德的腐烂实验得到证明的疾病细菌理论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然而，从哲学上讲，生机论产生了阻碍医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在最需要科学研究的地方，生机论给正常的因果概念注入一种神秘而又不可分析的生命力，据说这种生命力标志着大自然中的一种绝对特征。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在实验生理学的

主要人物中，只有弥勒是生机论者；在德国，路德维希和施旺，在法国，马让迪和贝尔纳都支持反对学派。他们利用化学提供的更有力的研究手段和高倍消色差显微镜，亲自详细观察作用过程；刺激剂通过神经系统到由其引起的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的踪迹；食物在恢复组织和转换为能量方面提供有效成分的情况。有些问题则要求更精密的技术以揭示各种结构的情况并测定其功能，例如贝尔和马让迪关于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研究工作；实验工作正进入其全盛时期。其他一些问题则等待开辟更广阔的科学前景。亥姆霍兹对感觉的出色研究，将物理学和解剖学结合起来，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更令人瞩目的乃是贝尔纳对代谢作用的研究，这使他获得生物化学方面早期伟大的成就之一。1846年，他证明胰液在把中性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方面所起的作用；1857年，他分离出糖原——糖贮存在肝中的形式。他还最早认识到内分泌，并研究通过神经对它们进行控制。

糖原的发现说明动物的躯体也是可以合成的，从而打破了植物生理学与动物生理学之间以往的区别，即认为在前者，纤维素之类的物质是由它们的无机成分构成的，后者则被认为是破坏性的。这些研究除了在理论方面和医疗方面的意义之外，还使人们考虑生物体是一个密切不可分的有机体，各部分互相关联，功能保持平衡。神经系统不仅可以看成是与周围环境沟通信息和实现意志的工具，而且是调节生物体的温度、分泌和总体工作的机制。生物体所具有的以及其活动所依赖的高度复杂的物质的发现与合成已经开始。以往有关生命性质的一些玄奥的问题被科学远远地抛到后边，因为作用过程的长链（每一过程都受因果关系的正常法则的制约）已被揭示出来。

在甚至更细微的程度上，生理学遇到了生命组织的生长与生活力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被纳入细胞理论的总的范围内，细胞理论由于打破了技术方面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大约在1830年，消色差显微镜已成为一种可实际应用的仪器，它具有高放大率和良好的分辨率；10年后，出现了断面染色法；1870年前不久，磨片切片机问世。许多个世纪以来，在胚胎学中已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卵细胞，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胞，在细胞学中仍具有重要性，虽然对遗传机制（进化论赋予这种机制以新的重要性）的研究当时尚未进行。1831年，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发现了细胞核，1838年施莱登认为植物由细胞的群体构成，这时，细胞结构知识在植物方面比在动物方面更取

得高度发展。施旺于1839年进一步推广了细胞学说，确立了动物界和植物界都是由细胞作为单元而构成的概念。不久后便观察到细胞的分裂，莫尔和内格利分辨出了细胞本身的各部分。组织学具有其本身的复杂性；根据对单细胞有机体的研究和许多不同类型细胞的发现，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说明这些结构单元。此外，魏尔啸于1858年强调生病的细胞在造成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并像巴斯德和主张微生物是病因的理論的其他人一样，强烈反对疾病自发产生的理论。当舒尔策于1861年提出有关细胞的经典性定义和生理学思想中现代细胞理论的见解后，生物的突变细胞学说中所遇到的困难似乎至少像物理学中的原子学说所面临的困难一样大。尽管生机论的不完善的概念到1870年已不再存在，但是在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中生命之谜仍然未能解开，几乎像有机体之对前辈生理学家一样模糊。

在自然史发展的主线之外，实验生物学的进展主要出现在法国和德国。英国人的贡献在于直接从自然史的研究中得出了有关生物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影响并丰富了生物学的每个学科。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林奈学会上宣读的学术论文中，首次阐明了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接着出版了《物种起源》，与一切正统思想宣告彻底决裂。现在已很明显，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一方面对这些科学主张抱着恐惧和警惕的心情，因为它们否认独一无二的人类尊严和《圣经》中所讲的真理乃是神的行动的启示；而同时，进步的思想又使他们充满自满情绪。变化的观念、发展、详尽的阐述和专门化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兴趣，并十分自然地采用成长一词作为比喻；当代文明状况与过去的文明状况之间的历史对比，使人们意识到艺术、科学和制造业的成长带来了好处并将持续下去。这种想法仅仅遭到少数浪漫主义作家的反对，例如卡莱尔和罗斯金，他们不相信科学进步和它的成果。以动的观点研究历史，影响人们的同样的观点去研究社会，研究科学。这表明，对事物照原样进行静止的说明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忽略了事物是如何发生的，又将如何走向未来；而且因为它忽略了所观察的东西是不断变化和短暂存在的这一事实，所以就更加严重地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已将时间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这在前面已经提到，生物学也已要求对其各种原理进行类似的革新。

实际上，在唯一一个学科，即古生物学中，维护生物学理论而顽固坚持宇宙是静止的主张也不得不按照地质学家们似乎已心安理得地追随达尔文所作出的强有力的解释来检验所取得的证据了。关于化石乃是洪水的遗迹的假说或对人类轻信的各种说法的检验，在1830年已经是老生常谈，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地质学已确定地球的年龄为1亿年左右。科学采用的各种主要技术已经形成，地层和构造的顺序已经测定，对世界的许多地区已进行了考察。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是当时的权威性论著。他采用了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原则，否定早期关于地壳形成的灾变说，认为地壳的构型应完全归因于至今仍在进行着的隆起和陷落、沉积和侵蚀的缓慢过程。然而，他追随古生物学之父居维叶（居氏将已灭绝的物种的消失归因于连续灾变），反驳一切认为生存的物种起源于那些只在化石遗迹中才能找到的物种的理论，他的论点尤其是针对拉马克的。地球有一部进化的历史，但各个物种都是近因的产物。

正统的博物学家的理论是简单的。每一个独特的物种创始时都有原始的对偶，通过纯种繁殖，使之以现存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形式繁衍在地球上。这种信念的根据并非完全是神学的，而是建立在以前许多世纪作为主要任务而确立的物种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物种的成员构成一个同种属的群体，按精确选择的特性而各不相同。根据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完善的体系，这种特性主要来源于繁殖机制；物种又依次组成属、目和更高一等的纲。林奈已认识到任何分类学都必然会有人为因素，并认为很可能目仅代表已产生的对偶，种是这些目范围内的分支。但林奈的许多后继者没有听从他的这些告诫，他们忽视了具体的特征的模糊性，而把杂交的准则夸大成为是否属于共同血统的试金石。如华莱士所说，有一些原理，其本身赖以建立的根据相当于种的自然概念，如果我们把种的概念建立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那就成为循环论证了。这些原则是适用的，但是由于植物的整个发展规律的各种因素在1859年尚未被人们所广泛认识，所以才站不住脚。反对任何进化理论的科学论点显然是：既然植物或动物都有共同的祖先，那么尽管沿着不同的道路进化，必然是可以杂交繁殖的；既然根据定义不同的物种不能杂交，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血统。

生物进化的概念在达尔文之前即已存在。在林奈看来，变种，或许还有始终是纯种繁殖的物种，是从共同的群体进化而来的。伊拉兹

马斯·达尔文于1794年，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于1802年，都强调大自然的能动性，但是，在发现生物体将自己的适应性遗传给后代的创造力发生异变的原因时，他们过分轻信了。赫伯特·斯宾塞支持拉马克而不支持赖尔，他在1859年以前就已提出进化的哲学。在其间的半个世纪，地质学证据的积累大大地延长了可被看作实现进化过程的时期，加之历史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有助于为达尔文开辟道路；然而，具有更大影响的是他提出的进化机制。它认为生物体虽然并不通过遗传而得到亲本在后天获得的变异，但发现各代个体之间确实稍有差异；发生微小而无规则的变异（达尔文认为这种变异具有遗传性），促进或妨碍个体在各自种属的正常活动和功能中发挥作用。达尔文采用马尔萨斯的定律：人口比他们的生活资料增长得快，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代人中造成高死亡率，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下来。19世纪中叶社会的人们深深懂得了竞争和弱者灭亡的道理。那些最能适应自然界某种特定地位的个体和它们的后代变得具有特性，在类型上不同于它们的同伙，这些同伙要么灭绝，要么同样适应某些其他生活方式。达尔文常常将自然选择比作饲养人员进行的人工选择，他们只让每一代中那些最接近于他心目中的理想类型的个体繁殖，利用这种方式繁育出与其野生种都不完全相似的具有特征的家畜。因此，尽管他有意识地抵制目的论的影响，但对他来说完全避免这种影响是困难的，因为他的主张似乎可以解释为自然界必须有目的地使生物体最有效地适应宇宙万物中的各个小生境。

达尔文在他早年作为博物学家时即开始构想他的进化假说。《物种起源》之所以经过长期酝酿是由于要积累详细的证据，根据这种证据才得以形成一种有充分道理并能贯彻到底的学说。他深知他的思想大胆鲁莽，将会遭到强烈反对。在接连问世的著作中对各种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类的遗传》（1871年）。为了这个新目的而对整个自然史进行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达尔文的天才在他研究这一课题的高超本领中最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因为在这个课题中几乎每个词都是从与他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出发写成的。他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被迫依靠自己亲身的观察和实验来为他提出的新问题提供答案。他不得不革新生物学研究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指望按照他的学说进行改革。单结构发展的比较研究，植物的性生理学，动物的行为，物种的地理分布，遗传的选择机制，生态学和古生物学的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是达尔文几乎从头开创并和谐地融为一体

的现代形式的科学分支。他特别对人工选择给予极大的重视。尽管这个课题在农业上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但以往为科学界所忽视。他研究了伦敦育鸽家们的秘密，并将这些在形态上十分独特的品种同博物学家们几乎无法区别的一些单独的品种进行了比较。然而，遗传学研究仍处于原始状态，以致无法提出任何结论性的论点，足以反驳正统观点的批评，达尔文有关这些问题的仍不十分严密的推理同10年后孟德尔关于遗传问题的精确实验对比起来也相形见绌。总之，对进化论来说，无知也许比并非无知更有利。达尔文预料到批评他的人还会提出许多其他反对意见，例如如何保持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原种的纯正品质，或退化和不完善的器官究竟有什么用处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物种起源》中最不令人信服的部分，因为该书的说服力主要在于对这个学说的概括论述，而在比较和发展的研究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才能充分揭示高等动物和高等植物的进化过程。生物由之组成的细胞的进化变异当然是任何正确的进化学说的必要基础。虽然这一点或许在1860年已经为人们所了解，但细胞学的进展实际上在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文献中极少反映。

《物种起源》引起的批评狂潮和轻蔑嘲弄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冲突是激烈的，但就所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相对而言却为时较短，因为这些问题深深地涉及基督教文明的根基。在博物学家中，胡克和赫胥黎很快就倒向达尔文的观点，赖尔也使地质学家们支持达尔文。到这个时期的末期，科学家们虽已普遍接受达尔文主义，但阿加西斯、欧文和塞奇威克等人最初提出的批评决非完全因偏见所致。达尔文的论点中的某些部分确实存在足以引起科学上的怀疑的缺陷。某些早期的反驳意见其立论基础与近期那种认为达尔文主义已经过时的论点一样。如果说较早期的怀疑论者是墨守比较脱离实际的自然哲学（生机论也是一种表现形式）的话，那么其他人像在德国的克利克之所以攻击达尔文的学说并非是由于它是进化论——据声称各种各样的进化假说都是可信的——而是由于它包含着目的论，由于缺乏过渡形式的证据，而且由于它关于遗传的论点缺乏有力的根据。就古生物学来说，在1870年确实还没有提出什么进化论的证据；人类学史则几乎还完全没有探索过。对于众多的追随威尔伯福斯主教而反对达尔文的人来说，等于是看到了光明，这反映在这位主教对基督教《圣经》进行诠释和他在人的灵魂这个最令人头痛的复杂的奥妙问题上所提出的主张上。在教皇统治下由于讨论哥白尼的宇宙论而引起的对科学的仇视，

很久以来已经销声匿迹。而在新教教徒中，既信仰科学又信仰宗教已形成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更深地崇拜造物主的愿望经常促使人们对大自然进行研究。现在，这种和谐状态被打破了。1864年，庇护九世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直言不讳地宣布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坚定地反对现代文明的趋势，谴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影响（参见第4章，原文第90—93页）。从这个立场，再也没有后退。但新教教会一般已接受并开展了1859年以前在德国即已开始的对《圣经》的语言和历史的科学研究，并逐渐与达尔文主义妥协。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震动是深远的，但由此而衰微的是宗教的权威而不是科学。达尔文本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对法拉第的单纯虔诚在科学界越来越显著了。

19世纪中叶的医学仍然距离实验生物学和理论生物学甚远，不过接近这个时期之末时，已有人提出医学应由一种技艺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一般的治疗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听诊器和体温表虽已发明，但医生还是更愿意采用老的诊断技术而不愿意使用医疗器械。许多最引人呕吐的和无效的调剂已被禁止纳入药典，某些真正有效的药用植物，如鸦片和洋地黄等，已采用化学方法制成纯剂。由于能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疗法极少（这些疗法包括服用奎宁治疗疟疾和用汞治疗梅毒），患者充其量只能指望强健的体质辅之以补药，再适当注意减轻疼痛症状。培训医务人员的工作在1870年也许比在1830年较为完善，要求他们必须学习更多的一般科学知识。医院是骇人听闻的死亡之地，在那里，穷人治愈疾病和分娩成活的机会比在家里接受治疗的富人要少得多。改建这些几乎是中世纪的医疗机构大都是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事。罗马天主教徒患者的治疗仍然像从前一样由护理牧师掌管。在新教国家，医疗已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培训有一定质量的护士的最初尝试是在德国和法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改组英国军队的医疗工作之前曾学过新的护理方法。这方面所需要的并不是很高深的科学知识，而是一般常识和卫生知识，但医院的管理工作到1870年很少进行过改革。城市生活情况也是如此，往好处说是不清洁，往最糟处说是难以想象的肮脏，尽管国家在1848年制定第一个英国公共卫生法后已开始承担某些责任。就人们的知识而言，在为城市提供净水，处理污水，设立公共浴池，建筑像样的工人住宅等方面几乎无科学可言。促使人们改善这些方面的状况的，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即认为坏气体会致病，对社会上最低层的人所过的令人

作呕的家畜生活表示怜悯，以及连较好的地区也无法避免发生贫民区的流行病的经验等。黑鼠造成瘟疫流行；在较洁净的城市，斑疹伤寒和霍乱造成死亡的人数虽少，但这些疾病的传染源和传染媒介人们仍然没有弄清。

另一方面，外科手术则直接受益于有机化学的进展。1844年在美国，莫顿和韦尔斯使用乙醚作为麻醉剂，1847年辛普森使用氯仿作为麻醉剂，从而解除了外科手术中最令人害怕的事。这些先驱者不得不经受专业的和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反对，而且最初的方法也不完善。产科的医疗器械和技术以及诸如截肢及膀胱切石术等少数外科手术已经高度发展，而且由于需要快速，使一些最好的外科医生具有熟练的技术。尽管可借助于麻醉剂，但在这方面还不可能有什么改进，因为创伤受坏疽或败血病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外科医生的活动范围仍很有限。由于外科手术死亡率一般为50%，所以在利斯特于1865年在格拉斯哥采用消毒法之前，人们只是在最后不得已时才接受外科手术。利斯特后来相信了细菌致病的理论，亲自反复进行了许多次巴斯德关于腐烂的实验，他把余生的闲暇时间都用于研究微生物。其做法目的在于通过用苯酚喷洒仪器、病人、手术人员的手、穿的衣服，甚至空气，以消灭一切可能的细菌传染源。他的实验获得直接成效，逐渐迫使他的同事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在1870年后，使外科手术得到迄那时为止不可思议的范围的扩大和安全。

利斯特的发现是一位本身并非从事创造性研究的科学家进行科学发明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在早期从医时苦于病人感染化脓而不得不动外科手术的事实，对组织的化脓同死亡物质的腐烂进行了比较。在巴斯德的研究成果中，他发现了说明死亡物质腐烂的原因的理论，并在有机化学中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药剂可以阻止这种腐烂。通过实验，他的方法的详细步骤臻于完善。在化学工业中或电力工程中合理应用这一发现的过程也大致相同。1830年以前，技术方面和医疗方面的改进是由于出现事故或反复实验的结果，而在1870年以后，则大都是设计的成果。在这方面发生变化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年代也许是从1855—1865年那些年。从17世纪以来人们即已意识到科学同时具有物质目的和哲学目的，在19世纪中叶仅仅限于实现前者。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性质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因为从发现到应用一般要间隔很长时间。但这确实意味着，如果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物质的进步，那么

发明家的作用就极为重要；而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具有科学经验的媒介，致使工业进步一直到1855年前后仍然主要掌握在纯粹以实践经验为主的人们的手中。早期的发明家们，剽窃一点原始科学（例如蒸汽机的原理等）并在自动机械方面模仿纺织工人的动作，创造了一个产业革命的丑恶社会。他们的笨拙的才能虽然仍起很大的作用——到1851年，他们将铸铁用于适当的和不适当的一切目的——但由于它失去与科学的联系，因而没有得到任何新的启示。他们的目光局限于煤、铁和蒸汽，直到1855—1870年科学发明家们的介入，才出现了新的材料和方法。这种偏向最初并不明显，无法说明例如碱厂或含磷火柴厂的条件就比纺织厂的条件好。劳动强度的减轻应归于人道主义运动和社会立法，1833年以后，这方面的斗争越来越取得成功。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有了便宜的面包和税制改革，而不是科学。例如在英国，1830—1850年，工资一直保持相当固定，但生活费用呈普遍下降趋势。1857年的繁荣崩溃后，物价停止大幅度上涨，从1850—1870年，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参阅第2章，原文第47—48页）。最差的住房条件，最长的工作时间，最严重的饥荒，已经或正在消失。然而，粗略统计的死亡率并未明显地出现下降迹象，一直保持在22%强，不过这个数字一直低于法国或比利时的死亡率，尽管法国的农业人口较多。气候较冷、人口不太稠密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要健康得多，丹麦的人口死亡率从1840年的20.3%下降到1870年的19%——大约比同期英国乡村的死亡率稍低一些。只是在1870年以后，科学才使得健康状况像制造技术一样得到极大的改善。

像孔德和斯宾塞这样的人物在思想史方面起到了技术发明家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阐明科学知识的思想和哲学内涵，因为正如同一项发明也许会引起一项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一样，例如斯宾塞也同样促使生物学家们更加仔细地检验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原理。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们对这样的人物虽然没有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们的思想，尽管在事实和逻辑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仍然已经变成了人们普遍的意识。实证主义学派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但是，科学作为一门特别精确、严格和实际的知识已经变成通用的语言。当人们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当他们终于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比罗马时代的世界更富裕而且更有学问时，他们也深信带来这种福祉的主要是科学思想，并越来越相信它今后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人民大众对科学的兴趣已从讲述自然史、天文学和在客厅里谈论奇迹逸闻而转向电学和

化学这些有建设意义的科学。从正面意义讲，科学意味着知识和力量。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的学说更具有无穷的力量了：它立论的内涵是生命具有可塑性，科学不屈服于上帝造物的柱石——疾病、劳作和谦卑。从反面意义讲，凡是不属于科学领域的东西都不是知识，而是任意的或因循守旧的东西。到1870年，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上述论点，规定科学见解不可逾越的范围；新教教会虽然还没有被达尔文主义所击败，但已不能再有效地坚持道德法则也同科学法则一样明确无疑了。那些忽视信仰自由、理性主义和思想自由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的人往往认为，进化论对于传统的宗教是一种突然而极为巨大的打击。事实上，拒绝相信别的权威正是科学方法所固有的特点，尽管许多早期的科学家本人拒绝作出这样的推论。达尔文并没有提出科学遵循的是最单纯的假说这样的理论；他从自然中排除的原始的天命观也是早已被自然科学和严肃的哲学所拒绝承认的。唯物主义，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相信宇宙间一切现象，包括人类在内，都可简单归结为物理学家所说的物质和能量这一事实。《旧约全书》文字中所列的年代顺序与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定论之间的矛盾；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36年）和蒂宾根学派的著作中对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的批判性研究，所有这一切早在1859年以前很久就造成了19世纪中叶的宗教危机（参阅第4章，原文第101—102页）。如果说在英国和美国，从前一直很谨慎的自由思考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突然迸发出各种评论，那么从伏尔泰的时代起，反教权的怀疑主义就已成为自由主义在天主教欧洲的试金石。然而，达尔文主义在它引起的究竟应忠于哪一方的论战中起了催化作用，而由于新教神学倾向于断言它的教义完全以理性为根据，而不是建立在盲目迷信的基础上，从而使这种论战更加扩大了。达尔文主义是对基督教《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最后打击，但它并没有填补所谓科学无所不知的说的最后漏洞，因为还有许多更加微妙的借口，可以用来为需要由上帝设计的说法进行辩解。科学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偶然现象，正如一位统计学家所设想的，并不完全能起造成混乱的作用；并表明，至少现存的世界及其现存的物种并非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和永远不变的东西。同样，在传统的哲学中，使生物学能够像力学之立足于17世纪后期思想界一样而立足于19世纪思想界，达尔文的影响远远超过斯宾塞的影响。但是，设法说明人类在道德伦理方面并不是退化，而是由直立猿

人经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而逐渐进化的一种生物，在1870年几乎还没有开始。在这方面，心理学和人类学这两门新科学起了关键的作用。

（陈养正 译）

[1] “科学”在此处是就自然现象的互相合理相关的知识而言。火车头的发明严格地说来是一项技术发明；但使铁路可以快速通信的电报术严格地说来则是一项科学发明。

[2] 1870年，布雷德福煤气工厂每年处理其废料要付出800英镑；而在1878年，出售这些材料每年可获得1万英镑。

[3]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逻辑体系》（第7版，伦敦，1868年），第2卷，第414页。

[4] 磁场对光的作用由法拉第于1845年表述出来。

[5] 同样数目的原子，类似地排列，在两种物质中产生同样的结晶体；同样元素的相同比例，产生两种化学性能不同的物质。

[6] 前者为一种以大黄为主的泻药，后者为一种用泻叶和泻盐泡成的泻药。——译者

第四章 宗教和政教关系

加富尔的名言“自由国家里的自由教会”，成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政教关系方面最有影响的原则。这句话过分标新立异，不易为人们普遍接受。法国革命在其直接征服的领域范围以内，甚至在此范围之外，不仅动摇了王权，实际上也同样动摇了教权，打破了传统的政教联合局面。因此，在英国，越过英伦海峡而来的移民，不论教士还是世俗人，都受到同情的接待。简·奥斯汀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英国国教的教士，现在充当了新的重要角色，成了教会反对雅各宾主义和无神论的战斗队的指挥官。当代法国历史学家A. 拉特雷耶教授认为，1789年的各项原则是极权国家与基督教在现代发生冲突的预兆，从而在实际上证实了这种解释。他说“于是便要求完全服从国家和法律，可以与宗教上的服从相比拟，于是也就产生了狂热的决心，心便在一旦遇到阻力时保证使维护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各项原则获胜”。^[1]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也将包含着把甘必大的格言“教权主义就是敌人”变成“基督教就是敌人”这样的内容的话，那么，随着拿破仑的失败而来的基督教会的反应，其性质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不是比较容易为之开脱的话。在法国，复辟了的波旁王朝力主同教会结成最密切不过的联盟，力主把教权和王权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教皇统治也随着取得胜利的盟国的辎重列车重返罗马和教皇国。即使在英国，对不信奉国教者，不论其为教皇派或清教徒，均不能与信奉国教的兄弟们享受平等公民权的传统政策，最初似乎也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背离。但是，到了1830年，1815年的解决办法所掩饰的裂痕，开始再次暴露出来；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一个实行镇压的政权并不能把1789年的后果磨灭掉。1828年，英国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标志着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胜利，虽然这些法令有将近一个世纪没有实施，而且这些法令的废除只不过是争取公民平等和争取取消尚存的各种禁令的长期运动的第一步。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于翌年解除了罗马天主教的各种禁令；与此同时，1828年还创办了伦敦大学学院。这是第一家不由教会管理，而是完全进行世俗教育的具有大学地位的教育机构。此外，1830年7月在巴黎发生了显然是反教权性质

的革命。面对着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英伦海峡两边的国教不得不拟定出有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新理论和新做法，并针对自由主义而树起新的防御屏障。

在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观点的各种尝试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由拉梅内发起，得到拉科代尔、蒙塔朗贝尔和热尔贝支持的在法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这一运动似乎十分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比利时的一个相当的派别得到启示而发起的。在比利时，有以马利纳大主教德梅翁为中心的一群自由天主教派人士，其领导人是这位大主教的教区代理主教昂热尔贝·斯特克斯，斯特克斯本人后来也成为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但“马利纳学派”的名声不久就被法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所超过。到1830年，拉梅内从一个热情的保皇派转变成一个同样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已经以他那出人意料的天才完成了一系列根本大转变的第一步。“人们在自由主义面前发抖；让自由主义成为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吧，这样社会就会获得新生”，^[2]这已成为他的新政策的箴言。1828年他发表了《论革命的进程与反对教会的战争》。在这部著作中，他呼吁高卢派教会承担责任，向忠于波旁王朝的垂死政权要求自由，要求改组国内体制，特别是对它的教士进行教育的权利，以便为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做好准备。1830年的反教权动乱起初似乎预示着对这个新福音来说不利的征兆；但在10月，拉梅内和他的门徒们在巴黎创办了一份日报《前途报》，在该报第一期上拉梅内要求宗教与自由结为一体：“上帝与自由，让它们合而为一吧。”而如果教会不与国家结成联盟，那就只有依靠罗马教皇；这些革新者的纲领有赖于罗马给予支持，以抵制法国主教团的反对，因为法国主教团自然而然地对实现四大自由的要求感到恐慌。这四大自由是：教育自由（包括取消国家控制的拿破仑的教育总署享有的垄断权）；出版自由（包括废除审查制度）；结社自由（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宗教团体的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包括每个教会有权对自己的成员绳之以纪律）。因此，一切都有待于罗马作出决定。在罗马作出决定之前，拉梅内创立了“保卫宗教自由总会”。与此同时，埃克斯的方济各会托钵僧和米勒雷的西多会修士行使了成立宗教社团的权利；在巴黎，不顾教育总署的反对还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这确实要比《前途报》要大得多的威胁。这是“天主教的行动”；由于国内外敌人开始围攻改革派，拉梅内在1831年11月采取果敢步骤，停止出版他的报纸，并吁请教皇亲自调查他的主张并提出报告。可惜对改革派来说，格列高利

十六世除了与格列高利七世同名以外，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即使他本人的政策想那样做，他所处的地位也不允许他得罪国内的王公们，而去支持一个革命的主教团，团结在拉梅内的旗帜下。因此，当拉梅内、拉科代尔和蒙塔朗贝尔在12月到达罗马去为他们的事业亲自进行游说的时候，竟没有得到教皇的接见，直到次年3月15日，教皇才接见了他们，为时只有15分钟，而且谈话也是一般而不得要领。

在返回途中，他们在慕尼黑受到格雷斯、多林格尔、谢林和巴德尔组成的著名天主教团体的款待，但是就在那里他们受到教皇1832年8月15日颁布的诏书《对你们感到惊异》（*Mirari Vos*）的打击，该诏书给他们所抱的希望敲响了丧钟。格列高利十六世不但拒绝承认这些改革派，而且还谴责他们的改革运动所遵循的原则。诏书谴责关于废除政教协定的要求；它驳斥了这样的意见：教会需要更新和改革，或者它应与革命的自由主义结成同盟；它谴责对宗教的冷漠态度；它特别痛斥冷漠态度的主要错误，即良心的自由；它还谴责言论自由。稍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红衣主教帕卡在诏书前面写的一封信解释说，虽然诏书驳斥了自由天主教的主张，但是，考虑到《前途报》和它的编辑们过去曾为教皇效劳，所以没有专门点名加以谴责。

这道诏书的影响十分深远；因为拉梅内虽然起初表示服从，但他宣布改变信仰为时甚短；不出两年时间，罗马进一步发出了严厉谴责，即1834年7月7日发表的通谕《我们独特的》（*Singulari Nos*），指名谴责他所著的《一个信徒的话》包含着“各种各样虚伪的、诬蔑性的、轻率的、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违背《圣经》的、不虔诚的、恶意指责的和错误百出的论点”。然而，尽管自由天主教运动因此失去了它的领袖，但它的追随者拉科代尔和蒙塔朗贝尔继续高举它的旗帜，而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获得了成功。在七月王朝时期，这一运动实际上已重新抬头。这是由于：一方面，拉科代尔在四旬斋期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为其教义进行辩护的会议；男女信徒们的宗教团体均已得到恢复；成立了非教士的团体——味增爵会。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印度、暹罗和中国，传教活动突然十分活跃起来；在印度支那，许多传教士英勇的殉道精神使这些传教活动尤为崇高。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梅内的遗产中存在最持久的成分竟然不是他所最热情宣扬的自由天主教主义，而是教皇权力至上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在自由天主教精神的发祥地高卢派的法国反而把

自由天主教精神扼杀了。《前途报》和《宇宙报》截然不同的遭遇也许最能说明这一奇怪的现象。这当然不是说《宇宙报》的主编路易·维伊奥是教皇权力至上反动倾向的最重要和最典型的人物；虽然他也许是最善于使这种倾向受群众欢迎的人。个人命运奇怪现象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盖朗热长老。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加入拉梅内的集团，后来成为在索莱斯姆隐修院重新恢复的本笃会隐修院的院长，主张恢复礼拜仪式的主要人物，其结果是，在法国各地的教堂都普遍一致采用罗马教廷规定的仪礼。在盖朗热于1837年被任命为索莱斯姆隐修院院长以后两年，朗格勒主教帕里西斯长老（他的教区在1801年以后包括以前五个教区的部分地区，因此就有五种不同的礼拜仪式）实行统一的罗马教廷规定的礼拜仪式。这种减少礼拜仪式不同的地区的过程，逐步取得进展，于1875年达到最后阶段。在这一年，奥尔良教区迪庞卢主教去世三年以后，也同样采用了罗马的礼拜仪式。在使教皇权力至上主义战胜高卢主义的策划者当中，并非不重要的人物是撰写《仪礼制度》丛书的学识渊博的盖朗热院长，庇护九世戏称他为“盖罗耶长老”。^[3]

但是，有一个时期，自由天主教运动的旗帜威武地飘扬。蒙塔朗贝尔争取天主教教育自由、争取摆脱拿破仑的教育总署对教学的垄断的运动发展壮大，规模越来越大。1831年蒙塔朗贝尔因在巴黎创办一所教会学校被起诉到贵族院，结果被罚款100法郎。这一可笑的惩罚壮了他的胆量，于1843年发表了《论天主教徒在教育自由问题上的责任》。在这一著作中，他发动了一场争取各级教育自由的战斗。在他的影响下，1844年提出了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政府法案，但该法案由于不能被主教团所接受而未获通过。蒙塔朗贝尔遂组织了一个“保卫宗教自由委员会”，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作准备。在教育战线上，“十字军的子孙们”公开向“伏尔泰的子孙们”提出挑战。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在1846年的大选中，有140名声明保证支持这一委员会实现天主教教育自由要求的人当选。政府也不得不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在1847年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虽然不是废除，但减少了拿破仑的教育总署对民办学校的控制。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仍在继续，直到1850年通过了《法卢法案》才算解决。这项法律，由于1848年的许多过火行为所引起的反应，是教会方面的一个胜利，不过它带有妥协的印记，这是因为它必须一方面得到蒙塔朗贝尔和迪庞卢主教的支持，另一方面得到梯也尔的支持，从而受到

像《宇宙报》主编这样一些天主教极端分子的指斥，以及维克托·雨果从迥然不同的观点出发的谴责。这项法律废除了拿破仑教育总署的垄断地位；以一个新的“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来代替“皇家教育委员会”。在这个新的委员会中来自教育总署的成员只有8人，占少数，其余19名委员中有4个主教，2个新教牧师和1个犹太教教士。在每个省都新设一个学术委员会，负责监督当地的教育，有权颁发合格证书（brevet de Capacité），作为教学人员必不可少的职业证明；学校可以是公立的，即国家管理的，也可以是私立的；在私立学校里，国家只有权监督其卫生保健情况；宗教团体的成员，凡是有教学合格证者均可任教。因此，天主教的行动在自由天主教的原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法卢法案》通过后不出一年便开办了250多所新的教育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各宗教团体开办的。和英国一样，群众教育也已成为教会与国家之间进行争论的战场，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与此同时，持续不断地从法国吹来的政治和宗教学说之风对瑞士产生了影响。自从法国革命的影响蔓延到瑞士国土后，由于世俗社会的各种革命口号以及崇尚理性的精神渗透进来，把它的各个州分成天主教和新教两派的那种传统的宗教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在拿破仑被击败后，旧秩序业已恢复；当1830年的革命使自由主义理论在法国重新抬头后，旧秩序的权威同样第一次受到了挑战。瑞士的“新生”运动也许可以说在国民教育的领域内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参看本卷第5章，原文第108页）；彻底改革了小学，设立了师范学院，并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创办了大学。自由主义精神通过这些教育方面的措施得到广泛传播，在一些州受到热烈欢迎，在另一些州则引起惶恐；结果导致在7个自由主义的州缔结了政教协定以保障它们的新体制，在另外5个州则通过缔结政教协定以维护它们的旧制度。事实证明宗教问题实际上再次成为引起分裂的因素。即使在茨温利的故乡苏黎世，小学教育的改革也引起了反对；1839年，由于任命一位自由派神学家到大学里任职而在好几个农业区引起群众起义，并蔓延到市区本身，结果建立了新的地方政府，成员都是保守的教会人士。此外，1841年卢塞恩将该地的新宪法呈报教皇，并大胆进行试验，建立了一种与天主教结成联盟的民主政体。

这就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准备好了舞台^[4]；引起冲突的事件还是围绕着宗教问题。在阿尔高，天主教少数派起来造反，反对

激进派的政策，遭到挫败，被指控促成这次叛乱的一些修道院遭到报复，不久就被解散。但是，不论在瑞士的其他各州还是瑞士联邦外部，这种将修道院世俗化的做法引起了天主教方面的激烈反对。而且，这时冲突已经不是新教各州与天主教各州之间的传统对立，而是新抬头的富有战斗性的教皇权力至上主义与自由思想之间的冲突。1844年，卢塞恩州议会邀请耶稣会士到该州神学院教授神学；这显然是对解散阿尔高修道院事件的一次回击，因而在整个联邦引起反响。激进派接受挑战，组织了一个反耶稣会运动。在唇枪舌剑之后便兵戎相见。卢塞恩、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楚格、弗里堡和瓦莱各天主教州为了自卫而缔结了通称为“分离主义者联盟”^[5]的防御联盟。当这个盟约提交瑞士联邦审议时，由于圣加仑州加入了激进派阵营，使激进派获得了多数，该派遂利用这一多数要求解散分离主义者联盟，认为它与联邦公约不符，并要求联邦禁止耶稣会进入联邦。这些事件是1847年内战的前奏，在这次内战中分离主义者联盟遭惨败。欧洲的各主要国家虽然都认为瑞士内部事务与它们有切身利益关系，但由于分离主义者联盟意外迅速地遭到失败，它们从中进行调停的愿望落空；接着它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到1848年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影响更加深远的革命，因此，瑞士得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根据内战的情况而对联邦宪法做必要的调整。新宪法的特点是温和与和解的精神；在瑞士，教会与国家后来一直保持和平关系，直到1870年因宣布教皇永无谬误随之而来的旧天主教大分裂为止。

“人们在自由主义的面前发抖；让自由主义成为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吧，这样社会就会获得新生。”这就是拉梅内在1830年提出的箴言。而在纽曼和英国牛津运动的其他领袖看来，真正能医治致命疾病的药方恰恰相反。的确，英国基督教历史学家格沃特金仅仅用“改革法案的反响”这么一句话来轻率地说明这个运动。^[6]虽然纽曼宣告与之决一死战的自由主义主要是宗教方面的，但是宗教问题是从政治问题产生的。在纽曼于1832年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评论1830年的法国革命说，“国家摆脱其统治者的控制是不合乎基督教教义的，而摆脱具有神圣的继承权的君主的统治，就更加如此”。辉格党在英国上台执政同样提出了“这个重大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教会不致自由化呢？”如果说在他离开英国期间“自由派的事业的成功使他内心烦恼”的话，那么辉格党人所主张并进行的爱尔兰教会改革计划则促使

基布尔就“国民叛教”问题在巡回审判时作布道演说。^[7]这位文雅的《基督周年》的作者确实曾经劝说他的农村教区的土地所有者拒绝投票选举支持第一个改革法案的候选人。所以，“书册派”信仰复兴运动是在一种恐惧气氛中诞生的。在教会人士当中普遍存在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格雷向主教团提出的整顿他们内部的建议会成为使教会与政府分离和没收教会基金的前奏。新近获得解放的不信奉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徒很可能殷切希望教会与政府分离；而杰里米·边沁则希望没收教会基金作为向他的国立技工学校提供经费的手段。于是，达勒姆的十分富有的教长和牧师会，在范米尔德主教的建议下，决定牺牲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在该地创办一所大学，希望能从预料将由于没收财产而造成的破产中挽回一点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书册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一旦教会与政府分离的灾难突然降临，好为英国教会提供一个存在的理由。纽曼在他以教士为其读者的《时代书册》的第一册中曾直截了当地问道：“难道政府和国家竟然完全忘记了它们的上帝，以致连教会也要抛弃，剥夺其在人世间的荣誉和收益，这样，你们靠什么去要求你们的群众尊重你们和听从你们呢？……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抛弃我们，那么我们该把我们的权力寄托给何物？”答案是明白的：“我们的权力所赖以建立的真正基础乃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使徒教义。”

由于阐明了这个矫正办法，牛津运动便从政治运动转而成为宗教运动。在宗教方面，它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基督教的教义基础，以此向自由主义做斗争。纽曼在他的《为自己一生辩护》一书中公开宣称：“我的战斗是与自由主义进行的战斗；我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反对教义的原则及其发展……这就是1833年运动的根本原则。”在牛津运动兴起之前，英国国教内部占支配地位的是福音派，这派人重新点燃了个人宗教的火焰，并形成了牧师工作的新模式。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重要性也是人们所公认的。他们的领袖们在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中曾发挥了主导作用。就在“国民叛教”的那一年，投票表决为解放奴隶拨款2000万英镑，废奴运动达到了高潮；同年，即1833年，沙夫特斯堡的努力也有了结果，通过了在工业中限制童工工时的工厂法；而且福音派教士和世俗人士一起鼓励在印度和纽芬兰这样一些迢迢万里之外的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牛津运动后来以其教会理论、牧师和圣

事对福音派信仰复兴运动起到了矫正和补充作用。《时代书册》的第一册中便已确立了一种只有国教牧师才算合法的理论。“所有我们这些以我们特有的圣职授予方式被授予圣职的牧师，都承认基督使徒以来神权递嬗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务必认为，凡未以这种方式被授予圣职的人均非真正被授予圣职的人。”为抵制教会脱离政府而确立的这一原则，成为在英国和英国以外的地方鉴别是否真正基督教徒的最有效的试金石之一。为了有力地进行由于这些原则所引起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牛津运动开展了一个普遍深入和影响深远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它恢复了对早期基督教领袖著作的研究；它强调生活的神圣性和严格的道德传统；它恢复了秘密忏悔和赦罪的纪律，恢复了各宗教团体；它注重宗教礼仪和礼拜方式；所有这一切形成思想和实践方面普遍水平的变化，无异于发生了一场革命。由于皮由兹和基布尔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尽管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不顾一切仰仗罗马的成分，尽管纽曼于1845年、曼宁于1851年先后引人注目地前往罗马，但这一运动并未因此失去自信心而且取得了成功。

但是，牛津运动在向国家挑战的时候，它的语调和当时发生在苏格兰教会的事件相比则是比较低沉的。在苏格兰，教会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激烈冲突。这一争端是由地方上教会行使授予私人圣职的权力而引起的，这一权力虽然为1707年的联合法^[8]所禁止，但是，联合议会于1712年又加以恢复，在18世纪到处行使。1834年，苏格兰长老会大会重申在一个教区内家族的族长有权以多数票通过把一个不受欢迎的参加者排除在外。同年在奥赫特拉德，1837年在马诺奇均付诸实行。与此同时，前一争执在诉讼方面出现了问题；苏格兰最高民事法庭确认了授予圣职的权力，而上诉到上议院后则裁定限制教务评议会的权利，对证据确凿的关于异端邪说、愚昧和不道德行为的指控无权驳回。这一决定虽然在法律上无可非议，但并不能解决通过私自授予圣职把一个牧师强加给一个反对他的教区因而不可能建立融洽关系这个困难问题。而且，坚持教会权利运动的领导人托马斯·查默斯在大会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到1840年，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格兰的圣职授予制度不是应予调整而是应予摧毁”，它体现了“涉及一切国家和教会共同利益的那场伊拉斯谟学说的大争论”。因此1842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私自授予圣职的制度，并威胁说，如果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将退出长老会；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

“本王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和全世界各地一切属于改革派的教会，凡是信奉唯有主耶稣有权主宰他的教会这一伟大教义的，都应证明正是因为他们信奉这一教义……这个教会才受到苦难；如此神圣地作出誓言并保证给予它的那些权利正处于危险境地”^[9]。女王政府认为这些决议是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威胁便于1843年5月24日付诸实行，474名退出长老会的牧师在这一天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其结果十分惊人；不出四年这个教会就筹集到125万英镑，修建了654座教堂。由于出现这样的奇迹而戏剧性地和成功地置极权王国于不顾，致使一位本来并不特别同情教会方面的权利要求的现代评论家，在感动之余，记录下他的惊讶心情：

对于牛津运动和1843年苏格兰国教大分裂二者之间十分类似之处，本来不应更多地注意。这两个运动基本上都是反伊拉斯谟学说的运动。参加这两个运动的人们都坚决主张反对国家包办一切。这两个运动存在的时间相差无几。从狭义上来说的牛津运动开始于1833年，而于1845年，即纽曼转变信仰的那一年结束；以查默斯为杰出领袖的苏格兰国教分裂开始于1834年苏格兰国教大会废除可以授予俗人圣职的制度，而于1843年结束，当时那些拒绝接受他们称之为国家侵犯教会管辖的特殊范围的人退出了该运动。正如当代人士所十分明确地承认的那样，这两个运动都力图……制定一种教会的原则，这个原则根本不理睬国家，使教会成为一个完善社会的总的组织。^[10]

和蒙塔朗贝尔的自由天主教运动一样，苏格兰教会以实际行动来加强它的抗议活动；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极权主义的国家均未能占上风。

1851年，英国恢复了罗马天主教地区教阶制度，取代了代表教皇的名誉主教管理制度，这是教会蔑视国家取得成功的一个较小的例子。1850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即已决心进行这一改革，威斯敏斯特新任大主教尼古拉斯·威斯曼给教区的一封言辞夸张的信是这个决定的先声，而这封信却激发了英国舆论界潜伏着的反对罗马教皇制的警觉。约翰·罗素勋爵1850年11月4日“致达勒姆主教的公开信”斥责这个“目空一切的阴险狡诈的行动”，但形势并未因此而好转。直到1930年还活着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英国圣公会高级教士还记得1850年11月5日罗马教皇是如何充当了盖伊·福克斯那样的角色^[11]，当时他亲身参加了在约克焚烧真人一样大的模拟人像的示威游行，模拟人像上写着“啊，不要皮奥，不要，不要！”^[12]不幸的是，这些示威游行

不单表现了学生般的感情冲动；因为在罗素的倡导下，不顾布赖特和格莱斯顿的反对，以占很大优势的多数票决定把教士资格法载入法令全书。该法案禁止罗马天主教教士拥有地区主教的头衔。尽管如此，罗马天主教的改组工作仍然按计划进行；该法案所规定的惩罚措施并没有执行；格莱斯顿在他第一届任期内不声不响地平息了内阁的不满。

与此同时，国教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集中在教育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在新教徒达到了使不信国教的教士获得婚姻权和丧葬权这一最初的目标之后，随着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的斗争而出现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制度，由于国家介入了这个以前民办的领域而逐渐改观。1833年，政府首次拨款2万英镑用于教育经费，由“按照国教原则促进贫民教育的全国贫民教育协会”和它的竞争对手“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根据各自领导的学校多少的比例分配。随着国家补助费的不断增加（到1850年已增加到每年12.5万英镑）和国家更多地干预教育事业（其标志是1839年成立了一个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到1856年改为教育部，由枢密院一位副主席主管），在国教和自由教会之间发生了关于是否应使用国家经费资助在学校中开设不同教派宗教礼仪课的严重的意见冲突。起初，非国教教徒确实坚持他们一向主张的民办原则，即爱德华·贝恩斯在1843年所主张的：“教育人民不是政府管辖的范围；如果承认教育人民是政府权限内的事这一原则的话，那就会产生对公民和宗教的自由都致命的实际后果。”^[13]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不论是教会还是民间团体都没有力量为全国范围的教育系统提供必要的手段，由于国家对教育的兴趣越来越大，因而使人们改变了态度。到19世纪中叶，不信奉国教者主张由国家管理教育，只要教育成为世俗的或至少不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而国教派则由于当时掌握着绝大多数小学，因此拒绝为上述任何一种目的而交出这些学校。在格莱斯顿第一届政府任期内，1870年的福斯特教育法案才使这一冲突有了结果，因为这个法案建议继续开设民办学校（尽管民办学校具有十分浓厚的英国国教色彩），建议增加国家拨给民办学校的经费，并在有必要的地方开设寄宿学校。宗教问题，则由于考珀—坦普尔条款的提出而得到解决，该条款规定，在新的寄宿学校宗教课不得具有教派倾向，容许家长以信念为理由，不让他们的儿童聆听这样的宗教课。和法国的《法卢法案》一样，这个法案是一种妥协，它是英国国教的一大胜利；因而受到诸如伯明翰的戴尔这样的激进自

由教会人士的批评。戴尔宣称：“哪怕是根据一个自由派内阁的命令，我们也不会同意任何这样的主张，即以教育措施为名，授权某一教派征收捐税，用于讲授其教义和维持其信仰。”^[14]这个法案并没有解决教派之间的竞争，反而成为由于接受两套学校系统而进一步引起不和的因素；从而使国教派与自由教会派之间的争吵持续下去，在此后四分之三世纪里使公共教育深受其害。

不论是在法国或是英国，把关于教育和教会与国家各自掌管教育的权力的漫长争执过程，简单地说成是人们对神学的厌恶的恶性发作，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虽然在争论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从表面上看无足轻重，而其实质却是重要的，现代极权国家的出现正好突出说明了这一点。此外，B. L. 曼宁所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国会议员》^[15]的历史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过去所作出的反响。它谴责了“格莱斯顿的愚钝和福斯特的恶毒”；它表示十分蔑视“教育委员会那个固执己见的加利奥斯”；它最后断定“到目前为止在英国还没有被认识到的教权和反教权斗争的种子是由前公谊会教徒福斯特播种，由白厅的那些不可知论者浇灌的”；它提出，在宗教教育问题上，那种能使同一个屋子里的人同一个心眼的神奇万应灵药就连善于随机应变的英国天才也发明不出来。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关于这个特点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那就是1845年的《不信奉国教者教堂法》，该法案宣告，凡由上帝一位论派实际拥有已达25年的教堂、牧师住宅和捐款，即法定继续归其所有。这些教堂、牧师住宅和捐款原先是供宣扬正统的新教三位一体论而遗留下来的（在一系列具体案件的司法决定中也是这样判决的），在18世纪，这些东西便已移交给了上帝一位论派了。英国议会不顾信托书的条款或虔诚的创始人的意图而从实际政治利益出发就一个神学问题作出决定，它这样引人注目地表现出它拥有无限权力尚属罕见。采取逐渐的步骤使古老的大学向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开放尤其值得称赞。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1854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取消不许授予不信奉国教的人学士学位的规定，两年后又取消不许授予硕士学位的规定。这一过程到1871年通过格莱斯顿的大学考试法而实际上宣告完成；该法令规定：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达勒姆大学的全部职务均向不信奉国教的人开放，只有专门给教士的奖学金、某些学院的院长和神学教授的职位除外。该法令还为自

由教会的神学院重新回到各大学打开了道路，这对教会、国家和学术界都是有利的。

然而，英国宗教生活的多样性显然对于想要把它加以概括或综述的人来说是个障碍。卫理公会教徒在19世纪前半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由于时时出现内部分裂和脱离该教派的结果，这一情况在1844—1848年的关于“宣传小册子”的争论中达到了高潮，后来开除了大约5.7万人，公理会和浸礼会于1831年成立了各自的联合组织，从而为更加密切的联合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英国长老会教徒实行了改组，这对他们从18世纪他们的先辈一味倾向于一位论的境地恢复过来是至关重要的。据1851年宗教普查的最新数字，英国国教共有14077座教堂，可容纳5317915人；其次是卫理公会（他们内部又分成许多派），有11007座教堂，可容纳2194298人；独立派共有教堂3244座，有座位1067760个。罗马天主教除恢复它的主教管区外，由于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和由于威斯曼大力提倡改宗天主教，其信徒的数量大大增加。1865年，威斯曼担任的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职务由本来信奉英国国教现改宗罗马天主教的曼宁继任。罗马天主教教徒们从纽曼所描绘的“不敢见阳光的种族”突然变成曼宁所推进的富有进取心的教会，这一情况在W. B. 乌拉索尔内主教的自传中作了极其生动的叙述，乌拉索尔内生于1806年，一直活到1899年，他亲自经历了这个天主教扩大和巩固的世纪。

然而，与此同时，庇护九世于1846年任罗马教皇，他的即位成为欧洲各国政教关系发生整整一代冲突的先声。庇护九世的当选是个不祥之兆（梅特涅对此事的评论是，除了一位自由主义的教皇，别的一切他都能对付），它在天主教自由派中间重新燃起了希望，认为他们的事业终将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但是，皮奥·诺诺^[16]的自由主义显然已经软弱无力了，发自他的好心而不是他的信念；就连它的一些初步的表现，如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成立调查委员会研究对教皇国行政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及任命一个国务会议和内阁等，也注定要在1848年的狂暴震荡中夭折（参看本书第21章，原文第565页）。因为1848年的革命也影响到罗马。罗马宣告成立共和国，迫使教皇逃亡到加埃塔，到1849年他才作为法国军队的代理人在法国军队的继续保护下回到罗马。这些法国军队是路易·拿破仑为了击败奥地利，使他自己获得教会保护者的美名而派去的。教皇同自由主义的调情从此告终。此

外，教皇在流亡时还曾寻求圣母玛利亚的特别保护；在1849年圣烛节他发通知给各教区主教，征询天主教徒对把圣灵怀胎的信仰提高到信条的地位持什么意见。这个说法得到耶稣会会士们的热烈支持；罗马学院的佩罗内教授以在他神学上的敏锐阐述了公开的传统和潜在的传说之间的区别，论证后者足以成为一种教义。1854年12月8日，庇护九世正式下了定义，宣告“教义所教导的最幸福的圣母玛利亚在她受胎的第一瞬间就是万能的上帝的特别恩赐……不受原罪的玷污而保持了贞洁。这乃是上帝的启示”^[17]。和这个定义的内容同等重要的是公布这个定义的方式，因为虽然对各个教区的主教作了调查，1854年11月罗马的大约150名主教在四次会议上辩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宣布这个定义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取得大会的同意。

在从宣告圣灵怀胎的定义到发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间相隔10年，在这10年里，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意大利，一步步恶化。在皮埃蒙特—撒丁不但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控制了公共教育，而且他的对外政策也有意刁难教皇。1859年拿破仑三世与加富尔结成同盟，把奥地利赶出伦巴第平原，吞并中部各公国，加里波第远征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及消灭教皇国的前奏；消灭教皇国后只给罗马教廷保留罗马城，而这也还是法国驻军延长了它朝不保夕的占领地位的结果（参看本书第21章，原文第571—574页）。拿破仑三世为了摆脱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缔结了1864年9月的条约；根据条约，这位皇帝答应永远撤出其驻军，交换条件是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允诺不在罗马而在其他地方建立意大利首都，保证将罗马给教皇。但是，在撤离中的法国军队才走到契维塔韦基亚又出现了教皇取得罗马的威胁，法军又急忙返回，支撑罗马教廷剩余的那部分势力。正是处在即将发生革命和叛变的噩兆下，教皇决计向世界发表正式受教会当局谴责的错误原理和学说的汇编。

这个《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后来成为利奥十三世的当时的佩鲁贾主教的一项提议，这个提议是1849年在斯波莱托的一次公会议上提出的，主张教皇应发布一道通谕，列举当代有关教会权力和财产权的错误学说。1851年，新创办的耶稣会月刊《天主教文明》主张在这些错误学说中再加上理性主义和准理性主义；1854年，教皇任命的一个神学家委员会开始着手起草这个通谕；1860年，佩皮尼昂主教热尔贝（以前是拉梅内的门徒）发表了《关于当代各种

错误学说给教区的指示》，其中包括85种错误主张。后来教皇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把这几种意见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蒙塔朗贝尔的活动又进一步提供了谴责的题目。在1848年之后，天主教自由主义的命运确实是大起大落。最初，在法国，革命似乎已使人们所希望的天主教教义与共和主义合而为一（如农村神父主张到处种植自由之树，有三个主教成为制宪会议员，拉科代尔通过民选当选为马赛的议案），而到了6月，局势恶化，尤其是当巴黎大主教在动乱中为了拥护当时的政权而以身殉职的时候。因此，绝大多数天主教自由派人士都欢迎路易·拿破仑的当权。但是，在政治方面的自由主义现在却被置于遥遥无期的、三心二意的自由帝国实验的地位（参看本书第17章，原文第456—457页）；天主教自由主义没有希望找到和它志趣相投的第二帝国的气氛了。天主教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不得不指望他们的原则在国外取得胜利。1863年在马利纳举行的天主教代表大会上（天主教自由主义运动曾在马利纳处于开始兴起和初步兴盛时期），蒙塔朗贝尔再一次高举起他的旗帜。他祝贺比利时认识到“公共生活的新形势，并接受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独立的原则”。他还指出，正如天主教徒对旧秩序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一样，他们对新秩序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确实，比利时1830年以来的历史证明，由斯特克斯领导的天主教自由派与政治上的民主派结成联盟以产生1831年的宪法是正确的；红衣主教斯特克斯仍然在指导着比利时主教区的政策，直到他于1867年逝世为止。蒙塔朗贝尔冒着离经叛道的危险表示他同意接受宗教自由，并把宗教迫害与政治相提并论，以此努力表白自己的主张：“我认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法官对离经叛道者所说的‘选择真理，或者选择死亡’，和法国恐怖主义者对我的祖父所说的‘选择自由和博爱，或者选择死亡’同样令人憎恶。”他还对自由推崇备至。

“我所说的自由是完整的自由，不是只有政治自由而没有宗教自由；我指的是以习惯法和平等为基础，由理性和正义所规范的现代自由、民主自由，而非其他。就我来说，我坦率地承认，我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公共自由的牢固结合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8]他这样毫不含糊地采纳加富尔关于自由国家里的自由教会的信条和无条件的民主自由权利的概念，致使普瓦蒂埃的皮埃主教正式向罗马教廷对他提出控告，竭力要求点名明确谴责他的主张。但是，庇护九世一方面宣称应尊重信仰自由（尽管教会决不能在原则上承认和赞成这种自由，而只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另一方面拒绝公开谴责蒙塔朗贝尔本人，而

把对他的各项原则的谴责留待即将颁布的关于错误学说的汇编中进行。至于把信仰自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加以接受，而作为原则问题则不加以赞成这一点，1863年12月6日一期的《天主教文明》月刊上一篇论述马利纳代表大会的文章不但原原本本地引述了这种思想而且引述了教皇本人的原话，特别是“论题和前提之间的区别，是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教皇提出的一个公式，本刊编辑们曾就这个问题同教皇进行了详细的谈话”[\[19\]](#)。

《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同时的《若干忧虑之事》（Quanta Cura）通谕，发表于1864年12月8日。这个通谕开始时追述说，庇护九世以前即谴责过当代各种主张中荒诞不经的邪说，现在必须重新对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其他堕落和荒谬的主张加以斥责，因为它们不但腐蚀了个人而且败坏了社会。首先是将自然论原则应用于公民社会，以及主张公民社会不应区别真正的宗教和错误的信仰的原则；圣奥古斯丁曾经将其斥之为一种将人们引向地狱的自由；它导致产生仅仅由自然力量和舆论支配的社会。其次谴责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它们否定了家庭的神圣起源和教会所专有的指导年轻人教育的权利，因此，它们敌视教士，把教士看作应用知识和文化进步的敌人。再者，这些错误学说认为教会应受制于国家，认为教会法只有由世俗方面来执行才有约束力，应把教会的财产和收入世俗化，并且否认教会有独立的主权和权威。这个通谕在结尾时对否定基督神圣性的人发出了警告，并劝诫人们向圣母玛利亚祈求祷告。

《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共列举了80条错误学说。前两节中有7条谴责泛神论、自然论和绝对唯理论，接着有7条谴责温和唯理论。对由此而造成的一些错误思想，如否定神的启示或认为它是逐渐形成的；否定圣经中的预言和奇迹，而认为圣经中有些只是神话等，也都加以谴责。其次受到谴责的是四条有关对宗教的冷漠态度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主义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信仰，如认为通过任何宗教都可以拯救世界；新教和天主教一样都是基督教教义的正当阐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秘密社团，包括各个圣经会和自由教会社团，列为一条综合地加以斥责。有20条有关自然、权利和教会权威的说法受到谴责，特别是否认教会是完美无缺的社会，否认天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以及否认教会有直接或间接管理世俗事务的权力等说法。有17条关于公民社会的错误意见受到驳斥；包括民政当局有权过问宗教和道

德事务，国家有权管理教育，教会和国家应当分开等。另有9条有关自然伦理和基督教伦理的错误意见受到斥责，特别是认为即使没有天启教作为基础和约束也可以保持伦理和道德的说法，以及许多中立国家或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国家所尊奉的信条。受到谴责的还有关于基督教徒婚姻方面的10种错误见解，包括否定婚姻具有神圣的性质，主张离婚合法，以及一般认为婚姻案件应由民政当局审理等见解。有两条强烈谴责了关于罗马教皇世俗权力的错误意见，即认为对罗马教廷的自由和福利来说，世俗权力是不必要的。最后，有四条指责有关当代自由主义的错误意见，即认为所谓只有天主教才具有国教地位的说法已不合时宜；认为在天主教国家中，来自信奉其他宗教的移民应当享有宗教自由；应当赋予一切公民以宣扬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权利；罗马教皇能够而且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化达成妥协与和解。

关于如何解释这两个文件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个通谕是教皇谴责现代错误学说的一系列文件中的一个；《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简略地综述了以前教皇发布的训谕中提到的各种错误思想，并参照了庇护九世列举的32种谬说。这两个文件的首页都有教廷国务卿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给各主教的信。“教皇已在历次通谕和训示中谴责了这个最不幸的时代的主要错误学说。但是，也许你们大家还没有全都接到教皇的各项法令。因此，教皇希望将这些错误加以汇编，供全体天主教主教们使用，这样他们便可亲眼看到教皇所列举的各种有害的学说。”^[20]从表面价值看，《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似乎是对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直接攻击，是对天主教自由派实现和解的一切尝试的决定性批驳。唯其如此，教皇极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教皇颁布的这一文件。但这是正确的解释吗？这些文件能够产生比较有益的意义吗？杜庞卢主教发表了一本小册子《9月15日会议和12月8日通谕》。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一方面承认论题与前提是有区别的——这一点神学家们都很了解，在《天主教文明》月刊中也曾提到——同时也指出，教皇的文件提出了论题，即完美地支配基督教社会的各项绝对原则；但是，这并不排除教皇实际上承认甚至事实上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由于存在着邪恶和持反对意见的一代，实际上非实行妥协不可。因此，教皇庇护九世所做的无非是恢复基督教的绝对原则，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出现了马上要采取权宜之计和妥协的前景，人们很可能会忘记这些原则。因此，罗马教廷固然不能同意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当作普遍的理想和绝对的权利，但它可以容许采取权宜之计，接受他们在宪法中规定

的实际状况。所以，罗马教皇可以一方面接受现代文明中美好的东西，同时摒弃其中邪恶的东西；他所斥责的并不是进步和文明的本身，而是某些进步和某些文明。杜庞卢的解释解决了天主教信仰方面遇到的难题，这从许多主教对他表示感激、教皇本人也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纽曼在英国也以类似的语调解释说：“至于《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它除了发表的日期外，与教皇的通谕毫无联系。它并非来自教皇；……它不是教皇直接颁布的法令，而是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向各主教颁发的，只是在时间上巧合；事实上，每一条谴责意见只是由于人们可以从教皇原来发布的文件中找到才会产生影响。如果一道训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力量，那么它所包含的对某种错误思想的谴责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力量。”^[21]除了教会人士发出的这些忧虑不安的声音之外，后来又有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法国人、拿破仑三世短命的自由帝国的首席大臣埃米尔·奥利维埃同样把1864年的文件解释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特别贬低了《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的意义。

根据这个解释，分散在各地的主教们必须从事大量的历史研究才能肯定每一条受到谴责的学说的确切意义和权威程度。例如，他们需要弄清楚对自由教会社团的谴责指的只是皮埃蒙特王国的意大利教士们创立的某些团体，因为它们所关心的是意大利国内政治。又如，对国家控制教育的谴责只涉及皮埃蒙特的废除教会管理青年教育的法律，而对不干涉原则的指责指的是皮埃蒙特对教皇国的侵略以及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不采取行动保卫罗马教廷这样一些政治行为。所以，最后强烈地加以谴责的错误学说引自教皇1861年的训谕，在这个训谕中，教皇专指他无法与之妥协的某些反天主教的倾向。

如果说天主教自由派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承认多姆·卡斯伯特·巴特勒对列举的最后一条错误学说所写的论点是最正确不过的：“作为一条索引，把这一条列为错误学说而不管它的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这是非常不幸的。”^[22]因为，可以肯定说，教皇选择了一种很不幸的手段来让全体主教注意他以前发表过的各种言论，他采用的做法是把这些言论加以摘录，把它们作为简明的、权威性的原则而提出来。而且，发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的目的，在首页的那封信中也曾说明：并不是所有主教都已阅读过教皇分别发表的一切言论。那么，广泛传播这些言论的核心内容而又不对其来龙去脉作任何

说明性的和确切的解释，而且采用了一种不作大量调查就无法确定其含义和目的的方式，其用意究竟何在呢？

在发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之前两天，庇护九世曾秘密地对参加礼仪会议的红衣主教们说，他一直在考虑召开一次公会议，并请他们提出建议。有21个红衣主教发表了意见，其中只有两名明确表示反对，6名表示有条件的同意，而多数表示无条件赞成。他们还提出了许多供审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1865年3月里便任命了一个由5名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来筹备会议。同年4月向34名选定的主教（其中包括杜庞卢和曼宁）发出了一封密信，他们绝大多数都回信表示赞成，虽然奥尔良主教表示希望推迟举行，有8位主教把教皇永无谬论列入他们建议讨论的问题中。因此，1867年6月26日，教皇正式宣布他打算召开一次公会议。这时，杜庞卢和法国天主教自由派的多数人已转而赞成召开一次公会议。他们甚至公开表示有信心，认为这次公会议将会宣告赞成他们为贬低《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的意义而作的解释，并会由于强调主教区的重要性而对建立一个立宪教皇君主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为了回答教皇的训谕，发表了一篇有500名主教签名的信表示欢迎上述建议，这封信词句冠冕堂皇，有人描写它“辞藻华丽，热情洋溢，甚至是有意奉承。但是，庇护九世已经年迈，而且是天主教徒非常仰慕、同情、钦佩和热爱的人”^[23]。由于成立了五个委员会，筹备工作这时加紧进行，这五个委员会分别负责信仰和教义、教会纪律和宗教法规、宗教团体和修士，东方教会和国外传教活动，以及政教事务和政教关系等问题。在应邀到罗马担任顾问的神学家和宗教法学家当中有罗马教会最有学问的主张公会议权力至上的历史学家C. J. 黑费尔（后以罗滕堡主教的身份参加公会议）。1868年6月28日，发表了教皇关于召开公会议的诏书，确定开会日期为1869年12月8日，提出一个广泛的、审议各种议题的议程，但并未具体提到教皇永无谬误的问题。

虽然官方对此保持缄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新信条的定义并非已经成为广泛讨论和争议的问题。1869年2月8日，《天主教文明》月刊描述在法国的天主教人士的舆论为希望这次公会议给《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以明确的说明，以便消除对它的解释存在的怀疑，热烈赞扬教皇无谬误论，并进一步宣告圣母升天为信条。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一个试探气球。它的重要作用为人们所公认；它引起了慕尼黑罗马天主

教学院资格最老的教会史学家伊格纳蒂乌斯·冯·多林格尔在《奥格斯堡汇报》上发表一系列很出色的文章作为答复。这些文章后来又增加了其他文章汇集成书，书名为《罗马教皇与公会议》，用的是笔名“雅努斯”。多林格尔对历史证据所作的学术研究，其重大意义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过分。慕尼黑天主教历史学院的名声，包括J. A. 默勒和黑费尔的名声，当时曾经是罗马教会的光荣之一。多林格尔尖锐辛辣的文章表明，教皇的新建议并未得到天主教会一些最有造诣的学者的赞同。在《罗马教皇与公会议》一书中，丝毫没有使法国天主教自由派受到削弱的那种机会主义的东西，虽然法国天主教自由派中也确实出现了索邦天主教神学院院长马雷神父所著《宗教会议与宗教和平》一书，宣扬康斯坦茨公会议关于经常召开公会议的著名法令所采取的立场，宣称公会议具有超越教皇的最高权威，这样的公会议每十年举行一次为宜。马雷和杜庞卢在离开法国出席公会议之前都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赞成和服从公会议最后制定的任何法令。

教皇在召开公会议的问题上，面临着是否应向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君主发出邀请的困难问题。教皇同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关系显然决定了绝对不能邀请后者参加，而这样的决定其必然结果是也不能要求其他信奉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派出官方代表。这样打破传统的做法会引起欧洲各国大臣们的怀疑，而且也并不能解决民政当局与公会议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主教们要开会并使会议继续下去，必须依靠拿破仑三世的军队驻在罗马；如果这些军队撤走，意大利军队就会开进罗马城，那么公会议就将自动中断。何况，拿破仑三世本人的处境也很微妙；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因而需要同意大利紧密合作；而国内天主教人士的意见则要求继续把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拒之罗马城外。德意志南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邦急切促成欧洲各主要国家在召开公会议的计划上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但奥地利当时犹豫不决，普鲁士则不愿意这样做。不过，正如俾斯麦所指出的，会议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法国手里。在英国，格莱斯顿首相虽然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与阿克顿勋爵结成紧密联盟，同情反教皇永无谬误论者，但他的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则受英国驻罗马代表奥多·拉塞尔的相反观点的影响；拉塞尔又听信曼宁的论点；教皇为了使曼宁能够阻止英国方面采取行动，没有要他进行主张公会议权力至上的神父们必须进行的保守机密的宣誓。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外交形势下，公会议的召开

虽然并未因受到政治压力而停止，但是会议的进程随时都可能使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局面受到危害。

从会议的议事规则的组织情况看，这样的困难局面很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组织一个第一次会议就有679人参加的大会的工作本身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了；而12月2日颁布的《各种问题》的诏书所作的规定又免不了受到批评。这个文件授权由教皇提出会议审议的问题，教皇根据主教们提出的建议作最后决定。会议将把由神学问题和教规问题等筹备委员会拟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如果经过这种讨论以后这些文件需要修正，这个任务将交给四个代表团去完成，每个代表团由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24名主教组成。凡是经过修正的纲领性文件将在大会上再次进行辩论；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最后通过，在这个公开的会议上，主教们投了赞成或不赞成票后，由教皇庄严宣布。在选举负责信仰问题的代表团时首次出现了骚动；为筹备这一选举，先由安吉利斯红衣主教以圣灵怀胎的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向全体主教们散发了24名候选人的名单。当选为这个十分重要的代表团成员的24个人全部是坚决主张教皇永无谬误的人，反教皇永无谬误论者全部被排除在外，后者觉得他们受骗了。这对这次会议来说绝不是好兆头。

然而，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第一批纲领性文件拟定的全都非常草率，需要彻底修订，这时已经可以清楚看出，召开公会议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因此，从2月25日到3月8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体会议，公开说是为了进行改善圣彼得教堂用作公会议会场的那部分的传音设备的工作，但实际上是设法打破议事规则问题上的僵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发布了新的规则：纲领性文件将先分发给各主教，以供他们考虑，并在大会讨论之前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各有关代表团在审议了这些书面修正意见之后便可修改文件，提出供口头讨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修正；但是，最重要的并引起争论的一条规则是：如有10名主教提出书面请求停止辩论，或者如公会议以简单多数表决停止辩论，那么在大会上进行的辩论就必须停止。有90名主教签署了一份抗议书以反对这项议事规则。这条规则还引起这么一个微妙的问题：在制定一项教义时，是不是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一致而不是靠数量上的多数？在世俗的立法部门，可以运用停止辩论的规则和依靠足够的多数票表决，因为这些决定可以被以后的会议推翻；而公会

议大会最后通过教义要求严肃的态度和全体一致的原则，因为已通过的教义是再也不能改变和撤销的。这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到这时，少数派对多数派所采取的策略已经疑心重重，对任何在外表上看起来会进一步侵犯自己权利的东西越来越敏感。

此外，1月21日又散发了触及当时政教关系各个神经中枢的有关教会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长，前十章是给教会的理论下定义，接着有两章论述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没有论及不同于教皇拥有地方行政权的主张的教皇永无谬误的问题），以及教皇的世俗权力。最后三章论述政教关系。虽然后来加进去教皇永无谬误论的教义成为公会议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展开讨论和进行外交活动的话题，但最初人们主要关心的还是论述政教关系的那几章。在这几章中重申了国家承认教会这一最高宗旨；坚持教皇有权按照基督的启示评断和谴责世俗当局的行动；纲领性文件还主张教会有权管理教育，教会的牧师免服兵役，教会有权不受限制地成立宗教团体，获得并保有财产和收入。在论述宗教事务（De Ecclesia）的一节中含蓄地提出教会权力拥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间接权威，这一主张在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引起很大的不安；因而再次引起对教皇采取协同一致的外交策略的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国采取什么态度。在法国，奥利维埃于1870年1月2日当了首席大臣。奥利维埃一向力主不干涉公会议的事务；但外交大臣达律伯爵是几个主要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的朋友，热衷于进行干涉；《宗教事务》一节的内容泄露给报界，为干涉提供了机会。因此，达律于2月20日在皇帝同意，而没有通知奥利维埃的情况下给法国大使发了一封转交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电报；但是，第二天，当他向内阁报告他的行动后，内阁发出命令暂缓递交该电报，以便考虑电文的措辞。这个备忘录经过奥利维埃的修正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调子之后才于2月23日获得通过。它不是最后通牒，而是提醒教皇《宗教事务》一节的含义所引起的争执，成为民政当局十分关注的事情，并且是向公会议提出的告诫，要它在拟定有关政教关系的实际问题的法令时谨慎行事。尽管如此，如若这个警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话，本来可能会起作用。但是，奥利维埃越来越确信任何公开的行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不明智的，因此亲自争取他的内阁同僚和皇帝支持他的严格不干涉的政策，而达律则徒劳地争取欧洲各国首相们的积极支

持。安东内利于3月19日发出的回电，强调论题和前提之间的区别，重申教皇有权谴责民政当局的行为，并认为达律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法国政府面对这种丝毫没有从《宗教事务》一节的措辞后退的有礼貌的反驳，仅仅决定重复它以前的主张，但不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而且，达律于4月11日辞职；从巴黎发往罗马的电报简明地综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达律辞职，由奥利维埃取代，公会议自由了。”^[24]法国采取积极行动的希望和威胁从此消失。从此以后公会议可以遵循自己的方针召开了。

这段外交插曲对于教皇永无谬误论的定义比对于受到威胁的民政权力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在3月6日宣布，一个关于教皇永无谬误的纲领性文件将提交全体大会讨论，这个文件已分发下去。尽管如此，在其他纲领性文件都要求优先辩论的情况下，什么时候上述新文件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是无法断定的。因此，组织了一系列向教皇请愿的活动，恳求他把确定教皇永无谬误论的纲领性文件优先加以讨论，而少数派接着也发起了反请愿。庇护九世接受了前一种请求，从而把教皇永无谬误的问题列为最优先讨论的问题。于是，5月13日正式辩论开始，共进行了15天，其间共有65位主教发言，报名发言的还有40名主教，但是，到了6月3日有150名主教请求停止辩论，由此又引起80名主教提出抗议。随后，从6月6日到7月4日对纲领性文件的若干节进行了详细的审议。7月13日公会议在闭会前一天对确定教皇的地方行政权（magisterium）和教皇永无谬误的定义的纲领性文件进行表决，451名主教投赞成票，88名投反对票，62名表示有条件地赞成。经过有关代表团的进一步审议，作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修改，经过修正的定义于7月16日通过，并定于7月18日在公会议的公开会议上最后表决，且宣布这个定义为信条。这一天碰巧雷雨交加，上天使之显得特别庄严，最后投票结果是533票赞成，2票反对；从而，宣布永恒的牧主（Pastor Aeternus）成为法规。有55名主教在发出一封信给教皇说明他们不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的理由后离开了罗马。7月19日，法国和普鲁士宣战；9月20日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10月20日教皇宣布公会议无限期休会。

教皇拥有地方行政权和教皇永无谬误的定义就这样予以确立而没有附加上《宗教事务》那部分的章节，而在纲领性文件中本来有这些章节，而且是该文件的组成部分。定义的第一章确定教皇的最高权

力；第二章确定罗马教廷永远拥有这种权力；第三章宣告教会的地方行政权的权力和性质。它声称“罗马教廷的这种具有统治实权的管辖权是直接的”，所有人，不论是主教还是人民，不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受它管辖，包括行政管理和纪律方面的事务；这种行政权力绝不会“损害各主教辖区的一般和直接的权力，因为各主教是由圣灵派遣来继承和替代使徒们的，他们作为忠实的牧师供养并统治自己的信徒大众，因此他们在教区拥有的权威实际上是由最高普世牧主所维护、加强和捍卫的”。[\[25\]](#)

第四章是教皇永无谬误的定义：“当教皇以其权威确定某项普世教会必须遵守的有关信仰或道德的教义时，他具有基督赐给他的教会的那种永无谬误性，因此，罗马教廷所确立的这种定义其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是经教会同意才有效的。”[\[26\]](#)

宣布的这个定义是要求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文件的多数主教和要求文件写得缓和一些的少数主教之间的一种折中。关于教皇的地方行政权力，少数派希望删掉“具有统治实权”的提法并对“一般的和直接的权力”加以解释；关于教皇永无谬误，则希望加上“由教会提供证据予以证明”（*et testimonio ecclesiarum innixus*）或“不排除各主教”（*non exclusis episcopis*），以便把教会的权威与教皇的特权正式结合起来。少数派所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哪一条也没有被接受。相反，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对纲领性文件进行表决以后和公会议最后接受之前，对教皇永无谬误的定义作了更改，在有关教皇定义的部分加上了“但无须经教会同意”（*non autem ex consensu Ecclesiae*）的字样。另一方面，对行使教皇永无谬误的特权的条件作了缜密的规定，即教皇必须按照职权发表意见，他宣布的事项应仅限于信仰和道德方面，这个范围比一些多数派所要求的要小一些。由于发生了国际事件致使公会议闭幕，因而未能进一步审议关于《宗教事务》的纲领性文件的其余内容，因而也未能就教廷和教区各自的权力的范围和大小作出规定。

梵蒂冈公会议的政治后果确实不很美妙。11月1日，由于意大利国王和政府入侵罗马，教皇将他们革出教门；并且拒绝一切妥协建议，包括提出保证的法令。这些妥协建议作出了除放弃罗马作为意大利首都之外的其他一切合理的让步。这一争执直到1929年与墨索里尼签订政教协定才解决。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垮台、巴黎公社的出现

以及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间旷日持久的分裂，为教会与国家之间十分激烈的敌对播下了种子。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内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以及俾斯麦针对罗马而进行的“文化斗争”，导致与教廷的极其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教会方面，梵蒂冈公会议确定的定义很容易地被普遍接受。法国天主教自由派则由于一派人以与历史证据不符为理由反对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另一派人仅仅认为目前的定义不合时宜而出现内部分裂，从而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此外，认为该定义不合时宜的一些主教依靠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外交干预，以免他们直接与庇护九世的愿望对立，而当这一希望破灭后，他们显然也就无能为力了。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少数几位主教，特别是黑费尔、施瓦岑贝格、海纳尔德、斯特罗斯马耶拖延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公布了法令，要求人们予以接受。但是，最坚决的抵制来自德意志的慕尼黑、波恩和布拉格各大学，最终导致把多林格尔教授和弗里德里希等教授革出教门。从此导致了旧天主教的分裂，蔓延到瑞士和荷兰。但是，持不同信仰的一派人数并不多，不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在英国，爱尔兰圣公会问题在整个这一时期既引起宗教事端，也造成政治事端，到1869年达到严重关头。19世纪30年代，罗马天主教徒要向新教爱尔兰圣公会交纳什一税，这曾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吵，由此而产生的1838年法令确定向地主征收什一税的税额，致使教士古已有之的收入减少四分之一。在这个问题这样得到解决之前，由于1832年公开发表了审议爱尔兰教会收入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个报告，结果于1833年通过了教会财产法，根据此法令，通过合并的办法减少了主教区的数目，这一做法导致基布尔提出了反对国民背教的抗议，纽曼认为这一行动是牛津运动的正式开端。1829年罗马天主教获得了解放，这实际上势必导致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越来越多地要求废除爱尔兰圣公会的国教地位；虽然19世纪中叶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延缓了对该教会的攻击。然而谁也预想不到的事是，废除国教地位的事竟是由格莱斯顿实行的，而他早先的观点曾是在爱尔兰和英国都保持国教地位。红衣主教卡伦、约翰·格雷爵士和W. J. 奥尼尔·当特等人进行的鼓动是意料中事；但是格莱斯顿1865年转而赞成政教分离的原则，1867年他又宣布打算履行“他应负的公民正义的职责，平息全国范围，或几乎是举世的非难，因为这是使英国获得和平与满足的一切努力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为爱尔兰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敲响了丧钟。^[27]1869年，不顾爱尔兰圣公会各主教

和广大教士的反对，通过了废除国教地位和没收其基金的法案；尽管鼓吹通过这一法案的人并没有为改组被废除国教地位的教会提出实际可行的规定。这个措施无疑是以前写过《国家及其与教会的关系》一书的格莱斯顿改变主意的预兆；而且有迹象表明格莱斯顿甚至开始抽象地考虑，不信奉国教者所进行的在英国同样使政教分离的运动有可能取得胜利。爱尔兰发生的事件使支持他自由教会主张的人们受到了鼓舞，坚定不移地要求在英国实现政教分离；但是，直到1914年威尔士政教分离法通过之前，他们的努力迄未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在这一时期，教会对社会问题更加关注，结果形成一种基督教的社会意识。“人民的生活状况”确实成为他们首先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法国，天主教自由派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致拉梅内毕生都在为此大声疾呼；他的原则影响了他的许多追随者。奥扎纳姆和他所创立的味增爵会积极开展慈善事业，主要是改善个人境遇；比歇则成为天主教民主的理论家。1848年，一批与由拉科代尔创办、后由马雷神父接办的《新时代》报有联系的法国天主教徒坚持天主教社会秩序的原则。但是，由于第二帝国的建立，保守主义获得了胜利，这些人的主张没有机会传播。在德国，凯特勒是温和的天主教社会改革派的代表，多林格尔则意识到存在社会问题，需要由天主教士和俗人以同情的态度加以研究。在英国，由F.D. 莫里斯的学说和实际试验而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学派。莫里斯认为，竞争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合作才是宇宙的神圣法则。他教导说，社会主义若要继续忠实于它的理想，并在实践中使之成为现实，那就必须基督教化，而教会则必须接受合作这个根本原则。他自己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实验虽然失败，但他是一位生不逢时的预言家，是他那个时代创新的思想家之一。随着梵蒂冈公会议的闭幕，一代人正在退出舞台，另一代正在取而代之。拉科代尔于1860年去世，随后蒙塔朗贝尔也于1870年去世；在19世纪最后30年，占据舞台的是新的问题和新的人物。

此外，在有关教会与国家、教育，甚至社会问题的一切争论的背后，由于各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迅速发现，以及上上下下对圣经的批判运动，教会正面临着13世纪以来对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原则的极其严重和影响极其深远的挑战。在科学方面，赖尔1830年的《地质学原理》和1863年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这两部著作推翻了厄谢所提出的上帝按圣经中所述时间次序创造万物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

文1859年的《物种起源》提出革命性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代替了圣经中上帝创造各种物体的学说。1865年E. B. 泰勒的《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研究》提出了人类学和宗教比较研究方面的新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些研究对宗教的影响是间接的（虽然并不因为是间接的就麻烦小一些）的话，那么文化界和历史界对圣经本身的批判攻击则是直接的和革命性的。关于圣经的旧约全书，继18世纪艾希霍恩的开拓性著作之后，19世纪埃瓦尔德的《以色列人民史》（1843年）问世，该书把希伯来人的氏族时期解释为神话，把摩西说成是第一个历史人物；而德·韦特则争辩说，《旧约全书》的《申命记》属于约赛亚统治时期；库南的《以色列的宗教》（1869年）坚决主张多神论本来是希伯来人的信仰，这一信仰直到他们被放逐一直保持下来，从而把争论又推进了一步。韦尔豪森的《以色列史》（1878年）将这些理论加以完善。该书提出有关《旧约全书》各卷的批判性假设，认为8世纪的先知书是最早产生的而把《旧约全书》的前五卷的绝大部分归入希伯来人历史后期的产物。在英国，H. H. 米尔曼的《犹太史》（1830年），曾隐隐约约地预料将会有这样的理论出现，这本书试图唤起知识界对来自德国的冲击作好舆论准备。更加严重的是对《新约全书》的猛烈抨击。1846年乔治·埃利奥特翻译了D. F. 斯特劳斯的《耶稣的生平》，该书认为福音书并不是历史传记，而是以神话体现的宗教真理。作者坚持认为，福音书的宗教价值与它们作为历史文献是否真实无关。以F. C. 鲍尔为首的蒂宾根学派试图为《新约全书》的历史真实性辩护，根据黑格尔的原理，把它解释为犹太基督教与非犹太基督教矛盾斗争的产物，这一斗争最终演化为天主教教义；但这种正统说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慰藉。E. 勒南的《耶稣生平》（1863年）一书进一步打乱了传统的信念。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关于上帝启示的性质、关于《圣经》的历史特点，以及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与宗教比较研究的关系等方面的看法都产生了混乱和被打破，教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30年。教会一方面逐渐接受了科学的发现，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对《圣经》进行批判研究的原则，这一过程属以后一个时期的事，非本章所叙述的内容。不过，与这些影响深远的根本性的问题相比，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此外，在19世纪同时出现了自从基督教早期数百年历史以来空前未有过的传教活动大发展；但这主要是非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的活动，特别是在美国进行的传教活动。从这个更大的舞台的角度来看，欧洲大陆原

有的基督教国家中的政教关系之争，甚至就更加令人淡忘，成为一些古老的、令人不愉快的、遥远的过去的事物和斗争了。

（李朝增 译）

[1] A. 拉特雷耶：《英国天主教会与法国革命》（2卷本，巴黎，1946—1950年），第1卷，第83页。

[2] E. D. 福尔格：《拉梅内未发表过的书信集》（巴黎，1863年），第2卷，第106页。

[3] 按法文盖朗热长老的姓氏和尊称为Dom Guéranger，庇护九世戏称他为Dom Guerroyer，二者谐音，后者的意思是“战士”“斗士”。——译者

[4] 关于这个冲突的民族主义方面，见本卷第9章，原文第222—224页。

[5] 原文Sonder bund，意为“特别联盟”。——译者

[6] H. M. 格沃特金：《到安娜逝世为止英国的政教关系》（伦敦，1917年），第384页。

[7] J. H. 纽曼：《为自己一生辩护》（牛津，1913年），第131、134和140页。

[8] 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法令。——译者

[9] H. 瓦特：《托马斯·查默斯与苏格兰教会的分裂》（爱丁堡，1943年），第227、243、257—258页。

[10] H. J. 拉斯基：《主权问题研究》（纽黑文，1917年），第112—113页。

[11] 盖伊·福克斯，1604年密谋在英格兰国会开会时用火药炸死詹姆斯一世及其主要大臣的军人，后被处决。——译者

[12] G. F. 布朗：《一位主教的回忆录》（伦敦，1915年），第7页。[原文为“*Oh, No, Pio No No!*” Pio Nono是Pius IX（庇护九世）的拉丁文写法，这个口号利用其谐音，意思是“不要庇护九世！”——译者]

[13] R. W. 戴尔：《英国公理会教派历史》（伦敦，1907年），第659页。

[14] A. W. W. 戴尔：《伯明翰的R. W. 戴尔生平》（伦敦，1928年），第275页。

[15] B. L. 曼宁：《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国会议员》（剑桥，1952年），第353页。

[16] Pio Nono，即Pius IX（庇护九世）。——译者

[17] C. 米尔布特：《罗马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历史原始资料》（蒂宾根，1934年第5版），第447页。

[18] E. 勒卡尼埃：《蒙塔朗贝尔》（巴黎，1910—1912年），第3卷，第353页。

[19] 路易·博纳尔：《普瓦蒂埃的皮埃主教生平》（巴黎，1887年），第2卷，第218—219页。

[20] J. B. 伯里：《19世纪罗马教皇史》（伦敦，1930年），第8—9页。

[21] W. 沃德：《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的生平》（伦敦，1912年），第2卷，第101页。

[22] 卡斯伯特·巴特勒：《梵蒂冈公会议……》（伦敦，1930年），第1卷，第70页。

[23] 卡斯伯特·巴特勒：《梵蒂冈公会议……》（伦敦，1930年），第1卷，第86页。

[24] E. 奥利维埃：《梵蒂冈公会议上的政教关系》（1877年，巴黎），第2卷，第225页。

[25] C. 米尔布特：《罗马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历史原始资料》，第463—464页。

[26] C. 米尔布特：《罗马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历史原始资料》，第463—464页。

[27] J. 莫利：《格莱斯顿生平》（1903年，伦敦），第2卷，第257页。

第五章 教育和新闻事业

在欧洲，教育也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深受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影响。欧洲各国所有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彻底垮台，古老的教育概念也荡然无存。唯有位于欧洲边远东部平原的俄国以及英国例外。英国在教育方面，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依然走着自己的道路。在法国，世俗的、受国家控制的“教育总署”已经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出现，这是拿破仑为了指导中等和高等教育于1808年创建的。在王朝复辟前，国家在初等教育方面一直无所建树。在其他西方文明国家中政治和经济生活所占据的地位，在德国却是由学术研究占据着；德国对教育的信念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特别是普鲁士于1807年大复兴后建立了柏林大学（1810年），这所大学给19世纪的全部大学工作树立了样板。旧有的拉丁文学校发展成为文科中学，初等教育也按照瑞士教师和理论家裴斯泰洛齐所提出的方针路线在发展。1815年和平恢复后，欧洲各国所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对教育事业都普遍感兴趣。到处是百废待兴，特别是在像意大利、哈布斯堡帝国东部各省以及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在教育方面要做的事情更多，而且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那里的政治反应对教育事业的进步往往是有害的。随着19世纪向前推移，教育政策在欧洲本土受到促进民族团结和推进民主制度的要求的影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由于美国和英国自治殖民地的成长，以及欧洲向其他各洲的渗透，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欧洲世界虽然变得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铁路、轮船、电报的发展同时又缩小成为一体，从而使人们对于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能有比以往多得多的了解。如果要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就必须对各阶层人民提供更为广泛的受教育的机会。因此，1830—1870年不仅传统形式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活动大大地发展了，而且对技工、成人和妇女的培养也提供了更多的条件。此外，在制造并左右舆论的其他种种方法上，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新闻出版事业，这个事业当时就已具有和现代颇为类似的形式。

欧洲各国教育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问题是国家在教育中发挥适当作用的问题。国家对教育应干预到何种程度，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国家

同教会以及可能各自抱有相同或不同的目标和理想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法国和德意志各邦与英国截然不同。马休·阿诺德在其论述欧洲教育制度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把英国将教育一律委诸私人或私人团体之手这种混乱的方法，同他在德意志、法国、荷兰或瑞士所见到的国家对教育进行有条不紊、经常不断的指导的办法加以比较。在这一时期（1830—1870年）之初，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干预在英国尚不普遍，所采取的改革虽然大部分是出于私人的努力，但是即便在英国，国家在指导教育政策方面也起着日益增大的作用。在法国和普鲁士，国家管理教育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这首先是在1789年革命，其次又在耶拿战役之后大改革时期的复兴工作中得到肯定。很多法国人认为，国家如果放弃促进教育的职责，就将完不成它的使命。基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国家管理教育的制度是法国的“历史和民族精神”赋予法国的。“我们要求统一——这一点只有国家才能做到；我们已经破坏了一切，我们必须重新创造。”^[1]费希特曾把德意志的未来寄希望于一种新的国家教育制度。德意志人相信，国家的任务是利用教育制度焕发它自身内在的天赋力量，并通过发展文化和悉心教育其公民来促使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一思想并不仅仅限于像普鲁士那样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在瑞士，1830年推翻了各州原有的寡头政治的宪法后，自由派对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关切，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公民民主品德的神经中枢，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因此，国家有责任帮助本国公民发挥自己最大的聪明才智。

如果说这就是国家管理教育的目的所在，那么国家所施行的教育自然就应为国家自身的目的服务了。因此，拿破仑三世的政府牢牢地控制了法国的教育，解除了像历史学家米什莱、波兰诗人和斯拉夫语言学者密茨凯维奇这样一些对他不友善的教授们的职务。同样，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对小学强制实行了1854年的条例，用以对付新思想的危险，并使学校忠于教会和国家的成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统治下的俄国对教育采取了最极端的控制形式，当时的教育大臣把俄国的教育精神规定为：“正统、专制、民族性”（参见原文第230和363页）。然而国家设立的培训官吏的机构所获得的效果，却与政治家和统治者们的愿望大不相同。在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统治下，大学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它们培养出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同以前有文化的贵族阶级不同，在俄国国民生活中没有确保无疑的地位。这种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敌视政府，

脱离群众，是一股潜在的革命力量。在西方国家中，反动政府的政策同样也不能阻挡这一时期成为学术自由伟大时代的发展趋势。在1848年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革命中，大学教授和学生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德意志，大学已超越了各邦和宗教的障碍，成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温床。“哥廷根大学七教授”由于抗议汉诺威国王埃内斯特·奥古斯特破坏宪法而被开除（1837年），遂成了当时德意志的英雄人物（参见第19章，原文第494页）。在瑞士，1830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成长是同教育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离主义联盟战争之后，联邦进一步统一的标志之一，就是建立了一所联邦技术大学，即1855年开办的苏黎世综合技术大学。但是在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情绪也是造成教育冲突的一个原因。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敌对，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敌对，大多是在学校里出现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波兰人的教育在1830年起义后，在俄国边境地区遭到取缔；在1863年起义以后又在波兰“会议”王国本身遭到取缔（参见原文第236和376页）。

1830—1870年，国家由于在教育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因此便不可避免地要同个人和团体，特别是最重要的团体教会发生冲突。没有国家的协助，教育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发展的；但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容纳新实验和新思想的余地就必然越来越小。国家对教育的干预表明国家“体制”的壮大。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意志，教学计划和教学方针是同为国家服务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目的都在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就必须通过官方考试取得资格。教育机构越是官僚化，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危险就越大，发挥个人首创精神的余地也就越小。哪里的国家体制最有效、最广泛，这种危险在那里也就最大。在19世纪教育学家的圣地普鲁士，福禄培尔的幼儿园被取缔（1851年）；在平民教育取得相当成绩的邻国丹麦，格伦特维主教及其信徒感到缺乏自由和自发精神。国家教育的发展所包含的另一种危险，在于国家对公民行使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于是世俗界和宗教界之间因争夺权利而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德意志各邦、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等许多国家中，国家和教会在初等教育中合作得很协调，这种初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在英国，宗教与世俗原则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这种冲突被英国国教与不信奉国教的宗教派别之间的争吵所取代，此种争吵在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基础的1870年教育

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在许多国家中，这种冲突同基督教会，特别是罗马教会与世俗的教育观点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学校问题是罗马天主教同新的意大利国家间的主要争执之一。这一问题是瑞士爆发分离主义联盟战争的原因之一，并一直存在，成为1848年以后发生动乱的一个根源。1855年的奥地利政教协定是国家对教会权力的彻底投降，由于害怕革命而采取的政策由此而达到顶点（参见第20章，原文第533页）。

各国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教会和学校等问题的态度，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差别甚大。法国天主教徒为反对教育总署垄断中等教育进行了多年的斗争，直到1850年制定《法卢法案》允许私人（实际上是允许教会）有自由兴办中学的权利后方才罢休（参见第4章，原文第80页）。许多自由主义者，如拉马丁，反对教育总署对教育的垄断，天主教领袖蒙塔朗贝尔所采取的方针，其基础则是要求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在比利时，人们憎恨荷兰统治下国家对初等教育的垄断，构成爆发1830年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革命后即采取了教育完全自由的政策。但是，教育问题打破了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的同盟，因为自由主义者意识到，教育自由实际上就是教权占支配地位。1834年双方都创办了大学。天主教徒建立的大学在马利纳，1835年迁到卢万；自由主义者建立的大学在布鲁塞尔。1842年的小学法对教会有利，然而1850年的中学法却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天主教徒对之表示强烈不满。在荷兰，拿破仑时代建立了初等学校体系（1806年），仅仅讲授非教派的宗教课程；而且，初等教育由国家垄断，获准开办私立小学的情况甚为罕见。一方面有人争辩说，国家有责任在各地兴办非教派性的教育并继续实行现行的体制；另一方面有人争辩说，这种体制侵犯了个人和父母的权利。这个问题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分裂；有的人支持教育自由，但是由于十分惧怕教士的影响，因而对1848年的宪法所赋予的教育自由加上了严格的限制。国家对教育的垄断终于被1857年的法律所打破，但是这一点既没有使正统的新教徒感到满意，最终也没有使天主教徒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各处来讲，满足国家、个人和团体各自的要求，要比自由主义者关于个人自由的理论所想象的困难得多。

理论家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并不亚于政治家和实务家；他们都对教育问题表示关注，这就表明教育在欧洲思想和意识中将要起日益重要

的作用。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之一，瑞士人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于1827年逝世。但是，他的信念在平民教育中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必须通过儿童自己的活动，循序渐进地发展其才能和天赋，才能把儿童的潜在力量发掘出来。与裴斯泰洛齐同时代的瑞士人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冯·费伦贝格，在他霍夫维尔的庄园开办了一系列学校，每所学校对不同的社会阶级给予适合其社会地位的教育。他的工作引起了外国观察家极大的注意，他自己则积极从事这一工作，直到他1844年逝世为止。受裴斯泰洛齐影响的德国思想家有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年）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培尔（1782—1852年）。赫尔巴特开始创立一种以心理学和伦理学全面观点为基础、着重强调教学方法重要性的教育学。他的思想受到德意志关心教育理论的大学教师们的大力支持，后来英国和美国对他的思想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福禄培尔是创造比较好的幼儿教育法的先驱。他教导说，应该让儿童懂得事物的相互联系，通过游戏促使他们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为此目的，他创造了一系列“礼物”和“劳作”来发挥儿童的才能。“礼物”即各种形状的积木，用以构成各种图形；“劳作”即编织，制作泥、纸模型等。前者是教儿童模拟，后者是教儿童表达自己的想象力。按照这种想法创立的第一所幼儿学校于1837年成立，名为“幼儿园”。前面已经提到，普鲁士政府对福禄培尔并不赞许，因此，他的工作不是在德意志，而是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影响。

法国和英国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们都对教育问题表示关心。1830年的英国功利主义者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其信条，当然十分关心教育问题。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都写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特别是穆勒对教育所能产生的结果抱有极大的信心。其后的另一位重要英国思想家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他深受新的科学思想的影响，坚持心理学的重要性；他着重指出，儿童教育必须同儿童智力发展的自然阶段相协调，同时也要同人类文明演进的连续阶段相协调。他大力强调科学知识的价值，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能使人获得过完美生活的必要技艺。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也要求提倡“实证”教育，这种教育应同现在的时代要求相一致，应以教授各门科学的相互关系为基础。法国早期的两个社会主义思想学派，即傅立叶和圣西门学派，都强调发掘儿童的天

赋才能对社会和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圣西门派还帮助宣传进行平民教育具有普遍的好处。

在大学、中学和技术学校以及小学教育中取得实际成果的国家中首推德国。来自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各地的旅行者，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无不表示称赞。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教育部部长霍勒斯·曼在19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认为，普鲁士、萨克森以及德意志西部和西南部一些邦在平民教育中站在最前列。法国观察家维克托·库辛在1831年就把普鲁士称为“典型的兵营加学校的国家，学校教化人民，兵营保卫人民”^[2]。在普鲁士以及在德意志诸邦，教育一般是义务性的，但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所规定的免费教育条款并未实施。在奥地利，政府在教育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哈布斯堡帝国西部诸省，儿童入学的比例很大。但是有关平民教育的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教育所达到的水平也远较北德意志低。1869年的小学法为培养师资作了较优厚的规定，并把学制延长到8年。

德国的邻邦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荷兰在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霍勒斯·曼、库辛，英国观察家如詹姆斯·凯一沙特尔沃思爵士和马修·阿诺德等均对荷兰小学加以赞扬。阿诺德还在60年代著文把瑞士较先进邦中的学校列为欧洲最优秀的学校；1830年后，各邦的体制迅速发展，都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教育虽然经常遇到巨大的困难，但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全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国家建立和掌握了一个包括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在内、涉及全国的全面小学体制。这种全面的小学体制在瑞典建立于1842年，在挪威建立于1860年；在人口较稠密的丹麦，1814年就有了这种全国性的体制，1856年的一项法律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在这三个国家中都实行了义务教育。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产生了一些自己的、饶有趣味的教育思想。在丹麦，格伦特维主教的弟子克里斯滕·科尔（1816—1870年）按照比国家体制更自由的方式创设了“自由学校”。瑞典首先承认体育课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芬兰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乌戈·胥格奈乌斯（1810—1888年）首先在学校中倡导手工训练。

在西欧政治先进的国家中，普及文化是促进民主必要的附带措施。此外，要求受到更好的教育则是技术日益复杂时代的要求。使用和管理机器的人们比其耕种土地的祖辈需要更多的“书本知识”。另

一个起作用的力量则是博爱主义，即对社会上不那么幸运的人们给予援助的愿望。这种博爱主义，举例来说，在英国工厂立法中也反映出来。平民教育不仅是出自上层的恩赐，就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来自下层的要求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领袖如罗伯特·欧文和宪章派威廉·洛维特对这些问题深为关切。在法国，工人们相信，教育是改善他们状况的关键，并且要求实行免费和义务教育。到1870年，不论在法国或英国，这一目标均未达到。就教学方法而言，先由教师教一些辅导生，再由这些辅导生教其他学童的风行一时的互助制，即兰开斯特制，到了30年代已经不流行了。1837年，法国初等教育协会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不同的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一制度的缺点。法国建立全面的小学体制比英国早得多。1833年的教育法规定，每一小行政区应有一所小学，每一大行政区则应有一所师范学院。马休·阿诺德1859年访法时，对此评价甚佳；当时所达到的水平虽低，但是随着国民生活的改善，其水平也必将进一步提高。英国政府也于1833年对两个团体，即英格兰圣公会的“全国”协会和非教派的“英国”协会首次给予补助。补助的规模逐渐扩大，但是由于1862年实行根据考试成绩给予补助的制度，补助的进程受到了阻碍。1870年福斯特教育法案通过后，英国才有了一部全面的教育法。福斯特教育法维持当时已经存在的非教派学校，并用地方税创办新的学校来补充这种学校。苏格兰的教区学校具有可以远溯到17世纪的光辉历史，曾经受到霍勒斯·曼的赞许，其特点也许是以培养学生升入大学为目标，而且升入大学的学生的年龄比英格兰升入大学的学生的年龄小。由于法定的教育体制满足不了全国的需要，作为这一体制的补充，各种各样的民办学校建立起来；其中大多数被纳入了根据1872年苏格兰教育法重新改建的国家教育体制之中。

南欧和东欧的教育状况比较差，文盲十分普遍。意大利南部的文盲问题尤为严重，新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根据1859年通过的法律，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并取得了实际进展。然而时至1871年，文盲仍占人口的72%。^[3]在奥地利东部诸省以及匈牙利，教育也十分落后。匈牙利1869年的普查表明，文盲占63%，能阅读但不能书写者占9.7%。^[4]在俄国，文盲问题最为严重，直到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改革，农民的解放问题把文盲问题提到显著地位之后，才真正着手试图解决

这一问题（参阅第14章，原文第378页）。1864年建立的地方自治会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是解决文盲的任务至1870年几乎还没有开始。

科学的进步迫使高等教育去适应新的要求。古典学科唯我独尊的地位遭到了非难。其中一个要求是，普通中等教育的领域要扩大，对科学和现代语言应给予更重要的地位；另一要求是为工业提供技术训练，因为工业文明不仅需要数量不断增加的、受过训练的高级技术人员，而且也需要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低级人员。德国的院校，在现代和技术等学科的教育方面，就像在古典学科方面一样，组织得很有成效。普鲁士的文科中学是以古典学科为基础，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1834年规定，凡未取得文科中学毕业证书者不得进入大学，而大学乃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阶梯。德意志各邦的教育体制重点各有不同，但大体相似；奥地利的体制原先规定的课程范围甚为狭窄，但1849年大力地进行了改革。在这一时期中，以现代学科为基础、对学生进行全面训练的实科中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实科中学创始于19世纪初，在普鲁士于1832年和1859年根据法律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其一年级的课程与文科中学类似。其他国家通过设立现代学科课程（1850年比利时中等学校法）或另立现代学校（1863年荷兰的类似法律），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在法国和英国，中学课程仍然全部是古典学科，现代学科未加提倡。在英国，赫伯特·斯宾塞和T.H. 赫胥黎等评论家着重指出了传统课程的缺陷，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这一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关切。1870年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考虑科学教育和促进科学的问题。在法国，1852年曾实行过文学课程与科学课程“分支”的制度，但是没有取得成效；因此，这一制度在1865年被“专门科学教育”计划所取代。法国的中学，包括皇家中学即公立中学和市镇中学与大学各学院一道均属拿破仑时期的教育总署管辖。1850年以前，私立学校，实际上即教会学校，如未经事先核准则不得成立；私立中学获准建立后，往往倾向于脱离国立中学的轨道，二者之间绝少联系。但由于国家掌握学衔，因此各处学校的课程均以通过国家的业士学位考试（即中学毕业会考）为目的。于是像在条件类似的德国那样，法国也有批评家抱怨学生的课程负担过重，考试，特别是职业中学的考试对学生的压力太大。严格的专业学习，在中学教育中起重要的作用，学生一旦离校之后，便进入从事专门职业的训练。其结果，在法国，正规教育同

自由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中学最后几年的课程密切相关，而在其他国家，主要到大学时才衔接起来。法国的这种教育概念的例子之一便是哲学在中学教育的最后一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修·阿诺德认为，法国的中学教育值得称道，而且费用不大。法国所提供的全面的国民教育制度是英国无法比拟的。他说，英国虽有少数水平很高的伟大学府，但是对广大的中层阶级却没有作出什么实际建树，因而他们几乎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差的。阿诺德呼吁由国家管理中学教育的要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忽视了。国家对教育不加管理，也没有一个全面的体制；除了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私立学校外，只有古老以学习拉丁语为主的文法学校，而且其中许多学校办理不善，甚至营私舞弊，另外还有少数大致是从这种学校发展而成的“公学”，这种“公学”大多为寄宿学校。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拉格比中学校长（1828—1842年）托马斯·阿诺德等人士对老式中学进行改革，以及由于创立了许多新学校，使“公学”制具有了现代的形式。虽然1864—1867年的汤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制止了滥用文法学校基金的现象，但时至1870年，英国在教育方面仍落后于邻国。

技术和职业训练的重要性在各国也与日俱增。德国建立了大量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初创立时往往简陋而且不大协调。按照它们的教育水平，逐渐形成了等级，它们受到的强烈的外部影响是苏黎世的综合技术学校，它成为德国技术大学的样板。到1870年，一些主要的技术学校，如卡尔斯鲁厄（1825年）、德累斯顿（1828年）和斯图加特（1829年）等地的技术学校逐渐过渡成为大学，但完全发展成为技术大学则在1870年以后。但在1868—1872年，德国的高等技术学校每年在校学生平均人数已达到3500人。^[5]1828年，法国建立了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以及其他较低级的学校，英国却远远地落后。女王的丈夫对此十分关心，想以1851年博览会的收益在南肯辛顿所购置的地皮上建立一所学校。学校虽未建成，但这块地皮成为商务部于1853年成立的分支机构“科学技术部”的总部。这一机构在资助科学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活动范围并不广泛；此外，政府1868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也揭示出了英国的弱点。

这一时期，在各国广为推行的一种特别的职业教育是为小学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师范学校也是德国人首创的，是德国平民教育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普鲁士小学教育界当时最杰出的人物是F. A. W.

迪斯特尔韦希（1790—1866年），他自1832年起到1847年被撤职为止一直是柏林师范学院院长。瑞士的师范学院也受到了英国评论家的赞扬。瑞士最杰出的师范教育家是约翰·雅各布·韦尔利（1790—1855年），他曾在费伦贝格的领导下在霍夫维尔工作过，当过克罗伊茨林根师范学院院长（1834—1853年）。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体力劳动与通常的课堂教育相结合。在英国，1839年设立的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拟建立一所国立师范学校，但由于遇到宗教上的困难而未成功。但是委员会秘书凯博士于1840年在巴特西建立了一所卓有成绩的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转交给了“全国贫民教育协会”。在这之前，戴维·斯托在格拉斯哥曾进行过类似工作（1836年）。1846年以后，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推行小先生制，以建立一支人数众多的受过训练的教师队伍。

处于教育阶梯顶端的是大学。这是欧洲生活中根本性体制之一，各种大学的地位大体相同。当时大学的楷模是德国的大学，在德国的大学中正在形成学术研究的现代标准。18世纪，神学、法学和医学三个专业位于第四个专业，即自然科学之上，但在19世纪，这一有其本身宗旨的独立研究专业，却成了这些大学中最重要的部门，大体上讲来，大学的目的在于成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德国的教授都是卓越的学者和独具见解的研究家，大学中的学习越来越集中于详尽地进行学术研究。在教授指导下从事高深研究工作的“研究班”或小型学习班的成长，是当时总的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教授和学生的目的都是追求学问而进行研究。在这一时期，德国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出自大学，而在英国则不然。德国是首先把科学研究组织起来并把它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生理学家弥勒、数学家高斯、化学家李比希都是大学教师（参见第3章，原文第50页）。

奥地利、瑞士德语地区、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大学，大体上都袭用德国大学的组织形式。奥地利统治下的德意志诸邦没有取得德意志其他各邦的那种成就。特别在1848年以前，奥地利的大学同中学一样墨守成规。文科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都要按照政府核定的教本教学。大学受到学监的监督，教授和学生都不例外。不强调独立思考，而是死记硬背；考试繁多，限制重重。就是在1849年以后，奥地利的大学虽有一些卓越人士任教，但政府的精神并不利于学术自由。两个扩大高等教育的计划都遭到了失败。一个是格伦特维主教建立一

所大型斯堪的纳维亚大学的计划。另一个是在瑞士建立一所联邦大学的计划，这一计划因无法克服各州之间以及教会方面的妒忌而遭到失败。但是，1833年在苏黎世、1834年在伯尔尼，以及1835年在巴塞尔建立了新的州立大学，瑞士德语地区的大学进行了改组。

唯有在法国不存在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真正的大学生活。旧的基础已被法国革命扫荡无遗。拿破仑分别设立了神学、法学、医学、科学和文学各个学院。由于罗马天主教反对神学院，因此罗马天主教神学院形同虚设。法学和医学院仅仅是职业学校；科学和文学院则仅仅为不固定的临时学员提供考试委员会或举办讲座。国民教育部部长基佐（1832—1836年）想创建一批课程齐备的综合性大学，但计划未能实现。后来，维克托·库辛在雷恩创办大学的计划（1840年），同样也遭到失败。各学院分散在全国各地，常常互不往来；这些学院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协作精神，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中心。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重要的高等学术中心，即享有很大自由的法兰西学院，它同上述学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法兰西学院的著名教授中有米什莱、居维叶、安培^[6]和贝托莱；法兰西学院没有规定的课程，学生无须考试。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代，教育大臣迪律伊热衷于提高高等教育水平；1868年他建立了高等学科实验学校，作为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严格的职业教育在法国高等教育中起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中要大；这类学校中，著名的仍然是为国家培养民用和军用工程技术人员的综合技术学校，以及为中等教育培养高等人才的高等师范学校。

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在意大利改革了中等和高等教育，但在1815年后，由于严厉的审查制度以及宗教力量的影响，所取得的成果都已丧失。按照高等师范学校的模式在比萨建立的师范学校关闭了；1846年托斯卡纳政府重新开办了这所学校，但是到1862年，这所学校已无在校学生。大学为数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那不勒斯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但是当时的气氛阻碍了新的学科的发展，压制了独立思想。1859年的教育法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中等和高等教育，并要求明确规定大学入学标准和严格的考试制度。但是，如同初等教育一样，其前进的道路漫长而又坎坷不平。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欧洲大陆上的中学和大学》一书（1868年）中指出，大学里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数量极少，绝大多数学生均研习医学和法律这两门职业科

目。1859年的教育法所规定的严格考试制度没有实行，学校当局懈怠宽松，教授和学生也缺乏纪律。

英国的大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学大不相同；英国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而德国大学的目的则是造就学者和官员；英国大学不搞职业教育，不鼓励研究工作，仅举办授给普通学位的课程，学位虽对成绩要求严格，但通过的标准较低。马修·阿诺德认为，英国大学最多不过是高中而已。英国大学的豪奢及其仅对英国国教教徒给以优惠的做法，受到了革新派严厉的抨击，许多革新派希望取消大学体制，鼓励德国式的职业教育，或具有独立和较为平等传统的苏格兰大学的做法。老一些的英国大学虽然保守，但具有自己的真正传统，即进行综合性教育、培养学生准备进入社会生活。这种传统有自身的价值观念，逐渐与时代的条件相一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直到1871年才最后免除了宗教考试。到此时，免除宗教考试的新大学纷纷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1836年获准创建的伦敦大学，但是伦敦大学不过只是许多独立学院的中心考试机构而已。其他新大学有1837年获准建立的达勒姆大学和1851年获准建立的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欧文斯学院即现代的曼彻斯特大学的雏形。建立这些大学并不是国家采取行动的结果，而是出于私人的主动精神。

美国的教育史是将欧洲教育思想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一个新环境的突出说明。最先进的地区是新英格兰，最落后的地区是南部，内战更使南部遭到严重的挫折。初等和中等教育总的趋势是走向非宗教的公立体制，这种体制是民主思想扩展的一个方面。正如1856年一位英国评论家所写的：“……在普通中学中，随意发表的平等言论似乎甚为响亮——与后来在演讲台上和投票箱旁声嘶力竭的呐喊一样。”

^[7]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在实行免费的、由税收担负并由州政府控制的非宗教的初等教育问题上，赞成与反对的双方在北部诸州进行了长期斗争。许多教会人士和有产集团拼命反对这种学校；但是到了1850年，这一问题在北部诸州在原则上已经得到了解决，1834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了免费学校法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在中等教育方面，同样的要求，即公立中学由政府管理的要求，导致了公立中学的建立，第一所公立中学1821年在波士顿建立，但在这一时期末，私立中学的势力仍十分强大。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向由州管理的方向发展，遂导致了在南部和西部各州建立州立大学，但这些大学真正成为重要的学府

则是很久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主要是规模较小的教会学院，这种学院经费拮据，惨淡经营，在当地还有很多竞争的对手。但是，随着开拓地区的扩大，这类大学也就随着扩散开来，并在边疆地区做了重要的开化工作。内战结束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仍然很低，即使是东部的老牌大学如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课程都是初等的，课程安排也是老式的。但是，1870年前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此时新建立了一些大学，如1868年建立的康奈尔大学，并出现了新的教育界领袖，如在1869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W. 埃利奥特。美国教育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习德国的榜样，因为美国学生通常是去德国留学的。通过诸如马萨诸塞州的霍勒斯·曼以及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州的亨利·巴纳德等教育改革家所进行的工作，欧洲的思想也对公立中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巴纳德在他1855年创办的《美国教育杂志》中传播新思想；霍勒斯·曼的成就之一是于1839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创建了第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州立师范学校。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教育思想在各自治领和印度都广为传播。在各自治领，除法国教育思想影响很大的下加拿大外，都是照搬英国的教育体制。大多数自治领都是在1870年前后才建立某种初等教育体制的。像在英国一样，教派竞争在教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主张全国性教育体制和教派教育体制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在加拿大各省，各教会之间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例如，约翰·斯特罗恩主教为把后来的多伦多大学置于英国圣公会掌握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终未成功。英国的“公学”体制也向国外传播，在奥地利、新西兰，以及南非，均有仿效此种体制而建立的学校。印度的教育问题很大，也大不相同。在这一时期之初，在关于英国当局应赞助传统的东方教育还是应推行西方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讨论。1835年作出了推行西方教育的关键性的决定。^[8]由T. B. 麦考利起草的著名备忘录与这一决定虽有一定关系，但还有一些人士也赞成推行西方教育方针，如C. E. 特里维廉等官员、拉姆·摩罕·罗易等印度自由思想家，以及1830年在加尔各答创办“教会大会学院”的亚历山大·达夫等传教士教育家。英国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它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会被西方的生活方式所同化；并且相信，西方思想会通过他们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这一政策实际上忽视了东西方之间的深刻差别，例如，学校教育与家庭影响之间的冲

突。查尔斯·伍德爵士在1854年的报告文件中计划以政府拨款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制，并于1857年创办了一批像伦敦大学那样纯属是考试机构性质的大学。英属印度教育体制的缺点甚多。初等教育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未加注意，经费极为有限。世俗化的英国学校不符合伊斯兰教徒的要求，他们不信任与其宗教脱离的教育体制。所施教育的内容纯属于文学方面，而印度人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则太少。更为严厉的政治批评是：英国的统治对受其教育的阶级并没有给予什么机会，因而给其自身制造了不满。虽然如此，但英国在短时期中在印度却做了出色的工作。与荷属东印度的情况相比是很有意义的。荷属东印度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为当地欧洲居民开设的学校上。但是即使为这些欧洲居民，也只是在1860年以后才开始创设中学，土著居民只有进入欧洲人的学校才能受到西方教育，而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在初等教育方面，工作做得不多。荷兰殖民地的教育事实上比英属印度要落后半个世纪，只是在1864年以后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欧洲传统的教育体制除广泛地传播到其他地区外，同时也在本国传播到新的阶层居民中。在19世纪下半时期，这种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妇女实行公共教育，这涉及妇女争取获得与其比例相称的普遍受教育的权益要求。在欧洲的大国中，在这方面最落后的是法国。教育大臣迪律伊在60年代倡导学校为女生开设课程，但是国立女子中学到80年代才开始建立。德国虽有女子中学，但也仅仅到这一级为止。在英国，这一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但已做了较多的工作。基督教社会主义者F.D. 莫里斯、休斯、金斯利及其友人们致力于创办伦敦女王学院（1848年）。这所学院早期的两位学生弗朗西丝·玛丽·巴斯和多萝西娅·比尔在促进女子走读学校和寄宿学校的发展中，分别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60年代给女子学校的拨款只占中等教育捐助基金的百分之二。下一步是大学教育问题。在伦敦，有20年历史的贝德福德学院于1869年实行男女合校，大学学院于1870年开始向妇女开放。剑桥的两所较古老的女子学院建立于1869年和1871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已设立了女子中学，瑞典并于1870年给予妇女上大学的权利。就全国总的情况看来，俄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858年建立了第一所女子文科中学。1873年已有190所具有各个班级的女子中学，此时，妇女也逐渐进入大学学习。^[9]然而取得成就最大的还是美国。玛丽·莱昂及其在豪尔约克山建立的学校（1837—1849年）和埃玛·威拉德及

其在特罗伊建立了的学校（1821—1838年），都是这方面的先驱。1833年创立的奥伯林学院一开始就给妇女以平等的机会，首批女生毕业于1841年。1853年创建的安蒂奥克学院也加以仿效。到了1870年，西部诸州一些州立大学都已向妇女开放。东部诸州则倾向于为妇女另设学院，建立这种学院的主要年代是瓦萨学院开办的1865年。

英国对成人教育十分重视。英国建立了许多“技工学校”，但这类学校一般对真正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吸引力。50年代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86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开始在北部城镇讲学，成为大学附校运动兴起的根源之一。由格伦特维主教（1783—1872年）在丹麦提倡的“人民中学运动”，也是这种将教育扩大到成人群众中去的例子。对他的思想产生根本影响的是基督教教义、爱国主义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独特文化。他于1829—1831年数次访英，对英国的教育自由，以及对英国教育高度集体的生活印象颇深。回国后，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理论，旨在唤醒丹麦人民，给予他们一种新的自由意识和集体观念。他抨击传统教育死气沉沉、机械呆板，希望代之以不是灌输死知识而是不同思想的系统的生活教育。他认为在儿童时代进行这种教育为时太早，不能达到目的，要年过18岁才能进行这种真正的教育。例如，他想创立一所大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学的计划虽没有成功，但是，在19世纪中叶丹麦经历危机时期——这一危机的高潮是1864年丹麦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别人把他的想法加以改变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一所人民中学于1844年在边境省份石勒苏益格开办，人民中学运动逐渐扩大，其实际主要领袖是克里斯滕·科尔，他真正把这一运动同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人民中学为农民举办冬季班。冬季班不抱功利主义的目的，不举行考试，也没有固定的教学纲要。其目的在于振作精神，增强民族情绪。它们的成就是在精神上和在现实生活中提高了农民的水平。

丹麦的人民中学把正式教育同一般地对公众思想施加文化影响结合在一起。另一受成年人欢迎的运动是美国的学园运动。以这种运动开办讲座，既是教育又是消遣。这一运动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吸引了爱默生、《纽约论坛报》的格里利，以及科学家阿加西斯这样的一些人士举行讲座。免费借阅的图书馆的发展也对公众思想产生有力的影响。当然，各种各样的学术图书馆和收费的图书馆早就存在，但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都尝试这种做法，即让无力购买图书或

无钱借书的人能借到书籍。公共图书馆运动在英国和美国约开始于19世纪中叶，到1870年还只是处于初创阶段。在英国，技工学校作出了一些成绩。1850年的“尤尔特法”第一次规定：各市可以自愿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但不得动用款项购买图书。尤尔特法是以议会中这项法案的主要提案人威廉·尤尔特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收集资料、统计数字等大部分工作是由爱德华·爱德华兹做的，他是根据这项法律开办的第一个图书馆即曼彻斯特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1855年通过的另一法案允许使用少量的地方税款购买图书。1870年议会统计表明，1868年已有52个图书馆，藏书50万册。^[10]美国最初是在学校所在地区设立图书馆。纽约州是于1835年通过此种立法建立这种图书馆的第一个州，此后其他许多州也照此办理，但建立图书馆的计划一般来说均未获得成功，其中原因之一是行政区划太小。最后获得成功的办法还是类似英国的那种办法，即允许城镇用地方税款建立图书馆。波士顿于1848年获准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是最早设立图书馆的城市，波士顿图书馆本身于1854年开放。新罕布什尔是第一个通过建立图书馆法律的州（1849年），其后是马萨诸塞州（1851年），另外三个州于1870年以前也通过了这种法律。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体系最强的是在马萨诸塞州，该州在1872年即有82个图书馆，藏书56.5万册左右。

影响公众思想最大而且最广泛的工具自然要数报纸和期刊了。这个工具是国家领导人和政治改革家手中的一件强大的武器。举例来说，加富尔和俾斯麦都懂得它的重要性。出版自由是基本的自由要求之一，在比较进步的国家中压迫性的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已取消，而通信之迅速也意味着新闻出版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随着民众教育的传播，报纸能影响到更为广泛的读者，精明的政论家如巴黎《新闻报》的吉拉尔丹和《纽约先驱报》的贝内特等都认识到，对于贫穷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报纸的各个阶层施加巨大影响的办法，就是廉价的报纸。如果说德国在教育方面首屈一指，那么英国在发展出版事业方面，无论是就商业效率或是社会地位而言，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在英国，这一时期是报纸家族时代，这些报纸家族构成了“一种人数不多的具有高尚理想和伟大坚定性格的贵族”。^[11]这些报纸家族中最大的是创办《泰晤士报》的沃尔特家族，创办《每日电讯报》的利维·劳森家族和创办《曼彻斯特卫报》的泰勒家族也同属

这一类型。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新闻出版在社会上的信誉日益上升。以前那种玩世不恭的新闻传统已不适用了，到1870年时，大学中许多极有作为的青年人已开始为报刊撰稿。一般而言，除了公众和刊登广告的人以外，报纸已不为任何人所左右。当时许多极负盛名的政治家如布鲁厄姆、帕默斯顿和阿伯丁都曾企图影响新闻界，但是政治家与报刊之间的关系与早年相比平等多了，因为报纸的地位已经稳固，不需要政府的资助。“1852年有评论说，国内办得最好的报纸，如果公众得悉它已被政府收买，其价值和影响就会立刻扫地以尽。”^[12]

早年由政府控制报刊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中仍然残存着。两个著名的急进派记者于1831年以在工人中煽动骚乱的罪名，受到格雷勋爵政府的指控，其中理查德·卡莱尔被判刑二年，威廉·科贝特无罪释放。但是，司法官员总的态度是：自由讨论并不可怕。其后，这一观点成了主流。1843年通过的坎贝尔勋爵的《毁谤罪法》在法律上引起了重要的变化。这项立法允许被告就其出版物报道真实、符合公众利益而提出抗辩。这一改变增加了新闻出版不受官方干涉的自由，但这仍然只是给予少数人的自由，因为一份日报的售价包括报纸税和印花税以及广告税在内竟达七便士。亨利·赫瑟林顿不顾法律的规定于1831年出版了不付印花税的《穷人卫报》，其后数年在“不付印花税的斗争”中许多人因违法而被定罪。小说家布尔沃在议会中领导了一次反对所谓“知识税”的运动，结果虽然由于更加严格执行上述法律而使不付印花税的报纸遭到取缔，但广告税于1833年降低，报纸的印花税于1836年减为一便士。这一时期十分兴旺、价格低廉的刊物是《一便士杂志》（1832年）。这一刊物只刊登普通消息，不登载政治新闻。“知识税”终于在1853年至1861年间被取消，其关键是1855年取消报纸印花税，从而使新闻出版事业能够向廉价方面发展。

英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倾向于集中在首都，这与法国的情况相同，但不同于德国。英国最大的报纸是《泰晤士报》，该报在这一时期其相对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1854年它的发行量为5.5万份，几乎是伦敦另外五家大日报发行量总和的三倍。约翰·沃尔特第二和第三都是《泰晤士报》的开明业主。托马斯·巴恩斯（1817—1841年）和约翰·撒迪厄斯·德莱恩（1841—1877年）是它的两位杰出编辑。它的社论撰稿人有爱德华·斯特林、亨利·里夫和罗伯特·洛等人。《泰晤士报》俗称“雷神”，是政治上独立的报纸，它的一贯宗旨是领导具

有重要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舆论。它同第一流的政治家们保持密切关系，它的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在1845年12月通过阿伯丁勋爵的关系发表了关于皮尔拟取消谷物法的消息。但是，《泰晤士报》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取得的。当时，该报记者W. H. 拉塞尔对阿伯丁勋爵政府的无能进行了揭露，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的倒台（参见第18章，原文第481页）。《泰晤士报》地位牢固的原因之一是它重视最好和最早的新闻。1838年该报就设置了专门信使递送东方来的消息。由于法国政府从中作梗，《泰晤士报》曾临时改变路线经由里雅斯特和奥地利以便及时获得消息（1845年）。

印花税取消后，《泰晤士报》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并失去了它相对的突出地位。有几家售价昂贵的老报纸经过这一变化都已停办。1846年创办的《每日新闻报》在1868年降到了每份一便士的普及价格。该报最大的成就是刊登阿奇博尔德·福布斯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报道。另一家老报《旗帜报》在1858年时降至每份一便士。但《泰晤士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报》。该报受J. M. 利维控制。他使这家报纸成为伦敦第一家售价每份一便士的报纸。这家报纸由于有像G. A. 萨拉和埃德温·阿诺德这样有才干的记者积极写稿和大力服务，1870年发行量达17.5万至19万份，而《泰晤士报》发行量则为7万份或不到7万份。报纸读者数字的大大增加，可以从发行量上看起来。1865年仅伦敦一地的报纸印刷份数即为25年前整个联合王国全部报纸印刷份数总和的6倍。^[13]1855年以后情况的改变也使地方新闻报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创办了许多新的日报。其中最重要的有亚历山大·拉塞尔于1848—1876年负责编辑的《苏格兰人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这两家都是于1855年由原来的双周刊改成日报。英国也拥有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期刊，从季刊到周刊，如从1861年起由R. H. 赫顿和梅雷迪斯·汤森控制的《旁观者》周刊。这一时期英国最著名的期刊是《星期六评论》，约翰·道格拉斯·库克于1855—1868年担任其主编，工作十分出色，该刊还有一批才干出众的撰稿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这个事业中走向成功之路的青年人。

在法国，新闻事业曾经是引起1830年革命的争端之一。在这场革命中，报纸同样起了很大作用。1830年修改后的宪章保证出版自由。预防性的审查制度被取消，报纸必须支付的保证金已降低。在当时的

法国，新闻事业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新闻、文学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梯也尔的经历）。这种情况在英国是不存在的。法国的新闻事业甚至比英国更集中于首都。巴黎资格最老的报纸无疑是《辩论报》。这家报纸由贝尔坦家族所控制。它代表上层中产阶级，它的观点倾向于奥尔良党人。它的著名撰稿人中有圣马克·吉拉尔丹，德萨西和普雷沃-帕拉多尔，有许多人还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在法国期刊中，居有类似地位的为《两个世界评论》，1831年弗朗索瓦·比洛任该刊主编。许多当时著名的法国文学家都为这家刊物写稿。法国新闻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是天主教报刊。拉梅内任主编的《前途报》（1830年）鼓吹天主教与人民治理相结合，但是拉梅内在1832年受到梵蒂冈的谴责（参见第4章，原文第78页）。其后十分重要的刊物为《宇宙报》（1836年）。这一刊物后来的主编是路易·维伊奥。该刊在第二帝国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在1860年遭到政府查禁。不过1867年维伊奥又获准恢复该刊。

七月王朝在最初几年受到正统派和共和派双方报纸的激烈抨击。左翼报刊中著名的有阿尔芒·卡雷尔的《国民报》和阿尔芒·马拉斯特的《论坛报》，后者常与当局对立。最后，政府在1835年加强了新闻法，但麻烦一直不断，一直到政权垮台时为止。共和派秘密发行报纸，在新闻案件中政府和反对派互有胜负。1843年反对派得到新创办的主要主张社会改革的《改革报》的支持。《工场报》（1840年）也提出了关于社会改革的类似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家由工人创办，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

与此同时，法国报纸在商业方面也不知不觉地产生着巨大的变化。上述的法国报纸，像较早的英国报纸一样，售价昂贵，吸引力不大。显然，报纸售价便宜才能开辟新的读者来源。在这方面的先驱是迪塔克和埃米尔·德·吉拉尔丹。他们于1836年分别创办了《时代报》和《新闻报》，其全年订阅费用仅为较老的报纸的一半，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迅速增加，连载长篇小说对其帮助也不小。为这家报纸写连载小说的著名作家有巴尔扎克、乔治桑、大仲马和欧仁·苏等人。在利用连载小说方面，老报也不得不跟着新报学。吉拉尔丹深受英国做法的影响，他提出可在法国报纸上刊登更多的广告用其收费可支付报纸的费用。但法国报纸直到19世纪末在利用广告上还是赶不上英国。吉拉尔丹理应在那些认为报纸主要是一种商业事业的人们中间

享有很高的声誉，报纸的商业性是办报的一个方面，其重要性随着19世纪的进展增加。

1848年的革命扫除了对新闻事业的一切限制，代表各种不同观点的新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路易·菲利普倒台后接管权力的临时政府代表着《国民报》和《改革报》的观点（参见第15章，原文第390页）。但是，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由于许多报纸言论过激，各种限制便又恢复了。保证金（1848年）和印花税（1850年）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都恢复了。新闻事业在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终于受到了更严厉的约束。1852年的新闻法规定报纸须经过核准才能出版。预防性的审查制度虽未恢复，但代之而来的却是“警告”制度。警告可以导致停刊乃至查封。这一制度实际上迫使报纸编辑自己进行审查。后来，其他国家也仿效这一制度。这一严厉的钳制结果使巴黎的报纸的数量减小。在各省，官方的控制甚至更为严厉，反对派的报纸根本就无法出版。虽然拿破仑三世得到报纸的支持要比查理十世得到的多得多，但在巴黎反对派的报刊仍占优势。泰奥菲尔·戈蒂埃、圣-伯夫和梅里美为《政府通报》撰稿，其他的政府报纸则仰赖发行量大和像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和德·拉·盖隆尼埃尔这样有才干的记者。

由于政治新闻难写而又危险，因此作家们便转而写题材较为轻松的文章。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伊波利特·德·维尔梅桑创办《费加罗报》（1854年起为周刊，1866年起改为日报）。这一出版物最初不谈政治，只刊登巴黎的街头趣闻。在把报纸当作一项重要行业来经营方面，维尔梅桑甚至比吉拉尔丹走得更远。在这方面另一发展则是穆瓦兹·米洛创办的《小日报》（1863年），每份发行价格为一苏。这表明，吉拉尔丹和迪塔克是要吸引中产阶级的下层，而米洛则是要吸引贫民。要吸引贫民就要创造更先进的宣传和售卖方法。在这方面，两家刊物都获得了成功，《小日报》销售量很快达到了25万份，在特殊的情况下远远超过此数。1866年《时代报》发行量为4.4万份，是普通日报中发行量最大的。

与此同时，在1860年以后，政治性报刊的处境好多了。几家新报创刊，其中有1861年创刊的《时报》。1868年废除了办报须经核准以及对报刊警告的制度。此时新的报刊大量涌现，对政府进行尖锐的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罗什福尔创办的《灯笼报》。它在创刊号中开头就说：“按《帝国年鉴》的统计，法国有3600万臣民，还不算

那些心怀不满的臣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帝国覆亡。其中最著名者有博丹审判案，在这一案件中，甘必大大胜，政府失败（1868年）。

德国的情形同法国的相似，政治因素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颇大。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并未导致当时政府实行的高压政策永久性变化；这一政策反而由于1832年颁布的“六条法令”而变本加厉（参见第19章，原文第493页）。一般来说，德国历届政府的政策是只保持少数报刊，并对其内容加以限制。像1842年在科隆创刊、卡尔·马克思一度担任过主编的《莱茵报》这样一些自由主义报纸，很快便被取缔。德国最大的报纸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受到巴伐利亚邦的审查，并且受到奥地利的严密监视。1832年该报所有人科塔接到警告，不得再行刊登其驻巴黎记者诗人海涅的稿件。梅特涅从维也纳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新闻报刊的动态。刊物的出版也很重要，在审查制度下，期刊有比报纸较多的自由，并允许有较多的讨论余地，但著名的自由派期刊如F. W. A. 黑尔德创办的《火车头》（1843年）则因触犯审查制度而遭到封闭。海涅曾发挥突出作用的有关“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论战，导致联邦于1835年对这一批新出现的据认为是革命派的作家加以取缔。

由于德国的生活具有地方局限性，因此德国不存在像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大中心，各家报纸主要在本地区产生影响。德国的出版事业由于受到不胜其烦的、变化多端的审查制度的严厉限制，因此在技术上落后。最先进的报纸之一是《科隆报》，它的所有人约瑟夫·杜蒙于1833年安装了德国的第一台蒸汽印刷机。在40年代，《科隆报》和《总汇报》的发行量均为8000份左右。柏林的《福斯报》在1840年发行量不到1万份，到1847年则增加了一倍。

1848年革命带来了出版自由。各地报刊大量地、几乎是猛烈地增加。奥地利在1848年年初有79家报纸，到年底就有了388家，其中306家是政治性的日报。许多新创办的报纸寿命都不长；但其中有一些却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如柏林的《国民报》，以及俾斯麦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机关报、一般称之《十字架报》的反动报纸《新普鲁士报》。

1849—1850年反动势力的胜利迅速遏止了这一发展。在奥地利，恢复了保证金制度并实行了官方警告制度，创办报刊必须经过核准。

因此，发行的报纸的报社数量急剧减少，许多报纸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1862年和1863年通过的法律准许出版事业享有较大的自由。1864年，《新自由报》创刊，成为奥地利的主要报纸。与此同时，普鲁士也采取了十分类似的政策，例如，1855年，《科隆报》在政府要撤回办报许可的威胁下，被迫更换了主编。

新闻事业尽管遭到了所有这些困难，但总的说来还是改善了地位。新闻事业的企业性质增强，技术设备不断改进，而且由于公众对政治的关心，在60年代新闻事业也获得好处。此外，它仿效法国开辟了小说连载专栏。报纸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营特征越来越突出，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奥古斯特·桀格。他在1848年创办了维也纳《新闻报》，售价低廉，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新型报纸是《法兰克福报》，它的原名不叫《法兰克福报》，1856年创刊时起就刊登商业消息，成了德国西部主要报纸之一。新闻事业在企业化方面这种进一步的广泛发展在政府的政策上也反映出来了。1848年后，政府主要的武器已不是审查制度，而是撤销办报许可和没收保证金，以此打击报纸所有人的商业利益。

1860年后新闻业虽然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但报纸仍处于国家严密的控制之下。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都严密地控制本国的新闻事业，并把自己的影响尽可能扩大到其他邦的报纸。它们的办法也十分相似：设立新闻出版局指导报纸政策，出版官方“通讯”说明官方观点并散发到各报。这个在50年代由曼陀菲尔开创的制度，在普鲁士由俾斯麦继承下来。俾斯麦早年便认识到了新闻事业的重要性，在其整个生涯中对新闻事业都给予极大的重视。例如，他利用新闻作为武器同法国进行斗争。为他的政策提供财政的手段是臭名昭著的由汉诺威王室财产中捐赠的“卑鄙的基金”。

1850—1870年这一时期是新闻事业同日益壮大的政党之间关系十分密切的时期。拉萨尔在1863年的一次演说中，以社会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报纸进行了尖锐的抨击^[14]，其后的几年便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大体上与此同时，天主教的新闻事业也发展起来。但是，1870年以后，报纸的商业性一面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发行量在上升。新闻事业的评论家们开始指出商业因素的重要性，报纸由于屈从于不正当财政利益而受到了批评。报纸越来越复杂；其重点开始由发表议论和表达舆论转而客观地报道新闻。重要的变化是广告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事实上，德国所走的道路是法国和英国已经探索出来的道路，不过稍落后于法国和英国。

在欧洲较小的自由主义国家中，新闻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瑞士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在这两派互相敌对的报纸之间进行的。19世纪30年代，瑞典国王查理·约翰政府与以拉斯·希尔塔的《晚报》为首的自由派报纸进行了斗争，但在1838年由于对一位自由派编辑定罪而爆发骚乱后，政府放弃了这一斗争。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在丹麦新闻界也日益抬头，这也引起了对政府的不满。1849年丹麦宪法保障出版自由。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在丹麦和挪威的另一个发展便是出现了迎合农民要求的新闻报刊。在比利时同在法国一样，新闻问题在1830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利时1831年宪法保障出版自由。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比利时成了法国流亡的新闻工作者的避难所，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攻击导致了比利时同法国政府之间的严重不和。法国代表瓦莱夫斯基在巴黎会议（1856年）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由于比利时政府态度坚定，这一事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流亡的新闻工作者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朱塞佩·马志尼。他在1831年离开意大利以前，已经为好几家报纸撰稿。在他流亡时期的许多出版物中，最重要的要算发行了六期的《青年意大利》（1832—1834年）（参见第9章，原文第224页）。这一时期，意大利国内严格的审查制度只允许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期刊存在，然而在讨论文学的文章中却可读到大量的弦外之音。政治性报纸的出版自由开始于皮埃蒙特。1847年审查制度经过修改，允许较为自由地增办报纸。加富尔伯爵的《复兴运动》报是新创建的报纸之一，这家报纸成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的跳板。1848年的皮埃蒙特宪法规定了出版自由。1849年反革命势力在与自由派1848年的原则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虽然在意大利其他各邦废除了出版自由，但在皮埃蒙特还或多或少地保持了这一自由。加富尔认识到新闻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和俾斯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晚期生涯中，他通过《两个世界杂志》得到了在法国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该报的主编是比洛，原籍萨伏依。意大利在全国统一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新闻事业。意大利的新闻事业与德国相同，但不同于法国和英国，它不是集中于一地发展起来的，这是意大利历史的必然结果。

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审查制度十分严厉（参见第14章，原文第359页）。1848年，除有一般的审查官员外，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视新闻出版事业。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这一委员会被取消，允许出版新的杂志。这些月刊水平很高，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适合于一个没有政治生活的国家的状况。俄国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所面临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引起了报刊大量的评论，新闻出版尽管受到束缚，却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重要人物是另一位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他的双周刊《钟声》于1857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秘密地运进俄国，在这一关键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1863年波兰起义后，其影响即告消失（参见第14章，原文第370页）。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日报的发行量虽然很小，但已初次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1862年后，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严峻。1865年实行了新的审查条例。这一条例在各省保持了预防性的审查制度，但对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纸则采用类似法国的“警告”制度。这一新条例执行十分严格，但新闻报刊在代表当时的舆论方面仍然有一定权威。新闻界主要人物是《莫斯科新闻》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他在60年代逐渐变成了民族主义和君主专制思想的拥护者。作为报纸主编，詹姆斯·布赖斯认为他可以同德莱恩和J.D.库克，以及同美国的格里利和戈登·贝内特等人相伯仲。俄国新闻事业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报纸落后，仍然处于预防性审查制度的束缚之下，而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新闻事业则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美国，实现廉价报纸的时间大体同法国差不多。1830年以前各家报纸十分昂贵，只有少数人才能买得起。第一个认识到廉价报纸前景的人是本杰明·戴，他受到英国《一便士杂志》成功的鼓舞，于1833年创办了《纽约太阳报》。这家报纸不过问政治，专门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及警方和法庭的报道。1835年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按照同样的方针创办了《纽约先驱报》，虽然他的主张要比戴的广泛。他还是采用电报这一类新技术的先驱。他办报严格按自己的方针，即使有点浮夸，曾因被指责宣扬色情和登载遭到非议的广告而导致纽约其他报纸于1840年对他发动了一场“道德战”。但是，和《纽约太阳报》一样，《纽约先驱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849年贝内特的报纸每日销售量达3.3万份。同这家报纸类似的《费城公共纪事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分别于1836年和1837年在其他城市创刊。这几家报纸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它们首先着眼于尽量迅速地搜集新闻。由于发

行量大，广告收入多，它们比老报纸的财力更为雄厚。它们一般都不需要政界的赞助，经常夸大新闻中不平常的和耸人听闻的成分。

廉价报纸此后发展的方向则很不相同。1841年霍勒斯·格里利创办了《纽约论坛报》。他不愿采用贝内特报纸的那种遭人非议的办报方针。他同政治的关系密切，最初是辉格党，后来是共和党。他是一个善于撰写社论的宣传家，热心于新的事业，如傅立叶的生产者联合会的原则、女权，尤其是热衷于废除奴隶制。他通过《论坛》周刊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这家周刊到1860年时每周销售20万份。历史学家们强调他的报刊在使舆论转而反对奴隶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他的助手之一亨利·J. 雷蒙德于1851年创办了《纽约时报》。他看到报纸有可能既可避免贝内特办报的粗俗风格，又避免格里利一味追求阳春白雪的方针。这家新报持论平正、稳健而沉着冷静。关于报纸日益复杂的资金情况，曾有过这样有趣的说法：雷蒙德的报纸的资金是10万美元，而在此10年前格里利创办《论坛报》时只有2000美元。

与此同时，政治性报纸与各党派有密切关系的老传统仍然保留下来，但已变得不那么重要；杰克逊总统的智囊团的机关报《环球报》就是一例。随着美国不断扩大，华盛顿各报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消失，迄至南北战争以纽约为中心的新型新闻事业，更能够满足当时对报纸的各种不同的要求。19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在期刊方面较为落后，不具什么重要性。人们不应忘记废奴主义者的报刊，它们的首要人物是波士顿《解放者报》（1831—1865年）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废奴主义者的报纸邮局往往不予邮寄，印刷所时遭捣毁，编辑人员也受到袭击，起码有一名编辑，即伊利诺伊州奥尔顿城的洛夫乔伊遭到暗杀（1837年）。这些事实表明一个民主国家对发表不受欢迎的言论所施加的限制。

南北战争大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新闻事业。以《纽约先驱报》为首的报纸大力报道战争消息。战地记者的技巧也进一步有了发展。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美国记者也很出色。在国内战线方面，报纸发表许多社论抨击林肯政府，不少官员抱怨走漏消息。战争的消息使公众比以前更加爱读新闻，报纸的发行量迅速上升，内地城市报纸的发展尤为迅速。美国新闻事业向各地分散，是开创一个新时期的变化之一。贝内特和格里利均于1872年去世。新一代新闻工作者与党派的关系疏远，日益重视新闻报道而不是发表评论。1872年，纽约

的报纸中，《纽约太阳报》日售10万份，《纽约先驱报》日售9.5万份。新闻事业正在全国扩大，60年代美国报纸的数目增加了1/3。在这一时期末，内地的报纸，如约瑟夫·梅迪尔的《芝加哥论坛报》等，已成为比较重要的报纸。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记者塞缪尔·鲍尔斯已是美国一流的新闻记者。他的报纸自1844年改为日报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而蜚声全国。在纽约年青一代的报纸编辑中，著名的有查尔斯·A. 达纳和E. L. 戈德金。达纳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的左右手。他在1868年掌握了《纽约太阳报》，采用新的体裁和轻松活泼的文风，着重刊登有“人情”味的报道和故事，从而给该报带来新的兴旺时期。戈德金是英国人，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于1865年创办《民族》周刊。它是美国评论性周刊的先驱，发行量一直不大，但对美国思想界领袖人物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可以把上述国家作一番比较。1870年，人们认为伦敦的报纸比纽约的报纸刊登的新闻要多，巴黎在这方面最差居第三位。这三个国家的新闻事业均已高度资本化，但其发展的道路各不相同。同英国的报纸相比，美国的报纸更多地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英国的报纸则以登载评论较多而著称，但两国报纸主要还是报道性的报纸，把新闻报道和刊登广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法国的报纸则是评论性的报纸。1822年，一位评论家将它们的不同之处总结如下：“英国读者希望了解的是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读者希望知道的则是某些知名的政治家对在法国发生的事抱什么见解。”^[15]总的来讲，德国的新闻事业落后于这三国。1889年英国的评论是：30年前，英法两国的新闻事业就已高度发达，而德国的新闻事业虽然在这一期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十分落后，所报道的也是过时的新闻，还没有商业性的新闻企业。^[16]欧洲各种思想和技术的发展再次起了重要作用。到1870年，近东的埃及、远东的日本等国逐渐发展使用本国文字的新闻事业。印度的报纸虽小而穷，但已有了一个真正的开端。1818年出现了第一家用当地文字出版的报纸；到1875年已有254家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报纸。

在这整个时期，新闻事业逐渐采用新的技术。其结果之一是画报的出现和增加。《伦敦新闻画报》于1842年出版；一年后，巴黎的《画报》和莱比锡的《画报》也相继问世。平版印刷术的发展，使漫画艺术这一有关的领域有了发展的可能。在法国，夏尔·菲利普创办

了《漫画》和《喧哗》周刊，这两个刊物曾于1831年讥讽路易·菲利普。10年后，《笨拙》在伦敦出版，其后德国的这类报刊于40年代后期出版，慕尼黑的《飞叶》杂志出版于1845年，柏林的《闲话》杂志于1848年革命年代中出版。然而最根本的进展是印刷术不断进步，才有可能解决报纸大量发行的问题。1846年，理查德·霍为《费城公共纪事报》制造的四滚筒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8000份，但是只能一面印刷。1848年《泰晤士报》采用了类似的阿普尔盖思式印刷机。1861年理查德·霍式印刷机第一次改装成可以使用铸版的印刷机，即可用活字版铸成多块印版，而无须用活字版直接印刷。1868年，《泰晤士报》采用了沃尔特式印刷机，这是第一台现代化的使用卷筒纸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整份报纸1.2万份。差不多与此同时，伊波利特·马里诺尼在法国也取得了相似的进展。他最初在吉拉尔丹的《新闻报》工作，60年代后期在《小日报》工作。印刷术取得进展之后，接着便是铁路、轮船、电报等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美国报纸使用电报最早。1851年，格里利就说过，美国报纸使用的电报量比英国报纸多100倍。《泰晤士报》虽然注意新闻迅速及时，但在使用电报方面却很保守，认为电报昂贵而又不准确。但是，克里米亚战争证明，电报是不可缺少的新发明。

电报新闻事业出现的重大结果便是收集和向报刊和商界售卖新闻的通讯社的兴起。显然，通讯社的兴起，使得收集新闻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集中，通讯社虽不能取代大报的老练特派记者，报刊却因此而有了更大量的新闻来源。最早的通讯社是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该社原为一家翻译社，1840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组织过信鸽通讯业务。新的通信工具发展后，它便加以利用，1856年接办了一家大型广告社，从而掌握了大部分法国报纸的广告业务，获得了稳定的收入。1849年，伯恩哈德·沃尔夫在柏林开设了一家电报局，其后成了庞大的德国通讯社。1851年另一个德籍犹太人尤利乌斯·路透来到英国，在伦敦创办了一家通讯社。1858年10月，他说服了除《泰晤士报》以外的伦敦各家报纸试用他提供的消息，并赢得了各报所确认的地位。不久，《泰晤士报》也开始利用他的新闻。路透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比欧洲任何报纸早两天报道了林肯总统遇刺的消息。他向德国扩张引起了同受普鲁士政府大力支持的沃尔夫通讯社的冲突。最后，在1870年这三家大通讯社一致同意划分地区。沃尔夫通讯社的范围是中欧和东欧，路透社的范围是英帝国和远东，哈瓦斯的范围是法

帝国和拉丁语国家。在英国本土，消息并不是由路透社而是由英国联合通讯社收集的。联合通讯社是由各地方报纸于1868年在《曼彻斯特卫报》创办人约翰·爱德华·泰勒的领导下成立的，它同路透社密切合作。地方报纸对于私营电报公司提供的服务很不满意，因此政府当时接管这些电报公司后，各家地方报纸便作出自己的独立安排。由为之服务的各家报纸所共有的合作通讯社，也在美国发展起来。纽约各报急于获得欧洲的最新新闻，于1848年成立了一家“联合通讯社”收集国外新闻。这家通讯社于1856年采取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成为“纽约联合通讯社”。1855年通过合并成立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后，这两家通讯社便作出进行合作的安排。由于纽约联合通讯社有进行垄断的趋势，这就导致了西部各家报纸之间进行合并。西部联合通讯社于1865年取得特许执照，它在与纽约联合通讯社进行一段时间的斗争后，于1867年与之达成一项协议。此后，美国便分成了几个合作的联合通讯社的集团。1866年横越大西洋的电缆终于铺设完成。1870年印度可以直接与英国进行电讯联系。因此，从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来看，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整体，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要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欧洲体制在走向控制全球方面，又跨进了一大步。

（魏书铭 译）

[1] F. 基佐：《阐述我这一代历史的回忆录》（J. W. 科尔译，伦敦，1860年），第3卷，第23页。

[2] 维克托·库辛：《论德意志各邦的公共教育……》（第3版，巴黎，1840年），第1卷，第26页。

[3] 贝内代托·克罗齐：《意大利史，1871—1915年》（英译本，牛津，1929年），第57页。

[4] 斯科特斯·维亚托尔（R. W. 塞顿-沃森）：《匈牙利的民族问题》（伦敦，1908年），第207页。

[5] J. 康拉德：《最近50年来的德国大学》（英译本，格拉斯哥，1885年），第188页。

[6] 著名物理学家安培的儿子、历史学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译者

[7] 《星期六评论》（伦敦），1856年11月8日，第2卷，第616页。

[8] 对产生这一决定的背景情况一直有争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K. A. 巴尔哈切特的文章《自治政府与本廷克的教育方针》，《剑桥历史杂志》，第10卷，1951年第2期，第224—229页。

[9] C. 伊波：《俄国的公立教育》（巴黎，1878年），第245—246页；又见阿尔弗雷德·朗博的文章，《两个世界评论》（巴黎，1873年3月15日），第104卷，第327页。朗博的数字与伊波的数字稍有出入。

[10] 《图书馆和博物馆：统计摘要……》，下院168次会议录（1870年），第54期。数字已由J. J. 奥格尔在《免费图书馆》（伦敦，1897年）一书中概述，第38—39页。

[11] G. 宾尼·迪布尔：《报纸》（伦敦，无出版日期），第100页。

[12] A. 阿斯皮诺尔：《1780—1850年期间的政治与新闻事业》（伦敦，1949年），第372页。

[13] 《现代报纸》，《泰晤士报的印数》（伦敦），1929年10月29日，第10页。

[14] 斐迪南·拉萨尔：《论节日、新闻和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全集》（莱比锡，无出版日期），第1卷，第107—155页。

[15] 约瑟夫·赖纳奇：《19世纪》（伦敦，1882年9月），第12卷，第349页。

[16] 西德尼·惠特曼：《帝国的德意志》（伦敦，1889年），第282页。

第六章 艺术与建筑

19世纪的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约始于1760年。在那以前，多数国家的艺术都为教会所用或供宫廷贵族赏乐。从那时起，艺术家像作家一样，开始摆脱受艺术赞助人保护的处境而获得解放。艺术成为自食其力并受社会器重的独立人所从事的职业。雪莱称艺术家为“世上无须他人承认的立法者”，席勒将吟游诗人与帝王并列，“因为两者都是在人类的顶峰之上”。在英国，人们认为约翰逊博士1755年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书信最能代表这种社会的决裂：

爵爷，何为保护人？任溺水者拼命挣扎而冷眼旁观，甫抵岸却以救护为名阻其登陆者是也。我半生辛勤，倘早蒙眷顾，确能受惠；迟至今日，已如粪土……因我功名已噪，无须扶掖。

这篇杰出的早期的自由宣言出自英国是有代表意义的。因为18世纪的英国在社会、政治和哲学各方面都在欧洲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在艺术与建筑方面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举出华托或提埃坡罗的绘画、南德意志及奥地利的教堂和洛可可式宫殿的纤巧精美来反对这种说法。不过，如若我们把18世纪后半叶看作19世纪的序幕，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至少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英国从筑路和开挖运河、建造工厂（炼铁早在1792年就开始了）和桥梁，直至建筑和绘画各方面都是先进的。18世纪大陆绘画主要以宗教及神话为题材，再不然就以古典为题材；而英国绘画是肖像。当时J.H. 莫蒂默拿去参加艺术协会颁发的大奖竞赛的作品，不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生平为题，而是以忏悔者爱德华为题；威廉·汉密尔顿为奥尔德曼·博伊德尔画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逊位》，这就是说，这幅画不是以希腊、罗马史而是以本国历史为题材的。1760年海曼画了《奎勃隆湾大捷》及《印度土著总督向克莱武表示忠诚》；1770年威斯特创作了他的名画《沃尔夫将军之死》。这些画画出了当代事件，而非往昔的历史场面。1777年卢泰尔堡画了听众围绕的卫理公会传道士的画面；1778年科普利画了《布鲁克·沃森与鲨鱼》。这些画与历史毫无关联，而是对当代轰动一时事件的描绘。至于想象画，这时画展的观众从1782年展出的富塞利的《噩梦》中可以体会到几个世纪以来《对圣

安东尼的诱惑》和《阿加塔殉教》两幅画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但同时又引起的快感；《噩梦》描绘的是一个妇人被掀翻在卧榻上，胸部袒露，痛苦万状，一匹冥灵似的大牝马正从床幔间向她窥视。富塞利就这样以人间的感受替代了宗教感受（戈雅不久后在《狂想曲》中也加以仿效）。与此同时，布莱克以他个人的神话替代了为知识阶层所熟知的神话。至今读者也无法理解他塑造的尤里曾、卢瓦和洛斯这类人物。这些完全是个人的表现。而一旦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整体使个人凌驾于集体、阶级或民族之上，不论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占支配地位的统一局面，也不论这种纯属个人的作品效果如何；但哪里出现这种情况，哪里的艺术和艺术家的社会生命就必将受到危害。这就是给艺术史家们提出的需要探讨的19世纪的根本问题之一。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19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之前，17世纪由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荷兰共和国，就有过类似的问题。塞赫尔斯、伦勃朗和弗朗斯·哈尔斯晚年的遭遇，就是布莱克、柯罗、塞尚和凡·高的殷鉴。19世纪与伦勃朗时代的荷兰的另一相似处是两个时期在宏伟的艺术风格方面都无建树，而是以风景、肖像、静物和风情画之类寓有亲切感的艺术驰名于世。英国在这方面又居于领先地位。从1760年起到1800年前后这段时期，英国的贡献主要是在肖像和风景画方面；1760年，雷诺兹、庚斯博罗已是成熟的画家，1800年，克罗姆、格廷、透纳和康斯太布尔开始作画。雷诺兹的《内莉·奥勃伦像》、庚斯博罗的许多肖像以及斯塔布斯和佐法尼的作品中的亲切感，在欧洲大陆上是无与伦比的。油彩和水彩风景画家对大自然的观察能力，在大自然中的自我沉醉（尤其是对英国本土的自然风光的沉醉）也是无与伦比的。

正是风景画家和肖像画家作品中呈现的那些相同的特质，使得英国（从更早的时候起）放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花园的那种讲求宏伟的固定格式，代之以随意的非对称的布局，即所谓的别致布局。大家公认这种随意性是英国政治自由的必然产物。花园布局的这种随意性和自然感对大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在艺术和建筑方面所有的创新也许都未能给大陆以如此深刻的印象。这种布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为一种同样是随意的、非对称的和别致的建筑风格奠定了基础，这就是19世纪中叶和末期多数私人建筑和不少公共建筑盛行的风格。至于1760年和此后的建筑，英国再次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很早就抛弃了那

种千篇一律的爱好，本身就证明它是领先的。当然，直到1830年及其后还有人仿效帕拉第奥的宁静整齐的古典主义，但是1760年前后主要的事实是：发现了真正的希腊陶立克柱式并偶尔为某些设计师及用户所采用，以及哥特式的流行。间或也有模仿其他的建筑风格，如中国、摩尔、印度的风格。反过来说，也只有在已经能够自觉选择格调，并以多样化代替千篇一律的时候，像约翰·索恩爵士这样的设计师才有可能发展他那种高度个人的风格，那种绝无时代前例的风格。

普金把建筑风格的千姿百态称作“建筑艺术博览会”^[1]，这种建筑格局的层出不穷是整个19世纪建筑的特征。不过，1830年标志着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野。我们在这里要首先分析英国1830年及其后几十年间的情况，因为英国在建筑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由于英国的高度繁荣，公私营造的房屋范围广博以及各种对寺院建筑起到了同等强有力刺激作用的宗教运动。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水晶宫无疑是1830—1870年这段时间最显赫的单一建筑。但是水晶宫就像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兴建的钢铁框架工厂和为数众多的钢铁框架办公楼一样，就像1829年设计的克利夫顿吊桥以及1883年开工的福斯港湾桥一样，并不是一个建筑师的作品。它们大都出自土木工程师之手，这是一门在19世纪初从建筑师中分离出来的行业。水晶宫的设计人约瑟夫·帕克斯顿（1801—1865年）是一位园林家、园艺家和业余发明家。一些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可以看出钢铁和玻璃具有一种崭新的建筑风格。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1811—1878年）可能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建筑师，例如他就写道：“现代金属结构的这种成就，为建筑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2]不过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天地竟是他的。思想和行动脱节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虚弱的标志。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处处表现了这种脱节的现象，这说明平衡失调，造成失调的原因有多种。像中世纪一样，建筑师们不能吸收新材料和新技术，更不用说创造了；因为建筑作为一门艺术，与所有其他各门艺术一样，其作用已经改变。

新出现的建筑赞助人阶级有着新的要求。这个阶级的人没有受过乔治时代那种细致高雅情趣的熏陶，也没有时间去培养这种风雅的情趣。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没有闲暇时间的艺术赞助人。终日努力工作的有钱人是一种新型的富人。艺术和建筑要取悦这种人就必须是一种新型的：要有说服力，大声疾呼，既要注重实效，又要避免琐

俗，以显示出一种卓尔不群和货真价实的气派。绘画方面的情况显然如此，建筑亦复如是。至于建筑，城市的日常环境枯燥无味，单调的工厂，几英里色调阴暗的住房。工作是职责，艺术则不过是表面上的装潢。罗斯金教导人们说：“装饰是建筑的主要部分。”^[3]用斯科特的话说，建筑的“主要原则”就是“装饰结构”。^[4]两个定义都忽视了设计规划，这就是说忽视了在空间里的创造，不论是城镇或街区的外部空间，还是房屋的室内空间。建筑师们只设计建筑物的外观。

这是对普金“建筑艺术博览会”说法的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让一位忙忙碌碌的门外汉去辨别一个建筑物的外观是希腊式的还是哥特式的，要比让他去鉴别各种比例、线条和类似细节的美学价值容易得多。第三种解释是，在整个19世纪，各种有关事实的知识包括考古知识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的人相信可以验证的事实，相信科学的精确性，相信数据的累积。这在建筑方面则意味着接连问世的一卷卷，其中有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北德意志的砖结构，托斯卡纳的宫殿建筑，英国大教堂的古迹，窗棂的花格以及柱顶等。建筑师局限于装饰建筑物，并为那些重知识甚于重感受的委托人工作，因此他们大量利用了这些为数众多的出版物。所以19世纪的建筑史，被少数几本腾出篇幅谈到它的教科书和手册说成是一部抄袭风格的历史。即使如此，它也不失为一部有趣的历史。

起初，上溯到1830年前后，教堂多数是古典式的，但也有哥特式的。私人住宅则二者兼有（就像18世纪末一样）。公共建筑清一色是古典的。英国第一座打破乔治时代审美观窠臼的公共建筑是新的议会大厦。1835年为这座建筑征稿时规定哥特式或伊丽莎白式为英国的两个民族形式。哥特式获胜，以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地位：A. W. N. 普金（1812—1852年）这位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满怀热忱提出的理论，约翰·罗斯金（1819—1900年）以同样热忱更加喋喋不休地、因而更广泛传播的理论，以及在1839年由剑桥卡姆登学会发起并在《教堂建筑及装饰研究者》各卷中倡导的教堂建筑及装饰运动，这些理论和运动都加强了哥特式的地位。哥特式就这样成了英国占优势的基督教风格。诺曼式或罗马式一直比较罕见。考古研究对19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哥特式教堂加以认真对待，这在乔治时代晚期人们的工作中是看不到的。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设计的教堂也许单调呆板，但却实用。威廉·巴特菲尔德（1819—1900年）在教堂建筑方面表现出的独

创性是少见的，通常不受人们欢迎。教会建筑的设计似乎应该严谨并使人有某种得到安慰的感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和委托人的那种虽比较粗犷但比较坚固的优点，这时开始在民用建筑上显现。在公共建筑方面，除了哥特式和伊丽莎白式以外，又接受了第三种风格，即意大利宫殿式；这种风格是由议会大厦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1795—1860年）在伦敦的旅行家俱乐部和改革俱乐部两座建筑上首先确立的。这种更为随意、更开阔、装饰也更华丽的意大利16世纪艺术格调，在市议会厅的建筑和其他官方建筑方面，成为哥特式强劲的对手。至于私人住宅，只有坚定不移地主张采用哥特式的人才推荐哥特式。伊丽莎白式和詹姆斯一世式则大为流行，詹姆斯一世式是一种低格调的意大利式，罗伯特·克尔教授称之“农村意大利式”。^[5]这三种风格都是非对称的和别致的，以天空为背景呈现出错落不一的轮廓，周身的装饰给人以动感。19世纪中叶已经确立的建筑风格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屋顶上带着高亭子的法国文艺复兴式，这是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英国的（约在同时传至美国）。至此，我们已概括了组成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建筑全景的各个部分。有些评论家抱怨19世纪缺乏独创的风格，但是像斯科特这样的评论家却写道：“折中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原则”；^[6]克尔教授则断言：“我们的时代有自己十分突出的风格，一种以学问代替直觉的风格”；^[7]罗斯金用他那种容易激动和夸大其词的口吻表达了同一思想，他说：“我们不要什么建筑风格……已有的形式对我们就足够了，而且远比我们的任何形式都优越……有才华的人吸收任何一种通行的风格……并将在这方面大有作为……”^[8]他的结论是，应该在比萨的罗马式，托斯卡纳、伦巴底和利古里亚的哥特式，威尼斯的哥特式和英国最早的装饰式之间进行选择。显然，他是由于天主教色彩而选中它们的，并无多大的固定不变的标准，不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选择。克尔论建筑风格的那一章的头一句就说：“你将采用何种风格建筑你的房子呢？”

至今，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不过20世纪逐渐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因而减小了这种态度的危害性。当这种态度处于全盛时期，它造成最大的危害就是建筑师对建筑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毫无兴趣，因为这些是社会问题而非美学问题，规划问题而非外观装饰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城市急剧增加的工人阶级的住房？19世纪40年代特地为他们修建了经济公寓，起初搞得颇有希望，但到了男爵伯德特-库茨夫人、皮博

迪信托公司和类似的慈善组织和营利组织手上，这些建筑就变得死气沉沉，外表上看起来令人讨厌，但在卫生方面无疑要比它们所取代的贫民窟好得多，工厂不是由专业人员设计的，而且厂址与居住区的关系毫无规划，学校阴暗无光，空地不足，社会活动的场地只有教堂、小礼拜堂和酒店。建筑师及其职业代表机构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本应指出这些缺陷并加以补救，但却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建筑师仍然只管装饰外表。

如果说英国的情况如此，所有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上面描绘的这幅1830—1870年英国建筑发展的图画，与同一时期法国、德意志、意大利、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还有美国的发展图画大同小异。各个地方的着重点不完全相同，某些细微的差别只能或主要在几个国家才能看到，但事情的总的性质和主要过程则具有国际性。

19世纪30年代，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建筑活动的学术领域，新希腊风格牢牢地占据上风。如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斯塔索夫（1769—1848年）在圣彼得堡建造的莫斯科门（1833—1838年）就是一座六柱希腊陶立克式凯旋门，柱子用的是铸铁而不是石头，这座建筑可以矗立在任何国家。

另一方面，哥特式又因国家不同而在数量上、形式上各不相同。英国毫无疑问处于领先地位。一个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英国建筑师不但赢得了设计1844年汉堡当时最大的圣米迦勒教堂的国际竞争，还赢得了1855年新建里尔大教堂的国际竞争。不过，哥特式在德国教堂建筑方面和英国一样，也取得了差不多同样的领先地位。歌德在青年时期首先评价了这种建筑形式的宏伟和特征。浪漫主义作家瓦肯罗德尔、施莱格尔和其他一些人也崇拜它。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德国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1781—1841年）在运用哥特式方面和他运用新希腊式一样热心，一样匠心独具。1840年哥特式在社会上获得全胜，当时科隆新建大教堂的本堂，以便按照1814年和1816年发现的原来的蓝图完成这座大教堂的未竟工作。E. F. 茨维尔纳（1802—1861年）被任命为教堂建筑师，1842—1880年，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便巍然矗立于这个中世纪城市。然而，哥特式并没有独占德国的教堂建筑阵地。它的竞争对手是所谓的圆拱式，这是一种将早期基督教及意大利罗马式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的风格。申克尔和他的后继者佩尔西乌斯（1805—1845年）在普鲁士，格特纳（1792—1847年）和其他人在

慕尼黑同时确立了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在英国只在19世纪40年代盛行了一个短时期。它在德国甚至被采用来建造了一座火车站（1847—1849年由比尔克莱因建于慕尼黑）；在汉诺威及其附近，学校、博物馆、银行和其他建筑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也许它确实比到处林立的哥特式建筑更适合采用于世俗领域。但是直到这个时期结束，甚至在这个时期以后，一些外表极尽华丽之能事的公共建筑，都选中了哥特式的外形，例如维也纳市政厅（1872年）、慕尼黑市政厅（1874年）及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1885—1902年）。

拉丁语系国家的反应不同。它们没有盎格鲁—德意志民族对新哥特式的那种热情。哥特式在意大利始终没有能够成功地生根发芽，即便是在13和14世纪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哥特式的复兴也就姗姗来迟，而且来势也软弱无力。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一座哥特式建筑的范例是在英国影响下，由意大利最优秀的新希腊式建筑之一的建筑师建造的，即朱塞佩·亚佩利（1783—1852年）在帕多瓦建造的所谓“1837年的佩德罗基诺”，亚佩利是久负盛名的带有陶立克前廊的“佩德罗基咖啡厅”（1816—1831年）的建筑师。

法国对哥特式的复兴并不热情，乍看起来似乎颇为费解。其实我们无妨说，正由于法国在12世纪创立了哥特式，并在13世纪发展它，使之达到顶峰，因此她才本能地反对将哥特式纯粹用于赏心悦目的目的。巴黎最优秀的新哥特式教堂圣克洛蒂尔德教堂（1840年）是科隆人弗朗茨·克里斯蒂安·高（1790—1853年）的作品。然而对哥特式原则的真正理解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英国人理解更深。对此有事实证明：19世纪中叶有些法国建筑师就准备颇为巧妙地毫无顾忌地运用新型金属建筑材料。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在使用金属建筑材料方面可能比法国更广泛，但是利用这种材料的只是些门外汉。在法国，亨利·拉布鲁斯特（1801—1875年）却骄傲地在圣热内维夫图书馆（1844—1850年），后来又在国家图书馆（1868年）展出了他的架结构。与此同时，L. A. 布瓦洛（1812—1896年）建造圣欧仁教堂时使用了铁柱和穹顶铁骨架（1854—1855年）。在英国就找不到这样大胆地尝试。

美国对哥特式也不热情，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乍看去像是仅仅在照搬英国的模式。一方面，多数大型公共建筑都是新古典主义的，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州议会和华盛顿政府大楼都是如此。如果说像威廉·斯特里克兰（1787—1854年）这样的建筑师与他们的

英国同行有什么区别的话，只不过是比他们高明而已。另一方面，主要的教堂如理查德·厄普约翰（1802—1879年）设计的纽约圣三一教堂（1839—1846年）和詹姆斯·伦威克（1792—1863年）设计的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1850—1879年）都是哥特式，商业建筑则彻底使用铁结构。美国在这方面似乎比英国走得更远。外墙不用石墙，完全利用铁和玻璃建起来的第一批办公楼的外观，显然属于纽约和19世纪30年代、40年代。^[9]当然，在一个缺乏能工巧匠的国家，由工厂制造建筑部件在工地只是组装的预制体系，是大受欢迎的。

美国比英国先进的地方还表现在，设计必须确保在工厂制造的东西要舒适，例如普尔曼制造的火车和车上可以改变的房间，以及家庭和旅馆用的洗澡间。饭店实际上是美国的产物。英国摄政时期风格的饭店是一种乡间别墅加会议室，这种饭店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现代新式饭店所取代。在美国，1828—1829年在波士顿就出现了乔赛亚·罗杰斯（1800—1889年）设计的特里蒙饭店，备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盥洗间和在地下室内装有自来水的浴室”。^[10]不过，在这座饭店和其他饭店所用的装饰格调始终保持古典式。

我们讨论的这一阶段古典的和哥特式建筑情况就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除以上两种风格，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还增加了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式和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式，当时又称为本地文艺复兴式。15世纪式和16世纪式在大陆上复兴的最佳范例出现在德国。在慕尼黑，这种风格的复兴最早开始于莱奥·冯·克伦泽（1784—1864年）的1816年音乐厅，1831年格特纳的州立图书馆继其后。但是，这种新文艺复兴高潮的标志却是德累斯顿的戈特弗里德·桑珀（1803—1879年）的大作：1838—1841年的第一座歌剧院和1847年的州立美术馆，它们和另外两座早先的建筑偶然构成一幅城市规划的杰作，这在19世纪是罕见的。本地“文艺复兴式”的再兴起是指北方各国16世纪风格的复兴，它在法国和英国同时开始。主要是两个国家民族自豪感使它们赏识起它们16世纪那种有些讲求华丽的建筑。在法国，关键的时期是1836年巴黎市政厅的动工扩建，和1851年罗浮宫更加华丽、更有影响的扩建工程；罗浮宫的扩建开始是由L. 维斯孔蒂（1791—1853年）主持，以后又由H.-M. 勒菲埃尔（1810—1881年）继任。1844年德姆勒在德意志北部什来林动工修建那座卢瓦尔城堡式的大型新宫殿，这是法国文艺复兴式重新抬头的—一个特别早期的单独的例子。其他国

家也有转向本国“文艺复兴式”的趋势，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立即转向本国形式就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再举一个例子，在俄国，拜占庭式正在缓慢而不断地复兴，16、17世纪的俄罗斯风格重又赢得同情，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崇尚浮靡和排场在英国原本主要是盛期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气，到19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这种风气也开始沾染了更加纯古典式的设计。在法国，1841年开始兴建J.-L. 迪克（1802—1879年）设计的正义宫，这一类建筑的外观开后来美国人称为“美术式”的那种建筑风格之先河，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采用的就是这种风格。在美国本土，1855—1865年，托马斯·U. 沃尔特（1804—1887年）在华盛顿建成带有巨大（铸铁）穹顶和长长的柱廊环抱的国会大厦，这代表着同一种趋势。19世纪末这一趋势在一些宏大空荡的纪念性建筑上达到了顶点，如1885年在罗马开始兴建的由萨科尼设计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堂等。

这些建筑的宏大，其本身便代表着19世纪的特色。大的城市需要大的市政厅，居民人口多，又需要有公共事务场所。所以，中央的和市的行政机构、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都要求有像巴洛克时期统治者的宫殿那样宏大的建筑；当这种大厦在各国首府大量涌现后，就促使建筑物的体积普遍加大。19世纪那种一味追求宏大的倾向留给子孙万代的纪念碑似乎是约瑟夫·波埃莱特在布鲁塞尔建造的那座确实宏伟壮观的正义宫（1862—1883年）。这座用巨石构成的巍峨殿堂使皮拉内西最得意的梦想都相形见绌。在鲁本斯的故乡出现这样一座建筑物是意味深长的。英国则像她那善于克制的民族性格一样，除了在戏院内部装修方面偶尔采用新巴洛克式以外，其他地方很少采用。新巴洛克式最精美的典范就是夏尔·加尼埃（1825—1898年）设计的于1861年在巴黎动工兴建的歌剧院。

歌剧院位于巴黎新建的几条林荫大道的交会处，剧院的外观大部取决于它坐落的位置。这些新建筑的宽阔笔直、树木葱茏的长街，是我们时代对城市规划所做的最为人称颂的贡献。这些大道宏伟、整齐，给人极深的印象，它们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而且的确是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1809—1891年）的专制主义的产物。这些大道笔直，发生内战时在防卫上有好处，但在美学上肯定也是可取的，伦敦就没有可以与之比拟的四通八达的轴线。霍尔本高架桥、维多利亚大街和沙夫茨伯里林荫路与

之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巴黎这些大道就像伦敦缺乏任何基本规划一样，同样是无益的。在这些新的堂皇的外观后面，大片出租房屋和狭窄不见阳光的庭院构成的穷街陋巷仍原封未动。

如前所述，19世纪的建筑完全是门面货，它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设计。这个世纪何以在雕刻方面毫无成就，而在绘画上却十分出色的原因也就在此。雕刻是在立体和空间工作，绘画则是在平面墙上和画布上工作。1830—1870年，我们能想到的雕刻家寥寥无几，而阐述这几年艺术史的篇章则告阙如，这并非偶然。英国可以提起的有谁呢？当然要提到艾尔弗雷德·史蒂文斯（1817—1875年），他没有什么成就；然后是托马斯·伍尔纳（1825—1892年）和亚历山大·芒罗（1825—1871年），这二位是作为拉斐尔前派画家开始创作的；之后是约翰·贝尔（1811—1895年）和J.H. 弗利（1818—1874年），他们很受欢迎并参加了装饰阿尔贝特纪念会堂的工作。这些人的德国同行有恩斯特·里切尔（1804—1861年），也许还应该算上奥古斯特·基斯（1802—1865年）；马修·迪格比·怀亚特爵士1881年说，基斯的作品《女战士》“也许是现存艺术品中最宏伟的一件”。法国人所作的贡献在美学方面比其他国家的更有价值，如弗朗索瓦·吕德（1784—1855年）的戏剧群像、路易·巴里（1796—1875年）的动物，以及年轻的J.B. 卡尔波（1827—1875年）的生动优美的新罗可可派裸体像及群像。只有卡尔波的作品里，在色欲之中还含有高度的艺术性。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的有钱的主顾需要的是色欲，而那些不拘原则但报酬很高的艺术家提供的正是色欲。

总的看来，可以这样说：19世纪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社会上和官方看来有成就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学方面有价值。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的前半叶也没有多少变化，将学院举办的展览和严肃的当代作品评论家探讨的艺术作一比较，就能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前面说过，这种不一致最早是在17世纪的荷兰出现的。先驱和开拓者只能满足于阁楼，绫罗和天鹅绒，属于外表有魅力的人或廉价的自然主义者。在法国，也是在罗可可时代，布歇之类的画家掩盖了夏尔丹之类的画家的光辉，不过并未使之全然失色。那么，维多利亚时代有哪些东西是新的呢？主要有两项。过去罕见和稀有的东西，现在俯拾皆是。17、18世纪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属于社会上有

成就者的行列，但现在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中已不复存在美学的良心了。这种情况在法国表现最明显。由于法国的绘画在19世纪的欧洲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在谈这几十年的时候，必须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加以分析。

到1830年，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已经死去五年左右。他年轻的时候属于革命的国民公会，曾为法国大革命的烈士画过许多清晰的画像，如《马拉之死》，他赞成取消绘画雕塑院，认为它是旧政权时期艺术上的特权团体。后来他转向拿破仑，以宏伟的场面、具有古典主义超然态度的作品歌颂他和他的帝国，随着复辟，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死在布鲁塞尔。这时，绘画雕塑院恢复，成为美术学院，是法兰西学院的一部分，像过去的绘画雕塑院一样享有特权。它为美术学校分配教师，颁发奖金（包括令人羡慕的罗马奖在内），并为美术展览会挑选作品。到1830年时，美术院的领导人是让·奥古斯特·多明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他在年轻时抱浪漫主义的理想，但不久他的完美无瑕的绘画便转向古典题材。年事越高，他的法则便越趋狭窄，局限于古雅高洁。他一生的事业与德国的彼得·冯·科内利乌斯（1783—1867年）十分相似。后者也是以背叛学院的陈规旧习而转向浪漫主义为开始，结果在1830年和以后成为学院的暴君。他像安格尔一样，把素描与色彩对立起来，精确与制作迅速对立起来，把来自历史、宗教或神话中为人接受的领域的题材与年轻画家由于种种新的原因而热衷追求的题材对立起来。

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属于18世纪末出生的一代人：在艺术方面有泰奥多尔·热里科（1791—1824年）、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卡米耶·柯罗（1796—1875年）；在文学方面有维克托·雨果（1802年生）；在音乐方面有埃克托尔·柏辽兹（1803年生）。这种背叛的含义，在文学及音乐方面比在艺术方面更为人们熟悉。雨果的《爱尔那尼》（1830年）首演之夜引起的震动，正像他的《克伦威尔》（1827年）的序言一样，将为人们永志不忘；雨果在这篇序言中强调自然、真实和灵感，强调强烈对比、地方色彩和特色而不强调美，强调戏剧是现代的主导艺术。19世纪20年代柏辽兹在巴黎音乐学院始终抱叛逆态度。1827年他谱写了《威弗利》序曲，1828—1829年根据《浮士德》创作了八场合唱剧，

1830年发表大合唱《萨丹纳帕路斯之死》。随后又创作了有几个动人段落的《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德在意大利》交响曲。

热里科由于他的《梅杜萨之筏》（1819年）而一举成名，这是对当时一次沉船事件十分戏剧化的报道，并恰如其分地突出了事件的全部恐怖场面。他还画了埃普瑟姆赛马会，骑在腾跃的骏马背上冲锋的骑兵军官，并将疯人院里男女疯子的面孔描绘得极为逼真。他集中全部精力工作；他下笔如飞，他的生命也飞快地消逝了。安格尔称他是“健全诚实的绘画”的敌人，并谴责他败坏了人们的审美能力。^[11]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最重要的早期作品有《马里诺·法列里》，《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列日主教被害》（取材于《昆丁·达沃德》），一组《浮士德》的石版插画，还有《希阿岛的屠杀》和《街垒上的自由》。显而易见，这些1830年法国浪漫主义者的灵感来源于英国和德国，来源于拜伦、司各特和早年的歌德，并且来源于当代的事件。

德拉克洛瓦的才智是19世纪所有画家当中最出众的。他的日记和信札是理解在19世纪最初三分之一时间所经历的比较深刻、涉及多种学科、比较富于基督教色彩的浪漫主义之后于1830年出现的第二次浪漫主义的基调的无与伦比的材料来源。在德拉克洛瓦看来，鲁本斯是绘画界的荷马。早期的浪漫主义画家不同意他的看法。^[12]德拉克洛瓦称鲁本斯为“温暖与热情之父”。^[13]他对他的那种“既有活力又有理智的气质”深为倾倒。他写道：“他以如此丰富的自由和勇气主宰你、征服你。”^[14]他在这一类的文字中为自己、为自己的性格和艺术作了表白。但是在另外一些文字中，却又完全自相矛盾，表示了他对莫扎特、拉辛和拉斐尔的尊崇。他说，有些艺术家“他们不能驾驭自己的天才，而是为天才所驾驭”，另一些人则“随心所欲，但仍能控制自己”。^[15]他在一处说，天才不受规则的制约。在另一处（固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很久以后）他却又把天才定义为“一个具有非凡理性的人”。^[16]我们应该记住，19世纪有成就的艺术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另一个例子，那就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尽管德拉克洛瓦从来不受欢迎，也没有创立一个学派，但他确实是有成就的。德拉克洛瓦的社会态度也反映了在性格与抱负之间同样存在的矛盾。他肤色黧黑，外表潇洒，长于音律，衣着讲究，他与约瑟芬皇后的侄女有一段私情；

而且，20年来一直渴望被美术院所接纳，但他同时又将群众称为“群氓”^[17]，他在写给一位警告他不要展出过于革命和大胆的作品担任行政官员的友人时说：“宇宙间任何人也不能不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事物。”^[18]

他的艺术风格如何？这是一种从对热里科的倾慕和在罗浮宫学习中发展而来的风格。德拉克洛瓦以自己基本上是无师自通这一点而自豪，这种自豪感在19世纪中叶的画家中间屡见不鲜，并表达了他们对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不信任。不过在德拉克洛瓦形成其风格的年代中有一件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就是他发现了康斯太布尔的艺术。1824年在当代画家作品展上展出了康斯太布尔的三幅画。德拉克洛瓦当时正准备展出他的《希阿岛的屠杀》，他在展出前夕将这幅画大加改动，使画面开阔明朗，剔除了在造型和色彩上给予人的压抑感，并运用了康斯太布尔的那种表现大自然永无止息的生命力的写意手法。从那时起，德拉克洛瓦的画笔也采用了那种一挥而就的笔势。戈蒂埃说：

“当他站在画布前面的时候，就忘却了他的古典主义观点，他的画家的冲动气就占了上风，一幅热情激昂的画面便一挥而就。”^[19]德拉克洛瓦第一个系统论述了康斯太布尔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又成了印象派的问题，这就是使最后完成的画保持第一幅草图时的那种新意，而又要使之具有早期阶段必然缺乏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德拉克洛瓦工作起来简直是在玩命。他在55岁的时候写道：“我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待到现实与一个人的梦想不再一致时，我们除了沽酒以求一醉之外，还能做什么呢？”^[20]他的作品数量多，范围也广。我们已经提到他早年取材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品。他26岁时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想获得永恒的灵感，就要记住拜伦的一些诗篇。”^[21]1830年的《街垒上的自由》是一幅偶然涉及当时政治的作品，不过却有代表性。1830年后，这类现象不再出现，文学题材也罕见了。另一方面《圣经》却继续为德拉克洛瓦提供题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位能够画出《雅各布与天使角力》或《革尼撒勒湖》或《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的画家。一个比他年龄小的，生在19世纪而不是18世纪的画家是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的。只有到了19世纪末的高更和20世纪的鲁奥和诺尔迪，以宗教为题来作画才重又成为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19世纪中叶不是宗教的时代，也不是热情的时代。这个时代过于讲求现实。说到现实，一件

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事是，德拉克洛瓦本人在1830年以后为了使他的炽烈的场面具有真实感，他需要在比拜伦和《圣经》更真实更有可能的环境中作画。1831年他在去摩洛哥的一次旅程中找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在这里看到了或他幻想看到了激情与暴力，为他此后一生提供了题材：画着酋长、奴隶和劫掠妇女情景的战争场面和猎狮的场面，画面上色彩绚烂的猩红与翠绿衬托在偶尔夹杂着青蓝的红棕色基调上，以饱满的激情奋笔急挥，这是自鲁本斯以后欧洲绘画上从未有过的。不过鲁本斯所画的《劫掠塞宾的妇女》和《卡利敦的野猪》现在被画成像是当代的场面。就这样，1830年以后，德拉克洛瓦对现实主义作了很大让步。

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中叶数十年的标志。现实主义在艺术领域里的地位相当于伟大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当于《物种起源》和水晶宫。法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以多种姿态出现：保罗·加瓦尔尼（1804—1866年）表现巴黎生活的石版画；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年）的政治及社会讽刺画和他那机智生动的油画素描——剧院、洗衣妇和她的孩子、三等车厢；让·路·欧·梅索尼埃（1815—1891年）那种画法陈腐、细勾细描而且备受欢迎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风情画，以及他所画的当代战争场景；柯罗早期的那类精巧清新的风景画；以及那些居住在枫丹白露森林的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的伟大作品。卡米耶·柯罗（1796—1875年）是19世纪的又一位无师自通的艺术家的。他在晚年写道：“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我孤身与自然奋斗，结果我就成了现在这样。”他又说：“必须具有赤子之心才能解释自然。”^[22]的确，赤子之心是这位非常受人爱戴的“柯罗爷爷”的人格中最可爱的品质之一；他的童心使他在20年代画的质朴的小型意大利风景画具有清新和自然之感。这些画是法国可与同时代的科特曼的水彩画相媲美的作品。柯罗的那些更著名的雾霭弥漫的山林沼泽中的神女画，属于他的晚年作品——这是19世纪画家生涯中由紧张变松弛的一个例子。19世纪40年代、50年代最敏感的艺术评论家波德莱尔将柯罗排在“现代派之首”，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如果卢梭再多表现一些，谁是首位就难说了。^[23]

泰奥多尔·卢梭（1812—1867年）可以说是巴比松画派的领袖。他的风景画的粗犷的画法显然是受了康斯特布尔的影响。很难说，他或这个画派较早的风景画家们开拓了新的领域。但是他们使英国在19

世纪的头30年和第二个30年间的创新在欧洲大陆得到确立，并且将它们传给最后30年中的印象派。从我们这个概括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年）。他在1849年定居巴比松。米勒为19世纪画坛挖掘出了农民和农田劳动者的题材。自勃鲁盖尔以来还没有一个画家像米勒这样重视农民。他不自觉地——主要是由于他的视平线低，因而他的人物就显得比真人高大——使他的人物形象高大起来，而且赋予他们以感情色彩，那幅著名的《晚钟》就是一例。波德莱尔是唯一有眼力的评论家，他看出“他笔下的农民循规蹈矩，过分考虑自己……不论他们耕地、播种、放牛还是照料牲畜，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是我们这些贫穷无地的人把大地变成沃土。我们在完成一件使命，尽着一个布道者的职责”。^[24]米勒很担心别人把他误解为社会主义者，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想法。^[25]1840年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发表，1846年又发表了他的《贫困的哲学》。从此以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暴露生活的真实——就很容易与社会主义合成一股力量了。

在我们所叙述的这个时代的后半期，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年龄大二十多岁的德拉克洛瓦仍然保持了浪漫主义炽热的激情，柯罗仍然保持其诗情画意。库尔贝则以“没有理想没有信仰”为荣。于是，他用他自己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在个人信笺的顶楣上写着“既无理想又无信仰的绘画大师居斯塔夫·库尔贝”。^[26]绘画界的库尔贝就像建筑领域里维多利亚盛期的英国建筑一样，坚实、自信、粗犷。他谈到自己时说：

“我是本世纪首屈一指和独一无二的画家。”^[27]库尔贝高大肥胖，大笑时声震屋瓦，动辄以拳头敲桌子表示赞同与否，作画时大杯大杯饮啤酒。他大言不惭地说，他对妇女只有一个意图，就是用她们来享乐；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很典型，简直就是无耻的春宫画，有许多则是刻意表现色情猥亵。法国文学中相当于库尔贝的人物是比他年轻许多的左拉，而不是与他同期的福楼拜。库尔贝像其他许多19世纪先进画家一样，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自称“以造化为师”。他成熟初期，即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作品，值得逐幅予以评介。这些作品中的第一幅《碎石工》是他31岁那年所画。他写到这些碎石工时说：“我并无创造。我每天散步的时候就看到画中的这些可怜人。”^[28]但事实上，即使他未创造，也须作出布局。那个老人和他的年轻伙伴的姿

态一眼就能看出是有意安排的，而其着色有着名家的丰富多彩和真实感。结果他和米勒一样，把大地上的生活崇高化了，只不过缺乏情感而已。同一年，在当代美术家作品展上和《碎石工》一起展出的还有一幅9.5英尺长，宽超过21英尺的《奥南的葬礼》，画面结构着意追求质朴，许多人物一动不动，站得笔直。人物画得非常真实。葬礼的参加者似乎并无虔诚的表示，也无哀容。

几年后继而问世的《库尔贝先生的画室》在尺寸上与《葬礼》相仿。它是1885年国际博览会上专门展厅中显示主题的中心展品；展厅是库尔贝为展出他的作品而建造的，取名“现实主义”。画的正中画家本人正在画布上挥笔创作一幅风景画。一个农家的男孩和一个衣服摊了一地的裸体女模特儿在看他工作，表明人人都能理解库尔贝的作品。左边是他的其他几个模特儿，一个猎人，一个衣衫褴褛的爱尔兰贫妇，一个犹太人，一个掘墓人，一个妓女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人物。右边有波德莱尔代表诗歌，蒲鲁东代表社会主义，在另外一些人中还有两对男女代表上流社会的爱情和自由的爱情。

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出浴》，在郁郁葱葱的风景背景上有两个体格健壮的女人；一个赤身裸体，背部展现无遗。德拉克洛瓦评论这幅画时说：“构思之粗俗乏味令人憎恶。”^[29]再就是《塞纳河畔的少妇们》，画着河边上懒洋洋地躺着两个年轻的女人，色情毕露；还有《吊床》，画的也是一个肉感的女人，大腿和乳房袒露得未免太多了点。这是对兽性的揭示。库尔贝绘画的粗犷有力和造型的立体感与他的布局配合得恰到好处。这些就使他得以创造出19世纪最有感染力的风景画和海景画。与库尔贝画的岩石峡谷相比，柯罗的画就显得单薄了，莫奈的也一样。然而，特别是他后期画的牡鹿和群鹿，他那种缺乏细致的粗俗的风格，往往损害了一切，但却仍旧博得喝彩。正是他的这些最不易识别的作品经过复制却得到广泛流传。库尔贝至今仍然是风格粗俗却成为大画家这样一种有趣而罕见现象的实例。正像他的一些裸体像一样，他画的某些风景画唤起的是平庸的感情。库尔贝把杜米埃看成是他的革命手足，但他不能理解杜米埃为什么不愿意出头露面。1870年杜米埃拒绝接受荣誉勋位的时候，库尔贝很高兴地赞许他并拥抱他，但又责怪他没有“大肆渲染”地加以拒绝。库尔贝做任何事都喜欢大肆渲染，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在设计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时也表现了这种好渲染的风格，不过比较淡雅一些。圣

伯夫在1862年告诉我们：库尔贝的想法是“把宏大的火车站看成是用绘画作装饰的新教堂，在高大的墙上画满成千个题材……优美的风景、道德的教诲、工业的气息……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神圣事物和各种奇迹”。[\[30\]](#)

这个梦想并未实现，库尔贝没有画过歌颂工业和商业的绘画。更广泛地说，工业革命和铁路时代没有给当代绘画留下多少痕迹。德比的赖特笔下的锻工是受卡拉瓦乔派影响的作品，人物都处在强烈的人工光线照射之下。透纳在1844年作的《雨、蒸汽、速度——大西部铁路》是一幅给人以美感的作品，而不是社会题材。卡尔·布莱肯（1798—1845年）的印象主义素描《轧铁工厂》和阿道夫·门采尔（1813—1900年）在1847年作的《柏林一波茨坦铁路》也是这样，不过门采尔还是第一位以工厂内景作画题的主要画家。他的《轧铁工厂》画高五英尺、长九英尺多，表现的是在巨大玻璃屋顶下蒸汽和烟雾弥漫的气氛，工人们——丝毫没有崇高感——正在摆弄流出的白炽熔铁。这幅画绘于1875年。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门采尔的一生颇为有趣。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他早期的素描受到布莱肯的影响，带有前印象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可与康斯太布尔和波宁顿相提并论的德国画家，主要画柏林附近的风景；或是教堂的一角，布道坛上立着牧师；或是一间屋子，微风吹拂着白色窗帘，洒满阳光。不过，门采尔同时还创作了一组木刻，这是为库格勒的《腓特烈大帝生平》一书所做的插图。他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尽可能搜集了有关18世纪普鲁士生活用品的一切资料。这组木刻在所有细节上都精确无误，其成功促使门采尔开始以这位国王的生活为题材创作油画。其中第一幅画于1850年。作为19世纪标志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在这里得到纤毫入微的表现。其表现手法近似于梅索尼埃在描绘罗可可纨绔子弟时所使用的手法。门采尔在晚年用同一种手法描绘了取材于当代社会的群体场景。1878年的《皇宫晚宴》和1884年的《维罗纳芳茵广场》都是经过细心观察和在细节安排上下过一番功夫的精心之作，使人观赏不厌，且不落俗套。

门采尔在技巧上放出的奇光异彩植根于他早年的印象主义，并使他迥然区别于他的英国同行威廉·鲍·弗里思（1819—1909年）。对于人们所熟知的作品如1854年的《拉姆斯峡谷的沙滩》，1858年的《赛马会》和1862年的《帕丁顿火车站》，这里就不多谈了。这些画

使弗里思名扬全欧并使他能在自传扉页上本人的名下署上“荣誉勋位获得者，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及安特卫普各学院院士”的头衔。

当时比利时颁发的各种荣誉最受重视。因为安特卫普已成为欧洲学院艺术的中心。一种以情节取胜的历史画就是在这里从瓦佩斯（1803—1879年），加莱（1810—1887年）和德·凯泽（1813—1887年）的笔下发展起来的；大约从1830年起，这种画取代了那种虽高尚但缺乏活力的新古典主义漫画或绘画。这些比利时人和法国的保罗·德拉罗什（1796—1856年），个个都像德拉克洛瓦，但却缺少他的天分和他的才华。

为了成为一名历史画画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1821—1893年）来到安特卫普从师瓦佩斯。但他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了罗马，并在那里接受了奥韦尔贝克的影响。奥韦尔贝克是19世纪初期德国浪漫主义画派的耆宿。其结果就是布朗在1847年所作的《乔叟在爱德华三世的宫廷》。这幅画和他所绘的哥特式拱尖和穿着14世纪服饰的色彩绚丽的人物，在风格上完全属于拉斐尔前派，虽然这幅画的成画时间先于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立数月。兄弟会的创始人主要是罗塞蒂、霍尔曼、亨特和米莱，他们都比布朗年轻，而且罗塞蒂在1847年年底至1848年年初那个关键性的冬天，曾短期做过布朗的门生。这些人在他们昙花一现的杂志《萌芽》上阐明了兄弟会的宗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主张，除一点外，其他各方面不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翻版而已。弗·乔·斯蒂芬斯曾写道：“只有心地纯正，所做的一切才是高尚的”，他又说：“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沉湎声色、缺乏创新”必须极力加以避免。“完全遵循自然的纯朴”是目标。“并应直接注意那些本着这种精神而进行艺术创作的比较罕见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应到拉斐尔以前的意大利去寻找，甚至更应到梅姆灵和丢勒的荷兰和德国去寻觅。于是1848年和其后几年霍尔曼·亨特、米莱和罗塞蒂画的极富魅力的、通俗而棱角明显的绘画就此产生了。这些画似乎与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在同期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不过在这些拉斐尔前派身上也深深烙有19世纪中叶的印记。他们的格言就是真实，但是这并非拿撒勒派所理解的真实。“真实性要求历史画画家充分熟悉他准备画的人物的时代及习俗的特色……（并且）向有关专家

请教关于服装……建筑、植物或地貌或各种有关事项”。这些话简直像是出自门采尔笔下。但事实上这是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话。

布朗比其他人年事稍长，而且严格说来并不是兄弟会会员；但他自始至终恪守《萌芽》的原则，不论他画威克利夫、科德利亚还是用纤细的笔触所作的碧绿山水画都是如此。他个人最具特点的贡献也恰与《萌芽》的要求不谋而合（见J.L.塔珀写的一篇文章）。《萌芽》写道，要找到有价值的题材，画家不仅应到历史中去找，还应在我们的时代的“虔信、真理、怜悯、荣誉和勇敢的各种伟大教训”中寻找。当代英雄人物应当走上当代的画布。我们虽应憎恨尼禄，但我们也应憎恨“廉价出卖工人的压迫者”。库尔贝对这番话定会大加赞赏，他笔下的我们时代的英雄，如《碎石工》，与约翰·布雷特七年后画的《碎石工》在形象上大不相同，布雷特的碎石工是以洒满阳光的风景为背景的一个健壮俊秀的后生。马多克斯·布朗在1852年开始创作《向英格兰告别》，表现的是去澳大利亚的移民离国的场面；他在同一年画了《劳动》。他的后期作品有《约翰·多尔顿收集沼气》和《克雷布特里发现金星凌日》。《劳动》是当时欧洲的绘画中有关社会改革的最重要的文献。要在本书中恰如其分地描述这幅画的内容、将近20个人物的含义深远的姿态和动作是不可能的，这会占去过多的篇幅。自贺加斯以来，还不曾有人试图在一帧中幅尺寸的画面表现如此多的含义。画的地点是汉普斯特德，景物逼真。卡莱尔和弗·丹·莫里斯两人的面貌一眼便能看出。他们代表脑力劳动，正如挖泥工人代表体力劳动，衣衫褴褛的卖花人代表从未学会劳动的人一样。还有一些衣不蔽体的贫民窟孤儿，懒散の少妇和一位正在散发宣传小册子的好心的女人。小册子的书名是《泥瓦工的避难所——饥渴灵魂的饮料》。挖土工人选择了麦啤酒，而且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另外一些写在广告招贴等上面的字不禁使读者——更确切地说是观众——联想到工人学院（1854年由莫里斯创办，罗塞蒂曾一度在那里执教）和设在尤斯顿路上的儿童之家。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题材，只有经过解释和指点才能充分领会！不过库尔贝的《画室》和门采尔的《皇宫晚宴》也是如此。拉斐尔前派强烈反对那种随便以诗歌或小说为题材所作的虚浅夸张的风俗画，这种画在维多利亚时代广为流行。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对这类画作过如下的描写：“一处有裂缝的石头阳台，远处有一艘威尼斯游

艇，一套完整的威尼斯元老院议员的服饰，白色锦缎服装上满绣着模特儿嘉格小姐的侧面像，一柄做工精细的镶金短弯刀，刀柄上嵌着宝石，摩尔人（稀有的）考究的装束，以及奥赛罗。”^[31]这种画即使画得非常认真，拉斐尔前派也还是反对。布朗在1851年5月曾写道，“弗里斯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32]他们自己画的《李尔》《但丁》和《夏洛特姐妹》则将精确与新的献身精神和热诚结合在一起，至少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是如此。

青年艺术家们的组织往往很快就解体，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也一样，没有几年便解散了，创建人分道扬镳。霍尔曼·亨特（1827—1910年）毕生成为彻底的拉斐尔前派。他为了画《替罪羊》，于1854年前往巴勒斯坦，以便画出的死海能够不差分毫，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实主义变态；为了画《牛津的五朔节》，虽然他已高龄，仍执意每天清晨五点钟登上马格达伦塔。其结果是在细节上过于近似自然，画面过分集中，结果完全失去了真实感。这些画若非由于着色粗糙、夸张而且明暗不分，着重用石南紫、苦艾绿等颜色，定会使人联想到现代摄影师所摄的大小鹅卵石和未经修版的特号头像。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年）后期作品的色彩较为热烈瑰丽，但也同样令人反感。他笔下那些慵懒淫荡的人物与《萌芽》宣扬的宗旨毫无共同之处，虽然与库尔贝那种情欲强烈的性感相比又相形见绌。即使如此，到了伯恩-琼斯手里经过净化并采用蓝和灰这些冷色加以表达，这样的作品才普遍受到欢迎。不过伯恩-琼斯比较高雅的艺术却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了。

最后，还有约翰·埃弗雷特·米莱（1829—1896年）。他从一个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员成为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他在晚年画的是《西北要隘》和《肥皂泡》，而不再是《基督在自己父母家中》和《奥菲利亚》。他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集严肃艺术与社会成就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矛盾于一身。另外一个例子是乔·弗·瓦茨（1817—1904年），他以生气勃勃的威尼斯风格步入画坛，画法强劲而热情；最后的作品是一些大幅索然无味的情节画，著名的有《财神》《爱与人生》和《时间、死亡与审判》。

在维多利亚时代盛期，标题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一幅画赢得成就。这就像让一个门外汉区别意大利式和哥特式建筑，要比让他分辨两个建筑物正面的尺寸比例的处理有何不同更加容易，因此人们宁愿看一

幅画有两只狗的画，只要它的标题是《上等生活与下等生活》，或是一幅画着公鹿的画，只要标题《幽谷之王》就行；而不愿去看寓有象征意义和浑然天成的好画。这两个标题我们是从埃德温·兰西尔爵士（1802—1873年）的作品中信手摘录的。他其余的作品还有《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保护动物协会的一位卓越成员》（一只圣贝尔纳狗）以及《尊严与无耻》。

在法国，一幅流行画，一幅年度佳作不大可能是一个文艺作品。英国画家想要成名，需靠情感，而法国画家则需靠理智。像卡巴奈（1823—1889年）和布格罗（1825—1905年）这样的画家年复一年画着他们那种诱惑人的裸体画。卡巴奈的《维纳斯之诞生》画的是女神妖娆地卧在一片片纸板上；这幅画1863年在当时艺术家作品展中展出时，立即被拿破仑三世买走，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买去弗里思的《拉姆斯盖特沙滩》并封兰西尔为爵士一样。

卡巴奈的《维纳斯之诞生》在画展上引起轰动的同年，莫奈画的《奥林匹亚》被画展拒之门外。广泛为人欢迎的艺术与莫奈及其聚集在印象主义旗帜下的友人们的艺术之间的对立，比19世纪中叶的那种对立更尖锐。“对于绘画基本因素年幼无知”，“矫揉造作，难以想象的俗不可耐”，“这个奥林匹亚简直是一只母猩猩”，“怯懦的女奴婢”，“艺术堕落到如此低下的水平简直不值得谴责”——这仅仅是1865年展出这幅画时报章评论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已。[\[33\]](#)

不过，1832年出生的莫奈，只有他最早期的作品属于我们目前探讨的这个时期，而印象派则与本时期没有多少关系。1870年，德加36岁，莫奈和雷诺阿30岁。印象派艺术正如它的名称一样是一种微妙的、瞬间的、极敏感而十分注重外表印象的艺术。这个名称表明，一切现象都被看作纯粹是眼的感知，这个流派肯定属于19世纪末期。在英国的建筑和设计方面，主要由于威廉·莫里斯和诺曼·肖的作用，也出现向细腻的转变和把艺术的美学方面从其他方面分离出来的倾向，英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直到超出本章所叙时代的范围。莫里斯生于1834年，诺曼·肖生于1831年。莫里斯的风格和社会改革理论的特有形式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而非盛期的；诚然，他的这些风格和理论是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的传播则完全是在他的公司接受了第一笔大宗委托之后的事，如1867年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设计的餐厅，也是他在1877年开始公开

讲学之后的事。诺曼·肖的风格是从设计伦敦城利登霍尔街的新西兰商会开始成熟的。设计日期是1871年。大厅凸窗的纤巧精雅，底层宽阔的凸肚窗设计新颖不落窠臼，各种图案花纹交织在一起，自然流畅，别具一格，所有这一切都与前几十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盛期的那种笨重、豪华、端庄、阴暗的办公楼形成鲜明对照。四年后，在伦敦附近的贝德福德公园建成第一座市郊花园住宅区，同样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肯辛顿及贝斯沃特住宅区形成对照，令人叹为观止。又两年后，威廉·莫里斯在他早期的讲学中把中世纪伦敦“优美、精心涂成白色的房屋”与他那个时代“难看的大中小型简陋房屋”构成的伦敦作了比较。他在同一次演讲中提倡应该研究古代的建筑，但不应照搬，他宣扬“生活简朴”以及住宅中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要讲究“清洁大方”，他在结尾时希望“世界上应暂时将所有艺术都清除掉……以便尚能有机会在黑暗中加快步伐”。^[34]现在让我们把这些革命的词句与新涌现的画家如惠斯勒在1885年，莫奈在1889年所说的话作一番比较。惠斯勒说：“艺术……是细密思维的女神，习性严谨，不尚炫耀，从不与人争胜。”^[35]莫奈说：“他甘愿生来双目失明，然后忽然恢复视力，或者在他丝毫没有看见过他所画的东西是何物的情况下开始作画。”^[36]这种超然于任何物质、任何文学、任何道德之外的态度，像诺曼·肖的建筑和莫里斯的理论一样具有革命意义。所有这一切只能理解为在19世纪末期比起中期来人们感受力更加敏捷，美学的完整性已得到恢复的结果。

（麻乔治 译）

^[1] 《为基督教建筑在英国的复兴辩解》（伦敦，1841年），第2页。

^[2] 《论当前及未来的民用和家用建筑》（第2版，伦敦，1858年），第109页。

^[3] 《建筑与绘画》（1853年），演讲第1、2部分的附录，丛书版，第12卷（伦敦，1904年），第83页。

^[4] 《论建筑》，第221页。

^[5] 《绅士的宅邸》（伦敦，1864年）。

^[6] 《论建筑》，第266页。

^[7] 《绅士的宅邸》，第358页。

^[8] 《建筑的七盏灯》（伦敦，1849年），《顺从之灯》，第4—5页。

- [9] 参见N. 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企鹅丛书，1959年），第5章。
- [10] T. 哈姆林：《美国的希腊复兴式建筑》（牛津，1944年），第112页及以下各页。
- [11] A. J. 波义尔·达让：《从未发表的书信中看安格尔》（巴黎，1909年），第28页。
- [12] J. J. 威廉·海因泽在他的《杜塞尔多夫美术馆来信》中第一个热情称颂了鲁本斯。这些信件是1776—1777年写的。海因泽生于1746年，富塞利生于1741年，歌德生于1749年。因此，他们都属于狂飙突进时代，都是上文已说过许多的19世纪的指路人。
- [13] 《日记》（A. 儒班编，巴黎，1950年），第2卷，第95页（1853年）。
- [14] 《美的问题》（载于《文艺作品集》，克里斯编，巴黎，1923年），第1卷，第31页及《日记》，第3卷，第307页（1860年）。
- [15] 《日记》，第2卷，第456页（1856年）。
- [16] 《日记》，第2卷，第372页（1855年）。
- [17] 《日记》，第2卷，第318页（1855年）。
- [18] E. A. 皮隆：《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865年），第71页。
- [19] 《浪漫主义史》，重印自《箴言报》，1864年11月17日。
- [20] A. 儒班编：《德拉克洛瓦书通信全集》（巴黎，1937年），第3卷，第180页（1853年，致乔治·桑的信）。
- [21] 《日记》，第1卷，第99页（1824年）。
- [22] 转引自《柯罗自述……》，第1卷（日内瓦，1946年），第84、88页。
- [23] 1845年当代艺术家作品展。转引自《评论文集》（克里斯编，1924年），第2卷，第216页。
- [24] 《评论文集》，第1卷，第172页（1859年当代艺术家作品展）。
- [25] 阿·桑斯埃：《让·弗·米勒》（英文版，伦敦，1881年），第93页和157页。
- [26] 引自《库尔贝自述……》，第1卷（日内瓦，1948年），第21页。
- [27] 引自《库尔贝自述……》，第1卷（日内瓦，1948年），第28页。
- [28] 引自《库尔贝自述……》，第1卷（日内瓦，1948年），第96页。
- [29] 《日记》，第2卷，第18页。
- [30] 《库尔贝自述……》，第1卷，第164页。

[31] 参见拉斯金在《拉斐尔前派的艺术》（1853年）一书中对身披从伦敦沃德尔街古董店买来的铠甲的骑士们那种气派所作的讽刺和总是搬用《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和《威克菲牧师传》等书的场面所作的讽刺。丛书版，第12卷，第351页。

[32] F. M. 许费尔：《福特·马多克斯·布朗》（伦敦，1896年），第78页。

[33] A. 塔巴朗：《莫奈及其作品》（巴黎，1947年），第107—108页。

[34] 《次要的艺术》，《全集》，第12卷，第11、15、20页。

[35] 《十点钟》（伦敦，1888年版），第8页，演说发表于1855年。

[36] J. 雷沃尔德：《印象主义史》（纽约，1949年），第408页。

第七章 想象文学^[1]

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是，它既以罕见的力量促使人们对历史作出广泛的概括而又使之归于失败。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家表现出一种程度极高的历史自觉感，他们根据“时代的需要”来讨论自己的问题，深信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在思想上有一种崭新的见解、崭新的态度和崭新的发展方针。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只不过是一个征兆，表示人们天真地持有的一切共同信念正在解体，这个消极的事实使我们难以为这个时代找到一种明确的共同特性。这是一个具有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时代吗？是的。它是孔德、费尔巴哈、达尔文、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的时代。然而，它也是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焦急地期待着人的精神及其文化财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史中如果不提卡莱尔、爱默生、拉斯金、马修·阿诺德、奥地利作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那么，这部文化史就会是严重地失去了重心。这是一个疏远宗教的时代吗？肯定如此。然而宗教热情却很高涨，而且还不仅仅是热情。这个时代拥有学识异常渊博和令人瞩目的宗教思想家，如克尔恺郭尔和纽曼枢机主教这种人物，在文学方面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邃的宗教天才。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吗？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个时代也同样创立并热情地实践了“纯诗歌”的学说，并且十分爱好理查德·瓦格纳音乐的奔放的感情。这是一个相信人类生来就有能力走上一条无限进步的道路的时代吗？这个问题本来无疑地应该很容易给以肯定的回答，但是有些并非一般的人物却欣然接受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悲观论。看来，要在一幅尺寸有限的画布上描绘这个时代，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可以作出一个一般性结论，这个结论对于理解这个时代的理智特点，可能会证明是有益的，即小说占据了文学舞台。这点不仅在今天回顾起来十分明显，而且当时也是如此。1849年《展望评论》的一位投稿人写道：“当今小说占据的地位和伊丽莎白及詹姆斯一世当政的时代戏剧所占的地位相等”；1850年，当同一杂志论述小

说是“应现代的需要和倾向而产生的重要产物”的时候，它不仅说出了英国的，而且几乎是整个文学世界的情况。^[2]

白哲特在1858年回顾英国小说从沃尔特·司各特到乔治·艾略特这段时期的历程时，忽然想到另一种在英国文学舞台之外也能看到的趋势：“想要树立一种信仰的愿望已经成为男女主人公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感情，但这个愿望与司各特的纯朴的真知灼见以及他的旧式艺术似乎绝无共同之处。”^[3]换句话说，小说有它的历史：它从简单的史诗叙述开始——这种叙述认为人们当然以一种举世公认的和明白易懂的方式对某些形势和事件作出反应——走向对内心生活越来越细致的描绘，因为史诗的纯朴不能应付十分复杂的内心生活。尼采曾经列举特别适合于新的小说家的目的的一些心理特性：一个小说家必须天生具有细腻的情感和大胆的观念，他必须喜欢追本穷源，以至于达到了玩世不恭的程度，由于憎恨生活的杂乱无章，他必须善于推理，他必须是解谜的能手、狮身人面怪物的朋友。这与司各特的“纯朴的真知灼见”的确大相径庭！我们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与荷马的《尤利西斯》进行比较，就能够窥见这种发展的两个极端。古代的英雄通过时间和空间探索外部世界；现代的尤利西斯则待在城里，在一天内对付潜伏在他心底的种种惊险。从荷马到詹姆斯·乔伊斯这段整个过程，似乎被压缩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32年逝世的沃尔特·司各特仍然和荷马相近；但是从1881年逝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詹姆斯·乔伊斯或从乔治·艾略特到普鲁斯特则只有很短的距离。

对于“心理学”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关注和“想要树立一种信仰的愿望”当然是有关联的，按照白哲特的说法，这种愿望已经变成“主人公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感情了”。在史诗和旧式小说的情节里没有信仰的位置，因为信仰会形成必须说明行为、事件和情感等意义的明显背景。只有当这个背景变模糊时，探讨意义这件事的本身才能成为故事的组成部分。往昔的各种信仰的世界是一个“宇宙”，其基本秩序早已永远地确立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可能发生离奇的和惊人的事情，但是不论发生什么，它们都能各得其所。在新的世界里，则没有预定的位置，必须到个别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灵中发现。这种寻求证明是永无止境的，每个新的发现都被更细致的怀疑弄得疑问重重。因为在人的心灵的代数学中失去一个信仰不等于获得一个疑问，却等于无

穷的可能真理与谎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即便在他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武断地归咎于两个人的时候，也对这种情况做了恰当的描述，1867年他写道：“边沁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引导人们对于古老的或已被接受的见解提出疑问，这些见解正确吗？柯尔律治则引导人们去问：这些见解的意义是什么？”^[4]迪斯累里的《坦克雷德》（1847年）一书的主人公提出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的警句：“我应该相信什么？”

随着人生意义的基本信念结构日渐削弱和最终崩溃，文学势必无法抗拒地试图改变自己的意义和功能。它不能再满足于提供比较高尚的娱乐和道德教训；它本身成了一种探索的工具，寻求真理的手段。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甚至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卡莱尔在1833年所写的著作表达了施莱格尔的看法：“诗歌将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它是高水平的知识，而不是其他东西；它是唯一真正的浪漫主义的（对于成年人来说）现实。”^[5]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有人写道：“我们应该给予诗歌应有的评价，要比我们一向对它的习惯看法更高一些……人类将越来越领悟到：我们必须依靠诗歌替我们对生活作出解释，并且安慰我们和鼓舞我们。没有诗歌，我们的科学就会显得不完整。我们现在看作宗教和哲学的大部分东西都将被诗歌所取代。”上述这段话的作者当然是马修·阿诺德。^[6]例如，这种“取代”不是由“马克·拉瑟福德”（威廉·黑尔·怀特）予以实现的吗？他谈到华兹华斯的时候说过，华兹华斯替他做了“每个精神导师所能做的事——他重新创造了我的上帝”。^[7]在19世纪以前，人们绝不可能以这样的说法来论述一位抒情诗人。

“现实主义”这个词按照人们普遍接受的意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文学的探索性质和文学是“高级知识”，是专门把握“现实”的这样一种信念。这个名称含有这样一种意思：现在，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关心“真实”。接受这种主张就是迎合一种幻觉，尼采无疑说得非常正确：“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幻觉……从古至今，所有的作家都相信他们是现实主义的。”^[8]实际上，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像古往今来所有作家一样，他只是被现实中的某些方面所强烈吸引，并使用对他的这种吸引力具有的选择方式为他所选中的题材从美学观点上安排顺序。因为我们似乎是以忽略一个事物作为代价来逐步认识

另一个事物的。不论我们的兴趣如何广泛，我们在一个领域中感觉的敏锐也只是和另一领域中感觉的迟钝相对而言的。尼采又继续说，那么当代现实主义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他找到的答案至少非常符合一种信念，即新文学应当是“知识”。尼采认为，新作家渴望用分析和近乎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并理解现实。因此，他说：“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家用自觉不自觉地颂扬了科学的福祉。”^[9]

这段话真正指出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个显著的特性。因为，不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题材，还是对“生活阴暗面”的大胆反省都没有新颖之处。乔叟是高度“现实主义的”，18世纪在文学方面给了我们大量的生活实录，它们表明了默默无闻、平庸无奇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享受生活或糟蹋生活的。狄更斯在1841年为《奥列佛·特维斯特》写的序言中表示相信，他必须使他的读者们做好准备来接受他的现实小说将要引起的震惊：“……有些人生性高雅柔弱，不能经受对这种丑恶的事物所进行的苦思冥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本能地躲避罪恶，而是为了迎合他们，必须把那些犯罪分子乔装打扮一番，就像对他们的食物进行加工一样……”但是对于一位习惯于约翰·韦伯斯特、西里尔·图尔纳和约翰·福特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读者来说，狄更斯给读者揭示的“恐怖情景”的“严峻及明显的事实”也许真显得还不够味。那些看惯了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一书中的坦率描述的读者们会说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的坦率态度”在写到平庸和粗鄙的情节时总不能完全摆脱过分拘谨。诚然，描写“恐怖情景”和“现实的”粗鄙情景都没有给文学开拓出新的天地。但是19世纪现实主义能使往昔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它特有的热情，在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这种热情在起着作用（尽管在英国这一时期的小说中，除乔治·艾略特外，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热情）。这是一种理解的热情，是要求以理性去洞察，以想象来占有的欲望，是促使人们解开生活奥秘的动力。

波德莱尔注意到这个奇怪的事实，巴尔扎克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声望竟然以他客观的观察能力作为基础。巴尔扎克给波德莱尔深刻印象的特点是他本人的那种炽烈的感情和不切实际的热忱。人们常把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比，而上述特点正是他和狄更斯的区别所在。

确实，巴尔扎克的细腻的描述中如果不是洋溢着一种想要绝对地在想象中占有他所描写的东西的热情，那么，这种描写将是非常枯燥的；斯丹达尔的情节剧如果仅仅是挑起感情，而不用具有分析的理智去全面控制感情，不用通过清醒的嘲弄戏谑洞察一切的慧眼去充分显示这种感情，那么，这些情节剧将会一文不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与他的探讨精神密切相关，他独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以探索一切的光亮也正是他的焚身之火。托尔斯泰一再声称的“理性即善”，这和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艺术，也并不是不相干的。因为，托尔斯泰散文（有的评论家甚至称之“田园诗”）的那种明显的静谧与平稳也充满了寻求理性理解的炽烈热情。

因此，19世纪的现实主义看来是一种比它通常的定义所提示的更为复杂的现象。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当然明显地和我们为了方便统称为“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社会性质的剧烈变化有关。现在，人类前所未有地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大张旗鼓地建成的社会里。

“文化”与“自然”两个领域分开了。迅速发财致富和突然成为赤贫，似乎成为等待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可能的命运。当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物质”的时候，人与人本身之间和人与集体生产的“物”之间的关系，被弄得日益引起疑问，日益“抽象”了。“与生俱来”的特权和所继承的社会地位在赚钱的技巧面前一步步退却，而生活变得具有越来越尖锐的竞争性，事物日益具有商品的性质，人的价值也就越发可以用钱来确定。当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的“抽象”性，谈到人在世界上的“自我异化”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这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物”在其中占据的支配地位终于将这个世界也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物品。

以上所述的情况与当代文学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几乎所有多少有点重要地位的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是强烈地被它所吸引，或是对它产生反感，或者二者兼有。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1854年）这个书名本身就反映出他强烈地意识到（而且时常在压力下不得不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问题，这种意识在当时英国文学方面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因素。如果说1832年一本英国杂志抱怨说“在这个剧烈动荡和变幻莫测的时代，谁也不谈文学……人们注意的只是对改革和统治者的变迁进行推测”的话，

[\[10\]](#)那么，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情况已经变成，如果不听关于改革

的议论，就几乎不可能注意文学。对于各个阶层的不成熟的观点和已经成熟的道德伦理，都有一些议论——用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登》（1848年）一书的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一种痛苦的地步……以便使这个缄默的民族受到强烈的震动”。英国小说就像社会本身一样充满了问题，而且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但是比许多小说中表现出的社会义愤更加重要的是，有时（例如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样的小说）对社会的批判成了小说本身，被小说体现出来，并真正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巴尔扎克在长长的一系列小说中为了刻画人间喜剧所做的巨大努力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即在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所支配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虚伪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年）揭露了精神堕落，这是由于从过去模糊地和虚假地继承下来的人生观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在普遍背叛传统的人的价值的时候是否能真正做到真实，对这点的怀疑给“教育小说”又新增加了一层曲折，其中心主题是一个人的品性如何逐渐趋于完整。

“教育小说”的文学原型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1795年和1829年），^[11]这部作品对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无法摆脱的魅力。他们不模仿《威廉·迈斯特》的典型及其表面上的主题，几乎就想象不出一本小说（这里所说的表面上，是因为要从这座迷宫似的建筑中总括出一个主题性的纲要是绝对不容易的）。这个主题是人与世界之间最终的和解，在我们这一时期，只有两部重要的德语小说，即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1854年和1879年）^[12]和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的《残夏》（1857），无疑是以歌德的作品作为蓝本写的。然而个人与世界二者是对立的，虽然最后在歌德的笔的诱导下彼此变得协调，但是二者的重要性相差悬殊。主人公具有令人信服的（而且令人可信是自传性的）存在，不过世界却是一个古怪的、朦胧的实体，其朦胧有如“普遍的善”。歌德的另一位主人公浮士德最后赎罪式地向“普遍的善”献上自己的灵魂，却几乎遭到它强有力的主观性的永恒诅咒。甚至在以比较现实的态度去理解世界时（例如凯勒便是如此），凯勒的那本《绿衣亨利》也需要两易其稿，中间相距四分之一世纪，才决定了这场由来已久的仇恨的真正性质和结局。如果我们补充一句说在施蒂弗特的《残夏》（该时期最优美的作品之一）中主人公完成其学业的那个“世界”已不再是原来

的世界，而是人类的一个严密防守着的世外桃源式的领域，我们就会明白“教育小说”在这样的时代必须经历一场激烈的改革，这个时代使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问题，甚至连个人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到完善和真实这样一个概念都发生了动摇。这就难怪“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词（它正确地表明作者对于“现实”即外间世界的关注）简直成为“心理小说”的同义词；“心理小说”表明人们专心关注对内心生活的自省。哪里社会传统信念逐渐变成徒具形式，人们不再认为它是真实的，哪里在传统信念与个人存在的内心真实之间就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时，真正的真实反而变成一种令人烦恼的和根本不能实现的要求。在这样的世界与这样的个人之间根本不会产生协调一致的问题，于是个人不得不走上一条空想的追求“自我实现”的路，其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已经不再存在着理想的个人这种健全的模式。“教育小说”成了这种追求的记录，而且多半要由一位主人公作为实例，来证明这类微妙的道德虚伪，它的危害性和它实际上的不可避免性。

这个主题和这一类主人公，进入小说后就再也不离开了，例如邦雅曼·贡斯当的《阿道尔夫》（1816年）。这是一部关于一个青年的故事，他被迫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且不能感受他“应该”感受的东西。虽然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里可能找到令人想起传统“教育小说”的东西，像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1830年）、萨克雷的《彭登尼斯》（1850年）、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年）和《米德尔马奇》（1872年）这些小说中所找到的，但是这种小说风格却十分强有力地影响极其深远地在斯丹达尔的《红与黑》（1830年）中的于连·索累尔这个最为“变形的人物”身上活了下来。于连必将成为“虚假的”主人公的典型，他之所以“虚假”是因为“生活”不给一个超人（“un esprit supérieur”）提供地位，如泰娜对于连的描述那样。在一个精神堕落的社会里，天才人物注定要成为局外人，而他在这种被疏远的状态中注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堕落下去。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会设想出这类主人公，简单地将他作为一个迟钝的社会不能理解伟大人物的一个实例。斯丹达尔的现实主义的敏感性则更为深刻：归根结底，社会成功地阻挠了天才达到完整性。这就使斯丹达尔的批评取得了结论性的和全部的意义。于连·索累尔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地位卑微的家庭的“拿破仑式”青年，在他

的一生最早时期，他追求穿上教会的黑长袍，黑长袍比军队的红制服更能给他敞开通向享有更巨大权力的大门，最后他在断头台上结束了一生，罪名是他企图谋害过去的情妇，因为她干预了他野心勃勃的婚姻计划。斯丹达尔用艺术的手法把这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写成一部极为细腻文学作品，它至今仍是心理小说的标准范例。后来这类虚假性竟作为这种小说的主要题材一再出现。巴尔扎克笔下千姿百态的社会呈现一片混乱，令人目眩神迷，社会上挤满了一帮恶棍和骗子，巴尔扎克使人深刻地认识到善良即失败这一教训。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年）是对真实的否定，而他的《情感教育》（1869年）从标题上看是一部“教育小说”，实际上恰恰相反：在当代社会中，主观的复杂和理想的热情产生的结果不是诚实与和解，而是道德的解体。

这个主题以多种形式和不同深度，在整个心理小说中继续存在下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40年）虽然背景不同，并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的核心却仍是这一主题，这部小说在辉煌的俄罗斯小说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年）的小说里，这个主题常以错综复杂的喜剧形式一再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年）则把它提高到了宗教热情的高度。

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出一个可能的总结：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里，“英雄”变得越来越平凡了。诚然，从斯丹达尔和卡莱尔到尼采，非凡的英雄一再成为渴望、浪漫的崇拜和抽象的期待的对象，但一本本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人物根本不能和这个传统的名称相称。这个名称已变成一个纯技术名称了，非凡的英雄的衰败原因恰恰就是现实主义的、分析性的和心理的小说本身出现的原因。这种小说之所以取替了更富于“诗意”的叙述形式，是因为“生活”已不再宜于用那种简练的诗的语言来表达。在新一代作家的眼中，生活不再是已知的和确定的，而是永无休止地变化着，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中——而且是由人们自身予以形成的。因此生活永远要求给予它新的理解，然而却又始终回避这种理解，结果为了探求生活的意义和真谛不知写了多少本书，拖延了多少时间。因此，如果不存在既定的和人们普遍接受的秩序，那么，任何东西——确实是任何东西、任何想法、任何梦想或任何狂想——都可能帮助揭示那难以捉摸的真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不会有真

正的英雄。传统的英雄面对一个已知的世界，扮演自己命运决定的角色，而他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成功或者被压碎；另一方面，新的“英雄”不是接近于成为他自己的世界和灵魂的创造者，便是正被历史环境的浪潮所吞没。有这样一种内在的逻辑，它能证明完全不同的作品属于同一时期：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深刻批判了英雄主义的理想；同一作者的《巴马修道院》（1839年）对滑铁卢战役这个英雄主义的场面的实际情况作冷嘲热讽的评论；萨克雷的《名利场》（1848年）在序言中挑衅地自称是“一本没有英雄人物的小说”（这正符合作者在一封信中所表达的信念：小说就其本意而言“应该尽可能强烈地反映真实的情感，而悲剧或诗则不然，它们可以歌颂英雄”），^[1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5—1869年）则是关于那些听任神秘的历史力量摆布的男男女女的史诗。

当然，并不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每部作品都是如此。在英国文学中，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就是重要的例外，尤其是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年），它不受周围文学界那些分析的、嘲讽的、改良的、说教的或推理的倾向的影响，成为原始感情的庇护所。假如我们在阅读一本这个时期的小说时，偶然读到“那个违背了骄傲的诸神和人世的主宰而始终不渝向前奋斗的顽强的人……愿他愉快”这样的句子，我们确实会感到疑惑，我们是否已离开了时代的主流而在一个由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英雄冒险业绩所汇成的陌生海洋中漂流。实际上，我们阅读的很可能是所有文学杰作中最奇异的一部作品，即新英格兰人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著的《白鲸》（1851年），这是一部叙述捕鲸船长埃哈伯的史诗，他在南太平洋追逐白鲸莫比·迪克，是一个与无情的命运及灭亡进行搏斗，充满了激情、毅力和仇恨的“顽强的人”。这部小说的故事是在一个刻画入微、却又失之过于琐细的现实背景的陪衬下讲述的，而在这部小说里，现实主义只有这一次与英雄的崇高气魄和似乎只有荷马的或莎士比亚的时代才有象征的直接性融为一体，这种交融也许不是完全成功的，却能感人至深。

此外，作为“例外”，首先要推那位狂放不羁的天才维克多·雨果——其之所以狂放不羁是因为他蔑视任何历史的窠臼和观念的约束。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他是在法国文坛占有中心地位的一个怪人；他是古典主义的死敌，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位典范——尽管稍嫌为时过晚。1830年当雨果震动巴黎舞台的时候，欧洲浪漫主义的极盛时期已

告结束，他的《爱尔那尼》将巴黎舞台上貌似不可战胜的古典主义传统彻底击溃，1838年他的《吕伊·布拉斯》再一次获得成功并将这些成就巩固下来。虽然“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最难以捉摸（而又几乎遍布各处）的特征之一，拒绝接受将它纳入任何范畴的一切企图，但它仍然具有一种坚强和显著的“性格”——雨果肯定就是这种性格的一个化身。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后，再读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两部小说几乎是同一期问世的——就像是从一个可怕的梦中回到清醒明确的白昼；尽管在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里很容易找到许多浪漫主义的成分。此外，雨果小说的中世纪背景，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神秘主义，表达而未加以分析的激情，寓于截然不同的人物身上的善与恶（在同一个人身上绝不出现两种品质），骈丽流畅的辞藻叙述，故意渲染的离奇情节和恐怖形象，激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并使评论家为之瞠目结舌，而无法挑剔；所有这些浪漫主义的品质将《巴黎圣母院》划入一个远离这个时期的文艺中心的领域。但是雨果有他自己的王国，尽管这个王国略微欠缺文学上的地位。雨果全凭他诗一般的巨大能力、语言和富于想象的创造力的威力，在这个王国里睥睨百雄，凌驾于当时许多为满足浪漫主义需要而写作的次要作家之上。在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1844年；《基督山伯爵》，1845年）和具有更高文学水平的普罗斯佩·梅里美（《查理九世朝遗事》，1829年，以及别具风格的《嘉尔曼》，1845年）。然而，甚至在雨果这样一位浪漫主义作家身上，时代精神也终于表现出来：当他离开路易·拿破仑的法国流亡到格恩西岛后，写了许多小说，其中一部是《悲惨世界》（1862年），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不恰当地但却强有力地用来描述当时社会最关注的那些既非英雄主义亦非浪漫主义的问题。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在我们叙述的这一时期内留存下来的那类“历史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杰作。“历史小说”只在不久以前凭借其创始人沃尔特·司各特的势力和影响曾占统治地位。的确，我们不禁要假定，历史小说，作为对过去的浪漫主义的发现而带来的产物（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在1802年写成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就是这类作品第一次真正在文学上的表现）必然是浪漫主义的。这个假定可能由于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闯入浪漫主义领域而得到支持，其实这是文学方面的一个错误认识，它是以一部历史小说《萨朗宝》（1862年）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将之与萨克雷的

《亨利·埃斯蒙德》（1852年）、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年）、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的《维提科》（1864—1867年），尤其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5—1869年）相对照，就必须将它放弃。《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历史小说，许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19世纪文学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成就。的确，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方式，不仅侵入了历史领域，而且闯入了浪漫主义情感的另一个明显的禁区，即“大自然生活”和“田园生活”。人们很有兴趣地看到，由于对“人民”的兴趣日益增加，浪漫主义对城乡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的眷恋之情也逐渐和新现实主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融为一体，并且最后被这种关心所取代；浪漫主义所赞赏的平民百姓生活中的“纯现在”的态度，也转变为“对未来持有要求”的态度，迪斯累里在他的小说《西比尔》（1845年）中看到“几百万灾难深重的人们代表着”这种要求；乔治·桑早期小说（《安蒂亚娜》，1831年；《瓦朗坦》，1832年；《莱莉亚》，1833年）中那种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业绩，在她的后期小说中让位给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安托万先生的罪恶》，1847年）；至于狄更斯从《老古玩店》（1841年）到《荒凉山庄》（1853年）或《艰难时世》（1854年），从《圣诞故事集》（1843—1848年）到《小杜丽》（1857年）中间所经过的几乎是田园诗般的境界和感伤的气氛到比较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历程，就更不必说了。

作家们在对待贫苦大众方面的这种情调的变化从各式各样的文学体裁中体现出来，但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而没有浪漫主义丰富的情感。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1842年）以讽刺形式表现了这种变化，《死魂灵》是模仿但丁的《神曲》的一部作品，可是它的第一部分（现在只存在第一部分）情节紊乱、喋喋不休地探讨社会现象，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年），然而在其他方面却又和《匹克威克外传》迥然不同；它的辛辣讽刺中贯穿着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以类似约翰逊式的“诙谐”进行了恣意的丑化，但是整个作品却预示全民族的光辉的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1845年）使作者在俄国一举成名（一位俄国诗人第一次阅读手稿时惊呼：“新的果戈理诞生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中充满着强烈的怜惜与同情。瑞士牧师阿尔伯特·毕齐乌斯用笔名耶雷米阿斯·戈特赫尔夫发表作品（《农民之镜》，1837年；《长工乌利》，1841年；《佃户乌利》，1849年），

这位现实主义作家将他的卓越的天赋和教化世人的热情融为一体，站在保守的立场上维护宗教真理，反对他那个时代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1847—1852年）有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会的轻松的书名，但实际上却是一本描述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俄国现实主义的一部杰作，据说它曾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果真如此，这也正是作者的意愿），使该书的一名读者深信必须废除农奴制。这个读者就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在探讨无比卓越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同时，必须提醒读者注意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论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是许多文学史家共同的想法。这种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通过文学形式的典型反映，是伴随已成为社会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掌权者的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资产阶级而出现的艺术产物。然后根据这个理论，把英国和法国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与“落后的”德国处于萌芽状态的现实主义文学进行比较。“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与诸如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成熟的社会与政治觉悟对比，就显得政治上幼稚而在社会意义上又混淆不清；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即便有浓厚的“地方气息”也绝对比德国同类小说高明得多。譬如，把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养老院院长》（1855年）或《巴塞特寺院》（1857年）与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借方和贷方》（1855年）或奥托·路德维希的《天地之间》（1856年）进行比较，我们会很明显地看出，英国人的作品文笔稳健、深邃、有力，想象力活跃而且自然，后一特点正是德国作品的缺陷，即便偶而显示出来，确实也远为逊色。在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特两位“疑虑重重的”妇女面前，“青年德意志”派的古茨科的《多疑女人瓦莉》（1835年）只能降格为枯燥浅薄的文学习作。从较高的水平来看，伊默尔曼的《闵希豪生》（1838年）根本无法与几乎是同时代的《匹克威克外传》相比；关心社会的评论者也许会问，德国这位最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伊默尔曼竟选中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故事”中谎话连篇的男爵做他的主人公，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这不恰好说明他代表了缺乏社会现实感这个现象吗？施皮尔哈根的《可疑的人物》（1860年）与同时代的法国小说的社会问题性质相比结果又如何呢？

文学史家们为了证明上述论点，可以引证美国的情形来说明美国社会的实验性和动荡不安是怎样从美国作家们异想天开和富有自我意识的文笔中表现出来。这也许确实是由于美国的社会存在还具有不定型的特征的缘故，因此在所有它的早期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文学想象力往往描写海外的和荒诞不经的故事（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埃德加·爱伦·坡），或者描写永恒的英雄激情（赫尔曼·梅尔维尔），或是在一种新型的自然神秘主义及泛神先验论中去寻求根源。新英格兰派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在马萨诸塞州乡间他们的“湖区”，[\[14\]](#)发扬这种新型的自然神秘主义和泛神先验论，但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抱着一种令人惊讶的过时的唯心主义的决心。纳撒尼尔·霍桑的现实主义与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对比显得多么不自然，就连他的最伟大的作品《红字》（1850年）也时常被比喻和象征的手法玷污而失去光彩！最终，还有一个事实可以支持这种文学上的社会学理论，这就是在随即到来的那个时期产生的美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马克·吐温。他是一位非凡的、悲观主义的、愤世嫉俗的滑稽角色和幽默大师，他写的两本杰作《汤姆·索耶历险记》（1874年）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4年）的主人公都是儿童。童年距离社会现实最远（除非迫不得已踏入社会现实，但哈克贝里·费恩和奥利佛·特维斯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儿童），而和生活的某些本质最为接近，古往今来，正是这些本质吸引人类永恒地探索生活，难道不是吗？

不过，这个理论即便在美国也遇到巨大的障碍，因为正是在美国，一位新的诗人的声音开始响起来了，这就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现实主义的声音。当这个理论遇到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就更不能自圆其说了，请看下面的事实：俄国的知识分子是把“落后的”德国而不是英国和法国当作“先进”欧洲的典型，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悲惨的落后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批评，他们致力的“西方化”实际是“德国化”，对于俄国的现实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确实起了推动作用。现实主义之花就是在这片残留着封建主义、农奴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刚刚怯懦地露头的土地上绽蕾盛开的。

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还使人对另一个普遍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这种说法认为俄国人的精神和思想根本上是“化外的”。它是一个双重性的信念：既在文学批判方面产生作用，又在西方解释俄国的现实时

采取的辩护态度中产生也许是更大的作用。毫无疑问，俄国文学有俄国的本色，但是我们却难以准确地说明俄国文学，譬如说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差别，比起英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之间的差别来，它具有“根本”的性质。如果欧洲这个概念在思想和文学方面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不可能把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排除在欧洲之外，而且如果不包含“具有独特的俄国本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欧洲这个概念肯定是不完整的。俄国文学往往以十分显著的而且在精神上更加强烈的方式反映出整个欧洲普遍体验过的社会、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种种混乱和纠纷。例如，屠格涅夫的精神世界的原型并不是草原上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而是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他在1860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论文就是专为阐述这两位欧洲文学中的主人公而作的。他的小说《父与子》（1862年）以一种悲观的超然态度和完美的艺术手法来对待两代人的冲突，使这部小说很容易地就在欧洲小说范畴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因为它主要关心的是反宗教信仰、唯物主义和严格的唯智主义的问题，所以更牢固地树立了它的地位。如果说屠格涅夫是第一个被欧洲人承认为伟大小说家的俄国作家，那是因为他的写作方式与在巴黎发展起来的写作方式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他在主要方面比托尔斯泰或冈察洛夫更缺少“俄国的本色”。

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如此，难道他比其他俄国小说家更富有“俄国的本色”吗？也许仅从埃米莉·勃朗特比狄更斯更缺乏“英国本色”这个意义上来说，情况确实如此。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到“陌生”，不过他在自己的文学故乡也是一个陌生者。例如他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深刻差异已成为批判性思考和文学论证方面的典型题材。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难以理解，因为在政治和近似政治的思想和活动方面，他以自己的方式与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志趣方面充分一致，可是在他所有的重要小说所描绘的世界里却根本不能容纳任何在政治上矫正时弊或集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所描绘的世界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展示的任何世界同样都是社会性的，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像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样擅长用巧布疑阵、制造悬念和探索真相的手法来使社会冲突戏剧化，不过其中每个人的关系都必定要和获救的希望和毁灭的威胁纠缠在一起。他的人物诚然都是血肉之躯，但在他们的血肉之躯中都体现了对神的向往和对精神满足的渴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尔斯泰尽管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战争与和平》里生动地反映的生活，但在宗教和道德方面却是清教式的：“生活”

是一回事，最终的道德和宗教的要求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不论用什么样的纯美学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托尔斯泰无疑都是更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在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史上享有确定的——也许最高的地位。因此，托尔斯泰1880年在他的宗教信仰改变后，也曾想放弃文学，谴责文学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业。这种以清教徒的宗教观点来否认艺术的做法，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毫无意义的。对他来说，宗教本身在他的小说中变得具体化了：《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1872年）和最伟大的一部《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因为他的宗教不是一种崇尚共同事业的宗教，也不是一种追求超常的极乐的宗教，而是一种关于血肉之躯的，涉及极乐与痛苦的宗教。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他们所研究的心理学截然不同。托尔斯泰探索的是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和促动因素，揭示出天性冲动、社会习俗和对人间利禄的贪婪之间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细腻地进行了心理洞察以后，他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心理上无法解决的神秘的核心，每个人物都从这个核心出发，在一部发展变化都有定数的戏剧里扮演各自的角色。这部戏剧没有给予人们任何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世主并不是来给人们解除痛苦的，而是肯定了痛苦的全部残酷性和悲剧性。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表达的宗教狂喜不是通过对灵性进行神秘的冥想产生的，而是通过人与尘世及一切污秽的融合得到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人的每种处境，甚至看来非常无关紧要的处境都位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和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为人间俗事所安排的位置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我们在许多欧洲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精神上的悲观主义的暗流，这种悲观主义的暗流可以归因于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不能对世界持有神圣的看法。另一方面，正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上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因而可能使他的看法有时带有强烈的不和谐和神经质似的过度夸张等特征。这就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显示的一种驾驭自如的诗一般的活力截然不同。上述巨著，无懈可击，它反映生活，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而是如实地符合生活本身，因此读者不禁怀疑，对于一部文艺著作来说，这种规模是否太庞大了。《战争与和平》是一个最罕见的实例，它表现出在艺术想象力与生活现实两者之间很少达到的平衡，这种平衡如此完整，以

至它既不是一部悲剧或喜剧，也不是愤世嫉俗的作品或多愁善感之作，同时也没有歪曲地模仿或进行道德说教的目的——这些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然而托尔斯泰本人却不能保持他的平衡。绝望的阴影笼罩着他的下一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年），这标志着他开始逃避文学而隐遁到宗教生活中去的历程。

俄国小说的另一个极端是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和阴沉的幽默大行其道。它们富于启示意义而且获得极大的成功，因此，冈察格夫的《奥勃洛莫夫》（1868年）这部关于一个人的毫无目标的一生的故事，其主角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人物，一个“不能不事事忧虑的”哈姆雷特，一个“无动于衷的”浮士德。一个悲观的文学观察家可能看出下列事实的重大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现实主义和心理小说的历史是从《红与黑》这部对社会以及对社会的情感和理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的小说开始，而以奥勃洛莫夫的史诗告终。奥勃洛莫夫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不值得为生活而起床。

这样一个文学观察家就是尼采。他从未听说过奥勃洛莫夫，但他猜想会有这样的人。他计划写一本论述“欧洲虚无主义”的著作时（但他始终未写成），打算用开篇的第一章来分析现实主义文学。从他死后发表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在1830年到1850年这段时间里，浪漫主义对于爱和未来的信念是怎样变为对于虚无状态的追求”。^[15]从他的笔记可以看出，在他的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福楼拜。毋庸置疑，福楼拜的现实主义里潜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已经变得明显了。因为，曾使19世纪许多思想家迷恋的“实际”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引诱着福楼拜进一步地想用唯理主义的方法去征服人类世界，但最后只是向他表明这是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福楼拜来说，现实主义的巨大优点：心理上的真实和忠实的描写，仅仅是他从事的文学事业的传统外表而已。而在内心深处，他仇视现实，并且渴望征服现实。有时候他觉得，甚至从事写作的这个人的“实在”都成为取得在理性上和美学上最终胜利的障碍。人的主体如果能脱去形骸而仅仅化为观察、理解和写作；真实的客体如果能完全变成词句，那就太理想了！“实在”应当被洞察力和文章的风格所融化！但是我们从他来往的信札中可以看出，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作出了过分的抗拒，使福楼拜一再感到沮丧。经过对《情

感教育》这部作品所作的“现实主义”的努力以后，他说：“美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这是我和现实世界最后一次打交道。我已感到厌烦了。”^[16]看来，不论如何妥善地将文风弄得纯正，但只要现实主义一旦和实在相接触，它势必要受到感染，文风的纯正是无力克服这种感染的。要使这种完美无缺的纯正对于实在获得全胜，也许只有一种办法，即像福楼拜曾经说过的那样，写“一本言不及物的书，一本与外间世界毫无联系的书，它全凭内部文体的力量独立存在”。^[17]

显而易见，这就不再是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者福楼拜所说的这些话和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独创性的一种诗歌创作是有关联的。“美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这句话所包含的怀疑，确实是使诗歌改变方向的决定性动机之一。它使诗歌从浪漫主义转为越来越彻底地要求诗歌领域的“纯正”。现实与诗歌的两极对立是本时期文学史最典型的特征，结果当现实主义小说竭尽全力对付“真实”世界的时候，抒情诗歌却寻求尽可能立足于远远离开“生活”的领地。在最初的时候，这种情况似乎还有调和的余地；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826年在为他的《桑-马尔斯》一书写的序文中说道：“在我们充满不安和矛盾的心中，我们应当发现两种看来是互相抵触的需要，这两种需要，在我看来，在同一起来源中融为一体：一个需要是对真实的爱，另一个则是对虚构的爱。”^[18]这种对立毫不新鲜，至少和柏拉图的时代同样久远，他为了维护真实性，曾抨击诗歌的幻想所虚构的东西是骗人的。但有一点却是新鲜的，即这两种对立的力量竟然在文学本身的领域中牢固地占有自己的地位。因为，德·维尼的两种爱鼓舞了这个时代的两种主要的文学潮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如果他仍然希望这两者取得和解，那么，到了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他的同胞兰波的诗及其一生却成了诗与现实互不相容的象征。

虽然，整体说来，“现实主义”是这个时代散文文学的适当模式，但这个时代的诗歌却主要是“浪漫主义的”。要给“现实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而“浪漫主义”的本质看来就在于它是难下定义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格调而不是实体；它不表现为行为的形式而是在行为中模糊反映出来的一种心境，它不存在于一句话的句法和语法之中，而存在于这句话的语调和音调中，从整个欧洲来看，浪漫主义的实践肯定并不完全忠实于鼓吹这个运动的德国人为它制定的

章程。因为，这个章程在思想方面具有宏伟的抱负，想囊括人类思想的各个矛盾着的方面；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宣称从今而后一切诗歌都必须是浪漫主义的诗歌的说法并不十分错误。^[19]从那时以后，几乎所有的诗歌都以其“浪漫主义的”反对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的平淡无奇的方式——这种反对不是通过条理分明的见解而是通过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反应——从这方面来说，他说的那句话已经得到证实。因此浪漫主义的主要来源和主题能够从消极方面予以更好的叙述：它是想象力脱离“实在”的异化，是精神上较高尚的欲望，实际上是精神自身脱离“实在”的异化。这也是从费希特到马克思这个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的重大主题之一。黑格尔早已写道“精神由于失去了它的世界而啜泣”，然后它就“超越世界”并终于“完全从它自身中创造出世界的真正个性”。黑格尔接着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将出现绝对的艺术”。^[20]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预言了这种“绝对的诗歌”，它将成为浪漫主义历史的顶峰。兰波后来在他的《在地狱中的一季》（1873年）中对它的悲惨的失败发出哀叹：“我创造了一切筵席、一切戏剧。我致力于创造新的花朵、新的星辰、新的血肉、新的语言。我认为我自己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啊！我必须把我的想象力和记忆埋葬！……我曾称自己为先知、天使，不受一切道德律法的约束，但现在我又回到了尘世，要克尽自己的职责，去拥抱严酷的现实！”^[21]一位与黑格尔大致同一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坦诺，在兰波之前大约30年便已预见到浪漫主义对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的崇拜这样一种特殊的结局。他说：“我们只是培育了想象力，而想象力反过来又几乎把我们吞噬了。”^[22]

如果想简要地概括地论述大约在1830—1870年写作的诗歌，那也只能局限于评述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诗，当然也有一两个例外。俄国的古典诗人普希金和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以及他们的主要诗作属于前一时期。在上述这三个国家中，法国对浪漫主义诗歌史写下了最精粹的篇章。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经典著作”曾经有过全盛时期。歌德已于1832年逝世，尽管他敌视浪漫主义的理论家，他的诗歌却具有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诺瓦利斯于1801年结束了短暂的一生，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男童的神奇号角》是浪漫主义作品之中最富有德意志味道的典型作品，专门表现民谣自发的抒情特点，这部诗集于1805—1808年发表。在英国，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实际上已不写诗

了；济慈、雪莱和拜伦已经去世。然而，在法国，文学的古典主义模式根深蒂固，具有在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说服力和排他性，因而浪漫主义姗姗来迟，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对于德·斯塔尔夫人的偏爱在推动浪漫主义来到法国起了部分作用。正是她的《论德国》（1810年）这本书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传布了德国新文学的福音。浪漫主义一旦被法国所接受，它在那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创立了更为坚实的事业。古典主义给法国人思想遗留下逻辑性这样一项遗产，也许正由于法国人的这种逻辑性，而使诗歌的浪漫主义激情不受约束地发泄出来，最后竟允许它对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梅这样的人建立了诗歌的恐怖统治。

如果说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创造了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并为它提供哲学推想的一切深奥的见解和种种工具的话，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则比任何其他人更胜一筹，他们给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关于浪漫主义实践的一幅尽量模糊不清但却丰富多彩的画面。我们论述的这个时代的法国文学史读起来就像一部关于浪漫主义特征的完整的汇编。在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的《沉思集》（1820年）和《新沉思集》（1823年）中，我们读到一位青年在森林和群山中漫游，谛听鸟语和自己孤寂心灵的激动声。在他的《诗与宗教的和谐集》（1830年）一书中，上帝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天使谪凡记》（1838年）和《约瑟兰》（1836年）中，天使的和人的激情、神圣的和凡俗的爱情互相交融。伟人们不论是上帝的先知还是凡人中的诗人，他们的悲剧性的孤独是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悲观地反复描述的主题：摩西（《古今诗稿》，1836年），基督（《命运集》，1864年）和诗人（剧本《夏特东》，1836年和《诗人日记》，1867年）遭受的是同一种痛苦，即被上帝和世界摒弃并成为它们的牺牲品而感受的痛苦。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一生（1810—1857年）及其写作中，爱情和心灵方面激荡的事件是以奇异的和阴森的美作为陪衬的，在矫揉细腻中混有绝望，在拜伦式的尖刻中掺杂着忧伤，孱弱的身体却由于精神上患“世纪病”而得到了补偿，夜晚便成为当时诗歌的主题：《夜歌》（1840年）是缪塞最闻名的组诗。在热拉尔·德·奈瓦尔的身上，诗歌和疯狂结成浪漫主义的联合，精神的下意识突破了梦境的界限，以它神秘的美的象征侵入诗歌的白昼的境界；奈瓦尔的某些诗与以往时代的柯尔律治有联系，同时也和未来的象征主义者相关。

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年）标志着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诗歌本身经历了所有过分的个人和主观的感情流露以后，通过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诗歌世界，来向一个对它敌视的世界进行报复。戈蒂埃在他的小说《模斑小姐》（1835年）的序言中宣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为了号召人们绝对地服从这个独立领域的法则，戈蒂埃给浪漫主义法典增加了古典主义重形式的优点，给浪漫主义对《旧约全书》和中世纪的探索增添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成分。随着独立自主的诗歌世界的建立，一种新的客观现实才变得可能和必要。诗人不必再在这个毫无诗意的尘世间专注于自己魂魄和心灵中诗的感情了；一个全部充满诗意的新世界，任凭他去冥思苦想。戈蒂埃在他的诗集《珉琅和雕玉》（1852年）中对自己的学说作了示范，这一学说成了帕尔纳斯运动灵感的源泉。帕尔纳斯运动以在1866—1876年出版的《当代帕尔纳斯》当代诗刊为中心。虽然包括勒孔特·德·李勒和何塞·玛丽亚·德埃雷迪亚在内的几位诗人为帕尔纳斯派添加了光彩，但戈蒂埃的名字也可能由于自己在诗歌方面的重要成就而名垂万代，而且也许更稳妥地来说是由于波德莱尔在《恶之华》一书中对他的题献。因为波德莱尔是我们目前论述的这个时期中最重要的抒情诗人。

然而，在19世纪中期，如果有人问最伟大的诗人是谁？人们会毫不含糊地回答：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德国的海因里希·海涅、英国的艾尔弗雷德·丁尼生。我们所说的关于小说家雨果的一切，也适用于诗人雨果：他既是例外又是典型。此外，在有关如何对待那个几乎无用却又必不可少的“浪漫主义”概念方面，雨果能够比任何其他诗人更好地教诲我们所应采取的谨慎态度。因为他在著名的浪漫主义大师中，可以说是最具有浪漫主义特征同时也是最不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诗人。维克多·雨果，从不因为无法满足渴望而忧郁沮丧，从不因为性格内向和身患肺癌而避世离群，而且从不以一种轻蔑和怯懦交集的感情去面对人生。难怪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根本不承认他是诗人！还有什么能比他那种似乎无限的精力，他对“人生”的贪欲所获得的那种巨大的满足，他把那些无法言传，必须避讳的言语看作仅仅是丰富他自己辞令巨流的支流那种态度，更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呢？但另一方面，他在早年的作品《颂诗与长歌》和《东方吟》（1829年）中，渴望征服新的和更多的陌生领域以扩大诗疆界；在诸如《秋叶集》《黄昏之歌》《心声集》《光与影》（1831—1840年）等

深入探索自己的感情、激情及信念；在《静观集》（1865年）中对于最终的奥秘进行高度主观的追求；在《历代传说》（1859—1883年）中想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纳入一部浩瀚的史诗等，难道还有什么能比上述这些作品更富于浪漫主义的吗？而且，他还是一位最能为人们广泛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反古典主义的创新者。他试图创造新的形象、新的韵脚和新的格律；由于他赋予诗以预言的力量，确实，相信诗人的声音与上帝的声音极其相似，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二者是同一的，因此他是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富于浪漫主义特征的一个。

维克多·雨果具有多方面惊人才艺和雄辩的辞藻，他能够模糊造作和真实之间的界限，能够轻易地激发政治热情，而且还具有激怒文学评论家并使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的天赋才能；在这些方面他和德国浪漫主义的“捣蛋的孩子”（enfant terrible）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年）相媲美，两人都曾同样经历过流放的生活：维克托·雨果在格恩西岛写出了讽刺路易·拿破仑的《惩罚集》（1853年），海涅则在巴黎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一书（1844年）讽刺德国的政治现状。海涅的第一本诗集《歌集》（1827年）已经为他建立了声誉，而这种声誉由于他的诗句流畅自然和格律富于感人的启示性而流传遐迩。海涅无疑堪称伟大的诗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的伟大是以他聪颖的天资为基础的。如果说他的伟大是由于他的天才，恐怕就有些不大确切；即便他确有天才，恐怕这也是天资妨碍了天才发展这样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例子。他非常出色地创造了一种肤浅和不负责任的印象，不过他并不能总是平息别人对他的怀疑，即认为他实际上可能就是肤浅和不负责任的。然而这种怀疑是不公平的。海涅深刻地体会到浪漫主义敏感性的矛盾：理智与感情拒不融合。对于海涅和对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一样，诗歌不是平息这种矛盾的手段。相反地，他正是利用这两种功能之间的不协调来作他创作诗的手段。他使感情和理智分道扬镳，然后使两者在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中突然相遇。因此海涅和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同，他能完美地将民歌和民谣的纯朴情感糅合成一种兼具两者精华的作品，他的手法极为高超，结果这种作品远远胜过自身的价值，有时甚至还超过了它的典型。有时他保持天真的调子而不让些微的讽刺加以干扰，可是更经常的是运用自己的天赋才华进行高超的讥讽，目的倒不是要奚落多愁善感，而是利用一种狡黠的保存面子的手法，以便使它在诗歌中留有一定的尊严。姑且不论这种技巧的优劣，它却肯定地使海涅

在广大的读者中间博得了喜爱，他巧妙地使他们在理智方面心安理得地享受陈腐的诗句。

海涅在《阿塔·特罗尔》（1847年）和《罗曼采罗》（1851年）这样的诗集中将他的这种方法发展到了更高的精湛程度。他的辛辣尖刻在这里愈加咄咄逼人，他的韵律更加有意地使人难以容忍，他的诗的质量也愈加令人迷惑。有一次，他问道：“凡是重要的人物，哪个没有点欺世盗名的地方呢？”^[23]这个问题揭示了他那令人反感的诚实，同时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不过，1853—1856年海涅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所写的诗中，他的“欺世盗名”增加了一种自然力的特征，当时他正躺在巴黎的“褥垫——墓穴”上遭受痛苦的折磨，每天都在等待死亡，仍然沿用同样的诗的格调对生活、痛苦和死亡进行苦思冥想，像峭壁脚下的浪花一样，咆哮着、嬉戏着、嘲弄着。

这个时期在所有的德国诗人中，只有海涅在世界文学评论中占有牢固地位，这一点绝非偶然。浪漫主义有一种特有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广大世界对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个人或小组各有自己所关心的方面，海涅代表着世界性这个极端，而紧张状态的另一极则导致已被人们忘却的民族文学的复兴，例如普罗旺斯文学，在这种文学的复兴中，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起了杰出的作用。而就海涅来说，他确实把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民歌风格、他们那村庄的月色、飒飒作响的森林和水声潺潺的溪流加以调整，使之适合各国的口味，正如他把德国散文加以欧洲化一样。与海涅相比，连艾兴多夫、默里克和安内特·冯·德罗斯特-徽尔斯霍夫这类高雅的诗人都带有地方气息。然而，这并不一定是赞赏世界性而反对地方性。最卓越的浪漫主义诗歌由于在语言上是一种亲昵的窃窃私语，因而难以解释，而最大的喧嚣绝对不是最纯粹的诗歌之声。抒情诗在全世界享有的盛誉一般说都是由于传说而在全世界造成的误解。

严格地从诗的含义来说，如果我们认为诗能揭示事物、感情、思想与词句等性质之间可能存在的完美和谐的话，我们可以举出默里克为例，他可能是这个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阅读过默里克的《诗集》（1838年）的读者们对于这点有很深的感受，《诗集》中有许多首诗并没有模仿但却保存了歌德的抒情天才的精神。艾兴多夫的《诗集》（1837年）中有些诗公然表述了对月亮、山峰、森林和草地的浪漫主义的爱，它们也同样成功。安内特·冯·德罗斯特-徽尔斯霍夫早

期的诗发表于1837—1844年，他的诗显然比默里克的诗复杂（而从根本上来说，默里克也并不简单）。他对大自然细节的观察缺乏远见，充满了一个唯恐失去这个世界的人的焦虑。在《宗教的一年》（1851年）中同时出现的语言的宗教性，语言的病态和语言的优美，几乎使人想起波德莱尔的世界。尼古劳斯·莱瑙却截然不同，他是那些受纤细感情折磨，以发疯结束一生的不幸诗人们所怀有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化身。《浮士德》（1836年）、《萨沃纳罗拉》（1837年）和《唐璜》（1844年）是他那些富有诗意和戏剧性，以及半史诗式英雄的典型人物，不过他的真正才能却表现在抒情方面，他的一些描写自然的诗篇由于情感浓厚强烈，成为这类诗作中颇为重要的成就。他醉心于万物安详地消亡（Ich liebe diese milde Sterben）；这一时期的德国诗歌多半都带有同样阴郁的调子。这就是这类诗人的心声，他们知道自己既无法和他们的大师歌德相匹敌，也不能摆脱他的想象力和语言风格的力量。

这个时期的英国诗歌虽然并不一定更加伟大，但在它的力量和范围方面肯定更加广阔。诗坛的中心地位是由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丁尼生安稳地占据着，他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向那些对于诗的深度和精妙所确定的标准并不过分苛刻的广大读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而又符合美学的关于“诗人”的概念。当法国的诗人苦苦寻求诗在这个全无诗意的时代可能具有的意义，并像鸬鹚一样啄出自己的心来滋养全民族饥饿的灵魂的时候，丁尼生则满足于给这个没有教养的世界以诗的教养。他发出的火焰不是火山的火焰而是壁炉的火焰，暖融融地温和着灵魂的表面。尽管他要讲的话不多，但他讲的话贴切得体，有如抒情诗一样恰到好处。正像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诗人一样，他的力量就在于言简意赅的抒情语言，在于“燕子轻掠般的歌韵”，他1842年的《诗集》可以作为例证。而且，又和许多其他诗人一样，他也被诱使去和已经被当代小说成功地占有的“史诗精神”进行竞争，在这方面他是比较不幸的。因此，他在一生中一再地试图把亚瑟王的传奇的和英雄的世界同《田园诗》糅合起来的尝试也大部分遭到了失败，尽管他不能充分地将抒情风格与叙事融为一体，不能将寓言式的说教融汇到诗的主体中去。

《公主》（1847年）和《伊诺克·阿登》（1864年）尽管值得称道的是形式和修饰方面，但仍然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奇作，是诗人遭受的大胆失败，因为诗想带着诗魂进行漫长的遨游，而不顾诗魂只存在

于感情迸发的瞬间。然而，他在为悼念友人之死而写的具有强烈的个人和自白特色的诗篇《悼念》（1850年）中，他达到了前一时代所确定的诗的严肃性的标准。

仅次于丁尼生的诗人是温波尔街的浪漫主义英雄罗伯特·布朗宁，不过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心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他引诱伊丽莎白·巴雷特成为他的妻子，他（而且不仅限于他）认为巴雷特是一位伟大的女诗人。确实，她的《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850年）比《奥罗拉·利》（1856年）更能显示出她那虽纤弱但真正的诗才，她仅有的缺点是语言过度雕琢和夸张，而这两点正是这个时代许多次要的诗人由于有意脱离理智的生活而受到的惩罚。罗伯特·布朗宁本人则成了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他如果不是一位有缺陷的天才，便是一位有巨大独创性的拙劣诗人。他虽然不像丁尼生那样温文尔雅，却能写出节奏快捷的抒情诗；但他很少在人们公认的诗歌本来应有的音调优美方面下功夫。他的格律和韵脚往往粗糙刺耳，不甚美妙动听，但他敢于提出见解并促使人们深思。然而，他在消除读者所感到的不安方面却始终不大成功：这是因为他认为内含的目的已经十分坚实，足以为他的那种非正统的表现辩护呢？还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深奥，足以补偿为进行思索所作的努力？他所选定的形式是那种不能上演的抒情诗剧，或者可确切地说是“戏剧独白”。这种形式最适合他的文艺性格，即以自我为中心同时要求对客观世界有深入的理解。《帕拉塞尔萨斯》（1835年）、《皮帕走过了》（1841年）、《戏剧抒情诗》三卷（1842年）、《男人和女人》（1855年），以及《剧中人》（1864年）都是这个类型的例子。在这些诗中，许多来自《圣经》和文艺复兴的人物一跃进入了多少有些过于渲染的和安排失实的环境。他坚持最久的尝试就是想赋予他的哲学以诗歌的生命，其结果就是写成了《指环和书》（1868—1869年），这首诗的中心内容是邪恶问题。只要邪恶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是远远超越它所产生的哲学情节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作品就成为布朗宁最典型、最明显的失败之作。

在这一个时期，对英国诗歌作出的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贡献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1859年），其之所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因为它选择了波斯诗歌这样一个异域的典

型，同时也由于它采用了适合的改写手法。如果不是丹·加·罗塞蒂周围那些文学艺术界人士发现了他，菲茨杰拉德可能始终是默默无闻的。罗塞蒂周围的人的理论超出了帕尔纳斯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见解，正像他们的实践一样，他们倾向于“为艺术而生活”。艺术是真理的工具，因此艺术应当避免在技巧上为了美而过分雕琢。无论是在诗歌还是绘画中，罗塞蒂都企图做到大胆的简洁，这是他从拉斐尔以前的意大利绘画中发现的特性，但作为诗人，他也仅仅是达到了围绕着简洁外层的气氛所形成的那种色彩缤纷的迷雾。他的追随者之一是威廉·莫里斯。此人多才多艺，他的诗歌的主题是中世纪的（《圭尼维尔自行辩解和其他诗篇》，1858年）或者说在技巧上是乔叟式的（《地上乐园》，1868—1870年），到了晚年，他的诗歌实际上也就停止了。当时他正专心致志地从事社会改革任务，对于这种改革的迫切性，他是受了罗斯金的影响。科文特里·帕特莫尔也与这个集团有联系，他因著有韵文小说《家里的天使》（1854—1856年）一书而享有盛名，但他走的却是另一条很不相同的道路：他越来越牢固地依附罗马天主教会。随着他的灵性的加深，他成为一位卓越而且非常富于独立性的诗人，正像他在《无名的爱神》中所表现的那样。

为了使上述英国诗歌的图景臻于完整，我们不妨把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毫无学术性而又缺乏德行的诗，来和马修·阿诺德主要在学术方面的优点作一对比。阿诺德在批评方面的洞察力更胜过他的诗才，而斯温伯恩最早的（也是最佳的）诗作《阿塔兰忒在卡吕冬》（1865年）和《诗与谣》（1866年）在该时期末问世。斯温伯恩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不过，这种争议已经与他给同时代的诗人带来的震惊无关了，这些诗人认为诗歌乃是通俗化的审美观所认为的美。斯温伯恩却以他的主题公然宣扬性欲和他的韵律表达异教的淫荡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不是恬静地回忆自己的种种感情，而似乎是收集词句来描述淫乱。当然对于他们的触犯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从斯温伯恩的时代以来，对诗的鉴赏不仅逐渐习惯于他的题材，而且对于题材完全失去了兴趣。马拉梅说：诗不是由思想构成的，它是词的产物。这种批判的观点逐渐主宰了对诗的鉴赏。正如托·斯·艾略特说的，由于斯温伯恩似乎“全神贯注地和始终如一地”专门讲究“辞藻”，^[24]因而今天的人们对于他的兴趣就不像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其他诗人那样抱着一种迁就的态度。不过，我们对于马拉梅的那句名言也不能刻板地理解；不论一个诗人的词句表达如何华丽，

如何强烈有力，但最后起更大作用的仍是他所表达的实质。就实质而论，斯温伯恩几乎不能和波德莱尔相提并论，斯温伯恩承认波德莱尔是他的老师，他沉湎于过多的肉欲描写，看来并非生活本身使然，而是由于最初受了波德莱尔的诗的引诱所致。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年）是由浪漫主义土壤中最纯净、最真实的成分滋养起来的。他在诗中把精神与现实、词句与肉体、“理想”与“怨恨”完全对立起来，造成一种无法忍受的紧张，最后用语言把这种紧张全部予以融解，其中包含并吸收了庄严和堕落、幸福和愤怒。这种完美的形式和高超的手法似乎证明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断是有巨大成效的，即证明诗人只要用心使自己的技巧臻于完美的境界，就会获得巨大成果；但是这些诗却说明：实际上，诗人只有更多地关怀技巧以外的东西，这个理想才能实现。波德莱尔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牺牲了善而一心寻求恶，实际他两样都关怀。但是，《恶之花》如果不是通过它本身的美表达了一个惧怕沉沦的灵魂秘密怀着企求获得拯救这一希望的话，它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伟大诗篇。这像是主持弥撒的神父以他的诗人般的圣洁说服了上帝，由上帝阻止了魔鬼庆典的进程。这种美学上的完善与强烈心灵活动的罕见的结合使波德莱尔成为近代诗歌的不朽大师。正是他第一个把城市生活的惨状和俚语方言带进像拉辛的作品那样灿烂晶莹的诗境，而且也正是他第一个赋予大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所造成的厌倦以真正的、尽管是消极的精神上的重要意义。

美国诗人和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本来很可能是一位文坛外缘的人物，但波德莱尔（他翻译了坡的《奇异故事集》）却把他美化，使他成为近代法国诗歌的守护神。坡之所以能使自己为波德莱尔及其后的许多法国诗人所喜爱，是因为他强调简洁，在他看来，“长诗”一词从措辞上来说是有矛盾的，而且他还强调要剔除所有非诗的题材，不论是说教的还是教育性的。爱伦·坡在其本国文人中间仅享有一般的声誉，爱默生称他为“韵律简单的诗人”，^[25]洛威尔说他“五分之三是天才，五分之二纯属胡言乱语”，^[26]可是法国人却尊他为典型的“纯诗人”。坡曾写道：“物质世界中的某些事实与精神世界中的另一些事实确实太相似了。”^[27]正是这种看法和波德莱尔的信念相吻合，这种信念原本是由于受E. T. A. 霍尔曼的影响而产生的，即认为宇宙是由一个神秘的交流系统，即“信息”（correspondances）结合

在一起的。因此，譬如说，色彩是和味觉紧密联系的，声音和香味是联系的，形象和心灵状态是联系的。生活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森林”，树林的枝蔓相互纠缠在一起，轻轻发出阵阵互相暗示的合鸣。因此，坡与波德莱尔在诗才的伟大天赋方面便有了共同点：他们给予隐喻和诗的象征以一种新的直接感和结合力，并给诗的语言增加了一个领域，这便是后来由象征主义运动以及由魏尔兰、兰波和马拉梅这样的诗人热心地探索和利用的领域。

波德莱尔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十字路口的路标，由于不信任现实，浪漫主义到达这一路口时便选择了彻底否定“实在”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波德莱尔的“信息”仍然是指现存一切事物的神秘统一，可是诗人却能随心所欲地予以运用，因为想象力已不再受到任何重要的和独立的“实在”的约束了。如果还有什么重要的世界的话，那就要我们去重新体验、重新命名，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全部予以重新创造。兰波的散文诗《灵光篇》（作于1873年或以前）在诗歌技巧方面借鉴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兰波本来已经相信诗人必须成为一位有洞察力的人；但他的本意比这个词的通常含意要丰富得多。为了要“洞察”，诗人必须系统地把他的感觉顺序打乱，因为各种感觉按其原来的顺序除了传达毫无意义的世界以外，不能传达给诗人任何东西。词本身很快出现了危机，它们变得太“实在”了，因而对于诗也就没有用了：诗（例如马拉梅的诗）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那么词必须用纯洁无瑕而深奥的象形文字来代替，这种象形文字和音乐近似，丝毫不受“实在”意义的沾染。这就是浪漫主义漫游的终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甚至陷于绝望的现实主义者福楼拜也预见到了。

在这一时期中只有两位主要诗人朝着其他方向前进，而且离开浪漫主义主流很远：他们是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和美国的沃尔特·惠特曼。他们是唯美主义贵族中间的“真正民主主义者”，因此被指责为“没有诗意”。屠格涅夫评论涅克拉索夫时说：“诗从未在他的韵文中留宿过一夜”，^[28]爱默生评论惠特曼：“我指望他能创造出民族的歌曲，看来他却满足于开清单。”^[29]涅克拉索夫对民歌的热爱是“浪漫主义的”，但他不像德国人那样，他爱的不是那种沉浸在梦幻般的怀旧情绪中的人民的歌曲；他喜爱的歌曲更接近于街头卖唱者的通俗民谣：粗犷、通俗、充满义愤。《贼》（1846年）、《货郎》

（1861年）及《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年），这些标题本身便表明它们是一种与《男童的神奇号角》完全不同的诗。他的最长的诗名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写于19世纪70年代，是一篇民歌形式的讽刺作品，而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1855年）不妨另取一个标题：“在美国，人人都应当快活。”惠特曼对诗的理想：“用通俗语言来写人之常情”肯定也是涅克拉索夫的理想。这位俄国人和这位美国人共同的灵感源泉是同情，两人的差别在于：涅克拉索夫同情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而惠特曼同情的则是一个民族建立起自由社会后将会享有的那种喜悦。《草叶集》写作的时期大约与《恶之华》相同，因此有充分理由必须在一般地概述文学时期时采取谨慎态度，并会对各诗歌派别之间的巨大距离感到惊异。然而，惠特曼献给人民灵魂的那种激昂的、充满活力的抒情辞藻，在19世纪的文学史上，也是众多孤芳自赏的浪漫主义者中的一个孤独的声音。

文学的主要状况就是与世隔绝，甚至文学欣赏亦复如此。“读者界”的构成也逐渐变为个人，他们孤独地进行文学探索。就连以家庭为单位，聆听朗诵司各特或简·奥斯汀或狄更斯的作品的一些小团体，也无法理解作家们越来越复杂和隐秘的描述。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艺术给予他们的高尚情趣的时候，把他们聚集起来的是音乐。文学的词句已变得过分精雕细琢，因而失去了吸引大众的魅力。安德烈·纪德曾说：“剧院是庸俗语言的场所。”^[30]他不仅总结了19世纪的情况（当时戏剧的粗犷似乎已无法与深刻共存），而且暗示伟大的戏剧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作家与观众在深刻的但却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的共同兴趣方面应是一致的（因此，“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平庸”）。因为，只有如此，观众才成其为观众，而不是一群更适合于在私下与之接触的个人。戏剧要想保持健康，它就好比所有其他文学表达手段更需要一种共同的信念，即相信动人而朴实的事迹和激情会产生直接的重大效果。而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如同小说和诗歌所表明的那样，小说日益趋向分析的探索，而诗歌则更坚决地要退出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心理状态与浪漫主义的精神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留下的真空中，是无法建筑起具有表现力的舞台的。有人说，英国没有戏剧，因为英国几乎没有可以演戏剧的建筑。如果说英国没有剧场是因为它没有戏剧，这个说法同样正确。甚至在那些并不缺少剧场的地方，例如法国，戏剧创作虽然无疑比较丰富，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像小说和诗歌所达到的那样优秀

的水平。斯克里布写过几百本构思巧妙的剧本，还有奥日埃和小仲马，他们运用戏剧技巧从道德的角度解释社会上贫寒人家的前屋和豪门显贵华丽的客厅之间的差别和相互纠葛，而一旦人们提到斯丹达尔和波德莱尔的名字，这几位作家在文坛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甚至显然无可匹敌的维克多·雨果在《爱尔那尼》和《吕伊·布拉斯》两剧中以西班牙斗篷短剑式的人物取得了浪漫主义的胜利后，最后也被逐出了舞台，他的《卫戍官》一剧在1843年遭到的惨败，就像《爱尔那尼》在1830年取得的成功一样引起震动。只有缪塞在戏剧形式方面的试验（他的本意只着眼于阅读而不是为了演出）获得了和他的诗歌同样的成就：这就是他那部几乎无法上演的剧本《罗朗扎齐奥》（1834年），剧中的主人公以自己变为刺客的手段浪漫地追求“自我实现”和“同一存在”，此外就是他的那些短喜剧和“谚语剧”，这些剧流露的情感令人感动，表现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失之太过，而其发人深省的幽默则富有浪漫色彩。

俄国对戏剧的贡献也是来自那些无须依靠剧场而享盛誉的作家，不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836年）却是他在社会讽刺剧方面的一个巨大成就，就和他所著的《死魂灵》一样，这个剧远远超越了这类作品通常比较狭窄的艺术境界。屠格涅夫的喜剧（《村居一月》，1850年和《外省太太》，1851年）以及这些剧作细腻的心理描写并将“氛围”作为戏剧特色之一的手法，都非常近似缪塞的戏剧散文，同时开创了契诃夫这位天才写作特色（且不谈其他）的先河。恰好就在我们这个时期到来以前，而且在它结束以后，俄国的戏剧是由一些非戏剧家作为代表的，如普希金和后来的托尔斯泰，而在这个时期本身则由奥斯特洛夫斯基作为代表，他像斯克里布一样多产，在戏剧方面多才多艺，凭借这两个特点，他以非斯克里布的现实主义主宰了彼得堡的舞台，只是在他的《大雷雨》（1860年）中才以诗意弥补了这种现实主义。

德国和奥地利在戏剧方面的贡献比法国或俄国的贡献要大（英国的贡献不值一提）。格里尔帕策和黑贝尔都是戏剧诗人，他们具有高尚的目的、罕见的真诚和伟大的艺术品德。在格里尔帕策不平衡的和近乎病态的悲观主义天赋中，歌德和席勒时代那种“古典式”冲动掺杂着维也纳“巴洛克”传统的那种戏剧的幻想和感伤。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与西班牙相距不远：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与格里尔帕策在

思想上的近似几乎像歌德和席勒与格里尔帕策在思想上的近似一样。格里尔帕策虽然由于过分悲观而写不出伟大的悲剧，过于多愁善感而写不出伟大的喜剧，过于喜欢内省而写不出伟大的戏剧，但他的作品却充满伟大剧作的那种感觉和味道。他一生只有最后几部剧作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他的喜剧《说谎的人倒霉》（1838年）未能博得观众的喜爱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1872年他逝世后，人们从他的抽屉里找到了三个剧本，其中《哈布斯堡兄弟阅墙》一剧是他最成功之作，由于鲁道夫二世这个人物而不愧获得戏剧的最高荣誉。

格里尔帕策谈到他自己的时候说，他真正的根扎在“利奥波德施塔特剧院这个鬼仙境”，^[31]那里是维也纳“民间戏剧”（穿插着音乐和歌曲的大众喜剧）的故乡。在这个哈布斯堡首都中心的这块具有地方特色的飞地利奥波德施塔特，当时剧院度过最自由的生涯，不受戏剧理论和文学上过高的雄心的干扰。在那里，谁也不用为狄德罗或莱辛操心。约翰·内斯特罗伊是给利奥波德施塔特剧院提供剧本最多的作家；他真正充满智慧，属于笔触虽不高明却能触及人们心灵的那种作家。有一次一位友人对他：“现在是你该为子孙后代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他回答说：“后代？他们为我做了些什么？”^[32]但是 he 为自己的时代创作、排演和扮演了他那些富于活力和奇想的讽刺喜剧，剧中充满诡谲的词句，抓住了只有真诚的人物才能彻底摆脱的浮华的生活幻象。他和比他年纪较大的同时代作家费迪南·雷蒙德一起，给维也纳创造了一种本国的伊丽莎白式舞台。内斯特罗伊一直精力充沛地活跃在舞台上，而他同时代的许多严肃的作家却缺乏这种精力。

例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便是如此。内斯特罗伊曾经拙劣地模仿过他的《犹滴》（1840年），黑贝尔的剧作虽然严肃，在文学上具有重要性，但是随着无情的时间进程可能会成为牺牲品。不论他的剧作有什么其他优点，但时间对它在题材与意图之间的脱节给予无情的惩罚。黑贝尔企图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不仅想写出伟大的诗剧，而且想通过深刻的哲学再一次挖掘他自己认为伟大的诗剧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寓意深刻的神话或对生活和世界所做的系统的抽象解释。他的日记、序言和戏剧理论文章有时很能引人入胜，它们证明了他理性方面的爱好。他说：“艺术乃是哲学的实现”，^[33]他的戏剧想要实现的哲学是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和

黑格尔的历史末世论二者不和谐的混合体。他虽是“时代精神”实际存在的见证，但很可能是在没有哲学家们的实际帮助下自己产生这些想法的。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性的，因为黑贝尔和叔本华都认为，个人存在是为了摆脱生活整体的束缚而必须获得，但最终将自我毁灭的一种解放的结果。所以，他的悲剧性负罪论是亚当与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堕落这一教义的世俗翻版，即生存就是负罪。因此，黑贝尔的男女主人公之所以遭到厄运，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性格中有悲剧性的缺陷，或是卷入了积极的犯罪活动，而仅仅由于人类最原始的罪：存在的罪。黑贝尔用戏剧手法把这个罪表现出来，即赋予他的人物以超出人的存在所应有的品质：《阿格妮斯·贝尔瑙厄》（1855年）的女主人公是无邪的，但过于美，《尼贝龙根三部曲》（1862年）中的齐格弗里德是善良的，但过于强健了，这些过度之处正是必然导致悲剧的原因。不过他们的厄运一定具有戏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黑贝尔的历史乐观主义取代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英雄的毁灭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历史的必然、变化和进步的祭坛上的牺牲品，齐格弗里德之死为人类更高一级的和平与友善敞开了道路；阿格妮斯·贝尔瑙厄的可怕结局导致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进一步巩固；《希律和玛丽安妮》（1850年）之间充满杀机的爱与恨的斗争，为基督教进入异教世界打开了合乎道理的大门。

黑贝尔还强调另一个因素，即破坏个人神圣的意志自由必然产生悲剧性结局。这样，他就使他那个就历史来讲阴暗中充满希望的形而上学结构更加复杂了，这使人想起了康德而不是黑格尔或叔本华。尼贝龙根的灾难来源于对布伦希尔德个性的自欺欺人的忽视；希律对玛丽安妮的爱情导致灾难是因为无视她本人意志自由的权利；这个主题以更大的力量主宰了《吉格斯和他的指环》（1854年）这个剧。

黑贝尔的戏剧既然承载着这类哲学思想的负担，他在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的同时出现这些缺陷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像与他同年龄的理查·瓦格纳（两人都出生于1813年）一样，在一个对戏剧对于人生的意义缺乏任何自发意识的时代里，却迷恋于“戏剧问题”。然而，由于黑贝尔追随的是史诗的创作方法，而发展这种创作方法的诗人则很少了解他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因此他不得不违背这种手段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来表明他的意图，始终未能找到真正恰当的形式解决他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本身非常真实的问题的压力下，他选定的方式已经变成

了一套固定的程式，不管他多么热心也无法迅速使之具有令人信服的生命力。格奥尔格·毕希纳“缺乏诗意的”作品反而无可比拟地成为更正统，最终更具有诗的特点的东西。毕希纳早在1835年，也许是1836年，写出了两部充满绝望情绪的虚无主义剧作：《丹东之死》和《沃伊采克》。

使这个从伟大剧作的传统要求来说最“没有戏剧特色的”时代问题具有真正戏剧特色的是挪威作家易卜生。黑贝尔的剧作已经提出了后来易卜生剧作的一些主题，由于某些历史的必然因素，这位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代结束时写出了他的两部最著名的诗剧：《布兰德》（1866年）和《彼尔·英特》（1867年）。但是不久后，他就着手用诗歌现实主义的戏剧杰作去征服剧场了，多年以来，这些剧场只知道奄奄一息的“资产阶级戏剧”和正在衰退的晚期英雄史诗剧。就本时期而言，戏剧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不在文学领域，而在威尔地和理查·瓦格纳的歌剧，这就足以衡量出戏剧由于没有能够讲出时代的不安心情而遭到失败的程度。

（麻乔治 译）

[1] 作者谨对已故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院长E. K. 贝内特先生所给予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2] 引文见凯思林·蒂洛森《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牛津，1954年），原文第37、495页。本书作者从读书中摘录一些引文和精辟的意见。

[3] 沃尔特·白哲特：《文学研究》，第2卷（伦敦，1858年），第160页。

[4] 《论文与讨论》（伦敦，1867年），第403页。

[5] 卡莱尔：《论狄德罗》，最初发表在《外国评论季刊》（1833年），重印刊载于《评论和杂文》（伦敦，1839年）。参见雅各布·麦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94—1802年：青年时期散文集》（维也纳，1906年），第2卷，第200页。

[6] 《批判论文集》，第2辑（伦敦，1915年），第2页。

[7] 《马克·拉瑟福德自传》（伦敦，无出版日期），第19页。

[8] 弗·尼采：《全集》（穆撒里昂版，慕尼黑，1922年），第11卷，第80页。

[9] 弗·尼采：《全集》（穆撒里昂版，慕尼黑，1922年），第10卷，第284—285页。

[10] 《雅典娜神殿》1832年5月12日，第307页。

[11]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作于1795—1796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作于1821—1829年。——译者

[12] 戈特弗里特·凯勒的《绿衣亨利》是自传小说，1854年写成，1879—1880年经改写再次发表。——译者

[13] 1851年5月，《信札》（伦敦，无出版日期），第2卷，第773页。

[14] 英格兰坎布里亚郡湖泊风景区，19世纪初英国的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居住与活动的地片。——译者

[15] 弗·尼采：《全集》（穆撒里昂版，慕尼黑，1922年），第19卷，第384页。

[16] 《古斯塔夫·福楼拜全集》，第5卷（巴黎，1929年），第260页。

[17] 《古斯塔夫·福楼拜全集》，第2卷（巴黎，1923年），第345页。

[18] 《桑-马尔斯》（M.雷旺编，无出版日期，巴黎），序文第30页。

[19] 参看雅各布·麦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94—1802年：青年时期散文集》（维也纳，1906年），第2卷，第220—221页。

[20] 《全集》，第2卷（柏林，1832年），第529页。

[21] 《作品集》（巴黎，1950年），第198页。

[22] 克·布伦坦诺：《全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55年），第9卷，第423页（写于1842年4月，临终前几个月）。

[23] 《作品一卷集》（萨尔茨堡，1954年），第40页。

[24] 《论文选》（伦敦，1932年），第327页。

[25]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记述的他和爱默生的谈话，见《文学界的知己与相识》（纽约，1901年），第63页。

[26] 詹·拉·洛威尔：《写给评论家的寓言》（波士顿，1848年），第78页。

[27] 《埃德加·爱伦·坡作品集》（爱丁堡，1875年），第3卷，第354页。

[28] 引自D. S. 米爾斯基《俄国文学史》（伦敦，1949年），第228页。

[29] 约翰·巴勒斯1871年12月的日记，引自埃德蒙·威尔逊《一举成名》（第2版，伦敦，1956年），第277页。

[30] 见沃尔特·本杰明在《作品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中摘引的谈话，第2卷，第299页。

[31] 《论自传》（1846年），《全集》（斯图加特，1887年），第15卷，第200页。

[32] 有关内斯特罗伊的一件逸事，来源于剧本《门徒》中一个角色说的话：“后代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好，我也同样不做！”见该剧第一幕第

二场。约翰·内斯特罗伊：《全集》（维也纳，1926年），第7卷，第116页。

[\[33\]](#) 《玛丽亚·玛格达莱娜》（1844年）序言（Th. 波普编：《作品集》，第8卷，柏林，无出版日期，第75页）。

第八章 自由主义与宪政的发展

1830年“半途而废的革命”和1848年这个“现代历史并未发生转折的转折点”，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时期，各国政体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方式，或许比18世纪革命的90年代到20世纪震撼世界的第二个10年之间的任何时期都要急剧，都要多样化而且有趣得多。

在1830年至1871年这个大约40年的短暂时期，法国就曾试验过半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激进的第二共和国，半独裁的君主总统制，独裁的第二帝国（参见第17章），所谓的“自由帝国”，极端激进的巴黎公社和（初期）性质不确定的第三共和国。英国曾通过两项议会改革法（参见第13章，原文第335和336页），废除了在各郡已有400年历史的40先令选举权，清除了先前由某些个人或家族操纵的腐败的国会议员选区，并且在1870年就已准备采用那些令人敬畏的宪章派在1839年要求实行的他们的“六项要求”之一的秘密投票制。普鲁士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王位时出现的虚假的自由主义曙光（就像1846年底护九世被选为教皇时的意大利那样）以后，曾于1847年首次召开了联合议会，1848年首先成立了立宪政体，并且在实行了短短的一段时间的成人普选之后，终于根据1850年宪法的规定确立了稍加限制的君主制（尽管明显存在不民主的等级选举）。这部宪法直到1918年才废止（参见第19章各处）。另一方面，奥地利在第一次成为立宪国家之后，又于1851年倒退了（匈牙利的1848年宪法甚至被废除得更早）。而且，在两次试验（1860年的文告和1861年的特许令）失败之后，终于在1867年的奥匈协约中达成妥协，如果说并没有取得稳定的话。德意志的其余部分，在比较有远见的普鲁士的领导下，已经统一成为一个准联邦，其中有几个邦仍然保有美国联邦任何一州均享受不到的权力，而普鲁士本身则设法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中保持着支配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无论像弗吉尼亚还是马萨诸塞这样的州都未能取得，尽管它们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意大利也完成了统一，并且在统一的过程中拒绝了联邦制，至此普遍采用中央集权的，在当时是自由主义的1848年皮埃蒙特宪法（参见第

21章)。瑞士的政体于1848年(后来又在1874年)朝着比较名副其实的联邦制,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制进行了改革,因此它就成了寻求有效的政府和自由体制相结合的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鼓舞力量,就像美国在1865年后和英国在1867年及1872年以后曾再次进行改革的那样。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西班牙却遭受了连续不断动乱的痛苦,无论它的独裁势力还是自由主义势力都未能造福西班牙,为它带来一个稳定的或明智的政府。遭受同样痛苦的墨西哥,1856年放弃了圣安娜的中央集权制,采用了胡亚雷斯的联邦制。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墨西哥的来之不易的共和体制在外国干涉的打击下遭到暂时的挫折,而它的反对欧洲冒险家的潜在保护者美国,此时正忙于打内战(参见第25章)。美国在这场南方对北方的内战中,经历了它自己的最大的一次联邦制危机:1861年的南部邦联宪法曾一度向1787年的联邦宪法中的许多神圣原则提出挑战。一直到1865年南方战败之后,联邦才在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得以恢复(参见第24章)。波兰人虽然在1831年和1863年为反抗压迫者曾经两次英勇起义(1846年还有一次起义夭折),但却未能收回他们失去的独立和自由的任何部分。在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统治下的俄国一直故步自封,毫无进步,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转而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参见第14章,原文第369—380页),但一直到20世纪才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或国家立法机关。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一直远未受到哪怕是最微小的改革努力的遏止。而中国在腐败的清朝皇帝们的统治下苟且偷安,似乎完全证明了艾尔弗雷德·丁尼生于1852年所作的嘲讽是正确的:“欧洲的50年胜过中国的一个朝代。”

从英国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到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告成立的20年是整个19世纪朝着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穆勒的《代议制政府》中所说的民主制方向前进最迅速的时期。在截至1848年6月的6个月中,民主制的进展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它在世界各地取得完全的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从1848年年中以后,那个在一国又一国似乎不可避免的趋势开始逆转。宪章派4月的惨败,使英国束缚于“定型”的模子里达二三十年之久。对巴黎“六月起义”的血腥镇压,终于吓坏了法国中产阶级,使之放弃激进主义,并使他们投入小拿破仑的怀抱(参见第15章)。库斯托扎和诺瓦拉两次战役阻止了撒丁的查理·阿尔贝特向当

时似乎已唾手可得的自由团结的意大利的王位宝座进军。在布拉格，温迪施格雷茨解散了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扼杀了波希米亚的革命。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国民议会脱离了争取民主制的轨道而参加日耳曼沙文主义的“十字军”去反对丹麦。对于此事，甚至连激进派首领卡尔·马克思也在他攻击别人的巢穴科隆和其他人一起欢呼。维也纳、匈牙利、克罗地亚、波兰等地的情况都是这样。革命的浪潮甚至还没有到达因循守旧的俄国和奄奄一息的西班牙的边境，就退了回去。

整个1849年，革命的激进力量仍然在巴登、萨克森、匈牙利和罗马进行零星的战斗，少数地方的战斗甚至拖到1850年和1851年。但是，路易·拿破仑1851年在法国发动的政变（在政变中普选之所以未被取消，只是因为拿破仑之流不再害怕它会成为一种有破坏性的力量，甚至还发现可以利用它充当反动工具）在全世界看来是一个信号：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完结。当他于1852年作为拿破仑三世复辟法兰西帝国时，对于从1776年、1789年两年的幼弱的萌芽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力量说来，大门似乎死死地关闭了。这些力量曾于1793年1月和1848年2月两次震撼西方世界。其影响之大是自1649年1月30日刽子手在白厅高举英王查理一世被砍下的头颅以来人们从未经历过的。

如果有一位真诚的激进派，他曾经参加过瑞士1847年反对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斗争，或者曾于1848年为巴黎改革家的宴会捐款，或者曾于1849年毫无畏惧地屹立在被围困的罗马的壁垒上，或者于1850年在伦敦的街道上追逐过“屠夫”海瑙，或者于1851年在纽约对被流放的科苏特欢呼；到了1852年时，这位激进派完全可能陷入失望的深渊，因为他理想中的前景在此之前一直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到处黯然失色了。

因此，从法国修改宪章到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这40年，形成了欧洲和世界各种宪政形式发展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向着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体制继续前进的时代。诚然，1831年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真正的全国范围的民主政体，而到了1871年，却已有几个这样的政体，同时也有更多的地方具有民主的特色和内容。但是，前20年的进展并未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保持下来。实际上，大约从1849年至1859年，插入了一个反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民

主政体失去了许多地盘。在1859年稍后的时候，进展重又开始，但比较反动时期以前却显得踌躇不前，小心翼翼。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经历了50年代的挫折之后，当年的乐观和热情已大都不复存在了；这时他们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国家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民主派的人们手中接受了宪法，或是在他们认为并不健全、并非自由的基础上得到人们长期梦寐以求的政治统一。他们往往忍气吞声，就像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1866年通过了俾斯麦的赦免法案（参看第14章，原文第520页）以及像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落入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加富尔的圈套那样，并且尽量利用这个和他们梦想中的美好世界相去甚远的新世界；但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来，这个过程却使人永远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新的力量和新的学说已经兴起，向19世纪正统的自由主义挑战。乌托邦式的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发射了若干小排炮，现在轮到大炮开火了。1847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之一和对1848年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批评的当代尖锐批评家卡尔·马克思在他在科隆出版的报纸上并在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无情地揭露了这些自由主义者的错误。此外，他在1870年之前又完成了他的巨著《资本论》的第一卷。虽然《资本论》这部书这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晓，读过它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在它的字里行间却隐藏着一整套可以替代迄今为止一直占据着进步阵地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办法，善于发掘的人们就可以找到它。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原来在独裁君主与深受自由原则鼓舞、争取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府中取得更充分权力的人民之间的斗争，已经被社会上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更为残酷的经济斗争所取代；在他看来，这种斗争只能在被剥削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个真正没有阶级的、完全平等的、生产手段和全部劳动果实归全民公有的社会时，才能结束。不管在他晚年主张的社会主义多么温和，但这并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乌托邦！

但是，这个新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在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教条，甚至到了这40年的末尾，仍然没有在任何国家的现实政治中和制宪工作中发生作用。诚然，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某些人是不自觉的或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法国1848年革命的“六月起义”看成是城市无产阶级为要求劳动权以及单纯的投票权而起义并遭受到

镇压的运动，并且像马克思那样从中得出他们的结论（虽然比马克思的结论更加混乱，而且也更无系统）。但是，巴黎公社至多不过是一个纯属地方性质的极端激进的事件而已，它没有导致任何全国范围的运动，也没有建立任何全国性的政府机构。它甚至没有像俄国人在1905年革命的“演习”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那样，找到了一种新的革命手段。巴黎公社主要是由一批幻灭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搞起来的并由他们操纵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在第二帝国期间曾被迫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世界观，不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而像1793年的雅各宾派。

早在前几个世纪就率先确立并且保障个人在国家中的自由的那些国家，在19世纪就开始致力给公民个人以表达思想并使自己的观点上达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自由。统称为“人民”的国内每个公民的集体，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开始通过所谓民主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情况最先只是在1848年至1851年间在政变前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和1848年至1850年间的普鲁士存在。在瑞士，自1848年以后就一直存在。在其他各国，除了美国的少数几个新的州（如艾奥瓦和威斯康星）之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明显起来。

以法国1814年宪章为模式的所谓“正统派”宪法（因为人们怀疑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和1814年的挪威宪法是由革命产生的而且受法国18世纪90年代宪法实验影响太大）是从不折不扣的专制主义前进了一步，但绝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其本意是反对民主的。除了炮制这类宪法的那一小撮温和的保守派之外，任何人对这些宪法都不感到满意。反动分子（在法国以“白色恐怖”时期的“极端派”为代表）认为这些宪法不够反动，而形形色色的激进派则认为它们太反动了。它们在四面围攻之下，居然还能一直存在到19世纪30年代，真是出人意料。只用法国这个例子就可说明西欧和中欧的一系列国家是怎样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修改它们正统的宪法的。而那些这时还完全没有获得宪法的国家，则接受了正统派或正统派以后形成的政体。

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政府分别于1830年、1831年和1832年进行了真正彻底的改革。就在这短短3年间，欧洲的自由主义力量得到很大的鼓舞。而德国的几个小邦萨克森和库尔黑森（于1831年），布伦瑞克（于1832年）和汉诺威（于1833年）都分别获得了新宪章；后来梅特涅在1834年的条约中通过“联邦”这一机构制止进一步颁布任何宪

法，直到1848年他和他的体制退出舞台（参见第15章，原文第396页）。这些宪法中有一些（如萨克森的宪法）保持了几几乎一个世纪。但是，汉诺威的宪法（国王威廉四世于1833年颁布的）是个例外，虽然它是一部很温和的正统派宪法，但4年后于1837年在国王埃内斯特·奥古斯特即位后即被废除。他是维多利亚女王那些“坏叔叔”当中最坏的一个。奥古斯特1840年颁布的“宪法”只不过是肯定并重申国王在国家中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和议会的从属地位，从序言到正文，甚至比1814年的法国宪章还保守。埃内斯特·奥古斯特竟然能在汉诺威使时钟倒转，这是查理十世在法国所未能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在法国扎根已有多深；而在德国已取得的进展多么微小。事实上，德意志各邦1848年以前在宪法方面的发展比法国落后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它们就必须在革命的岁月里设法迅速赶上去。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普鲁士），它们在1847年至1850年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尽管这些进展并未完全保持住）。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在奥地利和一般来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这些年里它们并未成功地“吸引”新思想的灌输，因而在10年之后还必须从头开始。

修改后的法国1830年宪章——其中虽未明确宣布权力归于人民但宣布剥夺君权，不过旧宪章中有关君主专制的序言已被删去——在其他国家远没有像1814年旧宪章那样被直接照搬。这是因为这个宪章在1814年所表示的是当时的国王愿意作出的让步的限度；而到1830年时，许多国家的人民正在要求的却是更为广泛的实际参政权和更彻底地承认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比路易·菲利普愿意承认的还要彻底。这就是为什么维克多·雨果称1830年为“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1]；而且为什么浪漫派和激进派像攻击复辟王政那样激烈地批判七月王朝。1830年宪章在任何地方都不像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那样成为一面高悬在旗杆上的进步旗帜。模仿它的其他国家和人民都设法对它加以改进。这正是路易·菲利普该办而未曾办到，法国那些批评他的人一再告诉他应办的事情。阿道夫·梯也尔反对“国王应该称王但不应亲政的说法”^[2]。这样的地位曾为英王威廉四世和比利时新国王利奥波德一世所接受，但路易·菲利普——和基佐——却觉得实在难以接受。菲利普根据宪法规定虽然可以在很大范围内操纵议会并且在立法等机关里塞满自己的亲信，但是这位“公民国王”仍然无法拒绝

竭力扮演乔治三世这个角色的诱惑。但是他并不像乔治三世那样幸运，结果把王位都丢了。

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看来，1831年以后的法国比较之下还不如尼德兰南部脱离荷兰王国后的比利时；这两个部分是根据《维也纳条约》的条款于1815年被粗暴地强行合并的。突然，由于比利时革命的结果，1831年出现了一个“模范”国家，由一位真正堪称模范的国王治理，他接受了有限君主制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并且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人民的主权。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至今仍然有效，而且实质上毫无修改，它完全胜过修改过的法国宪章，实际上胜过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一切宪法。只有在大西洋彼岸真正存在着一部合众国宪法，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的《美国的民主》（1835年初版）一书中曾热情称颂这种政体，它对旧大陆有自由主义头脑的公民说来，具有竞争性的吸引力。但是，许多比较保守的欧洲人（如果他们是伊丽莎白·特罗洛普夫人和查尔斯·狄更斯先生的信徒就更会这样）确实非常怀疑这个由安德鲁·杰克逊领导的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这个“食人癖者”和“无所知党人”的国家，这个“工匠党人”和“罗克福克党人”^[3]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是否适用于他们的比较高尚的文明。

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迅速取代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拉丁欧洲和拉丁美洲比较边远的落后地区除外）成为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指路明灯，这两派人到那时为止并不一直坚持左倾（在19世纪30年代采取这种立场的人寥寥无几），非要推翻一切君主制而代之以共和国不可。凡是以受严格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为理想的地方，都以利奥波德国王的比利时为光辉榜样。比利时的宪法“具有一切”——明确地承认人民的主权；君主及其王朝只有在宣誓尊重宪法时才能取得他们的地位；立法机构系两院制，两院议员完全由人民选举；司法独立；教士由国家供养但不受其管辖；并且还宣布严格按照1776年和1789年的原则而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在一些方面还对这些原则作了改进。不错，这样一部宪法典范并不是民主的（尽管它的条文并无妨碍日后增加民主内容的任何规定），而且修改起来很难（虽然不像美国的宪法那样难修改），但是它具有的许多特点却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宪法好得多，其中也包括英国的宪法。比利时的宪法制定者们从英国宪法中借鉴了许多思想和做法，使人感到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没

有模仿了更多的东西。但是，在1848年制宪的革命时期，它在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与比利时1831年的宪法在世界各地引起的注意不相上下，而且同样到处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尽管原因和方式各不相同。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早就认识到英国是一个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国，它设法保护公民自由使之不致受到政府专断行为的影响，并且收效很大。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在大陆上的许多其他评论家，几乎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讨论过这些特色；威廉·皮特和利物浦勋爵偶尔采取的压制措施并未动摇大陆上的人们对英国实际存在自由的信心。但是任何人都未能十分清楚地阐明英国是怎样设法做到这一点的。英国的中央政府极其无所作为（外交事务除外），地方事务由兼职人员经管，军队无足轻重，也无称得上官僚机构的东西，而最突出的一点是“管理国家不用警察”（更不用说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了，而大陆上的统治者们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批人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对于外国宪法制定者来说，英国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使人望尘莫及的国家。他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的体制“不能输出”（除了有限的和个别的情况之外）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合乎逻辑的定义。

英国的政治制度不但难以解释，更加难以照搬，而且对于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者说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切合他们的需要。英国那个来之不易的，但为时短暂的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使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了大约50%；但是英国公民的选举权甚至在1832年以前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了，只有美洲大陆上的几个新共和国除外。瑞典1809年的宪法，西班牙1812年的宪法，挪威1814年的宪法，荷兰1815年的宪法，法国1830年经过修改后的宪章，以及比利时1831年的宪法本身（或按宪法规定通过的选举法）所规定的选举权范围，甚至比英国未改革前的40先令地产选举权制以及几乎是腐败的城市当中最腐败的那些城市实行的老的选举制还要狭窄。法国根据1814年宪章在2900万人口中投票人不到10万人；比利时1821年在400多万人口中只有4.6万人享有选举权，甚至到了1848年也只有7.9万人。因此，1832年的改革法虽然扩大了已经比大多数外国改革家们迄至那时为止梦寐以求的选举权还要广阔、业已实行400年之久的郡选举权，并且废除必须自己成家才有选举权、按能力交纳教区税者才有选举权，以及有关市民、社团和自由民自治城市选举权（这些人对于这种选举

权的意义只有模糊的理解）的规定，但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并没有起到直接的鼓舞作用。引起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英国议会在第一次改革后的立法活动（尽管事实上这些立法活动仍然和以前一样，大体上操纵在原来的统治阶级手中）以及英国转而深入改革法律和编纂法典的计划（杰里米·边沁及其学派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这项工作指出了道路，大陆上的人钻研这些著作比英国本国人还要刻苦）。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英国的许多制度得到改革，使英国在行政管理上能够跟上1830年以前几乎席卷英国政府机构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外国人也对英国的议会和它的办事程序以及如何保持其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感兴趣；他们对于内阁体系以及它如何综合各种政府职能感兴趣；他们对于政党制度，对于这种制度为什么甚至在托利党人变为保护主义者、后来又变成保守党人以后，在激进派从辉格党分裂出来、皮尔派转变为自由党人以后，以及在1832年“坚强不屈的托利党人的新希望”格莱斯顿摇身一变成为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自由党首相以后仍能避免永久分裂也感兴趣。

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欧洲大陆对改革后的英国立宪制度的“欢迎”也受到阻碍，因为当时对于英国的立宪制度缺乏最新的评论，在权威和分析能力方面都不可以与一个世纪以前孟德斯鸠的评论，或者与托克维尔评论美国宪法的新作同日而语。罗特克和韦尔克尔的《国家词典》（1834—1849年）仅仅是解释性的著作，一直到1857年鲁道夫·冯·格奈斯特才发表了他有影响的著作《英国的宪法和行政法》，1867年沃尔特·白哲特才写成明白易懂的著作《英国宪法》。

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注意到，英国国内对19世纪30年代宪法改革步子之小，对某些主要政治家一再声称这些改革已是“最后的”改革一直表示不满。1837年加拿大发生的几次叛乱，也使世界其他各国对英国的制度没有一点好感。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1839年“德拉姆报告”的全部含义，只是在若干年之后才为人们所理解并设法予以实行。宪章运动的日益高涨，清楚地表明在英国政府内腐败现象仍然存在。英国年轻的新女王和她那位同样年轻而无经验的丈夫（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同属一个家族的一位德意志的小王公）在当时的局势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实际上尚难预测。1847年，英国可能正在走向也许会破坏一代人政治生活的另一次宪法危机，尽管外部世界很难看出。因此，英

国对于那些发动并领导了1848年各次革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来说，并没有起到本来也许会起到的鼓舞作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还不如比利时。

对比之下，美利坚合众国从1835年以后却很快地成为欧洲大陆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崇拜的偶像。这些自由主义者曾经逃脱了特罗洛普夫人和狄更斯的毒箭，他们的同胞也没有和美国人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在法国，对美国一切都加以颂扬的伟大战士和作为对美国友谊的传统象征的拉斐特一直活到亲眼看见托克维尔接过了火炬。在德国，罗特克和韦尔克尔（他们也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把自己最高的赞美留给了美国宪法；像特尔坎普夫教授这样的归国移民，也在演讲和小册子中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宪法无限的热情。奥地利作家卡尔·波斯特尔（查尔斯·西尔斯菲尔德）的生动活泼和激动人心的小说，用一种比较为大众所欢迎的浪漫主义手法向欧洲各地所有说德语的读者描绘了美国向西部移民的过程和边疆地区的生活，那里生活自由，没有陈规旧习，不分社会等级。在这一代人中，想要建立乌托邦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去美国或其国境以西的荒原。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儿子们从新拉纳克前往印第安纳的新和谐公社；吉森黑衣社领导人卡尔·福林和他的兄弟们前往密苏里。没有一个人打算在迪斯累里的“两个国家”的国土上建立乌托邦，就像没有人想在埃内斯特·奥古斯特和格廷根大学七位殉道者的国土上建立乌托邦一样。

在梅特涅的德国、基佐的法国和约翰·拉塞尔勋爵的英国“大局已定”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榜样在欧洲取得很大进展；因此当被压制的激进改革力量由于1848年的1月、2月和3月的革命性爆发而挣脱羁绊时，一些制定宪法的人最终所向往的是美国和比利时。如果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纯粹中央集权的政府或者是限制君主制而不推翻君主制，那么他们往往就会转向比利时。例如丹麦，甚至荷兰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国，或者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无论是君主制的或共和制的），那么美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十分强烈。波尔克总统利用在1847年和1848年12月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机会向欧洲宣扬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他派驻国外的代表如安德鲁·杰克逊·唐纳尔逊（前总统的同名外甥），是驻普鲁士公使，1848年派往法兰克福临时中央政府的使节。他曾利用一切机会着重阐述这个主题。唐纳尔逊曾

于1848年7月25日写信给安东·冯·施默林（当时法兰克福临时政府的首脑）说：

德意志运动所产生的这种“统一”的思想，乃是美国各州原先行动的基础，它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足以抵抗外国侵略的联邦政权，从而开始了它们的独立。它们在这个制度下经历了三次战争，并且在积累了四分之三世纪的经验之后，可以满怀信心地声称：它们拥有的公民无不认为联邦的解体即是降临他们国家头上的最大灾难。^[4]

法兰克福政府驻美国代表弗里德里希·冯·伦纳（以前曾任普鲁士驻美公使，他的亲美观点尽人皆知）为了促成这件好事，不厌其烦地向临时政府的各部和国民议会的各个委员会提出意见，陈述美国人做事的情况，提出模仿美国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德国如何有利，等等。^[5]例如，1849年1月10日他曾长篇引用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一次演说，其主题是：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不能整个地或者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实施这种权力，而只能通过他们的代表去实行。在他返回美国任职以前于1848年4月28日在柏林竞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时发表的一次演说（后来印成小册子）^[6]中，甚至极力要求以美国的联邦制作为君主制的德意志联邦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另外一些努力，在1848年和1849年制宪期间，以美国为榜样实际上几乎成为法兰克福每个人的口头禅。瑞典的一位观察家马克西米连·舍勒·德弗雷（他曾在普鲁士服役）1848年7月23日从法兰克福写给罗伯特·T. 亨特（当时美国众议员）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发现，美国的名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崇高；在书店里，在我们各个机构的会议桌上，到处都有一些关于美国的著作和小册子；几乎每一位演说家都用手指着它们说美国是一个光辉的榜样。”^[7]

毫不奇怪，经过德意志国民议会审议最后终于在1849年产生的这部联邦宪法，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1787年的宪法。这部宪法建立了一个真正的联邦，它和美国宪法的主要区别就是国家元首以世袭的君主替代了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它在许多方面是根据美国宪法而加以改进的，而且没有任何比美国宪法明显逊色的地方。在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接受这个新的小德意志联邦^[8]的领导地位从而使法兰克福宪法遭到破坏后，这部宪法仍然不失为一种理想。俾斯麦1867年设计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时，曾在许多地方借鉴（虽然他不承认）这部宪法的内容，并加以扩充以

满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需要。1919年，德意志第一共和国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们曾再次利用这部法兰克福宪法。甚至连西德联邦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于它。

另外一些试行制定联邦宪法的人则汲取了美国1848年和1849年的经验。瑞士在1847年的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中打败了分裂势力和狭隘的排他主义的力量之后，通过1848年的新宪法把1818年的松散和不健全的邦联变成一个真正的联邦。他们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借鉴法国（他们采用了第二共和国的男子公民普选权）和比利时（尽管他们保留了自己软弱的“指导性”的行政机构；当然也保留了他们神圣化了的共和制），但是只要美国宪法中有任何吸引他们的东西，他们就采用。他们特别效法美国宪法的第四部分，使联邦政府拥有权力在必要时可以干涉各州的事务。然而，各州保留的权力也极为详尽地加以规定并予以保障，实际上比美国各州的更为仔细。美国宪法有一些含糊不清的规定，曾经引起约翰·C. 卡尔霍恩的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州提出主权的要求并且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还曾引起“改善内地交通”和“美国银行”的争论（参见第23章，原文第604—610页）。瑞士制宪时，这些含糊之处都被认真地加以避免。瑞士22个州之间的谈判，使用了美国早先13个州之间谈判的方法，但加以改进。如果美国在1848年就有一部像瑞士那样严密制定的联邦宪法，那么50年代的宪法危机和1861年联邦的暂时分裂可能就不致发生。

然而，瑞士人在保卫他们的新联邦制度方面并未像他们可能做到的那样坚持到底。例如，他们并未建立最高法院以监督宪法的实施。1874年成立联邦法庭，这个漏洞才得以弥补。即使如此，瑞士的政体（即使在1874年的重大改进之前）即在1848年一跃而居于全世界那些鼓舞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府的前列，并且向所有向往联邦制的国家提供一个可贵的榜样。瑞士宪法就像比利时1831年的宪法那样，从那时起至今一直有效。瑞士自1848年实行男子成人普选以来，从未背弃；就在那一年，英国的宪章派和他们的“六点要求”（其中一点就是男子成人普选权）却在举国的反对下丧失了信誉而被抛弃。

在革命的年代里，另一个联邦制实验的命运却不太妙。乍看起来，奥地利帝国——实际上是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似乎在获得联邦制的福祉方面或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成熟。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各省和一些王室领地所组成，它们的传统和需求截然不

同；它有许多东西需要从美国和瑞士的榜样中学习——尽管匈牙利王国的马札尔人过分急于制服他们的那些“从属民族”，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他们的“十点”改革计划发展到在1848年年初设计出一部完全统一的宪法，并且把它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他们的君主。在君主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曾经真正试图用联邦制来解决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尽管帝国中的斯拉夫民族很快就分离出去并拒绝在1848年5月9日第一次召集的奥地利帝国议会的工作中进一步合作（正如他们在法兰克福制宪会议的工作中从开头就拒绝合作那样，这次会议本来打算把奥地利的王室领地包括在大德意志联邦中），但这个大会还是担负起制宪的职能并坚持工作下去，于1849年初产生了著名的克雷姆泽尔宪法草案（参见第20章，原文第524页）。这个宪法也在多处（但绝不是盲目地）借鉴美国和瑞士的宪法。假如它被采用的话，也许会改变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命运。因为，如果它在奥地利取得成功，匈牙利的王室领地很可能会最后在合理的平等（彼此之间，以及奥地利各地区之间的平等）的基础上被合并；无论哈布斯堡王朝能否继续统治奥地利，一个伟大而有活力的联邦将会兴起，在一种政治制度下把多瑙河流域各国联系在一起，公平合理地解决它们之间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关系。约瑟夫·雷德利希在谈到1849年克雷姆泽尔宪法草案时说，无论用道德的或是理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文件都是为这个国家树立的代表共同愿望的唯一的丰碑，它是人民通过他们自己的代表在奥地利帝国之中建立的。^[9]R. W. 塞顿-沃森曾说，他在这部宪法中看到“生动的证据，说明奥地利各族人民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在政治上拯救自己”；^[10]但它和法兰克福宪法不同，后来成为死胎。奥地利制宪议会皇帝和他的反动谋士们流放到摩拉维亚的边远城镇克雷姆泽尔，后被解散，它所制定的宪法被皇帝和他的谋士们拒绝，而采用了他们自己草拟的、于1849年3月9日颁布的那个中央集权、缺乏自由主义精神而且完全不适当的宪法。即使是这样一部宪法，也不过是足智多谋的费利克斯·冯·施瓦岑贝格亲王为自己装饰门面而已，因为它的“代议制”立法机构始终就没有开会。这部宪法于1851年12月31日被废止，重新恢复赤裸裸的专制主义近10年之久。

克雷姆泽尔宪法承认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宗教自由，保护少数民族并保障个人的权利；它宣布民族绝对平等并提供一个所有各民族在其中均拥有适当代表的联邦立法机构。虽然根据这个宪法皇帝应接受一

种君权受到限制的地位；但若实行这个宪法，哈布斯堡王朝也许会延长它的统治，而不致在1918年垮台。即使对那个理想主义者的时代来说，克雷姆泽尔宪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不过它却为这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奥地利君主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实际的机会，使之实现现代化并在一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中保住自己的地位。

在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很难在纷纭错杂的制宪试验中看出明确的趋势。但是有一个目标是清楚的，这就是把奥地利人赶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写《君主论》一书时感受的那样，在意大利爱国者的头脑里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种野蛮统治臭气熏天”。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民族独立和自由制度一样重要；而且，民族感情和自由主义感情当时在意大利最密切地协调一致。在法国，由于民族独立已经完成，国家的（如果说不是“天然的”）边界也已形成，作为“由国家组织起来的民众意志”，整个民族反对并推翻了一个不开明的国王；在德意志和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互相掣肘、互相抵消，就像正在法兰克福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国民议会不去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却去和普鲁士勾结去欺凌丹麦；或者像马扎尔人在匈牙利为他们自己取得自由制度，却拒绝给予匈牙利王国的“从属民族”以同样的制度（参见第9章，原文第239—240页）。自由主义的动力在德意志被贪得无厌的民族主义逐渐地湮没，而奥地利和匈牙利则要迅速得多。这种民族主义利用黑格尔学派的“国家即上帝”的观念为铁血手段为解决德意志问题铺平了道路。只有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在1848年并在1848年以后仍然不失为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致像他的法国同道那样必须接受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或者在流放中或转入地下追求他的自由主义；他们不致像那么多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优秀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被驱逐出境移居美洲。在意大利，朱塞佩·马志尼既是代表民族主义理想，也是代表自由主义理想的典型人物；1849年在他被法国武装赶出罗马共和国之后，还能够暂时和皮埃蒙特—撒丁的君主国政府合作，把法国人和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但是他一直到最后仍然是一位共和派。1848年的查理·阿尔贝特宪法，其自由主义内容刚好达到足以被19世纪30年代创建“青年意大利”运动的那些人接受的程度。他们没有被迫接受彻头彻尾专断的君主政体的复辟（就像1851年以后在奥地利复辟的君主制那样），也没有被迫接受一个只是把自由主义装潢门面的政体（如

在政变后的法国或实行1850年宪法时期的普鲁士)。这就是为什么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和加富尔的意大利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的原因所在;也是俾斯麦并未完全忽视的一个教训,他在1862年残酷地粉碎了自由主义反对派普鲁士进步党之后,于1867年设法进行弥补,从自己盔甲中取出一纸为北德意志联邦准备好的男性公民普选权,并在1871年设计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时从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中借鉴了许多东西。

意大利统一的历史(第21章)是在追求政治上的统一和独立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的过程中,采用和抛弃各式各样宪政形式和观念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1848年以前,有几种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宪政方案互争高下。1815年,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理名词”,在它的传统边境以内,任何一个国家、公国和省份都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对于相继两代人当中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来说,意大利实际上是一张“白纸”。甚至迟至1820年和1821年为反对更加专横的统治者而爆发的不成功的骚乱时,从半岛一端的皮埃蒙特到另一端的那不勒斯的革命者提出的要求只不过是采用西班牙1812年的宪法。这部已有点褪色的法国1791年第一部革命宪法的翻版,这时已完全不适合意大利(实际上也不适合西班牙)的需要,而要求颁布这部宪法的意大利人中,曾经读过这部宪法的却寥寥无几。这部宪法成为当时争取从君主暴政和外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人民的愿望的一种象征,因此它长期以来就在拉丁美洲受到欢迎,虽然拉丁美洲早在1821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追求更高的理想了。那些愚昧无知的那不勒斯人,自从1815年“古代政体”在这个王国中复辟以后,一直坚持蒙昧主义的独裁;在这个时期,他们与欧洲政治思潮的主流隔绝;因此,甚至迟至1848年,他们还再次要求实施西班牙1812年的宪法;而且居然真的再次在那不勒斯宣布实施这部宪法——虽然从未认真付诸实施。与此同时,西西里人也回到他们在同一年(1812年)制定的“英国式”的宪法上去,把那时英国的制度写在纸上。这种做法虽说有点土气,但很是有趣。

除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好古的特点,意大利人对待他们1848年在宪法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处境是非常现实主义的。马志尼和“青年意大利”运动自1831年以后一直主张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新归尔甫派则要建立一个在教皇主宰下的君主制联邦,焦贝蒂1843年发表的颇有影响的著作《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给这

种思想指明了方向并使之具体化。后来，1848年巴尔博的《意大利的希望》一书问世，鼓吹由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率领一支十字军对付意大利的压迫者们。在1846年和1848年之间的一段较短的时间里，许多意大利人（和梅特涅一样）都相信庇护九世真的是一位自由派教皇，《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一书所主张的联邦君主制的解决方案似乎站住了脚。甚至马志尼也声称他将支持一个由教皇领导的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庇护九世在1848年头几个月里表现的怯懦态度以及后来向奥地利人“投降”，完全破坏了新归尔甫派的事业（就连焦贝蒂本人也于1851年背弃了这个事业）。而那位迄今为止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君主——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查理·阿尔伯特在伦巴第攻打奥地利人并把他们牵制在他们的那个四方形堡垒之中时所表现的英勇行为，立刻使意大利各地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忠心转向巴尔博的观点；当然，这也强有力地使查理·阿尔伯特本人产生了影响。

查理·阿尔伯特在他解放伦巴第的过程中，亦即梅特涅在维也纳被免职的一个多星期以前于1848年3月4日谨慎宣布的“宪法”，促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感集中在一个目标和一个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办法上。这个“宪法”还谈不上是像1848年实行的各种宪法，远比不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那样开明，在某些方面甚至远不如1830年修改过的法国宪章。它实际上是1830年和1814年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案，具有某些英国的影响（如责任“议会”内阁）和某些比利时的影响（特别是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美国的联邦制虽不能适应皮埃蒙特1848年的需要，但在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审查提出的法律的永久性立法委员会的制度，却被采纳并被写入“宪法”——尽管美国宪法并未正式认可这种委员会。1848年的选举法（在“宪法”中作了规定）根本就不民主。因为在法国和瑞士都已实行男性公民普选的头年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选举法只给2.5%的居民以选举权。在人民主权的问题上，“宪法”的制定者们采取了骑墙态度。它不是由人民选举出的议会产生，甚至也不提交人民的代表批准，只不过是由一位一向专制的君主赐给他的臣民，尽管他表示同意，宪法一旦实施，他就宣誓要保持下去。它使用多少有点（也许是有意识地）模棱两可的语言宣称国王拥有王位是“根据上帝的恩惠，根据国民的意志”。十分幸运的是（至少对于萨伏依王室说来是这样）没有为修改这个“宪法”而成立什么专门的机构，因此，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一般立法程序，

经两院通过并由国王同意而加以修改。因此，当时机到来时，便可将这个“宪法”逐步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纳一种比较民主的选举法，并在取得统一之后使用许多其他办法使意大利国家（如1859年以后所谓的国家）自由化。这个“宪法”有一个弱点，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就是，它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歪曲成为一种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因此贝尼托·墨索里尼在1922年以后根本无须为正式废除它而操心，宪法的哪些部分不适合他的需要，他就可以不予理睬。

就这样，皮埃蒙特宪法成为意大利国家在宪法领域中自我表现的新象征，意大利的爱国者们也就随之聚集在萨伏依王室的旗帜之下。在19世纪50年代，正如联邦制和共和制一样，一时都被人们遗忘了。马宁（1855年）以及马志尼本人最后也和焦贝蒂一起支持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和加富尔。于是，受到各种类型的爱国者支持的“国民协会”于1856年成立，旨在统一“不带修饰语的意大利”，也许还可以加上：没有过多的自由派空谈家的顾虑。

在俾斯麦以前，人们对如何建立国家的问题多少感到有点神秘，这使得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变得复杂起来。在俾斯麦以后，这样的人也非少数。意大利人没有这种神秘观点，他们是马基雅弗利真正的同胞。在他们看来，任何政治和宪法手段，只要最适合于使他们能够最快地取得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就采用它。这样的意大利后来在1870年作为一个统一的君主立宪国家出现，但它的宪法有点陈旧而不合时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外国照搬过来的19世纪早期的那些思想观点的大杂烩，而且有时还是一些移植错误了的东西。意大利人对此并未感到十分忧虑，因为他们在革命时期的理想幻灭后，早期争取建立世俗共和国以及教皇统治下的联邦的热情显然已经消失。甚至拿破仑三世的似乎为时已晚而且半心半意地企图收买他们接受一个包括全部意大利（包括尼斯和萨伏依）在内的软弱的联邦的计划，也遭到意大利人的拒绝；他们宁愿要一个虽不包括尼斯和萨伏依在内（如果必须付出这个代价的话），但却是强大而统一的君主国，即使暂时不包括罗马也行。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那些艰难的岁月中（从1848年1月1日米兰的吸烟者的暴乱起到1860年加里波第向罗马进军暂告结束），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和爱国者也许可以说是在欧洲找得到的最坚决的人了。就连加里波第也不得不眼看着他自己的出生地

尼斯在意大利统一的神圣事业中沦于法国的统治下，因为除意大利统一的事业之外，其他的事情都算不了什么。

意大利革命者的事业就是这样经受了1848年的风暴和苦难，他们要比法国、德国或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革命者坚强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并未沉睡着的意大利自由主义爱国者们并不需要像法国雄鸡在1848年2月24日那样鸣啼来加以唤醒，他们的革命运动到这个时候已经进行将近两个月了。

瑞士人在动乱的一年也已度过危机而保持稳定的局面。而比利时人（就像英国人那样）却能够由于预先实行了许多法国人和德国人尚未获得的改革而把革命拒于国门之外（参见原文第191页和196页）。爱尔兰的“菜园革命”就像宪章派在伦敦的示威那样终于灰溜溜地宣告失败，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甚至丝毫没有遭到动摇。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继续进行他的审慎的统治，他和1847年适应一时需要而上台的自由党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像他在1831—1846年和自由党——天主教联合政府相处时一样。因为革命在1848年还没有降临这些幸运的国家；事后，这些国家也没有像在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区那样出现反动。英国人、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对于“革命的年代”和“反动的年代”有理由感到自己比别人优越，并且以使人感到屈辱的不偏袒的态度欢迎从上面这些国家流放出来的人们。梅特涅公爵和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都受到接待（虽然接待的阶层稍有不同），并被允许愿意在英国停留多久便停留多久，而“自由主义”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却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那位“公民国王”，在英国虽然并不比那位曾任奥地利首相的人物更受欢迎，但他却被允许不受干扰地在英国居住直至逝世。格莱斯顿为反对那不勒斯的监狱和保加利亚的暴行而开展的一些斗争，并没有激起英国人的义愤；要想打破巴克利和帕金斯二位先生合营的酿酒厂的雇工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之转变成反对当时哈布斯堡的暴政和匈牙利的迫害狂的显示实力的示威行动（1850年）（见第20章），就需要装扮出一副披着人皮的狼的样子。但这样未免太野蛮了，甚至连全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也感到震惊。

“革命年代”形成19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使在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意识到这些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居住在中欧的人们从1848年以后就开始有了“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这种说法

（或者用德语更简洁地说“三月前”；Vormärz），就像1914年以后（尤其在1918年以后）人们说的“战前”一样。“在19世纪50年代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人们回顾过去时总像是越过一个大分水岭。” [\[11\]](#)

这一点在政治和政府领域里，也许比在人类行为的任何其他范围内更为明显。左右三月革命以前时期舞台的绝大多数的人物以及某些理想已经消失或已退隐。在英国，墨尔本勋爵于1848年去世，罗伯特·皮尔爵士和威灵顿公爵也相继于1850年和1852年去世；在美国，约翰·昆西·亚当斯、艾伯特·加勒廷、约翰·C. 卡尔霍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亨利·克莱都在1848年到1852年间相继死去；在法国，第二共和国业已灭亡，拉马丁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自由主义也大部随之消失；梅特涅于1848年垮台后从未东山再起，甚至他的继承人施瓦岑贝格这个主张奥地利在德国应当拥有独裁霸权的人物也在1852年4月去世；在遥远的墨西哥，圣安娜将军这只曾经扰乱墨西哥的政治和对外关系达30年之久的暴风雨中的海燕，终于在1850年后黯然失色，并于1855年步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流放阶段。虽然在“革命的年代”里只有法国的一个奥尔良王朝失去王位，但有许多君主被迫和自愿退位，结果有一批新的国王或王后的肖像在钱币上和刚刚开始通用的邮票上出现，例如在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皮埃蒙特—撒丁等王国；荷兰国王则于1848年、丹麦国王于1849年先后去世。

在大臣中间，在大使馆和议会里，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人。像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美国的林肯，德国的俾斯麦等人物，这时正平步青云，领导着他们将在60年代取得成就的事件；在1850年以前，尽管他们是一些有希望的人物，但毕竟仍然全都是一些小人物。诚然，还有寥寥可数的一些经历过三月革命前时期的著名人物，如教皇庇护九世，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及那不勒斯国王“邦巴”；打不倒的帕默斯顿勋爵在1851年年底失宠后在政治上又重新显赫起来，并且一直活到1865年；尼古拉一世的道路也还有几年才算走完。

即使在“革命年代”经历了重大改革而且时钟并未倒转的国家里，19世纪50年代也是一个暂时停顿的时期。尽管1851年大博览会的气氛热烈，但是50年代在英国无论从社会改革或是从政治改革来说，都不是有明显成就的10年。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这两大危机把英

国的大部分政治能量吸引住了。美国由于作出了1850年艰难的妥协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难，在奴隶问题上的僵局又造成了像堪萨斯内战和约翰·布朗的袭击这样一些不光彩的事件（参见第23章，原文第624—625页）；在白宫掌权的平庸之辈——同情南方黑奴制的总统菲尔莫尔·皮尔斯和布坎南——在这紧急时刻却领导不力，令人失望；只有在剑拔弩张的北方和南方以西的地方才是一片相对来说比较光明的国土，像在艾奥瓦、威斯康星、犹他、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俄勒冈这样一些新成立的州或准州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制度。丹麦终于在1849年接受了一部现代形式的宪法，但是它的政治生活却由于那个显然无法解决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以及各公爵领地境内外的德国人与丹麦人之间的敌对而陷入混乱（参见第9章，原文第219页）；瑞典和挪威保持着他们共同的国王，但仍拥有各自的1809年和1814年的宪法，但是这些宪法这时已经显得有些不符合自由主义了，而且到60年代以前两国都一直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普鲁士在奥尔米茨蒙受耻辱后仍在养伤；它那所谓的“新时代”（即使在当时也是假的）的曙光一直到1858年才来到。在荷兰，1848年的相对来说属于自由主义的新宪法中不太明确规定的内阁责任制一直到60年代才兑现。在希腊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新成立的巴尔干国家中，事情也并非进展十分顺利；而在1856年置于大国集体保证下的多瑙河两公国，1859年他们的“虚假的”首次选举被宣布无效，一直到此时还看不到一点自由的或民主的制度的曙光。在这整整10年间，西班牙一直处于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局面（就像在已经获得解放的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那样）。在俄国，尼古拉一世遏制住了这股洪流，直到他1855年去世时为止，而他的继承者也只允许进行点点滴滴的改革，或者只是作一些承诺，一直到1861年由于农奴获得解放才第一次打开了水闸门（参见第14章，原文第369及其后各页）。

所以，尽管19世纪50年代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一个政治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10年，而且实际上在法国、哈布斯堡统治的各国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君主专制和独裁的复辟，但是这10年至少是一个过去几十年和“革命年代”的某些重大收获得到巩固的时期。在俄国和西班牙的境外，农奴制和封建主义残余在1848年仍一直存在的地方都已经被扫清（参见第15章）。即使在哈布斯堡各国，在施瓦岑贝格统治的反动时期，也没有打算取消农民在经济上的解放。实际上，所有各阶级都承认，农民的解放已经是太迟了，虽然除法国

和瑞士外都还没有给予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政治解放和选举权，但经济自由（即使在它往往会暂时带来痛苦和失调的时候）是获得政治权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否则，政治权利对于接受者来说，可能比毫无用处更糟。然而，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之间先后相差几代人的时间，似乎仍然是正常的事情。奴隶身份在英国早已绝迹，但农业劳动者一直到1885年才获得选举权（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普鲁士在19世纪初就已废除农奴制，但1850年的宪法只给予极其有限的三级选举制，受惠者主要是土地和房产拥有者阶级；甚至法国也到1848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而瑞士这个农民自由和自主的摇篮，也只是到了1848年在它的大多数州内和联邦立法机构中才有受到严格限制的选举权；美国的许多州（虽然不是新成立的州）一直到内战爆发时，享有的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选举权（联邦选举中的投票权也是以此作为根据的），至于黑奴和“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被排除在外，在政治上根本不存在，就更不用说了。

1850年至1865年这些年（19世纪50年代的10年更为明显），就像1834年至1845年之间的情况一样，看来似乎是两个集中改革和政治进步时代之间的一个插曲。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的改革时代和40年代末的改革时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在后一个改革时期政府或人民作出的一点点（如果说有的话）进步变化后来都遭到破坏。19世纪最后的25年也是一个朝着自由和民主政治前进的时期，尽管并不是稳步的前进。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俄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独裁制出现并得到巩固以前，还没有一个可以和19世纪50年代相比的反动时期。虽然所有这些国家在这以前曾经享受过（尽管在某些情形只是暂时的或断断续续的）自由的和多少是民主的政治所带来的恩惠。

用一般的词句来厘清或描述19世纪60年代千头万绪的政治改革，要比说明50年代比较简单的反动、挫折和“定局”要困难得多。最突出的主题或许是彻底实现传统自由主义的各项原则的最后尝试。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60年代初给“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作了经典性的解释，并于1863年为“功利主义”作了权威性的论述。因为他对功利主义作了历史的论述而不是为它辩解，因此还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他本人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功利主义立场，朝着“集体主义”方向迈进了一大步。A. V. 戴西后来认为这种“集体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起

在影响“立法主张”^[12]方面曾起了主要作用。斐迪南·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已于1862年在德国出版；5年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初次问世。因此，甚至早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前，新旧意识形态就已经交锋。自由主义的冲力尚未最后耗尽，仍然可以完成伟大事业；但是，自由主义再也不能够保持其作为一切进步的、有远见的男男女女的信条的地位了。它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不仅新的社会主义和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运动”从左的方面向它挑战，而且经过革新的、在英国已经由迪斯累里这类人实践过的现代模式的保守主义伺机从右的方面战胜它。此外，自由主义向60年代末和70年代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党派中的民族力量（尤其是其比较具有沙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投降，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吸引力。自由主义直接变成中间道路的信条，愿意和俾斯麦、加富尔这样的人物“搞交易”；越来越多的在此以前对它一直忠诚不渝的人，感觉到它在出卖自己。它不再能够比新保守主义（迪斯累里1867年的改革法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年代那种狂暴和坎坷的经历中，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它那明亮眼睛般的真纯。知识分子已经被迫变成务实的人。他们新的经历中，往往不得不像职业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那样干出他们一向鄙视的那些妥协和肮脏的交易。

60年代的第二个趋势是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质量改进。这种趋势反映出治理现代国家日益复杂。法国和普鲁士已经拥有了有效率的文职人员，这是拿破仑一世和施泰因的改革遗留给它们的；这些人员是从两国尽管严格但值得称赞的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人员中任用的。在国家主办的教育方面，英国落后了；它任用文职人员的工作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也非常没有计划。但“考绩制度”（首先在东印度公司的文职人员中实行，1858年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中实行）在英国也已普遍实行，大学的老课程的改革，加上在伦敦新建立的大学（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沃尔特·白哲特就是出身于这些大学的）以及在曼彻斯特和别处新建的大学，即将结出硕果（参见第五章，原文第116页和第13章，原文第337—338页）。在美国，政党分赃制还是一种刚刚产生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政治工具，因此不致受到改革派的严重威胁。诚然，在美国整个政治史上和联邦政府中最腐败的莫过于内战刚结束后的那个时期。但是，即使在美国，卡尔·舒尔茨和霍勒斯·格里利领导的自由共和党人也号召“把坏蛋们赶

出去！”抨击华盛顿的格兰特政府和纽约民主党“特威德集团”的贪污行为；怀俄明州则于1869年给予妇女以选举权，而且一个名叫维多利亚·克拉夫林·伍德哈尔的妇女竟然在1872年根据“平等权利”政纲与格兰特和格里利二人竞选总统。

1865年以前，在美国由于自由的地方政府倒台致使自由遭受破坏、自由制度受到攻击的危险，相对来说是很小的；主要的危险毋宁说在于利用根据联邦宪法赋予各州的自治权和任意扩大州权，从而造成联邦分裂，国家解体（参见第23章）。瑞士在1848年以前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1860年南卡罗来纳退出联邦时，这种危险达到了严峻的程度。虽然在1865年以后重建时期北方“毡囊客”和南方“无赖汉”^[13]统治的年月中，南方一些战败的州朝相反的方向摆动得过分了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偏差（参见原文第629页）。另一方面，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中，19世纪50年代的反动时期（恰巧与工业革命的到来同时发生）导致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加紧控制，以致最微弱形式的地方自我表现都有遭到扼杀的危险。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各地，旧时的行省制早已在1848年被破坏，这时按照巴赫的“制度”彻底取消了“县”（Kreis）而建立了若干“区”（Bezirke）；这样，“县”也继“省”而被废除。“区”以上的行政单位完全不予保留。施默林曾试图扭转这种趋势，于1860年恢复失去的某些地方自治权，后来这个打算还是放弃了（参见第20章，原文第544—548页）。在普鲁士也是这样，地方政府（至少是廉洁而有效率的）也变得更加专断，群众推选县长的任何权利都被取消，完全改由中央政府单方面任命。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一帝国一样，提高了省长的权力，使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成为小小的暴君。即使是在英国，乡村地区地方政府体制拖延已久的改革和自由化也并未实现1835年的市政机关组织法所作的许诺；地方政府委员会一直到1871年才建立，大的改革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才实行。

然而，自由派人士即使生活在独裁的阴影笼罩下，仍然是心明眼亮，认识到如果连地方政府都不能给民众提供表达意见和作出选择的渠道，那么希望中央恢复或扩大这些自由就更渺茫了。法国政治学家E. 拉布莱在他的著作《自由党·它的纲领和将来》（1863年）以及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国家及其权限……》中，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论点。这两本书都是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令人沮丧的

第二帝国的独裁时期问世的。与此同时，鲁道夫·冯·格奈斯特1857年出版的一部关于英国宪法的重要著作，也强调自由的地方制度在培育臣民的自由和训练公民参与公务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对地方政府的职能重新作了某些自由主义的解释（虽然它并没有牺牲其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而去实行1870年巴黎公社所要求的“由地方行政单位构成的联邦制”），但奥地利和普鲁士甚至在此时也没有采取步骤向本国公民提供在地方一级获得政治经验和受到教育的适当手段。在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甚至在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和多少有点责任制性质的议会政府之后，民主的生活方式仍然未能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未能使地方政府自由化。即使德国1919年极端自由主义的魏玛共和国和同时成立的民主的奥地利共和国，都尝到它们所继承的两个帝国遗留下来的痛苦：本国公民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独裁制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分别在1933年和1934年在这两个国家中建立起来，证明在这两个国家同样缺乏任何真正的自治传统。另一方面，1922年在意大利建立的独裁统治之所以得逞，是因为议会政府的衰落和中央政治的腐败，不过也是因为它能够利用老百姓们由于文化程度低因而无知而又轻信，却对政治强烈感兴趣的缘故。

19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个，也是最有意思的趋势，就是联邦思想先是失势，随后又（在1865年以后）部分地得到恢复。在大西洋彼岸，现代形式的联邦已经牢固地建立了半个世纪以上；如前所述，联邦思想到了欧洲的“革命年代”时，1848年和1849年曾对瑞士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思想和制宪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在反动的10年间只有瑞士把有效的联邦制度保持下来。在拉丁美洲（参见第25章），独立初期曾进行过几次颇有希望的成立广大地区联盟的尝试，但后来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分裂和中央集权的时代；墨西哥虽然根据1824年的第一部共和宪法开始成为一个联邦国家，但在1836年的新宪法中却又倒退到中央集权制，最后终于在1855年摆脱了顽固不化的中央集权者圣安纳，于1857年产生了一部新的真正的联邦宪法，这部宪法一直持续到1917年（必须承认，这期间与其说是遵守宪法，还不如说是违反宪法），从1864年至1867年之间的马克西米连帝国这段插曲不计在内。但在当时明显的反对联邦制的趋势中，墨西哥再次成为联邦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一直到美国的北方战胜并于1865年在原有广泛的基

础上重建美利坚联邦，这才使人们恢复了信心，认为在民族成分并不像法国和比利时以及不列颠诸岛（爱尔兰始终除外）那样单纯的国家，也可以用联邦的办法解决问题。

尽管联邦制度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个以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为主流的年代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却不能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科学中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前面已经提到，马扎尔人的自私自利如何在1848年阻止在匈牙利王国实行联邦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愚钝如何在1849年使两次很有希望的联邦试验流产，这些试验本来可能有助于拯救他们各自的王朝免遭最后的覆灭。意大利的特殊情况，使联邦制不如中央集权制那样吸引人，因为联邦制意味着政府软弱无力，缺乏足够的决心把奥地利人和更加反动的本国统治者赶走，而实行中央集权的皮埃蒙特的扩张却有希望很快地实现全国范围的独立和统一；这个希望果然惊人地实现了。此外，拿破仑三世由于参与策划建立一个意大利联邦，在意大利人的心目中引起了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猜疑；其实意大利人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这位外国同情者。“普隆比埃联邦”是按照被人鄙视的德意志“联邦”的模式为意大利制造的一个政府，一眼就可被人看穿。而拿破仑三世的下一个机智的计划（即在维拉弗兰卡提出的由四部分组成的意大利国家）把加富尔赶下了台，而且使所有善良的意大利人感到震惊，因为根据计划奥地利人将永久统治意大利的北部（参见第17章，原文第463页）。在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卡纳和罗马涅四国的革命的立宪会议全都推选萨伏依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为它们的国王后，加富尔及时复职，挫败了拿破仑企图利用联邦制作为武器使意大利保持软弱无力的地位最后所作的绝望努力（在1860年）。这位不屈不挠的皇帝从这次失败中所能捞到的只不过是把罗马城并入意大利人“自己缔造”的新意大利王国的日期推迟了10年。无怪在所有善良的意大利人心目中，甚至像贝内代托·克罗齐和圭多·德·鲁杰罗这样良善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思想家的心目中，联邦制始终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政治概念！鲁杰罗曾写道：“联邦制从来没有给它在法国的信徒——从吉伦特派到巴黎公社社员——带来成功，而且由于他们的彻底失败，它只能着重说明法兰西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结构根本上是实行中央集权制的”^[14]，从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对联邦制及其在意大利的信徒的想法也完全相同。

联邦制于1849年在奥地利被抛弃之后，它在1860年和1861年“十月文告”的“政革”时期，曾被人们半心半意地恢复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是1861年的“二月特许权”恢复了中央集权制，1867年的“奥匈协议”（在1865年屈服于戴阿克和马扎尔沙文主义者之后）又使臭名远扬的双君主制代替了真正联邦制的哈布斯堡国家（参见第20章）。舍夫勒1871年的“基本条款”，是运用联邦制概念以便起码做到给予波希米亚以自治地位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努力在来自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两方面的压力下，很快就被放弃。从此以后，哈布斯堡帝国就注定要灭亡了。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部分恢复联邦制的计划为时已太晚，而且距离萨拉热窝事件也太近了。

普鲁士在1850年有了一次沉痛的教训。当时在奥尔米茨由于施瓦岑贝格的压力它被迫同意恢复原有的不起作用的1815年德意志联盟，并再次在一个分裂的德意志中充当奥地利的配角。奥托·冯·俾斯麦正是由于普鲁士在奥尔米茨会议上受辱以及他1851年至1859年间在恢复后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中担任普鲁士代表时的痛苦经历，才从一个1848年的反动的、受蒙蔽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客和支持《十字架报》的立场转变成1867年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他转而采用一种经过修改的联邦制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并且设计出（部分地根据流产的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一个在普鲁士的统治下统一北德意志的宪法计划，并在1871年把这种统一扩大到南方各邦（奥地利除外）（参见第22章）。然而，1867年的联盟和1871年的帝国都是不完全的联邦制（因为普鲁士在两者都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在1871年给美因河以南的三个邦以某些微小的特权作为诱饵），正如它并不是完全的民主制一样（尽管有男子成人普选权）。这个新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困难，承认议会完全有权控制军队；并且用不能令人满意的1874年的“七年任期制”（Septennat）来解决（不如说搁置）这个问题；而俾斯麦又觉得非保留那个不负责任的行政机构不可，这是因为他素来的保守思想使他相信这样的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直到最后才决定把它变成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但已为时太晚；于是，在威廉二世的1918年9月30日的宣言发表后六个星期，德国便宣布成为一个共和国。时机的选择并不比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元老院法令确定1870年5月21日的帝国宪法更好些。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于1870年9月4日即宣告成立！

俾斯麦的联邦计划并不如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计划完备，甚至不如1863年的“王侯会议计划”完备。人们把它称为把（1815年的）联邦法（Bundesakte）与法兰克福宪法合而为一的一种尝试。但是，它也包含许多俾斯麦自己的主张。他关于联邦政府的各种观念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长期以来引起研究人员们的兴趣。特赖奇克认为“俾斯麦在青年时代是美国天才的历史学家莫特利的朋友。莫特利写了一本论述尼德兰联合王国的书，俾斯麦就是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关于联邦制的理论知识的”^[15]，但实际上俾斯麦可能是得益于1867年和1871年与莫特利通信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问题的讨论，而不是由于阅读了《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一书。莫特利1866年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说：“我相信您是愿意知道我的意见（这也是每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的意见）的少数欧洲人当中的一位，并且认为一个美国人可能知道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国家的事情……至于如何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我不愿向您提出什么意见。”^[16]俾斯麦也曾读过罗伯特·冯·莫尔、康斯坦丁·弗兰茨以及其他19世纪中叶的作家关于联邦制的著作。据信，他的1867年北德意志宪法的定稿曾大大受益于马克斯·东克尔（他曾是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起草人之一）所拟的“初稿”。^[17]1867年和1871年的德国宪法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1849年宪法删去了自由主义内容的翻版。俾斯麦不可能诚实而公正地赏识联邦制原则；当然，正像他不会赏识自由主义一样。

撇开1867年的瑞士宪法改革不谈，1865年联邦制在美国全国恢复之后，联邦制最大的胜利都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取得的。墨西哥联邦共和国于1867年恢复，同年，根据英属北美法建立了联邦制的加拿大自治领。加拿大人从美国宪法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也从美国宪法的一些错误中获益匪浅，而且（也像瑞士人那样）给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比1787年在费城给予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大。组成自治领的各领地称为“省”，而不叫州，其余一切权力都留给自治领政府。俾斯麦如果愿意，或者如果他的消息灵通的话，他本来是可以从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中关于在联邦中保持一个拥有充分权力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的。但是，后来澳大利亚（1900年）和南非（1909年）也没有从加拿大的例子和经验中学到本来可以学到的一切。

1867年是宪政变化和改革出现奇迹的一年（但并不一定都是朝着自由或民主的方向发展的）。这一年还出现了英国第二个改革法案，荷兰实行了内阁责任制（1866年瑞典宪法朝着自由主义方向作了修改，丹麦宪法则朝着非自由主义的方向作了修改），奥地利的第一部现代宪法生效付诸实施（但很难说是一部民主的宪法），日本“明治维新”（参见第26章，原文第713页），年轻的睦仁天皇由此摆脱了德川幕府的控制，发动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维新运动。这次维新在著名的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奈斯特的帮助下，及时地产生了西方形式的具有“神权一族权”性质的1889年日本宪法；但这只是在首先建立了一支普鲁士式的陆军和英国式的海军之后——因为“铁血时代”这时已经开始，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和采取多数原则的时代”已经过去。

实际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和采取多数原则是否像俾斯麦断言的那样，是“1848年的错误”；或者，“铁和血”是1862年、1867年和1871年的错误，则仍然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陈厚珩 译）

[1] 维克多·雨果：《1830年一位革命者的思想及见解的日记》，《争论的哲学》（巴黎，1841年），第158页。

[2] 1830年2月20日《国民报》，引自迪韦尔吉埃·德奥朗纳《代议制政府史》（巴黎，1857—1871年），第10卷，第405页。

[3] 都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激进党派。——译者

[4]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保管的联邦档案中的原稿，帝国外文部文件，第13卷，第120页。

[5] 参见J. A. 霍古德《弗里德里希·冯·伦纳——德国的托克维尔》，《伯明翰大学历史杂志》，第3卷，第1期（1951年），第79—94页。

[6] P. 文茨克：《有关德国宪法问题的小册子评介书目，1848—1851年》（萨勒河畔的哈雷，1913年）。

[7] C. H. 安布勒编：《罗伯特·T. 亨特书信集》，《美国历史学会1916年度报告》，第2卷，第91页。

[8] 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指不包括奥地利的统一的德国。——译者

[9] 《奥地利的国家与帝国问题》（莱比锡，1920—1926年），第1卷，第323页。

[10] C. 楚皮克：《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统治》一书英译本序言（伦敦，1930年），第20页。

[11] R. C. 宾克利：《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1852—1871年》（纽约，1933年），第124页。参见第10章，第267页及以下各页。

[12] A. V. 戴西：《英国19世纪法律与舆论之间的关系》（伦敦，1905年）。

[13] 对南北战争后到南方投机谋利的北方人和与北方政府合作的南方白人的蔑称。——译者

[14] 《欧洲自由主义史》（R. G. 科林伍德英译；伦敦，1927年），第205页。

[15] H. 冯·特赖奇克：《政治》，第2卷（莱比锡，1897年），第3册，第312页，英译文引自H. W. C. 戴维斯《H. 冯·特赖奇克的政治思想》（伦敦，1914年）。

[16] 《J. L. 莫特利和他的家庭》（S. 和H. 圣约翰·迈尔德梅编，伦敦，1910年），第246—247页。

[17] 参见H. 特里佩尔的论文《论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来历》（《奥托·祁克七十寿辰论文集》），魏玛，1911年，第589—640页。

第九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

1830年前后的几年时间，对于一个在1815年还很少为人注意的事业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民族主义事业。大约就在这几年间，“民族”一词第一次作为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名词而为人使用。法兰西科学院于1835年接受了这个名词。1834年，俄国人普列特科夫说“民族”（Narodnost）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新词。这个词很快就在捷克语和意大利语中流行，而且过些时候在德国（为Nationalität或Volkstum）和英国也为人们所熟悉了。要给这个词下定义并不容易。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比歇评论说，这个词已经获得巨大成功，尽管人们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它的含义。他又说：“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仅指民族，而且还指一个民族即使在失去其自主之后仍能借以继续存在的某些东西”^[1]。从那时以后，政治学家们一直试图阐明这个词的具体定义；但是，像比歇那个含糊其辞的定义也许就满不错了，正因为它含糊不清，所以这个词才这样受人欢迎：“每一位理论家，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任意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塞进去，证明自己的某些愿望是合理的。”^[2]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它意味着自由和一定程度的人民主权——因而马志尼可以说“构成英国民族的进步原则”^[3]；对于保守派来说，则是维持本地的传统和确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其他人们来说，则是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在精神上结成一体的社会，或者是由血缘纽带或与祖国的特殊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有一些人认为民族运动是向世界大同前进的一步，另外一些人则把民族国家看作至高无上的和最后的实体而为之效忠。看法各有侧重，各个年代亦有所不同，东西方之间也有所不同。但是，不论强调的是什，反正这个名词出现了，很快就充满了感情色彩；而且，它和它的姐妹词“国民”（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都包含着一种具有无限潜能的推动力。

到了1830年，民族事业已经是羽翼丰满了。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诗人和记者在重新燃起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作用。自愿的或被流的流亡者们，激起了法国人和英国人亲希腊或亲比利时的感情。从法国大革命的武器库中就可以找到一些有力地鼓舞

人民热情的象征性的东西，如三色旗、国歌、国民服饰、国民节日、国民自卫队等。作为民族事业基础的那些基本概念，即有助于使民族事业具有号召力的那些特征，几乎早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都已经全部由民族主义思想或行动的先驱者们发明创造出来了。在1830年至1870年间，人们一再鼓吹和散播这些基本概念和特征，其效果之大，使得欧洲的政治思想起了变化，欧洲的地图也大为改观。统治阶层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则，到了1860年已为多数统治阶层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虑了。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政论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当时就声称，“一般地说，各国政府统治的界限大致应与各个民族的居住界限一致，这是自由体制的必要条件”。^[4]到1862年，阿克顿勋爵把民族学说说成是当时最有吸引力的能够翻天覆地的理论，“而且是将来可能具有巨大力量的最富有意义的理论”^[5]。到了187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各自统一就显示了这种力量。

19世纪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取得的成就，使统治权的分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而破坏了两个重要原则，即181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但这种破坏原则的情形是有限的，总的说来，各有关大国仍然遵守这些原则，“欧洲一致原则”仍然维持下去（参见第10章）。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附属民族都不可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赢得政治自由。而在像希腊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具有特殊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情况也表明，其边界线主要仍然由各大国的利益所决定。因此，许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对于争取自由的民族所作的努力究竟能推动到何种程度。

到1832年，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英国对比利时的干涉是出于对法国扩张的恐惧。它干涉希腊的目的既是支持希腊人，也是为了遏制俄国。这一目的达到后，英国就要严格限制这个幼小的希腊王国并保持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残存领土完整无损。这样一来，希腊的爱国者就很不满意，他们几十年间梦寐以求的是解放在国境线以外的希腊人，是在君士坦丁堡重新建立一个希腊帝国的“伟大理想”。但推动英国政府行动的并非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同情。尽管在1832年后英国的体制变得比较自由了，并且越来越被人看作是自由主义的范例和支持者，但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仍然是保持和平、现有的条约和国际均势（参见第10章，原文第267页）。

1830—1831年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表明，对俄国不能有所指望。只要俄国的保守主义仍然支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保守主义，只要它剥夺了波兰人曾经在“会议王国”时代享受过的自由，那么俄国在全欧洲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就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不过，这种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曾经以一个同一宗教信仰的保护者的身份援助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以推进它对土耳其的图谋。俄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取决于它是否对从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中所获得的好处感到满意，或者它是否打算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然而，1830—1831年，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法国。他们希望法国再次举起战刀充当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但是他们失望了。路易·菲利普和他的顾问们很清楚，法国无力征战，也无法与一个新的欧洲联盟对抗。因此，那些“具有历史上重要性的”臣属民族对于各国政府无所指望，至于那些默默无闻、被人遗忘的“不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民族的要求就更难指望得到支持了。他们不得不各自寻求自救的道路。

这就是他们的领袖们所寻求的事业，而且并非毫无指望。这种事业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中讲理智的社会风气中得到鼓舞；也许还从一些敏锐的观察家们的判断中得到鼓舞，这些观察家们认为民族主义的主要障碍——多民族的大国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维克多·雨果早在1831年就已声称，到处都可以听到“革命的隆隆雷声……从位于巴黎的中心经过每个王国的地下通道涌现出来”。^[6]不管各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像伦敦、布鲁塞尔、伯尔尼、苏黎世、日内瓦，尤其是巴黎这些城市在1848年以前的岁月中一直是民族主义的摇篮。“在英国的意大利人”、杰出的马志尼长期的流放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度过的。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则在巴黎进行讲学和写作。富有的罗马尼亚贵族也是把他们的子弟送往巴黎。这些西方城市成为来自许多国家的流亡者的避难所，其中有德国人、意大利人，尤其是波兰人。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出版和集会结社比较自由，这就为进行宣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因此，巴黎是一个国际首都，许多国家的慷慨好义的男男女女互表同情，流放者和流放者交相聚会，流亡者熙熙攘攘往来不绝，创办报纸，结成团体，这一切都使19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气息。

这些城市并非消极的东道主，“波兰之友会”和“意大利之友会”继20年代亲希腊社团之后成立。文学界人物如米什莱和布朗宁、基内和施温伯恩被争取过来支持各民族或至少某一民族的事业。而且文学本身就能有力地鼓舞人心。特别是法国的作家把文学的力量和政治号召结合起来。拉梅内的《一个信徒的话》一书（1833—1834年）强烈谴责“民族压迫者”，该书一再重版。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历史》（1847年）在都柏林、雅典、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等城市和在巴黎一样，都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似乎扮演了“各民族之间的调停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而且，法国那些已故的和健在的民族事业的鼓吹者，有许多人仍然相信法国将再次成为伟大的解放者。难怪俄国的赫尔岑回忆说，他如何带着“崇敬的心情”进入巴黎，“犹如人们进入耶路撒冷和罗马时经常感受的那样”。^[7]难怪1848年人们的期待心情发展到狂热的程度，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立即扮演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无畏的十字军的角色。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把巴黎看成是流放者的圣地麦加，把法国看成是唯一真正的无畏战士。有些意大利人就对他们的法国邻人不信任，德国人则对他们持有强烈的反感。不仅如此，德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赫尔德（1744—1803年）的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语言学方面的民族主义。这倒不一定和自由主义有联系，这种民族主义在中欧和东欧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参见第15章，原文第391页）。赫尔德还首先提出“民族国家（Volkstum）”，即有机的历史群体的思想。他用这种思想来代替传统的国家概念，这种思想又经过19世纪有影响的作家们的发展。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德国一些大学的威望，德国遂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相匹敌的具有吸引力的中心，那些迷信他们的人们则往往从语言和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从有共同目标和自由制度的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民族问题。

这就是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民族运动背景中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在历史的舞台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到处可以看到。在像法国这样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中，在像比利时这样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中，在那些渴望更紧密地统一起来的松散的联邦如德国、瑞士，在历史上暂时臣服于他国的民族如波兰，甚至在那些刚刚开始重新夺回失去的文化遗产的民族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

在英国，很难说有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就英国存在过的民族主义而论，它只表现为岛国一贯的骄傲；表现为对待那个传统的敌人的厌恶（尽管在路易-菲利普和拿破仑三世时代曾经有过协约或同盟）；表现为帕默斯顿勋爵的深得人心；表现为一些人物不顾白厅所主张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而推行殖民扩张和发展殖民地的活动；而且还表现为爱尔兰地主和日益富强的工商界的利己主义。但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却遇到了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所遭受的屈辱打动过雨果，捷克人对此也感到同病相怜。^[8]

1801年的联合法撤销了都柏林议会，而让爱尔兰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享有代表权，但实际上却使爱尔兰人大失所望，因为爱尔兰的利益仍然要从属于英格兰的利益。天主教解放斗争的“救星”丹尼尔·奥康内尔终于在1840年决定重新掀起废除联合法的宣传运动，不久就成立了名为“取消联合法全国忠诚协会”。两年后，一些年轻的律师，即后来成为“青年爱尔兰”的核心人物，独立创办了《民族》周刊，其宗旨是“首先是把人民的思想和所有各党派有识之士的同情引向民族主义这一伟大目标……不仅要为人民争取建立本国的立法机构，从而拯救人民摆脱贫困，而且要用崇高而英勇的对祖国的热爱激励人民，使他们热情奔放，心地纯洁——这就是字面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民族主义”。对于像约翰·皮戈特（该运动中最年轻的成员）这样的人来说，正像他在1847年所写的：“民族问题是一种神圣的宗教；我用这个字眼是从它最崇高的意义来说的。”^[9]最初他们是支持奥康内尔的一批异军突起和颇受欢迎的盟友，但他们后来终于和由奥康内尔之子所掌握的已经堕落的取消联合法协会决裂，并于1847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爱尔兰联盟”。但是由于在政策上是按宪法行事还是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而告分裂，这个联盟只维持了18个月。1848年当法国大革命甚至把那些比较谨慎的人们也鼓动起来，极力要求他们的支持者也拿起武器进行操练并计划自己的起义时，政府自然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了。增派军队；极力主张起义的约翰·米切尔由于煽动叛乱而受审并被逐出境；7月，又中止了人身保护法。这些事件激怒了谋反者，他们过早地采取了行动，结果惨败。人们原来希望以吉尔肯尼和梯普拉利为基地举行广泛的起义，举起绿旗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起义军队没有准备就绪，响应者也为数寥寥。实际上，“青年爱尔兰”也像1848年的其他许多声名扫地的运动一样，

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准备不足，组织不善，既缺乏有势力的社会集团的支持，又很少和饥饿的农民大众联系。对于农民来说，生计和宗教比政治更重要。他们当中有人就这样表白说，“这些联盟派并不比伦敦佬更了解爱尔兰”。[\[10\]](#)

在这次灾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爱尔兰“比1800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死气沉沉”[\[11\]](#)。但是1848年的仁人志士并未放弃希望。10年后他们又开始活动，1858年在美国或在爱尔兰本土开始组织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称“芬尼亚运动”。这是一个秘密社团，目的是重新采用沃尔夫·托恩的方法，即经过周密策划后，以武力摧毁英国的统治。这同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做法一致，是一个比1848年的计划较为实际可行的在全国人民中掀起热潮的计划；但是时机不对头。芬尼亚运动发起为时已晚，因而未能利用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期间所造成的困境。他们的愤怒呼声使他们的事业广泛地为人们所知晓，这就促使格莱斯顿宣布爱尔兰政教分离，从而赢得了爱尔兰舆论的好感（参见第4章，原文第100—101页）。但是，他们并没有动摇英国的统治。实际上，在新芬党兴起以前，爱尔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也许就是大批横渡大西洋的移民运动，这个运动在30年代就已开始，到40年代和50年代已形成大规模之势。集中在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它比在波兰的大移民运动中分散在欧洲许多国家里的波兰人的政治力量还大。他们加强了美国当时已经存在的反英情绪，他们的金钱和同情给予身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以强大的支持。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这些爱尔兰人寻求鼓舞和援助的地方。

在法国，19世纪中叶的民族主义是在战败之后希望继续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中诞生的。它的表现是，排外运动时起时伏，一再流露出要推翻1815年的各项条约和要求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的愿望（参见第10章和第17章）。在这些年月中，民族主义仍然是革命传统的一个部分，民族主义的主要旗手仍然是那些自命为大革命真正继承人的左派人物。但是，法国是在自己的大部分是天然形成的国境范围内存在的，它既没有一个爱尔兰，也没有一个波兰，对此，特赖奇克感到羡慕。因此，法国很少受那种企图合并各同种民族的野心的影响。米什莱很可能曾希望法国特别同它的拉丁“姐妹”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合作；而且语言和文化渊源可能成为法国对比利时的觊觎或对罗马

尼亚人进行援助的有力根据。但是，泛法主义并不存在，而拉丁民族合作所产生的唯一结果，不过是1865年的拉丁货币联盟。法国民族主义者尽管喊叫得很响亮，但在1848年以前对法国的政策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在北欧和西欧较小的国家中，民族主义也取得重要地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中，对于民间传说、历史和语言文学的研究，使得每个民族更加意识到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研究特别是在挪威人和丹麦人中间助长了更加坚强的民族意识。在挪威，这种民族意识虽然几乎完全表现在语言和文学上，但这对挪威最终在政治上脱离瑞典来说，却是必要的前奏。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主要受害国丹麦，这种研究激起了对新挑战的强烈反应，丹麦把挪威丢给了瑞典。现在它又发现它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控制正受到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势力渗透的威胁。它对这种危险的反应是把它和要求结束专制主义的愿望密切联系起来，这样就引起了微妙的宪法问题。

根据1846年皇家特许状记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两个独立的邦，除了各由丹麦的公爵享有统治权外，其他与丹麦毫无共同之处。最南部的荷尔斯泰因是德意志联盟的成员，居民几乎全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有相当多的丹麦人，主要是农民，很久以来就和丹麦国王有联系，因此这些丹麦人在感情上总认为石勒苏益格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42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位议员由于坚持他有权用丹麦语向石勒苏益格议会发表演说，因而被驱逐。这个事件使丹麦舆论哗然。在随后的两年中相继成立了几个维护丹麦人利益的协会，丹麦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民族自由党，坚决要求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他们在1848年取得了胜利：新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接受了意见，废除了专制主义。此外，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又进一步激起哥本哈根的民族主义热情，当时的口号是“丹麦要以艾德河为界”（该河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之间的界河）；凡此种种，导致一个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内阁应运而生，宣布通过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石勒苏益格将和丹麦合并。这两个公国的议会中占多数的德意志人立即起来反击，宣布独立，并要求正式加入德意志联盟。法兰克福议会答应了这一要求，并请普鲁士派军队前往支援：于是丹麦的自由民族主义党人使他们的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一直打了三年之久，只是在大国进行干涉后才宣告结束（参见

第10章，原文第265页）。1852年的《伦敦条约》标志着又回到维持现状：重申丹麦君主国的完整，承认两个公国的特殊地位，关于在位君主由谁继承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弗里德里希七世没有子嗣，而两个公国又遵守萨利继承法）似乎也圆满解决了。

但这种妥协使丹麦的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都不满意。不久又出现了紧张局势，于是，始终拒绝以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边界问题的丹麦人，于1863年企图实现他们在1848年未能实现的和石勒苏益格更紧密的联合。又有一位新国王，即克里斯蒂安九世被迫批准一部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分开，使它更密切地与丹麦联合。德意志人这次的反应仍是十分强烈，这次俾斯麦玩弄的手腕非常狡猾，终于使普鲁士捞到了这两个公国。这一次并未招致有力的外来干涉，因为西方几个大国在采取任何有效的共同行动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参见第19章）。就这样，丹麦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当初太固执，结果给丹麦带来了应有的报应：普鲁士政府不顾《布拉格条约》（1866年）中有关公民投票的规定，从而使丹麦永久失去了这两个公国。只有北石勒苏益格除外，许多年以后，它在1920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重归丹麦。

1864年的战争对于广义的北方民族主义，即所谓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或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的现实也是一次考验。虽然浪漫主义运动使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更加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别，但不少知识分子却强调这些国家在历史、传统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之处，因而建议进一步密切知识交流，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友谊，就可使北方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是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种回敬，尽管它的力量还很弱。这个主义对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学生，对丹麦的民族自由派都有强大的吸引力。斯堪的纳维亚团结一致这个概念之强大有力，使瑞典于1848年派遣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去保卫丹麦的菲南岛。但是俄国很讨厌任何扩大合作的想法，因而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瑞典或挪威扎下根来。1863—1864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五世同情这个主义，极想帮助丹麦；但是他的政府提出种种条件，终归一事无成。而自愿为丹麦人打仗的瑞典人和挪威人也为数很少。“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要维持瑞典和挪威之间原有的联合已很困难，再想把它加以扩大更是谈何容易。” [\[12\]](#)

荷兰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尽管泛日耳曼主义者对荷兰虎视眈眈，但却不存在像上述两公国这类有争议的领土可以引起德、丹两国之间的纠纷问题。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是语言问题，这对比利时来说是个内部问题。但也有某种非常类似的情况，即在荷兰和比利时，民族主义情绪也正处于高潮，正如丹麦与两公国最终导致分裂前后的情况一样。

在荷兰，荷兰人和他们的国王一样对“十八条条约”甚为不满。因此，当国王为了要获得与比利时分治的较为公平的条件而出动军队进行较量时，人民支持他。但是，当他坚持拒不承认1831年11月的“二十四条条约”规定的经过修订的领土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对荷兰比较有利而且各大国又坚决加以维护）时他的臣民就开始对他的这一政策感到厌烦。因为这项政策要保持相当大数量的武装部队，还要征收沉重的赋税。到1839年国王终于接受条约后，当时的民族主义发现与其谴责比利时，倒不如要求修改宪法，使人民选出的代表能更多地参与决策。

另一方面，比利时人对于“二十四条条约”深感不满，对于丧失东林堡、马埃斯特里希和后来成为新的卢森堡大公国的那部分领土提出强烈的抗议。1839年，比利时议会举行会议批准协议时，要交出的那些领土的代表表示反对。他们的发言感人，而且是后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代表们1871年发言的先声。曾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一种要求收复领土的民族主义。但不久，大多数比利时人接受了大国决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入侵的危险；以有保证的中立为条件，限制采取冒险的对外政策。对于要交出的领土上的居民来说，这倒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荷兰和卢森堡的政府都是温和的；同时，民族自尊心在比利时国内得到了补偿，自由制度得到发展，迅速成长为工业和经济强国（参见第2章，原文第191页）。

然而，在比利时国内另外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荷兰实行兼并遗留下来的，部分是由于浪漫主义运动对语言和历史研究的冲击的产物。很久以来法语在比利时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而威廉一世却坚持要把荷兰语定为正式语言。同时，以扬·弗朗斯·威廉斯（1793—1846年）为领导的语言和文学运动业已在佛兰芒人中间开始。他是一位诗人、语言学家和时事评论家，竭力鼓吹佛兰芒语言和文学的伟大，并吸收了一群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忠诚的信徒。

这个运动一旦发起，就不断扩大，并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得到许多为人民爱戴的作家们的援助。用佛兰德伯爵们盾牌上的佛兰芒雄狮作为“佛兰芒政府的象征”，人们普遍歌唱一支新的爱国歌曲《佛兰德的狮子》。亨德里克·康赛恩斯（1812—1883年）在他的《佛兰德的狮子》（1839年）第一版序言中写道：“佛兰芒人比瓦隆人多一倍。我们纳税也比他们多一倍。因此，他们要把我们变成瓦隆人，要牺牲我们，我们古老的种族，我们的语言，我们光辉灿烂的历史以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一切”，这在政治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已很清楚。但直到1856年政府才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佛兰芒人”的疾苦。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他们十分同情，以至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纲领。他们极力要求在佛兰芒各省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一切事务中，在佛兰德的学校中，在根特大学以及在法庭中（在被告请求下）均应使用佛兰芒语。他们建议应成立佛兰芒学院以保护佛兰芒文化，军队应分为讲佛兰芒语的和讲法语的。但是，尽管调查结果如此，政治舆论并未受到震动：1870年以前大部分时间执政的自由党人对“佛兰芒人”不表同情，认为没有让步的必要。这个运动仍然主要是理性方面的，它没有自己的任何具体的政治组织。运动领导人的目标不是分离，而是要使比利时成为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竭力主张国家的统一并不取决于语言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以引用瑞士作为有说服力的例子。

瑞士的民族问题，在1848年以前的确非常严重。只有付出内战的代价才能解决；但并非是由于国内或国外的任何语言矛盾引起或激化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可能要求合并说德语的瑞士以及荷兰和丹麦，而且个别德裔瑞士人可能感到德意志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像石勒苏益格那样的民族主义冲突的难题。瑞士的民族运动是企图解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结构问题，由于掺杂上宗教的矛盾而使问题更加棘手。瑞士的民族运动基本上是内部问题，尽管邻近的大国有意进行干涉。

事实证明，根据1815年的联邦公约产生的议会和内阁，就像德意志联盟的议会那样，臃肿繁杂，既不适于防止外来的干涉，又不能阻止国内分离主义集团的反对。实际上，这些情况是主要的；而且各州为了各自的政治领导权，尔虞我诈，百般猜忌；再加上全国各地的经济管理、币制、度量衡、关税、税收和邮政等几乎像中世纪那样的混

乱。于是瑞士的民族主义者，就像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设法要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和一個比较合理统一的经济体系，以便更好地适应一个工业化已经开始大步前进的国家的需要。在蓬勃发展的1830—1831年，几个州采取了自由体制，鼓励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派掀起一个要求修改联邦公约并按自由主义原则改邦联（staatenbund）为联邦（Bundesstaat）的运动。但是30年代初的这些修改公约的建议遭到梅特涅的反对，而且那些主要信仰天主教并以农业为主的比较保守的各州也极力反对。结果这些建议一事无成。但党派的激烈斗争却继续下去，激进派则通过报纸和他们组织的狩猎活动传播他们的主张。

1844年当卢塞恩州大委员会决定把该州高等教育的领导权交给耶稣会时，便发生了一次危机。尽管这是该州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但这项决定看起来好像是针对早先阿尔高州采取的反教权措施的一个挑衅性反击。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一个主要的州采取这一行动不可能仍然纯粹是一个州的问题，于是原来在不信教者与教皇至上论者之间存在的争执^[13]就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斗争，七个信奉天主教的州终于在1845年组成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即分离主义者联盟（Sonderbund），而这时反耶稣会运动取得选举的胜利，使激进派在议会中取得绝对的多数。于是激进派便急于实现他们的纲领。议会中的多数代表全国80%以上的居民和90%以上的财富^[14]，他们投票主张以违反联邦公约为理由解散分离主义者联盟，并主张修改公约本身。由于分离主义者联盟拒绝解散，结果爆发了内战。梅特涅和他的保守的同伙又一次急于干预，但激进派取得的胜利如此迅速而彻底——战争进行了还不到一个月——使他们的欲望受到挫折。联邦政府指出大国无权进行调停或阻止瑞士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自己的宪法。正如瑞士的一篇评论所说，“该文件有一种自力更生的新调子”。在“对外政策上，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意味着瑞士终于摆脱了被监护状态，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15]由于1847年民族主义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1848年的联邦宪法才有可能制定。这个宪法建立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有一个常设的行政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有权指导外交政策，掌管关税，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可以监督各州内政的权力。这次改变一方面由于杜福尔将军态度温和，他在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中表现了人道精神，使战败的各州易于和解；另一方面也由于激进派领袖们办事

稳健，他们没有企图成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以及为了僵化的原则而践踏各州历史上一贯实行的自治制度。下述事例即是明证：禁止为了让外国雇用瑞士雇佣兵而与任何外国签订投降协定；禁止改组后的联邦文武官员接受外国政府的金钱或荣誉奖赏。激进派虽未实现其梦想，即成立一所联邦大学和一些联邦师范学院以传播“一种新的瑞士精神”，但这并无损于他们的巨大成就；因为，尽管瑞士人大体上来说愿意把教育工作交由各州当局管理，但他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充分民族感的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了”^[16]。

因为瑞士在当时（正如奥克森拜因所说）是欧洲的一个缩影，所以欧洲其余部分都在兴致勃勃地效法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斗争。这种情况莫过于意大利和德意志；瑞士为这两国的许多流亡者提供了庇护所。

在烧炭党运动和1830—1831年各次起义失败后，热那亚（该城邦当时已被并入皮埃蒙特）人马志尼坚持不懈地鼓吹意大利统一的事业。他的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1831年7月成立于马赛，是他千方百计地教育他的同胞的一个主要组织。意大利复兴运动在其他地方也产生了效果（参见第21章），这里只能论述一下有助于激励意大利民族主义和对发展意大利民族本身作出贡献的各种思想和著作。马志尼的基本思想在该团体的同名报刊《青年意大利》上发表，并在他后来发表的大量著作中得到发展。独立、统一和自由是三个目标。其中自由要通过成立共和国取得，通过共和国可形成民族。马志尼解释说，他所谓的民族系指“说同一种语言的公民总体，他们共同相处，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其共同的目的是使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发展臻于更加完美的境地”。^[17]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从来与自由主义不可分离，虽然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语言。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说“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这些岛屿之间的较小岛屿与意大利大陆……无可否认地都属于你们……”但他承认有界线，认为存在天然疆界线——对意大利来说，就是从瓦尔河口到伊松佐河口的“庄严和不可否认的”疆界。“在这条疆界以内，人们都说你们的语言，通晓你们的语言；越出这条疆界，你们就没有权利了。”^[18]他心目中的意大利民族不是排外的，他的主要理想是重新建立人类在道德上的团结。“人的团结就是要在工业化的大众文明中克服现代人类的分散趋势……民族的团结就是要把民主制度下的所有自由的个人纳

入一个自由、平等的集体之中……人类的团结就是要保证一切民族的和平与合作。……罗马就是这三重团结的象征。”^[19]就在法国遭到失败的地方（他认为法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在1830年没有支持意大利人），意大利可以向人类表明如何享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

1833年“青年意大利”在皮埃蒙特的革命尝试失败之后，具有独特的大无畏精神的马志尼又成立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团体，叫作“青年欧洲”。这个组织于1834年4月15日开会，草拟了一个博爱公约，这是一种由各民族青年组成的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的神圣同盟。他公开宣称，“青年欧洲”的使命是“树立人道精神，使之通过不断地进步，尽快地发现和运用上帝的法律”，“各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它们将通过合作去实现人道精神这个总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是神圣的”。^[20]“青年欧洲”像“青年意大利”一样，不久投入不成功的革命活动。它又按民族划分为若干分会，不久这些分会就争吵起来，于是瑞士当局不得不于1836年禁止它活动，并把它的成员驱逐出境。但是，尽管这两个团体注定是要失败的，特别是“青年欧洲”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式产物，但他们树立的榜样到处有人仿效，从19世纪那些自称“青年爱尔兰”“青年塞尔维亚”的团体到20世纪的“青年土耳其”或“青年中国”。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宣扬意大利民族命运的不仅是马志尼的著作。焦贝蒂的《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1843年）一书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它主张用联邦制而不是单一政体的办法来解决意大利的民族问题并且预言教皇将起到新的作用，而且因为它以十分赞扬的词句论述意大利的作用，说意大利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和革故自新的民族，是一个古老家族中的长子，享有长子的一切权利并拥有特权。一些诗人，如被称为意大利的提尔泰奥斯的贝尔凯特和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两人都流亡英国）、著名赞歌《意大利弟兄们》的作者马梅利、朱塞佩·朱斯蒂和其他许多人，都曾谱写过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威尔地的歌剧如《伦巴第人》（1843年）和《埃尔纳尼》（1844年）曾引起爱国示威运动；马基雅弗利和但丁被人们重新发现为意大利独立运动的先知，而曼佐尼（1785—1873年）、卡洛·特罗亚（1784—1858年）、切萨雷·巴尔博（1789—1853年）、米凯莱·阿马里（1806—1889年）等人的作品在历史上则又重新风行一时。对

于他们，人们评论说，他们“有两个共同点：认真而勤奋地钻研，对意大利的事业表现热情……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在短时期出了几版。他们如此迫切地研究历史……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意大利人意识到，或者至少是急于要发现他们自己历史的道德统一性”^[21]。马志尼公开表示对法国不信任，焦贝蒂希望避免革命或“争取外国援助那种最可悲、最可耻的权宜之计”^[22]。他们的这些主张以及由这许多爱国文学产生的自信，也普遍形成认为意大利能够自救的感情。意大利1848年的运动也像德国的类似的运动一样，并不具有法国的特色：“激励大学生们参加志愿军向‘德国鬼子’猛冲的爱国意识，其来源就是产生于罗马的马志尼和焦贝蒂的理想”^[23]。三四十年代的事件大大地推动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但却使它离来自拿破仑的意识更远了；法国在1848—1849年无所作为，也意味着法国影响的进一步削弱。

与意大利并驾齐驱、历史上具有光辉文化传统并正在寻求有效的政治统一的国家是德国。国家和民族这两个名词，当时人们往往用来指德意志的各个邦。^[24]但是他们所说的其实用“邦独立主义”（particularism）一词更为恰当。德国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其目标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吸引着所有人的理想：它的最强烈的鼓吹者是一些被合并的邦的人；它对保守派以及自由主义者都有吸引力；这些人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在于目的。

1815年的德意志联盟就像瑞士一样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政治力量。一位保守的巴伐利亚贵族在1847年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个联盟不满的性质。他宣称德意志人已经获得多数地位。

全民族都要求参与国家行政管理……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全国一盘散沙……这就使德意志在其他国家中处于无权地位……奥地利享有的权利太少，因为它内部虚弱无力；……普鲁士……只是在得到宽容的情况下才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之中……而德国的其余部分则永远只能扮演随从的小角色。谁都不会否认：令人难堪的是在国外不能说“我是德国人”——不能以自己的船只上飘扬着德国国旗而自豪；必要时没有德国的领事可求助，只得解释说，“我是一个黑森人、一个达姆施塔特人、一个比克堡人；我的祖国一度曾经是伟大的强国，而现在却分成了38块”。^[25]

两支时分时合、时而互相冲突的主要势力有助于赋予德国民族主义以力量和色彩。一支势力来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另一支来自本国的文化传统，赫尔德是这支力量最光辉的战士。他曾收集德国民间

诗歌并极力主张德国人要钻研本国语言。如前所述，他提出“民族国家”的主张，并宣称德国的民族精神要求德国领土的统一。这个新论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其以后又为许多作家所强调。费希特（1762—1814年）在李斯特之前就已提出经济自足的主张；格雷斯提出了类似后来的泛德意志的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丹麦在内的大德意志。把阿米尼乌斯称颂为民族英雄的雅恩（1778—1852年）是基内所宣扬的主张的先声，他在1842年曾把德国的政治目标说成是回到凡尔登条约的状况；就像阿尔尼姆和阿恩特（1769—1860年）的反法爱国歌曲是1840年行将与法国重新开战时贝克尔和施内肯贝格尔反法爱国歌曲的先声那样（参见第19章）。亚当·H. 米勒（1779—1829年）也是一系列民族主义者的先驱，他歌颂战争，说战争赋予国家以性格，使它们具有分明的轮廓和坚实的基础。黑格尔（1770—1831年）的哲学更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主义的倾向，他把德意志精神说成是一个在形成过程中的新世界的精神；他颂扬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并把普鲁士说成是最好的榜样^[26]；此外，像萨维尼（1778—1861年）这样的一些法学家，也把德国的法律说成是从这个民族的整个过去，从它的灵魂深处，从它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的。

到1830年，民族主义的著作已大量出现。这些著作之所以重要，一方面由于某些作者威望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著作抛弃许多起源于法国的思想，企图代之以某些人们认为纯属德国所特有的思想。因此，反对近期的征服者和世仇（格雷斯首先这样称呼法国），既是实际要求，也是合乎理性的，而且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些作品充满浪漫主义的对强大实力的渴望，充满关于德意志人具有超人创造力的传说，从而赋予德意志民族主义以排外性，这一点固然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所特有，但在德国表现最早，而且表现得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粗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反对法国，嘲笑东方各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态度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普遍价值加以排斥的性质。因此，在德国正在产生一批伟大的经典作品学者的同时，另有一些德国人却在贬低这些经典遗产，这种情况看起来十分荒唐。正如费希特欢呼他所说的古代德意志人拒绝接受罗马帝国的保护，以便保持“纯粹的德意志人”那样，40年代学识渊博的“德意志精神论者”也试图在整个德意志以德意志法取代罗马法以便清除贪污腐化。

经济方面的著作也回荡着民族主义的声音，主要的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的著作。李斯特攻击经济自由主义是唯物主义和世界主义，主张必须实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他声称民族性是他所主张的制度的明显特点，并认为，在德国适应世界自由贸易这个最终目标以前，保护关税十分重要。但是李斯特关于经济的必要条件即经济利益的观点，远远超出关税壁垒的范畴。他希望德国关税同盟扩大到“从莱茵河口到波兰边境（包括荷兰和丹麦在内）的整个海岸”^[27]；他说，这个同盟是“德意志民族最重大的贡献之一”。荷兰和丹麦这两个天然的日耳曼国家都将加入德意志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就可获得“现在还缺少的捕渔业和海军力量，海上贸易和殖民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德国的使命是在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使那些荒凉、野蛮的国家开化，向尚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这样，原来的泛德意志主义者被这位帝国主义者所超越。这种梦想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1849年霍恩洛厄-席灵斯菲斯特亲王克洛德维希就极力主张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罗得岛、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并向各岛输入德国移民。“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找到一条美好的出路，我们将得到一个滨海地区，一个商船队，海员和水手。我们也不要忘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一些配备有高效率工作人员的德国领事馆，这也是帝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28]

实现这些理想的尝试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但在1848年和1849年中对丹麦战争和对待波兰人这两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热情，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已经如何牢固地掌握了人心。德国的自由派，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自由派从1830年以来就一直对波兰人深表同情；1848年春，法兰克福的预备议会就毫不含糊地宣称，波兰复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职责。”但是，这项决议比六个星期以后法国国民议会的类似声明并不具有更多的实际价值。实际上，波兰和普鲁士之间确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参见原文第397页），普鲁士方面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即将和俄国开战，届时普鲁士将需要波兰臣民的全力合作。普鲁士政府宣布波兹南大公国“国家改组”，并且似乎准备主动提出波兰实行自治的某些措施。但是以后几个星期中的兴高采烈和动荡不安却很快使这两个民族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一旦不再担心俄国对德国进行干涉，德国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要统治他人的民族主义胜过了奉行民族自决的自由民族主义，因此在7月底召开的法兰克福议会上，

575名代表中只有101名投票支持下列论点：瓜分波兰是可耻的错误，应通过恢复波兰的独立予以纠正。大多数代表则赞成普鲁士有权进行征服，主张开化劣等民族，并同意批准完全对波兰人不利的分割波兹南的提案；在这些代表中有几位竟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分道扬镳业已明显，而德国的自由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被大大地削弱了（参见原文第397页）。

迄至这时为止，西欧和中西欧各民族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平稳。然而，东欧的情形就非常复杂了，这是因为那里的民族繁多，而且他们各自的愿望也是相互冲突的。

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多民族的大帝国都面对着强烈程度各自不同的民族运动。在俄国和土耳其，民族运动是在两国的边缘地区发生的，影响着土耳其的巴尔干臣民和俄国西部从芬兰到乌克兰的非俄罗斯地区。但在奥地利，民族运动却出现在中心地带，直接造成帝国瓦解的威胁，只是由于俄国的干涉才幸免解体。这次干涉是19世纪保守的各国在受到革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威胁时，能够团结一致的最突出的例证。奥地利帝国幸存下来；俄罗斯帝国粉碎了波兰人1863年的又一次起义；但是，土耳其虽然在1840—1870年的最大危机中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后来还是对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做了很大的让步。除了新成立的罗马尼亚国之外，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民族主义骚动并没有使欧洲的地图改观。不过，重大的斗争出现，重大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在像爱沙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这些连自己的存在都被人们遗忘了的民族当中，民族感情也已经开始高涨。但是，尽管这些在历史上并非著名的民族中产生的运动对于将来意义重大，在当时则并未严重威胁到现存的国家体系。对原有秩序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那些在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如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顽强不屈。这些民族以及其他一些较大的从属民族的民族主义，已经证明自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是没有内部的分裂和相互的角逐，本来是可以更为强大的。例如，这种内部分裂和相互对立就使得哈布斯堡能够挑拨克罗地亚人反对马扎尔人，使得俄国人争取波兰农民的支持以反对波兰的土地贵族。不仅如此，附属国的民族主义还加深了两大帝国内部那些主要的、历史上著名的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如马扎尔人与日耳曼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对立。但是到了1870年，这些对抗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在哈布斯堡帝国中，日耳曼人的成分尚未强大到足

以随心所欲地统治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的程度，因此，随着1867年奥匈协议的达成，过去的敌人马扎尔人成为伙伴（见第20章）。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帝国，1863年以后企图一笔勾销波兰的民族主义的残酷做法，使这两个主要的斯拉夫民族之间原有的裂痕更加扩大，而且看来其中之一注定是要沦于无限制的从属地位。这也使民族运动所引起的诸多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斯拉夫人究竟如何？他们有可能比拉丁民族更容易联合起来吗？泛斯拉夫主义究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新兴的超民族主义强大力量的反映呢，抑或是像斯堪的纳维亚主义那样并不牢靠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最大的斯拉夫国家的意图究竟何在？俄国是否根本就不会把民族主义这匹马套在自己的车上呢？

其实，在三个帝国中俄国是唯一可以说具有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这一方面是那些希望保持一个信奉东正教的不受西方思想腐蚀的神圣国家的人们流传下来并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使专制制度受到震动而得到加强的老传统。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入侵和失败所激起的民族精神，由于波兰起义的新冲击而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结果，政府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对某些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过激主张并不同情，但官方的政策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当时知识分子中维护旧传统的主力）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致的。民族主义在官方的反映就是俄罗斯化，这主要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奉行的政策，在亚历山大二世当政的头几年有所放松，1863年波兰叛乱后又恢复实行（见第24章）。最初，这自然给那些刚刚反叛的国家——俄属波兰以及迄至那时已大部分波兰化的国家如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带来极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行政管理工作操纵在俄国官员的手中，维尔纳大学被关闭，俄语成为强制使用的官方语言，大量产业被没收，归俄国人所有。立陶宛法令在立陶宛本土被废除；1842年，“政府”被分成三个部分，行政事务中不再使用立陶宛这个名称。这个政策在教育方面，就是发展俄国本土的文化，这是从1833年至1849年任教育大臣的乌瓦罗夫伯爵的目标的一部分。就是他在一封出名的备忘录中宣称，教育应当以“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精神这一真正俄罗斯的保守原则为基础”（参见第14章，原文第363页）。1835年设置了第一批斯拉夫语言和文学讲座；在他的赞助下，宣扬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杂志《莫斯科人》于1841年创刊。

但是，尽管俄罗斯化奴役俄属波兰和立陶宛达一代人之久，但并没有消灭波兰文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贵族在圣彼得堡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德意志文化以及社会和经济的特权。他们对俄罗斯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因此俄罗斯化只是在乌克兰人中间暂时遏制了刚出现的民族主义，在一段时间里使它的中心从基辅转移到奥属加利西亚的利沃夫。有人说，俄罗斯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宗教的外衣下取得的，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说服力：例如1839年曾劝喻某些受罗马教会影响的东正教徒（所谓东仪天主教派）重新加入“祖传的全俄教会”；又如1836年在里加设立了东正教主教区，随后有许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改宗东正教。

俄罗斯化政策的实施往往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保护专制制度使之不受革命颠覆和政治分离主义的危害。因此，1846年成立了秘密团体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会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希望成立一个由所有斯拉夫民族组成的民主联邦。另一方面，北方波罗的海各国主要是文艺方面的民族主义运动依旧发展而未受到阻碍，因为他们没有构成明显的政治或社会危胁。在这些国家中，文艺运动引导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并促成1835年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英雄国）和1857年爱沙尼亚的第一首史诗《卡列维波埃格》（卡列维之子）的诞生。但在半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它是这三个国家中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最进步的——语言上的斗争即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之间的斗争。芬兰在长期受瑞典的统治之后，到1830年瑞典语仍然占统治地位。芬兰语的捍卫者和比利时的佛兰芒语的捍卫者一样，都在为本民族语言争取平等的地位。1863年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项语言法令规定，在属于说芬兰语的那部分居民的一切事务中芬兰语和瑞典语具有同等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还可以迁就芬兰人。的确，波兰的历史和芬兰的历史实有天壤之别。尽管在1830年以前它们的地位是相似的，但在1863年，当波兰人再次起义并再次遭受残酷镇压时，芬兰人却得到允许使用自己语言的法令，并且召开了他们50年以来的第一次议会，在1864年又采用了单独的芬兰货币单位（参见第14章，原文第376页）。

如果说芬兰的民族主义似乎是无足为害的，那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人数较少，又以农民为主，他们的民族主义也同样无足轻重，

甚至他们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占压倒优势的德俄两国文化之间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而无人去过问。“甚至在60年代也还没有一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相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语言有什么前途，更不用说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在政治上有什么前途了。”^[29]然而，还不到一个世纪，这些民族和芬兰人的语言运动就发展壮大成为强有力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从而在欧洲社会中又增加了三个新国家。

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是俄国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参见第14章）。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特别是德国的思想和文学，但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它的追随者没有严密的组织或明确规定的政治目标；但是，就像许多德国浪漫主义作品赞扬德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相比是独一无二的那样，他们也高度赞扬俄国是无与伦比的，并宣称俄国还有一项使命，就是要“成为全世界人类特性的原型，从而超越民族特性的范围”。^[30]他们笃信宗教，极端保守，不相信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国家机器。他们独具特色，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的群众意识的民族主义。看不出他们对俄国的对外政策有什么直接影响，但他们同与他们对立的理性主义者，即西方派进行的辩论，标志着俄国思想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段。他们还鼓励另一种其性质极难捉摸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特点的运动，即泛斯拉夫主义的成长。

虽然在三四十年代的俄国有像巴哥丁和丘特切夫这样一些有时被说成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人物，但是泛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却是起源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中，是由两个路德教派的斯洛伐克学者杨·科拉（1793—1852年）和约瑟夫·沙法日克（1795—1861年）所鼓吹的。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文化复兴并使他们的斯拉夫同胞明白他们有共同的文化遗产。但是，两个人的著作引起了炽烈的热情，这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学识，而是由于他们使人们认识到了斯拉夫民族的伟大。

因此，科拉尔的《斯拉瓦的女儿》就被称为早期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圣经。这位作家哀叹他自己将见不到“斯拉夫人支配一切的伟大时代”，那时各门科学都将通过斯拉夫渠道奔流，斯拉夫人的服饰、生活方式和歌曲将风行于塞纳河和易北河畔。同样，萨格勒布的爱国者们看到沙法日克的《斯拉夫人种史》一书中的地图时也着了迷，因看到斯拉夫民族居然散布得这样远而感到惊讶。在这些热心人看来，

从克罗地亚到乌克兰，所有的斯拉夫人自由、平等地统一起来，似乎是一种新颖而美妙的理想。在学者们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许多奥地利斯拉夫人希望看到一种更加明确的促进斯拉夫人团结的主张。结果于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压力的一种反击。341名代表6月间在欢欣鼓舞和满怀希望的气氛中举行会议：“蓝、白、红三色的新斯拉夫旗帜到处飘扬；‘斯拉瓦’（Slava）的欢呼声代替了通常的‘黑尔’（Heil）或‘维瓦’（Vivat）^[31]……斯洛伐克歌曲《斯洛伐克人万岁》成为斯拉夫民族永生的明确体现。”^[32]大会宣布成立一个斯拉夫代表团以便传播自由和启蒙思想，代表们还考虑向奥地利皇帝呈递请愿书，起草一个致斯拉夫世界的宣言，并呼吁欧洲各国安排一次解决国际争端的大会。整个插曲具有十分鲜明的1848年的特色。发起人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将是一系列代表会议的第一次；但这次大会在许多年中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布拉格的降灵节起义和随后而来的镇压使大会夭折。这次大会号称泛斯拉夫会议，但除了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以外，来自普属波兰的代表只有寥寥数人，来自俄国的只有两名。尽管作了许多善意和团结的表示，但是对于当时斯拉夫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的任何严重问题都没有达成协议。

实际上，斯拉夫世界陷入毫无希望的分裂。在宗教上有罗马天主教（如波兰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和俄国领导的东正教之间的分裂；在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和帝国外的斯拉夫人之间似乎有一条分界线；而帝国内部的斯拉夫人之间也有分裂。巴尔干各国中的情况也许可以除外，这些国家中人数较少的斯拉夫人整个说来对于俄国的扩张主义野心和专制制度都极不信任。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帝国内部，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与捷克民族主义相互冲突，罗塞尼亚人讨厌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宁愿取得自己的发展，而不愿合并到一个较大的南斯拉夫联盟中去。野心勃勃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梦想有一个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塞尔维亚或大克罗地亚。

但是，1848年的惨败并不意味着泛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已经消失。无论作为革命的理想——例如对于被流放的冒险家巴枯宁来说是这样，他认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由各个自由、平等的斯拉夫共和国结成的联盟是全面革命的必要条件——还是作为保守的理想——如对于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都是这样。尼古拉一世

死后，在知识分子享有较大自由的亚历山大二世朝代，关于俄国的使命问题，即俄国不仅是东正教的天然领袖，而且是各斯拉夫民族同胞的天然领袖的思想，在俄国越来越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于是，泛斯拉夫雄图的中心移到了俄国。在50年代，尤其是在60年代，早一代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消失，农民的解放，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都促使反对西方的斯拉夫战士们变成更加显露锋芒的唯物主义者 and 民族主义者。由于俄国在1830年以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就更容易理解了。正如汉斯·科恩所说的，“到了1860年，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觉得欧洲的文化是他们的遗产的一部分，俄国的精神生活正在全面发展，俄罗斯不但土地广阔，而且人口众多，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33]于是，1867年，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新的斯拉夫会议，这次是在莫斯科，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如卡特科夫（1818—1887年）领导的泛斯拉夫宣传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争取到许多有影响的信徒，甚至在皇族当中也是如此，就连1864年至1877年担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伊格纳季耶夫也成了他的一名强有力的拥护者。1867年的奥匈协议使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希望破灭，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便有希望赢得他们的同情；莫斯科代表大会引人注目地有84位奥匈代表参加，包括几名捷克人在内。不仅如此，泛斯拉夫主义者还下了特别的一注，愿意充当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保护者。但直到1870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对俄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实际的影响。

任何使所有斯拉夫人自愿在俄国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梦想都是不现实的，如果想证明这一点，波兰人就是例子。许多波兰人就像他们的诗人克拉辛斯基那样，把俄国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并且轻蔑地把俄国人叫作“亚洲佬”。1867年他们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波兰历史的进程，已经完全与欧洲发展的主流背道而驰，是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胜利史上最明显的例外。意大利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取得了胜利，而波兰到1870年似乎距离恢复民族独立更加遥远了。

被三个大国瓜分的波兰，由于1831年的大移民又重新分裂。大约有一万人逃往西欧，主要是逃往法国。尽管在波兰也和在匈牙利一样，贵族和缙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本民族的构成因素；但是包括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在内的移民们，也同样具有民族自豪感并准备为

波兰战斗和受苦受难。波兰人很快就分成两个主要集团：一个是贵族集团，他们后来以居住在巴黎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为首领；另一个是民主集团，以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莱威尔领导的短命的“民族委员会”“旅英波侨协会”和其他一些团体为代表。他们的社会目标很不相同，各自指望以不同的手段实现波兰的再生。尽管两个集团全都徒然地希望某个政府会允许成立一个波兰军团，但恰尔托雷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却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外交上，而民主派则像马志尼那样，主张搞秘密团体和发动新的起义。

他们的革命努力并不比恰尔托雷斯基的外交更为成功，只不过使他们国内同胞的命运变得更糟而已。1830年的叛乱一方面使俄属波兰在一个时期遭到镇压，同时也使普鲁士于1825年在波兹南大公国开始实行的德意志化政策加强了。1833年策动加利西亚反叛的尝试，同样加强了奥地利政府实行德意志化的趋势；而1846年的起义表明农民的大多数认为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要比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更加可贵；起义的结果是，波兰领土独立的残迹，即名义上自治的克拉科夫自由市不复存在，被并入哈布斯堡帝国。1848年起义的结局也相差无几。虽然波兰的事业在各种会议和各个战场上得到广泛的宣传，虽然波兰的流亡者在每一支革命军队或每一支民族军队中战斗，但宣传和战斗对波兰本身来说并无裨益。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讲过短暂时间的兄弟友谊之后发生的冲突使两个民族之间的鸿沟加深，从而导致在波兹南重新实行德意志化。同时，在加利西亚，由于类似的自治愿望而引起的骚乱，使克拉科夫和利沃夫遭受轰击，从而导致奥地利当局鼓励罗塞尼亚人日益增长的反波民族意识。此后，只是在俄属波兰还有起义发生，但在1848年并无动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深知叛乱是没有希望的，宁愿通过维护他们的民族文化，通过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而做到民族团结，并且指望法律和议会机构能够维护他们的权利（参见第20章）。

俄属波兰的发展趋势也类似。亚历山大二世新的和解政策在那里导致一次大赦，并且成立了一个农业协会和一个华沙医学科学院。维洛波尔斯基侯爵等稳健派认为通过与俄国政府的合作就可能改造波兰的失去平衡的社会，回到1815年的立宪体制，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使这个国家得到加强。但米罗斯拉夫斯基等移民，尽管1848年受到挫折，仍然不改初衷，主张举行起义。移民中的贵族派由于在1856年巴

黎会议上波兰问题未能得到大国的考虑而丧失信誉（参见第18章，原文第490页），起义派开始再次得势。现在他们为什么选择俄属波兰作为用武之地，是很有道理的。俄国政策的改变在那里唤起巨大的希望，并引起知识界的某种骚动。新的一代人已记不得1830—1831年的恐怖情景，米罗斯拉夫斯基的秘密人员和归国流放者讲述的故事，很容易把他们煽动起来。同时，意大利1859—1860年的起义引起许多波兰年轻人的梦想，效法加里波第的行为。对于这些狂热派来说，沙皇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与征服者合作是可耻的。但是，在1861年2月华沙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亚历山大批准了几项行政和教育改革的措施，并任命维洛波尔斯基监督执行。若不是波兰人毫不明智地提出归还1772年失去的东部边境地区的要求的话，这种和解政策本来是有可能暂时取得成功的。这种要求是俄国任何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俄国一般认为这些省是俄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沙皇的拒绝使局势恶化，1863年的征兵令触发了久而未发的起义。起义爆发时革命者之间却陷入分裂，政治上或军事上都缺乏统一的指挥。因此，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尽管民主党人对他们竭尽鼓动之能事，他们却漠然置之。

“只有在城市里，年轻的官员和官员的儿子们以及工匠阶层中间；在乡下的小乡绅中间才普遍存在着战争的热情。”^[34]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各大国四分五裂，不能站在波兰一边进行有效干涉，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继起义而来的是比1830年至1831年更加残酷的镇压。俄国政府重新实行俄罗斯化政策时，得到了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波兰“王国”变成了“维斯杜拉领地”。俄语成为行政管理中的官方语言，甚至在农村学校中也强制教俄语，禁止在宗教课中使用波兰语。与此同时，俄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其目的在于使波兰农民深信沙皇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迄至那时为止一直标榜的俄属波兰自治现在已无影无踪。人们的幻想在1863年彻底破灭后，新一代波兰人将效法他们在波兹南和加利西亚的同胞，专心致志于起义前已经取得人们赞同的“基本工作”计划。实行土地改革，结果从解放的农民中获得充分的劳动力；修筑铁路，使之能促进工业发展，夺得许多俄国的市场。

与波兰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的立陶宛人，同样在苦难之中。他们1830年以前所经历的那种文化复苏，除了意味着为争取实现自由波兰外，并不意味着最后争取民族独立。他们在1830年曾和波兰一道叛乱；1863年又有许多人响应了波兰人的号召。但他们自己也是分裂的。一个新的因素——民粹派出现了。他们一方面主张社会改革；另

一方面计划采取独立于华沙的行动。叛乱开始后，他们在维尔纳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管理立陶宛。反叛失败后，在穆拉维也夫残酷统治下，变本加厉地实行俄罗斯化。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一切立陶宛书籍。罗马天主教教区学校被关闭；大批“老信徒”迁入该国建立居民点，以加强俄国人的成分。叛乱的失败意味着给民族文化运动带来严重的挫折，虽说这个运动本来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对引起这次叛乱的爆发并未起任何作用。这次失败在乌克兰也有反响，虽然乌克兰人并未响应波兰人的呼吁，但俄国人却乘机扑灭一种可能包含着某些分离主义倾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并未出现新的大批人外迁的现象。以外逃为荣的时期已经过去。1830年的“大移民”在不止一代人以上的时间里产生了影响，但未取得任何具体收获。尽管如此，它在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因为它激起一种伟大而热情的民族主义文学。

“事实证明，拯救波兰的既不是那些政客和秘密人员，也不是大移民中的那些外交家们，而是诗人。”^[35]密茨凯维奇在他所著的《波兰民族及其朝圣者之书》（1832年）和其他散文诗或韵文诗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他的国家在各民族中起着救世主的作用，是人类自由事业的伟大殉道者。克拉辛斯基（1812—1859年）的激动人心的诗篇《黎明之前》（1843年）也是在这个主题启发下写出的。而斯沃瓦茨基（1809—1849年）则教导他的同胞说，他们必须为民族再生最后到来之日而高尚地就义。在流放中的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不太著名的作家才真正是陷入分裂的波兰的精神领袖。尽管有检查人员和海关官员的检查，他们的作品还是设法流传到本国并促成同胞精神上的团结，这种团结一致超越人为的界线，对统治他们的国家推行的德意志化和俄罗斯化政策进行反抗。

东欧第二个大国哈布斯堡帝国仍然充当维护各国王朝财产这一古老原则的大靠山和民族自决的大敌的角色。奥地利没有像法国或丹麦那样的民族主义。但是，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这四个在哈布斯堡帝国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大民族，强烈地自以为高人一等，而那些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民族则低人一等。这样表示出来的恶感，往往受到加倍的回敬。这种恶感在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情绪的增长而更为强烈。格里尔帕策在1830年写道：“匈牙利人仇恨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仇恨德意志人，而意大利人则仇恨所有这些

人。”^[36]在1848—1849年情况更加如此，使维也纳当局得以继续应用“分而治之”这句古老的格言，特别是在1848—1849年的大危机中，这次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帝国（参见第15章和第20章）。若不是发生了各从属种族的问题，哈布斯堡继续控制除匈牙利以外的军队，和俄国准备进行干涉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当时就会在四个主要民族之间垮台。因为不仅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要求独立，而且波兰人也迫切要求重建一个独立波兰的核心，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则强烈向往德奥合并，即并入一个大德意志。

哈布斯堡帝国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夹杂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城市如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种情况反映在政治性报刊的增加上，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报纸和卡列尔·哈夫利切克主办的《布拉格新闻》（1846年）和劳约什·科苏特的《佩斯报》（1841年）；表现在一些具有政治目的的社团的出现，如“捷克取消联合会”（沿用奥康纳在爱尔兰的组织名称）；此外表现为要求地方自治，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削减主要是封建贵族的特权，并让小乡绅和中产阶级分享一些权力。正是这种多少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激发了1848年3月主要在城市发生的革命，并造成了后来维也纳政府所面对而立宪要求浪潮。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的立宪事业不久就由于民族主义问题而遭到破坏。

梅特涅政府对于几乎影响到帝国的每个民族，引导各民族珍爱并发展自己的语言，歌颂自己的历史的文化复兴运动，一直采取高傲的冷漠态度，看来似乎矛盾的是，往往被简单地斥责为政治上反动时期的三四十年代，对于马扎尔人和许多奥地利斯拉夫人来说却是文艺、学术和语言发展的黄金时代。像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1849年）这样的诗人，像波希米亚的帕拉茨基（1798—1876年）这样的史学家，像路德维特·加伊（1809—1872年）这样的语言学家[他的《简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正字法》（1830年）为现代统一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们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引为自豪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活动在政治上产生的效果是增加了民族的自豪感、敏感性和排外性，激起了互相矛盾的权利要求。不过，捷克人与波兰人之间或波兰人与罗塞尼亚人之间的仇恨，则被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国界的更大的民族问题所掩盖，显得逊色了。一方面，在新兴的大

德意志和庞大的专制主义俄国这上下两扇磨盘之间有被粉碎的危险。另一方面，马扎尔人采取的毫不容忍的态度也是存在的一个祸患。

第一个危险，捷克人看得最清楚不过了，他们和波兹南的波兰人一样，不愿被一个大德意志吞并。波希米亚连同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已于1815年在没有考虑波希米亚议会的意见的情况下，被并入德意志邦联；但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只能加强捷克人的分离情绪。因此，1848年当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被邀请作为代表出席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时，他拒绝了，理由是，他是这样一个民族的成员，“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自己认为也没有被人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而且也因为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设法“破坏奥地利……而奥地利的存在、完整和巩固”不仅对于奥地利本国人民，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防御俄国扩张不可缺少的堡垒。^[37]他以及和他有同样想法的斯拉夫人所要求的是在奥地利帝国内部的平等，而不是脱离它，即奥地利帝国改变成为一个联邦（不一定要在严格的种族基础上进行）；在这个联邦中，斯拉夫人能发挥与其人数和能力相当的作用（参见第20章，原文第523—524页）。他们是奥地利斯拉夫人，他们对马扎尔人的敌视使他们更乐意支持曾经答应给予他们以更多的自治权利并进行改革的中央政府。

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的排外特点，实际上是维也纳能够最后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尽管匈牙利有古老的体制，但它从来没有充分形成一个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的国家。在1100万人口中，占统治地位的马扎尔人为数不过500万。斯洛伐克或其他非马扎尔族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如科苏特和裴多菲等可能已完全马扎尔化，但是，从绝大多数人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马扎尔贵族却未能同化主要由农民构成的非马扎尔臣民或使他们甘心接受他们的统治。在三四十年代，在各臣属民族以及马扎尔人自己中间民族主义同时发展起来，自然就使已经公开化的紧张局势加剧。例如1843—1844年的语言立法规定在公务和公共教育方面必须使用马扎尔语，这就使马扎尔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相互指责，并大大推进了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运动，即南斯拉夫的事业。

1848年春，变革有了希望。佩斯的一些年轻的民主党人得到了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同情，并且“认识到，只有把匈牙利的每个不同民族的特殊利益考虑进去，匈牙利宪法才行得通”。^[38]3月间匈牙利南方某些城镇的塞尔维亚人自发的起义，起初并不是专门针对马

扎尔人的；诺维萨德的塞尔维亚人主要关心的是废除封建主义，他们从那里派出了一个友好代表团前往佩斯。此外，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虽然抗议科洛日瓦尔议会（他们没有代表出席该议会）投票赞成与匈牙利联合的决定，但只要皇帝向他们保证新的匈牙利政府将会制定特别的立法保护他们的民族，设立罗马尼亚人学校并在所有的行政部门使用罗马尼亚语，他们就准备接受这个决定。只有长期享受一定程度自治权利的克罗地亚人从一开始就采取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

但是，科苏特和新掌权的人物并不喜欢各从属民族新兴的民族主义力量，也不理解它同自治的愿望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做个好的匈牙利人，就像阿尔萨斯人和布列塔尼人是好的法国人那样，满足于已经给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因此，当塞尔维亚的一个代表团要求自治时，就遭到了拒绝。结果，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起来反叛。这次叛乱得到东正教会的支持，他们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烈，终于导致在5月间成立了塞尔维亚国民议会。但是，科苏特和他的同僚们并未接受这个教训。8月，韦塞莱尼男爵徒劳地在匈牙利议会中吁请实施皇帝答应的罗马尼亚法令。科苏特谴责罗马尼亚人是反对匈牙利的主要阴谋策划者，坚决拒绝给予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斯洛伐克人以任何特殊地位，因为这将危害这个整体一致的国家 and 马扎尔人的统治地位。^[39]因此，从属民族不可避免地就站到维也纳一边反对布达佩斯。但是，这样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自治，因为维也纳一旦取得控制，就重新恢复了专制主义。1849年8月匈牙利人遭到失败后，一个单一体制的奥地利帝国的实验开始了，虽然对各民族在文化方面做了让步，但一个逐步德意志化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在特兰西瓦尼亚，甚至萨克森人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自治；罗马尼亚人等待实现皇帝1848年的许诺，也属徒劳。几年以后，俄国强烈抱怨奥地利忘恩负义；而这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这个帝国，不满的人们抱怨说，“支持政府的各个民族受罪，反对政府的反而受奖赏”。^[40]但是，在繁荣的50年代，许多不满由于在物质上受益而趋于缓和，而且，当帝国的命运因战争中的失败和财政上的困难再次受到危害时，匈牙利人顽强的民族主义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皇帝接受1867年的妥协，即奥匈协议。这样终于使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奥匈协议建立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联合统治，直到帝国的灭亡。

在东方大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弱的一个大国即奥斯曼帝国中，民族主义开始在三个方面活动：它激发巴尔干基督教徒摆脱穆斯林的枷锁，争取自由的新愿望；它领导他们反抗在宗教和世俗中进行的希腊化，这是法纳尔希腊人^[41]控制行政部门和宗教生活的结果；此外，像一切地方的从属民族一样，它带来文化生活的新生，过去历史的再发现，并使那些鲜为人知的巴尔干各民族彼此逐渐分化。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人数较少、物质力量单薄，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究竟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而且，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否肯定会避免落入土耳其的欧洲陆上邻邦俄国或奥地利的掌握之中。

希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历史到了30年代就已表明，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自治是实际可行的目的。但是，多瑙河两公国的历史却表明，在其他地方，这个目的可能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为自1821年以来虽然那里的罗马尼亚居民获准由本地人而不是由希腊人充当总督，但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却确定由俄国军事占领，一直持续到1834年，并确定为保护国，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为止。但是不论俄国的力量还是土耳其的力量都不能阻止民族意识的增长。早在1835年，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在谈到在一个外国君主统治下统一“整个民族的愿望”时，曾这样写道：“这个外国君主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希腊人。”^[42]由于罗马尼亚有钱的青年人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受教育，再加上当地的一些学术机构如1835年成立的雅西科学院的发展，上述愿望更加强了。不仅如此，1846年两个公国之间关税壁垒的废除，就像在德国（参见第19章）一样，乃是政治统一的经济前奏。但是，由于俄国曾伙同土耳其进行干涉，镇压1848年短命的自由主义的社会革命，俄国的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又重新占领了这些公国（参见第18章），所以这个目标只有在俄国被严重削弱后才得以实现。

俄国在那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但结果却反而削弱了土耳其；而维护土耳其不受俄国的侵犯曾经是西方大国的主要目标。这时，各大国对巴尔干各国的兴趣更直接了，于是类似集体保护的主张便取代了俄国自以为与它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应由它一国进行保护的主张（参见原文第488页）。罗马尼亚人的抱负有希望得到实现；门的内哥罗的独立得到确认；克里米亚战争加上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都鼓舞巴尔干其

他民族去实现解放自己、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及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等比较大胆的计划。

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自救和法国的支援是决定的因素。1848年以后，许多罗马尼亚的自由派重返法国。他们的民族事业在那里找到强大有力的支持者，如米什莱、基内、库辛，最后还有拿破仑三世本人。拿破仑很喜欢有机会表现他对民族事业真诚的同情，提高法国在近东的威望（参见第18章）。他的政府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大力兜售联盟的主张，尽管暂时未获成功，但法国的影响却促成一种联盟主义势力得以取胜的局面。1859年，两公国选出了同一个本地人君主亚历山大·库扎，而各大国由于正忙于迫在眉睫的法奥战争（见第17章），只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但本地的君主很少会使各方面全都满意；因此，1886年当各大国再次忙于它们当中的两个国家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时（参见第17章、第19章），罗马尼亚人又抓住了机会。他们迫使这时已不得人心的库扎退位，挑选了一位外国君主霍亨索伦家族的查理为他们的统治者。同时，他们的国民议会以“罗马尼亚”取代了“联合公国”的名称。大国又一次不得不屈从这个既成事实。虽然名义上土耳其仍拥有宗主权一直到1878年，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出现。这样一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1830—1831年就已明显的教训是正确的，即一个从属民族只有在某些大国的帮助下，才可以取得国家的地位。同时，像希腊一样，这个民族国家虽然应自成一国，却受别国的统辖。早在1843年，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后来是自由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之一）就在他的讲演中宣称，所有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地方都是他的国家。

到1870年，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的政治气候也已明显改变。1862年，英国把伊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帕默斯顿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群岛接近希腊而且他们属于同一种族、语言和宗教，因而是“自然的安排”。^[43]在塞尔维亚，人们渴望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奥布廉诺维奇家族的一位最聪明能干的君主米哈伊尔在1867年争取到土耳其驻军的撤出，从而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因而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指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与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盟，争取到保加利亚革命派承认他成为一个包括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大南斯拉夫联盟可能的统治者，他设想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结成大同盟，这是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奏。但是，伟

大的解放战争在19世纪并未成为事实，因为米哈伊尔于1868年被暗杀，他的继任者既没有他的才干，又缺乏他的胆识。然而，希腊人的动荡不安，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得寸进尺，似乎都证明那些认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继承者不会是奥地利和俄国，而是巴尔干各民族自己的人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保加利亚人的重新抬头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是一个农业民族，长期以来受希腊化影响的程度很深，以致直到研究斯洛伐克民族起源的学者韦涅林（1802—1839年，在敖德萨的墓志铭中把他说成是“保加利亚的唤醒者”）的作品发表以前，“甚至连最著名的学者……也很少懂得保加利亚语”。^[44]至于其他许多“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民族，比如早期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设立学校以及发展本民族语言教育方面。但它也表现在要求建立一个不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主教区管辖的民族教会上，当土耳其人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终于同意于1870年设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主教区后，就引起了希腊人的强烈敌意。与此同时，类似意大利的烧炭党、希腊的友谊社（Hetairia）或塞尔维亚的奥姆拉迪努（Omladinu）的秘密革命团体纷纷成立，布加勒斯特和诺维萨德成为保加利亚流亡者的大本营。他们梦想重新建立一个保加利亚或南斯拉夫联盟。但是很明显，一个大希腊和一个保加利亚这两种幻想是不能共容的。如果巴尔干各民族想成为土耳其的继承者，那么他们很可能要为争夺这个继承权而争吵不已。

最后，还必须提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近代历史中一直没有祖国，因此，它似乎没有什么权利要求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犹太人。他们在1830年有300多万人，到1870年约有700万人。^[45]按照居住地点，他们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欧洲民族，但在许多地方他们仍然为人鄙视，受到迫害。在这整个40年，他们的大多数——从2/3到3/4分别住在波兰说依地语的地区和俄国西部。比较起来，他们在每个西欧国家中的人数并不算多，但是在改善他们的命运中起着最强有力的作用的那些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原则正是产生于这些西欧国家。1869年以前他们全部被赶出西班牙；1866年以前常常被从瑞士的巴塞尔这样的州驱逐出境；在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在拿破仑倒台后，他们又被限制住在犹太区内，如在皮埃蒙特一直到1848年，在罗马在1870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由于1830—1870年俄国犹太

区的人口过于拥挤，因此他们在多瑙河两公国中的人数大为增加，从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在俄罗斯帝国，他们必须住在犹太区内，除充当工匠和经商外，不得从事任何其他职业。但是到了1830年，他们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如荷兰、法国和德意志各邦，都享有信教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在有些地方，犹太人家族如路特希尔德等，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这种解放在各有关的犹太社会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因为这导致他们的世俗化并被居住国中的其他公民同化，逐渐用本地语取代依地语（直到18世纪末，它一直是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的语言）。这一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改进犹太人教育的运动，引起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依地语是犹太人区别于他人以及保持犹太传统的防御工具；而且，在比较严格的犹太人看来，犹太儿童在国立学校中与非犹太儿童混杂在一起，用当地的语言采用非犹太人的方式传教，都是应被革除教门的大逆不道行为。被外族同化的过程，对外国的知识和传统的汲取，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古老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犹太人社会解体，但是，作为补偿，那些仍然忠实于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富有的已经解放了的犹太人，现在能够为他们那些不大幸运的同胞的利益进行干预或从事组织工作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1840年13名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指控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杀害了一名圣芳济会修士及其助手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和阿道夫·克雷米厄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设法使他们获释。不仅如此，摩西爵士接着又从土耳其政府那里获得一纸敕令，结束了土耳其境内犹太人毫无地位可言的状况，使他们和土耳其其他非穆斯林臣民处于平等地位。一位犹太作者写道：“自耶路撒冷陷落以来，这是各国以色列人第一次共同磋商并一致行动以防御共同的危害。潜在的民族意识公开表露出来，现代的新以色列业已诞生……在1840年以前，相当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东西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在民族方面只是不自觉的。”^[46]另一方面，设法使1858年被劫持的犹太儿童埃德加·莫塔拉从教皇政府获释一事未获成功，这就说明需要有维护犹太人利益的永久性团体。于是，仿照1760年即已成立的“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而成立的“美籍犹太人代表委员会”（1859—1878年）在美国出现。1860年在欧洲又成立了更为重要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宗旨是“为以色列人的解放和道义进步而在各地积极从事工作，并给予所有因身为以色列人而遭受苦难的人们以有效的援助”。到1870年，这些团体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尽管在罗马尼亚仍然受到迫害，但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包括俄国在内，犹太人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与此同时，有些犹太人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得到救济。犹太人移居美国的趋势意义重大，特别是在1848年及其以后从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前往美国的犹太人尤为众多。有的是因为参与了革命；有的是由于重新爆发了反犹太人运动而逃亡，或者受到1848年4月在布拉格发起的“到美国去”的运动的鼓舞；有的则是因为对旧世界感到失望，并对之厌倦；还有的是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诱惑。在巴勒斯坦也为他们安排了几个聚居地，有些作家和协会，特别是英国的，也提出了各种方案，极力主张犹太民族返回到圣经上所说的他们的家园；相形之下，这些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们对于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从1830年至1870年民族主义得到巨大发展。它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加速了学术进步，并造就了一些英雄人物。不论在促成统一方面或制造分裂方面，它都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它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建设和巩固方面都带来巨大成就；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对基本上是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构成了一种威胁。欧洲文化由于一些默默无闻或被人遗忘的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出新的作品而得到丰富，但与此同时，以前存在的那种统一局面因此而受到分裂的危害。此外，由民族主义造成的各种对抗不仅引发了战争、造成骚乱和当地人们之间的仇恨——它们还与一个名义上都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形成或加深了精神上的鸿沟。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原则所鼓舞的世界主义运动，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自我孤立以及亲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派的突然转而反对西方而受到挫折；而由于农民获得解放，加上实行普选而使民族主义者得以在推动他们的事业中操纵民众，上面新出现的裂缝就进一步加深了。对一些浪漫主义者来说，1848年以前各解放了的民族形成一个真正兄弟友谊的世界共和国似乎已不是异想天开的美梦。然而，尽管各类和平团体纷纷出现，国际社会主义日益发展，国际合作已取得实际成效（如红十字运动），但1848年以后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却使这样的目标成了遥遥无期的事。俾斯麦和加富尔表明“现实政治”所能达到的效果和要求统治及扩张的主张随着民族主义本身愈加具有排他性、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势力显示出其力量而变得更加强烈。民族主义和争取民族地位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它们很有希望成为未来国家的基础和动力，但是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像阿克顿那样对它们感到忧虑不安，

认为民族理论是历史的倒退的人非止一人。蒲鲁东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态的发展，认为它严重妨碍了社会的进步；被科恩称之为“少数充分珍视个人权利和西方自由的俄国人之一”的赫尔岑谴责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促进全球自由的主要障碍；而敏锐的比利时政论家埃米尔·德·拉维莱耶则宣称，它使他满怀忧虑，有时感到痛苦：“它嘲弄条约，践踏历史权利，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扰乱一切局势……到明天也许将发动不义的战争。”^[47]

（陈厚珩 译）

[1] 《政治学与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巴黎，1866年），第75页注，引自G. 韦伊《19世纪的欧洲和民族观念》（巴黎，1938年），第6页。

[2] G. 韦伊《19世纪的欧洲和民族观念》（巴黎，1938年），第6页。

[3] 《瑞士的民族主义问题》，《洛氏爱丁堡杂志》，1847年5月号。

[4] 《代议制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经典著作”版，1924年），第384页。

[5] 《自由的历史以及其他论文》（伦敦，1922年），第273页。

[6] 《雨果全集，诗集》（《秋叶》），第2卷（巴黎，1880年），第239—240页。

[7] 引自E. H. 卡尔《浪漫的流放者》（企鹅丛书，1949年），第32页。

[8] 1853年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游行示威规模太小，无法在此详述。欲知详情，可参阅雷金纳德·库普兰爵士《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民族主义研究》（伦敦，1954年）。

[9] 引自丹尼斯·格温《青年爱尔兰与1848年》，第112页。

[10] 托马斯·F. 马尔致加万·达菲，引自丹尼斯·格温《青年爱尔兰与1848年》，第152页。

[11] 托马斯·F. 马尔致加万·达菲，引自丹尼斯·格温《青年爱尔兰与1848年》，第466页。

[12] C. 哈伦多夫、A. 舒克：《瑞典史》（L. 亚普夫人译本，伦敦，1929年），第377页。

[13] 参见本卷第4章，原文第81页。

[14] 《一个时代的开端：1848年》中J. 霍尔珀林的话（F. 费日多编，伦敦，1948年），第61页。

- [15] E. 邦儒尔、H. S. 奥弗勒、G. R. 波特合著：《瑞士简史》（牛津，1952年），第267页。
- [16] E. 邦儒尔、H. S. 奥弗勒、G. R. 波特：《瑞士简史》（牛津，1952年），第274页。
- [17] 《马志尼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第3卷（伊莫拉，1907年），第64页。
- [18] 《马志尼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第69卷（伊莫拉，1955年），第61—62页。
- [19] 汉斯·科恩：《先知与人民》（纽约，1952年），第82页。
- [20] 《马志尼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第4卷（伊莫拉，1908年），第9、11页。
- [21] D. 佩托埃洛：《意大利文明概要》（伦敦，1932年），第419—420页。
- [22] G. 巴尔萨莫-克里韦利编：《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第3卷（都灵，1946年），第291页。
- [23] C. 维达尔：《法国与1848年的意大利问题》，《近现代历史研究》，第2卷（1948年），第169页。
- [24] 例如，《观察家报》（1832年），第488页，第1栏。
- [25] 《霍恩洛厄·席灵斯菲斯特亲王克洛德维希回忆录》（F. 库齐乌斯编，G. W. 克里斯托尔译，伦敦，1906年），第1卷，第41页。
- [26] E. 基内：《德国与意大利》（1842年12月），《全集》，第6卷（巴黎，1857年），第233页。
- [27]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桑普森·S. 劳埃德译，伦敦，1904年），第143页。
- [28] 《霍恩洛厄·席灵斯菲斯特亲王克洛德维希回忆录》，第1卷，第52—53页。
- [29] R. 维特拉姆：《波罗的海国家历史》（慕尼黑，1954年），第199页。
- [30] E. H. 卡尔：《俄国历史的主题：“俄国与欧洲”》，《献给刘易士·纳米尔爵士的论文集》（R. 佩尔斯和A. J. P. 泰勒合编，伦敦，1956年），第371页。
- [31] 斯拉夫语、德语和拉丁语欢呼“万岁”的声音。——译者
- [32] 汉斯·科恩：《泛斯拉夫主义：它的历史和思想》（鹿特丹，1953年），第71页。
- [33] 汉斯·科恩：《泛斯拉夫主义：它的历史和思想》（鹿特丹，1953年），第130页。
- [34] 《剑桥波兰史（1697—1935年）》（剑桥，1941年），第378页。

- [35] 《剑桥波兰史（1697—1935年）》（剑桥，1941年），第320页。
- [36] 引自奥斯卡·雅齐《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芝加哥，1920年），第11页。
- [37] 引自汉斯·科恩《泛斯拉夫主义，它的历史和思想》，第6页。
- [38] F. 费托编：《一个时代的开始：1848年》，第322页。
- [39] 但是，他最初曾准备考虑克罗地亚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甚至曾考虑和他们讨论他们最后脱离的问题。
- [40] 引自吕措伯爵《波希米亚史略》（伦敦，人人丛书版，1920年），第348页。
- [41] 指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的法纳尔区的主要家族成员，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上居于控制地位。——译者
- [42] 引自R. W. 塞顿-沃森《罗马尼亚史》（剑桥，1934年），第213页。
- [43] 帕默斯顿1862年12月8日致维多利亚女王信，引自E. 普雷维拉基斯《英国对希腊王朝改变所采取的政策》（雅典，1953年），第86页。
- [44] R. W. 塞顿-沃森：《巴尔干半岛民族的兴起》（伦敦，1917年），第81页。
- [45] 这些数字引自A. 鲁平《近代世界中的犹太人》（伦敦，1934年），第xvii页。
- [46] J. 雅各布斯：《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与美国的犹太人》，《美国犹太历史学会会刊》，第10期（1902年），第120页。
- [47] 《两个世界评论》，1866年8月1日。

第十章 联盟体系与力量均势

1830年革命的结果是欧洲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外交集团，紧接在1830年起义之后的那些年头，在欧洲多数问题上，东欧国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一起反对英国和法国。正如帕默斯顿在1836年所指出的，这种分裂“不是言辞上的，而是行动上的，不是空想或意志的结果，而是由环境的力量所产生。三国一方和两国一方想法各不相同，因而它们的行动也互异”。^[1]

分歧大都在于政治原则和方法的问题。东方这几个王朝出于对专制政府的共同信念和对1789年和1793年革命原则复活共同恐惧而结合在一起。它们对欧洲的组织采取一种完全僵化的观点，认为必须抵制欧洲大陆或欧洲大陆各成员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以免整个结构土崩瓦解。此外，它们认为一切争取宪政改革的运动或各从属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运动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自称它们有权干涉欧洲较小国家的国内事务，以便在这些异端邪说尚未传播之前就予以扑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主张自由和立宪政体，反对东欧那些反动政府提出的干涉理论，而且任何时候只要力所能及，它们就鼓励和保护其他立宪政权。

然而，如果认为这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是各自内部团结一致、彼此相互排斥的联盟，那就错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从1830年的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间的年代总起来看，那么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不计较它们之间的思想分歧和注意它们之间的分歧的情况同样经常发生。例如，帕默斯顿勋爵把同法国合作当作他的政策的“轴心”^[2]，然而，当这位政治家认为法国人采取行动的方式损害英国的利益或者危及欧洲平时，他便同东方国家缔结协定而毫不内疚；而在法国方面，路易·菲利普在他的政权一旦巩固建立起来后，他就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愿望，寻求与东方国家和解，甚至不惜牺牲他同英国的协约关系。几乎和这一模一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出于对俄国沙皇尼古拉近东政策的恐惧，有时不得不同英国讨论遏制尼古拉的办法；而沙皇由于对他的普鲁士盟友在波罗的海的野心勃勃感到不满，随时准备

同英国合作以挫败这种野心。总之，尽管列强之间存在思想分歧，在欧洲体系中仍然有足够的行动自由，一旦发生新问题，便可改变外交上的结盟关系；1830—1854年之所以成为和平时期，而且1815年在维也纳建立的在领土方面的力量均势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年得到维持，这一点并非是不重要的原因。

1830年在比利时各省的革命所引起的这个时期第一次严重的外交危机，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联盟体系的这种灵活变化。这次争端是在东方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之间势不两立的气氛中开始的，最后经过多次立场改变，由五个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而得到解决。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19世纪欧洲协作精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

比利时各省居民对于被迫与荷兰联盟一向不满，1830年8月，这种长期郁积的愤恨终于爆发：先是布鲁塞尔突然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发生革命骚乱；9月26日成立临时政府；10月份第一周临时政府开始研究独立宣言的各种草案。这些事件显然违反了1815年的各项条约，因为这些条约规定成立低地国家的永久性联盟，并且声称由于有必要建立屏障防止法国未来的侵略，这个决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这些事件就不能不成为列强关心的一个问题。荷兰国王信心十足地期待着东方国家至少会站在他这一方面来加以干预；而且据信俄国沙皇也急于进行干预。在维也纳，梅特涅也认为，要防止“整个欧洲沉沦”^[3]，干预是唯一的办法；而在柏林，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表现出了他通常在危机时刻背信弃义的毛病，但他的军队看来已准备行动，并且实际上已同俄国人举行参谋人员的谈判。

西方国家面临这种威胁，以令人赞叹的速度采取行动，9月下半月，老练的塔列兰作为法国新任大使到达伦敦。他第一次同英王与威灵顿公爵谈话就警告说：东方国家的军队如干涉低地国家将会立即遭到反击，只有强硬坚持不干涉政策才可以防止战争。威灵顿同意他的意见，并立即通告其他国家的宫廷，敦促他们不要采取行动，等待五国代表在伦敦就比利时各省前途举行友好会谈。

东方国家勉强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这大概只是因为梅特涅和他在圣彼得堡的对手涅谢尔罗迭认为有可能在讨论中说服威灵顿同东方国家一道恢复荷兰国王的权力。然而，他们要与之打交道的不是威灵顿。还没有等到伦敦会议认真讨论低地国家的难题，威灵顿政府便

已倒台；新成立的格雷内阁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成为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

一般认为，新的外交大臣渴望使比利时各省脱离荷兰，以便消除荷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威胁。^[4]事实上，帕默斯顿在私下对比利时反叛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低地国家继续维持联盟“对欧洲总的利益最为有利”^[5]。然而，他又十分现实，认为独立运动已经走得很远，无法逆转；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并不愿意看到另外一个大国的军队进入对他的国家一直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地区。于是他热心地和法国人联合在一起，坚持所有国家都遵守不干涉的原则，同时敦促各国接受比利时独立的事实，条件是尽可能弥补1815年体制的裂缝。

俄国的波兰人突然在11月起义，反抗他们的宗主国（参见第14章，原文第362页），这帮了帕默斯顿这方面的忙，这个事件牵制了俄国的军力，使梅特涅和普鲁士人把注意力转到他们自己的波兰省份的局势上去，使这三个国家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和平解决办法。到12月20日，帕默斯顿终于使参加会议的所有国家都同意比利时独立。然而，这一胜利仅仅消除了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个新国家必须拥有明确的疆界，还要有一个统治者；还得决定如何设置所谓的屏障堡垒；并且必须说服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接受会议的决定。除此之外，由于来自东方的威胁变得不是那么严重了，法国人的态度也就变得不再那么讲理了。塔列兰这时争辩说，路易·菲利普表现了令人赞叹的克制态度，如果不给他一些补偿，法国舆论就会不满意；巴黎政府开始施展手法，用以表明他们希望要一个屈从法国利益的比利时统治者。

帕默斯顿被法国方面看来不守信用的行动所激怒，于是断然采取威胁恫吓的手段，这种反应正如他后来在同巴黎打交道的许多场合的反应一样。他坚决拒绝塔列兰的要求，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同东方国家结成共同战线，这使法国全权代表相信必须退却；1831年1月20日，塔列兰和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一道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划定比利时同荷兰的边界，确定比利时为受到各国永久保证的中立国，从而成为对法国和其他签字国来说都同样表现出自我克制的一个文件。但是法国政府迟迟不肯批准这一议定书，不仅如此，它还卷入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想使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内穆尔公爵取得比利时王位。这种两面政策更加激怒了帕默斯顿，使他直率地表示：英国已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制止比利时任何一部分落入法国人手中而不惜一战。他在当时写的一封信中说，英国所处的地位是“以法国为一方和以其他三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不偏不倚的调解人……只要双方保持安静无事，我们将成为双方的朋友；但是……如任何一方破坏和平，这一方就会发现我们是反对他们的”。^[6]

这些告诫看来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随着温和的卡齐米尔·佩里埃政府在巴黎上台，英法政策的协调也大体恢复了；而在比利时国民议会选举萨克斯-科堡的莱奥波德为未来的统治者之后，两国终于说服与会的其他国家同意向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提出一项明确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法国政策的模棱两可尚未终结。当荷兰国王派遣军队在8月份进入比利时，会议授权英法进行干涉将他们驱逐，而法军在他们的任务完成后拒不撤离比利时；英国外交大臣不得不再次采用威胁手段，预先警告说：“法国人必须撤出比利时，否则我们将有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7]法国于是又一次让步。本来它可以强迫比利时人拆除某些屏障堡垒，甚至连这也放弃了。而且这是法国人最后一次抵抗，在1831年11月15日，他们同其他国家一道参加了接受比利时为欧洲国家体系成员的著名条约。这一文件的批准直到1832年5月才完成，而荷兰国王则在1839年4月以前一直不同意失去比利时。他之所以能长期抗拒是因为东方各国宫廷拒绝参加对他采取强制性措施。尽管1832年12月英法军队炮轰安特卫普要塞，迫使荷兰人把这个据点交给比利时国王，因而激起了一阵愤怒，但是到1831年年底，比利时争端就早已不再成为一个外交问题了。

在这次危机中，战争之所以能成功地避免，首先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决心合作，而且英国协约在1830和1831年的谈判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这个协约尽管有时中断，却一直存在到1848年革命前夕。与此同时，帕默斯顿经常向巴黎提出的警告，也明显说明这个协约的局限性；对于七月王朝来说，不幸的是在10年以后的另一次危机中，它的那些政治家忘记了帕默斯顿在比利时争端中的做法。至于东方各国，它们十分清楚，低地国家的分裂，使阻挡法国的屏障遭到危险的削弱。然而，它们受到各自边界地区纠纷的牵制，无法用行动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因而最终决定：与英国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比起由西方国家单方面强加一项解决办法更为可取。由于帕默斯顿经常拒绝承认党派或民族的目标，并有本领把各种会议的决定

都描绘成是“为达致欧洲的目的和维护和平与均势”而采取的行动^[8]，也许才使东方各国遇到的这种不得不违心地予以应付的局势有所缓和。

然而，东方各国采取这种默认的态度，无疑也受到英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和波兰事务上表现的克制态度的影响。继1831年帕尔马、摩德纳和罗马涅的起义^[9]之后接踵而来的意大利动乱中，在议会中有许多情绪激昂的演说，在巴黎也有不少措辞不慎的部长声明；但是，卡齐米尔·佩里埃政府最终还是决定：支持革命是不明智的，而鉴于梅特涅决心恢复意大利半岛的秩序，坚持不干涉原则是危险的。法国人的这种谨慎从事的政策，得到英国政府的鼓励；于是梅特涅得以贯彻他的警察行动而未遭到激烈反对。与此类似，在波兰问题上，尽管路易·菲利普认为有可能在沙皇和反叛者之间进行调解，但是为帕默斯顿所劝阻；帕默斯顿采取维护1815年条约的立场，对波兰的事业仅仅给予形式上的同情，并且由于他“在波兰发生斗争期间对俄国非常忠诚的做法”^[10]而赢得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夫人的称赞。西方各国小心翼翼的行为起了缓和欧洲两大集团之间的潜在敌视的作用；而且令人感兴趣的是，1831年10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大使级会议，居然能够达成一项议定书，其中建议全面裁减欧洲军备，并且以冠冕堂皇的词句大谈“各国之间愉快地恢复了一致”^[11]。

然而，这种和解的迹象被人们引入歧途，在1832年至1833年间，东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明显加深了。沙皇采取措施惩罚波兰人（参见第19章和第14章），激怒了西方的舆论；梅特涅鼓励德意志各邦诸侯镇压政治鼓动也造成同样的结果。同时，法国在1832年派遣一支观察部队到意大利的安科纳，引起梅特涅对法国希图进行扩张的严重猜疑。但是，使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最重要因素大概是近东事件的发展变化（参见第16章，原文第428页）。

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很久以来就希望把他的控制扩展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他在1831年下半年制造了一起与黎巴嫩帕夏的争端，并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包围阿克。马哈茂德二世苏丹试图对这一争端进行裁决，没有成功，于是宣告穆罕默德是叛乱者，并且发兵去镇压他。然而，随后在1832年整整延续了一年的战争

中，他的部队连续遭到惨败；到12月埃及人大有踏平整整个小亚细亚和直取君士坦丁堡之势。

埃及的进展引起与地中海东部有利害关系的一切国家的关心；奥地利政府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必须予以镇压的叛乱者，力图促成各国采取集体行动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然而，梅特涅在这方面的尝试在巴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法国政府与穆罕默德有着亲密的关系，更愿意在苏丹与其藩属之间进行调解而不愿采取任何强制行动；梅特涅的尝试在伦敦虽受到较热情的欢迎，但是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效果，帕默斯顿在他一生事业的这个阶段，对于采取何种政策最有利于推进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尚未作出决定；他倾向于认为集体行动是可取的，但是希望伦敦而不是维也纳成为列强会谈的中心，这样一个条件是梅特涅所无法接受的，他一直渴望使维也纳重新成为欧洲外交的首都。[\[12\]](#)

正当维也纳和伦敦进行毫无结果的讨论时，苏丹走投无路，转向俄国寻求援助；1833年2月，俄国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俄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碇泊，使西方国家大吃一惊。俄国这次干涉对于交战双方在5月达成和平起了决定作用，和平的条件是让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叙利亚、阿达纳和塔尔苏斯。但是俄国的行动还有一项甚至更令人震惊的结果。在沙皇军队撤退之前，土耳其和俄国于1833年7月8日在洪基尔—斯凯莱西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这个文件一方面确认两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同时宣告俄国和土耳其在8年内相互承担义务，一旦遭到外界侵略，互相保卫两国领土。然而，根据一个单独的条款，土耳其如果在战时对武装船只封闭达达尼尔海峡，“不让任何外国船只以任何借口进入海峡”，那么它就无须履行向俄国提供海军和陆军援助的义务。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在欧洲引起轰动，因为看来它使俄国在土耳其政府那里得到一种优惠地位，在伦敦，帕默斯顿公开声称藐视这个文件，但是，他同法国联合起来企图阻止条约批准的努力虽然气势汹汹可是毫无结果，毫无疑问，他害怕这项条约会使土耳其成为俄国的一个卫星国，或者促使土耳其迅速分裂。同时，他对梅特涅强烈不满，骂他暗中参与沙皇的密谋，欺骗英国政府。这可能不公平，因为证据似乎表明，这一条约使维也纳也感到惊讶不快。[\[13\]](#)但是，西方对奥地利和俄国政策的疑虑现在完全被激发起来，1833年9月尼古拉与

弗兰茨皇帝和梅特涅在明亨格列兹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沙皇显然力图就他在近东的意图向奥地利人再次作出保证，但会谈也涉及其他问题。在会谈结束之前，这些东方伙伴一致同意将来采取镇压措施对付波兰人和德国自由派，他们还结成正式联盟，承认任何国君都有权在受到革命的威胁时要求东方国家予以援助。这一宣告似乎成了对自由主义的西方发动新攻势的先声，于是英国和法国政府一致表示反对。

它们在伊比利亚半岛找到一个进行有效反击的机会。在此没有必要深入叙述伊比利亚国家复杂的政治局势；但是可以简要指出：自1831年以来，英国和法国对葡萄牙年轻的女王玛丽亚重新夺回王位的努力，一直给予鼓励，并暗地给予军事援助。玛丽亚的王位是1828年被她的叔父唐·米格尔夺去的。1833年7月，大约在俄国人正谈判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同时，在一位英国海军上将指挥下的葡萄牙舰队俘获了米格尔海军的大部，几个星期以后，玛丽亚的军队进入里斯本，推翻了米格尔。在这些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去世，把王位传给他年幼的女儿，由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任摄政。然而，费迪南德的兄弟唐·卡洛斯立刻表示异议，他举起反叛的旗帜，并且与葡萄牙王位觊觎者唐·米格尔联合。因为佩德罗和米格尔两人的反动观点都丝毫未改变，并且因为他们都得到梅特涅的同情，于是这两位年轻的女王在群众心目中自然就与自由主义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尽管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没有什么东西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英法两国政府正如对葡萄牙女王一样，也对西班牙女王张开保护伞；而且帕默斯顿决定以这一深得人心的事业为基础，作出一种外交姿态，目的在于回答和蔑视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和明亨格列兹声明。由于帕默斯顿的倡议，英法在1834年4月把它们同两位女王的谅解转变成四国同盟，引人注目地表明西方国家阻止在伊比利亚半岛实现梅特涅的干涉理论的意图。帕默斯顿夸口说，这将“强有力地抵销东方的神圣同盟”，因为“西方四个立宪国家组成的一个正式联盟在欧洲所起的道义上的影响绝不是无足轻重的”。[\[14\]](#)

这一联盟确实发生了很好的影响，阻止了其他国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活动，而且尽管骚乱和内战还延续了几年，这两位女王的事业终于取得了胜利。四国同盟似乎也确定了从1830年开始变得明显起来的欧洲固定地分裂为东方与西方。然而作为这一时期外交结盟特

点的变动无常实际上还是继续存在。例如，英法协约远没有四国同盟的热烈支持者设想的那样亲密。的确，签订四国同盟还不到一个月，路易·菲利普就同梅特涅的亲信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密谈，并且暗示，他是勉强参加四国同盟的，而且他更愿意与奥地利达成一项永久性的安排。

法国国王的这种做法在以后五年内还时时重复，尽管他从来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鼓励，但是由于他本人日趋保守，以及他渴望欧洲大陆各王室对他平等相待，这种做法无疑得以一直继续下去。但是路易·菲利普并不是唯一越来越不喜欢英法协约的人。这个协约的根本弱点，正如雷蒙·居约在《第一次英法协约》中所指出的，是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共同的经济利益。法国工业家对英国竞争的威胁极为愤慨，要求采取关税措施，而海峡彼岸则对此表示惊愕和愤怒。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利益在希腊和西班牙以及在非洲和太平洋更加遥远的市场上都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些情况无疑影响了两国的官方关系。帕默斯顿在1837年抱怨说，法国的主要动机是“嫉妒英国商业繁荣，想制止这种繁荣的发展”^[15]；第二年，两国的关税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时，英国驻巴黎大使警告法国政府说：“如果两国不能用商业的纽带直接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们在政治上的团结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16]英国外交大臣仍然认为同法国结盟在政治上有好处，并提醒英国驻外使节：“对我们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不仅是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且要向全欧洲表明这种姿态”^[17]；但是他既意识到存在各种使两国分离的力量，也意识到法国国王所玩弄的策略，而且了解，他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改变他对东方各国的态度。

英法协约的这种分裂倾向——以及东方各国首都对这种倾向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到的事实——对各国在1839年和1840年的近东危机中的结盟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次事件同早先1833年的事件一样，起源于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他明确地认为，他在1833年同苏丹解决问题，只不过是一次停战协定，他在1838年5月还告诉在亚历山大的一些领事，他打算宣布独立。而在马哈茂德苏丹这一方面，则急于想解决同穆罕默德的宿怨，而事实上是马哈茂德在1839年4月主动挑起敌对行动的。然而，苏丹的军队在这一次新的战役中也并不比以前更顺利。6月份马哈茂德军队的精华在奈兹布溃败，7月份他的整个舰队投

敌；到年底，穆罕默德·阿里看来又一次处于可以对奥斯曼帝国为所欲为的地位。

远在达到这一危险阶段之前，列强就已经开始行动。例如在伦敦，帕默斯顿这次一反前次危机中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1833—1839年之间，汽轮在红海和幼发拉底河试航成功，这在英国人眼里大大提高了通往印度陆路的重要性，这件事加强了帕默斯顿的决心：决不能让俄国或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红海和幼发拉底河，他开始越来越把穆罕默德·阿里看法国的代理人了。由于敌对行动即将爆发，他就希望安排一次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不仅制止埃及帕夏，而且以对土耳其的完整作出全面保证，来代替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在1838年春末和整个夏季，他一直努力说服其他国家，在侵略行动开始之前有必要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奥地利和法国似乎都愿意合作，但是帕默斯顿没有从圣彼得堡得到任何鼓舞。他采取他一贯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办法，频频向俄国首都发出照会，其中一次甚至警告说：“欧洲决不会容忍任何一国用自行其是和独断专行的干涉来解决问题”，明确提示英国将抵制根据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采取的片面行动。英国大使报告说，在他向涅谢尔罗迭宣读了这一照会后，这位大臣答复说，俄国把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看成是一个负担而非其他。^[18]然而，俄国在整个1838年对所有关于采取“事前的一致行动”的建议一直没有任何反响。^[19]

一旦战斗开始，梅特涅就夺得了主动，他看到这又是一个把“欧洲协同体”拉到维也纳的机会。1839年5月，他开始同驻维也纳的四国大使会谈，成立了一个事实上是召开一次讨论东方危机续会的机构。正是这一机构，在苏丹的部队6月和7月遭到惨败之后，发出指示，后来根据这些指示草拟了著名的7月27日集体照会，由五国代表在君士坦丁堡递交给苏丹，通知他，五国正在准备干预，并敦促他在五国没有宣布它们的意图之前，不要对穆罕默德·阿里作出任何让步。在土耳其政府由于军事上惨败和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逝世而受到震动之际，梅特涅的果断行动无疑促使它振作起来，鼓励它继续抵抗。但是，梅特涅的行动也促使沙皇方面采取一个出乎意料的行动。因为在8月初，尼古拉宣布，集体行动方针是在并未得到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制定的，他虽然接受这一方针，但断然反对把维也纳作为将来讨论东方问题的中心的建议。这一消息，以及沙皇对于奥地利参与在他看来是一次反俄表

现的行动而感到的明显愤怒，使梅特涅大失所望，精神似乎完全崩溃，于是隐退到自己的庄园去了。

然而，尼古拉并不想在近东单独行动。英国在前一年提出的警告给了他深刻印象，他懂得，他要是单独采取行动可能会引起同英国的一场战争。此外，正如涅谢尔罗迭说过的那样，他已经把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当作一种负担，并且认为，土耳其人如果确信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他们是会取消它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准备放弃它，而同意仍能保证封闭对俄国利益有巨大好处的海峡的任何安排。最后，沙皇看出这是一个离间英法，孤立他一贯认为是孕育欧洲革命和反叛的主要温床的那个国家的机会。于是他在1839年9月派遣他最能干的外交官之一布伦诺夫男爵前往伦敦，说服帕默斯顿相信俄国愿意进行合作，找出办法制止穆罕默德·阿里，并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

在帕默斯顿看来，俄国愿意放弃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胜过其他任何考虑；他和这位俄国使节没有什么困难就拟订了一个解决近东问题的方案；规定采取强制性行动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放弃他取得的大部分东西，并规定一旦战争结束就签订一项国际协定，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当帕默斯顿和布伦诺夫临近达成协议时，奥地利和普鲁士驻伦敦使节也得到参加会谈的权利，并表明他们的政府将支持已经达成的条件。同时，帕默斯顿也忠实地把会谈的要旨通知法国大使，希望在各拟议进行的干涉中得到法国的合作。

然而，他这方面的希望未能实现。法国舆论欢呼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胜利，不论是苏尔特政府还是在1840年3月继任的梯也尔政府，都不愿拂逆群众的情绪，剥夺埃及帕夏的胜利果实。而且，梯也尔拒不相信其他国家能够团结一致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对付穆罕默德，他受到英国亲法分子——其中有些人接近内阁——的鼓励，认为英国决不会抛弃法国，因此，他抵制英国外交部的一切建议。

列强之间的会谈和英国内阁的辩论，在1840年前半年一直继续进行。然而，帕默斯顿此时已下定决心：如果法国不肯合作，那么“为了英国的利益，为了维持力量均势和维护欧洲和平”，其他国家撇开法国而行动实属重要。他争辩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这样行动，俄国就会重新坚持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其结果是“土耳其实际上分裂

为两个单独的国家，一个是法国的附属国，另一个是俄国的卫星国，我们在这两个部分的政治影响将一笔勾销，我们的商业利益将遭到牺牲”^[20]。外交大臣明确告诉他的阁僚：除非采纳他的意见，否则他就要辞职，这件事肯定会使辉格党政府倒台。最后他的意见通过了，1840年7月15日，他同东方国家的代表签订了四国协定。

根据帕默斯顿和布伦诺夫已达成协议的条件缔结的这一协定，是近东危机决定性的转折点；四国如何执行协定以及如何迫使穆罕默德·阿里退回他的埃及领土，这里无须赘述。然而，应该指出，在协定签订后的三个月，欧洲和平千钧一发，因为巴黎的舆论由于法国遭到孤立而义愤填膺，人们愤怒地谈论要对英国作战，并且——没有道理地——要求打过莱茵河去。梯也尔不愿正视事实，改变站不住脚的立场；帕默斯顿对自己以前的盟友的这种强烈反应又无动于衷^[21]；而苏丹则想利用各国的支持彻底打垮穆罕默德·阿里，强迫他退位，这一切使得当时的局势更加严重。然而，梯也尔政府在10月份倒台，加之梅特涅采取了某些高明的外交手段，迫使苏丹手下几个态度比较顽固的顾问去职，终于使紧张局势缓和，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打开了途径，它使苏丹收回了他在1833年失去的东西，同时使穆罕默德·阿里保住了他在埃及的地位。

在危机完全消除之前，个别国家还曾施展过一些谋略，这使人们看到19世纪的前半叶欧洲联盟体系性质的某些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例如在1840年年底，尼古拉一世问英国大使，英国是否会“反对以某种行动书面商定和建立……愉快地存在于四国之间的联盟，作为一种安全保障，以反对法国可能用以唤起欧洲革命情绪的任何努力，或反对也许会发生的一次革命战争”^[22]。像这样提出用书面或口头协议把孤立法国的做法正式肯定下来，是令人为难的，帕默斯顿急忙拒绝了。他的做法是发出一封彬彬有礼的函件，强调英国打算继续“密切注视和尽心维护力量均势”，声称“一国企图占领属于他国的领土”会“破坏现存的均势”，与此同时他解释说，宪法方面的困难使英国政府无法参与“关于尚未实际发生的情况的约定”。^[23]

正当双方交换信件时，梅特涅与沙皇进行着目的正好与此相反的活动，注意到这一点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这位奥地利首相对于1840年7月的协定从未完全满意，他似乎怀疑帕默斯顿和沙皇都希望同法国开

战。梅特涅的传记作者写道：为了防止这场战争，“他决心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就退出七月协议，把普鲁士也一道拉出来，同法国缔结单独的协定”。^[24]虽然梅特涅并未被迫走到那种地步；但是在危机发生的那几个月里，他利用他在伦敦和巴黎以及在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影响，促成温和的解决办法；法国之所以能重返欧洲协约国，同意1841年7月13日签订的、结束长期危机的所谓海峡公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梅特涅在普鲁士人协助下，在法国同其他国家之间调解获得成功。

帕默斯顿之甘愿在1839—1840年的近东危机中转而反对法国，以及梅特涅在那场危机最后阶段采取的政策都表明：当涉及各国的利益，或涉及维护和平与力量均势的问题发生时，各国在思想上的分歧对它们的态度只起非常轻微的影响。到了19世纪40年代，“自由国家”与“反动国家”之间的分野已经完全消失，这样说并不过分。肯定地说，在东方问题解决之后的那些年，英国同俄国的官方关系以及法国同奥地利的官方关系，总的看来比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少纠纷。诚然，从1841年至1846年，当皮尔担任英国首相，阿伯丁勋爵担任外交大臣时，他们曾尽一切努力恢复英法协约。但是，尽管阿伯丁同当时任路易·菲利普的首相的基佐关系密切，两国却几乎在不停地争斗。英法两国传教士在塔希提岛的纠纷引起伦敦和巴黎报界在1842年唇枪舌剑的交锋；两国驻希腊外交代表之间的斗争使两国关系恶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法国国王对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抱怨说，“英国政府令人遗憾的倾向于无时无刻不在支持革命，从而破坏了欧洲和平”^[25]；最后，在帕默斯顿于1846年重返外交部之后不久，路易·菲利普的儿子蒙庞西埃公爵同西班牙公主联姻，这在英国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因为这次婚姻被认为是违背了法国以前的诺言，使法国有在伊比利亚半岛称霸之势，于是英法协约就在这阵浪潮中彻底垮台了。

法国政府充分认识到遭孤立的不利政治形势，于是加倍努力与奥地利达成谅解。基佐在1847年5月派遣一名特别代表前往维也纳与梅特涅会谈；当这一行动为对方热诚接受后，他接着就发出一信，其中写道：“法国目前倾向于，也适合于采取保守主义政策。它早已达到自己的目标，并拥有自己的地位……因此实行谅解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以事实为基础的。”^[26]梅特涅当时正忙于应付德国、瑞士，特别是意大利的革命宣传鼓动高潮（参见第19章和第21

章)；尽管他根本不会完全相信法国是真正转向保守主义^[27]，但仍然欢迎合作，这种合作可能用来保护维也纳会议决议，对付反对这些决议的种种麻烦。于是，新的协约关系诞生，不过，正如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它为时已经太晚，无法影响欧洲发展的进程。

与此同时，英俄关系比它们缔结反对拿破仑的联盟以来更加友好。沙皇在1840年建议成立联盟，帕默斯顿在答复时未断然拒绝，因此他一直努力取得英国的友谊。他在1844年甚至还访问了英国，同皮尔和阿伯丁会谈了土耳其的形势，向他们保证他将尽自己的力量保持现状，并且敦促他们，如果现状不可能保持，应考虑英俄就奉行什么政策达成谅解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认为，过去在两国之间存在的敌对是没有道理的。他对皮尔说：“几年前，德拉姆勋爵奉派到我国，他对我充满偏见。同我一接触，他的全部偏见就都烟消云散。这正是我希望带给你以及整个英国的东西。我希望通过个人交往驱散这种偏见。”^[28]

塞顿-沃森教授提出：如果沙皇在这次访问期间建立的个人接触得以保持下去，也许就能够避免引起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种种误解。这是一个假设，当然是不可能得到证明的。然而毫无疑问，俄国与英国之间的这种新的和睦关系是一种比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貌合神离的协约较有效的外交结合，它有助于在当时风暴席卷欧洲之际保持力量均势和普遍和平。

1848年的革命（第15章），对于1815年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和力量均势，构成空前严重的威胁。奥地利和普鲁士陷于瘫痪，法国突然由一个自由—保守的君主政体变成一个激进的共和国，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各族人民的民族愿望正在觉醒，这些情况给处在欧洲边缘的这两个国家带来了阴云密布的前景，因而它们感到应当共同关心尽可能阻止它们所惧怕的混乱和破坏，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尼古拉获悉维也纳和柏林发生革命的消息后，不久就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声称只有俄国和英国的“密切联盟”才能“拯救世界”^[29]；帕默斯顿1848年4月11日就如何答复涅谢尔罗迭类似函件时写给他的大使说：“向涅谢尔罗迭伯爵保证：我们对俄国的感情和情绪同他向你表示的对英国的感情和情绪完全相同。

目前我们是欧洲仅有的两个能挺直腰板的国家（除了比利时也经常如此之外），因此我们应当互相信任。”^[30]

如果说在革命动乱期间英俄实行合作，也许是夸大其词，因为两国都是自行其是，并非总是和谐无间。但是，它们的目标相同：每一方都想制止当地的动乱，使它们不致酿成一场普遍性的战争，打乱1815年的细心安排，破坏力量均势；而且每一方都小心翼翼，避免干涉另一方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步骤。

英国政策再次由帕默斯顿运筹帷幄，其首要目的是遏制法国新共和政府野心勃勃的计划。该政府外交部部长、诗人拉马丁虽然早在2月27日就曾宣告：“共和政体并未改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也未改变它忠实诚挚的愿望，同那些与法国一样希望国家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31]但是，3月4日，他在一个长篇的“致各国宣言”中却宣布：“从法律上说，1815年各项条约在法兰西共和国眼中已不复存在”，不过紧接着他又说，“法国承认该条约的领土条款是一个事实，是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他还说，“法兰西共和国不会发动针对任何人的战争”。^[32]

帕默斯顿看出，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长篇文件是想讨好群众情绪而又不至于把法国置于危险的冒险事业之中。他采取的政策——事实上是在《致各国宣言》以前就已经制定的政策——同1830年采取的政策一样：即他将制止欧洲进攻法国，条件是法国也不进攻欧洲。虽然3月在维也纳和柏林发生的革命，消除了进攻这个新共和国的任何可能性；但是英国从一开始就表现的友好态度，对于劝导法国政府在随后的几个月执行谨慎而有节制的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还有其他一些力量也在唆使该共和国参加一场打破现状的总进攻，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例如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革命，就促使德国某些自由主义分子，包括马克斯·冯·加格恩和普鲁士新任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阿尔尼姆策划一项计划，设想普鲁士可利用波兰人在波森的起义而解放整个波兰，故意挑动俄国开战，利用这场冲突所引起的狂热，形成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新德国。支持这项计划的人认为，在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时英国会保持善意的中立；但是，他们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和合作。阿尔尼姆因而在3月23日邀请法

国政府参加一项公开的联盟宣言，宣言的目的是重建波兰。他进一步要求法国在普鲁士认为有必要时派遣一支海军舰队进入波罗的海。

这个计划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它表明当时的欧洲形势孕育着种种危险；但它终于成为泡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沙皇和法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前者小心翼翼地不采取任何可能支持德国好战派的行动；后者则决定不把宝押在普鲁士政府的身上，因为它不相信这个政府的稳定性。但是，帕默斯顿决心干涉这件事情，很可能影响了俄国和法国的态度。3月30日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途经柏林时曾经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及其新任外交大臣会谈；国王曾敦促他劝告阿尔尼姆不要从事肯定会使普鲁士与俄国发生战争的计划。坎宁向伦敦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帕默斯顿立即给柏林发出了严峻的警告，敦促普鲁士政府“不要采取俄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侵略的任何行动”。^[33]这封信的语调打破了阿尔尼姆关于英国会对他的计划保持善意的幻想；它似乎也鼓励了国王对他的那些大臣采取坚定的方针，而在此以前他被革命的胜利吓破了胆，沙皇曾经轻蔑地称他为“庸庸之君”。^[34]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扬言，如果采取任何反俄政策，他就退位，于是阿尔尼姆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对和平严重得多的威胁。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居民由于梅特涅的统治崩溃而受到鼓舞，起来造反，并且得到撒丁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意欲成为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统治的解放者。帕默斯顿再次作为调解人出面干预，然而他的政策这次不像前次那样获得明显成功，并且也从未得到他的君主或他自己的政党的充分理解。起先，他的目的是劝说奥地利政府放弃它占领的意大利省份，这并不是因为他热心于意大利的统一，也不是因为他想削弱奥地利帝国——事实上，他一向认为强大的奥地利是力量均势和“欧洲的政治独立与自由”所不可缺少的^[35]——而是因为他认为奥地利肯定无法扑灭意大利的不满，而且企图这样做就将会招致法国的干涉，引起战争。奥地利政府在5月和6月至少愿意讨论能否给伦巴第以自由，但是米兰的临时政府态度僵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7月，奥地利在库斯托扎取得胜利，皮埃蒙特军队被迫撤出伦巴第，使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因为米兰政府和皮埃蒙特政府现在都开始考虑直接呼吁法国进行军事干涉，这样一来无疑会引起一场大战。

法国政府虽不急于打仗，但是正如卡芬雅克将军所承认的：“如果……意大利人民普遍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援助……在此地建立的任何政府都无法长期拒绝这种要求。”^[36]因此必须找出可以取代的行动方式，既能为法国舆论所接受，又能使干涉没有必要。帕默斯顿这次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建议根据奥地利以前的一项提议，由英法在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之间联合进行调解，将伦巴第合并于皮埃蒙特。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抓住帕默斯顿的建议，从而度过了危机。后来英国女王把帕默斯顿与法国联合说成是“最邪恶的行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给法国政府提供了不打仗的唯一可能的借口”^[37]，他在下院亲自夸口说调解“有助于维护欧洲和平”也是很有道理的。^[38]

除此以外，联合调解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这时在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有力领导之下的奥地利政府拒绝作任何让步，并且坚持不仅保有伦巴第，而且在这个造反的省份实行最野蛮的镇压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帕默斯顿已无能为力，只有保持同法国的密切联系，希望意大利的混乱尽快结束。1849年春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皮埃特蒙国王被引入歧途，竟与奥地利重开战端，不幸在诺瓦拉又遭惨败。当时情况很清楚，尽管法国新总统路易·拿破仑抱有明显的和平意图，但是如果奥地利把不合理的条件强加于遭到失败的国王，法国仍然可能进行干涉。因此帕默斯顿加紧努力使奥地利明白道理；然而他同施瓦岑贝格的私人关系使他们不可能从事客观的讨论，所以他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与奥地利领袖的亲信许布纳男爵接触，说服他相信英国唯一的意图是希望“意大利尽快平定下来”^[39]。这件事再加上法国代理人在意大利加紧活动，使施瓦岑贝格相信：不对皮埃蒙特施加不必要的凌辱是明智的；于是最后于1849年8月在米兰签订了和约，从而结束了危险的局面，在意大利恢复了1815年的领土安排。

在这件事情上，帕默斯顿自始至终有意无视意大利的民族愿望，他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维护力量均势。这也决定了他对待在东欧，特别是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当时匈牙利的科苏特革命政府正力图摆脱维也纳取得独立。帕默斯顿尽管个人对反叛者表示同情，但不能支持起义，因为如果起义成功就会动摇奥地利作为维护中欧秩序的堡垒的地位；他拒绝了科苏特的代表所作的一切友好要求，辩称他“仅仅知道匈牙利是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之一，对其他则一无所知”。^[40]俄国政府出兵援助弗兰茨·约瑟夫的军队，对恢复匈牙利秩序起

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英国外交大臣对于俄国原先的干涉不仅未表示任何反对，而且实际上是予以鼓励的，特别是考虑到帕默斯顿曾强烈抗议奥地利在反叛者遭到失败后还迫害他们，就更应指出这一点。实际上，他在1849年4月告诉俄国驻伦敦大使：俄国必须采取行动援助奥地利，但是必须“尽快结束”。布伦诺夫男爵正确地解释这一忠告的意思是英国外交大臣希望俄国承担起在东欧维持力量均势的责任。^[41]

俄国已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它在匈牙利叛乱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表现在它在1849年和1850年德国事件中所遵行的政策上。根据1815年的安排，德国各邦松散地组织在一起，以便作为列强衔接的领土之间的缓冲；而1848年3月的事态发展打破了这一细心安排的均势；由自由派政治家组成的法兰克福议会在1848年3月以后进行了英勇的努力，试图在旧德意志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们的试验失败了，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迅速恢复过来，普鲁士国王在1849年4月又轻蔑地拒绝接受法兰克福议会授予他的皇冠（参见第15章，原文第407页）。这些事件虽使沙皇感到放心，因为他丝毫不愿意看到在他的西侧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但是，他马上就遇到更加麻烦的事情。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根据约瑟夫·玛丽亚·冯·拉多维茨设想的计划，在1849年企图把德意志诸侯统一在他领导的一个联盟中。这个联盟排除奥地利，但设法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奥地利政府当然反对这个计划；在整个1849年，它一面忙于对付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事件，同时尽一切努力破坏普鲁士同其他各邦诸侯的谈判；施瓦岑贝格的独裁成性——如弗里德容所写的——“驱使他采取武力解决办法”^[42]，于是他在1850年就使普鲁士面对要么放弃原定计划，要么进行战争的处境，而毫无转圜的余地。

1850年这一年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危机日趋严重，到夏末看来战争十分可能发生，因为施瓦岑贝格和拉多维茨两人谁也不打算退让。1848年革命造成的战争威胁当时或许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正在这个关头，俄国进行了干涉。沙皇在6月警告弗里德里希·威廉：未经其他签字国同意而擅自改变欧洲各项条约，应看作是侵略行动^[43]；在对力量均势哲学下了这个近乎经典性的定义之后，他全力支持奥地利的反对意见。沙皇的力量是否足以有效地干涉奥普战争，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44]；但是毫无疑问，沙皇的立场起了决定作用。它使

柏林反动的王党又得到了一个论据，用以说服国王抛弃拉多维茨和他的计划；于是1850年11月普鲁士在奥尔米茨会议上向奥地利的要求屈服，同意恢复1815年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协议。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英国未起任何作用。然而，在1848年革命引起的最后一个复杂的国际纠纷中，英国政府在俄国的默许下，带头提出了目的在使力量均势不受破坏的解决办法。这一次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起而反对丹麦国王以及随后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军队站在两个公国一边进行干涉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争端。早在1848年6月，涅谢尔罗迭和帕默斯顿就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不愿看到波罗的海的力量均势因德国的胜利而遭到破坏；虽然这意味着反对德意志和这两个公国的自由主义愿望，但帕默斯顿还是承担了困难的调解使命，把它作为避免发生俄普战争的最好办法。持续谈判达两年之久，其间三次开战，三次停战，才说服普鲁士国王签订了一项符合英国和俄国愿望的恢复现状的条约；即使取得了这一结果，英俄两国政府还是认为最好召开一次五国会议，求得两个公国地位的最后解决。五国会议于1851年和1852年在伦敦举行。

这次会议并非没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1815年开始的长期和平阶段中按照欧洲一致原则举行的最后一次成功的会议。会议结束刚刚两年，列强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而战争一旦到来，各种力量便如脱缰野马，终于摧毁了俄国和英国在革命年代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的力量均势。

从1830年至1854年间充满着危机，就危机的次数和性质来说，这一时期竟成为一个持续和平的时期，似乎出人意料。如前所述，这部分是由于外交结盟体系的性质本身，由于它的流动性，使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有战争危险的关键时刻转变各自的立场和影响。然而，人们越是深入考虑这个时期多变的结盟关系，人们就越是对其他一些使这种流动性成为可能而且实际上成为必要的因素有深刻的印象。实际情况看来是：尽管各国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分歧，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意见一致。

除了不大敢承认自己的独特性的法国外，所有国家都承认力量均势：也就是说，它们同意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所作的领土安排，以及更广泛的原则：未经其他国家同意，任何一国不得进行领土扩张。不

仅如此，承认力量均势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它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保持高度的自我克制；它意味着尊重现存的条约；它还意味着：一旦这个体系的某些成员由于野心或轻率而寻求片面的领土扩张时，其他成员愿意参加一致行动加以遏制。

列强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的相互交往中，恪守这些行动准则，几乎毫无疑问，法国和英国的自由派舆论一定会满怀热情地同意在1830年公开支持波兰起义者或者在1848年公开支持皮埃蒙特王国；但是这两国政府却宁愿避免实行可能打乱整个欧洲体制的政策。也许沙皇会在没有遭到其他国家严重反对的情况下在1833年从对土耳其的援助中勒索出更高的代价，但是尼古拉碰到任何可能被看作片面领土扩张的事情时总是退缩不前；而且，即使他想到肢解奥斯曼帝国，他在行动时也总是根据以前列强之间的协议大家平分秋色。在整个这一时期，各种条约也得到尊重，其程度是近年来所没有的；1846年奥地利占领克拉科夫共和国引起了纠纷，这一事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整个欧洲舆论对奥地利的行动报以令人震惊的义愤，以及梅特涅拼命为辩解而炮制合法论据。[\[45\]](#)

最后，当时各国普遍愿意参加维护和平与力量均势的共同努力。这一点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英国的地理位置和世界范围的利益，使它和欧洲体制的联系比起大陆国家来要脆弱一些，而且它在19世纪20年代曾退出过1814年和1815年建立的会议体系。然而，即使在它退出的时候，卡斯尔雷也曾表示，当力量均势受到威胁时，英国愿意在欧洲事务中起自己的作用；而且在1830年至1854年间，英国继续不断重申这一诺言，并按此行事。1841年1月帕默斯顿致沙皇的照会中明确承认了英国同大陆体制的联系的基本性质；约翰·罗素勋爵1852年在下院发言时曾再次对此作了解释：

我们与整个欧洲体系联合在一起，而且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增加，任何破坏欧洲整个力量均势的领土扩张，尽管也许并不会立即引起战争，我国也不能漠然视之，而且无疑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如果这种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最终很可能引起战争。[\[46\]](#)

各国自我克制，尊重条约规定的公法，以及愿意采取一致行动予以贯彻执行，这就是在1830年至1854年间得以维护和平和保持力量均势的条件。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破坏了这些条件。

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和过程，将在本卷其他地方（第18章）讨论，在此不必赘述。然而，重要的是应该指出：这一荒谬的冲突成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在它之前是40年的和平；在它以后的15年中，欧洲列强打了四仗，结果是欧洲大陆的领土划分完全改变了。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破坏了各国之间存在已久的一致原则，并根本改变了它们对大陆现存力量划分的态度。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写的：“在1857年已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现状的义务。”^[47]至于法国，战争已使其统治者摆脱了他掌权最初几年所受的种种限制，或者说他所表现的克制。1853年，拿破仑三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被新原则的力量提高到旧王朝崇高地位的人物”。新原则就是公民投票的原则；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民族地位的原则。^[48]而当拿破仑在东方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威望和权力时，他就越来越热衷于根据民族界线重划整个地图了。至于其存在本身与维护1815年条约体系休戚相关的奥地利，新的危险倾向也是显然的。奥地利政府意识到奥地利在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在其他王朝所激起的普遍愤怒和怀疑，加之也许害怕报复，于是加紧努力巩固它在德国的地位和影响，采用的办法则完全违反了从1815年以来它一直遵守的与普鲁士合作的做法，并且破坏了它在1850年费尽心血才恢复的封建制度的基础。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感到安全没有保障，而且由于感到不安全，就更倾向于考虑采取冒险外交政策的好处。其他国家在邀请普鲁士参加1856年巴黎和平会议上表现出犹豫不决，加重了普鲁士的这种不安全感，因为这种犹豫似乎反映了这些国家对普鲁士是否有权被当作一个大国表示怀疑；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采取的策略也加重了这种感觉；尤其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越来越不愿支持军队——除非把这支军队用于解决德国问题——更加重了这种感觉。虽然直到1862年，使普鲁士从维护旧的力量均势转变成反对这种均势的那位领袖才出现，但是决定俾斯麦的政策的各种力量却早已在起作用了，甚至在1856年，俾斯麦就写道：“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战斗，反对奥地利以争取我们的生存，而且……要避免这件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德国事态的发展，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49]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在改变各国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作用发生在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力量均势最顽强的维护者，而且当1848年革命使欧洲焦头烂额时，实际上是它们采取联合的行动维护了这种均势。战争使俄国遭受的破坏以及俄罗斯帝国内部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使圣彼得堡的政治家们相信：过去执行的积极外交政策至少必须暂时终止。当时已经处于其漫长政治生涯终点的涅谢尔罗迭，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他说：“我们几乎绝对需要致力于国内事务，并发展我们的精神与物质资源。”^[50]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因为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一直大力支持现存的条约结构，不仅如此，它还利用它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密切联系，阻止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堕入公开的敌对和战争。所以，俄国计划实行的这种政策变化显然有削弱维护欧洲秩序的事业的危险。

然而俄国政府现在不大愿意支持这种秩序了。俄国由于战争失败，尤其是由于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在黑海的权利而受到奇耻大辱，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主张修改条约体系的国家；在以后的15年内，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政策方面仅有一个目标：使俄国摆脱1856年巴黎和会强加给它的屈辱条件。由于国家虚弱和国内事态发展的压力，使得要马上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从未失去这个目标。俄国的政策不得不像涅谢尔罗迭的继任者戈尔恰科夫在1856年所描述的那样：“俄国并非怒而不发，它是在默默地等待时机。”^[51]实际上，这在俄国政策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机会主义因素，因为俄国的政治家们现在愿意考虑同其他一些主张修改条约体系的国家达成协议，这些国家答应：如果俄国不干涉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计划，它们就支持俄国关于黑海权利的要求。

英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从大陆纠纷中脱身，这也破坏了当时存在的力量均势和欧洲公法。对于英国人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令人失望和没有结果的冲突，它并没有给英国增添什么光荣。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存在一种总的愿望，即避免可能引起新冲突的各种冒险。这并不直接意味着英国将避免干预欧洲的纠纷，实际上，人们一般认为，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使它有道义上的责任对欧洲事务发表意见。正如丁尼生所写的：

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应自由抒发心声，
哪怕全欧洲的风暴在我们头上轰鸣。

我们不是一个小小的德意志邦，

我们必须讲话；但应是欧洲唯一的声音。^[52]

可惜，很难一方面把避免冒险的愿望，一方面又坚持向欧洲说教，作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当“良知与理智在心中斗争时”^[53]，目的的坚定性是难以保持的，于是欧洲很快被英国政治家们的表演所吸引，他们在外交危机中采取坚决的，甚至是好战的立场，而一遇到严重的抵抗马上就仓促地狼狈退却。在1863年波兰起义和1864年德国进攻丹麦（参见第19章，原文第515页）期间，这种情况更是特别引人注目。在这些危机中英国的“威胁从不兑现、诺言从不履行”^[54]的政策，既削弱了自己的声望，又削弱了自己的影响。

英国人自己也了解这一点，1864年在下院的一次著名的辩论中，所有党派的议员都一致攻击赋予帕默斯顿1830年以来的外交以活力的各项原则。以理查德·科布登为首的激进党人声称，已经到了在外交政策方面采用自由放任哲学的时候，而保守党人则主张英国的民族利益在海外而不在欧洲；力量均势的学说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55]

在这次辩论结束时取得的共识是：英国必须以不干涉原则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唯一基础，这实际上成了1865年至1870年之间所有各届政府的清规戒律。但是，这并不是由卡斯尔雷阐明、由坎宁和帕默斯顿实行的那种不干涉原则，因为按照这一原则，英国虽避免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但如其他国家拒绝遵守同样原则，英国总是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1865—1870年实行的不干涉，被解释为几乎对大陆事务毫不过问，而这时却恰逢过去的领土均势原则遭到越来越频繁的攻击。一位法国观察家写道：“有一个时期，他们什么事都干涉，而最后则变成任何事情都不愿干涉。”^[56]这个说法丝毫不错。英国在那些年头不仅在欧洲事务中只起一种无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好像是要给这种新的孤立以法律解释似的，下院还在1868年3月从兵变法中删去传统的提法：必须保持欧洲的力量均势，是英国军队存在的理由之一。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年代，各大国存在的新的恐惧、不满和犹疑，产生了一种十分适合当时正在欧洲舞台上出现的新型政治家的气氛；这些政治家如戈尔恰科夫、加富尔和俾斯麦，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同《维也纳条约》体系没有任何个人的联系，对与之相联系的各

种理想毫不相关；他们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和不受感情支配而感到自豪；他们还很容易以当然的国家利己主义为理由来为破坏法律辩解。在此无须详尽叙述他们实现自己的计划所采取的步骤，但是至少值得指出的是，在他们手里，外交成了一种工具，不是为了维持和平，而是为了促进战争。要说明这一点，考察一下他们缔结的联盟的性质和目的是再好不过的办法。

在1854年以前的年代，缔结联盟和外交阵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参加各方不致由于诸如革命或由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企图通过破坏力量均势来扩张自己的影响而受到威胁。1830年的英法协约、三个东方王朝的结盟、1834年的四国联盟、1840年英国与东方国家的结盟，甚至尼古拉一世在1840年提议的“永久性”四国联盟，都是这种性质的结合。

然而，在1856年以后，缔结联盟和达成外交“谅解”一般都是为了侵略目的，或者是取得盟友的合作以计划进行反对第三方的战争，或者是保证对其他方面实行善意中立以利于盟友之一实现自己的计划。1858年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缔结的普隆比埃密约，也许是这类新型联盟最好的实例，加富尔自己的话是条约性质最好的说明：

皇帝一开始就说，他已决定用他所有的兵力支持撒丁对奥地利作战，条件是这个战争不是为了革命的事业而进行的，并且从外交角度看来，尤其是从法国和欧洲舆论的角度看来，能够找出理由加以辩解。

为此寻找理由是主要的困难……皇帝也来帮我，我们一起想来想去，看遍了整个意大利地图，寻找这样难以找到的开战理由。找遍整个半岛地图，我们都毫无所获，然后我们看到马萨和卡拉拉，几乎肯定相信找到了我们费尽心力寻找的东西。[\[57\]](#)

普隆比埃会议或许是19世纪第一次处心积虑策划战争的阴谋，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1859年3月法国与俄国缔结秘密条约，规定一旦法国对奥开战，俄国保守中立，俄军并进行调动以牵制奥地利兵力，作为报答，法国承诺在俄国进行努力修改1856年条约时给予帮助。普隆比埃密约与1866年4月8日缔结的众所周知的意大利—普鲁士联盟，并无任何基本的不同，因为意普协定不仅以战争设想为依据，而且它还有一条规定：如果交换签字后三个月之内战争尚未开始，则条约作废。

如果欧洲一致的原则仍然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而存在，并且取得类似在1830年、1841年和1852年取得的成就，现实主义者的这些计划和他们的联盟的行动当然本来是可能遭到挫败的。但是，在1856年以后发生的几次重大危机中，尽管曾试图祈灵于欧洲一致的原则，五大国都很少开会，而且仅有一次，即关于1867年卢森堡争端的会议，制止了一次战争。总之，这个时期的政治家似乎缺少合作的能力或意志。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也许本来会阻止1859年的战争，但是会议却未能举行，因为英国怀疑俄国和法国的动机，奥地利则表示如果撒丁获准出席，它就拒绝参加。1864年虽然召开了一次大国会议，企图恢复丹麦与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和平，但是它根本没有达到目的；迪斯累里关于这次会议的说法总的看来是有道理的，他说：“开会的时间和狂欢节一样长，并且和狂欢节一样，它也是头戴假面、故弄玄虚。我们的大臣们去开会就像处于困境的人前往娱乐场所一样，明知失败近在眼前，还去消磨时间。”^[58]

英国在1865年以后日益孤立，进一步削弱了为了和平采取合作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越来越清楚，它不愿意承担那种遏制欧洲大陆现实主义者的行动的责任和义务。当两个德意志国家在1866年正在走向战争时，克拉伦登勋爵拒绝由英国进行调解的建议，他指出：“这既未涉及英国荣誉，又未涉及英国利益。”^[59]而在冲突爆发前之所以未能举行一次会议，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克拉伦登煞费苦心地使欧洲各国首相相信：英国不能以武力强制执行任何会议的决议。^[60]甚至就卢森堡会议而言，英国政府参加也是非常勉强的；而且当这个大公国已经置于列强集体保证之下，会议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英国仍然不打算在其他签字国违反这项保证时强制执行。欧洲各国获悉英国这种态度后感到惊讶不快。^[61]这似乎是对公法的嘲弄；而且，一个曾经在1830年至1854年间最有力地鼓吹欧洲一致行动的国家竟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也就难怪欧洲一致的原则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已是丝毫不起作用的手段，而且由于未能制止战争，它甚至连自己所作出的领土变更的合法性也不设法加以保证了。

欧洲一致原则的失败，当然只不过是前面所提到的各国之间意见一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的反映。1856年以后，为推翻现存秩序而斗争的国家要比以武力维护现存秩序的国家更多。仅这一事实就使力量均

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而这个秩序是在维也纳会议上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千方百计才得以保持的。

（张扬 译）

[1] 梅尔本子爵：《文件集》（L.C. 桑德斯编，伦敦，1889年），第339页（帕默斯顿致梅尔本信，1836年3月）。

[2] 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1789—1914年外交政策概述》（剑桥，1937年），第169页。

[3] 引自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梅特涅：政治家及其为人》（慕尼黑，1925年），第1卷，第660页。

[4] 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梅特涅》，第1卷，第659页。

[5] 赫伯特·C. F. 贝尔：《帕默斯顿勋爵》（伦敦，1936年），第1卷，第119页。

[6] 亨利·利顿·布尔沃爵士和伊夫林·阿什利：《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子爵传》（伦敦，1870—1876年），第2卷，第39页。

[7] 亨利·利顿·布尔沃爵士和伊夫林·阿什利：《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子爵传》（伦敦，1870—1876年），第2卷，第109—110页。

[8] C. K.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文政策，1830—1841年》（伦敦，1951年），第1卷，第158页。

[9] 参见本卷第21章，原文第553—554页。

[10] 贝尔：《帕默斯顿勋爵》，第1卷，第169页。

[11] 阿尔弗雷德·斯特恩：《1815年条约至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期间的欧洲史》（斯图加特，1905年），第4卷，第223—225页。

[12]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290，296—299，300页。

[13]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306、310页，尚可参阅G. H. 博尔索弗《庞森比勋爵》，载《斯拉夫评论》，第13卷（1934—1935年），第102页和注引。

[14]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397页。

[15]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455页。

[16] 居约：《英法协约》（巴黎，1926年）第149页。

[17]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414页。

[18]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2卷，第592—595页。

- [19] 见菲利普·E. 莫斯利《俄国外交与东方问题的发生》（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4年），第67—92页。
- [20] 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第205页。
- [21] 韦伯斯特（《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第2卷，第695—737页）对自己书中主人公的策略完全持赞颂态度。另可参阅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第213、220—222页。
- [22] 克兰里卡德1840年12月22日致帕默斯顿信，转引自F. S. 罗德基《英俄关于“永久性”四国同盟的谈判》，《美国历史评论》第36卷（1930—1931年），第343页。
- [23] 帕默斯顿1841年1月11日致克兰里卡德信，转引自F. S. 罗德基《英俄关于“永久性”四国同盟的谈判》，《美国历史评论》第36卷（1930—1931年），第345—346页。
- [24] 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梅特涅》，第2卷，第80页。
- [25] 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第235页。
- [26] A. J. P. 泰勒：《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1847—1849年》（曼彻斯特，1934年），第25页。
- [27] A. J. P. 泰勒：《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1847—1849年》（曼彻斯特，1934年），第25页。
- [28] F. 马克斯·米勒编：《斯托克马尔男爵回忆录》（伦敦，1873年）第2卷，第109—110页。另见弗农·J. 普里尔：《英国、俄国与海峡问题，1844—1856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31年），第40—74页。
- [29] A. C. 本森与伊谢尔子爵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伦敦，1907年）第2卷，第196页。
- [30] 伊夫林·阿什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生平与通信》（伦敦，1879年）第2卷，第79页。
- [31]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执政三个月》（巴黎，1848年），第68页。
- [32]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执政三个月》（巴黎，1848年），第69页及以下各页。参见L. B. 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英国科学院年刊》，第30卷（1944年）；第35—36页。
- [33] 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英国科学院年刊》，第30卷（1944年），第62—64页。
- [34] 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德国的统一》（慕尼黑，1935—1942年），第1卷，第331页。另参见鲁道夫·斯塔德尔曼《1848年革命的社会政治史》（慕尼黑，1948年），第55—56页。
- [35] 例如，参见贝尔《帕默斯顿勋爵》，第2卷，第14页。

- [36] 泰勒：《意大利问题》，第138页。
- [37] 泰勒：《意大利问题》，第218页。
- [38]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编，第102卷，第216页。
- [39] 泰勒：《意大利问题》，第230页。
- [40] 查尔斯·斯普罗克斯顿：《帕默斯顿与匈牙利革命》（剑桥，1919年），第46页。
- [41] 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第266页。
- [42]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奥地利，1848—1860年》（斯图加特，1908年和1912年），第2卷，第30—31页。
- [43] 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回忆录》（柏林，1892年），第1卷，第491页。
- [44] 例如，参见西奥多·希曼《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史》，第4卷，第226—232页。
- [45] 梅特涅：《遗稿》（理查·梅特涅-温内伯格编，维也纳，1880—1884年），第7卷，第276页及以下各页。
- [46]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三编，第119卷，第552页。
- [47] R. C. 宾克利：《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1852—1871年》（纽约，1935年），第179页。
- [48] R. C. 宾克利：《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1852—1871年》（纽约，1935年），第165页。
- [49] 俾斯麦：《全集》（第2版，柏林，1924年及以后出版），第2卷，第142页。
- [50] 《首相涅谢尔罗迭伯爵书信和文件集》，第11卷，第112页，转引自克里斯蒂安·弗里泽《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波兰起义期间的俄国与普鲁士》（柏林，1931年），第11页。
- [51] 弗里泽：《俄国与普鲁士》，第23页。
- [52] 《1852年2月3日》。
- [53] 《北不列颠评论》，第38卷（1863年），第493—494页。
- [54] 迪斯累里的话，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6卷，第731页。
- [55] 迪斯累里的话，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6卷，第731页。
- [56] 《两个世界评论》，第64卷（1866年7月1日），第248页。
- [57] 《加富尔—尼格拉书信集》（波洛尼亚，1926年），第1卷，第103页。转引自宾克利《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第203—204页。

[\[58\]](#)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6卷，第743页。

[\[59\]](#) R. W. 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第468页。

[\[60\]](#) 参见《1870—1871年战争的外交起因》。《外交部发表的文件集》（巴黎，1910年及以后），第9卷，第94页注。

[\[61\]](#) 英国关于保证的历次宣言，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7卷，第1922页及以后各页；第188卷，第148页及以后各页。

第十一章 武装力量和军事艺术：海军

在1830年以前的250年里，世界上的海军在装备和对人员的技术要求上并无重大的变化。如果德雷克^[1]的部下登上纳尔逊的“胜利号”的话，他们不消经过长期的训练便能以可观的效能扬帆出海和进行作战。因此，在这些世纪里，装备和人员的发展并不需要经常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另一方面，利用海军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以及由此引起的海战，则因其意义重大而难以置之不理。

但在1830年以后，重点恰恰倒转了过来。这时海上大国已不再发生地区性的冲突，而那些经常打仗的国家并非海上国家。因此，海军的“作战行动”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幕后。舰队虽然仍被用作推行政策的工具，但其用法则更为间接，更少带有打仗的架势。然而这时在装备上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革，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员，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海军的整个性质。虽然纳尔逊的部下退回到250年以前不会遇到困难，但如果把他们放在这段时间靠后的四分之一，他们就会全然不知所措。

因此，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舰船本身：它们的推进系统、武器和装备以及舰员。实际上，这些变化最为迅速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是从1830年至1870年，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也最具有决定性。1830年时海军在本质上还是纳尔逊和维尔纳夫时代的海军，而1870年时的海军则在许多方面已是属于费希尔和冯·提尔皮茨时代的了。

再者，在近代，人们脑海中没有比这时更加自信本国的海军远胜于其对手。英国近期所取得的对其海上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场竞赛中的那些新参加者——普鲁士、日本和美国——虽然注定要在以后接受挑战，但这时就海军来说还是处于襁褓时期。因此，即使从威信而不是单纯从实力来说，皇家海军在这整个时期都超越了它的一切对手。没有一个国家因其地理位置而如此把舰队视为它的主要武器，不论是用于进攻和防御，甚或只用于保持现状。因此，优先的地位必然要让给皇家海军，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能与之相比。

因此，我们需要顺着两条线进行探索。第一，影响及于世界各国海军的舰船在装备上广泛和迅速的变化，这可能是海军史上最大的革命，也就是把近代科学和发明应用于海军武装力量。第二，与此相关，在海军人员上几乎同等剧烈的变化，特别是表现在那支至高无上的皇家海军里。

装备上的变化涉及与军舰有关的一切，并可分为四大类，即推进系统从风帆变成蒸汽动力；基本材料从木变为铁；进攻，大炮的革新；防护，装甲的采用。这四大类发展迅速并且经常相互影响，在舰船和人员上引起了革命。

这些事态如此迅速地而又同时发生并不足为奇。其共同原因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技术的显著发展导致了各方面的改进，可能主要在于工作母机上的改进。而这种起带头作用的新技术，特别是在英国，主要还是局限于工业。实际上，它在很长时间内根本并未用于军事学上。因此，虽然英国在以机械为基础的工业发展上占有领先地位，但在海军力量方面并不居于优势。

道理也很简单。英国没有要使其海军发生变化的重大动因。它老式的海防舰队以其桅杆、风帆和两舷的滑膛炮担负了推行国家政策的重要使命，而且历来是获得成功的。因此，不论是英国政府或人民都自然而然地认为皇家海军长期以来服务成绩优异，并不需要有任何彻底的改良。

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偏见。但是，使英国拒绝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带头去干，则并非仅仅由于偏见。有两个原因阻碍它去实现剧烈的变革。第一，当时它在海军装备上已居于大大领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使自己强大的海军由于废旧更新从而有意识地牺牲掉这一地位呢？如果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它在面对潜在敌人时必须从头做起的话，为什么要使这厄运比它必然到来的时刻提前出现呢？

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指责历届英国政府采取鸵鸟政策的人所常常忘记的。当时许多新事物远非尽善尽美。事后诸葛亮是容易做的。它们最终证明了自己是可用的，并且成为完全可靠的东西。但是不能要求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能认识到当时尚未具有的可靠性。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让人很不放心：铁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浮起的；当时大量效率低下的引擎往往停止转动；早期试验新型的大炮、

火药和炮弹曾导致令人震惊的爆炸和火灾等悲剧发生。从这方面来看，似乎各国政府的谨慎是颇有道理的。

长期以来占英国首位和作为主要战争手段的老式海防舰队，即“木制壁垒”，当然具有这种至关重要的可靠性能。废弃它而采用显然不太可靠的装备，至少在当局认定确有需要之前，乃是毫无道理的冒险。

束缚英国的重重顾虑在别处，特别是在法国，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在法国，老方法远未获得成功，它利用这些方法与英国作战，但屡战屡败。于是便产生了进行试验的最有力的动因——失败的驱使，从而使法国居于这一新运动的前列。年轻的美国人民也带着特殊的动机来加入试验的行列。这并非由于他们的战列舰像法国的战列舰一样没有成功——他们连一艘也没有。在上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中，他们能出动的海军非常之小，只有22艘舰只，都是巡洋舰。作为海上大国的新竞争者，他们认为不用已经过时的老式海军去竞争乃是唯一合理的做法。如果他们想走一条明显的捷径，它正是英国所不敢采取的那条方针——在新的竞赛中迎头赶上。在19世纪60年代，增加了实际战争所造成的推动力，而南方各州的海军力量又非常弱小，只有努力采用新的和正在试验中的武器才有可能把天平掉转过来。南方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虽然未成功，但它迫使北方用同样的努力进行报复。这便是有利于迅速发展的最肥沃土壤。

对于许多相继发生的重大革新最有贡献的人是法国炮兵军官亨利·约瑟夫·贝汉。他早在1809年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惊人设想进行工作，在以后的20年里他进行了试验，出版了对未来最具深刻影响的几本小册子。[\[2\]](#)他鼓吹建立一支全新的作战力量，为一个全新的战术系统进行设计工作：一大批较小（因为较便宜）的军舰，用蒸汽驱动，铁制并有装甲，还配备有重量和口径都统一的、发射重型空心爆破弹的重炮组。他对用这种炮弹袭击老式军舰的成功试验作了详尽可信的描述，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所声称的破坏性效果已被海军部承认为事实。他响亮地宣称自己深信这些设计如果被接受，将迅速而决定性地把长期以来法国失败英国获胜的历史颠倒过来。在海峡对面人们以焦虑的心情阅读了他的著作，英国海军部虽然仍不愿采取行动，却以不断增长的怀疑心情注视着法国的造舰和重新武装的方针。当时出现了时期较长的停顿，因为贝汉远远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一时还没有受到

注意。但是很清楚，他的工作对于以后发生的一切乃是具有惊人预言性的蓝图。

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中，首先发生的是推动力的改变，把动力从风帆改为蒸汽，这显然是18世纪蒸汽机改进的必然结果。在一切海上活动中，不管是贸易还是作战，帆船所缺乏的“行动自由”——即它们不能随意向任何方向行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造成时间的巨大浪费，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带来严重危险。这种局限性在狭窄的水域中最为严重，在那里没有抢风调向的余地，船只和舰队可能多日甚或几个星期无法动弹。即便在那时，贸易世界里时间也是金钱。引擎故障虽然是严重的事，但它不一定是致命的，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立即恢复可能再次获得的行动自由。于是，蒸汽应用于商船早于军舰。它最初的用途是把船只拖到远离港口的海中，最早的汽船大都是拖船。但是到了1830年，蒸汽也用到了游乐用的船上，甚至还适当地用于商船在逆风或无风时的辅助动力。

然而这些优点也触及战舰。不论在港内或是在战斗的危急时刻，因风而受阻很可能是极为危险的。因而在这里也不能对蒸汽长期拒之不理；最初仍是用来拖船，但很快就用于提高舰只在作战中的机动性。最早的蒸汽军舰是美国的——1814年富尔敦建造的古怪的双体“德摩洛哥斯号”。皇家海军的第一艘汽船是1821年勉强购买的明轮拖船“猴子号”。1822年为海军建造了“彗星号”及其姊妹舰，但是权威们对它们的看法不佳，它们的舰名没有登上当时的海军舰船名录。^[3]第一艘有幸刊登上名录的是1827年的“闪电号”，它是一艘同样的明轮拖船；然而到1830年还没有其他舰只登上舰船名录，这是英国的既定政策，当时的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在1828年曾正式宣称：“海军大臣们认为竭尽全力反对使用汽船乃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他们认为采用蒸汽是对帝国海军优势的致命打击”^[4]。英国可能因拖船有明显节省时间的性能而接受了蒸汽，但却不让蒸汽染指它所钟爱的作战帆船。

然而，进步不会迁就海军大臣和他那些陈旧的世界观。在海峡对面，好战的贝汉咄咄逼人；而在英国，主张进步的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30年接替了梅尔维尔，并起用“纳尔逊的”哈代做他的海军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螺旋桨推进器的完善终于排除了海军部反对意见中的要害。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偏见。在各个时代的海军作战中，都存在着自由迅速移动的能力与狠狠打击敌人的能力——机动性和打击力之间的矛盾。在很久以前用船桨的时代，机动性占有上风，能自由行动，但是打击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划桨船的巨大弱点是它没有放置多门火炮或重型火炮的地方。在16、17世纪，所有各国都因两种性能不可兼得而仿效英国人完全放弃自由行动的能力，选择了猛烈的火力，把两舷装有强大火炮的高舷帆舰作为标准的样式。这样做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并未解决。蒸汽也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它能提供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但是传输动力的明轮和保护明轮的巨大箱壳遮住了两舷的大部，还占了舰船的重量。

但是螺旋桨没有这样的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的弗朗西斯·培蒂特·史密斯爵士和美国的约翰·埃里克森海军船长对螺旋桨的改进大有助于解决上述矛盾，从而说服了海军部允许蒸汽进入不可侵犯的“木制壁垒”。

即便如此，海军大臣们也还是不会冲动行事的。螺旋桨在所有的商船队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有些作战舰队中也取得进展，如在美国，埃里克森的“普林斯顿号”于1842年下水。于是海军大臣们在1845年组织了一系列官方试验来最后判定螺旋桨和明轮的优劣。他们准备了两艘同样吨位和马力的炮舰，一艘是“阿列克托号”（明轮），另一艘是“响尾蛇号”（螺旋桨）。先进行一般的蒸汽速航竞赛，“响尾蛇号”赢了。但是明轮的许多支持者不服，于是把两艘炮舰的船尾连接起来，各自开足马力前进。在这场奇怪的拔河比赛中，结果“响尾蛇号”以二海里半的时速把它的对手倒拖着前进。“响尾蛇号”大获全胜。

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海军部允许某些老战列舰装上马力极小的辅助引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它，而是因为法国人正在这方面做试验。在19世纪40年代，贝汉的精神影响了另一位进步军官拉布鲁斯。早在1841年他便建议用螺旋桨作主力舰的推进器。虽然他也遭到了反对，但法国仍在1850年下水由法国卓越的物资局长斯塔尼斯拉斯·迪等伊·德·洛姆设计的“拿破仑号”。该舰在其他方面是老式的，但从一开始便装有辅助螺旋桨。英国受到了这一挑战，在1852年以“阿伽门农号”作为回敬，它也用螺旋桨推进，但在其他方面同样是老式的。

当英法投入克里米亚战争时，它们的主力舰几乎全部都是用风帆的，尽管在必要时可由蒸汽拖船把它们拖去作战。这场战争并不是一个进行实验的好学校，因为俄国人始终不肯中计进行舰队作战。但是战斗使人人确信蒸汽动力将长期应用下去。例如，1854年10月17日从海上炮轰塞瓦斯托波尔时，虽然盟军无甚战绩而敌方也没受多大损失，但英国的10艘战列舰中有两艘、法国的11艘战列舰中有三艘是可以利用蒸汽动力的，它们显然较其他的战列舰更为有效和弱点较少。而在敖德萨发生较小军舰间的战斗时，蒸汽动力的军舰表现要强得多。

但这并不能使英国海军部相信风帆必须淘汰。相反，他们的结论是舰只必须兼有两种推进装置：正常巡航用全套帆具，紧急时用辅助蒸汽机。这里也有个通常抱审慎态度的问题。如果说帆船的战术能力差，难以自由行动，它在战略上却是非常强的，在此以前和以后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优势。它的“续航能力”是最强的，无须借助外援的活动半径比在它之前的划桨船和在它之后的蒸汽船都更大。它跟前者不同，宽大的船身和深深的吃水为装载供应品提供了足够的地方；它也跟后者不同，其推进力——风不需要燃料间来储存。而早期的汽船不仅需要煤，需要与其所产生的动力相应的大量的煤，而且不管船是在什么地方都非得有煤不可。这就难免要有两种昂贵的附属设备，或要其一，或两者都要，这便是经常得有大批运煤船伴随着，或者得有分布广泛的加煤站；而且说到底，加煤站也得要许多运煤船。英国最初是两者都没有，因而不能在缺少它们的情况下贸然完全改为蒸汽动力。海军活动很少远离本国的一些大陆国家也许可以冒这种风险，但是英国在全世界承担着帝国义务，它不能这样做。因此这次又是远洋利益较少的法国定下了步调。

1859年，法国建造了“光荣号”（5600吨），也是迪皮伊·德·洛姆设计的，虽然叫作护卫舰，但按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一艘硕大的蒸汽战列舰，比以前的一切舰船都要先进得多。英国必须再次作出反应，于是它造了“勇士号”（1860年），这可能是历来建造的军舰中变革最大的军舰，它具有各种新的性能，在后文中将予论述。这里只说它的巨大重量——9200吨和它那全套的螺旋桨机器，但它仍然是一艘桅帆齐备的帆舰。

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海军政策则更难为其辩护，英国落后了。它进退维谷，有两重困难，一是煤的问题，二是对手们在蒸汽方面的进

展。但是它摆脱困境缓慢，对于风帆过于偏爱。它不得不付出代价，而且代价很大。将近8000吨的皇家海军军舰“首领号”，是应一位性格坚强但不循规蹈矩的考珀·科尔斯舰长的迫切要求于1867年在疑虑重重下建造的。该舰具有一切最新的改进装置，连炮塔都有，这使它变得很重，但干舷低得很危险，只有不到七英尺。而最重要的是，它不仅具有全套桅帆，并且还都装在上层甲板上，安装得很高以避免影响火炮。当它于1870年9月在西班牙沿海遇到大风时，由此产生的种种不稳定性就成了致命的因素。它在一阵剧烈摇晃之后便颠覆沉没，科尔斯本人和大部分人被淹死，仅有18人生还。这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仅反对用全套桅帆，而且反对安装任何桅帆。出事以后建造的“劫掠号”（见原文第286页），便只有一根小小的信号桅。就在本时期结束时，蒸汽在经过长期较量之后便这样地替代了风帆。后来桅、桁还出现过，但从此再没有任何战列舰装备全套桅帆。

于是形势大变。军舰远远走到了商船的前面。有关商船的数字表明，甚至到1870年，在英国的全部海运量中，大部分仍是用帆船运输的。那年的560多万吨运量中有450多万吨用的是帆船，帆船以超过4：1的优势领先。^[5]此外英国在用蒸汽方面超过了任何其他竞争对手，并且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因为从长远看，改用蒸汽几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帆船需用桅杆，而联合王国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自产这种商品，这种情况在过去曾数次使它狼狈不堪。^[6]但是煤可以自产，且足敷一切需要；在把基本供应品的来源从斯堪的纳维亚转到威尔士之后，它便堵上了自己甲冑上最易攻破的裂缝。

基本材料从木向铁的过渡在此不必赘述。它开始得较晚，结束得较早，所遇到的保守阻力也较小，因为这种过渡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实际的情况是，木材，即使是精细处理过的橡木，由于要承载的物体越来越重，已开始达到其固有的强度极限。更大的火炮，特别是巨大的发动机在船上造成一系列局部重负，不均匀地分布在船体上，致使船只极度受力超过其耐力强度。甚至连加固受力过大部分用的铁支撑，因铁与木配合不佳也不理想。基本材料必须是质地一样的物质，而这必须是铁。

商人们再次带了头，因为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贸易需要的是速度快、容积大的船只，以装置大发动机和运载重货。还要船只不至于遭到炮火攻击——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下面很快就会看到。因

此，早在1815年便用铁来造商船（大部分是小船），而用铁作为建造军舰的材料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进入讨论阶段——贝汉的小型舰艇舰队后来使用的便是这种金属。30年代铁在商船建造上取得了长足进展，1839年I. K. 布鲁内尔大胆造出了第一艘铁质远洋客轮“大不列颠号”。在同一年，东印度公司得到两艘铁质炮舰，其中一艘“复仇女神号”在对华战争中表现出色。1840年“多佛号”（邮轮）成为皇家海军的第一艘铁质船。美国随起仿效，在1842年建造了“普林斯顿号”。当时看来这种材料将会压倒一切，特别是英国海军部在1843年以不寻常的热情定造了六艘铁壳明轮护卫舰。

但这时出现了反对意见，这次并非来自官方的审慎，而是来自非官方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他们的呼声是“不许碰我们的‘木制壁垒’”，海军部也不得不向这场风暴低头。1849年举行的一次火炮试验就炮火轰击铁壳船体的弹片效果提出了一项不利的报告。也许对木材的“兴趣”在这里起了不适当的作用。但是其直接后果是决定性的：这些铁壳护卫舰被降为非武装的运输船，其中之一的“伯肯黑德号”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于1850年在南非附近沉没。然而猜疑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法国沿同一方向进行试验（再次先于英国），在差不多同时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回到了使用木材。于是俄国居领先地位：正当英法两国后退时，它自1850年开始向英国定造了一系列铁制炮舰。

下一步也是由俄国先迈出的。1853年11月，它的黑海舰队在锡诺普发射爆炸弹的新火炮歼灭了一支土耳其木制舰队。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接受这一重大事件的教训很慢，但在此以后有一派人越来越对1849年报告的结论表示怀疑。因为锡诺普战役暴露了木材的一种多少被忽视了的特性，一旦爆炸弹得逞，这一特性必然会成为致命的弱点。铁不会燃烧，而木材会。俄国人在开战后不肯进行舰队交锋，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盟国的军舰没有一艘是铁制的。

战争结束后法国再次领先。我们已经提到过，1858年它建造了“光荣号”。该舰船体虽非铁制，但它用于装甲；这件事促使英国下了决心。英国的想法这一回很合逻辑。它几乎已相信未来属于铁制军舰。锡诺普海战提出了燃烧的问题，还有发动机和大炮的“重量”问题，但这时有人又提出最后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如果说木材只能勉强承受非装置不可的发动机和大炮，那么它怎么能经受住再加上一种

更重的东西——装甲呢？于是英国人建造了“勇士号”，并给它披上装甲，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他们比对手高明，大胆地完全用铁建造了它。

这样，木铁之争便十分迅速地结束。其他国家马上群起仿效英国。1861年以后一切战舰都用铁来制造，直到1885年被低碳钢取代为止。

从长期观点来看，“从木到铁”使英国获得与“从风帆到蒸汽”同样的利益。在使用木材时期，英国已有好几次因国内船用木材的匮乏而濒临灾难。但是一旦由铁取代之后，这一危险就永不再现。英国地下的铁较之地上的橡树要多得无法相比。

随之而来的是在进攻方面，即大炮的改进，其变革程度也并不稍逊。发射球形弹的铁制滑膛炮曾走过一段长途，虽然炮架有过不少改进，但炮本身却无基本变化。实际上，1545年与“玛丽·罗斯号”一起沉没的新炮与3个世纪后的标准舰炮在制造或结构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射程和射击精度上也无重大改进。造成这种显然奇怪的停滞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改变的动力，这在英国尤其如此。根据英国所有杰出军人的理解，战术经验告诉他们应当尽可能近地靠拢敌舰，以便进行猛烈轰击促使其投降。在此情况下，射程和射击精度便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纳尔逊本人的说法便可代表这种态度。当他得知一位朋友要介绍一个对于大炮瞄准有某种设想的人前来时，他写道：“至于那个计划……我当然要研究一下，如果有必要也愿意用它。但是我希望我们将像往常一样能够尽量靠近敌人以使弹不虚发。”^[7]上面的着重点并非出自纳尔逊之手，但是这种观点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英国军官中是普遍存在和无人反对的。

最终改变这一切的是用填充炸药或燃烧材料的空心弹头取代了实心弹丸。不出所料，这一回又是法国人当了先锋。对他们来说实心弹丸并非制胜武器。贝汉再次站在前列。他鼓吹使用的是发射空心弹的炮，这并非由来已久的只能把空心弹抛到近处的臼炮，而是普通的低射弹道炮。一切实心弹丸将毫无例外地全部废除，而用一种标准型的空心弹代替。贝汉不搞折中。他按自己的意向行事，但开始时只做到一部分。公众舆论对装炸药和能燃烧的炮弹表示反对。贝汉自己也承认，这种武器被认为是“可憎的”。这样的人道主义是极可称许的

（虽然另一种动机——对空心弹的可靠性没有把握——可能也混杂在内）。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罪恶的日子被推迟了。他提出的标准化意见虽被采纳，但直到1837年空心弹才原则上获得承认。

这是做出巨大变化的信号。英国远远落在后面，它甚至尚未把武器标准化。但是这时它发现不仅法国，而且丹麦、荷兰、俄国和瑞典都已采用了这些新东西，它被迫采取行动。幸好它当时已有了一个炮术训练中心，可以进行试验、演习和培训。中心设于朴次茅斯港的皇家海军军舰“卓越号”上，开办于1830年，到1832年成为常设机构。但是英国和它的对手们一样，并未一路向前干下去：它采取两种形式，将两种炮都标准化，一种是老式的实心弹丸长管炮，另一种是新型的短空心弹炮。这种做法并不仅仅由于保守思想。老式炮无疑仍有着三大优点：比起当时的空心弹炮，它的射程远得多，射击命中率高得多，穿透力也强得多。

因为空心弹仍然不过是空心的圆形弹而已。它打老式舰船足够厉害，因为这种舰船赖以防御的只是无装甲的木头，全世界都从1853年的锡诺普战役中了解到了这一点。但是用铁材的话，只要很薄一层的新式装甲（在当时还是一个试验课题），就无疑可以对付圆形的空心弹了。克里米亚战争使人们认识到（也是对武器发展的主要贡献）空心弹本身大有改进的余地。这种改进一实现，它几乎立即导致现代火炮和现代炮弹的产生。这两种东西变革了一切，弥补了老式空心弹的弱点，并创造了一种比过去射程远得多、命中率高得多和穿透力强得多的武器。

这方面的改进太迟了，以至几乎来不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进行试验；然而在战争末期，英国人确曾造出兰开斯特炮，它发射一种可以旋转的炮弹，它并无膛线而是让炮弹在一个略呈椭圆形的炮管中纵向地旋转。这太原始了。但在同年出现了一种高级得多的炮，它对火炮革新的意义比“勇士号”对造船革新的意义还要重大。

火炮革新方面的伟大人物是惠特沃斯和阿姆斯特朗。前者在造炮上引用了基本上已属现代性质的精确性：过去造炮时以几分之一英寸计算，而惠特沃斯是以几千分之一，甚至几万分之一计算，这样就把制炮业和射击术从难以捉摸的技术王国转变为一种极为精确的科学。阿姆斯特朗主要是个发明家。他在1855年造的炮是第一门真正的现代武器。它发射一种细长的圆柱形炮弹，炮管内的膛线使炮弹顺着自己

的长轴旋转；同时这种炮在结构上也进行了革新。摈弃了铸造成一体的旧原则，采取了后来制火炮一直遵循的新原则。这便是组合结构，由不同的部件组装成火炮：一根用锻铁造的内炮管，外面是起加固作用的圆筒，在两者之间是一层由长铁条绕成的铁套，铁条是加热到炽热时绕到内炮管管身上去的，冷却后就把内炮管紧箍起来。这种炮又是后膛装填的，但在这方面不大成功，炮栓闭锁装置是它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虽然阿姆斯特朗的其他主意被采纳了，但造出来的新炮仍然是前膛装填的。在这点上法国人发明出关键的“断线”（interrupted thread）原理。实际上英国这时落后于对手若干年，直到1880年才再次采用后膛装填，它几乎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海军大国。

在防护上，装甲乃是阿姆斯特朗炮导致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1788年便有了可资汲取的教训，当时塞缪尔·本瑟姆爵士指挥一支俄国分舰队，在黑海发射燃烧弹消灭了一支比它强大的土耳其舰队。教训在于炮弹意味着火，而火是木制舰的宿敌，是应当不惜代价避免的。贝汉在当时已表明他认识到这一点，他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便鼓吹改用铁材和装甲，但他未能使自己的同胞相信他的想法。其他先驱者也不比他更为成功。早在1842年美国国会便拨款建造一艘能抵挡实心和空心弹的蒸汽军舰，但一直未建成。次年，法国的拉布鲁斯建议造一艘有着装甲舰桥的快速铁制护卫舰，亦未获得同意。实际上，一切都要等到1853年空心弹在锡诺普战役中再次表现出自己的特殊威力。

即使在那时，英国还在犹豫不前。但法国并不这样，当时拿破仑三世在位，他自己就是一个不错的火炮专家。他匆忙定造的“浮动炮台”刚刚准备好进行实战试验，在1855年10月17日就轰击了金伯恩。“浮动炮台”是一些小型木舰，在17英寸厚的木壁上贴有铁板。它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有限任务。俄国的实心弹丸被舰壁反弹出去，空心弹虽在击中时爆炸，但几乎没有留下创痕。经过这次交战便很清楚，装甲足以对付空心弹。但这不过是这场发展中的大搏斗的开端。防护暂时占了上风，这就迫使进攻必须赶上来。正如浮动炮台是整体铸成的老式滑膛炮所发射的老式空心弹的直接结果一样，新式组合炮发射的新式炮弹也是浮动炮台的直接结果。因此，这一矛与盾之间的拉锯战从此便没有停过。

英国人似乎对金伯恩所证明的事实也无动于衷。虽然他们出于责任感也制造了类似的浮动炮台，并把装甲板钉在铁船身上从而使它们有些改善，但他们不肯迈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把装甲原理用到重力舰上。然而做事一贯合乎逻辑的法国人造出了“光荣号”，沿吃水线围了一条四又四分之三英寸厚的装甲带。英国人虽然可以不理睬金伯恩的经验，但他们不能对英吉利海峡对岸有一艘无法击沉的战列舰置之不理。于是他们以“勇士号”作为回答，从而重新走在前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铁制的，而它的对手是木制的。

到了1860年，火炮对装甲——攻击对防御——的大争斗统一起来了。其结果，老式舰船残存的特征很快被全部扫清。首先，人们发现不可能用厚到能抗御新式炮弹的装甲把全船覆盖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把全船的要害集中到一个“堡垒”或据点里。这就立即影响到已有350年历史的结构：舷炮。一旦“堡垒”或“炮塔”的设想被接受了，没有装甲的舰首和舰尾便不能再安装炮和引擎，而只起提供足够浮力的作用。打击力量必须集中在中心武装部分，而为了弥补必然要减少的炮数，炮必须更大些，并发射更重的炮弹。

使舷炮遭到淘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一直存在着一个特有的弱点——火力范围受到严重局限。这些炮都朝着一个方向（只能略有偏动）——与舰船航向成直角。因此，开火时必须用整个军舰来进行瞄准，改变航向，军舰不是朝着敌舰，而是横了过来。在舰只具有了新的机动性和火炮数量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看来效率低下到无法容忍的地步。火炮必须装置得能在舰上自由摆动，旋转弧度要尽可能地大，最理想的是360度。

“堡垒”原则和“机动炮”的想法相结合，在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炮塔”，这是一种重装甲的旋转炮台，在保护火炮的同时，也能够全方向开火。正是这种炮塔给予了两艘装甲舰——埃里克森建造的“班长号”和南部同盟的“梅里马克号”之间于1862年3月9日在汉普顿锚地的首次交战以如此重大的意义。

这两艘军舰基本上都是怪物，匆匆地设计和建造出来，以用于作战而不是航行，因而也都不适宜航海。“梅里马克号”只不过是一个浮动的（但是固定的）炮台，在22英寸厚的木壳上加了4英寸厚的铁板，只有10门炮，大多数是滑膛的，舰首还有一支可怕的撞角。“班长”不过是个勉强能浮动的炮塔（它的干舷只有2英尺），披了8英寸

厚的装甲，装有2门口径特大（11英寸）的滑膛炮。说来奇怪，这次交战没有分胜负：尽管打了4个小时近战，舰身的损伤和人员伤亡却极为有限。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一回是用新式防御装甲来对付老式炮的进攻。这次作战行动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两种武器发展的影响。

第一是撞角，两舰各有一支。3月8日“梅里马克号”用撞角撞沉了北军的小木舰“坎伯兰号”。撞了以后撞角便留在小木舰上了，这也许是因为它在次日撞了“班长号”后对方并未遭损伤的缘故。

“班长号”也努力用撞角去撞，但是略偏了一点。因此，没有获得什么证据来证明用这种武器去对付铁的效果。但是撞角给人的印象很深，四年以后似乎得到证实。那是1866年7月20日，在亚得里亚海的利萨附近，雄心勃勃的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格托夫以全速将他的旗舰撞进最优秀的意大利军舰之一装有铁甲的“意大利国王号”，穿透了它的装甲，戳开的大洞达300平方英尺，使它立即沉没。因此，到1870年撞角已经最为盛行。但是新的进攻武器赶上了防御武器，并揭示出撞角的致命缺点：有效距离太近，撞角很快丧失了它的地位。它的确能致敌于死命，但是面对一门在它逼近之前早就会将军舰击沉的火炮时，它是毫无用处的。

汉普顿锚地战役的更富生命力的经验是炮塔及它所提供的全方位火力。这并非纯属美国的发明，因为科尔上校关于第一艘装有炮塔的英国军舰“阿尔贝特亲王号”的计划，在汉普顿锚地战役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前便已获得批准。同时，炮塔直到1870年也还未取得彻底胜利。它还在跟称为“中央炮群”的另一种炮塔原则相竞争。但是胜利已经在望，因为英国于1869年建造一艘战舰，从而决定了胜负。它便是炮塔战列舰“劫掠号”，由科尔的对手E. J. 里德爵士设计，于1873年完工。它集合了各种新东西，从而不负“第一艘现代战列舰”的盛名。

从此1830年的“主力”舰便消失了。这种军舰单纯以风帆推进，用木材建造并没有任何其他防护；它的舷侧有多门铸铁滑膛炮，其方向几乎是固定的，发射不爆炸的球形实心弹，弹重很少超过32磅，有效射程不超过400码。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吨位四倍于它的庞然大物，单纯用蒸汽动力螺旋桨推进，全铁骨架，用一条10英寸厚的装甲带保护；旋转炮塔的装甲是14英寸厚，内装四门重35吨的部件组装、机械操纵、膛线炮膛的大炮，发射重700磅的圆柱形旋转炮弹，能够穿甲爆

炸，能在4800码内造成严重破坏，射程可达1万码。上面两类舰只，一类属于“胜利号”型；另一类基本上属于“无畏号”型，虽然在细部上未必全然一致。

那些典型的现代武器，如水雷、潜艇和鱼雷，在此不能详述，因为它们只是到了1870年以后才真正具有威力。但是它们在1870年以前便都已存在了。基尔港在1848年曾布过漂流水雷作为防御手段，但并未经过实战的检验。俄国于1855年在波罗的海最先认真利用漂流水雷。布伦的潜艇“潜水者号”于1863年下水；第一次致命的潜艇损毁是北部同盟的“胡萨托尼克号”，它是1864年被南部同盟的一艘叫“大卫”的只能半潜水的小艇击沉的。北南两军中英勇无畏的美国人那时已把原始的鱼雷捆在小船的木杆上或斜拖在船后，去冒自杀性的危险。甚至最早由奥地利设想的“鱼”型鱼雷，也于1866年由怀特黑德研制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东西虽然有的可能是英国最先主张的，但却都不是先由英国使用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跟前面一样。它们开始时都是海上小国的武器，这些国家想不花费维持巨大舰队和精巧舰只的代价便取得垂涎已久的主宰海洋的能力，都盘算着牺牲小卒来换取敌方的将帅。因此，在上述种种新武器上英国都是先按兵不动，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最终不得不仿效，有时赶上去，偶尔也处于领先地位。

纳尔逊和他的前人们是在比较简单的舰船上运用比较简单的武器。的确，海军工作在他们的时代里并非完全不科学，但基本要求几乎是英勇、领导能力、纪律、忠诚和经验这些抽象的东西，而不是关于高度专门和复杂的设施的技术知识。到1830年时情况仍是这样。

然而，到1870年，舰只和上面的设备已成为非常复杂的机制，所有这些舰上必得有人通晓并进行操纵。因此，人员显然必须随着装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人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这任务是双重的。人员在获取专门的新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得失去原有的抽象品质。正如伟大的美国人法拉格特所说，舰船的钢铁不如水兵的钢铁意志重要。

直到1815年，英国海军仍然采用行之已久的人员分类，使用大范围的称号“军官”“准尉”和“士兵”（现在改称“水兵”）。但是

上述各等级之间的差别极大，常常无法逾越。军官不论在地位和职权上都是最为重要的。他们都是“执行官”（不论平时或战时都负“指挥”责任）和“作战官”（所有战斗的主要参加者）。只有他们能被称为军官。他们包括全部将军、校官和尉官，其他的都不在内。这时中尉[1860年称sub-lieutenant，但1840年是以大副（mate）的名称最先列为一个正式级别的]这一级别已经出现；海军军官候补生这一级别已经正式实行。但他们并不是军官，正式来讲他们是水兵，而在具体工作中并未受如此对待，他们实际上是军官的胚胎。准尉——“部门”军官——的范围比现今的要宽，因为它不仅包括水手长、炮长和木工长等人（现在称“特别任务军官”，虽然在本质上与以前并无不同），还包括所有的“专业”军官，如事务长、医生、牧师和教官，而这些人现在是被任命为军官的。作用重要的轮机军官当时还不存在。剩下的都是水兵，舰长有权从中挑一些当军士，但这些人也只不过是本舰内暂时提升而已。

到1830年，上述做法几乎未有改变。在“军官”和“准尉”之间仍存在着一级难以攀登的高台阶。各类人员所穿的制服及其纽扣都截然不同。军官在舰队生活的等级制度中独特的威望仍然未曾动摇。

整个军官团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权利的特殊阶层——几乎是一个社会集团或俱乐部。它限制极为严格，甚至比在大战时期更难加入，大战时因追求数量有时降低了“质量”。但是在目前，需要用的人不多，于是仍然普遍采用的“关系”或“保护”的做法便往往向其他人关上大门，只吸收军官阶层成员认为社会地位合适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亲友。因此，海军的世袭性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这种特性常常在历史悠久的军种中表现出来。19世纪中叶的海军名录中某些姓氏不断重复出现，揭示出这时主要是“海军世家”的时代。

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一职业显然是不稳定的，不能提供铁饭碗。退休后待遇也不高。一般的军官实际上是在职的少，离职的多。甚至级别和资格的原则在理论上也未得到承认，虽然后者是被严格（极为严格）地应用在上层军官中。当时通行的规矩仍然是，凡是担任“任命舰长”的人都论资排辈，从此便不能逾越同事或被同事逾越。这一点再加上另外三个原因：即上次战争中人员大扩充造成了海军名册中人满为患，保留下来服役的舰只很少，缺少恰当的

退休制度——这一切给升迁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情况最糟的时候，年逾古稀的老将在统率舰队，年纪不轻的校官和尉官任舰上的军官，军士和候补生想成为军官往往根本达不到，如果他们坚持等下去，便会失望到老。这种做法有双重不利之处。一方面任用的人年龄过大，另一方面那些风华正茂的人常常受到冷落，而在等待期间不得不去另谋职业。因此，便出现了军官为外国服务的现象，如阿布尼·黑斯廷斯（为希腊）和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为葡萄牙）；或是为私人所雇用，如麦克林托克（对富兰克林^[8]的遇难情况作出说明的人）和艾伦兄弟（考察尼日尔的探险者）。同一弊病在马利亚特、夏米尔和霍华德身上也表现出来，不过境遇稍好一些，这些人在任职的间隔期间能够找到充分的时间来写作关于他们初恋的对象——海军——的小说。

这种状况为恩赐官职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关系”仍然是成功，甚至是雇用的前提。在战争时期，大部分军官终于得到了工作，因为服役的舰只很多。人们在那时利用关系去获取好的舰长职位，但现在要获得工作便需要有权势的关系才行。在这种沾染了邪恶的环境中，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关系须适合。了解何种关系才适合是有指导意义的，但并不容易。对于低级军官——一直到尉官——来讲，将军们和校官们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大部分空缺都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填补上的。而且在这方面甚至大人物也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屈尊去奖赏一个走运的低级军官，特别是当此人来自“海军世家”的时候。例如，在1841年，托马斯·B. 沙利文上校收到海军部给自己的一份公文，文中说：“为了特别表示诸位海军大臣对你在驻巴西期间的工作感到满意，大臣们高兴地提升你的儿子……为海军中校。”^[9]这是纯粹的“海军”关系，而且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因为被提升的人通常是受之无愧，就像小沙利文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这种做法根深蒂固，并被各级军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上校以上的军官必须得到政治人物的保护。最可靠的保护人是海军大臣，因为他是一切任命的直接来源。除此之外最好的是议会人士的关系。这种不健康的影响在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之后逐渐减弱，但这一过程的确是逐渐的。例如，海军上校威廉·狄龙爵士虽然是一位能干的军官，但自1819年到1835年从未任职，尽管在这段时期里他的有力关系是两位公爵：一位是苏塞克斯公爵，狄龙是他的侍卫官；另

一位是“水手王子”克拉伦斯公爵本人。但是，即使有这样好的条件，甚至到1827年克拉伦斯成为（最后一任）重设的海军最高长官^[10]时，狄龙仍未能成功。他最终获得成功，得到一艘军舰，不过这还是在他的王室后台当上国王五年之后。狄龙当然十分不满，举了一些先他入选的例子，并明确指出了这些军官被选中的原因。他们的“保护人”在国会里能够与管任命的人达成某种类似交易的协议，因为这些人掌握着某种东西，可以用之交换报酬！^[11]

对于20世纪的人们来说，像这种公然以裙带关系和恩赐官职为基础的制度竟能产生出好结果来，确实是出人意料的。人才肯定是好的，难以作出判断的是：如果用一种更富有竞争性的方法，其结果会好多少。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军官级人员仍然囿于统治阶层之内；随着先后几个改革法案逐渐扩大了统治阶层，在每个法案通过后不久，军官阶层本身也扩大了，不过总是稍迟一点。

当然，人们不会不注意到，所有军官都年龄过大，人们也常常为此叹息。但是直到无法容忍，即直到战争阴云密布，现役的考验即将来临以前，并无真正改善。改善的办法是现成的，而且对于细心的人来说，早就是非常清楚的。主要的一条便是当局最终必须承认海军是个固定的职业，因而无论何时都得把海军军官照顾好；不仅是在任职时，而且在不任职时和再也不需要时都得照顾好。直到1860年，严格的官方观点——幸而执行起来并不总是那么严格——是军官只有在实际任职时才是军官。作为从实际出发的权宜之计，军官也确实在赋闲期间受到“留聘”，否则一旦需要就无法找到他们。因此，付半薪的制度已经存在，尽管规模很小。不过也就到此为止。支付退休金的义务还是不被承认，虽然有极少数幸运者作为恩赏而拿到了。这并不足为奇。给非全日工作工人支付养老金的观念乃是20世纪40年代的，而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事。

两条性质相同的原则：海军军官在服役时拥有一定的持续任职的权利，以及在不再需要他时应得到充分照顾的退休的权利，几乎在同时获得承认，因而使这一职业大为改观。

政府在1860年对军官任命书的措辞作了一点不惹人注目的改动，从而终于承认了他是一个永久性的雇员。在此以前，每次任职时军官都接到一份叫“上舰任职”的文件，任命他在某一时期到某舰任某职。例如，按规定，他仍然是普通的约翰·史密斯，某舰的（临时）

舰长，而不拥有他有权得到的任何时候都拥有的资格；皇家海军上校史密斯。

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根据一项不事声张的会议决定，他将获得（他的后代仍然保有）一份“总任命书”，在他已达到的级别上一一直都有效。现在对他的任命是“女王陛下舰队上校（或中校、上尉）”了。上述区别是极端重要的。第一个做法使他的任职时续时辍，第二个做法给予他一个固定职业。

另外一个变化是上述变化的自然结果。他一旦成了永久性的雇员，就得允许他——实际上在必要时命令他——届时退休（并给予应有的生活费用）。主要是由于缺少一个命令退休的制度，大战后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为只要军官不退休，而只是（在不需要时）停止任职，便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军官不再争夺升迁，那就是他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1840年的名册上最靠前的20名上校早在1806年时便是上校了；资格最老的中校已当了46年；资格最老的上尉于1841年去世时，已在这一级别上干了63年！

改善的办法还是很简单——把名册一分为二，分为“现役”和“退休”两部分：把那些可能会再次任职的人保留为“现役”，而把那些不会再任职的人归入“退休”。这可以公平地做到。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军官根本不任职，他们只是在阻碍下面的人擢升。通过一系列大批“退休”——特别是在1847年、1851年和1864年——大刀阔斧地裁员，终于建立了一条通畅的升迁途径。但只是到1870年才分别刊印了“现役”和“退休”的名册。就在那一年，不再存在以往那些保有职位但只是部分时间工作的人，而出现了全部时间工作的拥有军阶的现代军官。

与此同时，在军官职业生涯的另一端——参军和初期训练——发生了具有同样决定性的变化。多少世纪以来，未来的军官都以某位舰长的被保护人的身份第一次出海。这种“舰长的仆人”成了唯一的方法，直到1676年塞缪尔·佩皮斯创立了一条现在被叫作“海军部任命”的规定时为止。但是即便佩皮斯的计划也并未涉及绝大多数候补指挥人员，这些人继续用“舰长的仆人”的名义参军，直到这种名称——但并非其实质——于1794年改为“一级志愿人员”。在这种状况下，裙带风和关系学起着早已注定的作用，实际上助长了等级制度的延续。

极少数并非通过与个别军官商定而加入海军的人，在佩皮斯时期被称为“指定志愿人员”（Volunteers-per-Order），俗称“国王的信差”（King's Letter Boys）。他们在18世纪一直存在。1829年他们的代表是朴次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80名学员。在这一职业中，海军部只有对这些人的最初任命才拥有发言权。到1830年，学院作为青年人的训练场所即将告终。在职的将军和校官们从来不喜欢这个学校，它直接侵犯了他们最珍贵的既得利益——挑选接班人的权利。但是海军部本身通常是支持学院里的学员们的，这部分地是因为这些人是他们挑选出来的，但主要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教育。十分自相矛盾的是，恰恰是由新的技术专门化所带来的这类教育的必要性，结束了学院作为训练场所的命运。在1829年，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一直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任何训练的年长军官跟年轻人一起入学；8年后他们便把年轻人通通赶了出去。在以后的几年里，所有志愿人员都直接去充当水兵。

这种变化不论在培训或是在入伍方面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像是倒退，因为随着这一变化，海军部不断配备上过大学的教官来从事一些海上培训工作。在入伍方面，几乎就在同时（1838年1月），不声不响地采用了对全部志愿人员进行考试的做法，不管是学院培训出来的还是由军官挑选的都一样。这是导致重要改变的一个开端，因为考试本身最初不过是一场滑稽剧，但它的存在说明考官（即海军部）有权不录取某个考生，从而也就最终保有了选择权。1839年规定了对下一个级别即候补生进行考试。这是实在的考试，因而此后海军部便具有了挑选除年龄最幼者外全部“青年绅士”的权利。自此以后，高级军官的这一既得利益趋于消失。这是通过一系列小的削减而取消的，1870年以前只有过两次。1848年，政府对每个高级军官提名推荐的人数作了限制；后来在1870年又规定提名数必须比空缺数多一倍，通过考试决定取舍。这一“有限竞争”对于军官提名制度是一个大打击，因为此后便不能保证军官所选的人一定会被录取。这是向不可避免的公开竞争观念迈出的一大步。在陆军和文职官员中也有了类似的规定。但是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1913年才以国家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与此同时，面临装备方面的变革，培训工作也有了进步。1857年彻底改变了让一切志愿人员——1843年以后正式称为军官候补生——不经培训便上舰出海的政策，所有的人都得在训练舰上开始受训。最

早担任这一工作的是“卓越号”，不久（1859年）便代之以“大不列颠号”，该舰在经过几次实验后于1863年永久碇泊于达特港。

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于英国许多年。1845年，精力充沛的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在安纳波利斯建立了海军军院，该校至今仍然享有盛名。他的做法远远超过了英国人，因为朴次茅斯只不过培训了全部军官中的一小部分，就是“大不列颠号”也不具备安纳波利斯那种理论上的“教育性”，虽然也许具有更为实际的“海军性”。只是在奥斯博恩（1903年）和达特茅斯（1905年）的两所学院建立之后，英国的全部军官候补生才首次在陆上接受初步训练。

在此期间设在朴次茅斯的旧学院因有了新学员（但年龄要大一些）而保存了下来。随着专门化的进展，课程大大增加，海军船坞内的建筑物已经容纳不下他们了。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在格林威治的雷恩大医院内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数字日益减少，这部分地是由于不打仗和没人受伤，但主要是因为允许他们在外领取养老金而不必住在医院内。于是，当这所医院在1869年关闭时，在朴次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便迁往那里。1873年实现的这一迁移，首次给了海军以一个海军军事科学理论学习的中心基地。

就这样，在上述短短一段时间里，对整个入伍和培训的过程进行了变革。1830年时的制度与佩皮斯时代并无不同：除极少数人外，都是靠关系入伍；训练在舰上实地进行，而理论教育则在哪里都不搞。到1870年时，专门化的必要性导致了现代制度的基本确立。

迄今为止，涉及的都是“指挥”或“军事”官员，即将军、校官和尉官。再者，这些人在1830年时是仅有的“军官”，他们的官职是由国王任命的，即仅有的“有军衔的军官”。在这些人和其他所有“委任状”委任的人员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不论是在“军务”上还是在社交上。但是，到了1870年，这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王任命已不再是垄断着它的特定集团紧扼不放的特权，它扩展到其他各部分：如领航、军需、医生、牧师、海军教官，也许最有意义的是轮机师。

首先是领航，即航海专家们。他们当中资深的代表于1832年被授予军衔。类似的特权在1843年授予军需、医生和牧师，在1861年授予教官。轮机师的地位不同，有一段时间还很困难。他们是自然而然地

跟着自己的蒸汽机一起上舰的，在1837年才确定为正式人员，但这时还没有一人是有军衔的军官。1843年的改革中他们被忽略了，但其中最资深的在1847年被任命为军官；自此之后，随着人数和技术水平的增长，他们的级别和地位也上升了，尽管上升的速度比他们所期望的要慢得多。到1870年时，一位最资深轮机师的军衔与一位资深舰长不相上下。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指挥军官和轮机军官是从不同社会阶层中吸收来的，他们之间显然存在的猜忌主要是由这一情况造成的。新来者，主要是技术人员，在扩大军官的阶级基础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双方对这一点都很清楚。轮机师不能不看到自己在一支全蒸汽机的舰队里前途广阔，指挥军官则不能不对此感到担心。于是，在这一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前者拼命要求提高地位，后者则尽力往下压他们。从1847年至1903年，海军继续称资深的轮机师为“船上机械检查官（或主任检查官）”，而不称为校官（或将军），这样做大概并非偶然。尽管如此，“海军世家”专有领地的被渗入仍然是时代的特征。这是新技术时代的直接结果，它在特权堡垒上打开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

这样一些一般性原因影响到水兵的性质和他们的服役期限。到那时为止，英国的海军人员基本上是非固定的；几乎所有的水兵都是如此，但战斗兵就不一定这样。在1830年及以前在海军中从未有过长期服役的。大部分人是平时当商船水兵，战时当水兵。两者之间的转换主要是通过实行强征服役制来完成的，这一制度在1830年时虽已过了黄金时代，但还未根绝。这是一个坏制度，常常受到正当的责难，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是它的最盛时期，因为这几次危机比过去的更长也更严重，使英国的海军人员紧张到极点，甚至超过了极点。早在这些战争结束前很久，整个出海人员便严重不足。结果是不得不录用没当过水手的人当水兵以补足乘员数；这种权宜之计反过来也暴露了强征服役制的毛病。问题解决得太晚，而且又用不明智和不公正的办法去解决，使国家以极大的代价获得的仅仅是岸上居民中的一些渣滓。

问题的根子在于海军这个职业对于志愿人员来说太无吸引力了。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强征服役意味着强迫拘留，许多受到这种胁迫的人只要可能就会逃跑，于是水兵便不可能请假自由上岸，这样一

来军舰实际上变成了监狱。但是自由人不会自愿进监狱，于是只好强迫征募来逼他们入伍。

另一件坏事是强征服役制使政府不必作通常的经济考虑。船主们经常得进行竞争，因而不得不保持适合当时的生活和工资水平；但政府由于有强征服役制撑腰，用不着这样做。当战争来临时，一般的水兵并不是不爱国。但是军与民两种职业给予的待遇极为不均：在商船队里比较舒适和安全，工资待遇极好（因为在战争期间，水手在商船和海军中都是市场上的紧缺商品）；而在皇家海军里，伤亡、住得拥挤、工资待遇相当差，工资发放起来又很不公平。在商船上，没有强迫服役，没有监禁；在军舰上，监禁还要加上粗暴和伤痕累累的惩罚。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志愿人员，如有志愿人员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些有头脑的人，如威廉·普尔特尼（在1786年）、马利亚特上校（在1822年）和其他许多人经常提出可能起弥补作用或部分弥补作用的建议。没有人打算取消整个强征服役制，如果别的方面不跟着一起改，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作战舰虽必须要找到，水兵们本身也接受这一点。但是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所有的海员必须进行登记，以便使大家平均负担巨大的从军义务；第二，对所有水兵的服役期要给予明确的规定。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改善工资待遇和薪饷制度，以及建立固定的养老年金制度的建议。这些改革本来会使海军水兵的生活好一些，再加上排除一部分难以置信的艰苦状况，志愿入伍的情况将会改善。但是这些都只是建议而已。

1815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这只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水兵能够退伍了。并未有意识地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强征服役制并未废除——实际上在原则上从来没有废除过。但是，不知不觉地迈出了相当明显的第一步去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在水兵们的逼迫下，政府从1797年起逐渐改善了薪饷待遇（及其发放办法）和海军舰只上总的生活条件。这些措施，加上和平时期的需求量小，自然使皇家海军逐渐得以在经济上和商船相竞争，这样它的需求便能通过志愿入伍而得到满足。政府一向明白，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志愿兵比义务兵更为可贵：合乎需要的状况终于出现了。

这一状况是在1830年达到的，但它并不稳定。这时绝大部分水兵都是志愿兵了，但这是由于需求量少而不是由于问题已经解决。直到

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海军部任职几年之后，才终于在1836年实现了讨论已久的改革——登记和限制服役年限（最长五年）。

这样，强征服役制那些最坏的方面消失了。志愿征募在英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准则。但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时将会怎样呢？19世纪50年代初这个问题又迫在眉睫，需要加以解决。

答案是实行长期服役，这是英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1853年，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做了法国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做的和佩皮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开始为英国军官做的事——建立海军入伍兵这一新职业。现在一个人终于可以加入皇家海军，将它作为终身职业，而且事先知道全部服役条件：期限、薪饷和养老金。

这个非常好的新计划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遇到舰队兵员现实的和预计的匮乏而出现的。但是改革由于另一原因，不管有无战争势必实行。这个原因与以前一样，是科学对海军造成的影响，海军越来越迫切需要培训和专门化。迄今为止，海员应邀（常常是被迫的）在航海事业的两大部类中轮流服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很大，海员用不了很长时间便能掌握当兵的起码本领。但是以后海军工作是如此的复杂，必须鼓励以海军为终身职业。实际上，这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即按需要花钱雇人，让他们干上一两年，然后毫不客气地让他们离开。现在是一旦招募了人员，他们便得接受培训。再者，这一专门化进程显然还只是在襁褓时期，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为此，建立了长期服役制度，伴随而来的是舰队后备役，当入伍兵服役期满时，便进入后备役。这一计划开始时遇到暂时困难，海员们的脑际仍然萦绕着往日极为不快的回忆，他们对上述计划的最初反应很不热情。但是这一做法确实照顾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最后终于作出了响应。这便是英国“蓝夹克”（水兵）这个十分受人喜爱、人们最熟悉的形象的由来，它出人意料地现代味儿十足。这是因为国家在首次给水兵发制服时选定长期采用“蓝色”（以及夹克和喇叭裤的裁剪式样），这种颜色当时恰恰也正在流行。

新的称谓是与地位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的。向来海员们简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动作粗野、言语粗鲁，显得冷漠无情，出海时受到铁的纪律的压制，往往是顺从的；上岸时（很难得获准）则像是在逃的疯子。但他们是些单纯的人，热心肠，彼此间十分讲义气。他

们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阶层，不信任陆上的人，自然，陆上的人也不信任他们，甚至对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地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海员一般不会离开海，陆上也没有人会雇用他们。这样只会使他们更加与世隔离，使双方因互不了解而继续互相猜忌。“一旦为海员，一世为海员”，这一说法既古老又真实。然而当“强征兵”成为“志愿兵”之后，一切都变了。原有的不适宜的纪律可以放松了。1847年便已有一个法令修改了比较残忍的18世纪法令，首次给了军法审判以适当的减刑决定权。其他法令也随之公布，最后都由1866年的海军军纪法所取代，除了细微的改动外，海军直至今日还在根据这一法令进行管理。自那时以后，旧秩序最具有象征性的做法——鞭笞——便迅速地消失了。新法令规定鞭打不准超过48下，海军部在多次指示中希望军事法庭最好不要下令鞭打，并规定执行刑罚要经海军部正式批准。1871年规定鞭笞在“平时”中止执行，1879年又规定在一切时候都“中止”执行。直至今日，它仍然只是“中止”而不是被废除，这是典型的英国做法。

在革除一种坏制度所形成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特点的同时，水兵也在努力保留那些可贵的品质，即其单纯、讲义气和热心肠。全国对他们的态度也随即完全改变了。海军一直为国家所钟爱，被认为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人们甚至公开表示爱水兵，但这是作为整体，而并非水兵个人。对水兵个人，人们只知道他们是些鲁莽的酒鬼，用英镑钞票点烟斗，或者买了金表放进油里去烹炸。然而现在酗酒之害由于减少发酒量而自行消失。1824年，酒的配给量从每日两次，每次1/4品脱酒加3/4品脱水，减至每日一次，晚上用茶来代替酒。1826年将配给量增加1/5，并恢复了晚上发酒。1850年又把当时的配给量减去一半，晚间停止发酒，每人发一笔钱来“代替”。水兵上岸不仅更为经常，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理由借酒消愁，因而人们开始跟他们熟悉起来，并喜欢起他们来了。这样，他们便从几乎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变成了宠儿。再者，他们也不再被迫去经受船上的危险与困苦，他们是志愿来的。因而，至少作为整体来讲，他们成了英雄。人们一心一意地喜欢他们。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成了音乐厅和轻歌剧院里的头号明星——“穿蓝色海军服的活泼小伙子”，“我们大家打心眼里敬慕的水手”；而值得永远称赞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头脑发热。

在考察其他国家的情况时，我们必须严格地把强征服役作为一种办法——强迫和不公正地征募海员当兵——和强征服役作为一种原则

——任何主权国家都有在危急时征召公民保卫国家的权利——加以区别。因为虽然几乎只有英国把强征服役作为一种办法，但是把强征服役作为原则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很普遍的。它实际上是今日的征兵制，即“命令入伍”的制度。任何国家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时都从未废除过这种制度。因此，美国能够自豪地讲自己从未采用过强征服役的办法。实际上，他们在海军方面的努力从来无法与英国相比，因为用不着那样做。他们也不必把伴随强征服役制而来的监狱般的纪律强化到残忍的程度。因此，在英国强征服役制处于巅峰的长期战争时期，美国海军的条件比英国的要好，于是许多英国水兵投向了美国舰船，成为1812—1815年战争的重大原因。在其他方面，传统的纪律两家都差不多，美国海军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它母体皇家海军的做法。

然而，当英国的紧张状况在19世纪30年代松弛后，情况也许就倒转过来了。施加影响说服国会在1850年废除鞭笞的赫尔曼·梅尔维尔，把这种倒转的情况主要归咎于当时的美国军官缺乏经验，他认为他们比起来不如英国军官。^[12]但是即便美国也不能回避强迫征募的原则，南北战争时的“征兵制”基本上就是强征。然而，美国水兵也的确不像他们的英国兄弟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因而当情况倒转过来时，英国水兵的形象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也就未在美国出现。美国水兵作为个人从未受到过那种猜疑，因而也就不曾那样到处被人当作偶像。

法国人干得更好更合理。他们不得不这样干，因为他们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弱点——不管是海军还是商船队都一贯缺乏海员。所以，从1769年起，他们组织了九个师的训练有素的水兵兼炮手，数目达1万多人，基本上都是长期服役。这些人都不列入海军花名册。法国的海军花名册与英国海员登记册几乎一致，不过英国人虽鼓吹很久但从未搞成，而法国人一直充分加以利用。然而恐怖时期毫不负责的政权取消了水兵兼炮手，无缘无故地把这一大优势扔掉，从而造成效率低和不服从命令的后果，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后来的政府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到1830年实际上已实行了征兵制，特别是1835年以后建立了固定征兵制。按照这一制度，自动征召所有年龄到达20岁的海员，从而有了一个常备人才库来提供训练有素的海员，尽管数量并不很大。例如，在1839年，法国海员花名册上总共只有4.5万人，其中1.8万人在军舰上，其余的在商船上。然而，虽然1844年的花名册上只有4.6万人，但从1835年以来已至少有55517名海员受过海军训练。而且，在克

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国人有接触的英国军官，对于他们的效率和造就他们的制度印象极为深刻。

其他国家从未采用过英国的强征服役制，至少从来未有过像英国那样的规模。这一制度显然很坏，而这些国家的海上活动又少得多，他们没有这种需要。他们总的说来倒是采取了与征募陆军类似的方针。那些能采用志愿原则的国家，如美国，便采用了它，但那些“军事”大国，主要是欧洲的，则仿效法国，按照他们实行征兵制的军事政策征召海军，实际上成为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1839年格雷厄姆时期新的海军登记册列入了167013人的姓名。还有21450名练习生，这些人以后差不多都会成为海员，使“人才库”中共有近19万人。但是在这些人中，曾在海军中服过役的可能只有4%。人们还认识到，当战争到来时还会有另外一个方面严重消耗海军兵员。当时私掠制度仍然得到普遍承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仅此一项每年便要损失4.7万名可能成为水兵的人。不愿面临这样危险的消耗，成了美国主张彻底废除私掠活动的主要理由。在采用长期服役办法之后，很快便在1856年巴黎宣言这一国际协定中彻底废除了私掠活动。

这样做，在开始时遇到暂时困难之后，满足了英国的当前需要，但是它又带来了必然随之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法国人这时通过“固定征兵”有了一支以征兵制为基础的真正后备军。英国能够在自己海军已有的志愿兵基础上建立起一支后备军吗？这是一个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时皇家海军和商船队首次不再从同一来源中召人，而成为各走各的路的不同实体。遇有紧急情况时，当局再也不能匆忙地把不愿干和未经战斗训练的海员驱入舰队，新军舰及其装备的技术性太强，这样做是不行的。舰队的后备兵员，不管质量如何优秀，也提供不了任何大规模扩军所需的数量。只有一个答案，而且幸好它很快就被找到了。建立了皇家海军后备役制度：入伍兵于1859年，军官于1861年。这在实际上改进了皇家海军和商船队之间的旧有关系，新的关系比旧的关系公平得多。海军水兵是志愿兵，海军后备役水兵也一样——商船高级船员和水手或渔民一方面继续从事自己正常的职业，另一方面每年志愿入海军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会复杂的作战新技术的初步基础。这件事不仅本身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而且还为另一个重大

的战时兵源——根据1903年议会法令建立的皇家海军志愿后备役制——树立一个模式。

英国水兵成倍的提高，部分是由于皇家海军及其大陆邻国仍然存在一大相异之处。原先各大国（包括英国在内）主要是从沿海省份招募水兵。根据法律，强征服役实际上只能在滨海各郡进行，抓捕权亦仅限于用在航海人员身上。在大陆各国征募范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但在英国新的长期服役志愿兵变得很有吸引力，而且它本身就是光荣的。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全国各处来参加海军，直到海军人员已不再局限于某些地区（这种局限并未彻底取消，只是就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

军官们也受到了影响，但较小一些。即便在18世纪，海军的赫赫声望和巨大成就足以吸引内地有采邑的家族以及各教区的优秀人员来加入它，有的人还来自统治阶级的府邸。在19世纪，这种扩展的趋势增加，以至今天已难以在地图上指出哪些郡是军官们的主要出生地。但在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中，陆军一直是它们的骄傲，因此海军总是来自某一些省份，在声望上也不如陆军。在英国则两者都并非如此。

为了完成在人员和装备上的革命性变化，另一种在行政上和指挥上的变革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变革也几乎正好是在本时期内发生的。在1832年至1872年这一时期里，皇家海军获得了它的现代管理机构——新的海军部。

直到1832年，指挥和行政还是分开的，海军部负责前者，海军委员会负责后者。这样的组织机构经常出现互相摩擦的情况。它对于简单的老海军来说勉强能对付，而应付新海军则远远不足。1832年，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将这两个单位合并到一个新的委员会中，各负责一个单独的行政部门，由一位直接向议会负责的首脑——海军大臣领导。这样做使行政效率大增，但开始时它走得太远，几乎毁掉了海军部原有的指挥职能。海军大臣现在总是由文职的政界人物担任，虽然他的海军部属能够在技术上向他提出高明的建议，但他发现这些人忙于分管部门的事务，难以向他提供更为全面的方针性建议。这有时——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导致出现一种不妙的局面：海军大臣实际上是在愚蠢地过多干扰舰队司令。这样做导致海军大臣的职务本身在60年代初和休·奇尔德斯多事的任期（1868—1871年）内几乎两次遭到撤销的命运，但是及时地达到了恰当的平衡。严格的部门责任

制无可怀疑的优点理所应当地被保持下来。而如果没有一位负责错综复杂的人事工作的第二海务大臣和一位负责装备工作的第三海务大臣（1869年后称审计长），这一过渡时期内出现的种种令人迷惑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应付的。然而，当乔治·戈申在1872年赋予行政和指挥以现代的含义时，他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现代的海军部。他的三项“原则”是：“海军大臣居于最高地位”，“其他成员各自向海军大臣负责”，“把海军部整体作为一个全面的咨询机构”。^[13]指挥和行政，如同装备和人事一样，在1830年以后实现了巨大的变革，但到1870年才具有了现代的格局。

（华庆昭 译）

^[1] 德雷克（1540—1596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航海家和舰队司令。——译者

^[2] 《新海军》（巴黎，1822年）和《一种新武器……的试验》（巴黎，1825年）等。

^[3] 即1814年以来由“权威界”定期出版的正式的海军舰船名录。

^[4] 致殖民部的备忘录，转引自J. H. 布里格斯爵士《海军的管理》（伦敦，1897年），第9页。

^[5] W. S. 林赛：《商业海运史》，第4卷（伦敦，1876年），第646页。与其他国家的对比颇能说明问题：

国别	帆船	汽船	总额	帆船对汽船的比例
联合王国	4506318	1111375	5617692	4 : 1
英帝国属地	1440682	90759	1531441	16 : 1
美国（登记在案额）	1324256	192544	1516800	6 : 1
法国	917633	154415	1072048	6 : 1
荷兰	474463	84942	499405	19 : 1
挪威	1008800	13715	1022515	50 : 1

^[6] R. G. 阿尔比恩：《森林与海上力量》（哈佛，1926年），书中各处。

^[7] 纳尔逊致贝里上校。N. H. 尼古拉斯爵士编：《纳尔逊公文书信集》（伦敦，1844—1846年），第4卷，第292页。

^[8]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57），英国海军军官和探险家，在加拿大北部探险时遇难。1857—1859年麦克林托克率探险队调查富兰克林遇难情况。——译者

^[9] 引自海军中将诺顿·A. 沙利文保存的原件。

[10] 1827年，英国重新使用Lord High Admiral（海军最高长官）的称号，授予克拉伦斯公爵。不久，又取消了这一称号。参见本书，第9卷，原文第80页。——译者

[11] 海军文献协会，第97卷，第446页及以下。

[12] 塞缪尔·利奇：《来自下甲板的呼声》（伦敦，1844年）；赫·梅尔维尔：《白夹克》（1850年）。两人都从下甲板的角度观察事物，英国人坦率地称赞美国的情况，而美国人也坦率地称赞英国的情况。

[13] 奥斯温·默里爵士：“海军部”（《海军镜据》，1938年，第24卷，第4期，第476页）。

第十二章 武装力量和军事艺术：陆军

战争的手段，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在1830—1870年的40年中发生了比近代史上过去整个时期，或者可以说比有史以来，更为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变化至少从表现出来的情况看是集中发生在这40年的最后10年里。在这10年里，战争中出现的技術、战术和战略上的发展，预示了下一世纪战争的作战趋势和社会形态。有些新趋势也表明了19世纪两位伟大军事思想家的显著影响，他们是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世纪30年代。

许多世纪以来陆军的实力是以人数来计算的，只区分为骑兵和步兵——这两大分支或两个兵种通称为“骑”和“步”。由于存在这种两者具有各自的机动性的区别，在枪炮出现以前人数是计算实力最合适的方法。只要枪炮只是在极短距离方才有效，人数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计算方法，因为枪炮准确性差，装弹慢，使对方特别是骑兵有机会在被打中以前便逼近敌人。即使如此，受过良好训练、使用燧发枪的步兵在齐发时也足以成为骑兵冲锋的巨大障碍，到了拿破仑战争时骑兵显然已成为一支日益缩小的兵种。与此同时，野战炮兵因在战术上集中使用而在拿破仑后期的战役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更有必要把“枪炮”和“步与骑”的数量一起作为实力来计算。但是在拿破仑失败后，炮兵出现了一个低潮，而骑兵则即使其威望还未跟着严重下降，但也并未恢复其势力，因而步兵便日益成为不论在力量上或在人数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兵种了。

在1830年，用人数来计算陆军实力仍有一定道理。但到了1870年，它就不再是一种合理或可靠的计算方法了，因为步兵火器在质量上已取得不同程度的巨大进展，火炮也在较小程度上有了进展。在此后40年中，炮兵武器比步兵单兵武器的进步要快，但是可携带的自动火器机关枪的发展使“轻武器”的力量得以保持。这样，单纯计算步兵或炮兵的人数便成为荒谬的做法了。然而，甚至在20世纪的第一次

大战中，人们仍习惯于用多少千支“步枪”和多少千“骑兵”来计算军队的实力，传统思想就是这样顽固。

在1830年，标准的步兵火器仍然是燧发枪，它是滑膛的，前膛装弹，用一根通条把圆形的铅弹头和火药筒塞进枪管里去。累赘的装填过程造成每分钟很少能装两发以上，往往低于此数。只有很好的枪手才能在50码外击中一个人，火枪要想超过这样短的射程发挥作用便只好依靠紧密排成一行的士兵一齐发射了。虽然带有来复枪膛的火枪被一些轻装侦察部队所采用，但它的螺旋凹线和容易塞住的毛病使装弹变得更慢——装好一颗要用近两分钟——而准确性只比滑膛火枪略好一点。19世纪初的步兵火器是否优于中世纪弓箭手的长弓颇堪怀疑，后者有效射程为200—300码，准确度更高，而且发射速度高于滑膛火枪四倍。

19世纪火器的第一个重要发展是击发式滑膛枪。它使用雷汞起爆药，这种起爆药是在以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福赛思于19世纪初所做实验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他的发明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短暂的兴趣，他被邀请到伦敦塔去继续进行实验。但是保守的军械局很快就将他辞退，从而断送了在反拿破仑的“大战”中用优于燧发枪的火器装备英国陆军的机会。战后不久，别的私人实验家搞出了给引信加上铜帽的办法，使雷管系统更为实用。但是直到1834年军方才听取劝告加以试用，1840年英国陆军才用击发式滑膛枪重新装备。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下，政府给了福赛思区区1000英镑奖金，而钱送到时他刚刚去世！雷管撞针的主要价值在于使哑火大量减少，特别是在潮湿的天气里。

下一项重要的发展是来复线步枪的改进。子弹除非与枪膛贴得很紧，不然便会失去力量和准确性，因为有游隙会损耗推进气体，而如果子弹与枪膛贴紧，装填起来又极慢。出路在于设法造出一种子弹，小得能够顺利进膛，而在发射时又能在凹线里膨胀从而与膛体完全吻合。各种各样能造成膨胀效果的办法被发展改进。最早付诸应用的是1826年由法国军官德尔维涅发明的，当一营非洲轻步兵1838年在阿尔及利亚战役中装备了他的步枪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英国，诺顿上尉在1823年想出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1835年由格林纳先生在设计上加以改进。它遭到了英国军方的拒绝，但在法国却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在那里，米尼埃上尉于1847年进一步改进了设计，被法国陆军所

接受。英国陆军在1851年予以采用，付给米尼埃2万英镑，后来又补给格林纳1000镑奖金，以奖励“首次公开提出膨胀原理的建议”。米尼埃的子弹最初是圆锥体的，但后来改为圆柱圆锥体。这颗长形带尖弹头的子弹底部中空而带有一个铁帽，当发射时铁帽挤进子弹底部的空穴，使底部能够与来复枪的凹线吻合。

弹头的形状加上它能充盈在带有凹线的枪膛里，大大提高了准确性和有效射程。在400码距离内，命中率为发射数的50%；而10年前刚刚开始采用的击发式滑膛枪的命中率只有5%，甚至在距离为800码时，专业射手的命中率也有40%左右。米尼埃步枪最初在1852年用于对南非卡菲尔人的作战中，当时发现可在1300码的距离击溃小股的卡菲尔人。但米尼埃步枪的可靠性与其表现并不相称，这特别是由于弹头无力和膛线太深，于是在恩菲尔德的轻武器工厂造出了改进型。新的“恩菲尔德”步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跟米尼埃步枪一道使用，它超过了后者，成了前膛装弹火器的最后一次改进。

因为这时在外国已迈出了一大步，发明了一种枪槽装弹的后膛来复枪，即约翰·尼古拉·冯·德雷泽在1836年造出并由普鲁士陆军在1841年采用的“撞针枪”。这种枪有一个像门闩那样的枪栓，就跟一个世纪以后通用的步枪一样。当扣动扳机时，由螺旋形弹簧带动的撞针的长而尖的针头便打穿装有火药的纸弹药筒的基座，撞上基座前端的火帽从而引发子弹。这一设计有着多种弊病：针头容易折断或弯曲，枪栓能逸出大量气体而使推进力降低，并造成枪栓生锈。但是，虽然它的有效射程比新式的前膛枪为近，它的发射速度却是后者的三倍，即每分钟7发与2发之比。最重要的是，它使士兵能平卧在地上装弹和发射，这样在敌人面前的目标要小得多。这一普鲁士新武器的价值在1848年和1864年与丹麦的冲突中展现了出来，在1866年和奥地利作战时则更为突出（参见原文第325页）。

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当局一如既往，总是挑“撞针枪”的某些个别毛病而不去考虑后膛装弹的种种好处，同时，节省开支也帮了保守主义的忙。但是这种步枪的潜力引起了军事当局的很大兴趣。1857年到1861年之间，有四种后膛卡宾枪（一种给骑兵用的短步枪）被推荐给英国陆军骑兵试用。美国的四年内战给这一系统的长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部队配备后膛武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参见第24章，原文第631页）。普鲁士人的战绩使欧洲军队受到强大的刺激。1866年，法

国陆军采用了一种由安托万·阿尔方斯·夏斯波研制的后膛步枪，在次年发生的曼塔纳战役中首次使用，给加里波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在1870年战争中，夏斯波步枪比德国的“撞针枪”要优越得多，尽管法军在技术上这样取得的优势被它在战略、战术和组织上的错误所抵消（参见原文第325页）。在此期间，美国陆军在1864年采用了由美国人雅各布·斯奈德设计的后膛枪，在1868年的阿比西尼亚战役中表现惊人。三年后，它被马蒂尼-亨利步枪所取代，马蒂尼也是一个美国人，他设计了击发装置。但是，虽然更为先进的弹仓式步枪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中表现出色，欧洲各国陆军采用这种式样的步枪却在很久之后——德军于1884年，法军于1885年，奥军于1886年，英军于1888年。

伴随着步兵武器的发展而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骑兵作战的局限性日益增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骑兵能执行他们传统的任务，但代价甚巨。在美国内战中，骑兵不久便改为在战斗中下马作战，从而变成具有一定机动作用的骑马的步兵。欧洲陆军对于这一教训置之不理，但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很快再次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训。在色当战役中，德军用过时的撞针枪发射一阵排枪便粉碎了法国骑兵的冲锋。但是传统和感情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足以压倒现实感，以至欧洲各国陆军继续保持大量骑兵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在1914—1918年的大战中，它们的领导人仍沉溺于再现早年一举定局的骑兵冲锋和追击的黄粱美梦。

火炮的进展没有步兵火器那样快，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不少滑膛炮改加了膛线，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收效惊人。它们在射程和准确性上的长处是如此显著，以至除了加上膛线外，还大力推动了后膛炮的发展。到1870年，带膛线的炮已广泛使用，但前膛炮仍为多数军队所喜爱。1860年英军在对华战争中试用了一种后膛炮，使用者提出了有利的报告，但反对革新的偏见极大，于是宁肯使用一种改进型的前膛炮而摒弃后膛炮的观点一直持续到1886年。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炮兵配备的是后膛炮，法军则仍是前膛炮。对各次战役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这种装配上的差异，加上高超的炮兵战术，使德军占有决定性的战术优势，压倒了法军夏斯波步枪对德军步兵撞针枪的优势。

德军炮火在一英里以外便摧毁了法军步兵的进攻，这一距离使法军无法有效地使用夏斯波步枪。德军在进攻时最初急于逼近敌人而等不及自己的炮兵扫清道路。因此，特别是在激烈的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中，他们未能利用炮兵在质和量上的优越性所提供的决定性优势。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的左翼倒在法军步枪手的顽强火力之下，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而格拉夫洛特附近的右翼有一部分陷于混乱，惊慌逃走。只是由于法军司令官巴赞元帅迟疑和不当的指挥才让德军最后得以取胜。德军步兵自此学会了耐心。使麦克马洪元帅的军队在色当陷入围困的战略行动，是由600门火炮组成了包围圈而决定胜负的。炮火摧毁了法军所有的突围攻势，迫使一支8万人的军队投降，而胜利者的损失不过是这一数目的十分之一。

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变革更大的武器——机关枪。它通过一种闭锁装置能迅速地连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试图发展这样一种武器，一般是用多管设计。但第一个表现出十分有效的是加特林机关枪，它受益于近期发展的后膛装填方法，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脱颖而出。它是芝加哥的理查德·加特林发明的，是一种有6—10根枪管的旋转步枪，枪管顺轴排列，由于旋转装置将其入位后依次发射，因而只要迅速转动曲柄把便能几乎不停地发射一连串子弹。它原本是用以加强射距类似的步枪火力的。

在此期间，法国炮兵在寻找一种能产生像老式榴霰弹的弹雨效果那样的武器，但是射程要远得多，以便能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外的阵地发射。以此为目的，炮兵指挥官雷菲耶在默东堡拿破仑三世的私人兵工厂里根据比利时的设计研制出了一种霰弹炮，射程达1500—2700码，外表像一门普通的野战炮，装在有前车的炮车上，用四匹马牵引。但是它的炮管里装有25根来复枪管，有一个用螺丝固定的复进式击发装置，枪膛里能装25发子弹。这样每分钟可齐发5次共发射125发子弹。法军在1867年采用了这种霰弹炮，在此后数年中，大量制造了这样的炮。但是保密被认为高于一切，将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在1870年战争爆发前既不知情更未用过，大部分操作人员到作战时才首次看见它发射。这种致命错误的保密还有一个更糟的后果，那就是领到这种新武器的指挥官把它们分散用于前锋部队的近敌作战，而不是按照原来的意图把它们集中起来在阵地后面远射。

保密的唯一成就是这种新武器使用不当。它未能防止泄露消息，风声不胫而走，说是法国人有某种这类东西在手里。于是德国人很快便发现了它们，集中炮火轰击每一门分散而暴露的霰弹炮，逐一加以摧毁从而消除了这一威胁。法国霰弹炮这样不起作用，不仅使它们带来的巨大希望化为泡影，而且使各国军人匆匆认定毛病出在武器本身而不是在用法上。甚至大有改进的新型机关枪——自动发射，体积小到手携，易于藏匿——研制出来后，军人们一般认为机关枪价值不大，如果有人替它说话，便拿出霰弹炮在1870年的失败来嘲讽一番。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在1914年投入战争的各国军队中，每千人还只有不到两挺机枪。但是为数不多的这点东西很快就主宰了战场，造成了一个持续很久的僵持局面。

对于以后半个世纪的这一简短叙述和对其间进展轨迹的概括，也许会有助于更清楚地说明1830—1870年作为一个战争新时代的开端的重大意义。此外，在此时期其他技术手段所取得的进步，其结果与枪炮火力的巨大发展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超过。

首屈一指的是铁路及其在军事上应用于协助战略行动。这一时期中它在欧洲发挥的作用是在协助进攻上：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中因利用铁路迅速部署军队而一开始便占了上风。但在北美，铁路在南北战争中主要起阻碍进攻的作用：由于在铁路线的前方一端集结过多部队，使指挥官们十分担心运往铁路前线的补给有被截断的威胁。

最早认识到在军事上使用这一新运输方法的是普鲁士。早在1833年，便有几位有识之士指出了这一点，而当时普鲁士还没有铁路。最有影响的预言者是经济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出生在符腾堡，在美国政治流亡时成为铁路的热心鼓吹者，1832年回到德国后，便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在报刊上鼓吹发展铁路的活动上。他提出：铁路网有助于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又能加强其防务实力，使德国能利用其位处中央——这一位置迄今是危险的根源——的优势，将军队迅速运往东西任何一方抵御入侵之敌。这一从防守出发的想法在随后德国的铁路建设中得到了实现；而30年以后，毛奇在作战时却利用铁路实施了进攻。

毛奇早在其军事生涯之初便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39年，当 he 从土耳其军事顾问的岗位上返回德国后，便将个人积蓄投资于新建的汉堡—柏林铁路，成了一名董事。他对铁路的技术方面了解之深，可从他1843年写的一篇论文中看出，在该文中，他论述了铁路的布局 and 经营。他对铁路战略能力的认识则表现于次年给一位兄弟的信中，他强调说：“当法国议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铺设了300英里的铁路，并且正在铺设另外200百英里。”^[1]1846年，即李斯特去世的那年，普鲁士陆军的一个军实施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铁路运兵行动，作为试验性演习。1857年，毛奇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他立即推动了铁路在军事上的应用。他跟李斯特一样，争辩说需要有一个战略铁路网以应付普鲁士两面受敌的需要，这将是解决危险处境所造成的问题的有效答案。因此，他强调战略要求在民用铁路建设计划中应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从那以后，这类计划便通常都通知他，他则对可能具有军事重要性的各点予以密切注意。

第一次利用铁路进行的重要作战行动是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当时奥地利进攻得到拿破仑三世强大法军支援的皮埃蒙特（参见原文第323页）。德国虽然未进行干预，但毛奇乘此机会对迅速运送和集中普军的计划进行了试验。当时所作出的重大改进在1866年普鲁士入侵奥地利时发挥了作用，又在1870年入侵法国时发挥了作用。这两次战争显示出了一个完善的铁路网给迅速集中和部署军队带来的巨大好处。这两次战争改变了过去对于战略集中要素——力量、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和计算方法。1866年，普鲁士人开始动员较奥地利人要晚，但是他们能用五条铁路线把部队从普鲁士各地集中起来，而奥地利人则只有一条从维也纳开出的铁路，并且未能有效地使用它。在奥地利把部队集中于摩拉维亚开始进军波希米亚之前，毛奇便把普军部署到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边境，并越过波希米亚的山隘。这样，尽管普军动员较迟和开始时兵力太分散，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

普军在1866年的胜利，加上在1870年又战胜了法国，给了军事界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他们认为最初阶段集中和部署的速度乃是取胜的主要关键。于是战略计划工作开始与时间表——主要是铁路时间表联系起来。这一趋向造成了一种习惯想法，对1914年突然爆发战争起了关键作用，打消了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希望。它也使人忽略了以

下事实：把一切寄托于像铁路这样固定的东西，这样缺乏伸缩性的运输能力，将会给战略带来瘫痪性的影响。1866年和1870年的欧洲战争都迅速结束，进攻者取得了胜利，以至认识不到如此依赖于一种呆板的战略活动手段所固有的缺点。在持久得多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这一缺点显著地暴露出来，但欧洲的军事界和军事院校对此教训注意得远远不够。

用电报作为军事通信手段产生了一种类似反作用，这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就显现出来了，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电报。各国政府及它们的军事顾问们很快便认识到它作为与战地指挥官保持联系的手段有种种优点。但在战地指挥官们看来，它弊大于利。英国指挥官抱怨说这一长途通信的新手段“弄糟了一切”，法国指挥官则说自己“处于一条电缆的瘫痪的一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这种使部队瘫痪的趋势更加突出。然而，当高明地使用这一长途通信手段时，它对于协调分布甚广、在不同战区作战的军队的行动价值极大。在1866年战争中，电报使毛奇得以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指挥普军的大部分行动，直到克尼格雷茨的决定性战役前夜他才亲赴前线，而当到达前线后，他发现还不如在柏林写字台旁更得以掌握情况。他的远距离控制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是他高明地只进行大的战略指导，而给执行者们留下很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当总司令部移近前线后，它跟过去一样，要依靠骑兵联络官递送信息。

这种情况在1870年仍然未变，因为虽然动员了七支战地电报分遣队，但是当进行关键的边境作战时，在毛奇本人的位置跟部队指挥部之间并未架设电报线，尽管两者离得很近。未架设的部分原因似乎是怕敌方窃听，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希望不致使部队指挥官感到身受一条电报线的束缚而影响了他们的主动性。因为普鲁士军事理论比任何其他军队更为注重培养下级指挥官们的主动性，并让他们不受限制地去发挥。

普军之所以能把这种主动性与各方协调的合作结合起来去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主要是由于它的参谋体系和训练制度。在对拿破仑的斗争中，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发展了原先由马森巴赫提出的思想，设立了一个叫“总参谋部”的核心，比起过去参谋人员对指挥官来说，其职能更广泛，责任更重大，而在过去，参谋们不过是指挥官的骑马传令官，或者是处理行政琐务的办事员。在普鲁士

制度里总参谋部是军队的集体智囊。它提出战术理论，在平时及战时制订作战计划，向各级战地指挥官提供专家顾问。这些参谋军官跟实际的指挥官共担责任，同时使后者从具体计划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像使徒一样向指挥官解释总参谋部的想法，并向下级执行者解释指挥官的决定。当指挥官不在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针对改变了的情况以指挥官的名义重下命令。这种明智地改变命令的情况，达到在名义上违抗命令的程度，它的基础是一种共同的理论和处理问题时的共同思维习惯。由于隔一定时期把总参谋部的军官下放到团队任职，促使这种共同理论得到传播。

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普鲁士参谋制度得到巩固，它的军事教育基础也发展了。1821年，总参谋部从陆军部分出来，自成为一个参谋机构，但仍从属于陆军部。这一措施一时削弱了它的势力，但给予它更多潜在的独立性。它的权力直到1864年对丹麦战争后期才得到扩大，而且是偶然发生的，当时战役受阻，于是总参谋长毛奇被派去任战场指挥官的参谋长。这一做法的成功结果改变了战地长官们认为总参谋部只不过是一帮多余的“策划于密室的家伙”的看法。1866年战争开始时，总参谋部受权直接指挥野战部队，毛奇取代陆军大臣任国王首席军事顾问。总参谋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1870年普法战争取胜而得到确认。这一情况导致其他国家的军队按类似的方针改组并发展自己的参谋组织和训练工作。

从此战争的指挥较之过去更具有集体性，原先主要是由战地指挥官的个人能力来决定战局，他们本人的作战艺术较之集体本领更为重要。总参谋部制度所形成的思想作风和共同的思维习惯产生了更高水平的职能效率，但同时也造成了思想上的一致性和保守性，从而不利于认识变化了的情况和采纳新的意见。

更糟的是，继总参谋部取得至高无上地位而来的是确立了一种军事概念，一种专职人员狭隘观点的产物，它认为军事胜利本身便是目的，而政治上的考虑和目标则是居第二位的和从属的，至少在敌人被打垮前应当是这样。这种概念和要求在毛奇掌握普军作战指挥权后便公开提了出来。当俾斯麦想对军事目的加以限制并在1866年和1870年早日媾和时，上述概念造成了与俾斯麦的冲突。此后，总参谋部不断加强的势力对于由军事考虑来决定政策的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在两代人之后造成了极为致命的后果。

在这一时期内，军队的征募和编制则不像火力、运输和通信等技术手段方面那样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它们也日趋系统化，特别是实施了征兵制。这一制度不仅在军事领域内有着重大而长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等于是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完成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而开始的断断续续的变革。

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军事政策和理论，加上普军在滑铁卢战役半个世纪之后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征兵制可能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在法国，征兵制随拿破仑倒台而被抛弃，因为这是人们在他统治下最为不满的事情。他们由于征兵制而流尽了血，废除它乃是新宪法的要点之一。在其他大陆国家中，名义上还在实行征兵制，甚至在法国不久后也恢复了，但是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修改，并允许代为应征，这一来实际上便成了对常备军的一种补充，这些常备军是由一些志愿从事长期服务的人组成的。例如在法国，1866年陆军全军40万人中只有12万人是征来的。

但在普鲁士，这一制度继续成为陆军的真正基础，军队的主要成分是短期服役的应征兵。普鲁士人民较易于被说服继续实行征兵制，因为跟法国人民不同，在他们脑子里征兵制是与从拿破仑暴政下解放出来连在一起的。

1814年的普鲁士陆军法奠定了强制17—50岁的全体男性服役的规定，虽然在实际上这个规定并未充分执行，但这一原则在宪法上得到了确认。1860年，跟法国打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征兵制便扩大实行了。每年征兵数从4万人提高到6.3万人，需服现役3年，预备役4年。这样便将陆军的现役及直接预备役的实力从20万人提高到44万人。这一改变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导致了在受俾斯麦左右的国王同议会之间的长期斗争（参见第19章，原文第509—520页）。在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之后，普鲁士人民才普遍接受了这一新法律，而其他大陆国家也都效法普鲁士这一制度。

后果是多方面的和深远的。军队变得规模越大，战争的范围就变得愈加广泛。它们对工业的需求更高，工业也更加密切地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军队变得更加不易管理，而这一困难加上后备役中受过训练的人力增多，往往使战争拖得更长。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在每个阶段都变得难以在政治上加以控制。首先，普遍征兵制往往加速战争的爆

发，因为当戏剧性地召集全国男性离开文职工作时会造成一种激动和动乱的局面，不利于旨在避免冲突的外交努力，同时也由于大规模动员和部署军队的行动必须严格遵守时间表。这种影响可以从1914年战争的爆发清楚地看到。再者，一旦战争在这种条件下爆发，其广泛的规模加上群众的情绪使得难以对目的和行动加以限制，比起由政治家控制的职业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更难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这样，随着战争越来越成为“总体战”，它的影响便更加坏，对一切有关的人更加有害。

此外，虽然征兵制在表面看来是民主的，但它为不管是世袭的或革命的独裁统治者强加其意志提供了更有效和更全面的手段，不但战时如此，平时也如此。一个国家一旦重新实行强征青年入伍的规定，政府也就更容易转向把全国人民置于俯首听命的境地。极权暴政乃是“总体战”的自然产物。

上述看法促使我们对处于初步形成时期的19世纪军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及它对数量概念、不受限制的战争目的以及不加约束的暴力行动这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20世纪“总体战”概念的各种因素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进行一番考察。

19世纪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近10年几乎同时出生，在拿破仑战争中便都年轻有为，崭露头角。但是他们的主要著作在19世纪30年代才出版，他们也随之遐迩闻名。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造就了下一代军人的观念和理论，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便是由这些人指挥的。而就克劳塞维茨来说，他的影响一直延及1870年以后的几代人，而且越来越大。

约米尼生于1779年，是瑞士裔。像许多热心的军事学家一样，他并非来自军人世家。但是瑞士革命的爆发使他脱离了巴黎的银行职员职务，得到机会参军，在21岁时便当了营长。《吕内维尔和约》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机会，使他再次从事文职，但也给予他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经验和进行更大范围的军事思想研究。1804年他25岁时写成了一本雄心勃勃的教科书《论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本书引起了内伊元帅的注意，他邀请约米尼作为一名志愿副官陪同他参加1805年的战役。当年晚些时候拿破仑也读了这本书，获得深刻印象，于是任命约米尼为法国陆军上校，次年在对普鲁士作战中让他当自己的参谋。约米尼的

军事生涯为自己赢得了男爵爵位和准将军衔。但是他的迅速升迁和影响日增招来妒忌，其中特别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此人在1813年阻挡了约米尼继续升迁。俄国皇帝过去曾请约米尼去效力，这时再次提出，答应给他中将军衔，约米尼接受了。拿破仑于1815年失败后，约米尼因竭力挽救旧主人内伊不被处死而得罪了新主人和他们的盟友。此后约米尼重新从事军事写作，但不久被召担任沙皇太子的军事导师，后来在俄国参谋教育中建树很多。1829年退休后，他定居于布鲁塞尔，在那里写出了名著《战争艺术提要》，成为此后两代人最为推崇的兵书。

迄今，该书仍被认为对于各种类型的战争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对进行各类型战争所产生的影响。约米尼并未被拿破仑以后时期人们不计后果、不顾得失而崇尚无限度使用武力的风气所迷惑。他指出，当谋求通过战争获益时，攻势作战的规模必须与所拟达到的目的相称。他对于拿破仑后期生涯所作的重要评论是：“我们可以说，他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教育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他们应当避免做些什么。”^[2]

约米尼赞扬拿破仑抛弃陈旧的赢分概念，赞扬他提出：“做成大事的首要之点在于努力瓦解和摧毁敌军，国家和省份在失去有组织的军队保护后，自然会自行投降。”^[3]但是约米尼不忘在俄国和西班牙历次战役中的教训，强调指出：在追求这一目的时，必然受条件的制约。他本人稳健的看法是：“拿破仑滥用了这一套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真正的优点，只要人们知道怎样对自己的胜利有所节制，并把自己的事业跟邻国及其军队的情况协调起来。”^[4]如果欧洲军事思想能继续处于约米尼的影响之下，各国便不至于像在1914—1918年那样不加考虑地互相残杀了。

但是，在初战后仍然可能出现僵持局面。因为约米尼的学说未能正确认识机动作战的基本条件，或者像18世纪末的两位卓越军事思想家布尔塞和基贝尔那样，在他们提出的理论中明确地指出必要的条件——拿破仑在其早期战争中曾英明地应用了他们的理论。

约米尼给“战争基本原则”所下的定义包括：

1. 集中兵力以战略配合依次攻击作战地区的决定性地点，并尽可能地攻击敌军交通线而不危及自己的交通线。

2. 调动部队以优势兵力攻击敌军之一部。
3. 以同样的指挥原则……通过战术机动将大量部队集中于战场上的决定性地点，或集中于敌军防线上有必要攻克的一点。
4. 竭力使上述部队不仅用于决定性部位，而且还要集中全力以使战斗立即奏效。[\[5\]](#)

以上的简单定义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但是在表达这一真理时却又失之过于简单。再者，约米尼在阐述时注重集中兵力而不着眼于突然袭击的效果，注重几何学而不重视机动性。当他简明地把战争原则的定义说成是“在决定性地点投入最大兵力的艺术”[\[6\]](#)时，这一错误更加明显。如删去关键性的副词“依次”，人们便看不到机动集中兵力这一重要思想，而代之以密集兵力的场面——这是敌方也可以用密集兵力来对付的。

他的《战争艺术提要》未能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所谓决定性地点必须是条件允许进攻者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地方。想要做到这一点，这一部位必须是与进攻的密集兵力相对来说较弱的地点。真正的作战本领在于保证或造成所攻击之点弱于自己。以某种形式分散敌军注意力是最有效的做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主要依靠机动性。

但是，约米尼对于自己取得机动性和使敌人失去机动能力很少加以注意。他过分热衷于作战的方式，以至看不到在作战时必须不断输入机动的有生力量。他连篇累牍地论述作战的基地、作战的区域、作战的战线、作战的方面、目标点、战略点、部队调动路线、内线作战、离心作战和向心作战，而且一律附有详尽的几何图。他说明了每一项的性质、优点和缺点。但是他对于任何有利的战线必须是敌人无法切断的这一点注意不够，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有赖于分散敌军兵力。他对于突然袭击对士气所起的作用也重视不足。

平心而论，约米尼用数学来指导作战乃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时他也不像别的军事学作者那样走极端。

他认识到“用三角学原理指挥战争”是谬误的。他指出：“国家的性质，河流与山脉的走向，部队的士气，人民的情绪，指挥者的能力和精力，这些都是不能用角度、直径和圆周长来衡量的。”他举例说明拿破仑不顾这些公式而取得了胜利，并说：“答案是简单的：战争是一出富有感情的戏剧，而绝非一种数学行动。”[\[7\]](#)

然而，由于他喜爱几何学术语和图表，而且不重视机动性，他无意中给学生们的观点造成了错误的影响。他在从数学角度阐明战略时，忽视了战争的心理基础。虽然他本人因富有亲身经验而了解战略，但对缺乏他那种实战经验的学生来说，战略像是一门点和线的科学。

更为糟糕的是，他把学生们的眼光引导到单一的目标点上，在他的学说中看不到他对于布尔赛论点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布尔赛认为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有几套办法，如果一条线被敌军阻断，马上便能有另一条来替代，以达到同一目的。任何忽略这一原则的战争理论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仗是双方打的。因此，从实际出发，任何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对方挫败自己计划的能力。对付敌军阻挠的最好做法是使计划能适应情况的变化，而且准备好第二套办法以应付新的情况。要想在具有上述灵活性的同时仍能占据主动，最好的办法是一开始就选择一条能提供不止一个目标的战线。

约米尼学说的缺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显现了出来。在南北两军所有将领中最勤学的是哈勒克，他深受约米尼的影响。但是在实战中，哈勒克表现出他可能是军队指挥官中最迂腐的学究，他那双无能的手伸到哪里，哪里便出现僵局。约米尼的另一位学生是谢尔曼，我们看到他在开始时受到教科书的局限，表现得不如格兰特，后者没有书生气也不拘常规。直到思想逐渐摆脱了理论的框框之后，谢尔曼才高明起来，从亲身经验中学会了以出其不意来取代正统战法。在此以后，过人的智力使他得以提出一种理论并付诸实践，对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的战略目的乃是通过具有多个目标而置敌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最后使人啼笑皆非的是，谢尔曼调动部队穿过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到达李将军后方的致胜行动因哈勒克的影响而迟延了，而这种影响却被错误地称作“正确的战略”。

当以后发生的一次大战在欧洲来临时，约米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这并非因为吸取了美国南北战争的有益教训（实际上是愚蠢地忽视了这些教训），而是因为另一作者的影响大大增加了。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是在普鲁士总参谋部里克劳塞维茨的门生们的指挥下取得的，这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并很快使得这些理论到处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在全世界形成了此后几代人的军事以至政治思想。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使

克劳塞维茨对世界的影响较之当时的执政首脑们大概还要大。不幸的是，它所形成的军事和政治思想，在某些重要方面是变了形的。

除了中国的孙子在公元前500年的经典著作外，克劳塞维茨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战争学了；而孙子的书则更加清晰易懂，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刻。克劳塞维茨这一伟大著作，充满了可贵的思想，但却主要产生了坏的影响，其原因虽非全部，但部分地是由于浅薄之士的错误理解所造成的。这部书是12年深刻思考的产物；如果作者活得更久些，书的结论可能会更加明智更加清晰。有充分的迹象表明，随着他思想的变化，他正在朝着另一种观点——更加深入——发展。不幸的是，这一历程过早地终止了。

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比约米尼晚一年。早在受教育之前他已身处战争之中了。因为他12岁便从军，两年之后在美因茨围攻战时被任命为军官。他乘机机会谋求进一步受教育，在1801年入柏林军官学校，成为沙恩霍斯特的得意门生。1809年，他成为沙恩霍斯特助手中的一员，协助他对败在拿破仑手下的普鲁士陆军及其训练工作进行改革。1812年他加入俄国陆军，参加了以拿破仑从莫斯科的致命性撤退而告终的战役。1815年年初，他重返普鲁士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任梯尔曼军团的参谋长。1818年，他出任普鲁士陆军大学校长，在任12年之久，他在校中的工作主要是行政性的，但他将闲暇时间用于对军事理论进行新的和深入的研究，并努力思考出一种战争哲学。1830年他重返作战部队，担任驻波兰边境部队的参谋长，次年死于霍乱。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由遗孀将他关于战争的著述出版。

这些著述是密封保存在一些封套中的，附有一张重要而带有预言性的纸条：“如果这一工作因我去世而中断，人们所看到的只能称为不成形的一堆构想……极易导致无穷无尽的错误认识。”^[8]被人错误理解乃是各个领域中心想家和预言家的共同命运。然而，必须承认，克劳塞维茨比起别人来更易受到误解。他是康德的再传弟子，有着一种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他在阐述自己的战争理论时过于抽象，使惯于思考具体事情的普通军人难以懂得他讲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往往又从其明显的思路中论述回来。他那些经常是十分生动的概括，使他们受到吸引，但又感到迷惑，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体会不到他思想深处的潜流。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强调了心理因素。他公开反对当时颇为时髦的几何战略派，表明了人的精神远比作战的线和角重要得多。他深深理解危险和疲劳所产生的影响及胆略和决心的价值所在，并加以论述。他还认识并强调了突然袭击的重要性和出其不意在士气上所造成的影响。他声称：“在一切行动中，它都或多或少地成为某种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它，在决定性时刻要取得压倒优势是不可想象的。”^[9]对于他后来的门徒来说，这句话要比许多他们记住了的话更应该牢记不忘。

然而，他对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更大影响，却来自于他的失误。他的观念过于大陆化了，以至不能理解海上力量的意义。他对于武器的发展过于漠不关心，而竟在即将进入机械时代时声称：“深信数量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决定意义。”^[10]军人们本来就抵制机械发明为一种新形式的优势提供日益增长的可能性，上述论断给这本能的保守性打了气。征兵制乃是提供最大量兵源的捷径，上述论断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手段的推广和永久化。这样，由于它忽视心理适应性，便意味着军队易于陷入惊慌失措和突然溃散。

在作战学方面，他作出许多可贵的指导，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却是引人走入歧途和眼光狭隘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的论断：“在战略上，没有比集中兵力更为必要和更为简单的法则了。除紧急必要者外，任何一部分军队都不应从主力中分离出去。对于这一箴言，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11]它极为清楚地说明他把实力看作一种完整一致的东西，而忽略了拿破仑体系的基本点。他仍然只从人力的集中而不从潜在的团结精神来考虑。实际上，通观全书，没有迹象表明他认识到拿破仑的灵活集中兵力和广泛分布兵力的价值所在，这种做法可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并成为对敌军阵地或部队之薄弱环节进行突然集中打击的前奏。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所起的最坏作用是他形而上学地阐明的“绝对”战争思想。由此把逻辑上的极端视为理论上的理想目标，他给一些浅薄的读者的印象是，无限度地使用武力乃是致胜之路。由此，把战争的理论说成“只是国家政策以其他手段的继续”^[12]，导致了政策为战略服务这一相反的目的。而且，克劳塞维茨还有一段常被引用的名言：“慈善家可能会轻易地想象有一种不经大规模流血便可使敌

人放下武器并战而胜之的妙法，并认为这是战争艺术的正确趋向……这是一种必须根除的错误观念。”^[13]这段话对于后来将领素质的下降有很大关系。克劳塞维茨是在反对18世纪末那些过于谨慎小心和保存兵力的领导人们，这些人小心翼翼地调兵遣将的做法被拿破仑迅雷不及掩耳地投入战斗打得一败涂地。不幸的是，克劳塞维茨这些纠正性的论述后来被无数的鲁莽家用来为自己大量牺牲生命的顽固进攻作为借口，甚至作为辩解的理由。

他的另一个更具灾难性的格言是：“把稳健原则引入战争哲学是荒谬的。……战争乃是一种被逼向极端的暴力行为。”^[14]这一论断成了20世纪进行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的荒谬而徒劳的“总体战”的基础。滥用武力和不计代价的原则就是否定政治家的才能。一个把实力扩大到耗尽资源地步的国家将导致自己政策的破产。

早在劫掠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理性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从经验中获得的这一严酷真理。克劳塞维茨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强调指出，在把事物推向合乎逻辑的极端时必须承认：“手段将会失去与目的的一切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极端的努力所追求的目的将会被自身内部的相反力量所破坏。”^[15]他本人显然是前后不一的，这从下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在抽象阐述道理时，人的思想不可能在到达极端前停下来……但当我们从抽象过渡到现实时，一切便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6]他著述这本书耗时近14年，在写作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拓展，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他那些界说性的段落不如那些激动人心的语句更有吸引力，在这些语句中他阐明了什么是合乎逻辑的极端，并将它说成是理想。

他最早的门徒之一毛奇成为普鲁士1866年和1870年两场胜仗的领导者，事实证明这对人类来说至为不幸。它使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极大地扩散。自此之后，他的说教被一切地方都承认为真理，而且完完全全是真理。所有的军人都生吞活剥地接受他的说教，而能够消化它的人则为数寥寥。

若不是霍乱菌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说教所造成的损害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细菌剥夺了他随着自己思想的发展而修改理论的机会，也使他无法大力消除对他原有的“绝对”战争概念的误解，他没有来得及修改自己的论著便去世，以至远远超出他所料的“无穷的错

误理解”谬种流传，因为普遍采纳无限战争的理论导致对文明的极大破坏。生吞活剥地接受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由此也十分合乎逻辑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直到19世纪60年代，新的技术手段和并非全新的观念才对战争的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军事研究家后来流行的观点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滑铁卢战役以后的50年乃是一片空白。一位杰出的军事史学家就提出一种代表性的看法：“兵连祸结的欧洲，从军事角度看实际上是不毛之地。”^[17]以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为代表的19世纪军事思想大丰收的时期，实际上正是欧洲战争最频繁的时候。这一时期发生的历次战争也可以证明军事学并未衰微，战术的进步也未停止，它并不像19世纪末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比若提出了一种适用于不同情况的非正规战方法，显现出足以与拿破仑相比的动能和机动性。法国于1830年派出一支远征军去占领阿尔及尔，但在试图控制内地时遇到了麻烦。组织臃肿，按欧洲方式装备起来的法国大批部队，不断遭到在马斯卡拉埃米尔阿布杜卡迪尔鼓舞人心而高明的领导下的灵活的土著部队的骚扰，常常落入他们的圈套。但是1836年云开雾散，在阿尔及利亚西部担任下级指挥职务的比若率领机动部队展开快速进攻，他们轻装并自带给养，以马、驴和骆驼取代马车运输军需品。1840年比若成为阿尔及利亚总督，更加广泛地应用上述新方法，到处追击阿布杜卡迪尔的部队，切断其补给来源，同时修建了一个道路网以加强法国对该领地的控制。他的作战行动是自觉应用自己深思熟虑而总结出的理论，特别是研究了罗马的经验，他对这些作战行动的论述成为后来几代法国军人进行殖民战争的经典文献。

另一出以欧洲为舞台的出色军事艺术表演，是奥地利司令官拉德茨基陆军元帅在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中所演出的。当时他粉碎了三次试图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的第一次努力。意大利人乘维也纳革命和匈牙利人反叛的良机，在米兰发动了暴动（1848年3月17日），暴动迅速蔓延到伦巴第和威尼托全境。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特率皮埃蒙特军队东进支援，教皇和那不勒斯军队也北上，使意军实力达到近10万人。当时奥军7万人，分驻于许多小据点，拉德茨基在米兰仅有1万兵力。为免遭包围，他撤至明乔河与阿迪杰河之间历史上著

名的四要塞防御区（曼图亚—佩斯基耶拉—维罗纳—莱尼亚戈）。在这里，他一面等待援军，一面打退了皮埃蒙特部队的进攻，只有佩斯基耶拉失守。在获得增援后，他一面抵挡住皮埃蒙特人，同时挥师向东，在维琴察附近歼灭了横切他交通线的教皇和那不勒斯军队。接着，他又肃清了布伦塔河谷。然后他回师对付皮埃蒙特人，迅速集结优势兵力于一区域内，在库斯托扎突破敌军防线。获胜后，拉德茨基又迅速把皮埃蒙特人赶回本土，于8月4日重占米兰。

奥匈内战的持续，鼓励了意大利爱国者在1849年再次试图独立。3月间，经过改编和加强了皮埃蒙特军以8万兵力重新向米兰进军。这一次拉德茨基可动用的兵力几乎与之相当。但是他再次撤出米兰，向东南转移，让人以为他要撤往皮亚琴察。然后他突然转而向西，进军帕维亚，在20日越过提契诺河包抄皮埃蒙特军的右翼，在其主力和侧翼掩护部队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晕头转向的皮埃蒙特人向提契诺河撤退，但是他们企图挡住拉德茨基向北进攻他们后方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他再次迅速迂回前进，这样便迫使皮埃蒙特军于22日向诺瓦拉北撤。次日，拉德茨基听了敌军已西撤的误报，再次向西北进军，以切断他们的退路。结果，只有他的右翼部队与在诺瓦拉的皮埃蒙特军遭遇，他手下四个军中只有一个军对付敌军全部主力。有几个小时形势看来十分危急。但由于前一段已使敌军陷入混乱和瘫痪，因而减轻了危险。当天下午其余各军先后到达后，为进攻提供了支援，同时对敌军的翼侧和退路形成了强大的威胁。后果是决定性的，当晚查理·阿尔伯特把王位让给儿子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奥军向后者提出了宽大的停战条件。这使奥地利人得以摧毁其在意大利各省重新爆发的暴动，然后把部队调去恢复对帝国中央部分的控制。

拉德茨基在上述战役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敏捷，出自他这位82岁的老人身上更是惊人。他对军事艺术和理论的浓烈兴趣，使他在多年推行他的军队改革主张未果的失望心情下，仍能保持思想活泼清新，因而终于得以充分利用在晚年到来的这一机会。

年长的指挥官们更加经常采取的做法及其后果，可以在五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看到。这是近代史上打得最糟的战争之一（参阅第18章，原文第478—483页）。它在战争艺术上之所以使人们长期感兴趣，在于它提供了丰富的例子证明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后勤补给上“什么不该干”。原来的英军总司令拉格伦勋爵和他的师长们除一人

外都已年近70。俄国总司令缅希科夫也一样。法国指挥官们没有这么老，战术表现也不错，但是远远称不上是出色的。双方将领绝大部分属于在长期和平环境中被擢升至高位的“服饰讲究皮鞋锃亮”的一派人。兵营大院便是他们的天地，演练时的准确性被认为是考核专业能力的标准。英国军队的野外训练极少，指挥官们也无掌控大兵团的经验。俄国人的机会较多，但也还是用阅兵场的方式来进行训练，在战场上让部队密集行动而不考虑火器已得到改进。再者，大多数俄国部队所用的还是滑膛枪。

行政组织工作比战术运用还要糟，这对双方都极为有害。英法联军企图占领俄国在黑海唯一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远征之举，是在对地理条件了解极少的情情况下发动的。他们以为：克里米亚既然是个半岛，便可轻易地用联军舰队的大炮控制地峡而把半岛孤立起来，待到他们发现地峡两侧的海水过浅，舰只难以进入射程时，为时已晚。英国人带了足够的马匹以供骑兵和拉炮之用，但没有运输工具运载粮食及军火补给。当9月中旬的登陆未能迅速攻下这个要塞时，远征军发现它缺少冗长的冬季作战所需的几乎一切东西。战地医院很快便令人可叹地超员了，到年底以前适于服役的英军已不到一半。疾病所造成的法军损失比英军还大，不过由于报界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而被掩盖了起来。俄军的损失要更大，新征兵员在派往克里米亚镇补缺额时有三分之二的士兵因病和饥饿而死于冬季长途旅行的途中。

正是1815年以来欧洲第一场重要战争所表现出的全面无能状况，使得后来的军事家持有否定一切的观点，认为在从滑铁卢之役到1866年普军获胜之间的50年中，在战争学上乃是毫无收获的衰微时期。

1859年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也未能消除这种印象，当时拿破仑三世率15万法军支持皮埃蒙特人作新的努力把意大利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不过这次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重要的进步。双方都利用铁路进行动员和集结部队，法军在皮埃蒙特布防后用一条铁路把重兵从右翼调往左翼，以便在马让塔附近打击奥军右翼。这一计划是约米尼提出的，拿破仑三世曾征求他的意见。法军也得益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他们组织了规模巨大的运输梯队，把后备军火送到各军，并从法国运来补给。他们也采用了新式线膛炮，比仍用滑膛炮的奥军占了优势。

但是作战指挥却不能与上述改进同日而语。拿破仑在开战时精力充沛，但法军行动迟缓，步调不一。法军6月4日在马让塔战役中获胜，但未能利用这一胜利；奥军安全撤至四要塞防御区——尽管他们因指挥笨拙而给了对手许多可乘之机，已无法与拉德茨基时期相比。

法军在追击后撤敌军时行动缓慢，拿破仑也被普鲁士在莱茵河地区进行动员所造成的威胁而分散了注意力。与此同时，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掌握了奥军最高指挥权。奥军在6月24日发动攻势，而法军正好向明乔河前进。于是两军在出乎双方意料的情况下迎头遭遇，索尔费里诺遭遇战成了“短兵相接”，鏖战激烈，指挥混乱。到了下午奥军脱离战斗，退过明乔河，而法军也几乎受到同等重创，无法扩大战果。因此心中暗怕普军从背后入侵的拿破仑便乐意妥协议和。但是虎视眈眈的普鲁士看出马让塔和索尔费里诺的“战斗荣誉”远远不如法奥两国的军事弱点更为突出。于是俾斯麦更加信心十足，将普鲁士的政策引向对奥地利在日耳曼世界的霸主地位进行挑战，在把统一的德国置于普鲁士的领导下之后，去对付法国。毛奇和陆军大臣卢恩在为普军今后打仗做准备方面，也因从远处观察1859年的战争而获得了教益。毛奇曾撰文论述那次战争；这是各国陆军中第一次由参谋人员撰写出版的官方历史，从而使军事学术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已经考察了1866年和1870年战争在技术和战术方面的特点（参见原文第305—311页）。在战略方面，1866年的“七周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普军的部署面极广，它的25万主力部队分布在一条276英里的战线上，其目的是保护西里西亚和柏林，使补给方便，并可使用一切可用的铁路以节省时间。这样宽阔的战线说明兵力与面积的比例是极低的，如果遇到一个机动活跃的敌手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奥地利人兵力相当，还可指望2.5万萨克森部队的直接支援和巴伐利亚及其他德意志邦（符腾堡、黑森—达姆斯塔特、汉诺威及黑森—卡塞尔）的间接支援，这些邦的全部兵力又有15万人。

但是毛奇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可以利用奥地利人既不机动又无生气的缺点，而且普军只要用一支小部队便可控制住奥方的盟军。他同时计划以三个普鲁士集团军快速通过边境的山脉地带，向内收缩，然后集中在波希米亚北部一条较短的战线上。但是由于国王不愿让人认为自己是侵略者而失去了时间，于是毛奇的打算落空了。在拖延期间，奥军前进至毛奇准备集中兵力的地区，部署在一条40英里的战线

上。此外，由于错误地估计奥地利人将会入侵西里西亚，导致位于左翼的普鲁士王太子把部队转移向东南，以保护这个位置突出的省份，这样就把正在缩短的进军战线又扩大了。

奥军总司令贝内德克未能利用这一扩大所造成的机会，甚至连王太子的部队在山间小路进军中受困时他也未有所作为。相反地，他被对他的侧翼和后方越来越大的威胁弄得手足无措。他唯一做的事便是把部队收得更紧，就像刺猬蜷缩成一个球似的，这样就丧失了自己处于中心地位在反攻上所具有的优势，使普军得以包围他在克尼格雷茨附近布防的8英里战线上静止不动的奥军。在这里，位居普军中心的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的部队因过早在7月3日单独发起进攻而陷入被击溃的危险，但是这一鲁莽行动带来的危险由于普鲁士人的机动灵活而得到挽救，当天下午，由于位于奥军侧翼的王太子部队的到达，决定了这一战役和整个战争的胜负。

这一速战速决的战役是毛奇战略的一大胜利。虽然对战役的结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并非他原来所计划的，但是与他将计划适应于实际情况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计划执行者们的失误得到了补救，甚至转而对己有利。然而，普鲁士人显然也得力于后膛装弹的步枪所带来的技术上和战术上的优势，因为对手用的还是前膛枪。奥军除被俘者之外，死伤为普军的三倍之多，即2.5万人对9000人，尽管普军步兵作为进攻者要比对方暴露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奥军唯一获胜的特劳特瑙边境战斗中，他们的伤亡多达被赶出战场的普军的五倍。

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略模式与1866年的战争大体相似，随着战斗的发展则越来越相似了。而且，战争的结果更加明显地归功于战略上和机动性上的优势，而这些又是卓越的领导、参谋工作和训练工作的产物。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武器水平比较平衡：德军的炮兵优势被法军的轻武器优势所抵销。但是，这一回毛奇的战略是以人数的优势为后盾的，因为德意志各邦的部队这时已经加强了普军的实力。由于高明的参谋计划工作和铁路组织工作，总共动员了38万人（三个集团军），并在18天内运到了前线；而在1866年则用了5个星期。另有三个军，共9万人，得到铁路运输后立即补充上来（他们原来是留下以防奥地利介入的）。法军的动员工作搞得一团糟，大批后备役军人抵达前线过晚；更糟的是许多在那里集结的部队因缺乏运输工具和补给而一时无法行动。在开战之初只集结了20万人，其中仅有一部分能及早投

入战斗，虽然后来总数达到了30万人。而到那时，形势已变得对法国人不利，因为他们取胜的黄金时机是在德军完成部署之前把他们打乱。失去了时机，加以领导迟疑不决，抵销了法军原希望由于职业军人占有较大比例而在质量上占有的优势。

与1866年一样，毛奇的战略并未“按计划进行”，但是由于他的灵活性和执行者的主动性与广阔战线上的机动性所固有的价值结合起来，绕过了侧翼的抵抗而造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使他的战略变成了决定性的优势。他本来想在萨尔河畔进行决战，集中德国三个集团军兵力摧毁人数少得多的法军。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部分是由于德军下级指挥官过分独立行事，以及不服从命令；部分是由于德军的行动造成法军指挥部的瘫痪；部分是由于战事捉摸不定。法军的瘫痪是一则消息造成的：据报在极左翼靠近莱茵河的德军第三集团军（由普鲁士王太子指挥）已经越过了边境，在魏森堡附近击退一小支法军。第三集团军所部四个军向前推进，在该集团军其他部队投入战斗前即已包围并击败了法军右翼。在8月6日这次沃思战役中，以寡敌众的法军进行了英勇拼搏，他们本该有更好的命运和更好的指挥部。

然而德军指挥部这时也对战争捉摸不定，草率地认定法军全军正在西撤渡过摩泽尔河——这是拿破仑三世临时作出的决定，但在巴黎来电说此举将会动摇人民的信心后便迅速取消了。毛奇以为敌军正在总撤退，便准许第三集团军不去收缩向内而是继续向南迂回至摩泽尔河，处于这次战役下一阶段的焦点的外围。这一大规模的翼侧进军成为下一阶段战役中虽不是最主要的，也是居于第二位的决定性有利因素。

与此同时，德军大部横扫梅斯以南，越过摩泽尔河后直逼默兹河，以为自己在追逐敌人，结果在梅斯略西与法军主力的翼侧遭遇。这一出乎意料的遭遇，以及德军因此转而向北，导致了8月16日在维翁维尔和8月18日在格拉夫洛特的两次错误的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双方都朝着自己的后方作战。德国人集中了占有三对二优势的兵力，但是在战术上两家打了平手，德军伤亡还大于法军。然而，德军在战略上占了优势，因为法军退到了梅斯的防线之内，并在那里停留下来。他们的司令官巴赞没有抓住德军在16日的意外侧翼遭遇战后立脚未稳和分散的良机进行反击。

正在马恩河畔的夏龙集结四个新编军的麦克马洪元帅，这时出于政治原因被迫前来援助巴赞。在指挥十分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法军的这一行动是致命的：德军惯于每日行军15英里，而法国人以大编队转移时，每天平均只走5英里或6英里。仍在沿着一条宽阔道路西进的德国第三集团军，这时转而向北，插向麦克马洪部队的翼侧和后方，后者这时已被从梅斯挺进的部分德军阻挡。麦克马洪的部队在比利时边境色当附近陷入重围，被迫于9月2日投降，共8.2万人。这样就在五个星期战斗后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一个法国野战集团军被监禁在梅斯，另一个集团军则被送入战俘营，德军向巴黎进军的道路已畅通无阻。

尽管如此，取代了拿破仑三世的共和国国防政府征召新兵，使战争又延长了六个月，这大大打乱了德国的计划。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军事界留下的记忆是以色当战役为巅峰的速胜，而不是那出人意料地持久的余波。各国军人都认为未来的大战都会像1866年和1870年那样速战速决，而且按此认识去做准备。如果他们对为时不短的最后阶段和对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给以更多的注意，他们就会变得更聪明些。因为美国南北战争更真实地预示了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尽管据说毛奇对它不屑一顾，说它是“两股武装暴徒在国内互相追赶，从中没什么可吸取的”。

美国南北战争是工业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也是近代民主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参见第24章）。战斗的过程受到铁路的发展、磁性电报的发明，以及愈加依赖大规模制造或进口武器和其他补给的巨大影响。同样重要的是报纸的成倍推广发行，对公众舆论并从而对于民主选举的政府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提高了经济目标和道德目标，同时又使这两种目标更加容易受到破坏。这样便又激励人们去打击敌方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不是其盾牌——武装力量。

上述发展的重要性一度被人忽略，因为南部联盟由于其松散的农业性质而在结构上较为原始，远不像高度的工业社会那样容易受到攻击。南部联盟的意志没有固定的核心，它的各中心点大都离得很远。虽然南部邦盟把首都建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但战争意志最强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它曾带头退出联邦。那里离联邦部队很远，受着妥善的保护。

联邦军进攻如此遥远的目标，唯一的有利条件是战线很宽，它给突破行动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新建的铁路网也可助一臂之力。但是铁路的潜力受到路线固定的限制，通常它造成了沿狭窄的直线进行作战的倾向。此外，铁路日益带来的补给便利，使指挥官们不断增加铁路终端的兵力，而毫不考虑这对自己调动部队的能力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样，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战略转移的新手段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削弱了自己的战略机动性。铁路促进了部队的展开，它运送和供养更多部队的能力比提高作战效率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也往往会使部队的需求增加，使他们更为依赖铁路终端或沿海基地。

战术机动性也因火力在战争中不断加强而日益受到限制。在起初还是标准武器的滑膛枪，逐步被准确得多的前膛来复枪所替代，而在战争结束之前，后膛枪的出现使得装备这种武器的部队的射击速度加快。火力效果的日益提高使人们重返堑壕，甚至在野战中还使用了护胸甲；上述两者的结果使防御较之进攻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联邦军队在打通被人数少得多的南部联盟军切断的通往里士满的道路时，屡遭失败，从中可以看出机动性所受的上述双重限制。当1862年春试图从海上实行侧翼进攻时，这一看来可能成功的行动在登陆后的命运，比起此前此后从陆上直接发动的进攻来也并不见佳。此外，本来作战本领和指挥能力都更强一些的南部联盟军，虽然成功地顶住了联邦军的攻势，但每当向北攻入联邦地区时，也遭到了同样的挫折。南军最为成功的地方是对华盛顿和北军交通线所造成的威胁——用消极办法挫败敌人进攻，从而解除了所受的压力。但在李将军于1863年入侵宾夕法尼亚时在葛底斯堡受挫后，他们挫败联邦继续作战的决心的机会便越来越少了，尽管此战并未解决林肯总统怎样打赢战争的问题，也未打开北军进军里士满的道路。只要他们主要局限在弗吉尼亚战场的狭窄范围之内作战，攻势便展不开，也就只能招来失败。

在宽阔的西部战场，前景要好些，那里一直被认为不是主战场。1862年4月，法拉格特率一小海军分舰队溜过防守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迫使新奥尔良不战而降。7月4日，即李将军从葛底斯堡撤退的那天，格兰特指挥的北军在四次受挫后攻占了密西西比河中游的战略要地维克斯堡。这一胜利使北军得以控制这条大动脉，使南军无法从密西西比以西各州获得增援和补给。

格兰特接着转而向东，击退守卫在进入“南部联盟粮仓”佐治亚州的大门查塔努加的南军。打胜了这场仗之后，他在1864年春奉召返回华盛顿就任联邦军统帅。但是他再次发动的南进里士满的攻势并不比他的前任成功，而且代价更为昂贵。他先后发起的每一行动都被李将军挫败。到了夏末，损失之惨重已令北军及北方人民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厌战情绪非常强烈与广泛，使立即讲和接受南方独立要求的主张迅即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林肯本人也失去了在秋天再度当选总统的希望。但是在9月，格兰特在西部战场的继任者谢尔曼以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占领了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在这些战斗中，他一再诱使南军进攻，用一种在战地快速筑垒的方法挫败了他们的攻势，每当敌军代价昂贵地突破他的机动掩体失败，他便利用新取得的有利地位在战略上得到好处，敌军则被削弱。他这些振奋人心、代价甚微的胜利，乃是林肯重整旗鼓并当选连任的要素。

在进军亚特兰大的过程中和在占领该地之后，谢尔曼遇到的主要困难是铁路补给线过长，易受机动突击部队破坏。这类突袭曾破坏了北军前一阶段的攻势。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促使谢尔曼去试用一种大胆的新方法。敌军通过他的铁路运输来袭击他，他便去袭击他们的铁路运输，好使自己不再挨打。他认识到：为了重获并保持机动性，他必须使自己不依赖于一条固定的供应线，这便意味着部队必须自给自足，只携带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而在所经过的农村征集粮草作为补充。于是，在把运输量减至最低程度之后，他便脱离了自己的铁路补给线，向东穿越佐治亚州，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军的补给系统，切断了李将军指挥下的南军主力在弗吉尼亚州的供应线。

在抵达萨凡纳海边后，谢尔曼在海上重开了自己的交通线，并转而向北，穿越南卡罗来纳州直捣李将军的后方，使南部邦盟失去了剩下的主要港口。看到这种深入的战略进攻不受阻挡，南方人民对于自己领导人和报刊的乐观保证失去了信任。失去信任导致了失去希望，接着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决心。在1865年3月中旬，谢尔曼已席卷北卡罗来纳州，格兰特也得以告诉他李将军的军队“现已士气涣散，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的投向我们，有的回家去了”。^[18]尽管这时格兰特自己的部队由于1864年夏天陷入僵持局面而仍在彼得斯堡和里士满周围堑壕里无法行动。但对敌方的经济和心理后方的这一间接进攻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南部邦盟陷于崩溃，三周后李将军投降了。

要是欧洲的军人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像研究1870年战争那样去注意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他们在1914年时便会对战略和战术机动性的基本条件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不致因随意行事而遭受损失。（德国在1940年的军事胜利得益于研究谢尔曼的作战及应用了由此而形成的方法。）

同时，他们也就懂得，即使想打一场短促的战争，仍需做长期作战的准备；估计到经济和社会的因素，相应地拓宽军事研究的领域，加速国家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动员，并对有可能在长期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新发明给以更多的注意。同时他们也就认识到，只寻求眼前军事上的好处而不顾政治上的坏处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很危险的。他们甚至还会看到：休戚相关的欧洲国家之间长期进行无限制的战争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看到不计后果地进行“欧洲内战”，将会摧毁欧洲文明，或者至少会危及它的未来。

（华庆昭 译）

[1] 《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写给母亲和兄弟们的书信集》（C. 贝尔和K. W. 费希尔英译；伦敦，1891年），第2卷，第138页。

[2] 《战争艺术提要》（巴黎，1838年），第1卷，第58页。

[3] 《战争艺术提要》（巴黎，1838年），第1卷，第201页。

[4] 《战争艺术提要》（巴黎，1838年），第1卷，第202页。

[5] 《战争艺术提要》（巴黎，1838年），第1卷，第157—158页。

[6] 《战争艺术提要》（巴黎，1838年），第1卷，第254页。

[7] 《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巴黎，1804年），第3卷，第274—275页。

[8] 这张纸条注明写于1827年7月10日，在1832年的第一版上刊印于他的遗孀所写的前言之后。

[9] 本书第3卷，第9章，第1段。

[10] 本书第5卷，第3章，第2段。

[11] 本书第3卷，第11章，第1段。

[12] 本书第1卷，第1章，第24节。

[13] 本书第1卷，第1章，第3节。

[14] 本书第1卷，第1章，第3节。

[\[15\]](#) 本书第8卷，第3章，B节。

[\[16\]](#) 本书第1卷，第1章，b节。

[\[17\]](#) A. F. 贝克：《战术史导论，1740—1905年》（伦敦，1909年），第38页。

[\[18\]](#) 格兰特写于1865年3月16日的信函——全文载《威廉·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纽约，1875年），第2卷，第311—312页。

第十三章 联合王国及其全球利益

联合王国在1830—1870年，其国内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大体上以1850年为界。到1850年，大不列颠（但不包括爱尔兰）已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和工业为主的社会。在前20年中，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和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之间发生了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是由下列问题引起的：如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的改革、贫民救济制度的改良和市政府的改组、自由贸易和工厂立法。1830—1850年，还出现了宪章主义和工联主义等工人运动的崛起和暂时的挫败，这些工人运动是这20年中工业发展的产物。到1851年的大博览会时，显然工商业者的要求几乎已全部得到满足，新兴的商人和工厂主阶级为自己赢得了行动和结社的自由，而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取这种自由所做的努力，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1851年以后的20年中，新兴的统治阶级所获得的利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整个国家财富以及海外贸易和投资都有了显著增长；并采取了大量的立法措施来调整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使之适应由城市与工厂组成的新型社会的需要。国家财富的增长和法律保护的增强，也使工人阶级获得相当大的利益。他们建立了工会和其他自愿性组织，从而为日后在国家中享有权力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冲突和权力转移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因素在起着作用，那便是巨大而急剧的增长：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增长、贸易和投资的增长。1831—1871年，联合王国（1801年由爱尔兰合并于大不列颠而构成）全国人口从大约2400万增加到近3200万。其增长数几乎等于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人口的总和，这是18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人口大量增长现象的继续。联合王国各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40年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持续猛增，苏格兰的人口也不断增长，但不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增长得那样急剧。爱尔兰的人口则持续增长到1845年，此后主要由于大量向海外移民和饥荒，人口反而急剧减少，这种现象直到19世纪末才停止。因此，大不列颠的人口在这前20年中从1650万人增加到2100多万人，到1871年增至2600万人以上；而爱尔兰的人口由1831年的约700万人增加到1845年的850万人的最高数

字后，到1871年却下降到不足550万人。在前20年中，共有200多万人从联合王国迁移国外，在后20年中，又有350多万人迁出。其中大部分去美洲大陆，日后又回国的大概还不到100万人。英伦三岛之间的人口流动也相当可观，有的从爱尔兰迁往苏格兰和英格兰，有的从苏格兰迁往英格兰，有的则是在上述各地本地区内从乡村迁往城市。这一人口大流动既是工业迅速发展的一個原因，又是它的一个结果。

其结果是，联合王国国内的人口分布和职业情况，也产生了同样急剧的变化。尽管大不列颠在1871年仍和1831年一样，农业所雇用的男女雇工比其他行业为多，但在1831年之后不久，就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半数家庭依靠耕种或为农村人口服务的工商业为生。1831年在大不列颠直接从事农业的家庭为27.5万户，在其后的40年间，这个数目几乎没有变动。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衰落，而是说明依靠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谋生的人口比例大大增加了。

1830—1850年是铁路修建业和轮船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部分地由于上述原因，也是重工业、采矿业和纺织业大发展的时代。1830年9月，威灵顿公爵出席了新建成的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通车典礼，这次通车标志着蒸汽机车首次取得伟大胜利，说明它已被公认为最佳的轨道式牵引工具。议会于1825—1835年，共通过了54项各种各样的铁路法。1836年及1837年两年中，铁路修建事业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议会又通过了39项在大不列颠铺筑新铁路的议案，使全国铁路又增添了1000英里。在1844—1847年铁路修建事业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后，到1850年年底，全国使用的铁路长达6600英里。及至1870年，铁路总长已增加到15620英里，尚待修筑的已所余无几了。这些铁路经整顿、合并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而作为铁路的主要附属设备的有线电报也得到发展。1840年，罗兰·希尔爵士创立了一便士邮政制。同年，创办了丘纳德轮船公司，12年之后，该公司开辟了每周从利物浦至纽约的定期航线。1827—1848年，包括轮船和帆船的英国船只总吨位，由250万吨增加到400万吨，到1860年已达到500万吨。1850年，在世界远洋运输吨位中英国船只约占60%，联合王国口岸吞吐量（不包括英国沿海口岸之间的海上运输及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上运输），从1834年的600多万吨增加到1847年的1400万吨以上。在1847年的商业危机之后，海运量曾一度下降，而后到1870年又增加到

3650多万吨。恐怕这是英国依靠海外贸易而繁荣兴旺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英国煤矿的产量，由1836年的3000万吨增加到1851年的5700万吨，到1870年达到1.1亿吨。在19世纪中叶，世界生铁产量大约一半产自大不列颠，其中四分之一的产量来自苏格兰西部。然而，与其说这是钢铁的时代，还不如说是煤和铁的时代（参看第2章，原文第29—31页）。虽然在70年代末期，炼钢技术已因贝塞麦、西门子、托马斯和吉尔克里斯特等人的发明而臻于完善，但直到1870年以后才被普遍采用。到1871年，冶金、机械制造和造船业的就业人数已超过75万人，煤矿的就业人数超过30万人。英国的煤、铁和钢的出口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在这40年中，煤的出口总值由18.4万英镑增加到563.8万英镑，钢铁的出口总值由100万英镑稍多一点增加到2350万英镑以上。在50年代以前，机械工程和制造业的规模还一直很小；但到5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机械工程和制造业了。

这不但是煤和铁的时代，也是棉花的时代。由于原料需要进口，棉纺织业与海外贸易的联系更为密切。早在1830年，就有3/4的原棉由美国进口；到1849年，进口原棉总额高达34.6万吨，约值1500万英镑。翌年，棉纱和棉织品（主要是棉布、针织品和花边）的出口总值超过了2825万英镑。到1870年，棉花出口总值高达7141.6万英镑。1851年，单是棉纺织业就雇用了50万人以上，而整个纺织业就业人员远远超过了100万。纺织业是机器和动力时代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工业，从这一时期初起，棉纺织业就是首屈一指的工厂工业，其他纺织业，如毛、麻、丝纺织厂，不久也把它们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更大的工厂。在这40年中，机械化的速度始终是缓慢的，生产仍旧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长时间的劳动。

这40年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到了1850年，大不列颠已成为既是“全球的加工场”，又是全球的海运商和进出口商。这一地位在日后的20年中为它的企业和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此后不久，它这种已成为全球性的利益，就受到这时也在进行工业化的劲敌的深刻而严重的影响。其中最强大的对手是德国和美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的10年中，由于英国的发展势头和生产力正在方兴未艾时期，它仍继续获得巨大的利益。1850—1870年，英国的进口额增加了两倍，即由1亿英镑增加到3亿英镑。它的出口总额由7100万英镑增加到近2亿英镑。英国

在航运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等“无形出口”的收入，不但弥补了其进出口之间的逆差，而且还绰绰有余。英国所积累的庞大资金，一部分投资国外，因此到1870年，它的海外投资总计约达7亿英镑。而在1830年，海外投资仅有1.1亿英镑。因此，到1870年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在这些年代里，联合王国的国内历史就是受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所支配的。从这种增长中受益最大的阶级，一方面是矿主、工厂主、船主、商人、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切与工商业的广泛发展有关的辅助性商业的业主；另一方面是人数急剧增加的城市工人，他们由于在上述企业中找到了工作，从而避免了他们的爱尔兰同行们的悲惨命运。爱尔兰人口迅速增长，土地不足，又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因此产生了极端贫困与饥荒。英国的地主与农民，尽管他们从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和采用更科学的耕作方法，以及日益扩大的国内食品市场中得到利益，但是没有那么直接地享受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厚利和无限的繁荣。虽然在70年代以前，英国农业的衰退迹象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早在1850年之前就已具备了使农业一蹶不振的条件。

甚至在大不列颠尚未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以前，那种认为土地乃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的政治制度，就已从根本上受到挑战，并进行了修改。这一挑战便是议会和市政制度的改革运动，所作的修改就是1832年的改革法和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一旦实现了这些改革就为进一步取消地主阶级原来所占绝对优势的其他一系列改革开辟了道路。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航海法和谷物法（这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和W. E. 格莱斯顿先后执政时期的一系列自由贸易预算造成的结果），以及1867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总之，这些变化改变了整个政治权力的均势，并改革了选举制和代议制。在这数十年中，社会和国家都经历了巨大而持久的变化。

1832年的改革法，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允许人数日益增多的工商业阶层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并未取消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权益。1710年规定的下院议员的财产条件仍原封未动，只有苏格兰是例外。因此，郡议员每年须有600英镑的不动产收入，自治城市^[1]议员每年须有300英镑的不动产收入。1838年，这种财产条件由不动产扩大到包括动产，而且，人们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逃避这项法律规定。1832年后，苏格兰就取消了这样的财产条件，但是联合王国其余地方

直到1858年才取消这种财产条件。由于竞选需要巨大的费用，而且议员们不领薪俸，因此绝大多数议员，仍像1832年以前一样，是那些有不动产收入的人，往往不是乡绅就是贵族门第出身的人。

上院早在1832年以前，议员人数就增加了很多，因此，一般说来与18世纪比较，在许多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全国代表性。在整个18世纪，上议院的平均人数是220人，其中大多数贵族议员代表着地主阶级。由于小皮特和他的后继者滥封新贵族，到1837年，上院议员达到456人，其中包括许多军事首脑、内阁阁员、富商和厂主。通过改革法，这些新的财产形式和社会势力的代表得以进入下院与土地贵族平起平坐，直到通过1867年法案以后，才在下院中占有重要的比例。

1832年改革法引起的主要变化是选区的重新分配。下议院虽和以前一样，有658席。但是，郡议员的人数却由原来的186席增至253席。而自治城市议员人数则由原来的262个市镇选举465席，减到257个自治城市选举399席。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各选两名代表。有56个较小自治城市被剥夺选派议员的权利，另有30个自治城市降格到只能选出一名议员的选区，这对实际控制这些选区选举权的地主和城市商人的势力是个沉重的打击。郡议员增加65人，这就加强了地方的直接权力，从而削弱了那种由少数人通过提名、操纵和舞弊来左右选举的做法。与此同时，增设了22个各选两名代表的自治城市新选区和20个各选一名代表的自治城市新选区，这就给在中部和北部城市地区享受这种新选举权的工厂主和商人以更多的权力。伦敦的代表比率低于其他城市。这一法案宣告了自治城市土地所有者的黄金时代的末日；但是，保留了许多选民人数不多的小选区和各郡的选举权扩大到生活小康的自由佃户农，因此在选举中仍大有操纵和舞弊的机会。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将近50个自治城市的近70名议员仍然仰仗豪门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此外还有大约40名贵族和少数几名非贵族，他们实际上可以指定下院议员的人选。在一些大的，众人都想染指的选区，竞选活动的费用往往相当可观；因此，营私舞弊虽在性质上似乎有所改变，但在规模上却并未减小。事实上，由于竞争的席位有日益增多之势，因而需要花钱的机会就更多了。在1832—1847年的五次选举中，401个选区中竞选激烈的平均达半数以上；这比1832年以前的竞选的比例要高。只要投票还不是秘密投票（直至1872年才实行秘密投票），只要候选人主要把选票看作在选举时有利可图

的私有权力，利用威逼利诱或其他非法手段竞选的情况就不可能有多大改变。

选民总数在1832年以前还不到50万，由于通过了1832年法案，增加了1/2左右。到1867年，主要因为总人口的增长和货币贬值，选民总数远远超过了100万。1867年的改革法，进一步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增加到近200万，次年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通过了同样的法案，又使登记的选民总数增加了26万。但由于1867年法案使自治城市选民增加了一倍以上（由51.4万增加到120.3万），而郡的选民仅由54.3万增加到79.2万，因此城市选民的增加，大大超过农村选民的增加。此后，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自治城市的选民总数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郡的选民总数。长期以来在下院一向是郡的议员比自治城市的议员多，现在改变了过去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同时该法案规定，每个居民不足1万人的自治城市减少一名议员，这样重新分配后所余的45个席位，一部分让给各郡，一部分让给大城市。因此，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反映了这几十年来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其结果是扩大了各郡中产阶级的选举权，同时（由于规定城市内户主的选举权）手工业者与大多数家境较富裕的产业工人也有了选举权。正如第一次改革法案一样，这个法案并未立即改变组成下院的社会成分：中产阶级仍然当选为议员。但是，整个下院从此受到广泛的群众的更大压力，而政党组织使这种影响更加直接和有效。

到19世纪中叶，地方政府的制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根据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法案，成立了由纳税人选出的管理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担负起过去由教区委员会和治安官负责的贫民救济工作。它们在一个新的中央机关——济贫法委员会的总的领导和指示下进行工作。各教区联合组成协会，以便办理贫民习艺所。到1840年，这些济贫协会所管辖的范围已扩大到占全国人口6/7的地区。翌年，根据市政改革法，对市政厅机构进行了整顿。在大多数自治城市中，已关闭的市政机关仍有权力。这次新的改革也还实行地方代议机构和加强中央控制这两条原则。此后，经纳税人选出的市议会便成为正规的市政府的形式。市议会的工作由某些领薪俸的官员担任，至少要有一名秘书和一名司库。他们有权制定地方法律并管理新设立的警察，公产以及诸如征收地方税等财政事务。发行债券则须经财政部批准。有权选举市议会的选民，包括凡占有其现有房地产至少3年以上，并已交纳过济贫税

的户主。这一般比选举议会和选举济贫委员会的选民的面要窄，但已足以将大城镇中大多数富商和工厂主都包括在内。1848年由于霍乱盛行和埃德温·查德威克的努力，公众注意到城市急需有最低限度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于是，依照济贫委员会那样，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它有权成立地方卫生委员会。到19世纪60年代，地方机关终于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委派卫生检查员，并担负起建设上、下水道和处理垃圾的工作。1870年，教育法规定选出地方性的教育委员会。这样，地方政府一再重复的特征就是不断增设由地方选出的机构，以负责各项事务，结果就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权力机构；但是代表公众福利事业的地方和中央各式各样的公共机关所进行的活动也随之增加起来。

随着政府机构日益扩大，工作日益复杂，并日益专业化，对专家和领取薪俸的官员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监狱和工厂的监察官、城镇的秘书和司库，以及医生和行政管理人员等，形成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和官员阶级。中央政府也遇到需要更多的、经过更严格挑选的文职官员的问题。1853年，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和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发表了《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他们力主仿效麦考利在同年印度政府法案内规定的新的印度文官制度（参看第8章，原文第206页），由一个中央的委员会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新的文职官员为唯一办法，以代替原来的由个人推荐，各部门自行考试录取的办法；并把文官编制分为两级或两等。1855年5月21日，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文官委员会，负责与各部门的领导商榷进入该部门的条件。“在挑选出来的报考人员中进行有限制的竞争，而不是在所有报考人员中进行公开的竞争，而且录取的最终权限仍归各部门的领导人——这就是1855年改革的要点。”^[2]1870年，格莱斯顿根据另一条敕令，废除了恩赐官职的做法，采用了通过“公开竞争”录用的原则，并实施了两级组织形式，1870年虽未实现有效而统一的行政管理这一理想，但当时已为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1830—1870年的40年，是先由辉格党，后由自由党统治的时代，其间有时插进为时甚短，但很重要的保守党内阁。辉格党内阁于1832年通过了三项改革法案，这是在各地的激进党的压力下和托利党的强烈反对下通过的。1867年和1868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是在议会和各地的自由党与激进党的压力下，由本杰明·迪斯累里和德比勋爵领导

的保守党内阁通过的。这40年当中，各政党的组织及其性质和结盟的情况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墨尔本勋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性格左右了前20年的党派斗争，而帕默斯顿勋爵和W. E. 格莱斯顿的性格则决定了后20年的党派斗争。在前20年中，自由贸易的问题搅乱了党派的阵线：尽管大多数辉格党人支持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代表工商界利益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然而，正是保守党人皮尔在1846年由于废除遭人憎恨的谷物法而分裂了他的党。在后20年间，由于帕默斯顿勋爵反对议会改革，党派阵线也被搞乱；因为虽然自由党基本上赞成议会改革，但最后却是保守党人迪斯累里通过了1867年的法案，从而再一次“挫败了辉格党”。

然而，在整个混乱时期，各政党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加深了分歧，政党为竞选和议会辩论进行的组织工作也变得极为复杂了。1832年以后，在选民面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分歧，起初，这一分歧甚至被夸大，因为托利党人把改革法案看得比实际要激进得多，而激进党人则因其过于温和而大为失望。于是，辉格党就在激进党的支持下，主张废除农奴制，改革济贫法和市政府，以及实行自由贸易等措施；另一方面，托利党由皮尔改组成保守党，它承认改革法案为既成事实，成为地主、教会和议会的保护人，反对进一步的激进变革。皮尔1834年的塔姆沃思宣言，成为这种谨慎但比较开明的保守主义的宪章，其内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友好的态度仔细检查一下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一方面坚持已有的权利，另一方面纠正业经证实的弊端并消除真正的不满”。较大选区的存在和选民登记的技术要求促使全国各地的党组织更加严密，从而导致1832年成立保守党卡尔顿俱乐部，1836年成立自由党改革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不同于以前的那种逐步趋向于过问政治的社交中心，而是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政党组织，兼有中央机关和全国总部的职能，首先关心的是选民登记和指导竞选问题。从那时便发展起比较现代化的一整套党组织机构。党的基金、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已经具备：这时又开始增设地方选民协会、选民登记委员会和选举代理人。1867年出现了全国保守党人和立宪党人联合会，10年后又出现了全国自由党同盟。各大党已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各党在组织上都是由地方协会联合组成的，然而它们的纲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议会领袖和中央总部制定，或由全国联合会所表达的意见形成，则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比较强大和更加严密的组织，为1868年以后的年代里多数党取得决定性地位铺平了道路。但在过去的40年中，大多数内阁仅获得微弱的多数。历届政府不稳定，对党的效忠也变化不定。议会里的政党受自己的选民协会的影响较少，而受这些年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的非党派的大型团体的影响则较多：这些协会如反谷物法同盟、宪章运动协会以及由激进的群众鼓动工作而产生的其他许多宣传性团体。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处于政党发展中的过渡阶段。舆论的力量变得强大而活跃，议会内党派的内聚力日益增强。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两个重要的发展因素还没有结合在一起。只是到了1868年以后，当政党不得不在选民中更深地扎根时，在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的领导下，才形成两党竞争的传统形式。

议会的政党和内阁之间同样也没有结合在一起。内阁职务仍按18世纪和皮特的传统，绝大部分由贵族而不是平民担任。首相常常是贵族而不是平民，如果说财政大臣总是由平民担任，那么外交大臣则几乎总是贵族。这时的上院比以后的几十年在议会生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保守党人始终占绝对优势：但是在下院则大部分时间里辉格党或自由党拥有多数。两院在议会辩论和控制内阁方面所起的作用，比20世纪时更为平等。内阁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同样处于变化无常和难以捉摸的基础之上。首相的地位居于其同僚之上，内阁阁员之间的团结和集体负责的原则，这时已基本上得到承认，但这些原则的含义尚未充分形成。维多利亚女王希望在政府中，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起独立的积极作用；直到这一时期末，党派政治的复杂多变使她在选择和影响内阁的组成方面仍有一定的权力。她保持了作为君主特权的解散内阁的权力，并有权拒绝接受首相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她致约翰·罗素勋爵的关于帕默斯顿的著名备忘录，写于帕默斯顿因表示赞成法国路易·拿破仑的政变而被突然免职之前不久，这个备忘录是对几十年来她成功地维护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典型说明。她要求：①他（帕默斯顿勋爵）可清楚地阐明他对某一件事所提的建议，以便女王同样清楚地知道她对什么事给予批准。②一旦她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批准，首相便不应任意加以变动或修改；她将认为这种行动是对君主不忠，将正当地运用宪法权利解除首相的职务。她希望知道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交换了哪些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作出决定；

她要求及时收到外交文件，有充分的时间批阅送给她的各种草案，以便在草案必须发出以前使她了解它们的内容。^[3]

在这些年里，英国宪法保留了充分的贵族势力和王室权力以维持传统的议会制度。正当各政党仍在群众舆论中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基础时，这些传统势力使民主力量和具有新目标的工商界能够在避免激烈的动乱和不打乱政府与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在政治制度上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成果。强大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运动使改革后的议会通过了相关的重要措施。改革后的议会的首批议案之一就是在英帝国全境废除奴隶制。自1807年起，在帝国领域内买卖奴隶已属非法；由托马斯·福埃尔·巴克斯顿爵士和扎卡里·麦考利领导的废奴协会坚决主张取消奴隶制本身。1833年，斯坦利勋爵在巴克斯顿的支持下，在议会通过了他的“在英属殖民地全境废除奴隶制”的议案。英国的纳税人提供了2000万英镑作为对奴隶主的赔偿；实际支付了18669401英镑。主要受到影响的殖民地是西印度群岛、英属圭亚那和毛里求斯。这一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这些殖民地的经济，但是，到这几十年的末期，由于发展了蔗糖之外的其他农作物和雇用了印度苦力，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

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运动在改革后的议会中推行的另一改革，是改善国内产业工人的境遇。1802—1819年，已经通过几项工厂法案，其目的是禁止棉纺织厂雇用的9—16岁的童工每天劳动超过12小时，并且不准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非棉纺织厂的童工和成人的劳动条件仍不受限制。1833年的工厂法将这些规定扩大到所有种类的纺织厂。它规定9—13岁的童工每天劳动不得超过8小时，13—18岁的青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丝织厂可有某些例外。受保护的年龄层的儿童每天至少要上学两小时。向内政部负责的工厂督察员受命执行这些规定。于是，建立了三项新的重要原则：规章制度更加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公正的监察和执行。1833年的工厂法也开始激起争取成人每日劳动10小时的长期宣传鼓动工作，它由缩短工时委员会一直坚持到1847年。1847年的10小时工作日法案，由于雇主的反对和对法律的解释而告失败，但是到1850年，达成了10小时半工作日法案的协议。与此同时，罗伯特·欧文和沙夫茨伯里勋爵等孜孜不倦的慈善家，与埃德温·查德威克等激进派改革家合作，根据类似的规定，改善了打扫烟囱的儿童、精神病人和犯人的生活。许多工作是在良好的榜样的推动下

进行的，例如罗伯特·欧文在19世纪初期重新组织了自己在新拉纳克的工厂，又如沙夫茨伯里勋爵1851年在继承他父亲的庄园上为雇农所做的工作。由议会进行宣传鼓动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群众的良心已被激发，为国家在经济生活制定更广泛的规定铺平了道路。

1842年的矿业法，将国家法规和检查制度扩大到煤矿，它禁止雇用妇女和女童到井下劳动。1844年的工厂法，确定了机器安全防护设备和其他规章制度，1845年花布印染业也被纳入保护工业之列。1860年，工厂法实施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漂白业和印染业雇用的女工和童工。1864年，“工厂”的定义扩大到包括“进行雇佣劳动的任何地方”，于是陶瓷和火柴等行业也属于规定范围之内。三年以后又包括了小作坊、铸工厂、玻璃工厂和炼铁厂。到这一时期末，人们普遍承认工业应履行国家法规，以增进职工的利益和福利。人们也日益认识到，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说，如果工人不因劳动时间过长和不良工作条件而造成身体衰弱，则生产还会提高，改善工作条件决不会妨碍工商业的发展。

国家用这些办法不断为工业制定法规的同时，取消了对商业的旧法规。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于1776年问世后，就出现了对自由贸易和简化并减少进出口税的要求。这一运动在1830年以后大为加强，1836年，由于粮价昂贵，伦敦的激进党人首次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但是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注定要成为自由贸易运动的真正中心和动力。原棉需要进口，而棉制品在英国的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兰开夏的繁荣显然直接依靠对外贸易：但看来非常荒谬的是为了保持粮食高价而制定的谷物法却阻碍了对外贸易。19世纪30年代，棉布制造商理查德·科布登成为在议会中代表这一行业利益的主要代言人。不久，罗奇代尔的一位棉纺厂厂主的儿子约翰·布赖特也和他站到一起。虽然他们的总的要求是自由贸易，但合乎策略的做法自然是首先集中力量抨击遭到痛恨的谷物法。在这个问题上，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利害冲突达到了顶点。1838年成立了新的反谷物法协会。由于得到富裕的工厂主们的支持，反谷物法协会有了大量经费，用于群众集会和出版宣传物。不久，它们的刊物大量登载了谴责地主罪行、狩猎法规和农民自私自利行为的文章。19世纪40年代英国国教支持的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地主方面的报复行为。

一个富有阶级与另一个富有阶级进行搏斗，双方都求助于工人阶级的舆论支持，虽然工人阶级尚未获得选举权。

1839年1月28日，《泰晤士报》宣称支持自由贸易。在此之前，它一直攻击新的济贫法体制，现在又把火力转向谷物法，声称税率的浮动会导致粮食价格经常不稳定，这甚至对农民也是不利的。同年，各地方协会联合组成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总部设在曼彻斯特。约翰·布赖特本人是一个教友会教徒，于是非国教的新教徒们开始普遍支持反谷物法同盟。由于英国国教支持要求工厂实施管理规定的宣传工作，所以各派教会之间在要求社会改革方面出现了竞争，正如农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之间的竞争一样，每一方都在对方身上吹毛求疵。自由竞争的原则运用到争取社会改革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似乎很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正如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者所主张的那样，说它会在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中起有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科布登主义”就可能变成一个世纪以后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完整哲学体系。在它的最狂热的信徒心目中，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在群众集会上，在小册子里和报刊上，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反对谷物法和拥护广泛的自由贸易的宣传。

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运动对政党和议会制度的冲击，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某些时候（例如1842年），这种运动与宪章运动联系在一起，带有革命性质，人民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反对政府。到1843年，反谷物法同盟出版的周刊《同盟报》，发行数达两万份，还在科文特加登剧院^[4]举行了24次群众集会，运动就这样发展到了首都。随着运动扩及各郡，烧干草工人和农民的动乱也随之蔓延开来。从1844年夏季开始，反谷物法同盟完善了为同盟的同情者购买土地并将其作为完全保有的地产分配给他们的办法，这样就保证了他们作为40先令地产保有人而拥有一张选票的权利。尽管1842年、1843年和1844年连获丰收，反谷物法同盟仍然成长壮大起来。1845年略有歉收，病虫害又毁坏了马铃薯的收成。由于马铃薯较之其他谷类更为爱尔兰人的主食，于是给爱尔兰带来了饥荒。反谷物法同盟要求立即彻底废除阻碍粮食进口的法案。两党均发生混乱。皮尔辞职，约翰·罗素勋爵未能组成少数党政府。皮尔组织一个与旧内阁相差无几的新内阁，并着手检查整个财政制度。当即完全取消玉米税，大大降低小麦、燕麦、大麦和黑麦的税率，以代替1842年的税幅，并从1849年年初起，上述谷

类每1/4英担只需缴纳一先令的固定的轻税。他又将黄油、乳酪、啤酒和腌鱼的税率减半，并允许免税进口一切其他食品。为了补偿这次农业利益所受的损失，他建议减轻他们对地方财政的负担，并降低工业品的进口税。他在过去1842年和1845年的预算中，实际上已取消了原料的进口税。现在，他完成了使英国成为自由贸易国的进程。为了解决爱尔兰的饥荒，一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另一方面采取了广泛的公私慈善救济措施。亚当·斯密曾以“保护毕竟比富裕重要得多”[\[5\]](#)为理由捍卫过航海法，该法的目的是保护英国的航运业，正如谷物法是为了保护农业一样。及至1849年，这些航海法也被废除了，而且对英国的航运业未造成任何损失，因为它在世界上已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到19世纪中叶，税收只是为了国家收入，而不是为了起保护作用。

全部争论是在言过其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都抱有过多的希望和恐惧。事实上，在废除谷物法以后，粮价并未下降，虽然谷物法的废除可能防止了粮价的上涨，但谷物法并不是影响生活费用的唯一或必然的主要因素。事实上英国这时已成为一个工商业国家，它的利益主要在于廉价的食物和廉价的原料；不论在技术上或在出口的总生产能力上它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竞争者，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对国外的敌手无所畏惧。既然现在俄国、德国和北美能大量提供廉价的谷场，那么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英国通过出口工业品和商业往来偿付上述进口物资的费用，是更为有利的。但是，这种优势只延续了20多年的时间，由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英国终于恢复了保护措施。最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使英国稳得利益的政策，必然是永远适宜的政策。

皮尔的卓有成就的内阁自1841年一直维持到1846年，这是托利党革新的极盛时期。它的其他成就包括将英镑定为金本位制的1844年银行特许法。该法确定了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合股银行之间的关系，这些合股银行这时业已证明是成功的。自1826年起，合股银行获准在距离伦敦65英里以外发行纸币；1833年起，又允许它们在上述65英里以内的地区内发行。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铁路事业繁荣时期，银行的信贷急剧膨胀，造成了财政危机，于是导致要求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1844年的法案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同发行部分开，限制其信用发行的纸币为1400万英镑，并要求超过上述数字的几乎全部纸币必须以金

条、银条或硬币为保证金。不允许新办的银行发行纸币，其他原有银行不能增加发行额（参见第2章，原文第40—41页）。同年，另一法案规定了合股公司的业务范围。皮尔的预算在整顿和简化整个财政制度、减少关税和货物税，以及减轻国债等方面获得了成功。

当有进取心的工商业阶级用这些方法为自己在国家中和制定国家政策方面争取新的地位时，工人阶级也并非没有采取行动。到1830年，城市工人中间已经有了自助和激进主义的生气勃勃的传统。激进主义思潮自1815年以后便开始传播，尽管惊慌失措的政府采取种种镇压手段。各种政治联合会不同程度地参加了争取改革法案的宣传鼓动工作，与此同时，由于弗朗西斯·普莱斯等的努力，1824年成功地废除了结社法中最具压迫性的部分。在战后的年代里，贫困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感情，同时，工业主义的发展促使工人组织获得显著的成长。从前用于掩盖工会活动的互助会，现在可以去掉伪装了。新成立的工会公开自己的会章并出版有关规章制度的书籍。它们卓有成效地就劳动条件、工资和学徒期限等达成地方性协议。此后20年的主要特征是激进主义与罗伯特·欧文所阐明的新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以及二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和组织的合作。如果说截至1850年，他们所取得的具体成就还很少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传播和显示了工人阶级自助和自愿组织的原则。到1870年，有组织的工人显示出他们在国家中是一支决定性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宪章派的一些要求有的已得到满足，有的日益被认为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

激进党人对1832年的温和的改革法感到十分失望；而新的济贫法在早期执行得很严苛，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1832—1850年，社会动荡的表现：建立更广泛的工会组织的强大势头、宪章运动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和合作化运动。这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认为运动的成功取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树立团结一致和奋发自助的精神，也取决于向统治阶级和工厂主施加压力。从这一观点来看，自由贸易运动便是一种敌对和异己势力，因为它鼓励通过立法和财政改革来达到繁荣的目的，并且强调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存在某些利害冲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同样强调有钱有势的阶级中两部分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当时对廉价食物的要求比对选票和一年一度的选举的要求更为迫切；到19世纪中叶，自由贸易的宣传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而宪章主义以及为更广泛地成立工会所作的努力却遭到失败，两者之间形

成鲜明的对比。这20年里，在主要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只有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的确，宪章主义从工联主义的早期失败中得到了一些动力。1829年，约翰·多尔蒂成立了纺纱工人总工会，翌年，他建立了全国保护劳工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在纺织业中得到发展，并将其成员扩大到陶瓷、采矿、制帽和机械等行业。它没有起到什么推动力，也未获得多少成就便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较大的工人组织中有建筑工人联盟，不久它就拥有4万多名会员，居于领先地位。1833年，这个工会接受了罗伯特·欧文的理论，欧文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一项合作生产计划，通过它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并由一个全国性大协会接管建筑业。1834年，这个协会成为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核心，其目标是把所有工会联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它将包括迄至那时为止工联主义极少接触的农业工人和女工。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是欧文创建的联合王国全国生产部门道义大联盟和国家复兴促进会（均建于1833年）等组织发展的顶峰。该联合会不同于以前的组织，它仅限于工会会员。这些年来激增的各种合作性和宣传性团体不能参加该联合会，欧文本人最初也没有参加。这标志着成立“总工会”的几次失败的尝试达到了顶点：总工会想使许多现存的工会采取一致行动，尽管不要求它们在组织上一模一样。但是从工联主义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面对着冷酷无情的雇主和敌对的政府，它的计划全是空想，无法实现。当多塞特郡托尔普德尔村的6个农业工人因犯非法宣誓罪而被判处7年流放时，该联合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这6人的目的是组织一个农业工人的联谊会，并与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建立一些联系。对他们的野蛮惩罚引起了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多切斯特委员会”所组织的广泛抗议。但是，政府拒绝减轻原判。此后，由于对法律的畏惧，许多工人脱离了工会。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瓦解。

“托尔普德尔蒙难者”4年之后获得赦免，但他们的遭遇对工会活动仍是个可怕的威慑因素。许多行业的全国性组织消失了，甚至建筑工人联盟也解体，分别恢复为它的各个组成行会。在19世纪40年代，矿工成立了全国协会，1845年再次成立“总工会”的尝试只获得暂时成功。只是到了1851年才形成后来工会组织的一个模式，当时成立了一个工程人员联合会，它由中央机构管理，捐款甚多，福利甚高，是全国性的组织。熟练工人尤为成功地组成了稳定的工会，如1861年成立

的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1868年成立了英国职工大会。从那时起，工联主义发展壮大起来。

同时，19世纪30年代的失败激起了社会上的不满和不安的潮流，从而产生了宪章运动。1836年，威廉·洛维特在受人尊敬和自学成才的伦敦手工业者中组成伦敦工人协会。两年以后，他与弗朗西斯·普莱斯草拟了有6点纲领的“人民宪章”，它成为改革的纲领，激进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大多数联合的基础。宪章要求男子（不包括女子）享有普选权；平均分配选区；取消议员的财产条件；对议员支付薪金；秘密投票和每年举行一次普选。其中最后一点是宪章主义者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也是最激进的要求，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改变整个议会体制的性质。一个一年一度进行选举的下院将会成为直接民主的工具，而议会职责的性质（以及内阁职责的性质）也会彻底改变。

1816年成立的伯明翰政治联盟这时由银行家和货币改革家托马斯·阿特伍德恢复起来，它支持人民宪章，并号召为实行宪章而举行全国请愿。脾气暴躁的费格斯·奥康纳领导下的利兹改革派也支持宪章运动，奥康纳的《北极星报》成为宪章派的正式机关报。以伦敦、伯明翰和利兹三城为基地，宪章派组织了群众集会和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宣传鼓动工作。很富有煽动口才的演说家，如J. R. 斯蒂芬斯·布朗特、奥布里恩和理查德·奥斯特勒唤起民众对“宪章”的热烈支持，不久，宪章就被视为包医社会百病的万应灵药。这一运动的最高潮是1839年春在威斯敏斯特宫广场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组织了规模巨大的向议会请愿的活动。但是，宪章运动在洛维特及其南部追随者所领导的温和派与奥康纳、奥布里恩及其北部追随者所领导的暴力派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年7月，当全国代表大会迁移到伯明翰，将近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遭到下院拒绝以后，各地出现了内战的气氛。请愿遭到拒绝后，各地发生骚乱和地方性罢工，在南威尔士甚至发生了暴动。但是，政府的坚定立场和工人阶级内的手工业者的团结精神阻止了暴力行动。为了使运动保持活力，成立了全国宪章协会。1842年举行的第二次请愿又遭拒绝；其后于1848年又举行了第三次请愿，这次请愿许多签名是伪造的。1839年以后的宪章运动，在言辞上很激烈，但缺乏坚实的力量。运动在年景歉收和社会极端贫困时活跃一阵，可是再也没有恢复原有的力量。它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商业复

兴和更大的经济繁荣。但宪章运动是第一个有效的和自发的工人阶级组织；它使各阶级注意到社会改革的迫切性；它激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良心并动摇了麻木的自满情绪；它在英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和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1815年以后的年代里，以自愿合作进行生产的理想来取代追求个人利益的竞争性私人企业的思潮广泛地活跃起来，最积极的是罗伯特·欧文和他的追随者。他们在1821年成立了合作经济协会，各地也进行了类似的合作社试验。1834年，他们由于工联主义普遍失败而受到损失，从此欧文主义丧失了阵地。但是，像昆伍德那种合作村试验一直继续到19世纪40年代，1844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员”成功地成立一个合作商店。该店建立在社员即消费者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给社员分配“按收益计算的红利”。1854年，他们又办起罗奇代尔生产合作社，将其经营范围扩大到生产和零售商业方面。10年以后，建立了批发合作社，随后在1868—1869年在苏格兰也兴办起同类的合作社。1852年和1862年通过的工业和节俭性协会法大大促进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它们还得到工会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原则迅速扩大到经济生活的其他部门，开办了合作性的煤矿、纺织厂和银行等。合作运动是这些年来所有工人阶级运动中发展最为迅速、成绩十分显著的运动。

1868年以前的20年是国家极为繁荣、中产阶级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要求实行不记名投票和扩大选举权的激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继续进行。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这一惊人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前20年的尖锐紧张的社会形势已经过去。工人阶级的激动情绪已经消除。议会通过的国内立法也很少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议。在帕默斯顿勋爵的领导下，外交事务占主要地位。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上台，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兴奋，美国南北战争，以及俾斯麦的控制欧洲事务等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些对外政策问题，本卷其他章节（第17、18章）将有论述，这里我们要谈的只是有关帝国发展的问题。

在帕默斯顿执政时，英国欢迎被压迫民族要求实行自治的每一个运动。^[6]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其他列强的扩张，特别是俄国的扩张，在这一时期它参加的唯一重要的欧洲战争就是对俄国的战争。它企图通过缔结通商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860年与法国签订的《科布登条

约》），来与欧洲进行自由贸易。它推行和平政策，因为战争，即便像1860—1865年的美国内战，也会妨碍贸易和损害它的工业生产。科布登和布赖特主张自由贸易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论据，就是自由贸易能消除战争的一些主要根源，并通过共同的利益把各国团结起来。总之，英国的利益未被视为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为它的利益遍及全球，也因为贸易和活动的自由将消除实现各国人民利益的障碍并使其自然和谐地发展，所以英国的扩张和繁荣是世界普遍向前发展的途径。这是令人高兴和欣慰的信念，但也是一种真诚而有活力的信仰。

形成英国商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这些思想，也彻底地改变了它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之所以有这种重大变化（这种政策在自治领中建立了自治政府，并且产生了帝国和英联邦的新观念），是由于英国的经济利益在全世界得到发展，它们看来与全球的自由通航和自由贸易，以及全世界的进步是协调一致的。英国与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的发展，影响了移民和海外投资的进展；这两方面的进展都与铁路和航运事业的发展以及殖民地自治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迅速扩大的工业生产正在寻求相应扩大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而促使英国人能够在比以往更加全面的世界范围内追求这一目标的是交通和通信，特别是铁路、轮船和电报的引人注目的发展。

早在1840年就已建立了连接英国与其殖民地以及印度洋上势力范围的轮船航运事业；但地中海航线仍有一段需经亚历山大港到苏伊士和亚丁的陆上运输。大部分的东方贸易依旧是靠帆船绕过好望角，航程长达6—8个月。此时也已开辟了好望角至澳大利亚的轮船航线。1870年，英国印度电报公司成功地铺设了第一条连接英国和孟买的直达电缆，再经孟买通向新加坡，转而通到澳大利亚。海外殖民地的铁路发展较慢。到1853年，加拿大仅有约200英里的铁路，而澳大利亚实际上没有铁路。印度的铁路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才发展起来，几乎全部是靠英国资本。殖民地已由遥远的难以到达的前哨和基地，变成密切得多的经济利益网，在这种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经济的统一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更加心甘情愿地放松对殖民地的政治和商业控制，而过去一直认为这种控制是维系帝国的天然纽带。但是，尽管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经济地位起初仍普遍地维持不变。殖民地依然是英国商品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在这些

年中，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分工，不仅保持下来，而且得到发展：英国资本随着英国产品不断地输入殖民地。“日益集中于几种大宗产品的出口；采取以运进生产资料为主要形式的大量资本输入；高额的投资；尽管有大量移民却仍能充分就业；提高利润和固定资产的价值——这些就是殖民地经济活动的普遍模式。”^[7]

大约在1850年以后，殖民地的发展引起英国海外投资目标的改变，甚至缩小投资的地理范围。在1850年以前，资本流向世界各地，但很少输入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25年中，资本日益集中到殖民地。1850年，英国1/3左右的海外投资（约2.25亿英镑）是在美国，其余的主要在欧洲。及至1870年，仅印度铁路一项投资便达7500万英镑以上，而且海外投资总额的1/4左右是贷给各殖民地政府的贷款。

在1830—1870年之间联合王国的海外利益在两个方面起了变化：海外利益第一次真正变为全球范围，同时，在性质上不再以商业为主。老殖民帝国主要是由北美互相毗邻的地区组成的，帝国的主要中心在北大西洋；美洲13个殖民地宣告独立后，它支离破碎了。帝国与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的联系，以及与美国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使英国的利益仍固定在北大西洋。但是与此同时，帝国利益的重心已由大西洋转移到印度洋，在那里，英国在印度、锡兰、缅甸的贸易和势力的发展和巩固正在开创着一个广阔的新东方帝国。因此，英国在南大西洋和太平洋正获得广泛的新利益。开普殖民地和一系列岛屿以及西非各港口成为北大西洋区域与印度洋之间海路上的踏脚石。1830年的英属殖民地地图，看来似乎已具有后来发展情况的大致轮廓。到1870年，西非的港口和商埠已发展成为大片的殖民地，利文斯通已经考察了非洲中部，好望角已成为向北无限扩张的跳板，而在印度洋西岸则有相应的一长串英属殖民地。在南太平洋，过去在澳大利亚南部和新西兰北部的立足点，现在正在迅速变成英国控制下的整块大陆。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人们预料经地中海到达印度的更快的新路线将立即使原来绕过好望角的全部由英帝国控制的旧航线失去其价值。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好望角仍然长时间地保持其原来的优越地位。关于这一点，一位英国殖民部的官员是这样说的：“好望角没有苏伊士运河那些复杂情况，它距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福克兰群岛的路程相差不多，是来自东方的军队的最好

宿营地，最好的物资补给站，良好而廉价的供应市场，以及大型船舶的修理所。”[\[8\]](#)

扩大贸易和寻找市场，仍然是这些发展背后的重要的刺激因素。但此时其他方面的目的和刺激因素也不低于纯商业的目的。这几十年当中，工业革命已达到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的阶段，它不仅要求殖民地市场，而且要求世界市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意味着曾经是重商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死亡。在这一时期中期废除了航海法，表明对殖民地商业价值作出新的估计。殖民地商业被认为是全球贸易的基础。保持全世界原料供应和市场对英国工业品的开放，被认为比在分散的殖民地取得特别的商业利益更为重要。这些地方被认为是保证“航海自由”所需的战略优势和力量的地点；它们可以为投资者、传教士和移民提供有利的机会；它们可以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保持国家威望。总之，这些优点超过了过去的重商主义的纯商业动机。

放弃以重商主义的商业精神作为殖民地的发展和管理的统一政策之后，曾一度出现政策上的真空。在这一时期之初，对于殖民地没有一套完整的政策，而且最有影响的学派把殖民地视为应尽早摆脱的累赘。但在下一个时期制定了帝国的积极的新政策，包括有计划地利用殖民地的土地组织殖民事业和投资，并建立负责的自治政府作为管理殖民地的目标。乐观的自由主义者将自己对自由贸易的信念建立这样的基础上，即各国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和谐，他们也把这种理论用于殖民地事务。他们认为不应由伦敦实行控制，而应及时地允许殖民者组织自治政府。通过自由民族之间利益的自然和谐而产生的自我利益，将证实比人为地管制贸易或由母国给予远距离的政治指导更能加强帝国的团结一致。殖民地如能享有贸易自由和航海自由，也享有联合王国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巨大优势，它们也就能享有自治的自由。如果能在世界各地实行“门户开放”的话，那么即使在英国的殖民地也实行“门户开放”，其代价也算是很小的：只要英国的工业品在竞争很小的情况下能从每个开放地点获得利益就行。

1798年，杰里米·边沁曾敦促法国人“解放你们的殖民地”，而早期的激进分子在美国独立经验的影响下反对殖民主义，认为它是他们所谴责的旧制度的一部分。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激进革新者，他们从殖民地的开明的计划和管理工作中，看到了解决

联合王国人口迅速膨胀的出路（马尔萨斯等悲观的预言家们断言，人口膨胀会导致普遍的贫困），同时也看到了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的机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查尔斯·布勒、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德拉姆勋爵也持同样的看法。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当中的大量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紧迫的殖民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其原则的机会。通过他们的努力，责任制自治政府的原则扩大到由英国人殖民的所有海外领土，而英国19世纪产生的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思想之一的“自治领地位”的概念，使帝国内部团结的新思想不是建立在控制和限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帝国的最大一块领土印度的行政管理工作也是由这些激进改革家改组的：1853年在麦考利主持下对印度文官制度实行改革，采用了新的效率和道德标准，这些做法后来又影响了联合王国自身的行政管理制度（见原文第337页）。1860年施行的印度刑事法典，也是麦考利以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思想为基础制订的。

年轻的激进派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到澳大利亚，韦克菲尔德制订出一个系统开拓澳大利亚的殖民计划。他建议政府应高价出售土地，并用所得的利润组织耕种土地所需劳动力的移民。这样，联合王国将迁出其剩余人口，以利于新殖民地的繁荣。边沁为他拟订了建立一个合股殖民协会的计划，并按时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得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乔治·格罗特和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的支持。虽然韦克菲尔德精心设计的计划只有部分得到实现，但他的殖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却激起人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命运和前途的新的兴趣。移民工作从出售土地收入中得到一部分资助，另一部分来自英国政府的补助，过去缓慢迁徙的移民，到了19世纪30年代加快了步伐。1840年停止向新南威尔士流放囚犯，但1850—1868年又恢复向澳大利亚西部流放囚犯。1837年，韦克菲尔德成立了新西兰协会，以便实现他的理想，两年后又创办了新西兰土地公司。向该地的移民是在极大的混乱中进行的，但是在1840年，根据《怀坦吉条约》，英国国王终于获得了新西兰的主权。

在此期间，加拿大的叛乱吸引了激进派的注意力。到1838年，原来根据1791年的加拿大法而在英国移民占优势的上加拿大和以法国移民为主的下加拿大之间制定的划分办法，显然不能再维持下去。下加拿大说英语的少数人由于移民而人数增加了。但是，两个民族之间的

恶感，使法国人占多数的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与英国总督和政务会之间在宪法问题上形成了僵局。由于种种原因——在旧保王党家族所控制的政府和新迁来的较贫穷的移民占优势的议会之间的冲突——在上加拿大也出现了类似的僵局。1837年年底，两个省份都发生了暴乱。约翰·罗素勋爵实施了暂时停止下加拿大宪法的一项法令，1838年德拉姆勋爵受命担任拥有广泛权力的高级专员和北美各省的总督（包括上加拿大、下加拿大，以及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德拉姆在布勒和韦克菲尔德陪同下到达任所，他的使命被视为对辉格党和激进党处理殖民事务的政治能力的考验。第二年，德拉姆写了《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该文成为英联邦发展的宪章。

这个报告不仅致力于解决加拿大的当前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而且要解决公地、移民、定居以及未来的政治自治和统一等更广泛的殖民地问题。它提出的两个基本建议是使上、下加拿大重新联合，以及实行责任制政府。德拉姆认为重新联合就是实行彻底的联合，而不是结成联邦；他认为这是成立自治政府的必要前提。他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也把某种程度的民族统一看作自治政府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目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省的民族性质”。这将通过英国人对法国人的绝对支配来实现，从而永远消除“一个好幻想的小民族所具有的某些无益的狭隘观念”。他希望统一的加拿大将成为北美全部英国领地在未来组成联邦的核心。关于责任制政府。他的意思是使各省的行政当局直接对立法议会负责，而不是对伦敦政府负责。他写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某些英国政治家竟设想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不承担责任的政府。”他争辩说，责任制政府自身将维持帝国的统一，其途径是使帝国成为自由民族的共同体。但是他对英国政府想保留一些控制权的愿望作了重大的让步，他建议各省在内部事务方面享有完全的自决权，但伦敦政府仍然掌握处理一定事务的权力，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伦敦政府保留的权力包括“确定政府形式，处理外交关系，调整与母国、其他英国殖民地和外国的贸易关系，以及处理公有土地”。总督仍对伦敦负责，但他不能指望“与当地议会发生任何争议时得到国内的支持，除非问题严格地涉及帝国的利益”。

1840年，上下加拿大联合，建立责任制政府的问题则留待后任的总督在实际上加以解决。1846—1848年，新斯科舍省长和加拿大总督

先后接到指令，要他们按照代议制议会所能接受的部长们的建议行事。1847—1853年，德拉姆的女婿埃尔金勋爵逐步建立起一套惯例，按照这些惯例，行政部门在处理各项内部事务时必须得到立法议会的同意。1867年，英属北美法为除纽芬兰之外的所有各省成立联邦敞开了大门，这一工作于1873年完成。在一个世代内，加拿大从不满和不团结的局面转变到自治和民族团结。但是，这一变化来之不易。1846年，加拿大谷物种植者失去了过去在联合王国市场上享受到的优惠待遇。三年后，规定他们的出口贸易局限于英国市场的航海法才被废除。要不是1854年埃尔金与美国签订通商互惠条约的话，加拿大脱离英国的倾向就很可能更为显著。这个新自治领向西扩张的过程是缓慢而困难的。1869年，它购买了赫德森湾公司在温尼伯湖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广阔土地，翌年建立了新的省份曼尼托巴。连接加拿大东西各省之间的干线——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铺筑中遇到很多障碍，直到1885年才由蒙特利尔开出通往太平洋的第一列火车。

加拿大向责任制政府的迈进，成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政体发展的榜样。1851年，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被邀请起草它们自己的殖民地自治法规。1855年，议会法案承认了这些法规并使之合法化。如同加拿大那样，自治政府成立后便向该大陆的更多地区扩张，而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金矿更促进了这种扩张。1859年，昆士兰单独成为一个殖民地，但西澳大利亚在1890年发现金矿以前，一直是又小又不发达的殖民地。1850—1870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增长了三倍，由不到50万增加到将近200万人。1852年新西兰分为6个省，每省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省议会。整个殖民地的政府由一名总督、一个被任命的政务会和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管理。从1857—1870年，由于毛利战争，国家遭受创伤，到1867年英国军队才完全撤出，新西兰成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统一自治领。1870年其人口仅有25万。1854年以来，开普殖民地已有一个立法议会，到1872年成立了责任制政府。

1865年，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宣布，由殖民地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只有在与英国议会法案明显相抵触的情况下，或与根据此法案适用于殖民地的法令或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方属无效。这实际上是保证所有殖民地立法机关享有内部自治，并正式消除了由于南澳大利亚法院就与英国法律相抵触的殖民地法律的有效性问题作出的判决而引

起的疑问。这意味着在殖民地自身的范围内，它的立法机关是至高无上的，它仅服从帝国议会。这就是“殖民地立法独立的宪章”。放弃德拉姆建议实行的各种限制的过程业已开始。根据1840年和1852年的法案，加拿大未被占有的土地的控制权已移交给各省。1858年，加拿大立法机关关于征收英国商品关税的规定得到通过。到1870年，自治领实行完全自治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这项工作持续到1931年，当时威斯敏斯特条例正式承认了自治领的完全自主权。

但是这样明确地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殖民地确定的发展模式，在帝国范围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某些较老的殖民地，如巴巴多斯、百慕大和巴哈马仍保持它们的古老的代议制，但没有建立起责任制政府。牙买加过去曾有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但后来取消了。1814年以后经过征服或取得特许权而得到的大多数殖民地，都没有获准成立旧式的代议制机构。在印度，经1857—1858年的兵变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结束，代之以英王的直接统治。在整个英帝国，很可能一方面继续实行直接的殖民地行政管理，同时从备受优待的白人殖民地將责任制自治原则传播到别处。在一个千差万别的帝国中，政府采取多种形式似乎确实比强行采用任何单一形式更为适宜。

在1870年之前开创的帝国防务体制集中体现了这些年当中英国在国内外发展的特点。几十年来，海军从帆船发展到轮船，由木制发展到铁制，由弹丸发展到爆破弹（参看第11章）。新型舰艇和大炮要求更高的技术，因此需花费更高的训练费用。在此期间，海军军费的支出大约增加一倍。除在印度驻扎强大的军队外，帝国的陆军都集中在国内。由于具备迅速的轮船运输力量才有此可能，而且欧洲的紧张形势也要求如此。1868年之后爱德华·卡德韦尔改组了陆军，建立起一支比克里米亚战争时的陆军更有战斗力和更民主的战斗部队。人们日益认识到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和领土需要一个始终一贯的帝国防御计划，这使1867年约翰·科洛姆爵士以传统的形式制定的战略原则得到承认。^[9]意味深长的是，这些战略原则是建立在贸易乃是维系帝国的纽带这一理论基础上。在战争中，海军的任务应是封锁敌国的港口，保持连接帝国海军基地和商业基地的重要海上航路的畅通；从而破坏敌人的贸易，同时保护英国的贸易。陆军的作用在于守卫印度，保护国内港口和海外海军基地，并在海军的掩护下成为攻击敌人领土的矛头。显然，这是最适于海上商业帝国需要的防御体制，其特点在于它

不过是查塔姆和威灵顿的理论的现代化而已。以新的方式使英国致富的各种变化，也以新的方式使英国容易受到打击。但是，通过创造性地采用传统的制度和原则以适应新的需要，英国仍然有希望保持富国强兵。

（黄东明 译）

[1] 原文borough，指有权派议员进入议会的城市。——译者

[2] 爱德华·休斯：《文官制度改革，1853—1855年》，《历史》杂志，第27卷，第76页。

[3] 维多利亚女王致约翰·罗素勋爵的备忘录，1850年8月12日（A. C. 本森、伊谢尔子爵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伦敦，1908年；第2卷，第264页）。另参看斯托克马尔男爵的备忘录，女王的备忘录即依此为根据，维多利亚女王致约翰·罗素勋爵的备忘录，1850年8月12日（A. C. 本森、伊谢尔子爵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伦敦，1908年；第2卷，第238页）。

[4] 即伦敦皇家歌剧院。——译者

[5] E. 坎南编：《国富论的实质和目标之研究》（第5版，伦敦，1930年），第1卷，第429页。

[6] 但是帕默斯顿对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态度，参看本卷原文第264页。

[7] 《剑桥英帝国史》（剑桥，1929—1936年），第2卷，第754页。

[8] 《剑桥英帝国史》，第2卷，第591页。

[9] J. 科洛姆：《关于保护我国商业和部署兵力的意见》（伦敦，1867年）。

第十四章 俄国在欧洲和亚洲

随着20世纪俄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性质日益确定和明显，19世纪中叶俄国的状况在促成这次革命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清楚地显示了出来。甚至在革命前二三十年，沙俄的各种制度，就已经像这个专制政权为保持这种制度而作的种种努力一样，只不过是阻碍，反而是促进了这种统治的垮台，有利于实现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仍常常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世界性目标。同样，精神上的集体主义，实际上即社会专制主义的倾向，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前很久就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互相敌对的各派俄国改革者所共有的东西。这种倾向也仍然被认为是偏离了自由发展的正轨。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沙皇专制制度和反对它的运动，给革命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提供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西方日益倾向于对历史进行修正。俄国的制度和思想的残存和重现显然是进行修正时的指导因素。

也许，这方面的迹象最明显地表现在，一方面是专制中央集权政府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名义上（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农村集体主义传统，二者并存的局面。但是西方的解释者们还会像他们的目光敏锐的前辈当时所见到的那样^[1]：看到政治权威来自官僚或军队高层，而不是私人的、地方的或世袭的地位；为了道德或经济目的，对西方的自由概念普遍持冷淡态度；对俄国的历史地位念念不忘；民族排外意识与超国家的，实际上是全球的使命感联系在一起；与老牌的海上商业帝国不同的新教条产生了一种命定要向亚洲扩张的信念；除俄国知识分子所吸收并改造的德国哲学教育外，又勉强地接受了德国的国民经济理论以及军国主义和工业技术二者的模式。

使这些民族特点得以持续保存下来的俄国历史进程，是按历代沙皇的统制来分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界格外依赖于政府，又格外依赖于专制君主本人；一方面是由于历代沙皇的统治时期常常是以暴力始以暴力终。例如，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由于继承人难以决定，他的兄弟尼古拉一世的继位就被推迟并引起混乱，而且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流血哗变；尼古拉一世死于克里米亚战

争期间，当时有人写道，他的唯一抉择是退位或者死。^[2]25年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死于恐怖分子的暗杀。以1825年12月14日（旧历）/26日（新历）^[3]的起义为顶点的第二次这样的危机，是广泛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在俄国的第一次爆发。尽管它的领袖人物是一些拥护18世纪哲学家学说的20世纪型的“年轻的校官”，但这并不只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精神错乱的统治的尾声。正如苏联的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列宁的话：“十二月党人鼓舞了赫尔岑，赫尔岑发展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4]赫尔岑本人是19世纪最著名的俄国政论家，在他所著的《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中，对19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作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承认十二月党人是先驱和烈士。

沙皇尼古拉的第一项行政措施就是对十二月党人进行大规模的侦查和审判，目的是取得政治情报和进行政治示威。仅仅处决了5名谋杀沙皇的嫌疑犯，其余的人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成为该地开化的促进因素。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出于怜悯和对革命传统的同情（后者更为持久）对此加以谴责，这未免过分。尤其是因为其流放的生活条件，无论是在最初的名义上服苦役期间，或者是在那里落户以后，都与对普通罪犯、战俘或政治犯，特别是波兰民族主义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在1800年至1850年间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平均为5000人）。^[5]

沙皇的这种仁慈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于宽宏大量；他并不想由于对贵族中的政治异端分子的处理而使贵族们沮丧。结果，他作为残酷暴君的名声有所挽回，原来甚至连那些忠实于他的贵族也怀疑他抱有军国主义野心，现在也改变了看法。实际上，尼古拉作为沙皇发展成一个严厉但头脑清醒的专制君主，而且享有有才能的君主的名声，这不仅在俄国历史而且在欧洲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掩盖了“沙皇盛世”时期在相对军事力量和民族团结方面的衰落，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为止。这个政权主要依靠他个人的声威，通过这个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事务。他在1844年访问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竟对自己能同“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共进早餐感到惊异，这时他的声望可谓达到了顶点；尽管意义深长的是，她接受了普遍流行的西方观点，即认为这位沙皇的赫赫声势是靠在国内进行镇压得来的。^[6]但是，他那刚强的举止欺骗不了他左右的人。他既没有担任领袖所需的那种才华，也没有那种镇定，他的左右从他那些似乎果断的决定中发现的是高度的紧张而不是坚强的性格。

尼古拉不是作为政治理论家而是作为军人接替处于混乱状态的军队而开始他的政治统治的，因此，他准备把从十二月党人革命得来的教训运用于进行权宜的改革，并制止来自欧洲的革命影响。可是即使在1830年的革命风暴之前，这个政权的施政方针也是由两项著名的镇压措施决定的，一项是关于改组和加强在上代沙皇时已经非正式发展起来的政治警察的敕令，一项是关于新闻检查的敕令，两项都是在1826年颁布的。前者授权这个新的警察机构“处理一切高级警察事务和搜集情报”，特别是控制“国事犯”，监视外国人和宗教异端分子（分裂派）以及检查通信。皇帝陛下办公厅“第三厅”与已有的宪兵或半军事警察或由地方征募和管理的普通地方警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仅仅由40名官员组成，但到尼古拉在位的末期，关于它通过秘密的特务网进行控制的情况已经众说纷纭。它正式形成了俄国的警察政权传统，它“按行政程序”（俄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说法）采取超法律行动，可以拘捕、流放或查封财产而不通过法律手续。此外，它还是一个实行文化控制甚至精神控制的机构，一部分是超出法律的，一部分则属于新闻检查敕令范围之内。这个敕令在当时具有同样的代表性，它建立了一种检查制度，这个制度在1828年修正，以后只有细微修改，一直延续到1865年。尽管这是一种愚民政策，但是在俄国和在不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行政措施中有与它相类似的做法。它往往被任意应用——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所发表的大部分评论现在看起来是天真的。当时欧洲各专制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禁止出版诋毁宗教、王朝或合法政府的书报的做法，扩大到对过去的革命过分宽容的历史研究，除教科书以外的哲学著作，甚至扩大到“削弱灵魂不死信念”的医学著作。这个机构是预防性的，由在文化中心的一些由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主管，受教育部的监督，但经常由沙皇或皇帝陛下办公厅干预。1828年以前，检查制度还有一个任务是控制文风和语言，而到19世纪30年代，它又被用为官方民族主义的工具。另一方面，对哲学的攻击显然是由于沙皇本人认定这种著作会煽动或包含着政治思考。其结果是关闭了某些大学的学院。但是，尼古拉已用不着亚历山大统治末期曾经盛行的在各大大学独立从事迫害的教士：这些教士中的主要分子被贬斥，为首的右翼宗教极端主义者佛提乌修道院院长失宠。亚历山大一世曾经长期鼓励的福音派新教运动甚至更受到怀疑，它的主要机构，传布俄文版福音书的圣经会被解散。

对任何自发运动的镇压都是由一个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阴谋的报告引起的。这个报告建议进行改革，但其结论是，对改革的要求是由于思想和教育的过分自由而造成的。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尼古拉在其统治初期所考虑的许多改革都有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他的一些比较肤浅的建议付诸实施了，而一些比较深刻的改革，特别是巩固贵族阶级和实行土地改革，虽然一再提起，但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政权在早期所持的这种态度还表现在1826年任命一个由科丘别伊领导的“大”委员会来调查现存的政府制度并决定“哪些适合今天的情况，哪些不应予以保留，用什么来代替”。

经过这样改革的专制机器，得以在较高的级别上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进行，以后继续如此。在下半个世纪中涌现出许多较低级的委员会就说明了这一点。国务会议与其说是一个内阁，不如说是一个指定的半立法机构；它制定预算、审查经沙皇批准由大臣们提交给它的法律草案，但这个程序往往被具有同样法律效力的由皇帝陛下办公厅直接发布的命令所绕过。各部大臣通常直接与沙皇打交道，1805年设立的大臣会议又与国务会议重叠。大臣之间也群龙无首，即使在科丘别伊和他的继任者戈尔恰科夫任职期间，由国务会议主席兼大臣会议主席并挂帝国首相头衔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参政院只不过是最高法院。实际上，唯一有权力的政府机构是沙皇本人的皇帝陛下办公厅，这个办公厅没有需要改革的问题；尼古拉统治时期一些最重要的机构，就是作为办公厅的新部门而设立的，其中包括第三厅、法典编纂厅和1838年成立的负责改革国有农民地位和国有土地的厅。经委员会审查但未加改革的各省行政机构，通过50个省的省长以及西伯利亚和一些边疆区和殖民地的总督而实行中央集权。这些机构以缺员著称，如遇紧急情况或行政积弊严重时，不管涉及某个省的小城，还是西伯利亚那样的广阔地区，就从圣彼得堡派专员去调查或处理。尼古拉的特点是他最信任的代表通常是军官，不论执行的任务是处理灾荒还是暴动。

科丘别伊委员会还负责考虑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与当时美国的奴隶问题一样，影响一切政治思想和行动。在1815年俄国本土大约4500万的总人口中，大约2100万是依附土地的农奴，他们是20万世袭贵族或50万文武官员中少数享有终身贵族爵位的人所拥有的私人财产，而另外1500万人是国家或皇家拥有的享有不同程度的微小权利的农民。

到此时为止所进行的一些小的改革试验——解放非俄罗斯人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农民，但不连同土地；批准俄国其他地方地主和农民之间自愿达成的连同土地解放的协议——充其量不过对俄国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道义上的影响。沙皇本人之不愿进行改革，表现在1834年他对基谢廖夫所说的话上，他说他的责任是为他的继位者修改农奴法做准备。但是，旨在反对把农民与其土地分开对待的进一步的零星改革，在该委员会中遭到康斯坦丁大公的阻挠。以后发生了1830年的欧洲革命，引起了更普遍的反对向自由主义思潮让步的局势。

但是，沙皇一直到1848年仍对土地改革感兴趣。从1833年起，对国有农民的身份、租佃、赋税、兵役和地方自治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对他们的自由身份予以肯定。1838年，设立了一个由基谢廖夫伯爵领导的国有土地部，基谢廖夫是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沙皇的土地委员会里最积极的下属。但是，这些委员会所取得的成绩，其间接意义大于直接意义。1833年，禁止公开出卖农奴，1842年颁布的法令修改了1802年的法律，通过形成一个暂时“有义务”继续服劳役的“自由农民”阶级，鼓励地主解放他们的农奴并给予土地。1844年准许解放无地的家务农奴，但是直到1858年，通过有效地禁止把农民从土地转向家务劳动，才纠正了由此而引起的弊端。1840—1848年颁布的一些法令，规定农民在他们的主人出售其庄园时有权赎回他们的自由。这种权利必须与主人达成协议方才有效，从而避免承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成为固定不变的。实际上，直到1848年，法令才规定属于私人所有的农奴有权拥有动产。上述这一切法令适用于整个俄国。此外，在乌克兰西部，比比科夫总督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农民对他们大部分是波兰人的主人应尽的最大义务实行登记，但是当这种制度扩大到影响俄罗斯贵族时便停止实行。

当时改革者受以下几种动机的影响：对农奴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罪恶普遍感到不安，越来越相信浮动工资劳动最为有利（既受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也是实际试验的结果），担心有可能出现从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俄国所特有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次数增加，看来是不祥之兆；官方的数字表明，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起义次数每10年增加50%以上，从1826—1835年的148起增加到农奴解放前6年中的474起，而有记载的地主或管家被杀事件，在1861年前的35年中达300起左右。这种动乱也许一方面是由于零星的改革和保密不周过早地引起关于即

将解放的谣传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拖延感到愤怒而激起的。它既加剧了保守主义者对解放的反对，也加强了自由主义者迫切需要改革的信念。

这种动乱几乎完全是由纯粹俄国的条件所造成的。1830—1833年俄国霍乱流行期间发生的起义和兵变，凑巧与欧洲的政治动乱同时发生，与官方的怀疑相反，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偶然的。唯一一个可能受西方革命乐观主义思潮影响的地方是波兰。那里的强烈不满情绪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1830年11月7日（旧历19日）华沙爆发起义时，总督随俄国驻军一起撤退，独立编制的波兰军队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随后的战争进程对俄国武装和波兰政治都无利；俄国人直到1831年5月才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那里没有强有力的持久的游击抵抗运动，因为波兰爱国者从不过问处于半农奴状态的波兰农民的利益或情绪。起义以成百上千的人被处死和成千成千人被流放而告终，给双方留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

在俄国本土，1830年的警钟结束了尼古拉政权的试验时期，于是文化镇压就更加系统化了。这种镇压制度是与1833—1849年任教育大臣的乌瓦罗夫伯爵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从来不是沙皇最亲密的顾问。乌瓦罗夫被当时的人看成是人道主义的叛徒，他是作为一个官僚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在1832年提出他的“三准则”，即“正教、君权和民族性”的。^[7]这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强调的是君权，而且一直延续到沙皇统治的末期。1832年颁布的帝国根本法授予沙皇超越东正教会的神圣最高权力，而对民族性的从属地位乌瓦罗夫在1847年作了说明：“俄国的民族性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正教和君权。”^[8]

与警察管理和检查制度相比，教育政策在控制任务中是次要的。大学的扩充受阻，不过乌瓦罗夫在基辅新建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作为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机构，是对这个乌克兰历史名城的文化分离主义的挑战。在该校和在任何其他地方，哲学课程是有限的，数学课程则因为被认为有军事价值而受到重视；教职人员由国家任命，学生穿制服，他们的行为和纪律受到国家学监的监督，除贵族外不许“其他阶层”进入大学或中等学校，出国留学的年龄界限降低了，出国旅行一般受到护照制度的限制。尽管这样，就目标和方法而言，这个政权的文化政策不是野蛮的。乌瓦罗夫是科学院的支持者，在他的支持

下，考古学、地理学和历史文献等领域内的大量俄国官方刊物开始出版。

与保守的专制政治同样相一致的是大肆宣传俄国法律的半法典化，这是老资格的斯佩兰斯基的最后一项任务。它包括1649年以来的全部法律汇编（1830年出版，共45卷）和作为一部准法典的《帝国法典》，即一些当时仍然有效的法律的摘编（1832年出版，共15卷）。但是，这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所吹嘘的那样确立了法治，尽管它使后来的司法改革变得比较容易一些。^[9]这是一项学术活动，不是一项立法活动，正如这个王朝的一些不朽的新拜占庭式王朝建筑只是一些公共工程一样。沙皇负责兴建的教堂和宫殿反映了这个王朝的高傲气概和豪华风尚，圣彼得堡社会中那种世界标准的奢侈风气，主要是由此而来的。这与尼古拉本人所夸耀的军人式的简朴形成对比，而且与外国人经常看到的周围俄国的贫穷的深度和广度也形成对比。^[10]

保守主义的某些利弊也表现在经济政策中。当时的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有任何国家适合“自给自足”的话，那就是俄国^[11]，而且实际上，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只经过微小修改的1822年关税税则，完全禁止许多商品进口，特别是纺织品和金属。但是民族主义经济并非一成不变，1852年在税收政策方面发生了革命；通过废除关税边界而对付波兰的竞争。1857年俄国进入了一个实行除英国外比其他大国更自由的贸易政策的时期；而收入仍然维持不变。与此同时，1823—1844年任财政大臣的坎克林重新厘定了币值。1843年发行“银卢布”，价值等于旧纸卢布的3.5倍，新币的纸币在随后的25年中贬值不到25%。

经济的进展只不过触及俄国农业的皮毛，尽管如此，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一整年，即1853年的对外贸易额达2.5亿卢布，几乎等于1825年的两倍。^[12]原棉的进口和纺织品的工厂劳动生产率^[13]几乎增长了一倍，在19世纪50年代初，俄国已经有大约1700台机动的织布机。^[14]1855年，它生产生铁25万多吨，几乎跟德国相等^[15]，不过用的是原始方法。在19世纪40年代，哈克斯陶森写道，莫斯科这个并不是以工业著称的地方，已经“从一个贵族居住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16]但是工厂组织并不意味着机械化，只是从家庭工业迈出的第一步，这种家庭工业同时在私人庄园和城镇中发展；1860年，50多

万俄国人被列为工厂工人。与此同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人口从5300万增加到7100万，但是当时的统计没有表明谷物产量有相应的增长，尽管从黑海各港口新出口了一些小麦。^[17]

俄国的官僚并不全都喜欢工厂制度的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家庭工业是有前途的，并且受到外国专家和其他专家的鼓励，这些人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西方的“无产阶级癌症”。^[18]但是沙皇以国家的利益为由采取较单纯的重商主义观点，并用以下方法鼓励工业的发展：建立一个制造商委员会；给生产者提供直接的资助，建立示范的工业企业和技术学校与农业学校，并赞助举办工业展览。但是，他在修建铁路这个关键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从圣彼得堡到沙皇村的第一条长27公里的铁路是在1838年由私人企业修建的；1843年，由华沙至奥地利边界的铁路由国家建造，1847—1851年由国家建造从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每英里的造价一次比一次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俄国的铁路建设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情况与人口的变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紧密相关，这种流动是在农奴制废除后出现的，它和经济发展的加快一样，属于一个新的时期。

沙皇认为，俄国的政治制度是他在国际反革命政策中分担的一项义务，这种政策由三个东欧君主国推行并通过1833年的明亨格列兹协议（参见第10章，原文第252—253页）维持了15年。1839年起草的一份权威性的评价，^[19]说明各位君主如何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超越了国界。这个文件说，革命的中心在法国，英国也意欲在“这方面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和……它实行的宪政制度”。俄国关心的是加强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反对不断攻击他们的敌人……的严酷斗争中的力量”。1848—1849年的事态发展证实革命是有国际联系的（参见第15章）。在俄国，天天传来的消息使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兴奋状态，而关于外国发生动乱的传闻似乎刺激了本来在俄国就常见的骚动。沙皇在1848年3月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中接受了这项挑战，该宣言的结尾说：“请注意，各国人民，服从（你们的统治者），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提出告诫和最终在国外进行干涉的同时，在俄国对危险思想进行更加无孔不入的镇压。新闻检查交由一个委员会执行，乌瓦罗夫失去了他的职位，也许部分是由于他保护大学使之免受在数量上和课程上的限制。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发生革命的煽动或阴谋，但在1849年，极端分子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讨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该小组成员）被解散了。对独立的右翼，即所谓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也采取了行动，部分是由于革命和民族主义在欧洲专制君主的头脑中仍然被混为一谈，部分是为了制止反对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宣传，因为这些人对俄国军队和政府很有价值，部分也是为了保护沙皇的兄弟君主们免遭由于战争或关于战争的流言所激起的俄国人的仇外暴乱之害。

这种反应其实并不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恐怖”，不过值得玩味的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人士后来向尼古拉的继位者报告说：“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于1849—1855年采取的镇压措施。”^[20]实际上，这些措施把镇压政策推向一个高峰，这种政策是专制政体及其批评者在俄国造成的除农奴制以外的最大问题。对危险思想进行控制并不是新鲜事，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使沙皇统治成为欧洲左派的仇敌的象征，在俄国内部，它与一种新的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学相互作用，这种文学除虚无主义外还是好几种学派的思想 and 行动的萌芽。这种文学更多来源于欧洲普遍存在的各种思潮而不是来源于欧洲的政治冲动，但在欧洲，它的重要作用被低估了，直到人们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响使俄国接受并最终实行了马克思主义。

普希金的伟大成就达到顶峰时所绽放的智慧之花，在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中从政治上表现了出来。这个运动失败后，革命精神从军官的食堂和沙龙里转移到新一代爱好艺术的学者和政论家，即后来的“四十年代人”身上。出现了两个学派，即“西方派”和“东方派”（亦即斯拉夫派）。他们之间的文艺论战使已经以初期形式流传的各种思想系统化并广为传播。它发轫于1836年P.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的发表，这本书的要点是说俄国文化毫无价值。恰达耶夫写道：“我们属于那样一些国家……其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以某种严重的教训。”^[21]地理和拜占庭教会已把俄国同创造性的欧洲文化分开，它对彼得大帝提出的开化主张的响应是微不足道的，而最近同西方的接触则导致了灾难——十二月党人的叛乱。唯一的希望是“重新探索人类经历的全部过程”。^[22]赫尔岑说这是“暗夜里响起的枪声”。^[23]虽然它在团结“西方派”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渐进的，但是斯拉夫派接受了这一挑战，从而决定了俄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发展历程至少达一代人之久。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对立是形式的而非根本性的，因为双方常常改变自己的立场，而且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往往很密切。双方都受过黑格尔和谢林的德国哲学体系的训练，但是，尽管这使斯拉夫派的历史传统主义具有合理的基础，但对西方派来说，正如赫尔岑的名言所说的，黑格尔乃是“革命的代数学”。^[24]的确，当这个思想基础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融合一起后，便使一些更有影响的人物，如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转向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并与当时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德国学派发生联系。亚·伊·赫尔岑（1811—1870年）是一位具有巨大文学才能的有感召力的人道主义者，一向不喜欢俄罗斯的民族特点或国家制度，1847年移居国外后，又对资产阶级民主和“雅各宾”革命的集权性质感到厌恶。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7年）是俄国当时的政论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信奉黑格尔的时期，曾比斯拉夫派更公开地颂扬沙皇国家，但反对斯拉夫派认为民族与政治无关的思想。尽管他后来作为一个维护个性的作家而写作，但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那种自发的个性，而是寻求或被迫在一个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正义”和“自由”的社会里实现自我的那种个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这个社会并赋予它以活力。米·巴枯宁（1814—1876年）甚至前后更不一致。他那永恒的无政府气质表现在1847年他的名言“破坏的热情就是创造的热情”中。但他在1848年由于参加德国革命而被监禁以后，写了忏悔书，其中所表现的病态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竟不亚于任何斯拉夫派^[25]，后来，在他逃往欧洲与马克思争夺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控制权以前，曾在西伯利亚私下向伊尔库茨克总督穆拉维约夫鼓吹实行一种原始的法西斯专政。

另一方面，斯拉夫派用俄文的 *народ* 代替德文的 *volk*，但不仿效其超国家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符合他们对教会的同情，而是把德国的历史主义转变为一种神秘的俄罗斯民族性。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历史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历史，彼得大帝是一个背叛者，俄国的世界使命将通过民族的特性来实现，这种民族特性比拉丁西方的民族特性更符合基督教教义，它的谦虚美德体现在个人身上，它的精神上的集体主义体现为村社（米尔）和工匠劳动组合这样具有特色的机构以及国教和异端教派。两个最受尊敬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著作不如西方派那样多。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年）的文学声誉建立在两篇论文上，他的朋友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主要是作为一个

世俗神学家而写作的。他们的影响是通过个人和书信产生的，例如他们对尤·费·萨马林（1819—1876年）和阿克萨科夫兄弟（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年；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的影响。前者在改革农奴制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后者的文化复兴主义导致大肆仇恨圣彼得堡的新建以及当时俄国政府的整个机构。所有这些人都是乌瓦罗夫制度的反对者，他们谴责农奴制是俄国历史的罪恶，其严厉程度丝毫不亚于西方派。他们主张恢复旧时莫斯科的缙绅会议。即使是那些最顺从政府的斯拉夫派，如舍维列夫和波戈金，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都变成了改革派。19世纪中叶，三大思想派别最明显的标志是他们关于村社的概念。在西方派看来，这是所有欧洲社会的一个阶段，西欧已度过了这个阶段，但它有可能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在斯拉夫派看来，它是斯拉夫文化的一个独有的宝贵现象。在乌瓦罗夫看来，它是彼得大帝设计的一种不能替代的财政机构。

一些伟大的文学家的名字只出现在这场政治争端的边缘。由于普希金（1799—1837年）在争论出现以前已被杀死，双方都宣称他的思想遗产应属于自己。他与十二月党人有联系，但不赞成西方自由放任式的民主，他发现在生产粮食的俄国农奴身上比无产阶级的英国工厂工人有更多的人类尊严。尼·瓦·果戈理（1809—1852年）的著作是对安于现状而不是对急剧变化的讽刺，但他后来公开为农奴制辩护，引起了别林斯基的猛烈谴责，这种谴责曾作为一种秘密宣言在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传阅。在下一代中，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年）与西方派有紧密的联系，但不是他们的成员，他对他们的政治影响，正如同一时期的托尔斯泰一样，是他那些非说教式的小说的重要副产物。

检查制度迫使政治争论伪装成以文学批评的面目出现。俄国的期刊，1800—1850年增加了将近3倍，起到了替代辩论和鼓动的作用。像别林斯基所使用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以及斯拉夫派的《莫斯科人》之类的期刊，传到了高级官僚和无业的贵族们手中，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改革和下一代更革命的知识分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教育。由于政治不满的蔓延，更多的贵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问题。尽管免除了以前服兵役的义务，但除一些比较粗俗的人以外，一般都要为中央政府服役几年，或者在军队里，或者担任文官。然后他

们往往退休回到圣彼得堡、莫斯科甚至某个省会，访问他们的庄园，在那里长期度假而不是居住，出租他们的庄园，让他们的农奴担负代役租（用货币支付他们应服的劳役）。有一些进步的务农地主，但那是例外。没有西方那种大规模的乡村生活。实际上，庄园很少经历几代人而不易主，结果是形成不了家乡意识和地方特性，而这在其他地方是有助于把阶级和阶级联系在一起而不论剥削程度如何的。此外，尽管贵族在政治上停滞不前，但他们的人数在增加，生活水平在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压力在增长。由此而引起的灰心丧气的典型体现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和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那位听天由命的主人公身上。

军队仍然是个人提高地位的主要途径，而且不仅对贵族而言是如此，由于从其他阶层而不只是从士官学校大量征募军官，军队便是通向高级官员享有的世袭封爵的主要道路。同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与普鲁士军队所处的地位相同，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从普鲁士汲取它的大部分理论的。从1812年以来，军队是俄国的国际影响的真正基础，尽管国外批评家指出它腐化。怀疑它是否有能力部署或供应它那表面上拥有的大约50万士兵，还不算哥萨克骑兵或驻在高加索的10万军队。19世纪20年代末期对波斯和土耳其的胜利提高了它的威信，但是由于高加索游击队的坚持抵抗（参见原文第385—386页）而使它的威信降低，不过1849年镇压匈牙利起义的胜利（参见第15章，原文第407页）又恢复了它的威信。

在军事上创造奇迹是至关重要的事，因此军队的改组被普遍认为是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必然结果（参见第18章），1855年2月18日（公历3月2日）尼古拉一世的去世则被认为是这两件事的前兆。各个阶级都认识到俄国已经精疲力竭。以后几年，它将有一段比较正常的政治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政策、舆论，甚至经济发展都是有条理的，尽管还不安定。

在苏联建立以前的历史中被称为“解放者沙皇”的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长大成人，能够接受他父亲关于军事专制的理想并为这种理想服务。但是他不像尼古拉那样极端地刚愎自用，如果改革符合国家利益，他准备接受改革。即将进行改革的最早的迹象表现在一般衡量国内政策的标准即检查制度上。在缔结和约后，皇帝即发表了一个宣言，日期是1856年3月18日（公历30日），其中有这样的话：“愿

每个人在法律的平等保护下，都能平等地享受他劳动所得的果实。”这在整个俄国被认为是即将废除农奴制的声明，随后又做了一些解释，目的是平息人们的焦急心情和反对意见。在这些解释中有沙皇于3月30日（公历4月11日）对莫斯科贵族的讲话，在讲话中亚历山大注意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比等待自下而上地废除而我们无所作为要好”。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沙皇本人承诺进行改革，并表明在这项任务中涉及拥有农奴的贵族。实行这样一项异乎寻常的承认来自政府以外的主动精神的政策，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它承认这样一种保守的观点，即放弃基本的财产权必须是自愿的，但又对国家应负担改革显然会带来的财政开支的问题含糊其辞。因此农奴主感到担心，当沙皇表现出开明倾向的新迹象，内务部搜集各省贵族自治机关的意见时毫无所获。官僚机构本身没有计划，但是个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普遍认为关键问题有：一个解放了的农奴应拥有多少土地；解放应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对有农奴的土地所有者应给予多少补偿。保守派认为立即解放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自由派看不出补偿的财政问题如何才能解决。1875年年初，不得不求助于沙皇常用的权宜办法，即在最高级成立“秘密委员会”，讨论立陶宛各省贵族提出的解放农奴但不给土地的计划，结果是在11月20日（公历12月2日）颁发了一道明确的诏书。要求这三个省修改他们的建议，规定分配土地；此外，要求其他各省的贵族也建立委员会制订类似的计划。

11月20日的诏书是改革在行政上的真正开始，标志着政府与改革派舆论之间的妥协的高峰，舆论中各派不同意见之间妥协的高峰。这时，激进派的主要代言人是在伦敦的赫尔岑和在圣彼得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的重大影响开始于1857年在伦敦出版《钟声》杂志。这个著名的期刊发表一些不署名的文件，大部分是俄国左派的主要计划和声明。尽管名义上被禁止，但它在俄国流传很广，连政府本身也承认它的权威。它要求解放农奴并给予土地，要求新闻自由，要求那些连大部分斯拉夫派也赞成的改革，这些改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政论家看来至少比其他改革更为重要。实际上，后者在《现代人》杂志上所写的文章对沙皇十一月诏令中表现的主动态度所抱的热情不亚于赫尔岑。但是这种休战并未持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政治中的一个新人物，一个像别林斯基一样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与

其说他是文学家，不如说他是经济学家，一个苦行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批评家。他和赫尔岑同样认为俄国的合作制度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但是他对“人民”的信念没有历史的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基础，就像构成赫尔岑和斯拉夫派的共同立场的那种基础。这是19世纪的民主实证主义者所信奉的教条，很快就对赫尔岑容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态度和在改革时的拖延感到不耐烦。新闻检查一度放松到准许直接讨论农奴制。但是，俄国的期刊不能像《钟声》那样直言不讳，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门徒杜勃罗留波夫在改革前夕进行的批评，一般是按通常的做法在文学伪装下进行的，后者论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的文章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与此同时，为改革进行的准备工作表明各省有很大的不同。在土地肥沃的地区，交出土地要求巨额赔偿；在劳动力能够从工业中获得高工资的地方，要为解放付出大量的赎金。性质不太明确的是某些省的方案中所具有的那种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特维尔，该地若干年来就有要求建立立宪中央政府的运动。总的说来，不论是保守的或自由的贵族都憎恨官僚机构，自由派的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点除促进了宪政运动外，还促进了一个主张实行寡头政治的运动，这是作为右派对专制制度改革反应而产生的。实际上，由于宫廷中和文官中有一些进步人物，最主要的是罗斯托夫采夫和尼·米柳京，改革才得以实行，在罗斯托夫采夫去世后，是沙皇的决心克服了在主要的（即“秘密”）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中的阻力。

改革法令于1861年2月19日（新历3月3日）颁布。它保证农民立即获得人身自由和永久占有将来分配给他的土地。在两年之内，地主和农民在从各省贵族中选出的“和平调停人”的协助下谈判一项契约。这项契约将根据给不同地区规定的标准确定分配土地的大小，并将结束地主的一切责任和管辖权。在同一日期，没有土地的家务农奴也将免除劳役。但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仍需在实行劳役租制的庄园服劳役[26]，或在实行代役制的庄园交纳代役租（即人身租）。他将处于一种“暂时义务农”的地位，男人每年仅服40天的劳役，大约为以前的平均服役天数的1/4，但在3年以后，他可以把劳役租换为代役租；这种情况必须一直继续到他付清分配给他的土地的赎金为止。赎金一般是在领取土地时现付土地价值的1/5，但由于计算方法的关系，一般都高于此数。赎金必须通过村社交付，以后通常是每年还6%。农民的交

付将继续49年，但地主则可以年息5%的可转让的国家债券的形式一次获得全额。赎买最终于1881年实行^[27]，在1870年以前，农民不能拒绝接受分配给他的土地。但他可以标准份额的1/4，即所谓“孤儿份额”，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很多人是这样做的，然后租进他们所需的额外的土地，这比为这些土地定期付赎金要便宜得多。

皇家庄园的农民从1858年起享有与国有土地农民同样的人身自由。1866年，这两部分农民的土地分配和年金交付问题得到解决，比适用于私有农奴的办法宽厚得多；实际上，他们占有的土地扩大了。对那些不在俄国土地制度管辖范围的农民，后来也实行连同土地解放的原则。在西伯利亚，私有农奴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波兰，这种制度在法律上已经消灭，但在1864年，发布了一个给予农民明确的所有权的法令，对农民有利，以对付那些民族主义较浓的地主。在外高加索，特别是格鲁吉亚，因为与那里的地主妥协是重要的，所以1864—1867年实行了一种相反的政策。

对各类农民都实行了一种新的农村行政制度。村社接管了地主的某些权力，担负起比地主的全部责任更多的责任。通过由各户户主选出的村长，它负责征收新旧税收和年金，次要的警察事务和紧急救济。由若干村的村长聚集在一起选出来的一个乡的乡长，担负更重大的警察任务，包括逮捕逃亡者和控制当地的移民。在村社和乡应负的责任中还有组织初审法庭，对小的纠纷和轻微罪行根据习惯法作出判决。因此对农民的生命和财产而言，特别是在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村社机构的权力是很大的。他们把每个农民当作村社集体负责管理的纳税人之一加以控制，其严密的程度不亚于以前地主的控制，他们可建议把一个为非作歹出名的人流放西伯利亚，而且经常这样做。

^[28]

两千万左右私人拥有的农奴从1861年2月19日（新历3月3日）法令所获得的实际上只是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签订契约、提出诉讼、结婚、经商、做工和拥有财产的自由。但是，平均说来，不像国有农民那样，他们获得的土地比他们以前耕种的要少。尽管“和平调停人”非常公平地监督契约的签订，但按各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俄国农奴拥有的土地减少了20%，从所需要的劳动量来看，这些土地用不着花费农民过去在土地上所花费的时间的一半。因此这些农民已对典型的庄稼汉曾经抱有的那种过好日子的幻想感到失望，暂时还必须继

续服虽已减轻的劳役或交纳代役租，并且对必须为土地付出代价耿耿于怀，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在他们属于主人所有时这些土地就已经归他们所有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充分理由对一些事情感到不满。他们对此耿耿于怀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土地是按劳役的资本化来计价的，而不是按市场价格计价的。幻想破灭的结果是1861—1863年爆发了激烈的农民骚动。

这些事件加深了激进派对这项法令的敌视。1861年针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重新活动所采取的第一批暴力措施，使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对派团结起来，他们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是与俄国农民同样的受害者。35年来第一次开始了从国内策划的密谋和骚动，而且此后在沙皇统治时期再也没有平息过。第一份因而也是划时代的非法刊物是《大俄罗斯人》，1861年秋在圣彼得堡出了三期。它号召推翻王朝，认为它与立宪政府或土地问题的公平解决是不相容的。随后出现了一份内容更深刻的宣言《致青年一代》，是由赫尔岑印刷并偷运进俄国的。这个宣言号召进行“帮助人民的革命”，建议在农村和军队中建立宣传小组，除要求实现自由派关于实行代议制民主的纲领之外，还要求把土地国有化供村社使用。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它强调合作组织和类似斯拉夫派的信念，即认为俄国的天才和使命能避免恰达耶夫坚持必须“重新探索”的历史进程的老路。更为极端的是扎伊奇涅夫斯基在莫斯科监狱中所写的《青年俄罗斯》纲领（1826年）。他把社会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他提出的以农业公社和工厂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计划。属于俄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即使他强调必须进行一次“流血的和无情的革命”并反对把婚姻作为一种制度，这也只不过带有一点未来主义的色彩而已。

造成这一激动局面的某些根源都与第一个“土地和自由社”的组织有关，它的纲领大部分出自赫尔岑的合作者奥加廖夫的手笔。这个纲领成为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地下组织与流亡国外者之间最重要的桥梁，是自从十二月党人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密谋活动。它计划建立一个由地方小组组成的金字塔式的组织，争取至少在名义上吸收大部分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其策动人S.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于1862年被捕，但他的后继者很快就自称“俄罗斯全国中央委员会”，并在1863年散发了两期称为《自由》的传单。这个团体内部对于在俄国发动一次农民起义来支持波兰的民族起义的计划意见不一，之后于1864年逐渐瓦

解。与这个团体有联系的一个独立小组决定在伏尔加地区采取这一行动，但他们被捕。他们的行动就是所谓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军官的喀山密谋，他们的首领于1864年被枪决。

积极从事活动的地下反对派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功绩在俄国革命前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它争取人们转向反对派一边，鼓舞牺牲精神或竞争的狂热，结果产生了恐怖分子。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那种令人难以对付的政治传统即使在那时也是在同情自由派的气氛中形成的。1861年他们在圣彼得堡为反对不彻底的农村改革而举行的示威中赢得了这种同情。当时他们遭到警察和哥萨克骑兵的镇压，随后又被开除了大学学籍。但其他方面的人厌恶这种方式，甚至同情自由派的人也谴责革命的破坏分子于1862年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大肆纵火的行为。于是随着屠格涅夫把“虚无主义”一词用在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新塑造的革命典型巴扎罗夫身上，这个词也就被人们用来指责左派分子。当一位新作家皮萨列夫（1840—1868年）在《俄罗斯言论》上撰文承认左派一般拒绝接受屠格涅夫的非难后，虚无主义的思想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皮萨列夫坚持别林斯基的激发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教育人民的力量任务。此外，他认为拒绝承认美学价值是俄国人的特征，他承认阶级利益的对立，他念念不忘唯物主义科学在俄国的社会作用，这一点是有预见性的，而且也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皮萨列夫所认为的虚无主义者是苦行式的激进分子，把理性主义推向极端，以至否认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以便把社会责任说成是先验的。社会主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年）中作出的虚无主义答案的组成部分，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甚至成了一个比巴扎罗夫更为俄国青年所熟悉的典型。在当时，俄国思想中最主要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特征是解除苦难，这在皮萨列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像在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一样明确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革命宣传中非理性的成分越来越得势，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任意地改变价值观念导致了目标与方法的混淆。清教徒的气质继续存在，但是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仅在名声上，而且在行动上同恐怖主义融为一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把较晚类型的虚无主义者典型化了，这部小说以巴枯宁的门徒涅恰耶夫的一生为原型，他的密谋活动由于在他的同伙中的一起谋杀案而于1869年暴露。

政治思想中的另一种新思潮是民粹主义，主要来源于斯拉夫派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直到70年代才形成政党，但是，从农民群众中寻求启示和力量的源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赫尔岑于1861年向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的学生们发出的号召“到民间去！”“四十年代人”的某些共同主张，同以往斯拉夫派那种反对西方思潮，认为俄国的村社组织可能成为自下而上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的偏见结合起来，从而得以重新抬头。民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这表现在赫尔岑式的人物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人物在许多方面互相同情上，表现在19世纪60年代秘密活动分子的大部分言论中。确实，有一位这类小组的成员在做证时曾说，他担心发生一场“将俄国推入西方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革命。^[29]此外，通过到处蔓延的一种由文化与劳动对比而产生的内疚感，使虚无主义者出于功利主义而对美学价值的轻视，也具有了民粹派的倾向。这种流行于俄国的人道主义异端邪说，最充分地从左面由拉甫罗夫（1823—1900年）表现出来，他是从赫尔岑到列宁的一系列流亡政论家中的第二位重要人物。一个忏悔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继“忏悔的贵族”^[30]之后而出现。属于这类知识分子的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在精神气质上与虚无主义者相去甚远的人，也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与虚无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的人。

被诬蔑为“虚无主义者”，而早已自称是“民主主义者”的秘密革命者，在俄国政治中起着强有力的发酵剂的作用，而且通过宣传鼓动或恐怖行动很快就在宫廷和沙皇办公厅之外取得了唯一真正的主动权。相形之下“自由主义者”内部既不一致，又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当中包括像进步的斯拉夫派萨马林和“西方派”卡维林这样的人物，他们曾在土地改革中合作，也许占19世纪60年代受过教育的和半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所追求的是立宪政府；正是由于在这一点上理想破灭才转向民粹主义。除极少数外，自由派欢呼解放农奴的法令，把它看成是新制度的开始。他们把法令的缺陷归咎于反动分子和政府中的“奸党”，这些人在1861年春赶走了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内务大臣兰斯科伊伯爵和比他更有名的副大臣尼·米柳京。

积极反对第一阶段改革的唯一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是特维尔省的贵族。1862年，他们表示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实现改革计划，而且表示他们愿意放弃贵族在财政上和职业上的一切特权；他们要求建立一个代议制的中央政府。该省的“和平调停人”甚至走得更远，宣称他们

愿意“服从人民的意愿”而不遵照部里的指示，结果被判无期徒刑。但这个事件只是昙花一现，总的说来，俄国的自由派满足于批判地接受自上而下的进一步的改革。

情况有助于使他们暂时达成和解，即农村紧张形势已逐渐缓和，虚无主义者构成对治安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对1863年波兰叛乱（另见第9章，第236页）人们作出了爱国主义的反应。这次叛乱采取了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形式，这种战术早期取得的胜利，是由于俄军的战略集中对游击战有利。波兰人尽管团结一致也绝无取胜可能，而这时他们又分成两派，即“红党”和“白党”，前者抱有社会主义的动机，后者则仅仅抱着民族主义动机。特别是对非波兰人的农民而言，“白党”的拥有土地的贵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如允诺进行土地改革的俄国人多。当1864年叛乱结束时，派系之间互相残杀而死的人数超过了俄国判处死刑的400人。除了死刑以外，流放、没收财产和罚款也远远超过1831年的惩罚措施。继之而来的是对波兰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更严厉的压制，同时，为了分化波兰各阶层，进行了一次比在俄国更开明的土地改革。在俄国本身，公众的不满被专制政权和新闻界在国内政治中加以利用。冒牌的自由派、后来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编辑米·卡特科夫开始青云直上，他成为专制政权的喉舌或顾问长达20多年。

与波兰相反，在芬兰，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带来了一种表面上的自由化。^[31]自从芬兰并入帝国以后，这个大公国一直由一个高度尊重民族的法律和习惯的官僚机构统治，不过避免不了沙皇政治制度的影响，国会作为一个机构遭到忽视。但是，亚历山大二世根据他在即位时作出的一项承诺于1863年召开了国会，并于1869年把每5年召开一次国会定为根本法。这并没有使芬兰成为一个立宪王国，而且，如果说芬兰人保持平静的话，那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民族政权的历史背景，而最重要的是由于不存在斯拉夫人之间的忌妒和互不相容的因素。但是，当泛斯拉夫主义后来变成极权性质，而且不能容忍少数民族以后，关系就变得不那么融洽了。

波兰叛乱以后自由运动转向右倾，土地改革也恢复正常地进行，使1864年成为对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有利的一年。随后通过的立法，像解放农奴的法令一样，大部分表现出沙皇在不损害专制政权范围内，作最激进的改革的愿望与顽固的贵族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妥协。无须用存在一个“鼓吹寡头政治”的反对派这样的理论来说明这一点。

专制政权害怕的是使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灰心丧气，而不是害怕向他们提出挑战。进一步改革的势头来自以下几方面的动机：人们认为必须使各种体制适应解放农奴的结果；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按照西方的实践使俄国现代化；需要争取温和的舆论以反对革命的左派。产生这一切的背景则是由于专制政权和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迷信都出现了裂缝，从而渗透出一种真正的19世纪政治乐观主义气氛。

1864年1月的法令规定成立地方自治会，即把农民的村社和乡两级机构与县、省两级选举产生的政府系统合并为一体的地方政权改革。农村和城镇的有产者和由农民的乡推举的选举人这三个单独的团体分别选举县代表会议；由县代表会议指定代表参加他们的省代表会议议会。这些代表会议每年只开几天会，审查他们任命的3年任期的领薪金的行政人员的工作。地方自治会接管了以前由缙绅会议管理得毫无成效的交通、救灾和医院等事宜，此外还监督当地的贸易和农业、监狱，特别是教育。甚至连列宁也把它称为“宪法的片断”。^[32]地方自治会分批在各省逐步成立。在前两年里，大约2/5的县代表是贵族，2/5是农民，在间接选举的省代表会议，3/4是贵族，农民和城镇居民代表的数目大致相等。这种各阶级之间的正式合作实际上相当于一次革命，尽管各种各样的批评者仍然说它是徒有其名。1863年，曾拟定改革方案，规定地方自治会的代表每年举行一次简短的中央代表会议，与国务会议合作。但是，随着政治紧张形势的缓和，对鼓吹制宪的人不再姑息，专制政权拒绝了地方自治会为了建立全国性组织而作的断断续续的努力。把它们当作私法上的法人，而不是行政实体，禁止各省地方自治会之间发生联系，省长和内务部具有绝对的权力，以致地方自治会未经批准甚至不得发布布告。因此，地方自治会是锻炼了而不是满足了俄国革命的政治本能，但是它们的实际成就远不止这些。实际上，所有的农村小学，许多中学和女子学校，以及农村的所有医疗机构，都是他们办的。

农奴解放以后的第二项重大改革是1864年年底实行的新的司法制度。旧的等级法院和不公开审讯，其职权范围不明确，移交其他法庭由行政当局控制，这些均改为异常简单的各级公开审理的法院，而且司法独立。全国划分为若干巡回审判区，在每个区，初审法院在陪审团的参与下作出判决。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可以上诉到管辖范围较广的巡回审判区的“司法厅”。唯一的高等上诉法院（只审理有关

法律的问题）是参议院。轻微罪行由选举产生的“治安官”审理，这些治安官不得撤换，就像行政长官在初审时任命的高级法院法官一样。

司法改革的基础是学习西方的司法程序。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解释这种彻底的“资产阶级”现代产物时把它说成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自由派批评家则发现其在对待农民方面与世界法学观点有严重差异。因为1861年建立的乡法院仍然存在，对于农民的案件使用性质完全不同的习惯法，而不使用帝国法典（参见前面原文第363页）中的公法和私法。农民被列为低下阶层的论据是，尽管1863年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军队中，都废除了肉刑，但对农民却仍然保留着。不过，法院在1878年大胆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即使有罪，却表现了法庭的独立性。查苏利奇是为了替地下革命者报仇而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察头子。此外，新兴的俄国律师界由于公正无畏和学识丰富，在早期赢得了比法院更高的声誉。

1864年的第三项改革是制定了设立“人民”小学的法律，这类学校可以由私人或公共团体创办。在地方自治会的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下，它们将提供“实用的”和宗教的教育，以俄语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另外实行中学的新体制，名义上废除了入学的阶级限制，并按照欧洲通常的办法分为“语法”学校和“现代”学校。女子中学教育于1862年规定由教育部管理，但仍由独立的团体创办和负责。另外的两项教育改革是：1863年规定名义上取消对大学教职人员的管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1865年实行新的书刊审查法。原则上，代替预防性审查制度的是对应负违法责任的编辑通过法庭起诉予以惩罚，但是仍然保留禁止出版无视官方警告的书刊的权力。这个制度是模仿当时法国的办法，但是正像通常的情况一样，成文的法律不如经常变动的政策算数，而且革命的恐怖主义一出现，19世纪60年代初期那种自由气氛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了。

1866年4月4日（新历16日）的刺杀沙皇的未遂事件，并没有给秘密活动开辟新的局面，但对自由派的信心却是沉重的打击，也使批评改革的人有了把柄。政府的对付措施使那种认为教育是革命的根源的理论重新抬头，开明的教育大臣戈洛夫宁被据认为是反动斗士的德·托尔斯泰所替代。托尔斯泰对学校、大学和新闻界所施加的限制，其严重程度也许被人们夸大了。最重要的是限制讲授科学而鼓励学习古

典文学。有人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与空谈理论的政治（无论是攻击传统观念的，还是空想的）二者之间有联系，这一点没有人否定过，特别是在俄国，尽管俄国专制政权的挑战毫无疑问激励了这样的倾向。但是，教育政策和书刊审查政策的倒退以及由于更换部长而出现的右倾变化，并没有改变改革计划。扩大现代化体制并不意味着放松专制政权的控制。虽然政治上不满的小集团有越来越增多的危险，但更加迫切的任务似乎仍然是完成改革计划。因此，在1870年，地方政府的改革扩大到城镇，仿照普鲁士的方式，其行政管理也纳入地方自治会系统。城市各阶级在民权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差别被废除了，政治权利方面的差别名义上也被废除了，但是全体纳税人的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划分为各种“选民”，这样较富的居民在城镇的杜马中就拥有较多的代表。和地方自治会一样，杜马选出的城镇行政机构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而且必须听命于省长，省会的行政机构则听命于内务部。

“改革时期”最后一项重大行动是实行普遍兵役制，这是德·亚·米柳京的杰作，他的弟弟在解放农奴中曾起过重大作用。1861年他就任陆军大臣后，把农民的选募兵役制的服役期从25年减为16年。1874年，他规定各阶级都必须服义务兵役6年，然后转为预备役9年，免服兵役者主要限于家庭中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这项改革是广泛的军事改组的组成部分，这次改组的范围从总参谋部到军官学校和征兵区，改组的效率与预期的自由化相同，或者更高。

“大改革”没有触动行政当局的权威，实际上没有触动特权和组织。1861年，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机构大臣会议，但是像它那仍然存在的前身大臣委员会一样没有根基。这似乎是由于在俄国有一条准宪法的规定，禁止撇开君主而制定重大的政策。实际上，这个专制政权真正接近于放弃特权也许是在1862年的法律中规定每年公布国家的收支账目。这毋宁说是属于从“为振兴工商业”而创立俄罗斯银行（1861年）开始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俄罗斯银行作为一个贴现银行而为此目的服务，此外还兼具国家银行的某些职能。其他一些措施规定对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实行统一管理和公布，并在1863年废除了经营酒类的特许权，改征执照税，利用这一丰富的税源保持了收入。

这些变革，与1857—1871年实行的较宽的关税（见原文第364页）一起，反映出这个专制政权相信一个政治的新时代意味着一个经济的

新时代。被当局赞为这个新时代的代表的是“商人”阶级，而不是受怀疑的知识分子阶层。商人对国家的贡献在上一代沙皇在位时就已经得到承认，而被授予“荣誉公民”称号，地位仅次于世袭贵族，在各省的城镇，他们正取得某些社会影响。但是，新的物质繁荣的模式仍然捉摸不定。亚历山大二世在位前10年的发展曲线陡升陡降，经历了两次财政危机和主要工业的衰退，后者是由于原料或劳动力缺乏，最重要的是由于农业收成长期不稳定而且很低，农奴制的废除在最初加重了这种灾难。直至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经济革命才度过试验阶段。

克里米亚战争后出现兴办企业的高潮，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外贸易、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上，最突出的则是铁路建设。1799—1853年，投入股份公司的资金为7210万卢布；1855—1860年为3.17亿卢布，其中1.77亿卢布投入铁路，使铁路里程增加了一倍。1858年以后，世界性萧条的迹象也出现在俄国，尽管是一些特殊的迹象。由于铁路投机事业，银行存款减少，随寸头不足而来的是某些生产部门的衰落。

[\[33\]](#)1860年工业再次上升，在此后的10年，按一项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指数表示产量上升约60%，以1913年的水平为100计算，从8增长到13。相比之下，在同一个10年，美国从8增长到11，德国从14增长到18。

[\[34\]](#)按照列宁挑选的重要工厂计算，1864—1870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将近20%。[\[35\]](#)早在1866年，有42个工厂雇用了1000多工人，在从事棉纺工业的16万工人当中，当时有9.4万人由工厂雇用。[\[36\]](#)不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已经生了根，而且经济革命已经扩展到对外贸易方面。从1860—1870年，出口值从1.81亿增加到3.59亿“信用”卢布，进口从1.59亿增加到3.36亿“信用”卢布。[\[37\]](#)与此同时，国家的支出增加了1/3以上，包括铁路贷款在内，正常收入的增长则超过这个比例，从3.29亿增加到4.6亿银卢布。在后一个数字中，经营酒类的执照税收入1.64亿卢布，占1/3以上；人头税和农民交纳的其他税为9800万卢布，占1/5，关税为4300万卢布，占1/10弱。[\[38\]](#)

铁路是主要的实际成就，总长度从1860年的1626公里增加到1870年的10731公里。早期的圣彼得堡—莫斯科铁路（见前面原文第365页）造价很高，因而政府于1857年给一个主要由法国资本为后盾的外国公司以租让权，从而使俄国的经济和战略计划开始与巴黎的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租让制在19世纪60年代仍继续实行，其经济成就

有大有小。实际上，政府必须紧缩预算，不仅为了给这一私营部门提供保证金和预付金，而且还要由国家为它修建建筑物。铁路由于土地改革而得到劳动力，因为改革放松了对季节性移民和无地农民的控制。他们作为不熟练工人的死亡率，用当时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是惊人的，但无人过问，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甚至在工厂里也没有保护性的立法。但是解放农奴却打击了另一工业部门：乌拉尔矿山和铸造厂中的国有农民开始向西迁徙，致使生铁产量下降，直到1870年才恢复。与此同时，俄国最先进的工业棉纺业由于原料缺乏而减产，因为美国内战使俄国原棉进口减少2/3。由于改向其他供应来源，结果使土耳其斯坦原棉价格上涨了两倍，但巧合的是，就在这1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出产这种原棉的中亚细亚各汗国；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俄国才不再依赖美棉而做到有计划地自给自足。

与初期工业化的起伏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土地革命在经济上的失败。1861年的谷物收成据官方统计是2.16亿俄国夸特；1865年下降到1.82亿，在1870年达到2.82亿之后，1871年又降至2.19亿夸特。^[39]在1870年以后的10年间，每人平均的谷物产量与60年代中期相比有了增加（从1864—1866年的19.3普特增加到21.8普特），而且随着机械化的加速，直到1913年都在缓慢地增加。^[40]但这并不能保证免于断

续发生的饥荒。主要是由于土地商品化和劳动力的流动，农奴解放才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乌克兰和其他黑土地带，在这些地方，根据1861年法律分给农民的土地平均每人仅1.2俄亩（约合1.3公顷），他们都愿把份地卖掉，因为它太小，耕种不足以维持生活。同样的过程在较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整个俄国的欧洲部分，因为在36个省里，农民拥有的土地比改革前平均减少18%以上。^[41]由于份地太小在经济上不合算，加上租税和赎金的负担，使能力较弱的农民落入同一村社中那些比较幸运、长于经营或放高利贷的伙伴的手心。因此就发生了著名的“农村分化”，分成了富农、中农和贫农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是，富农建立他的家业不仅是依靠仍然固定于村社的土地，而且往往还依靠从贵族地主那里买来或租来的空闲土地。贵族的土地开始易手，不仅是由于以前的负债。1860年，全部农奴的62%和全部农业土地的53%都被抵押给银行，这种情况对确定改革的时间和条件曾起了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产作价时不是被银行定低了，就是在改

革时被估高了，地主只需从收到的赎金5.43亿卢布中拿出2.48亿卢布来还债。但是剩余的钱似乎并没有很多返回他们的庄园；他们尝到了现钱的甜头，而且总的来说又不是留恋乡土、希望改进农业的农村阶级。因此，土地可以买卖结果导致更多的土地被卖掉而不是去提高农业经营。在改革的头10年，贵族的土地有大约5%被卖掉，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有30%被卖掉。

土地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惊人后果之一是俄国的亚洲部分合为一体，在此以前，那里非常分散，仿佛是由一些海外的附属国组成。俄国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实行合并和向前推进有四处地方：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对西伯利亚和在较小程度上对远东，以及最终对中亚细亚而言，欧洲农奴制的废除和由此造成的大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扩散，开始了一个人口变化的过程，正像半个世纪以前北美人口流向中部和极西部的过程一样。铁路在早期促进了对土耳其斯坦的战略同化以后，又在19世纪末促进了这一人口变化过程。在铁路线到达顿河畔的罗斯托夫之前，高加索就已被最后平定，但这时，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带来了俄国定居者，代替在抵抗失败之后逃往土耳其的25万切尔卡斯人。

当斯佩兰斯基于1819年被派往西伯利亚担任视察员和总督以改革那里的行政时，那里基本上仍然是一块惩罚罪犯的殖民地。对大约5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实行骨架式的军事占领或警察占领，其脊骨是森林与草原之间的黑土区上的一长条农业定居地带，洲际道路贯穿其上。在这里和沿各条河流的一些小块土地上，居住着也许有150万合法的或非法的移民或其后裔，包括罪犯、流放者、领退役金的士兵、受迫害的分裂教派的信徒、自由的或发配来的农民。^[42]由于当地人供奉的毛皮已经不如过去重要，政府没有兴趣维持旧有的集中管理。因此，尽管由于人口日益增加和越来越觉悟而产生了許多新的问题，但除了被统治者可以向圣彼得堡上诉这一特有的制度外，对总督没有什么约束。

斯佩兰斯基着手恢复对圣彼得堡的隶属关系，并扩大地方当局的权力。该地区被划分由设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两个总督府管辖；在改组后的每一级行政机构中，高级官员受参议会的约束。这又回到了“选兵团”制，回到了俄国固有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政权可由团体来加以控制，而无须代表公众。参议会成员就是官员，在较大的

城镇和城镇外面的最低一级（乡）只有选举产生的行政人员。这种助长低级官吏官僚作风的做法，一般认为是改革遭到失败的原因；它一直存在到19世纪80年代在西伯利亚建立地方自治会代替它为止。与此同时，如果说当局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但压迫程度却有所缓和的话，这也不是由于当地的权力受到约束，而是由于人员质量的改善和来自圣彼得堡的监督，以及由于斯佩兰斯基实行的社会和经济新政策。

在处理当地人问题上，斯佩兰斯基的目标是长期同化：在俄罗斯人定居的地区，用比较严厉的反对奴隶制的措施来促进同化，表明实际上没有种族歧视；在这些地区以外，实行间接统治，使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亚洲享有较好的名声，直到将近19世纪末开始有计划地实行俄罗斯化为止。

不过，斯佩兰斯基的影响最有效地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在这方面采取的西方自由放任原则导致废除国家的垄断和指导，并鼓励私人企业，特别是谷物的国内自由贸易。与此同时，西伯利亚所表现出的刑罚制度的温和在外部世界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它在实施上变得比较人道一些了。除逃亡农民以外，被判刑的移民的涌入仍然未见减少，但新来的人如十二月党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其素质要比刑事罪犯高。被放逐来的人分为被判苦役的苦役犯和移居罪犯；二者都是被锁链连在一起放逐来的；流放者仅仅是不许住在欧洲的人，另外还有一些自愿来的人，通常是犯人的妻子或家属。改革以后，前两类人必须由法庭判决，他们通常是终身流放，但是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当中，大多数是农民或被村社驱逐的流浪汉，只有少数人是“行政程序”的受害者。^[43]流放者和被放逐来的罪犯每年流入的数量不等，19世纪40年代时约为7000人，到50年代时约为1.8万人。在1881年取消限制以前，这个登记数字没有把私自迁移来的农民明确分开。

自从18世纪初征服堪察加半岛以来，西伯利亚的范围一直没有扩大。在南面，是一条不固定的边界，从名义上的欧洲边界直到中国统治的蒙古，接着是一条远至阿穆尔河^[44]的得到承认的与满洲帝国接壤的边界，但是阿穆尔河的整个流域根据《尼布楚条约》（1689年）归中国管辖。最东北的阿拉斯加，由1799年创办的俄美公司独立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彼得堡当局开始发现从这个公司的皮毛贸易获利，在经济上不划算，而且认为阿拉斯加就战略上讲得不偿失。因

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向美国提出了转让的建议，这块土地终于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另一派俄国政略家则认为，阿拉斯加本可以作为未来俄美两大国之间的桥梁。穆拉维约夫伯爵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怪人，于1847年任伊尔库茨克总督。^[45]发展洲际联系，作为反对英国在太平洋的海上势力的一条战线，是穆拉维约夫创议的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新的前进政策的动机之一，但是英帝国主义的进展给俄国人造成的机会远比这个借口更为重要。中国与英国的鸦片战争，继之而来的是它对西方列强在条约上的让步，然后是太平天国起义，一方面摧毁了对满洲帝国的迷信般的尊敬（这种尊敬曾使它与西伯利亚的边界长期相安无事）；另一方面也摧毁了满洲帝国的士气和本来可用于保卫这些边界的某些军事力量。俄国人曾就总体上说接受了他们不得在阿穆尔河航行的限制，以及从《尼布楚条约》以来在与中国交往方面的其他限制，而这条河的出海口及出海口外的萨哈林岛的地理状况，直到涅韦尔斯科伊从波罗的海到达这一水域并在1850年在后来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地方竖起俄国旗帜为止仍为欧洲人所不知。穆拉维约夫当时建议俄军沿该河而下进行一次武装突击，但这个计划只是经过再三犹豫之后才被批准^[46]，因为它必须与一种理论斗争，这种理论认为打开通向太平洋之路，就像打开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出口一样，虽然能使俄国人出去，但也能把海军强国引进来。事实上，穆拉维约夫在1854年的示威行动既没有遭到中国人的反对，也没有受到英国人的挑战；中国人无法再要求对该河以北的地方行使事实上的管辖权；1858年，他们的地方司令官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一项条约，把整个左岸连同乌苏里江以下右岸地区都割让给了俄国。与此同时，一个外交全权代表，海军上将普佳京于1858年自行抵达天津，在那里为俄国获得了西方列强已取得的享有通商权和根据条约取得的权利，另外还获得了到喀什噶尔经商的特权。1860年的一个补充条约确认了上述领土割让，并增加了后来的乌苏里省的其余部分。在它南面的海湾，俄国海军登陆并且也是在1860年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47]，即后来迂回包围北满，与日本北部遥遥相对的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从涅韦尔斯科伊把萨哈林岛绘入俄国版图，普佳京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宣布其为俄国领土以来，日本人就对萨哈林岛的所有权提出争议，但在1867—1875年实行共同管辖之后，俄国人用千岛群岛作为交换获得了该岛

的全部。在阿穆尔省和萨哈林，都立即通过强制移民来加强其战略意义。罪犯在服苦役期满后被作为流放者送到这块以前的领地，而所谓的阿穆尔和乌苏里“哥萨克”定居点则是由征召的军队构成。萨哈林岛本身则成为苦役犯的定居点。皮鞭随着旗帜而来。

在亚洲的另一端高加索，一个抵抗运动正在发展，它牵制了俄国的剩余军事力量达30余年之久。边境的传奇故事和山岳的魅力，构成俄国文学和军事历史中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成分。^[48]穆斯林狂热派的一个流派穆里德运动的教义与仇外主义和政治自由传统融合在一起，于19世纪20年代传到高加索。^[49]一种神权政治统治着一个由类似氏族式的社会组成的小联盟，这个联盟以达吉斯坦西部的阿瓦尔斯河为中心，从黑海几乎到亚速海的许多不同的民族都与之有联系或对之表示同情。第一位领袖卡齐穆拉在1829年宣布进行一场圣战，但在取得一些辉煌的军事胜利后，于1832年阵亡。第三位领袖沙米尔，成为世界闻名的游击队领袖，不仅采用游击战，而且用防御战不时挫败俄国正规军，历时将近1/4世纪。直到他本人于1859年被俘为止，他的部队从未溃散。以后切尔克斯人继续进行零星的抵抗，直到1864年他们自己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为止。但是，随后局势迅即平定。在19世纪60年代末之前，外高加索的第一条铁路，从黑海到第比利斯的铁路建成。由于治安状况和政府在这类问题上的开明态度，对中部高加索的高水平的考察活动由从事古典研究的英国旅行家们在高山向导的引导下开始进行。这时，俄军的突击部队和骨干军官也得以腾出手来去完成其他任务。

这些任务在中亚细亚。进军的地区是里海和天山山脉所包围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中央是俄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即三个著名的但是衰弱而长期争斗的汗国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向南的第一条实际边界在阿富汗的政治边界以南，位于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自然屏障。这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延伸，是印度的英国人尚未达到的地方，但英国人的推进并未失去势头，所以，这两个帝国是否会碰头，如果碰头，在什么地方，均在未定之数。在俄国人方面，通过土耳其斯坦达到印度，曾经是彼得大帝的目标，比较近一些时候是保罗皇帝的计划；在英国人方面，则是战略家们的一场噩梦，它在使英俄对抗一直成为欧洲外交的主要课题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近东问题。这种对抗直到19世纪末才宣告结束。

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的行政管辖停止于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的“哥萨克线”，它溯乌拉尔河而上，经奥伦堡抵该河源头，然后向东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中国边界。但俄国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越过这条线的草原和沙漠地带上的游牧民族的控制。因此，第二步是与来自旁遮普的英国人的勘察活动相竞争，那些穿过沙漠深入到俄国的探险家、学者和外交人员在那些绿洲上还未站稳脚跟。这场“亚洲的大角逐”^[50]反映了从印度河到咸海动荡的政治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三个注定要灭亡的汗国和难得安宁的阿富汗王国，挑拨他们的两大强邻互相争斗。然后是1838—1842年的危机年代。英国人从保卫赫拉特取得胜利到1842年在阿富汗进行无结果的军事示威惨遭失败，在奥克苏斯河以北产生了反响。与此同时，俄国发动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针对这些汗国的第一次军事冒险，但遭到了失败。

这就是奥伦堡总督佩罗夫斯基1839年对希瓦的远征。那里长期存在着许多能挑起事端的因素：掠捕奴隶，抢劫商队，任意征收极高的通行税。佩罗夫斯基宣布此次远征的目的是“在亚洲这一部分加强俄国有权享有的合法势力，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平”。^[51]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否认的目的是挫败英国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企图，俄国人把这两项都估计过高了。佩罗夫斯基的远征不得不中途折回；唯一的困难是对于一支5000人的全副武装的军队来说，路程太远。不过，同英国人在阿富汗的撤退相比，俄国人的这次撤退没有丧失什么威信，在1842年与希瓦签订了一项条约，满足了大部分要求。

领土扩张的决定性步骤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采取的。在西路，1845年建立了图尔盖和伊尔吉兹两处哨所；1847年占领了锡尔河（亚克萨尔特河），在阿拉尔斯克建立了一个要塞。1853年，经过围攻从浩罕人手中夺取了阿克梅切季（改名为佩罗夫斯克）。就在同一年已经有两艘武装汽船溯河而上，进行巡逻。这两艘船是经拆开后从奥伦堡通过整修后可以行车的沙漠道路而运来的。与此同时，在东翼，1847年占领了巴尔喀什湖对岸的科帕尔；1853年建立了韦尔内边区村，作为农业定居点，数千名国有农民和所谓的“哥萨克”被招募为那里的移民。1862年，俄国人已经能够把两条南进路线的前端会合，形成他们的新前线——新浩罕线。这件工作在1862年开始至1864年完成，这年从浩罕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绿洲城镇土耳其斯坦，而且为了作战的需要，占领了该城镇以南的奇姆肯特，但是对较大的城市塔什

干进行了一次时机未成熟，而且几乎肯定未经批准的进攻，结果失败了。

接着在1864年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过早地发出一份通知照会，目的在于说明俄国向前推进是正当的，并宣布推进到达的终点，他的论点是，俄国为了保护它的边界，不得不征服正在掠夺俄国保护下的人民的那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使之归属俄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过程需要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伊塞克湖—锡尔河一线是最终的防线。“选择这条防线，我们得到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森林茂密……另一方面，它使浩罕的定居农民和商人成了我们的近邻。”这个地点是“利益和理性要求我们应该到达并命令我们停止”的地方。这也许真正表达了沙皇的政策，但是军事行动的特有逻辑（如果说不是将军们的野心的话），导致这种说法被事态的发展所推翻。^[52]与浩罕人的冲突在1865年给了切尔纳耶夫另外一次机会，当时几乎可以肯定是违反命令，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塔什干，1867年根据一项全面的行政法令，把土耳其斯坦的行政中心设在该地。1868年，布哈拉埃米尔鲁莽的挑衅给了切尔纳耶夫的继任者之一的考夫曼一个进攻和占领撒马尔罕的借口，在击败了埃米尔的军队后，他同布哈拉和浩罕的统治者签署条约，分别给予该酋长国和汗国以保护国的地位。在这几个绿洲国中只有希瓦一直到1873年才被征服。

俄国在1860年以后的第二次扩张高潮不像以前那样遭到来自英属印度的战略竞争。但是在这个外交政策蓝皮书的黄金时代的大量已公布的通信表明，戈尔恰科夫的通知照会是如何实际上遭到拒绝的，对希瓦的征服是怎样受到了口头抗议，以及英国人是在怎样在外交上巩固了中部奥克苏斯战略边界的。总的来说，直到1885年发生经受考验的平狄事件为止，俄国人似乎尊重英国势力所达到的这条最后的鸿沟。即使像亨利·罗林森爵士那样的被俄国历史学家视为危言耸听的仇俄分子^[53]也认为对中亚细亚的征服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看不出对印度有什么威胁，只不过是来自亚洲俄国的竞争，这个“亚洲俄国……本身具有一种能够产生活力和生气的胚芽，使它能够不断增生母体的基干而不会干枯”。^[54]早在1865年，他即已正确地强调指出俄国企图合并这一地区，指出俄国与各汗国每年的贸易额将近100万英镑，而且带有某些预见性地指出俄国人可能“把中亚细亚变成单纯的

棉花产地”。^[55]他后来在1868年指出，位于奇姆肯特附近的一个俄国国营煤矿每年为咸海的汽船生产5000吨煤，另外一些私营煤矿产量更多。因此，这时已明显地看出，俄国命中注定要向外扩张，不再是从前被英国宣传家看不起的原始帝国了。^[56]但是在土耳其斯坦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从开始到这时一直是赤裸裸的军事和经济殖民主义。肤色不会构成障碍，俄罗斯化受到鼓励，种族只不过是暂时的阶级标志，而不是障碍。不过在塔什干的行政措施始终不属于新的俄罗斯帝国思想的范围。它是泛欧亚思想而不是泛斯拉夫思想，基本上属于从1878年对君士坦丁堡感到失望到1905年被日本打败这一时期。

（周叶谦 译）

^[1] 例如，A. 德居斯蒂纳侯爵：《1839年的俄国》（4卷本，巴黎，1843年）；A. 冯·哈克斯陶森：《对俄国内部情况、人民生活，特别是乡村机构的研究》（3卷本，汉诺威，1847年）。

^[2] T. 席曼：《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史》（柏林，1904—1919年），第4卷，第374页。

^[3] 俄历（“旧历”）与格里历（“新历”）在19世纪的差别是，后者比前者早12天。

^[4] 《列宁全集》，第15卷（1937年版），第469页。

^[5] G. 凯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2卷本，纽约，1891年），第1卷，第78页及以后各页。该书至今仍不失为描述西伯利亚罪犯流放地的最佳著作。

^[6] A. C. 本森和伊谢尔子爵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伦敦，1908年），第2卷，第12页及以下各页。

^[7] 参看第10章，原文第230页。俄文中的 *на род н о с т ь* 一词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词。它没有“民族主义”那么明确，近似于德文的 *volkstum*。

^[8] M. 列姆克：《俄国检查制度史论文集》（圣彼得堡，1904年），第186页。

^[9] P. P. 格龙斯基：《俄国法典的内容》，《斯拉夫世界》（巴黎，1932年），第400、406页。

^[10] 例如，R. 布伦纳：《俄国内地旅行记》（伦敦，1839年），第1卷，第340—343页。

^[11] W. 科塞加滕的话，见哈克斯陶森所著书的附录，A. 冯·哈克斯陶森：《对俄国内部情况、人民生活，特别是乡村机构的研究》（3卷本，汉诺威，1847年），第3卷，第533页。

[12]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439、453页上的表。数字按1840年的卢布值计算。

[13]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65、439页。

[14]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55页。

[15]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62页。

[16] A. 冯·哈克斯陶森：《对俄国内部情况、人民生活，特别是乡村机构的研究》（3卷本，汉诺威，1847年），第1卷，第xiii页。

[17]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436—438页。

[18] M. 图甘·巴兰诺夫斯基：《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圣彼得堡，1898年），第297、395页。

[19] 这份备忘录是由俄国的主要外交家勃伦诺夫按照太子的指示而起草的，其摘要见S. S. 塔季谢夫《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对外政策》（圣彼得堡，无出版日期），第25页及以下各页。

[20] P. A.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K. D. 卡维林关于虚无主义的札记》，《历史档案》，第5卷（1950年），第341页。

[21] P. 恰达耶夫：《论文和书信》（M. 格尔申森编，莫斯科，1913年），第81页。

[22] P. 恰达耶夫：《论文和书信》（M. 格尔申森编，莫斯科，1913年），第79页。

[23] 这句话见他的《往事与沉思》（谢尔本编，明斯克，1957年），第1卷，第378页。这是在俄国的社会和思想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部自传，有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英译本（伦敦，1908年版）。

[24] A. I. 赫尔岑：《论文和书信全集》（M. K. 列姆克编，22卷本，圣彼得堡，1906年起出版），第13卷，第16页。参见赫尔岑于1843年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的《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一文对黑格尔影响的称赞（全集，第3卷，第191页）。

[25] 它的动机如何和是否出于真心曾经受到怀疑。参见E. H. 卡尔《米哈伊尔·巴枯宁》（伦敦，1937年），第211—216页。

[26] 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原文第496页本文作者注明：在为本书第10卷写的文章中误将“周役”（week work）写为“恩役”（boon work）。故此处应为“周役”。——译者

[27] 原文如此，似应为1861年。——译者

[28] 《法律大全》，第42卷，第447—649号。

[29] 转引自F. 文图里《俄国民粹主义》（2卷本，都灵，1952年），第1卷，第546页。

[30] 忏悔的贵族是与拉甫罗夫同时代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这种现象本身已经过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著名的说法。

[31] 参看本卷第9章，原文第231页。

[32] 《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80页。

[33] 根据财政大臣本格的说法，转引自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第214页。

[34] 《经济研究季刊》（1953年），特刊第31号，第180页。

[3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5页和附录第471页。

[36] M. 图甘-巴兰诺夫斯基：《俄国工厂史》。但是后者表明国内工业同时也在增长，甚至是相对快的增长——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发展规律，因而遭到列宁的责难。

[37]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附录（统计表，第434—545页），第453页。“信用”（纸）卢布的价值在10年期间上下波动，1866年跌到值银卢布的68%，但在1860年和1870年贬值幅度很小。

[38]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引自表25a和26a，第495、517页。

[39]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引自表4，第452页。

[40] P. 赫罗莫夫：《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引自第168页上的表。1普特=16.4公斤。

[41] M. 利亚先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第590页。这个从百分比平均得来的数字在统计上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其他权威方面得出的另外的统计数字，即整个俄国欧洲部分减少至4%，给人一种更错误的印象。

[42] A. G. 拉申：《110年间的苏联人口》（莫斯科，1956年），第68页。但在1859年有350万人。见F. 洛里默《苏联的人口》（日内瓦，1946年），附录I，第208页。

[43] G. 凯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

[44] 即黑龙江。——译者

[45] 见本卷原文第367页。

[46] M. 塔季谢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圣彼得堡，1903年），第1卷，第127页，第273页及以下各页。

[47] 即海参崴。——译者

[48] 最突出的例子是长篇小说：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从高加索获得的许多灵感，使人联想起阿尔卑斯山对雪莱和拜伦的影响。

[49] J. 巴德利：《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伦敦，1908年），第230页及以下各页。

[50] 参见H. W. C. 戴维斯《亚洲的大角逐》，《英国科学院年刊》，第11卷（1927年），第19页。

[51] H. 罗林森：《英国和俄国在东方》（伦敦，1875年），第149—150页。

[52] 参见O. 霍茨《俄国—土耳其斯坦和现代俄国殖民政策的趋势》（《施默勒年鉴》，第37—38年度），第1卷，第388页。关于必须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论点，来自关于这次征服行动的最扼要的军事研究：M.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俄国势力在亚洲的推进》（柏林，1900年），第21页及以下各页。

[53] 例如，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588页。

[54] H. 罗林森：《英国和俄国在东方》，第195页。

[55] H. 罗林森：《英国和俄国在东方》，第199页。见前面原文第381页。

[56] J. H. 格利森：《英国的反俄情绪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0年），第150—151，172—173页。

第十五章 1848年的革命

尽管1848年各国的革命在同时发生，为共同的意识形态所鼓舞，但它们是互不相关的现象。当时没有国际革命组织，在法国、比利时、瑞士和英国等地聚集的政治流亡者，不是他们本国革命的鼓动者。没有统一的计划，这些革命并不是协调一致的。一些大体类似的问题在每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相同的词汇，相同的纲领，掩盖了各不相同的局势。

1848年年初，无人认为革命即将到来，可是在欧洲许多部分都呈现出革命前夕的局势。在意大利，庇护九世于1846年6月即位，他所宣布的大赦和所作的诺言，创造了一种狂热激动的气氛。伦巴第一威尼托发生了骚动，导致宣布戒严。1月12日发生了西西里起义。2月，在都灵、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颁布了或许诺颁布宪法。法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存在着革命前夕的局势。在要求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的大规模运动中，各反对党的联盟让领导权落入共和派之手，基佐内阁几乎没能维持到2月12日演说进行的辩论结束。在德意志^[1]，自由党和激进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制订了明确的改革计划。在爱尔兰^[2]，对独立计划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史密斯·奥布里恩和约翰·米切尔的支持者之间，只是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通过政治鼓动还是使用武力）上有分歧。在瑞士，短期的内战^[3]到12月时已经使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党完全掌握了分离主义者联盟各天主教州的权力。在匈牙利，反对党联盟在1847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改革计划。此外，1847年春的灾荒几乎到处引起了“饥饿骚动”，年底造成大量失业的经济危机，尽管没有带来动乱，却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工业地区。

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要一旦发生革命，立刻可以找到现成的纲领，这些纲领在意识形态上主要有两个来源——政治局势和社会局势。但是，反对现存秩序的各种力量，尽管是由具体的现实情况所激起的，本身却限于空想；它们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实践性的，它们没有接触到人民。实际上，1848年的各次革命不是群众的革命；它们的领导人和鼓动者是些缺乏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行动家。因此产生

了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政策；浸透了在浪漫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理想主义，他们不大注意事实。除了匈牙利、波兰和皮埃蒙特的少数例外，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至于在18世纪支持改革的贵族，在法国革命后已经同自由主义决裂，而把它的利益同王朝的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为王朝服务。他们的灵感不是来自美国，美国那时还不大为人所知，它的文明也被看作只是物质主义文明^[4]；他们的灵感也不是来自英国，英国只是在经济理论上有影响，而且由于它的贵族所拥有的权势和工人阶级所处的困苦状态而为大陆人士所不信任；他们的灵感来自法国给欧洲的教训。这些教训包括三个因素：首先，王朝复辟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特别是个人主义者邦雅曼·贡斯当，他的理论在瑞士和德意志尤其受到欢迎；此外还有空想派，他们是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导师。其次，是拉梅内，他的自由天主教教义和《前途报》^[5]在比利时、莱茵兰和巴伐利亚有深刻的影响。最后，是弥赛亚共和主义，它在1840年以后影响了许多共和主义者和青年，使他们把法国负有在整个欧洲传布和支持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使命和任务这一信念奉为教条（参见第9章，原文第218页）。大部分法国共和派的主张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求实行普选和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出版和结社完全自由；实行义务初级教育和征收所得税。政界的共和党人及其机关报《国民报》虽然没有比这要求得更多，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改革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建议进行社会改革，目的在于组织劳工，建立生产者合作社和协会，以及将主要工业国有化，包括保险和铁路在内。

欧洲的自由主义者^[6]根据上述一切制定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纲领。它包括保证个人自由，改革司法程序和实行陪审制度，出版自由，代议制，建立一支国民自卫军，废除教会国家和警察统治。此外，某些激进分子强调人民代表应该有充分的制宪权，并宣传尽人皆兄弟的概念。

除了由于学派的不同而有细微差别外，这些就是西欧、南欧的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提出的纲领，一个在性质上偏重于理论，一个则是比较注重实际。

民族运动代表当时政治思想（参见第9章）有两种彼此相类似的民族理论；它们尚未互相冲突，因为分歧还不明显。法国的民族概念来自18世纪的理性主义理论和大革命，把民族看成是一个由自由人自愿

组合的精神团体。另一方面，德国的民族概念来自赫尔德的哲学，来自浪漫主义和各大学的哲学、历史和法律研究，把民族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原始的有机体，赋有特定的才能，表现在语言、风俗和历史上。法国的概念传遍西欧，鼓舞了意大利和爱尔兰，正像它曾经鼓舞波兰和希腊一样。德意志概念在一些完全不同的地区流传，即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以及曾有青年在德国各大学学习过的地方。法国概念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要求联系在一起，德意志概念则鼓舞人们的权力意志，这种意志可能通过自由主义以外的其他方式实现。特别是在德国，这两种运动界限分明，由法国概念鼓舞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由对法国的仇恨培育起来的。因此，当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在1848年得到充分发展时，它们就使欧洲各国的整个结构发生了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公式。

社会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是由于它关系到群众，因而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在欧洲3/4的地区，拿破仑统治时期没有废除封建统治，社会问题在这些地方对农民的影响比对工人的影响更大。它包括地产权只限于贵族所独有，对人权和财产权的限制，维持什一税和强迫劳动。两个必要的条件是解放人身和解放土地。在普鲁士，1817年的特许权法阻碍了哈登贝格的社会改革；在整个德意志，甜菜和农业机械的引进加剧了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竞争。在三部分波兰领土上，从19世纪初以来，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加速。在奥地利帝国，那些从对谷物和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利的土地贵族，通过立法的经济措施力求限制不交租金的土地的数量，并以沉重的地租代替了以前的土地使用权。继拿破仑战争以后而出现的人口增长，加剧了农民的苦境，迫使他们去工厂工作以补充收入。工业就以这种方式影响了农村。

但是，和过去一样，工业的主要代表仍然是分散的工匠。几乎还不存在拥有机器、迅速的交通运输、资本主义组织和自由主义法律的现代化工业结构。^[7]只有英国经历了一次产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工业中心只存在于比利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少数地区（莱茵兰、图林根、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在奥地利帝国则有波希米亚和维也纳。因此，这种无产阶级的集中现象只是例外情况，除英国以外，还没有出现恩格斯所谴责的那些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境况不悲惨，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旧的行业团体的保护，还不能从人数和组织所形成的力量中得到好处。一些理论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矫

正办法都不够精确，而且表现出缺乏对现实的认识或经济知识，这些理论家除了蒲鲁东和德国的某些共产主义者外，都是一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些问题由于以下一些情况而显得更加迫切：1846年的农业危机；1847年年初的金融危机（它阻碍了投资并使一整年的信贷枯竭）；工业危机以及在秋季随之而来的萧条。农奴和失业工人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从政治革命在旧结构上打开的缺口汹涌而出。

2月24日的巴黎革命从一次偶然事故中爆发，这次事故如果不是事先安排的，至少也是被有意地利用的。在2月中，政治领袖和议会领袖以及共和党的报刊编辑，都没有想到自己已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但是一群年轻、热情的人认定应该进行一场革命。在通过举行民主宴会而组织了一场反对政府的运动后，他们决定举行一次群众游行，护送出席议会反对派于2月2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宴会的客人。尽管政府禁止这次集会，议员也撤销了他们的支持，组织者仍然让游行继续进行。接着，由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准备支持改革而不知所措的国王于23日撤销了基佐的职务，而这时他们在巴黎东部各区整天继续骚动，晚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沿着林荫大道示威。当群众和军队在外交部外面发生流血冲突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后，他们充分加以利用，夜间在圣奥诺雷、圣马丁和圣安东尼等郊区进行煽动，唆使人民袭击军火工厂和区政府，把自己武装起来。到24日清晨，巴黎就处在起义中了。起义者用街垒包围了市中心区。宫廷和政客们正在煞费苦心地商量更换大臣并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使得正在指挥部队的比若元帅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有效的干预，这时起义者已经冲进了杜伊勒利宫；12时半，心情沮丧的国王俯首帖耳地退位，从香榭丽舍大街逃走。一小时以后，王宫被占领并遭到劫掠，与此同时，少数坚决分子控制了主要的公共机构——巴黎市政府、警察局和邮政局。将近中午时，共和派的领袖们仍然在《国民报》的办公室里密议，力求使起义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和集中的领导，而这时起义已经获得胜利。但他们至少是巧妙地在议会抓住了机会。他们拒绝了关于为年幼的巴黎伯爵设立摄政的任何谈判，要求已经冲入议会的群众用欢呼表示同意成立一个由7名“激进”议员组成的临时政府，其中最重要的是拉马丁、杜邦·德·吕勒、勒德律-罗兰、玛丽。下午5时左右，这个政府占有了市政府大厦；大约

在7时，来自《改革报》有联系的一个先进团体的4名代表加入；其中包括路易·布朗和一名工人，他们是被邀请来参加政府的。

就这样，在几个小时内巴黎群众就推翻了政府和王朝。如果说他们没有1830年时那么多的领袖，他们造成的损害也小得多，因为少数暴力行动并不严重。跟1830年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不让胜利从手中溜掉。当天晚上，他们迫使新政府宣布共和制而不等待全国批准。第二天，他们将共和政权的方针引向社会方面，从政府取得许诺，保证全体劳动人民靠劳动可以维持生活，并保证全体公民就业。两天后建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工人们在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之前，要求首先把他们的工作日缩短一个半小时。路易·布朗是这些混乱的要求的发言人和制定者，但整个政府都被这种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真诚愿望所鼓舞。他们的审议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当着人民的面进行的。几个星期间游行队伍、代表团、各种宣言接连不断。就这样，一道命令接着一道命令，一个共和国逐渐形成，其基础是实行普选、出版和结社的绝对自由，废除政治犯的死刑，废除奴隶和债务监狱。这是一个为了调整劳工组织而进行各种社会试验的共和国。这些劳工组织有：各式各样的工会；吸收巴黎及各主要城市的失业者的国立工厂；在每个省和巴黎的卢森堡宫的劳动委员会，路易·布朗在那里将600名至800名成员组成一个实际上的议会，这些人包括雇主代表，工人代表（人数加倍），各个学派的经济学者。完全没有反对派。各省没有怨言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了巴黎的革命；教士装模作样地站在新政权一边，正统主义者也兴高采烈。

人们心中出现的问题是：对欧洲的影响如何？法国现在是否要实行传播自由（自由代表共和主义的福音）的计划？拉马丁及其同事担心战争会造成革命的混乱；如果与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已经计划成立的联盟作对，政权就难以建立起来。拉马丁向帕默斯顿保证他希望和平，结束了这一危险（参见第10章，原文第261页）。他在一个宣言中阐明了法国的立场，宣言于3月2日经他的同事批准，于5日公布。在宣言中，法国宣布实行人民统治的原则，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拒绝承认1815年的和约，宣称法国是每个追求同一理想的民族的盟友，但是暂时承认欧洲的现状，强调法国的和平愿望。另外有两个实际的原因促成这种温和态度：军队混乱和财库空虚。实际上，革命已经使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引起人们的恐慌；银行存款被提走；

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一切信贷停止；结果是工场和工厂倒闭；国库枯竭，法兰西银行面临破产的危险。凌驾于一切理论问题之上的是，紧急状态要求纸币必须强行流通，宣布所有的票据延期偿付（3月18日），建立贴现银行经营商业股票和发放商品贷款；不久以后，有9个省银行并入法兰西银行，授予该行以发行纸币的专权。灾难虽避免了，但是财政和经济危机直到夏天还很尖锐，使政府的行动陷于瘫痪。

巴黎的事态发展的消息，立即引起邻近各国自由主义的高涨，这些国家是法国思想的温床。在意大利，巴黎的革命证明已在进行的革命过程是正当的，并使这过程得到加强，但没有发动起新的力量（参见第21章，原文第562页）。在皮埃蒙特，3月5日颁布了宪法。教皇任命了一个世俗人员占多数的内阁，并在15日颁布了宪法。这两个宪法与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的宪法一样，是空谈派思想的实际运用，是路易·菲利普宪章的改编；没有一处谈到群众参与，没有一处谈到改革时触及民主。在德国西部，从3月1日至12日，以巴登大公国为榜样，属于知识界和商界的资产阶级发表的宣言，与街头的各种大型集会一起，导致在黑森—达姆斯塔特、黑森—卡塞尔、拿骚、法兰克福、符腾堡、不伦瑞克和图林根建立了议会制政府并取得某些权利上的让步。在北部的汉萨同盟各城镇，和平的革命把贵族政权变成了民主共和国。在普鲁士的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组织了大规模的请愿，要求成立代议机构，资产阶级夺取了大城市的控制权并组织了国民自卫军。因此，德国西部和其他部分的对比更加鲜明。但是，显然农民起义也重新抬头，在内卡河流域、黑森林和奥登瓦尔德开始了起义——这是多年积累的仇恨和苦难的爆发，很快就被正规部队镇压下去。最后，全国统一问题变得如此迫切，以致国会本身和普鲁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各邦的政府于2月底和3月初开始考虑一个改革联邦的方案。在少数几个自由主义者的倡议下，大约50名政治家和作家于3月5日在海德尔堡集会。他们发出呼吁，要求建立一个代表整个德意志的机构，由他们当中的7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召集了所有曾经参加过国会的人，以便为预备国民会议制定选举法。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没有使用暴力的迹象（除了内卡河流域发生的农民起义以外）；这些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舆论的一致支持，由于它们同时发生，由于它们的政府感到意外而产生的盲目恐惧心理。

中欧的革命来自另一个根源，即保守制度的心脏，维也纳本身。巴黎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波希米亚和维也纳的银行倒闭，工业危机加重，宫廷中的政治阴谋加剧和人们普遍感到高兴。这种感觉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和大学生多次提出了请愿书，在匈牙利国会开会地点的普雷斯堡发表演说要求废除人头税和义务劳动，并在全代表制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匈牙利政府。危机在奥地利国会下议院开会的3月13日达到顶点。正如在巴黎一样，由资产阶级和学生组成的和平示威者同部队发生了冲突，随后在郊区发生了起义。宫廷在恐惧中作了让步。梅特涅逃走。但骚动一直持续到15日，由皇帝许诺颁布宪法，给予出版自由并组织大臣会议，从而平息了起义。在普雷斯堡，科苏特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充分利用维也纳发生的事件提醒人们防止革命。这篇演说使国会决定通过自由主义纲领，然后由一个代表团送到维也纳要求批准。一个由包贾尼伯爵为首的联合内阁组成，国家着手对放弃封建权利的地主给予补偿。在随后的3个星期中，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法律，后来形成“匈牙利法典”。在布拉格，资产阶级和学生组织的请愿扩大了范围，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更带全国性。3月19日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维也纳提出更强烈的要求，代表团于22日返回，4月8日获得一份诏书，准许在3个联合起来的捷克省份里建立一个代议制国会，给予政治自由，使各种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地位，并且废除了领地制的司法行政制度。“波希米亚宪章”将由奥地利国会拟定和完成。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一群青年和激进分子试图扩大这个稳健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这群人很快就被软化自行解散。除了在维也纳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外，革命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论在波希米亚或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都没有牵涉到分离主义。但是革命的结果与其说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不如说是得到了一些诺言。

道义上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梅特涅政权垮台后，随之而来的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霸权迅即崩溃，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宣告结束（参见第21章，原文第562—563页）。当维也纳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于17日晚间传到米兰时，爆发了对日耳曼人的强烈仇恨。人民制服了求妥协的一切努力，表现出近乎愚蠢的英勇，尽管他们缺乏武器，但在邻近城镇的帮助下，经过5天激烈战斗，终于驱逐了拉德茨基和奥地利驻军。当驻军于3月31日逃入四要塞防御区后，一个临时政府接管了伦巴第的行政权。威尼斯更是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获得了解放：马宁在被群众从监狱释放后，恢复了圣马丁共和国，赢得人民的拥戴，并用威胁手段

使兵工厂缴械，舰队撤离，总督投降。在几天以内，威尼托地区的所有城市跟伦巴第的城市一样，驱逐了奥军。3月21日和26日，3个公国同样获得了解放。

在失业现象严重的大工业城市柏林，于16日听到了来自维也纳的消息，激起了一场骚动，规模迅速扩大，以致遭到军事镇压。军队的残暴行为使骚动在18日变为一次起义。这里的运动是自发的、激烈的。人民奋起反抗军队，控制了这座城市，迫使国王屈辱地投降，作出一系列政治让步，想借此平息人民的愤怒。首先他准许出版自由和召开议会，然后准许议会草拟一项选举法，又答应实行内阁责任制原则和成立一个自由派组成的“莱茵内阁”。他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德国统一，结果只是使他沿着一条比他所希望的要远得多的道路走下去。柏林的榜样激起了自由主义在普鲁士所有城镇的大爆发。从3月17日至30日在中德意志、萨克森和汉诺威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流血革命。与此同时，进一步走向激进主义的标志是在西德意志出现了一个共和党，由于失业，这个党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了支持，并表现为一种城市无政府主义。

在德意志边境，波兰人成群涌入波森，受到德意志舆论的欢迎，这些人等待着入侵俄属波兰。但是由于1846年流产的起义的结果，波兰本身变得毫无能力，而波兰人和普鲁士人的互相冲突的民族主义，很快就破坏了自由运动的统一（参看第9章，原文第228页）。到5月中旬时，就在上述这些德意志人的欢呼下，普鲁士国王把波兰领土并入他的王国，亦即并入德意志邦联。另一方面，革命在丹麦各公国获得胜利，这些公国在3月18日宣布独立，并选出了一位君主。德意志志愿军和普鲁士军队对他们进行了帮助。4月底，丹麦部队被击退到艾德河对岸。

总之，这些革命以微小的代价获得了胜利。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发生了暴力行动。在巴黎和维也纳，这种行动是短暂而且温和的；在米兰和柏林则是流血的和恐怖的，因为群众被某些偶然的事件或狂热的仇恨所激动。在其他一切地方，革命所需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宣言，这些宣言有时得到街头示威的支持。一般地说，目标是不高的，所得的结果往往是不完全的或模糊不清的，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这些革命巩固了它们的阵地。在巴黎，共和国尽管要同革命压力和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双重困难进行斗争，仍然加强了它的地位。极端主义

者，例如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的领导人布朗基和巴尔贝，曾试图延长由巴黎人民直接管理的不可靠的政权的存在，并在4月16日组织一个“劳动日”，以推迟选举。但是政府态度坚定，准备参加竞选的各党已经形成。保守派人士乞灵于社会秩序和宗教；民主派人士集中的地方是各俱乐部和由路易·布朗在卢森堡宫的工人代表团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些人要求成立一个“社会共和国”；另有《国民报》的共和派，他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鼓吹最广泛的自由主义。4月23日，按照“名单投票”的办法进行了选举，气氛有的地方平静，有的地方热烈；结果符合共和派的希望。同获得180—200个议员席位的保守派和民主派相比，他们获得了900个席位中的绝大多数。

在意大利，由于对奥地利人所取得的胜利，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在整个国家，甚至在那不勒斯和罗马，都组织了志愿军团去支持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最初，查理·阿尔贝特犹豫不决；害怕革命，不相信法国；但在3月25日，在舆论的推动下，他向奥地利宣战，然后越过提契诺河进入米兰。但是他的行动非常迟缓，直到4月初才同奥地利人接触，4月10日在戈伊托战役中获胜。

柏林议会表决于4月8日举行普选。政府在召开预备议会的代表开会时没有遇到困难，会议于3月31日在法兰克福召开。它宣布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或社会地位，都应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但是，尽管少数共和党人作了努力，但这次会议在4月3日解散，没有试图起草宪法草案的初稿；仅仅任命了一个50人的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在4月下半月或5月初，各地举行了国民议会或新议院的选举。

在奥地利，帝国政府在进行了一些抵制之后于4月11日接受了“匈牙利法典”，给这个圣斯蒂芬王国^[8]以自治地位，拥有一部中央集权的、自由主义的和议会制的宪法。两个星期以后，帝国政府给帝国的其余部分颁布了宪法，这是在3月15日许诺的，以比利时的宪法为模式。5月9日，对被限制性选举排除在外的各个阶级的抗议作出让步，又把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公民。5月15日，在一个公开的宣言提出“风暴式请愿”后，政府又把制宪权交给未来的议院，并准许波希米亚建立一个民族议会。

到4月底，一个谋求按照民主和民族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新欧洲诞生了。

可是到1848年夏，革命已经开始退潮。尽管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的，但欧洲已摒弃了社会主义和无秩序状态。这同样是效法法国的榜样。因为在法国，社会试验已经令人失望，各进步政党已表现出轻举妄动。5月5日首次召开的制宪议会改组了政府，把行政权交给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任命临时政府的成员掌管它的各部，但把社会党人排斥在外。社会党人由于失去了分享的全部权力而感到愤怒，依靠各俱乐部和卢森堡宫的工人委员会，于5月15日对制宪议会发动突然袭击，企图进行第二次革命。他们遭到失败，被迫放弃他们仍然拥有的职位，例如警察局局长。他们的领袖拉斯帕伊、布朗基、巴尔贝、阿尔贝都被逮捕。由于这次对国家政权的攻击，使民主观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信誉。持久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使任何税收的民主改革和加尼埃一帕热计划的国有化措施完全陷于停顿；它使工会名存实亡并使国有工场遭到失败。工场的领导人埃米尔·托马提出了一些福利措施，设立了进行公民教育的俱乐部，并且希望把工场纳入一个庞大的工业计划。但是由于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外省人的不断流入，各工场已经膨大得不成体统，工人总数超过了11.5万人。巴黎没有足够的工作给这样一支劳动大军，而闲散就会导致混乱。这些劳动计划有的像公共工程部部长计划那样无用，有的像道路桥梁部的计划那样需要长时间的事先研究，或者像加尼埃一帕热的收购铁路计划那样引起政治问题。议会对沉重无益的开支感到不安。此外，各革命政党指望从各工厂抽人组成一支军队，因为5月15日的大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军队。各种破坏性宣传开始流传。保守派人士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对社会问题采取激进对策的议员，发现谴责这种危险无须费多少气力；政府本身也感到惊慌。计划对各工场进行清洗，把那些不适当地录用的外省人赶回家去；把巴黎的很多工人送到能够开设大工场的省（例如索洛涅），以减少巴黎的工人数目。曾准备挑选一些人编成必要的组；但是，6月21日，青年工人得知他们要么必须前往外省，要么，如果愿意的话就参加军队，总归他们是被工场开除了；结果在第二天发生了暴动。这场暴动，工场工人参加的不多（大部分人袖手旁观），参加者主要是那些为建立社会共和国和组织劳工的理想而斗争的巴黎工人群众，当然还有一切革命分子。双方都很残酷进行的内战从6月22日延续到6月26日；死者肯定很多，但是数目无法统计。继之而来的镇压措施是逮捕、流放或监禁了成千上万的人。由于这一危机，一切权力必然集中到卡芬雅亚克将军手上，法国在“六月起义”以前那种平

稳的政治局势一去不复返了。恢复行政权力的方式是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委员会主席。他查封了各俱乐部和革命报纸，清洗了行政机构。各省曾急于在各地支持维持秩序的军队，现在由于感到自己再次有了坚强的政府而宽心了。

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法国的榜样曾激起各工业国家的社会运动；而这时，权威的胜利使各国政府都试图来一次反动。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曾经采取了多种形式。它最初、最自然的表现形式是为柏林、布雷斯劳和科隆的工人组织政治性的俱乐部；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俱乐部越来越兴旺。此外，由于新近获得的结社自由，工会的数目迅速增加，某些会员产生了成立一个中央组织的想法；4月19日，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柏林成立；汉堡和莱比锡也起而仿效。这个委员会的喉舌是《社会政治报》；它号召所有工人阶级的团体给它以支持，并且组织各种集会。一个更创新的步骤是企图成立一个阶级组织，奇怪的是，这一点首先是由手工业工人提出的。由于莱比锡的工人组织于4月22日发出号召，结果更多的地方举行了更大的集会，发表了反对自由企业的请愿书。后来，在汉堡举行的一次预备代表大会（6月2日至6日）召集了一个“社会议会”，它从7月15日至8月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起草了《手工业者宪章》。它要求在各同业公会必须参加的基础上成立各行业组织，各地方成立地方行业公会，全德意志成立各行业总公会；它还要求各行业的数目应有限制，恢复行业师傅的特权。该议会的代表和请愿书主要来自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利亚等地的纺织业中心。与这种用恢复中世纪制度来组织劳工的方法相反，工厂工人于8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工人总代表大会”，有300名工会代表参加，包括维也纳人、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他们通过了应当建立一个工人联盟，社会问题应由工人自己解决的原则。工人阶级用这种方式获得了不依靠政治团体的独立代表权，但是由于把德意志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工业经济，使这种代表权受到削弱。而且，正当这个运动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提出其双重要求时，由于它的部分成员与革命思想有联系，从而使它在议会中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正如在法国一样，社会主义者，不论是理论家和行动家都不可能想象发生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伴随一场政治革命，特别是科隆的共产主义小组，于6月间创办了《新莱茵报》，力求鼓动工人阶级走向这一目标。针对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议会，为进行选举而成立的各民主委员会建立代表大会制，由一位社会主义者担任主席。6月14日，它召集来自66个市镇的

234位代表，建立了各级地方委员会和地区代表大会，上面设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它的纲领规定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以保证全民的幸福和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但是当局不再惊恐失措，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到处镇压群众骚动，6月在柏林，7月在西里西亚，尤其是9月中在法兰克福和西部。至于法兰克福议会，它无视这些无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纲领。一些来自奥地利的工人曾给德意志人以支持，但没有起多大作用。在革命以前，他没有想到也没有设法建立任何形式的组织；显然，他们甚至不了解他们参加的这次革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他们满足于政府的失业救济和公共工程。政府由于经费困难，并且由于从法国“六月起义”的结局中受到鼓励，于8月19日削减了为公共工程所付的工资，这时维也纳的工人企图谈判。8月23日的骚乱引起激烈的战斗，在战争中他们受到了国民自卫军的镇压。

此外，在奥地利（见第20章，原文第523—529页），斗争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政府太软弱，既不能拒绝群众的要求，又不能抵挡英国的压力；英国急于尽快在意大利恢复和平，劝它在英国调停下，把伦巴第割让给皮埃蒙特，以便保有威尼托。与此同时，保守势力的抵抗以仍然保持着旧的君主专制精神的某些宫廷人士和军队为中心，这些人在没有政府命令或无视政府命令的情况下，发动了第一次复辟旧秩序的运动。温迪施格雷茨在波希米亚，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几乎同时进行这一活动。波希米亚仍然在耐心地等待帝国议会颁布的宪法，拒绝派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并于6月2日举行一次各斯拉夫民族的代表大会以证明它的忠诚（参看第9章，原文第232—233页）。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宣告了斯拉夫人的团结和自由平等的愿望，实际是反德反俄的独立宣言。6月12日温迪施格雷茨的士兵挑起同布拉格居民的冲突，从而使这位元帅在历时5天的战斗中压倒了资产阶级、学生和工人，并宣布戒严。

在意大利，民族运动的日益衰落符合奥地利的利益。4月29日，教皇在一项训谕中谴责战争。志愿军的热情，遇到的却是乡村人的冷漠；无所事事的当局不想支持他们；皮埃蒙特军队采取半敌对态度，不想收编或使用他们，听任他们进行局部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他们在奥地利人的技术优势面前，逐渐丧失了威尼斯的土地。他们精神沮丧，四散逃走。国王查理·阿尔贝特是一个极平庸的战略家，只求实现个人的野心。他无视其他君主提出的建立军事同盟的一切建议。尽

管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仍然获得当地人民投票赞成于6月并入皮埃蒙特。最后，在7月10日，他接受了英国调停的结果。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行动，而这时拉德茨基整编了他的部队，于6月10日攻占维琴察，拒绝执行他的停战命令，并且不理睬他的政府在英国干涉下所作的让步。在威尼托的一些较小的城镇陆续陷落后，拉德茨基于7月23日发动攻势。25日，他在库斯托扎击溃了皮埃蒙特的军队，赶在溃军之前到达阿迪杰河，强迫查理·阿尔贝特不顾他的正式协议于8月5日放弃米兰，并于9日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撤出了伦巴第、威尼托和各国。除了威尼斯虽被封锁仍然坚持外，这时已经恢复到3月以前的局势。拉德茨基在伦巴第—威尼托实行了铁腕统治，占领了弗拉拉。那不勒斯国王利用这种局势命令6月15日新选出来的议会休会，直到同那不勒斯的工人进行巷战才于9月将权力交还军队和一个经过清洗的民政机构。统一意大利的希望破灭了；只剩意大利中部和皮埃蒙特还有政治自由。

匈牙利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第20章，原文第523—529页）。三月运动鼓舞了效忠于圣斯蒂芬王朝的其他种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边境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特别是克罗地亚人。起初，这些运动并不是分离主义的，而且在4月里，它们的代表们曾经希望，通过与布达佩斯的自治政府进行谈判，它们的政治存在可能得到承认。但是它们发现匈牙利人态度顽固，因而在5月表现出一种民主的、反马扎尔人的情绪——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尤其表现出民主的倾向。他们在卡尔洛夫齐、布拉森多夫和萨格勒布召开的议会上，要求并宣布实行自治；他们要求与维也纳建立直接的联系，封建特权应予废除，大地产应予分开。克罗地亚人从长期的经验中知道匈牙利人多么顽固，他们为他们的共同事业推选出一个领袖，一个来自前线的军官耶拉契奇，他曾被维也纳任命为克罗地亚省省长，这时则由萨布勒布议会授予他独裁权力（7月9日）。他把克罗地亚改成一个单独的省份。与此同时，匈牙利国会于7月4日开会，这个国会在其社会成分上与以前的议会没有什么不同，它在科苏特的鼓动下，开始建立一支国民军。内战迫在眉睫。维也纳毫不费力地就唆使这些民族运动彼此互相攻击。由于战胜了意大利人，维也纳宣布匈牙利人投票通过的法律无效，匈牙利人还失去了德意志议会的支持。9月初，斗争开始了。帝国的斯拉夫部队从东南、南方和西方侵入了匈牙利各省。科苏特自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施行了

一些未经皇帝批准的法律；因此，匈牙利就像是一个独立国。9月23日，群众杀死了帝国高级专员，和解的可能性已经渺茫。由于维也纳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使这种可能性更加遥远。激进分子和工人计划反对军队开往匈牙利前线，10月6日发生了一次暴动，结果陆军大臣遭到暗杀，皇帝及其大臣逃往奥尔米茨。但是这些群众没有得到支援，无法抵挡军队。温迪施格雷茨向维也纳进军，在3天之内（10月29日至31日）重掌政权，在这个城市里进行了残酷镇压。几个星期之后，匈牙利就屈服了。

在国际事务中，外交活动重新活跃。对英国来说，松德海峡的航行自由既是它所需要的，又是它的传统，它不能允许德国人在这个时候控制该海峡；她对普鲁士的行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中调停并促成停战，迫使普鲁士撤出军队，而将争端提交8月30日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参看原文第265页）。

因此，到1848年夏末，革命到处受阻，往往是被击退的。社会革命被防止，先进的政党被击败。政府的权威已经恢复，有时甚至是军人掌权，如在伦巴第一威尼托王国，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到处忙于制定宪法。虽然自由派的让步还没有被放弃，但在这关键性的几个月里所得到的经验，使各国制宪议会都把行政权力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法国宪法经过审慎的起草和漫长的讨论，用无休止的辩论来详细审查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实际经验中解决，而是从理论上解决的。由此而产生的1848年11月14日的宪法具有彻底的民主精神；人民主权体现在通过普选选举一个一院制的立法议会和共和国总统；个人的一切权利和各种自由，包括受教育的自由，都作了规定和保证；责任内阁制保证了议会政治，议会费用的支付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议员。但在经历了“六月起义”后，由于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而放弃了分权主义，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而放弃了工作权。制宪者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希望通过把总统的任期限为4年，不得连选连任来避免权力归于个人的危险。议会尊重国家的权力，尽可能迅速地使新宪法付诸实现。立即着手总统选举；于12月10日举行。结果令人震惊。进步的候选人只获得少数选票——社会党人拉斯帕伊获4万票，民主党人勒德律-罗兰获40万票。真正的竞争在共和党候选人卡芬雅克将军同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之间进行。亲王在全国并不知名，但由于他的姓名，在6月和9

月间被几个省选为代表，他获得了550万票，而卡芬雅克得票略低于150万。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全都投路易·拿破仑的票；保守党人曾与他订立了一个维护秩序和保护宗教的协议，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和法卢为首的由非波拿巴主义者组成的内阁。9个月以前宣布为共和国的法兰西，现在却把它的命运交给了非共和党人。遭到削弱和丧失了威信议会不敢继续执行任务；它匆匆通过了几项法律，于2月9日决定在春季解散。波拿巴亲王的当选被整个欧洲看作维护秩序的力量重大胜利，促使各国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

与此相反，在德意志，制定宪法是一件新鲜事物。不仅中部和北部各邦，就连德意志邦联也不得不制定基本法，这项任务往往在断断续续互相矛盾的情况下进行。

在西部，资产阶级已经熟悉了议会政府的做法，问题容易解决：只要把政府引向民主即可。另一方面，在中部和东部，封建王朝的结构仍然根深蒂固，政府往往掌握在决心维护自身利益的贵族阶级手中。普鲁士议会于5月22日召开。左翼政党占绝对优势。群众的骚动在6月里有几天形成了起义，迫使议会采取民主措施；抛弃旧政权的观念和制度，建立新政府。但是到7月时，右翼重新组织了它的力量——大地主、路德派教士、王室侍从和军队，这些人都力求在农村获得支持。当议会要求驱逐军队中敌视新政权的军官时，冲突就爆发了。由于受到温迪施格雷茨的榜样的鼓舞，国王把他在柏林的部队交给一位名叫符兰格尔的坚定的将军指挥，他严厉镇压了9月的工人阶级骚动。对10月31日表决通过的一项同情维也纳人的行动，他的回答是任命由冯·勃兰登堡为首的反动内阁，并在11月中旬将议会遣散回各省。群众没有发生骚动，舆论似乎对他有利。于是国王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2月5日，他宣布解散制宪议会，自己颁布了一部宪法，保证下列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选、议会两院制，但国王保留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实行固定税收的原则。正如1月选举中所表明的那样，这部宪法满足了全国的愿望。德意志其他各邦君主也都采取了同样步骤。如果说自由主义获得胜利的话，那也只是一种以牺牲民主和人民主权为代价的胜利。

5月18日开幕的法兰克福议会，大约有800名议员。它根本不代表下层阶级，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有自觉的热诚和坚定的意志，但完全缺乏政治经验。他们采用的繁杂程序进一步延误了他们的

工作，当时成功的基本条件是立即利用举国的热情和政府混乱的时机，他们却进行无尽无休的辩论。议会分裂成为若干不稳定的派系。到6月30日，它才决定把临时政府委托给一位帝国临时元首约翰大公爵，实际上他到7月底才就职。然后议会才开始宣布它的目标，制定一项它无法实现的政策。它希望创建一支德国陆军和舰队，将所有说德语的各邦并入帝国，对各邦政府实行控制，并通过中央集权使国家的制度和经济划一。只是在这以后，10月19日，它才开始讨论它真正想要建立的那些制度。构成德意志普通法的各种基本权利迅速确定下来，并在当年年底未经各邦批准便予以公布。10月27日，议会被它自己的民族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宣布除一人兼任两邦君主的联合外，德意志帝国的任何部分不得与另一邦合并。但与此同时，奥地利和普鲁士当局所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它们无意被取代或受人控制，并将会加强那些已经对群众运动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的抵抗。维也纳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巩固了它的地位（参看第20章，原文第525—526页）。由温迪施格雷茨指挥的来自摩拉维亚、施蒂里亚和加利西亚的军队，于12月15日击退匈牙利人，1849年1月4日重新占领布达佩斯，并于2月26日取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于11月21日成立一个由施塔迪翁和巴赫等确有才能的人组成的政府。27日，他向帝国议会提出他的在统一但是自由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的纲领，并于12月2日以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替代虚弱的皇帝。与普鲁士国王一样，他的政府也面对一个帝国议会，这个议会从7月22日起已经谨慎地从事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民主体制。此外，也像普鲁士国王一样，政府把帝国议会从动乱的首都维也纳迁往摩拉维亚，然后宣布将它解散，于1849年3月4日公布一个以帝国统一、民族平等和代议制三者合一为基础的宪法。作为补充还发布了以下法令：规定废除封建制，建立市政机构和改革司法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得到俄国在外交上给予支持的保证。

由于查理·阿尔贝特的一项不幸的决定，奥地利政府获得了对意大利的进一步胜利。由于受到民主派的煽动，这位皮埃蒙特国王废除了3月12日的停战协定，重启战端。但是仅仅24日的诺瓦拉一战他的军队就溃败，他被迫退位，接受一项新的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条件十分苛刻，只是由于法国的外交努力才略加放宽。

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就难免受到阻挠。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提出了帝国领土应当如何划定，是否应将奥地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包括在内的问题。2月里，各政党分成了“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两个集团。大多数人对奥地利表现出的独裁倾向，对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邦政府已经开始同奥地利进行的谈判，对奥地利公开宣布的要像统治旧德意志一样统治新德意志的意图表示不满。

1849年1月底和2月，作出了关于国家制度的重大决定，3月27日宪法制定完成。3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以出席代表538人中的290票当选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的支持者获胜，他们利用了似乎席卷奥地利的突如其来的灾难。匈牙利人在科苏特的激励下焕发出新的力量，在三条战线上击退了奥地利人，4月7日击败了温迪施格雷茨，并在一个月之内解放了他们的领土。4月14日，议会宣布废黜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匈牙利独立。眼看奥地利将无法完全恢复原状。施瓦岑贝格当机立断，求助于沙皇。5月1日，他正式宣布得到俄国的支持，当月，俄国三个军开进了帝国领土。在德意志，奥地利的财产也被归还。4月27日，弗里德里希·威廉面临在德意志自由主义与普鲁士传统之间进行抉择，他轻蔑地拒绝了法兰克福议会给他的皇位，解散了他自己的议会，修改了选举法。

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法国选出一个保守的多数派，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德意志皇位，施瓦岑贝格求助于沙皇，皮埃蒙特的崩溃，法国军队在罗马国的登陆——表明革命进入退潮。在有些国家里，革命的结束只有几个星期。法兰克福议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奥地利的代表，然后是普鲁士的代表被他们的君主召回，自由派则沮丧地返回家园。留下的只是占少数的共和派，他们徒劳地企图实施已被国王拒绝的宪法。从那年年底开始，民主党一直在组织“三月协会”；现在则力求通过一次新的革命来实现共和国的统一。但是在萨克森、巴拉丁和巴登大公国（5月初）举行的起义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在斯图加特避难的议会也于6月18日解散。

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失望和自由派政府的无力对付经济危机，使革命运动在这一年的年底再起（参看第21章，原文第564页）。在皮埃蒙特，激进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使焦贝蒂和拉塔齐政府上台，结果奥地利战争重启，造成巨大灾难。在罗马，一场真正的革命导致政务委员会主席罗西于1848年11月15日被暗杀，教皇在面对进一

步混乱的情况下于24日逃往加埃塔。在托斯卡纳，激进派在圭拉齐的领导下掌握了政府，大公也同样决定逃亡。马志尼的支持者从四面八方涌向意大利中部这个民主孤岛；他们企图组织一个平民的制宪议会，最终宣布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成立共和国。但在诺瓦拉敲响了这些民主派的丧钟。天主教势力讨论如何最好地使教皇复位，教皇则向奥地利求援，因为奥地利正在开始占领教皇管区。法国政府决心防止和限制奥地利的行动，派遣了一支远征军，于4月25日抵达契维塔韦基亚。乌迪诺将军过早地发动进攻而失败，罗马只是在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后才于7月1日陷落。被乌迪诺复职的各红衣主教进行了报复，法国政府无法干涉。托斯卡纳共和国于5月底被奥地利军队推翻，这时那不勒斯国王也在4月和5月初重新征服了西西里。像民族主义革命一样，政治革命在意大利也已结束。只有皮埃蒙特的保持自由主义。不久以后，匈牙利投降。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仅用了两个半月的战斗就使科苏特垮台，于8月13日在维拉戈斯无条件投降。威尼斯在被封锁6个月和被炮击一个半月后于8月22日投降。这一系列的胜利使施瓦岑贝格得以撕下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奥地利宪法停止生效。

在法国和德国，革命处于停滞阶段。经过一段与政府严重分歧，法国制宪议会被解散。财政和经济危机已成过去，失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企业仍然不振，并一直延续到1852年。对这一切不幸负责的共和党，在5月13日的选举中遭到严重失败：代表保守党人、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的联盟的秩序党，赢得了750个议席中的450席。但是执政党却输给了左派。为了应付总统选举，一些民主分子曾经联合起来组成了“山岳”党，这个党仍然存在，巴罗内阁未能制止它的宣传活动。由于获得了左翼的全部选票，他们在新议会中占了约200席。在巴黎，他们特别成功；由于这一结果的鼓舞，他们的领袖不明智地认为在巴黎再搞一次“劳动日”将会使他们重新掌权，并且轻率地于6月13日企图组织暴力行动。人民没有起而响应；这个党由于很多人被捕而实际上瓦解；勒德律-罗兰、孔西德朗和费利克斯·皮阿前往英国与路易·布朗相会。继之而来的当然是镇压性的法律——停止结社权一年，并确定了新闻出版方面的一些新罪名。不久以后，10月31日，总统组织了一个由他的亲信组成的内阁，从而摆脱了保皇派的束缚；一方面努力保持他在人民和军队中的声望，一方面又迅速地将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参看第17章，原文第444页）。

与此同时，通过《法卢法案》（1850年3月15日）^[9]，大多数人了解到他们纲领中的一个主要点——受教育的自由。这似乎不是一项重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因为教会有效地控制了初等教育，而且在中等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特权。这项法律加上实行普选权，使教士具有头等的政治重要性。由于被山岳党在3月和4月的补缺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所震惊，议会对普选施加了严格的限制：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居住条件，从而把选民的人数减少了300万，即1/3，7月16日的一项新闻出版法，重新征收报纸的保证金和印花税。然而，大多数人尽管在反对共和党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但不同意王朝复辟。1850年8月26日路易·菲利普的去世，给两个王室之间的和解或者说“融合”铺平了道路，但由于尚博尔伯爵拒绝对自由主义作任何让步，因而和解迟迟未能实现。从此以后，不论王权派、奥尔良派、共和派和日益壮大的总统派情况如何，都未形成有效的多数。于是1848年的广泛民主政权变成了一种受监督的自由政权。

在德意志，主动权从人民手中转到了政府手中（参看第19章，原文第498—503页）。在普鲁士，1849年8月的选举给了右派充分的权力，使国王能在当年年底修改宪法，恢复地产的限定继承权，然后，在1850年，把上议院改为贵族院。城市的组织，地方庄园的恢复，以及关于内阁责任制的法律，也标志着回到旧的传统。其他君主仿效巴伐利亚的榜样，使他们的议会休会或延期开会，以便他们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国家的组织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一方面出于野心和信心，一方面出于博得臣民的支持，实际上是试图在政府一级行使挫败人民代表的任务。由于他对“制宪运动”的严厉镇压加强了他的力量，他于5月26日与萨克森和汉诺威签订了一项协议，称为三王同盟。它为其他各邦政府提出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计划，其中包含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些观点，不过由各邦君主和各邦代替了行政部门和下议院。已经在与施瓦岑贝格进行谈判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立即予以拒绝；其他各邦则在8月间予以接受；自由派各政党的领袖在6月间表示支持。

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行动以便从奥地利的困境中取得好处。但是直到10月15日联盟的行政委员会才召集各选帝侯决定于1850年1月31日开会，以便选举一个议会，3月20日起草的宪法将向这个议会提出。这样就给了奥地利时间来准备反击。它同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考虑改革邦联的其他建议；它于1850年2月27日组织了一个“慕尼黑会议”；并试

图破坏普鲁士对其他各邦君主的影响。它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时间来进行自己的内部改组；辩论的时间都被用于安排以一个临时的奥—普委员会来代替帝国临时元首，这个委员会于1849年12月接管了后者的职务。在讨论联盟议会的选举时，首先是萨克森国王（于10月25日），然后是汉诺威国王加以拒绝并退出联盟。议会开会时仅仅有来自普鲁士和26个小卫星国的代表参加，而且即使这样，宪法直到4月底才通过。弗里德里希·威廉不敢将它付诸实践。施瓦岑贝格从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况中得到了好处，进一步采取行动，按照以往的惯例召开了一次邦联全体会议，并组织了一个议会的“有限委员会”，直到议会改组后为止。1850年9月1日，这个问题突然变成实际的紧迫问题之一，当时在黑森—卡塞尔发生了革命，将选侯逐出卡塞尔。法律赋予普鲁士国王以在该邦恢复秩序的任务；另一方面议会委员会发布联邦行政命令，要求巴伐利亚予以执行。内战似乎迫在眉睫。施瓦岑贝格依靠俄国的有力支持和德意志另外四个邦的君主的支持，向普鲁士发出最后通牒，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便注定要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尔米茨遭受奇耻大辱，同意撤出黑森和荷尔斯泰因并解散已经缩小的联盟。奥地利只同意在各邦君主会议上讨论邦联改革问题。这个会议于1850年12月23日至1851年5月15日在德累斯顿举行。由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全体同意恢复旧体制。议会于1851年8月23日复会。德意志各邦政府由于不再担心革命，再也不愿提及国家统一的问题。

到这时，革命的唯一幸存者法兰西共和国也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参见第17章，原文第444—445页）。总统与议会之间自1850年秋季以来潜在的冲突，到1851年1月激化，因为这时总统撤销了由议会中保皇多数派任命的尚加尼埃将军对巴黎部队的指挥权。总统曾巧妙地公开指责议会无能和具有反动倾向。舆论由于害怕再出现无政府状态，同意应保持总统的权力，但是议会在1851年7月19日拒绝修改宪法以便使他连选连任。从这时候起，路易·拿破仑就下定决心，以武力保持他的地位。秋季，他准备好了武器，施巧计建议恢复普选权，以便使议会陷入错误，议会在11月13日拒绝了这个建议。1851年11月2日夜間，总统发布命令解散议会，逮捕其主要领袖，向全国建议举行公民投票授权他修改宪法。从理论上说，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852年12月2日宣布成立帝国时为止。但是实际上，由于这次军事政变和1852年1月14日的宪法，它早已不复存在了。

革命在每个国家和在每个方面都或迟或早地遭受了失败。不过，混乱时间尽管不长，却使1851年的欧洲与1847年的欧洲大不相同。

在那些仅仅出现政治问题的国家，明显得益的是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比利时把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降低到了宪法规定的最低限度，并且进行了行政改革；荷兰由于实行各省自治而加强了宪法的力量；两国都实现了议会制。北欧各王国，改为立宪制。丹麦是根据1849年的宪法，瑞典则是由于1851年国会的改变。瑞士虽仍保持海尔维蒂联邦的名称，但已变成一个联邦国家；对内战的记忆迅速消失，舆论一致抵制外国企业，经济在以国际规模发展，从而加强了国家的独立（参看第9章，原文第223—224页）。瑞士已经找到了在各州的民主自由与扩大中央权力之间的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法，它将成为政治试验的一种实验场所。即使在法国，尽管1851年的军事政变和1852年的宪法标志着从七月王朝的自由议会政权后退了一步，但是，普选权和人民当政的原则代表了永久性的成果。至于英国（参见第13章），宪章运动和爱尔兰骚动的被粉碎，使政治舞台陷于真空；约翰·罗素进行选举改革的努力，在公众中和他自己的党内都遭到了冷遇；这个国家忙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改革。在整个欧洲，政治演变停滞不前；个人自由和议会政府制度似乎令人感到不合时宜；在各个地方，教会和信徒都倒向保守主义。

在那些政治问题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的国家，革命的结果各不相同。

在意大利半岛，人们对在争取解放中第一次协同一致的努力记忆犹新，对“日耳曼”抱有深仇大恨，二者交织在一起，培育了国家统一的幻想。显然，必须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遭到失败的意识形态，但是，新获得的经验又很难汲取，马志尼的思想注定要在一段时间内与复兴意大利的目标相左。政治上的反动获得了胜利：在那不勒斯，它采取一种奇特的残酷形式，依靠的是它自己的人力物力，在各公国和教皇辖区，它得到奥地利驻军的支持；在罗马，法国军队的存在使它稍微有所收敛；而在伦巴第—威尼托，它在军事报复中表现出来。只有在皮埃蒙特，维克多·埃马努埃尔二世维持了“宪法”，自由找到了庇护者。实际上，皮埃蒙特成了爱国者和自由派的避难所；它正开始一个经济现代化的时期；而且，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1850年5月加富尔参加了政府。但这些仍只不过是未来的一些暗示。

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经历了多次起伏之后，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参见第19章）以后才归于消亡。但是统一曾经存在过，人们对统一记忆犹新。同样明显的是，统一可以通过议会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实现。普鲁士军队中的某些人士，由于受到奥尔米茨投降的屈辱，渴望以普鲁士为中心实现统一。所有各邦都已立宪，都已承认普选权。但是主要的新情况是，由于1848年和1850年的宪法——一部由上面自愿颁布的宪法——普鲁士不再是一个专制王国。它在另一方面也树立了榜样：它用一种阶级制度限制普选的作用，并通过实行固定征税原则巧妙地与议会的权力相抗衡。德意志的其余部分都仿效这种制度：1848年12月议会通过废除基本权利，恢复了政府修改立法和设立特别法庭的权利；反动势力发现了一种政治——宗教哲学。

奥地利帝国经历了更大的变化（参看第20章）。由于它对普鲁士的胜利以及它从南部各邦得到的支持，它从外部对德意志的影响似乎已大大增加；在意大利，它在该国的中心也占有坚强的据点。此外，奥地利由于内部实行新的体制而增强了力量。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不仅废除了历史赋予的权利，而且废除了天赋权利。接着，军队也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内阁，大臣只对皇帝一人负责。1851年12月31日，宪法暂停生效。施瓦岑贝格和他的班子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建立了以县（Circles）和乡为基础的统一行政体制，省被分开了，县从属于各部。值得它炫耀的还有一个统一的司法制度，这种制度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实行公开管理。它由于与教会取得密切的谅解而得到加强，这种谅解正式体现在1855年的政教协议中。总之，它是约瑟夫二世曾经梦想过的那种现代国家。不幸的是，创建并且本来能使之长久存在下去的施瓦岑贝格于1852年4月5日去世。

革命在社会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要大得多。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阻碍了社会改革政策，而经济制度的变化还没有达到足以显示其效果和可能随之而来的危险的不平衡状况的程度。在所有方面，任何可能表明或鼓励社会主义的事物均被清除；因此，在法国，特别是工作的权利被取消了。一项公共辅助政策（即提供廉价食宿，创办慈善团体，向工会提供贷款）代替了社会政策。在德意志，法兰克福议会在通过两个劳工宪章之后再也没有下文了。在英国，第一项社会立法《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于1850年通过。但是到处都出现了疑问：在法国和英国展开了对劳动条件的调

查；拿破仑三世特别注意到工人的地位。共产党人提出阶级斗争作为他们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当时还未得到响应。不过革命性立法已在各地使工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各种团体被取缔；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得到法律的支持，将会给新的产业制度提供必要的人力。总之，1848年的革命开始了或者是加速了群众的无产阶级化。

但是，土地问题涉及的人要多得多，革命在这方面的影响更深刻，所起的作为也更有益。各个不同的议会都废除了封建制度，反动势力不敢再恢复它。这影响了半个欧洲，因为俄国仍属例外。在德意志，改革首先在西部进行，然后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几乎是按照各地法律规定的条件给地主以补偿而自动进行的。在普鲁士，容许转让或转移西里西亚土地占有权的法律废除了封建权益。在奥地利帝国（参见原文第530页），任务比较艰巨，因为它还没有像普鲁士那样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对个人的劳役不给予补偿，而对土地收益的补偿则各省的做法不同，不过各地都是开明的。在匈牙利，革命政府把补偿归国家负担，这种做法一直在坚持，在加利西亚，由省预付现金；在王国的其他地方，1849年3月4日的法律规定了估价的原则和支付的方法；强迫劳役按一个工作日的1/3计算，实物支付则根据土地调查的估价来折算——一半由农民支付，一半由省支付。在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特别是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土地问题——把大地产分割为小块农民份地——无疑仍然有待解决。但是至少人身获得了自由。1789年在法国做过的事，1848年在欧洲做了。农奴制和对个人自由的一切限制的废除，使得工人和农民都可以自由流动；移民已经成为解决长期人口过剩和暂时性危机的持久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欧洲人向各地分散的开始，这种分散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如果用这些结果来衡量1848年的革命，它在欧洲演变中所具有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它带来了一个世界的结束。这次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实际运用。可以说，革命的失败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已经用尽了。因此，它是一个结束而不是一个开端，因为以后的事件是一些不同的思想的果实。把它引起的动乱与后来欧洲事态的演变联系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和武断的。我们必须等到1914—1918年的战争才能看到一个按照这次革命所主张的共和国和议会自由的计划以及民族独立的普遍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欧洲，才能看到

它为梦想实现自由人民的兄弟联盟所做的某些尝试。在经过一代人以后，欧洲才由于它传奇般的发展而重新起到指导和示范的作用。

试图对这样复杂的现象进行系统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对这些现象的全面研究已经显示出许多矛盾。纯粹按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来作出解释，固然可以说明革命所追求的理想，说明那些发动革命的人们的动机，以及革命失败的原因。但是这种解释太狭隘了；它把社会的动乱看成是革命极端主义的高涨；它没有考虑到作为各政党的基础，而且有时从政党的种种混乱状态后面显示出来的那个庞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经济原因论用群众运动来说明一切，通过严重的经济萧条以及通常伴随而来的人民苦难来看待革命，它无法解释像英国和比利时那样一些爆发革命的社会原因最为突出的国家为什么根本没有发生革命；它模糊了每次革命的特殊性。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把1848年的革命看作阶级斗争的第一次试验和无产阶级为挣脱资产阶级枷锁而作出的第一次努力，它对于一些非典型的、地方性的事件（如法国的“六月起义”，巴登的农民暴动和1849年的“宪法运动”等）作了过于一般的解释；它忘记了所有地方的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而最主要的是，它在预料未来的状况时，是以存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为出发点的，而这个阶级实际上只存在于英国而不存在于作为革命中心和发源地的巴黎。历史不会以有一些体系而满足，它要求有各种更丰富、更复杂的模式。简单的分析过于简单，不可能真实。为了厘清过去的一切复杂头绪，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的态度和各种形式的分析。

（周叶谦 译）

[1] 参看本卷第19章，原文第496—497页。

[2] 参看本卷第9章，原文第217页。

[3] 参看本卷第9章，原文第223页。

[4] 关于美国对1848—1849年某些制宪者的影响，参看本卷第8章。

[5] 参看本卷第4章，原文第77—78页。

[6] 参看本卷第8章。

[7] 参看本卷第2章。

[8] 即匈牙利，因匈牙利王冠“圣斯蒂芬王冠”而这样称呼。——译者

[\[9\]](#) 参看本卷第4章，原文第80页。

第十六章 地中海

本章不想重述地中海各国的政治史——意大利的统一，法国对阿尔及尔的征服和殖民，希腊这一小国的巩固，埃及的新觉醒以及为保持和改革土耳其帝国的残余部分所作的努力；也不想叙述诸如此类的事态演变所造成的国际危机的外交和军事历史。在本章范围之内，要想探讨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与欧洲其他国家共有的新思想、新习惯的影响，也并非易事。本章的目的是试图说明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共同特点，并着重论述整个地区外部条件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关键是首先出现了轮船，其次是出现了铁路，这两样东西把新的工业时代带进仍保持传统模式的生活之中。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就理所当然地应着重将地中海在内部作为一个交通网、在国际上作为连接亚洲与西方的通道而加以论述。必须注意这些变化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但这不应仅仅作为几个地中海国家的部分历史，或者作为地中海以外的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两国的较量对地中海地区的事态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的部分历史来认识。

“地中海”这个名称在各个时代含义稍有不同，而使用这一名词的人把哪些地区也包括在地中海这一概念之内，差别就更大了。不管地理学家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历史学家都把黑海排除在外；不论是曾被放逐到托米的罗马诗人奥维德，还是征服克里米亚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都绝不会怀疑地中海是遥不可及的。历史学家对于是否像英国海军部编的《地中海指南》那样，把界线定在加利波里，也许仍然犹疑不决；但他们大概会决定把君士坦丁堡算作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并认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通向外界的出口。即便如此，地中海的范围依然是很大的。君士坦丁堡和塞得港距离直布罗陀都有将近2000海里之遥，距离马赛和热那亚也都超过1500海里。的里雅斯特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比马赛和热那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近一些，但距塞得港就近不了多少。（可以比较一下，直布罗陀到伦敦相距约1300海里，格拉斯哥到纽芬兰不到1900海里。）地中海范围虽广，但它又是一个狭窄的海，其进口为狭窄的海峡，腰部也有几处多少有点狭窄。非洲海岸距西西里的一端还不到90海里（中间还有潘特莱里亚岛），

稍偏西距撒丁岛只有110海里，在东边距克里特岛约160海里。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处很窄，只有40海里。直布罗陀海峡长达30多海里，有一处宽度不到8海里；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弯弯曲曲有16海里长，宽度均不超过1海里。这个四周为陆地所包围、部分为陆地阻塞的广阔大海，也是一个很深的咸水海，一个几乎没有潮汐的海，同时又是一个强潮和风暴会突然降临的海域。

在大自然赋予那么多天然水道的地方，古代世界利用奴隶劳动开凿了不止一条人工运河，这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近代世界却等待了一个很长时期才大规模地重新进行这种尝试。机器的出现，只能说明部分原因。现在的苏伊士运河除最后阶段外都是靠埃及的人力挖掘的，很少使用机器。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挖泥机，运河西段就很难清除来自尼罗河的淤泥；而如果没有轮船，也就根本不会形成这样一个工程计划。

地中海不仅是一个海，它也包括全部沿海地带。对于沿海地带的各族人民来说，地中海是他们共有的海洋。这里有独特的气候，相似的自然物产；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历代的生活方式均有可以辨认的相似之处。就自然条件来说，地中海与其说把他们分隔开来，倒不如说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沿海一带，到处均少霜雪，平均日照时间长，生长同样的树木，同样的橄榄、水果和谷物，出产同样的鱼类。在这一时期，几乎到处都流行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疟疾似的热病，到处都惧怕鼠疫，并采取同样的预防办法。这些预防办法的效果是受到怀疑的；在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曾建议召开会议研究检疫条例而未能成功；不久，有人写文章表示反对，说这些条例大都没有必要，因为马赛虽与鼠疫流行的埃及贸易频繁，而且检疫规定未曾严格执行，但近期并没有发生鼠疫。^[1]人们怀疑有些政府利用检疫条例来检查信件或阻挠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船只和旅行者入境，这种怀疑有时是有道理的。例如，对于多瑙河口（主要指苏利纳运河）的检疫站就经常有这种不满；从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到1856年的《巴黎和约》这一时期，该地是由俄国控制的。

当年英国上流社会的子弟在欧洲大陆旅游的时候，由于他们富有，或者充满富于诗意的幻想，也就不大感到地中海这段旅程的不适或者艰苦。但到轮船航行时期，开始形成一个新阶层，即“旅游”阶层。他们对于旅途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很多评论，而且往往把他们的

痛苦和意见记录下来。其中最早、也最宽容的旅行者之一就是萨克雷。他作为一家迅速发展的航运公司的客人，受委托宣传该公司新组织的游览航行。^[2]但有一位棉纺织品制造商在1845年度假时连续乘坐几艘轮船，他在日记中一再抱怨船上太脏，跳蚤多，伙食差，特别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拉扎雷托港口因检疫而被迫停留了两个星期。^[3]然而，旅游的风尚仍然传播开来，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有关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叙述生动，或富于浪漫色彩，或出自功利观点认为那里有利可图，但从中很难选出可靠的、可资比较的事实材料，甚至可靠的印象也找不到。

19世纪初叶，进行了大量的测绘航海图的工作。英国海军少将史密斯在轮船时代到来之前于1810—1824年曾经做过这类工作，此后很久他写了一本地中海沿岸指南性质的书，这是他准备绘制近百张船海图的副产品。^[4]他一开始就引用约翰逊博士致保利的信中的一句话：

“旅行的伟大目标是看一看地中海沿岸一带……我们的全部宗教，几乎全部艺术，使我们高于野蛮人的几乎一切事物”来自这一地区。接下去，他很少谈到地中海的文明，但对于大多数港口却讲了一些情况。与轮船和铁路同时出现的早期的一些旅游指南很有条理，对于事物的外貌叙述很详尽，但一般不谈政治。这些书至少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情况，不仅谈到大城市和名胜古迹，也谈到旅游者这时可能想去访问，或者在旅途中将要经过的各个小港口。约翰·默里的《旅游者手册》和卡尔·贝德克尔的同类书都属于这种早期的旅游书。另外，这时商业统计时代刚刚开始，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这类资料有一个好处，即就各地的情况提出大体相同的问题，也作出多少相同的答案，这样就有可能在统计上作某种程度的比较，尽管这种比较不够精确，而且可能有错误。

下表中列举的一些很粗略的数字，可以大致说明这个时期前半段一些港口的有关活动。这些数字几乎全部取自同一资料来源，它们表明在一年内进出每一港口的船舶的总吨数（即进港加离港船舶的吨数，再除以二）。^[5]1870年各港口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来源于另一份资料。^[6]

1850 年前的 重要性 (顺序排列)	港 口	航运总吨数 (以千吨计)	1870 年前 后的重要性 (顺序排列)
1	君士坦丁堡	?	1
2	马赛	500	2
3	的里雅斯特	490	8
4	里窝那	360	5
5	热那亚	300	3
6	爱奥尼亚岛 (全部港口)	250	
7	直布罗陀	240	
8	巴塞罗那	170	12
9	墨西拿	165	6
10	马耳他	160	
11	亚历山大港	140	4

续表

1850 年前的 重要性 (顺序排列)	港 口	航运总吨数 (以千吨计)	1870 年前 后的重要性 (顺序排列)
12	士麦拿	110	10
13	锡拉	100	
14	尼斯	100	
15	安科纳	55	
16	威尼斯	50	14
17	巴勒莫	45	7
18	阜姆	40	16
19	萨洛尼卡	40	15
20	贝鲁特	40	
21	契维塔韦基亚	35	13
22	克里特（全部港口）	35	
23	比雷埃夫斯	35	11
24	那不勒斯	30	9
25	塞浦路斯（全部港口）	30	
26	帕特雷	30	

与上述数字比较，加的斯是165（千吨），敖德萨是160（千吨）。

至于人口数字，也许比较可靠一些，但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沿海城市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不是以其居民人数的多少来衡量的。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某些人口众多的城市，港口不良，贸易额也较小。但人口数字可以说明政治事件和轮船航线的经济情况在这一时期内对地中海各港口盛衰兴替的影响。下页（原文第420页）表上的人口数字尽可能列出2个或3个年份：本时期初，本时期末，以及某些港口大约十年以后的数字；表上排列的次序大体上以1870年前后的人口多少为序。1850年以前货运量大小的次序（如上表所示）用数字排在每个城市的前面。这些数字一部分来自默里的《旅游者手册》或麦卡洛

克的《商业词典》的前后各版，一部分来自《地中海航海指南》（1873—1882年）。

航运重 要性的 次序	港 口	人口（以千计）		
1	君士坦丁堡（无可靠数字，至少为 50 万）			
24	那不勒斯	（1845） 400	（1868） 450	（1881） 450
2	马赛	（1845） 170	（1870） 300	（1881） 318
11	亚历山大港	（1847） 80	（1872） 212	（1881） 220
17	巴勒莫	（1847） 178	（1862） 187	（1881） 230
8	巴塞罗那	（1845） 140	（1869） 180	（1881） 243
12	士麦拿	（1840） 150	？	（1882） 180
5	热那亚	（1842） 114	（1871） 132	（1881） 168
？	巴伦西亚	？	（1860） 108	（1881） 142
16	威尼斯	？	？	（1880） 130
？	马拉加	（1845） 51？	（1869） 110	（1881） 116
4	里窝那	（1842） 60	（1861） 80	（1881） 100
	土伦	（1845） 28？	（1869） 28？	（1881） 77
3	的里雅斯特	（1840） 57	（1871） 65	（1880） 90
？	卡塔尼亚	（1846） 56	（1862） 64	（1881） 90
9	墨西拿	（1846） 58	（1861） 63	（1881） 70
19	萨洛尼卡	（约 1840） 50？	（1872） 60	（1882） 65
23	雅典（加上比雷埃夫斯）	（1840） 20	（1871） 60	？
14	尼斯	？	（1870） 50	（1881） 50
20	贝鲁特	（1838） 20？	（1838） 45	（1881） 70
15	安科纳	（1843） 35	（1867） 30	（1880） 36
10	马耳他（瓦莱塔港）	？	（1873） 33？	（1878） 61
？	卡塔赫那	（1845） 30	（1869） 33	？
？	阿利坎特	（1845） 25	（1862） 32	（1881） 35
7	直布罗陀	（1840） 24	（1869） 25	？
26	帕特雷	（1840） 24	？	（1880） 26
13	锡拉（埃尔穆波利斯港）	？	（1872） 16	（1881） 20
	布林迪西	（1853） 6	（1871） 14	（1881） 18
18	阜姆	？	（1871） 13	（1880） 20
21	契维塔韦基亚	（1843） 7	（1871） 12	？
	塞得港	—	（1875） 10	
	波拉	？	（1871） 6	（1881） 20

表中所列地中海各港口的有关数字，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经过慎重考虑提供的。我们粗略研究一下这些地中海港口，便可了解本时期初政治和经济情况的背景。我们先从直布罗陀谈起，它是“英国向伊比利亚半岛走私货物的大货栈”，因而也是最早废除保护性关税的一个城市 and 引起多次战争的主要原因（萨克雷的这一论断过分简单化，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然后我们再来看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人口虽多却并不繁荣，但经过修筑铁路与马德里彼此联结起来之后，这些城市就繁荣起来了。马拉加的良港严重淤塞，但到1870年开辟了一条螺旋桨轮船的航线直通美国波士顿。卡塔赫那起初衰落，不为人所重视，末期才发展起来。其次是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在西班牙东海岸仅次于巴塞罗那，其港口自1792年后经修建大为改善。托尔托萨，由埃布罗河的沼泽三角洲可至该城，但航行困难。塔拉戈纳同样无足轻重，但它是一座有城墙的罗马式大城。至于巴塞罗那本身，它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是“加泰罗尼亚的曼彻斯特，而加泰罗尼亚则是西班牙的兰开夏”。接下来就是马略尔卡湾的帕尔马城，以及优良开阔的米诺卡岛的马翁港，英国的海军将领仍对这一良港垂涎不已。其次谈一谈法国海岸，从塞特（即蒙彼利埃港和古老的朗格多克运河的出海口）数起，然后是马赛。马赛这个大城市虽屡遭战争的严重破坏，但由于开办定期班轮以及新近与阿尔及尔通航，恢复得很快，不久便再次成为“法国最优良最繁荣的港口”，也是地中海最优良最繁荣的港口。土伦是海军兵工厂的所在地，但商业微不足道；耶尔锚地水域广阔，整个舰队都可以在此安全停泊。尼斯是一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小港”，1860年以前归意大利所有，这时逐渐成为兴盛的疗养胜地。再往东，第一个完全属于意大利的城市是热那亚，它与都灵和米兰有铁路连接，到1870年又与尼斯有铁路相通，但通向东方的沿海铁路尚未修筑。热那亚有古老的人工港湾，筑有两个巨大的防波堤，早在1870年前很久轮船就日渐在沿岸一带四通八达；它又是皮埃蒙特的一支规模虽小但却精良的海军的基地，这支海军的司令（约在1842年任职）曾在英国海军受训。

由热那亚向东，就是盛传“鼠疫猖獗”和沿海热病流行的地区。有一些人认为，托斯卡纳地区的里窝那之所以迅速发展，是由于它是一个自由港口以及信教自由，往往将它与发展缓慢的罗马港口契维塔韦基亚（其城堡出自米开朗琪罗的设计）相比较。那不勒斯尽管人口麋集，对游客颇具吸引力，但它只是沿海肥沃平原上的一个大城市，

并不是重要的商业港口。海军士兵对于以“小直布罗陀”著称的加埃塔要塞更感兴趣，而商人则更多注意西西里的繁荣港口巴勒莫，尤其是墨西拿。亚得里亚海岸起初只有塔兰托港，这个古老的港湾长期与外地阻隔，但仍然是一个大的渔业中心。巴里，和罗马教皇辖下的安科纳，此时贸易比日趋衰落的威尼斯较活跃，而且允许其数千犹太殖民者完全享有信教自由。布林迪西在1853年还是一个疟疾猖獗的悲惨城市，15年后已成为开赴苏伊士运河的轮船航线的中途港之一，但甚至在1875年，除每年有1.2万名旅客过境外，没有什么商业可言。

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奥地利的各港口似乎更为兴旺。威尼斯虽有长达4000码的高架桥，于1845年以铁路与大陆相连接，但它仍然比不上里雅斯特，后者很快“垄断了亚得里亚海的全部贸易”，上升为地中海各港口中头等重要的港口。由里雅斯特至维也纳的铁路工程艰巨（莱巴赫至维也纳的最后一段工程用了15年时间）。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奥地利劳埃德航运公司充分发挥了作用；该公司至1871年已拥有100艘轮船，不仅与地中海的各港口直接联系，而且与波罗的海和欧洲大西洋沿岸各港口联系起来，以及西印度群岛和美国联系起来。波拉起初是一个受到热病侵袭的半趋荒凉的城市，但很快得到恢复，成为奥地利海军的一处兵工厂，以“亚得里亚海的塞瓦斯托波尔”著称。阜姆在1871年虽仍无铁路与内地相通，但却是“匈牙利王国的巨大海港”。达尔马提亚沿海秀丽的港湾（卢辛皮科洛、扎拉、塞本尼科、斯帕拉托、拉古萨、卡塔罗诸海港）受到很好的保护，但由于缺水和与内地不相通，其发展受到阻碍，只能对当地具有意义。至于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西北沿海的一些小港口，早期的记载讲道，非旦热病流行，而且由此向东是海盗出没的地区，只有英国占领的爱奥尼亚群岛上的几个港口一带比较安全，它们是科孚、克法利尼亚岛上的阿戈斯托利（该群岛上最好的港口）和赞特。

下面讲地中海东部的情况。希腊各港口在1840年前后开始从独立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位于科林斯湾出海口的帕特雷港曾经是葡萄牙的主要出口港，但它从未恢复到过去的繁荣景况，而为新兴的城市比雷埃夫斯所取代（今天许多人仍称它为莱昂港）。起初，比雷埃夫斯只不过是一个“很方便的避风港”，“港口小，除石油外没有什么其他货物出口”，但到1870年轮船定期到港停靠。希德拉和斯培西亚两个小岛（位于阿戈斯的对面）已不再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希德拉的人口在19世纪20年代约计4万人，至1870年下降到

只有1.2万人。但锡拉岛仍享有短期的繁荣，起初是由于希腊起义骚乱期间这里航行比较安全，后来则由于这里是整个爱琴海地区旅客和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在1872年，每星期有10—12艘客轮或货轮到港，这些船只往返于利物浦、马赛或的里雅斯特与士麦拿或君士坦丁堡之间，或在当地的比雷埃夫斯、克里特（坎迪亚）和各小岛间航行。整个这一地区当地的活动频繁，但本地区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则反复由于土耳其的忽视、希腊的起义（1841年、1858年和1866年）和土耳其的报复行为等原因而致发展受到阻碍。米洛（梅洛斯）岛的港湾广阔，在帆船航海时期，“东地中海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要在此停泊”，包括列强的海军舰队在内，但自从使用轮船航行以来，这个港口就逐渐落后于其他港口。至于小亚细亚沿海诸岛屿，罗得岛早已衰落，它的两个港口几乎已阻塞不通；岛上有来自萨摩斯岛和莱斯博斯岛（米蒂利尼）的居民。希俄斯岛自1822年的大屠杀以来人口和农业已经恢复，但商业没有恢复。

至于小亚细亚唯一的大港士麦拿，据说在1840年“它已重新从废墟中崛起，比过去兴旺10倍”；该市15万居民（后增至18万人）中约有半数是土耳其人，约有4万希腊人，1万亚美尼亚人和1.5万犹太人。士麦拿与西欧有悠久的贸易传统，该地处在约5000名欧洲商人以及他们强有力的领事们的保护下。君士坦丁堡本身则是一个更大的国际城市，大约有50万人（还有一大群食腐动物的野狗）麋集在广阔的老城城区并散居在景色宜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一带郊区。早在1840年，旅行者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较新式的海军兵工厂（该厂的总监是一个美国人，工匠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军事学院和军医院、《奥斯曼箴言报》（1831年一）的印刷所以及该城非常古老的但却供水充足的蓄水系统。1870年以前，该城就有许多新发展（其中包括1863年建立的罗伯特学院），是由美国新教传教理事会兴办的，游客也主要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穆斯林，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居多。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也许不如士麦拿那样发达，但所有往来于黑海的船只都经过这个港口，同时多瑙河的航运迅速增长，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出口货物（主要是谷物）都以此地为出海口。此时虽还没有兴修铁路（除了都城以北100英里和120英里处为避免绕行多瑙河三角洲而修的两条由多瑙河至黑海的短程铁路）；但到1870年，至少有11个国家的轮船经常在君士坦丁堡停泊，包括（其中有客轮）三家英国公司和三家法国公司，奥地利的劳埃德公司，不止一家

俄国公司，一家土耳其公司，一家埃及公司，以及希腊的一些小企业。除君士坦丁堡和士麦拿外，土耳其的第三大港就是萨洛尼卡，该城发展迅速，主要掌握在一些富有的犹太家族手中，他们是很多年前从西班牙迁居到这里的。阿德里安堡的人口虽比萨洛尼卡多，但它是一个内地城市，由该城至海口虽有马里查河可通航，但淤塞严重，大船在某些季节才能到达。

从士麦拿再向南，沿小亚细亚南岸，旅行家注意到的地方很少。在叙利亚，开始是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达）这个“污秽而又破烂的登陆地点”，在它沿岸一带只有一个较好的锚地。它作为阿勒颇的港口，只有少量的贸易；定期有一班法国客轮，后来又有一班俄国客轮和一班埃及客轮在此停靠。甚至在1875年，伊斯肯德伦还只有1000人口和两个码头。相形之下，贝鲁特的贸易则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其人口在1868年前的30年增加了两倍。该地的美国的传教团最初建于1823年，此后其他国家的传教团体接踵而至；至1866年美国的传教团本身已发展成为叙利亚新教学院，即今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前身。在1870年以前，法国人修筑了一条通往大马士革的平坦的道路；几年以后，伦敦的一家公司为“叙利亚的这一商业都会”修建了供水设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其他港口更是微不足道；当西风劲吹时，甚至连特里波利、阿克和雅法也没有什么防护设施，防止较大的帆船撞击下风头海岸的危险。

大约到1860年，塞得港才开始出现，10年后人口达1万人，港口全部经营新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业务。运河的另一端是苏伊士港，1863年开始有淡水供应，该港口发展很快。1847年人们描述这个港口说它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镇，但作为以色列人越过红海的渡点……却不无重要性”；然而这时人们已经说它是由陆路前往印度的必经之地。在1869年运河通航之前，亚历山大是陆路旅行的起点；大约在30年间，这条路线一直组织得很好，途经开罗至苏伊士运送旅客和邮件，起初是沿河乘汽轮然后乘车，以后从1854—1858年起改由铁路运输。亚历山大早就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繁荣的国际性港口，在此期间人口由8万左右增至20万人以上，其中1/4是外国人，包括2万希腊人，1.4万意大利人，1万法国人，5000英国人和马耳他人，以及近500名德国人或奥地利人。

现在，围绕地中海一周，只剩下荒凉的北非海岸还没有谈到了。托布鲁克和德尔纳，欧洲的航海家们只不过闻名而已；班加西是一个筑有要塞的小城镇，虽有一个良港但进口狭窄；的黎波里，一位英国海军勘测军官在19世纪20年代曾经由此地出发向内地做过几次短途旅行，以便搜集有关前往廷巴克图的道路以及地图上尚未绘出的尼日尔河的资料；其次是突尼斯，这里有一个良好的锚地，1870年时有居民约2万人；离此不远就是比塞大湾，航海家们早就注意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大海港，天然屏障很好。至于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城镇，自从1830年首次被征服以后，法国控制多年并不稳固，但自1848年以后，逐步稳定下来。阿尔及尔这个城市1870年有居民7万人，与马赛来往密切，后者几乎把整个这块殖民地看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最后是缺乏特色的西属摩洛哥：得土安有1.4万摩尔人，约7000犹太人；丹吉尔的人口大约有得土安的一半；休达的人口与得土安差不多，但其中包括一支3500人的西班牙驻军和2500名左右的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地中海沿海各地是靠大海把彼此密切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胜过它们同它们的内地的联系。马赛人有着与巴塞罗那人，甚至亚历山大人共同的经历，但与巴黎人的经历则不同。他们长期以来几乎是法兰西王国版图内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更关心的是非洲和东地中海，而不是凡尔赛宫。巴塞罗那同样有自己的航海传统，这一传统与马德里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其他大港口，有些港口如热那亚和威尼斯，本来就是独立的城邦，而隶属土耳其的地中海东部各大港口则往往不管什么当地人的政治权力是否超过了地方总督的政治权力，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地中海民族性的问题，传统的竞争以及地中海东部地区宗教的分裂排除了这种概念的存在。但这种竞争往往是航海家和商人的竞争，反映当地的情况和利益的不同，而并非王朝和民族之间的大对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地中海的政治和战争中通常总是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倾向。

尽管如此，王朝之间的角逐很久以来已侵入这种地中海式的政治中，在这个争取民族存在的时代中也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之间的对抗。对于柯尔贝尔来说，尤其是对于拿破仑来说，马赛和土伦都是为实现宏图大略而在商业和海军方面的跳板，而这些宏图大略绝非那些思想囿于一地的人所能设想的。对于马德里来说，巴塞罗那是它与西属那不勒斯联系，以及经里窝那、米兰和阿尔卑斯山隘口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相联系的环节。热那亚和威尼斯（虽然它们作为共和国，没

有从正统思想和1815年的复辟中得到好处）不会轻易忘怀它们曾经是地中海的强国，是大规模争夺东方贸易的角逐者。亚得里亚海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威尼斯湖，它的东海岸要么必须为威尼斯所占有，要么必须把威尼斯的对手们拒之门外；这种想法连同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本身均被哈布斯堡帝国，后来又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继承下来。在地中海东部，威尼斯的声望随着其商业帝国的消失而丧失。拜占庭的传统更加根深蒂固，不仅存在于东正教徒的心中，而且存在于土耳其人自己的傲慢思想中。每当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在爱琴海游弋远至克里特岛的时候，或者扬帆远航出巡叙利亚和埃及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就不免要想起拜占庭当年在海上称霸的岁月。而现在，现实却与这种想法不大相同了。但重振声威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拜占庭的海军也曾经历过失败之后重又获胜的时候。同样，当法国的一支海军舰队于1827年驶入希腊的水域，或稍后又驶达叙利亚海岸时，13世纪的拉丁帝国并没有被敌我双方所完全忘怀；法兰西这个名字，不论根据过去的或当前的原因，仍然能够比它目前业已下降的实力更有理由引起人们的希望和忧虑。

自1823年以来，美国在地中海经常有一支小舰队，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但个别的美国人，尤其是作为慈善家和传教士却颇负盛名，因此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美国宗教”一词一度成为英语“新教”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代称。此外，1848年以后，北美和南美的各共和国成了许多追求生活新起点的人们的圣地麦加。这种兴趣是相互的，马克·吐温在《傻子国外旅行记》（1870年）中就描写了那位庸俗无知的美国旅行者，开始有一点自我批判了。

在地中海范围内，土耳其苏丹在海上以及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称霸的局面，这时已不再受到诺曼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法国人的挑战了；但挑战却是来自他自己的造反的臣民，他们梦想在希腊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在埃及建立一个新的阿拉伯帝国。来自外部的挑战，比较近期的是英国海军的侵入，以及来自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些新的海军军火库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入侵者。希腊、埃及、英国和俄国对土耳其苏丹构成了不同性质的威胁。

1830年的协议使新的希腊在英、法、俄三个保护国的外交保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王国；这既解除了三国本身的忧虑，也解除了土耳其苏丹眼前的忧虑。协议承认一个其前景不可预测的新角色已出现在

舞台上，它代表着未来扩张的希望，也代表着进一步发生变化的希望；但在此后的40年间，希腊人的雄心并没有给国际事务造成多大的麻烦，却对其国内的政治稳定影响较大。1843年希腊实行代议制宪政，20年后巴伐利亚国王奥托让位于丹麦亲王乔治，同时英国也把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但这一切都完全无助于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希腊人。1878年以后的情况和以前一样，他们在克里特岛，在马其顿，以及在小亚细亚的前途往往全部取决于他们同三个保护国的关系，有时还取决于三国之间的关系（参见第9章，原文第214页）。

埃及是第二个不安定的因素，它的命运难以预测，而且不久即使人感到震惊。北非在地中海政治中的重新出现，已不再是“北非海盗”的出没之处，这一变化从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实际上即已开始，他之被赶走以及最后失败都不能改变这一进程。1809—1849年统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无疑是一个野蛮人，但他与同时代的某些欧洲统治者相比至少是同样精明的。阿里不仅是面向地中海，因为他还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各穆斯林圣地，而且对土耳其苏丹的奴隶和黄金也感兴趣。但他的地位从来不是巩固的，因为他仍然不过是土耳其苏丹属下的一名总督。这使他非常关心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开罗的角逐；他希望这种角逐会转而对自己有利。如果说他喜欢法国的而不喜欢英国的军人、工程师和考古学者，但他对英国的海军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尊敬态度，因此他希望能够同时讨好法国和英国。对于希腊事务，在1830年以前他作为土耳其苏丹的同盟者承担了过多的义务而不能自拔，因而当英、法、俄三国准备一致同意共同进行干涉以支持希腊时，他不得不表面上进行一场战斗。但他又小心谨慎地向三国表明：对1827年10月他的舰队以及土耳其的舰队在纳瓦里诺战役中被摧毁，他并不心怀恶意；另外，当土耳其苏丹把克里特岛封给他，作为对他的功绩的奖赏后，他决心重建自己的舰队，向欧洲证明，比起土耳其苏丹本人来，他既是一个更加可靠的盟友，又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在19世纪30年代，很多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旧盟友土耳其苏丹对他们的新朋友穆罕默德·阿里作很大让步，会对他本人有利，同时也会对法国有利。虽然很多利害攸关的英国人（不是所有的英国人）持相反的看法，但这两个国家一致同意阻止沙皇取代土耳其苏丹的地位。

1830年，穆罕默德·阿里不愿被拖进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冒险行动。这次行动使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殖民。这一冒险行动

对于法国来说，虽不如征服埃及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更具有吸引力，但事实最后证明，这对于它在北非建立一个大帝国从而挽回它在欧洲的相对颓势更富有成果。起初，照法国人的想法，东部和西部的计划是密切联系的。^[7]波利尼亚克的第一个计划（1829年9月）接受了法国驻亚历山大领事最近的一项建议，即应诱使穆罕默德·阿里把他的目光从单独冒险侵入叙利亚转而与法国结盟进攻阿尔及尔。这位总督要求的条件太高（要法国无息贷款2000万法郎，并赠送4艘军舰），因此1830年1月波利尼亚克提议完全由法国进攻阿尔及尔，而给穆罕默德·阿里1000万法郎的贷款，只要他愿意出兵2.5万人同时进攻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法国将保有北非沿岸一带的各个战略据点，而这位总督作为法国之王的助手将最终不顾英国的反对而将法国的势力引进亚洲腹地。”^[8]但在2月，这位总督甚至断然拒绝了这项比较有限的计划，部分理由是他同一个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穆斯林的统治者，这将会动摇他在穆斯林世界的威信；另外，因为他不愿面对英国对于这项计划早已表明反对。他对英国驻亚历山大的领事说，土耳其已经完了，英国应准备在亚洲扶植一个国家来帮它与俄国对抗。这个国家除穆罕默德·阿里和他逝世后继位的儿子外，英国还能找到谁呢？同英国友好，他将无事不成，不同英国友好，则将一事无成。^[9]因此，法国单独行动（1830年6月），攻占了阿尔及尔城堡（以及土耳其总督在该地所积聚的珍宝），而此时英国正专注于其他事务，无暇进行干预。这一初步胜利并没有因为一个月后查理十世的垮台而丧失；此后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又继而进行了代价高昂的长期斗争，18年后菲利普本人垮台前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此后，由于原则上决定不把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殖民地看待，而是作为法国本土在非洲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便一直稳定地发展下去，没有受到巴黎政治革命太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马赛的资金和商业企业的哺育，地中海沿岸地区移民的定居，以及法国南部葡萄园的垦殖而逐渐繁荣起来。

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法国来自西方的诱惑之后，仍决心下一步攫取叙利亚，并且相信他在这里至少可以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并使两国都反对俄国。法国实际上仍在继续劝诱阿里，说他是“法国的一个天然盟友，并且像法国一样关心地中海的自由”；^[10]但是法国想要利用阿里来作为它反对英国优势的工具，而阿里的唯一目标则是要利用这些强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它们之间的对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英国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他诱劝帕默斯顿的企

图未能得逞，因为帕默斯顿此刻正热衷于向东方扩张的“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通过叙利亚，越过沙漠到达幼发拉底河，然后再利用汽船沿河而下，直达波斯湾。尽管如此，他在毫无把握得到法国的有力支持或英国是否会默认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就单独侵入叙利亚（1831年11月），一年后又进入小亚细亚，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的座右铭。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在科尼埃取得的胜利（1832年12月21日）打开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致使一个虽然重要但却是地方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对土耳其独立的重大威胁，这种威胁主要不是来自穆罕默德本人，而是来自俄国人，因为俄国人对软弱的土耳其苏丹新近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参见第10章，原文第251—252页）。俄国的舰队和陆军陈兵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显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使穆罕默德停止下来，也许他会为此而感到宽慰；因为在此普遍感到惶惶不安的局势下，他仍能达到这次战役所预期的目标，即他本人得以统治叙利亚、阿克和大马士革；他的儿子、他的军队的司令易卜拉欣得以统治阿达纳。如果他不坚持得到这么多，也许会更加明智。

土耳其苏丹决意报复。帕默斯顿也决意要破坏俄土两国签订的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并把穆罕默德赶出叙利亚，可能的话还要迫使他放弃由国家垄断贸易的制度。看来1833年7月8日签订的这一条约的秘密条款并不像当时所想象的那样惊人，因为俄国政府和土耳其苏丹都同样承担义务，在和平时禁止外国军舰，包括俄国军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不过，根据这个条约，这条原则是否适用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却不能肯定；此外也显然存在着俄国对土耳其“行使保护权”的威胁。^[11]另一方面，俄国人则同样认为1838年8月16日签订的英土巴尔塔—利马尼贸易协定具有不友好的政治含义；如果穆罕默德·阿里不承认该协定适用于埃及（因为这涉及要他放弃对贸易的垄断），英国就会有充分的法律根据代表土耳其苏丹迫使穆罕默德·阿里屈服。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他一直迫切要求承认他的独立，这样埃及就不会受到英土协定的影响。土耳其苏丹失察，在没有任何盟国的情况下，就于1839年春天贸然对在叙利亚的埃及军队发动进攻。只在一个星期内，他的军队就在奈齐卜被击败，舰队也陷于埃及人之手，苏丹本人也在这个不幸的消息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于7月1日去世。^[12]

穆罕默德·阿里却未能享有胜利的果实。因为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单独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五大强国都批准

了它们驻维也纳的大使1839年7月27日采取的行动，即在梅特涅的倡议下警告土耳其政府，未经它们的同意，不得匆忙地向穆罕默德·阿里作出让步。法国这样做是有保留的，它不愿看到穆罕默德·阿里遭受比土耳其苏丹更大的屈辱，因此拒绝强迫他接受帕默斯顿所建议的条件。帕默斯顿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俄国的意图感到放心，他在同他的内阁进行了一场斗争之后，感到即使没有法国也没有把握通过1840年7月15日的伦敦四国协定强行提出一项解决办法；协定规定：第一，必要时强迫穆罕默德接受；第二，重申封锁海峡这一原则。穆罕默德误解了他的法国朋友的好战的态度，因而拒绝了向他提出的上述两项步骤。他直到四国在叙利亚沿岸一带向他炫耀陆海军武力以及1840年10月梯也尔政府戏剧性的垮台以后，才于同年12月向各国屈服。1841年6月底，他才按照提出的条件与土耳其最后达成和解；他获得在埃及世袭的权利，土耳其苏丹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但其他一切必须恢复旧观。

1841年7月，法国回心转意，签订了五国海峡协定，规定土耳其不处于战争状态时，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得让军舰通过。尽管后来加以否认，但协定的本意是：在和平时期，即使土耳其苏丹提出请求，如无所有签字国的同意，军舰亦不得进入两个海峡。这不是一条新原则，但现在它有了正式的国际公约为依据，该公约又于1856年和1871年两度予以重申，而且始终未废弃。

这样，埃及问题的解决，结束了过去20年间由于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境外的野心所引起的惊恐，其代价是英法协约产生了严重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裂缝。法国1860年远征叙利亚，其直接起因是当地发生屠杀事件，而土耳其由于治理无方而未能加以制止。这次远征是在其他大国同意下在意大利危机期间进行的；而由于英国的坚持在一年内即告结束，因为英国怀疑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对近东的野心复萌。由于埃及对苏伊士运河来说具有战略地位，英法关系便再度紧张起来。但这个问题必须单独论述，而且直到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这个问题才发展到顶点。法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影响，虽然就政治上来说往往难以预料，但就感情和文化来说却是强有力的和持续不断的。这种影响在埃及建立在拿破仑留下的印记的基础上，在其他各地则建立在更悠久的传统联系的基础上。整个说来，法国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仍然比英国强大。但与俄国的影响比较起来，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

上面提到的另外两支力量，英国和俄国无法分开论述。正是英国不管发生什么紧急事件都在地中海东部拥有海上优势和俄国势力在这个地区的步步进逼，以及这两个外来强国的互相敌视，构成了1828—1878年这半个世纪地中海政治的鲜明新特色。诚然，在埃及问题得到解决和1841年海峡协定之后，英俄两国间的紧张状态缓和了十多年。但是对于两国的某些人士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正常的插曲，克里米亚战争的降临才足以说明由于作为俄罗斯专制帝国和大不列颠商业帝国之间缓冲国的土耳其的软弱所造成的真实局势是什么。不管俄国对地中海发生兴趣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预兆不祥的新问题，而他们同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吵则似乎是由来已久的，几乎是一家人的争吵。^[13]法国人也是一样，虽然不愿看到英国控制海上，或英国势力在地中海东部超过法国，但它却宁愿承认英国的现实，而不愿看到俄国的将来。其他地中海国家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政府对法国和英国表示十分友好的中立；而加富尔派遣一支皮埃蒙特军队去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其目的不仅在于希望法国和英国将来能对他在意大利的图谋给以支持，而且在于希望意大利将来也有权要求成为地中海的大国；他知道如反对英国这一要求是不能实现的，而俄国对于这一要求则是无能为力的。皮埃蒙特的切萨雷·巴尔博在《意大利的希望》一书（1843年）中的主要论点是：一旦奥地利人从意大利撤退，他们将会发现意大利人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可以帮助他们阻挡和击退斯拉夫人的侵略，特别是在亚得里亚海。卡尔·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反斯拉夫的论调。因此，从某种观点来看，克里米亚战争几乎可说是自由和激进的欧洲（实际上也是天主教的欧洲）反对“北方暴君”和波兰人的压迫者的一次十字军征伐；流亡在外的波兰著名人士，即使是斯拉夫人，也站在反对阵营大声疾呼（参见第9章，原文第234页）。

地中海沿岸各国对俄国和斯拉夫人普遍感到恐惧，而且往往是过分的恐惧，这正是它们所以默认英国为地中海政治中左右一切的势力的一个原因，它们认为这样做利多弊少。第二个迫使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英国海军一旦发挥作用其实力是压倒一切的。如果说，没有英国的同意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这固然是夸大其词；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未经英国同意而发生的任何变化，英国总是可以采取某种反措施而使其不致对英国有害。第三个原因是英国在制造业和使用新机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至少到19世纪中叶止，大多数轮船，不论是悬挂哪

国国旗，不是由英国制造就是在英国的指导下制造的，而且英国的工程师们也往往参与驾驶这些船只。铁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时间稍晚一些。

早在1818—1819年就有少数小型船只在意大利沿海一带使用蒸汽作为辅助动力（西西里—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航线，还有的里雅斯特—威尼斯航线）。英国海军部由法尔默斯至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运送邮件和少量旅客的武装邮船，也于1830年开始使用蒸汽。到1837年，每周有班轮向直布罗陀运送邮件和旅客，每两周再经直布罗陀前往马耳他和科孚。经由马耳他前往亚历山大的班轮是每月一次。在亚历山大有两家互相竞争的英国公司把邮件和旅客运到开罗，然后越过沙漠到苏伊士，再由印度海军的新式武装汽轮每月一次运往孟买。为此，英国于1839年占领亚丁作为加煤站，并感到更有必要把穆罕默德·阿里的势力限制在埃及。1837年，英国至直布罗陀的邮政业务转交伊比利亚半岛轮船航运公司经营，该公司当时已拥有六艘大型轮船（500—900吨）。两年后，与法国政府就东方邮件作出安排，由陆路送到马赛，然后再由英国海军部的班轮由马赛运往马耳他和亚历山大；但威廉·本廷克勋爵代表东印度公司极力要求建立一条完全由英国经营的航线，因此经英皇特许于1840年12月组成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轮船航运公司，条件是两年内建立通往印度的邮政业务，以及从马耳他至科孚的一条支线。

到1842年，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公司兼并了两家同它竞争的公司（东印度轮船航运公司和东方轮船航运公司），取得由苏伊士至锡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一线邮政业务的经营权；这条路线于1844—1845年延伸到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1851—1852年又从新加坡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苏伊士至孟买一线的业务，该公司在1854年以前不得不仍由东印度公司自行经营。1858年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建成后，陆路运输的不便大为减轻。1869年参加苏伊士运河开航典礼的官方客人们在马赛乘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轮船航运公司的班轮前往。到1870年，旅客可以乘火车到布林迪西，然后从这里经由海上去其他各地。1838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贸易协定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后，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了贸易繁荣的局面，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公司也于19世纪40年代开办了通往希腊和土耳其的业务。1844年该公司刊登广告，招揽顾客旅游和疗养，立即得到《英国医学杂志》的赞同。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几家英国轮船公司开始在地中海经营几条定

期航线；但主要的竞争者是一家法国公司，后称法国邮船公司（1852—1870年称帝国邮船公司），还有一家奥地利公司，即奥地利劳埃德公司。

法国邮船公司起初在陆路转运邮件，1851—1852年承运法国由马赛至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的邮件，1854年增加至阿尔及利亚的邮件，1857年开办至黑海和南美洲的邮政业务，1861年又开办了至印度和中国的业务。最初，该公司的大部分船只都在英国建造，但在1870年以前很久就拥有自己的船坞，并已成为地中海最大的航运公司，经常得到官方的支持，又无法国的其他公司与之竞争。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劳埃德轮船航运公司1833年开始时只是一个海运代理机构，1836年开始拥有轮船，并开办了至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条定期航线。该公司“最初创立时的主要信念是：埃及的复兴，希腊的解放……已经引起了一场贸易上的大革命，为它沿昔日航道重返亚洲做了准备”。^[14]虽然这家企业从未达到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公司或法国邮轮公司的规模，但的里雅斯特的复兴多得利于它的发展。热那亚有两家意大利企业，即经营地中海航运业务的萨尔达公司（1830年创立）和著名的鲁巴蒂诺公司（1840年创立）。鲁巴蒂诺公司后来专门从事东方贸易，1857年开办了直达孟买的业务，1869年取得阿萨布作为加煤站（1882年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最后于1881年与弗洛里奥公司的业务合并（后者创于1849年，设在巴勒莫）。业务合并后，公司称为“意大利航运总公司”，后来仍得到大量津贴，并且实际上一度成为意大利的垄断企业。

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还不算十分突出。直布罗陀于1840年成为皇家直辖殖民地（以前只是一个“要塞”）。西班牙海关和税务当局对于直布罗陀的情况虽感到恼火，但在这个时期内他们的不满还没有怎样公开表露出来，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政治事件。马耳他相当繁荣，意大利人正忙于其他紧急事务，而无暇过多地注意马耳他。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主要用来对抗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和法国在开罗的势力；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必须积极地控制通向印度的新航线，付出的代价虽然甚大，会引起政治纠纷，也许要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些航线至少不能让任何一个欧洲的竞争对手发展和控制。

英国的实力在以下一些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39—1840年帕默斯顿与梯也尔为争夺叙利亚进行的斗争（参见原文第256—257页）；1850年和1854—1856年他两次派遣英国海军对希腊采取高压手

段；以及1860年当加富尔利用加里波第的“志愿人员”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时英国表示友好中立所产生的影响（参见第21章）。1856年俄国的失败是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在保守中立的奥地利的支持下取得的；但克里米亚战争的性质，以及和约的条款，都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在导致这一结果中所起的作用。在结束对本时期的叙述时，还要谈到几件事情说明英国的影响：1875年，迪斯累里购买了埃及总督的股票，以和平手段取得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利益；1878年迪斯累里再次显示海上力量，不承认俄国人取得的胜利果实，同时占领塞浦路斯，表明将有可能使用这种力量；最后，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但是，英国只是在它的重大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方才炫耀武力。此外，正如这个本时期开始和结束时一些事件所表明的，英国显示威力也并非总是能够奏效。1830年及其以后，英国从未认真试图阻止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并把它变为殖民地，虽然威灵顿公爵、英国海军部及殖民部都怀疑法国会这样做。1870年俄国乘普法战争之际宣告废除黑海的中立化，而这条规定虽然不合理而且难以执行，但英国却认为是《巴黎和约》（1856年）的一个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为支持希腊自动地而且多少有点恩赐地放弃了半个世纪以来它对爱奥尼亚群岛不稳定的保护（参见原文第242页）。法国企业不顾英国政界的阻挠完成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工程；但在后期的各个阶段中却得到英国商界重要人士的有力支持。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不属于本章的论述范围；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对于大西洋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影响甚至比对地中海各民族的影响还要大。运河对地中海各民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修筑一条直达的公路干线或铁路对沿途村镇的影响一样，它使某些村镇在经济上不受其他村镇的影响而活跃起来，使所有的村镇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它们单纯地方性的重要作用。然而地中海国家对于运河的规划和施工所作的贡献最大，因而预料中的或想象中的运河完成后的重要意义对它们是息息相关的。1830—1870年这一时期地中海历史的这一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值得比较详细地加以注意，即使过分也不为错。最早设想开凿一条运河的人们几乎怀有一种宗教虔诚的信念，认为这条运河将会给地中海地区带来无限的繁荣，因为它将消除英国对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垄断，使它们可与地中海直接贸易往来。这种希望破灭了。这是因为，虽然地中海各港口与印度及远东各国的直接贸易迅速增加，英国的贸易额相对地下降，然而

英国从运河通航起就是这条运河的主要使用者；在1910年，使用运河仅次于英国的不是法国和意大利，而是德国和荷兰。^[15]但在当初，在马赛、在的里雅斯特，还有在德意志，人们正是抱着这一希望才设想开凿运河的。

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在1832—1833年27岁时即出任法国驻亚历山大的副领事，此后又任驻开罗的领事四年；在他任职期间，他曾读过拿破仑的工程师勒佩尔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他与后来成为埃及统治者的赛义德成为朋友。但是勒佩尔的报告中提出由红海至地中海水平面落差33英尺的说法，在1847年以前没有人认为是错误的；德莱塞普斯在1849年他的外交生涯由于他主持法国与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的谈判而告结束之前，也不曾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对于这项工程的热忱是受到其他一些人的影响，特别是米歇尔·谢瓦利埃、昂方坦和圣西门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对他的影响很深。早在1832年，谢瓦利埃就论证说，在一个由工业家和银行家构成的本质上是太平的新世界中，法国的共和政体只会导致战争；而战争只有靠煽起民主狂热和浪费掉新积累的财富才能进行；但是，“等级联合”制度能够避免这种冲突。况且，迫切要求进步的已经不仅仅是各基督教民族。因此，保持和平的计划必须以东方和西方的和解为基础，并且采取使地中海沿岸各国获得新生的方法，因为地中海“将成为东方和西方密切结合的纽带”。从物质方面来说，铁路是全世界联合的最完美的象征，它使目前的大国变成了不过中等的省份而已。未来时代可能发现一种新的动力，比蒸汽机更为简单，也更为省钱；但同时，蒸汽可以通过铁路、能通航的河流和运河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把每个地中海国家的港口与外界的海洋联系起来；从巴塞罗那经埃布罗河至马德里，然后沿塔古斯河顺流而下至里斯本；从马赛溯罗纳河而上至里昂，经卢瓦尔河流域至巴黎，然后沿塞纳河而下可到勒阿弗尔；或者从相反的方向来说，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经莱茵河至法兰克福，然后转多瑙河顺流而下，经贝尔格莱德至黑海或者至希腊的萨洛尼卡；也可以从波罗的海溯维斯杜拉河而上，然后沿俄国的河道顺流而下至黑海，再到阿斯特拉罕和黑海；最后，还可以从德意志南部经铁路至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铁路将是意大利统一的物质标志。亚得里亚海将成为德国的出海口，德国势必将通过亚得里亚海把它自己的产品以及斯堪底纳维亚各国的产品输送到地中海各地。通过另一条路线，铁路可把君士坦丁堡和阿勒颇与幼发拉底河联结起来，从而与巴格达和波斯湾相连接。此

外，由休达至亚历山大可以开辟一条贯通北非沿岸的航线。最后“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凿通苏伊士和巴拿马两个地峡，使欧洲和美洲的两洋航路汇集于古老的亚洲，那时也许我们能想象那幅动人的情景：古老的大陆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谢瓦利埃说，完成这两项工程约需180亿法郎，绝不会超过英国在60年中为发动战争所借的款项，也绝不会超过大国在和平时期为供养陆军和海军在12年中所花的军费。“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计划。……它是我们的‘至高之父^[16]’为我们设计的精神成就的物质表现形式，二者结合起来，总有一天必将使我们的信仰取得胜利。”^[17]

昂方坦这位“至高之父”在监狱中（1832年12月至1833年8月）就曾想到前往埃及传播思想，以促进教育事业，研究修筑尼罗河水坝工程，特别是开凿这条运河的问题。他深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完成这项运河工程。昂方坦带领50人前往埃及，由于穆罕默德·阿里持怀疑态度或者是不愿得罪英国人而毫无进展，他和其中大部分人于1837年返回法国。1839—1840年，法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叙利亚，无暇顾及埃及；但在1844年，谢瓦利埃在《两个世界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重新提出这个问题。1845—1846年，昂方坦当时正担任一家修建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的公司的董事，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并且得到法国工程界和金融界以及奥尔良家族的大力支持；但是他还打算得到一个奥地利—德国集团和一个英国集团的合作。法国集团的领导人包括昂方坦、塔拉博三兄弟（都是铁路工程师）以及里昂商人阿尔勒-迪富尔。奥地利—德国集团的领导人是A. 迪富尔-费隆瑟（他是莱比锡的商人，阿尔勒-迪富尔的堂兄弟）和L. 内格雷利，他是奥地利国家铁路的总工程师（1842—1848年），他对K. L. 冯·布鲁克男爵有一定影响，布鲁克是设在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劳埃德轮船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和董事。^[18]梅特涅和A. 冯·洪堡早就小心谨慎地对该公司和这一运河财团表示兴趣，因此1846年6月，内格雷利向奥地利财政部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英国的舆论已开始认识到在政治上有必要开凿一条运河以保障它在印度的统治，并非单纯害怕在商业上丧失它的垄断地位；“这条运河一旦通航，瓦斯科·达伽马的发现将基本丧失其重要意义，威尼斯及其邻近的亚得里亚海晚近兴起的城市将恢复过去的繁荣，奥属意大利，蒂罗尔、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将首先得到商业上的利益，整个奥地利和各邻国也将很快受益”。内格雷利建议，在运河

两端修建两个水闸，就能够控制预料中的由红海流向地中海的水流，从而清除来自西岸的淤泥。

英国“集团”只有罗伯特·斯蒂芬森和他的朋友H. 斯塔巴克。这个集团始终既不热心，也不积极。19世纪30年代，皇家海军上尉托马斯·瓦格霍恩创办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客货运业务，1841年与一家竞争者合并；但两年后，穆罕默德·阿里把这一线的业务垄断权交给一家埃及运输公司。1841年，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公司的一位创办人和董事阿瑟·安德森在访问埃及之后致书帕默斯顿提出建议说，已经到了考虑开凿一条运河的时候了；而埃及总督的法国工程师利南·贝伊仍然认为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位不同，主张开凿一条由苏伊士至开罗的运河，利用尼罗河到达亚历山大。但是英国的公私企业均反对这一意见。瓦格霍恩公开主张陆路运输，不久斯蒂芬森根据技术上的理由主张沿该线修筑一条铁路，认为这比开运河要省钱得多。帕默斯顿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另一条路线更感兴趣，即通过叙利亚至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因此，他在1840年坚持把埃及人逐出叙利亚，恢复土耳其对叙利亚的统治，从而使叙利亚摆脱了法国的影响。

从此以后，运河的规划已不再仅仅是圣西门学派的规划。1846年11月30日，三个集团签订了一项关于成立“苏伊士运河筹划公司”的协议，总部设在巴黎，每个集团承诺提供一名顾问工程师并认捐5万法郎；协议还规定最后成立一个新公司来执行共同认为可行的工程计划，并商定为这些创办人和三名工程师——保兰·塔拉博、路易·内格雷利和罗伯特·斯蒂芬森——以保留的股票份额。塔拉博被指定勘察苏伊士地峡；1847年他的助手们证明红海和地中海的水位并无差别；但他们更加担心西端的淤泥无法处理，因而同意利南特贝伊的意见，主张只从苏伊士到尼罗河开一条运河。内格雷利的奥地利工程队在研究了西岸的情况之后报告说，挖泥工程极为艰巨，但此处并无其他障碍。这一集团这时比任何其他集团都积极，特别是在的里雅斯特，那里的奥地利劳埃德公司、商会及该城市本身（连同威尼斯的商会）都成了该集团的认捐者。他们希望的里雅斯特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整个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从而在同马赛竞争中胜过马赛——一旦马赛至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铁路完成并且建立了它庞大的海运网之后，马赛的优越地位就将确立；因此，他们怀疑法国集团对运河工程是否真有热情。^[19]他们还迫切希望以这样一些论点来说服英国改变态度，例如，如果欧洲容许修建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直达加利福尼亚的铁路，

并在那里开辟一条到达中国的航线，甚至容许在苏伊士运河完成之前凿通美洲地峡，那么世界贸易的中心就将很快由伦敦转移到纽约，由欧洲转移到美洲；如果美国居于领先地位，英国和欧洲就将毁灭，俄国就将在它们的废墟上，在与中欧和西欧不同的基础上，独自建立起一个新的亚洲强国。[\[20\]](#)

另一方面，英国集团承担的费用份额是由斯蒂芬森单独负担；他对于这项工程早就半信半疑。他被指派的任务是报告苏伊士和红海入口处的情况，这没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利用英国海军部现成的海图而不必花钱组织专门的勘察队进行勘察，但他仍然对这项计划泼冷水，并且建议另行修建一条铁路。另外两个集团抱怨说，如果他认为修铁路和开运河是互不相容的，他就应该早告诉他们，并退出这个公司；但是，他们认为修铁路只能证明开运河也是必要的。[\[21\]](#)由于1848年革命和穆罕默德·阿里患病并逝世，计划暂停，在此期间，修铁路的计划得到进展。早在1847年帕默斯顿就迫使埃及总督接受修铁路的计划，并得到土耳其苏丹给予支持的许诺。1849年3月，约翰·皮里爵士带领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几位董事来到埃及，建议提供贷款，利用英国的工程师为埃及政府修筑一条铁路。穆罕默德·阿里一向反对不能由他完全控制的任何计划，因此他利用英国要修铁路和法国要开运河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从中渔利；他说他既不愿修铁路，也不愿开运河，而愿先修筑尼罗河的水坝；但在1849年他去世后，新任总督阿巴斯帕夏却接受了英国的新论点，即修铁路不同于开运河，它是一项国内工程，不需要苏丹的批准（他知道英国能够阻止苏丹同意开运河）；因此他在1831年7月同斯蒂芬森签订了修筑亚历山大至开罗第一段铁路的合同。这段铁路于1854年完成；另一家英国公司于1865年获得了修筑开罗至苏伊士第二段铁路的合同，这段铁路于1858年通车。

与此同时，德莱塞普斯于1852年试图争取阿巴斯同意开凿运河的计划，但未获成功。1854年9月阿巴斯逝世，他又亲自进行了戏剧性的干预，事情才出现了对他有利的决定性转机。他匆忙赶到埃及，同年11月，他的老朋友新任总督赛义德先是口头上同意继而以正式文件许可组织一个国际公司，为期99年，公司的一位董事由埃及政府任命（即由德莱塞普斯担任），公司每年的纯利润的15%归埃及政府所有。其余的利润中，10%归公司的各创始人，75%归公司的各股票持有人，

其中埃及政府认购股票的数量不受限制。至于公司的国际性，规定一切国家的船只都应缴纳同等的通行税，但没有提到筹划公司。德国集团先是感到高兴，很快就产生了警觉，不久即怀疑德莱塞普斯是否具有诚意。^[22]这不亚于是致命的打击，它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整个方案仍有待于苏丹的批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结成同盟的法国政府，此刻对于是否批准这一方案举棋不定。经过一段预兆不祥的拖延之后，英国政府于1855年夏致函巴黎表示反对，德莱塞普斯在伦敦更是公开遭到帕默斯顿和克拉伦登的拒绝。但是，他终于在1856年1月宣布：第一，他领导的国际委员会已向埃及总督提出报告，一致赞成开凿一条直达运河，这在技术和资金方面都可以办到；第二，总督已向他作出了经过修改的，对他的公司有利的更加具体的让步。其中有一条规定（这一条于1865年放宽）：大多数劳工应为埃及人；此外还确定了货运和客运的最高通行税额，规定99年后如重订，则修改各条款使其对埃及更加有利，并确定了该公司的组织章程，其法人代表和行政管理的总部均设在巴黎。

在埃及，所有赞成开凿运河的人都是法国人或坚决的亲法派；这时它似乎更像是法国的一项事业了；这个事实引起了英国的坚决反对。德莱塞普斯未得到巴黎和会的支持；他在伦敦虽然找到了有势力的支持者，但帕默斯顿在下院表示坚决反对（1857年7月7日）。1858年1月英国通知苏丹说，如果他同意开凿运河，英国对土耳其的保证就将失效。同年6月，下院进行辩论，结果绝大多数议员赞成政府的立场（290票对62票）。然而，德莱塞普斯于同年10月发起认购股票，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在法国，20万股迅即被认购，在土耳其和埃及大约有10万股被认购。1859年4月，实际上他已在后来的塞得港开始动工；他对土耳其苏丹连续两次向埃及总督提出的反对照会都置之不理。1859年10月26日，他终于得到法国皇帝的公开支持。在此以前，拿破仑三世虽然接见了昂方坦表示鼓励（1855年4月10日）^[23]，并使人毫不怀疑他个人对此事感兴趣，但他的政府却从未表明态度。现在他放弃了表面上的中立。尽管土耳其施展阴谋诡计，英国也提出备忘录重申“英王陛下政府坚定不移地反对计划中的苏伊士运河”，德莱塞普斯仍能使埃及总督按照他的意见办事，这位总督于1860年5月接受了尚未被认购的股票（113642股）。由于是向法国银行借的高利贷，这些股票很快就下跌，濒于破产。1863年1月赛义德去世后，强迫劳工来源短缺和工程费用日增所造成的困难日趋严重。但新任总督易斯马仪继续

支持德莱塞普斯，使他得到鼓励，不理睬土耳其重新提出的威胁。英国也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到底了。由于公司的董事们一再提出请求（1864年1月6日和1865年2月4日），拿破仑三世首先同意对公司与埃及总督间的财务纠纷进行仲裁，此后又同意对土耳其苏丹施加影响。最后，1866年3月19日，土耳其苏丹终于表示同意。同年8月，德莱塞普斯向一次股东会议宣布了他的胜利。在这之前几个月，帕默斯顿已经逝世。

运河工程开始于1859年4月，起初进展缓慢。1862年年初，引自尼罗河的淡水干渠到达提姆萨湖，同年年底地中海的海水流入该湖。此后两年工程很少进展；但从1865年起，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由于放弃使用强迫劳工而必须使用机器），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障碍逐渐消失，运河工程得到了新生。运河全长90英里，其中1/3是通过湖泊，1869年8月红海和地中海的海水汇合于苦湖。同年11月17日运河通航，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出席了运河船队的通航典礼。这是拿破仑三世的最后光荣时刻。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主要是法国人，虽然长期未能获利，但最后终于发了大财。运河的费用，1842年利南最初估计不到400万法郎，运河完工之日耗资竟达4亿法郎，因此公司的前景最初是十分暗淡的，当时法国的威望下降，有人曾在1871年和1874年建议，该公司应将整个企业卖给欧洲各国，由它们实行国际共管；但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埃及总督这时已经独立；他因经济陷于崩溃而被迫于1875年把他的股份出售，法国的股东们未能很快答应拿出这笔钱来，英国首相迪斯累里遂乘机买下埃及的股票，当时许多英国人认为这是很大的冒险。从商业利益来看，这种担心证明是不对的；但从政治上和战略上来说，这条运河对英国却几乎是利害参半。购买了这批股票使英国对运河的管理有了发言权，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发言权，英国只有占领埃及才能感到安全。

本章的主题是日益扩大的经济所引起的物质发展及其直接影响。这里没有谈到为实现统一而进行斗争的意大利，没有谈到具有世界意义的罗马问题，没有谈到西班牙的内战，希腊早期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从君士坦丁堡直到摩洛哥整个这一地区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虽然多半还只是表面的，但不久即将出现惊人和明显的突变。这些新的运动和势力并非都是由于物质上的变化而形成的；除纯粹经济上的原因之外，美国和法国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拿破仑战争的动乱所引起的不安定的心理状态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但那

些传播变革精神，特别是在伊斯兰教国家传播变革精神的人，其中有很多怀有商业上、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打算。新时期交通运输的便捷，对所有这些人都起了促进作用，而这些人则是受到物质进步是无止境的这种信念的鼓舞。至于这一地区在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和一般思想，并不具有什么地中海的特色。

（杨静予 译）

[1] J. 麦格雷戈：《商业统计》，第1卷（伦敦，1844年），第1256页及以下各页。

[2] W. M. 萨克雷：《搭乘伊比利亚半岛与东方公司轮船……由康希尔至大开罗旅行记》（伦敦，1846年）。

[3] 罗伯特·海伍德（波尔登市长）：《1845年地中海东部旅行记》（私人印刷，剑桥，1919年）。

[4] 海军少将W. H. 史密斯：《地中海：自然、历史和航海回忆录》（伦敦，1854年）。该书主要谈30年以前的情况。后由英国海军部根据本部材料及其他调查材料编著的《地中海指南》更为精确（第1版，伦敦，3卷本，1873—1882年）。

[5] 麦格雷戈：《商业统计》，第1和第2卷（1844年），第5卷（1850年）。当地沿海航运的吨数是否包括在内不很明确。君士坦丁堡的总吨数找不到可靠数字，即使不占第一位，也必定属于前三位。马赛和的里雅斯特的数字引自另外的资料来源。

[6] J. R. 麦卡洛克：《商业词典》（伦敦，1834年第2版；1871年修订版）。麦卡洛克的资料与麦格雷戈的资料不能完全相互比较，前者没有提供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数字。也可参考G. R. 波特：《国家的进步》（3卷本，伦敦，1836—1843年；1847年第2版；1851年第3版）。全部数字都曾参考英国的《报告和文件》，该书附有详细索引。

[7] G. 杜安：《穆罕默德·阿里与远征阿尔及尔》（开罗，1930年）。

[8] 波利尼亚克：《历史研究》，第227页（查理十世倒台后著）；G. 杜安：《穆罕默德·阿里与远征阿尔及尔》（开罗，1930年），第58页。

[9] 领事巴克1830年3月8日致阿伯丁信，转引自G. 杜安：《穆罕默德·阿里与远征阿尔及尔》（开罗，1930年），第91页。

[10] 塞巴斯蒂亚尼1832年7月20日给法国驻业历山大领事米莫的指示。转引自G. 杜安《布瓦斯莱孔泰男爵的使命：1833年的埃及和叙利亚》（开罗，1927年），第1页。

[11] P. E. 莫斯利：《俄国外交与1838和1839年东方问题的出现》（哈佛，1934年），第2章及附录A。

[12] 关于1839—1841年近东危机的详细叙述，参见本卷第10章，原文第254—258页。

[13]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参见本卷第18章。

[14] F. V. 劳莫尔：《意大利与意大利人》（伦敦，1840年），第1卷，第56页。参见后面第437页。另见《意大利百科全书》“的里雅斯特”条；以及A. 塔马罗《的里雅斯特史》（两卷本，罗马，1924年），第2卷，第37章。

[15] C. W. 霍尔伯格：《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和外交上的重要性》（纽约，1931年）。下列数字摘自该书附录一。

船只通过数		净吨数 (以千计)	平均吨数	乘客数 (以千计)	英国在总吨数中 所占比例 (%)
1870 年	486	436	低于 1000	27	71
1880 年	2026	4344	高于 2000	101	约 80
1900 年	3441	9738	将近 3000	282	约 70
1910 年	4538	16585	高于 3500	234	
1930 年	5761	31700	高于 5500	326	约 56

[16] 圣西门运动开始时带有宗教色彩，昂方坦和巴扎尔二人被奉为“至高之父”。——译者

[17] M. 谢瓦利埃：《工业政策和地中海体系》（巴黎，1832年），根据在圣西门学派报纸《世界报》上发表的论文重印，该报于1832年4月停刊。本书所概述的论点摘自第111—150页（1832年1—2月）。另见P. 拉雅德·德皮雅隆《圣西门学派对苏伊士地峡和铁路的影响》（巴黎，1926年）。

[18] 关于奥—德集团的活动，参见格奥尔吉博士和A. 迪富尔-费隆瑟（本书中提到的A. 迪富尔-费隆瑟的孙子）合著：《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莱比锡，1913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信集，其中谈到一个很少为人所知但很有意义的插曲。内格雷利的备忘录，第21—26页。内格雷利死于1858年，关于此人，参见维茨巴赫《传记集》。布鲁克在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两年后，于1855年任财政部长。他在君士坦丁堡曾会见德莱塞普斯。如果说奥—德集团的作用往往被低估的话，那么某些德国著作家却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作用。

[19] 《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迪富尔-费隆瑟致内格雷利信，5. ii. 48（第107—108页），17. x. 50（第128—129页）。

[20] 《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迪富尔-费隆瑟致斯塔布克信，16. vii. 50（第127—128页）；致内格雷利信，14. v. 52（第141—142页）。

[21] 《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昂方坦致迪富尔-费隆瑟的信，7. ix. 51；杜维利埃致迪富尔-费隆瑟的信（引用布鲁克语），21. xii. 51（第138—141页）。

[\[22\]](#) 《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阿尔勒-迪富尔致内格雷利信，20.Xii.54（第154—155页）；迪富尔-费隆瑟致昂方坦，19.ii.55（第178—179页），和致内格雷利的信，5.iii.55（第171—173页）。

[\[23\]](#) 《苏伊士运河历史文献》，昂方坦致内格雷利信，16.iv.55（第174—176页）。

第十七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远不只是共和派希望的破灭，而且意味着革命爆发以前在建立自由政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大都付之东流了。因为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后出现了法国从查理十世被推翻以来从未有过的更为独裁的统治。由于这一新的专制统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维护各有产阶级和教会，因此它从一开始就仿佛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一种政治上的和社会中的保守主义东山再起。然而第二帝国不仅仅是一种倒退，后来就连反动派也与共和派一样地咒骂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那个可爱的冒险家。他声称他的政权的宏伟目标是要使以“进步”作为口号的一派和把“秩序”奉为座右铭的一派的两派人物言归于好。时间的流逝表明他所说的倒是真心话，但这却使两派都大为恼火。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因为在他整个在位期间，两派始终不和，进行残酷的斗争，一直到第二帝国最后垮台。然而所作的努力也不是完全徒劳的。第二帝国持续的时间并不比1789年以来法国的任何一个政权短，而且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经济有着显著的发展。此外，不管皇帝原先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法国还是逐渐恢复了代议制政府；而且在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这种代议制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

在1848年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任何一个敏锐的观察家都有理由认为这一新的共和事业长不了；但是，要是有人预言说共和事业的完结就是路易·拿破仑的上台，那也未免过于大胆。1848年春天，也就是他成为法国的主宰前约4年的时候，这个觊觎皇位的波拿巴派人物几乎还只是一个蛰居故里的无名之辈。他的党羽寥寥无几，不过是他的一小撮亲信而已。路易·拿破仑的父亲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并被拿破仑一世封为荷兰国王；他的母亲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皇后的女儿。^[1]路易·拿破仑出生于1808年，正是他伯父昙花一现的赫赫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但是这位侄子对拿破仑的鼎盛时期并无多少记忆，因为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他还不到八岁。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早已分居，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她一直住在瑞士和巴伐利亚。路易·拿破仑就是在那里长大成人的。1831年他参加了教

皇国的起义运动，虽然他在其中没有干出什么大事，但这却表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热衷于政治上的越轨行动，也预示着他将牵连进意大利的民族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的哥哥死于热病。此后不久，1832年赖希施塔特公爵去世时，他已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他伯父政治上的遗产要由他继承了。从此以后，他把恢复帝国并由他自己登上帝位作为他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不懈怠，也从不灰心。他满怀信心以为只要他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法兰西就会伸出双手欢迎他，于是他在1836年鲁莽地进行了夺取权力的初次尝试；他越过边界进入斯特拉斯堡，试图组织一次拥戴他上台的叛乱。但是这次冒险行动惨遭失败，他自己也被俘虏，并被重新流放。此后他定居英国，在那里的上流社会中颇为引人注目。1840年他卷土重来，渡过海峡在布洛涅登陆。但是他的事业又告失败。这一次他被监禁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阿姆城堡。1846年他越狱逃跑，再次避难到英国，在那里一直住到本国1848年革命爆发。[\[2\]](#)

不久即可看出，这次革命造成的形势对他的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早先历次夺取政权的尝试使他懂得了，波拿巴这个名字所唤起的对以往盛世回忆的魔力，并不强大到足以使他能够把路易·菲利普赶下王位。但是第二共和国时期实行普选权，却能使他的姓名的魔力吸引被社会主义威胁吓破了胆的中产阶级和自耕农，并且使他在1848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甚至连在“六月起义”中遭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镇压而对之感到厌恶的工人们，也被波拿巴主义的纲领所吸引。尽管这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好处，但他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证路易·拿破仑实现他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他的个人统治。首先，在竞选总统时他已宣称他接受共和政体，而他的当选并不赋予他恢复帝制的权力。其次，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四年，而且不得连选连任。最后，他不得不与1849年5月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分享权力。在这个议会中，不管是居于少数的共和派，还是构成多数的结成松散联盟的保守派，都对他存有戒心，和他抗争。这些保守派根本无法争取使之转向共和。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裂痕有可能弥合，保守派的大多数本来是会支持拥有一个代表有产阶级的议会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既然不能弥合这一裂痕，他们就宁愿共和政体维持下去，只要立法权仍旧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因此十分明显，路易·拿破仑要么劝导保守派修改宪法以便使他可以延长总统的任期，要么就铤而走险发动政变。他从来没有排除后一个办法。不过，现在既然他要达到的目标已近在咫尺，因此他对于求助于暴力手段的做法反而显得异乎寻常地犹豫起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为了赢得保守派的信任与合作费尽心机，而且一度似乎得逞。他同意派遣一支军队远征罗马（1849年4月）以先下手为强的办法挫败奥地利，以便维护教皇的世俗权力，这就使他赢得了天主教徒们的好感。他对为教会参与初等和中等教育铺平道路的《法卢法案》[\[3\]](#)（1850年3月15日）的态度，也同样使他获得了天主教徒的欢心。他对剥夺了一大部分城市居民选举权的1850年5月31日选举法采取默认的态度，这又证明他愿意帮助保守派保持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的优势。1850年的夏天，形势一旦明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无望就任何一派的候选人登上君主宝座立即达成协议，于是两派中的一些领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路易·拿破仑继续担任总统，因为这样立法议会就会继续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可是，其他的人则仍然怀疑这样做是否明智。他们认为路易·拿破仑迟早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建立个人的统治，与议会分庭抗礼。尚加尼埃将军曾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总统凌驾于立法议会之上的任何行动；1851年1月3日，路易·拿破仑便解除了他的巴黎卫戍司令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这一事件使这些人的怀疑有增无减。因此，当修改宪法的问题于1851年7月9日在立法议会中付诸表决时，保守派支持共和派的人很多，足以使提案不能获得必需的3/4的多数票。

此后，路易·拿破仑除了策动政变外别无其他选择。1851年10月，他任命圣阿尔诺将军为陆军部长，任命莫帕为警察局长。圣阿尔诺已经答应在路易·拿破仑决心孤注一掷的大胆赌博中与他共同承担风险，而莫帕也甘愿充当帮凶。与此同时，为了重新挑起共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不和，以便阻止他们组成一个反对他的共同阵线，这位总统便提出废除（他原先已经批准的）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恢复普选权。正如他所预期的，居于多数的保守派投票否决了他的这一提案。这样就使他可能在打击立法议会的时机到来时，以一个人民权利的维护者的面貌出现。

几经推迟，最后定于1851年12月1日至2日的那个晚上发动政变。在圣阿尔诺、莫帕和已接任内政部长这一关键性职务的莫尔尼的指挥

下，政变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根据总统的命令，逮捕了立法议会各党派的领袖，解散了议会，宣布实施总统的个人统治。12月3日和4日两天中，巴黎共和派掌握的地区中曾发生了一些武装抵抗，但起义很快就遭到军队严厉的镇压。在外省的一些地方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小骚乱，但都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然而，这些骚乱足以说明，由于总统和议会都要在1852年重新选举，因此人们对于1852年将会发生混乱普遍感到担心，这就给这次政变提供了理由。

于是总统便立即组织了他的独裁新政府。1851年12月14日，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表示赞同政变，并授权路易·拿破仑颁布一部新宪法。在这次公民投票中，赞成票有700多万张，反对票却不到100万张。1852年1月14日公布了新宪法，保留了共和国的名称，但却确认了总统拥有不容置辩的主宰一切的权力。与此同时，又开始了一次在政治上进行镇压的运动。这次镇压运动比1793—1794年的“恐怖时期”以来的任何一次都更有步骤，范围也更广泛。根据1852年1月20日的一项行政命令，建立了所谓“混合委员会”的特别法庭，来对付那些被认为是危及公共秩序的人。这些由各省的主要军政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得到授权，可以自己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通常的司法程序；而且有权作出从拘押到流放的各种判决，或将报告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甚至处决。结果，大约共有2.6万人受审。其中约有1万人获释或者在警方继续监视下开释，还有1万人则被送往阿尔及利亚。

政变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法国一直处于共和国与帝国之间的过渡状态之中。在此期间，这位君主总统紧紧地控制着政府，为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最后步骤准备舆论，并使外交界确信他的统治不会给欧洲的和平带来任何威胁。最后他判断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852年11月21日举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批准恢复波拿巴王朝的世袭统治。这一次也有700万票赞成，反对票却只有25万张左右。于是路易·拿破仑便于1852年12月2日称帝，称为拿破仑三世。他自称为拿破仑三世是因为拿破仑一世曾于1814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后来称为赖希施塔特公爵）。因此，在联军扶植路易十八上台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以前的短暂时期中，这个尚在幼儿时代的波拿巴王子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位，但却曾是法国的合法君主，称为“拿破仑二世”。但是拿破仑三世明确承认，随着路易十八的即位，波拿巴王朝的统治在法律上也就中断，一直到1852年他自己称帝时才得以恢复。拿破仑三世认识到，他作为一

个新的世袭君主政体的首脑，必须结束独身生活，于是他就开始选择皇后。1853年1月30日，他娶了欧仁妮·德蒙蒂茹。她是一位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站在法国方面进行战斗的西班牙贵族的女儿。她从童年时代起就无限景仰关于拿破仑的传说。后来证明，选择这位皇后来为这个突然发迹的皇帝掌管匆匆拼凑起来的豪华宫廷生活，是十分恰当的。不仅如此，她立即摆脱了其他的义务，生了一个儿子，称为皇太子，使皇位的正常接替后继有人了。

尽管帝制最后终于恢复，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并非出人意料，但新政权上台伊始却很难看出它对法国国民生活的各个基本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路易·拿破仑当总统时曾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理人，但他搞政变却置保守派领袖们的意见于不顾，而他恢复帝制则不但与共和派的愿望相左，而且也与奥尔良派及正统派的愿望相悖。至于如果有人要问他搞的这新的一套有什么意义，最明确的答案就是：这意味着波拿巴主义的东山再起。然而却没有人能够对这一点的确切含义作一说明，因为作为第二帝国的思想渊源的帝国本身也不是什么周密成熟的思想产物。路易·拿破仑在他上台以前，曾写过许多文章，阐述他所代表的那个传统的思想。其中著名的是1839年第一次发表的《拿破仑思想》和1844年发表的《论消灭贫困》。前者阐述了人所熟悉的这样一种思想，即波拿巴主义就是权威与自由的协调；它还阐述了这样一种比较费解的理论，即波拿巴主义就是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外交。但是，这种论点措辞含糊，很难从中看出作者为解决摆在他面前的各项具体问题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路线。后一篇文章并不像它的标题那样吸引人。文章提出了一项计划，在政府主持下让城市贫民在已获准不再耕作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下来。这篇文章证明作者对穷人的处境是关心的，但同时也证明他又不愿引起富人的惊慌。

事实上，路易·拿破仑从来就未遇到过非要他拍板决定他将如何解决法国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自他成年以后，除了在阿姆城堡被监禁6年以外，生活的大部分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因此，他没有什么机会掌握法国事态进程的第一手知识。而且，由于法国人从来没有大批地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也就从来无须负起制定一个政党的纲领或指导一个大规模舆论运动的责任。他所需要的倒是不择手段地去拉拢朋友，而又尽量不要疏远那些可能支持他的人们。于是，这种环境势力

促使他自己那种喜欢梦想宏伟蓝图而不愿制订确切计划的秉性更为突出。

甚至在他当选为总统以后，他仍旧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领袖。他赢得了保守派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因为他充当了保守派所需要的抵销共和派力量的砝码。但总的说来，保守派只把他当作一时可资利用的人物，事后就把他撇在一边。担任总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身边集合了一批人马。这批人在他1848年突然发迹以前还不是他的亲信，现在则开始把他们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鲁埃、巴罗克、比约尔和富尔德等，他们以后在第二帝国的政府中都身居要职。尽管这批人有时被叫作“爱丽舍党”，但这个由一批钻营高官厚禄的人们组成的松散帮伙，并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派；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的纲领。而且在一般公众中也没有一批拥护者。因此，这批人参加皇帝手下的班底，既不能决定也不能表明皇帝将采取的路线。

即便是与皇帝更接近的那个核心集团也不能起这一作用，因为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物在观点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无从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欧仁妮皇后本人很快就对她丈夫的决策起着很大的影响，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影响。她利用自己的地位怂恿丈夫实行坚决的专制主义，并且要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完全听命于教会的意旨。然而，她的影响却被人称激进派的佩尔西尼和与奥尔良派有联系的莫尔尼公爵的影响抵销了。早在流放生活的艰难岁月里，佩尔西尼就已经是路易·拿破仑的亲密朋友和狂热的信徒，所以他在皇帝面前的发言权之大是谁也比不上的。而奥尔唐斯皇后的非婚生子莫尔尼则由于参与策划1851年政变而赢得了他同母异父哥哥的信任。皇帝对于给他出谋划策的人总是言听计从，然而这伙人却是利欲熏心，一味追求高官厚禄无所顾忌，以至皇帝所采取的方针路线也常常飘忽不定，左右摇摆。因此，一些观察家断言路易·拿破仑除了保住他的权位以外，从来就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他对如何保住自己的权位也没有什么比较确切的主张，只不过是随机应变，临时应付而已。不止一位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持有这种看法，都把拿破仑三世说成是一个毫无秘密可言的诡秘人物。

不过，除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以外，从他的统治中还是可能找出其他一些东西来的，或者说，至少可以从他的机会主义中找出贯穿

其中的逻辑。因为皇帝证明他自信有能力实现他自己宣布的使命，即让秩序和进步调和起来。在他执政初期所采取的措施使他很有希望实现他的目标。他认为法国最需要的莫过于一个安定的政治秩序，而正统派也好，奥尔良派也好，共和派也好，一派又一派都已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一需要。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凌驾于这些派别之上的君主统治了。这个君主将表达全国沉默无言的人民大众的愿望，而民众求之不得的福音是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不是某个党派的胜利。拿破仑三世不可能以武力来铲除由来已久的标榜为共和主义、奥尔良主义和正统主义的各种思想运动。他如果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党派来与其他已存在的各党派竞争以捍卫自己的事业，那是既不实际也不明智的。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政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对每一个党派都作出足够的让步以挫败其反对的锋芒，却又不致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俘虏。这类策略无疑是一种机会主义，但这种机会主义却既符合法国的利益，又符合皇帝的利益。

但是，光有个人独裁统治以及巧妙地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玩弄平衡的手段是不够的。他的政权还必须争取教会的赞同，否则任何政权都不可能赢得广大农村人口和城镇有产阶级的支持。此外，还必须使全国的经济有所发展。经济发展了，就能使资产阶级的进取心立即得到发展的机会，也使改善城镇大众的状况有可能。从这种观点来看，为教会利益服务和致力于物质进步的事业之间并无矛盾，维护有产阶级与关心穷人之间也并无矛盾。

以上这些似乎就是这位皇帝开始执政时脑子里考虑的逻辑，而且直到1859年以前他推行的政策都使人看来他还是有一套始终如一的纲领的。在这一时期，他维持了他大权独揽的个人统治，建立了政府与教会之间密切而又和谐的关系，并对实业界的进取精神给予有力的援助和鼓励。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法国看来是接受他的统治的，反对者极少。可是从1859年以后，帝国在国内国外都遇到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帝国政权采取了新的方针。皇帝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给予议会以更大的权力，直到最后他的政权与其说是独裁政权，倒不如说是自由政权了，他的政策表明他更为殷切地要安抚左派而不是讨好右派。因此，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说，他刚上台时奉行的政策代表着一种审慎的纲领的话，那么，他在后来

的那些年月里执行的政策，人们就必然会认为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开始的时候，皇帝对他的个人统治丝毫不加掩饰或根本不打算加以掩饰。他只把权力授予那些对他一直唯命是从的属下，或授予那些处于他的决定性影响之下的政府部门。他对发表政治意见限制很严，因此任何反对派都不能越过他规定的界限。为了控制舆论，他一方面与历届政权一样依靠大权集中的政府机构，定期从各省省长和总检察长那儿得到关于全国公众情绪状况的报告。另一方面，他依靠第二共和国时期通过的管理政治社团和新闻出版的立法。在这方面，1848年7月28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一切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必须向公众公开并在一名政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政治社团之间不得结成联盟。根据1848年8月9日至11日制定、1849年和1850年又两次重新提出并最后由1852年2月17日的一项法令确定下来的各项新闻出版法律，事先未经政府批准不得出版报纸。这就是说，报纸出版商和编辑人员的思想见解都必须是政府可以接受的；办报人必须要缴纳一笔高达五万法郎的保证金。在政府内部，确保拿破仑的个人统治的权力归属问题，是根据1852年1月14日的宪法规定，在宣布恢复帝制的时候，这部宪法只需稍加修正即可。

这部宪法规定皇帝为政府执行部门的绝对主宰，而且在立法过程中也享有很大一部分权力。作为君主，他全权负责对外关系，包括进行战争和签订条约的权力在内；同时还是陆海军的最高统帅。他自行任命或撤销各部大臣。各部大臣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向他负责。因此，内阁属于一个由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性质，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可以用集体的意志对付皇帝的意志的政府机构。政府要通过预算和通过不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都必须经过立法会议的同意。立法会议的成员由普选产生，任期6年。但是，立法会议却没有立法的动议权，也无权制订预算，而且没有行政法院的批准也不得修改预算或其他法案。行政法院是由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唯有它才有权起草各项立法。所以经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只能接受或拒绝由皇帝任命的人员所提出的措施。实际上，立法会议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咨询机构，而不是制定政府根本政策的机关。因为立法会议只起那么一点点有限的作用，原来设想通常每年只开一次会议，会期三个月，而且立法会议的成员也没有任何酬劳。但是实际上立法会议开会常常超过三个月，

于是最后还是给立法会议的成员发了津贴，称为“补偿金”。根据宪法还设立了参议院。参议院共有150个席位，除元帅、将军和红衣主教是参议院的当然成员外，还有其他成员，由皇帝任命为终身职。然而，起初参议院并不是与立法会议平行的上院。它在立法中的职权仅限于登记那些无须提交经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而又具有宪法条款性质的皇帝诏书，并且审查立法会议通过的各项法律，以保证这些法律与宪法一致。

然而，即使在实行个人统治的时期，帝国也不像人们根据其组成而有理由想象的那样大搞压制之风。因为拿破仑三世统治中的铁杆保皇派从来就为数不多，只是他的那些密友和曾经帮助他实现政变的那批干将。因此，皇帝不可能把那些仍旧向往另一种政权的人们统统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他不打算阻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公认的领袖们在报刊上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只要这些领袖们宣誓效忠，他也不试图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选举中，尽管政府和过去历届政府一样，也利用其影响使某一个候选人压倒其他候选人而当选，但政府往往不得不在一批候选人中作出抉择，而这批候选人中却没有一个可以看作政府政策可靠的支持者。共和反对派获准享有的活动余地要比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小得多。不过即使是共和派人，只要他们申明他们承认事实上的帝国，也允许他们参加选举，争取担任公职。

从一开始，皇帝就表明希望得到教会的赞同。他把法国在1849年派去帮助教皇的卫戍部队仍然留驻在罗马。他还准许教会可以根据1850年的《法卢法案》（另见第4章、第5章，原文第80页和107页）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扩大教会的作用。教会对于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允许修士会迅速发展尤为感激，而修士会的成员就可为扩大中、小学教育提供所需要的教员。使教会尤为感激的还有他的政府鼓励地方当局利用《法卢法案》的条款，在公立学校中录用修士会的成员担任教职。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对政治秩序的补充。在这些措施中，最突出的是获得信贷比较容易了。原先在临时政府主持下于1848年创办的贴现银行，已证明它在满足商业往来中短期贴现的需求方面是很有效的。现在又向贴现银行重新颁发了特许状，业务范围也扩大了。但是，仍然迫切需要有一种经营银行业的机构，以便向新办的生产性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政

府于1852年给两家新机构颁发了特许状，一家是动产信贷银行，另一家是地产信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在佩雷尔兄弟经营下进行了一系列颇有魄力的工作，给铁路、航运公司、煤气照明公司、采矿公司等许多类似的企业提供资金。地产信贷银行用其资金经营土地价值的抵押业务，把它的大部分财力用于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房地产投资，从而促进了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重建。这是当时的一项亟须进行的工作。不过，地产信贷银行在人们期待它要起的另一作用方面，即在为改进农业生产而提供长期贷款方面，却是令人失望的。

对铁路建设也大力加以推动。许多铁路支线的修筑在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铁路干线的建筑工程，由于资金不足，以及政府在制定全国范围铁路建设计划与方针中未能迅速地担负起领导责任的缘故，因而迟迟未能完成。计划中的由首都通向南部和西南部的铁路线的建筑工程进展迟缓，因此法国当时投入营运的铁路线仅有3000公里，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普鲁士。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迅速采取果断的行动，把无数家小公司合并成为6家大企业，每一家大企业负责建筑并经营一个地区的铁路网。此外，根据1859年的弗朗克维尔议定书，政府与这些大铁路公司签订合同，以取代过去协议的混乱情况，从而使这些大公司的资金万无一失。合同保证这些大公司在经营那些运量少、无利可图的特定的铁路支线时，它们的投资能获得规定的收益。到1870年，全国营运的铁路线已超过1.7万公里。政府也对海上运输予以注意。对法国邮船公司（参见原文第532页）给予补贴，以协助发展对地中海各港口的船运。对经营横渡北大西洋的海运的大西洋轮船公司也给予了补贴。

作为这种刺激经济努力发展的一个部分，拿破仑三世还毅然降低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业不受外国的竞争。作出这种决定，既有经济上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位皇帝希望与英国保持融洽的关系，而且他知道他的这个行动会赢得英国主张自由贸易人士的欢迎。不过，他也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谢瓦利埃的影响）全面降低关税对法国的经济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既可使法国进口的工业原料的价格降低，又可鼓励法国的制造商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比较现代化的生产方法。谢瓦利埃经拿破仑三世的批准，与理查德·科布登进行了商谈，起草了一项通商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于1860年经批准后开始生效。这个包括法国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条约的条款为

此后法兰西第二帝国与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关税同盟、瑞典、瑞士、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缔结的类似条约奠定了基础（参见原文第38页）。

由于拿破仑三世这样开始把他许下的使物质上的进步与政治上的保守政权协调起来的这一含混不清的诺言变为现实，帝国便开始得到了公众比较广泛和积极的支持。到1859年，那些长期以来使法国四分五裂的问题，看来实际上不是不可能逐渐消失的，法国人也许最终会重新发现如何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政变后的10年中，共和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共和派的大多数领袖早在共和制取消以前就被流放了。随着新政权的开始，绝大多数尚未被流放的共和派领袖们也被迫逃亡或保持沉默。在奥尔良派中，原先的所有领袖人物都不支持帝国。基佐、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实际上都已退隐，虽然后来梯也尔又重新出马充当了保守反对派的领袖。但是，另外一些奥尔良派的领袖如鲁埃、巴罗克和比约尔等，在皇帝邀请他们出来任职为他服务时，就不甘仍然处于默默无闻的地步了。至于奥尔良派的主要支柱，即各省大批的资产阶级，在拿破仑三世有能力保住其皇位并维持政局这一点一旦明朗化后，就不愿把他们对奥尔良家族的效忠当作迷信的偶像了。正统派表示和解则比较缓慢。尚博尔伯爵曾作出明确的指令，他的那一派的任何人不得在拿破仑三世手下任职。即使没有这个禁令，极右的人们也是不愿意向波拿巴分子妥协的。然而，也不是所有倾向于尚博尔伯爵、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人，都把复辟波旁王朝的统治当作他们政治上唯一的迫切需要。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教会事业的关心甚于对皇位问题的关心。拿破仑三世对教会的愿望是如此百依百顺，那么他们之中也就很少有人能够一直成为这位君主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了。

两派社会改革运动的门徒们的反应看来也是很重要的。这两派与第二帝国建立前的那三个政治党派中的任何一派都不一样。圣西门派是这两个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一个。尽管圣西门派组织在1832年就解散了，这一组织中的一些派系却仍旧忠于曾经鼓舞着这个运动的思想，其中有些人把拿破仑三世看成是和他们同一派系的人物，因为拿破仑三世结束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无谓纷争，并且开始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则是当今时代伟大的任务。这些人物中著名的有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兄弟。他们在组织和经营动产信贷银行方面，

在把各家铁路公司合并为6个大的地区铁路网方面，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米歇尔·谢瓦利埃既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又热情鼓吹搞公共工程和铁路建设。

新政权也使弗雷德里克·勒普拉的信徒们感到满意，其原因与帝国似乎实现了圣西门梦想这一原因迥然不同。这位秉性温和的采矿工程师提出的“社会安定”理论，并不重视财富的增加乃是增进人类幸福的手段。在他看来，产业主义对人类的幸福是一种威胁而不是福音。唯一能够收到效果的社会改革是那些能够维护并加强家庭的改革，因为只有家庭才能既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人们对获得别人的感情和尊重的渴望。皇帝很快就认识到，最大限度地使政治上向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化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以此作为社会信条，对实现他的目标可能是有用的，于是他十分爽快地支持勒普拉。勒普拉最后被任命为参议员。尽管勒普拉从来就没有赢得过大批的追随者，但是却有相当大的一批天主教保守派对他是信服的。他对帝国的支持在道义上与圣西门派对帝国的赞同有同等的意义。

但是，预示着皇帝的蓝图将最终实现的征兆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化为乌有。他很不走运，竟然参与了意大利的解放战争。^[4]这就标志着他执政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法国在宗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剧了，而且他曾竭力设法弥合的社会和政治的分裂重又出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这10年光阴的飞逝，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在各种誓不两立的手相互争斗的旋涡之中，帝国没有能力提出解决法国问题的新办法，只能做到保持一种很不稳定的平衡而已。

最能说明帝国这种困境的莫过于那些涉及教会的问题。拿破仑三世心里十分清楚：他对教会百依百顺的方针会引起左派中把教会看作反动堡垒的那部分人更加强烈的反对。但是他又期望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对他的方针的支持会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反对。这两派或者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因为教会似乎是维护保守的社会秩序的堡垒，都会赞同他的这一方针的。但是很不幸，他执政的时期正是教皇庇护九世在位时期。教会在他的领导下对自由主义无论是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里，都采取了丝毫不妥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果拿破仑三世要继续推行他的既定路线，那么他就不得不支持教皇反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世俗统治，而且还不得不默认《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对当今时代精神的大肆抨击，

并听从将在1870年梵蒂冈公会议提出的极端的教皇极权主义（参见第4章，原文第93—99页）。如果他这样做，他不仅会失去反教权的共和派的支持，而且也会失去那样一些保守派的支持，这些保守派虽然与左派的反教权主义毫不相干，但却仍然忠于各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传统。然而，如果他改弦易辙，他将遭受教皇极权派与他作对的痛苦。因此，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得推行一种两面讨好的政策，尽量不去得罪教皇极权派及其反对派，同时也不去迎合两派中的任何一派。

拿破仑三世除了无力制止宗教争端重新抬头以外，另外又遇到了一股反对力量。这股反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他在放宽信贷和建成全国铁路网中所采取的措施受到欢迎。但是，由1860年《英法条约》开始的降低关税的政策却引起了实业界，尤其是冶金和纺织工业界的广泛而强烈的抗议。冶金和纺织工业在此以前一直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和比利时的竞争。法国红酒在国外销售量的增加也没有达到预期的那样大，而据认为销售量的增加可以抵销外国竞争所造成的某些不利影响。对降低关税的政策，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而这就明显地说明，尽管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正确地认为外国的竞争能促使法国改进制造业的加工方法，但是实业界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却丝毫也不想去接受这种挑战。

当工业家们不满至极，发出愤懑的呼声的时候，城市工人阶级也开始重新出现骚动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居民中雅各宾主义流行病的复发。政府一放松政变后所采取的政治镇压措施，这一流行病就又开始重新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皇帝努力鼓励工业发展的同一过程造成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工业革命的进展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的膨胀，而商业状况的改善又导致价格比工资上升得更快。工会运动为了对这一经济压力作出反应，便不顾法律对劳动者不得为增加工资而结社的禁令，开始壮大起来。至于工人阶级提出的各项社会目标所以比雅各宾共和主义提出的更为广泛，主要是由于受到蒲鲁东或路易·布朗的互助学说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阐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他们的新学说在法国几乎还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然而，刚刚建立不久的第一国际1865年成立了法

国支部，这预示着无产阶级的崛起进入了一个更加势不可当的新阶段。

随着时间的进展，对中产阶级中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的共和主义又重新抬头。一些曾在1848年崭露头角成为这种共和主义的代言人的人物，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都没有重返政治舞台。其中大多数或者如勒德律-罗兰那样仍在流放之中，或者如拉马丁那样过着隐居生活。但是，不久就涌现出了献身于同一种思想的新的一代领袖人物。1857年的选举中，选入立法会议的共和派屈指可数的5人中，埃米尔·奥利维埃和朱尔·法弗尔两人尽管承认事实上的帝国，后来却成为共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不久，反政府的共和派里还有朱尔·西蒙、莱昂·甘必大、朱尔·费里、亨利·德·罗什福尔等人。

皇帝为了对付这种种压力，转而倒向左派。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事实是1859年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其中大多数是共和派。其后又颁布了1860年11月24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皇帝授权立法会议和参议院，可以对他在每届立法会议和参议院年会开幕时发表的演说投票表态，并授予这两个机构以发表它们的辩论逐字记录的权利。1867年1月19日颁布的法令又授权立法会议和参议院，可对各位大臣提出质询；此后，一年一度的皇帝演说中断了。根据1867年3月14日的一项法令，参议院可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使之暂停执行，并恢复它原先就具有的为维护宪法而对立法进行审议的权力。这样，参议院就变成了一个类似贵族院的上院。1868年，又放宽了管制新闻出版和公众集会的法律。上述种种改革措施大大地提高了议会的威信，并且允许皇帝的知交和部下的小圈子以外的政治领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即便是批评政府也在所不禁。然而，皇帝仍旧完全掌握着行政权（因为各大臣仍旧只对皇帝负责），而且也保持着足以左右立法的势力，因此他的政府提出的任何法案，他都有把握会获得通过。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说明皇帝向左转的新动向。1864年曾向工人阶级作了意义重大的让步，给予劳动者以罢工的权利，虽然仍然规定如罢工者企图阻挠别人上工的话，将予以惩罚。与此同时，由于天主教的宣传家们和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在1859年以后斥责皇帝以牺牲教皇的世俗统治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政府就显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心于让教会扩大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了，而在1863年任命维克托·

迪律伊为教育大臣以后，教会在教育方面扩大作用的情况也就停止了。

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足以安抚反对帝国的左翼，因此也不能抵销来自右翼的天主教会的批评。1863年和1869年的两次选举中，重新选入立法会议的共和派人数连连增加，而在1863年中重新积极投入政治生活的梯也尔则着手组建了一个保守的反对派，称作“第三党”。它虽然不同于共和派，但在坚决反对政府政策方面却是一致的。皇帝对此作出的反应，还是对左派作出新的让步。1870年1月，他罗致了立法会议中已经名噪一时的激进的反对派领袖埃米尔·奥利维埃为他服务，让他担任几乎相当于首相的职务。根据1870年5月8日付诸公民投票的新宪法的规定，给予立法会议和参议院以提出立法议案的权利，还有修改政府提出的法案的权利，也有权制订自己的议程和通过对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评论的决议。

在这次公民投票中，投赞成票的人数与1852年的那次相比所差无几。不过，对宪法的这一最后的修正究竟有什么意义还看不清楚。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一个以代议制政府而不是以个人专断的政府为基础的新政权——“自由帝国”——的开始。然而皇帝仍然握有若干重大的特权。仍然由他任命大臣，而大臣则仍然向他负责；他仍然是陆海军的统帅。而且，只有皇帝才能提议修改宪法，修改宪法要经过公民投票，而无须议会批准。所以，拿破仑三世并没有完全承担义务遵循议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原则，他也没有无可挽回地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如果他要冒险再发动一次1851年确立了他的独裁统治的那样政变，他仍然拥有足够的力量来重新确立他的个人统治。但是重新回到个人专制独裁的可能性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因为1870年的皇帝毕竟已经不是1851年的那个冒险家了。健康状况不佳已使他元气大伤，他甚至对保住个人统治兴趣也似乎渐渐淡薄了。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要为他儿子保住帝国，而不是为他自己。不管怎样，帝国以后将如何演变的问题，当时肯定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新宪法颁布以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帝国就在外国入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但是，拿破仑三世为解决政治领域中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对立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不是使他的统治在法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的东西。他执政的这个时期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长足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除了由于其他的情况外，也是由于政府的行

动。在19世纪法国经济现代化的缓慢进程中，第二帝国这一阶段，尽管既非法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也非法国工业革命最后的顶峰，却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陆上和海上运输的迅速发展是与采矿业和冶金业的繁荣有关联的。煤炭生产翻了一番还多。铁的冶炼从使用木炭这一比较古老的方式转变为使用焦炭的新技术。在19世纪60年代，贝塞麦炼钢法和西门子炼钢法都传到了法国。当时法国的钢铁总产量已大量增加，仅次于英国而高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在棉纺织工业中广泛地采用了机器生产；在毛纺织业中采用的程度则稍差，尽管在棉、毛纺织业中老一套的手工生产方法并没有绝迹。从制造业中蒸汽机的总马力数则可大致衡量出工业进步总的水平，从1850—1870年，总马力数增加了500%左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国投资的增加，在第二帝国期间，对外投资总额从20亿法郎左右增加到约120亿法郎。这些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外国的政府债券，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向西班牙、意大利及奥匈帝国的铁路系统的建设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参见原文第440页）提供资金。

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相比，农业的进展就慢得多了。在整个19世纪，法国农业的变化实际上是很缓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1789年革命中所实行的改革，这些改革加强了受传统束缚的小农的地位。但是，铁路的修筑使人们有可能把产品运到距离比较遥远的市场中去，从而促进了大土地的经营。这种大土地经营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而不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

要确定造成这一时期经济高涨的原因是困难的。在当时，经济高涨并不是法国所特有的现象。因为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在其他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出现全面经济增长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繁荣景象可能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黄金的影响所造成的。黄金的发现当然对全世界都产生了膨胀性的效果。这一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又是关税下降趋势的结果。特别是1860年《英法条约》以后，关税的降低使国际贸易往来有可能更加自由化了。另一个促成繁荣的因素是铁路的修建。铁路是对新技术进步的应用，因为修筑铁路不但造成了对钢铁的需求的大规模增加，也大量需要一支流动性的劳动大军，而且同时也扩大了农产品和制成品的有效市场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无疑也是有限责任公

司的广泛普及和新的信贷机构发展的结果。法国1867年通过的立法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法国的新的信贷机构中，除了动产信贷银行和地产信托银行以外，较著名的还有里昂信贷银行（1863年）和法国兴业银行（1864年）。要估价帝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比评价上述这些其他因素的重要意义还要困难得多。政府显然不是促成经济繁荣的唯一因素，但无疑地它对企业界给予鼓励，并且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随着企业的繁荣，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诚然，这是一个早就开始了的过程，但只是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地主贵族阶级才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这种衰落，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状况使商人掌握了获得财富和威信的新来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因素。贵族阶级的遗老占多数的正统派，他们基本上抵制了政治生活和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期，正统派就已奉行大体上相同的方针，并且已经开始尝到了他们这种自我封锁的恶果，但是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们的这离群索居的状态又延长到了第三个10年甚至第四个10年。成员中包括许多乡绅和企业家的奥尔良派没有采取这样不妥协的态度，他们中不少人还身居显位要职。不过，第二帝国时突出的人物显然还是企业界的巨头和证券经纪人。他们的财富来自新的工业企业而不是来自地产。这种人很容易进入皇帝周围的那群人的小圈子。皇帝对他们也恩赐有加。

工业化的过程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并不那么明显。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在社会上的影响扩大了。然而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工人阶级仍然以手工业工人为主。巴黎是法国这一时期人口超过100万的唯一城市，只是在以后它的人口才达到了200万。巴黎的劳动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仍旧是受雇于小作坊、生产奢侈品的熟练工匠，再加上一大批打短工的非熟练劳工以及家庭仆役。仅次于巴黎的三个最大城市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的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100万。新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出现在纺织和冶金两个行业，而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则是在较小的省城，例如里尔和鲁贝。这类城市的人口在5万至15万之间。农村人口的变化比城市的变化更小，因为农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只占很小的份额，而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又不太快，没有造成农村人口的显著减少。不过，自革命以来，第二帝国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关心农民。而且，从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了取悦于农村选民的做法，而取悦于农村选民的做法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

在思想领域里，却并不像经济企业界那样显得具有新的活力。教会的维护者们和与之相抗衡的科学倡导者们之间的辩论继续进行着，除了变得更为极端地教条主义以外，辩论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一方面，维伊奥仍旧是其观点集中体现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的那些天主教徒的代言人（参见第4章，原文第90—94页）。另一方面，奥古斯特·孔德和利特雷则成为那些相信科学才是人类自救的新道路的人们的先知。1857年孔德去世以后，利特雷成了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阐述者。但是，法国在扩大科学知识疆域的工作中，并未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诚然，这一时期有克洛德·贝尔纳和路易·巴斯德等人进行的科学研究（参见第3章，原文第50，65—66页）。但是如果把科学进步看成有赖于大批学者的集体努力的话，那么德国的各大学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参见原文第50—51，114页），而查尔斯·达尔文则肯定给英国带来了创造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杰作的荣誉。

然而，如果说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的巴黎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游乐场，是不会有人表示异议的。在这以前很久，欧洲就已经认识到了这座“光明之城”独特的迷人之处，但是在19世纪初，它的风采有所逊色。波旁王朝的复辟给巴黎带来了一种严肃的气氛，把纯洁的虔诚和变本加厉的保守主义混在一起，路易十八执政时尤其是如此。这不会给人们带来欢乐。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气氛轻松了些，但人们尊敬的是孜孜不倦地赚钱，而不是挥金如土地花钱。拿破仑三世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榜样。早在他到处漂泊的青年时代，他就热衷于寻欢作乐，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直到他临死前，仍然保持着一个浪荡公子的某些习性。不仅如此，他还挥金如土，讲究宫廷中的繁文缛节，宴乐无度，鼓励社会上的浮华作风，以此作为一种政策。他力图把宫廷变为上流社会的中心。在他统治时期，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主要街道加宽了，道路照明、卫生设施等公用事业也大有改进。这一工作是在塞纳河地区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个倡议却是皇帝提出的。他的倡议一部分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林荫大道加宽以后要在这些街道上设置路障就困难了，从而可以防止发生类似推翻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普的那种人民起义。当然也有意要

美化这个城市，要在巴黎增建各种设施，使之与城市日益扩大的规模相适应。这次巴黎的重建在建筑学上留下的两座丰碑是为巴黎中心市场建造的有天棚遮顶的建筑和新的歌剧院。歌剧院是在1883年动工，直到1875年才建成（参见原文第142页）。以后在欧美两洲的许多城市中，都模仿这两个建筑物。

麋集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是由一批新贵组成的，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突出。这种情况之所以形成，一是因为原有的贵族愿退出社交界去过隐居的生活；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成为暴发户；三是由于一位白手起家的皇帝无意歧视其他新发迹起来的人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之为“半上流社会”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突出作用。这个阶层里都是被人认为不十分体面的女人，但还不是声名狼藉；其中有的是名妓，后来变得相当富裕起来，并且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大的青睐。有的出身不错，却离开了她们的丈夫，或者是因为她们被发现过于公开地违反了她们的婚约誓言，或者是因为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好名声来换取一种独立的生活。身居高位的男人与这类女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半上流社会”是那个更有排他性的社会名流小圈子的一种附属品，这却是前所没有的事情；而经常出入于这个“半上流社会”的主要是企业界的巨子而不是贵族，这也是破天荒头一次。在使第二帝国的巴黎获得花花世界这一名声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正是这个“半上流社会”。法国首都将保持这个恶名一直进入20世纪。

然而，拿破仑在外交方面的作为其结果却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意义。在他关于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朦胧意识中，恢复法国在外交上的突出地位与解决法国国内积怨甚深的派别纷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达此目的，他的办法之一就是努力重建法国在海外的统治。1803年拿破仑一世放弃路易斯安那以后，法国在海外的统治已经几乎化为乌有。在极大程度上，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大陆以外地方的事业都是成功的，只有对墨西哥的干涉是明显的例外。后来使第三共和国颇为得意并为之津津乐道的那个庞大的殖民王国，大部分就是在拿破仑三世的倡导下开始搞起来的。法国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扩大了它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参见第16章，原文第427—430页），在塞内加尔和索马里兰建立了基地，开始了对印度支那的渗

透，还参与了打开中国的门户（参见第26章，原文第692—696，700—709页）。

然而，海外领地再一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声威的普遍标准是以后的事情，而且拿破仑三世本人也并不把海外领地看作显示他外交才能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他的成就的尺度就是打破曾经战胜了拿破仑一世的那个联盟，并使在维也纳会议上谈判达成的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行不通。他真诚地信奉他叔父在圣赫勒拿岛上所作的预言：“第一个对欧洲各国人民有号召力的统治者，将能够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任何事情。”决定未来的力量是民族，而且必须使这股力量为法兰西的利益服务，以便在道义上恢复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当然，滑铁卢大战的战胜国的联盟在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前很久就开始瓦解了。英国已表明它不愿在讨伐西班牙自由主义的远征中再支持它的四国联盟中的伙伴了；而且随着比利时的独立，这个置于荷兰管辖之下的阻挡法国向莱茵河扩张的堡垒已经崩溃（参见第10章）。然而，作为对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所作的反应，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再一次联合起来。而第二共和国在这三国的合流面前束手无策，这当然就使法国看到自己在决定欧洲的政治组合的关键性问题上是多么软弱无力。尽管法国人在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上的意见很不一致，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再一次教训欧洲，使它对法国的愿望和意志表现出适当的顺从。

拿破仑三世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他的政权获得外交上的承认。只要得到了外交上的承认，那么这种承认本身就将是一个公开的迹象，说明法国已不再处于1815年使法国受到屈辱的那四个大国的保护之下了，因为四国联盟条约中有一条规定签字国有如下义务：永远不许任何一个波拿巴分子再在法国执政。尽管从那以后，四个盟国之间产生了各种分歧，但是它们是否会赞同伙伴中蔑视联盟条约的如此大胆的行动，却仍然是个问题。的确，继梅特涅之后而成为反动势力的第一号代表人物的尼古拉一世，倾向于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而且如果英国愿意合作的话，尼古拉一世也许会劝使普鲁士和奥地利仿效他的做法。然而，希望与巴黎保持良好关系的英国，为了确保在挫败俄国对近东的侵略意图方面得到法国的帮助，毫不迟疑地承认了这个新帝国。接着，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也相继承认了。

尽管外交承认看来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一旦英国宣布了它的立场，这一危机的结局就表明英法协约的格局。这一协约很快就显示了它很大的重要性。帝国正式宣告建立以后不到两年，法国和英国作为盟国参加了一场战争，与尼古拉一世的军队作战以保卫奥斯曼帝国。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错综复杂的争端将在下一章里论述（参见原文第468—478页）。这里只说明一点就足够了，这就是，尽管法国与英国同样有理由反对俄国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来进一步扩大其势力，但除了所牵涉的特定的问题以外，法国在战争中还另有自己的利益。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从维也纳会议开始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一时代中，孤立法国曾经是欧洲外交结构安排的基本原则之一。曾经是四国联盟成员的两个大国现在第一次彼此公开地打起仗来，而法国却成了这两大国中一国的伙伴。而且，法国还不仅仅是它盟国手中的一个百依百顺的工具。拿破仑三世不仅在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中赢得了他的一份威信，而且成功地在战争的和平解决办法中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因为，尽管奥地利反对，尽管英国十分勉强，却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坚持，终于还是要求土耳其苏丹同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自治，导致了这两个多瑙河省份能在1859年联合起来，组成了被称为罗马尼亚公国的国家。

但是，拿破仑三世在取得了使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主宰者之一这一相当大的成功之后，接着就采取了另一个冒险行动——他与撒丁结盟向奥地利开战（参见第21章，原文第571—572页）。事实将证明这是他铸成的一系列大错和遇到的一系列灾祸中的第一件。这些大错和灾祸最后终于导致了他自己的毁灭，也给法国带来了新的灾难。诚然，他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像这件事后来的结局给人的印象那样毫无远见。他要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从而向另一个在1814—1815年打败了法国的胜利者报仇雪恨。同时，他可以借以证明他一再宣布的对民族原则的忠诚。他并不想帮助撒丁吞并整个意大利，因为那样不仅意味着取消教皇对世俗的统治，而这是法国天主教舆论所不能接受的；而且会使法国从此以后不得不永远要在其东南边界上对付一个强大的邻国。他原先只是打算帮助撒丁从奥地利人手中夺得伦巴第和威尼斯，然后在各意大利公国之间组成某种联邦。这个联邦将由继续统治着教会各邦的教皇来主持。而作为对帮助撒丁抗击奥地利的报答，拿破仑三世将从撒丁那里得到尼斯和萨伏伊。正是以此作为基础，这位皇帝才在普隆比埃与加富尔达成了协议（1858年7月），并

且着手加富尔不久即成功地挑起的战争（1859年4月）。但是，使拿破仑三世大为难堪和吃惊的是，一旦法国人和撒丁人打败了奥地利人以后，他要限制意大利民族运动的力量已是不可能的了。他觉察到自己犯了错误，便立即使这场战争停了下来（1859年7月），让奥地利人继续统治威尼斯。^[5]然而，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撒丁就取得了对除罗马以外的全部意大利的统治。因为罗马自1849年以来一直驻有法国的卫戍部队，所以仍然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按照事先的安排，拿破仑三世接管了尼斯和萨伏伊。但是，法国认为它在边境只有这么一点点领土的扩展并不足以补偿在使这个新的意大利王国得以出现中所做的贡献，何况这点小小的领土兼并还引起了英国很深的敌意和怀疑。不仅如此，在罗马问题上，拿破仑三世也发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继续把法国卫戍部队留驻在罗马，阻止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在罗马定都，那么他就会失去意大利对他的好感，因为他本来是可以标榜自己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维护者的。如果他从罗马撤回法国部队，从而支持剥夺教皇残存的世俗权力，他就会激怒法国的天主教舆论。他觉得与其激化国内天主教徒对他的指责，倒不如舍弃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感激之情。于是他决定让法国卫戍部队继续留在罗马，直到新建一支志愿部队去保卫教会统治为止。但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希望也落了空。尽管这些法国部队在1866年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曾一度撤回，但不久即又奉命返回罗马，一直留驻在那儿，直到标志着第二帝国瓦解的1870年战争的爆发之后不久。因此，在拿破仑三世以后仍然在位的那段时间里，他发现自己与他曾竭力使之重新兴起的意大利民族运动处于对立的状态，而他继续给予教皇的那一点保护又不足以平息天主教方面对他的批评。

法国干涉墨西哥的结局同样没有给皇帝带来多少荣誉（参见第25章，原文第677—678页）。1861年，法国与英国和西班牙合作，对墨西哥进行干涉。当时三国向维拉克鲁斯派遣了部队，为支持破产的墨西哥共和国的欧洲债主而显示力量。然而，法国很快就表现出它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广泛地支持想要推翻共和政权的墨西哥保守派。这样，法国就可以为天主教会出力，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使之不受墨西哥共和派所推行的反教权政策的威胁；就将成为新世界的天主教和各拉丁民族的保护人以及他们反抗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势力的旗手。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不久就撤回了他们的远征军。但是法国人却留下来了，并且与墨西哥保守派合作于1863年建立了一个墨西

哥帝国，怂恿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登上了这个帝国最高权力的宝座。可是，即使有法国的帮助，马克西米连也不可能保住他对墨西哥的控制。马克西米连的政府很快就表现出其无可救药的无能。法国人开始对墨西哥失去兴趣，而当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挑战给欧洲造成了与法国直接有关的严重的新问题时，法国人就急于想摆脱他们对新大陆的军事义务。于是，美国的内战结束后，从一开始就反对欧洲干涉墨西哥的华盛顿也明确表示美国要支持墨西哥共和派游击队的领袖贝尼托·华雷斯推翻马克西米连的斗争。于是拿破仑三世于1866年决心放弃原先的想法，下令撤回了法国的远征军。不久，华雷斯就取得了胜利，并把倒霉的马克西米连处死。

拿破仑三世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开始发展起来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其后果是比较重要的（参见第19章和第22章，原文第517页和577—578页）。当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预见到他不久将在统一德意志中所起的作用。1864年他设法使奥地利与普鲁士结盟夺取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省时，谁也没有看清这将导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一场决定性的实力较量。但是很快就可以看清楚，俾斯麦不辞辛劳地努力的目的就在于此。当柏林与维也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对此并未表示严重的关注。诚然，他并不是不知道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关系到法国的利益。可是他并不认为，他也没有理由认为，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普鲁士会很快赢得胜利。他倒是认为打乱现状会提供新的有利于法国的计谋的机会；而且即使战争发生，他也会有充裕的时间以仲裁人的身份去进行干预。因此，当俾斯麦为了在普奥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时稳住法国使之不采取行动，含糊其辞地表示他愿意让皇帝实现自己的愿望时，拿破仑三世很容易被俾斯麦的这种狡猾的花招所欺骗。奥地利似乎也同样承担了义务。巴黎与维也纳之间的谈判的确也得出了明确的约定：只要拿破仑三世在正酝酿着的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奥地利将保证他在议和时享有发言权，并将把威尼斯省交给他，由他让给意大利。但是，在他自己在外交上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准备就绪时，1866年的战争就爆发了；而且在他还没有机会对战争的结局施加影响时，战争就结束了。这使他大为恼火。

受到这一次严重的打击后，这位皇帝总算认识到了他面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俾斯麦是决不会对1866年取得的成功

感到满足而罢手的；而法国则决不能听任普鲁士进一步向统一德意志迈进而不提出挑战。但是，在皇帝为了应付不测事件所作的努力中，几乎已经不像他当年经常显示出来的那么有胆有识，而是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遇事拖延不决的倾向。这都说明拿破仑三世年事已高，精力衰竭；而且又受到疾病的折磨，元气已经大伤。此时他患有尿道结石，痛苦非常。他无可奈何地试图至少做一些小小的领土兼并来阻止普鲁士的扩张，借以安抚法国的舆论。于是他于1867年开始就从荷兰国王手中把卢森堡买过来的问题进行谈判（参见第22章，原文第581—582页）。但是就连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希望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与此同时，他注意到普鲁士在对付奥地利时所显示出来的出乎意料的强大实力，于是他便开始整顿法国陆军。但是当政府要求议会授权增加军队的人数时，却在议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几乎一事无成。他为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缔结同盟所作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除非皇帝从罗马撤出卫戍部队，否则意大利人就不愿意与法国进行合作，而他又不肯答应从罗马撤军。而维也纳的反应则是举棋不定。与奥、意两国的谈判在1869年和1870年持续了整整两年，一直到外交危机达到致命的高潮之前，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这次导致1870年战争的外交危机，将在另一章中加以阐述（原文第586—599页）。

因此，帝国在没有任何盟国以及其军队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便匆匆地投入了对它的一场决定性的实力考验。为时不久，便见分晓。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就使法国的抵抗化为乌有。皇帝本人也于1870年9月2日在色当战役中被俘（参见第12章，原文第325—327页）。第二帝国从而宣告崩溃。色当战役的消息传到巴黎后，立法会议中的共和反对派就宣布推翻帝国，成立共和国政府（1870年9月4日）。树倒猢猻散，皇后逃亡英国。不久，皇太子也到英国与她会合。战争结束后，这位被赶下台的皇帝也到英国去与他们相聚。拿破仑三世在英国度过了他的余生，他似乎把这段时日看作暂时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惬意的隐退生活。

第二帝国的崩溃是由其自身固有的矛盾造成的。从国内方面来说，事实证明要把波拿巴主义的独裁统治原则与产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对外政策方面来说，拿破仑三世对于民族将采取什么形式的想法是错误的。法国不是扶植起一批在法国保护之下的弱小的联邦式国家，而是造就了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强大的

中央集权国家。这就彻底改变了力量的对比。他自己的判断本来是比较正确的，甚至在萨多瓦战役之后他仍坚持自己的原则并接受既成事实。但在他手下人员和法国舆论的压力下，他违心地推行了一套外交赌博的绝望政策，以图挽回他的政权的威信。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一旦崩溃，法国似乎就抛弃了他的政权所特有的一切方面。然而，尽管帝国消失了，但是它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并不是没有留下某种烙印。议会居于支配的地位，这是第三共和国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一点无疑说明了奥尔良主义的传统的重新抬头，而不是拿破仑三世在其统治的末期出于无奈作出让步的结果。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另一个特点普选权，则可能主要渊源于第二帝国，而不是1848年的共和政权，因为拟订1875年宪法的那些保守派之所以不敢取消普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曾长期实施普选制，并一再对它赞扬。从反面来说，拿破仑三世还造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共和派不愿让一个抱有个人权力野心的人物来担任共和国的总统，也不愿意放手让民众选举来决定总统的人选。

在1914—1918年战争以后的20年中，政治运动风起云涌，遍及整个欧洲，企图根据民主的原则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于是，第二帝国似乎又具有了在此以前尚不明显的比较广泛的新意义。在某些观察家们看来，拿破仑三世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并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征询民众意见的独裁者，因此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类的恺撒大帝式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先驱。不过，拿破仑三世的政权与他们的政权的不同之处，可能大于相同之处，因为拿破仑三世和后来的这批鼓吹极权独裁的人有一点鲜明的区别，那就是拿破仑三世从来没有试图创立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专门来支持他的统治，并消灭任何其他不同于他的意见。拿破仑三世完全是一个19世纪中叶的人物，因此他想不出德国社党分子后来称为“一体化”的东西，即把整个国家的公私生活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置于一个单一的领袖统治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种种自相矛盾之中，这一条是最无可指责的。

（周兴宝 译）

[1] 有人提出路易·拿破仑是否婚生子的问题，还举出了一系列据说是他生父的姓名。这种怀疑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路易与奥尔唐斯感情不和在路易·拿破仑出生以前即已为人所共知。后来奥尔唐斯又生了一个儿子，即后来的德·莫尔尼公

爵，他肯定是一个非婚生子。但是，要证明路易·拿破仑也是私生子，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2\]](#) 关于这次革命，参见本卷第15章。

[\[3\]](#) 参见本卷第4章，原文第80页和第5章，原文第107页。

[\[4\]](#) 参见本卷第21章。

[\[5\]](#) 关于这次战争，见本卷第12章，原文第323—324页。

第十八章 克里米亚战争

在将近两个世纪中，俄国同土耳其之间大约每隔20年就要进行一场战争。这一系列战争中的第九次于1853年10月开始。但是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和前几次截然不同，因为土耳其确信能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武装支援。到1854年3月英、法与土耳其结成联盟。沙皇尼古拉处境孤立，甚至被他仅仅在5年前才从匈牙利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年轻的受他保护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所抛弃，从而极端懊恼。欧洲站在穆斯林苏丹一边，反对东正教沙皇。

土耳其人过去从来没有从西方国家得到过比外交支持更多的支援，通常是从法国得到外交支持。事实上，他们曾一度面对英法同俄国的暂时联合，以致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损失了他们的舰队。土耳其在欧洲的最古老的宿敌哈布斯堡王朝，曾不止一次同俄国结盟来对付土耳其，不久以前，就在1849年，还同俄国一起，为了匈牙利和波兰在土耳其的流亡者而同土耳其激烈争吵。这最后一次尖锐事件暗示未来事态的发展，既给予土耳其人很大的鼓励，也是对俄国人的警告。英国和法国都强烈支持土耳其，并派遣其舰队进入爱琴海。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竟不顾1841年签订的海峡协定，纵容海军上将帕克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从而激起了圣彼得堡方面提出正当的抗议。

在1840—1841年间，海峡问题第一次被公认为欧洲共同关心的问题，并由五大强国来处理（参见第10章，原文第256—258页）。尼古拉和他的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意外爽快地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他们估计要重订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不可能的，便企图利用第二次穆罕默德·阿里危机来离间英法。到了1853—1854年，俄国提出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前途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同时俄国发现这个问题也必须作为列强共同关心的问题来看待，而不再是像尼古拉及其前辈们所设想的那样，主要是一个由俄国作出决定而不管是否取得奥地利同意的问题。欧洲同土耳其的关系的这一新发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了严重关头。这次战争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1]，由于拿破仑三世的阴险狡猾，企图利用法国和俄国在圣地问题上的争端，通过光荣的诉诸武力来巩固他做皇帝的新地位；或者通过引诱英国与法国合伙，诱使奥地利脱离尼古拉所倡导的神圣同盟等办法，以离间那些曾打败其伯父的胜利者，或者策划使1815年的解决办法失败，并为了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利益而求助于这两个民族。也不像其他人所辩解的^[2]，认为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帕默斯顿和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的阴谋，企图搞乱阿伯丁的温和的绥靖措施，从而煽动起愚昧而好战的公众舆论去支持失败的一方。更不是由于英国的经济界要进一步控制土耳其市场，并向他们的高度保护贸易政策的捣乱者俄国进行报复而引起了这场战争。战争的开始是因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好战的土耳其不甘心向俄国的要求屈服。土耳其认为俄国的要求是对土耳其帝国生存的侮辱和威胁。法国和英国加入土耳其一边，奥地利也公开地倒向联军一边，因为联军方面不准备让俄国单独与土耳其解决宿怨，从而独占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支配权。

俄国对土耳其的要求是由于在圣地问题上的争端引起的，在性格暴躁和野心勃勃的新任法国大使拉瓦莱特到达君士坦丁堡（5月5日）之后，这场争端逐渐恶化起来了。法国作为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天主教徒的权利保护者的地位，由于上半个世纪希腊人不断增长的优势而受到损害。这个优势的形成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来朝拜圣地的东正教徒以一百与一之比在数量上超过了天主教徒。^[3]早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末期，正当罗马教廷和几个天主教教团重新活动之际，法国开始重申其权利要求。路易·拿破仑急于要安抚在法国的天主教舆论，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发展，但是他本人并不希望把这个问题搞成一个可能使自己卷入与俄国的纠纷之中的重大问题。然而，在进行复杂谈判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法国和俄国的外交人员在各自的外交部的某些人员以及某些报纸的鼓动下，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到1851年10月，看来拉瓦莱特即将取得成功。这时尼古拉却向苏丹提出一项“维持现状”的私人要求来进行干预。受到双方折磨的土耳其政府于1852年2月向法国提交一份备忘录，表示愿向天主教徒作出让步，这似乎使法国非常满意。几乎紧接着，它又秘密地向希腊人颁发诏书，似乎肯定他们的权利。但是由于在“不同信仰的宗教派别之间不断发生

一系列拼死的爱尔兰式的争吵”的干扰，在君士坦丁堡可能作出的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允诺，在耶路撒冷都不一定能够实现。^[4]

接着，在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当局进行了一连串搪塞、推诿的尝试，想给予每个基督教竞争者一点好处。威胁和反威胁交替进行：法国海军可能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或被派往叙利亚，而事实上却被派到了特里波利；俄国大使馆可能要撤离君士坦丁堡；经过一番热烈的争论，“夏勒马涅”号新战舰终于被允许驶过达达尼尔海峡，把拉瓦莱特大使带回到金角湾去。英国人当时尚未介入，因为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在休假。到了1852年年底，混乱局面空前恶化。俄国人准备帮助苏丹反对法国人，如果苏丹能完全履行他作出的诺言的话。但是俄国人又生怕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和外交大臣法德帕夏是拉瓦莱特的工具。涅谢尔罗迭把最坏的阴谋策划都归咎于拿破仑三世，后者是在11月公民投票后刚上台的。尼古拉曾经表示过欢迎这位“12月2日上台的人”，而现在却又为了他把土耳其人推向极端而在猛烈地抨击他，并表示不欢迎帝国的恢复。确实，他拒绝承认这个“王朝年号”，因为他误认为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他的兄弟国王们会跟着这样做。拿破仑用一个巧妙的回答把尼古拉对他的侮辱性称呼应付过去，而且通过长期召回（1月11日）拉瓦莱特，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克制态度。但是这个“王朝年号”事件仍然在双方引起了怨恨。

到了新年时，尼古拉正在冥思苦想，打算采取严厉的措施。苏丹已经食言，必须迫使他遵守诺言并对将来作出保证。恐惧曾使土耳其政府投入了法国的怀抱；恐惧也会将土耳其政府带回到俄国的怀抱之中。^[5]尼古拉认识到，土耳其的抵抗可能会导致战争，但是他对此已有所准备。^[6]1月间，在南部边境上的两个兵团已公开按战时编制。同时，他决定派遣一名特使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圆满地解决圣地问题，并要求根据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明确俄国有关东正教会的豁免权和特权的权利要求，签订一项对将来作出保证的条约或协定。

关于派遣特使的主意是涅谢尔罗迭首先提出的（1852年12月25日），大概是为了想转移目标不令其主子采取更严厉的步骤。关于签订一项条约或协定的建议是出自当时在野的赖希德帕夏。尼古拉本人正在考虑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而且据他的私人笔记所示

[\[7\]](#)，当时他正在阴谋策划指望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他从最坏的情况考虑，做最好的打算，设想了这样一个安排：把奥斯曼帝国缩小到仅限于亚洲地区，把两个公国和保加利亚北部领土割让给俄国，给保加利亚其余地方和塞尔维亚以独立，把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让给奥地利，把埃及或者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给予英国，克里特岛给予法国，爱琴海诸小岛给予希腊，并使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城市，而由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派兵驻防，奥地利在达达尼尔海峡派兵驻防。尼古拉深信这“病人”死亡在即，对后事的准备工作必须事先做好，便在同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四次会谈（1853年1月9日至2月22日）中宣布了类似的想法。

1852年12月，阿伯丁就任首相。约翰·罗素勋爵任外交大臣，直至1853年2月，由克拉伦登接任。1844年皮尔执政时期，阿伯丁曾任外交大臣，当时尼古拉访问了英国，并达成一项他认为是有有关土耳其前途的协议（参见第10章，原文第259—260页）。尼古拉立即就此事提醒约翰勋爵（12月16日）。当1854年3月战争来临之时，一份英国蓝皮书发表了尼古拉同西摩的几次谈话以及1844年同阿伯丁进行讨论的部分内容。这就充分证实了沙皇正在策划瓦解土耳其。尼古拉现在的目标如同1844年的一样，是想在土耳其崩溃之后下一步棋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取得他所宠信的外交上的智囊们的谅解。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一方应该了解对方所不允许的是什么。相反地，英国政府尽管直至4月5日从未指示西摩停止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却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沙皇认为奥斯曼帝国即将垮台的设想：与俄国的任何协作只能是防止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不是通过一项事先处理苏丹领土的协议去加速其崩溃。

实际上，双方都同意，他们决不容许君士坦丁堡落入任何一个大国的手中，也不允许成立一个拜占庭帝国或扩大希腊的领土。英国方面还答应在没有事先跟圣彼得堡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不签订导致土耳其覆灭的任何其他协议，对这一点俄国是非常满意的。可是，他们并未陷入尼古拉设下的关于埃及或者克里特的圈套，而对他提出的关于两个公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可能在他的保护下成为独立国的建议，他们只能感到焦急不安，更使他们不安的是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即使他不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所有人，环境也可能迫使他以托管人的身份这样做。

至于法国，尼古拉装作不把它放在心上，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它提出任何认真的建议。他宣称，奥地利是他可以信赖的（2月21日）^[8]——这个致命的错误观点是涅谢尔罗迭所不同意的。两天以后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答应如果他向土耳其提出的对门的内哥罗的要求遭到拒绝的话，必要时在军火方面给予支援。当俄国正准备要求土耳其给予满意的答复时，奥地利却在采取行动挫败土耳其想征服一向顽强不屈的门的内哥罗人的企图。它集结军队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警告土耳其司令奥马尔帕夏，要他撤军，还派莱宁根伯爵到君士坦丁堡，随身带去要求立刻停火并解决某些边境问题的最后通牒。在他到达后的两周内，土耳其政府让步了（2月14日），与门的内哥罗修订了和约。

不到两星期以后，土耳其方面又会见了另一位特使缅希科夫亲王（2月28日）。面对来自异教徒的威胁性要求，他们是否将作第二次让步呢？缅希科夫是一位显贵人物，海军大臣，但是他并非尼古拉的亲信宠臣，而且也不适合承担他的使命。他带着大量指令来到土耳其，这些指令给了他广阔的活动余地，还有一大群高级海陆军军官伴随着他。这些高级军官公开地侦察了远及土麦拿和雅典等地区。同时期的人都谴责他那放纵而爱骂人的行为，有些俄国人则责备他办事拖拉，缺乏干劲。他的缺点是被夸大了。然而他确实是一开始就坚持要求撤换外交大臣法德帕夏，后来在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回来之前又明显地未能如尼古拉所希望的把事情处理好。缅希科夫陷入了阴谋的迷津和土耳其的拖延战术之中，又受了互相竞争的议员和使馆里激进的参赞们的欺骗。“年迈的土耳其人”，即签订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的那些人都老朽无能了，又没有其他受到苏丹注意的团体或个人会坚决反对要求抵抗俄国威胁的高涨的民族主义。这种蔑视的态度在总理大臣穆罕默德·阿里和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拉什迪两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这就使土耳其人越来越感到，最后他们势必接受英法的武装支援，从而下定了决心。3月20日，在法德帕夏被迫辞职和俄国陆海军备战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法国舰队奉命从土伦开往萨拉米斯。拿破仑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单独作出了这个决定。当时英国政府严厉地驳回了驻君士坦丁堡代办罗斯擅自发出的从马耳他调遣舰队的命令。总是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拿破仑，看来已远远地倾向于战争一边

了，而他几乎在同时又摆向相反的方向，委派稳健人物德·拉古尔带着绥靖指令就任驻君士坦丁堡的新大使。虽然英国政府并未派出舰队，却派出了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土耳其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很怕他。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到来（4月5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只要他们立场坚定，是会得到他的支持的。斯特拉特福德4月27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俄国人错了，而我相信他们确实是错了，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错误揭露出来去支持土耳其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土耳其政府支持我。”^[9]

4月22日，刻不容缓的圣地问题的解决进一步鼓励了土耳其人。这是由于德·拉古尔同缅希科夫在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的帮助下进行友好会谈而产生的结果。雷德克利夫承认俄国人提出控诉是有正当理由的。这就为解决主要问题打下了基础，得以就保留东正教会所享有的宗教与精神方面的豁免权问题（宗教豁免权包括维持教堂、宗教建筑物和宗教机构以及东正教教士的公民权利和免税权；精神豁免权包括教士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签订一项对苏丹和俄国都有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缅希科夫被授权向苏丹提供一个防卫联盟，如果苏丹接受俄国的建议并因而招致任何列强的敌对行动的话。然而，他并未提出结盟的事。很难设想这件事能够成功。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会施加他的全部影响力来加以反对：假如土耳其想同任何列强结盟的话，那就应该是同英国结盟，正如他本人在1849年所倡议的那样。现在他向俄国人声明，如果与土耳其建立过分亲密的友谊将激起欧洲更大的怀疑，以致造成导致战争的破裂。

从土耳其方面来说，似乎很少有任何友谊的迹象。他们把缅希科夫起草的条约或协定看作同他们的主权独立不相容的，而且等于承认俄国在有关土耳其的东正教方面的一切事务中起着仲裁者的作用，这个观点得到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和德·拉古尔的强烈支持，后来又得到克拉伦登和德律安·德·吕的赞同。尽管缅希科夫大大地修改了他原来的条件，推迟了他离去的日期，最后又提出由苏丹写信给皇帝，以代替条约或协定，但他还是一无所获。内阁的变动（5月12日）使穆斯塔法帕夏登上了首相的宝座，赖希德帕夏出任外交大臣。当一次内阁大臣会议以压倒多数决定拒绝俄国的要求（5月17日）之后，缅希科夫的美好希望便彻底破灭了。土耳其方面5月20日的最后

答复仅仅提及精神豁免权的问题而未涉及所要求的约束形式。结果，
缅希科夫于5月21日离开君士坦丁堡，从而断绝了外交关系。

俄国在陆海军方面的措施已经引起伦敦和巴黎对俄国的意图的猜疑，当缅希科夫的指令只有一部分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传到英法当局时，这种猜疑加深了。他们得出结论说，土耳其方面对缅希科夫的要求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而且俄国的武装反击，大概会采取占领各公国的形式，看来是迫在眉睫了。6月2日阿伯丁政府命令马耳他舰队开进贝西卡海湾，就在达达尼尔海峡外边，拿破仑马上跟着这样做了。帕默斯顿在追溯这件事情时说，对土耳其人的这次巨大鼓励意味着“破釜沉舟”^[10]，他这样说是正确的。

沙皇尼古拉感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被苏丹打了一记耳光。为了想同土耳其政府直接达成一项妥善安排（俄历5月19日，公历31日），他确实又做了一次无效的尝试，但是附带着占领各公国的威胁，随后俄国方面又发出一份措辞激烈的、隐含着中伤法国的言辞的通函（俄历5月30日，公历6月11日）。然而，前一天尼古拉就已公开地向法国大使表达了这些意见，如同早些时候同西摩所谈过的一样，并曾寻求同拿破仑三世进行个人接触。

自1月以来，沙皇就打算或者由水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由陆路通过各公国和保加利亚向君士坦丁堡进攻。5月，鉴于这时已得到英国支持的法国的态度，沙皇决定采取一项折中措施——占领各公国作为抵押，直到土耳其方面满足其要求为止。同时，他又请求奥地利^[11]同样地占领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但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尼古拉本来不想越过多瑙河，但是，假如土耳其方面不肯让步的话，可能要宣布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独立。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基督教徒的总暴动和“敲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丧钟”^[12]。

越过普鲁特河的命令是在6月12日（公历6月24日）发布的，7月间，强大的俄国军队占领了两公国和多瑙河战线。尼古拉公开表示，要是苏丹肯接受缅希科夫的最后通告，而且西方舰队也撤退，俄国就撤军。这个最后条件包括在另一份措辞激烈、猛烈抨击西方对土耳其的支持的俄方通函（俄历6月20日，公历7月2日）之中。

如果当时的内务大臣帕默斯顿能够随心所欲，西方的支持将会更强大。当俄军渡过普鲁特河时，他正极力主张派遣混合舰队到博斯普

鲁斯海峡：一个果断而强有力的行动方针是维护和平的最稳妥的办法。由于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强烈反对，而且尼古拉也未必会屈从^[13]，这个没有把握的建议没有付诸实践。内阁陷于在巴黎、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系列谈判协商的迷津之中。许多方案在进行中，其主要结果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谈判代表被撤换了，在维也纳达成了协议。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致同意由苏丹送交沙皇一份照会，这份照会应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并导致从各公国撤军。这份以维也纳照会著称的文件，一部分由拿破仑亲手草拟，一部分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草拟。文件经过精心构思，既协调了俄国和法国的利益，又没有明显地侵犯土耳其的主权。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四大强国共同努力的产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被认为是一个欧洲问题。此外，奥地利远远没有像俄国曾经支持过莱宁根使团那样地去支持缅希科夫使团，奥地利在西方列强中却处于执牛耳地位，普鲁士也步其后尘。尽管尼古拉或涅谢尔罗迭并不认为这一步骤是怀有敌意的，可是它仍然标志着东方三强的同盟正日趋衰亡。奥地利人已经在告诉俄国人，在制定一项旨在使土耳其在欧洲迅速崩溃的政策方面，他们不准备同俄国人合作。^[14]

该照会的草案于7月28日送达圣彼得堡，很快就被接受了，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在俄军进入各公国时，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情绪。极端主义分子加紧采取军事措施，并利用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关英国舆论强烈反对阿伯丁及其绥靖政策的消息给人们以鼓舞，8月，载有1.5万名士兵的埃及舰队的到达激起了极大的热情。关于俄国献殷勤的消息证实了该照会真正是它策划的这样一些猜疑。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并不是他的所为——并且他也知道，他同意接受这个照会的个人影响与他的官方影响截然不同，不会被重视。最好的补救办法是给一个答复，提出三点修正意见，而不是单纯地拒绝（8月20日）。

制定这样修正意见的目的是要排除俄国对《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作任何广泛的解释，以及它对保护东正教教会的宗教特权和精神特权的任何权利要求。尼古拉起初倾向于接受土耳其的修改意见，但对精明的涅谢尔罗迭同民族主义和斯拉夫派极端分子的不寻常的结合作出了让步。9月7日他宣称，维也纳照会必须保持原封不动。外交上

他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其他四个强国仍然在支持这个照会，尽管它们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没有支持。

不到两星期，由于俄国外交部就这个照会和土耳其的修正案草拟了一份秘密意见书，而使俄国的地位遭到破坏。意见书把照会和修正案解释为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使人们相信“魔鬼的侵略扩张政策”已被完全遏制。这条消息走漏给了新闻界，9月22日在伦敦报纸上发表，立即在英国和法国政界以及公众中引起了可悲的结果。同时，在君士坦丁堡群众游行示威，煽起了战争情绪。懦弱、胆小怕事的苏丹和伊斯兰教教长随波逐流，好战的在任陆军大臣穆罕默德·阿里和在保加利亚统率一支大军的克罗地亚叛徒奥马尔帕夏却事事各行其是。到9月底大势已定。10月4日苏丹宣布如果两星期内不从各公国撤军就宣战。俄国人当然拒绝撤走，到1853年10月23日，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流域开始战争行动，几天以后逼近巴统。当时，俄国人至少总得紧急承担防守多瑙河北面的任务，但关于高加索却只字不提。[\[15\]](#)

在金角湾和多瑙河所发生的这些决定性事件，打乱了外交官们进一步谈判的企图。尼古拉尽管亲自会见了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无法用书面承诺来约束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严守中立。他主动提出与拿破仑三世达成私人协定的提议，也同样遭到失败，因为拿破仑三世是紧跟英国的。法国确实是带头迫切要求把贝西卡湾的两支舰队调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去，9月23日发出了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联合命令。按照土耳其的请求，英法舰队一部分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一部分驶向君士坦丁堡。然而，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却迟迟不执行9月23日的命令，直到他收到英国内阁10月8日要他把舰队驶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去的绝对命令才执行。英国舆论不允许抛弃土耳其，这是就连阿伯丁也私下承认的。11月15日英法舰队在君士坦丁堡会师。

英国政府拒绝了法国一项进入黑海的建议，因为正如涅谢尔罗迭写给他的驻伦敦大使布伦诺夫的信中所说，这将使战争不可避免。[\[16\]](#)相反地，英国告诉俄国，只要俄国人不越过多瑙河，不攻击任何一个黑海港口，英国就不会进入黑海；但是它不能为了要保持中立而抛弃土耳其人，让他们听天由命。尼古拉的直接反应是这意味着战争。[\[17\]](#)然而，他发布命令，不许在港口内攻击土耳其舰只，只能在海上攻击。[\[18\]](#)首先越过多瑙河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俄国人。他们

在此以前赢得了两次小小的胜利，11月18日（公历30日）在锡诺普，一支俄国海军分舰队消灭了土耳其的一支船队和两艘准备开往高加索前线的运输船。锡诺普战役展示了新型海军炮弹对木船的毁灭性威力（参见第11章，原文第281页）。锡诺普战役对西方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

这一完全合法的军事行动却被斥责为一场“大屠杀”，是一种无耻、残暴的变节行为，是对国家荣誉的不可饶恕的侮辱。英国整个报界号召战争，入秋以来已经发展到越来越反俄的群众情绪，这时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锡诺普战役的消息恰好同帕默斯顿由于反对约翰·罗素勋爵提出的一项修正法案而辞职的时间（12月14日）相吻合。据说，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与阿伯丁、女王和她的丈夫在对土耳其的武装支援上意见不同。要求恢复他的权力或至少恢复他的官职的呼声甚嚣尘上，认为只有像他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维护英国反对沙皇的立场，因而12月25日帕默斯顿重返仕途当上了内务大臣。群众对女王的丈夫发出了持久的强烈抗议，怀疑他为俄国人工作反对帕默斯顿，最荒唐的谣言竟然会有人相信。

在第二帝国的法兰西不可能有这样群情沸腾的情况，但锡诺普战役的影响是很强烈的。一项给予土耳其200万英镑的贷款马上解决了。拿破仑坚持这两支舰队一定要进入黑海而俄国舰队绝对不能向土耳其开火。这项要求是在12月22日由英法双方联合向圣彼得堡提出的，接着在1月3日两支舰队进入了黑海。尼古拉拖延一些时间后，在回信中（旧历1月4日，新历16日）问道，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舰队司令们是否也发出命令阻止土耳其向俄国开火；如果答复是否定的，他就马上召回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虽然，拿破仑现在对他致尼古拉的一封私人信件仍抱有幻想，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结局，因而不想马上给予答复，但他屈服于英国的压力，2月1日英法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回信。尼古拉对这些回信是不满意的，2月6日布伦诺夫和基谢廖夫分别离开了伦敦和巴黎。两个星期之后，西摩和卡斯特尔巴亚克也都离开了圣彼得堡。

这两个西方强国直到3月28日才宣战，但它们确曾作出决定，阻止俄国海军而不阻止土耳其海军在黑海采取行动。早在3月12日它们就同土耳其签订了盟约，3月19日第一支法国部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英法双方直到4月10日才相互签订了类似的盟约。与此同时，它们的军队已

开始在加利波利半岛和斯库台登陆，在那里设有一座辅助兵营。盟军方面认为俄国会重复1829年时采取的向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快速进军的突袭行动。俄土战争这时已成为有四方参加的一场斗争，俄国单独为一方。它甚至不能指望奥地利严守中立。沙皇派往维也纳（1月28日至2月9日）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奥尔洛夫，在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建议以及企求获得奥地利的明确保证方面都以失败告终。

军事行动进展缓慢。俄国人把军队分布在欧亚两部分，致使自己的力量太薄弱，难以进行快速的决定性攻击，只能决定围攻多瑙河流域的城市锡利斯特拉。在保加利亚的奥马尔帕夏不愿冒再一次打仗的危险。英法两军的总司令拉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奉命防卫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当时尚未立即遭到威胁，便集中力量搞些调动和安置军队扎营等行政事务性工作，从而延迟作出战略性决策。5月间联军到达保加利亚港口瓦尔纳，可是仍然不能决定究竟是采取防御性集结呢，还是发动进攻，给锡利斯特拉解围并解放两公国。还没有作出决定，俄国已从两公国撤军，这样联盟国军队在巴尔干半岛就再没有什么军事目标了。这是奥地利做的工作。

布奥尔的直接目的是要保卫多瑙河流域下游不受俄国侵袭。他的政策一直是反俄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是很强大的。俄国从波兰南部一直到比萨拉比亚都很容易遭受奥地利的袭击。在整个战争中，它始终把部分兵力驻守在这条边境线上以应付奥地利可能发动的敌对行动。到5月间，奥地利把它的军队部署成直接威胁着俄国在两公国的地位。它的第三军在土匈边境的后面已被动员起来，它的第四军驻扎在加利西亚，而且还批准紧急征兵9.5万名。早在4月20日布奥尔已同普鲁士签订了盟约，这项盟约授权奥地利向普鲁士招募20万士兵，并要求普鲁士必须和奥地利一起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撤离两公国。普鲁士同时呼吁联盟国方面撤离黑海，枉费心机地想以此使这个压力显得公正无私。6月3日布奥尔正式向俄国提出了他的要求，普鲁士也赞同这个要求（6月12日）。6月14日他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协定，允许奥地利在战争期间占领两公国，如果黑塞哥维那和阿尔巴尼亚发生骚乱，也予以占领。6月23日俄国解除了对锡利斯特拉的围困。俄方的答复（6月29日）对奥地利的号召作出了部分让步，因为尼古拉低估了布奥尔的反俄意向，又过高地估计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制约奥地利的能力。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些同等的让步，同时保住摩尔多瓦。但是，他

过于相信奥地利的诚意了。布奥尔业已就一项结盟的事试探过巴黎的态度。这时他正准备同联军的司令们共同商议对付在摩尔多瓦的俄国人的措施。他也同意得到奥地利支持的、联盟国要求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是弗兰茨·约瑟夫（8月8日）在对俄国的犹豫感到不耐烦的心情下接受的“四项条款”。但是戈尔恰科夫亲王已经到达维也纳，带来了俄国完全撤离的承诺。那时，甚至在俄国拒绝这四条款（8月26日）时，布奥尔也还没有结束同西方的谈判。8月22日开始的俄国人的撤离和奥地利人的占领使奥地利得到了布奥尔当时敢于取得的一切，但它防止俄国对多瑙河下游的重新威胁的最好保证将是一次它参与的西方的胜利。然而，布奥尔不敢去冒这个合伙的风险，除非胜利确有把握，足以使俄国人针对奥地利的反击措施不可能实现。

当撤离两公国解除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后，克里米亚变成了新的战区。不久前以炮击敖德萨来进行示威的倒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这种选择大概是反映了一个企图取得黑海制海权的海军强国的本能吧！其目的是想占领掩护俄国舰队的要塞，并摧毁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大量俄国军需物资。在战地的司令官们进行侦察（8月19日）之后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侦察结果却未能查明在克里米亚的俄军人数，也不能肯定这支远征军登陆之后给养是否跟得上。但是军队调动已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因为霍乱已开始军中肆虐，法军在7月初、英国在7月底霍乱流行。

在这场新的战役中，双方都有失误（参见第12章，原文第322—323页）。联军在欧帕托里亚海滩登陆的五天中，尽管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俄国却未进行攻击。由于当时担任俄军司令的缅希科夫的不负责任，同样也由于英军步兵的强大，俄国企图阻挡联军沿阿尔马河南下（9月20日）的努力失败了。另一方面，联军方面也没有什么收获，因为他们竟让缅希科夫带着他的丝毫未受损失的部队逃跑了。然而，缅希科夫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反而让联军来个大迂回、安全绕到东边，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南占领了有利阵地（9月26日）。联军也再一次失掉了机会。有六天时间，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当地的驻军，而且托德列本的防御工事还未完成，可是他们既不号召塞瓦斯托波尔投降，甚至在10月17日第一次炮击以后，也不想进行攻击。在巴拉克拉瓦（10月25日），缅希科夫在一次试图切断英军港口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和卡米埃希以西附近法国阵地的军需供应的行动中被击败。

但是，联军的胜利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卢肯未能将英国骑兵作为一个整体指挥好，不过重骑兵队的进击其指挥是英明有效的，而轻骑兵队的进击却全凭士兵的英勇牺牲。此外俄国人仅仅能够控制唯一一条连接港口同高地上的英国军营的碎石路。意见的分歧再一次阻碍了追击和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联军方面已大大为布奥尔壮了胆。奥地利在巴黎重开谈判（10月3日），命令它在两公国的司令官让土耳其人经过两公国进入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同时为了第二年春季的战役而将它的全部军队按战时编制。普鲁士感到担心，想诱使奥地利答应只同它和德意志邦联一起协商，但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它转向俄国，敦促俄国接受四项条款。当克里米亚的战事严重遏制布奥尔的时候，俄国曾表示愿意就这些条款进行谈判。11月17日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的准备工作使联军暴露在缅希科夫的野战军面前，这时野战军已得到了多瑙河地区的俄国军队的增援。11月5日缅希科夫在因克尔曼山岭对英军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这是一次步兵战，由于地形特点和浓雾、下雨的关系，变成了许多小股的拼死的遭遇战。俄军被打败了，但是塞瓦斯托波尔却得救了。这样一来，军事解决推迟了，在切尔松尼斯高原上的军队不得不在疾病与困苦中度过一冬。布奥尔不敢再继续推行他的反俄政策。11月20日弗兰茨·约瑟夫取消了总动员令。奥地利可能会向俄国宣战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这一点并不是一下子就清楚的。11月26日奥地利劝说普鲁士向两公国提出四月联盟所规定的给它的领土保证，12月2日奥地利签字参加英法联盟。可是，布奥尔采取这个最后步骤是因为预料到它不会生效。奥地利保证如果俄国到年底还不接受四项条款就对俄宣战，但是早在四天前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戈尔恰科夫已被正式通知就四项条款进行谈判。而且，其重要意义几乎在于它既反对俄国，又同样反对意大利。奥地利得到了拿破仑在12月22日协定^[19]中作出的关于在东方的纠纷解决以前意大利半岛领土维持现状的保证，作为对它的报偿。布奥尔为了保护他心目中的奥地利的利益，企图从各方面捞取好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策，它给中立国和交战国双方都留下了奸诈和胆怯的印象。

尽管三国联盟并未改变奥地利的对俄政策，在外交上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它成了与俄国进行新谈判的起点。3月15日在维

也纳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没有人相信这些会议能真正导致和平。实际上，在这个冬季，法国和英国的战争情绪被煽动得越发高涨。拿破仑想要取得彻底胜利的欲望反映在他决定亲自去克里米亚上，这件事使克拉伦登费了很大的劲才劝阻了他。在英国，对战争指挥不力的强烈抗议以及罗巴克在议会提出的进行一次调查的动议导致联合政府垮台。帕默斯顿就任首相；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格莱斯顿及其阁僚们辞职（2月22日）以后，新内阁积极担负起军事方面的责任。主张和平的科布登派彻底失败了，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把战争看作是自己的事。阿尔贝特亲王访问布洛涅（1854年9月），内阁成员访问巴黎（11月），以及拿破仑访问温泽（1855年4月），使英法联盟的活动更加顺利。与此同时，尼古拉于3月2日去世，由经验不足的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尼古拉的传奇式的野心和容易激动的刚愎性格从当时局势中的消失，鼓励了盟国，它们希望在战场上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可能真正带来巩固的和平。帕默斯顿反对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在“仗打了一半”时进行谈判。^[20]英国的全权大使约翰·罗素勋爵更希望获得与普鲁士的初步结盟，他认为这个结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失败了。土耳其躲躲闪闪。布奥尔把谈判当作主要是他对两方都留一手的手段。俄国拖拖拉拉——戈尔恰科夫向国内咨询的许多项目之一使讨论拖延了三个星期之久（3月27日至4月17日）——然而还是希望避免谈判破裂。法国全权大使德律安·德·吕希望谈判破裂会迫使奥地利回到联盟国方面来，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布奥尔的影响正在衰落，弗兰茨·约瑟夫的加紧控制产生了更严格和更公正的中立。因而参加谈判的人都怀着“虚假的亲善”^[21]敷衍应付，直到4月26日会议中断，6月4日最后破裂。

然而，谈判还是把列强带到最后制订的和平条款上来了。俄国对四项条款中的第一项作出了让步，即列强应共同拥有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力；也对第二点作出了让步，即必须采取国际性的措施以改善多瑙河的航运并保证其自由通航。但是，第四项即关于俄国对东正教的特殊关系应该终止、其特权应由列强共同担保这一项暂时被搁置起来了。争论集中在第三项，即关于修订1841年海峡协定的问题。鉴于一致同意第三项意味着欧洲对土耳其作出保证，并承认土耳其政府与列强中任何一国之间的冲突都与大家有关，分歧继续存在于海军的安排本身。对海峡的完全开放或部分开放，对遵守海峡关闭规定给予补偿

的制度，对准许许多多西方船只进入黑海会抵消俄国舰队的增加，以及对允许土耳其在必要时要求援助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关闭海峡并使黑海中立化——法国倡议的主张——乃是唯一有可能既被盟国方面接受，又能对俄国施加影响的安排。英法政府不承认它们的代表接受的这个补偿建议，结果使德律安·德·吕和约翰·罗素勋爵都丢了官。最后，这些会议使奥地利的影​​响大为削弱。在与俄国的斗争中，现在是英国领先了，英国人在牺牲奥地利的情况下对拿破仑三世的吸引力更强了。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奥地利的中立只意味着孤立的软弱而不意味着仲裁者的力量。

1855年内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在推向一个决定性的目标。尽管英国的辅助后勤部队有了改进，又有大量增援部队来到，这一年的开头还是非常不利的。4月9日至19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再一次徒劳无效，拿下刻赤半岛以切断俄国的海上交通的计划不得不放弃。只有当拿破仑的访问计划延缓后，同时爱吹毛求疵的康罗贝尔被比较果敢的佩利西埃取代之后，情况才开始有了好转。当撒丁的军队在拉马尔莫拉将军指挥下到达巴拉克拉瓦，驻扎在英军东边，这时对刻赤半岛的进军取得了成功（5月21日）。6月份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拉格伦的死亡（6月28日）也意味着英国指挥部的改变，辛普森将军也正好在人们恢复信心之时到来。8月16日法军和撒丁军在切尔纳亚地区击败了俄国野战军。翌日，重新恢复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紧接着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在9月9日那一天，俄国人放弃了该城。俄国人被打败了，但没有彻底覆灭。具有某些局部价值的目标虽已达到，可是联军对进军深入俄国很可能犹豫不决，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它有哪些力量用来进行防御。一次真正的胜利意味着另一场战役：此刻实现和平实际上是重复在维也纳会议上所讨论过的关于土耳其问题的条款。但是1855年的事态发展又引起了另外一些问题。

加富尔的政治需要和盟国的军事需要带来了撒丁岛和意大利的问题（见第21章，原文第569页）。起初，意大利人把这场战争看作自由主义的西方同专制主义的俄国及其传统盟友之间的斗争。从1853年12月拿破仑的密使布勒尼埃男爵在都灵的一些活动看来，这个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没有多久，奥地利就抛弃了它的伙伴。英国关于得到意大利援助的第一次试探（1854年4月）因此失败了。可是，加富

尔在国王的压力下终于采取了支持西方的政策，尽管有人反对，尽管有法国对奥地利的12月22日的保证，尽管同盟国所作出的任何安排的真正价值都不能写进这些安排之中。1855年1月10日，撒丁参加英法联盟，并于1月26日与英、法签订了军事和财政协定。不论加富尔的直接动机是什么（参见原文第569页），他把撒丁岛暂时置于与奥地利同一阵营的冒险行为，后来显示出他的政治家手腕的水平。他所获得的是撒丁乃是一个盟国而不是一个附属国，它所拥有的1.5万人的军队应像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那样行动，在和平会议上应有代表。然而，一系列事件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奥地利与西方联合将会一无结果，正如撒丁与西方联合一样。

拿破仑与帕默斯顿以不同方式正在思考土耳其以外的欧洲问题。拿破仑希望这次战争或许会使芬兰归还给瑞典，并给予波兰自由。法国向瑞典表示友好，德律安·德·吕在他去参加维也纳会议（1855年4月）的途中在伦敦与克拉伦登讨论了波兰问题。随后，拿破仑公开谈论意大利和莱茵河左岸所发生的变化。英国朝廷及皮尔派人士怀疑帕默斯顿有类似的策划。^[22]拿破仑过于摇摆不定，帕默斯顿则过于多疑，因此未能制订出把即将召开的会议开成像维也纳会议那样开明的会议的实际计划。不过，帕默斯顿准备广泛寻求确保不受俄国侵扰的措施：用克拉伦登的话来说，就是在它周围建立“一道长长的屏障”。^[23]首先他注意到波罗的海方面，因为在那里内皮尔的舰队已经取得了一条即使无益也给人深刻印象的通道。瑞典在挪威—芬兰边界问题上同俄国有过一次争执，看来是一个有希望的盟友。但是，奥斯卡国王不喜欢斯堪的纳维亚自由派人士对西方盟友所表示的热忱，而在1853年12月与丹麦联合发表了一个中立声明。然后，当西方的军事前景有所改善，同时帕默斯顿也积极起来时，瑞典鼓起了勇气，丹麦国王也宣布他将在对俄国采取的任何措施中跟瑞典一致行动。最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得以腾出部队增援波罗的海海军的作战行动以后，康罗贝尔成功地缔结了一项条约（1855年11月21日），由英法双方保证在瑞典面临俄国的要挟或侵略时予以支援。帕默斯顿从这个条约中看出了“防止俄国在挪威沿海”或波罗的海其他地方“建立一个强大海军基地”的办法。^[24]他想通过早在1855年3月建议的破坏奥兰岛上的防御工事，使人们理解这个有利方面。

其次帕默斯顿注意到高加索。1855年4月他表示赞成切尔克斯人脱离俄国和土耳其的统治而独立。在战争初期，俄国就是从切尔克西亚入侵土耳其，占领了控制英国通向波斯的贸易路线的巴亚泽特，现在又威胁着卡尔斯。英国特派员威廉斯将军同土耳其军队和少数英国军官组织了卡尔斯城的保卫战。但是，1855年11月28日卡尔斯城陷落了。愤怒的英国公众现在开始同帕默斯顿一样“极其重视”^[25]卡尔斯城和切尔克西亚了。除了黑海以外，如果能使希腊成为一个效忠于西方的稳定的王国，它可能成为又一个抵御俄国的堡垒。但是，它的不稳定性却证明是无可救药的。再者，1854年春季奥托国王已经准备同俄国一起入侵土耳其。根据1832年的条约，俄国是一个像英法一样的有保护作用的大国。随后联军占领了比雷埃夫斯（5月26日）。尽管帕默斯顿勉强克制住不使用军队去强迫进行改革，他仍希望在缔结和约时通过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去进行一些改革。

1855年秋，帕默斯顿正在策划一场夺取喀琅施塔得，并把俄罗斯人驱逐出格鲁吉亚和切尔克西亚的新战役，但是，拿破仑不管民族主义者对意大利和波兰的态度如何，拿破仑却倾向于和平，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满足了法国公众的愿望，仍旧使拿破仑希望温和的条件或许能让他与俄国修好，又不致失掉与英国的联盟。具有和平迹象的巴黎博览会为德国密使们的非正式试探提供了掩蔽处。他们给圣彼得堡以及法兰克福带去了和平的保证。12月，涅谢尔罗迭的女婿、萨克森驻巴黎的公使泽巴赫代表拿破仑试探了圣彼得堡的态度，同时戈尔恰科夫在维也纳与莫尔尼公爵进行了接触。

布奥尔已恢复了他作为调停人的作用，而且已就准备递交给俄国（11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的条款与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布尔凯尼取得一致意见。英国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因而当该备忘录被送去请它接受时，它有几分粗暴地拒绝了。它甚至表示要继续与土耳其和撒丁一起单独作战。在现任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西摩的协助下，11月24日又重新草拟了一份较易接受的备忘录。但是直到12月下旬，奥地利才把这些条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递交给圣彼得堡，限期为1月18日。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讲和，唯恐形势越趋恶化。瑞典条约、拿破仑有关波兰和英国在切尔克西亚的利益的态度使得他害怕另一次战役或许会以丧失领土而告终。财政的负担、征兵和新兵训练方面的困难，以及农民不满的怨声等也都是令人沮丧的。^[26]另一方面，在卡尔斯的胜利容许俄国

接受和平而不蒙受耻辱。可是，亚历山大不喜欢奥地利出面调停，尤其厌恶备忘录中的第五项条款，该条款容许盟国方面在四项条款以外再提出一些要求，这些要求是根据战争中得到的好处而提出来的。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一条。俄国的犹豫不决恰好给普鲁士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普鲁士尽管拥有一支40万人的军队，却只能扮演第二流强国的角色。由于在柏林的政界里的意见分歧，曼陀菲尔缺乏统治才能，更主要的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行事慌乱而烦躁，致使普鲁士的力量削弱了。然而，国王决不容许普鲁士紧跟在奥地利后面跑，也不愿严重危及它同俄国的关系。因而，亚历山大欢迎普鲁士的干涉，以便尽量缩小他向奥地利屈服投降的形象。布奥尔需要得到支持，因而立即提议，如果俄国拒绝最后通牒，在盟国商议进一步措施时让普鲁士也参加。普鲁士也相应地支持与沙皇谈判的条件（12月30日和1月6日），同时取得了奥地利的允诺，支持它参加和平会议的要求。接着，俄国接受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1月16日），巴黎被选定为大会的地点（1月23日），把原则上同意的一些条款都记录在2月1日的议定书里，大会全体会议的议程以及在3月31日以前停止地面作战的停战宣言（2月25日）也相继议定了。

战争的结果已在许多方面显露出来。伤亡相当严重。法国派出了按1832年征兵法所征募的30.9万多名士兵到克里米亚战场，其中1.1万名被打死或因伤致死，2.1万名死于疾病。英国方面通过志愿参军派出了9.6万多名士兵。其中2755名阵亡，11848名因伤致死，17799名死于疾病。根据俄国卫生部1853年7月至1856年7月的统计报告显示，俄军损失达50万人^[27]。虽然俄国名义上有100万军队，但1855年9月份只有15万人驻扎在克里米亚，在亚洲地区作战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28]，这个损失数字看来是估计高了。土耳其方面的伤亡人数不详。众所周知，许多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英国军队中，发生了许多可以避免的不幸。随军记者在1855年以后利用巴拉克拉瓦至瓦尔纳的海底电缆打电报发布新闻，详细而迅速地公布了指挥失当的情况。在英国，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军队管理系统的改组。原有的几个部门都合并起来，统归陆军大臣和总司令领导。民兵组织、军用被服厂、军粮部门、军械部门，包括工程兵和炮兵都从其他部门或从独立的编制分别转移到陆军部或骑兵禁卫军。陆军大臣不再兼管殖民地事务（1854年）而担负起作战大臣的责任，这个职务后来在1863年被法令撤销。

关于辅助部队方面，陆上运输兵团于1855年成立，陆军军医署总监的职权扩大了，管理陆军医院的后勤总长的职责范围有了明确规定。陆军医学院，包括采用氯仿麻醉的外科新技术，医院新技术，包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所倡导的现代护理技术等都是从克里米亚战争流传下来的东西。英国军队现代化的附带特点有：营房的改良，买下奥尔德肖特（1853年）后训练营的发展以及政府军火厂的扩充等。这些变革与1849年开始，并在格莱斯顿就任第一任财政大臣期间推行的一个走向废除恩赐官职权和强调效率的文官制的广泛运动是一致的。财政方面所受的影响要比行政方面的小；因为战争所花的费用与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相比是微小的。全国范围的商业都很活跃，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军火工业部门又提供了额外的就业机会。格莱斯顿编制1854年度的两份预算，主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开支；而G.C. 刘易斯爵士在1855年则更多靠借款。在战争花费的7000万英镑中，差不多有3800万英镑来自税收，其余部分则靠贷款解决。战时财政实际上意味着所得税的保留与增加，一直到1860年应该结束时还在沿用，后来成为英国税收制度中一个长久固定的部分。

法国政府较好地承担了战争的额外需求，陆军部在征召后备军以及采纳一些为保存军队所需食品而提出的发明等方面所作出的一些安排，表明其适应性是很强的。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战争对投资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忠诚会有什么影响。战争经费靠贷款来解决，在1854年3月、1855年1月和7月一共举债三次。每次贷款的数目都比前一次大，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容易借到。因为贷款都是直接由公众认缴而筹集的，其成功看来是公众对政府信任的证明。然而，拿破仑不愿意过分地考验法国的财政力量，到1855年秋季，看来他生怕这气泡会突然爆裂。他也对城市产业工人的状况感到紧张不安，因为1853年和1854年这两年里酒类原料和谷物的歉收，已促使食品价格上涨并造成了工业萧条，从而导致了失业，只有那些为克里米亚前线运送兵员和货物的港口以及某些受到特殊优待的工业部门除外。但是，总的来说，战争却显示了法国出乎意外地良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安定局面。

对比之下，战败的俄国却受到很大的影响，濒临革命变革的边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把它的一些重大内部问题带到了危急的关头。在沙皇统治的结构内部发生了一次社会与经济革命。以1861年的农奴

解放和法典的编纂与革新（参见第14章，原文第369—380页）为中心的60年代的“大改革”，都是与战败的后果有些关系的。

英法与土耳其的独特的联盟把更多的欧洲人带到了奥斯曼幕后，大概也引起了一种更现实主义的土耳其方式的改革和西方化。在另一方面，这样做的代价造成了纸币的贬值（纸币已大部分代替了硬币），从而促使物价直线上涨，苦难与骚乱频繁发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补救日益恶化的财政管理失当，直到1859年才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也无法制止苏丹独断专横的个人开支，因而正规的预算也无从制定。眼前的急需只能依靠外债来解决。在法国与英国的担保下，1854年和1855年借了两笔外债。在下一轮东方危机来临之前，土耳其还得签订十多个贷款合同。从那时起，欧洲一些债券持有者便成为一股关心土耳其改革的新兴力量，而他们得到保证的权利，为他们在土耳其一旦违约时干涉其内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会议于2月25日在巴黎开幕。英国和俄国是主要对手。英方代表克拉伦登和考利感到有些孤立，因为法国和俄国之间已开始恢复友好关系，克拉伦登给法国的首席代表瓦列夫斯基起了一个绰号：“第三号俄罗斯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亲王在布伦诺夫支持下，凭他的才干、礼貌和坦白直率为俄国充当了一名很好的谈判者。英国为建立一个可能防止或延缓俄国重新对土耳其进行侵略的安全体系而斗争。它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把俄国的南比萨拉比亚移交给了土耳其，并将其并入摩尔多瓦。这样一来，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就把俄国从多瑙河河口向后推了（第20条及21条）。帕默斯顿对此非常重视，并且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这是奥地利的而不是英国的利益的主张^[29]。然而，这个安排的寿命是短暂的，只维持到1878年。其次，该条约结束了俄国想按照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而行事的要求，同时也制止了它根据这个要求而采取行动。欧洲而不是俄国被承认为罗马尼亚两公国和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者（第22款和第9款）。欧洲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第7款），今后凡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强国都必须寻求第三者的调停而不得径自诉诸武力。4月15日由英、法、奥签订的一项单独的三方条约加强了这个保证。最后，结束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海军优势；因为黑海已中立化（第11款）而不再是俄国的一个内陆湖了。1841年的海峡公约为一个新公约所取代，该新公约规定了当土耳其政府处于和平状态时，遵守封闭海峡的规定。这些海事方

面的安排措施对俄国的傲慢自大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中立化与封闭在一起虽是对俄国的有效约束，但丝毫不能阻止土耳其在海峡中或在马尔马拉海上保持一支舰队，在战时它能随时召唤一个盟国通过海峡，这个盟国会发现俄国手无寸铁、不堪一击。可是，这个中立化局面仅仅维持了15年。1871年3月签订的《伦敦条约》认可了俄国1870年11月宣告巴黎条约无效的声明。

处于土耳其宗主国保护下的，经过改革而心满意足的罗马尼亚两公国，将会给俄国的侵略设置第四个障碍。有关改革政府的一些措施须由一个欧洲委员会作出计划，该委员会须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磋商（第22—27款）。罗马尼亚统一与独立问题的提出，打乱了这些计划。拿破仑早在1856年1月就提出统一的建议，尽管帕默斯顿表示反对，认为难以执行，而且很可能激怒奥地利和削弱土耳其，但瓦列夫斯基在3月6日又向大会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于是1858年8月这两个公国获得了小部分行政方面的统一，到1859年有了一个共同的总督，但是，这有损于英法双方的友好关系而丝毫无损于俄国。接着，该条约想通过改善苏丹与他的基督徒臣民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土耳其本身。帕默斯顿在大会召开之前，在参加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大使们的劝告下^[30]，希望能劝说他就这个问题和公国问题制定立法。但是，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而且在同法国争吵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而是一个不合作的谈判者。但是，苏丹被劝说于2月21日发布了一道敕令。于是该条约记下了这个行动以及苏丹要把这个文件传达给各签约国的意图，各签约国反对单独或共同干涉土耳其的国内事务。敕令宣称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法律面前、在担任公职、在宗教信仰自由、在维护教堂与学校的权利以及参军等方面一律平等。因此，会议同意接纳苏丹加入欧洲“公法”，并加入欧洲列强大家庭。这个条款虽然是由于讨论苏丹及其基督徒臣民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却在条约中首先写明了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最后，在波罗的海方面，通过一项英俄双方单独签订的条约，俄国被迫拆毁奥兰群岛上的要塞。

这些安排并不等于帕默斯顿的政策能够充分实现。从2月17日克拉伦登到达巴黎之时起直到3月8日，英国一直在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方案而斗争，但被俄国挫败了。它要求亚速海中立化，并拆毁在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议定书里记录有俄国的保证：俄国只利用这些地方建

造仍旧允许进入黑海的小型船舶，但不应将这些地方中立化。另外，英国在切尔克西亚独立的问题上也遭到了失败，尽管在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并略微改变俄土双方在亚洲地区的边界状况方面有所收获。克拉伦登相当贬低帕默斯顿的切尔克西亚计划。姑且不论其可行性如何，在俄国坚持1829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条款，并在法国的鼓励下坚持不包括这一点的二月议定书的条款的情况下，要对俄国施加压力也是困难的。他为了取得对比萨拉比亚更大的割让而艰苦斗争。但是，克拉伦登在争取拿破仑的支持以反对俄国这一点上却是一个拙劣的求情者。在单独与奥尔洛夫斗争将近两星期后，3月8日他反而屈服于一种几乎与法国决裂的选择办法。^[31]边界线将按照俄国的要求来划定，但是仍然使俄国不能进入小舰队可以通航的普鲁特河下游地区，这是帕默斯顿可以聊以自慰的^[32]。

奥地利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项条约充分保障了它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它必须在俄土和约签订后撤离两公国，并在1857年3月撤离了。比萨拉比亚的割让是一个实质性的收获，但是通向罗马尼亚统一与独立的道路却大大减少了它对于为两公国所作的安排感到满意的程度。这项条约为改善多瑙河的航运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这也是一项收获，但是它主张多瑙河上游及周围地区不受国际委员会的约束。在这两方面奥地利向英国作出了让步。

普鲁士在谈判的危机过去后参加了巴黎的谈判。它提出的议题是修订1841年海峡公约，因而它的参加也严格限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普鲁士在一场避免把这个限制记录在条约中的谈判“闹剧”^[33]中遭到了失败。

法国从这次会议及条约获得了一定的威信，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在大会期间，拿破仑更感兴趣的是改善法国同俄国的关系，而不是采取措施来限制他的野心。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想维持与英国的结盟。他对总条约及4月15日三国条约（在最后一刻他想从三国条约中把自己解脱出来）^[34]所承担的义务，与其说是保持与奥斯曼帝国的结盟，不如说是作为保持与英国的结盟的一种手段。他也没有很多理由对一些他感兴趣的、更为广泛的问题的处理感到满意。

条约签订后，会议转到这样一些问题。拿破仑和克拉伦登已经就波兰问题写信给奥尔洛夫。1855年11月拿破仑曾威胁要把波兰的自由

作为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在，他同克拉伦登只想为俄国改变其波兰政策而寻求一项公开保证，最后甚至连这一点也放弃了。在希腊问题上，帕默斯顿试图说服法国和俄国与英国联合起来共同给奥托国王施加压力，要他改革政府，但是没有取得成功。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结局也不比波兰和希腊的自由好多少。早些时候的关于将帕尔马和摩德纳割让给撒丁以及派一名它们的官吏去治理罗马尼亚两公国的计划，在会议的现实气氛中消失了。终于意大利问题在普遍哀叹欧洲局面动荡的发言中被提了出来，而克拉伦登对奥地利人、罗马教皇以及那不勒斯人对国家管理不当的指控却在议定书中降低了调子。最后，英国在4月14日签订的第23项议定书中载入了一项关于下述意见的记录，即赞成在诉诸武力之前应先求助于第三国的调停。这全凭克拉伦登自己的力量，并且预示着他的1869年裁军建议（参见原文第585页）的趋向，同时也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的科布登派的绥靖主义。英国另一个想通过主张粮食及原料自由贸易的决议案的主张流产了。会议最后一天，4月16日，签订了有关海事法的巴黎宣言。英国把非做不可的事装作出于好心才做，接受了国旗保护货物的原则，得到的报偿是正式废除私掠巡航。

在外交史上，克里米亚战争起着溶剂的作用，许多被认为是外交上正常的东西都消失了。尼古拉和涅谢尔罗迭的政策原来预想是俄奥双方的合作。但是，俄国再也不能指望奥地利了。奥地利在战争期间的态度，它在强求割让比萨拉比亚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它同英法签订的被视为联合契约的三国条约等，都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奥地利和俄国都在外交上衰落了。“欧洲宪兵”这个鬼怪已经被驱除。像奥地利一样，俄国将成为“泥足巨人”。俄国像奥地利一样转向法国。涅谢尔罗迭写道：“我们的全部努力必须是为了保持与拿破仑的亲善关系”，这是防止再度出现敌对的联盟的唯一保证。^[35]然而，虽然奥俄双方都倾向于法国，但1756年的联盟的逆转决不能在1856年重演。不到三年时间，奥地利就同它的1854年和1856年的新盟友作战了，而在弗兰茨·约瑟夫眼里，1859年的战争期间开始为他动员的普鲁士才是他唯一忠诚的朋友。亚历山大也觉察到法国是一个难对付的伙伴。从一开始他就害怕被拖着跟在拿破仑的野心后面跑。然而，他在1859年3月3日同拿破仑签署的答应在一次可能发生的奥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条约，几乎使他危险地卷入了拿破仑支持民族主义以及他推翻维也纳会议决议的活动。亚历山大也还记得，在列强中只有

普鲁士没有在战争中抱有敌意。1863年俄法友谊在波兰这块礁石上破裂，于是俄普联盟又恢复了。这样，克里米亚战争仅仅打破了欧洲关系的东方格局，但它难免会再次出现，不过是作为一个围绕着普鲁士或德意志的枢轴转动的集团而不是围绕着俄奥轴心转动的集团再次出现。

同样地，这场战争给了东方问题以新的形式。它推迟了土耳其的崩溃和对它的瓜分，并在它的帝国周围设置了一道防御屏障。在这道屏障内，三国联盟，特别是英法联盟，应该是起着加固钢的作用。这场斗争再也不是仅仅存在于贪图领土的俄国沙皇与无力防御的受害者苏丹之间，更不仅仅存在于东正教与穆斯林之间。然而，西方的情绪将来会被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争取自由、摆脱外族统治的斗争，以及争取行政保障或宪法权利，反对专横的压迫的斗争煽动起来。在俄国，人们的想象力会对斯拉夫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团结作出反应；因为战争已破坏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而使得沙皇对东正教基督徒的家长式统治过时了。此外，主要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俄英双方的敌意并没有减弱。要使1856年的一些安排成为永久性的乃是根本无法指望的事。亚历山大二世决心要推翻在比萨拉比亚和黑海问题上所作的让步。自1856年起担任外交大臣的戈尔恰科夫抱有必胜信心，因而经常在讲话中形容该条约为一幅“充满漏洞的屏幕”。^[36]对帕默斯顿和克拉伦登来说，这个条约听任俄国过于强大，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们认为“将来只有好自为之了”。^[37]他们对三国条约也缺乏信心，这个条约毕竟是奥地利倡导的，对与法国的联盟则更缺乏信心。用帕默斯顿的话来说是“一个夏季的”合伙关系^[38]，其价值到1860年已丧失殆尽了，而三国盟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当时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虽已停止，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一次新的东方危机中，英国可能会发现它自己处于孤立地位，而且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执行旧的反俄路线就需要反对民族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的事业，而它是同情这些事业的；执行新的自由主义的路线，就需要包括一项允许俄国为所欲为地反对土耳其的政策，而这是违反它的利益的。土耳其再也不能依靠英国或法国或奥地利的军火支援来反对俄国了。如果在列强就共同关心的土耳其问题所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的新的出发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它们中间对土耳其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的某些修改会取得一致意见，这些

修改可能会终止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预示的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类似的敌对状态。

（许邦兴 译）

[1] 例如A. W. 金莱克《入侵克里米亚》（伦敦，1863—1880年），第1卷，各处。

[2] 例如P. 德拉戈尔斯《第二帝国史》（巴黎，1894年），第1卷，第201页。

[3] 夏尔-H. 普塔：《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1848—1860年》（巴黎，1948年），第468页。

[4] 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E. M. 和E. 艾夫林编，伦敦，1897年），第322页；1853年至1856年间所写有关克里米亚战争事件的书信的一本重印集。

[5] 1852年12月20日（公历1853年1月1日）涅谢尔罗迭给沙皇的报告，见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1卷，第2部，第355页。

[6] 参见尼古拉关于1852年12月8日（公历20日）布伦诺夫紧急公文的备忘录，见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1卷，第2部，第348—349页。

[7] 尼古拉的亲笔札记，未注明日期，但显然写于1852年12月，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1卷，第2部，第357—358页印有法文原本。

[8] 见他就罗素1853年2月9日致西摩的信（2月21日送交）所作的笔记，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1卷，第2部，第364—365页。

[9] S. 莱思·普尔：《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传》（伦敦，1888年），第2卷，第261页。

[10] E. 阿什利：《帕默斯顿传，1846—1865年》（伦敦，1877年），第2卷，第45页。

[11] 尼古拉1853年5月18日（公历30日）致弗兰茨·约瑟夫函，引自H. 施利特尔《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统治时期的结束》（维也纳，1919年），第93页。

[12] 尼古拉1853年5月17日（公历5月29日）致帕什克维奇函，见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1卷，第2部，第437—438页；参见A. P. 谢尔巴托夫《陆军元帅帕斯克维奇亲王》（圣彼得堡，1888—1904年），第7卷，第54页。

[13] 见尼古拉7月29日（公历8月10日）给布伦诺夫的指示，见E. V. 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莫斯科，1941年）第1卷，第331页。

[14] 弗兰茨·约瑟夫致尼古拉函，7月21日；参见1854年1月7日约瑟夫给尼古拉的信；H. 施利特尔《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统治时期的结束》（维也纳，1919年），第94—95、98页。迈恩多夫致涅谢尔罗迭，旧历7月15日（公历27日），报告与布奥尔会谈情况，P. 冯·迈恩多夫：《公私信件（1826—1863年）》（赫茨希编，柏林，莱比锡，1923年），第3卷，第49页，参见E. V. 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莫斯科，1941年）第1卷，第324—325页。

[15] 10月19日（公历31日）涅谢尔罗迭通函；10月9日（公历21日）尼古拉致缅希科夫信，见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2卷，第3部，第170页。

[16] 涅谢尔罗迭，1853年10月5日（公历17日）致布伦诺夫信，见E. V. 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莫斯科，1941年）第1卷，第368页。

[17] 参见尼古拉的批语：“这就叫战争！”写在1853年10月26日（公历11月7日）布伦诺夫致涅谢尔罗迭函上；F. F. 马唐斯：《俄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集》（圣彼得堡，1898年），第12卷，第330—331页。

[18] 参见缅希科夫在克里米亚指挥作战时于11月6日（公历18日）给海军上将科尔尼洛夫的信，他传达沙皇的命令时，尽量缩小原意。见A. M.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东方战争，1853—1858年（圣彼得堡，1908年）》，第2卷，第1部，第300页。

[19] 其内容见F. 瓦尔塞基《克里米亚协定》（米兰，1948年），第479页。

[20] 帕默斯顿1855年3月11日、4月16日致克拉伦登，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集，博德利图书馆，克拉伦登部分，第31章，第49、126号。

[21] E. 哈蒙德1855年3月23日给他妻子的信，见政府档案馆的哈蒙德私人文件，英国外交部，391/31。哈蒙德是罗素的秘书。

[22] 德·阿泽利奥1855年2月9日致加富尔信，见《加富尔与英国人》（博洛尼亚，1933年），第1卷，40页。

[23] 克拉伦登致玛格尼斯（斯德哥尔摩），1855年10月18日，英国外交部73/269，转引自P. 纳普隆德《1836—1855年英国外交中的芬马克》，《美国历史评论》（1925年4月号）第30卷，第499页。

[24] 帕默斯顿1855年7月26日致克拉伦登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31章，第358号。

[25] 1855年8月3日帕默斯顿致克拉伦登，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理部分，第31章，第381号。

[26] 关于1855年12月20日（公历1856年1月1日）和1856年1月3日（公历15日）会议中的讨论情况，见E. V. 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莫斯科，1945年），第2卷，第406—411页。

[27] M. I. 波格丹诺维奇：《东方战争，1853—1856年》（圣彼得堡，1877年），第4卷，第413—415页。

[28] M. I. 波格丹诺维奇：《东方战争，1853—1856年》（圣彼得堡，1877年），第4卷，第184、192页。

[29] 1856年1月16日，2月25、27、29日及3月2日帕默斯顿致克拉伦登，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49章，第27号，第134页及以下各页。

[30] 见1856年1月11、18、21、25日、2月1日克拉伦登致斯特拉特福德信，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135章，第66、102、124、150、193页。

[31] 1856年3月8日克拉伦登致帕默斯顿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35章，第363页。

[32] 1856年3月9日帕默斯顿致克拉伦登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49章，第164页。

[33] 1856年3月22日克拉伦登致帕默斯顿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135章，第438页。

[34] 1856年3月31日克拉伦登致帕默斯顿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135章，第486页。

[35] 1856年4月5日涅谢尔罗迭致奥尔洛夫，见E. V. 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莫斯科，1941年）第2卷，453—454页。

[36] 例如，见布坎南1870年11月20日致格兰维尔信，格兰维尔私人文件，伦敦档案局，30/29/97。

[37] 1856年3月7日帕默斯顿致克拉伦登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49章，第155页。

[38] 1856年1月9日帕默斯顿致克拉伦登信，见克拉伦登私人文件，克拉伦登部分，第49章，第15页。

第十九章 普鲁士与德意志问题， 1830—1866年

德意志统一的形式问题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决议的性质提出来的。它没能满足那些想要看到从拿破仑战争的混乱中产生的某种形式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的人们的愿望。在各个邦实行宪政改革的期望也没有充分实现。在维也纳成立的德意志邦联证明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行不通的妥协。在普鲁士，1808年以后改革时期的许多工作都没有完成。梅特涅统治下的奥地利却提供了一个反动的模式。自1819年以来，这个模式一直为其他大多数德意志邦所仿效。在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后的10年之中，无论是关于宪法改革还是关于德意志统一方面的政治问题的讨论都很难进行，政治行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1830年7月的法国革命发出了在整个德意志复兴自由主义的信号。很少爆发真正的暴力行动，它们的影响也很小。在不伦瑞克，一位不得人心的公爵被他的兄弟取代；黑森的选帝侯，由于人们憎恨他的专制统治和他那挥霍无度的情妇，被迫颁布了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却一再遭到破坏。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其他地区发生了较小的骚乱，几个月以后，在汉诺威王国的格丁根大学的师生们占领了市政厅。1831年的波兰民族起义，在德意志唤起自由主义热情方面几乎和七月革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波兰代表参加了1832年5月在巴伐利亚的巴拉丁的哈姆巴赫举行的自由派分子的集会。这次“哈姆巴赫节”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教授、学生、律师、作家——的一次示威，表达了他们主张建立立宪政府和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复兴运动。这不能不令人回忆起1817年的瓦尔特堡节，其政治效果也确实很相似。梅特涅和奥地利政府已经在考虑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自由主义的复兴运动，而哈姆巴赫的示威足以克服其他一些邦的犹豫。因此，德意志大多数政府都在6月接受了维护君主政体的六项条款，它使人们回想起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尽管有法国七月革命的榜样，“梅特涅体系”看来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随着六项条款里所包含的原则以及类似的措施的

实施，自由派蒙难者的名单扩大了。比如，在普鲁士，被流放的海涅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在1835年遭到禁止；而在汉诺威，1837年7名格丁根大学教授由于抗议新国王（原坎伯兰公爵）违反宪法而被解聘。

较恢复对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在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所引起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因为它既影响了德意志一些邦的组织体制，也影响了整个德意志。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经济上的统一，从而改善了贸易，鼓励了工业，并导致德意志铁路系统中第一批路段的建设。（德意志的第一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于1835年12月正式通车。）尽管德意志东北部的汉诺威、奥尔登堡、不伦瑞克各邦和参加汉萨同盟的一些城市，由于依赖海上运输和英国的支持，仍然留在关税同盟之外的一个竞争性组织税收同盟中，但是普鲁士体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使它们不能长期处于关税同盟之外。不伦瑞克在1844年，汉诺威在1851年，奥尔登堡在1852年，先后加入了关税同盟，只有汉堡和不来梅还保持其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一直到1888年为止。

然而，尽管有了关税同盟，在建立帝国之前，德意志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是，交通的改善和工业的发展很快就产生了政治影响。人口的增加及其较大的流动促进了新工业区，尤其是鲁尔区和莱茵兰的发展。这些又成为普鲁士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商业界的新领导人物加入了已经组织了自由党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例如达维德·汉泽曼和卢多尔夫·坎普豪森在发展工业和铁路事业中积累了财富，并使他们的政治活动具有务实精神而且追求实际需要。取消贸易上的限制，中产阶级进入政府参加管理，以及削弱普鲁士旧贵族的势力，这些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的主要目标。到1840年，有些目标看来似乎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人们普遍期望在这一年登上普鲁士王位的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会开创一个政治变革的新时期。

到1840年，普鲁士邦已巩固了它在1815年得到的利益。尽管由于逮捕科隆和波森的大主教，1837年莱茵兰和波森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在不同宗教通婚所生子女的教育这类问题上的争论达到了顶点，但在这个新的统治时期依然出现了普鲁士邦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和解。这位新国王对天主教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感情（他对英国的牛津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的同情具体表现在他在1842年重建科隆大教堂中所

起的作用（参见第6章，原文第139—140页）。与此同时，尽管当地居民为保留法国人传入的法典的优点而作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法国行政当局在莱茵河地区的影响却已被忘却。成功地吸收几个新省份的问题表现在1840年的国际危机之中，当时，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守卫莱茵”（取自马克斯·施内肯贝格尔所作的一首歌曲的歌名）。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整个内容中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口号——比如霍夫曼·冯·法勒斯勒本的歌曲《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和尼古拉·贝克尔的“自由德意志的莱茵，不应该属于他们”。

成功地吸收几个新的普鲁士省份，与建立关税同盟一样，也是普鲁士官员们的功绩。他们使普鲁士的管理体制，特别是教育制度，为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人士所羡慕。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不仅仅是基于对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改革的怀念。普鲁士官僚政治正在产生一个由开明的家长式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新阶级，以加强传统的容克统治阶级，而普鲁士行政管理阶级的工作效率和忠诚，势必成为未来任何统一德意志的主要基础。来源于康德学派的对履行义务的绝对服从和来源于黑格尔的国家的要求高于一切的意识，产生了一个开明的专制制度的理想机构。黑格尔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他的著作可以激励普鲁士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话，那么这些著作也可以激励革命。国家是理性的体现这一学说，也可以改变成如果现存的国家不能体现理性就应该把它推翻这样一种学说。这样，“青年黑格尔派”就有助于激励1848年的革命，他们在莱茵河地区的自由派人士当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卡尔·马克思曾经在1842年的一个短时期内担任他们的一家报纸《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本人就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中的杰出人物。

“梅特涅体制”尽管有着明显的稳定性，却正在被削弱，这不仅是由于知识的发展，而且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的缘故。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有一些新的君主，似乎难以像他们的前任那样保持现行的制度。在奥地利，1835年登上王位宝座的皇帝斐迪南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而梅特涅的地位随着他的对手们的影响力的增长，也就不那么牢固了。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之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位新国王是在保守的浪漫主义思想复兴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复兴热衷于中世纪思想和制度。这位国王病态的幻想和虚荣心是由瑞士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冯

• 哈勒尔的学说孕育而成的。哈勒尔宣扬“基督教世袭国家”的理想。在这种国家里，各社会阶层团体都有条不紊地团结在一个仁慈的基督教国王的权威之下，接受上帝恩赐的统治。他对德意志浪漫主义的过去的热情，使许多人希望他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实现德意志在更大程度上的统一。然而，他对传统和对中世纪制度的感情也使他接受哈布斯堡王室的至高无上权威作为德意志的“首要王室”。这样，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没有马上出现麻烦。

然而，他的即位却得到了所有那些希望有一个能够促成政治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政策的人们的普遍欢迎。也有迹象表明他准备在国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开明的措施。例如，解放战争时的旧陆军大臣博伊恩恢复了职务；检查制度放松了；那些由于自由主义言论而受到过迫害的人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恢复了名誉。黑格尔的老对手谢林也回到柏林大学任教。人们希望这位新国王最终会同意将他父亲在1815年5月允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制度颁布出来。然而，对他的政策的失望情绪不久就开始表现出来。检查制度的放松仅仅促使人们更广泛地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个别几个普鲁士省的议会在1841年举行了四年来的第一次会议。他们进行的辩论所公布的情况，透露了改变宪法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各届会议上都有所增加。在东普鲁士，约翰·雅各比强烈要求出版自由；在波森，波兰人批评了普鲁士的统治；在莱茵兰，由坎普豪森、汉泽曼、赫尔曼·冯·贝克拉特和古斯塔夫·梅维森领导的新自由党不断地要求履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1815年许下的关于立宪的诺言。

然而，这位国王的“世袭国家”的思想与他的自由派臣民的立宪计划相差很远。他尽量推迟行动，并设法通过建立一个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办法来满足自由派人士的要求。虽然他一直拖延应付到1847年才妥协，但他终于在这一年的2月3日下令召开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一个联合议会，这个议会于4月在柏林召开。国王距离时代的要求究竟有多远，梅特涅在评论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时说得很明白：“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的，莫过于整个讲话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个人哀婉情绪，莫过于这位卓越的演讲人在表达他的自信心时所使用的自命不凡的腔调，莫过于他对时代思想的攻击。”^[1]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议会仅仅几个月即被解散就不足为奇了，自由派议员们的

希望没有得到满足，连会议将来是否定期召开也没有得到国王肯定的许诺。

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不仅仅局限于普鲁士。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困难，国外宣传鼓动的成功的榜样，与国家统一运动的不断发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要求变革的欲望。在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工业区，雇主和学徒们都渴望摆脱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清规戒律；西南地区的自耕农想要废除残存的各种封建义务；在所有的小邦里，包括官员、律师和教授在内的中产阶级，都要求有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德意志来开展更大范围的政治活动。各个地方的政治形势各不相同。在有些邦，比如在两个梅克伦堡，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秩序尚未改变，君主的权力受到由贵族和绅士组成的社会阶层的约束。其他的阶级过于软弱，不可能对现存制度构成威胁。在其他的邦，比如在黑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人们的要求是：在专制君主存在的情况下得到最基本的法律保证。在巴登和符腾堡，存在着有限的但是真正的议会制度，自由派正在为争取扩大公民权，首先是为争取德意志的统一而进行鼓动。在巴伐利亚，关于国王与以洛拉·蒙特茨闻名的舞蹈演员之间的关系的争论，掩盖了教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个主要的政治问题。

不管各个邦的政治和立宪的形势如何，造成1848年的革命形势的，是人数虽少却很活跃的中产阶级想要参与政治生活而提出的种种要求。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只是偶尔（比如在1844年和1845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骚乱中）以一种粗野的形式使人们感到他们的存在。事实上，一旦发生真正的社会动乱（如1848年4月发生在巴登的暴动，或1849年5月发生在德累斯顿的暴动），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就和保守主义者以及正规军联合起来，以镇压激进派的起义。

只需要巴黎二月革命的样板就足以使所有这些不满公开化了，1848年3月德意志革命爆发了。有关这次革命的史实，本卷其他地方另有叙述（参见第15章）。

到了1849年年初，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革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王朝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848年12月2日，斐迪南皇帝把王位让给他宠爱的18岁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4个月以前，意大利战争的第一阶段以奥地利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849年3月，皮埃蒙特人最后在

诺瓦拉战役中被打败。虽然匈牙利的起义直到夏季才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是对这个君主国的完整性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此外，帝国现已有了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亲王这个精明能干、具有了不起的外交天才和坚强意志的大臣。^[2]他不遗余力地为重新确立奥地利在德意志和在奥地利帝国本身的地位而斗争直到去世，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恢复君主国内部的政治秩序。3月，颁布了一部拥护集中制的新宪法，这部宪法把奥地利帝国看作一个单独的整体。施瓦岑贝格准备在德意志奉行独立的政策（参见第20章，原文第526页）。

到1848年年底，普鲁士的革命也归于失败。国王很快便失去了他在3月可能对自由主义稳健派感到的任何同情。柏林议会的气氛越来越激进，自由主义温和派的地位也越来越软弱。虽然像坎普豪森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仍然十分活跃（坎普豪森已经不再担任首相，但他仍旧是普鲁士在法兰克福的代表），但保守主义者却在不断地强大起来，对动摇不定的国王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11月2日，以勃兰登堡伯爵为首组成了新内阁。勃兰登堡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下层社会的女子联姻所生的儿子。12月5日，议会被解散。国王下令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但是宪法里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让步很快就由于1849年5月恢复旧的有限制的选举权而被宣布作废。在随后的一年中，经过反复讨论以后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并于1850年1月公布其最后文本。尽管个人的基本权利好像得到了保证，国王却保留了任命和罢免大臣的权力。如同1862年至1866年将要表明的一样，即使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也完全能够维持下去。

任命勃兰登堡组阁，解散议会，颁布新宪法，所有这些都说明国王是多么听信保守的顾问们的意见。事实上，实权已经落在一部分贵族手中，他们的意见能够通过《十字架报》表达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要恢复专政统治和普鲁士各邦的独立自主。在他们当中，奥托·冯·俾斯麦-舍恩豪森以最杰出的演说家身份开始出名。他热衷于“特殊的普鲁士风尚”，而对民族统一运动则表示怀疑和轻蔑，说它们是“德意志人的骗局”。^[3]1850年11月，奥托·冯·曼陀菲尔当了首相。在路德维希和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兄弟的支持下，他和他的保守的“心腹们”从此享有不容争辩的权力，普鲁士进入了全面反对1848年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时期。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得逞，意味着法兰克福议会不得不在这两个国家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只有得到这一个或者另一个政府的积极支持，德意志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1849年1月在法兰克福议会上通过将自由派的统一德意志新宪法提交审议，因而这个新德意志国家的主权和边界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兰克福议会的最后几个月（1849年1月至4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决定选举一位世袭的皇帝，并决定在3月28日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授予帝位。国王本人奉行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既想保持对哈布斯堡皇室的不切实际的忠诚，又想维护自己的虚荣心（布兰登堡抱怨说：“我们的主子的脑袋跟别人的脑袋构造不一样。”）^[4]。然而，普鲁士大臣们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统一德意志的计划。（这就是后来称为“小德意志”的德意志问题解决办法。）3月，奥地利新宪法的公布，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把奥地利的讲德语的省份分离出来并入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了，因为这时奥地利已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统一的國家了。施瓦岑贝格的目的是要保证奥地利以一个整体加入德意志联邦，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由奥地利皇帝来领导德意志。

“陛下是成为皇帝的第一个德意志王公。根据传统习惯和几个世纪历史的进程，根据奥地利的政治权力，根据尚未废除的邦联制度赖以存在的条约文本，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陛下是不会放弃这一权利的。”^[5]

这样无理地坚持哈布斯堡的权利肯定会失去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支持，因为他们在法兰克福已经投票赞成把讲德语的奥地利省份包括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内（这就是“大德意志”的解决办法），而且给拥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的人扫清了道路。因此，3月28日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普鲁士国王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被选为世袭皇帝。但是，当法兰克福议会主席爱德华·西姆森到柏林去向他加冕的时候，这位国王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认为他的王权是上天赋予的，他只能接受德意志王公们奉献的王冠；而且他在私下轻蔑地说这是一顶“猪冠”，它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而是来自“面包师傅和屠夫”。^[6]他的拒绝实际上等于法兰克福议会及其宪法的结束。尽管这部宪法原则上已经为许多小邦所接受，但是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帝位，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有效行动。随着春季和夏季的过去，法兰克福议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有的辞职，有的被召回，有的干脆不辞而别。在巴登和萨克森，左派

的最后几次起义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了下去。议会已缩小为只剩下激进分子的残余议会。5月底迁到了斯图加特，最后在6月被符腾堡国王下令解散。1848年的革命就此结束。

法兰克福议会为德意志制定新的政治机构的失败，说明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一些个别的邦的政府手里。按照宪法，1849年9月宣布了一项“临时性”的措施：在1850年5月采用正式立宪体制之前，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负责德意志事务。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妥协只能造成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激烈斗争，德意志各邦政府则在这场斗争中紧张地旁观着。

1849年夏，普鲁士终于开始有了一项明确的德意志政策以反对施瓦岑贝格的政策。这是由于约瑟夫·玛丽亚·冯·拉多维茨将军日益增长的影响。虽然他直到1850年9月才担任外交大臣，但实际上他从5月起就在很大程度上负责普鲁士的政策了。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的政治理想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理想出于相同的渊源，因而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这位国王的观点的更一致和稳定的翻版。俾斯麦后来称他为“国王的中世纪怪想法的管理员”^[7]，但是他具有比这句话所暗示的更实际的方针。他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和革命的反派，和格拉赫学派的普鲁士贵族们——他的同僚和最激烈的反对者——不同，他相信为了防止爆发革命，必须对1848年就表现出来的民族要求作出让步。他在1849年4月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必须设法，看看“能否引导我们这个政府在与民主派进行生死搏斗的开始阶段，不要把所谓的德意志派当成自己的死敌”。^[8]他的直接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所提供的机会，他决心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和赢得温和自由派人士在舆论上的支持，办法是帮助满足民族统一的愿望，如果可能，就和奥地利达成协议；如果不可能，就不达成协议。一旦弄清楚施瓦岑贝格不愿意合作，他的第一步就是争取与普鲁士毗连的两个国家——汉诺威和萨克森的支持。5月26日签订了“三王国联盟”，一致同意为建立德意志北方各邦的联盟而努力。其次，拉多维茨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6月他在戈塔，在“最痛苦的无奈，爱国主义的自我克制”^[9]的气氛中召集了有许多前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曾在法兰克福议会中支持过普鲁士享有最高权力的意见的自由派右翼同意了拉多维茨的计划，不过由于这一计划及其发起人的保守主义性质，他们在同意之前颇费踌躇。但是拉多维

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他的普鲁士同僚们。他的民族目标和他的天主教信仰都受到支持“独特的普鲁士”各邦独立自主论的新教徒的猜疑。在遭到了以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和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议会的激烈反对以后，由于国王的支持，拉多维茨才成功地为1850年3月在爱尔福特召开一次议会作出了安排，由来自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各邦的代表参加会议，并由他们组成新的联盟。

因此，秋冬两季都在进行外交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施瓦岑贝格极力分化普鲁士的支持者。因为奥地利也有自己积极的方针政策，不仅仅是维护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传统霸权，新的计划还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奥地利的商业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对于恢复奥地利在建立关税同盟时丧失的经济主动权有明确的主张（参见第20章，原文第530页）。他出生在普鲁士埃尔伯费尔德的纺织工业城，并在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港口发了财。他梦想建立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帝国，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庞大的经济单位，把关税同盟与奥地利在多瑙河流域的经济范围结合在一起。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注定要受到挫折，但是他的计划相当宏伟，足以获得自由派一定程度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施瓦岑贝格的强硬外交政策。

然而，这种外交在1849年冬天，甚至在爱尔福特会议召开以前，就成功地破坏了拉多维茨的结盟计划。汉诺威在开会之前退出了；萨克森、符腾堡和黑森—卡塞尔各邦的政府也已经对这次会议失去了兴趣。此外，奥地利人在1850年2月就已经同意支持不伦瑞克、符腾堡和萨克森提出的修改邦联宪法的方案。奥地利攻击普鲁士计划的宪法依据是德意志邦联仍然存在，而且没有邦联议会的批准，任何改变宪法的企图都是非法的。为了增加批判的分量，在5月10日临时措施期满之时召开了邦联议会。由于一些较小的邦动摇不定，弗里德里希·威廉本人也开始担心，害怕拉多维茨的计划过于自由化，因而爱尔福特会议失败了。另一方面施瓦岑贝格在5月成功地说服邦联议会，威胁要对企图脱离邦联的任何国家采取制裁措施。

1850年秋发生了危机。在黑森—卡塞尔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邦，自由派在拼命保卫1848年所获得的一些进步。这两个邦的君主黑森选帝侯和丹麦国王都希望奥地利和邦联议会支持他们反对他们的臣民。触发这场危机的原因主要在黑森。事实上，施瓦岑贝格是蓄意利用选

帝侯向邦联议会提出的请求，想以此来最后破坏普鲁士的同盟。10月12日，奥地利皇帝会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要维护邦联，如果必要的话，将对黑森进行干预。10月15日，选帝侯呼吁军事援助。

普鲁士在黑森的利益主要是战略上的；黑森的领土把普鲁士王国分割开了，因此普鲁士有权使用某些军事要道。同时，对拉多维茨的政策来说，保持普鲁士对毗邻小国的优势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派军队进入黑森。前者是为了帮助选帝侯，后者是为了保卫军事要道。眼看战争迫在眉睫，11月8日发生了小规模战斗。然而，这时普鲁士政府已经决定进行谈判。他们没有得到沙皇的支持（参见第10章，原文第265页），国王惊慌失措，想到一场德意志人打德意志人的内战就确实感到害怕。拉多维茨和王位继承人——普鲁士王子，准备向奥地利挑战，但是勃兰登堡和曼陀菲尔宁愿作出让步，而不愿破坏他们所认为的保守主义国家之间的天然团结，也不愿破坏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反对自由主义过程中传统的合作关系。拉多维茨于11月3日辞职。他的联盟计划已经失败了。11月6日勃兰登堡突然去世，由当时的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奥托·冯·曼陀菲尔接任。曼陀菲尔不久就开始进行谈判。在俄国调解的帮助下，他会见了施瓦岑贝格，并于1850年11月29日与他在奥尔米茨达成了协议。放弃同盟计划，把修改邦联宪法的问题交给德意志各邦君主自行决定。

战争是防止了，但代价是普鲁士在外交上的失败，这比奥尔米茨协定的实际条款更为严重。对许多普鲁士人来说，奥尔米茨协定一直是一种耻辱的象征。直到1866年的克尼格雷茨战役获胜才使这一羞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根据在奥尔米茨达成的妥协方案，邦联宪法将在1850年12月至1851年3月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一次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上自由修改，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对这一方案完全满意。

在德累斯顿作出的决议是1815年的邦联宪法应予恢复。既然如此，对曼陀菲尔和普鲁士保守派来说就是一个胜利，因为他们想要恢复的体制，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捍卫一个保守的、传统的德意志以反对革命的体制。然而，对于很多普鲁士人来说，不管他们是相信过1848年的自由主义理想，还是相信过拉多维茨的建设性保守主义，这都是一个令人深为不满的安排；过去3年的努力白费了，而且“奥尔米茨的耻辱”看来比恢复旧的邦联更为重要。施瓦岑贝格得到的利益也

比他预料的要少。他想要奥地利主宰新的邦联，他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奥地利可以控制的强大的行政部门，而且整个奥地利都应该加入这个邦联。施瓦岑贝格想把一些较小的邦排除在中央行政部门之外的愿望，使曼陀菲尔能够在谈判进入最后解决以前摆出一副这些小邦的支持者的姿态。所以施瓦岑贝格最后只好放弃那些更加野心勃勃的目标，而满足于回到梅特涅的立场（参见第20章，原文第538页）。也许比施瓦岑贝格在宪法问题上的失败更为严重的是，奥地利没有能够利用它在奥尔米茨获得的政治优势取得加入关税同盟的许可。布鲁克没有能够争取德意志各中等邦来实现他在中欧建立经济势力范围的主张，他也没有能够在德累斯顿会议召开的时候重新缔结关税同盟——应于1853年续订——以便能够使奥地利也加入这个组织。这样的重新缔结的确有过，而且是对普鲁士有利的，因为汉诺威和税收同盟其余各邦在1851年或以后不久都加入了普鲁士体制，而在德意志经济迅速发展第一阶段，奥地利仍旧被排除在德意志以外。

但是，如果说普鲁士为在奥尔米茨的失败而痛苦，施瓦岑贝格又没有能够实现他建立奥地利霸权的全部计划，对旧制度的复活最感失望的就是全德意志的自由派人士了。1848年终究没有取得德意志的统一。就连拉多维茨的计划提出的权宜之计也没有实现。布鲁克建立庞大的德意志经济范围的计划毫无结果。跟整个德意志一样，各个邦在过去年代中得到的利益正在丧失。根据1851年8月任命的一个邦联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为了要清除如普鲁士国王所说的“羞辱之年的污物”[\[10\]](#)，大多数邦都在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修改宪法。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被迫侨居他乡，或者自愿离开德意志——有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在国外继续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另外一些人到美国去另谋出路，如卡尔·舒尔茨，后来成为美国的内政部长。

在奥地利，政府试图建立一种由德意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的集中体制，并且采取支持教会影响的政策，这种政策给了罗马天主教自约瑟夫二世统治以来从未得到过的更大的权力（参见第20章，原文第533页）。在普鲁士，曼陀菲尔的内阁也表现了同样的心情。一个以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为基础的思想僵化、固执己见、缺乏灵活性的政府重新采取了设立政治检查制度和政治警察的措施。国王的私人顾问、特别是格拉赫兄弟代表了一种比曼陀菲尔本人更加保守的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础是狭隘的新教徒的虔诚，是拒绝接受任何自由主

义思想，哪怕是那种使温和自由派得以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的思想。因此，在以后的10年中，普鲁士在政治上仍然极其保守、褊狭，对于那些想要在民族统一和宪法改革方面得到积极引导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地方的人民，几乎不给予任何希望。

这种失望说明了19世纪50年代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形势发生变化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认识到1848年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太不重视。“作为君主，意味着行使权力，而只有掌握了权力的人，才能行使它。君主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是一条基本的真理，是整个历史的关键。”^[11]这段有代表性的话引自185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它的意味深长的标题是《政治现实主义之基础》，“现实政治”这个词似乎是第一次使用。此外，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体现在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力。1859年尤利乌斯·弗勒贝尔说：“德意志民族厌恶原则和信条，厌恶以文字粉饰的现实和以理论虚构的伟大。它需要的是权力、权力、权力！谁能给它权力，它就给谁以荣誉，比他能够想象的还要多的荣誉。”^[12]这种心情与越来越尊重政治生活中的事实相结合，势必会产生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自由主义和热烈支持俾斯麦的用武力实现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的政策。

然而，19世纪50年代不仅是政治停滞的年代，也是经济发展的年代。铁路网发展并完善了，煤产量提高了，因而到1860年德意志已经超过了法国和比利时。在鲁尔区、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等工业区，城区人口有了增长，因而不断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在政治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各种工人协会开始建立：经济学家如J. K. 冯·罗德贝尔图斯和赫尔曼·舒尔策-德利奇提出了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生产者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并为由斐迪南·拉萨尔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铺平了道路。德意志分享了由于开发新的黄金资源在欧洲出现的资金普遍增长，而在1857年，过分的投机生意导致了财政危机，加剧了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不满。

这种经济发展有利于普鲁士和关税同盟，而奥地利的经济地位却越来越衰弱。布鲁克已于1851年5月辞职（尽管他又在1855年出任财政大臣），他的继任者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不过是在1853年与普鲁士签订一项被他称为“不太有利的停战协定”^[13]的商业条约。普鲁士和

奥地利之间要找到和解办法已越来越困难，普鲁士日益扩大的经济要求增加贸易自由，而奥地利落后的工业和国家垄断企业仍然需要保护贸易。1862年，普法条约的签订给法国提供了“最惠国”待遇。根据1853年的条约，到那时为止这种待遇一直是奥地利所享受的。此外，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使它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它动员了军队，并驻扎在奥地利与俄国的边界上；而1859年与意大利进行的战争又加重了这种负担。因此，在1866年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奥地利在与不断增长的赤字和财政困难做斗争，而普鲁士和关税同盟的地位却在不断地改善（参见第20章，原文第538—539页）。

直到1859年在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政治上的反动才开始受到挑战。在这一年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引起了关于德意志邦联的巩固、它的军事组织和它对奥地利帝国的非德意志部分的责任等许多问题。同时，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运动的成功引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羡慕。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表明要求德意志邦联施行共同的政策有多么困难。当奥地利已经动员起来要迫使俄国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撤走的时候，普鲁士却严守中立（参见第18章各处）。然而，由于奥地利最终没有卷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整个关系问题和邦联的结构问题才没有提出来。

1859年的形势大不相同。战争开始时，不仅邦联的领导成员已经直接卷入，而且德意志舆论界也被深深地激动并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很多人认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事业肯定要引起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同情。他们认为奥地利，用阿诺尔德·吕格的话来说，是“镇压意大利人民的刽子手”和“德意志人民的压迫者”。这种观点在德意志北部自由派和激进派当中最为普遍，比如拉萨尔就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认为这场战争是向世代仇敌法国显示德意志民族团结的机会。这种观点在德意志南部自由派中最为普遍，他们仍然希望在奥地利领导下，而不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更大的德意志民族统一。

但是战争不仅仅是恢复了民众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它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的整个问题，并且要检验在奥尔米茨和德累斯顿建立起来的双重管理制度。奥地利政府自然急于要取得整个邦联的支持，首先是普鲁士军队的援助，但是外交谈判并

没有取得这些支持。阿尔贝特大公爵在4月访问柏林，想说服普鲁士人在莱茵河地区组成一支奥普联军，但没有成功。按照普鲁士的榜样，整个邦联从来没有动员过。普鲁士充其量只打算在6月14日（在马让塔战役以后10天和索尔费里诺战役以前10天）动员6个军团，但是目的不在于支持奥地利，而在于武装调解。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明显缺乏团结，跟俾斯麦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俾斯麦作为普鲁士的代表在法兰克福议会的一段经历是成功的，在那以后，他被任命为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于3月底到达那里。在法兰克福，他已经表明他是一个有手腕的冷酷无情的外交家，他不顾与格拉赫兄弟和其他亲奥地利的普鲁士保守主义者的友谊，明确地规定了普鲁士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他已认识到现有的邦联机构是多么不得人心，而且已经在考虑应该怎样把它改变得对普鲁士有利。

普鲁士的中立对奥地利和1850年至1851年重建的邦联是一个打击。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结束了战争之后，弗兰茨·约瑟夫公开宣称他被最亲近的天然盟友抛弃了。但是，1859年的战争不仅表明不可能产生一种既能为奥地利也能为普鲁士接受的共同政策，而且导致对德意志邦联机构的考验。事情的确很清楚，即使普鲁士已经决定支持奥地利，由邦联的各个邦作出统一行动的联邦部署也还很不充分。这些准备工作从1821年以来就在进行，但从来没有考验过。直到战争真的打起来了，还连邦联指挥官都无法任命。来自各中、小邦的分遣部队编入了混合军团，而这些军团中，组织或作战方法都不统一。例如在包括来自符腾堡和巴登的两个团的第八军团中，巴登军队的退却信号正好是符腾堡军队的进攻信号。

因此，1859年发生的若干事件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以以后的5年时间都花在对改革邦联宪法的建议和辩论上。这些讨论不仅仅是个别的政府所关注的事。始于1859年的群众活动的新的高涨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迫切。召开全德意志代表大会的惯例正在得到恢复。1858年召开了经济学家代表大会，1860年召开了法学家代表大会。1859年秋的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也提供了一个对德意志民族理想表达热烈忠诚的机会。然而，最重要的实际步骤还是1859年9月成立了“德意志民族协会”。

“德意志民族协会”是第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德意志绝大多数邦都有一个真正的组织——尽管偶尔由于过分自由化而遭到禁止，比如在德意志各个邦中最富有中世纪特色的两个梅克伦堡就是如此。德意志民族协会受到萨克斯-科堡的埃内斯特亲王的保护，得到了德意志中部和北部大多数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的支持。这些人在以后的30年中都是杰出的人物，对于帝国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汉诺威的鲁道夫·冯·本尼格森和约翰内斯·米克尔就是例子。（米克尔开始曾经是卡尔·马克思的朋友，最后却成为一名极端保守的普鲁士大臣。）德意志民族协会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如德意志合作运动的先驱赫尔曼·舒尔策·德利奇，这个运动的许多目标是由学术界的政治鼓动家们倡导的，如萨克森的青年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尽管他对德意志民族协会的许多做法持批判的态度，但他将成为普鲁士有权统治统一的德意志的最雄辩的鼓吹者。到1862年，民族协会已有2.5万名会员，大部分在德意志北部和中部。由于这个协会是那些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组织，他们现在相信德意志的问题要用“小德意志”的办法来解决。按照这个解决办法，奥地利应被排除在德意志以外，新的德意志应该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尽管有些自由主义者准备为获得民族的统一而牺牲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据报道，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自由派领袖曾经说过：“最严厉的普鲁士军事统治也比窝窝囊囊的小邦要强。”^[14]——德意志民族协会默默接受普鲁士领导的原则，必然会使普鲁士的内政成为全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的事情。

对普鲁士来说，1858年至1862年是充满政治危机的几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反复无常、骄傲自满、感情脆弱和想入非非渐渐变成了精神失常，1858年秋，他已经病入膏肓，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于是他的兄弟普鲁士亲王成为摄政王。未来的皇帝威廉一世当时已经61岁。他和他那富于幻想而又不可信赖的兄弟完全相反，他那小心谨慎、务实精神和准确谦逊的判断能力，倒像他那不引人注意的父亲。他被培养成为一名普鲁士军官，少年时代曾在拿破仑战争中作过战。他一生的主要兴趣在军队和军事问题上。另外，他敌视他兄弟的顾问们，虽然他赞成保守的君主政体和德意志现存的领土划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奥尔米茨的耻辱”。因此，人们期望他会任命一个新的内阁，来取代曼陀菲尔的内阁，因为现在人人都讨厌和不信任曼陀菲尔，就连他原来那些极端保守主义的同僚们也是如此。此外，威廉的

妻子是歌德的保护人，因同情浪漫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驰名的魏玛公爵的孙女；他的儿子也与维多利亚结婚，这个维多利亚是英国的长公主、阿尔贝特亲王的爱女^[15]。由于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在他家族中的影响，由于组织新内阁的需要，这位摄政王的掌权受到自由派人士的欢呼，认为他开创了立宪政体的“新时代”。

在寻找一个新政府以代替曼陀菲尔的政府和《十字架报》党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过程中，这位摄政王求助于也是以其报纸闻名的《周报》党。《十字架报》代表易北河以东的老式新教徒和普鲁士贵族的观点，而《周报》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的一些贵族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外交人士的喉舌。只有按照普鲁士在19世纪5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党才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党，但是它至少还能真正主张君主应该服从宪法，议会应该有一定的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多么有限。于是，由王室较为年轻的支系的一个成员，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的安东亲王任名誉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新内阁就由《周报》党的一些成员和少数非常温和的自由派分子组成了。摄政王的一位老朋友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担任不管部大臣和实际上的首相，他曾在1848年同坎普豪森和汉泽曼一起执政。

但是，自由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摄政王对他们的欢呼感到不安，新政府一上台就宣布了保守主义的原则，发表了它的德意志政策声明，只准许普鲁士进行“精神征服”。^[16]摄政王本人的兴趣限定在军事改革方面，1859年夏季的动员暴露了普鲁士军事机构的弱点，因而，在他看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当务之急。1859年12月，他任命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将军为陆军大臣，1860年年初罗恩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他是一个立志献身于军队的普鲁士军官：自幼成为孤儿，后来成长为普鲁士军官团的一名军官，他严肃刻苦，尽心尽意地在军队服役，只考虑军事效率而不考虑这种效率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很快就成为威廉最为重视的、肯定能全力支持他的军事改革的大臣。

这些都包括在1860年年初提交议会的一份议案中，议案还要求对实行改革计划所必需的拨款进行表决。罗恩的建议有些是纯属技术性的，比如全军都应以新式武器重新装备。然而两项最重要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罗恩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部队的元气，随时增加服役的人数，扩大职业军官团的权力。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提出

每个新兵应服兵役三年，而不是已成惯例的两年。为了达到另外两个目的，他准备取消后备军的独立性，在动员时把其中一些较年轻的人员召入正规军，把后备军军官纳入正规军军官团。

这些提议肯定会引起反对，甚至会引起温和自由派的反对，不管他们对建立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的理想是多么忠诚。后备军是中产阶级的宝贵财富，他们对解放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充满浪漫主义的回忆。后备军的独立性的丧失和它的军官的从属地位，对于实现自由派的全民皆兵的理想，对于那些最高的社会愿望就是当一名后备军军官的中产阶级人士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延长义务兵服役期限这个改革提议也是不得人心的，它的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威廉和他的顾问们认为三年的军事训练比两年训练更有可能产生忠诚的国民。

摄政王对这一议案遭到反对感到震惊，因为他觉得“新时期”的内阁使他有资格得到现在已成为议会中一支重要力量的形形色色自由派人士的感激。反对派的确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他们反对的不是军事改革本身，最后只限于反对延长服役期限。1860年达成妥协，同意满足政府为实现它的当前计划的需要；由于欧洲形势险恶，临时表决通过了政府的军事预算。1861年，冲突再次发生，并引起一次长时期的护宪斗争。春天，一项折中的军事预算计划以11票的多数通过，随后不久，一些看出议会控制军事开支这项原则的重要性，也希望普鲁士实行更积极的德意志政策的人士组成了一个新的自由派的党。这个新党叫作德意志进步党，领导人是马克斯·冯·福肯贝克和利奥波德·冯·霍韦尔贝克。福肯贝克是一位律师，后来成为布雷斯劳市和柏林市市长；霍韦尔贝克是普鲁士东部的一个贵族，他准备反对本阶级的其他成员，建立一个依靠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这个党也包括老一代激进分子，如柯尼斯堡的约翰·雅各比。该党的目标包括建立一个“牢固的统一德意志，而没有掌握在普鲁士手中的强大的集中的权力，没有德意志民众广泛的代表性，这是不可思议的”。^[17]这样，德意志民族协会的目标就是争取得到普鲁士内部强大而有影响的，看来是赞成保留议会制度的政党的支持。

进步党在1861年年底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虽然有限制的、间接的选举阻碍建立大党，但这个新党已经表明它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国王（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已于1861年1月去世）

和罗恩准备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高级官员中在谈论政变。1862年3月“新时期”的内阁被解散，并下令举行新的选举，指望破坏进步党人和老自由派在上年12月获得的多数。然而，尽管官方施展了各种伎俩来影响大选，新选出的议会仍然是自由派占多数，他们主张抵制为罗恩的改革计划提供经费所必需的军事预算。整个夏季，国王一直在设法找到一个能取得议会支持来解决这个难题的政府。然而，他所挑选的大臣没有一个能够找出解决办法。俾斯麦的名字常常被提到。5月间他在柏林，人们普遍期待会请他来执政。但是国王仍然怀疑他同格拉赫派和《十字架报》党之间的友谊，不信任他强有力的、独立不羁的工作方法，于是他被调到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馆工作。

到了9月，国王的地位陷于绝境。他的大臣们拒绝在预算没有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负起管理政府的责任，国王也谈到要退位。这时罗恩终于接受了成立一个对议会中的反对派不予理睬的政府的主张，并于9月18日发电报催促俾斯麦赶回柏林。现在连国王也清楚地看到唯有俾斯麦有魄力和政治才干、能够在无须宪法所要求的议会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俾斯麦在1862年9月20日到达柏林，两天后同意上任。

俾斯麦当年47岁，精力充沛，食欲旺盛，酒量过人。他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很快就给所有会见他的人，甚至反对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强烈神经质的活力在危急关头偶尔也会用眼泪或盛怒来发泄。俾斯麦在普鲁士最虔诚的新教徒贵族圈子中结识了他的妻子，并从他妻子的朋友那里获得了坚定的宗教信仰，虽然这丝毫不影响他处理公务的品德。在他愿意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得富有魅力，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有时还流露出诗意的情感。尽管他在外交上的经历已经使他在智力方面与他1847年作为一个年轻容克来到柏林充当联合会议员时大不相同，但是他在感情上从来没有忘记他在普鲁士的财产和他出身于德意志北方平原，也没有丢掉他对没有土地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容克式的鄙视。然而，他的容克背景从未阻止他采取与他那些贵族同胞的观点相抵触的政治行动，只要他认为这行动对他的远大目标有利。正是这种不持偏见和毫无顾忌给了他力量。他蔑视“喋喋不休的人道主义的碎嘴子”和“含糊不清而且变化无常的人道主义观点”；他残酷无情地迫害他的敌人。他不受政治上的禁令的约束，也不受道德上的约束。当他掌权的时候，以同样的轻蔑谈到自由派的“民族骗局”和小邦君主的“主权骗局”^[18]。然而，正是在1862年9

月29日他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第一次出席普鲁士议会的财政委员会时，他的讲话中最著名的一段一下子暴露了他的政治纲领和方针。他说：

“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普鲁士必须保存它的实力，等待良机，这样的良机已经错过了好几次。普鲁士的边界现状与正常的国家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铁与血。” [\[19\]](#)

俾斯麦被召去处理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和实现军队的改革。然而，他发现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德意志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和德意志的民族斗争——纠缠不清地搅在一起，直到1866年的战争以后，也的确是依靠战争，这两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外交策略和1859年开始的群众骚动都要求普鲁士对德意志的统一问题采取积极的政策。各中等邦对邦联的宪法改革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建议，主要是在萨克森的首相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伯爵和中、小邦中积极主张独立的人士的鼓动之下提出来的。这些计划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有关各邦的利益各不相同，加上猜疑（尤其是在巴伐利亚）使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奥地利。事实上，博伊斯特和巴伐利亚的大臣路德维希·冯·德尔·普弗尔滕仍然相信应该有一个“第三德意志”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奥地利政府开始作最后一次努力，维护奥地利在德意志的优势，并在德意志补偿它在意大利战败的损失。1860年冬季的宪法改革使人们有微弱的理由希望君主政体可能变得稍微开明一点。1862年10月在慕尼黑成立的改革协会，组织人民起来支持包括奥地利在内并由奥地利领导的“大德意志”的主张，以抵消亲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民族协会的影响。它的领导人尤利乌斯·弗勒贝尔是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的一名富有经验的左翼议员，参加过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但是现在，他的观点开始在奥地利官僚中传播开来。从1859年至1863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雷希贝格伯爵，真诚地主张对德意志实行和平的两国共管政策，即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另一些奥地利人，如内务大臣安东·冯·施默林和在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问题的路德维希·冯·比格莱本，则主张奥地利居支配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大德意志”政策。

1863年夏，主张奥地利采取积极的对德政策的各派势力，促使皇帝提出在法兰克福召开王侯大会来讨论奥地利关于改革邦联的建议。德意志南部自由派期望很高；但是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在满足人民和民族的任何要求方面都困难重重，民族协会在法兰克福会议期间针对极力主张弗兰茨·约瑟夫当德意志皇帝的宣传，贴出来一张招帖，清楚地指出了这些困难：

……让弗兰茨·约瑟夫当德意志皇帝？行，如果他愿意彻底抛弃一切，做一个无为而治的德意志皇帝。行，如果他有信心把自己置于这个民族的首脑地位，就要立即承认1849年宪法规定的永远不变的公民权利；行，如果他最终能够实现与他帝国内各民族的和平与和解，使他们愉快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一切敌人。说“行”吧，弗兰茨·约瑟夫，全体伟大的人民将把所有的财产和一切奉献给你，德意志光荣的重建者。[\[20\]](#)

但是就算完全撇开奥地利在满足人民的要求方面存在的困难，法兰克福王侯会议也因为普鲁士国王没有参加而告失败，而没有普鲁士国王的同意，有关邦联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想象的。俾斯麦掌权以后决心要维护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与奥地利平起平坐的权利。同时，如果普鲁士的霸权地位，至少在德意志北部和中部的霸权地位得到承认的话，他就准备与奥地利合作。（1862年12月5日，奥地利驻柏林公使报告说，俾斯麦正强烈要求奥地利放弃它的德意志政策，并把它的重心转到匈牙利去。）然而，俾斯麦意识到德意志各邦之间的差异有可能引起一场欧洲危机，尤其是法国的干涉。因此，在外交上，他首先需要弄清俄国的亲善是否靠得住。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主张中立，他在圣彼得堡大使馆工作期间的经历，以及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已经使他成为俄国政府信得过的人物。1863年1月在俄属波兰的叛乱使他在实际上帮了俄国人的忙。2月，冯·阿尔文斯勒本将军前往圣彼得堡签订了一项协定：允许就波兰的活动情况交换情报，许诺在必要时提供武装援助，许可在普鲁士的领土范围内追捕逃亡者。当这个协定被人们知道以后，普鲁士议会里的自由派人士（更不用说国外的舆论）对俾斯麦及其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没有理由推测普奥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到足以引起一场欧洲危机。俾斯麦仍旧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去达到他的目的。在1863年，这些目的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奥地利再次想按它自己的利益来改革邦联的企图。这一目的已经通过普鲁士不参加法兰克福

会议的办法达到了，尽管做到不参加大会也是经过一番困难的。8月初，弗兰茨·约瑟夫在加施泰因访问了威廉国王，并邀请他在当月晚些时候出席法兰克福会议。但是，邀请被拒绝了，开会时普鲁士没有参加。参加法兰克福会议的君主们（除了丹麦国王和三个最小的邦的统治者以外，邦联的所有其他国王都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决定再作一次努力说服普鲁士国王到会。萨克森的国王还亲自去送请帖。威廉的全部保守主义本性和君王之间的团结感都被激发了起来。“从30个执政的君主中推出一个国王来当信使”^[21]，这样的邀请实在令人难以拒绝。但是，经过一番斗争之后，俾斯麦终于还是说服了威廉不要露面；这是这位大臣为了克服君主的偏见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系列艰苦斗争中的第一次。

由于普鲁士拒绝参加会议，奥地利的改革计划注定要失败，很快就失去了德意志南方自由派群众的支持。正如他们当中的布隆奇利在上一年就说过的：“许多人在心里都相信‘大德意志’的主张，但是他们脑子里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因为需要而变成了‘小德意志派’。”^[22]1863年以后，奥地利的主张已经没有什么积极的吸引力了。俾斯麦立即利用他的反建议努力争取人民的支持。这些反建议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权力划分，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以全民族直接参加为基础的、真正的民族代表制……”^[23]但是，要自由派对俾斯麦相信的程度达到能够接受他这样的纲领仍然还为时太早；其他几个邦的政府对这样的极端措施也缺乏精神准备。

1863年秋，外交家和自由派领导人的注意力都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1848年的丹麦战争表明德意志自由派是多么热衷于把这两个公国从丹麦王国分离出来并完全与德意志合并的想法（参见第9章，原文第219页）。到了1863年，丹麦国王颁布法令，把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分开，根据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把石勒苏益格与丹麦王国的其他部分合并。邦联议会已经决定要采取行动对付丹麦，但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的去世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就在有关宪法的争论上又增加了关于继承权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公国的继承法与丹麦王国的继承法不同。自由派和德意志民族运动都把希望寄托在候选人奥古斯滕堡君主弗里德里希身上。他是一位没有经验的政治家，但一般都认为他同情自由派，并得到普鲁士王储的支持。他立即宣布自己是两个公国的合法继承人，请求邦联帮助确定他的权利。到

1864年年初，议会、普鲁士、奥地利和丹麦之间的谈判破裂。1863年12月，邦联军队已经进入荷尔斯泰因，1864年1月16日，普鲁士军队也接踵而至。2月1日，奥普联军进入石勒苏益格，于是与丹麦的战争开始了。

俾斯麦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法国、英国和俄国可能干预；而在普鲁士议会中他仍然面对拒绝通过战争经费的持敌对态度的多数派。因此，在联合奥地利反对丹麦的每一个步骤中他都十分小心，1月17日签订了正式联盟协定。虽然奥尔登堡公爵是继承公国王位的俄国候选人，但俄国却受到了波兰起义和阿尔文斯勒本协定的牵制（参见第9章，原文第236页）。拿破仑三世则满足于欧洲领土总的再分配的模糊的暗示；而在英国，帕默斯顿和罗素不能施展他们过去随意使用的威胁手段。由于大国之间缺乏共同的政策，他们企图通过举行一次伦敦会议来解决战争引起的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到1864年8月，战争结束，丹麦战败，初步签订了和约。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放弃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权利。

俾斯麦的国内政策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他在1863年4月曾对普鲁士议会说，他将从任何能够找到钱的地方得到钱，他还吹嘘说：“不管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都要进行战争。”^[24]此外，他充分利用宪法第一〇九条的规定：各种税款一经通过就必须持续征收，直到议会正式宣布取消为止。这样，通过间接税从邮政事业，大量国家财产的收入，特别是矿山和森林的收入中筹集了款项。罗恩的改革已付诸实施，他的行政管理和毛奇的军事行动计划都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中经受了考验。普鲁士在这场由它起主导作用的民族战争中的胜利，必然更加使人感到只有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民族统一，才是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唯一途径。尽管俾斯麦的政策在普鲁士继续受到进步党的敌视，但是自由派的个别领导人已经开始支持他的政策，而俾斯麦在丹麦战争和1866年的战争之间，也与普鲁士以外的自由派领导人有了接触，比如黑森-卡塞尔的厄特克尔，后来又与汉诺威的米克尔和本尼格森有了接触。

由于普鲁士在迪佩尔战线的强攻和阿尔森战役都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许多保守主义者，包括国王在内，也都对俾斯麦的政策重新给予了信任。但是，不论他们这些人也好，俾斯麦也好，对奥古斯滕堡和支持他的自由派与民族力量都缺乏热情。早在1863年12月31日，战

争刚要爆发的时候，俾斯麦曾在他家庭成员中私下承认，他的最终目的是将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两个公国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占领之下，由邦联对它们的前途作出裁决，因此，任何使它们只从属于普鲁士的解决办法都肯定会引起与奥地利的冲突。

普鲁士处于优势，因为奥地利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没有并吞德意志北方领土的欲望。弗兰茨·约瑟夫和雷希贝格的最大希望是他们或许可以利用从公国撤退的诺言，说服普鲁士人把西里西亚的土地让给他们，并保证奥地利在意大利剩下的领地。1864年夏，这两个胜利的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在申布龙宫会晤，并就占领被征服的领土作出了临时性的安排。雷希贝格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既没有得到领土的补偿，也没有得到对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的保证，几个月之内，他就只好辞职了。对奥古斯滕堡的支持，由于俾斯麦的反对和他自己的无能，已经减少了。邦联的其他成员也被迫撤走他们的军队，只留下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继续占领。1865年3月，普鲁士人将他们的海军基地从但泽移到了基尔。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普鲁士关于公国的权利要求的支持增强了。

整个1865年，看来俾斯麦是采取了一种既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以用战争手段来实现的政策。他的目的在于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把奥地利势力逐出德意志北方。如果可以用和平方式说服奥地利放弃它的德意志政策，将有利于避免国际纠纷，因为一旦发生国际纠纷，大国的政策，尤其是法国的政策就会难以捉摸。因此，他在5月间对国王和其他普鲁士大臣进行约束，因为他们显然想要立即促成与奥地利的危机。^[25]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及双方大臣们举行了另一次会议，达成了《加施泰因条约》——俾斯麦把它叫作“掩盖裂痕”^[26]——根据条约，两个公国暂时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分管：奥地利管辖荷尔斯泰因，普鲁士管辖石勒苏益格。它们的最终归属问题仍然没有确定。但是，由于接受了普鲁士关于分权的建议，奥地利不仅放弃了只以邦联的名义办事的原则，而且也给了俾斯麦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施展他的外交伎俩的机会。

到1865年年底，俾斯麦准备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加施泰因条约》为他提供了与奥地利挑起一场争吵的机会，这个条约对那些希望奥地利能在民族运动中勇敢地起领导作用的奥地利人来说也是一个失

败。普鲁士加强了对奥地利在荷尔斯泰因的管辖的批评。1866年1月，奥地利当局容忍自由派举行会议，从而为向维也纳提出正式抗议提供了理由。最后，国王于2月28日在柏林召集的会议上决定，普鲁士准备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所有权问题和在德意志的霸权问题开战。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有两个条件看来是必要的：一是要具备有利的欧洲形势；一是要得到德意志内部人民的支持。在前一年的秋天，俾斯麦在比亚里茨会见了拿破仑三世，但显然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承诺。直到战争爆发，拿破仑的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想得到领土利益，俾斯麦好像一度准备暗示把莱茵河以西让与他，尽管后来又对此矢口否认。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前，拿破仑从来没有打算断然进行干预。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他才把赌注压在奥地利的胜利上，与弗兰茨·约瑟夫签署了条约：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奥地利要割让威尼斯作为对法国保持中立的报答。俾斯麦对法国的中立政策是坚信无疑的，而且事实证明他下的赌注是正确的。

2月28日国王召集的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提出要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几乎紧接着就开始了谈判，4月8日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双方商定如果3个月之内不爆发战争，则条约失效。（意大利并不是俾斯麦准备动员来反对奥地利的唯一的奥地利的敌对国，因为在6月初，他就和匈牙利革命运动的一些领导人进行接触。）现在俾斯麦与意大利建立了联盟，他的战争政策得到了国王的批准（尽管有些犹豫）和罗恩及毛奇的赞同。普鲁士的保守主义者即使有些担心也都准备接受他的领导，只有他的老朋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一个高尚的例外，因为对他来说，俾斯麦的不择手段和轻易放弃保守主义原则都是无法容忍的。但是，俾斯麦仍然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4月9日召开了一次邦联议会的特别会议，俾斯麦的建议——由普选产生的德意志议会应该开会讨论改革宪法的问题——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希望通过这一步骤得到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使邦联的改革而不是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领土野心成为一个导致与奥地利最后决裂的问题。虽然这些建议符合自由派的要求，但是他们仍然疑虑重重，不能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些建议。此外，俾斯麦本人似乎相信普选是一项加强而不是削弱保守主义影响的措施，因为他认为忠诚的农民的选票会超过投给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的选票。

俾斯麦的建议足够使他迅速取得革命力量的支持，从而达到他破坏邦联宪法和迷惑小邦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的目的。进步党的个别成员和拉萨尔的追随者出来支持战争。鲁道夫·本尼格森主持的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自由派的会议宣布，他们赞成中立。在普鲁士内部，俾斯麦也在设法取得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他曾试图在上一年的军事改革问题上获得妥协，但是没有成功，议员们由于在议会上的发言而被起诉以后，他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又一次迅速恶化。现在俾斯麦向新任财政大臣奥古斯特·冯·德尔·海特许诺，他将设法通过表决对他没有得到议会支持的任期的工作不予追究。这年早些时候，议会言论自由的主要斗士卡尔·特韦斯滕说，他准备提议表决不予追究，条件是对将来按宪法行事作出保证。俾斯麦打算采取这一步骤，只是由于国王的亲自反对才使这一提议未能实现。

这样，他期望能从国内外得到支持的程度仍然没有把握，但是由于意大利和普鲁士军队坚决站在他这一边，俾斯麦就与邦联决裂并宣战。从4月底开始，意大利和奥地利开始进行动员。普鲁士在5月第一个星期进行了动员。敌对双方互相谴责对方的战争准备。最后出来调停的是奥地利在荷尔斯泰因的总督的兄弟安东·冯·加布伦茨将军和拿破仑三世。加布伦茨本人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他的家人在几个中、小邦中任职。他建议建立一个由一位普鲁士王公统治的单独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德意志在军事上分别由普鲁士和奥地利领导。拿破仑三世则与往常一样，还是建议召开一次欧洲会议。但是，他们两人的努力均未成功。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大臣们为了与普鲁士实现和平合作作出了真诚的努力，甚至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但是他们相信如果战争打起来他们是能够击败普鲁士的，欧洲其余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持这种看法。

中、小邦的处境很困难。北部和中部许多较小的邦都已经和普鲁士一起召开了军事会议。无论如何，对于他们来说支持普鲁士或者保持中立是他们唯一可能的战略选择。在所有的邦，王朝之间的争吵以及自由派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使它们不可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尽管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几乎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它们的统治者已经做好了向普鲁士进军的准备，而反对派却准备迎接普鲁士的胜利。只有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是两个大到足以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王国。但是普鲁士和博伊斯特直到最后时刻才与奥地利建立

了共同阵线。战争打起来以后，萨克森的军队在奥地利一边战斗得很好，但是巴伐利亚的政策却受到了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个性的妨碍，他最后死于精神错乱。这时他已经宁愿待在他那巨大的城堡中，过着耽于幻想的孤寂生活，只与演员和艺术家们为伍，而不愿过问政事。对于南方的群众运动，现在除了忠于邦联宪法的思想，奥地利已不能提供什么，而宪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1865年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临时解决办法中已被奥地利本身所忽视。

6月14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邦联议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一个星期以前，普鲁士军队已经开进了荷尔斯泰因，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中断。在法兰克福，巴伐利亚提出的动员其他部队而不动员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部队的动议，以九比六的票数通过。卢森堡、梅克伦堡以及由北部和中部的的小邦组成的三个集团站在普鲁士一边。普鲁士的代表随即退出了会场。6月15日夜普鲁士军队跨过了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的边境。

这场战争的军事史实后来在弗里德容的《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全面而权威性的阐述。^[27]汉诺威的军队起初得胜，但在6月27日、28日在朗根萨尔察战役中败北，6月29日投降。黑森的选帝侯已经当了俘虏。一支普鲁士军队穿过拿骚和法兰克福进入巴伐利亚，另一支军队集结在波西米亚与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作战。7月3日，奥地利人在克尼格雷茨（萨多瓦）遭到彻底失败。争夺霸权的斗争宣告结束。

这次胜利之后不到两个月，俾斯麦就解决了德意志统一的形式问题，结束了普鲁士内部关于宪法的纠纷。当普鲁士军队还在向维也纳推进时，法国干预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变得十分紧迫。俾斯麦一方面接受法国的调停，同时把他想要的和平条件强加给奥地利和南方各邦，他把这两者成功地结合了起来。7月26日在尼科尔斯堡草签了预备和约；8月23日正式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俾斯麦面临的最艰苦的斗争还是与普鲁士军事首领的和国王本人的斗争。这个国王既有一个正统王权拥护者的那种不愿意废黜王朝的情感，又有征服者的欲望，想从奥地利、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获取领土。另一方面，得到王储支持的俾斯麦认识到，只要把新的邦联局限在德意志北方，让南方各邦继续保持原状，他就可以减少战败国人民的不

满情绪，这些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愿意加入北方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再准备进攻法国。所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赔款，但没有丧失领土。同时，它们也都和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它们的军队一律归普鲁士指挥。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被废黜，其领土，连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开放城市法兰克福都割让给普鲁士。美因河以北的其他邦和萨克森加入新的北德意志邦联。奥地利失去了威尼斯，赔了款，并正式被剥夺了对德意志问题的发言权。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办法现在变得明朗了。

但是不光是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和“大德意志”的思想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及和约中遭到破坏，全德意志的保守主义者和教士都在俾斯麦现在能够利用的全国民众的力量手中吃了亏。从普鲁士内部新的政治势力的排列情况来看，有关宪法的冲突已经结束。议会已在5月9日被解散。大选的最后阶段在克尼格雷茨战役纪念日——7月3日举行。反对这次战争的进步党，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气氛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9月1日，俾斯麦本人向新的议会提出了一份议案，要求不予追究政府在过去几年在没有议会的支持下进行的工作。9月3日，该议案以230票对7票（有一部分弃权）获得通过。政府取得了胜利。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项法律的有限的价值表现在国王对他前几年的政策的评论之中，他说：“我不得不那样做，而且如果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我将继续这样做。”^[28]

北德意志邦联的组成，不追究法的通过，以及新的北德意志议会应该通过普选产生的决议，均为俾斯麦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奠定了新的基础。老保守党分裂了；因为许多容克贵族都觉得俾斯麦对议会明显的让步，他和人民以及民族运动的联合，是对保守党原则的反对和蔑视。而且，作为过时的正统王权拥护者，他们一定会谴责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的“窃取王权的行为”。一个由自由保守主义者组成的新党出现了，而且成为俾斯麦忠实的支持者。老保守主义者仍然不断地对他进行抨击。更为严重的是进步党有了新发展。该党的大部分成员和许多最有才干的领导者，包括福肯贝克和特威斯顿，现在都决心支持俾斯麦的民族政策，赞成不追究法。很快他们就要与普鲁士以外的自由党人一起在本尼格森的领导下组成民族自由党。而且正是由于他

们的支持，新的帝国才能建立起来。19世纪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政治道德和民族理想之间，他们选择了民族理想。

（万正忠 译）

[1] 法伊特·瓦伦丁：《1848—1849年德国革命史》（柏林，1930年），第1卷，第67页。

[2] 对他的完全不同的评价，参见原文第529页。

[3] 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1卷，第115页。以下几页中关于俾斯麦的经历和政策的叙述自然大部分根据艾克博士的权威性的俾斯麦传记。作者对艾克博士及其杰出的著作深表谢忱，该书的一些论断在艾克的英文著作《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伦敦，1950年）中亦有概述。

[4]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1848—1860年的奥地利》（斯图加特和柏林，第4版，1918年），第1卷，第180页。

[5] 施瓦岑贝格致特劳特曼斯道夫信，1849年1月24日，海因里希·弗里德容：《1848—1860年的奥地利》（斯图加特和柏林，第4版，1918年），第1卷，第182页。

[6] 法伊特·瓦伦丁：《1848—1849年德国革命史》（柏林，1930年），第2卷，第380页。

[7] 奥托·冯·俾斯麦侯爵：《思考与回忆》（斯图加特，1898年），第1卷，第64—65页。

[8] 弗里德里希·迈因克：《拉多维茨与德意志革命》（柏林，1913年），第236页。

[9] A. 施特恩：《1848—1871年欧洲史》（斯图加特和柏林，1916年），第7卷，第402页。并见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1卷，第137页。

[10] 埃里希·勃兰登堡：《帝国的建立》（2卷本，莱比锡，1916年），第1卷，第363页。

[11] A. L. 冯·罗豪：《应用于德国国家现状的现实政治之基本原则》（1853年），转引自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慕尼黑，1925年），第493页。

[12] 转引自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德意志的统一》（慕尼黑，1935年），第3卷，第5页。

[13] W. O. 亨德森：《关税同盟》（伦敦，1939年），第225页，另见第20章，原文第535页。

[14] 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1卷，第337页。

[15] 这里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1858年她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结婚。其子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译者

[16] 摘自1858年11月8日摄政王的讲话：“通过明智的立法，通过提高所有道德因素，以及通过掌握统一的因素，就如同关税同盟那样，在道德上占领德国。”

约翰内斯·齐库尔施：《新德意志帝国政治史》（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5年），第1卷，《帝国的建立》，第11页。另见海因里希·冯·聚贝尔《威廉一世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慕尼黑，1889—1894年），第2卷，第220—221页。

[17] L. 帕里西乌斯：《德意志政党》（柏林，1878年），第36页，转引自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1卷，第371页。

[18] 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1卷，第373页。另见A. O. 迈尔《俾斯麦》（莱比锡，1944年），第153页。

[19] W. 伯姆编：《作为演说家的俾斯麦侯爵：俾斯麦议会演说全集》（柏林和斯图加特，无出版日期），第2卷，第12页。

[20] 海因里希·里特尔·冯·兹尔比克，《德意志的统一》（慕尼黑，1935年），第4卷，第65页。

[21]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1卷，第340页。

[22] 布隆奇利在1862年于魏玛举行的德意志各议会代表的一次会上所说的话。W. 莫姆森：《对德意志统一问题的评价》，《史学杂志》，第3辑，第138卷（1928年），第528页。

[23] H. 舒尔特斯：《欧洲历史年表》（内德林根，1863年），第78页。

[24] 伯姆：《作为演说家的俾斯麦侯爵》，第2卷，第101页。

[25] 特别见鲁道夫·斯塔德尔曼《1865年与俾斯麦的德意志的政治问题》（《史学杂志》附页，1933年）。关于1866年战争的外交背景资料的英文本，见切斯特·W. 克拉克《1866年前的弗兰茨·约瑟夫与俾斯麦》（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4年）。另见A. J. P. 泰勒《在欧洲争夺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牛津，1954年），第8章，其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

[26] 《俾斯麦侯爵致未婚妻和夫人的信件》（斯图加特，1900年），第567页。

[27] 关于这本书的简况，见本卷第12章，原文第324—325页。

[28] M. 菲利普森：《马克斯·冯·福肯贝克》（莱比锡，1898年），转引自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2卷，第305页。

第二十章 奥地利帝国及其问题， 1848—1867年

奥地利帝国19世纪中期的历史通常分为几个时期：三月革命前时期，这时以民族力量为主的革命力量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加强。他们不能忍受在弗兰茨皇帝统治时期建立起来，又在斐迪南统治时期得到延长的制度。革命时期，此时上述革命力量主动向统治阶级发动进攻并暂时推翻了他们。反动时期，此时仍受旧秩序支配的势力对革命进行了暴力镇压。以后，在各种力量互相妥协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制度。

头两个时期已经在别的章节里有过论述（见第11卷和本卷第15章），所以本章只讨论革命之后的重新调整。然而，很难确定从何处开始。上述分期从广义上看是较为方便的，但具体应用起来却很困难。政治上和年代上的界限不很清楚。在三月革命前时期，发生在奥地利的民族运动就有十多起，每起运动的目的都包括对现存秩序的改革，而政府基本上对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敌视的。但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目的，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以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加强皇帝的中央集权制，以便保护他们不受更强大的邻居的侵犯。反过来，皇帝也觉得有必要争取与这个或那个民族联合，以反对那些更危险的共同敌人。于是，被选中的同盟者就成为政府的忠实支持者，而第三方便是革命者。但是这些仅仅是政治上的区分，而不是法律上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常常是短暂的。耶拉契奇男爵的情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皇帝在一连串的文件里先后把他说成是一个忠诚的仆人，一个叛乱者，后来又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匈牙利人一直认为他们在1848年3月实行的政治变革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它已经获得议会的通过并得到皇帝的批准；而正是皇帝后来非法地单方面取消了这些政治改革；1865年，皇帝默认了这个论点的真实性。从历史年代上看，事实上革命是由加利西亚的农民在1846年发动的，而政府立即把他们变成它最可靠的支持者。在此之后，人们从实际出发，可以把1848年3月当作一系列革命的起点——这

里所用的“革命”一词必须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但是到了4月底，加利西亚的一切都结束了。4月25日解放了农役租佃农，第二天平息了波兰贵族在克拉科夫发动的叛乱。此后，政府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利用波兰的政治阶级或者忽视它们，并且据此鼓励或者镇压农民和未开化的罗塞尼亚人中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却不必过多地考虑这两个因素。8月9日，当查理·阿尔贝特接受了维杰瓦诺停战协定以后，意大利各省也从即将爆发革命的画面上了消失了。一部分（不是很大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必须留驻意大利，以防再度发生混乱。但是，由于一般认为在意大利各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把它们与奥地利其余的领土合并，因此它们在“革命”与“反动”进行的总较量中只构成一个小小的偶然因素，而这种较量的结果将构成奥地利未来的形式。

作为这个较量中的重要因素，除了朝廷及其支持者以外，在西面有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在东面，一方面有经过四月法令改组了的匈牙利政府（参见第15章，原文第398页）；另一方面有克罗地亚人、南方的塞尔维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较为次要的其他一些民族。在这里，朝廷于9月4日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当时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朝廷受其鼓舞恢复了耶拉契奇的地位和尊严（他是在6月10日由朝廷郑重宣布加以废黜的）。未来的匈牙利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仍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它的现政府今后将被视为叛逆者。

在西方各省的两个主角当中，捷克人一直都不太危险，因为这个小民族绝不会在奥地利帝国内部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除非俄国利用它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沙皇尼古拉正在保护，而不是攻击奥地利。1848年4月，帕拉茨基拒绝了到法兰克福去的邀请（见原文第238—239页）。在采取这一闻名的行动时，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捷克民族主义者必然会以这种态度去对待奥地利。剩下的问题是能不能在不引起奥地利德意志人反叛的情况下满足捷克人在奥地利内部的要求。事实上，捷克人以前要求奥地利承认“波希米亚国王的权利”——要求在奥地利内部建立由捷克人占统治地位的、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组成的联邦体制——这一直是奥地利德意志人感到最为恼怒的事情之一。但是温迪施格雷茨对布拉格六月暴动（其动机既有民族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的残酷镇压使捷克领导人冷静下来（其中一人后来承认：“若不是因为温迪施格雷茨，我们是决

不会到维也纳去的（即去参加立宪会议）”），并使他们当时急于与奥地利德意志人达成建设性的协议。

奥地利德意志人当中的坚定分子（他们远不如帝国内其他民族那么团结）在1848年整个夏秋两季里都保持了真正的革命性，希望在法兰克福出现一个能够满足他们的民族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解决办法；不然，他们就希望匈牙利政府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一方面压制斯拉夫人，另一方面在帝国内部建立立宪和自由主义制度。但是，他们寄予法兰克福的希望暗淡下去了，寄予匈牙利的希望也破灭了，于是温迪施格雷茨在10月镇压了维也纳的激进分子，如同他在6月镇压了布拉格的激进分子一样。现在，奥地利德意志人也不再是革命的因素之一；他们被迫回到“奥地利主义”，只能希望在限定的狭隘范围之内得到最好的条件。

这些条件是恩赐给他们的，而不是他们根据权利获得的。

当施瓦岑贝格的新内阁在11月组成，议会迁至克雷姆西尔以后，“反动”势力已经在莱塔河以西占稳了地盘。不管议会会形成什么样的方案，都不可能指望在最近的将来按照这个方案来统治奥地利。如果说议会所讨论的结果不仅是有趣而且是重要的话，部分原因是后来政府本身制定的方案中采纳了他们的一部分意见，另一部分原因是当人民代表于1861年获准重新开会时，提出了他们在1849年3月曾放弃的许多论点。最重要的是，经过以后18年中的各种变化，有两项基本原则保存了下来，在1867年的“基本法”中几乎毫无改动地再次出现：第一项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项宣布“帝国各民族的权利一律平等。每一民族在普遍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本民族的语言方面，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每一种语言得以在本地的学校、行政机构和社会生活中使用，它的平等权利由国家予以保证”。^[1]

在其他方面，争论的结果表明在“奥地利”各民族中，只有不重要的斯洛文尼亚人才真正希望废除“历史单元”，情愿接受在种族基础上组成一个新奥地利这种激进的解决办法。捷克人虽然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只是在他们再次提出他们最初的要求被拒绝后才这样做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要求与更广泛的计划（它超出了议会的职权范围）联系起来，那就是重新划分整个帝国，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地区划归捷克。他们并不真希望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分割开：他们希望

这两个地区保持不分离并处于捷克的统治之下。波兰人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希望加利西亚不被分割，并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愿与捷克人建立巩固的共同战线，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把握是否能与德意志人达成更好的协议。罗塞尼亚人由于惧怕波兰人，坚决拥护中央集权制。德意志人是最强大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人遍布各州。他们主张给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权力，给各州最小的权力。同时，由于他们自己的州虽然小，但为数颇多，因此他们赞成保留“历史单元”，并实行各州之间享受平等权利的原则。对他们来说，这样一种安排的结果比按照种族来重新划分帝国要有利得多。因为如按后一种办法，他们就会成为最大的单一集团，但仅仅是许多集团其中的一个，同时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长期控制其他各民族，而他们是不愿意放弃这种控制的。

妥协的结果是保留“历史单元”（除了福拉尔贝格要并入蒂罗尔以外），但规定那些民族混居的州应该划分成县（Kreise），按照种族划分县界。各州（Lands）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一州选派6名代表进入上议院。在分成若干个县的那些州，每个县也要派一名代表。这样的安排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尤其是对德意志人，因为尽管对帝国议会和各州的各自权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其趋势无疑是中央集权的。

与此同时，议会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仅仅是由于匈牙利还没有被打败。此外，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是，匈牙利政府赖以存在的四月法令，恰恰是匈牙利的合法国王斐迪南所批准的。12月2日，斐迪南被劝说退了位。这并不是因为他低能（虽然他确是如此），而是由于他必须受四月法令的约束。他的继承人是他年轻的侄子，以后称弗兰茨·约瑟夫。这位新君主在他的宣言中向人民宣布他的意图是“把帝国的各个州和各个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国家”。虽然这句话的意义含糊不清，但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出席斐迪南的退位仪式一事，便使他的意思变得清楚了。当然，匈牙利议会立即明白了他的话的含义，根据科苏特的提议，议会拒绝承认斐迪南的退位是合法的；议会对任何其他君主，在他正式加冕和向宪法宣誓之前，都不予承认。

于是朝廷摊牌了。12月19日，发布帝国特许令，宣布恢复塞尔维亚人的家长制和首领制，并许诺要“在帝国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上”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同一天，耶拉契奇率领帝国军队跨过了奥地利的边界进入匈牙利。温迪施格雷茨受年轻皇帝的全权委任，紧跟

在耶拉契奇的后面去征服这个国家。其他军队从北方进攻，南方的塞尔维亚人再次拿起武器。由于军队数量上的巨大悬殊，匈牙利人节节退却，1849年1月4日布达陷落。后来奥地利军队吃了一场短暂的败仗，但于2月27日在卡波尔纳又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时，战争似乎已经结束了。3月4日，施瓦岑贝格颁布了适用于整个帝国的新宪法（意大利各省除外，它们的地位留待以后解决）。3月7日，克雷姆西尔议会被解散，理由是它没有完成它的立宪任务。实际上它的立宪委员会已于3月2日举行了一场大肆宣扬的自我庆贺，就此结束了它的工作。

三月宪法主要出自施塔迪翁伯爵之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纳了克雷姆西尔议会的建议。它恢复了“西奥地利各州”的“历史单元”地位，并作了修改，将加利西亚划分成两个直辖地区（Crownland，这是施塔迪翁亲自作出的革新。他曾在利沃夫任总督，热心保护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曾经指责他把罗塞尼亚人“创造”成一个民族）。帝国议会将再次由上下两院和各州议会组成，但是这一次对后者的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加以相当的限制。对人民许诺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不是不慷慨的。其实，其中大部分是吸收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们所起草的条文，并且特别重申了各民族的权利一律平等以及每一民族有继承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神圣权利。宪法保证给予相当广泛地方自治权，并于3月11日通令颁布。由选举产生的顾问将协助各县和行政区（Bezirk）当局工作。时间将证明一项附加条款的重要性，那就是国务委员会（Staatrath）以改变了的形式保存下来。它是君主的顾问班子，从16世纪以来就以各种形式存在，由它衍生的枢密会议实际上代替斐迪南统治了奥地利。它的新形式是帝国咨政院（Reichrath），由皇帝提名的21名成员组成。但是，由于采用内阁责任制，参议院的作用就注定不会超过英国的枢密院。

然而这部宪法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他方面。弗兰茨·约瑟夫的宣言明确宣布了他决定将宪法应用于“一个单一的不分离的奥地利帝国”。未来的“奥地利”将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体。其君主将只称为“奥地利皇帝”，其国民将只有一个国籍，其法律将平等适用于整个帝国。

实际上，并没有设想达到完全的统一：伦巴第和威尼斯将得到一部特别法，宣言中还指明：“匈牙利王国的宪法仍然有效，只是规定

与现行帝国宪法相抵触的一切条款将予以取消，并保证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以及在一切公共场合和市民生活中使用当地语言的权利；这些问题将由一部特别法作出规定。”然而，这项宣言实际上产生的效果却是取消匈牙利的宪法；由于特许令列举了构成奥地利帝国的“直辖地区”，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匈牙利王国就是直辖地区之一；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上阜姆是另一个直辖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和各分区（Partium）^[2]完全独立于匈牙利，它们构成又一个直辖地区。“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3]的权利得到肯定；至于它是否应附属于“另一个州”的问题，将和达尔马提亚是否并入克罗地亚的问题一样，留待以后讨论解决。“军事边界”^[4]保持了原来的状况。

因此，这一宣言对奥地利的立宪主义者，对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是一次直接的挑战：实际上，除了对耶拉契奇以外，对每个人都是挑战，而对耶拉契奇来说，这项宣言给予他的东西比他所期望的要少得多。公平地说，奥地利各州的居民对整个事态只敢悄悄抱怨，他们的怨声低得不足以引起当局的不安。政府的事务完全和以往一样进行着：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前，由有关当局根据法令行事。

别处的情况则不尽然。在意大利，查理·阿尔贝特谴责了停战，威尼斯起来反抗。但是在3月23日，拉德茨基在诺瓦拉使查理·阿尔贝特遭受惨败，迫使他退了位（见第12章，原文第321—322页）。他的继承人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终于承认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然而伦巴第和威尼斯处于严格的军事控制之下，因此置身于整个形势之外。已经答应给予它们的特殊地位这时还不能给它们；另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全面措施（除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之外），也不适用于它们。

与此相反，在匈牙利，政府意味着将构成“神圣帝国直辖地区”的整个地区迅速而又全面地与奥地利各领地合成一体。温迪施格雷茨本人在匈牙利拥有地产，而且在地主阶层中有许多朋友。他起初倾向于把帝国的宣言解释为在这个国家的被征服地区恢复1848年以前的宪法，而把宪法的修改工作留待以后去做。在匈牙利西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和匈牙利权贵之间实行了某些合作。这些权贵们自称为“老保守党”，其纲领就是恢复旧宪法。除了接受解放农役租佃农这一既成事实之外，他们事实上不同意对旧宪法做任何修改。然而，国家并不支持他们。4月14日，匈牙利政府针对3月4日的宣言发表了一项

反宣言，宣布匈牙利及其全部附属领地（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等）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废黜了“发假誓的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王位。在国家的形式问题获得最后解决之前，科苏特任“总督”即“摄政”。^[5]当时任奥地利政府司法大臣的巴赫及时指出这项宣言“使匈牙利宪法完全失效”，因此政府可以放手行动了。施瓦岑贝格并不同意温迪施格雷茨的观点。他独断专横，但不封建，他已于4月12日让韦尔登将军代替温迪施格雷茨任临时首脑，既负责军事行动，也管理民政事务。5月30日，韦尔登的总司令职务又被海瑙所替代，并为其配一位民政专员格林格尔男爵。这时巴赫亲自接管了内政大臣施塔迪翁（他已失去理智）的职务。他授予格林格尔全权负责建立新秩序。7月4日公布了这种新秩序的蓝图。匈牙利剩下的部分将分为5个地区，每个地区由一名高级专员领导。随着军队的推进，这些地区陆续建立。实现农役租佃农的解放和提倡平等使用一切“地方”语言的工作同时开始进行。奥地利甚至给俄国军队也配备了奥地利的民政专员，以便在俄军战场的后方也实现所要求的措施。

8月13日，格尔盖伊在维拉戈斯向俄军投降。9月1日，海瑙发表声明，宣布叛乱已经结束，并要求所有的士兵、官员和议会议员向当局报到接受审查。前一天，维也纳的内阁会议已经撤销海瑙判处死刑的权力。尽管如此，著名的“阿拉德殉难者”还是在10月6日被处以极刑。有一千多人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或监禁。罪行小的被征入军队，但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至当局感到难以应付，于是只好把他们放回。10月17日，在全国建立了“临时行政体制”。11月1日宣布三月宪法也适用于匈牙利，但不附有以前的保留事项，这是因为再次提出这一论点：匈牙利议会本身的，行为使宪法完全失效。现在，这5个地区已确立，其划界则尽可能使马扎尔人处于少数地位。原来的行政区划予以保留，但所有的官员都成为政府雇员，其中大多数（人们称为“巴赫轻骑兵”的那一大群人）都不是匈牙利人，他们是奥地利德意志人、波兰人，主要是捷克人。民政当局得到新成立的宪兵队的协助，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它的建立是政府最紧急的任务之一。

特兰西瓦尼亚根据曾经许下的诺言加以扩大，它的组织方法遵循了类似的方针。在当地居民中，萨克森人受到最大的优待，但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对罗马尼亚人给予相当大的让步。然而，在这里也是维也纳掌握着最高控制权。

解决南部斯拉夫地区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塞尔维亚人大主教拉亚契奇是匈牙利塞尔维亚人的实际首领（选举产生的首领舒普利卡上校当时率领一个团到意大利去了）。他主要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南斯拉夫人。他现在要求伏伊伏丁那成为一块独立的直辖地区。除了巴奇—博德罗格县以外，他还要求把巴纳特、靠近边境的一些地区，以及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县也划给这个直辖地区。海瑙本来打算把巴纳特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由军队控制的单元，但是最后，为了安抚塞尔维亚人，他把巴纳特地区的3个县（但不包括边境地区）和塞莱姆的两个地区增加给巴奇—博德罗格，以组成“塞尔维亚人的伏伊伏丁那和特梅斯瓦尔的巴纳特”——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只占全人口的1/5，他们勉强超过德意志人，但显然少于罗马尼亚人。耶拉契奇为他的克罗地亚获得了塞勒姆的其余部分和斯洛文尼亚的其他两个县，还获得从匈牙利划出来的阜姆和穆拉科兹地区，但是仍没有得到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边境地区。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不满意的是他们与匈牙利和奥地利各省一样，都受中央集权的统治：奥地利的行政官员通过未经议会同意就颁布的法令来统治他们，而非克罗地亚官员、德意志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占据了各地方官职。

不管是好是坏，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的帝国终于建立起来了。内阁各部这时都掌握在巴赫的手中，他在6月取代了施塔迪翁的内政大臣职务，把司法大臣的职务让给施默林。施瓦岑贝格主要关心的是对外事务，他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巴赫·施默林、克劳茨（主管财政）、布鲁克（主管贸易）和图恩（主管教育）组成了一个很有活力的班子。每人都急于推行他认为必要的改革，谁也不愿意受到群众意见的妨碍。实际上，巴赫很快就取消了施塔迪翁所采取的实现人民代表权的步骤。他一接管内政部就中止了地方自治法，并于1850年3月取消了县和区的顾问。

这一时期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清除了许多过时的东西，其实它们早就应该不存在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农民的解放具有实际效果的那些措施——进行一项规模巨大而又复杂的工作，使300多万人（包括匈牙利）获得了土地。而将近10万人不得不把土地让出来。在奥地利德意志人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国家负责补偿1/3，州负责补偿1/3，土地获得者负责补偿1/3。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不要求农民付出补偿费，

即使在其他地区，补偿费也是很低的，因为在确定补偿费时，只是按土地实际价值的1/3左右来估价的。因此，对以前的土地所有者的补偿是相当少的。

取消地主的世袭管辖权以后，整个司法体制必须重建，于是建立了新的区级法院体系，在州中心设置较高级的审理机构，而最高上诉法院则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终审机构。在这一方面实行的变革并不都是倒退的，例如过去那种在私下用书面形式作证的旧制度已由以口头询问证人为基础的公开程序所代替。对处理一切犯罪案件和严重的行为不端都设置了陪审制度。

铁路已经收归国有，并加以发展。南方铁路的建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通信有了重大的改进，商船队得到扩充，对邮政事业进行了改组。人们建立了工商业行会，努力发展工业，推动出口事业。布鲁克的梦想是使新的奥匈经济联合体成为欧洲、特别是中欧的首要经济因素。由于有了这个目标，就采取了更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并减轻了关税。

在这一时期，连图恩的教育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大多数在技术上是值得称赞的，而且许多还确实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对文科中学进行了改革，在大学里实现了教学和学习的自由，大学生可以转学，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对帝国的不太发达的民族，尤其对匈牙利和加利西亚来说，这种新制度在较低的水平上甚至还满足了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和民族的需要。原则上已经规定，在小学里应该用学生们的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于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开始用斯洛伐克语、罗塞尼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来进行小学教育。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也不再用马扎尔语对斯洛伐克人进行教育，或用波兰语教育罗塞尼亚人。他们在这些学校中所接受的部分教育已经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了。

同样，首先发给匈牙利官员的指示中就规定：在教堂和学校中都不得“强迫使用某种语言”；当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应享有平等地位；一切官方文告须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处理公共事务须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以及接收和回答通信须使用当地语言。对其他州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但是，不久便制定了一条最为重要的规定，那就是德语将是在“内部事务”中使用的唯一语言。所谓“内部事务”就是指在整个帝国内部一个政府部门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所以每个公务人员都必须懂德语。在军队里服兵役期间也要使用德语。在西里西亚和布科维纳，德语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德语也成为法庭上使用的语言，不仅在高级法庭，而且在非德意志人居住区的许多初级法庭里也使用德语。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教育界。在罗塞尼亚人集中的加利西亚，由于没有合格的罗塞尼亚人教员，起初高等教育“暂时”用德语教学。虽然波兰的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克拉科夫古老的亚盖隆大学在1854年完全德意志化了，匈牙利的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也遇到同样的命运。1853年，除了在小学校和宗教教育以外，捷克语的使用已被禁止。1854年12月16日和1855年1月1日分别颁布的两条法令规定：在整个帝国（伦巴第和威尼斯除外）的所有文科中学里德语是必修课，必须“主要”用德语教学，至少在高年级应该如此。于是，在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除了最低级以外都使用德语，并且成为德意志化的工具。

在1850年和1851年，从官方来说所有这些措施仍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是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前未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法令。这时还不清楚这位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街垒大臣”的巴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他早先的主张。他很可能是被一种担心推向前的，那就是如果他不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其他人就根本不会作任何改革。另一方面，施瓦岑贝格和弗兰茨·约瑟夫周围的人所讨厌的并不是巴赫的方法，而是他的行为。他们早就开始说服弗兰茨·约瑟夫不要恢复他们打心眼里不喜欢的立宪政体，而要使自己成为唯一的专制君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多半是希望约束巴赫，而不是为了其他。这一方面的幕后策动者是冯·屈贝克。毫无疑问，他是旧政权最正直和最聪明的官员之一，但是在他看来，有效地保存力量现在似乎比任何形式的革新要重要得多。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要对组织斐迪南的退位和弗兰茨·约瑟夫的继位负责；他对皇室的秘密也甚为了解。1850年12月5日，屈贝克被提名为帝国咨政院的指派主席。第二年4月，这一机构建立起来了，在施塔迪翁建议成立的各种机构中，它是唯一得到实现的。这时屈贝克才明白他自己成了弗兰茨·约瑟夫的特别总顾问。他立即开始向年轻的君主鼓吹取消内阁责任制的好处，建议由皇帝一人全面负责行事。作为最高一级的顾问班子，咨政院将代替内阁会议，

大臣们将恢复到各部门首脑的地位（这大体上与1848年以前的国务会议和各宫廷办事机构之间的关系相仿佛）。

要使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的思想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并不难的，因为他和他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坚信，他神圣的权力和使命是对他的臣民进行统治，而不是与他们共同统治。1851年8月20日，即在屈贝克呈给皇帝一份条理分明的长篇备忘录，详细阐明了他的观点。3天之后，弗兰茨·约瑟夫发布了一项命令，解除了大臣们的一切责任，让他们只对皇帝负责。这时，废除三月宪法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之所以能够延期取消，主要是因为奥地利需要征求德意志中等邦的国王和君主们的意见，而这只有等到德意志与普鲁士在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中有了胜利的保证以后才有可能。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普遍担心在法国会重新发生骚动，并向欧洲其余地区蔓延开去。但是在11月29日，施瓦岑贝格和曼陀菲尔签订了《奥尔米茨条约》，这似乎表明——尽管以后的事态证明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奥地利在对普鲁士的长期外交斗争中占了上风，从而使它得以在德意志自由行事（参见第19章，原文第502—503页）。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在巴黎政变成功（见第15章和第17章，原文第411页和第444—445页）。现在，道路已经扫清。12月31日发布的所谓“除夕特许令”废除了三月宪法，但是规定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解放农役租佃农这些法律仍然有效。现在，由皇帝独自一人承担政治责任。管理国家的原则开列在下达给施瓦岑贝格的文件上，这个文件实际上是由巴赫拟定的。这个制度是通过官僚机构和严密的中央集权来贯彻的全面的专制制度。在自治机构中只有地方自治的残余还存在，但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现任地方议会议员等却变成了政府的公务员，而且将来不再举行选举。主要代表拥有土地的贵族的“顾问”委员会将在每一个直辖地区、县和区成立，然而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却一直没有成立起来。经过改革的“历史单元”保留了下来，但各州行政机构的作用却减少了，这时主要作用已转移到较小的单位“混合地方法院”。它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把政治和司法职能结合在一起。有许多职能是由维也纳任命并直接向其负责的宫廷委员会承担的。

有了这份文件，就完全恢复到革命前的政治状况，甚至远远超过那时的状况，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已经登峰造极。实际上，在以后的7年当中政治机器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只有一些小的调整和稳步推行

德意志化；同时在大多数直辖地区陆续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从而缓和民众的情绪。这个制度的重心越来越转入巴赫的手中，因为1851年1月施默林辞职，布鲁克于5月辞职，不久克劳茨也辞了职；而他们的继任者不是重要人物。1852年4月施瓦岑贝格突然去世，这时弗兰茨·约瑟夫没有任命新的首相，梅特涅的学生布奥尔伯爵负责主持外交事务。帝国咨政院没有起什么作用，不久屈贝克也辞去了主席职务。

这时采取了另一个重大步骤：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廷之间历史悠久的联盟关系。主要的倡议者是弗兰茨·约瑟夫过去的导师冯·劳舍尔以及图恩，劳舍尔在1853年成为红衣主教兼维也纳大主教；但是巴赫以及弗兰茨·约瑟夫本人和他的家族都是他们的强有力的同盟者。甚至在1850年，罗马天主教主教们的权力和特权已经有了相当的扩大；1848年5月被命令在奥地利暂时停止活动的耶稣会，到1851年6月恢复了活动。1852年4月开始就宗教事务问题举行谈判，1855年8月签订了政教协定，使罗马教会享有极大权力和特权的地位。天主教会受到国家特殊的保护。教皇可以与主教、教士和人民自由交往，不必征得世俗当局的同意。天主教的教育完全由主教负责。教会法庭得到恢复。教会的财产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约瑟夫二世解散修道院时得来的资金也移交给它们保管。一项秘密协议走得更远，例如它包括一项保证：在事先未得到罗马教廷同意的情况下，奥地利将不改变任何有关忏悔和互相忏悔的规定。

这一政教协定的签订可以被视为奥地利政府自1848年的倒退以来已走到最远处了。随后出现一两年的稳定时期，然后可以看出反对派的力量缓慢地聚集起来；从1859年开始，政府步步后退，直到1867—1868年才得到一个新的喘息时间。奥地利政府的后退是很勉强的，后退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与其说这是由于弗兰茨·约瑟夫的前后矛盾和感情冲动的做法（他常常因此而受到责备），不如说是由于那些迫使他后退，并且最终他不得不与之“妥协”的力量——匈牙利民族主义和维也纳的财政界——正是他和他最亲近的顾问们对其最缺少同情的力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受到多方攻击的“妥协”一经达成之后，能够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在中欧的任何解决方案能维持这样长的寿命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满足了最强大的较量者的要求。

帝国西半部的各族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欢迎专制制度的建立。必须记住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前是佃农，他们从解放中得到了很大

的利益。不错，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发现国家现在要向他们征税时，的确感到吃惊和反感，而且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还出现了一些暴动，但无论如何他们绝不要地主回来。产业工人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充分就业加上警察的严密监督使他们老实平静。革命时期在奥地利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中真正造成思想动乱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德意志人总的来说都觉得失去统一德意志的损失完全得到了补偿，那就是他们现在有了美好前景，可以管理包括匈牙利人在内的帝国其他各民族的事务，从而完成“日耳曼人的使命”。这个前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物质上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官僚机构的巨大发展为奥地利德意志中产阶级的许多青年人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维也纳以前的一些政客和文人学士编了一些讽刺笑话，后来的历史学家却煞有介事地把它加以编选作为“反抗”的例证，但真正的反抗是寥寥无几的。捷克人从新政权没有得到像德意志人所获得的那种满足民族自尊心的小小好处，但得到了与德意志人同样多的实际利益。每一个中产阶级的捷克人都能讲很好的德语，足可以成为“巴赫的轻骑兵”，其中捷克人占了大多数。捷克人当中少数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十分不满，但很孤立。1855年，他们当中最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哈夫利切克从政府作为处罚强迫他们居住的布里克森（当时的恐怖主义手段就是如此）回到布拉格，这时他最痛苦的印象是，“过去和现在，反动都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而且主要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6]

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一般人的物质生活都非常好过，这就大大有利于局势的缓和。农民的解放对农业和一般经济生活都给予很大的刺激。农民们为他们自己劳动，而几十年来他们从没有那样卖力地为他们的主人劳动过。他们生产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并且作为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进入了经济领域。布鲁克尽一切力量发展自由贸易：与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斯进行贸易的各种障碍终于被消除，现在他争取与德意志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他把禁止进口的制度改变为以关税为基础的进口制度，并尽量压低关税。在他以后，1853年布奥尔根据“最惠国”条款与普鲁士签订了贸易协定，这给消费者和多种工业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而且由于扩大了贸易市场，他们的所得超过了由于降低贸易保护所造成的损失（参见第19章，原文第505页）。新的工业和商业行会工作很出色，大规模公共事业（如铁路等）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和有利可图的合同；装备军队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项工作的做法浪费惊人。

以上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够促进工业的繁荣（主要对维也纳和波希米亚有利），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时首次将工业的经营大部分建立在信贷基础之上，换言之，这是因为金融开始支配工业。在三月革命前，奥地利国家银行几乎只限于与国家进行业务交往。在私人银行家当中，路特希尔德家族独占鳌头；其余各家规模甚小，他们的经营也大都是私下交易。现在，整个银行体系突然扩大起来。总部设在巴黎的犹太人经营的动产信贷银行首先开始承办大笔的信贷业务。然后于1853年，一个奥地利集团创办了第一家重要的奥地利私营银行贴现公司。1855年，维也纳的路特希尔德家族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信贷公司，其目的就是要将动产信贷银行排挤出去。

这些机构的确有助于维持和发展奥地利的工业；不仅如此，它们还给投机商带来了暴利，因为随着这些机构的建立，特别是随着信贷公司的建立和开业，掀起了一股投机狂潮。这不仅使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城的犹太人富裕起来，而且也使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走了红运，他们在众多新成立的股票公司中的一家有幸买到了价格暴涨的股票。此外，许多大贵族也获得利益，从而明显地缓和了他们对新的自由主义的憎恨。信贷公司的创建人不仅包括路特希尔德和劳雷尔斯，而且还包括施瓦岑贝格、菲尔斯滕贝格、奥尔斯佩格、肖特克等奥地利第一流家族中的其他人物。

事情的另一方面却是国家开支的不断增长。复杂的行政管理，挥霍无度的军事开支，宏大铺张的公共工程以及给地主的补偿等消耗了大量的钱财。尽管奥地利的征税制度扩展到匈牙利，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所得税，但是国家预算——虽然得到撒丁战争赔款这项意外收入——却始终达不到平衡。政府向国家银行借款，或卖掉王室的财产。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见第18章，原文第478—480页）的动员耗费极其惊人，在此之后，占当时全国铁路2/3的国家铁路，几乎以对国库极为不利的条件将其全部出卖给一个国际财团，而在这个财团中，动产信贷银行占有主导地位。

出售铁路后，国家又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的方法来弥补它的亏空。然而，只要国家不垮台，对购买无论是国家财产还是债券的人来说，情况都是极为有利可图的，更何况垮台的威胁还未到来。因此，政府的财政继续呈现出好景，而工业也在财政的好景中继续发展。

在匈牙利则是另一番景象。除意大利各省以外，只有在这里“反动”势力采取了严厉手段，因为这是必要的。然而也只有在这里证明在任何基本方面压力都不可能减轻。这里实行过大量的赦免并发布过一些恩惠法令，而且在除夕特许令颁布以后，整个政治制度在一年之内保持“临时”状态，以期可能达成某种政治妥协；但是老保守主义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未获成功。1853年1月发布了一个“最后决定”，对过去的领土和政治措施作了肯定，一个自上而下的更有系统的统治时期开始了。

当然，即使在匈牙利，也有与奥地利合作的人，他们主要是当地的斯瓦本人，但是过去在各个方面掌握国家命运的中小贵族当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却表现得极为冷淡，袖手旁观。即使巴赫不愿意那样做，他也不得不依靠外国人来管理他的新政府。他已经估计到这个问题；但是如同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人一样，他算计错误的地方在于他低估了这个国家传统的领导人对国家的控制力。数以千计的奥地利德意志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带着最开明的指示来到这里。他们不了解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不熟悉他们的环境，不懂得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一事无成。他们遭到当地人民的憎恨，他们并不比他们的受害者幸福。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生动而又诙谐地描述自己的经历。他到达他奉命管辖的村子的那一天，发现有一群人排着长队等着他。原来这些人是因犯有煽动叛乱罪而被判要关进监狱的。但是由于没有关押他们的监狱，所以他们每天要领一些钱以代替口粮，然后去当地的酒馆把钱花掉。警察沮丧地报告说，群众坚决支持过去的领导人。农民们仍然坚持说，是科苏特而不是巴赫解放了他们，而且他是违背“维也纳”的意志才这样做的。^[7]解放甚至填补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维也纳”。就连犹太人也站在匈牙利政府一边，因为该政府在德布勒森通过的几乎是最后一项法案就是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而新政府又把这些限制重新强加给他们。

一部分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站在新政府一边，请求在联邦制的奥地利以内实现区域自治，但他们人数不多。匈牙利北部两个地区的划界分别使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各占多数，这两个地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比中部各地区只是稍弱一些罢了。

此外，为了达到与匈牙利抗衡的目的而新建的直辖地区，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虽然对摆脱了马扎尔人

的枷锁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发现德意志人并不比马扎尔人好多少。他们没有与当地的马扎尔人联合，但是也和他们一样反对政府。使克罗地亚人大为不满的是他们发现达尔马提亚，甚至连军事边界地区都没有划归他们，而且克罗地亚仅仅是一个直辖地区——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并且与匈牙利一样，由非本地人掌握行政管理——而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王国的中心。“最后决定”把克罗地亚划分为6个行政专区，每个区由维也纳指定一名领导人。一个委员会来到这里审查官员。那些被认为不符合标准的官员，如果是属于政治上的原因，就解除其职务；不然就送进学校学德语。“巴赫的轻骑兵”就像骚扰匈牙利那样，残酷无情地骚扰克罗地亚。耶拉契奇被任命为地方长官，但他一头埋进诗歌创作之中，老实说，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能超过了他在政治或策略方面的才干。一位克罗地亚领导人对他的一位匈牙利朋友说的话是很有名的：“对你们的惩罚，正是对我们的奖励。”

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从最初起便一片混乱。巴纳特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对把他们包括在这一地区一直表示不满。德意志人（且不说布涅瓦茨人^[8]和当地的马扎尔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置于塞尔维亚人之下。塞尔维亚人报怨没有把边界地区包括进来；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忠诚成为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以后。最后，伏伊伏丁那也被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在较高一级主要通过德意志人进行管辖。

匈牙利的形势在两个方面显得特别严重。第一个是财政形势：毫无效率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的开支极大，而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在不交税方面表现了独出心裁的机灵手法。政府每年要把巨额款项耗费在企图统治不服它管的匈牙利。第二个危险表现在外交—政治方面。全国大多数人仍然把科苏特当成他们的领袖；而科苏特聪明、善辩，他周游世界，向各地派出使节，到处煽风点火，激起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敌视并密谋策划要把它推翻。这样，匈牙利的不满鼓舞了奥地利的敌人，因为可以预料，一旦爆发战争，匈牙利将起来反对政府。

这样的前景越来越近了。奥地利显示出来的权力在奥尔米茨战役中达到了顶峰。除夕特许令发布以后，施瓦岑贝格向德意志邦联发去一份照会，要求单一的奥地利，不管是德意志地区还是非德意志地区，都参加邦联。^[9]然而，正由于奥地利的胜利，才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造成一种普鲁士可以从中渔利的形势。德累斯顿会议最

后不得不恢复旧邦联，回到1815年建立它时的那样，结果很异常，新的单一国家有一半在邦联之内，一半在其外。现在奥地利又回到它原来的地位，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力量的对比一年一年对普鲁士有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的政策笨拙而犹豫不决，使它丧失了与俄国沙皇的友谊，它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参见第18章）。另一方面。加富尔巧妙的外交大大提高了皮埃蒙特的威望，打破了意大利的现状。再者，路易·拿破仑现在已经能够独立行动了，他对民族主义原则公开表示支持。法国和皮埃蒙特结成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在过去，甚至在1858年7月20日的普隆比埃会晤之前，就已经投下了暗影（见原文第271页和463页）。

这些事件使那些不妥协的匈牙利人继续抱有希望，与此同时，另一个神经中枢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855年布鲁克重任财政大臣，他试图通过回到传统的做法（包括大幅度增加税收）来恢复秩序。随后，1857年的股票市场暴跌。从英国和美国经过德意志传到维也纳。美丽的泡影破灭了。股票投机商变成了乞丐。工业贷款被收回。现在，不得不把新建的（而且是花钱最多的）南方铁路卖掉。蒂萨铁路也遭到同样厄运。信用机构本身受到重大损失。现有债券的持有者反对再发行债券，因为那样就会危及对已发行债券的保证。从此以后，财政界和商界普遍要求国家节省开支，他们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巴赫的官僚机构和军队。领导这些斗争的各界人士尤其反对政教协定及其全部内容，这是不无道理的。

在这个时候节约军费开支实在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因为现在已很清楚，法国和撒丁都准备在意大利打击奥地利，而且，普鲁士的态度也带有威胁性。弗兰茨·约瑟夫不愿意按照普鲁士的要价来买得它的支持。1859年4月，战争爆发了。由于奥地利发出了最后通牒，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是侵略者，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和加富尔制造的（参见第21章，原文第571—572页）。弗兰茨·约瑟夫只不过是让冲突提前爆发，以期速战速决，从而避免一场耗费极大的持久战，或者保持一支大部队处于备战状态，而这样做的耗费也少不了多少。

战争的威胁使奥地利的困难达到了顶点。如前所述，困难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又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对政府的严重威胁。政府不得不把15万士兵留在匈牙利，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暴动，另一方面是

为了征税，因为声名狼藉的巴赫轻骑兵根本征不到税。在维也纳，战争爆发的前4天，国家不得不停止兑付现金，并且采取剪去公债券息票的简单办法来征收紧急税。虽然以70%和5%的利息发行新的公债，可几乎没有什么人购买；于是国家命令银行、消费者和纳税人认购债券，并从国家银行预支了多达1.33亿古尔登的贷款。最后，帝国颁布法令，给直接税增加了特别高的附加税。

速战速决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奥军总司令吉乌莱和他的顾问们十分无能——对此弗兰茨·约瑟夫本人负有责任，因为他取消了国防大臣这一职务，亲自掌握军队和军务——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忠：德意志和捷克的军队驻守匈牙利，而匈牙利的军队却被派到意大利去，不仅他们和意大利士兵大量逃跑，更为不祥的是连受信任的克罗地亚士兵也有很多人当了逃兵。撒丁在马让塔战役和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获胜，主要原因是奥军士兵或逃跑，或投降。

索尔费里诺战役一结束，弗兰茨·约瑟夫就开始放弃专制主义。当皇帝向撒丁发出最后通牒时，布奥尔已经辞职，由雷希贝格接任外交大臣。7月，雷希贝格接管总理大臣职务。但是重要的变化是解除了巴赫的职务，由一位新的大臣戈武霍夫斯基伯爵接替。对于这个任命，每个人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戈武霍夫斯基伯爵是一个波兰贵族，原在加利西亚任总督。据说当皇帝把新的任命告诉他的时候，他惊喊道，“可是我是一个斯拉夫人呀”。对此，弗兰茨·约瑟夫回答说：“斯拉夫人是我最忠诚的臣民。”事实上，当时斯拉夫人比起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来说，没有给他带来那么多的忧虑。

但是，第一个让步并不是对斯拉夫人作出的，戈武霍夫斯基也不是主张联邦制的贵族的真正代表，不久，这些贵族再次提出他们的主张。1859年8月23日的“拉克森堡宣言”制定了新政府的纲领，它一开始就保证包括民用和军用的一切政府开支都应该受到“有效的控制”。宣言同时保证：天主教以外的各种宗教应享有自主权和信仰自由，以及“犹太人的地位应该根据现代的方针予以确定，但须考虑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区域自治的措施要恢复，目前由官僚机构行使的“大部分”职责将移交给各自治机构；接着要在“各个直辖地区”建立“代表各等级的机构”。

宣言里没有提到“宪法”这个词。这并不意味着弗兰茨·约瑟夫已经变得相信立宪政体，相信民主了，这只意味着对某些利益集团不得不作一定的让步。即使如此，这些让步的实现也是很迟缓的。直到12月21日才指定成立了一个国家债务委员会。财政界和商业界对这一措施的反应表明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完全不足以胜任其职。

这时，结束意大利战争的条件出乎预料地对奥地利有利——它虽丧失了伦巴第，但保住了威尼斯和四要塞防御区——于是匈牙利问题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弗兰茨·约瑟夫又表现出他的本性，不愿意与那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坚持1848年的立场的小贵族进行谈判；但这时老保守主义者又一次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甚至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超出了政府的意愿，因为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恢复1848年以前的宪法，但是他们也愿意对宪法作出修改，使帝国政府掌握较大的权力，以此来抗衡科苏特的分裂主义和自由主义。1859年整个秋季，雷希贝格都忙于与老保守党领导人进行私下会谈，主要根据他们的建议，弗兰茨·约瑟夫才于1860年3月5日发布了所谓的“三月特许令”。帝国咨政院将加以扩大，同时，虽然与过去一样仍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却被赋予半代议制性质，在它原有的21名成员之外再增加38名来自各州议会的成员。在组成后一部分成员时，皇帝将亲自任命新的成员。这个“加强的咨政院”定于5月31日召开会议；一部分成员来自维也纳资产阶级的上层，其余的来自各州，他们几乎都是大贵族或高级教士。

来自匈牙利的6名成员都是老保守主义者（说句公道话，政府也曾提出其他一些人，但被提名者拒绝了政府的邀请）。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表现出自己毕竟是匈牙利人，这是令人不安的。他们的领袖塞岑伯爵和埃米尔·德谢夫菲伯爵证明他们是在这些成员当中最老练和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实际上，他们控制了整个议事日程。他们把来自各州的贵族代表联合成为“联邦派贵族联合党”，使之在人数上超过了中央集权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然后，他们把议事日程改变成类似立宪会议的议程。

最重要的是匈牙利人对待他们的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同僚的态度。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维也纳的中央集权制——不管是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打算与任何反对中央集权制的力量联合。他们不仅支持波兰贵族为加利西亚争取特殊地位的要求，还支持了波希米亚领导人（他们的首脑是克拉姆-马蒂尼茨

伯爵）大胆提出的承认波希米亚王室各州的权利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在会议期间使用的一种策略，因为匈牙利贵族的智囊艾厄特沃什在他的《奥地利权利和统一的保证》（1859年）一书中支持这项要求。

作为报答，波希米亚贵族以及波兰人也支持匈牙利人提出的恢复他们的宪法的要求。这意味着抛弃了斯洛伐克人；很明显，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尤其是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注定将成为匈牙利的牺牲品。甚至克罗地亚人也没有得到多少重视。于是出现了一个政治力量的新联盟，或者说以更加肯定的形式回到老的联盟。捷克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更大的要求，放弃了迄今为止他们与德意志自由主义保持的共同行动，而德意志人民被迫再次向匈牙利自由主义者寻求友谊。

在匈牙利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的贵族在“加强的咨政院”以多数（克罗地亚人与多数派共同投了赞成票，但所有的德意志资产阶级代表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以及罗塞尼亚人都投了反对票）通过了一份报告，建议帝国应该根据一个新体制进行重建，这个新体制应该考虑到“组成帝国的各部分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特点”，并应该“与原先就存在的历史上的机构结合起来”。匈牙利的区域自治和地方机构应该予以恢复；在其他州，如果不存在与匈牙利的机构类似的机构，则应建立起这样的机构。各州的议会都应该召开，并保证各州真正实现自治。这个报告在原则上承认帝国各州一律平等。

当这些辩论和协商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向匈牙利作了相当多的政治上真正有价值的让步。这个国家不再分成五个部分。陆军元帅贝内德克被任命为总督，他是匈牙利人。又发布了一次大赦令。德语在教育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大大削弱了（在这方面，在加利西亚对波兰语也作出同样的让步）。可是这些措施丝毫没缓和社会舆论，尤其因为图恩于1859年9月发布“新教特许令”，规定了新教教会的地位，而教会认为这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现在，弗兰茨·约瑟夫急于要解决问题。他必须于10月21日在华沙会见沙皇和普鲁士摄政王，而他是不愿意在他的统治地区竟有一半几乎公开反叛他的情况下举行这次会见的。据说塞岑在火车上和他谈话时曾向他保证，匈牙利将会接受根据“加强的咨政院”以多数通过的报告的方针制定的解决方案。于是根据这一精神，急急忙忙起草了

一份文件，这就是所谓的“十月文告”，于1860年10月20日发表。实际上，十月文告是遵照以多数通过的报告中的建议制定的。皇帝将在“合法召集的各州议会和帝国咨政院的合作之下执行其立法权。各州议会将按皇帝规定的名额向咨政院派出代表”。“在早先的宪法规定属于匈牙利国王的各王国和州之内，以及在宪法规定的其他各王国和州内根据它们各自的法令”，咨政院将处理影响整个帝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均一一列举）；州议会将处理其他各种问题。匈牙利的地方自治机构将立即予以恢复，在其他地方要建立类似的机构。地方选举要立即举行。在非匈牙利各州的议会中，如果所讨论的问题属于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些州作为一个单元来“处理和解决”的那种类型，则无须请匈牙利人参加会议。

在发表十月文告的同时，还发布了许多法令。弗兰茨·约瑟夫重申了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他的祖先对某些与匈牙利等级会议有关的法律所表示的赞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匈牙利恢复1848年以前的宪法原状。与此有关的是重新建立了匈牙利宫廷总理办公厅，并任命直到最近还因煽动叛乱罪而关在狱中的沃伊男爵为总理。总理是中央政府的成员之一，塞岑也进入中央政府任不管部大臣。1848年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有关解放农民的法律的有效性得到承认，但其他法律则未获承认。马扎尔语作为中央的官方语言以及在“内部事务”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恢复，但同时将为非马扎尔人提供充分的方便，允许他们在地方行政管理和初等教育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县、市一级的议会要立即进行选举，然后恢复地方政府旧的自治制度。匈牙利议会将在1860年召开，以便就改革匈牙利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建议。

同样，特兰西瓦尼亚的宫廷总理办公厅也得到恢复。特兰西瓦尼亚议会以其原来的形式召开会议，以便在听取各地方民族、宗教团体和各阶层的代表们的意见之后，提出实现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原则的建议。克罗地亚总督受权召集当地的议会开会，以便对新的内部宪法以及对克罗地亚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议。将向伏伊伏丁那派去一个委员会，以便就当地各族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什么愿望提出报告。在内莱塔尼亚，政府将为各州精心制定各种法规，并向他们保证这些法规“将和他们的历史发展、他们目前的要求以及整个帝国的利益相适应”。

内政、司法和宗教信仰各部均被撤销。

十月文告几乎在各地都不受欢迎。就连捷克人也不满意，他们原以为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实际上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反对它：巴赫式的官僚们反对它，因为他们看到匈牙利正在摆脱他们的控制；民族主义者反对它，因为他们看到在新的联邦制度下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将要受占多数的捷克人的摆布；自由主义者反对它，因为他们看到联邦主义者和教士们成了奥地利的统治者；金融界反对它，因为十月文告没有真正满足他们的愿望。这后三部分人在“奥地利必须和匈牙利一样受到优待”的口号下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阵线。这就是说，如果匈牙利有一个中央的立宪议会，那么奥地利也必须有一个。显然，这个文告已经注定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将具有双重性。

检查制度的放松使抗议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戈武霍夫斯基开始出版他的《国家宪法》时，人们更加畅言无忌。这是一份在各方面都极端保守的文件，它使拥有土地的贵族和高级教士居于统治地位。随后出现了新的财政困难：布鲁克自杀以后出任财政大臣的冯·普莱纳不得不建议发行没有保证金的纸币，数额达5000万古尔登之巨，他把希望寄托在税收上。但是最令人失望的是匈牙利。塞岑本人没有料想到在事先没有任何舆论准备的情况下政府就突然用强行命令的办法公布了有关的法令。无论如何，情况很快就表明权贵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他们本国的公众舆论。的确，匈牙利的公众舆论对哈布斯堡王室并不都是持反对态度。在感情上，科苏特的名字在这个国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在签订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以后，科苏特要联合欧洲反对奥地利的宏伟计划看来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他的多瑙河联邦计划在匈牙利也绝非普遍受到欢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愿意与哈布斯堡王室达成协议，但是他们对可以接受的条件看法与老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大不一致。

匈牙利的舆论越来越与费伦茨·戴阿克的意见一致，他现在以这个国家的领袖的身份出现。他是一位寡言、谦逊的乡村绅士，1848年以前是匈牙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他参加了1848年的政府，任司法大臣，但没有随同政府于1849年1月迁往德布勒森。因此，他没有参与废黜哈布斯堡王室的活动，而且他也不赞成这样做。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四月法令”是完全合法的，同时认为从发布三月宪法以来帝国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法律上是完全无效的。甚

至帝国政府所做的最慷慨的让步，如果事先未经与匈牙利合法议会的协商就单方面公布，那也是不能接受的。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过渡性策略，他主张消极反抗；全国民众越来越相信这种观点，因为这样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把钱留在自己的腰包里（这些反抗主要是针对税收官的）。消极反抗显示出了实际的效果，逼得帝国政府步步退却。在戴阿克的领导下，匈牙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十月文告，因此，文告规定的那些让步所产生的第一批结果使政府感到十分沮丧；因为各县纷纷庆祝恢复他们的议会，把科苏特、加富尔和路易·拿破仑这样一些人选入这些机构。由于这些示威的影响，由于维也纳的纳税人和金融界人士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弗兰茨·约瑟夫在12月14日罢免了戈武霍夫斯基，由安东·冯·施默林接任。

好些年以来，维也纳的自由主义者、公务人员和苏台德的德意志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施默林这个人身上。他既代表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代表中央集权制和立宪政体，因此在封建主义者和斯拉夫人当中不受欢迎。非常奇怪的是，支持并且竟然提议由他作为候选人的却是匈牙利的老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他将有效地贯彻执行十月间对匈牙利作出的让步。匈牙利的1848年党人也欢迎施默林，他们认为他将为二元体制——一个中央集权的立宪的奥地利和一个中央集权的立宪的匈牙利形成均势——铺平道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如同他们在1848年所认为的那样）这是最能确保他们自己的地位的最终解决办法。

事实上，施默林任职以后才几天，伏伊伏丁那就重新并入了匈牙利，不久，穆拉科兹地区也还给了它。弗兰茨·约瑟夫对匈牙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不知道，他召见了艾厄特沃什和戴阿克两人进行私下会晤，这次会晤给双方都留下了好的印象。但是，施默林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亲匈牙利的人。他和巴赫一样是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但这时他还没有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后来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说能够实现中央集权制的话，那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2月26日公布了体现着他的思想的“二月特许令”。它名义上是十月文告的发展，实际上却企图从根本上修改前一文件的精神。帝国咨政院仍然存在；由“各州”（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分开列入的）的议会按固定名额派出的343名代表组成。对咨政院和各州（从匈牙利到布科维纳，各州都具有平等地位）的权限都作出明确规

方面有损于国家统一的要求，但是，他们根据艾厄特沃什的动议，同意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除了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各种不同语言，而且只限于在行政管理所必需时使用之外，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方案实际上满足了“各民族”中的许多人。议会还批准犹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废除了封建佃农仍在负担的那些义务。

戴阿克也与克罗地亚人进行交涉，他不作任何规定，要他们放手提出他们要恢复与匈牙利的旧有关系需要哪些条件。他还进一步承认他们对有争议的斯拉夫各国的要求。克罗地亚人对特许令也很不满意，由于政府迟迟不把达尔马提亚并入克罗地亚，他们更加感到愤慨。7月，他们的议会以120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他们的独立得到承认，他们就与匈牙利在宪法上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几天以后，他们决议不派代表参加帝国咨政院会议。11月，克罗地亚的议会也被解散。只有在特兰西瓦尼亚，事情的发展对政府多少有利。不久，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出席了帝国咨政院；但匈牙利人却仍然很仇视它。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的反抗变得越来越激烈。波兰人只顾他们自己的要求，希望给不分割的加利西亚一个特殊的地位。捷克人不仅再次提出他们对波希米亚王室各州所有权的要求，而且认为在匈牙利人缺席的情况下，整个帝国咨政院都是不符合宪法的。这样，施默林的统治既遭到斯拉夫人又遭到匈牙利人的反对，他的政权越来越像巴赫的政权，政治上实行镇压，财政上收支两方都出现短缺：行政费用开支巨大，财源不断减少，因为匈牙利人又采取了消极抵抗和不纳税的办法。这时，纳税者和银行方面又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表现自己的不满的方法对弗兰茨·约瑟夫来说尤其麻烦甚至危险：国家岁出的40%以上现在用于国债，而且还需要大量款项来偿还从国家银行借来的贷款。金融界宣布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对政府的抨击往往比反对派的抨击还要猛烈，在这些抨击中他们不仅要求减少行政费，也要求减少军费。

在政府的各种反对派当中，弗兰茨·约瑟夫决定首先要与其接触的是匈牙利人。戴阿克的立场毕竟不是反哈布斯堡王室的，也不是不合理的。他所采取的立场是严格根据帝国政府和匈牙利之间达成协议的某些基本文件：即对1687年的王位继承法加以修改和补充的1722年

的国事诏书，而这个国事诏书又根据利奥波德二世于1791年继位时所作的保证加以修改和补充。依照这些文件，皇帝必须征得匈牙利议会的同意，根据匈牙利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治理匈牙利而不是按照奥地利的法律去统治匈牙利——而且奥地利当局也不能干涉匈牙利内部的问题。但是，根据这些文件，匈牙利承认了哈布斯堡王室继承匈牙利王位的合法权利（只要他们接受加冕仪式、履行加冕宣誓并在文件上签字），承认了匈牙利已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其他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承认了匈牙利与其他领地在某些方面（外交政策、国防以及由此引起的财政负担）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同时，由于他也接受了科苏特所强烈主张的观点：只要奥地利政府保持独裁统治，像根据1848年的法律在匈牙利建立起来的立宪政体就不可能指望幸存下来，因此他必然同意与奥地利的合法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某种形式的协商。

这就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基础，而在1864年，已迫切需要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国际形势又变得危机四伏，奥地利同时受到法国、撒丁和普鲁士的威胁。弗兰茨·约瑟夫不愿意用收买其中一国的办法来分化他的敌国；于是，宁肯与普鲁士妥协的雷希贝格于10月27日被解除了职务，由门斯多夫-普利接替。他和这时真正负责外交政策的枢密顾问官比格莱本都主张前进政策。12月，弗兰茨·约瑟夫通过中间人开始与戴阿克进行秘密会谈。戴阿克坚持不能放弃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合并，也不能使克罗地亚脱离神圣的国王。弗兰茨·约瑟夫必须加冕成为匈牙利国王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戴阿克说明了在共同的体制方面他准备做到什么程度，并保证克罗地亚将享有充分的自治，同时，将根据1861年草案的精神对待各民族。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他于1865年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些基础。于是弗兰茨·约瑟夫突然来到佩斯，他在那里公开许诺“要尽一切可能满足我的匈牙利王国的各族人民”。7月27日，较小范围的帝国咨政院会议闭幕以后，施默林及其内阁的几乎全体成员，除了匈牙利首相门斯多夫、马伊拉特和不管部大臣莫里斯·埃斯特哈齐伯爵以外，都被解除了职务。9月20日，发布了一项声明，暂停执行十月文告和二月特许令。这些文件将提交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议会讨论。如果协商的结果尚能令人满意，则将提交给以后专门为此而召开的内莱塔尼亚各州的合法代表会议。在此之前，政府将行使紧急权力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样，在弗兰茨·约瑟夫看来，与匈牙利的谈判是沿着笔直的道路进行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他任命了贝尔克雷迪伯爵去接替施默林（但接任者的权限只限于内莱塔尼亚）；贝尔克雷迪出身于拥有土地的波希米亚贵族，思想封建，拥护联邦制，而且亲斯拉夫人。这一任命是根据埃斯特哈齐的建议提出来的。埃斯特哈齐本人是一个老保守主义者，他的思想仍停留在1861年时各种力量结合的情况，并根据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乐于支持施默林重新扩大了中央集权制，得出了一个自然的结论。同时，他显然和他的阶级同僚一样相信，如果一个中央的帝国咨政院的权力不是太大的话，匈牙利将会接受它。但是结果却很不相同。西部的斯拉夫人兴高采烈，重新提出使奥地利成为联邦的计划。与此相对，德意志人感到愤恨，事态的发展这时使奥地利德意志人自治论者上升到有影响的地位，他们是由凯泽费尔德领导的一个小集团，其力量主要在施蒂里亚。这个集团一直鼓吹原来的主张，即奥地利德意志人应该与匈牙利人和波兰人达成协议，从而腾出手来对付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自1862年以来，他们与匈牙利自由主义者一直有一项工作协议，这项协议现在得到加强。匈牙利议会于12月召开会议时，老保守主义者的估计又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弗兰茨·约瑟夫说，他再也不对1848年的法律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为表明这一点，他颁布再次合并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希望根据后来的法令对它们加以修改。匈牙利人有礼貌但坚决地拒绝承认十月文告和二月特许令，也拒绝加入任何中央的帝国咨政院；但是他们愿意考虑，当皇帝希望就国事诏书中所承认的对匈牙利和帝国其他领地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自己的议会代表和哈布斯堡王室其他领地的议会代表将同时召开会议。他们还将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讨论其形式问题。

同时，奥地利的各州议会举行了会议，会上争吵不休。在匈牙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事情处于僵持状态。正当此时，普奥战争爆发了，几个星期以后，这场战争就以奥地利的惨败而告终（见第12、19章，原文第325、519页）。

在匈牙利又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奥地利的困难为匈牙利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并不是戴阿克的观点，也不是久拉·安德拉希伯爵的观点，他现在上升到在谈判中属于仅次于戴阿克的地位。他与戴阿克、艾厄特沃什，甚至与塞岑相比，思想远为浅薄，但他一身兼有非

凡的个人魅力、富有说服力的口才和使他具有出入宫廷的资格的门第这些优点。安德拉希来自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地区，因此他对斯拉夫人的危险比戴阿克更为敏感，当地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发起的某些运动，正好与帕拉茨基轻率的言论相巧合，这使他更加深信要确保匈牙利的安全就必须与奥地利联合，而且必须是一个不受斯拉夫人控制的奥地利。

1866年，他在呈递给弗兰茨·约瑟夫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这样的看法：“人为地重建波希米亚王国并把斯拉夫各省团结在它的周围，这只会是在奥地利内部开始的一件工作，而这件工作必然将在奥地利的外部结束。”据说他在私下见时用下列几句话概括了二元体制：

“你们照管你们的斯拉夫人，我们照管我们的斯拉夫人。”自治论者的计划在奥地利提供了得以建立这种结构的基础。同时，俾斯麦抱有相似的信念，认为有鉴于俄国的危险，维护奥地利是欧洲的需要——这一信念使他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规定了如此慷慨的媾和条件——使这个奥地利内部的计划有可能与国际计划相适应。

正是安德拉希于1866年劝说弗兰茨·约瑟夫放弃在奥地利实行联邦制。这时实行二元制的主要障碍是贝尔克雷迪的政府，其大多数成员像他本人一样，拥护联邦制度并且亲斯拉夫。这个障碍在萨克森人博伊斯特进入政府之后得到克服，博伊斯特也赞成二元制——不是为了最终与普鲁士达成妥协，而是为了相反的理由。那就是他希望通过对奥地利德意志自由主义者表示支持，来重新获得较小的德意志各邦对奥地利的同情，从而为在德意志再次开展争霸斗争作好准备。但是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相同的。博伊斯特与匈牙利自由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奥地利德意志同情者都建立了联系。1867年2月17日组成了以安德拉希为首的匈牙利内阁。奥地利的各州议会已于1月2日解散，同时，宣布举行新的选举，选举之后将在一次帝国咨政院特别会议上讨论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方案。

这些选举是按照施默林的选举法进行的，但其结果却预示在帝国咨政院中联邦主义者将略占多数。博伊斯特认为这将会破坏与匈牙利达成的解决方案，安德拉希也从佩斯赶来支持他的意见，并坚决主张奥地利的代表们无权对匈牙利和它的君主之间的关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弗兰茨·约瑟夫做了让步，于2月4日公布一份新特许令，从而取消了1月2日的特许令，并将咨政院特别会议改为一般性会议。这时贝

尔克雷迪辞了职，由博伊斯特接替。他通过收买波兰人的办法，保证了在咨政院中中央集权主义者占有多数。波兰人最初要求加利西亚完全自治，后来终于接受了加利西亚在州长的统治之下享有特殊地位的解决办法。这实际上满足了他们的实质性要求。现在，捷克人处于少数地位，他们的领导人以“去莫斯科朝圣”的办法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在莫斯科他们称赞俄国为“斯拉夫人的太阳”。不用说，这一举动加强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中央集权主义。

现在比较容易地与匈牙利达成了最终协议。简单地说，匈牙利，连同四月法令和其他一切制度恢复为君主立宪政体，根据它自己的法律进行治理，不受奥地利对它的内政的任何控制。但是，双方都认为外交和国防以及进行这两项活动所必需的经费是对匈牙利和帝国的其他领地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于是成立了一个机构以便通过议会代表团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个机构组织得非常巧妙，以至谁也说不出它是方的还是圆的。双方对公共开支各提出一个定额，这个定额每10年重新拟定一次。他们还订立了关税同盟，也是每10年重订一次。6月8日，弗兰茨·约瑟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第二年，他与克罗地亚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克罗地亚获得了自治权，它历史上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一项民族法重新肯定了1861年的方案并确定了其实际施行方法。

没有捷克人参加的帝国咨政院充分“注意到”这一妥协方案，于是着手修改奥地利宪法，使它既更加中央集权化，又更加自由化；在克雷姆西尔规定的许多原则，包括关于民族和语言问题的著名声明，又重新出现了。加利西亚的地位根据已取得同意的方案进行了调整。

漫长的斗争终于结束了。1870年，当弗兰茨·约瑟夫打算报复普鲁士的时候，又重新提出朝联邦制和亲斯拉夫的方向修改宪法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安德拉希出来说服弗兰茨·约瑟夫放弃这一计划，所以奥—匈实际上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西面是德意志人占优势，而东面则是具有马扎尔人感情的匈牙利人占优势，其必然结果是它的外交政策方面肯定倒向德意志。的确，由于奥地利的平衡非常微妙，在莱塔河以西的德意志人常常成为少数派，但是在帝国存在期间，斯拉夫人再也没有力量推翻在1867年为帝国定下的那些基本原则。

[1] 1861年的法律用“承认”代替“保证”。

[2] 指匈牙利东部的一些地区。它们从历史上看并不构成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但在行政区划上曾几次划归特兰西瓦尼亚。

[3] 塞尔维亚人选举的首领称Voivode（音译为伏伊伏德），伏伊伏丁那（Voivodina）由此而得名，意为塞尔维亚人首领所治理的地方。——译者

[4] 见第7卷，原文第402页。

[5] 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当时匈牙利宣布自己是一个共和国，这是不正确的。科苏特的官衔（Kormányzó）原意是“总督”或“统治者”，1920—1944年霍尔蒂海军上将使用的也是这个头衔。他这个官衔一直译为“摄政”，在那个时期匈牙利是个君主国，尽管暂时缺一个国王，但君主国是不容争辩的。

[6] T. G. 马萨里克：《卡列尔·哈夫利切克》，第153页，转引自B. 布雷特霍尔茨《波希米亚和蒙赫伦人的历史》（赖兴贝格，1921—1925年），第4卷，第129页。

[7] 在1935年，还有一些匈牙利的村庄投票支持反对党，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仍然代表“维也纳”。

[8] 据信是在17世纪末从黑塞哥维那来的移民的后裔。他们的语言是塞尔维亚的方言，用拉丁字母拼写，但他们信奉罗马天主教。在政治上他们常常站在匈牙利人一边，而不站在塞尔维亚人一边。他们主要聚居在索博德卡及其周围地区。

[9] （见原文第503页）这份照会的措辞在意大利各省的地位上模棱两可。

第二十一章 意大利

1830年，几乎没有人认为会有一个意大利国家存在。在这个半岛上，当时有8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和传统。谁都不愿意，而且也没有能力重新进行拿破仑为实现统一所做的部分试验。1814年至1815年的和解方案只是恢复了地区性的分裂局面，更不利的是，奥地利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暂时阻止了意大利人在它以前的压迫者中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现在，奥地利拥有威尼斯和伦巴第，间接地控制了中部的公爵领地托斯坎纳、卢卡、摩德纳和帕尔马。而且奥地利的军队即将对1821年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发生的起义进行镇压。富有爱国热情的意大利人如福斯科洛和罗塞蒂被迫流放。意大利最大的国家——两西西里的波旁王国及其800万居民似乎偏远而对此漠不关心。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曾经是西班牙的组成部分，与意大利其余地区一直是格格不入的。每个地区的普通人民，甚至连知识界名流，讲的话都是他们互相不能理解的方言，而且缺乏最起码的民族意识。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的政府，而不要自治。他们欢迎拿破仑和法国人，认为他们比他们自己的王朝更公道、更有效。

1830年以后的40年间，这个半岛要在一个单独的政府下面统一起来。意大利的这次复兴运动并不是遵照任何预先制订的计划，而是由于许多思想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促成的。在原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在法国统治时期当过军官和民政官吏的人当中已经有了一种要求改革经济、改革政府机构的强大的运动。秘密团体已经出现，其中有烧炭党。该党的成员用血签名，发誓要造反。各地的农民都在等待时机，要通过起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商人都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开辟更大的市场，都希望取消内部的贸易关卡（单在波河沿岸这种关卡就有22处）。在他们看来，在这个运输铁路化的时代，迫切要求使交通连接起来形成系统。必须把不同的度量衡和币制统一起来，并使之标准化，因为它们非常耽误时间，造成许多差错，并引起严重的欺诈行为。进步的土地拥有者、商人和制造商对于建立意大利的关税同盟和采用公制的想法都很赞赏。所有这许多关于进行改革的鼓励都有助于随着意大利的形成而进行的许多革命，其中包括

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革命。更加深刻的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曼佐尼在不久前加以提炼的共同书面语言得到了传播。文化运动还培养了意大利人民的一种习惯，即在历史和小说中缅怀意大利过去的伟大历史，回忆伦巴第联盟和归尔甫党人反抗德意志侵略者的斗争。这样，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就很容易集中人们眼前的不满来支持他们首先为了个人的自由，其次为了摆脱外国人而独立，最后为了国家的统一而展开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外部环境是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需要果敢的政治手腕才能予以利用，并需要建立一支为准备兼并邻国，建成一个更大的意大利王国而使用的国家武装力量。其核心就是撒丁和皮埃蒙特，这个国家的人口只占意大利人口的1/5。其中大部分人讲法语，而其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1831—1849年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在都灵统治。起初他与自己的命运开玩笑，把皮埃蒙特与反革命派联合起来反对自由派，并与奥地利结成亲密的联盟以反对法国。然而，环境终于迫使他与统治意大利的国家奥地利发生争吵。1814年皮埃蒙特没有如它所希望的那样，从法国和瑞士获得领土，却几乎是偶然地获得了意大利沿海的利古里亚省。此后，通过热那亚和萨沃纳的南面出口，终于使它成为一个航海的、工业的而且主要是意大利的国家。利古里亚与撒丁、皮埃蒙特和萨伏依实行统一，也是打破妨碍意大利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地区独立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热那亚的商人激进派对于屈从都灵的统治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不久，这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就将把首都人数有限的宫廷贵族淹没。

1830年的法国革命引起了1831年发生在整个意大利的一系列小规模起义。如果说这些起义都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太不协调，他们的利益很不一致。一个极端是，野心勃勃的摩德纳公爵弗兰西斯四世试图利用革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另一极端是，丝绸商门诺蒂却梦想以罗马为中心实现民族的统一。唯一有实际意义的结果是在意大利中部，有几个政府发生了短暂的更迭。2月，弗兰西斯从摩德纳，玛丽·路易丝从帕尔马，教皇代理使节从波洛尼亚先后出逃。其他很多城市都挂起了三色旗，组成了临时政府。但是它们没有组成一个共同阵线，本能的地方自治的思想还很牢固。皮亚琴察仍然保持忠诚，不与帕尔马为敌。勒佐怀疑摩德纳，热那亚怀疑都灵，西西里怀

疑那不勒斯。摩德纳的新独裁者阻止革命扩展到马萨和卡拉拉，渴望奉行和平政策来求得奥地利的支持。为了同样的原因，波洛尼亚争辩说“摩德纳的事与我们无关”。1831年3月，奥地利人跨过了波河，以恢复原先的三个政府。但是当祖基从摩德纳撤退的时候，他和他的700名叛军被波洛尼亚的临时政府当作“外国人”而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来自安科纳、佩鲁贾、拉文纳和费拉拉的代表们在波洛尼亚开会，组成了“意大利联合省”。然而，到了3月底，最后一支叛军在安科纳投降。他们的投降，虽然为教皇特使所接受，但是后来又被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废除，理由是这一赦免是在被威逼的情况下同意的。

1831年的革命证明这些“合法的”政府没有获得人民群众坚定的拥护。它们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完全是由于奥地利的支持。这一次革命还表明一些具有初步的政治纲领的自由主义者依然存在。除非对他们作出让步，否则他们可能造成不断蔓延的动乱。但是，反革命暂时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观念又一次变得渺茫了。门诺蒂被他原先的合作者弗兰西斯四世处决了。许多未来的国家领袖们都从摩德纳和皮埃蒙特逃亡出去了。

旧制度又维持了15年左右。弗兰西斯和格列高利都一直统治到1846年。卢卡的玛丽·路易斯和查理·卢多维克的统治延续到1847年。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和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的统治延续到1859年。卡诺萨在那不勒斯实行的残酷统治和红衣主教贝尔内蒂在教皇国实行的残酷统治甚至遭到了梅特涅的批评。梅特涅主张实行温和政策并按法律办事，以防止再爆发革命。相比之下，奥地利管辖的伦巴第和威尼斯政府是比较开明的。托斯卡纳也由一个比较开明的专制君主所统治。来自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流亡者在佛罗伦萨感到不受拘束。在这里，普及教育和垦荒等工作都获得了发展。而法律体制在某些方面也比拿破仑法典更为宽容。另一方面，罗马的政府即使不说它一贯地毫不宽容，也总是十分无能、腐败、独断专横、行动迟滞。行政收支账目从不公布，因而无法以此作为对行政部门的一种控制手段。教会和政府方面的检查制度以及警察和宗教法庭都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在罗马乡村，一支反革命的非正规军“百人队”却可以任意践踏法律而不受惩罚。只有在1832年以后法国军队到达了安科纳——那是为了挡住在波洛尼亚的奥地利军队——才重新建立了那种均势。过去几年中

由于没有这种均势，革命受到了束缚。意大利的未来就取决于敌对的法奥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局面。

在皮埃蒙特，国王查理·阿尔贝特放弃了他在青年时代与自由派之间的友谊。相反，他采取了夸大正统主义的行动以便给保守派一个好印象。而且在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居然拒绝按惯例赦免1820年至1821年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他的合谋者。马志尼敦促他“做意大利自由的拿破仑”，却毫无效果。对于一个新时期的预言家马志尼来说，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民族的统一和独立，而不是烧炭党和联邦派所需要的部分自由。马志尼埋怨1831年意大利反抗奥地利没有取得成功。他的结论是纪律和自觉的民族主义是迫切需要的。因此，1831年他在马赛和其他40名流亡者一起组成了他的新组织，名叫“青年意大利”。他不仅企图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性的，而且要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一支团结的、积极行动的力量（见第9章，原文第224页）。这个组织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是1833年在皮埃蒙特发生的“军士”密谋。士兵们在争吵中偶然泄露了他的计划。和曾经宽恕祖基将军的奥地利人相比，查理·阿尔贝特作出的反应过分严酷。有12人被处死，马志尼被缺席判处死刑。1834年，加里波第也被判处死刑（他到突尼斯去为突尼斯贝伊服务）。被流放的人中还有焦贝蒂神父。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查理·阿尔贝特仍然是复兴运动的主要障碍之一。^[1]他在1833—1834年对激进分子的镇压当然适合于他在1831年与奥地利建立的同盟，同时也适合于他拉拢当时并不乐意的梅特涅参加反对奥尔良派当权的法国的战争。他对法国仍然有领土要求。^[2]他积极支持正统王权拥护者贝里女公爵反对路易·菲利普。他还用武器和金钱支持西班牙要求得到正统王权的唐·卡洛斯和葡萄牙要求获得正统王权的唐·米格尔。这样，他就无端引起了英国的怨恨。他的妻子是哈布斯堡王室成员。1842年他让他的儿子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和另一位哈布斯堡王室成员结了婚。他和奥地利保持一致的关系，以至在他儿子结婚的时候，奥地利将军拉德茨基居然把皮埃蒙特的军队称为“帝国军队的前卫”。

但是最后查理·阿尔贝特改变了立场。他没有能够从法国那里得到土地。他想兼并瑞士一个州的希望在1847年随着分离主义者联盟的失败也破灭了。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肥沃的伦巴第平原，长期以来这是野心勃勃的皮埃蒙特王朝的一个遥远的目标。奥地利对意大利中部

的干预打破了意大利反对阿尔贝特的力量的平衡。而且奥地利的独立的铁路系统正把欧洲中部的贸易从热那亚转移到里雅斯特。到了1840年，甚至连阿尔贝特的极端保守的外交部部长索拉罗·德拉·马盖里塔也怀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革命是否有可能使奥地利帝国瓦解，从而使皮埃蒙特能够在伦巴第放手行动。只是由于国王自己的性格才使他没有企图加快完成这件事情。正如法国大使1846年写道，他“喜欢听关于意大利前途的梦想，这些梦想预示他在历史上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到了行动的时刻，一切都消失了”。^[3]

在对内政策方面，尽管查理·阿尔贝特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但他也纠正了一些缺陷。这些缺陷曾使得他的王国成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几种不同的货币仍然在他王国的各个省里流通，而且国内的关卡妨碍了交通的自由。1815年至1830年，税收增加了4倍。这对国家的岁入和贸易都极为不利。因此，1835年后取消了许多限制性关税，开始修建铁路、灌溉渠道并在热那亚修建新的港口设施。在撒丁，人们试图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但态度并不认真。1838年至1840年间的法典改革使拿破仑体系得到了部分的恢复，这个体系是查理·阿尔贝特的前任者未经周密考虑于1814年废除的。随后，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批准成立了农业协会。通过它的2000名会员产生了深刻的自由化的影响。与伦巴第和托斯坎纳的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它对家畜新品种进行试验，引进机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并改进酒的质量和运输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它帮助推动了一场农业革命。

这种改革精神是时代的标志，而不仅是皮埃蒙特的特点。意大利的第一艘汽船、第一座铁桥和第一条铁路都是在那不勒斯问世的。早在1833年，斐迪南二世就已经谈到要在意大利各个国家建立一个同盟。政治上实行宽容政策的主要范例，也许要数帕尔马，实行最自由的关税和法律的地方是托斯坎纳，而行政效率最高的政府则要推伦巴第。只有在佛罗伦萨，非天主教徒能上大学，只有在帕尔马，犹太人能在政府行政机构中找到工作（在皮埃蒙特，犹太人只能居住在犹太人区，而且不允许拥有土地）。^[4]毫无疑问，奥地利统治的伦巴第表现出最繁荣的景象，而且在工业化方面也最为先进。伦巴第以拥有当时欧洲大陆上最良好的交通系统而自豪，米兰与威尼斯之间的铁路所以不通，不是因为奥地利反对开化，而是由于贝加莫和特雷维利奥这两个城市的嫉妒。在教育的发展方面，奥地利统治者远比其他意大利

统治者走在前面。他们所征的税虽然很重，但比起他们以前和以后的统治者来说还是少的。他们的出版法准许出版的报纸数目等于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坎纳出版的报纸数目的两倍多。卡塔内奥的《综合工艺》直言不讳地鼓吹革命的自由主义的改革。《统计记事》在意大利各地都有它的著名记者，而他们的文章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能发表。很明显，至少到1840年，伦巴第人民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满足和忠诚。他们根本没有感到意大利必须统一，所以米兰商会主张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以便使意大利能够变得更加繁荣。1841年梅特涅准备让奥地利和意大利各国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盟，以此来抵消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他们的计划很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即使在激进分子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卡塔内奥）认为从奥地利得到的利益要比从皮埃蒙特得到的利益更多。梅特涅失败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能够防止孤立的反对个别人滥用职权的运动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革新运动。这种革新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对于这种即将来临的政治革命，查理·阿尔伯特和梅特涅都同样感到恐惧，这是有原因的。索拉罗在政治上比1835年以前的历任大臣们都更反动。他甚至在1841年劝告格列高利十六世恢复教士的特权，而在奥地利和托斯坎纳，这种特权已被废除50年了。他的检查制度不准谈论教皇或者国王；必须用“国家”这个词来代替“民族”或“意大利”；不许使用“自由”和“宪法”这类词；“革命”必须用“无政府”或“暴力政府”这类词来代替。加富尔曾经把都灵描写成知识分子的地狱。1831年，德·阿泽利奥离开都灵12年，在米兰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出版了他的小说。

查理·阿尔伯特本人性格伪善，甚至对朋友也隐瞒自己的观点，并蓄意要把他们引入歧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每个人都不信任，而且惯于在大臣之间挑拨离间。外国大使们对他的喜好故弄玄虚，对他的观点变化无常，以及对他那很少掩饰的勃勃野心都颇有议论。梅特涅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既野心勃勃又动摇犹豫。他是一个暴君。他只要求自由派像文人们那样对他奉承恭维。他不仅痛恨法国，也痛恨阻止他登上意大利王位的奥地利。”^[5]长期以来，查理·阿尔伯特错误地认为民族独立的思想只不过是敌视王位和圣坛的一种伪装。但是他在给弗兰西斯四世的私人通信中表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开始有些害怕别的君主会摆出民族领袖的姿态，从而有可

能超过了他。同时还因为他曾提出只有他本人和教皇才是意大利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终于从保守派和天主教方面为自己找到理由，在反对奥地利王朝的战争中利用民族主义。

这第一次解放战争所必需的思想推动力是由新归尔甫党的作家们来提供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他们几乎使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成为文化人应尽的义务，并帮助促成了天主教和民族运动的联合。尽管他们对于细节意见分歧，也没有成立有组织的政党，但他们共同对马志尼的思想提出了一种高尚的（即便是歪曲的）解释，然后将它和以前的传统思想联系起来。曼佐尼、罗斯米尼和托马塞奥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自由派天主教的思想。其他人企图通过表明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如何反对德意志人的历史来把教皇拉进来。1847年以后，这些新归尔甫派人物中法里尼和明盖蒂成为庇护九世的大臣，卡波尼成为托斯卡纳的首相，巴尔博、焦贝蒂和德·阿泽利奥三人先后任皮埃蒙特的首相。但是，即便在1847年以前他们的书只能在外国出版，他们对于整个意大利却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1832年西尔维奥·佩利科写的《我的狱中生活》一书就出版了。这本书描述了作者在奥地利狱中度过的10年生活。虽然这本书的笔调中充满一种宗教上的顺从精神，没有多少爱国主义意义，但它的重大成功几乎同时也给奥地利贴上意大利半岛最大的压迫者的标签。1843年焦贝蒂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他的《论意大利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题献给佩利科（另见第9章，原文第225页）。他指出，即便政治上的统一不能实现，也仍然存在着一个意大利民族，它在血统、宗教和语言方面都是统一的；它的当然领袖就是教皇。虽然焦贝蒂对于教皇政治没有多少信心，但为了争取教士们的支持，他隐藏了自己更深层的思想，并谨慎地把对奥地利和耶稣会会士的一切批评全从手稿中删去了。这样，他采取了将宗教与国家相协调的策略通过了政治审查。爱国主义突然变成可以公开谈论的正统思想，再也不是一种秘密阴谋。后来，焦贝蒂对教廷的狭隘天主教义进行了公开的抨击。但是人们留下记忆的还是他早先提出的尊重教皇领导权的主张。他的意大利“优越”的主导思想促使他的同胞们建立起进行政治革命所必需的自信心。

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巴尔博的《意大利的希望》。它于1844年出版，题献给焦贝蒂。巴尔博同意实现联邦国家是明显的目标，因为

意大利各民族截然不同，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然而，他和焦贝蒂不同，他更注重具体问题而较少强调一般原则。他发挥了这样的观点：到了一定时候，奥地利可能自愿向东扩张，进入巴尔干，使意大利享有更多的自由。作为一个真诚的皮埃蒙特人，他设想未来的意大利联邦的领袖将是查理·阿尔伯特，而不是教皇。实际上，杜兰多在1846年发表的《论意大利民族》中就已经提议取消教皇的大部分世俗领地。在三个加入联邦的世俗王国之间重新划分意大利。

同时，几乎每年总有一些地方发生起义。这些起义都是由于马志尼的鼓动，尽管它们的方向并不总是由他决定的。马志尼所希望的不是君主国联邦，而是一个单独的共和国，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决定，而是自下而上地实行自治性民族自决。焦贝蒂反对这种局部性起义，认为这种起义浪费力量而且令人沮丧。马志尼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民，如果没有人民，革命将会变质，而且必然会遭到失败。这样，马志尼动员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对于这支力量，保皇党人先是与之对抗，后来又与之竞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1845年可以看出，当时查理·阿尔伯特告诉德·阿泽利奥人民应相信：只要他们放弃煽动，总有一天条件会允许他的军队来解救他们。1846年，与奥地利发生冲突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由于拒绝签订食盐贸易协定而引起报复：对运入伦巴第的皮埃蒙特所产的酒要征寓禁税。虽然亲奥地利的索拉罗直到1847年仍继续任职，但有好几次设想终将发生战争，不过却没有做好任何物质上的准备。皮埃蒙特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在米兰取代奥地利人。现在新归尔甫派和马志尼的拥护者都公开鼓吹民族感情，群众的激情很快就会使这一信念成为意大利许多暴发性的力量之一。

正当爱国分子对于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做法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被公认为是开明的教皇于1846年当选。庇护九世事实上并不是开明派，但他确实迫切希望缓和在格列高利统治下教皇政府与其臣民之间已经加剧的紧张局势。他赦免了大约1000名罪犯和流放者，尽管这只是一个惯常的仁慈行为，并在事先曾获得梅特涅的完全赞许。但它却立即被认为是对新归尔甫派所提出的自由与独立的纲领的一种支持。他的这种行动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庇护九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众人的欢呼与赞扬声中最易激动，因而促使他继续作出其他的让步。一个所谓自由和爱国的教皇的神话只不过是出于一些激动的群

众的想象。庇护九世在11月发表的支持铁路建设的声明和在1847年4月发布的关于国事咨询会的法令都可以与罗马的群众大示威联系起来，但人们却认为这表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焦贝蒂的思想。他对地方自治作了一些让步，提出了与意大利其他国家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犹太人获准在非犹太人区居住，每逢狂欢节，也不会因为要表明他们所处的奴隶地位而遭到脚踢。梅特涅开始感到吃惊，因为他看到庇护九世不明智地把一个恶魔扶植起来，而这个恶魔有可能证明是不可驾驭的。现在，革命者可以在“庇护九世万岁”这样的口号下面前进。归尔甫党又发展起来，不过这一次再没有吉伯林派来遏制它了。

1847年，意大利君主们被迫退却，特别是由于1846年的歉收引起的粮荒暴动迫使他们对自由派提出的经济改革作出让步。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革命胜利地开始了。查理·阿尔贝特企图阻止这股革命潮流，并且由于萨伏依—皮埃蒙特的农民和贵族对于政治改革明显缺乏热情而获得了支持。^[6]在都灵，禁止阅读托斯坎纳和罗马刚刚获准发行的报纸，也不准举行教皇的周年纪念日活动。但是当奥地利军队在弗兰西斯逝世的时候进入摩德纳，一种新的形势便出现了。1847年7月，梅特涅很不明智地无视教皇的反对，占领了费拉拉。这一行动除了进一步破坏反皮埃蒙特力量的平衡外，使奥地利丧失了它作为正统监护者的地位，并迫使教皇更加倾向于自由派，同时为查理·阿尔贝特进行自卫性战争和支持罗马教皇提供了借口。这位国王吐露了隐藏在心中的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10月，在巴尔博警告国王说利奥波德和庇护九世在获得对意大利的精神领导地位方面正超过他以后，他立即解除了索拉罗的职务，给地方政府作了一些开明的规定，放松了检查制度。他希望这些行动已经足够了，一再庄严重申不再作出更多的让步。然而，这只不过是人们得寸进尺的开始。巴尔博和加富尔出版了一种新刊物，名称引人注目，叫作《意大利复兴运动》，主张实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辩称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12月，当热那亚发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国王先以为这次示威是企图恢复热那亚在英国支持下的独立，所以他便命令军队进行镇压。尽管如此，共和体制的前景使他感到害怕，尤其是他的士兵们居然与示威者亲近，都灵市政府也和示威者一起要求制定一部宪法。

在意大利南部，如果说那里的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不如北部人民，但他们的革命性却更坚决，因为他们贫穷得多，而且要失去的东西也少得多。斐迪南认识到必须提供更廉价的谷物和盐，但是官僚机构的无能却往往使行动陷于停顿。他的最薄弱的环节是西西里岛。在那里甚至当地社会的上层阶级都对他最近把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行政合而为一感到愤怒。尽管比较温和的西西里人听从德·阿泽里奥的劝告放弃了起义，但是激进分子则毫无顾忌。所以马志尼的思想又一次战胜了新归尔甫派的思想。在巴勒莫传出谣言说，1848年1月12日他们将举行一次示威来反对当局。虽然有些犹豫不决，但有几个大胆者树立了榜样。示威逐渐变成了一次暴动。两天后，示威虽然站住了脚，但最后却被富人接管过去，使之成为恢复1812年的贵族宪法的运动。在巴勒莫，胜利的代价是牺牲了100人的生命。此后，骚动蔓延到那不勒斯。2月，斐迪南被迫颁布了一部宪法，以此证明他的良好的意图是“自觉的”和“不可改变的”。这种卑屈的投降迫使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和查理·阿尔贝特，甚至庇护九世都只好仿效他的榜样，在3月颁布了或多或少开明的宪法。

直到最后一刻，查理·阿尔贝特坚决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背自己心愿的。但最终他的大臣们劝他接受主教对他的誓言的赦罪，于是颁布了一部宪法。它首先作为皮埃蒙特的根本法，然后成为意大利的根本法（见第8章，原文第200—201页）。不过，他谨慎地使这部宪法成为一个保守的文件。他给自己保留了制定外交政策、进行战争的权力，以及一切行政权和对上议院的任命权。由于大臣们仍旧是对他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所以他既不希望也没有预见到在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下代议制政府将会得到发展。

另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是教皇提出的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皮埃蒙特还没有预料到这个协议是赶走奥地利并在意大利获得领导权的途径。1847年8月，托斯卡纳和教皇国已经准备一同建立一个经济同盟。但是查理·阿尔贝特不愿意把他的关税降低到托斯卡纳的水平，只是在几个月后才原则上表示同意。1848年年初，皮埃蒙特再一次阻止意大利各国组成防御同盟。查理·阿尔贝特宁愿按照巴尔博的意见，首先击败奥地利，以便能够控制未来的联盟。因此，对他的野心产生了广泛的怀疑。按照法里尼的看法，其他意大利国家有时对他比对奥地利更加害怕。只是到后来皮埃蒙特人认

识到如果没有援助他们不能取得胜利的时候，才对联盟有了更大的兴趣。

有些自由主义者，如佩蒂蒂和卡塔内奥现在开始认为进行一场独立战争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取的，因为战争可能影响在实现自由和繁荣方面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是，要求变革的力量过分强大，而且包括形形色色的人，因此无法实现和平的结局。西西里还没有获得正式的独立。马志尼对于温和的改革很不满意。奥地利人仍在费拉拉，奥地利对皮埃蒙特酒的禁运引起了严重的不满。放弃了部分的保护以后，粮食的产量并没有足够的增长。威尼斯和伦巴第仍然没有宪法。各国之间现有的铁路还没有连接起来，况且这些铁路主要用来满足皇室享乐的需要，商业用途则是次要的。《统计年鉴》抱怨说，人每小时可以走25英里，而从佛罗伦萨运往米兰的货物，行程200英里却费时8个星期。^[7]这家报纸曾希望“孟买和苏伊士、亚历山大和马赛之间的汽船航线已改变了瓦斯科·达·伽马在通过好望角时所解决的有关问题的条件”。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这种不满情绪由于思想方面的革命而扩大了，尤其是在伦巴第，这场革命已经动员起新的公众舆论来反对旧制度。全意大利科学会议1839年在比萨召开，1840年在都灵召开，以后又在佛罗伦萨、帕多瓦、米兰、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等地相继召开。这些会议一致强调意大利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的统一，并表明意大利各国是如何互相依存的。

1848年3月，一场长期被压制的起义在米兰爆发了，最后引起了战争。在前几个月中人们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米兰人从波士顿茶党那里学会了戒烟，这种消极反抗和抵制的蔓延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对于要求改革和实行自治的请愿，当局唯一的答复就是采取更加压制的手段，因为奥地利如果在意大利作出让步，必然会使它那摇摇欲坠的帝国中所有其他被压迫民族也起来反抗。最后，2月25日的巴黎革命促成了3月13日的维也纳叛乱（见第15章，原文第395—396页）。消息传到了米兰和威尼斯，当地人民这时也正在进行猛烈的反抗。米兰市长卡萨蒂企图阻止人民，但是一千多个街垒很快封锁了街道。为了把反抗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并给予某种引导，他不得不领导一个临时政府以便控制起义并加以引导。在米兰英勇奋战的“五天”中，起义者牺牲了300人，几乎全都是下层的城镇工匠。但是拉德茨基被迫撤出城市。

和西西里一样，米兰也证明了马志尼对人民首创精神的坚定信念是正确的。

后来传说查理·阿尔伯特在进攻奥地利以前一直在等待这一次叛乱，但实际上他对这次叛乱感到意外。他根本没有作好进攻的准备，而且他刚刚向奥地利保证了他的和平诚意。^[8]在发生叛乱的“五天”中，他的军队仍驻扎在遥远的法国边境上，只是准备抵抗巴黎的革命。虽然他最近曾运送武器给瑞士的反动分子，但他不能运送武器去米兰。他甚至阻止企图越过边境进入伦巴第的志愿军。他在等待，观望，首先，是要看群众起义是否能够真正击败奥地利。其次，是要看他自己的干预究竟有利于皮埃蒙特的君主政体还是仅仅有助于米兰共和国的建立。这种迟疑态度不仅使他失去了作为一个救星而受到的感激，而且使自己背上了玩弄政治的罪名。加富尔不得不警告他如果他不趁奥地利正遭到失败时进行干预，不但王朝可能覆灭，伦巴第也可能永远丢给皮埃蒙特——他已被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抢先了。因此，经过犹豫他终于接受了三色旗，越过提契诺河去援助叛乱，同时防止共和制的出现。他命令驻维也纳大使把这一行动解释为防止革命的进一步蔓延。他指示他的将领们要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所以拉德茨基在通过敌国仓皇撤退的时候没有遭到阻击。

很明显，如果没有皮埃蒙特军队参战，要想趁奥地利军队还未在加尔达湖对岸的四要塞防御区重新集结前将之击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连马志尼也对国王勉强地表示忠诚。但是，查理·阿尔伯特对激进派像对奥地利一样害怕。他拒绝接受加里波第提出的合作建议。他非常害怕威尼斯企图恢复共和制和呼吁法国出面干预。他还和托斯卡纳人发生了其他一些政治分歧。托斯卡纳人对皮埃蒙特的意图感到不安，而他们自己则决心要并吞马萨和卡拉拉；他与罗马教皇也有政治分歧，因为他预料教皇要合并摩德纳和帕尔马。更严重的是许多伦巴第人不论是由于怀疑皮埃蒙特还是害怕社会动乱，态度都很冷淡。为了维护秩序和保持开明的政府，他们宁愿相信奥地利。卡塔内奥激烈地谴责查理·阿尔伯特，指责他“出卖了1821年的爱国人士，屠杀了1833年的爱国人士”。他还说：“我宁愿让奥地利重新占领米兰，而不愿看到一个卖国贼来控制伦巴第。”当国王不是把政治问题延期到战后去处理，而是要求投票决定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立即实现联盟的时候，一些伦巴第人士表示反对，认为这会在紧急关头分裂

人民，并会使意大利其他君主对皮埃蒙特的扩张政策感到害怕。尽管如此，公民表决还是举行了，但附加的条件是成立意大利北部同盟后立即举行国民会议以便选定一部新宪法。而这个做法却激怒了都灵那些忠诚的君主制拥护者。他们认为伦巴第人把他们列入对他们的解救者忘恩负义的行列。但是，大约有10天时间，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威尼斯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同时，正如卡塔内奥所说：“当查理·阿尔贝特在收集选票的时候，拉德茨基却在集结人马。”^[9]波拿巴的军队并不比皮埃蒙特的军队壮大，却似一把利剑刺穿意大利北部，并从无到有组织起一支伦巴第军队。然而查理·阿尔贝特不愿建立一支具有潜在危险的伦巴第军队。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证实，尽管查理·阿尔贝特吹嘘自己对奥地利如何仇恨，但是他的指挥官甚至没有伦巴第的地图，对奥地利如防御工事也毫无研究，而且从都灵到亚历山大里亚的铁路也未建成；粮食、帐篷和医药供应全都短缺；由于缺乏马匹，大炮无法移动；士兵们尚未学会使用新式的击发滑膛枪；而军官大多数都是由于家庭关系而被任命的，因而甚至不懂基本的指挥术语。查理·阿尔贝特大胆地坚持要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但是他一贯优柔寡断，加上坚持拿破仑以前的统率思想，这就使他对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承担个人责任。

由于起初进展缓慢，对阿尔卑斯山关口又监视不严，这就使拉德茨基获得了给养，给了奥地利人两个月时间巩固阵地，并有一支援兵到达维罗纳。^[10]5月，托斯卡纳人被阻挡在库尔塔托内，罗马人被阻挡在维琴察；7月，皮埃蒙特人在库斯托扎被击败。接着拉德茨基提出妥协方案，从而确定米兰的独立。但是查理·阿尔贝特一方面准备放弃威尼斯，另一方面又指望英国人进行调停，把整个伦巴第都给予他，害怕达不到这一目的，将会引起共和派的起义。他没有接受停战，而是采取退却的方针，尽管在奥利奥河和阿达河均未设防。他拒绝听取将领们的建议，而是分散兵力，退守米兰，而不是皮亚琴察。他在米兰向当地人民保证要死守，但实际上很快就放弃了这座城市。这种做法表明了他所关注的主要是防止米兰再一次得救，并把法国人招引进来。这场民族战争正在变成一场王朝战争。他不顾他那主战的卡萨蒂—焦贝蒂内阁提出的向法国求援的劝告，认为法国人比奥地利人更加危险。因此萨拉斯科将军于8月9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位国王

现在不但没有成为一位救助者，反而带着背信弃义的罪名从伦巴第撤退了。

都灵的立宪政府在头18个月中相继更换了8位首相。没有一位首相热衷于执行萨拉斯科签订的“违宪的”停战协定。不仅1849年1月选举以后，出现的激进多数派主张重新开战，而且像加富尔这样的稳健的保守派也认为战争是“重建国内秩序的唯一办法”。^[11]英国和法国肯定会保证：皮埃蒙特即便遭到失败也只不过是付出一笔战争赔款。3月，战端重开，但军队仍像过去那样毫无准备。国王及其将军们威风扫地，以致不得不雇用一名波兰总司令来指挥作战，但他对于地形毫无所知。高级军官甚至向奥地利人坦白承认他们对战争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反对这场战争^[12]——这就证实皮埃蒙特人还没有受过领导一个民族运动的训练。由于战略上的错误，只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就在诺瓦拉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一名将军后来由于拒不服从命令而被处决。与此同时，伦巴第人仍然采取守势。

到了这时，革命在意大利南部已归于失败。西西里人的主要目的是要从那不勒斯分离出去。当他们拒绝接受那不勒斯新的立宪政府提出的调解时，甚至那不勒斯的自由派也都联合起来维护波旁王朝的统治。议会在巴勒莫召开，但是代表们的兴趣已经不在于原先曾激励普通公民起来守卫路障的那些问题。同样地，在那不勒斯一次农民起义使不满的农民与开明的知识分子分裂，因为后者的目的是获得工作和影响。1848年5月，在炮轰这个城市后，斐迪南改变了他那“不可改变”的宪法的精神。这部宪法显然难以执行，这反映了自由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国王的不诚实。4月29日，罗马教皇的一道训谕也否认了奥地利战争的正确性。这就证明了只要君主是更高级法律的唯一解释者，立宪政府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同年年底，教皇逃往加埃塔，使马志尼在1849年的3个月中成为一个罗马共和国的实际独裁者。马志尼作了一些努力，试图开放贸易，废除农奴制，解散大庄园。但是在罗马，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也出现了荒谬可笑的分裂。从此以后，庇护九世公开放弃与自由派的一切妥协，因为他们任意利用他的善良性情和轻信。他号召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支持他恢复自己的世俗统治，四支军队进击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与罗斯米尼和焦贝蒂的天主教自由主义相反，耶稣会教士得意地宣称自由主义来源于新教，它与真正的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从此以后，复兴运动便落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肩上。

这对教会和政府都是不利的。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开始和法国人进行斗争。以后，维护世俗政权需要一个专制政府和外国驻军。5月，西西里遭到国王“博姆巴”的瑞士雇佣军的蹂躏。8月，当马宁的威尼斯共和国崩溃以后，意大利的革命便告结束。这个半岛甚至比以前更进一步地沦为被占领的土地，奥地利军队占领了托斯坎纳和摩德纳，而法国军队仍留在罗马。

显然，稳健派和新归尔甫派对他们自身的个人解放比对民族的独立更感兴趣。那不勒斯的自由派转而反对西西里；墨西拿人反对敌对的城市巴勒莫。当革命触及他们的个人财产时，巴勒莫的自由派也改变了立场。除了一些突出的例外，人们没有作出牺牲的充分准备，当饥饿的威尼斯呼吁给予援助的时候，它从意大利其他地方（据托马塞奥说）只得到了一天的供给。革命非但没有达到团结意大利的目的，相反却使内部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德·阿泽利奥对罗马保卫者毫无意义的嘲笑得到了对方尽情的报复。查理·阿尔贝特的“意大利将由自己来治理”的政策被证明是荒谬的。幻想破灭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承认意大利的形成需要欧洲其他国家为之积极产生兴趣。德·阿泽利奥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经过几个世纪，意大利才能学会宪法的具体实施，变成一个强国。焦贝蒂放弃了他那“意大利优越”的神话，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共和的法兰西身上。他认为唯一的希望是要皮埃蒙特克服它的地方主义，适应民主。教皇将不得不放弃他的世俗权威。

就在诺瓦拉沦陷以后，查理·阿尔贝特立即逊位，不久死于波尔图。他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达17年之久，所以无法一下子就抛弃他的过去。尽管在他身后有种种传说，但他性格软弱，智力低下。他的亲切和蔼的品德无法抹杀他的朋友和敌人描述的他施展的两面派手法。^[13]所谓“意大利的哈姆雷特”和“波尔图的殉道者”这类吹捧的说法正是那些帮助把皮埃蒙特引向灾难的人们后来编造的。

另一个政治神话是，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在继承他父亲的王位后如何强迫拉德茨基缓和维尼亚莱停战协定的条件，并有力地抵制奥地利对宪法的攻击。^[14]事实上拉德茨基并不是一心想要侮辱皮埃蒙特，而是慎重地提出了有利的条件以避免法国进行干预，同时支持王室反对皮埃蒙特的激进派。作为回报，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保证他要制服议会中占多数的激进派。他无视这个多数派，任命一位保守派将军出任首相。另一方面，另一位将军炮轰热那亚，迫使激进派投

降。1849年7月举行的选举证明议会反对与奥地利签订的条约，尽管如此，他仍然予以批准。11月，他发布臭名昭著的“蒙卡列里声明”，亲自警告全体选民支持这一行动，并解释说，他决心“要把民族从政党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议会不批准他的条约，他就会废除宪法。

这样，维克托·埃马努埃尔重新确立王权，获得了部分成功。如果说他的君主制依然比那不勒斯或普鲁士的君主制更有局限性的话，那是因为库斯托扎和纳瓦拉两次战役的失败已经在皮埃蒙特和意大利严重地损害了国王的威信。有时候，他专横地进行统治，并用国王法令增加税收。但，意大利其他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更加暴戾得多。应知道皮埃蒙特对于政府的形式可能或多或少地不大介意，只要实际上它还有政府进行统治也就行了。^[15]至少，宪法和三色旗仍然存在。而且从那以后，代表复兴运动的是一个正式的政府，而不仅是一些预言家和密谋者。

国王作出了明智的稳健决定，他选中了中间偏右的德·阿泽利奥为首相。在担任首相期间（1849—1852年）德·阿泽利奥尽量以诚实、谨慎和理性来恢复人们对君主制的信心，并重新开始执行改革政策。他的主要措施之一关系到皮埃蒙特的教会。1814年以后，皮埃蒙特教会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全部得到了偿还，而它的独立法庭和庇护权则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所以在1850年，西卡尔迪法令废除了教会的司法权，减少了获得承认的节日，限制教会团体未经许可而对土地享有永久管业权。弗兰佐尼大主教禁止他的教士遵守这些法律，并企图用拒绝为当事人举行忏悔式和宗教葬礼等办法来对内阁施加压力。但是现在由于教会全力反对自由主义运动，这是一次力量的考验，对世俗力量来说，还不值得作出妥协。

德·阿泽利奥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加富尔伯爵的支持。加富尔在第一次选举中失败后于1850年参加了内阁。在嗣后的18个月中，他在不同时期负责过财政部、海军部、农业部和工业部的工作。在宗教上，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一个激进的保守派。从他的职业来说，他曾是军人，也当过记者。现在他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农业学家，以及都灵银行和都灵—热那亚铁路的董事。他是一个很有才干和雄心的人，曾经考虑是否参加反对党并推翻德·阿泽利奥内阁。

[\[16\]](#)他与右派的巴尔博和左派的拉塔齐继续保持联系，直到他能够在议会中形成自己的新的多数派。由于加富尔原是一位金融家，他必须筹措一笔款项来应付1848—1849年的竞选和付给奥地利赔款。他必须支付建设铁路的开销，承担极其必要的军事改革费用。他还必须恢复在斯培西亚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的计划，以便使皮埃蒙特“不比意大利任何其他国家逊色”。十多年来，大量增加税收终于使国家岁入从8000万里拉增至1.46亿里拉。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公债却增加了5倍。加富尔始终无法使预算平衡，但在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方面获得成功。他得到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的忠实支持，这些人曾经受过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教育。随着他们变得富裕，对于现存的经济束缚也就更加感到不满。所以，1850—1851年同法国、英国和奥地利谈判缔结通商条约，一个自由贸易的政策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同时也获得了英国的好感和友情。

由于德·阿泽利奥的战争创伤，加富尔很快就成为议会的领袖，并准备利用他的地位以取代他的首领。德·阿泽利奥不是战略家，也不是雄辩家。他对政治是个外行，就他的专业来说，他本是一位艺术家，从教养而言是贵族，只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成了一位政治家。如果说他是一个品格最高尚的人，那么加富尔毫无疑问就是最好的政治家。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即能认识到诚实并不总是最好的政策。加富尔首先需要在议会中有他个人的追随者；他对保守主义者有所偏爱，但由于宗教方面的顾忌[\[17\]](#)和他们对现任首相的忠诚，使这种偏爱受到影响。他在1852年2月秘密地与拉塔齐和中间偏左派结成联盟。在这件事情上，只有另一个大臣支持他。而且，他在事先没有提出任何警告就突然使政府公开与保守派决裂，使德·阿泽利奥更加陷于孤立。此事发生以后，他甚至没有自动提出辞职，直至国王迫使他下台，而且也直到他断定内阁的其他成员迟早也会被迫下台。这个联盟为意大利政治树立了一种持久的传统。从此以后，意大利的政治倾向于围绕着一个松散的中间派联盟，如后来法国的情形那样，而不像英国的政治围绕着两个或多或少地尖锐对抗的党派。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试图证明这是合理的。事实上，在这里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加富尔是力图效仿英国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迪斯累里和帕默斯顿之间正在形成一个类似的联盟。在所有的政治行动中，他最引为骄傲的就是这件事。而且这确实最后使他掌握了政权。

德·阿泽利奥终于在1852年11月辞职，当时国王拒绝批准他的世俗婚姻法议案。维克托·埃马努埃尔起初和元老院中“国王的朋友”密谋，企图废止这一议案。但是他发现加富尔由于希望获得首相职位，不会支持德·阿泽利奥反对这种专横的特权行为。加富尔只是在更牢固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才试图通过进一步反教权的立法，并劝说国王解散修道院。

正如加富尔所公开承认的，皮埃蒙特的法律仍然落后于意大利其他的国家。所以，他在担任首相的8年中所完成的这项改革任务，显得更加引人瞩目。他必须时常抵制国王个人的以及政治方面的反对。由于他过去的保守主义和征收沉重的赋税，他在普通人民中间很不受欢迎。为此，他必须设法予以改善。他还不得不和元老院中的贵族反对派以及包括欧洲一些最富有的高级教士在内的一批主教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使用的方法新奇而又严厉。他往往把内阁撇在一边；使用秘密经费去贿赂国内外报纸，有一次他雇用一個出身高贵的女人去勾引法国皇帝；对于有争议的措施，他确立了这样一个惯例，即先采取行动，然后再请求议会追认。和德·阿泽利奥不同，他任意使用文官制度来保证把政府候选人选入议会^[18]，并采取他明知是非法的手段来压制反对派的报纸。^[19]他往往声称为了达到自由的目的而采取不自由的措施是合理的，然而他从来不曾试图取消议会，因为他认识到，只要善于操纵，议会可以使他的势力变得相当强大。只要可能，他总是宁愿使用和平方式消除反对派的敌对情绪。他坦率地提出问题，接受人们的建议和修正案。

在对外政治方面，当马志尼在欧洲舆论面前仍然坚持意大利的不满的时候，加富尔甚至在1853年就预先警告奥地利要防范马志尼派在米兰的起义。尽管结果激进派指责加富尔实行皮埃蒙特主义——含意是把都灵置于意大利其他地区之上——但他只是在等待时机。他常说，唯一的真正的进击是那些缓慢的、指挥得当的进击。他决心要把意大利问题同民主与社会革命的任何偶然联系分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吸引唯一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阶级。这并没有妨碍他在1853年当居住在皮埃蒙特的伦巴第人的财产被奥地利没收时，提出庄严的抗议。另一方面，1855年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干预，并不像一度被人们认为是辉煌的成功^[20]，而是王室和法国大使策划的用保守派来取代他的阴谋所造成的间接后果。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喜欢打仗

就跟他喜欢打猎一样，因为在战争中，他可以抛弃宪法的束缚。他也想分散爱国分子和激进的意大利主义者对危险的伦巴第地区的注意力。加富尔不仅没有作出一个勇敢的、富有远见的决定，却勉强地迁就国王的奇异想法以免自己被撤职。只有一个大臣想参加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意味着要和民族敌人奥地利结盟，并在那民族利益并未遭受威胁的遥远的战场上消耗自己菲薄的资源。这件事并不能说明皮埃蒙特经过很长时间终于掌握了主动权，而是它的政治体制不稳定的另一个表现。它仅仅说明加富尔是多么明智地尽量减轻一个严重的不幸事件所带来的损失。

那支由1.5万人组成的小型远征军除了小规模交战外，还没有发挥进一步的威力，克里米亚战争就结束了。1856年加富尔很勉强地前去参加和平会议，仍然以为他会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替罪羊，但还抱着几分希望：作为对他所作努力的酬报，他可能获得一个公爵领地。在巴黎和会上，唯一积极的收获就是克拉伦登勋爵发表的简短声明，指出意大利目前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见第18章，原文第490页）。加富尔对此感到很失望。但是马宁和在巴黎的其他拥护共和制的流亡者却注意到他可以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发言，并有可能劝说他，从扩张皮埃蒙特的势力进而缔造意大利。加富尔私下说，他们关于意大利统一的议论是“一大堆废话”^[21]，但后来在1856年他又暗中表示愿意支持马宁的民族协会，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放弃共和制，一是必要时，他可以不承认与他们有联系。这样，他又一次巧妙地分裂了他的对手，获得了一种可贵的新的力量源泉，却又不致使他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他完全愿意支持统一的主张，但只有在公共舆论已告成熟的时候才行，而且它也不能危及君主政体，同时不能损害皮埃蒙特的利益。他还解释说，由于他从来不能漠视拿破仑三世的愿望，那不勒斯有可能成为它的前任国王约阿基姆的儿子吕西安·穆拉的封地。幸运的是穆拉还不敢大胆地坚持他的要求。同样幸运的是，由于众多的意大利移民在都灵的新闻界和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皮埃蒙特的公众舆论正受到意大利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思想的教育和启发。

1857年选举的结果是教权主义反对派人数增加了一倍。这是一次严重的倒退。加富尔承认，在“正常时期”这可能造成一次内阁危机。但是现在他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并能找到借口宣布反对派的一些选举无效。他还强迫反对教权派的拉塔齐辞职，因

为后者的友谊现已变成了一个不利因素。拉塔齐作为内务大臣，在1856年卢尼贾纳发生的起义中与马志尼有牵连，而且没有能够制止1857年6月在热那亚发生的一场共和派的暴动。于是联盟以分裂告终。加富尔决定向右翼靠拢，以便向路易·拿破仑表明皮埃蒙特是反对革命的一座可靠的堡垒。于是马志尼又一次被判处死刑。频繁的起义由于人民的冷淡态度而失败，因此，人们对于他所称之为加富尔的“普鲁士政策”的反对也正在削弱。马志尼表示要求进行合作，但是加富尔却需要他作为自己的对立派，以便借此恫吓国内外的保守派，使他们支持他本人所领导的更加正统的革命。无论如何对加富尔来说，马志尼是比弗兰茨·约瑟夫本人更为严重的敌人。一个是民主主义者，一个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一个是神秘主义者，一个是理性主义者；一个是预言家，一个是持怀疑论的政治家，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虽然两人对于缔造意大利来说都是必要的人物，但加富尔现在成了定调子的人。

1858年1月，一个名叫奥尔西尼的意大利人试图刺杀拿破仑。由于法国的支持十分必要，所以加富尔急忙对革命党进行起诉，而当证明陪审团对他不驯服时，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法律诉讼程序加以修改。一百多名鼓动嫌疑分子被驱逐出境。至少已经被没收了150期的马志尼的报纸《人民意大利》，也完全遭到蛮横的查封，幸运的是拿破仑需要皮埃蒙特作为反对奥地利的同盟者。他需要制止奥地利势力在意大利扩张，同时也需要获得声誉，并打破1815年蒙受耻辱的结局。他并需要对边界进行某种修改，以作为对他所提供的帮助的报酬，而且要求通过联姻成为欧洲最古老的王朝的成员（参见第17章，原文第462—463页）。于是加富尔便信心十足地和布奥尔伯爵展开了一场外交上的决斗。1856—1857年，奥地利企图以在马克西米连大公的统治下实现部分自治的许诺去讨好伦巴第人。一些流亡者由于感到任何其他办法毫无希望，甚至开始返回米兰。加富尔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加以抵制。他找机会挑起争端，劝诱布奥尔设法以断绝外交关系来恢复奥地利的尊严。然后，他着手扩大这种分裂，并催促拿破仑与奥地利开战，造成对意大利有利的形势。

加富尔为了和拿破仑洽商部署问题而做的旅行并未得到他的内阁的同意，甚至把他们完全蒙在鼓里。1858年7月在普隆比埃作出了大致的安排：加富尔在下一年春季趁马萨-卡拉拉的“人民”要求合并时挑

起战争。届时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应该恢复旧的拿破仑的北意大利王国，疆域直到波洛尼亚，而另一方面则将会出现一个可能由拿破仑的堂兄弟统治的单独的中意大利王国。1859年1月的一项正式条约进一步确认法国应当获得尼斯和萨伏依作为补偿。同时，加富尔极力使奥地利宣战，使他的同盟者借口保卫被压迫者而进行干预。伦巴第人被大张旗鼓地征召参加了他的军队，以便奥地利以强者的姿态要求将这些人予以引渡。国王在拿破仑的建议下，向议会发表了煽动性言论，大谈其他意大利国家被蹂躏的臣民们发出的“痛苦的呼声”。英国感到震惊，它认为加富尔“没有遭到外国军队的袭击，其荣誉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竟然如此蓄意地要挑起一场战争。马姆斯伯里恫吓拿破仑改变态度，并要求皮埃蒙特解除武装。加富尔灰心丧气，不得不屈服。但是，奥地利尽管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均无准备，仍然再一次把伦巴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检验它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活力。布奥尔愚蠢地抓住拿破仑撤退的机会去攻打孤立无援的皮埃蒙特（见第20章，原文第539页）。等到他的军事顾问弄清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为时已晚。4月，由于奥地利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结果使加富尔摆脱了困境。

另一个幸运的因素是，奥地利军队从都灵出发几小时的行军竟耽误了几个星期，这给拿破仑进行干预提供了时间（关于这个战役的一些记述见第12章，原文第323—324页）。6月初，法国在马让塔击败了奥地利，并把他们赶出了伦巴第。接着又在索尔费里诺取得了另一次胜利。以后，在7月间，正如马志尼正确预言的那样，拿破仑突然停止了干预，在维拉弗朗卡缔结了停战协定，把威尼斯，甚至伦巴第的四要塞防御区都留给了奥地利所有。加富尔大为震惊，极力劝说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继续单独作战。但是，国王利用战争的机会把推行政策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十分讲求实际，拒绝了这种劝告。法国在维护自己尊严方面赢得了胜利，但害怕北方的德意志人会集结在莱茵河一带支持奥地利。同时拿破仑也不愿意让皮埃蒙特在他打算建立的意大利联邦中占有过于强大的地位。他发现加富尔不是按照在普隆比埃一致取得的协议为建立一个单独的中意大利王国而奋斗，相反地却秘密地派遣人员准备把几个公爵领地并入皮埃蒙特。因此，拿破仑感到只要法国放弃对萨伏依和尼斯的领土要求，他便有充足的理由抛弃他的同盟者。加富尔辞了职。不久前，他在指责国王的情妇不忠的时候，和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发生了一场争吵。7月又因为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再次争吵。加富尔既不是军人，又不是投机家，更不是宠

臣，所以，他从来就没有获得国王的宠信。因此，更谦恭、更适合朝廷气味的拉塔齐组成一个过渡政府，11月《苏黎世和约》确认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威尼斯应该归还其原来的统治者。

法国的干预至少为皮埃蒙特赢得了伦巴第的大半地区，而且没过多久，和约进一步作了修改，对它更为有利。1860年1月约翰·罗素勋爵劝告法国接受对意大利中部不进行干预的原则，以便几个公爵领地和罗马涅能够选择自己的前途。里卡索利男爵在佛罗伦萨，法里尼在摩德纳、帕尔马和波洛尼亚都建立了临时政府并请求兼并。奉行新教的英国并不反对缩小教皇的领地；根据正式批准出版的小册子《罗马教皇与议会》来判断，拿破仑的态度也是如此。加富尔在1月又重新执政。他计划把萨伏依和尼斯再一次让给拿破仑，倘若拿破仑允许兼并意大利中部的话。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到3月成交。当议会尚未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法国军队已经开了进来，“筹备”公民投票，以便对既成事实予以认可。加富尔玩弄非凡的手法，使议员们确信尼斯确实更具有法国的而不是意大利的特点。同月，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与皮埃蒙特的合并也和平地实现：在艾米利亚登记的427512张票中就有426006张票赞成兼并，其余的票被宣布作废。^[22]于是，撒丁王国的土地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几乎占意大利人口的一半。

加富尔继续设法争取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在这次解决中作为同盟者和平等的伙伴。他没有统一意大利的计划，但是希望巩固他在北方的地位。然后在几年的时间内，在另一场欧洲战争中予以援助，以便他的北方王国可能利用这场战争去夺得威尼斯。他认为在南方再一次发生暴动是不合需要的，因为他只有严格保持稳健和保守的立场，法国才有可能帮助他夺取威尼斯，或者从罗马撤出它的驻军。

与此相反，马志尼则以宗教的虔诚坚决相信意大利必须统一。这必须通过它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有关的外国人恩赐。否则，某种严重的道德上的腐败将使它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南方存在着革命的形势，他能够加以利用，以便重新获得主动权。西西里再一次证明它是爆发点。对那不勒斯的敌意和农民家族间的仇杀是西西里的两种处于十分紧张状态的力量。1860年4月，马志尼的代表们激发起这两种力量。此外，尽管加里波第本人与马志尼意见分歧，但是加富尔用他的家乡尼斯来进行交易的行为使他十分愤慨，所

以他也充满反抗情绪。加里波第曾两次被驱逐出皮埃蒙特，他在南美流亡期间就已经成为一位杰出的游击队领袖。他是在意大利处于民族危机的时刻回来的。但是在1848年和1859年，他在伦巴第战斗中没有能大显身手，因为正规军军官们鄙视并害怕他的志愿军。1860年5月，他不甘受人摆布，率领他那著名的1000名到处煽动叛乱的志愿战士来到了西西里。加富尔竭尽一切可以使用力量去制止他，但后来却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政策。加富尔向法国大使解释说：“如果起义被镇压下去，我们无话可说；如果他们胜利了，我们就将以维护秩序和权威的名义加以干涉。”^[23] 内阁甚至已经决定要逮捕加里波第；但是加富尔本人犹豫不定，因为这时正在进行选举，尼斯问题正引起严重的内阁危机，而且他害怕国王会同情加里波第，需要寻找借口任命一位新的首相。

在加富尔还未能作出决定以前，加里波第就已经攻占了巴勒莫，使人人感到震惊。一个迅速蔓延的农民起义正在瓦解波旁王朝的统治，并促使一支庞大的部队闻风投降。加富尔抓住这个机会委派特派员去兼并西西里。但是加里波第无疑正确地认为加富尔想要阻止他获得那不勒斯，所以拒绝放弃这块根据地，因为他在大陆上继续进行作战是需要这块根据地的。这使加富尔感到忧虑，因为“国王不会在加里波第的控制下接受意大利王位”^[24]，而且如果叛乱者继续前进，他们可能会和驻罗马的法军发生冲突。所以他现在停发了用于援助革命的给养。他一方面假装要同波旁王朝的弗兰西斯谈判结盟，另一方面他驻那不勒斯的公使馆策划针锋相对的密谋，以便抢在加里波第之前采取行动。他还成功地贿赂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将军和大臣。但是他的代理人却完全错误地向他汇报了那不勒斯的公众舆论。当加里波第在9月攻克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更大胆的计划。加里波第的巨大成功促使人们要求立即实现统一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因此，加富尔终于宣布他转而采取马志尼的异端做法：在罗马教皇的边境上制造了“事端”，从教皇的辖区占领了翁布里亚和边境地带，以便“把它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接着那不勒斯遭到了入侵。加里波第不得不屈服；皮埃蒙特在卡斯特尔菲达多打败了教皇的雇佣军。这一胜利被官方的辩护士肆意夸大，企图以此来冲淡加里波第本人以前取得的胜利的光辉。照例在占领军监督下举行了公民投票，自然又是绝大多数人宣布他们无条件地要求兼并。

“兼并”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使用的，因为尽管意大利王国现在已经宣布成立，但它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的撒丁王国的树干上嫁接而成的，国王的称号仍然是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对他们来说，皮埃蒙特的这一姿态有助于使他们组织——最初是统治——意大利其余各国的任务听起来悦耳一些。但是对于其他被征服和被兼并的各国来说，实行“皮埃蒙特化”的必要过程当然是令人厌烦的。许多西西里人曾经为那不勒斯的独立而战斗，而且只求和皮埃蒙特结成联盟来作为实行自治的一个手段。许多那不勒斯人错误地认为兼并将会与地方自治一并实现，而现在他们却只好眼看商业、行政职位和威望都丧失给较小的和“意大利特色”更少的都灵城。一些激进分子一直在为实现一个共和国而战斗。加里波第对于他的志愿军所受到的刻薄待遇，以及阻止他到达罗马都很反感。托马塞奥和卡塔内奥则代表一批顽固分子。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意大利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因为在这样一个政府之下，千差万别的各民族都要接受远在都灵的冷漠无情的官僚们的统一治理。至于占人口总数90%的农民，几乎没有人懂得“意大利”这个词的意义。他们向反叛者提供了有力的援助，盲目希望获得土地和经济保障，但是他们现在发现旧政府在反对那些贪婪的中产阶级和地主方面一直是他们的朋友，而他们却不知不觉地不自愿地帮助中产阶级和地主夺取了政权。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震惊：加富尔竟然通过向罗马教廷开战来表示他对开除教籍的做法所采取的蔑视态度，竟然会占领教廷的大部分领地并把北方现行的反法推行到那里。此外，由于未经周密考虑就把自由贸易从皮埃蒙特突然扩展到落后的省份，使地方工业倒闭或萧条，并把大片地区由比较富裕的畜牧业变成了不经济的谷物生产——因为，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不发达，南方在失去保护之后就立即陷入了不利的地位。甚至在都灵，宫廷贵族也对由无门第的南方人造成的他们的权力的削弱过程感到强烈的不满。德·阿泽利奥建议那不勒斯应该立即重新分离，因为公民投票明显地与公众舆论相去十万八千里。

尽管有许多人反对，甚至继续拒绝承认一个意大利国家的存在，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却发生了一个奇迹：当时出现了少数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具有才干和崇高抱负；欧洲外交出现了一个偶然的时刻；人数日益增加的一批知识分子抱有固执的信念；一股突然狂热的思潮把与一切高尚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统一等同起来。所有上述这些因素侥幸地结合起来，便使马志尼的乌托邦梦想得到了实现，而这时马志尼本

人的幻想却已彻底破灭，并再次被迫过着痛苦的流亡生活。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被选入议会，1861年2月议会在都灵召开。不幸的是，这次会议由于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之间发生了不适当的争吵而遭到了破坏。6月，由于加富尔得了严重的热病，因此为保证实现统一而作的努力确实是太少了。医生给他放了六七次血，直到他的最后抵抗力都被疾病耗竭为止。贾科莫教士出于仁慈，不顾教会的禁令给他举行了最后的宗教仪式。他逝世时离他51岁生日还差几个月。最大的憾事是他生前没有来得及考虑困难重重的重建国家的问题。

在12年中，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只换了三位首相。现在则是一年更换一位：1861年是里卡索利，1862年是拉塔齐，1863年是法里尼和明盖蒂，1864年是拉·马尔莫拉将军，以后又是里卡索利和拉塔齐。1867年是梅纳布雷亚将军，1869年是兰扎。政治舞台变化无常而杂乱无章，一部分原因是意见上的分歧极不明确。在鼓励组成议会反对派方面，加富尔和德·阿泽利奥不差上下，而且当他在1852年和1859年离职时，他仅仅是离开都灵，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以便重新掌权。在他死后，许多人结成小团伙有点漫无目标地争夺地位，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养就是卑躬屈膝地依赖某一个人。

对尚待解决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意见：夺取威尼斯和罗马；把不同的法令和关税统一起来；对反革命进行镇压；争取财政平衡。这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由下列事实证明：有几年，支出是收入的一倍半。为了挽救这种局面，货币贬值了，教会的财产国有化了，并对食品征税，致使许多人陷入了饥饿之中。支出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要把60个营的兵力几乎立即派到南方去平息延续已达4年之久的内战。波旁分子和天主教徒利用了人们要求实现地方自治的愿望，以及北方人民对征兵和税收的不满，而政府和地主在经济上的歧视则使农民一直成为一支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力量。在西西里也不得不实施戒严令。在那里，每年征集的新兵名额中的大多数都设法躲入山区，从而扩大了十足的无法无天者的队伍。在巴勒莫曾经一度确实成立了一个由分裂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这场消耗战中，死亡人数超过了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历次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的总和。因为，在1848年和1870年之间的所有的正规战中为争取独立和统一所付出的总代价估计约有6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25\]](#)与实现独立和统一这一成就相比，这一代价还是小的。

威尼斯是在1866年夺取过来的。奥地利人最初提出不战而降，以避免两线作战。但是意大利希望在战场上获胜，以振声誉，因而拒绝了奥地利投降的请求。然而随后发生的战争，其结局却不光彩。意大利尽管兵力占有优势，却又在库斯托扎被击败，在海上，也在利萨遭到失败。但是，由于它的同盟者普鲁士赢得了压倒的胜利（见第19章，原文第519页），奥地利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拿破仑将它让予别人。罗马的形势更加困难，因为教皇没有奥地利皇帝那样顺从，因而谈判一再地未取得任何结果。1862年，加里波第再一次试图向罗马进军，事实促使他认为拉塔齐会袖手旁观，准备利用他的成功或者失败。相反，他却在阿斯普罗蒙特被王军打伤被俘。1867年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梅纳布雷亚无可奈何地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他不得不设法帮助法国在曼塔纳打败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大多数人（德·阿泽利奥是一个突出的例外）都认为没有罗马，意大利将不成为意大利。这是因为除了感情上的原因以外，其他的地区越来越不愿意让都灵或任何其他仅仅是各省的中心城市居于优越地位。最后，在1870年，由于普鲁士出乎意外地打败了法国，迫使法国撤走了防守的驻军，而在宣布教皇永无谬误的时候，意大利人向罗马进军，粉碎了象征性的抵抗。这并不十分符合马志尼关于依靠人民的积极性来拯救民族的思想；在马志尼看来只不过是意大利的幽灵或者僵尸的东西，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则显得是十分真实的事物。意大利这个“地理名词”终于有了生命。随着罗马的收复，复兴运动看来暂时是大功告成了。

（万正忠 译）

[1] 参见L. 萨尔瓦托雷里《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活动》（都灵，1944年），第100—101页，L. 布尔费雷蒂《复兴运动史中的几个问题》（米兰，1951年），第130页以下，这两者之间的争论。

[2] P. 席尔瓦：《意大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时期》（米兰，1939年），第148页。

[3] G. F. H. 伯克利：《意大利的形成，1815—1846年》（剑桥，1932年），第256页。

[4] 关于犹太人的地位的一般情况，见本卷第9章，原文第243页。

[5] C. 斯佩兰宗：《意大利复兴运动和统一史》（米兰，1936年），第3卷，第453—454页。

[6] 马萨里致明盖蒂信，1847年11月19日。M. 明盖蒂：《我的回忆》（第4版，都灵，1889年）；G. 普拉托：《1848年前夕的事实与经济学说》（米兰，1921年），第238页。

[7] R. 恰斯卡：《1847—1848年意大利全国舆论计划的由来》（都灵，1916年），第358页。

[8] C. 斯佩兰宗：《意大利复兴运动和统一史》（米兰，1936年），第3卷，第628页；另见A. 奥莫代奥《近代史上有关查理·阿尔贝特的传说》（都灵，1940年）；N. 罗多里科《1843—1849年时的查理·阿尔伯特》（佛罗伦萨，1943年），第2卷，第325页。

[9] 卡塔内奥对皮埃蒙特政策和战略的责难大部分已被文献证实。见P. 皮耶里在《伦巴第复兴运动研究》一书中的论述（A. 蒙蒂编，米兰，1949年），第9—45页。

[10] 有关拉德茨基的军事行动，见本卷第7章，原文第321—322页。

[11] 加富尔：《加富尔未发表的书信》（A. 贝尔特编，罗马，1889年），第222页。

[12] A. 科隆博：《根据新资料撰写的维多里奥·埃马努埃尔二世王国的曙光》（罗马，1937年），第41页；A. 安齐洛蒂：《焦贝蒂》（佛罗伦萨，1922年），第232页。

[13] 见于他的忠实朋友松纳兹伯爵很能说明问题的说法。见松纳兹《回忆查理·阿尔伯特国王》，A. 奥莫代奥编（都灵，1940年）。

[14] 参见W. R. T. 塞耶《加富尔的生平和时代》（伦敦，1911年，第1卷，第104，208页）和霍华德·麦高·史密斯在《近代史杂志》第7卷（1935年，芝加哥，第141—182页）的文章。

[15] 法国公使在都灵的报告。1949年11月21日。P. 马特尔：《加富尔与意大利的统一》（巴黎，1925年），第2卷，第134页。

[16] L. 萨尔瓦托雷利：《1848年前后》（都灵，1948年），第179页。

[17] 德·拉·里夫：《加富尔伯爵》（巴黎，1862年），第302—303页。

[18] 加富尔书信：《南方的解放》（波洛尼亚，1949年），第1卷，第122页。

[19] L. 基亚拉：《C. 加富尔书信集》（都灵，1887年），第6卷，第130页。

[20] 参见F. 瓦尔塞基《克里米亚联盟》（米兰，1948年，第346—417页）以及A. J. 怀特《加富尔的政治生涯和书信》（伦敦，1930年，第122—151页）中所阐述的旧观点。

[21] G. E. 库拉图洛：《加里波第、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和加富尔》（波洛尼亚，1911年），第12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基亚拉编辑的加富尔书信的半官方版本（第2卷，第372页）中没有这句话。

[22] G. 德尔·博诺：《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1859—1860年》（都灵，1941年），第289页。

[23] C. 马拉尔迪：《法国有关南方五国覆灭的文件》（那不勒斯，1935年），第30—31页。

[24] 加富尔致尼格拉信，《加富尔—尼格拉书信集》（波洛尼亚，1929年），第4卷，第122—123页。

[25] 福尔图纳托的数字，见E. 塔利亚科佐《1870年后的政治现实主义》（巴里，1937年），第118页。

第二十二章 普法战争的起因与德意志的再造

多少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俾斯麦略施小计，法国便坠入其彀中，于1870年7月对普鲁士宣战。在渲染这个故事方面，用心之恶毒和自鸣得意之程度，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俾斯麦本人。许多历史学家寻找证据证明他的说法，并且认为他欺骗法国人的做法，早在1870年以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实际情况远为复杂。俾斯麦在促使战争爆发上，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负全部责任。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希望有一场战争，他所希望的战争结果究竟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至今仍不甚明了。

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欧洲的外交中心从巴黎转向了柏林，这是俾斯麦1862年上台以后的几个长远目标之一。他一直在打算，只要他能够统一德意志，就要使柏林成为普鲁士化的德意志控制下的欧洲的指挥中心。19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为他所下定的决心所左右，就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抉择再造德意志。这种决心不久即显露出来，而四个能与普鲁士抗衡的大国，不得不对此作出对策。大不列颠和俄国由于不同的原因，采取冷漠的态度。英国人有意地奉行一种孤立政策。俄国人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见第10章，原文第268—269页）曾销声匿迹，这时逐渐抬头，发现自己在欧洲的东南部与奥地利成了对手，因此，对于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另有他图，自然乐于旁观。奥地利积极从事的反对活动已被挫败，这在前几章中曾经阐述。法国也是持敌对态度的：法国人想要干涉德意志的内战，但却找不到机会，而柯尼格雷茨（法国人称为萨多瓦）战役中的几个战胜国，也不是轻易可以向之挑战的。

在以后的四年中，争夺对德意志统一的控制权的斗争，带有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之间决斗的性质。他们之间一个深刻而又简单的分歧，必须从头说起：拿破仑三世对于自己的意图究竟何在，并不清楚；而俾斯麦则心中明了。拿破仑三世就像“布里丹的驴子”^[1]（这是借用艾克所著《俾斯麦》一书中的比喻）一样，总是在王朝、宗教

利益与军事利益之间，在对外政策的利益与国内政策的利益之间犹豫不决。他太富有政治想象力，而且往往追求那些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因此受到困扰。关于他的活动，有许多说法认为他每次只始终不懈地追求一个目的，其实并非如此。但是，俾斯麦就像一个成功的将军那样，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目标：一个君主立宪的德意志，在他出身的那个普鲁士的统治阶级的控制下统一起来。他看出，如果使拿破仑三世感到彼此都得到应有的利益，而且适当地达到他的目的，以此来迷惑他，将会是大有好处的，因此，他不打算一下子拿到太多的东西。

在法国和普鲁士的君主左右，都有一个有力的由职业军人形成的“军国主义”集团。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专长有用武之地。两国实施的征兵制训练出大批善于使用武器的士兵（见第12章，原文第312页）。和平主义的意见在科布登的英国能够起点作用，在法国就无足轻重，在普鲁士则根本没有意义。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战争以后，普法两国都对本国的武力深信不疑，准备有朝一日与对方决一死战。拿破仑的英明给法国带来了莫大的光荣，但是，这位拿破仑的侄子却没有他叔父的那种作战天才、领导能力和坚强的性格。而俾斯麦则无论是在政治形势不适宜发动战争时钳制军队，或是在为军队所追求的胜利创造条件方面，都证明是更为成功的。

克尼格雷茨战役失败的当天，弗朗茨·约瑟夫打电报给拿破仑三世，告知割让威尼斯给他，请求他调停休战。这位法皇对奥地利的溃败感到意外。他似乎曾期望为奥地利打赢这场战争，因此，事先无论如何也未曾采取任何步骤以阻碍现在他所面临的这场普鲁士的胜利。他未曾动员他的军队。现在他的一些大臣敦促他趁奥地利军队仍然处于战时编制时动员军队，可是他发现要有效地把军队动员起来时间来不及了。此外，他在患病；而且，原来似乎可以把握住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他花了10天的时间编制出显然对弗朗茨·约瑟夫有利的建议。然而，俾斯麦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无意于把奥地利踩在脚下，他需要的只是在普鲁士夺取权力的道路上除掉奥地利（1866年7月26日《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以及8月23日的《布拉格和约》）。威尼斯要转让给战败的意大利，这虽然有损威信，却不是实力上的损失。当时有些人认为，把这一地区的怀有敌意的人口交出去，实际上对奥地利有利。对于战胜国普鲁士，奥地利完全不必割让领土，只需付给一

笔为数不多的赔款。而且，虽然普鲁士放弃了原来的“德意志联邦”，代之以“北德意志联邦”，但这个联邦主要限于新教各邦之间，并且不超过美因河以南的地方。

俾斯麦一直到次年的6月，主要从事于制定新联邦的宪法。他对美因河以北的地方是这样安排的，即普鲁士对奥地利的一些德意志盟邦的条件是极为苛刻，以便使自己得到补偿。在这些盟邦中，使几个邦通过调整边界并入普鲁士邦，从而使普鲁士的人口增加了450万人；并且使普鲁士第一次从默兹河到梅梅尔河有一条连续不断的边界。这几个不复存在的邦中之一汉诺威，在即将来临的三四十年中，将为普鲁士提供大量的机密活动经费，而要把汉诺威邦过去统治者的公私财产划分开来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俾斯麦在与普鲁士国会进行的初步较量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策略上的胜利。进步党对于俾斯麦在30多个月以前财经上未经国会批准即对丹麦开战的违宪做法所持的反对态度，突然失去了舆论界的支持；舆论界这时却热情欢呼打败奥地利的胜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的那天选出的新国会中的自由主义多数派，不敢再冒被解散的风险，以免被彻底摧毁。因而，于1866年9月3日以三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免于追究用于丹麦战争的违法开支的法案。这次投票由于考虑此前刚刚完成的光荣业绩，对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标志着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它为以后各届政府提供了一个可资援引的适用先例，从而使政府可以摆脱国会的控制。

俾斯麦又为新的联邦设计了一个行政机构，它具有旧的行政机构所没有的实际的行政管理权，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他在国会中的敌人。下议院（Reichstag）将由普选产生——就连威斯敏斯特议会也曾害怕做这种安排——不过其权限只是咨询性的，甚至不包括不久前普鲁士的经验已经表明是行之无效的那种财权；不过有一点除外，就是对于军队的规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而选民中的农民大多数是十分保守的。新的联邦由普鲁士国王任主席；而普鲁士通过一种巧妙的手段，可以在联邦中稳居优势。普鲁士除了拥有在原来的联邦上议院中所拥有的4票以外，又增加了新近宣布纳入普鲁士的各邦原来拥有的13票；而在新的上议院（Bundesrat）中，有14票就足以否决任何的宪法修正案。

讨论和辩论宪法，不论是私下或公开地，在其整个过程中，拿破仑三世无意中给俾斯麦帮了忙。每当需要借助外国危及德意志领土这一幽灵时，拿破仑三世就会出面充当这一恶魔的角色，使俾斯麦称心如意。拿破仑三世提出了以美因河为边界，以使德意志各邦保持分裂状态。他设想德意志会分成三个集团，第一个以普鲁士为中心；第二个以奥地利为中心；他希望，第三个，也是最弱的一个，即以美因河、莱茵河、奥地利和波西米亚为界的四个邦，会依靠他的引导。

《布拉格条约》约定，这四个邦可以在国际上独立存在，但还在该条约签字以前，俾斯麦就已经秘密地说服了它们签字放弃它们要求独立的部分。

根据法国的舆论和法国外交实施的需要，普鲁士实力增长，法国的实力也必须随之增长。为此，拿破仑三世曾派遣他精明的驻柏林大使、科西嘉人贝内德蒂（1817—1900年）前往战地拜访俾斯麦，不顾巴伐利亚、卢森堡以及普鲁士本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要求扩大法国在巴拉丁的领地范围。俾斯麦简慢地对待贝内德蒂，但却设法从这位大使那里弄到了（在两人都已返回柏林后）他亲自起草的一个条约草案，内容有一些新建议，据此，法国将拿到比利时和卢森堡，交换条件是，它同意除奥地利以外，全部德意志统一，并缔结一个既是进攻性的，又是防御性的法德同盟。这个根据拿破仑三世的指示而提出的计划，俾斯麦在四年以后却引人注目地加以利用了：1870年7月25日的《泰晤士报》披露了这个计划，但未注明其日期。他得以更及时地向南德意志各邦驻在柏林的外交官们揭发拿破仑三世的种种图谋。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对于法国的欺诈意图深信不疑，因而于8月中旬与普鲁士签订了密约。根据此条约，一旦法普开战，它们将把自己的军队交由普鲁士指挥。

拿破仑三世的扩张计划在欧洲得不到支持。奥地利无能为力，普鲁士持敌对态度，俄国则表示冷淡。英国正处在政府更迭的困难关头，表示出其一贯的对比利时的忧虑。意大利愤愤不平于威尼斯归其所有所采取的方式，因此不愿向拿破仑三世提供它那微不足道的支持。拿破仑三世因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撤回，不能不感到羞辱。但是，他对这些要求念念不忘。在此以后他统治的时期里，对于他的对外政策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一未减缓的欲望：普鲁士获益，法国定要得到补偿。

从此以后，和平就不牢靠了。拿破仑三世自己深信，或者说，他的那些狂热的顾问们使他相信，看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出现，他将是受不了的，他必须下定决心为阻止这样一个德意志的出现而奋斗。他立即让他的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离职，因为德·吕这时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对于被罢职并不感到遗憾。他对北德意志的使节戈尔茨这样说：“我看见过两个王朝垮台，现在我又看出了这种迹象。”^[2]就像一个人在奔跑着，他不敢突然停下来，否则就要失去平衡而跌倒；因此，拿破仑三世只有在国外从一个胜利向另一个胜利奔跑才能在国内保持平衡。他在墨西哥的冒险已然失败：在美国的压力下，于1867年3月把他的最后一支军队撤出。

与此同时，他试图与俄国友好，但谈判却处置失宜。俄国需要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给予支持。在这个地区，克里特岛发生了一次起义，这似乎是造成一次重新讨论东方问题的机会。但是，法国当时在东方的利益是在商业方面，不是在政治方面，因此，俄国也不会被说服对莱茵兰问题发生相当的兴趣。拿破仑三世需要取得某种胜利以打动他的臣民，向他们表示，在普鲁士获得新的利益时法国也得到了与之相当的好处，从而保护了法国的利益。1867年年初在与俄国进行谈判时他似乎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这时他重新提出了要求取得卢森堡的提议。

50年来，卢森堡城有一支普鲁士的驻军，作为德意志联邦的一个堡垒，目的是与其他几处的驻军一起阻止法国向中欧推进。新成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并不包括卢森堡。因此，按理说这支驻军应当撤走。再者，荷兰的威廉三世拥有卢森堡大公领地的主权，比利时的建立，便把卢森堡与他的王国其他部分分开了；威廉三世这时财力不足。1867年3月，拿破仑三世与他秘密商定，以即付现金把这块大公领地买去。他认为，先前已与俾斯麦作过协商，普鲁士不会表示异议。但是，保密不慎，秘密被泄露出去，于是德意志报界——在俾斯麦的纵容下——对这个拟议中的交易强烈抗议。俾斯麦就选择了这一时机，公布了他在头年8月间与南德意志各邦签订的密约。

拿破仑三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种形势：如果他要卢森堡，就得出动军队和付出财力。并且他再也不能像一年前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盟友帮助他取得这个地方。确实，俾斯麦要结成一个联盟来对付拿破仑三世同样也未得逞；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1826—

1893年）虽然缺乏经验，但却不易激动，普鲁士暗示拿破仑三世确实对比利时抱有图谋，没有使他感到恐惧；而奥地利的外交大臣博伊斯特（1809—1886年），最近才从萨克森来转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他严厉地拒绝了俾斯麦作出的友好表示。他出于某种德意志人的爱国心，也拒绝拿破仑三世提出的结盟建议。因为这种结盟难免与普鲁士交战，这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所不欢迎的。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卢森堡应交给比利时，法国则应得到1815年交出的两个比利时的要塞。这个建议既为布鲁塞尔所痛恨，也遭到伦敦的断然反对。法国和普鲁士都采取各种预防性的措施，进行初步动员。但是，外交活动并未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两国的领袖也未下定决心诉诸一战。俾斯麦认为——或者4年后一时率直地这样说过——普鲁士本身还不够强大，不一定能通过一次战争就击败法国，而且它与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关系也还不够牢靠。他可以通过普鲁士驻巴黎的大使（他会让法国的皇后听取他的意见）向拿破仑三世暗示，卢森堡问题小事一桩，不值得以兵戎相见。

趁沙皇提出友好而不偏不倚的建议，在伦敦召开了欧洲各大国的代表会议。正如19世纪举行的大多数成功的会议那样，有争端的各国经过预先彼此协商，解决了所要解决的问题。拿破仑三世意识到自己的孤立，而且也不愿引起一场战争，遂改变了调子，他不再极力要求补偿，一时高唱和平并声称法国愿意尊重国际义务。他的大臣鲁埃同戈尔茨一起为和解方案作安排。普鲁士的驻军将撤离卢森堡，要塞拆除，各大国保证这个大公领地的中立。由于普鲁士对斯坦利施加了压力，这些条款才得以包括在《伦敦条约》之内。1867年5月11日《伦敦条约》签字，这次短期会议遂告结束。

此后不久，斯坦利和他的父亲，即英国的首相德比便向威斯敏斯特议会提出了对于条约中有关“集体保证”一词的奇怪解释。他们的主张似乎是，如果任何保证国侵犯被保证的领土，共同保证国中的任何一国不会因人之请采取任何行动以保卫被保证的领土。这种说法使法律家们都感到费解。这一事件在其他方面起到了它的作用：在英国的政治中，少数派政府在关于议会改革这场棘手的辩论中得到加强；在普鲁士的政治中，则仓促结束北德意志宪法的辩论。法国人对卢森堡的驻军行将撤走而欣喜；德意志人对于不让法国人继之派去驻军也感到高兴（确实，俾斯麦此时并不希望进一步激怒法国人，在9月间他

拒绝了巴登加入新联邦的要求）。巴黎博览会为国际关系的交往提供了比唐宁街的谈判桌更具有吸引力的场合。沙皇和其他各国的皇室（包括普鲁士国王在内）都前往参观；但是，沙皇却遭到一名波兰青年的枪击；而且，博览会上的欢乐气氛又进一步被6月底传到欧洲的消息所破坏。墨西哥事件已告结束：马克西米连在克雷塔罗被处决（参见第24章、第25章，原文第641，677—678页）。

两个月后，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到萨尔茨堡访问弗兰茨·约瑟夫，表示吊唁。拿破仑三世在前往萨尔茨堡途中在慕尼黑车站几乎是随便地说道，如果南德意志各邦要加入俾斯麦的新联邦从而激怒法国，他就不得不和它们开仗了。奥地利皇帝由几名大臣陪同；而这位法国的皇帝却只靠他自己的聪明。无论是忠告或是鼓励都没能导致任何明确的协议；拿破仑三世只好寄希望于他那吸引人的风度能对这位皇帝有所感动，而在过去的8年中，他对这位皇帝的帝国却频频地发动过进攻。在以后的3年中，他还一直幻想着要与奥地利结成联盟。但是，弗兰茨·约瑟夫是否愿意和这位法国皇帝达成协议，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要不是这位法国皇帝，他的弟弟就不会受到枪毙之刑。

拿破仑三世要和哈布斯堡王族结盟的诱因之一，是因为奥匈帝国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因而，这个联盟会受到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欢迎。另一方面，奉行一种坚信天主教的政策，势必使他与意大利发生矛盾，而意大利唯一有待实现的民族抱负，就是要获得现时仍然处在教皇世俗权力统治下的罗马周围的领地。拿破仑三世于1866年7月通过将威尼斯交给意大利以讨好意大利人未能成功，于是他至少在这年的12月间撤走了法国在罗马的驻军。因此，意大利政府才敢于纵容，甚至鼓励革命者袭击教廷领地。到1867年9月底，这种袭击的力量已强大到令教皇吃惊的地步。由于加里波第亲临现场领导了这些袭击，教皇更为惊慌不已。

面对着这种局面，拿破仑三世难以作出决定；而他的顾问们的意见又大相径庭，这使他更加为难。他可以支持意大利人对教廷领地的要求，这样，他既可以得到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盟友，又可以实现他自普隆比埃会议以来作为统一的意大利的保护人的作用。但是，要这样做，他就不得不与反教权的力量以及革命的势力结合起来，这又是他所不敢干的。他自己的政权过于依靠用暴力镇压骚乱，同时又过于依靠天主教徒的忠诚。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热

心的天主教徒——法国的义务是不容置疑的，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教皇。最后，拿破仑三世宁要国内的支持者，甚于国外的盟友。于是他派遣了一支人数不多的法国远征军乘船前往台伯河；尽管他总是犹豫，甚至到了最后，当远征军即将驶离法国领海时，他还曾想用旗语将他们召回。

这支远征军来得正是时候，11月3日在离罗马只有12英里的曼塔纳地方，它帮助打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意大利人对于远征军的截击是不会原谅的。几天以后鲁埃在法国议会中声明，法兰西帝国决不会允许新的意大利王国把罗马占为己有，这也是意大利人所不能接受的。

拿破仑三世秘密地用巧言继续欺骗弗兰茨·约瑟夫，希望把他自以为他们在萨尔茨堡已经取得的谅解发展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联盟。这一政策终于使他又恢复了在罗马的驻军。与奥匈帝国的会谈最初是非常秘密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驻维也纳大使格拉蒙，在他1870年出任外交大臣之前，对此也毫无所知。弗兰茨·约瑟夫表现出其一贯的彬彬有礼；但是礼貌所掩盖的却是不愿作出承诺。博伊斯特不肯接受拿破仑三世重新提出的结成一个针对普鲁士的积极同盟的建议，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占奥匈帝国人口一半的说德语的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且也是因为由于奥匈协议（参见第20章）地位得到加强的某些马扎尔人领袖无疑地对法国持有敌意。拿破仑三世也不肯接受博伊斯特貌似单纯的反建议：两国事先如未取得一致意见不得采取任何外交行动。因为那样会使他失去主动。事实上，奥地利感到自己太弱，难以单独行动，按照它的提议，要把意大利拉进来成为联盟的第三个成员，为此，谈判在一年以后陷于停顿。如果说没有意大利，奥地利不会行动，那么不得到罗马，意大利也是不会行动的。奥地利所以支持意大利加入这一同盟，是因为它唯恐普鲁士不但可能把罗马，而且还可能把特兰提诺送给意大利，以此作为结盟的代价。而罗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仁妮的丈夫这时是不会放弃的。1869年9月拿破仑三世与弗兰茨·约瑟夫之间，拿破仑三世与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之间终于交换了信件。奥、意两国君主言辞热烈地向这位法国人的皇帝保证他们对他有着友好感情并决心在战争时援助他。但是，这不过是私人信件，不是正式的外交文书。对于这些没有价值的保证，拿破仑三世无可奈何，只好表示信任。阿克顿评论说：“他无精打采地进行准备，

就像一个为痛苦所折磨的人，失去了决心、活力和希望；因此，他久久不能作出决定。”^[3]

由于这些谈判徒劳无益，法国陆军当局一直在设法改良他们的军队，以解决自萨多瓦战役以来他们心存的疑虑，即他们的军队是否还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拿破仑三世对于军队的组织和军备问题极感兴趣。尼埃尔（1802—1869年）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已被擢升为陆军元帅，1867年初出任拿破仑三世的陆军大臣，并负责军队的大规模改革。经过长期的准备，1868年1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服役年限从7年延长为9年，后四年为预备役。在旧体制向新体制改变的过程中，于1870年爆发了战争。新体制并没有收到像其设计者所希望的效果，其部分原因是在议会通过时作了某些修改，因为许多议员急欲缩减军事开支。但是，尼埃尔至少在他死前看到了全部陆军都装备了一种优良的后膛装填式步枪，这种步枪以它的发明者命名为“夏斯波特式步枪”（参见第12章，原文第305页）。根据曼塔纳战场上法国指挥官送回的报告，一些早期的夏斯波特式步枪在曼塔纳“创造了奇迹”（ont fait merveille）。消息发表后，使普鲁士人感到不安，也使意大利人的情绪受到打击。在法国国外，人们认为尼埃尔的改革极为重要。在北德意志，军队也在进行改革，阻力较小，收效甚大。新联邦其他部分的各军队，也都尽可能地按照普鲁士军队那样进行了改革。

在进行这些改革时，法国和普鲁士都不希望打仗。法国人是因为尚未做好准备，而普鲁士则因为战争的发生推迟一年，就可使他们的军队增加10万名经过训练的士兵。然而，法国人给欧洲其他国家造成的印象是，他们是难以相处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环境不满意。例如，1868—1869年的冬天，法国一家以法国政府为债权人的铁路公司，打算向比利时购买两家铁路公司。比利时人对此感到害怕，遂于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比利时的铁路公司把铁路卖给外国人，法国政府很是生气，其激烈程度使人产生一种推断，认为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参与了这项交易，由于它在政治上向莱茵河下游推进未能得逞，现在就想在经济方面取得发展。克拉伦登（他在12月间再次出任英国的外交大臣）提出了坚决的抗议，遂使这一威胁立即消除。

战后，一些法国人说，他们事先就感觉到了战争即将来临，因为危机四伏。事实上，1869年春天的情况是这样，1870年则不是。

1870年的第二天，法国的奥利维埃政府组成，克拉伦登的朋友达吕任外交大臣（参见第4章，原文第97页）。奥利维埃是以支持德意志的统一著称的。达吕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要求拿破仑三世停止进行另一次的秘密谈判，并且取得了成功。拿破仑三世继9月间的交换信件之后，又着手进行关于拟议中的三国联盟的秘密谈判。他派遣他的军事随从弗勒里出任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他一面策划他所设想的三国联盟，同时又在探询如果俄国能够取而代之与他结盟，所索取的代价是什么。弗勒里的活动一经制止，达吕便进行了一项同样秘密的计划，同样是也没有结果。达吕说服克拉伦登向俾斯麦提出裁减大量常备军的问题，要他做得好像是出自他的本意，而不是由于达吕要求。这些谈判确实做到了严加保密，几乎逃过阿克顿的注意，直至43年之后，与此谈判有关的一位大使的生平——牛顿勋爵的《莱昂斯勋爵》——发表，此前没有在报刊上披露过。这些谈判毫无结果。俾斯麦无疑已察觉到，克拉伦登的建议源自巴黎。他提出反对该建议的一些理由，有的荒谬可笑，有的闪烁其词，非常像他的后继者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为拒绝裁减德国海军而提出的那些理由。他矢口不谈他之所以拒绝谈判的真正理由：他不信任法国人，因此不能冒风险。他已预见到，如果法国发动进攻并遭到失败，可能就是他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的时机。克拉伦登在谈判失败后不久，在欧洲最需要他的时刻，因操劳过度于6月27日与世长辞。

拿破仑三世一如既往，没有认真地研究大臣们提出的计划。3月间，当裁军谈判仍在柏林进行时，他在巴黎却和奥地利的一位大公举行军事会谈，目的是要使他的三国联盟计划进一步落实。达吕由于在内政问题上与其同僚意见分歧于4月辞职，5月15日由格拉蒙公爵（1819—1880年）继任。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以憎恶俾斯麦为人注目。他的任命显然表明，拿破仑三世就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君主一样，要独揽外交事务。6月，这位皇帝派遣他的另一名军事亲信勒布伦前往维也纳，对此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的大臣们。勒布伦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给予军事援助这一令人满意的保证，不过只是口头保证而已。格拉蒙劝告拿破仑三世事先寻找盟友是无益的。他说，如果发生对普战争，其他强国会争先恐后地站到获胜的法国的一边。万一法国没有取胜，盟友又有何助益？由于拿破仑三世的身旁有这样一位谋士，他便走近他的统治的最后危机。

虽然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就已经扩大了法国东南部边疆，而且自1866年7月以来，又徒劳地企图扩大东北部边疆，但他似乎从未对西班牙抱有任何觊觎之意；一部分原因是比利牛斯山脉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疆界；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妻子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西班牙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对于他的叔父入侵西班牙导致毁灭一事记忆犹新。但是，造成他的帝国垮台的危机，正是在这个被忽视的地方发展起来的。

西班牙伊萨贝拉二世的统治于1868年9月在动荡中告终。她那腐败的专制政府由于其本身的无能，又受到军人政客塞拉诺和普里姆（1814—1870年）的攻击而垮台（普里姆曾担任西班牙在墨西哥驻军的指挥官。他知道墨西哥对于法国没有好感）。有些人试图找出俾斯麦这些年来在制造对法国不利的种种交易活动中所策划的阴谋，他们以为他们能够从俾斯麦在西班牙问题上的谋划中找到蛛丝马迹。如果相信俾斯麦老谋深算，对于未来的一段岁月具有先见之明，那么，上述猜测可能就是一例；但因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证据，因此这种猜测不大有可能。伊萨贝拉逃往巴黎。接替她的人们立即着手寻找一位君主登上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立宪政体的宝座。艾克曾生动地描述普里姆翻阅《哥达年鉴》，想从中找出一位具有必备的无可指摘的教养和信仰天主教的君主。^[4]但是，能中选的人物却寥寥无几。当时，新闻界和“外交界”普遍认为，可能参选的人只有伊萨贝拉的儿子阿方索，葡萄牙的费迪南德、蒙庞西埃、奥斯塔和热那亚的三位公爵，以及霍亨索伦家族中的信奉天主教的一支中的某位王公，该家族信奉新教的首领是普鲁士国王。

从西班牙国内人士的观点来看，除阿方索不受欢迎外，这些候选人中间也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但是，其他国家，却都另有考虑。预料英国根据传统的理由是反对蒙庞西埃公爵的，因为他是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奥地利不会欢迎挑选一位意大利人，法国则不愿挑选一个德意志人。而在波拿巴家族的成员统治下的法国，同样也反对蒙庞西埃。对于普鲁士来说，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如果能够继位，在战略上显然是有利的，因为一旦和法国打仗（柏林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他就会使法国人不得不有后顾之忧。许多历史学家曾约略地谈及这一点，因为他们试图把提出这个候选人看作只是俾斯麦蓄意推进战争的一种手段。

俾斯麦对提出一名霍亨索伦家族人为候选人甚为关怀，这一点现在已是无疑的了，虽然他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究竟何在，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早在1866年11月他就加以注意^[5]；因此，他密切注视着西班牙的局势，1869年5月曾派遣两名密使伯恩哈迪和弗尔森（1833—1893年）到西班牙；他们的最终任务——为此可以动用5万英镑现金——是要让西班牙的军队和教会对于要有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成为统治者的主张有所了解。^[6]最初，俾斯麦的行动是出于要使法国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这一策略，即要么接受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做西班牙国王，要么则展开困难的外交活动以阻止这位候选人的入选；除此以外，无须推测其他的动机，普里姆选中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公爵（1835—1905年）。利奥波德由于有缪拉祖母的血缘，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要比与威廉一世的关系更亲近。俾斯麦就是利用这一事实为借口，对法国反对利奥波德为候选人一事表示惊讶。这位首相知道，霍亨索伦家族一定是完全忠于普鲁士的。利奥波德的父亲卡尔·安东1858年曾任普鲁士的首相，是他的远房兄弟普鲁士国王本人的朋友。

利奥波德的另一个重要的家族关系是，他娶了葡萄牙费迪南德的女儿为妻。因此，西班牙主张成立一个伊比利亚联合王国的人们则指望，如果利奥波德成为西班牙的国王，有朝一日他的子女就会通过继承而拥有葡萄牙。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更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拥戴费迪南德本人或他的儿子葡萄牙的当朝国王路易斯为西班牙的国王；利奥波德公爵夫人是绝对不愿反对他们的。直到费迪南德和路易斯两人，以及上述意大利人中的一个对普里姆的建议表示拒绝为上，普里姆于1869年9月间首先与利奥波德正式接触。^[7]这次接触可能是得到了柏林方面的鼓励。无论如何，这次接触失败了。利奥波德和他的父亲都无意于西班牙的王位，而且他们也害怕法国的反对。普里姆因而便和热那亚公爵开始会谈，当时公爵在哈罗还是一个孩子。但是，1870年年初，公爵的叔父意大利国王却不准他充当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因此，普里姆实际上已无可选择，只好去找势单力薄的小诸侯，这是和西班牙的骄傲不相容的；或者，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共和国，这又是和西班牙人的感情格格不入的；或者，不怕触犯英法两国而立即挑选蒙庞西埃公爵；或者，再去找霍亨索伦家族。

1870年2月末，普里姆的信使萨拉萨尔再次前往德意志，向俾斯麦和普鲁士国王以及利奥波德本人提出请求。普里姆要利奥波德严守秘密，虽然他过去所进行的谈判都多少是公开的。这一做法说明他对于引起法国的反对而使计划破产有所顾虑；也可能是由于柏林的促使，这时柏林方面，俾斯麦已接受由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充当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而且极力要促成此事。他在3月9日的一份强有力的呈文中，向不大赞同的国王大力陈说掌握西班牙在战略上具有的重大意义，并且巧妙地却有失公正地补充说，如果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不充当候选人，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成员则将捷足先登，并且可能为对俾斯麦正在缔造的新德意志持敌意的分子提供一个虽属遥远、但却是可靠的恢复元气的据点。^[8]

在普鲁士的首都，事后有人向为数不多的当时知情人询问此事时，他们却伪称，萨拉萨尔的访问纯属家族事务。可是，3月15日威廉在他的宫中举行了一次宴会，出席的除了卡尔·安东、利奥波德和国王自己的王储外，还有他的首相、陆军大臣、参谋长以及三名次要的顾问。俾斯麦这时和他的全体同僚一道，极力要求利奥波德公爵肩负起责任，实际上就是必须要竞选西班牙王位。但是，这位普鲁士国王却不愿强迫这位年轻人奉命，而是让他自行作出决定。利奥波德经过几天的考虑以后，表示拒绝。而他的父亲这时对于当“王父”一事却颇为热心，便立即把利奥波德尚存的一位弟弟弗里德里希找来（安东在柯尼格雷茨战役时受伤死亡），但弗里德里希拖延了一段时间后，也对这一可疑的荣耀表示拒绝，于是整个计划就被放弃了。

这个计划却由弗尔森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这位36岁的骑兵少校不甘心他为之花费了许多时间的计划付诸东流，于是，他通过巧妙的安排，劝说普鲁士王储、卡尔·安东和俾斯麦合作——背着国王——请求利奥波德改变主意。普里姆自然支持这一渺茫的希望。萨拉萨尔又一次回到德意志。利奥波德最后终于在6月19日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请求他正式同意他接受西班牙的王位。威廉非常生气，被迫于21日表示同意。萨拉萨尔还要再等两天才能够带着这封非常重要的认可书动身去马德里。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萨拉萨尔通过普鲁士的电路向国内发了一份密电，声称他已大功告成，并将于6月26日回国。事后经过秘密调查，是马德里的译电员将电文译错，于是普鲁士驻马德里的官员

转达的回国日期成了7月9日。日期错译产生的后果影响很大。马德里的人们情绪十分激动，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而普里姆由于不愿议会对于一个他当时尚不能披露的问题再开上两个星期的会议而激怒他们，便让议会休会到10月。萨拉萨尔在行程中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马德里时，并没有把他带回来的消息向他的朋友们隐瞒。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在言行方面也没有做到较为谨慎。因此，7月2日，巴黎的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个谣传，说利奥波德已经同意继承西班牙的王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当天晚间，普里姆便不得不为这个问题向大发雷霆的法国大使竭力进行解释。7月3日星期天，即萨多瓦战役四周年之际，这个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巴黎。

直到上个星期四，奥利维埃在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还说，他的政府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欧洲持续的和平这时对于欧洲似乎再稳定不过的了。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7月15日对新任的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在外交事务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长的平静。英国的读者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普鲁士同样也十分平静；俾斯麦在瓦尔青，住在他那遥远的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里；王后在科布伦茨，国王则在附近的埃姆斯矿泉疗养；贝内德蒂7月1日离开柏林去维尔德巴德疗养，留下勒苏尔代理大使职务。这种平静瞬息即逝，普法两国未出两个星期就开战了。下面将对这两个星期中的事态予以概述；好奇的读者如欲探究其细节可阅读洛德的著作、法国的文献以及诸多回忆录，不过这些文献都多少会使人有所迷惑，因为冲突的参与者们在其中都极力洗刷自己而诋毁对方（拿破仑三世及普里姆的回忆录都未保存下来）。

利奥波德接受王位的消息传到法国后，群情激愤。巴黎各报报道此事时几乎一致痛斥，认为这项计划意在削弱法国的安全；并且对此计划至今仍严加保密提出了严正抗议，措辞极其强硬。宫廷和政府人士虽然众口一词，但他们持敌对态度的理由却更为复杂。这次意外事件之后，拿破仑三世说，西班牙王位的不稳定对他至关重要，因为这种不稳定似乎表明数年时间之内普鲁士会进行干涉以支持利奥波德对抗革命（的确，下一位西班牙国王只统治了两年就在混乱中垮台）。这时，拿破仑三世同意了亲信们的意见，主张必须立即予以反击。7月7日宣布，西班牙议会将于20日复会正式选举利奥波德，这时，反击就变得更为紧迫。但是，法国人展开反击运动过于急躁，从而铸成两次大错误。其一，运动是完全针对普鲁士的。如果只是要求普鲁士政府

从中斡旋，劝告利奥波德不要挺身而出，并要求它和法国一道向马德里提出抗议反对普里姆的人选，普鲁士政府若对此加以拒绝确实是困难的。但事实上，勒苏尔7月4日奉命向蒂尔提出一个粗暴的问题，蒂尔给予的答复更为粗暴。奥利维埃回顾说：“在柏林，他们砰的一声把我们关在门外，并且嘲笑我们。”^[9]

第二个错误更严重。7月6日下午，格拉蒙对议会的质询作了简短的回答，要求议会不要在如此微妙的时刻强求进行辩论，结尾是一段大肆渲染的言辞：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尊重一个邻国人民的权利居然会迫使我们容忍外国势力把它的一个王公扶上查理五世的王位，从而破坏欧洲目前的均势，对我们造成不利（来自各方面的热烈掌声）并且危及法国的利益和荣誉。（更为热烈的掌声，持续的欢呼。）我们衷心希望，这一事件将不会发生。为了制止它，我们同样信赖德意志人的明智和西班牙人的友谊。（友好地打断了发言。）如果此事一旦竟然发生，先生们，在你们强有力的支持下，在全国强有力的支持下（又一次友好地打断了发言），我们知道如何尽我们的职责，毫不动摇，绝不软弱。（长时间的鼓掌——一再欢呼。左翼进行干扰并提出抗议。）^[10]

国民议会听取了这一发言无比兴奋，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帮助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奥利维埃，在他任职期间一直维护它，说它是一个绝妙的宣言。这个发言虽然大快人心，实际上却导致了灾难。这不仅在于它的语气令人反感，故意地指斥普鲁士这个像西班牙一样的毗邻国家为“外国势力”而不说“邻国”，还不仅在于格拉蒙在指责普鲁士一手策划了这个阴谋时，并没有拿到证据就采取行动，而且是和蒂尔的正式否认针锋相对。他发言结尾的话显然是一种威胁：他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诉诸战争。这番话是至为严重的。若不是因为格拉蒙和拿破仑三世的外交进一步表现无能，几天以后把法国投入战争，他们对这番言论就必得作出解释；正如俾斯麦在随后的那个星期里不止一次所说，他准备要求对这种如此侮辱人，使法国只有诉诸战争的言论作出解释。

俾斯麦在离首都有半日旅程的地方，迄今对事态并未起重大作用，然而他和萨拉萨尔一直保持接触，萨拉萨尔早在6月29日的一个电报中就提醒他说，事态逼近严重关头。格拉蒙利用俾斯麦不在首都的有利时机，他知道威廉一世虽处事谨慎，且有时固执，却缺乏他的首相的那种决心。7月4日下午危机开始时，格拉蒙和奥利维埃会见了普

鲁士驻巴黎大使韦特尔，他是一位正直的外交官，不了解西班牙王位候选人问题的内幕，他们劝他把受王位候选人给法国政府造成极为痛苦感受的消息带往埃姆斯，韦特尔早已准备在次日晚前往该地。他们通过韦特尔，求助于秉性善良和热爱和平的威廉，表明他们希望威廉让利奥波德就此止步。韦特尔于7月6日晨抵达埃姆斯，他转达了他们对他所说的话，但说得比较缓和，但至少已向国王说明白了巴黎官方的神经十分紧张，那里普遍在谈论战争。

威廉显然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当天下午——真是出人意料，就是那天下午格拉蒙发表了那个无可挽回的演说——他给卡尔·安东写了一封信。国王提醒他的同族兄弟注意法国人激动的程度，信中附上一份韦特尔向他报告的副本，并且提出了各种息事宁人的建议。与此同时，利奥波德却不知去向。为了说明他的去向，人们浪费了不少笔墨。他的家人说明的真实情况，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他已去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徒步旅行，没有留下地址；而且碰巧他在7月13日前一直没有看报纸，那么7月13日他自然就立即动身回国了。就他在7月1日动身外出时所知道的情况，他的命运要到10月间才能决定，而且，那些日子他十分劳累，需要一次休假。

在次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廉一直心绪不宁，思想混乱。他要贯彻自己的政策，劝说他的王室兄弟们或通过对西班牙失信的手段，或表现出对法国的威胁作出不当的让步，而在丝毫无损霍亨索伦家族荣誉的情况下，撤销利奥波德作为候选人的名字。格拉蒙的演说使他很生气。但是，韦特尔所阐述的巴黎方面的情绪，使他深信存在着真正的战争危险，而他自己是不愿意挑起战争的。俾斯麦安排在威廉身边的资历较浅的外交官阿贝肯，在俾斯麦掌控下，一直敦促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和不让步的政策。但是，威廉每日与妻子互通信息，他的妻子还常常去看望他，这时向他力陈保持和平的重大意义。他的朝臣们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是好战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贝内德蒂的翩翩风度和娓娓劝说的影响。贝内德蒂是由他自己提议于7月8日来到埃姆斯的，他的任务是即使他不能使威廉命令利奥波德退出王位候选，也要诱导威廉劝说这位王子这样做。

其他方面的势力也在为和平的利益发挥作用。威廉本人向俾斯麦建议，可以吁请某个友好国家根据《巴黎条约》规定的方针进行斡旋。俾斯麦反对这一建议，其反应速度之快就足以证明他已决心要让

法国人落入他们正在为自己掘的陷阱。格拉蒙已经向其他国家提出呼吁。沙皇不同意利奥波德充当候选人，但他不愿声明反对；6月初，他在埃姆斯会见了他的叔舅普鲁士王威廉，会见时对于王位候选人问题似乎只字未提，而且，虽然他认为霍亨索伦家族的自命不凡已经大大超过了对法国保持礼貌的程度，但这时要增加法国的力量来反对普鲁士人，则对俄国不利，因此他没有采取行动。奥地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以支持任何一方。弗兰茨·约瑟夫的驻巴黎大使能够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巴黎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已决心要把一场战争强加于普鲁士。早在7月6日他就发现皇后“强烈地支持战争”，而且“对于政治胜利或战争的前景看法显得幼稚10年”。^[11]博伊斯特劝格拉蒙要有节制，并且从布鲁塞尔派出一名特使，以便向他和拿破仑三世对此予以强调。但是，两人都拒绝会见特使，一直到为时已晚。在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对爱尔兰的土地政策意见不一致——现在人们才知道，这个问题当时几乎使这个内阁垮台——而且正恼于国内问题，对于海峡彼岸所发生的事情，只能勉强地予以注意。

因为在法国，主战派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在新闻界几乎一致的支持下，向法皇力陈立即开战的种种好处。德意志的人口与法国的人口相比较，逐年都有增加。德意志各邦过去每年日益紧密地结合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法国军队在装备方面暂时居于优势，因为后膛快枪是一种比撞针枪精良的步枪，还有一种叫作连射枪的新式的可怕武器预料会产生摧毁性的效果，这就是后来1918年在各个战场占优势的机关枪的雏形（参见第12章，原文第307页）。这一明显优势所引出的问题是严重的。法国和德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男女在1870年都会一致认为，战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罪恶。然而，他们总是可以振振有词地提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论据来说明：还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普鲁士的实力使法兰西文化黯然失色，而俾斯麦的普鲁士与西班牙暗中达成的协议已经表明普鲁士为造成这种局面正在行动；因此，法国的任何一个政治家要是不能抓住由于这种秘密协议而送到手中的时机，利用法国暂时的、可能稍纵即逝的军事优势来对付普鲁士，他就是干了背叛法国的蠢事。再者，不能认为法国主战派的所有发言人在当时都是有理性的。“爱国者”的传单强烈要求立即动员，准备宣战。军人们虽然没有强烈要求对事态迅速作出结论，但是他们也采取了许多警戒措施。这些措施并未逃过驻巴黎的北德意志

大使馆的注意，而且早在7月9日，贝内德蒂的使命刚刚开始之时，就已经将这些措施向国内报告了。

在普鲁士方面，无须在军事上采取预防措施。蒂尔在10日傍晚打电报给阿贝肯说，一名军官“向我保证总参谋部已做好一切准备”。毛奇和罗恩日来在他们的乡间别墅逍遥自在，他们获悉，应该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已准备就绪，因而甚为放心。俾斯麦自然要忙碌得多了。他不仅要处理瓦尔青外交部的重大事务，并且经常与国王电报往还；他还要领导普鲁士各家报纸展开强大的宣传运动，对法国及法国的一切极尽诋毁之能事，其恶毒的程度与巴黎的各家报刊同时对普鲁士及普鲁士的一切进行的猛烈抨击不相上下。他对他的国王与贝内德蒂在每日的会谈中以及在与卡尔·安东的书信往还中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并不完全了解，而且也不及时。但是，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决定的时刻即将到来，因为这时无论法国或霍亨索伦王室方面都已失去耐心。他于7月12日离开瓦尔青前往埃姆斯，途中必须经过柏林。

当晚，他抵达首都。离车站后在途中，他乘的马车与戈尔恰科夫的马车不期而遇。两位首相握手略事寒暄。戈尔恰科夫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这时在度假。俾斯麦遂继续前往他的办公处所，在那里他发现的事，使他大为震惊：阿贝肯发来电报向他报告说，利奥波德已经退出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其他的有关函电说明，退出候选一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系威廉对卡尔·安东施加压力所致；威廉正打算亲自向贝内德蒂宣布此事；而且，巴黎的情绪可能是比过去几天更加反普鲁士了。俾斯麦决定不再前往埃姆斯，在柏林停留下来考虑法国的外交活动何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年迈的基佐把这个胜利说成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

乘俾斯麦不在时对威廉施加影响这一策略确实高明。威廉没有——或许是不敢——把他的主张告诉俾斯麦，就派总参谋部的施特兰茨上校携带函件去会见卡尔·安东，函件的内容虽从未公开过，但卡尔·安东的行动却清楚地表明了其主旨。不仅如此，拿破仑三世和西班牙驻巴黎的大使私下里作出安排，同样也向卡尔·安东派去另一名特使，以家族利益为理由陈述意见，此人就是卡尔·安东的儿子、罗马尼亚公爵卡尔在巴黎的代理人斯特拉特。斯特拉特不仅负有使命请求这位年老的王公为了维护和平，要让他儿子利奥波德撤销其作为候选人的名字；而且，他还含蓄地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儿

子卡尔在布加勒斯特的王位任期在法国的策划下，将被缩短。斯特拉特和施特兰茨都在7月11日晚到达，并与卡尔·安东会谈到深夜。是把希望寄托在利奥波德身上呢，还是寄托在卡尔身上？是维护家族尊长的责任感呢，还是维护荣誉感？这位老人权衡得失，举棋不定，不愿收回已作出的诺言。次晨，卡尔和责任感占了上风。他给普里姆发了一个电报，也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发去同样的电报（均未用密码），以利奥波德的名义，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任何要求。向威廉也报告了此事，威廉获悉这一消息后，感到很高兴，一个棘手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巴黎的反应有所不同。这种弃权自然受到欢迎。但法国至今群情仍然激愤，卡尔·安东电报的本身看来是不够的。父亲的话是否能够被认为对于儿子具有约束力？每个人都记得，或者马上就会想起来，只是在6年前，德意志的另一位王公奥格斯滕堡对丹麦王位权力的要求，他的父亲以他的名义宣布弃权，而他则拒绝遵从；利奥波德自己的兄弟途经敌国领土前往罗马尼亚接受王位时的惊险旅程，更是使人记忆犹新，那次旅程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出轻歌剧。有一种外交论点也值得重视，即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产生的方式既突然又秘密，因此法国受到了来自普鲁士以及西班牙的侮辱；虽然法国的外交官们对于任何人向他们问到法国是否永远不会同意让一名德意志人充当西班牙国王时，他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产生过任何怀疑。

当格拉蒙和奥利维埃于7月12日下午一道会见已经返回巴黎的韦特尔时，他们思想中主要考虑的无疑就是这个外交论点；虽然他们不可能忘记，他们自己的政府任期朝不保夕，因为两院的议员虎视眈眈，如果他们两人不对普鲁士采取毅然决然的坚定态度，就要猛烈地攻击他们。格拉蒙只是在两个小时前才得知弃权的消息——邮政当局在把卡尔·安东的电报送交西班牙大使的同时，也把一份副本送交了格拉蒙。西班牙大使在韦特尔会谈开始时，即把电报的内容通知了格拉蒙；格拉蒙不可能经过深思熟虑或在征询皇帝的意见之后再行动。他向韦特尔提出，这个事件只有由威廉一世写信向拿破仑三世道歉才能罢休，普鲁士国王应在信中说明，他为他的王室兄弟所制造的麻烦表示歉意，同时由衷地对法国表示尊敬而友好的感情。韦特尔答应把这一要求转呈他的国王，从而毁掉了他自己的前程。但是，事态的发展

不只是一个老年人在普鲁士外交界的去留问题。格拉蒙坚持要求普鲁士除放弃王位外还要有所表示，以此来引发战争。

虽然格拉蒙最初是凭一时冲动行事，可是他凭借个人和社会的力量得到了奥利维埃——这位地方律师是不愿和一位公爵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气氛中进行辩论的——当天晚间格拉蒙前往圣克卢宫把他的所作所为向拿破仑三世作了报告。他把造成巴黎中心群情激愤的那种情绪带到了平静的郊外。看来，他并不费力地就说服法皇相信了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实际上，他们两人在欧仁妮的影响下决定向普鲁士国王进一步提出足以伤害感情的要求。7点钟，格拉蒙打电报给贝内德蒂要他从威廉那里取得保证：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首脑，他决不再允许利奥波德接受西班牙的王位。格拉蒙在午夜时又重新发出这个命令，只是电文词句有所不同。但是，这两份电报都没有向贝内德蒂提及他在下午和韦特尔的谈话。然而，他的确使这位大使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为了平息巴黎人的感情激荡，需要迅速得到答复。被奥利维埃称之为“圣克卢宫疯狂的即兴之作”的这两份电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毁掉了第二帝国。这些电报虽然愚蠢，但只用一天时间就产生了效果，这就是1870年7月13日，星期三。

那天早晨8点钟，威廉去埃姆斯的公园进行通常的两小时的散步活动。散步中有几次停下来通过侍从与贝内德蒂交换意见。散步结束时，这位大使终于亲自出现在国王散步的路上。两人就放弃王位一事（两人都看到当地报纸的报道）交谈几分钟后，贝内德蒂就极力要求国王作出许诺，决不让利奥波德的名字再被提出。他处理这个问题不像往常那样得心应手。威廉对这种要求感到惊讶，更被这位科西嘉人说话的紧逼语气所触怒，于是断然地说，他决不能作这样的许诺，随后举了举帽子，继续向前走去。

那天稍晚的时候，威廉通过侍从通知贝内德蒂，这时他说已从书面获悉放弃王位一事（斯特兰茨已于中午回到埃姆斯），并且已予批准。但是，傍晚时，他对这位大使提出的要进一步会谈这一几乎是发狂的要求，予以断然拒绝。他拒绝的原因肯定是由于下午较晚的时候收到了韦特尔的电报，报告格拉蒙要求写道歉信，国王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要求是无礼的。而且，他认为贝内德蒂也奉命向他提出这一要求，虽然事实未必如此。

但是，应该指出，午饭后不久，那时贝内德蒂还没有受到断然拒绝，阿贝肯就起草了一封给俾斯麦的电报，报告（主要用国王的原话）那天早晨在公园里发生的事情。这封著名的电报^[12]把贝内德蒂的建议以及威廉对他的态度说得比事实更严峻。这封电报的语气何以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埃姆斯夏日午后的气候闷热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电报的最后一段非同寻常，授权给俾斯麦向报界以及普鲁士各驻外使馆（如果他愿意这样做）揭露这一事件。

俾斯麦在柏林度过了难眠的一夜和焦急的一天，没有获得巴黎对放弃王位一事反应如何的可靠消息。下午4时左右，他会见了动作迟缓而神态严肃的英国大使奥古斯塔斯·洛夫特斯勋爵。俾斯麦对他毫不隐瞒他对法国人的仇恨。他甚至把拿破仑三世的政府比作“一帮土匪”，理所当然地希望洛夫特斯听后当天就重述这一伤人感情的言辞，从而刺痛法国人使之无法容忍。因为，毋庸置疑，俾斯麦得知利奥波德退出西班牙的王位候选后，就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挑起一场战争，最好是使法国充当侵略者。他希望，法国人的傲慢和愚蠢会使法国认为仅仅退出王位候选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某种新的要求，从而使战争的爆发无可避免。如果此举不成，他准备让普鲁士转而采取攻势，要求对格拉蒙一周前所作的那次关系重大的演说作出解释，这样就会产生此刻他热切希望的结果。他几乎将这些想法对洛夫特斯直说；至于其他，从随后几小时他发出的电报；从事后几年他总是眉飞色舞地叙述那天傍晚他如何诱使法国人似乎就要挑起他当时所希望的战争，人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俾斯麦希望最终导致战争，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喜欢重述这次战争的爆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伟大胜利。他是否一直希望战争尚难确定。他的辩护者为开脱对他的指责，必然竭力进行反驳，说在他知道危机临近爆发的程度以前，他就已退居瓦尔青，而且后来他又充当了欧洲和平的仲裁人。虽然明明知道法国的敏感之处，他还硬要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候选西班牙王位；还有他在危机最后阶段所持的态度，这些都使人强烈地感到他念念不忘战争，不过他只是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抓住了那稍纵即逝的时机，从而达到促使战争爆发的目的而已。

罗恩和毛奇那天晚上与俾斯麦共进晚餐。他常说他们来时情绪低沉。但事实上他们三人情绪高昂，要发电报给国王建议向法国发最后

通牒，要求法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与此同时，阿贝肯说明当天早晨在埃姆斯所发生的事件的电报已经译出。最初，俾斯麦和他的客人看到这封电报大为扫兴。但他们从准许将事件公之于众这一点看出事情尚有可为。俾斯麦迅速写好他所修改的电稿，文字大大删短，口气更加粗暴无礼。不到两个小时，电讯稿就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免费散发。^[13] 电讯也发给了驻在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首都的北德意志代表，但巴黎除外。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巴黎。这个节略的电文使人觉得既然贝内德蒂不礼貌地强迫威廉接受无理的要求，因此受到同样不礼貌的断然拒绝。

人们一般总是把俾斯麦删改电文看作导致普法战争的直接原因，但这只是部分正确。的确，这个电文使各自国家的居民都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心情，从而使战争深得人心；法国人和普鲁士人都各自认为他们受到了无法忍受的侮辱，必须诉诸武力才能解恨。但是，法国和普鲁士都不是民主国家，因此有必要简要地追溯一下两国的统治者们急迫地采取了哪些步骤，把开始时的一桩外交事件从而推向普遍认为外交手段已不可挽回的绝境。

法国内阁7月14日下午在土伊勒里宫举行会议，拿破仑三世出席作出了两项决定：动员陆军后备部队和呼吁举行大国会议。直到内阁会议之后，那位不幸的韦特耳才得以会见格拉蒙并解释说，他已经接到指示，要他立即休假。他作此解释无异于说明，普鲁士政府已经将他撤职。这个事件使格拉蒙更加感到普鲁士已无所顾忌，准备一意孤行了。当晚，大街上人群麋集，大声疾呼要求战争，其激烈程度与头一天晚上柏林的人群呐喊战争一样。大臣们这时意识到他们作出的两项决定自相矛盾。晚饭后，他们又在圣克卢宫开会。拿破仑三世一直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因此意气消沉。但是，这时已有不少的人们准备替他下决心，尤其是他的妻子（她出席了会议）感情激动地力主开战。坏消息不断传来，最糟的一条是，普鲁士的驻外各使馆正在散发俾斯麦改写的埃姆斯电报。对法国内阁来说已经很清楚，普鲁士一心要把一场战争强加于法国。因此，他们决定，为了国家的安全，要求立即实行动员，最好先发制人，并且凭借迅速行动夺取可能取得的军事优势。陆军大臣勒伯夫向大臣们保证军队已作好充分准备。当拿破仑三世提及举行大国会议的主张时，格拉蒙几乎是大声喝止住这位皇

帝的发言（顺便提一下维斯蒂姆第二天晚间对他说的话“使公爵陷入难以形容的狂怒之中”^[14]）。第二天上午内阁最后召开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拿破仑三世几天后对一位英国朋友说：“法国已经脱离我的掌握。我若不领导，我就不能统治……我别无选择，只好走在我既不能阻止也不能控制的舆论的前头。”^[15]这简直是勒德律-罗兰在1848—1849年骚乱时一段著名发言的奇异翻版。^[16]

贝内德蒂连夜从埃姆斯赶回，于15日上午法国内阁会议刚刚结束后进见了格拉蒙和奥利维埃。他报告了在埃姆斯散步时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可能还提到当他离开埃姆斯车站时，普鲁士国王一面握着他的手，一面喃喃地说“柏林再见”。^[17]他的报告并没有使这两位大臣有所动摇，他们认定普鲁士希望战争（贝内德蒂本人的记事在他离开埃姆斯后就终止了）。

7月15日星期五的下午，奥利维埃和格拉蒙向议会提出拨给动员费的要求，他们所使用的言辞无异要宣战。奥利维埃的提议在下议院以245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只有梯也尔和法弗尔发表了有力的演说，表示反对。甘必大发言时支持他们，但投票时却支持战争。几小时以后，威廉作出了自己国家实行动员的决定。在此之前，他白天乘车去柏林，在火车上与俾斯麦会谈了一个小时，在波茨坦的拥挤的候车室里对来自巴黎的不准确的消息又考虑了10分钟。然后他经过密集欢呼的人群，前往他的宫殿。法国的正式宣战书是在4天以后，即1870年7月19日达到柏林的。

格兰维尔呼吁法国和普鲁士请求英国进行斡旋。这是一个中立国为避免战争而进行的唯一认真尝试，不过为时已晚（7月14日晚间），以致毫无成功的可能。事态发展得太快，双方对此呼吁都无法进行认真的考虑。再者，英国内阁一向消息不灵通。正如阿克顿对此所作的记载（虽然过于苛刻，但却是事实）：“他们的告诫失之于对过去5个月中发生的重要情况一无所知，而且把握不住问题的实质，因此，既无权威，又不能令人信服。”^[18]

1870年战争的直接起因可能是由于交战两国的民众和政治家们的脾气急躁和感情用事，两国的首都都失去了理智，疯狂地叫嚣战争；格拉蒙的轻举妄动遇到俾斯麦的老谋深算；拿破仑三世长期的优柔寡断又碰上了威廉一世仓促之间乱了方寸。

关于战争的过程，本书另一章（第12章，原文第325—327页）中已有概述。本章结束前只论及一些伴随着军事事件而发生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实际上也往往为军事事件所左右。例如，美因河以南各邦所以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原来是因为它们惧怕法国；各邦的政府和人民想起法兰西第一帝国便觉得胆寒，这种共同的感受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对于法兰西第二帝国那种没有效率的动员则不必担心法国的军队会大举越过莱茵河而在其东岸进行决战。看来是经过慎重考虑，它们决定履行1866年8月秘密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普鲁士遭到法国攻击时把它们的军队交由普鲁士指挥。而且，任何一个爱国的德意志人都不怀疑普鲁士已受到进攻。

拿破仑三世未能让他的盟友们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自食其果。俄国明确地表示，奥地利如进行干涉将招致攻击——俄国早在1868年3月就已向普鲁士作了这样的许诺——对俄国的畏惧足以使奥匈帝国保守中立。弗兰茨·约瑟夫和拿破仑三世彼此之间虽继续作出重要的个人保证，但维也纳却没有送给法国人一粒子弹。法国再次要求意大利给予援助；意大利再次提出要罗马作首都，以为代价，拿破仑三世则再一次给予拒绝。到战争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法国军队即使在一个波拿巴指挥官统率下，也并非不可战胜。法国也就像开战时那样，仍然是孤军作战。

10年来英国一直存在疑虑。贝内德蒂的计划（见前面原文第580页）被公开后，它更加与法国疏远。法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同意——但拖延时日又制造了许多困难——另行签订一个条约以加强比利时的中立。普鲁士立即表示赞同这一条约，因为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明白，这样就不需要派遣军队越过比利时领土去打倒拿破仑三世了。

拿破仑三世于9月初投降，他的帝国也随之垮台。教皇拥有的世俗权力只比第二帝国多维持了16天；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的军队便开进了罗马。

继拿破仑三世之后的法国政府，本来准备立即缔结和约，如果俾斯麦对战争赔偿的条件不那么苛刻的话。法国的国防政府认为它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俾斯麦根据军方的意见，坚持要法国割让在其管辖下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东部边疆领土。法国的新政府认为，在战场上还没有一试胜负即割让疆土有失公道。很久以后，俾斯麦有时谈到吞并

阿尔萨斯和北洛林（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说，这次吞并“使世界和平不稳定达50年之久”）时，好像他一直不赞成兼并。他本来有能力制止兼并，但他却不愿这样做。他当时只是用一些言论为掩护，说德意志以孚日山脉为疆界在战略上是必不可少的；又说他的年事已高而又固执的君主坚持要获得某些实质性的胜利品。他还施展自己的全部杰出的外交才能来实现这一兼并，并且取得成功（1871年2月26日的《凡尔赛预备和约》和5月10日的《法兰克福和约》）。格莱斯顿义愤填膺，竭力安排欧洲起来反对这一要求，但却不起作用。因此，他只得止步于减少对战败法国索取的巨额赔款。

与此同时，俾斯麦还在另外两个方面积极地发挥作用。俄国要求废除《巴黎条约》中有关禁止俄国在黑海驻有舰队的条款，此问题另在他处讨论（见第11卷中“论国际关系”一章）。本文最后还要论及德意志问题由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而得到解决的问题。

军事需要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推动力：7、8两月，南德意志各邦认为它们面临的来自法国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因此请求普鲁士给予保护。秋天，当普鲁士的军事天才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这些邦发现自己处于胜利的一边，因此，出于人们类似的愿望，继续请求普鲁士人留驻在那里。

俾斯麦多年来一直认为，需要掀起德意志民族感情的高潮，才能使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他看到并抓住了胜利所提供的时机。但是，他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统一，因此他十分谨慎地不让民族的感情失去控制。除了对法国东部疆土作了过分要求这一重大错误外，他限制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领土使之不超出普鲁士能够顺利消化的范围。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小德意志国家感到满足，从未希望把奥地利本身或把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数百万德意志人中的任何一部分纳入新的国家。此外，俾斯麦不仅在领土方面，而且也从宪法上限制新成立的德国。1870年秋天，他在凡尔赛（当时在这里设有普军司令部）和巴登、巴伐利亚、黑森和符腾堡的代表们分别地，而不是召集会议，就德意志帝国的组织形式进行谈判。已有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被采用，改动处绝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一一甚至那些看来是对巴伐利亚作出的广泛让步，要么是就一些实际上无足轻重的问题，要么是在以后的实施中一直流于形式。只有普鲁士有可能禁止对宪法作任何的修改。政府与议会相比，联邦的权限与各成员邦相比，

权力都是强大的。武装部队仍然直接受命于君主，实际上完全不受议会的控制。国家的行政首脑，即帝国首相——当然是俾斯麦自己——仍然“实行责任制”，可是新宪法与旧宪法一样，到此就意味深长地画上了句号，而不说明对谁负责。除了缔造了一个“德国”，对于人民大众没有给予任何权益。

俾斯麦大功告成；但是，最后的努力很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王本人和他的称号。威廉一世一直是一个爱国的普鲁士人，出身于王族，对于国王的称号已经十分习惯，因此不愿称皇帝，而且不喜欢俾斯麦坚持要他使用的“德国人的皇帝”而不是“德国皇帝”这一称号——因为这个称号听起来更受欢迎，而且它并不意味着领土的统治权，因此不会伤害从属各邦统治者的感情。像往常一样，威廉最后还是对俾斯麦让步了。不过，这还需要俾斯麦再作一番努力与密谋，以取得德意志其他各统治家族的元老——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国王给威廉一世的一封必不可少的请求信。若采用一种更通常使用的请求形式，俾斯麦以及所有有关的统治者可能认为并不合意。路德维希二世只有25岁，他认为霍亨索伦家族是暴发户，蔑视他们；因此，他不愿把自己置于霍亨索伦皇帝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对政治不大感兴趣。建筑和音乐是他公开承认的两项爱好（他是瓦格纳的保护人）。当时他已经表现出有疯狂迹象，致使15年后他在施塔恩贝格教区自杀。他已经开始建造一群浪漫主义颓废派风格的宏伟城堡，这就是他在他的王国中留下的不朽纪念。他在僻静的霍恩施旺高城堡听从他的宫廷内侍霍恩施泰因的劝告，照抄了俾斯麦亲自起草的颇为得体的致威廉的信，并签了名。霍恩施泰因说明他的理由有二：一个是政治性的，即新建立的君主政体君主将由选举产生，“今天是霍亨索伦家族，明天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9]；另一个理由是物质方面的，更有说服力。今后在路德维希的一生里，每年再额外得到1500英镑，此款由俾斯麦从路德维希过去的盟友汉诺威的乔治的资金中提供。这样，使城堡的建筑又有可能继续铺张浪费，并使路德维希的财政崩溃推迟了10年。霍恩施泰因从中取得十分之一。

德意志帝国就是通过这样不高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帝国于1871年1月18日，即普鲁士王国诞生170周年之际宣告成立，地点在凡尔赛宫的镜厅。48年后凡尔赛宫镜厅在德国历史上再次成为有名的地方。

（丁钟华 译）

[1] 出自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所讲的故事，一头又饥又渴的驴子在两堆稻草之间，不知先吃哪一堆好，比喻犹豫不定。——译者

[2] H. 昂肯：《法皇拿破仑三世对莱因地区的政策……》（斯图加特，1926年），第2卷，第41页。

[3] 阿克顿手稿，4928号，第108页。

[4] 埃里奇·艾克：《俾斯麦》（苏黎世，1941年），第2卷，第438页。

[5] 这一事实，就像这个问题的其他许多重大事实一样，都是R. H. 洛德《1870年战争的起源》（哈佛，1924年）一书首先披露的，这是对德国部分档案的一种分析。洛德根据档案文件所作的许多结论，阿克顿凭借其历史洞察力，早在30年前就已作出了预言；但洛德似乎并未利用阿克顿的文章；而且，他不可能看到德国的全部档案。对他保密的那些材料，是由G. 邦宁《俾斯麦与霍亨索伦家族对西班牙王位的候选问题》（伦敦，1957年）一书所披露的。这两本书以及法国政府的《1870—1871年战争的外交渊源》（巴黎，1931年）第28卷涉及1870年7月1日至15日这一时期，都是刊印的主要参考材料。

[6] 阿克顿手稿4928号，第162卷，邦宁书，附录A。

[7] 1869年3月末，西班牙的一名外交官访问柏林，贝内德蒂怀疑——可能是错误地——他当时是去讨论提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候选西班牙王位的问题。贝内德蒂一方面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他的怀疑，同时也向普鲁士外交部中俾斯麦的副手蒂尔（1812—1889年）提出了这个问题。蒂尔坚决否认这种候选的可能性。5月，俾斯麦对贝内德蒂说，西班牙王位问题尚无定论——估计他是言不由衷，因为他刚刚向西班牙派去了伯恩哈迪。

[8] 这一文件在20世纪20年代严加保密，洛德以及《总政策》一书的编者均无从看到。它于1931年第一次发表，现在可以看到德皇表示不同意的可贵的旁注批示，见G. 邦宁《俾斯麦与霍亨索伦家族对西班牙王位的候选问题》（伦敦，1957年），第68—73页。

[9] 《自由帝国》，第14卷，35。据回顾奥利维埃的这一自辩书在1909年以前一直未在巴黎披露。

[10] 1870年7月6日，立法院；《法兰西帝国公报》，7月7日，第1189页，第2栏。

[11] 梅特涅1870年7月8日致博伊斯特信（摘自《英国历史评论》，第38卷，第92—93页）。

[12] 至下午3点10分电文已译成密码；3点50分发出，柏林于6点零9分收到。全文见洛德《1870年战争的起源》，第220—221页；译文见（例如）C. 格兰特·罗伯逊《俾斯麦》（伦敦，1918年），第496—497页。

[13] 电文见洛德《1870年战争的起源》，第231—232页；译文见（例如）格兰特·罗伯逊《俾斯麦》（伦敦，1918年），第496—497页。俾斯麦从埃姆斯发出

的压缩后的电报手稿原件，见PRO: GFM21/47。

[\[14\]](#) 维斯蒂姆笔记，可能是1873年，引自昂肯《拿破仑三世对莱茵河地区的政策》，第3卷，第443页。

[\[15\]](#) 对F. C. 劳莱的谈话，《每日电讯报》1870年7月25日。

[\[16\]](#) “我是他们的领袖，可我得听他们的。”

[\[17\]](#) 阿克顿手稿，第4928号，180卷。

[\[18\]](#) 阿克顿手稿，第5519号。

[\[19\]](#) 阿克顿手稿，第5387号，第33卷。

第二十三章 美国的国家力量与地方力量

1830—1870年，西方世界的特色是，国家主义在三个重要地区，即意大利（参见第9章和第21章）、德意志（参见第9章和第19章）和美国取得了胜利。在意大利，国家主义只是在克服了普救论（教会和帝国都存在的普救论）的重重障碍之后才实现了其目的的。在德意志，俾斯麦的国家主义，由于它粉碎了德意志的主张各邦分立的势力并且牺牲了1848年的民主准则才实现其目标。在美国，力量的组合则不相同：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想融合起来了，而反对国家主义的力量则是美国内部的地方主义。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因为国家主义在19世纪的头30年间似乎在美国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取得了胜利，但后来却遇到了迟迟才出现的地方主义的分裂力量，这种力量日益增长，两种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

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就任美国总统时，意大利仍然分裂为一些小公国，主要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辖之下；而德意志这时还是一个由38个自治邦组成的松散邦联。相比之下，国家主义在美国的胜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已大功告成。在这个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感到如此自豪。美国1830年的人口达到1280万人，是1790年的3倍多。美国的面积也扩大了1倍以上，为175.4万平方英里。西部的边界从密西西比河推进到洛基山脉，而南部的国境原来在沿着佐治亚—罗里达一线，这时也延伸到墨西哥湾。13个州的联邦已扩大为24个州。

不仅如此，伴随着这些物质成就的是政治的发展，这似乎不断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掌权达28年之久的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理论上奉行其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的州权思想，但在实践中杰斐逊的追随者们却转而采取了极端国家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过去曾鼓吹过的那些措施。其中如：（通过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由国

家当局而不是由州当局取得了广袤的领土；1812年对英国进行了一场民族主义的战争；1816年特许成立一个全国金融机构（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年采取了保护关税制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措施；由联邦政府出资修建一条沟通东西部的国家公路（即坎伯兰公路，1818年完成）；1923年又大胆地宣布把整个半球置于美国监护之下的外交政策（即“门罗主义”）。在国会与政府采取这些国家主义的重大措施的同时，最高法院院长约翰·马歇尔又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规定各州的行动只要侵犯了宪法授予中央政府的行动范围均属无效，从而使美国的宪法具有强烈的国家特征。正是马歇尔于1821年宣称“在许多以及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合众国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

在经济方面，这个共和国也越来越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时期，毗邻的殖民地之间往往老死不相往来；而当时唯一的重要商业形式，即远洋贸易，却把它们与大西洋彼岸的市场紧密地联结起来。但是，公路的修建，运河的开凿，汽船的发明，凡此种种都推动了国内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各州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最后终于超过了对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国家主义的潜力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承认。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曾鼓吹建立“美国制度”，为把农产品运往市场而提供道路和其他运输工具（称为“国内改良”）以鼓励西部农业的发展，并通过建立保护关税制以促进东部的工业。按照克莱的设想，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东、西两大地区在经济上要相互补充，在政治上要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体系。尽管这种经济国家主义的措施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断地遭到反对，但事实上到1830年，全国经济体系已经在上文提到的建立银行、保护关税和公路等立法的支持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然而，对于现代的国家主义研究者来说，无论美国在物质方面的发展，或者国家的发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表现，都远不如作为美国民族的本质和基础的共同点那么重要；正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制度使他们融为一体的。根据所有这些标准来看，美国人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民族。他们的宗教和道德传统，主要是新教徒的传统；他们在旧大陆仍然主要渊源于英国；他们的语言尽管有地域上的变异，却远不及母国境内方言的差别之大。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仍然大

同小异，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根源都是属于旧大陆上以体力劳动谋生、耕种土地的阶级。他们来到新大陆这个环境后，仍然过着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仍然强烈地坚持着劳动是必要的、劳动是尊严的这种信念。从个人来说、他们崇尚自力更生的理想；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们崇尚平等主义的理想。他们发现，这些理想体现在美国的政治与法律的体制之中，这里有广泛的选举权，受教育容易，可以自由地取得土地，并且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制度”极为自豪，甚至达到了引人反感的地步。很明显，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比美国人更热爱自己的国家了。

但是，尽管这种国家主义似乎已经取得胜利，它要不断地保持优势，还有两个严重的障碍。一是，杰斐逊所设想的民主与汉密尔顿所设想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尚未消除。汉密尔顿曾预料，全国的政府将会成为保护社会精英的利益并迫使老百姓就范的反民主的工具。而杰斐逊正是由于担心会出现这样一种中央政权，曾指望各州抵制国家权力，保护地方一级的民主。只要这种思路占了上风，就是说，美国人民必须在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两者之间任择其一，那么国家主义将仍然是前途未卜。二是，美国各地方之间在物质、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如此强大，以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把全体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特点一笔勾销，就会把地方而不是把国家提高到成为效忠的对象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两种障碍在杰克逊执政时期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所以，正是在此时期，美国国家主义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某些方面，杰克逊本人似乎就代表着南部和西部的地方利益。作为一个奴隶主和棉花种植园主，他对州权表现了南部人所具有的重视。作为一个战斗不息的西部人，他自己一生与享有特权的社会和政治的核心集团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因此，出于本能他对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思想持有敌意。他在1828年的选举中所以能取胜，是靠赢得了特拉华河和哈得逊河以西的每一个州（马里兰州除外）的选票，但却失去了这两条河以东的各州的选票。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是国家主义的典型象征。作为一名田纳西的边疆居民，他和其他西部人一样对联邦忠心耿耿；作为新奥尔良战役的英雄，他又是国家军事荣誉的象征；作为对佛罗里达的入侵者，他曾经是美国领土扩张中的一名敢作敢为的战士。他的立场虽然复杂，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他对任何一

个特定的问题所持的态度，通常都可看出他的立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尽管与国家主义的公开形式不相一致。所以，当佐治亚州开始把印第安人从州有土地上迁走，违反了联邦与这些部落签订的协定时，杰克逊却予以批准。他所以批准，就在于他认定把印第安人迁走乃是正确的国家政策，即使是由州来执行也行。同样，当国会投票通过由联邦拨款建造肯塔基的梅斯维尔与列克星敦之间的公路时，杰克逊否决了这一措施（1830年），从而使拥护州权者大为宽慰；然而，他的行动并不是出于他反对联邦对一个全国运输体系给予支持，而是因为他认为梅斯维尔公路主要是一个地方项目。另外一些纯属全国性的项目，例如延长坎伯兰公路以及在一些准州内修筑道路等，都得到了他的坚决支持。

然而，杰克逊的国家主义最清楚不过的特色，表现在他的政府所进行的两次重大的斗争，即在合众国银行特许状延续问题上的较量和在州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问题上与南卡罗来纳州的斗争。前者涉及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协调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

这家银行是由合众国颁发特许状但由私人股东所有和控制的一种企业。它起着政府唯一的储备银行的作用，因此独家享有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此外，它还受权发行可以用来支付政府债务的钞票。因此，这种钞票经政府批准成为通货。这家银行并未取得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力，因为许多银行都由各州颁发特许状而取得这种权力，州银行发行的钞票有很大数量在市面上流通。但是，合众国银行对其他各家银行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它的业务规模之大，可以把任何一家州银行发行的钞票积聚起来，并在它怀疑这家银行的经营方针时拿出来兑换硬币。因此，合众国银行几乎对所有其他各家银行都拥有控制权。尽管存在这样一种协调权力可能是可取的，但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一家私人控制的企业是否明智，这就远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原先将这种权力授予第一合众国银行，就是有意要建立政府与金融界之间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在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后继银行时期仍然坚持下去。这家后继银行的特许状将于1837年终止。这家银行的董事长，费城的尼古拉斯·比德尔，是个傲慢而又专横的贵族。他被说服要在1832年总统选举前争取该银行的特许状得到延长。亨利·

克莱在国会里提出了这项措施，并且毫不费力地使延长法案获得通过。于是，问题就直接提到了安德鲁·杰克逊的面前。

杰克逊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项法案。他之所以反对，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根据州权原则，否认中央政府拥有给一家银行颁发特许状的宪法权利；部分原因是因为西部对这家银行的信贷方针过于苛刻深表不满（虽然杰克逊本人并不主张实行宽松的信贷方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于把公共权力授予私人受益者的这种特权深为厌恶。他认为，交替扩大和紧缩信贷的权力可能被金融投机商用来掠夺生产工人工资收入的价值。在他看来，政府应该与任何这类活动一刀两断，而且用“硬币”来进行自己的金融交易。这样可以促成一种以硬币为基础、无法进行投机的货币制度，从而有助于保护正当的收入。总之，他的反对意见是以民主主义为根据，他呼吁信仰民主主义的大众给他以支持。他的民主主义与杰斐逊的民主主义不同，不是那种以农场主为主的民主主义，因为他的民主主义包括所有进行生产的阶级。因此，它标志着为了一个已经不再是农业的共和国而调整民主主义哲学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杰克逊的否决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应付自如。他的对手们最初企图使他的否决归于无效，在遭到失败后，又联合起来推选克莱为1832年总统候选人和他作对。双方都极力向人民呼吁，而杰克逊则以绝对多数票获胜。他在打退进攻后，立即转入攻势。他不等合众国银行的特许状期满就指示财政部长不延迟地将联邦资金全部抽回。

此举摧毁了合众国银行的力量，似乎杰克逊彻底地获胜了。然而，不久就可以看清楚，他并没有找到一家令人满意的银行来替代合众国银行。他唯一的办法只是把资金存放在各家州银行中，这些银行就被人们称为“宠物银行”。这些“宠物银行”手里有了新的资金，又没有中央银行牵制它们，于是便不顾一切地扩大信贷，愈来愈和总统的硬通货理想背道而驰。杰克逊打算通过以硬币出售公有土地的手段来遏制这些银行的通货膨胀做法，但为时已晚，其结果只是引起了一场恐慌（1837年）。在这场恐慌中，这些银行绝大多数破产了，而政府则丧失其存款。这时，杰克逊的任期已满，他的继任者采取了这样一个方针，即把政府的资金储存在一个“独立的金库”，而让各家银行自寻出路。其后果是：从那时一直到南北战争，国家的流通手段

主要是各州特许银行发行的五花八门的钞票，每种钞票的兑换价值与其票面额的差额也各有不同。简而言之，币制几乎已彻底地分散了。

从形式上看，杰克逊的政策似乎是对国家主义的绝对否定。他不承认国家有权对银行颁发特许状。由于他摧毁了美国仅有的中央金融机构，因而使得合众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全国性的货币供应。然而，说来也奇怪，正是在银行斗争期间，杰克逊使美国国家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人民支持，从而使它具有力量。

在银行斗争中各种力量组合的本身就是对国家主义的促进，因为国家大事直接提交投票人由美国人民集体作出决定，这还是第一次。不仅如此，杰克逊的大胆政策开始改变了总统职务的性质。杰克逊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行政机构的主事者，而是民众的保护人；所以，他才破天荒地毅然行使被人忽略了的否决权，并且直接要求舆论支持他对抗国会的行动，从而使他的总统职务具有一种美国政治制度过去一直缺少的领导全国的职能。现代的美国总统职务作为一个权力机关，发轫于安德鲁·杰克逊。此外，银行争端的激烈程度也促进了两个高度组织的政党，即民主党和辉格党的发展；而这两个全国性政党在各州都设有地方组织，这一事实，有助于使美国的政治全国化。

在这些具体的发展之上，隐隐地出现了这样一个总的情况：杰克逊坚持保护民主准则乃是国家政策的一项宗旨，从而就开始把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了。他支持没有限制的男子普选制、职务轮换制，由政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议会党团提名总统候选人，以及人民统治这一普遍原则，因此，确立民治政府取代显要的绅士阶级政府的，正是杰克逊，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他对国家权力的观念与联邦党人大不相同。他宣称：全民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使人感到的不是它的权力而是它的仁政；不是它的控制而是它的保护”。^[1]国家的力量，如果以民主而不是以单纯行使权力为基础，就会增强；坚持这一点就会使国家主义洗去其联邦主义的污名，并且第一次把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一代人以后，亚伯拉罕·林肯成功地领导国家度过了南北战争的危机，也是由于他始终坚持维护这二者的结合高于其他所有的目标。

这样，杰克逊就成功地扫除了走向国家主义的两大障碍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大障碍，即地方主义的障碍，在他执政期间以州可以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否认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杰克逊也对付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那么很成功。

所谓否认原则的危机是由于南部、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反对保护关税的立法而产生的。保护关税于1816年首次实施时并没有遇到地方的明确反对，而且在1824年和1828年相继的法令中又得到加强。在19世纪20年代的10年中，南卡罗来纳遭受到长期经济萧条的痛苦，该州把它归咎于保护关税。因此，当1832年新的关税法并没有给它解除痛苦的时候，该州便援引其参议员约翰·C. 卡尔霍恩提出的一条宪法规定来保护自己。卡尔霍恩后来成为南部的伟大代言人和他那一代人中最突出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项保障州权的理论，称为否认原则。卡尔霍恩从公认的大前提，即各州本来是限制中央政府某些职能的一项协定（即宪法）的签署各方，从而提出：如果其中一州认定中央政府超越其权限时，该州作为签署各方之一，可以用中止或“否认”有争议的职能的行使，以制约签署各方的代理人（即中央政府），并且可以维持这种中止状态直到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争端得到解决时为止。总之，他认为各州才是宪法权力界限的最终裁决者，而最高法院则不能充当这一角色，因为最高法院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从法律上来说它就不能决定它所从属的政府的权限。他并不主张各州退出联邦——实际上，他坚持说他的纠正办法可能避免分裂——然而，他的各州主权不受损害的理论却为后来的分裂提供了理论基础。

南卡罗来纳采用了卡尔霍恩的理论，召开了州代表大会，于1832年通过了一项“否认法令”，停止征收关税。杰克逊作为答复，在一篇严肃的讲话中告诫南卡罗来纳人说，“合众国的法律必须执行”，“使用武力进行分裂就是叛国”。同时，他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强制法”，授权他动用陆海军来执行法律。冲突看来一触即发，但是还是避免了危机。提出否认原则者同意暂停执行他们自己的法令，以等待国会重新考虑关税问题；国会立即通过一项由克莱提出的措施，逐步降低关税；于是南卡罗来纳州废除了它的法令，而且，尽管南卡罗来纳州又“否认”强制法案以示对抗，但这场争论终于平息了。卡罗来纳州声称取得了胜利，不过1837年杰克逊卸任总统职务时，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一位维护联邦获胜的战士。

杰克逊在处理“否认原则”的问题上所以获得成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在维护联邦时的坚定立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卡罗来纳的不满得到了及时解决。他把地方危机推迟了，一直到联邦能够更好地应付这个危机的时候，因此，他为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但是，1833年的妥协并没有触及地方动荡不安的根源。而且杰克逊所以能够控制局势，只是因为南部的其他各州尽管在关税问题上也和南卡罗来纳一样表示反对，但却不准备支持它的极端措施。一言以蔽之，当时地方的团结一致尚未形成。

实际上，地方的格局如此错综复杂，因此对其背景不可不稍作探讨。早在17世纪，在宾夕法尼亚以北的殖民地和马里兰以南的殖民地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南部殖民地在自然条件方面与众不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生长期长，沿海平原地势低并有河流穿行入海。所有这些条件对于发展主要作物（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卡罗来纳的大米和靛青）的经济极为有利；这些作物又便于种植园发展成为生产单位并使用黑奴劳动力。这种经济还必须有大量的出口贸易，并且依赖海外市场不仅作为产品的出路而且是供应物资的来源。种植园奴隶制形成了一种家长制社会，其特点是倾向保守，社会各阶级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种植园主们信仰相当拘泥形式的英国圣公会教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程度的纵情享乐。

另一方面，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沿岸的殖民地，却没有种植主要作物的自然条件；那里经营的是一种自耕自给的基本经济。不过，大西洋中部沿岸的殖民地却摆脱了单纯维持生计的局限，它们生产粮食到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上出售，而新英格兰发展了规模广泛的渔业和远洋商业。当财富的源泉主要来自商业时，是商人而不是种植园主成为社会的权势人物，而劳动力所需要的是自由工人而不是奴隶。由于长期缺少出口产品用来购入进口产品，北部各殖民地便发展手工业，使生产多样化。贫富两极分化不像南部那样突出，因此社会阶层界限也不那么明显。社会更具有竞争性，对于变革也更易响应。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的影响，使得人们更为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虔诚守规。

南部和北部之间这些鲜明的对比，当时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它们是造成相互一定程度对立的基础。因此，后来有些历史学家把南部和北部描写为两种不可调和的文明的中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不可

避免的战争中较量。^[2]然而，即使充分承认南北分歧这一事实，美国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地方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显得比南北两方的矛盾还要根深蒂固。这就是新、老殖民地之间的对立。比较老的殖民地位于沿海一带，人口较密集，经济上已经成熟，社会上阶层分明。而比较新的殖民地则在内地，人口少，经济不发达，社会尚未分化成阶层。就地方而言，这些差别往往容易以东部对西部或沿海对边疆这种轴心而两极分化。西部地区资本不足，往往容易陷于负债境地并遭受经济剥削，因此造成了长期容易发生冲突的局面，从早在1676年弗吉尼亚的“培根反叛事件”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运动。这种东西部之间的对立，往往似乎压倒了南北的矛盾，成为首要的地区界限。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弗吉尼亚的谢南多亚河流域和卡罗来纳内地的贫苦农民地理上与世隔绝，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经济上债台高筑；他们似乎与马萨诸塞的内地和宾夕法尼亚边远地区中处境相同的居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与沿海地区的显贵阔佬，不管是波士顿城里的巨商大贾，还是詹姆斯河与阿什利河一带的种植园主贵族，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19世纪初，西部各地不仅具备了与东部地区对比鲜明、相互对立的特点；它们还不断发展，显示出将来终将压倒具有明显的北部和南部特征的沿海地区。不论是南部受潮水影响地区的稻米和烟草的栽培，还是北部沿海地带的海上贸易，看来都不可能渗透到内地的深处。因此，看来边疆的所有居民点都在迅速地向西推进，而且不论南北，将仍然是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地区，其间居住的小农人口的不断增长，将把北部沿海地区的商业社会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社会全都限制在当地的小块土地之内。密西西比河流域地理上的浑然一体和这一水系提供的经济纽带，将增强西部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农业集团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预见的美国民主主义的基础。因此，1804年，当东北部除康涅狄格以外的各州的内地推翻了联邦党人的控制时；当南部的内地各处不拥有奴隶的农场主向种植园主的政治权力发出挑战，甚至对他们本州内的奴隶制进行责难时，杰斐逊的理想似乎正在实现。1831年，西部各县还迫使在州议会里就奴隶制问题展开一场认真的辩论。

于是，东西部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一时成为主要的地方矛盾。然而，就在这对矛盾登峰造极，似乎必将压倒南北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局

部化的时候，开始发生了一种双重变化——北部与南部都发生了这种变化——从而改变了地方组合的因素，使南北矛盾重又成为主要矛盾。这一变化进行了数十年之久，在杰克逊担任总统之前就已开始，但当时还未充分发展到能使1832年的地方危机尖锐化的地步。但是，1830—1860年，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两个地方之间的和谐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在北部，这一变化产生于工业的迅速增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出现。从历史上说，东北部有着多样化的经济，长期从事数量有限的手工业生产。然而，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由于种种因素受到阻碍，即由于英国货可以自由输入，由于远洋贸易吸收了新英格兰的资本，特别是由于缺少广阔的市场——而缺少市场又是因为许多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不具备这方面的自然条件；而且维持生计的农民也无力购买商品。但是，在杰斐逊实行禁运和1812年的战争期间，由于商船队陷于瘫痪，这就迫使资本家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企业形式；同时，英国商品禁止进口，这就又强烈地要求有当地的制造业。这些情况就加快了工业增长的速度；但是，工业长期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却是交通运输方面的彻底变革，这场变革使美国的国内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毫无障碍的贸易天地。1807年以后汽船开航成功，1817年汽船经过改进使之适合于密西西比河的交通运输，1818年由联邦出资修建了穿越阿勒格尼山脉的坎伯兰公路，1825年由州提供资金开挖把大湖区与纽约州连接起来的伊利运河，1828年以后又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这整个一系列的发展使得建立一种交换的经济成为可能。在这种经济中，工业的北部和农业的西部将相互作为彼此的市场和货源地。这种东西部联盟的发展，就是早先1824年克莱的“美国制度”以及后来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所以既支持自由宅地政策，又支持保护关税的基础。由公路、运河和铁路组成的新的人工纽带，其发挥的作用非常奏效，以至于西北部在经济上几乎完全摆脱了它在地理上沿密西西比河而下直至河口的天然走向，反过来却与东北部连接起来。1852年谷物从密西西比河流东运经过布法罗运往东部各港口的数量，比沿这条河流而下运往新奥尔良的数量多一倍半。到1860年，密西西比河上游一带和东北部各州之间的分歧已经减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它们在地方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北部。

在这一经济革命在北部进行的时候，由于伊莱·惠特尼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后而同时出现的另一场革命，也给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由于惠特尼的发明，种植一种比稻米和烟草更赚钱的新的主要作物，从经济上来说已是实际可行的了。棉花与稻米、烟草不同，它可以在不同的土壤中种植，既可以大面积种植，也可以小面积种植。但是，种棉花使用大批的奴隶劳动是有利的，这一点又与稻米、烟草一样。因此，棉花给奴隶制带来了新生；种植园制度迅速地从沿海各地扩展到内地；南部高地的普通农场主便放弃了原有的自耕自给的经济，改变成为以棉花为主要作物的经济。在惠特尼的发明问世不到50年间，棉花的种植经过地势较低的南部向前推进了1000英里，一直达到得克萨斯州的布拉索斯河的低地地区，所到之处带去了奴隶制和种植园。这种推进结束时，棉花这个新作物已成了南部之王，而南部旧有的内部分歧也就随着南部成为“棉花之乡”这一事实而烟消云散了。

刚刚变得共同一致的南部在刚刚变得共同一致的北部看来，更是前所未有的格格不入。因为南部采取了种植园的生活方式，依靠奴隶劳动；它越来越强调社会稳定和因循守旧的准则，强调要维持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乡绅阶级所有的悠闲与尊严的理想（其实南部的许多地方仍处于原始、混乱的未开发阶段，离这些理想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是，所有南部人却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奉为理想）。而北部由于日益都市化和依靠工业企业，因此，它奉行“进步”与社会变革的准则，坚持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并且维护审慎、勤奋和求实等中产阶级的理想。

这些发展情况不仅加深了南北之间的不同之处，而且破坏了两个区域在1790年在财富和人口方面大体相等的平衡状态。这种差异本身就使联邦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因为北部自然指望它日益扩大的物质优势要在政治权力的优势上有所反映。而南部则顽固地坚持说，在政府中保持地方平衡乃是地方根据宪法所应享有的权利。

显然，地方问题是一个尖锐的现实，但是区别地方的差异和地方的对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从宿命论出发认为地方差异必然要导致地方冲突，但是历史却提出了许多例证，说明许多不同的地区，由于它们有差异才促使它们相互依赖，从而紧密相连，形成了国家的统一。事实上，国家要能自给自足，就要依靠国内的差

异。^[3]因此，要说明地方之间的敌对，仅仅举出生活方式的不同是不够的；一定会有引起冲突的具体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越是完全遵循地方的方针，就越容易产生尖锐的地方敌对情绪。

当工商业正在缔造一个更为紧密结合的新北部，而棉花正在减少南部过去受潮水影响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分歧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国家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北部和南部发生冲突。问题之一是，联邦政府对国内的改良工程进行补助究竟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总的说来，北部希望对那些把东北部的工业和西北部的农业联合起来的工程项目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而南部则深有戒备，对于这样一个发展计划表示反对；它会破坏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向南通向新奥尔良港口的天然趋势，而且它也不可能有效地把南部的各大西洋沿岸港口包括进去，因为在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横亘着一条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地方畛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杰克逊所摧毁的中央银行问题。作为资本中心的东北部也是拥有银行股份的中心；此外，东北部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它深知建立一个严格控制的货币系统的好处。因此，东北部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部以农业为主，而且处于债务人的地位，对于一个代表债权人的利益，为别的地区的股份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机构，当然要采取敌视态度。

往往容易造成地方分歧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将国有的土地向移民定居开放的问题。东部的工业界反对把公共土地进行任何分配，因为这样做将使地价非常便宜，足以在工业发展需要供应劳动力的时候，把工人从工厂中抽走。南部和西部由于日益依靠农业，因此非常愿意鼓励迅速分配土地以刺激农业的发展。这种利害冲突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不断发生，因此参议院于1830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Y. 海恩提出了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否认原则，而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发表了一篇不朽的演说，捍卫国家的统一。

还有第四个问题，即关税问题。这个问题充满了危险的导致地方冲突的潜在可能，这一点已在“否认原则”危机中显露出来。北部认为保护关税制对于发展工业是必需的；要取得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国家的自给自足和经济独立，保护关税制是至关重要的。而南部则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其棉花，对于阻止其在同一市场上购买货物的限制表示

不满。因此它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地区，正在被迫为一个竞争的地区的经济提供补助，由于南部不能在国外购货，它就被迫进行两次出售——首先出售棉花换取外国信贷，然后再在北部的金融市场出售外国信贷。这一过程使它不断遭受损失，因此，它极力反对保护关税。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安全因素，可以防止地方的紧张关系在任何上述的一个问题上达到破裂的程度。这个因素就是，在发生争执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并不是完全团结一致。诚然，南部反对对土地政策和国内改良工程有所限制；但有些种植园主已经看到，廉价土地在占领新的土地竞赛中会使小农场主比奴隶主有利，而地处内地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和地处内地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一样，都迫切需要联邦的援助以改变他们地处边疆、孤立无援的境地。反过来看，虽然北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赞成这些政策，但北部的农场主却不愿在土地问题上受北部实业家的指点；而波士顿这样一个城市就反对目的在于帮助它的商业劲敌如纽约、费城等所采取的种种措施。

银行和关税问题也是如此。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工人阶级反对它们所属的地区反对中央银行，而查尔斯顿的商业集团则反对它们所属的地区支持中央银行。尽管北部的工业需要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场，但北部商人却奋力打一场后卫战斗以保卫他们的远洋贸易。虽然南部的棉花需要一个自由市场，但南部有雄心的人物梦寐以求的是要有一个受保护的南部纺织工业。直到1816年，卡尔霍恩还一直率先鼓吹保护关税的措施，而韦伯斯特则是反对派的首要人物。直到1832年，企图在关税问题上使南部团结起来的南卡罗来纳人才发现自己孤立无援，独自站在“否认原则”的大旗之下。

在这些问题上，队伍的划分并不完全与地理区域相一致这一事实对遏制地方主义的分裂势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只要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派，或者银行支持者和硬币拥护者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群众中，个人的接触使他们彼此之间不致给对方造成一刻板的和虚假印象；同时，地方的政治领袖们也会感到必须寻求双方的共同点。因此，地方主义不可能采取全然以自我为中心的形式。但是，一旦地域形成，就无法遏止了，一个地方的人们就可对另一个地方的人们极尽夸大之能事并且处处为敌——一方的政客们为了讨好自己地区的人而对另一地区的人进行恶毒的咒骂。地方主义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以自

我为中心，此乃地方主义的本性。在其他的问题上，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但在黑奴问题上地方主义的畛域却已形成。

直到18世纪末叶，奴隶制无论在法律上或道义上都还没有形成地方之间的悬殊差别。奴隶在最初组成联邦的全部13个殖民地内，沦为一种动产的地位即已确立。然而奴隶在北部各殖民地中却为数不多，北方佬从事奴隶贸易是很惹人注意的。至于从道义上感到有所顾忌的，也只限于教友派而已。其后，启蒙运动传来，在北部和南部都造成了反对奴隶制的反响。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华盛顿、杰斐逊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应予以根除的罪恶。然而，奴隶制的规模，在梅森—狄克森线南北两边，却大不相同。1790年，奴隶人口中只有不到6%居住在该线以上，而94%则居住在该线以南。在该线北边，49个人中有一个奴隶；而在南边，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奴隶。这些比例使南北两地的奴隶制的价值，在经济利益方面和控制黑人的社会制度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许多黑人并没有越过非洲部落状态，取得很大的进步。

由于这种巨大的差异，各种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所起的作用自然极不平衡，在南部，由于这些力量的努力，出现了某些个人释放奴隶的行为，州在联邦禁止非洲奴隶贸易法令于1808年生效之前就采取了种种废除这种贸易的措施，提出建议要限制国内奴隶贸易并支持成立“美国殖民协会”（1817年）争取释放奴隶并把他们遣送回非洲。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北部，1774—1804年，各州相继地采取行动，或者彻底地废除了奴隶制度或者规定逐步予以废除；因此，到1846年，奴隶制度的最后残迹已在马里兰和特拉华以北地方不复存在。

最初，“蓄奴州”与“废奴州”这两类名称截然相反的州，并不表示任何真正的分裂，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差异而已。因为南部由于奴隶人数较多，解放就不那么容易。但是，到了1830年，南北两部的态度显然趋于两个极端。在南部，棉花经济的发展，使一个头等田间劳动力的价格从1795年的300美元，一直上升到1820年1100美元。因此，原来似乎已日渐成为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奴隶制度，却又在经济上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暴力事件和暴力威胁层出不穷，如圣多明各的血迹斑斑的奴隶暴动（1792年），查尔斯顿破获一起重大的暴动阴谋（1822年），以及弗吉尼亚55名白人被一伙造反的奴隶杀死（1831年）。这些事件使心怀畏惧的南部人采取了更加高压的态度。过去曾

经和美国殖民协会拉拉扯扯的南部奴隶主，随着北部越来越谴责他们的制度，便愈来愈采取防卫措施。1830年以后，南部完全放弃了早先对奴隶制的谴责，转而提出了美国最明确的保卫等级社会的主张。托马斯·R. 迪尤、詹姆斯·H. 哈蒙德和卡尔霍恩以及其他等人声称：财产奴隶制要比工资奴隶制人道得多；一个注定要从事土地劳作的劳动阶级，从来就是文明的必要基础；黑人从生物学来说天生低劣，不配享受自由，而奴隶制则是上帝的旨意。总之，正如卡尔霍恩所断言的，奴隶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善行，先生，一种确确实实的善行”。^[4]

如果这一观点仅仅限于奴隶主所持有，它就不可能控制了南部的政策，因为2/3的南部白人家庭根本没有奴隶，拥有5名以上奴隶的白人家庭仅占1/6（1850年）。但是，虽然南部自由民的绝大多数与奴隶制并没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他们却非常一致地接受了赞成奴隶制的观点。他们作为统治种族的成员，与奴隶主完全一样地害怕一旦奴隶获得自由会对社会秩序和白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产生什么结果。于是，南部便团结起来不仅把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统治的制度加以维护。

与此同时，北部具有战斗性的反奴隶制运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北部充分地投身于世界性的技术变革之中，正在用机器劳动代替不熟练的人工劳动，因此奴隶制在经济上已成过时；社会头一次把使用非自愿的劳动作为一个道义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来对待。在北部，传播新教教义的、充满感情的强大宣传运动，再加上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学说，产生了人类尊严这一普遍而深刻的信念。例如这种信念就在美国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拉尔夫·W. 爱默生的作品中成为主题。它鼓励人们相信进步，相信人是可以臻于完善的。这种信念从而又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这些运动成了这一时代最典型的特色之一。监狱改革、服装改革、对精神病患者和盲人照料的改革、禁酒改革、实施男子普选制、女权运动、和平主义运动，以及各种乌托邦式的居民点的试验，全都反映了这一人道主义运动的活力。但是，奴隶制公然违反启蒙运动倡导的平等原则和福音派教会宣扬的人类博爱原则，因此要比任何其他的罪恶吸引改革家们更多的注意。这些改革家们深受英国废奴运动的影响，积极地效法，要求采取立法行动。因此，他们抛弃了原先的采取说服方法，以自愿，逐步解放奴隶为目标的纲领，转而

开始谴责奴隶主的罪恶，极力要求立即强制废除奴隶制度。1830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了《解放者》周刊，宣称他不打算“以温和的态度思考问题，发表言论或写文章”。1831年，具有无限热情的福音派教徒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开始展开了一场运动，训练了70名传教士到北部各地激烈地谴责奴隶制。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到1840年又组织了两千多个分会，拥有15万到20万名会员。

因此，由于废奴主义者的宣传鼓动而日趋紧张的奴隶制问题，便产生了一种几乎完全以地方为畛域的分歧，这是任何其他问题所没有的。从而奴隶制问题就为南北两个地域相互蓄意地曲解和诬蔑对方打开了道路。于是，北部人便逐渐地把南部人说成是堕落的、虐待成性的奴隶监工。南部人则把北部人说成为大言不惭的、异想天开的废奴主义者。围绕着这种不实而耸人听闻的成见，所有造成地方对立的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因素便激化了，从而地方主义便达到了最危险的阶段，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阶段。

但是，即使完全承认奴隶制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认为1830年至1860年的整个阶段只不过是南北战争的漫长前奏，这是一种错误（许多历史学家就犯有这种错误）。根据某些说法，人们可能以为美国人民在整整30年中从早到晚、不分昼夜地关心的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奴隶制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扩大民主制度，不断增加美国的面积、人口和财富，不断地在为开发利用天然资源而孜孜努力。3万英里的铁路铺成了，成千的新企业成立了，490万移民从旧大陆涌入了，美国的制造业的年产值总额达到了18.85亿美元。所有这些活动都与奴隶制的争论全然无关；然而，北部比较迅速的发展往往容易增加南部认为自己是个处于少数地区的自我感觉。

另一个当时的南部人和以后的历史作家常犯的错误是，以为北部人作为一个整体，全都具有废奴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废奴主义者的势力虽然很大，但却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他们从未在任何全国性的选举中获得大量的选票；他们从未取得对一个主要政党的控制权；而且，他们从未解放过任何奴隶，除了少数的逃亡奴隶；可以这样说，他们的重要意义在南部却比较在北部为大，因为他们在南部无意中造成了这个地区对北部舆论的强烈反感；而在北部，他们有意要挑起对南部奴隶制度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并未得逞。由于他们对北部人民进

行说教，他们在促使人们在道义上同情奴隶遭受的苦难虽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却未能克服人们对于奴隶主的法律权利所持有的道义上的顾虑。美国人民在政治组织上还处于联邦制阶段，他们一直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熏陶，即各州根据宪法拥有自行决定奴隶制问题的权力。像加里森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废奴主义者，大胆地根据这种逻辑而作出结论抨击宪法是“和死神缔结的盟约，和地狱达成的协议”。^[5]但是，大多数的北部人唯恐任何政策可能危及联邦，由于他们尊重合法的权利，而有所克制。他们满足于在自己的州内废除奴隶制从而在道义上做到问心无愧；而不去干预其他各州的奴隶制，从而在宪法上做到问心无愧。

但是，尽管这种法律上的顾忌仍然在克制着采取直接行动的感情，反对奴隶制的感情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却逐渐使大多数北部人深信，奴隶制度最终必将从美国社会中消灭，即必须使奴隶制处于“最终灭亡的过程中”^[6]，不管这样做将会给南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此同时，在他们等待着开辟一条通向这个目标的合法途径的期间，反对奴隶制的感情冲动所具有的巨大心理力量（它过去曾经偏离了直接攻击奴隶制的本身）却在一些枝节问题所引起的激烈争执中发泄出来，例如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地位，逃亡奴隶的归还，特别是在当时虽已具有政治组织但还未被接纳为州的新殖民的准州中奴隶制的地位等问题。

由于这种迂回曲折，所谓准州问题40年来一直成为美国政治中一触即发的问题。说来是个莫大的讽刺，地方之间的斗争中心并不是集中在400万人受奴役的那些地区的奴隶制上面，而是在那些找不出奴隶的地方的奴隶制上面。从自然条件来看，这些准州绝大多数都不具备实行奴隶制的有利条件。因此，有人就说，为“一个不可能的地方的想象中的黑奴”而进行的斗争，使联邦毫无必要地遭到了破坏。^[7]如果有人真的以为这场关于准州的斗争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那么看来这要么是因为当时的政治领袖们不现实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然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问题而造成这样一种具体的危机；要么就是因为这场斗争基本上是一场争夺地方权力的斗争——北部所关心的是要另外缔造一些北部可在其中发展的州，而且它们在参议院投票时可与北部站在一起；而不是要帮助南部的可怜的奴隶。这两种观点都广泛地为历史学家们所持有。^[8]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情况似乎可能是

这样，即准州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反对奴隶制的力量被迫只能在根据宪法奴隶制有懈可击的地方，而不是在宪法已经认可奴隶制的地方发动进攻。^[9]但是，不管哪种观点，只要开辟一个新的地区，地方危机必然就要接踵而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安德鲁·杰克逊于1837年卸去总统职务的时候，决定奴隶制地位的法律根据在美国全国各地似乎都已解决。各州之内，决定之权完全在于各州自己；其中13个州许可实行奴隶制，另外13个州则予禁止。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佛罗里达这个准州在从西班牙手中取得时就已经有了奴隶制；另一个准州威斯康星，却根据国会按照邦联条款于1787年通过的法令禁止奴隶制。根据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取得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明确规定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全部地区不得实行奴隶制；而在该线以南则默许其存在。这种沿着纬度线划分的办法被采用作为“密苏里妥协案”的一个部分，这是在接纳密苏里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以后的事情。

因此，只要美国的领土面积不变，看来奴隶制问题就不会成为一个联邦的问题。但是，只要领土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就会再次被推到政治舞台中去，因为“密苏里妥协案”只适用于“路易斯安那购买”中所取得的地区，而不适用于未来所要取得的领土。领土扩张的力量是从来不会长期停止活动的，于是又在被称为得克萨斯的这个地区开始活动了。

得克萨斯在历史上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政府曾鼓励从美国移民到该地。种植棉花的南部人群起响应，他们带着奴隶涌进了富饶的得克萨斯河下游地区，但很快就证明了他们在墨西哥的统治下是难以驾驭的。当墨西哥政府开始警觉，曾经迟迟疑疑地打算维护它的权威的时候，移民们就起而革命，宣布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836年），并在圣哈辛托战役中打败了墨西哥的大军。不久，移民们即要求接纳得克萨斯为美国的一个州。

对于北部人来说，他们赞成扩张，但又担心地方上的奴隶制的势力，因此得克萨斯问题便是一个难题了。而且，北部强烈反对兼并的力量已出现。安德鲁·杰克逊认识到问题十分微妙，就把它完全推给他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1837—1841年在任）。范布伦也不愿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因此他在1840年竞选中被辉格党击败后，又把这个问

题交给了威廉·亨利·哈里森（他于1841年就任一个月后就去世了），然后又转交给哈里森的继任者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泰勒（1841—1845年在职）。泰勒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同意积极进行兼并。但他的国务卿约翰·C. 卡尔霍恩公然把得克萨斯问题和维护黑人奴隶制联系起来，这就进一步招致北部人的反对。北部人越来越认为，得克萨斯革命是一个维护奴隶制的阴谋，如果兼并就将导致与墨西哥的战争。1844年，即得克萨斯成为共和国已8年之后，美国参议院以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兼并条约。地方之间的敌对态度已经妨碍了国家的扩张。

但是，扩张的势力这时已开始更大范围内进行活动。美国的开拓者在越过大陆向西推进，达到太平洋沿岸。他们以相当大的数量向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流域移民。英国和美国都声称这个地区的主权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地区根据1818年的条约，曾经对两国的移民都开放。另外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则前往加利福尼亚，他们很快发现这个遥远的地方和墨西哥之间的联系多么薄弱。扩张主义者看到，美国的农场主在俄勒冈的竞争中胜过了英国的皮毛商人；他们也看出，墨西哥在从得克萨斯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的统治非常薄弱。于是，他们便开始梦想建立一个横跨两大洋的大共和国。

1844年，民主党突然地抓住了主张扩张的这种民族感情，并且找到了一个办法，消除了一个地方对于另一个地方权力扩大的畏惧心理。民主党人委婉地提出要求“重新占领俄勒冈和重新兼并得克萨斯”的计划，使南北两部的扩张保持平衡。他们以此为口号，使詹姆斯·K. 波尔克胜利地当选总统（1845—1849年在职）。波尔克的胜利，使国会甚至在他就职以前便投票通过把得克萨斯作为蓄奴州并入美国。而且，他一上任就立即通知英国终止1818年的《俄勒冈条约》，并向墨西哥提出要购买整个的西南地区。

在这个时刻，对扩张主义计划广泛的支持似乎标志着国家主义对地方主义的胜利，但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却又很快地使地方问题再次居于支配的地位。波尔克并没有实现民主党人关于“取不到54度40分的边界，就打仗”的诺言，却与英国达成协议，按照北纬49度线划分俄勒冈。在他这样放弃了一部分他曾经许诺给北部扩张主义分子的东西的时候，他却不折不扣地满足了南部扩张主义分子的要求，在美国与

墨西哥的沿着格朗德河的巡逻队发生冲突之后（参见第25章，原文第674—675页），要求国会对墨西哥宣战（1846年）。

在随后的一年零8个月的战争中，美国军队长驱直入开进加利福尼亚，进军蒙特雷，直捣墨西哥城。由于美国军队大获全胜，从而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美国取得了整个西南部（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国家主义的愿望这时终于实现，合众国成为一个横贯大陆的共和国和一个称雄两洋的强国。美国在《独立宣言》发表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从开国之初的风雨飘摇中成长起来，它所拥有的幅员和资源，已经使它能够在20世纪占据世界强国的地位。

然而，说来奇怪，民主主义抱负的实现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却也就是地方危机的前奏，因为准州的问题又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墨西哥战争开始起，北部的国会议员们就打算对牺牲他们在俄勒冈的一部分权利要求而达成的妥协进行报复，要求从墨西哥取得的任何领土均不得实行奴隶制（即威尔莫特但书）。4年来，奴隶制在墨西哥割让地中的地位始终未定，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争斗不已，危机日趋严重，到了1849年达到了十分尖锐的阶段。这时，辉格党人扎卡里·泰勒（1849—1850年在职），继波尔克出任总统。他建议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均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这时，南部的领袖们威胁说宁可退出联邦，也不能在“用全体人民共同的血汗和财富取得的”地区被排斥出去。于是，计划在纳什维尔召开南部9个州的代表大会来考虑南部是否还应留在联邦之内。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达成了一项协议，它是一系列重大妥协案中最为有名而又完备的一个，它几乎像国际条约一样照例被引用来解决尖锐的地方争端。1787年立宪代表会议通过的奴隶应以3/5计数的关于代表权的妥协做法，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以及1833年的关税妥协案，全都为另一个重大妥协提供了先例。曾经在后两项妥协中发挥作用的亨利·克莱，如今又提出了种种和解的措施。1850年泰勒总统去世，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年在职）继任，克莱遂能得到总统的支持。德高望重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表示首肯。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A. 道格拉斯给予大力而机智的支持，这样在国会通过就不成问题了；因此在泰勒去世的那年秋天，1850年的妥协案就通过了。

这项妥协案企图对奴隶制问题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办法，包括逃亡奴隶回归的立法，保障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但废除那里的奴隶贸易，并接纳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加入合众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妥协案为墨西哥割让地的其余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式：这一整个地区（现已成为四个州）划为犹他和新墨西哥两个准州，但对奴隶制不作任何规定，只是宣称“上述准州或其任何部分被接纳为州时是否拥有奴隶制，将按照其在被接纳时州宪法之规定办事”。

这一公式看来几乎收到了奇妙的效果：援用无可非议的地方自治的民主原则，即可在全国政治活动中消除了奴隶制问题。要是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人有权自行解决奴隶制问题而不受国会的干涉，那么，人们就可以声称，犹他和新墨西哥人也应享有类似的自由权。然而，在“人民主权”论及其无可指摘的民主前提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致命的，也许还是故意的模棱两可之处。对南部领袖人物来说，不加限制即意味着：国会现在放弃了它曾擅自声称拥有的在准州阶段废除奴隶制的任何权力，并承认奴隶主有权把奴隶带入一切准州，直到它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时再行使人民主权。对某些温和派人士来说，这却意味着法院将按照墨西哥和美国的法律来决定这些准州的奴隶制问题。然而，对于道格拉斯和北部民主党人来说，这就是说，各准州的立法机构一经组成即将决定这个问题。总之，在地方自行决策原则上取得的一致意见，掩盖了地方决定权应在政治发展的哪个阶段行使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两年后，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年在职）和民主党人以“妥协案为最后定案”为竞选纲领，取得了自1820年以来总统选举中最多的票数。于是，乐观派人士认为地方斗争的危险已经安然度过。但是，“人民主权”的公式实际上只掩盖了意见分歧，并没有加以解决。因此，这种分歧无论如何会再次爆发的。果然，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问题和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上意见分歧又爆发了，而且比以往更为激烈。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地区系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一部分，正好横跨伊利诺伊与太平洋沿岸之间拟建的铁路线。为了加快这项工程的进展，需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准州，于是斯蒂芬·A. 道格拉斯便率先着手安排。他认识到取得南部的支持是必不可

少的，因此建议取消“密苏里妥协案”的反奴隶制的限制性条款而实施人民主权，以此换取南部的支持。这就使北部移民和南部移民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展开了竞争。道格拉斯依靠南部的赞成票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终于在1854年使这一措施得以实现。但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士极为愤怒，他们坚决表示：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人民主权与墨西哥割让地的人民主权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在多年前同意接纳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时所得到的保证如今上当受骗了。因此，他们无比愤怒，准备抵抗任何新的让步。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否定了一项关于准州的妥协方案，却没有影响国会进行妥协的权力。但是，3年后，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裁决（1857年）却剥夺了国会的这项权力。最高法院就一名黑奴以曾在自由准州居住为根据要求获得自由一案作出裁决，认为国会无权从任何准州排斥奴隶制。这样一来，不仅密苏里妥协案从头就是无效的，而且还必然得出结论：如果国会没有排除奴隶制的权力，它也不能将这种权力授予任何准州的立法机构。这就是说，北部的关于准州的人民主权论也是无效的，因此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对奴隶制开放的。只有在各州的范围以内才能禁止奴隶制。起初，人们对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全部含义并不普遍了解，但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参议员选举中与道格拉斯进行的一系列辩论中对阐明这一裁决的含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到1857年，长期存在的一套妥协办法的结构就被粉碎了。过去顶多不过是一种脆弱的樊篱，如今已不复存在，从而为南北两部的直接冲突打开了道路。南部决心要取得最高法院作为宪法保证所赋予它的权利；北部既丧失了北纬36度30分这一分界线，又丢掉了人民主权原则，于是日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如干脆放弃这些不彻底的做法，不管最高法院的反对而把奴隶制从所有准州排除出去。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南部确信，18世纪建立的松散的联邦体制应予维护，以对抗19世纪的改变一切的经济力量；作为法律的绝对准则的宪法，应保持不变以对抗演化性的变革。由于进步迅速，力量日益强大而扬扬得意的北部，却下定决心不应让少数派妨碍对这种变化作政治上的调整，也不允许用字面上死扣宪法条文的办法来对抗。从这种前因后果来看，奴隶制不过是两种社会——一个是停滞不前、留恋过去的社会，另一个则是充满活力、相信未来的社会相互敌对的一个方面。

随着上述截然相反的态度日趋明朗，一系列的事态发展都说明全国的感情日益尖锐并恶化。轰动一时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852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议员萨姆纳1856年遭到鞭挞；北部各州通过各项人身自由的法律以阻止逃亡奴隶法的实施；北部聚集大批人群戏剧性地打算援救被押回的逃亡奴隶；在“流血的堪萨斯”，拥护奴隶制的移民与反对奴隶制的移民之间进行着长期的游击战；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时正在发挥作用的各势力所采取的极端做法。1859年，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企图袭击弗吉尼亚的哈珀斯费里，发动一场奴隶起义；在他失败被俘并被判处绞刑时，北部群情愤激，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在南部引起了深切的恐慌，并使南部的联邦主义的感情疏远了。

卡尔霍恩曾在1850年说过，“维系各州的纽带，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性质迥异。有的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或宗教方面的；有的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的则是社会方面的”^[10]。他预言，分裂不会一下子就出现，而必然是随着这些纽带一根一根地割断而逐渐地发生。甚至在他说这番话之前，教友会和浸礼会就已分裂为独立的南北两支，长老会则陷于地方的分歧而不能自拔。在50年代中，南部的学生开始从北部的学校中离去，南部人度假也不再跑到他们常去的那些北部胜地，而南部爱国者宁可穿土布也不穿北部工厂的机织布。维系合众国的纽带正在一根一根地断掉。

仍然维系国家统一的最重要的机构是政党。辉格党和民主党一直在南北两部都保持自己的政党体系，在国家大事上总是力图立足于全国而不采取地方性的立场。南部和北部的领袖们在党的会议上共同磋商并为党的目标共同努力。但是，在50年代中，即便是维系国家统一的这些柱石也开始崩溃。在辉格党内，所谓“良心派辉格党人”与“棉花派辉格党人”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党的瓦解，绝大多数北部的党员最后参加了新成立的共和党，而南部的党员则逐渐加入民主党人的行列。到1856年，民主党是仅存的全国性大党，这一年，它提名詹姆斯·布坎南（1857—1861年在职）竞选总统。布坎南获得了5个自由州和除马里兰州以外的全部15个蓄奴州的选票而当选（马里兰州支持一个排外主义团体，叫作“一无所知党”，或称“美国党”）。布坎南的主要对手是共和党人，他们谴责奴隶制是“野蛮社会的遗迹”，获得了11个自由州的选票，但在整个南部只获得1200张选票。这时，民主

党是全国性的政党，但在仍然支持人民主权论的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和要求在一州中自由建立奴隶制的当权的民主党人之间出现了分裂并各自提名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和约翰·C. 布雷肯里奇），于是在1860年也地方主义化了。从辉格党人演变而来的立宪联邦党人，则提名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共和党人提名亚伯拉罕·林肯，其竞争政纲是从一切州中彻底清除奴隶制。

林肯只获得39%的选民票，但却完全集中在自由州内，所以即使反对派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照样可以当选。他获得了18个自由州中的17个州的选票，还取得了第18个州的部分选票；15个蓄奴州却以压倒多数反对他。南北两部的两极分化至此已经形成，最后的危机已相去不远，指日可待了。

历史已经表明，林肯所处的地位已远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领袖的形象；他给予奴隶主们以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合法权利，但关于州的权利则除外，因此他永远是公正的；而且，他认识到奴隶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能草率地加以解决，因而他也是英明的。但是，在1860年，他所取得的胜利却使南部感到前景暗淡，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下流的、煽动的废奴主义者。南部人认为局势是这样的：由于实施歧视和剥夺性的政策，已使南部在财富和人口方面远远落后于北部（1860年，自由州的自由居民达1880万人，而蓄奴州的只有803万人），南部早已丧失了原来在众议院中享有的平等地位，国会已落入一个公开表示要对抗最高法院裁决的政党手中；如今总统职务也即将为这些心怀敌意的人们所掌握。许多南部人认为，真正的联邦已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区域的统治，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始终坚持要保护自己主权的南部各州应该恢复它们的主权地位了。

十多年来，一伙狂热的分裂主义者（或称“吞火魔术师”），在亚拉巴马州的威廉·L. 扬西、南卡罗来纳州的巴恩韦尔·雷特和弗吉尼亚州的埃德蒙·拉芬等人的领导下，曾极力主张分离。他们曾经提出警告说，南部只有立即退出联邦才能逃脱为异己的北部所统治的命运；现在他们的警告在南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这种立即退出联邦的纲领遭到了温和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极力主张稍事拖延，以便从北部取得保证，或者使南部各州保证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温和派中的绝大多数人热爱联邦，希望在自愿的基础上维护联邦的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联邦主义在南部仍然是种强大的力量，几乎强大到足以制止

要求退出联邦的趋势。但是，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强制各州服从的这种无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联邦主义又是极为软弱的。随着危机的发展，进行妥协的尝试失败了，温和派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安然地度过风暴。

从1860年12月到1861年3月之间，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纷纷召开代表大会，各自通过了一项退出联邦法令。几乎与此同时，这些州又组成了南部联盟——南部邦联——并于1861年2月22日拥立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不过，尽管南部邦联吹嘘南部是一致的，但另有8个蓄奴州却不愿追随它们，仍然留在原来的联邦内。美国的国家主义即使到了内战前夕，仍然在南部具有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林肯于3月4日就任总统时，他不仅面对着一个羽翼丰满的南部共和国，并且发现联邦在南部的两个堡垒，即佛罗里达的皮肯斯堡和南卡罗来纳的萨姆特堡的形势十分紧张。南部邦联分子认为守卫这些堡垒的联邦警备部队是入侵者，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武力。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林肯既不盼望战争，也不需要战争，但却希望有一个不采取行动的阶段，在此期间南部的拥护联邦的势力（他在就职演说中曾向他们发出了呼吁）能够再阐明己见。但是，他不愿撤出这些警备部队，也不愿让他们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因此，他在4月派了一支援军前去萨姆特堡。南部邦联早已料到援军的到来，便轰击该堡并占领之。于是，林肯便征召7.5万名军队。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拒不应召而倒向南部邦联。于是，美国的国家主义进入了最严重的危机阶段，只有打了四年的南北战争，危机才获得解决。

历史学家一直热衷于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南北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这场战争是各种命里注定的力量的必然结果，即一场“压制不住的冲突”。有些作家分析了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得出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另外一些作家则强调准州问题全然是人为的，不理智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而废奴主义和分裂主义两个阵营的极端分子的愚蠢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从而认为所谓“不可调和的”分歧实属杜撰，并非事实，而这场危机也是人为的。^[11]这场争论可能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解决，但是有两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却值得注意。首先，这样说看来是可靠的，即心理的和感情的力量以及极端分子爬上领导地位，从其影响上看，是完全“实在的”；而从其起源

上看都是最基本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也必然是确定了。其次，事情看来肯定是这样的：北部和南部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别破坏了南北两地之间的平衡；但南部不经过一场危机是绝不会接受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的。至于这场危机是否非要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而这场武装冲突的阶段是否非要在当时爆发，或者可以或早或晚1个月、1年、10年，这就可以无休无止地猜测了。

美国南北战争不属于本章的范围之内。^[12]但是，如不稍稍涉及这两种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则本章对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的相互作用的讨论就不完整了。

从南北战争开始起，最直接的问题乃是联邦能否获胜，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却是：即使取胜，这一胜利能不能使美国国家重新振作起来。一个区域胜利了，另一个区域失败了，这能否使地方主义的强度减小？特别是在共和党人为了达到北部地区的目的已在采取诸如莫里尔关税法、国民银行法、太平洋铁路法等措施的时候？强迫的过程能否产生自觉自愿的忠诚精神？而这种精神却是联邦的实质所在。

虽然绝大多数公职人员不能或不愿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亚伯拉罕·林肯胸中对此却洞若观火，这是美国的幸运。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他时刻警惕着把维护联邦作为战争的伟大目标，并像安德鲁·杰克逊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在美国国家主义的观念中注入了广泛的民主思想。因此，他不愿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种目标，因此等待了几乎两年才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这项宣言给予所有仍在反叛但并未干预仍然忠于联邦的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等蓄奴州的奴隶制的那些地区中的奴隶以自由。在他确信“奴隶制必须灭亡，国家才能生存”之前，他不愿采取行动；这种态度激起了废奴主义者的强烈谴责。然而，正是他们为之叹息的这种耐性才使林肯能够对奴隶制度给予比他们所曾给予的更为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他耐心地等待联邦的原则和解放奴隶的原则能够结合起来，他才能够如J. G. 兰德尔所说，“把国家主义的事业和自由的事业融为一体”。^[13]

林肯所处的是一个极端而无情的国家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这种国家主义往往以国家的名义牺牲个人，并且认为民主制度与国家权力不一致因而予以摒弃。在林肯所处的那个世纪里，其他的一些伟大的国家缔造者们——拿破仑、加富尔、俾斯麦——似乎愿意把人的一般

福利从属于法兰西、意大利或德意志命运的完成。所以，林肯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捍卫联邦并不是以抬高美国国家为基础，而是以普遍的民主事业为基础；对于后者，保存美利坚合众国是必不可少的。在葛底斯堡的崇高时刻，他没有提到美国这个字眼，却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一个考验：即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能否长期存在下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多一个国家或少一个国家的存在，而是一个坚信这样的原则的国家要存在下去，这个原则就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绝不应从地球上消失。

由于林肯深刻地理解自觉自愿的忠诚乃是国家统一的基础这一重要意义，由此他准备以可能的、具有最和解精神的条件让南部各州返回联邦。为了这一目的，他甚至准备牺牲北部在胜利后可能获得的某些地方利益。总的说来，共和党的想法和他的并不一样。在林肯遇刺后，控制权就落到了一个对南部强行实施一项比较苛刻的“重建”计划的派系手中。这个计划在其他方面不论有何成就，但它肯定没有减少存在于北部或南部的地域仇恨情绪。在12年的重建结束时，国家主义精神看来比内战初期还要淡薄。所以，凭借政治手段重振国家主义的做法，应该说是失败了；要重新建立联邦的纽带，仍然有待于一种渐进的社会过程，一种民间的重建过程。国家主义的基本力量虽然长期地销声匿迹，但并未被扼杀；只是到了这个最后阶段才再一次发挥作用。美国人民具有基本上的同一性；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都是接受新教的伦理；他们在美国革命和开拓边疆中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他们都坚信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理想，从而在感情上产生出一种在原有联邦的内部重新和解的愿望。这种愿望以上千种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弗朗西斯·迈尔斯·芬奇1867年写了一首诗，向“蓝衣军与灰衣军”一并致敬^[14]；又如，1885年举行格兰特将军的葬礼时，南部著名的将军们戴着邦联的灰色绶带抬着灵柩；再如，1898年美西战争中，南部的军队踊跃地自愿报名参加联邦军队。到了19世纪末，民间的重建取得了政治重建所未能取得的成就，而在南北战争所维护的联邦国家范围内，再次涌现了一种自发的美国民族主义。

（潘绍中 译）

[1] 安德鲁·杰克逊1832年7月10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载詹姆斯·D. 理查森编《历届总统咨文和文件集》（1900年），第1卷，第322页。

[2] 例如，爱德华·钱宁：《合众国史》（纽约，1925年），第6卷，第3—4页；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美国史诗》（波士顿，1931年），第250—255页。

[3] 詹姆斯·G. 兰德尔在《南北战争的再研究》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载《南部历史杂志》（1940年），第6卷，第441—449页。

[4] 1837年2月6日在参议院的演说，转引自理查德·K. 克拉莱编《约翰·C. 卡尔霍恩文集》（纽约，1851—1867年），第2卷，第631—632页。

[5] 1843年的《解放者》刊头刊载了对宪法的这种提法，此后一直保留。

[6] 亚伯拉罕·林肯1858年6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演说（即“房子已经裂开”的演说），载罗伊·P. 贝斯勒编《亚伯拉罕·林肯文件集》（新不伦瑞克，1953年），第2卷，第461页。

[7] 据说系一位没有点出姓名的南部的国会议员之语，见詹姆斯·G. 布莱恩《国会二十年……》（康涅狄格州诺威奇城，1884年），第1卷，第272页。

[8] 关于参加斗争者都是不现实的观点，可参见例如G. F. 密尔顿《冲突的前夕：斯蒂芬·A. 道格拉斯与不必要的战争》（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1934年）；爱弗里·O. 克雷文《可避免的冲突》（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1939年）；詹姆斯·G. 兰德尔《林肯总统》（纽约，1945年），第1卷。关于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的观点，参见查尔斯·A和玛丽·R. 比尔德夫妇《美国文明的兴起》（伦敦，1927年），第1卷，第17章。

[9] 戴维·M. 波特、托马斯·G. 曼宁：《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1775年至1877年》（纽约，1949年），第215—216页；小阿瑟·M. 施莱辛格：《南北战争的起因》，《党派评论》，第16卷（1949年），第469—481页。

[10] 1850年3月4日在参议院的演说，转引自克拉莱编《卡尔霍恩文集》，第4卷，第556—558页。

[11] 见本卷原文第611页和620页。

[12] 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见本卷第24章。

[13] 《南部历史杂志》（1940年），第6卷，第441—449页。

[14]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部军队穿蓝色制服，南部军队穿灰色制服。——译者

第二十四章 美国南北战争

从军事史的观点来看，美国南北战争乃是第一场现代战争。^[1]这场战争标志着从主要涉及作战部队的老式战争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上的每个集团并且最终要求国家生活总体化的现代战争的过渡。南北战争既是一场人与人的较量也是一场物与物较量的战争。在战争中发明了或使用了大规模的军队、铁路、装甲舰只、电报、连发后膛枪、各种锥形机关枪、铁道炮兵、讯号气球、堑壕与铁丝网。^[2]这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战争，因此具有无限的目标。两方中必须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或是北部迫使南部回到联邦中来，或是南部迫使北部承认它的独立。其间毫无妥协可言，任何一方也毫无取得部分胜利可言。与18世纪的那种不慌不忙、目标有限的战争相比较，南北战争是粗暴的、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

这是美国人民第一次伟大的军事体验，也是他们最伟大的一次历史体验。1861年至1865年的这场戏剧性的事件，这场痛苦的磨炼和英勇精神，已成为美国民族意识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部分。同样，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可以与法国的1789年革命相提并论。它解决了，而且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某些分歧。它摧毁了奴隶制，保证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上升。不仅如此，它还维护了联邦，稳定了（如果说不是缔造了）现代的美国国家。尽管美国人现在还就这场战争所遗留下的某些问题争论不休，但它的伟大成果，即联邦维持下去了，这一点已为全国各方人士所公认。自1865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党、阶级或阶层就连分裂国家的可能性与可取性也没有人再考虑了。

在南北战争的前夕，北部是否会获胜，并不是有把握的。诚然，它拥有全部重大的物质因素。北部的23个州，即合众国，比南部的11个州，即南部联盟人口要多，也就是说人力后备要大，北部人口近2200万，而南部人口略多于900万。不过，在比较人力潜力时，还应考虑一些限制性因素。北部的总数包括了拒绝退出联邦的4个蓄奴州（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密苏里），它们向南部联盟提供了成千上万

的志愿军；太平洋沿岸的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从未向主战场派过兵。南北两部都有少数人反对这场战争：北部有“主和派民主党人”，南部有反战的山民。这两部分人可能人数相当。在南部人口总数中奴隶约占350万人，白人约为600万人。虽然奴隶不能直接服兵役，但如果把他们不计算在内，那也是错误的。他们间接地提供了重大的人力资源。许多奴隶充当民夫，在军队里赶车、做饭或修筑工事。绝大多数奴隶留在种植园里，在农业生产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播种、管理和收获庄稼。白人就要来干这些活儿。总之，奴隶解放了大量白人的生产劳动，使之可以服兵役。

但是，在衡量了人力方面的全部因素以后，北部显然比南部肯定占优势，能够征集更多的军队。不过，这个优势并不是决定性的。许多战争并不单靠人数多寡来决定胜负。不仅如此，北部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半时才在军队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南部联盟由于很早就实行了征兵制，因此迅速地动员了一部分很大的兵力。南部联盟军队到1863年人数一直增大，此后即一直下降了。1863年以前，联邦军队人数一般比敌军要多，但差距并不很大。在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1861年）时，两军兵力数量大体相等，各为3万人。夏伊洛战役（1862年）时情况也是如此，两军在第一天交锋时的人数都是4万人。在里士满战役（1862年）前的“七天战役”中，联邦方面投入兵力10万人，与南部联盟方面为8.5万人。其他各次战役中，北军人数稍多，但差别不是很大，如斯通斯河战役（1862年）为4.5万人对3.8万人；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为9万人对7.5万人；查塔努加战役（1863年）为5.6万人对4.6万人。在奇克莫加河战役中，南军数量占优势：7万人对5.8万人。有几次战役两军人数相差较大，特别是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1862年）和钱塞勒斯维尔战役（1863年）差不多为二比一；但是，到1865年的最后几个月时，南军由于屡屡战败和不断逃亡而人数大减，两军兵力差距达到了五比一之大，这是以后历代南部人所牢记不忘的。因此，南部联盟在战争的头两年中，通过在战场上取胜从而赢得独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比兵力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北部经济体制的潜力占优势。随着战斗转为持久而胶着后，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种差距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都很明显。战争刚开始时，双方都有能力生产足够供应老百姓所需要的粮食。由于战争继续下去，北部能够扩大生产能力

以满足新的战争需要，而南部的农业生产却在战争的负担下下降了。北部尽管有成千上万名在农场劳动的小伙子参军去了，但是由于日益使用了节省劳力的机器，如收割机、脱粒机、条播机等，生产反而增加了。在南部产粮区由于遭到联邦军队的占领或破坏不断缩小；而农业劳动力也由于奴隶们成群地逃向入侵的北军方面而减少了。但是，尽管受到破坏，南部至少在1864年以前，还一直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它的最低需要。战争最后两年中的大多数匮乏现象，主要是由于铁路系统能力不足，不能够把物资运往所需要的地方而造成的。

北部的巨大潜力在工业生产方面极为突出。内战前夕，北部拥有大约11万家工厂，共有8.5亿美元的资本投资，雇用了11.31万名工人，每年所生产的产品的产值约为15亿美元。而南部仅有2万个企业，资本为9500万美元，共有11万名工人，年产值为1.55亿美元。双方都努力要扩大自己的生产设备，但是北部由于开始时就已遥遥领先，对工业技术更为熟悉，因而必然远远胜过了南部。例如在关键的军火工业方面，北部的38家最大的枪炮工厂到1862年时已能日产5000支步枪；而南部工厂的最高日产量仅为300支，而且由于劳力与原料不足就连这数量往往也不能达到。

北部的工业优势意味着在经济体系转向为战争生产以后，北军一切供应都比南军充分。在战争的头一年里，双方都在欧洲购买大批物资，特别是武器。但是到了1862年，北部实际上已经能够供给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原料，不再依靠欧洲了。相比之下，南部尽管拼命扩大生产设备，却始终要依赖欧洲，要靠冲破北部海军封锁进口它能取得的任何物资。南部联盟在工业上的不足几乎对战争努力的每个方面都有影响。虽然以杰出的乔赛亚·戈格斯为首的军火部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南军的武器低劣于北军的武器，因此南部联盟军队的火力很少能与北军的相匹敌。南部的经济无力为它的军队提供制服、鞋靴、药品——也无力为它的平民百姓提供普通消费品。这种匮乏影响了南部的战斗意志。1863年以后，南部士气严重低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民认识到南部的资源已经枯竭，而敌方的资源却似乎无穷无尽。

北部在运输方面具有显著的长处。它具有更多、更好的内陆水运，有更多的铺面的道路、更多的车辆和大牲畜。但是北部最大的优势还在于铁道。南北战争是第一次铁道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战争。铁道把原料运往工厂，再把制成品运往军事分配中心。铁道把新兵运

到训练营地，把经过训练的士兵运到兵营。铁道长距离地而且空前快速地把部队从一个战场运往另一个战场。1862年，南部联盟在西面的主力野战军从北密西西比经过莫比尔转移至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全程800英里。1863年，一支联邦军队从东战场转移到西战场只用了8天时间，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北部大约有2万英里铁路，而南部陆地面积相当，却只有1万英里的铁路。不仅如此，南部的铁路线大都是为连接两个特定的城镇而修建的，因而比较短；在关键地段之间往往有很长距离的间断；而各条线路所采用的轨距也不一致。少数的几条直达线，如里士满到孟菲斯，里士满到卡罗来纳之间的铁路，又靠近南北交界线或海边，因此容易受到攻击。战前，南部需要的铁路车辆是从北部工厂购买的，或者虽从南部工厂购买，但这些工厂在战时已集中力量生产军备了。结果，车辆一旦遭到破坏或用坏时就无法更换。铁路系统越来越糟，到了1864年几乎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铁路的瓦解是南部战败的主要原因。^[3]

北部还有一个强大的武器——海上力量。1861年，联邦海军并不大，名类舰只只有90艘，水兵9000人。海军力量迅速扩大后很快就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864年，联邦海军已拥有大约670艘舰只，5.1万人。南部联盟的海军平均总数无法得出，因为它的舰只经常被击毁；不过人员只有4000名。北部的海上力量在两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它确立了对南部的封锁。由于南部海岸线很长，封锁这条海岸线的使命是难以执行的；甚至在联邦的海军扩大到最大规模以后，要做到对它实行完全有效的封锁，也是不可能的。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偷过封锁线的船只一直都在活动。虽然切断南部物资供应的封锁所取得的效果有些言过其实^[4]，但是，封锁毕竟使南部联盟受到了很大损害，使它无法运进体积较大的物品（偷渡封锁线的船只必然是小型的船只），它使南部联盟的巡洋舰不能使用南部港口作为基地，因此它还使南部人民感到被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海上力量的第二个作用是支援联邦陆上部队征服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大西部地区。在这一带的大河里可以航行炮舰和运输船只。在西面的一些最大的战役都是海陆军联合行动。在西面河流上不使用海军力量，联邦军队能否占领西部，是值得怀疑的。

某些历史学家^[5]，由于看重北部的物质优势，就得出结论说南部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其实，其间差距并不像表面上看来

那样是一边倒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直到1863年南部联盟本来有可能赢得军事上决定性的胜利。北部并不是全部优势在握。南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自己的地区内进行防御战，处于内线。北部入侵者则不得不保持很长的运输线并在占领区部署卫戍部队。而且，因为这是一场内战，因此北方必然不仅是攻占敌方首都，或者打败敌军，它还必须征服人民，使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已经毫无希望。或许，在南部联盟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的机会消失以后它的最大希望是在心理方面。南部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目标而战，即独立；它对北部并不怀有侵略的意图。另一方面，北部却是为了维护两项相当抽象的原则而在打一场侵略性的战争：维持联邦，然后解放奴隶。北部只要退出战争就可以在任何时刻取得和平和自己的独立。如果南部能使北部相信南部是无法打败的，那么，即便是在1863年以后，南部仍有可能赢得自由。有好几次，特别是1864年夏天，看来北部已经非常丧失信心而要放弃这场斗争了。

有头脑的南部人认识到北部经济潜力占优势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相信，南部的军事领导与勇敢精神可以克服北部的物质优势。但是，即便是人的因素不能超过经济因素，仍然还有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胜利希望——欧洲会站在南部一边进行干涉。甚至连最现实的南部人士也相信这种“干涉”论，其论点大体如下：英法两国的经济体系依靠它们的纺织工业，而两国的纺织工业则必须要有南部的棉花；因此，英法两国将迫使北部停止战争并同意南部独立。于是，外交手段便成为南部联盟安邦定国的一个重大因素了。南部希望得到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希望得到物质援助，因此便说服英国和法国打破封锁，迫使北部接受调停。合众国则认为，只要没有外来干涉的干扰，它是可以解决自己内部的纠纷的，所以竭力阻止对南部的承认和外来的干涉。

说到外交，关键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有能力对美国的内战进行干涉，也只有它们才会感到自身的利益会受到战争结局的影响。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就已结成同盟，两国在许多地区继续采取共同行动。两国的谅解之一是：关于美国的问题是属英国势力范围以内的。因此，法皇拿破仑三世将不会在英国首先采取行动之前进行干涉。欧洲的第三个大国俄国，和美国一样，也是一个新兴国家，同样感到它的抱负受到了英国的压抑。由于这种所谓的

利害一致，俄国公开对北部表示同情。1863年，俄国派出了两支舰队，一支去纽约，一支去旧金山。所以派出这两支舰队，实际原因是就要就波兰问题对英国进行战争威胁：俄国想使它的舰队进入阵地以便对英国的海上贸易发起攻击。但是在美洲，人们却普遍认为，俄国人是为了对合众国表示友好而来的，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经久不衰的说法：如果英法两国一旦企图打破封锁，俄国舰队愿意提供支援。

冲突开始时，英法统治阶级确实对南部联盟表示同情。虽然有些人是基于他们感到在文化上与蓄奴州的种植园主贵族同出一流，但是他们之所以同情南部联盟，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合众国所代表的那种理想和现实。极力要求政府应有更广泛的人民基础的欧洲自由派人士，曾经欣慰地举出美利坚合众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实行民主制的成功事例。这个论点是保守派人士难以回答的。伟大的英国自由派人士约翰·布赖特曾经对美国影响的性质作了雄辩的描述：

“特权在过去多年中一直展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景象。它看到了有3000万人幸福而富裕地生活着，没有国王，没有宫廷的生活，没有贵族，只有因为才智出众和品德高尚而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这一伟大试验竟然成功，古老的欧洲可能发生的一切，将会使特权不寒而栗。”^[6]可是，这个伟大的试验看来正在垮台，而它的失败有可能给各地的民主制度抹黑。而且，多年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也不安地看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力量的增长。他们看出，一个独立的南部联盟的出现，就会是对这个在西方崛起的年青国家的一种遏制。一个分裂的美国将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强有力的国家在西半球将不复存在。分裂的过程一旦开始，可能会继续下去。继一个独立的南部之后而来的将是一个独立的西部，各美洲共和国将不得不寻求英国或法国的支持，从而将沦于欧洲的控制之下。甚至英法两国反对奴隶制的自由派人士，也倾向于赞同南部的事业。北部政府最初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坚持说它之所以要进行战争是为了恢复联邦而不是要摧毁奴隶制。许多自由派人士因而得出结论说：南部是在为争取自治权这一崇高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战斗。

但是英法两国的舆论从来不是坚定不移地对南部表示同情的。特别在英国，上层阶级的某些人士从一开始就为北部仗义执言。像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等自由派人士预见到，不管北部政府如何解释这场战争的宗旨，它最终将必然成为一场摧毁奴隶制的战争。他们对他

们的工人阶级中的追随者们描绘说，美国的这场战争乃是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说法在那些政治上已经觉悟但仍未享有选举权的劳工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不论英国的保守党领导人的看法如何，英国工人把北部的事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在群众集会上，在决议中，并且通过布赖特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在议会中的演说表示了他们的同情。当林肯总统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1863年1月1日）时，他们觉得，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争取自由劳动的斗争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这一宣言把解放奴隶作为北部的战争宗旨的一项正式目标，在使欧洲的自由派舆论转而反对南部联盟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敌对行动刚刚开始时，英国政府即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承认南部联盟为交战一方。法国和其他国家也照样行事。英国的行动在合众国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北部政府声称它不是在进行战争而是镇压叛乱，因此给南部联盟以交战国地位的本身就是非中立行为。虽然如此，英国的做法既符合公认的中立惯例，也符合现实的情况。无论合众国官方对这场冲突如何解释，它实际上是在打一场战争，在林肯自己宣布进行封锁的声明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北部深信，英国并不打算一直保持中立，在承认了交战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承认南部的独立。

然而，无论英国、法国，或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给南部以外交上的承认。虽然英法两国曾经有几次商讨进行调解的问题，但是它们都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进行干涉的问题。有几个因素影响到外交斗争的最后结局。一般来说，北部外交使团的各级人员，都比其对手的地位优越。朱达·P. 本杰明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担任南部联盟的国务卿。他虽然为人精明能干，但他在陈述南部的事业时，却未能打动欧洲各国政府和舆论。他的北部对手，威廉·H. 西沃德，尽管开始时犯了以武力相恫吓的错误（他最初似乎以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侮辱英国人），却成为一位杰出的国务卿。北部很幸运，派驻伦敦的代表是一位干练、出色的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担任过美国总统。他轻而易举地压倒了南部联盟的代表詹姆斯·M. 梅森。梅森是一位脾气和善、颇有农民风度的弗吉尼亚的乡绅。南部派驻欧洲的外交官们身上反映出南部在文化上长期处于与

世隔绝的状态，他们对于欧洲人的思想一无所知；特别是低估了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反奴隶制情绪的强烈程度。

棉花外交没有起到南部预计的决定性作用。南北战争开始时，英国的纺织厂商拥有剩余的库存棉花。他们在1860年从美国进口了大约258万包之多。战争和封锁所造成的棉花缺货情况首先使这些厂家能够把手头剩下的制成品高价售出。到1862年，只进口了7万包，棉花供应日益不足，英法两国都身受其害。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英国就有50多万名工人失业。但是，英法两国的厂商设法从埃及和印度运进了足够数量的棉花以免彻底垮台。英国的纺织工人们，甚至包括那些失业的工人在内，仍然继续支持北部，这或许是最有意义的一点。

事实证明，其他的经济力量要比棉花匮乏强大得多。英国的庄稼连年歉收，国内的小麦大幅度减产，已经达到这样地步，每年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小麦；小麦大王一时显得比棉花大王更为强有力。英国的一些重要行业发现他们从这场战争中发了财。军火、纺织、亚麻布和其他工业由于和美国的交战双方做生意，利润急剧上升。由于南部联盟破坏贸易的驱逐舰（其中有的是英国建造的）从海上骚扰美国的贸易，英国就把它的主要商业对手的海上运输贸易接管过来。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起到了阻止英国进行干涉的作用。解放奴隶宣言使得英国的舆论显著地转变而有利于北方。英国作为最强大的海军大国，其本身就是倡导使用封锁这个武器的主要国家，因此对于干涉北部的封锁行动颇为犹豫，唯恐因而制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最后，除非南部联盟看来已是胜券在握，否则英法两国即使想采取行动，但谁也不敢冒进行干涉的风险。否则，它们就不得不和北部打仗，而北部却是大有还手的能力的。但是南部却从来没有出现肯定会有把握获胜的情况。在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曾经有一个短暂时间，南部似乎已胜券在握——这时英法确有可能采取行动——但是由于联邦在安提塔姆和斯通斯河打了胜仗，这个短暂时刻即告消失，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在南北战争期间，发生过三次事件使合众国与英国的关系紧张起来；一次造成了危机，几乎导致战争。第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在美国史中称为“特伦特号事件”，发生于1861年年底。当时，南部联盟政府委派了两名专员詹姆斯·M. 梅森和约翰·斯利德尔前往英国和法国。他们越过封锁线来到哈瓦那，然后搭乘英国轮船“特伦特号”前往英国。此时，在古巴水域里恰有一艘美国快速舰“圣哈辛托

号”，是由查尔斯·威尔克斯舰长指挥的。他获悉梅森和斯利德尔在特伦特号轮船上后，未经请示上级授权便决定前去抓他们。在特伦特号离开哈瓦那以后，他就截住了这条船，强迫船长交出这两名外交使节并把他们押往波士顿。北部的公众向他欢呼，把他说成是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他逮捕了叛军的专员，还使不守中立的英国丢了脸。他实际上已把他的政府置于一种微妙的境地，英国政府谴责威尔克斯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准备提出释放俘虏，赔偿损失和进行道歉的要求。原来起草的文件几乎是一道最后通牒，美国政府十有八九是会予以拒绝的。可是在发出之前却把文字改得不那么激烈了；这主要是出于女王丈夫的大力主张，以便给美国政府一个台阶可下。林肯和西沃德认识到北部不能再卷入一场对外的战争。他们也知道，如果把被俘获的两名外交官立即释放，就会激怒北部的公众。他们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一直到舆论冷静下来，然后才放还梅森和斯利德尔并间接地表示了歉意，从而使英国感到满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两国政府所力争的恰恰是它们历来所反对的政策：英国争取的是中立国的权利而美国争取的则是交战国的权利。其实，梅森和斯利德尔分别到达住所后并没有为他们的国家作出什么成绩。梅森在伦敦从未受到正式的接待；他于1863年前往法国时，深信英国是偏袒北部的。斯利德尔在法国虽然与法皇交往友好，但在取得法国的承认或使之进行干涉方面则一事无成。他们两人在北部备受铁窗之苦时倒是对于南部联盟有用得多。

第二个事件使美国怀疑英国不打算信守适当的中立的思想加深了。战争开始不久，南部联盟政府为了削弱封锁，决定在欧洲购买或建造一批快速驱逐舰用来破坏北部的海上贸易。南部联盟海军部以为这样一来北部就会从封锁线上抽出一些舰只去追捕这些驱逐舰。南部联盟在英国建造和购买了6艘舰只，它们从英国港口起航开始执行它们的任务。其中最著名的是“亚拉巴马号”。虽然合众国驻英公使亚当斯经常将每一条军舰预定的起航日期通知英国政府，但英国政府并未采取有效行动加以阻止，总是声称它没有掌握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这些劫掠商船的舰只是属于南部联盟的。1863年以前，合众国唯恐引起英国的干涉，不敢提出过分强硬的抗议。它的抗议只限于指责说，允许建造这些驱逐舰是违反中立条例的。开战以后，这些抗议就构成了所谓“亚拉巴马号损坏赔偿要求”的基础——美国向英国提出了这些要求，而英国则如数予以赔偿。

第三个事件实际上是第二个事件的继续，即莱尔德撞角军舰事件。1863年，南部联盟开始感到封锁的压力。尽管劫掠商船的舰只几乎使北部的商船队完全从海上消失，联邦政府仍然毫不放松它的海军封锁。南部政府采取了一个打破封锁的大胆行动：它向莱尔德造船公司定制两艘强大的铁甲舰。这些装有撞角的舰只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北部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它可以忍受贸易上的损失，但封锁必须坚持下去。不仅如此，既然战争形势趋于对它有利，合众国就可以更为坚定地表态。西沃德指示亚当斯通知英国政府说，如果准许为南部制造的这些重型舰只或任何其他舰只离开英国港口，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亚当斯递交了信件。但是，英国政府甚至在收到信件之前就已扣留了这两艘重型舰只。事实上，内阁在几个月以前已决定禁止英国的造船厂为南部联盟造船。这一新政策合众国已经看出来了；亚当斯发出戏剧性的警告，其目的不过是要保证新政策得以贯彻。英国已猛然醒悟，英国作为一个海军大国，行事有欠审慎。它曾经准许向南部提供的支援，很可能在将来的战争中给自己带来类似的报复。因此它便赶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免制造一个危险的先例。

拿破仑三世如果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话，他是会对美国的战争进行干涉的。但他不得不追随英国，只能对南部表示同情，并且允许南部在法国购置骚扰海上贸易的驱逐舰。他希望南部获胜，主要是因为他野心勃勃，想要在西半球重新确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如果美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无论哪一个都无力阻碍他实现他的图谋。他抓住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机会，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法国一手控制的帝国。墨西哥在南北战争前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银行家手里借了8000万美元。当这个政府近于破产无力还债时，那些债权人便纷纷要求本国政府协助，三国同意派遣一支陆海军部队前往墨西哥。1861年下半年，联军占领了几个沿海城镇，于是墨西哥提出愿意清偿债务。可是几个入侵国家在目标上开始发生分歧。1862年4月，英国和西班牙撤军，但是法军却占领了墨西哥城，并于1863年在当地某个政派的支持下宣布成立了一个以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为皇帝的新政府。拿破仑的行动显然与门罗主义相违背。但是，合众国由于害怕引起法国的干涉，由于国内问题自顾不暇，只敢提出一项正式抗议而已。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它才能够对拿破仑三世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撤回军队（1866—1867年）。于是马克西米连政府垮台，他本人也被他的臣民处死。南部联盟由于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对这个新出现的附庸国正

式表示承认。但是，南部的舆论却倾向于谴责法国的冒险行径，认为这是对门罗主义的侵犯。这就提出了历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假使南部赢得了独立，那么承认并执行门罗主义的究竟是哪一个美国？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门罗主义是否还能维持？

北部经济体系的辉煌成就，预示着一个新的工业巨人在崛起，欧洲的观察家们对此并非没有看到。工农业的生产能力都扩大了。北部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后来美国国民经济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样立了大功劳。它不但为现代战争的巨大需求提供了物资，而且扩大了国民财富。它制造商品的速度超过了战争破坏的速度。这种大发展主要是战争所促成的，是政府大量采购各种物资而造成的。虽然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按照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干涉以动员经济，但是政府的活动却推动了经济体系的几乎每一个部门。

发展最大的是工业。供应武装部队军需品的那些工业部门产量的增长最为突出：钢铁、纺织、靴鞋、武器、军火、铁路和煤炭。煤炭年产量从和平时期的1300万吨猛增至2100万吨，羊毛年消费量从8500万磅猛增为2亿多磅。有些铁路的运输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之多，而内陆航运量则增长更大。这种惊人的发展，部分是由于改造了老厂或建设了新厂，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使用了战前虽已采用但却尽量少用的机器和工艺。胜家缝纫机使得纺织业能够满足对军服的要求，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男子成衣。在制鞋工业中也采用了一种类似的工艺，即机器纳鞋，使制鞋工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在武器制造中使用了零件可以互换的原则，收到了惊人的效果。战前，两家最大的军火厂年产武器一共只有2.2万件；到1862年，一家工厂年产步枪即达20万支。

北部的农业生产也取得了类似的巨大成就。除了满足老百姓的正常需求外，还要求农民为军队提供口粮并解救英国的小麦短缺状况。农业体系几乎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国内和国外的需要。小麦产量从全国的1.42亿蒲式耳猛增为仅北部即生产了1.91亿蒲式耳，而出口量则增加了两倍。羊毛生产从6000万磅增至1.42亿磅。如同工业一样，农业的增产部分是由于扩大了生产设施，即在西部扩大了新开垦的耕地面积，部分是由于使用了战前即已采用但却从未广泛利用的机器。农民们由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时候转而依靠节省劳力的各种机械：割草机、脱粒机和收割机。到战争结束时，在北部农

场上使用了25万部收割机。小麦生产的巨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些机械。

刺激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共和党在战时制定的立法。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共和党人代表着北部的企业和农业的企求；他们鼓吹过去联邦党—辉格党的主张，即联邦政府应该用补贴和可享受利益的法律来扶持经济。随着南部反对派退出国会，他们就着手去满足那些使他们上台掌权的那些集团的经济要求。大多数法律都对企业和金融界有利，这就表示共和党里的东部派比西部农业派日益占优势。

西部派的主要收获是《宅地法》（1862年）和《莫里尔土地赠与法》（1862年）。根据前一项法律，任何公民或任何宣布愿意成为公民的外国人，均可登记获得四分之一平方英里（640英亩）的公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提供已在该土地上居住5年的证明后，只需缴纳一笔象征性的费用即可得到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证。战后，成千上万在西部定居的人就这样获得了“免费”农场。莫里尔法满足了西部要求联邦对农业教育给予援助的愿望。该法规定，各州每有一名联邦众议员就可获得3万英亩的公地，这些公地的收入将用于农业、工程和军事科学方面的教育事业。这一措施在战后为所谓的“赠地学院”的大发展提供了基础。

共和党中的企业派在关税、铁路和移民立法方面得到了重大的好处。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规定对现行关税税率作了不大的提高。后来的措施（1862年，1864年）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7%，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因此这就使工业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保护，使之不受欧洲的竞争。主张建筑横越大陆铁路（从密西西比流域的一点至太平洋岸）的倡导者们说服了国会通过立法（1862年，1864年）成立了两家公司，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与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和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之间建造一条铁路。政府将向两家公司提供贷款并赠予公地给予援助。这条铁路线的修建工程直到战后才开始动工。这时，在其他方面提出倡议的人们也在寻求并且获得了类似的立法支持。西部的大多数铁路的修建都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补贴。这些国内的建设措施的规模是联邦党人或辉格党人所难以预料的。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从欧洲来的移民数量急剧下降，因而可能会造成劳力短缺时，国会立即设法加以解决，通过了一项契约劳工法律，授权雇主可以支付旅费从国外招进劳工，而用这批移民的未来工资作为抵押以偿还这

笔费用。主要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70多万移民便在内战期间进入了美国。

对企业和金融业最重要的立法是国民银行法（1863年，1864年修正）。该法建立了一套新的金融制度，即“国民银行体系”，一直延续到1913年。这项措施的提出，部分原因是要对银行业作长远的改革，部分原因则是要解决政府当前现金的需要。法案的制定者之一是财政部长萨蒙·P. 蔡斯。他们提出这一法案，目的在于恢复由联邦政府控制通货（在内战前夕有1500家持有各州特许证的银行在发行币值相差甚大的纸币）。他们争辩说，国家需要有统一的纸币，而国家对银行体系的监督将使政府能够更经济地推销公债。该法提出了一个程序，由“银行业协会”取得联邦特许证成为“国民银行”。每家协会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本并将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投资于政府债券，它就可以发行纸币，纸币总额可达该协会拥有债券时值的90%。国会为了保证通货的标准化并促使各州银行加入这一体系，对各州银行的纸币征收寓禁税。到内战结束时，这个体系已有11582家银行发行纸币，总额达两亿多美元。虽然有些银行家不喜欢这项法律的调节作用，这个制度最终还是首先对金融和债权阶层有利；东部发行的纸币仍然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从历史上来看，“国民银行体系”标志着这是回到了联邦党—辉格党所主张的政府与金融界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而这正是杰克逊派民主党人所极力想要摧毁的。

北部由于拥有广大的财源，因此它有充裕的资源可以负担现代战争的巨大费用。但是，北部对战争费用的筹措并不十分高明。政府和财界的领袖们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财源，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为任何耗费巨大的事业提供资金方面尚缺乏经验。这对于一个几乎不缴任何赋税的人民来说，要对一场每日耗费竟达200万美元的战争的现实有所理解毕竟是困难的。北部提供战费主要来源有三：税收6.67亿美元；发行公债收入26亿美元；发行纸币4.5亿美元。

内战爆发时，蔡斯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没有提出征收新税的计划。他和议员们都认为战费主要应靠发行公债来解决。1861年实施的一项主要措施是征收为数不大的所得税，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直到1862年，国会才通过了一项征收适度税收的法案，即国内税收法，该法几乎对所有商品和大部分的行业征收适当的税收。虽然政府的计划并没有充分地利用国家的税源，但征收战时税仍然标

志着一种新的做法。政府通过战时税这个媒介对那些从来没有向中央政府纳税的成千上万的人伸手要钱了。合众国正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内税收系统，这也是内战所造成的全国一体化的许多意外结果之一。政府从发行公债中取得的收入，为全部其他收入总和的三倍。但是，销售债券的过程，却由于蔡斯和银行家们之间的意见不同而受到妨碍：这位财长赞成发行短期低息债券，而金融家们则坚持主张发行长期高息公债。双方不得不进行妥协。蔡斯在推销债券上最有创见的贡献是寻求人民广泛地认购政府公债。财政部向小数量购买者一共售出了4亿美元的债券，成为近代史上大规模筹措战费的最早事例之一。1862年年初，税收所得不多而公债销售不快时，政府就靠发行纸币。“合法货币法”授权印发纸币通货，这种纸币由于它的颜色被人称为“绿背纸币”。因为绿背纸币没有硬通货作后盾，兑换全靠政府的信用，因此币值波动很大，与金币的比值介于0.39美元至0.69美元之间。这是解决政府急需资金的一种省事办法。但是，绿背纸币造成物价上涨，这也就使战争费用增大。然而，纸币对经济却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这些绿背纸币连同各国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一同构成了美国的流通货币供应的大部分。合众国也在建立一种全国性的通货。

北部战时岁入的大部分用于维持人数众多的军队。开战之初，正规军人数只有1.6万人。林肯总统在未经宪法规定的极限的准许下，擅自下令增加军队人数并征召志愿兵为国家效劳。1861年7月国会开会时，根据林肯的建议，规定募集50万志愿兵服役3年。战争初期，全国人民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志愿兵制征募到了足够的兵员以补充军队。但是在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应募的人数惊人地下降。最后政府终于认识到，它将不得不采用征兵制。因此，1863年3月，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征兵法律，规定凡属20岁至45岁的未婚男子和20岁至35岁的已婚男子，凡身体健全者，均须服兵役3年。尽管免服兵役的人数很少（政府高级官员和独力抚养亲属的男子），但应征人可以雇人代替或向政府缴纳300美元而不服兵役。人们尖锐地批评这些做法是特权的典型，因此以钱代役的做法取消了。

实际上，这项法律并不是要直接征兵。其背后的用意是要用征兵作为威胁以促使人们应募入伍。各州每隔一段时间均分摊一个应募指标。如该州用补助金或其他奖励办法完成其摊派的指标，该州既完全免于征兵。只有在完不成摊派指标的州中，联邦政府才在该州征兵。

尽管这种做法颇为特别，但它却可以使军队得到补充。联邦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865年达到了顶峰。由于战时的统计数字不确，因此无法提出征集的确切人数。据估计，有150万人服役3年。伤亡率很大。如果连南部联盟的伤亡一并统计在内，南北战争是美国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战争。北军死亡总数为36万人，南军为25.8万人。在北军死亡总数中，11万人系阵亡，其余则死于疾病。

美国人民在战前几乎并未感到政府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征兵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既陌生而又令人不快的控制。尽管大多数人对这种纪律屈从了，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劳工、移民和主和派更加反对。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纽约市，因而发生了暴力事件和骚乱。某些州长对于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征兵提出异议，但是林肯政府继续强迫人们从军，战争的影响所及，摧毁了北部各州的权力，犹如战争的结果必将摧毁南部关于各州拥有主权的概念一样。

北部把它的总统看作一位决心维护美国国体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具备政治家的种种品德——有智慧而且德高望重，对于时代的精神和民众的思想情绪有深刻的理解，掌握高明的政治技巧——以及利用这些品德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决心。林肯的使命是一个美国政治家所未遇到过的最为艰巨的使命，即维护一个国家。他必须恢复联邦，指导内战，同时还要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基本上保持目标一致。正如阿伦·内文斯教授所着重指出的那样^[7]，林肯之所以能够完成他的伟大使命，是因为他具有政治家的另一要素：激情。林肯的激情是对民主制度、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典范即美国联邦，对其称之“世上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8]的激情。

在林肯就任总统时，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自知不堪当此重任的人物。其实，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巨大的内在力量，对自己的能力极有信心。从他挑选内阁的人选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内阁中有4个人曾经是和他争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对手。总的说来，才干超出一般水平之上，而且有3名成员，西沃德、蔡斯和陆军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都是第一流人才。尽管有几名部长自认为才干要比林肯高明，他都能设法驾驭他们为他自己的目标服务。林肯的信心还表现在他能够大胆地行使他拥有的指挥战争的大权。他对总统在战时应起什么作用的想法比较开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甚至不惜违反宪法的规定；他说，他绝不拘泥细节因小失大。他召集部队镇压“叛乱”，

这无异是宣战；他不按宪法规定擅自扩大正规军的人数；他宣布对南部实行海军封锁。

由于行使总统的战时权力因而引起最大不满的事件是在出现反战行动的地区停止实行民法。有两类人反对战争的努力：忠诚的蓄奴州中的同情南部的人和“主和派民主党人”。民主党分为相当明确的三派。“主战派民主党人”是少数，他们同意担任职务，并且基本上并入了共和党的组织。民主党的绝大多数可以叫作“正规的民主党人”，他们一般地支持战争，但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并保留批评政府的权利。在民主党主体范围之内活动的还有第三派，即“主和派民主党人”，又称“铜头毒蛇”。这是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反战派。他们以西部诸州为中心，代表旧的农业传统；他们担心为了工业和国家主义而会牺牲农业和州权。他们主张停战，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南部参加；并且修改宪法以维持州权。因为主和派民主党人赞成维持国家，所以即使他们提出的方法不切实际、毫无可能，他们毕竟是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却陷于分裂。有的支持建立一个西部联盟；有的组织秘密团体，据说还从事叛国活动。林肯使用派军队逮捕这一武器对付反战分子。

起初，他只在某些特定地区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权；但1862年，他宣布凡阻拦他人应征入伍，抗拒民兵征召或从事不忠诚活动者均将受到军法审判。估计有1.3万人被捕下狱。悍然的逮捕使得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其中也包括那些支持战争的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只不过代表着为了强制取得现代战争所需要的统一而感情用事罢了。

共和党内也有派别——激进派和保守派。虽然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基本上意见一致，但在作为战争的结果应对奴隶制采取什么政策上分歧很大。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激进派的典型代表。他们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以林肯为首的保守派则担心种族关系上的突然而激烈的变化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主张在若干年内逐步地、有补偿地实现解放奴隶。在两派斗争中，激进派取得了胜利，这倒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出于战争形势的必然结果。保守派主张应进行战争以挽救联邦而不是要去摧毁奴隶制，因此他们一直在要求人民打仗并作出牺牲，以保存那个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次战争根源的制度。战争打得越久，北部舆论就会更加肯定地要求摧毁奴

隶制。到1862年的夏天，舆论已经迅速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7月，激进派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个“充公法”，宣布凡援助和支持叛乱者，其奴隶皆予以解放。

林肯总是最能够体察民情的，他看出了时代的迹象。他认识到，为了要达到他的保存美国国家这个更大的目标，他就不得不放弃他的防止突然打倒奴隶制的这个较小的目标。为了挽救国家，他必须保持激进派这些无条件的联邦主义者的支持；如果北部多数人要求把解放奴隶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绝不能抗拒他们的意志而造成人心涣散。他于1862年7月作出决定，发表一个总统宣言给予南部联盟境内的奴隶以自由，从而使自己站到反奴隶制运动的前列。他的决定是以这样一个正确的原则作为依据的，即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作出所需要的改变。他的决定符合英美实用主义最良好的传统。

林肯一直等到战争形势有了好转时才宣布了他的宗旨。1862年9月22日，他在安提塔姆战役之后发表了一项初步宣言，声称他将于1863年1月1日宣布给予届时仍然进行叛乱的所有各州中的奴隶以自由。由于到期没有一个州回归表示忠诚，于是他便发表了不可更改的“解放宣言”，宣布永远给予南部联盟的绝大部分地区中的奴隶以自由。田纳西州不包括在内，因为该州的大部分地区均在联邦控制之下。还有西弗吉尼亚和南路易斯安那，这两部分也为联邦军队所占领。这些地区所以除外，大概是因为它们不是敌方领土，因而不适用战时权力。宣言当然也不适用于那4个忠于联邦的蓄奴州，也没有在确实适用的地区把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废除。宣言并没有立即使奴隶获得自由；实施这一宣言不得不等到联邦军队征服南部以后。但是宣言的颁布意味着战争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它不仅是一场拯救联邦的战争，而且也成为一场摧毁奴隶制的战争。因此，废除奴隶制的进程一旦开始，它就不可能再行逆转了。1865年年初，国会将第13条宪法修正案送交各州批准：这个修正案使全国各地的奴隶获得自由并废除了奴隶制度。

1864年，合众国又面临着总统选举，这是在战时举行的头一次总统选举。选举中要求全国人民就继续战争或放弃战争的问题作出抉择；这是民主政府历史上少有的几次选举之一。人民投票赞成战争。在民主党取得重大胜利的1862年国会选举后，共和党企图加强他们的组织，把它变成一个所有主战集团的联合。他们尤其要争取主战派民

主党人，因此把党的名称由共和党改为联邦党。林肯就是联邦党1864年的候选人（虽然许多激进派人士本来是想挑选一位不那么保守的领袖的），主战派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提名人。这年夏天，情况看来似乎共和党人将会在11月大选中被击败。林肯本人也以为会被击败。对战争的厌倦情绪笼罩着北部人民；他们似乎准备承认南部是不能被征服的了。诚然，许多人投民主党的票就反映了这种低落的情绪。奇怪的是，北部看来是要在南部已经山穷水尽、无力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放弃这场斗争了。一些激进派领袖深信林肯将会把党拖向失败，因此他们打算不让林肯提名，而以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来取代他。

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反对林肯的时候，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民主党人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激进派既害怕又痛恨的前将军乔治·B. 麦克莱伦。主和派在竞选纲领中塞进一条，指责战争已经失败，要求停战并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尽管麦克莱伦拒绝接受这条纲领，但民主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成为一个主和党了。这条主和纲领和麦克莱伦的提名，只能起到促使激进派团结起来支持林肯的作用罢了。同时，北军取得了几个重大胜利，特别是攻克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使民心重新振奋起来，对共和党又寄予希望。

11月计算选票时，林肯获得了212张选举人票，麦克莱伦只得到21张。但是，林肯获得的选民票的优势仅为40万张。只要几个大州的选票稍有变化，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但是即使民主党获胜也不会改变战争的结局。即使麦克莱伦决定按照主和纲领去做，他也要等到1865年3月才能就任，到那时已是南部接近垮台的时候了。

分裂运动结果所造成的南部国家——“美利坚诸州联盟”，是一些主权州的联盟。最初退出联邦的7个州的代表于1861年2月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开会，制定了一部宪法，选任了行政官员。（后来退出联邦的4个州也接受了蒙哥马利宪法）州主权在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承认。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比原来的联邦宪法所规定的要少，而各州保留的权力则更大。南部的意见一致的原则，即少数制约多数的权力，在文件中屡见不鲜。通过各种立法——接纳新州、通过拨款法案——都需要两院议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只要有3个州即可要求并强迫召开所有各州参加的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各州退出联盟的权利在宪法中有所暗示，但很有意思的是，却没有明文规定。南部联盟政府同

联邦政府一样，也实行三权分立：一个由总统和副总统组成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国会，和一个全国法院。

蒙哥马利城的政府缔造者们极力想要避免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代表一个仓促行动的革命运动。他们推选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推选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为副总统。戴维斯是一位稳健的脱离主义者；斯蒂芬斯虽然强烈地主张各州有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却怀疑是否真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必要。挑选戴维斯是个大错。他和他的在华盛顿的对手大不一样，他的对手的使命是维护一个国家，而戴维斯则是要创建一个国家。他失败了，主要因为他缺少政治家的许多必要的素质。他为人正直，有头脑，是一位卓越的行政管理人才。他过分相信自己的才能，刚愎自用，容不得任何批评和不同的意见。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管理才能，在日常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在政治考虑上却超不出一个内阁部长的水平。他从理智上信仰南部的事业，但却缺少激情。他处理公文有条有理，无可挑剔——就是无动于衷。也许，他作为一个革命事业的领袖，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拒不承认这个事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南部联盟已经是一个基础巩固而且为人公认的国家，并且按此想象去行事。当形势需要拼命的干劲的时候，他却埋首于按部就班的官样文章之中。奇怪的是，领导一个基础巩固的政府的林肯，却比戴维斯表现出更大的革命劲头。

戴维斯的内阁充其量不过是一批中庸之才的汇合。其中几名阁员是能干的行政官员，但仅此而已。最有才干的是朱达·P. 本杰明，他担任过三种不同的职务，最后出任国务卿。他把自己的精力只用于他所主管的部门，从不打算在许多大的政策问题上去影响戴维斯。内阁人员经常更换。前后有过三任国务卿，两任财长，五任陆军部长和四任司法部长。内阁人员的变动表明戴维斯不愿意放权。部长们实际上是他的办事员。其中许多人看清了这一点，因而辞职而去。

在北部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候，南部却经历着一个匮乏、痛苦和作出牺牲的时期。在战争的重压下，停滞的南部经济系统几乎崩溃。南部缺少工厂、机器、生产经营者、熟练工人和创造新财富的资源。北部在创造新的资源，而南部的人力、物力却迅速地被军事机器的需求消耗殆尽。不仅如此，战争，具体说是封锁，切断了南部的主要税收来源，即在欧洲出售它的农产品。南部经济生活的状况，给那些必须

为南部联盟提供战争费用的人们提出了一些难题。因为剩余资本过去通常已经投资于奴隶和土地方面，银行或个人拥有的短期资产数额寥寥无几。南部的银行（在南部唯一的城市中心新奥尔良的除外）比北部的银行不但数量要少，而且规模也小。政府所仅有的硬币，就是在战事初起时从南部的合众国铸币厂夺取的100万美元。

南部联盟筹措战费来源有三：税收、公债和纸币。南部联盟的议会和北部的国会一样，不愿意对未曾习惯缴纳重税的人民征收苛捐杂税。1861年通过的第一项措施，实际上没有征收什么税。它规定由各州征收财产直接税；如果各州愿意，可以不向人民收税而由州缴纳它所应缴纳的份额。承担了这种税额，大多数州都靠发行公债来解决。1863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国内收入税，这项措施有个独有的特色：它征收的是“实物税”。它要求每个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向政府缴纳其产品的十分之一。征收到的各种战争税是很少的。由于难于确定所收到的农产品的价值，也就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数额。但是，据估计，在南部联盟的总收入中只有百分之一来自税收。政府发行的公债数量之大，就连人民后来也都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有的公债是以实物形式计算的，允许购买公债者可以向政府交付商品或许诺交付商品购买。这种许诺常常没有兑现，或者商品被敌军破坏或毁掉。政府之所以接受实物形式的税收或公债，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本身也不愿意收取自己发行的货币。政府是在1861年开始发行纸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需要现款，部分原因是这种形式的通货看来似乎是筹措军费的一种简便办法。此端一开，再也无法制止了。到1864年，发行纸币总数竟达10亿美元。其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邦的绿背纸币在南部使用时竟比联盟纸币值钱，这是联盟的货币制度混乱的一个明证。物价上涨受害最烈的莫过于固定收入者和城镇居民，因为他们需要向他人购买食物。他们一贫如洗，困苦已极，逐渐在很大程度上对南部联盟能否取得胜利丧失信心。为了使政府避免受到它自己所发行的纸币的影响，国会通过了“征购法”授权政府部门自行确定征购价格。其后果之一是生产者纷纷逃避向政府出售货物。

南部联盟起初是从志愿人员中招募军队的。1861年，有几十万男子入伍，其中大多数报名参军1年。开始时的热情一旦消失后，自愿人员大大减少，南部联盟似乎面临着一场兵员危机。最为不妙的是，那些入伍1年的老兵不再重新入伍了。因此，国会于1862年4月通过了

“征兵法”宣布所有18岁至35岁的白人男子，只要身体健康，均有义务服兵役3年。那些志愿服役1年的军人留在部队里了，但要求他们再服役两年。后来又于1862年和1864年通过法令，把年龄限制延长为17岁到50岁。最初的和后来通过的兵役法都有许多有关免役的规定，因为当时认识到必须留一些男人在后方以便从事生产。因此，许多人由于工作原因准予暂缓服役。但法令制定者们错误地准许免于服役的人员类别以及一些借故要求免服兵役的个人，如编辑、教师、印刷工人等并非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员太多。这些准予免服兵役的规定使得那些广大的不能免服兵役的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他们受到歧视。有些规定看来对有钱人有利。应征者可以雇人代替而自己不服兵役（后来这条规定被取消了）。凡种植园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者，可以有一名白人缓服兵役。这个所谓的“20个黑鬼法”使一般人感到愤慨，他们说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而要穷人去打仗。

一直到1862年年底都是通过征兵补充军队的。1863年年初，大约有50万人服役。此后，部队人数不断地减少。军事形势逆转，人们厌战以及大片地区被联邦军队所占领，这些都使人力资源告竭。到1863年年底，军队在编人数为46.5万人，但实际服役人数只有23万人左右，1864年至1865年形势恶化，估计有10万人开了小差。在最后失败时，南部联盟在战场上的全部兵力总数只有10万人左右，如同北部联邦的军队一样，服役的确切总人数很难确定。服役3年的比较确切的估计数字为90万人。

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唯一有组织的反战力量来自山区，特别是在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两地的人口还不到南部人口的10%。南部人希望赢得这场战争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上分歧很大。某些分歧意见几乎使政府四分五裂。某些分歧是任何民选政府中都难免发生的正常冲突：人们批评戴维斯作了错误的决策或是批评国会制定了不明智的法律。另一些争论则反映了南部文化的状况。大多数南部上层人士（他们大部分位居要津）骄横、敏感。或许因为他们主宰着一个被统治的种族，因而他们在遭到反对或批评时容易发怒。他们惯于发号施令，却不愿意遵守纪律。戴维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许多激烈争吵，可以解释为是由于当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这与林肯大不相同，林肯只否决过3项法案，而戴维斯则否决了38项法案，然而其中的37项重又获得通过。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分裂的巨大力量还是州权的原则。南部人没完没了地谈论州权，对任何控制均表不满。州权论者抱成一团，因而被人认为是一个党派，即以副总统斯蒂芬斯为首的州权党。他们首先主张各州拥有主权，其次才赞成南部成为一个国家。他们想要获得一个独立的南部，但是如果必须牺牲州权才能达到这一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宁愿战败。他们热烈地坚持这种堂吉诃德式的信条，对政府的任何中央集权的企图几乎一概加以反对。他们在两个主要问题上攻击戴维斯政府：（1）他们不承认政府可以中止人身保障法并实行征兵；（2）他们声称政府拒绝进行和谈的机会。戴维斯由于面对着山区的反战，因此要求国会授权取消民法（而不像林肯那样擅自予以停止）。他得到许可仅在有限的时间内或在有限的地方停止施行；一项对他全面授权的法案被州权论者击败，他们指责他企图建立独裁。他们反对征兵也同样激烈，而且由于州里的官员可以阻碍征兵，因此他们的反对就更加起作用。根据征兵法的条款，州长可以为州民兵开具证明免于服役。于是某些州长，尤其是佐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泽布伦·M. 万斯，使成千上万的人免服兵役。1864年，当联邦军队深入南部时，布朗还公然反对政府在佐治亚州实行征兵。州权论者迷恋于和平谈判的主张，不断地对戴维斯施加压力，要他向北部作出表示。他们从未完全肯定地表明，他们要求的究竟是要在独立的基础上还是在南部回归联邦的基础上的解决。在不同的时候，这两种方法他们都曾极力提出过。看来有证据显然说明，在战争的最后几个阶段中，他们是会接受没有胜利的和平的，不管能说服北部同意在种族关系上给予什么样的控制都行。

对南部失败的任何评价，都须估计到几个因素：南部缺少工业资源，运输系统不足，金融体系崩溃。但是失败因素中首先应是南部政治制度的性质这一因素。南部联盟是在州权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这使得失败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事。由一些主权实体构成的联盟能否打赢一场现代战争，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即使能打赢，这样一个政府能否在现代世界维持下去就更值得怀疑了。

战争开始时，双方政府都没有一个总体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是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根据决策者对军事形势的了解而制定出来的。由于北部的方针是用武力恢复联邦，北部的战略势必是进攻的。联邦部队必须侵入南部，打败南部联盟的军队，并且占领整个南部。南部的方

针则是用武力确立它的独立。因此，政府决定采取防御战略。这一决策南部是被迫采取的，部分是由北部战略的性质决定的，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个只想独立不抱侵略意图的南方来说，采取防御战略看来是势所必然的。根据同样的道理，南部也可以转而采取攻势并在北部土地上夺取胜利，从而证明它很强大，是不可征服的。

地理环境对双方的战略计划和这次战争的性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大部分战役是要在南部进行的，而南部的地形特点使战争形成了三个战区：东部、西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巨大的天然屏障从马里兰延伸到佐治亚，使得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无法进行任何的统一的军事行动。从山区到海岸之间的地区构成了东战区；山区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西战区。密西西比河以西，即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各州，则为密西西比河以西战区。

东战区的大部分战斗发生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攻占里士满（这个城市在弗吉尼亚州退出联邦后成为南部联盟的首都）并击败进行防守的南军。敌对双方的首都相距很近，行军路程只有130英里，两军的行动大体上都是由这一特点所左右的。对北部入侵者来说，最明显的捷径是从华盛顿或从北弗吉尼亚的一个基地向南进击，直取里士满。1862年曾经有一次，北军曾试图采取另一条可能的入侵路线，即沿首都以东的水路运动，但未成功。在西弗吉尼亚，两个首都之间还有一条次要的路线，即沿着谢南多亚河谷，穿过弗吉尼亚州，直插波托马克河。双方都可利用这条路线展开攻势或进行佯攻以迷惑对方。南部联盟方面特别便于调动他们驻守河谷的部队，以造成威胁华盛顿的假象。联邦军队一直到1864年至1865年才粉碎了南部联盟在弗吉尼亚的抵抗，拿下了里士满。

在西战区，联邦方面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夺取密西西比河一线，把南部联盟拦腰切断。为此，他们水陆并进，南北夹攻南部联盟在河上的据点。他们发现某处防守坚固难以攻下时，就沿着与密西西比河平行的河流运动，迂回包抄南军。到1863年的夏季，联邦军在攻下维克斯堡以后，便控制了大河全线。然后，他们又开始行动夺取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即田纳西河一线。田纳西河流过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的一部分地区，汇入俄亥俄河，显然是直插南部心脏地区的必由之路。田纳西河上的关键阵地是查塔努加。如果联邦军队能夺取这座城市，他们就会得到一个进而分割南部联盟的基地。他们于1863年占领了查

塔努加。1864年以W. T. 谢尔曼将军从此城出发开始了伟大的进军，到南北战争结束时一直打到了北卡罗来纳。

与其他地区的战役相比，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战斗是次要的。双方都未在这个区域投入大量军队。联邦部队从密苏里进攻，占领了阿肯色的北半部。1862年，北部的一支陆海军远征队攻占了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的南部以后一直被占领直到战争结束。曾经提出过几个计划，要占领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其余部分，并派一支部队攻入得克萨斯，但是联邦军最高统帅部不愿提供足够数量的部队来执行这些计划。在打下维克斯堡以后，征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各州就没有必要了。联邦军只要守着密西西比河一线就足以控制整个战区，使其陷于孤立了。

主要由戴维斯制定的南部联盟的战略是：反击每一次北军攻势，坚守每一处受威胁的要点。这叫作分散防御。兵力占劣势的南部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围绕最宜防守的地区或拥有最重要资源的地区，缩短防线，进行防守。戴维斯之所以决定要防守整个南部，部分是由于受到实际政治考虑的影响。因为新成立的南部政府如果放弃任何领土，无异承认自己的虚弱，这就有可能丧失人民的支持。不过，戴维斯看来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念念不忘防守；对他来说，寸土必守已经成为不变的信条，而许多守地实际上成了守军的陷阱。有几次南军展开了进攻，但攻势失败了——主要因为兵力不足——因为政府拒绝将可动用的防守部队用来加强进攻的力量。但是，戴维斯和他的顾问们终究不应因为他们采用错误的战略而受到指责。他们的军事思想必然受到他们的文化影响的限制。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将决定它进行什么类型的战争。南部制度的原则是州权，因此南部是打一场州权的战争。南部的政治领袖们在管理政府时无法集中，而南部的军事指导者们也无法建立统一的战略和集中的指挥。

南部联盟的指挥部在战争整个过程中主要都是由戴维斯总统一人构成。1862年年初，戴维斯曾在一段时间里任命罗伯特·E. 李将军在他的领导下担任全部联盟军队的司令官。尽管李将军才识过人，但除了个别时候外，从不找他来制定战略；他只是充当一名顾问，在戴维斯咨询时才提供意见。1862年夏天，李担任了战地指挥职务，戴维斯也不再另派他人接替他。一直到1864年2月，他才又找了一位顾问，即在战地指挥中打了败仗的布拉克斯顿·布雷格。1865年年初，国会采

取了一项措施，目的在于限制戴维斯的权力，设立了总司令的职务。人们以为戴维斯将必然要任命李将军这位南部最杰出的将军担任这项职务，李将会接过军事指挥权。戴维斯倒是任命了李，但同时又宣布他自己仍是总司令。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受职的。新的安排还没有来得及证明是否有成效，战争就告结束。但李是否能在指挥一支野战军的同时还能指挥其他军队，这是大成问题的。而且，李的思想主要从他的故乡弗吉尼亚考虑问题，他能否改变他的战略思想从而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这也是有疑问的。

合众国进入南北战争时，它的指挥系统已经过时，而且不力。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很少，指挥工作是由一个笼统地称为“参谋部”的单位来作出安排的。参谋部是由军队中拥有相当军阶的将军和陆军部各局局长共同组成，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它既不召开联席会议，也不讨论共同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或机构承担制定战略的任务。每个官员——后勤局长、军火局长、人事局长——大都各行其是。战争开始时，资格最老的将军是75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除了另一位老将约翰·E. 伍尔以外，斯科特是唯一的一个曾经指挥过人数可以称之为一个军的军队的军官。（斯科特的军队在对墨西哥战争时有1.4万人）。在战争中应当指挥野战部队的年轻一些的军官中，没有一个指挥过一旅人数的军队。

军事组织的首脑是宪法规定的总司令，即总统。林肯完全是平民出身，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除了曾当过民兵这样无足轻重的经历外，也无任何军事经验。然而，林肯却成为一位伟大的战时总统。作为战争的指导者，他要比受过专门军事教育并在正规军中服过役的戴维斯高明得多。林肯证明了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说法是对的：懂得军事问题并不是战争指导者的主要条件，而智力过人与道义力量则是更为重要的。林肯由于他的智力和道义方面的力量，成了一位极其高明的战略家。他认识到自己一方人多势众，就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北部的人力，并极力要求他的将领们对南部联盟具有战略意义的战线不断施加压力以发现对方的弱点。他比手下的第一流的将军们都要高明，因为他认识到真正的目的在于摧毁南部联盟的军队而不在于占领地方。后来有人批评林肯干涉将领们的工作，但是他的干预，主要是为了迫使犹豫不决或胆怯的指挥官奋力向前。而且，他的干预大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戴维斯干涉其军事将领的工作使得本来就差劲的防守战略变

得更为消极。林肯和他大不相同，他的行动是为了贯彻一个健全的进攻战略。

在战争的前三年，林肯所担负的许多职能如今是属于参谋长的。他制订战略计划，甚至指挥战术行动。林肯所以亲自过问，是因为现有的指挥系统不力，也因为他前后任命担任总司令的将领——斯科特、乔治·B. 麦克莱伦、亨利·W. 哈勒克——不是不愿就是不能执行其职责。1864年年初，主要在林肯和国会的筹划下，国家终于建立了一个有力的现代指挥系统。此后，林肯虽然还继续监督军事机器的总的运转情况，却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发挥指挥官的作用了。

在新的安排下，已经成为北部最优秀将领的尤利塞斯·S. 格兰特被林肯任命为总司令，授予国会新设立的中将军衔。格兰特负责制订所有战区的战略方案并指挥各条战线上的17个联邦军的调动。事实证明，他正是林肯长期寻求的将领。他具有南北两军都没有人能与之匹敌的通盘考虑战争、制定全面战略的能力。虽然林肯对他相当放手，但他总是把他的方案总的特点提交总统核准。原来担任总司令的哈勒克，如今成为“参谋长”，充当在林肯与格兰特之间和格兰特与各战区指挥官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1864年的这种体制，即总司令制定政策并指明全面战略，总指挥制订战役策略，参谋长协调情报，可能除了普鲁士总参谋部之外，这在当时是最有效率的一种体制。这是北部所以打赢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北战争无论对当时的还是在它对美国的和世界历史中的许多问题的最终影响上，都起到了决定作用。它决定了美国将仍保持为一个国家。它使这个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并使它走上了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它既然摧毁了奴隶制并证明了一个得民心的政府在国内冲突中能够维护自由，这就给所有世界各地的民主观念提供了真凭实据并使它们具有旺盛的活力。林肯看到了这场战争在这方面具有的意义。他在1864年大选后说：“它证明，一个人民的政府可以在一场大规模内战当中经受起一场全国性的选举。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可能的事。”^[9]内战的某些直接后果是不幸的、有害的。国家必须制定一条通过重建的痛苦考验，通过战后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的方针。而处理重建这一问题的政治水平并不很高，物质标准在当时似乎又高于一切。尽管如此，就在当时，批评美国式生活的伟大理想主义者们对南北战争仍然持有长远而恰当的观点，并且相信它的结果将

会长存。爱默生写道，符合社会利益的革命总是永远地为人民所记忆的：“人们怀着激情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些革命史，它们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失去它们的动人之处”。如果“无忧无虑、昂首阔步地登上力量高峰”的美国人民，能够重新振作并且调整他们所以打赢这场战争的那种精神，合众国就能够成为“新的国家，一切国家的向导和立法楷模”。^[10]沃尔特·惠特曼也深深为战争的影响所感动，他比大多数人更理解它的意义和他的国家；他虽然从1871年的美国看到了许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但却仍能写道，“今天，放眼未来，虽然依旧一片迷蒙，然而我们展望前景，看到的却是一个充实的、有理性的、巨人般的后代！”^[11]

（潘绍中 译）

^[1] 关于南北战争军事进程的概述，参见本卷第12章，原文第327—330页。

^[2] 参见第12章，原文第305—306、310页。虽然南北战争中使用了连发后膛枪，但是步兵使用的基本武器仍是单发前膛的“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这种步枪杀伤力达半英里，距离230码时最为准。射程达5英里的具有来福线的大炮也已使用，但炮兵的标准武器仍是“拿破仑式的”12磅黄铜滑膛炮，射程为1英里，半英里内较准确，杀伤力在250码。斯式枪与拿式炮使南北战争中的两军有了比过去美国军队具有的更大的射程，准确性和火力。

^[3] 例如，查尔斯·W. 拉姆斯德尔：《在南部联盟的战线后面》（巴吞鲁日，1944年），第94—95页；罗伯特·C. 布莱克第三：《南部联盟的铁路》（查佩尔希尔，1952年），第294—295页。

^[4] 关于封锁的效果以及学者们对其影响的互不相同的看法，参见J. G. 兰德尔《南北战争和南部的重建》（波士顿，1937年），第650—651页。对封锁的效果所提出的批评，参见法兰克·L. 奥斯利《棉花王的外交》（芝加哥，1931年），第268、273—274、285页。

^[5] 例如，弗朗西斯·B. 西姆金斯：《新旧南部》（纽约，1948年），第137—138页，查尔斯·A. 比尔德与玛丽·R. 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1939年），第2卷，第52—54页。

^[6] 《约翰·布赖特关于美国问题的演说集》（波士顿，1865年）第177页。

^[7] 参见《南北战争的政治家才能》（纽约，1953年），第5—6、8—9、17—18页。

^[8] 罗伊·P. 巴斯勒编：《亚伯拉罕·林肯文集》（新不伦瑞克，1953年），第5卷，第537页。

^[9] 罗伊·P. 巴斯勒编：《亚伯拉罕·林肯文集》，第8卷，第101页。

[\[10\]](#)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全集》（纽约1929年），第2卷，第1185、1188、1193—1194页。

[\[11\]](#) 引自《民主的前景》，见马克·范·多伦编《沃尔特·惠特曼》（纽约，1945年），第389—390页。

第二十五章 拉丁美洲国家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实际上在1824年已告结束。从五大湖到合恩角，欧洲在新大陆的领地只剩下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串岛屿、中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伯利兹，以及南美洲的英属、法属和荷属圭亚那三个殖民地。在加勒比海中，原法属圣多明各已经成为新生的海地共和国，并将原西属圣多明各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巴西已经脱离葡萄牙。在北美和南美大陆上，在原西班牙的总督辖区、将军辖区和审检法院院长辖区，建立了7个新的共和国——墨西哥、中美洲联合省、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巴拉圭和拉普拉塔联合省。拉普拉塔联合省后来成为阿根廷。到1830年，南美又增加了4个新国家。上秘鲁诸省，即原查尔卡斯检审法院院长辖区，于1825年成为玻利维亚共和国。1828年，乌拉圭在拉普拉塔联合省与巴西的战火中诞生；1830年，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领土还会有变迁，新的共和国还将诞生。但是，在1830年，南美洲的政治地图已经形成了今天的形式。

从原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地产生的13个国家当中，面积最大，历史上最幸运的是巴西帝国。西班牙美洲的大多数新生共和国多年的战争和社会骚乱，破坏了繁荣和安定，打乱了经济生活。它们没有受过自治的训练，独立的苦果是政治崩溃。这些国家至少在政治上不是西班牙帝国成熟的继承者；它们还是帝国的弃儿。大多数国家没有什么内聚力，没有什么社会意识来把社会上各种成分融合在一起；广大群众贫困无知，统治阶级在管理别人之前，还先得学会管理自己。未来的南美北部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1815年问道：“能够想象一个刚刚摆脱枷锁的民族，可以上升到自由领域而不像伊卡鲁斯那样融化翅膀，堕入深渊吗？”^[1]15年后，他悲惨地死去了，他临死前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写道：“对我们来说，美洲是无法治理的。为革命尽力，犹如耕耘大海，徒劳无益。”^[2]

巴西的独立却与众不同。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里，19世纪初的总人口还不到400万，而每个省的面积却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它从不

独立到独立有个渐变的过程。先由殖民地的过去突然一刀两断，没有发生争夺权力的暴力斗争，也没有发生漫长的破坏性的内战。它几乎没有流血就取得了独立。葡萄牙王储自己成了巴西的皇帝，他为这个国家制定了宪法，使它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和平建立的王位，维持了65年之久。

布拉干萨王朝的威望，维护了原巴西总督辖区的团结和统一。1822年，年轻的佩德罗亲王曾经提出“不独立，毋宁死！”的著名口号，但到1830年，他却丧失民心。为了换取英国和葡萄牙对巴西独立的承认，他不得不同这两个国家签订不受欢迎的条约。他还同拉普拉塔联合省打过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当然也没有取胜。在巴西人的眼里，他仍然与葡萄牙的事务有不应有的牵连；他的对外政策信誉扫地，对内政策也令人失望。他说话独断专横，举止放荡无度，受国内的葡萄牙分子的影响太深，过于偏袒巴西的种植园贵族，他从来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完全的、真正的巴西人”。^[3]1831年4月7日，他被迫退位；结果，巴西的权力就从葡萄牙人转移到本地贵族的手中。

“巴西将成为巴西人的巴西，自由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曙光报》的杰出编辑埃瓦里斯托·达·贝加在4月8日帝国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的一份公告中这样写道。^[4]但是，刚即位的皇帝唐·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还不到6岁，在一个接一个摄政王的统治下，巴西还能继续存在吗？君主制，不仅君主制，而且君主所象征的国家统一还能继续保持吗？佩德罗一世被流放以后，对君主专制的反应是那么强烈，政治上的解体是那么迅速，国家的经济状况是那么混乱，以至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定的。巴西同西班牙美洲的其他新生国家一样，不断发生骚乱，军队的阴谋和军事暴动。最北部的巴拉有过长达4年的革命动乱，最南部的南里约格朗德省公然对抗里约热内卢当局达10年之久。1834年，巴西颁布了宪法补充法，把3人摄政改为1人摄政，省政务会也改为省立法议会。一方面，巴西的完整面临威胁；另一方面，根据该条例，这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虽未完全，但也几乎变成了联邦共和国。

但这一经历是确定性的。温和派舆论支持年幼的皇帝。巴西很幸运，有一批才能出众的政治家竭力维护君主制，保持文职政府至高无上的地位，重新建立权威。1840年，补充法作了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地方立法议会的修改；同一年，为了维护国内的安宁和统一，佩德罗

宣布已经成年。次年加冕，不过直到1847年才登基亲政。但国家仍然处在多事之秋。南里约格朗德省到1845年才平定下来，伯南布哥省到1848年才停止革命对抗。但是，在此后的40年中，巴西享受着这位学者皇帝的仁政，经历了一个和平昌盛时期，这是在大多数西班牙美洲邻国所罕见的。

1872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巴西人口还不过1000万。在50年代，人口不超过800万。内地的几个省，只有米纳斯吉拉斯省人口比较稠密，其他省只有沿海狭窄地区才开化一点。大多数人是文盲。1/3以上的是奴隶。在北部和南部，土地贵族——东北部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内陆各省和南里约格朗德省的牧场主，东南部的咖啡种植园主——支配着社会和经济生活。

但是，一个新的巴西已经在出现。虽然奴隶制仍然在这个帝国投下暗影，奴隶贸易却已经停止了。根据1826年的英国巴西协定和1831年的反奴隶贸易法，巴西曾经努力制止奴隶贸易，但这种努力实际上失败了。一方面英国使用粗暴方法，特别是在通过1845年阿伯丁法案以后，扫荡海上的奴隶商，激怒了巴西舆论；另一方面，在1831年到1851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这个国家。但是，这种贸易终于在1850年被取缔，几年之内也就停止了。在南里约格朗德省、圣卡塔林纳省和巴拉那省，德国移民源源不断到来，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后来为开发巴西南部做出了贡献。虽然以棉花和蔗糖为基础的巴伊亚省和伯南布哥省在经济上仍保持原有的突出地位，但是东南部圣保罗省、米纳斯省和里约热内卢省的咖啡工业的发展已经预示咖啡在未来将支配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变革在悄悄进行。银行、铁路、工厂、轮船、电报出现了。连接里约热内卢省和米纳斯吉拉斯省的“团结和工业”公路干线、唐·佩德罗·塞贡多铁路和著名的桑托斯—圣保罗线，分别于1853年、1855年和1860年动工兴建。1851年，以毛阿男爵知名的伊雷内乌·德·索萨，创建了毛阿银行；他还兴建了巴西的第一条铁路，把煤气灯引进里约热内卢，在亚马孙河上使用轮船。他的经营是以国际规模进行的，他是新时代的先驱，是一代人的先驱，这一代人将对工业、商业、金融以及土地感兴趣，这一代人的崛起，将削弱地主阶级^[5]的统治基础。

但是，创建这个帝国的地主阶级，控制着它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支配着它的政治生活。不过他们上面还有皇帝。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寡

头势力，根据1824年佩德罗一世为这个国家制定的宪法，只有一小部分人有选举权。在形式上是英国的议会制。由首相选择自己的同僚。内阁从属于众议院多数派。上院（由终身议员组成的参议院）由于严肃出色的辩论享有很高的声誉。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新闻是自由的。但是，不管立宪制多么完善，表面上对皇帝的特权限制多大，最高权力归根结底还是在皇帝手里。他的执行和所谓的“节制”职能，他的任免权，确保了佩德罗的愿望最终占上风。

这个制度很引人注目，经验丰富。它之所以行得通，有两个原因。首先，在佩德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次，因为它符合佩德罗的意愿。他认为，议会起政治指导和管理国家的作用；而他的任务则是实行总的监督，尽可能保证官员的公正，保证宪法的正确实施。当然，他犯了不少错误；他在位的时间越长，对他“个人”权力的批评也越激烈。但是，佩德罗是这个国家的导师：他的最大贡献是给予巴西以政治教育。

19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帝国到了全盛时期。贸易和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外国投资（主要是英国的投资）与日俱增。的确，19世纪80年代以前，正当英国的资本输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巴西一直是英国在拉丁美洲最乐于投资的地方。1852—1875年，被恰当地称为“帝国银行家”^[6]的N. M. 路特希尔德父子，在伦敦为巴西筹集了一项又一项贷款。

但是，虽然这个帝国不断昌盛，君主制的威信却不断降低。巴西参加南美最大的战争——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见原文第673页）之后的10年中，帝国结构第一次出现了分裂迹象。自由党人在议会内外活动，要求削减佩德罗的“个人”权力。共和党也在1870年成立，虽然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影响并不大。1863年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后，黑奴问题在巴西变得更加突出，现在它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奴隶制的大国了；虽然在1871年，著名的里约布兰科法建立了解放基金，规定今后出生的奴隶的子女不再是奴隶，似乎把这个问题降到次要地位，但9年以后，废奴运动又轰轰烈烈展开了。正像共和国思想迟早要在新大陆上这个唯一的君主国出现一样，随着欧洲教皇极权主义的兴起，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了1873年开始的一场围绕共济会仪式问题的斗争。这场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君主制的威信和巴西大部分教士对佩德罗的忠诚。巴拉圭战争是一次巨

大的斗争，虽然不是这个帝国参加的唯一的军事斗争（因为对拉普拉塔河流域政治一直极感兴趣的巴西，曾在1852年帮助推翻了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但是这场战争不但时间长，费用大，而且使政府和军事当局发生了摩擦，留下了对政府危险的不满和士兵对平民的蔑视。最后，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创建这个帝国的地主阶级的优势地位已经在削弱。帝国存在到1889年。但是，它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没落了。

许多自由国家当中有这么一个奴隶制国家，许多共和国当中有这么一个君主国，巴西帝国就是拉丁美洲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在原西班牙殖民地建立的国家当中，只有智利在1830年后的一些年中经历了和巴西类似的演变。地理环境使智利成为一个自然整体。这个国家像个岛屿。它的四周有高山和沙漠、海洋和森林围绕。科皮亚波是北部居住的极限，瓦尔迪维亚和奇洛埃是文明的南方前哨。但是，从阿塔卡马沙漠的边缘，一直伸展到比奥-比奥河（这条河是阿劳坎印第安人区的北部边界），智利有人居住的地区，面积比英格兰加苏格兰略小。1830年时，它的总人口略多于100万，都是欧洲血统和印第安血统的人，民族日益同化的现象很突出。智利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是世袭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制度产生了大庄园这个土地、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单位（根据契约或者传统，农民被固定在这样的单位）并使智利有了一个在本能、习惯和信仰方面都保守的地主绅士阶级。

地主阶级创建了巴西帝国。大庄园主阶级则把智利建成了“贵族共和国”。独立战争在智利造成的混乱不像西属美洲其他大多数共和国那么严重，政治上的试验和混乱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久。1830年，经过7年各派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动乱以后，保守的寡头势力紧密团结起来了。寡头势力找到了波塔莱斯实业家族成员塞亚公司股东、新秩序的缔造者迭戈·波塔莱斯作为自己的领袖，智利就有了主宰。经过长期的辩论，最后在1833年颁布了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这个国家终于在牢固持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1833年的宪法完全符合智利贵族的思想和习惯，完全符合智利社会的结构和传统。它使受到攻击的限制继承法重新生效；它使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和没有产业者得不到选举权；它使教会和国家联合；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结合。在中央政府，宪法赋予总统那么广泛的权力，他可能并实际上成了独裁者，尽管他与其说是个人统治者，不如

说是授予他权力的那个政党的领袖。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个制度几乎没有变动。在这些年中，国内和平只受到3次严重干扰，智利只有4个总统——华金·普列托、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曼努埃尔·蒙特和何塞·华金·佩雷斯——每个都连任了两届。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一个新的秩序已经在形成，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833年宪法即使在不同情况下一直是智利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在1891年的内战中，总统制垮台，改为议会制政权，但是宪法仍然保存了下来，直到1925年才被最后废弃。拉美国家没有一个法律文件比这部宪法更成功的了；另外只有一部宪法也使用了这样长的时间。

在19世纪30年代，智利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稳步发展经济开辟了道路。但是，目的在于分裂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新建立的邦联（这个邦联由当时玻利维亚的独裁者安德烈斯·圣克鲁斯将军缔造，是北方一个潜在的过分强大邻邦）而进行的战争，的确阻碍了经济发展，并在1837年发生了哗变士兵杀害波塔莱斯的事件。但是在40年代，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北部发现了铜矿和银矿，南部发现了煤矿；国家财政有条不紊；由于忠实地偿还了1822年伦敦贷款的债务，对智利贷款的信心得到恢复；对外贸易增加，大部分是对英国的贸易；这一切都带来了新的繁荣。智利没有毛阿那样的人，不过毛阿为巴西所做的是，部分地由马萨诸塞人威廉·惠尔赖特替智利做了——1840年，他创办了太平洋轮船航运公司，这个公司的船只把智利的港口同秘鲁、巴拿马以及欧洲的港口连接起来；他引进了电报；修建了第一条铁路，这条从科皮亚波到铜港卡尔德拉的铁路于1851年通车；他还发起修筑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铁路，这条铁路后来由另一个美国人亨利·梅格斯在1863年完成。布尔内斯堡和1847年阿雷纳斯角的建立，标志着开拓最南地区和实际占领麦哲伦海峡的开始。同时，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政府鼓励德国移民、农场主和农民在一个不甚遥远，但还“不算智利而是智利领地”的地区——瓦尔迪维亚的森林沼泽地带建立新家。与此同时，1842年创办了智利大学，由伟大的委内瑞拉人安德烈斯·贝略担任第一任校长；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院，由阿根廷流亡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任院长；还创办了存在不久的文学协会，这些都反映并促进了智利人的思想觉醒，这种觉醒不久就在政治生活中反映出来。

智利是个一党制的国家。但它又是个变化中的国家。城市在发展。新一代人在出现，他们不知道波塔莱斯。4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自由党，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向保守主义的统治进行挑战，并在1851年用武力来挑战。斗争是短暂的、血腥的、决定性的。在以后的10年中，曼努埃尔·蒙特（自由党人就是为了反对他当选总统才发动叛乱的）在政治上控制得像波塔莱斯那样严格。可是，著名的“蒙特的10年”（1851—1861年）除了政治以外，其他各方面几乎都是进步的，显示了寡头势力正逐渐削弱。蒙特是个惩罚严明的人，坚信“由阶级统治民众”^[7]，他在1852年废除了限定继承法，沉重打击了顽固的特权势力，从而促进了大庄园的瓦解。他还和教会发生了尖锐冲突，虽然起先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却破坏了政教当局之间一向还融洽的关系。他上任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暴力行动，到任期届满时，又面临新的暴力行动的威胁。极端保守派对蒙特的自由主义不满，而极端自由派对他的专制主义也不满，结果两派就站到一起。1859年，当他的忠实追随者和知心朋友安东尼奥·巴拉斯出来接替他的时候，内战爆发了。和1851年一样，斗争是短暂的。但是巴拉斯退出了竞选，在1861年选举时，中间派的候选人何塞·华金·佩雷斯当选。

佩雷斯是最后一个连任两届（每届5年）的总统，他的当选，标志着政治上逐步自由化的开始，标志着“专制统治”的结束和“自由”共和国的开始。没有发生突然的变化。但是佩雷斯请自由党人合作。同时，立法议会的日趋重要，一个激进党的成立，一个允许信仰自由的法律的颁布，以及1871年通过的关于禁止总统连任的宪法修正案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都是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反映。1871年的智利，还是一个小小的“无足轻重的”共和国。^[8]统治阶级仍旧是贵族阶级，但是此时这个贵族阶级是比制定1833年宪法的那个寡头势力要广泛得多的贵族。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19世纪60年代时，这个国家和外国发生过一次战争。西班牙和秘鲁发生了纠纷，一支西班牙海军舰队在1864年夺取了皮斯科湾中鸟粪储量丰富的钦查群岛。几个月以后，西班牙迫使秘鲁接受屈辱的条件，归还了该群岛。但是，这件事激起了美洲人的感情。智利提出了抗议，圣地亚哥举行了示威游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外交交涉。最后，1865年9月，西班牙舰队司令宣布封锁智利海岸，智利以宣战回击，秘鲁、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接着对西宣战。这次战争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有：该舰队司令在他的一艘纵帆船被智利炮艇俘获后自杀；1866年，瓦尔帕莱索和卡亚俄先后遭受猛烈炮击。直到1871年，它们才签订了停战协定；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很快就要爆发。战场在阿塔卡马沙漠。在长达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智利和玻利维亚两国为领土要求而争执不休。这里的硝酸盐工业使用的是智利工人和英国—智利的资本，发展很快。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已经准备好，智利就要夺取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沿岸和秘鲁最南各省。在这次战争中，智利增加了新的财富，成为南美西海岸最强大的国家。

从智利史转到玻利维亚史，就是进入不同的世界，热带南美洲安第斯山和印第安人的世界。玻利维亚本身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在政治、社会和地理方面都没有紧密的结合。它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从荒芜的太平洋海岸，一直伸展到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丛林。它的人口不过100万，大部分住在崇山峻岭里，安第斯山脉在这里的宽度最大。拉巴斯位于原西班牙帝国从利马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商路上。波托西皇家别墅曾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矿业镇。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陈迹了。商路已遭破坏，矿业崩溃。玻利维亚在太平洋战争中把沿海领土割与智利以前，已经是个群山闭锁的国家。它的土著印第安民族处于半野蛮状态，少量的白人和较多的梅斯蒂索人没有受过统治的训练，无力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因此，玻利维亚早就注定成为一个停滞衰退的国家。在1829年到1839年的10年中，虽然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梅斯蒂索军人安德烈斯·圣克鲁斯控制了局面，甚至还成功地把玻利维亚和秘鲁结成一个短命的联邦国家——秘鲁—玻利维亚邦联（1836—1839年），以后，除了若干短期以外，这个国家后来的历史是阴暗的，无政府状态、苦难和暴政的历史，最后让一个无知的混血种人，一个酒鬼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掌了权（1864—1871年）。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这个人的生涯是集“越来越卑鄙可厌的叛国和犯罪”^[9]的大成。

任何南美国家都没有像玻利维亚那样面临那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秘鲁的军人政治和厄瓜多尔（前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1822年至1830年曾并入邻近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同样根深蒂固的病症。这些国家都滨海，比较容易跟上对外贸易的新潮流。但是，它们也是印第安人和安第斯山地的国

家，人口比较稀少，但土著居民和人数稍少的梅斯蒂索人占了极大比例。高地民族和低地民族生活在两个世界。长期的独立斗争已使他们筋疲力尽。要成为国家，他们条件还很差：军事传统束缚着他们；地区之间的对立分离了他们；两国人对个人、对地方和对局部的忠诚，超过了对整体、对国家的忠诚，两国都时而是无政府状态，时而是专制统治。独裁是统治的准则，革命又是改换独裁的手段。厄瓜多尔的悲惨历史，是一部首都山城基多和太平洋港口瓜亚基尔之间的冲突史，是相互角逐的军事首领之间的争斗史，这些首领中最著名的当推那个残酷无情的神权主义者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他从1860年起到1875年被暗杀为止一直是个支配国家的人物。他求助于教会和教规来提供国家无力提供的统一力量，但是终于失败。秘鲁出了一个印第安混血种的军人，“勇如狮子，行动迅速，受部下爱戴的”^[10]拉蒙·卡斯蒂利亚作领袖（1845—1851年；1855—1862年）；一方面，卡斯蒂利亚使国内空前安定；另一方面，欧洲人需要购买钦查群岛和终年无雨的海岬上出产的鸟粪，以及最南部的塔拉帕卡省藏量丰富的硝石，使这个国家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财政，开辟了繁荣昌盛的光明前景。1849—1874年，尤其是1861年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输入秘鲁，开采鸟粪层，到沿海谷地的甘蔗、棉花种植园做工——这种不光彩的贩卖苦力连卡斯蒂利亚本人都反对。但是，这样轻易得来的财富，反而使这个本来可能复兴的国家堕落了。在卡斯蒂利亚离职后的10年中，秘鲁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与西班牙进行了一次历时不长的战争（见原文第666页），二是政治上又重新陷入一片混乱，国家到了破产的边缘。由于大肆修建公共工程，尤其是兴修铁路这种建筑上的奇迹，来连接沿海和内地，而这些工程又都是无节制地用贷款提供资金的，浪费很大，结果造成了70年代的财政、经济危机，使秘鲁陷于瘫痪。这也是社会风气长期堕落的结果。对于这些年的浪费和不负责习气，这个国家还要受到最后的惩罚。太平洋战争爆发（见原文第666页），秘鲁毫无准备，结果使国家遭到破坏，国力耗尽，国土沦丧，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和热带地区最北部的两个共和国——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是梅斯蒂索人的而不是印第安人的国家。纯印第安人在这里并不占突出地位。混血种人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再就是黑人，委内瑞拉的黑人数量比哥伦比亚多。但是，等级和阶级的界线分明。贫困和无知是共同的遭遇，革命战争造成的破坏是那么严

重，委内瑞拉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命。这两个国家曾短时期和厄瓜多尔合并成一个国家——大哥伦比亚，玻利瓦尔本人是这个联邦的主要创立人。但是，1830年玻利瓦尔死时大哥伦比亚已经解体。此后，它的成员国就各走各的路了。在委内瑞拉，一小撮文职寡头政客，支持并受到玻利瓦尔的老助手，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支持，从1830年至1846年，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权达16年之久。但是后来，在古斯曼·布兰科开始长期的独裁统治（1870—1888年）以前，这个国家一直动荡不安。哥伦比亚倒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它先后称为新格拉纳达（1832年）、格拉纳达邦联（1858年）、哥伦比亚合众国（1861年）和哥伦比亚共和国（1886年）。这个国家全靠“法律大师”弗朗西斯科·德·保罗·桑坦德的组织天才。回顾起来，它在40年代的10年间，经历了几乎可以说是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些年展示出来的大有希望的前景没有实现。虽然哥伦比亚人可能的确在“为思想而斗争”^[11]，这里的政党可能的确和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国家的政党不同，代表了真正反对竞争的原则，但是，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教权派和反教权派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冲突，阻碍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政治生活陷于混乱。在哥伦比亚，虽然独裁统治不如在其他安第斯国家那样盛行，但也同样难以维持安定的局面。

虽然南美北部，安第斯山和热带地区的那些共和国的前进道路是混乱不堪的，但是地处南部温带和低地的拉普拉塔联合省和乌拉圭的道路也同样骚乱不安。拉普拉塔联合省的领土包括了美洲最大的平原，从大西洋伸展到安第斯山脉，从多强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伸展到玻利维亚边境上的悬崖峭壁。但是，除了一些还没有征服的印第安部落以外，这个国家的人口在1830年还不到75万。居民点很分散，彼此相隔遥远。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位于拉普拉塔河上，是大草原通向海洋的门户，连接欧洲和平原地区的枢纽；它同辽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样，靠对外贸易发展繁荣。但是，内地的城市却陷入贫穷境地。内陆各省对这个沿海省在经济上的霸权感到不满。整个国家拒绝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的政治地位。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城乡之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各省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到1830年，联合省已经成为“一串小共和国”^[12]，成为互相敌对的首领的争夺物。这些农村首领在牧民——阿根廷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高卓人（意为马背

上的人)的支持下,使内地的城市服从自己,把各省当作自己的封地来统治。

只有一个高卓人能够控制这个部落。1829年12月,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就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他是个联邦制拥护者,地主、牧场主,熟悉高卓人的技艺和生活方式。他的就任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拉丁美洲一个最野蛮、最狂妄的专制政权的建立。1829—1852年的岁月,是罗萨斯时代。这个时代在某些方面至今仍是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13]、最复杂的时代。直到1835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之后(在这个时期里,罗萨斯辞去了省长职务,在南部边境讨伐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获胜,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威信),立法议会才勉强授予这个大独裁者所要求的绝对权力。但是,从此以后,罗萨斯以专制手段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成了阿根廷其他各省首领的首领。在这些年中,制定阿根廷宪法的事被搁置起来。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省以外,阿根廷的经济停滞不前;即使在这个省里,虽然罗萨斯起先还代表地主和牧场主的利益,扩大省的范围,便利把公有土地大量转给私人,但到最后他只代表他自己的利益。虽然这个国家的知识界“从来没有那么活跃”^[14],但它活动在国外,而不在国内。是在乌拉圭和智利,伟大的流亡者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蒂、巴托洛梅·米特雷、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等许多人,对这个暴君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罗萨斯时代也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阿根廷邦联”内部以及同别的国家战争不断的时代。1837年,罗萨斯跟玻利维亚开战。乌拉圭已经在1828年取得独立,成为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缓冲国。那里敌对的首领、“红党”和“白党”的领袖争权,罗萨斯坚持把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看作阿根廷不驯从的一个省。他的流亡国外的对手支持一派,他自己支持一派,结果使蒙得维的亚变成了“新的特洛伊”,从1843—1851年长期被围。与此同时,阿根廷又和法国发生纷争,结果法国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1838—1840年),封锁军跟罗萨斯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沿海诸省的敌人结成了联盟;这次封锁后,法国和英国为保卫乌拉圭的独立和它们自身的特殊利益联合干涉,在1845年又一次封锁这个城市。

最后,罗萨斯胜利了。英国和法国于1847年和1848年先后解除封锁。接着,1849年签订了《英阿条约》,1850年签订了《法阿条

约》。但是，封锁给经济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管罗萨斯在外交上取得多大成功，阿根廷的政治、经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罗萨斯坚持对各省小首领的控制，间接为阿根廷的统一效了劳。他还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了比较廉正和有效的管理。但是，罗萨斯没有建设性的政治纲领。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利益，他长期牺牲内地各省的利益，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为他的领导付出了过高的代价。1851年5月，他的一个亲信、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在乌拉圭和巴西的支持下，“宣布”反对他。1852年2月3日，这个独裁者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蒙特-卡塞罗斯被推翻，他逃到一艘英国军舰上避难，被带到英国——在南安普顿附近过着流亡生活，结束了他的余生。

乌尔基萨保证要为阿根廷制定宪法，但十几年之后他的保证才完全兑现。1852年，制宪会议在圣菲召开。1853年5月25日，会议颁布了阿根廷邦联宪法。这部宪法要归功于杰出的流亡者J. B. 阿尔维迪在智利匆匆写成出版的一本小册子^[15]，这部宪法反映出美国宪法的巨大影响。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唯恐失去自己的优越地位，担心乌尔基萨会继承罗萨斯的衣钵，拒绝派代表出席制宪会议，也不承认宪法。大会施加高压无效，只得让它自行其是。1854年，它制定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州”宪法，保持了实际的独立。

这时，阿根廷有两个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和阿根廷邦联政府，后者的首都临时设在巴拉那。乌尔基萨分别同英、法、美等国签订条约，保证内陆水道对外国船只开放。他还奖励外国移民入境，改善交通，重新组织联邦的财政。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垄断大部分对外贸易，结果也垄断了大部分关税。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关税战不久开始，在1859年发展成公开的战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在塞佩达战役中被击败，不得不加入联邦共和国。但是，只有按照它的条件，它才愿意永久加入。1861年，冲突又发生；这一次，塞佩达战役的战败者于9月17日在帕翁战役中获胜。巴拉那全国政府被推翻，新的全国议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重建了全国政府；1862年10月，帕翁战役的胜利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巴托洛海·米特雷成为这个统一国家的第一任宪法总统。

米特雷在乌尔基萨打下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虽然阿根廷的制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由于在1862年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个国家

可以充分地、自然地发展经济了。1862年时这个共和国拥有的铁路还不到50英里。耕地面积只有373平方英里。草原印第安人还没有被征服。养羊业比养牛业更重要。1869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的人口还不到200万。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外省的控制日益加强，1863—1870年连接罗萨里奥和科尔多瓦的中央阿根廷铁路的修建，1866年的巴林财团贷款，以及数量虽少但不断增多的外国移民，都表明经济大革命就要到来。阿根廷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最新时代，大草原的改变已经开始了。

但是，1868年，米特雷的总统职位在一场大灾难中结束了。灾难发生在一个亚热带国家——小小的巴拉圭共和国。这个国家和阿根廷、巴西以及玻利维亚接壤，它作为独立国家的奇特历史，只不过是3个人的历史，这3个人相继成为巴拉圭人民的独裁统治者。

这3个独裁者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他根据巴拉圭的土生白人摆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心，于1811—1814年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使用恐怖手段加以巩固，此后，他就独断专行地统治这个国家了。但是必须说明，土著的瓜拉尼人和梅斯蒂索人农民对他的统治普遍感到满意，因为他多少对他们有利。弗朗西亚是个严厉、多变、冷酷的人，把自己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化身。他使巴拉圭与世隔绝，保持独立，自给自足，维持了安定局面；他在1840年死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动乱。不久，另一个专制统治者接替了他。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在1841年宣布就任执政官，1844年成为独裁总统。在他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仍是个警察国家，弗朗西亚创立的特务系统继续兴旺。巴拉圭人被征入伍，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南美最强大的军队。不过，洛佩斯的统治没有弗朗西亚那么严厉，他抛弃了弗朗西亚的孤立主义体制；邀请外国人来巴拉圭，开发河流，鼓励对外贸易，甚至还兴修了一条铁路。他希望和平，他的军队是用于防御的。但是，他在1862年临死的时候，实际上把总统职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不管他对他的国家有过多大贡献，这一举动却败坏了他的声誉。

这时巴拉圭成了一个“潜在的普鲁士”。南美洲出现了“一部由专制政权控制的强大的战争机器”^[16]，其主人是一个冒牌的拿破仑，一个骄矜暴虐、野心勃勃的无耻之徒。在1864—1870年的巴拉圭

战争中，绝对服从的农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牵制了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三国联军，这次战争的起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洛佩斯要对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负主要责任。巴拉圭同阿根廷、巴西都存在着边界争端，但是，假若洛佩斯不决意一战，这些争端并非必然导致战争。乌拉圭的政局动荡不定，“红党”和“白党”之间的斗争仍在进行，“红党”时而求助于阿根廷，时而求助于巴西，而巴西本身就怀有帝国野心。因此，拉普拉塔河流域犹如一个火药桶，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假若洛佩斯不蓄意寻找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拉普拉塔河的事务中取得发言权”^[17]，满足他自己的野心和维护自己的权力——这场战争是不会发生的。他在1864年巴西对乌拉圭的干涉中找到了这个机会，首先向巴西挑战，继而向阿根廷挑战，把本国人民引上了一条奴役、流血和恐怖的道路，结果使巴拉圭民族濒于灭绝的境地。1870年洛佩斯垮台时，巴拉圭的人口从50多万锐减至不足25万，幸存者都是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就是专制政权的代价，这就是弗朗西亚缔造的国家的命运。

三国同盟战争和随后的1879年的太平洋战争（见原文第666页）是19世纪南美洲最后两次重大的国际冲突。除了西班牙在60年代挑起的对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那次战争（见原文第666页）外，冲突都是在南美国家之间发生的。除了来自另一个南美国家的威胁外，任何南美国家的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确实，英国曾于1832—1833年占领了福克兰群岛，逐走了阿根廷在那里的驻军。但是福克兰群岛离美洲大陆很远，它的归属也还有争议。法国在1834—1840年，而后英、法在1845年，曾两次武装干涉罗萨斯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见原文第670页）。尽管这些干涉在原则上是危险的，违反1832年宣布的门罗主义的精神，但并没藏有扩张领土的目的，事实上也没有威胁阿根廷的独立。至于西班牙在太平洋沿岸的反常行为，只能落得个狼狈撤退的下场。

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外来的威胁，有来自欧洲的，也有来自美国的；也确实存在着门罗主义制定者预见的那种危险，即一个不稳定的或分裂的地区会招致竞相干涉，使欧洲均势原则扩展到西半球，而且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墨西哥在1821年取得独立时，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一半，人口却与当时的爱尔兰相近。1810年，墨西哥爆发了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

利亚领导的大暴动。这是一次被剥夺者反对剥夺者的起义，虽然好不容易地给镇压了下去，却显示了革命可以释放出多么危险的力量。但是墨西哥的独立在取得后却采取了一种保守反动的形式。在原西班牙殖民地中，只有墨西哥在独立时是君主国而不是共和国。可是，墨西哥的第一个统治者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是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的土生白人军人，他并不具备帝国缔造者的素质。一次军事政变很快就推翻了他。1823年，帝国改为共和国。克里奥尔人贵族知识分子领袖们发生分裂，用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联邦制替代了他们熟悉的中央集权制政府。

帝国是一时权宜之计，也是一次加重苦难的实验。以美国的宪法为模式的共和国宪法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胜利，地方利益对大城市利益的胜利，这个共和国似乎招致无穷无尽的灾难。1823年至1827年墨西哥确实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但是此后，暴乱、武装起义以及军队叛变层出不穷。联邦制度刚扎下根，就在1835年废除，而几年之后至少在名义上又恢复，不论是联邦政府或中央集权政府，结果都一样。总统、副总统、代理总统不断更换。在30年中行政首领换了46次。在这整个时期，墨西哥的支配人物是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在外交上是反复无常的塔列朗，在军事上是卑鄙无耻的拿破仑”[\[18\]](#)。

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墨西哥的领土完整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1829年西班牙从古巴入侵墨西哥，企图重新征服这个国家。入侵固然被有力地击退了，但是分裂运动迅速发展。1839年尤卡坦脱离联邦，长期独立在联邦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移民开拓的边缘省得克萨斯在1835年发生叛乱，1836年宣布独立，成立“孤星共和国”，并用武力捍卫独立。得克萨斯人在经过一场殊死的斗争之后，最后俘获了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本人。9年后，即1845年，“孤星共和国”并入美国。这一事件加速了美墨战争的爆发。战争以美国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墨西哥城而告终。根据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不仅将得克萨斯，而且将加利福尼亚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大片领土割让给美国（参见第23章，原文第621—622页）。墨西哥的领土面积减少到不及原有的一半。

1836年得克萨斯的割让主要应归咎于墨西哥本身。虽然美墨之战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迟早要丢给正从大西洋向

太平洋扩张的美国。因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既无力开拓又无能力管理。但是，墨西哥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这个国家能产生诸如保守派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卢卡斯·阿拉曼、自由派老战士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乃至圣安纳等人，并非缺乏人才。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利。困难的根源要深得多：人数不多的土地贵族；大量贫苦无知的农民；教会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教会财产不能转移，教士不受民事法庭裁决，它的影响完全是保守反动的；军队的军官养尊处优，士兵愚昧无知，只服从军法；等级、阶级以及省与省之间的割分使国家分崩离析。没有建立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政府的基础。圣安纳时代造成的道德败坏和组织涣散、金融的混乱以及欺诈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制度的标记，只是证明产生这些罪恶的社会若不改造或得到控制，政府的职能必然要停顿。

19世纪中叶开始了改革运动。1854年在格雷罗州的阿尤特拉小镇发生了一次暴动。它标志着一个更为猛烈动荡的新时代的开始。暴动在起初只不过是政治家们反对“最尊贵的殿下”圣安纳专制统治的一次叛乱，但很快就发展成广泛的几乎席卷全国的运动。这个运动面向过去，追求墨西哥梅斯蒂索人受到挫折的抱负，怀念已遭失败的那些改革。这个运动也面向未来，希望按19世纪自由主义者塑造的形象建立一个新的墨西哥。它用原则的论战替代党派的争斗；它把一个廉洁正直、坚韧不拔的萨波特克族印第安人贝尼托·华雷斯选入内阁，最后升任总统。

接着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改革——1855年11月颁布了“华雷斯法”，改组司法系统，限制教士和军人的法律豁免权；查禁耶稣会；1856年6月颁布了“莱尔多法”，又称“财产征用法”，规定除了用于公共礼拜外，僧俗社团均不得拥有不动产，并且规定对教会永久管业的固定土地不实行没收，而是以优厚的条件强迫出售；对教士收费也作了限制；最后于1857年2月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在结构上和1824年的联邦旧宪法相似。不过新宪法规定建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它显然不顾罗马天主教会作为国教的存在；它还同一件很长的权利法案一起，体现了“华雷斯法”和“莱尔多法”。

在此后的年代，这个自由主义的宪法容易被用来为总统独裁服务。“莱尔多法”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促进财产分配得更广泛，但

实际上对扩大农民的所有权没有多少帮助，反而帮助了一个新贵族阶级的兴起。再者，正如在宪法里再次规定的那样，“莱尔多法”也是对乡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打击，导致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进一步贫困化。同时，“华雷斯法”和“莱尔多法”两者也引起了僧俗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教皇早已谴责了这些新的立法。墨西哥的大主教曾威胁要把宣誓忠于宪法的教徒开除出教。1857年12月墨西哥城的政变是一长系列武装叛乱的顶点；它废弃了新秩序，恢复了旧秩序，次年1月建立的军事独裁政府加速清除改良主义者所作的改革。此时，根据宪法担任总统的华雷斯逃亡外省，准备组织抵抗，最后在墨西哥的主要海港维拉克鲁斯重建自由派的政府。

由此开始的战争持续了三年，而且异常激烈，使墨西哥精疲力竭。在战争的中期，1859年7月华雷斯宣布了更为彻底的改革：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财产；封闭修道院；规定结婚不用宗教仪式。他还提出了分解大庄园，改革税收制度，发展教育事业和鼓励移民等一系列计划。这时他已经取得了美国的承认。由于他控制着维拉克鲁斯港，墨西哥城军事政府十分需要的关税收入全掌握在他手里。可是他的事业直到1860年才转向胜利；1861年1月才最后回到了首都墨西哥城。他赶走了西班牙驻墨西哥城的公使和罗马教皇的使节，因为他们都曾积极支持过那个被推翻的政府。他还驱逐了大主教和其他一些教会人士。他实施了他的改革法令，但是游击战仍在进行；国家经济一片混乱。7月，即华雷斯“重新当选”为总统后不久，他采取了一个严重的步骤，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步骤——国家外债全部缓期两年支付。

后果是灾难性的。早在4个月之前，英国已经承认了华雷斯政府，条件是该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赔偿英国国民在历届墨西哥政权下所受的损失。其中有些要求是新提的。如提出刚下台的政府曾掠夺了英国驻墨西哥公使馆的大批现款。又如，要求归还政府的反对派抢劫了一列装载外国商人白银的列车。其余都是原先的要求。根据1851年签订的协定，墨西哥已拨出关税收入的一部分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墨西哥因为20年代的第一次英镑贷款，欠了英国债券持有人一大笔债。它这时不仅缓期支付长期借款，而且还拒绝（至少暂时地）履行同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等国签订的协议所规定的义务。“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对墨西哥奉行耐心等待的政策”，到这时就改为采取行动的政策。^[19]根据1861年10月签订的伦敦协定，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

一致同意采用武力，占领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来迫使它偿还欠债，但也同意不破坏墨西哥的领土完整或政治上的自主权。12月，一支西班牙陆军在维拉克鲁斯登陆，并于1862年1月同法国军队和英国海军陆战队会师。长期以来笼罩着墨西哥的外来干涉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

就西班牙和英国而言，这个事件很快就过去了。它们在1862年4月撤走了军队。可是，干涉一开始，法国官员的所作所为，包括支持一个极无耻的经济要求，很快地表明，法国的意图与伦敦协定所一致同意的意图大不相同。拿破仑三世受了墨西哥流亡者以及他自己在墨西哥的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员似是而非的说的欺骗，竟相信法国军队在墨西哥将作为一支解放的军队而受到欢迎（参阅第17和24章，原文第464和641页）。他把自己看作受压迫民族的救世主，对抗美国势力的拉丁世界保卫者。其实，当时美国被内战所分裂。拿破仑三世还相信墨西哥建立君主制的条件已成熟。他选定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为统治这个新国家的皇帝。他大大加强派往的军队，向前推进遇到坚决抵抗。华雷斯现在不仅是墨西哥自由主义的象征，而且也成了民族独立的象征。1863年5月他再次离开首都。在法国的指使下，社会知名人士集会把皇冠献给马克西米连。马克西米连由于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接受了皇冠。1864年6月进入墨西哥城。这个充满阴谋、野心、幻想和欺骗的故事至此达到了高潮。

结局是一出悲剧。马克西米连是个宽宏善良、耽于幻想的人，但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缺乏最普通的常识。他对自己要统治的国家一无所知。当时这个国家的民情激愤，到处流血。教会和保守派虽然历经苦难，却毫未接受教训。他们很快与马克西米连疏远，因为他倾向于自由派，拒绝将这时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国有化的教会财产归还教会。罗马教廷舍弃他。逃亡者华雷斯仍在顽强抵抗。最后拿破仑出卖了他的傀儡。这个帝国本来就靠外国的刺刀才得以存在，当1866年那些外国刺刀开始撤走时，帝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垮台了。此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由于拿破仑受到了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又急于摆脱这一耗费巨大、不得人心且看不到尽头的冒险，就抛弃了马克西米连，任他听凭命运的摆布。1867年3月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撤离了墨西哥。他们一离开，华雷斯的部队就向注定灭亡的皇帝进逼。5月，马克西米连宣布投降；6月，他为自己的愚蠢和别人的欺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着战争的结束，帝国也灭亡了。华雷斯再次成了墨西哥无可争辩的总统。他只剩下生命最后的5年时间来着手重建这个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巨大任务。他在1872年逝世时，他的抱负并没有实现。国家的政治生活仍然不断受到暴乱和骚动的干扰；学校寥寥无几；广大群众陷于贫困。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涣散的民族中，民族意识还是开始在慢慢发展。如同华雷斯曾拯救了这个国家一样。1876年以后，华雷斯的老副手波菲里奥·迪亚斯出来掌握这个国家，把它革新，最后使它得到和平。

拿破仑在墨西哥的冒险行径，自始至终是以力量均势为名的对门罗主义的持续挑战，也是有意限制日益增长的美国势力的一种企图。门罗主义在欧洲不受尊重，在拉丁美洲不受信任。法国在墨西哥以敌对行动公然向门罗主义挑战；英国在中美洲拒绝接受它，不过对于美国的敏感不能不考虑；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对门罗主义的运用则是置之不理。

中美洲是墨西哥和巴拿马地峡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区。它的名字源于中美洲联合省。中美洲联合省是1823年在原西属危地马拉将军辖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治上的联邦。危地马拉在1822年曾并入伊图尔维德的帝国。联合省由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等五国组成，从来不曾统一过，联邦是徒有其名。它领土的总和略大于西班牙，总人口不到200万。大部分居民是无知的印第安人和几乎同样无知的梅斯蒂索人。这个新的国家刚成立就陷入政治的、地区的和宗教的争斗中。洪都拉斯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就是1829年在这种争斗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他短暂地控制了无政府状态；对罗马天主教的权力和财产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把联邦的首府从危地马拉城迁至圣萨尔瓦多，并把一个貌似联邦一直维持到1838年才解体。虽然中部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相互关系比之跟危地马拉或哥斯达黎加更为密切，一次又一次企图恢复联邦，但均遭失败。

因此，从1838年起中美洲的历史就成了争吵不休、动乱不安的5个共和国的历史。它们都任意干涉邻国的事务。最强的是印第安人占多数的危地马拉共和国。在1865年之前几乎一直在拉斐尔·卡雷拉的控制下。卡雷拉是一个迷信而反动的混血种人，既是保守的教士贵族的头子，又是他们的工具。哥斯达黎加最为孤立，却也最开明。在这些

国家中，用武力建立和维持的权威是唯一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权威。在这些国家，“对付腐败的政府，除了革命之外，别无他法”。因而，在这些国家，内战“就成了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20\]](#)

但是，并非全部中美洲地区都为这5个中美洲共和国所占有。在加勒比海沿岸，濒临洪都拉斯湾的是英国殖民地伯利兹。它的由来可追溯到17世纪。虽然英国从未正式宣布占有，但实际上英国长期对它行使主权。同时，伯利兹的移民已经逐渐把他们砍伐红木的活动范围扩展，在西面和南面远远超出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给他们划定的边界。再者，东至洪都拉斯角，南至圣胡安河的“莫斯基托海岸”是属于“莫斯基托印第安人”的领土。“莫斯基托印第安人”是一个各族混杂的半游牧混血民族。他们坚持反对西班牙的权威。在18世纪，英国含糊地把它作为一个保护国。

英国从未完全放弃与莫斯基托印第安人的联系。例如，按照习惯，莫斯基托国王在牙买加加冕，但是1824年国王改在伯利兹加冕。在19世纪30年代，主要由于伯利兹总督的有力活动，这种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英国不仅重新提出对鲁阿丹岛这项十分站不住脚的领土要求，而且还要求恢复莫斯基托保护国。鲁阿丹岛是洪都拉斯湾的海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1838—1839年曾为英国人所占领。1844年英国任命了驻莫斯基托海岸的驻扎官。该领地在当地被重新命名为莫斯基蒂亚。英国授予莫斯基托国王一面和英国国旗极为相似的旗帜。3年之后，英国宣布圣胡安河为这个英王保护国的南界。1848年英国又以莫斯基托国王的名义驱逐了圣胡安港的尼加拉瓜主管机构。该港口被重新命名为格雷敦，以纪念牙买加的总督。

就这一切来看，英国人在中美洲的意图比当时人们所设想的要小得多。同时，中美洲国家中没有一个直截了当和无可争辩地要求把莫斯基托海岸归自己管辖。但是格雷敦本身有它的重要性。它位于利用圣胡安河和尼加拉瓜大湖建设连接两大洋运河的一条最实用的路线上的关键地点。英国强占格雷敦时，这条路线以及整个横贯地峡的交通问题正取得新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不仅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而且在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亚还发现了金矿。必然的结果是淘金热席卷整个中美洲。1846年美国和新格拉纳达共和国早就签订条约，授予美国公民穿过巴拿马地峡的用地权。1855年由美国资本修筑的巴拿马铁路通车。1849年在美国成立了一家运河公司，准备开凿一条以格雷敦为

终点横贯尼加拉瓜的通航运河。这家公司刚同尼加拉瓜签订合同，英国就发出通知，圣胡安河属于莫斯基托王国，没有征得莫斯基托国王及其保护人——英国政府的同意，不得擅自处置。

接着是外交上的争论，这场争论在伦敦和华盛顿进行得很有礼貌，但两国在中美洲的代表却激烈争吵。最终于1850年4月19日双方签订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根据该条约，英美两国同意，拟议中的运河应在双方共同保护下修建。任何一方都不得谋求独占运河，任何一方也不得对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莫斯基托海岸以及中美洲的其他地方进行“占领、设防、殖民以及承担或行使统治权”。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目的是企图调和英美两国的观点，并且实际上要使中美洲地区中立化。但是这个要求双方自我克制的条约及其解释性的声明的文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在英国人看来，这个条约没有影响到莫斯基托保护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而又受保护的王国的地位，不过承认莫斯基托人最后应撤出格雷敦，并划定保护国的边界。条约也完全不提伯利兹殖民地或鲁阿丹岛。1852年，鲁阿丹岛及其相邻的岛屿被设立为海湾群岛殖民地。

这一事件迅速触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华盛顿方面强烈要求英国不仅从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保护国撤走，而且从伯利兹殖民地最近占领的部分撤走。同时，在中美洲本身，事态日趋严重，一触即发。格雷敦市政当局和附属运输公司——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通航运河公司（这家公司正从事取道圣胡安河运送旅客横跨地峡的运输业务）之间发生了纠纷。1854年，一艘美国军舰炮击并摧毁了格雷敦。次年，美国一个“暴乱煽动者”，曾领导过袭击墨西哥领土的威廉·沃克来到正在内战苦难中的尼加拉瓜，夺取了格拉纳达市，并于1856年“当选”为总统。他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承认，运输公司却和他势不两立，并遭到了中美洲其他共和国一致的反对。1857年，他被驱逐出去。他曾两次企图卷土重来，最后在1860年死在洪都拉斯。

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容忍的。但是英国无意冒跟美国作战的风险，而且对阻止美国势力在中美洲的扩张也不坚决。1856年两国政府为进一步解决双方的分歧作了极为认真的努力。假若这次努力失败，美国很可能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结果势必加剧中美洲的矛

盾。为了避免这一危险，英国决定就条约总的方针达成协议作出努力，但是这一次采取直接同中美洲各共和国谈判的方法。

最后在1859年和1860年，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根据1859年英国—洪都拉斯条约，海湾群岛划归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对莫斯基托海岸的部分要求也得到了承认。根据1860年的英国—尼加拉瓜条约，尼加拉瓜对莫斯基托海岸的其他部分的主权也得到了承认，不过莫斯基托印第安人在特定的范围内将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而且格雷敦成为自由港。根据1859年的英国—危地马拉条约（该条约后来成为签约两国间长期争论的根据），伯利兹殖民地的边界按照伯利兹居民以前提出的要求重新划定，因为在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时认为边界早已存在了。3年后，伯利兹正式成为英属洪都拉斯殖民地。

从1823年美国宣布门罗主义到1895年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发生争吵引起危机的这一时期中，中美洲问题是英美两国在拉丁美洲关系史上争斗最激烈的事件。它的解决并非是门罗主义的胜利（《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后来被认为是违反门罗主义的），而是明智和善意的胜利。再者，构成对中美洲各共和国安全和独立更为巨大的威胁，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但是在60年代这种威胁也消除了，因为美国陷入了痛苦的内战。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扩张主义情绪低落了；与此同时，对于横贯中美洲连接两大洋的交通问题的兴趣也衰退了。

在另一个地区，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原则和一个欧洲强国所采取的行动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就发生在当年哥伦布命名为西班牙的岛上。1822年，在受过教育的混血种人让-皮埃尔·布瓦耶统治下的黑人共和国海地，并吞了邻近的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海地的独立在1825年得到了法国的承认，但附有苛刻的经济条件。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布瓦耶的统治有10年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在一小撮上层的有色人种影响和统治下的海地黑人还处于半野蛮状态。广大农民贫困不堪。1843年，一场“知识分子革命”推翻了布瓦耶的统治，政治和经济也同时衰落。黑人恢复最高权力的结果是一个愚昧无知的黑人长期野蛮的独裁统治。这个黑人就是福斯坦一世皇帝。他封授了4名王子和59名公爵。国家的财政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1859年他垮台后，海地恢复了共和国，但直至1862年才得到美国的承认。共和国仍然多灾多难，1888年弗劳德曾尖刻地称海地共和国是“对文明的讽刺”。

[\[21\]](#)这无疑反映了当时的舆论。

与此同时，圣多明各为争取独立举行了起义，于1844年成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这以前，这个国家忍受了长达22年的暴虐统治，占领者蓄意要使说西班牙语的白人、黑人以及混血种人海地化。他们阻碍人们使用西班牙语。各方面用黑人代替白人，地主纷纷移居国外。多米尼加虽然赢得了独立，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地对新国家安定的微小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国家因国内的争斗弄得惶惶不安，还时刻畏惧被黑人邻国再次吞并，因此，它请求法国、美国和英国提供保护，或者准予归并。英、美、法三国虽然互相猜疑，但还是努力去限制海地的野心。最后在1861年当时的多米尼加总统请求西班牙重新前来管辖。西班牙军队从古巴开到多米尼加。西班牙国旗代替了多米尼加的国旗。原共和国总统成了西班牙的新总督。

西班牙重返多米尼加这一事件举世瞩目，成为欧洲国家对原美洲殖民地重新拥有主权的唯一实例，只有英国在1832—1833年占领福克兰群岛可能是例外。但是，这一试验是短暂的。结果证明西班牙的统治同多米尼加一样无能，同海地一样丑恶。它只能凭借武力来维持，而且耗费巨大。1865年宗主国西班牙放弃了这个徒劳无功的任务。4年后，这个复活的共和国与美国签订了归并的条约，但是美国参议院不予批准。与海地一样，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全靠自救。一个以黑人占多数的共和国和一个以混血种人占多数的共和国在一个小岛上紧靠在一起，却不能和睦相处，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地导向它们历史上的那个重大事件——由美国暂时占领。

“许多暴君将在我的坟墓上出现。”^[22]玻利瓦尔在1826年这样写道。他的这一预言应验了。考迪略主义，即军事首领、强力人物和地方领袖的统治是拉丁美洲各国共有的现象。它不只是革命战争中军人领导的遗产，而且在西班牙美洲社会的结构、性质和传统中深深扎根。新秩序的缔造者曾多次徒劳地企图在宪法里确定一个合理的自由模式，可是这些宪法常常是从国外宪法折中借用的，极不适合本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人治之风扫荡了”宪政。^[23]权威复活了，但它不是非人格化的权威，而是首领个人的权威。大多数新建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和智利是两个主要的例外）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都时而遭受暴政，时而遭受无政府状态的祸殃。在走上独立道路时一开始就这样无能的民族是少有的。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自由和秩序是这样难以协调。

不过，即使在那些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国家里，时间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人们的思想也不是僵死不变的。政治倾向逐渐发生了变化，赤裸裸的军事专制开始消失，文职的寡头取得了支配地位，新型的总统独裁出现了。虽然“首领的没落”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10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在这个时代中，各国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新崛起的阿根廷和墨西哥到底赶上了起步较早但继续上升的智利和巴西。日益增长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50年来，拉丁美洲在向世界贸易开放。但是欧洲的资本投入在20年代出现第一次高潮后，却普遍地减退。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移民潮流也转向北半球而不来南半球。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了变化的迹象。1876年单是英国投入拉丁美洲的资本达到1.8亿英镑，到1913年几乎达到10亿英镑。随着资本的输入和移民的到来，经济活动的加快以及政治上的日趋稳定，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史开始了新的一章。这一章也是与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史密切联系的。

（姚乃强 译）

[1] 维森特·莱库纳编：《解放者玻利瓦尔书信集》（10卷本，加拉加斯，1929—1930年；第11卷，纽约，1948年；第12卷，M. 佩雷斯·比拉编，加拉加斯，1959年），第1卷，第196页。

[2] 维森特·莱库纳编：《解放者玻利瓦尔书信集》，第9卷，第376页。

[3] 约翰·阿米塔奇：《巴西史》（两卷本，伦敦，1836年），第2卷，第104页。

[4] H. 汉德尔曼：《巴西史》（里约热内卢，1931年），第932页。汉德尔曼的著作最初在1860年用德文发表。

[5] 即庄园主、牧场主和种植园主。

[6] J. F. 诺玛诺：《巴西经济类型研究》（查佩尔希尔，1935年），第155页。

[7] M. H. 赫维：《智利的黑暗时代》（伦敦，1891—1892年），第305页。

[8] 1890年巴尔马塞达总统的话。《政府公报》（圣地亚哥），1890年10月2日。

[9] 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玻利维亚通史，1809—1921年》（拉巴斯，1922年），第252页。

[10] C. R. 马卡姆：《秘鲁和印度游记》（伦敦，1862年），第297页。

[11] F. 加西亚·卡尔德隆：《拉丁美洲的崛起和发展》（伦敦，1913年），第201页。

[12]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话。埃内斯托·克萨达：《罗萨斯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年），第230页。

[13] 克萨达：《罗萨斯时代》，第41页。

[14] F. A. 克尔克帕特里克：《阿根廷共和国史》（剑桥，1931年），第160页。

[15] J. B. 阿尔维迪：《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瓦尔帕莱索，1852年）。

[16] P. H. 博克斯：《巴拉圭战争的起因》（伊利诺伊州厄巴纳，1930年），第289页。

[17] P. H. 博克斯：《巴拉圭战争的起因》（伊利诺伊州厄巴纳，1930年），第211页。

[18] H. H. 班克罗夫特：《墨西哥史》（6卷本，纽约，1883—1888年），第5卷，第802页。

[19] 德克斯特·珀金斯：《门罗主义，1827—1867年》（巴尔的摩，1933年），第354页。

[20] D. G. 孟罗：《中美洲的五个共和国》（纽约，1918年），第31页。

[21] J. A. 弗劳德：《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伦敦，1888年），第343页。

[22] 莱库纳：《解放者玻利瓦尔书信集》，第5卷，第292页。

[23] R. M. 莫尔斯：《关于西属美洲政府的理论》，《思想电杂志》，第15卷（1954年），第79—80页。

第二十六章 远东

远东的中心地区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人口约占亚洲人口的一半、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19世纪进入20年代中期之际，这一地区仍然几乎是西方各国旅行和贸易所无法到达的地方，西方的文化影响实际上也难以渗透。特别是广袤的中华帝国，在1644年满洲人在北京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尚未出现内部的解体，也没有遭受外部的蚕食，而在中国以西的一些亚洲大国则从17世纪以来，就已发生了这样的内部瓦解并遭受到外部的侵略。莫卧儿帝国已经消失，在印度的绝大部分地方则代之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失地于俄国，又因埃及的脱离和希腊的民族起义而被削弱。波斯也失地于俄国，又因阿富汗新王国的建立而在东面缩小了疆域。但中国自1700年以来不仅没有丧失过领土，而且由于兼并了卡尔梅克蒙古人的中亚帝国（包括西藏）而扩大了疆域。这个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帕米尔的巨大的政治有机体，松弛地、然而有效地由一个设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它承袭了帝国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同儒家士大夫阶级的学说密切相关，而且可以追溯到相当于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的时代。1830年，这个帝国的传统结构看来像过去一样地强大；而在统治阶级中，满洲人的文化习俗已同汉文化融为一体。这个统治阶级充满着种族优越感，沉湎于一种自鸣得意的自满自足之中，完全没有料到即将降临到它头上的灾难和变革。

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有任何能够威胁他们的独立或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提出挑战的邻国的存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过去曾经是对“中国”的如此巨大威胁，现在却是在这样一个中国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政府首先就是从这些民族取得力量的。再往北去，这个帝国包括了今天的西伯利亚东部的许多地方，直到鄂霍次克海。这一疆界是1689年同俄国人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当时因为人数太少，同本土的陆路交通又很困难，因此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以东还不能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西面，高大的山脉为满洲中华帝国提供了坚固的自然疆界。在西藏的那边，喜马拉雅山设下了一道屏障。在1792年中国人击败了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之后，直到1904年英国远征拉

萨之前，再也没有人逾越过这道屏障。在东面和南面，中国对一批较小的国家——朝鲜、琉球、安南、暹罗和缅甸——保有一种不明确的宗主权，这些国家对中华帝国缴纳礼仪性的贡品。再往东去，日本在自己的岛屿上闭关自守，他们不向中国进贡，但在德川幕府朝代（自1600年起统治日本）的统治下，不再派出海盗舰队，这样的舰队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曾经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祸患。从南方的海上，西方国家的商人同中国进行贸易，但从1757年起，根据法律规定这种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进行。中国人把西方商人统称为“西洋人”，属于“夷”即“野蛮人”一类。这些人在东南亚一些地方取得了领土权，如西班牙人在菲律宾，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英国人在若开、丹那沙林^[1]和新加坡——但这些地方没有一处同中国邻接，而且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占有一个据点，除了葡萄牙人在1557年占领了澳门，作为对他们在剿灭海匪中效力的报偿。但是，中华帝国很快就受到了这些从遥远的欧洲来到远东进行贸易的海上国家之一的打击，这次打击不但深深地屈辱了它的国威，而且注定要对它以后的整个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有一种在平等主权国家的体系内进行永久性外交往来的思想；而中华帝国政府却一直没有相当于这种思想的任何观念。在儒家的哲学中，中国是人类真正文明的无与伦比的来源，而中国的皇帝则是在人世事务中“天”的唯一合法代表；他在概念上是世界的主宰，其他君主同他的关系只能是附庸对宗主的关系。这种附庸地位的表现就是纳贡以及各种表示承认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礼仪。贡品在数量上并不是个沉重负担，中国朝廷对之所以珍视并不在于它的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是因为它提高朝廷的威望。纳贡国还往往获得厚偿，可以得到同中国通商的特权。这一制度由于不牵涉到中国政府对纳贡国内部事务的直接控制而为许多国家所自愿接受；这些国家并不认为对于远比自己强大的大国采取这种形式上表示臣服的行动有损于它们的尊严。但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政治上的需要驱使中国同这样一些外国统治者打交道，他们拒绝听从中国关于他们应处何种适当地位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官场就得对原定规矩有所通融。因此，在划定中俄两个帝国疆界的《尼布楚条约》中，就没有表示沙皇要比中国皇帝低一等。这种让步是迫于要结束敌对行动并议定陆地疆界的需要而采取的，但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至于同那些只是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但与“中央王国”并不接壤的遥远

国家，似乎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建立这种在非纳贡基础上的外交关系了。北京朝廷允许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商人在广州遵照中国地方当局单方面定下的种种规章进行贸易，但它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同这些外商的本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广州的外国人得不到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对他们的利益的支持或保护，他们吁请中国当局申冤理枉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公行”（一种由官方准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联合会）呈递卑躬屈节的禀帖。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人在广州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最大。他们的商业不是通过东印度公司，就是通过来自印度的持有东印度公司执照的“同胞”商人进行的，所以这个公司驻广州的代表可以作为广州整个英国商业利益的代表行事。但是，这个公司却不能对广州贸易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作任何改善，也未能取得在广州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贸易的许可。英国政府于1793年派遣了一个以马戛尔尼伯爵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以便直接同中国政府谈判一项协定。这个使节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载送使节前往京城的车船上都插着写明“英吉利进贡”的旗帜；而所提出的修改在广州的现行贸易办法或开放新的通商口岸的要求，都未为中国人所允准。1816年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第二个使团同样没有取得结果，广州的贸易还是照过去的老办法进行着。尽管情况使人厌烦，但贸易却获利甚大，外国商人舍不得放弃，而中国人则只要外国人遵守（不论如何勉强）规定的制度，也就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种制度了。尽管如此，但在30年代出现了两种新的发展形势合在一起促使广州的英国人和中国地方当局之间出现了危机。第一是广州贸易的一个项目——鸦片数量增加了。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些可以向中国销售的商品，以偿付在中国收购的茶叶以及其他产品的费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贸易的收支差额对欧洲人不利，差额要用硬币来补偿。但到18世纪末，贸易逆差由于从印度输出鸦片而减少。这种毒品先前是由葡萄牙人从果阿运来的；英国人于1773年开始参与这一贸易，但当时的销售总量还是很小的。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诏禁吸鸦片（这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时髦”的嗜好），但在1800年以前，鸦片作为一种药品还是可以合法输入的。1800年，嘉庆皇帝下诏断然禁止。此后，鸦片就不再由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船只运载，而是由其他英商船只从孟加拉运来，在珠江上的木船上转卖出手，买主向当地官员行贿，这些官员便对这种交易装作没有看见。在19世纪头30年中，这种买卖不断增大。中国当

局也不时地想要实施禁令，结果商人们就把鸦片先转移到停在珠江口外的趸船上，然后再走私运上海岸各地。法国的、荷兰的和美国的以及英国的商人，都从事鸦片贸易，但除从波斯和土耳其运来少量外，鸦片都是通过英国人的关系由印度供应，所以中国人认为英国人应该负责。随着这种非法贸易的数量增长，北京的中央政府对之越来越关注了，不仅是因为吸食鸦片的嗜好——这在官场中已十分流行——所造成的后果，而且还因为由于外贸逆差导致白银外流，贪污盛行，广州的官员们中饱私囊而海关则毫无收入。最后，道光皇帝在1838年授以钦差大臣林则徐特权，指派其前往广州实行查禁。

这一行动必然造成了中国当局与广州外商在关系上的危机，但英国的商业利益当时如果仍由东印度公司代表，也许还不至于导致任何武装冲突。但从1834年以后，另一个因素彻底地改变了局势，这一因素对加剧紧张局势所起的作用不下于鸦片贸易的增长。1834年，英国的议会法终止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因此对华贸易在英国方面实行自由竞争。同时，律劳卑勋爵被任命为商务监督前往广州，并在那里执行过去由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总管所担负的职责。过去在广州的资历较深的商人被中国人承认为“大班”，有资格代表各个外商组成的行会，而新的商务监督则是作为政府代表前来，声称要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按照帕麦斯顿勋爵的指示，写信通知广州的中国总督他即将到达。但中国人拒绝接受此信，宣称他必须遵守关于外国人只能通过“行”商协会递呈禀帖而与省一级的政府联系的规定。总督指示“行”商通知律劳卑，他“不知必须遵守天朝法令”情虽可恕，但必须立即离开广州。由于律劳卑没有照办，因此中国官方就下令停止一切贸易并禁止中国人将食用等物品卖给英商。律劳卑的回答是命令两艘英国炮舰冒着炮火，强行溯江上驶，并派遣陆战队登陆，保护英国的商行。但英国的商行却被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包围，供应缺乏。最后律劳卑只好让步，离广州去澳门，半月后因热病在那里去世。他的商务监督一职的继任者在得到伦敦的新指示以前，一直采取了“绝对沉默和停止行动”的政策。

鉴于中国官方断然拒绝建立任何类型的官方关系，英国政府便不急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出决定。律劳卑曾报告说，没有足够的“强制手段”，同中国人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种“强制手段”——不只是两三艘军舰——在中国海还不具备。与此同时，广州的贸

易已经恢复，尽管关于商务监督的地位问题还陷于僵局，但贸易却一直继续到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执行查禁烟土的法令之时。林则徐的做法是用军队包围外国商行并宣布，在趸船靠岸并把全部鸦片缴出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在这样的压力下，收缴了两万多箱鸦片并被销毁。接着林则徐批准重新开放正常的贸易。但现任商务监督义律船长命令所有英商离开广州去澳门，除非保证对他们不再采取这种集体胁迫的办法。因为英国人不愿返回广州，林则徐便命令葡萄牙总督把他们驱逐出澳门。于是他们便登上了自己的船只，在珠江口另一边的香港停泊。这时发生了一桩涉及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裁判权这一整个问题的事件，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了。有几名英国水手在九龙上岸后，被卷进了一次斗殴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一名中国人被杀死。根据监督的权力，在一艘英船上举行的一次审讯中，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打出致命的一击因而致死。中国当局对于这一审讯结果不满意，要求把所有参与斗殴的水手都交给他们调查。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绝了。按照英国的一贯做法，凡被控杀人的人不能交出，因为中国人审讯时用酷刑逼供。

1839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英国船只必须在3天内驶入广州，或驶离中国沿海；同时并重新要求交出九龙杀人案件的犯罪水手。义律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于是11月3日，英国的两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同中国的一支由29艘作战平底帆船组成的舰队发生了冲突。中国战船有4艘被击沉，其余逃走——这一行动第一次清楚地显示出欧洲军舰同古旧的中国海上军备之间的作战力量有天壤之别。第一次中英战争已经开始了。

英国政府这时决定从印度派遣一支远征军并将敌对行动进行下去，其目的不仅在于恢复广州原有的状态，而且还要修改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基础。作战行动进行着，不仅在广州地区，而且沿着海岸向北发展直到舟山群岛，舟山群岛被占领；英舰继续驶向白河口，要求中国指派全权代表进行谈判。清帝国政府对于“逆夷”的显然不可抗拒的海上力量以及珠江口和长江口被海军封锁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惊慌，于是就派遣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国使节在广州谈判。英国人要求直接与广东省级政府以平等条件进行正式的交涉，以解决由于广州贸易而引起的争端；赔款、割让香港岛。琦善接受了这些条件，但割让中国领土一事在全国各地引起哗然；琦善遂被押解北京并被处死（但

予缓刑，后被赦免）。于是，战事再起，其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场灾难。曾在印度服役的陆军上校亨利·璞鼎查爵士，这时奉派从英国出发，充当英国的全权代表；并且增派海陆军增援部队以作他的后援。厦门和宁波相继被攻下，入侵者又强行溯长江上驶，占领了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点镇江。当兵临南京城下时，中国再次求和。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同一个西方海上强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作战情况表明，中国官军虽然还保持着1792年战胜廓尔喀人的威名，但在陆上对付西方武装部队并不比中国海上作战的帆船强多少。中国官军这时是由两类显然不同的部队组成的，一是八旗兵，都是满洲人（还有蒙古族和满族汉人的队伍），驻防首都和帝国各主要战略地点；二是绿旗兵，都是汉人，而且早在18世纪就已被认为优于满洲兵。要把这些分开的军事建制联合起来对付外国敌人是困难的；而且，到1840年，这两种军队的将领都已腐化，装备也太落后，不能在战场上抵挡一个西方强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在组织上是割裂的和分散的；统率部队的军官则是从射箭和举重比试中选拔出来的；军队中贪污盛行，士气不振，有的部队的花名册上只有极少一部分实有其人；武器只有老式的火枪、梭镖和弓箭等；而且中国人一贯尊崇读书人出身的文官，轻视武夫。因此，中国军队毫无准备，现在在清帝国一旦不得不面对着沉重压力时，毫无准备担当起国防的重任。事实上，中国的实力可为儒家文人狂妄的国际主张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文人极力主张“中央王国”不对外夷开放，同时却又要在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平等外交制约下进行大量的对外贸易。中国人的观点是：在广州进行贸易只是皇帝的恩典特许的；到那里去的外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反对帝国官吏；如果他们不喜欢所规定的条件，可以请便。对主权的这样解释，在理论上同西方国际法是合拍的。西方国际法认为，外国侨民拒绝服从所在的独立国家在其境内的管辖权或在他们感到受委屈时请求本国武装部队加以保护，都是不正当的。但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际法中，承认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管辖权是同下述正式的国际关系制度密切结合的，即在国家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外交使节和领事的谈判来解决争端。而中国政府拒绝建立这样的关系，这件事情本身就引起了西方商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国政府的最大不满。由于同中国官场没有任何正式的接触，争端往往演变成为武装冲突，特别是英国，因为这个中国海上的主要西方贸易国家这时也是印度的主人，它在加尔各答耀武扬威，大耍帝国的威风，而到了广州却要卑躬屈

膝，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双方对于国际交往既有根本不同的看法，而且又都非常骄傲，因而在1834年以后的广州的局势中，早晚势必要爆发战争。而且，英国人如果获胜，就不可避免地会运用他们的力量把中国海岸的至今对外国人几乎是关闭的大门开得大一些。中国人的排外政策不能继续下去，除非他们强大得足以执行这种政策，而他们却又并非如此。

《南京条约》规定把香港岛的全部主权割让给英国，除广州外，另外开放四个对外贸易口岸，即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在所有通商口岸，英国将委派领事，他们有权在平等基础上和同级的中国官员直接来往。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治外法权，它是在一个补充协定中提出的，规定英国臣民如在中国被控犯罪，由领事法庭按照英国法律审理。英国人提出治外法权的要求，是由于他们不愿使英国国民接受中国法庭的审理，这含有认为中国司法制度低劣的意思。但治外法权起初一点也没有成为和平协议中争执最多的部分，因为从中国当局的观点看来，它有这样一种补偿性的好处，即英国政府对离船上岸的水手负责，可以帮助条约口岸的中国薄弱的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只是到了后来，这一制度对中国所造成的不利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才明显起来，而中国人在熟悉了西方的主权观念之后，也意识到这一制度所造成的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直到这时，治外法权才开始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使人痛心的特征。废除治外法权便成了民族主义宣传鼓动的最高目标。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一方面否认中国享有同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同时西方却又在努力争取北京的朝廷承认它的统治者同中国的“天子”地位平等；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英国在签订《南京条约》时，曾宣布它无意在中国为自己谋求其他国家不能享受的权利和特权；于是美法两国赶紧步英国的后尘，为他们本国的国民同中国谈判类似的条约。美国人由于没有参加对华战争，不能要求清廷专门指派钦差大臣同他们谈判订约。但原在南京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两人之一的耆英，这时被派往广州，负责处理外交事务。他同意同凯莱布·顾盛举行谈判。顾盛是作为美国全权代表被派到中国来的，于1844年年初到达澳门。耆英起初想用他们采取的官方文书的形式使美国使节接受比中国低下的地位，但顾盛坚持要享受已经给予英国的同样规格的平等地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第一个中美条约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签订。3个月之后，法国使节泰奥多尔·德

- 刺萼泥为法国取得了一项条约。法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逼迫中国取消1724年发布的对天主教的禁令，并成功地取得了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的敕谕。由于基督教新教的代表们要求平等待遇，这道敕谕后来也适用于基督教新教。清帝国政府所以同意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则是耆英一手促成的。儒家保守派为此始终不能饶恕他，由于他“谄媚”洋人对其恨之入骨。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后，他被贬黜。1858年进行天津谈判时，他在外交活动中重新有过一次短暂而不成功的露面，之后他被判处死罪。

1842—1844年签订的各项条约所造成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上海急剧地成长为一个商业口岸。在此以前，广州一直是扬子江流域物产外销的唯一出口地。如果这些物产沿着这条巨大的通航河道，顺流而下，到达位于入海口或接近入海口的一个商业中心，那就更为顺当；因此，上海对外贸易一经开放，它就开始在经济上发展，很快成为一个比广州还要重要的贸易中心。1844年，44艘外商船只进入这个港口；185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37艘。与贸易同时发展的是上海外国商人的数量和富裕程度的增长。1845年，英国领事同中国地方当局达成一项协议，把城墙围绕的老城之外的一片土地划出来供英国人居住，由英国人同中国地产所有人个别订立合同以取得这些土地。后来，由于美国领事在这个区域里升起他的国旗而引起一场英美纠纷。这场冲突因达成一项土地共有的协议而得到解决。这就是上海著名的公共租界的由来。起初，在这一地区不存在取消中国行政权力的问题，但这里的新居民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决心要创建欧洲城市所具有的公用设施和服务。于是成立了一个“道路及码头委员会”，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市政管理机构。1854年，当上海为一场中国内战所波及而中国政府的权威又处于低潮的时候，外国侨民在他们的租界内取得了设置巡捕和征税的权力，他们还可以组成志愿军保卫租界以抵御来自外部的入侵，必要时还可由停泊江中的兵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增援。这样，公共租界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有自己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公共租界的繁荣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居民，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外国侨民，但不能分享市政公民权。

因此，1842年至1844年间的各项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但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触动中国的传统地位。在同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没有让步。的确，这时中国政府

事实上已经同外国政府的代表正式打交道了，但只是通过驻广州的一位钦差大臣进行，而这位钦差大臣在大多数时间里同时兼任驻广州的总督，因此同清帝国政府还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此外，外国人除了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狭小地区（估计半径为30英里）获准游览外，不得前往他处旅行。北京以及整个内地仍然不准外国人前往。对中国的闭关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这些限制，把那些野蛮的入侵者圈在指定的居留地界之内；由于战败的结果，要保持老一套的控制洋人的办法已不可能，但除条约所严格要求的以外，现在寸步不能再让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它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远远不能感到满足，它们决心强行要求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机构并在中国全国各地旅行的自由。1844年同美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就有一项条款，阐明12年后条约可以修订，这就为谈判上述两项要求提供了机会。英国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也有权提议修订条约。要求修约的时间将是1856年。与此同时，实施现有条约带来了无休止的摩擦，1848年从广州召回耆英以后这种摩擦有增无减。耆英在任期间执行一项和解政策；他为这一政策辩护的理由是，指望这些西方的蛮夷遵守文明的习俗是毫无用处的，正如他在给皇帝的一项备忘录中所解释的：“彼等既不奉正朔，又未受册封，我若限以藩民礼仪，必不肯俯首就范，甘心自居于安南、琉球之列。”

这些年里最尖锐的冲突莫过于所谓“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1842年以后，外国人不再像战前那样被禁闭在狭窄的洋行区域内；这时准许他们在农村各地走走，但中国人仍然不准他们通过城门进城。外国的领事们认为，条约赋予外国人进城的权利，但中国人予以否认，而根据条约的中文本，他们看来是对的。这是广州特有的问题；在上海和其他新的通商口岸，1842年以前没有见过外国人，进城被认为是新秩序的一部分——这种新秩序在当地是颇得人心的，因为它使广州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垄断对外贸易——但在广州，居民记得这些外国商人过去的卑下地位，一想到要让他们获得在城里随便来去的自由，他们就觉得很难容忍。广州人以为，只要外国人被拒诸城门之外，他们就能够保持自尊。另一方面，外国人觉得如果他们不坚持这一应有的权利，他们就要在中国人眼里失去面子。在外国领事们的强大压力下，耆英最后终于在1846年1月同意准许外国人入城，但由此在城里引起的骚乱是如此激烈，他被迫改变了这一决定。他的继任者们在北京的支持下，继续拒绝，并以广州人民坚决不愿城内出现洋人为

禁止入城的理由。领事们提出抗议，但当时并没有采取步骤来实现这一要求。

西方传教士（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内）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是条约解释上产生纠纷的另一个来源。中国政府坚持认为，除五个口岸及其邻近地区外，条约并未允许外国人在帝国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另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士则宣称，1844年的关于信仰宗教自由的诏书意味着可以在全国各地传布各派基督教信仰的权利；不管怎么样，他们无意于因来自中国不开化的统治者们的任何阻力而放弃他们的任务。他们有治外法权这一原则的保护，中国法律对他们不适用。中国官吏们根据条约所能做的只是在内地发现传教士时将其逮捕，押送到最近的条约口岸。因为他并未触犯他本国的法律，所以他在被释放后，立刻又再一次地潜入禁止前往的地区。不过，这些传教士免不了要遭到骚乱人群的暴力行动，而官吏们对于这些暴行一般是不大急于去制止的。传教士们的生命虽可借西方大炮的威势而得到保障，但他们的中国信徒和那些为他们的居留提供方便的人，却不免受到迫害。儒家士大夫阶级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人为这些先驱的传教士刻苦地为事业而献身的的生活所感动，对于他们宣传的教义虽感兴趣，但不信奉。但这一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却认为，这一新的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在侵略性的列强保护下正在中国传播的外国信仰，它还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不像佛教和道教那样，它是同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格格不入的，对祖传的生活方式是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这些预见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得到了明显的证实。这次运动自称是基督教的，它不但武装起事，反对朝廷，而且在它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对其他形式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极端无情的排斥态度。对于作为国教的儒教来说，异端和叛逆之间的区分从来是不明显的；在那些受到太平军威胁或蹂躏的地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偶尔发生的迫害事件，终于发展到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的殉教而达到高峰。马赖神父于1856年2月被广西西林县地方官吏滥施酷刑后斩首，他的信徒也被杀或被监禁。法国领事向驻广州的总督要求为此案申冤，但为后者所拒绝。这一事件遂成了法国同英国联合进行1856年战争的宣战理由。

如果说外国传教士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的活动在中国人看来是对清帝国国内司法权的侵犯，那么，1842年以后兴起的做法，即属于中国人所有的船舶在外国登记，也是同样严重的对帝国国内司法权的削

弱。在外国登记之后，中国船舶就在外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华南沿海海盗猖獗，特别是在清帝国的权威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削弱之后尤甚，所以外国海军的保护对中国商人是极为有利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这样做可以使中外商业在中国行政管理陷于瘫痪时期得到安全保障；那么，这种做法同时也意味着，只要是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中国警察即使是追捕中国罪犯或防止走私也不能登船检查。中国当局企图干预在外国登记的中国船舶，这就导致了同外国领事的尖锐冲突。1854年，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在上海港口内被拦截，船员因涉嫌为叛军私运军火被扣。一艘美国炮舰进行干预，强迫一艘中国兵船向美国国旗致敬，作为赔礼。两年之后，中国兵士在广州港内登上了一艘在英国注册的船舶“亚罗号”，以海盗罪逮捕了几名水手。于是，英国领事便向驻广州的总督叶名琛提出各种要求；在这一事件得不到完全满意的解决时，英国海军便开始对珠江口炮台和广州城内采取军事行动。

这样，中国便第二次与英国交战，但这时它已不再是1829年与西方“夷人”遭遇时那样虽然吏治松懈但团结一致的帝国了。过去5年中，太平天国的大规模造反，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次起义是在清朝统治刚满两百年的时候开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华南被满人征服后一直潜在的反满情绪的激励；它又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压力在中国国内每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稳定后就会发生，并周而复始地爆发巨大的反抗，从而改朝换代。但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因为清室可耻地败于西方蛮夷之手而丧失威信；《南京条约》使中国人感到耻辱，朝廷对此不能辞其咎，而根据历史的先例，“天命”，即统治中国的神授权威，即将另有所归。另一方面，西方的冲击现在也在影响着中国国内事件的进程。反对中国现在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起义运动，一贯同来源于佛教和道教教义的左道邪说有关联；在已经存在的颠覆思想的因素中，现在又加上了基督教。洪秀全是广东人，世代务农，1813年出生。那时许多中国人在受过正规的经典教育之后参加竞争性的公开考试（这是通往仕途的大门）而落第。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1837年，他第二次落第后，在病中产生一些幻觉。以后他又在广州偶然得到一些基督教新教的小册子。他便按照这些小册子的内容来解释他病中的幻觉，最后终于相信他已被赋予再造中国的神圣使命。他既不能登上仕途，遂去村塾执教；1844年，他开始宣扬他的救世新教义，举行洗

礼，接受信徒。这个教派自称“上帝会”（上帝是新教传教士给神取的中文名字），它不但贬斥佛教和道教教义，而且反对向孔子牌位行礼。这样，洪遂使自己同中国所有现存的宗教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他很快便失去了所教的普通学生，被迫四处流浪，以贩卖文具为生。但是，他就利用这种方式把他的教义传播到其他地区。1847年，他重游广州，跟一个名叫罗孝全的美国传教士学习了两个月。此后，他反对偶像崇拜的说教更趋激烈，他的信徒开始捣毁公共庙宇中的塑像，使非信徒们大为恼火，他们的控诉导致对一些信徒采取了法律行动。直到此时，这个运动还是纯宗教性的，并无政治目的；但是，由于上帝会采取暴力行为而同世俗当局发生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反对上帝所启示的意志的官吏们，他们本身是否就是必须从中国清除的罪恶势力的一部分。最后，到1850年秋天，事态有了急剧的发展，省警察部门企图逮捕洪秀全，他被信徒们用武力救出。这时，他发觉他已成为一支决心公开反叛现存政府的武装部队的首领了。其后不久，他接受了“天王”的称号并宣布建立一个名为“太平”的新朝，由此他的信徒们被外国人称为“太平军”。清政府称他们为“长毛贼”，因为他们拒绝留辫子，而留辫在中国一直是表示向满洲人降伏的标志。

政府派出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去对付太平军，但都未能将他们击溃。在洪秀全的一个信徒的高超的军事领导之下，太平军的狂热使他们成为一支可畏的战斗力量，而清帝国的政府军的战斗力却比鸦片战争时期还要低下。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被围，但他们突围而出，取道湖南直抵长江，然后乘船沿江而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最后于1853年3月攻下南京。南京被宣布为新朝的首都；一时，洪秀全似乎已把整个中国置于其支配之下。如果当时他集中全力直趋北京，他可能轻而易举地灭亡了满洲王朝，因为太平军节节胜利已使清帝国的军队士气瓦解；而清廷在软弱无能的咸丰皇帝（1851年即位）统治之下，看来不能振奋果断地采取行动以保卫自己。但洪秀全却在南京安顿下来，坐享胜利的果实，只派出一部分军队北上进攻北京。这支军队到达了距天津不过20英里的地方，但却被一支包括蒙古骑兵劲旅在内的军队所击败，而太平军几乎全是由步兵组成的。命运的潮流开始转变；又经过了几次战斗，太平军便撤到长江以南。新政权的弱点现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了。这个政权除在南京一地外，保持着流动的游击作风；这种作风是它在广西山地开始出现时就具有的。它在被征服的

省份中未能建立起正规的文官行政管理机构，而征敛税收则往往采取一种很难与盗匪行径相区别的掠夺方式。太平天国根据其教义中模糊的平均主义经济原则，提出过一项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农民们曾为这一方案所吸引，但无情的征敛使农民同太平军疏远起来。太平军虽然相对来说纪律严明，但由于进攻北京的远征失败后将领之间的不和遂使军队陷于分裂。1856年，东王（仅次于天王本人的5个主要首领之一）开始争夺他的主上的权威，声称他也直接领取了天帝的启示。他以及他的家属和依附他的信徒均被处死，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这次屠杀而大为削弱。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事业的命运来说，更为严重得多的是这一运动的宗教狂热所引起的敌意。太平军到处摧毁寺庙塔刹，中国的建筑遗产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基督教在中国人面前成了一种暴力的、迫害人的信仰。华南民间的反清秘密会社本是太平军反对清王朝的天然盟友，但是这些会社同佛教或道教均有联系，由于太平军不能容忍异教，它们同太平军便疏远了；或者，它们提议合作时，只因不皈依天主而为洪秀全所拒绝。但对太平军革命最尖锐、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对抗在儒家学者中间发展着。一个成功的叛乱首领，只要对孔夫子表示应有的崇敬并对儒家传统表示尊重，就不难把这一阶层争取过来，为自己充当在各个朝代中治理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的行政官吏。即使是17世纪的满洲人也能够找到足够的士大夫来为他们的军事统治建立一种传统的文官行政体制，尽管当时有些儒者仍为亡明的大业保持着带有浪漫色彩的忠诚。一个汉民族的新朝代，既已打破了满人军事力量的神话，又能够为汉人提供他们在清朝统治下所能担任的职位，以及那些专门保留给一个在文化上已被同化但仍被视为异族的民族所担任的那些职位，它在这方面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的！但太平军的反儒主义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使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这是他们未能在所占领的各个省份建立起文官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原因。而且，儒士们的反对也不限于同新政权不合作，而是进而采取武装对抗革命的形式——这一运动的起因同它名义上所效忠的北京朝廷的指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直接由各省的地方绅士（绅士有学位而无官职，在乡里中势力很大）所发动的。在这一反对太平天国的反动势力中，两个最重要的领袖是湖南的曾国藩和安徽的李鸿章。他们两个都举办了本省的民团乡勇，与太平军作战；这些军队证明比老的满洲八旗兵和绿旗兵有效率、有纪律，而后者却是一再为叛军所击溃。他们作战的结

果，把太平军从被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赶了出去；到1860年年初，太平军已被局限在安徽、江苏沿长江下游的一条狭长地带之内。南京被围。当太平军从东面向上海方向突围成功并从而为它的历史增添了把其他国家和中国人都牵涉进去的一章（参阅原文第705—706页）时，起义已经濒于失败了。

太平军1853年攻占南京时，通商口岸西方侨民对待他们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抱有希望的期待。由于起义是在内地而不是在口岸外围发展，人们对它几乎全不了解；但是太平军的领袖们自称信奉基督教这一事实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同情。人们希望太平军将比现存政权更愿意开放这个国家并同外国人建立商务和外交关系。再者，太平军看来正在赢得这场内战，因此，在这场斗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同帝国未来的可能统治者进行友好的接触，似乎是得计的。因此，香港总督乔治·文翰爵士乘坐一艘海军小舰溯江而上，直达南京，请求天王接见。但这事未能实现，因为文翰被告之：“天父上帝派遣我主下凡为世界万国唯一真主”，文翰必须承认他本人是天王的臣民。作为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皇陛下的官方代表，他不能这样做，因此不得不开船回去，同太平军领袖没有进行个人的接触。这确实是1834年律劳卑勋爵曾面临的局面的简单重复。清王朝声称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气焰，由于战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而消失了，但现在还没有尝过西方炮火厉害的新王朝的创建者，却又滋长了这种气焰。腐败的清王朝所不能保持的中国的权力，天王现在要来恢复；他对基督教的上帝赋予他神圣使命的信念只是加强了关于中国皇帝的正当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他是从小就被灌输的。

在1860年以前，太平军并没有推进到镇江以东的地方。因此，他们没有同正在兴起的上海外国商民社团发生过任何直接的接触。他们占领南京之后如果立即向上海前进，他们将很可能在没有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占领上海城，此后即可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太平军既未东进，上海的外国商民社团就间接地卷入了中国的内部斗争。尽管各国领事宣布严守中立，但是上海成为军火交易的中心，双方的军队中也都有西方冒险家服役。国际阴谋的谣言盛传。美国全权委员汉弗莱·马沙利向他的政府报告说，英国人即将支持太平军以换取向英国开放长江以便进行贸易，而清朝则正在寻求俄国的援助。接着，1853年9月，中国南方无数秘密会社之一的小刀会起事，占领了上海。

小刀会不受太平天国的控制，太平军谴责他们信奉异端；小刀会的起事是由太平天国起义所触发而又不受它控制的一系列起事之一。在上海市内和四周进行了一年半的混战，外国人同中国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发生过冲突。1854年4月，官军在外国租界进行抢劫，英、美志愿军在海军登陆部队的支援下把他们赶走了，这就是“泥地”之战。12月，法国军队因采取措施保护一个天主教的传教机构而卷入了战斗之后，会合官军，从小刀会手里收复了这座中国城市。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领事和商人采取了种种步骤维持了这个港口的某种行政秩序；因此，上海虽然不断出现政治混乱，但贸易仍在继续进行，清廷设立的海关官署已被摧毁，关员星散，应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出入口税也无人征集。因此，与中国的最高地方官员（他在租界里避难）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各国领事任命外籍海关监督负责收税事宜，并为中国政府服务。由外籍人员主事的海关监督就是这样起源的，后来沿用到所有各条约口岸，并成为中国政府可用作举借外债担保的主要税收来源。

从1855年春到1860年春，上海地区的情况比较平静，但在1856年，如前所述（原文第696页），因中国人登上一艘在英国注册的船舶，在广州爆发中英之间的敌对行动。有一段时间，战事显得胜负不定，因为当地英军的兵力不足以攻占广州，而援军又久久不来；而印度政府则忙于同波斯的战争，后来又忙于镇压印度的兵变，一些从英国派往中国作战的军队也改调往印度参加平乱。但到1857年秋，法国因马赖神父案与英国联合对中国交战，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对广州总督叶名琛交战。这两个盟国联合起来则可以调集足够的兵力进攻这座城市。在海军炮火猛烈的轰击之后，进攻者打进城去，抓住了已经躲藏起来的叶名琛。他被押送到加尔各答，一年后死于该地。

在此之前，英法两国已分别指派额尔金勋爵和噶罗男爵为全权代表，同中国谈判修订条约。这时，他们决定率领舰队北航上海，邀请清廷派代表前往会谈；如果这一步骤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他们计划继续北上到白河，直趋首都北京。美国和俄国的使节现在都同英法联合起来，虽然两国并没有采取实际的交战行动。美国全权代表列威廉本人是主张美国参战的，他对国务卿报告说：“西方文明的列强必须坚持它们认为属于它们的权利，并且放弃把中国作为一个适用任何普遍规律的强国来对待的梦想。”^[2]但美国政府不允许他动用美国军队，命令他只是根据最惠国的原则，利用英法两国从中国那里强行取得的

任何让步，而由英法两国去进行必要的战斗。俄国的立场不同。俄国不是从海上同中国通商的国家之一。相反，它被明确地排除在海上贸易之外，理由是它已通过蒙古边境的恰克图进行陆上贸易。1857年年底，普佳京伯爵到香港会晤海上列强的使节。他奉命为俄国取得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以及陆上贸易的权利；但是，对于俄国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同时由俄国驻西伯利亚东部的军事总督穆拉维约夫^[3]伯爵通过北满军事总督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参看第14章，原文第384—385页）。阿穆尔河^[4]以北的俄中边界名义上仍根据1689年的条约规定，但在19世纪50年代，穆拉维约夫却乘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中华帝国的时机，沿阿穆尔河设立了俄国人的居留地。当时北京政府正集中所有可用的兵力用来对付使清朝有覆亡之虞的乱事，因而无力抗拒在人烟稀少的北方边陲领土上的这种蚕食，所以对之毫无作为。但是这时俄国要求中国正式割让它在阿穆尔河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领土，这就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北京让步。英法对中国进行战争，有利于达到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北方进行抵抗的能力和意志的目的；普佳京的任务就是增加西方对北京的联合压力，同时避免交战，这样，一旦时机有利，俄国就可以一变而同中国友好，反对英法——就像两年以后它们所做的那样。

在上海进行谈判的打算毫无结果，因为4个西方列强的使节被告之返回广州去同一个新任钦差大臣打交道，这个新钦差是委任接替被流放的叶名琛办理外交事务的。但是，这些使节拒绝返回广州；相反，他们驶往白河，并送信到岸上，要求同清廷全权代表在天津或北京会谈。清廷的答复被认为不能满意，英、法舰队司令攻占了大沽口炮台，两国的使节便溯江而上到达天津。北京政府这时同意指派全权代表并在经过简短谈判之后，同4个西方列强分别签订了条约。与此同时，在大沽口炮台陷落10天之后，穆拉维约夫同清廷单独签订了《璦琿条约》，根据这一条约，阿穆尔河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均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则由俄中共管。

《天津条约》不仅规定再开放11个通商口岸——其中3个在长江上游，现在西方船舶已获准在长江上航行——而且给予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的权利和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的权利。这两点过去清廷一直对西方的压力抵制得最坚决。自由传播和信奉基督教也写进了条约。从而，西方政策的主要目的都达到了。但是，由于这些条约是用武力迫

使一个不心甘情愿的政府签订的，而且由于有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极端主义势力责备政府过于忍让，所以不难预料，在条约生效之前将会出现新的麻烦。实际情况也真是如此。清廷利用条约签订后进行关于海关税则谈判的机会，请求英国不要行使《天津条约》所赋予的在北京保持常设外交使团的权利。英国政府同意它的驻华代表居留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但在特殊情况下应获准入都。这样的特殊情况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一为交换最近签订的条约批准书而必须举行的会晤。英、法、美三国使节为此乘船驶向大沽。他们于1859年6月20日抵达时，发现河口已被封锁，不准他们驶入。指挥英国海军护卫舰队的贺布水师提督下令攻击大沽炮台。炮台守军自去年战败后已重新装备，这次便进行了有效的抵抗，进攻被击退了。遭到这一挫折后，英法使节返回上海。但美国代表华若翰因为在英法对华战争中曾采取正式中立的地位，所以便与他的英法同事分手，在更靠北边的海岸北塘登陆，并获准前往北京。俄国使节伊格纳季耶夫^[5]则早已在京互换了批准书。华若翰为了向皇帝面致美国总统函件，请求朝见，但听说要他叩头，又取消了这一请求。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决定恢复对中国的交战行动，并在1860年夏天增派兵力，再次北上。经过一度激战后，攻下大沽炮台并占领天津。中国政府面对着即将向北京进军的局面，就同意举行谈判。但是，清廷中有一派主张继续抵抗，并且背信弃义地对打着休战旗帜行进的英法谈判代表和他们的卫队发动攻击；谈判遂在这一派的压力下被破坏。两国谈判人员中有18人被俘，21人被杀；被俘者中有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和额尔金勋爵私人秘书的巴夏礼。要想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的企图没有得逞；英法军队便恢复进攻，要求无条件释放被俘人员。中国皇帝和他的扈从逃往热河，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同入侵者谈判。俘虏释放了，但作为对杀害谈判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惩罚，额尔金勋爵下令摧毁皇室的夏宫圆明园。在此之前，圆明园已经遭到英法先头部队的洗劫。几天之后，1858年英法条约的批准书在北京互换，并缔结了一项补充协议，中国被迫偿付新的赔款，开放天津对外通商并重申外交代表在首都居留的权利。

在清帝出亡后的严重日子里，中国官员们惊慌失措，俄国使节伊格那季耶夫充当了中立的谈判中间人，并诱使中国人把《瑷珲条约》规定由俄中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干脆割让给俄国，以报答它

为平息西方交战国家的怒气所作的努力。——他在表白自己所作的努力时，未免夸大其词。于是，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不仅按最惠国原则取得了英国和法国强行从中国那里取得的所有商业和外交权利，而且还取得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从而使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疆界沿太平洋岸向南延伸到朝鲜边境。确实，当时这片乌苏里江以外的领土是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只居住着人数稀少的原始狩猎部落，但割让之后不到一年，俄国人便在它的最南端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6]（参见原文第385页）。

缔结1860年的协议并结束这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大灾难的战争的是恭亲王。朝廷以“秋狩”为名离开了首都，留在热河，在安全的地方远远地观看事态的发展。整整一年以后，皇帝才返回北京，但已不是原来那个皇帝了。咸丰是一个懦弱的统治者，他的政策不断地因宫廷阴谋而摇摆不定。他在热河患病，1861年8月在那里死去，由他的当时只有五岁的独子继承。他的生母是一个名叫叶赫那拉氏的妃子，皇后无子。咸丰在世时，叶赫那拉氏已经有很大的势力，但当皇帝病危时，她在宫廷中的敌人便阴谋策划旨在不使她在儿子亲政前参与摄政。皇帝弥留时被诱使签署一纸敕令，指派一个由反叶赫那拉氏集团提名的8人摄政团。但她已掌握了国玺，而敕令是必须盖上国玺才能生效的；她的支持者不承认摄政们的权威。一次政变行动决定了两派冲突的胜负；在朝廷返京后，摄政们即被逮捕，或杀或贬。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力就由皇太后和叶赫那拉氏所共同掌握。后者取了一个尊贵的称号“慈禧太后”，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更为人们所知。她在以后的47年里成为中国政治中支配一切的人物。那位和她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却愿意让她在实际上独揽政事；政府各部门都要等她作出决定，而她是从来不会不作出决定的。尽管她对宫墙之外的世界非常缺乏了解，但在玩弄政治手腕方面却十分高明。她成功地使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又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像这样的政权要是在不那么能干的人手里，本来是会很快就最后覆灭的。

新朝廷的第一个，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使帝国重新统一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1856年到1860年的对外战争的整个期间，叛乱仍存在，但它再也不像1854年那样成为对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威胁了。到1860年年初，曾国藩的军队的作战确实已经到了几乎要把起义镇压下去的地步；对南京的粮食供应被切断，

这座城市的收复看来已经在望。但太平军突围东进，成功地占领了苏沪地区的大部，这个地区直到这时为止尚未受到内战的破坏。这一强有力的但严格地限于局部性的太平起义的再兴，中断了上海与其内地的贸易，严重影响这个迅速扩展的商业港口的中外商人的利益。西方列强对中国内地所进行的斗争一直保持的中立，现在一变而进行干涉，站在北京政府一边反对太平军了。近年来，随着把太平军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先驱者的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崇敬思想不断增长，人们常常把西方进行这种干涉的动机说成远不止于保护上海的地方性商业利益，而归之于下述两种因素：一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一个不受他们指导却又和他们同一的宗教教派的嫉妒；二是西方政府担心太平王朝如在北京胜利建立将使中国强大到不受西方列强的压制。但太平军在1861年时并不是一支走向胜利的军队；他们显然未能推翻清王朝，而且几乎丧失了他们6年前控制的全部领土。现在他们只有在上海地区才是强大的，而在那里，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他们也不再是一种可以同清帝争夺天朝帝国的力量，而只是一群正在毁坏一个富庶肥沃省份的、掠夺成性的讨厌家伙。上海商人的愿望是看到中国恢复和平和秩序，以使贸易得以恢复；如果太平天国具备成为中国的政府的前景，外国商团将会首先支持对新政权的承认，但既然不存在这样的前景，他们就赞成同清廷当局合作，以便尽快结束这场灾难性的乱事。因此，即使当他们的同胞们正在白河对中国中央政府进行敌对行动的时候，英法军队却在协助守卫上海以对付太平军的进攻；后来，当华北恢复和平之后，又协助江苏地方官击退太平军侵犯一事得到北京朝廷的赞许。不管北京朝廷多么不喜欢西方的蛮夷，但却认为，他们站在“天子”一边作战而不是与“天子”作战是正确的，而且是恰当的。有些战斗的确是由英法正规军进行的，但作战行动越来越多地由一支外国人充当指挥官的中国部队担当起来；这支部队由上海商人出资，最先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华尔指挥，他的身份是为中国人服务的一个雇佣军将领。华尔起初取得一些惊人的战绩，但在1862年9月阵亡。他的部队在经历一段时期混乱之后改由查尔斯·戈登少校指挥。戈登是经英国政府允准在中国政府领导下服役的。戈登同曾国藩和李鸿章率领的中国民团湘勇协同作战，对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1864年春，起义的终结已经在望，但戈登没有留下来参与最后一战，他被召回英军服役，他的军队——所谓“常胜军”——也

被解散了。曾国藩在没有外国的援助下，围困了南京，并于7月将其攻陷，天王自杀。

太平天国叛乱溃败后，清朝恢复了从北京到广州对全中国的权威，中国又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面对世界了。但是在帝国的西陲还有着一些叛乱地区，虽然它们同太平军毫无关系而且不会有接管中央政府的威胁。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朝廷权威的中断，使其他一神论宗教（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提出了挑战）的信徒有机会取得地区性的独立：中国穆斯林（在云南称班泰人，在甘肃和陕西称东干人）起事反抗，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政权。云南回民的起事在1855年开始，陕甘回民则是在1862年。陕甘回民的起事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引起了反响。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也都是穆斯林，虽然他们的语言是土耳其语系而不是汉语系。一个来自费尔干纳的名叫阿古柏的冒险家自封为喀什和塔里木盆地的主子；俄国利用1871年清朝的混乱状态，占领了伊犁。有一段时期，满洲人的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疆看来可能分裂成一群伊斯兰国家。由于叛乱中心地点僻远难达，重新征服是困难的，但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粉碎穆斯林叛乱的任务就开始进行，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慢慢地，然而坚持不懈地完成了。云南回民抵抗到1873年，土耳其斯坦叛乱则延续到1878年，但各处的叛乱最后都被粉碎了，而且常常是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的。北京的权威再度向西扩展到帕米尔，向西南到达缅甸的边境。俄国在一次以战争相威胁的外交危机之后于1881年把伊犁交还给中国。收复失地的事业完成了。

但是，恢复后的帝国已不再是1839年的中国，甚至也不是1859年的中国了。中国社会的闭关自守状态已彻底地被打破；中国已被迫同西方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允准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自由前往全国各地。问题已不再是中国的统治者能否阻止西方的侵入，而是他们将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他们可以通过获得西方的技术和行政组织（他们正是被这些事物所击败的），谋求自强；或者，他们也可以竭力不顾不愉快的当前现实，对那些他们已不敢公开反对的力量，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加以阻挠。他们主要是采取后一种途径，虽然他们也不得不作出某些适应性措施，而这些措施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858年的条约要求中国设立一个正规的外交部，同外国外交使团打交道，而不是把对外关系交由各省总督或钦差大臣去办理。这也

意味着，一些高级官员必须具有外语知识，而不是一味依赖卑微的译员；因此，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外语学院。又进一步决定，必须为陆海军的现代化有所作为；为此目的，次年在上海又设立了一所学校，附属于江南制造局，由外国教习讲授西方科学和数学，但直到70年代才派学生出国训练，由此而来的异域思想对青年心灵的感染曾引起更保守的官员们的忧虑。无疑地出于同样的恐惧心理，政府甚至在外国公使馆已在北京设立之后，还是不愿派遣自己的外交使团到外国去。在1877年以前，中国没有在任何西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使馆；在此期间，中国主要依靠友好的外国人代替它在外国进行交涉，在这些外国人中最出名的是首任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他在1868年对美国听众说，“这个伟大的民族把他的双臂伸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的日子就要来到了。^[7]但是，中国直到那时，社会上最有力量的那些人物还是在处心积虑地设法阻挡西方文明。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文明在中国的主要传布者基督教传教士——西方世俗教育的更具有颠覆性的文化作用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驱赶他们或干扰他们工作的唯一办法是用暴徒捣乱，而这也就成为19世纪最后40年中中国同西方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到1900年大规模的拳乱爆发而达到顶点。在对传教士及信徒们的攻击中，“乡绅们”常常置身幕后。反对基督教的煽动宣传以贴传单的方式进行，这种煽动有时还产生纵火、攻击或暗杀等后果。1870年在天津发生了一次特别猛烈的暴乱，两名天主教神父、10名“味增爵会”的修女，另外还有9名欧洲人以及许多中国基督教徒被杀。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官员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有责任保护外国人不受无法暴行的伤害，但他们自己通常也恨这种外国宗教，并且害怕因对这一宗教表现热心而引起公愤。因此，他们常被怀疑实际上默许这些排外暴行的发生，而且几乎每次事件之后西方使馆总要提出惩办当地失职官员的要求。因此，骚乱事件使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不断产生麻烦，而并未达到这种煽动的真正目的，因为传教士没有被赶走而是越来越多，他们所办的学校成为在中国传布西方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

中国作为在远东的传统超级大国所遭受的失败和耻辱，不可避免地对它南方和东方的较小亚洲国家产生相应的后果。1855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约翰·包令爵士奉派去同暹罗谈判订约。他以英国迫使中国签约的前事作为他的论点的后盾，按照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模式，议定了各种条款——包括治外法权在内。3年之后，法国把它的

对华政策扩展到安南。天主教是在18世纪由法国传教士引进安南的，在19世纪上半叶受到迫害。法国按照第二帝国把保护天主教教会同积极促进法国在海外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加入了第二次英国对华战争，为法国马赖神父的被害索取报偿。在安南，曾在1858年参与白河作战的法国海军也被用来协同来自马尼拉的一支西班牙远征军，迫使安南容许自由信奉基督教。这一事业取得了成功，但胜利的果实不只限于宗教方面；法国兼并了交趾支那东部的三个省，包括西贡这一城市在内，从而为它的印度支那帝国奠定了基础。1863年，法国把柬埔寨（安南和暹罗在对它的宗主权问题上发生过争执）变成了它的保护国；1867年，交趾支那的其余地方也为法国所吞并。因此，到了1870年，法国人便在湄公河三角洲站稳了脚跟，虽然他们尚未控制了安南本土或东京。

9名法国传教士在朝鲜被处死后，法国在1866年曾作了一次企图制服朝鲜的类似尝试，但不大成功。在罗兹舰队司令率领下的一支海军舰队被派去对付朝鲜，但由于缺乏登陆作战部队，只凭封锁和海军炮火不能迫使朝鲜人进行谈判，因此没有结果，在反对西方所提出的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并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的要求上，朝鲜因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实际上成为抵制时间最长的远东国家，从而名副其实地获得了“隐士王国”的称号。朝鲜在击退法国的远征之后，又挫败了德国、俄国和美国开辟外交关系的企图，在1876年之前一直没有同任何一个外国签订过一项条约。1876年的条约是同日本，而不是同任何西方国家签订的。日本自己直到那时以前还是一个奉行其极端形式的闭关自守主义的国家，而顷刻却带头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这一重大事实显示出远东事务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因素——一个亚洲国家不是消极地抵制或接受西方的压力，而是积极、灵活地使自己适应这种压力的主动精神。

日本在17世纪之前曾同西方各国有过商业接触，基督教也在日本传布过。17世纪以后，它采取了“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在闭关政策下，除中国和荷兰商人可以在长崎一个港口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小额贸易外，任何外国人不许进入日本，日本人也一律不准出国。而且，禁止建造远洋航船，严禁传布和信奉基督教。在日本有少数人懂得一点荷兰文，并从荷兰书籍中对日本以外的世界稍有认识，但他们所处的地位对于国家的政策不起作用；而日本的实际政府，即在天皇

的名义统治下取得将军大权的德川幕府的态度，在19世纪前半叶一直没有改变。1825年，海岸警卫部队接到指示，要对任何靠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舶开火；这一条以后修改为“可以对海上遇难的水手供应食物和饮水，但必须迫使这些并非自愿的来访者尽快离境”。

西方为打开日本门户而施加的压力在早期比发展对华贸易而施加的压力要小得多。英国人在日本不存在像他们在1839年前在广州已有的那种商业利益，而荷兰人也力量不足，无法考虑对日本使用武力；再者，日本也没有像中国茶叶这样重要的出口货物，而对欧洲海运国家——以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来说，日本是远东各国中最遥远的。但随着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开发和旧金山到上海航路的开通，日本在地理上同西方海上事业有了一种新的关系；美国开始对打开日本门户产生兴趣，特别是为了在横越太平洋通往上海的漫长海路上得到一个加煤站。因此，迫使日本放弃闭关政策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或法国。这件事只使用了武力威胁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战争就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知道西方的船舰和大炮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4艘美国战舰到达距江户（今东京）不远的浦贺口外；浦贺当时是幕府政府所在地。他带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一封信，并宣布：除非日本接受和答复这封信，否则他对所产生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在信件被接受之后，他驶离该地并宣布明年来取答复；幕府对这一威胁性的访问大为惊慌，召集封建藩主们会商。藩主们就抵抗或是屈从美国的要求进行了辩论。强硬派主张同敌人公开对抗。但是，日本没有舰队，海岸防卫力量又不足以抵挡西方海军大炮的轰击，这种论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会上作出决定：至少就目前而论，谨慎胜于勇敢，应给佩里以和解性的答复。结果于1854年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这是打开日本门户的第一步。实际上，条约没有规定建立外交关系或治外法权，开辟的通商口岸也只有下田和函馆两处。但这只不过是得寸进尺的开端，而且就像在中国一样，很快就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和俄国立即继美国之后要求日本订约，两国都取得了长崎作为对它们的船只开放的口岸，俄国还成功地为它的国民取得了治外法权。到1858年，幕府政府已经深信，闭关政策必须作彻底的修改，而关于中国的遭遇的消息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即日本必须不加抵抗地接受正在强暴

地施加于中国的新秩序。但江戸政府这时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全国强烈反对作任何进一步的退让。京都的天皇宫廷首先反对。德川家族自1603年以后一直控制着幕府，它对外国的要求采取明显的完全屈服的政策，由此引起的不满威胁着它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冒犯西方列强又可能与中国一样招致无法招架的猛烈的压迫。

在德川时期的日本政治体制中，皇室从未被剥夺正式的统治权；从宪法上说，统治权力只是交由幕府以终生首相的身份代行。实际上，皇室已被排斥在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以外，历代天皇都过着近乎囚禁的隐居生活，他们唯一的国事活动就是举行某些宗教仪式。在外部世界看来，江戸的幕府似乎是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并且在当时常常被称作“皇帝”。但幕府只有在它们掌握有效的力量而且现存的事态使日本的民族情绪感到正常和恰当的时候，才能使古老的皇朝处于从属的地位。1858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再存在了。自18世纪以来，对早期日本文学和神道教的研究，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它同幕府所推行的中国的、儒家的学术研究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广泛地传布这种思想，即日本的权力理应属于皇朝，合法君主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幕府的权力。对于德川政权这一道义上的破坏，其本身倒不一定是致命的，但它同时又碰上了一些封建家族及其家臣同德川家族之间的宿怨复发，其中突出的有其采邑主要在九州西南部的萨摩和下关海峡（日本内海的西面入口）沿岸的长州家族。幕府的威信既已因它屈从外国的要求而急剧地下降，现在不再能有效地控制皇室或封建贵族中的不满分子了。

江戸政府试图为自己寻找抵制批评的护身符，因此要求天皇批准同美国驻下田领事汤森·哈里斯——他已同幕府建立了准外交关系——谈判的一项新约。但天皇不同意，条约就在天皇不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1858年的哈里斯条约远远超过了外国列强同日本以往签订的协议；它规定在江戸设立外交代表机构，开放更多的口岸，给予外侨以永久居留和旅行自由等权利。但幕府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广泛流传的论调，即这一条约以及后来同英、法、俄国议订的相应条约，对于爱国的日本人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这些条约未经天皇批准。排外的煽动导致了一系列谋杀暴行，不仅是针对口岸的外国人，而且也针对在江戸建立的西方外交使团；与此同时，天皇在萨摩、长州以及其他对幕府不满的藩主的支持下，开始向幕府将军发出命令。1863年1

月，天皇终于命令他立即着手“把蛮夷赶走”。幕府将军比京都的那些深居简出的廷臣们更了解蛮夷的力量，因此无法执行这个命令，因而被反德川派称为叛徒和胆小鬼。他被召到京都，最后被诱使通知外国使节，日本将恢复闭关政策。西方外交官们甚至拒绝讨论这个主张，江戸政府因向京都报告说，天皇命令无法执行，但是长州领主却自愿在下关海峡执行这个命令，用海岸炮台和小战船去阻止外国船舶通过。因此他自己卷进了一场反对西方世界的私人战争，结果是他的炮台为一支英、法、荷、美海军联合舰队所轰毁。与此同时，萨摩藩主因他的家臣杀害了一名英国人，他的采邑首府鹿儿岛遂遭到一支英国分遣舰队的报复性轰击。不论是长州或萨摩都不能有效地对抗西方的炮火，这使京都宫廷的封建支持者们现在相信，赶走蛮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西方列强方面，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签订的条约由于未经天皇批准因而为无效，遂决心要取得这种批准。他们把海军分遣队开进大阪湾。天皇别无出路，只好批准。

从逻辑上讲，天皇既已对条约表示同意，德川的敌人就失去了可以用来使将军为难和威信扫地的借口。但是西方列强现在正式承认天皇是日本合法君主这一事实，造成了幕府统治的垮台。1867年11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把他的统治权力交还给15岁的天皇睦仁（在历史上他的朝名“明治”更为人所知）。幕府交权为时已经太晚，所以在萨摩和长州领导下的一些采邑藩主和仍然忠于德川的藩主之间还是不免发生了一场内战，但斗争持续时间很短。战争结束之后，天皇的朝廷就从京都迁往江戸（现更名东京），接管了幕府的所有机构。

现在名位显赫，顾问朝政并以年轻的天皇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大部分是萨摩和长州的家臣，他们为了国家的强盛和独立，准备进行彻底的改革。历史事件已使他们相信，除非学习西方列强成功的秘诀，否则就不可能反对西方强国。他们主张同西方进行无限制的交往。他们在劝使天皇在1868年4月召开的封建藩主会议上宣读的“誓文”中，加进了“从全世界寻求知识”一条。他们为了获得使国家富强的知识，利用他们起而掌权的特殊环境，有可能把革命的精神和传统主义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结合起来了。他们用恢复更加古老的传统来推翻旧政权，这种古老传统由于长久被抛弃，较能免于牵涉到特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在中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义曾经攻击和反对

社会上的主要传统势力，而明治维新及继之而来的改革都是以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和最古老的民族体制的名义进行的。不仅如此，明治维新派来自一个军人阶层，因军事失败的教训而深信必须进行改革。与此相对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却并不认为蛮夷的炮火威力足以证明儒家文化的不足。日本在1868年后为适应西方挑战而作的努力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意志的集中，统治者以此致力于国力的建设。他们得到了报偿。在40年中，当中国仍然处于衰弱、被动和停滞状态的时候，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的考验中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西方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强国。

（沈苏儒 译）

[1] 上两地均属缅甸。——译者

[2] 科士达：《美国的东方外交》（波士顿和纽约，1904年），第234页。

[3] 旧译穆拉岳福或木哩斐岳幅。——译者

[4] 即黑龙江。——译者

[5] 旧译伊格那提业幅。——译者

[6] 即海参崴。——译者

[7] F. W. 威廉斯：《蒲安臣……》（纽约，1912年），第119页。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 见本书的边码)

Aaland Islands, 奥兰群岛, 484, 489

Aargau, anti-clerical measures in, 阿尔高, 该地的反教权措施, 223

Abbas Pasla, 阿巴斯帕夏, 埃及总督, 438

Abd-el-kader, 阿布杜卡迪尔, 马斯卡拉埃米尔, 320

Abeken, Heinrich, 阿贝肯, 海因里希, 普鲁士外交家, 592, 593, 596

Aberdeen Act (1845), 阿伯丁法案, 661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4th earl, 阿伯丁,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第四代伯爵, 122, 259, 471, 474

Abyssinian campaign (1868), 阿比西尼亚战役, 305

Académie des Beaux Arts, 美术院, 144

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 213

Académi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绘画雕塑院, 144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科学院, 50

Accessory Transport Co., 附属运输公司, 681

Acids, 酸性物质

石炭酸, 52, 64, 73

无机酸, 52

醋酸, 65

酒石酸, 65

Acid towers, waste from, 制酸塔, 制酸塔的废料, 51

Acre, 阿克

被埃及军队包围, 251

作为一个港口, 423

由埃及治理, 428

Act of Union (1707), 联合法, 该法的教会圣职授与权, 83

Act of Union (1801), 联合法, 解散都柏林议会, 217

Acto Addieional, 补充法, 661

Acton, John Emerich, 阿克顿, 约翰·埃默里奇, 第一代男爵

谴责民族主义, 12

论天主教公会议, 95

论民族理论, 214

民族性是倒退的步骤, 245

英国内阁消息不灵通, 599

Adams, Charles Francis, 亚当斯, 查尔斯·弗朗西斯, 美国驻
伦敦公使, 638, 640

Adams, John Quincey, 亚当斯, 约翰·昆西, 美国第六届总统,
203

Aden, 亚丁, 被占领作为船舶的加煤站, 431

Adrianople, 阿德里安堡, 423

阿德里安堡条约 (1829), 241, 417, 489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421, 425

Afghanistan, 阿富汗, 685

Aftonbladet, 《晚报》, 127,

Agamemnon (1852), (1852年建造的)“阿伽门农号”军舰,
279

Agassiz, Louis, 阿加西斯, 路易, 科学家, 51, 71, 120

*Agence générale pour la défense de la liberté
religieuse*, 保卫宗教自由总会, 78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的传播, 9

Agriculture, 农业

农业市场的扩大, 5, 25

农场生产率不断提高, 23

圈地, 24

施用肥料, 24

牲畜的疾病, 24

排水系统, 24—25

三个阶段的改进, 24—25

佃农需要资金, 25

甜菜种植的推广, 27

农业科学, 52

农业技术革命, 65

农业方面的就业, 332

革命对农业的影响, 413

Aigun, 瑗珲, 瑗珲条约, 703, 704

Ak-merchet (renamed Perovsk), 阿克梅切季 (改名为佩罗夫斯克), 387

Aksakov, I. S., 阿克萨科夫, 伊·谢, 作家, 368

Aksakov, K. S., 阿克萨科夫, 康·谢, 作家, 368

Alabama, 亚拉巴马, 615, 627, 655

Alabama damage claim, 亚拉巴马号索赔案, 640

Alamán, Lueas, 阿拉曼, 卢卡斯, 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675

Alaska, 阿拉斯加, 让与美国 (1867), 384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422, 479

Alberdi, Juan Bautista, 阿尔维迪, 胡安·巴蒂斯塔, 670,
671

Albert, Archduke of Austria, 阿尔贝特, 奥地利大公, 1859年
访问柏林, 506

Albert, 阿尔贝, 法国社会主义者, 被捕, 399

Albert, Prince, 阿尔贝特亲王,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论科学, 52

对技术研究机构感兴趣, 113

被怀疑为俄国人效力, 477

访问布洛涅, 481

与“特伦特号”事件, 639

Alcohol, 酒精, 酒精的成分与合成, 65

Aldershot, 奥尔德肖特, 购买该地, 486

Aleppo, 阿勒颇, 423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俄国沙皇, 他的去世, 358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沙皇在他统治时期给予知识
界更多的自由, 233

对巴黎和约的态度, 259

被刺, 358

与改革, 369

解放农奴，370

与芬兰的自由主义化，376

刺杀他未遂，378，582

成为沙皇，481

与比萨拉比亚和黑海的割让，492

与霍亨索伦家族作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592

Alexandretta，亚历山大勒达，423

Alexandria，亚历山大

停泊船舶吨数，419

人口，420，424

通向该地的邮政服务，431

通向苏伊士的交通，432，436—438

Algebra，代数学，56

Algeria，阿尔及利亚

法国征服该地，7，320，416，427，433

法国的延伸地，427

通向该地的交通运输，445

法国加强对该地的控制，461

Algerian campaign (1838)，阿尔及利亚战役，使用来复枪，
304

Algiers，阿尔及尔

与马赛贸易，421

人口，424

Alicante，阿利坎特，420

Alizarin，茜素，茜素的合成，64

Alkalies, 碱, 52

Allgemeine Zeitung, 《总汇报》

海涅的稿件被禁止, 125

销售量, 126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世界犹太人联盟, 244

Alsace, 阿尔萨斯

1852年在该地发现钾盐, 24

棉纺厂利用水力, 28

Alsace and 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法国割让该地, 17,
600

Alsen, battle of, 阿尔森战役, 516

Alvensleben Convention, 阿尔文斯勒本协定, 515

Amari, Michele, 阿马里, 米凯莱, 历史学家, 225

Amazon, 亚马孙河, 该河行驶轮船, 662

America, South, 南美洲, xix—xx, 659—673

路特希尔德的势力, 3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 618

American Board of Protestant Missions, 美国新教传教理事会,
423

American Civil War, 美国南北战争, xix, 631—658

伤亡人数, 19, 654

使用后膛装填武器, 304

电报, 310

约米尼的教导, 316

战事的总过程, 327—330

物质的和目标无限的战争， 331

南部联盟的成立， 627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cety, 美国殖民协会， 616, 617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美国教育杂志》， 117

American System (Henry Clay), 美国制度 (亨利·克莱),
604

Amherst of Arracan, William Pitt Amherst, Earl, 阿美士德
伯爵 (若开的), (威廉·皮特·阿默斯特), 率贸易团前往北京,
687

Amiel, Henri Frédéric, 阿米尔, 亨利·弗雷德里克, 瑞士思想
家, 评托克维尔, 12

Ammonia, 氨, 52

Amoy, 厦门

被英国占领, 690

成为条约港口, 692

Ampère, Jean Jacques Antoine, 昂佩尔, 让·雅克·安托万,
历史学家, 115

Amur river, 阿穆尔河 (黑龙江), 384, 702, 703

Anaesthesia and anaesthetics, 麻醉和麻醉剂

麻醉术和麻醉剂的使用, 51, 72—73

另见Ether, Chloroform

Ancona, 安科纳

法国观察部队在该地, 251

航运量, 419

人口, 420

容许犹太人信仰自由, 421

法国军队在该地， 554

Anderson, Arthur, 安德森, 阿瑟, 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轮船航运公司董事, 437

Andrássy, Count Gyule, 安德拉希伯爵, 久拉, 匈牙利政治家, 549—550

Angelis, Cardinal de, 安吉利斯红衣主教, 96

Anglo-Argentine Treaty (1849), 英国—阿根廷条约, 670

Anglo-Brazilian convention (1826), 英国—巴西协定, 661

Anglo-Chinese War, 中英战争, 690, 696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1860), 英法商务条约, 37, 454, 458

Anglo-Guatemalan Treaty (1859), 英国—危地马拉条约, 681

Anglo-Honduran Treaty (1859), 英国—洪都拉斯条约, 681

Anglo-Nicaraguan Treaty (1860), 英国—尼加拉瓜条约, 681

Anglo-Turkish Trade Convention of Balta Liman (1838), 英土巴尔塔—利曼贸易协定, 429

Animal products, 畜产品, 到1870年畜产品的增加, 26

Annali di Statistica, 《统计年鉴》, 556, 561

Annam, 安南

向中国纳贡, 686

该地的传教活动, 709

容许信仰基督教, 709

Annapolis, 安纳波利斯, 在该地建立海军学院, 293

Anthracite, American, 美国的无烟煤, 31

Anti-Corn Law League, 反谷物法同盟, 342—343

Antietam, battle of, 安提塔姆战役, 639

Antioch College, U. S. A., 安蒂奥克学院（美国），119

Antiseptics, 防腐剂, 64, 73

Antonelli, Cardinal Giacomo, 安东内利红衣主教, 贾科莫, 教廷国务卿, 97

Antwerp, 安特卫普

学院派艺术的中心, 151

英法军队炮轰该地, 250

Aosta, prince Amadeus, duke of, 奥斯塔亲王, 阿马迪厄斯, 公爵, 587

Apostolical succession, doctrine of, 使徒继承的原则, 83

Apprentices, 学徒, 普鲁士缺少学徒, 43

April Laws, 四月法, 费迪南德批准该法, 523

Arad, 阿拉德, 阿拉德殉难者, 528

Arakan, 若开, 英国在该地的势力, 686

Aralsk, 阿拉尔斯克, 387

Architecture, 建筑, VII, 135—143

18世纪英国在欧洲的领先地位, 134

拜占廷风格在俄国复兴, 142, 363

重建巴黎, 460

中国建筑的破坏, 699

Argentina, 阿根廷

与玻利维亚的战争, 670

巴拉那政府的垮台, 671

成为完整的国家, 671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税战, 671

1852年的立宪会议, 671

1853年的宪法, 671

巴拉那成为首都, 671

铁路, 672

人口, 672

巴林银行贷款(1866), 672

Argostoli, 阿戈斯托利, 422

Arkansas, 阿肯色, 627, 654, 655

Arlès-Dufour, Jean-Barthélemy Arlès, 阿尔勒-迪富尔, 让-巴特勒米·阿尔勒, 里昂商人, 436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422—423

Armies, 军队, XI, 302—330

改革, 14

英国军队的改编, 356, 486

英国军队的作用, 356

俄国的军队, 369, 379

陆地运输军团, 486

辅助勤务, 486

购买奥尔德肖特, 486

罗恩改革普鲁士军队, 509—510

中国的军队, 690—691

Armstrong, Sir William George, 阿姆斯特朗爵士, 威廉·乔治, 工程师, 51, 284

Army Medical School, 陆军医学院, 486

Arndt, Ernst Moritz, 阿恩特, 恩斯特·莫里茨, 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227, 496

Arnim, Count Heinrich von, 阿尔尼姆伯爵, 海因里希·冯, 普鲁士外交大臣

建立统一的德国的计划, 261

为建立联盟与法国接近, 262

Arnim, Ludwig Achim von, 阿尔尼姆, 路德维希·阿希姆·冯, 诗人, 172

Arnold, Edwin, 阿诺德, 埃德温, 记者, 122

Arnold, Matthew, 阿诺德, 马修, 学者和诗人, 105, 109, 110, 112, 115, 116, 158, 178

Arnold, Thomas, 阿诺德, 托马斯, 拉格比学校的校长, 113

Art, 艺术, VII, 134—135, 143—155

Asia, Russia in, 亚洲, 俄国在亚洲, 382—388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422—423

埃及的侵犯 (1832), 428

Aspirin, 阿司匹林, 64

Aspromonte, 阿斯普罗蒙特, 加里波第在该地被俘, 576

Assab, 阿萨布, 取得该地作为加煤站, 432

Atacama, Desert of, 阿塔卡马沙漠, 666

Atelier, L', 《工场报》, 123

Athens, 雅典, 420

Atlanta, 亚特兰大, 占领该地, 649

Atlantic and Pacific Ship Canal Company, 大西洋和太平洋通航运河公司, 681

Atomic theory, 原子学说

道尔顿使原子学说恢复活力， 60

原子学说的巩固， 60

Atomic weights, 原子量， 原子量表的编制， 61, 62

Attwood, Thomas, 阿特伍德， 托马斯， 银行家， 货币改革家，
347

Auchterarder, 奥赫特拉德， 83

Auersperg family, 奥尔斯佩格家族， 535

Auerswald, Rudolph von, 奥尔斯瓦尔德， 鲁道夫·冯， 普鲁士
首席大臣， 508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汇报》， 94

Augustenburg, Prince Frederick Charles of, 奥古斯滕堡的弗
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统治权的要求者， 515
—516

Aurora Fluminense, 《曙光报》， 660

Ausgleich of 1867, (1867年的) 奥匈协议， 185, 209, 229,
234, 24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羊毛供应， 27

铁路， 34, 350

与英国电报联系， 36, 350

联邦自治领， 211

批准移民， 353

系统的殖民地化， 353

采金地， 355, 458

人口， 355

宪政的发展， 355

邮政设施, 432

Austria, 奥地利, X VI—X VII, 522—551

伦巴第, 88, 401, 535, 540, 552, 569

政教关系, 107, 413, 504, 533, 557

新闻出版, 125, 238

宪法, 185, 197, 408, 499, 526, 532

联邦制, 197, 209

议会, 197, 239, 524, 526

君主制度, 199, 406, 497, 499, 532

反动时期, 204

地方政府, 207

民主的生活方式失败的原因, 208

匈牙利事务, 209, 239—240, 398, 406, 522, 526, 528—
529, 535

与俄国的关系, 229, 407, 469

与德国事务, 237, 268, 412, 512

文学和学术, 238

语言问题, 239, 531

德意志化, 240

迫使普鲁士在奥尔米茨投降, 265

占领克拉科夫共和国, 267

占领托斯卡纳, 408, 565

与普鲁士的关系, 410, 505, 520

责任内阁, 412

中央集权制, 413

司法制度, 413, 530, 533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保持中立, 430, 481, 482, 538

为法国所打败, 463

威尼斯, 463, 520, 535, 552, 576

巴尔干半岛, 469, 472, 475, 479

与克里米亚战争和谈, 480, 485

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 489

外交上的衰落, 491

与关税同盟, 501, 503

警察, 504, 534

书刊检查制度, 504

财政和经济, 505, 535

商务条约, 505, 535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514—515

在克尼格雷茨战败, 519

摩德纳, 560, 565

费拉拉, 560

在马让塔战败, 571

在索尔费里诺战败, 571

Avenir, L' (Lamennais), 《前途报》(拉梅内创办), 77—79, 123, 390

Avogadro, 阿伏伽德罗, 分子学说的理论家, 60, 63

Baader, Francis Xavier, 巴德尔, 弗朗西斯·格扎维埃, 神学家, 78

Bach, Alexander von, 巴赫, 亚历山大·冯, 奥地利政治家, 406, 528, 529, 533, 539

Bacon's Rebellion (1676), 培根叛乱, 611

Bács-Bodrog, county of, 巴奇-博德罗格县, 529

Bacteria, theory of, 细菌学说, 50

Baden, Grand Duchy of, 巴登大公国

骚动, 395, 407, 497

镇压起义, 500

给普鲁士的赔偿, 520

与普鲁士的秘密条约, 580

与新的邦联, 582

Bagehot, Walter, 白哲特, 沃尔特, 经济学家和作家

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 157

论英国宪法, 193

在伦敦大学, 206

Bahamas, 巴哈马群岛, 356

Baines, Edward, 贝恩斯, 爱德华, 记者和政治家, 85

Bakunin, Michael, 巴枯宁, 米哈伊尔, 俄国革命家, 367, 374

Balaclava, 巴拉克拉瓦, 联军在该地获胜, 480

Balance of payments, 国际收支, 19世纪中叶的国际收支, 39

Balbo, Count Cesare, 巴尔博伯爵, 切萨雷, 意大利爱国者, 200, 225, 430—431, 558

Ballot, secret, 秘密投票, 185, 347

Baltic, the, 波罗的海, 489

Baltimore Sun, 《巴尔的摩太阳报》, 129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 小说家, 21, 124, 159, 161, 162

Bánát, the, 巴纳特地区, 529, 537

Bancroft, George, 班克罗夫特, 乔治, 美国海军部长, 293

Bank Charter Act (1844), 银行特许法, 42

Bank für Handel und Industrie, 工商银行, 41

Banks and Banking, 银行和银行业

圣西门学派的影响, 3

合作银行, 23

1815和1825年银行的破产, 40

私营银行, 40

股份银行, 40, 344

英格兰银行, 40

银行的职能, 40

地方支行, 40

贴现率, 41, 42

控制纸币的发行, 41—42, 345

独家发行纸币的银行, 42

与其他股份银行的关系, 344

法国的银行, 41—42, 394

俄国的银行, 379—380

美国的银行, 604, 606—607, 614, 643—644, 645

南部联盟的银行, 651

巴西的银行, 662

Bank Charter Act (1844), 银行特许法, 344—345

Barbados, 巴巴多斯, 356

Barbès, Armand, 巴尔贝, 阿尔芒, 社会主义者, 397, 399

Barbizon, painters of, 巴比松画派, 147

Barcelona, 巴塞罗那, 420, 424—425

Bari, 巴里, 421

Barnard, Henry, 巴纳德, 亨利, 117

Barnes, Thomas, 巴恩斯, 托马斯, 《泰晤士报》编辑, 122

Baroche, Pierre Jules, 巴罗克, 皮埃尔·朱尔, 法国内务部长, 447

Barrett, Elizabeth, 巴雷特, 伊丽莎白, 诗人, 177

Barrot, Odilon, 巴罗, 奥迪隆, 法国政治家, 14—15, 404, 452

Barry, Charles, 巴里, 查尔斯, 建筑师, 138

Barye, Louis, 巴里, 路易, 雕塑家, 143

Baths, public, 公共浴室, 72

Batthyanyi, Count Ludwig, 包贾尼伯爵, 劳约什, 奥地利大臣, 396

Batum, 巴统, 476

Baur, Ferdinand Christian von, 鲍尔, 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冯, 历史学家, 102

Bavaria, 巴伐利亚, 390, 395, 407

 与梵蒂冈公会议, 95

 与施瓦岑贝格的谈判, 409—410

 统治者的改变, 497

 国王与弗兰茨·约瑟夫会晤, 502

 普鲁士军队的侵犯, 519

向普鲁士赔偿和缔结同盟条约, 520

与普鲁士的秘密条约, 580

Bay Islands, 海湾群岛, 洪都拉斯, 681

Bayazid, 巴亚泽特, 484,

Baudelaire, Charles-Pierre, 波德莱尔, 夏尔-比埃尔, 艺术评论家和诗人, 147, 148, 149, 159, 172, 173, 178—180

Bazaine, François-Achille, 巴赞, 弗朗索瓦-阿希尔, 元帅, 306, 326

Beaconsfield, 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比康斯菲尔德, 本杰明·迪斯累里, 第一代伯爵

参见Disraeli, Benjamin

Beale, Dorothea, 比尔, 多萝西娅, 118

Becker, Nicolaus, 贝克尔, 尼古拉, 诗人, 227, 495

Beckerath, Hermann von, 贝克拉特, 赫尔曼·冯, 自由党领导人, 496

Beer, 啤酒

用于啤酒的谷物生产, 26

啤酒的酿造, 64

Beirut, 贝鲁特, 419—420, 423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贝鲁特的美国大学, 423

Beltredi, Count Richard, 贝尔克雷迪伯爵, 里夏德, 奥地利国务大臣, 548, 550

Belgian National Assembly, 比利时国民议会, 选举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 249

Belgium, 比利时, 389, 390, 392

比利时的出现, 16

谷物生产，26

科克里尔工厂，29

钢产量，30

道路状况，31

1844年时的铁路线，33

铁路国有，33

取消谷物法，38

法国流亡新闻工作者的避难所，127—128

1831年政府的改革，189

人民主权，191

公民权，192，411

自由派当权（1847），202

英国的干预，214

脱离荷兰，221

二十四条款条约，221

丧失东林堡、马斯特里赫特和卢森堡，221

语言问题，221—222

“佛兰芒语捍卫者”，222

1830年反对强迫与荷兰合并的起义，247

独立，248—250

中立，7，600

Belinskii, V.G. (1811—1847)，别林斯基，维·格，政论家，
367，368

Belize，伯利兹，679，681

Bell, Sir Charles, 贝尔爵士, 查尔斯, 外科医生, 对感觉和运动神经的研究, 66

Bell, John, 贝尔, 约翰, 雕塑家, 143, 626

Bell, The (Herzen), 《钟声》杂志, (赫尔岑创办), 128, 370, 371

Bello, Andrés, 贝略, 安德烈斯, 智利大学校长, 665

Benedek, Ludwig von, 贝内德克, 路德维希·冯, 陆军元帅, 324, 542

Benedetti, Count Vincent, 贝内德蒂公爵, 樊尚, 法国外交家
会见俾斯麦, 580

在维尔德巴德, 589

在埃姆斯, 592, 593

受命从威廉一世处获得保证, 595

埃姆斯事件, 595—596

会见格拉蒙和奥利维埃, 598

Bengal, 孟加拉, 鸦片出口, 688

Benghazi, 班加西, 424

Benjamin, Judah P., 本杰明, 朱达·菲利普, 南部联盟国务卿, 638, 650

Bennett, James Gordon, 贝内特, 詹姆斯·戈登, 美国新闻工作者, 129

Bennigsen, Rudolph von, 本尼格森, 鲁道夫·冯, 汉诺威政治家, 507, 515, 518, 521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 功利主义哲学家, 7, 53, 82, 109, 157, 193, 352

Bentham, Sir Samuel, 本瑟姆爵士, 塞缪尔, 海军准将, 284

Bentinck, Lord William, 本廷克勋爵, 威廉, 印度总督, 431

Benzene, 苯, 苯的环状式, 62

Benzol, 苯, 52

Berchet, Giovanni, 贝尔凯特, 乔瓦尼, 诗人, 225

Berlin, 柏林, 43

 1848年革命, 261, 397, 400—401

 失业, 397

 联合议会的召开, 496—497

 取代巴黎成为外交中心, 577

Berlin Academy for Officers, 柏林军官学院, 317

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 柏林科学院, 50

Berlioz, Hector, 柏辽兹, 埃克托尔, 作曲家, 144

Bermuda, 百慕大, 356

Bernard, Claude, 贝尔纳, 克洛德, 生理学家, 50, 65, 66, 459

Bernetti, Tommaso, 贝尔内蒂, 托马索, 红衣主教, 教廷国务卿, 554

Bernhardi, Theodor, 伯恩哈迪, 特奥多尔, 俾斯麦的密使, 587

Bernoulli, Jean, 伯努利, 让,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气体分子运动说, 60

Berry, Caroline, duchesse de, 贝里女公爵, 卡罗科娜, 555

Berthier, Louis-Alexandre, 贝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 元帅, 314

Berthollet, Comte Claude-Louis, 贝托莱伯爵, 克洛德-路易, 化学家, 115

Bertin family (*Journal des Débats*)，贝尔坦家族（《辩论报》），123

Berzelius, Johann, Jakob, 贝采利乌斯, 约翰·雅各布, 瑞典化学家, 完成原子量表, 61, 62, 64, 65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480

割让给土耳其, 488

Bessemer, Sir Henry, 贝塞麦爵士, 亨利, 土木工程师和发明家, 30, 51

Bessemer process (1856), 贝塞麦(转炉)炼钢法, 4, 30, 65

Beust, Count Ferdinand Friedrieh von, 博伊斯特伯爵, 斐迪南·弗里德里希·冯, 萨克森政治家, 512, 519, 549—550, 581, 584, 592

Beyle, Marie-Henri (Stendhal), 贝尔, 玛丽-亨利(笔名斯丹达尔), 作家, 159, 162, 163, 164

Biarritz, 比亚里茨, 1865年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在此会晤, 517

Bibikov, Dmitri, 比比科夫, 德米特里, 俄国总督, 362

Bible, 圣经

赖尔关于地球年代和古代人类的学说, 9

达尔文的进化论, 9

旧约全书的纪年, 75

福音书的真实性, 75

对圣经的历史评论, 102

圣经的纪年表, 102

Biddle, Nicholas, 比德尔, 尼古拉斯, 第一合众国银行董事长, 606

Biegeleben, Ludwig Maximilian von, 比格莱本,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连·冯, 奥地利外交部官员, 512, 547

“Bildungsroman”，The，“教育小说”，161—162

Billault, Auguste, 比约尔，奥古斯特，法国政治家，447

Birkenhead, H. M. S.，“伯肯黑德号”，英国军舰，在海上沉没，281

Birmingham, 伯明翰

 机床生产，29

 国内工业中心，42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 伯明翰政治联盟，347

Bismarck, Otto, Count von, 俾斯麦伯爵，奥托·冯

 掌权，16

 由于俄英无暇他顾而取得的成就，17

 对天主教公会议发生兴趣，95

 与新闻出版业，121，127

 赦免法案，188，199，520，579

 借鉴美国宪法，195

 镇压进步党，199

 建立统一的德国，199，504，577，601

 对联邦制的理论知识，210

 奥尔米茨会议对他的影响，210

 莫特利和莫尔的影响，211

 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211，220，245，516—517

 对奥地利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268，324

 与毛奇的冲突，311

 成为普鲁士首相，464

 智胜拿破仑三世，465

卓越的演说家，498

与拉多维茨，500，501

普奥之间缺乏团结，506

他的性格，511—512，599

“铁和血”的讲话，512

取得俄国的亲善，513

为丹麦战争提供资助，515

1866年与意大利结盟，517

与匈牙利革命党人的联系，517

与拿破仑三世在比亚里茨会晤，517

与普选权，518

解散邦联宣布战争，518

公布贝内德蒂的条约草案，580

与霍亨索伦王室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588，594，596

不信任法国，585

在瓦尔津，589，593，597

作好战争准备，596—597

Bitzium, Albert (“Jeremias Gotthelf”) , 毕齐乌斯, 阿尔伯特, (笔名 “耶雷阿斯·戈特赫尔夫”) , 瑞士基督教牧师和作家, 166

Bizerta, Gulf of, 比塞大湾, 424

Black Forest, 黑森林, 395

Black Sea, 黑海

英法海军进入黑海, 477

普鲁士号召盟国退出黑海, 479

中立化, 488

准许小船进入, 489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诗人和画家, 1, 135

Blanc, Louis, 布朗, 路易, 社会主义者, 393, 394, 398, 408

Blanco, Guzmán, 布兰科, 古斯曼, 委内瑞拉独裁者, 669

Blanqui, Louis-Auguste,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革命家, 397, 399

Blassendorf Assembly, 布拉森多夫会议, 403

Blast furnaces, 高炉, 51, 342

Bluntschli, J.K., 布隆奇利, 约翰·卡斯珀, 律师和自由主义者, 514

Bohemia, 波希米亚, 392

1848年的波希米亚, 187, 395—396, 398, 401—402

自治方案, 210

普鲁士军队侵入, 519

捷克人在波希米亚的统治, 523, 524

贵族的领导人, 541

选举团, 546

Bohemia, Charter of, 波希米亚宪章, 396

Boileau, L.-A., 布瓦洛, 建筑师, 140

Bokhara, 布哈拉, 386, 388

Bolívar, Simón, 玻利瓦尔, 西蒙, 哥伦比亚的创始人, 659, 668

Bolivia, 玻利维亚

1825年成为共和国, 159

领土丧失给智利，666

人口，667

采矿工业，667

与秘鲁短暂联合，667

Bologna, 波洛尼亚，553, 554, 571, 572

Boltzmann, Ludwig, 玻耳兹曼，路德维希，物理学家，56

Bolyais, the, 鲍耶父子，数学家，56

Bone dust, 骨粉，用作肥料，24

Bonham, Sir George, 文翰爵士，乔治，香港总督，700

Bonn University resists decre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波恩大学抗议天主教公会议的法令，100

Books of the Polish Nation, 《波兰民族之书》，237

Boole, George, 布尔，乔治，数学家，56

Bosnia, 波斯尼亚，472

Boston, U. S. A., 波士顿（美国），开办图书馆，120

Boston Liberator, 《波士顿解放者》，130

Bouguereau, William, 布格罗，威廉，画家，153

Boulogne, Prince Albert at, 布洛涅，阿尔伯特亲王在该地，
481

Bourbon monarchy, 波旁君主制度，与教会的密切关系，76

Bourcet, Pierre-Joseph, 布尔赛，比埃尔-约瑟夫，工程师，
314, 316

Bourqueney, Francois-Adolphe, 布尔凯尼伯爵，弗朗索瓦-阿道夫，法国大使，484—485

Boussingault, Jean Baptiste, 布森戈，让·巴蒂斯特，生物化学家，65

Bowles, Samuel (*Spring field Republican*) , 鲍尔斯, 塞缪尔
(《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主编), 130

Bowring, Sir John, 包令爵士, 约翰, 语言学家, 驻华商务监
督, 709

Boxer rebellion (1900) , 义和团起义, 708

Boyen, Hermann von, 博伊恩, 赫尔曼·冯, 普鲁士副官长, 恢
复职务, 496

Boyer, Jean-Pierre, 布瓦耶, 让-皮埃尔, 海地总统, 682

Boyle, Robert, 波义耳, 罗伯特, 物理学家, 60

Bradford, 布雷德福, 43

Bragg, Braxton, 布雷格, 布拉克斯顿, 南部联盟顾问, 656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400, 414

Brandenburg, Count Friedrich William von, 勃兰登堡伯爵,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 普鲁士首相, 405, 498, 502

Brazil, 巴西

地主的权力, 3

脱离葡萄牙, 659

独立, 660

人口, 660, 661

与拉普拉塔河联省的战争, 660

文盲, 661

巴西的奴隶制, 661, 663

日耳曼移民, 661

棉花, 661

糖, 661

咖啡, 661

铁路, 662

煤气灯的使用, 662

亚马孙河行驶轮船, 662

佩德罗统治时期的宪法, 662

出版自由, 662

英国在巴西的投资, 662

政教冲突, 663

共济会员, 663

君主政体的威望, 663

巴西的共和党, 663

Brazos river, 布拉索斯河, 613

Bread, 面包

为面包生产谷物, 26

1838—1842年面包不足, 26

面包的价格, 74

Breckinridge, John C., 布雷肯里奇, 约翰·卡贝尔, 南部联盟的将军, 626

Bremen, 不来梅

轮船带来的繁荣, 4

自由贸易港, 494

Brenier, Baron de, 布勒尼埃男爵, 法国密使, 483

Brentano, Clemens, 布伦坦诺, 克莱门斯, 诗人和浪漫主义者, 172

Breslau, 布雷斯劳, 400

Brett, John, 布雷特, 约翰, 画家, 152

Bright, John, 布赖特, 约翰, 政治家
 反对教士资格法, 85
 与反谷物法联盟, 342—343
 与美国南北战争, 636—637

Brindisi, 布林迪西, 420—421

Britannia, H. M. S., “不列颠号”, 英国军舰, 292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英国科学促进会, 50

Britisn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 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 85

British Guiana, 英属圭亚那, 该地的奴隶制, 341

British Honduras, 英属洪都拉斯, 681

British Indian Telegraph Company, 英属印度电报公司, 350

British Jews, Board of Deputies of, 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 244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英国医学杂志》, 432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 英属北美法, 211, 354

British Public Health Act (1848), 英国公共卫生法, 72

“British Society”, “英国协会”, 国家第一次给予资助, 110

British Trade Convention (1838), 英国贸易协定, 432

Brontë, Emily, 勃朗特, 埃米莉, 作家, 163

Brown Ford Madox (1821—1893), 布朗, 福特·马多克斯, 画家, 151—152

Brown, John, 布朗, 约翰, 美国废奴主义者, 203, 625

Brown, Joseph, 布朗, 约瑟夫, 佐治亚州州长, 653

Brown, Robert, 布朗, 罗伯特, 植物学家, 67

Browning, Robert, 布朗宁, 罗伯特, 诗人, 177, 216

Bruck, Baron Karl Ludwig von, 布鲁克男爵, 卡尔·路德维希·冯, 奥地利大臣

论地中海贸易, 432

对苏伊士运河感兴趣, 436

奥地利的经济主动权, 501

辞职, 505, 533

贸易大臣, 529

财政大臣, 538

自杀, 543

Brunel, Isambard Kingdom, 布鲁内尔, 伊桑巴德, 金登, 工程师, 建造了第一艘铁质客轮, 281

Brunnov, Baron Ernst Philipp von, 布伦诺夫男爵, 恩斯特·菲利普·冯, 俄国驻英大使

会见帕默斯顿, 256—257, 264

前往巴黎, 478

在巴黎会议上, 487

Brunswick, 不伦瑞克

1832年的政府改革, 189

发生骚乱, 395, 497

不伦瑞克公爵为其兄弟替代, 493

在税收同盟中, 494

修正联邦宪法, 501

Brussels, Palais de Justice, 布鲁塞尔, 该地的正义宫, 142

大学, 107

Bryce, James, M.P., 布赖斯, 詹姆斯, 国会议员, 民法教授,
129

Buchanan, James, 布坎南, 詹姆斯, 美国第十五任总统, 203,
626

Buchez, Philippe, 比歇, 菲利普, 天主教民主理论家, 101,
213

Büchner, Georg, 毕希纳, 格奥尔格, 戏剧家, 184

Buda, 布达, 它的陷落, 526

Budapest, 布达佩斯

国会两院, 140

为温迪施格雷茨再次占领, 406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与欧洲的联系, 669

被英法封锁, 670

在塞佩达战役中战败, 671

在帕翁战役中获胜, 671

1861年国会, 671

行政管理, 671

布宜诺斯艾利斯宪法, 671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比若·德·拉·皮
康内里, 托马-罗贝尔, 元帅, 320—321, 393

Builders' Union, 建筑工人联盟, 346, 347

Bukovina, 布科维纳, 531, 545

Bulgaria, 保加利亚

民族主义, 242—243

教育的发展, 242

要求教会独立, 243

Buller, Charles, 布勒, 查尔斯, 自由派政治家, 352

Bulnes, Fort (Chile), 布尔内斯堡 (智利), 665

Bulnes, Manuel, 布尔内斯, 曼努埃尔, 智利总统, 664

Buloz, François, 比洛, 弗朗索瓦, 《两个世界杂志》主编,
123, 128

Bulwer, Edward George Lytton (Bulwer-Lytton, 1st Baron
Lytton), 布尔沃, 爱德华·乔治·利顿 (布尔沃-利顿, 第一代利顿
男爵), 122

Bunsen, Robert Wilhelm, 本生, 罗伯特·威廉, 化学家, 58

Bunjevci, 布涅瓦茨人, 537

Buol, Count Karl Ferdinand von, 布奥尔伯爵, 卡尔·斐迪南
·冯, 奥地利政治家

起草维也纳照会所起的作用, 475

反俄政策, 478

与普鲁士结盟, 478

雄心太大的政策, 481

充当调停人, 484

指导外交事务, 533

辞职, 539

与加富尔的外交斗争, 571

Burckhardt, Jacob, 布尔克哈特, 雅各布, 历史学家, 12

Burdett-Coutts, 伯德特-库茨, 女男爵, 139

Buren, Martin Van, 范布伦, 马丁, 美国第八任总统, 621

Burlingame, Anson, 蒲安臣, 美国驻华公使, 708

Burma, 缅甸, 351, 686

Burne-Jones, Edward, 伯恩-琼斯, 爱德华, 画家, 153

Buss, Frances Mary, 巴斯, 弗朗西丝·玛丽, 118

Butler, Dom Cuthbert, 巴特勒, 多姆·卡思伯特, 93

Butter, 黄油, 64

Butterfield, William, 巴特菲尔德, 威廉, 建筑师, 138

Buxton, Sir Thomas, Fowell, 巴克斯顿爵士, 托马斯, 福埃尔, 改革家, 341

Byron, George Gordon, 6th Baron, 拜伦, 乔治·戈登, 第六代男爵, 诗人, 146, 172

Cabanel, Alexandre, 卡巴奈, 亚历山大, 画家, 153—154

Cables, 电缆, 海底电缆对航运的影响, 5

Cadiz, 加的斯, 419

Cairo, 开罗, 424, 431

Calcutta, 加尔各答

 与伦敦的电报业务, 36

 来自苏伊士的邮政业务, 432

Caldera, 卡尔德拉, 665

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卡尔德隆, 德·拉·巴尔卡, 佩德罗, 戏剧家, 182

Calhoun, John C., 卡尔霍恩, 约翰·考德威尔, 美国政治家

 他的逝世, 203

 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危机, 609

 主张采取关税措施, 615

 论奴隶制, 617

得克萨斯问题, 621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203, 632

发现金矿, 458, 680

在该地的移民, 621

加入联邦, 622

美国军队在该地, 622

由墨西哥割让给美国, 675

Callao, 卡亚俄, 666

Cambodia, 柬埔寨, 709

Cambridge, 剑桥大学, 各学院向非国教教徒开放, 87

Cambridge Camden Society, 剑桥大学卡姆登学会, 138

Camphausen, Ludolf, 坎普豪森, 卢多尔夫, 工业家, 494, 496, 498

Canada, 加拿大

1837年的叛乱, 19, 193, 353

铁路, 34, 350

联邦自治领, 211

上、下加拿大重新统一, 354

在联合王国市场上失去谷物特惠待遇, 354

对英国货物征收关税, 355

购买赫德森湾领地, 355

新建曼尼托巴省, 355

Canada Act (1791), 加拿大法, 353

Canning, Stratford, 坎宁, 斯特拉特福德, 参见Stratford de Redcliffe, 1st Viscount

Canosa, Antonio, Prince of, 卡诺萨亲王, 安东尼奥, 他在那不勒斯的暴政, 554

Canrobert, Francis-Certain, 康罗贝尔, 弗朗索瓦-塞尔坦, 元帅

被佩利西埃所取代, 482

与瑞典缔结条约, 484

Canton, 广州

对外贸易港口, 687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该地, 687

鸦片贸易, 687

中国人对广州贸易的看法, 691

进入广州城的权利, 694—695

Cape Colony, 开普殖民地

与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 350

宪政发展, 355

Capital, 资本

在农业改进方面的大量投资, 25

联合企业筹集资本, 39

Capponi, Gino A. G. G., Marchese, 卡波尼侯爵, 吉诺, 托斯卡纳首相, 558

Captain, H. M. S. (1867), 英国军舰“首领号”(1867年建造), 280

Capuchins of Aix, religious Community of, 埃克斯的方济各会托钵僧成立的宗教社团, 78

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卡德韦尔子爵, 爱德华, 陆军大臣, 356

Carlile, Richard, 卡莱尔, 理查德, 新闻工作者, 121

Carlos, Don VI, 卡洛斯六世, 唐, 西班牙王位觊觎者, 253, 555

Carlton, Club (Conservative), 卡尔顿俱乐部 (保守党), 339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 10, 11, 21, 68, 158

Carnot, Sadi, 卡诺, 萨迪, 工程师, 热动力研究, 59

Carolina, North, 北卡罗来纳, 330, 627, 634, 653, 655

Carolina, South, 南卡罗来纳

退出联邦, 207

拒绝执行国会法令问题, 606, 609

经济萧条, 609

召开州代表大会, 609

强制法案, 610

Carpeaux, J. B., 卡尔波, 雕塑家, 143

Carrara, 卡拉拉, 553, 563, 571

Carrel, Armand (*Le National*), 卡雷尔, 阿尔芒, (《国民报》主编), 123

Carrera, Rafael, 卡雷拉, 拉斐尔, 危地马拉独裁者, 679

Cartagena, 卡塔赫纳, 420

Casati, Gabrio, Conte, 卡萨蒂伯爵, 加布里奥, 米兰市长, 562

Cassagnac, Granier de, 卡萨尼亚克, 格拉尼埃·德, 新闻工作者, 125

Castelbajac, Barthélemy, Marquis de, 卡斯特尔巴亚克, 巴泰勒米, 侯爵, 法国驻俄大使, 478

Castelfidardo, 卡斯特尔菲达多, 教皇军队在该地战败, 574

Castilla, Ramon, 卡斯蒂利亚, 拉蒙, 秘鲁总统, 668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卡斯尔雷子爵, 罗伯特·斯图尔特, 267, 270

Catalysis, 催化作用, 63

Catania, 卡塔尼亚, 420

Catherine II, 叶卡捷林娜二世, 俄国女皇, 与地中海, 416

Catholic Congress (1863), 天主教代表大会, 89

Cattaneo, Carlo, 卡塔内奥, 卡洛, 作家亲奥观点, 557

与意大利独立, 561, 574

谴责查理·阿尔贝特, 563

Cattaro, 卡塔罗, 422

Cattle, transport by rail, 牲畜, 用铁路运输牲畜, 25

Cauchy, Augustin Louis, 柯西, 奥古斯坦·路易, 数学家, 56

Cavaignac, Louis Eugenne,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将军, 法国陆军部长, 263, 400, 404

Cavour, Camillo, Count di, 加富尔伯爵, 卡米洛·迪

普隆比埃密约, 16

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 76

与拿破仑三世联盟, 88

论新闻出版, 121

复兴运动, 128

意大利自由派的支持, 188

打败拿破仑三世，209
1850年进入内阁，412，567
派部队前往塞瓦斯托波尔，430
支持西方的政策，483
老练的外交，538
论都灵，557
警告查理·阿尔贝特，562
与拉塔齐联盟，568
解散修道院，568
用密款贿赂新闻界，568
就马志尼在米兰的暴动警告奥地利，569
出席1856年的和平会议，569
不反对拿破仑三世，570
与布奥尔伯爵的外交斗争，571
重新掌权，572
希望与那不勒斯结盟，572
辞职，572
逝世，575

Celluloid，赛璐珞，64

Central America，United Province of，中美洲联合省，678—
681

共和国，659

人口，678

首都迁到圣萨尔瓦多，679

打击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和财富，679

Central Committee of Working Men, 工人中央委员会, 400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中太平洋铁路, 643

Cepeda, battle of, 塞佩达战役, 671

Cette, 塞特, 421

Ceuta, 休达, 424

Ceylon, 锡兰, 350, 432

Cézanne, Paul, 塞尚, 保罗, 画家, 135

Chaadaev, Peter Yakovlevich, 恰达耶夫,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 俄国散文作家, 366

Chadwick, Sir Edwin, 查德威克爵士, 埃德温, 改革家, 337, 341

Chalmers, Thomas, D.D., 查默斯, 托马斯, 神学博士, 苏格兰牧师, 83

Chambers of Commerce, 商会

 在奥地利, 535

 在米兰, 557

Chambers of Trade and Industry, 工商业行会, 在奥地利, 530

Chambord, Henri, Comte de, 尚博尔伯爵, 亨利, 409, 452

Chancellorsville, battle of, 钱瑟勒斯维尔战役, 632

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尚加尼埃将军, 尼古拉-安娜-泰奥迪尔, 被路易·拿破仑撤职, 444

Chapdelaine, Auguste, 马赖(夏普德莱纳, 奥古斯特), 罗马天主教神甫, 696, 701, 709

Charles X, 查理十世, 法国国王, 逊位, 14, 427

Charles X V, 查理十五, 瑞典国王, 220

Charles of Hohenzollern, Prince, 霍亨索伦家族的查理大公,
242

Charles Albert, 查理·阿尔贝特, 皮埃蒙特—撒丁国王

在库斯托扎和诺瓦拉战役中战败, 186

解放伦巴第, 200

他颁布的宪法, 200

逊位, 322, 527, 566

对奥地利宣战, 398

他的性格, 402, 557

放弃米兰, 402

不幸的决定, 406

接受维杰瓦诺停战协定, 523

废除停战协定, 527

为拉德茨基击败, 527

与奥地利和法国结盟, 553

放弃与自由派的友谊, 554

与奥地利的联系, 555

支持贝里女公爵反对路易·菲利普, 555

支持唐·卡洛斯和唐·米格尔, 555

梅特涅对他的看法, 557

与摩德纳的弗兰西斯四世的通信, 557

撤去索拉罗的职务, 560

被迫颁布宪法, 560

越过提契诺河, 562

军事上没有准备, 562

拒绝加里波第提出的合作， 563

政策和战略， 563—564

撤退到米兰， 564

被控叛国， 564

依靠英法， 564

蒙卡列里的声明， 566

逝世， 566

Charles, Jacques Alexandre César, 查理， 雅克·亚历山大·塞扎尔， 物理学家， 60

Charles Ludovic, duke of Lucca, 查理·卢多维克， 卢卡公爵， 554

Charleston, U. S. A. , 查尔斯顿（美国）

商业利益集团， 615

1822年的叛乱阴谋， 617

“Charter for Artisans”， “手工业者宪章”， 400

Chartist Movement, 宪章运动

六点纲领， 185， 347

4月的失败， 186

加强宣传鼓动， 193

丧失威望， 196

伦敦示威游行， 202

需要加强团结， 345

运动的失败， 346

请愿书， 347—348

Chase, Salmon P. , 蔡斯， 萨蒙， 美国财政部长， 643， 644， 646

Chassepot, Antoine Alphonse, 夏斯波, 安托万·阿尔方斯, 发明家, 304

来福枪, 305—306, 593

Chattanooga, battle of, 查塔努加战役, 632

Cheese, 奶酪, 美国控制英国的进口市场, 26

Chekhov, Anton, 契诃夫, 安东, 戏剧家, 182

Chernaev, Michael, 切尔纳耶夫, 米哈伊, 将军, 388

Chernyshevskii, Nicholas,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 社会主义者, 370—371

Chevalier, Michel, 谢瓦利埃, 米歇尔, 政治经济学家, 434, 436, 452

Chia Ch' ling, 嘉庆, 中国皇帝, 禁止鸦片输入, 688

Chickamauga, battle of, 奇克莫加河战役, 632

Child, banking firm of, 蔡尔德银行, 40

Child-labour, 童工, 1833年法案禁止雇用童工, 44, 83, 341

Childers, Hugh, 奇尔德斯, 休, 海军大臣, 300

Chile, 智利

共和国, 659

地理影响, 663

议会制度的建立, 664

限定继承法的恢复, 664

教会和国家的联盟, 664, 666

总统的权力, 664

地域, 664

人口, 664

1833年宪法, 664
一党制国家, 665
废除限定继承法, 665
德国移民, 665
智利大学, 665
师范学院, 665
电报的使用, 665
铁路, 665
发现铜和银, 665
发现煤, 665
伦敦贷款(1822), 665
鸟粪层, 666
向西班牙宣战, 666
增加其领土, 666
宗教自由, 666
内战, 666
Chiloé, 奇洛埃, 663
Chimkent, 奇姆肯特, 387—388
China, 中国
 太平天国起义, 8, 384, 695—701, 705—706
 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79, 707, 708
 满清皇帝统治下, 186
 鸦片贸易, 384, 688
 邮件的运送, 432

被法国打开门户，461

合并卡尔梅克蒙古人的帝国，685

与西方世界的贸易，686

外交往来，686—687，691，694，703，707

来自小国的礼节性进贡，686

广州成为通商口岸，686，688

茶叶贸易，687

贸易收支，688

中国与欧洲各国军队和战舰之间作战力量的悬殊，688，690

任命领事，692

宗教容忍，693，695，703

外国人旅游的权利，694，703，707

治外法权，695

儒家学者的态度，695

中国建筑物的毁坏，699

帝国海关被破坏，701

夺取大沽口炮台，703—704

与西方列强的条约，703

被迫赔款，704

外交人员在京居住地，704

皇帝逃往热河，704

攻击打着休战旗帜的谈判代表，704

利用被俘人员作为人质，704

太平天国起义对贸易的影响，705

清王朝的重新统一，705
咸丰皇帝之死，704—705
慈禧的摄政，705
清王朝恢复权力，706
设立外交部，707
外语学院，707
海、陆军的现代化，707—708
1900年义和团起义，708
煽动暴民的暴力行动，708
天津的暴力行动（1870），708
派遣留学生，708
在西方各国首都设公使馆，708
Chincha Islands, 钦查群岛，666
Chinkiang, 镇江，英国占领该地，690
Chios, 希俄斯岛，422
Chloroform, 氯仿，52, 64, 72, 486
Cholera, 霍乱，44, 72, 479
Choshu, 长州，712
Chotek family, 肖特克家族，535
Christian IX, 克里斯蒂安九世，丹麦国王，220, 575
Christina, widow of Ferdinand VII, 克里斯蒂娜，费迪南德七世的遗孀，西班牙摄政，253
Chronograph, Bashforth electric, 记时器，巴什福思电记时器，51

Church, Eastern Orthodox, 东正教会, 支持匈牙利克罗地亚人起义, 240

豁免权和特权, 470, 473, 476

与俄国东正教的特殊关系, 482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圣公会

学派, 87

支持1840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 342

支持工厂立法, 343

Church, Protestant, 新教

与达尔文主义妥协, 71

研究圣经语言, 71

对科学的态度, 74

苏格兰长老会大会, 83, 84

圣职授与权, 83

苏格兰自由长老会, 84

不信奉国教者的平等公民权利, 85

公理会运动的开始, 87

卫理公会, 87, 625

浸礼会运动的开始, 87, 625

爱尔兰圣公会与政府分离, 100—101, 218

威尔士圣公会与政府分离, 101

在匈牙利, 542

Church,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 VI, 13, 76—85, 87—

101

与教育, 107, 409, 444, 456

在奥地利, 413, 504, 533
在法国, 444, 448—451, 454, 456
在普鲁士, 494—495
在皮埃蒙特, 567
在墨西哥, 675—676
在洪都拉斯, 679
在中国, 693, 695—696, 708
在安南, 709
在朝鲜, 709

Church Temporalities Act (1833), 教会财产法, 100

Chusan Islands, 舟山群岛, 被占领, 690

Civil Service, 文官制

在法国和普鲁士, 206, 495

吸收新成员, 206, 338

英国需要扩大文官制, 337

改革, 338, 486

在意大利, 569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文官委员会, 338

Civiltà Cattolica, 《天主教文明》(耶酥会刊物), 89, 90,

94

Civiltà-Vecchia, 契维塔韦基亚

法国派遣军队到该地, 408

海运和人口, 419—420

罗马港, 421

Clam-Martinitz, Count, 克拉姆—马蒂尼茨伯爵, 波希米亚领导人, 541

Clarence, William, duke of, 克拉伦斯公爵, 海军最高长官, 290

Clarendon, George, 4th earl of, 克拉伦登, 乔治, 第四代伯爵

对教皇无谬误论的看法, 95

英国的调解, 272

任外交大臣, 471

出席巴黎会议的英国代表, 487, 489

指控奥地利人、教皇和那不勒斯人对国家管理不善, 490

在诉诸武力之前, 先由第三者进行调停, 490

关注波兰的解放, 490

论比萨拉比亚和黑海, 492

关于意大利的意见, 569

外交大臣, 582

去世, 586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将军, 军事战略家和思想家, 302, 313, 316—320, 655, 656

Clausius, Rudolph Julius Emmanuel, 克劳修斯, 鲁道夫·尤利乌斯·埃马努埃尔, 物理学家, 51, 59, 60

Clay, Henry, 克莱, 亨利, 美国政治家

他的“美国制度”, 604, 613

延续美国银行的特许状, 607

作为总统候选人, 607

拒绝执行国会法令问题, 609

1850年的妥协, 623

Clayton-Bulwer treaty,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680—681, 682

Clergy, 教士

具有新的性质, 76

教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409

在墨西哥的合法豁免权, 675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s, 克利夫顿吊桥, 136

Clippers, American, 美国的帆船

用于快速航行, 35

用于克里米亚战争, 35

Clothing, 服装, 一种家庭工业, 42

Coal and Coal-mining, 煤和采煤业

产量, 30—31, 333, 505

价格, 31

1869—1873年的煤荒, 31

美国的无烟煤, 31

美国的烟煤, 31

在深煤层采煤, 31

成为危险性较小的工业, 31

在1841到1871年间雇佣工人的增加, 43

用于轮船, 279

出口, 333

雇用妇女和少女, 342

在智利, 665

Coal-gas, 煤气, 52

Coaling stations, 加煤站

亚丁, 431

阿萨布, 432

Coal-tar, 煤焦油, 52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 威廉, 激进派新闻记者, 121

Cobden, Richard, 科布登, 理查德, 政治家

与法国签订条约 (1860), 38, 349, 452

论外交政策, 270

与谷物法, 342

与美国南北战争, 637

Cochin-China, 交趾支那, 7, 709

Coffee, 咖啡, 巴西的咖啡, 661, 663

Coke, 焦炭, 29

Coke-ovens, 炼焦炉, 5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尔律治, 塞缪尔·泰勒, 诗人,
157, 172

Coles, Captain Cowper, R.N., 科尔斯舰长, 考珀, 皇家海军,
280, 286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115

Collodion, 胶棉, 52

Cologne, 科隆

重建科隆大教堂, 139, 495

在1848年, 400, 401

科隆大主教被捕, 494

Colomb, Sir John, 科洛姆爵士, 约翰, 356

Colombia, 哥伦比亚, 659, 669

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1865), 殖民地法律效法, 355

Colonial policy, 殖民地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改变, 导致自治, 20, 349, 352—356

Colonies, 殖民地, 英国商品的原料来源和市场, 350

Columbia, District of, U.S.A., 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

 逃亡奴隶的返回, 619

 该地的奴隶贸易, 623

Combination Laws, 结社法, 45, 345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Religious Freedom, 保卫宗教自由委员会, 79

Commons, House of, 众议院, 议员的财产条件, 335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3, 11, 188

Community of the Polish People in England, 旅英波侨协会, 234

Compagnie Générale Transatlantique, 大西洋轮船公司, 452

Compromise of 1850, 1850年妥协案, 623

Compromise Tariff (U.S.A.) of 1833, 1833年美国折中关税, 37, 609

Comte, Auguste, 孔德, 奥古斯特, 法国哲学家, 54, 55, 109, 459

Concordat with Austria (1855), 与奥地利的政教协定, 107, 533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南部联盟

它的形成, 627

又见American Civil War

Confiscation Act, 没收法案, 648

Congregation of Rites, 天主教礼仪会议, 赞成召开一次公会议, 93

Congress (U. S. A.), 美国国会

废除鞭笞, 298

走向国家主义, 604

投票表决修筑梅斯维尔公路的资金, 606

延长第一合众国银行的特许状, 607—608

降低关税, 609

投票表决合并得克萨斯, 622

与墨西哥战争, 622

与奴隶制, 622—624, 626, 647—648

南北战争时期的立法, 642—645

南部联盟国会, 650—653

Conscience, Hendrik, 孔西延斯, 亨德里克, 小说家, 221

Conscription, 征兵制

在法国, 578, 584

在普鲁士, 578

在美国, 645

在南部联盟, 652

Conseil Académique, 学术委员会, 80

Conseil d' Etat, (法国) 行政法院, 450

Conséil Royal de l' Université, 皇家教育委员会, 80

Conseil, Supérieur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 80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英国保守党的形成, 339

Considérant, Victor-Prosper, 孔西德朗, 维克托-普罗斯佩, 社会主义思想家, 408

Constable, John, 康斯太布尔, 约翰, 画家, 135, 146

Constant, Benjamin, 贡斯当, 邦雅曼, 著作家和政治家, 162, 390

Constantine Pavlovitch, 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 俄国大公爵, 361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423, 425, 476, 478

Convicts, transportation of, 向海外运送犯人, 353

Cook, John Douglas, 库克, 约翰·道格拉斯, 《星期六评论》主编, 123

Cooper, James Fenimore, 库珀, 詹姆斯·费尼莫尔, 小说家, 167

Co-operative movement, 合作运动, 345, 346, 348, 507

Co-operative societies, 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 25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 46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批发合作社, 46, 348

Copernican cosmology, 哥白尼的宇宙学说, 171

Copiaco, 科皮亚科, 663, 665

Copley, John Singleton, 科普利, 约翰·辛格尔顿, 画家, 134

Copper, 铜, 智利的铜, 665

Corfu, 科孚, 422, 431

Corn, 谷物

谷物税, 343

来自俄国、德国和北美的供应, 344

Corn Laws, 谷物法

具有共同的模式, 26

皮尔修正案 (1844), 26

废除谷物法, 26, 27, 122, 334, 338

爱尔兰饥荒的影响, 38

废除谷物法的影响, 432

Cornelius, Peter von, 科内利乌斯, 彼得·冯, 画家, 144

Corot, Jean Baptiste Camille, 柯罗, 让·巴蒂斯特·卡米耶, 画家, 135, 144, 147, 148, 149

Corps Legislatif, 立法会议

职责, 450

参议院可否决其决议, 455

逐渐重新被共和派掌握, 456

立法动议权, 456

宣布推翻帝国, 465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678, 679, 680

Costilla, Miguel Hidalgo, 科斯蒂利亚, 米格尔·伊达尔戈·伊, 墨西哥革命家, 674

Cotman, John Sell, 科特曼, 约翰·塞尔, 画家, 147

Cotton, 棉花

纺纱的革命性变化, 28

产量和劳动成本, 28

采用动力织机， 28

法国和比利时棉纺厂， 28

1830—1860年美国的产量， 28

印度和埃及成为输出国， 28

丝光工艺， 64

出口， 332

棉纺工业与海外贸易的联系， 333

从美国的输入， 333

棉纺业的雇佣工人， 333

基本上是工厂工业， 333

比烟草或大米的获利较多， 613

轧棉机的发明， 613

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 4， 638

从埃及和印度购买棉花， 638

在巴西， 661， 663

Council of Constance, 康斯坦茨公会议， 94

Courbet, Gustave, 库尔贝， 居斯塔夫， 画家， 148—150， 151，
152

Cousin, Victor, 库赞， 维克托， 哲学家， 109， 115， 241

Cowley, Henry Wellesley, 1st earl, 考利， 亨利·韦尔斯利，
第一代伯爵， 外交家， 487

Cowper-Temple clause (Forster Education Bill), 考珀—坦
普尔条款（福斯特教育法案）， 86

Cracow, 克拉科夫

不再是自由市， 16

并入奥地利, 235, 267

波兰贵族的起义, 523

克拉科夫大学, 531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贷银行, 25, 451, 458

Crédit Lyonnais (1863), 里昂信贷银行, 458

Crédit Mobilier (1852), 动产信贷银行 (1852年创立), 34, 41, 451, 453, 458, 535, 536

Creditanstalt, 工商信贷银行, 34, 535, 538

Crémieux, Adolphe, 克雷米厄, 阿道夫, 法国司法部长, 244

Crete, 克罗特岛

 建议德国移民, 228

 本地的航运业, 422

 交予穆罕默德·阿里, 426

 当地的反叛, 581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X V, 468—492

 不是局部斗争, 15

 复杂的外交活动, 16

 新式武器的威力, 16, 306

 使用快速帆船, 35

 显示出军事行动缺乏效率, 122, 241, 322, 481, 486

 维持和平的条件遭破坏, 267

 对势力均衡的影响, 268—269

 军舰大部分使用风帆, 279

 电报的使用, 309, 486

 医疗服务, 323

土耳其的软弱，430

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462，469

德意志邦联的政策，505

与奥—普关系，506

Croatia，克罗地亚

作为一个独立的省份，403

一个王室领地，537

与匈牙利的关系，543，547

敌视“二月特许令”，545—546

Croce, Benedetto，克罗齐，贝内代托，政治思想家，209

Crome, John，克罗姆，约翰，画家，135

Cronstadt，喀琅施塔得，俄国海军基地，484

Crystal Palace，水晶宫，136

Cullen, Paul，卡伦，保罗，红衣主教，都柏林大主教，100

Cumberland，坎伯兰，铁矿藏，29

Cumberland，“坎伯兰号”，美国小炮舰，285

Cumberland Pike, The, U.S.A.，坎伯兰公路（美国），604，606，612

Cunard Steamship Line，丘纳德轮船公司

1840年开辟利物浦—波士顿航线，36

利物浦—纽约航线，36，332

创办，332

Curtatone，库尔塔托内，564

Cushing, Caleb，顾盛，凯莱布，美国来华专使，629

Custine, Astolphe, marquis de, 居斯蒂纳侯爵, 阿斯托尔夫, 旅行家, 18, 357n

Customs, amendments of 1842, 1842年关税修正案, 26, 46, 53, 60

Custoza, battle of, 库斯托扎战役, 186, 263, 321, 402, 523, 564, 576

Cuvier, Georges, 居维叶, 乔治, 古生物学家, 68, 115

Cuza, Alexander, prince of Roumania, 库扎, 亚历山大, 罗马尼亚大公, 241—242

Cyprus, 塞浦路斯

主张德国向该地移民, 228

海运, 419

占领该地, 433

Czartoryski, Prince Adam-George, 恰尔托雷斯基亲王, 亚当-乔治, 波兰政治家和将军, 234

Czech Repeal Association, 捷克废止合并协会, 238

Czechs, 捷克人

捷克民族主义, 238, 523

要求建立捷克人占优势的联邦实体, 523—524

在匈牙利的官员, 529, 536

语言限制, 521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得到实际的利益, 534

民族主义的知识界, 534, 541

在匈牙利的军队, 539

反对参加帝国咨政院, 545—546, 550

“到莫斯科朝圣”, 550

Daily News, 《每日新闻》

价格, 一便士, 122

关于普法战争的报导, 122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利维·劳森家族, 121

伦敦第一家售价一便士的报纸, 122

Dairy produce prices, 乳制品的价格, 27

Dale, R. W., 戴尔, 公理会牧师, 反对福斯特教育法案, 86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前途未卜, 527

附属于克罗地亚, 546

Damascus, 大马士革

水源, 423

由埃及治理, 428

Dana, Charles A., 达纳, 查尔斯·安德森, 纽约报纸主编, 130

Danube, river, 多瑙河

多瑙河的航行, 7, 482, 490

中游航行轮船, 32

国际委员会疏浚河道, 32

俄国的控制, 417

土耳其武装力量越过多瑙河, 477

Danzig, 但泽, 维斯杜拉河流域农场的主要产品出口, 26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对军舰不开放, 252, 256, 429

海军上将帕克的舰队进入海峡，468

由五强控制，468

Dartmouth, Royal Naval College, 达特默思，皇家海军学院，
293

Daru, Comte Napoléon, 达律伯爵，拿破仑，法国政治家

与天主教公会议，97

外交大臣，585

辞职，586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生物学家

进化论，9，67，102

对生物研究的影响，49

自然选择的假说，56

《物种的起源》，67—70

不可知论者，71

为科学家普遍接受，71

他的影响，75

引起争论，348

Darwin, Erasmus, 达尔文，伊拉兹马斯，医生和诗人，69

Das Kapital (Marx)，《资本论》（马克思著），55，188，205

Daumier, Honoré, 杜米埃，奥诺雷，漫画家，147，149，151

Daunt, W. J. O' Neil, 当特，奥尼尔，政教分离鼓吹者，100

Davaine, Casimir-Joseph, 达瓦纳，卡齐米尔-约瑟夫，医生，

24

David, Jacques-Louis, 大卫，雅克-路易，画家，144

Davis, Jefferson, 戴维斯, 杰斐逊, 美国南部联盟总统, 627, 650

Davy, Sir Humphry, 戴维爵士, 汉弗莱, 化学家, 发现电解作用, 63

Day, Benjamin, 戴, 本杰明, 美国新闻工作者, 129

D' Azeglio, Massimo, 德·阿泽利奥, 马西莫, 意大利爱国者和政治家

在米兰, 557

嘲笑罗马的保卫者, 565

对意大利作为一个强国的观点, 566

皮埃蒙特首相, 567

辞职, 568

利用文官保证政府候选人的当选, 569

非法查禁报纸, 569

那不勒斯的分离, 575

De Ecclesia, 《论宗教事务》

要求教会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97

泄漏给新闻界, 97

Deák, Francis, 戴阿克, 费伦茨, 匈牙利政治家, 544, 545—546, 547, 549

Death penalty, for political offences, 由于政治罪而判死刑, 394

Death-rate, 死亡率

一直不下降, 74

与法国和比利时死亡率的比较, 74

Degas, Edgar, 德加, 埃德加, 画家, 154

Del Primato morale e civile degli Italiani (Gioberti), 《论意大利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焦贝蒂著), 199—200, 558

Delacroix, Eugène, 德拉克洛瓦, 欧仁, 画家, 144, 145—147, 148, 149

Delane, John Thadeus, 德莱恩, 约翰·撒迪厄斯, 《泰晤士报》主编, 122

Delaroche, Paul, 德拉罗什, 保罗, 画家, 151

Delaware, 特拉华

该地的奴隶制, 616, 628

拒绝退出联邦, 632

Della nazionalità Italiana (Durando), 《论意大利民族》(杜兰多著), 558

Delle speranze d' Italia (Balbo), 《意大利的希望》(巴尔博著), 200, 558

Delvigne, Henri-Gustave, 德尔维涅, 亨利-居斯塔夫, 发明家, 在研制裂开弹方面的工作, 304

Demmler, Georg Adolph, 德姆勒, 格奥尔格·阿道夫, 什未林宫的建筑师, 142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 12, 186, 191

Democratic Party (America), 民主党(美国)

北方辉格党加入该党, 626

内部的派系, 647

1862年在国会取得的胜利, 648

Denmark, 丹麦

大地主作为农业生产者, 23

谷物的净出口国, 26

德意志反对丹麦的“十字军”，187

为普鲁士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威吓，198

1849年宪法，203，411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203，220，265，464

国王的去世，203，514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使国家卷入战争，219

王位继承问题，219

民间传说的研究，219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219

在一个中央集权制宪法下吸收石勒苏益格，514

不出席1863年法兰克福会议，514

被普鲁士和奥地利打败，515

Deportation to Siberia, 放逐到西伯利亚，372

Derby, Edward Geoffrey, 14th earl of, 德比, 爱德华·杰弗里, 第十四代伯爵, 首相, 582

Derby, Edward Henry, 15th earl of, 德比, 爱德华·亨利, 第十五代伯爵, 英国外交大臣, 581

Dernah, 德尔纳, 424

Des Progrè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guerre contre l'église (Lamennais), 《论革命的进程与反对教会的战争》(拉梅内著), 77

Descent of Man (Charles Darwin), 《人类的遗传》(查尔斯·达尔文著), 70

Dessewffy, Count Emil, 德谢夫菲伯爵, 埃米尔, 匈牙利联邦主义者, 541

Devastation, H. M. S., 英国军舰“劫掠号”, 286—287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Ideas in Russia (Herzen) ,
《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赫尔岑著), 358

Dew, Thomas R. , 迪尤, 托马斯, 南部联盟政治家, 论奴隶制,
617

Diaz, Porfirio, 迪亚斯, 波菲里奥, 墨西哥总统, 678

Dicey, A.V. , 戴西, 法学家, 205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尔斯, 小说家, 11, 152, 162,
165

Dictionary of Commerce (McCulloch) , 《商业辞典》(麦卡洛克著), 419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丹尼斯, 哲学家和评论家, 183

Diesterweg, F.A.W. , 迪斯特尔韦希, 柏林师范学院院长, 113

Digitalis, 洋地黄, 药用, 72

Dillon, Captain Sir William (R.N.) , 狄龙爵士, 威廉, 皇家
海军上校, 苏塞克斯公爵的侍从官, 289

Diploma of 1860, 1860年特许令, 185, 209

Disarmament, 裁军

欧洲建议裁军(1831), 251

1870年的商讨, 585—586

Disease, germ theory of, 细菌致病说, 66, 73

Disestablishment, 政教分离

牛津运动对政教分离的看法, 83

爱尔兰圣公会的政教分离, 100—101

威尔士圣公会的政教分离, 101

Disraeli, Benjamin, 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西比尔》的引文, 1, 10, 165

《坦克雷德》的引文，10

1867年的改革法案，206

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433，440

Dissenters' Chapels Act (1845)，不信奉国教者教堂法，86

Dobrolyubov, Nikolai A.，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作家，371

Doherty, John，多尔蒂，约翰，工会领袖，346

Döllinger, Johann Josef Ignaz，多林格尔，约翰·约瑟夫·伊格纳蒂乌斯，神学家，78，94，100，101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要求保护或合并，682

 西班牙重新承担其以往的保护，683

 被美国占领，683

Donelson, Andrew Jackson，唐纳尔逊，安德鲁·杰克逊，美国驻普鲁士公使，194

Dostoevsky (Dostoevskii)，Feodor，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作家，21，157，159，163，166，168—169，365

Douglas, Stephen A.，道格拉斯，斯蒂芬·阿诺德，美国参议员，623，624，626

Dover (1840)，“多佛尔号”，1840年建造，皇家海军第一艘铁质舰，281

Drainage，排水系统

 作为增加土壤肥力的措施，24

 排水系统的费用，25

Dred Scott decision (1857)，德雷德·斯科特裁决，624

Dresden，德累斯顿

 歌剧院，141

国家美术陈列馆, 141

1849年5月的骚动, 497

1850—1851年德国各邦君主会议, 410, 503

Dresden, Congress of, 德累斯顿会议, 538

Dreyse, Johann Nikolas, 德雷泽, 约翰·尼古拉, 304

Droste-Hülshoff, Baroness Annette Elizabeth von, 德罗斯特-徽尔斯霍夫男爵夫人, 安内特·伊丽莎白·冯, 诗人, 175—176

Drouyn de Lhuys, 德律安·德·吕, 法国全权大使

对缅希科夫条约草案的意见, 473

希望奥地利的干预, 481

对黑海的建议, 482

与克拉伦登讨论波兰问题, 483

离开内阁, 580

Du Concile général et de la paix religieuse (Maret),
《宗教会议与宗教和平》(马雷著), 94

*Du Devoir des catholiques dans la question de la liberté
d'enseignement* (Montalembert), 《论天主教徒在教育自由问题上的
职责》(蒙塔朗贝尔著), 79

Duc, J.-L., 迪克, 建筑师, 142

Duff, Alexander, 达夫, 亚历山大, 神父, 118

Dufour, Guillaume-Henri, 杜福尔, 纪尧姆-亨利, 将军, 瑞士
司令官, 223

Dufour-Feronce, A., 迪富尔-费隆瑟, 商人, 436

Dumas, Alexandre, père, 大仲马, 亚历山大, 小说家, 124,
164

Dumas, Jean Baptiste André, 杜马, 让·巴蒂斯特·安德烈, 化学家, 62

Du Mont, Joseph (*Kölnische Zeitung*), 杜蒙, 约瑟夫 (《科隆报》), 126

Dupanloup, Félix Antoine, 迪庞卢, 费利克斯·安托万, 奥尔良主教, 79, 80, 92, 93, 95

Dupont de l' Eure, Jacques-Charles, 杜邦·德·吕勒, 雅克-夏尔, 393

Dupuy de lôme, Stanislas, 迪皮伊·德·洛姆, 斯塔尼斯拉斯, 法国装备局长, 278—279

Durando, Giacomo, 杜兰多, 贾科莫, 意大利政治家, 与教皇的世俗财产, 558

Dürer, Albrecht, 丢勒, 阿尔布雷希特, 画家, 151

Durham, John, 1st earl of, 德拉姆, 约翰, 第一代伯爵, 政治家, 20, 260, 352, 353—354

Durham Report (1839), 德拉姆报告, 20, 193

Durham University, 德拉姆大学

由教长和牧师会所建立, 82

各学院向非英国圣公会教徒开放, 87

Duruy, Victor, 迪律伊, 维克托, 法国教育大臣, 115, 118, 456

Dutacq, 迪塔克, 新闻工作者, 124, 125

Dyes, aniline and vegetable, 染料, 苯胺和植物染料, 52, 64

Dysentery, 痢疾, 44

Earth, age of, 地球的年代, 68

East Anglia, 东英吉利亚, 排干沼泽地的水, 24

East India Company (British), 东印度公司 (英国)

结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8，356

东印度公司的文官，206

铁甲炮舰，281

邮件的运送，431，432

取代莫卧儿帝国的统治，685

在广州的贸易，687

茶叶的航运，687

结束在中国的贸易垄断权，688

East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东印度轮船航运公司，
432

East Limburg，东林堡，比利时丧失该地，221

Easter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东方轮船航运公司，432

Ecclesiastical Titles Acts，教士资格法，85

Ecclesiologist, The，《教会学者》，138

Ecole des Beaux Arts，美术学校，144

E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中央高等工艺制造
学校，113

Ecole Libre，Paris，教会学校，巴黎，78，79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高等师范学校，115

Ecole Polytechnique，综合工科学校，51，115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高等学科实验学校，115

Economists，Congress of (1858)，经济学家会议，507

Ecuador，厄瓜多尔，首都和港口之间的斗争，667—668

Education，教育，VI，104—120

日益要求“现代化”，6

不信奉国教的人集中在教育界，85
第一次政府批准办教育，85，110
成立教育部（1856），85
民办小学，86
增加国家的拨款，86
寄宿学校，86
在法国，51，78，79，104—118各处
在英国，85，86，104—119各处
在德国，104—116各处
在意大利，104，115
在俄国，104，106，119，363，378—379
在波兰，106
在瑞士，106，110，113，114
在比利时，107，112
在丹麦，107，110，119—120
在荷兰，107—108，109，112
在奥地利，109，111，114
在芬兰，110
在挪威，110
在瑞典，110
在匈牙利，111
在美国，116—117，119，120
在澳大利亚，117
在加拿大，117

在自治殖民地, 117

在印度, 117—118

在新西兰, 117

在南非, 117

在荷属东印度, 118

Edwards, Edward, 爱德华兹, 爱德华, 曼彻斯特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120

Eggs, import of, 鸡蛋的进口, 25

Egypt, 埃及

成为棉花输出国, 28, 638

易卜拉欣率领的军队包围阿克, 251

侵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 251, 428

瘟疫流行, 417

埃及的铁路, 424

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426

1827年舰队在纳瓦里诺被歼, 426

它的战略地位, 430

被英国占领, 430, 433

舰队驶往君士坦丁堡, 475

Eichendorff, Joseph Freiherr von, 艾兴多夫男爵, 约瑟夫·冯, 诗人, 175—176

Eichhorn, Johann Gotlifried, 艾希霍恩, 约翰·戈特弗里德, 神学家, 102

Eider, river, 艾德河, 219, 397

Eighteen Articles, Treaty of, 十八条条约, 221

Elbe, river, 易北河, 轮船在该河的行驶, 32

Elberfeld, 埃尔伯费尔德, 501

Elections, 选举, 竞选的费用, 335, 336

Electricity, 电, 1870年的电力耗费, 57

Electrolysis, 电解作用, 戴维发现电解作用, 63

Elgin, James Bruce, 额尔金, 詹姆斯·布鲁斯, 第八代伯爵, 加拿大总督, 354, 701, 704

Eliot, Charles W., 埃利奥特, 查尔斯·威廉, 哈佛大学校长, 117

Eliot, George (Mary Ann Evans), 艾略特, 乔治 (玛丽·安·埃文斯), 小说家, 159, 162

Eliot, T.S., 艾略特, 托马斯·斯特恩斯, 诗人, 178

Elliot, Captain, 义律, 海军上校, 商务监督, 689, 690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U.S.A.), 解放奴隶宣言 (美国), 628, 639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 作家, 120, 167, 179, 180, 617, 658

Emigration, 移民

欧洲向美洲的移民, 2

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 2, 382—384

禁止熟练工人移民, 28

来自英国的移民, 332

Emilia, 艾米利亚, 与皮埃蒙特联合, 572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帝国和联邦, 它的新概念, 20

Enclosures, 圈地

在英国, 24

在德国，24

Energy, 能量

能量概念的确切定义，59

能量的守恒，59

能量的转换，59

Enfantin, Barthélemy Prosper, 昂方坦, 巴泰勒米·普罗斯佩, 改革家, 434, 435—436

Enfield rifle, 恩菲尔德步枪, 304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社会主义者, 3, 55, 392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中的雇工, 333

Engines, marine, 轮机

格拉斯哥制造的轮机, 29

复式轮机, 36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Bagehot), 《英国宪法》(白哲特著), 193

englische Verfassungs-und Verwaltungsrecht, *Das* (Gneist), 《英国的宪法和行政法》(格奈斯特著), 193

Entail, law of, 限定继承权法, 智利的限定继承权法, 664, 665

Enzymes, 酶, 酶的发现, 65

Eötvös, Joseph, Baron, 艾厄特沃什, 约热什, 男爵, 匈牙利领导人, 545, 546, 549

Ere nouvelle, L' (Lacordaire), 《新时代报》(拉科代尔主编), 101

Erfurt, 爱尔福特, 议会在该地开会(1850年3月), 501

Ericsson, Captain John, 埃里克森船长, 约翰, “班长”号设计者, 278

Erie Canal, 伊利运河, 32, 612

Ernest of Saxe-Coburg, Prince, 萨克森-科堡的埃内斯特亲王, 507

Ernest Augustus, 埃内斯特·奥古斯特, 汉诺威国王

违反宪法, 106, 494

他的宪法, 189—190

Eskompte-Gesellschaft, 贴现公司, 535

Essay on Population (Malthus), 《人口论》(马尔萨斯著), 1

Esterházy, Count Maurice, 埃斯特哈齐伯爵, 莫里斯, 548

Esterházy, Prince, 埃斯泰尔哈吉公爵, 254

Estonia, 爱沙尼亚, 231

Ether, 乙醚, 由莫顿和韦尔斯使用, 72

Eugénie (de Montijo), 欧仁妮(德·蒙蒂茹), 法国皇后

与拿破仑三世结婚, 446

对政治决定的影响, 447, 582, 595, 598

虔诚的天主教徒, 447, 583

逃往英国, 466

Eupatoria, 欧帕托里亚, 479

Evolution, 进化论

英国对科学的贡献, 50

进化的机制和原理, 69

又见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Ewart, William, M.P., 尤尔特, 威廉, 国会议员, 致力于图书馆和博物馆事业, 120

“Ewart’ s Act” (1850), 尤尔特法, 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 120

Excellent H. M. S., 英国军舰“卓越号”, 283

Explosives, 炸药, 52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治外法权

根据南京条约, 692

在中国, 695, 696

在暹罗, 709

在日本, 711

Factory Acts, 工厂法, 44, 83, 341—342

Factroy inspectors, 工厂督察员

根据1833年法令所任命的, 44, 341

在普鲁士, 45

在法国, 45

Falkland Islands, 福克兰群岛, 被英国占领, 673, 683

Fallersleben, Hoffman von, 法勒斯勒本, 霍夫曼·冯, 音乐家, 495

Falloux, Frédéric, Comte de, 法卢伯爵, 弗雷德里克, 404

Falloux Law, 法卢法, 见*Loi Falloax*

Faraday, Michael, 法拉第, 迈克尔, 化学家, 51, 53, 56—57, 58, 71

Farias, Valentin Gómez, 法里亚斯, 巴伦廷·戈麦斯, 墨西哥自由主义者, 675

Farini, Luigi Carlo, 法里尼, 路易吉·卡洛, 教皇庇护九世的大臣, 558, 560, 572

Farm Produce, increase of, 农业生产的增加

在匈牙利, 23

在罗马尼亚, 23

在俄国南部, 23

Farming, 农场

1870年农场雇用的工人, 24

设备的改进, 25

西欧的高额管理费用, 25

Farragut, David, 法拉格特, 戴维, 美国海军司令, 328

Fathers and Children (Turgenev), 《父与子》(屠格涅夫著), 374

Favre, Jules, 法弗尔, 朱尔, 政治家, 反对与普鲁士进行战争, 455, 599

February Patent, 二月特许令, 545, 548

Fellenberg, Philipp Emanuel von, 费伦贝格, 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冯, 教师, 108

Ferdinand, emperor of Austria, 斐迪南, 奥地利皇帝

登上皇位(1835), 495

意志薄弱的人, 495

退位, 497, 531

Ferdinand II, of Napks, 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

他的统治, 554

想使意大利各国结成联盟, 556

被迫颁布宪法, 560

宪法的改变, 565

Ferdinand of Saxe-Coburg-Gotha, 萨克森-科堡-戈塔的斐迪南,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的丈夫, 587, 588

Ferdinand VII, 费迪南德七世, 西班牙国王, 他的去世, 253

Fermentation, 发酵, 65

Ferrara费拉拉, 402, 554, 560, 561

Ferry, Jules, 弗里, 米尔, 法国政治家, 455

Fertilisers, 肥料, 24, 65

Feudal system, 封建制度, 德意志各邦仍从属于封建制度, 15

Fichte, 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约翰·戈特利布, 哲学家, 宣传自给自足的经济, 227

Figaro, 《费加罗报》, 125

Fillmore, Millard, 菲尔莫尔, 米勒德, 美国第十三任总统, 203, 623

Finch, Frances Miles, 芬奇, 弗朗西斯·迈尔斯, 诗人, 630

Finland, 芬兰

《卡勒瓦拉》史诗, 231

大公国, 231

形式上的自由化, 376

拿破仑三世有意将芬兰归还瑞典, 483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一合众国银行, 606

“First International”, “第一国际”, 法国支部的成立, 455

First Manassas, battle of, 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 632

Fisheries, 渔业, 新英格兰, 610

Fitzgerald, Edward, 菲茨杰拉德, 爱德华, 诗人, 177

Fiume, 阜姆, 419—420, 422

Five Power Conference (1851—1852), 五强会议, 266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居斯塔夫, 作家, 148, 159, 161, 165, 170

Flax, 亚麻, 湿纺法, 28

Fleury, General, 弗勒里将军, 驻圣彼得堡大使, 585

Fliegende Blätter, 《飞叶》杂志, 131

Flogging, 鞭笞, 在美国海军中废除鞭笞, 298

Florence, 佛罗伦萨, 389, 556

Florida, 佛罗里达, 603, 606, 620, 627

Fly Sheet Controversy (1844—1848), 关于“宣传小册子”的争论, 87

Foley, J.H., 弗利, 雕塑家, 143

Follen, Karl, 福林, 卡尔, 革命家, 194

Foochow, treaty port, 福州, 通商口岸, 692

Foodstuffs, 食品, 进口税, 343

Foot rot, 腐蹄疫, 24

Footwear, 鞋类, 一种家庭工业, 42

Forbes, Archibald, 福布斯, 阿奇博尔德, 报导普法战争的战地记者, 122

Force Act, 强制法, 609—610

Forckenbeck, Max von, 福肯贝克, 马克斯·冯, 律师, 510, 521

Ford, John, 福特, 约翰, 戏剧家, 159

Forster's Education Act (1870), 福斯特教育法案, 86, 107, 111, 337

Forsyth, Rev. Alexander, 福赛思牧师, 亚历山大, 化学家, 303

Foscolo, Ugo, 福斯科洛, 乌戈, 作家, 被流放, 552

Fossils, 化石, 68

Foucault, Jean Bernard Léon, 傅科, 让·贝尔纳·莱昂, 物理学家和机械师, 58

Fould, banking family of, 富尔德银行家族, 41

Fould, Achille, 富尔德, 阿希尔, 政治家和金融家, 447

Foundries, 铸工厂, 342

Four Kings Alliance, 四王联盟, 410

Fourier, François Charles Marie, 傅立叶, 弗朗索瓦·夏尔·玛丽, 社会主义者, 109

France, 法国, XI V—X V, 442—467

贸易和商业: 农业, 26, 457—458; 钢铁, 29—30, 457; 煤, 31, 357; 嫉妒英国的繁荣, 254; 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 487

交通: 公路, 31, 451, 458; 铁路, 333; 海运, 452

建筑: 哥特式的恢复, 40; 铁用于建筑, 140; 新文艺复兴, 141—142; 美术式建筑, 142; 立体设计, 143

文学: 小说取代戏剧, 156; 探索性的特点, 158; 现实主义, 159—160; 维克多·雨果的天才, 164; 历史小说, 165; 福楼拜的现实主义, 170; 诗以“浪漫派”占优势, 171—173; 波德莱尔卓越工艺, 179

绘画和雕塑: 19世纪在欧洲占最重要的地位, 143; 艺术院的恢复, 144; 德拉克鲁瓦的作品, 145—147; 绘画和雕塑中的现实主义, 147; 巴比松派, 147; 库尔贝的作品, 148—149

宗教, 政教关系: 1830年革命的反教权性质, 77; 礼拜的自由, 77; 教皇拒绝接受自由天主教教义, 78; 恢复宗教团体, 78; 传教事业, 79; 强制推行罗马礼拜仪式, 79; 天主教教育自由, 79, 80; 法卢法的通过, 80; 《现代错误学说汇编》, 90—92; 公会议,

97—98；教皇指责与世俗权力有关的行为权利，97—98；教皇永无谬论，98；天主教自由派由于分裂而削弱，100

战争，陆军和海军：贝汉的工作，276—277，283，284；螺旋桨推进器，278—279；拉布鲁斯的工作，278，284；蒸汽战舰，279，285；装甲的使用，282；空心炮弹代替实心弹丸，283；征募常备军，299；子弹设计的改进，303—304；夏斯波步枪，305—306，593；拿破仑三世的私人军火库，307；机关枪，307，593；征兵制，312；约米尼的著作，313—316；铁路的利用，323

条约和同盟：给予英国以最惠国待遇，38；与奥地利达成谅解的努力，259；与俄国，491；与皮埃蒙特，538；与中国，693，703—704；与土耳其，487；与俄国的友好关系，487

与中国战争：马赖神甫案，696，701，709；联合英军进攻广州，696，701；噶罗男爵被任命为特使，701；占领大沽炮台，702—704；天津条约，703；重启对中国的战端，704；批准1858年条约，704；保卫上海，706；法国的政策将安南包括在内，709

意大利独立战争：观察部队，251；在手段和方法方面值得注意的发展，323；铁路的利用，323；约米尼建议的企图，323；马让塔战役，323，324，571；使用装来复线的火炮，323；索尔费里诺战役，325，571；派往契维塔韦基亚的军队，408；接受尼斯和萨伏伊，463；天主教教会势力号召恢复教皇的世俗统治权，565；罗马共和国落入法军之手，565；军队继续留在罗马，565；普隆比埃密约，571；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572；承认不干涉意大利中部的原则，572；撤退罗马驻军，572

普法战争：争论的根源，16；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17；宣战，98，598—599；骑兵在色当被粉碎，305；普鲁士炮兵的战斗，306；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306；机关枪，307；战略格局，325—327；动员，597；请求意大利援助，599；和约的条件，600

在非洲：征服阿尔及尔，7，424，461；把危险分子押送到阿尔及尔，445；在塞内加尔和索马里兰的基地，461

在交趾支那，7，709

在叙利亚，430

在印度支那，461

在墨西哥，464，580，641

在朝鲜，709

与克里米亚战争：战争非法国所愿，469；法国作为圣地的拉丁人的保护者的地位，469；拉瓦莱特的到达，469；海军在特里波利，470；拉瓦莱特休假，470；舰队的调动，472—473，474，476—477；拿破仑在维也纳照会上的作用，475；埃及军队的到达，475；给土耳其的贷款，477；宣战，478；派遣军队到达达尼尔海峡，478；拿破仑访问温泽，481；佩利西埃代替康罗贝尔，482；商讨芬兰和波兰问题，483；与瑞典签署条约，484；和约的条件，485；伤亡人数，485；损失和耗费，486—487；和平会议，487—488

与墨西哥战争：1861年的伦敦会议，677；军队在维拉克鲁斯登陆，677；马克西米连在法国支持下僭取王位，677；马克西米连被抛弃，法军撤退，678；马克西米连被处决，678

Francia,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弗朗西亚，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巴拉圭总统，672

Francis IV, duke of Modena, 弗兰西斯四世，摩德纳公爵

希望革命，553

逃离摩德纳，553

处死门诺蒂，554

他的统治，554

Francis Ferdinand, Archduke, 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计划恢复联邦制，210

Francis Joseph, emperor of Austria, 弗兰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

他的愚钝，209

与沙皇尼古拉的会晤，252

担任军队最高司令的职务，323

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国王会晤， 502

建议召开各邦君主会议， 513

访问普鲁士的威廉， 514

相信王权神授， 532

大臣只对他个人负责， 532

前后矛盾和容易感情冲动， 533

与沙皇和普鲁士摄政在佩斯会谈， 548

1848年法令的合法性， 548

加冕为匈牙利国王， 550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参见France条目下

Franco-Russian secret treaty (1859), 法俄密约, 271

Frankfurt, 法兰克福, 395

预备议会在该地举行会议, 398

工人阶级代表大会在该地举行, 400

各邦君主会议 (1863), 513, 514

法兰克福自由市被普鲁士兼并, 520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参加反对丹麦的十字军行动, 187, 198

主张仿效美国的联邦制, 195

法兰克福宪法, 为魏玛共和国所借鉴, 196

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219

投票赞成波兰独立, 228

推选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皇帝, 264, 499—500

议会的组成, 405

被驱散，500

Frankfurt, Treaty of (1871)，法兰克福条约，600

Frankfurter Zeitung，《法兰克福报》，126

Frankland, Edward, F.R.S.，弗兰克兰，爱德华，皇家学会会员，化学家，62

Frantz, Constantin，弗兰茨，康斯坦丁，作家，211

Franzoni, Luigi，弗兰佐尼，路易吉，都灵大主教，567

Frederick VII，弗雷德里克七世，丹麦国王，废除专制统治，219

Frederick Charles，弗里德里希·查理，普鲁士亲王，325

Frederick William III，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他的优柔寡断，247

Frederick William IV，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

拒绝接受新建立的小德意志联邦的领导，195

他的性格，209，485，495—496，508

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会谈，262

威胁要退位，262

被选为帝国皇帝，264，407，500

被迫作出政治让步，397

解散制宪议会，405

成为普鲁士国王（1840），494

关心牛津运动，495

重建科隆大教堂，495

梅特涅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496

对他的政策的失望，496

被内战的思想所吓倒，502

去世, 510

Fredericksburg, battle of,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 632

Freemasonry in Brazil, 巴西的共济会, 663

French Organic Law of 1842 (railways), 1842年的法国基本法(铁路), 33

French Society for Elementary Instruction, 法国初等教育学会, 110

Freytag, Gustav, 弗赖塔格, 古斯塔夫, 小说家, 166

Friedrich, Johann, 弗里德里希, 约翰, 神学教授, 被革出教门, 100

Frith, William P., 弗里思, 威廉, 画家, 150

Froebel,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福禄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奥古斯特, 教育家

普鲁士取缔他的幼儿园, 106

受裴斯泰洛齐的影响, 108

Froebel, Julius, 弗勒贝尔, 尤利乌斯, 政治作家, 504, 512

Fuad Pasha, 法德帕夏, 土耳其外交大臣

被怀疑同情法国, 470

被迫辞职, 472

Fugitive Slave Act, 逃亡奴隶法, 625

Fulton, Robert, 富尔敦, 罗伯特, 工程师, 277

“Fundamental Laws” (1867), “基本法”, 524

Fünem, 菲南, 丹麦岛屿, 1848年瑞典派兵保护该岛, 220

Furtrade in Oregon, 俄勒冈的毛皮贸易, 521

Fuseli, Henry, 富塞利, 亨利, 画家, 135

Gablenz, Anton von, 加布伦茨, 安东·冯, 普鲁士将军, 518

261

Gaeta, 加埃塔, 408, 421, 564

Gagern, Max von, 加格恩, 马克斯·冯, 普鲁士自由主义者, 261

Gainsborough, Thomas, 庚斯博罗, 托马斯, 画家, 135

Gaj, Ljudevit, 加伊, 路德维特, 语言学家, 238

Galicia, 加利西亚, 234—236, 406, 478

 解放农民, 414, 523

 波兰的统治, 524

 分成两个王室领地, 526

 特殊地位, 546

Gallait, Louis, 加莱, 路易, 画家, 151

Gallatin, Albert, 加勒廷, 艾伯特, 美国政治家, 203

Gallipoli, 加利波利, 478

Gambetta, Léon Michel, 甘必大, 莱昂·米歇尔, 法国政治家

 反对教权主义, 76

 博丹审判案, 125

 反对帝国, 455

 赞成与普鲁士交战, 599

Gangrene, prevalence of, 坏疽病的流行, 73

Garibaldi, Giuseppe, 加里波第, 朱塞佩

 远征西西里, 88

 向罗马进军, 201, 433, 576

 被缺席判处死刑, 555

 表示要与查理·阿尔贝特合作, 563

 被逐出皮埃蒙特, 573

夺取巴勒莫和那不勒斯, 573—574
与加富尔的争吵, 575
阿斯普罗蒙特, 576
在曼塔纳战败, 583
领导对教皇领地的袭击, 583
Garnier, Charles, 加尼埃, 夏尔, 建筑师, 142
Garnier-Pagès, Étienne, 加尼埃-帕热, 艾蒂安, 政治家, 399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加里森, 威廉·劳埃德, 新闻工作者和废奴主义者, 130, 618, 619
Gärtner, Friedrich von, 格特纳, 弗里德里希·冯, 建筑师, 140, 141
Gases, kinetic theory of, 气体运动的理论, 56
Gaskell, Mary (Mrs), 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 小说家, 11, 160
Gas-light industry, 煤气灯工业, 52
Gastein, 加施泰因, 弗兰茨·约瑟夫和威廉一世在此会晤, 514
Gastein, Convention of, 加施泰因协议, 516—517
Gasworks, 煤气厂, 51, 65
Gatling, Richard, 加特林, 理查德, 发明家, 306
 火炮, 306—307
Gau, Franz Christian, 高, 弗朗茨·克里斯蒂安, 建筑师, 140
Gauguin, Paul, 高庚, 保罗, 画家, 146
Gauss, Karl Friedrich, 高斯, 卡尔·弗里德里希, 数学家, 56, 114
Gautier, Théophile, 戈蒂埃, 泰奥菲尔, 法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125, 146, 173
Gavarni, Paul, 加瓦尔尼, 保罗, 画家和平版印刷工, 147

“General Assembly’ s College”，“独立教会大会学院”，加尔各答，118

General Council (Vatican Council)，天主教公会议（梵蒂冈公会议）

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94

会议的召开，94—95

会议的进程，96—99

不良的政治后果，99

Genoa，热那亚，553，560，562，570

航运和人口，419—420，431

海军基地，421

东方贸易，425，432

贸易转移到的里雅斯特，55

港口设施，556

遭炮轰，566

Genoa，duke of，热那亚公爵，587，588

Geology，地质学，确定地球的年代，68

Geometries，几何学，建立在非欧几里得原理基础上的几何学，
56

George，乔治，丹麦亲王，继承希腊王位，426

Georgia (Transcaucasia)，格鲁吉亚（外高加索），372

Georgia (U.S.A.)，佐治亚（美国）

北方联军穿越该州，329

印第安人的迁移，606

征兵，653

Gerbet, Olympe-Philippe, 热尔贝, 奥林普-菲利普, 佩皮尼昂主教, 77, 89

Gerhardt, Karl Friedrich, 热拉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 化学家, 62

Géricault, Théodore, 热里科, 泰奥多尔, 画家, 144, 146

Geringer, Karl Gabriel, Baron, 格林格尔, 卡尔·加布里尔, 男爵, 奥地利民政专员, 528

Gerlach, Leopold von, 格拉赫, 利奥波德·冯, 将军, 499, 504, 511

Gerlach, Ludwig von, 格拉赫, 路德维希·冯, 政治家, 499, 501, 504, 511, 517

Germany, 德意志, X V, X VI, X VIII, 493—521, 577—602

贸易与商业: 铁路, 4, 41, 308, 494, 505; 主要是制造业国家, 4, 51; 第一个合作银行, 23; 地主作为农业生产者, 23; 圈地的扩大, 24; 钾碱的矿藏, 24; 化肥, 24, 65; 土地信贷银行, 25; 关税同盟, 26, 37, 228, 494, 501, 503, 505; 谷物生产, 26; 使用纺纱机, 28; 铁的生产, 29—30; 煤的生产, 31, 505; 银行和银行业, 41; 童工, 45; 科学领域, 50—51, 57—60, 62, 65—67; 需要海上商业、渔业和殖民地, 228; 农业占主导地位, 494; 人口, 494, 505; 合作运动, 507

宪政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发展, 17, 198, 226—229; “激进派”联盟, 46; 普鲁士在宪政发展中的支配地位, 100, 185, 494, 499; 各小邦的宪法, 189; 美国对1849年和1867年宪法的影响, 195;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199, 210, 602; 恢复专制制度, 204; 奥尔米茨战役失败之辱, 204, 210, 410, 412, 502, 503, 508; 拉萨尔的“工人纲领”, 205; 民主失败的原因, 208; 1867年和1871年的宪法, 210, 211, 520, 578—579; 1815年的邦联, 210, 226, 493, 518; 宪政改革问题, 496—497, 502—503, 507, 512—514, 517; 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 227, 512; 1848年的革命, 389—415各处, 497; 1848年3月柏林起义, 397, 497—49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帝位, 407, 499; 三王同盟, 409—410; 所有各邦这时均已实行宪政, 412;

中产阶级参加政府和行政机构，494；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承担处理德意志事务的责任，500；法国作为宿敌，227，506

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100，107

教育：教育与国家和教会的关系，105—107；福禄培尔的工作，108；教育的高标准，109；文科中学，111；技术学校和大学，111，113—114

新闻出版：发展，125—127，131；新闻出版自由，125—126，397；相对的地位，131；沃尔夫通讯社，132

建筑，139—140

艺术，143，150

文学：浪漫主义作家，158，174；“教育小说”，161；相对说来不成熟，166—167；诗歌，174—176

战争：撞针枪，304—305；骑兵已经过时，306；后膛装填的火炮，306；铁路的利用，308—309；电报，310；征兵，312；罗恩的改革，509，515；基尔成为海军基地，516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1864年的丹麦战争，211，219，220，311，514—516

奥普战争（1866），16，305，308，310，324—325，517—519，578

普法战争（1870），见France条目下

又见各国条目下

Gettysburg, battle of, 葛底斯堡战役，328，632

Giacomo, Fra, 贾科莫，教士，575

Gibbs, Josiah Willard, 吉布斯，乔赛亚·威拉德，美国科学家，51

Gibraltar, 直布罗陀

航运和人口，419—420

走私活动，420

英国海军部从法尔默思开往该地的班轮，431

1840年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433

Gide, André, 纪德, 安德烈, 作家, 181

Giessen, 吉森, 李比希的实验室, 50

Giessener Schwarzen, 吉森黑衣社, 194

Gioberti, Vincenzo, 焦贝蒂, 温琴佐

与新归尔甫党人, 199—200

支持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201

赞成联盟的解决办法, 225

被流放, 555

不信任教皇政治, 558

与耶稣会士, 565

与教皇的世俗权力, 566

Giovine Italia (Mazzini), 青年意大利 (马志尼), 555; 见
“Young Italy”

Girardin, Émile de, 吉拉尔丹, 埃米尔·德, 巴黎《新闻报》, 121, 124

Girardin, Saint-Marc, 吉拉尔丹, 圣马克, 《辩论报》撰稿人, 123

Girtin, Thomas, 格廷, 托马斯, 画家, 135

Giusti, Giuseppe, 朱斯蒂, 朱塞佩, 诗人, 225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降低进口税, 38

反对教士资格法, 85

1871年大学考试法, 87

关心天主教公会议, 95

与废除爱尔兰圣公会国教地位, 100, 101, 218

反对那不勒斯监狱和保加利亚暴行的运动, 202

辞职, 481

1854年预算, 486

与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 600

Glasgow, 格拉斯哥, 29, 43

Glass-works, 玻璃厂, 342

Globe, Le, 《环球报》, 130

Glycerine, 甘油, 66

Glycogen, 糖原, 66

Gneisenau, Neithardt Count, 格奈泽瑙, 奈特哈特, 伯爵, 普鲁士元帅和改革家, 310

Gneist, Rudolph von, 格奈斯特, 鲁道夫·冯, 作家, 193, 207

Goa, 果阿, 688

Godkin, E. L., 戈德金, 埃德温·劳伦斯, 纽约报纸主编, 《民族》周刊创办人, 130—131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诗人和哲学家, 139, 161, 172, 176

Gogh, Vicent van, 梵高, 文森特, 画家, 135

Gogol, Nikolai, 果戈理, 尼古拉, 小说家和戏剧家, 165, 182, 368

Goito, battle of, 戈伊托战役, 398

Gold, 黄金

供应的新来源, 505

在澳大利亚, 355, 458

在加利福尼亚, 458, 680

Golovnin, Alexander V., 戈洛夫宁, 亚历山大·瓦·, 教育大臣, 379

Goltz, Robert, Graf von der, 戈尔茨伯爵, 罗伯特·冯·德, 外交家, 582

Goluchowski, Count Agenor, 戈武霍夫斯基伯爵, 阿格诺尔, 奥地利政治家, 539, 543, 544

Gorehakov, Alexander, Prince, 戈尔恰科夫亲王, 亚历山大, 俄国政治家

接替涅谢尔罗迭, 16, 269

国务会议主席, 360

首相, 387

征服基瓦, 388

维也纳谈判, 479—481

与莫尔尼公爵接近, 484

黑海问题上的让步, 492

Gordon, Charles, 戈登, 查尔斯, 陆军少校, 706

Görgey, Arthur, 格尔盖伊, 阿图尔, 匈牙利将军, 528

Görres, Johann Josef von, 格雷斯, 约翰·约瑟夫·冯, 民族主义作家, 78, 227

Goschen, George Joachim, 戈申, 乔治·乔基姆, 海军大臣, 300—301

Gotthelf, Jeremias, 戈特赫尔夫, 耶雷米阿斯, 166, 见 Bitzius, Albert

Göttingen, 格廷根, 106, 493, 494

“Government Commission for Workmen”，“政府劳动委员会”，393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3)，印度政府法，337

Graham, Sir James, 格雷厄姆爵士，詹姆斯，海军大臣，278，295，299，300

Grain, 谷物

欧洲的生产，23，26

美国的生产，65，613

Gramont, Alfred, due de, 格拉蒙公爵，阿尔弗雷德，法国外交大臣，583，586，590—591，595，599

Granada, New, 新格拉纳达，与美国签订条约，680

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346—347

Grant, Ulysses, 格兰特，尤利塞斯，将军，美国司令，316，328—329，330，630，657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 Gower, 2nd earl, 格兰维尔，乔治·利文森·高尔，第二代伯爵，589，599

Grassman, Hermann Gunther, 格拉斯曼，赫尔曼·贡特尔，数学家，56

Gravelotte-Saint Privat, battle of, 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306，326

Gravitation, doctrine of universal, 万有引力学说，49

Gray, Sir John, 格雷爵士，约翰，100

Great Britain, 英国，XI—XII，331—356

贸易与工业：工厂制度的开始，4；家庭工业，4，42；进口家畜，25；谷物生产，26，683；纺织品，27—28，333，342，638；谷物法，27，38，122，334，342；铁，29，333；钢，30，333，342；煤和采煤业，30—31，279，333，342；运河，30；公路，31；铁路，

32—33, 332; 航运, 36; 邮政, 36, 332; 电报, 36—37; 航海法, 38, 334, 351; 所得税, 38; 银行和银行业, 39—41, 334—335; 雇用童工, 44, 83, 341—342; 工会, 45—46, 346—347; 移民, 332, 353; 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 334; 海外投资, 334, 350; 贸易差额, 334; 工厂督察, 341; 工厂法, 341—342, 413; 特别税法, 345; 对海外贸易的依赖, 353

农业, 24—25, 332, 342

外交联盟和事件: 给法国“最优惠国”待遇的条件, 38; 比利时的独立, 214, 249, 461; 将爱奥尼亚群岛让与希腊, 242, 246; 不再干预大陆问题, 269—270, 272; 地中海政策, 431, 433; 承认法兰西第二帝国, 462; 与土耳其结盟, 468; 占领福克兰群岛, 673; 鲁阿丹和莫斯科托保护地, 679

宗教、教会与国家: 撤销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 76; 解除天主教的各种禁令, 77, 100; 牛津运动, 81—83, 100; 传教事业, 83; 苏格兰长老会, 83—84; 罗马天主教在英国, 84—85, 87; 不信奉国教者, 85—87; 爱尔兰长老会, 100—101; 基督教社会主义, 101

教育: 大学, 87, 116, 119, 206; 国家的作用, 106; 兰开斯特制度, 110; 国家的拨款, 110—111; 1870年福斯特教育法案, 111, 337; 公学制度, 113; 小教师制度, 114; 技工学校, 119, 120; 图书馆, 120

新闻出版: 家族所有, 121; 诽谤罪法的改变, 121; 出版税和印花税, 121—122; 报纸数量的增加, 123; 插图报刊的增多, 131; 通讯社, 132—133

建筑, 134, 136—143, 154—155

雕塑, 143

绘画, 150—155

文学: 一般的特征, 156—160; 小说家, 162—163, 165—168; 诗, 172, 174, 176—178; 戏剧, 181—182; 又见各作家条

行政机构和改革: 公民权, 185, 192, 204, 336; 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选区, 185, 192, 336; 宪章运动, 193, 202; 文官, 206,

337—338；地方政府委员会（1871），207；警察，337；济贫法的执行，337；改革法（1832），189，192，289，334—336，338，345；（1867），206，211，236；市政改革法（1835），207，334；（1841），337；人民代表选举法（1867），334

战争：海战和陆战：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274，282—283；武装力量，275—276，280，284—287；恩赐官职制和提升制度，289—290，292；新兵的补充，291—292，293—295；预备役，296，299；骑兵，302，305；火器的发展，302—306；电报的使用，309—310；军队的改编，356，486

与中国的战争：太平天国起义，8，384，695—696，697，698—699，700，705，706；1856—1860年的各次战役，701—704

与克里米亚战争：复杂的外交，16；新式武器的威力，16，306；显示出军事行动缺乏效率，122，241，322，481，486；对势力均衡的影响，268—269；医疗服务，323；导致战争的事件，462，469；联军舰队的活动，472，474—477；帕默斯顿的态度，474—475；召回大使并宣战，478；陆战，478—484；和平的条件，485；伤亡人数，485；损失和耗费，486；和平会议，487—488

与墨西哥战争（1861），677

Great Exhibition（1851），大博览会，6，25，52，53，203

Great Lakes, U. S. A.，大湖区（美国），32

Greece，希腊，391

作为一个王国的出现，16

受英国干预，214

由于独立战争的影响而重新获得港口，422

葡萄干的收获，422

议会制宪法（1843），426

奥托国王为丹麦的乔治亲王所继任，426

收回伊奥尼亚群岛，426

奥托国王的统治, 490

Greeley, Horace (of *New York Tribune*), 格里利, 霍勒斯 (《纽约论坛报》的), 120, 129—130, 188, 206

Gregory XVI (Mauro Capellari), Pope, 格列高利十六世 (毛罗·卡佩拉里), 教皇, 78, 554, 557

Grey, Charles Grey, 2nd earl, 格雷, 查尔斯·格雷, 第二代伯爵, 248

Greytown, 格雷敦, 680

Grillparzer, Franz, 格里尔帕策, 弗朗茨, 戏剧家, 182, 237

Gros, Baron, 噶罗男爵, 法国派往中国的特使, 701

Grundtvig, 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格伦特维, 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弗林, 丹麦主教, 107, 114, 119

Guadalupe Hidalgo, Treaty of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622, 675

Guardians, Board of, 济贫委员会, 337

Guatemala, 危地马拉, 678, 679

Guayaquil, 瓜亚基尔, 668

Guéranger, Dom, 盖朗热长老, 索莱斯姆隐修院院长, 79

Guerazzi, Francesco Domenico, 圭拉齐, 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 408

Guéronnière, de la, 盖隆尼埃尔, 德拉, 法国新闻工作者, 125

Guibert, 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吉贝尔伯爵, 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 18世纪军事思想家, 314

Guizot, François, 基佐, 弗朗索瓦, 法国政治家, 105, 115, 190, 259, 389, 392, 452

Gun-cotton, 火药棉, 64

Gutta-percha, 杜仲胶, 53

Gutzkow, Karl Ferdinand, 吉茨科, 卡尔·费迪南德, 小说家, 166

Guyot, Raymond, 居约, 雷蒙, 254

Gwatkin, H.M., 格沃特金, 基督教历史学家, 81

Gyulai, Count Franz, 吉乌莱伯爵, 弗兰茨, 奥地利将军, 539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

 在爱尔兰中止, 217

 在美国中止, 647, 653

Haiti, 海地, 682

Hakodate, 函馆, 日本贸易港口, 711

Halleck, Henry Wager, 哈勒克, 亨利·韦杰, 将军, 316, 657

Haller, Karl Ludwig von, 哈勒尔, 卡尔·路德维希·冯, 作家, 496

Hals, Frans, 哈尔斯, 弗朗斯, 画家, 135

Ham, 火腿, 英国输入市场, 26

Hambach, 哈姆巴赫, “哈姆巴赫节”, (1832), 493

Hamburg, 汉堡, 4, 26, 400, 494

Hamburg-Berlin Railway, 汉堡—柏林铁路, 308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 美国政治家, 603, 605, 606

Hamilton, Hugh, 汉密尔顿, 休, 自然哲学教授, 56

Hamilton, William, 汉密尔顿, 威廉, 画家, 134

Hammond, James H., 哈蒙德, 詹姆斯·亨利, 废奴主义者, 617

Handbooks for Travellers (John Murray), 《旅游者手册》
(约翰·默里著), 418, 419

Hanover, 汉诺威

1833年宪法, 189

1840年宪法, 190

1848年革命, 397

在税收同盟内, 494

与普鲁士和萨克森成立三王国联盟, 409, 501

退出普鲁士联盟, 410, 501

加入关税同盟, 503

在朗根萨尔察战役中败北, 519

并入普鲁士, 520

为德意志特务机关提供资金, 579

Hansemann, David, 汉泽曼, 达维德, 工业家, 494, 496

Hardenberg, Karl August von, prince, 哈登贝格, 卡尔·奥古斯特·冯, 亲王, 391

Hardy, Sir Thomas Master man, 哈代爵士, 托马斯·马斯特曼, 海军上将, 278

Harper' s Ferry, raid on, 袭击哈珀斯费里, 625

Harris, Townsend, 哈里斯, 汤森, 美国驻日本下田领事, 712

Harris Treaty (1858), 哈里斯条约, 712

Harrison, William Henry, 哈里森, 威廉·亨利, 美国第九任总统, 621

Harvesters, 收割机, 25

Harz Mountains, 哈尔茨山脉(德国), 24

Hausmann, Baron, 奥斯曼男爵, 塞纳河地区行政长官, 142, 460

Havas Agency, 哈瓦斯通讯社, 5, 132

Havliček, Karel, 哈夫利切克, 卡列尔, 民族主义者, 238, 534

Hawthorne, Nathaniel, 霍桑, 纳撒尼尔, 小说家, 167

Haxthausen, August, Baron von, 哈克斯陶森, 奥古斯特·冯, 男爵, 18, 357n

Hayman, Francis, 海曼, 弗朗西斯, 画家, 134

Haynald, Ludwig, 海纳尔德, 路德维希, 红衣主教和考洛齐大主教, 100

Haynau, Baron Julius Jacob von, 海瑙男爵, 尤利乌斯·雅各布·冯, 奥地利总司令, 528

Hayne, Robert, Y., 海恩, 罗伯特·扬, 美国参议员, 615

Health, Board of, 卫生委员会, 337

Heat, physics of, 热物理学, 59

Hebbel, Friedrich, 黑贝尔, 弗里德里希, 戏剧家, 182, 183, 184

Hebrew faith of polytheist origin, 希伯来人的信仰来源于多神教, 102

Hefele, C.J., 黑费尔, 罗马教会历史学家, 94, 100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哲学家, 55, 183, 184, 227, 495

Heidelberg, 海德尔堡, 395

Heine, Heinrich, 海涅, 海因里希, 诗人, 17, 126, 174—175, 494

Held, F.W.A. (*Die Lokomotive*), 黑尔德 (《火车头》), 125

Helmholtz, Hermann von, 亥姆霍兹, 赫尔曼·冯, 生理学家, 59, 60, 66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爱尔维修, 克洛德·阿德里安, 哲学家, 53

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赫尔巴特, 约翰·弗里德里希, 哲学家, 108

Herder, Johann Gotlifried, 赫尔德, 约翰·戈特弗里德, 哲学家, 216, 226

Hérédia, José-Maria de, 埃雷迪亚, 何塞-玛丽亚·德, 诗人, 173

Hertz, Heinrich, 赫兹, 海因里希, 物理学家, 58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472, 474, 479, 537n

Herzen, Alexander, 赫尔岑, 亚历山大, 政治作家, 10, 13, 128, 216, 245

Hesse-Darmstadt, 黑森-达姆施塔特, 395, 520

Hesse-Kassel, 黑森-卡塞尔, 395

1850年革命, 410

普鲁士撤离, 410

拉多维茨的联盟计划, 501

选帝侯寻求联邦议会的帮助, 502

选帝侯被囚, 519

被普鲁士兼并, 520

Hetherington, Henry (*Poor Man's Guardian*), 赫瑟林顿, 亨利 (《穷人卫报》主编), 121—122

Heydt, August von der, 海特, 奥古斯特·冯·德, 普鲁士财政大臣, 518

Hierta, Lars (*Aftonbladet*), 希尔塔, 拉斯 (《晚报》主编), 127

Hill, Sir Rowland, 希尔爵士, 罗兰, 332

Hirsch, Max, 希尔施, 马克斯, 德国工会活动家, 46

Histoire des Girondins (Lamartine), 《吉伦特派的历史》
(拉马廷著), 216

History of Israel (Wellhausen), 《以色列史》(韦尔豪森
著), 102

History of the Jews (Milman), 《犹太史》(米尔曼著),
102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Edwold), 《以色列人民
史》(埃德沃尔德著), 102

Hoare, banking firm of, 霍尔银行, 40

Hoe, Richard, 霍, 理查德, 发明家, 131, 132

Hoff, van t', Jacobus Hendrikus, 范托夫, 雅各布·亨利
克, 化学家, 63

Hofmann, August Wilhelm von, 霍夫曼, 奥古斯特·威廉·冯,
化学家, 52, 62

Hoffmann, E. T. A., 霍夫曼, 作家和音乐家, 179

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Chlodwig, Prince von, 霍恩洛
厄-席灵斯菲斯特亲王, 克洛德维希·冯, 228

Hohenschwangau, 霍恩施旺高城堡, 602

Hohenzollern, Leopold, prince of, 霍亨索伦亲王, 利奥波德
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 587—592

退出, 594—596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Prince Karl Anton of, 霍亨索伦-
西格玛林根的卡尔·安东亲王, 508, 587, 593—594

Holland, 荷兰

排出泥炭沼泽的水, 24

谷物净进口国, 26

公民权, 192

国王的逝世, 203

十八条约, 220—221

派军队进入比利时, 249

将安特卫普割给比利时, 250

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 686

Holnstein, Count, 霍恩施泰因伯爵, 巴伐利亚宫廷内侍, 602

Homestead Act (1862), 宅地法, 642

Hoduras, 洪都拉斯, 678—679, 681

Hong Kong, 香港, 432, 689, 690, 692

H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行会, 689

Hooker, Sir Joseph Dalton, M.D., 胡克爵士, 约瑟夫·多尔顿, 医学博士, 博物学家, 71

Hope, banking family of, 霍普银行家族, 41

Hope, James, 贺布, 詹姆斯, 英国水师提督, 703

Hopes of Italy (Balbo), 《意大利的希望》(巴尔博著), 200, 431

Hortense (de Beauharnais), 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 荷兰王后, 442—443, 447

Hospitals, 医院, 72

Hottinguer, banking family of, 霍廷格尔银行家族, 41

Housing, 住房, 43—44

Hoverbeck, Leopold von, 霍韦尔贝克, 利奥波德·冯, 德意志进步党领袖, 510

Howe-Singer sewing machine, 豪一胜家缝纫机, 642

Hsien Feng, 咸丰, 中国皇帝, 698, 704—705

Hübner, Joseph Alexander von, Baron, 许布纳男爵, 约瑟夫·亚历山大·冯, 奥地利代理人, 263

Hudson Bay Company, 赫德森湾公司, 355

Hughes, John, 休斯, 约翰,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118

Hugo, Victor Marie, 雨果, 维克托·玛丽, 法国诗人和戏剧家, 13, 80, 144, 164, 165, 174, 181, 190

Humboldt, Alexander von, Baron, 洪堡, 亚历山大·冯, 男爵, 436

Hung Hsiu-ch' tuan (Tien Wang), 洪秀全(天王), 太平天国领袖, 697—698, 706

Hungary, 匈牙利

大地主作为农业生产者, 23

马扎尔人禁止实行联邦制, 209

奥地利的独立, 264, 407, 528

反党联盟在1847年选举中获胜, 389

1848—1849年的革命, 390, 402—403, 406, 408

为废除封建权利给地主的赔偿, 396

匈牙利法典, 396

科苏特任摄政, 528

效率低的行政管理, 537

偷漏税, 537—538, 547

解放农民, 542

马扎尔语恢复成为官方语言, 542

重新设立总理府, 542

将举行选举和召集国会, 543

四月法令的合法性, 544

消极反抗, 544, 547

立宪君主制, 550

Hunt, Holman, 亨特, 霍尔曼, 画家, 151, 153

Hunter, Robert T., 亨特, 罗伯特, 律师, 政治家, 195

Huskisson, William, 赫斯基森, 威廉, 政治家, 38

Hutton, R.H. (*Spectator*), 赫顿, (《旁观者》周刊主编),
123

Huxley, Thomas Henry,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博物学家,
71, 112

Hydrodynamics, 流体动力学, 51

Hyères, 耶尔, 421

Ibrahim, 易卜拉欣, 埃及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之子, 251, 428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克, 戏剧家, 184

Ignatyev, Count Nicholas Pavlovitch,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234, 703, 704

Illinois, 伊利诺伊, 615, 624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伦敦新闻画报》, 131

Illustration, L', 《画报》, 131

Illustrierte Zeitung, 《画报》, 131

Illustrious, H.M.S., 《卓越》号, 英国军舰, 292

Immaculate Conception, doctrine of, 圣灵怀胎说, 85

Immerman, Karl Lebrecht, 伊默尔曼, 卡尔·勒布雷希特, 小说家, 166—167

Imperial, the Prince, 皇太子, 446, 466

Impressment Act, 强征服役法, 651

India, 印度

建立在总督领导下的统治， 8

实行西方式的教育制度， 8， 117—118

棉花出口， 28， 638

铁路， 34， 350

传教活动， 79

报纸， 131

通往印度的陆上路线， 255

文官， 337， 352

电报通信， 350

刑法， 352

国王直接统治， 356

邮政， 431—432

英国东印度公司， 685

鸦片贸易， 688

Indian Mutiny， 印度兵变， 造成银行业危机， 42

Indiana， 印第安纳， 194， 615

Indigo， 靛蓝， 64， 610

Indo-China， 印度支那

 传教活动， 79

 法国的渗入， 461， 709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686

Induction， electrical， 电感应现象， 56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s （ 1852 and 1862）， 工业和节俭性协会法， 348

Industries， domestic， 家庭工业， 42， 341

Ingres, Jean A.-D., 安格尔,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 画家, 144, 145

Inspectorate of Maritime Customs (China), 海关临督 (中国), 701

Institut de France, 法兰西研究院, 144

Institutions Liturgiques (Guéranger), 《礼仪制度》(盖朗热著), 79

Instruction pastorale sur diverses erreurs du temps présent, 《关于当代各种错误学说给教区的指示》, 89

Instrument makers, scientific, 科学仪器制造商, 53

Internal Revenue Act (U.S.A.), 国内税收法 (美国), 644

International Postal Union (1874), 国际邮政联盟, 它的成立, 36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 7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Movement, 国际工人运动, 205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英国割让给希腊, 242, 426

航运, 419, 422

Iowa, 衣阿华, 189, 203

Ireland, 爱尔兰

缺少工业, 2—3

移民出境, 3, 218, 344

马铃薯枯萎病, 24

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事务, 100, 217

政教分离, 100, 161

“菜园革命”, 202, 217

民族主义，217—218，391

合并法（1801），217

中止实施人身保护法，217

人口的减少，331

独立纲领，389

Irgiz，伊尔吉兹，387

Irish Confederation，爱尔兰联盟，217

Irish Republician Brotherhood（Fenians），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芬尼党人），218

Irkutsk，伊尔库次克，383

Irving，Washington，欧文，华盛顿，小说家，167

Iron，铁

铁的生产，3，29，30，43，333

用于造船，4

铸铁的锻造，29

矿藏，29

价格，29

由于使用焦炭而使产量增加，30

匹兹堡的钢铁工业，31

雇佣工人，43

用于建筑，136，140，142

铁的出口，333

Isabella II，伊莎贝拉二世，西班牙女王，586

Ismail，易斯马仪，埃及总督，440

Isomers，同分异构体，光学方面的同分异构体，63

Italia del Popolo (Mazzini), 《人民的意大利》(马志尼主编), 571

Italy, 意大利, XVII, 552—576

宗教, 教会与国家: 加富尔的箴言, 76; 教会财产世俗化, 88, 575; 掌管教育, 93; 教会束缚下的国王和政府, 99; 对待犹太人, 243, 556, 559; 教会的书报检查制, 554; 容忍非天主教徒, 556; 庇护九世的当选, 559; 耶稣会对自由主义的态度, 565; 西卡尔迪法, 567; 解散修道院, 568; 世俗婚姻, 568

条约和联盟: 普隆比埃密约(1858), 16, 209, 271, 463, 538, 571; 与拿破仑三世结盟(1859), 88; 与普鲁士结盟(1866), 271

教育, 111, 115

新闻出版, 128, 560

建筑, 140

查理·阿尔伯特, 见Charles Albert条下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 继位, 209, 566

第一次奥地利战争: 库斯托扎战役, 186, 263, 402, 523, 564; 诺瓦拉战役, 263; 1849年和约, 264; 停战, 322; 宣战, 398; 戈伊托战役, 398; 重新开战, 407; 财源, 567

第二次奥地利战争(1859): 铁路的利用, 309; 马让塔战役, 323, 571; 法国军队支持皮埃蒙特, 323, 462—463; 索尔费里诺战役, 323, 571;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572

第三次奥地利战争: 第二次库斯托扎战役, 576; 海军在利萨的失败, 576

又见各有关国家条

Iturbide, Agustin de, 伊图尔维德, 阿古斯丁·德, 墨西哥皇帝, 674

Jackson, Andrew, 杰克逊, 安德鲁, 将军, 美国第七任总统, 605—610

Jacoby, Johann, 雅各比, 约翰, 激进分子, 496, 510

Jaffa, 雅法, 423

Jahn, Friedrich Ludwig, 雅恩,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政论家, 227

Jamaica, 牙买加, 356, 679

Japan, 日本

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7, 712

明治维新(1867), 211, 713

1889年宪法, 212

创建陆军和海军, 212

闭关自守政策, 709—710

基督教在日本, 710

贸易, 710—711

外国人的旅行, 710, 712

德川幕府, 710—713

1853年的防卫, 711

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 711—713

炮轰鹿儿岛, 712

在大阪湾的海军舰队, 713

内战, 713

宫廷迁至东京, 713

西方承认日本为强国, 713

Japelli, Giuseppe, 亚佩利, 朱塞佩, 建筑师, 140

Jassy, Academy of, 雅西科学院, 241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 美国第三任总统, 603, 605, 612

Jellačić, Joseph, Count, 耶拉契奇, 约瑟夫, 伯爵, 克罗地亚省省长, 403, 522, 523, 525, 537

Jesuits, 耶稣会

在瑞士, 81, 223,

支持圣灵怀胎说, 88

1851年在奥地利恢复原来地位, 533

焦贝蒂论耶稣会, 565

自由主义与真正的宗教水火不能相容, 565

在墨西哥遭取缔, 675

Jews, 犹太人

人口, 243

被很多职业排斥在外, 243

依地语遭取缔, 243

在巴勒斯坦定居, 244

移居美国, 244

支持匈牙利政府, 537

担任公职, 556

在法国, 243

在德国, 243

在意大利, 243, 566, 559

在尼德兰, 243

在波兰, 243

在两公国，243

在俄国，243

在西班牙，243

在瑞士，243

在土耳其，244

在匈牙利，537

在奥地利，540

John, Archduke, of Austria, 约翰，奥地利大公，405，410

Joint-stock companies, 股份公司, 这类公司的创立, 39

Jomini, Baron Henry, 约米尼男爵, 亨利, 军事思想家, 302, 313—316, 323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33

Joule, James Prescott, 焦耳, 詹姆斯·普·雷斯科特, 物理学家, 57, 59

Journal des Débats, 《辩论报》, 123

Journalists, 新闻工作者

 因鼓动在英国的动乱而被判有罪, 121

 法国流亡者攻击拿破仑三世, 128

Joyce, James, 乔伊斯, 詹姆斯, 作家, 157

Juarez, Benito, 华雷斯, 贝尼托, 墨西哥共和派领袖, 464, 675—676, 678

Jurits, congress of (1860), 法学家代表大会, 507

Kaiserfeld, 凯泽费尔德, 德奥自治主义领导人, 548

Kangagawa, Treaty of (1854), 神奈川条约, 711

Kankrin, Count Jegor, 坎克林伯爵, 叶戈尔, 俄国财政大臣, 364

Kansas, 堪萨斯, 203, 624

Kansas-Nebraska Act (1854),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 624

Kápolna, battle of, 卡波尔纳战役, 526

Karlovitx Assembly, 卡尔洛夫齐会议, 403

Karlsruhe Conference (1860), 卡尔斯鲁厄会议, 62

Kars, 卡尔斯, 484, 489

Kashgar, 喀什, 385, 707

Katkov, Michael, 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 《莫斯科新闻》主编, 129, 234, 376

Kavelin, Constantin, 卡维林, 康士坦丁, 律师和土地改革家, 375

Kay-Shuttleworth, Sir James (Dr. Kay), 凯-沙特尔沃思, 詹姆斯爵士(凯博士), 109, 114

Kazimullah, 卡齐穆拉, 高加索领袖, 385—386

Keats, John, 济慈, 约翰, 诗人, 172

Keble, John, 基布尔, 约翰, 牧师, 82, 83, 100

Kekulé von Stradonitz, August, 凯库勒·冯·施特拉道尼茨, 奥古斯特, 化学家, 62

Keller, Gottfried, 凯勒, 戈特弗里德, 小说家, 161

Kentucky, 肯塔基, 628, 632

Kerr, Robert, 克尔, 罗伯特, 教授, 建筑师, 138

Ketteler, Freiherr Wilhelm Emmanuel von, 凯特勒男爵, 威廉·埃马努埃尔·冯, 美因茨主教, 101

Keyser, Nicaise de, 凯泽, 尼凯斯·德, 画家, 151

Khiva, 希瓦, 386, 387, 388

Khokand, 浩罕, 386, 387—388

Khomyakov, Alexis Stepanovitch, 霍米亚科夫·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 作家, 367

Kiel, 基尔, 海军基地, 516

Kiev, university of, 基辅大学, 363

Kindergarten schools, 幼儿学校, 108

Kingsley, Charles, 金斯利, 查尔斯,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118

Kirchhoff, Gustav Robert, 基尔霍夫, 古斯塔夫·罗伯特, 化学家, 58

Kireevskii, I.V., 基列耶夫斯基, 伊·瓦, 作家, 367

Kiselev, Count Paul Dimitrievich, 基谢廖夫伯爵, 帕维尔·季米特里耶维奇, 政治家和外交家, 361, 478

Kishen, 琦善, 直隶总督, 690

Kiss, August, 基斯, 奥古斯特, 雕塑家, 143

Kiying, 耆英, 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特使, 692, 693, 694, 695

Kladderadatsch, 《闲话》杂志, 131

Klenze, Leo von, 克伦泽, 莱奥·冯, 建筑师, 141

Koch, Robert, 科赫, 罗伯特, 卫生学教授, 24, 66

Kogalniceanu, Michael, 科加尔尼恰努, 米夏埃, 政治家, 242

Kohn, Professor Hans, 科恩教授, 汉斯, 历史学家, 233

Kold, Kristen, 科尔, 克里斯滕, 教育界领导人, 110, 120

Kollar, Jan, 科拉尔, 扬, 学者, 232

Köllüikker, Rudolf Albert von, 克利克, 鲁道夫·阿尔贝特·冯, 动物学家, 71

Kölnische Zeitung, 《科隆报》, 126

Kolokol, 《钟声》, 见 *Bell, The*

Konieh, battle of, 科尼埃战役, 428

Königgrätz (Sadowa), battle of, 克尼格雷茨 (萨多瓦) 战役, 310, 325, 519, 578

Kopal, 科帕尔, 387

Korea, 朝鲜

俄国把边界扩展到朝鲜, 7

向中国纳贡, 686

闭关自守政策，709

Kossuth, Lajos (Louis) , 科苏特，拉约什，匈牙利政治家

与各臣属民族，239—240

争取从奥地利统治下独立，264

提醒人们防止革命，396

建立军队，403

他的垮台，408

匈牙利摄政，528

寻求反奥地利的支持者，538，544

Kowloon Incident, 九龙事件，689—690

Krasinski, Zygmunt Napoleon, Count, 克拉辛斯基，齐格蒙特·拿破仑，伯爵，诗人，234，237

Krausz, Baron Philip von, 克劳茨男爵，菲利普·冯，奥地利财政大臣，529，533

Kremsier, 克雷姆西尔

克雷姆西尔宪法草案（1849年），197—198

克雷姆西尔奥地利国会，524，526

Kreuzzeitung party, 《十字架报》党，14，498，508，511

Kübeck, K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屈贝克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顾问，531—533

Kuenen, Abraham, 库南，亚伯拉罕，希伯莱文教授，102

Kugler, Franz Theodor, 库格勒，弗朗茨·泰奥多尔，美术评论家，150

Kulja, 伊犁，707

Kung, Prince, 恭亲王，中国皇帝的兄弟，704

Kutchuk Kainardji, Treaty of (1774),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 470, 476

Laboulaye, Édouard-René, 拉布莱, 爱德华-勒内, 政治学家, 207

Labrousse, Nicolas-Hippolyte, 拉布鲁斯, 尼古拉-伊波利特, 法国海军军官, 278

Labrousse, Henri, 拉布鲁斯特, 亨利, 建筑师, 140

La Convention du 15 septembre et l'encyclique du 8 decembre, 《9月15日会议和12月8日通谕》, 92

Lacordaire, Jean-Baptiste-Henri, 拉科代尔, 让-巴蒂斯特-亨利, 多明各会神父, 77, 78, 89, 101

Lacour, Edmond de, 拉古尔, 埃德蒙·德, 法国驻土耳其大使, 473

Lafayette, Marquis de, 拉斐特侯爵, 将军, 194

La Gloire, “光荣号”, 法国快速帆船, 279, 282, 285

Lagrené, Théodose de, 刺萼泥, 泰奥多斯·德, 法国派赴中国的特使, 693

Laird, 莱尔德, 造船公司, 640

Lamarck, Jean Baptiste, 拉马克, 让-巴蒂斯特, 动物学家, 68, 69

La Marmora, 拉马尔莫拉, 将军, 萨丁军队司令, 482, 575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 阿尔方斯·德, 作家和政治家, 21, 173, 216, 261, 393, 394, 455

Lamennais, Félicité de, 拉梅内神父, 费利西泰·德, 77—78, 79, 101, 123, 216, 390

Lancashire, 兰开夏, 排干沼泽地, 24

Land and Liberty (Ogarev), 《土地和自由》(奥加廖夫著), 373

Landschaften, (普鲁士)土地信贷银行, 25

Landseer, Sir Edwin, 兰西尔爵士, 埃德温, 画家, 153

Landwehr, 普鲁士战时后备军, 509

Langensalza, battle of, 朗根萨尔察战役, 519

Lanskoi, Count, 兰斯科伊公爵, 俄国内务大臣, 375

Lanterne, La, 《灯笼报》, 125

La paz, 拉巴斯, 667

Laplace, Pierre-Simon, Marquis de, 拉普拉斯侯爵, 皮埃尔-西蒙, 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55

La Première entente cordiale (Guyot), 《第一次友好协约》(居约著), 254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 社会主义者, 127, 205, 505, 506

Latin Monetary Union (1865), 拉丁货币联盟, 218

Latreille, A. Pierre André, 拉特雷耶, 皮埃尔·安德烈, 历史学家, 76

Latvia, 拉脱维亚, 231

Laurent, Auguste, 洛朗, 奥古斯特, 化学家, 62

La Valette, Charles-Jean-Marie-Félix, marquis de, 拉瓦莱特侯爵, 夏尔-让·玛丽-费利克斯, 法国驻土耳其大使, 469, 470

Laveleye, Émile de, 拉韦莱耶, 埃米尔·德, 政论家, 245

Lavoisier, Antoine Laurent, 拉瓦锡, 安托万·洛朗, 化学家, 61

Lavrov, P., 拉甫罗夫, 彼, 政论家, 375

Lawes and Gilbert (Rothamsted), 劳斯和吉尔伯特(罗塔姆斯特德实验站), 24

Laws of Thought (Boole), 《思维规律》(布尔著), 56

Laxenburg Manifesto (1859), 拉克森堡宣言, 540

Le Bel, Achille, 勒贝尔, 阿希尔, 化学家, 63

Leben Jesu (D.F. Strauss), 《耶稣传》(达维德·弗雷德里希·施特劳斯著), 75, 102

Leboeuf, Edmond, 勒伯夫, 埃德蒙, 元帅, 598

Lebrun, Barthélemy Louis Joseph, 勒布伦, 巴泰勒米·路易·约瑟夫, 将军, 拿破仑三世的副官, 586

Leconte de Lisle, Charles, 勒孔特·德·李勒, 夏尔, 诗人, 173

Le Creusot, 勒克勒索, 30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勒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共和派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 393, 404, 408, 455

Lee, Robert Edward, 李, 罗伯特·爱德华, 南部联盟将军, 328, 329, 330, 656

Leeds Mercury, 《利兹信使报》, 44

Lefuel, H.-M., 勒菲埃尔, 埃克托尔-马丹, 建筑师, 142

Legal Tender Act, 合法货币法, 645

Leghorn, 里窝那, 419—421, 425

Legitimists, French, 法国的正统王权主义者, 444, 446, 448, 450, 452, 454

Legnago, 莱尼亚戈, 321

Leiningen, Count, 莱宁根伯爵, 奥地利密使, 472

Leipzig, 莱比锡, 400

Lelewel, Joachim, 莱莱韦尔, 约阿希姆, 历史学家, 234

Le mie prigioni (Pellieo), 《我的狱中生活》(佩利科著), 558

Lenau, Nikolaus, 莱瑙, 尼古劳斯, 诗人, 176

Lenin, (Vladimir Ilyich Ulianov),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革命家, 358

Leopardi, Giacomo, Count, 莱奥帕尔迪, 贾科莫, 伯爵, 诗人, 172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比利时国王, 190, 249

Leopold II, 利奥波德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47

Leopold II of Tuscany, 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 554, 560

Le parti libéral, son programme et son avenir (Laboulaye), 《自由党的纲领和未来》(拉布莱著), 207

Le Père, Jean-Baptiste, 勒佩尔, 让-巴蒂斯特, 建筑师, 434

Le Play, Frédéric, 勒普拉, 弗雷德里克, 社会改革家, 453

Le Plongeur, “潜水者号”, 法国潜水艇, 287

Lermotov, Michael, 莱蒙托夫, 米哈伊尔, 小说家, 162

Lesbos, Island, 莱斯博斯岛, 422

Le Sourd, Georges, 勒苏尔, 乔治, 法国驻柏林临时代办, 590

Lesseps, Ferdinand de, 莱塞普斯, 费迪南·德, 工程师, 与苏伊士运河计划, 434, 438—439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莱辛, 戈特霍尔德·伊弗雷姆, 评论家和戏剧家, 183

L'État et ses limites (Laboulaye), 《国家及其局限》(拉布莱著), 207

Levant, The, 地中海东部地区(利凡得), 418, 422, 424—425, 430, 433

Levy, J. M., 利维, 约瑟夫·摩西, 《每日电讯报》的控制人, 122

Levy' Lawson family, 利维·劳森家族, 与《每日电讯报》, 121

Lewis, Sir George Cornwall, 刘易斯爵士, 乔治·康沃尔, 财政大臣, 486

Ley Juárez, 华雷斯法, 675—676

Ley Lerde, 莱尔德法, 675—676

Li Hung-Chang, 李鸿章, 反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 699, 706

Liberator, The (W.L.Garrison), 《解放者》报,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主编), 618

Libraries, 图书馆

在英国和美国免费借阅, 120

Liebig, Justus, Baron von, 李比希男爵, 冯·尤斯图斯, 化学家, 24, 50, 51, 62, 65, 114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 (Kugler), 《腓特烈大帝生平》(库格勒著), 150

Liguria, 利古里亚, 553, 570

Lille, 里尔, 43, 139, 459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有限责任公司, 40

Lin Tse-hsü, 林则徐, 688—690

Linant Bey, 利南特·贝伊, 穆罕默德·阿里的工程师, 437

Lincoln, Abraham, 林肯, 亚伯拉罕, 美国第十六任

总统被刺, 132

支持保护关税, 613

当选总统, 626—627

解放奴隶宣言, 628, 637

志愿忠诚的重要意义, 629

违宪法令, 645, 646—647

大胆行使权力, 646

中止民法和人身保护权, 647

杰出的战略家, 656

与将军们的冲突, 657

Lincolnshire, 林肯郡, 排干沼泽地, 24

Linen, 亚麻布, 亚麻湿纺法, 28

Linnaeus Carl, 林奈·卡尔, 博物学家, 68—69

Linnean Society, 林奈学会, 67

Lion of Flanders (Conscience), 《佛兰德之狮》(孔西延斯), 221

Lissa, 利萨, 海军基地, 576

Lisf, Friedrich,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经济学家, 227, 228, 308

Lister, Joseph, Lord, 利斯特勋爵, 约瑟夫, 外科手术消毒法的创始人, 24, 73

Lithography, 平版印刷术, 131

Lithuania, 立陶宛

俄国的镇压, 230, 236

民粹派, 236

Liverpool, 利物浦, 43

Liverpool-Manchester Railway, 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 32

Livingstone, David, 利文斯通, 戴维, 探险家, 351

Lobatchevsky, Nicolas Ivanovitch, 罗巴切夫斯基,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数学家, 56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哲学家, 53

Locomotives, manufacture of, 火车机车制造, 29

Loftus, Lord Augustus, 洛夫特斯勋爵, 奥古斯塔斯, 英国驻普鲁士大使, 596

Loi Falloux (1850), 法卢法, 80, 86, 107, 409, 444

Lokomotive, Die (F.W.A.Held), 《火车头》(黑尔德主编), 125

Lombardy, 伦巴第

反对奥地利的叛乱, 262—263

骚乱, 389

临时政府, 396

割让给皮埃蒙特, 401

接受特殊条例, 526

优良的治理和交通, 556

奥地利允许其自治, 571

London, 伦敦

机床的制造, 29

大学, 50

阿尔贝特纪念堂, 143

圣潘克拉斯车站, 149

London Conference, 伦敦会议, 关于比利时各省问题的, 248

London Convention (1840), 伦敦协定, 429

London, Treaty of (1852), 伦敦条约, 219

London, Treaty of (1867), 伦敦条约, 582

London, Treaty of (1871), 伦敦条约, 488

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伦敦工人协会, 347

López, Francisco Solano, 洛佩斯,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 巴拉圭总统, 672—673

Lord, R.H., 洛德, 历史学家, 590

Lord Campbell's Libel Act (1843), 坎贝尔勋爵的诽谤罪法, 121

Lord High Admiral, office of, 海军最高长官的职务, 290

Lord Lyons (Lord Newton), 《莱昂斯勋爵》(牛顿勋爵著), 585

Lords, House of, 上议院, 335

Louis Napoleon (Charles Louis Napoleon), prince, 路易·拿破仑(夏尔·路易·拿破仑), 亲王

1851年政变, 187, 416, 451

当选为总统, 404, 443

出身, 442

被囚禁在哈姆, 443

宪法困难, 443

参加烧炭党人的起义, 443

恢复帝国是唯一目的, 443

早期夺取权力的企图, 443

在英国的生活, 443

对诉诸武力举棋不定, 444

对法卢法的态度, 444

与选举法, 444, 445

著作, 446

称拿破仑三世, 446

关心穷人, 447

无党派领导人, 447

又见Napoleon III

Louis Philippe, 路易·菲利普, 法国国王

垮台, 124

被报刊嘲弄, 131

寻求与东方各国和解, 247

阴谋夺取比利时王位, 249

不喜欢英法协约, 254

退位, 393

去世, 409

与阿尔及利亚战役, 427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627, 655

Louisiana Purchase (1803), the, 购买路易斯安那, 461, 603, 620, 621, 624

Loutherbourg, Philipe Jacques de, 卢泰尔堡, 菲利普·雅克·德, 画家, 134

Louvain University, 卢万大学, 107

Lovett, William, 洛维特, 威廉, 宪章派, 110, 346, 347

Lowe, Robert, 洛, 罗伯特, 《泰晤士报》主编, 122

Lowell, James Russell, 洛威尔, 詹姆斯·拉塞尔, 诗人, 179

Loyal National Repeal Association, 取消联合法全国忠诚协会, 217

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3rd earl, 卢肯, 乔治·查尔斯·宾厄姆, 第三代伯爵, 480

Lucca, 卢卡, 552

Lucerne, Switzerland, 卢塞恩, 瑞士

1841年宪法, 81

大委员会, 81

与耶稣会, 223

Luchu, 琉球, 向中国进贡, 686

Ludwig II, 路德维希二世, 巴伐利亚国王, 519, 601—602

Ludwig, Karl Friedrich Wilhelm, 路德维希,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生理学家, 51, 66

Ludwig, Otto, 路德维希, 奥托, 小说家和戏剧家, 166

Lunéville, peace of, 吕内维尔和约, 313

Lussinpiccolo, 卢辛皮科洛, 422

Luxemburg, 卢森堡

比利时失去该地, 221

1867年的争执, 272

在列强的保证下, 272

在联邦议会中支持普鲁士, 519

Lyceum movement (U.S.A.), 学园运动(美国), 120

Lyell, Sir Charles, 赖尔爵士, 查尔斯, 地质学家, 9, 68, 69, 71, 102

Lyon, Mary, 莱昂, 玛丽, 教育家, 119

Lyons, 里昂, 42, 43, 435

Macao, 澳门, 686, 689, 692

Macartney, George, 1st earl, 马戛尔尼, 乔治, 第一代伯爵, 687

Macauley, Thomas Babington, Lord, 麦考利勋爵, 托马斯·巴宾顿, 117, 352

Macauley, Zachary, 麦考利, 扎卡里, 慈善家, 341

McClellan, George, B., 麦克莱伦, 乔治, 布林顿, 美国将军, 649, 657

McCormick, Cyrus Hall, 麦考密克, 赛勒斯·霍尔, 发明家, 25

Macedonia, 马其顿, 426

Machine tools, manufacture of, 机床制造, 29

Machinery, 机器

- 起义中破坏机器 (1830), 25
- 机械的改进, 27
- 禁止出口机器, 28

MacMahon, Marie-E-P-M., 麦克马洪, 玛丽, 法国元帅, 306, 326

Madder, synthesis of, 茜草染料的合成, 64

Madras, 马德拉斯, 432

Madrid, 马德里, 420, 424—425, 435, 589

Maestricht, 马埃斯特里希, 221

Magellan, Straits of, 麦哲伦海峡, 665

Magendie, François, 马让迪, 弗朗索瓦, 生理学家, 66

Magenta, battle of (1859), 马让塔战役, 323, 506, 539, 571

Mahmud II, 马哈茂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 被穆罕默德·阿里击败, 251

请求俄国援助, 252

再次开始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敌对行动, 254—255, 429

去世, 256, 429

Mahogany, 桃花心木, 679

Mails, 邮政

一便士邮政, 332

地中海的邮政传递, 431

印度的邮政传递, 432

Majl ath de Székhely, George, 马伊拉特·德·塞克海伊, 乔治, 政治家, 548

Malaga, 马拉加, 420

Malaria, 疟疾, 72

Malines, 马利纳, 33, 77, 89, 90, 107

Mallarmé, Stéphane, 马拉梅, 斯特凡娜, 诗人, 178, 179, 180

Mallet Frères, 马莱兄弟, 银行家, 41

Malmesbury, James, 3rd earl of, 马姆斯伯里, 詹姆斯, 第三代伯爵, 英国外交大臣, 571

Malta, 马耳他, 160—161, 431, 433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政治经济学家, 1, 54, 69

Mameli, Goffredo, 马梅利, 戈弗雷多, 诗人, 225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10, 29, 43, 120, 206

Manchester and Liverpool Railway, 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 332

Manchester Guardian, The, 《曼彻斯特卫报》, 121, 123

Manchu empire, 满洲帝国, 384—685

Manchuria, 满洲, 385, 702

Manchus, 满族人, 690—691, 698—700

Manet, Édouard, 马奈, 爱德华, 画家, 154

Manila, 马尼拉, 709

Manin, Daniel, 马宁, 达尼埃尔, 威尼斯领导人, 201, 396, 565

Mann, Horace, 曼, 霍勒斯, 马萨诸塞州教育部长, 109, 111, 117

Manning, B. L., 曼宁, 历史学家, 86

Manning, Henry Edward, 曼宁, 亨利·爱德华, 红衣主教, 83, 87, 93, 95

Manteuffel, Otto von, 曼陀菲尔, 奥托·冯, 普鲁士政治家, 485, 498—499, 502, 503, 532

Mantua, 曼图亚, 321

Manumission of slave, 解放奴隶, 616

Manzoni, Alessandro, Count, 曼佐尼, 亚历山德罗, 伯爵, 作家, 225, 553, 558

Maori Wars (1857—1870), 毛利战争, 355

March Patent (5 March 1860), 三月特许令 (1860年3月5日), 540

Maret, Mgr, 马雷, 神父, 索邦神学院院长, 94—95, 101

Margarine, 人造黄油, 64

Marie, 玛丽亚, 葡萄牙女王, 253

Marie, Alexandre Thomas, 玛丽, 亚历山大·托马斯, 政治家, 393

Marie Louise, 玛丽·路易丝, 帕尔马女公爵, 553, 554

Marinoni, Hippolyte (*Presse*) , 马里诺尼, 伊波利特 (《新闻报》主编), 132

Marnoch, 马诺奇, 83

Marrast, Armand (*Tribune*) , 马拉斯特, 阿尔芒 (《论坛报》主编), 123

Marriage, Civil, 世俗婚姻

在皮埃蒙特, 568

在墨西哥, 676

Marryat, Frederick, 马利亚特, 弗雷德里克, 舰长, 海军军官和小说家, 295

Marseilles, 马赛, 422, 431—432, 434—435

借助轮船而导致繁荣, 4, 421

该地的检疫规定, 417

航运规模, 419

人口, 420

与阿尔及尔的联系, 421, 424, 428

复兴, 421

对拿破仑的重要性, 425

马志尼在该地, 555

Marshall, Humphrey, 马沙利, 汉弗莱, 美国驻华全权委员, 700

Marshall, John, 马歇尔, 约翰, 美国首席法官, 604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社会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 3, 43

决定论, 6, 55

阶级斗争学说, 10

编辑《莱茵报》，125，495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160

赞成反对丹麦的“十字军”，187

尖锐批评自由派，188

被接纳在伦敦定居，202

《资本论》，205

反斯拉夫著作，431

Maryland, 马里兰，605，610，626，628，632

Mason, James M., 梅森，詹姆士·默里，南部联盟代表，638，
639—640

Massa, 马萨，553，563，571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34，45，185，611，623

Massenbach, Christian von, 马森巴赫，克里斯蒂安·冯，上
校，310

Match industry, 火柴工业，342

Mauá Bank, 毛阿银行，662

Mauá, Ireneu de Souza, Baron of, 毛阿，伊里内乌·德·索
萨，男爵，巴西金融家和工业家，662

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de, 莫帕，夏勒马涅-埃米尔·德，
警察局长，444，445

Maurice, Frederick Denison, 莫里斯，弗雷德里克·丹尼森，
牧师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01，118，152

Mauritius, 毛里求斯，该地的奴隶制，341

Mayer, Julius Robert von,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冯，物
理学家，59，60

Maximilian, 马克西米连, 墨西哥皇帝 (奥地利大公), 208, 464, 582, 641, 677—678

Maxwell, James Clerk, 麦克斯韦, 詹姆斯·克拉克, 物理学家, 49, 57—58, 60

Maysville turnpike, 梅斯维尔公路, 606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马志尼, 朱塞佩, 意大利爱国者

青年意大利, 128, 224, 555

与皮埃蒙特-撒丁合作, 198, 563

赞成建立统一的共和国, 199

支持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201

论英国的民族性, 213

流亡在伦敦, 215

主张自然边界, 224

对法国的不信任, 225

组立“青年欧洲”, 225

在1848—1849年, 408, 412, 565

民族统一的目标, 555

被判死刑, 555, 570

与隆贾纳起义, 570

Meat prices, 肉类价格, 27

Mechanics Institutes, 技工学校, 119, 120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497, 519

Medicine, 医学, 71—72

Medill, Joseph, *Chicago Tribune*, 梅迪尔, 约瑟夫, 《芝加哥论坛报》主编, 130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 , 416—440

相对距离, 416

气候, 417

检疫规定, 417

各港口比较, 418—419

各港口的人口, 420

Mediterranean Pilot (1873—1882年), 《地中海指南》, 419

Mehemet Ali,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总督

包围阿克, 251

保有叙利亚等地区, 252, 428

扬言要宣布独立, 254

苏丹欲粉碎他, 257

对奴隶制的关注, 426

迫切要求承认他的独立, 429

对苏伊士运河计划的态度, 436

要求修建尼罗河水坝, 438

他的逝世, 438

首相, 470, 472

陆军大臣, 476

Mehemet Rushdi, 穆罕默德·拉什迪, 土耳其陆军大臣, 472

Meiggs, Henry, 梅格斯, 亨利, 美国公民, 665

Meiji Restoration, the, 明治维新, 211, 713

Meissonier, Jean Louis Ernest, 梅索尼埃, 让-路易·欧内斯特, 画家, 147, 150

Melbourne, William Lamb, 2nd viscount, 墨尔本, 威廉·拉姆, 第二代子爵, 202

Melgarejo, Mariano, 梅尔加雷霍, 马利亚诺, 玻利维亚总统, 667

Melville, Henry Dundas, 1st viscount, 梅尔维尔, 亨利·邓达斯, 第一代子爵, 海军大臣, 277

Melville, Hermann, 梅尔维尔, 赫尔曼, 小说家, 164, 167

Memphis, 孟菲斯, 634

Mendel, Gregor, 孟德尔, 格雷戈尔, 布尔诺修道院院长, 56, 70

Mendeléef, Dimitri Ivanovitch, 门捷列夫, 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化学家, 63

Menotti, Ciro, 门诺蒂, 奇罗, 爱国者, 553, 554

Mensdorff-Pouilly, Count Alexander, 门斯多夫·普利伯爵, 亚历山大, 将军, 547, 548

Menshikov, Alexander Sergeievich, prince, 缅希科夫,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亲王, 472, 473—474, 479, 480

Mentana, battle of (1867), 曼塔纳战役, 305, 583, 584

Menzel, Adolf, 门采尔, 阿道夫, 画家, 150, 151, 152

Méon, Mgr de, 德梅翁长老, 马利纳大主教, 77

Mercerisation, 丝光工艺, 64

Mercury, use in venereal disease, 汞, 用于治疗性病, 72

Meredith, George, 梅瑞狄斯, 乔治, 小说家, 163

Mérimée, Prosper, 梅里梅, 普罗斯佩, 作家, 125, 164

Merrimac, “梅里马克号”, 南部联盟装甲舰, 285—286

Messageries Maritimes, 法国邮船公司, 432, 452

Messina, 墨西拿, 419—421

Metal trade, employment, 金属贸易, 该行业中的雇工, 333

Metal wares, 金属器皿, 一种家庭手工业, 42

Metric system, 米制, 552

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t, Prince von, 梅特涅-温内堡, 克莱门特, 公爵, 政治家

他的六项法令的影响, 13

论庇护九世就任教皇, 87

严密注视新闻界, 125

阻止进一步赋予宪法权利, 189

被免职, 200, 203

在伦敦受到接待, 202

30年代初瑞士主张修改公约一派人的建议, 222

与分离主义者联盟, 223

担心俄国的近东政策, 247

与比利时各省, 248

决心恢复意大利的秩序, 250—251

支持俄国对付波兰反叛者, 251

与1839—1840年的近东危机, 255—258

与对克拉科夫的占领, 267

离开维也纳, 396

与地中海的检疫规定, 417

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 436

竞争者的影响, 495

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一次讲话, 496

批评意大利的行政机构， 554

对查理·阿尔贝特的看法， 557

计划奥地利和意大利在经济上联合， 557

Mevissen, Gustav, 梅维森，古斯塔夫，自由派领袖， 496

Mexico, 墨西哥

放弃统一的国家体制而实行联邦制， 186

放逐圣安纳， 203

恢复中央集权制（1836）， 208

联邦宪法（1857）， 208， 676

恢复联邦共和国（1867）， 211

法国的干预， 464， 677—678

英、法和西班牙占领沿海地区， 464， 677

马克西米连的帝国， 464， 677—678

得克萨斯的反叛， 621， 674

根据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丧失的领土， 622， 675

与美国的战争（1846）， 622， 674

被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 622， 674

暂停支付债务， 641， 676

马克西米连的治理， 641

成立共和国， 659， 674

获得独立， 674

人口， 674

西班牙从古巴的入侵， 674

分裂运动， 674

政教关系, 675, 676

在圣安纳统治时期道德败坏, 675

华雷斯统治时期的司法制度, 675

1857年政变, 676

在维拉克鲁斯重建自由政府, 676

与英国的关系, 677

外债, 676—677

恢复共和国, 678

Meyer, Victor, 迈尔, 维克托, 化学家, 63

Michael Obrenovich, 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 塞尔维亚大公, 242

Michelet, Jules, 米什莱, 朱尔, 历史学家

新的历史观, 11

被免职, 105

在法兰西学院, 115

拉丁合作, 218

罗马尼亚自由派的辩护士, 241

Mickiewicz, Adam, 密茨凯维奇, 亚当, 诗人, 105, 215, 237

Microscopy, 显微镜, 67

Middlesbrough, 米德尔斯布勒, 铁矿藏, 29

Mieroslawski, Ludwig, 米罗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希, 将军, 235

Miguel, Dom, 米格尔, 唐, 葡萄牙王位觊觎者, 253, 555

Milan, 米兰

在1848年, 201, 321, 396—398, 402, 562

交通, 421, 425

与德意志关税同盟, 557

加富尔警告奥地利米兰将发生暴动 (1853), 569

Mildert, Bishop van, 范米尔德主教, 82

Mill, James, 穆勒, 詹姆斯, 经济学家, 109, 352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 哲学家, 12, 53—55, 205, 206, 214, 352, 353

Millais, John Everett, 米莱, 约翰·埃弗雷特, 画家, 151, 153

Millaud, Moïse (*Petit Journal*), 米洛, 穆瓦兹 (《小日报》), 125

Millet, Jean François, 米勒, 让·弗朗索瓦, 画家, 147—148, 149, 151

Milman, Henry Hart, 米尔曼, 亨利·哈特, 圣保罗大教堂教长, 102

Milo, island of, 米洛岛, 422

Milton (Blake), 《弥尔顿》(布莱克著), 1

Milyultin, D.A., 米柳京, 俄国内务副大臣, 371, 375

Milyutin, N., 米柳京, 俄国陆军大臣, 379

Minas Geraes, 米纳斯, 吉拉斯, 661, 662

Mines Act (1842), 矿业法, 342

Minghetti, Marco, 明盖蒂, 马尔科, 庇护九世的大臣, 558

Minié, 米尼埃, 上尉, 法国陆军军官和发明家, 304

Minnesota, 明尼苏边, 203

Miquel, Johannes, 米克尔, 约翰内斯, 普鲁士财政大臣, 507, 515

Mirari Vos, encyclical of Gregory X VI, 《使我们感到惊异》, 格列高利十六世的通谕, 78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work, 传教团和传教活动

在非洲和东方, 8

在亚洲, 79, 695—696

由非罗马教会所发展, 103

在美国, 103

英国和法国的传教团在塔希提岛, 259

美国传教团在贝鲁特, 423

Mississippi river, 密西西比河, 31, 34, 328—329, 603, 611, 613—614, 620, 635, 654—655

轮船在该河的行驶, 32, 612

Mississippi state, 密西西比州, 615, 627, 634

Missouri, 密苏里, 194, 620, 629, 632

Missouri Compromise (1820), 密苏里妥协案, 620, 621, 623, 624

Mistral, Frédéric, 米斯特拉尔, 弗雷德里克, 诗人, 175

Mitchel, John, 米切尔, 约翰,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217, 389

Mitrailleuse, the, 机关枪, 307, 593

Mitre, Bartolomé, 米特雷, 巴托洛梅, 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 670, 671

Modena, 摩德纳, 209, 250, 553, 560, 565, 572

Mohl, Hugo von, 莫尔, 胡戈·冯, 植物学家, 67

Mohl, Robert von, 莫尔, 罗伯特·冯, 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 67, 211

Mohler, J. A., 默勒, 约翰·亚当, 教会史学家, 94

- Moldavia, 摩尔多瓦, 479, 488; 又见Principalities
- Molecular theory, 分子学说, 60—62
- Molesworth, Sir William, 莫尔斯沃思爵士, 威廉, 政治家,
353
- Moltke, Helmuth Karl, Graf von, 毛奇伯爵, 赫尔穆特·卡尔
• 冯, 德国总参谋长
- 注意把铁路用于军事, 308—309, 310—311
- 克劳塞维茨的门徒, 320
- 七周战争, 310—311, 324, 517
- 普法战争, 310, 325, 326, 593
- Monarchy, 君主政体
- 在比利时受到限制, 191, 194
- 在英国受到限制, 192
- 在克雷姆西尔起草的宪法中, 198
- 与大臣的关系, 340
- 哈勒尔的君主制思想, 496
- 中国对君主政体的看法, 686
- Monasteries, dissolution of, 解散修道院
- 在奥地利, 533
- 在皮埃蒙特, 568
- 在墨西哥, 676
- Monet, Claude, 莫奈, 克洛德, 画家, 149, 154, 155
- Moniteur Official*, 《政府通报》, 125
- Moniteur Ottoman*, 《奥斯曼箴言报》, 423
- Monitor*, “班长号”, 埃里克森建造的装甲舰, 285—286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604, 641, 673, 678, 682

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蒙塔朗贝尔伯爵, 夏尔·福尔贝, 作家和政治家, 77, 78, 79—80, 89, 107

Montefiore, Sir Moses, 蒙蒂菲奥里爵士, 摩西, 慈善家, 244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 241, 472

Monterrey, 蒙特雷, 美国军队在该地, 622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670

Montez, Lola, 蒙特茨, 洛拉, 舞蹈家, 479

Montgomery, Alabama, 蒙哥马利, 亚拉巴马州, 南方代表在该地举行会议, 649—650

Montgomery Constitution, 蒙哥马利宪法, 649

Montpensier Antoine, duc de, 蒙庞西埃公爵, 安托万, 259, 587

Montt, Manuel, 蒙特, 曼努埃尔, 智利总统, 664, 665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the Italians (Gioberti), 《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越》(焦贝蒂, 1843), 225

Moravia, 摩拉维亚, 309, 523, 524

Morazán, Francisco, 莫拉桑, 弗朗西斯科, 洪都拉斯领导人, 679

Moreno, Gabriel Garcia, 英雷诺, 加夫列尔·加西亚, 厄瓜多尔总统, 668

Mörke, Eduard, 默里克, 爱德华, 诗人, 175, 176

Morny, duc de, 莫尔尼公爵, 奥尔唐斯皇后的私生子, 445, 447, 484

Morrill Land Grant Act (1862), 莫里尔土地赠与法, 642—643

Morrill Tariff Act (1861), 莫里尔关税法, 628, 643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美术设计家和社会主义者, 154—155, 178

Mortara, Edgar, 莫塔拉, 埃德加, 犹太儿童, 244

Mortimer, J. H., 莫蒂默, 画家, 134

Mortmain, lands held in, 享有永久管业权的土地
在皮埃蒙特, 567
在墨西哥, 675—676

Morton, William Thomas Green, and Wells, Horace, 莫顿, 威廉·托马斯·格林, 和韦尔斯, 霍勒斯, 使用乙醚作为麻醉剂, 72

Moscow, 莫斯科, 36, 365, 368, 373, 381

Moscow News. (Katkof), 《莫斯科新闻》(卡特科夫主编), 129

Moskvityanin, 《莫斯科人》, 宣扬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杂志, 230, 368

Mosquito coast, 莫斯科托海岸, 679—680

Motley, John Lothrop, 莫特利, 约翰·洛思罗普, 历史学家, 210—211

Mount Holyoke, 芒特霍利奥克, 美国学校, 119

Muddy Flat, battle of, 泥地之战, 701

Mulhouse, 米卢兹, 该地的纺织厂, 43

Muller, Adam H., 米勒, 亚当, 民族主义者, 227

Müller, Johann, 弥勒, 约翰, 生理学家, 66, 114

Multiplices Inter, 《各种问题》, 庇护九世的通谕, 95

Münchengrätz, 明亨格列兹, 沙皇尼古拉与奥地利皇帝在该地会晤, 252

Münchengrätz, Treaty of (1833), 明亨格列兹条约, 13, 253, 365

Munich, 慕尼黑

拉梅内、拉科代尔和蒙塔朗贝尔在该地, 78

大学反抗公会议的敕令, 100

当地的建筑, 140—141

Munich Convention (1850), 慕尼黑会议, 410

Munro, Alexander, 芒罗, 亚历山大, 雕塑家, 143

Muraköz, the, 穆拉科兹地区, 529, 545

Murat, Prince Lucien, 缪拉亲王, 吕西安, 570

Muraviev, Count, 穆拉维约夫伯爵, 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 236, 384—385, 702, 703

Muridism, 穆里德运动, 385

Museums, under “Ewart’s Act” (1850), 博物馆, 根据1850年尤尔特法建立的博物馆, 120

Musset, Alfred de, 缪塞, 阿尔弗雷德, 诗人, 173, 174, 181—182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99, 201

Mustapha Pasha, 穆斯塔法帕夏, 首相, 473

Mutiny Bill (1868), 兵变法, 270

Mutsohito, 睦仁, 日本天皇, 211, 713

Nagasaki, 长崎, 710, 711

Nägeli, Karl Wilhelm, 内格利, 卡尔·威廉, 植物学家, 67

Nanking, 南京, 690, 698, 706

Nanking, Treaty of, 南京条约, 690, 692, 697

Napier, William John, Lord, 律劳卑勋爵, 威廉·约翰, 在广州的商务监督, 688—689

Naples, 那不勒斯

大学, 115

颁布西班牙式宪法 (1812), 199

1848年宪法, 389, 395

招募志愿军援助伦巴第, 398

国王使议会休会, 402

奥地利驻军, 412

航运业和人口, 419—421, 431

被加里波第攻陷, 433, 574

酷政, 554

吕西安·缪拉可能实现的权利要求, 570

Naples, Ferdinand II, King of, 那不勒斯国王, 费迪南德二世, 402

Napoleon II, 拿破仑三世, 法国皇帝

普隆比埃密约, 16, 463, 571

性格, 19, 448, 454, 460, 577—578, 598, 599

英法商务条约, 37

巴斯德的影响, 50

与加富尔联盟, 88

普法关系的紧张, 95

他的政权的垮台, 99

新闻界对他的支持, 125

兼并尼斯和萨伏伊, 201, 463, 572

希望保持意大利的衰弱, 209
同情民族主义, 241, 462
向约米尼请教, 323
关注工人的情况, 413
被怀疑对近东抱有野心, 430
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 439—440
他的政权的广泛目的, 442
婚姻, 446
统治权力, 449
与教会的关系, 450—451, 454
获得信贷的措施, 451
关税, 452, 454
大赦, 455
向左转变, 455
健康情况不佳, 457, 465, 578
重建巴黎, 460
外交上承认的重要性, 461
破坏维也纳会议决议, 461
与奥地利交战, 462—463, 571—572
在罗马的驻军, 463, 465, 573, 583—584
墨西哥事件, 464, 580, 677—678
设法取得卢森堡, 465, 580—582
改编法国军队, 465, 584
色当投降, 465, 600

与皇后在英国相会，466

“王朝年号”事件，470

与克里米亚战争，472—475，477，480—485

有意让芬兰重归瑞典，483

改善与俄国的关系，484，489—491

与罗马尼亚各公国，488

与波兰的自由，490

与奥地利签订条约，517

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18

谋害他的企图，570

1866年未能抓住时机，571

得到威尼斯，576，578

建议改组德意志各邦，579

扩张主义的谋略，580—582

向奥地利提出的建议，582—584

计划建立三国同盟，584—586

与霍亨索伦王室候选人问题，587，590—592，595—599

又见Louis Napoleon

Nashville，纳什维尔，622

Nassau (Germany)，拿骚（德意志），395，519

Nation, The，《民族》，爱尔兰周刊，131，217

National, Le，《国民报》，123，390，393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of Labour，全国保护劳工协会，346

National Bank Act (1863 and 1864)，国民银行法，628，643

National Committee (Poles) , 民族委员会 (波兰) , 234

National Guard, 国民自卫军, 214, 390, 392, 395

National Mechanics' Institute, 国立技工学校, 82

National Society (Manin) , 民族协会 (马宁) , 570

“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 “全国贫民教育促进会” , 85

Nationalverein, 德意志民族协会, 510, 513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69

Naval Discipline Act, 海军军纪法, 297

Naval power, 海上力量: 海军, 274—301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使用, 279, 283, 433

英国的海军费用, 356

武装邮船, 433

法国海军, 276, 281, 283, 284, 298, 299, 300

美国海军, 276, 277, 278, 298, 425

俄国海军, 281, 284, 287

土耳其海军, 281, 284

奥地利海军, 286

意大利海军, 286

德国海军, 516

中国海军, 688

Navigation Laws, 航海法, 它的废除, 38, 334, 344, 351

“Navig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 “意大利航运总公司” , 432—433

Near Eastern Crisis (1839—1840), 近东危机, 254—258, 429, 433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 624, 643

Neckar valley, rising in, 内卡河流域的起义, 395

Negrelli, Louis, 内格雷利, 路易, 奥地利国家铁路总工程师, 436, 437

Neilson, 尼尔森, 克莱德赛德炼铁工人, 热鼓风炼铁法, 29

Nekrasov, Nikolai,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 俄国诗人, 180

Nemesis, “复仇女神号”, 炮舰, 281

Nemours, Louis-Charles, due de, 内穆尔公爵, 路易-夏尔, 比利时王位候选人, 249

Neptune, 海王星, 它的发现, 49

Nerchinsk, Treaty of (1689), 尼布楚条约, 384, 685, 687

Nerval, Gérard de, 奈瓦尔, 热拉尔·德, 诗人, 173

Nesselrode, Karl Robert, Count von, 涅谢尔罗迭伯爵, 卡尔·罗伯特, 俄国政治家, 248, 260, 265, 269, 470, 476, 477

Neue Freie Presse, Austria, 《新自由报》, 奥地利, 126

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新普鲁士报》, 126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莱茵报》, 401

Nevelskoi, G. I., 涅韦尔斯科伊, 根纳季·伊凡诺维奇, 考察家, 385

Nevins, Professor Allan, 内文斯教授, 艾伦, 历史学家, 论林肯, 646

New Brunswick, 新不伦瑞克, 353

Newcastle upon Tyne, 泰因河畔纽卡斯尔, 29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610

Newlands, John Alexander, 纽兰兹, 约翰·亚历山大, 化学家, 63

Newman, John Henry, 纽曼, 约翰·亨利, 红衣主教, 81—84, 92, 100, 156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622—623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613—614, 651

新奥尔良战役, 605

New York, 纽约, 36, 141, 206, 636, 646

New York Associated Press, 纽约联合通讯社, 133

New York Herald (Bennett), 《纽约先驱报》(贝内特主编), 121, 129, 188

New York Sun (Day), 《纽约太阳报》(戴主编), 129, 130

New York Times (Raymond), 《纽约时报》(雷蒙特主编), 129

New York Tribune (Greeley), 《纽约论坛报》(格里利主编), 129

New Zealand, 新西兰, 8, 350, 355, 432

New Zealand Company, 新西兰公司, 353

News agencies, 通讯社, 5, 132

Ney, Michel, 内伊, 米歇尔, 法国元帅, 313

Nicaragua, 尼加拉瓜, 678—679, 680, 681

Nice, 尼斯

航运业和人口, 419—420

疗养地, 421

割让给法国, 463, 571, 572, 573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 俄国沙皇

1825—1850年的近东政策，247，252，256，258—260，266，

与比利时，247

与波兰，251

与奥地利的弗兰茨在明亨格列兹会晤，252

建议缔结四国联盟，258，270

法国的孤立，258

访问英国（1844），259—260，359，471

与1848年的革命，260，394

与普鲁士联盟计划，264—265，502

支持现存的条约，265，269

继位，358

统治时期，XII，358—369

去世，358，369，481

性格，358—359，361，363，462

信任军官，361

1826年12月委员会，361

被奥地利抛弃（1854），468

冷落拿破仑三世，470

与导致1852—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危机，470，471，474—

与克里米亚战争，476—479

Nicolaieff，尼古拉耶夫，该地的造船厂，489

Niel，Adolphe，尼埃尔，阿道夫，法国元帅，军队的改革，584—585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哲学家, 157, 158, 170

Nightingale, Florence, 南丁格尔, 弗洛伦斯, 改组英国军队的医疗服务, 72, 486

Nikolaevsk, 尼古拉耶夫斯克, 385

Nikolsburg, Preliminary peace of (1866), 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 519

Ningpo, 宁波, 690, 692

Nitrate industry in Chile and Peru, 智利和秘鲁的硝酸盐工业, 666, 668

Nitrates, Chilian, 智利硝酸盐, 用作肥料, 24, 65

Nitrogen in Soil, 土壤中的氮, 65

Northcote, Sir Stafford, 诺思科特爵士, 斯塔福德, 政治家, 337

Northern Star, 《北极星报》, 347

Norton, Captain, 诺顿上尉, 英国陆军军官, 304

Norway, 挪威

宪法, 189

选举权, 192

民俗学的研究, 219

Notes from the Fatherland, 《祖国纪事》, 368

Novara, battle of 诺瓦拉战役, 186, 263, 406, 497, 564

Nullification, 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原则

争议, 606, 609, 615

法令, 609

Oastler, Richard, 奥斯特勒, 理查德, 改革家, 44, 347

Oberlin College, U.S.A., 奥伯林学院（美国），119

Obломov (Goncharov),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著），169—170, 369

O' Brien, Bronterre, 奥布里恩, 布朗特尔, 宪章派, 347

O' Brien, Smith, 奥布里恩, 史密斯, 爱尔兰政治领袖, 389

O' Connell, Daniel, 奥康内尔, 丹尼尔, 爱尔兰政治领袖, 217

O' Connor, Feargus, 奥康纳, 费格斯, 新闻记者和改革家, 347

October Diploma (1860), 十月文告, 542, 543, 544, 548

Odenwald, 奥登瓦尔德, 395

Odessa, 奥德萨, 26, 479

Oersted, Hans Christian, 奥斯忒, 汉斯·克里斯蒂安, 科学家, 53, 56

Oetker, 厄特克尔, 黑森—卡塞尔自由派领袖, 515

Ohm, Georg Simon, 欧姆, 格奥尔克·西蒙, 科学家, 57

Oidium, 粉孢子菌, 对法国酿酒业的影响, 24

Oken, Lorenz, 奥肯, 洛伦茨, 哲学家和形态学家, 50

Old Catholic schism, 旧天主教的分裂, 100

Old Testament, 《旧约全书》, 从历史角度对该书的评论, 102

Oldenburg, 奥尔登堡, 494

 奥尔登堡公爵, 515

Ollivier, Émile, 奥利维埃, 埃米尔, 政治家, 92, 97, 455, 456, 585, 589, 591, 595

Olmütz, 奥尔米茨

 皇帝和大臣们逃往该地, 403

 施瓦岑贝格和曼陀菲尔的会晤, 502, 532

Olmütz Punctation (1850), 奥尔米茨条约, 普鲁士的耻辱, 204, 210, 265, 410, 412, 503, 508

Omer Pasha, 奥马尔, 帕夏, 土耳其司令, 472, 476, 478

Opium, 鸦片, 72, 687—688, 689

Oporto, 波尔图, 查理·阿尔贝特死于该地, 566

Oregon, 俄勒冈, 203, 621—622, 632

Orenburg, 奥伦堡, 386

Origin of Species (Darwin), 《物种起源》(达尔文著), 67—68, 70—71, 102, 348

Orleanists, 奥尔良派, 444, 446—448, 450, 452, 454, 458

Orlov, Alexis Feodorovitch, prince, 奥尔洛夫公爵, 阿列克西斯·费奥多罗维奇, 外交家, 478, 487

Orsini, Felice, 奥尔西尼, 费利切, 革命分子, 谋刺拿破仑三世, 570

Osaka Bay, 大阪湾, 713

Osborne, Royal Naval College, 奥斯博恩, 皇家海军学院, 293

Oscar I, 奥斯卡一世, 瑞典国王, 483

Ostrovsky, Alexander Nicholaevitch, 奥斯特洛夫斯基,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戏剧家, 182

Otto I, 奥托一世, 希腊国王, 484, 490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列强都关心它的命运, 16

衰落, 186

巴尔干信仰基督教的臣民的民族主义, 240—243

法纳尔希腊人控制着行政机构, 240

受到穆罕默德·阿里的威胁, 251

又见Turkey

Oudinot, Charles-Nicholas, 乌迪诺, 夏尔-尼古拉, 法国元帅, 408

Overbeck, Friedrich, 奥韦尔贝克, 弗雷德里希, 画家, 151

Owen, Richard, 欧文, 理查德, 博物学家, 批评达尔文, 71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社会主义改革家, 110, 194, 341, 342, 345, 346, 348

Oxford college opened to non-Anglicans, 牛津大学向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开放, 87

Oxford Movement, 牛津运动, 81—83, 100, 495

Ozanam, Antoine-Frédéric, 奥扎纳姆, 安托万-弗雷德里克, 作家, 101

Pacca, Bartolomeo, 帕卡, 巴尔托洛梅奥, 红衣主教, 教廷副国务卿, 78

Pacific Railroad Act, 太平洋铁路法, 628

Pacific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太平洋轮船航运公司, 665

Pacific, War of the, 太平洋战争, 666, 668

Paáua, 帕多瓦, 140, 562

Pdez, José Antonio, 派斯, 何塞·安东尼奥, 游击队的领袖, 668

Paixhans, Henri Joseph, 贝汉, 亨利·约瑟夫, 发明家, 276—277, 284, 477

Palacky', Frantisek,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历史学家, 238, 523, 549

Palaeontology, 古生物学, 68

Palermo, 巴勒莫

港口, 420—421

骚动, 560

议会, 565

被加里波第占领, 572

分裂派政府, 576

Palma, 帕尔马, 420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帕默斯顿, 亨利·约翰·坦普尔, 第三代子爵, 政治家

威望, 216

割让爱奥尼亚群岛, 242

与法国合作的政策, 246

与比利时各省, 248—249

与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 252, 255—256, 428

近东政策, 252, 258

势力均衡, 257, 258, 264, 267

就孤立法国答复尼古拉一世, 258

重掌外交部, 259

英俄关系, 260

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261

在意大利的调解 (1848), 262—263

警告普鲁士不要侵略, 26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265

对“不干涉”的解释, 270

被免职, 340

与穆罕默德·阿里, 428—429

将解决办法强加给土耳其和埃及, 429

用海军压制希腊，433

与加富尔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433

苏伊士运河，435—440

内政大臣，474，477

首相，481

反对不成熟的谈判，481

与希腊奥托国王的政府，490

论比萨拉比亚和黑海，492

给内皮尔勋爵的指示，689

Panama railway and canal, 巴拿马铁路和运河，435，680

Pan-Scandinavian movement, 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220

Pan-Slav Conference (1867), 泛斯拉夫会议，234

Pan-Slav Congress (1848), 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187，232—233，402

Pan-Slavism, 泛斯拉夫主义，232—234

Panthays, 班泰人，中国的穆斯林，707

Papacy, 教皇

教皇永无谬误论，13，81，93—94，96，98—99

世俗权力，13，565，583，600

对科学的态度，71

使徒继承论，83

与圣灵怀胎说，88

天主教公会议对教皇的权力，94

指责公民权力的权利，97—98，99

Papal States, 教皇国

废除教皇国， 88

改革行政机构， 88

烧炭党人的起义， 443

格列高利十六世的专横统治， 554

百人队， 554

犹太人被允许居住在犹太区之外， 559

与托斯卡纳结成经济联盟， 560

对摩德纳和帕尔马的阴谋， 563

Paper, wood-pulp, 木浆纸， 64

Paraguay, 巴拉圭， 659, 672—673

Paraguayan war (1864—1870年)， 巴拉圭战争， 663, 673

Paraná, 巴拉那， 671

Paris, 巴黎

巴黎大主教， 89

建筑， 140—142, 460

艺术院， 142

在1848年， 392—395, 397—398, 399—400, 415

人口， 459

大部分为拿破仑三世所重建， 460

半上流社会在巴黎的作用， 460—461

Paris, comte de, 巴黎伯爵， 393

Paris, Congress of (1856)， 1856年巴黎会议， 128, 235, 241, 268, 487—491

Paris, Declaration of (1856)， 巴黎宣言， 299, 491

Paris Exhibition of 1867, 1867年巴黎博览会， 29

Paris-Lyon-Méditerranée railway, 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 436

Paris, Treaty of (1856), 巴黎条约, 32, 269, 271, 433, 462, 488—490, 600

Parisis, Mgr Pierre-Louis, 帕里西斯长老, 皮埃尔-路易, 朗格勒主教, 79

Parkes, Harry, 巴夏礼, 英国驻广州的领事, 704

Parma, 帕尔马, 209, 552—553, 572

犹太人在行政机构中, 556

政治上的容忍, 556

Paroles d'un croyant (Lamennais), 《一个信徒的话》(拉梅内著), 78, 216

Parsonstown, 帕森斯顿, 58

Pasteur, Louis, 巴斯德, 路易, 化学家, 24, 51, 63, 65—67, 73

Pastor Aeternus, 《永恒的牧主》, 98

Patmore, Coventry, 帕特莫尔, 科文特里, 诗人, 178

Patras, 帕特雷, 420, 422

Pavia, 帕维亚, 321

Pavón, battle of, 帕翁战役, 671

Paxton, Joseph, 帕克斯顿, 约瑟夫, 园艺家, 136

Peabody Trust, the, 皮博迪信托公司, 139

Peehi, Count Gioacchino Vincenzo, 佩基伯爵, 焦阿基诺·维琴佐, 佩鲁贾主教, 89

Pedro I, 佩德罗一世, 巴西皇帝, 660

Pedro II, 佩德罗二世, 巴西皇帝, 661—663

Peel, Sir Robert, 皮尔爵士, 罗伯特, 政治家, 26, 38, 202, 259, 339, 343

Peiho river, 白河, 701

Pélissier, Aimable-Jean-Jacques, 佩利西埃, 埃马布尔-让-雅克, 元帅, 482

Pellico, Silvio, 佩利科, 西尔维奥, 作家, 558

Penang, 槟榔屿, 432

Peninsul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伊比利亚半岛轮船航运公司, 431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伊比利亚半岛和东方轮船航运公司, 431—432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31, 610—611, 615

Penny Magazine (1832), 《一便士杂志》, 122

People's High School Movement (Denmark), 人民中学运动(丹麦), 119

Péreire, Émile and Isaac, 佩雷尔, 埃米尔和伊萨克, 动产信贷银行创办人, 453

Pérez, José Joachim, 佩雷斯, 何塞·华金, 智利总统, 664, 666

Perier, Casimir, 佩里埃, 卡齐米尔, 法国政治家, 249

Periodic Law, 周期律, 63

Perkin, Sir William Henry, 珀金爵士, 威廉·亨利, 化学家, 52

Pernambuco, 伯南布哥, 661

Perovskii, Count Basil Alexeievich, 佩罗夫斯基伯爵, 巴维尔·阿列克谢维奇, 奥伦堡总督, 387

Perrone, Giovanni, 佩罗内, 乔瓦尼, 罗马学院教授, 88

Perry, Commodore, 佩里, 海军准将, 美国海军指挥官, 710

Persia, 波斯, 685

Persigny, Victor Fialin, duc de, 佩尔西尼公爵, 维克托·菲亚林, 447

Personal Liberty Laws (U.S.A.), 人身自由法 (美国), 625

Peru, 秘鲁, 659, 666—668

Perugia, 佩鲁贾, 554

Peschiera, 佩斯基埃拉, 321

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 裴斯泰洛齐, 约翰·海因里希, 教师, 104, 108

Pesti Hirlap, 《佩斯报》, 238

Petit Journal, 《小日报》, 125, 132

Petitti di Roreto, Carlo Ilarione, 佩蒂蒂·迪·罗雷托, 卡洛·伊拉廖内, 经济学家和慈善家, 561

Petőfi, Alexander, 裴多菲, 亚历山大, 诗人, 238

Petrashevskii-Butaševič, Michail Vasilevič, 彼得拉舍夫斯基-布塔舍维茨,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政治家, 365

Pfordten, Ludwig von der, 普弗尔滕, 路德维希·冯·德尔, 巴伐利亚大臣, 512, 519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费城公共纪事报》, 129, 131

Philipon, Charles (*Caricature and Charivari*), 菲利蓬, 夏尔 (《漫画》和《喧哗》), 131

Philippines, 菲律宾, 686

Phosphates, 磷酸盐, 65

Phosphorus, 磷, 30

Photius, Archimandrite, 佛提乌, 修道院长, 宗教极端分子, 360

Photography, 摄影术, 52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65

Phylloxera, 葡萄蚜, 24, 66

Piacenza, 皮亚琴察, 321, 553, 564

Pickens, Fort, Florida, 皮肯斯堡, 佛罗里达, 627

Pie, Louis François, 皮埃, 路易·弗朗索瓦, 普瓦蒂埃主教, 90

Piedmont-Sardinia, Kingdom of, 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宗教, 政教关系: 教会财产的世俗化, 88, 575; 控制教育, 93; 侵略教皇国, 93; 信教自由, 243, 556, 559; 教会的书报检查, 554; 在卡斯特尔菲达尔多打败教皇军队, 574

政治和宪政的发展: 1848年宪法, 128, 185, 198, 200—201, 395, 412;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的继任, 209, 566; 青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 225; 查理·阿尔贝特的退位, 322, 406, 527, 566; 与法国结盟, 538; 获得利古里亚, 552; 法典的改革, 556; 与托斯卡纳和罗马的争执, 563; 1861年都灵议会, 575; 首相, 575

出版新闻: 出版自由, 128, 557, 560

与奥地利的战争: 库斯托札战役, 186, 263, 402, 523, 564; 在伦巴第攻击奥地利, 200; 诺瓦拉战役, 263, 406, 527, 564; 1849年和约, 264; 利用铁路, 309; 停战, 322, 406; 马让塔战役, 323, 571; 索尔费里诺战役, 323, 571; 法国军队的支持, 323, 462—463; 宣战, 398; 戈伊托战役, 398; 重开战端, 407; 海军基地, 热那亚, 421; 斯培西亚, 569; 除罗马外统治全意大利, 463;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572; 海军在利萨失利, 576

贸易、商业和经济: 发展, 209; 交通, 323, 556; 海关, 556; 农业, 556, 559; 货币, 556, 575; 一个落后的国家, 556; 战费, 567; 克里米亚战争, 569

Pierce, Franklin, 皮尔斯, 富兰克林, 美国第十四任总统, 203, 624

Pigot, John, 皮戈特, 约翰, 爱尔兰爱国者, 217

Piracy, 海盗行为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422

在中国, 696

Piraeus, 比雷埃夫斯, 419—420, 422, 484

Pirie, Sir John, 皮里, 约翰, 从男爵, 船主, 438

Pisa, 比萨, 562

Pius IX, Giovanni Mastai-Ferreti, 庇护九世, 乔瓦尼·马斯塔伊-费雷蒂, 教皇

《现代错误学说汇编》, 9, 89—94

反对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71

恢复地区教阶制度, 84

就任, 87, 185, 389, 559

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下, 88

大赦政治犯, 88, 389

逃往加埃塔, 88, 408, 564

拒绝公开谴责蒙塔朗贝尔, 90

召开公会议, 93

与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关系, 95

优先确定教皇永无谬误论的定义, 98

把意大利的国王和政府革出教门, 99

向奥地利投降, 200

任命内阁, 395

颁布宪法，395

谴责战争，402

向奥地利求援，408

对自由主义不妥协，454

对在群众中的威望很敏感，559

转而相信焦贝蒂的思想，559

被迫颁布宪法，560

谴责墨西哥的立法，676

Place, Francis, 普莱斯，弗朗西斯，激进派，345，347

Plague and the black rat, 瘟疫和黑死病，72

Plating, electro, 电镀技术，13

Plener, Ignatius von, 普莱纳，伊格纳茨·冯，匈牙利财政大臣，543

Pletkov, 普列特科夫，俄国作家，213

Plombières, Pact of (1858), 普隆比埃密约，16，209，271，463，538，571

Poe, Edgar Allan, 坡，埃德加·爱伦，作家，167，179

Poelaert, Joseph, 波埃莱特，约瑟夫，建筑师，142

Pogodin, Michael Petrovitch, 波戈金，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历史学家和政治家，232，368

Pola, 波拉，421

Poland, 波兰

法兰克福议会投票赞成独立，228

1830—1831年的移民，234，237

克拉科夫并入哈布斯堡帝国，235

亚历山大二世的大赦, 235
农业协会, 235
华沙医学科学院, 235
行政和教育的改革, 235
要求归还东部边疆地区, 235
俄语成为官方语言, 236
宗教课遭到禁止, 236
肃清自治的痕迹, 236
成为“维斯杜拉领地”, 236
起义: (1830—1831), 21, 186, 248, 362; (1846), 234—235, 397; (1863), 21, 128, 186, 230, 236—237, 513
镇压措施, 252—253
重建波兰的“阿尼姆”计划, 262
农奴制, 372
在1848年, 390, 391, 397
巴黎会议讨论波兰问题, 490
Polignac, Jules, prince de, 波利尼亚克公爵, 朱尔, 427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6, 53
Politecnico (Cattaneo), 《综合工艺》(卡塔内奥), 556
Polk, James, Knox, 波尔克, 詹姆斯·诺克斯, 美国第十一任总统, 622
Polytechnikum, 综合工科学学校, 苏黎世, 106
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 济贫法修正法案, 337
Poor Law Commissioners, 济贫法委员会, 337

Poor Man's Guardian (Henry Hetherington), 《穷人卫报》
(亨利·赫瑟林顿), 121

Pope and the Council (Janus), 《罗马教皇与公会议》(雅努斯), 94

Populist movement, 民粹派(平民党)运动

俄国的民粹派运动, 375

美国的平民党运动, 611

Port Mahon, 马翁港, 420

Port Said, 塞得港, 420, 424

Portales, Diego, 波塔莱斯, 迭戈, 智利政治领袖, 664, 665

Portugal, 葡萄牙, 253, 686, 688

Posen, Grand Duchy of, 波森大公国, 228, 234, 397, 494

Postal service, 邮政, 1840年英国的邮政改革, 36

Postl, Carl (Charles Sealsfield), 波斯特尔, 卡尔(查尔斯·西尔斯菲尔德), 奥地利作家, 194

Potassium salts, 钾盐, 24

Potatoes, 马铃薯, 24, 26, 343

Pottery industry, 陶器工业, 342

Pottinger, Sir Henry, 璞鼎查爵士, 亨利, 上校, 690

Prague, 布拉格, 100, 402, 523

Prague, Treaty of (1866), 布拉格条约, 220, 519, 520, 580

Prague News, 《布拉格新闻》, 238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Jomini), 《战争学概要》
(约米尼), 314—315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 151—153

Press, 新闻出版, VII, 14, 121—133, 409, 449, 486, 496

在奥地利, 126, 127, 504

在比利时, 127

在丹麦, 127

在挪威, 127

在瑞典, 127

在瑞士, 127

在意大利, 128, 560, 569

在埃及, 131

在印度, 131

在日本, 131

Press Association, 英国联合通讯社, 132

Pressburg, 普雷斯堡, 395, 396

Presse, Die, 《新闻报》, 维也纳, 126

Presse, La, 《新闻报》, 巴黎, 121, 124

Prévost-Paradol, 普雷沃-帕拉多尔, 作家, 《辩论报》撰稿人, 123

Prieto, Joaquín, 普列托, 华金, 智利总统, 664

Prim, Juan, 普里姆, 胡安, 政治家和将军, 586, 588, 594

Prince Albert, H. M. S., “阿尔贝特亲王号”, 英国军舰, 286

Princeton, “普林斯顿号”, 1842年建造, 美国军舰, 281

Principalities, The, 多瑙河两公国, 204

民族意识的增强, 241

俄国的撤出, 478

被奥地利占领, 479

今罗马尼亚, 488

奥地利撤出，489

Principles of Geology (Lyell)，《地质学原理》（赖尔著），68，102

Privateering, formal abolition, 私掠巡航的正式废止，491

Prix de Rome, 罗马奖，144

Prospective Review, 《展望评论》，156

Protestant Dissenting Deputies, The (B.L. Manning)，《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国会议员》（B.L. 曼宁著），86

“Protestant Patent”，“新教特许令”，542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社会主义者，149，392

Prussia, 普鲁士，X V—X VI，493—521

军队：改革，16，509—510，515；总参谋部，310—311；征兵制和编制，311—312；1814年普鲁士陆军法，312；普鲁士军事学校，317；战时后备军，509

争取德意志霸权的斗争，16；在德意志占支配地位的力量，100；走向统一的进展，465；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为德意志事务承担责任，500；俾斯麦确立普鲁士政策的独立性，506

条约和联盟：奥尔米茨条约，210，265，410，412，503；与萨克森和汉诺威达成协议，409；1853年奥地利商务条约，505；1862年法国商务条约，505；1864年与奥地利结盟，515；1866年与意大利结盟，517；1866年布拉格和约，220，519；与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的密约，580

贸易、商业和经济：谷物进口，26；缺少艺徒和短工，45；童工，45；关税同盟使之改进，494，503；铁路，505；人口，579

宪政发展：1850年宪法，109，409，498；民主制度，189；1817年特许令，391；1848年的变化，397—398，405，498；1849年的反动，407，409，498；改革的要求，496；联合议会的召开，496—

497; 1860—1866年的冲突, 510—512, 515, 517—520; 民族自由党的成立, 521

君主制: 受到温和的限制, 185; 修宪权, 409; 不再是专制政权, 412; 大臣任免权, 498; 国王的神圣权利, 499

行政机构: 地方政府, 206—207; 行政制度, 495

宗教: 与罗马天主教会和解, 494—495

教育, 107—109, 111—113, 495

新闻出版, 125—127, 131—132

海军, 516

与1870—1871年普法战争: 争执的根源, 16, 597—599; 要求获得阿尔萨斯—洛林, 17, 600; 宣战, 78; 夏斯波后膛枪的优越性, 305; 使用后膛炮, 306, 325; 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 306, 326; 色当战役的胜利, 306, 327; 机关枪的失效, 307; 电报的使用, 310; 下级指挥官的主动性, 310; 战略, 325—326; 优越的部署, 325; 沃思战役, 326; 维翁维尔战役, 326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和1848年和1864年与丹麦的战争: 各独立邦, 219; 1848年普鲁士派驻军队, 219, 265; 公民投票的规定, 220; 奥古斯滕堡君主的候选资格, 515, 516; 1864年与丹麦的战争, 515; 俾斯麦的目的, 兼并, 516

与1866年的七周战争: 普鲁士撞针枪的价值, 305; 普鲁士取得初战优势, 308; 铁路的利用, 308—309, 324; 由柏林指挥行动, 310; 毛奇的战略, 324—325; 王太子率领的部队的到达, 325; 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失败, 325, 519; 中断外交关系, 519; 布拉格和约, 519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在1870年前几乎没有改进, 44

Pugin, A. W. N., 普金, 奥古斯塔斯·韦尔比·诺思莫尔, 建筑师, 136, 137

Punch, 《笨拙》周刊, 131

Punta Arenas, 阿雷纳斯角, 665

- Pusey, Edward Bouverie, 皮由兹, 爱德华·布弗里, 牧师, 83
- Pushkin, Alexander, 普希金, 亚历山大, 诗人, 172, 182, 368
- Putyatin, Count, 普佳京伯爵, 俄国海军上将, 385, 702
- Pyat, Félix, 皮阿, 费利克斯, 政治家和戏剧家, 408
- Quadruple Agreement (1840), 四国协定, 257, 429
- Quadruple Alliance, 四国联盟 (1815), 462; (1834), 253—254, 462
- Quakers in U.S.A., 美国的教友派教徒, 610, 616
- Quanta Cura*, 《若干忧虑之事》, 1864年底护九世教皇的通谕, 90
- Queretaro, 克雷塔罗, 马克西米连在该地被处死, 582
- Quinet, Edgar, 基内, 埃德加, 作家, 216, 241
- Quinine, 奎宁, 64, 72
- Quito, 基多, 668
- Radetzky, Count Joseph, 拉德茨基伯爵, 约瑟夫, 奥地利陆军元帅, 321—322, 396, 402, 523, 562—564
- Radiations, study of, 放射性的研究, 58
- Radowitz, General Josef Maria von, 拉多维茨将军, 约瑟夫·玛丽亚·冯, 普鲁士外交大臣, 264, 500—502
- Raglan, Fitzroy Somerset, 1st Baron, 拉格伦, 菲茨罗伊·萨默塞特, 第一代男爵, 英国陆军司令, 322, 478, 482
- Ragusa, 拉古萨, 422
- Raiffeisen, Friedrich Wilhelm, 赖菲森, 弗里德里希·威廉, 23
- Railways, 铁路
- 与其他各种交通工具的竞争, 4, 26, 33

英国和比利时的领先地位, 30

迅速发展时期, 32, 332

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 32, 332

运营里程, 32, 332

旅行速度, 32, 33

舒适性, 33, 141

作为通用的运输工具, 33

运费, 33

到1859年的发展, 34

用于军事, 308—309, 323, 324, 325, 328, 329

电报的发展, 332

资金, 334

在阿根廷, 672

在澳大利亚, 34, 350

在奥地利, 530, 535, 536

在比利时, 33

在巴西, 662

在加拿大, 350

在埃及, 432

在法国, 33

在德国, 494, 505

在荷兰, 34

在印度, 34, 350

在意大利, 34, 556, 561

在秘鲁，668

在俄国，34

在西班牙，34，420

在美国，34，612，618，624，643

Rajačić, 拉亚契奇，塞尔维亚大主教，529

Ram Mohan Roy, 拉姆·摩罕·罗易，印度思想家，118

Randall, J.G., 兰德尔，约·乔，历史学家，论林肯的解放宣言，629

Rankine, William John Macquorn, 兰金，威廉·约翰·麦夸恩，物理学家，59

Raspail, François, 拉斯帕伊，弗朗索瓦，化学家和政治家，399，404

Rat, black, 黑死病，72

Rattazzi, Urbano, 拉塔齐，乌尔巴诺，皮埃蒙特，政治家，568，570，572，576

Rauscher, Joseph Othmar von, 劳舍尔，约瑟夫·奥特马尔·冯，红衣主教，弗兰茨·约瑟夫的导师，533

Ravenna, 拉文纳，554

Rawlinson, Sir Henry Creswicke, Bart, 罗林森爵士，亨利，克雷齐克，从男爵，陆军少将，388

Raymond, Henry J., 雷蒙德，亨利，美国新闻记者，129—130

Raznochintsi, the, 平民知识分子，106

Reaping by machine, 机械收割，25

Rechberg, Count Johann Bernard, 雷希贝格伯爵，约翰·贝恩哈德，奥地利外交大臣，512，514，539，547

Reciprocity Treaty, Anglo-American (1854), 英美互惠条约，354

Red Cross Society founded, 红十字会成立, 7

Redlich, Josef, 雷德利希, 约瑟夫, 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论克雷姆西尔宪法草案, 197

Reed, Sir Edward James, 里德爵士, 爱德华·詹姆斯, 海军建筑师, 286

Reed, William Bradford, 列卫廉·布雷德福, 律师, 外交官, 702

Reeve, Henry, 里夫, 亨利, 《泰晤士报》主笔, 122

Reffye, J.B.A. Verchère de, 雷菲耶, 韦西埃·德, 炮兵军官, 307

Reform Association (*Reformverein*), 改革同盟, 512

Reform Club, 改革俱乐部, 伦敦(自由党), 138, 339

Réforme, La, 《改革报》, 124, 390, 393

Reggio, 勒佐, 553

Reichsrath, the Austrian, 奥地利帝国咨议院, 533, 540, 541, 545, 546, 550

Reichstadt, duc de, 赖希施塔特公爵, 拿破仑一世之子, 443, 446

Reichstag,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帝国议会(北德意志邦联), 579

Religion, 宗教, VI, 76—103

传教活动, 8, 79, 83, 423, 695—697, 708—709

教皇永无谬误论, 13, 81, 93—94, 96, 98—99

废除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 76

法国的宗教派别, 78, 451

在巴勒斯坦, 469

解散修道院，81，676

耶稣会，81，88，223，523，565，675

牛津运动，81—83，100

使徒继承论，83

政教分离，83，100—101，218，676

《现代错误学说汇编》，89—94，454，459

教皇指责世俗权力的权利，97—99

犹太教，243—244，540

在圣地的东正教，470，473

美国的新教徒，625

Religion of Israel (Kuenen, 1869)，《以色列的宗教》（库南著，1869年），102

Renan, Ernest, 勒南，欧内斯特，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9，102

Renoir, Auguste, 雷诺阿，奥古斯特，画家，154

Renwick, James, 伦威克，詹姆斯，建筑师，141

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Durham)，《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德拉姆），353

Report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Permanent Civil Service (Trevelyan and Northcote)，《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特里维廉和诺思科特），337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人民代表选举法，（1861）338；（1867）334，338

Republican Party (U.S.A.)，共和党（美国）

成立，626

与林肯向南部联盟提出的条件，629

内部派系，647—649

Researches into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Tylor), 《人类早期历史研究》(泰勒著), 102

Reshid Pasha, 赖希德帕夏, 土耳其外交大臣, 471, 473

Reuter's news agency, 路透通讯社, 5, 132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两个世界评论》, 123, 128, 436

Rheinische Zeitung, 《莱茵报》, 125, 495

Rhett, Barnwell, 雷特, 巴恩韦尔, 脱离联邦主义者, 627

Rhine, river, 莱茵河, 32, 228, 326, 495, 506, 579, 585, 599

Rhineland, the, 莱茵兰, 390, 392, 494—496, 508

Rhodes, Island of, 罗得岛, 228

Ricasoli, Baron Bettino, 里卡索利男爵, 贝蒂诺, 意大利政治家, 572, 575

Richmond, Virginia, 里士满, 弗吉尼亚州, 南部联盟首都, 327, 328, 330, 634, 654

Riemann, Georg, 黎曼, 格奥尔格, 数学家, 56

Rietschel, Ernst, 里切尔, 恩斯特, 雕塑家, 143

Rimbaud, Arthur, 兰波, 阿尔蒂尔, 诗人, 171, 172, 179, 180

Rio Branco Law (1871), 里约布朗科法, 663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661—662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

共和国, 659, 669

又见Argentina

Rio Grande do Sul, 南里奥格兰德, 该地的骚乱, 661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Motley),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莫特利著), 211

Risorgimento, II (Balbo and Cavour), 《意大利复兴运动》
(巴尔博和加富尔), 560

Roads, macadamised, 碎石路, 31

Robert College (Constantinople), 罗伯特学院 (君士坦丁堡), 423

Roberts, Issachar Jacob, 罗孝全 (罗伯茨, 伊萨卡·雅各布), 前往中国的传教士, 697

Rochdale Co-operative Manufacturing Society, 罗奇代尔合作生产协会, 348

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 46, 348

Rochefort, Henri (*La Lanterne*), 罗什福尔, 亨利 (《灯笼报》), 125, 455

Rodbertus, J.K. von, 罗德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冯, 经济学家, 505

Roebuck, John Arthur, 罗巴克, 约翰·阿瑟, 政治家, 481

Roenne, Friedrich von, 伦纳, 弗里德里希·冯, 法兰克福政府驻美国代表, 195

Romagna, the, 罗马涅, 572

Rome, 罗马

拉梅内鼓吹他的事业, 78

罗马共和国, 88, 198, 565

法国军队在罗马, 88, 95, 444, 465, 565, 573—574, 576, 583

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 98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的纪念碑, 142

加里波第进军罗马, 201

罗马的陷落, 408

教皇在罗马的统治, 463, 554, 559—560

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 600

Roon, Albrecht, Count von, 罗恩伯爵, 阿尔布雷希特·冯, 普鲁士政治家和将军, 324, 509, 517, 593, 597

Rosas, Juan Manuel de, 罗萨斯, 胡安·曼努埃尔·德, 阿根廷独裁者, 663, 669—671

Rosmini-Serbati, Antonio, 罗斯米尼-塞尔巴蒂, 安东尼奥, 神学家和哲学家, 558, 565

Rosse, William Parsons, earl of, 罗斯伯爵, 威廉·帕森斯, 天文学家, 58

Rossetti, Dante Gabriel, 罗塞蒂, 丹特·加布里埃尔, 诗人和画家, 151, 152, 153, 177, 178, 225

Rossetti, Gabriel, 罗塞蒂, 加布里埃尔, 诗人和自由主义者, 552

Rossi, Count Pellegrino, 罗西伯爵, 佩莱格里诺, 外交家和经济学家, 他的被刺, 408

Rostovtsev, Jacob, 罗斯托夫采夫, 雅各布, 文官, 371

Rothschild, house of, 路特希尔德家族, 34, 243, 535, 663

Rotteck, Karl Wenceslas von, 罗特克, 卡尔·文策斯拉斯·冯, 历史学家, 193, 194

Rouault, Georges, 鲁奥, 乔治, 画家, 146

Roubaix, 鲁贝, 459

Rouher, Eugène, 鲁埃, 欧仁, 政治家, 447, 582, 583

Roumania, 罗马尼亚

建立, 229, 241, 462, 488

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 239—240, 402—403, 523, 529, 537, 541, 546

又见Principalities条下

Rousseau, Théodore, 卢梭, 泰奥多尔, 画家, 147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journal, 皇家农业协会的刊物, 23

Royal Commission, 皇家专门委员会

关于爱尔兰教会收入问题的(1832), 100

关于大学问题的(1850), 50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139

Royal Naval College, Portsmouth, 皇家海军学院, 朴次茅斯, 291—292

Roze, Pierre Gustave, 罗兹, 皮埃尔·古斯塔夫, 舰队司令, 709

Ruatan, island of, 鲁阿丹岛, 679, 681

Rubber, 橡胶, 52, 53

Rude, François, 吕德, 弗朗索瓦, 雕塑家, 143

Rudin (Turgenev), 《罗亭》(屠格涅夫著), 369

Ruffin, Edmund, 拉芬, 埃德蒙, 农业家, 出版商和脱离联邦主义者, 627

Rüge, Arnold, 吕格, 阿诺尔德, 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 506

Ruggiero, Guido de, 鲁杰罗, 圭多·德, 政治思想家, 209

Ruhr, 鲁尔

煤矿, 30

新工业主义, 494

人口, 505

Ruskin, John, 罗斯金, 约翰, 艺术评论家和作家, 63, 137, 178

Russell, Alexander (*Scotsman*), 拉塞尔, 亚历山大 (《苏格兰人报》主编), 123

Russell, Lord John, 罗素勋爵, 约翰

致德拉姆主教的“公开信”, 85

论英国与欧洲的联系, 267

维多利亚女王的备忘录, 340

组织政府未成, 343

与加拿大宪法, 353

与选举改革, 411, 477

外交大臣, 471

在1855年维也纳会议上, 481—482

不干涉原则, 572

Russell, Lord Odo, 拉塞尔勋爵, 奥多, 英国驻罗马代表, 95

Russell, William Howard, 拉塞尔·威廉·霍华德, 《泰晤士报》随军记者, 122

Russia, 俄国, XII—, 357—388

领土的变化: 将其边疆扩展到朝鲜, 7; 征服中亚细亚各汗国, 381—382, 386—388; 将阿拉斯加让给美国, 384; 获得阿穆尔河省和萨哈林岛, 385, 704; 占领和归回伊犁, 707

反叛: 波兰的起义, 13, 229, 234, 237, 251, 362, 376; 乌克兰的秘密团体, 231

贸易和工业: 出口, 26, 364, 380; 生产率, 364, 380; 生铁生产, 364, 381; 关税政策, 364, 380; 货币, 364; 家庭工业, 364; 纺织工业, 364, 380; 铁路, 365, 380, 381, 382, 385, 386;

合作制度，371，373；俄罗斯银行，379—380；财政改革，379；收成，380，381；股份公司，380；税收，382；煤，388

教育：国家的控制，106，230，362—363，379；大学，106，230，363，365，378；教育部，360；科学院，363；中等和初等教育，378；科学教育，379

社会结构：知识阶级没有可靠的地位，106；解放农奴，204，370—372，380—382，487；需要进行国内改革，268；贵族，360，369；公开贩卖农奴，361；“自由”农，361；赎买自由的权利，362；军队是个人发迹的主要途径，369；用金钱偿付劳役，369；西伯利亚、波兰和外高加索的农奴制，372；奴隶制，383，387；强迫向远东移民，385

政府机构：地方自治会，111；警察统治，359；皇帝陛下办公厅，359，360，361；第三厅，359，361；教育部，360；大臣会议，360，379；国务会议，360，377；地方政府，361

新闻出版，128—129，230，368，370—371；检查制度，128，359—360，365，368，376，378

建筑，139，142，363

文学，165—166，168—169，182，366—369

克里米亚战争，X V，468—492；结局，241；俄国海军在战争中，279，281；俄国军事上的缺陷，322

军队：征兵制，236，379；在克里米亚战争中，322—323；军队的声誉，369；军队的腐败，369；个人发迹的主要领域，369；军队的规模，369；普遍兵役制，379

条约：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252，255—256，428，468；明亨格列兹协定（1833），252—253，365；法俄条约（1859），491；巴黎条约（1856），269，488—490，600；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470，476

宗教：皈依东正教，231；圣经会被解散，360；沙皇的权威，363

司法制度：皇帝陛下办公厅颁发的法令，360；法律的编纂，363，487；放逐，372；新司法制度，377—378；法庭，378

君主制度：沙皇的神圣权利，363

Russian America Company, 俄美公司，384

Ruthenes, 罗塞尼亚人，525, 530, 537, 541, 549

Rutherford, Mark (William Hale White), 拉瑟福德，马克（威廉·黑尔·怀特），158

Sacconi, Giuseppe, 萨科尼，朱塞佩，建筑师，142

Sadowa, 萨多瓦，见Königgrätz

Šafarik, Josef, 沙法日克，约瑟夫，学者，232

Said Pasha, 赛义德帕夏，埃及总督，438, 439, 440

Saigon, 西贡，709

Saint Arnaud, Armand Leroy de, 圣阿尔诺，阿尔芒·勒鲁瓦·德，法国元帅，444, 445, 478

Saint Domingue, 圣多明各，改名海地，659

Saint-Simon, Comte Claude, Henri de, 圣西门伯爵，克洛德·亨利，哲学家，109

Saint Simonian school, 圣西门学派

对铁路和银行发展的影响，3

对莱塞普斯的影响，434—435

支持拿破仑三世，453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of, 味增爵会，78, 101, 708

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圣伯夫，夏尔-奥古斯坦，评论家，125, 149

Sakhalin, island of, 萨哈林岛（库页岛），384, 385

Sala, G. A., 萨拉，新闻工作者，122

Salasco, Carlo di, 萨拉斯科, 卡洛·迪, 皮埃蒙特将军, 564

Salazar y Mazarredo, 萨拉查-马萨雷多, 西班牙国务大臣, 588, 589

Salic law in Denmark, 丹麦的萨利克继承法, 219

Salonica, 萨洛尼卡, 419—420, 423

Salt trade, Austro-Piedmontese, 奥地利—皮埃蒙特的盐业贸易, 559

Salvador, EL, 萨尔瓦多, 678

Salzburg, meeting of Napoleon III and Francis Joseph, 拿破仑三世和弗兰茨·约瑟夫的萨尔茨堡会晤, 582

Samarin, George, 萨马林, 乔治, 改革家, 375

Samarin, G.F., 萨马林, 尤·费, 行政官员, 368

Samos, Island of, 萨摩斯岛, 422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636, 643

San Jacinto, battle of, 圣哈辛托战役, 621

San Jacinto, U.S. frigate, “圣哈辛托号”, 美国快速帆船, 639

San Juan river, 圣胡安河, 679, 680, 681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中美洲联合省首都, 679

Sanctuary, in Piedmont, right of, 庇护权, 在皮埃蒙特, 567

Sand, George (Aurore Dupin, baronne Dudevant), 桑, 乔治 (奥罗尔·迪潘, 杜德旺男爵夫人), 小说家, 124, 165

Santa Anna, Antonio Lopez de, 圣安娜, 安东尼奥·路佩斯·德, 将军和政治家, 203, 208, 674

Santa Cruz, Andrés, 圣克鲁斯, 安德烈斯, 将军, 玻利维亚独裁者, 665, 667

Santander, Francisco de Paula, 桑坦德, 弗朗西斯科·德·保罗, 哥伦比亚爱国者, 669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617, 682

São Paulo, 圣保罗, 661

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 萨米恩托, 多明戈·福斯蒂诺, 阿根廷流放者, 665, 670

Satsuma, 萨摩, 712—713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123

Savannah, 萨凡纳, 329

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法学家, 227

Savoy, 萨伏伊, 割让给法国, 463, 472

Saxony, 萨克森, 392

道路状况, 31

政府改革(1831), 189

起义, 397, 407, 500

工业动乱, 497

三王国联盟, 501

计划修改联邦宪法, 501

城市人口, 505

国王, 将王位让给普鲁士的威廉一世, 514

遭普鲁士侵犯(1866), 519

加入北德意志邦联, 520

Scharnhorst, 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沙恩霍斯特, 格哈德·约翰·达维德·冯, 将军和改革家, 310, 317

Schele de Vere, Maximilian, 舍勒·德弗雷, 马克西米连, 1848年在法兰克福的瑞典观察家, 195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von,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 哲学家, 78, 496

Schiller, Johann Friedrich von, 席勒, 约翰·弗里德里希·冯, 诗人和戏剧家, 134

Schinkel, Karl Friedrich, 申克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 建筑师, 139, 140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威廉, 评论家, 139, 172

Schlegel, Friedrich, 施莱格尔, 弗里德里希, 评论家, 158, 171

Schleiden, Matthias Jakob, 施莱登, 马蒂亚斯·雅各布, 植物学家, 67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219—220, 265, 464, 514—518, 520

Schmerling, Anton Baron von, 施默林男爵, 安东·冯, 奥地利政治家

与德意志的统一, 194

企图恢复地方自治, 207

主张实现大德意志, 512

司法大臣, 529

辞职, 533

取代戈武霍夫斯基, 544

中央集权主义者, 545

与匈牙利国会, 546

被免职, 548

Schneckenburger, Max, 施内肯贝格尔, 马克斯, 诗人, 227, 495

Schönbrunn, Francis Joseph meets William I at (1864), 申布龙宫, 弗兰茨·约瑟夫与威廉一世在此会晤, 516

School Board (U.K.), 教育委员会(英国), 1870年设立, 337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Arnold), 《欧洲大陆上的中学和大学》(阿诺德), 115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阿图尔, 哲学家, 183, 184

Schültze, Max Johann Sigismund, 舒尔策, 马克斯·约翰·西吉斯蒙德, 解剖学教授和生理学家, 67

Schulze-Delitsch, Hermann, 舒尔茨-德利奇, 赫尔曼, 经济学家, 505, 507,

Schurz, Carl, 舒尔茨, 卡尔, 美国共和党政治家, 206

Schwann, Theodor, 施万, 特奥多尔, 生理学家, 66, 67

Schwarzenberg, prince Felix von, 施瓦岑贝格亲王, 费利克斯·冯, 奥地利政治家

解散议会并暂停宪法, 197, 408

鼓吹奥地利的霸权地位, 203, 499, 503

迫使恢复德意志邦联, 210

在伦巴第的镇压措施, 263

致普鲁士的最后通牒, 265

组阁, 406, 524

请求俄国支援, 407

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谈判, 409—410

使奥地利成为中央集权国家, 413

他的去世, 413, 533

他的性格，498

企图使整个奥地利加入邦联，499，538

利用黑森—卡塞尔选帝侯的要求，502

他的制宪希望的破灭，503

颁布新宪法（1849年3月），526

取代温迪施格雷茨，528

讨厌巴赫，531

签署奥尔米茨条约，532

Schwarzenberg, Friedrich, Prince von, 施瓦岑贝格侯爵，弗里德里希，奥地利主教，推迟发表公会议的法令，100

Schwerin Palace, 什未林宫，142

Scotland, 苏格兰

排干沼泽地，24

教会，83—84

民族主义，217n

人口，331—332

公民权，335

Scotsman, The, 《苏格兰人报》，123

Scott, Sir George Gilbert, 斯科特爵士，乔治·吉尔伯特，建筑师，136，138，145，149

Scott, Sir Walter, 司各特爵士，沃尔特，小说家，157，165

Scott, Winfield, 斯科特，温菲尔德，将军，军人和总统提名人
林肯对他的批评，657

占领墨西哥城，674

Screw-propeller, perfection of, 螺旋桨的完善，278

Scutari, 斯库台, 478

Sebastopol, siege of,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 306, 322—323, 479, 480, 482

Sebenico, 塞本尼科, 422

Secession, Ordinances of (U.S.A. 1860—1861), 脱离联邦法令 (美国), 627

Secret Societies, 秘密团体

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 (乌克兰), 231

在波兰, 234

在保加利亚, 243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647

在中国, 699, 700

Sedan, battle of (1870), 色当战役, 305, 306, 327, 465

Sedgwick, Adam, 塞奇威克, 亚当, 地质学家, 批评达尔文, 71

Seebach, Saxon minister in Paris, 泽巴赫, 萨克森驻巴黎公使, 484

Semipalatinsk, 塞米巴拉金斯克, 386

Semper, Gottfried, 桑珀, 戈特弗里德, 建筑师, 141

Senegal, 塞内加尔, 461

September Convention (1864), 九月条约, 88

Seraing, 塞兰, 附近的煤和矿石, 30

Serbia, 塞尔维亚, 240—242, 474

Serfdom, abolition of, 废除农奴制

在奥地利帝国, 6, 413—414, 523, 530

在俄国, 6, 370—372

- Serrano-Solovevich, S., 谢尔纳-索洛维耶维奇, 革命家, 373
- Serrano, Dominguez Francisco, Duke of La Torre, 塞拉诺, 多明格斯·弗朗西斯科, 拉托雷公爵, 586
- Seton-Watson, R. W., 塞顿-沃森, 历史学家
- 论克雷姆西尔宪法草案, 197
- 论克里米亚战争, 260
- Sewage disposal, 污水处理, 72
- Seward, William Henry, 西沃德, 威廉·亨利, 美国政治家, 638, 646
- Seymour, Sir George Hamilton, 西摩爵士, 乔治·汉密尔顿, 外交家, 英国大使, 471, 478, 485
-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沙夫茨伯里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83, 341
- Shamyl, 沙米尔, 高加索游击队领袖, 386
- Shanghai, 上海
- 成为国际租界, 7, 693
- 通商口岸, 692
- 它的发展, 693
- 被小刀会占领, 700—701
- 贸易由于太平天国反叛而受到影响, 705
- 英法军队防卫上海, 706
- 讲授西方科学和数学的学校, 708
- Shaw, Richard Norman, 肖, 理查德·诺曼, 建筑师, 154—155
- Sheffield, 谢菲尔德, 42, 43
- Sherman, William T., 谢尔曼, 威廉·特库姆塞, 将军, 316, 329—330, 655

Shevyrev, Stepan Petrovich, 舍维列夫, 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文学评论家, 368

Shiloh, battle of, 夏伊洛战役, 632

Shimoda, 下田, 贸易港口, 711, 712

Shinto religion, 神道教, 711

Shipbuilding, 造船业, 该行业中雇用的工人, 333

Shipping, 航运, 25—26

在湖上和河上运输粮食, 4, 32, 35

横贯大西洋的航运, 36, 332

英国航运吨数, 332—333

依靠航运使殖民地与英国保持联系, 349

地中海各港口航运吨数, 419—420

到地中海和以东地区的邮政, 431—432

游船, 432

旧金山—上海航班, 710

Short Outline of Croat-Slovene Orthography (Gaj), 《简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正字法》(加伊著), 238

Siam, 暹罗

当地的传教活动, 79

英国与之签订的条约, 709

Siberia, 西伯利亚

向该地的移民和流放, 2, 358, 372, 384

农奴制, 372

俄国势力在当地的巩固, 382

行政, 383

人口, 383, 384

边境, 384—386

Siccardi laws (1850), 西卡尔迪法令 (1850), 567

Sicily, 西西里

英国式的宪法 (1812), 199, 560

1848年的起义, 389, 560, 562, 565

人口, 552

在行政上与那不勒斯联合, 560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573

军事管制法, 576

Siècle, Le, 《时代报》, 124, 125

Siemens, Werner von, 西门子, 维尔纳·冯, 工业家和无线电报先驱者, 51, 53

Silesia, 西里西亚, 392, 401, 413

纺织工业, 400, 497

人口, 505

捷克人的统治, 523

Silistria, siege of, 锡利斯特拉之围, 478, 479

Silk, 丝

里昂的丝织工业, 42

代用品, 64

Simon, Jules, 西蒙, 朱尔, 政治家, 455

Simpson, Sir James Young, Bart, 辛普森, 詹姆斯·扬, 从男爵, 64, 72

Simpson, General Sir James, 辛普森爵士, 詹姆斯, 将军,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指挥官, 482

Simson, Eduard, 西姆森, 爱德华, 法兰克福议会主席, 499—500

Singapore, 新加坡

海底电报, 350

邮政, 432

英国在当地的影响, 686

Singulari Nos, 《我们独特的》, 格列高利十六世发布的通谕, 78

Sino-American treaty (1844), 中美条约, 692—693

Sinope, 锡诺普, 土耳其舰队的失败, 281, 477

Six Articles, The (Germany), 六条法令 (德意志), 493—494

Slav Congress (1848),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232—233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限制, 6

非洲废除奴隶贸易的措施, 616

在巴西, 661

Slavery, 奴隶制

废除奴隶制的斗争, 83

在英帝国废除奴隶制, 341

给奴隶主的赔偿, 341

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有利条件, 610

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辩论, 612

南部扩大棉花种植的影响, 613, 617

解放奴隶，616

在美国南部各州，616，632

奴隶反叛，617

为奴隶制辩护，617

废奴运动，618—619

逃亡奴隶的归来，619，623，625

立法的基础，620—624

宣告解放奴隶，639，648

没收法案，648

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648

Slavophiles，斯拉夫派

在俄国，230，232—233，366—368，370—371，375

在奥地利帝国，548—550

Slidell, John，斯利德尔，约翰，南部联盟派往法国的代表，
639，640

Slovaks，斯洛伐克人，240，524，530，537，541，546，549

Slovenes，斯洛文尼亚人，402，524，529—530，545

Slowacki, Julius，斯沃瓦茨基，尤利乌斯，诗人，237

Small Swords Society，The，小刀会，700—701

Smiles, Dr Samuel，斯迈尔斯医生，塞缪尔，作家，51

Smith, Adam，亚当·斯密，经济学家，342，344

Smith, Sir Francis Pettit，史密斯爵士，弗朗西斯·佩蒂特，
工程师和发明家，螺旋桨的发展，278

Smyrna，士麦拿，419—420，422

Smyth, W.H.，史密斯，海军少将，418

Snider, Jacob, 斯奈德, 雅各布, 发明家, 305

Soane, Sir John, 索恩爵士, 约翰, 建筑师, 136

Soap industry, 肥皂工业, 64

Società Rubattino (1840), 鲁巴蒂诺公司 (1840年创立),
432

Società Sarda (1830), 萨尔达公司 (1830年创立), 432

Société d' Etudes du Canal de Suez, 苏伊士运河筹划公司,
437

Société Cénérale (1864), 法国兴业银行 (1864年创立), 458

Society of Arts, 艺术协会, 134

Sociology, 社会学, 54, 55

Sodium salicylate, 水杨酸钠, 64

Soil fertility, 土壤的肥力, 24, 52

Solar system, 太阳系, 59

Solaro della Margherita, Clemente, 索拉罗, 德拉·马盖里塔, 克莱门特, 皮埃蒙特外交大臣, 555, 557, 560

Solesmes, Benedictine abbey of, 索莱斯姆, 本笃会修道院,
79

Solferino, battle of, 索尔费里诺战役, 323, 539, 571

Solingen, 佐林根, 家庭工业, 42

Sologne, 索洛涅, 399

Somaliland, French bases in, 索马里兰, 法国在该地的基地,
461

Sonderbund War (1847), 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 81, 107,
196, 223

South Africa, 南非, 27, 117, 211

South Africa Campaign (1852), 南非战役, 304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196, 207, 329, 606, 609—611, 615, 627, 634

Souza, Ireneu de, 索萨, 伊雷内乌·德, 见Mauá, Baron of

Sozial-politische Zeitung, 《社会政治报》, 400

Spain, 西班牙

 不断的混乱, 186

 1812年宪法, 189

 1812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权, 192

 无秩序和混乱, 204

 排斥犹太人, 243

 铁路, 420

 在菲律宾的影响, 686

Spalato, 斯帕拉托, 422

Spectator, The, 《旁观者报》, 123

Spectroscopy, 光谱学, 58

Spectrum analysis, 光谱分析, 58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哲学家, 69, 109, 112

Speranskii, Count Michael, 斯佩兰斯基伯爵, 米哈伊尔, 政治家, 363, 383

Spezia, naval base, 斯培西亚, 海军基地, 567

Spielhagen, Friedrich, 施皮尔哈根, 弗里德里希, 小说家, 167

Spinners, General Union of Operation, 纺纱工人总工会, 346

Spirits, duty on, 酒税, 38

Spoleto, Council at (1849), 斯皮莱托公会议, 89

Sprengel, Kurt Polycarp Joachim, 施普伦格尔, 库尔特·波利卡普·乔基姆, 医生和植物学家, 65

Springfield (Mass.) *Republican*, 斯普林菲尔德 (马萨诸塞州), 《共和党人报》, 130

Staatslexikon (Rotteck and Welcker), 《国家百科词典》(罗特克和韦尔克主编), 193

Stadion, Count Francis, 施塔迪翁伯爵, 弗朗西斯, 政治家, 406, 526, 528

Staël[Holstein], Germaine, Baroness de, 斯塔尔 (荷尔斯泰因), 热尔梅娜, 男爵夫人, 作家, 172

Standard, The, 《旗帜报》, 售价一便士, 122

Stanley, Edward Geoffrey Smith 14th earl of Derby, 斯坦利, 爱德华·杰弗里·史密斯, 第十四代德比伯爵, 政治家, 341

Stanley, Edward Henry, 15th earl of Derby,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第十五代德比伯爵, 政治家, 581, 582

Stanton, Edwin M., 斯坦顿, 埃德温, 美国陆军部长, 646

Starbuck, H., 斯塔巴克, 苏伊士运河英国“集团”成员, 436

Starnberger See, 施塔恩贝格尔教区, 路德维希二世的自杀, 602

Stassow, Vassili Petrovich, 斯塔索夫,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建筑师, 139

Statuto of 1848, 1848年宪法, 见Piedmont-Sardinia条下

Steamship, the, 轮船

作为远洋航行工具, 4, 36

在开凿苏伊士运河上所起的作用, 4

扩大了市场, 5

用于拖带驳船，32
作为湖泊和河流的运输工具，32，35，424
在密西西比河上，32，612
轮船的改进，35—36，278，281，420—421
横渡大西洋，36，332
在海军中，277—280
用于牵引，277
运煤船，279
在地中海，418，420—424，431—432
英国的造船业，431
在亚马孙河上，662

Steel，钢

贝塞麦炼钢法，4，30，457
世界产量，30
出口，30，333
炼钢，333
西门子炼钢法在法国，457

Stendhal，斯丹达尔，见Beyle，Marie-Henri，159，162—163，
166

Stephens，Alexander H.，斯蒂芬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南部联盟副总统，650，653

Stephens，Frederic George，斯蒂芬斯，弗雷德里克·乔治，艺术评论家，151

Stephens，J. R.，斯蒂芬斯，宪章派，347

Stephenson，Robert，斯蒂芬森，罗伯特，土木工程师，436，
437，438

Sterckx, Engelbert, 斯特克斯, 昂热尔贝, 红衣主教, 89

Stethoscope, invention of, 听诊器的发明, 72

Steuerverein, 税收同盟, 494, 503

Stevens, Alfred, 史蒂文斯, 艾尔弗雷德, 雕塑家, 143

Stevens, Thaddeus, 史蒂文斯, 撒迪厄斯, 国会议员, 647

Stifter, Adalbert, 施蒂弗特, 阿达尔贝特, 作家, 161, 165

Stirling, Edward, 斯特林, 爱德华, 《泰晤士报》主编, 122

Stone' s river, battle of, 斯通斯河战役, 632, 639

Stow, David, 斯托, 戴维, 教育界著作家和先驱, 114

Strachan, Bishop John, 斯特罗恩主教, 约翰, 117

Straits Convention (1841) , 海峡公约, 258, 429, 468

 修改, 482, 490

 被取代, 488

 俄国通告废除, 488

Strantz, Colonel von, 施特兰茨上校, 冯, 普鲁士军官, 594, 596

Strat, J. , 斯特拉特, 罗马尼亚在巴黎的代理人, 594

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st Viscount, 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 斯特拉特福特·坎宁, 第一代子爵,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 262, 270, 468, 470, 472, 473, 475, 476, 489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施特劳斯, 达维德·弗里德里希, 神学家 (《耶稣传》) , 75, 102

Strickland, William, 斯特里克兰, 威廉, 建筑师, 141

Strossmayer, Mgr George, 斯特罗斯马耶长老, 格奥尔吉, 克罗地亚主教, 100

Sruart, James, 斯图尔特, 詹姆斯, 成人教育先驱, 119

Stubbs, George, 斯塔布斯, 乔治, 画家, 135

Stuttgart, 斯图加特, 407

Styria, 施蒂里亚, 548

Succession, Hungarian Law of (1687), 匈牙利王位继承法, 547

Sudeten Germans, 苏台德德意志人, 544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4, 424, 433—440

Suffrage, universal manhood, 成年男子普选权

比利时, 192

法国, 192, 204, 404, 409, 411, 443, 445, 446

英国, 192, 204, 336, 343, 347

荷兰, 192

挪威, 192

西班牙, 192

瑞典, 192

瑞士, 196, 204

皮埃蒙特, 200

德国, 204, 210, 398, 498, 518, 579

美国, 204—205

匈牙利, 398

巴西, 662

智利, 664

Sugar, 食糖, 27, 38, 65

Sugar-beet, 甜菜, 27, 391

Sullivan, Captain, Thomas B. , 沙利文舰长, 托马斯, 海军军官, 289

Sumner, Charles, 萨姆纳, 查尔斯, 美国参议员, 被鞭打, 625

Sumter, Fort, 萨姆特堡, 627

Sun Tzu, 孙子, 中国军事思想家, 317

Šuplyika, colonel, 舒普利卡上校, 匈牙利塞尔维亚人首领, 529

Supreme Court. (U. S. A.) , 最高法院 (美国) , 624, 625

Surgery, 外科学, 72—73

Sussex, H. R. H. , Augustus Frederick, duke of, 苏塞克斯公爵殿下,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 290

Sweden, 瑞典

1809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权, 192

与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220

议会的改革 (1851) , 411

与俄国的边界纠纷, 483

英法与瑞典签署条约, 484

Swinburne, Algernon Charles, 斯温伯恩, 阿尔杰农·查尔斯, 诗人, 178, 216

Swine fever, 猪瘟, 24

Switzerland, 瑞士

贸易、工业和经济: 纺纱业, 28; 工业化学, 29; 道路状况, 31

经济混乱, 222

教育: 小学的改革, 80; 师范学院, 80, 224; 苏黎世技术大学, 80, 106, 113; 伯尔尼大学, 80, 114; 与耶稣会, 81, 223

冯·费伦伯格的学校，108；实行义务教育，110；巴塞尔大学，114

宗教：信仰新教和信仰天主教的各州之间的对立，80—81；解散修道院，81；耶稣会，81，223；教会与国家的和解，81；旧天主教的分裂，81，100；犹太教，243；又见*Sonderbund war* 条下

宪政发展：在自由主义各州，80；在卢塞恩，81，223；1815年联邦公约，81，222—223；激进派的胜利，81，223，389；1848年宪法，81，185—186，196，223，441；真正的民主，186；1874年；联邦法庭（1874），196；政治实验室，196，411；1867年宪政改革，211；完全的民族独立，223—224，411；取缔“青年欧洲”，225

Sybil (Disraeli)，《西比尔》（迪斯累里著），引语，1，10

Syllabus of Erros，（*Syllabus Errorum*），《现代错误学说汇编》，89—94，454，459

“Sylvester Patent”，“除夕特许令”，532，538

Syra, Island of, 锡拉岛，419—420，422

Syria, 叙利亚

传教活动，79，423

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427—429

1860年法国派军到叙利亚，430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 叙利亚新教学院，423

Széczen, Count Anton, 塞岑伯爵，安东，政治家，541，542

Szerem, 塞莱姆，529

Tahiti, missionaries in, 塔希提岛，传教士在该地，259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起义，8，384，697—700，705，706

Taku forts, 大沽炮台，被占领，703—704

Talabot, the brothers, 塔拉博兄弟, 法国铁路工程师, 436, 437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de, prince of Benevento, 塔列朗-佩里戈尔, 夏尔·莫里斯·德, 贝内文托亲王, 外交家, 247—249

Tamworth Manifesto of 1834 (Peel), 1834年塔姆沃思宣言 (皮尔), 339

Tanered (Disraeli), 《坦克雷德》 (迪斯累里著), 引文, 10

Tangier, 丹吉尔, 424

Tao Kwang, 道光, 中国皇帝, 688

Taranto, 塔兰托, 421

Tarapaca, 塔拉帕卡, 668

Tariff of Abominations (1828), 可憎的税率, 37

Tariff Compromise (1833), 折中税率, 623

Tarim basin, Turkestan, 塔里木盆地, 土耳其斯坦, 707

Tarragona, 塔拉戈纳, 420

Tashkent, 塔什干, 387, 388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 353, 355

Taunton Commission, 汤顿委员会, 113

Tax Union, 税收同盟, 见 *Steuerverein*

Taxation, 税收

满足克里米亚战争的部分费用, 486

所得税, 486

在奥地利, 538

在皮埃蒙特, 567

与美国南北战争, 651

在上海, 693

Taylor family, 泰勒家族, 《曼彻斯特卫报》, 121

Taylor, John Edward, 泰勒, 约翰·爱德华, 《曼彻斯特卫报》
创办人, 132

Taylor, Zachary, 泰勒, 扎卡里, 美国第十二任总统, 622—623

Tea, 茶叶

茶税, 38

与中国的贸易, 687

Tegetthoff, Wilhelm von, 特格托夫, 威廉·冯, 海军上将, 奥
地利海军司令, 286

Telegraph, electric, 电报

欧洲大陆与美洲的电报服务, 36, 57

发展, 53

铁路加以利用, 57, 332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使用, 309, 486

英属印度电报公司, 350

Telescope, reflecting, 反射望远镜, 58

Tellkamp, Johann Louis, 特尔坎普夫, 约翰·路易, 德国教
授, 194

Temps, Le, 《时报》, 125

Tenasserim, 丹那沙林(德林达依), 英国在当地的势力, 686

Tennessee, 田纳西, 605, 626—627, 634, 648

Tennessee, river, 田纳西河, 655

Tennyson, Alfred, Lord, 丁尼生勋爵, 艾尔弗雷德, 诗人,
174, 176—177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 它们的废除, 76

Tetuan, 得土安, 424

Texas, 得克萨斯

棉花, 613

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 (1836), 621, 674

并入美国, 622, 674—675

退出联邦, 627

内战的战场, 654—655

Textile industries, 纺织工业

家庭工业的衰落, 4, 42, 333

机械的发展, 27—29

英国的棉花, 333

英国纺织业雇用工人情况, 333

与纺织业有关的工厂法, 341—342

在俄国, 364, 380

在法国, 457, 459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萨克雷, 威廉·梅克皮斯, 小说家, 162, 163, 165, 418, 420

Thermometer, 温度计, 临床用的温度计的发明, 72

Thierry, Augustin, 梯叶里, 奥古斯坦, 历史学家, 11

Thiers, Louis-Adolphe,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与法卢法, 80

成为反对派, 190

与1840年近东危机, 256—257, 433

他的政府的垮台, 429

实际上引退, 452

重返政坛, 456

反对与普鲁士交战, 599

Thomas, Pierre-Émile, 托马, 皮埃尔-埃米尔, 法国国有工场领导人, 399

Thomson, Sir, William, 汤姆孙爵士, 威廉, 后为开尔文勋爵, 科学家, 50, 53, 58, 59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 亨利·戴维, 美国作家, 167

“Three Kings Alliance” (1850), 三王同盟, 409

Threshing machinery, 打谷机, 在起义中破坏, 25

Thun-Hohenstein, Count Leo, 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 利奥, 奥地利教育大臣, 529, 542

Thuringia, 图林根, 392, 395

Tibet incorporated in China, 西藏并入中国, 685

Ticino, river, 提契诺河, 321, 398

T' ien Wang, 天王, 见Hung Hsiu-Ch' uan

Tientsin, 天津

普佳京海军上将在天津, 385

开放对外贸易, 704

被英国军队占领, 704

Tiflis, 第比利斯, 386

Timbuktu, 廷巴克图, 424

Times, The, 《泰晤士报》, 14, 121, 122, 131, 132, 342,

Tithe, 什一税
 爱尔兰天主教徒缴纳, 100
 在欧洲, 391

Tobacco, 烟草
 英国的烟草税, 38
 在弗吉尼亚, 610

Tobolsk, 托博尔斯克, 383

Tobruk, 托布鲁克, 424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德, 政治家和政论家, 1, 10, 186, 193

Todleben, Franz Eduard Ivanovich, 托德列本, 弗朗兹·爱德华·伊凡诺维奇, 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将军, 480

Tokyo, 东京, 710, 713

 “Tolpuddle Martyrs”, “托尔普德尔蒙难者”, 346—347

Tolstoi, D., 托尔斯泰, 德, 俄国教育大臣, 379

Tolstoy, Lyof, Count, 托尔斯泰, 列夫, 伯爵, 作家, 160, 163, 165, 169, 182

Tommaseo, Niccoló, 托马塞奥, 尼科洛, 作家和政治家, 558, 574

Tortosa, 托尔托萨, 420

Toulon, 土伦, 420—421, 425

Townsend, Meredith (*Spectator*), 汤森, 梅雷迪思 (《旁观者》周刊主编), 123

Trade and Commerce, 贸易和商业
 美国由于移民而使发展加速, 2, 332
 控制海上航线成为必不可少的, 3, 349

铁路和轮船的影响, 4, 25—26, 32, 33—34
为贸易和商业而增加农业生产, 23, 27
生产新的农具供销售, 25
作为贸易和工业的资金来源, 25, 458
关税, 25—27, 37—38, 254, 342—344, 364, 452, 458, 535, 604, 609—610
国际谷物贸易, 26—27
纺织品的重要性, 27—28, 333, 381
用铁的时期, 29—30
煤, 30—31, 333
关税同盟, 37, 494—495, 561
国际贸易政策, 37
需要增加资本, 39
银行和银行业, 40—42, 334—335, 451, 458, 535
英法的竞争, 254
特许公司, 281, 353, 355, 431, 432, 685, 687—688
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加剧, 334
英国的海外投资, 334, 350
工会, 346, 455—456
合作运动, 348
商业条约, 349, 452, 505, 535, 567
寻求新的市场, 349, 351
殖民地市场, 350—352
英国在印度和远东的垄断地位, 434
与中国的贸易, 461, 686—688

又见各有关国家条

Trade Union, 工会

早期的发展, 45

作为联谊团体, 46

仲裁机构, 46

在美国, 46

在英国, 345—347

Trade Union Congress, formation of, 英国职工大会, 它的成立, 347

Traité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Jomini), 《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约米尼著), 313

Transatlantic cable, 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133

Transcaucasia, 外高加索

当地的抵抗运动, 369, 385

被同化, 382

铁路, 386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s, 罪犯的流放, 353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402, 529, 537, 543, 545—547

Trappists form community at Milleray, 西多会特拉普派教士在米勒雷成立社团, 78

Travellers' Club, London, 伦敦旅行家俱乐部, 138

Treasury, 财政

英国赞成市政贷款, 337

美国成立独立的财政部, 607

Treaty Ports, Chinese, 中国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 692, 703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特赖奇克, 海因里希·冯,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210, 218, 507

Trent affair, the, “特伦特”号事件, 639

Trevelyan, Sir Charles, Bart., 特里维廉爵士, 查尔斯, 从男爵, 马德拉斯总督, 118, 337

Treviglio, 特雷维利奥, 556

Tribune, 《论坛报》, 123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18, 420, 421, 425, 432, 501, 555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 都柏林, 在下议院中有了代表, 335

Tripartite Alliance (1854), 三国联盟, 481

Tripoli (Libya), 的黎波里 (利比亚), 424

Tripoli (Syria), 特里波利 (叙利亚), 423

Trollope Anthony, 特罗洛普, 安东尼, 小说家, 与同时代的德国小说家相比较, 166

Trollope, Mrs Elizabeth, 特罗洛普夫人, 伊丽莎白, 作家, 191, 194

Troy, 特洛伊, 美国的学校, 119

Troja, Carlo (1784—1858), 特罗亚, 卡洛, 意大利历史学家, 225

Tseng Kuo-fan, 曾国藩, 反对太平天国的领袖, 699, 705, 706

Tung Wang, 东王, 太平天国领导人, 698

Tungans, 东干人, 中国的穆斯林, 反叛, 707

Tunis, Bey of, 突尼斯贝伊, 加里波第曾为他效力, 555

Tupper, J. L., 塔珀, 《萌芽》的撰稿人, 152

Turgai, 图尔盖, 387

Turgenev, Ivan, 屠格涅夫, 伊万, 小说家, 166, 168, 180, 182, 368

Turin, 都灵, 392

全意科学代表大会, 562

议会 (1861年2月), 575

Turin, Luigi Franzoni, archbishop of, 都灵大主教, 路易吉·弗兰佐尼, 567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棉花, 381

俄国的征服, 382, 386—388

塔什干的兼并, 388

Turkey, 土耳其

与克里米亚战争, X V, 486—492

巴尔干民族主义, 229, 240—243

衰弱, 241, 430

与穆罕默德·阿里, 251—252, 254—257, 427—429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 252, 255—256, 428, 468

港口, 422—423

舰队在锡诺普被击败, 281, 284, 426, 468

在纳瓦里诺, 426

在叙利亚的大屠杀, 430

Turner, J. M. W., 透纳,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 画家, 135, 150

Tuscany, 托斯卡纳, 552

教育, 115, 554

选举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209

与皮埃蒙特联合，209，572

宣布为共和国，408

开明的统治，554，556

农业团体，556

新闻出版，556，560

关税，556，561

废除教会特权，557

颁布宪法，561

与教皇国的经济联盟，561

兼并马萨和卡拉拉的图谋，563

军队在库尔塔托内受挫，564

被奥地利军队占领，565

恢复过去的统治者，572

Twain, Mark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马克·吐温(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幽默作家，167

Twenty-four Articles, Treaty of, 二十四条条约，221

Twisten, Karl, 特韦斯滕，卡尔，普鲁士政治家，518，521

Tyler, John, 泰勒，约翰，美国第十任总统，621

Tylor, Edward Burnett,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人类学家，102

Typhus, 斑疹伤寒，44，72

Tyutchev, Fedor Ivanovich, 丘特切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诗人，232

Tzu Hsi, 慈禧，中国皇太后，705

Ullathorne, William Bernard, 乌拉索尔内, 威廉·伯纳德, 罗马天主教伯明翰主教, 87

Ultramontanism, 教皇极权主义, 79, 81

Uncle Tom's Cabin, 《汤姆叔叔的小屋》, 625

Union Pacific Railroad, 联合太平洋铁路, 643

Unitarians, 唯一神教派, 86, 87

United Diet (Prussia), 联合议会(普鲁士), 在柏林举行会议, 496—497

United Italian Provinces, 意大利联合省, 554

“United Party of the Federalist Nobility”, “联邦派贵族联合党”, 54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XVIII—XIX, 603—630

社会结构: 移民, 2, 618, 643; 人口, 2, 22, 603, 626, 642; 奴隶制, 203; 选举权, 204—205

贸易和商业: 国内市场, 5; 谷物生产, 7, 642; 与英国, 26, 612; 棉花, 28; 铁和钢, 29, 30, 31; 煤和焦炭, 30, 31, 642; 黄金, 35; 航运, 36, 280; 州际自由贸易, 37; 关税, 37; 银行和银行业, 41, 607, 643; 工会, 46; 所得税, 644

农业: 进口机械, 25; 谷物生产, 27, 642; 棉花, 28

交通: 运河, 31, 612, 680; 铁路, 32, 34, 141, 612, 618, 624, 643; 公路, 35, 604, 606, 612

财政: 银行和银行业, 41, 607, 643; 联邦基金从第一公众国银行撤出, 607; 成立独立的财政部, 607; 财政分权, 608; 公路和铁路的经费, 612; 关税, 643; 所得税, 644

教育, 50, 116—117, 119—120

科学, 51, 72

新闻出版, 129—133

建筑, 140—141

文学, 164, 167, 179—181

宪政发展: 成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样板, 195; 选举权, 204—205; 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 207; 186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 603, 620, 621, 624; 国有土地上的印第安人, 606; 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危机, 606, 609, 613; 强制法案, 609, 616; 密苏里妥协案 (1820), 620, 621, 623, 624; 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648

南北战争: XIX, 631—658; 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19; 伤亡人数, 19, 654; 约翰·布朗袭击, 203; 后膛武器, 304; 作战的总过程, 327—330; 南部联盟的成立, 627

海军, 277—278, 285—287, 298—299, 425

陆军, 304—305, 310, 316, 328

与墨西哥, 464, 580, 622, 674

司法制度, 604, 609

与中国, 692—694, 700—703, 708

与日本, 710—712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concept of a, 欧洲合众国的概念,
7

Univers, L' (Veuillot), 《宇宙报》(维伊奥主编), 79,
80, 123

Universal Postal Union (1874), 万国邮政联盟, 7

Universities, 大学

创办伦敦大学学院, 77

对非英国国教教徒开放, 87

自由教会学院, 87

接纳妇女入学, 119

大学附校运动, 119

课程改革, 206

创办新大学, 206

俄国关闭维尔纳大学, 230

牛津和剑桥在议会中的代表, 335

俄国的大学, 106, 119

比利时的大学, 107

奥地利的大学, 114, 530

德国的大学, 114, 116, 459

瑞典的大学, 119

美国的大学, 119

University Tests Act (1871), 大学考试法, 87

Unkiar Skelessi Treaty of (1833),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 252, 255—256, 428, 468

Upjohn, Richard, 厄普约翰·理查德, 建筑师, 141

Ural river, 乌拉尔河, 386

Urea, synthesis of, 尿素的合成, 62

Urquiza, Justo José de, 乌尔基萨, 胡斯托·何塞·德, 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 671

Uruguay, 乌拉圭, 659、670

Ussher James, 厄谢尔, 詹姆斯, 阿尔马大主教, 102

Ussuri river, 乌苏里江, 385

Utah, 犹他州, 203, 623

Utilitarianism (Mill), 《功利主义》(穆勒著), 205

Uvarov, Count Sergei Semenovich, 乌瓦罗夫伯爵,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 俄国教育大臣, 230, 362, 365

Vacuum Tubes, Faraday' s work on, 真空管, 法拉第的研究工作, 58

Valdivia, 瓦尔的维亚, 663, 665

Valencia, 巴伦西亚, 420

Valency, theory of, 原子价学说, 62

Valetta, 瓦莱塔, 420

Valparaiso, 瓦尔帕莱索, 炮轰该城, 666

Vance, Zebulon M., 万斯, 泽布伦,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 653

Vanderbilt, Cornelius, 范德比尔特, 科尼利厄斯, 轮船提倡和铁路的提倡人, 681

Varas, Antonio, 巴拉斯, 安东尼奥, 政治家, 666

Varna, 瓦尔纳, 478, 481

Vassar College, U.S.A., 瓦萨学院(美国), 119

Vatican Council (1870), 梵蒂冈公会议, 454; 又见General Council

Vay, Baron, 沃伊男爵, 匈牙利总理, 542

Veiga Evaristo da, 贝加·埃瓦里斯托·达, 主编, 660

Venelin, George (1802—1839年), 韦涅林, 格奥尔格, 俄国研究斯洛伐克民族起源的历史学家, 242

Venereal disease, 性病, 使用汞治疗, 72

Venezuela, 委内瑞拉, 668—669

Venice, 威尼斯

与伦巴第一起举行反叛, 262

获得解放, 396

被封锁, 408

人口, 420

对犹太人的容忍， 421

奥地利允诺割让给法国， 464

接受特殊的法令， 526

马宁的共和国的垮台， 565

恢复过去的统治者， 572

由弗兰茨·约瑟夫割让给拿破仑三世， 578

Vera Cruz, 维拉克鲁斯，法、英、西三国军队在该地， 464, 677

Verdi, Giuseppe, 威尔地，朱塞佩，作曲家， 184, 225

Verlaine, Paul Marie, 魏尔兰，保罗·玛丽，诗人， 179

Verona, 维罗纳， 321

Versailles, 凡尔赛， 601, 602

Versen, Max von, 弗尔森，马克斯·冯，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
587, 589

Veto,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wer of, 美国总统的否决权，
608, 653

Veillot, Louis, 维伊奥，路易，政论家， 79, 80, 123, 459

Vicenza, 维琴察， 321, 402, 564

Vicksburg, capture of, 夺取维克斯堡， 328, 655

Victor Emmanuel II,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意大利国王

1864年保证将罗马交给教皇国， 88

没有被邀请参加公会议， 95

罗马不支持他， 95

当选为意大利国王， 209

与1849年维尼亚莱停战协定， 322, 566

维护宪法， 412, 566

承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属地（1849），527

部分地恢复国王权力，566

与德·阿泽利奥，567—568

与加富尔，568—569，571—573

与克里米亚战争，569

Victoria, 维多利亚，英国王室长公主，508

Victoria,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购买弗里思的绘画，154

封兰西尔为爵士，154

关于帕默斯顿的备忘录，340

对大臣们的态度，340

与沙皇尼古拉一世，359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154

Vie de Jésus (Renan), 《耶稣生平》（勒南），102

Vienna, 维也纳，18, 125

银行业，41, 535, 539

剧场，182—183

革命，261, 321, 395—396, 403, 524

交通，425

工业的迅速发展，535

证卷交易的崩溃，538

Vienna, Congress of (1815), 维也纳会议，266, 462, 493

Vienna Note (1853), 维也纳照会，475—476

Vienna Settlement (1815), 维也纳会议决议, 16, 191, 247, 260, 266, 272

Vigevano, Armistice of, 维杰瓦诺停战协定, 523

Vigny, Alfred de, 维尼, 阿尔弗雷德·德, 诗人, 171, 173

Világos, 维拉戈斯, 匈牙利人在此投降, 408, 528

Villafranca, armistice of,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506, 544, 572

Villemessant, Hippolyte de, 维尔梅桑, 伊波利特·德 (《费加罗报》), 125

Vionville, battle of, 维翁维尔战役, 326

Virchow, Rudolph, 魏尔啸, 鲁道夫, 普鲁士医生和政治家, 67

Virginia, 弗吉尼亚, 185

在南北战争中, 327—328, 627, 648, 652, 654

烟草, 610

培根反叛事件 (1676), 611

仅仅维持生计的农业, 611

立法机构辩论奴隶制, 612

1831年奴隶起义, 617

Visconti, Louis Tullius Joachim, 维斯孔蒂, 路易·蒂利乌斯·若阿基, 建筑师, 141

Vistula, river, 维斯杜拉河, 26, 32

Vladivostok, founding of,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的创建, 385, 704

Voivodina (Serbian), 伏伊伏丁那 (塞尔维亚), 527, 529, 537, 541, 543

Vom Kriege (Clausewitz), 《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著), 317

Vorarlberg, 福拉尔贝格, 被并入蒂罗尔, 525

Vossische Zeitung, 《福斯报》, 126

Wackenroder, Wilhelm Heinrich, 瓦肯罗德, 威廉·海因里希, 浪漫主义作家, 139

Waghorn, Thomas, 瓦格霍恩, 托马斯, 皇家海军上尉, 开创陆路到印度的人, 436

Wagner, Wilhelm Richard, 瓦格纳, 威廉·里夏德, 作曲家, 184

Waitangi, Treaty of, 怀坦吉条约, 353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韦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 殖民地政治家, 352, 353

Walewski, Alexandre, comte,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 法国政治家, 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大臣, 487

Walker, William, 沃克, 威廉, 美国冒险分子, 681

Wallace, Alfred Russell, 华莱士,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 69

Wallachia, 瓦拉几亚, 462, 505; 又见Principalities

Walter, Thomas, U., 沃尔特, 托马斯, 美国建筑师, 142

Walters family of *The Times*, 《泰晤士报》的沃尔特家族, 121, 122

Wanghai, 黄海, 693

Wappers, Gustaf, Baron, 瓦佩斯男爵, 古斯塔夫, 画家, 151

Ward, Frederick, 华尔, 弗雷德里克, 美国冒险分子, 706

Ward, John, Elliott, 华若翰, 埃利奥特, 美国律师, 政治家和外交家, 703

Warrior, H. M. S. (1860), 英国军舰“勇士号”(1860年建造), 279, 285

Wartburg festival, 瓦瓦特堡节, 493

Washington, 华盛顿, 141, 142, 328

Water, provision of pure supply, 净水供给, 72

Water power in spinning mills, 纺纱厂的水力, 28

Waterways, 水路, 30

Watts, George Frederick, 瓦茨, 乔治·弗雷德里克, 画家, 153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国富论》(亚当·斯密著), 342

Webster, Daniel, 韦伯斯特, 丹尼尔, 美国政治家, 195, 203, 615, 623

Wehrli, Johann, Jakob, 韦尔利, 约翰·雅各布, 教育界先驱, 113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208

Weld, Theodore.Dwight, 韦尔德, 西奥多·德怀特, 废奴主义者, 618

Welden, Baron Franz Ludwig von, 韦尔登男爵, 弗兰茨·路德维希·冯, 奥地利将军, 被海瑙所替代, 528

Wellhausen, Julius, 韦尔豪森, 尤利乌斯, 福音派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102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威灵顿, 阿瑟·韦尔斯利, 第一代公爵, 202, 248, 433

Werther, Karl von, Baron, 韦特尔, 卡尔·冯, 男爵, 普鲁士驻巴黎大使, 591, 592, 595, 598

Wesselenyi, Baron, 韦塞莱尼男爵, 匈牙利议会议员, 240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该地的奴隶制, 341

Western Associated Press, 西部联合通讯社, 133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 西方联合电报公司, 133

Westminster, Statute of, 威斯敏斯特条例, 355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400

Wette,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de, 韦特, 威廉·马丁·勒贝雷布特·德, 福音派新教会神学家, 102

What is to be done? (Chernyshevskii), 《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 374

Wheat, 小麦

俄国, 26

美国, 27

Wheatstone, Sir Charles, 惠斯通爵士, 查尔斯, 物理学家, 53

Wheelwright, William, 惠尔赖特, 威廉, 在拉丁美洲创办企业者, 665

Whistler, James MacNeil, 惠斯勒, 詹姆斯·麦克尼尔, 画家, 155

Whitehead, Robert, 怀特黑德, 罗伯特, 工业家, 发明家, 287

Whitman, Walt, 惠特曼, 沃尔特, 美国诗人, 2, 167, 180—181, 658

Whitworth, Sir Joseph, 惠特沃思爵士, 约瑟夫, 工程师, 284

Wiegmann, Arend Friedrich August, 维格曼, 阿伦德·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德国博物学家, 65

Wielopolski, Alexander, Marquis, 维洛波尔斯基侯爵, 亚历山大, 波兰政治家, 235

Wilberforce, Samuel, 威尔伯福斯, 塞缪尔, 主教, 71

Wilkes, Captain Charles, 威尔克斯船长, 查尔斯, 指挥“圣哈辛托”号快速帆船, 639

Willard, Emma, 威拉德, 埃玛, 妇女教育的先驱, 119

Willems, Jan Frans, 威廉斯, 扬·弗朗斯, 诗人, 语言学家,
221

William I, 威廉一世, 荷兰国王, 221

William IV, 威廉四世, 大不列颠和汉诺威国王, 189, 190

William I, 威廉一世, 普鲁士国王

在位初期充满军队的冲突, 16

任摄政, 508

其性格, 508

未出席法兰克福各邦君主会议, 513—514

不愿废黜王朝, 520

在埃姆斯与贝内代蒂交换意见, 595—596

决定进行动员, 599

犹豫不决, 599

皇帝的称号, 601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荷兰国王, 581

Williams, Sir William Fenwick, “of Kars”, 威廉斯爵士,
威廉·芬威克, “卡尔斯的”, 将军, 英国在土耳其军队的特派员,
484

Wilmot Proviso, 威尔莫特但书, 622

Windischgrätz, Alfred, Prince von, 温迪施格雷茨亲王, 阿尔
弗雷德, 奥地利陆军元帅

解散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187, 402

在波希米亚恢复旧秩序, 401—402, 523

在维也纳恢复权力, 403, 524

重新占领布达佩斯, 406

被匈牙利人打败, 407

在斐迪南逊位仪式上，525

受权迫使匈牙利降服，525—526

被韦尔登将军所替代，528

Windsor, 温泽，拿破仑三世访问该地，481

Wine, 酒

酒税，38

法国的出口，454

皮埃蒙特的酒，556，559，590

Wisconsin, 威斯康星，189，203，620

Wiseman, Nicholas, 威斯曼，尼古拉斯，罗马天主教威斯敏斯特大主教，84，87

Wochenblatt party, 《周报》党，14，508

Wöhler, Friedrich, 韦勒，弗雷德里希，化学家和药学教授，62

Wolff, Bernhard, 沃尔夫，伯恩哈德，德国通讯社创办人，5，132

Wood, Sir Charles, 1st Viscount Halifax, 伍德爵士，查尔斯，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子爵，政治家，118

Woodhull, Victoria Claflin, 伍德哈尔，维多利亚·克拉夫林，改革家，美国总统候选人，206

Wool, 羊毛

欧洲，23

俄国，26

价格的上涨，27

来自欧洲以外的供应，27

机械梳毛，28

动力织机的使用，28

棉花和羊毛织物, 28

Wool, John Ellis, 伍尔, 约翰·埃利斯, 陆军少将, 美国退伍军人, 656

Woolner, Thomas, 伍尔纳, 托马斯, 雕塑家, 143

Workhouses, 贫民习艺所, 337

Working-men's Associations, 工人协会, 在德国, 505; 又见 International 条

Wörth, battle of (1870), 沃思战役, 326

Wrangel, Friedrich, Graf von, 符兰格尔伯爵, 弗里德里希·冯, 普鲁士将军, 405

Württemberg, 符腾堡

建立议会制内阁, 395

与施瓦岑贝格的谈判, 407—410

鼓吹扩大选举权, 497

修改联邦宪法, 501

军队, 507

支付赔偿, 520

与普鲁士签订秘密条约, 520, 580

与德意志帝国的形成, 601

Württemberg, king of, 符腾堡国王

驱散残余的法兰克福议会, 500

与弗兰茨·约瑟夫会晤, 502

Wurtz, Charles Adolphe, 维尔兹, 夏尔·阿道夫, 化学家, 62

Wyatt, Sir Matthew Digby, 怀亚特爵士, 马修·迪格比, 建筑师和艺术评论家, 143

Wyoming, 怀俄明, 206

Yakub, Beg, 阿古柏贝伊, 喀什的统治者, 707

Yancey, William.L., 扬西·威廉·朗兹, 脱离联邦主义者, 627

Yangtse river, 长江, 对西方船舶开放, 703

Yeh Ming-ch' en, 叶名琛, 两广总督, 696, 701

Yehonala, 叶赫那拉氏, 见Tzu Hsi

York, 约克

 英国科学促进会在此召开会议, 50

 烧毁教皇的模拟像, 85

 “Young Europe”, “青年欧洲”, 225

 “Young Italy” (Mazzini), “青年意大利” (马志尼), 128, 224, 225, 555

Yucatán, 尤卡坦, 退出联邦, 674

Yuenmingyuen, 圆明园, 被烧毁, 704

Yung Chêng, 雍正, 中国皇帝, 1729年下令禁止吸鸦片, 688

Yunganchew, 永安州, 太平军被包围, 698

Zagreb Assembly, 萨格勒布会议, 403

Zaichnevskii, Peter Grigorievich, 扎伊奇涅夫斯基, 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 革命作家, 373

Zang, August (*Die Presse*), 桑格, 奥古斯特 (《新闻报》), 126

Zante, island of, 赞特岛, 422

Zara, 扎拉, 422

Zasulich, Vera, 查苏利奇, 维拉, 革命家, 378

Zoffany, Johann, 佐法尼, 约翰, 画家, 135

Zola, Émile, 左拉, 埃米尔, 小说家, 148

Zollverein, the German, 德意志关税同盟, 26, 37, 38, 228, 494—495, 501, 503, 505

Zucchi, Carlo, 祖基, 卡尔洛, 将军, 554, 555

Zug, canton of, 楚格州, 81

Zürich, 苏黎世, 80—81, 106, 114

Zürich, Peace of (1859), 苏黎世和约, 572

Zwirner, Ernst Friedrich, 茨维尔纳,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 建筑师, 140

11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 1870—1898年

[英] F.H.欣斯利 (F.H.Hins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1: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 Wide Problems, 1870-1898

11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 1870—1898年

[英] F. H. 欣斯利 (F. H. Hins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1卷：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英）F.H. 欣斯利（F.H. Hinsley）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书名原文：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1,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 Wide Problems, 1870-1898

ISBN 978-7-5203-2595-0

I. ①新… II. ①F…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870—1898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3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张湑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54.25

字数 859千字

纸书定价 18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1 :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 Wide Problems, 1870-1898

ISBN 978-052129109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经济状况](#)

[第三章 科学与技术](#)

[第四章 社会政治思想](#)

[第五章 文学](#)

[第六章 艺术与建筑](#)

[第七章 教育](#)

[第八章 武装力量](#)

[第九章 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第十章 德意志帝国](#)

[第十一章 法兰西共和国](#)

[第十二章 奥匈帝国、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

[第十三章 俄国](#)

[第十四章 英国和英帝国](#)

[第十五章 1840—1905年的印度](#)

[第十六章 中国](#)

[第十七章 日本](#)

[第十八章 美国](#)

[第十九章 拉丁美洲各国](#)

[第二十章 国际关系](#)

[第二十一章 在地中海、中东和埃及的角逐](#)

[第二十二章 非洲的瓜分](#)

[第二十三章 太平洋上的扩张和对中国的争夺](#)

[第二十四章 美国与旧世界](#)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如果要问19世纪最后30年的重大发展究竟是什么，人们不禁想起人间事物具有连贯性的力量以及很少发生突然的变化。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在下列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如物质力量和财富；工业主义和都市化；技术和科学知识；运输、交通和贸易；人口和人口迁移；中央集权制政府；民主政治；阅读与写作能力和教育；舆论和报刊等——所有这些发展在以1870年为终点的那个世代中，如果不是整个19世纪的话，几乎也是同样显著的；而这些相同的发展对于了解从20世纪初到今天的这段岁月，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时期简单地称作物质改善或工业发展或民主进步的时代，那就没有说出它的许多重要性。而且，这个时期还有另一特点，就是这些持续性的巨大发展，或其中的大部分，只发生在欧洲社会及其在北美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衍生社会，但对这一特点进行探索，也无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做出更明确的定义。这种限制以及伴随而来的欧洲的势力与文明在世界上所占的优势，早在187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将延续到1900年以后。在1900年，欧洲对所有这些进步的垄断地位，还不曾受到日本发生的变化的影响，同时，欧洲社会与不够先进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比以前变得更为明显了。在研究这个时期的这另一特点时，如同在分析更发达的地区发生的变化一样，第一个问题是给予这个时期在更漫长的一段时期中应有的适当地位，在这段更漫长的时期中，同一的力量和关系一直占有显著的优势，但却始终没有停止不变。

第二个问题也产生了。这个时期的某些主要特点之间的矛盾乍看之下令人惊讶。这些年代既有巨大的物质发展，也有经济萧条；既向世界经济更紧密的结合突飞猛进，也对自由贸易经济产生强烈反应；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也存在着贫困和社会上的堕落现象；既有迅速的社会变化，也有国家内政方面的停滞状态；既传布了民主政治，也加强了政府甚至专制主义；既维持了国际和平，但也在武装的状态下维持和平——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这些年代既产生了宣布启蒙时代胜利的作品，也产生了触及深刻幻灭和绝望的作品。但是，任何时代的各种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表面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

行研究时就显得突出，直到更细致的研究能顺利地对它们做出解释或加以解决。而了解这个时代的另一途径也就是对这些矛盾进行解释或予以解决。

从经济和物质的观点看，这个时代的特征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显著。这个时代比任何更早的世代，在更大的程度上，见证了近代的工业在地理上传播到它的发源国家以外，以及科学和技术被应用于工业和农业；结果，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额，在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规模上，如果说不是在更快的速度上，有了增长。这一点不难解释。它不是把这个时代与某些其他时代区别开来的特点：物质生产的增长和扩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近代时期，一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发的过程。第二个事实要显著得多。由于物质产量比以前需求增长的幅度更大更快，因此，这些年月也是价格、利润和投资收益一律下降的年月，以至被称为“大萧条”时期。

1870年，只有英国和比利时的经济可以说是高度工业化了；在这一年，即便是英国，在开矿、采石、金属工业、工程和造船业方面的总劳动力，仍然赶不上纺织工人和成衣工人的数目，或农业劳工，或家庭佣工的数目。在以后的30年中，工业在美国和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和日本，发展的程度则较慢。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比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这些工业是完全由于科学上的发现而兴起的第一批工业。它们的起源，空前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增加工业生产并使之多样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只不过是关于工业、技术和科学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互相紧密结合的最显著的例证，尤其是电力的发展，为热、光和动力提供了全新的来源。多数的早期发明是那些仅有很少科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工匠们取得的成果。现在，整整一个世纪在纯科学，特别是热力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方面的缓慢进展和重新陈述，开始与实际的机械工程，尤其是工作母机的生产以及工业方法的迅速发展结合起来。所有这三者的相互影响变得逐步增加，以至难以区别彼此的因果关系，而在这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仅新的工业得到发展，新的动力来源被提供出来，如内燃机由于热力学理论的发展而产生，它仅比电力次要。而且，无数的现有工业，都得到了改造并扩展了，其中采矿和筑路、炼钢、农业、石油、橡胶、混凝土只是少数几个实例而已。无数的新产品如近代的自行车、电话、打

字机、漆布、气胎、廉价纸、人造丝、铝、现成衣服和鞋首次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化首次成为一般工业的特点，虽然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被摒弃，而且在某些工业中仍占优势，同时工业产品的范围达到了与现在相仿的广度。

随之而来的总产量的增长是巨大的。在1870年至190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几乎4倍。^[1]世界生铁产量增加到三倍多，从1225万吨增加到3700万吨以上。在1830年至1850年间，它增加了将近两倍，从大约160万吨增至447万吨；在1850年至1870年间，它增加将近两倍，从447万吨增至1225万吨。在1870年至1900年间的增长率不如在1830年至1850年间或1850年至1870年间那么大，但增长的数量却大大超过以前的40年。世界的煤产量增加了两倍半，从大约2.2亿吨增至约8亿吨。在1830年至1870年间，它增加了大约6倍，从3000万吨增至2.2亿吨，增长率每10年为60%—70%。因此，同样地，早期的这种增长率在1870年至1900年间并没有保持下来，但增长的数量却大大地超过了早年。棉锭的数量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几乎增加了1倍；在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则超过了1倍。

如果生产增长率随着工业化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下降，则它在开始实现工业化较早的那些国家中，下降得最为显著。英国的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1倍，结果，英国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份额从1870年的大约1/3降至1900年的1/5；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被美国超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中被德国超过。在1871年至1895年间，法国冶金工业的产量实际上没有增长，而在德国则增加了3倍，在美国增加了4倍。但在较老的地区，特别是英国，使得工业基地和社会本身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这一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个相对的下降。在较新的领域里，产品有了很大的增长。这在轻工业方面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可能，而在消费品如肥皂、巧克力、浓缩牛肉汁和廉价报纸等的生产方面，则是由于分配方法较前低廉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可能，正如在这些最先进的社会中，从事分配工作、办公室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人员数目有了很大的增加。

总的财富随着总的生产而增长。在英国，资本投资并未能按照1873年以前的30年的同一比率增长，但在以后的25年中，它像在法国一样，还增加了1倍，而在德国则增加了3倍，在美国增加了3倍以上。在英国，每人的实际收入在1851年至1878年这一整个时期，增长了大

约30%，而在1870年至1900年间，尽管总人口日益增加，每10年则以17%至25%的比率增长。这个比率在以前从未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在以后的年月里也没有保持下去。在其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根据在一个工业社会的基本设备如铁路、船坞和城镇方面仍然需要大量投资的情况，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较慢，但同以前所经历的情况相比，速度仍较快，程度也大得多。

生产和财富的增长，不限于工业以及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欧洲的海外投资，甚至在1870年以前就使得一些海外地区能够为世界市场生产粮食和原料，而这时仍继续增长。英国的海外投资，如同它的国内投资一样，并没有保持早期的增长率，但在这个时期中，却增长了几乎3倍，而在某些地区，它们的增长要大得多。例如在阿根廷，在1870年至1900年间，它们增长了10倍。法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增加了一倍多；德国的海外投资从一无所有，增加到英国的1/3。这些增长率代表着输出资金的数量巨大增长。英国的海外资金在1855年的总额大约为2亿英镑，在1875年为10.5亿英镑，在1885年大约共计15.3亿英镑，1900年大约24亿英镑，1907年接近27亿英镑。而且，欧洲输出的不仅是资金。

欧洲人口向海外的迁移，有了很大的增长。欧洲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地理和地质情况的知识有了巨大的进步。在1821年至1924年间，从欧洲向海外移民的5500万人中，有2100万人是在1870年至1900年间移居的，其中半数前去美国，半数去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下列事实：随着交通的改进，也许多至1/3的移民这时又回到了欧洲，而且，经常做短暂的和季节性的移居的人们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迁移的人数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正是在这同一的30年中，世界上许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被开发了，而且随着地质知识的增长，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矿产地区也被发现，尽管不是全部都已经加以开发。许多移民，尤其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是熟练工匠，对于接受他们的那些国家的工业的创办和扩展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将那些国家开发为基本供应地区，则是这种移居、随着移居而发生的资金转移以及在知识方面和长距离运输与交通方面同时取得的巨大跃进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而运输和交通方面的巨大跃进，对于刺激人口向海外移居和资本输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都没有如此迅速地在自然财富方面

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在1869年以苏伊士运河开航和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通车作为开端的一个时代里，由于铁路在效率上有了改进并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由于世界航运从1870年的1600万净吨位增至1900年的3000万净吨位，并且世界航运的运载量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4倍（世界轮船吨位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与帆船的吨位相等，一艘轮船的载运量与一艘比它的净吨位重4倍的帆船的载运量相等），以前的外围地区开始以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生产和输出，而从新地区运到旧世界的食品和原料则不断增长。直到20世纪初期，供应品中除了羊毛以外，均以美国所提供的为主，但是到了19世纪末，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输出。最初，增加的物品主要是谷物、羊毛和腌制食品。美国达科他地区和阿根廷1880年在小麦生产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到了1887年，则分别输出6200万和800万蒲式耳小麦。1897年，阿根廷输出1亿蒲式耳小麦和玉米。1877年，第一艘冷藏船装载羊肉离开了阿根廷；1882年，第一艘满载新西兰羊肉的船抵达英国；到了1890年，随着采矿和冷藏船的发展，输出品中有石油、矿物、肉类和乳类制品，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以及各种不属于体积过大和容易损坏之类的物品。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论在耕种面积以及应用机械去开矿和耕作方面，还是在人口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这些新地区对欧洲产品的需求也在扩大，因此，它们作为输入者和输出者，在刺激那些更先进国家的工业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发展为旧有产品和新型的制成品提供了新市场，同时也增加了财富和产品范围，从而也增加了较老的社会内部对货物的需求。它们也在世界贸易交流中承担了比以前更大的份额。阿根廷的对外贸易在1870年至1900年间增加了两倍，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一倍多。1860年，对外贸易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但在1870年至1900年间，随着制造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分工的加强，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它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这个发展在西北欧国家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之间尤其显著。但是，一个单一的大西洋集团的更紧密的经济结合不是唯一的结果。在欧洲本身，有新的专业发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铁矿的生产和输出扩大了。遥远的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范围，从北美洲、罗马尼亚和俄国扩展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及比它们更远的澳大拉西亚^[2]和南非。以前是独立自给的贸易

地区和贸易联系融化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单一经济。金融和财务服务的改进以及通信联络的改进（随着海底电报的扩展和在本时期末无线电报的开始使用），同时将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单一的、多面的国际支付体系。一个由世界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第一次出现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上更多地区在经济上和财政上，比以前或许也比以后的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最初看来觉得奇怪的是，当工业与农业的扩展和多样化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和生产时，当交通、通信和财政方面的巨大改进一同使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这些情况却没有使世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比以前得到更大的发展。世界贸易总额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多了。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30年中，它的黄金比值也许增加了一倍多，每年从大约28亿英镑增至50亿英镑，而且鉴于价格的下降，它的数额可能增至3倍。由于价格和贸易额在1896年至20世纪最初十年中期上升很多，因此，1873年至1896年间，在价值和数额方面的增长，比这个全面数字所表示的要小。当时它的价值也许从28亿英镑增至39亿英镑，数额大约增至两倍；这个数字虽然还是相当大，但在价值上却比1860年至1872年这段时期（只相当于上述一半时间）的增长要小，而且用价值或数额来衡量，其增长率比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3]但这种降低了的增长率，则是工农业的扩展和改进的必然结果。这些过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世界工农业的生产暂时增至超过世界需求量增长的程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贸易重又按照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速度迅速增长（在1898年至1913年间它的价值增加了1倍），但在这些日期之间，正是这种超额生产把价格降低了；而降低了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世界贸易价值增长率的降低。这也降低了贸易量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工业扩展和工业生产增长的地方，其后果是供应以前由国外来供应的国内市场，从而增加了国内的商业活动，但却降低了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的增长率。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作为它们对外贸易总额的一个部分，在1880年后一直不断地下降，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在1890年后也同样下降。由于同样的情况，在工业化地区和新的农业地区之间的贸易，也由于国家保护农业和工业这一决定性的倾向而受到了阻碍。

总的形势的影响，尤其是采取关税措施的影响不应过分局以夸大。世界贸易，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之间，比以前

或以后时期增长的速度放慢，但在绝对数额上仍然有了可观的增长。在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只有法国的输出额在1895年比1875年或1883年要小。生产的扩大迫使贸易总量上升的程度比它限制贸易增长率的程度更大，而向保护贸易主义的倒退则被国际贸易中不断扩大的机会大大抵消了。而且，这种倒退并不如有时设想得那么剧烈和广泛。也许因为国家和商人的自然倾向是要实行保护贸易主义，所以贸易自由化的倾向在早期一直是缓慢的，而在19世纪70年代保护贸易主义重新恢复时，贸易的自由化远远没有完成。要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障碍，需要依靠许多条件，其中包括各国在其他税收来源正在扩大而国家支出也在增长的时候，是否有能力经得起关税收入的损失，或者找到一种替代的收入。同样地，在欧洲，经济的自由化和自由贸易与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政治自由主义是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所深恶痛绝的。曾经有过实行低关税的倾向——例如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美国 and 法国——但这只是在1850年以后的情况。虽然在那一年以后，有明显的倾向要降低进口税，而且没有多少增加关税的实例，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只有在罕见的实例中才有完全取消税收的情况。甚至在英国，税收的削减和取消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1870年，还存在着17种可征税的进口货物。另一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某些国家抵制了增加关税的措施。

然而，这些国家是些例外，它们坚持自由贸易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英国和比利时，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农业的利益，而且，工业发展到如此先进的地步，以至保护关税主义将会降低、而不是刺激国内外对工业的需求。在荷兰，如同在英国和比利时一样，商业占有极大的优势，使保护关税主义难以实行。丹麦对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使自由贸易成为必要，并且相反地，迫使它采用专门的农业耕作来逃避新的农业竞争。在土耳其，关税只有在获得大国的同意时才能提高。它们的政策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同一发展过程，在一个水平上，使世界总产量产生巨大的增长并使其经济结合起来，而在另一个水平上，则有助于脱离自由贸易，而且，这个时代是一个关税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经济日益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这一情况如此明显，以至那些例外的国家，特别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国英国，在大多数国家正在采取日益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时，如果不向一切国家的进口货大开方便之门的话，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取得实际上取得的发展。

这是因为供给与需求之间正在变化的全面关系，不但限制总的贸易中的增长率，而且是在地理上的距离正被大大缩短的时候，在一个变化中的地理结构中发生的。它正在制造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个别的国家之间重新调整供给与需求，这些国家不能迅速采用专业化经济，或者轻易地实行国际分工。人们不禁要假定，保护关税主义，对于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而现在维持着武装和平的那一代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吸引力。事实上，采取增加关税的决定，对于政治局势或政治目标，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英国尽管深深地陷入国际政治纠葛，却仍坚持自由贸易，而美国尽管对世界政治采取疏远态度，它的关税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高。美国关税从1869年的47%上升至1890年的49.5%，而且（经过一些减轻以后）在1897年升至57%。加拿大和其他英国自治领，在政治上甚至比美国更无关联，却筑起极高的关税壁垒。甚至在拉丁美洲，也采取了关税手段来保护新建的工业，如果工业界由于力量强大而提出了这个要求的话，例如在智利的情况。在欧洲，关税战并不总是和政治抗衡相一致的。1879年后，当俾斯麦渴望保持俄德两国之间的友谊时，德国对外国谷物设置阻碍，在俄国引起了严重的埋怨。而且，按照合乎理智的水准，政治抗衡很少用来作为采取保护关税主义的理由。人们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形势，正如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要求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那样，他们对此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论是有许多理由，还是没有多少理由。如果使一些国家避免遭受其他国家的剥削，从而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能达到享受国际和睦和物质福利这一幸福目标，这就会使全人类都获得益处。当人们对这种改变了的形势加以考虑时，则很难避免这一观点：如果一些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它们就会回到实行关税措施上来，甚至像早期的战争和自由贸易的倾向相巧合那样，而且，除了像在那些特殊的国家里有特殊的经济情况予以抵消的时候，很自然的情况是，人们会比以前更容易认定，没有国家的保护，他们就不能繁荣起来。

问题究竟是什么，结合农产品来看，就显得特别清楚了。以前，农业繁荣几乎自动地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因为不断增长的需要当地得到了满足。英国的农业在19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之间曾经迅速发展，尽管谷物法已经废除。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世界的生产尤其是谷物生产，迅猛地增长，它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而且确实增长得过分迅速，以至不能以令人满意的价格轻易地被世界市场吸收；同时，产品经过长距离的运输

而所需运费低廉，大陆与大陆之间的运费并不高于一度在省与省之间的运费，从而使整个欧洲面临农业危机的威胁。于是，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最早的关税增长中对于农业就有某种保护，而在1885年后，大部分的进一步增长都是为了农业利益而实现的。即便如此，在1871年和1895年间，欧洲的小麦价格下跌一半。其目的是要在下列这种经济中保持平衡，关于这种经济，英国由于自己坚持自由贸易已经把它丧失，但是对于有些社会来说，将它加以保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些社会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仍比英国更着重于农业。工业也获得保护，这里的动机是，需要防止其他地区迅速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以及希望促进国内的工业化。朝着这个方向首先采取慎重步骤的，有这样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在1875年，俄国在1876年，西班牙在1877年，意大利在1878年——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已有了一个开端，但仍处于萌芽状态。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正值1873年开始的工业不景气情况，由于工业化较高国家大量倾销其产品而被弄得严重起来。嗣后，为了保护工业而提高关税，从既适用于工业而又适用于农业的1879年德国高关税开始，关税的增加仍然是由于下列情况；虽然工业化正在扩展，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工业之间，它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效能水平。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关税增加，那就会刺激工业化，而且保护现有的工业。因此，关税的增加对于这些萧条情况的持续起了促进作用，萧条情况的产生，不论在工业或农业中，都是因为生产的扩展和加强超过了世界的需求直接吸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

然而，萧条状况限于价格、利润和投资收益的范围。这个时期不是一个全面经济萧条的时期。如同上面已经表明的，根据对生产、消费和收入的考查，与对价格和利润的考查相反，这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而且，价格的下降并不全是萧条的症状。在前一个世代，经过不断上升以后，价格向下移动，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这时的价格一般比1873年低40%，而且直到1896年，才又重新恢复上升。但是，这种下降既因为运输费的大大降低，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规模的增大，同时也由于生产超过了需求。正是由于方法有了改进，生产有了增加，加上运输上发生了革命，这才迫使粮食和原料价格下降。仅举工业上的一个例子来说，方法的改进、生产的增加以及原料费用的降低，使欧洲的钢轨价格在1872年至1881年间降低了60%，并使得美国的钢轨在1898年的销售价格仅是1875年销售价格的1/10稍多一些。同样地，铁的价格与一般的趋势相反，在前一个世代曾经下降，从1825年

的每吨10英镑降到1866年的每吨3英镑。当时曾经是例外的情况，这时变为一般的，即便不是普遍的倾向。而且，由于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牵涉进去，价格的下跌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利润幅度的下降。运输费和原料价格的降低、方法的改进、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增长等有利条件，能够引向相反的结果。

然而，一般利润也同价格一样下降，而且几乎达到同样的程度。它们的下降作为大萧条的重要特征是由于两个原因。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暂时生产过剩的因素，而生产过剩也是（尽管同样也部分是）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当时的有利条件被每个市场和每个领域中日益增长的竞争性公司所利用。关于在交换日益扩大和增长的时候，重新恢复关税的解释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参加整个交换；对于大萧条的解释是，在总的生产和总的利润增长时，个体公司的利润——虽然有例外，但那是在开发新领域中迅速适应和开创的结果——一般都随着企业的激增和竞争的增长而下降。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繁荣的；国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繁荣的，其繁荣程度取决于它们参加并适应正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对于数目迅速增加的个体公司来说，境况是日益艰难了。

物质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竞争二者结合起来，在国际范围内既使世界经济更成为一个整体，又使保护关税主义较前增长；既使产量增加，又使利润下降。这也是在更先进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的基础。这些变化反映了一个摆脱自由放任政策的明显趋势，而倾向于在经济企业中实行联合，在雇佣劳动者中实行集体自助和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中实行国家管制。如同为实现更多的物质生产的运动以及在技术上和生产方法上取得的进步一样（这些都是与下列倾向有密切关系的过程），在人们中间，作为专门团体和作为整个社会向更大的组合发展的倾向，在整个近代时期几乎一直持续不断，而且其重要性不断地增加。但是，在1870年以后的这一代中，当这种倾向由于各个社会所面临的更大问题和更大机会的相互作用而大大地加快时，上述那些形式和态度才第一次明显地变为今天存在的形式。

问题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竞争所造成的。虽然这些问题在更先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际上表现出来，但它们也是由于在增长的人口实现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所造成的日益复杂和迅速改变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人口在这些国家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增加得更

快。即便考虑到向海外移居人数占人口自然增长率的40%，但欧洲的人口在1870年至1900年间仍增加了30%以上，即增加了1亿——从3亿至4亿。而与此相对比，在1850年至1870年间则增加了3000万，即11%。由于移民的帮助，欧洲在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海外边远地区的人口，甚至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6000万。在这些地区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涌往城镇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城镇和郊区人口的增加，与总人口中这种巨大的增加相等。在其他地区——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俄国的欧洲部分、奥地利和澳大拉西亚——同样的发展仍造成巨大的即便是孤立的城市人口增加，如同在这些地区以外的印度和日本，那里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但工业化程度甚至更低。^[4]德国在1870年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有8个，而到1900年则有41个。除了在法国——那里的人口增加特别慢，但在这些年总的人口增加中的几乎半数，大约80万人，都是在巴黎自然增加的——以外，同样规模的都市化也在西欧和美国发生。即便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这类城市的数目到了1900年也从6个增加到17个。到了这时，美国人口的1/3住在工业中心，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0集中在伦敦，德国的城镇化率从1870年的36%升到54%，而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莫斯科、纽约、芝加哥、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东京、大阪和加尔各答作为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与伦敦和巴黎并列。而且，事实也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况：人口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工业区和城市区中去。

工业的组织 and 工业中的工作条件变得更为复杂。工业与整个经济之间、都市地区与它们所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组织工业生产和处理它的产品中所涉及的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以及工业组合如要发挥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就必须完成的日益复杂的任务——这些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扩大而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由于工业中竞争加剧而引起的经济问题同时并存。

工业和其他形式的企业必然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更早世代的大部分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扩展，都由家庭公司和小型合伙公司在比较简单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而能干的人则享有无限自由。现在在商业组织和商业方法中发生的从小单位和无限责任的原则向大型合股企业的过渡，其程度容易被夸大。股份公司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经营公用事业方面——运河、铁

路、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银行业和码头——证明变得日益必要，而在19世纪50年代，私人公司和有限责任等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在1900年以后很久，家庭营业和小型公司在各国都仍处于支配地位：在德国，在20世纪开始时，有93%的工业企业仍由个体业主经营，而产业工人中有1/3仍被不超过5名工人的作坊所雇用；1914年在英国，甚至在62762个活跃的股份公司中，有4/5都是以新的姿态出现的私人公司、家庭公司和私人合伙企业。另外，虽然有限责任最后成为通过证券交易所为工业筹措资金的一个新方法，但是，直到1890年后，它才开始在大范围内被用于这个目的。然而，在1870年以后，小公司越来越被大型有限责任公司所取代，这种大型公司现在第一次进入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域。

到了1900年，在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一种二重性的经济——一个未曾被组织变革所触及的庞大的传统部分，与一个有限的但经济上却占优势的近代部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上述近代部分包括主要工业和一大部分商业金融企业，其典型单位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有限责任的企业。这是由于比较大型的公司的规模和资本有了增长以及一些公司进行了合并而产生的。补充这些过程的还有：为了取得一致的价格而形成的联合公司，为了追求垄断而建立的托拉斯——最早的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1882年）——以及建立卡特尔，通过卡特尔，一种工业的公司设法控制有关的和附属的工业中它们所依靠的部分。这些发展在国际范围和各国内部发生。1883年，在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钢铁公司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均分市场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但接着在工业家和银行家之间，为了分配生产者，确定航运量、回扣和运费，做了许多类似的安排。军火制造商如阿姆斯特朗、克虏伯和勒克勒佐达成了关于均分外国市场的协议。1886年，诺贝尔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托拉斯——甘油炸药托拉斯有限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科茨股份有限公司把与它竞争的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公司加以合并后，对棉线几乎取得了世界性的垄断。因为这些都必然是不连续的发展——这类发展一旦进行以后，不能重复或继续很长时间——所以，19世纪末期不但和较早时期而且和1900年后的那个世代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发展当时产生的范围的大小。

这些发展是企业及其经营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复杂性迅速增长所造成的后果，也是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更大困难与更大机会所造成的后

果。公司随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应用而成长，由于这些过程，公司就必须要有更大的规模和数额更多的资金。公司越大，它就越容易指望能合并其他公司，而且依靠技术上的突破和社会日益增加的一体化，它也就更容易控制价格并取得垄断。诺贝尔、洛克菲勒和其他大企业的先驱们所积累的财富，都表明抓住这种机会所能获得的成功实例，而且无疑地，这就是那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洛克菲勒心中所想的那些机会，当时他声称：“合并的日子将在这里保持下去。个人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当公司迅速地成倍增加，当传统方法由于革新而被废弃不用的事实正在变成工业生活中的一个持续的而不是偶然的特点时，困难就如同机会那样时常发生。每有一个公司扩大了自己的规模或企图将别人合并，就会不只有一个公司由于不能扩大或者不能幸免于新的竞争而被别人加以合并。与每个寻求联合和垄断，以便扩大市场和利润的公司相对照，另一个公司被引向这个方向，则是因为它需要保住这些市场和利润，因为它对安全更加关切，而这种关切的根源是，在日益增长的竞争情况下，必须要有更多数量的资金。这是在农业生产者中间要求组织起来的运动后面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不能按照制造商或金融家的形式集中，各地的农业生产者都对改变了的条件做出了反应（在法国和丹麦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爱尔兰从1889年，其余地方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合作社，以便提供信贷，为防风险提供保险措施，以及为产品进行加工和在市场上销售。

旨在实行组织和联合的运动不仅限于雇主和生产者。1880年后，在雇佣劳动者和消费者中间，由新的立法所保护的互助会和合作商店成倍地增加，遍布英国、西欧和美国各地。互助会在英国于1875年后受到立法保护。1885年，它们的会员约有700万人，1910年约有1400万人。合作社于1876年在英国得到法律上认可，1900年全国有1400多个合作商店。互助会和合作商店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程度与此极其相仿。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工会有了增加，而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90年后，这些发展传到其他地区、欧洲的其余部分和拉丁美洲。工会最后在法律上也获得承认，例如在比利时于1866年，在奥地利于1870年，在英国于1870年至1876年，在西班牙于1881年，在法国于1884年（1862年曾获得部分承认），在德国于1890年在反社会主义立法失败以后获得承认，然而，在俄国，直到1906年，它一直

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工人的违约行为已从刑事犯罪项目中删去。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工联主义”随着立法而产生了。

工会以前是行会组织，其会员主要限于个别行业的熟练工人，其职能限于为防止疾病、事故和死亡提供互相保险并在雇主和雇员之间作为调解机构。“新工联主义”寻求一种全国范围的和按工业划分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和按行业划分的工人阶级组织。这是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形势：随着国内交通的改进，一度曾是局部性的地区和职业正在变得互相竞争了。为了适应工业变化的强大影响和初等教育的传播在增加半熟练工人的比重和提升机会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新工联主义”不仅吸收熟练工人，而且还吸收不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参加。同早期的工会相比，这个运动在目标方面更具有战斗性和政治色彩，同时与政治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或社会观点更密不可分，如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由天主教赞助的工会，以及19世纪90年代在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情况一样。

如果工会开始具备它们的近代特性，则它们在这些年增加的会员数目要比互助会和合作社少得多，而且在1900年以后，增加的数目也比它们慢得多。在1886年至1900年间，工会会员数目在英国从125万（在1875年约有100万）上升至200万，在德国从30万上升至85万，在法国从5万上升至25万。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00年只有50万会员。到了1913年，在英国，工会会员增至400万（大部分增长数，从250万至400万，是在1906年后发生的）；在德国，增至300万；在法国，增至100万。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到了1904年，拥有150万会员。它们在20世纪初期以前在新的职能方面，也没有多大进展。这些事实部分通过所增加的问题，部分通过当代正在改善的条件而再一次得到了说明。

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虽然使工人具体地比较容易组织起来，却也在生活条件方面引起了大量意外的、不愉快的巨大变动，使人遭受新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失业——这是更迅速的、连续不断的技术变化和工业改组所带来的后果。人们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实行集体自助的可能性，被唯一能提供这种自助的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通过互助的福利计划，主要应用于为家庭和个人提供物质供应的问题；或者，不熟练工人中的工会会员（他们在某些行业中是可能的竞争者，在境况不佳时被迫在雇主面前抢饭碗，愿

拿较低的工资）在19世纪 80年代暂时成功地被组织起来，加入一般工会后，又迅速地脱离，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中才恢复。而且，一般工会和最强大的工会（即代表特殊行业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工会），重又继续为各地区或个别的行业在相互间的利己主义的竞争中进行谈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以后；它们没有朝着合作或联合的方向发展，以便实现代表全部工业的全国性行动，更谈不到制定政治纲领和建立政党，以便代表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了。而这不仅因为永久性就业的不可靠性诱使他们继续为自己寻找生路。朝着这一方向的进展，需要对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一个新的认识。虽然它们有必然的前途，但工会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群众中间的组织，而不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因为公共舆论，包括工人本身的舆论，由于它们要注意更直接有关的事务，而不能迅速认识到劳工有权为强制实行它们的要求而团结起来。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会在一些较新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就比在欧洲发展得更快。

另一方面，在美国，几乎同样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的发展却比在欧洲要慢。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有利的环境延缓了它们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主要力量，尽管从程度上来说，在美国比在欧洲要大一些。虽然这些年是暂时失业增长的岁月，但是，尽管属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总的就业还是很好地保持下去。在英国，总失业的增长率只是从4%或4.5%增至5%，尽管工人人口在1870年至1901年间从1000万增至1450万。总体来看，除了少数情况外，长期性的不充分就业让位于非经常性的和有限的失业。这些年是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这在美国特别明显，但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英国，实际工资上升了大约75%，在美国超过了这一数字，在法国和德国比这个数字少些。这是既同以前它们增长少得多的那个世代相比（在英国，1875年至1898年间的增长，比1853年至1873年间的增长大6倍多，在美国大12倍多，在法国则大一倍多），又同1898年至1914年间它们处于停滞状态的那段岁月相比。这是由于物价下跌，由于在多数工业中，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对不熟练工人的比例，报酬较高的职业的比例有了不断增长。在1850年至1888年间，熟练工人的比例在英国增加了1倍，嗣后至少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增加。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级差也稳步增长，到了1900年，熟练工人的工资为不熟练工人的工资的1倍。随着较好的就业水平和工资的增加，价廉的消费品范围也日益扩大，而且一般家庭的规模也正在缩小。在

1860年至1885年间，英国每个家庭有5.71个孩子，而在1880年至1905年间，则减少到4.66个孩子。在这些年间，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因此，人们就逐渐地不大需要让孩子去工作，逐渐地不大需要让结了婚的妇女为挣工资而去工作，同时也逐渐地可能出于自愿增加闲暇而减少了工作时间。

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国民收入增长中的一个最大份额，归于少数人，不过，却归于数目扩大了少数人，归于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而不是贵族。但是，在雇佣劳动者阶级中间正转入报酬较丰的职业的人数不断增长，从而扩大了中产阶级。除此以外，广大的雇佣劳动者以他们在1870年前的收入来对比，甚至比中产阶级更改善了地位。在整个这一时期，这种相对的改善，持续地即便是缓慢地进行下去。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也许从来未曾有过一个时刻，物质状况如此之好；而在接踵而至的那一代，情况就不继续这样好了。有数目可观的少数人却未分享这种物质状况的改善。也许，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和不大富于营养的廉价食品的销售，最贫穷的人们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得更苦了。但是，他们在社会上所占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小了，尽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绝对数目方面减少了。较好的环境使大多数人而且数目越来越多的人适应他们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中的变化。而且，在推迟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方面，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这些年中，人们看到工人阶级的命运由于国家的直接行动，第一次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近代国家这个题目正如中产阶级的兴起一样，十分容易将人引入歧途。近代国家的发展史是漫长的，因此，人们有时无可奈何地下结论说，近代国家一直在兴起中。但不容争辩的是下面这些事实：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政府不是在甚至更近的时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在19世纪最后的1/3时期内，它第一次从事于对社会的全面管制。虽然在这个方面还有更早的步骤，因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缓慢地成长起来的。但按上述这个意义所说的政府在1870年^[5]，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存在。在那个日期以后，政府除了衰落和垮台以外，只要它发展，它就开始具有这个特性，并且迅速地采取这种行动。比较先进的国家在以后的30年中，都看到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有了空前的增加，而且，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

发展并不因为从此以后这些权力和职能继续增加和这些关系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变化，就变为次要了。

如同想要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就是说，要在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进一步组织的那些运动一样，上述过程的产生是由于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更大的可能性二者同时出现所造成的。它比那些其他的运动发展得更深入、更迅速，而且它的进展也部分推迟了它们的发展，因为这些年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具有如此专门的特性和如此复杂的内容，因此，集体自助办法，尽管在企业单位、互助会和合作社以及工会的发展中取得了进展，却越来越不能处理那些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新的方法，而只有国家才能加以利用。自愿的私人组织的情况如此，地方政府当局的情况亦复如此。虽然这些地方政府经过改善和改革，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如伯明翰在1873年以后，维也纳在1890年以后）在公共计划和管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首创工作，虽然其他城镇，至少在欧洲，也跟着它们这么做，或更经常的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行动强迫它们这么做，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的帮助和控制，它们就变得软弱无力。在国内运输革命、工业发展、人口迁移、城市地区的扩大和社会的复杂化等方面的每一个更深入的阶段，都使地方当局的力量变得更加不足，除非其担任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这主要是因为有关科学和行政的知识方面的每一个进展都表明，如果这种知识要加以应用的话，只有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才能够办到。

这种知识，和这些问题一样，也很快地取得了发展。这部分是科学自动发展的结果，而在公共卫生的范围内情况尤其如此。在1867年以后的10年中，如果没有像巴斯德、李斯特、微耳和科赫这些预防药物创始人成功地确定，许多疾病都是由于细菌造成的，可以用例如无菌操作和接种等简单的预防措施和方法加以防止的话，那么，现在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就不大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知识的发展，也部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专家（自命的改革家或官员们）对社会新条件的实际经验的积累所促成的。检查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管理工厂、矿山和公共卫生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如同在监督教育方面一样，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影响，促成了政府的行动并把政府的注意力扩大到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但是，科学家的工作和个别改革家的鼓

动，如同官员的经验一样，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力量作为后盾的话，则不会有多大效果。

如果这些考虑为政府制造了机会，如同社会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制造了或至少增加了问题那样，则政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抓紧了这个机会，因为中央的行动正变得更加可行和更加必要了。社会的变化正在制造这些问题，同时也使得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变得更加可行。坚持在密集的人口中以及由快速运输工具为之服务的人口中提供用水、环境卫生、医院和道路等条件，比在分散的和联系不便的居民中采取这样的行动更加容易，同时管理和监督像工作条件这类事情也变得更加容易。而且，采取这种做法也更有必要了。例如，在群众集中居住和集中工作的条件下，当防止流行很广的疾病或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已成为一项有关公共效能和政治需要的事，而不是出于个人需要和私人良心的时候，即便通过国家采取的行动，也是可以防止的。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结果对于7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19世纪的历史所做的说明，则是政府不能或不愿按照社会变化必需的速度，也许不能或不愿按照由于知识的增加而使之可能的速度，来调整它们的态度和扩大它们的活动，而现在的一些政府的态度和活动则开始符合更紧迫的问题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业化、都市化和知识的发展，或者寻求工业化、都市化和对知识的使用的更迅速发展，如在奥地利和英国、在日本和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情况那样，迫使政府按照不同社会中的不同变化速度和不同的政府效率，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又不大考虑政府的政治状况的时候，政府的统治便发生了同样的增长。地方当局的代理人中开始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参加进去并加以监督；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官员要求中央政府认识到需要大量增加立法和扩大它们自己的权力：政府开始使用最严厉的强制权，以实现社会目标与公共目标，而“普通立法的基本原理获得了强制实行这一新颖的优点”。[\[6\]](#)

这个过程在四个领域中发展得最快也最深入，而截至1870年，不论在什么地方，在这些领域中只是采取过最踌躇的步骤。这四个领域是公共卫生、初等教育、工作条件规则和政府对于公用事业的占有或控制。在这些领域中，上述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内，按不同的速度发展。

在以后的30年中，在整个西欧、北美和澳大拉西亚，以英国在1860年至1875年间通过的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

和居住条件的法令作为开端，在公共卫生事业中，继续通过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立法，继续发展了管理和执行机构。尤其在城镇中，这种效果是惊人的，而且是这些地区内人口巨大增加的重要原因。早在1880年，为消灭重要的致命疾病——瘟疫、斑疹伤寒、伤寒、天花、霍乱、猩红热——而展开的战斗正获得胜利，而城市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变得比农村更加卫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在1870年为22%，与1840年一样高，而对某些城市来说，则比整个国家要高一倍，但1870年以后，几乎每5年下降一次，在19世纪90年代降到18.1%。在20世纪最初10年，降至15.2%。在同一时期，平均寿命增长了10年以上。在所有这些地区内，取得了类似的进步。作为对比，在俄国，1890年的死亡率仍为35%，在欧洲是最高的，而在欧洲以外地区，死亡率则更高。

在上述这些地区（在这个范围以外，例外的情况是在日本），由于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对于熟练和半熟练劳工以及办公室人员的需要日益增加，甚至对于不熟练工人，也要求给予更好的训练。这就需要（而且看来也需要）对于提供免费的义务初等教育给予同等注意。1870年，在英国，儿童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日本，也许全部的儿童，都仍然处于一种愚昧无知和未受教育的状态。从这个状况出发，国家教育制度发展得非常快，到了1895年，除了迅速发展的城镇以外，在英国，每个儿童，而在日本，61%的儿童都有上学的地方，并且，到了1906年，日本95%的儿童都上了学。这些数字是衡量所有先进国家截至上述日期所取得的进步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教育仍属于最简单的一类。中等教育的发展缓慢得多。但这一变化对于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不论怎么估计，也不是过高的。

伴随公共卫生和教育的进展，在大部分这类国家中，政府扩大了对工作条件的管制。19世纪70年代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从1883年开始在奥地利，从1886年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90年代在法国，通过了工厂法。凡是已经有了工厂法的国家，则对它加以扩充，如1878年、1886年、1891年和1901年的英国工厂法令所做的那样。最后两项法令把委托立法原则引进英国，准许内政部不经过进一步的立法，就可以对规章做进一步的较大改动。这些改动涉及商店、洗衣店以及工厂，涉及男女以及儿童的工作时间，涉及对职业病的控制以及比较简单的安全措施。一个更新颖的做法就是开始为工人施行对事故和疾病

的强制保险。在这方面，德国做出了榜样。在1887年至19世纪结束时期，俾斯麦的1883—1889年的保险方案被许多欧洲国家所仿效，奥地利于1887—1888年，瑞士于1890年，丹麦于1891年和1898年，比利时于1894年和1903年，意大利于1898年分别加以采纳。在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在那里，国家至少强迫雇主赔偿工人因事故而遭受的损失）和美国，上述方案未被采纳。这是因为私人企业和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较早时期的发展抵制了国家的干预，而这种抵制是不容易克服的。

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为个人提供的机会现在正迅速地扩大，美国在发展有关工厂和保险的立法方面，以及在发展有关违反自由契约原则的其他措施方面，则比英国和西欧落后。然而，甚至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个人自由得到强调，国家为了进行报复，不得不设法对有利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加以管制。虽然在1900年以前进展很慢，但1887年通过的关于管理铁路的法令和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带头使托拉斯约束自己，不得进行不合法的贸易，并使企业界有遭受中央政府代理人起诉的危险；甚至在美国，尽管有联邦制、政党分赃制以及对职业文官制度（被当作一种贵族制）的根深蒂固的反对，但是，特别在1883年以后，在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方面，以及为了这项和其他任务而在发展职业文官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央政府和文官们比美国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都做出了更多的工作，因此，国会的委员会有必要增多。

由于同样的理由，美国以及英国在较小的规模上，都在下列过程中落后了。这个过程是政府由于经济扩展和公共效率的需要，被迫将较复杂的公用事业国有化，或以其他方法予以控制。在英国，由于地方当局的早期发展和私人企业继续保持力量，接管电报和越来越多的电话业务，是对中央政府直接提供的各项服务所增加的唯一重要的项目。在美国，甚至这些仍控制在私人手中；两国的铁路也是如此，虽然它们接受政府津贴的帮助，并开始受政府管制的初步措施的限制。在英国（但不在美国），地方当局在中央的贷款和拨款的帮助下，它们的职能远比以前更扩大了。到了1900年，地方当局强行取得了国家大部分的自来水厂以及许多煤气、电力和电车企业。然而，在后面几个领域内，私人企业继续兴旺发达，而一些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公司都是私营的，而不是市办的。另一方面，在许多欧洲国家，在比利

时、挪威、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俄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电报与电话业务和铁路，从这一时期开始，就由政府接管，而中央政府在提供其他公用事业方面，给予私人企业较小的自由，同时，对地方当局也给予较少的自由处理权。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不发达国家，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以及在努力使自己更加发达的任何地方，有关公共卫生、劳工立法和义务教育^[7]的进展，由于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落后状况而变得困难并且收效不大，但在上述其他方面，却朝着中央管理的方向，甚至迈了很大的步伐。在印度，铁路和广大的灌溉系统（这些发展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有了间接效果，因为印度在1880年至1943年间消灭了由于饥饿而造成的死亡），在拉丁美洲，不仅铁路，而且有煤气、电力、水和其他事业，在俄国和日本，不仅公用事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工业、金融和商业都划归中央所有，或由中央严格管理。

如果卫生、教育、企业工作条件和公用事业最迫切地要求给以注意，而且在这些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环境中获得了最大的注意，那么，对于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正在扩大的政府来说，在更必要或次要的任务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了。而且，“不断扩大和改善政府机构……日益应用一种新的集中制”^[8]的趋势一旦开始以后，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几乎自主的力量。它在条件所必需的情况下，在具体困难及社会习惯和政治利益造成的阻力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尽量迅速地、尽量向远处蔓延。在俄国、东欧和南欧的部分地区，在欧洲以外这个趋势确已开始的许多地区，甚至在迫切需要的领域内，它也由于人们的落后状态和反对而受到了限制。在美国，除了在被认为是个人权利的教育领域以外，它同样受到限制，但由于固有的传统，联邦结构和私人企业的上升趋势所造成的限制却比具体困难造成的限制要多。然而，在英国和西欧，国家对社会的有效干涉，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央管理地方当局的途径，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和更广泛的战线上建立起来：设置并监督监狱和教养院、疗养院和医院以及学校；提供津贴并为了佃农的利益，强行规定固定的地租和为了进行改善所需的补偿，以及规定工厂条件；而且同样重要的，采取征收所得税的手段，来支付社会服务事业不断增加的支出，并且把征税办法本身（分级征收所得税和资本税）作为实行社会改革和控制财富的一个手段。

直到1870年前后，在英国，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岁入都来自对消费品征课的间接税，而一半以上的支出，则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处理国债所需的费用。它的主要财政任务是把一小部分来自穷人的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给富人。在其他国家中，这种情况甚至达到更大的程度。虽然在同一方向的变化，从20世纪最初10年开始，发展得要快得多，但到了19世纪结束时，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所得税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已不再被当作一个不幸的应急措施，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和西班牙第一次被采纳。所得税，由于对它要求更多，开始分成等级，以便使较重的负担由收入较高者承担，并且在英国，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1894年以后，在法国，从1901年开始，用征收遗产税的办法来加以补充。在英国，除了来自对财产所征的地方税的岁入，从1870年开始比来自国家税的岁入在比例上要大得多以外，所得税在总税收（地方税和国家税）中所占的比例，也从微不足道的数目上升到30%。在欧洲国家中，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比较低，而较大一部分增加的支出则仍然依靠对消费品所课的间接税来偿付。越来越大的支出对于这类国家中的某些政府来说，也许和正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形势同样重要，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采取较高关税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些国家以及英国，正是在19世纪最后这些年才在对待税收与支出的旧态度方面，做了第一次突破。

实际上，到19世纪结束时，在这些国家中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之多，因此，对于那些尚未完成或尚未尝试的工作加以详细说明，是很重要的。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由于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控制，只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在医疗事业和卫生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改进，这二者共同使死亡率，尤其是婴儿和老人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在1891年至1901年间，婴儿死亡率同19世纪40年代同样高；对于超过45岁的人来说，死亡率减少得很慢，而这主要是影响到35岁以下的成人。由国家或市政当局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问题仍待将来解决；在1914年时，提供住房的规模仍然很小。扩大的工厂立法只处理工作时间、年龄限制和安全与健康标准；而且，工作时间尽管稍有减少，仍然很长。在英国，从1870年以来，工作时间由每周60小时降至55小时，但最低工资还必须等待更关心社会的一代来确定。采取最低工资率是脱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做法，首先在英国于1909年、1912年和1914年实行。与事故和疾病保险相对的失业保

险，与雇主和雇佣劳工出钱的保险相对的国家保险，在1911年以前的各种保险方案中没有它们的地位。不论在什么地方，公共的社会政策都没有对贫穷问题表示关注，也许这个时代的最大失败是，贫穷现象竟被允许在富足中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不是更增加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这时具有50年后在许多国家中一同使得经济管理和防止失业成为政策主要目标的那种知识或见解。有关提供普及的义务初等教育的措施涉及行政管理，建造校舍和培训师资等庞大方案，这些只能慢慢地进行。在1900年，在任何地方，这些都未完成，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与个人积极性和私人捐助相比，国家对于大学和中学教育没有提供很大的援助。征收所得税，甚至分级所得税已经实行，以满足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但即便在最先进的社会中，每英镑征收1先令2便士的所得税，在1901年被人们认为这在和平时期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英国的所得税从1875年开始不断上升，直到1885年达到8便士。它从这个数目再没有上升，直到19世纪末布尔战争爆发时，它达到了1先令3便士。布尔战争结束后，它又回到1先令，但在1910年至1914年间，曾经回到1先令2便士。许多国家仍然主要依靠直接的消费品税，特别是依靠关税，这些税收由穷人和富人同样负担。然而，由中央政府供给社会需要和控制社会问题，尽管其规模受到这些限制，至少在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到了20世纪初，在30年中有了如此巨大的进展，结果如论述1888年英国地方政府法案时所说的，它们已经“改变了生活的……结构”，并把“一般生活的全部过程，从诞生，甚至从生前一直至安葬时止……都纳入公共关心和注意的范围以内”。^[9]

这些政策，一旦被采纳后，不能撤销或搁置一边，而且，如果不能倒退回去，则同样不可能停滞不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比较先进的社会中，循着同一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是日益迫不及待地对受欢迎的政府所进行的考验。没有多久，在世界其余地方的政府，将面临的选择是招致政治上的混乱，还是试图仿效。在1870年至1900年间，事情还不是如此。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等方面变化的潜流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变化的缘故，这个时期是国内政治比较稳定，宪法领域的发展无足轻重和政治观点方面采取保守主义的一个时期。

在截至1875年的100年中，革命或企图进行的革命以及政权的剧烈变动，已经成为通常发生的事件，甚至在这一时期的最后 15年中，发

生了美国南北战争、波兰起义、日本明治维新、法兰西帝国崩溃、西班牙君主复辟以及德意志统一和意大利统一所涉及的许多重新调整。从1905年以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国内政局也同样不安定。在中间的这一世代，至少在卷入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那些国家中，情况并不如此。在古老的和主要实行君主制的欧洲，除了新国家（它们本身也是君主制）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新世界（主要实行共和制）除了在巴西的唯一君主国的垮台，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由于当地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扩张的共同力量而被推翻，以及在几乎未被经济和社会变革所能触及的拉丁美洲较小的国家中继续发生内战和军事政变；在实行更新的制度的日本；在欧洲以外其他的白人的殖民中心地区——在所有上述这些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关于政权方面的变化，或企图实现这方面的变化。这是它们在19世纪，以及在以往的150年中，所经历的最长的一个国内政治比较持续稳定的时期。

甚至在确立的政权组织以内，也没有多大宪法上的变革。在除了日本和俄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中^[10]，它们的宪法于1870年已经确立了一种议会；但所有这些议会，除了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以外，对于行政部门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在这以后的30年中，除了在日本以外，没有建立任何新议会；除法国外，在任何国家中，立法机构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来建立一种议会控制行政部门的制度，即一种可以同在更早时期英国、比利时和美国所发展的议会相媲美的议会制度。在其余地方，行政机构，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容易保持它的权力和地位或加以扩大。甚至在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尽管议会的控制仍然牢固地确立，但立法机构在与行政部门的对比关系中开始衰落。美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时，企图实现国会对总统和最高法院的压倒优势，但结果由于总统权力的扩大以及最高法院对国会通过的法案加以否决和进行解释的情况不断增加，国会只好退却。在英国，以议员享有独立地位和下院享有立法动议权作为标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接踵而至的是政党组织的增加和控制多数党的内阁对议会事务的控制的日益增加。在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成功地使海外活动与政策不再受议会的监督，特别是通过他的国际非洲协会，建立了对刚果自由邦一种个人的、虽然不能说是专制的君权。

在政治的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对比，力量继续增长，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党，或是成为猎取职位、脱离公众的寡头政治家和著名人士的小集团，或者如果成为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群众党派，则继续失去政治影响或掌权的希望。在这一方面，英国及其实行自治的殖民地、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也许是唯一经历过明显的内部发展的制度，这种发展是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有机变化，而不是为了维持旧政治结构所发展的新策略。它们趋向政治观点上的保守主义，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盛行的政治特征。

在英国，拥护共和体制的情绪在19世纪70年代并不罕见，在1880年至1885年间，一个任期很长的自由党政府掌握了政权，但在以后的20年，则由保守党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统治。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结束这一时期，美国这个一度曾是欧洲激进派的灯塔的国家，稳步地向藏在保守信念后面的一致性发展；日益变得保守的共和党的权势正蒸蒸日上；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激进的提案越来越得不到赞助；甚至这个时期平民党进行的鼓动，看来可能是对这些倾向形成了一个例外，但它却与这些倾向相一致，因为它基本上要求实行更多的统治。它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对其统治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美国1880年后在社会改革和工业立法方面落后于西欧。在法国——甚至在法国——宪法问题几乎到处失去了它一度拥有的力量，关于它的分歧和武断见解，在机会主义的共和党人的决心面前已失去了重要性。这些共和党人奉行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1898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他们的决心就是要避免一切有争议的方案来进行统治，但他们为了坚持社会改革而提出的方案则不在此列。

在这些西方国家中的保守主义，将保存一个较早的自由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它的实践者们是在一个得到接受的和持续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工作。另一方面，在俄国和土耳其，正是针对这些成就和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保守主义采取了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反对态度。然而，上述那些国家也经历了保守主义倾向，即便那里的保守主义倾向，经过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独裁政府施行自由化政策的时期以后，采取了反动的形式。那种倾向的另一方面，即自由主义的衰落，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过程，只要历史学家被名称（按照吉本的说法，人们被名称所统治）。引入歧途，它的广大范围就被掩盖了。所谓的“自由”党在几个国家中仍然掌握政权。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们在任

何一段时间内掌权，如在拉丁美洲、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那样，它们的观点和纲领便与传统的西欧自由主义的观点和纲领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按照自由党遵循那个观点和那些纲领的程度，它们或者像在俄国和土耳其那样受到排斥，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失去了影响、追随者和职位，经历了那种内部分裂，使想象力变得狭隘，有利于宗派主义和武断的信念，而这种分裂到了20世纪最后促成了它们的衰落。这一过程在整个西欧、英国，以及美国都可看到，而在美国，民主党比它的对手共和党更严格地奉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衰落的不同性质如保守主义目标的不同性质一样，可能提示人们，即使是为了做出必要的概括而认为这类形形色色的国家都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那也会令人产生误解；而且，把那些倾向解释为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则更令人产生误解。事实上，证据表明所有这些国家从不同的出发点，朝着一个保守主义方向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不同的水平上，它们都朝着同样的保守主义方向前进。关于这点，有一个主要原因：当它们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政治结构（这些都是它们以前不同的历史的产物）的时候，它们受到了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冲击。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些变化。但是，它们全都经历了那些变化的重大政治后果，即近代政府的开端。如果它们也全都经历了一个政治稳定或停滞时期，如果在一个总的保守主义倾向中，自由主义在某些国家中消失殆尽，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歪曲，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受到挫败，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国家的兴起，不论其后果对于未来如何，这时却支撑住政府的现有形式——不论这些形式如何——而所采取的手段则是使政府的态度社会化，并增加政府的权力。

至于结局是稳定还是停滞，它的产生是更多地由于一个政府改变了的态度，还是由于一个政府依靠它所增长的力量，这决定于每个国家一系列的过去与现在的情况。在某些国家（总的说来，那些政治上最先进并经历了最迅速的社会与经济变化的西北欧国家和英语世界），政府态度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要求政府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也减少了，因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已改善了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这个事实有助于推迟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并使他们不去进行政治鼓动，同时，结合对工人组织的危险性的恐惧，有助于使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和保守主义政府结成同盟。这个事实在美国尤其

有影响，因为那里总有某些事业比政治更有利可图，在德国也同样很有影响，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尽管在鼓动上和纲领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在实践中却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不过它却没有使中产阶级放心。它成为一个压力集团，它为工人在工业的利润中谋取更大的份额，而不是要削弱社会的基础或在国家的统治中为工人谋取甚至更多的地位。然而，除了在美国这另一过程被推迟以外，不论在什么地方，物质改善本身都不如下列事实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个事实就是，政府已经先解决了那些不满，否则，这些不满将支持或制造对政治变革的要求。除了在美国以外，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扩大社会领域中的中央控制和干预都有两个共同点，它使社会上最需要改善的不大富裕的阶层获得最大的好处；它由于政府的主动而产生，而不是由于政治鼓动的结果。在英国，当时被认为自相矛盾的是，对于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而且在实行以后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措施，在事先并没有多少公众提出要求。

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增长的情况，对于这些年来在这些政府活动的政治范畴内所造成的一项直接变化，即选举的民主化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在20世纪以前，除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不论在什么地方，妇女都没有获得选举权（在其他地方，芬兰和挪威于1907年开了先例），但是，普遍的平等的男子选举权在1870年只存在于美国（南方黑人除外）和英国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这时在这些国家中它正被提到议程上来，而在某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它在不同的国家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时候进行，但是选举权在不同程度上的扩大是由于政府的创议而产生的，不是由获得选举权的人们迫使政府做出的让步。有时，对于这种扩大产生了抵制，比对政府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进行抵制的情况还多。尽管有这个事实，有些政府仍然坚持实行。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扩大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一样，这些政府，不论其处境如何不同，其动机之间的差别却不易察觉：一般说来，采取创议的原因，如迪斯累里和俾斯麦在这个时期初所做的那样，是由于相信人数扩大后的选民主要将是保守的。另一方面，这个由政府采取创议，而没有发生政治鼓动的时期和下列那个时代之间的差别很大，那个时代认为，按照墨尔本勋爵的说法，“政府的全部责任是防止犯罪和保护契约”；而且，那个时代在英国产生了有关第一个改革法令、宪章运动和废除谷物法的斗争，并在欧洲引起了1830年至1849年间的革命。同时，对于政府采取创议和没有发生鼓动这二者之间的

联系，不能有任何怀疑。正是主要由于政府采取行动来管理社会，实行直接的、分等级的征税并扩大选举权，阶级怨恨才逐渐减轻，并且在这些年间，普遍维持了政治稳定的局面。

在另一个极端，则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对选举权没有加以扩大，如葡萄牙、瑞典、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德意志的一些邦保留它们高度限制性的选举制，虽然奥地利1896年曾扩大它的4个等级的间接代表制度，以便将代表群众的第五个等级包括进去；或者，如俄国直到1905年的革命以后，或土耳其直到1908年的革命以后，选举权都仍然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政府不大依靠预防不满的措施，而更多地依靠它日益增长的力量来压制不满情绪。在东欧，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个地区，传统形式的政府，多年来没有受到多大变动，恰好同这样一种形势相合，即经济与社会变化制造了恶化的而不是改善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未能同人种区域相一致。同一人口增加，对于德国的工业革命做出了主要的贡献；而在俄国和东欧，则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在那里，发生了在欧洲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即农业人口较以前任何时候都增加得更快，造成了贫穷、土地不足和普遍的经济动荡。这些情况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但规模较小，并且从这些地区向外国移居也比较容易。同一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和同一的民族感情，在西欧使中产阶级同已确立的权威取得和解，但在这个地区，在不大发达的政治结构中，却导致那些阶级中至少某一部分反对上述权威，如半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那样。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显著地是在俄国和土耳其，那里不存在议会，而政党仍然被看作阴谋集团，严重的不满情绪只是依靠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日益增加的效能，才能予以压制。缺乏政治上和宪法上的变化，在一些国家中主要是政府态度的改变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在经济条件改善的帮助下所带来的后果，而在这里，在社会与经济情况恶化的条件下，则主要是政府权力得到了较大增强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些极端实例之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一些国家中，选举权只是稍加扩大。在意大利，1882年的立法，即这个时期的唯一的扩大，将选举权扩大到7%的人口；在日本，根据1890年选举法，选举权第一次给予大约1/10的人口，而他们主要是地主；在印度，英国政府在1880年决定按西方方式发展代议机构，到了1892年，选举原则从

地方议会扩大到国家议会，尽管选民仍受限制。在其他国家，只是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一种高度限制性的选举制才突然被废弃，通常赞成采纳普选制：如1890年在西班牙，1893年在比利时，1898年在挪威，1900年在巴登，1906年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同其他国家中的政府情况相比，在一些国家中，政府的社会活动更能与公众的思想同时并进，而且政府的压制行动也比较缓和。造成的某些结果是，如在印度的集权而又开明的专制主义，又如在日本和拉丁美洲的主张秩序和进步并且日益提高效率的独裁主义，它们往往以一些社会纲领和一种宪政主义的伪装来掩盖它们寡头政体和使用暴力的性质。但是，我们不能做一般性的结论，而只能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依靠暴力和改革的混合物来防止不满和维护秩序，虽然程度不同，但比起极端的实例的情况来，在程度上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把极端的实例的差别加以夸大，而这样做，将会把最先进国家的历史上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特性掩盖起来。这些政府着手社会改革和扩大选举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同一件事。如果关于采取这些步骤的决定通常是行政措施而不是政治策略（即运用确认的权威的实践，而不是为争取拥有权威的斗争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些决定在改变统治阶级成员方面至今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它们在任何国家内，都几乎没有像在英国由于1872年的无记名投票法和1885年的选区重新划分法那样，同时也规定了关于秘密投票和公平地划分选区等办法。虽然由于创造了大批选民而扩大了选举权，这将有一天会改变政治的形式和制度，也就是说，将迫使政党将自己从寡头政体改为群众组织，收纳新人作为会员，采用新的演讲术和新闻技巧，促使选民去投票。但这个改变，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议会与行政部门对比，议会的权力继续受到限制的缘故，而成为一个缓慢的过程。

即便在英国，由于议会的权力和秘密投票的措施，使这个改变很早就开始，但继续实行一人多选区投票权的办法（50万选民在1885年后仍然行使一人多选区投票权，某些个人享有9票之多），以及一个长期确立并得到承认的统治阶级的存在，延缓了这个改变，并保证民主体制不会迅猛地向前发展。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在中产阶级增长时缓慢地变化：从1885年开始，在贵族中的工业家人数开始有显著的增长。但在政治上，1900年的形势和在19世纪70年代的形势没有什么重

大的差别，当时有80名贵族的儿子在下院任议员，而内阁成员则有1/3至半数是贵族。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受到限制，却是英国和美国以外发展大量拥护者的唯一政党，它发现政府组织不准许政党的力量化为政治影响和权力。美国是久已确立具有这一意义的民主体制并确实使之得到发展的唯一国家，在那里，甚至对民主体制也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在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和富人中间，开始对民主体制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们因为未能确立一个得到承认的统治阶级而感到懊丧。当时是1870年至1910年这段岁月，美国女继承人和欧洲贵族之间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现象特别常见。这个事实不论它如何阐明欧洲贵族的历史，却确实说明了美国富人中间的舆论动向。虽然普选权原则上是不可根除的，但要把它扩大到黑人，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上的推诿予以躲避。正是由于害怕强大的利益集团实行多数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即要尊重宪法而不是《独立宣言》，并将宪法置于选民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结果使最高法院的权势比国会和联邦各州议会的权势，有了增加。

如果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统治阶级的组成没有多大改变，民主政治没有多大进展，而且对它还有某些反作用，那么，下列情况也是事实，即在那些国家中，如同在更加独裁的国家中的情况一样，权威的力量稳步地增长——正如在某些独裁制国家中，至少有一种要想治理和改进社会的努力。关于这个时期的所有扩张的政府，可以说它们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才在社会领域内进行干预，而且，也不仅在社会范围内才增加了它们的效能和力量。所有的政府，包括独裁程度最低和最高的，都在行政和管理效能方面有了进步；所有的政府都依靠这种发展：即依靠官僚、军队和警察的成长和专业化；依靠武器和运输的巨大改进；依靠通过对报刊的影响，越来越可能控制舆论和取得公众的效忠；依靠广泛实行征兵制和提供国家教育等措施；依靠增加中央集权的所有这些原因和结果来维持稳定的局面。这种依靠，按照它受到继承下来的政治结构和一种进步的统治态度的影响的多少，而达到不同的程度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它在维持秩序与政治稳定等方面也起了作用，这种作用，即便是间接的，也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只是比社会改革、扩大选举权以及这些事情所导致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日益增长的信任次要一些。

这些事实对于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它既有增长权威，又有扩大民主的特点，而且，它的特点与其说是扩大民主体制并使政府民主化，不如说是走向政府政策的民主化，以及政府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正是这些事实说明了自由主义衰亡的原因——说明它在比较民主的国家中已经衰落，在不大民主的环境中遭到了挫败，而且在介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条件下，遭到了歪曲。

19世纪70年代，在西欧的先进国家中，当自由主义在它的欧洲发源地正达到高峰时，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府抛弃了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反对，同时把国家看作是在改变了的环境中实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时，这些政府接受了关于不可避免地扩大政府职能的早期步骤，并对个人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目标——接受国家教育的概念，给予工会合法的地位，证明公共卫生措施的正确性，采纳了甚至保险立法与工厂立法。在这些国家中，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能够反对这些发展，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政府在那些国家中，却被群众和近代国家这两个相关的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所压倒和推翻。国家作用的每种扩展，社会问题的每个新方面，对于群众的出现的每种承认，政策的每个新转变（不论是转向保护关税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转向社会管制和扩大选举权）都同自由主义关于契约自由和企业自由、自由贸易、个人自由、公共经济和政府尽量少进行干预等信念发生冲突。作为自由主义的伟大贡献的宪政国家及其指导原则，即个人自由、法律平等以及同教会的冲突，根据它们在这些国家中已经确立的不同程度，已被具有更多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们接收过去。自由主义变得更加教条，更狭隘地同城市的和大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甚至当工业组织本身，随着从个人控制转向社团控制的运动，正在摒弃自由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自由主义政党在这些当前的问题上分裂为温和的（民族的、社会的或帝国主义的）和激进的派别，并失去了职位。自由主义统治或其相等物于1885年在英国、1878年在德国、1879年在奥地利和荷兰、1880年在瑞典、1884年在比利时、1885年在法国告终。在德普列蒂斯与克里斯比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在西欧以外的一些国家中，自由主义政党仍继续执政。但是，它们只在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开始实行保护关税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事社会管理，而在旧有的自由主义信条中，只继续保持反对扩大选举权和教会

的权利。在这些国家中，如同在甚至更加独裁的国家中，真正的自由主义仍然成为反对已确立的权威的一个有关的、即便是削弱了的基础。但是，即便在这个任务中，即便当它不受到日益增加的遭到压制的可能性的约束，它也注定要遭受挫败，因为对于社会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且广大的群众也要求这些东西。

自由主义的衰落，在1880年后从保守主义政党获得的新生命中，从政局中新的教派政党的成立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教派政党中的大多数代表着一个天主教—社会运动，正如德国的中央党、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教权主义党、法国的“自由主义行动”和意大利的“大众行动”那样，它们全都以它们对传统制度的忠诚，对作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实利主义所进行的批评，和采取社会纲领以及同样地传播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提出一个民主的呼吁。保守主义倾向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的竞争而增强。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自由主义的取代者，而且作为对现存社会的批评者和对抗者来说，在逻辑上也是它的继承者。这仅是因为它向群众进行呼吁：它本身将使用近代政府的一切权势和近代镇压措施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它的目的，即便它相信，当这些目的实现后，对于镇压的需要和国家本身都将消亡。但是，社会主义迄今造成的恐惧，比它赢得的拥护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在独裁国家中，它由于受到压制而被延迟和挫败，在那里，有一天它将因此而更强烈地表现自己；在比较自由主义化的国家中，它由于人们主张宪政改革，甚至对君主权威进行妥协而失势，被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府采取的预先行动所延迟和挫败；不论在什么地方，它会由于一种十分精确而又全面的信条，在其追随者中间必然引起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争吵，而被延迟和挫败。

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道德上和物质上产生的纷乱，对于某些政府丧失信心，而另一些政府又失去权势，正是这些情况最后将为社会主义提供它的第一个机会和许多追随者。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1/3时间内，却惹人注目地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争，正如没有发生国内的政治与宪政的变化一样。

在1871年以后，而且一直持续到1914年，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时期，甚至比1815年至1854年还要长久，而这个时期尤其没有被一些比较次要的战争所扰乱。在1854年至1870年的16年中，曾发生过5次战争，涉及全部位于欧洲的最主要的国家中的一个或几个：经

过一段岁月，在这些国家的相对力量缓慢地发生了变化以后，现存的国际秩序（1815年和解方案中的领土安排和政治设想）已经不再代表力量和利益的真正分布。那些冲突中最近的和最重大的冲突——其结局是强使奥地利不得过问意大利和德意志；普鲁士击败法国；意大利未经宣战或国际会议的认可，占领了罗马和教皇统治的各邦；普鲁士未经一次会议或公民投票的认可而占领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证明是一个调整过程中的最后步骤，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端。至少30年来，欧洲的新现状，正如它所取代的1854年前的形势那样，没有遭到挑战，并且广泛地得到了接受。只是在巴尔干半岛，疆界有所改变，或主权有所转移；甚至这些改变也是强加给那些不乐意的大国，而不是由它们引起的；甚至这个东方问题也没有严重地危害了和平，虽然它支配了欧洲关系，因为这些大国不能回避由于土耳其的崩溃而造成的复杂局面，但又不能同意采取瓜分土耳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相反地，在欧洲以外，疆界和主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变化，都更加迅速和更加广泛。这些变化的实现，没有在主要大国之间引起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危险。在这种流动性很大而行动方向未曾探明的情况下，外交活动证明是与它在旧大陆的拥挤而熟悉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同样产生作用。而且，政府也证明是同样谨慎行事的。

在欧洲以外，如同在欧洲以内一样，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新的力量均衡所造成的。欧洲以外的新国家正在兴起；它们为追求它们的利益，甚至能够正式向另一国家宣战，如日本于1894年对中国宣战，美国于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但是，日本在击败中国后必须更加谨慎，美国在远东必须比在新世界更加谨慎，因为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一直到美西战争，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兼并了夏威夷，作为一个太平洋强国出现；而且也直到俄国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欧洲以外的许多问题都由欧洲强国所左右，除了像北美洲那样的特殊地区被门罗主义和门罗主义所依赖的英国舰队封锁，以及像拉丁美洲那样，在中部和南部国家之间发展了地区的力量均衡。在那些国家中，只有英国，由于它的特殊地位，甚至对一个小国正式宣战，如对布尔人宣战；或者，如在法绍达危机时，甚至能够对另一个大国以宣战进行公开威胁；或者，如在1882年对埃及实行占领时，能够着手把当前的力量均衡进行严重的改变。俄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近东危机时对土耳其宣战，虽然它公开宣

称它具有基督教的和欧洲的目标，而不是自私的目的；它和其他欧洲国家后来都不能避免在欧洲以外的活动，甚至战斗。但是，即便在欧洲以外的范围内，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欧洲内部本身，所有的国家都由于在它们中间存在的那种相互关系的体制而受到约束，不采取轻率的活动——不互相作战，不同其他国家进行正式战争，不为自己攫取那种其他国家不能攫取的利益。

柏林代替了维也纳和巴黎，成为那个体制的中心。新的德国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保证使奥地利和法国都不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改变形势，而且使它们得不到支持来改变形势。但是，这两个国家尽管遭到过失败，如同俄国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耻辱一样，仍然是大国，而当时正是大国与比较弱小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变得很大的时期。^[11]许多同时代的人们早就盼望法国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在他们的眼中，对于奥地利和法国的恢复元气，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而它们的潜在力量也不亚于德国。如果有一些同时代的人们认识到或者担心它们的相对衰落，他们也同意或坚决认为，德国要想扩大它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对任何一个被削弱的国家进行袭击，必然会促使其他国家给予这个国家援助。俄国和英国本来对奥地利和法国早期的失败漠不关心地旁观，但在1875年却表示它们不会容忍普法战争的重演，正如它们不会帮助推翻普法战争的结局一样。而且，这也不是唯一证据来表明，最近的变化非但远远没有建立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德国优势，而且还使欧洲摆脱了随着拿破仑三世而重新出现的法国优势的威胁，同时却又没有让德国的优势取而代之。俾斯麦尽管进行种种威胁，却坚决认为德国是一个得到满足的国家，它只是经常特别畏惧别的国家结盟，企图安抚俄国和奥地利并孤立法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最痛恨俾斯麦的花招的法国在内）认真地认为俾斯麦的花招，以及使他能够施展这些花招的从巴黎向柏林的中心转移，对于上述体制或者和平是危险的；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在一种力量分布大体相等和总的方面达到均衡的情势下，列强选择了和平而不要战争。这种形势接近于、尽管不能完全达到那种完全的和平状态，“如果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实力与实力并存，而且没有软弱点和腐朽点存在的话”^[12]，这种和平状态将会存在。但是，这种形势不只是鼓励它们重新采取 19世纪上半叶

的那种自我克制。它使它们能够继续奉行这样一些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在较早时期建立了一种关于列强的集体主义和“欧洲协同比”的认识。这些原则，如条约不应当以单方面的行动而抛弃不顾，个别国家要取得利益，不能不得到普遍的同意，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能不给其他国家以补偿，列强对于欧洲的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在1854年至1871年的战争中，不可避免地被停止应用了。但是，既然它们从来没有被解释为在战时可以适用（关于战争的法规同样地而且也合乎逻辑地是大家所接受的公法的一部分），它们在停止使用期间，却仍然限制了那些战争的目的：关于这些战争的显著的事实是，它们所造成的改变是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的，尽管也谈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煽起战争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爆炸力量。上述那些原则在战后也幸存下来：对它们继续默认，是广泛地接受新的现状和一同下定决心在1871年后保全和平这二者的基础，正如由于力量均衡而产生的现实考虑所引起的自我克制，也同样是它们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两个因素是互相支持的。列强之间的力量均衡遏制了危险的活动，而自我克制的这个另一来源正促使力量均衡能够发生作用。

然而，国际关系在性质上和1815年后较早的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不同。列强之间的均势及其在避免战争方面的共同利益——这些东西使得承袭下来的关于公法的即便是原始法律的概念持续下去；它们不允许回到、更不用说扩大“欧洲协同比”所体现的那种合作形式。列强的会议和大会如同公法本身一样，在1854年至1871年的战争时期已变得难以实行；与1856年的解决方案曾经采取列强会议的方式不同，1870—1871年的解决方案没有加以采用。在1871年以后，这个途径并没有立即予以抛弃。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大会的方法不但加以恢复；而且为了回答近期发生的战争所引起的恐惧，还做出努力来改进它早期取得的规模。1871年的伦敦会议批准了俄国废弃黑海条款。然而，批准它时，却按照这一原则，如果没有列强的全体同意，不能获得好处；而这次会议也对“条约的尊严”加以重申。在下一次于1875年至1878年间由于东方问题而引起的危机中，俄国在它遵循列强取得协议的决定时获得了好处。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后，当土耳其不遵照会议的建议进行改革时，没有任何国家会采取行动来保护它不受俄国的袭击。但是，当俄国背离了这项作为“欧洲协同比”的基础的原则，把圣斯特法诺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时，它便使其他列强失去了忍耐；正是英国出面为东方问题是全体列强关注的问题这一原则进行呼

吁，因而它在1878—1879年间的柏林会议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柏林会议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许多方面又回到维也纳会议的原题。接着，出现了格莱斯顿的决定，即在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后，把埃及事务置于“欧洲协同比”的监督之下，以及1884年在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上确立了关于有效占领奉开化国家的规章。然而，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列强之间经常举行会议的做法日益在一种几乎普遍的感情下被放弃了，这种感情就是，每个大国必须独立自主——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同时又不会使上述体制遭到严重损害。1884年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除了流产的1899年海牙会议以外，是二十多年来最后一次关于政治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在政治家中；只有格莱斯顿继续鼓吹联合行动，而不主张个别行动。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对于格莱斯顿的意见，从理智上加以蔑视。他们却更能代表那个时代。

如果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则结盟是它典型的外交手段。在19世纪上半叶，列强之间的协议曾是不明确的和暂时的——即谅解而不是结盟。从1879年的奥德同盟开始，产生了一系列以书面写成的许诺，具有曾经与旧的政府一同消失的那种细致特点。每个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对某个其他国家做出正式保证并经常地予以更新。甚至英国，尽管它有特殊的地位，在1887年后，若干年也不能避免这种做法，当时，它在地中海协定中接受了一项比它20年后同法国和俄国订立的协议中所包含许诺更有约束性的许诺。这些盟约限于欧洲的意外事端，尽管它们时常遏制，有时刺激而经常影响在欧洲以外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欧洲以外的国家迄今还未卷入。在两个方面，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提示，它表明对于权力和均势的追求已经变为世界性的，扩展到欧洲列强的狭小圈子以外去了。

英日同盟也是1879年以来所缔结的一切同盟中的第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如果只是从日本方面来说，对于战争与和平同样有关，而且，既与改变现状又与维持现状有关。直到那时，如果国际关系与19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不同，它们也不同于18世纪的国际关系。由于对于和平的决心更大，由于接受了18世纪几乎不熟悉的公法，新的同盟与旧国家的同盟（以及与1854年至1870年的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同，都毫无例外地是防御性的。^[13]许多同盟都明确地以保全现状作为目标；其余的同盟同样缺乏改变现状的意图。没有任何一个同盟是侵略

性的盟约，即那些成为其他时期特征的盟约，而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场计划进行的战争中取得另一个国家的援助或中立。它们和1858年的普朗比埃尔条约完全不同，那是“19世纪第一个确切的战争阴谋”，是法国和意大利关于寻找一个战争理由的协议；它们不同于法国和俄国的1859年3月的秘密条约，那是规定在法国和奥地利开战时俄国保守中立；也不同于1866年的意普同盟，那是以下列假设作为基础，即如果战争在3个月内没有爆发，盟约将无效。在列强缔结即便是防御性的盟约与坚持它们的独立自主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富于讽刺意味，尽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对于这点，却敏锐地认识到了。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1891年，三国同盟过早地展期12年，而作为法俄同盟基础的1892年的法俄军事协定缔结的期限“将与三国同盟持续同样长的时间”），所有的同盟缔结的期限都是短暂的，通常为三五年^[14]，其理由同样是因为这些同盟细致地处理确切的和防御性的意外事端：每个国家都不愿放弃它的行动自由。

在1890年后，和以前一样，每个盟约的谈判基调仍是勉强的情绪。列强不乐意缔结盟约中的第一个，即奥德盟约，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到：尽管这个盟约是“秘密的”，德国皇帝却坚持将一个副本送交俄国，以证明它的防御性质，而奥地利则通知英国关于这个盟约的存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关于缔结和展期三国同盟的那种勉强情绪，在三国之间不时发生变化，但在谈判过程中则一直是一个因素。法俄同盟在俄国和法国之间是一项声名狼藉、不受欢迎的交易，而双方的勉强情绪往往被误解为仅仅是由于沙皇制和法国共和制之间的互不信任。至少英国是极不乐意在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的，而且如果不是德国决心保持自由，这本来会成为一个英一德一俄三国同盟。部分由于这种不乐意情绪，尽管这些盟约从法律意义上说都是秘密的盟约，但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内容往往对于所有国家的外交部来说，一般都是知道的。^[15]由于盟约内容精确，期限短暂，而且根据法律意义来说是秘密的，所以，它们如同本来的意图那样，使列强除了对加以说明的、范围狭窄的意外事端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可以自由行动。列强也使用了这种自由。如果认为同盟的体制是一个外表，除了在举行隆重仪式时和被易于受骗者加以重视以外，往往遭到漠视，那也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除非强调它对于互相对立的同盟成员（奥地利与俄国、法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意大利与法国）之

间的了解，或者对于同盟者（意大利与奥地利、法国与俄国、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分歧不是一个障碍，否则，它的性质就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国家试图进行冒险，就会受到它的同盟者和反对者的同样约束。俾斯麦甚至同奥地利和俄国，同奥地利和意大利缔结不相容的同盟。曾经有过这种时候：英国政府不能想起它曾签订过地中海协定，或者不能决定这些协定是否已经过期。列强全都企图在事实上变为孤立主义者，如英国通常所能做的那样。它们的同盟关系证明它们希望独立自主，同样也证明它们取得独立自主的困难。

多疑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包含着这个困难。由于武器和战争艺术的巨大发展，困难便增加了。奥德同盟的起因是由于俾斯麦决心要维护1871年的有利的现状，他害怕另一次欧洲战争不能局部化，可能以德国被削弱或分解而告终。为了防止这个危险，他除了依靠外交手腕，还依靠德国在军事上已做好准备。但是，正如第一个同盟不可抗拒地导致其他的同盟一样，如果军事上已做好准备，那就日益需要有一个同盟者了。将科学、技术和工业应用到战争手段，将国家日益增长的效能和官僚制度应用到军事机构，这就使得持续的准备、迅速的动员、庞大的兵力和普遍的征兵制，在抵抗那种使用近代运输工具和近代武器所发动的进攻时，成为取胜的必要条件。所有主要的大陆国家仿效德国在这些方面的榜样，第一次成为和平时期的备战国家。另一方面，这些发展的唯一最重大的后果就是武器的发展。从16世纪以来，武器的发展比移动能力的改进要快，并且使战术越来越静止不动，而这时它比以往更向前突飞猛进了。武器的射程在1870年时比拿破仑一世时期大10倍；到了1898年，则大40倍。武器的效能也同样向前猛进，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机关枪的发展和1889年马克辛式的真正自动机关枪的发展。但是，战场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由于铁路的发展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战略机动性相对照，却因为较大型的武器的产生而削弱，直到后来在1914年以后，将汽油引擎应用于战争。战场上的机动性与武器的威力相对比，变得比以前更加不相适应了。这是海军和陆军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巨大差别。海军在速度和机动性以及武器威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因为海上的推动力量和陆上的自动力量相比，前者的发展早得多，而且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结果它们遇到的困难，如1914年的大战所表明的，是如何使敌方的舰队来应战。

在向一个做好准备的敌人展开陆地进攻中取得胜利，即使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结果也需要进攻一方对防守一方，在力量对比上拥有不断增长的优势。当列强不论如何全都做好了准备，当技术发展经常增加武器的费用及其报废速度，当日益复杂而有效率的总参谋部计划展开正面进攻（这是他们的习惯做法，而且，鉴于缺乏战术上的机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以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并且作为他们的职责，计划要获得胜利而不仅是成功的防御，另一方面，就在上述这样一个时刻，当各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和其他社会措施方面的花费越来越多，结果从财政上和心理上来说，负担十分沉重，以至列强感到不得不缔结同盟。如果这些盟约都涉及确切的意外事端，那么，它们在规定互相提供军事援助的细节方面，会达到最大的精确性。到了1892年，这个事实变得非常明显，结果那个最后变成法俄同盟的盟约起源于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严格的军事协定，缔结的目的在于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而法俄两国无意将它们的政策统一起来，同时也没有承担关于实行这种统一的义务。

如果只是因为它们直接由于军备形势而变为必要，那么，这些同盟，尽管因为它们使列强面临一个全面战争或全面和平的唯一选择，而加强了这个时代的防御性质，事实上却没有抵消这个时代在国际交往中的主要特征：每个国家最终依靠自力更生。俾斯麦开创了一个同盟网，因为他的各种同盟，不论其最后效果如何，都增加了他对国际政治的控制。由于欧洲的僵局变得更加全面，特别是在1892年后，这种局面鼓励列强在欧洲大陆以外寻求足以补偿的利益和消除差别的效果，从而加剧了它们的殖民活动。俄国日益转向波斯和中国北部；法国转向中国南部和非洲；意大利转向非洲；奥地利和德国转向土耳其方面。这些活动所占据的兵力，与用来保全欧洲的均势所做的努力和关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截至当时，而且直到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的序幕中弄巧成拙时止，这些活动一直从属于维持那种均势与和平，虽然有时，而且也越来越频繁地，只是在它们引起了国际危机以后才这样做。但是它们并不从属于欧洲盟国的希望或利益。正是由于这些独立活动超越了处理纯粹欧洲意外事端的盟约并且数量有所增加，结果才在1892年后特别有助于促使盟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相渗透。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当它们在国际关系中，随着致克留格尔的电报、法绍达危机和对中国的争夺的发生，已经造成一个额外的紧张局势来源，俄国这个首先发觉军备负担非常沉重的国家，建议召开海牙

会议，以便讨论过多的军备和保全和平的手段。尽管所有被邀请的政府同意出席，但没有一个政府，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说法，“十分认真地”对待这次会议，而且都一致同意德皇的话：“这个会议是乌托邦式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被看作是需要恢复旧的“欧洲协约国”机构，或者采用任何新形式的国际合作，只是建立一个纯粹自愿的仲裁法庭，而且，甚至这个步骤也几乎促使冯·霍尔施坦辞去他在德国外交部担任的要职。除了政府以外，在19世纪90年代，对于防止战争的问题的关注显然地有了增加，但是，诺贝尔、卡内基、德斯土尔内耳、伊凡·布洛克所代表的流行看法仍然是，进步的政府能够采用联合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需要那种复杂的国际机构，以及对于主权的限制。关于这些，在18世纪早期曾予以鼓吹，而且在20世纪将重新予以鼓吹，并且以18世纪的做法作为支援。

列强继续相信它们有力量不要一个机构也能展开工作，这如同“欧洲协约国”本身早期受到掩盖的情况一样，是当时最显著的发展的一个反映。这个反映在下列事实中更为显著，即正当自由放任原则由于国际机构之间的交往增加，同样也由于国家内部的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变得过时的时候，它们却这样重新得到维护，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据统计，关于这类事项的国际联盟和协定，从1878年至1880年间的20个增至80年代的31个，90年代的61个和1900年至1904年的108个。正当自由和个人主义让位于国内事务中的管制和组织时，而且正当世界必然经历着第一次大量增加国际立法和与各国均有关的行政技术事宜如邮政电报和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时，各国便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坚持国际政治中的自主地位；它们开始尽可能地完全依靠它们之间的一种均势来控制国际形势；它们开始相信在外交事务中，如同在关税这类事务中一样，每个国家享有的最大自由，将自动地产生对大家都是最好的结果。在国内机构和国际法及国际执行机构的成长背后的同一发展，即政府职能和权限的扩展以及每个政府与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具有明显的矛盾后果。它们使各国互相保持密切的和更持续的接触，甚至使各国在组织上彼此更加类似，但是，它们同时强调它们政治上的独立存在，并限制它们之间的政治团结。

君主间的团结的衰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直到19世纪70年代，不论如何削弱，这种团结，在那些即便是在不同程度上

却都防范着国内不同意见的政府中间，一直成为一种普遍的感情，而一种“欧洲协同体”的体制，就以这种感情作为基础建立起来。它现在却衰落了，而取代君主政治或王朝统治的，不是一种将各国政府团结起来的新的忠诚，而是一个新的国家观念，按照这个观念，每个国家的政府宁可和它自己的社会结为一体，而不和其他政府并列来反对自己的社会。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武装部队的感情联系的加深，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表现。民族主义本身经过了一个变化。在中欧和东欧这些地方，至少在当时是民族主义感情浓厚和未曾得到满足的唯一重要地区，除此以外，对民族的忠诚在一般群众中让位于对国家的忠诚。在那个地区，反对得到确认的政府的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比较容易压制下去。有一点始终是真实的，即这类运动往往只有在一个坚强的政府加以接受，其他国家政府表示赞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成功；它们现在受到国家权力的更大来源以及下列事实的障碍，这个事实是，各个政府本身，而且包括尤其是以前从民族原则获得好处的德意两国政府，在现存的疆界内，实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柏林会议甚至比以前的维也纳会议更忽视了民族原则。土耳其被剥夺了它一半的欧洲领土；但这是为了使列强的领土变得完整，有利于它们之间的均势，而不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的事业。撇开其他一切考虑，当各国政府在它们本国内，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成建立多数民族，竭尽最大的努力以同化少数民族的办法来制造同一民族的人口；当德国政府正在把波兰人和丹麦人德意志化；当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制如同奥地利一样忽视少数民族和地方主义，当俄罗斯化与马扎尔化一样残酷，甚至更为广泛，那么，对于捷克人或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或波罗的海地区人怎能有同情，更不用说是支援了。甚至在英国，格莱斯顿发现，公众的情绪顽固地反对他关于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计划，甚至在小国——如在比利时，当地的法兰西民族对佛兰芒民族的优势稳步地发展——各国政府同样也采取一种中央集权和民族统一的政策。

这种转移，以及伴随而来的政府对于限制责任和维护它们自己国家安全的关注的增加，使得各国政府不愿甚至在与它们全体有利害关系的政治纠葛中，实行会议的方法。不仅在东方问题中，而且也不仅在俾斯麦看来，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类麻烦和风险越来越被人们看作不值得为之牺牲一兵一卒。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更加肯定的是，像格莱斯顿这类人所做的努力，目的不仅要恢复“欧洲协同体”，而

且要加以扩大，使之回到会议体制，但这只会导致它的垮台。然而，格莱斯顿企图提交给它的问题如埃及的内部行政，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或解体，对非洲的开发等，则表明向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另一发展的重要性。如果各国政府比以前更不乐意在解决甚至是共同的问题方面进行合作，则下列情况也同样是真实的，即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问题，对一个纯粹欧洲国家的结构来说，不是共同关心的或至少不是同样关心的事。同时，尽管这些国家继续占有卓越的地位，但产生的某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所关注的事。这个时期的问题，比以往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由于这两种原因而不存在条件来应用一个欧洲协调机构，或甚至应用这类机构一度所依据的欧洲公法的一般概念，尽管在1884年关于非洲问题的会议中，以及对刚果自由邦地位的国际保证中曾做过努力，要将它们予以应用。

这第二个发展是其他两项发展的直接后果，世界上发达部分和不发达部分的差异正在变得尖锐。它变得尖锐的时期，正当欧洲的世界随着交通的巨大发展而缩小，而且也正当开拓不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正由于这个和其他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而大大地扩大。由于世界上不同部分的不同环境和以前不同的历史，工业与技术革命和近代国家的兴起（不论在何处发生，都表现为这个时期的这种显著的特点），并没有到处发生，而只在某些国家内发生，正如在它们确实发生的地方，并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速度一样。但是，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很巨大。不仅新的国家在欧洲以外正在首次出现。从18世纪以来，在西欧和其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差异，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是第一次，而是比以前更迅速、更广泛和更直接地扩展（也许不能避免扩展）它们对于下述地区的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些地区，社会和政府仍然像它们在欧洲中世纪那样。这种情况，从1870年前后开始，发生在土耳其的欧洲省份和中亚；从大约1880年开始，发生在土耳其的北非领地、近东和波斯，在不发达的非洲和不发达的太平洋地区；从大约1885年起，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甚至从大约1890年起，发生在新世界，当时美国从它自己的大陆扩展到加勒比海，从事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并在门罗主义指引下，维护它在南美以及北美作为一个支配国家的权利。而且，当这个比较广泛的政治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涉及所有这些欧洲国家，当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以同样的程度来影响那些国家，当有些问题更直接地受到欧洲以外新

的国家的关注，超过它们受到有些欧洲国家的关注，这时毫不足怪的是，这些发展证实了维护一个较老的、纯粹欧洲的习惯和合作体制是不可能的。或者，尽管美国、日本、中国、暹罗和墨西哥以及欧洲国家参加了海牙会议，它们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鼓励一个比较广泛的体制的成长。

不论做出一个全面的分析还可能需要什么进一步的细节，这些发展已构成充分原因，导致帝国主义活动和帝国主义情绪的增长，使之成为本世纪最后15年或20年的特征。这种帝国主义的许多特性，而且无疑地还有它的进一步推动力，一方面来自大萧条的特殊经济条件和欧洲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则来自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和传教活动。这个时代是一个基督教教会进行不断增加的传教活动的时代。这种传教活动由于物质上的发展（如运输的成长、廉价印刷的发展、对疾病控制的改进以及西方国家的财富的不断增长使这项工作不断获得的财政援助）而获得了便利，姑且不论这还归功于为了传播福音和照顾落后国家而继续显示的也许是不不断增长的献身精神。19世纪70年代，拉维热里创建了白袍僧。1885年剑桥大学赴华传教团成立。随后，全世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成倍地增加。到了1900年，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教团体的人数，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国驻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共有4.1万余名天主教士、1.8万余名新教教士，2000余名东正教教士（以上数字均包括当地的教士）。他们的活动由于刺激了公众对海外扩展的兴趣，而且由于采用了更加直接的方法，无疑地刺激了帝国主义情绪。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现在在程度上超过了更早时期的帝国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世界上比较有效率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异正变得更加显著，而当时正值由有效率的地区进行扩展和开发的可能性，比以前增长得更快。因此，殖民主义的扩张至少比以前更为广泛，并且被数目更多的国家所偏爱。

人们不禁要假定这个事实增加了，正如人们不禁要假定这个时期的军备、同盟和关税战增加了国际关系中的猜忌和紧张状态。同样可以论证的是，猜忌和紧张状态是主权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必要因素，帝国主义由于各国之间的抗衡既被限制而又被加速，正如这些其他的表现既被遏制而又被鼓励一样。如果国际紧张关系果真在1900年比1870年有任何增长——这个论点没有多少同代人会接受——那么，它由于

有一个比帝国主义、同盟、军备和各国的经济政策更为基本的原因。各国之间的均势本身正在变化，它们抗衡的目标也在随之变化。

当这个时期，即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而又不断增加作为特征的一个时期宣告结束时，另一个差异（即比较发达的各国、即列强本身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显著。自从19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这个差异正在出现。德意志的统一、美国南北战争的告终、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明治维新和1877年日本最后一次的封建叛乱的失败——这些发展已经在当时奠定了一个与近代一直盛行的体制不同的国际体制的基础。直到本世纪结束，尽管在这些基础上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而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迅速；尽管其他国家，如在1870年前发展得最快的英国和法国，现在正丧失它们早期的领先地位；尽管还有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和意大利，发觉自己的机会和作为近代强国的资源受到限制，但力量对比的转移一直不迅速或明显，而且它被较旧的国际秩序的牵制与平衡所压倒。比较旧的秩序仍然和新的秩序一同继续坚持下去。德国在1870年已经比法国强大，而法国是第二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德国拥有超过法国一倍的煤产量和几乎一倍的铁产量；它在1871年击败法国后，变得更为强大；嗣后，它不断地向前猛进，超过了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但是直到1890年，它在物质力量方面仍在英国之下，而且没有超过欧洲列强的联合力量。然而，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在欧洲内部接近取得的物质优势，是1815年来没有一个大陆国家所拥有的，而且牵制与平衡也无法掩盖的。10年来，尤其是从1895—1896年间的萧条结束以来，它在工业生产方面迅速增强它的领先地位，除了英国以外，超过了每一个其他欧洲国家。它很快地和英国并驾齐驱，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生产者，到了1900年，德国取得了名列第二的地位，当时美国生产世界钢产量的 $\frac{1}{4}$ ，德国为 $\frac{1}{5}$ ，而英国则不到 $\frac{1}{6}$ 。德国生产了740万吨，英国600万吨；对比之下，法国生产了190万吨。在同一时期，德国的人口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每个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它的人口保持在5600万，它的出生率和西欧许多国家的出生率一样，开始下降，但从70年代以来，人口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俄国人口从7200万增至16600万，美国人口接近于8000万。更为严重的是，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尽管仍然不发达，美国经过以前比较缓慢的发展后，开始经历德国已经经历了 30年的工业和技术的迅速成长。

德国现有的优势地位，或它能利用这种地位的时间有限的想法，在这两个考虑中究竟哪一个对它更有分量，这是不容易决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受了两方面的影响。

自从1871年以来，尽管在某些方面，德国对一些个别国家享有领先地位，但它一直关注着它的当前弱点。它现在开始被它的最后危险所震惊，并考虑它的当前力量。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它以前的审慎政策开始具有一种反复无常的和不稳定的性质，而它的利益以前集中于欧洲和它的陆军，现在则鼓励它把欧洲与帝国结合起来，除了在它的陆军方面以外，还在海军方面做出努力。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开始，它的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惧，招惹了报复，而它不断增长的相对力量本身在一定时候也会引起这样的后果。在嗣后的斗争中以及在国际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中（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在这个阶段，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有效力量的分布中出现了严重的和正在改变的不相等状况，从而代替了欧洲国家之间以前的均势），德国寻求一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未曾寻求过的那种对欧洲的霸权，同时所有的国家最后抛开了它们的一些原则和它们的集体感，而这些原则和集体感，尽管“欧洲协同体”本身已经瓦解，在19世纪最后1/3时间内，却有助于约束它们。尽管后来在国际组织方面有过许多实验，但这些却没有加以恢复。

（张自谋 译）

[1] 必须强调，关于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数量上的估计都是近似值，由于许多统计数字不全或根本没有，因而很可能存在着错误。关于所有的引证数字，也应考虑到这点。

[2]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指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译者

[3] A. H. 艾姆拉：《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经济基础》（哈佛，1958年），第189页，及以下各页列举了最近的估计数字，但它只能是近似值。按照这些数字，1873年至1896年间在价值上的增长，与1850年至1860年间80%的增长和1860年至1872年间几乎100%的增长相比，为1/3。这些较早时期都是价格增长时期：但是如果贸易以量来衡量，它在1800年至1840年间当价格下降时，增长了将近300%（每年7%），而在1840年至1872年间当价格上升时增长了约400%（每年超过13%），与此相比，1873年到1896年间当价格下降时它增长了100%（每年4%）。但是，在1898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重新以近乎早期的比率增长，在价格上增加了1倍，每年从39亿镑增至83.6亿镑。

[4] 这种人口增加不是世界性的。它在印度和俄国增加的速度与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增加的速度几乎同样迅速，而且在那里它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以至造成饥荒或饥荒状态。但在其他地区，物质条件仍然如此低劣，因此，人口停止增加（在非洲可能如此），甚至下降（如在中国，据估计，1850年长江下游一带人口比1950年要多，而且仅仅在19世纪70年代中，华北灾荒就使 1500多万人死亡）。

[5] 把187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这方面（无论如何，这只是约略的划分），英国是唯一重要的例外。人们一致认为，大约从1830年起，在所谓“自由放任时代”，英国发生了“19世纪的政府方面的革命”，管理性的国家的萌芽体现在以下方面：建立首都警察（1829年），任命第一批工厂监督（1833年）和第一批移民官（1833年），国家承担关于初等教育的部分责任（1833年），设立济贫法委员职位（1834年）以及建立监狱视察制度（1835年）。但是，即便在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至1870年间，对集体倾向也有很大的犹豫以及某种倒退，而从1870年前后开始，在这个范围内有了很大的进展，在立法语调上也有重要的变化。

[6] 约翰·西蒙博士：《1866年英国公共卫生法令》，G. 基特森·克拉克在《近代国家与近代社会》一书中引用，英国皇家学会记录汇编，第37卷（1959年），第561—562页。

[7] 但是，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参阅本书原文第20、179、472页。关于其他方面，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初等教育只有微小的进步，而其他地区则根本没有。

[8] A. V. 戴赛：《19世纪的法律与舆论》（1914年，第2版），第306—307页。

[9] G. M. 扬：《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一个时代的描述》，第151页。

[10] 在整个欧洲，其他不设议会的国家只是门的内哥罗、梅克伦堡—什未林、梅克伦堡—施特赖利茨（直到1918年仍保持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土耳其。在欧洲以外，在已提及的地区内，比较不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是除日本外的唯一例外。

[11] 人们只需列举一些国家，就可看出这个差距有多大。1871年在欧洲，与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并列的，有11个较小的国家：土耳其、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士、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土耳其、西班牙、瑞典—挪威和丹麦是完全的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虽然是自治的，但法律上仍属于土耳其帝国。希腊保证遵照三个保护国的忠告，这三国是俄国、英国和法国。比利时受1839年大国强加给它的中立条约的约束。瑞士和荷兰受维也纳会议的同样约束。葡萄牙传统上与英国联合。在19世纪结束前，只有罗马尼亚（1878年）和保加利亚（1878—1886年）加入了这些国家的行列。在欧洲以外，只有美国在1871年被认为属于大国等级。但它和迅速兴起后的日本都不能说是在19世纪结束前已经被纳入国际体系之内。

[12] F. 迈因克：《马基雅弗里主义》，第420页。

[13] 1873年的三皇同盟开始时是俄德协议，规定它们之间的一方或另一方受到袭击时实行互助，最后，奥俄两国取得了协议，即在受到侵略的威胁时共同进行商讨，于是，这个同盟便完成了。

1879年的奥德同盟是纯防御性的，主要是两个国家做出保证，共同抵抗俄国的袭击，而在任何不受俄国援助的其他国家发动袭击时，提供友善的中立。

1881年的三皇同盟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在除了对土耳其作战以外的任何战争中，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互相保证只遵守友善的中立。而与土耳其发生任何战争时，他们事先一同商讨，在没有取得协议的情况下，对东南欧不做任何改变。在这最后一方面，它主要是德国强加给不乐意的奥地利和俄国的一个自我克制的法令。在这背后，则是所有三国的这一愿望，即急于想保护现有的征服地——阿尔萨斯—洛林，比萨拉比亚和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882年的三国同盟，即由于意大利加入而予以扩大的奥德同盟，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袭击，德国和奥地利将给它援助；如果德国被法国袭击，意大利将援助它；如果这些国家之一遭到两个或更多的其他国家袭击，所有的国家都会一同参加。意大利保证在俄奥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在这个同盟背后，是急于保护现有征服地的愿望——意大利的愿望与德奥的愿望结合起来，以免其他两国在关于教皇国家的问题上支持教皇。

1887年德俄之间的再保险条约是两国所做的中立保证，但在俄国袭击奥地利或德国袭击法国时除外，这些保留一向存在，但现在使之成为正式的规定。

1892—1894年法俄同盟规定，如果法国被德国袭击，或被由德国支持的意大利袭击，俄国将使用全部力量反对德国，而如果俄国被德国或被由德国支持的奥地利袭击，法国将袭击德国。

[14] 1873年的三皇同盟（它是一种旧式的谅解，即神圣同盟或1854年前的谅解的一种再现）没有规定期限，而1879年后的一切同盟都故意是短期的（3—5年，有时10年，如1881年的奥地利—塞尔维亚同盟），但可以展期。

1879年的奥德同盟首次是缔结5年，每隔5年展期一次。

1881年的三皇同盟订为3年，1884年展期，1887年满期。

1882年的三国同盟订为5年，1887年展期5年；但在1891年未到期时，展期12年。

1883年的奥地利—德国—罗马尼亚同盟订为5年，时常展期。

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订为3年，1890年满期。

[15] 英日同盟的部分内容已发表，但它有秘密条款。直到那时，同盟都是秘密的。尽管如此，就其内容已被了解的程度来说，研究工作至今做得不够。显然，整体来说，内容是已知的。

第二章 经济状况

突然的变化不是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具有的特征。在许多方面，甚至到了19世纪，人们还在比以往大得多的规模上，探索从较早时期承袭下来的一些方法的逻辑性。19世纪和以往若干世纪愈来愈不相同，因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把先进地区发生的经济变化这一手段，传送到落后地区，无远弗届；而且，它传送范围的广泛，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世纪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速度，以及它的节奏和规模。先进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出售（多半是采取贷款形式）资本设备，其中有铁路、机车、车辆、采矿装置、水泵和各种机械。这就加快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安排和社会结构的改造速度。由于贸易的内容不仅限于货物的交换，而且意味着一种永久性的投资关系，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关系随之涌现，这种关系给人们在物质方面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在政治上却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英国在1900年，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所依赖的，是和一些国家签订的合同，这些合同的目的是以最简单的条件，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用往来账户支付资本设备的国家，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添置设备。这些交易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作为基础的，就是认为这种交易所创造的机会，可以使借方有能力将来连本带利偿还贷方。

这种现象在1870年并不新鲜。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大陆开始进入铁路建设时期，这种现象曾有新的突出意义。在这一世纪的最后25年中，由于人们修建新的铁路，用钢轨更换旧有的铁轨，这种现象继续蓬勃发展。英国在当时作为主要的制铁厂商和铁路技术的先驱，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修建铁路所需的人才和材料的出口国。路轨和车辆是由英国制铁商承造的，铁路通常是由英国承包商修筑的，筑路的资金是英国投资者借给的。有时候，这些任务由一方全部包下来了。19世纪中叶，南威尔士的制铁厂商同意那些购置铁轨的铁路公司，用它发行的债券来支付厂商们向北美出口的铁轨的部分费用。这一情况最能说明当时所谓“资本外流”的性质。这是英国和它那些充满发展前途但又缺少现金的主顾做生意的唯一途径。到1900年，英国在海外积累储存的资本，在20亿至25亿英镑之间。其中大概有1/5是对

北美铁路事业的投资。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南美、近东——它对铁路事业的投资比例究竟有多少，不大清楚，但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它对矿山、煤气、自来水、电车、电话，还有有线电报等企业提供设备并进行开发。这在发展国际资本信贷制度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制度本身，加上这一制度所促成的货物与劳务的借出借进，日益成为一种推动变化的巨大力量。重商主义的思想家们从不掩饰，他们对于允许那些潜在的竞争者购买或借贷英国早年在工业上赖以取得高超技艺（主要是纺织业）的工具和机器所造成的结果，表示担心。然而，铁路比起珍妮纺纱机或蒸汽纺织机来，却是更为强大的变化动力。运输技术既是物质进步的基础，也是最终发生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基础。它的直接影响也扰乱了那个普遍提供资金的重要国家本身的经济。在1870年后的一二十年中，英国目睹它和美洲、欧洲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它自己的资本和创造发明，在它们的经济之中造成的。

美国的经济在1870年至1900年间起了根本变化，因为这个最大的食品和原料生产国，也变成为第一流的工业生产国。在这段时期内，从事工业生产和运输业的美国人所占的百分比，超过了务农人数的百分比。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些采矿业城镇，在新英格兰有机械制造业城镇，在宾夕法尼亚州有炼铁业城镇。到1900年，有1/3的美国人住在这些城镇，那里的人口增长，比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要快。这一新兴的工业社会的主宰者就是那些巨头，就是美国民间政治神话中那些“强盗大王”。他们具有精力充沛的而往往又是冷酷无情的创业精神，替美国的民间传说创造了一些半是英雄、半是恶棍、难下定论的人物：洛克菲勒家族、哈里曼家族、希尔顿家族、摩根家族、卡内基家族，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直接或间接以铁路起家成为巨富的，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新美洲就是靠铁路才得以兴起的。J. P. 摩根的事业也不是出于偶然，他是靠他的家庭和伦敦的关系而开始的。他决心要在英国投资人中间（这些人拥有在美国的外资投资总额60亿美元的一半以上）保持他这家商号的信誉，从而使他的事业达到顶峰。1873年以后，北美的铁路系统日益使用酸性转炉钢。苏必利尔湖的矿砂，现在可以经由铁路，越过这个大陆的1/3的土地，被运送到新的转炉中去。美国到1886年，凭借着基本上是英国的一些创造发明，取代了英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家。美国的炼钢厂商，就

像许多制造其他产品的厂商那样，乐意拆除旧有的工厂，投资去盖新厂，这种做法使他们突出地成为一个资本消费国，正如他们早已以其他许多商品的消费国著称一样。

欧洲的主要铁路系统到1870年亦已建成。铁路绕过比利牛斯山脉的两端，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脉。甚至俄国也修筑了1万英里以上的路轨。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这一进程还在继续。欧洲的铁路网的密度增加了，许多铁路被连接起来——有圣哥达和辛普朗那样十分重要的隧道，有通往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长途铁路运输。^[1]1900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它在欧洲那一端是在1891年开始修筑的；约有4000英里的路轨是由国营企业花费1亿英镑筑成的。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及美国的铁路那样，它的作用是把东西两端连接起来，开辟一个不冻港，并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典型的事例是，俄国在主要的国家中是地处最东面的国家，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则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但到了这个世纪末期，竟成为修筑铁路最快的国家；促成这一快速发展的原因，不仅由于如维特伯爵这样的大臣们的新重商主义的抱负，而且，因为那些亲斯拉夫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都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这个铁路系统是把俄国从西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个手段。然而，古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反而把俄国和它的西方邻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国家的铁路系统同样也在扩展。比利时仍然是欧洲铁路服务最好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士加入了这个铁路国家的大家庭。德国增加了约3万公里的轨道；法国增加了约2.5万公里。

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国内资本迅速积累的佐证，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到1875年，它那与日俱增的人口——包括劳工，由于农村产业的衰落而引起过剩——使得铁路的建筑费用相对地低廉。法国的厄运同德国的兴旺是分不开的。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1903年写道：“可以说，通过战争赔款，法国替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主要铁路网。”推动运输方面这一巨大进展的工业基础，是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中迅速而坚定地奠定的。普鲁士在色当战役后的4个繁荣的年头里建立起来的制铁企业和各种工程企业，其数量要比这一世纪的以往所有年代的都多。但是，大跃进是在80年代来到的，德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全靠一个名叫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的年轻的伦敦化学家。此人和他的表兄弟P. C. 吉尔克里斯特发明了一种炼钢除硫法。这本是贝色麦和西门子无法解决的问题。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

法，为广泛地发展以阿尔萨斯—洛林矿砂为基础的钢铁制造业打开了大门。自从1871年把阿尔萨斯—洛林从法国人手里夺来以后，由于这里的矿砂含磷，一直无法利用。从此以后，欧洲的钢铁生产，依赖这一矿床和鲁尔的焦煤的比例数字日益增大。英国的钢产量从1880年的37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600万吨弱；法国的产量从140万吨，上升到190万吨；而德国的产量则从150万吨增长到740万吨，而且，以后增长得甚至比这还要快。这一增长反过来为各种冶金工业的上层结构，打下了基础。德国到1900年已为自己建造了接近150万吨数的钢制汽轮，供它的商船队之用。这也是它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当时德国汽轮的吨数比不上法国，甚至也不如西班牙。

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的物质上的进步，有一个方面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应归功于冶金和电力这两项技术。风帆的“黄金时代”是在1851年的博览会至80年代后期的不景气之间的这些年代。这个时期，即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中叶，帆船的效率达到了顶峰。它极力斗争以保持它对动力推动的船只的优势，这些动力船只当时还有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因而在发展方面受到了阻碍。即便是铁壳船，经营起来仍然是所费不赀，因为船底黏满了海藻、贝壳之类，航行缓慢，延误时日，而且清除船底也要花钱。因此，用铜包底的木帆船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联合王国1870年的帆船吨位仍有450万吨，而蒸汽铁壳船的吨位才超过100万吨。帆船继续载运体积大的货物——铁、煤、麻、大米、羊毛、小麦、硝酸盐——环绕着半个世界航行。即便铁路在19世纪70年代中开发了中西部的草原，但是几乎所有运出的谷物和鸟粪以及回载的货物煤，都是用帆船装运横渡大西洋的。1882年，有500多艘几乎全部是英国的帆船，从美国西海岸装运谷物去欧洲，虽然这时新的设计已使50年代的装货舱位扩大了1倍，因而制造铁壳船并装上钢制船桅变得合算了。从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轮船引擎要想和风帆做有效的竞争，需要更大的压力，人们对于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正在进行研究。这些问题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得到解决。这时，由于改进了钢锅炉和钢管道，造船商们因而能够制造出一些装有在150磅或以上的压力下进行工作的三次膨胀引擎的船只。1881年阿伯丁白星航运公司的“阿伯丁”号轮船在格拉斯哥下水。这标志着帆船在这场顽强的竞争中已成为强弩之末。1883年，英国的轮船吨数已和帆船的吨数相等。10年后，全世界的吨数也达到同样的情况。

轮船引擎的效率与日俱增，这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促成的。影响最大的是苏伊士运河，它把西欧和中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3000 英里。正像过去多次那样，这一次也是法国人提出了开凿这条运河的想法。然而，别的国家从德莱塞普斯的远见和勇气中得到的好处，要比法国为多。查尔斯·迪尔克爵士曾预料说，法国将会发现它“花费了好几百万法郎开凿了一条运河，却供英国使用”，这番话说的不是不中肯的。7年后，欧仁妮皇后于1869年亲自主持这条运河的通航典礼，对于法国的威望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当时还演出专为这次典礼而创作的歌剧《阿依达》。迪斯累里及时地买下了埃及统治者的股份，使英国政府成为主要的股东。此后，这条运河主要是由英国的船只使用，直到20世纪时止。新的巨型轮船也需要改进港口、码头的设施。这就要求投入巨额的资本，加深航道，建造更大的码头、更大的货栈以及挖泥船、起重机和升降机。1872年，鹿特丹的一位工程师卡兰德修造了一条把鹿特丹直接和北海连接起来的“新水道”。1887年至1895年间，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建成。曼彻斯特的“通航运河”接着于1894年凿成。这些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在西欧的生活中，它们对于方便和刺激商品的流通这一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海底电缆在连接世界各地的市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这些运河。在这方面，主要的所有权又属于英国人——甚至在1900年，世界上的海洋电缆有3/5是属于英国所有——但是，最初的发明既归功于英国，同样也归功于德国。不论从科学方面还是从商业方面来说，威廉·西门子都是一个主要人物。他是来自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德国移民，是德国技术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学生。1843年，他作为他的家庭所经营的买卖的代理人前来英国。19世纪，有一些德国科学家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西门子便是其中之一。到1863年，他在伍尔威治已经建立了他的海底电缆厂，就在德莱塞普斯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西门子正在敷设他的第一批海底电缆。1871年，印度至欧洲之间的电缆完成了，它从洛斯托夫特开始，经过北海海底通往德国，穿过中东，经德黑兰至印度。到1874年，已敷设5条电缆，横贯大西洋。到1883年西门子去世时，西门子兄弟公司已经制造并敷设了将近1.3万英里的重要海底电缆——足够绕地球半周还多。

发明和技术，尤其是动力和冶金方面的发明和技术；陆路和海上运输及其辅助交通体系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投资机构的成立——这些都是促使世界贸易的性质和规模发生彻底变革的因素。其中某些因素到19世纪中叶，甚至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发生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力量合在一起，对欧洲和欧洲以外世界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却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的事。任何一种概括或统计学的解析，都无法说明已经深深渗透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经济的以及政治和社会的习惯做法中去的这些变化的全部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国际贸易增长的数字。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30年中，国际贸易的价值以黄金计算，大概翻了一番还多。如果把价格下跌这一因素计算进去，贸易额很可能增加了两倍。

而且，这种贸易的性质及其规模正在起变化。17、18世纪的国际贸易主要是纺织品占支配地位。即使到了1900年，棉毛织品和其他纺织品仍然是英国出口商品单上数量最大的一项。但是 1870年以来，无论是单独地还是和金属、机器的出口相比，纺织品的价值，都在下降。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济特有的问题——关税的影响以及新兴工业国的竞争。但是，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德国出口的钢铁以及用钢铁制成的商品和机器，到1900年就已超过英国。事实是，对外贸易在19世纪的前半叶，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的生活中，还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而到了1900年，新兴的运输业已使对外贸易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体积庞大的货物，现在可以轻易地搬运到很远的地方。因此，在欧洲制造业国家中心集团和位于遥远外沿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分工；那些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地区，如美国的南方各州、中西部草原、印度、马来亚、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国，到80年代全都向欧洲供应食品和原料。法国需要的煤有1/3依靠外国供应；德国几乎要全部进口它所需要的原羊毛；英国需要的小麦有4/5要从外国输入。这3个国家全都依靠对外贸易来提供和支付所有输入的棉花、橡胶、黄麻、大米、几乎所有输入的锡、铜和矿物油。英国特别依赖进口食物，法国和德国在步它的后尘，甚至美国也愈来愈倾向于使它的食物输出与输入保持平衡。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把它食物的输入值加了1倍。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这样一个差异：它买进的是主要的食物——特别是小麦——而其他国家买进的有一大部分是奢侈品，必要时，可以取消进口。英、法、德三国依靠进口工业原料的程度增加得很快。

工业国和初级产品国之间的这种分工，使工业化的国家日益依赖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它们不再是欧洲商人偶尔过访的边缘地区，也不只限于一年一度地把它们的货物运往西方。就像中世纪每年举行的集市让位于17、18世纪的贸易中心那样，这些中心——它们的皮货、香料、细布、酒等交易虽然比较经常但仍然是间歇性的——现在却让位于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间歇的国际贸易交流。收成可能仍然会影响物价，冬令会使加拿大和俄国的河流和港湾的货运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般来说，贸易往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大自然的支配了。而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出口货与进口货价值之间的差距，并导致高度的互惠性，这就可以使国际支付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商业银行业务的广泛开展（大部分业务受伦敦的管理）减少了贵金属作为偿付手段的重要性。金条和金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银行家的最终的储备；硬币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只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通常总是在情况十分不妙的时候才加以使用。当贸易按正常的途径进行，不受战争、战争谣言或紧急危机的干扰时，金银的流动减少到只是涓涓细流。伦敦的银行日益频繁地协助远在半个世界之外的买卖双方的商品贸易筹措资金，而这些商品却从来也没有到过欧洲附近。

紧随海外资本投资而来的，是日益高涨的商品流通的浪潮，而使这一运动顺利进行的，则是劳务。英国虽然在提供商品和劳务这两个方面仍然领先，不过，现在德国和法国也参加进来了。这种商品浪潮再加上这种劳务，就产生了一个新现象：一个受世界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出现了。同时，它也带来了支付的新问题。过去多少是自给自足的贸易地区（例如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和范围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相融合，因为中国、印度和日本开始在世界市场上销售货物。英国和这半个世界的有形贸易有逆差，但和另外半个世界的贸易有顺差，足以取得平衡。英国这一维持逆差的能力，成为国际支付机构的中心支点。从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北美富饶的自然资源，英国对美国的逆差稳步上升。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逆差就由英国来偿付；美国对加拿大和阿根廷的顺差日益增加，这就使它能够有钱从巴西和印度输入货物。英国除了对美国有逆差以外，对其他国家还有巨额逆差。由于资本投资带来了硕果，生产和出口有了增加（比如说，阿根廷从19世纪90年代起，它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从逆差变为顺差），这些新兴国家常常把它们顺差用于别的工业生产国家，而不是花在

英国身上。英国看到它和南北美洲、欧洲和自治领在贸易上的顺差消失，同时由于关税和竞争的关系，英国的产品更加难以向海外输出，它也必然愈来愈依靠它和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如土耳其、日本，最主要的是印度仍然保持着的顺差，来偿付它和欧洲以及美洲的逆差。据说在1914年以前的三四十年中，英国敞开大门让世界各地的货物输入，因而对于世界经济的顺利运行，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英国在国际支付中的多边格局，愈来愈取决于它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关系；印度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帮助印度弥补它对英国的逆差。通过这一办法，到1900年时，英国对印度的顺差大概可以用来支付英国对其他国家的全部逆差的2/3。这一多边体制，对于国际贸易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尽管要求改革关税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体制的受益者无疑地包括许多英国出口商在内；其他工业国家通过这一体制，可以不必输出工业品作为双边的偿付手段，来取得它们所需的食品和原料，这就使英国制造商在他们欧洲以外的市场上，不会遇到可能的竞争。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惠，只有英国的农场主除外。从这一世界贸易体制所引起的偿付义务，有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主要机构来进行结算。这个机构接受各个大陆买主的交款账单，把它当作支付的款项。北京1894年通过英格兰银行向东京偿付战争赔款，是世界经济新秩序最生动不过的象征。

在国际贸易总额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均势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尤为突出。英国在1870年的优势是无敌的，但是到了1900年，虽然它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首位，但已受到挑战，在走下坡路。英国在1880年到1900年间的份额，从25%降到21%；法国的份额，从11%下降到8%。相反地，德国的份额，则从9%上升到12%，美国从10%上升到11%。用外贸的价值来计算，当时人们认为在前一时期，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超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总和。到1880年就不再如此，尽管到1890年，英国的贸易仍然超过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贸易。到1900年，德、法两国的贸易总额加在一起比起英国来，如果还有差别的话，也少不了许多，而在某些方面，比英国还要多些。

在美国，情况正在变化，但是美国的制造业仍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广阔的国内市场方面，那里如果资本不算充足，原料和劳力的供应都是无比充足的。美国作为一个输出国，直到转向20世纪，仍然把

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初级商品和食物——棉花、粮食和烟草——向工业化的欧洲出售方面。当时在国外市场上，它的竞争还不足以引起英国制造商的严重担忧，不过，那些在美国旅行、较有眼光的英国实业家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忧心忡忡地看到，那里的技术和干劲正在迅速地把美国的许多工业变成现代化、经济实惠而又有效率的样板。那里有一个庞大而又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它那显然无穷的需求，促使美国钢铁业巨擘把生产计划的规格提高到英国不可能实现的地步。产量在上升，价格则下降。1875年，钢轨的成本是每吨160美元，而到1898年，只是原来价格的1/10稍多一点。南威尔士马口铁制造商发现，美国的石油和食品罐头工业给他们的订单，转向一项新兴的蓬勃发展的工业，这种工业是在威尔士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些因素：制造商的进取心，一支放弃怠工、信心十足的劳动大军，经常把资金用于省工省料的装备，通过广告来探索并开辟市场。这些因素在这个世纪末就被人们看到了，当时的心情是既感兴趣，又有点担心。但是，这种担心还不是剧烈的。美国在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以前，在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只要美国的创造性集中于生产那些用来制造鞋靴、廉价的纺织品和英格索尔先生的名牌表的机器，人们的议论就可能是温和的。

法国和美国一样，并不站在制造商寻求新的扩展中的市场这个竞争的前列。但是，就它本身的情况而言，这是因为它的工业化的进度较慢，且有明显的困难。直到1890年前后，法国工业中的动力机器发展缓慢，产量增加也慢，说明这个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了从乡村的个体生活方式中转变过来这一事实。这绝不是说，法国人创造性天才的火焰不如别人的那么光亮。在科学方面，有如人文学科方面一样，都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法国人的活力。18世纪，那种创造发明的传统，看来和过去一样的旺盛。水下潜望镜、柴油引擎、照相平版印刷术、陀螺仪以及其他许多发明，不都是起源于法国吗？第一次驯服阿尔卑斯山两侧奔腾而下的“白煤”的，不就是后来成为水力发电的鼻祖、法国格勒诺布尔地方的造纸商贝尔热吗？法国人勒瓦瑟生产了近代汽车的雏形。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现，使法国成为新医药业的不容争辩的创始人。法国确实是个“伟大发明的国家”。但是，从发明到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来说，法国则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缓慢。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工业化的进程是缓慢的。

从此以后，它加快了速度，但是，比起德国来，步伐还是慢得多。到19世纪末，法国的钢产量，一年不到200万吨，只及英国的1/3，德国的1/4。纺织品产量——特别是棉、毛和丝织品——因采用动力而增加得很快；而法国的蒸汽动力在90年代中增加了一倍多，从不到100万匹马力，增加到200万匹马力左右。但是，和同时期的德国工业的奔腾步伐相比，它只能算是慢步徐进。

法国的竞争是独特而有限的。同时，美国仍然忙于国内的市场，因此，只剩下英国和德国能在世界市场的制造业方面一争短长。德国从一个农业国一跃而为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经济国，这个转变一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突然变化，对于经济史这门学科来说，是少有的。同1816年普鲁士相比，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农业特性迟至1871年，不过略有减少，而工业化的程度也只是稍有提高。随后，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所有刺激工业发展的力量合在一起，发生了作用。在这些年代中，人口从4100万增加到5600万，住在城镇里的德国人，在同期内从36%增加到54%。这些数字给人的印象是“举国一致涌向城镇”^[2]，而最大的人流则是涌向最近的城镇。现在具有吸引力的，不是宾夕法尼亚或是中西部，而是柏林、埃森、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和莱比锡，这些城市吸引着来自东部的工人和矿工，使得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农场缺少所需的劳动力。整个社会这种剧烈的调整，给社会造成了负担：工资按英美的标准经常是较低的，伙食和劳动条件很差；德国工人是世界上食用廉价的黄油代用品最多的消费者；劳资关系带来了难以对付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如特赖奇克所说的那样），铁路把德国人的潜能释放出来了。

这种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其惊人的后果，它反映在煤的产量上。在1871年到1900年间，德国的产量（包括褐煤）从3800万吨上升到15000万吨；英国的产量从11800万吨上升到22800万吨；法国从1300万吨上升到3300万吨。这些，再加上洛林和卢森堡的矿床，构成了钢铁工业的基础。这个工业从1870年的小规模开始，到了1900年，超过了英国。而且，出口煤也成了一项行业，为这期间迅速发展的商船业提供了业务。德国人在工业设想和技术方面，并不是新手。相反地，农村工业，主要是粗糙的纺织业，从中世纪开始，就在德国普遍发展。中世纪德国的玩具制造商、钟表制造商、军火制造商的技艺，与制造发动机、各种机器、提高羊毛、毛纺、丝、棉工业产量的新工业之间，是有一种连续性的，对于这一点，谁又能怀疑呢？而且，有些古代的

行业，如莱茵兰地区佐林根的刃具工人这一行，是通过德国在电力技术方面的绝技而保存下来，并得到巩固的，因为它在电力工业方面的技术，为那些小人物提供了工作需要的照明和开动车床、转轮和砂轮的动力。

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德国工业对它的出口贸易的贡献，不同于英国工业对英国出口贸易的贡献：因为英国的出口货，在传统上首先是以纺织品为基础的，而德国则是用相反的顺序来处理它的事务。首先是钢铁，随后是机器，再后是煤炭，接着才是毛、棉及其他纺织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德国的纺织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的原料。如果说英国人吃的要靠外国，那么，德国人穿的要靠外国。但是，这一事实不应掩盖它通过技术教育，通过德国特有的工业组织形式，正在发展中的一些新的变化过程的特殊性，即它的重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它的化学工业在19世纪 60年代，还几乎是个空白，发展成现代这一方面的最大的工业的物质基础，就是普鲁士的萨克森丰富的盐和钾碱的蕴藏量。它的科学基础是国家的教育体制。一个国家出了利比格、本生、霍夫曼这样的人物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化学家，它十分重视科学教育是很自然的。远在德国化学工业的规模形成以前，亨利·罗斯科曾对科学教育特别委员会说，在德国，“为爱好科学和知识而爱好科学和知识的情况，在大学里要比在我们英国的大学里普遍得多”。亨利·罗斯科只是通过自己艰巨的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才制止了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取消他所主持的化学讲座。在柏林，一个学生一年只要花20英镑稍多一点的钱，就够缴纳学费和实验室做实验的费用；在其他地方就更加便宜。高等技术学校是和工业挂钩的，工业科学家们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应用科学，而且水平要比英国的机械学院高。普鲁士1870年花在这些人身上的钱达 25000英镑；到了1900年，为117000英镑。这一笔投资及时地为德国化学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一批批训练有素的基层技术人员，领导他们的则是一些大学出身的、具有创造才能的化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等骨干。正当法国、英国的化工厂商日益感受到为过时的工厂所束缚——特别是作为化学工业主要基础的勒布兰制碱法——的时候，德国却在放手发展像索尔韦制碱法那样的新方法。德国的硫酸制造商可以任意侵袭染料和农用化肥的市场。在1870年到1900年间，各个生产部门都有巨大的增产——硫酸和强碱的产量增加了7倍，染料的产量大约增加了3倍。德国精细化工产品 and 合成染料工业是工业上的一个光辉榜样：它以英、法的创造发

明为基础，依靠教育和进取精神，把这些发明创造实际变成了德国的垄断。到了1900年，推广使用化学染料合成法的一些德国小厂家，已经变成巨大的康采恩，其产量约占世界染料产量的90%。

电力工业的创立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经济成就。某些基本发明的出现，又是比本章所叙述的这一时期为早。威纳尔·冯·西门子是1843年到英国去的一个年轻德国科学家的同胞兄弟，很有冲劲。他6年后设计并创造了德国第一台主要的电报机，这台电报机于1849年在皇帝选立后的一小时内，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柏林，轰动一时。这就是西门子和哈尔斯基伟大事业的开端。这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和威廉·西门子创立的英国企业有联系。1867年惠纳发明了发电机。1861年发明电话，几年内，德国成为使用电话最多的国家。继发电机的发明而来的，是传送电力和电力牵引的试验，试验成功后，又为德国城市提供了电力照明和电车。英国的旅行家看到德国在这些方面比英国远为先进。一个巨大的新兴工业的崛起，为新设备提供所需要的发电机器、电报材料、电缆和灯。1882年的人口调查中，还没有电力工业工人一栏，可是，1895年，电力工业工人就有25000人，到1906—1907年，则达107000人。

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一样，由于集中（它为三家大公司所控制），说明了它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大规模生产和耗资巨大的工厂所需求的。这一工业的大部分市场是在国外，如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国家通过水力发电，现在能从天然燃料匮乏的情况下解脱出来。发电厂通常是在德国建造的，这就使德国为欧洲工业化的第三阶段提供了工业革命的手段，就像英国曾为第二阶段制造过当时工业革命的手段那样。

德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它对重型生产资料的强调，它在1875年到1895年间的迅猛发展，西方的运输和公用事业发展所达到的先进阶段——所有这些，再加上德国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政治习惯，促使德国的工业对国外市场发生一种特殊的兴趣，特别是对中东和远东的市场。但是，不能完全（甚至主要的也不行）把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归罪于德国的工业。新的重商主义和旧的一样，是许多种力量、动机、雄心的产物，绝不全是经济上的产物。那些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首的所谓“历史经济学家”曾经表达了重商主义的抱负。施莫勒1882年后在柏林大学任教授。对于他和他的学派来说，（在其他国

家中，还没有类似的学派）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经济规律。经济理论只是在和实践、历史和实际的制度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能有它的价值。而在德国，这些就要求国家干预并调整经济事务，以便促进国家的富强，这也就是这项政策的双重的、一贯相连的目的。1900年的海军法就有其思想上的根源，这就是25年来日趋成熟的一些学说。经济上的进步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效率被等同起来。施莫勒尔在1884年写道：“正是由于这些政府懂得如何使得它们的舰队和海军部的力量，以及海关法和航海法这一套工具，迅速地、大胆地而且明确地为本民族和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它们从而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在财富和工业繁荣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前10年间的波动已经削弱了东部农业巨子——一般是玉米出口商——对自由贸易的信心。1877年以后，俾斯麦更加全神贯注地聆听西部工业界的抱怨，特别是因为他的财政部也已经感到萧条带来的拮据。从1879年起，德国实行一种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的范围内，工业在国家的赞助和合作下，打算在关税的保护下取得稳定。德国的工业可以自由制定价格协议，组织它的原料供应，划分并组织它的市场。不论是个人主义的传统或政治权贵的怀疑，都没有妨碍德国工业建立大联合企业来保护自己避免萧条。而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艰难日子里，舆论都曾经起了妨碍的作用。投入那些新兴工业的固定资本数额是可观的，这意味着不能听任市场去碰运气，供求必须是“有组织的”。这一理论在工程、电气两项工业和它们的“主顾们”的关系之间，得到了合乎逻辑的最大限度发挥。那些“主顾们”本身就是一些公司——消费公司，它们是在供应公司的帮助下，建立起来购买它的产品的。这一过程只不过是把垂直联合企业这一原理，向前推进一步而已，通过这种垂直联合企业，每家商号成员把它的产品卖给一个离最终市场更接近一层的“主顾”。而且，也只有“联合体”这一极端的例子（这些联合体是通过贷款银行扶植起来的），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衍生，恣意践踏那些即使不是所有的英国实业家至少也是英国经济学家仍然珍惜的自由竞争原则。德国的工业家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公职人员，在观点上，并不存在什么显著的分歧。经济学本身是法律的一个分支，而作为行政管理法学家所得到的训练，同样可以在商界或一些专门行业里任职。18世纪的财政管理家，即皇室财库的经管人员，在德国往往行使在别的国家里是私人企业家行使的职能；这一传统直到俾斯麦时代的德

国，仍然没有完全消亡。资源仍然是比较贫乏的，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准备把开发资源这样的事，听凭那套放任自由的做法来摆布。容克地主、工业家、官僚和经济学家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保证他们的新重商主义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而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和舆论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任何有影响的舆论，都不反对德国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需要。1900年的危机以后，达姆斯塔特银行指出，“大工业集团的共同利益，通过卡特尔这一表现形成，保障工业不像卡特尔建立前那样所费不貲和突然倒闭”。

它们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对于像梅维森（达姆施塔特银行的创始人）、威纳尔·冯·西门子、工程师哈尔科特以及其他几十个那样的人来说，为寻求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工业斗争，看来就是为德国争取威望的一项使命。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取得德国国家的支持，如保护性关税、补助金、特惠货运价格等等。结果是德国错过了自由贸易这一时期，“几乎毫无间歇地从科尔贝尔^[3]的时代，进入沙赫特博士^[4]的时代”^[5]。

德国的新重商主义有些什么影响，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论。评论家们认为，德国在这些年中，是在建立一个危险的、头重脚轻的经济，拥有太多的勉强设立、受到各种照顾的工业，使它不堪重负。这些工业除了迎合那些闭关自守者和军事野心家的意志以外，对于德国既无需要，也非所长。即便把新建的工业需要保护、取得新的技术需要时间这些因素充分地考虑进去，这一代价肯定仍是很高的。于是，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一次被压得比他们的技能和劳动本来应得的水平要低。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补贴和“共同利益”政策，以鼓励非经济投资并使之继续下去。1876年至1900年间，德国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年实际收入，从24英镑增至32英镑。而在英国，则从28英镑上升到51英镑，分别增长33%和82%。工会运动的缓慢发展无疑与此有关。工会会员人数在19世纪，从来没有达到百万大关。在工人中间，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在雇主中间，保守思想强烈。这两者难以使双方通过集体的讨价还价，达成工资协议。对德国经济的另一种批评，是说它有生产过剩的趋向，迟早要走向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来寻求出路。对于这一批评，更加难以评价。在某些德国工业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开始左右德国的政治）之

间，肯定关系密切。至于他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究竟有些什么影响，仍然是看法各有不同。

与此同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的观察家们带着日益严重的不安心情，一直注视着外国工业，特别是德国工业竞争的崛起。从70年代起，英国驻在外国各地的领事们开始逐渐地发来警告。法国人开始争夺意大利的纺织品市场。比利时的铁开始在西班牙打开销路。罗马尼亚的农民开始对德国生产的犁有所偏爱。这一阴影当时仍然只有巴掌那么大小。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这片阴影显然要比过去大得多。英国驻希腊的一位领事哀叹别国——现在无可争辩地主要是指德国——损害了英国出口商的利益而得到好处。他认为英国的制造商不能随着潮流而前进，也根本不去考虑外国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相反，德国人“没有成见”，如果他们发现某一形状的货品，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能够立即有销路，他们就会去生产……“尽管这对他们自己的口味和需求来说，是多么不合适的”。这样的指责持续有好多年。不管是对是错，“贸易工业萧条调查委员会”1885年对于这种事实有着深刻的印象：“〔德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竞争愈益严重，德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事业心，正在使人们对之有所感觉。在商品的实际生产方面，我们超过他们的长处，即使有，也不多。而在对世界的了解，在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和癖好方面，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立定脚跟的决心以及在保持这种立足点的顽强性等方面，他们看上去是在胜过我们。”

英国人对于这些不利于他们的对比，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那些最聪明的商人——如柴郡的路德维希·蒙德和他的伙伴、邻郡的威廉·利弗，或沃林顿的克罗斯菲尔德——都承认德国人的科学知识的价值，大量购进这种知识，或借用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化学工业中的进步人士，在那些年中，充分利用了德国专家。其他工业较为自满。德国钢铁工厂的做法是把各个生产过程，尽可能地、继续不断地连接在一起，以节约热力和电力。英国的钢铁在模仿这一做法时，相对地说，是缓慢的。这些工业无疑地遇到了一些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实际上，在英国制造业中，真正的“大规模生产”堪称占支配地位的部门很少。相对来说，大部分工业都是小批生产，而且，往往是为专门的订货生产；各项生产过程和工厂仍然在许多方面受到手工匠和传统技艺的限制。“质量市场”的性质的形成缓慢——就毛织品而论，竟历时好几个世纪，私人买卖固有的个人主

义，总是不鼓励可能影响质量的降低成本的革新。还有一种保守思想就更加说不过去了。它的根源在于纯属无知或漫不经心，譬如说，就像威尔士的马口铁制造商的那种保守思想。这种人对一项新的生产方法的反应，就是问：“是不是还有任何别的傻瓜，已经试用过这个方法？”

后来，天空的阴霾在19世纪80年代消散，商人天生的乐观情绪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1891年至1895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使议员们提出抗议。他们怒气冲冲地反对外交部购买巴伐利亚制造的铅笔，或者进口德国罪犯生产的廉价刷子。不过，在这个世纪最后几年中，贸易和就业在增长，这一情况看来又一次使英国的恐慌心情平静了下来。德国的竞争这时已经成为必须接受的一种现实。采取保护性措施，不大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即使那些受到德国竞争打击最厉害的工业，它们要放弃一个信念，也是慢吞吞的，因为它们树立起这一信念，就曾花费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只有英国和西欧的小国仍然是自由贸易者。法国步俾斯麦 1879年关税的后尘，从1881年开始，提高了关税。1892年，法国关税全面提高了。俄国在1881年和1882年也提高了关税。1890年的麦金莱税率和1897年的丁利税率，把美国的税率提高到最高税率之列。英国殖民地也征收了关税：加拿大和维多利亚在1879年采取高关税；1900年全澳大利亚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真正蒙受持续的自由贸易之害的是农场主。他们两次遭殃：第一次在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工业方面，英国在日益增长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后果就是出口市场中各种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有了转变。

纺织品和棉纱，特别是兰开夏的棉纱是制造业中的最大一户，它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约占英国全部出口值的一半。它最大的市场是印度和中国，但是美国、德国和中欧国家，特别是就那些高级纺织品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主顾。而难处也就在这里。欧美的关税增加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这一发展通常是借助英国的资本和资本货物而取得的——因此，英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布匹市场不再存在了。到1900年，英国棉织品出口商被迫重返亚洲市场，可是，即使是亚洲，它也开始兴建棉纺厂了。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英国甚至在

毛织品方面，也只能保持原来的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在日益增高的关税壁垒后面成长起来的工业，又需要煤、铁、钢和机械来装备新的工厂和提供能源。提供这些装备和能源的英国工业从而又得到了促进。下面表格中的出口数字，清楚地说明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的情况。

英国主要出口货物的价值（以千英镑计）					
	输往所有的国家		输往十个主要采取保护政策的国家		
	1880年	1900年	1880年	1900年	
棉织品	75564	69751	15990	13840	
毛织品、绒线	21488	21806	13526	11475	
钢铁等	32000	37638	17626	15171	
机械等	9264	19620	5797	10892	
煤、焦炭	8373	38620	4822	23349	

英国工业的一个部分，正在向外国竞争者提供武器用来对付英国工业的其他一些部分，这是难以否认的。美国赖以把英国竞争者抛在后面的自动机器，大部分是英国发明的，有些还是英国制造的。装备主顾，使这些主顾不再向英国购货，对这一明显的蠢事是不乏批评的。煤炭出口——它是潜在的竞争者所需要的一项原料——也容易受到类似的反对。不过，在这方面，可以这样辩解：煤是必须外运的大宗货物，它可以为运进英国几百万工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木材和饲料的英国庞大的商船队节约经营费用。对于这些批评的真正的回答是：英国不可能指望在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前面坚持下去并维持一个垄断性的、十分危险的专业化的经济。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广开门路。因此，工业多样化的过程，即使反映在各种工业兴起的时候（这些工业看来正在产生相互斗争的根源），也是最终补救办法的一个部分，尽管及时进行调整是痛苦的。

就在制造业仍然是英国经济的中心的时候，销售和处置货品的方法，正在成为一项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早年贷出的款项所产生的日渐增多的进益，在英国的账册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有形贸易的逆差一直上升，到1871—1875年间，平均每年逆差达6500万英镑左右。但是，英国从它向外国提供的商业劳务中取得的收入——保险、货物的装卸、回扣、经纪贸易，更重要的是

航运，却上升得非常之快，因此，每年仍可有大约2300万英镑的总盈余，这还没有把从英国累积起来的海外投资所得的每年收入大约5000万英镑计算在内。船运方面的收入非常可观，它从19世纪中叶的每年1800万英镑，上升到近乎5000万英镑。到20世纪的头5年中，这笔收入每年几达7000万英镑。英国在陆地上丧失领先地位很久以后，在海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船坞为英国船只制造的吨位，只比90年代初期的最高数字略低一些，而它为外国船只制造的吨位，则比过去要多得多。

在19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国家的账册上出现了一个根本变化。输入英国的货物价值急剧上升，有形贸易的逆差于是增加到每年约12500万英镑（约100%）。英国的工业品出口——逐吨计算——同1873年的萧条时期以前相比，收入少多了。也就是说，进出口货价之间的比例暂时的趋向，是不利于工业品生产国的，而英国在有形贸易和劳务方面的总盈余，在这些年中每年逆差很大，达3200万英镑。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账目第一次只能依靠海外投资的收益来平衡——海外投资这时已大大超过10亿英镑，每年给英国的投资人带来大约5500万英镑的收入。从1881年起，事情有些起色；随着进出口货价之间的比例有所好转，有形贸易的逆差下降了。可是，从1891年到1906年间，英国每年都不得不依靠它从国外投资方面的巨额收入，来帮助它自己支付亏欠。它也确实很容易地就能这样做到，因为它在这方面累积的收入本身，在1870年到1900年间，已经翻了一番，从每年5000万英镑，变成1.12亿英镑。显然，英国经济各界之间的平衡，以及它的境况和它的资本曾经帮助发展过的国家相比，正在改变。但是，这一变化也会被渲染过甚。完全不能肯定，这个“出口顺差”的时期到1875年，就像一些作者经常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过去。相反，在1880年到1914年间的这些年中，英国仍然能够显示出，它在和世界其他各地进行的贸易和劳务中，是有盈余的。

对于有时被称为对外投资“政策”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过。不过，一种表示自觉地指导事务的字眼，能否被正确地用来形容这样众多的私人决定，还是值得怀疑的。反对这种海外投资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它无利可图；第二，它意味着，甚至需要对借钱的国家的事务进行新的、不受欢迎的干涉，换言之，经济的渗透和帝国主义是携手并进的；第三，输出的“资本”在国内可能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且资本的外流滋生了一个靠投资生活的阶级，它的主要利益是在英国国

外。最近的调查表明，英国的投资者，特别是在1875年后，投资时通常是审慎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维多利亚后期的政府，是否支持早先历届政府所不会支持的帝国主义政策，看来是值得怀疑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把印度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殖民地，把拉丁美洲发展成为一个私人贸易和投资的范围，而在维多利亚后期，情况没有多大变化。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帝国各国和英帝国以外的国家。在海外企业中，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如非洲的塞西尔·罗得斯、巴纳托和拜特或在埃及的卡斯尔，像在国内企业中的威廉·利弗或托马斯·利普顿一样，都称不上“典型”。但是，它们的“特点”在于它们是在开拓新的地理疆域，就好比那些新兴的工业家是在开辟国内消费的新领域一样。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那些比较老一点的地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早先那样重要，那就错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只是不大容易被人注意到罢了。1888年以后对非洲的争夺，不应该完全转移历史学家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早先使印度、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繁荣起来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繁荣，现在正在结出果实。

人们对资本“输出”的许多批评，都没有看出，这种输出和生产过程本身是多么深刻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投资者不愿把资本借给外国主顾，让他们用来购买这些出口货物，那么，出口工业就无法找到和维持它们的市场，更不要说扩展这些市场了。因此，南威尔士的制铁商接受了美国铁路公债，作为他们售出的铁轨货款的一部分。谢菲尔德、格拉斯哥和斯旺西的炼钢厂商，对西班牙铁矿区的开发进行投资，这些地方生产了英国当时所需要的矿砂量的一半。出口工业和资本外流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总是这么直接或紧密的，但是，其效果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铁路的修建、汽轮和收割机带来了粮食的丰收——70年代末是从北美，1885年以后是从南美——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输出促进了出口，从而增加了就业。它加速了食物和原料的进口，从而提高了福利、健康和生活享受的水平。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下述指责的部分答复：英国如果把它的资本留在国内，情况还会更好些。实际上，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无论私人企业或政府企业，都不可能为钢铁、铁路车辆、电报事业、机器等找到另外的出路。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期，对外投资的一般好处，在英国似乎正在减少。看来，进一步的投资，不大可能降低进口货物的成本，从

而也不大可能降低生活费用。相反，它却更有可能加剧外国的竞争。主要靠在原先是进口国家的关税壁垒保护下开设工厂的这种资本输出形式，这也许是最不容易受到抨击的一种资本输出形式。反正早先的那种出口贸易慢慢地被绞杀，已是无法的了。正如一个资本家所说的那样：“当关税超过了在别处经营和在别处设厂所花的成本的时候，那么，在〔购进〕国家设厂，将是经济实惠的，我们的主顾可以从这些厂家获得更为便宜的供应。”^[6]这种做法在1900年以后是常见的。

投资也不是集中在国外。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英国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提高，除了北美突飞猛进的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外，它比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达到的水平都要高出许多，这是国内企业经营和海外投资的直接结果。实际工资在1860年到1900年间增长了大约75%，而这一增长的1/4是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取得的。这种增长基本上是由于财富的增加，而这些财富是从早年的经营和投资得来的。而工资增加范围的广泛，并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部分原因是因为比较便宜的食物和原料进口像回潮一样涌进，生活费用下跌。这些又是早先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会对雇主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是19世纪90年代“繁荣罢工”和一切形式的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由于必需品价格下降，可以省出更多的钱来买半需品，甚至购买奢侈品。总之，在一千多万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妻子中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一市场吸引了当时一些最活跃的商业头脑的想象力。正如一个富有观察力的新闻记者说的那样，这些人看到“工厂的家庭主妇节俭，爱清洁，健谈，往往是十分精明的”。一些规模很大的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主要是靠这些主妇挣得的和积蓄起来的一个一个便士。1860年，全国肥皂的消费和生产，大概1年为10万吨，比1800年增加了1倍。到1890年，它就达到26万吨，而到了1900年，则是32万吨。还有其他许多工业，对于为新兴的手艺匠人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和享受，甚至是娱乐，都有所裨益。食品加工工业颇为突出，有巧克力、果酱、茶叶、人造黄油、牛肉汁、鱼和肉类罐头、香肠等等。联营的杂货铺，通过专营一两种商品，如黄油、人造黄油、鸡蛋，把价格削低，这在些年中是很典型的。这一类的实业家人数颇多，首先要推托马斯·利普顿，他于80年代在格拉斯哥创办了他的店铺，到90年代，向南发展到伦敦及其周围6郡。正当利普顿为工人人们的饮食操心时，像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和阿瑟·皮尔逊这样的人便

赶紧抓住国民义务教育所提供的机会，出版了半便士一份的报纸，传播政治新闻和那同等重要的赛马消息。这些新兴企业和那些旧有的企业，为争夺工人阶级的腰包进行激烈的竞争。那些旧有的企业，直至当时一直供应大部分工人阶级的饮食必需品，以及不小一部分工人阶级赖以消遣的东西——啤酒。

在社会阶梯的更上层，出现了当时很典型的另一套设施——迎合中产阶级市场需要的伦敦百货商店。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工业的领先地位正在消失。于是，为了取得补偿，资本、劳力和智慧全都涌向轻工业、分配业和推销业。”^[7]正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些新兴的工业里，塞缪尔·斯迈尔斯^[8]的天然信徒，投机分子和广告业者大量涌现。他们对工业所做的贡献和他们的前辈所做的贡献不同，这些先辈的才智中具有更多的技术知识的因素。而这些人则侧重于推销货品，他们大力推广销售术，无意中扩大了他们和老一辈工业家之间的鸿沟，而后者对前者的那一套做法仍然是侧目而视的。这些新人中有一位这样说：“广告的全部目的，就是在货物的周围造起一道灵光。”这些人本身多半出身于专唱反调的自由主义分子，往往代表一种真诚的而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社会启蒙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意的前途和他们的销售对象——上百万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主顾，息息相关。1879年设立的伯恩维尔和1888年设立的桑莱特港——利润分配计划和模范工业村——是他们在改善工业关系中所做的独特贡献。很难说，这类工业在总的生产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它肯定是在增加中，但这类工业仍然只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的“特点”，而不是“典型”。“基础”工业仍然是经济的中心。不过，这些新兴的工业，对于工业生产的方法和关系的改变，毕竟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这些工业还有一个日见重要的特征：哪里可能出现一个潜在的市场，他们就可以相当轻易地在那里建立工厂。因此，这些工业能够而且确实通过在当地建立一套生产和供应的方法来避免征税。

当时的人们对于这种日趋成熟的经济成长状况和前景，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舆论颇有影响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爵士认为，英国的经济正在迅速上升，对工人阶级特别有利。他认为，耐心将能治好在暂时性的波动中产生的大部分弊端；他对自由经济的信念，丝毫没有因为“大萧条”的变迁而稍减。他同意某些大工业的发展将会

缓慢下来，但这种发展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正在继续进行。他在1887年写道：“工业根据一项自然法则正在变得愈来愈庞杂，而且由于人口的增长，这些庞杂的工业中被雇用人数的增长和在可称作精神职业中受雇的人如教师、艺术家等的增长，都是不相称的。这就阻碍了主要产品继续以过去那样的速度增长。”其他一些人，包括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内，不是那样肯定地认为一切都是顺利的。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不到之处。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正如那位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新的竞争动摇了英国的保守主义，而“英国正在准备证明，它并不像它的敌人和朋友都经常说的那样，正在没落下去”。^[9]最新的统计调查同样也得出结论说，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英国经济持续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10]

对于这一时期，甚至应比近代史上最近的各个阶段做出更多的历史设想，其任务就是要了解经济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一系列的波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稳定的发展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部门，如英国的农业，受到了挫折；有些行业，如欧洲许多农民的手艺，实际上是被扼杀了。但是，这一阶段整个来说，是增产的阶段，每一个周期阶段涌现出来的财富累积，比过去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经济波动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波动的幅度和普遍性。对波动的原因所做的调查，比绝大多数的经济调查更加证明，它是一个无底洞。周期的成因以及组成这些周期的各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假设性的。如果说，主要波动的发生，是各类发明之间巨大摩擦的结果，是大规模生产、投资、货币与货品供应、需求变化和战争的结果，那只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说明，从表面上看，一种经济不大可能在迅速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按照正常的节奏行事，那么，说明一下也是值得的。重资本货物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表现不同。譬如说，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纺织业生产，相对地说，下降不多，而钢铁生产则大幅度下降，达1/3之多。1885年到1886年间——这是许多工业倒霉的年头——英国肥皂制造业协会的成员是如此富裕，以至要劝说他们有必要去参加会议，是不容易的。反之，80年代末的复苏，却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命运几乎完全和原料价格联系在一起。厄运的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不一样：80年代中期的危机在英国比在德国严重：1900年的一次危机又恰恰相反。

这些年间周期性的进展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870年到1873年间，欧洲是处在一次历时很久的物价、利润上升趋势的末尾。资本仍然流向铁路建设，工业仍然为了适应这些和那些需要而在发展。雇主、银行家和农场主都享受一份繁荣，《笨拙》杂志竟然能刊载英国矿工喝香槟酒的漫画。接着，从1873年6月起，欧洲市场崩溃了。此后，大约有1/4世纪，投资的收益低，价格水平也低。相反，劳工的实际工资，以及工资收入带来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通常被称为“大萧条”期间却上升了。在特别坏的年头，特别是在和资本货物出口有关的行业里，英国失业人数上升，但是，90%以上的工人的工资，在1874年至1900年间每年增长2%。所谓的“大萧条”是指某些商业的价格和利润下降，在以前价格上升时期内迅速发展重工业，尤其严重。铁路钢轨的价格在1872年至1881年间，下跌了60%。重工业这种暂时的过度发展，再加上由于早先的投资因而谷物以及其他物资的大量涌来，这就造成了物价的普遍下跌。在这时刻，财富造成了困境。

美洲的新发展在1879年至1882年间带来了一些复苏。南非的黄金、巴拿马运河计划以及美洲和英帝国的发展，在1887年至1890年间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这种繁荣在一片破产、赖账和失望声中消失了。风暴的中心是那个在南美事务中陷得很深的巴林家族^[11]的垮台。直到1896年，才能重新辨认出一次重新上升的动向。它的基础是欧洲、美洲和英帝国各地对钢轨新的需求，但现在对于电力、化学、石油、汽车和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可以供给新的装备，这一新的刺激一直持续到1914年。

经济波动的原因可能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但波动的影响并非如此。这个世纪第三个25年的普遍繁荣中出现的不受限制的竞争，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商人来说，气氛确实是太振奋人心了。在每个国家中，他们不但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而且在旨在限制他们通常称之为“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协议保护下，设法躲过阵阵的寒风。这些协议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协议，目的在于保持一些企业的主权独立——这些企业都已自动参加了限制竞争的合同。还有一类，它们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更大的企业单位，办法是把现有的各种企业的同一性，纳入一个更大的企业的同一性中去。前一种办法名目繁多——卡特尔、辛迪加、普尔（联营）、康弗伦斯（联盟）、康特瓦（同业联盟），但是，这一办法通常总是预示着政策相似。卡特尔的成员要一致同意，不在低于某一价格的情况下出售他们的产品，而且他们也完

全可能做出安排来瓜分市场，或按地理区域来瓜分，或根据份额制。这就可能最终产生一个中央销售机构。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安排有时是从那些历史悠久得多的同业公会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些同业公会所表现的一般善行，往往是笼统的，但又是虔诚的。现在需要的，是更具体、更切实的东西。譬如说，肥皂业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公会。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开始公开地确定价格。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刻，这种违背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做法，仍足以促使公会的秘书辞职。许多小商业本性难移，这就意味着限制竞争的协议所取得的平衡，总是不可靠的。一旦情况好转，协议就被撕毁。因此，这些协议对消费者利益的威胁是非常有限的。对限制贸易有强烈偏见的法律传统，也无法帮助想出这些办法的人，根据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联合的原则”行事。

因此，寻求稳定的英国工业，宁愿建立一种更有永久性的联合体。就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危机和19世纪末之间，一些非常庞大的联合体组成了，如1888年组成的联合制盐公司，它包括柴郡所有的生产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者。还有1891年成立的联合制碱公司，它包括了所有用勒布兰法的纯碱制造商。这两个联合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纺织业大规模的合并开始于90年代中期。1895年，生产缝纫用线的J. 和 P. 科茨公司和它的4个最大的对手合并。使用苏尔维法制造纯碱的大化工企业布伦纳—蒙德公司，1895年后，就把它的竞争者吸收到它的系统中。接着就是棉布印染公司、约克郡羊毛精梳机公司、英国棉花和羊毛染色公司等等。至于实现联合的具体办法——一家公司直截了当地把其他公司购买过来，交换股票，或成立一个新的控股公司——与企业单位的规模持久地扩大这一事实相比，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些联合是要发挥更大的效率，有的是要迅速获利，少数的则是直截了当地要搞垄断。一般来说，凡是把它们自身组织起来，遵循一贯的经营方针的，就取得了成功。

一般而论，德国对这方面的发展，比起英国来，是更为肥沃的土壤。巴伐利亚的一处法院，1873年做出了一项裁决，支持某家卡特尔的合法性；从此，卡特尔的数目激增。这些卡特尔再加上1879年的关税税率，大大地保护了德国工业，使之不受1873年对它造成严重威胁的那种外国竞争的压迫。有三家大卡特尔掌握了对于这一发展阶段中的德国至关重要的产品：这就是为了制止生产过剩而在1879年成立的钾碱辛迪加，1879年以后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各个煤炭卡特尔，以及70

年代以后成立的各个钢铁卡特尔。德国的卡特尔大部分是80年代创始的，它们是逆境的产物，和英国的同业公会一样，在生意兴隆的时候，就不太牢靠。可是，在某些工业中——如化学工业——这种卡特尔证明是产生更具永久性的集团的场所。它们在德国比较容易组成，因为许多企业都互有关联，它们的董事都是由银行指派的。德国工业是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渠道交织起来的，这些渠道触犯了古典经济学的全部教条，但是，德国人却把这些渠道看作完全正常的。

德英两国企业联合的倡导人，都是以美国作为他们的样板的，特别是“美孚石油联盟”。约翰·D.洛克菲勒在1872年至1881年间，把美国的大部分石油工业并入这个联盟。洛克菲勒在石油方面，卡内基和摩根在钢铁方面，哈里曼和希尔在铁路方面，都创立了大托拉斯。这些托拉斯达到了它们限制竞争的目的，非常有效，以致引起了一阵抗议的风暴。竭力反对托拉斯的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1894年写道：“一批为数不多的人物，正在取得一种权力，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得向人民提供现代生活和工业所熟知的几乎一切形式的火，从火柴到火车头和电力。”自由主义派的忧虑，一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唯恐美国正在创立的各种组织如此富有，以致能败坏全部政治并永远毁掉自由社会的基础。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就企图遏止这一运动；但是，1900年罗斯福上台后，就无所作为了。甚至罗福斯的审慎，也遭到杜利先生的讥讽。他说：“这些托拉斯是可怕的怪物——一方面，我要把它们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又不要踩得那么紧。”

销售和利润方面的波动，导致了主要是“水平面式”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出售同一种或类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联合。同时，技术又使人设想建立一种“垂直式”的联合体。到了19世纪70年代，米德尔斯布勒的博尔考·沃恩在西班牙和非洲拥有12处煤矿和矿藏，还有成队的汽轮，雇用了数达1万名的人员，而且，正从炼铁业转向制钢业。凡是要求生产顺利“流动”的工业，在任何地方，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努力取得原料的稳定供应。化工制造商购买盐田以取得碱的供应，陶器制造商从事采掘瓷土矿，肥皂制造商则经营植物油厂。

这两类扩展所需的资金来源，都要比合伙经营或凭家族关系所能弄到的资金来源大得多。1875年《泰晤士报》商业栏的标题，仍然是“股票、铁路和其他证券行情”。这里，“其他”是指几家电报公

司，还有6家工业单位。到了1900年，这些证券还包括南非的矿山，14家大酒厂，7家钢铁公司，化工、纺织和伦敦的大百货商店以及联营的杂货铺。这样，贸易循环加上技术，形成了工业的规模。规模需要资本，资本需要保证，而保证需要合并。制造商们往往仍然是真诚信奉自由经济和个人主义的。但是，规模愈大则愈合算这一点，也不容忽视。这将是经常出现的怪事；竞争总是扼杀竞争。

从早先的阶段开始，德国的工业就已经表现出极权和“集体”的倾向，和英国那种微小地应付当前需要的办法大不一样。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创业者就是像阿克莱和卡特赖特^[12]那样搞修修补补的人。在一个财富相当分散的国家里，取得资金的种种问题，深深地影响着工业组织。重工业方面的企业家们，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银行求助，而银行在1870年后建立公司方面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合股银行不仅是个信贷组织，而且也是一个把德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政治经济机构。19世纪80年代里，贷给钢铁业的资金带有投机性。1894年至1900年间，埃森信贷银行把它的资本增加了两倍，为的是向周围的采矿和冶金业贷给资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建立的许多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帝国银行，就是发挥这种作用的。这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不鼓励最大限度的竞争，这种竞争被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商人（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是一种经济体制健康的准则。银行指派的工业董事，能够左右这一工业的政策，有时甚至通过出售这些银行的证券，来左右这一工业的股票价格。这些银行本身同时也在经历不断的组合过程。这一制度为政府提供了相当范围的干预和控制。德国的经济学家，一般也不反对这一制度的某些含义。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从通过卡特尔在价格方面达成非正式的协议，到完全结成一体的康来恩，没有被看成是走上邪路，而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走向垄断这种正常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现象。这一制度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程度的稳定性，免得利润和就业发生波动。

集体自助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商品，而且也影响了劳务。如果说一个工业社会的性质，使得工联主义显得更有必要，那么，它也使得组织工会这件事，变得更为容易。一道在矿井或工厂里工作的人们，比起分散在小屋或小作坊里工作的人来，更会产生一种休戚与共感，而且要实现它。但是，工会的发展有两个条件。第一，舆论、政治权利和法律，必须赞许工人提出的关于组织起来并行使他们的权利的主张。第二，这一劳动大军，必须是由具有工资工人这一永久性身

份意识的挣工资者所组成的一个稳定团体。在大多数国家中，缺少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两者都不具备。在法国，对于劳工联合的限制，直到1884年才取消，1895年成立的劳动联合总会，在20世纪以前，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该会直接行动的宗旨付诸实施。比利时从1866年开始，允许成立工会，但仍然惩处罢工者。在德国，工联主义在1868年至1875年间取得进展，但在俾斯麦1878年对“社会祸害”宣战以后，有一百多个工会被取缔。作为补偿，又投下了诱饵，对疾病、事故、丧失工作能力和老年实行保险，而从政治上来说，这一诱饵并不是没有获得成功。在美国，这一问题有所不同：工人中间存在着高度的流动性——社会方面和地理方面的流动性。如果一个人不能被擢升，他随时可以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有稳定的工会。在不祥的日子里，早年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工会全垮了。即便是劳联，它在1900年也只有大约50万会员。英国劳工运动的成就，比起美国这种逡巡不前的开端来，就显得斐然可观了。1875年通过的迪斯累里法，消除了半个世纪以来在法律上的疑虑，使集体交涉以及它所引起的事件合法化。19世纪70年代就曾出现了活跃的行动，有1871年的所谓“繁荣罢工”和1873年、1875年举行的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工联主义受到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的鼓舞，于90年代迅猛发展，它深入到整个工业劳工中去，而不仅是几个行业的工人，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到了1900年，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200万人。工会通过停工、罢工，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1893年损失的工作日就达3000万个以上。有些大工会，如联合工程师协会，碰上了针锋相对的雇主组织，如工程界雇主联合会，它在1897年至1898年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因此，1900年的世界，已在各个方面并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离开了自由竞争，走向集体的或国家的干预。即便说，自由竞争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若干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天堂”（这些人的想法，就是完全的自由和竞争，但在政治家、官僚和商人的“人间”，也只有微弱的反映），1870年以来的变化，还是一个现实的变化。但是，设想事物的经济性质会发生更大变化的思想家，是否不止寥寥可数的几个，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那些被人雇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写作的人，他们的头脑里也没有这种趋向。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经济问题是直接的东西，必须用经验主义的办法来对待。在英国，就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在南非发生的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比经济上的预言重要得多。黄金正在流入银行，货币市场看来也比过去更有希

望。在德国，贸易非常顺利。但缺少运煤车辆。美国是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经济问题想得少，对其他许多事情想得更多。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世纪结束了，它的告终所激起的想法，大概没有比下述的想法更为深刻的了：“贸易从来没有这样昌盛，工资从来没有这样优厚，失业工人也从来没有这样少。”《泰晤士报》1899年12月30日就是这样写的。

（任家桢 译）

[1] 欧洲铁轨里数的增长如下：

年份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公里	51900	104900	169000	224000	283500

[2] J. H. 克拉芬：《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279页。

[3] 科尔贝尔是法国17世纪的一个政府官员，重商主义者。——译者

[4] 沙赫特博士是德国20世纪的金融家。——译者

[5] A. J. P. 泰勒：《德国历史进程》（伦敦，1954年），第126页。

[6] C. 威尔逊：《尤尼莱佛史》（1954年）第1卷，第99页。（尤尼莱佛（Unilver）为“利弗联合公司”的音译。——译者）

[7] G. M. 杨格：《一个时代的景象》（1949年）。

[8] 苏格兰著作家，主张在个体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取得物质上的进步。——译者

[9] J. H. 克拉彭：《现代英国经济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3卷，第23页。

[10] P. 迪安：《19世纪下半叶国民收入的最新估计》，《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9卷，第3期（1957年）。

[11] 英国银行业著名家族。——译者

[12] 英国织布机等的两个发明者。——译者

第三章 科学与技术

1870年到1900年之间，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密切得多。19世纪最后3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虽然这不是说传统的、来自经验的方法全盘或甚至大部分都被抛弃了。经验主义在许多工业中仍然占统治地位；有些工业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是，1870年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科学工业的开端。新兴工业，诸如电气工业等这些完全是在科学发现中首创的工业，其面貌的改变当然要比那些早已建立的工业显著得多；在这些早已建立的工业中，科学的应用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进旧的生产方法，而不是建立崭新的生产方法。

尽管在这个阶段中，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要区分因果关系却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一项纯科学的发现，在研究时并没有什么实际目的，可是，它所具有的实际重要意义是这样的明显，因而自然而然就应用于商业方面。染料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一批煤焦油染料，是由于想用人工合成奎宁而做的一次不成功的（我们现在知道，完全是误入歧途的）尝试所取得的。然而，另外一些科学发现之所以变得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有利于对它们加以利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的历史意义也许微不足道，或者是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变得明显起来。例如，汽轮机广泛地应用于船只中，并不是直接由于船舶机械师需要一种不同的推进动力。它主要是由于新兴的发电工业需要一种能够比往复式蒸汽机转动得快得多的汽轮机。

虽然这个时期是科学与技术共同改变历史进程的时期，然而，两者又是分别前进的。在科学方面，对于我们通常所谓的纯研究工作（与应用研究工作相对而言）说来，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许许多多的发现，都有助于丰富人类知识的宝库，但是，对于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例如，门捷列夫1869年制出了他的著名的元素周期表，但是，它的深刻意义，特别是与原子结构相关的意义，只是到后代才理解；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于他的想法确实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硅的有机化合物，在19世纪结束以前，早为人们所熟知，

并且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才使它们具有实际的重要性，硅这个词才开始普遍使用。

科学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同样，技术也是如此。内燃机终于在陆上运输中引起了革命，它最初是由一些讲究实际和有决心的人几乎完全凭借经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人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很少或毫无知识。同样，汽车制造业所必需的新的石油工业，并不是由科学家，而是由一些具有革新才能并有敏锐的商业感的人们所建立的。

因为许多技术的发展是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因此，在研究工业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前，先讨论同一时期科学进展的一些主要方面是适宜的。虽然我们主要应该考虑1870—1900年这段时期，但是，也有必要考虑一下在此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就科学史而言，这30年，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意义。这30年在科学上确实是很活跃的年代，但是，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来源于更早的研究工作。虽然技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世界中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形成的，但公平地说，总的来看，科学却是在孤立状态中发展的。这种事态一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很久还在持续着。

在物理学的许多部门中，这是一个紧张活跃的时期，但是，很难挑出任何一个特别的研究领域，说它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一致承认，热力学和电磁学理论的发展，总的来说，对于物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热的真正性质和它同机械运动的关系，尽管从最早的时代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然而，开始对它有所了解，也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情。在19世纪中叶，还有热质论（即把热看成是某种不可称量的流体）的拥护者。这正如在化学方面一样，在拉瓦锡等人的研究说明了燃烧理论的真正性质以后很久，关于燃烧的燃素说还迟迟没有消失。关于热和温度的区别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的确立，所花的时间也长得惊人。但是，到1870年，一些重要的原理已经确立：热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在一切通常的物理过程中，能量守恒，也就是说，某种形式的能量消失了，那么，同等数量另一种形式的能量则出现。能量守恒的理论和早先的质量守恒的理论，具有同样的基本重要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物理学还是基于这种假说上：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是两个普遍的、但却是各不相关的定律。将二者统一为一个具有更加根本重要意

义的理论——质量能量守恒定律，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成就，但是，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一深刻重大的综合，其种子则是在本文讨论的这个时期播下的。

对热的本性的种种思想的澄清，导致了热力学诸定律的确定。大致说来，热力学是一门研究热转化为功和功转化为热定律的科学。第一定律与能量守恒有关，第二定律于1851年提出，阐明任何热机的效率，都有一个理论上的极限。第三定律实际说明，转换愈多，则可用于有用功的热能愈少。^[1]这些定律是怎样论证出来以及有关其应用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本书这种一般性著作的范围。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这种看起来似乎简单的归纳，在研究任何一种包含热能的过程时，不论是属于蒸汽机，还是属于化学反应，都是十分有用的。作为一种科学工具，它们的重要性很快就为人们所理解，例如威拉德·吉布斯（1839—1903年）在1876年^[2]建立了相律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物理化学理论。但是，它们在工艺方面的重大意义，则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

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年）确立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这件事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后果，其中之一是使电力工业得以建立。然而，他的定律是根据经验确立的，后来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1879年）把它向前推进重要的一步，用数学的理论来表述法拉第的想法，确定了电和磁的基本单位之间的量的关系。他推导出电磁波速度的理论数值，发现它和光速大体相同。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光是一种电磁现象。麦克斯韦的研究工作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写在他的著作《电学和磁学》（1873年）一书中，并在英国立即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它和当时盛行的概念相去太远，因而在欧洲大陆上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在大陆上得到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因里希·赫兹（1857—1894年）杰出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电（无线电）波；而电波的存在，已经由麦克斯韦作为他的理论的必然的后果而推论出来。赫兹证实了电波和光波的基本相似之处，并且，以他的实验所能达到的准确程度证明光速和它们的传播速度是相等的。赫兹的研究工作在我们这个世纪所具有的实践上的重要意义，无须着重说明。托马斯·杨和菲涅耳在19世纪初提出了光的波动说的有力的实验证据。光的波动说的牢固建立，标志着第一次打破了牛顿的物理学。

关于光的实质的争论，并未妨碍对它的各方面的特性进行的实验研究。其中光速问题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如上所述，这证明它是电学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物理常数。例如，精确地了解它的数值，对于设计海底电缆是必不可少的。从1676年以来，一直采用天文学的方法测定光速，但是，在地球上相对短距离内做第一次测定，是由阿蒙·菲梭（1819—1896年）在1894年进行的，随后的多次测定，导致了迈克耳孙在1887年进行的著名实验。这次实验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观测到的速度与光源的运动无关。这项实验对于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这又导致了他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它是原子物理学的真正基础。

牛顿用三棱镜所做的尽人皆知的实验，证明太阳光，而且实际上通常遇到的其他一切光，事实上都是由几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在19世纪后半叶，光谱分析已经达到非常高度的发展，可以用来得出发光体性质的详细资料。罗·威·冯·本生（1811—1899年）和古斯塔夫·基尔霍夫（1824—1887年）都是著名的先驱者。由于他们的工作，才得以测定许多甚至是极其微量的化学元素。用这种方法，终于发现了两种新的化学元素：铯和铷。但是，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却是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因为对太阳和星体发出的光进行详细的光谱分析，可以得到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的大量资料。1878年，约瑟夫·洛克耶爵士（1836—1920年）在太阳光谱的绿色区观察到一条线，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已知元素是和它对应的。他和爱德华·弗兰克兰爵士（1825—1899年）满怀信心地预言，在太阳中存在着一种新元素，他们命名为氦。威廉·拉姆赛爵士（1852—1916年）在沥青铀矿中发现了氦，从而惊人地证明了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几年之内，又发现了4种未知的气体元素。

光谱天文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中间有威廉·哈金斯爵士（1824—1910年），他是一位把著名的多普勒效应用于天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先驱。多普勒效应所依据的是这一事实：当波源和观察者有相对运动时，观测到的频率和它们处于静止状态时的不同，这个差异就是相对速度的测度。就星体而言，它们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就可以用精确测量它们的光谱的办法来测定。这种测量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星球运动的认识，并且构成了近代宇宙理论的基础。

J. J. 巴尔默（1825—1898年）于1885年第一次揭示了，某些光谱线（氢的光谱线）的频率，有一种简单的数学关系。

虽然近代意义的原子物理学主要是20世纪发展的产物，但在19世纪后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发端。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迈克耳孙对光速进行的极其重要的实验。威廉·伦琴（1845—1923年）于1895年发现X射线具有同等重要意义；除了在医疗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外，这些射线后来又卓有成效地用于确定晶体的原子结构。次年，安托万·贝克勒尔（1852—1908年）发现铀化合物放射出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射线，从而奠定了放射性研究的基础。1898年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中分离出镭。

19世纪最后的30年，在生物学方面也同在物理学方面一样，不再是一个界限明确的历史阶段。这些年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发现，形成了许多新的观念，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起源于前一个时期，而且又毫不间断地继续到20世纪。有两个发展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于1858年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生物进化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终于牢固地确立了；这一理论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年）卓有识见的拥护。虽然在1900年之前格莱哥尔·孟德尔（1822—1889年）的工作实际上一直默默无闻，他却已经发现了自然进化赖以进行的机理。其次，活力论^[3]越来越不时兴了。这种学说不是根据支配无生命宇宙的各种规律，而是以存在某种无法说明的“活力因素”来解释生命的过程。这两条思想路线的探索，自然而然地使科学家们同教会发生直接的冲突。1860年威尔伯福斯主教与赫胥黎在牛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展开的那次著名争论，绝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

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使得生物进化的理论迅即得到科学界无条件地支持，尽管在此之前生物学家们已做了许多工作，使人们对接受这种新思想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在这些生物学家中应当提及的，有埃蒂耶纳·圣伊雷尔、罗伯特·钱伯斯和更负盛名的拉马克。然而，达尔文从他的前辈那里取得教益的，主要不是一位生物学家，而是一位经济学家；这真是一个思想交流相互得益的有趣事例。达尔文在自传中记载说，使他第一次获得生物进化如何进行的明确概念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89年）。

虽然达尔文最初在1838年就酝酿成熟了他的学说，但是，他并未试图公之于世，而是在他一生中随后的20年里，充分搜集证据来支持或反驳他的学说；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法。甚至当1858年他收到华莱士的一封信，其中包括了他自己的学说的主要论点时，他也不愿声称他的学说发现在先。最后，通过林奈学会做出了联合发表的安排。达尔文这时才把他搜集的大量证据写进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这一著作无疑地是对人类思想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进化论的学说，使生物思想界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不仅给现有的大量知识赋予了新的重大意义，而且还为许多条新的探索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这一学说获得显著教益的有人类学家和地质学家，前者得以看出人类各种不同种族的分布格局；后者则得到了对化石的合理解释。

活力论有一种天然的哲学上的吸引力，至今自然还有许多拥护者。但是，19世纪下半叶提出了许多不利于它的证据。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就有可能用纯自然科学的道理，来解释许多生命过程，如呼吸和消化作用。人们对自然发生的信念破灭了，这主要是由于法国的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所做的工作。经过证明，具有活的有机体特征的某些物质如尿素，可以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例如能够把糖变成酒精的酵素母中的酵素，当把它从它通常存在的活细胞中分离出来以后，证明它仍然是活跃的。事实证明，能量守恒定律不仅适用于无生物，也适用于生物。既然这样多的现象能够不依靠活力论而得到解释，那么，假设一切现象都可以这样解释，看来也是合理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科学和教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但这绝不是说，除了在科学本身的领域以外，进化论引起深远反响的只有在宗教思想方面。哲学思想，从而政治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受到影响。在某些人看来，适者生存这一原则最后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基本的道德价值并不就是那些适于生存的道德价值。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就否定宗教，寻求创造一种超人的种族，把这看成是最强的种族强行自我表现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他鼓吹的“主宰者的道德”，对于在德国出现的那种把它两度引向世界大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们对进化论普遍感兴趣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主张暴力和自私，认为人类和一切生物都必须冷酷无情，“牙齿和爪子沾满鲜

血”。然而，从这个学说中也产生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道德本能有利于社会安定，因而有助于人类生存；因此，自然选择的一个后果应当是促进人类社会的道德本能，并使之万古长存。

虽然进化论的形成是19世纪生物学的最大特色，并且引起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的激烈争论；但在生物学的其他领域，虽然并未从进化论得到多大的帮助，却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微生物方面进行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巴斯德就是这方面极其卓越的先驱。关于微生物的生长和功能的各种观念得到了澄清（显微镜的改进在这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具有深远的影响。

巴斯德证明某些疾病，如炭疽病和蚕病，是由某些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的。这就为一些重大医学发展铺平了道路。约瑟夫·李斯特（1827—1912年）发现巴斯德的看法是对他的观点的补充，即在外科手术和妇女分娩中，有可能防止由于感染而引起的死亡。消毒技术——大量使用苯酚之类的杀菌剂——第一次制止了感染的发展。随后，又采用了无菌技术，即保持极端的清洁来消除传染的媒介。这些发展是十分及时的，因为在此以前发现和使用麻醉剂，固然使得以前无法施行的外科手术得以施行，但手术后的感染造成很高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使手术前功尽弃。麻醉技术再加上广泛使用消毒和无菌技术，在医学实践上引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就获得成功的。教会对麻醉技术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之一（即将它用于减轻妇女分娩的痛苦）所持反对的态度，直到1870年才算消除。1853年约翰·斯诺在维多利亚女王生利奥波德王子时使用了氯仿麻醉法以后，潮流才发生了转变。李斯特的方法虽逃过了教会的批评，却没有逃过他自己同事的批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嘲笑他的看法。尽管如此，到19世纪末，近代外科的原理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了。

对疾病性质的知识日益增多，也产生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实际结果。到19世纪末，已经确证了许多重要的病原菌和某些致病原生动物。例如1880年发现了疟疾的病原体，17年后，罗纳德·罗斯爵士确证了疟蚊乃是疟疾的传染媒介。经过某些名家如罗伯特·科赫（1843—1910年）和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年）之手，新研制出了苯胺染料，对利用对比着色法鉴定细菌，用处很大。还可附带提一下，这种对比着色法对于用显微镜观察广泛的生物物质，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发现不同的生理组织对染料有不同的亲和力，这就导致一种新学科即化学疗法的建立：用一些对侵入人体的微生物有很高毒性，而对病人身体组织无害的化学药物治疗疾病。埃尔利希曾设想利用这样一种“魔弹”杀死致病的细菌而又不伤害人体。虽然在1909年发现洒尔佛散（六〇六）以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化学疗法的基础却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奠定的。现代的磺胺药物和抗生素均可溯源于当时的这些成就。

到1876年，人们已经非常了解致病微生物的某些作用，是由于它们产生的特定毒素引起的；到1888年，某些这样的毒素已经可以提纯。这方面的发展使免疫技术大有改进。例如给马注入白喉病毒毒素，马的身体组织就会产生抗毒素。从经过这样处理的马的血液中取出血清，可用于防治白喉症。巴斯德还证明，通过适当的接种，可以预防狂犬病。

化学发现的某些方面已如上述，这并不奇怪，因为化学是最重要的基础科学。例如已经谈到利用光谱进行化学分析，解释呼吸过程的化学性质，合成化学药品。整个化学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最重大的进展毫无疑问在有机化学方面；因为在这方面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顾名思义，有机化学原来所研究的是能够从植物或动物中取得的范围广泛的物质，而且原来也认为这些物质只能从这些来源中取得。1828年维勒发现，他可以人工制出尿素，而“不需要一个动物的肾脏，不管是人肾或是狗肾”；这个发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过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实际上，所有生物的组成部分都是碳元素的化合物；通常只是与自然界中另外91种元素之中的少数几种结合在一起，其中主要有氮、氧、氢、硫和磷。有机化学从专门与生物体中存在的物质有关，逐渐地包括了数目迅速增加的纯粹是合成的碳化合物，而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与之相应的化合物。有机化学事实上成了一个元素即碳元素的化学。

从1828年开始，合成了大量的有机物，并开始产生了对这些碳原子相互之间以及碳原子与其他元素的原子之间排列方式的明确看法，研究工作一直进行了大约40年，到1870年，近代有机化学的绝大多数重要原理都已确立。但是，1856年出现了一个事件，在19世纪其余年

代，而且确实直到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那一年，威廉·柏琴（1838—1907年）想人工合成重要的药品奎宁。他失败了，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他当时使用的方法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然而，他却合成了苯胺紫。这是第一次人工合成的苯胺染料，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工业，并大大地推动了有机化学的研究工作。

如上所述，柏琴发现苯胺紫染料是出于偶然。海因里希·卡罗（1834—1910年）最初合成茜素也是如此；在一次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有人把他叫走了，混合物加热过头了，他回来时发现一种烧焦了的残渣，而它的粉红色的硬皮，却正是他在寻求的染料。当时的有机化学，事实上大都是一半靠经验，但是这类新物质比比皆是，有待人们去发现，只要观察敏锐，就可收获累累。然而，与此同时，在理论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凯库勒（1829—1896年）阐明了苯的分子结构。这种物质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意义，因为从它可以得出上万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即所谓的“芳香族化合物”，如染料和药品等。苯的分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有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长期以来，都想不出一种方式来排列这12个原子，使之能符合苯的化学特性。凯库勒却找到了正确的答案：6个碳原子不是排列成直链或支链，而是一个圆圈。这个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意见——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却改变了19世纪下半叶的化学思想。

另一个理论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立体化学。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的不朽的研究工作，确立了这样一个根本重要事实：某些物质如酒石酸可以两种形态存在，它们在化学上是无法区别的，但在物理上却有重大的区别，特别是对偏振光的效应。这种区别通常是用这一事实来说明：晶体的一种面式是另一种面式的镜像；一种晶型可以看作一双手中的左手，而另一种晶型则可以看作右手。这种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区别也许看来没有什么重要关系，可是，事实上，这种区别却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生命过程的化学中。比如人体能从糖的一种立体异构体“葡萄糖”得到大量的能量，而另一种立体异构体则无法利用。

巴斯德的发现从两位年轻的化学家约瑟夫·勒贝尔（1897—1930年）^[4]和雅科布·范特荷甫（1852—1911年）所进行的工作中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他们确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组成分子的原子是

按照严格的几何图形排列的，而碳原子价——也就是与其他原子连接的纽带——在立体空间的分布情况，使得在某些分子中同一类的原子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几何图形的排列。范特·荷甫于1874年第一次发表了结论；这些结论首先是无人理睬，后来又遭到嘲笑。过了一年多，德国大化学家约翰奈斯·维斯里辛努斯（1835—1902年）看出了这些结论意义重大，并给予支持。

范特荷甫的名字，也同另一项重大的化学发展，即溶液理论密切相关在一起。他对渗透作用所做的实验证明：当固体在一种液体中溶解时，固体的粒子活动的方式，非常像占有与溶液同等容积的一种气体的粒子。举例来说，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些重要的植物生理现象：从土壤摄取矿物质和体液在树中向上流动。然而，这一概念应用到某些通称为电解质的重要物质（由于它的水溶液能够导电而称为电解质）的时候，就碰到很大的困难。这类物质的典型就是普通的食盐，即氯化钠。为了解释这类物质的特性，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列纽斯（1859—1927年）提出了革命性的假说：这类物质的分子在溶液中离解为所谓离子，也就是带电荷的原子。他说，氯化钠是作为带正电荷的钠原子和带负电荷的氯原子存在于溶液中。阿列纽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他的这个光辉的假说写入他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他的不安是有根据的；他的论文只给他博得了一个4等学位，比彻底的失败略好一些。正如阿列纽斯所预见到的，困难在于那个时代的化学家无法理解，带电荷原子的特性，可能完全不同于不带电荷原子的特性。人所共知，钠遇到水，要发生极其强烈的反应，而提出任何形式的钠原子能够在有水的地方存在，这似乎十分荒谬，使人无法接受。直到里加大学的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年）得到了这篇论文的副本，这篇论文才算找到了一位别具慧眼、影响很大的读者，得到认真的考虑。阿列纽斯终于获得机会，同奥斯特瓦尔德、范特荷甫以及欧洲其他大化学家一道工作，并且使他的电解质在溶液中离解的理论臻于完善。同范特荷甫的合作特别重要，因为阿列纽斯的理论完全阐明了电解质溶液的异常的渗透压。可是，许多化学家仍然拒不接受这些野蛮的“离子人”^[5]的见解。直到1890年，也就是奥斯特瓦尔德第一次支持阿列纽斯的见解后大约7年，反对派才算是最后彻底失败了。这些情况是值得回忆的，因为这能够提醒人们，科学绝不是一个冷静的、论理的工作，它像人类其他一切活动一样，也受到人类弱点的影响。1890年在利兹举行的英国科学促

进协会的会议，邀请阿列纽斯、奥斯特瓦尔德和范特荷甫在会上阐明他们的理论。人们满以为他们会经受不住正统观念的压力而信誉扫地。事实上，结果适得其反：“离子人”的见解占了上风。

谈到技术问题，应该再次着重指出，目前有一种倾向，即把技术与应用科学混为一谈。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许多技术部门，早在近代意义的科学诞生以前，就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自17世纪以来，科学在工业中变得日益重要；但是，甚至到19世纪末，如果说，许多重要的工艺过程由于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有所变化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固然有所进步，但这主要是依靠经验，通过改进设计、提高技艺和改善企业管理来取得的。那些采用科学见解的地方，则往往是缓慢而又勉强地这样做的。

然而，在某些领域内，科学发现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在以前是空白的方面，创建了新的工业。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电力工业，它提供了崭新的光、热、动力和通信的能源。电力工业可分为3个单独的项目来考虑：发电、配电和使用。虽然这样划分有点武断——例如，配电方式可能要取决于发电的方式——但至少它和这一工业目前仍然存在的工作和利益的划分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本文主要论述机械发电，而不是很早以前就采用、目前仍占重要地位的通过电池的化学变化发电的办法。电磁原理是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年）创立的，他证明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可产生电压。尽管第一批机械发电机早在1832年就在巴黎出现了（最早，显然是由伊波利特·皮克西制造的），可是，过了许多年以后，发电机才具有足够的功率和充分的可靠性，使电能够实际应用。最早的发电机是由永久磁铁推动的，最初产生的电流是所谓的交流电，也就是说，电流的方向在每秒钟内改变或者说交替变化多次。人们最初对电流的方向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这大概是因为早期的工人全都更熟悉由电池产生的直流电，于是就设计整流设备，将其调整为单一方向。然而，整流设备常常引起麻烦，而且，人们也逐渐理解，交流电不仅在许多方面和直流电同样有用，而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优点，特别是从输电方面来考虑。1881年，在巴黎博览会上展出了交流发电机，到19世纪末就广泛地使用了。在交流和直流何者为优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19世纪末以后，还没有最后得到解决。在这以前很久，出现了另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非常重要的设计，这就是

应用自激原理。早期发电机中的永久磁铁，换成了用发电机本身产生的一部分转向电来激励的电磁铁。

到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发电事业，不论直流或交流，均已牢固建立。1882年投产的位于霍尔本栈桥的爱迪生公司的发电站，是向私人用户供电的第一家公司。几年内就建立了大量发电站，其中许多电站是专门供应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主顾的，如地方当局、街灯照明等，但同时也向私人用户供电。这些发电站的设计，主要还是单纯供应当地用户。有些人已经看到，发电工业的前途，在于修建向大片地区供电的大得多的电站。齐阿尼·德·费朗蒂就是最早看到这一点的一个，他设计的德特福德发电厂，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该厂于1891年全部投产运行。早期的发电站绝大多数以蒸汽为动力；首批大型水力发电计划之一，是1893年在尼亚加拉瀑布城开始兴建的发电站。

用户越来越多，向用户送电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大大影响着电力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最后交流电大量取代了直流电。高压电比低压电的传输损失小得多，而且，从技术上说，生产高压交流电又比生产高压直流电容易。采用非机械装置，即人们熟知的变压器，可以把高压交流电降到多种实际需要的低压电。在19世纪80年代，这已经在电力工业中普遍使用。输送大量高压电，给电缆设计提出了许多问题，从绝缘观点来看，更是如此。费朗蒂在德特福德发电站采用了同轴铜管。

电的最早重要用途之一是照明，特别是用于灯塔，因为在灯塔中，非常明亮的光源是很重要的。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是弧光灯，在弧光灯中，两个电极之间发生电火花。南福雷兰灯塔于1858年装上了弧光灯，邓杰内斯则在4年后装上。作为家用，即使是最小的弧光灯，光线也嫌太强，但是，不久便在较大的设施中广泛地使用了。在法国，1875年米卢兹的一家面粉厂采用了电力照明，一年后，夏佩勒车站也采用了。英国则是1878年在娱乐剧院^[6]首先采用。

白炽灯问世以后，电力照明就普遍了。约瑟夫·斯旺（1828—1914年）和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在白炽灯的早期发展中曾做出了特别积极的努力。能够取得这样简单、廉价和有效的光源，使得电力照明得以迅速广泛地采用。早在1880年，爱迪生就以每月5000盏灯的速度从事生产。在短短几年内，白炽灯就在各种类型和规

模的建筑物中广泛使用。电力照明比煤气照明要优越得多。虽说煤气照明在出现时曾经是个创举，但是，它还依靠鱼尾形和类似的灯头，就相形见绌了。1886年采用了韦尔斯巴赫的白炽灯罩后，煤气照明再次显示出它的竞争能力。

电动机实质上是反过来工作的发电机。虽然法拉第早在1821年就阐明了电动机的原理，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电动机到1873年才在市场上出现。这是一台直流电动机；交流电动机是到1888年才使用的。电动机早期用于牵引。1879年，在柏林展示了第一条电气铁路，第一条伦敦电气化地下铁路则是在1887—1890年间修建的。1895年，第一条铁路干线从蒸汽机车改用电气机车；这项非常重要的革新发生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在公路上使用电力牵引，除有轨电车外，有赖于蓄电池的发展，只有它才能不和外界联结，单独提供所需的强电流。普兰特式蓄电池出现于1880年前后，电动三轮车出现了1882年。1897—1899年间，曾在伦敦街头短暂地出现过一队电动出租汽车，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电动车辆。但是，蓄电池的电力有限，严重地限制了它们的使用，至今依然如此。

从技术上来看，电动机——或许可以一般地说电——的最重要的应用是把它作为一种小型、有力和机动的动力装置用于工厂。虽然在19世纪末已可看到这种用途的开始，但是，它主要还是在20世纪中发展的，因此，本章不拟赘述。当时人们已经适当地考虑到电报和电话，虽然它们消费的电力是比较少的。快速通信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现时已无须再加以强调，到1870年，已经为一般人所认识。在帕丁顿与西德雷顿之间敷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于1839年建成，到1870年已经有一个广泛的电报通信网。使用橡胶作为电线的绝缘材料，在远距离电讯线路上采用继电系统，以及建立电报局，这都是一些重大的发展。新世界和旧世界^[7]之间的电讯于1858年第一次建立，但直到1865年才敷设了一条令人满意的电缆。1861年第一次出现了电话，但电话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则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年），他在1876年申请了第一项专利。1878年，英国建立了商用电话，次年，伦敦有了第一个电话局。实际使用无线电报是在20世纪，但基本实验则是在1900年以前进行的。海因里希·赫兹（1857—1894年）早在1887年就阐明了无线电报的原理。到1895年，古利耶利

莫·马可尼（1874—1937年）在一英里多的距离间收发了电报，1901年他沟通了大西洋；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于1897年建立。

电力工业与这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化学工业直接联系起来。电的某些化学效应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例如，汉弗莱·戴维1807年通过电解熔融的氢氧化钠而分离出钠。工业上要应用这些效应却有待价廉、正规和充足的电力供应的出现。一旦具备了这种条件，电化学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电力供应是使一种金属，即铝能够迅速得到商业性开发的直接原因；许多年来，人们一直知道这种金属的许多宝贵的性能，但由于价格过于高昂而不能有效利用。19世纪中叶，提炼铝的方法是用钠来还原氯化铝，但钠的价格昂贵，而且，这种方法的操作过程一般又很困难，得到的铝价格太高，只能用于奢侈品。19世纪80年代中，H. Y. 卡斯特纳（1858—1899年）设计出一种比较便宜的制钠方法，使得生产商业用铝成为可能，并且为此目的在伯明翰建立了一家工厂。但是C. M. 霍尔（1863—1914年）在美国，P. L. T. 埃鲁（1863—1914年）在法国，分别研究出电解法，使卡斯特纳的方法几乎立即就过时了。这种新方法是将矾土，即一般天然存在的铝的氧化物，溶于熔融冰晶石中进行电解，而取得铝。几年以内，长期以来一直不过是一种科学珍品的铝得到广泛的应用。多年以来，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提炼这种第一流的用于建筑业的新金属。

如上所述，卡斯特纳的制铝法一出现几乎就过时了。这最初对他似乎带来致命的影响，因为他当时仅有的本钱只是一种便宜的制钠法，而钠在市场上已不复需要。但他很快又研究出各种利用钠的化学方法。他的产品中有一种是氰化钠，它在日益发展的澳洲、美洲、南非等地的金矿中找到了广大的市场。他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极其成功，以至在短期内就不得不扩大他的制钠能力。为此，他开始注意用电化学方法，特别是电解熔融氢氧化钠的方法来制钠。然而发现，他当时购买到的最好的商品氢氧化钠含有大量杂质，以致使得他最后设计出的方法无法进行。于是，他着手用电解盐水的办法来制造接近纯净的氢氧化钠。结果，他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能把纯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氢氧化钠投入市场，而这种纯度的产品，当时在制碱行业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烧碱比一般家庭用碱的碱性要强得多，是许多工业，特别是肥皂制造业所需要的。这种生产的副产品是大量的氯气，氯气转变成为漂白粉，是许多工业，包括纺织工业所大量需求的。电

解法生产烧碱成功，使这种生产法在美国得以推行，1896年在尼亚加拉建立了一座工厂；由于3年前在那里建成了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因而可以得到大量廉价电力的供应。

然而，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电化学方面的发展，还不过是19世纪最后30年，在化学工业方面实现的巨大技术变革的一部分。具有突出重要意义的，是制造纯碱和硫酸的新方法，二者在工业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年以来，纯碱几乎完全是用勒布兰法从盐中提取。这种方法有许多固有的缺点。特别是它很脏，产生大量令人讨厌的废物，处理起来很困难；它产生盐酸气雾；而且，还需用大量的燃料。人们一方面对这种生产法做了重大的改进，特别是从盐酸中回收氯，用以制造漂白粉。同时，对另一种称之为氨碱法的替代方法愈来愈注意。这种方法开始也是用盐作为基本原料，但用氨作为媒介。尽管这种方法原理非常简单，但使之完善而用于商业性生产，却花费了多年时间。第一次尝试始于19世纪30年代，可是直到1861年，才由一位比利时的化学家欧内斯特·苏尔维（1838—1922年）申请专利，随后的工业生产就是以这项专利做基础的。即使如此，直到1867年，在库耶勒建立的第一座工厂才开始进行令人满意的生产。进一步的关键性专利是在1872年提出的。那年，路德维希·蒙德（1829—1909年）和约翰·布伦纳（1842—1919年）取得了英国的专利权，在柴郡盐场的温宁顿建造了氨碱工厂。不久，美国、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从此，勒布兰法的命运就注定了，虽然进入20世纪以后，它还继续存在了较长时间。1902年，全世界纯碱产量为180万吨，其中至少有 165万吨用苏尔维法生产的。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另一项早已在工业中确立的化学方法，遇到了第一个劲敌。在此以前，硫酸一直用铅室法生产。这种方法在19世纪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早在1831年，布里斯托尔的一个制醋商佩里格林·菲利普斯提出了另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申请了专利。这种方法通过一种称作催化剂的媒介物，把二氧化硫直接转变为三氧化硫，在操作中催化剂保持不变。由此产生的三氧化硫能够直接与水作用变为硫酸。但是，直到1870年才克服了这种方法的全部技术难题。在锡尔弗城建立了一个生产硫酸的工厂，生产能力最后上升到每周1000吨。在几年内，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

用接触法生产硫酸的工厂。染料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因为接触法生产的硫酸比铅室法生产的硫酸浓度大得多。这种高浓度的硫酸，人们称之为发烟硫酸，以前实际上只能从波希米亚的工厂得到。它是从当地一种特殊类型的板岩制得的，成本非常高。制造硫酸的接触法，并不像氨碱法对勒布兰法那样，置较老的铅室法于死地，因为两种方法并行不悖。

在这一时期，由于肥料工业迅速发展而需要大量的硫酸，尤以制造过磷酸钙所需量为大。过磷酸钙通过用硫酸处理骨头，后来则是处理磷酸盐矿而取得的。19世纪初，詹姆斯·默里（1788—1871年）首先在都柏林附近从事这种生产；但是，直到1843年，约翰·贝内特·劳斯（1814—1900年）才建造了第一个真正大型的过磷酸钙工厂。它位于伦敦附近，到19世纪70年代，年产量约4万吨。

当然，磷不过是植物所需要的许多元素之一。另一种基本元素是氮。在我们论及的这一时期，氮的最重要产地是智利，硝酸钠以生硝的形式天然地存在那里。1900年，世界硝酸钠的消费量是135万吨，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植物所需要的第三种基本元素是钾。直到大约1870年为止，用于肥料和制造业的钾盐的主要来源是草木灰。在加拿大，木灰的生产特别重要。1871年，那里有500座木灰厂，一年消耗木材400万吨以上。然而，到19世纪末，由于开采了施塔斯富特的巨大的天然钾盐矿藏，加拿大的草木灰工业濒于灭绝。

上面谈到，制造染料需要发烟硫酸，这是19世纪后期发生另一次极其重要的技术变革的标志。以前，实际上到1860年为止，纺织业使用的全部染料几乎都是天然的。到19世纪末，合成染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开始于1856年，当时威廉·珀金第一次发现了苯胺染料——苯胺紫。他很快就在英国建厂制造，短短几年内，就有了其他许多种合成染料。其中有些完全是新创的，其余则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天然染料用人工合成的制品，在后一类染料中，有两种发现特别有趣。1869年，柏琴在英国，海因里希·卡罗（1834—1910年）在德国，几乎同时申请制造茜素（存在于茜草中的染料）的专利。这种发展迅即给茜草种植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类似，1897年首次进入市场的合成靛蓝染料的制造，几乎顷刻间就挤垮了印度的靛青种植园，当时印度用于生产靛青的土地约达20万英亩。

也许比这些天然染料的人工合成产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的，是同时可染羊毛和棉花的品类繁多的新合成染料。采用这些新染料，普遍对纺织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合成染料工业虽然发轫于英国，但是，很快就转向德国；到19世纪末，德国染料工业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然而，这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在19世纪末兴起的一个事例，其他一些事例将在别处论及。

化学工业另一个重要的新部门，就是与制造现在称之为烈性炸药有关的工业。早在1845年，就发现硝化甘油具有高度爆炸性能，但是过了很多年，才找出安全处理这种价值很高的物质的办法。这方面的先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年）。他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了甘油炸药，就是硝化甘油和一种称之为硅藻土的纯良矿物质两者的混合物。爆炸胶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把这些非常强烈的炸药变成安全的形态而加以使用，当然会在采矿和土木工程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军事方面，其后果也非常重大，采用硝化甘油，不论在陆军和海军的一切种类的军备中，都引起了一次全面的革命。在这个时期，硝化甘油用作发射剂的两种极其重要的形态，就是无烟火药和无烟线状火药。除了硝化甘油以外，在19世纪结束以前，又采用了另一种新的烈性炸药。这就是黄色炸药，是由硝酸作用于苯酚而制成。1886年证明它适用于填充炮弹。

上面我们较详细地论述了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一个是崭新的工业，一个则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革命性变化。不仅如此，两者对其他技术部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原已建立的工业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其中许多是采用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例如，我们前面附带提到的冶金工业，不论在提炼方法和制作方法上都出现了重大的改变。用铝作为一种崭新的建筑金属材料，就是具有头等重要的事情。几乎在所有冶金过程中，第一个必要的阶段是精选原矿石，以便除去不需要的杂质。随着富矿和最易开采的矿石的枯竭，必须利用品位较低的矿石，这一加工过程自然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便采用了三种新的选矿法。1895年采用了威尔弗莱法，在装有淘汰盘格条的斜床上，在水中搅动磨碎的矿石来进行精选。1860年首次提出了浮选法，用油和水的混合液来搅拌磨细的矿粉；这种办法在19世纪末开始商业性应用。这两种方法在现代采矿中都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意

义。第三种主要的精选法则是可以普遍应用电力的结果。这就是磁选法，办法是让磨碎的矿石在强大的电磁铁的两极间通过。

在这段时间，对铜的需求大为增加，因为它的优良的导电性能，使它在电器应用方面特别理想。铜的生产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老办法，但是，也出现了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这就是采用了电解提炼法。这也是普遍应用电力后才得以实现的又一发展。只有最纯的铜才表现出理想的导电性能，而这种高纯度只有用电解法才能比较容易地取得。第一座电解铜提炼工厂1896年在南威尔士建立。1892年，铜的电解提炼法传入美洲。

另一种重要性也大增的金属是镍。从19世纪开始，对这种金属的需求就一直在缓慢地增长。但在1889年，证明钢经过加镍以后可以大大增加它的韧性，因此，这种金属很快就被大量使用。1893年宣布了一种改良的工艺过程，称之为奥尔福德“顶部与底层”法。用奥尔福德法炼得的金属铸成锭块，把锭块用作进一步电解过程中的阳极，于是就得到了极纯的产品。1890年，路德维希·蒙德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炼镍法。根据这种方法，先将这种金属变成一种易挥发的物质羰基镍，进一步加热分解，就产生镍。到19世纪末，蒙德炼镍法从商业上说，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镍的重要性增加，人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新的矿石供应来源。1883年，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时，在萨德伯里（安大略）发现了大量矿藏。规模之大，可使今后许多年供应无虞。

锌能防止暴露在外的铁器生锈，这使这种金属的生产量在19世纪末大为增加，以便用于电镀。1860年，设计出连续电镀铁丝的办法，大量电镀铁丝运往新发展起来的海外领地。美国大约在1880年采用了带刺铁丝，在欧洲，则过了一些年以后才普遍采用。

在金属加工方面最突出的变化在于：机械化程度日益增加；金属加工业的许多部门中，可加工的坯料体积的增大。1842年采用了内史密斯首创的汽锤，这件事突出地说明了机械化日益增长的力量。到1887年，在设菲尔德安装了一台4000吨的水压机，用以锻造钢锭。在铜的加工方面，到1873年就能轧制重达两吨以上的铜板。

对用于围栏的铁丝，用于吊桥的钢缆等，需求量本已增加，而电报系统和输电系统的迅速扩展，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需求。最初，电报电缆用铁制成，但很快铜就开始在一切电力工程中几乎居于独占的

地位。多年来，金属线的制造都是用穿过一个拉丝模拉延的办法，但是在1875年开始出现了多头拉丝机。为了提高产量，加快了拉丝的速度，到1890年，就达到了每分钟1000英尺。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讨论了有色金属，因为这个时期钢铁工业的变化非常深刻，有必要单独加以论述。1850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黑色金属生产国，生产了250万吨铁，但是，钢却不超过6万吨。到1900年，全世界钢的年产量为2800万吨，而且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主要的生产国。在这个时期，钢在许多建筑用途方面，代替了熟铁和铸铁。形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发现在生铁处于熔态时吹进空气可以使它变成钢。这一发展的技术史很复杂，过于具体而且争论纷纭，因此，本章无法详述。但这里必须指出，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是亨利·贝色麦（1813—1898年），他的炼钢法举世闻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贝氏转炉。

弗里德里希·西门子（1826—1904年）设计出一种不同的但具有同样效果的方法。西门子后来与法国炼钢专家比埃尔·马丁联合起来。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得到广泛采用，到19世纪末，也许比贝氏炼钢法还要普遍。然而，贝氏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都有根本的缺陷，即两者都不能使用含磷的矿石。这对英国来说，后果尚非十分严重，因为它拥有大量不含磷的矿藏，但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却大为不利。1875年，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1850—1885）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他的发明经过许多年以后，才得到普遍采用。托马斯的发明的原理，是用从煅烧白云石得到的碱性物质作为炉衬。当这种炉衬与磷作用达到饱和时将之除去，然后可用来作为宝贵的肥料。这一发明大大推动了德国的炼钢工业；它从1871年已经接收了洛林的丰富的铁矿，而这些矿石含有大量的磷，在采用碱性炼钢法以前，对德国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19世纪下半叶，推动炼钢工业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是世界上铁路系统的大扩展。一直到1880年前后，路轨多半是铁制的，但从那以后，就广泛地采用了钢轨，因为钢轨有巨大的优点，比铁轨的寿命长15倍到20倍。钢也越来越多地用于许多其他方面。1860年前后，钢板开始用于制造锅炉。造船商很快采用贝氏钢，第一艘钢壳船于1863年横渡大西洋。尽管它对造船商有利，但是，约在1890年以前，还看不出从铁壳船向钢壳船转变的决定性动向。

钢变成了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建筑材料。1883—1890年间建成第一座全部钢造的桥梁，横跨在福思湾上。1889年建立起来的埃菲尔塔是用法国炼出的平炉钢建造的。首先由美国工程人员建造的高层建筑，也是在19世纪末主要用钢材建造的。1885年出现了十分重大的发展：采用了曼涅斯曼法来制造无缝钢管。

钢产量大量增加，对于军火工业也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到1861年已经证明，可以压延一英尺厚的熟铁板，但即使这种铁板也抵挡不住由于掌握了硝化甘油而可能制出的高爆炸性炮弹。到1892年，皇家海军就采用钢板作为装甲；19世纪末，已经能够轧制规格很大的钢板了。例如，德国的克虏伯工厂就能够轧制厚12英寸、重达130吨的钢板。

运输技术发展的某些方面，例如采用钢轨以及用钢壳船代替铁壳船，前已述及。这些都不过是海陆交通运输中不断变革的一部分。在海运中，出现了一种新型蒸汽机。1897年，在斯皮特黑德检阅海军时，查尔斯·帕森斯爵士（1854—1931年）的第一艘用蒸汽轮机推动的船“杜宾尼亚”号引起了轰动。这艘船的速度达到34.5海里，创造了当时水上航速的最高纪录。非常奇怪的是，帕森斯最初对蒸汽轮机的兴趣与船舶推进器毫无关系。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当时迅速发展的电力工业；他感到急需一种蒸汽发动机，其转速需大大超过当时通用的往复式发动机。他的第一台涡轮发电机制于1884年。到19世纪末，蒸汽涡轮已经被确认为是用于发电的最令人满意的蒸汽发动机了。在当时已决定性地胜过运河的铁路上，蒸汽发动机已在盛行，人们尚未感到电力牵引和内燃机牵引的挑战。但是，到19世纪末，公路运输已经有效地撒下了大力竞争的种子。到1900年，已经制成令人满意的汽油和柴油发动机；而且，虽然汽车和卡车仍然很稀少，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但现代车辆的一切必要条件几乎都已具备。可以很公平地说，1900年的汽车工程师，在今天的汽车中也不会看出有多少新的特点；当然，他将会看出在设计和制造材料上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公路车辆对石油和汽油的需求量，即使到1900年也仍然很小，但石油工业在这个时期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因为它的某些产品在其他用途中的需要量还是很大的。石油的挥发性强的馏分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沸点较高的馏分，即人们所熟知的火油或煤油，在取暖和照明两方面都已大量使用。煤油炉通过1878年规模甚大的巴黎博览会

而变得家喻户晓，在随后的10年内，竟售出 50万只。到19世纪末，石油广泛用于点燃船舶的锅炉，而煤油灯则几乎在全世界都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大量需要润滑剂，其中许多是用石油制造的。

很多年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天然石油的存在，事实上，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就知道沥青了。然而，之近代石油工业则是从1857年开始的。当时在汉诺威打出了一些油井。但石油工业真正的中心却是在美国，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钻探石油达到70英尺的深度。然而，之所以能打成这些油井，和在此之前其他领域中取得的技术进展是分不开的。虽然在中国凿深井已有几百年之久，但在19世纪以前，欧洲或北美洲均未广泛采用。最初促使人们改进技术的是农业需要用水，化学工业需要盐水。北美洲最初的油井是用带有钢刃的熟铁钻头打成的，设备用蒸汽机驱动。然而，1864年，由于采用金刚石钻孔而实现了非常巨大的改进，结果在19世纪末，钻井深度即达7000英尺之谱。早期提炼石油的方法粗糙而效率不高。厂家主要是提取其中具有中等挥发性的成分，即火油或煤油。较轻的成分，即人所共知的汽油，易于燃烧，很危险，直到出现汽油发动机以前，大都让它白白地浪费掉。差不多直到19世纪末，其运输主要是用木桶或铁桶。油船和铁路上的油罐车，大约是在1870年开始出现的。

由于公路运输发生变化而受到重大影响的一项工业是橡胶工业。橡胶产品具有绝缘性能，这对于电力工业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使橡胶工业发展成目前这样庞大的组织的，是对轮胎的需求，先是实心胎，然后是充气胎。充气胎于1895年首次用于汽车，但在此以前，它已很广泛地用于自行车；自行车大约从1885年起即已普遍使用。第一条邓禄普充气轮胎制造于1900年。

最初，橡胶工业用的主要是来自南美洲的野生橡胶，但即使在出现轮胎工业以前，就已供不应求。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提出了建立橡胶种植园的计划，但是，直到1870年，这种计划才开始得到官方的考虑。1873年，印度事务部从南美洲得到了橡胶树种子，打算把它们种植在加尔各答，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1876年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有相当大一部分幼苗长成了大树。从这一个小小的开端，逐渐发展成目前这样庞大的种植园橡胶工业。到19世纪末，已经有很大数量的种植园橡胶供应伦敦和其他的国际市场了。

纺织工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革新，即广泛采用合成染料，已在有关化学工业部分谈到。虽然纺织工业相对来说革新不大，但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也发生了许多其他变化。恰当地说，这主要是越来越向机械化发展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基本工序都发生了某些相当大的改进。最大的一项革新也许是自动织机。这是 J. H. 诺斯罗普在1890—1894年在美国设计出的。但是，这仅仅是在织布方面应用机械方法的一个例子。这一时期，动力织布机战胜了手工织布机，旧式的提花机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对各种地板铺垫物的巨大需求。亚麻油毡就是当时的产品之一，这导致了地毯工业的大量机械化。大型的羊毛地毯动力织机，1876年在美国造成，两年后传入英国。廉价缝纫机的普遍使用预示成衣工业的发轫，也导致精密机器首次进入普通的家务劳动。在纺纱方面，这一时期的标志是朝着今天已广泛应用的环锭纺纱法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方法虽然1828年在美国即已发明，但直到1870年才为英国纺织工业广泛采用。对比之下，针织工业采用机械化则很缓慢；甚至在1870年，针织品还多半是靠手工或至少是手摇机器制作的。以后，机械化则越来越普遍。1890年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发展，一位美国发明家R. W. 斯科特应用一种针织机，能完整地织出一只袜子来，只是在脚尖部位有一条小接缝。

19世纪这些重大变化，以及居民中识字的人数稳步增长，自然就大量需要各种印刷品。出版书籍的地方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出版报纸、期刊以及其他廉价读物和寿命较短的读物的方法，却有很大的发展。对报纸和类似出版物的需求大增，这就要求扩大机械化程度，以便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在这方面，《泰晤士报》起了带头作用。布鲁斯的铸字机于1850年问世，但是，第一次真正取得成功的这类机器，则是《泰晤士报》的轮转铸字机。这台机器是弗里德里希·威克斯在1881年取得专利的。它每小时可铸6万个铅字，因此印刷完毕后铅字不必拆版再用，只需回炉重铸即可。机械排版则是发明家多年来无法解决的一项难题。在1822年到1890年间，做出了许多设计，但直到行型排铸机问世之前，迄未令人完全满意。这项美国发明的突出特点是它只需一人操作。它于1890年出现，1900年已经在全世界使用了。例如，伦敦有20家日报，在其他各地有250家报纸和期刊，采用行型活字铸造机排版。

在印刷机方面，轮转式印刷机的制成是一项重大的发展，它大大提高了工作速度。1855年，英国取消报纸税以后，大大推动人们设计这种令人满意的机器。然而，早在1846年就已经设计出一台成功的轮转印刷机。《费城询问报》1865年采用威廉·布洛克设计的一台轮转机印刷。《泰晤士报》则于1868年采用著名的沃尔特式轮转机印刷。两年后，开始用机器裁切和折叠报纸。

大量生产群众性读物，对插图画家提出了要求。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开始时，仍然广泛使用木版，但是在1880年开始用金属版印线条画；《每日电讯报》早在1881年就采用金属版。用网目铜版复印照片始于1877年，是在维也纳发明的，到19世纪80年代，开始为报纸广泛采用。到1900年，则通用于全世界。复印彩色插图的原理，在19世纪初即已确定，但直到1870年才普遍使用这种大量生产的方法。

人们说，工业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创造生产工具的工具，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尽管这种说法也许过分简单化，但是无疑地，工作母机制造工业具有极大重要性；因此，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工业出现巨大发展的时候，工作母机制造工业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领域里，要加以概括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样说也许是公平的：相对来说，新型机器问世并不多，主要变化是在设计和制造材料方面，以及向自动化工作转变的显著趋势方面。后一种趋势在美国特别显著，因为美国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从而形成了一股转而使用机器的强大动力。而在欧洲，新的机器在造成失业之虞，因此，趋势常常恰好相反。人们需要用工作母机来制造技术装备工业各个部门的所有产品，如制造铁路机车、自行车、打字机、纺织机械、印刷机以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其他许多种类的机器，因此，工作母机对于工业的根本重要意义，就不难想象了。

一般认为，自动化基本上是20世纪中叶的一个特点。因此值得指出：事实上它大约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动车床是在1861—1865年南北战争后不久就开始在美国问世的。在战时和战后，熟练劳动力奇缺，从而就大大需要自动化机械。新机器的需要量极大，而在许多情况下，新机器要求的精确度大大超过技术准备工业以前一般达到的水平。因此，对精确度特别注意，设计出了精密的度量仪器。约瑟夫

• 惠特沃斯爵士在这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由于普遍采用了机器零件相互通用的原则，精确度就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

前面已经指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即采用比以前能够得到的硬度大得多的钢。这一变化大体上可追溯到1868年，当时发现含有钒和钨的钢，每分钟能切削60英尺，而以前能够炼出的最好的钢，每分钟只能切削40英尺。1900年出现了另一次大跃进，泰勒和怀特的合金钢能把切削速度提高到每分钟120英尺，即30年前达到的速度的3倍。当时发现，现有的机械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够精确、不够牢固，无法利用这些新的切削材料，因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设计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张扬 译）

[1] 此处原文如此。按热力学第三定律应为“不能用有限手续使系统的温度达到绝对零度”。——译者

[2] 应为1878年。——译者

[3] 亦称“生机论”。——译者

[4] 按勒贝尔的生卒年应为1847—1930年，此处原书疑有误。——译者

[5] “离子人”原文Ionians，与古希腊“爱奥尼亚人”的写法相同，此处一语双关，有挖苦之意。——译者

[6] The Gaiety Theatre，在曼彻斯特。——译者

[7] “新世界”亦称“新大陆”，指美洲大陆；“旧世界”指欧、亚、非三洲。——译者

第四章 社会政治思想

一个以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起源》（1871年）、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学和磁学论》（1873年）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1872年）作为开端的时期，必然会引起思想上的动荡。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要算马克思和达尔文。但是，这种影响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却受一般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日益改变的性质以及科学思想对社会思想所产生的波动所左右。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对于社会思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情况正是科学发明、工业发展和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所造成的。思想史与经济史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密不可分，这是科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迅猛异常的社会变化的影响，那些维护旧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信仰的人们，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论点与观点。功利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仍然是有势力的思想流派。但是，这些流派是在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信仰的环境中，在一种新的精神和物质情况下保留下来的；这种环境影响了这些学派的整个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力量的分析，旨在为他和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所提出的政治学说奠定坚实的基础。《资本论》名义上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它却为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运用提供了详尽的证据。这部著作阐述了他认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学原则。它是当时用经济学原则和社会历史演变来解释工业文明的最有系统的尝试。《资本论》第一卷以德文出版于1867年；后两卷在他去世后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1886年出版了第一卷的英译本，并没有引起注意。作为一种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靠恩格斯和其他门徒为报刊撰写文章和进行论战活动，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到19世纪末，通常被恩格斯以及后来被列宁斥为异端邪说或离经叛道的各种变

相学说，已经影响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党纲的发展。

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正如书名所表明，实际上是两本书。书的前7章是《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也出版于1859年）的续篇。《物种起源》推翻了各种动植物都是各自不同和分别创造出来的看法，并且为所有生物基本相同和有着共同起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达尔文这时已经把搜集的证据整理出来，主张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都是通过自然选择从早期比较简单的生物演化而来。正是这个在《物种起源》中还只是加以暗示的结论，引起了19世纪60年代对达尔文主义的普遍争论。达尔文提出的更加明确的论证并没有因此免遭新的攻击和谴责，尽管这时它已经比较容易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这部著作的另外14章对他原来的论点做了某些修改，这种论点认为，在生存竞争过程中进行的自然选择说明了不同生物种类的存在。这14章研究了性的选择，认为它是物种演化的一个因素。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自然选择意味着两性都经受生活中的危险而得以保存下来，而性的选择则是同一物种、甚至同一性别中的某一个体战胜其他个体。达尔文的这本书和先前那部名著一起提供了托马斯·赫胥黎所说的一种“由于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而富有活力的生命概观”。

以后30年中，在哲学、神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中发生的思想上的重大动荡，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这两种因素引起的。造成这种动荡局面持续存在的，主要倒不是学说的创始人，而是他们的主要使徒托马斯·赫胥黎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达尔文和马克思分别于1882年和1883年去世，而赫胥黎和恩格斯都活到1895年。赫胥黎比达尔文更富有战斗精神，自从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开了那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以后，一直捍卫着他所崇敬的伟人。30年以后，他同格莱斯顿先生进行了一场几乎同样激烈的争论，那是关于加大拉人的猪的奇迹^[1]是否可信的问题。“不可知论者”这个词就是这些大论战的产物。通过这些论战，赫胥黎终于使进化思想成了人类整个生命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斗犬”，那么，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1878年，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提出

了比马克思本人写的任何著作都更加完整的一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这是一本论战性极强的书，书中抨击了杜林认为政治比经济更为重要的主张，并发展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具有什么意义的论著。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中，虽然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社会思想方面，但《反杜林论》仍然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爱德华·伯恩斯坦承认，他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使他“改信”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影响由于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更加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他们的思想与达尔文的思想方向一致，具有同样的科学性。马克思宣称他把社会演变看作“自然史的进程”。他想把《资本论》第一卷献给达尔文，可是，达尔文以他独有的审慎，没有接受这种荣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词中宣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这两位思想家确实都在耐心地核对了大量详细的事实和观察结果后，找到具有说服力的重要观念，这些统一的基本观念的阐明把以前一直是分离的事实连贯起来了。两位思想家都发现了一条简单的运动和发展原则，找到了更好地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关键。两个假说都带有革命性，意思是说它们猛烈冲击着关于人类和人生的传统看法，使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许多以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两个学说都发现变化的原因在于斗争——生存竞争和阶级斗争。两个学说都是严守基本原理的学说，因为它们都是用一个重要的单纯原理去说明历史，像万有引力那样明白易懂。两者可以同样言之成理地（尽管往往不免歪曲和只使用类比）应用于其他思想领域。这样的学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破坏性；一旦结合起来，它们就成为革命力量。

除了同时出现这一点外，还有两个条件使得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特别强大的思想力量。一是整个科学思想同时也在前进；二是整个西方文明出现了新的政治结构。

化学、力学和物理学这些科学，在当时已经达到需要重新做出概括和综合的阶段。人们发现化学元素按照原子量排列成一个整齐的数学序列；1871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提出了便于发现新元素的周期表（1871年发现镓，1879年发现钪，1886年发现锗，1895年发现氩）。詹姆斯·焦耳发现了热与化学能或者与产生热所消耗的功之间

的等价关系；赫尔姆霍茨把这个原理推广，应用到整个自然界，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原理。凯尔文勋爵又补充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有用的能量普遍可以转化为被消耗的热能的原理。克拉克·麦克斯韦在他的《电学和磁学论》（1873年）一书中，把他在这些领域中的发现纳入力学和热力学的新的模式中去。他提出的论点是：电像光波和辐射热一样是以波动形式运动的物质，因此各种能最后可能都有电磁能。

新物理学与新生物学之间相类似的情况给人们造成很深的印象。正像物理学是从最初认为原子是有固定重量的台球形状的固体，逐渐发展成为把物质与能联系起来的分子说一样，生物学也是从认为物种各自独立存在，逐渐发展成为把不同物种看作相互关联着的进化学说。与此类似的是，马克思用辩证唯物论这个包罗万象的学说取代古典经济学家一成不变的经济“法则”，用阶级社会学说不仅说明经济变化，而且也说明政治与文化。发现重大的基本原理，从而对知识与思想的各个不同方面做出新的综合，这是当时的风尚。马克思主义也试图说明变化、运动和发展，它具有似乎符合这种风尚的优点，因此获得了科学假说的声誉。

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政治思想所起的特别影响，也必须结合19世纪70年代西方文明的新的政治结构来估价。19世纪60年代的结局是重新划分了政治地图：规定了新的边疆，创建了新的国家，旧的国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巩固。由于北方在内战中获胜，美利坚合众国才得以保存下来。由于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到1873年的充分生效，才建立了统一的加拿大。由于成立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才继续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下去。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获得统一。爱尔兰独立运动受到挫折，法国巴黎公社也被镇压下去。甚至罗马教皇的坚持教权，终于导致在1870年举行了梵蒂冈会议。所有这些事件都表示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巩固或建立。19世纪后期的国家比起前几代的国家来，在统治和管理上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稳定和具有活动能力的机构。由于事实和情况的改变以及受到新学说的挑战，政治思想家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根本性质，政治义务的根据，及导致成功的革命行动的新的先决条件。

另外，这些新国家的兴起也是长期斗争和重大战争造成的结果。美国南北战争，俾斯麦对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意大利为争取统一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以及马克思曾生动论述过的法兰西内战，都说明暴力很自然地伴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19世纪70年代的新欧洲可以看作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的最新表现，又可以看作唯物辩证法所指的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新阶段。马克思确曾把巴黎公社当作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不管采取哪一种看法，权力、斗争和暴力都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政治事件也赋予政治社会思想以一些残酷和暴力的观念。

斗争的基调首先影响了那些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政治社会理论的作家，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早已发表过大量社会学理论的赫伯特·斯宾塞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斯宾塞的多卷本《综合哲学体系》发表于19世纪60年代。他那部颇有影响的《社会学原理》最初发表于1872—1873年，是在美国的《大众科学》月刊和英国的《当代评论》上分期连载的。由于他在哲学上带有决定论的倾向，而在政治上则主张放任的个人主义，所以他认为：“最大的善就是让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而为了追求错误想法而采取的政策，则会由于干扰、歪曲和镇压而造成很大的损害。”他主张，社会政治科学必须承认和采纳生物学的“普遍真理”，绝不能“由于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而违反自然选择的原理。

这样一种看法到处受到保守派的热烈欢迎。法国人对阿尔弗雷德·埃斯皮纳斯的《动物社会》（1877年）所表示的欢迎，也属于这种情况。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这种看法也受到保守派的热烈欢迎，这些保守派从中为放任主义的竞争和他们对于进步所抱的信念找到了根据。安德鲁·卡内基后来写道，当他读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时，就好像见到了“无限光明”，“我不仅摆脱了神学与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还找到了进化的真理。‘万事大吉，因为一切都在变好’成了我的座右铭，成了我内心快乐的真正源泉”。^[3]无怪乎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当时写道：“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种选择对全体人类起着作用，目的在于精选出适合完成某些工作的人。……他们有很高的薪水，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是，这对社会来说，还是合算的一笔交易。”^[4]达尔文主义也

能够支持沾沾自喜的实用主义。正像一位批判这种态度的英国唯心主义者戴·乔·里奇所指出的：“照自然选择来讲，道德无非就是‘一事成则万事成’。”^[5]

达尔文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对马尔萨斯所说的人类（以几何级数增长）与动植物（只以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基本区别的反驳，这一事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欢迎达尔文主义，就是因为它反对马尔萨斯的主张，否认生活本身必然产生贫困的看法，从而得出只有资本主义才产生贫困的结论。马克思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野兽和植物之中认识到他的英国社会，这社会有它的劳动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和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6]

然而，超出斯宾塞的广泛传布范围，达尔文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真正含义却复杂得难以做出评价。甚至斯宾塞也抱着机械论的看法（可以从他于1864年出版的《社会静力学》或1881年出版的《人与国家》中看出），他往往把有机体思想仅仅当作粗浅的类比来使用。通常被划入那个容易被人误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范畴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运用生物学原理来研究社会，得出各自不同的、往往互相矛盾的推论。人类学和地质学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新的生物学。人们即使正确理解了达尔文主义，也从中找到了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而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概念，则是从黑格尔、孔德这些先于达尔文的思想家们那里得来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往往被人用来加强或仅仅用来装饰那些实质上产生于十分不同思想来源的论证。

英国自由主义者沃尔特·白哲特和奥地利社会学家路德维希·龚普洛维奇看出了新生物学的更精微的含义，把它同爱德华·泰勒、刘易斯·摩尔根和威廉·冯特的新人类学结合起来。白哲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1872年）包括6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写得简练精辟；而斯宾塞的著作则冗长烦琐。这本书的主题可以从其副标题《关于把“自然选择”和“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的一些看法》中看出。他的论点是，政治组织从前固然有助于建立“固定的习俗”，维系社会的统一，使之在生存竞争中不致灭亡，而在比较近代的情况下，要取得进步就需要打破这种“固定的习俗”。灵活性首先来自思想自由，这种自由受到“推崇理智”的“讨论的时代”的鼓舞；它培养近代政府妥善治理所必需的那种“生气勃勃的稳健性”。这样他就把着重点从

保守主义转移到自由主义上来。龚普洛维奇则更倾向于决定论。他认为，国家以及一切政治制度都是社会集团之间进行斗争、某一集团终于战胜其他集团的结果。物质的、社会的甚至思想的进步都靠适者获胜这一事实；这种进步全凭“社会的作用和反作用，完全不以个人的主动性和意志为转移，同个人的思想、意愿和社会奋斗背道而驰”。这种集团斗争的看法有时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启发。

龚普洛维奇坚信国家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他又很接近德国思想家的“强权政治”学派，这派中前后主张最为一贯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但是特赖奇克强调伟大的领袖人物在创建国家方面所表现的创建意志。他直接师承黑格尔哲学，又得力于19世纪60年代国家兴起的经验；照他本人所说，事实上他的学说可以上溯到马基雅弗利的传统。

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华德和龚普洛维奇不仅有私交，而且哲学观点也一致。他从达尔文主义中引申出与斯宾塞恰好相反的结论。他攻击放任主义而赞成社会计划。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生物学的真理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并不就是人类的规律。他在1893年写道：“生物学的基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这意味着弱者的毁灭，我们最好就用这个说法。如果说自然界的进化是靠毁灭弱者，人类进化却是保护弱者。”华德承认龚普洛维奇关于集团斗争的看法，认为它适用于将来的种族斗争，但他又认为，在进步的社会中，合理的政策会代替过去的暴力和残忍，这正是托马斯·赫胥黎同一年在罗马尼斯讲座所作的关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讲演中所主张的论点。^[7]

后来的种族理论家们都热衷于利用达尔文思想，当时的种族主义通常和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响亮的鼓吹者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在1885年出版了他那本极为流行的书《我国：其未来前途和当前危机》。他扬扬得意地引证了达尔文本人在《人类起源》一书中的看法，“把美国取得的辉煌进步和美国人的性格看作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显然含有不少真理；在过去10代到12代中，从欧洲各国移居到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比较精力充沛，不辞劳苦和富有勇气，因此，在那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8]。斯特朗看到下一阶段世界历史将是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这是种族之间

最后的竞争，为此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接受锻炼”。取得德国国籍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99年出版了一部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风行一时并对希特勒产生过某些影响的著作《19世纪的基础》。他大量引用达尔文的著作，以及其他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论述，认为“杂交会消除特征”，主张保持种族纯粹是进步的先决条件，日耳曼民族必须为了保持血统的纯粹和统治世界进行斗争。

然而，种族理论绝非达尔文首创，因为达尔文认为种族差别的重要性不大，甚至也不是来自一般生物学。首先于1853年提出种族理论的人是法国的阿尔蒂尔·德·戈宾诺伯爵；它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来自整个19世纪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日益增多的接触，来自包括爱·奥·弗里曼和查尔斯·金斯莱在内的“条顿”历史学派。法国的爱德华·德律蒙、德国的阿道夫·施特克尔和维也纳的卡尔·卢格等反犹太顽固分子对这种种族理论做了非常不科学的表述；它受到法国的居斯塔夫·勒蓬或俄国的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等假科学社会学家的支持。正像在其他论证范围内一样，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由于人们的滥用，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大部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些空论或者是论战的伪装，算不上真正的思想力量。

为了把达尔文主义的不同用途完全列举出来，有必要提一下两种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相反的政治学说。这就是英国的费边主义和俄国的哲学无政府主义。19世纪80年代的费边主义者的经济思想来自亨利·乔治的《进步和贫穷》（1879年）而不是来自马克思；但是他们都是从达尔文学说中找到了相信“渐变的必然性”的理论根据。如果身体上的微小变化积累起来，就能够使生物种类各不相同，那么，社会变化就必然可以通过一系列逐步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完成。这种思想是英国人所理解的以进化论为根据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费边社秘书和费边社历史的撰写者爱德华·皮斯对达尔文主义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形成19世纪80年代青年思想的重大因素。

“我们的父母既没有读过斯宾塞，也没有读过赫胥黎，他们的思想世界和我们的全然不同；由于我们与从所受教育中承袭下来的传统割断了联系，我们就不得不亲自去发现当时新建立的社会学的真正原则。”^[9]西德尼·维伯在《费边社会主义论丛》（1889年）一书中，就曾主张“用有意识的‘直接适应’逐步取代生存竞争的早期形式——无意识的和代价高昂的‘间接适应’，认为在当今的文明条件

下，被选择的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社会”^[10]。在费边社社员手中，以进化论为根据的达尔文主义成了对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在《互助论》（1902年）中也以动物学为根据，辩称社会合作和互助这种本能同战斗和斗争的本能一样强烈。他正确地提出，达尔文曾强调人的道德意识在进化中的重要意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有益的进化力量。但是，同他的看法最接近的还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而不是任何其他学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必然会得出结论说，达尔文主义（以及整个生物学）对社会政治学说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千差万别，因此谈不上有任何意义呢？达尔文主义的直接和具体影响常常被人加以渲染夸大。它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同其他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进步结合在一起，打破旧的政治主张和信念，打开对社会政治思想进行大胆探索和彻底重新思考的大门，并加深政治哲学与神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早已存在的鸿沟。由于达尔文主义思想易于应用到社会思想方面来，它就助长了实证主义哲学倡导的那种搜集精确的社会资料和寻找可证实的社会“法则”的倾向；新生物学赋予实证主义原理以新的生命，正像它在某些方面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样。但是，达尔文主义思想最有力地渗入哲学领域却悄悄发生在20世纪，是在赫胥黎雷鸣般的战鼓声已经停息后，通过亨利·柏格森这样一位哲学家来完成的。

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按照大体相似的过程，渗透到人们的头脑和思想习惯中去。它的信徒几乎遍布各个欧洲国家，他们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组织政党。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这些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政党，有了一个借以讨论原则和政策的公共论坛。但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深厚的基础，因此，大部分讨论不是研究正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问题，就是研究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与人数较少但却肩负使命、斗争性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方之间的实际工作关系问题。结果是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竞相出现；因为同达尔文和赫胥黎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魔鬼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援引经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现本身陷进了一场几乎是按照达尔文所说的那种生存竞争的斗争之中。直到1900年，

它还远远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同“以进化论作根据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平共处的基础。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或法国的让·饶勒斯就曾把这些信念讲得娓娓动听。

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有好几个国家成立了明确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879年，朱尔·盖德的“法国工人党”成立，同年成立的还有“比利时社会党”；在英国，1881年亨利·海德门成立的“民主联盟”，两年后改称“社会民主联盟”；1883年，由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在瑞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成为未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萌芽。但这些政党都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长期努力和争吵的背景下建立的。产生这一背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想从斐迪南·拉萨尔及其信徒手中夺取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但未能成功，以及与1864—1876年寿命不长的第一国际有关。最重要的结果是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个纲领，他的批判后来由恩格斯在1891年发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60年代中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势均力敌，使得哥达纲领成为在德国建党的一个良好基础。纲领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出发，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纲领接着要求实现通常的民主权利：自由国家，通过不记名义务投票来进行普选，“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废除“一切限制思想自由和探讨自由的法律”，实行免费诉讼以及普遍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公众教育。纲领还要求制定社会福利立法、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并用单一的累进所得税代替各种间接税。^[11]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逐条进行了抨击，指出各条不是意义含混或前后矛盾，就是表现出不理解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抨击主要是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这个教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2]恩格斯在当时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说得更为明确：“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采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

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13]这些基本不同的国家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的追随者，而且也是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冲突的根源。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采纳了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与贫穷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化日益加深以及把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纲领还是保留下很多拉萨尔对于国家权力所抱的信念，因而添上了这样的话：“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不能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去进行经济斗争和发展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取得政权，就不能完成把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社会所有这一改变。”这种看法在欧洲各国日益发展的社会民主党中自然会逐步取得统治地位，因为这些政党正企图通过议会程序取得权力并成为有组织的劳工的代言人。这一立场还产生了某些政治争论——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同自由主义政党联合，他们应该在哪一方面抵制民族国家的要求以便支持“没有祖国”的工人的要求，他们能够合理地拥护什么样的国家军队。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第二国际的历届大会，并使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争吵。

社会民主党人在获得选票以及同那些旨在提高工会会员的直接物质利益的工会建立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助长了这种看法，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毕竟可以通过逐步改革或宪法程序来实现，而无须经过马克思所预言的启示录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由保尔·布鲁斯领导的法国可能派、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追随者、奥地利的维克托·阿德勒的追随者和意大利的菲立浦·屠拉梯的追随者，走的都是这条路。凡是使用选举权范围比较宽广而议会机构又比较强大，从而使社会主义有可能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权力的地方，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就发展缓慢并遭到失败。让·饶勒斯以雄辩的口才，大讲当时在欧洲大部地区正在形成的一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在1914年以前，一种适应一时需要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别，在纸面上保持了目标的一致。最高纲领是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词汇来表述的，而最低纲领则是罗列一些可以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范围内通过宪法程序实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只有在俄国，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才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因为在那里连最低的要求也具有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欧洲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小得出人意料。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遍布各国，其国际影响把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聚集在第二国际之内。它给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一种新的理论上的严密性和思想深度；但也带来一些死搬教条的僵硬做法和更加激烈的争吵。人们以经院式的狂热来争论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细枝末节和政治策略上的微妙差别。社会主义由于本身的内部分裂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变乱而受到重大损失，不得不于1918年后彻底改弦更张。这时，由列宁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190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和社会思想产生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使19世纪思想中原来处于低音调的唯物主义变成了高音调。在马克思以后，特别是经济学再也不能原封不动了，正像达尔文以后生物学发生的变化一样。许多不承认马克思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人，也吸收了其中某些唯物主义成分，从而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人们对经济史早已开始给予更大的注意，这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不过20世纪经济史研究上取得的迅速进展却多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学说的新流派，英国主张边际效用的人或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受到马克思的对手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党，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中甚至宣称：“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14]但是，对于所有经济学家来说，正像对于所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一样，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十分严格的，它便成了一种外部的衡量标准，一种用来衡量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之间的差别的绝对尺度。在这一方面，它澄清了思想，尽管其直接影响带来了很大的混乱；这一点，它很像达尔文主义。至少在一位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喀山青年看来是如此。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比作“一块坚固的钢，你只要取消其中一个基本假定，就会陷进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错误中去”。

可是，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得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了。它不仅反对那些赞同伯恩施坦在《以进化论为根据的社会主义》（1898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右翼社会主义者，而且要反对在实践

中由法国各工会和在理论上由若尔日·索列尔所发展的左翼革命工团主义。索列尔坚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学说。他并不笃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福音。他主张通过天然的无产阶级组织即工会采取直接行动；主张由“少数勇敢的人”来领导，这些人把每次罢工都作为阶级斗争中的一次小规模战斗来部署，懂得利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他主张在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总罢工获得胜利这一“神话”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他的主要著作和影响虽然属于20世纪，但他早在1898年就在《工团的社会主义前途》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他的一些基本看法。索列尔被人称为“棱镜思想家”，意思是说许多思想光辉集中照射在他身上，又从他身上折射出去。如果说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见解主要来自马克思，那么，他的心理学上的见解则来自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这几十年中，只有尼采在地位上可以同达尔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于1872年问世；他死于1900年。从1878年起到1888年精神失常止，他每年出版一部书。他那极度专心、善于沉思和内省的气质，孕育出一种生与死的哲学，反对一切现有的和传统的学说。在上述三位巨人当中，他大概要算是最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了。尼采领悟到一些心理学上的真理，这些正是在他死后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亨利·柏格森和卡尔·荣格所阐明的；然而，柏格森和弗洛伊德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尼采对他们有什么思想启发。若尔日·索列尔大概要算是他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继承人。通过研究索列尔，可以无意中发现马克思与尼采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同他们一样，索列尔也深信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他相信只有暴力才是医治它的罪恶的唯一药方，他歌颂战争，鄙视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他把马克思的两种道德（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同尼采的两种道德（主人的和奴隶的）混合在一起。^[15]索列尔从革命工团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演变，标志着在他的哲学中尼采的成分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人们可以把来源于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的整个思想倾向，说成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总攻击；因为尽管尼采强烈主张人的意志的重要性，反对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决定论，他所说的意志并不是合乎理性的理智所表现的意志，并不是黑格尔及其门徒所说的纯粹理念或精神的表现。唯心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关键在于这是对他们的世界观提

出的挑战，因为他们把世界看作绝对理念与价值的不完全的然而却在不断扩大的体现。这一点在贝内戴托·柯罗齐写的一篇短文“1870年以来各种政治理想之对比”中就曾谈到过。他写道：“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上受到这种学说启发的，既有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由数量上最强大、擅长生产生活资料的阶级实行专政），也有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主张把社会阶级斗争转到国家或民族斗争上来）。这种学说在以一个精神上受着折磨的诗人尼采命名的那样一种不宁静的宗教中，找到了带有英雄气概和贵族风度的表现形式。它的弱点表现在它与道德观念的剧烈冲突上，因为它对后者深恶痛绝。”^[16]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旧思想的冲突似乎比当时人们看到的要激烈得多；其他各种政治思想流派则由于以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方式，部分地吸收或适应了新的思想，设法缓和——或者至少推迟——它们与“道德观念的剧烈冲突”。

一个时代的政治学说不仅包括新颖的思想，而且包括为人们所熟悉的各派旧思想的引申、完善和改变。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代中，功利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各派哲学的发展竟然与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处于半隔绝的状态，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就更少。我们还要简单说一下这些发展的主要轮廓。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他去世那年（1873年）出版的《自传》中，对当时功利主义的发展和困境做了经典式的表述。这部书既没有提到达尔文，也没有谈到马克思。但它却告诉我们：对于真理的真诚探索和敏锐的社会意识是怎样使得一位受边沁派的正统思想影响很深的思想家，进而主张大大扩充国家活动的范围的。“我们认为未来的社会问题，就是怎样把最大的个人行动自由，同地球上原料的公有及平均享用共同劳动成果结合起来”。^[17]穆勒的激进主义成了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的来源。为在英国复兴唯心主义哲学而做出很大贡献的托马斯·希尔·格林的自由派唯心主义，也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的来源之一。有人讲，穆勒的《自传》，实际上“最能说明为什么边沁主义不能满足19世纪后期英国的需要，及为什么1870年以后格林取代穆勒而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哲学著作家”。^[18]但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传统并没有中断。这一传统的代表有像艾伯特·戴西那样的法学家，他写的《英国19世纪法律与舆论的关系讲演集》（1905年）特别探讨了“边沁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影响”；^[19]有詹·法·斯蒂芬

爵士，他写的《自由、平等、博爱》（1873年）从旧激进主义的立场抨击了穆勒的《论自由》；还有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他的《政治学精义》（1891年）公开承认他的思想“来自边沁和穆勒的著作”，很少谈到甚至根本不提达尔文和马克思。边沁关于立法应以增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宗旨的理论，同自由放任的主张是有区别的，并且像穆勒和西奇威克所表明的，可以用来证明大量的国家活动是必要的。

由于这种原因，格林的温和黑格尔主义在现实政治中可找到与后来的功利主义很多相同之处。1879年到1880年之间的冬天，格林在牛津大学做了他那有名的《政治义务原理讲演》，比他的同事弗朗西斯·布拉德雷发表《伦理研究》一书晚3年。同布拉德雷相比，格林受康德的影响较多，而受黑格尔的影响则较少。但是，他们却共同创立了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中包括伯纳德·鲍桑葵、约翰·米尔黑德和戴维·里奇（他写的《达尔文主义与政治》（1889年）和《达尔文与黑格尔》（1893年）把唯心主义思想与生物学思想融合在一起）。由于格林对个人自由的意义重新做了非功利主义的阐述，以及他用伦理的和精神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学说提出了“共同的善”这一概念，从而在当时提出了一个比边沁的学说更令人满意的关于自由改革的政治学说。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也得到了复兴。诚然，德国的唯心主义与其说得到复兴，不如说没有中断，因为人们从未失去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崇拜，实证主义从未像在法国、甚至意大利那样流行。在伟大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了60年的历史编纂工作后，于1886年去世）的影响下，威廉·狄尔泰、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和恩斯特·特勒尔奇等德国思想家，想一方面根据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吸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一种自成体系的哲学。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非常适合这一宏图，并且与康德哲学结合起来。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言》（1883年）就是以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与以同样合乎科学但又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科学方法所研究的人文界（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其基础的。就这种意义来讲，狄尔泰和他的同事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反击，反对简单地把人等同于动物和把社会等同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科学领域的知识，必须通过某种内在过程，通过生活体验与理解才能得到。

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所谓的“非理性主义者”的政治思想铺平了道路。这派思想的成果有马克斯·维贝尔的社会学，就宗教与经济、精神与物质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做了富有独创性的说明。维贝尔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首先是以论文形式于1904—1905年间发表的。这本书成为20世纪社会思想的伟大的首创性著作之一。有人认为，“在他的同代人当中，维贝尔是唯一能把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鸿沟填平的人”。[\[20\]](#)

在意大利，用柯罗齐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终于填充了意大利的思想和理想所出现的空白”。这种社会主义一方面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又同唯心主义合流。相比之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倒成了一种极其贫乏的运动。维尔弗雷多·帕雷托的思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扩大为更加复杂的集团斗争学说；他的《社会主义制度》（1902年）一书成为反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柯罗齐本人从1895年到1899年有过一段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奇怪的“插曲”，当时他从意大利唯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来，他又回到他那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和美学研究上去。柯罗齐把唯物史观当作他的思想的磨刀石，用它来加强他那早已开始形成的关于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打击实证主义，纠正他的唯心主义思想；然后，又随意地加以抛弃。如果我们想找到马克思主义同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最明显的例子要算这些年代中的意大利哲学了。

实证主义在法国比在意大利更为流行。但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已经失去其早期激进的功利主义阶段所特有的那种乐观主义，这是由于它部分地受到新生物学和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反教权主义这种更为重要的影响的缘故。它已经成为一种更严峻、更不注重个人和带有更多宿命论色彩的教条。当然，厄内斯特·雷南也还在继续宣传一种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科学观，想把政治思想像伦理学一样建立在一种平静而合理的人生观的基础之上。他那本小书《精神和道德的改革》（1871年）就是有感于当时法国一些骚动事件而写的，并企图找到造成这些事件的永久性力量。1890年，他出版了一本最初在1849年写成的题为《科学的未来》的著作。这是他写的一部最详细地论述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历史和社会的书。然而，他那敏锐的、有批判能力的、

不爱武断的头脑，甚至对实证主义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尽管他拥有许多读者，但是没有什么门徒，只能唱独角戏。

法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人物是伊波利特·泰纳，他直接师承孔德，生卒年月几乎和雷南完全同时。实证主义所特有的那些教条式的、机械论的、甚至决定论的特点在泰纳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现。“有关人类的一切事实，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都有其原因，并受法则的支配；因此，一切人类创造——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道德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现象，都只不过是那些必须由科学方法来确定的普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他在1870年写的；[\[21\]](#)他还进一步揭示在法国历史进程中起过作用的这类普遍原因。他为历史研究树立了严格标准，从而开创了对历史资料更加符合科学方法的研究；他那本大部头的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1875—1885年），由于其教条式的结论和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解释，成了同朱尔·米希勒在该世纪初期已形成的影响相对立的一种保守主义的（但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力量。从辞典编纂家埃米尔·利特雷、文学批评家埃米尔·法盖、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社会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雷耶这些人身上看，法国学术界仍然充满着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残余的东西。这些思想家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如涂尔干），有的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挑战（如富耶）。他们试图用一种适应这些新思想的实证主义重新阐述当代的问题。

在英国，一些受人欢迎的理性主义著作家的观点，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基础，这种实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介绍过来的，他在1865年带着某种保留态度写了《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一书，并且在19世纪40年代曾与孔德通信。弗雷德里克·哈里逊、约翰·莫利、莱斯利·斯蒂芬和许多其他撰稿人把《双周评论》办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主义的有力喉舌。可是，正如在法国一样，英国的实证主义这时已经残缺不全，由于去掉了一些机械论的成分和增加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成分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查尔斯·皮尔斯和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代表着实证主义向另外一个哲学方向的发展。

基督教思想，不论是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全都受到了上面说过的各种新思想和新情况的挑战。一方面，教会面对着人们不再重视宗教仪式和信仰，面对着在意大利和德国新兴的民族国家的世俗势力；

另一方面，神学则受到新科学以及由于校勘《圣经》而形成的崇拜“现代主义”的势力的挑战。在这段时期，教会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公开冲突，例如法国宗教人士与反宗教人士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战，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梵蒂冈与新意大利王国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政治与社会斗争背景加剧了神学中原教旨主义派与现代派之间的争论。在思想领域中，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思想方面，两种倾向大有迅速蔓延之势：一种是新教思想中主张“多行善事”的倾向；一种是鼓吹社会天主教和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新教世界中出现了新的宗教运动。1878年，在英国成立了救世军，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基督教科学派”运动。新教信徒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人道主义、教育、慈善和社会改革以及（同天主教徒一样）海外传教事业上。除了英国许多早已成立的团体，又出现了许多戒酒运动、少年团、保护儿童和动物的团体以及旨在消除社会贫困的各种运动。新教神学有分为敌对的两派的趋势：一派重新肯定对圣经作原教旨主义的解释，另一派则采取现代主义的方法，将新科学的思想吸收到神学中去，并使他们的信念与之相适应。

罗马教会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教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采取顽强抵抗态度，这是由于它对1870年教皇失去俗权和对梵蒂冈公会议的结果总是耿耿于怀而造成的。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的充满骚乱的任职年代告终。这位教皇在1864年颁布了《现在错误学说汇编》，把认为“罗马教皇可以而且应当同‘进步’、自由主义和世俗社会当前的发展和谐一致”的看法也包括在应受谴责的思想之内。他的继承人利奥十三世发表了一系列通谕，偏重从正面解释罗马天主教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的含义，特别是《不朽的神》（1885年）、《自由》（1888年）和《新事物》（1891年）。由于他复活并发展了托马斯主义及其能够把信仰与理智、神学与科学调和一致的特点，从而为“归顺”和适应新形势的政策奠定了神学方面的基础，这一政策使社会天主教的兴起成为可能。教皇虽仍然谴责唯物主义、世俗主义和不可知论；但这时已（有条件地）承认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目的在于将基督教教义注入其中，以反对富有斗争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世俗思想。在《新事物》通谕中，资本家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剥削的现象，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受到同样严厉的

谴责。国家有权力和责任鼓励成立自由的工人协会，并以立法手段反对经济压迫和社会贫困。

在教皇的鼓励下，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成立了天主教工会。这些工会，凭借自己的工人阶级产业组织，同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分庭抗礼。一些组织严密、即便往往人数不多的政党，以社会天主教思想为基础，也在同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抗衡。这样，教会承认现有制度是进行政治活动的正当手段。这些发展产生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社会思想。在法国，在蒙塔朗贝尔和拉梅耐早已开拓的基础上，像在《垄沟》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马克·桑尼埃以及阿尔贝·德·门和勒内·德·拉图尔·杜班等人都设法把利奥十三世宣布的“归顺”政策，^[22]既当作一种政治力量，又当作一种精神的和思想的现实。在教皇庇护十世于1903年即位以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又趋恶化，在法国尤其如此。但是，天主教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运动却得以延续下来，后来到20世纪又取得成效。

在德国，社会天主教思想在早先就由阿道尔夫·柯尔平和冯·凯特勒主教做过阐述，到1870年建立了一个公开声明其宗教信仰的中央党。这个党由于经受了德国文化斗争的风暴而大大加强，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制定了一整套建设性的社会改革纲领。在奥匈帝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强有力的鼓吹者是卡尔·冯·福格耳臧男爵，而维也纳的那位令人敬畏的卡尔·卢格则以基督教的名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进行了同样猛烈的攻击。在奥地利，主要由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鼓动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反犹性质；而意味深长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是由奥地利犹太人发起的。1896年，泰奥多尔·赫茨尔出版了他的《犹太国家》一书，翌年，他就创立了“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各种宗教和种族力量之间的冲突似乎就是奥地利政治的关键所在，这至少是1909年住在维也纳简陋的小客栈里的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的印象。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讲到舍纳雷尔、卢格和赫茨尔的思想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并说他越来越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知识是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因而也是了解其真正目标的唯一钥匙”。同其他已经提到的种族主义者一样，希特勒也是用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的字眼来看待政治斗争的。“斗争的观念同生命一样久远，因为生命的保存全靠其

他生物在斗争中的灭亡。……在这种斗争中，强者、能者获胜，而弱者、愚者失败。”[\[23\]](#)

19世纪最后30年的思想大动荡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其性质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但这却是20世纪的伟大播种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样强有力的生力军，更加风靡一时而且深入人心。1870年以前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盛极一时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受这种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和基督教哲学则想方设法吸收很多科学和社会学的思想，而未向唯物主义屈服。20世纪最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同时反对功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其人道自由主义找到了哲学根据。凯恩斯在写到本世纪初他在剑桥大学时那批志同道合的人时说：“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我们是最早的也许是仅有的能够背离边沁传统的人。……此外，正是由于这种背离，加上我们哲学上坚定的个人主义，我们大家才得以免受边沁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即马克思主义的侵害。”[\[24\]](#)

这种思想动荡本身比政治哲学家们的直接影响更为重要。它带来两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倾向。其一是人们认识到，人的社会行为受非理性的、下意识冲动的影响；其二是人们相信，“直接行动”，或者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作为推动社会政治变化的手段，具有一定效能。把前一种倾向同尼采的哲学等同起来，把后一种倾向同索列尔的哲学等同起来，都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的《释梦》出版于1899年）的发现中，从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中，或从沙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25\]](#)所表现的那种实证主义与反理智的种族主义的独特混合体中也都找不到这两种倾向的完整的说明。实际上，那些日后利用非理性主义的伟大人物和行动主义的实践家们都是在这些年月里臻于成熟的。列宁生于1870年，斯大林生于1879年，墨索里尼生于1883年，希特勒生于1889年。但是，作为影响他们思想形成的力量，当时的思想环境与当时的各种暴力和非理性的运动是分不开的。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法国德雷福斯案件引起的动荡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大众新闻和国际外交活动所起的激动人心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形成一种黯淡的背景，无疑在向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正当性提出挑战。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行动倾向——一种新的信仰，在20世纪初逐渐占了上风。

在思想和行动上，新时代的先驱是列宁，他的小册子《怎么办？》（1902年）可以同时看作前一代政治哲学的尾声和下一代政治行动的前奏。它不仅包括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包括所有一党专政制度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政治行动成功的先决条件在于有“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26]当1903年以后他着手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并领导它走向胜利时，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张金言 译）

^[1] 事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28节以下。——译者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译者

^[3]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波士顿，1920年），第327页。

^[4] 威·格·萨姆纳：《事实的挑战与其他论文》（纽黑文，1913年），第90页。

^[5] 戴·乔·里奇：《达尔文主义与政治》（伦敦，纽约，1895年），第13页。

^[6] 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2年6月18日），R. I. 米克在《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尔萨斯》一书中引用，见该书第173页。另参阅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2—1882年）引文见同上书，第185—188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88页。——译者）

^[7] 托马斯·赫胥黎和朱利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1943》（伦敦，1947年），第81页：“社会进步意味着宇宙进程在每一步都受到抑制，并代之以另外一种可以叫作伦理进程的东西。”（《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即严复译《天演论》。罗马尼斯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在牛津大学创立了一年一度的罗马尼斯讲座。——译者）

^[8]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起源》第1卷，第179页。

^[9] 爱德华·皮斯：《费边社历史》（伦敦，1916年），1925年修订版，第18页。

^[10] 《费边社会主义论丛》（伦敦，1889年），1920年版，第57—58页。

^[11] 本段中引语中译文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67、68页。——译者

[12]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23页。——译者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50年，两卷本）第2卷，第39页。（译文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页。——译者）

[14]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附录，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页。——译者

[15] E. H. 卡尔：《关于革命的研究》（伦敦，1950年），第154—157页。

[16] 贝·柯罗齐：《政治与道德》（伦敦，1946年），第91—92页。

[17] 约·斯·穆勒：《自传》（伦敦，1873年），1924年版，第196页。

[18] H. J. 拉斯基为穆勒的《自传》（牛津，1924年）写的引言。见该书第10页。

[19] 关于戴西较早时期写的更有权威性的著作《宪法之法的研究导论》（1885年）一书，其现代编者E. C. S. 韦德曾说，“历史学家若想正确评价维多利亚女王后期辉格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的看法，这部著作的优点是无须推荐的”（H. J. 拉斯基为穆勒的《自传》，第9版，1939年，第14页）。

[20] 斯图尔特·休斯：《意识与社会》（伦敦，1959年），第335页。

[21] 伊·泰纳：《论智力》（1870年）。

[22] 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要求法国天主教徒归顺第三共和国的政策。——译者

[23] 1928年2月5日希特勒在库姆巴赫的演讲，引自A. 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伦敦，1952年），第31页。

[24] 约·梅·凯恩斯：《两篇回忆录》（伦敦，1949年），第96—97页。

[25] “法兰西行动”，1898年在法国成立的鼓吹以暴力推翻第三共和国的保王派组织，先后易名“法兰西行动委员会”和“法兰西行动联盟”。莫拉斯为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译者

[26] 以上引文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241、290、329—330页。——译者

第五章 文学

19世纪后期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颓废迹象。所谓颓废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传统颓废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文学作品的基本风格、表现世界与正确描绘人生经历的常用手法都重新做了规定。这个传统主要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作为基础的，即艺术的想象能真实地反映自然；后来在主题和表现方法上虽有各种变化，但这一信念却持续未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使得19世纪初期的文学产生了各种主要变化，但仍然没有打破这个传统。相反地，它丰富了这个传统，使人们更敏锐地感到诗所反映的世界与散文反映的世界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表明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在思想感情方面完全主观的探索所起的作用是很有趣的。这时人们仍然相信艺术有能力反映这些更为丰富的各种可能性所具有的真实含义和形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凭想象来发现事物的“真实”状况并认识事物的意义是否可靠，也就是是否负责，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看来几乎可以用任何方法写任何事物，可以欣赏简直是无数的观点，但是在文学范围内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同时带来了一项损失——即丧失了创作上对人的真正形象和地位的肯定。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中，只可能找出一个共同特点：寻求一种可靠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在于科学的准确性呢，还是纯粹的想象？在于道义上的判断，还是玩世不恭的超然态度呢？在于健全的思想，还是美妙动听的言辞呢？这是当时提出的一部分问题，而即便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带有不确定的味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后世的读者感到，这一时期许多作品的风格和形式、语言和思想之中有某些不完全是“健全的东西”，有某些矫揉造作和偏重理智的东西：所有这些描述都与艺术中的“世纪末”一词有联系。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有各式各样的很有思想内容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的危险就在于显得过时。如果只有思想，而不完全相信想象力，因而也不与实际经验融为一体，那么，不论这种思想本身多么光辉，它也始终要归于失败。

纵观维多利亚后期的文坛，亨利·詹姆斯（1843—1916年）无愧于他所占有的头等重要地位。他作为一个寻求一种传统的美国人到欧洲来，但是他虽然学到了这一传统后期的各种细腻的表现手法，而且有时表现出对美学的过于微妙的悟性，却从来没有失去自己固有的精神活力。这些特点在他的同时代的作家身上，开始显得往往是互相排斥的，但他却以罕见的才能把这些特点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贵妇人画像》（1881年）和《使节》（1903年）这样的杰作。詹姆斯深知问题的所在，从中找到了他的主题：艺术和他通常所说的对丰富古老文化的“更细致的感受”二者不能摆脱道德败坏和邪恶。热恋、崇拜、求知，这些就要经受痛苦折磨，而占有就意味着悲剧：这就是詹姆斯那些毫无实质情节的、描写继承遗产、认识事物和自我克制的故事所具有的纯精神结构。他写的悲惨故事不同于寻常的一类：斗争总是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道德准则之间进行的，被杀害的不是人，而是人的灵魂。他的作品中很少直接接触到暴力，不论是行动上的或是感情上的均属少见，就连具体的场景似乎也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了。

《鸽翼》（1902年）和《金碗》（1904年）的实际“题材”几乎可以说，只不过是意识的精心运用而已，对于人物本身的描写几乎被变成对内在联系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对抽象联系的研究。然而，这一异乎寻常的创作手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全凭精神之美来弥补人间的邪恶。詹姆斯后期作品中的所有女主人公，从《波英顿的珍藏品》

（1897年）中的弗莱达·魏契开始，以至《梅瑟知道的事情》（1897年）中那个令人惊异的小女孩，都有“纠正错误”的本领；她们的爱超越了狡诈、失败与死亡。这些故事的寓意，如果不是有关精湛艺术的真谛，则可能被认为带有基督教色彩，而詹姆斯认为只有精湛的艺术才能“构成生活、引起兴趣、具有重要性”，结果他最后几部小说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好比在不可言状的灾难面前提出的冠冕堂皇的托词，仿佛“承认就要引起雪崩”，因而“几乎在任何方面，对于具体的东西都完全加以禁止”。然而，这一批评对于他早期创作的小说却是不大适用的，如《美国人》（1877年），《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年），《贵妇人画像》，在这些小说中，邪恶势力最后确实挣脱出来，尽管它只是在如同惩恶扬善的通俗剧的情节中出现。詹姆斯认为这些作品的风格极不完美，但是它们对有关颓废倾向的一些问题所做的比较直观地说明，在一个对于具有“美好形式”的外表缺乏信心的时代中，也许是更可取的。

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在小说的创作技巧方面与詹姆斯相比，站在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他的风格比较朴素，以农村为背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是朴实的乡下人，他写的悲剧是现实的。他的突出的才能在于辨识戏剧性的时机，他所描写的情景足以使他能够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相媲美。然而，他的这种才能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因为他不能确定如何使用这种才能，也无法断定它的含意。哈代知道纯粹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所面临的危险：“一个故事必须有讲述的价值，而生活的一大部分是根本不值得讲述的。”因此，他提出的论点是，艺术就在于它与现实的不相对称。他虚构了一些不大可信的情节或场面，显示出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才能。《一双蓝眼睛》（1873年）这部作品中就有最不可思议的例子。但是他这种习惯做法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而且产生了许多极好的效果。这也是他所有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获得成功的秘诀。例如载于《韦塞克斯故事集》的《三个陌生人》（1888年）就是如此。然而，哈代不仅用这一技巧使永恒的人间悲喜剧获得新的生命，而且也用这一技巧来对它们做了新的解释。他想建立一套关于偶然事件和不幸遭遇的理论，这就使他塑造的人物不必负全部责任。他这样做，对他塑造的人物是不利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他自己作为塑造者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对一切文学作品的兴趣来源于在纷纭的事物中看出个人的命运的能力，并抓住一个人的生活中能够形成他的独特的故事的那些特点。哈代的哲学思想远不如他所塑造的人物那样有说服力，他的人物把偶然遭遇的不幸变为自己的可怕的命运。哈代只是想到宇宙基本上是混乱的，毫无意义的，而他的想象力却自然地感到，在鼓舞他写作的所有那些不寻常的事情和惊人的场面之中，存在着戏剧性事件和表明重要意义的某种强烈启示。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可能无法在理论上加以说明，因为它几乎不能和他本能地感到值得讲述的各种细节分开：富有抒情味的优美境界和田园诗般的美妙情景（比如在《绿荫下》〔1872年〕和《号兵长》〔1880年〕中可以看到），神话的神奇色彩和悲剧的恐怖性（见《还乡》〔1878年〕和《卡斯特桥市长》〔1886年〕这两本最好的小说），神奇的力量和无穷的蠢事（见之于《远离尘嚣》〔1874年〕和《林中之人》〔1887年〕）。缺少的只是一样东西，那就是整个作品最后的一致性。哈代的诗人眼光受到了作为散文家的洞察力的影响，这一缺点破坏了他的风格，这在他的诗作《韦塞克斯诗集》（1898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诗，大部分是在他放

弃小说创作以后写的，因此不属于这一时期。他可能确实感到美和快乐之中都掺杂着残酷与忧伤，感到他所热爱的自然界没有怜悯，是冷漠的；这一切都是非常明显而且真实的，然而由于他的陈腐的不满之词和一番理论上的评论，因而失去了智慧上的纯朴。他的“现代的”思想，在《德伯家的苔丝》（1891年）和《无名的裘德》（1896年）发表的时候，招来了非议。他的这些思想原本是为了使人们避免遭受痛苦的，但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以高尚的精神忍受痛苦，相形之下，他的思想只不过是索然寡味的老生常谈罢了。

希望文学能起规劝的作用，这种想法对于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年）的作品来说，不能算是一种缺点。这始终是他的灵感的源泉。他取得成功是缓慢的，但是随着《包尚的事业》（1876年），《利己主义者》（1879年）和《十字路口的黛安娜》（1885年）的发表，他也成为英国小说界中一位知名的作家了。确切地说，他的长处不在善于讲故事，社会现实主义或朴实的“人物塑造”等传统的优点，他在这些方面并不擅长，而在于他把小说从哲学的角度，以分析的方法加以运用而产生的价值。在一篇题为《论喜剧》（1877年）的著名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喜剧的精神”可以纠正人世间的各种错误。这一概念是从戏剧引申而来的，而且和戏剧本身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在梅瑞狄斯的人生哲学中却具有新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以常识为基础的一种理论，但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它采取一种玄妙深奥地宣扬哲理的形式，这也正是梅瑞狄斯特有的风格。过多地宣扬精神节制，以那样复杂的语言来分析普通事物，在这方面没有能超过梅瑞狄斯的诗文的了。他的理想是超出自我而能看到生活的本来面貌，然而他的著作却充满了理性上的自负和烦琐的自我反省，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是梅瑞狄斯的作品的内容，它不能通过更加透彻地阐明他的思想来加以解释，而是需要了解这种思维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思维好比是一种智力竞技：一项人为的活动中表现出的真正的技能，为了精神的健美而拼命练习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动作。因此，举例来说，梅瑞狄斯可以声称，即使一个人并不信神，祈祷对他的心理也是有益的。梅瑞狄斯的风格鲜明地表现出活力；它时而富于哲理，时而充满警句，时而又抒情写意；它把喜剧、传奇、悲剧、讽刺作品结合在一起；不过，它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他采取的任何一种形式就完全是这种形式，或者是完全必要的，是作品的主题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梅瑞狄斯在这里已经接触到20世纪艺术方面的一个

主要问题，即真实性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称他为现代作家。但是他以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比较乐观的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完整的传统的语言和思想现在全部可以用来为最纯粹的智力游戏服务，这样他实际上就成了庄重文体的有名的倡导者。因此，他的进步的理论变得高雅、尊贵，甚至适合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仕女，他对上层社会的讽刺像阔人喝酒聊天一样不会造成危害。他抨击人们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和未能实现的虚荣心支配人们的生活，然而只不过使得人们更加相信，自己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的。梅瑞狄斯支持妇女的解放事业，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他晚期的全部作品，如《一个征服我们的人》（1891年），《奥芒勋爵和他的阿民塔》（1894年），《一桩惊人的婚事》（1895年）。他的主张，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心理方面；即他认为迫使妇女具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标准，这是男人为了夸耀他们自己的浪漫情趣而设计的温情主义的发明。这个问题是当时的一个中心问题，似乎可能损害社会上以及文学作品中许多传统的道德准则。然而，梅瑞狄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却只是有些人人为地把浪漫故事与心理描写混合在一起。他维护才子佳人原有的一切好处，同时却造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假象，好像他在把“性”的关系从一切虚伪的偏见和习俗之中解放出来。

这一时期的其他小说家没有一个堪称英国的“大文豪”。许多小说家，如马克·拉瑟福德（1831—1913年）和汉弗莱·华德夫人（1851—1920年），可能会被人们遗忘；而迅速涌现出来的大批才华较为逊色的作家，现在恐怕也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当时，越来越多的明智人士把他们的问题和经历写成“文学作品”，以便使之具有意义，并得到承认。对于各种精神活动的能力来说，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已无法容纳或满足其要求，而小说似乎特别为这种能力提供了出路。因此，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的心理学中可以看出，虚构的作品是为了补偿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年）身上肯定显示出一个幻想破灭的神学家的影子，在乔治·吉辛（1857—1903年）身上也肯定有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痕迹。斯蒂文生（1850—1894年）的著名的探险故事好像儿童寻找刺激的愿望在幻梦中得到了实现，甚至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年）唯恐昔日海上的英雄业绩失传，因而就像从遥远偏僻的地方带回的宝藏一样，把他所知道的传闻轶事写了下来。从巴特勒关于“乌有乡”的两

部小说（1872和1901年）的鲜明的讽刺，到康拉德的《吉姆勋爵》（1900年）的阴郁的悲剧，无不使读者感到传统的一套生活方式和观点都是虚假的。但是，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呢，读者仍然没有被说服，或者仍然是不清楚的。真实似乎就在于能够逃避残暴的信念和虚伪的保证——这正是巴特勒的《众生之路》（1903年）的主题；这也就是康拉德对险恶的神秘事务所进行的惊险的探索，而不问它的最后“意义”是多么不可捉摸；实际上，真实寓于一种新型的文学创作自由之中。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就是这一时期最独特的一项创见。这一理论最初起源于观赏艺术，它也使文学摆脱了它对于道德、宗教或哲学关于真实的看法所应负的责任。人们没有必要相信，更没有必要宣扬艺术中的这些观点，只要感觉美就行了。至于这种美是否“真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艺术家感受美的能力。这种理论的重要性，必须联系到当时的背景来加以判断，当时神学对宇宙的解释和科学对宇宙的解释正僵持不下。在19世纪所有争论中，以这次争论最为有名。牛津大学是一个中心。它形成了一条普遍坚固的阵线，既反对唯物论者，也反对不可知论者。在这里看到了“精神”的事业能够取得明显进展的唯一基础：即通过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结合，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保证使日益衰落的信仰得以复兴，这正是马修·阿诺德孜孜以求的，也是约翰·罗斯金在绘画和建筑方面热心的再探索所加强的，而且也集中表现在沃尔特·佩特（1839—1894年）的作品中。他的《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年）和富有哲理的传奇《贪吃的马理斯》（1885年）是这一时期极有影响的两本书。他的渊博精深的文风本身就是一篇完美的文章，反映出他“改进一切对内对外直觉途径”的理想，而且努力“达到预卜我们的实际经验——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使之成为‘幸福的预卜’”。这是最后一次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天才加以神化，预示着美学对怀疑的胜利。人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永无休止的变迁，而瞬息间的美却可以在艺术中得到永生；甚至世界上已被唾弃的概念在诗中都是长期有意义的。史文朋说得好（《黎明前的诗歌》〔1871年〕）：

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人！因为人是万物的主宰。

佩特的思想在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听到共鸣。康拉德在《纳西索斯的黑人》（1898年）这部作品的序言中使用的语言就有

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吉辛也说“人的生活只有作为艺术材料才有意义”。吉辛的极端现实主义使他坚持“按原样”描写《德谟斯》（1886年）、《阴间》（1889年）或《新格罗布街》（1891年）所包含的种种丑陋与平凡的东西，这种极端现实主义与更明显的唯美主义者，如乔治·摩尔（1852—1933年）和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年）直接从佩特学来的对美与才华的崇拜，有着意想不到的密切关系。这两种倾向是相关的，因为它们都试图把生活中或多或少暧昧地摒弃了人们公认的真、善、美概念的那些方面，看作纯粹的艺术。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文学引以为自豪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倾倒，而道德败坏据说正是可以保证其美的纯正性的标志。然而，在英国是没有人能和福楼拜、龚古尔兄弟、于伊斯芒斯、莫泊桑相比的。吉辛的作品既不是采取讥讽的超然态度，风格方面也不过分雕琢。他的作品在道德方面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他的风格不是压制而是纵容自己感情上的苦恼。史文朋在《咏别》（载于《诗歌与民谣》1866/1878/1889年）这部作品中欢呼波德莱尔为兄弟，然而，相形之下他却显得肤浅：他所鼓吹的诗歌应不拘一格而且具有反抗精神，这与其说出于真实的体验，不如说有点追求修辞效果的味道。摩尔在《一个年轻人的自白》（1888年）中所分析的青年人的放纵行为和模仿外国的做法，是故意的矫揉造作；他的《艾斯特·华特》（1894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丑闻，然而，此书内容涉及了一些被视为禁区的主题，这一点现在却不如其对传统道德的同情那样显得突出。甚至王尔德的名声不佳的《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年），尽管有显示其才华的变态思想，但仍算是第二流的小说。另一方面，他最令人感动的散文《惨痛的呼声》（1895年入狱后写的），记录了他在美学方面的冒险做法的悲惨结局，表明实际上他已放弃了这种做法。这一年，《黄皮书》（1894—1897年）出版了最后一期，这是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版的期刊，它集中体现了一种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的首要风尚。《卷心菜》（1896年）更加公开地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只维持了8个月。到了1902年，亨利·詹姆斯显然是认为唯美主义已经成为陈迹，却把它比作“来自海外的味道很浓的奇异水果”，它永远不会适合英国人的胃口。

王尔德最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莎乐美》，最初也异乎寻常地用法文写成。这个剧在伦敦被禁演，后来在巴黎出版并上演（1893—1896年）。王尔德的社会喜剧证明是更容易被接受的。《温德美尔夫

人的扇子》（1892年）和《理想的丈夫》（1894年）中关于道德败坏的暗示可以被看作不过是一个假想的传统世界里有趣的俏皮话。王尔德的杰作是《名叫欧纳斯特的重要性》（1895年）。作者的机智主要依靠颠倒是非的推理，而这个剧本则成功地把这种推理恰好变成不会招致批评的富有灵感的胡说；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看到究竟有多少与喜剧格格不入的正常情况在新的环境中产生了喜剧的效果。

这可能是英国公众知道如何就艺术本身的价值来欣赏艺术的唯一领域，因为他们在童年时代已读过爱德华·里尔（1812—1888年）和路易斯·凯洛尔（1832—1898年）的作品，而长大以后，又把吉尔伯特和沙立文的滑稽歌剧作为正统来接受。吉尔伯特（1836—1911年）善于讽刺，然而，除了有名的歌剧从《由陪审员审判》（1875年）到《大公》（1896年）之外，他的那些非喜剧性的剧本，尤其不公道的是《巴布歌谣》（1869—1873年），现在都已被人遗忘了。在上述有名的歌剧中，他通过音乐和哑剧，把讽刺转化为无害的笑料。他幽默地嘲弄英国人的习俗和特性，不久就成了歌颂喜爱这些习俗特性的爱国热情的一种方式。比较年轻的讽刺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把自己的幽默用来达到更加严肃的目的。他的嘲笑军人的喜剧《武器与人》（1894年）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英轮“皮纳福”号》（1878年）之类的作品所没有的。因为萧伯纳自称对社会问题采取激进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却是赞成西德尼·维伯的政治观点的，并曾为他编辑了《费边社会主义论丛》（1889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在这些社会问题之中能找到他在《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年）一书中所说的近代戏剧复兴的基础。虽然他的大部分作品不属于这一时期，但是，他的《愉快的戏剧和不愉快的戏剧》（1898年）和《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1901年）相当充分地表现了近代戏剧复兴的基础和规模。这些作品显然不是以易卜生的戏剧中那种富有想象力的材料构成的。萧伯纳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色，他的机智是在时兴的反论流派中训练出来的，而在这一方面王尔德和马克斯·比尔博姆是最擅长的。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音乐评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希望艺术“能够发展并提高我们的感觉和官能，直到视、听、触、嗅、味对我们来说都变成高度自觉的、带有判断力的行为，强烈地抵制丑陋的形象、嘈杂的声音、刺耳的语言、龌龊的衣着和污浊的空气”。这听起来又像是佩特的话了，它被当作一个社会改良计划而提出来了。评论萧伯纳的人们必然会对他把

艺术用来实现伦理目的提出疑问，他们一致的反对意见就是：“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他写的人物和情节是不自然的。”事实上，当萧伯纳从激进的思想中找到真正的可能性来创造戏剧性的对话和喜剧场面的时候，他的天才才充分地显示出来；更确切地说，正是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不自然了，而他的戏剧，因为具有为了艺术、为了取得文学效果和显示聪明才智等伦理目的，所以才是最成问题的。

与这一时期艺术上偏重理智的倾向相对比，必须提出明显地崇拜帝国和丈夫气概的一些例子。这种例子在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年）的作品中，或者在人们几乎忘却的威廉·亨雷（1849—1903年）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吉卜林的《兵营谣曲》（1892年）和《七大洋》（1896年），人们不予重视，认为不过是“歌谣”。但是，他努力挽救抒情的主题和语言，使之脱离对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颇有吸引力的、充满虚饰浮夸的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在这过程中，他即使没有写出多少重要的诗篇，却触及了诗的一个重要问题。吉卜林的解决办法是使用方言和俗语，坚持使用实有其地和实有其事的传奇故事，他还特别提倡要意识到社会性和人们的共同经历，这种认识自从18世纪以来已逐渐从诗中消失。从他的短篇小说《山中轶事》（1888年），《三个士兵》（1888年）等可以看出，他不长于细致地描写性格，而善于叙述故事，他在印度曾亲身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英国人在印度要经受现实生活基本的一课，而在其文明日渐衰落的祖国，他们就可以避免这一课。吉卜林既是自由派的天然敌人，也是唯美主义者的天然敌人。不幸的是，他不如他们有头脑，而且毫无批判地把自己和帝国的成就的一些无法辩护的方面联系在一起。他既没有萧伯纳的才气，也没有威尔斯（1866—1946年）的独创性。然而他意识到事物持久的规律，要认识这一规律，只有好奇心和勇敢才是唯一的关键。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作品虽然大都并不深刻，而且有时味同嚼蜡，但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接近于诗的传统源泉。

恢复具有充分表达力的语言的源泉，也就是说，重新掌握那些能表达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本身也具有重大意义的词汇，这就是诗的传统在将来的中心任务。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1844—1889年）和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年）肯定都是受了它的影响的。无论他们的成就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端，还是一场最后的实验，他们

仍被看作英国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霍普金斯的简短的作品，大约1400行诗句，直到1918年才发表，而叶芝早期的集子，如《十字路口》（1889年），《玫瑰花》（1893年），《风吹芦苇》（1899年），使人不大能看出他后来在成名作《塔》（1928年）中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里稍稍探讨一下他们的风格还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风格与19世纪下半叶欧洲普遍开始出现的诗歌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在霍普金斯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他没有受外国的影响。这一运动虽然不如前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那样明确，却同样广泛。称它为“象征主义”只是指它的主要特点，而不是指它的公认的名称。它的各种形式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放松了对使用比喻的限制。根据传统，诗中的形象必须完全服从于含义，象征主义的出现是由于不相信和不完全遵守这种传统的规则。在近代诗中，一个象征究竟“意味”着什么，往往不予说明，也许永远是很不清楚的。在极端的例子中，它甚至仿佛是无要紧要的。因为摆脱了通常的思想环境，所以，思想中的形象和言语的声音就在新的艺术环境中显得很突出。因此，霍普金斯曾试图使用各种奇异的句法，而叶芝则使用许多深奥的思想，而且往往不予解释。

因为象征主义作家的目的是提高诗的表现手法的地位，他就不采用漫谈或叙事的风格，这种风格，正如叶芝所说，产生了他早期的诗篇中的“装饰性的风景和静物”。这个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霍普金斯的不成熟的风格残存的情况。事实上，象征主义作家都不满足于就某一事物进行写作。如果只是以激昂慷慨的语言就某个题目来表达思想感情，他担心这只会导致辞藻的堆砌，而这种因袭的做法，现在就像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一样不为人们所接受。对叶芝来说，诗的语言必须起到类似宗教的作用，但其含义却与传道相反。伟大的诗篇就像一座“教堂，其中只有祭坛，而没有布道坛”，因为它歌颂奥理玄义，与之相比，道德上的评论是肤浅的。这就是为什么叶芝对于凯尔特族的神话，神秘的象征，“空想”的作品以及历史上的启示性运动都感兴趣。这些主题大都还需要以散文来阐明；诗篇力图以某种形式来表现或唤起这些主题，仿佛诗的语言本身在宗教仪式中起一定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叶芝如此崇拜曾“宣布艺术是一种宗教”的布莱克，为什么在他回顾斯宾塞时代（当时“大地还是神圣的，可以起庇护作用”）时，他如此痛切地感到诗已经失去了这种神圣庇护的意义。霍

普金斯确实成为一个耶稣会牧师，这个决定起初使他不得不放弃写作，因为他认为写作完全不符合虔诚和神圣礼拜的要求。当最后他以写作《德意志的毁灭》（1876年）作为一个新的开端时，他创作了他的最优秀、最独特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以极大的力量给那种由于被用于世俗目的和亵渎神灵的传统而变得陈腐的语言注入他强烈的信念，从而使写作成为一种赞美行为。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名词产生于法国。让·莫雷阿斯（1856—1910年）于1885年首先提出。虽然当时只有一些不大有名的诗人公开宣称属于这一流派，但从那时以来，人们认为它包括阿尔图尔·兰波（1854—1891年）、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年）和保罗·魏尔伦（1844—1896年）的作品。兰波的创作活动只有3年多的时间。1870年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他就写出了最初的诗篇，显示出空前未有的早慧，表明自己能够掌握19世纪法国诗坛的一切成就，并与之媲美，在气势上甚至可以与波德莱尔争雄，在技巧上又可与戈蒂埃匹敌。他的《灵感》一书是1886年他已放弃写作后才由魏尔伦为他出版的。这本书探讨了象征主义仍然可能取得的成就会有什么限度。他的诗集确实可以被看作一部关于近代诗人思想的象征派的历史。这种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那部奇特而阴郁的题名为《地狱中的一季》（1873年）的作品中。它记录了近代诗人思想的最后绝望的情绪。诗的形象是从灵魂的哪一部分产生的呢？难道语言具有产生任何体验的神奇力量吗？难道语言是产生幻觉的开端吗？这就是兰波进行探索的问题，但他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索，而是通过与所能想象到的思想感情方面的一切可能性所进行的实验，甚至有步骤地打乱自己正常的感官以求“达到未知的境界”。他认为通过“语言的炼金术”，可以从精神错乱中产生诗篇，在这种思想的诱惑下，他有时似乎使自己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有时则又充分意识到物质的事物。他把当时在对事物感知的两个极端做法，即把完全是思想产物的诗歌与诗歌厌恶和否定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他看到奇异的美的幻象，却觉得自己是在地狱之中，而且知道“撒旦……希望作家不要有描写或教诲的才能”。这位象征派大师的数量不多的作品被笼罩在一种遭受可怕谴责的阴影；他想用诗歌的光辉来改造宇宙，使之超脱善与恶，而几乎一下子就使宇宙失去了任何确定的意义。

相形之下，马拉美就黯然失色了。他的诗作不多，但也同样晦涩，然而他的诗歌不是靠诗兴勃发的灵感写成的。许多迹象细致地表明，他在思想上经过精雕细镂近40年之久。他在散文中，如《文选》（1891年）、《音乐与文学》（1894年）、《乱弹集》（1897年），以及偶尔在某些诗句中，都表达了他把音乐当作运用文字的最后秘诀的这一理想，同时把他古怪地称作唯一的另一提法为幻想。这另一提法是“主张语言应包含物质的现实事物”。这就重复了一场古代的哲学辩论，在这种辩论中，一位象征主义的诗人现在对现实主义重新展开攻击，他采取的立场是坚持一种标榜高超微妙的心理描写的艺术观。在诗里，一句话之所以真实，在于它有所启示，它有能力造成梦境般的情景，它的节奏给人以感情上的满足，它可以人为地刺激人们的想象力。据说，其结果就是某种纯粹的精神享受，像音乐那样远离现实。然而，仅仅单纯地脱离一般的体验，并不就是衡量艺术伟大的标准，而感情也不因为是来自精神，而非“现实”，就一定纯洁，这一点马拉美可能已在兰波的例子中看到，甚至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听到，他的《致意》就是为瓦格纳而写的。他的诗歌实际的成就是把抽象观念与声色欲望融为一体，在这种状况中，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形象对神经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模糊不清的思想片断与混乱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牧神的午后》（1876年）和《海洛狄亚德》（1899年）多少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色情的幻想。后一作品以自我陶醉的处女生活为主题，使马拉美一生都受它的困扰。这两篇著作都同样妄想把真正的感情提炼为“纯粹的”美的感受。《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1897年）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歌，这篇作品只是把一些词组毫无规律地排列在纸上，留出空白，以表现马拉美唯一“真实的”体验：对字的理解的体验。对他来说，完美的词语，或者说神奇的字，是在尚未形成完整句子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可能永远不会产生通过理性可以理解的主题。传统的概念是只有某种前后一致的整体才谈得上美，才有意义，这样的概念在马拉美看来几乎已不存在，因为萦绕在他思想中的是各个部分。马拉美坚持使用的只有单一的形象，即几个音节的巧妙组合。这就是他的“绝对之物”，因为他只对此感到有把握。然而，他也知道这样的思想完全是“掷骰子”式的，全凭“运气”：庸俗的世界不过是偶然事件组成的，超出了他思想的狭隘的范畴。

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要简单得多，不会使读者在理解上感到多少困难。虽然他的《诗的艺术》（1884年）批评了传统的修辞手段，而且把字仿佛当作颜色或者音乐效果来看待，实际上，他还是用字来描写容易辨认的体验，主要是在节奏上有创造性，不受正统的束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创造一种基调，这种基调是他的诗的主要特点，和他同时代的一位不甚出名的诗人特里斯坦·柯比埃曾把他的这种基调称为“大杂烩”。魏尔伦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象，但结果调子都是极其相同的。根据《可怜的勒里昂》——他为自己的散文集《被诅咒的诗人》（1884—1888年）所写的评论——一文来判断，这种调子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而提出的一个理想。“人既是神秘而耽于享乐的，却又仍然是一个有头脑的动物”，他希望对于人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会有共同的反应，因为它们各自不过是“同一个思想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对善与恶兼收并蓄这种聪明的做法，就成了一种把二者均视为诗的感觉的技巧；甚至对罪的感觉似乎也是一种优美的艺术享受。魏尔伦的技巧在于他能使他的精神的片断产生感情的魅力，甚至切实的魅力；在于他能在自己比较现实的活动中觉察到某种微妙的或情感上的颤动。从他的早期作品如《美好的歌》（1870年）到后来的《平行集》（1888年），主题无疑是越来越严肃，但是技巧却依然未变。灵与肉之间的相互交替使艺术效果有所不同，而未赋予道德的意义，直到最后，这种只在基调与言辞的美妙上面下功夫的手法，便显得十分单调了。魏尔伦的气质过于消沉，因而创作不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他既有放肆的堕落行为，又有虔诚的献身精神。因此，他所描写的伤感中掺杂着纵情享乐的情绪，而他所描写的堕落却由于悔恨而显得低沉。

唯美主义对于人生的发掘和象征主义对于形象的探索，都表明一种态度，即对于人们在世界上曾经一度共有的准则与体验，表示极端厌恶或怀疑。这种态度可能采取成为佩特的特色的那种表现形式，即酷爱各种思想与信条，也可能采取像保罗·瓦勒里（1871—1945年）在《与台斯特先生夜叙》（1896年）一书中所特有的那种表现形式。瓦勒里认为语言过于真实，不能表达纯粹的思想。因此他几乎不得不保持沉默。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唯美主义者是埃桑泰斯公爵和奥斯堡的阿克塞尔伯爵。这两个小说中虚构的贵族人物，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前者是J.K. 于伊斯芒斯（1848—1907年）的小说《倒逆》（1884年）中的主人公。他生活在孤独的“天堂”里。这是一个局限在室内

的天地，里面摆满各种能够刺激他的好奇感官的东西，以及丰富的颓废派著作。他隐居在这里，与社会完全隔绝，深信即使“自然界也不再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题目了，而且觉得现在没有必要亲自去同世界进行任何接触，因为通过读书与想象去接触世界会更有意思了。

《阿克塞尔》（1890年）是维里埃尔·德·伊斯勒·亚当（1838—1889年）写的一篇散文体裁的戏剧诗。它表达的是一种更崇高的，却也更值得怀疑的关于精神升华的主题，采用了丰富的音调和激起情欲的场面。这大概原来是为了产生瓦格纳式的宏伟效果，但是读起来却像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阿克塞尔伯爵在黑森林的深处，一所古堡里研究炼金术士的神秘哲理。他不想获得可能到手的巨大财富，他弄死了自称为“现实生活”的体现者，因为她来扰乱了他内心的宁静。一位美丽的姑娘以她能获得广大的世界向他提供的一切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来进行引诱。但是他又拒绝了。他们在想象中“享受了未来的一切”。对比之下，现实是全无意义的：“生活？让仆人们替我们去生活吧。”他们就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在光耀夺目的财宝面前，怀着爱情破灭的巨大苦痛，双双自杀。

维里埃尔出自天主教徒的良心，对于这一结局是否合乎道德规范感到不安，然而这一结局对于他那富有想象力的生性却有深深的吸引力。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情节上具体违反道德准则问题，也不只是阿克塞尔的异教徒的说教。于伊斯芒斯后期的小说如《那边》（1891年），《大教堂》（1898年），《奥布拉特》（1903年）内容越来越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然而在思想上也留下了类似的提问。因为，使19世纪末许多作家的颓废的想象力感兴趣的那种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做法，必然要被心理学家所利用，他们从中看到了某些反常的内在需要的表露，而不是外部的或“真实的”实情的表现。要想了解这一差异的性质，就要了解这一时期在思想方面的重大分歧。因为，很明显，社会或个人所遵循的许多准则和概念，如果一旦感到需要加以明确解释的话，可以被解释为各种下意识的动机间接地得到了满足，即心理学家所谓的“升华”。这种解释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比如说，那些一心揭露虚伪的讽刺作家便是如此；它只是慢慢地才具有对文明生活和文明思想的几乎所有的“假冒现象”能给予明显的毁灭性打击的力量。这样一种心理，目的在于使每一种精神现象变为某种更为实际的目标，它显然是仿效关于真理的一种科学观念。但它本身却最多

是一种伪科学，是无法确立证据的；称它为一种受科学影响的思想状态，可能更为确切。

在这一时期，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认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但是就宗教信仰、道德标准或艺术形式来说，事实究竟是什么呢？在19世纪早些时候，人们认为，所谓事实是属于环境方面的东西，是从外部起作用的，这是从物理学引申而来的一种事物的图式。随后又受到生物学后来发展的影响：环境不过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而意识活动的真正基础是某种生命力，表现为感情的力量，是从内部产生作用的。这种理论极力宣扬以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可以算作证据，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证据如何解释。有一种倾向在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它在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1881年）中发展到了极端：它以近于疯狂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揭露一切思想或感情方面的活动，认为这种活动是虚假的，滑稽可笑的。还有一种类似的倾向，在各个国家和各种体裁中表现为自然主义运动，其中包括一些前所未有的对于人类的最丑陋、最绝望的看法。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能做出的解释。因为它们出发点是模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大概可以归结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即不论一个人可能抱有什么理想，无论它是关于宗教、道德、实际生活还是艺术的，都可能“只在心理上是真实的”；这种想法也可以从相反的意思、最高傲的意思——象征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的意思——来解释。对他们来说，诗歌只需要在心理上是真实的。人的头脑可以随意创造它本身感到满意的东西，随着制造它感到愉快的东西，它愿意有的知识。人的想象力如果激发适当的感情，甚至可以产生宗教的狂欢。瓦格纳就是这种内心世界杰出的建筑师，将近19世纪末，他的音乐获得人们几乎狂热的崇拜，以歌颂它具有征服灵魂的力量。然而，尽管他天资过人，但如同对《阿克塞尔》持有怀疑那样，现在对《巴赫西法尔》（1882年）的神秘的赞美也持有同样的怀疑。这并不是怀疑许久以来人们努力超越物质世界的那种本领，而只是怀疑表现这种努力的方式。这种怀疑也许只在下列范围内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瓦格纳、维里埃尔、于伊斯芒斯以及许多其他“精神艺术家”本人都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宗教信徒，而且有时他们的口味和天才使他们以追求精神的纯洁为借口而得到微妙的艺术享受。

自然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始于法国，以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年）及其弟于勒（1830—1870年）合写的小说作为开端。关于自然主义的起源和理论，他们在当时的《日记》中有所论述，他们的日记后来增加了许多内容，于1887年到1896年间由爱德蒙发表。艺术方面的一个新出发点的产生，并非第一次由于人们的这种感想，即过去的传统做法是不合乎自然的，文学作品没有充分反映生活；然而自然主义并不要求回到自然与情感，而是要求对人的行为做更科学的记录。这一新的流派中最伟大的小说家是埃米尔·左拉（1840—1902年）。他在《实验小说》（1880年）中便宣扬这种理想，他采用的方法也是每写一部小说，事先要认真地做大量的笔记，记录事实。他称巴尔扎克为先驱。1866年在一次关于巴尔扎克的早期演讲中，他把巴尔扎克比作一个外科医生，或一位化学家，能够不带偏见地解剖或确定人的机体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左拉特别喜爱的一个比喻，它概括了自然主义运动的特点。龚古尔兄弟如果知道这个提法也会同意的，因为他们也曾有过小说的“临床”分析这种相类似的提法。福楼拜可能也会同意。

自然主义作家遇到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一部小说很难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实验或记录；书中的一切都是虚构的，至少是经过选择的，然后加以安排，在语言表达了赋予一定的风格，这都要根据场面与情节、悬念与结局、伤感与悲剧等非科学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爱德蒙·德·龚古尔声称他们的作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试图把小说的整个情节加以破坏”；这也是为什么福楼拜由于同样意识到科学的目的与艺术的实践之间的矛盾，曾试图在风格上用非同寻常的手法来解决这种矛盾。左拉似乎很少考虑这一困难，在他的写作风格中看不出什么科学的客观态度。他肆无忌惮地巧妙运用文学效果，不惜用一切手段使读者的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共鸣。结果，人们认为他的作品耸人听闻、淫秽、粗俗。虽然如此，除了有些段落枯燥无味外，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这是无法否认的。这种力量是他特有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文学感觉的文学理智能够加以区别的话，他的这种感染力作用于前者，而不是作用于后者，使这种文学感觉始终不加鉴别地充满愉快，因而很少变化，即使遇到可怕的或悲伤的主题也是如此。因此，它的主要危险在于显得过分。但是在它并不显得过分的情况下，读者的想象力倒会殷切地期待更多的刺激，它不是通过复杂的惊险行动表现出来，而是来源于与具体形象的不断接

触；这种具体形象，如果不是因为全部经历都由文学创造出来的话，则很有可能被当作生活的真正素材。左拉真正的艺术渊源也许同龚古尔兄弟这类专爱挑剔而有头脑的描绘社会状况的作家没有太多近似之处，但和理查德·瓦格纳相似的地方却较多。这位音乐家以同样宏伟的规模来创作他的歌剧，也利用了类似的纯粹感情力量的效果，声称这是为了高尚的真理。

在1871年至1893年之间，左拉发表了20部小说。根据计划，作为一套丛书，总题名是《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社会史和自然史”。他希望确立的一条真理就是遗传对于“人的性格的全部本能表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正是“人的性格的全部本能表现产生出通常所谓的善与恶”。然而，卢贡-马卡尔一家的天生的倾向，无非是具体表现为“过分强烈的自然欲望”，而左拉认为这种欲望在一心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里，是有典型意义的。这个家族的成员分布很广，这就使作者有机会来描写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写得最成功的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小酒店》，1877年），矿区小镇上受人践踏的穷人（《萌芽》，1885年），普法战争中注定要失败的军队（《崩溃》，1892年）以及最后的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他曾表白自己说，他“作为艺术家需要这一场灾难”。在他后来的小说中，如《三城市》（1894—1898年）和《西福音书》（1899—1903年），左拉预言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勇敢的人，他谴责宗教迷信，宣扬繁殖、劳动、真理、正义这四部福音。在他的晚年，由于写了为德雷福斯进行申辩的著名文章《我控诉》，他甚至得到了殉道者的荣誉，并短期离开法国。然而，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显示出他的作品的最弱一面，如果以19世纪的小说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衡量，他的弱点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他对人物的理解上。左拉在其为《泰雷兹·拉坎》1868年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含蓄地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说：“我的意图不是研究人物，而是研究性格。”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他自己的富于想象力的性格在他所写的人物的经历中起了支配的作用，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的实践，不如说是一个诗人的实践。其结果，在他的想象力表现得感情最充沛的地方，他似乎把宿命论对于罪恶与堕落的整个广阔的安排推进一步，使之超出了心理分析或从社会角度来做解释的范围，或者使这样的分析或解释变为不必要。他使得对于单纯的感情和具体事物的描写，听起来像是神话中对于神秘的自然力所做的

赞美，并使之处于异常强烈的气氛之中，而这与实际的演员、动作和场景的低劣相比，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极不相称的。

1880年，自然主义通过联合出版《梅塘之夜》一书，将自己确立为一个文学流派。这部书的序言以强烈的语言表明了原则，它收集了6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他们是：左拉、于伊斯芒斯（他只是在后来才发现他的真正创作途径是写唯美主义小说和宗教小说），3位次要的小说家：保罗·亚历克西（1851—1901年）、亨利·塞阿尔（1851—1924年）和莱昂·埃尼克（1851—1935年），最后是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年）。福楼拜曾是莫泊桑的老师，在他的评价中，他的学生的作品《羊脂球》完全“打败”了其他作家。福楼拜的教诲长期以来对莫泊桑的风格具有明显的影响，他以讽刺的手法陈述事实，文笔简洁精确。他虽然没有左拉那种宏伟的气魄，但显示的天才却优秀得多，尤其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共写了三百余篇，其中许多堪称杰作。写得最出色的有：《戴家楼》（1881年与《一家人》同时发表）、《菲菲小姐》（1883年）、《密斯哈列蒂》（与《洗礼》同时发表）、《伊韦特》、《巴朗先生》（1884年）。莫泊桑的自然主义使他很快成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以高超的技巧写平凡的主题，淋漓尽致地揭露假斯文，用优雅的文笔描述粗鄙的或淫欲的行为，在这过程中，他使粗俗与高雅浑然一体，这种做法适合当时人们的口味，因为他们对于更为严肃的现实主义已经感到厌倦。他一贯悲观，而他的悲观往往流于充满诙谐的略为尖刻的讥讽。虽然他的观察与创作涉及的范围极广，他现在给人一种印象：他大大缩小了生活的潜力。在他的内容最丰富的小说《皮埃尔和若望》（1888年）的序言中，他说“每一个人都对世界有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可能是诗意的，或是温情的，或是欢乐的，或者是忧伤的，或者是污秽的，或是阴郁的，根据每个人的性格而定。作家的唯一任务就是忠实地反映这种幻想……”这样的作家有一个危险：这种心理方面的洞察力，实际上可能使一切体验简化为一种类型，即幻想与幻灭，表现的事例变化无穷，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由于莫泊桑的艺术技巧高超，能够把他的全部主旨集中体现在一个场面、一个地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上面，那么效果就可能是冗长乏味的。他擅长描写瞬息即逝的魅力，流露真情的时刻，残忍的意外事件，但他的才智有时似乎不足以用长篇小说的篇幅来说明推动一项事业的力量（《漂亮的朋友》，1885年）或说明整个一生的轮廓（《一生》，1883年）。莫泊

桑的幻想世界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当然是感觉，这些感觉通过不同的方式或者得到满足，或者受到挫折，莫名其妙地引导生活向前发展，使之有时鲜明，有时阴郁。对自然主义来说，感觉就代表着不可解释的现象，代表着左拉在悲惨的同名小说中所说的“生活的乐趣”，代表着体现在精神空虚之中的现实生活。人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时甚至在莫泊桑幽默、超然的思想里也会引起怜悯的感情，虽然其中掺杂着憎恶与惊恐的情绪。

阿尔丰斯·都德（1840—1897年）的作品中表达的感情，由于是建立在对人和动物的真挚的爱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也就更为纯洁。虽然他与自然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有密切的关系，采用他们的办法，把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而且产生了像《艺术家的妻子》（1874年）这样不厌其烦地记录事实的作品。和《月曜故事集》（1873年）的某些故事中关于战争和贫民窟的阴暗的细节，但都德值得人们纪念的是他关于南方的故事（《磨坊文化》，1869年），所表现的幻想与魅力，尤其是《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年），这是法国文学中伟大的喜剧作品之一。如果说都德的许多小说已经不像过去一度那样地受欢迎（《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年；《富豪》，1877年；《努马·卢梅斯当》，1881年），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他后期的技巧和风格中产生了某种不稳定性所引起的。因为，他只部分地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而部分地仍然是放纵感情的作家，他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自己的童年（《小东西》，1868年）。虽然都德在《福音传教士》（1883年）中描写了宗教狂热，并把这本书奉献给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夏尔科，而且由于在《萨芙》（1884年）中分析了一种堕落的感情而受到左拉的称赞，但是他的“自然主义的”心理和他的同情心所具有的力量相比，是软弱的。这种心理很容易变质，成为温情主义，而这是贯穿他的全部作品的忧伤情调中固有的缺点。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引起了人们对人们和一些地方的深厚感情，使他同情穷苦人的不幸遭遇，这就使得许多读者感到他很像狄更斯。

一部简明历史是有局限性的，这对于法国文学来说就显得特别不公平道，因为许多有名的人物只能一笔带过。这一时期的文学流派尖锐对立，这种状况至少有助于把一些次要的诗人明显地归于象征主义的传统之中。这样的诗人如阿尔贝·萨曼、居斯塔夫·卡恩、勒内·吉尔，以及在美国出生的斯图尔特·梅里尔和弗朗西斯·维厄莱-格里

芬。这种状况也进一步便于区别两种戏剧：一种是安德烈·安托万在他的自由剧院上演的自然主义戏剧，在这里，根据左拉的作品改编的戏剧和亨利·贝克创作的戏剧，因为同易卜生的戏剧对比，相形见绌，终被压倒。另一种是吕尼埃-波埃的作品剧院上演的戏剧，这个剧院首先实验演出了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年）的象征主义的作品。这位比利时剧作家兼哲学家早期的作品虽然往往显得过分随便地使用难以想象的奇异象征，但是这些作品对于别的作家是富有启发性的，皮兰德娄和叶芝都曾受过他的影响。这些作品对戏剧演出者以及后来对电影制片人也都很有启发，尤其是对德彪西，大概正是他的音乐使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1892年）免于泯灭^[1]。然而，后来梅特林克发表了他的科学的与玄学的著作（从1901年起，以《蜜蜂的生活》作为一个开端，一系列有名的关于昆虫生活的著作），使他更为出名。虽然《卑微者的财宝》（1896年）等作品以其优美的风格而受到推崇，虽然他作为诗人，对人生的基本神秘性的感受，主要是具有文学价值而不是哲学价值，但他以毕生的精力探索人生意义的过程却属于思想史的范畴。

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思想起伏不定，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和可靠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一种真实态度，因而不得不在风格、哲理或实验方面不断改变，这就无法把他们归为某一流派。在这一时期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的4位诗人：苏利·普律多姆（1881年）、弗朗索瓦·科佩（1884年）、勒孔特·德·李尔（1886年）、J.-M. 德·埃雷迪亚（1894年），只有他们与旧的传统手法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肯定了一种“高蹈派诗人”的风格与感情，但是，更有趣的发展情况却没有那么高的学术水平。象征主义作家让·莫雷阿斯脱离了象征主义运动，创立了“罗曼派”，这标志着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反应，由过于偏重理智与内省的诗，变为倾向于反映地中海一带富于创造性的纯朴理想的诗。在这一方面，他遇上了有名的沙尔·莫拉斯做他的伙伴。莫拉斯曾是米斯特拉尔的弟子。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830—1914年）是普罗旺斯^[2]复兴时期的唯一被人们记得的诗人。普罗旺斯复兴代表着近百年来人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想从古代地方传统（这里指的就是11至13世纪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的传统）之中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无疑地一种反映生活的创作方式，比在当时都市文明生活中可能找到的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完美。从这一没有成

功希望的背景中，只有比利时的埃米尔·韦拉朗（1855—1916年）偶然写出了一些伟大的诗篇。他使用了象征主义的技巧，这种技巧是在以《黑色的火焰》（1890年）作为顶点的更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中得到发展的。韦拉朗便凭借这种技巧来表达近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他心中激起的社会主义的义愤、兄弟般的同情和不切实际的批评。对于亨利·德·雷尼埃（1864—1936年）来说，他认为人们失去的光荣最多只能在充满伤感的回忆和梦一般的幻想之中重新攫住。另一方面，更为年轻的诗人保罗·克洛岱尔和沙尔·贝玑则认为，要想重新得到这种光荣，只有回到天主教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诗的微妙的感受只有从这里才可以重新获得某种真实的目的和意义。克洛岱尔最初的灵感是与发现兰波的《灵感》一事有密切联系的。他声称他从这显然既有破坏力而又遭受过破坏的想象力所发出的地狱般的可怕光亮中看到了建立神圣秩序的可能性（或许说是一种紧迫的必要性）。当然，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就会使诗非常容易倾向于对混乱状态只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赞扬，朱尔·拉福格（1860—1887年）的作品就具有这一特点。

接近19世纪末的散文作家，无论他们是写小说，写评论，还是写哲学著作，都有比较突出的一个倾向，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天主教的和保守的思想；而这种倾向的产生与自然主义精神上埃尔的空虚所引起的普遍反映在时间上相合，伯吕纳吉埃尔的评论（《自然主义小说》，1883年）首先做出了这种反应。保罗·布尔热（1852—1935年）对青年受到有害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责任感，促使他写了《门徒》（1889年），并在《论当代心理学》（1883—1885年）中，试图对当时的各种思潮进行分析。他以《阶级》（1903年）一书作为开端，写了一系列宗教小说，揭露了一个实利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缺陷。莫里斯·巴莱士（1862—1923年）虽然生性见异思迁，而且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逐渐克服了只关心个人内心世界而又全无一定之规的缺点，开始寻求在一个尚未腐败的社会中过健康生活的奥秘；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洛林那个偏狭的、保守的社会，而不是他在《背井离乡的人》（1897年）中所谴责的巴黎；后来，这也意味着一个天主教的社会，如同他更晚期的小说所表明的那样。当然，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和其他考虑。举两个例子作为结论，也就够了。一个例子是皮埃尔·洛蒂（1850—1923年），这是一个海军军官的笔名。他以叙述发生在遥远的他乡的伤感故事，描写这些地方的风貌以及记载关于那些更

为朴实的人民和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见闻（《冰岛渔夫》，1886年）而获得极大的成功。另一个例子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他赢得了那部分偏重理智的读者大众。他们希望以文质彬彬和以理服人的方法来对待各种思想，而且准备追随他去实现他的反宗教的社会主义。

上面谈到法国诗人和小说家在探索近代思想和近代世界方面走到了各种互相对立的极端。现在，再来看一看同一时期用德文进行创作的作家（用德语来说，他们可以被称为“散文诗人”，如果不把诗与散文加以严格区分的话）和他们的作品，就会觉得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领域。同时，也显然有时间倒转的感觉。有一些明显的标志，比如康拉德·斐迪南·迈尔（1825—1898年）运用历史题材，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泰奥多尔·史托姆（1817—1888年）在怀念故乡的回忆中显示出关于过去浪漫主义的更细微的痕迹，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年）在他写的那些似乎完全脱离现实环境的故事中，体现了某种完全更古老的传统。除了这些明显的标志以外，这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作家和过去的历史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联系，那就是他们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所谓“诗的现实主义”。它继承并发扬了一种语言的艺术传统，一种古典的风格，可以一直上溯到19世纪初的德国文艺复兴时期。

在工业和科学日益发达的时代，德国文学如此长期地脱离毫无诗意的现实，这究竟是文艺复兴及其浪漫主义音乐与艺术理论的卓越成就，还是由于民族的气质或政治上的分裂乃至落后而出现的一种偶然现象呢？种种解释都不切实际。唯一事实就是，为数众多的德国作家仍然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所以称为理想的，不是因为它在道德方面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因为它实现了某些文学上的传统做法。然而，这时，在其他国家，传统做法的局限性却正在彻底地加以改变。因此，当冯塔纳描写他那个时代的柏林和普鲁士各省的时候，他选定的地点以及他那样的描述（例如到乡间去游览或进行正式的访问）都可以放在歌德或施提弗特的作品之中。迈尔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写了歌颂英雄的田园诗（《胡腾的末日》，1871年），写了关于瑞士爱国者于尔格·耶纳奇那个充满狂热的悲剧性人物的事迹，他最初试图将它写成剧本，而在1876年却写成了小说。他有描写伟大的英雄、罪犯与充满了极其悲怆的心理“契机”的历史事件等故事（从

《圣者》，1879年，到《帕斯卡拉》，1887年，和《安吉拉·保吉亚》，1891年）；此外，他还认为“只有艺术才能使我们摆脱生活琐事”。他崇拜席勒，厌恶“现代题材所涉及的残忍的现实”：这一切都表明他不像一个19世纪晚期的小说家，而像德国古典剧院的一名落选的候选人。

另一位瑞士诗歌现实主义的代表哥特弗里德·凯勒，无疑是德语作家中最优秀、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但是，如果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成分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则下列一些方面又是属于传统的了。这些方面包括：他利用文学从道德方面进行开导，并永远关注自己的“教育小说”《绿衣亨利》（1854—1879年），此书的第二版在风格和形式上做了改变，其目的是要更清楚地显示从经验中得出的真正教训。而最重要的，是他关于人文主义的理想。“人文主义”一词的概念是无法翻译的，这一概念是奠定德国古典主义的基石。它把人道主义与美学的优点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看到美好生活的壮丽前景。凯勒出版过两本故事集：《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年，续集出版于1874年）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8年）。他在这两本故事集中所描写的塞尔德维拉和苏黎世这两个地方，与欧洲小说中任何其他地方相比，是多么不同啊！各个国家的地方省市的生活状况可能没有什么明确的差别，但是，凯勒却使它们变成民谣和传奇的素材，以幽默的手法使家庭琐事有时像史诗一样庄重，有时又带有抒情的色彩，而且做得那样自然，以至人们难以相信，福楼拜和乔治·艾略特是和他同时代的专描写地方情景的作家。这批小说家还以诗作著称，他们的诗写得既多又好，而凯勒则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冯塔纳在小说创作方面是最接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甚至他也写过几个优美的诗篇。泰奥多尔·史托姆之所以受人欢迎，主要是由于他以德国浪漫派的风格所写的诗篇像歌曲一般美妙。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是经历了一段逐步发展的过程，从开始写《茵梦湖》（1852年）这种纯粹抒情的故事，直到写《白马骑士》（1888年），这是他写的最接近于小说的一本著作。人们对这本著作，正如对凯勒的《马丁·萨兰德》（1886年）一样，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两本书，就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来说，超出了“诗”的传统的理想界限（更适合短篇小说或长篇故事这种形式），进入了欧洲小说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这里，它们的危

险在于过分地放松发挥想象力引人入胜的作用，以至显得只是有地方风味而已。

冯塔纳就避免了这个缺点，而把传统加以发扬，使它至少包括一个被广泛地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主题，即关于婚姻与不贞行为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他所有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沙赫·冯·乌特诺夫》（1883年）、《通奸》（1882年）、《裴多菲伯爵》（1884年）、《迷惘·混乱》（1887年）、《施蒂娜》（1890年）、《无可挽回》（1891年），都表明了爱情与社会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对习惯势力赖以存在的道德律的信仰已经开始下降了。剩下的是对不应忍受的苦难竟然违反常情地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光荣。与冯塔纳有关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感情的实际性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的最成功的小说《艾菲·卜利斯特》（1895年）不同于描写同一主题的更为成功的作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此书所以没有享有上述两部作品的那种国际声誉，一部分原因是它在风格上的优点至关重要，译文难以体现。对于冯塔纳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他的创作态度极其谨慎，不做直接的描写，在这方面，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一个爱情故事中，许多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情节或情感，他似乎都注意得太少了。另一方面，有些显然是次要的细节，特别是对话，他却处理得巧妙而又细腻。原因在于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变通手段，使冯塔纳认为某些事情是不应当有意识地用语言来描写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可能过分强烈地感到，他没有充足的理由把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具体而细微地描写出来。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喜爱对话，而把对话记录下来，总是适宜的，同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又从另一极端出发，喜欢在写景时描述一些不言自明的象征性的细节。冯塔纳的小说中有一种善意嘲弄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由于他把他的能够说的事情和用最隐约的暗示来表明他们所经历与感受的一切进行对比而产生的。

和接受不可驾驭的“生活”现实的情况相反，以较少的嘲弄情绪或比较逊色的才华来接受“文学”的高尚传统，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流弊，即促使这一时期为讲德语的读者大众所真正喜爱的那种文学作品问世。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1830—1916年）的作品以自然的高尚情操与天生的教育家的权威，表现了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向往，他

可能继续受到尊敬。但是，费利克斯·达恩和尤利乌斯·沃尔夫在小说中对于条顿族的过去大加颂扬；厄内斯特·冯·维登布鲁赫极力想使近代普鲁士的侵略性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理想调和起来；保罗·海泽以纯洁的风格赞颂爱情；对于这一切，现在没有什么读者会认真地看待了。评价最低然而却最畅销的，是马尔利特的温情主义作品。马尔利特通过年轻的贵族与中产阶级的女儿的拥抱来克服阶级的界限。这就是当时“德国文学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一个自然主义运动，以柏林与慕尼黑为中心，用左拉和易卜生的理论做出了反应。

自然主义虽然在德国对各类文学都发生了影响，却只对戏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给它注入了革命的活力，把大批的观众吸引到俱乐部主办的剧院（如柏林有名的“自由舞台”剧院）中来。这种剧院可以不受审查，但却特别招引观众。自然主义培养了一代富于创造性的舞台监督，他们的艺术利用发挥想象力的新机会，填补了由于缺乏诗作而产生的空白。奥托·布拉姆以及后来的马克斯·赖因哈特就是这一类艺术提倡者的杰出代表，只到这时，他们才真正表现出他们的才能。此外，还产生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表演风格。这种风格取得了突出成就，使得许多优秀的演员不能再去掌握古典戏剧的动作与节奏，却使他们有所准备，以适应不久以后电影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这种表演方法，奥地利剧作家路德维希·安岑格鲁伯（1839—1889年）在自己的剧作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提倡。他的戏剧是用农民的语言写的，并且通过它们的主题，朴素的智慧，粗野的幽默来进一步声称它们代表坦率的现实主义。不仅如此，当自然主义的风格盛极一时，其他一些次要的但具有足够技巧的剧作家，如赫尔曼·苏德曼（1857—1928年）和马克斯·哈尔伯（1865—1944年），与自然主义运动的关系并不密切，却从人们对小巡回法庭法官们的世界早已形成的爱好以及自然主义的表演技巧中获得了好处。

除了格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年）以外，自然主义运动的成员却没有运动本身那样有名。这些成员为：海因里希·哈特（1855—1906年）和他的弟弟尤利乌斯（1857—1930年），他们是《批评的论战》杂志的编辑；M. G. 康拉德（1846—1927年）是《社会》杂志的编辑；阿尔诺·霍尔兹（1863—1929年）和约翰奈斯·施拉夫（1862—1941年），他们合著了《哈姆雷特老爸爸》（1889年）和《赛利凯一家》（1890年）。现在看来，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抱负在许多方面是

自相矛盾的：他们把人描写成环境和遗传的牺牲品，却又相信社会进步的乐观理想；他们揭露人性中的那些更为赤裸裸的细节，显然认为这种可怕的景象一定可以解放思想，提高思想，就好像想到了一个崇高的真理；他们安排在舞台上产生大胆而巧妙的“自然主义”的效果，却又把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东西”而加以维护。冯塔纳称赞年轻的格哈特·霍普特曼的作品取得了他本人无法仿效的成就。他指出：“在外行看来只不过是生活的记录，而在某种程度上，它则代表着难以超越的纯粹的艺术技巧。”这样高的评价对于其他的德国自然主义作家来说无疑是过分了；他们用粗俗的陈词滥调来干扰悲剧性的沉思，这可能最多也不过是一次耸人听闻的实验而已。他们试图让观众逐渐习惯于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猥亵的气息（这一流派最雄辩的代言人之一赫尔曼·康拉第称之为世界的真正气息），以此来引起观众的兴趣，或以“有趣的方式”使他们目瞪口呆，而格哈特·霍普特曼却利用最原始的素材，成功地创造了纯粹的非常感人的悲剧场面。《织工》（1892年）尤其是这样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没有主人公，几乎没有情节，然而，它却打动人的心弦，使人感到怜惜与恐惧，通过细致紧凑的主题使人感到信服。主要人物是一个乡村里的西里西亚织布工人，他们是受人剥削的穷苦人，几乎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却用方言土语道出了人们的悲惨境遇。如果说霍普特曼轰动一时的第一个成功的剧本《日出之前》（1889年）因有表示思想信念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以及关于“新世纪的黎明”的预言而仍嫌美中不足，并且过分喧嚣地宣扬带遗传性的酒精中毒这类风行一时的家丑，那么，《织工》这出戏就没有什么寓意。在这出戏里，社会不是社会改良者们所说的夸大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根深蒂固的格局，它包含着人们的贪婪、痛苦、不合理的希望和莫名其妙的自欺行为。一个年轻叛逆者的反抗宣言，并不比一位老人的基督教徒的顺从态度更受到推崇，就连小镇上的财主，既是坏蛋，也是受害者。霍普特曼就是根据这种惩恶扬善的精神，在一系列自然主义的剧本，包括《车夫汉色尔》（1898年）和《洛色·柏恩特》（1903年）这样的杰作里，使人物具有人格尊严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尊严，而这些人物的如果用传统的悲剧的标准来衡量，都是渺小的。

霍普特曼在《汉娜的升天》（1893年）一剧中把诗与散文融合在一起，这进一步说明他的想象力并不受任何程序的限制。这个短剧的主题与背景都完全是“自然主义的”：情节是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因

为她的养父是一个酒鬼，而她受不了他的折磨，结果被迫自杀，剧本就描写她自杀前在救济院里度过的最后时刻。然而，霍普特曼的感情十分激动，它变成了真正的激情，最后在守护天使出现的充满诗意的幻景下笼罩着全剧。虽然他以极其可疑的手法，即通过幻觉把普通的人物变成了神，使诗境与现实结合起来，然而，他全凭语言的生动来避免明显的温情主义的危险。霍普特曼在诗剧《沉钟》（1896年）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实验，虽然不甚成功。在这出戏中，光明与黑暗，精神自由与恶魔的羁绊通过多少有些混乱的、使人迷惑的象征性代表，彼此进行着由来已久的斗争。作为一个戏剧家，他后期作品的特点是兼有自然主义的主题和传统诗的主题，交相变化。

正如德国的自然主义是受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斯蒂凡·盖欧尔格（1868—1933年）的象征派诗作也是受了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的影响。盖欧尔格主办了一个刊物，题为《为艺术的篇页》（1892—1919年）。这是德国的《黄皮书》，^[3]然而，这一伙新成员的热情取代了那一伙纨绔子弟的排外的情绪。为这个刊物写稿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也认为“一首诗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内容……而取决于它的形式”。然而，他们的唯美主义与法国的唯美主义不同，具有某种战斗的和近乎宗教狂热的味道，而盖欧尔格则是他们的首领。这样，他和他的信徒进一步认为，为了维护和发展诗的“纯粹精神”，就需要一批聪明而有纪律的中坚人物。他们应当在思想上非常坚强，不仅能抵抗时代的腐蚀，抵抗写实主义、思想怠惰与温情，而且实际上能使民族复苏。或许，盖欧尔格想要起先知作用这一倾向，以及他坚持领导作用并要求忠诚等主张难免被人误解为暴露出法西斯主义的欲望。然而，如果他有什么过错，那也只是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企图激起的那种要求实现“民族复苏”的动力，有可能在政治上赤裸裸地被人利用。他的诗作表现出的文化上的愿望，不是要求实现一个以显示民族主义力量而沾沾自喜的近代国家，而是要求实现一个达到古希腊的完美境界的理想国，关于这个理想国，德国诗人的想象力曾通过许多形式梦想过。但是，就盖欧尔格的情况而言，他的差异令人不安，这种差异在于他把古典派作家的传统的平静和谐语调变成了尼采的超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优越口吻。然而，预言的调子并不是盖欧尔格全部作品，或者说最佳作品的特征。虽然他的诗作具有连续性，被他的崇拜者尊为一种精神朝圣——从早期的《颂歌》（1890年）和《朝圣》（1891年）开始，然后经过各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包括古希腊阿卡狄亚人的、中世

纪的、东方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领域：《阿尔加巴尔》，1892年；《牧人之书和颂诗》，1895年），探索灵魂深处变化不定的情绪（《灵魂之年》，1897年），以便最后得到包含在《生活的地毯》（1899年）以及后来许多的作品中的启示——然而，这些诗都是抒情的短篇，而其中最佳的作品可以单独列为独立的杰作，而不必考虑它们假托的前后关联。为了使人们对盖欧尔格有所认识，我们把他同一些相近的英国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可以说，他的某些主张（例如“思想、灵魂与肉体相结合”）和梅瑞狄斯的主张有时相似，也是含糊的，过时的；他对印刷术的爱好则近似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的倾向；但是，他能生动地运用象征，决心避免使用表示保守情绪或表情的陈词滥调，这些却又可以使他与叶芝相提并论。

在德国，要衡量盖欧尔格的成就比较容易，只要看一看他的那些不甚重要的对手的作品就行了，这些对手是：迪特莱夫·冯·里林克隆（1844—1909年）、理查德·戴默尔（1863—1920年）、马克斯·道滕代（1867—1918年）。他们的问题显然是后来者在一个传统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在充满令人厌烦的人云亦云的语言中，力图创新。戴默尔使用的印刷技巧、毫无意义的音节、新颖的形象和勉强的想法，只表明他比里林克隆和道滕代的“印象主义”更自觉地意识到困难的所在，而他们妄想以细腻的笔触和观察这种特意的技巧，从事物之中直接摄取新意。因此，精彩巧妙的词句比比皆是，伟大的诗篇却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盖欧尔格的风格就显得非常突出。人们感到这种风格使他的诗句深受影响，它来源于他的权威思想，取决于他的坚定意志，正是这种思想和意志鼓舞他与颓废倾向奋斗终生，鼓舞他寻求并确立崇高的、神圣的准则。

然而，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年）的诗作体现了更为强烈的对比。他在晚年曾为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作词，但他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诗集，表明他具有第一流抒情诗人的才华。这本诗集后来也没有增添内容，因此，应当算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德国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雷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年〕的作品不同，他在19世纪末也同样突然成名，却并没有写出与之相称的作品。）从盖欧尔格与这位年轻的维也纳贵族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对共同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在理论上，偶尔也有一致的看法，他们的艺术气质却截然相反。霍夫曼斯塔尔的性格相形之下十

分消极，几乎是女性的气质。虽然他也是一位象征派诗人，但对他来说，艺术方面的单纯训练与性格方面的训练恰恰相反；仿佛他的想象力沿着没有止境的岸边随波逐流，对流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感兴趣，然而，却从来没有停留下来。他的灵感从一开始就与一种解体的感觉密切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在那封著名的“信”（《一封信》，1902年）中达到了顶点。他在“信”中，通过钱多斯勋爵这个虚构的人物，说明自己为什么放弃了写诗。他描写了一种思想境界，在这种思想境界中，传统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乃至语言这一传统的表达手段，似乎突然失去了连贯性和意义。对于诗人来说，剩下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虽然含混不清，也不连贯，而且互不相干，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仿佛其中包含着整体所失去的一切意义。这就是对当时许多象征主义作品的神秘根源和意义所做的一个最精辟的说明；这也补充说明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一些诗篇和短剧（《大门和死亡》，1893年；《法隆的矿山》，1899年）中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的主题；采取这种微妙的近代形式的诗作，虽然可能产生一种幻象，似乎想象的景象可以无限地发挥，而且深奥无比，然而，追求这样的诗作却与朴素的现实生活脱节。霍夫曼斯塔尔早期作品的妙处，就在于他对已失去的东西的感情，这种感情激发出无可比拟的抒情格调，其中还包含着忧郁的无可奈何的感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化为悲哀的某种深切的恐惧感。

这一时期众说纷纭、使人无所适从的局面终于被一个言论真有权威的人予以控制。这个人能够把当时的复杂问题写成戏剧，从中再度触及人们动机的永恒源泉，并且揭露了人们困境的无法改变状况。这个人就是挪威诗人、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年）。如果说他是“现代戏剧之父”，他却没有培养出和他同样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剧作被称作革命的宣言书，在整个欧洲不是受到赞扬，就是受到指责。这些宣言书即使没有使他成为进步的文学改革运动或社会改革运动的奠基人，看来也使他成为运动的同盟者。在论述自然主义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也有同样充足的理由把他看作一位象征派作家，或者干脆把他看作一位最新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资产阶级悲剧”作家。因为，即使在《群鬼》（1881年）这个涉及遗传性疾病的剧本里，他也不是单纯利用惊人的恐怖场面，而自然主义者却似乎认为这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对于易卜生来说，灵魂的拯救，善与恶在心理方面而不是在物质方面的斗争，才是最真实的。如

果把《玩偶之家》（1879年）仅仅当作一篇争取妇女解放的檄文来读，那就忽略了在这个剧本的爱情故事之中隐约包含着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困境。如果说易卜生认为有任何必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就必须在个人的内心进行，使个人参与那个古老的斗争，通过斗争而与其命运取得妥协。这可能确实有悲剧的必要性，但绝不是解决的办法。

上面已经清楚表明，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是多么不明确和难以捉摸。这不只是历史情况的概括问题，而是反映了许多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困境。当时，人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知识，他们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以致可能自己也弄不清真正要求什么，或者自己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只有当时人们要为自己的思想确定一个特征的问题，大概可以被看作仍是一个真正“普遍存在”的问题。易卜生在他的剧中主人公的生活中全神贯注地对待这个问题，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流派问题的广泛代表性，这正是最伟大的作家的特色。这个主题最完美地体现在《彼尔·金特》（1867年）一剧中。该剧是国际公认的一部杰作，虽然由于翻译的缘故而使剧中的诗受到了损害。剧中的主人公是一般常见的爱吹牛的喜剧角色，他也像堂吉诃德或福尔斯塔夫一样，确实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的某种特性的典型代表。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否做过任何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事，担任过任何无愧于人的称号的职务？为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也不一定需要以真正优秀的品质作为证据；真正恶劣的品质也行，但必须具有某种道德品质，有一个值得拯救或值得谴责的灵魂，这对于易卜生来说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危险不在于邪恶本身，而在于虚无状态，这种毫无意义的人生，只配重新投入熔炉，化为灰烬，不留痕迹。难道这种状况不是今天人们最深切忧虑的，并与最傲慢的浮夸紧密关联的吗？易卜生坚决认为这是一个保持精神节操的问题，这种节操必须维护，不仅为了反对肉体的堕落，而且为了反对想象力与思想的沦丧。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在灵魂偶尔要有作为的时候予以挫败，使它在艰苦努力的过程中失去其原有的实质。如果灵魂确能获得拯救，那就要通过由爱情引起的悲惨苦难才能实现。

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种需要，或者说这种强烈的愿望，构成了易卜生两个最优秀的剧本的中心思想，这两个剧本是《海达·高布尔》（1890年）和《博克曼》（1896年）。易卜生在其全部作品中都在探索个人为了达到自我体现而进行的同一斗争所包含的各

个不同方面。斗争的焦点在于近代世界力图满足其寻求意义的强烈要求的这些方面，即：它希望从令人安逸的旧传统背后得到它认为必然隐藏着的某种“真正的真理”；因此，它好奇地希望了解神秘的性心理；此外，它还提出要有享受艺术的绝对权利。“革命的”戏剧《社会支柱》（1877年）和《人民公敌》（1882年）之所以使人发生兴趣，不在于它们所精选的社会上虚伪与腐败的事例；它们的基本着眼点是人们在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悲剧性冲突。如果这一冲突只是一场反对虚妄的正面斗争，那么，它就不过像一个情节剧；事实上，它是对人物内心的考验，并且涉及个人的感情和忠实。这一主题最后在《野鸭》（1884年）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在这个剧中，格雷戈·威利不顾一切，坚持要求彻底了解事实的真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父亲的强烈不满所造成的，于是，只会给朋友们生活带来灾难，因为朋友们生活与痴心妄想、暧昧关系和纯真的爱情是不可分割的。

这个主题的另一说法，也一直使易卜生全神贯注，从《布朗德》（1866年）到后来的“象征派”剧作《建筑师》（1892年）和《我们死而复苏的时候》（1899年），都是如此。在这里，作家需要忠实于自己的灵感，需要满足对他经受考验的节操所提出的几乎不人道的要求。在易卜生致力于了解艺术特点的模糊性质的时候，他的洞察力看得最远（但有时也接近于辨认不清的境界）。它渴望达到最高的标准，然而，其动机是值得怀疑的；它的光荣接近于虚荣，接近于用贬低爱情来颂扬思想。当它在诱惑之下为生活服务的时候，它对本身就不再忠实了。易卜生揭示了一个时期之中必然出现的艺术方面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在这一时期中，理想缺乏现实的基础，而真理也不再符合本能的感觉和信仰了。这样，理想主义就必须带有强烈的反常现象，而且只有奇迹般的希望才能维持它免于崩溃。易卜生就具有这样的希望，虽然一般只是隐晦地暗示一下，或者通过象征和比喻，间接地表现出来。暗示总是千篇一律：通过苦难，特别是通过爱情，连同罪恶与牺牲所包含着的无法根除的道德根源（《罗斯莫庄》，1886年；《小艾友夫》，1894年），灵魂就会被“唤醒”了。

这种用比喻来进行暗示所造成的差异究竟有多大，看一看比易卜生年轻的同时代的瑞典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年）的剧作就清楚了。他塑造的人物总是在地狱之中，而且，这个地狱是

“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描写的，似乎完全不考虑使用比喻，无论是用诗的形式，还是别的形式”。在《死神的舞蹈》（1901年）这个剧中，初次看到地狱场面的人就有这种感觉。这个剧也和斯特林堡早期的剧作一样，在地狱的狭小范围内囚禁着一对人间的夫妇，被注定是要互相毁灭的。戏逐渐展开以后，他就会进一步了解这个明显地排除了诗的全部含意的地狱。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转化为”邪恶。事实上，这种转化的奥秘就在于歪曲人们最大的创造天赋：把实际体验的事物“带入”一个具有精神意义的境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成了一股邪恶的力量，因为它现在被用来进行破坏，即以魔鬼对残暴的目的和恶毒的用意所作的某种解释，暗中来破坏灵魂所宣扬的一切。灵魂吃掉灵魂，以许诺来引诱牺牲品，以温情使之丧失警惕，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心理面前，无任何神圣事物可言。在斯特林堡的剧作中，表露于外的行为是次要的，这种行为就像扑杀以前所做的种种假动作一样；一旦生命赖以存在的幻想破灭以后，也就没有多少必要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债主》（1889年）无疑是文学中表现缓慢的精神折磨最成功的一个戏剧。《父亲》（1887年）一剧也使用了类似的技艺，虽然没有那样细致。在这个剧中，在承认失败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面临决定命运的现实，本来是会使人进行抵抗，使人振奋精神和采取行动的；然而，我的思想已经化为乌有，我的头脑已经空空如也，它终将被付之一炬。”

斯特林堡塑造的男女角色都是“被罪恶拴在一起的”（《鬼魂奏鸣曲》，1907年），谁也逃脱不了；然而，他们的结局并不体现那种传统的劝善惩恶的思想。《罪恶种种，各不相同》（1899年）就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明了这一点。剧中描述一个年轻的剧作家，他认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三幕戏如何动笔，那么，第四幕的构思就很简单了”。他在过去种种不端行为的驱使下，现在面临着最后的抉择，是自杀，还是接受宗教的惩罚，但是在最后一幕里，由于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他的心情又变得愉快起来。这种前后不协调的地方，并没有采取令人心安理得的喜剧形式，而是像斯特林堡的戏剧手法中的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对作为传统戏剧的基础的惯用做法表示怀疑。易卜生努力追求的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与情节在道德方面的连贯性瓦解了，它们变成了关于生存的可怕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幻觉是与客观的事实不可分割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从这种状态中醒悟过来，因为思想完全脱离了任何外界的标准，完全脱离了任何表明可靠的真理的背景，

而只有凭借可靠的真理才能判断人的经历，即便是以比喻的形式来做判断。因此，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风格发展成为后来在关于梦的剧作中体现的“象征主义”风格，而这不过是侧重点有所变化而已。他超出了这两个流派的范围，发展到一种地步，使得认为现实与意识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这种看法开始崩溃，虽然这两个流派曾把这种看法发展到极不相同的程度。他的戏剧与其说接近左拉和梅特林克，还不如说更接近下一世纪的表现主义戏剧。

在斯特林堡最著名的剧作之一《朱丽小姐》（1888年）中，一个地主家庭的容易激动而且近乎神经质的女儿委身于男仆。男仆的性格比较粗犷坚强，不为“荣誉可能危及生命之类的迷信”所动摇。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举止文雅和思想高尚可能是可悲的不利因素，这种看法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在俄国，感触尤深，因为俄国的上层社会看来与老百姓通常关心的事务以及其他努力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安东·契诃夫（1860—1904年）在他最后一个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剧作《樱桃园》（1904年）中，也描写了一个狠心的仆人，就是未来的那种迟钝的、白手起家的人物。这个仆人取代了这个地主家庭，因为它已经无法料理自己的事务。他也许会赞成斯特林堡的看法：“为了幸福，需要有坚强、健康的人种。”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剧作中，偶尔也讲一些话，表示向往人类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前景。然而批评家们，谁也不能肯定契诃夫本人对此相信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准备到库页岛去报道那里监狱的情况，为人们的苦难而忧心如焚；但他也是当时的一位艺术家，就像莫泊桑那样，以超然与讽刺的态度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人们甚至无法断定，根据作家的本意，《樱桃园》究竟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人们对其他几个剧：《海鸥》（1896年），《万尼亚舅舅》（1899年），《三姐妹》（1901年），也存在着类似的疑问。由于契诃夫有天生的同情心和幽默感，他不像斯特林堡那样夸张，但是，他所塑造的人物也同样不幸地互相隔绝，也同样都是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下，成了牺牲品；事实上，传统戏剧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了。譬如，对话似乎往往是由互不相干的话构成的；至于情节，与其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一连串的各种情绪和小插曲。

剧作被搬上舞台，是最容易受到破坏的；然而，契诃夫很幸运，因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能够理解他的作

品，能够体会并表现每一个简短的词句所包含的潜在感情，以及标志着一幕戏的发展的“气氛上的”变化。契诃夫的艺术是以对比为基础的，这就是一般表露出来的现象（包括人们实际的行动、言论以及他们表面上的为人）与某种比较深刻的含意的对比。这种对比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每一个哲学家和艺术家都肯定地熟悉它的某种形式，而契诃夫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作品的含义是不能通过编造一个惯常的剧情、配置角色和人物以及拟定连贯的对话这样的方法，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样做，就是使生活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而实际上，生活是不具备这种连贯性的，不过，哲学或艺术当然除外。契诃夫深切地意识到这种常见的似是而非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决心忠实于“事物的真实面貌”的作家是一种限制，使他对每个事物采取嘲讽的态度。他对剧中和许多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所热衷的说教，时常采取这种嘲弄的态度，然而，这种嘲弄却从来没有蜕化到玩世不恭的地步。他轻轻地触动一下人物思想上的弱点，抓住人物的回忆和希望中的抑郁情绪，突出地显示出他们的乖戾、荒唐与残暴。契诃夫十分了解，这样一种态度是有局限性的。当他的良知要求他去掉艺术加工，把含意说得更加明白，他就只好像《一个无聊的故事》（1889年）里的著名学者那样回答说不知道——虽然他完全知道，要实现人类幸福这一“状况”，就必须提供一个答案。因为，“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比外界事物更坚强、更伟大的东西，那么，一场重感冒就足以打破他平静的心情，而他的悲观情绪、乐观精神、大大小小的各种想法，除了作为症状以外，也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契诃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自然主义作家之中是最能克制自己、最富于同情心的作家；而且，他虽然善于捕捉能够反映一个腐朽社会的各个细节，却不坚持任何放肆的自然主义哲学。他的判断能够像左拉或斯特林堡所提出的判断那样使人感到极为不安（《第六病室》，1892年），但是，由于他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他的判断是比较缓和的，因为他认识到：他的艺术并没有揭示真理，顶多不过反映了他意识到缺少真理这种可悲的状况。

要使文学提供一个答案，提出具有道德含义的真理，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年）在一生的最后30年中主要关心的事情。到了19世纪末，托尔斯泰受到人们崇拜，自歌德以来，没有任何作家曾受到过这种尊敬。从欧洲各地都有“朝圣者”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来看望这个小说家与预言家。他的服饰像个农民，穿着一件现在叫作“托尔斯泰服”的宽大的罩衫。虽然持有托尔斯泰所写的某些

谴责政府的罪恶行为的小册子，就被警方视为犯罪，但政府却不敢再干扰这位世界闻名的作家了。他的名望现在主要建立在《战争与和平》（1869年）^[4]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上面，虽然他本人在经历了《忏悔录》（1879年）中所述的那种精神危机后感到不得不抛弃这两部著作。《忏悔录》是一部带有强烈感情的极其动人的自传体作品，它标志着托尔斯泰一生事业中的一个转折点。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阐明他那非正统的基督教观点（其要点见于《我的信仰》，1883年），还写了一些简单的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如《人靠什么而生存》（1882年）和《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1886年）。他后来又继续创作小说，写了《复活》（1898年）和《哈泽·穆拉特》（1904年），以及几个短篇小说，包括有名的《克莱采奏鸣曲》（1886年）和《主人与仆人》（1895年）这一杰作；此外，还尝试地写过讽刺剧，如《教育的果实》（1889年），以及较为严肃的“问题剧”，如《黑暗的势力》（1886年）。但是，他后期的所有作品都受他的生活和思想中发生的巨大动荡的影响。

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对道德问题和哲学问题感兴趣，但他的兴趣所在，不是把这些问题当作有关思想理论的事情，而是在于它们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如《哥萨克》（1862年）明显地脱胎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自始至终成了贯穿他的作品的一个主题：朴素的“自然的”生活方式比社会、文化、文明所提供的一切，更使人们接近于达到善的境界的秘诀，而对托尔斯泰来说，这也意味着获得幸福的秘诀。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中，安德烈公爵和彼尔都经过曲折的道路而认识到同一教训的不同侧面。这部小说的宏伟结构是用一种信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信念就是：历史与英雄行为这种重大问题，同普通生活的真正价值相比，是一种幻想。《安娜·卡列尼娜》的伦理结构就更为明显了。在这部小说中，情欲使人逐渐走向毁灭，它吞噬了日益放纵并陷于孤立的一对情人的灵魂。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列文和吉蒂为了寻找自己真正的本质，相互间的认识，以及他们在一个真正的集体中应有的位置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当托尔斯泰尚未写完这部小说的时候，道德与宗教的危机的紧张程度正开始加剧；他没有认真地修改此书，最后终于把它抛弃了。要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的思想的实际内容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看来，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相信到什么程度。他把道德问题作为题材来写小

说，把这些问题作为生活全貌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一部分。他对于生活，“无论是它的光明面，还是黑暗面”，比对他想象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热爱。他探索过精神觉醒与精神崩溃时的心理活动，尝过其中的欢乐与悲哀，在悲剧中找到了解决办法，从而在艺术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然而，对他那么出色、那么巧妙地予以阐明的真理，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呢？他的经历自始至终是一个作家的经历，而公众只是阅读。这些真理对于他或对于公众，是否有所不同呢？但那毕竟不过是由想象所构成的作品，不过是艺术而已。

“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起初几乎被托尔斯泰个人关于信仰的表白完全掩盖了，但它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并在1897年的一篇用这个题名的文章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文章的激进论点使人震惊，而且显然是与当时的“美学”观点格格不入的，虽然文章一般地探讨了一部作品以怎样的同情心和感情来“感染”读者的问题，借以避免在教诲问题上陷入狭隘的争论。即使罪恶行径在表面上是受到谴责的，难道作家长时间把自己的想象力放在罪恶行径上面，描述五光十色的细节和引人入胜的心理，是妥当的吗？因为，如果要写得好，就必须吸引住它的兴趣。托尔斯泰这样提出问题，就连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被排斥了，而《圣经》中关于约瑟的故事却依然是一个楷模。这个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不过，与看到显然更难以接受的例子而感到愤慨的那些批评家通常所允许的情况相比，它就较为明确。必须承认，只有把这篇文章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念的背景联系起来看，才能领会其中的道理；然而，站在他的宗教信念的极端立场上可以看出：颂扬虚荣与错误，在道德方面可能是有不妥之处的。过去，清教徒曾提出反对艺术，纵然一般来说，这不是艺术家提出的。只要托尔斯泰努力把文学中不真实的东西搁在一边，改用他所描写的现实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会具有他所推崇的那种令人赞赏的单纯朴素特色，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努力“改变”自己的想象力和自己的艺术，在他写《忏悔录》的时候，他以前所未有的严格认真态度注意自己的文体。

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们曾多次暗示说，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找到他所宣扬的内心宁静，有时并指出，在他对社会弊端发动的进攻中有自我毁灭的成分。这些社会弊端不断地为他提供主题，使他得到满足（在写《复活》的时候，他说他又感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感

到的那种创作激情），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怀疑，需要他加以解决。

《疯人的笔记》（1881年）生动地说明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一恐惧心理与他的信仰危机紧密相连，同时也和邪恶吞噬了近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使他困扰的看法紧密相连。《克莱采奏鸣曲》或《魔鬼》

（1889年）对于婚姻的揭露和斯特林堡所做的任何揭露是同样可怕的。但它们不仅在心理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托尔斯泰一味谴责文明社会，对任何不符合他的理想的东西都感到无法容忍，结果就连契诃夫都反对他，因为契诃夫不能接受这些妄称可以提供一条出路的谴责哲学。托尔斯泰是先知的神话既然已成过去，便不易看到他因自己的天才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他的天才曾使他认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拯救世界。邪恶能被圣人制服，但是能被作家制服吗？

《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第一章的章前语是：“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两句话就把托尔斯泰所处的困境做了概括。如果不写人的曲折的历程，不写人的失败，便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如果没有上帝牢牢控制的关于善与恶的安排，也同样就没有人的失败。托尔斯泰深感不安的是，他无法相信正教关于最后赎罪与惩治的说法，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典型的。从《圣经》中引来的那句话，本意可能只是要反驳那些持偏见的人，他们想从不贞的女人的悲惨结局中得到乐趣，但是，后来他开始感到这句话里包含的真理正是将道德上的责任问题束之高阁。邪恶可以留待来世处理，但眼前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苦难和不幸的遭遇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作家，他需要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觉得无法忍受，必须加以谴责，加以克服，加以纠正。因此，先是作者的自我斗争，接着，便是他与这个罪恶世界的斗争，而且出现了在《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年）、《主人与仆人》和《复活》中所描写的那样的胜利结局。对于托尔斯泰所处的困境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特别对于最后一部小说提出的批评。人们批评说由于作者坚持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从而破坏了这部作品；如果说有所弥补的话，那就是作品对人们的软弱和痛苦表示了富有想象力的同情。表现幸福的场面，借以惩治道德方面的罪恶，并解脱自古以来就有的罪过，是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而如果幸福生活不能通过神圣的手段来实现，便只有引起革命。

[1] 德彪西曾将其改编为歌剧，流传较广。——译者

[2]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濒临地中海。——译者

[3] 《黄皮书》是1894至1897年间在伦敦出版的季刊，撰稿人有亨利·詹姆斯、阿诺德·贝内特、奥斯卡·王尔德等。——译者

[4] 见第十卷第七章。

第六章 艺术与建筑

有关19世纪艺术史的大多数著作的错误，在于把艺术和建筑分割开来。大家公认，要在斯科特1868年所设计的圣潘克拉斯车站^[1]和莫奈1877年所画的圣拉扎尔车站^[2]之间找出统一的风格是不容易的。而且，人们一旦把眼光从最熟悉的绘画作品转到最熟悉的建筑物，就可看出其美学质量一落千丈，使人再没有什么兴致花费力气来探讨这种统一的风格。谁也无法否认这种判断艺术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其中也含有谬误之处。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官方的绘画与非官方的建筑的差别，前者就像任何保险公司总公司的建筑一样低劣，后者则即使不如莫奈和修拉的绘画那么优秀，但有时也几乎堪与之媲美。如果人们认识到其全貌，就能够试图对其一切方面做出公正的评价。剩下的唯一困难是，一般外行人——在这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是外行——对印象派画家和后印象派画家知之甚详，而对菲利普·韦布和诺曼·萧、亨利·理查森和斯坦福·怀特，甚至包括安东尼·高迪都几乎一无所知。

这就是本章首先论及绘画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19世纪的确是一个绘画占最重要地位的世纪，在美学上和在社会上都是如此。这种支配地位在1870年以前即已确立。就社会方面来说，1870年的艺术赞助人已不再是1770年的艺术赞助人。在1770年前后，艺术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当时的赞助者是教会、宫廷和贵族，虽然对偶然赞助艺术的商人、银行家、酿酒商也不应该忽视。赞助人总的来说是有闲阶级，他们所受的教育已包括一些对建筑、工艺和美术的欣赏。一百年以后，建筑师们为简陋的郊区建筑了成百所教堂；建筑师们对这些建筑没有足够的兴趣，而由一些投机商进行建筑，结果是使得广大的新郊区庸俗难看；贵族们早已衰落或正在衰落，新兴工商业阶级出身的赞助人，过去既没有了解艺术问题的机会，后来在生活中也没有闲暇去掌握它们。这就不仅决定了他们对待他们投资兴建的建筑物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对待选来装饰自己住宅的绘画的态度。但是一个建筑师离开赞助人就无法进行建筑，而一个画家只要肯忍饥挨饿，就是没有赞

助人也能作画。在艺术史上，枵腹画家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即第一个中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他成为19世纪值得人们提及的画家的典范。米勒为了买一双鞋，卖了6幅画。雷诺阿在1869年写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吃饭的”，莫奈在同一年写道：“你瞧，我停顿下来了，因为没有颜料。”能够对这样的生活安之若素的画家，总有一天会等到难得的了解他们的赞助人出现。所以最有信心的画家能够保持美学上的纯正和探索的热情，这是建筑师们望尘莫及的。

通常认为印象画派以爱德华·马奈（1832—1883年）和他在1863年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兰毕亚》这类画为其滥觞。但是这些画并不完全符合条件。使批评家和公众感到震惊的与其说是这些画的手法，莫如说是它们的题材。男人们穿着日常服装去野餐，一个裸体的姑娘和他们在一起，或者说一个年轻女人摆出提香所画过的那种传统姿势，但又显得不像是裸体画而倒像是被剥得一丝不挂似的——库尔贝也这样做过，并且更糟。糟就糟在他作为一个感情外露的、好炫耀的写实主义者，想要他的裸体像含有猥亵的意味，而马奈的裸体女之所以特别令人不快，毫无疑问是因为他是纯粹以美学的超然态度作画的。事实上库尔贝也为《奥兰毕亚》感到震惊，但那是由于这幅画缺乏写实主义。他把她称作“一张纸牌”，可是在这幅画中确实包含了一些新的东西。如果说她看起来平板单调，那是因为强烈的光线直接照射在她身上，看不出起伏不平的表面的细微差别。委拉斯开兹在17世纪也这样做过，但是再没有别的人这样做过。马奈在1865年访问西班牙时把委拉斯开兹称为“画坛之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于直射阳光及其在人体上所产生的效果的兴趣，成为印象派画家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另一个课题——虽不那么新颖，但同等重要——是关于当代的、日常生活的题材。第三个课题表现在1862年马奈画的《杜伊勒利宫花园音乐会》中：那就是运用让画框任意地切去画面，更多的是用快速、有力、粗线条的笔触和用画笔的运动表现人物的活动这些手法，令人信服地画出人群的问题。

马奈遭到猛烈的攻击。罗赛蒂把他的（和库尔贝的）艺术称为“堕落”，朱尔·克拉雷提把他们的作品贬为“笑料或拙劣的摹仿”。其结果是最优秀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他周围。他们是埃德加·德加（1834—1917年）、克劳德·莫奈（1840—1926年）和奥古斯特·雷诺阿（1840—1919年）。如果加上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

年)和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年),主要的印象派画家就都已列举到了。印象派这个词是稍后才出现的;但是“印象”这个词过去就曾偶尔用来表达风景画家,甚至包括巴比松派^[3]及其同时代人,即1820年前出生的画家们的创作意图。一位批评家在谈到雷诺阿时说,“他的一切都存在于印象之中”,另一位评论家则在1865年称多比尼为“印象画派的领袖”。刚才说到的5个人都出生于1830年至1840年间,其中3个是风景画家,雷诺阿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风景画家。只有德加坚持画人物画。所有的人都受到马奈(还有库尔贝)的影响,但是他们很快就在一个方面超过他,并反过来影响了他。1869年莫奈和雷诺阿两人都画了塞纳河上布日瓦尔附近的《格勒鲁依叶》,这些画直接抓住阳光投射在叶丛上和水面涟漪上的瞬间即逝的效果,而没有经过在画室里的校正。从这一意义来说,它们都是户外画。直接利用外光描绘的画法成为印象画派的基石之一。其他的基石是:“印象”,即把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如实地描绘下来;把运动转化到静止的画布上;以及日常生活题材,不论是风景、静物、人物肖像或风俗画,而所谓风俗画就是再现一些除了它们是刚刚发生的之外再无其他意义的事情。诚然,马奈在1864年画了美国南北战争中“基尔萨奇”号与“亚拉巴马”号在法国海岸附近的海战^[4],1867年画了枪决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但是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不是典型的,而且无论如何,正如《奥兰毕亚》一样,它们还不完全是印象派作品。德加是画日常生活琐事的大师。大约在1873年他画了勒皮克子爵和他的小女儿们出去在协和广场散步——他们位于画面的前景,画框切去了他们的腿部。左边有另一位绅士,但是我们只看见他的半个身子,因为画框把他纵向切去了一部分。广场周围的房屋和树木只有模糊的轮廓,此外几乎再无他物。然而和德加的另一一些作品相比,这幅画所画的还算是大事。他的《熨衣女工》画的是一些忙着熨烫衣服的女工,有的伸胳膊伸腿,有的打着哈欠;还有他画的在浴盆里沐浴的姑娘们,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一些毫不自觉,因而是十分吸引人的并不雅观的动作,“好像你是从钥匙孔里看到的”(他自己这样说);他的《芭蕾舞演员》画的是许多正在排练或表演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画的都是她们的一些偶然摆出的姿势,但由于学习了日本木刻画的长处,因而能够在画布上安排得十分巧妙而富于高雅的情趣。

对日本艺术的爱好，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以后就愈来愈趋强烈。其影响因人而异。马奈以一幅日本木刻画作为他1868年为左拉画的肖像的背景，对他来说，感兴趣的是清晰而没有阴影的线条和轻淡的色彩。对德加来说，感兴趣的则是妙趣横生的不对称的人物安排。对惠司勒、对高庚、对梵高等人的影响，我们只好在下面再来探讨。

在1869年以后的5年中，这批当时都是35岁上下的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于1897年举行了第一次画展。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官方的沙龙^[5]把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拒之于门外。展出的作品有莫奈的《卡皮希内大街》，画上的人群被大胆地用一些垂直的笔触画成，树木除靠我们最近的一些树枝外，画成蒙蒙的一片，房屋也只是透过寒雾若隐若现。远处是一片灰色和蓝色，街道就消失在其中。雷诺阿展出的作品有《包厢》，这是在一家剧院包厢里的一对夫妇的出色的画像，是检验印象派画家如何集中表现中心题材的一个范例。在这幅画上，中心是那位年轻女人的面孔，而离中心越远的东西，画得也越简略。颜色是黑色和白色——早年雷诺阿惯用的颜色——背景则是他特有的那种玫瑰色和略带淡灰的粉红色。雷诺阿还展出了他的《芭蕾舞演员》，画的是高雅而年轻的演员们，舞衣的薄纱是最轻盈的灰白色，只是缎带上有淡淡的一抹浅蓝，棕色的头发和一只耀眼的黑色手镯。这幅画的背景也是完全不明晰的。展出了10幅德加的、5幅毕沙罗的和5幅西斯莱的作品。在莫奈的5幅作品中，恰巧有一幅题为《印象·日出》，正是这个标题，使《喧哗》周刊产生了把整个这批人称为印象派画家的念头。从此他们的这个名称就固定了下来。

公众和报刊在很长一个时期仍旧怀着敌意。《费加罗报》戏谑地把他们在意大利大街附近勒佩尔蒂埃路的迪朗·吕埃尔画店举行的第二次展览会称之为仅次于最近在歌剧院发生的火灾的一场大灾难。但是盟友开始出现了。左拉早在1866年就曾著文支持他们，预言在罗浮宫中将会有马奈的位置，并赞扬莫奈和毕沙罗，而这时，1878年，泰奥多尔·迪雷出版了他的著作《印象派画家》。但就收入说，画家们并未从这种看法的转变中立即获利。他们在头两次画展之后经过努力售出了50至70幅画，但是每幅画的收入平均不到160法郎。1878年拍卖一次。莫奈的画平均每幅185法郎，西斯莱的每幅平均115法郎。当迪雷在1894年不得不出售他的藏画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时莫奈的一些主

要作品售价达 5000至11000法郎。最初经常的买主中有像亨利·哈夫迈耶那样一些美国人。

对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从敌视转变到欣赏，总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就印象派画家而言，这也是一种视觉习惯的改变。当罗斯金把惠司勒的《克雷莫恩花园》说成是“把一罐颜料泼到公众脸上”时，我们姑且可以承认他或许确实未能看出被他讥讽的画布上表现的是什么。但是对于今天的外行人来说，印象派已成为所有绘画作品中最容易为人所欣赏的，而且比18世纪以前的名画家的作品要容易欣赏得多。这丝毫不足为奇，因为印象派画家并非革命派，尽管他们的技巧使他们看来似乎是革命派。他们处在一个绘画的黄金时代的末期，而不是处在一个其美学价值尚未确定、尚未经过考验的新时期的开端。提香在创作的后期，委拉斯开兹、伦勃朗、戈雅、康斯太布尔，都是他们的先驱，因为他们画的是他们接受的各种印象，而不是像拉斐尔或普桑或安格尔那样从众多的印象中提炼出永恒的形象。印象派的特点是人们记得许多熟悉的图画，但是不能从中挑出几幅来作为全体的代表。人们常常会说马奈的这幅风景画跟另一幅一样好，德加的这一幅芭蕾舞演员也跟另一幅一样好。人各有自己的爱好，自然也有突出的成功之作和一般的平庸之作；但技巧始终是惊人的，映入眼帘的一切所产生的愉快之感永不会磨灭。卡米耶·毕沙罗比其他人的年龄稍长，更富于思想，他在大约65岁时教导他的学生说，应该“更多地为形象和色彩，而不是为素描去观察”主题；一直到最后都不应该“失去最初的印象”，“画得准确会破坏印象”；“感觉到就必须立刻画下来”。雷诺阿不善于有系统地思考，他写道：“我没有理论。我是为绘画而绘画。”莫奈也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在晚年写道，他别无他求，他的“功绩只是直接描绘自然，力求把我所感受到的稍纵即逝的印象表达出来”。他在文章的另一处说他但愿“生来就是一个瞎子，然后忽然重见光明，这样一来他就能把他所看见的东西画出来，而无须知道这东西是什么”。这种一味主张仅仅是看，然后把看到的東西画出来的狂热，竟使得莫奈在他妻子刚刚去世之后，观察她面孔上呈现的死亡时各种各样的色调。

如果说连死亡都能够变成一种视觉的感受，显然印象派画家是不会对题材的理性价值感兴趣的。对他们说来，并不存在所谓《牧羊人来拜》，不存在所谓《珀西亚斯和安德罗表达》，不存在所谓《托比

大叔和华德曼寡妇》，不存在所谓《奴隶市场》。^[6]画家的领域虽是有限的，但极严格地限于视觉领域。理性的领域对他是关闭的。这里有一个马上就会使人感觉到的局限。莫奈却有勇气去追求其终极的效果。1891年他展出了15幅在不同的光线下画的同一干草垛（每幅以3000至4000法郎售出）。他提出这样做的理由是：谁也不要因为与这些绘画的主题不相干的思想而分散了对我的艺术效果的注意。只需观察并欣赏我的视觉的真实性。写实主义就这样被认为仍然是正当的，而且如此之彻底，正如当初库尔贝曾经以他那种直言无隐的方式说出他以“没有理想、没有宗教”而自豪一样；但是这时写实主义已经是一种升华成为空气和光一样无形存在的写实主义了。

印象派终于传播到所有的国家，为各国文艺界所接受，但这种传播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英国，这一变化属于沃尔特·西克特（1860—1942年）一代；在德国，属于马克斯·李卜曼（1847—1935年）一代。李卜曼曾于1874年，西克特于1883年来到巴黎；意大利人朱塞佩·德·尼蒂斯（1846—1884年）甚至更早，在1867年就来到巴黎。要不是那些美国人这时不仅作为引人注意的绘画买主，而且作为引人注意的画家开始出现在欧洲舞台上，而且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詹姆斯·麦克尼尔·惠司勒（1834—1903年）早在1855年就来到巴黎并于1859年决定住在伦敦的话，他本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皈依印象主义的外国人。因此在《草地上的午餐》和《奥兰毕亚》之后直到《格勒鲁依叶》问世的年代里，惠司勒还不是当时正在形成的那个团体的成员。如果说他1859年的《少女弹钢琴》，1862年的《白衣少女》和1866年的《瓦尔帕莱索港湾》给人以印象派或接近于印象派的感觉的话，其原因也必然在于惠司勒本人独自的努力。他画瓦尔帕莱索港口外的大海，把一切固体的东西都化入一片朦胧的蓝灰色之中，这的确超出了当时巴黎的青年画家们所做的任何尝试，而当惠司勒开始公开地系统阐述他的一些观点时——这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有不少观点纯属印象主义。只消举一个例子，他评论他的一幅画面上只有一个黑色人像的雪景时说：“我对这个黑色人物的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关心，之所以把他放在那里，是因为那地方需要黑色。”

但是惠司勒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观点有一个方面与印象派画家的学说相抵触，这在他的早期作品如《少女弹钢琴》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少女弹钢琴》是一幅自觉地创作出来的作品，如同德加在早

年，即在他终于转向现代题材以前所画的那些作品一样。所以当德加仍在受各个艺术学校的那些神话题材的束缚的时候，惠司勒即已为着非学院派的创作目的而力图运用对他同时代人的精心安排进行创作了。这些在他最著名的肖像画，即他母亲（1872年）和卡莱尔（1874年）的肖像画中达到了顶点。此外，惠司勒不是谦逊地把他的风景画叫作“印象”，而是比较自负地称为“和声”、“交响乐”或“夜曲”——“灰色和绿色的交响乐”，“灰色和金色的夜曲”，等等——这样就引进了与音乐有关的——即抽象的——含义以及情绪上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对于那些沉溺于视觉领域的印象派画家来说是被禁止的。人们绝不会发现莫奈或雷诺阿会像惠司勒那样，说在暮蔼中“高耸的烟囱变成了钟楼”，在夜晚“货栈成了宫殿”，或者“绘画是视觉的诗篇，正如音乐是音响的诗篇”，或者更彻底地说“大自然通常是错误的”。

惠司勒和他的弟子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好出惊世骇俗之论。拿奥斯卡·王尔德的百合花和惠司勒的手杖和眼镜取笑是很容易的，事实上拿19世纪末那些颓废的唯美主义者和纨绔子弟们的一切装饰打扮来取笑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在惠司勒关于艺术高于生活的信念中，也有一些积极的有远见的东西。就我们从照片上所能看到的而言，印象派画家对他们自己的住房是缺乏审美观念的。他们作画，而他们与艺术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惠司勒的住宅，在切尔西的泰特大街上的那幢“白屋子”，是他的朋友爱德华·戈德温（1833—1886年）于1878年设计的；这座房屋是对19世纪建筑方面的历史循环论和对当时流行的那种笨重的样式和阴暗的色彩的挑战。房屋正面是白色的，门窗的位置独出心裁，室内陈设简单，粉刷成白色和鲜艳的纯黄色。惠司勒首次举行个人画展的展室四壁是灰色的，并摆设着一些中国青花瓷器用来衬托展品。惠司勒对室内装饰的趣味无疑是受了戈德温的影响，早在1862年戈德温就把他在布里斯托尔的住宅里的房间漆成素色，布置了少数精选的古式家具，未上漆的地板上铺有几块波斯地毯，挂着一些日本木刻。惠司勒也深为日本艺术所吸引，早在1865年就创作了他的《瓷器之国的公主》（《玫瑰红与银白色》）。这幅画形成著名的孔雀厅的中心点；这个厅是1877年他在伦敦为利物浦船业大王 F. R. 莱兰布置的，饰以用深蓝色和金色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式盘旋花纹画成的孔雀。同年，科明斯·卡尔为展出近代艺术，开办了格罗夫纳画

廊，现在，读者也就会理解吉尔伯特写的“青枝绿叶的花纹装饰的格罗夫纳画廊”是什么意思了。

同时，注意到下面两点是很有意思的。戈德温在纯净、明朗的色彩和少而精的陈设方面，一定是仿效日本的艺术——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家具业设计了许多略呈纺锤形的家具；而惠司勒对日本艺术的欣赏也一定包含了同样的特点，但也一定包含了那种永远使人感到纤巧精致的构图，这同时也是德加所喜欢的。

在本文中，惠司勒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从纯熟的写实主义转变到纯熟的装饰艺术；从维多利亚时代在家具陈设方面的阴暗色调转变到维多利亚时代以后的鲜明色彩。在这方面，他和戈德温的创作超过了在装饰艺术领域的其他方面更有影响得多的作品，即同一时期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的作品。莫里斯最初在牛津大学攻读神学，后改学建筑，又因不满足于画图板上的工作，而改学绘画。他曾一度就学于罗赛蒂，因此拉斐尔前派画家和他们的辩护士约翰·罗斯金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从罗斯金的著作中学会了喜爱中世纪哥特式的艺术，尊重他们的技艺，并对这样的技艺产生了热烈的信念。拉斐尔前派画家的艺术——当时尚年轻而且未受玷污——还使莫里斯对准确且具有装饰性的线条产生了同样强烈的信念。罗斯金一方面鼓吹技艺，一方面鼓吹社会改革。莫里斯把二者结合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炽热的力量，一种坚定的进取心和艺术天才，这一切都是罗斯金所缺少的。于是莫里斯同他的拉斐尔前派画家朋友们，特别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建筑师菲利普·韦布（1831—1915年）聚在一起，于1861年决定成立一家他称之为“绘画、雕刻、家具和金属制品美术工匠”的公司。他们设计家具、砖瓦、壁纸、彩色玻璃窗，风格与当时流行的迥然不同。家具不再是过分讲求装饰的，鼓鼓囊囊的那种所谓“自由式或混合式文艺复兴风格”——即从16世纪的意大利到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和法国历代路易国王时期形成的各种主题的大杂烩——而是简单、有棱有角、模仿英国农舍的式样。

彩色玻璃，不再是在玻璃上画上逼真的图画，而是回到用纯净鲜明的色彩，绘出简单的平面图形，并在经过深思熟虑而选用的每块玻璃之间镶上框架。壁纸，不再是喜用一束束用自然主义手法画出的花卉和立体的风景，或者二者兼用，而主要用简单的花纹，画成平面，

让人看起来壁纸覆盖的是墙面，正像莫里斯所设计的玻璃让人看起来仍然是玻璃面一样。

这种重新回到以实用为基本原则的做法，是装饰艺术的一次革命，而莫里斯本人的设计比起他同时代的设计来更加出类拔萃，正如印象派画家的绘画高人一等一样，无人能对此提出异议。这一革命早在1859年即已开始，当时莫里斯已结婚，让菲利普·韦布给他和妻子设计了他的住宅“红房子”。这幢房子坐落在伦敦东南的贝克斯利希思，朴实无华而不拘格式，不落过去任何一种式样的窠臼，内部陈设的家具都充分体现了莫里斯的理论。特别是有一个壁炉，上面刻着“人生朝露，艺术千秋”^[7]，它是那样丝毫不落俗套，那样丝毫不尚装饰，其设计那样地注重实用，因此定然会被列为对历史循环论最早的一次打击。它具备了前面提到的戈德温在1862年装饰他的房间时必然也具备的一切大胆创新之处，而且这些特点比莫里斯本人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体现得更多。

而正是在这些年里，莫里斯通过演说和写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和社会改革的理论，因而声名大振，并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转变了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的观点。他的两个出发点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必然是不健康的，因为不管它多么有价值，也只不过是一些大人物的自我表现；同时，建筑和设计也必然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们所生产的只不过是在人们住宅里的“成吨成吨十足的垃圾”，以及为富人建的那些“庸俗不堪”，为穷人建的那些“简陋无比”的住宅本身。在中世纪，小城镇是美丽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丽的。原因何在呢？莫里斯的回答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工匠，每一个工匠又都是艺术家。“艺术是人们劳动愉快的表现”。如果艺术要存在下去，必须恢复这一点。机器是敌人，工业是敌人，工业设计师只不过是一个“眯着眼睛看一张纸的人”。当然莫里斯本人也是设计师，但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制造者。

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他的信条，正如他自己曾经写过的，是由于“对历史的研究和对艺术的热爱与实践”。在他心目中，艺术绝不是某一幅伟大的绘画，而是设计，也就是制造既美丽又有用的东西，并且是为了大家而制造它们。他说：“我不愿艺术为少数人服务，正如我不愿教育为少数人服务，或自由为少数人服务一样。”由于他也不相信灵感，但确信人人都能成为一个工匠，因此他认为艺术归根结底

既是一种“对制造者和使用者都是一种快乐”的事，也是一种“由人民来做，为人民而做”的事。

至于怎样才能使艺术和生活回复到健康状态，莫里斯始终没有肯定的主张。有时他采取施本格勒的激进路线，比如他曾写道：“也许，经过一场可怕的灾难之后，人类可以学会如何努力去获得一种健全的动物性，可能从一种还算不错的动物成为一种原始人，从原始人再成为野蛮人，再成为其他等等，经过几千年之后，他们也许会再开始创造我们现在已经失去的那些艺术。”有时，他又采取一种更近于进化论的观点，建议我们“尽我们的一切做好准备，应付这一转变，以便减轻它将引起的震动”。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绝不会坐等他所说的大灾难。他演讲，他写诗，经营他的商店，并且向那些不事生产而单纯消费的人提出建议，让他们做些有用的事。他们对所说的话，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同工厂和家庭的烟囱的烟尘做斗争，不要随地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始建筑房子之前就把树砍倒，等等。还有“不要把任何你不知道会有用处的或者你不相信是美丽的东西放在你家里”。凡是接受这一原则的人都会发现他能够（或者必须）放弃很多东西。莫里斯曾说他宁愿“住在波斯沙漠的帐篷里，或是冰岛山边的茅屋里”，也不愿住在今天为“无知的、炫耀金钱的消化机器”建筑的房子里，人们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但是莫里斯的整个学说包含一个缺陷。虽然他是一个狂热的工匠，但他所做的和使他成名的大部分东西——特别是他的印花棉布和壁纸——实际上只是由他设计而在工厂里制造的。还有，他的家具生意并不是以帐篷和茅屋为对象，而是在于创造非常文明的、完全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环境。所以莫里斯所生产的东西未必总是包含着“劳动的愉快”，当然也绝不是“为了人民”。总之，他的商店是一家价格昂贵的商店。他知道这一点。有一次当问起他正在从事何种工作时，他说他在“为富人们卑鄙齷齪的奢侈生活服务”，另外一次他更加深思熟虑地说道“一切艺术都要付出时间、辛劳和思想……而金钱只是代表这些事物的筹码”。

所以莫里斯的主张与其说是社会革命，倒不如说是一种美学革命。诚然，他说服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以工艺作为终身的职业，而且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在其早期也确实产生了许多诚实的、有创见的

优美作品。而且，设计方面的美学改革，如果在一开始不是掌握在制造者手中，而是掌握在为工厂服务的设计师手中的话，也确实不会有足够的推动力。但归根结底，获益最多的还是设计师，而如果说20世纪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种新颖、实用的风格的话，主要应归功于莫里斯和他为了使人们认识到日用产品比画架上的绘画更为重要而做出的努力。

莫里斯专门进行平面设计。至于家具，则由菲利普·韦布（1831—1915年）为公司设计。韦布还是他那个时代两个最重要的英国建筑师之一。他的“红房子”是大批建筑师设计的许多不拘格式的舒适住宅中的第一幢。整个运动被称为“住宅建筑的复兴”——这个词当然包括莫里斯的工作在内。韦布建筑的房屋不多。他一贯诚实，从不赶时髦，能够大胆地使用材料，并兼收并蓄各种风格之长而融为一体。理查德·诺曼·萧（1831—1912年）具有更敏锐的想象力和更灵巧的技艺。他在19世纪70年代设计的房屋大部分在汉普斯特德和切尔西，而且是为艺术家们设计的。这些房屋都是砖结构，基调是把荷兰和英国17世纪的建筑风格优美别致地融为一体。这种风格不十分确切地被称为安妮女王风格。韦布设计的“红房子”已经表现了这种特色。10年以后，它的发展前景开始为其他人所认识。1868年伊登·内斯菲尔德在丘加登斯建造了一所安妮女王式的住宅，1871年J. J. 史蒂文森在贝斯沃特路建造了一所“红房子”。1872年诺曼·萧在离开他早年的伙伴内斯菲尔德以后，独自发现了这种风格。正是他使这种风格成为那些敏感的和“喜爱艺术”的人的时尚。到了1881年，吉尔伯特就得以在歌剧《忍耐》^[8]中写道，“仁慈的安妮女王在位时是文化鼎盛时期”。不管所谓安妮女王风格的真正特色是什么，实际上它们是荷兰17世纪和英国威廉与玛丽时代的风格，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的粗俗形成鲜明对照的优美的家庭建筑。正是这种优美的格调，把法国的印象主义与英国的“住宅建筑复兴”运动联系了起来。库贝尔的写实主义与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的建筑同样粗俗。而这时，精美、雅致、轻快的格调成了理想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历史方面，19世纪中期那种什么也不加怀疑的乐观主义也衰落了。

绝不可能给一种风格的出现定出一个确切的日期。“红房子”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而不是维多利亚全盛时期，虽然它是在斯科特

极力追求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的风格而设计圣潘克拉斯车站之前将近5年设计的。莫里斯的设计，戈德温的建筑和设计，以及诺曼·萧的住宅也属于维多利亚后期的风格。从第一个先驱作品的出现到一种风格的确立，其间总要相隔一段时间。19世纪70年代应被视为“住宅建筑复兴”运动的典型作品出现的时期，正如它是印象主义典型作品出现的时期一样。诺曼·萧所设计的新西兰会馆（New Zealand Chambers），阿伯特纪念堂^[9]附近的他设计的住宅（现在的皇家地理学会），在汉普斯特德的埃勒戴尔路的他自己的住宅，切尔西的天鹅住宅楼（Swan House）——都建于1872年至1876年——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当时欧洲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远比他自己后期设计的新英国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历史意义。诺曼·萧在社会上最有意思的工作是1875年受科明斯·卡尔的兄弟乔纳森·卡尔的委托为伦敦特恩哈姆草地的贝德福德公园所做的设计。这是所有花园郊区中的首创之作，19世纪90年代的桑莱特港和伯恩维尔就是按照这个样式设计的。它是从适应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的需要转变到适应工人阶级需要的典型。从花园郊区到拥有本身的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的独立的花园城市，只有一步之差；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的《明天的花园城市》（1898年出版）一书中从理论上迈出了这一步。而巴里·帕克和雷蒙德·昂温于1903年开始建设的莱奇沃思^[10]则最后在实践上完成了这一步。

这一切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影响。“花园城市”开始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普鲁士政府于1896年派赫尔曼·米特希乌斯去伦敦数年，研究“住宅建筑复兴”运动，莫里斯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爱德蒙·德·龚古尔于1896年给这种新的装饰艺术风格起了一个英文名称，叫作“游艇式”。黑森大公委托英国建筑师为他设计在达姆施塔特的府邸。在大陆上，艺术家开始转变为工匠，像英国的艺术家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这个运动只停留在设计私人住宅及其陈设这种个人交往范围内。官方的建筑物仍然是富丽堂皇的，正如各国官方的付价昂贵的油画还没有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一样。只需翻阅一下巴黎艺术沙龙插图纪念册或是了解一下伦敦皇家艺术院用钱特利遗产基金^[11]购买美术作品的情况，就足以使人回想到当时的情景——对密莱司和莱顿勋爵的作品付价2000至3000英镑。埃德温·朗的《巴比伦的婚姻市场》于1875年以1700英镑买进，1881年转手卖了6615英镑。

19世纪末以前，在英国以外的建筑物无一可与英国的“住宅建筑复兴”派的建筑相比拟。不论你去罗马参观1884年开始兴建的维克托·埃曼努埃尔二世纪念碑和1888年开始兴建的司法部大楼，或是到柏林去参观1884年动工兴建的国会大厦和1894年动工的大教堂，竟然都是新巴洛克风格。

只有美国是例外。这里，在建筑方面至少像英国一样发生了重大的事情。这里我们只谈及与我们有关的住宅建筑的改革——亨利·霍布森·理查森（1838—1886年）和斯坦福·怀特（1853—1906年）在19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房屋，像韦布和萧以及他们的同派人那样自由地随意运用过去的题材，未始不受他们的影响。这些美国房屋，如同惠司勒的绘画一样，标志着美国从一个外省的后座议席的地位跃居于西方艺术的前排席位的时刻，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离开这一地位。甚至在官方建筑方面，美国这时也享有超出其他国家的盛名，斯坦福·怀特所属的麦金、米德和怀特公司，于19世纪80年代又转而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如1888—1892年建筑的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以后又和其他人一起，模仿古典再复兴时期的风格，比欧洲的新巴洛克风格更加严谨（如1906—1910年建筑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

正是在美国人的这些作品中才应当寻求与高尚的古典风格相类似的东西。这种与印象主义相对立的古典风格，在法国表现在皮埃尔·皮维斯·德夏凡纳（1824—1898年）的给人以冷漠感的灰色壁画中；在德国的汉斯·冯·马雷（1837—1887年）的神秘、沉郁而在技术上质朴的绘画中达到顶点。在这些绘画中，画成正面或侧面的模糊的神话人物，或站立，或静静地走动在庄严的树丛中。构图遵守最基本的中轴线。马雷一生中虽然只有一次受委托创作壁画，但他一贯按照壁画的要求来构思。在这一方面和所有其他方面都与印象主义的原则完全对立。马雷是从古典主义的传统出发形成他的立场，而并非有意识地反对印象主义，因为他对后者几乎丝毫没有认识。

在马雷的晚年，乔治·修拉（1859—1891年）在法国确立了与之不相上下的地位。他的题材与马雷的截然不同，他的色调不同，他运笔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但是严格地忠于简练和保持中轴线的信念，把修拉与马雷连在一起。在修拉成熟后的不多几年间，即1884年至1891年间，人们对他议论较多的是他的着色法而不是他的构图。其实更加

新颖，因而必然比前者更加令人迷惑的是后者。修拉思想清晰，合乎逻辑，气质冷静。他对谢弗罗尔和其他人的光学论文产生了兴趣，发现如果把调色板上的颜料减少到有限的几种清晰、明亮、不加调配的颜色，再把这种颜色以不掺杂在一起的色点点在画布上，那么眼睛就会完成“光学混合”，从而得到更真实的天然色彩。修拉的科学手法立即赢得追随者，首先是保罗·西涅克（1863—1935年），接着是其他人，如一些法国人，几乎随即又有一些比利时人（包括亨利·范德威尔德）。西涅克在1887年写道：“我们的准则是可靠的，能够论证的，我们的绘画是有逻辑性的，不再是任意地作画了。”

这一派人，由于他们使用的手法，被称为“分割派”或“点彩派”，但是更以新印象派而闻名。他们是如此热衷于绘画的科学，以致对构图的规律，线条的方向及其感情上的意义，特别是关于色彩的感情意义也都发生了兴趣。但是，一旦走到了这一点，结果反而不能更加精确地描绘自然，而是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原则。西涅克画了一幅费利克斯·费内昂的肖像，背景是许多圆圈、星星、明亮的旋涡，波纹状的平行线和另一些有点像凯尔特人的形象。费内昂是最早著文介绍新印象主义的人。这样抽象的背景（它开 1910—1915年出现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先声），是对费内昂的一种赞扬，因为他曾说西涅克“为了追求阿拉伯式的图饰而舍弃了那种以奇闻逸事为题材的做法”。然而把人物与抽象的形象并列在一起，仍然是罕见的。修拉虽从未发展到这种地步，但他的人物画的背景同样是虚构的和恪守一定风格的，他作画不是抓住转瞬即逝的一刹那，而是建立一种永恒的感觉。按照费内昂的说法，印象画派是被“天空、水、树叶在每秒钟的变化”所吸引、而竭力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景象，把它画在画布上”。在修拉1884—1886年画的《大碗岛上的下午》上，每一个人都仿佛固定在一个位置。人物像一些木头玩具，轮廓简单，僵硬，大多数是正面和侧面，只摆出最基本的姿势。构成画面的鲜明的色彩和密集的色点，就是这种有意识地以天真、幼稚和孩子般的态度处理画面的恰当的伴随物。修拉在他后来画的《马戏团》和《喧闹的舞蹈》中，在因袭奇异怪诞的风格方面走得更远。

如果人们承认修拉是一位强行把自然纳入各种基本模式的风格大师（例如，范德威尔德指出修拉是“回到风格”的艺术家时，他正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就有可能把他视为与保罗·塞尚（1839—1906

年）相辅相成的人物。印象派画家中最聪明也是唯一能了解他们后来的对手的毕沙罗，曾经把塞尚叫作“这个文雅的野蛮人”。塞尚自从1870年前后就顽强地致力于“题材”的简练，风景画上平面的布局，房屋的立体感，女人面孔的苹果般的充实感。但是在所有这一切耐心的研究中，他从没有忽视过自然。修拉的构图与塞尚的比起来仿佛是一条捷径。如果说追求简单的和基本的东西就是目的，那么修拉画的那些玩偶似的人物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但是他也像塞尚一样，相信简单的几何图形可以补救印象派画家的视觉的短暂性。塞尚在一封人们常常引用的写给埃米尔·贝尔纳的信中写道：“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由圆柱体、圆球体和圆锥体形成的。”塞尚的艺术远不止此，他接着就在信中强调说，对于画家来说，所有的绘画都是色彩，所有的造型也都是色彩。所以他的风景画、静物画和肖像画最终都带有一种安详、宁静的高尚气质，不允许留下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尽管如此，如果能够找出一个原则作为这一切努力的基础的话，那就是相信几何是安排宇宙万物的秩序的力量。

上面引用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埃米尔·贝尔纳（1868—1941年），也和梵高有书信来往，并且是高庚的弟子。贝尔纳有几年时间以他的一些宗教画和装饰艺术品而名噪一时。那是在1888—1890年间当贝尔纳和高庚在布列塔尼过从甚密时的产物。贝尔纳不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从那些比他坚强的人那里寻求灵感。与其说他是作为艺术家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活着，倒不如说他是作为塞尚和梵高的听从者而活着。但是尽管贝尔纳设计的镶饰、刺绣和彩色玻璃无疑受保罗·高庚（1845—1903年）的启示——高庚在同一时期做了一些未加修饰的陶瓷用品和木刻浮雕——然而倒是贝尔纳的宗教画感染了高庚，而不是高庚影响了贝尔纳。贝尔纳1890年创作的《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这幅画上，有一些画得过分细瘦的姿态非常紧张的人物，这是受了中世纪的壁毯和彩色玻璃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绘画，却缺乏紧张感。然而，尽管贝尔纳的画在质量上可能远逊于高庚的画，但回复到具有感情含义的题材这一点仍具有重要意义。高庚自己的宗教画，如《雅各与天使摔跤》、《黄色的基督》和《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在形式的紧凑和色彩的强烈方面都与主题相称——尽管毫无疑问他画得不如贝尔纳真实，但的确是如此。否则他怎能画出那幅令人难堪的《基督在花园里》，竟然把基督画成了他自己的肖像呢？在他1888年画的《雅各与天使摔跤》中，他们脚下的土地是大红色的，这是他为

反对他称之为“那个该死的自然”而选择色彩的一个很早的例子，并且纯粹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高庚曾在布列塔尼度过几个夏天，因为在巴黎住过之后，这个地方给了他一种“粗犷而自然”的感觉。农妇们看着和天使摔跤的雅各的形象而祈祷，或者在《黄色的基督》——这幅是偶然间从布列塔尼一幅中世纪的木刻画临摹而来的一一的十字架前祈祷，也表现了有泥土气息的纯朴风格。在这些年里，追求简朴的生活是高庚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使他在1887年去马提尼克岛度过一年，然后在1891年去塔希提岛。他于1893年重返故土，但1895年又永久地定居在那里了。他在热带找到了他长期追求的东西，获得感官上的满足，丰富多彩的风景、妇女和少女们（他不常画男人）在这样的景色中如同盛开的鲜花。造型是简练的，色彩是暖色而不给人以热感，姿态和背景都减少到最低限度。他在塔希提作的这些画的标题都用当地语写在画上，它们的意义常常是象征性的：《亡魂在守候》或《我们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往何处去？》构图使人联想起壁毯的构图，作为背景的风景被大胆地画成平面并简化，人物静静地站着、坐着或躺着，安排得像横幅构图的浮雕饰带上的一样。正是修拉在不久前说起过“人们在浮雕饰带上走动，几乎一丝不挂”。但是高庚的人物世界不像修拉那样是一个玩偶世界。它更加庄重和高尚，足以与塞尚所庄严地安排的那个宇宙相媲美。另一方面，直接的富有感情的感染力，把高庚与梵高联系在一起。他在布列塔尼时，从塞尚得到灵感，因为他看出那对他是有用的，但是他并没有受梵高的影响，虽然他们在1888年年底一起在阿尔度过了后来招致不幸命运的几个月。

二人结成这样的伙伴是梵高的主意，他相信“一群人聚在一起来实现共同的想法”可以补偿19世纪艺术家们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高庚只是一时逢场作戏画画基督教的题材，随即专心致志地享受他的异教徒的世界；文森特·梵高（1853—1890年）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成为画家以前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非专职的传教士。在所有伟大的画家当中，梵高肯定是最没才华的一个。他只是在经过多年顽强而成效不显著的努力之后，才终于掌握了素描和油画。在他获得成就的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绘画中表现的强烈感情也就是凝结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强烈感情。这里所说的强烈感情，在三四年前有时被那些认识他的人说成是疯狂。正是这个梵高在1888年年底确实发了疯，而且在这第一次发作之后，又有多次的发作，以致最终自戕而亡，放弃了他曾经以完全清醒的神志对神志不清醒的行为所进行的斗

争，这一切对我们都无关紧要。他的艺术并不疯狂——并不比格吕内瓦尔德^[12]的更疯狂；他的病只是打破了在他自己的新教徒头脑中的障碍，这种障碍在1888年以前曾使得他的艺术才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他还在巴黎学习的最后日子，到在他和高庚在阿尔的房间里冲上前去要杀死高庚的那一天为止，中间相隔还不到一年。在阿尔的最初几个月是他最幸福地作画的时候，那时他终于获得彻底的解放，而还没有意识到为了这一解放他必须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1886—1888年梵高在巴黎接触到印象派画家，随后又接触到新印象派画家，还有日本艺术。他为第一个帮助他的画商唐居伊老爹作肖像画时，在背景上画了日本版画，但他所受的影响同过去马奈、惠司勒、德加和高庚所受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他来说，日本艺术意味着清晰无阴影的色彩和以犀利的笔法画出的轮廓，所以他能够写道：“我的全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日本艺术为基础的。”当他从巴黎迁到阿尔时，他写信给家中的兄弟说：“我觉得我是在日本。”但是，即使在阿尔，他的作品也丝毫没有日本艺术的那种优雅，那种美妙的明暗谐调；一切都是感情的冲动，是在南方的阳光下狂热地工作的结果。他画12个小时，再睡12个小时，常常忘记吃饭；他工作得“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像一个“在酷热中奋斗”的收割庄稼的人，他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为热情所折磨……像一个在青铜三角祭坛上发布神谕的希腊祭司”。

高庚前往热带，是为了专心致志地去发挥这种发自自然的激情，梵高非常赞同他，以至竟然（赞同地）写道：“绘画的前途肯定是在热带。”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前去，也没有感到必须探索以寓意的、象征的，甚至是宗教的题材来表现它。他羡慕和钦佩高庚的无情的力量和狂热的活力，但那只是很短暂地影响了他。他反对高庚和他的小圈子的那种他称之为“抽象性”的东西，坚持至少他必须保持大自然中的主题，以激发他的思想。他画过一幅《客西马尼》^[13]，但是又把它毁了。他给他兄弟写信说：“他们用他们的‘基督在花园里’这一题材简直把我逼疯了，那儿什么也看不见”，他警告贝尔纳说，他的宗教画可能是“一种虚构”，是“故弄玄虚”。他问道，难道你真的能够把中世纪的缀锦画恢复过来吗？

梵高没有这样做，他从事于描绘周围的风景，画他每天在室内看见的事物，画平凡的物体的静物画，画他的少数几个朋友的肖像画，

但他是以完成一种宗教使命的炽热感情来画它们。他要“用神像头上的光环通常所象征的那种永恒的东西”，“用以实体为模型的圣贤和圣女的肖像……她们会是今天的中产阶级妇女，但又与早期基督徒有些共同之处”，来表现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要以“像你在乡村历书上看见的那些粗糙的版画”那样简单的手法和技巧去画他们。梵高是一个比巴黎和布列塔尼的那些自觉的象征主义者更地道得多的象征主义者。不管他画什么，都含有超出作品本身之外的意思。构图的因素，尤其是色彩的选择，都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当他画一幅夜晚的咖啡馆时，他用“路易十五时期的柔和的绿色的孔雀蓝，与黄绿色和刺眼的蓝绿色对比……形成一种暗淡的硫黄色的气氛……一个简直使人能毁灭自己，发狂，或者自杀的地方”。当他画一幅黄昏时的书店时，他“把正面画成黄色和玫瑰色”，使之在实际上和象征的意义上都成为“光的焦点”。他在一封信里描述了他是怎样给他的朋友（一位诗人）画像的，怎样在最初画出肖像后，开始“把他头发的金黄色夸大”成为“橙色、铬黄色、淡黄色”；用“最浓艳最强烈的蓝色”象征“无限”，以之代替一间普通房间的后壁；这样做，最后达到表现出“我对他的全部爱”的效果。在鲁兰夫人的画像（更以《摇篮曲》著名）中，他想画出一幅作品，“会使得水手们——他们同时又是一些天真的和长期受苦难折磨的人——在他们的船舱里看见它……就会感到过去那种摇晃的感觉又攫住了他们”。

虽然他的肖像画的目的在于宁静，然而他成熟的风景画却自始至终是激动的——1888年时是一种昂扬的情调，以后表现为一种永不停歇地创造的强烈力量，最后有时表现为“极度的孤独”。自然之于梵高，不像它之于塞尚，是秩序；也不像它之于高庚，可以包罗万象并滋生万物；自然之于他是一片混乱。他写信给贝尔纳说，你不能“硬把混乱的东西塞进一个容器，因为它之所以是混乱的，正是因为不能硬把它塞进任何我们能够制成的容器之中。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画出这混乱事物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一匹马，一幅肖像，你的祖母，一些苹果，一幅风景画”。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他面对着户外或室内的任何题材时，便飞快地挥动手上的钢笔或画笔，或如急驰，或如挥鞭，或如锤击；他的颜料涂得又宽又厚，或鲜艳夺目，或炽热如火，同修拉用的颜料一样纯，但从来不是按科学的道理来运用它。新印象派画家给予他的影响是明显的，但那不是他的艺术的最基本的特点。当他到达阿尔时，他已经知道他需要“夸大最基本的特点”。

（高庚在1885年已经说过同样的话：“只有在极端中才能得到拯救”），运用色彩达到了“像彩色玻璃窗”那样的格调。

前面已经说过，贝尔纳在同一时期制作了一幅用彩色玻璃镶嵌的布列塔尼妇女，这和前面也已提到过的他的另一件镶饰所采用的构图一样。合乎理性的构思，当时在英国导致了工艺美术运动的兴起——英国工艺美术品展览协会成立于1888年——它也使这些法国艺术家不十分自觉地走上同一方向。一个普遍的原则是装饰性，虽然就塞尚和梵高而言，人们不大愿意用这个词。但是和印象画派那种虚无缥缈的自然主义相比，塞尚那犹如墙壁饰画一样坚固的表面，和梵高常常以弯曲或向内卷曲的平行线画出的火焰般或漩涡般的有力笔触，同高庚和修拉的“横幅构图”一样，都是装饰艺术。

这些确实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的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从写实主义转变到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一种新信念，和转变到对装饰艺术的一种新信念；这就是说，转变到把一幅油画作为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有机体，而不是作为表现在大自然中所看见的某些事物的一种东西。莫里斯·德尼在他最早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一幅画，实质上是用各种色彩按一定的秩序覆盖的一个平面。”甚至连雷诺阿也在一个短时期内经历了同样的转变。他去意大利旅行之后，为了竭力模仿拉斐尔和安格尔，曾尝试加强他的轮廓，其主要成果是1884—1887年完成的一组精美的《浴女》。不单是法国人渴望回到表现艺术和装饰艺术。在荷兰人扬·托罗普（1859—1928年）的绘画（如1891年创作的《丧失信仰》等）中也出现了神秘的主题和颇长的幽灵似的摇摆着的人物；在斐迪南·贺德勒（1853—1918年）的大幅寓言画（如1890年创作的《夜》等）中，出现了线条分明的比较写实的人物，表现在仪式上舞蹈的人们那种生硬夸张的姿态；在爱德华·蒙克（1863—1944年）的油画、石版画和木刻中出现了表现纯粹感情的主题，如《绝望》《吻》《呼喊》《最后的早晨》等。线条也许表现了过多的含意——蒙克1895年创作的《圣母像》的边框架上竟然有精子的描绘——或许它们仅仅是表现一种模糊的渴望；它们总是起伏不定，总是给人以紧张的感觉。

上述情况可与19世纪最后10年在纯装饰艺术方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运动相提并论。后者在英文和法文中称为“新艺术”（Art Nouveau），在德文中称“青年派艺术”（Jugendstil），在意大利文

中称“自由派艺术”（Stile Liberty）。颇能说明这一运动的特征的是：“青年派艺术”这个名称来自一个杂志的名称，因为装帧书籍的艺术家是最早和最热心地转向新艺术运动的；“自由派艺术”这个名称则来自伦敦的“自由”商店，这家商店起初主要经营远东的货物，因此与英国的装饰艺术复兴运动有关系。英国在这方面确实是先驱，阿瑟·H. 麦克默多（1851—1942年）的《雷恩的伦敦城教堂》^[14]一书的扉页，它上面画的那些盘旋缠绕的枝叶和挤在边框左右两边的两只细长细长的小公鸡，是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新艺术风格的第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年代是1883年。溯其源流无疑来自拉斐尔前派、工艺美术运动、莫里斯的壁纸的风格，以及英国哥特式建筑复兴时期的某些装饰品。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与此相类似的有艾尔弗雷德·吉尔伯特（1854—1934年）的青铜雕塑和装饰，他以创作了皮卡迪利广场^[15]上的厄洛斯（爱神）喷泉（1887—1893年）的雕塑而盛名。这件作品和吉尔伯特的其他同时代的作品上的装饰，同麦克默多的作品上的装饰同样有独创性，同样具有波状起伏的线条，但它们是立体的，并具有一种面团，即熔岩的质感，这又源于其他流派：也许是意大利的样式主义^[16]雕刻和17世纪的荷兰装饰品。但是吉尔伯特的立体作品没有人响应，而麦克默多的平面作品却早就为插图画家和别的版画家，特别是奥布里·比亚兹莱（1872—1898年）所采用。例如，他在1892年创作的《亚瑟王之死》中，用同样的成分炮制出味道异常浓烈但丝毫不利于健康的一剂药，使大陆上的嗜毒者比英国人更加为之陶醉。

比亚兹莱的作品在《画室》杂志第一卷中作为插图发表。该刊创办于1893年，立即在宣传复兴英国装饰艺术和建筑艺术方面居于领导地位。随后不到5年时间，类似的杂志也在法国和德国出现。它们并不总是抱着狭隘的门户之见，同时为印象派画家和后印象派画家，为健康的工艺美术运动和颓废而优雅的唯美主义者，为民间艺术的复兴和使难以捉摸的日本艺术得到理解而进行宣传。各杂志得到各展览组织的支持，其中有属于前面已提到的工艺美术品展览协会举办的展览会，有巴黎的“独立派艺术家沙龙”和同样重要的布鲁塞尔的“二十人沙龙”^[17]（二者都创办于1884年）这一团体举办的展览会。1892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展览会上首次包括了彩色玻璃、刺绣和陶瓷制品——这是高庚和贝尔纳将注意力转向实用艺术4年之后。由于受到英国

工艺美术复兴运动和法国的这个小团体的影响，新印象派画家亨利·范德威尔德（1863—1958年）从绘画转向了工艺设计和建筑。他在1892年创作的插图（为《主日》而作）反映了麦克默多的弯曲或者说有弹性的线条，但是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表现的，而不是取材于自然。的确，新艺术派的装饰品有的是采用植物图案，有的则是抽象的。前者尤见于埃米尔·加莱（1846—1904年）的玻璃制品和他所属的南锡画派^[18]的家具等物，也见于奥托·埃克曼（1865—1902年）的德国书籍装帧艺术；后者则见于范德威尔德，比利时建筑家维克托·霍尔塔（1861—1946年），法国建筑家埃克托尔·吉马尔（1867—1942年）和伟大的苏格兰人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1868—1928年）。但是不论用自然的或抽象的手法，新艺术派的线条总是起伏波动的。它使人联想起鞭梢或花茎，珊瑚或软骨，花丝或蛇体，火焰或泡沫。

新艺术派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物体的表面，它的工作主要是装饰，正如威廉·莫里斯一样。因此新艺术派在版画艺术方面最有力量，在这方面引起一场大革命，不仅影响到插图艺术，而且影响到印刷工艺和招贴画。这方面最优秀的作品是亨利·德·土鲁斯-劳特累克（1864—1901年）和贝加斯塔福兄弟（威廉·尼科尔森爵士，1872—1949年，和詹姆斯·普赖德，1866—1941年）的作品。土鲁斯-劳特累克是效法德加的画家和图案设计家，但又欣赏后印象派画家，并且是威廉·莫里斯的好友，他曾有一次称莫里斯是复兴书籍装帧艺术和一切日用品艺术的“万事通”；他发挥了新艺术派的全部风格和泼辣手法画夜总会里的歌舞明星。贝加斯塔福兄弟却始终保持一种更加严肃的，实际上是更从实用观点出发的鲜明的平面风格。麦克默多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已在纺织品上应用了他在1883年画扉页时用的风格。他也设计家具，不仅以运用新艺术派风格装饰镶板而著称，而且以在细长的柱子顶端像戴帽子似的装一个平扁的凸出檐口而著名。如前所述，用细长的式样代替维多利亚全盛时期所喜爱的笨重式样，已经出现在戈德温受日本艺术影响而设计的“艺术家具”中。范德威尔德为他自己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于克勒的住宅所设计的家具（1895—1896年），也使用了轻巧明快的式样。但是不久他和新艺术派的大多数其他装饰艺术家又转而采取比较宽大，比较富于曲线的式样了。英国人，从麦克默多到欧内斯特·吉姆森（1864—1919年）等工艺美术运动派最优秀的青年匠人与设计师，再一次保持了比较稳健和比较注重

实用的风格，因而实际上置身于新艺术派之外。其风格是复杂的，但是必须加以了解，才能正确评价 1900年前后欧洲装饰艺术的状况。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曾是新艺术运动的先驱。该流派在欧洲大陆的流行则在90年代，这时英国已经离开新艺术运动而转向一种比较注重理性的，不过分奇特的风格，由此才得以产生20世纪的风格。

以上情况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苏格兰，因为格拉斯哥拥有麦金托什，他是所有新艺术派创造家中最杰出的一个人，并且是把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派在嵌板和家具设计方面严格采取长方形样式而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与最新颖的抽象的装饰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人。色彩虽杂乱——白色、珠母色、淡紫色、淡粉色——但是运用这些颜色所表现的结构则是健全的。在1895年至1900年间，麦金托什同他的妻子和妻妹这两个麦克唐纳家的人，同其他许多人一起，使格拉斯哥突然成为欧洲的艺术中心之一。1900年他们在维也纳举行展出，在那里强烈地影响了1898年联合起来创建“分离派”的那些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们。

格拉斯哥画派用木头、玻璃、金属为材料进行创作。在英国以外，新艺术派玻璃艺术品最著名的制作者是前面已提到过的加莱和美国人路易斯·C. 蒂法尼（1848—1933年）。提到新艺术派的金属作品，人们立即会想到保罗-埃米尔·詹森大街上霍尔塔设计的住宅（1892—1893年）^[19]上那些富有幻想意味的铁饰品。铁在19世纪末叶的建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暂时只谈铁在装饰方面的作用。必须与霍尔塔的作品相提并论的有巴黎地下铁道车站粗犷的铁饰品（1900年）和通常称为贝朗热城堡的公寓大楼（1894—1898年）^[20]，两者都出自吉马尔之手。

贝朗热城堡的外观，从其凸肚窗和三角墙以及完全不对称的造型看来，可能是怪诞的，但它是棱角状的，缺少的正是新艺术派风格所特有的那种曲线美的张力。霍尔塔设计的保罗-埃米尔·詹森大街上的住宅的外观也是如此，不过不像前者那么明显，甚至连麦金托什设计的格拉斯哥附近的乡村住宅也是如此，不管它们的构图是多么有独创性和明显的不对称。但是，使麦金托什在职业上获得短暂成功的建筑物——格拉斯哥艺术学院（1897—1899年），在其正面把新艺术派的特色创造性地与大胆的实用主义的特色结合在一起，正如麦金托什在设计室内装饰时所做的那样。画室的大窗户安装着没有装饰线条的窗

框和横竖窗棂；而中间的支柱——不是在正中——上则饰有古怪的花纹图案，有的弯弯曲曲，有的有棱有角，有的轻巧，有的粗重，与窗框和窗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丝毫没有历史循环论的痕迹。附带说一下，在打破历史循环论方面，麦克默多又走在麦金托什的前面。1886年他为他所在的工匠和设计者的行会“世纪协会”制作的一个展览台的正面，就丝毫没有采用过去的题材。全部都是非常细的柱子，柱顶有前面已描述过的那种扁平的盖帽和一个显得很有分量的扁平顶阁楼，也是短柱带有盖帽作为顶饰。但是麦克默多在他的建筑风格方面不久就变得比较稳重了。

从根本上而且毫不含糊地证实新艺术派风格有可能运用于建筑艺术，只能归功于一个人，一个在边远地区和特殊情况下工作的建筑家：安东尼·高迪（1852—1926年）。他住在巴塞罗那，在那里最早设计的是式样奇特的摩尔式-哥特式建筑维森斯大楼（1878—1880年），它那有棱角的形状，外墙的风格，尖长的铁饰品都是粗犷的，而后者已经惊人地接近于新艺术派的风格。从此，高迪的独创性和大胆探索的精神很快发展到越来越高的完全超脱于实用范围的天才的顶峰。继奎尔宫之后是奎尔大教堂的小教堂，奎尔公园^[21]，最后是1905年至1907年在巴塞罗那的两个街区建筑的楼房群，和宏伟但未完成的萨格拉达：法米利亚（Sagrada Familia）^[22]教堂的后几部分。柱子是倾斜的，建筑物上的小尖塔看上去好像洪水时代^[23]以前的怪物或白蚁堆，彩色墙面用碎杯盘和碎瓷片镶成，不仅是房屋正面，甚至每个单元里房间的形状也呈波状，石料则宛若熔岩。

要超出高迪是不可能的，任何模仿他的尝试都必然导致惨败。然而就新艺术派装饰艺术中那些深奥微妙的最突出的作品，如吉马尔和霍尔塔的铁饰品、比亚兹莱的插图，甚至范德威尔德的书桌等等来说，情况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新艺术派的自相矛盾之处。它是由唯美主义者创作，供唯美主义者欣赏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属于19世纪；因为19世纪是艺术脱离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世纪，是艺术成为个人绝技的世纪，是艺术只由行家来欣赏的世纪。但是就其结束了模仿的时期，重新发挥了独创性这一点来说，新艺术派又预示着20世纪的来临。大家公认，摆脱历史循环论是由诺曼·萧和亨利·霍布森·理查森开始的，但是只有新艺术派才彻底表现了这一倾向。这种激进主义不合英国人的口味。查尔斯·安斯利·沃伊齐（1857—1941年）从

萧和早期的麦克默多停止的地方又继续下去，但是他创作的那些十分简单而使人感到亲切的乡间住宅，不管整个外形和各个细部是怎样地简化了，却仍然是源于都铎式的建筑。沃伊齐设计的建筑物，尤其是他为纺织品和家具所作的新颖秀丽的设计，再次在大陆上造成深刻的影响，但与其说是赞成新艺术派，不如说是反对它。如果要最终达到20世纪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或许新艺术派的激进主义是必要的。由于沃伊齐保持了他对都铎式风格的爱好，而萧则在晚年对雷恩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产生了爱好，因此英国在20世纪的头25年走上了折中的道路，脱离了致力于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那些国家的行列。

这些新的解决方法，不论是从哪里找到的，都是对新艺术派的否定，而不是它的继续。新艺术派的激进主义虽然曾经是必要的，但在仅仅10年之后就使新艺术派遭到失败的，也正是这种激进主义。一种艺术风格愈是锋芒毕露于一时，它的寿命也就愈短促。人们会开始感到厌倦，甚至厌恶。维也纳新艺术派的情况就是如此，其结果是出现了20世纪初期的严格的立方形风格，其提倡者是麦金托什，而以约瑟夫·霍夫曼和阿道夫·鲁斯运用得非常自如。柏林的情况也是如此，这表现为彼得·贝伦斯的比较庄重的风格。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均同样地有影响。他建筑工厂和办公楼，不再建筑私人住宅；他设计电壶、电扇和弧光灯等物品，不再是家用家具、纺织品和壁纸。莫里斯鼓吹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社会目的，在这里全部得到表现，正如它们表现在奥古斯特·佩雷在巴黎建筑的早期混凝土建筑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芝加哥周围建筑的长方形和布局开阔的牧场住宅，以及芝加哥的商业建筑一样。

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即并不严格地从它在本时期的重要性来看——芝加哥的商业建筑确实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令人感兴趣的大事。最清楚地看出它的问题，并以最精湛的美学造诣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建筑家，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尊敬的大师”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年）。由于地价昂贵，也由于宣传的目的，美国发明了摩天大楼。起初那只不过是一幢高大的砖石建筑，但1884年在芝加哥采用了铁架结构，用柱子和桁梁支撑建筑物，其间的空隙处装以玻璃或别的轻型材料。作为使用铁和玻璃的能手，欧洲的工程师则领先于美国工程师。水晶宫于1851年落成，全部1850英尺在5个月内就

竖立了起来；而 1863—1865年建成的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站台天棚是当时跨度最大的建筑物，达240英尺。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机械陈列馆又超过了它；这幢非常优美的建筑物跨度达385英尺。居斯塔夫·埃菲尔为同一博览会建造了埃菲尔铁塔，这是人类到那时为止建造的最高建筑物。

但是这些并不是建筑家的作品。有声誉的建筑家都表现出一个特点，他们避免参与这种发展。人们当记得，莫里斯是憎恨机器和工业的成果的，罗斯金则厌恶水晶宫。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这位维多利亚全盛时代最有成就的英国建筑家，口头上称赞金属结构的用途，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它。1864年在利物浦建成的奥里尔办公楼（Oriell Chambers）是由一位不知名的建筑师彼得·埃利斯设计的，这是一座最卓越的维多利亚全盛时期式的建筑物，其中铁和玻璃发挥了主要作用。第一个掌握了新技术的应用并为之找到一种适当的建筑形式的天才建筑家是沙利文。1890—1891年他在圣路易斯建筑的温赖特大厦是一个方格结构，严格地强调分格式结构和分格式用法。沙利文并不坚持反对装饰；相反，他曾经于1888年，在一幢他早期设计的建筑物“大礼堂”（Auditorium）的内部采用了非常新颖的羽状装饰，这几乎和高迪在同一时期的装饰设计一样，成为新艺术派风格的前驱。但是他劝告他的同代人“在一年当中完全避免使用装饰，以便我们能够将思想敏锐地集中于建造没有任何点缀也美观的建筑物”。这正是20世纪所发生的事情。

本章所叙述的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30年，的确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写实主义最终升华为印象主义。塞尚和梵高，高庚和修拉，托罗普和蒙克都脱离了写实主义，20世纪继续进入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韦布和诺曼·萧和亨利·理查森使历史循环论达到最后的完美境界。沙利文、麦金托什、高迪则与历史决裂。新艺术派的装饰艺术家也是如此。

但是从画家和建筑家手里继承下来的20世纪，既继承了福，也继承了祸。建筑学和设计艺术，由于它们所继承的遗产，得以形成一种表现新的世纪并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和接受的风格。然而绘画和雕刻却被推进了甚至更加孤独的境界，比塞尚、高庚和梵高的孤独的命运有过之而无不及。抽象化使建筑学成为一种通用的工具；它却使绘画与雕刻成为一种完全是表现个人的东西，几乎不再能将其含义确实无疑

地传达给别人。20世纪最初30多年的艺术和建筑，虽然不可能在这里加以探讨，但也只能是根据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来加以讨论。

（宋蜀碧 译）

[1] 伦敦附近的一个火车站。——译者

[2] 巴黎附近的一个火车站。——译者

[3] 19世纪30至70年代盛行的法国风景画派，以其活动中心在巴比丛村而得名。——译者

[4] 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联邦军舰“基尔萨奇”号于1864年6月19日击沉南部同盟军舰“亚拉巴马”号的战斗。——译者

[5] 官方的沙龙，指一度在巴黎举行的当代画家作品展览会。——译者

[6] 这些都是宗教和世俗的题材，曾为印象派以前的画家所采用。——译者

[7] 原文为“Ars Longa, Vita Brevis”。——译者

[8]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合作的喜歌剧。——译者

[9] 阿伯特纪念堂（Albert Hall），1871年建成的伦敦圆形剧场。以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亲王的名字命名。——译者

[10] 英格兰中东部城镇，第一个花园城市。——译者

[11] 钱特利爵士（Sir Francis Legatt Chantrey, 1781—1841年），英国雕塑家和画家，死后将遗产大部捐赠给皇家艺术院，作为购买名画的基金。——译者

[12] 格吕内瓦尔德（1455—1528年），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画家。——译者

[13] 客西马尼（Gethsemane），耶路撒冷附近的花园，耶稣被出卖后被捕处。——译者

[14] 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年），英国建筑家，设计并负责建成了圣保罗大教堂等五十余座伦敦教堂。——译者

[15] 伦敦的交通和娱乐中心。——译者

[16] 样式主义（Mannerism），一译风格主义，流行于17世纪的欧洲，人物形象较夸张和矫揉造作。——译者

[17] “二十人沙龙”（Les Vingt或Société des Vingt），1884—1893年比利时的一个象征主义画派。——译者

[18] 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当地有著名的美术博物馆和美术学院。——译者

[\[19\]](#) 指布鲁塞尔的“塔塞尔住宅楼”（Tassel House），这座建筑被认为最新艺术派风格的代表作。——译者

[\[20\]](#) 贝朗热城堡（Castel Béranger），在巴黎拉封丹大街。——译者

[\[21\]](#) 这些建筑均在巴塞罗那。——译者

[\[22\]](#) 意为“圣家族”，指圣母玛利亚、约瑟和婴儿时的耶稣。——译者

[\[23\]](#) 指基督教《圣经》中洪水灭世时代。——译者

第七章 教育

全世界的教育在这30年中呈现出某种相似的特点，使我们能够超越国界一并加以研究。因此，我们不必逐一地研究各个国家的情况，只需研究某一特定国家不时表现出的教育的各个方面。

研究教育的发展和内容，只能采用社会生态学的方法。各种教育制度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它们影响社会、政治、知识界和宗教界的结构以及当时的运动，而且也受到它们的影响。19世纪最后30多年的情况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如此。这是一个欧洲、美洲、中国和远东兵连祸结的时期。这是一个工业大发展和工人阶级跃居重要地位的时期。这是一个欧洲扩张到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时期。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期。教会，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中，也相继失去它对生活与思想的各个领域的控制。教育已成为一种公民权利，从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关心的事业，而不再是仅仅为私人和地方所关怀的事业。

教育最早的目的之一（这种目的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个时代），是训练一批具有行政管理才能的社会杰出人才^[1]。这种认为有地位就有才能的对待教育的态度，迟迟未能改变。直到19世纪，各地才认识到应该以培养“教育”杰出人才来代替单纯培养社会杰出人才。但甚至在1870年以后，从培养社会杰出人才过渡到培养教育杰出人才的过程也只取得缓慢的进展。

也许英国的“公”学^[2]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这种学校由于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年）在拉格比进行的改革而获得新生；但是，本世纪中叶科学的发展和对捐款越来越多的批评，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不足之处。因而成立了克拉伦敦委员会（1861—1864年），对9所较大的公学进行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这些公学实际并无任何不妥之处。的确，“英国人民对于这些学校培养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这些优秀品质所怀抱的感激之情，是无法估计的。这些优秀品质有：他们治人和克己的能力，他们把自由与秩序结合起来的才能，他们热心公益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和英雄果断的性格，他们坚定地尊重舆论但又不盲从，他们热爱有益的体育活动和锻炼……他们也许在塑造英国

绅士的品格方面，尽了最大的一分力量”。这些美好的情操在1868年的公学法中得到应有的肯定；然而，这个法案只涉及9所公学中的7所学校的委托书，并未做出任何有关检查或监督的安排，这就使得学校校长对教师们处于一种完全独断专行的地位。

考虑到1864年英国已有大批靠捐款兴办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3]，其中有一些早在11世纪即已创立，所以上述7所学校为数并不多。因此，1864年又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以调查不包括在女王陛下原有的两个委员会（1859年的纽卡斯尔委员会和1861年的克拉伦敦委员会）调查范围内的各学校的教育情况”。这个极其重要的委员会（称汤顿委员会或学校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20卷，包括对800多所用捐款兴办的学校的调查和对147位证人的询问。虽然委员们主要关心的是捐款的使用情况，但是他们也草拟了一份国民教育计划，其中初步涉及今后的发展，并且也认识到用现代的课程代替古典课程的迫切性。为了实施他们的建议，他们主张设立一个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主管体系。对所有的学校都应进行审查，教师应仿效法国教师在师范学校接受训练的方法加以培训。至少在这一范围内，委员们已经摒弃了训练社会杰出人才的想法。

虽然，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人心目中的杰出人才是知识界的而非社会上的；这种对于杰出人才的想法，与其说是英国教育的一种特色，不如说是法国教育的特色。或许这是由于法国有一个中央主管教育的部门，可以组织各级教育，而在英国，一直到1900年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才出现了这样一个中央主管部门。在法国是没有教育捐款的。它们早被大革命一扫而光，因此私立学校几乎都掌握在教会的手中；教会为穷人开办学校，也为有钱人开办学校。当国家接管时，这种分离制度就永远保持下来；法国的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制度，不可以从低一级转入高一级。

德国制订培养杰出人才的计划，与法国的多少有所不同。这种计划是与进入大学相联系的。只有文科中学（Gymnasium）毕业的学生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大学他们所选择的科系。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毕业的学生不能进神学院，高等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4]毕业生则不能进医学院和神学院。

专门为培养杰出人才而设置的学校由于收费昂贵而且社会地位优越，不可避免地具有排他性；除此之外，古典课程又进一步设置了一道障碍，从各方面把它们与外部世界的新的爱好隔绝开来。工业和社会的状况在不断变化，日益促进现代学科的设置，但是这方面的变化也仍然是姗姗来迟。在英国，克拉伦敦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忘记了时代已经改变，因为他们对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可以陶冶人的灵魂这一点似乎抱着极深的感情。1869年，爱德华·鲍恩（1836—1901年）在哈罗公学创设了“现代课程”，在英国公学中开风气之先，当时人们认为他在学术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在法国，对这方面的强调甚至比在英国更加明显，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在英国那样由于各种社会方面的考虑而变得复杂。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哲学和政治的传统也要求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受古典学科的熏陶。“现代学科”是功利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对于工商业来说诚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地位却在古典学科之下。然而，1890年的利鲍委员会在肯定古典课程的同时，也对这种不平等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完全不公平”。

在远东，出现了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运动，反对仅仅训练社会杰出人才的旧观念。在印度，推行的教育是（英国的）统治者阶级的教育，并且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是用英文施教的。这是一种把杰出人才与人民群众割裂开来的政策。这时，一种新型的杰出人才出现了，它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教育的，而是民族主义的。雅利安人协会大约建立于1875年，第一次印度国民大会1885年在孟买举行。在孟加拉建立了完全是印度的国民学校，课程的基础是印度的历史、文学和宗教。在日本，没有外国政府把事情弄得复杂化；1867年德川幕府垮台后，全国热烈地向往着西方的教育方针。天皇宣布，政府以后将任人唯贤，而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新的杰出人才应以教育程度为基础。中国这一时期也向西方学习。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是以中国的经典著作作为基础的，但是自从1861年开办两所现代高等学校（一所在北京，一所在广州）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坚定地追随西方教育的运动，这一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促成的。中国被日本人打败（这是由于日本已经西方化）后，总督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之惟一希望》（1895年）[\[5\]](#)，强烈地支持这一运动。

能够更好地说明欧洲人的教育宗旨的，莫过于非洲那些欧洲人的政府能够毫无阻拦地为所欲为的地区了。19世纪的政策（如果可以称之为政策的话），就是把当地居民中比较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变成欧洲人，虽然不同的政府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在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有着由达勒姆大学出资经办的古典方式的高等教育的悠久传统。其他地方，如在莫桑比克，教育的目的仅仅在于给白人造就合格而驯服的仆人。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远远超过英国，把受教育机会的大门敞得更开。在法国各领地，当地学校的精英被送往巴黎去完成他们的学业，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把这些杰出人才培养成非洲的文官。同样，比利时人则把他们最有前途的学生从刚果送往布鲁塞尔。

因此，殖民地人民受教育的目的有所不同，或者是使非洲的杰出人才与欧洲政府联系在一起，或者是产生更有效率的劳动大军。初等教育和教师的培养，绝大部分是在传教团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掌握之中，而已有的高等教育则由政府予以津贴。直到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盛大的传教士大会之后，各殖民地民族才开始把教育的目的作为本地人民自身道德上、体格上和精神上的发展而加以接受。

1850年以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现代新型大学的发展和旧式大学的改革，是由培养社会杰出人才缓慢地转变为培养教育杰出人才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约翰·亨利·纽曼（1800—1890年）在其《大学教育论文集》中颂扬了英国两所古老大学的导师制和学生住宿制。这种制度是按照旧式的手工业行会制定的。但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它们有着教权和英国国教的浓厚气息，并由各学院的独身院长组成的严密团体所控制。1854年和1856年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曾为这两所大学制定了比较民主的章程。1871年的考试法废除了全部宗教考试，只有要想获得神学学位者除外；现在连这些考试也已取消。但是这两所古老的大学仍然不能使一些人满意。

在19世纪，手工业同业公会的师徒关系让位于雇佣关系。由于认为教育是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这一看法的发展，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教育中。伦敦大学代表了这种新的精神。该校实际创办人布鲁厄姆勋爵——皮科克的小说中的“博学的朋友”——是一位苏格兰人，他极力主张伦敦大学应尽可能地不同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它应废除宗

教考试，实行授课制而不是导师制，也不应实行住宿制度。经过一段十分激烈的变动之后，该校于1858年进行改组，成为一所仅仅是授予学位的考核机构；各学院之间互不联系，教学上各自为政。1889年和1894年的另外两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颁布了1900年的法令，以典型的英国方式，决定同时实行它可以采用的两种办法。这所大学成为既是对内的又是对外的，即对内对外均可授予学位，同时又是一所进行教学的大学。尽管伦敦大学在其初期采取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商业的态度，它对英国的高等教育，甚至对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多数现代英国大学起初都是为取得伦敦大学校外学位做准备的学院，因而能够有一种现成的得到公认的标准作为起点。甚至远在蒙特利尔和锡兰的高等学院也由于它们与伦敦大学的联系而得到了好处。

英国大多数新的大学学院，都成立于1870年以后的时期，创办人的精神可以用乔塞亚·梅森的目标来说明，他于1880年在伯明翰创办了他的学院。他的目标是“促进全面的、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使之适合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工业在实践、机械和艺术方面的要求……取消纯文学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全部神学教学”。1881年，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的各学院结合起来成立联合制的维多利亚大学，但是在约瑟夫·张伯伦将伯明翰学院改为伯明翰大学——英国第一所“市立”大学——以后，维多利亚大学取消了联合制，从此以后，所有后来成立的大学学院都获得了独立的大学地位。

威尔士大学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仍然是按照联合制的计划而建立的。威尔士是一个讲两种语言的地区，但是与瑞士的情况不同，它的一种语言只在威尔士地区内使用。和其他地方一样，它在南北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多山地带又分为更小的带有浓厚个体主义色彩的小单位。威尔士在另一方面又分为信仰英国国教和不信奉国教者；而在不信奉国教者之间又另外分为公理会教徒和加尔文卫理公会教徒。在这种形势下，联合的唯一纽带只是威尔士本身的爱国主义；1872年在阿伯里斯威思建立一所学院的运动，给了它一个目标。随后1883年在加的夫，1883年在班戈，又相继建立了学院。1893年在弗里亚姆·琼斯的鼓励下，这三所学院联合成为威尔士大学，这所大学立即成为威尔士民族主义的中心。

当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发展新的大学和学院的时候，苏格兰则仍然只有4所古老的大学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4所大学是圣安德鲁斯大学（1411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年）、阿伯丁大学（1494年）和爱丁堡大学（1582年）。这些大学一开始就是按照大陆的模式而不是按照牛津和剑桥的模式创办的，这或许是由于苏格兰人和法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但是，苏格兰的大学的体制不同于大陆体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与国民学校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德国的体制中，大学是一切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它规定接受学生的条件，而小学教育则被忽视。同样，法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完全平行地进行的，彼此从不交叉。苏格兰的大学则是纳入学校体制之中的，正因为在中小学一级不存在为培养杰出人才而设置的专门教育，所以乡村子弟若立志进入大学，是没有障碍的。大量的大学新生直接来自初等学校。

英国也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马克·帕蒂森（1813—1884年）写了两篇关于改革大学的著名论文（1868年和1876年），强调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指责当时流行的做法，即把大学作为仅仅是成年的中小学生对应付考试而临时突击功课的业余补习学校。大学的目的是“广泛地涉猎知识，训练科学的头脑，并使各种智能协调一致”。

在美国，个人的进取精神在高等教育、特别在大学中是很明显的。这个时期创办的著名大学是康奈尔大学。它的创立应归功于埃兹拉·康奈尔与该校第一任校长安德鲁·怀特的合作。怀特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提出三点理由，证明这一新的大胆尝试是正确的。第一，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政策应该是分散人力财力，但对于大学教育，则应该是集中人力财力。第二，各自为政的学院不符合这种工作要求。第三，高等教育的任何机构应是整个公共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大学与中小学体系的整体性，怀特把为128个议会选区的每一个区提供4个“州奖学金”名额这一条写入了章程。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当时存在的大学获得了新生。这次振兴首先应归功于一批卓越的校长们的努力，怀特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是耶鲁大学的诺亚·波特（1871年），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186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麦科什（1868年），密执安大学的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1871年）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1875年）。其次，应归功于“青年耶鲁运

动”，其目的在于学科的自由化和校友参与学院的管理（因为这方面的安排并不总是适当的）。再次，1862年通过了莫里尔法，根据这一法案，由政府授予土地，帮助设立了农学院和工学院。农业必须打破仅凭经验的做法，而要合乎科学。艾萨克·罗伯茨（1874—1903年）担任校长时的康奈尔大学，在这方面起了示范作用。工学院则已有了比较好的开端，麻省理工学院在南北战争前即已创立。但是靠政府授予土地而开办的学院并不仅限于这些学科，也不限于招收男生。尽管发生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但这些学院仍在不断增加，课程也在扩大。阿萨·格雷、路易·阿加西兹、克拉伦斯·金、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和刘易斯·摩尔根，虽然并不都是名列前茅的科学家，但他们却使科学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修课程。

这一时期，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有的大学朝着掌握更大的行动自由或摆脱教会的控制（这通常是一回事）并朝着设置技术课程这个方向前进。新的大学应地方的要求而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许多学院，比如苏黎世的学院，开始时是技术学院，这时也沿着大学的道路发展起来。1873年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仿效牛津大学1871年的做法，废除了教义考试。1879年爱尔兰的皇家大学成立，贝尔法斯特、科克和高尔韦的三所女王学院便和它联合起来；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都柏林创办了另一所大学，贝尔法斯特也创办了一所新大学。在瑞士，著名的日内瓦专科学校于1876年成为一所大学，随后洛桑神学院也于1891年成为大学。1889年在弗里堡成立了一所新大学，是特地为弗里堡州设立的。一所大学与一个特定地区的结合，标志着早先的观念有了改变，英国的“市立”大学也许是这种结合最为突出的例子。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大学——隆德、乌普萨拉、克里斯蒂安尼亚和哥本哈根——都继续与国家所信奉的路德教教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种族和宗教的因素在比利时各大学的发展中是很突出的，虽则在荷兰并不这样，那里于1877年成立了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加拿大，不仅要顾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而且要顾忌新教徒本身内部也存在着的教派分歧，这就影响了大学教育的发展，比如多伦多大学就在章程中规定允许卫理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和英国圣公会中的“高教派”与“低教派”的教徒入学。“与教会有关系的学院”的情况也相类似，这种学院正是美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南非，斯泰伦博希的荷兰新教学院正在成为一所单纯使用阿非利卡语的大学。1874年好望角大学按照伦敦大学的方式，只授予学

位而不管学生是什么学院毕业的；悉尼大学也是采取同样方式，但它在1884年开始对所属各学院的毕业生授予学位。新西兰大学创办于1870年，将设在奥克兰、克赖斯特彻奇和奥塔哥的各学院作为自己的下属学院。

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权，已载入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一个进程的顶点，即教育的逐步世俗化并从宗教与慈善团体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同时，“国家”这个常常用作贬义并通常表示“政府”的概念，已开始为一个更加有机的概念所代替，即国家是通过它所挑选出的官员进行活动的整个社会群体。因此，这一时期流行的那种反对意见，即认为国家教育是教育“另外一些人的孩子”的，也逐渐地被认识到是错误的了。

在英国，除了“公学”和许多为上等和中等阶级设置的私人学校以外，还有为劳动阶级设立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慈善事业的成果，并且大部分是属于“全国协会”（1810年）的英国国教学校和属于“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1808年）的非教派学校。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开始于1833年，并且只限于向这两个协会提出补助金，虽然主管官员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设法使这项补助金用于提高整个教育的水平。然而，经过修订的1862年的教育法规，却规定这项补助金需根据考核结果而定，考核失败将导致学校失去补助金。这就是根据考核结果来决定是否发给补助的制度，这一制度在英国一直实行到1895年。教育显然成为一种商品，因此可按商品来估价。

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给各教育协会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内尽可能开办更多的小学校。在不可能办到的地方，则由纳税人成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开办一所公立小学，以每英镑抽三便士的地方税作为资助金。根据1880年的一项法令，无论是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小学或是教会办的小学，都是义务教育。1870年的法令标志着在英国第一次出现了为教育规定的法定权力和教会与私人对教育控制的削弱。这并非出于任何反宗教的情绪，而纯粹是由于经费不能从私人那里筹措。这种被人称为“世俗的解决办法”，目的在于消除教权的控制，对课程中的宗教内容的处理，只是次要的问题。最坚决主张在小学讲授圣经的，恰恰是最令人信服的主张“世俗的解决办法”的人物之一——托马斯·赫胥黎。但是，教士方面反对由非神职人员担任宗教课的教学工

作，迪斯累里也在辩论中指责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神职阶级”，即教师。

在英国，由国家控制教育之所以进展迟缓，有各种原因。第一，是由于英国人的妥协的性格。第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根深蒂固地认为阶级差别是神的安排。第三，迟迟未认识到教育的必然结果，那就是要求得到更多的教育。没有人能下令停止，说“到此止步”。第四，这样一种信念无法根除，即教育是一种私人的事情，父母在这方面的权利应不容侵犯。第五，缺乏适当的地方政府机构，而英国人又不喜欢为某一问题而专门设置相关的机构。直到1888年根据议会法建立起郡议会，才有了合适的地方当局。

教会并不是反对发展初等教育的唯一的方面。雇主们为反对普及教育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因为推行这种普及教育使得半工半读就业得到了法律的认可。1876年的一项法令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为固定职工，规定全日劳力的年龄为13岁。1901年，半工半读的年龄提高到12岁。1918年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年龄规定为14岁，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禁止一切固定就业。同年取消全部学费。

在这里把英格兰和苏格兰做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早在16世纪，苏格兰就要求每个教会或教区设立一所教授基础课和拉丁文的学校，毕业于这种学校的比较有才能的学生，不论贫富，都可升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直到全体国民都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这个实际上是“政治性的”目的，虽然也包括在教会的教育目的之中，但是只要它被接受，从长远看来，必然要导致脱离教会的控制。特别是城市，在教权的控制下，日益动荡不安起来。阶级差别的消失，使教育成为人人关心的事；有趣的是，在1872年的苏格兰教育法中，把“初等”一词从标题上删去，因为它带有十分浓厚的英格兰人那种谄上傲下的势利眼气味。教育儿童并不像在英格兰那样被人当作一种几乎是低人一等的职业。像“迪克遗赠”（1828年）那样的信托财产，甚至最简陋的乡村小学校也能得到它的益处。

苏格兰是一个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比英格兰较为一致的国家，甚至教权的控制也不像英格兰那样形成一个统治阶级。然而，1872年的法令剥夺了长老会长期行使的视察权，1861年的市镇和教区学校法即已废除了教师必须赞同教义陈述的要求。此外，苏格兰是最早成立

教师联合会，将之作为取得教师身份的必要步骤的国家之一。苏格兰教育学院创办于1847年，并于1851年获得许可证。各教师联合会又把第三个因素引进了争取教育控制权的斗争中来。由于职业上的利益，这样的联合会既不站在教会一边，也不站在政府一边，不过它们的存在是有助于实现教育与教会分离的趋势的。

丹麦、法国和瑞士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教师联合会。在英国，1856年成立的教师学院是一个比较具有学术性的机构，但1870年成立的全国教师联盟则为了教师这个阶层的利益而并不放弃使用政治压力。在美国，贺拉斯·曼和亨利·巴纳德于1849年建立了教育之友全国协会，它在经过种种内部变革之后，于1870年成为全国教育协会。但这并不妨碍各州有自己的联合会，1847年成立于罗得岛的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教育的世俗化根据各地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在美国，政教分离是载入宪法的，因而也无所谓国教；教育中的政教关系之所以为人关注，与其说是由于对教育的控制权问题，不如说是由于教育的经费问题。在这方面，北方和南方之间以及各州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在南方，南北战争以前，主教区和乡村的教育都被视为家长和教会的私事。南北战争破坏了这种原始制度。此外，奴隶从一种重要的财产变为一种严重的负担，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某种行动。然而联邦政府援助南方教育的一切尝试却深为人们所不满，虽则南方人并不是不屑于接受像1867年建立的皮博迪教育基金会这样的私人财源的帮助。给予400万主要是文盲的黑人以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平等，这就造成一种困难而危险的局势。政府为帮助黑人而设立的自由民局，在南方非常不得人心，因为它是由北方人管理的。此外，它开始帮助的是那些在教育阶梯的顶端而不是底层的人；而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867年创办了亚特兰大大学。菲斯克大学于1890年创办于纳什维尔。这项政策受到自由民中比较有野心的人物的欢迎，对他们来说，受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育，就是与白人平等的标志。但是像布克·华盛顿（1858—1915年）这样比较有远见的领袖，却认为黑人首先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解放，要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创造财富，而财富只能通过工农业方面的训练来创造。华盛顿本人就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阿姆斯特朗将军的农业学院受过训练，他在1881年成为亚拉巴马州

特斯基吉的一所农业学院的院长。黑人知识分子瞧不起这些学校，认为它们把黑人限制在体力劳动上，但是显然两种类型的发展都是需要的，因为南方的黑人和南方的白人都不是由一种人组成的。

在北方各州，促进教育发展的一般性团体到处出现。这里也和南方一样，城乡地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城市地区希望教育应由税收中拨给经费，由公家管理，不属于任何教派，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因此，在这里州当局不是同联邦当局做斗争，而是不得不同成百上千个要求各自为政的小集体做斗争。但是，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最后是经费的需要决定了教育应由谁管理。纽约是第一个由州当局设置公立小学督学的州。到1861年34个州中有28个州的教育已经由州管理。教会当局逐渐被排挤出州的体制以外；除西弗吉尼亚以外，没有一个在1858年以后加入合众国的州在其宪法中有与入教会学校有关的任何规定。

这种教育世俗化的进程，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开始是和英国一样，给各教派团体津贴，1858年在新南威尔士结束了这一制度，到1863年就在整个大陆结束了这一制度。在丹麦，从17世纪以来教育基本上一直是政府管理的事务。丹麦普及教育的真正缔结者霍尔伯格（1684—1754年）曾经宣称：“孩子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必须先成为人。”

法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因为法国虽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它的教育制度却是由共和国制定的，而共和国奉行由世俗人办世俗教育的制度。共和派要求实行义务的、世俗的和免费的教育，讲授不受教会支配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右翼则支持教会在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于是学校的管理、津贴、课程设置和教师的地位都受到法国政局左右摇摆的影响。然而，法国在1871年战败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更多的钱用于学校，在朱尔·费里（1832—1893年）担任国民教育部部长期间，初等教育成为世俗的、免费的义务教育。1901年，所有的宗教团体都需申请政府批准才能继续办学。1904年，在孔布执政期间，各宗教团体在神职人员指导下进行的一切教学都被禁止。

瑞士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政治骚动之后，着手解决教育中的政教问题。1874年，伯尔尼州获得了政府超越教会之上的权利，而日内瓦则要求教士宣誓效忠于宪法。1874年的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把教育完

全置于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下，并授权联邦对没有履行义务的各州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德国，教育世俗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所有各邦的教育在浪漫主义复兴的全盛时期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种新兴的人文主义是与教权控制针锋相对的。但是，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结局是极端的反动。有关学校的新规定，以小小的乡村小学校作为准则，而在这种乡村小学里，是连一点革命热情的气味也不可能有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年）给政局带来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这种气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笃信君权神授，在他看来，不仅教会，就连国家也是上帝的仆从，因此全国每一所小学都被卷进政治中去。然而，福尔克在1872至1879年间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却把责任完全放在国家的肩上。教会管理初等教育的权力被取消了，这项工作交由政府官员担任的督学负责。这样做也影响了课程。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召开的一次教育会议上，极力主张设置现代学科，不仅反对学习古代的经典著作，甚至也反对学习德国的经典著作。他说，学习经典著作已经产生了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但这根本不是新的帝国所需要的。歌德的民族性格的思想，让位于俾斯麦的个人服从国家的主张。

因此，德国的政教关系，在欧洲国家中有其独特的方面。除了已取消教会的控制权之外，很难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世俗化，因为国家现在既然是一个神秘的神授“人物”，国家的控制就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而且也是宗教方面的。这一点从强调爱国主义以及从义务兵役制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看出。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个男教师都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代表。

在比较落后的欧洲国家中，至少初等教育仍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教会的控制之下。比如，在俄国，当时所存在的初等教育是在东正教最高会议与当地神父的管理之下的。教师不需要教学证明书，神父又是那样忙于他们的教区事务，以致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样的教育几乎纯粹是职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只限于比较富有的阶级，其特点是对自然科学和西方的政治思想抱着很大的怀疑。一直到俄国被日本打败，发生了1905年革命以后，教育才有了普遍的发展。即使在比利时，虽然政府在1878年接管了全部公立学校，神职人员仍然进行抵制，并拒绝赦免“不信上帝的”学校的教师的罪。1884

年天主教党政府掌权，又一反前届政府的做法。在西班牙，185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但是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直到20世纪初期，大部分人仍然是文盲。1902年萨加斯塔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私立学校和学院需经政府批准，并接受政府的检查。但是在阿方索十三世即位后，教会的势力又占了上风。类似的势力在葡萄牙也起着作用，那里甚至更早在1844年即已宣布7岁至15岁的儿童须受义务教育。但是这项法律也是一纸空文，它的目标在政教斗争中根本无法实现。

马修·阿诺德借他在1861年给纽卡斯尔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报告的机会，使他们注意到大多数人还认识不到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我深信，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将在千万人的心中激发起他们想象不到的感激之情，如果他们能够在拿出在初等教育方面付出辛勤劳动的成果的同时，又对政府说，‘注意不久将来的需要，组织你们的中等教育’的话。”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者的口号。

但是，大多数国家已经有一套掌握在私人手中和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中等教育体系，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英国有为少数阶层的人所设立的它所谓的“公学”。在法国，中学与小学学制是不相连的，由家长决定他们的子女是进中学还是进小学，一旦决定下来就不能再跨越。在苏格兰，已经有一条从教区学校直接升入大学的道路，因此如果政府举办中等教育，那就等于是从大学降低一部分或从小学上升一部分，两种变动都是一样。而一旦中等学校办起来时，立刻就会同专科院校和市镇学校处于同样的地位，因为这两种学校里都有与之同等班级的学生。

还有另一层困难。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初等教育的延续，即比原规定的课程稍微多一点呢，还是完全应该是另一回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相同呢？它应该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吗？它应该由个人所属的阶级来决定吗？如果是这样，应该是教育他去适合他的那个阶级呢，还是应该帮助他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上升呢？

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在英国产生了一种要求进一步受教育的渴望，在家长愿望非常强烈的地区，一些公立小学自己在小学校里开办了较高的班次，而伦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教育委员会甚至开办了“高等小学”。这一切当然都是完全非法的，因为这是将公共经费用于教

育法批准的范围以外的更加广泛的目的了。但是，与这件事有关的不仅是父母。师范学院开始认识到需要有比小学所提供的更高的入学标准。同时也发现孩子们把进师范学院作为获得高等教育的途径，而不管他们以后是否会去教书。大学学院的设立，再次说明需要有中等教育作为基础，特别是在讲授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势力联合在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

教育部门的一位官员罗伯特·莫兰特爵士向政府审计官科克顿提供了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科克顿因此就向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征收额外的款项，以弥补他们为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提供的教育费用。地方教育委员会上诉失败。此案被称为“科克顿判决案”，成为法律上的一个判例。

这件事促进了立法。必须使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做法合法化。但是这只有在更大的计划范围内才能做到。当然，一个困难就是除非在大城市，地方教育委员会单位太小，不能处理超出初等教育范围的任何事情。但是，1888年设立了新的地方政府机构，即郡议会，如前所述，这些新的机构几乎立即受权负责它们地区内的技术教育，从威士忌酒的税收余额中给予津贴。然而，中等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用这种零打碎敲的办法来解决。于是在1894年指派了布赖斯委员会考虑这个问题。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郡议会于1902年成为所辖地区各类教育的主管机构，并于1900年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作为在议会之下主管教育的中央权力机构。1944年，教育委员会改为教育部，从而取得与其他各部平行的地位。

在威尔士，组织中等教育是困难的，因为乡村人口过于分散。1889年通过了中间教育法，这项法案规定设立一种新型的走读学校，不过不如在布雷肯、班戈和兰多维里已有的3所文法学校那么有远大的目标。到1895年，已经建立了30所这样的学校。这时感到郡一级的机构已不适于管理这项新的事业了；虽然约翰·里斯爵士和弗里亚姆·琼斯希望由大学来管理这类学校，但1896年还是单独成立了一个威尔士中央教员委员会。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离它的主管对象很远，因而倾向于强调考试结果。不过1899年的法案规定为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教育委员会，1902年的法案又应允为中等教育设立一个更加实际的机构，于是这些缺陷也就克服了。

在苏格兰，也设立了各地的地方教育委员会，不过到1918年才取消。苏格兰实际上长期以来就有一个从教区学校到大学的全国教育体系。但是，也非常需要由政府主办的中等学校，于是阿盖尔委员会（1864—1868年）便被任命去调查苏格兰的全部学校，包括中学在内。在所有这些学校中，全苏格兰只有5所算得上是中等学校，因为其余所有的学校都是“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合而为一”的。“市镇学校”的课程非常注重古典学科，而“专科院校”开始时是讲授科学和商业课程的，虽然到1864年它们与市镇学校或文法学校的差别已不很大。如前所述，1872年的法案设立了地方教育委员会，并且给了它们一年的期限为他们所辖地区的教育提供全部需要，然后给各民办团体以机会来弥补其不足，并为此目的给予补助。英格兰的安排恰恰相反，首先给民办团体以机会，但在建校方面则不给予帮助。

苏格兰各地的地方教育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对它们所负的责任有比较广泛的见解，但是1862年的修订教育法规对教区学校多少有一些不利的影响。虽然修订法规使苏格兰受到的挫伤从来不像英格兰那样严重，但一些高级课程也减少了。于是，指派科尔布鲁克委员会对苏格兰的全部教育捐款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颁布了1878年的捐款管理法，该法授权设立一个7人常设委员会来决定捐款的用途，对高等教育特别给予关注。

德国的中等教育是沿着中产阶级的路线发展的，但是几乎比任何别的国家更多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实科学学校在德国中等教育中与文科中学一样，成为永久的可供选择的学校。这是中产阶级从教会和贵族的控制下获得解放的象征。同时，比这程度较低的中等学校^[6]实际上是高等小学而不是中学，它是从国民学校发展而来的，就像在英国高等小学是从小学发展而来的一样。按照 1872年的一项裁决，儿童们能够在9岁时转入这种学校，一直学到15岁为止。它比小学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它收学费，但是只收中学的一半。因此，正如英国的私立学校对家长们有吸引力一样，德国的中等学校也受到家长们的欢迎。这些家长虽无力支付较高类型的学校的费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受的又不是免费教育，因而他们的社会等级是比较高的。总共有6种类型的中等学校——3种是九年制的，即文科中学、实科中学和高等实科学学校；另外3种是六年制，即初等文科中学、初等实科中学和实科学学校。

在法国，维克多·杜律伊（1811—1894年）根据其教育自由化的政策，于1865年建立了他称之为中等专业教育的制度。1870年战争之后，这种教育制度由共和国沿着三条路线加以发展——高等小学，补习课程，以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技术学校。但是，直到1880年才开始组织由政府主办的明确的中等教育体系。这时成立了最高委员会和各学术委员会。这些几乎都是选举产生的机构；而且，只有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人士才能进入这些机构。这是教育行政上的一项果断的创新，因为它把教师与大学教授和政治家们摆在同等地位。自从拿破仑1808年把所有各级教育统统纳入一个叫作“法兰西大学”的单一体制之内以后，法国的教育就总是高度集中的。这一原则的中心思想是创立一个与教会相对的世俗的思想主体。这个原则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和普法战争而坚持下来。因此，中等教育并不是从初等教育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大学决定了其性质。

高等小学类似威尔士的中间学校或德国的中等学校，给学生安排了两种类型的考试——一种是进入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另一种是为取得高等小学毕业证书的考试，其实证书的名称与实际并不相符，这是一种一般的证书。上课时间是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点至4点，一味地枯燥乏味地死读书，只能收到非常机械刻板的效果。学校还受到没完没了的检查之苦——这种弊病也带进了自1879年起就在每个“部门”中设立的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人们对这些学校非常不满，是不足为奇的。这种不满导致了对整个法国教育制度的检查。利鲍先生1899年对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声称：“全世界到处都听到对中等教育的一片埋怨之声。”

中等教育是由国家办的公立中学和市镇办的中学进行的，同时也允许私立学校进行。智力较好的人只有从这些学校毕业才能获得发展机会。因为中等教育是有这种阶级偏见的。所有这些学校，形式非常相似，而利鲍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这种千篇一律的状况。就公立中学来说，他们希望把寄宿学校的学生分散到适合的家庭中去，而不是把他们关在一所学校里。有趣的是，这正好与阿诺德博士的计划相反，他是要把孩子们从寄宿人家领出来，集中到学校“宿舍”里去。但是也有另一种倾向，如在德莫兰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是怎样产生的？》（1897年）中所主张的，这一倾向导致按照英国的方式设立了5所寄宿学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导致在

1902年，即颁布英国教育法的同一年，改组法国的中等教育。公立中等学校的课程的设置，是为了将来能够通过业士学位的考试^[7]，这通常成为进入大学的入学资格。市镇中学则较低一级，有自己的证书，而不是业士学位证书。私立中等学校应由国家检查，教师不得属于任何宗教团体，必须有教师的证书。既有公立男子中学，也有公立女子中学，并在塞夫勒建立了一所培养中学女教育的师范学院。

19世纪初期，教育理论有了显著的发展，人们并愿将其付诸实施。在这方面的3个伟大人物是裴斯泰洛齐（1746—1827年）、福禄培尔（1782—1852年）和赫尔巴特（1776—1841年）。他们每个人的著作对教育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祖国的范围；人们对他们的著作最初所抱的热情虽早已消失，但这些著作却显示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裴斯泰洛齐坚持认为教育来自事物，而不是来自书本，教育应随着儿童智力的发展而进行。裴斯泰洛齐认为主要的教师是经验；赫尔巴特根据他的这一见解，形成一种理论，即“多方面的兴趣”对于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福禄培尔又从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这一信念出发，形成了他的自我能动性的理论——“儿童有权在每个阶段成为那个阶段所要求的那个样子”。

福禄培尔的思想于1854年传入英国并得到查尔斯·狄更斯的赞同。“幼儿园”一词已作为对福禄培尔式的学校的说明而为英语所采用。但是这个时期创办的学校都是为比较富有的阶级设立的私立学校，直到1874年，福禄培尔的原则才开始对各地的幼儿园产生影响。美国的第一所幼儿园是1860年由伊丽莎白·皮博迪在波士顿创办的，它在威廉·托里·哈里斯博士和苏珊·布洛的影响下，于1873年成为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福禄培尔的思想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批评，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夏洛特·梅森小姐于1887年创办了“全国家长教育协会”，她批评幼儿园的课程，因为里面渗进了某种恩赐精神，梅森小姐认为不让儿童读书是错误的，她声称“任何教育不让儿童们在书的世界中遨游，看来就不配称为教育”。

如果说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在小学和幼儿园特别有影响，那么赫尔巴特的影响主要是在更高的阶段。齐累尔（1817—1882年）从赫尔巴特的学说形成一种理论，称为“文化阶段论”。他认为应该根据

儿童成长的各个心理阶段来选择教材，而这些阶段是与种族的发展相一致的。当赫尔巴特学说传到美国时，使斯坦利·霍尔（1844—1924年）感兴趣的正是这一方面；他的巨著《青春期，它的心理学和它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科学和教育的关系》的标题就表明了赫尔巴特派的“多方面的兴趣”，并且是以接受“文化阶段论”为基础的。在美国，一个更伟大的人物是内科医生、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他既关心宗教又关心科学，因此也既关心灵性的感受，又关心教育的指导。他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是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这部著作中主张心理学应列为一个专门的科学，而不仅仅是生理学或哲学的附属物。他那闲话家常般的通俗文风和他那善于运用生动的词汇和阐明问题的天赋，使他不仅能把普通常识应用于心理学，而且也应用于教育，并且强调二者要与活生生的人相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理论相联系。他的《对教师们谈谈心理学》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恐怕比这方面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大。

这样，赫尔巴特学说在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长期互相冲突的两个对立的学派。它一方面对学习过程提供了合乎理性的逻辑解释，因而和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相适合；另一方面，由于它强调文学和历史为两门最能塑造性格的学科，又与当时对科学和数学的普遍热情步调不一致。赫尔巴特学说既给予理性主义者以帮助，他们倾向于认为知识渊博就是美德；也给另一方以帮助，对于这一方来说，教育是培育有教养的想象力和情感的问题。

英国在教育理论方面从来是比较薄弱的，但是19世纪后期的科学运动产生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它强烈反对古典学科在学校的垄断地位，并赞成新的“现代”学科的教育价值。这就是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1860年）。斯宾塞（1820—1903年）已经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一句口号：“适者生存”。他处于新的科学运动最激烈的时代，他坚信知识即博学多闻。他把知识按其重要性排列为五大项，以生理学开头，在一长列目次的最下边以文学和美术结尾，“因为它们只占生活的闲暇部分，所以它们也应只占教育的闲暇部分”。

斯宾塞的著作并非特别有创见，但是它引起人们把科学作为教育的一门学科的兴趣，并用它取代古典学科。他的一位同代人托马斯·

亨利·赫胥黎（1825—1895年），把科学训练与真正人文主义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达尔文的学说除了应用于自然科学方面外，还可应用于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这个学说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和目的应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去发现。每一个机构都应当通过它的发展道路而对之进行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它经过了哪些阶段？它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圣经、神学、选举权、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妇女的从属地位等。给所有这些机构下一道令状，责问他们根据什么行使职权？不做出满意的答复就不许通过，这对于年轻人和敢于冒险的人是一种痛快的做法。赫胥黎自认为他站在这一帮年轻的战斗者的最前列，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赫胥黎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相信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教育所具有的价值，但是他也十分清楚科学的价值取决于怎样讲授它。他本人是知道怎样讲授科学——也知道怎样写作的。他说，教育“就是按照自然规律传授知识，在自然规律中，我不仅把物及其力量包括进去，而且也把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在内，并把感情和意志变成成为一种同这些规律和谐运动的热切而充满爱的愿望”。就他那一代人来说，赫胥黎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但被人遗忘了的（如果说曾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却是他对文学和圣经的兴趣。在新成立的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他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中，正是由于他的提倡，圣经才在实际已被提出应予废止的时刻，得以在学校中保留下来。

然而，教育科学所遵循的不是赫胥黎的路线，而是斯宾塞的路线。它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谈的是科学，想的是科学，做梦也梦到科学。诚然，欢乐是不断地迸发出来，因为科学给了业余爱好者一些好玩的东西。约翰·亨利·佩珀（“佩珀的幻影”的发明人）甚至使人从他的广为传播的著作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出，从科学中能够得到何种乐趣——《金属游艺书》、《青年科学游戏》和《科学百科简编》。然而就学校来说，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门学科，但主要地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手段。“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人们喜爱的格言，而所谓知识就是指科学知识。

1872年以后出现了代替初级学校的有组织的科学学校。它们属科学和艺术局管辖，该局于1853年成立于南肯辛顿，它是1851年大博览会激起的人们对工业热情的产物。（它在枢密院领导下，所以与教育

局的地位相等。1900年二者均并入教育委员会。) 这些学校除科学以外什么也不教，这是打算把类似德国的实科学学校介绍到英国来的尝试，但不设文化课程。然而，赫胥黎很快就看出，科学学校只不过是填鸭式的教育；而且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专门化的教育在英国也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需要良好的普通教育作为基础。从此以后有组织的科学学校在课程表中增加了文科的课程，同时，这些“根据成果得到报酬”的学校的辛勤经营，也由于科学和艺术局发给科学津贴而得到缓和。

与此同时，科学在高等教育中也争到了一席之地。1881年伦敦矿业学校成为皇家矿业学校，1890年又成为皇家科学学院。在19世纪80年代，“科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以至技术教育在科学工作这一总的领域内变成了一门专业。188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了技术教育的准备情况，1889年的技术教育法给予新近设立的郡议会一笔基金，用于技术与科学教育。新成立的大学学院都与科学有关。利兹大学就是先有染色工艺系，然后才有英语系的。

德国的情况与英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在边境那边的瑞士，1854年已在苏黎世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工艺学校。该校成为德国同类学校的一个样板，以后德国的这类学校都改变成为大学。但是，在中等学校一级，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准备工作早在18世纪末叶创办的实科学学校中即已开始。1870年，在实科学学校修完全部9年课程的男生，可以进大学学习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即使如此，实科学学校仍被视为供社会上智力较差的人进的一类学校。然而，对现代学科的重视及其发展，说明人们已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富于竞争性的世界上，一个工业的和商业的社会要求为年青一代提供一种足以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教育。自从1890年的教育会议（见第188页）以来，科学和技术教育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因为它与德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野心是一致的。

作为本文所论述这一时期的特征的科学运动，往往容易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经院哲学。只有教育的内容是新的。人们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认识到科学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因为这需要对讲授科学的特有方法有所了解，而直到当时教授科学和方法与教授任何文科的方法尚无多大区别。的确，据说赫伯特·威尔斯虽获得了理学士学位，却根本没有进过实验室。H. E. 阿姆斯特朗教授是使用新法讲授科学（1844

年)的先驱者,他把这种教学法叫作“启发式的”或“让儿童们自己去发现事物的艺术”。这是对通过实验来教授科学这种方法所起的一个别致的名称;这种方法在今天已是不言而喻,甚至人们会奇怪,为什么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发现它。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儿童的学习,则到20世纪初比纳概括出它的智力测验的方法后才实现。

教育对于社会结构和当时思想运动的依赖关系,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妇女教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除了性别的差异外,还受阶级差别的影响。总的说来,各国工人阶级的女孩子都受到与男孩子相同的教育,并未因性别而有所差异。这倒并不是出于什么男女平等的想法,而是由于人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子女是命中注定要靠体力劳动为生的。因此,当我们谈到女子教育,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时,我们并不包括工人阶级的女子在内。

在英国,正是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女子教育非常缺乏,这里性别差异意味着一切。女孩子或是在家庭里跟不合格的家庭女教师学习,或是进私立学校,而这种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一种非常浅薄的“才艺”。女子的高等教育由于缺乏中小学教育而受到妨碍,因而英国的妇女教育的先驱者们看出她们必须同时着手解决中小学校和大学的问题。学校情况调查(汤顿)委员会于1864年揭露了女子教育的贫乏状况,甚至到维多利亚时代,委员们也不得不承认开办女子中学的重要性以及开办这样的学校迫切需要支持和捐款。

女子教育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多萝西娅·比尔于1858年担任切尔特南女子学院的院长,她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06年去世为止。在她的领导下,这所学校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培养女子中学女教师的寄宿的师范学院,一直到准备进正式学校的幼儿班。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弗朗西斯·玛丽·巴斯(1827—1894年),她原在哈利大街的女王学院与比尔小姐在一起。1850年巴斯小姐创办了北伦敦女子学院;这所学院在1871年改成一所由理事们管理的学校。她以在关于卫生和学习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而著称;她把冷水浇在病人脸上,消除了当时流行的晕厥的习惯! [\[8\]](#)

妇女受高等教育的问题,曾引起对大学发动的一场攻势。关于授予妇女以学位,美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虽都走在英国的前面,但1878年伦敦大学准许妇女享受学位。维多利亚大学从一开始就

兼收男女生，爱尔兰皇家大学也是如此。1892年苏格兰的4所大学都向女子开放。

但是，男子特权的真正堡垒是牛津和剑桥，对这些学府发动的攻势至少表明了在社会进步和教育进步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发动这一场攻势的两位领袖是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格顿学院的创办人埃米莉·戴维斯最初在距离剑桥不远的希钦开始，到1870年才算推进到剑桥的郊区。她为她的女生争取在接受大学课程和考试方面与男子完全平等。安娜·杰迈玛·克拉夫是一位利物浦的妇女，她早已为家庭女教师开设了讲座。她在亨利·西奇威克教授的鼓励下，把她的活动转移到剑桥，于1874年建立了纽纳姆学院，这所学院直接设在剑桥的中心，因为克拉夫小姐所关心的不是参加考试，而是听课。当这两所学院均收到成效后，格顿学院要求准许听课，纽纳姆学院则要求允许参加考试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它们都达到了目的。

但是，这只是做到了一半。学位问题还未解决。这时，剑桥大学提出为妇女建立一所平行的大学，这与拉德克里夫大学是和哈佛大学平行的女子大学的做法有几分相似。克拉夫小姐本来乐意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戴维斯小姐却立即加以拒绝。她清楚地看出这里面牵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在得到平等之前先得到差别，你就永远得不到平等。必须在男子擅长的方面与他们比试，并在他们擅长的方面压倒他们，然后才能谈到任何差别。1887年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格顿学院的阿格纳塔·拉姆齐在剑桥大学古典文学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头等中的最高成绩。但是，即使这样的成就也不足为奇，因为1890年纽纳姆学院的菲利普·福塞特获得至高无上的成就，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中成绩超过了高年级的一等及格者。从此以后，人们就很少谈论什么所谓妇女智力低人一等了。

1871年，玛丽亚·格雷夫人建立了“改进各阶层妇女教育全国同盟”。次年，女子公立走读学校协会成立。牛津和剑桥制定了允许女子参加的地方考试^[9]。妇女教育家把重点放在走读学校，而不放在寄宿学校，并且由于这些学校不像男子的公学那样受到几百年来传统的束缚，因而在教学方法和学科设置方面都能自由地进行试验。不仅如此，由于是走读学校，使父母收入微薄的女子也能入学。这些学校并不全都是一个模式。走读学校是最受称许的，但也按照男子公学的模

式设立了三所寄宿学校——圣伦纳兹（1877年）、罗丁（1885年）和威科姆修道院（1896年）。

女子学校的兴起，导致了一场要求男女生同校的运动。在一些公谊会办的学校里总是这样做的，这是遵循这个团体的男女平等的规则；但是，现在人们主张使男女同校本身成为一个原则。1889年通过于威尔士中间教育法，结果建立了一批男女生同校的走读中学。比德尔斯中学创办时原是一所男中，7年后在1900年改为男女同校。在苏格兰，男女生同校已存在了几百年，在市镇学校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美国东部各州，男女同校已成为通例。这种通例由于裴斯泰洛齐在美国的广泛影响和他认为学校应该按照家庭的样式来办的观点而得到加强。于是这在美国就成为普遍的了，虽然也有按照英国模式创办的像格罗顿那样的男子公学和像法林顿斯那样的女子学校。

1870年的战争之后，德国全国各地的教师齐集魏玛，要求让女子受教育，并于1872年成立了“女子高等教育协会”，这在教育方面实现了1865年成立的全德妇女联合会的目标。与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这一联系，进一步推进了创办女子学校的运动。从1888年到1898年，海伦·朗格是这两个运动的领袖。她在1887年提出了一项改革女子教育的方案，1889年在柏林开办了女子实科课程。1893年在卡尔斯鲁厄创办了一所女子文科中学。在许多邦，男子中学也向女子开放，不过许多妇女仍然越过边境到瑞士去受大学教育。个人的进取精神仍与通常一样激励官方机构采取行动，在巴登和巴伐利亚，女子学校的男校长都由通过高中毕业考试而取得资格的妇女替代。德国的教育与教会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关系，这表现在1902年宗教与教育大臣所规定的女子教育的总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以家庭为主，并认为妇女的正当位置应该是在家庭，因此不需受专门的训练。但是这一规定遭到那些要求直到大学阶段均应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的反对；1908年建立了一套女子学校体系，从为9岁到16岁的儿童设立的女子中学开始，然后是高等女子中学，给以两年普通课程或者4年培养小学和初中师资的师范课程。但是，想要学习中学课程的男女学生，在13岁时都可转入高等中学学习准备进入大学的三门课程，即古典课程、半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政府虽在对待男子教育方面无法与传统决裂，但在对待“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女子的教育方面，却很乐意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

在法国，直到1867年，在维克多·杜律伊的影响下，女子教育才被人认为是重要的。这里又是个人的进取精神和鼓吹活动走在政府的行动之前，成立了一个女子中等教育协会；该协会设置了最后授予毕业证书的三年中学课程。有些后来成为中学甚至公立中学。卡米耶·塞（1827—1919年）在1877年改组了女子教育，三年之后建立了国立中学。这些学校收费比男子中学低，课程完全是现代的，没有拉丁文，也完全不像男子中学那样为繁重的功课所苦。如同德国那样，女子学校的男校长都已由妇女取代，这就同瑞士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瑞士以民主政府而享有盛誉，但女子学校的教师却全部都是男子。女子学校的风气远比男子学校自由。卡米耶·塞于1883年在塞夫勒创办的师范学校，保证了高标准的工作。欧内斯特·勒古韦说，12岁到17岁的女子教育的目标，是“在差别中求平等”。把这一原则与埃米莉·戴维斯的原则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在此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其发展超过中学和大学学龄的人们的教育而著称。成人教育理所当然地主要是与工人阶级有关，虽然其范围各国有所不同。

丹麦在这方面居于首位。格隆德维格（1783—1872年）和克里斯滕·科尔德（1816—1870年）创办丹麦国民中学的工作受到1864年损失惨重的战争的激励。在这次战争中，丹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省割让给德国。正如费希特在耶拿战役以后，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以后和维克多·杜律伊在色当战役以后的态度一样，格隆德维格的态度是“在外部损失的，必须在内部找回”。这是一个要求在教育方面向前迈进的号召。丹麦转向国民中学，把它们作为任何军事上的失败都不能损害的民族主义机构。这个运动发展很快。原来在罗丁的学校，越过新的国境线迁到阿斯科夫，在路德维希·施罗德的领导下兴旺了起来。反过来，这些学校在人民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又帮助丹麦从下一个打击中恢复了过来。丹麦原是一个种植小麦的国家，主要向英国出口谷物。但是，这时加拿大和乌克兰开垦了大片的麦田，使得丹麦完全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从事竞争。然而，国民中学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聪明才智，因而在10年之内，丹麦的经济就从以小麦为基础，改变为以生产乳制品为基础。阿斯科夫的学校在施罗德和保尔·勒科尔领导下，一方面不忘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种种神话，一方面同样重视现代的农业，把二者结合起来。1876年以后，学制扩大到

两年，1885年以后成为男女同校。它的课程非常广泛，包括物理、化学、农业、历史、神话、教会史和心理学。哥本哈根市开始重视这一运动，并于1890年开办了一所走读的国民中学。

与此同时，成人教育也在专门培训职业人才方面发展起来。从1867年起就为农业和其他产业工人开办了中学。其中最著名的一些中学是由路德教会的“国内布道团”开办的，支持这种中学的人士中就有泽伦·克尔恺郭尔。它们吸收了格隆德维格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产业工人。

这一运动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开展起来。挪威从1864年开始设立国民中学，性质和格隆德维格所办的一样，信仰基督教，男女同校，几乎完全设在乡村。在瑞典，这个运动恰巧与争取扩大选举权的政治运动同时发生，并成为瑞典自由党所关心的事。瑞典的学校比较注意实用，因此格隆德维格的精神动力不大为人所感觉到。瑞典人的实用性格也在初等教育中表现出来，称作工艺教育的手工训练成为小学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芬兰，国民中学运动和丹麦的一样，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俄国的影响，并促进了讲芬兰语的工人阶级与具有高度文化的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芬兰也步瑞典的后尘，发展“工人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是在市政当局领导下的夜校，创办于1889年。

这里应对“成人”教育和“进修”教育加以区别。后者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正是这种形式的教育吸引着德国人。在德国，成人教育主要是关于技术方面的，虽然这种形式的教育充分发展是20世纪的事，这时克申施泰内在慕尼黑办的业余补习学校闻名于全欧洲。成人职业教育在德国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逐渐取代了学徒制，虽然在德国成立了各种艺徒公会，其职能由1887年的一项法令所规定，其中一条是培养雇主与雇工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主要工业设立的各种专门学校，是对学徒制的补充，而不是像在法国那样，用来代替学徒制。

在瑞士，成人技术教育的主要中心是苏黎世，联邦拥有技术大学，并根据1884、1885和1895年的法令，联邦对职业教育给予援助。这包括各音乐学校、艺术学校、丝织学校、兽医学校、师范学校、一

所手工艺学校和一所工业学校，还有日内瓦的一所高度专门化的钟表制造学校和布里恩茨的一所木刻学校。

美国北方各州在南北战争之后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迄今，农业一直受到教育家们的注意，1862年联邦政府根据莫里尔法在每个州设立了“政府授予土地”的农学院。但是，1865年由于认识到工业需要教育，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该学院在新世界的地位，相当于苏黎世工艺学院在欧洲的地位。然而，职业教育迟迟没有开始，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做了一些努力；而且到1912年，一个关于职业教育的全国委员会才成立起来。这一迟延，部分原因是约翰·杜威（1859—1952年）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不需要成立什么专门学校，因为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成为职业学校，从而成为训练民主的场所。

成人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由于奴隶的解放和外国移民的大量流入而在美国变得尖锐起来。但是，由此而采取的措施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是实用主义的。然而，在美国主办成人教育的主要机构是教会。宪法上规定的政教分离给教会加上了一副沉重的但并不是不受欢迎的重担。各种各样由捐款兴办起来的团体创立起来，最初有“学园”讲座，这种讲座在1874年以后又为“肖托夸运动”所代替^[10]。这些机构的最初的目的是要培养主日学校的教师，但是他们不久便为更广泛的公众服务。可是美国人当中很大一部分在就业之前都上过中学或大学，这一事实使得成人教育的吸引力相对地有所减弱。

在此时期，英国成人教育在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明显。伦敦同业公会在1880年创办了“伦敦城市和行会学会”，作为统一技术的教育审查机构，领导人是菲利普·马格纳斯爵士。1884年该学会自己建立了一所学院，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对技术教育的兴趣也随之而伴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想法。比如，罗斯金就被“技术”这个词的希腊文原义引入歧途，以为他支持这个运动是在支持发展创造性的手工艺技术。领导人们则很少想到这一点，他们想的是如何在世界市场上击败德国人和美国人。

在成人的文化教育方面，总是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才最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并要求学习更多的东西。在英国，最初为工人发起的运动，反而对职员、教师和学徒产生

了吸引力，而当这些人参加进来以后，工人就退了出去。但是，宪章运动这一真正的工人运动，后来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由此而于1854年成立了工人学院。这是第一次把旧式大学和成人普及教育联系起来，它吸引了一批卓越的讲师，免费为它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科学研究所是受欢迎的成人教育机构，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互进会，有的是由教会经办的，有的则是独立地经办的。

安娜·克拉夫小姐在利物浦发起了由大学开办补习班的运动，由詹姆斯·斯图尔特担任第一位讲师，这再一次表现了大学出身的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足之处是听众太多，不能进行讨论，但是1903年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弥补了这一缺点，因为这个协会不是建立在讲大课的基础上，而是以“导师个别指导的班级”为基础。在伦敦的各种大学社会福利团体，是大学出身的人与工人群众卓有成效地结合的又一成果。这些团体中最早的一个叫作汤因比会堂，是以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杰出的年轻学监阿诺德·汤因比（1852—1883年）而命名的。综合性工艺学校是另一种类型的机构，最早的一所于1880年由昆廷·霍格在摄政大街创办。开办头一年就吸引了6800人。1883年伦敦教区慈善事业法允许将部分慈善经费用于建立综合性工艺学校。因此而获益的机构之一是“人民宫”，它后来成为东伦敦学院，再以后成为玛丽女王学院和伦敦大学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工会开始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1899年他们在牛津创办了罗斯金学院，作为训练工会领袖的场所。它设在牛津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在10年以后的分裂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分裂使马克思主义派独立出来，在牛津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移往南威尔士，成为中央劳工学院。

（宋蜀碧 译）

[1] 本章中“杰出人才”一词，原文为*élite*，意为精华、精英、优秀分子。——译者

[2] 照英文意义上说，“公”学即学校的管理人员并不拥有这种学校，只不过是受托管理学校，一切收益均归学校所有。此后又对原有的定义加上了一些别的条件，但使用“公”字一词来源于上述定义。

[3] 原为英国较早时期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主课的中等学校，后亦为普通中学的名称，毕业生可升入高等院校。——译者

[4] 按当时德国的学制，上述3种学校均为9年制，学生毕业后可升入高等学校。
——译者

[5] 疑即写于1898年的《劝学篇》。——译者

[6] 六年制的中学，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高等学校。——译者

[7] 即中学毕业会考。——译者

[8] 当时英国中上流社会妇女矫揉造作的一种表现。——译者

[9] 地方考试：英国某些大学在各地举行的考试，对考试及格者发给证书。——译者

[10] “学园”讲座，19世纪美国以开办讲座等形式推广成人教育的团体，以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学园”为名，南北战争后，该团体衰落，“肖托夸运动”兴起，以其总部设在纽约州肖托夸而得名，主要以开办暑期主日学校来推广成人教育。
——译者

第八章 武装力量

19世纪最后的30年，如果不是给全世界，至少也是给西欧各国人民，带来了实际上从未间断的和平时期。在打破了维也纳体系格局的各次统一战争和后来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夺四分五裂的土耳其帝国领土的各次冲突之间，西欧出现了一段间歇期。即使在这一地区以外，也只发生过三起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的事例：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898年的美西战争；而这些纷争，或者由于它们的性质，或者根据大国间一致同意的政策，也严格地限制在局部范围以内。欧洲列强为了保护和扩大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利益，不断地发生小冲突；英国于1899年卷入同南非布尔共和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发展到超越了“小规模战争”的范围；但在欧洲本土，除了巴尔干半岛以外，法国和获胜的德意志帝国之间于1871年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带来了43年的持续和平。

然而，在这些年中，大国，特别是欧洲大国，却正在做出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努力，为一场战争进行准备。海陆军兵器的数量、复杂程度和成本都大大地增加。防务费用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欧洲大陆国家的男子，从他们的青春时代后期直到即将进入中年时代晚期之间，都有义务服兵役。由于每一个国家在防务上所做的准备，都被它的邻国看作对它们自身安全的威胁，各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显然卷入一场无法避免的竞争；这场竞争给国家财政造成日益增大的负担，煽起相互间的疑惧，并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大灾难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许多历史学家会说是起了主要的作用）。

在这些岁月里，欧洲表面上的和平后面潜在的紧张局势，有其政治、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原因，这些原因将在本卷其他的章节中加以论述。然而，这种紧张局势至少部分地可归因于战争的武器和技术获得了事实上自发和自动的发展。这由于当代工业和科学的进展才首次成为可能。现在，拥有优越军备的国家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1870年法国的崩溃，比1866年奥地利的崩溃更加清楚地表明，那些未曾学会如何训练和部署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庞大军队的国家，将遭到何等厄运；而且，欧洲国家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或者屈服于以这些技术武装起来

的新兴德意志帝国的霸权，或者用这些技术武装自己。在这个新时空中，可靠的防御体系不仅意味着对全体成年男子施以军事训练和获得昂贵而又迅即过时的武器；而且，它也包括建设战略铁路的开支，积累巨量的战争物资，以及保持高度的人口出生率，高度的教育水平和现代的工业潜力。每一个国家，若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必须是“全民皆兵”，能够在几天内部署几十万大军，否则，毫无准备就将为人所乘，导致彻底失败。

这种状况必然要给国际关系带来一种紧张而又不信任的因素；而技术的迅速变革使得事态更为恶化，因为这种变革迫使各国政府平均每20年就要完全更新一次它们的陆军装备，而且，海军面临着更大的军费问题。此外，如此规模的变化，使得对于战略和战术的一切军事评价都成为问题。范围广泛的专业和非专业文献，包括大部头的军事字典和在期刊上连载的研究文章，以至无数不时发行的半政治性的小册子相继问世。在这些文献中，对每一种新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发展给战争艺术带来的变化，进行了不断的、极为细致的研究。欧洲各国的参谋总部设置了历史研究部门，出版了详细分析过去和现代战争的文章；总部的情报和测绘部门，则同样编写了有关假想盟国和敌国的资源和武力的详细报告，在编写过程中，这些部门得到谍报网的帮助，但可以大胆地说，这些情报对于编造虚构故事和制造著名政治案件的贡献，比对于获得真正的军事知识要大得多。他们的调查研究最终总是导致同一结论：需要更多的军费。正当国家预算中教育和福利费用所造成的压力不亚于军费时，提出如此的军费需求，就造成新的政治紧张局势。军界认为自己对国家安全负有责任，对民主控制所加给他们的限制感到愤慨。正在增长中的自由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这种念念不忘安全和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看到同样是眼光短浅的“军国主义”，而这种军国主义，尤其在各中欧强国，正与一个军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相一致，对此，不仅必须通过代议制议会，而且，必要时还要运用总罢工这一武器进行斗争。防务问题不仅在对外事务上，同样在对内事务上也加重了欧洲各国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困难。

在本章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对于世界的命运仍然具有决定性；而且，既然列强在军事上首先一心考虑的是陆战而不是海战，本文在此将颠倒英国惯用的先后次序，首先论述陆

战。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欧洲各国一心考虑的，一直是建立、装备和部署陆军的问题；当时只有马汉的著作才提醒这些国家，过去决定它们的命运的，不仅是它们保卫本国边疆的能力，而且是它们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它们长期以来依靠这种联系获得它们的财富，而且，它们很快就依靠这种联系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到这时为止，在军事思想方面一直是由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开创新的风气，而其外围各国，诸如土耳其、日本、美国乃至英国本身，都不加批判地照样抄袭。只是到了19世纪末，海上角逐才在有关欧洲和平的各种问题中，与陆上的角逐相提并论。后来，这两个问题在1899年的海牙会议上都加以考虑；虽然在即将进入下一世纪时，欧洲的政治家们（如果不是军人们），显然已看出这个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召开这次会议就证实了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他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解决的问题。

19世纪的技术革命在军事方面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任何其他方面，这是理所当然的。到1870年，冶金技术的发展已能够把拿破仑时代的平均射程各为100码和700码的滑膛前装弹步枪和火炮，改进为有来复线并由后膛装弹的武器，其射程也增加到原来的10倍。普法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军队就是用这类枪炮装备的。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使用金属弹筒，是另一较大的进展。土耳其军队有鉴于此，在1877年时已配备有这种弹药，而大部分俄国军队则尚未采用；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所以能制造出威力愈来愈强大的炸药，正是由于化学方面的发明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传统使用的由硝石、硫黄和木炭配制成的火药，既浪费材料，又不便于使用。这种火药一小半变为气体，其余的则变成厚厚的一层玷污武器的附着物，或一团浓密的白烟。自从火器于500年前初次出现以来，这种浓烟就一直弥漫着战场。后膛装弹的武器具有更快的发射速度，从而相应地增加了这些不利因素，因此，人们努力探索其他类型火药的可能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61年制造出硝化甘油，但过了许多年以后，才能将其实际应用于军事上。一旦应用硝化甘油制造火药，轻武器和火炮的效能就大为改进，其成就可与40年前采用来复线时相提并论。这种新型火药实际上完全燃烧，因此爆发力更为强大，而所产生的烟却很少。不仅射程增加了1倍，而且由于火药用量减少而爆发能量却加大，枪弹和炮弹的体积得以减小。枪炮的口径也可以比原来的小；小口径武器不仅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而且，由于改进的发射火药可以使子弹运动的弹道变低，这

就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在1898年，用无烟火药作弹药的小口径来复枪的有效杀伤射程可达4000码，而采用连发装置又相应地增加了发射速度。1886年，法国首先采用了勒贝尔式来复枪和“B号火药”，德国和奥地利于1888年仿效法国，其后4年中，欧洲的其余国家大多相继采用。

在1870年，普鲁士炮兵曾显示了火炮对小型武器的优势，但由于新式步枪的战术效果如此之大，以致在一个时期内上述优势似乎已根本被推翻。当年在色当击败法国步兵的夏斯波式步枪的普鲁士大炮，倘若遇上的是以勒贝尔式来复枪装备的步枪手，恐怕也只好甘拜下风。但是，火炮同时也在改进。关于制造火炮的材料，究竟使用青铜为好、还是铁为好的讨论，经过一番争论后，确定使用后者，后来又决定使用钢；其结果火炮现在能承受更大的爆发力。同小型武器一样，通过使用无烟火药和改进炮弹结构，炮弹的初速得以增加。不仅如此，无后坐力炮架的发明，开辟了发展速射炮的道路，这种火炮无须每发射一次后重新瞄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各国陆军已使用最大射程达9000码、有效射程为3000至6000码的野战炮。然而，攻城炮的发展甚至大大超过了上述射程，德国急于在未来战争中速战速胜，因此在这方面一路领先。到了1898年，欧洲各国陆军已装备了重炮、榴弹炮和迫击炮，其标准射程为10公里，而且由于采用了麦宁炸药，它们的穿透力得以相应地增加。

小型武器的改进，迫使火炮也必须改进；同样，火炮的改进，要求防御工事亦须改进。在19世纪50年代采用有来复线的气筒后，城防要塞就有必要在外围构筑堡垒，以进行炮战并保护要塞本身不受轰击，巴黎的伊西、旺夫和蒙德鲁日就是如此。然而，巴黎周围的堡垒群并未能使该城于1871年免遭克虏伯式21厘米口径迫击炮的直接轰击。母体要塞周围的堡垒群向外愈推愈远，到1898年，已经认为要塞地区的直径不得小于18公里。在各个地方，水泥工事取代了石造工事。即使如此，也未能获得充分的防护能力；在19世纪90年代，欧洲各地的军事工程家们，以比利时的布里阿尔蒙将军为首，努力为这一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布里阿尔蒙本人主张，以广阔的设防地区代替要塞；防御越来越依靠地下工事，可以升出地面的圆顶形炮台的发明，使得有可能把整个防御体系设在地下。在20世纪初，诸如安特卫普、凡尔登、波森和伦贝格那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要

塞，都是蜘蛛网般的防御工事的中心；这些工事绵延数百平方英里，绝大部分构筑地下，从地面上一无所见，而它们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则占去越来越多的国家预算。

然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中，最著名的防御要塞之战并没有依靠复杂而昂贵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在1877年，奥斯曼帕夏利用就地挖掘的野战工事，在普列文抵挡住向保加利亚推进的俄国军队达5个月之久；而俄军在进攻中蒙受的伤亡（在参加一次进击的6万兵力中付出1.8万人的伤亡），不能完全归罪于战术和指挥上的错误。普列文战役使俄军懂得了，能够有效地对付后装式来复枪的是铁锹，到战争末期，全部俄国步兵都携带掘壕工具。欧洲其他国家的陆军也仿效他们。到19世纪末，步兵在防御中应掘壕据守，已被公认为正规手段，于是，步兵不仅携带每人自用的掘壕工具，而且往往还要带上大量的铁镐和铁铲。在普列文，俄国部队虽然拥有4倍于敌的火炮，并使用了高爆炸力的炮弹，却无可奈何对方的土筑工事；有鉴于此，现在轮到炮兵必须想出办法对付壕中的步兵。如果说铁锹是对付来复枪的手段，那么，榴霰弹、榴弹炮和迫击炮就是炮兵对付铁锹的手段。但是，火炮的任何发展都未能抵消铁锹和来复枪给处于守势的步兵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好处甚至在马克沁式弹带机枪出现前很久就显示出来了。由于马克沁机枪消耗很多弹药，并在早期存在一些技术缺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国军队对于这种武器都持怀疑态度。即使对于用19世纪60年代那种原始的后膛装弹步枪装备的步兵来说，要进攻他们也是困难的，这一事实使战术家们大伤脑筋，并且在纳霍特和格拉夫洛特^[1]那样的几场鏖战中得到证实。现在的杀伤射程，估计比夏斯波式步枪时代增加近4倍，进攻防御阵地的步兵部队，即便完整无损地通过了炮火发挥其最大威力的3000码地带，还需越过2000码的距离，而在这一地段内，部队将遭到藏身于堑壕中的敌方来福枪手的射击而大量伤亡。因此，一般认为在进攻者占有火力优势以前，不可能发动攻势：正如一位战术家所说，“步兵的进攻成了一条移动着的火力线”。自从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以来，散兵线比列队进攻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这时，在军事教科书中，前者完全取代了后者，而在1860—1870年间的战争实践中，也正是如此。怀疑派提出疑问道：在野战战场上，进攻的部队究竟能否用火大量消耗对方掘壕据守的步兵，使他们陷入易于被攻克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得到两个正式答案。一个答案来自《德国步兵操典》。它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缓

慢、耐心而准备周到地向前推进，甚至可能需时数日。这种战术不像野战，而更像攻坚战。另一个是法国提供的答案。法国准备依靠步兵传统的士气和奋斗精神，来克服一切障碍——而俄国陆军受到德拉格米罗夫将军的影响，也很赞同这一观点。1894年的《法国步兵操典》中规定，在进攻时，不再采用分散队形，而改用几个连队并肩前进的密集队形，其理由是，只有这种队形才能保持进攻者的士气并保证有足够猛烈的火力。科兰上校和奈格里埃将军那样的军事思想家，指责这些战术是自杀性的，但他们的意见一直被人忽视，而法国参谋总部愈加重视保持士气高涨，以便部队能够克服在任何未来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十分困难的障碍。

随着对1870年和1877年战争^[2]记忆的逐渐淡忘，同时，在和平时期要保持部队的高度士气，就必须更多地注意战争中鼓舞人心的方面，而少去理会令人沮丧的一面，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军队开始表现出非常缺乏现实感。这一点，在训练骑兵中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兵种都更为突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武器的新发展，使得骑兵所担负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当时，内燃机尚未发展到可供军事上使用的程度，而且，虽然采纳了其他一些发明并努力加以研究（各国陆军都有自行车部队和观测气球部队，而法国陆军于1884年使用可操纵气球所进行的成功试验，指出了通往属于崭新范畴的发明创造的道路。这些发明创造将超越以往的一切成就），但同作为不可缺少的机动兵种的骑兵相比，所有这一切，其重要性均属可有可无。部署在广阔战场上的庞大的新型军队，使联络和侦察工作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也带来无比的困难；同时，通过科学饲养，培育出优良纯种马匹，能够耐受前所未有的役使。然而，侦察和联络只是次要任务。骑兵的传统任务是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发动冲锋，对动摇的步兵给以最后一击；进行追击，使后撤变成溃败。尽管1870年骑兵在摩尔斯布隆、维昂维尔和弗洛因格遭到大量杀戮，但没有一国的正式骑兵条令接受如下结论：在现代火器占统治地位的战场上，骑兵已无用武之地。人们认为骑兵的作用基本上与拿破仑一世时相同。德国陆军的骑兵操典仍然是以腓特烈大王时期的条例为蓝本。人们争辩说，在新式战场上，骑兵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除了冲锋本身在士气上所造成的效果之外，无烟火药使骑兵得以更好地判断敌方步兵部队何时开始瓦解，陷于易受冲击的境地。

这种顽固地坚持过时理论的态度，看来是企图要使深深扎根于19世纪欧洲阶级结构中的一种社会偏见合理化。无可否认，人们对骑兵所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是很强烈的，在中欧各贵族一君主制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对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进行攻击，其含意就超越了纯粹军事范围。然而，撇开作为突击手段这一作用不谈，也没有理由认为骑兵已无用武之地。不仅有上述大量增加的侦察任务，而且人们还广泛地研究了仿照美国南北战争中骑兵长途奔袭的方式，以骑兵深入敌后截断敌方交通线的可能性。在俄国陆军中，把进行这种突击的前景视为国防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时，人们希望在靠近德国和奥地利边境处集中大量骑兵部队，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派出它们去执行破坏公路、铁路和通信的任务。这样就有可能削弱中欧各国由于拥有更迅速的动员手段而占有的优势。其他国家的陆军做出尝试，把骑兵恢复到机动步兵的地位，以便进行包抄进攻；正是为了有利于进行这种包围运动，德国陆军于1898年首先为骑兵部队配备了机枪。他们偏重于把机枪视为进攻用的一种机动火力，而不是用于为防御增添力量。但是，这些尝试和设想过于离奇，也并不可靠。骑兵继续支配着各兵种和各种军事行动，而且没有一个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公开怀疑，骑兵也将支配整个战场。

这样，只是部分地吸取了1870年那场战争在战术方面的教训。德国的胜利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战略和总的军事方针方面。法国之所以遭到厄运，最明显的解释是由于它未能及时调集足够的兵力——它只能以24万多人对抗毛奇率领的、于8月的第一周越过边境的37万德军。

造成这一状况的近因是，法国动员和集中兵力——如召集预备役兵员入伍并进行编制，把装备齐全的部队送到作战地区——在技术安排方面有缺陷。但是，原因在于普鲁士的整个军事制度具有优越性——普遍实行短期兵役，优于法国在拿破仑时期以后发展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法国相信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一支数量虽少但顽强的军队，能够战胜大量的义务兵；然而，这一信念彻底破产了。法国共和派也坚信，未经训练的人民武装的热诚本身就构成足够的防御力量，但这个信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法国战败后开始尽力依样抄袭战胜者的军事制度，而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照此行事。

迅速动员的重要性，不仅来自有必要使征兵制所提供的受过训练的人员立即发挥作用，以便能够给予（或抵挡）最初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其重要性也部分来自战场本身的性质——来自正面进攻有困难，需要进行包抄和包围，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需要有大量的兵力。即使在1870年的各次战役中，正面进攻从未带来胜利；胜利只有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包抄敌军两翼才能获得。然而，进行这样的包抄运动，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欧洲各国军队愈来愈缺乏这种能力。铁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把空前庞大的部队运到战场，或战场后方的集结区。但是，这些部队一旦到达那里，部队的给养仍然完全依靠铁路，因而，他们的活动即使不是取决于也是受限于铁路运输。德国铁路系统优越的运输能力，是它在1870年赢得胜利的一个有利因素，而今后一个国家的军事效能，显然将取决于全国铁路系统的分布情况和里程。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通往比利时边界的铁路有了相当的发展（4条线路可供运输3个军团）。这就使德国总参谋部能够通过侵犯比利时领土，来避免正面进攻法国边境的要塞地区。

因此，在国防上，发展铁路被视为与发展现代化武器具有同等的迫切性。正如戴莱加盖将军在1890年所著的《现代战争》（第1卷，第165页）中所指出，“一个国家在组织本国边疆的防御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不是把国土用要塞地带围起来，而是使铁路网布满全境，以保证尽可能迅速集结兵力”。布龙扎尔特·冯·舍伦多夫将军在他的著作《总参谋部的职责》中称，总参谋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和平时期，检查本国铁路系统的确切的运输能力，目的在于能将部队集结于各条不同边境线，并将所得结果，同一个或几个邻国所拥有的集结手段逐一加以详细比较”；他接着写道，“一旦事先发现在这一方面有任何不利之处，可采用由国家拨款扩展铁路系统这一简单手段来加以补救”。铁道兵部队成为每支军队必不可少的机构；民事—军事混合委员会为军用线路进行准备；用铁路调动部队，成为一门可以准确计算的科学。例如，德国人估计一个军团连同全部军需物资，需用117列火车运送，在一条铁路上需时11天，在两条铁路上需时5天；在复线铁路上，9天可运行900公里——这一距离如徒步行军，则需花费两个月。然而，距离越近，使用铁路的优越性也越小。比如，距离112公里的运输，利用铁路需时8天，而利用公路只需5天。因此，铁路提供的战略利益大于战术利益（在1870年的巴黎保卫战和布尔战争中，都使用了装甲列车，但效果均不大），然而，这一战略上的重要

性则非常之大。法国和奥地利在发展它们的铁路网方面，仿效德意志帝国首先树立的榜样；1870年到1913年间，法国把通往东部边境的铁路线从3条增加到10条，而德国通往西部的铁路线，从9条增加到16条；同时，德国及其盟国奥地利在东部边境发展了一系列的铁路线，当然，后者的规模较小，这些成就使俄国望尘莫及。

俄国在发展铁路上落后的局面，是它和它的盟国的总参谋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弥补这一弱点，俄国在建造自己的铁路时采用了比欧洲铁路较宽的轨距（不用4.85英尺而用5英尺），以便俄国一旦遭到入侵时，它的敌国至少不能利用俄国本土的铁路网；然而，这一预防措施使它自食其果，当俄国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一到达罗马尼亚边界，它的整个部队（20万人和1200门火炮）就不得不改用不同的铁路车辆。1891年至1898年间建造的横贯西伯利亚的单线铁路的运输能力之不足，在日俄战争中暴露了出来。开战后最初每天只能运行3列挂30节车厢的列车（而且最高速度每小时只有11英里），从华沙到沈阳需时40天。然而，俄国人能够把100万兵力集中到太平洋沿岸这一事实本身则是一种不祥之兆；在法国资本的援助下，他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在努力发展自己的铁路运输能力。德国总参谋部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

因此，铁路在现代战争中为取得胜利提供了一个主要条件，而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组织良好的动员机构。这里再次引用戴莱加盖将军的论述（第一卷，第363页），“原则上，一支未能首先做好准备的军队，就不要想在战争中争取主动，而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动员问题的范围广泛，并且，随着战时编制的规模增大而愈加扩大。动员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召集预备役兵员回到他们原来所属的各团；它还包括建立新建制、新的后勤和医疗机构和人员配备齐全的司令部，以及和平时期根本不存在的通信联络网。除了俄国以外，名国都采用了普鲁士于19世纪60年代形成的那套办法——动员工作和其他后勤事务分别由各地区司令部承担，每一司令部负责招募、装备并运送一个军团到集结地区。每一地区司令部保存着最新的预备役兵员手册，并储存了大批被服、装备和军火以备使用。一旦接到陆军部的指示，就立即通过给个人拍发电报或通过发布布告来召集预备役兵员；而在陆军部里，必要的电报是已准备好的，只需填上日期就可生效。

由于不断的改进和实践，到19世纪末，德国人估计他们的部队自开始动员之日起，不到两周内，即可准备就绪，投入战斗。法国人对本国部队的估计也大致相同。较差的交通条件和后勤设施妨碍了东欧各国。当军需总监贝克1881年就任奥地利总参谋长时，他大为惊讶地发现，德国军队能在20天内做好准备，向俄国进军，而奥地利却需时45天，因此，“我们将作为一种后备军，进入胜负已定的战场……我不相信这将符合我们的政治或军事的利益。如果我们的军队投入战争，它就必须赢得胜利，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工作大收成效，到1890年，奥地利军队集结兵力所需的时间，缩短到19天。

俄国人最初无法与之相匹敌。多亏米柳亭根据1876—1877年的经验教训实行了改革，俄国人才有希望能在16天内完成动员工作本身。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在和平时期保持着许多司令部和后勤单位，而其他各国则不得不到战时才建立这些机构。但是，俄国的兵力集结，从乌拉尔、乌克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通过他们运输能力不足的铁路系统运送部队，情况却完全不同；这一缺陷给俄国带来的不利地位，只好以在西部边境保持大量常备掩护部队的办法来弥补。根据一个统计资料，1893年俄国在波兰集结的兵力有442293名，包括一支准备深入普鲁士、西里西亚和加里西亚腹地进行袭击的庞大的骑兵部队，这个数字几达俄国和平时期总兵力的一半。然而，保持这支掩护部队，进一步放慢了动员和集结工作。守卫边疆的任务不能交给从不可靠的波兰边境省份召集来的部队，掩护部队必须由来自俄国国内的团队组成，而这些团队的预备役兵员，在一旦发布动员令时，需费数周才能回到本部；另一方面，波兰部队在俄国国内担任守备任务，因为他们在那里不能制造麻烦，而这些部队也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动员工作分散到各地区司令部。在欧洲列强中，只有俄国的陆军部继续担负动员军队的具体琐碎的职责——这种安排本身就不利于迅速行事。

奥匈帝国是一个充满了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的多民族国家。它可能比俄国更为严重地受军队“地区化”之害。但是，为了有利于迅速动员，贝克宁愿冒此风险。如拉德茨基在任时那样，军队企图成为超然于种族之上的组织，军官团由离开本民族地区的军官组成，以德语为统一的军事用语；但是，在军事文件中承认可使用11种其他语言，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迹象，表明“帝国和王国陆军”内部管理工作的复

杂性。奥匈帝国曾经希望在捷克人、罗塞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和加里西亚人所组成的同种族的部队中会充满军队的那种效忠国家的精神；但是，虽然在正规干部中这一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应征新兵和经过一段平民生活后重新入伍的预备役士兵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斗中，这些正规干部一旦倒下后，部队残余部分的不可靠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例如推广普及教育和增加国家医疗设施等方面），军事上的需要在打破上述旧的社会格局上起了主要作用，而颇为自相矛盾的是，军事阶层却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坚决地维护这个旧的格局。

梯也尔曾经指责征兵制是“给每一名社会主义者扛上一条枪”；但是1870年以后，这种制度在军事上的需要已是不言而喻，从而压倒了上述反对意见。所有大陆国家都以德国式征兵制为楷模，而第二帝国自己的立法，是以博伊恩于1814年为普鲁士拟定的法律和罗昂于1867年为北德意志联邦拟定的法律为蓝本的。帝国的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每一名德国人从20岁开始有义务服3年现役和4年预备役，然后再编入“后备军”（这一组织自1862年以后与正规军紧密相结合，以便成为第二线的正规预备部队）直至39岁。然而，这种显然无法逃避的义务，由于对非军事方面的考虑做出了某些让步而有所缓和。首先，通过“一年志愿兵役制”（也是“解放战争”遗留下的一种制度），专业人员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达到一定教育水平并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装备和军服的青年人，在格外宽厚的条件下只服役一年，即可获得后备军军官或预备役军官的资格。在第二帝国时代，预备役军官的职衔，成了取得社会地位必不可少的保证。其次，帝国议会通过控制预算来规定军队数量的最大额度——每当重新讨论这一限额时，必然爆发一场政治风暴。最后，在一个社会主义正在迅速传播的社会里，陆军部必须权衡下面两方面的利弊：保持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军事上是可取的；而就政治上的需要来说，又必须保证这支军队只能由政治上可靠的分子组成。于是，陆军部有选择地对帝国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那些地区里，民事—军事混合委员会根据“品德、健康状况和入伍前的社会关系”来挑选新兵。

奥匈帝国于1868年效法普鲁士的榜样，根据库斯托扎战役^[3]的胜利者阿尔伯特大公起草的一项法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直至1894

年，阿尔伯特大公一直主宰着军队的命运。该国的服役年限也是3年现役，然后再服预备役，或在后备军中服役。在那里，也由议会规定军队的最高限额，由地方混合委员会挑选新兵，同时，受过相当教育者和有产者，可以服一年为期的志愿兵役。某些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农业的土地所有者完全免服兵役，教师和神学院学生也是如此。然而，征兵制暴露了奥匈帝国的弱点。将征兵制强加于罗塞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是很困难的，况且他们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大量移居国外；此外，即使到19世纪末，应征人员中适合于服役者的比例不过1/4。在俄国，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为尖锐。作为米柳亭广泛的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俄国于1874年采用了德国式的普遍兵役制，其服役年限为5年现役和13年预备役；但是，对哥萨克人和芬兰人施行这一制度时，做了相当大的修改，而在地方感情表现得过于敏感的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和其他一些地区，则根本没有施行。不仅如此，俄国在挑选新兵时远比西欧更为注意家庭方面的考虑——这在农民各自耕种自己一块土地的国度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最后，德国的“一年志愿兵役制”，以更广泛的形式被采用，学生根据他们不同的教育水平，得以减免兵役。每一欧洲国家确实认为，一个受过教育并感到满足的专业人员阶级，对于国家的利益来说，至少是和一支庞大的军队同等必要的因素；为了兼有二者，各国都找出自己的折中办法。

法国在1872—1873年的军事改革中，也紧步他们的战胜者的后尘，实施不许顶替的普遍兵役制，同时，也采用了一年志愿兵役制。但是，传统主义者仍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那种主张完全废除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并全盘接受德国的“全民皆兵”思想的做法。为了造就真正的军人，也为了建立一支在愈益严重的内部危机中确实可靠的部队，长期服役仍然被认为有其必要。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即每年的招兵额中，有一部分人服役5年，其余的则服役6至12个月。这样区别对待，一部分是根据体恤某些人的困难，一部分则通过抽签决定。只有短期服役的部队仿照普鲁士的方式，以地区为基础组建；其余的部队都是由离开家乡的士兵组成——由于在非洲紧急需要服役人员，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那些得以完全免服兵役的人（由于预算拮据，这一部分人有时达到全年征兵额的1/4），受不到任何训练，虽然有几次曾计划为他们建立某种组织。就连组织和训练地方自卫队的工作，也一直等到1889年至1893年沙尔·德·弗雷西内接任陆军部长后才得以实现。服兵役方面的这种不平等状况，不断遭到比较

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反对这种不仅保存了搞政变的军队，而且完全免除教士和神学学生服役的办法。1889年，众议院表决通过一个服役期为3年的平等的兵役方案，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一直到1905年，共和主义者才强行通过了一个法令，实行无例外地服役2年的普遍兵役制；这个行动是共和主义者向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彰明较著地显示力量的反动堡垒发动总攻击的一环。德国人树立的榜样极有说服力，他们早在8年前的1893年就实行了服役期为2年的兵役制；这既不是出于平等的考虑，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只不过是面对着一年前形成的法俄的联合威胁，为了加速训练本国可动员的人力而已。面对着来自莱茵河彼岸的强大威胁，兵士们只好默默地接受；但是，许多士兵和加利弗将军一道抱怨说，法国简直是既不要教会，也不要军队了。

由于欧洲列强除英国外都采用了征兵制，受过训练的可服兵役的人数稳步增长。1874年，德国有正规军42万人，战时编制可达130万人。到1897年，正规军虽只增加了1/3，为54.5万人，但战时编制却达到340万人，几乎增加到3倍。在同一时期，法国的战时编制从175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奥地利从113.7万人增加到260万人；俄国从17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而俄国动员工作中的困难，促使它经常保持约100万人的正规军。欧洲各大国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在这一期间总共增加将近1000万人。很明显，未来的任何冲突，其规模将如此巨大，以至很难说有任何一国能够承受在战地维持这么多部队所需要的哪怕是单纯经济方面的负担，且不说在战略方面的各种问题了。这一情况就更加促使在1891至1905年间任德国总参谋长的史里芬伯爵寻求一种能够避免正面进攻造成的长时间消耗，并能取得速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内崩溃）的作战方案。

随着处理军事事务愈来愈接近于完全按科学办事，欧洲各国的军队在组织方面，如同在装备方面一样，彼此愈来愈相像。一些主张维护传统的人在反对科学的统一作战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德国骑兵以长枪作为自己的常规武器；法国步兵保留了有历史意义的红色军裤；但是，欧洲各国军队在阅兵时军装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在战争中，却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不得不都是清一色的黄褐色，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等级森严的组织里，这些差别属于一些细节。在各个国家，军团是自身配备有一切武器和辅助设施的最小单

位，它由约3万名战斗人员组成；由于不可能在一天的时间里把更多的人员部署到纵队的先头部位，因此，军团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军团与某一固定地区建立关系，它从这一地区征召全部新兵和预备役兵员。因此，军团指挥官不仅要负责组织并指挥他属下的部队，而且还负有相当的责任（俄国和英国除外），在和平时期执行军事方针，以及在战争爆发时实行动员。一个标准的军团包括两个步兵师，每师辖有一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每一旅由两个团组成）和一个野战炮团；此外还有一个直属军团的重炮团。在20世纪初，武器也同样实行标准化。步兵配备8或9毫米连发步枪，野战炮兵配备8厘米口径钢炮，攻城炮兵和重炮兵则配备15厘米和21厘米口径的大炮、迫击炮和榴弹炮。军团之下，还配置有工程部队和后勤部队，其机构越来越复杂：医疗队，电信队，铁道支队（其任务不仅负责维护现有线路，而且要铺设新线路——在波兰进行的一次战役中尤为必要），气球支队，自行车部队，架桥部队，以及为了在战地维持如此规模的军团而设置的庞大的后勤机构。

在掌握和管理这些庞大的机构的工作中，未经训练的外行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平时对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中，参谋工作变得愈加严格、愈加繁重，犹如在战时一样。德国总参谋部，由于下属机构井然有序，办事程序固定而又灵活，掌握着军事训练工作，它的总长享有极大的权力，因而成为其他各国军队模仿的榜样。总参谋长在各方面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虽然很少有人能和冯·毛奇那样的人物相比。在俄国，总参谋部仍被置于陆军部之下；在奥匈帝国，阿尔伯特大公的行动和强硬意见，使贝克那样的总参谋长无用武之地，只是在这位亲王死后，强有力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霍曾道夫才得以大权在握。在法国，这一职务在1888年前是一项政治任命，随内阁的更迭而更迭，而且与指挥战场上的军队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和陆军部有联系而已。在英国，直到1904年的伊谢尔改革^[4]以后才设置这一职务。然而，在各国，总参谋部的威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同时，军官的军事教育在各国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在1870年以前很久，就曾设置军事学院和参谋学院，虽然这些院校几乎未曾兴盛过。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学院、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总参谋学院和坎伯利的参谋学院，都与普鲁士的军事学院同时存在，此外还有许多不同兵种的军官训练学校，不胜枚举。但是在1870年以后，这些院校在19世纪上半叶里所表现的那种自由散漫的气氛已不复存在；入学要求提高了，课程

更加充实，竞争更为激烈。军人不仅是一种天职，而且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军官与其说像是骑士，不如说更像是工程师。

欧洲各国的军队的规模日益增大，意味着军官不再能完全来自上层阶级，而18世纪时，这一阶级实际上垄断了军官职务。俄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不可能这样做：在它庞大的常备军中，大部分军官不得不来自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官（一般是从行伍中提升的候补军官），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远比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的志向是担任近卫军军官）为低。法国军队中也明显地存在同一倾向，自大革命以后，上层阶级已经不能够垄断军官的职务了。1815年以后，贵族不屑于从事军职，只是到了第二帝国时期，他们才开始回到军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军官团的性质愈来愈贵族化并坚持正统思想，这是因为法国上层阶级的成员受到19世纪70年代农业萧条的影响，被迫离开他们的庄园，而他们发现法国共和派新统治者的偏见或政策阻碍了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文职、法律、政治）的途径。于是，法国军队在1880年至1900年之间，获得了贵族阶级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至少在社会上有此倾向。这些特征是普鲁士军官团一向具有，而且这时仍在极力保持的。

在德国，随着军队的扩大，不得不招纳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不仅被派往特种技术兵种，或担任预备役军官，而且，还被派往正规军本身。1890年，威廉二世公开号召具有贵族气质的人挺身而出，协助贵族出身的人向军队提供军官。其结果并不像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那么糟。来自中产阶级的新兵不仅使军事效能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也模仿他们现在有权与之交往的上等人士的作风和观点。济贝尔、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迪等人的著作，1870年的光荣传统，这一切都使德国中产阶级更易于接受在1860年前不可想象的那种程度的军国主义化。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军队的扩张所引起的问题，更多的是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的4根支柱（教会、贵族、官僚和军队）中，在19世纪进入末期时，前两根支柱的作用不断衰落，其结果军队的重要性增加了。奥国军官一再被提醒注意他们作为皇室的直接支持者所处的凌驾于阶级和民族之上的特殊地位；在他们的队伍中存在一种“同志感”，这同德国军队特有的那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欧洲的3个帝国——俄国、奥地利和德意志——在军事方针上全都表现出下述共同的特征：通过将广大民众

置于一个忠诚的军官团的控制和指导之下，征兵制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抵制民主主义和激进主义发展的工具，因为这些思想的发展威胁着支撑他们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本身。在法国，由于没有一个君主政权可以维护秩序、传统和教权这些理想的尊严，于是，军队感到自己有更大的义务去保卫这些东西。

这样，虽然各国的军事领袖（也许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除外，因为自从西班牙帝国崩溃后，那些国家是由军方的种种宣言决定国家的命运的）都表示，他们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也不喜欢，但他们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要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奥匈帝国闹对立的民族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法国的激进共和主义均有发展。这一切在军队内部各阶层都引起反响，军事领袖们看来具有充分的职业上的理由（而且往往还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去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来反对这些东西。俄国的情况属于例外。在那里，总参谋部的中坚分子加入了自由派，即“西方化”分子的行列，这派人的强烈要求是：如果俄国想要得到识字的新兵、充足的装备和铁路，那么，就必须实行更大程度的工业化、普及教育以及一切必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种军事自由主义，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并非罕见，因为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取决于技术和教育发展的迅速程度。土耳其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各继承国在20世纪也表现了颇为类似的趋势；而到了19世纪末期，甚至在德国内部，总参谋部和帝国军人内阁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前者决心推行史里芬的设想，组织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和经济后果；而后者作为负责任命和晋升的机构，却希望尽可能使军队保持这样一种规模，即主要由贵族和老资格的正规军军士充当它所需要的军官。

在法国和德国，军事领袖们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干预政治，而在于保证政治家们不要干涉军事。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专家们不愿让外行人过问他们所做的规定。1874年，当德国议会企图削减或改变政府所要求的军队规模时，毛奇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变动这一数字，就使许多范围广泛的准备工作没有把握完成，而这些准备工作是必须提前很久就着手进行，而且必须一丝不苟地予以完成的”。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有效的武器系统的费用增加了，另一方面，普选又使那些发誓要把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和社会事业的政府上台，因此，各国议会和内阁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1887年，俾斯麦宁肯解散帝国议会，

也不肯向议会提出的每3年而不是每7年讨论一次军队的规模这一要求让步。在1894年，过于庞大的海军预算在导致最后一届格莱斯顿内阁的倒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武装部队的规模和装备，只是军队和行政双方之间争议的许多问题之一。在日益自由化的社会里，军队的司法、上下级关系和纪律这一整套机器，受到吹毛求疵般的批评和攻击。在德国，军官团企图在庞大的军队里保持普鲁士古老传统的盲目服从精神和军人的骄矜习气（这种习气在威廉二世的支持下已扩散到正规军队以外，使每一个以能穿着军装为荣的资产阶级预备役军人受到沾染），这一切在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像《西卜里齐西姆斯》那样的讽刺刊物的文章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由于帝国议会中反对军队的情绪越来越高涨，结果德国军队便设法抽掉陆军大臣所掌管的军政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而使军队事务完全摆脱议会的控制，因为陆军大臣是帝国议会在领导军事事务方面唯一应向议会负责的官员。由于在德国——实际上在奥地利、俄国以及很大程度上在英国也一样——武装力量仍被视为专归皇帝统辖，应该使之保持完好无损，不应受到正在侵袭社会其他领域的民主主义的影响，这就使这种企图摆脱控制的做法更加容易实现。德国皇帝通过自己的军事内阁，奥地利皇帝则通过他的军事办公厅，控制着对军职的任命，他们的总参谋长直接对他们负责。军官同他们的君主保持一种特殊的半封建式的效忠关系，这与公民对国家元首表现的正常的忠顺迥然不同。干涉武装部队的内部事务，被看作如同干涉皇室事务一样的亵渎行为——军队实际上就是皇室的延伸。

然而，很难避免得出如下结论：忠诚与其说是为保持欧洲各国军队的“团结精神”而提出的一个理由，毋宁说是一种借口。在法国军队中，根本没有一个可以表达这种忠诚的中心，有的只是对陆军部长的等级森严的服从，而部长本人虽然是由政府任命的军人，但他在陆军部里犹如一位军队派驻的大使，而不是民主管理的工具。虽然如此，法国军队的“团结精神”丝毫不逊于德国或奥地利。法国军队也许比那两国的军队更加为自己保持纯洁，不受时代精神的污染而感到自豪。1870年以后，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蜜月时期，那时，法国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不仅把军队视为命中注定的为民族雪耻的工具，而且也是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同时，相当一部分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把军队

当作培养法国人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尊敬权威这些美德的学校，而1870年的败北，暴露出他们多么明显地缺乏这些美德。德泰的军事题材的画片畅销各地，流行歌曲赞颂军队，而且，当那位不幸的布朗热将军发现自己被推到民族大救星的地位时，他的支持者中至少有同右翼的保皇党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保守主义者同样多的左翼人士，戴鲁莱德和“爱国者同盟”使这个左翼保持了雅各宾党军事传统。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这一段蜜月已近结束。当时出现了一股写反对军队文章的浪潮，德泰让位于卡朗·达什，军队的缺点开始受到敌对而有才干的人们的挑剔。法国军事领导人像他们的德国同行一样，也认为这样的批评不仅是不了解情况，而且肯定对国家安全和士气有害；因此，当有关德雷福斯上尉1894年因间谍罪被判刑的遭遇的种种传闻开始传播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宣称这纯系内部事务，第二个反应是反对重新审理此案的任何企图，第三个反应是做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军队的声誉现在取决于德雷福斯的罪行，而国家安全又有赖于军队的声誉，那就必须不惜采取伪证或伪造文件等手段，使其罪行得以确立。

然而，也许德雷福斯案件最有意思的一面，并不在于法国军队为了维护军队的独立和国家的威信竟然准备走得这么远，而在于它在这么做时，公众给予支持的那种程度。这一案件在社会上自上而下造成了分裂，在各行各业以及持各种政见的人们中间，都有反德雷福斯分子。军队是国家的象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其神圣地位。在德国，这种感情更为强烈；在奥匈帝国和俄国，只是由于皇帝和沙皇本身唤起了程度更为强烈的忠诚之心，才使这一感情有所减轻；而在英国，皇家海军到了19世纪末，在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政论家，他们那种感情激昂的强烈劲头，在三年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要探索欧洲各国对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工具——国旗、武装力量和君主本人——的感情何以如此高涨，将远远超越本章的论述范围。在此只需指明，陆军和海军的领袖们，在争取拥有更大的军事力量并自主地领导这支力量的斗争中，不仅代表一个职业集团的利益；他们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能够获得公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他们与之争执的那些文职官员的领袖们有时所得不到的；毫无疑问，意识到能够获得这种支持，就进一步激励他们之中能力较强的人——德国的瓦德西、英国的费希尔、奥地利的康拉德、俄国的斯科鲍列夫——企图去影响国家的政策。

军方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似乎总是有限的。还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经济等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利益。但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对于海军和陆军顾问们出自国家安全的最低要求而提出的种种考虑，则必须给予仔细的注意。法兰克福和约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毛奇和总参谋部坚持占有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两处要塞的要求而制定的，同时占有贝尔福的要求只是勉强才放弃的。英国的海军和陆军顾问如此坚决地要求建立海外基地以保护供应线，以致索尔兹伯里伯爵声称，“如果听任他们放手行事，他们会坚持月球对保卫我们免遭火星的进攻具有重要地位”。从要求获得保护性的基地，就能轻而易举地发展到要求发动预防性战争。这方面有两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费希尔非正式地建议给予德国舰队以“哥本哈根式”的打击^[5]，以及康拉德·冯·霍曾道夫对奥地利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消灭塞尔维亚——均非本文讨论的范围。然而，奥地利和德国军事当局对俄国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则肯定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以内。

正如俾斯麦在外交领域中那样，1888年以前一直担任德国总参谋长的毛奇，更多地意识到新德意志帝国的弱点，而不是它的力量。他不安地注视着法国的军事力量东山再起；当法国在1876至1878年间修筑了一条巨大的要塞地带以保护它的东北部边境，从而使得1870年那种速胜显然不可能重演时，毛奇就更加感到不安。因为毛奇既担心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前景，同样也担心俄国由于米柳亭的改革产生效果而使它的军事效能日益增长。两线作战，只有指望在一条战线上能够迅速取胜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既然法国的要塞地带看来已使在西线取得速胜的一切希望破灭，毛奇便决心在莱茵河以西新赢得的领土上采取守势，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东线。做出这一决定，不仅恰巧是1879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一事之时，而且也是俄国发现了1876—1877年间动员计划中的种种缺陷而决定在西部各军区维持一支常备部队之时，这支部队据德国和奥地利总参谋部估计达60万人之多。这样的对手，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于是两国总参谋部在未得到各自政府的正式授权下，于1882年开始制订计划。当有人问到俾斯麦对于这些会谈的态度将会如何时，毛奇傲然回答说：“我的地位使我无须依靠外交部。”到了1887年，当巴尔干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保加利亚危机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看来如此之大，以至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参谋部都认为，只有首先发动进攻才能保障安全；于是，毛奇的副手和继任者瓦德西与贝克共同草拟了一项军事协定，计划在1888

年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甚至毛奇都认为这未免太过分了。俾斯麦不得不决心进行干预，并摆脱这些急躁的军人们。但不久，他又不得不对付一位急躁的皇帝。1889年，威廉二世摆脱了俾斯麦的约束后，向贝克许诺说，“不管你为了什么原因进行动员，不管是否为了保加利亚，你开始动员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的军队进入动员的一天，首相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一年后，俾斯麦去职了。维也纳的军人们公开表示他们感到满意。

维也纳的高兴未免过早。1891年，瓦德西本人也被免职，他的继任者史里芬不久就放弃了他的方针。俄国部队的重新部署，以及纳雷夫河和涅曼河要塞地区的加强，使得在那条战线上的速胜同样没有可能；而且，史里芬无论如何不相信奥地利军队有能力完成共同制定的战略中它们那部分任务。在19世纪结束前，他已将注意力转回西线，开始拟订通过比利时进行大迂回、一举包抄法军和要塞地带的著名计划。这个计划终于体现为臭名远扬的1914年的进军。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间，德国军事计划制订者一直根据这样一种设想进行工作：法国和俄国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都将成为同盟。一反俾斯麦的和平政策而听任中止同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的人物卡普里维伯爵，居然是一个职业军人，这一点也许并非偶然巧合。无论如何，为俾斯麦所畏惧而总参谋部视为不可避免的法俄协约，只是到了俾斯麦辞职以后才形成，并且是作为一项军事协定而发起的。这个协定的产生，除了出于对德国的共同畏惧以外，还有几个因素。对英国的敌视也是一个有力的原因，同时，俄国很自然地指望法国向它提供它发展铁路和军用资源所需的资金和工业援助，因为德国愈来愈不愿提供这些援助。两国的政府首脑（俄国的吉尔斯、法国的利鲍和弗雷西内）都表现出不愿缔结任何特定的军事协定。正如俄国人不愿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一样，法国政治家也反对为君士坦丁堡而参加战争。但是，1891年法国舰队到喀琅施塔得进行友好访问时，法国副总参谋长德布瓦戴弗尔将军与俄国副总参谋长举行了试探性会谈，通过会谈清楚地看出，只有采取为相互支援而立即进行动员的手段，才能产生一些军事价值。法国人知道，除非俄国人立即发动牵制性进攻，他们自己无法抵挡全部德军的猛攻；俄国人也同样为他们在波兰的前沿部队的暴露的阵地感到担心，因为奥地利和德国依靠他们优越的铁路设施，能够集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来进攻这些部队。1892年，在沙皇亚历山

大三世的大力支持下，军事专家们克服了政府方面的犹豫态度，签署了俄法协定，根据协定，两国不仅一致同意在德国进攻任何一方时相互给予支援，而且，如果三国同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进行动员，则其他两国也要开始动员。这项协议的批准一直拖延到第二年；但到那时德国已开始实施两年兵役制，从而增加了该国经过训练的人员的数量。这也就足以打消最后的一些顾虑了。

以上我们只集中论述了欧洲的事务，因为虽然各国对海外世界的兴趣和依赖程度日益增加，但各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政策和军事组织都是设法应付纯属欧洲的威胁。中欧各国，除为了在非洲作战而装备的一小部分德国军队以外，可以把它们的军事能力完全用于制订欧洲战争的计划。但是，西欧沿海的殖民帝国法国、西班牙，尤其是英国，除了应付邻国入侵以外，还要准备应付其他军事事变。这些国家在海外广泛地承担的义务，使它们卷入一些边界战争，而它们的手，虽然常常只具有工业化以前的文明程度，却表现得有手段、有勇气，足以给为了对付他们而所能动用的有限兵力造成相当紧张的局势——自从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能够购得现代化来复枪以后，这种紧张局势大为加剧。的确，1881年和1899年，英国在南非发现布尔共和国这个敌人起初拥有优于自己的技术和装备。美国于1898年摆脱了孤立主义，同欧洲独占帝国主义权益的情况展开了竞争，从而给世界政治带来一个新因素：欧洲以外的一个充分工业化的强国。

海外领地的防务问题，不仅包括保卫或拓展边疆，还必须安抚这些领地境内的居民，而这只有采用军事镇压与开明的行政管理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做到。因此，19世纪后期的军人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欧洲的参谋军官，他们能熟练地掌握发展武器、供应、铁路运输以及管理庞大部队等复杂的工作。另一种是吉钦纳和利奥泰一类兼擅军事和行政的人才，他们独当一面，兼顾多方，既关心军事组织，也关心民事机构，既注意消灭反对者，也注意依法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帝国殖民地总督。在海外服役的英军和法军部队（实际上也包括在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俄国部队），从事建筑工程、改进交通、救济饥荒等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才与军事有关。在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摩洛哥，法国军队中有高度教养的司令官，如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等人，提出了一种军事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征服的方法与其说是取决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

说更多地取决于在征服以后进行安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需要；在英国军队中，即使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地形成这种理论，但实际上往往是这样实行了。

对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军队，即便是对于法国的军队来说，同保证本国不受欧洲邻国入侵的需要相比，在殖民地的作战只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对英国来说，这样的作战却是军队存在的理由：对于经常分散于全球各地驻防的一支军队，所有其他欧洲列强均采用的短期兵役制原则，即使在政治上可行（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则不可行），其效果也值得怀疑。尽管如此，英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感受到普鲁士于1866年和1870年所获得的胜利的影响，从而加速了业已进行的军事改革运动。自从15年前克里米亚战役惨败以来，在一个原封不动地保持了18世纪军事组织原则的军队中，一些最有害的反常现象正在慢慢地得到消除；当时，格莱斯顿内阁正以热心于节约和改革的精神，改变着英国的整个行政、司法和教育制度。当爱德华·卡德韦尔1868年把这种热诚带到陆军部时，清除反常现象的进程加快了。卡德韦尔为了追求效率和节约，不得不推倒旧秩序的两根支柱：一根是把军队的统辖权分属于对君主负责的皇家总司令和对国会负责的陆军大臣的二分制；另一根是保证把军队控制在有产阶级的手中的那种购买军职制度。这些只有根据早已过时的问题和爱好才有理由存在的反常现象，都及时地得到消除。总司令被降到“陆军大臣的军事顾问”的地位；关于购买军职制度，卡德韦尔则争辩说，废除这种制度完全属于国王的权限，因此，可以通过国王颁布敕令来进行改革，从而他得以驳回议会的反对。此外，对军队本身也进行了改组。海上运输愈来愈方便、迅速，因此，不再需要在海外驻地多年不动地保持大量的守备部队；而那些幅员辽阔的海外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则已自行解决防务问题。通过减少海外驻军的人数，卡德韦尔得以在国内训练出一批干部，派往新建立的66个军区的每一训练营地，既可作为海外驻军的姐妹部队，又可管理地方民兵部队的训练工作；自王政复辟以来，民兵的训练工作一直由各郡的军事长官管辖，现在则再次改归国王掌管。这样，卡德韦尔实行了一种经过修改的德国式“军管区”制，使每一支部队都同一个地区联系在一起，从那里招募新兵，定期补充兵员，并获得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缩短海外服役年限，也使得有可能采纳一种加以修改的大陆式短期兵役制，1870年的陆军入伍法规定新兵只需服12年兵役——6年现

役，6年预备役。军队第一次对它招募的人员能够有所选择。入伍津贴被废除，品德恶劣者被开除；在最近两任总司令，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和弗雷德里克·罗伯茨爵士的影响之下，英国军队越来越注意兵员的舒适、福利和教育。由于没有实行征兵制，军队和国家还不能够像在欧洲大陆国家那样成为一体；但是，军人已不再是终生从事一种受到平民忽视和蔑视的职业的被社会遗弃的人；到19世纪末，由于拉迪亚德·吉卜林、斯潘塞·威尔金森和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等作家活动的结果，英国军队逐步地获得公众前所未有的爱戴和尊敬。

然而，还有进一步进行改革的很大余地。总司令的办事机构完全无力处理复杂的军政问题，这些问题在欧洲大陆上统统归日益扩大的总参谋部管理。哈廷顿勋爵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于1888年建议根本撤销上述机构，以一个相当于海军部的陆军委员会和一个德国式的总参谋部来代替它。维多利亚女王为这个“真正可恶的”报告所触怒，于是，报告中的各项建议经过种种折中，修改得面目全非。直到布尔战争之后，这些建议才得以实施；而且，布尔战争还暴露了其他急需补救的缺点。卡德韦尔把军队组织得能够向帝国各驻防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增援，同时，又提供一支本土防卫部队和一支人数很少的战略预备部队。它却不能提供一支在给养、人员和后勤等方面都已组织停当的大部队，去同“文明的”敌人进行一场持久的海外战役。这一切不得不临时筹措；到1901年，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英国军队要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那就仍然需要进行至少同卡德韦尔的 any 改革同等广泛的军政改革。所需进行的这种改革，也并非纯属军政方面。1899年10月至1900年8月之间10个月的战争表明，军队的战术、训练和专业领导水平完全不足以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为了在远方作战的需要而重新部署帝国武装力量所牵涉的海军以及陆军方面的许多问题，都表明有必要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其管辖范围将超越纯军事的问题，而涉及帝国长远的防务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的前25年，人们就已时常感到并强调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哈廷顿委员会曾建议设置一个以首相为主席的海陆军联合委员会，索尔兹伯里勋爵于1895年设立了内阁国防委员会；但是到了1902年，才成立一个专门性的帝国防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全面考察帝国在战略方面的军事需要”。它的成员除了首相和秘书处以外，保持很大的流动性，以便不仅能视情况需要招请海军和陆军专家，而且还能招请经济、财政、外交和政治方面的专家。在冲突行将成为全球规模的时代里，对于英国这样一个

承担如此广泛义务的国家，这样一个机构对制定军事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同德国“大总参谋部”在较小规模的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一样。

十分自然，英国首先是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确，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历史学家，往往容易指责大陆上的战略家们目光狭隘，认为这些人只看到拿破仑或毛奇等人的业绩，而完全不考虑控制海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一个没有易受攻击的陆上边界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在欧洲各国中，海军事务对于英国是生命攸关的；对于法国和意大利是次要的；而对于德国和俄国，就无关紧要了。法国的海军优势虽推迟了1870年的失败，但却未能避免败绩。然而，进入20世纪时，海军军备和海上战争问题，即使在欧洲大陆各国和主要的非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也都引起关切；本文现在即将把注意力转到这种国防手段所涉及的技术和政治问题。

1870年，由于蒸汽机和铁的使用以及造炮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造舰技术的革命，已经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自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蒸汽机就已替代风帆，成为军舰的主要推进工具；而1853年土耳其的木造舰队在锡诺普被俄国炮火所摧毁一事，已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装甲是不可缺少的；1862年3月美国南部同盟的铁甲舰“梅里麦克”号在汉普顿停泊地所取得的战绩，更证明了装甲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幸而北部联邦的“蒙尼陀”号正巧出现在战场，才使联邦舰队免于被炮火和撞角所摧毁。由拿破仑三世和迪皮伊·德·洛姆大胆首创的蒸汽铁甲舰“光荣”号和它的姐妹舰只于1859年下水，这种军舰遂被广泛采用，而那些曾参加过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舰只，则如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政论家所说，“像古代三层橓战船那样地过时了”。为了完全同过去决裂，只需再迈出两步：放弃用木材作为建造海军舰只的主要材料；放弃使用即使是作为辅助动力的风帆。英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铁材有其缺点，在远洋航行中尤其严重（铁制船底比木材包铜的更易腐蚀）。但是，使用铁材能够建造大得多的舰只；同时，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它的价格低廉。英国拥有丰富铁矿，但没有足够的木材。1859年下水的“勇士”号是英国建造的第一艘铁制军舰。意大利于1861年，俄国于1864年步其后尘；但是，法国迟迟未放弃它所采用的铁甲木制军舰，这种舰只能够很充分地满足它较为有限的需要。直到1872年，在它战后的第一次造舰计划中，法国才将

铁材视为最经济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大舰体的材料而加以采用。此后，欧洲的海军造舰工程师实际上放弃了使用木材；欧洲大陆上日益发展的冶金工业，也由于造船合同而兴旺起来。

第二步，具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870年9月8日发生的一场灾难后，英国海军部迈出了这一步。当时，扬满全帆的蒸汽铁甲舰“舰长”号翻船沉没，船员几乎全部遇难。由于风帆简直可以无法估计地增加巡航能力，各国海军不愿意放弃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保存全帆同影响海军造舰的其他一些考虑正相矛盾。在这些考虑中间，主要的问题是在敌人威力强大的新式火炮面前，必须把暴露的目标尽可能缩小，因而就要把吃水线以上的干舷部分降到最低限度；而正是这种低干舷（仅有6英尺高）加上扬满全帆的桅樯导致了“舰长”号的那场灾难。但是，低干舷也意味着必须放弃传统的舷侧炮——采取这一步骤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希望将火炮安装的位置改变，使军舰在炮击和冲撞敌舰时，能够越过舰首向前射击。以蒸汽机代替风帆为控制军舰的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一般认为，这将导致在近距离进行海战，采取冲撞或登上敌舰等手段；就像“梅里麦克”号在汉普顿停泊地撞毁它的敌舰，和奥地利海军上将泰格特霍夫于1866年的利萨海战中撞毁意大利旗舰那样；这两次行动的结果，决定了5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海军作战思想。于是，撞角和向前发射的炮塔就成为海军装备的必要部分。第二个因素是海军火炮的体积和重量均有增加。海军火炮的重量从5吨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的80吨。要增加发射火药首先就要求大大加固后膛；慢燃火药的采用，又要求加长炮筒，以便充分发挥爆炸力——这一发展迫使英国海军部放弃他们在1880年以前一直死抱住不放的前膛装弹的火炮。这样巨大的火炮，只能够安装在舰只的中轴部位；旧式的炮门让位于炮塔、中央炮塔或固定炮塔。

于是，19世纪70年代的铁甲舰所采用的形式是，距水面较低的装甲平台，在它上面，矗立着装有重炮的重装甲中央炮塔，炮塔周围是未加装甲的水兵活动区。英国的“劫掠”号和“刚劲”号，法国的“劲敌”号和意大利的“杜利奥”号均属这一类军舰。但是，这些舰只也有它们的缺点。将全部火炮集中到军舰上的一个区域，就使得一门火炮的硝烟妨碍所有火炮的视界；而且，由于炮弹的穿透力增加，要在所有要害部位（特别是水线部位和中央炮塔）都装上足够的装甲已属不可能。以1874年建造的“刚劲”号为例，其要害部位不得不使

用有时厚至24英寸的铁甲板来保护。法国人完全放弃了中央炮塔，他们于1876年建造的“迪佩雷海军上将”号只对水线部位施加强甲，并把火炮安装在前炮塔和后炮塔中。英国人不准备仿效这种看来为了保护舰只而无情地牺牲了对水兵的保护的做法。不久，科学就给他们以帮助。美国的哈维和英国的贝色麦正在改善一种淬硬钢的新工艺，到了19世纪80年代就已获得一种轻、薄而又强韧的新式装甲板；这样，不仅舰只可以不再像在19世纪70年代那样，犹如囚犯似地非穿着笨重铁制紧束衣不可，而且也可以为巡洋舰装甲，不再需要为了速度而牺牲防护了。1890年的“君主”号和1895年的“尊严”号标志着英国海军又回到高干舷，这一改变意味着在舒适条件和速度上获得改进；其他国家的海军造船工程师迅即仿效此法。中央炮塔终于消失了，重炮安装在旋转炮塔里，并以较小的12磅、6磅和3磅炮弹的速射炮，乃至霍奇基斯和诺登费尔特发明的机关枪作为辅助火力。到了19世纪末，战列舰的排水量达14000—15000吨，以蒸汽为动力的航行时速可达18海里，并装有12或13英寸口径大炮，炮弹初速达每秒钟两千英尺以上。

显然，在这些载有巨炮的战舰之间进行的海战，在性质上和程度上，都将不同于纳尔逊时代的战舰之间的海战。那个时候，风向和天气等偶尔可能帮助一支巧妙地操纵的较弱的舰队。正如法国人在18世纪所学会的那样，占据上风位置并击落敌舰的帆索，就能够给较强的敌人以创伤而自身安然逃脱。但是，现在面对着更强大的蒸汽机和更大的火炮，幸运或航海技术都无法提供解救办法。一支较弱的舰队一旦被发现有，甚至无法再在海上航行；而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4000码左右时，这支舰队再也不能靠短兵相接的一场混战来补救自己的劣势。1894年，在鸭绿江口外的海面上，日本舰队单凭炮火就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舰队，当时根本没有接近到进行冲撞或登舰的距离；4年后，美国舰队在马尼拉和圣地亚哥再次给人以同样的教训。那些速度更快、装甲更好、火炮更有威力、训练更精的军舰将会赢得胜利。在陆战中，未来战争的结局看来将取决于经过长期准备的征兵政策和动员计划；而海战中的优势愈来愈掌握在设计师和海军造舰工程师的手中。对法国和俄国造舰活动的恐惧，驱使英国加快了步伐。对德国和意大利的造舰活动的恐惧，又驱使法国加快了步伐。美国和日本害怕在武力和威信上落后于人，也驱使它们急起直追。相互对抗的各国政策，促使战列舰的吨位及其火炮的口径一步步地加大。

然而，除了战列舰以外，海军设计师们还发展了其他一些武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人有效地使用了系列水雷，在那场冲突结束后10年，阿瑟·怀特黑德获得他的第一种自动鱼雷的专利权。最初的几种类型速度慢，不准确，射程有限，并且非常难以发射；但是到了1877年，俄国人能够用它有效地攻击停泊中的土耳其舰只，于是鱼雷战很快成为海上作战全部技能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鱼雷艇不仅成为必备的海岸防守手段，使得任何近岸封锁成为不大可能，而且还给海战增加了另一因素。它们被视为海上骑兵。英国专家H. W. 威尔逊在《战斗中的铁甲舰》（1898年）一书中写道：“在战列舰完好无损时，舰上的速射火炮处于良好状态，炮手们也未产生动摇。这时，不大可能派遣鱼雷艇去攻击它们；在战斗趋于结束时，鱼雷艇大显身手的时机便来到，这时，战斗已使一堆堆巨大的钢铁百孔千疮；这时，这些目标已失去行动的能力；这时，舰上人员人数减少，并已经过紧张的战斗而疲惫不堪。”到了19世纪末，人们的确愈来愈怀疑，鱼雷艇是否有能力穿越战列舰能够在自身周围构成的火力网，尤其是这时舰只已不再为旧式的火药的浓密硝烟所笼罩；但是，已经开始发展潜艇，这种舰艇能够更为安全地取代鱼雷艇的地位。

正像许多其他的军事发明一样，潜艇的起源也可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但是，当时所采用的不甚奏效的原始类型已得到改进，首先是荷兰于1877年发明了水平舵，使得对潜水动作的控制成为可能；其次是蓄电池的发展，使得储存电力成为可能。如同在这一时代的许多其他重大的海军发明一样，法国海军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先驱的作用。到1899年，法国制造了“居斯塔夫·泽代”号，这艘潜艇可在60英尺的水下航行，时速达8海里；这或许是可供实战使用的第一艘潜艇。两年以后，除了已有的8艘以外，法国又订购了23艘这样的潜艇，于是，法国的潜艇力量超过了其余各国的总和。1901年，英国海军部试探性地定制了5艘，他们在关于预算的备忘录中声称，“这些舰艇在海战中将来的价值如何，只能属于猜测之事”。过了5年，德国海军才步其后尘。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于1904年颇有道理地写道：“我感到惊奇，非常惊奇，我们之中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居然认识不到潜艇在海军作战和海军战略中将完成广泛的革命。”

法国人首先发明潜艇战并非偶然。在法国海军中，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历次战争中他们的强大的私掠船对英国贸易发动的“突袭战”，

一直没有被人遗忘；在某些法国海军理论家的心目中，19世纪海军和经济的发展，给他们的海员带来一个良机，只要他们能够抓住这个良机，就能取得超过迪居埃-特鲁安和让-巴尔^[6]的成就。这个少壮派的发言人曾指出，英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于它的海外贸易，不仅维持它的生活，而且维持其本身的生存；海外贸易受到干扰，不仅将引起商业恐慌和工人失业，而且会造成饥馑。即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用来袭击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有限活动，已足以表明利用少数大胆而装备齐全的舰只能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现在，蒸汽时代给袭击商船的武装快船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由于燃料的限制，商船总是沿着经常行驶的航道航行，而不能安全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而武装巡洋舰却能建造得具有满载的商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高速度。像加布里埃尔·夏尔姆这样的作家，就曾在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强调指出，英国的海上霸权已成为往事。鱼雷艇将使英国不能使用近岸封锁这一武器，而袭击商船的武装舰艇却能够给英国的商船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这种袭击必要时可以毫不考虑现行的战争准则），以至很快就能使它屈服。“别人尽可以抗议；我们自己却把这些新的破坏手段，视为我们坚信不疑的进化法则的发展而加以接受，最终的结果将是完全消除战争。”这就是海军上将泰奥菲尔·奥贝以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口气所写的话。他于19世纪80年代在海军部任职期间，实现了少壮派的许多主张。法国海军开始将精力集中于鱼雷艇和巡洋舰的作战，并且热情地关怀潜艇的发展前途。解决法绍达危机的办法，还在于建造“居斯塔夫·泽德”号这样的潜艇；至少有一位热衷于此的人德阿马尔，在他所著《潜艇与对英战争》（1899年）一书中，主张法国应完全放弃建造战列舰，而依靠装甲巡洋舰去破坏敌人的商业活动，依靠潜艇去消灭敌人的舰队。

但是，少壮派即使在法国也未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主张。法国海军部承认巡洋舰、鱼雷艇和潜艇是战列舰的辅助舰艇，但绝不能以它们来替代战列舰。1900年，法国海军部采纳一个建造6艘15000吨级战列舰和5艘12500吨级装甲巡洋舰的七年计划时，海军部长所做的解释是依据英国海军理论家一直未曾放弃的正统观点。他声称，在海上保持威力尽可能强大的火炮尤为重要。只有在宽阔稳定的平台上，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样的船身平台，再加上必要的装甲和速度方面的要求，其结果就是战列舰。海军力量的对比，终究是以大型战列舰来计算的。

英国的确就是这么考虑的。在19世纪80年代，它发现如果它的两个主要对手法国和俄国一旦把力量联合起来，那么，英国的海军力量就不够充足。如果说德国总参谋部为法国和俄国联合兵力的数字所烦扰，那么，英国的海军理论家也同样为法国和俄国舰艇的总和感到担忧。由于英国在非洲和亚洲同这两个国家一再发生矛盾，10年来，它和它们的摩擦一直在增加；不仅如此，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还暴露了英国海军的动员和训练措施同它的打击力量是一样的不充分，而这场危机当时看来显然有可能引起战争。在报刊上和国会中掀起的一场运动，终于导致正式采纳“两强标准”。英国海军的战列舰要保持相当于两个仅次于英国的主要海军强国的联合舰队的力量。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政策，1889年通过了海军防务法——这一步骤带来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军备竞赛。英国决意实行一项海军建设计划，耗资2150万英镑，要在今后3年内建造10艘战列舰（其中8艘是新型的“君主”号级，吨位超过14000吨），以及9艘大型巡洋舰和33艘较小的巡洋舰，以对付少壮派的那些舰艇。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同法俄两国竞争（1891年这两国海军之间表现出令人讨厌的亲睦关系后，这一竞争被视为尤其具有威胁性），以及海军舰只迅速变得陈旧过时，这两方面的刺激，迫使英国计划在1904年前建造42艘战列舰和45艘装甲巡洋舰，并在1893年至1904年间平均每年下水7艘主力舰。在新成立的海军协会的推动下，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派帝国主义者通力合作，促使加快步伐。只有格莱斯顿先生宣称，海军部的要求是“发疯！发疯！发疯！”，他宁肯辞职，也不批准一项他认为将致命地损害经济与和平事业的政策。

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及传统的殖民地争夺所带来的恐惧，本身就足以构成进入20世纪后即开始出现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原因。军备竞赛牵涉的范围不仅限于舰只。放弃使用即使是作为辅助动力的风帆，就使得一切船只必须完全依赖沿着它们的航线每隔不远处能够得到加煤站；而对于军舰来说，如果它们要在遥远的海域处于临战状态并保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比燃料更多的东西了。军舰将需要军火和食物供应，船坞设施，海军营房和医院，即一个完善的海军基地所应具备的一切设施。因此，如果各国政府要对本国的商业给予传统上它所应得的保护，他们就必须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军基地，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基地本身需要得到保护；连续各个基地的交通线也是如此；于是，就需要更多的舰只和经费。因此，扩张海军的要求不仅来自负

责安全问题的军界；而且，由于西欧和美国的多种商业和财政利益依赖于维持并扩大繁荣的世界贸易，因而也扩展到财经界。那些从事造船、冶金和军火生产的大企业，依靠政府合同获得繁荣。假如它们没有对全欧各地和美国成立的海军协会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的话，本来还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超然脱俗的姿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成立这些海军协会，就是为了鼓吹继续推行并加强一项不仅对于保护国家利益至关紧要，而且本身也是大为有利可图的政策。

正如让-雅克·卢梭将情感和个人主义对18世纪形式主义的总反叛加以具体化并加以阐述那样，美国海军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上校成为这种新的“海军主义”的鼓吹者。1890年，马汉出版了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所作的讲演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这些讲演的大部分内容是详细分析17和18世纪时海战的战术与战略；但是，它们包括了有关海上力量的性质和组成因素，以及海上力量对于国家繁荣昌盛的关系等问题的综合归纳，集“海军主义者”正在形成的信念之大成。朱利安·科贝特爵士写道：“这是第一次将海军史建立于哲学基础之上。”这样的论断，对于在科贝特本国正在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海军少将菲利普·科洛姆的思想来说是不公正的，科洛姆的《海战》这部有分析性的伟大著作与马汉的名著同时问世。但是，马汉的论断听来具有权威和说服力，使得它们易于被引用，并且易于翻译，而科洛姆的用词谨慎的专门术语却不是如此。直到1914年去世以前，马汉在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中继续阐述有关海军力量和政策的前后一贯的主张，这些主张已成为全世界每一海军国家所接受的原则。他主张海上力量、商业和殖民地这三者紧密相关，它们是国家取得财富和繁盛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他写道：“从这三个方面，即生产以及交换产品的必要性；赖以进行交换的航运；可以帮助和扩大航运活动，并通过增加安全的立足点而有助于保护航运的殖民地，人们将会找到解释沿海国家许多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的关键。”再者，海上力量不仅保护商业，它也从商业中获得力量。他写道，海上力量“不仅包括以武力统治海洋或海洋的任何一部分的水上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和平的通商和航运，因为只有通过它们，一支军事舰队才能自然而健康地生长，同时，舰队的安全也有赖于它们”。没有商业，就没有海军；没有海军，也就没有商业。而商业和海军都需要海外基地。马汉于1893年写道，“控制海洋……在构成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单纯物质因素中是首要的”。“……由此必然导致下述原则，即，作为控制海洋的

辅助手段，只要能够正当地做到，就必须立即占有那些有助于获得制海权的海上据点”。

马汉的主张更多地着重于现行的政策，而不是制定新的政策。当他抨击突袭战整个方针的文章发表时，少壮派已经在走下坡路，而对海外基地的争夺已进行了很久。他只能敦促他的同胞们加入这场争夺。他提出，美国首先应占据能够使它控制巴拿马地峡的一些据点，由于商业上和战略上的考虑，迫切需要立即修建一条横跨地峡的运河；其次，应在太平洋占据基地，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在那里，正在进行扩张并互相猜忌的三个新强国日本、德国和美国，加入了原来的宿敌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行列；而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马汉的狂热信徒。

德国作为海军大国的出现，有一个同自己的民族传统彻底决裂的过程。自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个别德国舰只或舰队一直在显示帝国国旗并保护商业：1872年在海地，要求对德国贸易商人的损失做出赔偿；1876年在中国沿海，同其他欧洲国家一起采取共同步骤以镇压海盗；以及1883年在安格拉皮奎那和1885年在桑给巴尔的行动。但是这些活动对德国的海军政策并无多大影响。自从阿尔勃莱希特·冯·罗昂1867年创建德意志海军以来，它一直像是陆军部的继子，主管该部的军人虽然有效地尽了他们的监护之责，却认为海军的作用主要在于卸去陆军的防守海岸线的责任。除了分派负责保护贸易的无装甲的轻巡洋舰和炮舰，以及少数铁甲巡洋舰以外，德国舰队主要由鱼雷艇和海防舰艇组成——这支舰队的威力已足以引起法国的担心，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它完全有可能用来袭击法国的海岸和港口。这就是俾斯麦在外交方面实行的有限责任政策所强加给海军的紧束衣，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件紧束衣就开始使身体钳痛得难以忍受了。早在1884年，海军部在提交给德国议会的备忘录中就抱怨说，德国赖以保护贸易的无装甲舰只，在战时将毫无价值；这一论点投合了正在发展中的商业和工业阶层的心意，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既出自政治上、也出自经济上的动机，就不愿再提供陆军部吞噬的那愈来愈庞大的款项。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德国赢得它的勤劳、才能和命运所赋予它的地位，而且能够在不增加容克贵族势力（他们仍然垄断着比他们应得的份额更多的权力）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俾斯麦的失势排除了在德国推行海军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新

皇帝居然设置了独立的海军部，并引用海军的一句话打比喻说：“舰艇的命令依旧：全速前进！”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威廉二世是一个不甘心落后于世界思潮最新发展的人物。他“狼吞虎咽似的”攻读了马汉的著作，并且在德国海军的每一艘舰艇上放置了这些著作的译本；他于1892年授予他的海军参谋长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以直接晋谒之权，他的首席陆军顾问已享有此权。提尔皮茨是作为鱼雷艇指挥官而崭露头角的，但在他看来，德国海军应发挥比单纯防守海岸远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他于1894年写道，“没有一支能够发动攻势的舰队，德国就不可能发展世界贸易、世界工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海捕鱼、世界交往和殖民地”。不仅如此，提尔皮茨比马汉更迈前一步。他看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一支强大“舰队的存在”，也能给外交谈判增加力量 and 作用——这一论点特别为他的皇帝所赏识。但是，强大的舰队意味着战列舰，而且如果这支舰队不只是单纯用于防御的话，战列舰的数量就必须足以给英国人以深刻的印象才行。正是为了满足最后这一点，提尔皮茨才提出了他著名的“风险”论。德国舰队至少应该强大到足以在同英国交锋时使之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以致英国舰队无力再同它的对手法国和俄国交战。因此，同德国海军进行决战所带来的风险，就会对英国起威慑作用，使之不再指望靠大大增加舰队规模的办法就能有效地打击德国。这是一种企图以低廉的代价来建立海上力量的做法；提尔皮茨于1897年就任海军大臣时所采取的步骤是比较谨慎的；建造7艘新战列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更换过时的舰只），以便使德国总共拥有19艘战列舰。

甚至1898年的第一个海军法，既可以看成是扩军措施，也可以看成是合理化和标准化的措施。该法将海军力量定为19艘战列舰和12艘大型巡洋舰，并规定了支出的最高限额。但是，两年以后论调改变了。提尔皮茨发现，比起皇帝和他费了很大力量才建立起来的海军协会来，他的热情已瞠乎其后。英国看起来已不再是一个强大到只有在冒风险和求平衡的基础上才能对付的海军强国了。布尔战争不仅暴露了英国在军事上的不足，而且也暴露了它在外交上的孤立；1897年英国舰队在斯皮特黑德举行的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阅舰式，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事情很明显，英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如此广泛，因此，德国海军要同英国海军留驻本国海域的舰队平分秋色，并

非不可想象之事。1896年，基尔运河的开通大大增加了德国在北海的潜力，同时，在埃姆登和威廉港正在建造新的大型船坞。1900年的海军法规定德国海军的主力舰数量增加1倍；当帝国议会中提出异议，反对为此增加开支因而不得不做出让步时，被牺牲的是巡洋舰，而不是主力舰。于是，20世纪以德国决定建造一支威力强大的作战舰队为开端，而英国人不久就无法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这支舰队主要是针对他们的。

美国不同于德国，没有感到有必要以英国的海军实力作为确切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舰队的规模究竟以多大为宜。但是，如同德国的一样，美国的海军政策到了19世纪末，已经远远摆脱了自南北战争以来就成为它的特色的那种单纯依靠海岸防御工事和袭击商船活动等做法，变得同马汉海军上校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坚持不懈地传播的学说趋于一致。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既未感到有必要，也没有劲头去参加欧洲各国所热衷的那种所费不赀的建造铁甲舰的竞赛。没有海外权益，依赖同外界遥遥隔绝的力量，孜孜于国内的事务，这一切都妨碍了美国海军的发展。直到1883年，美国海军是由木制舰只组成；甚至那一年下水的3艘钢制军舰，也是以袭击商船为目的的装有满帆的巡洋舰。当南美洲的一些共和国开始从欧洲的造船厂那里获得能够把整个美国舰队从海洋上一扫而光的现代化舰艇时，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审慎的政策甚至连最起码的防御要求也无法满足。美国人开始谨慎地进行建造战列舰的试验；1889年，海军部长本杰明·F. 特雷西大胆地确定了一条新方针。他在这年的年度报告中宣称，美国海岸的防务，只能由那些能够在公海上击败敌舰的舰只来承担。他主张，“要对付铁甲舰的攻击，就必须拥有铁甲舰”。“我们需要一支使我国免除战争的海军，但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海军，是一支能够进行战争的海军”。这样的一支力量，他估计须有20艘战列舰和40艘现代化巡洋舰。这一要求对国会来说是过于极端，因此，特雷西只得到3艘战列舰。然而，这是一个开端。次年，《海上力量的影响》一书出版了；书中的论点本已赢得海军部的赞同，这时很快地就使那些将会接受政府合同的工业家、行将在远东开辟市场的商业家，以及开始意识到美国将成为大国的“天定命运”的一般公众改变了主意。特雷西的继任者希拉里·赫伯特规定，海军应保持“如此有效的状态，以便它能够为我国政府认为适宜而采取的任何政策添加分量和力量”。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是纯属防御性的。海军必须“向身居国外的

我国公民提供切实的保护，对我国外交给予有效的支援，并且在一切情况下维护我国的荣誉”。在这种压力下，国会的犹豫消除了。同西班牙的冲突虽然为时短暂，却起到最后的刺激作用。1898年，美国海军拥有5艘战列舰；1901年，当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时，海军共有已服役和建造中的战列舰17艘。

强大的舰队和繁荣的商业是马汉的三位一体学说中的两个要素。海外基地是第三个要素；而如前文所述，马汉把他的同胞的注意力转向应该建立这种基地的两个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前者是为了保卫大西洋上的通商；后者是为了保护同中国和日本的日益发展的交往；而且，顺理成章地还有两洋之间的地峡——在那里开辟一条通道，不仅会增加美国商业的潜力，而且会减轻保护商业的困难。这时，在上述两个地区，美国人目睹了一个欧洲大国（它在一度曾是一个伟大帝国的最后的一片废墟上松松垮垮地施行着弊政）衰落的情景。古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对美国来说，犹如对自己国内事务一样关切；而1898年2月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神秘地炸沉一事，只是提供了介入冲突的因由。当时舆论大哗，促使美国政府投入了这场冲突。美国人很难再找到一个更好的对手来增长自己的本领了。西班牙海军只有一艘战列舰，而美国有5艘；西班牙的舰艇破旧，水兵未经训练。杜威于5月1日在马尼拉消灭了太平洋舰队，桑普森于7月3日在圣地亚哥消灭了大西洋舰队，菲律宾和古巴的守备部队与他们的本国隔绝，当地的土著居民又发生叛乱，占领这二地就成为唾手可得之事了。马汉关于海上力量的理论，看来得到非常成功的印证。

但是，美西战争并不完全是一场海军的战斗。在古巴登陆是经过计划而勉勉强强地实现的；这一行动所涉及的组织和作战问题使美国人认识到——正如布尔战争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一年后使英国人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要将战争一直进行到赢得最后胜利，只靠海上力量本身是不够的。1898年，美国陆军的作战装备不良，如海军在10年前时一样。陆军的2.8万名士兵分为小支队，散驻在全国各地，从未集中进行训练。此外，国民警卫队虽提供了另外的11.4万名兵员，但它出于猜忌而保持着自己对正规军的独立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军事效能。加上志愿兵，陆军部统辖的总兵力达到22.5万人。而该部却完全无力为他们供应充分的食物、被服和营房。这比在古巴登陆的部队未能突破圣地亚哥防线一事，更为引起公众的关注。1899年7

月，伊莱休·鲁特就任陆军部长，他的任务是整顿混乱局面，并且保证不再发生这种情况。他在他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描述了陆军必须进行改组所应采取的方针。2.8万人已不足以承担美国新的殖民任务。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兵力，必须增加到10万人，并应采取一切步骤，使这支部队在战时能够立即得到扩充。鲁特要求美国建立这时在欧洲早已尽人皆知的一切军事机构：扩大的陆军部、总参谋部、国立军事学院，以及受过训练的后备役军人体系。这个计划既不为将被改革的旧正规军所喜爱，也不为将为之付出款项的国会所欢迎；但是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美国人民逐渐适应了这种必要性。美国同欧洲各强国一样，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

亚洲新兴的强国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人从闭关自守状态中觉醒过来，正在使自己能够成为与欧洲各国旗鼓相当的伙伴；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仿效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模式。1866年，幕府将军^[7]从法国邀请一个陆军顾问团，从英国邀请一个海军顾问团来日本，以便为日本的新式军队打下基础。这些顾问团的工作由于导致建立天皇亲政的那场叛乱^[8]而告中断；但是他们于1872年重返日本，发现他们的学生颇能适应而且勤奋。1875年，天皇发布诏书，废除士族对武力的垄断，采取了普遍征兵制，从而在这一方面同欧洲各强国并列。他宣称，“朕希望全民族将成为军队”。10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的陆军顾问团，继法国顾问团后接踵而来，自此日本的军事训练和组织机构就更加接近地模仿德国的模式。实行3年现役、4年后备役的义务兵役制；仿效德国后备军而建立地方军队；建立地方军区制；实行一年志愿兵制，所有这一切都通过1889年的立法而建立或者加以确认。

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0年日本与西方各国共同发动的惩罚性远征，只不过是日本军事效能在世界各国面前初试锋芒而已；1904年至1905年的对俄战争，证实了它具有多么大的破坏力。但是1894年日本海军获得了更大的机会来显示它从英国老师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海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陆军。1894年，海军只拥有3艘装甲舰，它们是型号完全过时、有20年舰龄的铁甲舰。海军的主要力量在于装有战列舰重型火炮的3艘无装甲巡洋舰。但是在航海术、训练和炮火方面，日本人表现出他们比拥有更强大武装的对手远为优越，在鸭绿江口外的海战中，他们夺得了制海权。唯其如此，才得以在大陆上获得胜利。此

后，日本政府努力加强这样一支其作用得到如此明显证实的军事力量。1895年，开始实施一项造舰计划。它包括建造4艘15000吨级战列舰和4艘7500吨级装甲巡洋舰——其中的一般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是在日本本国的船坞中建造的，这些船坞的扩建和重新装备，是这项新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04年，日本海军以6艘第一流的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迎战俄国人，并在太平洋海域建立优势。这对实力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根据布洛克在他所著《现代战争》一书（第4卷，第280页）中的估计，1874年至1896年间，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防务开支总额增加了50%稍强。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的防务开支上升79%，俄国上升75%，而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依次分别增加47%、43%和21%。对西欧各国而言，这个负担尚不是严重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并且劳资双方的巨大利益，都依靠兴旺的造船厂和阿姆斯特朗、施奈德、斯科达和克虏伯这些庞大而往往又相关联的企业。但是，俄国承受这一负担的能力较小。1883至1897年间，俄国的军费开支从20156462卢布上升到284379994卢布——这还不包括建设战略铁路的相当可观的费用；而整个这笔款项必须由总额只有1414000000卢布的国家预算中支出。毫无疑问，为了在它难以承担的军备竞赛中赶上他国而承受的重压，是一个强有力的（如果说不是唯一的）因素，促使帝俄政府于1898年8月建议各国应协商“保证各国人民享受真正持久和平的最有效办法，首先是结束不断扩展现有军备的最有效办法”。

各国以带有怀疑的礼貌态度接受了帝俄向各国发出的照会；这和这些国家对待拿破仑战争以后俄国提出的启示式的建议的态度非常相似；但所有被邀参加协商的国家（除了与圣彼得堡建有外交关系的各国以外，还包括卢森堡、门的内哥罗和暹罗），都派出代表出席了1899年5月18日在海牙举行的会议。说裁军而言，这次会议是一次失败。俄国的建议包括：在5年内禁止增加军费和扩大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以及限制采用比目前使用的更为强烈的火药，或更为有效的武器。这些建议几乎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对国防的其他因素不同时做出规定而想限定现役兵额，即使是为期5年也是很困难的；（因此）要想通过国际协定来限制各国根据不同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上述国防各因素，将会同样地困难”。至于限制进一步发明创造的问题，美国代表干脆宣称，他的政府“不认为在使

用军事发明方面做出限制，将会有助于世界和平”。最后，会议仅投票通过了关于军备的三项限制。一项是有关“从气球上投掷抛射物”的限制——为期只有5年，因为期满时可能发明出某种可以辨别目标的轰炸方法；其他两项是有关使用软弹头子弹和窒息性毒气的——这两项限制尽管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却表决通过了。

然而，海牙会议在两个方面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第一，它在使战争变得人道方面，进一步采取了两个步骤，这将大为减轻20世纪的残酷战争。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连同有关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中立化以及保证对所有伤员给予平等照顾的各项条款，今后也适用于海上战争；而且，所有未曾签署该公约的国家，现在都签字了。同时，1874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曾经拟定的《关于战时法和战争惯例的宣言》，经过审查修改，体现在一个新的公约中。该公约规定了各交战国的地位，对间谍和战俘的正确对待，军队在作战中或占领敌方领土时应遵守的限制，以及休战和停战所应遵守的草约。第二，出席会议的各国承认，仲裁是解决属于法律性质的国际争端的“最有效同时也是最公正”的方式。于是，着手组织一个常设的仲裁法庭以及必要的秘书处，设在海牙。如同后来抱负更大的建立国际组织的尝试一样，海牙法庭只能为那些抱有充分的良好愿望和自我克制精神的国家提供一个可使用的机构；而且，除非依靠交战各国的人道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否则，海牙公约所规定的各项限制，也不可能具有约束力。这些只不过是用来束缚那些利用破坏力愈来愈大的战争工具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搏斗的强大的主权国家的几条纤细的线罢了。

（李家骅 译）

[1] 纳霍特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东北部城市，普奥战争中普军于1866年6月27日在此击败奥军。格拉夫洛特是法国东北部村庄，普法战争中普军于1870年8月18日在此击败法军。——译者

[2] 即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译者

[3] 库斯托扎（Custoza），意大利北部村庄，普奥战争中奥军于1866年在此战胜意大利军队。——译者

[4] 伊谢尔（Reginald Baliol Brett Esher, 1852—1930），英国政治家，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推动军队改革而著称。——译者

[5] 指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中，英国摧毁丹麦舰队并占领哥本哈根的军事行动。——译者

[\[6\]](#) 二人均为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法国著名私掠船长和海军军官。——译者

[\[7\]](#) 指德川幕府。——译者

[\[8\]](#) 指明治维新。——译者

第九章 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1870年前后，欧洲的历史由于德国和意大利最后形成了民族国家，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欧出现了两个民族国家，标志着从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欧洲国家体系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使这个体系改观，但没有使它瓦解。19世纪的两个主要特征——自由宪政和民族原则，构成这个事件的特色；这个时代的第三种动力，即社会主义，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以前，尚未出现。

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在其历史进程中达到了顶峰。它促使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成文宪法和议会，扩大了选举权，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要保障人身自由。1848年的革命和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把法律上的不平等和束缚的最后残余清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身自由，尽管遭到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但实际上在每个国家都已经成为法定的原则。因此，自由主义在民权方面实现了它的纲领；但是，自由主义者在宪政方面的目标，即政府由议会控制和立法机构的权力不受限制，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在不同的程度上部分地实现了。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一直是由中产阶级中的显要人物组成的各个自由党，日益陷入引起形式与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困境。到19世纪末，工人阶级的社会问题，使自由主义到处面临着一个任务，这就是如何在社会结构的范围内把法律上的自由变为实际上的自由。如果不触犯像国家不得干涉社会和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等这样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原则，要做到这一点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全心全意地实行社会自由主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民族原则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了它在这个世纪中的最大胜利。俾斯麦和加富尔缔造了各自的国家乃是这一胜利的顶峰。但是，成为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的障碍的，也正是这两个国家。诚然，这种障碍在意大利由于受到民族统一主义的冲击而被打开了缺口；但是，俾斯麦缔造的德意志帝国，则长期以来起着阻挠民族主义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在东南部，即奥地利，情况更是这样。在民族杂居的东欧地区，建

立民族国家的运动暂时只是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才得到发展；在这部分领土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到19世纪末获得了自治。

保守势力和保守党派在和这个时代方兴未艾的各种力量，特别是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进行较量中，极力想要保持其阵地。在英国，保守党沿着“民主托利主义”的路线发展；在普鲁士和德国，保守党则充当了农民利益的代表。几乎在每个国家，就像在英国那样，立宪民主制及其各种议会集团仍然和有势力的君主制度并存着。西班牙在经过卡洛斯战争后，君主制再次战胜了共和制（1875年）；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中欧新建立的民族国家，都是由强有力的君主政体统一并结合起来的；在土耳其帝国内，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新建立的国家，也都是由君主统治的。在法国，第二帝国垮台后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依然存在了下来，不过即使在这里也一再有人企图恢复君主制。在奥匈帝国和俄国，君主制的统治是强有力的，因此，民主化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展甚微。在德国，1871年建立的皇权，与其说是要受议会的制约，不如说是受联邦的约束，而在1890年以后就开始朝着皇帝“个人统治”的方向演变，尽管宪法从来没有批准这一点。到19世纪末，欧洲基本上实行的仍然是君主制。很明显，除了法国和实行共和制的瑞士是一种例外情况，俄国是另一种例外情况，在欧洲的几乎每个国家，中产阶级至少在当时倾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共和政体。

与此同时，尽管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国同盟等，其目的往往还是为了加强君主制原则；但是，君主制已经完全失去了历史上那种独立存在的力量，现在它只能依靠诸如立宪政体这样一些当代更强的势力而同时存在。它在许多情况下确实给予这些势力以有效的支持，但同时又受到这些势力的限制和约束。不仅如此，产业工人组成的各种协会和他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几乎全都支持民主共和的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促使中欧、东欧的一些君主大国垮台的，主要就是这些组织。许多人梦想做到的，特别是在德国从洛伦兹·施泰因到弗里德里希·瑙曼这些作家们所宣扬的君主制与工人阶级的联盟，即社会君权，在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成为现实。

在从普法战争到19世纪末的30年中，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一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君主政体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除俄国外，都已

得到缓和。革命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影响，虽已演变成为工人阶级运动，但它仍然还缺少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所需要的那种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势头。这就足以说明，何以从巴黎公社起义到俄国1905年第一次革命之间的几十年，会成为19世纪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没有发生任何革命动乱的最长的一个阶段。

在这几十年间，国家的力量不仅在一国范围内有了空前的扩大和增长，而且也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这种力量愈来愈注意发掘技术科学的资源和潜力以及发展工业体系。为产业革命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变成了一种超越任何国家疆界的动力。所有国家人口都在增加、集中和移动，国家只能部分地加以控制。这些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所具有的强烈欲望，又进而支配着国家本身；他们大批地涌向欧洲以外的地方，凭着一股迫不及待的政治扩张热情，使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海外发现和海外殖民大功告成。作为这个新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为本国的变化和改革提供的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政治方面，在欧洲发轫的产业革命通过这一过程进而席卷整个世界。

欧洲人口不断地增加，构成19世纪一切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这种增加稍稍超过了整个世界人口增加的幅度。欧洲人口的增加率，从1800年前后的22.4%上升到1900年前后的25.9%。欧洲人口在1800年前后大约为1.87亿，1850年增加到2.66亿，1900年则增加到4.01亿；换言之，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一倍多。这一增加的曲线不再能表明出生人数的增加，因为差不多在欧洲的每个国家，出生率到1890年已越过其最高峰，而且，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挪威和瑞典，出生人数逐渐下降的情况出现得更早。^[1]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下降的结果；所以，出生超过死亡的最高值，通常要比出生率最高值出现得晚（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德国，1901—1905年间平均每年出生超过死亡为14.4%，意大利在1903—1913年间为12%，奥匈帝国在1901—1905年间为11.2%）。

欧洲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各不相同。法国的变化最小（1872年为3610万人；1901年为3870万人）；英国和爱尔兰从1871年的3150万人增至1901年的4150万人；德国从1870年的4080万人增至1900年的5670万人；意大利从1871年的2680万人增至1901年的3250万人；奥匈帝国从1869年的3590万人增至1900年的4540万人。但是，正如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相比

较，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而且，它们还在海外寻求补偿。只有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增加（由1867年的7220万增至1897年的11590万），预示着对斯拉夫各民族有利的重大变化。

但是，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整个过程，应该更多地从欧洲当时正在出现的工业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而不仅从国家或民族的观点来看待。欧洲各国的过剩人口，现在麋集在各个大工业区，特别是下莱茵地区以及英吉利海峡两岸。鲁尔区的增长此时超过其他地区，但是，像英格兰中部各郡、萨克森、波希米亚边界地区这样一些较老的工业区，也同样出现高潮，尽管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的最高潮出现在1870年以前。在这以后，各地城市化的过程加快起来，这决定了欧洲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形式。城市愈大，人口的增加就愈快。1871年德国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8个；1900年即达33个。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则停滞不变甚或下降。这种趋势，在1870年以后的英国最为明显。在东德意志，施泰因男爵解放农民后，农村的人口曾达到最大程度的增长；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即呈现停止状态。只有在俄国欧洲部分（由于1861年解放农奴的影响）和在东南欧，农村人口这时开始出现最大程度的增长。

工业人口日益集中，这主要是因为人口外迁地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人口充斥远近郊区，工业城市便应运而生。人们从德国东部涌入鲁尔地区定居，说明从更远的地方迁徙而来的人口构成了工业人口增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某些地方实际上是基本的因素。成百万的人涌入欧洲各国首都，经常是由各种特殊情况所决定的；谁也难以确定这些地区的范围，虽然在柏林这样的地方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工业发展的最后几十年期间，人口的这种大量移动，并没有造成欧洲社会基本民族结构的变化。只有在个别地方，由于经济变革而造成的移民，才超越了欧洲的国家边界。头一个例子是法国，法国人口的增长停止最早，所以主要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的大量涌入就很引人注意；波兰的农业工人（最初主要是季节工）则流入了德国的东部。但是，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向海外的移民，还是大大加强并扩大了白人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北美洲定居的区域。1871年到1900年间，欧洲向美国的移民达1050万人；其中欧洲各国所占比例，在各个时期相差甚远（详见第二十四章）。移居海外其他地区的人数，亦与此相当。这些人外移的动机，主要是属于经济的和社会的，

很少像19世纪前半叶那样出于政治的或宗教的原因（也许东欧的几个大国和爱尔兰的情况除外）。但是，移民也说明交通比以前方便，同时世界已逐步成长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在欧洲范围内，民族差异从未消除，而在这些新的国家中，民族的隔阂则比较容易消除。在美国，新的社会集体不仅就教派和阶级来说，而且就民族来说也日益成为一个熔炉。

欧洲人口外移是一个迹象，说明欧洲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然而，特别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工业化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席卷了所有欧洲各国之后，又席卷了北美洲的各个移民区。商品生产有了增长，交通得到改进，商品的交换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就使一个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这个体系各方面周密地协调一致，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动荡，反应就会极为灵敏。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体系，在技术上、财政上和政治上受欧洲的支配，也是与世界政治发展相对应的经济方面的发展。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19世纪中叶把当时正在开始定型的世界经济看成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它将用一个协调一致的社会来代替民族和国家的传统的多元化状况。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协定，1860年英法缔结的科布顿条约所体现的国际自由贸易原则，即将促使世界贸易、世界团结和世界和平这三者协调一致起来。但是事与愿违，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影响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可以感觉到）动摇了这种认为经济将不断发展的天真想法；而且除美国和俄国之外各国实际均已实行的自由贸易，也正在宣告结束。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时间内，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转而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只有英国、荷兰、丹麦和土耳其由于不同的原因，仍然坚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经济事务方面保护贸易政策风行一时，乃是作为这一时期标志的加强国家控制的做法的一个征兆，而且在后来还采取了其他的形式，例如国家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干涉和实行殖民帝国主义等。国际贸易变为相互竞争的各国之间的经济斗争；支持各种左右贸易和经济行动的那种力量，又间接地转向政治领域；而各大国彼此之间由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造成的强烈敌意对此投上一层阴影。

由于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形成而改变中欧面貌的大动荡局面，并没有把1815年建立的秩序彻底打乱，只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改变了它的结构。民族国家的思想，在维也纳会议希望防止其出现的那

些地区占了上风。但是，1870年以后，看来主要的是应当限制民族国家思想的发展，使它不要再超过形成德、意民族国家的那些战争所达到的程度。从1882年以后，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由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盟而受到遏制，未能充分发展。俾斯麦把他所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说成是“已充分满足了要求”，因此，他对任何一种民族统一主义，即便是为了居住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中的日耳曼人的利益而由帝国进行干涉的事，也漠然置之。而且，俾斯麦的继任者们坚持奉行这一方针。1890年以后成立的泛日耳曼组织的成员们，属于对德国官方政策持敌对态度的反对派，他们对官方政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在整个东欧，几个大帝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仍然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着彼此之间的政策。在俄国，一种由泛斯拉夫思想发展而成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增大，以致削弱了那些主张向超民族和联邦制发展的人们的影响，并促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由大俄罗斯构成的民族国家。在波罗的海沿岸各省（1881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第一个不认可这些省的传统特权的沙皇），19世纪80年代是加紧推行俄罗斯化的时期，在学校中尤其如此。19世纪结束时，芬兰大公领地的自治政体已陷于瘫痪。1863年波兰起义以后，波兰的由俄国占有的部分，已失去最后的一点独立，而且日益受到俄罗斯化政策的压力。在德国，波兰人和丹麦人这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非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地位，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这个国家这时在理论上接受了德意志国家这个原则，而且在实际上也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做法。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于1878年一致同意放弃1866年布拉格条约的第五条，而这一条本来是允许北部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就同丹麦合并问题进行自由的公民投票的。在匈牙利居统治地位的马扎尔人企图把奥匈帝国东半部建成马扎尔民族国家，其影响在多少年以后仍然可以感到。在这些事件发生之际，格莱斯顿也试图让议会通过他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旨在结束爱尔兰人的从属地位而允许其实行自治，但未能如愿。

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国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决定支持居于多数的民族；这些政府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并且尽量设法使他们在语言和民族感情上一致起来。在典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少数民族谈不上享有什么特权。只有土耳其这样一个衰弱、没落的国家，各民族

继续朝着自治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了新国家，如罗马尼亚（1878年）和保加利亚（1878和1887年）。以保加利亚的情况来说，民族运动只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就（于1887年）把柏林会议为了保持均势而将该国分成两个国家的决定予以废除。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北欧亦颇引人注目，以至在该地区愈来愈看得清楚，瑞典和挪威的联合已不能持久。挪威终于在1905年使联合解体。而在一些属于多民族结构的国家，例如在奥匈帝国的内莱塔尼亚这一半地区，民族问题对组织和体制都产生了影响。1870年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试图放宽约瑟夫二世根据奥地利—日耳曼人居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个民族争执中心的民族和语言置于平等的地位。这些尝试在一个敏感点上触动了奥地利—日耳曼人的传统支配地位（参见霍亨索伦内阁1871年为调整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分歧所做的努力和巴戴尼1897年的语言法令）。虽然在这个地区范围内，只有一两个地方有可能使尖锐的民族敌对情绪得到缓和，如1905年解决摩拉维亚问题那样，但瑞士却继续处于民族倾轧的风暴区之外。1874年的宪法改革批准了联邦政体，这种政体本身表明它是消除多语种民族主义最有效的手段。

这时盛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采取了十分不同的形式。在法国，大革命已经破坏了过去历史上形成的各省，因此它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制。没有任何环节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政治组织与各地区、特别是各选区热烈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意大利的民族君主制仿效法国的这一体制，并竭力仿效法国和比利时，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下面是一些消除了过去各个国家的畛域而新建的省份。这种体制是为反对存在着由外国王朝控制的各个分散的国家的局面而举行的一次民族革命起义的结果；但是它和意大利各个不同省份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及它们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毫无联系，因此，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特别是在南方。尽管意大利新政府的“皮埃蒙特主义”受到非难，但是，各省要求权力分散、要求自治的呼声并没有得到满足。德国1871年的民族国家和意大利的不同，它是由各个君主国家结成的联邦，是各王国和自由城市的联盟。宪法使普鲁士牢固地建立起霸权地位，虽然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把这种霸权地位与联邦和中央集权这样一些特点糅合在一起。到俾斯麦的任期行将届满时，他作为宪法制定者同国会发生愈来愈多矛盾，因此，他曾考虑解散1870—1871年的联盟并且发动政变成立新的联盟，

削弱或者甚至彻底取消国会的民族民主制。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出现了皇帝的“亲政”。这种做法是没有宪法根据的，但是，它无疑地扩大了皇权，使之成为比建立帝国当初的任何规定都更加令人瞩目的民族统一的象征。

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不同，它的宪法的基本精神既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联邦，而是联合。传统上组成英国的各个国家通过这个联合国家的统一体及其各种体制，特别是议会，既保持了本身的存在又融汇成一体。只是在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这种体制才被认为是一种压迫，一种强制，因而遭到抵抗：因为爱尔兰的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不仅仅是宪法问题。在1886年和1893年最初为制定爱尔兰自治法进行努力时，由于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极其强烈的反对而被挫败。但是，爱尔兰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争取自治法的斗争，在于当时形成的那种要改变整个英帝国面貌的自治概念。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政治和宪法方面的一些最大的问题已不再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是关系到帝国的庞大结构。

在这个阶段，各处的殖民扩张明显地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其结果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官方的兼并，虽然有时这种兼并只不过是在现存的地方政权或土著政权之上构成一种保护性的上层建筑。于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就发展成为在世界范围进行统治的机构，而这时支配着这些民族国家的宪法和政府的却仍然是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政策观念。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英帝国。它在殖民扩张方面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大国不能与其相比拟。英帝国主义这时将其力量主要放在非洲；在非洲，它制订了一些庞大的扩张和控制计划，以及一项政治纲领。同样是在非洲，它深深地卷入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各种问题（从1882年在埃及进行干涉到布尔战争）。但是，如果说这个大规模扩张的最后阶段无疑迫切需要解决组织一个世界帝国的问题，用西利的著名的话来说，这个问题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那么，由此而出现的各种基本主张中，有两种是从母国的政治传统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责任自治的主张和托管的概念。英帝国的大殖民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地位，由于自治范围的扩大而大大地改变了。在其他类型的殖民地中——旧日的英国直辖殖民地、马来亚各邦、塞浦路斯和非洲的各个地区——代表土著民族实行托管的主张，就具有了新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说，即使理论不总是

和比较严酷的现实相符合，托管的概念现在还是肯定了殖民地拥有主权这个原则，而不是对之表示怀疑。1876年迪斯累里把“印度女皇”的头衔授予英国女王，这同样也着重说明印度是作为英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单独的政治单位而存在的。

对于英帝国来说，就像对于欧洲大陆上较小的哈布斯堡帝国一样，组成单位的增多，马上就提出了如何把帝国组成一个整体这一问题。这就是何以第三种主张，即要求组成联邦的主张成为一种积极力量的原因所在。这种主张不可能从联合王国的以母国为中心的现代立宪政体中脱胎而来，它显然脱胎于曾经对以联邦为基础的自治领政体产生影响的美国模式。美国的情况也否定了过去的偏见，即认为自治必然会导致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散。1872年迪斯累里在其著名的水晶宫演说中首先宣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西利以后，认为联邦其实是一种扩张形式的主张日益得势。1884年成立的帝国联邦同盟，鼓吹帝国应采取联邦形式。但是，这种改组成为一个联邦体系的梦想不久即告破灭，因为1887年和1897年的两次殖民地会议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约瑟夫·张伯伦担任殖民大臣时，他把联邦会议称为“我们的最终理想”，但各自治领并不支持他的这一观点。结果只是设立了帝国会议和一个很不健全的军事和经济组织。这种在美洲和欧洲大陆上的各帝国发展起来的联邦思想，不能教条式地应用于任何像英帝国这样结构完全不同的地方。英帝国的统一一直是依靠一种松散的依附关系，而不是正式的体制。

欧洲大陆的各大国中，殖民扩张对整个国家结构的改变，都没有达到像英国那样的程度。以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而论，所取得的殖民地，无论如何也没有大到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地步。意大利的克里斯比时代野心勃勃的殖民扩张，在签订乌西阿利条约（1889年）和将尼格斯^[2]的帝国变成保护国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杜瓦战败后（1896年），便一蹶不振。1884年在俾斯麦执政时推行的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最初的目的既不是想要直接攫取帝国的殖民地，也不是想要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只是想建立一些由贸易公司控制的“保护”区。这一制度到处都证明是失败的，最明显不过的是在东非（1888年）和新几内亚（1898年），于是，根据1900年的法案，这些“保护”区就直接处于帝国即皇帝的宗主权管辖之下，到当时为止只有帝国的领土阿尔萨斯—洛林属于这样的情况。就德国

来说，殖民扩张有助于加强母国的中央权力，而这一点也正是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特点。在这方面最使人感兴趣的例子是法国。法国的殖民地政权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控制了一个幅员广大的殖民帝国（1875—1889年，法属赤道非洲；1885—1896年，马达加斯加；1881年，突尼斯；1883—1884年，东京和安南）。这个政权完全是以在法国本土也是盛行的中央集权作为基础的，它只不过是法兰西国家的分支。法国的殖民地管理机构到1889年为止一直是海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以后又改属商务部。直到1894年，它才有殖民地部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使各殖民地成为“统一的政权管辖下的一个整体”，尽管这些殖民地无论在地理方面或是在生活水平方面都是彼此相去很远的。由于许多新取得的殖民领地在文化和历史上都和法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使得这一目的受到限制。因此，在20世纪初，1900年4月13日的法案就导致殖民地管理机构某些权力的分散。尽管受到英国殖民地体制的一些影响，但是，殖民地自治的原则从未在任何地方实行；在各保护国情况也是一样，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情况，要比英国在其保护国的情况更为明显。

整个说来，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结构由于殖民帝国主义而发生的变化是很小的。由于这些国家一味从事于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事业，从而促进而不是阻止了因强调民族主义而已经造成和仍在继续造成的欧洲分裂局面。但是，它们在殖民领地上相遇，并非时时处处都作为竞争者和对手。殖民主义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以国际法的准则作为基础，必须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确定这些关系。广大的新地区不仅受欧洲大国宗主权的管辖，而且也受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法的约束。一方面是欧洲大国的权术，另一方面是出于人道和经济的动机，这二者凑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结果，这就是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领导下成立了独立的刚果自由邦和他的国际非洲协会，并在1884年年底到1885年年初关于刚果问题的柏林会议上得到承认。1885年的刚果法宣称，在中非促进贸易和文明，乃是建立刚果自由邦及这项法案各签字国的基本目的。法案宣布贸易完全自由，禁止奴隶贸易，并确立刚果河流域的中立。就这样，比利时本身在欧洲的中立立场，也反映在非洲大陆上。也正是这样，它阻碍了各大国间的角逐。各大国在该法案中宣称，把文明带给不发达地区作为传教士的一种世俗使命，乃是殖民化的目的，虽然就刚果的情况来说，这一计划并未全部实现。

各国政策中谋取本国利益与进行合作之间的紧张状况并不局限于在殖民地问题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充满在国与国之间的全部关系中。在这个时代，由于交通、通信日益方便而迅速，使得各国彼此更加接近。同时，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日益增长，又使他们彼此疏远。到19世纪末，过去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已经毫无踪迹；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像1878年在柏林举行的大规模会议或1884年年底到1885年年初的刚果问题会议，这时已成为能够表明各国仍然是一个大家庭，而不仅仅是互不相干的成员的唯一标志。然而，这个大家庭现已扩大到欧洲以外，开始包括整个世界。有美国参加的刚果问题会议，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召开一些特定的会议，也已不足以巩固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并使各国在技术和商业交往的各个方面较紧密地团结一致。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一些新的合作形式出现了；1870年以后，各国间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达成的政府之间的联盟和协议，每10年都有增加——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有20个；80年代到90年代增加到31个，90年代到1900年为61个，1900年到1904年就增加到108个。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条约网开始形成，目的在于以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国际主义同每个国家的政治上的和各自的民族主义相抗衡。这就要设法尽可能地把在一个国家内所建立的法律保障以及技术成就的有效范围扩大到整个国际大家庭。因此，这些特定的协议首先是在交通、通信、统一标准单位、货物和思想的交流等问题上做出决定。例如，根据1874年的伯尔尼条约和1878年的万国邮政公约，产生了万国邮政联盟；1875年成立了度量衡协会及其所属设在圣克卢的国际度量衡局，以便管理公制。接着，1886年有10个国家签订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10年后签订的国际私法协定，主要是确定国与国关系中法律援助的形式。

过去为了一些特定目的而在某些地区实施的办法，现在被开始试用于处理各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解决战争与和平这样至关重大的问题。这首先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会上进行尝试。诚然，由于某些策略上的考虑，使沙皇倡议的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三大洲的代表参加的这些会议，为了制止国与国之间团结的涣散，正在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建立超越于个别国家之上的法律准则。虽然那种认为只要有一种充分发展和牢固确立的国际法就可以结束一切战争的希望并未实现；但是，在一个国家主权正在提出愈来愈多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能够造

成空前毁灭的时期，人们正在确立在战时与平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公认的法律约束。继1874年布鲁塞尔宣言之后，又订立了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这个公约在1907年海牙会议上以海牙陆战法规的形式出现，至今仍被认为有效。它对国际军事法规的各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关于交战国，占领军的权利，战俘的地位等均有明确规定）。关于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为在海牙成立了常设仲裁法庭。当时它还不是一个常设的审判法庭，而是为就某些案件进行仲裁组成法庭提供方便的一个机构。它是为国际大家庭提供能够坚持正义原则的体制而第一次做出的尝试。

此外，尽管在对外政策上有着种种隔阂，但是，各个国家的体制和这些国家的宪政，却彼此日益相似。各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和民族根源上的深刻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一次暴露出来；但是，整个说来这个时代在宪政模式和社会体制方面是日趋一致的。特别是民主原则以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强大的势力仍在反对它，尤以俄国为最，但是，这些势力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到处退居守势。

有两个问题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几十年间宪政发展的情况。它们涉及议会制的类型和选举权的逐步扩大。到这时为止，除俄国外所有国家均已有了议会，不过其作用和权限各不相同。但在各大国中，唯有英国和法国才有真正的议会政体；特别是在这两个国家，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发生重大变化和发展的时期。在英国，为通过逐步改革而实现普遍选举权的理想，采取了一些决定性的步骤。1867年和1868年的两个选举改革法，在城镇中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准许工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享有选举权。根据1884年的第三次选举改革法案，格莱斯顿政府把乡村地区的代表名额同城镇加以划一。1885年的选区重新划分法使各选区的代表权一致起来，并且采取每个选区只选一名议员的原则。这些改革不仅使选区数目几乎增加一倍，而且对整个宪政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全民投票的原则这时已明显地确立起来。格莱斯顿在中洛锡安进行的著名的竞选活动（1879—1880年）就是这种呼吁选民群众给予支持的做法的重大发展，连政治活动也出现了民主化，现在终于和贵族政治的传统决裂了。各政党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各政党在全国范围建立组织、并使自己转变成为民主的群众性组织的时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议会的作用。大臣们在选举失

败后，不再采取不首先会见议会议员就辞职的做法。迪斯累里在1868年12月和1880年4月以及格莱斯顿在1874年都是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而索尔兹伯里在1892年夏天则是一直等到在议会中遭到失败才辞职的。另一方面，在下院遭到失败，继而更迭政府后，这时通常是导致宣布举行选举。1885年格莱斯顿的第二届内阁垮台后，索尔兹伯里作为新的政府首脑就是这样做的；而格莱斯顿自己1886年夏季在下院失败后，同样也是要求立即进行选举的。要求选民给予支持的做法，虽然是英国宪政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完全符合选举权民主化的原则，然而，这却是和英王指定人组成政府、特别是提名政府首脑的无可争辩的权力相冲突的。但是，由于政党和公认的反对党领袖的出现；除非在非常情况下，这种权力正在消失。1880年维多利亚女王试图阻止任命格莱斯顿时的情况即是这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传统的英国议会制，其作用决定于宪法中各种因素之间，即在英王、议会和作为选民这个民主体的人民之间保持的均衡。但是，它的作用也决定于两党制这一传统形式，尽管这种传统形式有时会受到干扰，如在1885年年底的选举中由于出现了巴涅尔的爱尔兰党，或1886年夏季由于自由党的分裂而受到干扰那样。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制度与英国迥然不同。它是在1875年的第三共和国宪法中确立的，在1877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大体上最后定型。人民的权力作为一种思想体现为议会拥有最高权力，即“议会政治”，任何力量均不能与之相抗衡，而没有关于公民投票，或关于总统拥有权威性的控制权的规定。1875年2月25日的宪法法案的第五条预料到总统有可能下令解散议会，但规定必须取得参议院的同意。1877年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与议会发生冲突并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事实上是合乎宪法的，但却等于是发动了一次政变。自此以后，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就停止使用。如仅仅几年以后发生的布朗热危机所表明的那样，人们认为上述权利具有君主制的倾向而不符合公民投票式的民主的原则。

与议会在第三共和国享有绝对的最高权力的情况相辅而存在的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多党制。这些政党缺乏一定的组织，即“党的机器”。这就在议会内形成了小集团。议会中多数派变化无常，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组成形式只可能是不同集团的联合。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代议制这种思想的，然而在议会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它所激烈反对的。不过，尽管政府不断更迭，这种制度却有着相当普遍的稳定性，它也满足了法国人民大众对安全的需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承认这种议会独揽大权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体现民主原则的最好表现方式。法国人生活中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特点，是和比较严格的政党组织格格不入的，它支持由地方提名并选出的议员拥有权力。

比利时是一个在宪政制度方面最接近英国的欧洲国家，而意大利在宪政方面的政策则表现出罕有的摇摆不定。它是以1848年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宪法为基础的。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该法规也就适用于新建立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地方。在1848年皮埃蒙特宪法中君主制所占有的强有力的地位，从理论上说也扩大到整个意大利民族国家；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削弱了，因为萨瓦王朝在自己所辖领土以外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所以，君主制度丝毫不足以同议会进行任何有效的抗衡。人民大众的意见也丝毫无法民主地表达出来，因为意大利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还没有充分觉悟。此外，到1882年为止实行的选举制度，规定有相当高的纳税额的人才能成为选民，这就把选民限制在60万人左右。1882年的选举改革大大地降低了这个纳税条件，并把现行的受教育情况的条件，降低到受过义务初等教育即可。选民人数因而增加到200万人以上，接近于普遍享有选举权，不过，由于有数目比较多的文盲，继续使之受到限制。由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对来说都比较软弱，因此，在意大利，宪政方针的重点就落在了众议院身上。自从意大利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众议院的政治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在1876年以前，右翼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左翼党是反对党。英国的两党制似乎有可能成为仿效的榜样。但在1876年3月右翼政府倒台后，马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实行这种制度是毫无基础的。虽然左翼党政府（德普列蒂斯，克里斯比）这时接替了右翼党政府，但它已不再代表一个明显可供选择的反对党了。政党解散了，意大利成了一个“典型的无政党的国家”。议会中以个人或地区的关系组成集团和派系（就像法国那样，不过更加具有排他性的色彩），代替了壁垒鲜明的政党的地位。政府由某些政治家的个人追随者所组成，而不再代表任何明确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政治气候中，反议会的批评和思潮盛行起来。政治不稳定成了“改造”一词所体现的一个原则。

在意大利仿效法国的模式而趋向于使议会享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在另一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中，议会只限于单纯地行使立法职责，宪法未保证它对政府具有任何直接的影响。根据1866年至1871年间由奥托·冯·俾斯麦制定的复杂的宪法，帝国国会在性质上是民主的和全国性的，并以普遍选举权作为基础，这抵消了各邦及其统治者所持有的那种由各邦享有独立地位的作用。帝国国会同另一个宪政机构联邦议院相互并存，而这个联邦议院并不是上院，只是一种“政府联盟”式的联合政府。自由主义者在宪法开始实施时和1878—1879年的危机中，都没有能够建立对帝国国会负责的帝国政府；帝国首相单独对帝国的政策负政治上的责任，至于是否得到帝国国会的信任，对他无关紧要。德意志帝国的每任首相只要取得皇帝的信任就可获得这个职位，失去皇帝的信任也就失掉这个职位。尽管如此，帝国国会在撤销这个负有帝国重任的政治家的职位问题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即使在导致俾斯麦下台的1890年的首相危机中，情况也是这样。而更加明显的例子是1909年首相冯·比洛的被免职。因此，可以说，国会是逐步取得帝国宪法中的控制权的。

德国的宪政制度可以称之为一种联邦式的君主立宪制。它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帝国及其首要的邦——普鲁士在宪法上性质不一样。虽然在帝国已经实行普遍选举权，但普鲁士却始终保持着它那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第二个缺点是作为帝国国会基础的广泛选举权和国会的有限权力很不相称。普遍选举权有利于群众性政党的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这些政党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代表各种社会势力上。然而，那些控制政党的人物并未因此而取得公职。只有为数很少的政党领袖设法获得了政府职务：例如民族自由党的约翰·米凯尔当上了普鲁士的财政大臣。在德国，有组织的政党体系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宪法中所包含的民主成分，仅限于几个方面。于是一种罕见的“分权”现象出现了，因为议会、政府和皇帝并立，而皇帝不像在联邦国家中那样作为领导权的代表，而是作为掌握特别军事指挥权的人物。

1874年修订的瑞士联邦宪法，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联邦宪法。它不是各君主政权的联合体，而是在古老的人民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各州的联合体，因此，它最终要比德意志联邦国家由各君主政权组成的情况更能够防止联邦权力过大的现象。联邦权力是通过一个联

邦议会来行使的，联邦议会由在普遍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国民院和代表各州的联邦院组成。这些议会机构占据优势地位，使联邦政府，即一个由7名委员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只是一个不受议会多数影响的行政委员会的水平。此外，1874年修订的第八十九条还增加了公民投票的成分，即由公民对联邦法律进行投票，这个规定以后起了重大的作用。必须记住，这个宪法是为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拟定的；而且，虽然在宪法本身并非十分明显，但在这一联邦制的目的中，包含着各语言集团之间的妥协。尽管在别的地方，民主化的结果几乎总是加深了民族主义的紧张局势，然而瑞士的民主制却是个例外，这是由于它的联邦结构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二元帝国，即奥匈帝国，它的存在同时受到这个时代的民族和民主趋势的威胁，却未能制定出任何能够制止这种威胁的宪政方针。它的宪法以1867年的奥匈协定为基础。这个协定改组了匈牙利王国，然后共同就匈牙利和帝国的西半部做出安排并建立了各种机构。陆军、外交和财政三个共同的部以及由两个分立的议会的代表团组成的、代表帝国两个部分的各种组织机构，构成了帝国的体制。但把两个君主政权实际上联结起来的只是那位皇帝兼国王的人。这个君主政权的“二元制”看起来有利于在帝国两个部分中占多数的各民族，但实际上只有马扎尔人充分得到了好处。日耳曼人虽在帝国西半部居于领先地位，但陷于四分五裂。不论在帝国的东半部或西半部，在选举权和议会权力的民主化方面做出任何让步，都意味着其余各个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抬头。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为了寻求某种办法以摆脱这种困境，曾做过种种尝试，其中一个主张是实行三分制，给波希米亚王室各领地以特殊的地位。此外，为了消除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在各地区，特别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曾经做过种种尝试。这些努力只在摩拉维亚（1905年的摩拉维亚问题解决办法）和布科维纳收到效果。在帝国的西半部，除了现行的特殊等级选举制外，于1896年实行了普遍选举制，把24岁以上的全体公民包括进来，但只有权选举425名议员中的72名。一直到1907年才在内莱塔尼亚王国实行普遍选举制，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扩大到匈牙利。

由于奥匈帝国的两半部的发展不同，因此，这个二元帝国整个说来很难说有什么宪政制度。在东西两部分，两个议会都迟迟不实行民

主代议制的原则。特别是在内莱塔尼亚王国，政治动荡与其说是由于政党和政党势力的变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不同民族的影响造成的。造成政府更迭的，事实上是民族问题。

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大国都没有产生像英国的议会制那样的东西。在德国，这是由于宪法具有偏袒君主专制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成分而受到阻碍；在奥匈帝国，则是由于国家的复杂的多民族结构；在法国和意大利，则是由于政党的软弱无力。但是，也有可能实行一种两党制，不过它起着与在英国不同的作用。我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希腊和罗马尼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两党制，而且都是一方面是一些进步—自由党派，另一方面是一些保守的党派，然而，这些党派只是一些集团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的小圈子，在国内都没有牢固的根基。这种议会政权往往是猝然之间就发生更迭，因此，政治上缺乏连续性，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做出重大的决策。这种情况在1875到1876年波旁王朝复辟后的西班牙特别明显。在那里，自由党内阁和自由保守党内阁的更替，根本不能说明相互竞争的两大力量之间不断发生消长，只不过是上层进行操纵的结果而已。每届政府在取得权力后就操纵选举以取得议会的多数。在葡萄牙就像在意大利那样，进步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频频从执政党变成反对党。到头来，简直很难把那里的制度称作两党制。

从整个欧洲来说，19世纪末是一个宪政发展日趋衰落的时代。宪政思想本身已不具有什么力量，不过这时同新国家的建立，同民族地位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只有在法国和英国，国家的结构呈现出内部的演变。只有在一直没有任何立宪政体的俄国，宪政才是一种革命的因素。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1874年的瑞士，1893年的比利时，1887年的荷兰），对宪法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正，但这些都不能算是政府结构的根本改变。在这个时期，任何国家都没有做过任何尝试，试图解决工人的政治运动将会对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制定宪法的那些国家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人领袖们，曾试图揭露自由宪政制度不过是中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幌子，这一点至今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一条原则。但实际上立宪民主制度开始迎着工人的社会革命运动而向前迈进。

在这几十年中宪政发展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更加把这一过程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就是选举权的民主化使大多数国家已接近实行全体

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制，在某些国家则实际上已经实行。没有重大条件限制的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在德意志帝国从1867年到1871年在法律上（根据帝国宪法第二十条）即已存在（但在它所属的各个邦中并不存在，1904年时的巴登除外）。法国从1870年到1875年，西班牙于1890年，瑞士于1874年，希腊于1864年，保加利亚于1879年，挪威在1898年亦均存在这一制度。几乎是纯属名义上的财产条件限制则仍然在例如英国（到1884年）、意大利（1882年）、荷兰（1896年）这些国家存在。在罗马尼亚（1866年宪法规定实行三级选举制）和比利时（1893年宪法规定实行一人多选区投票制）选举权是普遍的，但却不平等。作为联结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纽带之一的选举权，现在开始发挥它本身的力量，并改变着政治的形式和结构。政党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大多数国家的政党这时已从社会显要人物结成的组织松懈、通常只是在选举期间才像是个团体的俱乐部，发展成为有固定核心和扎根全国各地的群众性政党。英国自由党的情况是最清楚不过的。该党自1867年以后，首先从伯明翰选区开始，仿效美国政党决策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一些纪律严格的组织，并把政治活动带到群众中。但是，在其他国家，自由党则是最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化的政党之一，并且长期保持其只是由一群头面人物组成的集团这一性质。另一方面，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群众性的政党。最初建立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实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时代结束后，于90年代起走上这条路。这些政党有统一的领导，并受到广大追随者的支持和资助；它们通过它们的组织系统，渗透到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这些社会主义者拥有一批社会地位相类似的追随者。但是，一些教派团体，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成员也组织了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现代群众性政党，例如在1869年后的比利时（天主教团体联合会），在瑞士、荷兰、奥匈帝国，在1870年到1871年以后的德国。最后是在意大利，在该国，最初教皇曾禁止任何教会团体进入议会。从德国中央党的结构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些教派政党的组织形式。它没有真正的党的机器，而是以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之类的教会团体和教派行会作为基础的。这样的党不是结构严密的群众性组织，而是以争取各个团体的利益为中心的松散的结构。其他国家中的天主教党也是沿着类似的联合路线组织起来的。

我们不应由于欧洲各国政党的结构类似或相同，因而看不到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政治接触人民大众仍然只

不过刚刚开始，例如在巴尔干各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由于中产阶级软弱无力，因此，尽管根据宪法条文的规定，这些政党本来是可以在扩大它们的影响方面大有作为的，但它们只不过仍然保持着小集团的性质。在其他国家，如在法国，公众生活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色彩，妨碍了这些政党的充分发展。而在俄国，由于根本没有任何宪法可言，因此，组织任何政党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革命的密谋。以德国为例，花费气力去组织政党未必就能在国内产生政治影响。国家生活的传统方式方法，往往在政党内部发生影响。譬如，在英国，各种宗教派别运动以及它们在国内的传教活动影响着群众；在德国，则是受国家限制的教会中，以及后来的哲学学派中的那些学院式和教条式的成分。几乎在每个国家，尽管封建的传统和晋升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但政党这时已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政界领导人物多是从中所遴选。这种从政党中遴选政界领导人物的方法，在拉丁语系国家法国和意大利所起的作用最大；当然，在英国也由来已久，不过在这里，贵族势力仍在起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在外交界。德国政党的不幸就在于它不能通过政党政治而涉足于公职。

19世纪末，自由主义在重大的政治运动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但是，从这个世纪中叶以来，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范围和它的一部分思想根源已有很大的变化。欧洲的自由主义过去的伟大成就，在于缔造并发展了自由的国家，实行了宪政和法治；在于坚持了某些政治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后来也被各种非自由主义的运动和政党所采纳，包括教派的，社会主义的，贵族的，有时甚至是保守的运动和政党。它的成就还在于自由党人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有东欧和巴尔干各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宪政国家，只要得到民族主义的帮助，甚至在那些反自由主义的力量以独立发展为标榜而盘踞的国家（如像意大利）也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是把一个宪法，即皮埃蒙特宪法，扩大到更大范围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典型例子。自由主义起作用的第三个大的方面是经济政策方面以及对经济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例如曼彻斯特学派的作用。

1870年后，自由主义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除了中产阶级外，另一个人数不断增加、按照严格的路线组织起来

的新阶级——工人阶级正在成长的时代，自由党究竟应在社会的哪些领域进行活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在随着产业革命而出现的社会危机中究竟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曼彻斯特学派的不干涉政策行事，显然解决不了这种社会危机。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得出任何一致的答案，并且在对待当代推行民族国家政策的政治运动，即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彻底陷于分裂。自由主义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在这几十年中左右其政策的另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课题。然而，另外还有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个课题上，老自由主义的传统甚至更为强大，这就是政教关系问题，或者不如说是富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同与当代的自由主义精神大相径庭的各种制度，特别是梵蒂冈宗教会议以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欧洲的自由主义进入其历史的这一阶段时，它所持的态度是什么，它的对策是什么呢？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它都组成了政党，或与别的党共同执政，或独自执政。英国的自由党在当时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尤·格莱斯顿的领导下，曾与保守党内阁轮流执政，有四次接管政府（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它进行改组以适应大众民主的现实情况，并在其政策中把辉格党的传统和在议会外成长起来的激进主义融汇在一起。意大利和法国的内阁变化无常，其组成只不过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意大利1876年以后的“改造”时期和法国在麦克马洪辞职（1879年）与德雷福斯危机之间一段时期的政局，就是这种情况。法国当时由共和党执政，它的各派支持一种共和的、反对公民投票的议会自由主义。后来（1899年以后），激进社会党取得了领导权。在1867年至1878年之间的德国，民族自由党人在帝国国会中掌权，但是，俾斯麦打算把他们直接拉进政府（1878年以鲁道夫·冯·卞尼格先为大臣候选人）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这位首相和民族自由党人的目的是互相对立的。德国的左翼自由党人在1874年以后毫不动摇地对政府持反对态度；它的右翼则从未打算放弃它固有的那种既反对又支持的自相矛盾的立场，尽管整个来说在1884年以后它愈来愈站在政府的一边。在1905年以前的俄国，既然还没有什么宪法，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自由党，尽管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任务仍然是从事争取宪法和立宪制的斗争，因此几乎被人认为是一种革命的政治活动。土耳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撇开英国的特殊情况不谈，各国自由党的组织都是松散的。它们仍然保持着那种由上层和中层社会组成的俱乐部的性质，和当时的群众民主潮流从未发生任何接触。自由党人在任何国家都从未深入工人阶级之中，即使在英国也从未在任何时候这样做过。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活动都是由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在某些国家，例如在1888年后的荷兰以及在比利时，人们可以看出自由党在19世纪开始以来所出现的衰落过程已经开始。但是，在这个时期，属于自由主义类型的人物和思想仍然在当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某些国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自由党始终在执政。然而，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日益四分五裂就可以看出它的力量已有些衰退。这一过程在德国和意大利特别明显。在英国，自由党也于1886年在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上陷于分裂。到这一世纪末，自由主义日益变成机会主义性质，面对着当时的保护贸易政策、国家干预社会问题，以及和这两个问题息息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这些重大问题，已不复保持任何团结。

转向保护贸易政策即保护关税政策，引起自由党人的激烈反对。这种情况在德国实际上造成了政府与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之间的决裂。但是，民族自由党反对关税保护政策的行动远不是全面一致的，赞成保护贸易的一派立即从该党中分裂出来。只有代表金融界的自由党左翼始终忠于自由贸易政策。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管是自由党的或是保守党的，在这个时期都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鉴于社会状况的急剧改变，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总是符合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该学派宣称，在个人的自由受到无法遏制的经济演变过程的威胁时，国家有权进行干预。在英国，托·希·格林和弗朗西斯·查·蒙塔古发表了这种见解。蒙塔古甚至在其1885年发表的《个人自由的限度》一文中这样写道：“在那些个人既没有生产充裕的财富所必需的资本，也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国家不得经营这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许多工业企业。”自由主义对于把这种干预政策付诸实施十分犹豫，也十分担心——在英国也莫不如此。然而，英国却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采取主动行动的范例。格莱斯顿的1881年的土地法，是一个大胆的步骤，它通过由官方固定地租而给爱尔兰的佃农提供了减少其地租的某种手段。第一次承担起伟大的社会—政治任务，使工人朝不保夕的生存能够得到某些保障的是一个保守的政府，即俾斯麦的政府。这位德意志

帝国的首相制定了疾病保险法（1883年）、意外事故保险法（1884年）和老年保险法（1889年）。德国的自由党人对于这些立法的感受是复杂的。尽管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现了各自由党自己对社会趋势所做的结论，但是，自由党左翼仍然拼命加以反对。只有在俾斯麦辞职后，这一派人才开始采取同一步调，试图改进这种强制保险制度，使之更加灵活。右翼的民族自由党则设法去掉政府建议中来源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团思想的东西，但他们最后几乎全体一致投票赞成这些立法。在德国的这些社会立法的影响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引起关于意外事故保险法的第一次辩论浪潮时（1887年在奥地利；1894年在挪威；1897年英国的“工人赔偿法”；189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丹麦；1900年在西班牙和荷兰；1901年在瑞典；1903年在比利时和俄国），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矛盾现象。社会自由主义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并不能就此说，19世纪末推动社会政策进展的力量完全是或主要是来源于自由党人或自由主义思想。新出现的社会自由主义，尽管有其可称道之处，但它的成就同早期的自由主义在其全盛时在促进宪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日而语。

保护贸易政策、国家干预和帝国主义这三者基本上构成一个整体。就是在对待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的阵线也是四分五裂的。英国自由党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的观点依然受到科布顿和曼彻斯特学派理论家们的影响。这些理论家们认为，过分地实行自由贸易将会造成英帝国的涣散和解体；将会给母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会保护各旧有的殖民地的利益，也无法再获得新殖民地。激进的和温和的自由党人怀疑地问道：民主制度和帝国究竟是否能够共存。有些人，如第十五代德比伯爵得出结论说，“国王和贵族可以统治帝国，但是，一个民族却不能统治另一个民族”。但是，在早期支持帝国主义扩张的人们中间也有自由党人，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杰出人物、《大英帝国问题》（1868年）的作者迪尔克以及约瑟夫·张伯伦等。从1895年起，英国帝国政策的这个典型阶段是同张伯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政策是设法使帝国成为一个联邦性质的联合体，同时又是一个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关税同盟。

帝国主义问题也使德国的自由党人深感苦恼，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赞同德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像弗里德里希·瑙曼和马克斯·维贝尔这样一些自由党人

从德国参加世界政治的过程中看到唯一能够把德国人民训练成为在政治上有觉悟的民族，并使工人阶级和这个民族融合起来的伟大前途。在他们看来，这并不能代替社会改革而是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在意大利，弗朗契斯科·克里斯比首相（1887—1891年，1893—1896年）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本着一种充满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成分的民主自由主义精神而采取的殖民政策的典型例子。这种政策于1896年遭到惨败后，和平主义的因素有一个时期曾侵入了意大利的自由主义，但从整个来说，民族统一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应运而生。

社会领域中的干涉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是当时的潮流，这种潮流即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富有自由主义精神，但它们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无多大关系，或者说毫无关系。自由主义对造成这几十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教关系危机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导致这种危机的有三件事。世俗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最终的哲学基础是科学的一元论。由此，产生了一种对教士和教会的明显厌恶，以激进自由主义者和站在他们左边的社会主义者最为典型。即便是英国的激进主义也不能例外，虽然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和不信奉国教的一些教派联系在一起。其次，当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欧洲取得胜利，而且国家开始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几乎每一领域扩大其积极的影响时，国家的权威大大提高了。自由主义最初是以反对这种国家权力增长趋势的力量而出现的；后来，它又采取了黑格尔学派的观点，认为国家是达到自由的最有效的手段，于是，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但是，如果说自由和开明是通过国家而实现的话，那么教会在许多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就成为实际的障碍。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由于其本身的结构，在对待国家权力的关系上，同在任何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就完全不同。第三，罗马天主教会由于受到时代的趋势和事态发展的威胁（特别是在意大利），于是就通过加强教皇制度和使“宗教法规精神化”（1870年的梵蒂冈公会议），来抵制对它的世俗权力的侵犯。

从这三个方面，形成了一场冲突的根源；于是这场冲突在意大利的最上层爆发了。在那里，罗马教皇管辖的各国被占领并被并入意大利民族国家，乃是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国家之间持续几达60年之久的对抗的开端。梵蒂冈拒绝接受向教皇保证它在罗马享有独立、主权地位

的1871年5月13日的意大利保证法，并且认为这个法律是片面宣布的。这项法律还再次宣布实行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政教分离原则。这就意味着，意大利的国内政策现在是反教会的：实行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公证结婚，公立学校中宗教课程可以选修。意大利的公众生活笼罩着由世俗人左右一切的反教权的自由主义色彩。而且，天主教在政治上也无法形成反对力量，因为1874年的教皇敕令禁止教徒们参加任何选举；这项禁令到1905年才放松。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斗争。国家，特别是普鲁士国家，对罗马天主教会实行严厉的政策。根据1873年的五月法令，它竭力把教会的权利限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并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一步颁布的法令规定如触犯上述五月法令要严加惩办。一些主教和神父被撤职、监禁和判刑。俾斯麦首先给这种行动以鼓励，但完全不是出于使国家自由化的原因。不过，这主要是普鲁士教育大臣、自由派官僚福尔克的杰作。国会中的自由派，特别是左翼，在这场斗争中也不再是消极的了。正是他们散布各种口号，给这场冲突提供了远远超出俾斯麦的目标的各种基本论点。首先使用文化斗争一词的鲁道夫·微耳和根据自由派的论证方法，大谈向带有“教皇极权主义特点”的僧侣统治进行斗争，及“为了争取国家的解放，即摆脱教会的桎梏”而进行干涉。自由主义者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捍卫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但是，当俾斯麦为了寻求他自己的目的，置他们于不顾而同教廷言归于好时，他们却无法加以阻止。文化斗争的最后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战胜了故步自封的教会，充其量不过是把俾斯麦所谓的“僧侣统治”和“国王统治”重新加以区别而已。

这个结果远不及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在教会政策方面所做出的那些决定。1877年在法国同样是重要的一年。保皇派的失败和共和派的胜利，同时意味着反教权主义战胜了那些同时支持教会和复辟的分子。共和制国家现在开始在牺牲教会及其组织的情况下扩大国家的权限，实际在为政教彻底分离进行准备。1882年的学校法确立了学校脱离教会而由国家管理的原则，据此不得讲授任何宗教课程。1886年，禁止教士在公立学校任教。有一个时期通称“重新归顺共和国”时期；这时罗马天主教会和共和国关系稍有接近，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冲突又重新爆发。1904年6月实施了一项法律，规定在非教会的公立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并不允许任何教派办学；最后，1905年的“政教分

离法”造成了一个有利于由世俗人士控制的激进国家的新局面。同样，在其他国家，一旦义务教育制度确立起来，学校也就立刻变成教会的宗派主义观点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观点斗争的场所。几乎在任何情况下，自由主义都试图把公立学校义务教育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它建立一种不受任何教义束缚的自由、自主教育的理想。这一斗争也在比利时的非教会公立学校（1879年的法令）和由教会领导下的教区学校（1884年的法令）之间进行。在荷兰（1889年），教会学校坚持存在，与公立学校并立；而在奥地利，由于政教协议已于1870年中止，并根据1874年的教会法实行了一项开明的宗教政策，教会学校于1883年得以恢复。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在实行类似的政策，但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所采取的态度，说明它处于一种比较复杂的进退两难境地。由于自由主义，尤其是其激进派，包含着一种强烈的自由思想即不可知论的成分，那么，它同新教教徒，同不信奉国教者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对待这些人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对立关系，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大多数派别（格莱斯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比起欧洲大陆上的自由主义来，与宗教及教派问题有着更多的关联。例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对待英国国教的态度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具有自由思想的激进派和不信奉国教者在反对国教的问题上可能会是一致的，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却是不一致的。因此，使政府与国教分离开来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渗入英国的自由主义中。格莱斯顿虽然由于特殊的原因曾促使爱尔兰教会与政府分离，但却坚持在英格兰保持国教，尽管反国教的浪潮此起彼伏。在格莱斯顿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颁布的1870年教育法，并没有效法大陆上的方式，单纯建立非教会公立学校体制，而是保留了在国教控制下的教会学校，使之与新建的公立学校并存。尽管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即使是1902年的教育法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柯罗齐把1871年到1914年这个时期称作“自由主义时代”。从这个时期的公众生活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自由主义思想这个意义来说，“自由主义时代”一词是适用的；然而，决定这个时代性质的已不再是自由主义一家了。因为程度不同、大同小异的社会主义，这时已终于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以政党、革命运动、工人团体以及国际协会等面目出现，并鼓动国家和政府采取对抗行动，即经济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措施和改革，通过这些来推动政治的发展。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

1870年前后即已存在，但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恩格斯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1885年和1894年）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后，又给这一理论体系增加了许多思想。大约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89年）一书中提出的所谓“修正主义”。这本书后来用英文发表，书名为《渐进的社会主义》。它的渐进主义的调子，一部分来自1883年以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积极活动的英国费边社的思想。另一条路线则集中并加强马克思理论中的革命成分，以俄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奉行最力。究竟是民主的社会改革运动，还是推动社会革命，这个分歧本来就包含在马克思的双重性的革命概念之中，因此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争论得非常激烈。工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有关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比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要强烈得多。的确，纯理论性的推敲陷入迷津，往往使行动不知所从。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注重由工会所代表的工人们的具体经济利益，并且有一批身体力行的野心勃勃的革命家；列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任何理论上的观点仅仅当作是进行革命的一种技术手段。在直到1870年的这个阶段，充满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斗争。从此以后，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实际运用结合了起来。

甚至形成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式，也被认为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而产生的，是为过渡时期服务的。然而，这些方式也包括一些影响未来的基本决策。马克思对1864年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协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协会中，各个国家的工人组织被当作支部，而不是类似政党的独立团体。这些组织全部由作为最高执行机构的总委员会来领导，而在这个总委员会中，马克思本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第一国际不仅由于其中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而陷于瘫痪（这种冲突只是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开除了由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后才平息下来）；而且，从一开始就苦于同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缺乏密切的接触。总委员会于清除巴枯宁后在马克思的策动下迁往纽约，以后就等于是浮游于真空之中，直到1876年解散为止。部分是由于没有合法性，它不可能充分地具有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的性质。但是，马克思看到，它是被大多数国家工人政党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条件而存在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不同，工人们所享有的选举权和在议会中的力量各不相同，工

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发展不平衡，凡此种种，使得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成立，在性质上迥异。但是，它们之间的接触仍然要比各个自由党和民族政党之间的接触多得多。它们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成为从狂热的革命热情到英国的费边社和法国的“可能派”所表现出的那种通过演变而实现改革的主张等各种倾向的典型。尽管强大的工团主义势力极力主张采取罢工之类的单纯的经济行动，尽管与无政府主义也偶尔有所接触，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几乎一直是在利用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扩大选举权的趋势、它的议会和政党，作为在政治上取得权力的途径。只有俄国的情况特殊。这个专制主义的警察国家完全是向不同的方向转化，即使在1905年允许建立某些自由主义的机构以后，情况亦复如此。

从1870到1900这30年间，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并开始成长起来——1869年到1875年在德国，1878年在丹麦，1881年在法国，1882年到1892年在意大利，1885年在比利时，1887年在挪威，1888年在奥地利，1889年在瑞典，1893年到1903年在英国，1894年在荷兰。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它们有时可以感觉到国家对它们施加的强大压力。最初，各种不同的思潮和派别——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工作，后来，有的合并在一起，有的又分道扬镳。工人们通常仍然缺乏充分的政治权利；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所处的状况，的确增加了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并制止了除在有关革命方针的一些重大决策外的分裂趋势，而做出这些决策，往往是要经过尖锐激烈的斗争的。但是，对一些根本性分歧，例如究竟应以革命还是应以演变作为社会政策基础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往往掩盖了工人政党内部正在发生的不断适应新情况的过程。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9、1901和1903年的党的集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正式谴责修正主义，而他们实际的做法却愈来愈接近修正主义。为组成政党而进行的实际工作，在议会中发挥作用，参与解决当今的政治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各社会主义政党具有相当程度的策略手段和妥协愿望，而这些往往掩盖在革命言辞的后面让人看不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阶段时，必须记住这一点。特别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1870年以前。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最早带头这样做的。他们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斐迪南·拉萨尔和他在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另一派是

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都是来自下层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左翼，接受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两派以1875年的哥达纲领为基础而合并。这个纲领是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妥协产物。1878年，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刚刚兴起，就受到根据“非常法”而针对它采取的种种措施的遏制；这个“非常法”的宗旨是“控制社会民主党的具有普遍危险性的目的”。该党只是在1890年废除这些法律后，才得以发展和扩大。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它制定了一个新的纲领。这一回该党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它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加强了集中领导，党员的人数增加了，选民人数增加得更多。它成为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党；它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间接影响是相当大的；它在历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于1889年以后恢复了这个代表大会，作为各国工人政党的联合组织）的各委员会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典型的群众性的民主政党，它有力量统一它的组织和思想。它逐步地——在1891年以后完全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它的政策的思想基础，清除了来自拉萨尔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然而，虽然它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它把立足点转向了主张民主的选举竞争和在议会中进行反对和抵制活动的政策。这无须使用任何革命的或恐怖主义的手段。该党政策中的这种改良主义的特点，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反对，但由于在工会内部的这种倾向，在19世纪结束后又加强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有严格的纪律，有比较严密的思想，因而深入人心。在这一点上，它比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胜过一筹。在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或者具体说革命的传统最为悠久，但从1870年以前就存在的分歧使工人运动陷于分裂而无法克服，或者至少是尚未克服。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曾经参与巴黎公社战斗的人们的残暴而血腥的迫害已经停止，归国的公社社员得到了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机会，这时候，上述情况就立刻暴露了出来。在10年中间，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派（法国工人党）；一个遵循1789—1871年的革命行动主义传统、以路、奥·布朗基的思想为基础的派别（社会革命党）；第三个是工团主义思想（“交叉双臂的革命”）赖以存在的派别（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是法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它提出了一个被说成是“可能政策”的社会改革纲领。独立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亚历山大·米勒兰则试图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团结在一个社会改革

纲领的旗帜之下，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温和要求；并带有民族的爱国特点（1896年的圣曼德纲领），这也博得了商人以及小农的欢迎。米勒兰于 1899年6月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任职，这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日期。但这一步骤又造成了新的分裂，因此，在20世纪开始时又出现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组成的更加不妥协的派别和一个以让·饶勒斯和米勒兰为首的比较温和的改良主义派别。真正妨碍马克思主义派取得彻底胜利的原因在于法国的社会结构，法国政治中那种忠于地方的力量，法国民主共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情况迥然不同。任何指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工人政党，要想在这个国家得到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英国的激进主义在振兴自由党方面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成为社会改革思想和理想的一种理论源泉，从这里也可以汲取力量来加强工人的政治热情。1883年以后一直在倡导逐步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革的费边社就曾起过这种作用。另外还有工会。它们在实际改进工业中的劳动条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对政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工会，即便是德国的工会也望尘莫及。于是，各种不同成分在英国共同形成了一个工人政党：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改良主义小团体，1893年成立的独立工党之类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工会所实行的实际的社会政策以及要求在议会中有直接代表工人利益的力量。特别是最后这种要求，于1900年导致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组成。这个委员会于1903年取名工党，不过，有一段时间它只是一种号召力量，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如果说，英国工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思想的彻底胜利，那么，俄国则是形成激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例子。社会主义在俄国是从知识分子对沙皇政权的独裁专制主义的反抗中产生的。一套有计划的恐怖手段成了这个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革命运动找不到任何合法的表达意志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注入这个运动后，那些主张社会革命的人们开始怀疑：俄国是否必须先演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就不能同俄国的传统的农业体系中原始的共产主义成分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马克思未曾做出明确答案的问题。领导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把这个问题完全撇在一边，提出了一个

适应俄国情况的纲领：在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造就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前，就举行革命暴动，动员农民中间的革命力量，组织一个革命的行动党，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参谋部，准备发动武装革命。

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也以许多不同形式存在着上述在4个最大的国家中所看到的种种重大的一致和冲突。在意大利，一种修正主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去战胜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的马志尼主义的强大潮流。在奥地利，事实证明在一个由所有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党中，要想超脱于民族差别而保持社会民主是办不到的。捷克的一个党分裂出去了，整个党于1897年分成了6个愈来愈独立的民族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各社会主义政党不久就都仿效英国式的社会改良主义。到20世纪初，组织和思想巩固的阶段在各个国家均告终结，社会主义者所获得的选票开始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而增加。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的党，不久即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派别之一。在政府和议会中担任职务，分担政治责任等问题统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自由主义能够通过议会制度中所规定的指导原则和通过分担政治责任，而直接地和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当代的思想。社会主义则不能。它只能激起反对，刺激它的对手在社会政策上采取主动。俾斯麦的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实行的范围很广的保险法（它是欧洲许多国家采取类似措施的样板），就说明了这种因果关系。但这个时期也还有许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例，并不是由于对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做出反应才产生的。例如，许多国家甚至在19世纪结束以前就已经开始把他们的铁路收归国有；普鲁士（在建立俾斯麦所要求的帝国铁路系统失败后）这样做了；比利时、瑞士、挪威、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1905年）也这样做了。这些都是最初的迹象，说明在经济方面，未来事物的形成并不一定仍然保持典型的自由主义的传统面貌，它的某些特点也将由社会主义来决定。

（丁钟华 译）

[1] 出生人数达到最高峰时的千分率如下：

1861—1870年	英国和威尔士	35.2
	比利时	31.6
	荷兰	35.3

	俄国	50.0
1871—1880年	德意志帝国	39.1
	奥地利	41.8
	苏格兰	35.1
	爱尔兰	30.2
	丹麦	34.0
1881—1890年	匈牙利	44.0
	意大利	37.8

只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稍后才达到最高峰。俄国欧洲部分的数字不完全可靠，但是，尽管实际上达到的要比这个数字为高，这些数字还是表明从19世纪60年代起已在缓慢下降（引自J·康拉德《政治经济学研究纲要》，1923年版）。

[\[2\]](#) 尼格斯（Negus），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意为“万王之王”。——译者

第十章 德意志帝国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完成了旨在给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带来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国家都必须确立它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控制，这种运动在1848年反对各自的国家时，遭到了失败。在意大利，这种运动在把国家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方面，要比在德意志更加有所贡献；但是在德意志，在中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领导下，这种运动也对伟大的事业提供了主要的动力，尽管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在实际创立帝国的过程中，没有被给予任何明显的地位。在与奥地利较量实力的决定时刻，甚至连俾斯麦也毫不迟疑地利用民族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工具，1866年，如果不是武力迅速取得了结果的话，他就会向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发出号召——正如还向捷克人、马扎尔人和其他民族发出号召一样——动员他们进行民族革命。但是，在科尼格雷茨^[1]所取得的迅速而完全的胜利，意味着外交与军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民族革命在帝国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这正是俾斯麦的企图：他想利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但这只限于利用这些倾向帮助他战胜反对他的德国保守的和主张各邦独立的势力。俾斯麦越是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他就越是能够，而且的确不得不考虑各个邦的利益，它们在德国（这与在意大利不同）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色当战役（1870年）所导致的最后结局已经证实并且加强了德国统一的这个特点，通过每年把9月2日色当大捷作为国庆日来庆祝，第二帝国的德意志人就清楚地表明了，帝国的创建归功于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德意志的王公们曾经为了这个目的而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团结起来，而且，德意志民族的主要贡献在于军事方面。纪念色当大捷日所表现的这一切，使原先为统一而进行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于1848年遭到失败，后来在19世纪60年代又恢复起来）逐渐丧失了它的重要性。

从1871年起，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德国的内外政策，如同意大利的内外政策一样，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被德国和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暂时打乱了的欧洲国家体系，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了新的局面，那么，这是由于这两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有意识地避免

进一步打乱欧洲局势，从而再次肯定了这一体系。俾斯麦在1871年宣布新帝国已经“心满意足”。他在这里所指的是对于一切类型革命的抵抗；因为这种革命可能为了顺应民族感情而改变疆界，或者使现存的政治秩序被欧洲各国内部的社会压力所打乱。他开始抑制德意志人的民族不安感，而过去他却是与这种不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他的决定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原则不适用于奥匈帝国。他希望这个君主国能有保证地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主张那里的各个民族必须像过去那样，不受民族限制地继续联合在一起。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指明，任何建立“民族统一的德意志”（Germania Irredenta）的企图都是不相宜的。这位首相需要欧洲内部保持稳定，以便不使他的年轻的帝国受到危害；因此，他一贯反对任何旨在建立“大德意志”的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是由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德意志人在人口中占优势的一切领土在内的民族国家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为了阻止欧洲民族革命的发展，俾斯麦准备在政治上把德意志民族局限于一个“小德意志”的范围之内，并且打算利用奥匈帝国境内的800万德意志人，来抵消4倍于他们的非德意志人的力量。

与这种限制德意志人离心力量相对应的，则是实行遏止一切民主倾向的对内政策。在国内和在欧洲境内，俾斯麦设法控制他自己在实现建立一个统一帝国的冒险政策时所亲自鼓动起来的那种精神。他不得不在仍然强大并要求采取克制态度的传统力量与要求变革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力量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1871年到1890年间俾斯麦全部政策的特点。他的联合噩梦和他对革命的恐惧心理结合在一起了。俾斯麦虽对此感到悲观，但他还是果断地企图对联合与革命全部加以控制；最后，这二者在1890年至1918年间使他的继任者全都遭到了失败。因此，从帝国的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国内的历史——这总是与其对外政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为保守派的僵化和民族的活力之间不断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强调这一点时，我们不能忘记，在1870年前后德国和欧洲境内，只要这些力量在起作用，要想找到另外一种可以解决这种紧张局势的办法，似乎是不现实的。俾斯麦要沿着他的道路前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须考虑欧洲各个大国，德意志各邦诸侯要求独立的愿望和他自己的国王威廉一世以及他的贵族同事们所持有的普鲁士式的保守主义，以及已经日益具有政治头脑的人民大众不同的党派倾向。

帝国宪法在各方面都以俾斯麦亲自制定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为蓝本，它是俾斯麦在暗礁中前进的危险历程的表现。这部宪法不是按照任何合乎逻辑的体制制定的，它是适应当时的情况，即统一与联邦制之间、君主制原则与主权在民思想之间的妥协产物。它使帝国成为各立宪君主之间的联盟，而帝国本身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其最高权威是德意志皇帝（“联邦元首”）。帝国并不像德意志各邦那样，拥有一部全面而详细的成文宪法，因为许多事情都在帝国的权限之外，要由各邦自行处理。此外，为了迁就各邦，特别是为了迁就普鲁士及其大臣们的本位主义，就有意地没有建立帝国的各个部。代替各部而建立的联邦议会，本来不仅可以具有立法权，而且，还可以通过各个委员会对帝国政府各部门实行某些控制。虽然普鲁士在这个联邦议会中并没有掌握绝对的多数，但实际上，它不大可能在投票中被压倒。这就是那些一贯坚持这一主张的联邦主义者的意图。按照一种相反的意见，帝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应由普鲁士的各部来进行。这种“大普鲁士”式的解决方案是与建立普鲁士内阁的愿望一致的。俾斯麦没有明确拒绝这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因为他知道他势必要做出的让步影响会有多么深远。帝国政府的某些部门被转到了普鲁士的各部，这些部——尤其是陆军部——从而变成了准帝国的部。但在实际上，俾斯麦的意图是既不采取超联邦的方式，也不采取大普鲁士的方式。从1866年秋以后，他就在秘密地谋求由他自己来管辖帝国，管辖的范围尽可能地广泛，并且置于单独一个责任国务大臣的领导之下，而这个国务大臣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俾斯麦正如他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做法一样，在联邦的各个邦政府和普鲁士国王以及普鲁士内阁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从而得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即找到了能使他自己为所欲为的解决方案。他当了联邦首相，1871年以后，又当了帝国首相，从而也就成了一个独裁政府的责任首脑，而不是一个由平起平坐的同僚们组成的多数人负责的行政机构的首脑。的确，官方所用的词汇是“帝国领导”，而不是“帝国政府”。俾斯麦同时仍然是普鲁士的首相，即普鲁士内阁中的“首席大臣”，当时还兼任普鲁士外交大臣。虽然从1870年1月1日起，普鲁士外交部变成了北德意志联邦的外交部（从1871年起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但它始终是俾斯麦自己所独管的一个部。在19世纪70年代，帝国政府按照俾斯麦的计划迅速扩大，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帝国署”，而不

是“帝国部”。每个帝国署，例如邮政、海军、司法、内政等署，都由一个没有大臣职权的国务秘书来领导。

根据帝国宪法第十七节的规定，帝国首相的“职权”是一个政治和道义的概念，在俾斯麦看来，它说明了在皇帝的主宰地位之下，首相所享有的权威地位。帝国首相不对帝国议会负责。俾斯麦不愿受议会的辖制，正如他不愿受同僚大臣们的辖制一样。因此，德意志帝国及其各邦在德国始终忠实地保持了典型的19世纪式的政体，一种其行政不受议会辖制的君主立宪政体。根据帝国宪法的规定，皇帝可以自由任免首相，完全不受帝国议会的限制。帝国议会与联邦议会一起享有立法权，因此帝国议会的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又不可避免地要赋予它以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必须重新制订帝国的法律，而且立法机构控制着预算，包括军事预算在内。

君主立宪制确实是一种适合1870年的德意志的政体。但是，潮流趋向民主制；这清楚地意味着帝国议会和各邦的议会总有一天会加强它们的地位，并决定政府的构成。在一个议会制君主国家中，民主和帝国权威相结合的最大障碍之一（强大的传统反对势力除外）就是德国的政党为数过多，这就妨碍议会做出明确的决定，并阻碍形成任何稳定的政府多数。因此，简单地把英国式的制度搬到德国来是不可能的；甚至连鼓吹议会制的民族自由党人，在帝国刚刚成立时也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帝国宪法序言中所宣称的那样，沿着民主议会路线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帝国是一个君主们的联盟。帝国议会的任何加强都会不可避免地对帝国的集权性质有利，这是各邦的君主和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俾斯麦曾不得不向联邦的压力屈服。但是，为了与危及帝国统一的联邦主义相抗衡，他利用了对于这个目的最适用的帝国议会，并且还利用了普鲁士的霸权地位这个事实：普鲁士拥有帝国领域的65%和人口的61%，还拥有帝国的3个主要重工业中心，即萨尔、鲁尔和上西里西亚；此外，它在人事和机构方面，还与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的德国宪政史，说明了俾斯麦多么成功地调整了他的帝国宪法这个天平，尤其是就联邦主义而言。同北德意志联邦各邦发生的困难于1867年被克服了；在1870年，又给予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以更多的特权，特别是在军事和邮政方面；从那时以后，帝国的历史就不再发生帝国与各邦之间的严重分歧了。联邦议会始终

支持帝国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没有受到几个邦的主张各邦独立的势力的危害，因为俾斯麦在他采取了兼并汉诺威、黑森（黑森—卡塞尔和黑森—拿骚）、法兰克福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种惊人的行动以后，便有意识地对各邦采取克制的态度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领导与帝国议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困难了。起初每隔3年，后来改为5年，通过平等、秘密和直接的普选办法，选举一次帝国议会；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曾认为这种办法是对付自由派的恰当的武器。由于政党为数众多，它们的纲领又是为互不相容的思想体系所支配，以致帝国议会的大多数会议都出现了多变的反对帝国政府政策的消极多数。于是，帝国政府不得不为它所提出的每个议案逐项争取多数。在1871年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曾经拥护建立帝国的民族自由党，在汉诺威县乡绅冯·卞尼格先的领导下（尽管还有其他拥护帝国的自由派和拥护俾斯麦的“自由保守党人”一起参加）勉强地控制了议会的半数（382席中的168席）。就连这种多数，也早在1874年就丧失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俾斯麦又解散了他日渐衰落的民族自由党的联盟，而首先转向中央党和保守分子，后来又转向保守分子以及那些已经与其左派断绝关系的民族自由党人。由于这些人的支持，他在1887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取得了政府的绝对多数。

从1867年起，民族自由党就成了德国全国性的首要政党；他们和从1860年起以进步党人为代表的普鲁士反政府的左翼自由派脱离了关系，以便结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按照“政治的现实主义”与政府达成妥协，并促使民族的帝国得以诞生。民族自由党人几乎一成不变地坚持忠于帝国的路线，尽管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们的左翼在一些有名望的议员，特别是在犹太律师拉斯克尔的领导下，极力要求实行议会自由化，因而使他们与俾斯麦的矛盾尖锐化，直至1880年终于背弃了该党。

长期处在欧根·李希特尔（威斯特伐利亚省工业城市哈根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下的左翼自由主义，有着一段分裂与联合多变的历史。他们对于帝国的政策几乎没有采取过什么积极的态度，而是在多半属于消极反对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但是，就连这样一个政党也逐渐习惯于现状了；而且，除了比如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后来提出的一

些建议之外，它从来没有为推进议会控制下的君主政体这一政治目标做过任何积极的努力。

俾斯麦阻挠了自由派对于宪法所抱希望的全部现实；而且，自由派一旦分裂，就被这位首相所击败。这些事实就形成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这种说法。但是，为了正确理解这个悲剧，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探索俾斯麦与自由主义之间政治和思想的斗争；我们还必须考虑要求把广大的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实行民主这种社会—经济潮流。破坏了自由派和他们的理想的，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且还有朝着日益民主的社会发展的那种趋势，自由派妄图通过例如反对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来抗拒这种趋势，但未能奏效。一直到20世纪初，才在把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并不十分受人欢迎地结合起来以及比较有效地组织自由主义政党方面，进行了认真而稍有成效的尝试。在这方面，人们会想到弗里德里希·瑙曼、路约·布伦坦诺和马克斯·维贝尔，而最后这位马克斯·维贝尔是以他的政治理论精辟而著称的。

保守党人分裂成为两个主要政党。老普鲁士保守党人对于帝国的建立感到不高兴，从一开始就态度冷淡，以此来表明他们对普鲁士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自由主义的厌恶。1876年该党经过改组后（这时叫作“德国保守党”），他们效法另一个保守党，即“自由保守党”的榜样，也转向俾斯麦。此后，他们就越来越支持正向右摆的帝国政策——但丝毫也无意放弃他们那些独特的普鲁士特点。他们的选票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地区。他们的政治领袖绝大部分出身于东方各省的普鲁士贵族。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大多数德国政党为经济利益所左右的这个总的趋势下，他们变成了代表土地利益的政党，并且采取了于1893年成立的“土地所有者联盟”的宗旨。由于直到1918年普鲁士还在实行“三级”选举制，该党在普鲁士下议院的地位，要比它在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地位强大得多。19世纪80年代以后，当俾斯麦允许普鲁士的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执行他的反自由主义政策时，该党在普鲁士取得并且保住了权力，首先是掌握了任命官吏的大权。自由主义时代结束以后，普鲁士政府高级部门的官职主要是留给贵族子弟，或者也可能留给中产阶级的律师。这些律师由于政治观点保守，参加过某种有名的学生军团，并且是预备役军官，因而被列入普鲁士贵族这一等级。普鲁士与帝国是如此密切关联，以至于后者自然地要受到官僚机构中这种人事政策

的影响，而这种官僚机构，一般来说，不能被认为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尽管它在业务上和道义上是卓越的。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的“官僚统治”一直是遵循着施泰因和哈登堡的传统，自由主义倾向特别明显；而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部分情况还是如此；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它的保守主义就变得日益僵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君主政体是和以贵族为领导的社会相联合的，它与社会中争取政治地位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加剧。另一方面，司法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而且比较成功地保持了自由主义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人力量的增长，极为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紧张状况；他们在1875年哥达大会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党，尽管社会民主党人由于他们的革命纲领，由于他们拒绝与国家和解因而被俾斯麦在1878年的非常法中宣布为“帝国的敌人”，然而，每次选举以后，他们的人数都有增加。1871年，他们只赢得了2%的选民，在帝国议会中只得到一个席位；但在1912年的最后一次帝国议会选举中，他们赢得的选民数增长到占选民总数的29%，在帝国议会中获得了28%的席位。这种迅速的增长，首先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那些在帝国成立之初已经有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以外，又设法争取到一些新参与政治的人们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主要是从下层民众那里获得了力量，这些人从农业地区迁入工业地区，而且他们在成为产业工人前没有行使过选举权。到头来，俾斯麦的希望落空了，他曾希望普遍而平等的选举会使对帝国忠心耿耿的群众支持政府，并在投票中压倒反政府的自由派。

从1890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思想基础是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深受群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成了迅速壮大、成员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它拥有将近100万登记过的党员，400万选民），并且具有完善组织的群众性政党。就这些情况以及就它能对其成员实行严密而完整的控制来说，这个党与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不同，这些政党在组织效率、纪律以及吸引新党员的成效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以及组织力量的增长，采取行动的革命热情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政治—社会的现实明显地矛盾，从这个事实中，处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思想领导之下的“修正主义者”得出了他们的结论。这些结论未被党的委员会所接受，并在1903年的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被拒

绝。党的首脑倍倍尔及其追随者愿意正式保留革命的学说，因为他们觉得它还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不太远的将来获得成功。但是，并没有出现像后来成为列宁的共产主义特色的那种革命战略和策略。相反，在1893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民主党问答》一书中，党的权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提到了“民主一无产阶级的……所谓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这就是他向党所推荐的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但它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党”，这就奠定了党在1890年至1918年整个时期的路线。

从1890年起，在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利气氛中，工会完全独立于社会民主党，成功地进行了有组织的、“和平的”阶级斗争。虽然德国工人非常愿意相信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但实际上却对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比对革命更感兴趣。接受现状是更加容易的事，尽管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在工人中间有相当大的实力，但1914年的德国并没有处于革命的边缘，虽然帝国议会中的投票，尤其是1912年的投票，明确无误地显示了潜在的爆炸性的局势。在战前年代的稳定情况下，不可能爆发革命；要爆发革命，就需要1917—1918年战争最后阶段的那种日益加剧的灾难。

天主教党，即“中央党”，向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一个德国政党的特殊性质的格外清楚的图画。早在1806年以前的旧德意志帝国议会时代，各宗教教团，即“各自行动者”，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了，并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突破了邦的严格体系的束缚。从那时起，在社会运动的问题上，教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1870年成立的中央党就是来源于1848年德意志法兰克福议会中，以及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派。这个党认为，它必须执行一项以天主教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教义为基础的政策，特别是要在1870年的那种极为紧张的局势下，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天主教与各种形式的（首先是自由主义的）革命之间的全面冲突，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而1870年的梵蒂冈公会议着重地表明了天主教是准备进行斗争的。但是，天主教的政治人物认为德国的局势，特别是1866年以后的局势极为危险。他们的目标本来是联邦制的大德意志。这一点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排斥以后，他们发现自己首先在北德意志联邦中，后又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国王兼皇帝统治下的德意

志帝国中降为少数，并且为民族自由党人的强大势力所迫，进一步退居守势。中央党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反对在帝国范围内谋求统一的一切努力，主张实行联邦制，只要与起码的帝国权威相符合，则范围越广泛越好；另外，还要坚持遵循普鲁士宪法中有关保护教会的规定，并为促使在帝国宪法中采纳各有关条款而努力。他们已经在1871年的选举中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由于“文化斗争”的结果，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在1874年大为增加^[2]；此后直到帝国的终结，该党拥有的议席一直保持在100个。换言之，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大约有25%属于天主教党，而在帝国的总人口中，信仰天主教的人正好为37%。

最后，德国政党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强调具有反抗性质的分立主义，而与德意志民族国家针锋相对。从前的汉诺威王国不久前已经变成了普鲁士的一个省；在这里，教皇党是所有想号召抗议普鲁士兼并该王国的人们的团结中心。但是，这些人在居民中只不过是人数日益减少的少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人民选出的代表，曾在波尔多的法国国民议会中抗议德意志帝国的兼并；他们以绝大多数的选票，把具有强烈地域主义色彩的成员选进了帝国议会。这些成员持分立主义的态度，因而他们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地域自治的基本概念，这种概念反对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的控制之下的任何统一的民族国家。此外，还常有一两名来自北石勒苏益格的丹麦议员；在那里，因为没有举行过《布拉格和约》（1866年）所规定的公民投票，因此在靠近哈德斯莱夫的北部边疆地带，出现了一个丹麦人占多数的地区。波兰“派”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一派通常包括15至20名议员，到了19世纪末，它拥有的选民数目逐渐增加到25万人；但是，在1903年、1907年和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它的选民数目猛升到35万、45万和44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中所出现的这种猛增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波兰人在上西里西亚一部分信仰天主教、讲波兰语的居民中进行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们在过去的700年中，曾经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曾经受到奥地利的的影响，以后从1740年开始又受到普鲁士的影响。这些地域主义的党派加在一起，大约一直拥有选民总数的5%，占有帝国议会席位的5%—10%。

帝国议会的选举制，并不能按确切的比例反映选民的意志，因为实行的是个人投票办法，这就有可能在某一选区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

一轮投票中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再进行第二轮投票。不仅如此，帝国议会选举的选区一直未变，它忽视了人口由农业地区向工业地区的流动。假如我们不去研究帝国议会中的席位数目，而是来研究一下从1871年至1912年这段时期每次选举中所投的票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所谓中产阶级党派所得票数的百分比一直未变，尽管在个别选举中，票数会有相当大的波动。例如，各个保守党（包括那些持同情态度的分裂出来的较小派别在内，它们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力量很弱，只拥有10%左右的选民）拥有全体选民的14%—15%，保持中等力量——这些百分比以及下面的各个百分比，均就全体选民而言，包括那些没有行使自己选举权的选民——而右翼和左翼的自由党人，除去1893年至1903年这段特殊软弱无力的时期以外，一直相当稳定地拥有23%的选民。在早些年代民族自由党人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和经过19世纪80年代的波动以后，这两派自由党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旗鼓相当的（1912年分别拥有12%和10%的选民）。中央党仅拥有15%的选民，各分立主义的党派拥有5%；这就表明，他们要比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所获得的票数更为一贯稳定。不妨拿社会民主党所拥有的选民数字由2%增加到29%的情况，与这些相对稳定的选举结果对照一下，就可一目了然；而这种增加的幅度，是与没有投票的人数从48%下降到16%这一点密切相符的。用投票的数目衡量政治觉悟的提高，这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也很相符。在不参加投票的人数的减少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力量增长的那些地方，受益者就是中央党了；1871年至1874年间，中央党的选民数字由9%上升至16%，而且，如前所述，一直保持了水平。

因此，右翼各党，即保守党与民族自由党——它们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相当一贯地“忠于帝国”，并且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所拥有的选民总数并没有大大地超过全体选民的1/4；由于投票情况有利于社会民主党，1874年又有利于中央党，它们所得到的选票就相应地减少了。帝国诞生的第一年，3个右翼党仍然得到了全部所投票数的57%，尽管人们公认，它们在政治上并不是联合一致的；但是除去1884年的选举失败以外，它们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只得到了47%至48%的选票，而从1890年起逐渐下降到1912年的30%。它们在帝国议会中所拥有的席位比例，虽然通常稍高一些，但仍然是与它们在选票中所占的比例相符合的。然而“文化斗争”一旦偃旗息鼓，中央党也在

1879年以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党。在帝国时期，它已经在朝着它自1918年以来在德国充当的那种起稳定作用的角色方面发展了。与上述政党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分立主义者，一贯坚持以原则为基础的反立场。他们在1871年至1912年这段时期拥有的选民数目，由8%上升到34%；在帝国议会中所占的席位，由6%增加到37%。如果再加上左翼自由党人（他们1912年拥有选民的10%和帝国议会席位的11%），那么，在帝国的末期，几乎有半数的选民和议员，势必要被视为不仅反对、而且是在原则上拒绝接受宪法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以下两个因素，这种多少令人吃惊的情况，就不会在政治上显得那么严重了。首先，亲帝国的政党和反帝国的政党之间有着种种彼此相通的渠道，这就有可能出现种种变化不定的联合；其次，表面上“反帝国的”那些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全都是习惯于现状的，因此，只要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们就不会实行任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反对政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保守党以外的各政党才开始为了实行宪政的改革——特别是改善普鲁士的选举制度和强调议会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的作用——而积极活动起来。

德国的政治状况是传统的僵化与社会的动荡奇异的结合；这种状况是与社会的变化过程相适应的，而这一过程又与经济发展彼此发生作用与反作用。1871年帝国的成立并不标志着在这方面有了什么新的起点。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必须把1850年至1914年，而不是把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视为一个整体。这是德国广泛地实行工业化的时期，第一次经济的迅速增长，出现于19世纪中叶前不久，一直持续到1873年的大衰退，即“创业者的兴旺时期”的结束。1848年的革命是多年来危机的顶峰，它发生在一个严重饥馑时期的末尾；俾斯麦式的帝国是在工业发展与经济繁荣的顶峰之上建立的。“大德意志”革命在严峻时期遭到了失败；“小德意志”帝国则在繁荣中诞生。在1873年以后的20年中，工业经过了几次严峻的萧条时期，又开始比较缓慢地发展了。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了进一步有力的进展，除了一些小危机以外，这种进展持续下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突然将它打断。到了这个时候，半个世纪前虽曾非常活跃却相对贫困的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了。1913年，德国采掘了1.9亿吨煤（褐煤不计算在内），生产了1930万吨生铁。

德国的煤炭供应非常充分，吸引了国产生铁和主要产自瑞典的进口生铁以建立重工业，这就是当时那个阶段德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主要基础。直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主要是以煤和铁的结合为基础的；但是后来，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发展中，电气、化学、内燃机以及和它们有关的工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述的一些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工业有关的基本情况，在政治方面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1871年至1914年间，农业的产量大约增长了1倍。这意味着，在严格的节制下，德国能够在一段时期内不需要进口而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不断增强；因为都市化的日益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有了新的、更大的要求；而且，在70年代末以后，农业，特别是谷物市场，受到了来自海外和俄国的进口价格的压力。

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仍然缺乏资金。这种情况在工业发展时期很快就改变了。有密切联系并在迅速增长的银行证券与工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依赖的。很快就开始寻求在国外进行投资的机会。直到19世纪80年代还是输入资本的德国，现在开始输出资本了。1913年，德国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估计约为300亿马克。德国的对外贸易在1890年以前发展是缓慢的；尔后，到1900年就较快地发展起来，而在1900年至1914年间，则有了急剧的增长；主要由于在国外有资金储备，对外贸易得以维持这样的水平。从工业成品在总输出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它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1872年，这个比例只是大约1/3，到了1913年，就达到大约2/3了。这种增长是与德国对外移民的迅速下降相符合的，当漫长的繁荣时期在19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的时候，移民也就开始减少了。尽管在帝国时期（1871年至1914年），人口由4000万迅速增长到6700万，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内安排增长的人口，同时逐渐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仍然是可能的。

由经济发展的上升趋势所引起的乐观情绪，可以从人口的这种增长中体现出来。自19世纪80年代起，德国经历了一切工业国所共同具有的人口出生率的缓慢下降。但是，只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那10年，人口出生率才更急剧地下降到了28%（死亡率是 16%）。在接近1910

年以前的年代里，帝国的人口每年增加80万以上，而每年参军的人数比法国多一倍以上。这是德国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而在20世纪的最初年代里，德国人口的构成也特别有利：32%的人口是14岁以下的少年，65岁以上的老人只占4%强。此外，在帝国存在的几十年中，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农业的生产方法更加集约而合理，使得剩余人口由农业地区（不只是东部各省）流向日益需要劳动力的、人口密集的各个工业中心。

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字与百分比下降了：1882年为1920万，占总人口的42.5%；1907年为1770万，占28.6%。换言之，从帝国的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由总人口的1/2减少为1/4。因此，帝国存在的几十年，正是处在所谓“背井离乡”这一过程的中期，这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恰好开始于1850年前后的经济转折点，并且造成了今天德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大约15%这样一个最低的数字。从事工业的人数在1822—1907年间有了相应的增加（从1610万，即占总人口的35.5%，增加到2640万，即42.8%）；从事商业和运输业的人数也是如此（从450万，即占总人口的10%，增加到830万，即13.4%）。在那个时期，工业和除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都需要大量工人；这个需要可以很容易地用从农村流入的剩余人口来满足（到那时为止，农村人口一直是过剩的），或者通过人口的巨大的自然增长来解决。所有这些数字的增加，并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它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发挥了特长，提高了个人的生活水平，并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社会和文化组织。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健全乐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特别是自19世纪90年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开始对社会和文化提出生动的批判以后，常常被说成是物质第一主义的。

但是，在此以前，即在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被这种上升趋势鼓舞起来的信心，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动摇，而在接踵而来的20年中的主要情况，对于维持这种信心不起什么作用。着重说明下述的事实是很重要的，即经常为国内问题所苦恼的俾斯麦，在经济不景气和停滞的年代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帝国政策的指导力量，而威廉二世的首相们，却在经济大发展中捞到了好处。这种动向一方面使他们的对内政策简单化（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兴起），一方面又给这种政策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诱使人们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掉以轻心。

俾斯麦在1871年至1890年的对内政策，正如他的对外政策一样，可以追溯到唯一的一个指导原则，即保证帝国安全无虞，因为帝国的缔造者要比大多数德意志人能够更直接地意识到什么在威胁着帝国。他们很快就开始把他们的民族国家，这个他们整整两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视为理所当然地要取得的财产。俾斯麦知道，他一直在国内和国外向所有“帝国的敌人”进行着一场防御战。众所周知，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经常为了防御的目的而运用出人意料的、大胆的外交手腕和结盟方法。他甚至玩弄过预防性战争这样的手法，但是他一直知道这种做法是多么不可靠，与总参谋长毛奇伯爵和瓦德西伯爵不同，他从没有真正想使用它。俾斯麦处理国内政治纠纷的方法是与此相类似，这确实暴露了俾斯麦作为一个处理国内问题的政治人物的局限性。固然，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一点远远超过当时的或以后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程度，这种责任感深深扎根于他对新教的信仰；他是一个为正义的国家服务的政治家，超越于一切党派之上。但是，实际上他发现自己经常受到很大的压力，要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战斗，因而总是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称之为“国内的预防性战争”再恰当不过了。

俾斯麦当年做出了重大决定，要与中央党，也就是要与普鲁士的天主教会进行较量时，情况尤其如此。这个决定是在帝国初建，而且特别需要各个派别和解的那一年做出的。但是，俾斯麦无意卷入自由党人与天主教徒之间的那种哲理战，而“文化斗争”的主张和他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文化斗争”一词最初是鲁道夫·微耳和教授使用的，他是进步党人中最坚信这一点的国会议员之一）这位首相的目的其实是要消除这样一种危险：国内外一切天主教势力结成联盟来对付他的帝国。也就是说，害怕奥地利、法国（在那里王政复辟是有可能的）和德国的中央党及其在战术上的同盟军波兰人和教皇党之间结成联盟。对按照小德意志的原则建立帝国持有敌意，并与帝国的宿敌奥地利联合在一起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竟在国内政治中建立了中央党这样一种先头部队，这个情况使得俾斯麦非常恼火。在俾斯麦看来，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自己组成一个政党，就像居民中的工人阶层自己组成一个阶级并组织一个政党，同样具有破坏性。因此，尽管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很对立的，然而，它们还是被俾斯麦统统列为“帝国的敌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俾斯麦憎恨一切要求自治并标榜国际观点的群众组织。

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的目的，是要政教实行最彻底的分离，同样，教会与教育也要最彻底地分离，并且加强国家对教会和教士的控制。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普遍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普鲁士不同寻常的与更其严重的特征，乃是通过了咄咄逼人的立法，直至明令加以禁止和绳之以刑法。当教士们对1873年的“五月法令”，尤其是对“教士训练与授职法”进行抵抗时，主教与神父们便被起诉。1876年，普鲁士的每个主教不是进了监狱，就是离开了那个国家，许多教区都没有主教了。

俾斯麦认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无望的冲突。他曾经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他感到不再需要这种斗争的时候，同样的利益又促使他去寻求缓和这场斗争的办法。他一反过去的做法；当他在1878年至1879年间开始与民族自由党人分手，指望与欧洲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大国奥匈帝国结盟时，他设法寻求中央党作为他的同盟者而给予支持。1878年，新教皇继任，这对俾斯麦的计划是有利的。俾斯麦设法离间了教皇利奥十三世与中央党的关系，他和教皇进行了直接谈判，使冲突得以缓和。1879年，中央党对俾斯麦的财政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表示支持。但是，直到1887年，在废除了有争议的那些法令以后，冲突才正式结束；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一些重要的变革，如国家对学校实行监督以及不举行宗教仪式的世俗结婚，仍然被保留下来。争论的结局，对于俾斯麦并非不利。但是，它对于人们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以后持续了很长时期。经过这场斗争，中央党的天主教政治势力得到了承认和加强。

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也同样失败了。在发生了两次企图暗杀威廉一世皇帝的事件后（尽管这与社会民主党毫不相干），俾斯麦于1878年提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危险活动”的议案，从而挑起了这场冲突。这种做法引起了民族自由党人的严重不满，因为尽管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强硬的对手，但他们在原则上对任何“非常法”都是有顾忌的。一直到议会被解散，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在1878年的新的帝国议会中表示支持，“非常法”因而得以通过。这就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集会和出版物遭到禁止，党的工作人员被起诉并被驱逐出境。但是，选举和政治活动仍然被认可进行；尽管警察在执行法律时非常严厉，制造了不少困难，招致了人们的怨恨；然而，这些仍然不能与现

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更加严酷的镇压措施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这个反社会党人法执行了12年，使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更加坚定和纯洁了。这段镇压时期作为“英雄时代”（考茨基语）留在社会党人的记忆中。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在增长；在1890年，党员人数开始猛增，使该党后来成为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党。

如果认为俾斯麦对付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只是表明他缺乏社会责任感，那就错了。早在19世纪60年代，他就深信社会党人的要求是不容忽视的，国家有责任解决社会问题。他之所以和拉萨尔有过短暂的联系，并不仅仅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在俾斯麦看来，国家进行社会改革责无旁贷，这是和反对社会党人拒绝与国家妥协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社会政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对国家的概念，即国家是一个超越一切党派团体的“绵延不断的主体”。

俾斯麦通过三项著名保险法令，即有关疾病（1883年）、意外灾难（1884年）以及老年和残废（1889年）三项法令，提出了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他的原则是由雇主和雇员为保险事业提供款项，另由国家给予财政援助，实现集体自助；国家还应当通过法律使这种保险事业具有强制性。他发现他的自由派对手指责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而这些自由派是反对国家的一切强制手段或补贴的。这位首相接受了这个语句，并且公开承认这一点。他还预言，将来的趋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走向国家社会主义。他甚至不反对对矿山实行某种形式的国有化。但是，这些建立现代国家保险和发放养老金制度的果断步骤，与俾斯麦完全不愿为保护工人而做出任何尝试这一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愿禁止星期日劳动，不愿限制女工、童工以及全体工人的劳动时间。俾斯麦作为一个习惯于农村劳动条件的地主，他在这方面的经历，使他恪守传统；而且，他还相信，他这样做并不是在反对工人家庭本身的真正利益。

反社会党人法和国家的社会政策，都与俾斯麦在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有关。这里我们接触到在1879年起作用的各种势力广泛结合这个问题。这一年必然会被视为帝国的经济和国内政策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威廉二世时代。它的直接起因来自双重意义上的经济需要。在宪法中，有关帝国财政的规定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只是一些临时性的规定。帝国不能征收任何赋税。即便是在帝国建立的最初年代里，大部主要是来自邮电部的微少岁入也不足

以维持帝国不断扩大的行政机构；因此，帝国简直变成了“各邦的寄食者”，依靠各邦提供的钱来维持，而就连这些钱也是不够的。因此，帝国的财政进行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俾斯麦试图通过间接税和关税来增加税收。因此，他为帝国财政制订的计划，就与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贸易之争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而保护贸易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引起人们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和做法提出批评后，才在德国开始实行的。自由保守党人的领袖威廉·冯·卡尔多尔夫自己的经济利益，既在农业，又在工业；他在凯里的理论影响下，写了一本题为《反潮流》的小册子，并在1876年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促进与保护本国劳动力中央联盟”。卡尔多尔夫对于俾斯麦有决定性的影响；俾斯麦在1878年决心仿效英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其他工业国的榜样，放弃自由贸易，实行相当高的关税。由于不仅钢铁工业，而且农业也第一次提出要求实行保护关税，这就使俾斯麦的决心更大了；农业由于生产成本相对地高，因此不能够再与美国和俄国的低价格竞争。这是特别不幸的，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变成了谷物的进口国，而在那以前，东部各省的经济是建立在农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的。由于谷物出口继续下降，土地所有者急切地希望国内价格能够得到保障。在1878年至1879年间，谷物种植业和炼铁工业在“保护本国劳动力”的口号下结成了经济联盟。有人提出异议说，消费者由于实行保护性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而受到损失；对此，俾斯麦争辩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帮助，企业才能够得到恢复，从而再一次为劳动就业和提高购买力打下基础。他进一步表示希望，当帝国有了自己的足够应付需要的岁入，而各邦因此有可能停止或减少对帝国提供款项时，各邦就能够降低自己的直接税。

俾斯麦为了实行他的关税和财政改革，巧妙地进步了长期的准备。他首先取得财政大臣的支持，然后取得联邦议会的支持，最后取得了帝国议会的支持；而在帝国议会中，到了1878年年末，主张保护贸易的议员们所组织的“民族经济联盟”，几乎影响到每一个政党。中央党被争取过来了。虽然民族自由党人在这个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问题上分裂了，但他们大多数人仍然站在俾斯麦的一边，尽管他们信守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使俾斯麦得到了有保证的多数，而这个多数经过1879年夏季在关税问题上的辩论和由此而引起的分裂中，一直保持不变。但是，他对中央党的依赖，确实也危及了他的主要目标，即关税问题应当和财政问题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中央党提出的一

项动议被通过了，根据这项动议，每年必须将帝国全部岁收超过1.3亿马克以外的部分转交给某些邦，而这些邦必须根据情况需要向帝国提供款项。这样，与俾斯麦的意图相反，财政上的联邦主义保存下来了，而议会对一大部分帝国岁入的控制权也保存下来了。因此，俾斯麦只获得了一半胜利。帝国的财政体制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支出日益增加，对各邦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大，帝国的债台也就越筑越高。

1879年以后，与影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总的趋势相一致，德国的农业仍然依赖于对价格实行保障；而在工业方面则组织了卡特尔，以便保护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时，各种同业公会的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公会以及易北河以东的土地所有者的公会，这两者的利益在1879年汇合到一起了，尽管后来二者又经常发生冲突。

虽然俾斯麦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出自他的经济目的，但这个政策在国内政治和党派政治方面的后果，对他同样是重要的。他在争取中央党方面获得了一半的成功；民族自由党人的队伍被他分裂后，失去了权威性的影响；他把这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此外，他的政策导致最终摒弃议会制政府，这个问题在1877年曾经又成了俾斯麦和卞尼格先谈判的课题。俾斯麦对议会和议员们的厌恶（他并不隐讳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879年；在1881年至1884年这段时期帝国议会开会时，多数议员都反对他，他屡次被难以驾驭的帝国议会所挫败。在这种情绪下，他甚至（尽管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到修改宪法，实行集体代议制。

总的说来，19世纪80年代比70年代更加是俾斯麦遭到敌视和面临日益加剧的摩擦的年代。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帝国议会分裂为许多党派，不能形成可靠的多数。俾斯麦所想保持的欧洲平衡不断受到威胁。其他极为重要的因素是，由于这位首相个人所决定的政策常常遭受挫折而造成权力的损失，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各代人之间的倾轧。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俾斯麦那经常受到严酷考验，而他自己又使之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他脾气粗暴，刚愎自用，生性多疑，从而折磨着自己以及所有和他打交道的人。他行动的基础是决心不依靠任何人。他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以致无法与之建立亲密的友谊。他想一手扭转乾坤，然而他却完全明白，一个舵手处在这样的风浪之中，他的能力毕竟有限——他有时也使用这个比喻，比如他的一句座右铭就是“要战

胜风浪，不要被它所制伏”。随着紧张局面的持续，俾斯麦不止一次不由自主地采取了一些妨碍自己目标的措施。这些情况不仅包括他缺乏自知之明，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利益，实际是既不尊重权利，又不重视正义，而且也包括他在政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俾斯麦的殖民地政策是适宜的。德国在很短时期内不声不响地取得了它的殖民地。这个时期的出现，其间接原因是1879年在商业政策方面出现了转折点。1882年，德意志殖民协会成立；1884年，成立了德国殖民地协会；到了1884年至1885年，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攫取殖民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完成。这些要归功于几个有进取心的商人和柏林贴现公司的银行家们。他们的活动是以迅速在中产阶级中间传播开的殖民宣传为背景的。帝国政府只不过是在私人采取的最初活动之后继续加以发展而已。起初，俾斯麦表现冷淡，因为他想避免使他的欧洲帝国卷入任何国际纠葛中去。其后，他设法使帝国仅限于对拥有殖民领地的贸易公司履行保护的职责。但是，这种保留态度是与当时开拓殖民地的总趋势背道而驰的，而在这种总趋势下，德国感到，尽管自己是个后来者，也是有权分得一份的。于是，俾斯麦顺应潮流，终于在实际上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这样做了，以便他有可能利用民族团结的口号，使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困难地位有所稳固。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建立殖民地的途径，为德国制定一项帝国主义的国际政策。他害怕殖民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在一起，而从19世纪90年代起，这实际上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甚至关于在东部各省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杂居地区建立德意志农民居住点来开展“国内殖民”的想法——这是一个符合民族自由党的路线的想法——也是别人向他提出，他只是勉强地加以接受的。因为他仍然坚持以前的看法，即尽管波兰贵族与其同盟者波兰教士是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敌人，然而波兰居民，尤其是波兰农民，始终表现他们是忠诚的臣民，正如不久前，他们在1864年至1871年间的战争中作为士兵所表明的那样。他屈服于1894年以后由于“德意志东进协会”的成立而加强的德意志化趋势，又一次接受了他原先反对的一个群众性的民族运动。这时，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都被卷入了这个运动。自从“文化斗争”以来，曾经围绕着语言和教育问题（波兰人被禁止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展开了一场艰巨的斗争；1886年以后，由于普鲁士“殖民委员会”的成立，又展开了争夺土地的斗争。波兰人以

其村社式的合作制度来与德意志的国家援助相抗衡，而且，他们通过积极购买土地并向那里移民的办法，成功地坚持了斗争，直到帝国的终结。

在威廉一世统治的末期，俾斯麦通过1887年的所谓“七年选举制”，赢得了国内政策方面的另一个巨大胜利。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再一次以典型的俾斯麦方式密切交织在一起。实际而直接的起因是军事问题。由于1885年至1886年的保加利亚危机，又鉴于法国在其陆军部长布朗热的领导下复仇精神加剧了，俾斯麦对德国的武装力量的建设落后于法国感到不安。法国在这方面的开支远远超过德国，其征兵制度也远比德国严格，结果是，尽管法国人口数目小得多，法国1886年的平时兵力却超过了德国。于是，俾斯麦不得不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陆军增加10%；正如过去的军事议案一样，这项议案也实行“七年制”，以7年为期。这件事本身是十分重大的，但是，俾斯麦的主要动机却是出于在对内政策方面的策略考虑，以对付帝国议会。帝国议会否决了“七年为期”，尽管没有连增加陆军的兵力的要求也一起否决，而这正是俾斯麦所需要的。这给他提供了解散帝国议会的有力借口，也提供了在新选举中提出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三个右翼政党，即联合起来组成“政党联盟”的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动员了大部分原先不参加投票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赢得了397个议席中的绝对多数，即220席。这使俾斯麦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好景不长，因为政党联盟在1890年就解体了。

王位继承方面同时发生的两次变化，在1888年为俾斯麦和帝国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位首相失去了威廉一世这位君主，而他可以说是这位君主忠心耿耿的臣下，虽然在关键时刻俾斯麦总是强使自己的意志占上风。他担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及其热心于政治的皇后维多利亚（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俾斯麦的死对头），会通过一种“格莱斯顿内阁”进行统治，而这个“内阁”在巴登人冯·罗根巴赫男爵的领导下，对外会过于亲英，对内会过于自由。但是，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就在3个月后去世了。他的29岁的儿子威廉二世皇帝的态度一直是尖锐反对其双亲的。尽管他头脑灵活，兴趣广泛，但他性格的危险的一面立刻就表现出来了；他情绪不稳，喜欢阿谀奉承，倾向专制君主的“亲政”，而

且，过于重视军事方面的事务并使军队的情调在社会上风行起来，这正反映了他在波茨坦近卫军团所受过的训练。

这位乐观的年轻君主，胸怀大志，渴望自己独立行事。他对一贯独断专行的老首相不能容忍。这是1890年3月20日俾斯麦被罢官的根本原因。宫廷牧师、基督教社会党反犹太主义运动的领袖施特克尔，以及与俾斯麦相反、致力于同俄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总参谋长瓦德西伯爵，是参与反对他的阴谋的主要人物。1889年鲁尔矿工大罢工以后，1890年年初就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以及就有关“反社会党人法”的争论上发生了冲突。皇帝希望社会政策以保护工人的措施为基础；俾斯麦希望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而威廉二世则希望废除这个法令，以便实现和解。帝国议会否决了延长这个法令，3个右翼政党的政党联盟解体。在帝国议会解散后，于2月间举行的新选举中，俾斯麦明显地失败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自由党人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一事实在皇帝与首相之间的争吵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俾斯麦决心抗拒帝国议会。这就是说，他当时显然倾向于再次解散议会，而且，如有必要，他将毫不畏缩地改变选举制度并实施新宪法。这种极端的行动方针，和威廉二世当时的见解迥然不同；因此，俾斯麦便在激烈而又带挑衅性的争论中提出辞呈，而皇帝也就以宽慰的心情接受了辞呈。

众所周知，俾斯麦的去职，在某些方面标志着对外政策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俄国谋求延长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遭到了拒绝；特别是，被枢密顾问官霍尔施坦斥责为太难捉摸的俾斯麦的诡计多端的外交政策，彻底被一种“简化”政策所代替。而在国内事务中，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曾经制定了帝国宪法的人物的离去，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俾斯麦的断任者们，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才干；这些人中，谁也不能填补他根据宪法日理万机的地位。首相的“职责”和那位实际才能远不足以“亲政”的皇帝所要求的专制之间的关系，仍然无法确定。帝国议会的重要性增加了。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一方面是首相的政治领导，一方面是相当独立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领导，二者完全脱节的情况，比过去更加严重了。现在只有通过皇帝本人，才能使它们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极不完善的。

在事后判断是非，人们会说把俾斯麦撤职是对的，因为不只社会改革，就连宪政改革也给耽误了，而人们寄予重望的“社会皇帝”威

廉二世，本来是有可能实现这些改革的。考虑到潜在的宪政危机，难道除了俾斯麦所设想的反议会的政变以外，就没有别的途径可循，即修改宪法，实行民主的议会控制吗？在当时的政党制度下，这样做肯定要冒政治风险；但是，这将比任何反民主的做法，更能适应时代的潮流。结果，威廉二世避免在宪政方面做出任何决定。社会改革是半心半意的；在宪政方针方面，根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俾斯麦解职后没有几年，威廉二世自己也考虑要发动政变了；1894年9月6日，他在柯尼斯堡的一次演说中，发出了一个夸夸其谈而不合时宜的号召：

“为了宗教，为了道义与巩固的秩序，反对那些存坏性的政党。”——在这里，“政党”一词用的是复数，表明所指帝国的敌人不仅是社会民主党。于是，对“新政”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无论如何，这是继俾斯麦而能胜任帝国首相的、旧普鲁士忠心耿耿的典范冯·卡普里维的力量所做不到的。皇帝及其臣属对像社会学家马克斯·维贝尔这样的批评者，根本不予理会。1895年，维贝尔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主张建立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并且对国内政策做了严峻的、悲观的预测。弗里德里希·瑙曼那本有着政纲一样书名的著作《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尊严》虽然曾轰动一时，却没有被认真看待。尽管皇帝对现代技术、航海和文化艺术运动不抱成见，但是，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看法是与现实隔绝的，就像被关在封建宫廷里，对他自己的人民中间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状况无动于衷。

冯·卡普里维1894年下台后，一位巴伐利亚贵族、自由派天主教徒、已无领导能力的老人克洛德维希·冯·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亲王当了6年的帝国首相。虽然霍亨洛埃没有对此做出什么贡献，但这几年却决定了威廉二世的德国将要走的道路。经济繁荣已经蓬勃地开始，而且开始产生效果。皇帝打算首先解决海军问题，以便使德国的地位适应于新的情况。德国的对外贸易已经仅次于英国而居欧洲第三位，但德国的海军却远远落后于英国，也落后于法国、俄国和意大利。这时，德国虽然为时已晚，但还是投身于“新海军主义”的总潮流中去了。鉴于对外贸易日益发展并且新近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取得了殖民的立足点，德国的海上利益已不容忽视，那么，现在还要像当年俾斯麦那样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了。对外贸易、海上力量以及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指导着皇帝的全部治国之道，而他最殷切的愿望，莫过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在这方面，他有意识地抛弃了俾斯麦的建立一个“心满意足”的帝国的欧洲

政策。如果我们正确地考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就不能把威廉二世的决策说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傲慢表现，这是按当时一般采取的方式承认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工业国的迫切需要。德国不得不超越俾斯麦的尺度。但问题是，要在新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新的尺度，并且控制由于德国在陆上和海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特别是涉及英国的）。威廉二世这一代人，由于政治上受到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这类历史学家关于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并推行积极的国际政策的主张的熏陶，容易乐观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却对德国政治的这一根本问题估计不足。

最初，在国内贯彻这种海军政策很困难，经常被批评为“亲英”的外交部进行了阻挠。帝国首相则只听从皇帝的意旨。保守党人的利益主要在于土地方面，因此对此表示淡漠与怀疑。欧根·李希特尔的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然反对庞大的海军计划所带来的负担。因此，1897年春，在帝国议会进行有关海军问题的辩论时，皇帝的目标未能达到。威廉二世曾考虑发动政变。但他没有采取这个值得怀疑的步骤，而是试图通过更换大臣的办法实现他的目标。他任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为海军大臣，并于1897年任命冯·比洛伯爵（后为亲王）为外交大臣。后来，比洛在1900年又担任了帝国首相。

在任命提尔皮茨以后，海军政策进展得很快，并且总是成为国内政治中激烈争论的根源。各有关工业部门支持海军协会，这个组织变得极为活跃，它鼓舞了右翼，却激怒了左翼。它常常提出一些要求，其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提尔皮茨或比洛所欢迎的程度。这个组织由于成员众多，已增长到五十多万人，因而成了政治“压力集团”中最有效的一个，这些“压力集团”在中产阶级中是与无产阶级组织，即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旗鼓相当的力量。通过这些团体，就可以了解右翼中产阶级的政治组织。除了海军协会以外，还有德意志殖民协会、帝国反社会民主联盟、德意志东进协会和国防协会。国防协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才成立，它不仅谋求扩大陆军，而实际上也谋求根据国家民主的原则改革陆军；因为陆军通过其领导人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冷淡态度，而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它比海军落后了。人们在谈论“全民武装”的问题，它的任务是进行一场“生存还是毁灭”^[3]的斗争，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为自己的生存和民族的荣誉而战。对于深受旧普鲁士传统熏陶的高级军官来说，甚至对于从1891年至1905年

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冯·史里芬将军这样一个“十足的军人”来说，这种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令人生疑的。“泛德意志联盟”虽然成员较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没有超过两万多人），却是这些组织中最极端的一个。他信口开河地提出实现全面的民族主义的要求，再加上不仅是德国才有的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的成分；这样，“泛德意志联盟”就已经在明显地滋长着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特色的形形色色“大众”思想的大杂烩。通过帝国议会的右翼议员，在较小程度上通过大学教授，以及通过商业和官僚机构内部错综的关系，泛德意志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洛，尤其是他的继任者贝特曼-霍尔威克领导下的帝国政府（1909—1917年），虽看出了泛德意志联盟的宣传鼓动是一种动荡的因素，但却无法避免它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涉及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德国1914年以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引向战争和鼓励发展战争目标的势力所驱使。德国官方对外政策的某些特点清楚地表明，德国在坚决实行调整使自己适应所谓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新形势方面，并没有成功；在这方面，皇帝时而表现出来的荒唐行径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尽管商业扩大了，扩建海军的政策实行了，并且举办了诸如修建巴格达铁路这样一些事业，但是并没有形成改变现状的真正意向，更谈不上用强力来打破这种现状了。官方政策还是认为帝国所要达到的是俾斯麦所说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程度。为驱使德国超越这个限度提供推动力和危险性爆炸物的，不是政府或陆军的领导，而是一个全国性的中产阶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理想主义与顺利发展着的商业野心相结合，产生了一种被夸大了的民族意识与意志力；而且，就像突然树立了雄心壮志、“觉悟起来”的民族那样，这种意志是如此强烈，以致有使人们丧失原则性和分寸感的危险。这种民族冲动的浪潮，甚至波及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政党，尽管这种浪潮往往受到它们的抵制，有时也受到旧普鲁士的保守派的坚决抵制。

因此，1906年，在国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在某些方面与1887年的“政党联盟”选举颇为相似的局面。帝国首相冯·比洛到那时为止虽相当巧妙地对付了各个党派，但没有对付各党派的任何真正的全面计划。在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为在德属西南非洲进行殖民战争而追加预算以后，他于1906年底解散了帝国议会，并且针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他的选举口号，“保守党精神与自由党精神相结

合”。欧根·李希特尔死后，甚至左翼自由党人也与保守党和自由党“集团”站到了一起，于是，这个“集团”在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一半的席位。帝国议会中终于出现了与某种联合政府相类似的各种力量的联合。

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暴露出帝国议会这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宪法所赋予它的作用。事情是由1908年10月20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德皇在英国”，引用了威廉二世对英国人斯图尔特·沃尔特利上校所发表的谈话。皇帝对英国表示了友好态度，但他在这样做时不注意策略地重提布尔战争的往事。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德国比在英国更为严重。皇帝曾对发表的文章感到满意，但是他曾把这篇文章送交比洛审阅，因此把责任推到了比洛身上。比洛没有阅读文章就把它转给外交部去研究处理，经过稍加修改后，便在德国发表了，而这时他自己仍然没有读过原文。在这个问题上，正在海滨度假并专心注意于刚刚爆发的波斯尼亚危机的首相，太草率从事了。他应当负全部责任，因为他负责辅助皇帝指导对外政策。但是，事情刚刚过了几天，舆论对威廉二世本人和他滥用“亲政”的批评，大大超过了对首相的批评。而比洛虽然知道责任在于自己，但他在帝国议会上进行解释时，却尽量把自己与威廉二世分开。他的主要目的是摆脱自己与此事的干系，以便保持清白。他答应务必要使皇帝“在将来，即便是在私下谈话中，也要审慎从事，而为了政策的统一和君主的权威，这种审慎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威廉签署了一项保证，重申宪法为自己所规定的职责，并向比洛保证完全信任他。这位皇帝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甚至打算退位。

在直到1914年为止的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每日电讯报》事件”几乎与具有决定意义的1897年一样，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皇帝的自信心破产了，他放弃了“亲政”的倾向。帝国议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帝国首相看来很轻松地过了关。但是，如果说他屡次都表现得很狡猾，他在道德上也是心胸狭隘的；而且，尽管他们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他还是失去了君主的信任。1909年夏，帝国议会否决了帝国第一个直接税，即遗产税的议案后，他被撤职。保守党、中央党及一些较小的党派都投票反对这个议案。这几乎开了议会搞垮首相的先例。

“《每日电讯报》事件”和比洛的去职，标志着开始朝着实现帝国宪法所规定的议会权威的方面演变。这种演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直到1917—1918年，在战争的压力下，这种演变才最后完成。

比洛的继任者是国务大臣兼普鲁士内政大臣冯·贝特曼-霍尔威克。他是个杰出的、兴趣极为广泛的行政官员。他对德国的对外和对内问题的洞察力，要比当时“官僚界”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更加深刻。但是他太缺乏信心，没有足够的魄力，因而无论在战前的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局势中，或是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都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对立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德意志帝国虽然表面上显赫一时，而且日益繁荣，但是也有许多国内问题尚未解决，它就是带着这些走向了世界大战——这是帝国政府既没有打算，也没有准备进行的一场战争；但是，许多德国人却有着当时欧洲人所普遍持有的想法，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赵书汉 译）

[1] 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在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文名称，普奥战争中，普军在该地附近的萨多瓦击败奥军，亦称萨多瓦战役。——译者

[2] 文化斗争原是俾斯麦为打击天主教会和中央党而实行的措施，但最后遭到失败。1874年选举中，该派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反而由原来的63席增加到91席。此后俾斯麦与中央党妥协，合力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3] 这句话引自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译者

第十一章 法兰西共和国

在1871年，法国人对于自1789年以来的3/4世纪这个多事之秋记忆犹新。如果不首先了解这一点，那么，对以下的章节也就无法理解。

[\[1\]](#)农民依然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他们接受新思想十分缓慢。他们仍然担心贵族和僧侣的统治会卷土重来，将封建的苛捐杂税重新加在他们头上；反之，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权开始有了强烈的意识，尤其是从1848年以来，很容易引起他们对“赤色分子”或“共享派”（重新分配派）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他们所说的“共享派”，就是指的政治上比较先进的城市居民；这些城市居民会来夺走他们的土地，至少要夺走他们藏在出名的羊毛袜子里的积蓄。无疑地，土地贵族（在某些地区仍然是很有势力的）和上层中产阶级，既不梦想去再次反对1789年颁布的各项自由，甚至也不打算再去触犯拿破仑法典规定的公民平等；但是，他们一想到1793—1794年的恐怖时期，出现七月王朝的那次起义，1848年的二月革命以及1848年6月的起义，就不免心有余悸。因此，他们不愿对新思想和新的阶层的普遍要求，采取任何妥协的态度，因为他们从中只能看到纯属破坏性的力量。至于坚定的共和派（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以及许多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理想是1793年：共和元年宪法。这部宪法不仅提出了一种非常自由、非常民主、地方享有充分权力的制度；还提出了国民公会和各个委员会享有最高权力；换言之，即一个其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全权议会。因此，他们在每件事情上都以1793年作为先例和榜样。

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对于一个重工业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的直接影响并不很大；可是，它在感情上激起的反应确实相当大。工人们并没有原谅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在内，因为资产阶级镇压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而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事件，把原有的对立情绪推向了顶峰，这就是巴黎公社。

对于最后发生的这段插曲，人们现在还在激烈地辩论着。本文不打算对对立的观点评断是非，但不妨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简短的回顾。巴黎被围一段时间以后刚刚向德国人投降；被围期间，巴黎的居民身

心方面受到严重的摧残；法国其他各地，正像下面即将叙述到的，刚刚选出了一个以保皇党人为多数的国民议会。经过一些偶发事件后（说来话长，这里无法概述），于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一场人民起义；梯也尔政府退到凡尔赛，放弃了巴黎并把它交给了起义者。首都在两个月中由它所选出的议会掌握。这个议会自称为“公社”。在这个人民运动中，受到挫伤的爱国主义，共和派对受到威胁的那种理想的渴望，一向惯于对各省发号施令的首都，现在却面临各省要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它这一局面而感到的愤怒，最后还有各贫困阶级的悲惨生活，所有这些因素，其重要性究竟孰重孰轻，这就很难确定了。社会主义者（这样称呼很恰当）在公社里起着显著的作用，可是他们只是少数。然而，可以断言，当梯也尔指挥的军队重新攻占巴黎的时候，抵抗最顽强的巴黎东部的工人区。重新攻占巴黎——1871年的“五月流血周”——具有极其残酷的性质，致使这两个敌手长期怀恨在心。秩序的维护者们——凡尔赛分子——长久地谴责公社处死了人质，焚毁了巴黎市中心的许多纪念物，他们把所有主张公社改革的人都贴上“公社社员”的标签。在工人这一边，他们则不能宽恕资产阶级采取的处死和大批流放的做法。社会主义者后来每年都照例要到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牺牲的地方拉雪兹神父墓地去朝拜。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俾斯麦虽然和1870年9月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开始谈判，但是，他只想和一个法国将来无法否认的有代表性的、没有争议的政府缔结和约。因此，在一个大部分领土被敌人占领的国家中，必须赶快进行选举。选举于1871年2月8日举行。当选的有共和党人150名，自由党人80名，保皇党人400名，波拿巴主义者20名。既然选出的数字情况如此，这又如何能在几年内建立起一个共和国呢？对这个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事实，现在有必要加以解释。

首先，选举主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进行斗争。共和派最出名的领袖甘必大，是奋战到底的一派的化身。共和派当选名单上的那些人，经常利用他的名字和他的各种主张。另一方面，保守派则宣称自己是主和派，并利用梯也尔的威望作为庇护。绝大多数选举人，首先是农村中的选举人，深信战争已经输定了，因此，首先需要的是和平。不仅如此，当时几乎任何地方都没有时间或机会来进行一次真正的竞选运动。公民们只能选举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候选人，也就是当地

知名人士中那些没有因为替第二帝国效劳而信誉扫地的人物；换言之，选出的大多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律师，而这些人通常是保守派。但是，法兰克福和约一经签订，恢复君主制的问题便又提出来了，农民们开始担心这种试验将会使“旧制度”卷土重来。从此以后，在补缺选举时，通常是共和派人取胜。

在国民议会内部，占多数的保皇派主要是由自由保守分子组成（50名至80名极右议员除外）。他们不但不攻击革命的社会成就，而且还真诚地赞成代议制，自然也就向往议会政府。但是，正统主义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是一个“旧制度”的人物。他要求拥有权力，是根据他那君权神授说，而不是根据享有主权的人民的委派。事实上，他本来也许是想不理睬革命以后的社会所建立的新体制，但不接受那个社会的原则，而在当时的法国这些原则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他竟然希望把亨利四世的白旗拿来作为国旗，以代替革命的三色旗。这就是这种冲突的象征。1871年7月和1873年10—11月，国民议会不得不两次放弃将他推上王位的企图，因为从他那里得不到对时代精神做出的必要的让步。保皇的多数派不得不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因为尚博尔伯爵一死，他的权力和王位要求就要转到奥尔良家族的代表、路易·菲利浦的继承人，因而也就是革命的继承人巴黎伯爵的手中。因此，国民议会将麦克马洪元帅的任期定为7年（他是一个保皇派军官，于1873年5月代替梯也尔担任总统），并且着手制定一部到时候能够适用于君主制的宪法。

但是，国民议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它正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而且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因此它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要打击颠覆性的理论。正如国民议会的一位最有权威的代表巴特比向议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所说的：“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里，存在着一支制造动乱的队伍，它比其他国家的这样的队伍人数更多，力量更强。……1848年，这支队伍的士兵自称为社会主义者；1871年，自称为‘公社社员’，今天，则通常被人称为激进派，这个名字在最近这些日子里，被人用来表示旨在导致我们毁灭的那个联盟。”梯也尔所以落选并由麦克马洪取代，正是由于他拒绝一致向“激进主义”作斗争。从1873年5月到1874年5月，布洛利公爵以麦克马洪的名义主持“道德秩序内阁”。这个名称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它所要捍卫的不仅是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有它认为受到威胁的一整套复杂的宗教、社会和家庭

的准则。但是，政府在与反对派共和派进行斗争中，除了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官僚主义的应急手段之外，拿不出任何现成的办法。它没有向全国提出最需要的东西：一条摆脱临时政府的道路。它只是使天主教和政治上、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比以往更加完全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保守的多数派中潜在的分裂更为加深。

正是由于这些分裂，1875年的宪法条文才最后确定了一种为共和派所易于接受的制度。奥尔良党人的领袖布洛利公爵曾设想成立一个相当于英国上议院或法国贵族院的大参议院，以保障保守派的利益。大参议院的成员有些是凭本人的地位，其他则由总统任命。大参议院将起着与普选产生的，谁也不会想要取消的众议院相互平衡的作用。可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参议院仅仅成了省议会和市议会所派出的人员组成的机构。但它在权力和地位上仍然与众议院不相上下，另外还设立了共和国总统。共和国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一变而成为国王，而且，他的权力远远超过当时英国的君主。共和国总统拥有提出法律的创议权；如果他对一项措施不满意，他有权强制两院中的任何一院重新审议；他可以根据参议院的建议解散众议院。他遴选各部部长。这些部长固然要对两院负责，但是他们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对两院负责，则不明确；没有规定设总理一职。总地说来，不妨推测，1875年宪法本来是能够发展成为美国式的总统制的，而且，还要注意到，梯也尔于1871年至1873年掌权期间，即已朝着这种制度演变。

但是，事态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1876年3月，在保守派处于混乱时选出的众议院中，共和派是多数；麦克马洪总统和参议院依然是保守的。在这种状况下，部长们的工作逐渐变得无法进行了；1877年5月16日，麦克马洪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并根据参议院的建议解散众议院，诉诸国民公断。“五月十六日事件”并不像人们在斗争白热化时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政变：总统并没有越出宪法所赋予权力的范围。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行动看起来像是对普选权的蔑视。尽管政府方面施加压力，普选的结果，共和派仍占多数。麦克马洪在接见为新选的众议院所能接受的内阁时，不得不在致辞中宣称：“1875年的宪法确定了各部部长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责任，同时也就确定了我的不承担责任的地位，这样就是创立了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真正确立了议会制度的，正是这个解释性的文件。

1879年1月，参议院进行部分改选，共和派成为多数，于是麦克马洪辞职，由共和党人朱尔·格雷维接替总统职务。从此以后，充满信心的共和派，即“天生的共和派”，便成为共和国的主宰。他们毫不迟疑地确定自己最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使国家权力“世俗化”。当时法国的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天主教的手里，除非记住这一点，否则不易懂得“世俗化”这个概念。必须记得，罗马教会是等级森严的组织，它以权力的原则为基础，以坚持万事不变的教条为己任。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颁布了《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列数被教会谴责的谬论条目。许多人把这些条目的颁布解释为天主教向现代思想、科学精神、民主自由、人民主权的原则等宣战。这种解释是否真有条理，可以讨论；但是绝大多数的共和派都有这种看法，因此，他们就把天主教看作天然的敌人。不仅如此，这些共和派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是渴望建立一个以科学代替宗教信仰的新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使教育摆脱教会的控制。

法国的初等教育是归村镇负责的；而且，这种教育往往是由宗教“修会”的成员，即修士和修女进行的。至于男孩子的中等教育，拿破仑一世已经创办了公立中等学校，与这种公立学校并存的，还有由耶稣会等团体经办的教会中学；可是，需要接受初等以上教育的女孩子，则是在女修道院中长大的。只有高等教育才完全是由国家任命的教师负责的。起初，曾经打算禁止未经批准的修会的成员任教；后来，由于这项措施遭到参议院的反对，于是，这些人员索性被赶走，其中主要是耶稣会士。女孩子的中等教育，开始时与男孩子类似，采取公立中等学校形式。最后，于1882年宣布，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世俗的”，就是说，不但要不受教会的控制，而且要摆脱所有的宗教思想；宗教教育可以由教派的教长进行，但是，必须是在教学时间以外，而且，与其他教学毫不相干。这些改革方案中绝大多数虽以朱尔·费里的名字命名，但是，他在把这些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时，得到许多热心的合作者的支持，得到几乎所有共和派的赞助。而且，有关学校的法律也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才提出来的。使初等教育摆脱教会的束缚并成为义务教育，被看成是能使法国人与“普鲁士人”相抗衡的爱国行动（据说，普鲁士所以能战胜法国，应归功于普鲁士的小学教师）。人们也认为，法国正在实现一场保证使所有公民机会均等的极好的社会改革。然而，教育“世俗化的”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也许还在于它们的政治后果。这些法律加深了“两个法国”

之间的鸿沟，从此以后，在许多农村里，共和党居然被说成是与“僧侣党”相对立的“小学教师党”。因此，新的初等教育在决定第三共和国的思想和政治阵营的划分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慷慨地给予基本自由：出版自由（今后如依然违反这类规章，将要受到法庭的审讯）和集会自由。仅仅结社自由这一项，虽然实际上是被承认了，但在法律上还未被认可，因为这要牵涉到如何对待“修会”的问题。还通过了一项法律，授予市、镇议会以任命市、镇长的权力，不过中央政府保有监督权。

但是，即便是在这项重大工作正在进行期间，共和派中间也出现了深刻的分裂，这个分裂一直到19世纪末都在支配着政治生活：“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各色各样的领袖担任公职直到1885年）遭到“激进派”的反对。起初，这只是一种策略上的矛盾。共和派的许多人考虑到共和国为了巩固自身已经有许多困难必须去克服，因而认为不应该再去触动那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表示支持哪一派的舆论，特别是在农村中。他们的准则是：“凡是全国大多数人所不能立即接受的事，均不得纳入共和派的纲领。”激进派或称“不妥协派”则针锋相对地回敬道：“必须要求彻底实施共和主义的学说，除非有证据说明全国人民不需要它，否则，纲领中的任何一点均不得放弃。”

这种策略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相一致的。激进派是一些喜欢谈论原则的人，往往爱感情用事，他们是“1848年的共和派”的继承人（他们的第一个议会党团正是由“1848年的共和派”成员之一路易·勃朗所建立的）；他们从老激进派中间和从那些本能地会走向极端的年轻人中吸收新的力量。机会主义者往往属于介于中间的一代，这一代是在充分利用当时所剩无几的各种半自由而与第二帝国进行斗争中形成的。这是比较积极、比较现实的一代，更着眼于当前，而不是生活在对1793年的回忆中。这两派人首先在气质和习性上有所不同。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实行统治，就是治理国家，处理出现的问题：他们是经验主义者。而激进主义者认为，统治就是改革。二者都是反教权和相信科学的，但激进派通常希望科学能给人类社会提供一些法则，就像支配宇宙的法则一样；而机会主义者则借鉴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从中获得“实验政治学”的方法。当然，由于个人情况不同，问题弄得比较复杂起来。机会主义者伟大的先驱莱昂·甘必大直到1877年5月16日为止一贯是激进派的领袖；他那

敏捷的地中海人的才智，热情洋溢的口才，以及他所具有的法国人称之为“国家意识”的深厚天赋，使他擅长于用最极端的共和主义的言辞来掩饰最温和的、最实际的主张。也许，只有他才能够为共和党人打开一条从过去的反对派转为今天的执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捷径；但是，正是他的这种性格的力量，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指责他是：“专制主义。”他于1882年12月过早地去世。他在政治上的继承人朱尔·费里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是法国东部人，为人冷漠、沉默寡言，往往粗鲁无礼，他的错误在于把一些本应说得含糊其词的问题，说得太明确了。例如，有一次他在谴责激进派的骚乱和越轨行为时，他说的一句话立刻被人理解为是说“危险在于左翼”。这在当时是许多共和派所难以想象的，几乎是荒谬到了极点。此外还必须提到，克列孟梭这位被人多少有些夸张地称为“倒阁专家”的激进派首领，他的鲁莽急躁，以至整个性格，也无助于息事宁人。

对甘必大独断专行的攻击和对费里表现出的厌恶情绪，基本上是许多人对于那些已经放弃了大部分共和派原有纲领的人的一种蔑视的表示，而甘必大本人正是靠着这个纲领于1869年在贝尔维尔（巴黎的一个地区，相当于伦敦的怀特查佩尔^[2]）当选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机会主义者虽然实行了许多意义深远的改革，但他们却失去了其他许多东西。

许多共和派认为，政权一经到手，就必须废除1875年的君主主义的宪法，以及自第一帝国以来几乎原封未动的政治体制。贝尔维尔纲领甚至还包括这样一个建议，所有公职人员应由选举产生。极端共和派分子的敌对情绪，首先是针对参议院、各省省长和国务会议。但是，机会主义者1884年只是对宪法做了非常有限的修改，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了这部宪法的坚定的捍卫者了；特别是他们认为参议院是一个有用的机构，可以对众议院一时欠考虑的冲动行为起制约作用，可以忠实地反映一些农村选民的意志。这些农村选民是他们特别害怕惊动的，他们担心这些人会对共和国疏远。在共和派看来，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只要他们一旦加以掌握，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如果他们废除了这个制度，他们就会使得君主主义者再次在一系列的部门中自由行事，特别是“世俗的”法律也就无法在这些部门中实施。选举法官，这是他们在这一方面曾经严肃考虑到的唯一措施，最后也于1882

年7月放弃了。这样，一个与最热情的共和派所梦寐以求的大不相同的政权，一点一点地巩固起来。

机会主义者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繁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时乖运蹇，恰恰就在他们执政期间，法国经济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情况最糟、时间最长的危机。这次危机虽与1873年至1896年间涉及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那次经济萧条相联系，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举个例子来说，1873年国际性的金融崩溃对于法国的经济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在法国，第二帝国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882年。但是，1882年带来的不仅是一系列的困难年头；停滞，有许多地区甚至是倒退，开始出现，至少一直延续到1895年。和其他的主要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利的条件；有人会说法国直到最近几年才把它克服。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在工业大国中，1895年的出口额低于1875年和1883年的，只有法国一个国家。

造成这次危机的头一个原因是农业。无疑地，作为法国的主要经济活动的农业，由于新的农业生产国家，特别是产麦国的竞争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小麦价格在1871年到1895年间降低了一半。与此同时，法国的另一主要作物葡萄，遭受到一场真正的灾难，葡萄的侵袭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地区。结果，破产的农民自然就少买工业产品了。

但是，法国的工业还受到其他方面的打击。法国工业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的声誉和繁荣，本来是从生产优质奢侈商品而来的。在许多情况下，它胜过竞争对手的主要优势，在于工人们（主要是手工艺工人）生产时的“诀窍”和典雅风格。这类工业部门，尤其是出口工业，它们的销售对象是贵族阶层的顾客。但是，当19世纪接近尾声时，世界正日益走向民主化；奢侈品的销路每况愈下，在萧条的年代里更是如此。质量高、价格昂贵的商品让位于价格比较低廉、质量比较一般而且做工不大精巧并可逐渐用机器来生产的那些商品。这类质量一般的消费品，正是那些新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中欧的工业化国家所着手生产的。纯丝和纯毛织品是法国工业的骄傲，现在遇到丝毛、毛棉、棉丝等混纺品的竞争。制革工业不再用坚硬的皮革而采用质地柔软的皮革。此外，美洲饲养牛群的大国，也已开始自己制革。而法国很难适应这种发展情况。这是由于它的传统，由于它的手工艺所特有的高质量（因而在一定情况下较高的工资）的缘故，许多

法国制造商认为，追随这些他们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俗不可耐的时尚，无疑是堕落。

但是，首先法国的设备简陋，要实现机械生产就需要大量的工厂、金属和动力。在19世纪末，煤的主导地位已经达到了高峰，而法国却缺煤。更为严重的也许是，即使开采法国所有的煤，其成本之高也使人不敢问津。法国最重要的煤田——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煤田，由于煤层较深和地质上的缺陷，开采起来更是困难；中央高原的煤田则离开主要消费中心很远，而且该地区又没有可通航的水道，只能利用铁路，因此运输成本较高。结果，法国就成了这样一个唯一的工业大国，它的煤的消费量尽管很低，可是煤的生产量却比消费量更低。其后果是，法国的冶金生产在1895年以前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而德国却增长了两倍，美国增长了3倍。至于英国的冶金业，在整个这一时期中，一直是法国的4倍。从第二帝国时代起，法国一直是世界上第二财政强国，即第二个债权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法国由于矿藏贫乏，因而缺乏强国的物质基础。

法国的经济停滞，还有另一个根本原因。大约从1825年以来，法国人口增长率持续地下降。每1万居民中，每年净增数从1821—1825年的65人降为1881—1885年的27人。这种现象与1920年以后在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所看到的属于不同类型。因为法国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远远发生在物质福利和现代生活方式获得大发展以前，而不是以后。出现这种十分反常的现象的原因，至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另一方面，它的影响却是十分清楚的：法国未能得到由于新兴的消费者——他们同时迅速地成为新兴的生产者——的出现而带来的那种刺激。经济大危机反过来又使人口的恢复受到严重的挫折。每一万名居民中，每年净增数从1881—1885年的27人，降到1886—1890年的12人，又进而降到1891—1895年的3人，只有在1896—1900年间才回升到16人。法国处于螺旋下降的趋势，所以人口、市场、生产全都减少。把这个阶段当作一个持续衰退的开始，而不是一次短暂的危机，这种看法并不过分。

这次经济大萧条持续不断，在许多领域内造成非常重大的后果。农业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同时还受到地价暴跌、地租下降的影响；因此，“缙绅们”在经济上的衰退，又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没落。与此同时，无地的农民、短工、农场短工大量流入城市，

数目日益增加。耕种自己土地的有地农民的数目上升，这种发展情况被人兴高采烈地欢呼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象征，但它并不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相反，小农的偿付能力并不能证明它能经得起竞争，而只是证明农民家庭的生活只能依靠农场。为了它自己的需要，什么都得生产一些，而购买和销售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东西。至于产业工人，如果总的说来，他们的工资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的话，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却经受着长期失业的痛苦。虽然缺乏统计材料，但看来在几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实际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地下降。但是，由于许多人放弃农业和工业而经商，商品便膨胀起来。结果，贸易部门的畸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价格高昂，造成了法国经济所必须承担的最沉重的负担之一。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未变。

这场危机时间之长、后果之严重，也使法国的进取精神受到挫伤。法国裹足不前了。保护贸易主义的胜利，就是这种心情最好的明证。早在1885年和1887年，就提高了谷物和牲畜的税率。1892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总税率，即梅利纳关税法；它不仅提高了许多产品的关税税率，而且严格地限制政府在谈判商业条约中的行动自由。

这场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也同样是重大的。它首先反映在1885年的选举中。在这次选举中，1881年曾经大大地下降了的保守派的得票数，又上升几乎达到1877年的水平。选票的增加，不仅由于天主教对“世俗化”法律的不满，而且因为农民们已经听信了这种说法，即农民的不幸是由于各届共和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它们的财政管理尤其受到攻击。激进派方面的席位增加到3倍以上，主要是利用了大城市中工人苦难和小商人的困难。如果说这两股势力都由于东京湾远征中的失误（有真实的，也有谣传的）而增加了力量，这也是实在的；但是殖民政策并没有造成任何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攻击殖民政策的人，早已在许多国内政治问题上成为机会主义者当权的历届政府的反对派了。

实际的结果是，1885年选出的众议院里没有多数派；机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这三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几乎势均力敌。由此而造成的众议院的无能，不久就引起一个强烈的反议会的潮流。这就是布朗热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把布朗热主义看成是企图搞一场军事政变，这就大错特错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是右派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至少它的本意并非如此。至于说布朗热主义反映了民族主义和“复仇”的心理状态，那么，有一件事必须弄清楚。希望要为1870年的失败复仇雪耻，很久以来不过是极少数人的希望；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对于孤立无援的法国来说，德国实在是太强大了。可是，有许多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德国人为了使1870年的胜利更加彻底和肢解法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借口。因此，民族主义不过反映了一种防御的本能，然而，它也很容易一变而为被围困者的歇斯底里。这就是1887年实际发生的情况。这时俾斯麦认为可以通过以战争相威胁的办法，达到成立一个俯首帖耳的国会的目的，以便通过他所提出的七年军事预算法。在这以后，又发生了几起边境事件，特别是施奈贝累事件，于是，布朗热主义就自然得势了。

但是，布朗热主义首先是一个极左的人民运动，甚至有社会主义的一面。一些走在前面的共和派企图使军队民主化。布朗热将军的政治生涯是从此起的。第二帝国军队建立的基础是通过抽签挑选一定数量的士兵的长期服役制。当时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共和派，要求取消作为个人权力主要支柱的常规军，而代之以民兵。1870年的战争迫使他们考虑国防的需要，因而取消了这项计划。但是，他们至少确实要求实行短期征兵制，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服役，这样就不可能利用士兵去反对其他公民。1872年的军事法只是使他们得到部分的满足：实现了普遍征兵制，但是，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仍为5年；而对于那些根据以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挑选制度而享有特权的人，则规定的年限要短得多；对于那些将要成为教师，或者——更糟的是！——教会人士则完全免除兵役。共和派便设法要使这项法律同他们的原则一致起来。

此外，军队越来越成为保皇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的大家族子弟们的避难所了。这些人从1879年以来，实际上从许多政府部门中被排挤出来。固然这些军官并没有梦想利用自己的指挥权，以武力来重新建立君主制，但是，他们对共和国讥笑辱骂以示反抗，并且经常地对共和派或非天主教徒军官加以歧视，或拒绝和他们往来。这种情况同样需要改革。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双重任务，激进派于1886年1月迫使政府任命布朗热为陆军部长。他在担任这项职务期间，孜孜不倦地为改善普通士

兵的福利而努力，从而使他赢得了士兵群众的无比爱戴。相反，许多职业军官对他极为反感，认为他那种渴望成名的野心，以及他惩罚某些不合时宜地发泄感情的保守派军官时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不可宽恕的。而在机会主义者方面，则对他炫耀他的激进派联盟的做法感到愤怒，因此，从1866年的夏季以后，朱尔·费里就同他发生了冲突。1887年春，机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利用布朗热在法德关系紧张时期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的轻率言行，结成同盟要把他赶下台。激进派的许多人认为这一行动是针对他们的。于是，他们激烈地攻击不再包括布朗热将军在内的各部部长，这些部长只能仰承右翼的鼻息而苟存下去。而且，布朗热并不甘心就此销声匿迹。他又几次大发雷霆，终于使他在军队中又被撤职。这时，他在几次补缺选举中被提名为候选人，作为对机会主义者政策的一种抗议；而且，右翼中有很有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在幕后插手支持他，目的是为了使共和派的混乱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右翼和极左翼的支持，布朗热在选举中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诺尔省两次当选（1888年4月和8月），在塞纳省一次当选（1889年1月）；换句话说，他在法国两个最大的，也是工业最发达的省拥有多数。大致说来，布朗热的纲领包括了老激进派的各种要求：他要求由制宪会议修改宪法；他的追随者、一些老的激进派分子则向工人们解释说，取消参议院，就会为结束他们全部苦难的社会改革清除主要障碍。至于和保皇派结盟的问题（因为布朗热运动的宣传费用就是他们提供的），当然是秘而不宣的。

激进派由于处于深刻的分歧和混乱之中，因而无法和布朗热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这项工作实际是由机会主义者领导的政府承担了。这位前将军被吓得仓皇出逃，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参议院根据宪法作为最高法院，对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提出了控诉。在1889年的选举中，布朗热分子当选的只有几十名（主要是在巴黎，它过去曾是激进派的大本营），共和派保持了他们的多数。经过这次事件而产生的政权得到了加强，但是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激进派的基础已大为动摇：他们的主要主张，即修改宪法，已经无人相信，因为布朗热分子曾经利用了它。保守派由于与布朗热结成同盟而牺牲了它们的原则，它们隐蔽的合作关系终于暴露；而且，他们也不再有任何推翻共和国的适当的机会了；至今一直追随他们的青年们也有走进一条死胡同的危险。最后的结果是，许多工人突然抛弃了传统的共和派政党：这对未来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在这时，机会主义者由于战胜了布朗热而重新振作起来，从1889年至1898年几乎毫未间断地继续掌权。就法国的标准而言，这个时期可算是政局稳定：先后有两届内阁，任期各达两年。这个时期也做出了不少的成就。经过长期谈判后，出现了法俄同盟，因而法国的孤立地位宣告结束，共和国也终于得到了欧洲各君主国家某种正式的承认。殖民扩张政策经过了多年的争论以后，也终于取胜。法国的社会立法体制，也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虽然过去任期4年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新的社会法律，没有一届曾经超过5项以上，但在1889年到1893年间却通过了15项，1893年到1898年间通过了17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值得注意。

工人，至少是大城镇的工人，历来是共和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共和党重新上台后，必然要深切关怀工人们的问题，并且准备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政治上的平等（这是该党的根本原则之一）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也是它全心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激进派和机会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分歧。机会主义者往往推举从前做过工的人担任自己的领导人，这些人虽然已成为政治上的温和派，却没有忘记自己当工人时的经验和问题：泥瓦工马丁·纳多已成为议员和甘必大的顾问之一；铸铜工人托伦1864年曾在自治团体“工人运动”活动初期起过主要作用，这时成为参议员和塞纳省机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与此相反，像伊夫·居奥等某些激进派则成为放任主义经济最坚定的拥护者，并以他们的名义反对国家对劳动条件进行任何干预。

然而，法国的共和派是生活在一个重工业发展特别缓慢的国家；因而，对于重工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也只是慢慢地才认识到。他们生在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国家，满以为只要普及教育，并成立自由工人协会以逐步替代雇主，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他们显然是受了法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的影响。为了实现他的思想，他们实行了义务制的初等教育，并于1884年给予各种工会以法律上的承认。要理解从法律上承认工会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必须考虑到共和国还没有确立结社自由，因为执政党担心这样一来会保护宗教团体；而且，根据刑法，凡是20人以上的团体，必须呈报政府批准。所以说，工会现在是处于一种享有特权的地位。

1880年到1885年之间，还讨论了其他许多有关社会方面的建议，甚至获得众议院的通过。但是，这些建议却为代表农村选民的参议院所否决。这些选民或者不懂得新兴城市和工业社会的必要，或者甚至反对给城市居民特权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

在从1885年到1889年这段岁月中，在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但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舆论的变化加快，许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首先是1884年的工会法并没有完全产生预期的效果。在许多地方，工会的成立遭到雇主顽固的反对；“产业工人协会”仍然是一个梦想而非现实；经济危机的影响所及，使得工人们忍无可忍，改革势在必行了；而且，在政治家们看来，布朗热派的企图更显示出危险确实存在。

所以，机会主义者从1889年起重新掌权以后，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推进改革运动，并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参议院。而参议院由于本身的政治信念，既无权又无理由对他们表示怀疑或加以阻挠。早在1890年，“工人身份证”这个帝国时期警察制度的残余，就已经被取消了；并且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设工人代表，其任务是保证各矿场的卫生和安全的各项规定得到执行。这项法律于1893年扩大到所有工业；1891年，法律规定缩短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1898年终于通过了一项有关工伤事故的法律；这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才产生的，因为必须放弃按照习惯法有关民事责任的原则，并树立起职工保险这种概念。最后于1891年，弗雷西内的机会主义者政府提出了发给工人养老金的计划，但20年以后才得以实行。

因此，虽然机会主义者保证说，尽管发生了许多表面性的事件，政府还是应当真正稳定下来；但是，法国政治生活的基础却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到这个时候为止，法国鲜明地分为两个阵营：一边为共和派，不管他们在某些特殊问题上意见如何不同，但是他们信仰的基本原则相同：即信仰政治自由；忠于民主制度，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能使任何新的革命暴力变得非法；信仰实际上意味着“反教权主义”的“世俗政治”。任何时候，只要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所有的共和派都准备捐弃前嫌，团结对敌。反对共和派的，是与它势不两立的右派，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毫无疑问绝不是融洽一致的，但是，他们主要的联系纽带就是捍卫天主教的一切。然而，从这个时候起，由于出现了天主教徒归顺共和国的运动，从而开始了消除法国人

之间的大分裂的努力。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因素，即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政党至少在理论上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刀两断，并为新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而奋斗。

天主教徒“归顺”共和国，这是几种因素造成的后果。首先是保守派由于已无发展前途而自然削弱了；时间越向前推移，他们重新掌权的机会就越少，布朗热主义的失败，是对他们的最后一击。早在1885年选举以后，接着又在1889年选举以后，曾经有一度做出努力，打算建立一个承认现存体制的“宪政派”右翼；但是，保守派直到当时为止，已毫无自信，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他以头脑灵活、目光锐利、具有政治才干而著称。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对《现代错误学说汇编》的解释，在1888年的《自由》通谕中宣称：“有人硬说教会对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并对当代天才的所有发现一概加以拒绝，这是一种徒劳而且毫无根据的诽谤。”因此，对他来说，法兰西共和国在原则上并不是比任何其他政权更不可接受。此外，他对法国当时的形势也了如指掌，看清这个共和国的未来寿命将会很长。如果天主教徒坚持不妥协的反对立场，必将自食其果。1884年2月。利奥十三世公布了题为《高贵的高卢人民》通谕，他在其中坚决要求必须维护1802年的政教协议。形势逐渐开始对他有利。1886年最后一项“世俗化”法律通过以后，反教权主义就不再具有可以动员共和派的明确目标了；因为，虽然激进派一直在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教分离，换言之，即谴责1802年的政教协议，但是，这种要求却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拒绝。与此同时，布朗热主义的失势，也使得保皇派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

利奥十三世看清了当时法国的形势。本着这种精神，非洲大主教拉维热里红衣主教在1890年接待一些海军军官时，曾提议为共和国干杯。这一主动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保皇派感到愤怒，而且天主教徒，尤其是各个主教，群起攻击共和国迫害天主教。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利奥十三世对这种指责进行了反驳。1892年2月，他公布了用法文写的通谕《在关怀之中》；他在其中声称：所有各国已经确立的政府都是合法的；天主教徒必须致力于修改立法。同时，教皇还表示，他并不希望成立天主教政党，以免使天主教重新卷入法国的政治斗争中去；而是希望成立一个不公开申明宗教信仰的大执政党，

这样的政党天主教徒可以参加，而且将会把那些教条主义的反教权主义者赶回到反对派一边。右翼保皇派议员于1892年6月毫不含糊地投了不赞成票，以此作为回答；他们宣称，虽然他们作为天主教徒，在一切信仰问题上应服从教皇，但作为公民，他们的政治行为不需要听从其他任何人的忠告。然而，他们之中有一定数量的人退出了政治生活。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右翼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在1893年的选举中，“天主教归顺派”的候选人当选的只有35名。但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利奥十三世的政策失败了。事实上，从1893年到1898年的议会会议期间，温和的共和派对“归顺派”的进步做出的反应是主张结束宗教斗争。但是，要做到结束宗教斗争，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而且，在本章所论述的这些年代中，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会成为借口，重新燃起教士和反教权主义者两派之间的激烈争吵。

1893年的选举也第一次把40至50名“社会主义者”议员送进了众议院。他们从哪里来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是最复杂不过的了。1870年以前法国产生了为数颇多的各种社会主义体系的思想家和作家，其中最近的一个即蒲鲁东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是，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使社会主义运动完全销声匿迹。幸存下来的或当时组织起来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工会，主要忙于自己的工会问题。

1877年共和派上台后，人们有机会再次听到社会主义的宣传。新的主张出来了。它们不再是根据法国的传统，而是受到卡尔·马克思的启示。这种变化的主设计师是朱尔·盖德。1879年，他建立了一个“工人党”。这个工人党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一些政治团体和工会组成，这些工会是从属于党的。但是，它的人数一直很少，并于1882年分裂：朱尔·盖德被认为过分拘泥于教条，在选举中被称为“可能派”的一派人赶下了台。可能派绝大多数是工人。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急于想要取得眼前的结果，在保尔·布鲁斯的领导下，组成了“法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与此同时，于1880年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以奥古斯特·布朗基为它的先知。这个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秘密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不包括任何工会，也不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准备利用任何时机发动暴动。此外，还有许多激进派也任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想表明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关怀而已。

很明显，这次经济大危机不能不在工人群众中造成各种反响和苦难。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小宗派，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互相争吵不休上，因而未能立即从这场危机中得到好处。相反，1886年却致力于建立一个“工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既要奉行革命的原则，又应独立于各种政治组织以外；这种概念后来成为法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特色，它本来是由于希望工会的行动不致因政治派别的争论而瘫痪。从此以后，这种向独立的工联主义（即工会运动）发展的趋势，同时得到来自两方面的支持而得到加强，一方面是那些从原则上就反对一切政治行为的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各个宗派里富于战斗性的分子，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工人们的不满情绪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布朗热主义运动。它把过去投票支持激进派的一大部分工人从激进派中分化出来。面对着布朗热主义，各社会主义派别虽尽了一切努力，但就是没有能够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可能派全力以赴地与之进行斗争，而布朗基主义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它。这种情况又在两派中引起新的分裂；结果是，巧妙地避免深深卷入这场斗争从而保持了自身团结的盖德派，成为最有影响的派别。因此，他们一方面对选举运动越来越感兴趣，一方面寻求一种能立即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纲领，从而在几年内终于控制了各个工会。

在工会的内部，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压力下，而且也在可能派的压力下，正在发生变化。这时，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甚至其中那些最坚决的分子，已经完全为了实际目的而放弃了武装起义的想法。由于盖德派在议会和选举中的活动也遭到否定，仿效英国工会的“渐进主义”又为人们所唾弃，因此必须找出某种新的道路。总罢工的主张于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和共同行动来完成革命的主张。因此，在最终的目标依然是革命的前提下，工会在费尔南·佩卢蒂埃的领导下，努力从事过去往往为人所不屑进行的实际工作。在当时的法国，进行这种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工具，不是人数众多的某一产业或行业的工会联合会，而是“劳工同盟”。劳工同盟把一个城镇的各行各业的所有工会联合在一起，进行劳工交流、失业津贴、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以及经济研究等活动。

但是，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在每年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时和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上已经携手合作。这就显示出工人阶级联合行

动可能具有的威力。从另一方面，有一定数量的激进派议员，他们不再满足于激进派传统的态度，设想创立一种摆脱教条主义的空谈和宗派主义的争吵的社会主义。它应是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而又没有像“盖德派”或任何现有团体的派别分子走得那样远的人们的信条。米勒兰和前议员、说话“简明扼要”的共和党人饶勒斯，就是这种重新组合的鼓舞者；这种重新组合在原来的各社会主义派别的周围创造了一种同情的气氛，从而帮助了这些派别；另一方面，又把相当数量的前布朗热主义者吸引到自己一边。

这就是社会党人在1893年选举中获胜的历史背景。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虽然这当然是无法答复的——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取得这些胜利，是否由于巴拿马事件深深震撼了当时的政界人物？在这家从事开凿巴拿马地峡运河的法国公司破产后不久，某些政界要人和许多不大知名的议员，被控告曾经接受贿赂而偏袒这家公司，特别是批准了以奖券形式发行股票（顺便提一下，这次发行奖券的失败就是这家公司最终倒闭的信号）。当时，大多数被控告的个人，并无确凿的证据。但是，这一事件被人充分利用，首先是被布朗热分子和保守派充分利用来诋毁共和派，而社会党人也不失时机地痛斥资本主义的腐败。公众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所有的政客们，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政客们都是腐败透顶，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来自肥。这绝不能肯定地说明，那个时期法国的公共道德标准，比任何其他国家要低。但是应当看到，特别是在巴黎，当时政治性日报的数量是很多的（是今天的10倍以上）；每个议员都必须有自己的喉舌来表达自己的独特的见解（而法国的政治思想，在这种细微的差别上，是极为丰富的），证实自己的独特的立场。当然，这类报纸中的绝大多数，如果靠它们公开宣称的财源是无法维持的；它们的销路十分有限；几乎很难定期发行，没有经常性的广告收入。因此，他们不得不取得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或者为他们做宣传，或者用揭发不愉快的内幕来威吓它们。提供款项最经常的，自然是那些冒险性最大的企业，而从事开凿巴拿马运河的企业，就更是如此。因此，许多政客就和一些不正当的商人沆瀣一气，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钱财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经费，特别是为了弥补他们报纸的亏空。很明显，巴拿马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利用报纸的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换了政治生活中的登场人物。但是，除了社会主义者的兴起之外，议会中各党派的力量对比几乎未受影响。

保皇派右翼已经削弱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它的解体已在所难免。而宪政共和派则牢牢地掌握着权力。看来，法国就要进入一个“和睦时代”了；在这种形势下，政治斗争将大大失去它的重要意义。但事实是，在法国，这种形势只是在伴随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才出现的。1893年和1894两年，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系列的暴行，特别动荡不安；这种暴行以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被刺而达到最高峰。为什么不前不后，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些暴行，人们做出了几种解释，但是没有一种解释是能够令人完全满意的。这些暴行，虽然当时造成群情激愤，但最后并没有十分重大的结果。不过，各届政府都通过了镇压暴行的措施；这又引起了社会主义者和极端激进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把这些措施称之为“罪恶的法律”。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已经开始的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机会主义者由于受到老右翼中一个派别的支持而逐渐得到好处，而激进派则正在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学说和一个新的纲领。修改宪法已经无人问津了，激进派加紧推行他们的反教权运动，并对天主教归顺派的一切姿态表示蔑视而加以拒绝。但是，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他们的真正问题在于决定他们对社会党人抱什么态度。社会党人的主张，他们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和他们的个人主义哲学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一味地攻击他们，因为这样做就会“使他们重新依靠右翼”。因此，他们就试图（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创立一种能够使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调和起来的新社会学说：莱昂·布尔热瓦的“社会连带主义”。他们由于与社会党人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且，这些社会党人也正在促成和解；他们毫无异议地让他们的一位领袖米勒兰在1896年5月的“圣·芒代演说”中描述出一种温和得多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采用议会的，即非暴力的方法，对少量财产不再构成威胁，对爱国主义也不再表示怀疑。在此以前，社会党议员也投票赞成莱昂·布尔热瓦领导的一个彻底的激进派内阁，这个内阁大力实施成为激进派纲领中要旨的所得税。

法国的财政制度，从大革命以来很少变化；长期以来就被人们谴责为不公平的和民主的。估定直接税额所依据的方法，要么是武断的（如动产税），要么就是完全过时的（如地产税）。国家收入大部分来自对日常消费品的间接税，而这种间接税的重担，是落在穷人身上而不是富人身上，虽然主要的一项间接税是酒税。以社会正义为理

由来反对酒税，并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很久以来，曾就几个方面提出了财政改革方案。但是莱昂·布尔热瓦内阁是第一个把自身的生存押在实行一项全面税收的计划上的政府。这项计划规定对每个纳税人的全部收入，经过仔细核实后，实行征税。这个制度从理论来说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由于实行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困难而告失败。法国的特点是它的小型企业太多（如在贸易、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情况），这些企业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而且它们的实际的财政情况很难搞清。此外，法国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的邻居或国家了解自己的情况。只有在法国农村生活过的人，才能充分地体会到法国人的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全面征收所得税，如果不是变成一场笑话的话，本来是可以消除这种传统的保守秘密的做法的；但是，这种“财政上的审讯”已经受到攻击。代表农村势力的参议院故意制造一系列障碍，迫使布尔热瓦政府屈服。所得税经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虽然最后算是通过了，但那已经是1914年大战的前夕，而农业收入则到这时候仍不能适当加以监督。

布尔热瓦政府下台后，由梅利纳的长命的温和政府打着政治“缓和”的旗帜上台。但可以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正是在这个政府执政时期爆发了德雷福斯案件。这个事件彻底地打乱了政治方面和道义方面的形势，从而明白无误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德雷福斯案件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情节最复杂而最离奇的侦探小说之一。这个案件一直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有关此案的材料卷帙浩繁。虽然提出了各种假设，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1894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发现犯有间谍罪，因为据认为一份写明送出若干秘密情报的清单出自他的手笔。据说这份清单是在德国大使馆中发现的（但即使对这一细节也有人提出异议）。这个清单实际上是由另外一名有外国血统的军官埃斯特哈济少校写的。但是，经过多年的讨论和暗中活动，要求重新审理此案一直遭到拒绝。这种不顾事实真相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报局的亨利少校从中玩弄诡计，因为作为他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他从一开始就卷入这个案件之中。为了证明德雷福斯有罪，并中伤发觉埃斯特哈济少校罪行的皮卡尔上校，亨利肆无忌惮地伪造文件。如果亨利的动机大白于天下，这一事件也就毫无神秘可言；不幸的是，当亨利伪造证件的罪行败露时，他自杀了（或者说是蓄意被杀而灭口），从而

将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是，真正要紧的是德雷福斯案件成了打乱人们的政治思想和立场的理由和借口。

在这以后直到1914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激进党取得了胜利；他们从1889年以来一直一筹莫展，但从这时起几乎是连续执政，往往是在迅速抬头的社会党人的帮助下上台的。第二，反教权运动又重新蓬勃兴起，不过1892年以后似乎有逐渐消逝的趋势。第三，过去在所有各种政治见解中，特别是在左翼方面所能看到的，而在激进党人中间尤为突出的那种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感情，从这时起似乎只有右翼才在那里维护了。

对这些十分重要的现象加以评论的不乏其人，值得注意的是小品文作家沙尔·贝玑就曾问道：“神秘主义怎么会退化成为政治的？”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必不可少的科学研究，所以，人们今天在写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时，主要是靠猜测。特别是各个党派的未来命运是怎样直接取决于它们对德雷福斯案件所持的态度，这一点现在还弄不清楚。虽然这个案件在巴黎是件大事，但法国的广大地区对于此事却不甚了了。最早、最积极的德雷福斯案件声援派是一些孤立的、具有迥然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右翼的《费加罗报》和左翼的《震旦报》都是他们的主要支持者。在激进党人中，前领袖克列孟梭是极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人们中的一个。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卡芬雅克则竭尽全力反对重审。在政治上即将被这个案件搞垮的机会主义者，产生了不少知名的“重审派”——舒勒—凯斯特纳、约瑟夫·赖纳克、瓦尔德克-卢梭，以及日益成为党的希望的彭加勒和巴尔图。但另一方面，梅利纳总理则试图阻挠调查一个使他的政府处于十分尴尬境地的案件。

另一方面，许多天主教徒则激烈而大吵大嚷地反对那些声援德雷福斯的人，《十字架报》尤为突出。也许，他们中间许多人所以如此不留情面，可以解释为他们是要发泄对于违反他们的意愿而强加给他们的“归顺”政策的愤恨；尽管利奥十三世本人深信德雷福斯是无罪的，但他一直无法使他们的运动有所缓和。军界人物都是反对声援德雷福斯的，而且来势如此猛烈，因而使声援德雷福斯的运动往往不得不带有一种反对军队的性质。但是，这里如果一概而论，也会流于轻率。在紧接而来的那个时期中，最积极的德雷福斯声援者中间有许多人，表现出既是不妥协的爱国者，又是军队的有力的捍卫者，如机会

主义者约瑟夫·赖纳克，前社会党人沙尔·贝玑以及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激进党人乔治·克利孟梭。

诚然，反对声援德雷福斯的情绪所以如此激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由于当时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更为激烈）出现的反犹太主义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本身，在基本思想上似乎也含糊不清。它已经发展若干年了，主要是在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发展的。对一般天主教徒来说，厌恶犹太人由来已久，因而可以说已经成了该宗教的一个部分。对于极端分子，即社会主义者、左翼分子而言，犹太人则正好是体现这个时代一切罪恶渊源的大金融集团的化身。最后，从1892年以来，存在着一个由爱德华·德律蒙鼓动的以明确地排犹为宗旨的运动，鼓噪一时，令许多政界人士害怕。最初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所做的努力，被谴责为“犹太人的阴谋”，起初许多社会党人接受了这种说法。另一方面，饶勒斯是最激烈的声援德雷福斯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当时的这种行动是造成从那时起至1905年止社会党两大派“饶勒斯派”和“盖德派”之间彼此斗争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德雷福斯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力量改组的历史，与下一阶段的政治力量改组的历史是难以分开的。因此，我们的叙述必须到此为止；那些激动人心的年月中的疯狂情绪现在既然已经平息，我们可以把1898年到1902年这几年作为一种历史学家的“荒地”，即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留给新的研究工作者。

关于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即文学和艺术生活，因在其他章节已有叙述，本章不再赘述。但这并不是说，这里对于任何基本因素可以省略，也不是说，拿不出一份或多或少像人们所希望的那么详细的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目录，就像其他时期那样。但是，给历史学家以深刻印象的，是这个时期内把知识界的生活和这个国家其他各界的生活隔绝开来的那条鸿沟。当维克多·雨果于1885年去世时，举国为他致哀，他的作品可以在许多贫苦人家中找到，而且在那里为人们所背诵。他的作品家喻户晓，其程度可以与1848年时拉马丁的作品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但它们属于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第三共和国的作家们，既没有如此广大的读者，对于他们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产生这般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往往还对它采取蔑视或回避态度。无疑，埃米尔·左拉曾试图广泛地描绘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面貌，他也

具有那个时代的某些主张和某些抱负，并试图把它们表达出来。但是，像斯特凡·马拉美其人，或者像《自我崇拜》一书的作者莫里斯·巴莱士，他们只是以最聪敏、最有才智的人为读者。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虽然比较易懂，但是，这些作品过于喜欢雕琢词句，怀疑论的色彩也过浓，因而不能深深地打动他的读者。就造型艺术而言，这个时代是官方学院派盛行的时期，相形之下，如印象派画家则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一九〇〇年风格”在任何领域中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只是在音乐方面，华格纳去世后，法兰西学派的比才、夏布里埃、塞扎尔·弗兰克以及其后的福莱和德彪西等人取得了某种卓越成就，但音乐在法国只是一小部分爱好者所崇尚的东西。

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共和政权是如何从一开始就与一种将科学放在第一位的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官方哲学并没有被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接受。诚然，泰纳和勒南二人曾经颂扬过科学，但是他们那种开明的保守派的信仰与一个民主制在胜利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而思想深邃的拉希利埃，甚至是令人眩惑的柏格森，都没有想去动摇同时代人那十分天真的科学信念；他们的同时代人将科学的形象过分简单化了，因此，他们的信念称为“唯科学主义”。

老实说，当时在人们的日常交谈中，尤其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文化生活中十分庸俗的东西。在“林荫大道上”演出的新剧^[3]，总是“一个巴黎味十足的结局”。巴黎总是在向被它吸引来的外国人提供同样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但是必须着重指出，首都五光十色的生活，这时已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根据在巴黎逗留时的观感来判断法国的人——今天有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必然要犯错误。从1789年到1870年，巴黎确实支配着法国，毫无阻力地把自己的爱好和感情，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制度强加给这个国家。但是在实行普选制以后，巴黎就只不过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了；而在公社时期以后，巴黎则处于对立地位了。这个首都先是拥护过布朗热，其后又支持过反对声援德雷福斯的民族主义，而绝大多数法国人则明确地表示对这些运动持敌对态度。第三共和国是十足的外省统治制。

（沈一民 译）

[1] 如果说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甚至连一部分都还没有编写，这也不算什么夸大其词。无数论述这段历史的著作，直到最近往往都是根据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或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要，而不是在有条理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写成的。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许多研究论文已列入写作计划；很明显，这些论文一旦发表，许多问题就会重新提了出来。因而本章提出的仍属初步意见，主要是以个人研究史料的一孔之见为根据，至少对布朗热主义时期的论述是这样。

[2] 怀特查佩尔（Whitechapel），意为“白教堂”，伦敦东区贫民和犹太人居住区。——译者

[3] 指在巴黎林荫大道一带的剧场演出的通俗喜剧。——译者

第十二章 奥匈帝国、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于1870年取得最后胜利之后，多瑙河流域各国和巴尔干半岛仍然是欧洲民族主义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一片广大地区。这种民族主义愿望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构成了心腹之患。然而，尽管面临新近的挑战，这两个帝国的王朝却仍依仗传统的习惯势力而得以延续下去；它们业已存在了很久，尽管帝国的魅力或任何其他笼络人心的作用均已每况愈下，每个人却都还可以不无理由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去取而代之呢？在国际方面，这个问题可以从新建立的德国和从英国那里得到现成的回答。前者将立即告诉俄国：欧洲不能没有奥匈帝国，而后者则一直在为土耳其提出同样过分的要求。如果是俄国的看法有分歧，也并没有达到最大的限度。在国内，许多人仍然觉得没有皇帝或苏丹的日子是不能想象的。查理·施瓦尔岑堡亲王仿效帕拉茨基的说法，在1891年向青年捷克党人中的极端分子问道：“对于你们这个小得难以独自生存的国家，你们打算怎么办呢？”1897年，流亡在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穆拉特贝伊说道：当今的王朝必须继续统治帝国，否则土耳其的势力就不复存在。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越来越无产依靠往日的光荣和今日的机遇，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1878年以后国际上的对峙局面，二是敌对行动造成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分裂，并延续和转移了他们对国家的挑战。本时期初，这两个帝国在对外战争中都蒙受了战败之耻，之后又都得到了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权，从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是，延缓毕竟是暂时的。在19世纪末，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在争取继续生存这方面，似乎比奥斯曼王朝做出了出色的努力，但实际上这两个王朝都已临近末日了。

奥匈帝国之所以看来略为景气一些，一方面是由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累累罪行骇人听闻，他那世间少有的统治残暴无比；一方面则是由于奥德联盟的威望；进入20世纪以来马扎尔人那种崇尚自由的习

气；奥匈帝国的官僚制度比奥斯曼帝国的优越得多；另外，这个君主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斗争错综复杂（在外国人看来是如此）。如果单从地理位置的接近来看，这两个帝国与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各继承国紧密相连，在它们的关系中还存在着互相交恶的伙伴之间某种纠缠不清的利害交易，这一点也突出地表现在各自的纯内部事务中。从许多方面来看，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相互支持以对付巴尔干各国中日益高涨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浪潮，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虽然俄国声称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两个帝国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感兴趣，但这两个帝国和巴尔干诸小国都有过教训，对俄国的企图抱有某种怀疑。

19世纪70年代初，虽然深知底细的人已经感到不安，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在西欧仍然有着许多朋友和良好的声誉。1856年的敕令^[1]中许诺或者说预示要实行的改革计划并未完全失败。土耳其的军队和政府似乎尚有足够的生气和决心，人民群众也许尚有一定程度的忠心或者说听天由命的情绪，可以使土耳其中央政府继续挣扎，扭转困境，甚至取得若干成就。国际形势并非不利，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愿意看到近东出现危机。虽然基督教徒的反叛旷日持久，遍及各地，在欧洲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但臣民们暂时还是平静无事的。

自谢里姆三世在位（1789—1807年）以来的近百年中，进行改革的倡议一直来自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在位）的即位为进行新的改革带来了希望。君士坦丁堡欧化的、本意是善良的坦齐马特派，特别是穆罕默德·克谢吉-扎德·法德帕夏和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这两位宰相，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867年，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政府对改革的进展情况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尽管认为改革效率差，情况混乱，但它们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是悲观的。土耳其政府也提出了一份报告，宣称它对各基督教米勒特^[2]传统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持审慎的态度。它争辩说，如果说敕令第九条——此条规定向帝国的全体公民敞开进入民事和政治机构的大门——普遍被忽视的话，错误也并不完全在土耳其当局方面；因为，基督教雷亚^[3]显然不喜欢服军役，而且通常总是胆小怕事，在担任公职时不能表明自己的主张。他们也不大愿意在自己的米勒特中进行改革。以法国的行政管理立法为蓝本而新实行的行省（维拉耶特）制，1864年至1867年间在米德哈特帕夏领导下被认为在多瑙河省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并于1867—1868年推广到除伊拉克和也门以外的其他各省。1868

年年初，组成了以米德哈特为主席的国务会议，成员中包括基督教徒和伊斯兰，负责规划进一步的改革和制订预算和其他工作。虽然法国人认为这些发展说明他们的中央集权纲领是正确的，但阿里帕夏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行政部门的专制主义实行群众性监督。但是进展甚微，事实证明，要想保持进步的外表是越来越困难了；阿里和法德只不过处于朝不保夕的地位，而苏丹——据说他在1863年曾把宰相职务交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会跳舞的托钵僧担任——则终于成了破坏他的大臣们的改革纲领的罪魁祸首。

在西方列强看来，改革首先意味着加强土耳其的武装力量，改善国家的支付能力，改变行政制度，以便使苏丹治下的各省臣民服从政府领导。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一支强大而忠诚的军队无论对于国内治安或抵御外侮都极为重要，但花费巨大；而财政破产的威胁必然会加剧包税人的横征暴敛，使各行省发生骚乱最直接的起因趋于激化。法国人所希望的是形成能听从一个开明、有效率和有偿付能力的中央政府领导的土耳其国家，这个国家通过逐步真心实意地实施行政统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这些原则，将会达到帝国内部各民族的融合。拉希德—法德—阿里这一派的改革家们也许是真心诚意地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土耳其国家的，尽管从他们对基督教徒所做的极为表面和有限的让步中，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真正认识到，基督教徒和伊斯兰的融合意味着观点和政策上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如法国人正确地估计的那样，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在中央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才能实现这种近乎奇迹的融合。但是在中央，法德和阿里以及他们培养的少数能干的进步官员，却须听任苏丹喜怒无常的性情的摆布。

然而，即使阿卜杜勒·阿齐兹及其周围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包含在奥斯曼人对旧日专制政权宏伟成就的怀念之中的反应方式，也未能在虔诚而正统的伊斯兰所持有的那种保守思想中找到任何真正的响应，于是他们便设法在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中鼓动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19世纪60年代，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最先在一些土耳其作家中明显表现出来，他们开始懂得了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并开始使用西方民族主义者所使用的自由主义的语言。只要一谈到祖国和代议制政府，马上就引起对苏丹的专制制度的更具体的抨击，并断言为使国家强盛，必须以西方的体制作为基础。如同大多数革命的自由主义者

那样，他们准备容忍少数民族存在，但不打算把他们当作伙伴。这就是第一阶段的青年土耳其（或称“新奥斯曼”）运动。当时这个运动在政治上似乎还无足轻重。其领导人的著作虽然在国内人数不多的一个圈子里拥有读者，但他们觉得还是生活在国外比较合适。里法特贝伊于1864年在伦敦创办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第一份报纸《自由报》。那米克·凯末尔的爱国主义剧本《祖国，还是锡利斯特拉？》于1873年首次上演。他们以及齐亚贝伊、希纳西·埃芬迪、努里贝伊和阿里·苏阿维等其他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使圈子虽小而人数却日益增多的人对立宪民族主义国家的面貌有所了解。这些人后来在1876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不论是这些人还是主张改革的宰相们，以及1877年以后的阿卜杜勒·哈米德，都不懂得需要一种现代化的经济来支持和推进改革。西方列强为这个国家行将破产的前景感到震惊，但它们也只是把财政改革看成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办法。然而，造成土耳其的特殊困难的根本原因，无疑应追溯到马哈穆德二世，他曾试图创建一支欧洲式的职业军队而以此巨大的代价来拯救国家，却没有在经济生活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在同样的情况下，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尽管最终并未获得较大的成功，但对于需要取得经济进展这一点却有着较多的认识。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土耳其军队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当然是改革时期最切实的成就。由退役的英国海军少将霍巴特帕夏掌管的海军，尽管缺乏海上训练，而且军官的素质也令人怀疑，但拥有优秀的水兵和21艘铁甲舰，在欧洲海军强国中名列第三。1877年年初，詹姆斯·贝克上校虽承认“就数目而言，土耳其陆军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加徒有其名”。但他仍估计其总兵力为416530人，此外尚有250000人可以征召，以补偿伤亡减员。他认为，这支陆军“就士兵而言，是最好的”，其大部分装备的质量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巨大的军费开支虽尚未能解决一支合格和有效率的军队的问题，但军队改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侯赛因·阿伍尼帕夏在1869年后推行的——表明，培训军官的重要性至少已引起重视。从8所军官预备学校抽调出来一批16岁的学生，送到一些优秀的军事学院去深造。马哈穆德二世创办的帝国军事学院的学员经5年学习直接进入陆军任上尉。炮兵和军事工程学院则以4年的学制培养中尉军官。1875年建立了初级军校，为军官预备学校输送学员。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所军事医学院。

雄心勃勃的努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得到了明显的报偿，在普勒夫纳战役中又再次得到了证明；但土耳其倘若不能继续得到西欧列强的军事支援，这种努力在政治上的价值就将大部分丧失。而这也可能是早已过时的土耳其经济因沉重的军备负担而彻底崩溃的结果，宫廷的大肆挥霍也在加速这种崩溃。军事方面的努力无论如何是不足的。军事院校的工作和经费似乎一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薪饷不能按时照发，升迁前景渺茫，获得较高军阶的人往往并无军事才干，而是由于得宠。这些情况无疑使经过训练的青年军官灰心丧气；何况他们还看到，有些军官虽然几乎未受过任何训练，却连连得到擢升。所以，军校毕业生最后都纷纷加入主张政治改革的青年土耳其运动，这就不足为奇了。征兵给某些地区带来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土耳其陷于穷困的一个原因。据贝克估计，每450个伊斯兰中，每年有一人应征入伍；况且，各军团的兵员限于在一定的军区征集，而有的军区基督教徒又占多数，所以在许多地区伊斯兰居民人口减少情况十分严重。然而，这种负担不可能有任何减轻。因为，对于一支时刻要准备同欧洲第一流强国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军队来说，由于帝国疆域辽阔而基督教徒又免征，因此兵源是远远不足的。

因此土耳其要继续生存下去就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苏丹本人的干预只不过使人看到，在他身上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最明显最奇特的病症。他的大量非生产性开支虽包括购置战舰，但也包括建造大理石宫殿。如果他多少还能在公共事务方面坚持做点儿合理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个人的一些怪癖——越来越喜欢恭维的言辞和献媚的礼仪，火树银花的节日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也许还可以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的怪诞想法而已。可是1871年阿里死后，苏丹对中央政府的干扰更加露骨而荒谬，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派就势必要把他当作1875—1876年骚乱的替罪羊了。一方面，苏丹大造宫殿，嫔妃成群，豢养亲信，满足个人嗜好，为此而挥霍无度，使国库收入几乎为之耗尽；另一方面，他肆无忌惮地任用能满足他在钱财和其他方面的要求的亲信。从1871年9月到1874年2月，宰相六度易人。在这段时间内，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宣布对改革方案增加新的内容，但这些新内容看来只不过是越来越令人难以相信地粉饰一下政府政策日益令人沮丧的实际而已。到1874年，大臣们早就不再指望宫廷能正视财政危机的严重性了。1875年8月，宫廷在奥斯曼帝国银行账户上的款项告罄，银行拒绝继续付款；但是，当英国大使向外交大臣问

及苏丹将对此做何反应时，外交大臣回答说，他怀疑苏丹是否会听到这个消息。

土耳其现已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由于没有取得足够的经济进展来增加国家的岁入，帝国政府不得不靠外债应付日益增多的开支；在没有正常的节余，甚至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税收制度的情况下，这种权宜之计虽不费力，后果却是致命的。1839年和1856年的改革方案曾宣布废除包税制，1875年又重申这项决定，但由于计划实行的财政体制现代化看来并不能提供急需的收入，每次宣布废除后又不得不予以恢复。为了应付克里米亚战争的开支，1854年发行了第一笔公债，总额为300万英镑，发行价格为80%，利率为6%，由伦敦的登特和帕尔默先生经办，以埃及的贡赋作担保。截至1875年，又发行了13笔公债，票面总额为184981783英镑。1874年发行的最后一笔为4000万英镑，利率为5%，发行价格仅为43.5%，它是紧接着在1873年试图以58.5%的发行价格筹集2800万英镑的计划惨遭失败之后发行的。债权人主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债台高筑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收入来源被当作担保：埃及贡赋的剩余部分，叙利亚的关税，君士坦丁堡的关税和货物入市税、烟税、盐税、印花税、执照税，鲁米利亚和爱琴海地区的羊税，托卡特的矿产税，以及“土耳其现在和未来的总岁收”。无论是以全部或部分拒付债款，还是以部分地暂时或长期地停止付息的形式出现的国家破产，都可能意味着这个“欧洲病夫”^[4]由于中央政府陷于瘫痪和由于完全无法用军队来抗击内外敌人而寿终正寝；这也将意味着土耳其在西方想方设法博得的追求进步的名声化为乌有。这也将给法国坚信不疑的开明中央集权制抹黑。据信，俄国大使曾怂恿土耳其在1875年10月宣布部分停付利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此期间，各行省的行政机构度过了阿卡杜勒·阿齐兹在位时期频繁的危机而继续存在下来；只是在波斯尼亚，由于各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最后发生了接连不断的起义。看来，即使实行了1865年敕令中许诺的在税收方面订出公平合理的标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持传统的宗教特权，忠实地执行治安措施，恐怕也不足以恢复人民以往对苏丹的忠心，使基督教徒和伊斯兰言归于好，并扭转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兴起的局面。尽管马哈穆德二世成功地阻止了帝国伊斯兰地区（除埃及外）的分崩离析，但是，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希腊等边远地区的基督教徒聚居区和一些小公国，到19世纪中叶时都已获得

了事实上的独立或完全的独立。帝国政府之所以在别的地方还能保持其权威，主要是靠时刻保持警觉，把革命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地方上到处出现的不满情绪尚未发展成暴力和广泛蔓延的程度时，就把它压制下去。不过，由于苏丹治下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臣民部族混杂，他们中间社会、宗教、种族，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和冲突错综复杂，这就使得基本上只能勉强支撑局面的土耳其当局经常得到很大好处，因而任何带有普遍性的或协同一致的起义都很难持久。

在保加利亚地区，虽然一些冲突已经预示着将要出现不满情绪，土耳其人却始终能保持其权威。居住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保加利亚农民，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但即使在这一地区，他们中间也夹杂着一些伊斯兰人，在别的地方，如巴尔干半岛南端和马其顿，则夹杂着人数较多的土耳其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或阿尔马尼亚人。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武器简陋，离土耳其的主要军事中心很近，因而不可能举行成功的起义。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本能地忌恨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是异教徒、收税人和征服者。土耳其人虽通过保护希腊教会消除了某些敌意，但并未最终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可是，由于1870年建立了保加利亚大主教区，有效地消除了基督教徒的联合反抗达40年之久。1864年以来从俄国的重压下逃出来的切尔克斯人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建立了移民点，这件事又增添了保加利亚人的不满。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特别是米德哈特掌管多瑙河省以后，是比较富裕的。上等阶层，即少数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商人，则只求平平安安地发展，倾向于坐待奥斯曼帝国不可避免地日趋衰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军队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对土耳其—保加利亚二元体制的解决办法也持赞成态度。那些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小集团，即那些积极筹划不切实际的起义的革命派，则往往对俄国政府持怀疑态度，而俄国政府对他们也同样不放心。俄国政府在1829年和1853年曾坐视保加利亚人的起义受挫，对1853年前10年间在巴尔干发生遍及各地的危机也没有准备，现在看到，年轻的保加利亚极端主义分子和俄国的虚无主义革命分子之间有着令人不快的相似之处。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俄国大使伊格纳切夫插手保加利亚人的某些阴谋活动，特别是通过一位名叫纳伊丁·格罗夫的同时担任俄国驻菲利波波利斯^[5]副领事的保加利亚人参与其事。例如，1867年和1868年的小规模起义就是经由这条渠道获得部分经费的。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两次起义，1872年的几次起义和1875年9月旧扎果腊的起义都不光彩地遭到了失败；革

命者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土耳其人则消息灵通，采取了果断而又并不过火的反击措施。

然而，波斯尼亚问题却远为复杂得多，因为当地的伊斯兰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有3个外国在那里角逐。土耳其人不愿过分压制他们的伊斯兰臣民；另一方面，倘若基督教徒居民的反叛使土耳其人的统治难以为继，那么，奥匈帝国或较小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等斯拉夫国家就会坐收渔利。自1463年土耳其征服这些地方后，土地拥有者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到19世纪，这些贝伊^[6]连同他们的半封建臣属，约占全部人口的1/3强。他们极为保守，在政治上忠于帝国，实际上是苏丹属下有任意行事的诸侯。他们对手无寸铁、备受剥削的基督教徒农民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压制。由马哈穆德二世开始的旷日持久的斗争，终于在1850至1852年间由奥马尔帕夏取得了胜利，摧毁了贝伊们那些实际上独立的封建王国；从理论上说，波斯尼亚现已置于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奥斯曼帝国官员的管辖之下，从而成为坦齐马特改革派适宜的活动场所。但实际上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虽然改革包括改善雷亚的法律地位，但奥斯曼当局从未冒完全疏远贝伊的风险，而且或多或少地有意默认了由伊斯兰继续保持统治地位的现实。在土耳其欧洲部分新成立的各地方议会中，通常有一名基督教徒代表，基督教徒的证言和伊斯兰处于平等地位；实际上，在这些议会中伊斯兰一律占多数，而且在波斯尼亚，他们以态度顽固、反复无常而著称。在税收方面，可以大致无误地说：新税制保留了地主可以得到农民1/3收成的权利，并且使奥斯曼包税人得到凶狠的警察的支持；与旧税制相比，它减少了其残暴的程度，但敲诈勒索的手段反而更加完备。贝伊们感到征赋之重，于是便增加他们的要求；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达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不允许对税收有丝毫的减免，更不必说取消包税制了。在这种情况下，便造成了周期性的、严重程度不同的起义，接着是镇压，然后是居民迁徙这样的局面；1874年的歉收和收税人无休止的压榨，最终导致各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多次冲突，其中1875年6月发生在黑塞哥维那的奈韦西涅地方的东正教徒和伊斯兰的冲突，通常被认为是波斯尼亚大起义的直接起因。

土耳其在波斯尼亚统治的崩溃，必然要深深动摇奥匈帝国不稳固的政治力量均势。在这个君主国中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是国内政治上的对峙局面，这种局面虽然使帝国政府避免受到任何根本性的挑战，但

也妨碍了人们对国家抱有至高无上的忠诚，在内政或外交政策路线上也难以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重大进展。有人认为奥匈帝国既已被赶出意大利和德国，因而它今后将主要在近东寻找机会，这种说法显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内政和外交形势在1866年后均已发生变化，它利用即使这种机会的可能性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一点也是确实的。

弗兰茨·约瑟夫与马扎尔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而结成的联盟，在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时已经显露出征兆，而于1871年宣告建立，它左右着奥匈帝国的内政外交，直到该帝国的终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该帝国的终结。它是帝国内部仅有的两派真正的保守势力之间的一种权宜的而不是相互尊重的联盟。这位皇帝处理国事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同时反映出他的专制主义思想，求生图存的愿望和政治上的缺乏创见。到19世纪70年代，他已是一个历经沧桑，在某种程度上幻想已破灭的机会主义者，他知道马扎尔人那种坚强不屈的性格所构成的危险。然而，他也看到，单纯依赖德意志自由派一定会遭受失败。在对究竟应走向何处尚无十分清楚的概念的情况下，他就在1866年着手进行一系列宪政改革，其出发点是要雪萨多瓦战役之耻^[7]，但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这样干的还是超国家体制的失败；据认为，1866年和1859年的败北充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失败。他制订了军队改革计划，任命萨克森首相博伊斯特伯爵为外交大臣，这些行动似乎清楚地表明了他最初的目的；但雪耻的事未能立即做到，而且俾斯麦迅即粉碎了奥地利（和法国）在南德意志各邦进行的反击措施。当为适应新的事态发展而随之进行的调整本身也成了问题时，反普鲁士的意图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观望政策；而当1870年法国的战败证实了这种转变的正确后，就不仅从外交方面，而且同样可以从内政方面找到它的原因了。

在1867年的奥匈协议中，马扎尔人为匈牙利取得完全的内部自治，使之无论在宪法上或事实上都与这个帝国广大而富庶的“另一半”（现称奥地利，有时亦称内莱塔尼亚）处于平等地位。整个帝国仍然是一个“共同君主国”，有陆军、外交和财政三位大臣处理其事务。帝国两部分各派60名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轮流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举行会议，讨论帝国的共同事务，共同的支出由奥地利承担70%，匈牙利承担30%。双方结成关税同盟，每10年重订一次。迄今一直鼓吹和主要支持“统一的国家”这一主张的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这些协议最

明显的受害者，因为随着奥匈协议的签订，不仅超国家帝国的概念消失了，而且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毋庸置疑的优势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在当时虽然想把政府工作交付给德意志自由派，但与马扎尔人的野心相比，这些德意志自由派的野心更使他恼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就新政策本身的性质来说，必须对匈牙利以外的其他民族集团也作出让步。在皇帝和帝国的官僚们看来，这“另一半”是一些有历史渊源的政治单位，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朝剩余遗产的继承人。尽管他们愿意给予那些大叫大嚷、气势汹汹的民族以更多的地方自治权，但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必须保持中央的最高权威。按照这种条件达成满意交易的只有一件事。1871年奥地利设立了一个专管加里西亚事务的部；波兰语被承认为在行政和中等教育中使用的语言，财政上也做了有利的安排。于是，政府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了波兰人的投票支持，波兰人在加里西亚的支配地位也得到了肯定。此后波兰人就变得顺从和忠诚起来，只是有一点还支配着他们，那就是对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所抱的高于一切和压倒一切的忠诚。在加里西亚，仍然还有一些处于从属地位、但最初还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愿望的罗塞尼亚族农民，他们也可能成为大俄罗斯人，也可能成为独立的乌克兰人，尚待做出抉择。这就提醒波兰贵族，使他们想到，帝国政府手中还留着罗塞尼亚人这张牌。

在别的地方，就再没有这样方便的交易可做了。捷克人自1868年以来也一直要求取得与匈牙利人类似地位；1871年霍亨索伦内阁的建议曾使捷克人的要求似乎有了实现的希望。捷克人在1871年的波希米亚议会以后提出的最后形式的要求得到了皇帝的批示，他答应承认波希米亚王国的各项权利，并举行加冕宣誓来确认这项承认。捷克人的要求包括18项“基本条款”，是由内阁同捷克人的领袖们谈判拟定的。他们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主张成立一个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三元制王国；他们承认二元制，但建议由波希米亚和其他行省的议会直接选举代表团中的奥地利代表。不过，他们希望波希米亚议会应接管奥地利帝国议会的几乎全部职能，这个议会将变成仅仅是联邦制奥地利国家中各方代表的一个代表大会。这样，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就将在帝国和内莱塔尼亚的政府机构、商业，也许还有文化生活中失去他们的影响和重要性，还将失去对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政治控制。马扎尔人既预见到权力扩大的捷克人将同匈牙利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又预见到马扎尔人的影响可能因心怀不满的奥地利

德意志人同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结成联盟而遭到削弱。倘若当初捷克人的要求不那么多，毫无疑问，他们本来会得到有利的和确实很大的让步；但是，尽管弗兰茨·约瑟夫的态度已不那么坚决，而在拉迪斯劳斯·里格尔领导下的捷克人却因他们的盟友、波希米亚土地贵族的领袖亨利·克拉姆—马提尼茨伯爵寸步不让而未能达成任何妥协。不过，根本问题还在于德意志人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由博伊斯特发出了公开的挑战，而马扎尔人也由安德拉西表示了彻头彻尾的反对。于是，霍亨瓦尔特下了台，安德拉西接替了博伊斯特，哈布斯堡王室和马扎尔人便基于利害关系而亲密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看，这是以一种多少有点玩弄人的手法利用德意志人的忠诚，来维持弗兰茨·约瑟夫统治的长久基础。以阿道夫·奥尔施佩格亲王为首的德意志自由派内阁接替了霍亨瓦尔特内阁，其阁僚是一些空谈理论，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奥地利德意志人，他们的理论非常适合于对少数民族进行镇压。布拉格军事总督科勒将军严厉地推行这种政策，他封闭报馆，向德意志人组成的陪审团对捷克新闻工作者提出公诉，严格限制公共集会。捷克人满怀愤怒，拒不屈服，不但抵制奥地利帝国议会，而且还抵制布尔诺和布拉格议会。不仅如此，1873年发生了财政崩溃，带来了困苦，出现了议会丑闻，政权因而更加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或是马扎尔人的政治领袖们，都不会高兴看到帝国内斯拉夫居民的增加，虽然他们同样不欢迎把波斯尼亚并入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而组成一个南斯拉夫国家。鉴于这一切，尽管霍夫堡^[8]本身抱有扩张野心，但最简单的办法乃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土耳其的统治。然而，这种办法被认为无非是把迟早要遇到的事情推迟一些时日而已，何况奥匈帝国并不乏理由在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时机采取进一步行动。

1870年，确实有人试探过塞尔维亚摄政团对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所持的态度，根据这个计划，主要由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居住的西北部三角地带将划归奥匈帝国，而其余部分则将划归塞尔维亚。安德拉西受多少有些亲塞尔维亚的驻贝尔格莱德领事本亚明·卡莱的影响，起初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除了向奥地利的达尔马提亚提供一个后方地带从而满足了军事需要之外，还在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制造了一个将会引起纠纷的导因，从而会使塞尔维亚亲近并

依附奥匈帝国。可是，正如安德拉西正确猜测的那样，塞尔维亚希望通过适当的办法获得整个波斯尼亚，因而拒绝考虑这些建议；接着，塞尔维亚摄政团转而采取亲俄政策，安德拉西也就开始怒气冲冲地谈论起泛塞尔维亚的主张。然而，事态的这种变化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不重要的问题上来。

克罗地亚人没有很多可抱怨的事，至少马扎尔人是这样看的。1867年，他们被允许尽可能与匈牙利达成谅解，并自行向马扎尔人做出了妥协。他们已从德亚克和埃特韦什那里取得了在匈牙利王国范围内独立存在、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的统一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家的权利，不过财政仍严格地、但并非不公平地控制在匈牙利议会手中。他们在代表团和匈牙利议会中都拥有代表，从而使他们在处理帝国的共同事务中分享的权利得到了承认；他们还可以在任何地方讲克罗地亚语。即便如此，在政治权利问题上还是常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甚至发生了一些小规模起义。在财政和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1873年又任命一位农民出身的著名诗人伊凡·马茹腊尼克为总督，使得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温和的舆论得以满足。但是，克罗地亚人仍然憎恨马扎尔人的统治，对于自己为哈布斯堡所抛弃也耿耿于怀，于是便开始从建立南斯拉夫这种主张的诱惑中寻找安慰。这个运动以两种形式出现，其一是19世纪40年代盖伊所鼓吹的“伊利里亚主义”^[9]，另一种是斯特罗斯迈尔主教及其追随者在19世纪60和70年代进行的关于南部斯拉夫文化的宣传活动；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对哈布斯堡—马扎尔政权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对塞尔维亚人的愿望的挑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安德拉西十分希望塞尔维亚人同克罗地亚人的对立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因为这至少可望削弱克罗地亚人在对匈牙利政府表示不满时所抱的自信。

除了这一点之外，再要制订什么有把握实现的计划就很困难了。斯特罗斯迈尔的热情而宽大的纲领，给克罗地亚学术界以极大的鼓励，但其影响及于所有南部斯拉夫人中的各种文化团体和活动；它具有这样的政治愿望，即希望斯拉夫人中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和睦相处。有一批克罗地亚人渴望在一个国王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体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国家，以阿格拉姆（萨格勒布）^[10]为首府，人口大约600万。它将包括三元制王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

塞尔维亚和旧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其他人则所抱希望不大，仅仅包括三元制王国也就满足了。塞尔维亚人的愿望仅限于把居住在萨瓦河右岸的斯拉夫人统一起来；对克罗地亚人及其天主教徒们的宣传表示怀疑，而那些泛塞尔维亚扩张主义者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真地想过要把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居住区从这个二元帝国中分离出去。然而，一个在损害土耳其的利益的条件扩大而成的大塞尔维亚将会包括旧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门的内哥罗。甚至不乏更大的幻想。在伏依伏丁那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居民中，有人梦想组成一个包括保加利亚人在内的南斯拉夫联邦，有人甚至主张把罗马尼亚和布科维纳也包括进去。匈牙利塞尔维亚人的领袖人物斯韦托扎尔·米莱蒂奇一贯的毛病是热衷于实现无所不包的斯拉夫统一计划，再加上总是与大多数邻国争吵。他对于把迄今称为军事边界的地区移交给匈牙利政府控制颇为不满。这些地区的居民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血统的村民，从小就受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的熏陶。数百年以来，一直是奥地利进攻土耳其人的先锋和抗御土耳其人的第一道防线；他们一直受维也纳陆军部长的管辖。米莱蒂奇与塞尔维亚摄政团和东正教教士的关系也不好，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亦颇多指摘。

但权衡利弊，在安德拉西看来，占领波斯尼亚虽可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也很可能使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驾驭。对此，还必须考虑到俄国人究竟抱什么目的，而这一点是难以估计的。众所周知，俄国人有两种论调，而这两种论调本身又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说俄国外交部不赞成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青年的革命激进主义，它却对门的内哥罗的尼古拉亲王的愿望加以鼓励，并在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开设了许许多多的领事馆和副领事馆，而在这些地方他们并没有什么正经的事需要处理；如果是伊格纳切夫和领事们所表白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徒谋求福利，但他们之中却也有那么一些人毫不掩饰他们的革命狂热和敌意，而这往往与其说是针对土耳其人的，毋宁说是针对奥地利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夸大了俄国的影响。这对克罗地亚人丝毫不起作用。在塞尔维亚人中间有一个叫作塞尔维亚青年联盟的秘密团体，自1866年成立以来，米莱蒂奇一直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个团体同塞尔维亚政府的关系有点紧张，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许多官方人士当然就把它看作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工具，尽管看来它并非如此。

奥地利之所以奉行一项推进政策，是出于对威望、战略和贸易利益的考虑。只要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一些引人注目而并非十分困难的成就，便可抵消它在1859年和1866年的损失。军界希望得到一部分或整个波斯尼亚，以便为奥地利狭窄的达尔马提亚领土提供一个后方基地。人们认为，军事边界的移交增加了向前推进的需要（或者说更加有理由这样做）。尽管1871年后安德拉西越来越小心谨慎，但不论是从整个欧洲的角度考虑，还是作为向皇帝做出的一种姿态，他都很容易接受关于保持威望的论点。他也许同样或者更强烈地受到了下述信念的影响：奥匈帝国必须坚持认为自己是西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天然保护者，它的天然任务就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好邻邦，以保证西巴尔干各族人民得到土耳其人的公正对待。贸易方面的论点也是根据防卫和扩张的利益提出的。克里米亚战争前，奥匈帝国控制着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对外贸易；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给了英国。从萨洛尼卡到米特罗维察，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堡^[11]和菲利波波利斯的铁路以及通往德德阿加奇^[12]和扬博尔的支线的通车促成了这一过程。在米特罗维察和巴尔干山脉以北的土耳其领土上只有两条铁路，一条由多瑙河通往黑海，另一条更短的线路从奥地利边界通往波斯尼亚北部的巴尼亚卢卡。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贸易界意识到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北方开辟适当的商路；在1875—1879年东方危机期间，奥地利外交部贸易局有影响的局长施韦格尔男爵终于使之完全实现。主要目标是完成由维也纳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东方铁路，使之在尼什与土耳其段相接，并与萨洛尼卡—米特罗维察线相接；占领波斯尼亚可以为奥地利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便利条件，从而把塞尔维亚保持在奥地利的贸易势力范围内，并保障它的通过斯库台的商路的安全。这反过来又表现出与北部阿尔巴尼亚各部族的友好关系，以及对新帕扎尔行政区的控制。它表明抑制对门的内哥罗的领土野心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

尽管安德拉西在外交部任职期间（1871—1879年）取得了一些眼前的成就，但他只不过把奥地利内政上的僵局长期转移到外交政策中罢了。1878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于俄国的帮助而落入帝国的控制，这时安德拉西对自己的外交才干颇有些扬扬得意；但总地说来，1875—1879年的近东危机充分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奥地利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从政治上和战略上来

看，可能奉行的最好政策是根本避免变化。安德拉西从柏林会议上得到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形成了一种使所有政治和战略争端都尖锐起来的均势。在比萨拉比亚的俄国人回到了多瑙河，这是保加利亚的一个自治小国，它把俄国人的影响带到了巴尔干山脉；马其顿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下，但已受到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甚至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愤愤不满和威信扫地的塞尔维亚已为俄国所抛弃，正以厌恶的神情考虑是否有必要与奥匈帝国和解。

帝国国内许多人不安地注视着新的局势，在占领波斯尼亚这件与长远的外交问题无任何直接关系的事情上，安德拉西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不论对那些想要得到更多的土耳其领土的人，还是对那些对国内种族和政治均势遭到即使这种程度的破坏亦感到惴惴不安的人来说，占领波斯尼亚都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各派之间展开了公开、激烈而势不两立的斗争。阿格拉姆的克罗地亚人和莱巴赫^[13]的斯洛文尼亚人强烈表示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愿望；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极力称赞沙皇和俄国军队，里格尔曾向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伊凡·阿克萨柯夫表示，斯拉夫民族如果不是由于分裂而削弱了力量的话，就能够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但是，1877年土耳其战败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号召向俄国开战，并对土耳其普遍表示同情。布达佩斯的公民把一支象征荣誉的剑献给了1876年征服塞尔维亚的阿卜杜勒·克里姆，而捷克人则把一支象征荣誉的剑献给塞尔维亚的败将车尔尼亚耶夫。扩张主义者包括皇帝本人在内，在军队的将领中也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安德拉西白白放过了一次不但可以立即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可以控制甚至兼并远达萨洛尼卡的西部巴尔干地区的天赐良机。弗兰茨·约瑟夫对推进政策表示明确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安德拉西；皇帝的愿望促使柏林条约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都获得了批准，不过在批准之前却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危机。

各个国家攻击的理由有某些共同之处。在奥地利，在爱德华·赫布斯特和德意志自由派其他领导人不太谨慎的领导和《新自由报》的支持下，这种攻击并不表明他们对土耳其人的感情怀有特殊的关切，但反映了他们极其惶恐不安，唯恐200万斯拉夫人涌入境内危及奥地利德意志人岌岌可危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发泄由于该党在外交政策上

的发言权实际上已被剥夺而积累起来的不满。在匈牙利，对斯拉夫人大量涌入基本上也存在着恐惧心理，但这种攻击来自保守势力和独立党方面，而且受到某种亲土耳其的自发感情的影响。人们对于政治现状的任何变化都极为关注，因为这会削弱匈牙利在帝国事务中的相对实力。结果使弗兰茨·约瑟夫和安德拉西都感到德意志自由派不再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了，因为这些人的主要长处在于能逆来顺受。在帝国丧失了影响的阿道夫·奥尔施佩格亲王辞去了职务，该党在1879年6月的大选中遭到了失败。而另一方面，在匈牙利，自由党党魁、1875年以来在匈牙利鼓吹二元体制的首相科洛曼·蒂萨虽因支持占领波斯尼亚而大为失势，但这次危机的最终结果却巩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结果，奥匈帝国内部二元体制所固有的对峙局面更加严重；1878年俄国和奥地利向巴尔干各国推进后出现在该地区的对峙局面则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对奥匈帝国来说，眼前的后果是有利的：在国内政治方面，它获得了一个相对的安定时期，而在巴尔干，则成功地支撑住它目前尚无意打扰的土耳其国家。

对于弗兰茨·约瑟夫来说，1879年至1893年任奥地利首相的爱德华·塔菲伯爵是一个忠诚而顺从的仆人，他可以尽量利用这一短暂的有利形势。帝国在国外的地位的增强和国内异己分子的削弱，使他得以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把一批支持者团结在一起（“铁环”[\[14\]](#)），并提高皇帝的影响和权威。捷克人不妥协态度的失败乃是塔菲取得成功的基础。1868年以来对帝国议会的抵制没有给里格尔及其追随者带来好处，1878年他不得不说服他的同胞中那些打算看看合作能带来什么好处的人。这样，塔菲就把捷克议员们争取过来支持他的内阁。准备有条件地响应皇帝的效忠号召的波兰人和天主教中央党人，是使他得以超过德意志自由派和进步分子而获得多数地位的另外两支力量。这三个集团的规模大体相等，因此塔菲在一方面避免做出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做出某种程度的眼前让步，并给予最终解决民族主义要求的希望。捷克人虽不满意，但也并未失望，他们得到了各种报酬，主要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捷克语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公共事务中获得了与德语平等的地位；1881年在布拉格创办了一所捷克国立大学，建立了一些捷克中学；在国家机关中捷克人可以担任某些职位。波兰人和保守派也得到了报酬。在此期间，奥地利的国家财政

慢慢走上正轨，国家恢复了对铁路的管理。“奥地利思想”虽然在政治上不再能博得普遍的承认，但由于建立起一套称职的和无所不包的官僚机构，从行政管理方面证明这种思想还是正确的。但是，帝国的一切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塔菲只不过是弗兰茨·约瑟夫用来拖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合意和最干练的工具而已。

帝国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赢得各民族的忍让，但这些民族彼此之间却毫无忍让之意。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向捷克人要求让步，同样，马扎尔人也不愿再向克罗地亚人的要求让步。它们拒不妥协并非由于要想搞垮帝国，相反，把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要求扩大到情理所允许的极限，必须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帝国结构为先决条件，因为在这样的帝国结构内才能为争取让步而进行无尽无休的斗争。80年代后期，塔菲能做出的让步已经到尽头，里格尔及其“老捷克派”追随者便由于青年捷克党的兴起而迅速失势，而青年捷克党后来又被捷克激进派和平均地权派弄得坐立不安。青年捷克党人在1889年的选举中控制了波希米亚议会。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同样毫不妥协的德意志人反对派。1882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林茨纲领”就是在奥地利恢复德意志人最高地位的一次尝试；该纲领寄希望于俾斯麦的帮助（但俾斯麦并无此意），并通过日益加剧的反犹太主义突出表现了其排外性。这种反犹太主义正是他们的首领之一舍纳雷尔用煽动暴力来控制该运动的一种手段。整个80年代中，斗争在波希米亚激烈地进行。德意志人大声谴责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在语言、教育和行政方面对捷克人寸步不让，而捷克人也同样顽强地为每一个可能取得的让步而斗争。为了谋求解决办法，1890年1月在塔菲的倡议下进行了协商，结果制订了一项方案，规定每个民族在各自所在地区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占据优势。这实际上等于是将波希米亚的行政由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分管。对此，“老捷克派”表示同意，而青年捷克党人则不打算放弃他们对整个波希米亚的要求。德意志人尽管是少数也不打算接受少数的地位。塔菲的妥协方案归于失败。1893年，塔菲提出一个实行几乎是普选权的建议，使他的追随者差不多全都大吃一惊，接着他就被解除了职务。塔菲认为，给公民以选举权，就会全部消除构成现有各党派政治生活的那些出于狭隘利益的争端。皇帝不想采取这种猛烈的措施，他认为这样做会使他碰到的问题比他逃避的问题更多，并会迫使他接受代议制政府，从而肯定会危及他的权力。他召集了一些非选举产生的政客集团组成今后几年执政的政府，但他们除了对普遍选举共

同表示反感外，再没有任何一致之处，因而也就无法找到解决德意志人—捷克人争端的办法。

匈牙利的对峙局面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但在这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牢牢掌握了政权的集团的问题。占人口总数达50%的马扎尔人牢牢地控制着其他集团。在奥地利，德意志化运动处于守势地位；而在匈牙利，马扎尔化运动仍在被推向最大限度。在林茨纲领中，德意志人完全是心甘情愿地提出把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变成完全由匈牙利人统治，此举固然会使马扎尔人决定性地处于少数地位，而加强德意志人在奥地利的势力，但也主要表明，他们进一步承认解决帝国的基本问题已宣告失败。虽然匈牙利人本亚明·卡莱于1882年作为财政大臣而被授予掌管波斯尼亚的权力，但该地区仍然处于二元体制的控制之下。在1875—1890年间担任匈牙利首相的科洛曼·蒂萨主要是依靠贵族的支持而领导着一个由虽然忠实可靠但苛求无己的追随者所组成的自由派内阁。蒂萨及其追随者谴责泛斯拉夫主义和对各个民族实行彻底的高压政策，以此作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来表明他们虽然效忠于皇帝，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马扎尔人。有限制的选举权建立在严格的语言基础上，使马扎尔人甚至在非马扎尔人选区也实际上保持着独占地位。和奥地利一样，这种选举制也把劳动者排斥在外。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文学或宗教方面的愿望遭到了拒绝；一些较弱小的集团，如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失去了它们在地方的特权。然而，主要问题还在于克罗地亚人，他们梦想成立一个在三元制王国中的南斯拉夫国家，波斯尼亚被占领后这种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他们比别的少数民族较有效地抵御了马扎尔人的几次侵犯，经过几次严重冲突之后，1879年和1889年在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先后重新达成了妥协。与此同时，匈牙利的权贵们制订了他们自己反对二元体制的政策；这证明是一种推翻仍然忠于奥匈协议和皇帝的蒂萨的有效政治手段。然而，国王的称号于1889年改成了“皇帝兼国王”；这导致了取消其他有关象征，如共同的军队等的要求。

到了90年代末期，奥地利立宪政体的垮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坚强不屈，意味着奥匈帝国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但是，它仍然支撑着，因为它的大多数政治家们深信，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它。

在1875—1878年的历次危机中，土耳其曾面临在内外夹攻下丧失其全部欧洲领土的可能。这一事态之所以未继续发展下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列强虽进行了干预，但无论在1876年、1878年或1880年，都未能就强制措施究竟应执行到什么程度取得一致意见；各基督教少数民族之间继续相互对抗；大多数伊斯兰继续接受哈米德的统治；也许最重要的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屈不挠地、毫不松懈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然而，这还不足以解开这位“欧洲病夫”仍能继续生存之谜。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和在奥地利一样，帝国体制正在做最后的挣扎。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哈布斯堡王朝不同，他既无繁荣可言，又无良好的行政管理，更无从以强国的地位去安抚半岛上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使他们感到满意。

1880年以后出现的虽然有限，但确实出现过的复兴，其原因之一是1875—1876年的革命运动至少意味着革除了改革计划中固有的某些严重弊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那些异想天开和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会再重复了。他于1876年5月29日被迫逊位，6天后被发现他已溘然死去。他的继位人穆拉德五世显然由于在危机中过度紧张而致精神崩溃，8月31日被废黜。继位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虽是个天生吝啬的人，但无论如何国家的破产迫使他也不得不厉行节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情况与以前大不相同：宫廷放弃了一切炫耀排场的旧习，苏丹在正式场合也只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军大衣，不佩勋章；侍从们衣着简朴，甚至显得寒酸；达官贵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显露出奢华和骄矜，许多人的境况也确实拮据。这种节俭的做法使首都的革命分子的不满情绪有所缓和，那些认为这个政权已毫无可取之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已财力有限，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即位初期能够一方面称赞改革计划，同时又似乎很有道理地把它推迟执行。

确实，他使许多密切注视他的人相信了他的热忱。他一度还使曾在穆拉德被废黜前夕于1876年8月会见过他的米德哈特帕夏相信了他的话。他不仅接受了颁布新宪法和任命青年土耳其党人齐亚贝伊和凯末尔贝伊为他的私人秘书这样的条件，而且还以十分向往的口吻谈论他主张实行的更进一步的改革。他在同英国大使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爵士多次亲切交谈中痛心而且显然很诚恳地谈到他的抱负和困难，使这位大使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信不疑。他为自己的安全惶惶不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由于1876年事件迭起，他的两位先王很轻易

地就被废黜而造成的后果。1878年5月24日青年土耳其党人阿里·苏阿维因企图夺取会舍拉根宫扶持穆拉德五世复辟而被枪决，此后数日，阿卜杜勒·哈密德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惊慌失措地要求英国大使和德国大使保障他的安全，为他出奔英国做出安排。这次事件发生后，他除了每星期五在一个宫门口的清真寺做守礼拜外，寸步不离他的王宫和御花园。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阿卜杜勒·哈密德所以于1877年2月放逐米德哈特以及其他改革分子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很可能是出于他的这种对个人安全的惊惶，而并非因为他一般地厌恶改革，这种看法可能是有道理的。罢黜了米德哈特之后，他召开了已许诺的议会。该议会于4月批准了对俄战争，一直到1877年6月才被解散。柏林会议之后，他于1878年10月同意英国关于在小亚细亚进行改革的建议，并出人意料地任命粗壮结实的突尼斯人哈伊尔丁帕夏为大臣（此人定过一本糅合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法规于一体的小册子），似乎进一步保证实行开明政策的意图。即使议会政体被置诸脑后，宪法却仍然存在，他继续在抱怨他只是通过手下的大臣们进行统治。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一个头脑固执、心胸狭窄而只顾实利的人，即位之前还是一名优秀的手枪射手和精明强干的小地产经营者。像他这样一个人，当然不难懂得，一个稳定的、人人满意的社会能为他带来实惠。他在同莱亚德的谈话中，痛心地谈到严重缺乏能干的人才以及人人只想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等情况，越来越多地夹杂着伸手要钱的意思，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灰心丧气。他对国内的敌人恐惧万分，因而不愿把实权长期交给任何一个人，这是贯穿在他的全部政策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财源确已枯竭，这一点在财政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由此愈来愈意识到，列强无意卷入近东进一步的危机中。到1881年，他已估量出国内外各方面对手的力量，对哪些该作多大的让步，对哪些又该如何掌握与之相抗衡的分寸，已经了如指掌；因而得以在虽无建树但亦无灾难的情况下，保持王位达20年之久。

首要的问题是尽可能挽回1878年的损失。虽然柏林条约规定要把土耳其领土割让给奥匈帝国（波斯尼亚）、俄国（比萨拉比亚）和巴尔干诸国，但在很多情况下，新边界只是以笼统的措辞在有些地方并不精确的地图上绘出梗概，因此在各划界委员会中大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凡是苏丹在称号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地方，如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都进行了保持残余权力的斗争，尽管不久就可以看出，他只是在反对奥地利人时才有意进行真正的斗争。直到1879年4月21日，双方经

过了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才签订了一个奥土协议，规定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新巴扎尔行政区的条件，土耳其政府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做绝望的努力来说服安德拉西放弃奥地利在新巴扎尔行政区驻军的权利。协议包括一项秘密条款，规定无论哪个强国对该行政区的驻军发动进攻，奥土双方将联合进行抗击。但协议墨迹未干，苏丹就强行要求取消该条款，理由是它很可能把他卷入镇压已被奥地利的暴政和压迫逼得起而叛乱的伊斯兰的作战行动中去。这项条款引起了奥斯曼帕夏的敌意，据说是俄国向土耳其政府告发了此事。5月20日，安德拉西同意取消该条款。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顾虑或许是真的。然而，他很明白，有三个分布得很广的伊斯兰地区抗拒柏林协议，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自己的伊斯兰臣民。

这三个地区中，波斯尼亚起义的规模最大，起义分子达9万人，主要是伊斯兰和东正教徒；他们在土耳其正规军和阿尔巴尼亚志愿军的支援下态度强硬，抗拒哈布斯堡的军队进入该地区。只有罗马天主教徒居民稍稍表现出热情来欢迎哈布斯堡军队。东正教徒要求同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联合。伊斯兰的要求则不十分明确，其中有许多人对土耳其政府1875年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他们并不要哈布斯堡的统治。占领军由一位克罗地亚将军率领，经过数周激战，起义被粉碎。然而，由于起义已为举世皆知，使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政府威信扫地；由于镇压极为残酷，也使政府在这两个行省声名狼藉。苏丹虽超然于这次事件之外，但他的统治权和他作为伊斯兰居民领袖的权力，在四月协议中得到了承认。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规定都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在起义失败之后，整个行政机构都主要由克罗地亚的官员按照奥匈帝国的制度加以改造，所以1882年又爆发了新的起义。

对伊斯兰起义分子中地位最卑贱、结局最悲惨，而且由于靠近首都因而最易受到打击的那一部分人，即波马克^[15]，无论苏丹或土耳其政府也都未能给予任何帮助。所谓的“罗多皮起义”从1878年4月至10月断断续续地发生，其领导人是一个英国血统的冒险家。在马里查河以南的山区，起义者竭尽全力抵抗俄军，保护从作战地区以及从保加利亚人的敌对行为下逃出来的伊斯兰难民队伍。武装人员一度曾多达5万人，并成立了一个“波马克临时政府”，发表了宣言，据说还曾在君士坦丁堡派有代表。俄国军队和保加利亚民兵的大规模残暴镇压

使起义遭到致命打击。有迹象表明，土耳其政府对这样一次虽然在保卫土耳其领土却是自行其是的运动，既是鼓励，同时也感到害怕。

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其规模更大，更引人注目。那里开始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族运动，尽管俾斯麦对此予以否认。在1878年以前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即不断发生，不过这些起义只是由于征税、征兵和未开化的山区人民顽强抗拒中央集权的压力而引起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政治纲领。圣斯特法诺条约建议把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地区并入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的新疆域。为此，阿尔巴尼亚各地区的领导人于1878年6月初在普里兹伦集会，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保卫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联盟”，1878年6月15日，他们向柏林会议递交了一份旨在保卫阿尔巴尼亚人权利的决议。此后为维护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具有3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抵抗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柏林条约借以保持列强之间的和平的，是一种复杂的、并不牢靠的妥协办法；除非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新的边界被各方所接受，否则就会再次引起争端。塞尔维亚在未遇到挑战的情况下占领了划给他的一些阿尔巴尼亚地区，但阿尔巴尼亚的部落成员于1878年9月发动大规模的战斗，阻止门的内哥罗军队进占古希涅和普拉瓦。此后两年中，列强打算重新划定疆界，也因阿尔巴尼亚人的敌对行动而均告失败。以阿卜杜勒·弗拉谢里为首的保卫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联盟的一个南方分部，拥有3万武装部落成员，他们同样坚决地反抗希腊人在伊皮鲁斯的领土要求。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训是，如果列强僵持不下，坚定的巴尔干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会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

由此而产生了第二个重要的特征：这就是，土耳其政府无力利用这个主要是伊斯兰参加的运动来为它自己谋利。诚然，土耳其政府一度曾对阿尔巴尼亚人不妥协的态度表示欢迎，以之作为延缓不可避免的让步的一种手段；国外也普遍认为保卫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联盟是土耳其政府预先就策划好的工具。但是，随着1880年斗争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让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了——门的内哥罗人终将得到已经许诺给他们的东西——而且，保卫民族权利联盟很可能不仅把斗争危险地继续下去，而且将会激发民族自觉，从而对苏丹本人的权力形成威胁。另一方面，苏丹又不愿失去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

的支持。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由于君士坦丁堡的意见分歧而更加严重。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的官员似乎比苏丹宫廷中的近臣更倾向于镇压阿尔巴尼亚保卫民族权利联盟。在1880年10月英国威胁要夺取士麦那后，苏丹才最后同意采取坚决行动。未经过激烈战斗，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就被由德尔维希·多尔古特帕夏率领的一支强有力的正规军所粉碎。

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第三个特征是，像柏林会议后几乎各方面的发展一样，它也加强了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奥匈帝国巩固了它对波斯尼亚的控制后，决心阻止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的扩张，保持从波斯尼亚和新巴扎尔行政区经由马其顿通往萨洛尼卡，以及经由斯库台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商路畅通无阻。英国和奥地利破坏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中规定建立的包括阿尔巴尼亚科尔察省的一些地区在内的大保加利亚计划；但是，列强在格莱斯顿的领导下于1880年9月举行了支持门的内哥罗的海军示威之后，格莱斯顿虽然曾一度认真地想支持阿尔巴尼亚争取自治的行动，但英国已经很难再被当作一个朋友来看待了。由于俄国公开反对阿尔巴尼亚成为反斯拉夫影响的中心，土耳其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人关于建立地方学校、任用地方官员、建立代议机构以及减免税收等要求的疑虑也日益增加，在此后的20年中，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来反对奥地利对西巴尔干各国的统治了。在1881年6月18日关于三皇同盟的谈判中，奥地利已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放弃同英国的合作，并可依靠俾斯麦而使俄国保持缄默了。尽管奥地利对俄国的敌视态度和俄国奸细的阴谋活动表示不满，但是有一点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在此后若干年内，处于守势的是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此期间，在1881年12月20日颁布的关于清理欧洲债务问题的穆哈兰敕令^[16]中，苏丹又一次表明，他非常明白他不得不因财政拮据而做出多大让步。柏林会议后，他在财政方面最迫切的需求便是与君士坦丁堡的各地方银行做出一项临时性的安排。这些银行曾经主要以安排其担保颇成问题的短期贷款和谈判成一项国防贷款（伦敦的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为对俄国进行战争提供了经费。柏林会议之后，外援暂时中断。1878年12月英国下议院的态度使得从英国得到贷款的希望全部落空；法国通过托克维尔伯爵提供贷款的尝试到1879年3月也告失败。苏丹既借不到内债，也借不到外

债。索尔兹伯里说风凉话道：“忍耐和破产将使他老老实实地做人。”“不错，他确实得不到贷款，但没有贷款对专制君主也许要好些，因为他只会用它来修宫殿和造军舰。”可是，总是采取一些措施。第一步是同地方银行做出临时解决办法，1879年11月10日达成一个协议，将某些税收给予各银行，满足了它们的要求。不过，土耳其政府保留了把这个协议纳入更广泛的协议中去的权利，而在1880年似乎已经放弃了不再继续让步的一切希望。正当门的内哥罗危机达到顶点时，土耳其政府在1880年10月3日的照会中提出了一个解决财政问题的全面建议，虽然这种巧合似乎使得对土耳其的许诺极不放心的列强低估了这些建议的意义。但是，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各个外国债券持有者的全国性集团都指派了代表，于1881年9月在君士坦丁堡开始进行讨论。债券持有者要求得到充分的赔偿，而土耳其政府则决心避免承担这种倾家荡产的义务，和提供使土耳其丧权辱国的偿付保证，结果双方取得了妥协。一方面把全部债务从1.91亿英镑缩减为1.06亿英镑，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又“绝对而不可更改地”让出了许多项税收，直到债款全部还清为止。这些税收包括1879年11月10日协议规定拨付的税收，再加上某些直接税和从保加利亚贡赋中得到的收入，塞浦路斯和东鲁米利亚的税收，以及根据柏林条约的规定各继承国应付给帝国政府的任何收入。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涉及面甚广的解决办法一直拖延到关于柏林条约悬而未决的谈判结束后才实现。苏丹顽固地对抗列强，等于警告他的债权人：土耳其走的不是埃及那条以一个国际金融管理机构为幌子的路子。并没有建立像柏林条约第十八号议定书所设想的那样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土耳其的财政，而只是建立了一个由债券持有人的各个全国性集团的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其中也有土耳其的代表。另一方面，这个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和保证；有人担心它会像先前那些机构一样不起作用，但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敕令规定建立一个设在君士坦丁堡的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征收和管理让出的各项税收。全部收益扣除管理费用后，均根据它的指示而用于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委员会议事时有咨询权，但明文规定，“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委员会在它认为合适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任命、雇用和解雇政府官员。在此基础上，管理委员会在以后的20年中继续使债券持有人感到满意，并且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涉和阻挠。

但是，阿卜杜勒·哈密德在付出代价保住了他在欧洲的残余领地之后，就专心致志于千方百计保全他的性命和他那勉强维持下去、再也不能指望使帝国永世长存的权力。阿卜杜勒·阿齐兹那种愚蠢至极的风头主义和飞扬跋扈的暴虐作风，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实行的半心半意和敷衍了事的改革，已由一种警察统治所取代。它对政治家们的唯一要求就是谨小慎微。苏丹对于列强之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貌合神离，以及究竟应向它们做多大的必要让步，都掌握得很有分寸。在70年代最主要的教训是：在所有列强中，唯有俄国的耐心是有限的。因此，俄国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满足，而苏丹很快也就发现俄国已经打算把他弃之不顾了。但是这也意味着苏丹不得不把他自己的许多心怀不满的臣属弃之不顾，从而增加他的国内政策的消极性质。1879年夏俄国军队撤离巴尔干半岛时，苏丹未能将他自己的军队进驻巴尔干山区，这样他就丢弃了他从柏林条约中得到的主要好处。这就等于承认，任何对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的挑战都是徒劳的，而据估计俄国是憎恨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的；虽然直到1885年，土耳其一直控制着东鲁米利亚，但土耳其并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去巩固它在那里的地盘。1885年9月在菲利波波利斯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之后，两个保加利亚自行宣布联合，尽管沙皇为保加利亚人胆敢自行其是的行为所激怒，纠集了三皇同盟以图维持现状，但苏丹却未进行干预。由此引起的保加利亚危机在此后3年中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而在这次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是土耳其政府始终抱消极态度。它所采取的很少几次积极行动之一，是1886年9月试图阻止任命敌视俄国的威廉·怀特爵士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8年之后，亚美尼亚问题引起了一场国际危机，在某些方面与保加利亚危机类似。如同1876年在保加利亚一样，1894年亚美尼亚山民在萨逊地区发动的一次考虑不周的起义，被哈密德的军队所粉碎，接着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列强的干涉走得很远，竟至在1895年5月提出了一项改革计划，而苏丹于10月间也接受了这项计划，但是他同时又授权进行屠杀，据信在这场屠杀中有8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这说明他对这些国际干涉无动于衷。1896年8月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屠杀规模虽较小，但也同样举世皆知。在亚美尼亚人对奥斯曼银行进行了一次袭击后，土耳其暴民在首都杀害了约6000名亚美尼亚人。革命派的领导人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以为只要他们遭到报复，外国就会进行干预。然而由于俄国的反对，外国不可能进行干预。比起“忘恩负义”

的保加利亚人来，亚美尼亚人与俄国革命团体的联系甚至更多些，在沙皇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去干预土耳其镇压一个并不希望得到泛斯拉夫或东正教感情支持的运动；何况这个运动如果获得成功，很可能会削弱土耳其这个有助于对付西方的缓冲国。英国人更加积极地敌视土耳其，但最终并不那么可怕。苏丹断定，旨在促进实施边界协议和在亚洲部分进行改革的1879年10月和1880年9月的两次海军示威，只有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才可怕。1880年8月苏丹问道，而且当1895年亚美尼亚危机期间英国人的愤怒有增无减之时他更有把握地问道：皇家海军的舰只难道能登山吗？为了一步一步摆脱英国的监护，他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控制埃及的最后一个机会。他举棋不定，直到1882年才对埃及进行干预，但为时已晚。英国于1887年提出有条件地撤出该地，也遭到他的拒绝。这种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不过，英法两国虽然在1897年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发动反土耳其的骚动之后，曾与其他海军强国合作，于1898年4月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但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自1889年起对土耳其明显地表示友好（苏丹从1880年起就一直在寻求德国的支持），法国的兴趣也在于挫败英国，而不是与土耳其政府为难。

然而，在大国当中唯独奥地利能够利用土耳其在巴尔干分崩离析的局势。它在国王米兰的协助下控制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80年代初期，希腊曾与它接近，企图结成联盟；罗马尼亚在1883年被拉进了一个秘密的反俄联盟；1881年后，俄国甚至在保加利亚也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守势。1880年，波斯尼亚加入了奥匈关税同盟。1888年8月，穿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巴尔干铁路干线连接了起来，从而有助于奥地利向巴尔干半岛的进一步贸易渗透。英国人之所以处于有利的贸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运费用低廉，而且可到达爱琴海沿岸各港，而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的地盘一天天丧失给了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北部和保加利亚经营工业品的奥地利商人。而奥地利商品虽然往往质量较差，但通常价格较低廉，推销技术较好，而且较容易获得信贷。马其顿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实行苛政的最后一块重要的地盘，也是不久将来显然要进一步出现危机的地方，在这里，奥地利也占据着支配地位。在一些小国当中，人们认为，马其顿有朝一日将并入它们之中的某一个，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些小国不能同意任何瓜分计划，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根据经济、文化和历史上的理由来力图加强各自的要求。奥地利无意去鼓励这些野心的

发展。它在1881年的三皇同盟谈判中很注意坚持要俄国停止在马其顿的宣传活动，它一度还曾准备怂恿国王米兰要求得到马其顿北部的领土，但以不致破坏奥地利自己的战略计划为限。这些战略计划的矛头显然是对准萨洛尼卡的，尽管马其顿南部从来不是奥地利在商业上有利可图的地区，但它仍在窥视该地。1903年8月终于爆发了马其顿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全面起义；对这次起义，奥地利和俄国在头年的冬季就已经预见到，并建议进行改革来加以防止。

阿卜杜勒·哈米德虽然排除了外国对帝国内政的干预，但他未能有效地利用这一点，因为他既不打算把权力交给别人，也不打算把他有限的财力用于长远的建设计划。土耳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不仅由于他大力搜捕实际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反对苏丹的阴谋分子，而且由于苏丹本人对国家事务，特别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一点也不放松地加以监督；在行政工作中，不论巨细，事必躬亲，修桥铺路，任命低级外交官员，审阅警察关于无数普通公民的私人生活的报告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占去了这位专制君主的大部分时间，而无暇顾及重大事件。审查制度无孔不入，十分严厉，对高级官员的怀疑甚于以往任何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是一方面对挥霍无度熟视无睹，一方面又不得不过分吝啬。宠臣们依然是高官厚禄，士兵们则仍旧薪饷无着。但总地说来，苏丹对谁都不大信任。大臣更迭频繁，可疑分子每遭流放，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办事效率的提高。这些当然并非是土耳其政府的新特点。宫廷和政府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什么新特点，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凡属公共生活和政策方面的事务不论大小均亲自控制的做法，算是给这种无效的制度又增加了新的花样。如果不是苏丹案头的文件累积如山（这还是经过秘书们初步转出和选择过的）、问题积压成堆的话，这种由宫廷秘书处治理国家的做法，与由毫无效率可言的帝国政府治理国家的做法相比，本无所谓好坏。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位后期的首席秘书是达赫辛帕夏，他忙于设法独揽苏丹的一切事务，并排挤他的敌手、副秘书伊泽特帕夏·阿比德。宫廷秘书处里还有其他一些官员，通常是昙花一现。他们为苏丹效力并一味阿谀逢迎，随着苏丹的喜怒而浮沉；他们为苏丹在各部中安插密探，源源不断地把苏丹臆想中的敌手搞阴谋诡计的种种传闻向苏丹告密，使苏丹时而如释重负，时而忐忑不安，从而更多地耗费了每个人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无可否认阿卜杜勒·哈密德在重建中央权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尽管除了顽强地抵抗内外压力之外，很难说他的政策有什么雄才大略。他的政策一时获得成功，是由于列强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他分裂了列强。另外，当时国内还没有能够起作用的反对派，因而国内那些批评他的人还没有可以利用的力量。而同样的情况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苏丹曾有过喘息的机会，可以用来建立人们对其政权的切实可靠的忠诚，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时机。

从苏丹即位之时起，就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强调他作为哈里发^[17]的地位，自称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权威。这虽然像俄国的沙皇自称有权保护苏丹治下的东正教徒臣民一样没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种努力的目的在于给列强，特别是英国制造困难，使之不敢轻易向一个在感情上受到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支持的土耳其寻衅。确实，这种政策除了起自卫的作用外，也再无其他目的，因为苏丹也绝对无意追求在政治上控制在宣传中提到的印度人、马来人、中亚土耳其人、波斯人以及帕坦人。90年代青年土耳其党人对苏丹的指责之一，就是他未能有效地利用哈里发的地位。他在自己的疆域内，实实在在地为伊斯兰居民做一些好事，其中包括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许多小学，1900年以后又修筑了汉志铁路等等，这些都超出了人们通常对他的评价。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工人往往觉得受到他们的敌手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愚弄，看来完全愿意把苏丹当作自己的保护人；1896年在首都大规模杀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就主要是搬运工人公会干的。然而，当苏丹的伊斯兰臣民不再以那种传统的和多少认为是命中注定的忠心对待苏丹时，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怨恨就日益加深；而且如同他的两位先王一样，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王位也正是丧失在他自己的伊斯兰臣民手上。

但是，一直到19世纪末，他总算使他的敌人未能得逞，而这些敌人显然并非都是他臆想出来的。阿里·苏阿维在1878年试图营救穆拉德五世，只不过是新奥斯曼党人最后一次孤立无援的行动；此后直到80年代末，新的革命运动的迹象才开始出现。1889—1897年间，一个以推翻苏丹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在君士坦丁堡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个团体同流亡在国外、主要是在巴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关系密切。阿卜杜勒·哈密德在与这两个集团的第一次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君士坦丁堡的革命团体大概成立于1889年，成员是首都军事医学院的学生。这

个团体的第一位领袖易卜拉欣·特莫是阿尔巴尼亚人，曾在意大利与共济会会员有过接触，因此试图按照烧炭党的模式来建立他的团体。其成员迅速扩大到陆军学院和海军学院以及其他公立学校的学生。当局很快就获悉有这样一个团体，逮捕了一些人；但这丝毫未能阻止其继续发展；更多的知名人物参加了进来，并开始在学校以外吸收成员。最后，该团体过分自信起来，竟计划于1896年8月发动政变，但就在行动的时刻之前，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全部被捕，这才使该团体的人大吃一惊。这虽然是由于苏丹的密探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令人痛心表明这些密谋者还不老练。苏丹在以后的一年中取得了一次更大的成功。这不是别的，而正是国外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垮台；该运动内部的分裂倾向是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但并非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这个时期两位最杰出的人物艾哈迈德·里扎和穆拉特贝伊，在他们的缺乏想象力的政治纲领上并无多大分歧，他们认为，除阿卜杜勒·哈密德之外，从根本上来说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除掉哈密德，恢复米德哈特的宪法，改革政府机构，那么，帝国就能保护法律不受宫廷的侵犯。“东方的坚韧性能够创造奇迹”，穆拉特在1897年写道，“群众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稳健而又忠诚的，他们的罪过就在于盲目服从声名狼藉的政府当局”。穆拉特认为不能没有苏丹，他说：“没有苏丹，就没有土耳其国家。”他是一个泛伊斯兰主义者，而艾哈迈德·里扎则是一个虔诚的孔德主义者，他的实证主义信念使他坚决反对暴力。然而，恰恰是穆拉特这位革命暴力的鼓吹者和反对艾哈迈德·里扎的渐进主义观点的公认领袖，突然同国外的几乎全体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道放弃了斗争。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卜杜勒·哈密德最亲信的密探之一艾哈迈德·杰拉勒丁帕夏的勤奋努力。他发现穆拉特私下怀有和解和回国的愿望。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大部分流亡者都同意放弃他们的宣传活动，以换取一些关于实行改革和逐步实行大赦的空洞诺言；于是包括穆拉特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种安排被说成是一种休战，穆拉特则被说成是人质；但他变成了苏丹豢养的帮凶，而严峻、不肯妥协但能力不大的艾哈迈德·里扎则继续同少数追随者一起几乎是孤立无援地进行宣传活动。

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十分奇特的方式苟延残喘到20世纪。在许多外国的首都，它都受到诅咒，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它又为人们所容

忍。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80年代在国外树立起来的相当高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但他在回顾90年代时，仍然可以把它当作为自己辩白的证据，因为他凭着他的本领使自己免遭国内外敌人的蓄意谋害。直到1907年重新抬头的土耳其各民族主义团体几乎是偶然地联合起来以后，哈米德的专制统治才最终受到严重的威胁。

（许明龙 译）

[1] 1856年颁发的敕令（Hatti-Humayyoun），一译“哈特-伊·胡马云”。——译者

[2] 米勒特（Millet），奥斯曼帝国时期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伊斯兰宗教集团的称谓，意为“奥斯曼帝国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或民族”。——译者

[3] 雷亚（ra' iyeh），奥斯曼帝国对一般纳税的臣民的称谓。——译者

[4] 指土耳其帝国。——译者

[5] 即今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译者

[6] 贝伊（Bey或Beg），奥斯曼帝国贵族或王室成员的尊称，地位次于帕夏，后地方上的首领亦称贝伊。——译者

[7] 萨多瓦（Sadowa），即科尼格雷茨，普奥战争中普军于1866年在此击败奥军。——译者

[8] 霍夫堡（Hofburg），奥地利皇宫的名称，此处指奥地利宫廷。——译者

[9] 伊利里亚（Illyria）为古代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的名称。——译者

[10] 阿格拉姆是萨格勒布的德文名称。——译者

[11] 即今土耳其埃迪尔内。——译者

[12] 今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土耳其名称。——译者

[13] 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的德文名称。——译者

[14] 塔菲政府存在时间较久也较稳定，被人们称为“铁环”（the iron ring）。——译者

[15] 波马克（Pomaks），即保加利亚的伊斯兰。——译者

[16] 穆哈兰为回历之1月。——译者

[17]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译者

第十三章 俄国

在所有的欧洲列强中，俄国对19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精神所做的让步最少。直到1906年，沙皇仍然是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他可以不经各部大臣同意，随意制定和废除法律，大臣们只对他一人负责。争取宪政改革的努力遭到专制政体的两大堡垒——官僚阶层和地主贵族中保守分子的顽固反对。沙皇政权的存在最终所依赖的，是构成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政治上的迟钝。近代思想传进俄国农村的速度很慢。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沙皇仍然是一个近乎神一般的人物，认为他关心着他们的利益，并且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他的统治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广大民众和极少数有教养的人之间，横隔着一道社会和文化的鸿沟。这一批高贵人物，力量如此之大，威望如此之高，似乎是坚不可摧的。但事实上它即将堕入深渊。俄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中间集团，他们充当了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但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始终没有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迫使政府做出让步。然而，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后不久，专制政权及其反对者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就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亚历山大的统治（1855—1881年），以一派吉祥景象开始，着手进行广泛的社会、文化和行政改革计划，但却以一场毫无收获的战争和一阵革命暴力的浪潮而告终，沙皇本人也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这种悲剧结局可以部分归咎于亚历山大本人不能贯彻始终。他之所以进行改革乃是出于环境所迫，而非由于信念所致。他用心良好，但意志薄弱，因此，那些只关心维护自身特权的、人数虽少却很有势力的反动集团一旦对他施加压力，他就轻易地屈服了。1863年波兰起义，3年后，又有人打算对他行刺，在这以后，他就变得更不愿意冒险了。改革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程度上已经缓和很多，步伐也大为放慢。沙皇迅速失去了公众最初对他产生的信任，同时事实证明，他半心半意向之寻求支持的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主要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笔资产。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情况变得很明显：如果俄国要想取得进步，或者仅仅想要保持其大国地位，首要的一点就是解放当时仍然完全依附于私人地主的2250万受苦的农奴。1861年2月19日^[1]颁布的《解放农奴诏书》成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了。但是，实行这场大改革的动机，仅仅是由于为国家着想，而不是出于对农民福利的无私关怀。它是比较开明的官僚与贵族当中的反动分子互相妥协的产物，前者力求保证被解放的农奴至少有能力恪尽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后者则力图让他们为获得自由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2200万国家农民^[2]和200万采邑农民^[3]作为单独立法的对象，一般都获得了较好的规定条款。因为对于这部分人，改革者没有像贵族的那种利益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对于以前的农奴说来，解放办法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他们要同农奴主签订契约，按照不同的地区，取得面积各不相同的分配地。这些分配地一般都少于他们当农奴时为了维持自身生活而耕种的小块土地，平均面积不到3俄亩^[4]，在人口稠密的中央黑土地带则更少。它们主要是耕地，因为地主为自己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这些分配地必须按照已经上涨很多的、根据以前缴纳的租金算出的价格来赎买，而这类租金同土地的市场价值或可能的产量都毫不相干。赎金通过村社（“米尔”）分期偿付，在付清债款以前，土地归村社公有。可能要经过长达49年之久的一段时间以后，农民才能说，他的土地是归他自己所有了。在签订契约以前，农民仍然有义务像原来那样向地主缴纳租金，或者服劳役。许多农奴迟迟不愿签订条件如此苛刻的契约，因此，迟至1881年，还有15%的从前为人私有的农民，除徒有其名外，实际上依旧是农奴。

村社仍保留着，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方便的财政和行政管理组织，另一方面是因为相信它会防止形成一个贫困无地的无产阶级。但是，村社制度的鼓吹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不管这种制度可能具有什么社会优点，它在经济上却是倒退的。它使古老的三田轮作制延续下来，根据这种耕作制，每户人家只能在不同的地块里拥有一些零散的小片土地，这些土地定期重新分配（至少在大俄罗斯是这样），以保证在各户的人力物力和应尽的义务之间大致保持均衡。这样一来，比较有进取心的村社成员就失去了改良土地的推动力，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这些土地。农民天生具有的个人主义本能遭到了压抑，或者转入了

不正当的投机渠道。村社当局严惩那些拖欠税债或在其他方面触犯法律的村民，并负责发放通行证，没有这种通行证，村民一律不得离开村庄外出旅行。农民要想出售分配地或退出村社，更是困难重重。在村社之上设有乡（沃洛斯特）公所，它被设想为农民的自治机构，但实际上往往蜕变为庞大的官吏阶层的驯顺工具，而这些官吏大多数是从握有乡村最高权力的土地贵族中任命的。农民仍旧构成一个单独的“等级”，可以把各种歧视性立法，任意强加到他们头上。他们虽然不再是农奴，但并没有变成公民。

农民获得解放的苛刻条件，加剧了由于乡村人口的迅速增加而正在发展的危机。当时，单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农村人口就由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5000万人左右，增加到1897年的8200万人，而不论是农业生产率，还是其他就业机会，都没有相应地增长。拖欠的税款数量愈积愈多，富庶的产粮区萨马拉1873年又发生了灾荒，这些都成为动乱日益临近的迹象。农民们本能地感到，只有把地主的田产夺过来，分给缺地的人，才能最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到处流传着有一份所谓“金敕书”的谣言，据说沙皇在这份敕书中准许他们以暴力夺取按照权利来说应当属于他们的东西。暂时还没有发生叛乱，但是在俄国农村平静的外表下面，暴力行动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地主对解放农奴也怀有他们的不满。按照偿付赎金的规定，应该缴纳给他们的金额，一半由国家扣下来以供偿清旧债，而他们收到的债券的市场价格，则急剧贬跌。一些人任意挥霍他们的资财；许多人不再经营农业；有技术和决心以及必要的资金去改革自己庄园的经营管理的人寥寥无几。由于劳动力丰富，他们就往往容易想至少在表面上竭力保持昔日的荣华。地主贵族已经是一个没落阶级。只有在南乌克兰发展了一些比较繁荣兴旺的新的大农庄，专为西欧市场生产粮食。20年内，出口量增长了4倍，但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产量仍然很低。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北美的竞争造成了俄国农业的不景气，使地主和农民都遭到打击。

俄国陷入了恶性循环：农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从而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缺乏，又使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过剩的农民人口——无法被吸收。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工业的发展在解放农奴后的25年内仍然没有起色，和西欧同时期的工业发展相比尤为逊色。采矿业和冶金业的主要中心依旧在乌拉尔地区，而其技术之

陈旧是闻名遐迩的。到1880年，俄国的煤和生铁产量只分别达到400万吨和50万吨，工业劳动力的人数不足50万，而且几乎全部是非熟练工人；许多工人仍然拥有土地，每年都要回农村去参加收割。雇主为了弥补生产效率的低下，便求助于大多数工业国在工业化初期常见的那种加强剥削的办法。工资很低，而且日趋减少；劳动时间长而且工厂的条件普遍恶劣。国家至今并没有干预这类问题，但是一旦出现工人闹事的任何迹象，警察却行动迅速，立即进行镇压。

经济领域最令人鼓舞的发展，就是这时已经着手实行修筑铁路的宏伟计划，因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不便，一直是经济进步的一个主要障碍。1861年，铁路的总长度还不足 1000英里，20年后，却达到了13000英里以上。这时，铁路的交通网把各个主要产粮区和新旧首都以及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都连接起来。不过，为这一成就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财政大臣M. 冯·路特恩为限制政府开支着想，赞成由私人公司在外国筹集资本来修筑并拥有铁路。财政部通过提供有保障的优厚利率和给予其他种种特别有利的特许权，千方百计地吸引投资者，但由于当局昏庸涣散，投机和贿赂之风盛行。

路特恩的自由放任政策，受到政府官员猛烈的抨击，但他根据财政上的理由，为他的做法辩护。从外国筹集贷款，可引进外国资本并有助于克服当时存在的通货奇缺。自由的资本积累，迄今一直为国家的庞大开支所阻碍；路特恩这时宣布他的目的是要“把新的血液注入已经干涸的商业动脉”。一个分布广泛的私人银行网出现了。国家的收支账目公开了，财政部更加严格地控制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浪费性的开支。渐渐积聚了一笔储备基金，准备把纸币换成硬币——这是吸引外国投资者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路特恩激烈反对的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使得为一代人实现稳定的希望又被推迟了。战后的俄国，国债大增，年度预算出现一系列的赤字。

财政状况最严重的方面，是岁入经常无法保证，赋税制度基本上仍然没有改革，最沉重的负担继续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承担它们的人的身上。只对农民征收的古老的人头税，依然是直接税的主要来源，征收累进制所得税的想法，被认为带有危险的革命色彩而被抛弃。大部分岁入的来源，主要是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因此，俄国仍然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在这里，制定经济政策的人往往总是把特

权阶层的利益当作国家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导致大踏步走向普遍繁荣的希望破灭了。

亚历山大二世的其他改革，同样也没有实现原先许下的诺言。这些改革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并且常常半途而废，它们仍然有助于在一个具有“强权即公理”的传统的国家中，普及对法律和个人尊严的尊重，而且由于培养起一种彼此都是公民的情感，也有助于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它们具有比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更为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对中央政府的组织没有做任何变动，官僚结构因而也就丝毫没有触动。而且，改革的势头也没有保持下去。

最重要的变革发生在司法机构和地方政府方面。俄国的司法一向以其武断专横而臭名昭彰，因此，很少有人怀疑彻底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解放农奴的措施，使千百万迄今几乎完全听任主人生杀予夺的农奴，获得法律权利以后，情况更加如此。1864年颁布的若干法令，相当广泛和开明，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各法院之间的关系都做了明文规定，并予以简化；案件都按照现代诉讼程序公开审理，被告是否有罪，由陪审团决定；原来的法官常常是愚昧无知而且贪赃枉法，现在则挑选法律界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并规定法官终身任职，以保障他们的独立地位；为防止警察在审查嫌疑犯时滥用权力，而采取了若干措施；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律师开业，并按照西方的做法拥有自己的自治组织。

这给司法管理的真正革新带来了希望。但是，第一，改革进行得缓慢，而且在某些偏僻的或政治上敏感的地区，则始终没有充分实行；此外，还存在着若干漏洞或疏忽。从地方贵族中推选负责审理农村地区小案件的“治安官”，并没有完全纳入新的司法体系；他们按照当地五花八门的习惯断案，对于他们的判决，也没有地方上诉。第二，改革者们并没有彻底修改早已过时的刑法典，他们只满足于缓和某些刑罚的严厉程度。一些最残酷的肉刑被废除，但是根据法庭的命令，仍然可以拷打农民。第三，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新司法体系未曾涉及的方面。官吏只是在他们上司同意下，才能被传到庭。枢密院被认为是公民防止行政机构滥用权力的主要依靠，但枢密院的组成并未加以改革，其成员仍然是一些被指派的年老政客，他们办起事来，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很少考虑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政治嫌

疑犯仍然可以不经审讯而被长期拘留，或者不经由法庭只凭一纸“行政命令”就被流放。宪兵队或保安警察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犯人，处境极其艰苦，受尽残酷的折磨。正是在库页岛的矿山里或施吕塞尔堡的土牢中，沙皇政权显示了它最黑暗的一面：在这些地方，地位低微的小官吏成了至高无上的土皇帝，而法制则几乎荡然无存。

在一个官僚阶层如此掌握大权的国家，独立的司法机构，反而成了某种反常的东西。法院和行政机构之间，很快也就发生了冲突。1867年，大力推行改革的司法大臣D. N. 扎米亚金被免职，由极端保守的K. I. 巴伦继任。反动报刊不断地攻击律师是潜在的颠覆分子，陪审团是不伦不类的西方舶来品。司法部门很快便被迫退居守势，但是法律界依然对官僚阶层破坏或玩弄法律的种种行为进行顽强的抵抗。改革一旦获准进行，便不能轻易被取消。

1864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前进的步骤。它规定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和各州（边境地区除外）都设立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地方自治会有一个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会议所任命的常设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由地主、农民和集镇居民分别开会选出。1870年，在大多数城市建立的市代议机构，其宗旨及组织结构，大致和地方自治会相似，但是由于城市人口比较少，这些机构的重要程度比不上乡村的地方自治会。这些机构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们给以前的农奴和以前的农奴主一个合作的机会，从而在分裂俄国社会的鸿沟上架起了一道脆弱的桥梁；第二，它们鼓励那些至今一直习惯于指望某个远方的、握有全权的当局主动地替他们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们，能够开始（至少是在地方性的问题上）为自己着想并采取行动。地方自治会鼓励人们拥有广泛的政治抱负，因而被大多数自由派认为是走向立宪的第一步。政府深知这将意味着什么，因此谨慎地把地方自治会的职权仅限于过问教育、卫生、筑路和救灾等问题，并把它们的活动置于官僚阶层的严密控制之下。各个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不准聚会协调政策，即便是在纯技术性的问题上，也不容许这样做。他们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向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民征税来获得经费。把持着大多数地方议会的，都是思想保守的贵族，他们对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置之不理，总是设法想要削减开支。不过，还有不少地方自治会的领导人，以堪作楷模的理想主义精神，致力于促进民众的

福利，但当他们的工作愈来愈频繁地受到官方的干涉和阻挠时，他们也就心灰意冷了。

尽管存在着这些巨大的障碍，地方自治会的实际成绩，仍然是远远不能忽视的。它们明智地集中力量同乡村中几乎是全部文盲的现象做斗争。到1881年，他们已经办起了将近1万所小学。这至少是一个开端，虽然这些学校的质量不高，而且办学的主要负担，都落在乡或村的行政当局身上。不管某些农民集体是多么渴望获得知识，但他们都负担不起很多费用。教育的普及程度，各地差别很大。一般地说，最贫困的地区，学校的数目也最少。这仅是地方自治会的工作缺乏中央协调的许多方面的表现之一。

在这项至关重要的活动中，它们从政府那里遇到的障碍多于鼓励。1866年，代替自由主义者亚·瓦·戈洛夫宁担任教育大臣的德·安·托尔斯泰，是一个心胸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官吏，看不起任何敢于反对他的政策的人。他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普及知识而是扑灭革命思想。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督学队伍，在各省充当他的代理人。由地方自治会选举的地方学校管理委员会经过改组，被置于一个贵族代表的监督之下。

中学里感觉到的反动趋势更加严重，由于中学一般都是教育部办的，所以更加容易控制。争议最大的措施，是修改教学计划问题。按照修改后的规定，花在学习古典学科上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托尔斯泰的提案虽然遭到许多著名官员以及广大公众的反对，却获得了沙皇的支持，因此，即便是在国务会议上遭到了坚决反对，也未能阻止它变成法律。古典课是以一种特别迂腐的方式讲授的，当局几乎是好像认为用拉丁文动词无穷的变化，就可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去注意那些带有可怕的达尔文进化论含义的自然科学。这样做的结果，也就非常自然地使俄国青年加速转向唯物主义。托尔斯泰原则上也并不反对讲授科学，事实上，他还比较有效地促进了这方面的工作。他所考虑的主要是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他在古典的“文科中学”和非古典的“实科中学”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并且规定只有从前一类学校毕业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希望借此来保证大学生的成分更可取和更可靠。

事实上，正是在大学里，托尔斯泰失败得最惨。由地方上的种种不满引起的学潮，很快便具有一种政治色彩，使得涌入激进派阵营的人与日俱增。政府起初试图进行镇压，后来又设法以允许大学内部充分自治（1863年）来解决问题。但是，大学生的反抗情绪始终存在，1866年4月，发生了大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独自一人企图行刺亚历山大的事件。这就导致政府采取了托尔斯泰的更着重镇压的政策，他成立了若干官方委员会，制定出种种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徒劳无益，因为大学当局死抱住1863年给予他们的权利不放。托尔斯泰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建议还没有被批准，他就在1880年4月被迫辞职，作为向舆论做出的一种姿态。

托尔斯泰所能采取的手段，本来不足以应付所有国家在某个演变阶段普遍面临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学中的问题：即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兴起的问题。大学生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除去地主和官吏的子弟外，传教士、商人、工匠偶尔还有农民的子弟也进入大学。到1880年，这些所谓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已经占大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知识分子素来喜欢进行抽象的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思考，作为这样一个悠久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成了对现状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思想的传播也由于报刊的发展（在1856—1865年间出现的报刊，数量等于前10年的10倍）和检查制度的放松，而变得大为方便了。根据1865年颁布的规定，政府仍保有勒令任何刊物停刊的权力，但它已不再怀疑舆论存在的权利，而作家们又是擅长于同法律斗智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都认为，亚·伊·赫尔岑的观点过于温和，因而抛弃了它，虽然他的流亡刊物《钟声报》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最初几年间，曾经在俄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现在宁愿追随和《现代人》杂志相联系的一些作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政治哲学是乌托邦理想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结合。他以其丰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据，发展了赫尔岑的这一观点，即俄国农民能够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建立起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制度，从而为西欧的无产阶级树立一个榜样。更加走极端的是德·伊·皮萨列夫的观点，他由于崇拜自我和反对公认的社会和道德约束，因而使激进派获得了“虚无主义者”的名称。另一个知名人物是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鼓吹者米·亚·巴枯宁，他那丰富多彩的个性，使他深受俄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然而，这些人打算从言论转向行动的尝试，却没有获得显著的成功。1861年，地下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在其成员与农民建立联系以前就被警察破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也在次年被捕。由于失去了领导人以及两个主要的激进刊物于1866年被封闭，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产生这种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知识界的情绪，在1863年波兰起义后，发生了变化。激荡着华沙的民族主义曲调，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回声。大多数俄国人都一致反对波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认为这是破坏帝国统一与完整的一次少数人策划的阴谋。人们纷纷支持政府。那些曾经玩弄议会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现在确认，实现这类想法的时机还不成熟；一些人埋头于新成立的地方自治会的实际事务，另一些人则参加了爱国主义的合唱。米·尼·卡特柯夫是一位曾经热烈欢迎改革的莫斯科最主要的宣传家，这时成了鼓吹新的民族主义最卖力的代言人。在伊·谢·阿克萨柯夫的著作中，早期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高尚的宗教理想主义让位于更粗鄙的民族至上的主题。莫斯科的报刊记者猛烈抨击据说是沾染了西方自由主义病菌的圣彼得堡官僚。他们宣称，政府必须保持强大，特别是要巩固它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只有这样，俄国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扩大它在亚洲的疆域，并且帮助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摆脱异族统治的桎梏。

对民族主义信条中泛斯拉夫主义这个方面鼓吹得最起劲的，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这类作家，达尼列夫斯基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概念应用到国际关系上，从而给泛斯拉夫主义贴上了一张时髦的伪科学的标签。但是，通常使用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一名称，根本不足以概括一个复杂的、其内容除巴尔干政策以外还涉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运动。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军队和外交界以及宫廷里，都有许多同情者。就连亚历山大二世也时常对他们表示赞赏，因此，虽然在俄罗斯人或其他斯拉夫民族中支持他们的人并不多，但这种在危机时刻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已足以补偿其群众基础的不足。

实现斯拉夫人统一的主要障碍是波兰问题。继残酷镇压起义以后，随即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目的是要削弱政治上不可靠的贵族并赢得农民的支持。此外，还制定了旨在消除波兰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宗教政策和教育政策。在曾经对起义者表示相当同情的俄国本

身的西部各省，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各省和乌克兰，潜在的民族对立情绪却发展了起来。

当1875年的巴尔干叛乱再次形成了“东部问题”的时候，泛斯拉夫事业遭受了一次更严重的挫折。俄国政府踌躇不决，一方面勉强参与国际合作以实现和平解决，但同时，又被民族主义情感的浪潮推入了单独同土耳其的斗争（1877年4月至1878年3月）。到这时，曾经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而大受损害的俄国军事声誉，通过亚历山大二世手下既精明强干而又思想开明的陆军大臣德·亚·米柳亭的几次重大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米柳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实行征兵制（1874年），因此，军官团便不再为贵族所把持，而且社会各阶级都要公平分担服兵役的义务。新的俄国军队由人数不多的常备军，加上庞大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军组成，具备了形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所需要的素质。但是，在这些改革还没有充分收效，而米柳亭本人又极不赞同的情况下，战斗的号角就吹响了。发动奇袭的有利条件失去了，统帅部原以为很有把握，轻而易举就能获得胜利，但这没有实现。军队仍然由于传统的指挥无能和后勤供应的低效率而深受其害。直到1877年12月，军事要冲普列文才被攻下，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才被打开。

由于这一胜利而得意忘形的最高统帅部，胁迫土耳其人签订了屈辱性的圣斯特法诺和约。但是，这项条约引起奥地利和英国的激烈反对，有几个星期，对英国的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亚历山大二世虽然一心想要以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他军事上的胜利，仍然不得不同意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来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根据柏林和约（1878年7月），俄国所获无几：在亚洲获得巴统和卡尔斯，在欧洲收回1856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俄国也没有能为它卵翼下的巴尔干国家提供多少帮助，保加利亚的领土被缩减到只有它原来提出的疆域的1/3（虽然仍旧为俄国的渗透保留了充分的机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得到了一些领土，但是没有共同的边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被奥地利占领。

柏林条约在俄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民族主义者谴责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但是，俄国外交失败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已经远远不足以让单独一个强国成功地进行扩张，哪里还有俄国的份？因为它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已经使得

它比过去更加依赖两个日耳曼人帝国的友好态度了。所以，经过几个月无益的孤立后，他便着手修补“三皇同盟”（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但由于巴尔干危机而遭到了破坏。1879年9月，他在亚历山德罗沃会见了威廉一世；两年后，这个联盟，由他的继任者以隆重的仪式，重新建立。从俄国的立场看来，联盟这时主要有助于保护俄国免遭英国的进攻。德、奥两国负责防止土耳其人允许英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来威胁俄国几乎是没有设防的黑海海岸。

在国内，战争的结局也使政府感到惊恐，因为由此而造成的痛苦和混乱，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已经非常盛行。一些激进分子为彼·拉·拉甫罗夫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所吸引，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更加令人神往的巴枯宁学说，但他们全都认为应该到农民当中去进行宣传鼓动。1874年夏季，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这一目的“到民间去”，然而，其结果只是很快就被警察逮捕，而且，警察有时还得到了他们打算去解放的那些人的合作。由于缺乏群众支持，革命派并未构成对沙皇政权的严重威胁，但是宪兵队为了自己从中渔利，往往夸大这种危险，使沙皇及其大臣不断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可是，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反而使革命派获得了一般公众的同情，而人们对俄土战争的强烈不满，更加强了这种同情心。至于民粹派本身，他们则被迫采取恐怖行动来进行报复。1878年1月，一个贵族出身的女青年薇·伊·查苏利奇为了给被监禁的一个革命同伴报仇而枪击一名高级警官。继她这一壮举以后，发生多起谋刺重要官员的行动，其中有一些获得了成功。但并非所有的民粹派都赞同这种策略，于是，他们的政党，1876年重新建立的“土地和自由社”，在一次议论纷纷的辩论中瓦解，那些赞同采取恐怖行动的人，在安·伊·热里雅波失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民意党”，该组织在其纲领中把刺杀沙皇列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对于政府要求公众给予支持的呼吁，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是小心翼翼地请求获得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沙皇既然给予保加利亚人以宪法，为什么就不能给本国人民以宪法呢？1880年2月，民意党在冬宫策划的一次爆炸，险将亚历山大炸死，这使惊恐万状的沙皇认识到，对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温和的同情者进行离间，将大有裨益。于

是，成立了一个最高执行委员会，它的领导人米·塔·洛利斯-梅里柯夫被赋予几乎是独裁者的权力。在为对付革命暴力而加强保安措施的同时，报刊、地方自治会和学校，却由于行政压力的放松而得到好处。这项政策的成功，使洛利斯-梅里柯夫得以首先解散委员会，同时为自己保留了内政大臣这一重要职位；然后，又进一步拟订了一项召集民选代表起草某些法律的复杂方案（1880年12月）。但是，这些建议（其特点是它们均系秘密拟订的）并没有达到足以使温和的反对派感到满足的程度，更谈不上平息革命派了。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最后批准这一方案后返回皇宫时，被一枚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成致命伤。

民意党的领袖们曾经希望，暗杀沙皇的成功即使不能触发一场农民起义，至少也会使政府大为震惊，从而会同意给予俄国以宪政自由。但这两种希望全都落空了。刺杀沙皇反而妨碍了民意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是一个严厉而专横的人物，以其忠实而勤于国事受人尊敬，但却缺乏想象力和智慧。他秉性保守，而且，由于父亲被暗杀而变本加厉，他认为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是前朝政府政策的软弱和不坚定。他立即着手消除革命的威胁，办法是加强他的君主最高权力，加强社会上每一级政府当局，并维护土地贵族的地位。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俄国社会既然历尽千辛万苦才挣脱了重重桎梏，要想强迫它再长期戴上原来的枷锁，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专制制度要想求得安全，取决于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农村日趋贫困和工业开始兴起所带来的种种紧迫问题，而在这方面，政府的行动是迟缓而远远不足的。

新沙皇的政见，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正教最高会议总监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主张。他以前是沙皇的老师，这时是沙皇的亲信。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个老朽的人物，根本不配充当俄国的俾斯麦。他对现代文明心怀憎恨，梦想在俄国复活一种死气沉沉的实行僧侣政治的社会，坚决不受诸如宪政或法治这类外来的西方思想的腐蚀。实际说来，他的纲领就是以警察手段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促进东正教的宗教教育，并使边境地区俄罗斯化。最初，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亚历山大三世还装模作样地要实行洛利斯-梅里柯夫提出的改革，但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成功地利用了他的恐惧和疑虑心理，说服他颁布了一道

诏书，宣称他“相信君主专制的力量和真理”，以预示不祥之兆的口吻暗示，他将把“秩序和正义贯彻到”他的父皇所确立的各种制度中去（诏书是 1881年4月29日颁发的）。

这是对自由主义派大臣们的直接挑战，他们纷纷辞职或被免职。但是，洛利斯-梅里柯夫的继任者尼·巴·伊格纳切夫是一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同情者，为波别多诺斯采夫所不信任。伊格纳切夫鼓励沙皇和民众直接接触，想用这种方法来加强君主专制。因此他鲁莽地批准了一项想入非非的计划，即准备模仿中世纪时的全俄缙绅会议，召开一次各等级的协商会议。波别多诺斯采夫立即利用这件事把他搞下台，代之以一个更加正统的保守分子德·安·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教育政策在前朝曾经引起舆论的极大注意。此外，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把一个俯首帖耳的伊·达·捷里扬诺夫安插在教育部。波别多诺斯采夫俨然成为俄国大权独揽的人物，可以任意干涉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其他各部，虽然他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政敌，他们极力阻挠和拖延他们所不赞成的那些极端反动的措施的实行。

新政府相当顺利地恢复了俄国政局表面上的平静。恐怖主义分子的领袖人物被捕获，政府不顾呼吁赦免的要求，将热里雅波夫及其4名同党绞死，其他人则被判处长期监禁和流放。那些设法逃往国外的流亡者，陷入了无谓的理论上的论争，而恢复恐怖活动的努力，未能得逞。英雄时代已经过去。绝大多数对民粹派抱有同情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时都认为，他们对民众事业最好的援助就是静静地埋头于自己的职业，并且从事法律所允许的那些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革命运动的衰落，很快也使自由主义派在地方自治会中的宣传鼓动工作销声匿迹。俄国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缺乏坚定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动向，随着革命潮流的涨落，时兴时衰。由于检查制度变得更加严厉，批评政府的大部分报纸杂志都被迫停刊。当局充分利用了许多温和派对谋杀沙皇事件的厌恶情绪，对政府的指示俯首帖耳的地方自治会重新陷入了过去对国事保持沉默的那种局面。

人们曾对之抱莫大希望的这些机构，这时已完全处于守势，只能小规模地开展它们的活动。德·安·托尔斯泰一度着手把它们并入各级官僚机构，但后来由于不得不考虑反对者的批评，才改变了他的计划。1890年6月的法律，扩大了各省省长和其他官吏的权力，特别是在批准选举结果及人事任命以及暂停执行被认为有损国家利益的决议等

方面。选举制度被任意篡改，以便削弱公民的选举权和进一步增加贵族代表的比例。1892年，在市政机关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托尔斯泰在1889年7月设立了“地方长官”，这使他的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长官由省长从当地地主中遴选，只对中央政府负责，从而成了俄国农村十足的土皇帝。他们通过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否决乡的或村社的大会决议，惩罚经选举产生的农民行政机构。曾经以断案公正赢得良好声誉的治安官制度，现在被取消了，他们的职权移交给地方长官。这就为专横行为开辟了道路，是在有意破坏已经由于损害法官的独立地位、限制陪审团的活动以及其他措施而受到威胁的司法系统的完整。但所有这些改革，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当贵族的经济力量正在不断和无可挽回地日趋衰微的时候，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是徒劳无益的。1885年成立了贵族土地银行，它们的明确目的是要帮助贵族维持他们的庄园。尽管这家银行暗地给予贵族大笔津贴，他们的土地在1877年到1905年间仍然缩减了1/3以上，从7300万俄亩减少到4600万俄亩。

政府的教育政策同样加强了前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各种趋势。设施增加了，但是，这应归功于地方自治会和其他公共团体，而并非政府的业绩。在小学里，波别多诺斯采夫大力强调宗教教育，旨在灌输对一切教会的或世俗的权力机关都俯首帖耳的服从精神。虽然东正教最高会议未能像它原先打算的那样全部控制小学网，它还是成立了自己的教育管理机构，从而造成了一种必然会对整个教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竞争局面。从质量上说，教区小学远比那些由世俗机构办的学校低劣。

对中学和大学教育，波别多诺斯采夫希望把它们变成只对上层人士的子弟开门的场所。靠颁布法令是很难使学校与社会隔离的，但是政府试图以提高学费的办法，来间接地做到这一点。大学终于失去自治权（1884年），笼罩上一层军营般的气氛，但结果却促成了对立情绪。大学生们一般都能设法绕开不准成立任何组织的禁令，仍然是“社会的气压表”，随时都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做出反应。波别多诺斯采夫虽能够剥夺俄国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但却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积极地接受他的理想。

他在争取帝国境内非俄罗斯族和非东正教居民的思想上的效忠方面感到更加失望。波别多诺斯采夫毫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千方百计地提高国教的地位。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得到大力支持，法律禁止东正教徒改信其他宗教。他侵扰和迫害福音派新教，特别是那些其教义带有社会或政治激进主义色彩的教派。由于他的宗教政策主要是从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种政策的影响，在边境地区因而令人感到最为强烈。因为在那里，信奉异教者往往同时怀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

600万犹太人的遭遇最为悲惨，他们被限制在一个指定的允许居住区（或称“居留区”）之内。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以及许多显要官员，都持有强烈的反犹观点。前朝实行的比较开明的同化政策，这时被取消了。1882年，禁止犹太人居住在乡村地区，即使是在指定居留区内，也是如此，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城镇人口的拥挤和贫困。

“入学人数限制条款”规定了允许犹太人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比例。被容许住在居留区以外各城市里的少数享有特权的犹太人，也遭受各种歧视性措施的折磨。

在波兰以及在西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学校和东正教会成了推行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波罗的海地区的情况，尤为复杂。那里的俄国官员和用德语的贵族阶层展开了竞争，力求把正在迅速产生本民族政治抱负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亚历山大三世很少考虑该王朝和波罗的海地区日耳曼贵族之间历史悠久的联系。虽然地方政府仍归他们掌握，警察和司法机构都按照俄国方式进行了改组，教育系统也被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这导致了长期以来成绩卓著的路德教学校的衰落，使得居民识字率实际下降。成千上万人动摇于相互敌对的两派宗教信仰之间，在他们的地位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波别多诺斯采夫实现统一的努力失败了。他的种种措施完全不足以抵挡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浪潮这时已经遍布于整个东欧，在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声势，也相当可观。政府的镇压措施，虽然并不像同时代人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促使少数民族反对俄国人统治的直接原因，但确实也只不过是激起了他们原来打算防止的离心倾向。

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波罗的海政策所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不敢让这个比较小的问题破坏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特别珍视的同

德国的良好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本来想奉行一种完全因循守旧的外交政策，最后却同意彻底改变结盟路线。到1887年，俄国同德、奥两国的关系已经疏远，这是因为奥地利卷入了保加利亚事件，而德国的俾斯麦则采取了敌视法国的行动。它显然成功地同它的主要敌人英国实现了缓和。“三皇同盟”终于瓦解，而代之以同德国签订的一项对俄国的价值要小得多的再保险条约，而且，仅仅维持了3年，就被俾斯麦的继任者废除。

俄国并不热心于同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结盟，以消除它由此而陷入的孤立地位。虽然1891年8月达成了没有什么约束力的谅解，但直到1893年12月，俄国才勉强保证，在法国一旦遭到德国进攻时给予支持。而且，从外交方面来说，事实证明这一新的联盟并未妨碍同柏林及维也纳保持良好关系。事实上，俄国从此同奥地利在巴尔干问题上以及同德国都和谐地合作了数年之久。但是，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结盟路线的改变，是标志俄罗斯帝国衰落的一个里程碑。俄国不再是同德、奥这两个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帝国结盟，反而越来越依靠法国的友谊和贷款了。法俄关系在财政方面的意义，迅速变得重要起来，一直到1905年，法俄同盟已经成了一把钢钳，俄国只是以发生一场革命为代价才摆脱开它。当然，俄国并没有实际损失任何主权，但是，1905年俄德毕由克协定的解体，表明俄国的行动自由已丧失到何种程度，它已无法再疏远法国这个盟邦，因为法国的财政援助已经成为沙皇政权继续存在的保证。

依赖外国贷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的国内财力无法提供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政府虽然对国家的经济落后没有直接责任，但它在许多年内，也确实没有为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尽什么力量。亚历山大三世的第一任财政大臣尼·赫·本格，尽管不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仍然认识到实行财政改革的重要性。1882年，在最后一批前农奴被强迫改为交付赎金的农民以后不久，这方面的税收数目就减少了；1885年，不公平的人头税也为时过晚地废除了。国库弥补损失的办法是，把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缴纳的地租，几乎提高了1倍，同时进一步增加了间接税。可是，本格的改良主义措施，尽管规模不大，仍然引起了其他大臣对他的猛烈抨击。他不得不于1887年1月辞职。他的继任者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是一个有经验的金融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期受苦的农民则被交给托尔斯泰及其继任者彼·尼·

杜尔诺沃掌管。这两个人是单纯从安全观点出发，来考虑土地问题的。所希望于农民的，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地方长官和其他政府机构的代表。1886年颁布的一项实际上并未生效的法令，要求政府机构批准传统的宗法式农民大家庭分立小户，因为这种大家庭已无法抗拒个人主义的无情压力的冲击。政府还把村社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农民即使已经赎回他们的份地，如果得不到本村人的同意，依旧不能自由地退出村社并对自己的土地行使全部所有权。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在1891年至1892年那次灾难性的饥馑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那次饥馑加上霍乱流行，夺去了大约50万人的生命。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即便是不严重的歉收，也会造成普遍饥荒。显然，采取更重大的行动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财政部现在由谢·尤·维特掌管，他是帝国政权日趋没落时期最干练的一个臣仆。作为一位善于和企业界周旋的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他深知俄国能否保持世界强国地位，取决于能否迅速开发它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认为工业化和维持沙皇专制政体，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事实上，只有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有领导的经济发展计划，专制主义政权才有希望继续存在下去。他辩称，如果国家采取主动，它将获得私人企业的热情合作和一般公众的尊重。维特的性格坚强而又比较喜欢反驳别人，加上虚荣心极重，因此，给自己树立了许多有权势的敌人，但是，他几乎是独掌经济大权达10年之久。

他用来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在原则上和他的历届前任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实施时，更注意协调一致，目的也比较明确。在19世纪90年代，经过10年的巩固和财政整顿以后，俄国进入了一个主要由国家投资修筑铁路的新时期。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最为重要的工程是兴建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这条铁路于1891年动工，在短短的14年内便全部完工。到1905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37500英里，其中2/3属国家所有。

国内工业现在已能够提供所需要的大部分铁轨和其他金属设备。在18世纪80年代，顿涅茨盆地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的采矿和冶金中心。在1900年，这里出产的生铁已占全国生铁产量三百余万吨的一半；这时煤的产量也达到了1500万吨。这在全世界的产量中仅占很小一部分，但是，在一种日益重要的产品即石油的产量方面，由于在外高加索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俄国这时则居首位。集中在莫斯科地区和

波兰的纺织工业，也由于中亚细亚植棉业的发展，而迅速前进。在19世纪最后15年内，工业总产量几乎增加到原来的3倍，90年代末期的进展，尤为显著。到1900年，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雇用的工人，达到了250万到300万人。

工业的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益趋向保护主义的政府关税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对进口的工业产品和原料征收的税额不断提高，1890年和1891年，又相继做了两次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这就导致和德国发生纠纷，德国这时已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俄国刚刚兴起的产业革命的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特征，是依靠外国投资。到1900年，外资在20年内增长到8倍，几乎已占俄国私人工业企业总投资的1/3。外国资本还以直接向政府贷款的形式流入俄国。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和降低重利率，俄国才实行了金本位制（1897年）。这一步骤大大增强了它的财政地位。

但是，为获得这种援助，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付出了代价，这反映在俄国负债数字的不断增加上。在1894年至1903年间，据估计，每年付给外国债主的钱平均为3亿到4亿卢布。到1904年，仅国债就超过65亿卢布，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外债。由于国家预算只有依赖借外债才能平衡，对贷款的需求不断增加，以致恢复偿付能力的前景，似乎更加遥遥无期了。

批评维特的右翼人士担心，过分依赖外国银行家会危害俄国的主权地位，而左翼则要求首先进行土地改革，以提高农民为国家提供岁入的能力。维特可能会答复说：没有外国资本的援助，工业化将大大加重农民的困苦（这一论点已经为苏联后来的经验所证实）；而且，从长远来说，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希望，才有可能打破阻碍经济进步的恶性循环；因此，一定程度的经济紧张应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工业化的速度越快，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就越小。

但同样真实的是：农民纳税者即便是在工业发展并最终导致普遍繁荣这一有价值的事业中，也负担不了日益加重的负担。在维特的任期内，国家岁入增加了一倍。到1903年，总岁入的1/4是由1894年开始实行的国家酒类专卖提供的。这实际上使国库由于永远保持酗酒现象而获得了某种既得利益，虽然酗酒是众所公认的农民生活中的一大祸

害。维特增加国库收入的另一项受到人们怀疑的措施，是国家对甜菜的生产进行控制（1895年），这使甜菜的价格人为地提高，以致对农民来说，食糖更加成为餐桌上的奢侈品了。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村的日趋贫困，从官方资料中也显示了出来。图拉省的调查员于1902年发现，农民家庭住在既肮脏又漏雨的茅屋里，用干粪作燃料，吃的是面包、克瓦斯和土豆这类菲薄的食物。在90年代后期，有1/5应征的兵员，体格检查不合格。俄国人的死亡率为35%，是欧洲最高的；其特点是，农村的死亡率高于城市。从政府的观点看来，最不祥的征兆也许就是欠缴的税款额有增无减，在1896年至1900年间，尽管各地采取了种种豁免和缓缴措施，欠税额仍超过每年平均应缴税款的1/5。

农民怎么能够指望既尽自己对国家的一份义务，同时又能养活自己和妻儿老小呢？由于缺乏足够的贷款便利，要想额外购买土地，变得十分困难。本格1882年创立的农民土地银行的业务，在强大的地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受到了限制。据估计，从1861年至1905年，实际从事耕作的农民共购买了1600万俄亩的土地，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购买的。这些土地的很大部分是由村社、其他农民团体或个体农民直接或间接地从贵族手中购买的，贵族的土地从1877年到1905年减少了2700万俄亩（从7300万俄亩减少到4600万俄亩）。在土地较多的地方，租地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但是在土地严重缺乏的地区，由于供不应求，租金飞跃上涨，特别是最贫苦的农民所订立的短期租约，租金尤高，因为他们仅仅是为了糊口活命才这样做的，往往耗尽了地力。租地耕种也不利于改进技术。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为时过晚地开始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向俄国亚洲部分地广人稀的未开垦地区移民。到1904年，已有将近100万未来的移民越过乌拉尔山。但是，许多人不听官方的劝告，动身时并未做充分的准备，以致中途失望地返回。总之，移民开荒仅仅是吸收了一小部分俄国欧洲部分自然增殖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不管多么严重地缺乏土地，农民仍然宁愿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寻找工作——有的是在乌克兰南部的大庄园，那里每年都要从人口过剩的中央地区吸收100万季节工；有的是在城市和工业聚集地区。

在这种工业区，农民突然投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明，急速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农村缓慢拖沓的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陌生的感

觉加剧了他们对工业环境天生的厌恶，而这时的工业环境，仍然和以往一样恶劣。本格虽然在1882年规定了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但是来自某些工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妨碍了这一法律的普遍施行。直到1897年，男工的工作日才限制为11个半小时。新设置的工厂视察员很快便奴颜婢膝地成为政府当局的鹰犬。工资现在虽然定期以现金支付，却由于农村失业者的大量流入而被压得很低。罢工和任何形式的劳工组织都被严厉禁止。大部分集中在大企业中的产业工人，构成了蕴藏着革命情绪的天然水库，而这农民不满情绪的滚滚洪流，又源源不断地倾注其中。城市里发生了公开的骚动，加上农村中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使形势越发险恶。到19、20世纪之交，君主专制的俄国，尽管表面平静，实际上正在走向革命。

这种群众反抗具有更加有组织的性质，这主要得力于知识分子。1891年的大饥荒，把俄国社会由前10年在压抑下造成的消极状态中惊醒起来。随着地方自治会的活动再次扩大，它的雇员（教师、医师和统计师等）的人数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加，在各种专业组织和其他机构中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这种复兴局面也影响了民选的地方自治会的代表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贵族，但事实表明，他们的为公精神要比托尔斯泰所指望的阶级自私心强烈得多。不过，这时为公众舆论定基调的，已经不是比较微弱的俄国自由主义派的声音。在知识界，围绕着长期争执不休的俄国前途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已经主要是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民粹派把农民的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是由国家故意人为地强加给俄国淳朴的农业经济的。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有机发展，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它开辟了物质高度繁荣以及在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的前景。他们谴责民粹派是空想和反动；民粹派则攻击他们像维特一样心肠冷酷，对人民的眼前利益漠不关心。在这场发生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辩论中，胜利属于理智；因为在一个科学日益昌明的时代，民粹派讲求伦理的理想主义，远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周密逻辑性和明显的必然性那么富有吸引力。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力图把他们的理论化为行动：他们竭力争取对于方兴未艾的劳工运动的领导权，把工人的注意力从产业活动转移到政治目标上来。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圣彼得堡的纺织厂

爆发了一次大罢工（1896年），成立了一个地方工会，其他城市也竞相效法。但是，这些秘密组织很快便由于成员的被捕而解体，在以后几年内，政治性罢工的次数一直比较少。1898年，社会民主党成立，但它并没有获得任何大规模的群众支持。

劳工运动的力量在边界地区比较强大。在那里，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彼此既是盟友，又是对手。乌克兰的反对派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和统一主义者，但在1900年以后，也出现了民族主义集团。在波兰，自1863年起义失败以后，调和主义的倾向一直流行了25年，但这时出现了政治活动的浪潮。最强有力的团体是波兰社会民主党，该党把争取独立列为其纲领中的首要任务。右翼是民族民主党人，左翼是极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国际化倾向。俄国最强有力的革命组织是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崩得”，但由于和各个非犹太人反对派集团相互摩擦而不能和它们紧密合作。许多犹太人被以犹太复国主义为代表的、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潮所吸引。更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时变成了紧张的政治活动舞台，社会民主主义在拉脱维亚盛行，在爱沙尼亚占上风的则是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大军中又增加了两部分新成员：芬兰人和亚美尼亚人。1899年，致力于实现统一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废除了芬兰长期以来享有的宪法权利，于是，整个芬兰民族都聚集在自由主义派领导人的周围，投入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消极抵抗运动。在亚美尼亚，政府在1896年的大屠杀中，以默许的态度支持土耳其，从而引起人们的反对。在这里，民族主义证明是一个比社会主义要强大得多的力量；格鲁吉亚的情况也是如此。

俄国社会中这时已经形成的尖锐紧张关系，对君主专制政权造成了可怕的威胁。它当时只有显示出极高明的预见性和灵活性，才能消除这种紧张形势。但是，继承王位的是一个显然缺乏这类品质的君主。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继承了他父亲的缺点，却没有继承他父亲谦恭的美德。他虽然顽固地主张加强政府的力量，可是性格软弱，而且头脑迟钝。他对那些能力超过他自己的大臣心怀猜忌，却愿依靠那些常常是声名狼藉的幕后顾问。因此，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层出不穷，它的影响波及整个官僚阶层。特别是财政大臣和内政大臣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政方针的根本分歧。尼古拉二世不赞同维特所主张的具

有能动性的君主专制。他因循守旧，对他自己作为专制帝王，有一种非常天真幼稚的想法。由于他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使得君主政权在整个俄国社会中，甚至在那些最温和的分子中陷于孤立，而这些人本来是它反对革命的天然盟友。

尼古拉二世即位不久，就把地方自治会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实行宪政的愿望粗暴地斥责为“愚蠢的梦想”。他本想使这份诏书产生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诏书所产生的作用，但实际上反而激起了反对情绪。在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贵族德·尼·希波夫的领导下，许多地方自治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协调各地自治会活动的“局”。态度左右摇摆的内政大臣伊·洛·哥烈梅金对此感到恐慌，下令解散这个局。但他摇摆不定的态度也导致他的敌人（包括维特在内）进行策划，把他赶下了台（1899年）。他的继任者德·谢·斯皮亚金推行一种直截了当的堵塞政策，从而扩大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在这样一个灾难遍及全国的时候，地方自治会所取得的成就与官僚阶层的愚蠢无能所形成的对比特别引人注目。然而，维特已经拟就一份秘密备忘录，警告沙皇说，地方自治会和维护君主专制是根本不相容的。虽然他谨慎地没有提出解散地方自治会，人们却普遍担心政府已经在考虑这一步骤。人们开始以更大的决心，重新致力于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在原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改信自由民主主义的彼·别·司徒卢威的领导下，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主动。1902年6月，他开始出版一份秘密报纸——《解放报》，在形成温和派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几个月前，农民的不满情绪已经导致在乌克兰的两个省发生骚乱。骚乱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镇压，与此同时，维特设立了“特别会议”这个机构，来调查农村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特别会议这个机构和以前的许多类似机构不同，组织规模非常庞大，有几百个地方委员会，许多这样的委员会，邀请地方自治会的领导人参加。尽管政府做出种种限制，但这些领导人常常扩大讨论范围，提出进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种种要求，于是，自由主义派就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实践纲领而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农民的骚乱也极大地鼓励了民粹派，他们这时已经以“社会革命党人”的名义而重新展开活动，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

他们的恐怖活动，虽然最终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更加引人注目。暗杀的第一批对象之一就是内政大臣（1902年4月遇刺）。

继任的内政大臣维·康·普列维，原是警察头子，他有自己的一套应付危机的独特办法。他为了使地方自治会默认他的做法，私下保证说他赞成和解。但在实际上，地方自治会仍然经常受到干扰，而1903年2月26日颁布的诏书所答应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让步，却是含糊其词，而且微不足道，令人大失所望。自由主义派很快便拒绝了普列维虚伪的和解建议。1903年7月，他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成立了秘密组织“解放同盟”。该同盟在6个月后正式成立，通过了一项激进的纲领，要求由全民普选出一个制宪会议，实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民族自决权。

普列维通过成立由警探操纵的工会来控制劳工运动，最初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产业工人虽然愈来愈响应社会民主党人的鼓动，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坚定地追随他们。一群流亡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最知名的是弗·伊·列宁，企图通过为他们办的报纸《火星报》征募支持者来重新建党。但是在1903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种种个人的和理论上的分歧，年幼的党竟分裂成为敌对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每一派都自称是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衣钵。这种不稳定的状况给普列维以可乘之机。莫斯科的工人们由于迫切希望抓住一切机会组织起来，纷纷加入了由地方警察头子谢·瓦·祖巴托夫操纵的工会。但是，警察为了保持住对工会的控制，有时却不得不准许工人举行有限度的罢工。这就导致雇主和政府内部反对者的不满。另一项类似的做法，即建立一个表面上“独立的”犹太工人党来削弱“崩得”，但也在无意中触发了乌克兰全境的一次大罢工（1903年7月）。祖巴托夫的活动，结果适得其反：工人当中的革命情绪反而日益高涨了。

普列维也不惜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法：1903年4月，在他的纵容下，在比萨拉比亚的基什尼奥夫，进行了一次“大讨伐”，许多犹太人被屠杀。在芬兰和亚美尼亚，无情地推行了强制居民俄罗斯化的种种措施。但是革命的浪潮仍然高涨。普列维于是又采取了一种始终没有试验过的转移革命浪潮的方法：进行一次“小规模胜利战争”。结果，由于统治者一心想要在远东取得利益和荣誉，俄国这时就身不由己地被一步一步拖向了这样一场大灾难。

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以后的30年中，俄国一直满足于巩固它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分裂局面唤起了它潜在的扩张主义野心。维特急于要避免在俄国当时的软弱状态下发生战争，赞成采取一种承担有限的军事义务和逐步进行经济渗透的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尽可能争取与中国人合作。但是，大部分将领和外交官都不主张这样玩弄手腕，而宁愿实行直截了当地兼并领土的政策。最初，维特占了上风，但是，到1898年，俄国获得旅顺分地以后，它的势力范围便迅速扩展到整个满洲，从而不仅激起了中国，也激起了日本和英国的坚决反对。

俄国本来可以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像它自己在满洲拥有的那些权利，以收买日本，但在好几个场合，它都贻误了以这种办法达成交易的机会。1901年以后，尼古拉二世愈来愈为一批肆无忌惮的冒险家所左右，这些人终于得到普列维的支持，设法把维特赶下台（1903年8月）。这时，权力终于从正常的政府机构转到了这个不负责任的集团手中。尼古拉二世及其顾问们骄横自大，根本不把日本人看在眼里，并没有为他们的侵略行动势必会导致的战争做任何准备，因此，这场战争于1904年1月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情况下爆发以后，俄国的海陆军便遭受了一连串无可挽救的惨败。1905年5月14日，在对马海峡终于遭到大败以后，俄国被迫议和，根据同年8月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本获得库页岛南部和旅顺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不过，还保留着它对北满的控制。就俄国十分迫切需要得到的和约来说，付出的代价可谓极其便宜。

因为到这时，俄国的国内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公众舆论就普遍谴责日俄战争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轻启战端和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无可推卸地落在政府头上。战争起了触媒剂的作用，使各方面的反对浪潮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怒涛，随着前线失利消息的不断传来，这股怒涛也愈加高涨。君主专制政权以自己的行动有力地证明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必要。截至这时为止，主要只是少数知识阶层希望实现的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等，这时迅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共同反对君主专制这一点，给运动造成了一种团结一致的假象，其实，组成这个运动的是形形色色的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

危机无情地暴露了尼古拉二世缺乏政治家的应有品质。他狂妄地蔑视反对派，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力量，为了苟延残喘，徒劳地不断变换应急措施来进行挣扎，但就是坚决不肯让出丝毫权力。在普列维1904年7月15日遭暗杀后，他踌躇了一个月之久，才指定忠实而干练的彼·达·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接任内政大臣，米尔斯基一上任，便着手恢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米尔斯基缺乏政治经验，很快便被迫做出了大大超过了他的初衷的让步。他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便批准地方自治会的领导人举行一次旨在讨论宪法问题的全国代表大会。既然已经批准，再要收回成命，就不可能不损害他的政策业已取得的成功。这次代表大会果然发生了政府最担心的事：它热烈地通过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改革计划，甚至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而且2/3的与会者，都希望赋予这个国民会议以立法权力。代表大会于1904年11月9日闭幕时，向沙皇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开这样的国民会议。

米尔斯基这时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允许被选出的地方自治会代表参加国务会议。尼古拉二世起初勉强同意了这一方案，但后来由于维特向他警告说，这就是走向宪政的第一步，他又改变了主意。12月12日的一项法令答应在各方面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地方自治会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改革措施仍旧要按照通常的那套官僚程序规定细则，而不向任何民选代表征求意见；同时还宣布，帝国根本法将“不可动摇地予以维护”。于是，与缓和的舆论实行和平妥协的希望，就此被排除了。俄国只有通过革命行动，作为其间接后果来争取到它的宪法了。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首都的人民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在这里，祖巴托夫建立了一个工会，这个工会像以前类似性质的工会一样，是不受警察控制的。它的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有身份可疑的格·阿·加邦神父，为适应追随者的情绪，批准了一项在冬宫前面举行大示威的计划，预定在示威中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吁请沙皇注意工人们在经济方面的疾苦，要求进行治本的政治改革。当局接到了关于这项计划的警告，但没有采取有效的反措施。1905年1月9日清晨，示威群众赤手空拳，其中有一些人还举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但却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大约有100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这次大屠杀使民

众对专制政权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除殆尽，从此以后，专制政权便成了足以激起暴烈的憎恨情绪的压迫的象征。

工人骚乱的浪潮自发地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华沙和里加，发生了和军队的冲突并又造成死亡。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农民也彻底地觉醒了。他们的行动采取了违法放牧，砍伐木材，拒服劳役或缴租，有时甚至抢掠庄园和强占土地等形式。到夏季，俄国欧洲部分已有1/6的地区受到骚乱的影响，到秋季，受骚乱影响的地区已达1/2。在波罗的海沿海沿岸各省和格鲁吉亚，事态的发展特别严重，农民甚至把地主和官吏赶走，建立起他们自己特别的革命委员会。更加严重的是，由于战败而纪律涣散的海军发生了兵变。陆军虽然还没有达到海军那样的地步，但也士气低落，许多部队在政治上都已很不可靠。

这场大动乱是一场自发的而且往往是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一些人数很少的、有组织的反对派集团的鼓动，只起着较小的作用。这时，这些反对派集团全都急剧地向左转，以求跟上事态迅速发展的步伐。在所有的边界地区，民族主义政党都向它们的社会主义对手让步。民粹派帮助成立了一个全俄农民联合会，但这个联合会没有足够的机会争取到全国范围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抛弃了他们理论上的顾虑，赞同农民采取直接行动。布尔什维克尤其注意争取农民的支持，但他们的成果微不足道。他们那种号召举行武装起义的刺耳宣传，只博得城市中少数极端好斗分子的欢迎。比较务实的和正统的孟什维克，则竭力鼓吹利用政府权力崩溃的大好时机，成立工会和争取其他权利。他们的策略和“解放同盟”有很多相似之处，成功地建立了许多职业组织，很快又采取松散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组成一个工会联盟。

正是巴·尼·米留可夫领导的这个团体，在把地方自治会自由主义人士进一步推向左转方面，起了主要作用。1905年4月，他们在更具有代议制性质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制宪会议，并且提出了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甚至包括以有限的赔偿没收一些私人庄园的措施。一个月以后，地方自治会和市政机关的代表在对马海峡惨败的震惊之下开会，向沙皇本人呈递了另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尼古拉二世仍像通常那样拒不接受。于是，他们在7月再次开会，宣布他们要通过“最紧密地接触广大民众”来争取自由。这似乎表示

自由主义派也将投身于普遍的革命洪流之中。但是，由于农民暴力行动的浪潮日益猛烈，一些人因而便唱起一种比较谨慎的调子。有少数代表聚集在希波夫的周围，他只同意召开一种通过有限制的和间接的选举产生的、仅仅是咨询性的议会。可是，就连希波夫也无法接受政府这时提出的那种傀儡式的国民会议。由无能的新任内政大臣亚·格·布里根拟定的召开“国家杜马”的方案，引起了抗议的风暴。

决定了布里根建议的失败命运的，并不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而是被他剥夺了选举权的那一部分人。早在10月初，莫斯科地区就爆发了一次铁路工人的罢工。它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地区和工业部门，直到意想不到地使全国陷入了一次总罢工。城市瘫痪了，连学校和政府机关都关了门。对于这样一次产生了如此惊人效果的全国性反政府大示威，政府当然感到万分惊恐。尼古拉二世召见维特商讨对策，维特以他一贯的现实态度指出，沙皇除非准备实行军事独裁，否则，就必须答应实行宪政。尼古拉二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0月17日，沙皇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利，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力的杜马。维特被擢升为首相，负责组成新政府。

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但是“十月诏书”的各项许诺还有待于成为现实。维特面临的任务之艰巨难以想象，他要在来自左右两翼的强大反对派面前巩固新秩序。诏书根本不能平息全国广大地区的革命情绪。与此相反，农民骚乱这时达到了最高潮，而产业工人对他们的成功所鼓舞，也热衷于继续进行斗争，直至专制政权永远被推翻，召开制宪会议来擘画一个新的民主的未来。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竭力鼓吹这一观点，其中以列·达·托洛茨基尤为突出。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孟什维克，这时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中最知名的人物。苏维埃是一个各工厂代表的组织，本来是为罢工期间相互保持联系而成立的，这时已经巩固了它在首都的地位，和其他城市建立了联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对抗的政府。这时以立宪民主党的面目出现的自由主义派，也提出了同样激进的要求。他们怀疑维特既不会、也不能实行“十月诏书”的原则，因此，拒绝了维特要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的邀请，只向他提供有条件的支持。就连希波夫领导的温和派（这时称为“十月党人”）也拒绝参加一个由声名狼藉的彼·尼·杜尔诺沃担任内政大臣的政府。

维特拼命想恢复秩序，踌躇于和解与镇压两种手段之间，但愈来愈着重于后者，因为镇压已经变得切实可行。苏维埃由于走极端而很快丧失了它的中产阶级同情者。它的领导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还没有把握获得农民或军队的支持，就轻率地向政府发出了挑战。杜尔诺沃抓住这个机会，逮捕了苏维埃主席（11月26日），从而挑起了冲突。一个星期以后，苏维埃的全体成员继其主席之后都进了监狱。举行总罢工的最后号召在圣彼得堡很少有人响应，但在莫斯科，几百名追随者在一部分群众支持下，和忠于政府的军队展开了斗争。到1905年年底，政府的地位大为加强。讨伐队巡行全国各地，对被怀疑为进行过革命活动的人，大肆进行报复。

但是，反对革命的斗争每获得一次成功，都削弱了维特本身对付右翼极端分子的地位。在宫廷里众多反对他的人当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沙皇本人。尼古拉二世责备维特不该劝他颁布“十月诏书”，他这时已深感后悔，竭力想收回这份诏书。为了抵消维特的影响，他开始依靠各式各样的反动集团的支持，其中有臭名昭著的极端民族主义派“俄罗斯人民同盟”。这个同盟专门对君主专制的反对者采取暴力行动。说来是一个可悲的矛盾，宪政时代的黎明却是在遍及全国的“大讨伐”之际降临的，而一些高官显贵也时常被直接卷入。尼古拉二世自然乐意对这类非法行为装聋作哑，因为他本人就对之颇为赞同。

在这种情况下，维特感到有必要对右派做出让步。一方面，杜马的选举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则发布了好几道限制杜马权限的敕令。这些敕令规定：杜马提出的建议，必须经国务会议（这时已扩大，包括一部分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它对国家预算的监督权和立法动议权也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杜马召开前几天，颁布了新的“根本法”（也就是宪法），它违反“十月诏书”的精神（如果不说连字面上也是如此的话），规定沙皇仍然行使专制君主的至高权力。同一天（1906年4月23日）维特被免职，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当初本是想为立宪制度创造条件，结果却只是便利了君主专制在虚伪立法的外衣下复辟。他作为首相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帮助谈成了截至那时为止国际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贷款交易，从而使政府能够站在实力地位上对付杜马。

这对俄国议会民主试验的前途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届杜马（1906年4月27日—7月9日）忠实地反映了民众幻想破灭的愤怒情绪。

将近一半的代表是农民，因为政府在起草选举法时，给他们较多的代表名额，认为他们将构成一支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结果他们却追随了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立宪民主党，或者说比该党更左。立宪民主党人力求通过杜马实现革命暴力没有能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却把杜马设想成为一种唯命是从的协商机构。5月13日，新首相哥烈梅金驳回了杜马意在获得立法权的声明，特别是关于在需要的地方强制没收私人庄园，以解决农民缺地问题的主张。这时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到来了。在这以后，代表们又忙于起草很少有机会被通过的各项法律，辩论土地问题，希望在农民骚乱新浪潮的支持下，他们的主张会强迫政府让步。一些政府成员对全国形势如此惊恐，以致赞成向杜马提出的建立责任制内阁的要求让步。政府和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私下举行了探索性的会谈，但由于尼古拉二世丝毫不肯让出他的专制权力，会谈毫无结果。尼古拉二世和一部分大臣有着同样的担心，唯恐杜马成为一个危险的宣传鼓动中心。杜马在煽动下采取了超越其合法权限的做法，于是，紧接着它便被解散了。反对派领导人在芬兰的维堡集会，号召全国举行消极抵抗。但他们的号召无人响应；发生的一些暴乱也不过是零零星星的，这表明农民和工人已经再没有什么革命热情，根本无意为一个他们毫不理解的宪法问题去闹事。

这时，政府已由彼·阿·斯托雷平领导，他曾任省长，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人物。他企图以无情镇压结合土地改革的两手做法，来平定全国局势。1906年8月，他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据宣布8个月内就处决了1700人。对斯托雷平来说，国家利益比法律的正当做法更重要。在这个危急时期，他在没有任何应有的宪法权力的情况下，以法令统治俄国。他虽然并不反对和杜马合作，但认为在选举中施加压力，以便产生一个政治色彩可以接受的议会，是合理的。

可是，这些值得怀疑的做法造成的结果，适得其反。事实证明，第二届杜马（1907年2月20日至6月3日召开）甚至比第一届更加棘手。第二届杜马有一个强大的左翼，其中有不乏65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个人数虽少但叫嚣得很厉害的右翼极端主义集团。立宪民主党虽然力量大为削弱，却严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力求避免杜马再次被解散。但他们的谨慎只不过激怒了左翼，因为左翼仍然脱离实际地坚持已被事件进程证明过时的革命口号。斯托雷平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争吵，但未能说服杜马批准他的立法计划，特别是他的土

地政策。他要求代表们毫不含糊地谴责恐怖主义，以便抵消反动集团要解散杜马的压力，代表们也拒绝照办。当他认识到和杜马已不可能进行合作时，他便马上向杜马提出了证明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的证据，要求这些人出庭受审。杜马对此采取拖延态度，于是，就颁布了解散杜马的命令（1907年6月3日）。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选举法，大大改变了选举规定，使之对有产阶级有利。在发生这次事实上的政变以后，第一次俄国革命也就宣告结束。

从一切表面现象来看，专制政权获得了胜利。积极的反抗已被粉碎，镇压工具重新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判断它是否获得成功的真正标准，要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社会问题上，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工人除了尝到一些执掌权力的甜头以外，从革命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对于某些集团来说，20世纪头10年带来了较高的工资，但是不论在任何地方，生活水平都没有显著提高。虽然这时的法律允许成立工会，但是，在革命中大批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大多数被视为颠覆组织而遭到镇压。俄国不可能按照西欧的模式发展起稳定的群众性劳工运动。迅速增长的城市无产阶级，这时陷入了满怀积愤的消极状态，但始终是一支一遇危机就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爆炸性力量。

然而在农村，政府毕竟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以解决土地问题。革命已经打破了据说村社在起保守作用这样的神话。斯托雷平在1906年11月9日颁布的法令，准许农民脱离村庄和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向西伯利亚移民，受到更加有力的鼓励，许多皇室分配地和国有土地转交给农民土地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它们的佃户。除去不容许没收贵族庄园以外，斯托雷平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解决缺地问题，竭力想创造出一个与现存的社会秩序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个人性质的农民产业主阶级，而俄国截至那时为止，是明显地缺少这样一个阶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国的前途取决于在下一轮革命危机爆发前，它的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农民的不满。

在消除政治领域的紧张局势方面，进展不大。1905年4月，给予人民以更大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消除了一个其作用在日益减少的产生不满情绪的根源。一部分少数民族改善了处境。在事件的发展进

程和俄国其他地区相同的芬兰，取消了镇压性的法律，给予人民以公民权和一部民主宪法。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议会中成为最大的政党，所以，这个议会自然就受到帝国政府的怀疑，而帝国政府是自以为可以不受它自己做出的让步的约束。在外高加索实行了更加开明的政策。但是，在革命斗争中最活跃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却没有获得任何让步。危机到处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在俄罗斯人自己中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斯托雷平的新选举法，减少了少数民族在杜马中的代表名额，预示着将重新努力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有保障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引起的紧张状态继续存在。这类只存在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究竟有多少，实际上是由官僚阶层的一时的喜怒来随意决定的。虽然斯托雷平的政权并不像同时代的批评家们时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十足的暴政，但其暴虐的状况确是十分严重，以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反对政府。对自由主义的舆论界来说，杜马即使已残缺不全，也仍然是他们的愿望的象征。他们认为，杜马是在君主专制的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可以继续扩大，直到俄国成为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

现在回过头来看得很清楚，这类按照西方的道路前进的希望被夸大了。事实上，1906年出现的“半立宪”或者说“准立宪”政权，是建立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这方面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杜马和自由主义派所珍视的其他权利，都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而是在千百万民众施加的压力下获得的，但这些收获给这千百万民众带来的好处却非常有限。农民们珍视杜马，主要是把它当作取得他们所渴望的土地的一种工具。工人们自由地谈论民主，他们是从实现经济平等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的。除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以外，对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这些东西本身一贯抱有强烈兴趣的人是比较少的。俄国的自由主义获得成功，靠的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却同样具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色彩。

如果做一次测验的话，可以说大多数俄国人都宁愿舍弃自由，而要求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目标。维特认为，一个有活力的、能够不断进步的专制主义政权，将符合俄国的国情，这是正确的；但他以为在这方面可以由君主专制政权来采取主动，却是错误的。帝国王朝和少数社会特权阶层的利益是如此牢不可分，以致它没有可能对权力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假设尼古拉二世是另一位彼得大帝，也许可以想

象维特的主张能收到较大的效果——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想象而已。俄国的右翼由于受阶级意识和忠于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这方面的限制，缺乏独具创见的思想。相反，维特的计划却要由左翼来实现，而且其方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事实证明，1905年的革命不过是一场更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徐式谷 译）

[1] 日期是旧历。

[2] 即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译者

[3] 即耕种皇室土地的农民。——译者

[4] 1俄亩等于2.7英亩。

第十四章 英国和英帝国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辩的头等强国。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有稳固的基础，并且是欧洲和海外新老国家的典范。英国统治下的帝国包括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拉西亚的大片地区；英国的海军力量统治着各大洋；英国的贸易扩展到全世界；英国在长时期中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和工业中心。虽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结束以前，上述情景的某些细节已有所改变，但英国的影响和力量仍然强大，而且1901年时的英帝国比 1870年时更庞大，更富有。

在整个充满重大事件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英国在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它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拓荒者，它推动了海陆交通的发展，促进了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化，它的资本、企业家的才能和熟练技术帮助开发了边远国家的资源，它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被移植到全世界各个地区。这个时期，英国各民族大批向国外移居，从而使英国扮演了一些国家的创建者的角色，这是它事先没有考虑到的。

1870年，英国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认为英国的领土已经完全够了，但是在随后的30年，本杰明·迪斯累里和约瑟夫·张伯伦又极力主张帝国的扩张。他们两人都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而实行这个主张。在19世纪60年代，迪斯累里曾建议放弃英国在西非的前哨据点；80年代初，张伯伦也曾经反对过帝国主义。至于许多其他的英国人改变观点，这可以通过1880年和1900年两次大选结果的对比看出来。在1880年，绝大多数人否定了比康斯菲尔德勋爵的荒诞的帝国主义；但是20年以后，他们却赞同了张伯伦的主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尽管他的政策引起了代价高昂和使幻想破灭的南非战争。

迅速变化着的世界局势促成了英国对海外帝国态度的这一彻底的改变。1870年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它们的工业化也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对舶来品的需求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使这些产品容易得到；国际贸易扩大；国内局势较长时期的稳定，使得欧洲列强把注意力转向夺取和开发非洲和亚洲国家方面。俄国毫不

留情地向前推进它的帝国边界；法国紧张不安地设法通过海外冒险来恢复它在1870—1871年战争中失去的声望和自信；德国和意大利则为争夺殖民地和国际贸易中的更大份额而积极地投入竞争。

由于意识到在非洲和亚洲经济上的有利时机，加上因外国竞争者的出现而受到的刺激，英国工商界竭力鼓吹坚决的帝国政策。19世纪70年代，由于埃及、土耳其和几个中南美国家拖欠债务，英国投资者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们于是要求新的投资场所，并且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帝国的势力范围。当发现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都迟迟不愿向外扩展边界线时，一些非官方的帝国建造者就恢复了海外冒险事业的老办法——组织特许公司。19世纪80年代，4个这样的公司授权在婆罗洲和非洲开展业务。虽然在理论上这些公司受政府的严格监督，实际上它们可以自由地同当地的统治者交往。但是，当它们的活动同其他欧洲人发生冲突时，英国政府就不得不插手干涉，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很容易被调动起来去支持英国国民的要求。

特别是在非洲，上帝和财神在扩大英帝国的责任方面是密切配合的。19世纪初，英国先后结束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帝国内部的奴隶制，这时以托马斯·福埃尔·巴克斯顿爵士为首的废奴主义者发起了一个根除奴隶贸易和非洲内部的奴隶制的运动，其办法是发展非洲大陆物资贸易以代替奴隶贸易。他的方案立即得到传教士团体的支持。鉴于阿拉伯奴隶贸易者的掠夺行为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后果，非洲土著居民最伟大的朋友戴维·利文斯顿医生宣称，应该从“基督教和商业”中寻求治疗非洲的疾病的药方。对这位“加利利人”^[1]的忠实仆人所开的药方，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和商业的促进者都全心全意地加以接受。

19世纪最后25年间，英国传教士组织在非洲土著居民中积极进行活动。它们在东非特别活跃，因为在乌干达取得的成就使他们相信，东非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广阔天地。那些猎捕奴隶的阿拉伯人自然对这些希望同欧洲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合作的传教士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后者终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帮助。随着桑给巴尔被占领，阿拉伯人的动掠行为被制止了。虽然牟利是英国贸易公司的基本目标，但他们最积极的代理人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卢加德勋爵都

是热情的人道主义者。奴隶贸易的结束给苦难的非洲人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拯救。

在大洋洲，英国的人道主义同样是制定英国政策的重大因素。由于许多棉花和糖料种植园建立在斐济和昆士兰，所以短缺的劳动力是靠按劳动契约制招收来的波利尼西亚人补充的。但是，肆无忌惮的欧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商人常常拐骗土著居民，后者在种植园中的地位同奴隶几乎没有区别。经过某种犹豫以后，英会通过了太平洋岛民保护法，兼并了斐济群岛，并建立了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随着德国在这个地区商业活动的扩大，一些澳大拉西亚殖民地坚持要求英国进一步兼并，但是直到德国夺取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和毗邻的岛屿以后，英国才占领了新几内亚东南部。

虽然一些殖民地要求英国进一步兼并的急切愿望往往会被忽视，但保卫贸易路线和帝国现存边界安全的需要常常引起侵略行动。在苏伊士运河被证明是英国同东方贸易的主要途径之后，情况尤其如此。英国很快就被深深卷入了东地中海、埃及和东非以及红海地区的事务。对印度安全的关心，导致英国占领俾路支和缅甸的剩余领土以及扩大英国在波斯湾地区和马来亚的势力范围。

在各国对非洲领地的争夺中，英国夺取了许多宝贵的战利品。帝国东非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和南非特许公司是英国在非洲扩张的主要工具。对非洲的瓜分是通过会议和有关列强之间的双边协定完成的，没有发生国际冲突，但有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如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南非的卡菲尔人、马塔贝莱人和祖鲁人以及苏丹的马赫迪派狂热僧徒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是，最坚决反对英国兼并的是在南非的两个欧洲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境内黄金的发现把英国的冒险家们和资本吸引到这个国家，它的西部边界毗连着把开普殖民地和罗得西亚联结起来的一个比较狭窄的可居住的地带。外国人和本地公民在德兰士瓦发生摩擦，英国对传教士进入内陆传教的交通安全表示忧虑，对德兰士瓦与德国结盟感到担心，以及德兰士瓦人不愿以平等态度对待英国人，凡此种种，引起了从美国革命以来一次最大的英国殖民地战争。英勇的布尔人屡屡战胜英国的优势兵力。虽然在1900年他们的国土就已被兼并，但直到1902年5月31日最后一支布尔人军队在战场上投降，这场力量悬殊的冲突才宣告结束。

到1901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漫长的统治结束时，在她的帝国周围还进行着大量的活动。在南非，战争仍在继续；在马来亚和尼日利亚，英国的统治正在逐步地确立和巩固；在英埃苏丹，英国官员正把秩序和安定带给这个遭受严重掠夺的国家；在印度，老练的总督寇松勋爵努力改善广大居民的处境，使它没有遭受外敌攻击的危险；在远东，英国的特使想方设法捍卫英国宝贵的经济利益。在帝国境内，约瑟夫·张伯伦极力挽救西印度殖民地免于崩溃，并促进英国属地的经济发展和福利。

帝国扩张的动力与对海外帝国新老组成单位的统治所采取的稳定措施和不断适应新变化的办法相配合。英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再自相残杀、不再以人为牺牲品，并废除奴隶制的有秩序的社会结构，给生命和财产提供保障，给私人企业提供最基本的条件，给投资者提供利润，给当地居民提供职业。在印度许多土邦中普遍实行的间接统治制度推广到了斐济群岛、马来亚和非洲的大部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土著首领继续享有他们以往的声誉和特权，除了有关犯罪的法律，当地的习俗都保留不动。实行这种管理制度的许多地区称为保护领地或保护国，那里的居民不是英国臣民。在埃及，英国通过一个代理人 and 驻开罗总领事进行统治（受到许多国际上的限制）。从1883年到1907年，办事干练而又精力充沛的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一直兼任这两个职务。在理论上，英埃苏丹是英国和埃及以所谓共管的办法实行统治的，但实际上英国是居支配地位的一方。

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在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亚的殖民地已经享有自治。稍后，这一权利又扩展到南非好望角和纳塔尔殖民地。把殖民地结成地域性联邦的努力得到帝国当局的有力支持，这种做法在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亚获得成功，但是在南非和西印度群岛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对自治殖民地的自主权规定确切的界限，它们逐渐获得了主权国家的一些特征。帝国政府严格注意不干涉它们的内政，甚至在对待像1880—1881年新西兰没收毛利人的土地、1897年纽芬兰把公用事业设备出卖给私人商号这样一些被认为不明智的举动上也是如此。殖民地所制定的歧视非欧洲的英国臣民和亚洲友好国家公民的移民法，虽遭到唐宁街的反反对，但是殖民地最终还是自行其是。英国经济界对殖民地的保护关税十分不满，但是毫无用处。到19世纪末，殖民地的财政自主既成事实。自治殖民地如果不表示同意，就可以不受英国商务条

约的约束。1893年，加拿大又开创了直接同法国谈判签订商务协定的先例。

既然殖民地可以自由地谋求自身的利益，既不向英国缴纳税款，也不对帝国中心尽任何其他义务，所以作为英帝国的成员国对它们有好处。英帝国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犯；英国领事和外交代表为它们尽职服务；它们是受到优惠待遇的英国投资场所；它们可以以优惠条件在伦敦金融市场借款。

总之，英国是在“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基础上处理帝国内部关系的。直到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任殖民大臣后，政府才以一种有目的的、有建设性的帝国政策代替了自由放任政策。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行政官员，张伯伦将海外帝国看成是一项没有充分发展的产业。他承认英国对属地有明确的义务，因此——正如约翰·莫利写到他时所说的那样——他应当通过“把安全、和平和相当的繁荣带给以前从没有享受过这些东西的国家”，来证明他的统治是正确的。他关于发展和福利的计划，是和使殖民地同英国更紧密结合以及扩展帝国边界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正如那些热心维护帝国的人们促使帝国结成联盟的一切努力均遭失败一样，因为英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如果自治殖民地拒绝实行联合，对王室共同的忠诚和定期性的殖民地协商会议仍然联结着英国和大英帝国。主要的殖民地虽享有立法自主权，但它们的法律不能同英国的法律相抵触；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英帝国所有海外地区的最高法院。

英国的政治舞台被两个巨人控制着：本杰明·迪斯累里（后为比康斯菲尔德伯爵）和威·尤·格莱斯顿。就像皮特和福克斯的情况一样，这两位领袖人物不是唤起人们忠诚的感情，便是招致强烈的敌意。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十分强烈；议会享有崇高的威望；下院吸引了许多德才兼备之士；议会辩论报道被广泛阅读；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之间戏剧性的冲突，给党派斗争染上了一层英雄史诗般的色彩。这两位领导人虽然在看法和性格上截然相反，但却互相媲美。格莱斯顿自1868年任内阁首相，这时作为行政家和议会中的雄辩家正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既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又是一位热心参与维护道德风尚运动的人。他坚决纠正给予爱尔兰的不公正对待并使英国各种机构、制度自由化。他的政府开始实行用税款资助初等学校的制度；招纳人才

担任文官；取消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保护工会基金；改组英国的司法体系；并扩大政府的管辖以至控制爱尔兰地主与租佃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首脑，并获得下院中占大多数的自由党人的支持，格莱斯顿使1868—1874年他的第一任内阁执政时期在制定有关改革的法律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格莱斯顿的对立面是保守党人公认的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他冷静、超然、多疑、能言善辩，是一个十分干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他克服了巨大的阻碍，说服他的党采纳各项改革。称赞他的人虽多，但信赖他的人却很少，女王是后者之一，对他十分倾倒。迪斯累里比她的任何首相都更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作为1874—1880年的内阁首相，他支持关于劳动条件和工会、住房问题、围圈公地以及商业航运等方面的立法。但他富于想象力，充满浪漫主义思想，强烈爱好君主制的虚华外表，把帝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使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他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9/20的股票，批准了帝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成为中心人物。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爱尔兰问题引起了激烈而旷日持久的冲突。格莱斯顿安抚爱尔兰的办法是：在该岛实行政府与圣公会分离并没收该教會的基金，改善爱尔兰农民的处境。最后，在1886年他的第三届政府期间，允许爱尔兰成立单独的议会。这个纲领威胁了保守党人竭力捍卫的特权，但是直到格莱斯顿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以后，才真正引起了英国选民的激动情绪。反对者把自治说成是危害联合王国和在爱尔兰建立“罗马统治”^[2]的一项方案，从而重新煽起了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和恐惧心理。格莱斯顿辩解说，英国曾经主张欧洲各民族实体实行自决，并允许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实行自决，因此，也应当把这作为一种权利赋予爱尔兰，作为给这个海岛带来和平并使不列颠群岛真诚团结的措施。但这种辩解是徒劳的。这个问题使他自己的党陷于分裂，老朋友和同僚们抛弃了他，人们以过分的言辞谩骂他。爱尔兰自治问题除引起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分裂以外，还阻碍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进展。它损害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那里的爱尔兰移民在内心深处对英国怀着强烈的敌意，把这种敌意灌输给子女，并带入美国政治中去。

随着1881年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去世和13年后格莱斯顿退休，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两位最重要的角色。索尔兹伯里勋爵，作为19世纪末期

保守党的领袖，得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并受到女王信任。但是，索尔兹伯里善于处理对外关系，却不重视紧迫的社会问题。19世纪80年代，还是卓越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像流星一样出现，旋即悲惨地下台的年代；也是精明强干但冷酷无情的爱尔兰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取得非凡成功而又最终失败的年代。19世纪70年代，约瑟夫·张伯伦被全国公认为社会改革战士；到80年代后半期，则成为爱尔兰自治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到1895年，他就以索尔兹伯里政府最杰出的成员和最热情、最坚决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而出现了。

在海外国家，政治家们是在规模很小的民主社会的狭小天地里进行活动的，移植过来的英国各种制度必须适应这些边远地区的条件。所有殖民地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都苦于缺少资金和人力，它们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也同英国的根本不同。在英帝国内，在发展中的国家中最大的是加拿大自治领，它的宪政体制部分地仿效美国，但管理制度——君主制、议会制政府和法院——则是学英国的。在这里，保守党人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成功地领导这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度过了它最艰难的创业时期。他的政敌、自由党人威尔弗里德·洛里埃爵士，则在19世纪作为加拿大国家的缔造者而继承了麦克唐纳的事业。洛里埃虽以法国血统而自豪，但和麦克唐纳一样忠于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并献身于将它建设成英国那样的国家。他1896年出任首相，标志着一个漫长的空前进步时期的开始。洛里埃乐观地宣称，20世纪将是加拿大世纪。

在英国其他的自治殖民地，只有新西兰产生过两位领袖，其成就堪与麦克唐纳和洛里埃并列而被称为国家的缔造者。19世纪70年代，德籍犹太移民朱利叶斯·跃格尔（以后封为爵士）领导新西兰摆脱了由于一系列国内战争而带来的严重萧条。他促进公共建设工程，吸引投资和移民，使这个殖民地从一个松散的各省联邦变成了紧密结合的单一国家。20年后，新西兰出生的威廉·彭伯·里夫斯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南太平洋上这个小小的民主国家作为经济和社会实验的场所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新西兰取得进步的基本因素是母国提供保护、资本、人力和熟练的技术。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和大英帝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向政治民主稳步前进。在英国国内，国家管理的传统方针仍然未变，但其组织细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876年选举改革法给了城镇劳动者以选举

权，1884年的选举改革法又把这一权利扩大到农村地区。此外，随着这些改革而实行的下院席位的重新分配，把代表权置于更公平的按人口分配的基础上。1872年的秘密投票法减少了威吓投票人的机会，稍后的惩治行贿法则限制了金钱在大选中的作用。

但是，在向政治民主前进中，英国落后于自治殖民地。由澳大利亚带头（南澳大利亚州在1855年，维多利亚州在1857年，新南威尔士州在1858年），各自治殖民地早就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遍选举权，到1901年，新西兰和南澳大利亚的妇女也得到了选举权。此外，殖民地还普遍实行了“一人一票”制。而在英国，1884年的选举改革法仍然拒绝给居住在家里的儿辈和仆人以选举权，他们大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5%到20%；而经商的人或在几个区都有住所的人则可能在每个地方都符合选举条件，因而有几个投票权。由于并非所有选区均在同一天投票，就增加了这种一人多选区投票的可能性。享有多选区投票权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往往可在票数相近的竞争中决定结局。而且因为这些人一般都属于上层阶级，所以这种现象对保守党有利。英国下院议员不领取报酬的惯例也造成类似的效果。比较民主的殖民地社会是付给议员薪俸的。不过，英国和大英帝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主要区别在第二院。在英国，上院及其大多数世袭贵族继续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改革或者废除”上院的建议也很少引起公众的兴趣，即使在党人在上院占压倒性的多数，以致使之几乎变成了一党制议院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海外，第二院的成员既有任命的，也有选举的。然而，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殖民地，立法的惯常做法或选举方法的改变都削弱了他们的权力，使之不得不顾及公众舆论。

在英国，一系列的改革在地方一级促进了民主。根据1870年教育法设立的学校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妇女也有投票权。1888年，以索尔兹伯里勋爵为首的保守党人，废除了由治安官通过季度会议治理各郡的旧制度，而代之以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6年以后，自由党人继续推进民主化运动，设立了选举产生的教区和分教区议会。但是，爱尔兰的改革落后于大不列颠，直到1898年，选举原则才贯彻到这个“约翰牛的另一岛屿”的地方政府中。

英国的郡政府制度没有移植到主要的海外殖民地。澳大拉西亚、加拿大和南非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处理地方事务，不过均以遵循明确的民主路线作为普遍的模式。

1867年选举改革法通过以后，英国选举改革的著名反对者罗伯特·洛说：“现在，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这种情绪促使英国采取免费的义务初等教育；在劳动者得到选举权以后，一种对成年人的政治教育也迅速普及。因为伦敦的贵族政治俱乐部已不能指望操纵群众投票，所以两党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从地方小单位起直到强大的全国性组织止，给选民提供机会，挑选制定政治战略的管理人。约瑟夫·张伯伦“坚决主张”——我们再次引用莫利的话——“民主要强大，必须集中；如果各个单位不是为了选举的目的而参加到自由的、公开的、有代表性的、有自由选出的公认领袖的地方团体中去的话，民主的力量就会浪费了。”在开始时，格莱斯顿赞扬这种变革；但是，在保守党人中倡导这一变革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却难以取得索尔兹伯里的赞同。群众的兴趣被激起来了，政治团体的范围也被这种新型的政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团结和纪律的增强使政党的督导员比以前更重要，这就为政党首领的出现廓清了道路。直到1890年为止，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保持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绝对控制达数年之久，当时他就已经享有这种地位。

英国妇女虽然在全国选举中没有选举权，但是在1883年的惩治行贿法规定花钱雇用竞选人员为非法以后，她们被录用为政党的义务工作人员。樱草会无报酬地为保守党效劳，妇女自由联合会则要求她们所支持的候选人应当支持妇女的参政权。她们没有取得什么成功。新西兰和南澳大利亚的妇女比她们的英国姐妹们早25年得到了选举权。

群众的政治教育在1879年11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格莱斯顿在苏格兰中洛锡安郡开始他有名的竞选运动。在对大量听众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演说中，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责保守党政府在国内外事务中道德松弛。他有力地揭露了保守党的错误，强烈呼吁选民主持正义和公道。王国政府的一位前任首相竟然在群众集会上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使女王大为愤慨；比康斯菲尔德也讥笑自己的对手“花言巧语”；而选民们却喜欢被称为有理智的人。他们使格莱斯顿得以上台执政。从此以后，格莱斯顿这种诉诸群众的办法成为英国政治运动中的通常做法。而这种做法在格莱斯顿发动他的中洛锡安竞选运动以前很久，就在殖民地采用了。

习惯于靠“上司”指引的英国劳动者阶级，却迟迟没有运用历次选举改革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益。尽管许多工业界头子

和商业大亨支持自由党，而且格莱斯顿本人是一个坚定地拥护个人主义的人，但群众还是信任他和他的党。对群众来说，自由党人代表进步，格莱斯顿主持正义，他成了“人民的威廉”。他扩大社会就业的努力和他的道德标准对读圣经的劳动者有强大的吸引力。认识到吸引工人选票必要性的迪斯累里提出了“君主与民众一体”的口号，含义是政府应当像家长一样。1874—1880年在他的内阁中任内政大臣的R. A. クロス（后来封为勋爵）在首相的协助下，通过了几项社会改革法案。比康斯菲尔德死后，“托利民主政治”由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继续坚持。但是，普通劳动人民不信任保守党，因为在保守党里，“名门世家结成的实力集团”仍然很有势力，而对地主阶级和教会的种种特权继续表示十分关切。由于两党制传统左右着政治，劳工领袖们便从内部动摇这个传统的基础，以便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19世纪80年代，有两个纠正经济弊病的新方案提供给英国公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亨利·乔治的单一说。一些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国内外的劳动群众对上述两种灵丹妙药都不相信。但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被主张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倡议所吸引。时世艰辛，工人们不相信自己“生来只是为了受苦”。他们仍然从宗教中寻求安慰，而且可能结队前去参加在卫理公会教堂里举行的劳动者集会，唱着：

啊，上帝！过去世世代代帮助了我们，

您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但是上帝的支持看来不知拖到何年何月才会降临。1894年“人民的威廉”退出了政治舞台。一年以后，约瑟夫·张伯伦为了帝国主义的事业，而把社会改革事业束之高阁。索尔兹伯里超然地无所事事，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任何希望。在澳大利亚，一个年轻的工党正在成长壮大。英国职工大会则勉强地赞同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提议。到19世纪末，英国工人才为组织一个全国性工人政党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在政治方面如同在统治体制方面一样，殖民地也仿效英国。但是在尚未开发的地区，一个古老社会的各种惯例往往不是起促进作用，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殖民地社会是民主的，但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仍然是贵族式的。因为殖民地还不是主权国家，所以它们的自然资源的发展比对外关系更能影响政党的政策。只有在南非，对外关系问

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也只有在这里，非欧洲居民的存在具有更严重的复杂性。

加拿大政党的名称是借用英国的。保守党人麦克唐纳研究迪斯累里的政治思想；自由党人洛里埃则从格莱斯顿那里汲取力量。然而在这个新的联邦国家，政党的力量组合更接近美国的而不是英国的模式。像保护关税和地方权力这样一些问题，是在国境线以南而不是在联合王国，有其相同的情况。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关税问题经过多次讨论，把成立联邦问题拖延了下来。土地和劳动力问题，不论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始终是海外殖民地政治纲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加拿大采取美国的办法，把空闲土地划成中等面积授予永久定居的移民；但是在澳大拉西亚，大面积的公地早在殖民初期就已经转入了个人所有者或占领者手中，因而，究竟应当由王国政府重新拥有这些土地，还是应当把大地产加以分散，就成为政治运动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所有自治殖民地都需要劳动力，但是这种需要随经济繁荣的消长而变化不定，因此，资助移民的问题引起了无休止的辩论，于是产生了应当接纳谁的问题。西加拿大和东非的铁路建设是从中国和印度招募苦力；斐济、纳塔尔、昆士兰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按照劳工契约，从印度和波利尼西亚招收劳工。在自治殖民地，这些做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当地的劳工担心亚洲人的拥入将会降低生活水平。在英属哥伦比亚和澳大拉西亚，排斥亚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行为引起了激愤。澳大利亚联邦刚一成立，就通过了一个保障白人澳大利亚联邦法。

关于排斥亚洲人的争论促使劳工登上政治舞台，并鼓励澳大利亚殖民地结成联邦。为保持澳大利亚是一个白人的大陆，需要有统一的立法。促使澳大利亚劳工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坚决立场的，并非种族优越感，而是保护本身工作的愿望。在不景气的19世纪90年代，新南威尔士的劳工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进入了政界，新西兰的劳工则组成了自由党—工党联盟，以促成有利于劳工的立法。

尽管有这些不同情况，殖民地一般也还是接受英国的政治概念和方法。操法语的加拿大人和操阿非利卡语的南非人都熟练地运用着来自英国的政府统治手段。19世纪末在印度兴起了一个民族主义运动；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大党，其目的是要保证这个亚洲次大陆的各古老种族实行以英国为模式的自治。1901年1月26日，英国一家主要刊物

《经济学家》评论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不为整个世界所十分爱戴；但显然我们的政治力量的源泉却为人们所赞赏。”英国的政府制度被全世界所广泛采用这一事实即是明证。关于不久前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这家刊物说，她是“唯一这样一个人，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她的千百万臣民，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会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她占据王位”。不管这篇社论的作者还是广大群众，他们都不知道女王在1880年曾感情激动地宣称，她不愿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统治者。这个秘密保守得很严。国家稳步地向更加民主化发展，但她并没有退位。1871年时，共和派的声音在英国是软弱无力的，20年以后，在澳大利亚曾甚嚣尘上，但到1901年就无声无息了。

交通的改进对英国和英帝国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造船业中，钢铁代替了木材；新的复式蒸汽机比原来的蒸汽机效率高得多；到19世纪末，内燃机带来了陆地和海上机械推进器的革命，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制造者、船舶所有者和燃料煤的供应者。英国仍拥有海上霸权，它的商船大大有助于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和贸易，加强了帝国中心同遥远属地之间的紧密联系。货运、经纪人业务、保险、海运以及其他业务的收入已占很大比例。冷藏船只的使用大大推动了澳大拉西亚乳品制造业的发展。

在英国，铁路建设的伟大时代到1870年已经过去了，但它成为铁路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它的工程技术人员享有极高的声誉，它有可供在帝国内外建设铁路的资本。在1870—1901年间，英国的企业和资金把许多国家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为在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拉西亚开发农业和矿业资源创造了条件。英国资本大都以供给修筑和装备铁路所需物资的形式输出。火车车轮的铿锵声响，宣布加拿大草原和澳大利亚丛林居民们美好生活的日子已经降临。只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才使他们的艰苦生活变得安适些，并使他们胸中燃起了获得报酬的希望。但是随着运费的降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竞争十分激烈。对海外的牧场主、牛奶场主和小麦农场主来说是有利的事，对他们的英国同行来说则意味着破产。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是一件对英帝国有重要经济、政治意义的大事。在英国，地区范围的运河在同铁路的竞争中被淘汰了，唯一的一项开凿新运河的大工程，是曼彻斯特通航运河，它把曼彻斯特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了海港。在加拿大则不同，在那里，通过运河在国内

运送小麦或其他笨重的产品仍然是最便宜的办法。从蒙特利尔到苏必利尔湖的水路在1885—1900年间有了很大的改进。自行车和有轨电车改善了工作和娱乐条件。但是，英国在发展内燃机方面落后于欧洲大陆和美国。英国规定机动车时速不得超过4英里，这拖延了汽车的使用。

电报事业的状况则不同。在英国，这种设施属于国有，它改革了新闻事业，使伦敦能和遥远的地方直接联系。电报不仅对经济很重要，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对英帝国也具有重大意义。移居国外的英国人每天都能很快地得到国内的消息。帝国政府也不需要再像印度兵变时那样，成周地甚至是成月地等待有关边远地区情况的情报。必要的援助和指示能够及时发出。殖民地总督不再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就地权宜行事，而成为一位在电话线终端接受唐宁街命令的官员了。虽然人们已不再把唯唯诺诺看成是“总督的怪癖”，但英帝国也并非完全没有具有独立见解的总督，1898—1905年任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交通的改进带来了贸易的扩大，新的地区可以到达，更多的资源得到开发。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对商品的需求。船只、外轮的燃用煤以及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在英国出口项目中名列前茅。转口贸易仍占重要的地位。英国商人继续充当殖民地的以及欧洲大陆大批消费者的贸易中间人。然而，有许多因素干扰英国的工业家和商人。1873年以后，物价水平虽有波动但已下降，到1894—1895年降到了最低纪录。据调查贸易萧条问题皇家委员会1886年的调查报告透露，英国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其中德国和美国是最难对付的。作为工业家和国际贸易商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虽是新手，但却没有旧传统的束缚。它们精力旺盛，机智灵活，毫不迟疑地采用最新方法制造和出售商品。它们不像英国制造商那样，认为必须权衡新工厂与老工厂的利弊，它们没有这些障碍。美国和德国的推销员比英国的更善于随机应变，它们竭力取悦于顾客；德国人还特别得益于灵活的信贷制度。德国和美国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它们都用关税来保护新兴的工业。理查德·科布顿曾梦想全世界普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幻想已经破灭。除新南威尔士和开普殖民地以外，英国的自治殖民地都拒绝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加拿大人来说，“民族政策”就意味着保护他们自己的工业。甚至小小的维多利亚都试图以

征收高额进口税来实现工业化。在英国的各属地中，只有印度制定的税收制度对英国制造商有利。虽然英国没有给从帝国各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以关税优待，1896年加拿大却开始给英国制造的某些商品提供特惠待遇。

直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家一直坚持自由贸易。19世纪80年代一次软弱无力的公平贸易运动惨遭失败。为了销售产品，英国不得不从国外购买商品。因为廉价的食物适合工厂主以及工人双方的利益，所以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英国的农场主面对残酷的国外竞争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政治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经济理论都妨害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农业利益。

在张伯伦任殖民大臣以后，有利于西印度群岛的变化终于来到。他认识到英国殖民地的糖业生产者面临着欧洲大陆受资助的甜菜糖的不公平的竞争，便采取了显示其独有的魄力的行动。他扬言要对受资助的糖业征收反倾销税，从而稍稍减轻了西印度群岛的萧条状况。但是后来，当张伯伦真正着手进行关税改革时，他并没有给英国农场主以帮助。

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土地所有者集团丧失了他们在政府中一度起主导作用的影响，英国农业在生产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方面也不再占世界生产的领先地位。美国生产的小麦新品种的磨粉质量超过了英国。美国大草原上的处女地不需要施肥而年复一年地生产着各种农产品。在英国，土地要维持三个不同的阶级——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需求。只有10%至15%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土地是由土地所有者和实际占有者自己耕种的。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小麦农场主是免费或以很低的代价从政府或铁路公司获得土地的。他同雇工一起在田间劳动，后者一般是从欧洲新来的移民，劳动的时间长而工资甚低。他们只在农忙季节受雇，一年中的其余时间他们可以去菠萝园工作或从事农场主的家庭杂役，只供食宿。美国的农民知道他们很快也能成为自由占有土地的农场主，所以他们工作速度之快，在旧世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新式机器大大地降低了美国和加拿大小麦的生产成本。以改进的方法散运谷物，而且运费低廉，这对英国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廉价食品，但是对英国小麦农场主来说则意味着灾难。

19世纪80年代，冷藏船开始长途运输易腐烂的货物。从那时起，来自美国和澳大拉西亚的奶制品和冷冻肉以合理的价格大量出现在英国市场上。1900年这一年，仅新西兰就向英国运去400万只冷冻的羊羔和羊。为了控制英国市场，澳大拉西亚的牛奶场主至今还在和丹麦同行进行竞争。

各种发明和科学发现有利于牛奶场主，正如其曾经有利于小麦种植者一样。精心的饲养改良了牲畜品种，适宜的肥料和草类使饲草和牧草的品种更加丰富。奶油分离器和牛奶检验器彻底改进了牛奶的加工，黄油和干酪工厂也建立了起来。安蒂波德斯群岛上一般的农场主都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先进得多，后者不善于利用他们靠近世界上最好的奶品市场这一条件。

19世纪70年代，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加重了英国农场主的灾难。持续的降雨破坏了收成，而胜利的工会运动却使工资增加了。价格的直线下跌，给英国的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894—1895年，小麦价格下降到1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地方税收负担的减轻和地租的稍稍降低也未能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主的处境。1870—1901年间，有250万英亩耕地荒芜，农业工人减少了大约30万人。苏格兰的情况和英格兰相类似，不过爱尔兰的情况在将近19世纪末时有了改进。主要出于政治原因，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新法律改善了租佃农的命运，愿意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还可得到一大笔条件很宽的贷款。在霍勒斯·普隆克特爵士领导下，在爱尔兰大力推行农业改革运动，强调进行农业教育、发展乳制品业和兴办丹麦式的合作社的必要性，并请来了丹麦的专家。到1900年，前景已大有希望。

到19世纪晚期，英国恢复了对科学耕种的兴趣。设立了农业部，任命了农业大臣，强调农业教育，成立了英国农业学会，研究工作受到政府资助。但是，因为一般英国农场主不接受新思想，因而迟迟不见成效。由于进口粮食，使粮食出口国有了购买英国工业品的支付能力，英国人就认为没有必要增加农业生产了。

殖民地的情况则不同。特别是澳大拉西亚要用农产品换取铁路物资、重型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羊毛仍是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在有些殖民地，特别是新西兰，肉类和奶制品生产正迅速发展起来。新西兰

的北岛，由于气候适宜，雨量充足，具有发展奶制品业的许多天然优越性。这些优越性被机敏的农学家们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们采用了最新的发明，建立奶油和干酪工厂，并充分利用从丹麦人首创的农业合作中学来的经验。1891年以后，新西兰政府发展了更多的农场，发放条件很宽的农村贷款并帮助改进奶制品的生产。促进这一运动的动力是实际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和在国内的政策相反，英国政府积极寻找途径增加各属地初级商品的生产。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帝国的利益，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以改善经济情况。采矿业仍用私人企业经营，但种植业由政府给予鼓励。对可可、咖啡、棉花、花生、西沙尔麻和茶叶的生产都给予支持。丘镇皇家种植园成了整个帝国的总部，它推广种子和幼苗，提供专家咨询，和在锡兰、海峡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的植物研究机构保持联系。为了帮助种植园主和农民，还开办了试验站。对利润的追求把私人资本吸引到了各殖民地。在锡兰和马来亚，茶叶和橡胶种植园迅速发展起来，交通得到改善，贸易得到促进。虽然某些较新的植物学学科如遗传学和植物病理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英国政府努力把一切已知的科学成果推广到各属地去。

在大型的制造业，如钢铁和纺织业方面，英国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但随着它通过改善交通和输出资本、机器、科学思想和熟练技术来传播工业革命，它的突出地位逐渐降低，竞争的对手已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在钢铁工业方面，尤其如此。1880年，英国的出口额是法国、德国和美国总和的两倍。但以后10年，英国的钢铁生产就停滞不前。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制造商应用英国的发明和发现，产量大增；而保守的英国工业巨头们却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熟视无睹。英国的钢铁制造商不愿意抛弃陈旧的机器和工厂，在和从头开始的外国对手的竞争中遭到了失败。而且，德国和美国蕴藏着大量煤和富铁矿，它们本国的市场又受到关税保护。结果，在1900年以前，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都迅速超过了英国。

尽管遇到了剧烈的竞争，英国的纺织厂主们却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大部分原棉仍来自美国，澳大拉西亚则供给大量优质羊毛。英国纺织业中心兰开夏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因此，当日益发展的印度棉纺工业威胁到这个重要市场时，兰开夏的棉纺厂主就热心地参与了争取制定人道主义的印度工厂法的斗争，他们促成的另一项措施是，向印

度棉纺厂主强征货物税，其数额相当于向进口棉纺织品所征收的财政税。

阻挠英国钢铁制造商采纳英国新炼钢法的保守主义，也妨碍了英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英国人发明的从煤焦油提炼染料的方法，在英国不如在德国那么快获得重视。强大的德国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它的苯胺染料很快地从世界市场上排挤了植物染料。由于有些植物染料是用西印度群岛的苏木制造的，因而这门新工业又给贫困的英属西印度群岛增添了困难。

到1901年时，英国某些工业虽遭受了种种挫折，但它在财政方面，和在航运方面一样，仍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金本位的英镑仍然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号称金融界“直布罗陀”^[3]的英格兰银行，发挥着英帝国储备银行的作用。5家英国股份银行通过合并和分支行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权力。虽然1879年格拉斯哥城银行的破产和11年后巴林银行的倒闭使英国的银行系统受到震动，但是它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维持了下来，而在其他国家中却使银行遭到破产；这就为健全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由于意识到自己对储户和投资者的责任，英国股份银行在提供贷款方面是很慎重的，而且不轻易在英国以外开展业务，5家银行中，只有巴克利斯银行有海外支行。随着殖民地自治化，帝国对殖民地银行的控制也消失了。殖民地银行欢迎存款，但对伦敦（各大殖民地银行在这里仍拥有储备）方面的监督则表示不满。有些特许在海外开设并用英国资本建立起来的银行，其总行设在伦敦，因为这里是商业、保险、采矿、航运和其他事业公司的中心，这些公司的业务遍及全世界。实际上“伦敦城”是一个比英帝国更广泛得多的金融王国的首都。

不管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的财政大臣，他们都遵循着罗伯特·皮尔爵士和威·尤·格莱斯顿制定的原则——他们是对政府开支“负有神圣责任”的、受到人民群众“信赖和信任”的管家。其结果是，赋税负担减轻了，国债从1870年的7.47亿英镑下降到1899年的6.35亿英镑，利率从3%降至2.5%。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商业活动，其中的大部分流入帝国各殖民地。尽管遭到一些重大损失，英国在国外的长期投资在1870—1900年期间，还是由10亿英镑增加到25亿，其中约有一半投放在英帝国范围内。这些投资的利润，加上银

行、保险和航运事业的收入，促进了英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

从财政上说，所有的属地都是债务人，但都从它们同英国的联系中得到巨大收益。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各属地，按照殖民地贷款法，以很低的利率向公共工程和救济提供了资金。由于英国的政治统治保持稳定，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政府能在伦敦以低利息借到贷款，用于港口和水利工程、铁路、电报和电话的建设。在这方面，1900年的殖民地公债券法给借方提供了巨大的利益，这个法令允许给殖民地的债券提供信用资金。政治的安定还鼓励英国投资者和企业家们在帝国许多地方（包括印度在内）着手发展工业。

资本外流通常采取出售生产资料、向海外企业投资、向政府或私人提供贷款以及银行存款等形式。印度的水利工程，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铁路、船坞、港口和公用事业设备都得以兴办，因为能够从伦敦以低利息借到资金；张伯伦的殖民地公债券法在这方面起了特别有益的作用。私人企业资本有的投入前已提及的各特许公司，有的用于在殖民地建立种植园、开发森林、开采矿山和开办其他有利可图的企业。19世纪80年代末，已有大笔英国资金存入澳大利亚各银行。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失策，因为大宗存款鼓励了投机活动；当巴林银行破产使伦敦货币市场吃紧时，澳大利亚各银行才发现长期贷出而短期借入是干了蠢事。存款被纷纷提取，银行被迫关闭。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财政危机中，英帝国各殖民地政府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政策。受到各股份银行的资助但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英格兰银行在巴林银行危机中得以避免大的恐慌。维多利亚州政府未能采取行动，那里的一些银行因而关闭。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新西兰，则由于政府采取了果断行动而挽救了局势。英国最老的但自治程度最低的殖民地纽芬兰遭到的打击十分严重，致使各地方银行永久关闭。1894年，一家加拿大银行，蒙特利尔银行，根据请求在该岛建立了一个分行。加拿大有些银行机构，特别是蒙特利尔银行和新斯科舍银行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足以在自治领以外开展业务。在加拿大银行中，苏格兰的影响很大。加拿大只批准了少数几家银行在殖民点扩大和需要更多银行的情况下成立分行。

在殖民地，新的资本构成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从那以后被称为“公营部分”的形式。澳大拉西亚和印度的铁路是由几个政府修建的，因为这些亟须修建的路线获得利润的希望极小，所以私人公司不愿意承担它们的修筑任务。纽芬兰修筑了一条短距离的铁路线，后来，这条铁路连同其他公用设施，差不多是免费送给了一个加拿大资本家。在1867年成立联邦时，加拿大铁路属私人所有。但连接哈利法克斯和魁北克的殖民地之间的铁路是由政府修建和经营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则是由一家公司修筑的，这家公司得到自治领政府大量的援助。决定大英帝国铁路政策的是实际的需要，而不是关于政府所有权的理论。

最终使所有重要贸易国都采用了金本位的货币政策的趋势，导致商品价格下跌，到90年代时行将引起灾难。在此关键时刻，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挽救了局势。这些发现有许多是在英帝国领地上，它们全都激励了金融界的行动，结果引起的价格回升对整个英帝国的经济都是有利的。

除资本以外，英国还给年轻的海外国家提供了人力。在1870年至1901年间，有600多万人移居国外。这样的大量移民缓和了国内失业，给新国家提供了大量年轻力壮的财富创造者。虽然约有65%的移民迁居到美国，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继续做英国国民，在大英帝国的无人居住地区定居，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新西兰的人口增加了两倍；澳大利亚的人口也大量增加；在加拿大，英国移民的拥入补偿了迁往美国的移民。

各种类型的移民改变了帝国若干地区的人口情况。从中国招募的苦力帮助修建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印度则提供了在东非修筑铁路的劳动力；斐济群岛像纳塔尔和西印度群岛一样，给种植园招来了印度工人。昆士兰种植园主企图吸收波利尼西亚人，但由于澳大利亚劳工和英国人道主义者的联合反对而受到阻挠。最终导致各自治殖民地想出种种办法排挤东方人。加拿大对待来自欧洲的移民比澳大利亚要友好。到19世纪末以前，曼尼托巴省已出现了许多由德国人、冰岛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操多种语言的社会群体，而澳大拉西亚人则保持着他们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明显的偏爱。

在英伦三岛内部，人口的移动不仅加剧了原有的困难，而且增加了新的麻烦。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地区，从爱尔兰、苏格兰迁到英格兰，带来了严重的住房和环境卫生问题。犹太难民从波兰和俄罗斯蜂拥而来，增加了贫民区居民的数量，并促进了那些靠工人血汗劳动的工业的发展。但是血汗劳动并不限于英国城市。19世纪90年代初，这种劳动在墨尔本的盛行就曾使维多利亚州的社会工作者感到焦虑。

英国农场主的困境对工业劳工是有益的。由于食品价格下跌，实际工资因而上升。然而，千百万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缺衣少食。据英国一位船业主查尔斯·布思主办的关于《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营养不良，居住在不适宜于人住的地方。在英国其他城市，特别是格拉斯哥和利物浦，也有大片地区居民生活状况恶劣。这种住房拥挤而不卫生的情况，也不仅局限于城市。苏格兰的雇农和佃户，爱尔兰的农民，他们所居住的茅屋与牛棚相差无几。主要由保守党人倡议的关于住房问题的立法也未能改善这种状况。19世纪90年代新成立的伦敦市议会收到的成效还稍稍好些。

与此同时，在基督教的和世俗的人道主义激发下进行的各种活动，唤醒了英国人民的社会道德心。基督教救世军的创建者威廉·布思在他的《最黑暗的英国》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大城市里可怕的悲惨情景，并真诚地呼吁筹集款项给予救济。救世军和巴纳多博士（他终生从事改善伦敦东区流浪者的命运）都试图帮助那些贫困的、无亲无故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和成年人移居国外，使他们开始新生活。牛津大学教授阿诺德·汤因比唤起人们对下层社会的疾苦的极大关注，以至在他死后，在伦敦东区建立起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济贫院。英国国教的牧师们对社会问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传教团体在帝国内外扩大他们的活动，并且从单纯指责偶像崇拜的邪恶转向积极改进非洲人、亚洲人和南太平洋诸岛岛民的世俗生活。格伦费尔医生的医疗团体在拉布拉多岛的活动，说明改善帝国的这一被忽视地区操英语居民的生活的必要性。

公众对火柴厂女工和码头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的支持，证明了对劳动群众的命运迅速增长的同情心。码头工人有约翰·伯恩斯、托姆·曼和本·提列特等人精明强干

的领导；这些人得到红衣主教曼宁的宝贵帮助和澳大利亚工人的大量物质支援。他们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领袖于是强迫保守的工会代表大会接纳非熟练工人的代表参加该组织的审议工作。这样就产生了新工联主义，工人运动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

根据19世纪70年代的立法，英国工会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工厂法也加强和扩大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人都争取工人的选票；文盲的扫除和廉价通俗报纸的出现，开辟了联系普通群众的新途径。受到卡尔·马克思的福音影响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此表示赞赏，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一伙志同道合者建立了费边社，希望通过“渐进”过程“按最高的道德标准”重建社会。为此目的，该社出版了大量讨论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小册子。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持更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这些组织都未能在群众中吸引大批追随者，真正的群众领袖的社会思想还是以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统治阶级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也对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和工人完全依赖日工资的状况感到不安。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曾建议在政府的帮助下，分配或出售小块农田给工人。为达到此目的，通过了若干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并未能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状况产生多大影响。

虽然在社会立法方面英国落后于德国和澳大拉西亚，但也不乏各种减轻社会弊病和结束浪费的经济冲突的主张。政治理论家们强调考虑人的尊严和自尊；务实的政治家们则主张实行老年退休金和由政府仲裁解决劳动纠纷。但是，爱尔兰自治问题引起的激动情绪和对帝国扩张的重新重视转移了人们对“英国的状况问题”的注意力。新兴的海外社会群体由于没有社会的那种缚住人们手脚的影响的阻挠，能够更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使“生命的才华更有价值，使人与这种才华更相称”。用他们的领导人之一威廉·彭伯·里夫斯在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实验》（1902年）一书中的话说，澳大拉西亚各民族“把他们的殖民地看成是许多合作团体，他们这些男男女女都是股东，而政府是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虽然他们采用了许多英国的和某些美国的思想，但是“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的论据主要是他们的周围环境和地方经验的产物”。呼吸着“一个未开发国家的自由空气”，但又具有遵守秩序的教养的澳大拉西亚人，有英国作为他们的银行家和保卫者，能够倾全力于解决地方问

题。他们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工厂法，限制了劳动时间并确定了工资最低限额；他们取消了血汗劳动；成立了工资评议会，建立了强制仲裁劳资纠纷的制度，并开始发放老年退休金。他们把大地产分散，为缺地农民提供农场，发放条件优厚的农业贷款，并促进合作社的建立。1895年以后价格的上涨和较宽的贷款条件促进了各种试验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

在加拿大，社会立法的权力属于各省，但它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落后于澳大利亚。在魁北克有只能维持生计的农业，加拿大所实行的宅地法，在伐木场和铁路建筑方面具有的就业机会，同吸引着寻求职业者的美国接壤；工业发展的落后，以及对政府干涉的反感，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加拿大人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般看法与澳大拉西亚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大不相同。在南非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居民面临一大堆问题，但他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兴趣加以解决。在印度也是如此，那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所受的教育是，耐心忍受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期望在来世有更好的境遇。

在教育领域，变化很大，但是进步快慢不一。民族主义的愿望、种族和宗教的差异、财源的匮乏以及目标和方法的不一致，都妨碍着人们在探求知识方面的进步。如人们所料，在英国、澳大拉西亚和北美洲各自治殖民地，受教育的机会在飞速增加。初等教育是义务的和免费的，不过，只有在澳大拉西亚，它才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公办的中等学校、大学和高等学院在英国和海外都建立起来。在非洲和印度，基督教传教团体在各级教育中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直辖殖民地中，只有锡兰在对所有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牛津和剑桥为新成立的大学提供课程设置方案，并常常为这些学校培养教学人员，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它们通常是以伦敦大学的学院联合制为榜样。

在英国和英帝国，主张宗教与教育分离和主张宗教应是全部教育的基础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强调自然科学的德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功，又在主张保持传统的古典学科的人们和主张采纳德国制度的革新者之间引起了冲突。对一切人的免费教育是否应只限于初等教育阶段，大学应不应该招收女生等问题，为烦琐的学究式的争论提供了新课题，结果是传统主义者一步步地丧失阵地，特别是在各殖民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民主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在许多问题上都代表了真正的进步主张的约瑟夫·张伯伦，赞成在教育方面架起“雅各的天梯”^[4]，使“我们中间最贫困的人，只要有才能……就能上升到文化的尖端”。主要的传统主义者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不相信新的哲学体系、热忱和感情用事。他警告大学的导师们要“避免任何种类的改变信仰的做法”，但为了适应现在观点，他欢迎缩小“阶级与阶级之间的隔阂”。在乔伊特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学生中焕发“通过扎实的工作而产生的力量感”。他轻视那些混得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资格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贵族懒汉。他的箴言是一句挑战性的话：“勿再随波逐流。”在他的领导下，“贝利奥尔学院变成了主教、殖民地总督和内阁大臣的摇篮”。

乔伊特的影响波及帝国的许多大学，不过他的“勿再随波逐流”的告诫对牛津的学生比对殖民地居民更适用，因为后者在生活中遇到了不断的挑战，要求修改移植来的东西，在新创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新的制度。在英帝国的各大学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在19世纪末之前，有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效法德国；加拿大的大学则逃脱不掉来自边界南边的“传染”。然而，魁北克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那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按照早已不理睬他们的母国法国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制度。

尽管知识分子日益采取唯物主义的和世俗的态度，但在新的民主时代，普通人依旧不仅是政治的人而且是宗教的人。由于宗教分歧而引起的争端，常常在国内和海外的报刊上和立法大厅中引起愤怒的辩论。为取得大学学位而进行的宗教考试已废除（当然神学系除外），实现了普遍的宗教平等，英国国教在爱尔兰和几乎全部西印度群岛都已与政府分离；19世纪90年代初，在威尔士也出现了要求国教与政府分离的要求。旨在使英国的初等教育世俗化的努力失败了。在加拿大某些省份，各教派对教育的控制受到宪法的保护；废除教派学校在曼尼托巴激起了尖锐的政治争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还出现了教派学院，虽然这些学院没有取得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各学院那样的学术地位，但它们清楚地表明在大学界内部出现了宗教分裂。在英国，关于爱尔兰自治的辩论也带有宗教偏见的色彩。在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宗教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政治问

题。在英国，参加国教和非国教礼拜的人可能减少了，但是在格莱斯顿退休以后很久，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形成了一支确定无疑的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兴趣仍很强烈：向在遥远的国家里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团体提供了大量的捐款；伦敦人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听浸礼会传教士查·哈·斯珀吉昂讲道；《圣经》是最畅销的书籍；就决定英国工人的社会态度来说，“登山宝训”^[5]比《共产党宣言》更起作用。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报纸读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一种特殊类型的廉价报纸风行一时，如布赖斯勋爵在他的《现代民主国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报纸迎合了“未受过教育的、缺乏批判能力的和不苟求的读者群众”的心理。《泰晤士报》在它的著名主笔约翰·撒迪厄斯·德兰主持下，避开庸俗的商业手段，摒弃党派的偏见，设法引导和推动舆论。德兰的继任者则背离了他某些最有益的思想。随着爱尔兰自治问题的争论，《泰晤士报》变得具有不健康的党派色彩，当揭发出那些破坏爱尔兰领导人的信誉并在《泰晤士报》上公布的文件均属伪造之后，该报就丧失了其左右英国新闻界的地位。甚至在这次大挫折之前，《泰晤士报》就已经不再受那些喜欢鲜明而巧妙地写成的富于刺激性的新闻的人所欢迎了。一些新型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如威·托·斯特德，运用他们的才能推动舆论，要求实行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另一些人则主要关心的是牟利，而取得成功的却是后者。他们之中的首要人物是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后为诺思克利夫勋爵），他的成就是19世纪90年代惊人的成功故事之一。他和他这一派的新闻工作者不是诉诸人们的理智，而是打动他们的感情。他们夸大琐事，以宣扬丑闻为乐事，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把谣言说成事实。列强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为耸人听闻的报纸大字标题提供了材料；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庸俗的商业主义；仇恨在千百万人的心中滋长。索尔兹伯里勋爵虽然可以讥讽哈姆斯沃思的《每日邮报》是由“办事员为办事员”而写的，但是到1901年，它的每日发行量达到了100万份，成为左右舆论的重要工具。

在海外的主要报纸中，多伦多的《环球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在政治上都有强烈的党派色彩。虽然它们在社论专页中都强调本地区的特殊利益，但来自英国的新闻在它们的各个专栏中均刊登在显著的地位，以便对原来的母国的记忆永存心中。

对户外运动日益增长的兴趣，不论对社会或对英帝国都具有重要意义。板球和足球费钱不多，给青年人提供了赢得荣誉的机会，而不受种族或社会等级的影响。在1870年到1901年，这些运动项目非常普及，地区性的或帝国范围的比赛使散布四处的帝国各地区之间保持了友好的联系。英国的体育道德标准甚至也传播到帝国各个遥远角落。

许多19世纪的殖民地政治领袖均出生于英国。其中著名的有新南威尔士的亨利·帕克斯爵士和新西兰的理查德·约翰·塞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一些同事都出身于普通工人，所以他们的英国出身与其说有助于各殖民地和英国之间更好地了解，不如说更容易妨碍这种了解。在殖民地政界，如同在美国一样，低微的社会出身被认为是一种资产；但是在英国，那些曾在有名的公学和全国性大学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在工人阶级的选区也占有有利的地位。英国社会对殖民地的来客采取傲慢的态度，是英国和英帝国各国之间精诚团结的一个严重障碍。

虽然由于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取得了进展，殖民地的社会优良风尚和财富也已经增长，从而缩小了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距，但鸿沟仍然是既宽而又非常具体的。富于冒险精神和进取心的男男女女割断了与家庭的联系，在遥远的地区建立起新的社会。他们反对白厅控制他们的政府和经济生活；他们挫败了强迫他们信奉国教的努力；他们基本上是平等主义者，对贵族的优越感怀抱不满。旅居殖民地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社会感到震惊，犹如查尔斯·狄更斯和特罗洛普夫人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感受一样。正是在澳大利亚的11年，使罗伯特·洛成了英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激烈反对者；总督阿瑟·戈登爵士在新不伦瑞克和新西兰的殖民地议会的经历，使他确信殖民地自治是一个错误。1872年迪斯累里也悲叹，在授予殖民地自治权时，英国没有保留对直辖殖民地和关税的监督权，也没有强行要求他们执行关于在战时各殖民地有义务支援母国的规定。而海外英国的这种真正的精神则受到他的政敌格莱斯顿的充分赞赏。格莱斯顿作为爱德蒙·伯克的拥护者，坚决主张“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应是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准则；他宣称他坚信，只要给它们以自由，它们将会在经受考验的时候出于自愿慷慨地帮助英国。这一信念在英布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证明，当时成千上万的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的志愿士兵为英国而战。

殖民地自治取得了进展，在1870—1901年期间变得更有意义了。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澳大利亚联邦已完全具备了条件同加拿大自治领并驾齐驱，成为一个有巨大发展前途的联邦国家。海外大家庭在政治上迅速向主权国家发展，但是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依旧处于附属地位。在艺术、教育和文学方面英国的模式占统治地位。殖民者在征服荒野时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在文化领域则无法与之相比。他们的社会在这方面尚属原始草创时期，以致像凯塞琳·曼斯菲尔德这样有抱负的作家不得不到英国寻求职业。美国则吸引了有才能的加拿大人。只有一部殖民地小说《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在它的产生地以外得到人们的赏识，它的作者奥利夫·旭莱纳是一个在贝专纳传教的德国路德教传教士的女儿。

1894年3月，格莱斯顿辞去首相职位退休时，曾悲叹道“今天的世界已非我生长、受教育和大半时光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了”。他说得很对，不过，在许多领域，正是由于他自己实行的改革——即他感到非常自豪的所谓“打开窗户”——加上迪斯累里所支持的各项改革才产生了这些变化。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迅速改变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迫使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抛弃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个人主义理论，而支持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干预。工厂、农场和船只的所有者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父母必须送子女上学；房主必须遵守卫生规则。电报和电话系统归全国政府所有，公用事业由市政当局管理。只有当国家的权力也用来革除弊病和扶弱抑强时，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才能实现。

1901年，政府应当“民治、民享”的原则，在海外比在英国得到更广泛的承认。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再引布赖斯勋爵所著书的说法——即“由‘多数人’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绝不容许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在英国国内，斯坦利·杰文斯、托·希·格林和其他19世纪80年代的理论家们强调，要促进“人类最丰富多彩的发展”，只有当国家向个人提供这样的发展机会时才能成功。这样，他们就推翻了穆勒的理论。到19世纪末，上述原则在澳大拉西亚殖民地比在英国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原因很简单，因为管理着自己的政府的人民，要求改善其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为个人，他们要求过好生活，但这种生活只有在政府帮助下才能得到。这些小小的社会变

成了外部世界所密切注视着地进行立法试验的实验室。英国的属国就是这样改变了关于国家职能的老观念。

达尔文进化论广泛为人民所接受，这在知识界形成了一种与格莱斯顿“生长和受教育”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理论气氛。这位老政治活动家曾确认他对“坚如磐石的圣经”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企图以此英勇地阻挡日趋扩大的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潮流。支持他的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政治对手阿瑟·詹姆士·贝尔福。1895年贝尔福发表了一篇立论巧妙的论战性文章：《信仰的基础》。但是“不信仰”的毒素正在传播。由于英国劳动者以工人的神殿代替了教堂，他们的思想中越来越充满唯物主义信条。

英国已经向着政治民主前进，随着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也就为实行在各殖民地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民主奠定了基础。但是，到1901年时，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有这一变化过程的迹象。英国的旧的社会结构虽不断遭到破坏，但社会的虚华外表依然未变：贵族富丽堂皇的城市宅第和乡间大厦仍配备有全班人马；新加封的贵族热心于追求古代世袭贵族所建立的那一套风俗习尚；地位稍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他们的金银财宝用之不尽。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政治活动家感到不安。外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危险不容忽视。在事先察觉到危机临头的人当中有约瑟夫·张伯伦。他焦虑不安，于是，考虑实行新的关税政策的可能性，并且主张建立英、德、美三国联盟。但是，不论是他的同胞，或是预期中的盟友，都不同意他关于结盟的建议。

不论是英国还是英帝国都受到19世纪即将结束时不断壮大起来的民族主义潮流的冲击。任命了苏格兰事务大臣，允许威尔士成立国立大学，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扩及文化和语言方面。印度复兴的迹象大大增加，这个幅员广大的亚洲次大陆上的各古老种族在政治上已经发展得难以控制了。澳大拉西亚人虽然尚未产生一种真正“当家做主”的思想，但是他们已变得更加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他们同英国之间在借款关系上出现了摩擦。和加拿大一样，他们也许以享有作为“母家”的女儿所应有的特权而高兴，但是他们同时又坚持要求承认他们是自己家里的全权女主人。

在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讲法语的和讲英语的两部分加拿大人的尖锐分裂而受到阻碍。前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第一批定居者，因此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加拿大人。他们珍爱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后一部分人是前一部分人和安大略人民之间的障碍。在安大略，强大的奥伦治党人协会保持着来自爱尔兰的强烈宗教仇恨。然而，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安大略的奥伦治党人和抛弃了在美国的家园，坚持做英国国民的那些亲英分子，因决心不让他们的家园被强大的邻国吞并而联合在一起。他们愿意做加拿大人，并且证明，文化上的差别不会妨碍加拿大发展成一个民族国家。他们的总理威尔弗里德·洛里埃爵士可以很有说服力地向英国听众表明他作为一个英国国民的骄傲，但是他一再指出，他首先是一个加拿大人，是他的祖先于1665年踏上的这块土地的真正儿子。

1901年，由于英国在前一年吞并了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白人的南非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原指望这次吞并能促使在非洲次大陆建立起一个类似加拿大自治领那样的新国家。但是，甚至在英国人和布尔人卷入南非战争的殊死战斗以前，就有迹象表明，一个新的扎根于南非土地上的新的民族运动正在兴起，其主要宗旨是永远不忘他们那些移居到这块土地上，深入内地建立自己的国家，战胜凶猛的部落，并坚定地拒绝英国化的先辈们。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不同，他们渴望割断同母国荷兰的文化联系，以抬高他们通用的阿非利卡语的地位。他们希望，通过世世代代的冲突斗争和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这种语言和建立起来的传统，能成为一个欧洲人的南非国家的基础。

此时，年迈的女王已经时日不多了。她在位的年代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国王都长，变化也最多。她对她在位时期得到广泛承认的民主思想是不赞同的。她从来没有访问过她的任何一个海外自治领地。对女王来说，激励海外领地各族人民的那种精神，在许多方面不仅是外来的，而且实际上使她反感。不过，对她的国民来说，她仍然是一种鼓舞力量；她是这个庞大帝国团结的外部象征。她的坚强勇气、严格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十分坚强的性格，树立了品德方面的榜样，并在艰难时期给人以鼓舞和希望。当不吉利的消息频频从南非传来时，传出这样的话：女王并没有沮丧。这个家喻户晓的信息到处都产生了振奋人心的效果。从她即位以来，英帝国已大大成长了。女王欢迎领土

的兼并，对放弃不论是非洲还是亚洲的据点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主张。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批准给予海外殖民地自治权，从而使英国进一步成为国家缔造者。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同英国的“格罗里亚娜”伊丽莎白一世^[6]相媲美。

（程西筠 译）

[1] 耶稣自称为“加利利人”。——译者

[2] 这是人们以谐声的说法攻击自治法案是实行专制统治。英文“自治”为“Home rule”，“罗马统治”为“Rome rule”。——译者

[3] 直布罗陀被英国人称为攻不破的要塞。——译者

[4] 《圣经》中雅各在梦中看见的天使上下的天梯。见《创世记》第28章，第12节。——译者

[5] 《圣经》中耶稣对门徒们的训诫。见《马太福音》第5—7章，《路加福音》第6章20—49节。——译者

[6] “格罗里亚娜”（Gloriana），意为“光荣女王”，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斯宾塞的长诗《仙女王》中的仙女王的名字。这个形象代表着伊丽莎白一世。——译者

第十五章 1840—1905年的印度

在追溯印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时，重要的是应仔细地权衡印度和英国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而英国一方又不仅是英国，同时还有欧洲与西方，因为从其大量活动来看，英国人与其说是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征购粮食，不如说是传播整个西方文化的先驱。过去存在一种倾向，把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的重要特征，看成是英国完成了它的重要统治，看成是逐步推广英国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公共事业，以及传播西方的文化思想和西方的人道价值标准。决定把西方制度介绍到印度的人们认为：印度的制度是无能的，而且印度的传统思想意识，即使不是确实有害，也是低级的。他们指望逐渐以欧洲的事物取代印度的事物，虽然他们并没有都用麦考莱那种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们的期望。论述英属印度问题的第一个学派的作家，被英国力量的崛起这一景象所陶醉，认为在印度帝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英国力量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显著而持久的。随后，从詹姆斯·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为过渡，出现了一批作家，他们认为英属印度历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输入了西方制度。这两派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统治方面，在第一派强调“统治”这一概念时，第二派则注重“英国”这个概念。他们和当时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一道，都认为印度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贡献给它自己的未来。当印度人似乎并不那么积极地接受西方事物时，这一现象被说成是出自愚昧或顽固，而旁遮普学派则进而提出一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清教主义，主张辛勤地工作而不期望（从印度那里）得到报酬，决心给印度做好事而不考虑印度会怎样对待。

在20世纪，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这种观点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认识到不仅印度对它自己的未来大有切身关系，而且形成印度舆论的力量，也绝非全部是西方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所低估的印度思想，是和西方思想同样重要的，而印度人的观点的重要性，也同样不亚于白厅或西姆拉^[1]的观点。对于印度观点和印度社会发展的研究，在18世纪末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时又恢复起来，并被看作与关于英国政策或管理措施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印度

历史又一次被看作印度人的历史。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英国在印度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于印度人是如何做出反应的。这一变化过程，在英国和印度历史学家手里，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状态，但本章的概述正是试图从这一观点出发的。我们首先看到一股西方影响的潮流冲击着显然是一潭死水的传统的印度。然后，我们又见到这潭死水自己又翻滚起来，在20世纪形成一股其成分比例难以分析的混合水流，朝着未知的目的流去。这就是对英国人做了些什么和印度人对它们有些什么想法的研究。

在18世纪末，印度内战加剧而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同时随着拿破仑的出现而再次产生法国的威胁，只是到了这时，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才一致认为，霸权是继续进行贸易的重要条件。1815年做出了最后决定，1818年就赢得了霸权。这样一来，尽管议会坚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是一种公正的统治，实际上这种统治是为贸易服务的。它的主要目的既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福利事业。

在最终建立霸权的同时，东印度公司感到自由贸易的威力和当时在英国各处传播的人道主义的趋势。因此，就在霸权行将实现的前夕，允许私商和传教士进入印度。在货物和思想这两个领域，将同时出现自由的贸易往来和思想交流。控制印度的这个政治上的决定和这种垄断局面的结束，激起了一些思想和舆论上的骚动，这种骚动反过来又对做出进一步的决策产生影响。排除来自西北方向和来自海外的竞争者是必要的。阿富汗的另一边是波斯，而波斯再过去还有俄国。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历届印度和英国政府制定了西北政策。在印度本身，有必要在稳定的基础上组织行政管理工作。这意味着要对原来的税收体制进行一次彻底改革，并对税收主要来源的古老的土地制度，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这还包含着要调整一下与印度各王公的关系，因为他们还统治着印度一半以上的领土和1/3的人口。还有，就是在管理人民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对人民的思想和传统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

1820年至1830年这10年间，制定了19世纪英国对印度政策的第二个重大决策。在英国，极力促使制定这一政策的人是功利主义者和福音派的信徒；他们在印度最先受到以拉姆·摩罕·罗易以及他在加尔各答的朋友们为代表的公众舆论的支持。把英国制度和西方知识（后者通过英语作为媒介）输入印度的决定，意味着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将

不再是变本加厉的莫卧儿古老帝国，不再是沃伦·哈斯丁和老派英裔印度人的概念。它意味着开展一场文化革命，其目的是印度最终实现西方化。它的方法是以温和为特色，并且是英国式的。印度的制度，除极少数之外，将不受到公开的抨击或撇在一边。可以说是让它们和英国制度展开竞争，而由人民自由地在这两者中间进行选择。这一决策是由英国改良时期的辉格党政府和在印度的威廉·本廷克勋爵付诸实施的。

第三项决策也属于这一时期，尽管在任何政策法规或声明中都找不到它。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无须争论的。那就是印度在经济上隶属于英国。在东印度公司时代，从来没有想过，为了印度可能得到的利益，而给英国的贸易设置障碍。对这个总的态度，还要加上两个因素。自由贸易理论当时正在扩大影响，这就使下述主张得以成立，即在印度不对贸易加以控制是符合经济学说的，因而，也就对印度本身最为有利。其次，工业革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使用美国原料的棉纺技术制成的成品，可以比用印度原料在当地手工织出的成品更便宜地在印度出售。印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国工业的市场，这在过去是从来未有过的。理论和利益这两方面都决定了上述状态应该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而技术的进展又决定了古老的印度纺织工业注定要消灭。

在1840年以后的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些决策和发展的效果在发生作用。在政治方面，一个新的全印政府逐步形成，和先前的莫卧儿王朝政府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西方思想逐渐地、踌躇地被引进来，出自谨慎从事的考虑，规定改变应当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而不是带根本性的。在国际上，印度再一次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且成为亚洲国家中的一员。印度政府如同16世纪那样，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但在16世纪，外国影响来自西北，而在19世纪，这种外国影响则来自海外。两个政府都奉行扩张主义，但扩张的方向相反，莫卧儿帝国是从西北向东南稳步地扩展，而英国则是从东南向西北推进。然而，新的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到了莫卧儿帝国从未受到过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它的边境政策和外交政策受到欧洲强权政治的影响，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或东欧、乃至中亚的活动，能够改变印度政府的行动。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一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通过一系列并非专门为这一目的而制定的措施，摧毁了旧的统治阶级，促进了一个新阶

级的诞生，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新政权紧密相关。与此同时，通过新的西方化教育政策，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这两个革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社会变革把那些坚持旧文化的旧阶段推入失势境地，同时，在新的阶级中，为西方文化的扎根提供了社会土壤。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就产生了近代印度的温床和种子。

第三个后果是进入一个经济上的殖民主义时期，在这时期中，印度被视为英国工业原料来源地和英国产品的市场。上述第二个后果是英国在近代印度能够享有友好和权势的原因，而这第三个后果却引起20世纪那些具有政治头脑的阶级的许多批评和愤懑。

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858年为止，包括东印度公司实现对印度的全面统治以及兵变和镇压。第二阶段持续到1880年，这一阶段对于英国的统治，在实际上和理论上没有任何力量与之竞争。从这一意义来说，这个阶段可称为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880年到1905年，在这个阶段，英国在印度的势力显然达到了它的顶峰，而这个阶段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最终取代英国统治的力量得到发展。在论述第一阶段时，回顾一下造成各种发展条件的政治背景是有帮助的。印度政府远不是一个由英国内阁牵线操纵的傀儡政府，但它是英国的一个下属机构。一位总督可以兼并一个省份，尔后再报告白厅，但他这样做也有可能被召回，而且，实际上有时被召回过。地方权限相当大，但印度的政策大体上就是伦敦的政策。这一阶段开始时正值主张改革的墨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进入衰老的最后阶段。被提名为印度总督的奥克兰勋爵与他的前任威廉·本廷克勋爵相比，反映出辉格党的力量正在衰退。由于抱着要做一个从事改革的总督这样一种愿望，在他那些政治顾问和帕麦斯顿勋爵共同怂恿下，他卷入了阿富汗事件。在以罗伯特·皮尔爵士为首的保守党政府成立时，他辞职了，他的继任人是威灵顿内阁时期的督察委员会[\[2\]](#)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埃伦伯勒发现自己面临着像1841年至1842年在阿富汗遭到的那样悲惨局面[\[3\]](#)，经过一段犹豫以后，巧妙地把东印度公司从中解脱出来。但他那种丰富的想象力，促使他在令人质疑的情况下兼并了信德，与此同时，他那独断专行的脾气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以致在他统治印度两年多以后，董事会[\[4\]](#)最后一次行使了召回权。为缓和对他这一打击，皮尔内阁任命他的姻兄弟哈丁第一代勋爵为他的继任人。哈丁勋爵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军人政治

家，曾担任过陆军大臣和爱尔兰大臣。这次被遴选为继任人，部分原因是锡克教徒引起的危险局势。他把第一次锡克战争进行到底，并于辉格党人再一次在约翰·拉塞尔勋爵领导之下掌权时辞职。虽然他靠军事成就而闻名，但事实上，他继续执行了他的几位前任的对内政策。皮尔的新保守主义与其说是源出于威灵顿或埃尔登，不如说是从19世纪20年代的坎宁和赫斯基森等自由派保守党人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印度内部事务方面，党内不存在严重分歧，而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是和英国整个对外政策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印度各土邦内禁止寡妇自焚殉夫——寡妇在丈夫火葬的柴堆上烧死——以及禁止杀害婴儿等措施都受到鼓励，而且，教育事业也不受阻碍地继续发展下去。此外，巨大的恒河水利工程开始动工，并且还制订出印度铁路系统的第一批建设计划。

哈丁的继承人是**大贺胥伯爵**，他是一位皮尔派人士，在皮尔内阁的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贸易部任副大臣时出了名，他竭尽全力去控制19世纪40年代迅猛发展的铁路事业。大贺胥只有36岁，他年富力强，意志坚定，在以后的8年里，他一直统治着印度。他脾气专横而又积极肯干，富于想象力但没有多少对人的同情心，这样一个为了工作使自己筋疲力竭而又对任何监督批评都具有艺术家一样敏感的人，本来是容易和英国本土的当权者发生冲突的。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他的观点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体现了英国这一时期不停地工作的精神，以及对物质进步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所抱的信念；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英国国内混乱的政治局势。1846年保守党的分裂，使得辉格党和皮尔派中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掌管了英国，而激进分子和保护贸易主义者则在两旁争论不休。在大贺胥任职期间，共有四届内阁，他们都倾向于听任他们那位在印度的有能力的代理人自行其是。假如他当时精力过分充沛地回到英国的话，他能不去改组他们吗？1848年，大贺胥作为一个西方进步的热心倡导者和希望加快西方化步伐的人来到印度。在旁遮普发生的穆尔拉吉叛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结果旁遮普被兼并。但是，就他的本意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兼并主义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对西方进步的坚定信念。他相信，对人民来说，西方的政府要比印度的政府具有无限的优越性，因此，被并入的印度土邦自然是越多越好。在批评他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在有关丧失权利说的争论中，（“丧失

权利说”认为，各土邦王公的后裔，只有得到英国的承认，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没有嫡系嗣子为继承人时，按照印度人的法律可以收养嗣子。但“丧失权利说”则坚决认为其所收养的嗣子必须得到最高政府的认可，否则，依据“丧失权利说”，这个土邦就归东印度公司所有），往往忽视他执政时所做的其他一些事情，而他对西方主义的信念正是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正是他制订了兴建印度铁路系统的计划，引进了电报；他和查尔斯·伍德爵士一起，设计了第一批印度大学；他还建议让印度人进入新的一院制议会。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旁遮普和旁遮普学派是他施政的纪念碑，而他的政治遗产却是兵变；但是，较之上述两者都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为20世纪的印度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从下述背景，即在英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对西方精神的优越性、物质进步，以及经济贸易的功效等抱有纯朴的信念，来理解这18年所发生的事件。在政权方面，政策是以安全为原则。印度政府从来都无意于进行侵略，也就是说，它仅满足于印度天然边界的安全，除此以外，别无他求。然而，它不时地为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感到不安，并倾向于对被夸大的危险采取过分的安全措施。后来，伟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把这种心理状态描述为主张去占领月球以防止来自火星的袭击。1838年至1842年第一次卷入阿富汗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以及帕麦斯顿勋爵的对俄政策所造成的紧急局面和糟糕透顶的判断的结果。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第三次缅甸战争（1885—1886年）和寇松的入侵西藏，都是因过分恐惧而进行侵略的实例。在缅甸，引起恐惧的对象是法国人，其他地方则为俄国人。在第二次缅甸战争（1852年）和西藏战役中，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基本的动机在起作用，即认为愚昧无知的政权正在拒绝那些诚实的商人获得市场的愿望。

阿富汗冒险行动的结果，使当权者认识到印度没有统治伊朗高原的力量。整个下一代采取的政策是依赖这一地区国家的弱点，并利用一个友好的阿富汗作为缓冲国。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9世纪70年代，当神经紧张状态再一次压倒理智时才被改变。就历史上的地理政治论观点来看，印度的安全主要依赖于在印度北部有一个强大的能够有效地控制次大陆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过去曾经有过对印度的大举入侵，而且获得成功，例如贵霜人、匈奴人和土耳其人、

帖木儿^[5]、巴卑尔^[6]和英国人的入侵。甚至成吉思汗也未能敲开坚决抵抗的图格拉克王朝时代德里苏丹国的大门。而如果上述条件具备的话，安全的进一步要求就是在东部有一个友好的或安定的印度尼西亚，在西北部有一个同样的伊朗高原。历史上印度尼西亚从来没有构成过威胁。在西北高原存在一个历史古国伊朗，伊朗的那一边是中亚地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不时地从这方面入侵。中亚可以比作一个水库，它的水源来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而且说不清什么时候会溢出，以致泛滥到它的邻近地区。既然印度不能统治伊朗，它的利害关系就在于有一个强大的伊朗国家，足以作为一道政治堤坝，以防止中亚水库的泛滥。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末叶曾经试图在印度内部寻求而未能找到的那种自然的平衡力量，实际上只能在外部找到。这种力量存在于北部印度和伊朗的势力中心之间，这两方面势力之间得到承认的力量平衡，将使他们能抵挡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压力。这种条件在16和17世纪都得到实现，因为当时莫卧儿印度帝国和波斯的萨法维德王朝之间的力量对比，堪称势均力敌。在18世纪，这两个政权都宣告瓦解。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重建了印度政权，英国借助于海上力量，实际上控制了东印度群岛的荷兰统治者，从而巩固了这个政权的东部。然而，在西北部的伊朗依然很弱，而且第一次阿富汗战争证明了企图由印度来控制高原是冒险的。在伊朗的那一边，土耳其斯坦各汗国正明显地衰弱下去。正当他们的力量逐渐消亡之际，俄国人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犹如一股要把水库重新装满的强大水源。除了对欧洲的考虑之外，印度的西北政策还要取决于中亚这个水库的流量大小。

在印度内部，强权政治表现为建立完全的统治权。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安全的动机、商业的动机，甚至是人道主义的动机，然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安全的动机。在阿富汗战争时，把独立的信德作为一条通道，因为随着1839年旁遮普统治者兰吉特·辛格之死，出现了不安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部依靠旁遮普这一条路是不可取的。信德的几个埃米尔是彼此分离的，无能的，而且是蒙昧主义者。他们是从原先的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分裂出来的小邦，因而无权称他们自己是合法的。他们的国家需要发展，对边境安全的要求也是强烈的。他们的领土于1843年被兼并，米亚尼战役^[7]所获得的这一点荣誉，就作为埃伦伯勒从阿富汗撤退的某种补偿。此后，它的征服者查

尔斯·纳皮尔爵士粗暴地对它统治了数年。它成为孟买管区的一部分，新得到的卡拉奇则成为旁遮普的一个港口和一座典型城市。旁遮普是1845年至1846年和1848年至1849年这两次战争的战果。随着1839年兰吉特·辛格之死而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第一次战争的爆发。英勇的锡克军队，分裂成为由残忍而又野心勃勃的头目操纵的集团所控制的小股部队。在6年中，先后换了4个统治者，这支军队最后在摄政会议的鼓动下，渡过苏特里杰河，指望英国人会不再进逼。第一次议和时，试图采用裁减军队和建立以亨利·劳伦斯为首的摄政会议这样一种对待保护国的办法。1848年，穆尔坦发生了叛乱，在整个炎热的季节里，都听其积聚力量，后来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战斗才将它镇压下去。英国的指挥才能并不比锡克教徒高明多少，但他们有增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贺胥未经请示伦敦，便自行决定进行兼并。他的理由是锡克的“萨达尔”明显地持势不两立的态度。“萨达尔”这个词在印度北部，特别是在锡克人中间，被广泛地使用，指贵族、领袖和绅士。他的另一个理由是必须保卫西北部边境。锡克教徒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减少了内部搞阴谋的危险，而约翰·劳伦斯采取的以牺牲“萨达尔”的利益为代价来鼓励农民和改善物质条件的政策，又进一步减少了这种危险。水利灌溉冲掉了复仇之火。赢得旁遮普是靠刀剑，而保住它要靠铁锹。在发生兵变的危机时，可以依赖穆斯林来制止锡克人的任何叛乱企图，另一方面，锡克人又为挫败了德里的莫卧儿势力东山再起而感到高兴。可以说，凡属对旁遮普有利的事，英国人都干，唯独不使它的人民团结一致。建立完全的统治权的第三个措施是兼并缅甸。1852年，由于缅甸方面反应迟钝和英国人在商业上急于求成这两个几乎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因素而引起一场战争，经过一个典型战役后，大贺胥兼并了下缅甸和仰光。这才是英属缅甸的真正开始，因为这里的人是显然与若开和德林达依的山区部落不同的缅甸人，而且，这里是大米产区，它将为近代缅甸提供财富，也造成它的各种问题。上缅甸是在1886年从愚蠢的锡袍国那里兼并过来的。采取后一行动的动机对法国影响的恐惧和想要抵消他们对暹罗侵略的威胁。缅甸人无论在种族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和印度各族人民不同，而且从来没有被同化过。大贺胥派来的首席专员费尔小心谨慎地实施印度的管理制度，事实证明这是完全不合适的。

在印度内部，它的政府不得不和那些原先掌权的残余分子打交道。英国统治的兴起曾有效地抑制了他们的军事力量，然而，他们当中许多人还保留着一种传统的或宗族的号召力。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德里的莫卧儿皇帝本人。1803年，卫尔兹力一方面为失明的沙阿·阿拉姆提供舒适的生活和荣誉，另一方面又小心地回避做出对他效忠或不承认他的权力的表示。用查尔斯·梅特卡的话来说，以后几任官员逐渐“放弃他们原来效忠帖木儿王室的做法”。莫卧儿王室已经成为一个开销极大的包袱。1833年的特许状法宣告了英王在印度的君权，并逐渐减少对莫卧儿王室地位的承认，直到1856年，莫卧儿王室的继承人被迫同意在他父亲去世时搬出王宫，并放弃国王称号。王公的情况则与此有点不同，因为他们依然控制着全印度近一半国土和1/3的人口。东印度公司的最高权力是僭取的，而不是正式宣布的。但那些王公并没有和新的制度结成一体。他们被置于“从属的孤立状态”，仿佛被置于与世隔绝的领地里，不与外界来往，继续过着古老的生活，不为外界西方的进步对印度的冲击所干扰。这项政策的困难在于，要把这个新世界和欧洲人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与此同时，英国一方面通过遏制政策，打掉王公们的野心，另一方面又通过支持的办法，去掉他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他们对参加政府失去兴趣。这就使英国和王公们在行动准则上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一对照给统治力量提出了一个道德上的难题。怎样才能使不干涉既符合王公的，又符合英国公众的行动准则，或者说，怎样才能使干涉与英国承担的义务相一致？大贺胥首先试图从他的兼并政策来解决这个难题。大贺胥相信，英国的行政管理要比印度的无比优越，只要条件许可，兼并总是可取的。虽然他并非看不到古老的权利和当代的各种危险，但他充分具有他这一代的那种自信。他的政策的一个方面就是“丧失权利说”。这使他能在没有直接继承人情况下，把包括面积辽阔的那格浦尔和有影响的萨塔拉在内的几个信奉印度教的土邦接管过来。他的政策另一个方面是，他认为由于政府无能而进行接管是合乎道理的，因此，他通过征服而获得旁遮普，通过谈判而得到贝拉尔，以及通过兼并而得到奥德。在8年的时间里，印度由王公控制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减少了1/4，后来由于兵变，这一过程才突然中止。

在这一时期，政府本身的权力达到最高度的集中。1833年的特许状法规定设置印度总督，以取代孟加拉的威廉堡^[8]。立法权集中在加尔各答，它和行政机构唯一不同之处是，为了立法目的而在参事会中

增加一位成员（第一位“立法成员”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其他管区事实上成为地方机构，尽管它们保留自己的军队，但军队的规模和威望不能和孟加拉军队相比。行政机构也同样地有所区别，孟加拉相应地占据比较突出的地位。1853年，对文职人员的录用采取公开竞争的办法，结果虽然特殊人才的数目没有增长，但一般的水平有所提高。最有意义的进展是1853年成立一个独立的立法会议，这一机构尽管是由政府人员和法官组成，但它还是具有某些代表性，并且很快就声称享有言论自由，从而为这一立法机构赢得了一个小型议会的美称。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主题是西方影响。这个运动得到威廉·本廷克勋爵和他的顾问们的正式承认，稳步地向前发展。它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旧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垮台，这一结果是这个运动主观上没有料想到，但却是整个运动过程的重要部分。第二是引进西方的教育和思想以及建立相应机构的政策。第三是兴建公共工程的政策，而兴建这种工程则包括需要西方技术，以及一个为维持这种工程而经过西方训练的阶级。第一个方面采取的一整套措施，撤换了那些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坚持旧秩序的阶级，并使他们不再拥有权力；而第二和第三方面采取的措施，则向这个国家灌输西方思想，并且为建立一个吸收这些思想的阶级创造了条件。近代印度的兴起，不仅要依靠向印度输入西方思想，而且还需要一个特别形成的阶级去吸收这种思想。

在18世纪末叶，康华理时期开始了一场社会变革，这场革命没有受到什么重视，但对于理解近代印度却有重要意义。其表面的标志是把印度人从政府高级部门中排除出去。1793年的特许状法为那些与管区县过结的公职人员保留了年薪在500英镑以上的全部行政职位，而印度人没有一个是具过结的公职人员。印度政治传统的保持者于是自谋出路，或被安置到土邦的部门中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实施一系列土地整理，这个过程从实行“永久土地管理”开始，到兵变以后仍在继续。这项工作做得越来越精确，并认真参照当地条件而进行。这项工作的用意是做出规定和划定界限，公平地对待农民和地主，并尽可能保留村社制度。然而，当代革新精神终归会渗透进来，使事情发生突然变化，摧毁了旧土地贵族，并消灭了村社。起初，由于无知，出现了一种征税过高的总趋势。对于那些不能按时纳税，或不能交清全部

税额者的惩罚是剥夺财产，这种惩罚不是印度原有的，而是由令人憎恨的销售法所规定的。通过这些手段，孟加拉和比哈尔的整个土地占有阶级的性质起了变化，而在其他地方，许多土地也更换了主人。不交租金的土地使用权广泛恢复，并在印度北部和西部大规模地实行，一直到兵变，这些做法加快了上述过程。R. M. 伯德和J. 托马森在西北各邦，以及在孟买的伊纳姆事务委员会^[9]，也都推行这种做法。这些被剥夺的土地或被作为服务的报酬而授给人，或被作为教育和宗教活动之用，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授予的土地或被忘掉，或被任意移作他用。这种大规模没收的结果是，消灭了那些支持旧文化和宗教的有影响的阶级。由于被剥夺了官职，丧失了土地和公众的尊敬，这个阶级被迫不再积极参与国家生活，销声匿迹，沉湎于对过去荣誉的缅怀之中。

他们的地位要被一个富有新思想的新阶级所取代。然而，首先必须使人们能够得到这种新思想。1835年，本廷克和麦考莱开始执行一项通过英语做媒介来输入西方知识的政策。在后来的20年中，中小学校已经遍布全国。1835年，由于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果断行动，教育补助金制度得以建立起来。这就使私立中小学和学院有可能开设，教育体制能够形成，并从1857年创办最早的三所大学而使教育体制更臻完善。在看到政府这方面活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他们最出色的领袖是加尔各答的亚历山大·达夫，而他们最重要的业绩则是创办了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随着西方教育一起传入的，还有西方的法律。1861年，以英国法律为基础制定的新的刑法典终于开始生效。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是东印度公司法庭所采用的英国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基本原则。西方的法律观点被一些新型律师所吸收，因为它们到处传播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私法依然保留，但对许多难以决断的案件，则按英国衡平法的原则予以判决。法庭上的许多英国影响都是潜在的，而非明文规定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就更为有效。就政府方面受西方影响的情况而言，最后一项就是英语取代波斯语作为法庭及官方的用语。这就为学习英语提供了一个紧迫的理由，因而学习英语就意味着进入新的学院，并吸收西方思想。全印度的政府公职人员、律师、商人及专业人员，为了工作都需要会英语。而学习英语，就如同学习波斯语或法语一样，不可能不领略到哪怕是一点点这个国家的文化。专业教育机构也帮助推进了这个过程，如加尔各答医学院里所做的解剖意味着打破高等种姓的条规。类似的机构还有设在

鲁尔基的大贺胥创办的工程学院。除直接进行传教（可能弊多利少）以外，传教机构在创办学校、医院和孤儿院方面的活动，在农村进一步把这一过程推向前进。

西方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发展公共工程的政策。推行这一政策可以不用顾虑会触犯种姓和文化、伦理观和当地风俗等令人烦恼的问题。思想改革家和传统习惯拥护者、革新者和敏感的现实主义者，可以在砖石与灰浆的问题上进行妥协。这方面的发展，与大贺胥特别有关。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交通网。在1818年后，就开始有系统地建筑公路。在这方面的显著成效可以说是由大贺胥建成的而他自己也为之感到激动的通向白沙瓦的公路大干线，和在西姆拉山区开辟一条通向西藏边境的公路。1850年，他在距平原200英里的偏僻的奇尼山寨治理印度达数月之久。公路是修筑铁路的前奏。修筑铁路的工程是由哈丁勋爵开始的，然而，把铁路修建成一个铁路网的规划，则是大贺胥的功绩。他利用英国19世纪40年代铁路建设昌盛时期的经验，开始在一个广泛的规模上进行规划。在伦敦的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支持下，他在1853年提出的铁路备忘录，成为铁路交通完整体系的基础，而铁路交通将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果。由于除孟加拉和北部平原外没有河流可以通航，铁路就为社会和经济交流提供一条交往的途径。通过这条途径，新印度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公共工程的第三种形式是水利。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20年修复了从朱木拿河上游到德里的一段莫卧儿和图格拉克时代的运河。早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1835—1836年在南部跨考维里河修建的长两英里的大水坝和1854年由大贺胥建成的恒河运河。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开始把印度结合成前所未有的实在的统一体，并且开始第一次向以周期性的饥饿折磨印度农民的自然灾害展开认真的斗争。

印度人对于这些影响的反映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尽管慈善家们所希望的印度社会和宗教制度的尽早崩溃未能实现，但在孟加拉，聚集在著名人士拉姆·摩罕·罗易（他于1833年访英时逝世）周围的那一小批人，对西方思想和西方工程都是表示欢迎的。由罗易在1828年创办并得到泰戈尔家族支持的“梵社”，开始了在宗教和社会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土地所有者协会和英属协印度协会这类团体，把这项工作推广到政治领域。这一小批人的思想通过新的出版物、个人接

触、新的交往工具，以及让孟加拉人迁往北方政府机构中去工作等途径，彻底渗入到那个拥护政府新活动并日益壮大的阶级中。

在大贺胥执政期间，这里所提到的各种发展获得更快的速度，也可说是更强烈的紧迫感。大贺胥是维多利亚时代进步精神的体现者。由于他过分急于向前推进，以致未能觉察到习惯与偏见的石块给前进的车轮造成的颠簸。他的经历是一部不停顿地工作的记录：在政治方面是兼并；在物质方面是公共工程（公共工程部就是他在1853年创立的）和水利；在思想领域是西方教育。当时普遍存在着信任感和安全感。

就在这样一个正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着的社会里，爆发了孟加拉军队的兵变。这次兵变的日期，一般记载都确定为1857年5月10日在密拉特爆发的那天，或者5月11日夺取德里的那一天。这次兵变的起因是行政管理不善引起种姓方面的不满，后来发展成为在许多地区得到农民和宗教运动支持的孟加拉军队的全面起义。莫卧儿和马拉塔^[10]这两种感情，同与帝国感情截然不同的穆斯林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一局势得以挽救，是由于保住了勒克瑙，固守德里以抵御极占优势的兵力，以及约翰·劳伦斯在旁遮普采取了坚定的措施^[11]。就政治方面而言，还多亏了锡克教徒和王公们对政府的忠诚。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兵变爆发所引起的震惊，以及双方各自对往事的回忆和苦难所唤起的强烈感情。在我们分析起作用的因素时，可以明显地看出，士兵并不是因为孤立的种姓方面的不满而起来叛乱。士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国家，正在遭受到精神上被分割的痛苦，而他们行动的激烈程度，是与他们所遭受痛苦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对士兵来说，他们的选择似乎是：要么是表示出忠诚，而失去种姓和自尊——但“自尊”这个词并没有充分表达出其深刻含意，这个含意是用一个难以翻译的词“伊泽特”（izzat）^[12]来表达的——；要么是叛乱和几乎可以肯定的死亡，因为很快就断定英国人是不会宽恕的。只有从这样一种角度，才能说明这次表示效忠之后，突然发生兵变的原因。士兵的猜疑是有普遍的背景的。他们对普遍服役征兵法案，或者对兼并奥德的不满等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并不能说明这次兵变爆发的性质，同样，涂油子弹事件^[13]也解释不了兵变爆发的性质，这只不过是落在炸药导火线上的火星而已。要是在另外的局势下，这个意外事件本来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然后予以忘却的。然而，这一次的情

况则是，当局越是想进行解释并设法补救，士兵就越以为当局是怀有恶意的。士兵们通过自己的家庭联系所感受到的这一个国家普遍的情绪，是来自那些新的措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新措施和新思想二者都向传统的习惯势力及其假定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废除寡妇殉葬的习俗，允许基督教徒继承其家庭的一份财产，以及加尔各答进步阶级对种姓特权所持的否定态度等，从各个不同方面威胁着种姓制度的种种清规戒律，而通过法律和各学院所传播的平等和道德义务的新思想，与婆罗门教的不平等和特权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仍处于婆罗门影响下的正统社会受到冒犯，而把某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轻而易举地当作替罪羊。印度教的印度在政治上已经放弃了斗争，并把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新的、不可抗拒的莫卧儿王朝接受下来，感到自己受到威胁的正是坚持正统观念的印度。这样，印度教的印度就在其最重要的方面，即宗教和传统习俗方面，受到了扰乱。在这样一种不安定的情况下，爆发了印度兵起义，并使这次起义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总的说来，这一次兵变基本上是印度保守主义势力的一次急剧的行动，以便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向后倒退。十分明显的是，哪里兵变取得成功，哪里就退回到传统的模式，即莫卧儿或马拉塔的模式。新的西方化了的阶级，近代民族主义者的先驱，到处都站在英国一方，对反叛者来说，他们是旧秩序的敌人。

穆斯林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兵变的爆发最后比归咎于印度教徒更多地归咎于他们。在这里，穆斯林的政治家也放弃了斗争。但正统的伊斯兰教徒长期以来对英国的占领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且在好斗的“瓦哈比”运动中表现了出来。正统思想对西方的许多革新都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对与其说是教义上的原因，不如说是道德意识和习俗上的原因，因为在基本概念方面，伊斯兰教虽比印度教更接近基督教的西方，但它对革新和变革的极端厌恶程度，要比印度教更强烈一些。穆斯林法律专家与较为敏感的婆罗门教徒不同，一直保持不受西方思想的任何影响，并且停留在烦琐哲学和对经文进行争论的中世纪时代里。对他们来说，印度就是战争之家，在这里，造反从道义上来说是无非议的。因此，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发动起义，但他们得到的好处却比印度教的学者——像法扎巴德的毛勒维^[14]这样的人——要多，这就招来了要对叛乱负主要责任的臭名。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对帝国的怀念，英国人和马拉塔人正是在这个帝国里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德

里以及住在那里的领养老金的莫卧儿王朝皇帝^[15]，自然是莫卧儿帝国的中心，这就是占领德里对反叛取得胜利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所在。

英国的强烈反应产生了许多重要后果，需要加以说明。恒河流域的尼尔事件^[16]和旁遮普地区的库珀事件，仅仅是这许多事件中的几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兵变令人恐惧的另一个方面。这样一场发生在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区的暴动，使英国人感到震惊，并使他们产生一种极端不安全感；同时，他们也感到恐惧，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人口众多而又持敌对态度的国度中，处于孤立状态；这种对于暴动的震惊和对于孤立的恐惧，就形成了当时英国特有的精神状态。双方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印度关系之间形成一个需要经历两代人的时间才能使之愈合的伤痕。

总之，兵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西方对传统的印度所造成的冲击，结果酿成了兵变。其实，谨慎从事本来可以避免事件爆发，直到感情冲动的危险完全消失，但在这样强大而且互不相同的各种力量相遇时，谁也无法阻挡这一紧张局势的发展。保守的印度在进行抗议后，平静下来和新的世界达成协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在后来许多年间，一直成为增进双方互相了解的障碍。

后来20年，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英国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在公众的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它在思想领域里不仅有主动权，而且被公认拥有这种主动权。威廉·亨特爵士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写的《女王的印度》一书所表现的信心，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兵变对外界的影响。最初，出现进行报复的呼声，要求把德里的居民赶出该城，并建议拆毁沙·贾汗^[17]伊斯兰教大寺院。当这种主张被印度的坎宁和约翰·劳伦斯在英国当局支持下压下去后，占统治地位的情绪就是“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稳妥的主张逐渐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采取具体防范措施的主张，让位给进行改善和改良的主张。失去的与人民的联系也必须恢复过来。在兵变平息后，最初采取的大多数措施中，都可以见到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东印度公司被撤销了，英国女王成为印度的君主。对军队进行了改组，旁遮普人、锡克人、帕坦人和廓尔喀人被吸收到军队中，替换

了恒河流域的婆罗门教徒。除一些山炮连外，炮兵部队被撤销了。与此同时，英国军官和他们士兵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树立起一种“团结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独立。英国军队的比例增加了。交通系统得到了改进，特别是铁路网的建设进度加快了。

下一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为清楚地体现出要避免重犯过去错误的愿望，同时也表明认识到过去的错误主要在于过分地不尊重印度人的传统习惯，以及对公众思想活动的过于无知。大贺胥曾把那些王公们看成是过去时代的腐朽的残存者。他们在兵变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使得坎宁把他们称作“暴风雨中的防波堤”。他们的这种态度，事实上使他们的存在延长了几乎一个世纪。“丧失权利说”废止了，各邦的完整得到了保证，并授予承认状。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实行的“从属的孤立”政策，改为英王政府统治下的“从属的伙伴关系”的政策。这项政策一直被坚定地贯彻执行着，并且按照其他的必然的规律而有所发展，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王公们迸发出来的忠诚，显示了这一政策的令人鼓舞的成功。其根本问题是使各土邦的行政管理标准，与英属印度的行政管理标准互相协调起来。在从属关系时值得想望的东西，到了伙伴关系时就变成必不可少的了。解决的办法是，找出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政策，并对王公们进行教育，使他们能接受这项政策。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开明的专制政治。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难于接受的字眼是专制，而对王公来说，最重要的字眼是开明。他们从16世纪的印度，被带到了18世纪的欧洲，使用的方法是鼓励 and 进行西方教育。他们得到了新的尊敬和同情。梅奥勋爵创办了第一批供土邦首领入学的学院——1869年在阿杰米尔建立的梅奥学院和在拉合尔办的艾奇逊学院。1881年，里彭勋爵把迈索尔交还给旧的统治家族。利顿勋爵建立了印度的贵族爵位。达弗林勋爵创建了帝国军团，各土邦的士官在该军团中接受新式的军事训练，收到明显的效果。虽然对某些王公来说，西方文化引导他们过巴黎式的夜生活，但另外一些王公（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却在认真严肃地担负着他们的统治任务。到了1905年，马拉塔的瓜利奥尔和巴罗达，拉杰普特的比卡内尔，以及南方的迈索尔和特拉凡哥尔，都可以说已与英属印度的行政管理标准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超过。

1858年接管印度政府时，英国女王在公告中强调了宗教中立论。事实上，这一理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现在则进而避免产生一切违犯这一理论的现象。官员们小心地避开参与福音派的基督教活动。最重要的效果是官员们不愿介入社会问题，即使是在充满活力的西方化阶级要求介入时，他们仍然不介入。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是设法与印度人的舆论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一些最明智的官员的看法与最有权威的印度人如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官员脱离人民与军官脱离士兵是灾难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了行政机关和咨议机构印度化的双重政策。在印度化政策方面，最初一些步骤是由威廉·本廷克勋爵采取的，当时他允许印度人担任两个等级的法官。从1853年起，印度人可以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的竞争，可是直到1863年才有了第一个印度人萨蒂恩德拉·纳特·泰戈尔担任了文官，而且，种种条件限制大批的印度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文官的行列。但在司法部门，一直到高等法院这一级，担任法官职务的大门对于印度人都是敞开的，此外省一级的文官（全印度的文官有1/6是从省一级录用的）几乎已完全由印度人担任。这样就开始形成实际上由当地人组成的行政机关，不过从表面上看，几乎完全是英国式的。咨议机构采取了建立立法会议的形式。1853年的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立法会议，于1861年进行改组，允许印度人以非政府官员的名义参加。第一届立法会议有3名印度人参加。在马德拉斯和孟买建立了立法会议，后来，又推广到其他主要省份。这些立法会议被说成是“政府机构获得有关立法的咨询和帮助委员会”。事实上，这些立法会议是印度传统的“[\[18\]](#)”制的表现形式。统治者们通过“[\[18\]](#)”来听取顾问们的意见，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不过，这是一种披着西方外衣的“[\[18\]](#)”办法，从而使以后比较容易地把西方的代议制和责任制政府的内容装进去。这种“[\[18\]](#)”办法的原则是在1909年的莫利—明托改革中才最后形成的。但在这以前，1892年的印度立法会议法事实上已经以实行“荐举”为名把代表制的原则偷偷地塞了进去。“荐举”的办法就是，由各个公众团体推荐一些人，提请政府任命他们参加各立法会议，政府很快就做出任命。

这次兵变给整个英印关系带来震动。不仅事后不可避免地要调查分析这次兵变的原因，而且就英国政府在印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及采取的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探讨。英国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对进步势

在必行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整个知识界几乎尚未意识到应对印度的艺术和哲学，以及梵文文学进行新的了解并做出论断。在19世纪30年代保证西方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那种精神上的迫切要求和那种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但在推行这种政策时，却更加谨慎从事，对其能否为印度人所接受已不像先前那样乐观。早期的革新者认为，印度人由于受到迷信、传统以及僧侣权术的束缚，只是等待理智之光从黑暗中照射出来，而新一代则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反应迟钝和不可救药的人。只有少数人能够觉察到，印度本身已经在起变化。态度上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以“觐见”协商的办法作为政治发展的原则，而不再推行西方的自治制度（这种自治制度是1883年由麦考莱正式宣布实行，并仍为大贺胥所接受的）。

沿着西方路线前进的决心和对印度人的反应持悲观态度之间的紧张状况，造成旁遮普行政管理学校所具有的那种奇特的特征。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大贺胥，亨利·劳伦斯是该校的领导人，而为这所学校奠定了永久形式的则是约翰·劳伦斯。工作勤奋和生活刻苦的准则，忠于职守，对于公共工程抱满腔热忱，在这一切背后，有一种设想：即使印度本身不肯进步，也一定要使它进步起来。早期的旁遮普官员，有一些罗耀拉^[19]的味道——“辛勤工作而不图安逸，努力劳动而不计报酬……”由于印度人的思想似乎非常闭塞，因此，人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以公共工程的形式表现出的西方物质方面。教育形成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座桥梁，因为个人利益可以作为到传授西方知识的学校去求学的动机。这种态度在整个印度普遍存在。其准则是：不去理会印度人的冷淡，避免与它的传统发生公开冲突，同时，加紧公共工程的建设 and 加强教育工作。这种普遍的态度犹如领地监管人的态度一样，自认为他们大概要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负责。许多人的确怀疑那些受监护的人将来能否具有接管能力。这样一种态度与埃尔芬斯通、本廷克和1830年的改革者截然不同。新兴的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阶级发现，正是这种态度控制着19世纪80年代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态度在他们头脑中所引起的猜疑，直到1947年才被消除。

事实上，印度政府一直以一定的热诚继续在印度人中间寻求合作者，但他们一直在悲叹未能找到这样的合作者。这是因为这个政府一直向错误的方向去寻求。在印度各土邦，对王公进行的教育早已开始，并已初见成效。在英属印度，也希望能有同样的阶级出现。而这

个阶级的成员却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无法进入他们唯一所愿意从事的那种工作。他们得不到在军队中任军官的机会，没有资格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印度文官考试，并且，几乎没有机会成为公共机构的成员。他们对旧文化是忠诚和热爱的，如果西方教育甚至连一点儿实利也不提供的话，他们就不会选择西方教育。1879年，利顿勋爵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规定通过提名可以获准成为法定文官，而且1/6的印度文官将从“法定文官”中录用。但是这种办法也和利顿的其他许多措施一样，虽富有想象力，却没有成功。

把印度看成是一块有待改进的领地这一概念有很多方面。如果说这种看法目光短浅，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这种认识讲究实际，那么它也是颇具见解的。这一概念既包括佃户，即印度人，也包括地主，亦即英国人。首先对财政进行了改革，这项工作是由詹姆斯·威尔逊和塞缪尔·莱恩于1858年到1862年进行的。印度建立了有年度预算、所得税和关税制度的近代化财政体制。随后，于19世纪60年代又允许为公共工程提供贷款。公共工程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在印度的行政官员一心追求的目标。铁路和水利工程是两项最显著的成就。1857年，有200英里长的铁路供交通运输用。到1880年，印度就有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系统，成为亚洲第一。到了1905年，铁路的里程数达到33000英里。水利工程在兵变以前就有很大的进展，而且，一直在顺利地稳步推进，信德的苏库尔拦河坝就是水利方面的最大的成就。到英国统治时期结束的时候，灌溉面积为可耕地面积的1/5——在1940年达到3250万英亩。第三个成就是战胜了饥荒。由于没有剩余粮食和缺乏运输工具，这种周期性的饥荒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曾经是无法挽救的。1866年奥里萨的灾荒，由于孟加拉当局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曾夺走了近100万人的生命。1876年至1878年的大灾荒受到了有力的回击，并建立了1880年的赈灾委员会和制定了1883年的赈灾法。从那时起直到1943年，通过使用铁路、海运及采取相应的工程程序，食物的严重缺乏现象消失了，而出现了工作机会的严重短缺现象。由于政府机构提供食物，饥荒已经不再造成饥饿，仅仅是农活无法进行。与公共工程同时并进的还有教育，其道理上文已经讲过。教育的里程碑是1882年建立的亨特委员会和寇松对加尔各答大学的改革。在牺牲初等教育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中等和高等教育，但到这个世纪末，中小学和大学已经遍及全国，形成一个教育网。这就是培养西方化阶级的园地。

这些措施可以说是为印度“佃户们”造福，而与此同时，英国“地主们”也没有被遗忘。当印度贸易在1813年实行开放时，原指望不需要政府的协助，私人企业就可以发展印度这一潜在市场。但是，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这个国家的幅员广阔，加上缺乏良好的交通条件，这就给私人企业的活动造成一些不可克服的实际障碍。无论是市场，还是原材料，都不容易得到。在1815年以后，英国资金在欧洲及美洲都比在印度有更好的前景。这时，印度的贸易大体上仅局限在已经从事经营的人手里，他们的资金是依靠政府公职人员的积蓄以及他们本身所得的利润。直到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交通困难以后，贸易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铁路，上文对此已做了一些论述。在兵变后，安全与牟利动机相结合，促进了铁路的建设，同时，也从英国得到了资金。在1855年至1870年间，英国在印度在全部1.5亿英镑投资中，有一半用于铁路建设。政府在把铁路的所有权和规划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也吸收了私人企业家从事铁路建筑和经营。这些私人企业家，对印度情况仔细观察研究得出结论，鼓励他们实现由于铁路的发展而开辟的各种可能性。铁路的建设是近代印度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铁路的重建打开了印度近代工业化的大门。首先，铁路吸引了资金，然后，资金又充分地利用了它所造成的新条件。

受影响的最重要的工业是棉布业。来自英国的兰开夏的棉制品（使用美棉），已经破坏了这里古老的具有高度技巧的手工棉纺织业。铁路使兰开夏的棉制品得以深入内地，从而完成了这一破坏过程。但铁路也使印度西部的地方棉纺织工业得以建立起来。其中心在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是由那些有事业心的印度袄教徒和印度教徒首先兴办起来的。在这里，铁路的作用是把原棉从德干高原运往各工厂，并把成品运往各地。第一个成功的纱厂是1853年在孟买创建的。一些大工厂则是继詹·纳·塔塔于1887年在那格浦尔创办的女皇纺织厂后创办的。塔塔又把从棉纺织业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发展制铁工业。他的几个儿子1907年在比哈尔创办了塔塔钢铁公司，于1911年第一次出铁，到1914年又生产了钢。在生产钢铁很早以前，铁路就使大规模发展煤炭工业成为可能。在沃伦·哈斯丁时期就开始探矿，从1814年起就一直顺利地进行采煤，到1846年，煤的年产量为91000吨。铁路可以把煤运到各地，而铁路本身则要消耗掉煤产量的1/3。到1900年，煤产量达到600万吨，1938年达3800万吨。这就使印度在它的重工

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做到自给。在1838年，黄麻首次出口到苏格兰的敦提。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停止供应黄麻造成印度黄麻的繁荣，从而促使加尔各答的黄麻工业于1859年前后发展起来。除此以外还有种植园业，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和咖啡。起初，阿萨姆的茶树被看成是一种野草，仅仅由于难以用中国茶树来代替印度茶树，这才导致种植印度茶树。1850年以后，制茶工业迅速发展。1869年，英国进口的印度茶为1000万磅，而进口的中国茶叶为印度的10倍；到1900年，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增加到13700万磅，而来自中国的茶叶为2400万磅。在南方的咖啡业虽盛衰无常，但依然是有重大价值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为英国企业提供了多种出路。棉纺工业以及后来的钢铁工业，主要是用印度资金建立起来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的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煤炭工业和种植园业则完全依赖英国的资金和管理，而黄麻业的所有权则是一半对一半。英国提供资金，成品在印度销售，中间的环节则由“经营机构”来填补。这些机构为投资者和生产者提供必要的当地知识和必要的服务。这些人可称为当地的金融转换家。这些人也都是英国人。

这些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性质，必然会引起印度人思想上的反应。普遍的看法是，只要不触动印度人的宗教感情，他们是会持冷漠的旁观态度。但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上述的一切活动，从在一所学校里教授英语到建设桥梁和开采煤矿，没有一项能够在缺乏掌握技术的印度人给予协助的情况下进行。到了1860年，有相当一部分人靠技能和通过就业而献身于新时代。有钱人虽可以自由自在地不参与这些活动，但要自食游手好闲的后果。最初的反应来自人们预料在印度会自然做出反应的地方。对待新鲜事物，有一种传统上的本能上的厌恶。抱正统观念的人总是发现新事物打乱了种姓制度，因为新事物往往会触动种姓制度所涉及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种保守的反应，由于兵变的爆发而得到了发泄的机会。此后，印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到，它必须以某种方法和新世界达成妥协。问题是怎样妥协？有一批孟加拉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德罗齐奥的启发和民族主义者黑尔以及传教士达夫的鼓动，主张与过去彻底决裂，在某些情况下，达到连西方的宗教信仰也和它的学问和科学一起接受的程度。这些主张虽然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但随后出现了一系列运动，从各个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采取正视态度。由拉姆·摩罕·罗

易于1828年创办的“梵社”，把传统的一神论和基督教伦理的特点结合起来。1875年，在旁遮普创办的“雅利安人协会”是一个富于军事性的团体，它以基督教新教的方式，倒退到对《吠陀经》的原始的信仰。罗摩克里希纳和维韦卡南达（他们出席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信仰代表大会时，第一次公开表明印度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把印度教的认识论和基督教传教士行善事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在穆斯林中间则有瓦哈比派以及其他团体，他们想通过恢复原始的伊斯兰教而寻求复兴的道路。

所有这些团体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但都没有办法赢得整个国家。特别是它们仅仅争取到正在兴起的西方化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的支持，而这个阶级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他们的职业和信念而和新时代结合在一起的。其所以没有赢得整个国家的原因是，所有这些运动（也许上述第一个运动是例外），都在某种程度上以不赞成的眼光来对待西方事物。因此，他们无法满足这个以某种程度上接受西方事物为先决条件的新阶级的内在需要。这个新阶级的要求是，通过为旧的事物辩解而不是为新的事物辩解，来达到新与旧的调和。为印度教徒提供这种调和基础的，是孟加拉思想家拉姆·摩罕·罗易（约1770—1833年）的思想，而为穆斯林提供这种基础的，则是在1875年创办了阿利加尔学院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6—1898年）的思想。两个人都在理智原则方面发现了联系新旧两个体系的纽带，提供了一个既能剔除旧的弊病，又可接受新的真理的准则。通过这个准则，新的阶级既能够接受眼前的东西，而又避免有一种背叛过去的痛苦感情。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们缺少一件东西：一种宗教献身精神。而这种献身精神都来自一个人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它是世俗的西方信仰，即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大陆上，感情上的同样需要，孕育了同样的结果。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印度民族，所以，这些新的阶级便着手创了一个印度民族。一些像般金·钱德拉·查特基这样的天才人物，把印度想象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文字上虚构的事物变成了一个政治神话，这个政治神话反过来又产生一个目标和政治纲领。这种折中办法不是永久性的，但它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这些新的阶级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个人生活方面盛行着传统的方式，而在社会生活方面则盛行西方概念。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早晚会发生冲突，但时机尚未来到。这种双重性生活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引起

无情的观察家冷嘲热讽的后果。但这不是人们因身着不合适的衣服而带来的窘况，而是动物在换毛过程中的那种难堪。在英国本土的当局毫无所知和印度国内高傲的官员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那些使他们感到可笑的部下正在形成一个富有生气的，能够用三代人的时间接管这个国家的少数派。

这个时期的最后25年，是英帝国在印度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高峰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帝国的印度时期，它是从1876年利顿举行的盛大的“觐见”开始的，当时宣布英国女王为印度女皇；而1902年寇松勋爵举行的“觐见礼”，则宣告了这一时期的结束。它虽呈现出夏末午后那种表面上的光辉，但在有洞察力的人看来，帝国的太阳耀眼的光芒背后，阴影正明显地弥漫开来。兵变后印度的开明专制政治，具有给人印象深刻的效果，但它正开始受到挑战。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它已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人们正日益从创造性的活动转向自我赞赏。前途另有所属。

这时，印度成为英国党派之间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这是自沃伦·哈斯丁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争论的是对外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卷入了迪斯累里的对俄政策。还有民主自治也是争论的一个问题，而格莱斯顿曾把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作为他的第二届内阁期间印度发展的最终目标。前一个问题一度使对印政策成为党派之间一个敏感的问题，并导致两位总督辞职；而后一个问题则使得里彭勋爵的政府（1880—1884年）成为在本廷克政府（1828—1835年）与1926—1931年的欧文勋爵（后来的哈利法克斯伯爵）政府之间最有争议的一个政府。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方告结束，一个是由于英国各党派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默契，另一个是由于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造成分裂，以及自由党的帝国主义势力增强使该党的激进派几乎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里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不果断，达弗林令人敬佩但冷漠无情，而19世纪自由党最后一任印度总督额尔金，则可以说是属于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或者哪一派也不是。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行政机构的日益成熟，英国人继续占据高位，以及抱着对仁慈的专制政治的优越性和对印度人需要给予无限期的监护所树立的信念，这个帝国车队在向前推进，但给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它那威严的队形，同时，伴随它出现了最初征兆，表明驾驶员们将要易人。

整个19世纪中期，当对印度接受西方影响所抱的信心正在下降的时候，像科布顿·布赖特以及约瑟夫·休姆这些激进分子和人道主义者，则始终让19世纪30年代的那一种理想保持其青春活力。但直到格莱斯顿执政时间较久，才试图把这种理想变为现实。1880年，他在第二届内阁任期开始时，做出了两项对未来意义最为重大的决策。一是开始在印度建立代议制，另一是为达到此目的而采用西方的模式。通过这些决策，实际上把印度宪法发展过程中规定的“觐见制”取消了。莫利在1906年和以后发现，要推广代议制原则，必须采用西方体制，因为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已经生效。这项决策包括把未来交给新的西方化的阶级，因为他们是唯一需要、或者至少是理解这种体制的人。他们对这种体制的运用所以还不够完善，是因为他们对它尚未完全理解，而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摩擦，则是由于在下面实行代议制和某种程度的民主，而上面仍是独裁统治，两者形成对立。官员们作为一个阶级，把新阶级的鲁莽而不圆通与旧阶级的彬彬有礼而老练加以对比，基本上依然期望自上而下推行自治，而讨厌那些开始强加给他们来自下面的东西。

1880年以前，除孟买外，没有什么地方自治。里彭建设性的成就在于以市政委员会或地区委员会的形式建立起地方的代议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有一半到2/3是经过当地纳税人选举产生的。他们在教育、卫生、公共工程与保健方面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有权征收货物上市税、集市税、财产税和其他税；他们可以选举不由官方任命的主席。接替里彭的达弗林又前进了一步，他提议把选举推广到省和全印立法会议。这个提议经过5年之久的讨论后，于1892年通过印度立法会议法，才变换说法，以“荐举”的名义付诸实施。这个法案虽然直接效果甚微，但它能使一小部分精明强干的新型印度人登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个法案是很重要的。这些人一旦登上这个舞台，他们就形成印度人注目的焦点和印度新的公众舆论力量的团结中心。这些人一旦登上这个舞台，他们通过个人接触，开始使英国官员改变他们在里彭时代就形成的“除英国人外谁也没有能力办事”这一总的信念。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浦那的婆罗门种姓的戈卡尔，他因此成为一位全国闻名的人物。

要不是在印度人中存在一个愿意利用这些措施的阶级，这些措施是不会有any效果的。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英国的统治迄今已有一个

多世纪。以英语为媒介，西方教育也发展了近50年。政府的活动稳步地开展着，吸引着许多具有一定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印度人参加。铁路、电报、公共工程、中学、大学以及法院，就是这些活动的部分内容。印度人可以获得的职位大多是低级的，但有些也担负着实际责任，而像法律、教学及医务等职业，为有资格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提供了独立的职业。还有一个由孟买的印度袄教徒和孟加拉的柴明达尔等有钱人组成的西方化阶级。由于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背景并与外来的统治有着共同的联系，这些人正在形成一种全印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表现为对一个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的印度民族所抱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存在着民族主义的思想，所以就需要创造出一个印度民族。第一步是要求从孟加拉土地所有者已组成的团体中产生代表。英属印度协会于1852年提出了第一个印度人的宪法方案。

在鼓励和激愤这两方面的因素的推动下，这个运动壮大起来。鼓励方面的因素，包括欧洲人对梵文文学和哲学的发现。最初是威廉·琼斯爵士发现梵文与其他雅利安语言有亲缘关系。随后，又有许多学者，如普林塞普·穆勒、霍勒斯·威尔逊、多伊森和马克斯·缪勒，他们使那些好思考的欧洲人得到认识梵文文学，并深刻地理解这种文学的广度和深度。随后，詹姆斯·托德又重新发现了佛教，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成就，并对拉杰普特人做了传奇式的描述。就这样，正当西方化的印度人寻求他们可以为之骄傲的过去时，印度人的印度却在欧洲的知识界受到了赞赏。这种对印度事物的赞赏，经过詹姆斯·弗格森和亚历山大·坎宁安等人的努力，进而扩及建筑，后来又扩及雕刻和绘画艺术。在学者们鼓励这些新型印度人为他们的过去而骄傲的同时，一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英国人则鼓励他们应对未来抱有信心。埃文·科顿爵士、威廉·韦德伯思爵士、A. S. 休姆和戴维·裕尔爵士等人（其中前三人是1885—1900年间的印度国大党主席），鼓励那些新阶级领导人考虑按照西方标准而最终实现自治。他们祖先的成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具有潜力的保证。

再就是激愤的推动因素。这种推动力的起因之一是种族情绪和种族歧视。由于英国人与原来对之平等相待的贵族失去联系，由于他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随着英国企业的发展而增多，于是，这种种族情绪和种族歧视也就日益增长。在本来就容易酿起事端的各种原因之上，

兵变又增添了恐惧和不满的情绪，从而加速了已经发展着的这一进程。种族情绪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西方人身上，而正是这些人和新型的印度人接触最多，而且他们的粗鲁也更加令人恼怒。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和老的地主阶级共事，而把受过教育的新阶级的出现看成是暴发户的兴起而感到讨厌。对一个敏感的民族抱这种偏见，其后果是深远的，虽然很难予以说明。它造成一个极易产生怀疑与不满的舆论气候。这种怀疑和不满与这个阶级原来对西方事物的钦佩掺杂在一起，形成互相矛盾的思想。这使得许多西方观察家在以后的50年中一直感到难以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中，许多具体的不满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如此。由于难以参加在伦敦的印度文官考试，印度人实际上不能担任高级的行政职务。1879年降低了年龄的限制，这被认为是使印度人更难担任高级职务而有意采取的一个步骤。在经济领域，1879年为兰开夏的利益而取消棉织品进口税，被看作是一种歧视政策，而这种看法，又为1895年的棉织品货物税所证实。在政治领域，则对1879年的本地语言新闻所规定的出版限制表示不满，同时，也对由印度出钱派印度军队参加诸如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冒险行动，并于1878年把印度军队派往塞浦路斯等表示愤懑。最后的刺激是1883年的伊尔伯特法，该法建议欧洲人应服从某些由印度法官主持的法庭的裁决。那些不担任公职的欧洲人提出了强烈抗议，甚至提出要绑架总督。他们还得到了许多官员的暗地支持，从而导致优柔寡断的里彭同意采取一项妥协方案，但对此双方都不满意。新型的印度人感到在他们已经取得较大进展的法律领域中受到挑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欧洲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下，印度国大党于1885年诞生。

国大党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是谨慎而有节制的。它意识到它的赞助者为数甚微。达弗林勋爵把它的支持者说成是“微弱的少数”，但他没有认识到，事实上这是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他们将领导印度的全体人民，无论如何，它为政治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全印的论坛。它逐渐形成一种代议制的和民主的机器，并逐渐赢得了全国的注意。它的年会成为非官方的一件大事。国大党推举了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戈·克·戈卡尔和巴·甘·提拉克为它的卓越领袖，而提拉克是一个不仅仅局限于仿效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的人。他一方面求

助于正统的情绪和当地马拉塔人的情绪，另一方面则试图采取直接行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里，国大党支持了寇松的改革，如果说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话；但是，正是由于他在1905年不顾群众抗议而实行孟加拉分治，才使得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转变成一个半群众性的政党。这是一个对每一个孟加拉人都具有吸引力的问题，它使西方化的印度人和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达到感情上的谅解。民众的集会和示威，抵制外国布匹和开展“斯瓦德希”运动——提倡使用国货，抵制外货——以至在宗教的支持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动，使得这一民族运动在孟加拉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对整个印度来说，这一过程则是由甘地来完成的。

尽管这个新印度的内部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但帝国的外表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政治和行政事务吸引着公职人员，这些人以他们的光辉业绩，使得当代的历史学家为之茫然。边境政策由于推行“前进”派的主张，导致1893年杜兰德线的划定和19世纪末的部落战争。赈济饥荒政策已成为法律并得到发展，卢比被贬值，教育却获得了发展。吉卜林为帝国巨人高唱他的赞美诗。印度历史的这一阶段，由寇松勋爵1898年到1905年的总督任期恰当地做了总结。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和具有历史感的人。他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正如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一样。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印度效劳。在处理一切行政管理事务方面，他是卓越无比的，而在需要具备理解能力的其他方面，他则是有欠缺的和失败的。他能救济饥荒、发展水利、建筑铁路、鼓励经商、重整边界，并彻底整顿教育机构，劝勉王公们并坚持种族平等。他能宣传为帝国服务的信念，并能以身作则。但是，他不能理解新型印度人的思想活动，不懂得他们的情感，或同情他们的抱负。他不知道他的道德说教使印度人感到憎恶，他不了解他管理加尔各答大学的方式被印度人看作是试图对印度人在某种程度上享受自治权的唯一领域加以限制，而且，他不了解他的孟加拉分治计划虽然就行政管理上讲颇有理由，但却是对孟加拉人和所有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的一种严重伤害。他的感觉迟钝犹如他的热情洋溢和精力充沛一样，都集中地体现了英国人陷入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自己创造的，而后来又未能认清其本性的这个阶级，正在叩敲着权力的大门。70年前，即已展示了这个大门的美好前景，而现在，当印度人接近它的时候，却发现帝国主义、优越感和既得利益为它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1] 白厅指英国政府，西姆拉指印度殖民当局（该地曾为英属印度首都）。——译者

[2] 督察委员会是根据1784年的“改善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及印度的不列颠领地法”而设置的机构，有权决定印度的一切重大问题，并监督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译者

[3] 1841年，英国在喀布尔的驻扎官被杀死。1842年，英军从喀布尔撤退时大半被歼。——译者

[4] 董事会是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机构。——译者

[5] 帖木儿于14世纪90年代侵入印度。——译者

[6] 巴卑尔于1526年侵入印度半岛，建立莫卧儿帝国。——译者

[7] 1843年4月17日英印军队与信德各土邦在米亚尼镇决战，结果各土邦被打败，信德被吞并。——译者

[8] 威廉堡（Fort William）在加尔各答，原为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后成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中心，亦作为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代称。——译者

[9] 伊纳姆（Inam）是当时印度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英国殖民当局曾在孟买等管区设立伊纳姆事务委员会。——译者

[10] 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国都是在英国侵占印度后被消灭的国家。——译者

[11] 当时劳伦斯任旁遮普省督。他镇压了该省的起义，并率英军收复了德里。——译者

[12] 印地文，个人尊严和荣誉之意。——译者

[13] 当时英国在印度军队中开始使用恩菲尔德式火枪，据传子弹的润滑油是用猪油和牛油制作的，士兵们认为玷辱了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而拒绝使用，遭到英国军官的镇压。——译者

[14] 即毛勒维·艾哈迈德·沙阿，起义士兵拆毁了法扎巴德的监狱，释放了他，拥戴他为领袖。——译者

[15] 指当时仍保留着印度皇帝称号的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译者

[16] 英军指挥官尼尔，在阿拉哈巴德等地残酷屠杀参加兵变的军队和无辜人民。——译者

[17] 沙·贾汗（Shah Jahan, 1592—1666），莫卧儿皇帝。——译者

[18] “觐见”即“达巴尔”（darbar），印度王公们接受下属谒见，询问下情并接受下属效忠表示的一种传统做法。——译者

[\[19\]](#)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西班牙天主教士，创建耶稣会，按照军队的纪律制定了“会规”。——译者

第十六章 中国

1870年夏，中国发生了两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史学家所说的“同治中兴”的失败。所谓“同治中兴”就是在成功地镇压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年）后重振王朝的运动。1870年7月7日，英国外交次官在下院宣布，政府决定不批准英国驻华公使拉瑟福德·阿礼国爵士前一年10月23日在北京同中国全权代表所签订的阿礼国协议。6月21日，在通商口岸天津发生了激烈的排外暴乱，有数人死亡，通称“天津教案”。阿礼国协议遭到否决，标志着“同治中兴”所实行的外交政策的失败；天津教案则同样突出地显示了那些反对中兴派政治家所实行的谨慎的近代化纲领的守旧势力的胜利。这两起事件都是人民愚昧的排外主义的产物：一起是由于欧洲在华商人集团的自负和贪婪所激起的，另一起则是由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盲目仇外所酿成。

英国政府放弃了自己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屈从于上海和中国其他口岸的商人的叫嚣。这种叫嚣不仅仅是针对流产的阿礼国协议在两国通商关系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适当更改这一事实，更主要的是针对使这一外交主动行动的当事人受到鼓舞的那种政策。阿礼国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必须循序渐进，商人们所要求的那种一蹴而就的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也不会立即见效。他还认为，中国在外交谈判中应享受平等地位的待遇。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流产的协议，被恰当地称为“一次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修订条约的真正尝试”。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也是许多年来最后一次，在毫无武力威胁和危机气氛的情况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强国自由地谈判一项协定。

中国政府本身并未插手天津教案。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法国领事的傲慢和愚蠢，加剧并触发了天津民众的愤怒。中国政府一方面由于屈服于外国人的无理要求而受到本国臣民的攻击，另一方面又被谴责为煽动民众暴乱和纵容暴力行为，而实际上，它十分诚心诚意地力图管理和保护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中英两方，凡是试图建立更加正常的两国关系的政治家均遭到了打击和排挤，而那些随时准备顺应或接受民众偏见的政治家却仍然大权在握。列强重新回到以高压手

段为基础的政策，即“炮舰外交”，而中国政府则落到那些不信任西方世界及其所作所为的人们手中。“同治中兴”的希望根本没有实现过，于是，中国走上了一条通往虽然尚属遥远、但此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道路。无论正确与否，中国近代史学家深信1860—1880年这段时期是中国在现有政权的领导下，避免革命、内战和外国入侵的灾难而做出使国家走向近代化的变革和调整的最后一次机会。

1861年，清朝第七代皇帝奕訢（年号咸丰）逝世时，遗下两位皇后，即无子嗣的慈安和皇太子的生母慈禧。慈禧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即后来著名的西太后。这两位皇后在咸丰皇帝逝世时，被授予一定的权力，并掌管了国玺。没有国玺，任何命令都不能生效。皇帝一死，两位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的王公大臣之间便开始了一场危险的冲突。两位太后联合当时控制着京城的恭亲王奕訢，逮捕了这八位大臣，判定他们犯有阴谋篡权之罪，立即予以处决。这样，当时26岁的年轻的慈禧太后，在另一位性情谦逊、比她软弱得多的慈安太后的协助下，开始垂帘听政；而且，在此后的40多年中，从未真正地放弃过权力。

在两位太后第一次听政的11年期间，大部分皇权由恭亲王奕訢行使。虽然恭亲王由于自己学历浅以及朝廷中的保守主义而受到限制，但是，他逐渐认识到改革和谨慎的现代化的必要。因此，所谓中兴运动便在皇室中最有势力的成员，也就是这些年来掌握和控制摄政权的这位人物的支持下，进一步得到发展。然而，无论是恭亲王，还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发迹的大臣（这些人除个别例外，均为汉人而不是满人），都不是名副其实的改良派或维新派。他们的目的在于恢复儒家的地位，使这个失魂落魄的帝国恢复传统专制制度那种平静安稳的统治，这种制度由受过经典教育的官吏组成的统治集团来保持。这些官吏首先必须是学者，而不是管理任何行政部门的专家。因此，这些人对西方的学术和技术成就，持防范和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其中一部分是有用的，但是，整个西方文化，尽他们所知，是与儒家的哲学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国家制度互不相容的。因此，对于西方文化必须保持一定距离。

长期战争的经验，的确使他们确信中国必须进行某些改革。在他们看来，现代武器是西方文明的最有用和最独特的产物。在中兴运动的最初阶段，上海、南京和福州等地便开设了兵工厂和造船厂。那些多年转战于长江上下游的各省总督看到了轮船的用途，但对于修建铁

路的提议则一概反对，认为铁路会有助于外国入侵者深入中国内地。他们认为外国贸易虽是祸害，乃属非接受不可，但他们拒绝接受外国商人再次表示的在中国任何地方自由进行贸易和旅行的愿望。贸易只限在通商口岸进行，而中国政府此时根本无意增加通商口岸的数目。像拉瑟福德·阿礼国爵士这样一些西方外交官已对中国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往往赞同中国人的看法，而不迁就那些商人的意见。阿礼国再三表示怀疑“开放内地”（用现代的用语来说）能否给贸易带来好处，同时他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样做会引起暴乱、谋杀和不测事件，而这是他和中国当局同样希望避免的。

因为，与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民众对外国人所抱的那种普遍而执着的憎恨态度，并非受到帝国高级官吏的鼓励，虽然一些颇有势力的地方士绅也参与其间。激起广大民众怒火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产生这样愤怒情绪的原因是普遍而实际存在的。对于一个具有由于千百年的闭关自守而形成的十分强烈的社会团结感和广为传播而又十分丰富的文化的民族来说，传播新的宗教，而且随之还有一种与这个民族的许多古老社会习惯相冲突、与普遍信奉的信念相抵触的异族文化，无论如何，是一种令人质疑和挑衅性的活动。官吏和绅士们并没有忘记，民众造反往往是某些秘密的佛教派所煽动和组织的；而太平天国叛乱本身就受到其领导人和发起人的类似基督教的思想的强烈影响。每当中国教徒们和他们的乡邻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寻求外国传教士的保护。新的宗教禁止他们参加由村庄和贸易行会捐款举办的节日社火，这些教徒便拒绝出上述捐款。他们在婚姻和教育子女等一类事情上，也拒绝听从不信基督教的长辈们的教导。因此，人们认为他们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支柱——家族制度。

知识阶级，即地方士绅，无论在朝在野，都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不过，反对的理由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义无论多么神圣而高尚，总是从根基上破坏了整个中国文化。这种看法也许是过虑，但也不无道理。基督教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之外，又建立了一种新的正统观念。它传播的是一种新的、外来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经学迥异，对那些苦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是生疏的。它是外国的东西，而且是由外国人宣讲的。最后这一点，就连在对待已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佛教的态度上，也仍然可以感觉到。中国的伊斯兰，尽管

已经长期同化，但人们不但把他们看成信仰不同，而且看成是不同的种族。由于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的士人很难容忍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或者去赞助基督教，也就是外国传教士。人们绝不会忘记：只是由于中国在1839—1842年的战争，即鸦片战争中败北，这些传教士才得以有权在中国居住和传教。外国的贸易和外国的生活方式，促使一个新的阶级——城市商人——财富日渐增多，势力不断扩大，他们中间那些同外国人有关系的人，尤其如此。人们通常用一个葡萄牙语名词称后者为“买办”。地方士绅也十分讨厌这个新的阶级，特别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广州人。而他们的故乡素以帝国中最不稳定、最反抗朝廷、最容易出麻烦的地区而闻名。

因此，“同治中兴”由于中国的统治者未能果断地解决两个最大的问题而告失败。一是需要使中国近代化，从而避免外国侵略的威胁；二是与此同时产生的，需要给人民以这样的明确领导，即能够战胜反动与顽固的势力，而把他们的精力用在重建国家上。就在中国经历数十年而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明治政府却采用了大胆的，几乎是革命性的政策来解决了。同治时期的伟大政治家中，有些人起码与日本明治天皇手下的大臣同样有能力而爱国。但是，在这些关键的年月中，在最上层，在最高的宝座上，清王朝却没有一位已臻成熟之年而能真正掌权、英明睿智而知道什么是势在必行、众望所归而得以推行改良政策的君主。

清王朝无论如何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它的异族血统。尽管满族在征服帝国以前就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它仍然是一个外来民族。它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明显地表现出不信任其汉族臣民的政体。如果说这个政体经过200年的历程，在施政方面已较为温和，汉族士大夫阶级对之已不再强烈反对，但它仍然授予只占少数的满族人以完全不相称的权力和特权。无论是反英的鸦片战争，还是太平天国叛乱，都表明满族人的旧军事组织已经毫无用处。多亏那些统率汉族军队的忠君的汉族将领，才保住了王朝。然而，在中兴期间和以后，朝廷丝毫没有打算改变强加给汉族人的种种限制。文官中汉人只能占一半，而满族权贵，尽管往往是无所作为、平庸无能、不学无术，却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他们的特权。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王朝受到一个声称要使中国摆脱异族统治的对手的挑战。这一号召在南方各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省份在北

方归顺清朝以后，曾抵抗清朝的征服近40年之久。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采取了基督教的形式，从而削弱了其事业，因为广大人民对此既感陌生，也不欢迎，地方贵族对之也极为反感，因而均投向朝廷。此外，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当胜利在望之际，又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内部倾轧削弱了他们的运动，而且，也未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即使如此，这场运动曾得到了中国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在其得势的初期，也曾为减轻农民的痛苦和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尝试。太平天国运动旷日持久，取得不少局部战役的大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对朝廷本应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警告。如果朝廷在胜利后能领导并鼓励推行坚决彻底的改良政策，当可挽救王朝并确定中国此后 100年的历史进程。但是，占据皇位的不过是个孩童，摄政者又是毫无见识、难以承担这样领导的无知女流之辈。

在清朝末期，恭亲王奕訢是皇室中最有能力的亲王。然而，由于他身为臣属，甚至连摄政的权力也没有，加之性格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听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的权力和野心步步扩大。在听政初期，恭亲王曾掌握重权。他享有议政王这一新头衔，为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部）大臣和军机大臣（在某些方面相当总理的职位），同时还指挥着禁卫军。禁卫军是少数几支配备近代武器的军队之一。然而，在1865年，他的这些权力遽然被大大削弱。他不明不白地突然被解除了所有的官职；经朝廷一些重臣的求情，才恢复了他的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但未能重任议政王。于是，西太后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胜利，表明她虽为听政的太后之一，但已足能压倒皇室中这位居高位的亲王的权力。

在两位太后的第一次听政时期（1861—1873年），帝国的大部分疆土仍然处于咸丰在位时期兴起的各种叛乱的骚扰之下。虽然 1873年清军攻克肃州，平定了甘肃省，但西北各省的回民叛乱一直持续到1878年。因此，中国本土各省（即区别于诸如新疆之类的边远藩属）实际上一直到听政结束时，才完全平定下来。连年不断的长期混乱，使同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无心着手实行虽然意义深远却会使人心浮动的改革，相反地，他们力图平定各省，恢复传统的统治方式。

这一时期的重要官吏，无论多么精明强干，克尽职守，却几乎都不具备任何经济事务方面的素养和知识。他们认为高级官吏不需要具备这种专门知识，这不过是那些低级顾问的事。儒家的一个基本信条

是，凡擅长经营工商的人，不可能具备经典学者的那种纯正而高尚的德行。因此，如果说那些高级官吏中有人真正从这场大规模叛乱中吸取了教训的话，那也只是寥寥无几。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前一世纪康熙、乾隆两朝长期太平时期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给农业土地造成的压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略有歉收或遇严重水灾，必然造成极大的苦难，而由于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即使是最慈善、最有作为的政府，也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救济。大规模的叛乱就是由这种灾患带来的苦难所引起的。防止其重演的唯一实际的办法就是改进交通和发展工业。然而，修建铁路、开发矿藏以及开办工厂，全都是外国的新鲜事物，这些都是为官吏们所极不信任的。

1868—1870年间，英国驻北京公使同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曾就修改1860年为结束“‘亚罗’号战争”而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一事进行谈判。双方都意识到，这两个条约已不符合现实形势的要求，所以，为修改这些条约而进行的谈判为双方所欢迎。不幸的是，虽然阿礼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应该向中国做一些让步，并且认识到中国政府在不受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自由地谈判并签订的条约，一定会不断带来实际而持久的好处，但是，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在华外国商人所一味追求的，只是捞取新的利益和扩大特权的机会。阿礼国不断受到欧洲人在华发行的报刊的激烈抨击，他的政敌在国内也鼓动人们反对他。中方的谈判人员则受到守旧派的批评，加上在中国发行的外国报刊的攻击甚嚣尘上，使他们心绪不宁，因此，表现得迫不及待地急于签订这一条约。虽然英方在这一条约中做出的让步远不及他们所希望的，但是，毕竟还是做了某些重大的调整，至少是承认了中国有权享有平等的地位。条约于1869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订。中国人还不充分了解西方外交的全部细节，因而错误地认为，这一条约既已盖有皇帝的御玺和恭亲王以及四位大臣的印信，就已具有约束力。因此，数月以后，当1870年6月和7月间，英国政府由于屈服于在华与国内商界人士的叫嚣，显然已不会批准这一条约时，就使恭亲王严重地“失了面子”，而他的对手们则得到极大的满足。

在这些人们中，有一个人尽管仍然隐在幕后，但也必须计算在内，这就是皇帝（当时15岁）的母亲、仍在与另一位太后共同听政的慈禧太后。几年来，这位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的不和日益加剧，1869年

发生的一件事使这种不和变成了公开的敌对。恭亲王曾试图断然去掉慈禧的一个心腹太监，以便控制她的权力。这一行动使慈禧“丢了面子”，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极其严重的事。当英国拒绝批准由恭亲王谈判并用过印的条约时，慈禧便借机进行了报复。

就在英国即将宣布拒绝批准条约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使这位负责帝国对外关系事务的亲王更加难堪的事件。“‘亚罗’号战争”以后，法国于1860年占据了天津，直到1863年才撤离这座城市和外国租界。外国军队与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争执，使相互之间产生严重恶感。法国人还将他们的领事馆设在以前的一所皇家别墅中，并在一座中国庙宇的废墟上建造了一所教堂。所有这一切都触怒了当地的士绅。与此同时，特别是在1870年夏季，民众被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所激怒，他们将这些案件归咎于法国仁慈堂的修女。这些修女一直从事于救济被遗弃的孤儿的慈善事业，并且，对于将儿童活着送到修道院的人给以少量酬金，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这就鼓励了那些拐子们去诱拐儿童，赚取酬金。当时，一种在夏季极为常见的流行病正在蔓延，孤儿院的儿童大量死亡。这些事实一经透露，人们怒不可遏，加上法国领事丰大业又采取了不明智的暴力行动，更是火上浇油，于是，民众杀死了他和两名法国神父，10名仁慈堂修女以及他们的一些中国仆人。教堂、修道院和其他一些房屋也遭到焚烧和洗劫。

这起事件，即1870年6月21日发生的天津教案，在中国与西方关系方面以及清廷政策的内在演变方面，均成为一个转变的标志。只是由于这年法国与普鲁士之间发生了战争，才避免了一场中法战争；所有旨在进一步修订条约的倡议均告破产；而中国为了避免冲突，迫不得已派遣一位高级满族官员崇厚出使法国，对杀害丰大业一事向法国政府道歉。由于这位专使本人也曾险遭那位法国领事击毙，所以，中国人很自然地感到，崇厚此行是屈服于外国的威胁和暴力的软弱投降行为。天津教案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加深了双方的怨恨，可以说至今难以磨灭。因为，多年来人们都不断地指责孤儿院诱拐和虐待儿童的行为，不但义和团重新提出这种指责，而且，中国现政府对虐待儿童的指责也表示赞同。

毋庸置疑，1870年的两起事件——英国政府拒绝批准阿礼国协议和天津教案及其后果——大大地加强了中国守旧派的地位，削弱了像恭亲王奕訢这样的人的势力。随之而掌握了大权的慈禧太后便成为守

旧派的领袖。她与这些人持有同样的偏见，而且由于其性别和地位所限，根本得不到有关整个世界的广泛知识，而总理衙门的官吏以及各省的总督们则开始对此有所认识。

1871年，同治皇帝（本人名叫载淳）年满16岁，按照朝廷的惯例，已到亲政年龄。但是，仍然有人奏请慈禧太后继续听政两年。朝廷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违反王朝成规的做法。这成为一个不祥之兆，表明慈禧太后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支配地位。翌年，年轻的皇帝与一个贵族女子成婚。1873年2月3日正式宣布皇帝亲政。两宫听政随即取消，但实际上，慈禧太后继续控制着政府和她软弱的儿子。

从表面上看，同治皇帝亲政似乎诸事顺遂。云南回民叛乱终于被镇压下去。左宗棠收复了肃州，将西北回民叛乱分子赶出中国本土。6月29日，皇帝第一次赐见各国公使，按照条约的规定，接见时免行“叩头”礼。但是，对于了解宫廷内情者来说，形势似乎并不乐观。皇帝体弱多病，懒散无为，生活放荡。他很快就陷入那些腐败的太监们为他设置的种种诱惑而不有自拔。他不喜欢他凛然可畏的母亲，与她发生龃龉。他选中了一位蒙古族高级官吏的女儿做皇后，而他的母亲则不同意。他与自己的叔父恭亲王奕訢也不和，因为恭亲王指责他挥霍无度，行为不检。1874年11月，皇帝染上了天花。此病当时在中国极为常见，被认为是年轻人必染之症。载淳由于体质虚弱，所以卧病不起。12月18日，慈禧太后以皇帝久病不愈为借口，宣布再次听政。1875年1月12日，年轻的皇帝去世，时年19岁，同治朝至此结束。同治帝身后无子嗣。这样不到两年，原来想要获得成熟的领导和成年皇帝的希望便告破灭，于是，出现了性质极为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

清朝所采用的皇位继承规则，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中国历朝所沿用的成法。为了避免过去在皇太子周围频繁发生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情况，规定由皇帝将其所选定的继承皇位的儿子的名字写在纸上，在皇帝逝世以前秘而不宣。皇帝若无子嗣，他就应当从下一辈人中间，挑选一位侄子作为继承人。这位膺选者便正式成为皇帝的嗣子，有资格在祭祖时奉祀亡君的灵位；而与皇帝同辈的兄弟或堂兄弟则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与皇帝不是父子关系。清朝的头7位皇帝都有子嗣，其中之一被立为皇嗣，所以，实际上从未出现过上述选嗣的必要。已故同治皇帝载淳不仅是清朝第一位无子嗣的皇帝，而且也是咸丰皇帝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因此，也无侄子。所以，只能从道光皇帝

（死于1851年）的曾孙中物色继承人。这意味着唯一可能的人选是皇族溥伦。溥伦是亲王载漪的长子，当时还是一个孩童。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另一难处：载漪本人并非道光皇帝的孙子，只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的过继儿子。载漪在血缘关系上只是乾隆皇帝（死于1799年）的玄孙。道光皇帝有孙子数人，都是他5个小儿子所生，当时亦均年幼。但这些孩子当然与已故皇帝是同辈，按照继承法的严格规定，没有资格继位。

已故皇帝的遗孀此时正怀孕在身，因此军机处的某些大臣提议，先立摄政，到她分娩时生的若是儿子，便可立为皇嗣。慈禧太后根本不赞同这一主张。他的儿媳倘若果真生下一个儿子，那么，在这样一个婴儿成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听政的将是他的儿媳，而不是她，何况她是极不喜欢这位儿媳的。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她在政府中再无立足之地，将被迫隐退。因此她宣称，帝国局势十分严重，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必须即刻挑选一位继承人。于是，有人提出以溥伦为嗣，但慈禧马上表示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只不过是奕纬的过继儿子，因此，他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继位人。这种说法无论从惯例上还是从成法上讲，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中国，过继被认为是确立起一种明确的、具有约束力的关系。如果溥伦不在考虑之列，就只剩下已故皇帝的堂兄弟们可做皇帝，其中最年长者恭亲王奕訢之子载湫，当时14岁。如果他成为皇帝，则到他成年即位为期甚短，而且其父亲亲王显然将成为摄政王。但是慈禧不喜欢恭亲王，而且她非常清楚，恭亲王摄政之日，将是她的权力告终之时。

因此，她提议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当时4岁的载湫为皇嗣。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恭亲王奕訢之弟。但奕譞之妻乃是慈禧的胞妹，所以载湫是她的姨侄。因此，载湫是皇室中唯一与慈禧关系密切的成员，他的母亲是她的妹妹，这样便可保证她能够听政多年。载湫的父亲奕譞，为人软弱，缺少恭亲王奕訢的能力。假如恭亲王的意志更坚强一些，假如他的威望没有因为不久前外交事务上的失败而受到损害，他很可能会抵制这种篡权行为。众所周知，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但太后的野心既已得到军机处中善于谄媚逢迎的多数人的支持，恭亲王也只好听之任之了。这样，慈禧太后竟然明目张胆地破坏皇位继承法而继续长期控制政权，其结果最终使清朝走向灭亡。

载湉膺选，两位太后再次宣布共同听政。已故皇帝的遗孀被完全弃置一旁。几星期以后，她突然去世。据说，她是为抗议这种篡权行为而自尽的。显然，皇后之死至少正中慈禧太后之意，因为，如果同治皇帝的遗腹子出世，对于她的野心将是一大障碍。在此后的14年中，慈禧得遂独揽大权的野心。1881年4月7日，共同听政的慈安太后病了很短时间便死去。人们一直传说，是慈禧下令将她毒死的。慈安的去世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地位，并为他的下台铺平了道路。

光绪朝的最初几年，在两宫听政之下，外交事务仍然是政府的主要问题。1878年，清朝终于征服了新疆（或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叛乱，平定历10年之久的国内叛乱的最后阶段遂告完成。但是，这件事使清朝卷入了一个具有危险性质的新的外交问题。1870年，当叛乱者仍然完全控制着新疆（浩罕的阿古柏是其主要领袖），而且还控制着中国西北部分地区时，俄国占据了新疆伊犁地区，以便保护他的商人。在俄国人占据该地区整整10年以后，中国此时能否收复这部分领土，看来至少是令人怀疑的。由于参与天津教案而曾奉命出使法国的崇厚，此时是中国唯一具有直接与外国办交涉经验的高级官吏。他于1879年被派往俄国，就归还伊犁事进行谈判。

崇厚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后，又随着俄国宫廷前往黑海边的里瓦几亚，于1879年10月2日在那里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俄国撤离所占领土的1/3，中国付给俄国大笔赔款，并且还提供各种有利于俄国的贸易特权。这一条约遭到中国许多高级官吏的强烈谴责；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才能出众的人，即张之洞。主要由于他的猛烈抨击，崇厚被革职并监禁，条约也被废除。这位不幸的专使全仗外国公使的斡旋，才得以保全性命。这些外国公使自然不愿意看到一位外交使节由于有辱使命而被处死。守旧派自以为里瓦几亚条约的废除是他们的大功劳。其实，曾纪泽之所以能在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2月24日）中从俄国方面争到比较有利的条款，实际上是由于这位专使熟练的外交手腕，虽然他同意增加补偿给俄国的“占领费”的数目，但是，他得以收复很大一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包括伊犁与喀什之间的各个战略要隘。

与俄国人的这些谈判比较成功，得以收复失去的领土，并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但相形之下，与英国的关系却恶化了。关系恶化是由于英国国民马嘉理于1875年2月19日被杀害而引起的。马嘉理从

上海启程，穿过中国西南去缅甸的八莫，在那里迎接一个英国贸易使团。这个贸易使团的任务是在当时已被英国并吞的下缅甸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之间探查并开辟一条新的商路。在返回中国时，马嘉理比贸易使团略提前一步。他在缅甸边境中国一侧的丛林中遭到袭击并被杀害。这一地区当时非常荒凉（现在也仍然如此），而且仅在两年前才从叛乱的回民手中收复回来。在叛乱期间，一个英国贸易使团曾受到叛乱当局的接待，但帝国的军队却阻止该使团继续前进。因此，当地人对英国抱有一种偏见，因为英国对缅甸的渗透当时正在迅速扩展。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以及一般西方的舆论都把马嘉理的被害归咎于该省总督岑毓英。威妥玛要求由中英官员进行现场调查，并惩罚对此应负责任的人员。朝廷要求岑毓英禀报实情，但云南远在2000英里以外，无论是传令，还是回禀，都无法在数月内到达。与此同时，威妥玛一再坚持他的要求，并且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扬言要发动战争。当收到岑毓英的报告时，再次证实中国人的看法，即马嘉理是被当地土匪和散兵游勇所害，岑毓英对此毫无责任可言。威妥玛拒绝接受这一报告。而中国政府同样也不愿意把这一位曾为朝廷立下卓越功勋而且确实无可指责的高级官员作为牺牲品。

如果遵照外国人的旨意，将这位忠贞干练，甚得人心的有势力的人物解职，就会激起一次新的非常危险的叛乱，朝廷在各省也会威信扫地。恭亲王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建议以其他的让步来满足英国人的要求。经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条约同意增开通商口岸，给予新的通商特权，并且订立了接待外国使节程序的规定。像马嘉理案这样的偶然事件，虽然由无关紧要的原因引起，但中国朝廷却在战争的威胁之下，被迫向外国做出让步，帝国的高级官员虽然对此事毫无责任，却为此受到指责。这就大大削弱了开明派官吏的权威，并激起了人民和地方士绅的排外情绪。

从1881年慈禧单独听政到1889年光绪皇帝亲政，这一期间清政权的日趋衰落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虽然这时帝国国内终于安定下来，但是中国在其边远藩属中的地位，却由于法国在南面的侵犯与日本在北面的势力扩张而受到挑战。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对接受中国文明最彻底的毗邻的王国——南面的安南和北面的朝鲜——行使着微弱的宗主权。远在汉朝，两国曾是中华帝国的行省。以后数百年中，两

个王国分别实行了地方独立。但是，无论中国哪一朝代当政，它们都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力。满族推翻明朝后继承了这种宗主权。但中国仅仅是索取一种名义上的，也就是礼节性的朝贡，并且让朝鲜和安南的国王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它也没有向这两个属国提供任何保护，没有驻扎军队，也没有与它们建立任何正式的防御联盟体系。如果这两个属国受到攻击，它们将向中国的皇帝求援；不过没有任何条文规定，皇帝是否必须提供这种援助，或者援助应采取何种方式。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日本也善于趁火打劫，这种自古以来的关系就受到了挑战，后来终于被打破了。

早在1862年，当中国苦于应付太平天国叛乱和“‘亚罗’号战争”而无暇他顾之际，法国就强迫安南国王割让王国南部通称为交趾支那的三个省，包括重要城市西贡^[1]。普法战争以后，法国重新在安南推行其进逼政策，1874年获得了进一步的权利，包括在东京的红河通航的权利。中国拒绝放弃其宗主权并且不允许法国进入邻近的云南进行贸易。但法国在1882年继续施加压力。同年4月，派遣一支远征军占领了东京首府、安南王国的北部——河内。安南王国不敢公开向中国求救，而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干涉此事，以致同法国交战。于是便鼓励东京当地的爱国者组成一支称为“黑旗军”的军队进行抵抗，其指挥官是以前的一个土匪，名叫刘永福。中国在1882年支援安南抗击法国的方式，非常像是中国在70年后支持越盟从法国统治下重新获得独立时所采取的方式的预兆。到1883年年中，尽管中国根据李鸿章—福祿诺协定，同意开放广西和云南两省对法通商，但局势已经恶化到中法之间发生了战争。到1884年年中，中国军队几次受挫，中国沿海也受到法国军舰的威胁^[2]。

慈禧太后很久以来就在寻找机会消除恭亲王奕訢同她在权力上的竞争。此时，她借几位主战派的监察御史指责指挥作战无方之机，不仅将恭亲王，而且将军机处所有大臣均予革职。对这次人事变动，无人提出异议，这表明慈禧太后已最后取得支配一切的地位。慈禧挑选庆亲王奕劻接任恭亲王的总理衙门（外交部）大臣职务。庆亲王是乾隆皇帝的曾孙，皇室一个旁支的首领。他的才干远不如奕訢。他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开明的观点，但对于慈禧太后可谓唯唯诺诺，总是尽可能避免卷入任何危险的争端，而且他本人素以贪污腐败、从事卖官鬻爵的勾当而著称。此人当时48岁，成为帝国的首席大臣，直到清朝灭

亡时一直担任此职。奕訢已经失势，奕劻则丝毫不足以限制慈禧太后的权势。奕劻接替奕訢一事标志着清朝向着衰落大大接近了一步。

与此同时，虽然恭亲王因为所谓的贻误军机而被革职，但是中国人仍然继续对法国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无论是比20年前在抗击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亚罗’号战争”中，还是比10年以后在抗击日本人的进攻中的表现，都更加值得赞扬。然而，尽管中国人在东京取得了胜利，两国还是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德爵士的调停下，以1883年流产的李鸿章—福祿诺条约为基础，重新开始了和谈。1885年4月4日签订了合约，中国撤离东京并且放弃了对安南的宗主权。这一结局确实是荒谬绝伦的：李鸿章所做出的这些让步，是两年前主战派所坚决反对的，而现在，当主战派的政策意外地获得了未曾预料的成功以后，却被接受了。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之一，固然在于同法国的战争有扩大的危险，但主要原因大概还在于：就在同法国交战的同时，中国不得不应付在帝国的另一端——朝鲜所发生的同样严重的危机。李鸿章和其他高级官员深知，即使在对法战争中有可能取得某些胜利，也不可能指望中国在同时与法国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正像法国之所以能扩张到安南北部，其首要原因是中国未能支持其属国安南抗击法国对交趾支那的侵犯一样，日本此时对朝鲜的干涉，也恰恰是由于中国对朝鲜事务不闻不问所致。1875年，日本与朝鲜就朝鲜沿海居民抢劫和虐待失事职员的海员一事发生争端。中国拒绝对朝鲜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于是，第二年，即1876年7月23日，日本就直接与朝鲜国王交涉解决此事。这样一来，就有损于中国的宗主权，并且削弱了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上的王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以后的几年中，当朝鲜国内局势恶化时，中国和日本均派遣军队去恢复秩序。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经过一次交火以后，日本军队于1884年12月被迫撤出，中国人则仍然占据着汉城。[\[3\]](#)

因此，在1885年年初，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东京受挫的法国人和被赶出汉城的日本人将会结成联盟来反对中国。由于中国在4月间同法国签订了合约，从而避免了这种危险。同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会晤并缔结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双方同意从朝鲜撤兵，此后，不得在未事先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派遣军队进入该国。虽然中国暂时还没有完全丧失它对朝鲜的宗主权，但实际上它承认了日本在该国享有与它同等的地位。这种勉强达成的解决办法包含

着进一步发生冲突的种子。在以后的八年中，朝鲜继续处于动乱之中，直到1894年另一场危机引起了中日战争。

1886年，年轻的皇帝年满16岁。按照朝廷的成法和伟大的康熙皇帝所创立的不可违反的先例（他也是在未成年时继位的），皇帝已届亲政年龄。光绪皇帝载湫是一位很有出息的青年：聪明睿智，遇事能深思熟虑，生活习惯庄重朴实。和他的前几代皇帝不同，这位清朝的倒数第二代皇帝能够成为一位颇有作为、思想开明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无疑非常了解她这位姨侄的性格，而且已经对她所挑选的这位皇嗣感到失望。以皇帝软弱无能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整个朝廷，不但没有结束太后听政，而奏请她继续听政两年。皇太后欣然应允。

1889年，皇帝亲政已无法再行推迟。2月26日，他同慈禧的一个侄女成婚。他对这位皇后从未有过任何感情，而这位皇后一直都充当了其姑母监视皇帝的密探的角色。慈禧太后在稳固了他的权势以后，于3月4日正式退居北京附近的颐和园，不过，所有诏令仍然要经她过目，其重要者在颁发前须经她批准。她毫无从此隐退之意。确实，她对颐和园自从1860年遭英国人部分毁坏以来，断壁残垣年久失修的状况并不满足，她要求修复和重建颐和园。当时没有其他资金可用，她便挪用了为建设和装备一支近代海军，以代替并扩充中法战争中被摧毁的舰队而筹集的经费。皇帝和他手下的大臣，甚至连曾对建设海军特别而且真正关心的皇帝的生父醇亲王，都未能制止这一不法行为。

正是在光绪皇帝部分摆脱束缚的这一时期，在中国，南方出身的官吏和北方出身的官吏之间出现了重大而且日趋严重的分歧。满族官吏则往往与北方官吏站在一起。这种不和局面的危机由来已久。清朝不仅建都于远在北方的北京，因而北方可以得到朝廷的恩惠，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北方人的欢迎，南方人则远非如此。南方的不满情绪一旦公开危及王朝，便会被粉碎，对政府没有什么影响。然而，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清朝的存亡系于南方的军队和南方将领，例如曾国藩和左宗棠（均系湖南人）。这时效忠皇帝的南方官吏就变得更有势力，并且开始主张和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而不是附和满族的王爷们及其北方汉族同僚。总的来讲，南方人，即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和湖北这些富庶而文化发达省份的人，多半精明强干，而且这些地区与西方人接触较多。虽然这些外国人在南方也同样不受欢迎，但是南方人对他们的创造发明、他们的习惯和力量则更为了解。

在军机处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方是以皇帝的师父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谨慎的维新派。另一方是以徐桐和刚毅为首的守旧派。刚毅是满族人，是一个狂热的排外分子。翁同龢和他的追随者均为南方人，徐桐及其他守旧派则是北方人。南方派受到大多数南方总督的暗中支持，这些人有：统治着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两省的张之洞，多年在长江下游的江苏、江西和安徽任总督的刘坤一，此时虽未负责统治南方任何一省，但无疑是高级官吏中维新派领袖的李鸿章。

维新派取得了一些成功。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逐渐打破了对于修建铁路的偏见，1881年开始略有建树，兴建了从煤城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从1884年起，架设了连接各大城市与北京及各大城市间的电报线路。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于1885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按照近代方式训练军官和士兵的军事学校。清末民初统治中国政府而造成极大灾难的军人，全都出身于这所学校。1898年，铁路从天津延伸到北京，并开始动工修建北京通往南方的大铁路（即后来的京广铁路）。这项工程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特别关心，是由他擘画和促成的。

谨慎的维新政策是当时能够得到充分支持而实际可行的最上策，但不幸的是，中国以外的事态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那些最开明的官吏所准备迈出的步子。日本本国的维新政策已证明是成功之举，它已准备好向外扩张，所畏惧的是俄国对混乱不堪的朝鲜王国所抱的野心。1893年，朝鲜又爆发了一场激烈排外的暴乱，即东学党运动，促成了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5年3月，中国战败。显然中国已无法阻止日本人向北京挺进。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谋求停战。4月17日签订和约。此时，李已谋取德、俄、法三国的支持，以遏止日本人的野心。4月23日，三国履行诺言，插手干预，联合向日本提出坚持要求取消条约中有关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湾）割让给日本的条款[\[4\]](#)。这是中国当时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李鸿章正是靠这样的手段才暂时避免了丢失更多的领土。但是，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给日本商人以新的特权，巨大的赔款。这些条款本身已足以使中国丧失面子；将不容置疑是帝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割让给日本，则为以后接连不断的冲突插下了种子，而且迄今仍使远东不得安宁。[\[5\]](#)

这场灾难性战争所产生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此时，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它是一个软弱衰败的帝国，是一个比有名的“欧洲病夫”更虚弱的“东亚病夫”。接踵而来的是一段极不光彩的插曲，即通常所说的“争夺租借地之战”。当时，如事实所证明的，看来帝国的瓦解已为期不远，各国都决定要抢到一份。中国面临着被蚕食和鲸吞的局面，用中国的话来说，即将被“瓜分”。中日战争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争夺即已开始，不出两年，西方各强国便全力以赴地争夺他们的猎物了^[6]。

为了对付这个外国瓜分的浪潮，朝野上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应。1898年，当各国公开商讨攫取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开始采取步骤看管这些未来的殖民地的时候，皇帝在开明派和南方大臣的忠告之下，着手进行孤注一掷的变法维新；而仍然受到自古以来的自豪心情和仇外情绪激励的人民，则被吸引到一个社团中。这个社团采取了自古以来笼络人心的传统做法，就是它的信徒只要拒绝一切外国的影响、事物和习俗，在战斗中就可以刀枪不入。同在1898年，光绪皇帝开始进行通称为“百日维新”的改良运动，而义和团也在当时外国人压迫最严重的山东省兴起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外国人写文章对维新运动的种种措施极尽嘲讽之能事，把它们说成是鲁莽、考虑不周，时机不成熟就草率从事。然而，在50年以后来看，这个变法纲领就当时民族和王朝的绝望处境来说，倒是非常细微的改革。光绪皇帝值得称赞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困境所在，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同保守势力，包括同他那位炙手可热的姨母决裂，以便最后挽救朝廷。所有变法措施均作为帝国的法令在1898年6、7、8月间颁布，规定今后不多年内均须实行。而在以后的年月中，中国人民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比这更加彻底的革新。

颁布的主要变法措施如下：

1. 废除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科目的传统科举制度。
2. 设立京师大学堂。
3. 军队现代化。
4. 革新各省学制。
5. 多余的庙宇和佛寺改为学堂。

6. 开设经济特科考试。
7. 准许低级官吏和平民直接向皇帝上书奏事。
8. 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9. 设立一个国家总署以促进商业、农业、矿业和铁路建设。
10. 改革各省官府、裁汰闲散官职。

这个变法纲领在其短暂的实行期间虽不够平衡，也不够协调，但至少其中一部分，比如第九条，包含了有计划的国家发展纲领的思想萌芽。这种发展纲领在近代改革了中国的经济。

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退居颐和园，但她究竟是从一开始就决定镇压变法运动，剥夺她姨侄的权力，还是先看看他会走多远，然后再采取行动呢，这一点无法断定。但是，变法运动伊始，她就给予致命的打击，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一旦时机来到，即可轻而易举地采取反措施。6月15日，即第一道变法命令颁布仅仅4天以后，皇帝最亲信的顾问、变法纲领的策划者翁同龢被革去所有职务，退居原籍。皇帝无力制止这一行动。这一事实表明，皇帝一旦违背其姨母的意志，他的权力实际上就非常有限。没有翁同龢以及由他的资历、地位和业绩给变法纲领增添的威信，皇帝及其年轻的理想主义的支持者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朝廷上便陷于孤立，不断受到这时对事态的发展趋势日益感到惊慌的顽固守旧派的反对。

虽然主要的维新派人士都是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人才，但当时他们都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在文职官员中无一人身居要津。因此，他们突然间平步青云而且声势显赫，就遭到那些逐级晋升起来的官吏们的冷眼相待。这些人即使思想开明，也不免忌妒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假如皇帝能够把高级官吏中某些温和派的首要人物如张之洞或李鸿章拉拢过来，那么，他便有可能组成一个强大的派别，足以控制和压倒守旧派。他没有这样做，因此各省总督均持观望态度。李鸿章由于不久前在外交事务上遭到失败（即他一贯反对的中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处境不利；张之洞则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先是著书立说支持维新，但在政治上却不给予积极的支持。这可能是由于翁同龢的革职使他警觉起来。他机警地意识到，守旧势力仍然强大，很可能会取得胜利。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任此职已达20年之久）丝毫

不介入朝政。他几乎是同治朝高级官吏中硕果仅存者——忠诚、干练、稳健——但绝不是康有为式的维新派人物。

1898年9月初，第一道变法令颁发以后仅3个月，皇帝意识到，太后策划的一次守旧派的政变正威胁着他。在那些较保守的亲王和满族贵族的怂恿和徐桐等汉人的支持下，慈禧决定，必须制止变法纲领的实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际上废黜皇帝。皇帝预定要乘火车首次巡视天津。而铁路这一新鲜事物本身就深为守旧派所憎恶。于是，计划在皇帝出京城时将其拘禁，并将政府再次置于太后听政之下。

皇帝决定，他必须先发制人，制止这次政变；为此，他必须调走太后的的心腹——北洋军统帅荣禄，而换一个他所信任的将领。新任统帅将率军至颐和园，拘拿皇太后，而且无疑会将她处死。但是，皇帝的计划被出卖了，太后得到了消息，于1898年9月23日在军队的伴随下秘密返回北京，使皇帝措手不及，并将他幽禁在紫禁城旁中南海的一个岛上。9月25日，宣布慈禧太后重新听政。变法运动遭到镇压。除康有为、梁启超设法逃到国外，其余维新派人士均被捕获处死。谭嗣同拒绝逃走。他相信不辞一死将表明他对皇帝的忠贞，并更有利于变法维新。

在1898年剩下的几个月中，人们普遍认为光绪皇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在他“生病”以后，紧接着将会宣布他去世。这一行动之所以推迟，是因为接到了南方各大总督的警告，特别是南京的刘坤一，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太后，如果皇帝去世，在南方会认为是一次谋杀，可能会激起一场公开的革命。英国公使也告诉清廷，皇帝如果去世，外国将不会容忍，它们决不会相信皇帝死于自然原因的说法。尽管如此，太后还是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法。立端王的年轻儿子溥儀为皇储。端王是道光皇帝第五个儿子之子。所以溥儀乃是光绪皇帝生父奕訢的兄长的后裔。这就表明光绪现在被视为篡位者。而最适合被立为真正继承人的皇族溥伦，再一次被置之不理。新皇储的父亲端王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守旧派和激烈的排外主义者。各国公使没有表示任何祝贺，以表明他们不赞同册立端王之子。立溥儀为皇储一事确实是再次违反了皇位继承法，因为它以前一直禁止在皇帝在世期间指定皇储，而是将宣布膺选王子的名字一事作为君主临终以前的最后一项安排。

1898年秋，黄河决堤，致使山东西部及其接壤地区遭受严重灾害。庄稼歉收，加上当时驻扎在青岛的德国军队横行霸道，已使该省鸡犬不宁，政府又一次落入极端守旧派手中，于是，义和团运动便在饥饿的农民中间迅速发展起来。10月，义和团在该省几个地方公开袭击中国的基督教徒，而山东巡抚毓贤对这些骚乱一味姑息，如果说不是实际上加以怂恿的话。1898年12月，在外国的抗议之下，毓贤被撤换，但并未失宠，1900年3月调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替了毓贤在山东的职位，立即开始大力镇压义和团。朝廷对于此举的态度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1900年1月，朝廷警告袁世凯，说他失之过严。但是，他继续进行镇压，将义和团从山东驱入毗邻的直隶（河北）省，即北京所在的省份。直隶总督裕禄举棋不定，于是朝廷于1900年1月11日和4月17日接连发出上谕，要求对义和团运动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得过分严厉。外交使团于1月27日和3月2日对第一道上谕提出抗议，但朝廷并没有将其撤回，所以普遍认为义和团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不久，义和团自己也这样公开宣称，于是，追随者迅速增加。

这时，朝廷中有一派人势力很大，他们主张承认义和团，将它收编为由官方领导的民团，理由是朝廷应该爱护它所表现的爱国热情，使之为朝廷效劳，而不要听任这样一个运动在人民中间自行发展。各省的高级官吏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直隶总督裕禄，起初虽然允许义和团在他的省的范围以内发展，这时也表示反对。5月间，裕禄的军队与义和团交火，并击败他们，很明显地打破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但裕禄了解朝廷的动向，没有继这次行动之后再给予义和团以决定性的打击。5月下旬，义和团重新发起进攻。这时，他们开始拆毁电报线并破坏华北的铁路。驻北京的外国使节一方面十分害怕义和团在农村的暴行，传教士和铁路工程人员均因此而纷纷撤离；一方面也十分害怕已经为极端守旧派控制的朝廷所表现的暧昧态度。5月28日，义和团焚烧了就在北京以南的铁路枢纽丰台车站。各公使馆决定请求在中国水域的外国海军舰队派遣军队前来担任使馆的卫队。这些军队于5月31日到达北京。

破坏铁路的行动激怒了帝国的军事将领和各省官吏。6月4日，一位高级军官聂士成在京津铁路线上的黄村，与大队义和团作战，予以重创。总督裕禄这时请求朝廷允许他以武力镇压义和团（6月6日）。北京到保定的铁路（即将修建的京汉铁路的第一段）亦遭破坏。这使

倡议修建这条铁路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十分愤怒。他上奏朝廷，强烈要求镇压拳匪。

慈禧太后的宠臣、北洋军统帅荣禄身居举足轻重的职位。假如他投入他的兵力去镇压义和团运动，那么，粉碎这个运动就比袁世凯在山东摧毁义和团更加容易。但是，荣禄与朝廷的接触极为密切，他知道以新皇储的父亲端王为首的守旧派是狂热的亲义和团分子；太后虽然摇摆不定，但是她厌恶那离不开洋字的近代事物，仇恨那受外国思想影响的维新派，这就使她必然要支持和赞同极端排外的那一派。荣禄并不支持义和团，他也肯定知道，如果让义和团为所欲为，就有同外国人全面开战的危险。但是他天天接到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的指示，所以他按兵不动，以为权宜之计。

6月7日，朝廷派极端排外的满族军机大臣刚毅前往位于北京以南80英里左右的涿州会见义和团首领。无论他所带去的真正指示是什么，选择此人本身就肯定说明义和团将受到朝廷的承认。事实上，刚毅命令所有帝国军队撤退，让义和团自由地向京城挺进。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请求驻华舰队提督西摩尔派遣军队登陆，占领天津的外国租界并增援北京的使馆卫队。

从北京发出的最后一列火车于6月3日离京。到6月5日，京城与天津之间的铁路就全部中断并遭到破坏。十分奇怪的是，义和团一直让电报线路畅通到6月12日。在这天以前，西摩尔已率领500人在天津登陆，加上几支已经在天津的分遣队，共有兵力 1945人，于6月10日向北京进发。6月13日，朝廷命令帝国将领迎战并击退这支军队。这天，西摩尔的军队在前往北京的中途的廊坊同帝国军队遭遇。西摩尔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受阻，被迫冒险向天津撤退，6月26日方始返回。在此以前，中国已与外国处于战争状态。6月13日下午，义和团武装进入北京，随即开始屠杀中国的基督教徒，焚烧教堂，骚扰外国侨民。日本公馆使成员杉山彬先生6月11日在城外附近被杀。驻天津的外国海军指挥官认定，只有让中国人放弃作为天津屏障、海河入口的大沽炮台，天津的外国租界和西摩尔的军队才可保无虞。他们要求大沽炮台守军指挥官放弃炮台。守军指挥官没有接到北京的命令，因此加以拒绝。6月15日夜间，炮台被登陆的海军部队攻占。

直到大沽炮台失守以前，朝廷一直抱这样的态度：外国公使应该依靠中国政府的保护，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的内政，外国公使无权过问。看起来，皇太后可能仍然希望通过推行守旧派好战的，但又不至于引起战争的政策来威慑外国。而另一方面，像端王这样一些彻头彻尾的亲义和团分子，则决心肆无忌惮地干下去。6月16日，召开了御前会议，被幽禁的皇帝这次也破例地被拉来参加。端正及其党羽力主开战，太后也倾向于他们一边。皇帝毫不畏惧地反对他们的主张，得到军机大臣袁昶的支持。袁昶是最后仍然保留着职位的温和派中的一个。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次日，御前会议继续举行。慈禧太后制造了一份据她说是当日收到的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所有钱粮均由外国公使征收。（三）所有军务均按外国公使指示办理。（四）皇帝恢复执政。这些要求纯系捏造，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端王之手。他从6月起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即外交部）大臣。皇太后似乎对这些要求信以为真。虽然立山和总理衙门的其他高级官吏次日奉命前去会见窦纳乐爵士，但他们并未受命询问这些要求是真是假。不过，他们所有人从会议大致情况看出，这些要求纯属子虚乌有。另一方面，窦纳乐则拒绝接受请他制止外国军队登陆和进军北京的要求。

6月19日，朝廷得悉大沽炮台失守。太后认为这是一次战争行动，指示总理衙门同外国断绝关系，命令他们的代表在中国军队保护下离开北京。外国公使拒绝接受这一命令，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保护是毫无作用的，离开北京将招致一场大屠杀。6月21日，中国对西方列强宣战。在第一天，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前往总理衙门，准备就义和团袭击使馆卫队一事提出抗议。当他乘官轿到达哈德门大街时，被亲义和团的庄亲王直接指使的一个士兵拦住并杀害。当天晚上，北京的义和团对外国使馆发起总攻。外国居民在他们的使馆中进行防御，以围有高墙的英国公使馆（以前是一位满族的府邸）作为他们抵抗的中心点。

与此同时，义和团亦在攻击天津的外国租界，于是，一支从海军舰队和远东租界港口抽调来的国际部队正在集结，准备保卫天津和援救北京的使馆。6月24日，两千人在天津登陆。从此，外国租界的危局才真正解除。在北京，外国居民成功地击退了义和团无数次接连不断

的进攻。另一方面，帝国的军队，特别是由一位极端排外的回族将领董福祥（他也参加了进攻）指挥的甘肃回族军队，则没有装备大炮。虽然荣禄的军队配备有新式大炮可供其使用，但是他一直没使用这些大炮轰击使馆。出现这样奇怪的克制行为的来龙去脉，从未能予以充分解释。假如荣禄允许动用他的大炮，他肯定能够夷平使馆。朝廷公开支持义和团，而这位统帅却按兵不动，而根据这时他致南方几位总督的电报（6月26日）来看，他哀叹自己不能左右太后的政策。

南方几位大总督做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6月21日，他们接到向列强宣战的谕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驻节广州），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经相互电商，一致同意将宣战谕旨秘而不宣，并保持中立。在这一决定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是邮电局长盛宣怀。盛宣怀驻在上海，是位思想开明的官吏；其官衔虽不甚高，但由于其职务是负责收转各省消息，所以是一个颇能影响全局的人物。从6月24日至6月26日，盛宣怀曾就保护上海的外国租界和维持长江流域和平，同各国驻上海领事进行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虽然从未正式签署）。根据协议，如果各国不派军队登陆，并且不派军舰沿江而上，南方各总督和各省巡抚就可负责保护外国侨民，镇压义和团的渗入，并维护正常的贸易。南方实际上是脱离了朝廷，从而使大部分中国免受义和团叛乱所带来的后患。

南方各总督实际上准备走得比这更远。他们敦促离北京较近的袁世凯率领他的军队向京城进军，镇压义和团，结束这场动乱。假如袁世凯这样做，毫无疑问他会成功，但是，这样一来，他本人的处境就会格外困难。6月28日，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仍然按兵不动，既拒义和团于山东境外，也不对当时入侵邻省直隶的外国军队采取任何行动。帝国的四分五裂局面已经暴露无遗。

7月14日，联军攻占中国的天津城，粉碎了对外国租界的进攻。这一胜利使北京的守旧派暂时有所踌躇。很明显，义和团越来越令人失望，他们对各使馆的进攻毫无进展。中国这时正与准备入侵的几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交战。这样一种前景，本应使那些即使比端王和慈禧太后还顽固的守旧派也有所畏惧的，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这场大难。7月14日至26日，对各使馆的进攻实际上暂时停止。他们再次试图要被困的外交人员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离京，但是，这项建议又遭到拒绝。这时又发生了另一起怪事，表明不是朝廷

的政策出尔反尔，就是它的下属各行其是。华盛顺收到了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先生的一封电报，提供了有关各使馆局势的消息，并且从各使馆被围困起来第一次证实各使馆仍在坚守。这使外部世界松了一口气。这封电报竟是通过总理衙门送到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手中的，而总理衙门的头子正是臭名昭著的端王本人。

6天以后，即7月26日，慈禧太后又一次改变政策，重新向公使馆发起进攻。两天以后，又将军机处剩下的两位反义和团的温和派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处决。8月4日，联军离开天津向北京挺进。京城当时的局势混乱不堪。甘肃军和义和团遍布街头，凡被怀疑同情外国人和具有外国习惯、知识或举止者，均格杀勿论。他们闯入有权有势的官吏家中进行抢劫。成千上万的有钱人纷纷逃离这座大祸临头的城市。然而，朝廷似乎既无法控制军队，也不理解这场已经降临到王朝和民族头上的灾难的性质。不足两万兵力的联军进攻迅速，势不可当。8月8日，直隶总督裕禄战败，他的军队四处溃逃，他也于当晚自尽。9日，另一支由李秉衡将军指挥的军队亦被击溃。11日，大运河的起点通州失陷，李秉衡亦自杀身亡。这时，联军距北京已不到12英里。

败局已无法掩饰或逃避。就在通州失守的同日，朝廷电召远在广州任职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同外国进行和谈。但李鸿章并不急于承担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使命。他首先是等待，看中枢有无真正的改弦更张的迹象，因为他知道，只要端王和其他亲义和团的领导人在慈禧太后左右，任何谈判都是浪费时间。

1900年8月14日下午，联军到达北京城下，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就开进城内，解了使馆之围。次日，即8月15日黎明，在一片慌乱之中，太后装扮成中国农妇模样，在皇帝和皇储溥仪以及一些侍从的伴随下，乘坐普通的马车逃离了皇宫和京城。临行前，太后命令将皇帝的宠妃，他唯一挚爱的女子和知心人珍妃投入靠近紫禁城北门庭院内一口井中。17日，他们首先逃到了长城外的怀来，才第一次得到了援助和接济。联军的追兵似乎节节逼近，所以他们继续西逃，9月10日抵达山西省会太原，最后于10月26日到达陕西省会西安，方才停歇下来。与此同时，北京落入联军手中。李鸿章姗姗而行，9月19日才抵达天津，开始谈判。

在此后一年过程中，这些谈判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后果，决定了中国在清朝历史最后10年期间的地位。1900年秋，俄国占领了满洲。在南方，各大总督采取的明智政策，在同一时期避免了外国人进一步的侵略和提出新的要求，并延缓了一场已经威胁着这个威望扫地的王朝的革命。远在西安的朝廷，起初仍在亲义和团的亲王和大臣的控制之下，但慢慢地认识到，只有放弃这些人的政策并惩处和清除他们，才能够平息列强的愤怒，并防止这个已无可救药的帝国遭到瓜分。1901年1月初，端王之子溥儀被废去皇储的地位，赶出皇宫。李鸿章费了很大气力，才设法挽救了端王本人的性命，而将他终身发配到边远地区新疆去。其他亲义和团的亲王、大臣和巡抚，如毓贤等人，或者令其自裁，或者将其斩首。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签订了合约。两个月后，这位年迈的政治家，曾与太平天国作战，并在本身存在着种种局限性的条件下竭力挽救王朝的一代伟人中的最后一位，于1901年11月7日逝世。慈禧太后及其意气相投的支持者们所推行的反动政策，终于把帝国拖入落后、软弱、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一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得到复兴。这一复兴之实现，全是革命者的功绩。而与这些革命者相比，像康有为这些维新派人士、太后的眼中钉，就成了最大的保守派。光绪皇帝如此狂热信奉并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变法纲领，相形之下也成了最温和的保守政策。由于守旧派的政策所造成的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不仅使皇冠落地，王朝覆灭，而且埋葬了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制度 and 经济制度。

（朱小红 译）

[1] 见原书第664页注。

[2] 详见原书第650—652页。

[3] 见第二十三章。

[4] 此处原文为租让，按马关条约规定为割让辽东半岛。——译者

[5] 详见原书第655—657页。

[6] 详见原书第658页以下。

第十七章 日本

把1868年看作日本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是适当的。这年1月，一批新的领导人在当时的帝国首都京都夺取了权力。尽管后来在政策上和人事上有所变动，但这些人物开始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并终于把日本提高到一个具有很高国际威望的大国地位。

自从17世纪开始以来，政权一直掌握在德川家族的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手中。他们称为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军事代表，实际上却拥有世袭君主的权力；他们直接管辖自己在各地的辽阔领地，并有效地统辖在全国其他各地大片领地上割据的诸侯。他们设法阻挠变革，以此来保存自己的权力，并取得显著的成就。约在1640年以后，他们下令使日本同世界其他各地几乎完全割断联系；而在国内，政治关系则牢牢地固定于17世纪的模式，同时严格地划分了社会等级，并强迫各阶层人民一体施行，他们甚至企图禁止经济上的变革。

这种政策在经济领域中则收效最小。到了18世纪，国内商业有了发展，而大部分居住在城镇^[1]里的封建阶级即武士，这时已习惯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的税收或收入却未能相应地增多。因此，各藩政府也罢，武士个人也罢，都愈来愈依靠向城市米商和金融业者告贷。领地主企图从农产品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的打算，引起了农民的反叛。藩政府与城市商人合作垄断商业的种种办法，使得富农和新兴的农村经商者和它们离心离德。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大多数的武士受益。大部分武士不是直接从土地上取得收入，而是从诸侯的藩库领取禄米。这些禄米非但没有增加，而且在藩库遇到财政困难时，往往被削减。

因此，到了1850年，日本全国已广泛地认识到，德川幕府统治的社会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对这一政权的反抗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不少最强大的封建诸侯对于他们从属于德川幕府之下，不断吐露怨言——中央政府的一大部分机构，确实是用来钳制这些诸侯的野心的。贫困使下层武士的忠诚之心减弱了，而他们之中那些比较精明强

干的人，则对于堵塞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世袭官职制感到愤恨。城镇的富裕商人，虽然和封建的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会一心一意反对这一制度，但也对于强加给他们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感到不满。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以暴力来表示他们的憎恨。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德川幕府垮台的过程中起着作用。由于动机迥然不同，因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目标一致的单一运动。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除了单纯的变革要求之外，为合作提供了基础。19世纪上半叶，人们日益意识到，日本的闭关自守，由于西方各国在中国和亚洲大陆北部的扩张而受到威胁。这一估计，由于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日本出现，要求建立条约关系，显然得到了证实。由于日本的军事实力显然不足以保证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是不得不签订条约。而且，许多人认为，这种外来的威胁，使得进行彻底改革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

既然德川幕府负责处理对外关系，它就不得不对向西方让步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承担责任。这一事实就使得天皇宫廷更孚众望，因为宫廷是与幕府争夺合法权力中心的唯一潜在对手，而宫廷始终是对西方的要求采取毫不妥协的敌视态度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人士一直极力主张要恢复宫廷的威望，因此，天皇这时开始在反对德川幕府的运动中起着双重作用：至少在表面上成为超越宗派利益之上的效忠中心，使以他的名义进行的革命活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

因此，到1868年，所谓的“尊王”运动就使倒幕势力得以联合起来。时机一到，由日本西部的四个大藩——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一批中级武士所领导的松散的联合力量，就夺取了政权。他们事先已经控制了他们自己的藩政府，从而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核心，并得到这些藩主的合作，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总是自愿的。他们和宫廷的下层贵族结成盟友，这作为接近天皇的一个手段，是极为重要的。最后，他们能够指望得到一部分商人的财政援助，以及农村的许多地方领袖的积极帮助。这些就是终于构成近代日本的统治阶级的各个因素。

1868年1月，倒幕领袖们指挥下的部队占领了京都的皇宫。这时，以少年天皇明治——这是他的在位年号，他的名字是睦仁——的名义发布敕令，剥夺了幕府将军的权力和领地，并再次宣布天皇亲政。过

去的国家行政机构一扫而尽，行政工作被委于新的顾问官手中。德川幕府的追随者几乎立即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特权，但他们于2月间在京都附近的交战中被打败，此后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进行什么反抗。4月间，经过谈判，将军投降，他的首府江户被正式占领。几个月后，天皇的宫廷迁移到那里，并将该市更名东京，至此，这一城市恢复了国家政府中心的作用。在此期间，在北部和东北部继续进行一些零星战斗。一直到1869年初夏，才最终攻克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些孤立的抵抗据点。

明治政府在它诞生后最初的一年半中，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无暇顾及改革问题。政府执政之初缺乏财源，没有政府机构，因为这两者过去都是由德川幕府用自己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的。随着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德川领地归于天皇政府的控制。过去的幕府官员也是如此，其中有许多人终于为天皇效劳。然而，在此期间必须找到财源并建立一个机构，以便进行内战。于是就向同情天皇一方的商人筹措贷款。德川幕府的现金储备一经发现，即被没收，并印行纸币以弥补支出不足。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军队，于是通过效忠天皇事业的各藩属，筹集小股兵力以建立军队，每支部队均由其藩主率领。但是，这支军队要全力与德川幕府作战，不得成为对大多数诸侯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些诸侯在各自的领地内几乎完全享有自治权，而且要等着看一看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才决定宣布效忠于谁。因此，在1868年的头几个月中，新政府只能够在首都附近以及忠于它的军队正在作战的那些地区行使权力。这时，日本根本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为新政权建立一套体制结构的工作进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1868年1月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天皇周围为倒幕联盟的成员们设置一些官职。任命一位亲王为政府的名义首脑。在他之下设两批参议：上级参议^[2]包括几名宫廷成员和一些诸侯；下级参议^[3]人数较多，包括下层宫廷贵族和结盟各藩的士族领袖。同年2月，成立了各行政部门，并任命参议担任其中一些领导部门的领导职务。这些部门的职能，如同它们的成员一样，是有限的。例如它们不得干预地方事务时，行使这种权力要取决于诸侯们的同意，即使在参议们本人出身的领地亦如是，或许更甚。只要对内战的结局存有任何疑问，情况就一直是这样。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并扩大支持的基础，3月间召集了各藩士族代表，组成了一种类似协商会议的机构；同时，宫廷于4月

6日颁布了一项称为《五条誓文》的天皇政府声明，以含糊但令人安心的语言，表达了它今后的施政方针。《誓文》的要点是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有的“陋习”，以及向“全世界”寻求新知识，作为改革的基础。

随着4月间德川将军的投降，以及不久后对江户的占领，天皇政府感到更为安全了。1868年6月11日，作为实现《五条誓文》的明显表示，政府颁布了经过修订的对中央行政机构的安排。这些安排反映了受到西方影响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实际上行政机构仍居于最高地位，而立法机构的真正职能，正如在它以前的士族会议一样，是作为封建势力的喉舌。在北方战争结束几周后，于1869年8月实行的再次改组中，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立法机构^[4]现在失去了立法权，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于1870年10月宣布无限期休会。从此再也没有举行会议，便于1873年6月被废除。行政机构被置于一个中枢部门的广泛的监管之下，名为太政官，下设6个省（部）：内务省、大藏省、兵部省、司法省、宫内省和外务省。同时，减少了高级官职的数目并对任官职者，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授予同他们所负责任相应的宫廷阶位。

然而，反映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演变的，是所做出的这些任命的性质，而不是组织机构的变化。最初，在同德川幕府的斗争仍在继续的时候，维护联盟并尽可能地和“中立的”意见取得一致，是有必要的。因此，被任命官职的不仅是那些倒幕运动队伍中表现最积极的宫廷贵族、诸侯和士族，而且，还有那些表示愿意合作（在同样的社会阶层范围内）的其他一些人士。但是，随着新政府的日益强大，选择的基础就缩小了。1868年6月以后，从宫廷中任命的参议减少，封建领地出身的参议则大部分来自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等藩。1869年8月，余下的王政复古运动的挂名领袖们——上层宫廷贵族和原来结盟时的诸侯——被免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让位于长期以来在幕后决策的一小批地位较低的人物。这些人包括宫廷贵族岩仓具视和一些士族：萨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长州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肥前的大隈重信；土佐的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这些人和与他们出身相仿的直接下属，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

如果说日本的新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的详尽计划，那是错误的。他们的最终目的非常清楚：日本必须从内部的混乱和外来的威胁中得到拯救。为此而要采取的确切方法，以

及这些方法孰先孰后，则是较难确定的；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不管有其他什么事情需要做，政府的权力必须实现，它的决策必须在全国各地行之有效。封建割据是要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正如明治时代的一个领袖人物在大约30年之后所写的那样：“消灭以专制的封建地方势力为表现形式的离心力，是把全国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的必要步骤，没有这种统一，我们就不可能以一个联合阵线来对付外部势力……”

没有证据说明，新的领袖们在掌权以前就已决定要切除封建主义，尽管他们最初就打算建立天皇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对付任何其他传统的效忠对象。神道教由于强调天皇是神，因此在新的官方等级制中，被赋予重要的地位。而且更直接地打算采取某种措施，控制封建领地的事务。早在1868年3月，进入中央政府任职的士族，就奉命割断与他们的领地的关系，翌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些人物，则由天皇赐以俸饷并授予宫廷阶位。1868年6月，又对诸侯相互之间的行动自由施加了某些限制。同年年底，诸侯们奉命指派专门官员担任同政府的联络工作，并且要按照东京规定的模式，将他们领地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化。在处理从德川幕府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方法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类似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在战争期间，经过一段短暂的军管时期以后，这些领地被改称为府或县，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对某些人来说，这还不够。甚至在1868年6月以前，木户就曾提出要求诸侯交出他们的全部土地，因为这是保证有效地实行中央集权的唯一办法。当他的同僚们拒绝了他的建议后，他转而努力去说服他自己的藩主长州的毛利，并终于把他争取过来，只附带一个条件，即萨摩藩也做出同样的表示。木户于11月间向大久保利通提出此事，后者同意对其他萨摩的领袖们施加他的影响。到了1869年2月，他们都表示支持，土佐的板垣和肥前的大隈也同样表示支持。3月2日，这4个藩的藩主呈上请求书，将他们的领地和人民交由天皇处理。在御前会议的讨论中，有人极力主张这是废藩置县的机会；但木户和大久保都坚持说，政府还太软弱，采取这一步骤不会成功。一直到7月才做出决定，接受请求书，并命令其他诸侯采取类似的行动；于是，过去的封建领主现在被任命为他们所交出的领地的知事。

这种妥协办法，尽管使思想比较激进的人大失所望，看来却大致符合诸侯们和他们的许多家臣的期望。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是在长

州和萨摩，对于即使这样有限的中央控制也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政府看来，这一改革也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地方官员仍由地方任命，往往对东京只怀有表面上的忠诚。至少对大久保和木户这样的人来说，事情越来越清楚，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必须将其进行下去，直到获得其应有的结果。在整个1870年，他们试图克服他们本藩的同僚们的反对，但未能如愿。1871年年初，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继续分歧下去，就有可能摧毁这个政权的整个基础，于是，他们就请求天皇干预，并重新努力以求得一致。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成功。4月间做出安排，一旦出现动乱，即将萨摩、长州和土佐的部队开进东京。8月29日，57名藩知事（过去的诸侯）奉召面谒天皇，并告以行将废除各藩，此后全国版图划分为县，由天皇直接控制。

清除了国内的政治藩篱，就有可能解决向政府提供充足而稳定的岁收这一迫切问题。由于废藩，政府就继承了各藩的债务和其他义务，其中最大的一项是，每年士族俸禄的花费。政府也继承了各藩的封建贡租。不利之处在于这种贡租不仅因地段不同而大有差异，而且是按收获量的百分比以实物交纳。因此贡租随着年成的好坏而增减，并且也不易征收。只有用以现金支付的土地税来代替贡租，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必须首先确定每块土地的所有权（从而确定由谁负责交纳地税），才得以实行。1872年2月，德川幕府制定的不得买卖土地的禁令被解除。大约在此同时，政府开始颁发土地执照，首先是1月间发给东京的某些种类的土地，7月起，即在全国各地推行这一工作。

实行地税始于1873年。地税是按土地估定价格的3%，以现金交纳；此外，准许地方当局另行课以最多不超过1%的税款。土地是这样估价的：总收入大致与过去的封建贡租相等，但是，由于地税必须在固定的日期以现金缴纳，而且不管年景丰歉，逐年不变，因此大多数农民对它感到不满。尽管1876年地税降低为地价的2.5%，但到1881年为止，地税收入平均约达正常岁收的78%之多；从这一计算中，可以看出它对政府多么重要。

因此，到1873年，明治政府在掌权几乎5年以后，已为自己的权威奠定了基础。它建立了有效的中央行政体系，直接控制了地方事务，并使自己有一个可以预计的岁收。它也在建立一支不再是效忠于任何封建势力的武装力量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1872年颁布了征兵法，次年开始训练应征入伍的军队，终于为对付封建叛乱提供一种有效的武器，并在镇压农民暴乱中，给新成立的警察部队以无法估价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已经开始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力和国际政治等问题。

明治政权1868年采取的几乎头一个行动，就是明确地否定它自己过去提出的排外口号，并且采取步骤，制止它自己的追随者所进行的那些可能造成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发生冲突的活动。尽管如此，日本人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强烈的敌视西方的成分。这种敌视的主要目标是1858年签订、1866年增订的一系列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被剥夺了在它的港口中对外籍国民的法律管辖权，以及修改对外贸易关税的权利。1871年废藩后，岩仓具视率领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探索修改条约的可能性。在华盛顿，代表团——除岩仓外，还有大久保、木户和伊藤——清楚地看到早日修改条约的希望很小；此后，代表团对于获得知识，要比对于外交谈判更为关心。在伦敦，伊藤考察了工厂。在柏林，俾斯麦向岩仓讲解了现实政治。经过大约18个月的旅行，这部分日本领导人开始深信，只有通过实行一项比他们过去所设想的要广泛得多的国内改革计划，他们的国家才能得到列强的尊重。

与此同时，那些留在东京的人物正在走另一条道路。这时，由于朝鲜坚持奉行日本当时业已放弃了的同样的闭关自守政策，日本与朝鲜发生了一系列的争端；1873年夏日本的留守政府（其中最有势力的成员是西乡隆盛）决定以武力支持它的要求。这一决定的消息，使岩仓代表团赶忙从欧洲回国。他们同西乡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后，改变了这一决定，于是西乡同其他人等向政府辞职。^[5]这次危机的结局决定了此后20年间日本内外政策的模式。那些被赶下野成为反对派的人物，不断攻击他们过去的同僚，并如后文所述，成功地修改了日本宪政发展的方针，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夺回领导权。大久保直到1878年被暗杀前，一直是左右政局的人物，他得到岩仓和木户的支持，虽然后者并不是一贯地支持他。木户于1877年，岩仓于1883年相继去世，但他们的继承人与他们的思想相似，特别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政策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直到1893年以前，日本在国外的行动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在国内，日本政府采取了彻底改革的计划。

要叙述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情况，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通过政治上的竞争和立宪斗争的来龙去脉来进行，下文将分别加以论述。这里只需着重说明在朝鲜危机后的那些年代中出现的发展过程的总性质。对行政工作的控制逐渐加紧，同时一个职业官僚机构成长了起来，其成员所以能够被任命并得到提升，至少部分原因是国家的考试制度。与此同时，西方的方法和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部分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部分是为了使日本具有从西方的意义来说的“体面”的外表。这对于修改条约是必要的前奏。例如，1875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部新的民法典，不过，修订工作直到20多年以后才完成。这部民法最后于1898年通过并实施，从它的内容来看，是受到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各种西方模式的影响。在不那么正式的事务方面，日本的风俗习惯，也受到政府的注意，特别是那些可能引起国外批评的风俗习惯。官方的规定与告诫包括种种内容，从日本在海外旅游者的行为，到贩卖少女做娼妓、色情文学，乃至舞台上的戏谑等等。

这些年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德川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从事培养官吏，在新政府的监督之下，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1877年，一些这样的机构合并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不久，又增设了其他几所国立大学，而一些从事西方教育的私立学校，也获得大学地位。在此以前，文部省于1872年公布了一个小学教育计划，规定自6岁入学，当时设想，按大约每600人口设立一所小学。尽管缺少经费和师资，小学的发展却很快，使得受义务教育的时间，从最初的16个月增加到1880年的3年，到1886年又增加到4年。到这个时候，46%的学龄儿童都在接受小学教育。18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1%，10年后，达到95%。1872年，开始兴办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1894年增设了高等学校。

教育行政最初根据法国的方式，但1880年到1885年期间采用了美国方式，包括采用选举产生的学校董事会。然而，1885年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以后，民族主义的影响有所增加，又转而采用德国的由政府实行监督的方式。课程大部分仍然用于讲授“实科”亦即西方的学科，但是，也出现了强调学习日本的历史和文学的新倾向，同时，又蓄意大力灌输国民的忠诚和服从精神。由于1890年发布了教育敕谕，

这一倾向更为加强。这一文件的语句清楚地表明，此后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为一个专制国家培养有用而守纪律的公民。

在日本建设一个近代化交通通信网的计划，其特点也是由政府经营管理。政府的邮政设施建于1871年，到1873年已扩展到各主要人口中心，从那时起就禁止私人竞争。电报在前一年已成为国家垄断的事业，主要电报干线的敷设，或多或少是在以后10年中完成的。电话传入日本后不久，于1890年对它也做了类似的决定。铁路的发展虽然不完全由国家经营，但在财政和技术援助方面主要还是依赖政府，这就使得政府官员能够在修筑铁路时决定孰先孰后。第一条线路是东京和横滨之间的铁路，于1870年开工，1872年通车；但这条线路被视为连接东京和大阪的铁路线的第一段，全线到1888年才竣工。从此以后，铁路事业在政府和私人创业精神的推动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为促进教育和交通通信的发展而采取的步骤，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提供一个有法律保障和政治秩序的环境，也起到同样的作用。然而，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远不止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在工业化方面尤其如此。明治政府的领袖们从他们的前辈德川幕府，以及从某些大藩那里，接收了不少新近建立的西方式的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像在横须贺那样的造船厂和几所兵工厂。这类直接与军事实力有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必然引起那些看到自己的国家受到外来威胁的人们的关切；于是，这一部分经济如交通通信，仍由政府直接掌握。类似的理由促使政府对另一些类型的工业企业也感兴趣。人们认识到，财富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这些年的口号是“富国强兵”。其他一些动机也促使事情向同一方向发展。开放港口使得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流入日本，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量，比日本可供出口的东西要大得多。在1868—1881年期间，由于上述原因而出现的贸易逆差，造成了不断的、令人不安的硬币外流。不仅如此，进口外国货物，破坏了负担重税的农民赖以获得现金收入的不少国内手工艺工业。因此，工业化计划除了它与国防问题有关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吸引力。它可以用日本制造的货物代替外国货，从而减少进口量；而新工厂如果设在那些受到外国竞争严重打击的地区，则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另一就业机会。

这并不能说明明治政府之所以创办、不单纯是鼓励发展新型经济企业的原因。答案在于：一部分是由于需要速度，以免日本很快就屈

服于外国的压力；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可供投资的资本。德川时代的商业发展不大，不能促进任何规模的资本的广泛积累。而那些曾经出现的富有的金融家族，除极少数的例外，都因他们的事业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的崩溃而破了产。此外，1868年后，地租和利率仍然很高，地产和高利贷是比工厂更为吸引人的投资目标。因此，为了迅速地行动起来，政府本身就不得不带头这样做。

它这样做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途径。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充当教师和顾问——单是工部省到1879年聘请的人数就多达130名；同时，派出留学生到国外去培训。创办了技术学校，组织了贸易展览会。政府进口外国商品和设备，以便借给地方当局作为样板，甚至从国外购入纺纱机器，再以分期付款方式转售给日本的企业家。政府直接从事对外贸易，出售大批大批的大米、丝绸和茶叶，以支付进口的费用。最后，政府兴办了自己的工厂，其中例如爱知县的棉纺厂（1878年），主要是用来作为训练中心；其他如深川水泥厂（1875年），则是为了供应如不生产就不得不以高价进口的产品。据估计，1868—1880年间政府对工业的总投资，平均至少达到正常岁收的5.5%。到这一阶段末期，国营企业已拥有3所造船厂、5所兵工厂、10处矿山和52所工厂。

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给一个没有储备的政府带来了许多困难。向外国贷款不是可行的权宜手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外国投资者不愿把资金投在日本冒险，又因为日本人自己也怕这样做会给外国人控制日本经济打开道路。既然对于农民的课税已达顶峰，而条约又禁止对于关税做任何变动，于是，大量印刷纸币就成为暂时的解决办法。有一段时间，由于经济活动的增长，还能够吸收流通中的大量发行的纸币。但是1877年以后，通货膨胀开始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特别是米价，给农村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另一方面，物价高涨也使政府岁收的主要来源——地税的实际价值大大降低。1881年10月，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大臣后，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恢复国家财政的稳定，包括对米酒和烟草课以新税，严格节约行政开支，以及减少政府补助与津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处理由国家创办并仍在经营的大部分工业企业。出售这些企业，至少可以部分地收回政府在其中的投资，并使政府摆脱在经营中不断遭受的损失。政府只保留军事工业，其他企业大都在1884年遇有机会即行出售；而且，总是以便宜的价格售给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物，从而在政府与财政—工业大集团（财阀）之间建立密

切关系中起了作用，而这种密切关系是此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松方的政策在平衡预算和恢复币值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这种政策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农村，因而，此后几年中在农村此起彼伏的骚乱，大部分应归咎于这一政策。这一事实着重说明了明治政府的领袖们是何等重视他们的现代化计划。1881年以前和以后，他们都表示，如有必要，即使牺牲农民的利益，也要继续推行这一计划，而这样做是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然而，他们对农业还是真正关心的，如果说对于从事农业的人并非如此的话。在政府的经济培训计划中，有许多是针对改进农业生产方法的，其结果是大米和其他谷物的产量不断提高，几乎与人口的增长和个人消费量的逐步增加并驾齐驱。事实上，到1893年，尽管政府做了推进工业化的努力，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化的工厂为数很少，规模也小。对外贸易量平平，其重要性主要在于技术上的借鉴。绝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小村落，主要从事农业，而地税仍然是政府岁收的主要来源。直到中日战争以后，经济才开始迅速向新的形式发展。

在这些年代里，政治结构方面的发展情况，则不能说是一样的。除了为提高效率而进行的行政上的变革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而且是最突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于政府与批评政府的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而产生的。

19世纪70年代给政府造成最大困难的反抗，是由于士族的不满而产生的那种反抗。中央政权日益强大后，便逐渐放弃了对士族意见委曲求全的政策，并代之以一系列消除封建特权的措施。最初的一些措施包括颁布法令，规定不同的阶级之间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禁止士族穿着独特的服装或带佩刀。此外，征兵法虽未立即生效，但不久就构成剥夺士族在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威胁。但是，只是到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受到危害时，他们才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来表示他们的愤懑。1871年废藩后，政府承担了支付士族俸禄的责任，但数额有所减少，而且不同阶层的士族之间各有差别。诸侯本人得到优厚的待遇。这实际上是为了取得他们对这一变革的同意而设下的诱饵。但是，对于在旧制度下已经陷于困境的许多下层士族来说，现在实行的减俸，使他们的收入下降到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

完全失去效忠之心，因为在1873年上半年，他们在镇压地方农民暴乱中，同警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至少对于某些新的领袖仍然抱有信心。到了同年年末，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大久保和他的同僚在朝鲜问题的争论中获胜，这就打破了士族对于在海外进行征服的希望，并促使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和其他一些人辞职。剩余的那部分封建俸禄，几乎立即受到威胁。面临日益增加的开支，政府设法用让士族选择领取产业资金以代替年俸的办法来节约支出。将近3年以后，到1876年，就强制实行这一办法了。所有过去的士族都被迫接受一笔附有利息的政府公债。这比他们原来的俸禄要少得多。新公债的每年付息总额约为1150万日元，而1871年俸禄总额的市场价值约为2260万日元，过去各藩每年俸禄总额的估值，则达3460万日元。从上述事实，也可得出关于所产生的后果的一些概念。

这种发展引起士族的公开叛乱。由于叛乱集中发生在明治政府领袖们自己的出身地区，因而更加令人不安。1874年2月，江藤新平在肥前领导了一场叛乱。在长州几乎立即爆发了另一起叛乱。然而，最严重的一场叛乱，则在3年后发生于萨摩。西乡隆盛于1873年向政府辞职后，退居到他的家乡县份，忙于为士族组织“学校”。这种“学校”有双重目的，即培养一批经过训练的军事管理人员，以及通过合作达到自助。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追随者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府，并能够任意置东京的命令于不顾。1877年1月，政府在几经犹豫以后，采取了将该地区重新纳入控制之下的第一个步骤，下令把储存在鹿儿岛县首府的武器运走。西乡的追随者迅速夺取了军火库，发动了公开的叛乱。此后，战事持续了6个月，到那时，西乡率领他的残余部队1.5万人被迫退却到鹿儿岛，他在那里自尽身亡。政府不得不把整个3.2万人的常备军和1万名后备部队，以及大部分国家警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镇压萨摩叛乱虽然代价很大，但却表明，封建叛乱在近代国家中——即使像日本这样新诞生的近代国家中——是不能得逞的。士族仍然不时地采取暴力行动，最初作为农民暴动的领袖，最后则成了政治刺客——1858—1868年间的事态使这一类政治行动几乎变得受人尊敬——但从此以后，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成了反对政府的主流。这一运动也是由于1873年寡头统治集团的分裂而找到了有才能的领袖。肥前和萨摩出身的人如江藤和西乡，拿起武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

土佐集团，尤其是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却宁愿采用合法的宣传鼓动手段，来争取建立一个代议制的议会。

1874年，这一运动的领袖呈递的两封陈情书，表明了这个“自由主义”运动的动机和它的局限性。1月17日呈递的第一封陈情书内称：当政者的独断专行正在失去民众的支持，从而危害国家。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将能实现国家的团结：“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国家才能强盛。”虽然引用了西方政治哲学来支持这一论点，但它实质上是对当权的一派人提出的挑战。它同意以达到国家的强盛为目标，但争论点主要在于实现这一目标所要采取的办法。它不是一个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呼吁书。事实上，当一个支持政府的人批评说，要求成立议会为时过早，因为“除目前的政府官员外，全国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过六七十人”时，板垣和后藤回答说，他们并不打算立即实行普选。他们写道，“我们首先只给士族和较富裕的农民以及商人以选举权，因为正是从他们中间产生了1868年维新的领袖。”

因此，这一运动是直接向反德川联盟中的一些人发出呼吁。这些人有理由对他们曾经帮助实现的变革的结果感到失望。运动的领袖来自土佐和肥前这样一些对萨摩和长州出身的人在中央政府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感到不满的藩。最初，运动的基本成员大多是上述地区的士族。从早期为使这个运动具有某种团结力量而组成的一些政治组织的成员情况，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些组织有1874年组成的爱国党，以及继之而成立的爱国社，而土佐的一个完全由士族组成的团体立志社，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在农村是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的。地主和农村的企业经营者，虽然从王政复古中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却也欢迎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景，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在税收方面偏袒城市，对此尤为耿耿于怀，农民也憎恨地税。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不满，从高额的地租到征兵，乃至学校和电报这样一些新花样。1881年10月成立了日本的第一个近代政党——自由党，从而开始把这些团体纳入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

然而，在此以前，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它在发展宪政问题上的立场。早在1873年，木户就主张实行代议制，但大久保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过他同意，作为维护安定和国家团结的手段，制定某种成文宪法是可取的。实际上，大久保和他的同僚这一方的观点与反对派领袖们那一方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寻求制定一部将会确认他

们的权力的宪法，而后者寻求的则是一个可以打破他们这种权力的宪法。从1878—1880年期间政府领袖们就有关宪法的各种建议所进行的讨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伊藤对此说得最简单明了不过了。他对现有的反对党的性质，做了一番简短的分析以后说：“政府的责任在于奉行一个和解的政策，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倾向，以便我们能够控制而不是加剧局势。我们要放松对政府的控制，但不是把它交出去。”

寡头统治集团的队伍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这就导致了新的行动。自从大久保于1878年去世，争夺全面领导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得到岩仓和长州利益集团支持的伊藤与肥前的大隈重信。大隈最初在宪法问题上并没有表态，但在1881年3月，显然是企图利用煽动群众来支持他争夺权力的斗争。他公然出面赞同立即制定一部英国式的宪法。他说，它必须包括这些规定：设置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按议会中的多数组成政党内阁。根据伊藤和岩仓的意见，这个建议于6月被拒绝。10月，他们成功地把大隈本人赶下台，于是大隈便组织了他自己的政党——立宪改进党，其组成人员有比较年轻的官僚中他的许多追随者，一批城市知识分子和以庞大的岩崎（三菱）联合企业为首的一些新兴工业家。

在大隈被迫辞职的同时，伊藤和岩仓设法使天皇发布诏书，许诺将颁布一部宪法，但不是像大隈所要求的那样立即颁布，而是在1889年。这样做有双重好处，既可削弱反对党的攻击，又可获得时间，进行准备。不久以后，他们于1882年组织了自己的政党立宪帝政党，但这个党软弱无力，而且普遍不受欢迎。而有效得多的是他们对付反对党派所采取的直接手段。1875年的新闻条例规定，批评政府将受到惩处。这一条例已被广泛地用来钳制，有时是镇压反对党的报刊。此外，伊藤于1880年还曾制定法律，将政治集会置于警察控制之下，并禁止政治组织为集会登广告，拉人入会，或与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通信往来。最初制定的镇压手段，本是用来对付板垣的追随者的，现在又转而用来对付改进党了。这些措施，由于往往成功地使自由党和改进党之间相互对立，因而得到加强。最后，于1887年12月颁布了保安条例，这个条例又进一步扩大了警察的权力，使它能够把政治嫌疑犯逐出首都。

反对派各政党没有力量经受住这些措施。尤其在自由党内部，由于政府禁止通信往来和合并的规定，其后果是削弱了在中央的士族领袖们的控制权，使权力得以转移到一般由地主控制的地方委员会手中。而且，松方的财政政策1881年后给农村造成的萧条，带来了一系列租佃争端，在这种争端的影响下，该党的农民一翼在观点上日益激进，在行动上愈加暴烈，而地主则变得愈来愈保守了。面对着这些困难，板垣和他的同僚于1884年10月决定解散自由党。大约在同时，大隈退出改進黨，从此该党就不再具有危害作用了。

政府在此期间已着手为它的政策的积极一面，即为颁布一部成文宪法作准备。这一切并不完全由于政府的国内政敌所施加的压力，或者是为了使自已永远掌权而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这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近代方式取得政治统一的必然阶段，是打击地方分离主义的延续。正如伊藤在论述这一过程时所说的，日本人民“缓慢地但是坚定地被引导着来开阔他们的视野，使之超出他们村落的范围以外，把他们本区和本县的事务看作自己的事务，直到最后能够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事务，如对他们本村的事务感到同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的兴趣”。1874年，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设立了一个县知事会议。1878年，又迈出了另一步，增设了由选举产生的各县县议会，来讨论包括税收在内的地方事务，不过选民人数有限，而且又授予内务大臣和他的下属以广泛的否决权和停止执行权。对于1880年设立的市、町会和村会的活动，也加以类似的限制。由于同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加紧了控制，而地方官员又对一般民众加紧了控制，因此很明显，这些议事机构只不过是反映了寡头统治集团的控制，在表面上有所放松而已。

在决定颁布一部宪法后，中央政府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同制宪的准备工作有着更直接的联系。首先于1884年制定了新的贵族爵位制。公开的目的是要对于忠诚的效劳给予奖赏，但引人注目地把大隈和板垣排除在外，尽管他们在政府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成就。这就表明，此举也是为了给将来的贵族院输送政治上可靠的成员。翌年12月，采用了德国式的近代内阁制度，伊藤任首相，全面主管政策，下设各部大臣，每人直接向天皇负责。1888年4月，设置了由任命产生的枢密院。这是又一个寡头统治集团势力的堡垒。

宪法的整个轮廓已经于1881年7月由伊藤和岩仓确定下来，而且岩仓所拟的一套“总原则”，实际上就是8年后要颁布的这一文件的大纲，也已于同年10月获得太政官的通过。因此，伊藤于1882年至1883年间进行的著名的欧洲访问，表面上是要研究外国的宪法，实际上只是与确定宪法的细目有关。既然岩仓的意见是“按普鲁士方式组成一个不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伊藤自然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柏林和维也纳，他在那里听到的讲课肯定了他原来的设想。他对巴黎和伦敦只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即于1883年夏返回日本。此后，在他亲自领导下，草拟了宪法的最后文本；1889年2月11日，举行隆重的仪式，颁布了宪法。这部宪法于1890年开始生效。

明治宪法几乎没有向大隈和板垣的观点做出任何让步。这部宪法是天皇赐予的，他保留修改的权利。而且，这部宪法确认了几乎绝对的君权，包括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对官僚和陆、军的控制，以及发布敕令的权力。臣民的义务，诸如服兵役和纳税，均有明确规定。他们的权利（言论自由、公正的审判等）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在政府的反对派看来，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有关议会的部分，因为虽然天皇“在帝国议会的同意下”行使立法权，但大臣们却不对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负责，而贵族院这个注定是保守的机构，实际上拥有对一切议案的否决权。在财政事务方面，“行使天皇大权所需的”一切开支——随后明确包括武装力量的开支以及许多文武官吏的薪俸在内——均不受议会的控制。年度财政预算须获得众议院的通过，但如遭到否决，政府有权按上一年的预算行事。各政党要想利用宪法来实现它们的野心，几乎没有可能。事实上，这部宪法是建立近代国家结构的最后一个步骤，而不是政府的反对派从政府那里争夺来的让步。

1890年的选举法规定了以纳税额作为选举资格的条件，这样，在4000万总人口中，选民总数被限制为约45万人。由于地税所占的比率很高，在选民中地主就成为最大的一个集团。这一事实在第一次大选（1890年）中得到反映。当时，众议院300名议员中，有90%以上是依靠农村的选票的。具有更为直接重要意义的是当时经过改组的各政党的力量。板垣、后藤和大隈领导的各派控制了160席，从而拥有超过政府支持者的多数。他们企图利用这一多数来争取人们接受政党内阁的主张，而首相山县和他的大部分同僚则断然反对这一政策。结果，在寡头统治集团领袖和国会众议院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从一开始，冲

突就集中在预算问题上。在第一届会议（1890—1891年）上，众议院提议削减 10%，山县只是在使用了广泛行贿和恐吓手段后才达成妥协。他的继任者松方遇到更大的困难，于是在1891年12月解散了众议院，企图使用警察和贿赂来控制随后举行的选举。结果造成25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但是反对党的力量并没有多大削弱。围绕着预算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1892年年末，接替松方的伊藤，通过请求天皇的直接干预，暂时打破了僵局，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得不在1893年12月和1894年6月再次解散众议院。

在1894—1895年间，由于热衷于对华战争而带来政治上的休战。此后，政治活动开始缓慢地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各党派由于很少取得成就而感到失望，并且由于一再负担选举费用而感到恐慌；因此，希望分享政府官职的愿望，使得他们比过去较为愿意做出妥协。同样，寡头统治集团的某些成员这时也准备宁愿与众议院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伊藤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于 1895年和板垣的自由党联合；当他的政府于1896年下台后，继之而来的是松方和大隈的联合政府。但是，这两次联合都由于在宪法原则上和职位分配上发生争执而受到削弱。结果，1898年在一个短暂时期里又回到过去原有的格局，自由党和进步党合并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党——宪政党，并且在伊藤的首倡下，大隈和板垣组成了一个联合内阁。这一尝试未取得成果。对行政实行改革的企图为官僚机构所阻挠；为制定具体政策而进行的努力，引起了自由党所代表的农村利益和进步党所代表的城市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官职分配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尽无休。不出几个月，甚至政府尚未与议会打交道，这一联合就瓦解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结果，山县重新掌权，组成一个没有特定党派关系的政府。

这时，伊藤和山县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伊藤着手与一些政党政治家们建立起紧密的联合，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一联合比寡头统治集团的任何成员迄今所建立的联合都要密切得多。1900年9月，伊藤组成了他自己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其成员大部分是过去的自由党党员。在这场交易中，伊藤方面答应他的追随者，他们将在内阁中获得一些职位，对政策也可有所影响。正如他在成立大会的致辞中所表明的那样，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必须放弃政党政府的原则。结果，政友会先在伊藤，后在西园寺的领导下，掌握了10年的有限权力。

——虽然有时要以支持山县所提名的桂内阁为代价——而争取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的斗争却被搁置一边，几达20年之久。

1890年以后日本政治和宪政的发展，在一些外国观察家看来，肯定比不上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威望的迅速变化那样突出。这一点首先从修改条约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1878年以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课题，就是试图废除治外法权和对关税的控制，这两点都体现在德川时代末期签订的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中。这一年，美国同意给予日本以关税自主权，但必须获得其他列强的认可，然而英国的反对使这一谈判于1879年年初中止。1882年关于治外法权的谈判的命运与此相同。1886年，就建立由外国法官和日本法官共同组成的混合法庭以取代领事裁判权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一妥协的消息在东京传开后，舆论的猛烈批评阻止了做出任何最后的决定。大隈担任外务大臣后，于1888—1889年间重新开始谈判；这次谈判是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举行的，但是结果也大致相同。在伦敦过早地发表了达成协议的消息后，在日本再次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在这些妥协的尝试失败后，日本谈判代表的态度变硬了。1893年，伊藤政府的外务大臣陆奥重新开始谈判时，打算使英国同意完全废除治外法权。他的态度比他的几个前任的态度要坚定得多。他强调再度冒犯日本舆论的危险性，而当时议会中群情鼎沸，就代表了这种舆论；他甚至暗示，日本有可能不得不单方面废弃这些条约。尽管双方在观点上发生了一些尖锐的冲突，但终于达成协议。1894年7月，他同英国签订了条约，条约中规定在日本颁布新的民法典一年后，那里的治外法权即行结束。这一条约以及随后与其他列强签订的条约，均于1899年8月生效。即便如此，直到1911年关税条约有效期满时，日本才得到完全的关税自主权。

在陆奥的指导下，日本的政策表现出更大的自信心，这一点在日本处理同它的邻国的事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890年以前，日本历届政府处理事务都是小心翼翼，特别是有可能和这—个或那—个强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时，更是如此，虽然他们在争夺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这些次要领土要求时获得了成功。甚至在朝鲜问题上，他们自1873年以来也表现出相当大的耐心。但在1894年，日本提出要求在他的指导下在朝鲜实行改革，这就构成了中日战争的直接起因。

日本1894年的政策和10年前在同一争端中所奉行的政策，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在两次争端时伊藤均任首相，这种显著的不同就更加引人注目。历史学家在企图解释这一变化时，产生了意见分歧。某些人强调说，1894年，中国的政策更加顽固了，而在这10年内，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利益又愈来愈重要。另一些人则设法从反对党在议会中的活动给伊藤造成的政治压力中寻求解释。两种论点都有说服力，但至少第二个论点是有懈可击的。的确，大部分政党领袖是属于1873年由于在朝鲜问题上的争端而辞职的那一批人，而且他们发现，批评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软弱性”是争取选票的现成手段。在1853—1868年间由于西方的行动而引起了恐惧后，外交政策一直是一个容易引起感情激动的问题。另一方面，并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各党派已经十分强大，足以迫使政府实现它们的愿望。以更加极端的形式施加压力的，是各爱国团体；这些团体喜好强制手段；他们所设想的日本扩张计划，需要完全抛弃对西方外交惯例的尊重，而明治政府是有义务尊重这些惯例的。由曾与萨摩叛乱密切相关的政治不满分子于1881年组成的玄洋社等组织，企图通过幕后操纵和恐吓等手段，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但直到20世纪，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才在制定日本的政策中得到了有效的发言权。

如果我们记住1873年伊藤强烈支持不进攻朝鲜的决定时所持的理由是，当时进行海外冒险既有危险又不可行，那么，就可以对于伊藤的对华政策有更清楚地理解。在那以后，类似的理由继续促使政府谨慎行事。但到了1894年，这种论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说服力，日本的领袖们已能够怀着更大的信心面对世界。日本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稳定。它拥有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工商业，一支规模虽小但却有效的西方式海军，以及一支经过改组（特别是在1882年后）的陆军，这一改组使它成为能够被用于海外的有效工具。由于取得了这许多成就，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前景，就不那么令人担心，而且，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这个前景变得颇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策的变化以及平息国内反对意见的必要这两点，只不过是次要的原因。[\[6\]](#)

战争本身的进展很快就变得对日本有利。日本的海军在几周内就取得了朝鲜和华北之间的制海权，从而切断了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最有利的增援路线。到1895年年初，日本已占领了整个朝鲜，旅顺口及其

辽东后方地区，以及南满的部分地区。中国不得不设法媾和，最后派李鸿章赴日与伊藤谈判。根据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同意承认朝鲜的独立；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再开放4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并偿付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但是，这个条约立即引起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它们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政府勉强同意，于是对条约做了修改。日本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战争赔款增加了。

中日战争为日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因为它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外交事务中，都有着重大的反响。胜利引起的情感和3大国干涉造成的屈辱感，正好与条约的修改同时出现，这就给民族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并且使日本所抱的中心愿望不再是取得平等地位，而是向外扩张了。同时，日本跃居远东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这就要求完全重新考虑它的地位。1895年4月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要实现它的希望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俄国角逐，也许是公开的冲突。然而，日本对此并无准备。它要想有力量在必要时不惜以战争为代价来拒绝某一大国的“劝告”，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

日本在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虽然促进纺织品的出口，是由于签订了马关条约而比较容易地进入中国和朝鲜的市场，但1890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或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日本的重工业还远不能支撑一场重大的战争；于是，政府的注意力这时便集中于经济领域中的这一部分。建立诸如1896年的保险银行和1900年的劝业银行这样一批专业银行，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把投资引向政府所期望的方面。邮政储蓄运动也起到同样作用。结果，工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按照西方标准，直到1914年它的规模一直较小。例如，机械工业的已缴资本，从1893年的260万日元增加1903年的1460万日元，到1913年则达6110万日元。1896年，航运公司使用700吨以上的铁制或钢铁制船只可以得到补贴；到1899年后，使用日本建造的船只可以得到更多的补贴。日本的商船队和造船厂的生产量稳步增长：到1903年，进入日本各港口的船只中，有38%属于日本所有，与此相比，10年前只有14%。1901年，当政府出资创办的八幡制铁所投入生产后，具有相当规模的钢铁工业诞生了。不久，又相继建立了一些私营公司。煤炭生产

从1885—1894年间的年平均产量260万公吨，增加到1895—1904年间的年平均产量800万公吨。

因此，在中日战争10年后，日本的经济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1900年，丝和棉的纺织品，包括棉纱在内，占出口货物的22%。原棉的进口有了相应的增加，而诸如大米和茶叶之类的农产品的出口相对减少了。人口的增长终于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长，日本成为食物的净进口国。政府的支出10年内增加了3倍，这主要是由于军备费用和开发新殖民地的费用造成的，结果征税和政府的债务都增加了。1894年至1903年间，国债增加了1倍以上。

经济发展的性质是由政府的政策所决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它从根源上和目的上都与国际形势有关。另一方面，虽然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还不足以鼓励在外交上采取贸然行动。国内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在签订《马关条约》以后的6年里，日本更换了6届内阁。因此，它对待对外问题一直持谨慎态度，目的在于避免卷入与列强的纠纷。^[7]这终于导致同列强中的一国结盟。朝鲜到1898年初一直是兴趣的中心，日本曾试图在那里与俄国合作。在以1898年德国攫取青岛和俄国租借旅顺口为开端的对中国的争夺中，日本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地位。这一发展形势危及它自己将来在大陆上进行贸易的前景，而俄国夺取辽东，则又触痛了三国干涉留下的创伤。另一方面，日本知道自己太弱小，不能够控制事态，甚至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这场竞争。因此，它不得不谨慎行事。在1899年义和团起事所造成的局势中，情况亦复如此。在所有的有关国家中，日本最有可能提供部队去援救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但它害怕得罪列强，因此，一直等到它被邀时才参加干预，而且一有可能，就立即撤回了军队。但是，俄国占领满洲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它直接威胁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也威胁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伊藤政府的外务大臣加藤于1901年春向圣彼得堡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尽管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有效合作。

英日同盟的谈判，主要是满洲危机引起的。自1895年以来，两国中都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鼓吹两国结盟，并且已经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讨论。不仅如此，在有关中国，特别是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赔款问题的谈判中，已经进行了合作。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有可能做出某种更为正式的安排。但即使这个计划有明显的优点，从这里到缔结军事同盟，还需迈出很大的一步。英国将能获得阻

止俄国在远东向前推进的手段和缓和它海军兵力紧张的好机会。日本则将能大大提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然而，双方也有理由犹豫不决，因为同盟意味着对俄国的威胁。这就可能使得同俄国达成协议更为困难，从而带来新的复杂局面。由于这个原因，1901年7月在伦敦开始的谈判进展缓慢；谈判开始后，伊藤在一段时期里继续试探同俄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同时，在英日同盟的最后文本里，英国许诺支持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那一条款措辞谨慎，以避免对日本的野心给予不适当的鼓励。尽管如此，英日同盟终于在1902年1月30日签字，衡量起来，日本似乎从谈判中得益最多。对它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在许多方面，英日同盟确实代表着明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的顶峰。这个政府最初处于变化不定和内战之中，但是，它逐渐建立了日本过去从未有过的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行政机构。一个人数不多的领导集团，成功地抵制了对他们控制政府机构的挑战，首先在日本的社会和经济中实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他们终于实现了修改条约（这就构成各国对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正式平等地位的承认），并在对外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同最大的强国之一结盟，又使他们的成功有了保障。而且，在历史纪年上——如果说不是在因果关系上的话——这也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在20世纪里，日本势所难免地将在远东事务中起主要作用；在国内的扩张主义情绪的压力下，在国外出现的机会的诱惑下，日本开始了一个创建帝国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给它带来了灾难。

（李家骅 译）

[1] 镇（castle-town），日文为城下町，意即在封建领主城堡周围发展起来的城镇。——译者

[2] 日语称“议定”。——译者

[3] 日语称“参与”。——译者

[4] 日语称“议政官”。——译者

[5] 详情请参阅原文第645—646页。

[6] 详情参阅原文第644页以下。

[7] 详情参阅原书第658页以下。

第十八章 美国

在19世纪后期，美国丧失了以前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地位。到了1900年，诸如不成熟、实利主义以及一味自我吹嘘这些原来保守派批评家们惯用的指责，连欧洲的左派也已接受。尽管人们企图把这一时期说成是“企业时代”，但近代的美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同意上述的批评，普遍的看法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浮夸的时代”，表面上很富裕，本质上一钱不值。即使如此，美国不论是对成百万贫苦的欧洲移民或是对富有的投资者来说，依然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而美国人自己也从内战时期的猜疑和分裂转向自信、社会安定以及在基本信念上出人意料的一致性。各种抗议和批评运动都呼吁恢复传统的美国原则；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实行根本改革的主张几乎无人支持。对批评家以及保守派来说，美国人的理想国仍然是美国。

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在北部和中西部兴起。这个社会虽亦经历了与其他工业社会相似的内部关系紧张的情况，但避免了由于阶级而产生的重大政治分裂。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它虽未遇到海外属地的问题，但在与占美国领土大部分的不够发达农村的地区的关系方面，也面临着相类似的问题。由于政治制度允许这些“殖民”地区参加全国政府，鼓励不同地区的各个集团联合一致，从而缓和了由于大权集中于美国一个地区而造成的影响；但是，政治由于不是毫无作为，就是腐败无能，往往看起来损害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关系，而不是使它们和谐一致。1888年，布赖斯勋爵在他的《美国共和政治》一书中谈到两大政党时说：目的和原则似乎已不复存在，“除了当官或者希望当官之外，一切均已丧失无遗”；像詹姆斯·吉·布莱恩其人，在党内举足轻重并赢得了他个人的追随者们的忠诚拥护，但回顾其所作所为，似乎不过是个浅薄无知、不讲公德之徒，而且从未参与采取重大措施和制定重要政策。不过，美利坚合众国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产物，也只有靠政治权术才能使之保持下去。

南北战争和南部的重建助长了一种新的忠诚观念和关于政治目的的新定义，从1896年的选举中，可以看出党派斗争和各利益集团的实

际冲突是一致的；在介于其间的一段斗争缓和的时期，两党都竞相仿效，以便扩大自己的地盘。在感情冲突的整个时期里，各政党都依靠过去的历史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经历了这一时期以后，对政治家来说，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目的。在“一切均已丧失无遗”之后，剩下的只有一大批各自为政的地方党派组织，它们结成一种松散的联盟，其目的在于选举一位总统。成功的领袖要做的就是，设法控制这些由较次要的职业政客组成的地方组织，而且即使是有声望的全国性人物也免不了一心忙于搞政党分肥、培植势力和玩弄政治权术这样一些无法否认的事实。正派的政府官员也许会变得容忍他们在私下诅咒的那些做法；这个制度也会培植起一批政党首脑人物和“分肥者”，即搞党政分肥的掮客，他们以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看待他们所利用的各种原则。这种职业政治制度，有时看起来与由企业家们形成的真正美国历史毫无关系；但是，政治和经济是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的，就像同国家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纠缠在一起一样。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权力的构成方式要比民治政府的正规结构更为繁复，而且比那些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更为复杂。

共和党原本脱胎于一个持反对意见、抱不满情绪和具有理想的运动。它是南北战争中产生的一个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中产阶级政党。它罗致了大部分知识分子，把理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热情同对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力量的广泛重视结合在一起。共和党人认为，福利和个人主义之间并无矛盾。后来的一些评论家们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他们的思想贫乏或有意自欺欺人，但这正是他们的力量的主要源泉。该党认为自己不是大商业的仆从，而是为小企业主、辛勤劳动的农场主、正派的市民和正直的贫民服务的。当党的势头减退以后，它就愈来愈靠政党分肥，靠令人激动的对南北战争的回忆，并且靠讨好商业利益集团了。一个为了防止扩大奴隶制而建立的政党，结果却把提高税率列为自己政纲的核心；如果说，这一时期它以类似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作为开端，那么，又以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保守主义非常近似的东西作为结束。然而，它却在不断地宣称，它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党，在接踵而来的那个时期中出现的进步主义，正是从共和党的肥沃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虽然共和党在19世纪末期处于优势地位，但从1865年到1901年间的18届国会中，有9届是民主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虽

除4年以外均居于多数地位，但在1877年到1891年，这个多数一直没有超过3个席位。1860年在共和党的腹地中西部，道格拉斯曾赢得几乎与林肯同样多的选票，而且，民主党除已积蓄起来的这样大的力量之外，这时又得到愈来愈多的国外出生的罗马天主教徒和城市低工资工人们这些补充力量。在南部，共和党到1877年已经绝迹，原来的辉格党人领导了一个重新兴起的坚如磐石的民主党。在北部，民主党在城市中和在比较贫穷的农场主中间仍然保存了力量，而数目较少的富人（其中大多来自纽约州并与国际银行业和海外商业有着分支关系）则在党内拥有和他们的人数无法相比的影响。各个集团的目标仍然相当一致，但随着力量的消长，此一集团或彼一集团取得压倒的优势，这就使该党走向极端的混乱。民主党人从来无法肯定，他们究竟应主张实行硬通货政策，还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呢；究竟应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对关税实行温和的改革呢；究竟应实行改革，还是奉行保守主义呢。民主党安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如该党在东部各州的主要喉舌纽约州的《世界报》所说，它试图坚持“民主党的旧主张……凡是学区同样能做的事，就不要让城镇去做；凡是县、市能做的事，就不要让州去做；凡是州能够有把握完全做好的事，就不要让联邦政府去做”（1865年3月7日）。对于这样一个党来说，上述不一致的情况，其影响比可能想象的要小。对于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要求自由行事的人来说，地方自治仍然有着吸引力。民主党可能自称是普通老百姓的党，但它的真正支持者来自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实力派。所以，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地方自治原则使坦慕尼协会得以处在掌权的地位；在南部，该党则成为上层寡头政治集团手中的一个有效武器。共和党人被指责为实行“集权主义”，但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中，该党真正的罪过在于企图保护黑人免受由于南部实行地方自治而带来的危害。民主党在19世纪末虽然与农业激进派结成了联盟，但它对有组织的工人很少表示同情，对熟练工人并无吸引力，它仍然被它的许多拥护者看成是保守派，因此，必须在20世纪经过一番变革，才能成为工业时代的改革力量。

两党都在设法争取同一个中产阶级的选票，因此它们的全国纲领往往只不过是设法用两种说法解释同一件事；然而，它们在气质上和原则上都有所不同，这使得当时的人们相信它们不是在装模作样地打假仗。共和党是由个人组成的党，民主党则是由少数人的集团组成的党。民主党仍然主张在放弃脱离联邦的条件下实行州权，共和党则认

为州权不包括损害人或财产的权利。民主党人数虽多，但政策不够高明；共和党代表着有教养和有地位的人们，但由于它在选举中处于没有把握的地位，于是，就不得不专门玩弄政治策略，因而也就顾不得什么公共道德了。两党都靠过去来保持其地位，但民主党是真正相信过去，而共和党则是利用过去而已。

如果认为所有担任公职的人都是无赖，或者认为商界已把政界的一切优秀人才挖走，那将是错误的。大多数担任国家职务的人是可尊敬的，而且许多人是有力量的；而许多在商业方面获得突出成就的人，如投身政界则会成为平庸的政治领袖。而且，除非是在一个柏拉图式的共和国里，否则政治也不可能指望把最优秀的人才囊括无遗。美国缺少的是一个既能胜任公职，又能保持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的公认的上等阶层；南部的战败把这样的阶层赶出了中央地位，领导人才不得不从那些能够在地方政治的剧烈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人们中间产生。像早期一样，从事法律业务是进入政界的捷径，但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往往是一些只受过粗浅职业训练的小城市律师。大多数政界人物声称，他们主要是对选民负责，但实际上，对选民负责往往意味着为那些最有势力和最敢于讲话的人效劳。在这个时期，院外集团和压力集团愈来愈重要，那些拥有现成的核心组织的人们，例如大企业利益集团和“共和国大军”[\[1\]](#)等，在争权夺利的竞赛中，早已捷足先登。

国会的办事程序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政治往最好处说，不过是原则的妥协，往最坏处说，则是互相争夺报酬而已。充斥参众两院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把他们自己那种镇静自若而有条不紊的习惯带入政界，像韦伯斯特和克莱那种类型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已经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事情是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中处理的，而且，尽管比以往任何时期搜集的情报都多，处理的事情也多，但公众从国会得不到任何印象，说明它在有目的地进行着领导。由于宪法未做明确规定，制定政策这样至关重要的职能，是在避开公众眼目的情况下和容易引人怀疑的气氛中执行的。对院外集团表示的关注，可以辩解为在政府事务中进行协商的必要一面，但这也可能更加使人相信财富比国家更重要。最发人深省的不是偶尔发生的丑闻，而是何以无法防止丑闻的重复发生，何以无私的政治显然不能和政党组织的要求协调一致。州议会更加容易受到压力，某些州还赢得了由大公司所操纵的政

府进行统治的恶名。众议院的威信下降了，部分原因是死板的辩论法规使人们宁愿要用委员会来进行统治。参议院的声誉有所提高，但就整个国会来说，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国会议员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

在本时期开始时，人们坚决要求立法机构享有最高权力，这势必会使总统和最高法院在政府中退居次要地位。共和党继承了辉格党议会政治的传统——林肯所以拥有广泛的权力，人们可以解释为是由于战争的紧急状态，虽然这种解释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1865年12月，国会多数派从约翰逊总统手中夺去了主动权一事，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什么创新。南部重建联合委员会作为一种国会内阁本可以开创新的途径，它虽无行政权，但承担着汇集、拟定和提出立法措施的任务。1867年的任职法是企图建立立法机构最高权力的一次更加直接的行动。它完全改变了国会1789年的一项决定。这项决定规定，虽然宪法要求联邦政府官员的任命要由参议院批准，包括内阁部长的任命，但免职的权力则归于总统。倘若上述法案的规定不是在1869年撤销了的话，它将会构成像18世纪英国宪法最不稳定的因素——大臣们向行政和立法负有双重责任——而又没有提出解决英国宪法难题的那种集体责任制。最后，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虽然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了任职法，但实际上是由于他坚持一项受到国会和选民谴责的政策；弹劾如果成功的话，势必会开创先例，使行政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依靠国会，并对国会负责。但是，挽救了约翰逊使他免于被参议院定罪的那一票，挫败了立法机构权力至上的运动。格兰特继任总统后，多数人宁愿让行政和立法两个部门的关系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界限不明确的局面。国会政策就其想要达到立法机构权力至上这一目的来说，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是作为对一些特殊形势做出的一系列反应而提出的，几乎没有考虑总的问题，并且对宪法理论也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阐述。

总统作为政府首脑并负责任命一切联邦官员，掌握着强有力的武器，可用以影响国会，并使他的党唯他的意志是从。有一个时期，这种权力由于一些拥有压倒势力的大“分肥者”的影响而受到限制，但事实证明，对于一个总统来说，要打破这些人对党的控制是出人意料的容易。否决权仍然是总统手中保留的巨大权力，以使用这一权力相威胁，可以在影响立法方面起到作用。国会议员们谁也不会在一个他们明知其不会通过的议案上浪费精力和时间。而且，这种权力只有在

两院都有2/3的人数反对某项否决案的罕见情况下，才会遭到挫败。因此，总统拥有只要充分利用即可十分有效的权力。克利夫兰上台时，对总统的职权持十分谨慎的看法。尽管如此，1892年，他运用一切可用的办法，使犹豫不决的国会通过决议废除白银收购法。麦金莱是一位老练的政治策略家，他虽未使用那样咄咄逼人的手段，但却能从国会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大部分东西。在1865年至1868年间，共和党曾将总统的权力削减到该党的传统和政治利益所要求的地步。但到了19世纪末，国会显然已经达到并越过其权力的顶峰，而总统则显然拥有仍有待于发展的巨大潜在权力。

1865年，共和党对最高法院做出的评价不佳，对于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宣告法律无效来干涉国会的政策感到不满。废除国会法案只有两个先例，而且第二个先例（德雷德·斯科特判决案），在1865年对于提高最高法院的威望并无好处。最高法院有利于米利根的判决案——即不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均无权下令在战场之外进行军事审判——严重破坏了国会在南部的政策，而在南部，军事法庭是黑人公民权利的主要保护者。《民族》周刊（第四卷，第30页）曾发表社论指出，在德雷德·斯科特和米利根两个案件中，最高法院背离了它一贯的做法，即政治问题由国会处理，并指出：“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做法会再重复。如果再重复的话，人民对待它就不仅是蔑视，而将是惩罚。”1868年3月，国会剥夺了最高法院受理军事法庭上诉案件的权力；1869年，最高法院的成员扩大为9人，从而使格兰特总统得以任命两名新的最高法院法官，并推翻了一项与当时的国会货币政策相抵触的裁决。最高法院默认1868年的法案，也许使它免于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例如宣布国会法案无效必须有2/3的多数通过，或由国会重新审议失效法案的规定等。不过，以后几年宪法的改变是朝着司法部门解释立法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离开这个方向。

即使在蔡斯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期间（1864—1873年），也有十项法案被裁决无效。接着，司法部门否决法案的情况就更为增多。1895年，最高法院拒绝了一项联邦所得税法，而该法乃是国内政策方面的一项主要立法。最高法院承担了裁定国会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和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的真正含义的责任。当它这样做以后，其结果远远背离了热烈支持这些措施的人们的意图。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案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而最高法院赋予它的意义是该案倡议人所未

曾料想到的；它所受到的限制，也是这些人满心打算予以否决的。在这一时期，最高法院对各州的社会和经济立法，加上了种种严格的限制。这些侵犯立法自由的措施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害怕人们滥用多数规则。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统治集团把宪法和解释宪法的最高法院视为对安全和稳定的保障。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开始时建立了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而他们的继承人现在所需要的是超越人力所及的法律，于是，就由最高法院而不是由国会来满足这种需要了。

如果根本法可以超脱于政治之外，那么，似乎同样也有充足的理由对政府采取这样的做法。中央文官制度方面的缺点和地方政治中政党机器的兴起，大都是19世纪初叶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19世纪末叶的改革家们便以矫正由于实行多数规则而造成的这些现象为己任。以通过考试而录用、根据功绩而晋升为目的的文官制度改革，成为中产阶级改革家们最向往的一个目标，并且得到实业界愈来愈多的支持。要实现这项改革就必须坚持反对人们对于一切像是贵族统治的事务所抱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以及有经验的政客们的种种需要。一批有学问的杰出人物很容易被人们描绘成最坏的一种贵族统治形式，而一个人若提出，比起其他保持政治权力的手段来，政党分肥制并非最为有害的，这也未必就是冷嘲热讽之言。尽管如此，到1883年，要求改革文官制度的压力已十分强大，于是，国会通过，并经阿瑟总统（他本人原是赞成政党分肥制的，现在主张改革了）签署了彭德尔顿文官服务条例，把大批职务进行“分类”，规定这些职位将通过考试来任命，只要能有效地行使职责，即可继续担任。麦金莱总统虽曾将一批职位从分类中取消，但到19世纪末，美国已在建立职业文官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比起激励着许多改革家的堪称楷模的英国文官制度来，它仍然相去甚远：部长级的高级职位仍属于政治任命；没有什么刺激能鼓动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争取担任较低的职务；政客们把持一部分公职的现象虽已减少，但任意授予官职制并未打破，而且，由于这种做法比较起来不大会造成引起公愤的政府丑闻，似乎反而变本加厉了。

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中产阶级的改革家们竭力主张建立有效、节约而诚实的市政府，反对由党魁、集团和政党机器进行统治。地方上的这种改革运动偶尔也取得了早期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一旦政治

气温下降，就很少能阻止党魁重新掌权。一些“善良的公民”为实现改革所做的尝试，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而在主张对文官制度和市政进行改革的人们与下一代的进步分子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是，由于他们拒绝经常参与混乱的地方政治斗争，而且，为他们的社会哲学所限，他们的活动是零星分散的，成效也是肤浅的。

许多被误认为是政治争论的事其实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减少各种实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和结束时——即南部的重建和平民党的反抗运动——存在着两大冲突，它们确定了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与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重建南部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黑人的前途和联邦的前途。获得胜利的北部是不是要坚持种族平等而彻底改变南部的社会呢？如不进行这样的变革，联邦能够维持下去吗？在北部，约翰逊总统和在国会占少数地位的民主党认为：战争的目的，即维持联邦的存在，在南部投降后业已达到，剩下的唯一问题只是恢复南部正常的统治和各州与联邦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看法忽视了战争的经验，忽视了作战双方的那种激动的情绪，忽视了由于解放奴隶而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及在北部出现的一种信念，即认为战争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联邦，而且要建立一个更为完美的联邦。在信教的人们中间，战争曾具有启示的意义：流血是恕罪所必需的，巨大的牺牲胜过循规蹈矩的辩论，在长期的邪恶统治以后，上帝的选民又再次前进。林肯用世俗的语言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为争取自由政府而进行的斗争；《民族》周刊（该刊后来成为北部知识界的主要喉舌）在它1865年7月5日发行的第一期中则声称：“我们说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特权与平等、法律与强权、舆论与武力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在李将军放下武器的那天结束，问题无疑地依然存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张。”这种不可思议的狂言，比起某些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北部实业家的经济目的来，要重要得多，虽然对这一代的共和党人来说，北部经济利益的扩张和北部启蒙思想的扩张是一回事。即使对那些没有热情，也没有经济野心的北部人来说，也还有一个令人困惑而无法逃避的义务：400万奴隶获得了自由，而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前途如何，取决于北部怎样安排。

1865年夏季，约翰逊着手实行他的恢复政策。战争一旦结束，就不难在南部各州罗致一个愿意发誓效忠于合众国的多数，约翰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这些人组成各州的新政府的。虽然南部同盟的首

要分子不属于他所宣布的大赦范围，但他又宽宏大量地发布一些赦免令来放宽这一规定。他要求批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但对黑人的公民权却没有要求给予保证。在这种虽属宽宏大量但却有失慎重的政策指导下，各州政府成立了，南部人中间又重新恢复了希望，认为他们终究又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与此同时，在北部，人们日益感到惊恐，由于在选举中南部各州提出的国会议员人选都是以前南部同盟的显要人物。此外又通过了“黑人法典”，其中虽有某些为获得自由的黑人规定的必要的社会条文，但同时却又硬说黑人永远处于低下地位，这就证实了这种惊恐是有根据的。当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三十九届国会于1865年12月召开时，政治气氛充满了忧虑和愤懑。南部人和他们的北部民主党盟友看到恢复的权力几乎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老的废奴主义者则看到黑人仍然由他们以前的主人任意摆布而深感震惊；温和的联邦主义者看到南部人（由于黑人在国会选举的比例分配上不再被算作3/5个人，因此，南部人的代表额增加了）将会恢复以前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忧虑不安，那些忠于共和党的人则担心共和党成为全国的少数派。所有这些忧虑虽然并非完全出于高尚的动机，但全都是合乎人情和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把共和党的政策理解为北部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这个政策是要从总统手中夺过重建南部的控制权，并且，制定一个能够体现人们认为必要的各种保障的纲领。

形势把共和党激进派推到显著的地位，他们具有那种坚定的少数派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一切革命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在参议院中领导激进派的是查尔斯·萨姆纳。他从1850年起，代表了新英格兰思想。他对人类有着炽烈的爱，但对人性的了解却十分不完全。在众议院，性格狭隘但刚强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建立了特殊的支配地位。史蒂文斯懂得一切政治权术并且毫不吝惜地运用这些权术，但是，他的同时代人怀特洛·里德却发现他之所以有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平庸的政治家们很少注意的那个方面——他对一种崇高思想怀有的高尚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

激进派的这种“崇高思想”就是种族平等，但是他们却必须同那些缺少这种信念的同僚们共事，而导致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第一阶段重建国会的活动是一次妥协。这个修正案企图通过取消所有曾宣誓效忠合众国（如公职人员或议员），后来又参与叛乱的人的公

职，从而把南部的旧统治阶级赶下台。它处理争论不休的选举权和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办法是：由各州掌握给予选举权的权力，但是，凡任何一部分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被剥夺，则这个州在国会的代表名额即应按比例减少。然而，上述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一款规定，通过国家对公民权的保护来实行宪法改革；它禁止各州制定任何法律来“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或“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或“对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不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国会被授予实施此项修正案的权力，由于这一修正案而引起的案件可由联邦法院受理。查尔斯·萨姆纳认为全国政府一向拥有这样的权力（虽然由于奴隶主集团的阻挠而未能行使，其他人则认为这种权力来自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因为该修正案在废除奴隶制的同时，还赋予国会以“通过适当的立法来实施这一条款的权力”。但是第十四条修正案使公民权得到国家的保护，从而消除了一切疑虑。过去认为各州是使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当然保护者，从那时起，情况变得完全相反，旧宪法所理解的联邦主义已不复存在了。

国会的多数党也许认为，只要南部议员接受这一修正案，就足以作为根据而将他们重新接纳入国会；但是在南部各州，除田纳西州以外，该修正案为压倒的多数所否决。于是，重建国会的第一阶段陷入停顿，但共和党人的目标依然未变，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已经准备就绪。在老的废奴主义者强烈要求而温和派加以反对的情况下，被搁置一边的黑人选举权问题一直等待的正是这样的机会。南部的白人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加上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获得压倒的胜利，使得激进派的领导更加坚定，于是，开始了重建国会的第二阶段。1867年，通过了重建南部法，从而使现有的南部各州政府告终，恢复了军事管制，并指示军事指挥官召开由全体成年男子（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被剥夺公职者除外）选举的制宪会议。一个州重新加入联邦的条件是：在该州的宪法中规定一切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州立法机构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且有足够数目的州表示同意，使该修正案得以通过成为法律。重建工作由于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该修正案规定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的关系”而被剥夺，因而实行的不是普遍选举权，而是当时人们称之为公正的选举权制度，允许各州自行规定任何选举条件，只要平等适用于一切种族。从法律的意义来说，重建南部的各项法律所形成的纲领获得了成功。各州的新宪法都按北部各州最好的范本来拟

订；黑人成为州议员、行政官员，甚至成为国会议员；到1868年6月，有7个州被批准重新加入联邦，而到1870年6月，以前的叛乱诸州均已重新成为联邦成员。脱离主义势力的复活已被制止，不分肤色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共和党和联邦建立在忠诚一致的黑人选票的基础之上，而且，由于获得新的全国性的权力，使整个结构结合成为一体。唯一剩下未予考虑的，只是南部白人的态度问题。

彻底的政治革命，在英国农业工人还没有选举权的时候就给南部带来了不分肤色的民主，这也掩盖了一些严重的弱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曾经希望，在杰弗逊的完全拥有土地的主张这个牢固的基础上，建立黑人的民主。但是国会对于他提出的没收叛乱分子的地产，将它分配给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建议，置若罔闻。大多数黑人农民最后成为谷物分成的佃农。他们虽占用土地，但必须将收获的一半缴给土地所有者作为地租，往往又将其余的一半抵押给商人以维持生计。这样，上层阶级虽然由于被剥夺担任公职的资格，并需向没有地产的人的代表交纳地产税，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但它的经济优势却得到了保证。一方面，黑人大众依然是低等的农民，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黑人中产阶级，这就加剧了比较贫穷的白人的不满。同时，种族混合的威胁，又刺激了根深蒂固的情绪。重建时期的历史还同你死我活的经济斗争交织在一起。这种经济斗争却把投机商业引上了政治舞台，而没有吸引那些稳定的利益集团对新政府给予支持。没落了的种植园主家族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其中少数人把他们的命运同重建时期的政权联系在一起，而多数人则把赌注押在恢复白人的至高权势上；但是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它都会使他们同那些到南部来寻求未开发的资源，便宜透顶的劳动力和想从州的立法机构得到优惠的北部投机家们展开竞争。如果对各个重建时的政府做公正的研究，也许会发现他们持有的善良愿望和对公众负责的比较正确的见解，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要多——流传至今的许多说法都是南部白人愿意相信的——但也曾发生过轻微的偷窃行为、少数重大的丑闻和许多缺乏经验的情况。对黑人选举权所做的辩护，都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方式，说这是穷人赖以维护其权利的保护性措施，而就这个论点来说，黑人选民的无知问题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当要求黑人民主制度发挥积极的政府职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明显而重要了。当时的环境迫使这些未经过考验的政府必须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工作，而不能按南部过去的老一套办事。它们必须收税、借款和支出；必须赞同

恢复经济和吸收资金；必须提供救济和建立公立教育体系。虽然它们的大部分工作，就像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些制度一样，在它们垮台后依然继续存在。而且“新的”南部的建设，主要归功于那些“毡囊客”^[2]的活动的刺激，尽管南部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逆着传统潮流而行动的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些责任是太大了。南部的重建注定要成为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的典型例子。

战争和重建削弱了南部社会的凝聚力，暂时只有靠联邦军队或像臭名昭著的“三K党”之类非法的白人保护团体行使的武力来维持秩序，制止无政府状态。必须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对新社会的组成方式，出现了思想互相对立的两派主张：一派以种族平等和《独立宣言》所提出的诺言为基础，另一派则以白人至上和旧南部的理想图景为基础。但是，虽然有一半南部人的思想是坚决主张倒退的，而另一半人则欢迎一次经济革命，以便使南部重新得到战场上失去的东西。随着铁路系统的恢复和发展，棉花种植的恢复，棉纺厂数目的增长，以及钢铁和煤炭生产的发展，南部开始了一场工业革命。它同时吸引了原来的拥有土地的家族和白人劳工的热情支持，这种情况是罕有其匹的。随着这场经济革命的来临，某些旧日的领袖人物除了家族声望之外，又增加了抬高身价和充当领导的力量。早在1870年，反革命活动就在南部大多数州中进行着，一旦“拯救者”既得到群众的支持，又拥有经济力量，黑人选举权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暴力的威胁，经济的压制和社会的压力，迫使黑人不敢去投票或者被迫去投民主党的票。旧日的辉格党种植园主和边远地区的农场主捐弃前嫌，联合起来促使民主党大获全胜。到1876年，共和党政府只在三个州中仍然存在，而且全都是依靠联邦军队来支持。次年，联邦军队撤离后，共和党在南部的统治就结束了。

南部的“拯救”虽是自发的和南部人自己进行的，但其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北部人热情的衰退。虽然“三K党”的暴行一直激起人们的愤怒，并促使实施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各項法律获得通过，但激进主义的信心已经减弱，并陷入了分裂。1872年，萨姆纳和其他老的废奴主义者加入了主张与南部妥协（虽然不是以牺牲黑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共和党自由派运动，激进主义由于没有了他们，也就变成了仅仅是共和党的政治战略。由于成功的前景已属渺茫，人们也就愈来愈不愿支持失败者。虽然 1875年国会确实通过了民权法

（萨姆纳直到前一年逝世时为止，一直为此而奋斗），但辩论表明，国会并不愿意用能使公民平等实现的唯一途径，来约束个人行为。1883年最高法院宣告民权法无效，从而证实了上述怀疑是有根据的；1896年，最高法院又裁决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所说“同等的法律保护”与种族隔离并不相悖，只要各种设施“虽然分开但是平等的”。1890年，参议院拒绝通过一项实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法案。激进派所进行的不分肤色的民主的实验宣告失败，占多数的南部白人赢得了“自治”。在清算激进主义的背后，一个保守派联盟形成了，这个联盟对于未来有着重大的作用。北部的实业界把重建看成不过是一场输了的赌博，于是，转而又和南部的实业界携手；热衷于保持反革命局面的南部领袖人物，则与北方佬的保守派并进。在政治上，北部的保守派将停止在种族问题上进行宣传鼓动，而南部的保守派也将制止农业对商业领导地位的攻击；在实业方面，给予南部领袖人物以地方自治，但最后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北部的企业主和大金融家手中。这个并未见诸文字的保守派联盟，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一直控制着国会，特别是参议院；它似乎是实利主义的，斤斤计较，而且往往不近人情，但应当记住：凡在激进主义失败的地方，它都取得了成功，对恢复国家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本世纪其余的年代，南部当地的政治对全国的局面并无多大影响，因为无论如何，南部各州仍然是由民主党代表的，而南部的激进派在他们的地区以外除了举止粗鲁外，与上层阶级或搞“拯救”的极端保守的领袖人物并无二致。对重建时期的回忆，使人们把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斗争理想化了，所以，当本世纪末农业激进运动日益强大的时候，它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政治上的不满和种族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在民主党内的农村煽动家们领导下，边远地区的农场主取得了胜利，正是这种胜利导致了严格而合法地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并实际取消黑人的选举权。在“拯救”以后，黑人仍有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投票。在“黑人地带”，极端保守分子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黑人的选票，并且还有少数几个黑人担任了州议员。由于强制实行了选举资格的规定才使上述局面告终。这种规定虽不违反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但其实施却是有意破坏该修正案的宗旨。州政府当局任意规定文化程度、财产和纳税等有关选举资格条件，以此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却使贫穷的白人能够投票。如南卡罗来纳的本·蒂尔曼1895年在该州制宪会议上所指出的，选民登记官“对他的良心和他的上帝负责；除此

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负责任……这正表现了偏袒，或许有歧视”。

南部白人在崩溃和失败30年以后，恢复了他们的自尊，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北部人也停止了他们重新安排社会的努力。为了取得这一成就不得不付出代价。新秩序是依靠回避宪法修正案才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修正案正代表了从美国政治传统推出的合理结论。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气氛。美化过去，使南部人不能正视未来的实际问题。由于对重建行动做出的反应，各个州政府做起事来束手束脚。各重建政府创办的公立教育体系虽取得某些进展，但也还是在私人慈善事业的鼓励下取得的，而且，比起北部和西部各州已经完善的教育体系来，其成果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南部还没有一个州制定了义务入学的法律，不论在白人或黑人中，文盲仍很普遍。像以前各个时期一样，南部吸引不了移民。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许多南部人依旧在疾病、贫困和无知之中过着18世纪的生活，还不知工厂、学校或近代医药为何物，而各州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付出代价最大的必然是黑人。他们的贫穷和卑贱地位似乎证明种族不平等乃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在1900年时，严肃认真地说黑人在奴隶制下面生活得更好，而且，苛刻的歧视性法律也往往由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友好相处而得到缓和。人数不多的黑人中产阶级在慢慢地出现，最伟大的黑人领袖布克·托·华盛顿正是由此而看到了本种族最美好的希望。他发表意见，反对政治煽动，主张受教育、办企业和积聚财富。对平等的热烈要求从来只不过激励了很少数黑人；而更符合他们的性格和实际可行的，倒是表明黑人只是另一种优秀的美国人。像其他有理由心怀不满的人群一样，黑人也求助于美国的传统而不是背离这一传统；再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美国理想的吸引力了。

和南部不同，另一个广阔的农村地区，即大平原，接受了北部社会在知识方面的傲慢态度，但设法拒绝经济上的控制。南北战争后，大量移民涌向西部，他们是为追求独立而来的；然而，没有一个地区比这里更依赖于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所提供的资源了。广阔的平原是贫瘠不毛之地，只有很少仍处于原始状态的交通线，并且远离它们的市场。不仅是繁荣，即使是想生存下去，也要依靠铁路、大规模的销售组织、银行业机构和制造厂。不管1862年的《宅地法》（该法

规定真心诚意的定居者可以无偿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什么样的梦想，农场主们发现自己逃不出资本主义经济的罗网，并受到他们既不了解，也无法控制的各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小面积的耕作不保险的话，那么，经营大规模的小麦种植或养牛业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收益。这就有力地推动人们设法逃避宅地法中关于拥有土地最多不得超过160英亩，在占有和耕种5年后才完全享有所有权的规定。铁路授地原已不受宅地法的约束，再加上逃避宅地法规定而得到的土地，这就使得这一地区以外的资本家利益集团往往拥有并控制了大面积的土地。与此同时，西部的农场主如果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话，其数目是足以抗衡外来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势力的，于是，一个名为农民协进会的全国性的农民教育和合作团体便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农民煽动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大铁路公司，因为它们可以随意获得土地，并迫使它们拥有垄断权的那些地区，以高运费来补贴长距离的竞争性运输，况且它们往往热衷于迅速获得利润，而不愿致力于它们为之服务的那些地区的长期发展工作。

管制铁路成为农业激进主义的一大主题，另一大主题是货币改革。高利率、拒绝贷款、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独立业主变成了某些外地公司的承租人，这些都是由于华尔街和硬通货的幽灵作祟而造成的。此外对金本位制的攻击，反映了农业的西部和工业的东部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因为真正的争论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得到资金的问题。西部的农场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金融系统不适当地限制了资金向他们的农业地区流动——阻碍扩大资金并夸大投资的危险——而另一方也同样有力地争辩说：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如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将会妨碍这种投资。所以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利害冲突，把感情和激动的心情掺杂到争论中去：一方面农业激进派把“稳定的”货币看成是他们正在设法要控制的难以捉摸的外部力量的象征，而另一方面的人则把坚持金本位视为代表一切文明、合理和进步的东西。在胆小的东部人心目中，货币改革是与暴力、无政府主义和倒退联系在一起的。

要求发行低值货币在美国历史上虽有很深的渊源，但其近因则起源于南北战争及战后，而且是在东部，不在西部。南北战争的财源，部分地依靠发行一种不能兑现的绿背纸币来维持，这种纸币尽管已经贬值，却受到那些在战争中得到好处的人们——制造商、经商的农场

主和投机商人——的欢迎；纽约的银行家、进口商和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则不欢迎它。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主张，继续保持由政府管理的纸币，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制度是以保护关税来防止廉价劳动力竞争的。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绿背纸币也得到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威廉·凯利和本·巴特勒这样一些激进分子的大力支持。人们把这个问题同公债问题混淆了起来，而且，由于民主党在1868年采用了以纸币支付国债的“俄亥俄方案”，在共和党看来，低值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信用。尽管如此，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拒绝批准立即缩减绿背纸币（这项措施本可以使绿背纸币恢复到其票面价值，并为恢复硬币支付铺平道路的）；相反，他们采取了折中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绿背纸币在企业的经营额增加到使这种货币恢复其票面价值后，将可兑现。1873年萧条开始，这项政策的实现推迟了，并产生了发行新纸币以作为缓和措施的要求；但是，格兰特否决了体现这项措施的一个议案，结果，共和党就更加有责任恢复硬币支付，最后，于1879年得到实现。

在此期间，货币改革的重心转移到西部，1877年成立但存在不久的绿背纸币劳工党得到最多支持的，正是在西部各州。这一运动正好是在1879年至1884年间农业稍现繁荣的时期兴起的。但1884年出现的物价下跌，直至1896年才被制止；1887年，又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旱灾，使西部的许多农场破产。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的不满情绪而形成的规模最大的运动开始兴起。1892年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成立了平民党，从而使这个运动达到高潮。在平民党1892年7月4日政纲前言中，平民主义将西部具有不满情绪的各派人都纠合在一起，向在美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力量提出了挑战，宣称“我们在一个道德、政治和物质均濒于崩溃边缘的国家中聚集一起……千百万人以血汗换来的果实被肆无忌惮地盗窃，用来为少数人积聚巨大的财富……我们从政府的不公正这个多产的子宫中孕育了两大阶级——流浪乞丐和百万富翁”。平民主义并没有停留在辞藻上，而是提出了铁路公有、分级课取所得税、直接选举参议员、通过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公民投票而实行民主管理、为了劳工的利益而限制移民等主张。但它最大的注意力则集中在货币问题和要求不受限制地铸造银币这两个方面。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实行的是金银复本位制，但是，由于根据官方的金银比价，银价过高，因此白银没有投入流通，而且又在1873年停止了银币的铸造。在以后的数年中，西部新银矿的生产使银价下降，按照

原定16：1的金银比价，将白银售给造币厂将会有利可图。用一种同样是美国宝贵财富的贵金属作货币，似乎可以避免不能兑现的纸币的种种缺陷，而且，也提出了一种容易用群众易懂的行话加以说明的通货膨胀理论。国会对鼓吹铸造银币的主张做出了反应，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白银购买法，供给白银作为货币，但不采用银本位制。这一措施遭到正统的主张稳定的货币的人们的严厉抨击，他们抗议说，只要世界的货币市场伦敦墨守金本位制，任何实行复本位制的做法都将招致灾难。

当平民党的宣传鼓动达到高峰之际，入主白宫的是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民主党人很久以来就分成主张实行稳定的货币和主张实行低值货币的两派。不过，由于纽约在该党中的影响，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主张实行稳定的货币的人，克利夫兰也不例外。1893年一场激烈的经济危机骤然使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白银购买法的实施，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按照该法的规定，人们可以将白银售给铸币厂，得到法币券，再将法币券换成黄金，然后，就可以将黄金以相当高的利润出口。克利夫兰强迫国会废除该法，同时与约·皮·摩根协商设法充实国家的黄金储备；这种回复到硬通货和同上层金融界结成联盟的做法，使民主党陷于分裂，并且导致了政策上的彻底变革。在189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以“自由铸造银币”为纲领，提名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从而突然跳到了农业激进主义方面。布赖恩的雄辩获得了胜利，聚集在一起的党的代表们以一举迸发出来的激情，响应他提出的告诫：“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平民党有些勉强地支持了布赖恩，其实，他除了自由铸造银币之外，并没有答应该党的任何要求。这样就给1861年以来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次选举布置好了舞台。农业界摆好了阵势要与工业界交锋，农业煽动家反对银行家，不甚发达的属地反对高度发达的“祖国”。共和党人为了保卫由东部的一个民主党人提出的政策而紧密团结起来，而民主党人则收获了西部共和党人的土地分配政策所造成的不满情绪的果实。

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说得很少，并赢得了实业界空前热烈的支持。布赖恩说得很多，在农业地区激起热情的响应，但失去了东部地区民主党保守派的支持，在熟练的产业工人中间影响也很小。共和党的胜利并不能仅仅由实业界的宣传鼓动加上某些经济上的高压手

段来说明。布赖恩在每一个单纯经营农业的州中，均以绝大多数选票获胜，但在所有以工业为主的州中，他却失去了1892年克利夫兰获得的选票。反对布赖恩，使知识界和实业界携起手来，据称大学的全体教师都坚决支持麦金莱；大多数后来成为进步党运动著名人物的人，也投了共和党的票，或许大多数工会会员也是如此。共和党的胜利决定了美国历史未来的进程，因为农业激进主义从此以后再也无法赢得某一大党的支持或设法控制这个国家了。如果说平民主义预示了后来的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的话，那也不过是具有地方色彩，反对理性，反对犹太人，反对外国移民，以及充满了不近人情的狭隘情绪这样一些特征。它试图解决许多使美国感到困惑的问题，但是，它没有提出任何适用于一个以工业为主、城市人口逐年增加的国家的有条理的哲理。

1865年1月16日，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废奴主义者、劳工之友、绿背纸币党人和狂热的关税保护主义者、精力充沛的激进分子威廉·G. 凯利在众议院向国会谈到新时代已现曙光。他宣称：“历史并不是在重演。我们正在揭开国家生活的新的一页。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新的一页上，凯利看到：大众化的报纸、电报、铁路、工业发明、宅地法、对贫困移民的欢迎、美国传教士协会、解放奴隶、免费公立学校，以及通过廉价的书籍传播知识。这和上面列举的任何一项进步一样，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足以使北部和中西部社会的成员相信，他们正走在进步潮流的前列。有人怀疑，由于美国陷入内战，因此，它的实验已告失败。但这种怀疑几乎没有影响这充满希望的一代人的思想。如果说有些人认识到美国文化的各种缺陷的话，那也只有很少的人产生了对欧洲的怀念之情。美国文化也并非没有开发自己的源泉：尽管新闻界名声不好，但每个地区都有一些消息灵通和认真负责的报纸；像《哈泼斯》《世纪》《论坛》和《大西洋季刊》等期刊，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都是佼佼者；美国的大学已开始建立培养研究生的制度，这将是20世纪学术研究的中心。

在这个新社会中，占据舞台中心的是正在兴起的实业家阶级。虽然他们在参与政治方面显得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但他们的真正力量却在小城镇。在这些地方，他们是繁荣的创造者，地方上的施主和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不择手段的行为与虔诚的慈善活动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但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后一代的人喜欢发现这种矛盾）；一

个人在商业交易中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会受到蔑视，但人们却又希望他拿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进行义务的和慈善的事业。不管这些社会活动是出于自发的利他主义，还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它们造成了惊人的结果。经济势力的严密结构是靠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义务来维系的，即使是互助团体（实业家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开始在这类团体中享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表面上也标榜人道和慈善的宗旨。如果说人们希望普通的实业家都能这样行事的话，那么对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就更是希望他们能够慷慨解囊了。医院、大学、博物馆、公园，最后还有现代的各种慈善基金会，都是19世纪财富的副产品和实业家们创办的事业。安德鲁·卡内基于1889年出版的《财富的福音》一书，为美国人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捐赠习惯，提出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卡内基虽然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这对社会也是有益的；然而，卡内基对于为了使这些富人发财致富所付出的代价，感到不安。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富人应将自己看成是受社会的委托管理财富的人，他们有责任将这些财富重新分配到诸如医疗、教育和文化等渠道中，以便这些财富能为人类的不断进步与提高做出贡献。对有权势的人们所做的虔诚告诫，在20世纪的思想中是不受人重视的，但是，不了解这种做法对富豪们的行为曾起过什么作用，就无法了解19世纪晚期的美国。在欧洲的批评家以及后来的一些作家们的眼中，美国的实业家们看来是狭隘的、粗野的，除了金钱的价值以外，对于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根本不懂；而在他的同乡们看来，他很可能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巨子，是他发迹的那个社会的骄傲。

然而，这些构成商业文明的人们，在从事各自的事业的时候，也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新教所信奉的上帝、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兴的进化论，共同构成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存在着一个自然法则，在这个法则范围内，人类的能动力量得以发挥并协调一致，而竞争则可使人类获得进步与提高。这个道德、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合成体，被总称为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国家不干涉经济这样一种理论，在一代人的思想中仅仅是一个方面，但这一代人正埋首于人类改善自己境况的努力之中，并且由于这种改善而不断增强信心。增强信心有时是必要的，因为有许多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困难必须加以克服。如果说自然的平衡保证了人们在为自己服务时就不自觉地在为人类服务，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贪婪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应当加以宽恕呢？如果说自然法则乃

是决定人的命运的自动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那么，人们是不是应该放弃他们教育人应集体控制自己的环境的那一部分理论呢？有权自由采取行动的政治家们应该自愿放弃使用这种权力吗？个人主义可以和适者生存并行不悖吗？这些问题最终将驱使有理智的人或者接受由国家或大公司实行的集体主义，或者像人们反抗一种理论的专横武断那样，提出愤怒的告诫和悲观的预言，这种理论看起来就像生物界的生存斗争那样需要高昂的代价而又冷漠无情，但它所做的比拟却以这种生存斗争作为根据。

学术界的正统观念往往赋予经济科学的各种假设以自然属性，就连金本位制这种纯属人为地设计出来的办法，也成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在赫伯特·斯宾塞的说法已经受到事实的挑战时，还在为他的教条式的乐观主义拍手叫好。在1873年开始的大萧条以后，要让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不加控制的经济活动有什么好处，已经是困难的了；而在1877年的罢工和随之而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后，要让人相信社会是天然地和谐一致的也就困难了。在农村的贫民区和大城市中，赤贫者的数目日益增多，他们的境遇看来每况愈下。小实业家抱怨来自垄断巨头的不公平的竞争。约翰·戴·洛克菲勒晚年回顾他在1882年创办美孚石油托拉斯时说：“联合企业的时代已扎下了根，个人主义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那些白手起家的巨贾大亨还可以同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相一致的话，那么要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是从一个与人们相去遥远的上层社会来行使庞大的金融权力的。但是，经济变革形成的压力，并没有像在其他工业社会那样产生明显的后果。美国社会的“安全阀”（某些人认为是现存的无人居住的西部土地）是：技术革命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大量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对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来说，从事某些事业往往比进行政治煽动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如此，上述那些问题还是助长了隐藏在这个社会的表面下的种种忧虑不安的情绪。

对于美国的新秩序提出批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亨利·乔治。他在1879年出版了《进步和贫穷》一书。乔治要求人们注意“我们时代一个不可思议的重大问题”，即尽管生产率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贫穷却继续存在。这正是经济理论应予解决而却回避解决的一个问题。乔治一直坚信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是有好处的，只要能将其缺点加以排除和

纠正；他自己所做的分析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罪恶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有，因为他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无须没收土地，而是对土地价值课税以代替其他一切形式的税收，将劳动和技能所赢得的价值的增长转给国库，并使政府成为“仅仅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管理公共财产的机构”。他的主张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并在近代社会思想中形成一股往往不被人承认，但却很强大的潜流。但是，他满怀激情地对本可避免的贫穷现象进行抨击的那股力量，在就单一税问题进行技术性辩论时却没有了。比较深刻但却影响不大的一部著作是《动态社会学》，于1883年问世，作者是一位文官和科学家莱斯特·华德。华德将人类的进化和自然界的进化区别开来，认为人类的理智应控制社会，不应屈从于社会上的各种不合理的力量。他把人类进行指导和控制的力量置于自然规律的范围以内，从而给进化论遇到的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

自由放任模式受到了来自各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人们的政治压力的一次更严重的打击。在主张自由贸易的人的笔下，保护关税政策的历史被说成是由各既得利益集团强加的一项不得人心的和毫无根据的政策。事实上，保护关税在某些地区作为群众拥护并能赢得选票的政策，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随着工业的兴起，日益深入人心；有组织的劳工一般是支持它的，甚至连农场主也要求受到平等的保护而不是不要保护。很明显，高关税对某些利益集团没有好处，但是对于这些集团的代表所作的道貌岸然的说教也必须持怀疑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想要垄断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地区的利益的话，那么，只要他们准备付出代价，没什么特殊的理由说明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保护关税主义者的成就，可以从一些特定的物资税额的平均水平看出来：1869年为47%，1890年上升到49.5%，克利夫兰执政时稍有放宽，到1897年又上升到57%。

如果说在这一头不干涉政策失败了，那么，在另一头又出现了必须对资本主义加以控制的主张。不信任垄断是美国的一个老传统，老一辈的美国人认为州的经济活动除宪法所明确规定者外，是无限制的。有一派思想认为宪法应规定自由企业神圣不可侵犯，但这一学派尚不成熟。在最初，西部的农民协进会曾采取步骤控制公司的活动，并得到他们这一派人以外的某些人的同情。农民协进会的原则在1876年“芒恩控告伊利诺伊州案”中受到了考验。当时最高法院的多数法

官同意首席法官怀特的意见，即“财产如果能通过对公众具有重大意义并影响整个社会的方式而被使用时，即带有公共利益的性质”。这项理论允许州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但另外一种反对的意见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此在19世纪剩余的年代中，最高法院一心想要把它所打开的门关上。1873年，最高法院驳斥了这种意见，即认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特权和豁免权，包括不受立法干涉而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但是到了1890年，它又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控制很可能就是不经适当的法律手续对财产进行剥夺，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禁止各州这样做的。1886年，最高法院裁决：公司作为“个人”，有权享受宪法修正案的保护。对州的控制权的另一打击来自对商业条款的一项解释，即只有国会才拥有对州际商业活动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因此，如果州要对那些在几个州里进行经营活动的大公司进行控制，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是困难的。

对控制的目的所做的界说，从一开始就很混乱，莫衷一是。其目的也可能是保护消费者不受垄断的危害，也可能是保护小企业主不受“不公平的”竞争的危害。对第一个目的来说，实行直截了当的监督和控制的办法也就够了；但要实现第二个目的，就要求实施一个公平竞争的法规；或者由政府当局充当价格机构的公断人而不是照搬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或者废除垄断而强制实行自由竞争。19世纪末的政策采取了两条路同时走的方针，但未收效，而且行政管理机构的力量也不足，然而所创的先例对于今后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遵循的是控制的第一个原则，它使联邦政府插足于最高法院已经不许各州过问的领域。联邦政府设立了一个负责监督州际铁路的联邦委员会，但却没有明确授予它以确定运费的权力，而且不久就根据对法律的解释而拒绝授予它这一权力。法官们怀疑这将会集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于一体，从而形成对宪法的改革。因此，到19世纪末，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只限于收集和公布铁路的统计资料。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把实行竞争载入法律。洛克菲勒石油托拉斯的巨大名声对于通过这项法案起了刺激作用，因为该托拉斯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炼油业。上述法令断然宣称“任何契约、任何以托拉斯或类似形式构成的联合企业或任何密谋，只要它限制几个州之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均属非法”。该法所根据的原则与州际商务法迥然不同；它对成文法做了修改，将它

的实施权交给了法院，而起诉的责任则主要归于联邦政府的司法官员。限制贸易的契约是无效的，这在以往的习惯法原则中不乏可靠的先例，但困难在于它使用的词句过分精确而又过分含糊。在文字上宣布所有限制贸易的联合企业为非法，就可能把那些谁也无法反对的正常的商业协定包括进去，而检察官则不得不证明限制的存在以便反驳那种似乎有理的辩护，即实现联合以后，企业将会扩充，效率也会提高。所以，真正的困难在于对法令的解释，因此也就无须责怪法院给予被告优待，为他做出最有利的解释。就克利夫兰和麦金莱两届政府而言，它们也不愿提出起诉，而在这一时期内，大企业找到了更有效的组织方法。企业联合的传统障碍在于州政府所发的特许状中一般都规定一个公司不能持有另一个公司的股份；“托拉斯”则是由名义上各自独立的一些公司的股东把他们的利益交给一些“受托管理人”，从最好的方面来说，它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办法。当新泽西州废除了它的特许状中的旧条款后，大企业主才得以组成控股公司，然后由这些控股公司取得营业分公司的股份。在反托拉斯法通过后的头10年中，企业的联合与其说是受到了抑制，不如说是被加快了；而且，这个法案带来的一个适得其反的后果是：一些执行贸易合同的小公司很可能遭到成功的指控，而工业巨头反倒可以逃脱。尽管上述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两大措施的实行经过令人失望，但还是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两个方案均载入了法令全书，从而得以执行或加以补充；国会已做出了决定。法院也已经承认经营企业应当有规定；朝着由政府当局确立这些规定的方向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农业激进派和小企业共同做出的试图恢复小企业主天下的一种尝试，但有一个时期，整个雇主阶级几乎全都被迫起而抵抗。一个相信阶级斗争即将来临的观察家，可能于1886年就已预言这种斗争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决一雌雄。这年，一个自称拥有70万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会员的名为“劳动骑士团”的很大的劳工组织，在同雇主斗争中刚刚赢得一些引人注目的胜利，并有迹象表明行将步入政治领域。与此同时，新近来自德国的移民中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影响似乎也在增长。但是，“劳动骑士团”的力量掩盖了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组织劳工的实际困难：在这个国家里，教育和就业机会使之难以产生可能的领袖人物，小产业主在政治上占优势，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距由于种族和宗教的不同而扩大，而且，宣传鼓动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而必须动员一

切法律力量来对付它。在这样的形势下，外国鼓动分子的影响对正当的工会运动起了特别不幸的作用，而当1886年在芝加哥发生的炸弹暴行败坏了整个劳工运动的名声以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野心过大的组织“劳动骑士团”力量太小，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它的势力昙花一现，迅速地就从顶点上衰落下来，影响日益减少。

“劳动骑士团”衰落后，美国劳工联合会（创立于1885年）在它的任职多年的第一任主席塞缪尔·冈帕斯的领导下兴盛起来。冈帕斯为人干练，准备终生献身于劳工事业，但只有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办事才行。吸收会员的对象应是熟练工人而不是非熟练工人，争取改善这部分人数有限的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将是长期不懈的努力，但应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当前的利益而不是推翻这种制度；在政治方面，工会应恩怨分明，但不应将自己许诺于任何政党和政治纲领，并应避免与知识界的激进派实行联合。熟练工人应得到中产阶级的地位并接受中产阶级社会的习俗；有成就的劳工领袖应使自己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他能够使工人保持纪律以换得雇主的让步。19世纪末的劳工运动史远远不是平静的：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曾经发生过惊人的事件。当时为了对付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先是动用了平克顿侦查局的大批私人侦探，后来又动用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民团。1894年又曾动用联邦军队对付芝加哥地区的铁路罢工工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同情雇主的法官开始广泛地利用禁令，命令罢工工人停止采取威胁财产的行动，并不经陪审团的审讯，就以蔑视法庭罪惩罚那些违反禁令的人。这些事件把少数劳工领袖推向社会主义一边，但他们也显示了冈帕斯的谨慎政策的明智之处，这是一种为避免在劳工与法律和秩序这样有组织的力量之间造成冲突而精心制定的政策。更加保守的是吸引了劳工大军中的技术精华的铁路兄弟会。到190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自称200万工会会员中有3/4是它的成员。它虽然与新成立的美国制造商协会不断地进行宣传战，但已变得甚至更加固执地反对社会主义。

尽管初步形成的工业文明中心，草率成立，极不完善，但看起来生气勃勃，很有希望。不过大城市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在大城市，除了旧世界所有的罪恶之外，似乎又增加了某些美国特有的东西。1890年，一位丹麦裔美国新闻工作者雅各布·里斯出版了一本书，揭露了纽约人口拥挤不堪的经济公寓区的情况，书名为《另一半美国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本书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它不同意宗教的和进化

的思想所做的轻率的说法，即恶劣的社会状况是堕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在19世纪的改革家们看来，城市社会更加明显的罪恶是由政界头子和政治集团实行的统治。这虽然明显地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治弊端之一，但似乎是牢不可破地建立在由赤贫者举行的群众性投票的基础之上。在一些几乎毫无社会公用事业的城市中，以及在一个对那些麇集在城镇里的人一向持不信任态度的国家，贫民区的居民从政界头子及其亲信那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施舍、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同那个使人眼花缭乱的权势世界进行的接触。虽然一些善良的公民不承认政界头子在防止革命思想在这块充满不满情绪的土地上蔓延方面，为他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毋庸置疑，需要政界头子的存在这一点，说明了美国文明的一个重大失败。贫民区和城市治理方面的各种弊端使大多数明智的美国人看不清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美国新文明的旗手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城市既是社会罪恶的渊藪，同时也是文明和高等教育的中心，而且，特别是在中西部，为潦倒的或过剩的农村人口提供出路和机会的正是城市。对一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这一时期黑人开始大量从南部移居北部城市。

城市问题又同在国外出生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种人继续大量移来，他们同那些以英语为本国语言的人们大不相同，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进入大城市。但是，他们的同化，长期以来是爱国的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事情。一般来说，美国社会对他们也一直表示欢迎的态度。凡是美国教育系统能够接触到移民的地方，它就起了明显的灌输教育作用。而移民为了其子女成功的需要而接受美国化，就更加便利了这种教育。在大多数接受了移民的地区，免费初等教育的传统建立起来（如果说不是一贯坚持实行的话），其中大多数地区制定了强制入学的法律。浓厚的地方自豪感和大量的公益活动，在办好小学教育中起了作用。在此期间，免费中等教育在许多地区也正在开始建立。虽然教育的进步是一种自发取得的成就，而且遵循的也是早期的各种思潮所确定的方向，但是它的目的和方法都受到要培养具有美国公民精神的新美国人这一需要的影响。研究一下学校的课程，就会有效地表明美国人打算为自己和世界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没有作为古代君主制度象征的那种虚饰浮华；在短短的历史中致力于达到中产阶级的理想，而不是追求军事上的荣耀或装腔作势的骑士风度；而且对刚刚过去的内战记忆犹新，因此，19世纪末期的美国人究竟应该如何歌颂

或解释自己的民族存在，也许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尽管这样，到1900年时，没有人比美国人更能意识到民族的同一性，或者更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同一性的价值；美国的爱国主义超越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根源，在一个似乎并非众望所归的政府的领导下发扬光大起来。

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往往被说成是美国民族性格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似乎一下子就消除了地区之间的不和，并使美国人从一个内向的民族转变成为一个外向的民族。不过，民族感情本是潜在的，战争使之焕发出来，并不是创造了它。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领袖人物们想打它，而是遭到许多保持着北部人良知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但是它却唤起了那些过去与美国的进步毫不相干的人们的热情：南部人、西部人和那些被爱国的报刊激发起热情的普通的报纸读者。在长时期的地区倾轧中似乎已经丧失了民族主义，其实保住了它那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它的潜在力量一旦焕发出来，以前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特有的那种自信，就遍及全国了。

使美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获得新生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物质成就。尽管发生了周期性的危机，但是很明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境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美国在各工业国的竞争中遥遥领先。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物质进步不仅仅是财富和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概念，它把19世纪末文明的丑恶面转变成人类战胜自然和战胜贵族制度、君主制度这些古老桎梏的象征。没有再比征服北美大陆这件事更能有力地唤起人们的想象力了。一望无际的麦田覆盖着早先被地理学家们标明为北美大陆荒瘠心脏地带的土地上；五条铁路干线横贯西部地区；在太平洋沿岸，一个日益繁荣兴旺的美国新社会已经出现。以兴办铁路为名进行招摇撞骗的行为，宅地法的失败，移民和牧业大王之间的武装战斗，消灭和残酷迫害印第安人的战争，以及西部社会的无法无天和唯利是图的现象，统统变成了一首言过其实的歌颂成就的史诗。奋力向西部扩张并粉碎旧社会的桎梏，难道不能产生许多美好的事物吗？中西部的文明似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这个地区没有什么需要向旧世界的传统表示感恩的，它完全是美国人一手缔造出来的。在这里，贫富的悬殊能够顺应社会的流动性；和睦相处似乎与占有的本能并行不悖；不同种族的人融为一体，产生了一代新人；民主政治可以自由地和大力地推行。即使东部的学究们也为西部的这种成就感到兴奋，当年轻中西部历史学者弗·杰·特纳

于1893年发表他的《边疆论》后，立即得到了响应。在特纳看来，美国的文明是独特的，并不是仅仅模仿欧洲；它的特色来源于无可比拟的历史经历，正是不断移动的边界铸成了美国人的性格。特纳的理论也许会受到悲观主义的曲解。因为它产生的契机正是1890年人口普查时对边境的“关闭”，因此具有这样的含义：美国历史上这个扩张和创造性的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理论的影响在于他对民族的性格做出了解释。而且一个人若还记得美国政治气候造成的各种变化的话，那么他不一定忘记旧世界。就在1893年这一年，注定要比特纳产生更大影响的另一个年轻的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写道：“深入到这个大陆中来的旧生活的每种成分，都被消化并变成了新生活的一种成分。构成我国历史的正是这种转变。”

这种对民族性的看法虽源于经济上的成就和向西部的扩张，但美国人当然还是把政治看成是最足以说明民族存在的标志。特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乃是“从美国森林中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充满生命力的”美国经验的最高成果。美国的传统是作为一种政治传统而出现的，人们对之忠贞不渝的是一套政治学说；因此，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坚持18世纪在农村天地中形成的各种思想和制度的力量。政治实践对这些信念的破坏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因为，这种政治制度虽有种种缺陷，但它富有韧性，能够保持它兼容持有不满情绪的人的能力，并能提出一些准则，使各不相同的利益协调一致。南部之所以能接受它在国家中新的从属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它在一个主要政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激进派发出的不满呼声，由于农业的代表在政党和全国政府中分享了地位而消除了。平民党的大规模骚动之所以未能在全国造成持久的混乱，是因为该党先是被一个大党所吸收，接着又在一次正常的选举斗争中被击败。同时地方政治活动，又给那些没有能够在全国施展抱负的人们提供用武之地。虽然不满情绪在竞选时很可能被人利用，但政党政治总的趋势是消除不满情绪的锋芒而使意见分歧的各派协调一致起来。政治活动中的一些不太值得称赞的方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城市的政界头面人物为了防止城市民众受到革命影响而做出的一些有益的事情，已如上述。在更上一层，愈来愈多地利用压力集团，那些利益集团就有希望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就使得这些利益集团宁愿与一些政客们携起手来，而不愿去反对他们，并且保证要使那些拥有权势而且具有组织才能的人不致背离代议制政治。同样，政治的性质与有组织的劳工安于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政治反映了并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社会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有着许多巨大机会；阶级偏见和特征并不会使发家致富的人感到为难，而且社会方面和地理方面的流动性使得很多人能够从生活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

事态的发展显示了政治传统所具有的力量，这个传统是以革命原则为基础，而又体现了有保守思想的人们所珍视的各种制约和平衡。有不满情绪的人可以求助于这一传统，而又不致被人指责为异端；统治集团则可以从这一传统中取得恰恰是他们在经济方面和社会中所需要的东西。当人们想到别的国家政治的特点是分裂时，那么就可以看出，受到诋毁的美国政治制度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并有助于说明何以美国到1900年就能达到社会安定。19世纪末，进步主义正是在这个已经确立的体制的范围内，利用了人们所熟悉的口号和补救办法而开始酝酿起来的。它的三大激励人心的口号——反托拉斯、反政界头面人物和反贫民窟——不过是一般公认的主题的改头换面的提法，正在革新的知识界并没有产生曾严重影响他们的欧洲同行的那种深刻的格格不入的感觉。

把一种保守的社会秩序与一种仍然是激进的政治信念调和起来，必然会在美国思想界的一些领袖中间引起怀疑和分裂，而且要明显改变原来的主张，共和党激进派关于国家权力系于平等权利的观念失去了基础；由于重建时期民主制度的失败和城市治理的种种弊病，幻灭的情绪在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中蔓延开来。少数知识分子不再拥护公正的选举权制度，因为这将剥夺各个种族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选举权，他们转而对民主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亨利·亚当斯在他的小说《民主》和他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以明显的方式说明了这种脱离流行的信念的情况。反民主的情绪在法律界，特别是在较高级的法院中，表现得不大公开。在这些法院中，保护财产不受民主选出的多数人的侵犯，成为一个主要的课题。官员们公开赞扬民主，尽管在私下持保留态度；但是，如果赞成实行白人民主，那么就得放弃黑人民主。到本世纪末，有影响的少数派强调种族的重要性，以及领袖在种族中的重要性。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马汉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负有使命，他主张建立海军力量，因为只有建立了海军力量，这一使命才能完成。拉迪亚德·吉卜林认为美国人肩负不起白种人的重担，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则受到种族命运的神秘概念的影响。精神

状态的不断变化，反映在对美国历史的传统和象征的强调也在不断变化。国家的建设代替革命成为早期美国历史的伟大主题；尽管民主党抱有传统的忠诚，但杰斐逊之星已稍显黯淡，而汉密尔顿之星则照耀得更为明亮。最主要的是，“合众国的缔造者们”这个便于包括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的字眼，在美国的伟人祠中占据了第一位；而《独立宣言》这一革命的宣言则将其在美国舞台中心的地位，让给了象征着有秩序而又平衡的政治的宪法。

（郭健 译）

[1] 联邦海陆军的南北战争退伍军人于1866年建立的组织。——译者

[2] 南部人对南北战争后自带毯囊去南部帮助建设的北部人的讥称。——译者

第十九章 拉丁美洲各国

自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取得独立以来，到19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过了两代。在此期间，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维护了它们的独立，和欧洲发展了商务、文化关系，走向政治上的稳定。在与母国斗争中兴起的6个较大的西属美洲单位，大致相当于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区和都督区，这时已经分裂成16个各自为政的共和国。国家的感情，在每一个共和国里滋长，愈来愈有理由产生一幅新的政治区划图，而这样一张地图一开始并没有真正把这些国家的人民分开。相形之下，葡属美洲已经顺利地经受住离心力的倾向。到1870年，巴西帝国是拉丁美洲最大、最强盛、最稳定的国家。西印度群岛的政治形式则仍然是殖民地式的；古巴和波多黎各依然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小安的列斯群岛则听命于它们各自在欧洲的宗主国；唯独那与世隔绝的海地，还有那朝不保夕的主权国家多米尼加，在加勒比地区代表着共和国的原则。

1870年以后，这一地区变化的主要起因是它和外部联系的空前发展。欧洲和美国不断扩大的工业需要更大量的原料，诸如皮革、棉花、羊毛；新兴的化学和电力工业需要更多的橡胶、铜、锌、铅和其他金属。城市人口有新的集中，这也要求大幅度增加食物的进口，如食糖、小麦、肉类、咖啡和可可。与此同时，那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已拥有资金和工程技术，可以用来发展生产以满足这些新的需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各国如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大量涌向南美的温带地区。

欧洲的投资者敏锐地看到，紧接着这些地方获得独立，在拉丁美洲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那里新成立的政府从伦敦筹措来的贷款，几乎全都拖欠不还。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在智利和墨西哥的矿业投资的人，他们的奢望业已落空。从这一时期起，资金进入这个地区的速度放慢了，可是，在1870年后，情况迅速发生变化。我们无从获得全部数字，但据计算，到1880年，在伦敦发行了票面值达179490261英镑的拉丁美洲证券。其中大约有7000万英镑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拖欠的公债，但有56412255英镑是在拉丁美洲商业企业中的直接投资。到1900

年，这些数目猛增，不过，新增加的资金多半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之前投入的。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拉丁美洲证券，到19世纪末，其票面总值是5.4亿英镑，而这笔数目中的一大半是直接投资，不是拉丁美洲政府公债。当然，还有许多投资没有列入伦敦交易所的记载。到1897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总计3亿美元，主要是在墨西哥的矿山和铁路方面的投资，以及在古巴糖业方面的投资。同时，还有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投资，为数相当可观，而英国在投资总额中的份额是最大的。1913年，经过10年迅速扩大的投资，英国的投资仍然两倍于美国，4倍于法、德投资的价值。1900年时英国在这方面的活动甚至更为突出，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铁路方面，1890年约占70%。矿业、公用事业，还有在智利的硝石工业，则占英国其余直接投资的大部分。

资本的绝大部分是流往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的，它促进变化的效果，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它带来了公用设施的现代化，这里所指的是拉丁美洲主要城市中的煤气、电力、自来水以及市内有轨电车那样的公共运输事业。它使得有可能建设铁路，把矿区和偏僻的农业区与海港、主要城市、内地各省及港口连接起来。此外，机器、蒸汽机、发电机和电动机在劳动大军中也引起了变化，因为这些东西要求他们掌握新的机械上的技能。这就在原先几乎全部是农民（债役农）和土地所有者（雇主）居住的国度里开始形成了一个产业无产阶级。

欧洲移民的影响，比起外国投资的影响来是局部性的。虽然在拉丁美洲，凡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都有欧洲商人和专业人员、经理和技术人员聚居的地方，但就他们对人口的种族构成所起的影响而言，为数是微乎其微的。有3个国家是例外。在这期间，几乎所有去拉丁美洲的欧洲移民都是到阿根廷和巴西。总的移民数字中含有许多错误，没有把有时为数十分可观的移民倒流考虑进去。但是，在1870—1900年的30年中，仍有400万欧洲人移居拉丁美洲。这些年中，移民人数在稳步增加。在1870—1879年间，抵达的移民略少于50万，在随后的10年中，差不多有150万，1890年至1899年间，超过了200万。

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到阿根廷和巴西去的，除此以外，乌拉圭也是大批移民的目标。早在1860年，它的人口中有20%以上是在欧洲出生的。1900年，将近15万欧洲出生的人在这个国家里定居。智利接纳的人数要少一点。有相当一部分人集中在它的南部边境地区，很多是德国人或瑞士人。这多少使这些人显得更加突出。如果他们分布的范围更加宽广一些，本来是不会显得如此突出的。因为他们总的人数，从殖民开始到19世纪末，还不到10万，其中包括政府招来的和自由移居来的人。

移民中最大的部分是意大利人，其次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的人数要少一些（主要是移往巴西），然后是几部分数目少得多，却相当庞杂的人：他们中间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以及为数很少的斯拉夫人。在他们定居的地方，他们的人数压倒了当地的克里奥尔人。在巴西，从圣保罗到它的南方，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及其周围，在阿根廷的大部分（它的北部边远地区和西部各省除外），欧洲人占绝对优势。

和投资、移民密切相关的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北部加勒比地区之间的交通和通信有了改善。在1865年至1890年间铺设了海底电缆，经过太平洋海岸先把墨西哥和中美洲，随后把整个南美同美国连接起来。另外，还有一些线路把南美的东岸和欧洲相连接。尤其显著的是海上运输的改进。这是普遍使用供客运、货运的钢制轮船的缘故。南美东海岸的海运量最大，因而那里的海运最为发达。欧洲所有的海运国都在这一地区竞争。英、法、德、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客轮开进巴西和拉普拉塔河的港口，此外还有更多其他国籍的货轮。

在加勒比海上，美国的船只驶向中美、墨西哥、西印度群岛的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在太平洋沿岸，英国的航运对南美是至为重要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则把中美的西海岸以及巴拿马和美国在太平洋的港口连接起来。但在美国和巴西、阿根廷之间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客运航线。这说明美国和拉丁美洲这一地区之间的商务关系，在19世纪后半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

和航运、电信相辅相成，作为贸易的一种辅助工具的，是银行业所提供的服务。第一批专门向对外贸易提供资金的社团法人银行机

构，是英国在阿根廷开设的伦敦和拉普拉塔河银行和英国南美银行。两家都是在1870年前创办的。伦敦和巴西银行创于同一时期（1862年）。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意、法、德利益集团都建立银行，向这些国家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贸易提供资金。后来，在乌拉圭、智利和其他地方都开设了分行。

为了弄清楚这一时期的经济变化，有必要回顾一下各国的发展情况，因为各国的经验很不一样。

阿根廷的经济成长最为显著。它在19世纪初叶是西班牙帝国版图中最不发达、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它在人口增长的速度、移民的数量、修建铁路的里程、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1852年罗萨斯政府垮台后，移民迅即开始。但是直到1860年后，人数始终不多。1870年到1900年之间，有220多万移民进入阿根廷。他们中间一部分在圣菲、恩特雷里奥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省农业殖民点定居；还有许多人成为阿根廷牧场主所拥有的土地上的佃户，这些牧场主这时愈来愈致力于农业；其余的人则留在发展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和布兰卡港等城市。最大的移民群是意大利人。其次是西班牙人，为数略少。这两个民族的人构成了准许入境的全部移民的绝大多数。1897年，阿根廷人口调查表明，这一年的居民数和1869年相比，增加了1倍，这一半是由于新的人种流入的结果，但是，克里奥尔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一个原因。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快。铁路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到1870年，投入使用的线路只有458英里。但到1880年，线路就增加到1500英里以上，到1900年达到1万英里。阿根廷的铁路网超过了其他所有拉美国家。在1880年到1900年间，仅英国方面的投资，其票面值就从2000万英镑上升到2亿英镑以上。

铁路加上移民，破天荒第一次促成了小麦和其他谷物的大规模生产，以供出口之用。国内耕地，从1870年的150万英亩增加到1901年的1700万英亩以上。到1899年，阿根廷在30年内从一个进口谷物的国家，一跃而为出口1亿蒲式耳小麦和玉米的国家。与此同时，冷藏技术的出现，引起了肉类产品出口的根本变化。1877年，第一艘冷藏船满载冰冻羊肉开往欧洲。1883年，第一家现代化食品加工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兴建。到19世纪末，每年有成千上万吨的冰冻牛肉和冰冻羊肉运往欧洲。这一发展给传统的养牛业带来了变革；它原来只是生

产供出口用的皮革、牛角、牛脂和干牛肉。现在冻肉有了市场。这就促进了纯种达勒姆牛和赫里福德牛的进口，结果是提高了本地牛畜的质量。为了饲养这些比较值钱的牲口，有必要圈起牧场，控制虫害和牛的疾病，发展种植苜蓿和其他饲料作物的人工牧场，提供更好的水源，以及使用比过去更多的劳力。由于这一经济发展的结果，阿根廷的外贸额（进出口总额）在1870年和1900年之间几乎增加了2倍。

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在物质上的进步可与阿根廷相匹敌。它们中间的任何一国，都缺少像在阿根廷所出现的那些有利条件中的一项或几项。

19世纪70年代以前，巴西的发展在国土面积方面超过了阿根廷，但现在的发展虽然还是相当可观，已不那么显著。这里移民又是导致变化的主要因素，不过，它主要是在圣保罗到里奥格兰德之间的南方引起了变化。巴西开始接受移民要早于阿根廷，但直到70年代废除奴隶制的前夕，人数一直很少。随着咖啡业推行工资制劳动以及奴隶制劳动的消失，欧洲移民的涌入变得颇为重要。移民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到20万，到80年代的10年中增加到50多万，到90年代已超过了100万。直到1889年帝国时代告终为止，葡萄牙人数目最多，此后意大利人在数目上超过了葡萄牙人。绝大多数人移向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圣保罗州。在移民和铁路建设的双重刺激下，咖啡生产在圣保罗州蓬勃发展，就如谷物生产在阿根廷蓬勃发展一样。以营运中的铁路里程来计算，巴西并不落后于阿根廷多少。到1889年，它有6000多英里，1904年达到1万英里；自然，这个国家的幅员远比阿根廷为大，这些线路所发挥的效用就显得不足了。铁路大部分是在圣保罗州修建的，一些干线把这个州和南面的里奥格兰德以及北面和东面的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各州连接起来。咖啡出口在1870年到1875年期间平均是4亿磅，到19世纪的最后5年里，平均达到11.3亿磅。巴西和阿根廷不同，阿根廷可以依靠的主要出口产品种类多，而巴西的外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咖啡，约占它出口总值的2/3。它的外贸额在1870年是阿根廷的2倍，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的3倍。不过，此后它没有阿根廷那样的发展速度。橡胶似乎一度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合乎需要的多样化。亚马孙河流域提供的出口量从1870年的1000万磅上升到1900年的5200万磅。但是，这种蓬勃发展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不久就垮下来了。可可豆、肉类产品、木材和林产品，在出口货物中只是些次要的项目。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巴西在一个方面领先于阿根廷。棉纺织业到1905年扩大到100多家工厂，雇用约4万工人，生产了将近25万米棉布。1889年巴西帝国崩溃，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人们竞相向工业方面投资。除了纺织业外，这些厂家专门生产帽子、鞋子、服装，并对各种食品进行加工。咖啡种植园主赢利优厚，劳动力有保证，水力资源在19世纪末已为水力发电厂所利用，这一切在圣保罗促成了一个工业综合体。

尽管巴西的这些经济发展是很有希望的，但进展的速度无疑地不如阿根廷迅速。人口增长得慢一些，在1870年到1900年期间，总数从1000万增长到1700万，但没有能像在阿根廷那样增加1倍。还有，如果英国的投资可以作为表明增长率的一种标志，那么，巴西在这一方面是落后的。1870年，英国在巴西的投资比在阿根廷的多；到1900年，在那里的投资却不及在阿根廷共和国投资额的一半。

智利又是一个例子。它是另一个取得一些经济辉煌成就的国家，但是变化没有阿根廷那样大。移民不多，外国的投资也比阿根廷或巴西要少。1900年的外资总额稍多于巴西的1/3，基本上均衡地分布在矿山（包括硝石工厂）、铁路和政府公债方面。铁路建设虽然就其国土面积而言是可观的，但是，总的里程远远落后于阿根廷和巴西，到1900年，约在3000英里，其中国营和私营的线路各占一半。智利的农业虽然是多样化的，并有广泛的灌溉系统，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人口的增长也远比阿根廷或巴西为慢。1870年约有200万人，到1900年才增加到将近300万。

智利这些年在北方沙漠地区的硝石工业方面确有非凡的进展，这个地区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取胜后从玻利维亚和秘鲁手里取得的。1870年，智利还不生产硝石，但到1880年就生产25万公吨，1900年为140万公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4。这大大促进了政府收入、公用事业、铁路建设和工业的成长。到1900年，智利已在制造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帽子、鞋子、卷烟、面粉、猪油、纺织品、皮革、家具、绳索、纸张、锡器和陶器、水泥、火柴、肥皂、蜡烛、肥料以及工业用化工制品。还出现了重要的机械和金属产品工厂，可以维修铁路和工业机械并制造零件。智利的工商业者已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制造商联合会，并拥有足够的影响来说服政府采取一项明显的保护性关税政策。

所以，只是在矿业方面，智利到1900年可以说是超过了阿根廷和巴西。但如以按人口计算提出的一些统计数字来比，或以每平方英里计算，其结果就对智利有利得多。总之，智利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但规模要小一些。这对一个面积和人口比它在大西洋沿岸的邻国要小得多的国家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在这期间取得大量经济成就的国家中，也应该把乌拉圭包括在内，尽管它这些成就的规模比智利的还要小一些。到1900年只有约100万人住在这个国家中；然而，人口却在稳步增长，因为在1870年才有大约60万人。导致阿根廷的畜牧业扩大和改进的力量，在乌拉圭同样起作用，该国的牛羊头数增加非常之快。羊从19世纪中叶不足100万头增加到1900年的1800万头以上；牛在同一时期从不到200万头增加到将近700万头。干牛肉是重要的输出品，1900年，有21家厂商从事生产肉干。在乌拉圭还有首创生产牛肉汁的厂家，最早的一家是1863年在弗赖本托斯建立的利比格工厂。就其国土面积而论，乌拉圭的铁路有相当大的进展，到1900年，投入使用的铁路有1000多英里。在这个国家的3600万镑的投资总额中，有1100万镑就是投资在铁路事业。这个共和国的外贸额在1870年到1900年间翻了一番。但是，必须看到，除畜牧业外，乌拉圭的农业并无重要的进展。所以，比起其他具有更加广泛基础的地方，这里的繁荣发展就不那么稳定。

秘鲁到1870年算得上是一个经济取得显著进展的国家。这几乎要完全归功于它多岩石的海岸和沿海岛屿上的鸟粪的出口。几千年来，无数鸟类在那里留下的粪便造成可作肥料的堆积物，价值极大。政府依靠输出鸟粪的收入来支付在公用事业和修建铁路方面的大量费用。这也造成金钱上的浪费，以及那些和政府有关系的私人企业在这些活动中为它们自身获得了暴利。更糟的也许是它的外债，膨胀得出乎常情之外。何塞·巴尔塔总统的政府为了对付濒于破产的威胁，创建了一个经营鸟粪的垄断组织，目的是今后消灭那为数众多的经纪人，这些人曾经承包了在欧洲和殖民地市场上的鸟粪销售事宜。该政府于是和一家法国银行企业德雷福斯公司订立了合同，给予它垄断鸟粪交易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这家公司同意代为支付外债的利息，并贷款给秘鲁。这本来有可能帮助这个共和国井井有条地清除它在财政上的困难，但巴尔塔政府却开始边借边花，不顾一切地把将来的鸟粪出口抵押出去。这时，有个美国推销商和铁路修建商叫作亨利·梅格斯，

正在从事他的宏伟的建设计划。秘鲁当时表面上似乎正在迅速前进，其实，这种显而易见的进展是建立在相当不牢靠的鸟粪业上的。一旦鸟粪价格下降或对它的需求减少，就会带来灾难。

这是个带有投机性的繁荣时期，接踵而来的是1879年至1883年的太平洋战争，秘鲁吃了败仗。它在敌占区中的产业到处遭到洗劫和破坏，其结果是破产和停滞。1890年后才开始恢复，但即使到了1900年，秘鲁的贸易总额还是小于1870年。30年中，人口仅从320万增加到400万。欧洲来的移民不多，早先在1870年前曾从中国招来劳工，到90年代又加上来自日本的工人。1900年，秘鲁经济力量中的新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商业性农业在沿海灌溉地区的发展，生产了大量的糖和棉花。还有矿业的复兴，它在新的、技术先进的外国管理之下，把秘鲁变成一个重要的铜和其他金属的生产国。修建铁路花了大量的钱，工程非常艰巨，成本很高，但是投入使用的总里程却比智利少得多。在秘鲁，促使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为一些相反的力量所抵消。

在拉丁美洲的北部，只有两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可以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相比。那就是墨西哥和古巴。1870年，墨西哥的人口超过900万，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仅次于巴西，但是总的经济进展和它的人口不相称。国内只有一条铁路把墨西哥城和维拉克鲁斯连接起来。墨西哥的对外贸易比不上秘鲁和智利，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绝大多数墨西哥人从事农业，赖以糊口。即使那些大庄园，其经营范围也只限于供应本地的市场。采矿业占它的出口额的大部分，平时发展就缓慢，在多次内战中更是深受影响。不过，波菲利奥·迪亚斯的独裁政府在1876年后采取了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政策。这就导致大量修建铁路，并把墨西哥的铁路线和美国的铁路连接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采矿业出现了一个新时期，应用现代化技术，并能够使用低质矿石。虽然采银仍然占重要的地位，过去不受重视的铜和其他金属现在却大规模地生产了。采煤业到90年代也变得重要起来。外资还进入公用事业这一领域，也以较小的规模进入制造业，建立了黄麻和亚麻布工厂，肥皂和植物油厂，一家水泥厂以及其他企业。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发轫于1890年，以美资创设的墨西哥石油公司为始。从某些方面衡量，墨西哥的经济进展是可观的。政府信誉卓著。到1900年，共和国的外贸年值比1870年增加了3倍。另一方面，墨西哥的农业没有真正进展；广大农民的处境比1870年时更为悲惨，人口增长很慢。墨西哥和

巴西在1870年的人口几乎相等，可是到1900年，巴西竟然比墨西哥多出350万。到1900年，估计墨西哥吸收了约6700万英镑的英国资本，此外，还有2亿多美元的美国资本。因此，墨西哥和巴西两国的外国投资大致是相等的，这就充分说明总的经济进展还有赖于其他许多因素。

在19世纪后几十年取得显著进展的国家中，古巴要算一个。但是，它和秘鲁一样，这一进展为战争所抵消。古巴曾连续两次发生独立战争，一次在1868—1878年，另一次在1895—1898年。在这两次冲突之中，作为古巴财富的主要基础的甘蔗种植园受到很大破坏。此外，这个国家直到1898年还是个殖民地，所以很难把它和其他独立国家相比。不过，古巴显然代表了经济取得进展的地区之一。该岛人口随着糖业的繁荣而增长，接受从西班牙、牙买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岛来的移民，那些地方正苦于不能充分就业。美国投入古巴糖业的资金达5000多万美元。英国的投资包括投入铁路和制造业的约1000万英镑。1900年，古巴还没有从独立斗争造成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虽然如此，古巴的贸易额当时大于其他9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作为糖的主要来源，对世界其他各国是重要的。

至此还未提到的国家是从危地马拉到巴拉圭的一些位于美洲热带地区的国家。不能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是完全停滞不前的，但它们的进展相对来说是微小的。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主要是依靠一种或两种供出口的作物或矿物，不过，这些物资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并不稳定。这就难以取得稳步的进展。在哥伦比亚和几个中美洲国家，咖啡生产开始在19世纪末取得明显的进展。可可豆的生产在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如同在巴西蓬勃发展。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某种程度上都分享了橡胶生产的景气，橡胶生产在1900年在亚马孙平原突飞猛进。到19世纪90年代末，玻利维亚的矿物生产增加，取代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智利攫走的硝石生产的重要地位。玻利维亚锡的生产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变得十分重要。巴拉圭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有所恢复。它的外贸额在1880年到1900年之间翻了一番，但和邻国乌拉圭相比，其总值仍然是小的。

在拉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地区差异表现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外贸额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乌拉圭一国，而智利运营中的铁路比10个热带国家中的里程还要多。

拉丁美洲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它同各国经济进展的不同速度相互关联。政治活动的某些特有形式，在取得独立到1870年期间在拉丁美洲出现，这在不同的程度上在各国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动荡，其表现是未能产生一种切实可行的宪政秩序；内战和政变频仍；个人对具有声望的领袖效忠，甚于对思想信念的效忠，于是就流行以“考迪略”的威信为基础的强权政府；政治冲突采取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互相斗争的形式，这些自由派首先是反教会的，同时又坚持民主理论和地方自治或联邦制，而保守派所坚持的主张是一个等级制的、贵族式的政治社会秩序，以及国家和罗马教会进行密切合作。这些倾向在1870年后还在持续，不过在一些国家中，在几个重要的方面有些改变。在某些国家，政治稳定大有起色。这种稳定是建立在日益加强的“开明”寡头政治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些寡头人物，或者是通过在宪政制度下运行的政治机器，或者是通过和一个“开明”的独裁者进行合作来统治的。和这一在较大程度上的稳定同时发生的是官僚主义的大发展，以及军事服役的职业化。到这个时期的末年，还能看到人们开始对少数人为了私人利益统治广大人民表示抗议。

有些国家既是经济变化的范例，又是政治上的稳定获得加强的范例，阿根廷是其中之一。到1870年，内地的一些“考迪略”的零零星星的叛乱已被全部平定。但是，它仍然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省里发生的冲突的干扰；因为有人主张把这座城市“联邦化”，有人反对，冲突就是在这两部分人之间发生的。这个问题引起了1874年的战斗，1880年又再次发生战斗。但在后一次战斗中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决，成立了一个联邦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则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保持国家权力的观点获胜了。虽然阿根廷的宪法采取联邦制的形式，但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削弱各省权力的情况下迅速增长。1820年以来一直支配着阿根廷政治的主张中央集权的和主张实行联邦制的一些老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保守的、讲究实务的寡头政治集团在阿根廷实行了统治。政府还在根据宪法行事，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选举定期举行。但是，由于选举法中并无秘密投票的规定，这就给执政的保守党人以可乘之机，对选举加以控制。

在智利，政治上的演变采取不尽相同的形式。宪政的稳定是前一时期的成就，开始于1830年。从1870年至1890年，行政的权力逐

渐被削弱，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权力，能够通过内政部和警察来左右议会选举的结果。于是，这一早先原是强有力的总统制政权，就开始向议会中的各党各派起更大作用的制度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行政部门愈益成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内部派系交替进行各种联合的工具；在这些联合之中，民族主义者（一个较小的中间派别）和左翼激进派只起了次要作用。虽然1833年的宪法并无明文规定，但历届总统相沿成习，都通过受到议会中多数派所支持的内阁来治理国家。这一趋向已经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致1891年当刚愎自用的行政首脑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对这种做法表示异议的时候，爆发了一场革命，经过激烈的战斗，这位总统被赶下台。巴尔马塞达失败后自尽，从此智利的议会制便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30年代修改宪法时为止。另一方面，尽管保守党已不再占优势，尽管自由党（它主要代表一种要求限制教会权力的倾向）愈来愈得势，两党却都支持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利益。议会是寡头政治的据点，行政部门受它的支配，但是，它根据宪法所规定的法律和政府的全部形式进行统治。

巴西是“新世界”唯一的君主国。它在19世纪末叶的大事就是帝国的崩溃和巴西合众国的成立。尽管佩德罗二世个人颇孚众望，但共和主义思想在1870年以后就开始得势。这种思想和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哲学是一致的，和当时正在轰动全国的要求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也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巴西皇帝已经接受逐渐解放奴隶的政策，因此拥有奴隶的贵族对帝国制度的热诚就减退了。当时，教会对君主也已经疏远。这是因为皇帝从君权至上这一思想出发，干预教会，不准教会惩治共济会成员。经济上的均势也正在转移，从东北部以前的种植园地区转向圣保罗新的咖啡生产地区和更南边的其他各省。这些地方正是当时欧洲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的去处，而这里的工商业领袖对传统所表示的同情是比不上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等地的。新的力量增进了自由党人的权力，这些人开展运动反对这样一种制度：一方面是国民议会彬彬有礼地对政府的问题展开讨论，摆出一副英国式议会制政府的架势，自由党和保守党内阁井然有序地互相更替；另一方面是皇帝小心翼翼地注意保住他自己的特权，内阁的寿命要视他的意向而定，而不是由议会中的多数派来决定，因为这些多数派经常又是为了支持他所成立的内阁而制造出来的。

危机是在1888年开始的。当时，经过多年激烈的鼓动，政府屈从了立即解放剩下的所有的奴隶这一要求。废除奴隶制的立法没有规定对奴隶主给予损失补偿。这就触怒了保守党人，不然他们是会拥护帝国的，现在，当1889年发生军事叛变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却置身事外。革命派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夺取了政权。全国接受了这个新政权，佩德罗二世和他的家族被流放到欧洲。

武装部队没有效忠皇室，部队原因是实证主义者在军事院校里灌输的那一套思想，部分原因是佩德罗二世表现出一种文人的偏见，另外，也是由于高级军官有政治野心而造成的。在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中，陆军和海军军人出任新政府的重要职位。1893年，陆军和海军为了争夺优势而发生火并。不过，新政府宪法的形式还是联邦制的，并为国内正在上升的工商界提供了很大的活动余地。由于工商界对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两个最强大的州的政府的控制愈来愈得手，他们终于能够在表面上是军事领导而从幕后进行控制。在第一任总统迪奥多罗·丰塞卡及其继任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以后，接任的历届总统都是文人。

阿根廷在1880年后取得的宪政秩序方面的成就、智利所建立的议会制政府、巴西实施的共和国制度，这些发展虽然好像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同样都把寡头政治的政府推上了台。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行事和整个西方世界流行的宪政、共和国体制和代议制政府又是一致的。在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里，那些关心拥有土地和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的政府，采取了稍有不同的形式：“有秩序而进步的专政。”这样的专政和早先那种个人统治的政权迥异，因为它们全都自称是自由主义的和反对教会的。不过，他们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内容，由于他们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而有很大的改变。即使最终目标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实证主义者强调需要通过工作和教育来一步步取得进步。但实证主义者不相信革命，不相信通过宣传自由主义的原则就可以取得民主和进步。这些政权实际上同样也经常使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来保持他们执政的地位并消灭它们的反对派——这些手段正是早先那些思想上较少装模作样的独裁政权所使用从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这些政权依靠一部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支持来治理国家，此外，还得到工商界，经常还有外国资本家们的拥护。

墨西哥在马克西米连的帝国崩溃后，由贝尼托·胡亚雷斯恢复了自由主义的共和国，而迪亚斯的政权又是从这个共和国演变而来的。迪亚斯是反对法国的战争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之一。他想通过投票箱当上总统的企图失败后，于1876年做了第二次尝试，通过暴乱当上了总统。在他漫长的任职期间，他一直保持了他所标榜的自由主义的外表，但他就任后不久便建立了一个高度独裁的政治秩序。军队、土地所有者、外国投资者、商人、有野心的年轻政客，甚至教会——全都得到他们急欲到手的東西，他以此来博得这些人的好感。任何反对这个政权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极为不妙。

军队对迪亚斯（他们的自己人）有信心，将军们被广泛地任用，职位都是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肥缺。土地所有者对心怀不满、负债累累的佃农有自由处置之权；他们发现已为他们低价买进公地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对于迪亚斯的乡警在农村中维持秩序的效率非常赞赏。外国的资本家们对于迪亚斯重新建立了墨西哥政府的信誉一事表示钦佩，乐意借钱给他。凡是希望在铁路、矿山或农场方面投资的人，发现政府采取合作态度。迪亚斯尽管有反对教会的传统，但也逐渐放松执行那些教会所不满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在法令全书中仍然存在。所以，教会当局觉得和这个独裁者可以相处，也就不足为奇了。迪亚斯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年轻有为、有抱负的人，即所谓的“学者”，这些人满怀当时的那种实证主义思想。教育是落后的，农业停滞不前，但在其他方面，墨西哥在经济上的进步是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从1870年到1888年间在委内瑞拉的20年的统治，和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在许多方面有类似之处。他和迪亚斯一样，具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这种传统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一些开明的“考迪略”们对旧日的贵族和保守党进行的成功反叛。在他掌权期间，他比迪亚斯还要起劲儿地继续保持自由主义的某些习俗。他庇护共济会，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世俗的婚姻仪式和世俗的初等教育，并废止宗教仪式。他同时又赞助经济进步，从欧洲借款来营造精心设计和装饰美观的公共工程并修建铁路。他的政策带来了某种稳定。然而，就在自由主义外表的背后，不难看出这位暴君不给人民政治自由，迫害政敌，并把宪法和选举视同儿戏。

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拉丁美洲就有好几个类似的政权。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在1871年到1885年间统治危地马拉，也是自由

主义革命者的一个榜样，这种人就职后就成为施仁政的专制君主。他遵循的是一种对工商业、土地所有者和外国资本有利的经济政策。他发起了一项资助农业和商业、铁路修建和其他公共工程的计划。不幸的是，由于他一心想重建中美洲的政治统一，在这些方面的建树就没有原来所预期的那样出色。还有一些统治者本来可以归入这一类型，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执政时间长到足够建立一个真正可以被认为是“有秩序而进步的”专政那样的政权。

除了在发生上述这种类型的政治新发展的国家以外，拉丁美洲的政治仍然遵循早先建立的那种模式。特别是巴拉圭，它为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勇斗争到底，由于敌我悬殊，损失惨重，几十年也无法恢复元气。1870年它还被外国军队占领着，媾和条件要等到将来才能最后确定下来。战争中的伤亡、饥谨和疾病，把国内的人口从战前的100万左右减少了一大半。在那次冲突中，几乎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不是丧了命就是变成了残疾。从1870年开始，巴拉圭不再能够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政治中扮演一个主要或独立的角色，愈来愈趋向于成为正在迅速壮大的阿根廷的一个卫星国，而且，只有通过阿根廷的领土，巴拉圭才有可能和外界往来。在和巴拉圭的战争中，乌拉圭被迫成为阿根廷和巴西的盟国，这场战争在这个国家中确实导致一种反对军事头目左右政治的反应。1870年，属于两个传统政党的年轻的文职人员，发起了一个旨在实现以原则为基础的新政治联盟的运动；然而，这一运动是短命的，乌拉圭人对他们传统的政党和将领们有深厚的感情，这证明是改不掉的。由贝南西奥·弗洛雷斯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红党得以执政，它在表面上一直是掌权的。而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一批将军们的手里，他们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伙人谋利益。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海地，战争、革命和独裁，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但不值得一记。

但是如果不讲人们如何开始对寡头统治和独裁进行抗议，那就不能结束对这一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探讨。这些抗议运动是从民主理想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在19世纪末以前，这些运动没有一个堪称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不能忽视它们的开端，因为在1900年以后不久，这些运动都变得相当重要。

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主义在阿根廷的成长最为显著。米格尔·胡亚雷斯·塞尔曼总统的政府误国腐化，导致一个抗议集团“公民联盟”的形成，为首的是理想主义者莱安德罗·阿莱姆。后来在阿根廷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许多人都和他有联系，如伊波利特·伊里戈延、马尔塞洛·阿尔维阿尔、利桑德罗·德拉托雷等。公民联盟在1890年组织的一次起义虽然失败，却大大削弱了总统的地位，以致他辞职下台。公民联盟的某些领导人接受了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但是，阿莱姆和伊里戈延拒不接受并成立了“激进公民联盟”，后来称为“激进党”。激进党人开展一项运动，反对在选举中经常发生的弄虚作假和使用暴力。他们认为改革选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他们在1893年再次发动叛乱，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但是，日益赢得舆论的支持。在下一时期之初，他们将成为阿根廷占统治地位的政党。

除了在阿根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并没有导致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过，智利激进党的左翼，可以算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政党。尽管如此，许多重要人士都表示反对时弊。在墨西哥，著名诗人伊格纳西奥·阿尔塔米拉诺表示反对官方的实证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不承认人的权利。何塞·马蒂在古巴和在流亡中，用他的笔锤炼出的民主学说，后来成为古巴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在秘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号召他的同胞们为国家的幸福诚实地而又有纪律地工作。在乌拉圭，何塞·巴特列·伊·奥多涅斯在他那家报纸的专栏里和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呼吁采取超越国内传统的党派政治的政策。这些人仅仅是许多人中的几个，他们通过新闻和政治活动，在许多国家中坚持要求自由主义和民主。但是，很难说他们在1900年以前已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拉丁美洲，左翼激进主义在一开始也是分散的，甚至更没有什么具体的成就。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开始在几个国家里，在具有这种信仰的领导人赞助下，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会的活动。在墨西哥，宣传这一观点的主要人物是里卡多·弗洛雷斯·马冈；他和他的兄弟恩里克以及另外一些人的活动是从1892年开始的。1891年，一个工团主义的总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佩得罗·阿巴德·德·桑蒂连是这一思想在阿根廷的主要代表。就在19世纪末，1897年以后，工团主义的工会和刊物在智利北部的硝石产区出现。由于无政府主义学说在西班牙占有重要地位，在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的

不满情绪所采取的最早形式之一很自然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工团主义的主要对手社会主义，在1900年之前，除了阿根廷以外，几乎没有在拉丁美洲的任何地方立足。阿根廷社会党是在1896年由胡安·胡斯托和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创立的。这个党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组织，主张通过立法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它所遵循的是类似英国费边社的路线。

除了上述一些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各种类型的激进思想和组织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范围较小、更为温和的劳工组织。在墨西哥，早在1890年就组织起一个铁路工人工会。在阿根廷，最早的例子似乎是在1874年建立的制革工人工会。不过，大部分工会不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组织，就是从属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891年后，既有工团主义的总工会，又有社会主义的总工会。1900年以前，在古巴和智利的工会主要是受工团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宣传鼓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取得重要地位很久以后。拉丁美洲在这方面仍然迟迟没有作为。这一运动和宣传鼓动，很自然地首先是在受资本主义进步的影响最多的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古巴和墨西哥出现的。巴西在这个运动中是落后的，原因何在还说不清。

对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进行考察时，不能忽视西班牙美洲共和国大家庭中出现的一个新成员——古巴。虽然在西属美洲大陆取得独立的时候，这颗“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仍然留在西班牙的手里，但它并不是毫无动静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古巴人对实行歧视和剥削的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不满，引起了第一个争取本岛独立的强有力的运动。1868年的一次革命集会曾宣布实现独立，结束奴隶制，建立一个自由而民主的共和政权。在贵族人物卡洛斯·玛丽亚·德·塞斯佩德斯以及其他一些有地位的人的领导下，起义者向古巴各阶级发出呼吁。一些拉美国家承认了古巴共和国，但美国没有承认。由于没有得到承认，就不容易得到军火，于是这场战争变成游击战。西班牙当局无法把游击队压制下去，战争持续了十年。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这就导致妥协，和西班牙总督兼总司令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签订了《桑洪条约》。西班牙人没有全部恪守当时所做出的承诺，革命的动乱继续在潜伏中。何塞·马蒂在狱中，在流放中，体现出古巴人对自由的渴望。他的著作和他的榜样，在这些年中煽起了古巴人的民族精神。1895年革命再次爆发。马蒂在首次战役一开始就

以身殉职，但死后如在世时一样，他的事业把古巴人统一起来了，反抗的势头愈来愈强大。起义游击队的政策是烧毁甘蔗田，西班牙人针锋相对的政策是把农村的居民关进集中营。生命财产到处遭到毁灭，古巴人在受苦受难，对此欧洲和美洲都有广泛的报道。

美国在古巴革命开始3年后终于介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不在本章叙述的范围之内。随后的美西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全部覆灭。这一事实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还必须看到一点：古巴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自由。就在和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时候，古巴和美国双方的军事当局已有摩擦。当美国在古巴建立了一个军政府时，岛上的人民感到沮丧。美国在干涉伊始，国会曾正式宣布美国并无兼并古巴之心，它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古巴。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兼并之心却在增加，虽然还不足以完全改变原来的立场。不过，美国确实强加在古巴身上一项举世闻名的限制，限制这一新生共和国的主权，那就是“普拉特修正案”。这一修正案牢牢地扎根在美国和古巴的永久性条约以及古巴的宪法之中。修正案中有一条规定，即美国为了维护“古巴的独立，维持一个政府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可以对古巴进行干涉。古巴人在被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时美国才撤走了它的军政府。古巴共和国在1902年得以控制该岛。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告终，在许多方面有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重新建立亲善关系不再存在任何障碍，而且西班牙的和西裔美洲人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将是随后一个时代中的在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

在19世纪后期，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冲突往往是由于边界争端引起的，许多争执一直不能解决。这是由于双方的民族主义感情无法妥协，而且，对于通常涉及的荒无人烟在内的悬而未决的边远地区缺乏确切的地理知识，也造成了一些困难。此外，那些较强的国家总想控制邻近的弱国，由于这样的政策，引起了更多国家的敌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那些比较强大的南美国家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均势，而这个大陆上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都被卷入。在中美洲，有明显的类似过程，范围较小，但和南美这种关系形成的体系却无关联。

这个大陆体系，是从早年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地方冲突和太平洋沿岸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之中演化出来的。在前一地区，冲突的因素是

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竞争的野心。双方都企图对较小的邻国乌拉圭和巴拉圭的政治事务施加影响，以利于他们自己。1870年，具有破坏性的巴拉圭战争告终。这个小而好战的国家元气丧尽，它的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也跟着死去。那是一场历时近5年的反对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联军的斗争。两个较大的战胜国都向巴拉圭要求割地和赔款，双方都有制止对方把这个战败国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企图。巴西和阿根廷在乌拉圭经常动乱着的政治中讨好互相敌对的派系，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主要是由于这些对抗，阿根廷和巴西卷入一场争夺军事优势的竞赛。两国都开始发展更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阿根廷军事学院是在1870年成立的）。两国都向外国购买舰艇，从而奠定了现代海军的基础。

太平洋沿岸的国际关系，在19世纪70年代初是和谐的。就在几年以前，智利、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在秘鲁抵抗西班牙海军的干预中和秘鲁站在一起。然而，在这表面现象的后面，智利和秘鲁之间在传统上是互相妒忌的。在殖民地时期，秘鲁一直是西班牙总督当局的驻地，照例比边远的智利省要得到更多的优惠。这些抗衡自古就存在，本来是可以保持相安无事的，可是在秘鲁南部和玻利维亚的沿海干旱地区硝石工业的兴起，重又勾起了这一宿怨。智利的工商业者在开发这一新型的矿物财富方面很活跃；既然这片沙漠现在突然变得十分值钱，早先对这片领土的要求并不起劲的智利政府，现在却迫切地提出它的权利要求。玻利维亚是个弱国，而且政治并不修明。它在智利的外交压力面前做出让步，1866年签订了一项条约，把南纬 25° 以南的土地割让出去，并同意和智利共管南纬 23° — 25° 的土地，两国都可以在那里开发鸟粪和硝石之类的资源，分享从这方面取得的收入。但是，随后在1873年秘鲁和玻利维亚结成了同盟。智利的历史学家对这个同盟的解释是，两国采取步骤在硝石工业的垄断价格上采取一项共同政策，并且企图不让智利参加进去。秘鲁和玻利维亚方面的史学家则把这个同盟说成纯粹是一项防御性措施，用以对付一个显然具有侵略意图的邻国，否认有任何秘密条款或附加的协定。

智利和玻利维亚两国1866年的条约执行得不好。双方对于如何分享收入，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智利提出抗议，1874年又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把边界定在南纬 24° ，并规定玻利维亚在25年内不增加在它管辖范围以内经营的智利各硝石公司的税收。玻利维亚总统达

萨在两个强邻所施加的压力的夹攻下，决定与秘鲁合作。他对设在安托法加斯塔的一家智利硝石公司增收出口税。对此，公司和智利政府提出抗议，玻利维亚当局不为所动，坚持开征，并且在对方拒绝付税的情况下，没收了智利这家公司的财产。智利的部队随即于1879年2月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秘鲁政府试图调停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的争执，可是，智利认为玻利维亚的政策是在秘鲁的纵容下制定的，拒绝调停，并要求立即解除1873年建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战争随之而起。

这一场战争被称为太平洋战争，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智利夺取了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但由于智利的舰队未能控制海上通道，它的继续推进被阻挡了，直到后来舰队总算把秘鲁的快速巡洋舰“瓦斯卡尔”号击毁。第二阶段，一支智利部队击败联军并占领塔拉帕卡省。1879年年末，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在秘鲁引起了政治危机。马里亚诺·普拉多总统突然出国去欧洲，表面上是去购买军火，这使全国为之张皇失措。这一非常事件发生不久，尼古拉斯·德·彼罗拉成功地领导了一次起义，在全国的一致支援下，试图继续组织保卫祖国的战斗。可是，智利的军队一胜秘鲁人于塔克纳，再胜于阿里卡。到1880年年中，这两个省完全落入智利的手中。当时打算进行和谈未成，美国出面进行斡旋或调停，但是手法笨拙，做得很不适当，所以也没有成功。1880年年底，智利的军队向北推进，指向利马。1881年1月，秘鲁首都经过在它郊外的一场殊死战斗后被攻占。彼罗拉政权倒台，只有在内地的某些游击队还在坚持抵抗。占领军肆行抢劫，破坏财产，这就引起冲突，给和谈带来了困难。在秘鲁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取得人们的普遍支持，也无人能找到一个和智利谈判的基础。最后，总算由米格尔·伊格莱西亚斯将军出来，面对大势所趋的现实，签订了《安康条约》，把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同意智利占领塔克纳和阿里卡10年，然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最后如何处置这两个省。

太平洋战争除了对交战国产生影响以外，还引起了各种反响。反响之一表现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关系上面。这两个国家在边界问题上有争议，已有好几十年。争议地区在大陆的极南端，是一块除了少数印第安人以外无人居住的地方，直到19世纪中叶，智利才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叫阿雷纳斯角的城镇。但是，这时两国都开始认为这个地方愈

来愈重要。双方的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而且，谁也不肯让步。阿根廷愿意拖延下去，它的打算是它的财富和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最终会对它有利。智利试图争取巴西支持它的领土要求，但是没有成功。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现了危机。智利在这场冲突中不敢坚持强硬立场，因为这可能会促使阿根廷插手这场战争。于是，在1881年就一项条约达成协议，把在巴塔戈尼亚有争议的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让给阿根廷，智利只能控制麦哲伦海峡。

太平洋战争以后的几个年头里，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之间出现了相互抗衡高涨的局面。智利已被尊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头等强国。阿根廷和智利对两国山地边界的确切方位的争议尚待解决，智利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促使阿根廷增加它的陆海军人员和战斗力。在巴拉那河上游密西昂奈斯地区，巴西和阿根廷存在争议，1889年双方同意接受仲裁，从而消除了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边界的划定工作也在19世纪末完成。阿根廷和智利对两国边界究竟应该依照山脉的高峰还是大陆分水岭来划分，存在争议；1896年两国取得协议，把这一争议付诸仲裁。1899年至1902年间根据这一协议做出的决定正式公布。有一时期盛传要发生战争，这时此说烟消云散，两国关系有显著的改善。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德·里奥·布兰科男爵成功地处理了巴西到1900年尚未解决的大部分边界问题。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中美洲各国之间，棘手的边界争端持续不已，造成困难。

在1870—1900年这一时期，拉丁美洲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要素，那是经过吸收欧洲，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思想和流派而产生的。文明的某些方面，譬如说，在公共教育方面，在改进大学图书馆和设施方面，在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在发展宏伟的建筑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要视有无资金而定，所以，凡是积聚财富最有成效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就能够领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它和经济上的进步没有相互关系，在贫穷而不发达的国家里却产生了天才作品。

在这个时代，法国的影响占优势，法国的风尚是主要的，这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有教养的阶层读法国书，大学生的教科书也是法文的。拉丁美洲一些大城市新修的林荫路和大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巴黎林荫大道的翻版，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墨西哥城的改良

路，还有稍后几年仿效这一式样修筑的里约热内卢的里奥布朗科大街。交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得上层阶级的妇女能够依照巴黎的时尚穿戴。

在公共教育方面，德国和美国的影响是重要的。虽然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认识到全体公民都有文化的重要性，并且法律规定要提供某种公共教育，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扫盲工作方面真正取得成就。成就最大的是阿根廷。多明戈·萨米恩托受到在欧洲和美国的考察和旅行中的启发，在任总统期间（1868—1874年）建立了师范学校，为一套教育制度制定了标准和计划，由各省管理，但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鼓励。通过请进外国专家和在教育领域出版刊物，教学质量得以提高。乌拉圭1880年以后在萨米恩托的赞赏者何塞·佩德罗·巴雷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类似的进步，只是规模要小得多。在巴西，佩德罗二世做了很大的努力来推进教育事业，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到帝制时代末期，全国各省有6000多所中、小学校，包括在里约热内卢的唐·佩德罗二世帝国学院。

除了已经提到的国家以外，面向群众的普及教育工作做得极少。但在许多其他国家，高等和专门教育取得了进展。智利大学建于共和国的初期，在许多方面是拉丁美洲的一个样板。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大多数国家扩大并改进了它们主要学府中的课程和设备。然而在各国的教学和专业学校绝大部分是教法律和医学。大学里的研究工作这一功能，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过，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国家里，都创建或改进了国立图书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材料。

尽管拉丁美洲各国可以吸取西班牙艺术的伟大传统，而且，在有些国家还存在着很有价值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遗产，但它们在19世纪后期，在艺术上并无重要的或创造性的建树。在音乐方面就几乎完全是派生的，按照法国和意大利所赞赏的方式，努力追求演奏李斯特或威尔第等浪漫派作品的技巧。在雕塑方面，则限于使用学院派的手法，为公共广场制造纪念性的作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欧洲的工作室里创作的。在绘画方面，风格还多一些。虽然有许多是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画的学院派的肖像画，以及作为公共建筑物中装饰用的战争场面和其他激发民族感情的历史绘画，但也有一些超出这一范围的作品。乌拉圭画家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是个卓越的

肖像画大师，他的作品大部是在阿根廷绘制的。他也创作了一些戏剧性的油画，风格近似德拉克鲁瓦。^[1]19世纪阿根廷最杰出的艺术家是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1870年以前创作的，但他本人一直活到19世纪的晚期。他创作的一些出名的肖像画，对色调的处理尤称一绝，他还创作了一些极为有趣的风俗画。再晚一些时候，在19世纪末，阿根廷最杰出的画家是爱德华多·西沃里，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库尔贝和马奈^[2]的影响。在墨西哥，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绘画，出自具有卓越才能的风景画家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的手笔。他的墨西哥风光习作，如果说没有胜过同一时期美国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和这些人所画的落基山脉和美国西部风景相媲美。贝拉斯科本人出自一个意大利画家的门下，后来是迭戈·里维拉的业师，里维拉以后成为20世纪墨西哥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拉丁美洲人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创作成就是在文学方面。19世纪末年文学史上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两个流派：小说从早期的传奇形式，通过地方色彩派这一过渡形式，演变成得到充分发展的现实主义风格，后来又演变成自然主义风格。巴西在小说方面是个最为重要的国家。若阿金·玛丽亚·马查多·德·阿西斯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拉丁美洲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跨越整个走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时期。在19世纪末，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以其非凡的文艺—哲学—社会学作品《腹地》，还有若泽·佩雷拉·达·格拉萨·阿拉尼亚以其描绘在边境地区环境中互相冲突的各族人民的作品《伽南》，开创了自然主义流派。西班牙美洲的散文，虽然也出现了类似的流派，然而，它所产生的成果，如加列戈斯·里维拉以及其他许多人在20世纪初期的作品，要比在巴西稍晚一些。传奇性的风格在1900年以前就已经衰竭，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表现这种手法的媒介是风俗派的素描，也就是高卓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流行要归功于何塞·埃尔南德斯等人，而主要应归功于智利作家阿尔维托·布莱斯特·加纳的小说。自然主义于20世纪初在墨西哥的费德里科·甘博亚的作品中出现，他的作品似乎脱胎于左拉的模式。

西班牙美洲文学中的诗，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个丰富多彩、别开生面的时期。它的现代化运动，在某些方面是从法国诗人魏尔伦和博德莱尔那里汲取了灵感而产生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像是美洲诗人的独立宣言，在诗的形式和词汇方面，不再受西班牙传

统的束缚。这一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是尼加拉瓜的鲁宾·达里奥。他在他的诗篇和散文中，树立了他处理一切感觉印象的典范，自由奔放而又敏感。他还善于创造出新的方法来表达这些印象。凡此都对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是阿根廷的莱奥波尔多·卢格内斯，秘鲁的何塞·桑托斯·乔卡诺，还有墨西哥的阿马多·内尔沃，都是这一流派中有数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一现代化运动，从拉丁美洲传播到西班牙，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影响着所有随后使用西班牙文的作家们。

然而，在1900年，这些在19世纪末给予拉丁美洲文学以新的活力的年轻人，没有一些年事较长，往往是政治家、记者、教师或其他专业人才的人们那样知名，他们对19世纪所产生的影响，也比不上那些人。在加勒比地区，马蒂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心爱的古巴。在西班牙美洲的文化人中间，一种彼此本是兄弟的情感正在滋长，马蒂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也超出了他们本国的范围。在本文涉及的这一时期之初，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阿根廷与暴君作对，热心于教育事业。在早年的流亡生涯中，他到了智利，后来去游学，出使外国，到过不少地方。在乌拉圭的教育事业方面，他对巴雷拉有明显的影响。他还做了不少工作，让美国和阿根廷的教育家互相接近。在19世纪末，乌拉圭人何塞·恩里克·罗多对整个西班牙美洲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名论文《爱丽尔》（1900年），鼓吹西班牙美洲精神上的团结，警告人们提防所谓的美国物质主义文明，在下一代的理想主义大学生和文人中间被奉为“圣经”。在加勒比地区，波多黎各的欧亨尼奥·玛丽亚·德·奥斯特罗作为一个改革家，后来又作为一个革命者，遍游“新世界”各地，一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班牙或美国——的宣传家。他还为改进他本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教育事业而勇敢地工作。恩里克·何塞·巴罗纳，作为爱国者、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古巴有非常类似的影响。

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是多才多艺的，这是拉丁美洲独具的特点。这许多人很难把他们归入那一类，因为他们集许多不同性质的活动于一身。仅举两例，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方面的发展。巴托洛梅·米特雷在3个不同领域里都是知名人物。他在阿根廷国家组织的危急时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杰出的政治领袖。在几次内战中，从反对独

裁者罗萨斯的战役（1852年）到反对萨米恩托政府的未遂的起义（1874年），他都参加了，并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他又是阿根廷部队在巴拉圭战争中的领导人，并且出色地率领他的军队作战。还应记住，米特雷是当年阿根廷的第一个新闻工作者。他是《民族报》的创刊人。这家报纸从他那时起直到现在，一向是阿根廷的几家著名报纸之一。在他的第三个活动领域里，米特雷大概是阿根廷最有才能的史学家，也是至今仍拥有读者的少数当年西班牙美洲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圣马丁及美洲独立史》和《贝尔格拉诺及阿根廷独立史》，这些是米特雷晚年的作品，在19世纪80年代问世。这两部书既有生动叙述的风格，又能尊重文献史实，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无法把自己冷静地置于所要叙述的主题之外，但是他所写出的历史，可以和英国的麦考莱或美国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媲美。

拉美文人多才多艺的另一个例子，是智利人迭戈·巴罗斯·阿拉纳，他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的不朽之作《智利通史》。这部叙述他本国历史的著作，从西班牙征服以前写起，一直写到智利取得政治独立这一时期为止。这是拉丁美洲这类历史研究专著中最重要、最独具匠心的作品，一直被认为是19世纪的科学性的表现。除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以外，巴罗斯又是智利教育史上的第一流人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巴罗斯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致力于创建一套完备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他是著名的圣地亚哥国家学院的教师，又是智利大学的教授。他个人对两代年轻的智利知识分子有重大的影响。作为该大学的校长，他对组织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是有影响的。他的第三种活动使他进入国会，为他的国家服务。在国会中，他是个坚决的自由主义派，他又是个外交家。在智利和阿根廷关于巴塔戈尼亚的归属问题的争执中，他运用自己在历史方面的才学为智利辩护。他出面谈判了一项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智利在太平洋战争中于1881年放弃了它对这一地区的要求。

回顾一下19世纪后半期的拉丁美洲，可以理解当时许多拉丁美洲人对进步抱有的乐观情绪和信心。经济上和物质上的进步是存在的，虽然这些进步的许多方面，在分布上是不平衡的。在有些国家里，政治上的稳定有所加强；然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那就是寡头政治的统治，它无视广大公众的利益；在许多国家，内战和独裁政

权似乎已成为地方流行病，这些国家很难说有任何改进。还要再过15年，一个新的时代才会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动乱的影响要波及拉丁美洲，改变传统的关系，因为俄国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国家，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只有在这个较新的时代中，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才会在拉丁美洲发生，和日益加速的经济变化齐头并进，给这个大陆上千百万贫穷的人民带来比较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中的主要因素——工人组织及其政治活动，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民族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内就已经有了预兆。这个时期从表面上看来，社会改革停滞不前，而经济进展则突飞猛进。

（任家桢 译）

[1] 法国19世纪的著名画家。——译者

[2] 二人均系法国19世纪中叶著名画家。——译者

第二十章 国际关系

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洲的均势臻于十分完美的程度：即在5个大国（也许还可以算上第六个）中，每个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但没有任何一个，其势力强大得足以支配其余的大国。法国和德国的对立无法调和，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的对立，尽管不像法德对立那样长期持续，也是无法和解的。这种情况就使得这些大国之间不可能结成任何举足轻重的联盟。欧洲的均势看来仿佛是一个自然规律，它自行发生作用和自行调节；欧洲在近代史上享有最长久的和平时期；各大强国都转而把精力用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每个大国都建立起殖民帝国，有的就在自己的后门口，有的则在海外。

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造成了这种罕见的均势。战争的起因本来是法国企图阻止德意志走向统一；而战争的结果却把欧洲从受法国支配的阴影笼罩下解放出来，但并没有使德意志帝国获得主宰地位。这次战争仅在欧洲范围以内，而且限于欧洲强国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实际上，战争只限于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这种局面是出乎意料的。英国在比利时的安全一旦获得保证后真正保持了中立。但奥匈帝国则打算站在法国这一边进行干预，尽管这只是在法国打了胜仗以后。俄国最初曾经用暧昧的态度表示要胁迫奥匈帝国保持中立，接着，它又用同样暧昧的态度筹划与奥匈帝国竞争，以讨好法国。所有上述打算都随着战争的演变而突然落空。边境几场战役都对法军不利。9月3日，法军主力被击败，被迫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成了俘虏。法兰西帝国被推翻，共和国在巴黎宣告成立。

色当战役结束了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多少世纪以来法国主宰欧洲的局面从此成为陈迹。德意志现在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了。由于德国要求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普法战争又拖延下去。德国提出这个要求的表面理由是出于军事上的安全，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为了满足民族的感情。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要想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首先必须收复旧德意志帝国失去的领土。于是，法国举起了保卫国家的旗帜，由双方内阁开始的战争变成为两个民族间的战争。梯也尔在欧洲到处奔走，寻求盟友，然而毫无成效。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都不害

怕德国获胜。奥国人希望德国在近东方面给予支持，而俄国则盘算一个愤懑难平的法国将会遏制德国。只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反对在没有征求当地居民意见的情况下，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其主张是根据道义上的而不是权势方面的理由，但他没有获得他的内阁的支持。

此外，俄国宣布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黑海中立化的条款，从而把国际关系的焦点转移到东方。英国威胁要进行战争，最低限度要恢复“克里米亚联盟”。俾斯麦却不愿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可能使法国找到盟友，或至少使它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申述它的理由。俾斯麦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这场危机，其办法是让俄国和英国同样都能如愿以偿。俾斯麦建议召集一次限于讨论有关黑海条款的会议，而且，事先保证废除上述条款。这样，俄国就不再被人捆住手脚；在英国方面，它也总算维护了条约只能通过国际协议才能修改的原则。俾斯麦得到的报酬是，大家都许诺，在1871年1月伦敦召开的会议上，绝不提起德法两国之间的战争问题。

因此，法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但这并不能扭转色当溃败造成的定局。甘必大于是仿效1793年雅各宾派呼吁总动员的做法，宣布国家处于危险状态。虽然他把新军投入前线，但这些新军未能击败德军，也无法防止巴黎的陷落。1871年1月底，法国不得不接受德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成为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最后和约。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只是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贝尔福；法国必须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这笔赔款正好相当于1807年拿破仑一世从普鲁士索取的赔款额）；在赔款没有偿清以前，法国必须担负德国占领军的费用。这种和约条款确实是战胜国强加于对方的拿破仑式的媾和条款。然而，俾斯麦并未企图控制未来的发展。法国仍然是个大国。法兰克福条约既没有限制它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控制它的外交政策。如果法国想要复仇的话，道路是畅通无阻的，但法国却不能走复仇的道路。色当战役及其后果与其说是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不如说是它们象征着这种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对比越来越对法国不利。德国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在不断增长，而法国则几乎停滞不前。

当时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预料法国会早日进行复仇战争。虽然法国在梯也尔领导下一直采取“履行条约”的政策，但它也模仿德国的模式，推行普遍兵役制，并改组了军队。俾斯麦把孤立法

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石。1873年，俾斯麦使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一同加入“三皇同盟”。表面上，这是一个保守势力的神圣同盟，矛头针对着垂死的社会主义国际（卡尔·马克思刚把社会主义国际移到纽约，使它过早地告终）；实际上，其目的是三国互相约定，不与法国结盟。三皇同盟本身带着致命的病菌，即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没有放弃它们在巴尔干半岛方面的敌对意图。相反地，在同盟条约中出现了这样离奇的条款，规定即便当两国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争端的时候，双方都不得使这种争端“影响两国深切关注的最重要的一致”。跟神圣同盟一样，三皇同盟只不过是适合晴朗天气的一种体系，只要巴尔干风暴兴起，它就会被刮得荡然无存。

然而，巴尔干半岛毕竟还是平静无事的，而法国则是可能的风暴中心。1873年，梯也尔被赶下台；继起执政的拥护君主政体的一派人希望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来恢复法国的威信。他们朝夕梦想建立一个天主教同盟。他们首先庇护教皇——从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占领罗马以来，被关在梵蒂冈的一名囚犯。后来，在1874年放弃了庇护教皇的方针后，他们又转而猎取更重要的猎物，在“文化斗争”中支持德国罗马天主教徒。俾斯麦一向易于察觉广泛存在的反对他的阴谋，据他自称，他已看出了国际教权主义者对他伸出的黑手。至少，这看来是关于1875年4月俾斯麦策划所谓“战争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最合乎情理的解释。俾斯麦未必真正想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这条道路是违背他的最深切的感情的。但他打算借此恫吓法国人，使他们不敢利用教权主义者，同时也许会放弃重整军备。与此相反，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卡兹却利用这个危机得到了好处。他装作大难临头，向其他大国寻求保护，而一些大国果然予以响应。尽管奥匈帝国保持缄默，英俄两国在柏林向德国提出了告诫。俾斯麦假装惊讶，然后，便否认德国有任何侵略意图。这样，危机便告消失。法国算是取得了胜利，尽管它的性质是特殊的。英俄两国联合起来保护法国，并挽救了和平。但是，它们挽救的和平只是《法兰克福和约》基础上的和平。英俄两国都不打算扭转色当战役造成的局面，而是保证这种局面不致重演。两国都对当前的均势感到满意。两国都反对德国进攻法国；同样，也不支持法国进攻德国。这样，说来也怪，“战争迫在眉睫”的危机，反而使欧洲在超过一个时代的时期里没有发生战争。

法德两国的关系这样稳定下来后，只剩下巴尔干还是一个冲突的话题。1875年7月，冲突终于在巴尔干爆发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省发生叛乱。俄国和奥匈帝国谁都不愿把东方问题挑开；但是只要问题一挑开了，俄国就不能不管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而奥匈帝国却不敢让斯拉夫人获得成功。两国都设法信守在三皇同盟盟约中许诺的保证。他们企图通过在巴尔干进行改革的计划来避免这次危机。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首先建议，由各大国领事就地会商，平息波斯尼亚省的叛乱。于是，安德拉西拟订了1875年12月30日的照会，列举各大国应向土耳其建议的改革方案。接着，安德拉西在同俾斯麦和俄国首相哥恰科夫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了1876年5月13日的柏林备忘录，备忘录中不但列举了改革条款，还勉强地暗示了为了执行改革将采取的“制裁”。但是，由于土耳其政府的顽固反对，所有这些计划全都成为泡影，因为土耳其政府认为，推行这些改革会导致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土耳其的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俄国和奥匈帝国就分道扬镳了。安德拉西不愿逾越三皇同盟向土耳其所提出的劝告范围以外。哥恰科夫则希望以“欧洲协同比”的名义在巴尔干强行改革。他把法国也拉进谈判中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也卷进去。在过去，英国曾经一度积极倡导过“欧洲协同比”，但自从1864年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遭到失败后，英国从此再也不愿过问欧洲的事务了。保持孤立成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调；随着孤立政策而来的，当然就是采取孤立的行动。英国在既无盟友、又放弃外交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大干，要么什么也别干。这就是说，或者完全不过问某个问题，或者诉诸武力。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就难怪从1871年到1904年这段时期中，只有英国独自采取正式的战争威胁来对付另一个大国——1878年和1885年对付俄国，1898年对付法国。英国政府已经忍受了由领事团就地会商的办法以及安德拉西的照会，虽然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土耳其的利益。对于柏林备忘录，英国则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了——尤其是它传到伦敦时，正值周末假期。英国拒绝了备忘录，派舰队到贝西卡湾，从而鼓励土耳其抵抗列强的压力。

这正是土耳其一向愿做的事情。但平息叛乱，则非他力所能及。6月间，叛乱活动蔓延到保加利亚；土耳其所作的回答是制造了“保加利亚惨案”[\[1\]](#)——这是19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暴行，直到20年后，亚美

尼亚发生的大屠杀才使之逊色。俄国政府这时虽然还不愿打仗，但禁不住俄国国内斯拉夫民族主义情绪的猛烈冲击。哥恰科夫最初希望奥斯曼帝国会自行瓦解；所以，7月间他和安德拉西在扎库比（德文名称为赖克施塔特）达成协议，俄奥两国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可惜哥恰科夫的美梦落了空。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僵局，叛乱不时发生，屠杀层出不穷，然而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崩溃。俄国的干涉看来是迫在眉睫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11月间就公开予以暗示。哥恰科夫迫切地想使俄国不致重蹈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孤立无援、遭到失败的覆辙。他请求俾斯麦促使奥匈帝国保持中立，以报答据说是1870年俄国曾对德国的效劳。但俾斯麦加以拒绝。他后来声称，要是俄国肯答应保证让德国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话，他本来是会同俄国“患难与共”的。俾斯麦的话不过是说辞。奥匈帝国必须继续作为一个强大国家存在下去，这是俾斯麦对内对外政策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俾斯麦并不反对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成功，但这必须符合奥匈帝国的利益，而不应加以损害。俾斯麦所做的这个“重要的拒绝”在欧洲各国关系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从拒绝支持俄国去反对奥匈帝国，转而支持奥匈帝国去反对俄国，这是很容易的事情。1879年，俾斯麦终于采取了这一步骤，从而奠定了未来的发展形势。

哥恰科夫在拉拢德国失败后，又转而试图同法国修好。不料此举又使他失望。法国推托说，他们还没有从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中恢复元气，这虽也确是事实，但实则是一个合适的托词，它使法国借此免于卷入东方的危机，而不致得罪俄国。俄国的最后一招是向“欧洲协约国”求援，而这并没有使它完全碰壁。甚至英国也向“欧洲协约国”靠拢。“保加利亚惨案”在英国激起了一个由格莱斯顿领导的强烈的抗议运动。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不得不赞成对土耳其实行改革。1876年12月，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在为了尽力处理东方问题而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只有这一次是真正在现场召开的。这一次又制订了各种彻底的改革方案；而土耳其又一次躲避了——不过，土耳其这一回采取的办法很巧妙，它首先公布了一部宪法，然后坚决认为，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交付立宪会议审议，而这个立宪会议却始终未曾召开。尽管这样，君士坦丁堡会议却适合俄国的目的。虽然各大国不愿把会议制订的改革方案强制别人执行，但当俄国着手这样做的时候，各大国却又无法加以反对。“欧洲协约国”既未能在土耳其实行改革，现在也就不会去保卫它了。

甚至英国人这时也愿意站在一边而不介入。他们坚决认为，绝不当采取任何行动，使埃及受到干扰，关于这件不大可能发生的事，哥恰科夫立即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英国人还声明不能容忍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哪怕是“暂行的占领”也不行。关于这一点，哥恰科夫也深表同情地应允了。他本来不愿俄国为君士坦丁堡背上包袱。但土耳其要是崩溃了，谁敢保证将来发生什么后果呢？到时候究竟是欺骗英国人，还是欺骗得胜的俄国将军们，关于这个问题，哥恰科夫宁愿暂时将它搁置起来。

俄国所要求于奥匈帝国的，不仅是容忍，而是更积极的许诺。它需要奥匈帝国明确答应，如果俄国军队要安全地通过罗马尼亚这个隘道，它将保持中立。安德拉西准备进行讨价还价。作为最后一招，安德拉西宁愿让俄国在反对土耳其方面获得有限的成功，而不愿欧洲发生一场大战。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是胜是负，总会把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现存秩序打得粉碎。在哥恰科夫这方面，他对泛斯拉夫野心并不是很热情的，因此，他准备对俄国预期获得的好处加以限制。1877年1月15日签订的布达佩斯协定规定，一旦土耳其帝国瓦解了，将不应存在“任何庞大的、组织紧密的国家，不管是斯拉夫国家或其他国家”。作为交换条件，奥匈帝国答允在俄国与土耳其交战时保持善意的中立，而放弃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它曾经参加的三国对土耳其的共同保证。对于哥恰科夫来说，这是他在外交上获得的一大胜利，尽管对俄国还施加了一些限制。克里米亚联盟终于瓦解了；而且，直到柏林会议为止，安德拉西是履行了保持中立的诺言的。除此以外，谁能说一旦土耳其真的崩溃后，巴尔干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现在又是哥恰科夫可以决定究竟是欺骗安德拉西，还是欺骗泛斯拉夫主义者了。最关紧要的是眼前的利益。由于哥恰科夫的外交手腕，俄国现在可以放手用自己的武力处理东方问题了，这在19世纪中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事情的发展却使人大出意外。俄国的军事实力证明不足以实现它的目的。4月24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表面上是为了实施君士坦丁堡会议通过的建议案。俄国军队通过罗马尼亚向前逼近，并渡过多瑙河，但俄军在普列文要塞遭到阻挡。他们打得筋疲力尽，直到12月11日才攻下了普列文。在普列文进行的长时间战斗（实际上不是围攻，而是苦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堑壕战的雏形。所

不同的只是普列文战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6月间，当俄国攻打普列文时，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已经呈现即将土崩瓦解的迹象。而到12月间，俄军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国内的舆论已开始转变过来。普列文的英勇保卫战洗刷了“保加利亚惨案”的耻辱；这使英国保守党政府又回到当初采取的支持土耳其的政策。1878年1月底，俄军好不容易才进抵君士坦丁堡的门口；然而，奥斯曼帝国并未崩溃。虽然土耳其军队已经几乎溃不成军，俄军仍然无力给予最后的一击。直到谣传英国舰队开来而且后来真正开到君士坦丁堡时，才使战争告终。

俄国人本来认为只要战争一开始，奥斯曼帝国就会自行瓦解。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现在俄国人不得不在和约上打主意了。他们最初打算要求开放黑海海峡，但是，既然俄国在黑海并没有舰队，因此，即使这个要求达到了，也只是理论上的收获，实际上反而不利。于是，俄国转而增加君士坦丁堡会议主要建议的条件，要求“大保加利亚”获得自治。这倒并不是玩弄权术。取代土耳其统治的唯一办法，看来只能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俄国的缔结和约者则按照当时最高水平的人种学知识来划定保加利亚的疆界。但土耳其人认识到，这个“大保加利亚”必然会招致其他大国的反对；因此，它接受了3月3日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充分相信这项和约不久就会被推翻。一场大战似乎迫在眉睫了。英国始终把舰队停驻在君士坦丁堡，而且，示威性地把印度军队也调到马耳他。安德拉西虽然回避英国提出的关于结盟的要求，同时也避免答允俄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奥匈帝国保持中立。谁也猜测不出安德拉西的真实意图，也许连安德拉西自己也不明白。可是，俄国如果得不到奥匈帝国保持中立的坚决保证，是不敢重新发动战争的，也许即使有了保证，俄国也不敢发动战争。英国人已经准备在没有盟国的情况下迎战，事实上，甚至在军力不足的条件下迎战。这是一场神经战，英国获得了胜利。5月30日，俄国人同意把《圣斯特法诺条约》提交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并且达成谅解：“大保加利亚”将被取消。4月初就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还以下述两项协议进一步扩大他的成就：一是他保证了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安全，作为交换条件，租借了塞浦路斯岛；另一项是他在反对建立“大保加利亚”的问题上，取得了奥匈帝国经过拖延才给予的支持。

1878年6月13日举行的柏林会议是欧洲政治家的一次盛大集会，参加会议的有德国、俄国和英国的首相（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国际会议的英国首相）和各大国的外长。“大保加利亚”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半独立的公国；一个东鲁米利亚自治省；剩下的部分称为“马其顿”，仍然归奥斯曼帝国治理。奥匈帝国则负责治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即爆发叛乱的两个地区。出人意料的是，柏林会议对黑海海峡归属问题，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索尔兹伯里于5月30日同意黑海港口巴统应划归俄国；但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为愤慨。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索尔兹伯里宣布说，关于黑海海峡关闭问题，英国今后只能是尊重苏丹的“独立的决定”。在英国看来，苏丹只有采取亲英态度才能算作独立。从此以后，英国就能在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自由通过黑海海峡，对俄国说来，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驻在黑海的英国舰队的幽灵困扰俄国的政策几乎有20年之久。

柏林会议宣称它使一场大战免于爆发并解决了东方问题。这两种说法都言过其实。早在柏林会议召开以前，战争即已避免。实际上，当俄国军队在君士坦丁堡门前停止前进的时候，战争已经打不起来了。另一方面，柏林会议并不能使奥斯曼帝国重整旗鼓，再度成为一个独立大国。1875年到1878年的事件使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已不复存在；虽然此后奥斯曼帝国还苟延残喘地支持了30多年，但这主要是因为各大国忙于别的事情，而且害怕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将引起巨大的骚乱。因此，柏林会议的实际成果是微不足道的。直到俄罗斯帝国垮台后，英国舰队才得以驶进黑海；保加利亚分割成的三部分领土中，两部分没有几年就重新合并，而且得到1878年坚持分割它们的那些大国的赞赏。柏林会议把马其顿重新置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是一个错误，而更糟的是，它把波斯尼亚划归奥匈帝国。前一行动引起了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后一行动则引起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

这样的大错竟然发生在这次经过精心安排的会议上。更令人费解的是，柏林会议为什么在巴尔干问题上大惊小怪。欧洲大陆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大陆以外，也正在酝酿甚至更大的变化。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完成统一；法兰西失去了往昔的优势地位，并失掉了两个省；教皇丧失了世俗的权力。非洲很快就要被列强瓜分；几个强国正为瓜分中华帝国而争吵不休。所有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都聚集一堂，人数空前，面临的问题头绪纷纭。但是，他们认为所能讨论的

竟然仅仅是少数几个巴尔干村庄的命运问题。更有甚者，在柏林会议以后，东方问题竟继续支配着国际关系达许多年之久。这次会议形成的各种联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每个国家的外交部部长都围绕东方问题来调整政策，然而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东方危机此起彼伏，似乎层出不穷，人们施展了种种手腕，大家却都平安无事。

为什么发生这一切呢？一些外交家们指出，这种僵局是他们坚持不懈地施展策略的结果。一些冷嘲热讽的急进分子则反驳说，一切所以太平无事，是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危急的事情，而东方问题只不过是为了使外交人员捞到一些“额外的好处”而保持下去。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保持均衡可以遏制事态的发展，东方问题实质上成为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一个问题。人们长期以来把它看成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致连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重要也忘却了，即使他们过去曾经知道这一点的话。不过，决定性的原因也许在于东方问题实质上已成为一件消极的事情。如果两个大国之间抱着互相对立的野心的话，它们之间往往可能达成妥协。如果一方仅仅是要把对方排挤出去的话，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占有是达成交易的实际保证；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需要依靠对方的诚意——而在东方问题上正是缺少这一点。在俄国人方面，撇开少数泛斯拉夫主义鲁莽分子不谈，他们只不过想拒英国海军于黑海之外，而英国人则仅仅要使俄国人不染指君士坦丁堡。但每一方都深知对方的侵略意图。同样，奥地利人只希望阻止任何敌对国家控制通向萨洛尼卡的通道；法国人则希望保护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各方实际上都希望土耳其保持独立，但每一方又把这种独立解释为土耳其必须从属于它。哪怕是略有一些相互信任或者甚至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东方问题也就会从国际议事日程上消失。大约20年后，当所有的大国都不理睬巴尔干问题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使他们自己也觉得大出意外。

俾斯麦作为当时最明智的外交首脑，一直主张采取这样的做法。他把巴尔干地区居民说成是“偷羊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巴尔干地区而牺牲士兵的性命，更不用说牺牲波美拉尼亚士兵的性命了。就物质利益而言，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和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区相比，巴尔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争夺目标，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受到威胁的只是声望和战略地位，而这些比物质利益要重要得多。俾斯麦经常敦促其他大国不要理睬近东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采取

均分的办法——把君士坦丁堡连同东巴尔干地区分给俄国，萨洛尼卡连同西部划归奥匈帝国，英国则可以控制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因此，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建议索尔兹伯里“占领埃及”。由于同样的原因，又鼓励法国在突尼斯寻求它应有的好处。但是，各大国并不欢迎他的建议。首先，就像4年以后英国人在埃及所做的那样，每个国家都想得到自己的一份，而不愿把任何东西让给别人。更深刻的原因是，各国的目标都具有消极性质，这起了阻碍作用。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由于瓜分近东而引起纠纷。

更加深刻的原因是，当时各大国都缺乏共同的利益或信赖。在这个时代，各主权国家的混乱状况都发展到顶点；人们都认为，国际事务正如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那样，人人享受无限制的自由会自动给大家带来最好的结果。只有格莱斯顿鼓吹“欧洲协同体”。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是演奏者如果不同吹一个调子，怎么会有“协同”呢？当时并没有一个崇高的原则信仰能把欧洲团结在一起。君主国家的团结已成过去，各民族间的团结局面还没有出现。甚至对革命或对异教的入侵也还没有一种普遍的恐惧。相反，当时只有一种普遍的信心，认为每个国家都能够独立自主，而不致危及欧洲文明及损害自身。俾斯麦本人在评论“欧洲协同体”时曾经轻蔑地说：“无论是谁，谈论欧洲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还说过：“我听到一位政治家只是在为了给自己捞到某些好处时，才使用‘欧洲’这个词的。”俾斯麦赞成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但他有信心，认为他能够控制这种局面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和平。当然只要有一个“体系”的话，德国就能加以控制；但是，在俾斯麦的时代，德国的唯一的目的是消极的——它只想防止战争，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由于其他国家也抱有这种消极目的——虽然它们不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它们都默认俾斯麦的方针，尽管有时不免要抱怨一番。

柏林会议以前，俾斯麦曾经帮助俄国和英国设法达成协议。在会议后的几个月中，这个协议比起过去似乎更为渺茫。英国人因为获得成功而感到鼓舞，进而想攫取新的利益。索尔兹伯里计划使奥斯曼帝国在英国的保护下得到复兴。在小亚细亚，英国军事人员云集；英国使者不断地困扰苏丹，向他献计献策，尽管苏丹通常置之不理。在巴尔干诸国中，奥匈帝国和法国支持它们认为会获胜的一方。克里米亚联盟本已在新近发生的危机中消失，现在看来又将恢复。俄罗斯帝国

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这些新的威胁使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恼怒和惊恐。他们向俾斯麦求援，这一次俾斯麦做出了反应。他并不欢迎克里米亚联盟，正像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统治者们也不欢迎这个联盟一样。但另一方面，俾斯麦也不欢迎同俄国合作反对这个联盟。俾斯麦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也有过这样的政策考虑——乍看起来出人意料。他不是支持俄国反对英国，而是在1879年10月5日与奥匈帝国缔结了一项对抗俄国的防御联盟。他在当时和事后做了种种解释。有时说，他认为俄国进攻德国的危机迫在眉睫，需要得到奥匈帝国的支持；有时又说，他是在恢复以前神圣罗马帝国的那种大日耳曼联盟。有一个时期，他建议将这个联盟定为德意志帝国的根本大法；在另一个时期，他又劝告他的继任者要在适当时机取消这个联盟。不论是德国的和外国的历史学家又都对此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

俾斯麦在1879年10月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只要我们问一下：当时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答了。克里米亚联盟会变得强大起来；它会对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然后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或其他事件。更可能的是，使俄国遭受这样的屈辱就会破坏力量的平衡。过去曾经败于德国之手的奥匈帝国和法国，将会恢复威望；而在俄国之后，就该轮到德国了。事实上，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对英国人的态度变得冷淡了；巴尔干的事态发展，逐渐被人忘却。俾斯麦自己对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他和俄国大使谈到奥匈帝国时说：“我要在它和西方各国之间挖一条沟。”而当俾斯麦着手从奥德结盟发展到恢复三皇同盟时，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大约两年以后，他成功地恢复了三皇同盟。

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奥德同盟作为解决当前困难的权宜之计，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为什么俾斯麦要对这个同盟赋以那么严格的永久形式呢？在文字上明确规定的联盟，除非是作为战争的前奏，这种做法已经随着旧制度一起而过时了。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在此期间还没有一个大国承担过这种固定的义务。现在，奥德同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除了英国以外，每个大国都做出正式保证，将采取行动支持某些别的国家。然而，俾斯麦本人却轻视这种约束未来发展的做法。他曾经说，每一个同盟都有一条不成文的条款：“情势持续不变。”^[2]俾斯

麦这时已成为一位保守的政治家，或许他不但希望事物静止不变，而且他认为他能够使之静止不变。他或许也忽略了这一点：到了这个时期，同盟不是在君主与君主之间缔结，而是在国与国之间缔结。在18世纪，同盟是家族之间订立的契约，是帝王之间的私人交易。新的同盟则被公众舆论所注意，尽管人们对它们的确切条款毫无所知——但1888年公布的奥德同盟的条款却是公开的。实际上，俾斯麦自己的规则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详尽的条款以及各种保留和限制，其实际效果有如昙花一现。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这些响亮的名称已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决定了事态发展的格局。俾斯麦在缔结奥德同盟时，本想要保持他纵横捭阖的自由。相反地，每一个大国，包括德国在内，都成为俾斯麦所开创的同盟体制的奴隶了。

奥德同盟条约一经签订，它的明确的条款与它所产生的普遍意义之间的对比立即显示了出来，而且在条约的全部历史中，情况一直如此。条约的基本条款是两国均允诺抵抗俄国的任何进攻。俾斯麦的本意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他不会听任奥匈帝国作为一个大国而被消灭，但是，他也不会支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活动。而奥地利人则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保留；他们一直认为，德国现在由于条约的约束而和他们“患难与共”了。这样，就在维也纳和柏林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拔河赛，一直继续到1914年奥地利人把德国拖入战争为止。从1879年10月到俾斯麦下台为止，他的全部外交都是尽力把绳子往回拉，即企图逃脱他自己促成的同盟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他看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使奥匈帝国与俄国和解。但是，由于奥地利人不愿意，和解经常破裂，而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俾斯麦就设法为他们寻找其他盟友，这样德国便无须卷入。他的无与伦比的手腕使他能够成功地施展变幻莫测的计策；但是，如果没有缔结奥德同盟的话，这一切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俄国人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他们只要求近东的安全——黑海海峡不对英国的战舰开放，巴尔干诸国保持独立而不制造麻烦。他们渴望恢复三皇同盟；而俾斯麦也同意一俟奥德同盟签订，这件事就能实现。奥地利人则坚决反对，他们的政策是依靠英国人的帮助，“永远排除俄国”。1880年4月，这个政策不再有任何可取之处。英国自由党在格莱斯顿的领导下，在大选中击败了保守党。格莱斯顿希望以“欧洲协同体”来代替各国的单独行动，以此为基础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一

个新的时代。他只是在否定一些做法方面获得了成功。他放弃了索尔兹伯里对土耳其的政策；从小亚细亚撤回了军事人员；并无视对土耳其的保证，不过他没有归还土耳其作为交换物的塞浦路斯。但是“欧洲协约国”始终没有活跃起来。除了格莱斯顿以外，欧洲的政治家缺乏共同的认识。他们依赖势力均衡，只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使如此，格莱斯顿的行动自然使奥地利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被迫参加了三皇同盟。

新的同盟翌年才正式成立。最初是奥地利人反对，继而又因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而耽搁下来。1881年6月18日，同盟才最后签字生效。8年前，同盟的前身曾经是君主国家团结一致的宣言书；而现在的同盟则是一宗实际的交易，除了名称以外，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因素。三皇互相承诺保守中立，他们并宣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具有“欧洲的和相互承担义务的性质”——实际上，这是对奥匈帝国在过去所赞成的与英国合作的政策的双重否定。德国可以不必只限于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进行选择了。俄国在黑海海峡得到了安全，英国不至于不顾所有大陆国家的反对而采取单独行动。但是，奥匈帝国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奥地利人不相信俄国的诺言，不停地抱怨俾斯麦逼迫它陷于这样的处境。俾斯麦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使他们感到满意。意大利自从1861年完成统一以来，一直寻求跻身于大国之列。它寻求与别国结盟，实际上是想寻求别国承认它具有平等的地位，但这种承认却一直难以得到。在柏林会议上，意大利甚至位居土耳其之下，只是稍高于希腊。它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一怒之下，它就想争夺在突尼斯的控制权。这样就引起了法国的竞争。法国人本来宁愿对突尼斯不再过问，但他们不能容忍在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意大利人的据点。1881年5月12日，突尼斯终于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意大利人比前更受羞辱，君主政体本身岌岌可危。曾经一度是革命同盟者的萨伏依家族，现在转而争取保守势力的尊重。1881年10月，亨伯特国王为了求助于人，亲自前往维也纳，但是，奥地利人拒绝了他提出的相互保证的建议。1882年年初，意大利人偶然地交了好运。在俄国，有一个短时期内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重又流行。俾斯麦害怕俄国可能不信守三皇同盟。作为预防措施，他与意大利进行了谈判，结果在1882年5月20日缔结了三国同盟。在同盟条约中，有现实重要意义的条款只有一条，就是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发生战争时，意大利

答应保持中立，这样就使奥匈帝国能够抽出4个军团投入加里西亚前线。奥地利人白白地得到了这个好处。德国人所付的代价是同意保卫意大利抗击法国。就纸面上讲，这对于德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义务。不过在俾斯麦看来，这比起支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诸国进行扩张，还是合算一些。无论如何，他始终是以地道的拿破仑作风，认为不管他想做什么事情，总能如愿以偿。他可以设法以某种方式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保持和平，这样，他就永远不需要去履行他的义务。

事实证明，俾斯麦的打算是正确的。三国同盟和三皇同盟缚住了欧洲各国的手脚，没有他的认可，谁也无法妄自行动，而他是绝不会允许他们擅自行动的。局势的变化只在欧洲以外发生，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在埃及。英国和法国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对埃及实行共管，多年来一直在应付由于总督挥霍成性而陷于混乱的国家财政。1882年爆发了反对在埃及的欧洲人的民族主义骚动。两国计划共同进行干涉。但在最后时刻，法国政府由于议会的反对而作罢。英国单独进行干预；1882年9月，对埃及建立了保护关系（在开始时并未公开宣布）。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了70年之久。这是一件大事，实际上是从色当战役到日俄战争中俄国败绩这段时期内，国际关系中唯一的一件真正的大事。其余所有事件只是玩弄策略而已，战斗双方在结束时与开始时一样毫无进展。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改变了力量对比。这不但为英国通向印度的通道提供了安全保证，它还使英国成为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主宰；对于英国人来说，它从此也无须再站在第一线在黑海海峡反对俄国——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反对俄国了。此外，作为比较暂时但仍然是重要的后果，占领埃及一事使英国与法国的“自由同盟”解体，从而为10年后的法俄同盟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还不是直接的后果。相反，俾斯麦利用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不满，企图通过法德和解来最后完成他的“体系”。这个打算最后是落空了，因此无法确定当初两个国家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认真看待这个打算的——在历史上，失败的事是不会大书特书的。无疑，双方当时都是有保留的。在法国方面，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绝不会听从俾斯麦建议的“宽恕色当战役，犹如1815年以后他们宽恕了滑铁卢战役那样”。而且，在三国同盟中，德国的伙伴也并非真心实意地反对英国，因为可能有朝一日——当奥地利人反对俄国，意大利人反对法国时——很可能还要求助于英国。此外，以法德为一方，英国

为另一方，在非洲爆发了关于殖民地的争执，这就使大多数历史学家推断，法德合作只是这些争执带来的，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合作。就法国来说，情况也许是如此；但对于俾斯麦来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绝不是“一个要求殖民地的人”，因此，他突然提出要求非洲殖民地，这似乎属于他欧洲政策中的一招棋——当然，他不会拒绝接受由于提出这种要求而在德国国内带给他的声誉。

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是明白无疑的。不仅英国遭到孤立——这是它自己的抉择——而且它的两个追求建立海外帝国的主要对手法国和俄国，这次也不再为由于担心它们的欧洲安全而受到牵制。不仅如此，它们甚至还能经常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有限的。也许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认真考虑过对英国发动战争。从埃及到远东，都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但斗争是以外交方式，以借款、照会和铁路特许权作为手段来进行的。武力退居后台，成为几乎已为人们所遗忘的最后制裁手段。埃及的情况表明了这点。英国的陆军控制了埃及，英国的海军称雄于地中海。英国人可以随时宣布吞并埃及，而法国人却束手无策，不能加以制止。但是，英国人宣称，他们是按照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管理埃及的；埃及问题是在“债务管理局”里的争执，而不是在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争执。结果国际关系在两级基础上发展。一级是正式的同盟，保证在某种假设的战争中提供支援，而这种战争从未爆发。另一级是各银行家的和委员会的联合体。在第一级上，英国是大国中最孤立的国家，而在第二级上，则又是牵连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同盟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在全世界有着最广泛利益的国家，它既有无数的协约，当然也就有无穷的争吵。

即使在外交方面，英国在1884年和1885年年初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法国和德国在反对英国的殖民地扩张中走到一起去了。1884年7月，为解决埃及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以破裂告终，未获结果。俾斯麦向法国人提出了缔结海上联盟来反对英国的计划。向其他国家则夸耀他已经恢复了拿破仑一世的大陆联盟体系，不过这一次是以柏林为中心。1884年9月，三国皇帝在斯凯尔涅维采会晤，大陆的团结达到了高潮。这次会议是曾经召开的同类会议的最后一次。同年秋末，为了解决中非问题，特别是刚果河流域问题，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法德两国又一次显示了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的

伙伴关系，如果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话，在原则上却是如此。柏林决议书是国际事务中重要的一着。决议书订立了“有效地占领”未开化国家的规定，从而保证了瓜分非洲应在各大国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柏林会议还有附带产生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这次会议以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期中，再也没有召开涉及任何具体问题的国际会议——这实际上证明了欧洲协同体已经解体。每一个大国都是通过追求其本身的目标来为共同利益服务，似乎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就可以保证和平。

1885年4月，英国的孤立进入了最危急的时刻。3月30日，一支俄国部队在阿富汗北部边境平狄打败了阿富汗人，从而威胁了作为印度缓冲国的阿富汗的安全。英国人由于没有盟友，只得依靠自己的武力。4月21日，爱好和平的格莱斯顿作为进行战争的第一步，获得了下院的信任投票。英国人计划实行1878年索尔兹伯里的主张，派遣一支远征军通过黑海海峡。俾斯麦的联盟体系正像他当初计划的那样，起到了保护俄国的作用。每一个大国——不仅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而且还有法国和意大利——都告诫苏丹不要向英国人开放海峡。从拿破仑一世时代到希特勒时代，这是最有力地显示了建立在反英基础上的欧洲团结的一件事。一旦这种团结取得了胜利，它也就解体了。俄国人已经感觉到海峡形势不稳，因此它要在阿富汗对英国人进行一次反威胁。一旦确信海峡将会继续保持关闭，他们也就对平狄事件失去了兴趣，同意将这一争执交付仲裁——格莱斯顿的强硬态度这样就占了上风。阿富汗继续保持它缓冲国的地位直到今天：它是少数几个始终能在相互竞争的大国间保持其独立的国家之一。

对于英国人来说，平狄事件的和平解决并不是改善它的处境的唯一事例。在1885年夏季，法德协约逐渐瓦解，与其说是由于法国对德国怀有明显的敌意，不如说是法国对殖民地扩张抱有反感。而且，1888年9月，东方问题再度爆发，而俾斯麦由于奥匈帝国的关系，在对待英国人时不得不多加考虑。像前次一样，这一次新的东方危机的中心仍在保加利亚。但是，这次各国的立场正好与上次相反。在1878年，俄国人建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英国和奥匈帝国坚持必须将它解散。在1885年，保加利亚三部分中的两部分已合并——东鲁米利亚并入了现存的公国。俄国人想肢解保加利亚，或者至少要迫使它恢复到从属的地位。奥匈帝国和英国则要维护保加利亚的统一和独立。

从1885年9月直到1888年3月，这个危机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首先，俄国企图取消已成事实的统一；继而要委派一位俄国将军担任总督；最后则阻止选举一位反对俄国的国君。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宣告失败。1888年3月，保加利亚名义上的统治者苏丹宣布选举科堡的斐迪南一事不合法，这时俄国人得到了满足，但并未得到实惠。然而，任何事件也没有发生。危机消失了，战争也没有爆发。

回顾历史，人们不禁要说，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攸关存亡的大事。虽然保加利亚摆脱了俄国人的庇护，会使俄国人感到丢脸，但近东的局势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对于俄国来说，仅仅为了任命一位保加利亚国君，是否真正值得进行一场大战？无论如何，即使俄国人愿意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力量进行这种巨大规模的战争。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切并不是很清楚的，保加利亚危机曾在国际事务中引起了一场动乱。三皇同盟是它的直接受害者。奥地利人不顾俾斯麦怂恿他们采取相反的路线，决心抵抗俄国，并要求德国提供援助。俾斯麦让他们向英国求援。当时索尔兹伯里再度上台，同样不愿援助奥地利。德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竞相采取保留和躲闪的态度——两国都渴望避免战争，甚至避免承担义务，而且作为最后的理由，两国都怀疑战争是否真的迫在眉睫。1886年，在布朗热将军名义上的领导下，民族主义在法国再次狂热地兴起，这时俾斯麦得到了一个好机会。俾斯麦可以说明，德国由于受到法国的严重威胁，因此不能抽出部队去支援奥匈帝国。这是一个巧妙而难以驳回的借口。用俾斯麦的话来说：“我不能凭空造出来一个布朗热，但他的出现正合我的需要。”索尔兹伯里虽然不大关心保加利亚问题，但由于埃及问题的关系，不敢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过分疏远，其结果是在1887年3月签订了第一个地中海协定，根据协定，英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承诺在外交上互相支持。就保加利亚问题而言，这当然是奥匈帝国的一大收获，但更直接的结果却是英国以前由于在埃及问题上陷于孤立而受到威胁的情况宣告结束。

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的竞争尚未分晓。英国关于外交合作的诺言像其他任何承诺一样，几乎不承担任何义务；另一方面俾斯麦自己由于不得不同意恢复三皇同盟而有所妥协。两个人都想恢复自己的自由活动权。索尔兹伯里试图解决埃及问题，并且真的和苏丹（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订立了一项英国人有条件地撤退的协议。俄国人和法国

人提出抗议，吓坏了苏丹，他于是撤销了协议。俄国人的反对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法国人的主要动机是想在埃及得到俄国人的支持。然而，如果英国人撤出埃及，这种支持也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国际政策方面的错综复杂情况。无论如何，协议的失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索尔兹伯里被迫进一步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合作。法国除了寻求俄国的友谊外，别无其他抉择，这时，法俄两国缔结同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俾斯麦做得更巧妙。他自己付出很少的代价，帮助俄国人摆脱了在近东的孤立地位。6月18日，三皇同盟就法律意义来说，已届期满，俾斯麦便和俄国人订立了一项新的协定——再保险条约。这项条约重申了保持中立的诺言，但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俄国进攻奥匈帝国时条约不适用，德国进攻法国时也不适用。虽然两个签字国谁也不打算发动这种进攻，但这两项保留条件在含义中却一直存在。条约的其他部分具有更实际的作用——德国人将在保加利亚和海峡问题上给俄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当时虽还处于少数地位，但它至少还不是孤立无援，因此在道义上满足它的要求，可能有助于使它遵循和平的道路。再保险条约并无任何新的内容，它只不过是把俾斯麦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已经反复解释过的政策在文字上固定下来而已。在当时，如果条约的条款公布于世，虽不致使其他大国感到吃惊或被触怒，但必然会粗暴地伤害德国的舆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俾斯麦将条约秘而不宣——他执行的政策是违反德国人的感情的。德国和俄国之间虽无利害冲突，但是比起对任何其他国家来，德国对俄国怀有更多的敌对情绪。绝大多数德国人希望“西方化”和自由化，而廉价的俄国谷物所造成的威胁也使原来唯一的亲俄集团容克地主阶层与之疏远了。另外，俄国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一个即使在国势极度衰微时仍然顽强保持独立的国家，对于这一点，德国人不自觉地感到不满。俾斯麦知道如何使他的控制适可而止，而其他德国人则是比较难以克制的。

俾斯麦暂时可以随心所欲了。1887年秋，保加利亚危机显然达到了顶点。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又一次迫使索尔兹伯里摊牌；12月，奥匈帝国、英国和意大利缔结了第二个地中海协定。协定超出了单纯的外交合作，规定针对近东的任何“非法冒险”采取共同行动。比起英国在和平时期的任何协定来，这个协定更接近于一种同盟条约。同20年后英国与法国和俄国所订立的协约相比，这个协定当然有更多的

约束力，但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事件。俄国人并不想进行任何“非法冒险”，危机因此也就消失了。这一和平结局是力量均衡所产生的从未有过的最大成果，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对和平的共同意愿，才使力量均衡得以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俾斯麦当然愿意使他的“体系”长期存在——俄国虽受到三个地中海国家的遏制，但再保险条约给它以安抚，法国也因而被安全地孤立起来。事实上，俾斯麦的体系直至1890年3月他由于国内问题垮台为止，一直起着作用。此后，似乎随之而来了一次巨大的变动。俾斯麦的继任者，一些主张“新路线”的人物，对于俾斯麦的遏制与平衡的复杂模式表示厌烦。他们非但不承认德国的保留态度推动了英国，相反地，却相信如果德国也无限制地支持奥匈帝国，英国将会成为三国同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因此，他们拒绝使再保险条约展期，并且答应在巴尔干地区支持奥匈帝国。为了讨好英国人，他们宣布德国放弃达到尼罗河上游的任何企图。为了急于采取坚决行动，他们甚至答应支持意大利人在黎波里反对法国人的野心。事态的发展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非但没有被诱加入三国同盟，却乐于看到德国人承担起他们的责任，退向孤立。巴尔干地区幸运地变得很安静，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的诺言并无实际结果。但是，意大利人却自诩他们的外交上处于坚强的地位，这就引起了法国人的警惕。法国人出于无奈，只得向俄国寻求支持和结盟。

出于无奈，的确是法俄双方缔结同盟的主要原因。这不但因为共和政体与专制君主政体在本质上水火不相容，而且任何一方对于对方的实际利益也没有丝毫的同情。俄国人没有为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愿望；而法国，从它自己出发，在所有大国中最希望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它们唯一的共同利益是免除来自德国的任何威胁，以便每一方可以在其他地方追求各自的目标。但即使在这方面，它们的政策也不完全一致。尽管两国都是英国的对手，但它们与英国的敌对情况并没有部分吻合之处。法国要把英国人赶出埃及，俄国人则希望埃及纠纷继续存在，这样英法两国就会继续不和。俄国人的野心集中在中国的北部，而法国在那里却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尽管德国拒绝使再保险条约展期，但俄国人对德国并无严重的恶感，并认为法俄同盟是世界性的反英大联合。而法国人则希望最终会与英国和解，这样就会加强它反对德国的地位。

即使在军事目标上，这两个将结成同盟的国家也存在着冲突。法国人要求在爆发大战的情况下，应该保证有相当一部分俄国军队用来进攻德国；而俄国人则想打败奥匈帝国，并倾向于认为，只要他们自己能占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那么，即使德国人打下巴黎，也算不了什么灾难。因此，谈判旷日持久才达成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步，于1891年8月缔结了总的咨商协定；接着于1892年8月缔结了军事协定；最后于1894年1月，政治领导人最后确认了这项军事协定。法国总统直到1895年才被准许提到“同盟”一词，而沙皇则一直到1897年才公开承认这个同盟。就法律意义来说，法俄同盟只不过是发生对德战争的情况下，两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项保证而已。这就使德国不可能威胁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因而迫使它保持在俾斯麦当政期间它所乐意保持的和平。从表面上看，法俄同盟对俾斯麦的继任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但实际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恢复了俾斯麦的体系。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始终是防止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现在法国人承担了支持俄国的义务，因此也具有同样的目标。无论如何，巴尔干冲突的危机正在消失，法国和德国的影响都加快了这一过程。新的力量对比只提供了一种选择：或者是全面战争，或者是全面和平；而所有的大陆国家都选择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保持和平。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同样都变成了防御性的联合。任何国家想要冒险，它既要受到它的对手的遏制，也同样会受到它的同盟者的约束。

这种约束只适用于欧洲一地，正是欧洲的安全本身，使欧洲各国更易于在其他地区寻求“帝国主义”的目标。欧洲的僵持局面和欧洲以外的扩张，是同一形势下的两个不同方面：每一方面促成了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利益的英国受到了损失，法俄同盟开始了英国真正“孤立”的时期。英国人以前一直认为，其他人比英国人更需要帮助。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英国不是请求结盟，而是同意结盟。”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如果同英国缔结同盟，那就非但不会增加它的安全，相反会危及它的安全。英国人也曾认为它的海外对手——特别是法俄两国——会因对它们的欧洲边界忧虑不安而经常不得安宁。但现在，这些边界已经安宁无事。法国在西非和埃及对英国提出了挑战；俄国在远东无情地向前推进；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帝国主义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却有一个不公开承认的限度。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在欧洲大陆事务方面选择了和平；因此，它们只是在能够和平地取得帝国主义利益的时候，才这样做。如果法国不愿为了

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打仗，他们还会有多少热情为了埃及或暹罗去打仗呢？其他国家也一样。英国人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在欧洲没有什么可丢失的（或可得到的），他们准备为保持他们的帝国地位而战斗。由于英国的舰队在稳步扩充，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战斗。孤立地位在最初是一种令人为难的事，但到了后来，由于不受欧洲的约束，它反而使英国人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不受限制。

新的均势没有多久就显示它的作用。最初，似乎近东可能再次成为冲突的中心，特别是当1894年和189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引起了改革，也就是瓜分土耳其帝国的新要求后，情况更加如此。俄国人认为由于他们已和法国结盟，他们在近东的地位已经改善。地位的确是改善了，但只是在消极方面。法俄订立了同盟，英国当然不能按照地中海协定的旧章程行事，指望一旦英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抵抗俄国，法国会保持中立。现在既然法国成了俄国的盟国，英国人便不敢在后面跟着一个可能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的法国舰队的情况下通过海峡了。英国人建议，德国应该迫使法国保持中立。而这一点也必然是过分的要求，因为如果德国威胁法国，它的盟友俄国就会采取行动。德国和英国都向对方提出了不可能的事。英国人威胁要恢复它的孤立地位；德国人则采取了俾斯麦的相同手法，以结成大陆联盟来威胁英国，作为回答。

两国互相威胁，但是英国的威胁更为有效。由于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已经牢固，海峡对它已不再重要；1895年11月，英国舰队终于从爱琴海水域撤走。一个月以后，德国以詹姆森偷袭事件为借口，给克留格尔总统拍了一份声援电报，表示支持布尔共和国，并且暗示德国、俄国和法国向英帝国提出的挑战，将会是一致的行动。当然，这是虚张声势。俾斯麦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野心，他也不反对法国或俄国的野心，因此，他搞欧洲联盟或许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德国希望从法国和俄国得到支持，但又不想让它们因此获得很多好处。然而，法俄两国甚至连在它们自己的帝国事业中都不会互相帮助，要它们帮助德国岂不更加渺茫？此外，比起10年以前，现在的英国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为了回答德国给克留格尔的电报，英国人建立了一支“机动舰队”，表示他们有能力对付任何来犯者。

然而，正当德英两国陷于僵局时，俄国对于海峡的威胁——这是过去一直存在着的——消除了；不是由奥匈帝国或英国，而是由法国

消除的。法国人本来想避开这件事，但是其他国家均不过问，他们就只好采取行动了。因为，正如俄国根据法兰克福条约向法国提供安全保证那样，法国在柏林条约的范围内向俄国提供安全保证。1895年12月，当俄国人提出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法国人便回答说：“只要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能同样开始谈判就行。”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此外，俄国人对黑海海峡的关注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现在他们已经逐渐了解，英国人已经放弃了任何通过海峡的打算，俄国也就准备把海峡问题搁置一旁了。奥地利人依然愿意举行反对俄国的方针，但是由于得不到德国和英国的支持，他们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1897年5月，三皇同盟又以更加软弱无力的形式恢复了。俄国和奥匈帝国同意将近东问题冻结起来，并且在以后的一年中继续被搁置起来。这样，每一个欧洲问题都达到了暂时的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状态竟持续如此之久，以至1914年年初，一位善于审度局势的行家认为，现有的国家和疆界已经“永久地”固定下来了。

每一个大国的活动表明，它们仿佛已享有地理上的安全，这种安全已使英国人能够在“光荣的孤立”的状况下建立他们的帝国。这产生了另一个奇妙的后果。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从孤立主义者的地位出发，长期以来认为，外交政策是不必要的，战争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邪恶而引起的，这个观点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国。例如，在较早时期，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曾经谴责当时的国际秩序，并把梅特涅和沙皇尼古拉一世斥为和平贩子，因为他们维护一种不公正的现状。而1889年重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则教导人们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并且倡议组织一次总罢工来反对战争，因为任何战争只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一种自私的动机。甚至统治阶级出于良心的谴责，也反对战争；1899年举行第一次海牙会议提出国际裁军计划，虽然这次会议的唯一实际结果，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了海牙法庭。这个法庭只能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争端。对于诸如波兰问题，或者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帝国的前途等问题，法庭便无能为力了。海牙会议的建立，事实上证明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欧洲这种虚妄的僵局开始了一个短暂的“世界政策”时代。人们认为，各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竞争的目标如此之多，因为它们已放弃了在欧洲的争执，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欧洲争端极其棘手，难以处理，所以各大国才不得已把它们搁置起来。俄国和法国一直企图把欧

洲与它们的海外帝国合并起来。德国是这场争夺的新参加者。现在德国的经济实力已使它跻身于大国的前列，除了英国和美国外，它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德国应该像英美一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发展趋势还有它的政治原因。俾斯麦曾经认为，德国在欧洲的中心地位使它难以在海外进行扩张。他曾经对一个热衷于在非洲进行扩张的人说：“这里是法国，这里是俄国。那就是我们的非洲地图。”俾斯麦的继任者则认为，来自法俄两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被德国认为是对它绝对有利的。因为，只要法俄两国和英国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德国便能在既不激起英国的敌意，因而也不激起法俄两国的敌意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追求它的世界目标。德国一度曾是同盟体系的枢纽，现在却变成了“自由行动”的鼓吹者，乐得观看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德国从来没有和法国发生殖民地纠纷。德国计划修筑一条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这对俄国造成的威胁要比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抗所造成的威胁要小。最主要的，与法国或俄国相比，德国对英帝国的威胁要小，无论如何，在德国建立强大海军的计划完成以前，情况是如此，而这个计划一直等到1909年才告完成。虽然德国和英国之间在有关设想中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问题和在萨摩亚问题上存在着殖民地纠纷，但这些相对地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德国人没有提出欺诈性的前景，声称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或许能成为英国的盟友的话，这些问题也都能轻而易举地予以解决。

在世界政策时代中，决定性的冲突中心是远东。在这里，也像在近东一样，一个衰老腐败的帝国正在欧洲各国的入侵下土崩瓦解。然而，与近东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安全问题——俄国人不必为黑海问题而担心，英国人不必为通往印度的道路而忧虑。唯一的竞争目标是贸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一个想象中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进行贸易的前景，而事实上，这个前景始终没有成为现实。长期以来，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处于差不多是垄断的地位；但是，只要其他国家维护门户开放，英国也并不十分反对与这些国家分享贸易的利益。因此，当德国人于1897年夺取胶州湾^[3]，进入远东时，他们并没有提出严重的抗议；当美国短暂地突然以帝国主义面貌出现，于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征服了菲律宾的时候，英国还曾确实感到高兴。英国人的敌

对态度是针对俄国的，因为俄国人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软弱，但它使用武力来关闭中国的门户，而不是把它开放。

对于英国人来说，远东比过去的近东更加棘手。海军力量效力不大，盟友也更加难找。俄国人可以通过陆路进入中国的北部；印度支那又有法国人，因此，英国人利用舰队在中国海进行冒险，甚至比不上在君士坦丁堡那样有利。更不利的是，在远东似乎没有相当于奥匈帝国那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迫切地需要反对俄国。在1898年年初，就有了关于瓜分中国已经开始的警报；俄国人事事实上已经获得旅顺的长期租借权，控制了黄海。英国人到处寻找盟友。他们试探了日本，因为日本自己曾在1895年提出要求得到旅顺，但没有成功；他们也试探了美国，但日、美两国都避免卷入。英国人主要试探了德国，提出缔结同盟，阻止俄国扩张。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建议似乎是可行的。英国和德国都是近代的工业国，两国都要求保存中华帝国并维持门户开放。但计划由于下列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而告吹，即德国与英国不一样，它仍然处在欧洲。对于英国人来说，远东战争意味着在远东进行战争；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它将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场大陆战争。为了争夺中国市场而付出这种代价，未免过于高昂。德国人必须站在一旁而不介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一定会从英、俄两国必然要发生的战争中获得好处。

英国人由于人力物力不足，被迫后退。他们既无力抵抗俄国，因此只能等待时机，而俄国人始终是乐于如此的。像往常一样，俄国人的计划较之行动具有更大的野心。他们缺乏资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尚未建成；旅顺攫取到手后，他们的力量也就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其他地区则改善了地位。1896年，他们开始再度征服苏丹。1898年9月，他们在恩图曼击溃了伊斯兰僧徒军队。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支法国远征军在马尔尚统率下，到达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但是，法国人晚到了两年。这次远征原意是作为外交上的一着棋，目标在于重新讨论埃及问题，使英国人坐到谈判桌边来。而一旦英国军队挺进到尼罗河上游，外交谈判宣告中止，军事行动便取而代之。英国人拒绝谈判，他们要求马尔尚无条件地撤退。法国人别无他策，只得投降。英国军队能够粉碎马尔尚率领的这支小部队，英国海军控制着地中海。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都不会帮助法国。法绍达是“光荣孤立”政策的一次胜利。英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对尼罗河

流域的统治——事实上，如果有盟友的话，他们就得分享这些利益。此外，法绍达事件使英国人的孤立政策更加安全可靠。现在英国人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埃及，已不再需要其他国家投票赞成；英国海军驻守亚历山大，也就可以置海峡于不顾了。

英国人的自信达到了顶点，结果弄巧成拙。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在尼罗河流域赶走了法国人，满以为可以如法炮制，在南非对付布尔人；法绍达的胜利直接导致了一年后布尔战争的爆发。出乎英国人的预料，这场战争结果成了十分棘手的事。它非但没有使英国人在圣诞节时打到比勒陀利亚，结果却拖了3年，耗尽了他们的一切人力物力。不过，布尔战争也显示出“光荣孤立”的好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都同情一个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正义斗争的小国，就像各大国通常总是对一个不反对它们的小国表示同情那样。所有这些国家都想让英国丢脸，利用它的困境获得好处。但是，关于缔结欧洲大陆联盟的议论却毫无结果。欧洲本身潜在的纠纷重又显示出来。俄国建议各大国调解布尔战争。法国人机智地回答说，任何事情只要德国人同意，他们也就同意。然而，德国人提出愿意合作，但其前提是各大国“在一个长时期内互相保证它们在欧洲占有的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法国人要声明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是，假如仅限于欧洲的话，则不支持俄国在远东的活动。谈判宣告失败。总之，它们是枉费心机。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因此可以把英国的全部陆军派往南非，而不必担心英伦三岛遭到入侵。而假如全欧洲的军队都动员起来的话，恐怕它连一个士兵也无法到达布尔人那里。

远东仍然是英国的一个弱点，布尔战争使俄国获得机会，轻易地取得了成功。但英国人由于中国人自己的行动而意外地得到了解救。1900年6月爆发了义和团起义，这是自从印度兵变以来非欧洲文明排斥西方的最重大的事件。北京的使馆区受到围攻，德国公使被杀害。这种耻辱迫使德国带头起来反对中国。在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的指挥下，派出了一个国际联军：所有欧洲各大国的军队由一个统帅指挥，这在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一些敏锐的观察家预期欧洲各国将通过组成开发中国的“国际财团”而达到团结一致，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其中比较有实际重要意义的是，德国与英国在1900年10月16日缔结了一项协定，一致同意维持中华帝国的完整。德国人所关心的只是阻止英国人为自己攫取“势力范围”，而英国人则认为这个协定可以

用来反对俄国。不出几个月，英国人似乎就渡过了难关，也炮制了一个相当于地中海协定的远东协定。

然而，英德协定是针对俄国的一种恫吓，但这种恫吓不久就被揭穿。日本人急于抵制俄国的进一步扩张，但是，如果他们要在海外作战，他们一定要免除法国海军的威胁。1901年3月，他们请求英国人设法使法国保持中立。当时英国人还在南非作战，抽不出舰队派往远东，因此便把日本的请求转给德国。德国人的态度暧昧，他们提出“仁慈的中立”；后来又解释说，这意味着“严格的和恰当的中立”，仅此而已。英德两国在远东合作的神话被戳穿了。英国人提出与德国缔结正式的同盟，企图以此恢复合作，但无论什么建议，其代价都不足以使德国愿意卷入一场欧洲大战。英德两国表面上没有疏远。两国的政治家继续谈论“天然的同盟”，但到1901年3月以后，已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法国和俄国继续保持其独立国家的地位，英德同盟便不会变成有效的行动。

英国人继续等待时机。日本人却有些忍耐不住。他们决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明他们的立场：或者与俄国订约，共享远东的利益，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或者与英国结盟，使法国保持中立。1901年11月，日本人与两方同时开始谈判。俄国人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唯一认真的建议是，日本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被排除在远东以外。英国人比较乐于合作，特别是由于害怕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出现俄日联合。南非战争接近尾声，英国人这时已能够抽出军舰调到远东。1902年1月30日，日英两国达成协议，规定任何一方在远东受到其他两国攻击时，要互相帮助。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对抗俄国，而不必害怕在背后遭到法国海军的袭击。当然，这个同盟并不一定意味着同俄国作战。事实上，缔约双方希望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与俄国达成妥协，因为现在它们不会由于受到挑拨而互相争斗了。

英日协定也不意味着英国对德国的任何疏远。恰恰相反，英国人认为两国关系将会更加融洽，因为他们不必再向德国求援而使它为难了。从欧洲的观点来看，这个同盟实际上加强了英国人的孤立地位。以前，英国人经常寻求三国同盟中的这个或那个成员的帮助来反对法俄同盟，虽然这种打算始终没有成功。现在，他们像其他国家一样可以高兴地看到这两个同盟互相抵消了。但是，与预料相反，英日协定最后使国际关系陷于混乱状态。它不但排除了德国人原来认为英俄两

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战争，而且，由于俄国人荒唐地铸成大错，它导致远东地区的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动摇了欧洲的力量均衡，从而结束了使欧洲得以保持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的僵持局面。

（符家钦 徐慰曾 译）

[\[1\]](#) 土耳其非正规后备队对正在准备参加暴动的巴塔克村民进行的血腥镇压，杀害了7000居民中的大约5000人。——译者

[\[2\]](#) 国际法上的一条原则，即条约只是在主要情势未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有约束力。——译者

[\[3\]](#) 按德国强占胶州湾应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译者

第二十一章 在地中海、中东和埃及的角逐

以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波斯湾以及里海和黑海为界构成的广大地域，既是一个交叉路口，又是一个边境地带。到1870年，欧洲列强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影响比以往愈加扩张起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了。

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等首都当然也就久已代替君士坦丁堡、开罗或德黑兰而成为决定近东和中东政策的中心。^[1]如果真正发生了未能预料的情况，出现了当地的自发的事变，那就必须在这些中心迅即采取步骤，控制此类“不幸事件”的后果。1840年至1841年间，欧洲各国所采取的一次一致行动，曾制服了利凡得和平的破坏者、埃及的那位野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1854年至1856年，又采取过一致行动。这次被制服的却是一个力量更加强大的革新者，一位完全不能算是这一地区的土著的人——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1856年，英国人也曾派出炮舰进入波斯湾，阻止波斯国王掠走邻国阿富汗的领土赫拉特。各个强国互相承认各有各的“利益范围”，谁要扩张利益范围就要遭到反对。谁也没有去援助高加索地区切尔克斯人领袖沙密尔，或者去援助喀布尔的舍尔·阿里、突尼斯的贝伊或埃及的艾哈迈德·阿拉比，尽管出现这种情况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谁都承认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处境恶劣，但谁也不去设法加以改善。是下一代而不是这一代的英国官员们才断定应当支持汉志的哈希姆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在通往东方的道路上的任何地方出现反叛，哪怕只是一种革新，对所有欧洲列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因为在这条通道上，各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紧密相连。从战略上看，主张维持现状的理由总比主张改革的理由更充分。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能否继续维持现状，这就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中东地区是否会继续仅仅作为欧洲外交折冲的棋盘，或者它是否要成为欧洲军人真正采取军事行动的战场，这是当时的一代政治家必须做出抉择的问题。同时，在非洲，他们也面对类似的难局。尽管

欧洲恣意侵入了亚洲和非洲两个大陆，但是任何强国都未曾利用一场中东争端或一场非洲争端，作为破坏和平的借口。这应归功于政治家们和他们行事时所处的那种温和的舆论气氛。

在所有列强之中，中东的稳定对英国至关重要。英国的态度反映了帕麦斯顿勋爵的态度，他看到穆罕默德·阿里对克里特岛的控制和他在希腊、叙利亚的帝国主义行径是不祥之兆，所以一贯认为，由土耳其人占领通往印度的道路，要比一个扩张地盘的阿拉伯君主较为可取。尽管继任的外交大臣们认为没有必要维持野蛮的奥斯曼帝国的摇摇欲坠的体制，使之不致瓦解，但他们谁也没有改变方针。一直到1914年，大乱发生，土耳其苏丹与敌方阵营携手合作，这时，英国人才最后决定把苏丹的已被肢解的版图接管过来。

帕麦斯顿曾竭力反对由法国主持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也反对由英国主持从利凡得的出口沿幼发拉底河流域修筑铁路，唯一的理由是，利凡得不应被文明强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技术所扰乱，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1851年，他对斯特拉福德·坎宁说过，在苏伊士修建运河必然会改变——但不会改进——“某些欧洲海上强国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横贯美索不达米亚修筑一条铁路，将需要政府的保证做后盾，而且必然会卷入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帕麦斯顿遭到了失败，在幼发拉底铁路问题上则取得了胜利（后一计划由德国人在30年以后才着手进行）。但帕麦斯顿在这方面的一个论点，却使他的继任者们感到痛苦。虽然到1896年，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保卫君士坦丁堡是“过时了的观点”，并希望英国在1853年就听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意见——当时沙皇和汉密尔顿·西摩爵士进行过一场含义深远的谈话，谈到如何本着互相协作的精神瓜分奥斯曼帝国。比如说，由英国占领埃及——但帕麦斯顿的传统观点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按照这个传统的观点，俄国是一个必须经常加以监视的国家，是一个像不合群的野兽一样的国家，一个像彗星一样不走正轨的国家，一个唯一置身于欧洲国家体系之外，因而能够坐视这个体系瓦解的国家。这个潜在的敌人这样独处一方，明显地处于居心叵测的孤立状态，就使英国公众的恐俄症愈益严重了。

对于英国人来说，中东政策问题是一个交通问题。英国在印度和远东拥有一个殖民帝国，它必须与这个帝国保持交通畅通，还必须能迅速获得该地的消息。1857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获悉密拉特兵变的

消息时，事情已经发生40天了。因此，英国有必要控制位于直接通向印度的路线两侧的国家的外交政策——虽然这种控制正像格莱斯顿1880年在中洛锡安竞选时所说的，真可谓是“骇人的要求”。在某些地方，坚持这种要求是容易做到的。英国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海上强国，与所有拥有海岸线的国家均直接毗邻，而直接通往的路线到处都是海岸线。英国对于拥有海岸线的国家的内政很可以听之任之，尽管按文明的标准，它们的内政是声名狼藉的。因为如果出现危机的话，这些国家是没有力量抗拒海军的压力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就呈现出复杂的情况。达达尼尔海峡和刚建成的苏伊士运河（1869年建成）就是危险的“瓶颈”，而英国海军力量达不到的国家造成甚至更严重的困难。波斯固然南濒波斯湾，这一地区特鲁西尔诸国^[2]的所有酋长们是可以使之就范的，但要从漠罕默拉赫^[3]或卡隆河指挥遥远的北方首都德黑兰的政策，那就办不到了。阿富汗地处深山内陆，谁也不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国家也是通往印度的“途中旅店”。有无必要拥有这些旅店呢？或者，至少是租给可靠的人去管理呢？可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东方首领的可靠性呢？喀布尔的埃米尔和德黑兰的国王可以利用英国人的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况，而那个在君士坦丁堡拥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国家的苏丹却从来没有这种机会。

在1877年5月6日的函件中，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为俄国人列举了英国在东方的各项利益。其中包括继续保证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苏伊士运河以及波斯湾等地不受侵犯。对比之下，俄国人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在东方政策方面持什么始终一贯的态度。他们肯定决心不许任何强国控制黑海海峡，并于1870年废除了妨碍它行动的1856年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但是，虽然俄国人在从奇姆肯特的陷落（1864年）到对马海战（1904年）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从常识来判断，还缺乏根据。在克里米亚遭受挫败以后，俄国人便从欧洲转向亚洲，以满足其军事上的虚荣心，可是，困扰沙皇制度的社会和经济难题，在土耳其斯坦一个也得不到解决。俄国外交部希望把征服中亚作为一个杠杆，用以抵消和扭转英国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实行的可恶政策。然而，以圣彼得堡为一方和以第比利斯和塔什干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敌对的，也始终是微妙的。因为第比利斯和塔什干的雄心勃勃的总督有着他们自己的盘算，所

以，当白厅愤怒地谴责圣彼得堡玩弄两面手法向中亚推进时，圣彼得堡往往确实是茫然而无知的。

在局外人看来，正是由于俄国的官僚机构缺乏工作效率，使得俄国的政策带有神秘的威胁性。1889年，寇松在其所著《俄国在中亚》一书里写到这个问题时，他比哥恰科夫或吉尔斯说得要简单明了。寇松写道：“把英国缠在亚洲，以便使它在欧洲安分守己——简言之，这就是俄国政策的主旨。”但是俄国外交人士能够领会这话的含意，并乐于利用英国的忧虑心情。9年以后，维特在圣彼得堡设法把这个主张应用到更为广阔的地区。尼古拉斯·奥康纳爵士向上司报告说：“维特提出，俄国并不想打一场无益的海战，而应该准备在一个易受攻击的地区打击英国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穆尔夫（在土耳其斯坦境内）修一条铁路通到库什克（在阿富汗边境）。如果俄国在中国问题上和英国发生纠纷，这条铁路便可以使俄国进攻阿富汗。”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布尔战争时期曾写道，是中国还是德兰士瓦，到那个时候具体问题就无关紧要了；为了使英国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失灵，他只要电令动员驻土耳其斯坦的俄国军队就行了。

如果说，在苏伊士的东北方，俄国的威胁令英国不安，那么，在苏伊士的西方和北方，法国的刺激就愈益尖锐了。1870年，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刚刚得以巩固，突尼斯和摩洛哥两个侧翼还敞开着，英国的海军预算因而可以保持950万英镑的水平而不担风险。但是，现在法国的交通线已直接穿过英国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到1888年，法国在地中海已有15艘战列舰，而英国才有8艘。次年，英国采取了著名的“两强标准”，到1898年，英国便给自己的海军总兵力增加了29艘战列舰和26艘一级巡洋舰。尽管如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法国在土伦和突尼斯的比塞大两个基地的设施加起来，仍然超过英国在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设施。从长远看，英国舰队是能打败土伦舰队的，但这样一来，英国舰队就再无余力挫败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突然袭击（1877—1878年俄国人由陆路进攻君士坦丁堡失利以后，肯定会改从海上进攻）。法俄同盟一形成，从1894年起（这一年，法俄海军预算合起来是1750万英镑，超过了英国）英国海军当局就深信，一旦发生战争，就必须封闭苏伊士运河。并且，如果黑海成为俄国的内湖、黑海海峡成为俄国海军的安全出口，俄国势力的影响将会扩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全境，这样一来，英国势必要绕道好望角，因而将英国与

印度和东方分隔开来。作为英国海军优势象征的英国驻爱琴海舰队，由于优势不复存在，只好于1895年撤走。

这类事实加在一起，终于使扩张到了危险程度的英帝国有必要获得一个欧洲盟国，这个盟国应拥有一支陆军，因为不论与法国交战还是与之修好，都少不了这样一个盟国。由于认识到这一点，1895年以后，索尔兹伯里宁愿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人，只要他能够得到三国同盟的合作，以便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达成协议，并由此进而与法国达成协议，是索尔兹伯里和约瑟夫·张伯伦两人考虑已久的事。在帝国主义时代，英国所处的孤立地位，给英国的每一项政策都带来了危险。

1870年，拥有奥斯曼帝国公债半数的法国人，在利凡得已无所不在。他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势力范围看来可能要扩大；在埃及，连易斯马仪总督在内，一切都受制于法郎的威力和诱惑。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全然不能预计。即使能够预料，也没有一个英国政治家会乐意和法国结成牢固的联盟。

相比之下，意大利虽不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地理位置却使它成为一个相当有用的国家。它既是进入俾斯麦的欧洲的前厅，又是进入利凡得的跳板。1892年，索尔兹伯里在罗斯伯里继他出任外交大臣时，向后者进言说，欧洲目前局势的关键，“是我国如何对待意大利和如何通过意大利对待三国同盟”。这个想法来自迪斯累里，他在1878年3月提出的计划中，就包括鼓吹由意、法、奥、德四国建立一个地中海同盟，“以便确保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交通不受日益扩张的俄国势力的影响”。此外，在所有欧洲各国中，意大利最易受到敌人舰队的攻击。于是，和英国携手合作就成了意大利人的一个基本信条，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记得正是由于有了帕麦斯顿和拉塞尔这两个可以说是坚定地挺立在英国战列舰上的人，才排除了欧洲对意大利漫长的复兴过程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要奉行与英国合作的政策，意大利就不得不吞下一两颗苦药丸。比如，他们看到他们对突尼斯的野心于1881年被法国人所制止，因为法国人事先设法得到英国的赞同。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却可以从英意“地中海协定”（1887年2月12日）中获得安慰。他们知道他们总可以依赖英国，因为英国决心把法国排斥在尼罗河流域之外，在红海支持意大利人，并支持意大利人在东北非洲内陆的野心。

在亚得里亚海的对岸，外交形势可与意大利半岛相提并论。只要在侧翼存在一个友好的意大利，在南翼有一个友好的希腊，那么，巴尔干的动乱就不会对海军强国形成大的危险。虽然在这一地区，这一段时间内仅有一次出现一个新因素，但这一因素竟几乎使英国在利凡得的政策受到震动。俄国人根据圣斯特法诺条约（1878年3月3日）把“大保加利亚”强加给遭到失败的土耳其人，这个“大保加利亚”将在爱琴海获得一条海岸线；这样就可以绕得黑海海峡而进入马尔马拉海，而马尔马拉海的安全是英国海军部所念念不忘的。这样一来，圣斯特法诺条约无异让俄国第一次喝了一口令人心旷神怡的“热水”。后来的《柏林条约》（1878年7月13日），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它，毕竟还是取消了“大保加利亚”并使继之而建立的“东鲁米利亚”成为一个远离南海的内陆国家。这无疑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就。

俄土战争以俄国军队占领高加索以南的土耳其诸省而告终，这给英国造成了进一步的问题。1854年，当英国与俄国交战时，英国政府大伤脑筋的难题是鲸如何能有效地抓住熊？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那个大难题的一部分。当时，英俄两国终于在克里米亚交战。但是由“英一印”战略家结成的很有势力的一派人认为，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从俄国人手里把高加索解放出来。的确，当英国人事实上侵入亚速海并占领若干沿海城市后（1855年5—6月），俄国人大为惊恐，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英法的入侵阻止在克里米亚。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了。从那以后，他们完全制伏了切尔克斯人并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兵站。1877—1878年，英俄第二次冲突看来已不可避免，这时英国的作战计划尚未协调一致。迪斯累里可以侈谈什么派遣印度军从一翼进入土耳其斯坦，英军从另一翼进入第比利斯；他能够两次派出舰队进入贝西卡湾；他能够从印度调动7000士兵，于1878年4月进驻马耳他。但是，这样做究竟如何能解决问题，在情况需要时，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支部队，不但迪斯累里自己不清楚，就连他那位出色的印度总督利顿也不清楚，后者在奉命派出军队时，还提出了措辞温和的抗议。战争是避免了，但俄国人仍留在卡尔斯和巴统，他们的影响波及很远的地区，使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北方”。显然，英国不可能从遥远的基地马耳他，对这一广大地区施加能与俄国相抗衡的影响。因此，必须就近在利凡得当地取得另外一个瞭望塔，或者灯塔，或者军队集结地才行。

早在1876年10月，索尔兹伯里就从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名暗探，名叫霍姆上校，去访察可能成为土耳其未来安全的“切实保证”的地方，换言之，即在土耳其境内物色英国能够迅速地发挥作用的最佳地点。霍姆考察了加利波利半岛，迪斯累里对该半岛感兴趣，但霍姆认为并不合适，因为该半岛控制不了“必须加以控制的土耳其本身、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霍姆继续考察了爱琴海中的米蒂利尼、利姆诺斯、克里特和罗得等岛，最后考察了塞浦路斯岛。他认为塞浦路斯岛是最佳的战略地点。它控制土耳其的门户亚历山大勒达港，距叙利亚仅66英里。别的岛屿，像加利波利一样，过于遥远。克里特岛诚然有其优点，但据霍姆看来，该岛的与希腊合并运动势力颇大，会给外籍总督制造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从而抵消了这些优点。现在，又在1878年把霍姆的报告从案卷内取了出来。《圣斯特法诺条约》签字后5天，英国内阁采纳了霍姆关于塞浦路斯的意见。当迪斯累里要从印度调军队到地中海的计划尚在议而未决的时候，有人建议让军队在塞浦路斯或干脆在亚历山大勒达登陆。结果，军队开到了马耳他。然而，在柏林会议上，索尔兹伯里十分强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建立一个新基地对英帝国的重要意义，以致在《塞浦路斯协约》（1878年7月4日）^[4]公布以前，他就明确地告诉苏丹，英国准备占领该岛，不管苏丹是否颁发同意割让的敕令。柏林会议对这种策略感到惊异，但并未因之采取行动。唯一可能从中作梗的是法国，但索尔兹伯里向法国代表瓦丹通表明，将来法国有关突尼斯的任何计划均不用担心会遭到英国的阻挠，从而巧妙地收买了法国。

塞浦路斯几乎马上令人大失所望。英国对该岛寄予巨大的希望，这可以从派去的第一任高级专员的人选看得出来。这位大员就是英帝国最杰出的军人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5]，他立即派出副手吉钦纳对该岛做第一次精确的考察。但沃尔斯利又被调任别的更为紧急的帝国职务，当时或后来，就再也没有一个地位相当的人在塞浦路斯接替他。这个岛屿根本不宜于作为军队集结地，那里气候恶劣，港口不足。它也不能作为英国势力标志的灯塔。要从塞浦路斯监视在卡尔斯的俄国人，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当英国根据柏林条约在小亚细亚驻有军事领事时，该岛还具有一定价值，但1881年这些领事撤走后，它就全然无用了。只是由于有必要保持英帝国的威望，才没有放弃它。占

领塞浦路斯这件事后来继续成为说明拙劣的政治和更拙劣的战略结合到一起的很好例子。

在君士坦丁堡城郊签订的条约理应予以撕毁，而代之以在欧洲某个首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迥然不同的条约，这象征了那一时代的做法。但是，由欧洲掌握战略支配权的地区并非总是像欧洲的外交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诚然，利凡得地区的文明，如索尔兹伯里所说，是“落后于世界的普遍进程的”，但那里并不缺乏由于公务和个人的长期磨炼而政治头脑敏锐的王公们。既然他们在欧洲人的天平上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就自然而然求助于诡诈的权术。印度的英国政权在1857年至1863年间，每年付给阿富汗的一个埃米尔20万英镑，1879年答应给另一个埃米尔12万英镑；1881年起付给一个继任者8万英镑，1893年起这个数字又提高到12万英镑。但是，要用这种方式收买他们对外来制度效忠，是难以办到的。这一时期中东地区最卓越的外籍总督克罗默始终认为——引用他在《近代埃及》一书中的话来说——英国官员必须努力记住，“他们不是跟肯特郡或诺福克郡的居民打交道”；如果当地居民只是表示出一种半心半意的默认态度，或者表示出不加掩饰的敌意，于是，就愤恨起来，给这些人民扣上“不忠诚”的帽子，那是很荒谬的。俄国人出不起津贴，因而分文不付；虽然他们把被其征服的中亚伊斯兰民族的成员征募到他们的边防军中，但他们很快就对这些人失去信任，因此，当浩罕或土耳其斯坦爆发叛乱时，俄国人也就没有感到什么意外。法国人竭尽全力为地中海南岸的伊斯兰提供另一种文化，但由于伊斯兰教的文化和信仰是割裂不开来的，所以，利凡得的那些开化分子是底层的无知农民根本不信任的人。亚洲人的意见，不论属于哪一种，总是披着它认为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外衣。一位麦加行政长官在评述英国帝国主义时说：“它的受害者也不得不活下去。”埃及的阿拉比帕夏于1882年领导的军事政变，具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和激进的基础，但他的命运不只是给他同代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抛去这种外衣是危险的。

一个东方的当权者自然会同意外国人关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然而，他的保守观点根本不足以保证他本人能够生存下去。即使是统治波斯达48年之久的纳赛尔·埃尔·丁国王，结果也是于1896年死于刀下。外国人也许真心希望“保护”受其庇护的国家，由

一位驯顺的君主进行治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但是，很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继续执行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有时这位君主可能会背叛其保护人，舍尔·阿里于1875年至1878年间在阿富汗的行为，就被认为是这样；有时，这位君主可能会由于软弱而屈服于另一个争夺保护者地位的国家的压力，俄国和英国就担心波斯国王随时会陷于这种情况。再一种情况是，这位君主的政府可能纯粹由于无能而解体，从而使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于是，某个欧洲强国肯定会自告奋勇去填补真空。埃及就是这种意外情况最恰当的例子。不过，欧洲各大国确实也仅仅由于互相猜忌对方有野心这一固有的特性，才没有根据完全相似的理由而肢解奥斯曼帝国本身。

因此，这段时期的中东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很好地治理这些“落后地区”。对于欧洲的商业、战略和交通来说，这些地区极为重要，但那里的居民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却很少有一致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三个欧洲大国的军人们提出了相似且简单的答案。解决办法是，往当地派驻大量兵力。但只有俄国人，因为不缺乏人力，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政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一直不信任那些贵族式的僧侣和保皇党徒，可又一时麻痹，把法国的殖民帝国的发展托付给了这批人。因此，他们不愿看到这批人的权势再向任何地方扩展。至于英国人，甚至在一位美国海军史学家使他们更加确信传统的做法以前，便已退回到那种饱尝暴风恶浪而扬威海上的浪漫传统之中，而在舰只上是不需要庞大的陆军的，因此，他们宁愿采取一种进行远距离控制和炫耀帝国威望的理论。但实际上，英国人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所进行的各种交往中，是以他们的印度军队这一支确实存在的力量为后盾的。在这几十年间，这支军队驻在远离印度的马耳他、苏丹、索马里兰和马来西等地。

的确，在中东地区，英国海军与印度陆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英国的实力体系（罗斯伯里勋爵曾把这作为“权威性的意见”而很好地加以阐述），在这一地区，没有一个竞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迪斯累里是首先认识到实力这一事实的人，一直加以强调。1878年，印度政府入侵阿富汗遭到非难时，迪斯累里就大声疾呼，那不只是开伯尔山口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英国在欧洲的声望和影响的问题。那也不只是一个支持土耳其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维多利亚女王所赞同的

那样，世界上究竟是应由英国，还是由俄国称霸。占领塞浦路斯，其行动及目的不在地中海，而在印度。归根到底，一个大国应是一个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国家，一个能够控制和支配局势的国家。索尔兹伯里曾指出过，当欧洲的注意力集中在西班牙境内的冲突时，英国便占领了直布罗陀。当意大利的局势严重时，英国占领了马耳他。当事态似乎表明欧洲的注意力将要集中在小亚细亚或埃及时，英国就占领塞浦路斯。他说这番话以后不久，英国进而占领了埃及，这好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论点似的。

中东复杂形势中有三件事不可避免地影响欧洲各大国的政策，显示出相似的特征。

阿富汗危机的形成，是由于英国和印度政府表现出一种简单的愿望，想弄清楚俄国在中亚干了些什么。1864年到1869年间，俄国人已大踏步前进了。1864年他们占领了奇姆肯特，1865年占领了塔什干。1866年他们推进到霍占特，摧毁了浩罕可汗的势力。1867年，他们侵入布哈拉汗国，并建立设防据点，远抵锡尔河以南的地方。他们还新设了土耳其斯坦省，使之成为总部设在塔什干的考夫曼将军的一个总督辖地。1868年，他们攻占了布哈拉的首都撒马尔罕，并明确宣布，从此以后该汗国的埃米尔成为俄国人的附庸。1874年，尽管沙皇驻伦敦的私人代表彼得·舒瓦洛夫保证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但希瓦的可汗还是遭到同样的命运。要证明这些中亚汗国丧失主权一事是对人类进步的打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众所周知的特点是搜捕奴隶、贩卖奴隶和普遍存在的疯狂野蛮行为。因此，哥恰科夫宣称，俄国在东方的使命是文明使命，英国人对这种说法就不能仅仅斥之为自我吹嘘，因为英国人长久以来也是坚持以与此同样的原则来处理他们同印度土邦的关系的。

从这种执行文明使命的竞争中，可以找到英国人之所以对俄国人在亚洲的推进感到十分不安的原因。因为这种推进最终必然会使俄国人达到印度的边境。有些“英一印”军人和文官主张英国人也应向前推进，以对付步步进逼的俄国人，这样，将来确定实际接触线时，这条线就可以尽可能远离印度本身。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俄国军事力量的直接攻击，或者是因为他们夸大了阿富汗的帮助或波斯的友谊所起的作用。印度事务大臣领导下的印度参事会很有影响的成员亨利·罗林森爵士多年来一贯坚持认为，英国应进入克拉

特的基达、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这样，英国人就可以“越过现有的疆界，在最易接近的攻击线上，构筑一系列第一流的要塞”。他的理由是，印度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因此，必然总是有“一定程度的不满”积郁在人们心里，只要有一个敌对的欧洲大国煽动，就会燃起扑不灭的大火。罗林森的同僚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在1874年6月向印度事务部提出警告说，每一个印度王公和酋长都会把俄国人看作“要求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另一个可能的候补者”；印度所有的不满分子，所有危险的和犯罪的阶层都在随时保持着警觉，一有动静，就会发难。理查德·坦普尔爵士曾把可能成为俄国人走卒的不满分子分了类，他们包括王公、僧侣、军人和暴民。读过坦普尔的《1880年的印度》一书的外国读者（这样的人不少）很可能感到惊讶，在印度究竟还有谁是“忠诚的”。1888年在印度任总司令的罗伯茨将军，对女王的这些臣民的“忠诚”程度，甚至抱更为悲观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一旦俄国人进抵印度边境，英国统治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就会化为乌有。印度就不再成其为“安全岛”。再也不可能在印度问题上宣传“门罗主义”了。其直接的后果是，英国本身将会像任何别的国家那样，成为一个大陆国家。

所以，在亚洲人看来，俄国是以强大的替手的面貌出现，是又一个帝国主义监护人。形成“中亚问题”坚实基础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俄国陆军的效率有多高，或俄国将军们的野心有多大的任何估计。从俄国一波斯土库曼查伊条约起到1907年英俄协约为止的80年间，这个“中亚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外交部。

正如1860年拉塞尔所说，英国并不想在中亚和俄国开展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但我们的目的是，不能让俄国利用它跟波斯的关系，和它对中亚国家采取的高压手段，去侵犯那些我们认为应由当地统治者掌权，而不应受外国阴谋扰乱的国家”。所以，阿富汗必须继续存在下去，作为俄国和英国两个帝国之间在亚洲的缓冲国。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1869年至1873年，英俄举行谈判，要使阿富汗成为两个帝国之间的真正的“中立区”，谈判的破裂说明英国对于“外国阴谋”一词有其独特的解释。喀布尔埃米尔舍尔·阿里对印度政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不能照俄国人的意见，让它享有中立国的特权和地位。这位埃米尔无疑必须是“独立的”，但他又必须同意与印度政府友好相处。亚洲的生活现实必须如实地予以承认。根据占领地

保有原则^[6]（即双方都保证不越过某些限度）与俄国订立任何可靠的条约，那是没有用的。哥恰科夫于1864年11月曾表示希望俄国军队能在奇姆肯特停止推进，但正如他后来发现的那样，在中亚的一切界限，实际上都不存在。而且，俄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谁都不能够停留在固定的位置上，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可能把这一固定位置变成从地理上看十分荒谬的东西。1873年，英俄两国同意，只为舍尔·阿里的国家规定一条北方边界，并且俄国表示，它认为阿富汗处于它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外。俄国认为，这个协议给予它在中亚的其他地方自由行动的余地。而当它攻陷希瓦，发现英国的想法并非如此后，它真的恼火起来了。不过，至少有一条边界线是划定了，总算建立了一个格局。这样，中亚早就提出了欧洲后来在非洲面临的难题，那就是，除非一方或另一方蓄意把争端引向战争，否则到一定时候，必须就边界问题取得某种国际上的认可。

对亚洲人自己来说，亚洲的生活现实当然是一剂苦药。舍尔·阿里尽管需要印度政府的金钱并得到它的承认，但他也希望印度政府不要去管他的事。他并没有忘记，在他为争取埃米尔宝座而奋斗的5年（1863—1868年）中间，印度政府曾经背弃过他，并且把他的边境省份锡斯坦的大片土地给了他的对头波斯人（1872年）。但是，不许他闭关自守：那样一来，他会怎么干呢？他拒绝英国驻印总督在他的国家派驻英国的“观察员”，这就引起了危机。保守党政府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认为不可能继续“让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其品格大可值得怀疑的看门人的手中，因为这个看门人坚持，他服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不许监视他的行动”。索尔兹伯里虽没有提出要派一个违背阿富汗埃米尔的意愿的英国使团前往阿富汗，但他的确提出“让印度政府设法使埃米尔乐意接受英国使团”。利顿作为总督，极愿按索尔兹伯里的意图办事。利顿认为，舍尔·阿里是一个不可信赖的野人，一有机会，他就会在英俄之间玩弄政治把戏。他与塔什干的考夫曼从1870年开始即书信往来，现在应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利顿首先巩固了他在俾路支和克拉特的边界，把基达建成一个基地，然后，开始与舍尔·阿里举行谈判，但未获结果。与此同时，俄国也增加了压力。俄国人预料于1878年春季会同英国开战，于是，他们从撒马尔罕和在里海的基地克拉斯诺沃茨克，把一批批部队派往阿富汗边境。就在欧洲各国在柏林召开会议的同一天，考夫曼从塔什干派了一个军事使团前往喀布尔，6周以后，舍尔·阿里在喀布尔予以隆重的接见。利

顿决定要让英国的使团也受到同样的接待，从而一劳永逸地考验了一下这位埃米尔。这个英国使团在边境就遭到舍尔·阿里的断然拒绝，不过没有开枪射击。尽管在英国内阁内部有人警告说并不存在宣布开战的真正理由，但利顿仍于1878年11月派遣印度军队进入阿富汗。这是40年中对阿富汗的第二次进军。

舍尔·阿里逃跑了，神秘地死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1879年2月）。喀布尔的一个顺从的继任者于5月签署了一项条约，接纳英国代理人，外交政策听由印度政府处理，交换条件是得到一笔可观的薪俸。但是，英国驻扎官及其工作人员在喀布尔遭杀害（9月3日）。新任埃米尔曾参与此事，于是，阿富汗落入一些以劫掠为生的王公们的流窜部队的手中，直到其中最胆略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从土耳其斯坦回来，按自己的意志巩固了地位为止。他和印度政府达成了类似的交易，但得到的薪俸较少，因为对他的信任也是等而下之。派英国代理人驻在这个国家的尝试现在取消了。自由党人在还是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时候，就曾谴责说对阿富汗的整个政策是海盗政策。现在决定把印度军队撤出坎大哈省，于是，1881年4月，阿富汗就由这位显然是不可靠的新统治者来掌权了。

批评家断言，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印度大门的钥匙依然由品格可疑的看守掌管着，他依然坚持其行动不应受到监视。对这些批评者的答复是，问题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只靠使用军事策略去谋求解决。自由党人宣称，这不只是坎大哈的问题——他们这样恶意地解释迪斯累里早些时候的某些论断——这是影响到英国亚洲政策的整个方针的问题。可以说，实际上常常这样说，英国的印度帝国的周围，在西边从基达直到直布罗陀，在东边从缅甸直到香港和惠灵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能派兵防守整个这一地区吗？显然不可能。因此，这半个世界的防御安全绝不能依靠英国陆军，甚至也不能依靠英国海军，而是要依靠英国政策所赢得的尊重和依赖，依靠别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英国的政策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是旨在促进人类的和平与通商贸易的。如果英国忘记这一点，而去执行侵略的政策，或没收别人财富的政策，它就会马上四面树敌，俄国人在颠覆英帝国的事业中，就不难找到帮手了。

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很快就在自由党人自己身上也得到了证明。第二年，自由党政府决定炮轰亚历山大港，并占领了埃及。这一帝国

主义行径，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同法国和德国的外交政策相对比，遭到了损害，影响延及其后20年之久。自由党人虽然以后这些年几乎一直在政治上处于迷惘状态，但坎贝尔-班纳曼用他通常是明白易懂的语言表明，他们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他说道：“实际情况是我们养不起一个好战的帝国，并且，我们无论如何得不到那种兵力。”

的确，企图做到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俄国自己也远远不是一个“好战的帝国”，而当时欧洲最有效率的军国主义国家——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极其和解的。因此，俄国和英国把外交建立在军事机器上是浪费时间，因为军事机器必然不能应付两国面临的任何考验，正如英国最终在南非、俄国在对马岛的遭遇所证明的那样。所以，英国做出从坎大哈撤军的决定，虽然使圣彼得堡的吉尔斯迷惑不解，但这个决定却开创了在中亚事务上互相妥协的时期。这一政策尔后成功地经受了一些考验，其中有两次——1885年的平狄事件和俄国向波斯的不断渗透——与1878年向喀布尔派遣使团的事件具有同样猛烈的政治爆炸力。

对这一阶段的欧洲外交，在波斯问题上可以最透彻地观察出来。波斯问题从来也没有达到像阿富汗问题那样危险的程度，因为有关的两个大国注意不使问题变得那么严重。这并不是由于波斯的局势不及阿富汗的局势复杂。从英国的角度看，波斯是印度的前厅，远比阿富汗容易被敌对的入侵者闯入。1874年，希瓦落于俄国人之手以后，波斯北面的整个地区（波斯并没有明确的北方边界）被置于俄国将军洛马金管辖之下，他自封为该地区的“全权首领”。占有希瓦后，俄国人就能在奥克苏斯河下游立足，解决了一向最严重的补给和交通问题。在此以前，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省不得不由奥伦堡运送补给，而奥伦堡隔着沙漠，距锡尔河有800英里之远。但从里海通过希瓦和更远的地区，奥克苏斯河是可以通航的。并且，用修筑铁路或公路的办法，很容易计划建设一条新的陆上交通线，其一翼通往撒马尔罕和塔什干，另一翼通往克拉斯诺沃茨克，波斯的侧翼就暴露了出来，那里是未曾划定边界的霍拉桑地区，土库曼部落在该区游牧。这样，俄国人这次新的进犯就使赫拉特不仅成为进入阿富汗西部、喀布尔以及印度，而且成为进入坎大哈和波斯湾的“钥匙”。这样，就印度的安全而言，希瓦的陷落，就将问题的真正重心从阿富汗山区转移到了波斯平原和土库曼平原。

如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波斯国王是准备对北部的土库曼人行使统治权的。从1874年以来，英国的政治家和时论作家经常谈到麦尔夫这个名字（人们常认为它是一个大城市，实际上只是一座有绿洲的泥土建成的村落），因为它距赫拉特只有12天的路程；但尽管如此，白厅却不准备承担义务。在霍拉桑的英国军事人员——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曾向吉尔斯保证，这些军事人员在那里是出自“英国人特有的喜好冒险的精神”——继续就俄国影响的增长送来报告。波斯国王于1878年访问了圣彼得堡，把科萨戈夫斯基将军带回德黑兰，后者着手组织一个哥萨克旅——“尔后40年俄国在波斯施加影响的主要武器之一”。索尔兹伯里此时已从印度事务部调到外交部任职，他希望英国很快建立某种足以和俄国抗衡的力量。因为，“很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英国对俄国的立场会急剧转变”，使英国不得不付出大得多的代价以求获得与波斯结盟或波斯的中立。他想把波斯人久已垂涎的赫拉特给予波斯国王。实际上曾就此事草就一项协定（1879年11月8日）。但英国内阁并不喜欢这个意见，因为英国一旦在赫拉特扶植起一个被保护人，它就有义务使他在哪里存在下去，这就势必要派一支英国的驻军，因为如果俄国人反对的话，波斯军队是连反抗的样子都不会做出来的。波斯国王想讨价还价，把情况通报了俄国人，英国迅即放弃了那个协定，同时也放弃了波斯国王的地位。新执政的自由党政府急于同俄国人合作，在俄国和波斯谈判部分北方地区的边界线时（1881年12月21日），英国政府没有干预。这个阿哈尔—霍拉桑协议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波斯放弃对土库曼领土的任何要求，这部分领土从新近达成协议的萨拉赫斯边界，朝奥克苏斯河向东北延伸约200英里。

印度帝国周界上剩下的这一豁口应当封住，这虽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但符合英国的利益。使印度事务部感到忧虑的，依旧是阿富汗而不是波斯的形势，因为，如果俄国军队推进到新的边界，把土库曼人成群地驱入阿富汗境内，并跟踪追击（他们很可能这样干），结果俄阿冲突就极可能发生。但是，这时候英国如向波斯国王提议，说他应就麦尔夫及其所属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便他的主权国家在步步推进的俄国人和未设防的阿富汗侧翼之间作为缓冲国，已经不能把波斯国王争取过来了。麦尔夫于1884年2月落入俄国人之手。印度政府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力陈“就阿富汗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确切边界线同俄国达成明确谅解”的绝对必要性，于是，英俄两国开始谈判，讨论从萨拉赫斯到奥克苏斯河如何妥当地划出一条分界线来。对伦敦提出的每个

解决办法，圣彼得堡都认为难以同意，直到1888年才具体划定了那条界线。俄国人之所以能在那时放弃其反对意见，因为他们的起自克拉斯诺沃茨克的里海铁路，已经由安年科夫的工程兵修筑到距赫拉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

1885年3月30日，在阿富汗的一个村庄，俄国人赶走了当地居民，这就是著名的平狄事件。这件事打断了充满着仇恨的边界辩论，它使两个欧洲强国在中亚是和还是战的问题，系于喀布尔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一念之间，因为如果他决定宣布这一事件构成宣战理由的话，那么，他的外交政策的正式保护人印度政府就很难否决他的决定。英国政府在欧洲陷于孤立状态，它的常备部队驻扎在埃及和苏丹，这时，它仓促拟定了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高加索的作战计划。英一印战略家们很久以来就认为，高加索是俄国在中东称霸的关键所在。但是，要想到达高加索，就必须穿过黑海海峡，而俾斯麦当时无意表示欧洲会同意任何这种行动。幸亏这位埃米尔没有抓住这个事件不放，但是，如果再发生一个类似的事件的话，各方已经很紧张的神经就有可能受不住了，而且，英国这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同波斯保持友好关系。就在划定阿富汗的边境线期间，俄国对德黑兰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887年8月，俄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波斯国王同意，不预先同俄国沙皇磋商，绝不把在波斯修筑公路、航道或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任何外国公司。看来，俄国打算把整个波斯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以便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波斯湾。波斯国王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因此，他扬言说，除非英国给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他将同北方的这只“脾气温和的老虎”休戚与共。

波斯国王所希求的是结成一个同盟。当然，这一目的他是无法达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迫于大势所趋，已经继承了自由党政府有关英俄和睦相处的纲领，而且，索尔兹伯里已经决定对波斯国王不加理会，因为如果给这位国王以机会的话，他必然要损害英国的外交政策。1887年10月，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奉派前往波斯，以开创英俄两国在波斯和睦相处的新时代。当然，两国都有权在波斯市场上取得各自的一份合法权益。可是，在这项建议背后，却隐约存在着一个要最后把波斯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的政策，索尔兹伯里可能同吉尔斯一样不喜欢这个计划。但是，沃尔夫却继续推行这个计划，并引起欧洲对这一计划的注意，直到后来印度总督兰斯多恩向他指出，当

英国忙于在波斯南部修筑铁路的时候，鼓励俄国在波斯北部修筑铁路，这同印度政府一向所依赖的每一项安全原则都是直接相抵触的。沃尔夫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劝说波斯国王向世界各国的商船开放波斯南部的卡隆河。吉尔斯对此评论说：“这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而已。”

事实上，俄国人对英国人采取某种新的集中的手段从经济上剥削波斯，比对于英属印度对赫拉特的任何企图感到更大的不安。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时代，而在所有的大国中，俄国参加角逐的条件最差。俄国既然没有在波斯修筑铁路的资本，就决心不让任何别国在那里修筑铁路。因此，在1890年10月，波斯国王进一步同意在15年内不接受不论哪个国家提出的任何修筑铁路的计划。这项协议得到了遵守，因为1914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波斯境内还没有任何铁路线。直到那时为止，俄国的势力一直在德黑兰占有统治地位，俄国银行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波斯的绝大部分贸易也是同俄国进行的。爱德华·格雷在1903年公正地说：“波斯的独立不过是一句空话。”

因此，虽然英国人没有能够在阿富汗和波斯周围建立起一道十分坚固的、“精心构筑的栅栏”，但是，由于他们和俄国人之间力量的平衡，使双方保持了外交上的均势和与之俱来的和平局面。此外，在一个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下面这个问题被掩盖了起来，即1887年以后，沙皇和他的军事顾问已把注意力转向了远东，转向了满洲，转向了有可能弄到手的旅顺口不冻港。俄国由于把战线拉得过长，自然更加容易遭受打击。英国并没有忽视俄国这个弱点的重要意义，就在这个时期的结尾（1902年），采取了同日本结盟的做法。到了这时，俄国已经错综复杂地卷入了欧洲国家体系，不能再一味在东方恣意进行冒险活动了，而在帕麦斯顿执政时期，它还没有卷入到这种地步。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让德国人在波斯湾控制一条铁路的终点，不如让俄国人控制德黑兰，甚至让俄国人控制君士坦丁堡，也比让德国人在经济上对土耳其渗透要可取一些。到1899年，大声疾呼表示决心要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已经是俄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了。但是，到那时，英国也同样受到其他强国的政策的限制，而且，它也像俄国一样，从来没有设法挣脱这一束缚。

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英国在埃及投下了赌注。1882年以后，格雷后来称之为“帝国地位造成的必然结果”的情况——这是他在1915年发现自己不得不答应把君士坦丁堡作为战利品交给沙皇时所

用的说法——无疑已迫使英国政府加以注意，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索尔兹伯里在1895年以后，极力想同法国和俄国和解，只要不撤离埃及，几乎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这种帝国地位造成的必然结果使得某一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朝任何方向行动都是不安全的。除布尔战争外，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是英帝国所采取的最后单方面的行动。

1876年，德比任外交大臣时曾说：“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能够不受阻碍地通过埃及，以及没有任何外国势力控制那个国家。”然而，这将需要很大的努力，因为埃及已经成为欧洲的殖民地。1870年，在该国已经设有17所外国领事馆，代表着在开罗和亚历山大聚居的约10万名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1876年以前根本不向埃及政府缴纳任何税款。正如克罗默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个时期的埃及“一定是所有高利贷者的天堂，也是拿三等货卖头等价的商人们的天堂”。通往东方的主要轮船航线苏伊士运河为法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其结果是，法国对埃及总督伊斯马仪和他的政府拥有绝对支配权。到1873年，埃及政府所支付的苏伊士运河工程贷款的利息总数达到了600万英镑。埃及所欠外债的利息几乎达到每年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伊斯马仪的前任赛义德统治时期每年的税收总额还要大。这样一来，埃及的偿付能力同欧洲的债券所有人休戚相关。英国财政部主计长斯蒂芬·凯夫1876年的报告中强调说，埃及不能再继续“一方面，以25%的利率支付短期债务的利息，同时，为了应付国家债务的增加，又以12%—15%的利率向人借款了，这样做，国库连一个皮阿斯特^[7]的收入也得不到”。伊斯马仪迫于借款的需要，已经不得不把国家最大的财产苏伊士运河作为赌注（到1875年，苏伊士运河股票第一次分红，利率是5%）。1874年，伊斯马仪给予一位法国银行家以375万英镑的价格购买埃及政府所拥有的40%普通股股票的权利。众所周知，在1875年，迪斯累里又通过路特希尔德财团，以400多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176602股。

虽然迪斯累里在下院极为正确地指出，这项交易是一项政治上的交易而不是金融上的交易，但并非像他所说的“夫人，您得到它了”这句话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彻底的胜利：这些普通股并不带有表决权，因为在1871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已剥夺了伊斯马仪的这一权利。在谈判中，公司的董事长德·莱赛普斯固然同意将失去的10票表决权归还给大不列颠，但他只给了它24个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中的3个席位。

不过，迪斯累里的这一着妙棋迫使英国政府对埃及的财政给予更大的注意。凯夫的调查使命（1876年1月至3月）就是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然而，法国仍然不仅在财政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占有优势。意味深长的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法国竟不允许把埃及问题——就这个问题来说，还有叙利亚问题、圣地问题和突尼斯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878年4月8日，易斯马仪被迫暂时停止支付他发行的国库债券本息。5月2日，他颁布了一项法令，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埃及国债管理处，其成员包括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人、一名奥地利人和一名英国人（伊夫林·巴林是由英国的债券持有者，而不是英国政府指派的）。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不光彩的财政纠纷，其中有许多纠纷提交到治外法权法庭审理，而治外法权法庭却有一个未经宣布的原则：只承认本国公民的要求。国债管理处把全部长期和短期债款确定为9100万英镑，转为长期借款，规定利率为7.5%，欧洲的债券持有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的代表若贝尔和戈申重新组织了确定债务的工作，并建议任命两名监督官，一管收入，一管支出。同时，又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铁路、电报和亚历山大港。这些方面的税收都预先指定了用途。对于这种安排，短期债券的持有者（主要是英国人）又提出反对，在这种上下夹攻的情况下，埃及的行政管理陷于停顿。

1878年3月，英法两国政府第一次采取正式行动。它们任命了一个英法调查委员会。到8月，这个委员会已使自己变成埃及政府的责任内阁。易斯马仪现在成了他的债权人手中的俘虏。他当然也就故意不同自己的大臣们合作。这些大臣都是基督教徒——努巴尔帕夏、里弗斯·威尔逊和德·布利尼埃。他组织了两次反对他们的群众示威后，在1879年4月，设法排除了他们。他的这个行动太成功了。5月18日，俾斯麦出人意料地自命为欧洲债券持有者的代言人，各大国也对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施加了压力。1879年6月26日，苏丹给易斯马仪发去一份电报，称他为“前埃及总督”。从9月起，易斯马仪的继任者杜非克就被迫严格地从属于由巴林和德·布利尼埃所体现的英法“双重控制”了。虽然他们通过了一项债务“清偿法”（1880年7月17日），但债务利息仍占埃及税收的37%；甚至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数仍然高达22%。他们所采取的另一个经济措施是在1880年以88万英镑的低廉价

格，把埃及政府在运河公司中的优先股转卖给土地信贷银行，使这家公司有权获得收益的15%。其结果是，从那时起到1936年，埃及从运河得不到任何税收。

监督官还把埃及军队从45000名官兵减少到18000名，军队将领对此极为不满。然而，艾哈迈德·阿拉比并不仅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上校，不仅仅代表那些心怀不满的上校们：十多年来在埃及，知识分子中反对土耳其，反对外国势力的激进思想一直在不断增长。但是，不管阿拉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及的外国统治者在控制埃及总督和这个国家的问题上，都不能容忍阿拉比的对立竞争。1881年9月，阿拉比迫使杜非克接受了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关于成立代议制政府和扩大军队的要求。他在这位总督身上所取得的这一胜利，终于导致英法两国提出了严厉的照会（1882年1月8日），照会的主要策划者是甘必大。照会强调了对杜非克的支持，并对任何反对他的行动发出威吓。照会所产生的主要后果是惹怒了苏丹，使各大国都警惕起来，而且更加引起埃及舆论的不满。从外国人的观点看，埃及的局势在进一步恶化。所以，当杜非克要求列强帮助他摆脱阿拉比及其阴谋时，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就在5月间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

英国依然希望能够由土耳其人出面来改变埃及的局势，因为埃及毕竟是他们的一个从属省份。但是土耳其只是向开罗派遣了两个特派员，一个同总督进行谈判，另一个同阿拉比进行谈判，这样做于事无补。在甘必大去职后，法国人已谈不上有什么一贯的政策；他们的英国同事也是一样，犹豫不决，不能决定究竟是采取联合行动，还是诉诸国际干预；最后，正如迪尔克所说，跌跌撞撞地栽进了埃及。实际上是在亚历山大发生的两次反对外国的暴乱之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使会议（6月23日），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暴乱，终于招致了英国海军舰队的炮击（7月11日）；法国舰队遵照命令未参与此举。在拖延了一个月以后，英国动员了一个陆军军团，由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指挥，开往埃及。9月13日，在特勒凯比尔击败了阿拉比的军队。英国人成了埃及的主人。正如约翰·莫利所指出的那样，英国通过这次行动，终于使自己成为称雄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帕麦斯顿曾非常担心穿过埃及开凿运河这一想法可能带来危险，他的担心果然成为现实。

1883年1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通知列强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但是，在推翻了埃及唯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后，心神不安的自由党人已经无法洗手不干了。他们中间有128人在投票表决沃尔斯利的远征军费时曾经弃权。这些人要求改革埃及行政管理并从埃及撤军，因为如果继续统治埃及，就一定会给已经负担过重的英帝国带来不应有的负担。但是，正如他们自己的总代理人巴林（后封为克罗默勋爵）所尖刻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政策是“一项无法实施的政策”。谁要想在一个东方国家实行改革，他就不得不待在那里以保护这一改革。1883年，达弗林在报告中说，埃及在立宪方面，连一点进步的胚芽都没有。除非有欧洲的权威做后盾，否则，把欧洲的技能引进埃及也是毫无意义的。

巴林对格兰维尔指出，从埃及脱身和从阿富汗脱身是完全不同的事。毕竟除了阿富汗人自己以外，没有人对阿富汗的内政产生任何兴趣。这样一个半野蛮的民族完全可以听凭他们自己的半野蛮的统治者去摆布。固然，埃及人的精神和物质状况几乎和阿富汗人的一样野蛮。但是，就在这些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一个头重脚轻的、外来的上层建筑，如庞大的外债，西方式的法庭，完全的契约自由，事实上，是全套的欧洲文明，包括它的某些最坏的特点和少许最好的特点”。他进一步说，他认为欧洲不会袖手旁观，坐视这个上层建筑土崩瓦解。因此，从此以后，英国就以欧洲在埃及的利益的保护人自居。但是，英国担任这个角色，并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称赞，因为驻在开罗的欧洲各国的总领事都看出，只有他们的英国同事有一支军队做后盾——到1888年仍有4700人——他可以用这支军队支持他为了欧洲的利益而提出的任何建议。埃及的赤字是一个继续存在的欧洲问题，英国无法实行任何独立的政策。莱昂斯勋爵从巴黎注意到“在埃及问题上，几乎整个欧洲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站在反对我们的一边”。这样，巴林就承担起一项任务，一方面要维持自己国家的权威，同时又要尽最大的可能使人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在维持这种权威。1892年，年轻的新总督阿拔斯二世想要维护他自己的权力，坚持要更换他自己的内阁成员，巴林就马上使他明白，他身上带着的政治锁链有多长。巴林坚决表示，英国女王陛下政府“期望在更换部长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要同它进行磋商”，罗斯伯里对此表示支持。巴林很厌烦发生这一事件，抱怨说它“使他不得不走出藏身之处”，而且这样做足以破坏整个体制。

对法国人来说，这种藏身之处从来就不难发现，这个体制从来就是篡夺权力。用弗雷西内的话来说，任何埃及总督都不能不是“英国式的君主”——巴林认为这个评语是一种讽刺，因为他很羡慕法国在突尼斯的地位，在那里，任何法律如果没有法国总督的签字都是无效的。法国本来乐观地期望：在特勒凯比尔战役以后，会重新建立“双重控制”的制度。由于这一希望落空，法国就“保留了他们在埃及的行动自由”；这句话表明，从此以后，法国要尽最大努力阻碍英国实行其在埃及的行政管理和英国总的对外政策。由于丧失了已存在40多年的“英法协约”，英国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另一个欧洲强国——德国的亲善友好，因为它同德国之间还不存在直接争吵的理由。这是一个俾斯麦得以充分利用的局势。

英国人找不到任何办法，可以走出他们在埃及钻进的死胡同。他们无法把埃及接管过来，并按照合理的殖民地方式或印度方式加以统治，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发出全面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信号，因此，绝不能冒这样的风险。那样一来，法国和俄国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已经是两个土耳其属国的监护人的英国，如何能表示反对呢？在苏丹——这一地区可说是属于土耳其，也可以说是无主之地，但肯定不属于英国——出现的没有料到的复杂局面，使得平狄事件真正成为危险的事。当英国同俄国的这场争执正在发展的时候，英国不得不把派往苏丹去援救戈登的5000名军队召回国。这支军队刚刚到达喀土穆，只好又离开那里。这样，苏丹落入哈里发的手中，又混乱了10年之久。埃及问题的重心不在开罗，甚至也不在巴黎，而是在柏林。埃及是俾斯麦可以按照俄国在中亚的方式，对英国政策成功地施加压力的唯一地方。从安格拉皮奎那到新几内亚，到处都可以感觉到这一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同时，1884年为制订瓜分非洲的计划和办法而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则完全由俾斯麦和朱尔·费里所控制。会议的决定自然就打乱了乐观的英国人在非洲大陆上划出来的一块块“势力范围”。

像格莱斯顿一样，索尔兹伯里也想退出这条死胡同。他把英国在埃及的处境比作是“一个人暂住在一家旅馆，可是又想从附近的商店赊购东西”时所遇到的困难。他对法国大使瓦丹通保证说，他只是在“寻找体面地撤退的方法”。这种方法他始终没有找到。按照当时的国际行为准则，一个殖民帝国在另一个殖民帝国的压力下要想“体面地”撤退是不可能的。只要是法国命令约翰牛离开埃及，它是不会离

开的。而且，索尔兹伯里也同格莱斯顿一样，希望能够劝说土耳其人担负起他们自己对埃及和苏丹的责任。1885年8月，德拉蒙德·沃尔夫在前往波斯从事其冒险生涯以前，先来到了开罗。他得到的指示是接受撤离的原则，但是，不要确定具体的撤离日期，也不能使英国政府承担义务，答应在它决定做任何事情以前，须得到欧洲列强的同意。谈判最后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举行。在那里，德拉蒙德·沃尔夫于1887年5月22日提出一个条件专横而巧妙的协定，要求苏丹批准。

按照这个协定，英国人保证在3年以内撤离埃及。然而，协定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英国人有权“在一旦出现外来的危险时”，重新进入埃及；而是否出现这种危险，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判断。索尔兹伯里已经向瓦丹通说明：这一条款是英国女王政府最坚持的一条；除非重新进入埃及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英国人无意撤离埃及。另外，德拉蒙德·沃尔夫所提出的协定中的第五条规定：如果埃及总督行为不当，因而在埃及出现混乱，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政府双方都有权派出军队维持秩序；而且，即使土耳其人不使用这一权利，英国政府依然可以这样做。好像还嫌不够似的，沃尔夫又规定，如果地中海国家中有一个国家不接受这一协定并不予批准，这种拒绝本身将被视为“出现外来的危险”。这就足以使英国不把一兵一卒撤离埃及海岸。

这一协定的条款使外交界为之大哗，并揭开了英法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对抗最激烈的时期。法国和俄国大使对苏丹进行了无情的威逼恫吓，并告诉他如果他批准这份邪恶的文件，法国和俄国就认为，它们从而也得到了占领奥斯曼帝国所属诸如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等省的权利，并且，只有在缔结类似的协定以后，才撤离这些省份。把重新占领埃及的权利给予英国，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和土耳其苏丹之间平分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权。法国绝不能接受埃及永远地由一个强国控制的局面。俄国使节涅利多夫也同样地感情激动。他认为，由于这个协定，俄国就无法把埃及当作一件抵押品——像俄国把土耳其斯坦当作抵押品那样——来逼迫英国对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做出让步。这里当然也牵涉到一条原则，他的德国同僚拉多维茨愉快地评论说：“很好，你们就维护你们的原则，英国就保卫埃及吧。”英国人是这么做了。沃尔夫的协定既没有得到苏丹的批准，也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国家的批准。协定所产生的唯一的具體结果是土耳其派遣了一位高级专员

前往开罗，使得巴林在那里遇到的国际问题也相应地增加。撤出埃及的事，也像对山鲁佐德的处决^[8]一样，无限期地推迟了。

英国之所以占领埃及，是因为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存在。虽然英国为债券持有者担心也是它采取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但是，仅仅这种担心绝不会促使一个自由党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苏伊士运河现在促使英国人继续留在埃及。运河公司依然是一个法国公司，根据土耳其——埃及的特许经营业务。但是，一切有关公司的物质财产的事宜，都是在英国政府的外交庇护下办理的。沃尔斯利在1882年的远征中，曾利用苏伊士运河作为军事基地，这早已引起欧洲列强的注意。不过，一直到1883年1月，格兰维尔才在一份安抚别国的通知照会中提到了这件事。在这份通知照会中，他提议列强应联合起来宣布：苏伊士运河应该保持不设防，对所有船只开放；不允许在运河区卸下任何军队或军火；不允许在运河中或其入口处，或在埃及水域中的任何地方进行敌对行动，即使土耳其是交战的一方，也应如此。但是，后两项条件不适用于“为保卫埃及而必须采取的”任何措施。这一点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是居心叵测，列强把它看作是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带头召集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到1885年6月，委员会草拟出一份文件，把英法两国所提出的建议汇集在一起。但是，英国代表又附加了一个保留条件，其大意是，只要英国军队继续占领着埃及，就要推迟实行这个国际委员会所拟定的所有条款。1888年，英国固然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同时签字的还有法国和欧洲列强。但是，由于英国继续坚持它在1885年提出的保留条件，所以公约并未付诸实行。迪尔克在下院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所坚持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发了疯的公约”。根据这个公约，俄国舰队很可能通过这条运河去进攻印度。直到1904年举行谈判时，法国在埃及对英国的刺激最后消除，英国才放弃了这种态度。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在高喊它关心“海上自由”，但是，尽管苏伊士运河里流的都是海水，埃及的主人却不把它看成是一条国际航道。

这样，英国就在一个必须维护其势力的地区，成功地维护了它的势力。当1876年应适当对喀布尔的埃米尔增加压力时，索尔兹伯里给利顿的那个指标，其更广泛的意义现在得到了清楚的证明。索尔兹伯里当时写道：“那些最终要依赖英国力量保护的地区，绝不能对有可能正式受权进入这些地区的女王陛下的官员和臣民关闭。”然而，英

国政治思想中反对建立殖民帝国的传统这一次发挥了作用。这种传统始终是把推进政策拉向后转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由于英国人对坚持维护这种势力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人们越来越认为，英国人是为了埃及人本身的缘故，才承担起留在埃及的“责任”的。帝国所关心的对象应该是“农民”，而不是那些债券持有者。虽然自由党人从此以后主要是强调“克罗默主义”的这一方面，但格莱斯顿本人却一贯不承认存在着任何这样的责任，因为这取消了一切从埃及撤出的诺言。正像他在1893年5月描述的那样，埃及政府依然是“一个负担，一个难题，一种风险”。不管怎样，把执行文明使命这个新的因素掺杂到英国对埃及的态度之中，只能是进一步疏远法国，并使那些专门以搜集英国人背信弃义行为的材料为业的人们更加振振有词。

中亚地区的复杂局势至少有一个优点：它仅仅是两个强国范围之内的事。但是在埃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而且，每个人都发言。克罗默正是因为有过轻信别人说法的痛苦经验，才特别注意在“英埃苏丹”（这是他根据1899年局势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绝不能让外国人得到类似他们在埃及所享有的那种权利或特权。正是这种对英国在埃及所奉行的政策的共同厌恶，促使其他强国在非洲，在远东，事实上在世界上所有英帝国占有疆土的地方联合起来，对英国造成危害。从1892年到1893年，俄国的代理人正渗入克什米尔以北的帕米尔高原，法国人则从他们在印度支那湄公河上的基地进入暹罗。把这看作是向印度展开的一场巨大的“钳形攻势”，虽然不符事实，但其意图已足以使罗斯伯里政府感到惊恐。因而，英国政府在1895年就帕米尔问题同俄国和解速度之快，是其他任何中亚问题所未曾有过的。

在利凡得本身，也可以找到英国地位虚弱的其他例证。1894年12月，当亚美尼亚人的骚乱又迫使欧洲列强不得不加以注意的时候，罗斯伯里曾有意让俄国占领土耳其所属的这些亚美尼亚省份，以此来换取俄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同时，或许还打算使法国在叙利亚得到一些补偿。英国已经放弃了它维持利凡得现状的原则到了这个程度。此外，在小亚细亚也出现了一种需要应付的新因素。自从1888年第一条铁路从维也纳通到君士坦丁堡以来，德国各铁路公司就一直忙于在安纳托利亚进一步修筑铁路，到1892年，已完成了从博斯普鲁斯到安卡拉的铁路线。在这个时代，铁路被视为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章鱼的触角。这种看法是有充足的理由的。H. N. 布雷斯福德在

《钢铁与黄金的战争》（1914年）一书中，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安纳托利亚的铁路是怎样一英里一英里蜿蜒于平坦的原野，而第一英里都为承建者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的。然而，在波斯铁路问题上极为敏感的英国人，却无法阻止这种外国势力的推进。这种推进势必会沿着铁轨把外国势力送到一个还没有任何其他帝国的旗帜飘扬过的地区——波斯湾。德国人已向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有利地位：1892年12月，当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主动示意要阻碍德国进一步发展铁路的时候，德国就扬言要撤销对英国在埃及的政策的支持。克罗默当时正忙于应付毫不妥协的阿拔斯二世，并急于获得同意在埃及增兵，他说服罗斯伯里千万不要在安纳托利亚再惹恼德国人。甚至在中亚这个传统的外交战场上，英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1900年2月，俄国人废除了1873年的英俄协议，而这项协议包括一个俄国人保证阿富汗不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内的条款。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令人困惑不解，这就使得在“英一印”人士中引起的不安更加严重了。

不过，德国的侵入也给中东“俱乐部”的老成员国带来了一个共同的问题。1898年10月，德国皇帝第二次访问了利凡得，在大马士革宣布说，3亿穆斯林可以把他看作他们的朋友。对此，俄国、法国也和英帝国一样，都有理由感到气愤。一个由于受到德国人的热心支持而东山再起的奥斯曼帝国，将会对所有这三大国未来的安定构成长期的威胁。印度总督寇松劝说波斯湾的阿曼苏丹和科威特酋长——科威特最可能成为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修筑的任何铁路的终点——分别同印度政府签订条约。在条约中，他们保证未经英国政府批准，他们绝不割让任何土地，也不接受任何外国代理人。他们在1899年的头两个月签订了条约。但是，就在这年9月，阿曼苏丹正式批准给予一家德国公司以修筑经过他的帝国通往巴格达和巴士拉的铁路的特权。

这样，在中东历史上这个时期将结束的时候，对德国和英国来说，必须决定究竟是各自同德国和解，还是两国之间彼此和解呢，看来这样做对它们都是有利的。在这个时候，除非各强国同柏林保持对话，否则，在中东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而事实是：圣彼得堡和伦敦都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可以促使德国人觉得他们值得保持这一对话。虽然英国人令人痛心迟迟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但是，最后还是采取了行动。为了应付远东现状所受到的威胁，英国同日本以相互承认对方在印度和朝鲜的“特殊地位”为条件，缔结了同

盟条约。然后，英国人又成功地同法国恢复了英法协约（1904年），法国终于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英国则对法国在摩洛哥建立霸权表示赞同（极不明智的是，这样做时没有取得德国人的合作）。3年后，下一届英国政府在中亚问题上同法国的同盟国——俄国签订了协约（1907年）。

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实际上愿意为了保持他们在埃及的地位而放弃不参加任何欧洲集团的传统对外政策。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他们终于在1914年参加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最初的起因是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争执，而这种类型的争执，白厅过去是从不关心的。英国人站到了长期以来一直在中东同大英帝国争权夺利的对手们一边。而且在1914年，英国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国人和法国人不会再次扮演这种对手的角色。

但是，在这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于非洲和远东问题吸引了欧洲各大国的政府和舆论界的注意力，中东问题被忽略了。与此同时，克罗默则继续向英国议会提交有关埃及问题的年度报告。阿瑟·贝尔福坚持了他在1896年首次发表的意见：对印度和英帝国来说，印度军队在印度河上打一个败仗，同英国海军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败仗相比，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损失。南非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没有动员他在土耳其斯坦的军队。英帝国又重新振作起来，把皇家海军提高到了一个更受尊重的地位。但是，不论出现什么需要优先处理的其他事态，也不论欧洲在其他什么地方扩张其边界，三大洲之间的整个中东桥头堡的安全，对于每一个在欧洲以外拥有利益的强国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如同在19世纪一样，中东仍然是一个外来者拥有最大发言权的地区。帕麦斯顿曾经担心会有一个“活跃的阿拉伯君主”出现。这样的人物还没有登场，但是，即使有这样一位人物最后在舞台上出现，除了使局面更加复杂化以外，对于世界各大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郭华 译）

[\[1\]](#) “中东”一词始终是一个不符合时代情况的错误说法。虽然瓦伦丁·契罗尔曾1903年出版了《中东问题》一书，但“中东”一词是到1917年以后才在英国普遍地使用起来的。这个名称显然来源于指挥驻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莫德将军手下的参谋人员，他们把这个词作为部队的标志。现在这个名称仍然被用得很混乱。

尤其是美国作者往往宁愿使用较早的说法“近东”，而当他们使用“中东”一词时，往往把印度也包括在内。最好是恢复更早以前使用的名称“利凡得”。

[2] 即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管辖的地区。——译者

[3] 现名霍拉姆沙尔（Khorramshahr）。——译者

[4] 原文如此，据其他资料，此约签订日期应为6月4日。——译者

[5] 一译吴士礼，曾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译者

[6] *uti possidetis*，即国际法上允许交战国各方在战争结束时占有实际占领地区的原则。——译者

[7] 埃及的货币单位。——译者

[8] 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中善于讲故事的王后。国王每夜娶一王后，翌晨杀害，但山鲁佐德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因此，处决她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下去。——译者

第二十二章 非洲的瓜分

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就一直在加强对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是在重商主义时代挑选出来的，其中有澳大拉西亚、印度、东南亚，以及最为重要的美洲。这些地区或是白人移民迁居的温带地区，或是已经处于白人统治下的热带国家。白人扩张的方式逐步起了变化：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和工业的发展，重点已经从建立正式的帝国殖民地转向建立非正式的势力范围。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早在19世纪末，即在地图上确定具体的分割之前很久，欧洲帝国主义的基石实际上已经奠定了。非洲是引起扩张战略家们兴趣的最后一块大陆；他们似乎认为，他们在这里是在分最后一杯羹了。

分割非洲对欧洲人来说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当时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他们遥遥领先于其他大陆。经济的发展和技術革新给予他们保证和力量，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组织又给了他们一种克敌制胜的威力，足以和他们的铁甲舰以及高速枪炮相媲美。欧洲有能力并吞非洲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欧洲的统治者有这样做的坚定愿望吗？

短短的20年就把非洲大陆分割成了外交几何学家们所发明的若干对称体。到19世纪末，只有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还保持独立，而轮到它们被兼并的日子也不远了。可是，划分新国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要统治和开发那些已经弄到手的地盘。俾斯麦和费里，格莱斯顿和索尔兹伯里对于在非洲建立帝国都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事实上认为这种努力是一出滑稽戏而嗤之以鼻。在丛林和灌木丛中进行战争的赌博，可能会引起像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那样一个可怜的国王的兴趣，或者像克里斯比那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兴趣，但是就19世纪80年代的主要瓜分者们来说，在他们进行分割活动的背后，根本不存在建立任何宏伟大帝国的设想。他们不感到需要非洲的殖民地，在这一点上，他们反映了除少数极端分子外的欧洲企业界和政界所持的冷漠态度。在这里，历史学家们必须明白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不管社会科学家事后有些什么认识，在分割活动的背后确实不存在任何雄心壮志。在帝国主义漫长的编年史上，非洲的分割是一

件荒诞不经的咄咄怪事。在造成整整一个大陆发生剧烈变化的重大事件中，迄今很少有像分割非洲这样偶然促成的事件。

那么，政治家们当时为什么费心劳神地去瓜分非洲大陆呢？人们一贯认为，欧洲社会必定为这个时候在非洲建立帝国提供了较强大的推动力，并且为证明这一假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可是，这些原因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种使人生厌的缺陷：很少能够从中看出有什么强大的新刺激。只是在非洲分割完毕以后很久，资本才到热带非洲来寻找出路，工业才到这里来寻找市场。直到19世纪末，欧洲的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绕开了这些前景暗淡的地区，而更注意已证明为有利可图的美洲和亚洲地域。用欧洲人的思想情绪的某种变化来解释分割非洲的运动也是不真实的。在非洲建立帝国的自豪和荣耀，并不合乎公众的口味；直到19世纪90年代分割差不多完成之前，情况一直是如此。只是在非洲被完全分割和划分了势力范围以后，欧洲舆论界才接受帝国的神话。如果把白人变革非洲社会称之为运动，就像他们曾经变革印度或爪哇的社会一样，那么，帝国主义并不是实行分割的原因，而只是次要的影响之一。

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里只是要指出：被许多因素偶然促成的分割运动，并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总动因。所有的因素都必须包括进去，因为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才造成了分割非洲的后果。而且，除非摆脱迄今一直模糊了我们看法的那种观点，才能把这些因素一一揭示出来。把眼光死盯在欧洲身上找寻原因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一直是在错误的地点去寻求答案。推动一切因素起作用的决定性变化，发生于非洲内部。把非洲拖进现代历史的，是非洲北部一个旧政权的衰亡和非洲南部一个新政权的崛起。

从非洲大陆对立两端爆发的这些内部危机中，展开了两个互不相关的分割进程。南部非洲的这种进程起始于德兰士瓦金矿的发现，以及从贝专纳到尼亚萨湖殖民地当局与共和国之间竞相扩张的斗争。它终于把南部非洲推进了“詹姆森袭击事件”和布尔战争。第二个危机是“赫迪夫”统治在1879—1882年埃及革命中的崩溃^[1]。英国人对这种新的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处置不当，莽撞地闯到尼罗河畔，结果陷在那里不能自拔。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它导致英法两国之间在一场波及整个热带非洲的争执中相互仇恨，这场争执直到1898年才在法绍达得到解决。

由此可见，欧洲是通过两场内部危机卷入热带非洲的。先是同埃及早期民族主义者，继而又同遍及苏丹全境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所形成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把欧洲列强拖进了一场在东非和西非的大扩张。在南面几千英里的地方，英国人想把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2]并进入一个陈腐的帝国结构之内的努力，触发了在非洲南部进行的第二次扩张浪潮。因此，19世纪的最后25年，时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这种帝国主义的推进，大部分都只不过是欧洲对于非洲已经兴起的各种各样伊斯兰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做出的不由自主的反应而已，而这些运动的矛头所向，则是白人逐步扩展的奴役制度。

穆斯林的叛乱迫使费里仓促地占领了突尼斯，从而揭开了分割的序幕；开罗的穆斯林革命使格莱斯顿羁身于埃及，难以摆脱，从而开始了分割本身的进程。北非这部分地区的各族民众有着许多不满的原因。到1880年，来自海外的领事、高利贷者、工程师和慈善家们，使这两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埃及控制着通往英属印度的一条通道，又由于突尼斯在法国的地中海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赫迪夫”和“贝伊”^[3]在长达3/4的世纪里都一直是英法扩张过程中所玩弄的棋子。虽然这两个强国对这些地区的命运不能够漠不关心，但谁也不愿意把这些地区变成殖民地。英国人一心要使奥斯曼帝国保持完整，宁愿从君士坦丁堡监护苏伊士运河。法国人享受着非正式霸占突尼斯和开罗的果实，无意于建立第二个阿尔及利亚。但是，欧洲的投资和贸易额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却与日俱增，而正是欧洲人的投资造成了70年代的冲突；在70年代这个伊斯兰教徒无力偿还债务的黄金时代，连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都被逼得破了产。在开罗和突尼斯，欧洲人在财政上提出的意见竟成了某种金科玉律。债务稽核员负责管理被当地统治者非常轻率地抵押出去的国家税收；偿付国债利息成了这两国政府的头一份支出；在本国人民的眼里，这两位君主已经沦落成给异教徒征收税款的收债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从此财政上的破产走向政治上的灾难。他们的军队由于是这些国家中受束缚最少和西方化程度最高的集团，威胁着要发动武装政变；边界地区的部落也在谈论发动叛乱。他们从地主和农民那里搜括的钱越多，反对他们巧取豪夺的叛乱也就越接近。到1881年，埃及和突尼斯已经在滑向大崩溃。在19世纪，几乎所有试图实行欧洲式发展计划的非欧洲国家组织，没有一个能逃脱这种一败涂地的命运。对于实行

这种计划来说，伊斯兰教既不能提供合适的法律或制度，也不能提供所需要的社会精神气质；统治者们发现，要实现现代化，他们就必然要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力或独立地位。

尽管面临着与当地政府破裂的局面，法国人还是非常不愿意占领突尼斯。但是，1877年以后，在意大利人的鼓励下，挪用公款的能手穆斯塔发·本·易斯马仪接替了法国人的走卒赫雷丁的首相职位，并且着手铲除使巴黎可以任意操纵突尼斯经济和政治前途的那些特许权。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在这个局面下，要实现这些特权，光靠炮舰和兜售合同的掮客是不够的。

在阿尔及利亚，有许多人要求进行讨伐性的远征，但是在法国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有一些海军和陆军将领希望把突尼斯并入他们统治着的阿尔及利亚；有一些投机家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股票市场的大变化，因为要是他们的政府最后为一个战败的“贝伊”的债务做了担保，股票市场上的这种大变化就会到来。但是，法国大多数政治家都认为用兵有得不偿失的风险。“在一个大选的年头派出一支远征军吗？”总理费里对他的外交部部长喊道：“我亲爱的圣伊雷尔，这是办不到的。”但是国民议会议长甘必大主张干涉，这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政府由于有甘必大撑腰，终于把它的军队派了出去。1881年4月22日，开始了对突尼斯的军事讨伐。

法国抱有多大的企求呢？对于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来说，法国的目的显然渺小得可怜。甘必大对远征的目的做了明确的解说，他写道：“我们要让‘贝伊’付出一大笔赔款……割让出一大块领土作为对付未来的预防措施，签订一项具有切实保证的条约，然后……在显示了实力，足以永远保证我们在那里据有统治地位，从而与我们在地中海的权力、利益和投资相一致以后，我们就撤军。”费里的想法也是一样，他的目的只是要重新确立对外影响，而不是要获得一块新殖民地，这些有限的目标充分反映在迫使“贝伊”于1881年5月12日签订的巴尔多条约中。条约只宣布突尼斯为法国的被保护国。这本身意味着法国对它的海外关系只实行遥控；可是，就连这样温和的规定在国民议会履行批准手续时，还有120票弃权。法国占领突尼斯并不是出自巴黎主动进取的决策，而不过是对突尼斯内部日益加深的危机做出的反应。巴尔多条约仅仅是同一个已经丧失民众信任的穆斯林统治者做出的安排，他对法国的投降并不能约束他的臣民。

在突尼斯王国境内，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萨努西”教派的教士们煽起反对基督教入侵者的愤恨；继奥兰叛乱以后，在南部圣城凯鲁万周围又发生了另一次叛乱。叛乱者宣布发动圣战，拥戴了一个哈里发。远离突尼斯城的部落大批赶来参加这个运动。这种局面实质上曾经导致19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爆发了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野蛮的战争，和即将导致埃属苏丹产生马赫迪的穆斯林神权政治的那类局面一样——这是反对外国人和异教徒实行最高统治的一种宗教狂热，它的爆发犹如闪电般迅猛。

粉碎叛乱，对将军们来说，是不费力的，但是却给政治家们提出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有一件事现在是清楚的。实行非正式控制的那种旧制度的基础已经永远消失，被来自下层的政治和宗教叛乱扫荡干净。到了1881年夏天，法国在突尼斯必须做出像阿卜杜勒·卡德尔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向它提出的同样艰难的选择。它要么前进，要么就退出。条约规定的保护国必须予以实现，否则它就必须彻底取消。设法加以实现将会招致国民议会更多的指责。10月份，叛变被粉碎。但是，国民议会对在非洲进行冒险普遍感到憎恶，这意味着国民议会就此通过的决议将是闪烁其词和模棱两可的。甘必大设法让新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规定要“彻底实施”巴尔多条约。在这项巧妙地写得含糊其词的方案背后，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进犯突尼斯的侵略者现在不得不征服和统治一个他们已无法再从外部控制的民族了。

如此不正常的一种占领，绝不标志着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开始。这不是由法国社会内部要扩大其非洲帝国的深刻动因造成的。从议会竞选方面来考虑，它是冒风险的。它使得占领突尼斯的鼓吹者变得声名狼藉。它并没有激起高卢民族喜爱立功扬名的那种热情，虽然历史学家们每逢法国对外扩张引起的种种问题变得过于费解的时候，总是举出这种功名心来做解释。把突尼斯变成被保护国，不过是往昔打入阿尔及利亚的行动的继续，是过去以间接方式向突尼斯境内扩张的一个结局。

两年后开始的对非洲热带地区的瓜分，并不是突尼斯不幸事件造成的后果，也不是出自利奥波德的策划、俾斯麦的阴谋诡计，或是该地区的白人商人和探险家们的争吵。推动瓜分运动的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这场危机产生的反响。

到1882年，一场公认的近代民族主义革命正席卷着整个尼罗河三角洲；人们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要比对于把他们镇压下去的总督们熟悉得多。埃及人是对以往6年中英法两国日益加强的干涉做出的反应。英法两国融洽无间地对埃及进行的双重的最高监督以及它们各自在印度和地中海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因此，由于迫切地希望重新树立这个政权，它们曾经使用了高压手段。在它们的指示下，“赫迪夫”政权已经用君主立宪的漂亮外衣装扮起来，军队已经被裁减，地主们被迫纳税，“赫迪夫”易斯马仪被赶走，换上了特伍菲克，2/3的国家岁入都被扣押下来，付给证券持有者。无怪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贵族显要们不断利用宪法来摆脱外国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被欺诈的农民处在叛乱的边缘；穆斯林聚居的峡谷地区纷纷起来反对基督教徒；军队发生哗变，要求召回被开除的弟兄们；帕夏们也在驱逐外国人出境的爱国主义的幌子下，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到1882年1月，一切力量都团结了起来，共同反对英法两国的财政监督专员以及唯命是从的“赫迪夫”政权。法国领事报告说，特伍菲克已经威信扫地；英国领事则报告，阿拉比及其部属几乎已经接管了全国。

埃及发生的情况比突尼斯“贝伊”倒台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这里也是“一场注定要转变为狂热的反欧洲运动”^[4]，但这一次却有一支职业军队带头。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十分惊恐地预见到，‘监督’政策和任何真正的民族感情都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且深信我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失败”。“让埃及人主宰埃及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上策和唯一的妥善方法”。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由于“（英法两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是两国全面亲善关系的主要象征”，因此，双方在这场危机中都优先考虑步调一致的问题。两国对共同处理危机可能都有所不满，但它们又都不愿意单干。单是在突尼斯所进行的冒险事业不得人心这一点，就足以使弗雷西内内阁不敢在北非再次出兵。格莱斯顿的自由党人刚刚在德兰士瓦和阿富汗结束战争，并从突尼斯和摩洛哥脱身，因此，对于在国外再次进行干涉，也心存顾虑。显而易见，理想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格莱斯顿所说的唯一办法，就是和阿拉比达成协议。这一点他们试着做了。巴黎向阿拉比提出，可以让他带薪度假，去考察欧洲军队；伦敦则尝试让他同赫迪夫政府和解。可是埃及人的感情当时是如此强烈，以致使阿拉比不能接受那似乎不可缺少的一项条件：遵守“财政监督”制度。而只

要他拒绝接受这项条件，英国人就始终担心某个外国会割断苏伊士运河的咽喉；法国人就始终害怕土耳其的干涉，这种干涉会使伊斯兰的援军更加接近于他们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不听话的臣民。1882年1月6日，两国的联合照会宣布了由甘必大提出的、格莱斯顿勉强表示同意的结论：“赫迪夫”政府必须给予支持，财政“监督”制度必须予以维护。照会中没有公开宣布而实际上同样强调的一点是，两国政府都坚信，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在埃及登陆一支军队必定会适得其反。弗雷西内不能采取行动，因为国民议会反对这样做，所以发动一场入侵，将会把埃及拱手送给英国。格莱斯顿的内阁也进退两难。单独进行干涉将意味着和法国破裂，联合起来干涉，又将使法国对通往东方的海路获得一半权利。外交部的格兰维尔列出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埃及人和土耳其人反对；欧洲人忌妒；要承担起在力量不足和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统治一个东方国家的责任；还要估计到法国人会强烈反对我们的单独占领，正如我们将会同样强烈地反对他们的单独占领一样。”反对进入埃及的官方理由是极其有力的，正如迪斯累里所说，“通向印度的钥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在整个19世纪，英法两国在地中海进行的争夺没有几次像这样平静。此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人们乐观地认为有可能把“东方人”改变成英国绅士，这也是反对征服新的印度式殖民地的另一个有力理由。因此，所有的计划都是争取留在外部，并从外部解决问题。

但是，在促使帕夏们和清朝官僚们屈从于欧洲人的奇思怪想方面，“道德影响”的手法虽然曾屡奏奇效。可是它们用到阿拉伯主义者、马赫迪分子和义和团身上，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造成了更坏的后果，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群众反抗情绪是伊斯兰教和东方的政治觉醒的信号。炮舰外交和欧洲协作的压力，不仅没有使阿拉比的军官们清醒和挽救“监督”制度，反而增强了“埃及人”阿拉比作为超凡入圣的神奇领袖的号召力。英法两国海军6月的示威行动，激起了欧洲人在亚历山大遭到屠杀的事件。这一事件使阿拉比在英国自由党人当中的名声败坏。结果，虽然法国的舰队撤退了，比彻姆·西摩尔却获准炮轰亚历山大的要塞，以表示至少英国是认真的。但事实表明，使用这种老式的恫吓手段铸下了大错，成了事态无可挽回的转折点。阿拉比宣布对英国人进行“圣战”，骚乱一直蔓延到内地。按照战略上的绝对准则来考虑，如果苏伊士运河受到威胁，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它。按照英国—印度的正统观念来看，“圣战”是对帝

国在整个伊斯兰东方的威信发出了挑战。因此，对格莱斯顿的大臣们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采取哪种干涉方式……最不会引起反感，而是以哪种方式来进行干涉能够最迅速地行动起来”。和法国人合伙或者进行国际合作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运用惯常的那套恫吓的办法来迫使埃及人就范的时候，英国人押下了很大的赌注，以致他们这时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取得上风。8月16日，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率领英国军队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登陆，从而发动了另一场小规模殖民战争。他们在特勒凯比尔击溃埃及军队，囚禁了阿拉比，重新扶植起特伍菲克。格莱斯顿的政府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旦运河获得安全和特伍菲克立定足跟，它就会把军队撤回国会，让埃及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自由党人想做的事。就像法国人在突尼斯一样，他们只希望通过施加影响来恢复旧的保障，并不想扩大他们的统治。派出远征军只是一种帕麦斯顿当政时期的手法，这种手法曾经在1839—1841年使土耳其人听从道理，曾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教训过中国人，1869年教训过埃塞俄比亚人，1874年教训过阿散蒂。但是，经过许多个月以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一旦陷了进去，就不可能再从中脱身；他们已经实现了他们本来力图避免的占领。到1844年，他们已经不得不私下承认，“我们原来据以（实行进驻）的理论……不管怎样言之成理，现在已经完全崩溃了”。事实证明，这种干涉的模式已经像建筑水晶宫那样陈旧过时了。从开始到结尾，英国人都打错了算盘。他们曾力图去恢复“阿拉比以前的状态”，结果发现这种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跑来恢复“赫迪夫”政权，结果发现他离开英国刺刀的支持便毫无价值。因此，他们陷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了。

首先使他们认清现实情况的是非洲的另一次危机。穆罕默德·阿里曾经征服了东苏丹，把它并入了埃及；“赫迪夫”易斯马仪就对这个地区的民众课征重税，他同时还宣布禁止贩卖奴隶的贸易，从而剥夺了当地人应酬收税官或逃避其棍棒的主要手段。他又雇用白人当地方长官，把基督教道德强加给他的穆斯林臣民。苏丹人对开罗的帝国主义行径深恶痛绝，一旦埃及人被革命和外国入侵解除了武装，他们便趁机进行反击。正如时常在伊斯兰非洲发生的那样，解放运动采取了反对外国统治阶级任意破坏教义的清教徒革命的形式。1881年“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开始传教，奉行信仰复兴主义的伊斯兰教

游方教士团把政治上有不满情绪的酋长和被废黜的苏丹们、奴隶贩子和部落民族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最初，远在埃及的英国人由于隔着一道沙漠地带，对“马赫迪国”的意义还不了解，直到1883年11月消息传来，才知道马赫迪的信徒们已经把驻苏丹的埃及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特伍菲克手中既没有军队，又没有金钱，根本守不住喀土穆。瓦迪哈勒法城已经毫无抵抗能力地暴露在马赫迪军队的面前。正当英国人把一种更加充分的独立地位交还特伍菲克，并且正从开罗撤军的时候，马赫迪的推进迫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保卫下埃及的边境。最后，伦敦终于明白真相。灾难临头了。正如大臣们所抱怨的，“我们现在已经被迫陷入了充当埃及保护人的处境”。同马赫迪打交道，正像和阿拉比打交道一样，根本没有机会达成一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老式协议。格莱斯顿不顾埃及人的激烈反对，命令特伍菲克放弃苏丹，以免继续耗费埃及的国库开支，同时派遣戈登去完成那种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结果是让他去喀土穆送死。为了迫使埃及放弃苏丹，巴林实际上又不得不控制“赫迪夫”政府，而他对“赫迪夫”政府抓得愈紧，英国人陷入财政困难的程度就愈深。到这时，埃及的惨败招致公众不满的程度，已经类似突尼斯事件在法国引起的反响。情况愈来愈清楚：格莱斯顿内阁已经愚弄了自己。他们曾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埃及政府；但是，由于“马赫迪国”的出现、苏丹的陷落、经济的破产以及财政监督官在早期民族主义者当中的不得人心，一句话，由于这些因素的妨碍，英国人找不到埃及合作者，可以安全地把权力移交给他们。同时，只要被激怒的法国人拒绝承认英国人在开罗的独占统治权（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酬劳），他们就不能撤军。因为如果他们撤军，法国人就会推翻他们的势力，埃及民族主义者或者苏丹入侵者就会破坏已达成的财政协议，于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一切危险就都会重现。

结果，“马赫迪国”把英国人羁绊在埃及，使之不得脱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和南部的起义把法国人困在突尼斯一样。只要一个欧洲强国骑到了沿海城市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头上，内陆草原和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就会立即抓住机会摆脱帕夏们的桎梏。因此，欧洲人发现他们打算控制或恢复的政权结构，一个个地就在他们的眼前崩溃，他们只能留下来收拾烂摊子。格莱斯顿厌倦地总结了这场事件的后果，好像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并不存在一个革命中的埃及和一个宗教复兴中的

苏丹一样。他说：“我们已经了结埃及这桩事；我们就是一个埃及政府。”

英国驻军留守的时间愈长，主张留下来不走的理由就变得愈加有力。到1889年“隐蔽的保护国”已经成为帝国在全世界保持安全的必需品。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胃口已经愈吃愈大了”。伊夫林·巴林爵士和那些以“赫迪夫”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英国—印度官吏们，把他们由于职业而养成的对民族主义者的不信任，从加尔各答带到了尼罗河。关于可以信任埃及人实行自治这一点，已经变得难以想象。阿拉伯主义的情绪仍然潜在。在接管这个国家的过程中，英国人使自己的政治策略停留在两可之间。埃及老朽的土耳其统治者已经倒台，但是它新兴的自由主义派领袖也被镇压了下去。所以，巴林不得不代行统治权，以待本地的政权复活，但是，只要巴林在进行统治，本地的政权就很难复活。如果说撤军从内政原因考虑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从外部情况着想，也很快变得不切合实际了。结果，对埃及的占领终于把法国推到了俄国的怀抱；而这种存在于地中海的双重威胁，加上土耳其帝国的进一步崩溃，提高了埃及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因此，1889年以后，英国决定留下来压制正在沸腾的革命，而不是撤走军队，让另一个列强来扼住通往印度的要道。从此以后，英国政治家们便沉湎于有关尼罗河流域战略的种种牵强附会的幻想中。为了确保苏伊士运河和下埃及，他们将他们的领土要求溯尼罗河而上，一直推到法绍达，从印度洋扩大到乌干达和苏丹的加扎勒河。

纵观全局，占领埃及看来可能是始于18世纪末的欧洲两大扩张运动的必然结果。其一是英国人在东方长期进行的贸易和权力的扩张；其二是英法两国的势力在埃及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扩张，这种扩张彻底瓦解了奥斯曼帝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从而使通往东方的道路不再能保持安全。可以肯定，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必定为事态的发展规定了一个范围。但是，具体决定占领埃及的因素，主要并不是欧洲扩张的长期进程，而是阿拉伯主义者和马赫迪分子为了反对外国人不断加强控制而进行的革命。当这些革命挫败了英法两国一贯奉行的非正式控制的政策之后，要想寻找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已为时过晚，唯一可行的，只能是征服和直接统治。

西摩尔在亚历山大和沃尔斯利在特勒凯比尔发射的炮弹，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事态终于表明，这些掠过水面飞来的炮弹已经把非

洲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史阶段。对阿拉比的讨伐触发了英法两国在埃及问题上的长期冲突，这一冲突对于促使非洲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截至19世纪90年代，分割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欧洲各国首都的政治家们至少是主观上希望事情就到此为止。在此以前，他们一直不理睬本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们要求向热带非洲推进的喧嚣。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交通极不方便；内地的各个部落纷争不断，似乎陷进了一片混乱；人们很怀疑能否说服非洲人去工作，或者说非洲人是否有能力制作任何值得生产的东西；贸易和税收的前景看来确实是暗淡的。如果说一些国家的政府有时候费点儿心力去帮助私人贸易，或者派出快舰沿海岸巡逻，以便为曾经进行过奴隶贸易一事赎罪，这类行动也并不被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大的或者稳定的政权机构零零星星地少得可怜，就连最简单的非正式扩张的方法在热带非洲也收效甚微，因此，显然更谈不上建立殖民地了。所以，在1882年以前的几十年中，欧洲列强之间一直有一个君子协定，保证不以彼此的商人和官吏在沿海地区发生的小争吵作为建立帝国的借口。

但是，当格莱斯顿鲁莽地闯进埃及以后，那个时代便结束了。对法国人来说，埃及成为披着伪装的保护国是他们在色当惨败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耻辱。他们的运河以及他们从拿破仑登陆该地以来一直培育着的那个国家，竟然就在他们眼前被抢走了。这就破坏了自由党人建立起的亲善关系，使英法两国发生争执达20年之久。而且，一旦进入埃及，英国就非常容易受到大陆外交的损害。为了整顿埃及的财政，英国需要德国的支持，以对付法国在债务监督委员会中的反对立场，否则，它的大臣们就不得不请求难说话的议会拨款津贴“赫迪夫”。由于这样改变了欧洲的结盟关系，占领埃及事件在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就为欧洲列强同时提供了动力和机会，使它们得以打破不在热带非洲扩张的传统协议。当巴林在开罗担当幕后操纵者之际，法国人竭力想把他排挤出去，其方法是让法国的总督们任意侵犯英国在它没有加以控制的非洲地区内的未曾保护的利益，而德国人则趁机在他们的欧洲事务中，大肆要挟英国人给予更多的帮助。一旦列强为了外交目的而支持本国的私人企业，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在沿海地区有限地建立势力范围的问题；它变成了一项对广大内陆地区无限制地要求取得控制权的事业。于是，阿拉比的革命和格莱斯顿的重大失算就以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使得热带非洲本来很

小的争端变得特别重要了，从而把外交官们引起了分割非洲的拍卖行。

在1882年10月以前的西部沿海地区，很少有迹象表明争执双方之间的妥协会如此突然地结束。当时，在商品生产者和作为中间人的酋长们之间沿着不平静的供应线不断地展开的战争，正在扼杀贝宁湾的英法两国贸易站。在过去的20年中，殖民部一直在考虑放弃冈比亚、黄金海岸、拉各斯和塞拉利昂。法国政府已经放弃象牙海岸；到1880年，它又在考虑离开达荷美和加蓬，“因为它在那里的利益微不足道”^[5]。由于内陆地区的动乱，由棕榈油商人草草凑成的非正式的和平协议正在失效；但是，伦敦和巴黎都不愿以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秩序来代替它。

作为中间人的酋长封锁着通往内陆的一切道路，欧洲人冲破这种封锁的唯一区域就是沿着三条大河的地带。在塞内加尔河上，到1865年，费德尔布将军已经沿河而上，把法国的势力扩大到卡耶。16年后，驻守当地的法国军人曾打算继续推进，把苏丹西部若干凶猛的穆斯林土邦征服，并修筑一条从塞内加尔到阿尔及利亚的横贯撒哈拉的铁路。这项计划后来被束之高阁。可是，在1881年却成立了一个上塞内加尔司令部，波尔涅斯-戴波德尔上校得到指示，要他在上尼日尔沿着巴福拉贝到巴马科一线建立哨所。但是，当士兵们刚刚遇到麻烦，巴黎的政治家们便立即削减经费，并谈起取消这个司令部的问题。伦敦和巴黎的国务活动家们不愿为这种在塞内加尔的扩张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并不威胁远在3000公里以外的下尼日尔的英国主要贸易中心。

同时，这里也没有形成一场西非“大争夺”，在这里，利物浦的商人们没有殖民地政府的支援，生意也很兴隆。到1881年，乔治·戈尔迪已经把最富于创业精神的尼日尔商号并入国家非洲公司，以便更有效地垄断尼日尔河上游的贸易，从而把法国竞争者排挤出去。这是一种英法之间的竞争，但是只限于在私人商家之间，以普通的商业方式相互残酷地争夺。只要英法两国之间还保持缓和，两国的政府是不愿意卷入的，正如戈尔迪为自己的公司申请皇家特许状被拒绝时所发现的那样。英法政府对于沿着刚果河无人地带彼此角逐的商人和探险家们也不感兴趣。迪斯累里的内阁大臣们就曾拒绝批准和若干喀麦隆土邦订立的条约，虽然这些条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内陆盆地展开政治活动的机会。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则比较鲁莽。打着他于1876年

创办的国际非洲协会的幌子，这位顽固的投机公司发起人多方策划，打算以自由国家的漂亮名义建立一个私人的刚果帝国。1879年，斯坦利去那里着手创办这项事业。为了给本国设在加蓬的贫穷的前哨阵地保持一个后方，法国政府指示布拉柴与当地统治者们签订若干对付比利时人的条约，规定这些条约要“保持住我们的权利而又不承担将来的义务”。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地方性争夺的小小交锋。布拉柴的活动是一次仅仅有助于保持本国政府眼前利益的私人冒险。利奥波德的刚果计划很少有机会实现，正如他过去打算在中国、菲律宾、婆罗洲和德兰士瓦取得租让地的计划一样。比利时政府是不会参与其事的。同时，正如这位国王所承认的，在列强承认他在刚果的权利以前，也不会有人投资半文钱。但是，如果指望投资者们到时会变得非常慷慨，愿意赠给他的王室一项凭他自己的微薄力量无法夺取的巨大的产业，这种机会究竟有多大呢？只要英法两国能够保持协调关系，他想成为一位非洲皇帝的希望就极难实现。

可是，英国人于1882年10月刚把法国人从双重监督机构中排挤出去，上述发生在西非的那些次要的阴谋活动就被牵扯到他们关于埃及问题的争吵中去。在巴黎，关于放弃前哨阵地的议论，减少了，而关于进行扩张以加强外交上对付英国人的能力的推想却增加了。特莱克·拉普莱纳被允许扩大法国在象牙海岸的势力。更加重要的是，法国派驻下尼日尔的领事开始了一场匆忙和当地统治者缔结条约的活动，从而威胁到英国在海岸地区的贸易。1883年年初，格兰维尔试图重新做出旧时的那种双方都保持克制态度的安排。他提出，只要法国人尊重尼日尔河下游的现状，英国愿意承认上尼日尔为法国独占的势力范围。然而，达成这种愉快谅解的日子已经过去。正如英国大使所报告的，破坏有关埃及问题的君子协定已经使法国人愤怒已极，以致这时再也谈不上维持西非的平静局面了。因此，外交部到11月份已经无计可施，只能派出领事休伊特到尼日尔地区去签订各种保护条约，“以便使我国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受干扰”。休伊特的航程被耽误了6个月，因为人们竟然不能说服财政部或者利物浦的商人承担他的旅费！

与此同时，英法关系的恶化也破坏了两国在刚果问题上奉行不干涉政策的协议。巴黎对格兰维尔谋求维持旧协议的努力嗤之以鼻。与此相反，188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布拉柴宣布法国在尼日尔河右岸有独占权益的条约。一个月以后，格兰维尔进行反击，他宣布

承认葡萄牙对刚果的古老权利，条件是保证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在法国人看来，这项条约是英国在埃及伤害法国以后，又到西非来侮辱他们，“是英国人为了不让法国……在刚果河三角洲插足而取得的一项保证”，是对法国早在1786年就已经开始的一项事业的侵犯。作为迅速的回击，费里展开了一场抨击英葡协定的外交攻势。法国一旦取得了对利奥波德的土地的优先购买权，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刚果自由国的迫切要求，好像它们已经是它的囊中物一样。1884年3月底，欧洲最有力量的那位政治家也从中插手。俾斯麦本人在谈到有关问题时使用的譬喻很说明问题：他要举起他的“埃及问题的大棒”了。

由于在埃及问题上反目，法英两国都向德国讨好。格兰维尔需要俾斯麦帮助他的政府摆脱在开罗的财政困境；费里要请求德国帮助抵制英葡条约和英国在埃及的野心——这是在巴黎“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考虑”。这位德国首相可以待价而沽，支持出价最高的一方；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可以鼓动实力较弱的一方去反对较强的一方，从而使埃及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总之，德国不管怎么样，都能捞到一点儿东西：可能从英国手中收复赫尔戈兰；若干有关殖民地的小好处肯定能获得；或者出现更好的情况，即一个孤立的法国也许就不会同俄国结盟，也不会和英国重归于好，来共同对付阿尔萨斯-洛林的征服者。3月份，俾斯麦开始对这些设想进行试验。他暗示，如果法国强烈要求它在埃及的权益，德国将提供援助，但是费里怀疑俾斯麦“不想做任何事惹恼英国，而……（只）希望别人，特别是（法国）去反对英国”，因此竭力和英国谈判就埃及问题达成协议。6月份，英国答应在1888年撤离埃及，如果法国同意今后在比利时领地的边界线上使它中立化的话。

眼看“埃及问题的大棒”就要从自己的手上脱落，俾斯麦赶紧设法让法国采取强硬立场；他提出，如果法国抬高向格兰维尔提出的条件，德国将给予支持。他还设法消除费里的怀疑，表白德国联法反英也是有它自己的重要原因的。当然，在埃及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原因，正如这位首相过去经常宣布的那样。因此，为了装得确有其事，他把英德两国在非洲沿海地区微小的贸易争执大事宣扬，把它们变成了一场大吵大嚷的反英示威。5月份，他促使德国政府宣布保护安格拉皮奎那的吕德里茨租借地，虽然那是在荒凉的非洲西南沿海地区。一个月后，他对英葡条约发出谴责，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决定刚果

的前途。7月初，他宣布多哥和喀麦隆为德国的保护国。帝国内部当时并没有争取非洲殖民地的普遍要求，而且正像他本人经常坚持的那样，他也“反对建立……要派出官吏和驻军设防的殖民地”。但是，仅仅在纸面上宣布保护国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它们却是诱使法国上钩的很好的鱼饵，可以使法国背离英国，而同德国达成协议。令人惊异的是，这种狡猾的外交手法居然获得了成功。在7月的伦敦会议上，俾斯麦伙同法国国民议会和证券持有者，设法破坏了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协议。为了进一步离间英法两国，他建立法德两国在西非问题上达成协议。法国于8月接受了这项建议。“在我们遭到英国人的欺侮以后”，德库塞尔写道，“这种亲善关系对我们是至关紧要的，否则我们会陷入完全孤立的危险境地”。为了表示诚意，德国人协同法国支持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国。到1884年10月，这两个大国一致同意在柏林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决定尼日尔以及刚果的命运；英国人被迫同意参加，而在这以前，他们已对俾斯麦在非洲问题上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让步，并且放弃了英葡条约，因为他们害怕“同德国破裂……会损害我们从埃及的困境中体面地脱身的机会，使之变得甚至比现在还要渺茫”。

为了加强本国政府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的实力地位，领事和商人在西部沿海他们希望进行贸易的一切地方，都纷纷展开签订条约的活动。伦敦那些吃惊的大臣们发现，“欧洲列强的注意力，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转向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租借地”。在喀麦隆，纳赫提加尔捷足先登，休伊特便赶忙跑到尼日尔河三角洲，把那里的酋长们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以阻止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渗入。在下尼日尔，戈尔德收买了塞内加尔公司和赤道非洲法国公司，并派遣约瑟夫·汤姆森赶在德国远征队之前，与尼日尔北部的索科托和甘杜两个酋长国签订条约。同时，法国人对于下尼日尔不寄予多大希望，正从1883年加利埃尼占领的巴马科向上游前进，把条约的范围扩展到象牙海岸和奴隶海岸。欧洲各国政府听任本地的扩张主义者为所欲为，因为英国占领埃及，早已把领土要求和欧洲的强权政治融为一体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柏林乖乖地屈从德国提出的要求，表明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非洲冲突，其象征性的意义已变得多么重大。两个主要的海军强国和殖民帝国，居然在一个当时还没有一个殖民地的三流海军国家拍卖时，竞相投标，争夺西非的贸易。

与西非沿岸的狂热分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84年年底在柏林会晤的政治家们发现与会各方都通情达理，随和谦让。事实上，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紧张走向缓和的一次转变。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会议之前已经达到了。“埃及问题的大棒”已经使格莱斯顿有所收敛。法德结成了友好同盟，从而阻止了格兰维尔把埃及宣布为保护国，同时也阻止了他独揽埃及的财政大权。事实上，在这次会议将要结束时，费里和格兰维尔在伦敦协定中一致同意向“赫迪夫”提供一笔国际贷款，并继续对埃及的税收实行国际共管。虽然法国人只好眼巴巴地等待英国人离开开罗，但是，他们至少阻止了英国人对埃及的进一步渗透。因此，有关西非的争端，在柏林顺利地解决了，而这些争端曾经是重大的外交进展的外部标志。实际上，欧洲的舆论界对于这些争端的进展情况很少注意。

外交家们非常敏捷地处理了一些悬而未决的枝节问题：比如，该谁承担尼日尔河上的自由贸易和航行的责任？刚果河上的，又该谁来负责？列强通过承认刚果自由国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它们满不在乎的态度。这一年是利奥波德创造奇迹的年头。英法这些“林中之王”们竟同意把刚果河流域一块最大的肥肉送给他，而自己却满足于残羹剩饭。费里替法国拿到的是一个不大的势力范围。刚果河北岸的布拉柴维尔周围的地区将成为加蓬的内地；刚果河的其余部分被置于国际管辖之下。按惯例被称作刚果河盆地的地区，包括中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格兰维尔在刚果河上做出了让步以后，就能使尼日尔河不受国际共管。河的下游归英国控制，上游归法国。这种安排实际上只是保持现状。虽然柏林条约规定对西非沿岸地区的领土要求，应以有效占领为依据，但是，“有效占领”这个难以捉摸的字眼，其意义是这样含糊不清，实际上等于毫无意义。

政治家们在柏林远远没有为占领非洲制定出基本准则来，他们也根本不打算占领非洲。他们鄙视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冒险活动，延长他们不干涉的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占领它。他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使自己承担起管辖这样一些相对而言不甚重要的地方的责任。一旦这些国家，通过调整它们的国际地位，从外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外交家们就准备撒手不管了。俾斯麦把他的那些纸面上的保护国都交给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德国人，只是喀麦隆和多哥没有交出去，因为那里的商人不接受这种“礼物”。英国在下尼日尔河也赶紧如法

炮制。1886年6月，戈尔迪最终以皇家尼日尔公司的名义取得了垄断权。这是“履行在柏林会议上所承担的义务的最便宜的办法”。直到1891年，英国外交部还希望委托利物浦的各公司承担管理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任务，正如它早先把管理尼日尔河下游的费用推给戈尔迪一样。但是，这些商人拒绝了这种特权。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尼日尔海岸保护领地直接置于伦敦的统治之下，别无他法。英国自始至终对尼日尔河持消极的态度。“只要把其他欧洲国家挡在门外，我们就不急于进去”。不管这句格言听起来像什么，反正它不像是帝国主义。

巴黎的政治家们同样不愿意把法国新的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诚然，直到1885年，费里还在侈谈，法国必须为了投资、市场、威信和传播文明等这样一些通常的理由，拥有殖民地。但是，就在当年的3月，批评他进行殖民冒险活动的反对派把他赶下了台。在费里当政时曾经追随过他的弗雷西内不愿再跟着他一同下台了。十分清楚，法属刚果是一个新包袱，加蓬是一个旧包袱。法国政府对两者都不屑一顾。1887年，法国政府停止了给加蓬的年度津贴，^[6]并傲慢地告诫驻刚果的总专员布拉柴说：“我们不能在探险费用十分昂贵的时期无限制地待下去。”^[7]直到18世纪90年代，在这个地区只有15个法国官员。该地区每年的出口价值只有1500英镑。^[8]巴黎对其在贝宁湾的属地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法国外交部所能找到的赞同他们的话不过是：“即便我们承认它们（指贝宁湾地区）没有多大价值……（它们）仍然是我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利益还是会有用的。”法国海军部的领导人，“不仅对于法国开发西非缺乏热情，就是单纯地维持在西非已取得的利益也不热心”^[9]。在尼日尔河上游，他们对把势力范围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同样缺乏热情。在柏林会议上，他们最迫切想到的是实现尼日尔河的中立化和整个河流沿岸的自由贸易。^[10]但是，当英国人把尼日尔公司变为尼日尔河下游自由贸易的垄断者时，他们可能欺骗了自己，但是，没有欺骗得了法国人。这种显而易见的言行不一驱使弗雷西内于1887年宣布上尼日尔为保护领地，以遏制这种奇特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扩大。^[11]政治上，他的意图是以同这个地区的伊斯兰统治者结成不很确定的联盟为限度。1887年年初，加利埃尼同阿马杜·谢胡和萨摩利签订了条约。这两人是穆斯林统治者中最强有力的两个领袖。加利埃尼解释说，他所签订的这些条约并没有使法国承担义务，而且也不会使法国付出任何代价。它

们仅仅是为了“扩大我们未来控制的贸易地区，不让外国的势力渗入这些地区”。贸易本该把这些伊斯兰国家和法国联结在一起^[12]，可是没有多少贸易。“开展的贸易只是些零售商业”，加利埃尼的继任者报告说，“缺乏运输工具，使贸易无法扩大。”^[13]巴黎对于上尼日尔河的设想是，把它作为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廉价的、有条件地加以选择的地方。

如果在柏林会议后，外交家和商人一直是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西非问题，那么，事态不至于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们过去所想的是一个没有非洲人的非洲。所以，他们的意图是一回事，实际的结果又是一回事。由于受到埃及危机的影响，西非的“争夺”不再能随意地制止住了。原先静止不动的安排也不能安然不动了。最后，甚至原先纸面上的保护领地也发生了那种像炼金术似的特殊变化，即一个民族把在远方的其他民族的土地视为已有，还自诩这是对其他民族的福利负责。不过，这种思想尚未发生巨大的作用；欧洲的帝国情绪对于这次争夺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以在西非本身找到。这一阵紧张的外交活动迫使政府支持本国的商人们努力越过作为中间人的酋长，并鼓励深入内地进行贸易。结果，为谋求商业特权的竞争就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地。每一个港口为了争取内地，都同邻近的港口展开了竞争；港口的官员们也更深地陷入了非洲丛林的政治中去。即便如此，大多数欧洲列强还是竭力制止这些局部的倾向。德国在完成了1884年和1885年的外交活动后，对于自己利用英法的分歧改善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一事扬扬得意，因而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英国的野心也不大，至少它在西非沿岸的情况是如此。他们不仅在同内地强大的伊斯兰打交道时小心翼翼，不走得太远，而且，在当地的贸易和殖民税收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支付他们的开销时，他们精打细算，完全停止向前推进。英国人只想保住他们原先在尼日尔河上拥有的一切，至于西非的其他地方，往往就放任不管了。

这样，西非就落到了法国人手里。在以后的15年中，法国在非洲大陆的西部各地一直独占鳌头，虽然并非都是出于自择。要是说法国人这样做是由于一种追求功名荣耀的欲望所驱使，那么，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因为大多数法国人根本不知道巴福拉贝在何处。不可否认，在法国的殖民事业中，已确立的军事影响使得政治家们倾向于让

他们驻在非洲的军队按其自己的意图行事。但是，促使他们在1887年以后轻率地征服尼日尔河中游、象牙海岸北部以及西苏丹的，则是由于跟这些地区好斗的穆斯林神权政治集团发生了一系列不情愿的争端。巴黎那些时运不好的决策者原先谋求的只不过是对于这些地区实行一种不明确的最高权威。不幸的是，像埃及人、马赫迪分子和南部突尼斯人一样，这些神权政治集团宁肯进行圣战，而不愿与法国人合作，结果把法国人拖进了规模巨大的帝国征讨战中去了。纸面上的分割使法国军队和一种复兴的、富于反抗精神的伊斯兰教进行搏斗。为了征服伊斯兰教，法国不得不去占领那个纸面上的帝国。

在非洲历史上，伊斯兰教从8世纪以来的长期扩张，使欧洲短暂的影响相形见绌。像清教徒似的阿尔摩拉维德人从介于塞内加尔与乍得湖之间和介于沿海森林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西苏丹出发，进军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夺取了统治地位。^[14]在这里，马里和加纳两个黄金帝国经历了各自的兴衰。在这里，穆斯林和信奉泛神论者之间曾经斗争了几个世纪。然而，要把部落同化成民族，困难重重，使建立持久的国家的企图化为泡影。直到17世纪，这里的伊斯兰教至多是骑在异教徒百姓头上的那些贵族们的宗教信仰。但是，从18世纪后半期起，伊斯兰教的教义再一次向前发展了。图库勒人和富拉尼人被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传播及其宗教改革的号召所团结，奋起举行圣战，反对腐败的穆斯林统治者，在泛神主义者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帝国。在19世纪末，当英国闯进这两个国家——现今的尼日利亚北部——时，它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继承索科托帝国那些四分五裂省份的富拉尼人的酋长们，无法抵制英国人对他们实行宗主权。但是，法国人在跟西部的图库勒和曼丁帝国打交道中，没有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到1864年，提加尼教派首领埃尔·哈吉·奥马尔已把从富塔到廷巴克图的西苏丹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正当法国与这个帝国抗衡时，奥马尔的继承人阿马杜·谢胡着手使全国遵奉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解释，克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权。这样的帝国是在圣战中缔造的，而又用神权政治和信奉者之间的兄弟情谊牢固地加以结合。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它的指挥官，如果与一个基督教国家合作，就无法进行指挥。阿马杜和萨摩利是他们自己的领导制度的囚徒，如果他们不摧毁自己的权威，就无法跟法国签订条约媾和。他们俩都宁肯决一死战而不愿让位。到1889年，巴黎觉察到要巩固加利埃尼控制很松的保护领地，实际上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次军事远征。

法国海军部的一切传统都反对军事征服。塞内加尔总督表示反对，说道：“这是对我们政策的否定……它实际上是发动一场圣战……可怜的塞内加尔！”^[15]但是，在法国负责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事务的副国务秘书艾蒂安的庇护下，当地的陆军指挥官抓住了时机。^[16]1890年阿尔希纳尔上校粉碎了阿马杜政权，从此以后，巴黎的反对已经阻止不了上塞内加尔司令部里凭沙盘指挥作战的思想家们逐个包围和击败严阵以待的伊斯兰的贵族统治阶层。阿尔希纳尔“公然违抗命令”^[17]接着入侵了萨摩利帝国。在以后的8年中，这位君主和他的流动的索法游牧部落使法国军队疲于奔命，从上尼日尔一直追到象牙海岸。法国人在跟萨摩利和其他叛逆的伊斯兰领袖们的艰苦搏斗中，本想以占领整个西苏丹结束战斗。在80年代，法国人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走过了头。在90年代，按照正确的推理，他们合理地处理了这些轻率的征服。法属非洲必须连成一片；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必须与几内亚、象牙海岸和达荷美诸海岸的内地相连接，而这些内地又要在乍得湖畔与法属刚果连接在一起。

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抱旁观和默认的态度。正如索尔兹伯里讥讽地说的那样，“大不列颠采用通过贸易来求得前进的政策。它并不企图跟它的邻国在军事行动方面进行竞争”。英国在非洲优先考虑的是保护它在埃及的地位，并且为此目的，从1899年起对尼罗河流域实行了封闭。索尔兹伯里希望把关于埃及的争吵平息下去，因而他感到在1889年至1891年间，在西非再给法国一些补偿，没有什么害处。英国的这种慷他人之慨的行为，无论对于给予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来说，都不付任何代价，所以巴黎接受了。冈比亚的内地划归法属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的内地划归法属几内亚。然而，正是1890年8月的协议给了法国最大的意外收获。而英国对于埃及的优先考虑再一次给法国造成了这种机会。在1890年签订的赫利戈兰—桑给巴尔条约中，德国人给了索尔兹伯里在桑给巴尔和尼罗河上活动的自由。为了补偿法国人签订该条约而遭受的损失，索尔兹伯里欣然同意把在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乍得湖上的赛—巴鲁瓦线之间的西苏丹以及撒哈拉的“砂土”让给法国。英国就这样把其他民族的土地大块大块从地图上让予别人。法国外交部在接受时，以同样嘲弄的态度说：“没有付出任何重大的努力，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牺牲，没有花费任何探险费用……也没有签订一个条约……我们就劝诱英国人承认……阿尔及利亚和塞

内加尔应当贯通起来，连成一片。政治上进入乍得湖看来很重要……它也许会成为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但是，在努力向中非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时，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需要考虑，它具有更迫切、更具体的利害关系。我们要求对这一点得到永久的承认，那就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抵制我们在撒哈拉的影响，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永远不会受到来自背后的袭击。”^[18]对于狂热的殖民者说来，这种想法可能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对于掌管国家安全的专家来说，这些广大的、然而不值得考虑的地区，只有真正能改善法国在北非和地中海的安全时，才值得接受过来。如同他们在伦敦的同行一样，法国人在非洲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帝国，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他们原来在欧洲和东方的利益。对于法国人来说，就是要维护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内地的安全。但它也意味着要取得在埃及的安全。因此，索尔兹伯里所做的交易不可能结束对非洲的争夺。法国要取得它在西非所能取得的一切，但又不肯因此而在尼罗河流域做出让步。

在东海岸，对埃及的占领打破了原来的妥协局面。直至1884年，英国的海军力量使它从纳塔尔港到瓜尔达富角拥有主要的势力——一种通过桑给巴尔的傀儡苏丹来行使的势力。它的部分目的是使其他强国不得靠近通向印度的通道的侧翼，但主要目的是打击阿拉伯的奴隶贸易。与西非不同，在东非大陆上没有大的国家，也没有大宗的贸易。拖运象牙的是奴隶，种植丁香的是奴隶，商队经营的商品也是奴隶。这种商业活动与欧洲的成见相冲突，而且正在被取缔。列强在这样做的时候，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862年，英法两国达成了一项尊重苏丹独立的君子协定。确实，苏丹的政权正在衰亡。欧洲利用他把基督教的反奴隶制的伦理观点强加在他的伊斯兰臣民身上。这超出了他作为宗教领袖的权力范围。然而，没有一个政府要一个没有多少殖民价值的殖民地。1878年，英国外交部拒绝支持船主威廉·麦金农把桑给巴尔的大陆属地开辟为租借地的要求。4年以后，外交部对苏丹要求充当英国保护领地的请求置若罔闻。伦敦和孟买认为这样做需要很大开支，“得不偿失”。大约1884年年底，卡尔·彼得斯作为艰苦奋斗的殖民俱乐部的代表，像一个行商在坦噶尼喀兜售空白的条约表格；然而，格莱斯顿内阁不愿听到建立一个乞力马扎罗保护国。

但是，1885年2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破坏了这个均势。以前把彼得斯叫作江湖骗子的俾斯麦现在也承认彼得斯的协定了。在柏林召

开的西非会议正要散会时，俾斯麦首相为德国东非公司拼凑了一个纸面上的保护领地。英国和法国正在就埃及的财政问题进行磋商。这时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在非洲找个小岔子跟格兰维尔争吵一番，同时支持一下与法国达成的谅解。“埃及问题的大棒”又起作用了。伦敦接受了俾斯麦的要求，并命令桑给巴尔的苏丹也加以接受。正如格莱斯顿说的那样：“消除解决埃及问题的障碍，立即结束这些殖民地的小争执，其重要性确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尽管如此，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却不希望从整个海岸地区被撵走，因为在蒙巴萨和桑给巴尔的港口对于印度的安全具有一定的影响。结果是再一次在纸上进行分割。索尔兹伯里和俾斯麦在他们1886年10月的东非协定中，把大陆部分一分为二，北部给了英国，南部归德国。但是，两国政府打算不进入指定归属它们的地区。最后倒给了麦金农一个机会。伦敦给他的英国东非公司颁发了特许状，以便给它所要求的土地上设立一个岗哨；柏林在南部安插了德国公司掌管它的土地。

这些随便哄骗商人的纸上保证，使得一些有经验的政界人物感到有些厌烦。格兰维尔和德比一致认为：“在殖民地的争夺中，有些情况荒诞不经。”他们“不大想参加进去”。格莱斯顿欢迎德国建立保护国。索尔兹伯里对此也不介意，只要这些保护国保证自由贸易。德国对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要价是很低的。柏林和巴黎的政治家们对于他们的新殖民地也很不在意。但是在东非，与在西非一样，他们所承担的义务比他们预期的要多。到了1889年，德国公司跟布希里人和斯瓦希里人贩卖奴隶的酋长们发生了战争；柏林政府不得不去营救，替代身无分文的政府代理人，以保全面子。麦金农公司正趋向破产，因为东非对于英国投资者吸引力很小。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到了此时，英国势力范围的内地已经与尼罗河流域的安全以及索尔兹伯里为了在埃及确保印度安全所制订的计划纠缠在一起，密切相关。

巴林未能与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们达成协议，对于制订这个牵强的计划，负有一定的责任。持续的占领已经直接改变了地中海的均势。1887年，索尔兹伯里派遣德拉蒙德·沃尔夫去君士坦丁堡，认真地提出了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关于撤离尼罗河三角洲的建议：英国军队在3年之内撤走，只要列强同意，一旦情况需要，他们还可以回来。土耳其政府接受了，但是，法国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破坏了这个协议。索尔兹伯里仔细考虑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它说明了英国在君士坦

丁堡的影响已非畴昔可比了。很显然，1885年以后，平息和停止在埃及的争夺的可能性已愈来愈小了。尽管俾斯麦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法国还是逐步摆脱了孤立状态，80年代末，法俄两国联合了起来。更糟的是，索尔兹伯里发现英国没有足够的装甲舰可以开赴地中海来对付法俄的联合。那么，怎样煽动土耳其去反对俄国呢？由于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受到了削弱，索尔兹伯里就感到有必要加强它在开罗的安全。为了确保自己在埃及的地位，他采取了不让其他国家进入尼罗河流域的政策。但在这个政策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大惊小怪地认为“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会减少河水的流量，从而毁灭了埃及”。因此，从1890年起，英国人抬高了要价，提出整个尼罗河及其通路，即从蒙巴萨和瓦迪哈勒法到维多利亚尼安萨湖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赢得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他们准备把大陆上的其他部分作为赔偿让出去。当英国的重心从东地中海的亚洲沿岸转向非洲沿岸时，第二阶段的瓜分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扩展到赞比西河，从红海扩展到上尼日尔河。到1891年，非洲已经几乎无地可分了。瓜分实际上已经完毕，只是没有最后确定罢了。

柏林没有从中作梗，同意不进入尼罗河流域。德国经常忧心忡忡，害怕其他国家结成同盟。它比其他参加瓜分非洲的国家更多地受到欧洲形势的牵制。1890年3月，威廉二世和卡普里维就已经决定放弃和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他们不反对用放弃他们在东非的许多特权来换取在欧洲与英国建立明显的友好关系。德国人在取得了赫尔戈兰，以及把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达累斯萨拉姆向西扩张到坦噶尼喀湖和尼亚萨湖的北端后，同意桑给巴尔成为英国正式的保护国；并且放弃对维图的要求。维图本来可以用来阻止英国人从蒙巴萨进入维多利亚湖。德国人还撤回了在北部的要求，把乌干达让给英国人，而且不进入上尼罗河流域。对于索尔兹伯里来说，事情是再好也不过了。他庆贺自己说：“这个（赫尔戈兰—桑给巴尔）协议的结果是，在南纬1度（穿过维多利亚湖中部）和埃及边界之间，将不会有与英国势力相抗衡的欧洲竞争者”。索尔兹伯里的目的至少在纸面上达到了。这样，就必然抛弃了罗得斯关于在刚果自由国和德属东非之间建立一条开普敦—开罗走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索尔兹伯里是非常讲究实际的。总之，他已经清除了德国人设置的种种障碍，使英国的南非公司顺利地进入现在称为罗得西亚的那个地区。在对付了柏林以后，索尔兹伯里转向对付里斯本。根据1891年的英葡条约，他驳回了葡萄牙很

久以前就提出的关于占有在马达贝莱兰的莫桑比克的要求，从而给英国的南非公司取得了进入该地区的权益。这是一次彻底的瓜分。但是，索尔兹伯里并不到此结束，下一步他便去跟意大利人周旋了。

意大利人来到非洲时，无论在权威或热情方面，都比不上其他欧洲国家。1882年，意大利政府从一家意大利公司手中买下了阿萨布湾；3年后，在英国的怂恿下，占领了红海的马萨瓦港。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或马赫迪分子要稍好些。这就使新来的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接触交往起来。两年后，有人问当时意大利外交大臣罗比兰特关于建立新势力范围的可能性时，他不主张“过于重视那些在非洲，在我们身边寻衅闹事的一小撮强盗”。但是，后来情况变得不同了。靠争取意大利统一的复兴运动得以生存的旧的政府制度陷入一片混乱。从1887年至1896年，弗兰契斯科·克里斯比设法控制了这种混乱局面。在克里斯比上台前，他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当这个老红衫党人成为他曾经加以批评的那个政权的首脑时，他的极端主义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活动场所。在非洲的扩张中，他找到了这个场所。在19世纪末，对于那些成功的激进派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雄心勃勃的新帝国主义，时常成为那些由左转向右的野心家们利用的手段；因为在跟旧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们结合时，他们放弃了不少他们从前国内惯用的手段。张伯伦忘记了他未经认可的计划；甘必大的继承者背离了新的阶层；克里斯比通过法律反对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这些人所属的过渡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最不会引起麻烦的问题，所以，他们都被允许在海外发表在国内闭口不谈的不同见解。

马萨瓦空荡的码头给予克里斯比发挥其独创精神的机会。假如没有内地，这些码头将会继续荒芜下去。意大利曾在多加利被埃塞俄比亚人拉斯·阿卢拉战败，为了雪耻，克里斯比举行了一次讨伐性的远征。这次远征所占领的地区于1890年归并为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此外，他还着手计划对埃塞俄比亚建立一种非正式的最高控制权。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神秘莫测之地，但是在约翰尼斯皇帝于1889年与马赫迪分子作战中牺牲后，意大利人以为他们以前的被保护人绍阿的酋长曼涅里克将登上皇位，继续充当他们的代理人。曼涅里克似乎是个受西方影响较深的人，可以争取他替意大利效劳，根据5月2日签订的乌西阿利条约，罗马当局宣称曼涅里克已经接受了意大利的保护。但是曼涅里克否认了这种保护，尽管意大利赠给了他400万里拉和几万支火

枪。当时厄立特里亚似乎跟埃塞俄比亚有着一个很好的贸易前景。一年以后，为了谋求更大的贸易，鲁迪尼内阁把意大利的殖民地边疆向西推进到卡萨拉。卡萨拉位于尼罗河的一条支流上，在马赫迪信徒的地区内。

意大利人徒劳无益地被拖进了马赫迪信徒和埃塞俄比亚人之间危险的政治旋涡中去了，正如英国人曾被拖进了埃及的旋涡，法国人曾被拖进了突尼斯和西苏丹的旋涡中一样。他们仓促地干预了两个非洲社会，这两个社会通过一种反对异教徒的早期民族主义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巨大灾难尚未降临。索尔兹伯里和巴林在1890年所关心的，是这些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入侵，因为他们太接近神圣不可侵犯的尼罗河了。意大利人向“万王之王”的领地扩张，伦敦并不是不欢迎的。这种扩张的好处是它可以阻挡法国人从红海的吉布提港和奥博克港向尼罗河流域挺进。但是，意大利向卡萨拉推进则另当别论了。索尔兹伯里拒法国人和德国人于尼罗河流域之外，并不是为了让意大利人进来。因此，1891年年初，他就跟意大利人签订了一个条约，在条约中意大利同意“不把手伸进尼罗河的支流”，而英国则承认意大利对非洲之角大部分地区拥有优势，作为酬报。

索尔兹伯里通过逐步建立三国同盟和签订条约让出大片没有占领的非洲土地，以保全自己在埃及的安全，摆脱德国和意大利的干预。但是法国人拒绝做这种交易。用西非的那些“沙土”做馈赠，不能抚慰法国人，一笔勾销在埃及的旧账。巴黎在得到圣彼得堡愈来愈大的支持下，不仅不同意撒手不管尼罗河，反而要求英国从尼罗河撤走。伦敦比以往变得更坚决，断然拒绝法国的这个要求。埃及依然是英法两国关系上一道很深的裂痕。从西部进入尼罗河的通道仍是敞开的。因此，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瓜分非洲的斗争仍然进行得异常激烈。

关于造成19世纪80年代非洲这种令人震惊的瓜分局面的外交活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但是在它们背后的动机却比虚构的小说更加离奇。当列强的政治家们根据条约来绘制新的非洲地图时，他们并没有要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这样单纯和这样严肃的意图。有些商人和传教士大叫大嚷要求帝国支持他们的事业。但是，决定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政治家们，而后者没有时间去想让国家采取行动来开发热带

地区，以便增进国家的繁荣。在非洲的贸易或许会扩大，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会增强，但它们也可能全无进展。不管哪种情况，政治家们都乐于把此事留给私人企业去干。而在19世纪末的热带非洲，这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干，因为私人企业对此毫无准备。那么，目的是不是“想为后代占好地盘呢”？这种陈旧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它只是事后的一种推论。随着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领土被分割，政治家们发现用开辟新市场和传播文明来解释他们的行动，比用私下萦绕在他们头脑中的那些更复杂而又不甚高尚的概念来解释，要容易得多。

那些主持瓜分非洲的人们用一种冷漠、超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着眼的不是非洲本身，而是非洲对他们在欧洲、地中海和东方的巨大利害关系的影响。这种对非洲大陆的想法十分肤浅，只有那些官员们才会这么想。他们根据对国家的利害安危的传统观念行事。他们不是促进贸易或扩大帝国的疆域而是助长了恐惧。

从欧洲的观点看，这些瓜分条约是官员们异想天开的记录，而这种想象能力是他们在面对一幅标明2/3土地无人占领的大陆地图时油然而生的。战略家们预料到各种可能性；外交家们为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争执不休，而地理学家们则告诉他们那些引起争议的地区在何处。从非洲的立场看，他们这番努力的主要结果是在纸面上改变了国际上的领土现状。把虚无的东西变成公认的现实是律师们为之忙碌的事情。非洲人只是在事成很久以后才有事干。

为了在整个世界上不断地寻求安全，列强不得不争夺势力范围，宣布成立保护国和给予公司特许权。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积极目的无非是要排斥其他国家，可以设想，其他国家出现在那里会对一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一种障碍，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测，也未必成为事实。因此，俾斯麦在1884年到1885年间也在纸面上建立了一个帝国，主要是使法德同盟看起来合乎道理。1890年增加了卡普里维，使英德终于得以达成和解。由于同一原因，格莱斯顿进入埃及去保护苏伊士；索尔兹伯里提出英属东非洲的计划，以便保障英国在埃及和亚洲的安全。大体说来，英属非洲是对印度帝国的一个重大的补充；而法国同伊斯兰之间的许多长期斗争，则是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寻求安全所付出的一项代价昂贵的副产品。也许，在19世纪80年代唯一认真缔造帝国的人是克里斯比和利奥波德，可是他们抢到的只是富人宴席上

的残羹。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场“在非洲的争夺”而决不是“争夺非洲”。

然而，如果说瓜分非洲是外交上传统的做法，而且受到列强之间纷争的影响的话，那决不是说瓜分主要是由欧洲的均势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些新的帝国将会自始至终只存在于纸上。英法之间的抗衡给予德国人在非洲的一个可乘之机，而这种抗衡的产生则是由于英国人在埃及革命者和马赫迪分子手下遭到了惨败。同时，它又因为这些复杂的斗争与法国人同西苏丹的伊斯兰的斗争，以及意大利人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融为一体而变得加剧了。欧洲人的要求激起了非洲人新的反抗，这些反抗又迫使欧洲人做出更大的反应。于是，瓜分活动得到了一种新动力。19世纪90年代对赤道非洲的加速占领不同于80年代纸面上的瓜分。它是密切相关的两场冲突的高潮之高潮，一方面是法国和英国之间争夺尼罗河控制权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欧洲人、非洲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为了扩大对北非和中非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欧洲的统治者们开始时对非洲的这场争夺掉以轻心，现在都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欧洲正在将其势力伸展进去的这个大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非洲”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那么，它同时也是社会学上的一个速记符号，代表着占据这片大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语言、宗教信仰和社会。在衡量其居民的能力和成就时，白人们发现在一个极端是一些由微小的、分散的群落组成的人们，他们缺少一个政治权威作为核心；社会的凝聚力量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所形成的统一，而不是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统一。这种分散的群落合并在一起，形成了第二种类型，即分散的不统一的国家。这种国家的王权对部落的亲缘特点并无持久影响，而同化的努力也遭到了挫折。在另一个极端则是结构严密的伊斯兰国家和那些最有活力的尼格罗人和班图人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欧洲人在着手与非洲打交道时，在上述种种类型的社会中都遇到了麻烦。但从瓜分非洲的角度讲，他们同分散的群落制度的斗士们发生的冲突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家族间和部落内部的钩心斗角，几乎没有例外地为他们提供了合作者和反对外族控制的反抗者。但在那些组织完善的非洲国家中，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他们对待白种人的态度对于19世纪的瓜分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响，同时也给20世纪非洲的民族主义留下了一份容易引起爆炸性局势的遗产。

他们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在开始时进行了抵抗，但是，当榴霰弹的呼啸声一响，他们很快就垮了，此后直到不久以前一直一蹶不振；另一些人接受了新的统治，但不出10年时间又起来反抗；还有一些人干脆就反对一切形式的白人影响，只是在经过长年累月残酷的游击战争以后才被镇压下去。然而，也有一些人轻易地向欧洲人屈服，签署了条约，念起了圣经，并同欧洲的商人们进行了贸易。怎么来解释这些差别呢？究竟是什么使得非洲人有的怒目而视，有的笑脸相迎，有的进了学校，有的进行殊死的战斗呢？也许，这取决于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团结一致及其适应程度。

从已经获悉的零星片断情况来看，非洲政治历史上政权的更迭是十分频繁的。与中世纪欧洲各国政权一样，它们的权力中心长期缺乏后备力量来对付权力过大的臣民和惹是生非的教士。跟中世纪的欧洲政府相比，它们在政治交往中更加严重地缺乏有约束力的原则来把被征服的邻国人同化成效忠的臣民。这种情况在泛神主义的非洲特别显著。信奉泛神主义的民族是通过亲缘关系和祖传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它很难把这些结合的因素传播给它所征服的那些人。在他们创建的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总是格格不入的。从组织结构上来说，他们建立的帝国只是放大的部落。亲缘关系随着一代代人的交替而逐渐淡漠，他们的行省纷纷叛离，权力中心陷入混乱。结果，非洲政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这种非常短促的扩张和收缩循环组成的，像人身上的横隔膜起伏一样。为了猎取黄金、食盐和奴隶，他们就扩大他们的领土，但这种地理上的扩张最后往往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因此，他们对欧洲人入侵的反应，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在这种发展或衰亡的循环中达到什么阶段。在衰亡阶段，他们的统治者就有充分的理由同新的入侵者达成交易。反之，要是在发展阶段受到了挑战，他们就会做出决战到底的抉择。当然政体越是城市化、商业化、官僚化，其统治者就越是想在城镇被摧毁前实行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要是国家的团结越是依赖掠夺奴隶、抢劫和迁移来维持，那么，其统治阶层在同欧洲人进行斗争时丧失的东西也就越少。

这就是在解答是合作还是抵抗这个问题时，许多可变因素中的两个因素。不少泛神主义国家的经济是掠夺性的，而且正在不断向外扩

张，他们为了独立而奋起战斗。马塔贝莱人和达荷美人都如此做了。但一旦他们被击败，他们就萎靡不振。也许他们的教义没有普遍性，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征服者的文化。这场由火药和炮弹开始的事业，可以用《新约全书》来完成。许多前来战斗的人结果都留下来祈祷了。在英国国旗升起不到10年的时间内，巴干达人和尼亚萨人都渴望获得新的知识，并纷纷在东非和中非的政府机构里任职。在法属赤道非洲，巴刚果人当上了白人政府的雇员。在加丹加，巴卢巴人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伊斯兰中取得这样的顺从也是可能的。但这只是对那些定居下来的伊斯兰国家而言，它们已经发展成官僚国家而且正在走下坡路。那些稳重而年高德勋的苏丹和国王们同突尼斯的统治者一样，对号召进行一场护教的圣战不大感兴趣，但是显而易见，宗教信仰同这个问题很有关系，在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里，对《古兰经》的严格要求是心甘情愿地予以遵从的。事实非常明显，伊斯兰进行了最长期、最残酷的战斗来反对欧洲势力。欧洲人的一切花招都无法诱使他们变成睦邻。这个任务只能靠枪炮，而不能靠仁慈来完成。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些强盗帝国不肯屈服而继续向黑非洲扩张，继续流动，并依然由宗教先知们来领导。在蔑视和抵抗欧洲人时，他们的地位远比那些泛神主义者优越。伊斯兰教坚决主张在一个法规面前所有信徒一律平等，再加上它广泛的兄弟情谊和层层教职，使得他们的团结比起仅以亲缘关系和祖传宗教结合起来的团结具有更牢固的纽带。再者，它主张普遍的神性原则高于那些使黑非洲四分五裂的局部神灵和偶像崇拜。超部落的伊斯兰机构和纪律有时等于是一种团结一致的和延绵不断的反抗；如果不摧毁伊斯兰的权威和帝国的势力，就无法使他们屈服于信奉基督教的列强。在这些强悍的敌手中，有很多是从伊斯兰的新教主义里积聚力量的。这种新教主义企图用恢复产生于沙漠地区的伊斯兰教原有的纯洁与质朴以及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腐败的哈里发的权威来消除伊斯兰教中陈腐的东西。在信仰方面，正是那里新的先知们，把这种严峻的、不屈不挠的原教旨主义同部落所持的独立与征服渴望结合在一起。苏丹的马赫迪穆罕默德、萨努西教派的马赫迪赛义德、索法部落的阿马杜·谢胡和萨摩利、拉比，所有这些人都是先知或先知们的哈里发和当地的神权主义者。他们同样也都是独立运动的领袖。在非洲的词汇中，独立的意思就是扩

张和别人对他们的依附。他们为了真正的信仰，成了异教徒的征服者；不管怎么说，只有那些武装的先知们才免于被摧毁的命运。

为了生存，严阵以待的神权主义者必须抵挡住入侵的基督教施加影响的种种手段。他们宣传的新教旨使得世上的一切城市和国家都变得过时。他们号召所有的人都按他们的启示皈依真主，不然，就会被主所摧毁。经过这番说教，如果再跟敌人妥协，那就无异于为自己掘墓。这种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在马赫迪写给埃塞俄比亚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约翰尼斯的信中，至今尚能见到一斑：

“做个穆斯林，你就会享有和平……反之，要是你执意违抗，一意孤行……毫无疑问，你一定会败在我们手中。真主许诺我们去占有世界，真主一定会履行他的诺言。……不要让魔鬼缠住了你。”^[19]非洲的基督教，至少在埃塞俄比亚，同样也是如此固执而不妥协。尽管科普特教会的人神合一教义概念模糊，内容荒诞，但是，它们在意大利人来找麻烦时，仍然有助于使全国团结在皇帝的周围。

欧洲在向非洲扩张时，最致命的敌人是那些笃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国家。两者都是超部落的宗教性国家组织，能在国家范围内把各部落团结在一起。这些科普特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认为白人既是入侵者，又是异教徒，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敢于对抗。白人在这种坚定的信念面前被迫做出了他们原来想要避免、实际上曾预料能避免的选择。同神权主义者是无法进行理智的谈判的，更不用说让他们改变信仰了。他们的反抗在当地造成了无法掩饰的危机。一旦这些神权国家受到欧洲的挑战，他们就视之为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列强在它们自己的来临所激起的反作用漩涡中越陷越深，到了18世纪90年代，他们被迫占领了他们在80年代标在非洲地图上的要求占领的领土。由此造成的引人瞩目的扩张常被称作帝国主义，但深入分析起来，这是对非洲早期民族主义活动的一种反应。

不管白人们喜欢与否，他们现在一定要使19世纪80年代的抽象安排具有实际意义。非洲的严峻现实迫使他们这样做。法国人在英国人的默许和本国殖民军人的大胆战略诱惑下，也走上了这条路。在追击阿马杜的过程中，军队向西一直到了廷巴克图，不久又继续前进到加奥，而且把上尼日尔司令部改称为法属苏丹。巴黎的政治家们认为该收兵了，他们在1891年和1893年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宣称“征服和领土扩张阶段已告完全结束”。^[20]当前的问题已经是怎么使他们新到

手的土地变得有利可图。但是那些上校们，一手握着马克辛机枪，另一只手里拿着新的证据，坚持要击溃伊斯兰的抵抗，把他们驱逐到更远的富塔贾隆和上沃尔特地区。巴黎对这些新省份嗤之以鼻。但是绥靖行动本身使得这些省有了虚构的价值，况且这些领土得来不易，岂能轻易放弃。因此，军队就一步步地把巴黎卷入了开发非洲的经济活动中去了。当特朗坦尼安在1895年接管苏丹时，武力征服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政府投资把铁路筑向尼日尔河以后，进一步的统治就有可能，昔日的战场从此变成了殖民地。

渐渐地，法国人到达荷美和刚果也越陷越深。1890年，多兹将军在巴黎的艾蒂安庇护下^[21]出动军队，摧毁了达荷美。这个异教的掠夺奴隶的联邦，对沿海岸的法国人来说，早已是一个不能相容的邻居。这样，进入内地的通道打开了。到1894年法国已派人前去侦察尼基，准备进犯为戈尔迪独霸的尼日尔河下游地区界线未定的西翼。他们还意识到有机会把达荷美和他们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和上尼日尔等地的势力范围联结在一起。自1889年起，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一直敦促政府再接再厉。他们想把这些领土同贫瘠的法属刚果连成一片，过迟地设法把过去10年来断断续续所得的进展予以合理的处理。乍得湖将是这种地理上的浪漫主义的核心和象征。

外交家和军人在西非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10年光阴以后，巴黎出现了一批人，要求为自身利益计认真地对待法兰西帝国。1890年，他们自己筹资派遣克朗佩尔从布拉柴维尔出发，前往乍得湖地区以建立法国在那里的势力，从而保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刚果领地之间的连续性”^[22]。但外交部对这一想入非非的计划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在同年8月签订条约，把“乍得走廊”划给了英国。为了抗议，克朗佩尔的支持者在1890年底组成了“法属非洲委员会”。这是赞成建立热带非洲帝国的第一个重要的压力集团。但它从未引起任何强有力的商业利益集团的注意。尽管它获得艾蒂安的同意，它的直接政治影响却并不引人注目。委员会想把乍得变成法属非洲枢纽的想法虽有某种哗众取宠之处，但决定政治家们行动的不是动人的言词，而是所冒的风险。从北面进军乍得湖意味着横越撒哈拉，这种做法显然同阿尔及尔总督府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从1880年弗拉泰尔斯的远征队遭到图阿雷格人的屠杀以来，阿尔及尔拒绝考虑一切深入撒哈拉的计划，其理由是“冒的风险太大”^[23]。从西面进入乍得遭到同样

激烈的反对。如果沿着尼日尔河上游推进，则一路上将会遇到伊斯兰的抵抗，这可能会在新组成的法属苏丹引起令人难堪的反响。迟至1898年，圣路易总督府还反对这样进军。^[24]看来唯一可行的是从南面进军。1891年非洲委员会派出了迪波夫斯基，布拉柴派出了富罗，从刚果出发向乍得湖进发，但都被阻截回来。法国的扩张竟然重又弄得自己摆脱不了伊斯兰的抵抗。在加扎勒河流域的阿拉伯奴隶国家被摧毁后，它们的幸存者逃到了瓦代地区，由拉比赫重新组成一个强大的掠夺性国家，他们把欧洲人视为危险的敌手。又一个神权政权建立起来了。拉比赫发现“通过宗教得到的支持和力量要比一伙冒险家从掠夺的欲望中得到的动力强大”^[25]；他继续迁移到乍得湖沿岸的巴吉尔米地区，得到了“萨努西”教派的支持，再加上他从埃及带来的军事技术，这就使得他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在刚果的法兰西共和国专员布拉柴加倍地欢迎非洲委员会对乍得的进军。因为这样做不仅开拓了他的疆域，而且又引起了巴黎对他这块被忽视的殖民地的注意。但他还应当进一步把主张进军乍得湖的少数人的热情同严肃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使殖民部那帮玩世不恭的人发生兴趣。1891年，他向巴黎建议说，对乍得的征讨“能造成一种局面……使我们能和英国人着手谈判，要他们在埃及问题上……做出对等的让步……”^[26]这就是法国法绍达战略的起因。1891年8月，利奥塔尔被派到尼罗河流域的西大门乌班吉沙立地区，奉命使用布拉柴行之奏效的办法，给那里的小苏丹们施加影响。如果巴黎打算全力以赴重新谈判尼罗河问题的话，这倒是个可以采用的方法，而且连现成的手段都有了。

巴黎果真跃跃欲试。就像在争夺热带非洲的斗争中一切关键性行动一样，这次行动也是由这场长期的埃及危机中出现的一个转折所决定的。索尔兹伯里用断然拒绝讨论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冷了下来。在1892年英国自由党人再度执政时，法国人曾希望情况有一天会好转，但新的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直截了当地告诉巴黎，埃及问题已经结束了。1893年1月，埃及的赫迪夫胆怯地企图发动一场反英政变。克罗默一下子就把他制服了。但在巴黎看来，这场危机也有令人鼓舞之处。它表明埃及的革命局势远未结束。这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来同外界的势力结成联盟，把英国人从他们这座堡垒里赶出去。外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到了1893年随着法俄同盟

即将形成，一旦沙皇的军舰访问了土伦，对法国海军部来说，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就更有保障。一切听命于英国人的政治局面结束了。

巴黎因此有充分理由在埃及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从外交家的观点来看，非洲的瓜分是牌戏理论的一个大规模的实例。这场牌戏的规则之一是，对一条河道取得了控制，等于有了一手好牌、为取得领土而叫牌一样。尼日尔河的情况是这样，刚果河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不在尼罗河上游驻扎一支法国部队呢？谁都知道尼罗河等于埃及。一旦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占据了这条河，尽人皆知的埃及问题又能彻底地重新谈判了。1893年5月，共和国总统卡诺重又实施布拉柴计划。一支特遣部队可以沿着原来的路线开往乍得，朝西北穿越乌班吉沙立地区利奥塔尔的势力范围，然后直取尼罗河。他们势必要从马赫迪分子控制地区的南面和它会合，因为那些伊斯兰狂热分子不欢迎外人。但是神权国家的情况都相仿。在喀土穆南面进击尼罗河，法国人可以跟曼涅里克合作。曼涅里克正在寻求欧洲人的步枪和同情。一小股法国人的出现将会使尼罗河别有一番景色；但如果再加上一支埃塞俄比亚军队同他们在一起，那就简直令人胆战心惊了。

争夺埃及和地中海的较量又一次加剧了。随着较量的加剧，一个又一个边远的非洲国家都被卷入了这场争端：贫穷的刚果殖民地，乍得湖四周的神权国家，乌班吉沙立地区的伊斯兰寡头政权、加扎勒河沼泽地带的游牧部落、埃塞俄比亚的科普特基督教国家和法绍达一带沙滩上居住的石器时代居民都无一例外。至于因争霸而引起这场纷乱的两个欧洲强国则费尽心机，争先恐后地奔向尼罗河上游这片没有多少魅力的不毛之地。沙土地曾一度被视为末等奖。只有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者的过人的洞察力，才会把它们看作无价之宝。

但是法绍达计划是充满危险的。外交部不能想象英国人会平心静气地端坐在开罗，眼看着法国人在尼罗河畔安营扎寨。所以，巴黎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抑制一下他们开拓殖民地的狂热。在他们心中，把法国国旗插到尼罗河的计划并不是一个殖民计划，而是一个外交武器。他们想用这支“苏丹问题”的大棒把英国人赶回到埃及问题的谈判桌边来。所以，法绍达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时断时续，什么时候伦敦变得不易对付，就把它拿出来。巴黎还未下决心把它执行到底，伦敦就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在英国人这一边，他们正努力加强他们在尼罗河流域的实力地位。具体地点在乌干达。在外交部的唆使下，麦金

农的公司派遣卢加德深入内地，直达乌干达，加强英国对尼罗河河源地区的控制。在英国新教、法国天主教和非洲伊斯兰传教士们的煽动下，乌干达国内各敌对的派系之间你争我斗，把这个国家搞得乱成一团。1892年年初，卢加德设法把新教徒们扶上了岌岌可危的权力舞台。然而，为了维护新教原则，麦金农耗尽了资财，不得不命令卢加德撤出乌干达。这种做法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惊慌；因为在埃及的军事情报机构已经预言，一旦麦金农的公司撤离乌干达，法国在乌班吉的部队就会乘虚而入。而且，外交部里的非洲问题专家们又无中生有地谈论来自四面八方的法国威胁。对这些人以及对罗斯伯里勋爵来说，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向前推进。正式占领乌干达就能拒法国人于尼罗河河源地区之外。把乌干达同蒙巴萨用铁路连接起来，就能进一步使乌干达成为阻挡法国进入尼罗河上游河谷的一个基地。但是内阁中的格莱斯顿派人物却不愿跟罗斯伯里走那么远。他最多只能派波特尔到乌干达去，报告控制这个国家的利弊。

伦敦和巴黎日后都将发现他们投放的保险金额太低了；因为此时另一个非洲瓜分者宣称他对尼罗河流域有兴趣。他比起卡诺或罗斯伯里来，手段更灵活，更狡猾。此人就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出人意料地能把君主的圆滑狡诈手段和商人的充沛精力融为一体。尽管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桑福德是平凡起家，但也只有他们可与这位帝王企业家相提并论。他同这些人一样，把赌注押在未来；同他们一样，在一片纷乱中组成了卡特尔；而且，又同他们一样，不考虑后果地孤注一掷。利奥波德白得一个刚果，因为他的这个独立国是列强分歧最小的一个政权。他不用纳税人的钱而自掏腰包来装饰这块新得的皇家领地。但是，正是由于利奥波德的这场非洲赌博不是一个国家行动，而是他私人的冒险，因此，这场赌博一定得有现金收益。在刚果，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那里看来既无矿藏，而且老百姓对于为了市场而生产，又没有什么热情。为了使他个人所有的这个帝国能维持下去，利奥波德急需一些可供出口的货品。那里有象牙，也有黑檀木。但是，这些贸易都掌握在阿拉伯人，特别是刚果东部地区的阿拉伯人手中。如果能够的话，他愿意和这些人达成协议。但他的贸易与友好条约对一贯在黑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寡头政治支持者和垄断商人们毫无吸引力。结果发生了战争，从而把刚果自由国深深地推进到它和尼罗河之间的阿拉伯人领土中了。1891年，它的远征部队在乌班吉建

起了哨所，1893年深入到了加扎勒河地区。同年范·克尔奇霍文的部队一直打到了尼罗河上游的拉多。

无论巴黎或伦敦都不欢迎这种迅猛的扩张。法国人对此尤感难堪。利奥波德手下的人无疑地向北越过了1887年利奥波德与法国建议在刚果彼此的势力范围之间大致确定的边界。但是，在1892年到1894年的谈判中，当外交官们想要比较精确地划出这条界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能对这片土地的位置有丝毫了解。更有甚者，自由国对这片土地的试探性入侵还暴露了法国在乌班吉沙立地区的权威是多么虚弱；而这个地区原定是作为向法绍达采取行动的进击基地的。罗斯伯里也有他自己的困难。他可以命令波特尔把英国的势力范围从乌干达向北扩张；而且，在自由党人最终抛弃了他的领袖格莱斯顿后，他还可以将乌干达本土变成一个正式的保护国。但是，在列强对尼罗河上游地区进行的这场不切实际的角逐中，最保险的方式依然是外交上的纸上谈兵。罗斯伯里在1894年5月确定了两个协议。首先是意大利人成为英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的控股公司。由于承认了罗马人在欧加登和哈拉尔地区的霸权，罗斯伯里就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意大利人看守着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埃塞俄比亚皇帝对法国人的计划不会有多大用处。其次，英国人想抵消利奥波德的威胁，英国—刚果协定把赤道非洲和加扎勒河的大部分地区置于他的管辖之下，“以制止即将派遣远征队（进入加扎勒河地区）的法国人站在那里立足，同时也可以同已经在那里的比利时人周旋……法国人待在那里将是对埃及的一个严重威胁”。

这些外交文件读来娓娓动听，但实际却是枉费心机。罗斯伯里想在尼罗河上游解决埃及问题的笨拙尝试只是招惹法国人做出更激烈的反应。在巴黎，殖民部长认为英刚条约“看来要迫使我方采取新的措施”^[27]。其措施之一就是花费7万英镑贷款再次执行取道乌班吉沙立地区进入法绍达的计划。但是，即便到了那时，外交部的阿诺托还想方设法冲淡殖民部的这一计划。远征队将沿着乌班吉河前进，但它却奉命“避免突入尼罗河谷”。^[28]到了8月，第二个反击措施也完成了。英刚条约由于法德两国采用联合谴责的传统办法而遭到了破坏。阿诺托感到大为宽慰的是，沿乌班吉河进逼的攻击部队现在可以遣往他处，不致造成危害，以便设法同萨摩利在象牙海岸达成协议。^[29]

罗斯伯里被迫与巴黎直接进行谈判。据传他曾经说“在非洲，只要你们不染指尼罗河流域，想要什么都行”^[30]。就像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一样，他希望在西非洲显示他的豁达大度。为了保证埃及的安全，黄金海岸的腹地和在尼日尔河下游介于英法势力范围之间的边界地带均可让出来。但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对埃及的重视大大地超过了对非洲西海岸的重视，因此，这笔交易无从做起。结果，关于尼罗河和尼日尔河问题的争吵变得日益激烈，以致到了1895年3月，格雷公开警告法国人说，对尼罗河流域的任何推进都将被看作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形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如果说对埃及和尼罗河流域的角逐迄今一直停留在外交活动水平上，那么，现在就将发展为实际的征服和占领了。对非洲的瓜分，随着其高潮的临近，也从开始阶段的漫不经心而变得白热化。旷日持久的瓜分活动，使得新一代政治家们中的某些人物，诸如德尔卡塞和张伯伦之流，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旧式的强权政治，而且作为一个非洲的殖民地问题，开始予以认真对待。它使他们在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上患了幽闭恐惧症，担心各国的扩张将把世界上的地盘瓜分殆尽；担心20世纪的强国将是那些把地球上剩下的各个角落都窃取到手的国家。然而，驱使英法两国执行它们尼罗河战略的，却不是这种野心和竞争，而是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复兴的早期民族主义者手中所遭到的惨败。

这个半封建的一统的犹太狮子国家何以能在数百年来的伊斯兰和加拉游牧部队的袭击下生存下来一直是一个疑问。18世纪中叶以来，皇帝一直只是徒有虚名，而拥立国王的人却掌握着实权。但是，从提奥德罗斯二世于1885年登基后，皇帝和他的封建王公们却慢慢地团结一致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外族入侵威胁。当1867年纳皮尔的部队进军马格达拉营救被监禁的英国领事时，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团结而使他们无法做有效的抵御。1896年，克里斯比占领蒂格雷并命令意大利军队向埃塞俄比亚高地推进，企图用征服殖民地的胜利来维持他那四分五裂的内阁时，就指望利用这个弱点。但是，他的将军巴拉蒂耶里却比他了解得更清楚。他认为意大利的扩张在埃塞俄比亚人身上“激起了一种消极的爱国主义精神”。^[31]曼涅里克皇帝不仅通过白人外交的优惠手段搞到现代化武器，而且还得到蒂格雷、戈贾姆、哈勒尔和沃洛的酋长们的支持。1896年3月，这些埃塞俄比亚早期民族主义者在

阿杜瓦把意大利人打得溃不成军。这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自由，而克里斯比则被迫下台。这也是非洲的早期民族主义者第一次获得的胜利。马赫迪分子和埃塞俄比亚人一起向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进逼。意大利人在尼罗河支流阿特巴拉河畔的卡萨拉前哨阵地眼看就要孤立无援了。

阿杜瓦战役使尼罗河流域的政局发生了剧变，12天后，索尔兹伯里命令基钦纳所率领的埃及军队入侵东苏丹。如同他通知克罗默的那样，这一决定“特别是由于想要援助卡萨拉的意大利人而做出的；目的在于阻止伊斯兰教狂热分子赢得意义深远、令人瞩目的胜利；并可使埃及进一步涉足尼罗河流域”。意大利人的困境对英国人来说，确实是个好运气。德国皇帝敦促索尔兹伯里给三国联盟中那个失意的盟友帮点儿忙，这意味着在促使埃及财政部解囊支付入侵费用时，德国人将助一臂之力。但是，如果意大利的失败使英国人有机会进攻马赫迪分子，那么，埃塞俄比亚人的胜利就使得这种进攻势在必行了。在此以前，英国一直尽力使自己不插手埃属苏丹。1890年，索尔兹伯里曾告诉克罗默，“如果马赫迪分子占领了尼罗河流域，他们对未来毫无影响。他们什么也破坏不了，因为没有东西可供他们破坏了”。没有工程技术，他们无法改变尼罗河的流量。“确实……这些人生在世就是为了把床弄暖了，让别人睡觉”。甚至在1897年，克罗默依然反对向喀土穆进军，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获得“大片无用的土地，既难以恰当治理，又耗费钱财”。很明显，那时他们并不急于征服一个新的殖民地。他们小心翼翼地下令入侵，以防止法国人在尼罗河上游采取突然行动。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的胜利似乎使得法国人觉得可以一试了。

这一着虽然失算，但也有其道理。英国人对于采取这种行动的自满情绪以前是由于下列希望：从西面来犯的法国部队无法一路打到尼罗河；或者即使能够打到，则在意大利蹂躏其国家的情况下，曼涅里克也不会助它一臂之力；或甚至它确实获得了这种帮助，埃及军队也能在任何具有威胁性的法国—埃塞俄比亚联盟形成以前把日益衰落的伊斯兰教狂热分子的国家征服。阿杜瓦战役改变了索尔兹伯里对这些可能情况的估计。埃塞俄比亚人摆脱了意大利人以后，要比原来想象的强大得多。而且，要是他们真像索尔兹伯里错误地怀疑的那样，准备作为法国的同盟者的话，他们确实会变得令人可畏。

意大利人的销声匿迹也使得马赫迪分子得以东山再起。据称曼涅里克正谋求与他们结成联盟。这不仅使基钦纳不大可能突破马赫迪分子，并在法绍达挡住法国人；而且使法国人利用马赫迪分子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联盟来对抗埃及本身的这一隐忧再度产生。英国在埃及的赌注太大，因而不允许这种危险情况发生。因此，索尔兹伯里政府决定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这样，热带非洲瓜分过程中最后一场大危机的序幕便揭开了。像以前几次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也是由于非洲本身事态的变化而引起的。

不出所料，对东苏丹的入侵促使巴黎从西面侵入苏丹。^[32]这使索尔兹伯里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在基钦纳挥师指向栋古拉后3个月，马尔尚取道布拉柴维尔前往法绍达；拉加尔德返回亚的斯亚贝巴，匆匆与曼涅里克结盟并准备与马尔尚会师尼罗河。埃及军队是否能够把铁路从北面修通下来，是否能够把哈里发打败并在法国人到达以前赶到法绍达，似乎越来越成问题。因此，索尔兹伯里被迫试图从南面来挡住法国人。他加紧修建从蒙巴萨通往乌干达的铁路以补给那里的基地，并于1897年6月，命令麦克唐纳从当地沿尼罗河北上，想在从西面前来的法国人到达以前赶到法绍达。这样，英法对尼罗河地区的争夺触发了4场对埃及苏丹的入侵。法国人正从东西两个方向长途跋涉朝它进发，英国人则南北夹击。

长期以来，索尔兹伯里对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威胁的担心远远超过他对马尔尚远征军的忧虑。1897年年初，英国派驻曼涅里克朝廷的特使伦内尔·罗德报告说，曼涅里克看来深受法国人的影响；许多法国人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里位居要津，高官厚禄。10月间，这位皇帝又同法国人合作，派遣邦尚的法埃远征队沿着索巴特河直抵法绍达。事实上，曼涅里克只是想利用法国人来对付英国人，因为后者对他的独立看来威胁更大。他又瞒着他们与马赫迪分子达成了协议。对于那次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尼罗河的联合进军，邦尚曾抱怨说：“埃塞俄比亚人对这次进军毫无帮助，他们尽一切力量，想方设法不让远征队向尼罗河进发。”^[33]

要是索尔兹伯里早知道这些事实的话，他就不必费那么多心机去征服苏丹的其余地区。但是，根据伦敦所能获得的证据来判断，形势确实不妙。基钦纳到达伯贝拉后，发现马赫迪分子比预料的要强大得多。他对希克斯帕夏在沙漠中遭到的厄运犹有余悸，提出要用白人军

队。大臣们却十分不愿意把英国兵派到那里去。原定此时应从南面到达法绍达的麦克唐纳的部队，由于军队的哗变和巴干达人的叛乱，竟然尚未启程。英国在南线的战略，就同法国在东线的战略一样，也出了差错。除了加紧从北面征服苏丹外，别无他法；1898年1月，或许既出于害怕神出鬼没的马赫迪分子的反攻，又出于害怕法国人进逼法绍达，英国人给基钦纳派去于白人援军，命令他攻占喀土穆。于是，英国军队与马赫迪分子之间的困难复杂情势，终于将他们拖入了对东苏丹大片他们并不想要的领土的征服。这和1889年以后法国军队由于同阿摩利的好斗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组织之间的纠缠而卷入了西部苏丹如出一辙。在这件事中，早期民族主义的宗教狂热对欧洲帝国主义进入非洲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欧洲政治家们和商业利益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种种头绪在1898年夏天集结到一起。9月2日，基钦纳的机关枪被证明比喀土穆哈里发的马赫迪分子更厉害。英埃共管统治不久在苏丹扎了根。6个星期前，一支筋疲力尽的法国—埃塞俄比亚远征队一路跋涉，来到了法绍达附近的索巴特河与尼罗河汇流处，盼望找到马尔尚。马尔尚却不在。一位俄国上校把一面法国旗插在尼罗河的一个岛上以后，他们就离开了。3个星期后，马尔尚亲自抵达法绍达时，那里已无人迹。但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9月19日，基钦纳率领的各团乘炮艇沿河溯流而上，迫使马尔尚逃去。

乍看起来，英国人在法绍达似乎是杀鸡用了牛刀。索尔兹伯里耗费数百万英镑，从下埃及和蒙巴萨两个方向穿过沙漠，越过丛林，把铁路修筑到维多利亚湖和尼罗河上游；他派遣一支庞大军队深入沙漠，差一点儿同法国人开战；而所有这些只是为了恫吓8个法国人！为了尼罗河流域的这片不毛之地，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连维多利亚女王这样一位主张帝国扩张的人都反对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目标”而进行战争。然而，在法绍达，这出戏剧逐渐转入低潮，而在欧洲却引起了一次高潮。整整两个月，形势一触即发，谁也无法预卜英法之间是否会爆发一场战争。当然，这不是仅仅为了法绍达，主要是为了这场穷乡僻壤所象征的英国在埃及和印度的安全。以及法国在地中海的地位。最后，巴黎让步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以后的一片混乱中，布里松内阁不得不避免与英国人进行一场海战，这场海战，即使有俄国人帮忙，看来他们也难以取胜。1899年3月的英法宣言把法国排

除在整个尼罗河流域之外。作为补偿，它获得了东起达尔福尔，西至乍得湖的中部苏丹。埃及问题就这样解决了。1904年的英法协议只是予以确认而已。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埃及说来，地图上的边界划分最后本来可以和开始时一样，但这已经为时太晚了。到了此时，热带非洲已经没有剩下的地方可分了。

这场为夺取埃及和尼罗河的主要斗争，在非洲其他地方产生了副作用，造成了一系列次要的自成体系的争端。这些争端以英法之间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对抗最为严重。19世纪90年代初，这件事还一直像列强争先恐后瓜分非洲的最初10年一样，只是徒有声势。那里的政治气候随着尼罗河问题谈判的情况忽冷忽热。直到基钦纳侵犯了马赫迪分子的苏丹，马尔尚以进军法绍达作为回击的时候，西部非洲的争吵才开始有了实质性内容。1896年后，这场较量日趋激烈。卢加德和其他一些掠夺者在尼日尔河河套一带部族领地周围进行混乱的争夺。从伦敦的立场来看，这种进行抢占和远征的混乱局势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事，因为这对于至关重要的尼罗河问题无足轻重，除非是为了标明一些地方，作为筹码，以便对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讨价还价。但在巴黎官方的心目中，对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争夺，都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同法国的尼罗河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假如法绍达计划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建立从西非基地越过加扎勒河，到达尼罗河上这个新阵地的牢靠的交通联系。同往常一样，这种策划决定了所有的道路一定要通向乍得湖。法国殖民部长写道：“我们的主要要求必须是，把我们在（法属）苏丹的属地，同在乌班吉河一带的属地连接在一起，再把后者同尼罗河连接起来。在尼罗河和乌班吉河之间局势是大有希望的。……而在乌班吉和（法属）苏丹之间，我们想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依靠派遣（新的）远征队。”^[34]为了要执行这些指令，他们试图两路并进。一支部队从刚果北上，力争与拉比达成协议，因为他依然占有乍得湖的东岸和南岸。但他们发现拉比并不容易安抚。再者，法属刚果过于贫困，无法大量支援这路进军。另一路派卡泽马儒从法属苏丹出发，越过尼日尔河河套直抵乍得湖西岸。但这路线使他进入了索科托，从而践踏了1890年签订的规定英法势力范围的条约。与此同时，一支来自达荷美的支援部队威胁要把尼基和博尔吉两地从尼日利亚北部的戈尔迪的摇摇欲坠的帝国中分割出去。

简而言之，英国人在西非的一系列退让现在即将告一段落。在殖民部，有几个有权势的政治家急于建立一个非洲帝国来推行新帝国主义。张伯伦就是其中之一。原来的一派对待瓜分的态度是根据承担有限义务这一原则，这个原则支配着他们的全部外交政策，而张伯伦则相信对一个垮台的对手应给予痛击。为了在尼罗河向前推进，他们准备在尼日尔河后退。但张伯伦却主张要么两者兼得，要么两者俱失。他在1896年并吞了阿散蒂后，进而与法国人争夺沃尔特各酋长国的所有权。这场新较量很快使得尼日尔河地区的争吵更趋激烈。为了保住博尔吉和索科托，他迫使戈尔迪的公司也采取好战态度，这种态度既使其利润受到损害，又为外交家们所不齿。他坚持一定要用武力把卡泽马儒逐出索科托，但这位探险家已经死了，这种做法未免多余。双方尽管有这番斗争，还是签署了一个条约。但他们的眼睛却盯着别处。索尔兹伯里否定了他的殖民大臣的政策，并辩解说：“如果我们中断谈判，……这只会使我们在尼罗河流域增添困难。”阿诺托则盘算：一个协议可以阻止英国人用“怨言和要求补偿的策略来阻挠我们提出有关埃及问题的要求”。于是，在1898年6月14日，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法国获得了上沃尔特和博尔吉，而比邻的伊洛林和索科托则留给英国。

就伦敦而言，西非问题就到此告終了。由于埃及危机开始而引起的这个问题，在该危机尚未了结以前就能干净利落地被埋藏起来了。然而对巴黎说来，西非问题却仍未了结；它的终结是促使埃及问题继续存在的一个必要环节。乍得湖战略已经完全失败；同英国人达成协议，就有机会保住廷巴克图到法绍达这条路线不受张伯伦的西非边防部队骚扰。当英法谈判正在全力进行的时候，巴黎已在组织一支部队，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乍得问题了。这支部队起航去非洲的日子，由于时机上的某种巧合，刚好是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这个由武莱和夏努安率领的远征队，从规模上讲，比马尔尚的那个远征队要大。他们朝东进发，从廷巴克图直取乍得。他们在那里将最终给予让蒂尔和刚果政府一个机会，使他们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拉比赫。另一个远在撒哈拉北面的由富罗和拉米所率领的远征队也正在向乍得集结。尽管这支部队不在主要计划之内，但后来证明解决问题的竟是他们。

马尔尚在尼罗河的惨败使这些计划失去了主要内容。法绍达失利后，法国舆论不再赞助在非洲丛林中进行冒险了。政治家们不愿与议

会再度发生冲突，想置拉比于不顾，让他自食其果。刚果总专员更不愿冒险；他提议法国应同他达成一项松散的协定，允许他“在贝努埃河左岸随心所欲地行事”。^[35]武莱和夏努安失去了理智，跟他们的军官同僚们发生了火并，并窜入西苏丹的荒漠中准备自己建立一个帝国。消息传到巴黎，法国更不急于同他们的伊斯兰对手决一雌雄了。但是，决定此事的不是巴黎的深思熟虑，而是当地的局势。同拉比根本无法达成协议；他相继向让蒂尔、撒哈拉远征队、武莱和夏努安的残部发起了攻击。1990年4月21日，这三支法国部队会师了。第二天，它们就跟拉比打了一仗，一举解决了乍得争端问题，推翻了拉比，并组成了一个由阿尔及利亚、法属苏丹和法属刚果三者组成的联邦。旷日持久的纠葛终告结束。

摩洛哥、利比亚和刚果还要做进一步调整。但这些调整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序曲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这次争夺了。到了1900年，那些瓜分非洲的指导者已经把热带非洲处理完毕，就等那些当政者来落实纸面上的协议，从而使他们的征服能有所收益。大局已定，无可挽回。这些征服把欧洲各国与非洲各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致将来难分难解了。

决策者们在19世纪80年代的野心只不过是打算在这些领土周围筑起外交篱笆，用非正式的控制手段，把它们原有的统治者牢牢地束缚起来。但是，这种办法对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对于突尼斯和苏丹的伊斯兰复兴分子，对于尼亚萨兰和刚果的阿拉伯奴隶贩子，对于乌干达和达荷美的泛神主义王国，都无济于事。这些人不愿进行合作。对他们只能加以征服。一旦征服后，就必须给予治理，而进行治理后，则必须加以开发，以便支付行政费用。但由于非洲地图上蓝、红、黄、绿的新色彩在欧洲选民中唤起了自豪或羞耻感，因此，这种开发便被说成是进步和托管了。

这种从纸面上的帝国到实际的殖民地的演变过程，绝不像经济计划或帝国热情那样合情合理或目的明确。索尔兹伯里的尼罗河流域战略的结局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它曾经出人意料一样。在20世纪初，为了支付占领埃及和苏丹的耗费，政府不得不动用原定用于在尼罗河上筑坝防止洪水和发展吉齐拉长绒棉的公共基金。为了赚回建造乌干达铁路的费用，政府必须为铁路提供有利可图的货物运输。这是促使白人移居肯尼亚的最大动力，而且也大大地推动巴干达人变成种植经济

作物的农民。其他地方的变化过程也完全一样。在鲁梅和蓬蒂治理下的法属西非洲的开发是在总督府经过重新组织，以吸引来自法国的投资后才开始的。而德国由于俾斯麦对法国的政策的突然改变而意外获得的殖民地，则一直遭到冷落，直至1907年德恩伯格才进行全面建设。

所以，对非洲领土进行这种开发是当初占领时所没有预料到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开发中，政府本身被迫带头。企业家们仍不愿轻率地投入非洲的冒险事业中。因此，大部分资金和技术必须从公共部门抽调。时至今日，瓜分非洲的种种策略和错误都被合情合理地辩解成是为了建立非洲帝国。但理解这种帝国主义的关键在于它的因果关系。非洲的瓜分不是由实业家、传教士或帝国缔造者们发起的，而是由一伙外交官发起的。他们只是把非洲大陆作为他们在别的地方谋取利益的一种工具。但是，这种纸面上的瓜分一旦发起后，就由于欧洲人与非洲的早期民族主义者即带有宗教色彩的革命者之间的冲突而变成了占领和殖民地。只是在这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企业家们才姗姗来迟。这时，由于欧洲在处理非洲问题时从来不把它的居民考虑在内，已经不得不为这种做法付出代价了。这种因果关系同传统理论所假设的情形恰恰相反。不是帝国主义造成了非洲的瓜分，而是瓜分造成了帝国主义。

正当埃及危机使瓜分非洲的活动变得错综复杂时，另一场自成体系的扩张活动在次大陆的南端也达到了高潮。地处温带的南部非洲，与大陆的其他地方不同，是由白种人开拓的。这些白种人，自从大迁徙以来，一直把他们的家园向北推进，从奥兰治河和瓦尔河流域直达赞比西河及更远的地方。他们一面推进，一面把沿途的班图人征服。而且，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投资者和商人们用欧洲的工业力量来开发这里的殖民地经济，其规模之大，亦为非洲其他地方所罕见。自从金矿发现后，殖民地化的进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更有了显著的增长，使得新的资金和移民源源不断地迅速流入。因此，南方的危机起因于白人殖民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不像大陆的其他地方来源于一个东方帝国的衰亡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余波。而且，这个危机是因为殖民者之间相互冲突的民族愿望，而不是因为列强间的抗争引起的。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争吵，尽管对其余地区至关重要，但对非洲的这一部分却毫无影响。偶尔，德国人好像要插一手，但他们在危机中起的作用是微

不足道的。这场瓜分与其说是伦敦的帝国政府和当地的殖民者之间的事，不如说根本上是在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事，而当地的班图人只是在一旁冷眼观望。然而，南非和埃及的紧急情况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不是由帝国主义的野心引起的。两场危机的起因都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物，为了对付民族主义的挑战，维护旧制度的至高地位，几乎不由自主地征服和占领了更多的土地。就在他们的憧憬和现实之间，他们行动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在南非，如同在北非和中非一样，投下了帝国主义这一阴影。

直到19世纪70年代，伦敦官方一直满足于通过对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的控制来确保经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他们对内陆地区布尔人的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不牢靠的独立听其自然发展。但是，在金伯利发现了钻石并开始投资和修筑铁路后，英国人的目的开始不同于他们在埃及和热带非洲的目的，而变得明显地具有帝国色彩了。对于建立殖民地，英国殖民部先是企图阻止，继而又想置之不理。但是，开拓殖民地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因此，这时除了将它的属地和那些共和国联合成一个实行自治的自治领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这种形式的帝国结构，其成功的典型就是澳大利亚的责任制政府和1867年的加拿大联邦。南非殖民地居民团体，一旦在英国国旗下结合在一起，并摆脱了唐宁街形式上的控制，毫无疑问，他们同英国的利害关系将使得他们也效忠于英帝国，而这种关系即便不是血缘和文化方面的，也是贸易和自由方面的。确实，这种促使各阶级实行合作的办法，就开普殖民地荷兰后裔的情况而言，是行之有效的。他们是生在南非的阿非利卡人中最英国化、最商业化的一伙，1872年成立了可靠的自治责任政府。这种做法，在奥兰治河以北地区的布尔人身上，本来也是可行的，但就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的情况来说，事实证明却难办得多。他们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最少；在“大迁徙”中，他们为了摆脱帝国的统治，迁移到最远的地方；因而他们是布尔人中反英情绪最浓厚、共和倾向最强烈的一伙。他们乐意让别的外国来插手南非事务。幸运的是，或者在迪斯累里的殖民大臣卡纳尔文看来幸运的是，这两万多名来自17世纪欧洲、笃信加尔文教的边境农民，人数不多，十分贫困，并被敌对的班图人所包围，所以无法阻挡19世纪时代前进的步伐。1876年，卡纳尔文兼并了他们的国家，企图迫使他们加入一个帝国联邦，由远比他们更为富裕，人口更多而又更可靠的开普殖民地予以控制。但是，就像埃及人和突尼斯

人一样，3年后德兰士瓦人奋起反抗入侵者，争取独立；关于建立联邦的美梦就在1881年的第一次布尔战争的烽火中化为泡影了。更有甚者，帝国侵略的印象在讲阿非利卡语的南非人中唤起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情感，使他们想要同他们在瓦尔河以北的兄弟们团结起来。格莱斯顿内阁意识到“布尔人将会竭尽全力对抗我们的统治……如果我们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们只能用武力来保住它。战争的延续，即使不在开普殖民地本身引起一场叛乱的话，也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同自由邦以及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的较量”。殖民地的忠诚动摇了，阿非利卡精神在克留格尔的叛乱中似乎使人们团结起来。为了避免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造成一场“种族战争”，英国的自由党人明智地忍受了在马尤巴山蒙受的耻辱，允许德兰士瓦人重新建立他们的共和国。

于是，近代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就在卡纳尔文的粗暴干预引起的反应中出现了。它把“大迁徙”的历史当作它的神话，以“非洲是阿非利卡人的非洲”作为口号。在开普殖民地，霍夫麦耶的农民保护协会，同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阿非利卡协会的扩展结合起来，便显示出布尔人的政治觉悟是怎样在巩固中。同样地，S. J. 杜托伊特的阿非利卡语运动和荷兰改革派教会的牧师们也显示了他们准备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来反对英国化的决心。阿非利卡人的民族主义，由于面对着这样一个帝国，它对班图人的豁达大度威胁了殖民地居民作为一个白人贵族的地位，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反帝的。但他们的领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温和派，决不是不愿意同英国当局合作。然而，在兼并德兰士瓦的企图失败后，那里发展的民族主义就变得更加自信，格外极端化了。德兰士瓦人日甚一日地从需要南部非洲的团结转变到坚持一种浪漫的独立自主主义；从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发展到要摧毁一个旧帝国了。

对英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想把这个由好斗的民族主义者居住的巴尔干化的南非变成另一个加拿大并不容易。它的边界那边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的邻国，以便使布尔人确信帝国是维护他们民族特性的最好保证，如同当年法裔加拿大人被说服的那样。而且，在加拿大，向西开拓殖民地，一直推进到太平洋沿岸的，是占多数的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而向南非腹地扩张的，则是占多数的讲阿非利卡语的南非人。唐宁街为了维持它在3个阿非利卡人控制的自治政府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势，要做的事情太多，因而只能把建立自治领的步伐慢慢地加快。直

至1895年，英国政府一直等待它的殖民地合作者凭借英国资本和移民的输入，从内部促成一个帝国联盟。它一再使它的政策迁就开普殖民地内阁的观点，以免得罪它这个主要盟友。它非常审慎地对待德兰士瓦，唯恐与民族主义者的公开争吵会像这个国家在1881年曾威胁要做的那样，把阿非利卡人团结起来，反对帝国。由于对殖民地和对共和国一样采取姑息让步，南部非洲的“帝国因素”就逐渐消失，在各方面均以“道义影响”取而代之。只有一方面是例外：伦敦插手帮助殖民地进行扩张，而设法阻挠共和国扩张。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在最终建立联邦时，帝国的成分可占优势。

因此，一切都有赖于使南部非洲的力量平衡，对开普殖民地的未来有利。1884年，俾斯麦宣布把安格拉皮奎那湾置于德国保护之下，英国听从了开普敦的请求，立即将贝专纳和圣卢西亚湾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挡住德国人和德兰士瓦人的直接接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力量平衡变得对开普殖民地不利而使共和国受益的，倒不是德国人的外交，而是在淘金热潮中，倾入德兰士瓦开发威特沃斯特兰的英国资本。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这种倾向已经日趋明显。随着南非的繁荣中心从海港向共和国的金矿所在地转移，各殖民地如醉如狂地把铁路向北伸延，以追求新的“埃尔多拉多”^[36]的贸易。显而易见，殖民地的岁入和农民的生计，不久将要依赖德兰士瓦的市场了。另一方面，克留格尔政府却宁愿把它新获得的经济力量使用在加强整个南非的共和制度上。他不惜跟开普殖民地的阿非利卡协会相对抗，也不让开普殖民地的铁路通到兰德地区。同时又用新获得的财富来修筑一条通向迪拉果阿湾的铁路线，从而使共和国摆脱殖民地的港口和关税的桎梏。随着这场经济革命而来的是一场以关税、铁路和地盘为武器的求生存的长期斗争。在斗争中，开普殖民地的金融和商业阶层将他们的势力向北扩张，以求未来的发展，而德兰士瓦在铁路和新的讲英语的移民居住点包围下被威逼利诱跟它结成有利可图的商业联盟。

正是南方的这种殖民化行动和资本输入的高潮及这场商业上的内战促使了对领土的争夺，向北到赞比西河，继续伸展到尼亚萨湖和刚果自由国的南部边境。这种开拓疆域、建立帝国的十足劲头，在大陆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相似的情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身居白厅的人物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名存实亡的话，也是无足轻重的。

议会拒绝为一个被保护国或一条殖民地铁路付出任何代价。整个主意、数百万资金及伦敦和开普敦之间的政治安排，一句话，主要的原动力，都来自一位名叫塞西尔·罗得斯的人的杰出才华。凭借着路特希尔德家族、德比尔斯公司和统一金矿公司对他的绝对信赖，他和利奥波德二世本人一样；熟谙如何使大生意对政治产生作用，而另一方面又熟谙如何使政治为大生意服务，同时却又保留理想主义这件华丽的外衣。他好高骛远，不善深思；然而完成的计划却大大超过他的许诺。他是一个充满幻想、无暇考虑收支平衡的金融家。他不擅长辞令，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又出类拔萃，在南非他俨然是个阿非利卡人，在伦敦他又以一个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对自己和对南非命运特有的炽烈信念，使他的出尔反尔的性格也变得情有可原了。

1887年，他手下的探矿者告诉他，马塔贝莱兰的黄金储藏量将会和约翰内斯堡的一样富饶。他就着手获取这块地方，作为“把一个统一的南非置于英国国旗下”的一种方式。他断定“如果我们得到了马塔贝莱兰，我们就获得了非洲的力量均衡”。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他还说服索尔兹伯里政府同意了这一点，这也是他的特色。政府部长们，由于希望再发现一个和兰德一样的金矿，以及在洛本古拉的王国里建立一个坚强的英国殖民地，以抵消德兰士瓦的崛起，在1889年批准给予罗得斯的南非公司特许状。这场交易的部分内容，就是要罗得斯把开普殖民地的铁路修通到贝专纳，从而使财政部摆脱这个一贫如洗的被保护国的重负；实质上是罗得斯以20种不同的名义，进行各种工作并承担费用。帝国当局既害怕出现反对帝国的议会，又怀疑开普殖民地政府由于阿非利卡协会的阴影而对它不忠诚，也只好利用这位钻石大王而别无他法了。在北方，只有罗得斯才能使帝国的势力保持平衡：只有他一个人，先是作为霍夫麦耶的政治盟友，不久又作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才能在一场南非的争霸斗争中使阿非利卡协会保持忠诚。克留格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民们的不妥协态度，迫使罗得斯为取得决定权而承担费用。在罗得斯的坚决要求下，索尔兹伯里不顾葡萄牙的要求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抗议，一反他自己原来的意图，在1890年把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一起都划归南非公司。而且，又是依靠罗得斯的资助，索尔兹伯里才能在1891年把尼亚萨兰变成了被保护国，从而使这块由利文斯敦开拓的土地不致被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所进占。从此以后，白厅就牢牢地抓住这位巨人不放了，而罗得斯在南非也俨然成为一个“独立力量”。对白厅来说，问题不

在于促进英国的贸易和投资，而是把殖民地居民和资本的固有的中立运动纳入他们既定的帝国蓝图中去。由于害怕激起阿非利卡人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风险，他们即便有钱，也不能直接这样做。而罗得斯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在开普殖民地的阿非利卡人中，是个头面人物。所以，这件事必须要他来替他们做。

但是，到了1895年，这位开普殖民地总理的一切规划，看来都快成泡影了。传说中的马塔贝莱兰黄金并未成为事实，而德兰士瓦地层深处的黄金矿脉却是有利可图，并且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那些原来打算移居罗得西亚殖民地的移民们现在加入了约翰内斯堡的外国移民行列。在此后的一段漫长时间里，林波波河以北地区这个砝码在帝国的天平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贝专纳铁路和南非公司的股票暴跌，而威特沃特斯兰公司的股票却上涨了。帝国缔造者们一贯想以开普殖民地的优势地位作为基础来建立一个自治领，在他们苦心经营40年之后，如今却确信这一联邦的基石是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德兰士瓦共和国。1894年，克留格尔开放了迪拉果阿湾铁路。尽管开普殖民地从此有一条铁路线可通兰德，但它在交通运输和贸易上的比重却每况愈下，而德兰士瓦和纳塔尔所占的巨大份额则与日俱增。一年后，这场铁路和关税之战在浅滩危机中，几乎使开普殖民地和共和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但是，无论什么威胁都无法迫使德兰士瓦人按罗得斯的条件，同他结成一个商业联盟。克留格尔占着各种优势，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可靠的兰德公司和迪拉果阿铁路二者合在一起，使他达到了主宰殖民地贸易前途的地位。罗得斯和张伯伦怀疑他还会决定建立一个南非共和国。于是，他们就打算推翻他的统治。

1895年年底，罗得斯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一次外来移民的叛乱，结果以惨败告终。更糟的是，詹姆森博士的“袭击”事件暴露了阴谋，把帝国当局也牵连进去。整个南非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再一次团结起来，反对英国的侵略。在开普敦，罗得斯垮台了，政府落入敌对的阿非利卡协会手中。在自由邦，稳健派被更严峻的民族主义者所取代。这些人不久便同德兰士瓦结成了范围广泛的联盟。开普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阿非利卡人团结一致，保卫共和制度。德国小心翼翼地给克留格尔以外交支持，希望借此机会促使英国人更接近三国联盟。如果说兰德公司打破了经济上的平衡，那么，罗得斯也已经使得政治上的平衡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前途了。

这种大祸临头的看法并不是罗得斯独有的。高级专员罗宾逊和米尔纳，殖民大臣张伯伦和塞尔伯恩均有同感。1896年年初，殖民大臣们终于相信，德兰士瓦必须迅速予以兼并“在英国国旗之下，以加拿大的自治领为榜样，成立一个邦联”。不然，它“必然会把（殖民地）合并……成立一个（共和制）的南非合众国”。但是，内阁的其他阁员对这种激烈的论点都十分怀疑。他们想起阿非利卡人的民族主义对第一次布尔战争所产生的反应，认为殖民地的命运尽管一蹶不振，但另一场战争将会使帝国失去整个南非。而且，这样一种争端在英国也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索尔兹伯里内阁决心单凭施加外界压力来迫使克留格尔就范——也许通过占有迪拉果阿湾；或者通过笼络德国人；或者通过威胁和恫吓的手段为外来移民取得选举权；总之，通过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把兰德公司纳入南非贸易联盟中来。他们这种避免武装冲突的努力是在重演格莱斯顿对待阿拉比的故技。但事变再一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结局和他们的意愿大相径庭。罗得斯和南非极端的殖民地政党要求使用“道义劝服”这一更加严厉的武器。这些人作为帝国在南非剩下的唯一合作者所表示的忠诚，是帝国不敢丢失的。英国政府听从了他们的话，结果引起了战争。这场战争最后是克留格尔宣布的，这跟以前阿拉比的情况相似。不同的是，格莱斯顿内阁只是在事变以后才认识到他们在埃及铸成的大错，而索尔兹伯里内阁却不幸在事前就心中有数了。希克斯-比奇抗议道：“我希望不要让米尔纳和那些外来移民们把我们拖入一场战争。”首相沮丧地承认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冷静地、清楚地预见到布尔人的民族主义对帝国的事业将要施加的报复。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前夕，他就预言道：“即使他们屈服了，布尔人也会在一个世代里仇恨你……要是他们进行反抗而被打败的话，他们会对你更加恨之入骨……但考虑这些，也于事无补。米尔纳所做的一切，也无法消除……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讨厌的人，为了那些既不能为英国带来利润，又不能带来力量的领土。”

因此，占领南北罗得西亚和征服德兰士瓦是实行殖民化的过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在这过程中，阿非利卡人和英国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已经退到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外。一旦经济发展把反对帝国联系的敌人提高到比殖民合作者更占优势的地位时，伦敦政府就企图从外交上把南非再一次拉回到帝国路线上来。但是，在试图把南非建成另一个加拿大的过程中，他们只是造成了另一个爱尔兰。从这个观点出发，这

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但这一错误还不仅到此为止；因为最后他们为了想在自治领内建立帝国霸权这样一个过时的概念，为了已经成为美妙幻想的事业而打了一仗。

尽管19世纪末，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地图上施展了令人惊异的瓜分花招，但是，它只是早期欧洲的扩张活动所造成的第二种结果。在美洲和其他白人领地建立殖民地，已成为一个持久的成就，因为这是用大西洋沿岸土地的人力、资金和文化来进行建设的。到了这时，它们在经济上逐渐增长的自给自足的状况已使它们摆脱了欧洲控制的轨道，不管欧洲在纸上还可能留下多少当年霸业的遗迹，或者凭借武力，一时还能卷土重来。但是，对欧洲来说，这段时间也并不是它的衰落时期，它当时正把精力用来进行最大限度的推进。旧时的殖民地的潜在力量已经大大成熟，以致自身在当地开始进行扩张。加拿大人和巴西人已经组织开发内地，而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是伸展到太平洋地区。南非也已向北扩张到了赞比西河的北岸。不管打着什么旗帜，不管披上什么伪装，欧洲的那种对外扩张的精力仍然在为西方文明或其衍生形式取得永久性的成果。

这种情况对于在亚洲和非洲匆匆拼凑起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那些帝国却根本不适用。这种新帝国主义的进展主要是为了弥合那些旧帝国身上的裂痕。这些帝国与欧洲对外扩张的推动力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它们不是国民认真注意的目标。它们在拼凑起来后不过3/4世纪的时间里就分崩离析了。把这些华而不实的创造看成是实力平衡或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带来的必然作用，这将是容易受骗的历史编纂法。

尽管如此，对亚洲和非洲说来，这种新帝国主义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欧洲进行扩张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把以前按照传统方式实行统治的社会的外壳加以磨损或弄破。将近19世纪末，这已经造成了一种社会流动性，对于这种流动性，西方人这时不敢予以认可，也不敢采用支持新生集团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那种旧办法来加以利用。尽管进行扩张的疆域越来越深入这两个大陆的腹地，但19世纪初期的扩张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充满自信的盘算却已丧失殆尽了。

诚然，西方现在已推进到非常遥远的地区，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原来那种创造性的干预。俄国人没有多大机会同希瓦和布哈拉的伊斯兰酋长们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正如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什么

机会同苏丹的神权执政者进行合作一样。当中国、东京湾地区或斐济岛的人民遇到局势动荡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聚集在王朝的周围。这和非洲的摩洛哥人或埃塞俄比亚人聚集在他们统治者的神授权力周围是一样的。这种运动在它的结果方面是早期民族主义的，但它是一种反抗事实的、浪漫主义的斗争，是被正在变化的新时代所震惊而又无法安心的一些社会集团所提出的激烈抗议。然而，在对待西方问题上，也有更积极的反应。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更为成熟的民族主义，中国光绪年间的维新派，并入印度国大党的大陆联盟的各个派系以及非洲的分离派教会——它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计划按西方人的模式来改造他们的性格和重新取得权力。

这些反应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这些运动都属于同一种倾向。不论从野蛮的对抗直到老练的合作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相差多大，但它们中间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成长因素。西方的力量在打破它们的传统方式与引进交换经济和官僚国家的同时，把它们也投入了变革之中。它们逐个地暴露在急剧的社会变化面前，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冲突、新的社会中坚的出现和道德标准的改变。在这一切动乱中，西方能听到的，只是一片告急声。但是，就像它的种族优越感的偏见混淆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一样，它的达尔文主义强调了这些社会的衰落和分崩离析的迹象，而不考虑这掩盖了它们的成长因素。

欧洲是在对付这些早期民族主义者的觉醒的过程中，被诱入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觉醒又导致了后来出现的近代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但是，这种习惯的表达方式掩盖了实质。帝国主义一直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作用一直是次要的。世界革命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造成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帝国主义通过其他方式的继续。

（姚乃强 徐式谷 译）

[1] 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的总督称为“赫迪夫”。——译者

[2] 阿非利卡人（Afrikeners），从前译作“南非荷兰人”或“南非白人”。
“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指南非荷兰裔人中主张荷裔保持自身特点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那一部分人。——译者

[3] 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突尼斯的总督称为“贝伊”。——译者

- [4] 法国驻开罗领事1882年2月21日呈交弗雷西内的报告,《法国外交部档案集》(以下简称A. E.), 埃及卷宗第72号。
- [5] 海军部长致外交部部长文件,1874年1月6日,A. E. , 文件与备忘录(以下简称A. E. M. D.), 非洲问题, 第58号。外交部部长致海军部长文件,1880年1月31日,A. E. M. D. , 非洲问题, 第77号。
- [6] 西非使团团长给德卡兹的信,1885年10月19日,1886年3月25日,法属赤道非洲(以下简称A. E. F.)总督府档案, 卷宗2B, 第28号。
- [7] 弗雷西内致布拉柴的信,1886年4月12日,A. E. M. D. 非洲第94号。
- [8] 备忘录第70号,1890年1月24日,A. E. F. 内地形势报告,1886年10月—1890年2月。
- [9] 外交部备忘录,1887年4月15日,A. E. M. D. 非洲, 第83号。
- [10] 法国殖民局备忘录,1885年7月17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M. F. O. M.), 非洲, 卷宗A, 第12号B。
- [11] 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致弗雷西内的信,1886年3月1日,M. F. O. M,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84页。
- [12] 加利埃尼的备忘录,1887年9月24日,M. F. O. M. ,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90号;加利埃尼致殖民部副部长,1887年7月30日,M. F. O. M. ,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90号。
- [13] 阿尔希纳尔的备忘录,1889年8月19日,M. F. O. M. ,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93号A。
- [14] 阿尔摩拉维德朝系北非柏柏尔人的穆斯林王朝,在11与12世纪统治了摩洛哥和穆斯林西班牙。——译者
- [15] 瓦隆致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副国务秘书的信,1890年3月22日,M. F. O. M.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95号C。
- [16] 阿尔希纳尔写的备忘录,1889年8月19日,M. F. O. M. , 塞内加尔, 卷宗4, 第93号A。
- [17] 艾蒂安致塞内加尔总督的信,1891年4月14日,M. F. O. M. , 塞内加尔, 第91号B。
- [18] 外交部备忘录,“关于英法协议草案的意见”,1890年8月13日,A. E. M. O. , 非洲, 第129号。
- [19] 马赫迪致约翰尼斯皇帝的信件(1884—1885年),引自G. N. 桑得森:《非洲人对欧洲人在尼罗河上游争夺的影响》。莱弗霍姆历史会议文件,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1960年版。
- [20] 德尔卡塞1893年12月4日给格罗德信,M. F. O. M. , 苏丹(II), 第6号A。

- [21] 艾蒂安给塞内加尔总督信，1891年12月4日，M. F. O. M.，塞内加尔（1），第91号B。
- [22] 克朗佩尔给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副国务秘书的信，1890年3月12日，M. F. O. M.，非洲卷宗5，克朗佩尔档案（1890—1891年）。
- [23] 阿尔及利亚总督致殖民部信，1896年5月19日，M. F. O. M.，非洲卷宗10，富罗档案（1896年）。
- [24] 法属西非总督致殖民部信，1898年7月12日，M. F. O. M.，非洲卷宗11，乍得湖委员会档案。
- [25] 克罗兹致殖民部信，1895年8月26日，M. F. O. M.，非洲卷宗9，克罗兹档案。
- [26] 布拉柴致殖民部信，1891年4月18日，A. E. F.（非保密性文件）；布拉柴致殖民部信，1861年6月6日，A. E. F. 2B。
- [27] 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致蒙合尔信，1894年7月13日，M. F. O. M.，非洲（IV），第16～19页（档案19号B）。
- [28] 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致蒙合尔信，1894年7月13日，M. F. O. M.，非洲（IV），第16～19页（档案19号B），经阿诺托校订的修正稿。
- [29] 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致蒙台尔信，1894年9月22日，M. F. O. M.，非洲（IV），第16～19页（档案19号B），经阿诺托校订的修正稿。
- [30] 法国驻伦敦代办致阿诺托的信，1894年9月22日，A. E. 英国，第897页。
- [31] S. 鲁宾森：《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争夺中的地位》，莱弗霍姆历史会议文件，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1960年版。
- [32] 阿尔希纳尔的备忘录，1896年1月20日，M. F. O. M.，非洲，第14号。
- [33] 邦尚写的备忘录，“与马尔尚会师不可能的理由”，未注明日期，M. F. O. M.，非洲，卷宗III，档案第36号A。
- [34] 殖民部致法属刚果总专员信，1897年4月15日，A. E. F. 卷宗3D。
- [35] 法属刚果总专员致殖民部信，1899年11月24日，A. E. F.，卷宗3D。
- [36] 南美关于“镀金人”的传说，后引起了寻找“黄金国”的活动。——译者

第二十三章 太平洋上的扩张和对中国的争夺

在太平洋上和中国地区竞相扩张，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突出的特色；但是，要求扩张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不是首先来自欧洲的各国政府。1894年前，这种压力几乎完全来自亚洲各国政府和他们的外国顾问，或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太平洋各岛以及亚洲的欧洲殖民者和官员。在1882年到1885年的短暂期间，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后一部分人是受到欧洲的官方的有力支持的：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欧洲各国政府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一直不愿把他们的责任和竞争扩大到这个地区。

在这个地区最初出现的一些问题中，有的是由于欧洲人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扩大贸易和移民而产生的。欧洲人之间以及欧洲人与土著之间的冲突，早在1870年，由于贸易和种植园农业的兴起和交通的进步，以及由于这些发展打乱了当地固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因而变得严重起来。在斐济岛问题上，英国殖民部已经在12年前拒绝过英国的移民所提出的建议；这些英国移民也害怕斐济被法国兼并，因而建议，这些问题应通过由英国实行兼并的办法来解决。英国不愿冒与法国发生争执的风险。此后，尽管治理不善，混乱日增，移民的人数（主要是从事贸易和棉花生产的英国人）仍不断地增多。1870年，几百名居住在斐济的英国臣民，再次提出请求，要英国兼并这些岛屿。同时，土著领袖们请求英国像美国在夏威夷所做的那样，建立一个保护国并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土著政府。土著居民还向美国和德国提出割让领土。这些请求没有得到反应；所有各国政府抱有同样的愿望，即避免由于殖民地增多而要承担的开支和责任。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殖民地，要比英国对于这些岛屿上混乱日益增多的情况更为熟悉，对于其他大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扩张，更加感到害怕，而对于欧洲的问题，则不像英国那么关心。许多澳大利亚人公然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悉尼的约翰·兰牧师写了一本书，极力主张在西南太平洋的大多数岛屿上建立英国的主权；他曾鼓吹说，新

南威尔士的立法会议应该不需要英国的授权，即将斐济兼并。许多澳大利亚人害怕其他国家可能会抢在英国前头采取行动，从而有损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利益；而且，还有许多人深信，这些岛屿上的贸易，需要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对它进行保护，并制止英国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1870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殖民地在墨尔本举行了殖民地联席会议；会议做出决议，赞成把斐济变成一个英国的保护领地。这个决议由驻维多利亚的总督转呈上去。就像斐济自己所提出的请求那样，它被英国殖民部拒绝。殖民大臣还说，他可能支持一项由新南威尔士管理斐济的建议，但是，新南威尔士的内阁，虽然极力主张由英国实行兼并，自己却反对接受任何这样一类的建议。

后来，斐济的政治变动，给斐济摆脱这种局面提供了机会。一个由英国商人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土著政府，经过以前6年中4次尝试失败后，终于在1871年建立起来了。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干涉的必要，给予这个政府——伍兹政府以事实上的承认。这一做法，使得认为兼并实属必要的新南威尔士感到遗憾；英国领事本人就对斐济政府持有敌意；许多移民也反抗它的权威。不断出现的骚乱，威胁着在澳大利亚的利益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椰干和棉花企业。与此同时，在英国的政治中拥有势力的传教士们出来支持，把兼并作为一种保护土著福利、特别是反对滥招劳工的措施；这种滥招劳工措施正在附近的岛屿上激起反对欧洲人的暴乱。到了1873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伍兹政府的软弱无能便逐渐暴露出来；而且，情况如此之糟，因此，虽然这种情况对于殖民扩张特别不利，但是，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在1874年还是派遣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斐济。委员们违反指示，从土著领袖们那里接受了要把领土割让给英国的又一次请求。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更换了，新的保守党内阁最后决定兼并斐济，以此作为唯一手段来恢复一个遭到英国资本和英国人不法行为荼毒的地区的秩序。尽管这些领袖们不愿接受无条件的割让，但是，他们早先提出的请求，在不考虑其条件的情况下被接受了，于是，斐济便在1875年1月2日，成了英国皇家殖民地。

新西兰对待萨摩亚采取了比澳大利亚在斐济问题上所采取的更为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两个地区存在的问题相类似；但是，这里广泛牵涉到德国和美国的利益，因此，要单方面地解决萨摩亚问题是不可能的。德国人占有最大份额的土地，主要用于生产椰干，而萨摩亚是他

们最初向海外发展的场所。新西兰在萨摩亚既无贸易，也无投资；但是，新西兰总理朱利叶斯·沃格尔在1872年提出建议说，萨摩亚应由英国兼并，这对新西兰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并且指出美国打算攫取帕果帕果作为海军港口，以此证明来自竞争国家的危险。他在1874年建议，由新西兰政府创办一个萨摩亚开发公司。他的建议没有获得英国殖民部的赞同。这并没有减少新西兰关于在英国帮助下兼并萨摩亚的兴趣，虽然它的抱负在半个世纪内，一直未能实现。

美国对于萨摩亚感兴趣，并不是沃格尔凭空臆造的。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推销商，获得了萨摩亚最优良的港口帕果帕果的土地权；他在1872年劝说美国海军的米德司令官和当地的一名首领签订一个条约。为了报答美国的保护，这个首领给予美国以独家建立一个海军站的特权。这个条约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但格兰特总统却对这个条约表示认可。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又取得了这个港口周围的土地权，并且劝告当地的首领们请求并入美国。因为总统的兴趣在于保护地，于是，国务卿便秘密地派遣艾伯特·斯坦伯格上校前往萨摩亚，以便汇报情况。斯坦伯格于1873年到达时，受到土著人和外国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全都希望合并。他协助起草了一个建立现代化土著政府的法规。

在美国，就像在英国一样，对于干预萨摩亚的兴趣不大。参议院拒绝了米德所签订的条约；请求合并一事，也遭到拒绝；而且，在国会肯定了不干涉政策的时候，报界也对总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是，斯坦伯格却被允许自费再次前往萨摩亚，带有格兰特总统送给土著首领们的一些礼物；他后来成了萨摩亚国王的首席大臣。他组织了一个相对来说是有效率的政府；这个政府有力量维持和平。但是，它不久就变得不得人心，因为人们指责它太偏向土著人；而且，当他们发现斯坦伯格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时，英国和美国的领事便通过他们对萨摩亚国王的影响，把他驱逐出境了。内战再次爆发，萨摩亚国王也在这次由于反对斯坦伯格而进行的干涉所造成的混乱中被废黜了；而英、美领事的干涉，正像斯坦伯格的活动一样，都是未被授权的。

迄今为止，德国对于个人在海外，在斐济、萨摩亚、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的冒险事业，也不给予官方的支持。但是，在英国人拒绝接受德国人由于英国兼并了斐济而提出的要求时，俾斯麦首相对于这样

对待德国人的利益，开始感到不满。在萨摩亚的一个代表团于1878年前往华盛顿，并在那里谈判一个为割让帕果帕果以报答美国的帮助的条约时，又给德国人造成一个不良的印象；于是，他们派遣了两艘战舰进入萨摩亚的两个港口，帮助他们为自己取得一个有利的条约。英国因而不得不和萨摩亚的一个恰好在1879年居于统治地位的派别，谈判一项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规定，各国领事拥有对本国国民的领事裁判权，以及各国建立海军站和加煤站的权利。德国、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们，还根据他们于1879年签订的一项公约，建立了一个中立地区；他们从而控制了阿皮亚这个重镇。这些步骤并没有解决混乱和内战的问题。事实证明，外国政府带有偏颇的干涉，对于由土著人施行行政管理和改革，都是一种障碍；而且，几个外国分遣部队的出现，虽然维护了萨摩亚名义上的独立，但它却意味着，没有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局势。在土著人中间，内战继续不断，而外国人常常对之积极进行干预。萨摩亚群岛的政治结构，使得土著之间争夺具有无上权力的酋长地位的纷争，为一些支持各个觊觎者的欧洲人，提供了你争我夺的充分机会。

德国政府现在愿意给予居住在萨摩亚的德国国民以支持，这种新的态度，在德国国会中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一项要求准许政府对德国的一个大型公司“哥德弗洛伊父子公司”予以补贴的议案被否决了，因而这家公司不得不迅速改组，以免落入英国的债权人之手。尽管德国的海外移民和官员们之间开始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情绪，但是，德国的政党和舆论，仍然继续反对对殖民地承担义务，因而德国政府也就对英国移民于1880年提出的由英国兼并萨摩亚这个新动议，不表示反对了。而英国外交部则再次得出结论说，兼并将是不适当的。英国人的扩张主义情绪，就像美国人和德国人的那样，由于人民普遍反对在海外承担义务和增加开支，也由于官方不愿承担这项开支或冒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而仍然被局限于很小的范围。

就在这些岛屿发生上述纷争的时候，由于中国政府的衰落，由于日本社会发生了革命，而且由于中国和日本对于欧洲渗透到远东来的担心，中国的边境上也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四周的地方，几乎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些国家。在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1]，统治者们的称号仍然需要由中国的皇帝册封；他们仍然定期派遣使节，携带贡物前往北京，以表示承认中国的上国地位。这些使节提供贸易

的机会，交流情况，加强文化和感情的纽带。但实际上，进贡的国家已经独立，管理着自己的事务。一部分由于这种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对外国向这些毗邻的纳贡国家以及它的守卫不严的边境地区进行的扩张日益感到惊恐，因此，中国认为不得不给予军事援助，提出主权要求，或在那里扩张自己的控制权，徒劳地企图遏止敌对国家。它在北太平洋的动机，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南太平洋上各岛屿的动机一样：它试图抢在其他国家的扩张之前，或制止这些扩张。

另一个最直接有关的国家日本，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注视着欧洲国家和美国朝着日本方向步步扩张。1871年担任外务大臣的副岛种臣认为，如果日本控制了从台湾、琉球到日本、朝鲜这一弧形领土，它就会处于一种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日本就像中国，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设法控制邻近的领土，以便获得有利的防御地位，并且，不让这些领土被竞争对手所染指。日本两翼的这些领土，还可为日本提供一个它可以从那里影响中国和大陆的强有力的地位。

日本政治改革为它控制琉球群岛提供了机会。琉球王一贯向日本萨摩藩的封建领主以及中国的皇帝进贡，虽然这些岛屿实际上是独立的，而且愿意保持这种地位。当日本的中央政府于1871年废除这些封建领地，并把国家改组为几十个县时，琉球名义上被置于天皇统属之下，琉球王在东京被赐予宅第和年金，而和琉球群岛缔有条约的美国、法国和荷兰也被告知说，日本愿意承担条约所引起的义务。通过这种手段，没有遭到反对，日本在这些岛屿上就开始了关于建立现代意义的主权的那个过程。

当琉球的渔民在台湾岛的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因船只失事而被当地土著人杀害的时候，琉球的问题，便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被治理的台湾的问题，牵连在一起了。日本政府中有一派人决定派遣一支讨伐队，前去惩罚这些土著人，并占领他们居住的那部分中国守卫不严的岛屿。驻东京的美国公使把曾经参加美国派往台湾的讨伐队的李仙得介绍给副岛。这位日本外相雇用了他，并且答应一旦日本长期占领该岛，就委派他任将军和总督；而且，在1873年出使中国的时候，还把李仙得一同带去。这次出使的表面目的是交换被长期拖延的中日通商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并祝贺中国皇帝的大婚和登基大典。副岛的真正意图，表明在他给天皇的奏折中：“我将不允许觊觎台湾的外国人阻挠我。我将劝说中国人把这个土著领土让与日本。我们要开发这

块领土并赢得民心。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也许就没有人能够做到了。”但是，他似乎没有讨论过派遣一支讨伐队前往台湾的问题，更不用说取得中国人的同意、由日本占领这个岛屿了。他提出了琉球的问题，但中国官员坚持说，这些岛屿仍然是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之下。

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朝鲜问题又在日本变得特别重要了。与朝鲜的关系日益恶化，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子达到疯狂的程度。说起来，朝鲜人确实比越南人、中国人以及日本人自己更加排外。因此，他们对于日本的改革以及它和外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抱怀疑的态度；而且，他们还认为日本曾经允许法国利用驻扎在日本的部队，于1866年攻打朝鲜一事，耿耿于怀。在日本方面，许多领导人物都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就是，向中国和朝鲜扩张会加强日本，使它不受西方的侵犯。他们采用欧洲的办法和制度，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对外国人的喜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国的控制。此外，日本废除了封建制度，却留下许多过去的武士，这些人没有本领或技能去适应正在缔造中的新社会；而某些政府的领导人物本身，也反对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他们对于这些武士的困难境遇也表示同情。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过去的武士阶级进行军事征服，作为使日本走向富强的手段，而不必急于进行改革。西乡提出他出使朝鲜，并设法使自己在那里被暗杀，以便制造开战的借口。这个对朝鲜进行战争的计划，实际上于1873年获得批准；但是，这项计划的实施，一直推迟到出国考察世界形势的岩仓出使归来。

决定进攻朝鲜的消息，促使岩仓使团匆匆从欧洲回国；岩仓的归来使一场危机急转直下。岩仓使团的成员是另一派的首脑人物；他们认为，鉴于国外列强居于压倒的优势，而日本的财政力量又很薄弱，因此，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不是实际可行的。1873年10月14日，在近代的一次最关键性的决策中，岩仓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大久保利通，在取消进攻朝鲜的问题上获胜。西乡以及包括副岛在内的主战派辞职。这个新政策，就像1870年以后的德国的政策一样，在国外寻求和解，在国内集中全力于统一、发展和改革。

事实证明要取消远征台湾一事是更加困难的。新任外相极力把这次远征向后推迟。美国政府召回美国驻东京公使，因为他鼓励了日本向朝鲜和台湾扩张；它设法不让李仙得这样的美国公民插手其事，并且，不准利用美国的船只。但是，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被任命为

远征台湾的司令官。他继续在扩张主义者极有势力的日本南方，为远征台湾进行准备；而且，尽管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派的主导人物的大久保利通，甚至前往南方试图阻止这次远征，但是，西乡从道还是扬帆而去，行前声称，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可以把他视为海盗。大久保前往中国解决由于西乡的远征所造成的困难。只是在英国驻华公使从中调停后。他才得以在1874年取得了解决办法。他为在台湾被杀害的琉球渔民的家庭取得了一笔恤金，并为这次远征的费用取得了一笔偿金。有了这个解决办法，他才能够在西乡对当地土著居民采取某些无甚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后，说服他撤离台湾。

既然日本在和中国的谈判中，把琉球的渔民说成是它的臣民，它就已经在强化它对琉球拥有所有权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这些岛屿继续成为和中国发生尖锐争端的问题。中国坚称它在这些岛屿享有最高权力，但它却无法证明它的论点。日本终于在1879年把这些岛屿并入它的地方政府体制之内，中国人提出了抗议，但无效果。

日本还成功地在别的地方把它的边疆向前推进，并在那里固定下来。1875年，它和俄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日本放弃了它对北面的库页岛的主权要求，而俄国则承认日本拥有对千岛群岛的所有权。1873年，美国也仿效英国，放弃了它对日本正南面的小笠原群岛的主权要求，使它归于日本。

19世纪80年代中，虽然太平洋地区内的扩张主义势力远没有减弱，可是欧洲各国政府却对这个地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尽管为时短暂，而且尽管只是由于欧洲的情况暂时对英国的对手们有利，因而促使它们和英国抗衡。在远东，就像在非洲的日益尖锐的斗争中一样，俾斯麦的外交胜利（德国、俄国和奥地利重新结成三皇同盟以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使德国的势力得到加强。法国这时是在强有力的总理朱尔·费里的领导下；他深信法国是需要新的殖民地的，他对英国占领埃及感到愤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和德国合作。英国在埃及遇到了难题，而且，在使它的舰队现代化方面进展十分缓慢，因此，法国和德国在第一流的战舰的数目上，可能超过了英国。

由于这些原因，德国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涉及太平洋岛屿上的利益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而且，在冲突发生时，英国总是处于弱

势。纠纷从新几内亚问题开始，新南威尔士几次强烈地提出建议，主张由英国兼并新几内亚的无人提出主权要求的部分。殖民部曾于1875年、1878年，并再次于1882年，拒绝考虑这一建议。1880年后，德国殖民者已经开始开发东北部的海岸，于是，在当地出现了德国殖民者和英国的移民之间的激烈斗争。尽管就在1883年的1月，德国政府已经宣布不承认占领或政治控制新几内亚的任何计划，但在4月4日，昆士兰殖民地宣称它拥有新几内亚的东部。那里的总督在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地的支持下，提出可以支付管理费用。英国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一步骤，认为它是非法的，而且会触犯德国。英国的行动又促使新西兰的议会从萨摩亚着眼，通过了一项联邦法，以便推进“它在太平洋上的未经某一外国占领或在其保护下的岛屿上，建立其统治的步骤，而任何外国占领这些岛屿，则将损害澳大拉西亚的利益”。英国政府表示，英帝国不同意这一法案，因而使之不能生效。于是，昆士兰便提议，召开殖民地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在1883年11月和12月中举行，考虑采取联邦方式，以便对母国政府施加影响，并讨论兼并太平洋上各岛屿的问题。斐济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各个殖民地，均派出代表。会议做出决议说：“任何外国在赤道以南的太平洋上进一步攫取领土，均将严重损害澳大利亚的英国属地的安全和福利，从而也就有害于帝国的利益。”

德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德国的移民，对于所有这一切活动感到惊恐。1884年5月，德国的新几内亚公司组织起来了；该公司的代表设法要在新几内亚取得土地。那里的德国移民于8月20日升起了他们的国旗，他们的要求也受到柏林的支持。德国驻伦敦的大使强烈要求德国获得一个保护领地，以便在新几内亚进行贸易。英国政府为了对付德国的立场，也采取了一种立场。它对英国的各殖民地政府匆忙采取的行动感到遗憾，但是，它不能让德国的主动行动得逞。英国外交大臣通知德国说，英国不反对德国在南太平洋上没有被占领的岛屿上殖民；但是，英国对于与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利害攸关的新几内亚的那个部分，拥有所有权。当欧洲正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德国政府便准许德国的公司采取行动，仿佛这块领土到10月份将属于德国。

澳大利亚人被德国人走向兼并的步骤弄得慌乱起来，英国政府也是这样。但是，伦敦的自由党内阁，由于对俾斯麦现在用大陆联合这个危险来进行威胁感到吃惊，而且，在埃及的债务问题上需要德国的

友谊，因而已经解除了它的防范立场。它在新几内亚不得不做出让步。俾斯麦方面，虽然他对英国坚持反对德国的殖民目的而感到愤怒，可是，他却准备妥协；他过高地估计了在殖民地施加的压力能够迫使英国屈从于他在欧洲的企图的程度，而这种企图对他来说，要比殖民地重要得多。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不把英国逼得太紧。1885年4月6日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确定了英国和德国在西太平洋上势力范围的界线。新几内亚的东北部以及邻近的岛屿属德国的领土，新几内亚的东南部属英国领土，两国相互予以承认。因此，英国确实获得了一些领土，但并不是它的各个殖民地所希冀的全部领土；而且，英国也没有能够防止德国向其各殖民地邻近扩张，而这是它们最害怕的一点。

与此同时，萨摩亚的首领们于1884年11月再次请求由英国或新西兰予以兼并；于是，新西兰要求伦敦准许它兼并萨摩亚和汤加。它还提出要负起对斐济事务的责任。遗憾的是，刚刚达成的英德两国总的解决方案规定，两国均不得干涉汤加和萨摩亚，这一点不能被推翻。其后，英国、德国和美国在1889年签订的《柏林决议书》重申，除美国在帕果享有权利外，萨摩亚应予独立。这些岛屿继续处于三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个制度实际上实行得非常糟。这个制度为两个保护国联合起来反对第三个保护国，提供了很多的机会。通常是英国和美国联合一致来反对德国。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在这些岛屿上的贸易额最大，它总是要求占有优势，而另外两国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反对它的这种要求；但是，这种联合一致，由于英国不愿触犯德国，也由于美国不愿被人视为在与英国合作，因而有所变化。许多美国人甚至对于这种程度的牵连，也不愿意。他们把这个三国保护地看作是第一次、而且是不必要地抛弃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原则，即避免卷入纠缠不清的结盟中去。

至于美国对夏威夷日益感兴趣，并没有出现这种复杂的局面。1875年，美国和夏威夷王签订了一项互惠条约；这项条约给予两国以排他性的贸易特权，并且保证，这些岛屿的独立不受任何第三方的侵犯。这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保证。尽管夏威夷曾在1863年有几个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且英国和法国仍拥有一定的利益，但是，对这个群岛的独立的真正挑战，却是来自美国本身。美国的资金涌进这个岛屿的制糖工业，而且它们的贸易实际上已被美国先行控制。美国于1887年租借了珍珠港作为海军基地。美国的商业优势一直持续到1891

年。丽里奥卡拉尼女王在这一年即位后，曾打算予以抑制。她所进行的努力，迅即得到反应。1893年1月，一个维持治安的临时政府将她废黜，并为夏威夷并入美国开始进行谈判。

本杰明·哈里逊总统的任期只有几个月了。他赞同兼并。但是，在一项条约批准前，他就被格罗弗·克利夫兰取代了。克利夫兰本人承认这个群岛对于美国是重要的。但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他对于整个问题持怀疑态度，而且，对于哈里逊所插手的任何事项，倍加怀疑。他从参议院撤回兼并条约；但是，他无法扭转夏威夷的革命。他终于被迫承认夏威夷的临时政府为永久性的政府。这是兼并的前奏，兼并最后于1898年实现。

与此同时，1882年，另一个欧洲政府开始对中国地区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法国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征服了越南的南部交趾支那；而中部安南，北部东京，仍然保持独立并向中国纳贡。欧洲人后来在东京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由于当时在那里的法国人率先采取了行动。1873年3月，越南的官员曾经设法想要制止法国商人让·迪皮伊非法从东京向中国输出盐。迪皮伊及其一伙175人夺取了河内港口，并向交趾支那总督迪普雷海军上将请求援助。迪普雷当时曾经写道：

“我们在同中国接壤的这个富饶的国家中立定脚跟，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远东统治的前途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巴黎提醒他不要在东京引起国际纠纷，他还是在8月里派遣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前往河内，按他对越南皇帝所说，是要把迪皮伊赶走。当法国的部队看到越南人是多么弱小的时候，他们就占据了东京。当迪普雷于12月被中国的前叛乱首领、被越南人雇佣来维持北部秩序的刘永福的军队所杀时，巴黎坚持自己的权利，并命令从东京撤退。但是，1874年3月15日，法国和中国的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允许法国人在东京的各个贸易港口进行贸易，并保持少量的驻军；同时，为了瓦解与中国的联系，条约还规定，越南在有必要时将向法国请求保护。

1882年，法国政府准许400名兵士秘密加强法国在东京的人数不多的驻军，目的是要剿除那里的海盗。这些军队于4月占据了河内。在前驻越南军官、现任海军与殖民部长若雷吉贝里海军上将的推动下，法国内阁又派遣了3000名兵士前往东京，以便把越南变成一个被保护国。中国政府也派遣军队前往边境，并在那里援助越南人。

1883年年初，中国政府判定战争的风险太大，因此命令李鸿章和法国谈判一个解决办法。5月11日，他和法国公使福祿诺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承认法国在东京的利益，并开放广西和云南两省和法国人通商。李鸿章同意在6月底以前从东京撤回全部中国军队；但是，由于害怕朝廷中主战派的反对，他没有把协定中的这一条款公开。1883年5月19日，李鸿章—福祿诺协定签订仅仅一个星期后，刘永福组成的黑旗军，在河内打败了法国人。北京的主战派因此不准中国的军队撤出东京。法国人派去增援部队，迫使黑旗军撤退，并推进到中国的边界；但是于6月23日，在北丽附近又被击退。法国人由于中国破坏了李鸿章—福祿诺协定，因而要求大量赔款。在主战派的影响下，由于打了胜仗而感到鼓舞，中国拒绝了法国的要求，并对法国宣战。安南王对于中国人的保护感到怀疑，于是在8月25日同意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

1884年三四月间，法国人在东京向前推进，在几次遭遇战中，打败了中国军队；并且，从夏初开始，以舰队对中国沿海进行威胁。中国予以反击。8月间，法国人在福州海面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陈旧的海军舰队。但是，在同一个月里，法国的登陆部队攻击台湾的基隆被击退；而且，尽管法国人在10月间对台湾进行又一次的袭击，并且占领淡水和基隆，但他们没有拿下首府台北，台北抵抗了一次次的攻击，直至战争结束。次年，他们在东京攻下了谅山，并于2月到达了中国的边界。但是，1885年3月23日，他们在那里遭到惨败。到3月29日，中国人重新攻克了谅山，以及在1884年间在东京丧失的全部领土。

法国总理费里由于这些挫败而被赶下台，但是中国并没有能够阻止法国在其邻邦的扩张。尽管中国打了一些胜仗，李鸿章还是在1885年4月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根据这个和约，中国从东京撤出并承认越南（安南）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他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如果让对法战争扩大，种种危险将会接踵而来；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由于日本在朝鲜的活动，而同时受到威胁。

日本已经放弃了它征服朝鲜的计划，但它在1876年设法和朝鲜缔结了江华条约，从而建立了贸易和外交关系。该条约声明，朝鲜是独立的，并开放三个贸易港口；它实际上是仿效两年前法国关于东京问题所缔结的那个条约。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劝说朝鲜接待日本的使团，但这时却不接受这个条约中所暗含的拒绝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而且，朝鲜继续对中国表示忠诚。它甚至派遣一些朝鲜

留学生到兵工厂接受训练；当中国政府把掌管朝鲜事务的权力，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李鸿章手中时，一名朝鲜的代表就常驻在天津。李鸿章的政策是，朝鲜应当和西方大国缔结条约以防范俄国和日本；但他认为：“朝鲜遵循对我朝之一贯礼仪，并不致因与西方大国缔约而有所改变。”正是李鸿章劝说朝鲜人于1882年5月6日与美国人在济物浦^[2]缔结了条约，其后不久，又与英国和德国缔约。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亲华的保守派和亲日的激进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使朝鲜的统治阶级分裂；1882年7月，朝鲜国王之父、前摄政大院君领导下的保守派，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并企图控制首都汉城。日本公使被迫逃走。中国和日本都派遣军队前往恢复和平。中国人抓住了大院君，把他流放到中国，并恢复了秩序。中国的官员在朝鲜人和前往朝鲜试图解决这次争端的日本外相并上馨的谈判中，为朝鲜人出谋划策。在解决争端中，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以及和朝鲜人之间，都自由地进行磋商。中国人要求朝鲜人少做让步，但对最后签订的朝日协定感到满意。根据协定，扩大了日本的贸易和居留特权，并向日本赔款；协定中还商定，中国军队应支持朝鲜的稳健保守分子，而日本公使馆的警卫队，则应保护亲日的激进分子。

日本在取得使用公使馆的警卫队的权利后，即撤军。日本这时采取的政策，目的是要朝鲜独立，以便防止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对它进行统治，从而威胁日本，而不是想要直接统治朝鲜人。即便是日本的冒进分子，也是把朝鲜的独立作为他们的目标。日本的自由派支持最进步的一派，希望朝鲜能够效法日本的榜样进行改革，使自己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中国最近的这次干涉标志着中国对朝鲜采取了比过去几百年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朝廷中的激进派，现在要公开攫取对朝鲜的控制权并进攻日本，以便收复琉球。但是，李鸿章却愿意在汉城派驻一名商务督办，他可以对朝鲜国王提供建议。他反对和日本打仗，理由是必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李鸿章的政策被执行了。他决心增强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并且，不通过战争而使朝鲜免受敌对大国的控制。

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朝鲜的进步派于12月4日和5日发动了另一次政变。日本公使竹添超越他的权限，积极地参与了进步派打算攫取控制权的行动。亲华派的官员逃亡，首相被杀。朝鲜国王被迫向竹添及其公使馆的警卫部队求援。经过两天的迟疑不决后，中国军队与

日本军队交战，捉住了国王，迫使日本人撤退，并重新确立了亲华派的统治。在这次冲突中，由中国人训练的朝鲜人参加了中国的军队，由日本人训练的朝鲜人则参加到日本军队的一边。

日本在解决这次事件时，和朝鲜缔结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条约，尽管这次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爱国情绪的激奋；同时，日本并没有乘机 and 法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从而获得利益。相反，在这个世纪末对日本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伊藤博文前往天津，解决中日两国军队在汉城冲突的争端。1885年4月18日和中国达成协议，规定双方撤军，包括公使馆的警卫部队在内，但两国保持在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重新派兵前往朝鲜的权利。这样做，从战略观点来看，使中日两国处于平等的地位，然而，从政治上来说，中国比它在过去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汉城爆发的这两次牵涉到日本的战端，再加上来自欧洲列强的新的威胁，使得李鸿章有可能在日本的默认下，在这个半岛上扩张中国的势力。

天津条约签订仅仅3个星期后，比起某些欧洲大国来说不那么主张扩张的英国，突然侵占了朝鲜沿海的由两个岛屿组成的港口巨文岛。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英俄两国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爆发了平狄危机。由于可能爆发战争，英国海军部决心占领这个港口，作为海军基地。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英国海军舰只被派往这个港口；当一艘俄国舰艇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中访问这个港口时，那里已经竖起了英国的旗帜。中国驻伦敦公使曾纪泽4月8日就这次占领向英国提出询问。4月26日，他获悉这是一次临时性的占领，以免被另一个大国占领；而且，英国外交部表示，它准备就这一问题和中国达成协议。李鸿章乘机提出英中联盟的建议；但是英国，甚至中国，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中国政府提出的英国应保证朝鲜的独立这个建议，同样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日本驻北京公使提出，由各大国对朝鲜做出国际保证；但是，伦敦还是没有做出反应。然而，从这个时候起，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逐渐达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谅解，它们进行合作，反对它们的共同对手俄国、法国和日本，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时英国背离了中国为止。

几乎是在1885年4月巨文岛被占领的同时，英、俄两国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与此同时，中国和法国的战争以及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告结束。但是，这个地区的紧张状况，由于其

他大国对于俄国的意图的怀疑日益增加，因而仍未消除。自从俄国于1860年攫取满洲北部的领土，并建立符拉迪沃斯托克以来，它的扩张兴趣便转向东亚。由于那里的港口一年中有4个月封冻，因此，俄国人需要一个适于做海军基地的不冻港。朝鲜有优良的港口。俄国曾经在1861年甚至侵占了朝鲜南面沿海的日本的对马岛，一直到英国的海军舰只提出警告才离去。俄国现在对中国施加压力，对朝鲜人以提供援助作为诱饵，并且威胁要占领朝鲜的口岸，作为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一事的报复。同时，它又为共同保证朝鲜的独立，开始与李鸿章谈判。但是，由于中国人未能领会国际保证的价值，因而错失良机。俄国人坚持维持朝鲜的现状并做出一种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政权只有在在大国共同取得一致意见时，才得以变动。李鸿章害怕由于实际上是使这个半岛中立化的安排，将会使中国失去在朝鲜采取行动的自由。于是，这个问题便没有再谈判下去。

英国在得到俄国于1886年年底表示它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的保证后，便从巨文岛撤退。于是，中国人就积极地干预这个国家的事务，反对朝鲜国王向国外派出代表和偿清它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企图。中国代之以提供贷款，并取得对朝鲜的海关、电报的控制权作为抵押。中国通过这些措施，成功地扩大了它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并排斥了任何其他对手。它是在日本的默认下这样做的；这个国家成了中日两国共同的被保护国。但是，俄国扩张的危险仍然存在。李鸿章做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作战力量；但是，他依靠的只是他自己那个省的资源，其他各省都不愿向这个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提供资财。为了对抗俄国的扩张，英国向李鸿章提供顾问，协助他创建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并在满洲的旅顺口建立一个陆海军军事设施。1890年，李鸿章秘密地派遣一名英国工程师，前往调查一条向北直抵俄国边境的铁路路线。这件事情被俄国发觉了。这个警报促使圣彼得堡执行一个建造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计划；这条铁路的修建于1891年开始。其结果，俄国的力量必然会得到加强，这就使得中日两国的领导人物深感不安；他们开始感到，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便防患于未然。

日本这时的地位，由于20年来在国内取得的进展，和中国的地位大不相同了。通过国内的发展而加强国力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现代化的法律和法庭以及议会，都在发挥作用；一个现代化

的教育体制已经建立；日本得以修订它和各大国所签订的条约，废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以及妨碍其他东方国家的固定关税。除海军外，又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实行征兵制的陆军。这些进展使得人们对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的信心大增；而日本的领袖们曾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20年的辛勤努力。与此同时，对于这种迅速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后果表示不满的议会和各政党，提出了批评，特别对于迄今一直奉行的软弱和平的外交政策，更为不满。

在朝鲜的东学党要求结束政府的腐败无能，因而在朝鲜问题上出现新的危机时，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日本的状况，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这个党是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和反日的；他们寄希望于敌视现代革新、特别是西方式革新的朝鲜的保守主义。东学党人在朝鲜的许多省中掌握了控制权，并且打败了政府派往镇压他们的军队。朝鲜国王请求中国派军队前往镇压这次叛乱。李鸿章认为日本政府专心致志于国内事务，无暇顾及朝鲜，于是就派出军队。甚至中国驻东京的公使，看到议会中汹涌的政治纷争，也认为日本不可能采取行动。但是，日本这时反对朝鲜的情绪十分强烈：朝鲜曾经打算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而且，一名亲日的朝鲜进步分子金玉均又被杀害。当时的形势与1873年的形势相似。因此，日本的领袖们就像1882年和1884年两次不那么紧张的状况下的做法一样，立即派出军队；这样做，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日本军队到达朝鲜时，东学党人已经散去。中国军队留驻在毗邻中国边境的牙山，以避免发生任何冲突。日本的领袖们乘日本军队仍然留驻在当地的机会，想要在经过多年的毫无结果的努力后，强行要求解决棘手的朝鲜问题。由于日本迅速进行干涉而感到惊慌的李鸿章和中国朝廷，要求日本同时撤军，因为叛乱看来已经结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决定不撤兵，但却坚持要求，两国应共同实现朝鲜的内部改革。这样做实际上就会把朝鲜置于两国共管之下，从而结束中国单独自由支配朝鲜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并不打算接受日本的要求。中国常驻汉城的官员、性情直率的袁世凯，要求中国军队向前推进，并从中国派来增援部队。李鸿章要求日本撤兵，因为日本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它就不得干涉朝鲜的内政。李鸿章希望俄国进行干预。日本继续占领汉城，并宣称它要独自改革朝鲜。当日本把中国的官员赶出汉城的时候，李鸿章要求派出援军前往平壤。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

击沉了一艘中国的运兵船。7月29日，日本军队攻击并打垮了中国集结驻扎在朝鲜西海岸的5000名军队。日本于8月1日宣战。

中国人派出军队增援他们在朝鲜的军队，兵力达到13000人；但是，邻近朝鲜的满洲各省已经无力派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做从中国派出更多兵力的准备。此外，由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打败了中国的一支海军舰队，日本取得了制海权。这就使得中国人不可能利用这个唯一的交通捷径。在这次海战发生的两天前，日本陆军在平壤（北朝鲜的首都）前方，对人数少于他们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把他们打败，并把他们赶回中国的边界鸭绿江。在10月和11月间，日本人继续向前推进，进入南满，打了许多胜仗。11月21日，他们攻克了那条海岸线上最优良的港口旅顺。1895年2月，中国舰队的残余力量在威海卫被摧毁，这个港口也被攻占；3月间，日本在条约口岸牛庄附近的营口取得胜利后，对南满的征服就大功告成。

日本为了安慰英国和俄国，就向他们保证日本不会夺取朝鲜的领土：只是进行改革，不会实行日本的控制。英国最初以为，中国将会轻而易举地打胜；但是，当中国一触即溃，因而对实力均衡造成危险时，它就向几个大国建议，共同进行干涉。虽然俄国赞同，但德国和美国表示拒绝。英国内阁于是得出结论，中国过分无能，通过外交努力对它进行援助将是无用的。英国的舆论也不愿帮助中国。但是，正当英国撤回它的建议时，俄国于1895年的2月和3月，向法国和德国建议进行合作，以确保朝鲜的独立和完整。德国迟疑不决；它恐怕中国将被瓜分，于是，就探询英国是否会支持它获得长江口外的舟山群岛。但是，它最后赞同俄国的建议。这就发展成为欧洲三大国的联合；这个联合后来证明对于日本和英国的利益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在1895年4月的和平谈判中，日本坚持朝鲜实现完全的独立，并要求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包括旅顺口在内的满洲的南端一角，割让与日本。它对大陆领土的要求，超过了20年前副岛的政策。赔款，开放新的港口，在长江上自由航行，以及在中国开办工厂的权利，都包括在和平条款以内。一个包括这些条款在内的条约，于4月17日在日本的马关由李鸿章签了字。英国对于这些条件感到满意：日本所获得的新的商业特权，将会自然而然地给予其他的大国；对于俄国的野心，日本乃是一个比中国更为有力的阻碍。同时，朝鲜行将完全独立并摆脱俄国的羁绊。但是，俄国在西伯利亚铁路筑成前，尚无力夺取中国的

领土；法国自1892年到1894年间谈判法俄条约以来，一直是俄国的盟国；而德国唯恐不这样做就会在瓜分中国时没有它的份，于是就联合起来，一道“欢迎”日本放弃南满。如果日本拒绝，俄国就准备轰击日本的港口，从而就可以以中国的救世主自居。

俄国、法国和德国于4月23日发出照会。5月1日，日本提出归还除旅顺口以外的全部领土；但是，5月5日日本完全屈服。它同意在条约批准并能获得一笔数字更大的赔款后，归还它所占领的全部大陆领土。这个条约于5月8日，在卸下炮衣准备开火的俄国舰队的炮口下，在芝罘交换了批准书。

中国的三个朋友，在争取给予中国贷款以便偿还日本的赔款的机会上，发生了纠纷。中国与伦敦和柏林的银行家们的谈判开始了。法国唯恐被遗漏，表示愿意提供可供选择的款项；而俄国则同意向它们提供政府保证表示支持。中国接受了这些建议，并于7月6日，与俄国达成一项协议，同意另外再提供抵押以防拖欠。同时，还同意在不给予俄国以监督并管理它的税收的权利的情况下，也绝不给予任何国家以同样的权利。因此，俄国取得了一种优惠的地位。这就标志着它在中国享有优越地位的开端。德国由于它的银行家们在进行一项有利可图的贷款中受到排挤而感到不满；但是，它欢迎俄国不过问欧洲的事务而转向远东，因此，它没有提出什么抗议。

日本保住了它的胜利的某些果实，它取得了台湾、澎湖列岛，并且摧毁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但是，它却未能向大陆扩张；而这时，中国的软弱已经暴露无遗，再加上最近的法俄联盟对国际结盟的影响，都促使欧洲的列强起而争夺中国的财富和领土。对中国的争夺的特点是取得势力范围——在这个地区内，外国列强获得了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和开办电报业务的特许权，取得了贸易的优越地位，以及建立海军基地和进行商业活动的租借地。法国是头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国家。早在1895年6月20日，法国就强迫中国接受涉及东京的一个边境纠纷解决方案。三个进行贸易的新边境站开放了，中国的关税也降低了。中国同意在开发三个邻近省份的矿藏时，首先向法国申请给予帮助。后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法国将把铁路和电信延展到中国境内。

英国拥有华南贸易的大部分，并拥有势力，因而受到法国行动的威胁最大；但是，它也有着与之抗衡的优越地位。在法国采取上述行动后，它就立即和法国单独进行谈判，做出一项安排。根据这项安排，两国一致同意分享在华南各省所取得的任何特权。1896年2月，英国使中国同意英国对它提出的关于中国和缅甸之间边界的建议。它也取得了把一条铁路从缅甸延伸到中国境内的权利。这是作为中国对法国让步的补偿。法国于是又要求对英国的补偿进行补偿；1897年6月，它取得了延伸它在中国境内的铁路并优先开采华南各省的矿藏的权利。它提出这些要求的同时，还威胁要停止向中国支付作为对日赔款的贷款。

1896年4月6日，俄国提出了在北满修筑铁路的权利这一极重要的要求。它需要让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有一条更加直接的线路。由于这是一条中国人愿意自己修筑的线路，因此，在李鸿章前往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俄国向他提出结成联盟。于是，便在1896年6月3日，签订了一个在朝鲜以及其他领土上抵御日本的秘密防御联盟；对此作为回报，中国同意这条铁路应由华俄道胜银行修筑，租期为80年，虽然中国保留在36年后将其购回的权利。于是，华俄道胜银行和中国政府便组织了一个所谓私营的中东铁路公司。虽然有一些中国人在其中充当职员，但他们并不起什么作用：这个银行的股份全部归俄国政府所有，它不过是俄国用来逐步控制中国北部的一个工具。

日本对于朝鲜的局势并不满意，它也决定要和俄国达成协议。它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把朝鲜分成为俄国的和日本的势力范围。1896年6月9日达成一项协定（山县一洛巴诺夫协定），实际上把朝鲜变成了两国共管的保护国。无论是俄国或是日本，都感觉到在朝鲜问题上自己的力量不是强大到可以得罪另一方。它们保证共同支持朝鲜国王，使他能够稳定秩序，建立他的军队和警察，避免财政的崩溃。他们放弃在朝鲜采取单独行动，并且一致同意在必要时派遣军队进入该国的问题上所做的安排。因此，这两个国家暂时保证，任何一国均不得在朝鲜攫取领土，虽然日本可以自由地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商业渗透，而俄国在更北的地区，则早已可以自由地进行发展了。

中国和朝鲜得到保障不致受到日本的侵犯；但是，谁也没有保障中国不受俄国、法国或英国的侵犯；这3个国家在北方、南方和中部的各个势力范围内的工商业渗透，早已开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保障中

国不受德国的侵犯。德国的要求现在已经揭开了争夺的第二阶段。德国皇帝迫切需要获得一个海军和商业的基地，因为德国在远东的煤炭和物资供应，是依赖于英属香港的。1897年8月，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德国皇帝亲自和沙皇商谈德国租借山东的胶州港口的问题。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强盗杀害。德国派遣一个海军舰队前往胶州，将其占领，并且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这位皇帝宣称，他“坚决要放弃在整个东亚被人认为是软弱的那种过分谨慎的政策；并且要以严厉的态度，必要时，还要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中国人，以此来表明，对德国的皇帝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俄国人对德国的行动提出了强硬的抗议。另一方面，英国由于德国准备对它让步以换取支持，不仅不反对德国的这一步骤，而且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以外的华北进行竞争，感到高兴。俄国人支持中国人抗拒德国的要求；但是，这一年年底，他们另有打算，便抛弃了中国人。1898年3月，德国获得了胶州湾这个租借地，为期99年；它在那里不久便建立了青岛这个重要的陆海军基地。尽管规定不明确，德国拥有在全省修筑铁路和开采矿藏的广泛权利：这就在实际上把山东变成了一个德国的保护地。

当德国人在胶州问题上表示决不退让的态度时，俄国舰队准备反对这一占领的命令便撤销了。俄国另行采取的政策是，在中国北方为它自己寻求一个不冻港口。它在采取这一行动前迟疑不决，一方面唯恐由此而造成对中国的瓜分，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招致英国和日本的反对。英国和日本反对俄国控制朝鲜的任何一个港口，因为它们害怕，这样将会使俄国的海军在东亚占优势。于是，一个由9艘英国巡洋舰和一些日本舰艇组成的海军舰队被派往朝鲜，着重表示它们反对这一方面的任何举动。日本也开始实行一个将于1904年完成的扩充海军的计划；俄国驻东京的公使报告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和俄国作战。这些危险造成了俄国政府中的分歧。俄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伯爵极力主张，夺取仅在两年前从那里把日本人赶走的满洲南端的旅顺口；俄国的其他大臣全都反对。财政大臣维特认为，在中国和俄国关系如此友好的时候，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相反，他仍然认为，应当把德国人从胶州赶走。可是，穆拉维约夫设法说服了沙皇，沙皇于1897年12月14日对德国皇帝说，一支俄国海军舰队应中国人的邀请，将“暂时地”在旅顺口停泊；他还表示，希望俄国和德国将在远东进

行合作。这一决定表示俄国放弃了保护中国领土的政策，而宁愿参加到瓜分中国领土的争夺战中去。

当中国向俄国要求贷款，以便支付第三批对日赔款时，俄国要求中国将黄海上一个港口租借给俄国，以便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换言之，俄国要求一个港口和通往满州沿海的连接线。这正是它曾经迫使日本放弃的那块领土。中国转而向英国请求贷款，企图避开这种压力。英国要求获得能够使它在华南对抗法国并保障英国在华中的势力范围的种种权利，以报答它的支持。两弊相权取其轻，于是，由英国汇丰银行提供贷款，中国则给予英国以某种特许权。

英国政府对于俄国在北方渗透所造成的威胁，感到惊慌。它希望以合作来抵消这种渗透，于是，就和俄国展开了谈判。为了使它能够毫无阻碍地插手整个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它需要获得在俄国任何新建立的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经商机会的保证。俄国拒绝在这一点上给以充分的保证；不仅如此，又于1898年3月3日，向中国要求旅顺口、大连和修筑铁路的权利，从而给英俄关系带来一场危机。英国向美国、德国和日本建议共同提出抗议，反对租借旅顺口。3月17日，英国向日本驻伦敦公使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加藤高明向本国政府建议缔结一个联盟。这个建议遭到拒绝，于是，加藤便辞职表示抗议，因为日本首相和英国人一样，只要有可能，情愿和俄国达成协议。4月25日，日本和俄国签订了西罗申协定^[3]；协定重申两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干预朝鲜，而日本在经济上可以自由行事。由于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做了稍许让步，日本就对俄国在满洲的渗透表示默认。从日本方面来说，它不愿看到俄国的势力有任何的扩大；但是，日本首相认为，到一定的时候，和俄国之战在所难免，而在军事准备就绪和德法两国支持俄国的可能性减少以前，目前的这种安排是可取的。

俄国占领旅顺口时，英国已经于1月间派遣战舰前往那里；俄国的占领在英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抗议。有几个星期，冲突似乎可能爆发。但是，在传说李鸿章及其他谈判代表已在让步时（中国于3月11日同意把旅顺口租借给俄国），英国政府决定，为旅顺口问题而打仗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因为德国和美国政府已经证明和日本一样，都不愿进行合作。英国转而要求租借山东的一个与旅顺口隔海相望的港口威海卫。日本人自1894年的战争以后就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它愿意把它交给英国；英国向日本和德国保证，这个地方不会用来反

对它们。结果，它对俄国的行动的反应，就像俄国对德国的行动的反应一模一样。其他大国也不愿被排除在外。法国要求一个加煤站；坚决要求中国保证不会把华南的法国势力范围中的各省，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求进一步获得修筑铁路的权利。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法国于1898年4月22日，获得了南方的广州湾。1899年，意大利人要求得到浙江的三门湾。但是，这时的中国的态度有了改变。意大利的要求被拒绝了。意大利以战争相威胁，并且召回了它的公使。但是，中国的态度坚决，三门湾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国的争夺所以产生，是由于唯恐好处会被竞相掠夺中国的国家夺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1898年5月4日在阿尔伯特纪念堂发表的那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的演说”中，把激励着各大国的那种精神描述得非常好；他说，“那些生气勃勃的国家将逐步蚕食那些死气沉沉的国家，而文明国家间的冲突的开端将迅速出现。诚然，这并不是说，要让这些生气勃勃的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来垄断有利可图的对这些不幸的病患者的生杀大权；而发生争论的是，究竟由谁拥有这样做的特权，以及它采取什么手段这样做”。

美国政府由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的结果，对在远东的扩张也开始愈来愈多地表示支持。美国的移民多年来一直强烈要求兼并夏威夷；现在，由于对西班牙的战争，而且，因为日本的移民愈来愈多，就使得夏威夷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很可能丢失；于是，1898年7月6日，夏威夷被兼并了。

1898年5月1日，美国人在马尼拉湾打败了西班牙的舰队；而西班牙的战败引起了它的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德国希望获得这些殖民地。英国就像一贯反对德国的扩张那样，极力要求美国自己取得菲律宾。英国的这个主张，由于德国向马尼拉派遣了一个海军舰队而变得更为有力，因为这就使得德国和美国之间产生恶感。德国政府最初希望取得一个德国的被保护地，后来又希望使菲律宾保持中立，或者把它瓜分。美国对于德国舰只的出现，怀有强烈的敌意。这就加强了美国自己取得菲律宾群岛的决心，改变了它早先的迟疑不决的态度。而且，一反先前只是取得吕宋岛的决定，最后决定要占有全部岛屿。这些岛屿，除了使美国在太平洋上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外，还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靠近中国并和它进行有价值的贸易的领地基地。欧洲列强已经有了这种基地；很明显，它们和日本将要争夺任何尚未被牢固地占据的

地区。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根据类似的理由，美国还使西班牙认可它占有有关岛的权利。

德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它根据1898年9月和12月间与西班牙签订的秘密协定，购得了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帛琉群岛；这是一些荒芜不毛的小岛，可以作为海军站和加煤站。但是，它对菲律宾的结果，而且对它和英国关于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的协议的结果，都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在萨摩亚问题重新提出时，它就更加下定决心，要攫取领土。几经废黜、几经复辟的萨摩亚王于1898年去世，内战重新爆发。萨摩亚的美国人首席法官，由于他对萨摩亚王的继承人的选择，使他处境危险，于是他便逃到一艘英国战舰上去。1899年年初，一艘英国舰只运来陆战队登陆，以支持受到美国保护的土著人。1899年3月，一位美国海军上将抵达萨摩亚，他干预当地的政治。这又引起了新的暴乱。在骚乱的过程中，美国和英国的舰只破坏了德国的领事馆。这些事件使德国感到愤怒。它愈来愈下定决心，坚决要求实行它在1898年8月就已提出的瓜分萨摩亚群岛的建议。这些建议本来要求把两个岛屿归美国，两个给德国，汤加归英国人。英国强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反对，因而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1899年5月，在德国的压力下，而且由于英德关系日益恶化，英国同意三个保护国派遣专员前往萨摩亚。后来，部分由于英国在布尔共和国的问题上困难重重，它就倾向于采取一种能使德国感到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萨摩亚问题，然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反对德国的扩张，这就使英国难以和德国成交；而德国认为，对于一个本来是它首先殖民而且利益最大的地方，它却不得不要经过一番奋斗，因此，仍然感到很不痛快。1899年11月1日达成了最后的协议。德国获得了乌波卢这个主要岛屿和萨瓦伊岛。英国得到了汤加和萨维基，小所罗门群岛以及非洲多哥的一个有争端的地区。美国则取得了萨摩亚的两个它感兴趣的岛屿。

在中国，尽管政府抵制了意大利的要求，但是，外国进一步攫取权利的斗争并未停止。以华俄银行做后台的一个法一比辛迪加，在华中的英国势力范围内取得了修筑铁路的权利；一家英国银行也取得了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利。为了补偿俄国的势力从财政上侵入华中，英国通过威胁以及用海军显示力量的办法，也从中国取得了另外一些修筑铁路的权利。但是，由于英俄两国的利益日益发生冲突，两国终于

在1899年签订了一个协定，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不支持其他强国进入这些势力范围。俄国还做不到答应给予所有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以平等的经商机会，英国本来希望俄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英国愿意在自己的地盘内给予这种机会。

美国的商界已经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某些特许权。但是，他们还无法利用这些特许权，主要因为美国不愿在中国投资，而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自己直接牵涉到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因此，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要求英国、德国和俄国答应，在它们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在税收、铁路运费和港口费上对外商要平等对待。这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实行新政策的开端。这种要求和英国的在商业上保持“门户开放”的政策是一致的，是特别针对俄国的；美国政府开始害怕美国的商业利益在满洲会被排挤或受到歧视。英国过去曾经徒劳地提出过建议，要求俄国和美国支持这样一种政策。约翰·海在11月间又要求日本、意大利和法国赞助平等对待的原则。所有收到约翰·海的建议的政府，都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是，俄国的答复事实上是躲躲闪闪，避免对商业上平等对待的原则表示同意。美国使中国中立的直接效果是微小的，虽然这种企图后来得到了各主要大国的支持。约翰·海的行动表明，在中国的竞争已经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他打算找出某种通过合作来阻止吞并中国的方法，却为时过早。

与此同时，中国把日本看作一个努力自救、免遭欧洲侵略的榜样。它派出许多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因此，当日本对北京的影响增加时，俄国的影响就暂时削弱了。但是，俄国的扩张主义分子仍然在忙碌着。他们希望在朝鲜取得一个良好的阵地，这样他们就不会像在旅顺口附近为英国人所阻那样，受到阻遏；而且，他们可以在那里控制通往日本和华北的通道。1898年，俄国的一伙外交官员、银行家和商界人士组成了一个“东亚公司”，制订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计划，打算根据一项开发木材的特许权，把两万名军队乔装扮作伐木工人，偷偷地送入朝鲜境内。沙皇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为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所阻拦，他拒绝支付必要的贷款。俄国的海军当局于是设法要在朝鲜南端的马山浦弄到一个基地。尽管俄国进行威胁，但是，朝鲜人在日本的支持下，在1899年的秋天拒绝了这个要求。1900年3月16日，俄国的一支海军舰队在朝鲜的首都附近停泊，并劝诱朝鲜国王

同意它在马山浦建立一个加煤站和一所海军医院。这就造成了俄国同英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无论日本，或是俄国，这个时候都不准备打仗。当日本获悉租借马山浦的性质极为有限时，它决定不向俄国挑战。

1900年秋天，中国的义和团叛乱爆发后，虽然俄国政府曾经决定不夺取满洲和华北，但是，当俄国在满洲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受到中国人的袭击时，它就占领了满洲。不大主张扩张的那些俄国领导人，建议不要为援救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而采取行动。但是，终于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而俄国政府中的其他分子，则希望利用它来乘机控制北京附近的地区。各国使团一得到解救，俄国马上提出建议，各国派往北京的远征联军应立即撤退。包括维特在内的一些俄国人极力主张从北京全面撤军，希望从而可以阻止全面瓜分中国。其他一些人所以支持这个建议，是因为国际部队的存在将会阻碍他们在北京地区的计划。还有一些人至少希望利用这个建议作为一种手段，将来在解决问题时，可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英国和德国对于这个建议感到惊慌：在它们看来，这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劝说中国人把满洲奉送给俄国，以报答它使外国人离开了北京。

英国和德国也害怕瓜分中国。它们于1900年10月16日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它们将“尽它们力所能及地施加影响”，支持所有国家在中国全境享有贸易上的平等机会；而且，根据这一协定，它们自己将不寻求占有领土。英国希望，这将使它确保取得德国的支持以对付俄国。但是，德国在谈判这个协定的过程中，确实曾拒绝在满洲问题上使它自己承担义务；因此，它对俄国说，这个协定并不包括满洲，俄国政府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德国所焦虑的，主要是要防止英国利用这一危机来进一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它才签订了这个协定。

俄国已经在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在满洲和毗邻俄国的中国其他地区内，取得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地位。1901年2月8日，一份协定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协定草案规定，中国将恢复它的行政管理，但准许俄国军队留驻，给予俄国以新的筑路权并对俄国的各种费用给予补偿。甚至在这个协定草案送交中国以前，日本的外务大臣就曾要求英国和日本一道就此向俄国提出抗议。但是，他没有成功。2月，他建议英国和日本应该联合起来向中国提出警告，反对签订这个

协定。英国担心，如对日本的建议置之不理，日本最后将会和俄国达成协议，瓜分中国；但是，它也不愿得罪俄国。因此，它就打算寻求德国同它和日本合作来反对俄国。德国和英国，日本一道向北京提出照会；但是，它们不肯进一步采取行动。俄国人对于这一步骤置之不理，逼迫中国人于2月底签字。日本对攻击俄国一事迟疑不决，因为法国的舰队可能支持俄国。所以，它又寻求英国的支持，询问一旦俄日战争开始，英国是否会牵制法国。

德国希望英国会对日本承担这一义务，从而就会深深地陷入和法国与俄国的纠纷之中。这样它就需要和德国联盟。一些年来，德国一直希望根据它自己的条件结成这种联盟，其中包括要求在英国令人十分恼火地垄断着的海外领地中享有一个较大的份额。在英国和日本再一次要求之下，它答应一旦东亚爆发战争，它将保持中立；但它拒绝支持英国关于在满洲贸易机会均等，即“门户开放”的要求。这就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德国在一年以前，似乎同英国一起肯定地表示过对在中国保持“门户开放”政策感兴趣。英国政府为德国的这一态度所困扰，因而一直踌躇不前。日本人于4月6日单独向俄国提出强烈的抗议。俄国人便减少了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准许中国在满洲驻扎一部分军队，以换取更多的赔款，并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取得特殊势力范围的要求。李鸿章倾向于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其他总督们的反对下，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请求外国列强的援助。英国和日本再一次警告中国不得与俄国签订协定。这样一来，俄国便撤回了它的要求，并坚持说，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只是提出暂时安排的建议。

满洲的危机暂告结束；但是，由于俄国仍然占领着满洲，对于其他列强来说，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缔结英日同盟的背景。英国和日本于1901年7月在伦敦又一次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是，一直到10月才开始认真地谈判，而即使到那时，又遇到了耽搁。英国希望协定的范围把印度包括在内；但是，日本坚持这个协定只适用于“极东”^[4]。另一个困难是，一方面，英国需要保证它不会被卷入与它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俄日争端中去，而另一方面，日本却需要确切地获得英国的支持，以实现它在朝鲜的野心。而且，每一方都在犹豫不决，究竟是和俄国达成协议为好，还是两国之间取得协议为宜。但是，它们终于达成协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共同保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

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两国的商业和贸易中机会均等；条文的词句表示，日本在朝鲜可以自由行事，但另一方面，在那里不受到不适当的鼓励。此外，每一方允诺，在另一方卷入与第三方的战争时，要保持中立，如果另一国家在冲突中站在反对另一方的一边，则将给予另一方以援助。

这个协定对于英国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排除了在损害英国利益的情况下，日俄合作瓜分中国的危险。这个协定还起着保护中国的作用。在日本方面，协定保障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它主要关心的是，不应让俄国进入朝鲜，以免使它可以控制东亚并威胁日本。日本甚至一直愿意让俄国可以在满洲和邻近的中国其他地区中自由行事，只要允许它自己控制朝鲜。俄日谈判成为泡影，因为俄国一直不愿走得很远。一旦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俄国就要夺取朝鲜，不管日本反对与否。但是，由于有了英日同盟，日本充满了信心，它可以对付俄国的任何举动了。

俄国和法国获悉这个新的同盟后，既感到惊讶，也感到不愉快。对俄国的影响立竿见影。它宣布，它愿意从满洲撤退，但要求中国和俄华银行另行取得协议，并给予特殊的让步。2月11日，中国人由于美国提出抗议并在这个新的同盟的消息的鼓舞下，拒绝与俄华银行取得协议。2月13日，英国政府在议会中声明，满洲并不排除在这个新同盟的范围之外。虽然日本和英国无意在满洲问题上卷入一场战争中去，但在技术上说来，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而俄国人必然获得了深刻的印象。4月8日，他们终于从满洲撤退。他们尽管做了那么多努力，却一无所得。

英日同盟就这样结束了满洲的危机；而且也结束了（如果说，只不过是暂时地）特别是1894年以来欧洲各国政府以及日本和美国投身其中的、在远东愈演愈烈的竞争过程。

（丁钟华 译）

[1] 直到最近，通常称为安南，或包括在称为印度支那的地区之内。“越南”这个名称，当地人民自古以来就已用之，这是这个国家的最精确、含义最广泛的名称。这个国家的分裂，包括安南在内，参见本卷原书第650页。

[2] 即今仁川。——译者

[3] 西是指当时日本外相西德三郎。——译者

[\[4\]](#) “极东”即远东。——译者

第二十四章 美国与旧世界^[1]

到南北战争时，美国第一阶段的扩张行动已告结束。“天定命运论”最明显的目的业已达到，美国的边疆按理说已经是令人满意的了。美国领土横亘于两大洋之间。它北邻加拿大，也可以说，这块土地总有一天必然会落入美国的怀抱，但急于得到它，对美国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南边毗连的墨西哥，土地干旱贫瘠，无人愿意染指。当地居民的种族、语言、宗教和传统，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美国本身尚有足够的土地，精力充沛的人民大有用武之地。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天定命运论”和西部的诱惑就已经不是激励扩张的唯一动力了。南北双方为控制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来源而展开竞争，这在决定迅速向太平洋扩张方面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真正的扩张主义者曾希望借助于帝国的美梦，来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地区之间的争执上转移开。他们虽然未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也没有妨碍这种争执本身转变成竞争。当南北战争的胜败分晓时，扩张的最明显的目标已经达到，促使人们扩张的最迫切的动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说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没有什么因素使得人们对外交发生兴趣，那么，在外部世界也同样没有这样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30年间，引起欧洲列强注意的是欧洲的事务。在那些年，欧洲各帝国的版图大大增加，而到了这时，一些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它们所受到的注意形成了反比。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怪事。当竞争激烈时，宣传报道非常之多，而收获却寥寥无几。帝国的缔造者们总是在无人注意的荫蔽的情况下攫取利益的。西半球已再无可供殖民的地区，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美国的敌对立场以外，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已十分发达，以致在那里推行帝国主义成为一种要求耗费国家相当多的人力物力的事情。这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但欧洲各国政府正专心致志于欧洲事务，无法考虑这种要求。法国对墨西哥的干涉草草收场，其所以如此，与其说是由于美国的反对，不如说是由于在欧洲无法脱身；在这以后，美国的门罗主义原则就没有受到哪怕是最温和的挑战了。门罗主义最初是门罗总统在1823年提出的，主要包括两点：一是

不能再把西半球看成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区；二是欧洲对美洲的干涉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行动；另外，美国也宣称它无意参与任何欧洲事务。可以表明这一特征的是俄国的态度，它不仅愿意，而且急于放弃阿拉斯加，在1867年以仅仅700万美元的可笑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了美国。而美国买这块土地的热情，显然不如俄国卖这块土地的热情高。人们根据谈判这笔买卖的安德鲁·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的名字，把这块土地称为“西沃德的冰箱”，普遍认为这笔生意是不合算的。美国人漫不经心地就获得了他们最大的利益，真可谓帝国扩张的典型。

随后，美国进入了这样的时期：国内的发展吸引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外交则很少受人注意。北方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统治地位，使国家统一起来，虽然在开始时还是表面的，但多年来还未曾有过这样有效的统一。美国的实力增长了一——这确是惊人增长的年代——因而使得美国人在一个列强专注于欧洲事务而美国人专注于美洲事务的时代，得以信心十足。但是，美国人所以能有这样的信心，主要还是由于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产生这种信心的条件。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以在南北美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而在南北美洲，他们长期居于领导国的地位。他们能够在西半球的范围内奉行自己的政策，并创造自己的政治奇迹，这是他们的极大的幸运。

必要的条件是在欧洲存在着几个大致势均力敌的大国。如果不是就实际的军事力量，而是就潜力而言，美国已可跻身于列强之列；但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欧洲所起的作用，比不上可以同它匹敌的那些国家。那时欧洲列强的阵营还没有固定，任何集团还没有必要把美国拉入欧洲事务，而在别处向美国提出挑战，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不明智的。

在这些年里，美国和欧洲列强虽然并非没有往来，但美国扩张的趋势首先是指向西方——即太平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同远东接触从来没有感到往往由于欧洲的“腐败”所引起的那种反感。扩张总是意味着向西扩张。“天定命运论”的神话的一个强有力的要素，便是认为美国连接着东方和西方，居于贸易中心的理想地位。早在1844年，美国就与中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1853年，是美国人佩里打开了日本同西方通商的大门。但有很长一个时期，美国即使在远东也抱着它对英国所抱的那种信念：贸易是不受政府干涉的事。对西沃德国

务卿来说，购买阿拉斯加是更大的设想的一部分。人们对他此举漠然置之，说明这个更大的设想是如何不为人们所理解。

美国攫取属地的这些最初的事业，当然只会使美国人信心倍增。对夏威夷的统治以及最终于1898年将它吞并，没有遭到欧洲的干涉。在萨摩亚，虽然欧洲列强直接参与了争夺，但相对来说，美国付出的代价不大，竞争也比较缓和（参看第二十三章）。在其他地方，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与欧洲直接角逐。

而与此同时，和南美的关系则日渐亲密。1881年在加菲尔德总统手下和1889年至1892年间在哈里逊总统手下两次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是后来被称为泛美主义的思想的主要鼓吹者。他本人虽是一个坚定的保护贸易主义者，但他看到保护政策正损害着美国在南美的影响。南美国家主要还是原材料生产国，它们把大部分产品——咖啡、糖、皮革、羊毛等——出售给美国。然而，它们发现去欧洲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制成品较为便宜。贸易格局变得不正常，随着欧洲对拉美贸易额的上升，布莱恩担心欧洲的影响也将会增强。他提出的补救措施是建立美洲关税同盟，在这个同盟中，美国货物将在拉美国家享受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美国也给予拉美国家以最惠国待遇。作为他的设想的一部分，布莱恩希望签订仲裁条约，以解决在拉丁美洲的争端，并希望通过泛美会议来促进美洲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加菲尔德短暂的总统任期内，布莱恩未能获得机会将其计划付诸实施。当他在哈里逊手下重新任职后，便于1889年召开了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他提出的关于建立关税同盟和关于仲裁的两项建议均遭否决。拉丁美洲人担心来自北美的统治，而且，既然他们的货物大都已免税进入美国，因此，在他们看来，布莱恩的目的不在经济，而在于政治。就美国方面来说，掌握着布莱恩所属的党的那些企业家，同样怀疑这些条约很可能会限制美国的关税。不过，尽管大会没有承担仲裁义务，布莱恩只是表面上而不是实际上遭到挫折。海斯总统已经就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边界纠纷做出了仲裁，而后来克利夫兰又对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另一次边界纠纷做出了仲裁。布莱恩过分急于求成；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欧洲的挑战，他企图对拉丁美洲强加美国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正在与日俱增。

简言之，这是商业外交的年代。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时美国除了维护诸如能够使得世界对美国公民来说既安全又有益这样一些国际行

为准则以外，它在自己的边界以外并无利益。虽然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前提，它应该使推行一贯的政策成为容易的事，但同构成对外政策基础的其他条件一样，它也有种种局限性。由于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成是，甚至被确定为，关系到真正重大民族利益的问题，所以美国的政策更加容易受到地方的或暂时性的压力的影响。在国内，政治上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居于支配地位；于是，在政治家之间，在各方面都完全可以互相迁就，而政府在没有更强烈的反压力的情况下，对之难以加以反对。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并不是每一个动机都完全是自私自利或眼界狭隘的，有许多是富于理想主义的；那些维护局部利益的人的所作所为，往往也并非不当。但是，如此势均力敌，而又如此易于一时失去平衡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美国的政策比别的国家更为变化不定。

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才开始充分注意到对外政策上的一些迫切问题。其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自南北战争以来，人口和工业潜力均稳步增长，这使美国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欧洲列强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越来越承认这个事实，这也使美国人开始注意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连别人也在议论孤立主义的局限性，那么要继续奉行这一主义就更为困难了。第二，在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竞争仍以典型的帝国主义形式进行，在中国、非洲和太平洋上的角逐已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这时，盛行于西欧的种种思想也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在西欧，一位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家辩称：民族和种族也像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一样为生存而竞争；适者生存乃是一个合乎道义的进程，从而使强权政治又得到新的支持。实力不仅是安全所必需的，而且是生存权利的证据。这种信念在美国广为传播，由此而产生的雄心也人所共有。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仍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虽然新思想很有感染力，但由于美国的历史、政治传统和地理位置不同，这些思想的影响也就减弱了。帝国主义同旧思想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战斗，美国的政策则指引着这种斗争。

人们通常恰当地把美西战争看成是一个里程碑。正是美西战争迫使世界各国以及美国人自己注视美国的政策，但这一变化是有先兆的。第一次打开美国人眼界的争端是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从未经过认真勘定，长期以来争执不下。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委内瑞拉的外交交涉为时已久，美国曾多次居间调停。美国早些时候也曾单独表示对此关注，但也只限于一

般声明希望看到争执得到解决，并愿做出任何有助于解决争端的努力。委内瑞拉人则希望美国做得更多。他们常常告诉美国，支持一个南美小国反抗一个欧洲大国有好处，其目的或目的之一是要美国人进行干涉。1895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克利夫兰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决心使争端得到解决，必要时美国将采取直接行动。

这项新政策以1895年7月20日奥尔尼给美国驻伦敦大使发出的指示为始。它声称美国有权进行干涉，并引用门罗主义来作为这种权利的根据。如果英国的行动表明英国是在牺牲委内瑞拉的利益，并不顾委内瑞拉的反对而进行领土扩张，那么，这种行动就是与门罗主义相抵触的。奥尔尼说，从此可以得出结论：辨明事实真相，从而判断门罗主义是否适用于这些情况，乃是美国的权利和责任。当时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在4个多月以后才做出答复。他在11月26日发出的两封态度冷漠傲慢的函件，拒绝承认美国有权进行干涉。他指出门罗主义只是美国的政策原则，并非国际法准则。他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奥尔尼都是把该项原则加以引申，而运用到与之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了。

克利夫兰总统就索尔兹伯里的函件在12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特别咨文，从而使争论公开化了。在咨文中，他声称美国政府曾一再努力规劝英国和委内瑞拉和解，然而，这些努力均由于英国持顽固态度而宣告失败，现在已是美国决定正确的边界，并在必要时以武力强制争论双方加以接受的时候了。作为行动的开始，他建议指定一个美国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国会拨出必要的款项。

美国舆论强烈支持克利夫兰的行动。英国舆论则对此表示愤慨，但首先是感到震惊。如詹姆斯·布赖斯在写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说：“在下议院，10个人里也未必有一个人知道还有像委内瑞拉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是举行了谈判，通过谈判，英国最终接受了美国的干涉，而且美国不仅是干涉，实际上是代替委内瑞拉而成为争端的另一方。索尔兹伯里放弃了反对就边界进行仲裁的立场，得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即承认凡占领或在政治上控制某一地区达50年者，均应对其拥有所有权。仲裁法庭由双方各派两名成员和一名中立国法官——一位俄国人——组成。法庭上坐的是两名美国人而没有委内瑞拉人。法庭实际上是受理英国一方的诉讼案。

虽然克利夫兰曾谨慎地说，最初他只是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事实，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并不抱偏见，但在双方的许多观察家看来，事情很明显，他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英国是错误的。只有出自这样的估计才会使门罗主义与此事有关。不管引用门罗主义是对是错，反正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殖民地免受南美各共和国的侵犯。因此，美国的干涉不是公正的，但除开干涉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偏袒某一方这一点不说，如果遵循这个先例，美国可以插手进行干涉的争端的数目就会大大增加。从此以后，任何纠纷，只要是涉及一个美洲国家和一个欧洲国家，就都可以认为是属于门罗主义范围之内的事。有一个时期，这个先例似乎将要确立。后来美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了改变，主要是因为在美洲的一些小共和国中，对来自北美的这种监督日益不满。

克利夫兰总统是一位勇敢而诚实的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是最后一批反对扩张的人之一。他尽其所能阻止兼并夏威夷；他反对在国外进行冒险活动，反对建设海军以及同列强竞争；因此，他竟然会扩大门罗主义的范围，就更加出人意料。也许，他并没有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充分含义。他和奥尔尼一样，认为英国总是不尊重美国的利益，因此决心大力维护这些利益；不过，他的行动也显示出美国帝国主义具有强烈道义因素。当然，这种因素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它表现在别人身上，并不总是像克利夫兰那样强烈，但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美国政策中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造成的。克利夫兰和奥尔尼认为，他们是在纠正错误。如果承认仲裁委员会的裁决，那就不能说他们是在纠正错误，但他们自以为是在纠正错误，而且，由于对此深信不疑而理直气壮。

在发生委内瑞拉边界纠纷之际，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敌对——从芬尼亚共和主义到捕鱼权等等问题，不一而足。1897年，麦金莱总统接替克利夫兰时，两国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边界问题上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执，直到1903年才最后解决。该边界是根据1825年的英俄条约划定的。1867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后，美国人就继承了俄国根据该条约而享有的一切权利。然而，确定边界是一回事，勘定边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实践证明，对边界的确定是不充分的。在19世纪末，边界地区发现黄金以前，边界的准确位置本来无关紧要，但发现黄金后，两国采矿者就开始涌入这一地区，而且希望开发出取之不竭的矿藏。这样就需要精确地划定边界。从阿拉

斯加的主体，有一条港湾密布的狭长海岸地带向南伸延。争执的最主要之点，是边界正好穿过这些港湾。如果穿过这些港湾，加拿大就会在港湾的尽头处取得出海口，得到属于自己所有的便于通往金矿的港口，但这也会使这块美国领土成为与本土隔绝的一些地岬。加拿大人说，这才是对条约的正确解释，而美国人则说，在1890年以前，加拿大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因此它是站不住脚的。

处理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可循。一条是把它看成政治争端，从而可求得妥协。另一条则是把它看成严格的法律上的争讼。加拿大人——当然是由英国政府代表——设法双管齐下求得解决。当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时，一个由加拿大和纽芬兰都派有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已经在审查两国间一些虽不太大但却棘手的争端。确定阿拉斯加边界的问题被提交该委员会，但未获得结果。从这一争端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当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竟然抱怨英国首席委员赫谢尔勋爵过于在字面上坚持自己的理由而不愿让步。与此同时，如后文所述，两国还正在就开凿和管理一条地峡运河的条件进行着谈判。加拿大人试图把这个问题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扯在一起，但同样没有成功。美国人坚持阿拉斯加边界问题与其他问题毫无关系，应作为单独的问题来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稳妥的政策。美国人移居有争议的地区的速度比加拿大人要快，加拿大事实上没有取得出海口。时间对美国有利。1899年10月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而当这项协议消除了边界上发生纠纷的危险后，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海就极力拖延而不愿达成永久的协议了。

这样一来，加拿大人就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主要论点，即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争论，应由法庭解决，而不应通过谈判来解决。然而，事实证明，要组成这样的法庭是十分困难的。委内瑞拉边界问题是由一个5人组成的法庭来解决的，争论双方各2个，另一人来自中立国。然而，在1897年，英国和美国已签署一个仲裁总条约，规定在6个仲裁人中，每个国家应出3人，而每项决议需有5人同意才能通过。这项条约以微弱的票数之差未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经过长期谈判后，在1903年1月达成协议，同意成立这样形式的法庭，不过，没有5/6的多数这条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时间对加拿大是多么不利。到这时，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雷德·洛里埃爵士已放弃了得到一个港口的希望，急于把做出让步的责任推到一个法庭身上；而美国人则拒绝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法

庭，甚至连这样的法庭也只是勉强同意的。最后，法庭由三个美国人、两个加拿大人和一个英国人组成。

法庭被接受后，争论马上就转向如何正确解释1825年的条约。双方各执一词，不过，看来美国的理由无疑比较充分。最后，美国获得全胜。加拿大未能在争议地区取得出海口。然而，虽说结局是合理的，但达到这一结局所采取的手段，却是值得怀疑的。这个法庭不论就其组成或就其程序来看，都不是真正公正的。很显然，法庭要想做出一项裁决，起码需要有一个成员对任命他的那个政府所持的理由表示反对，而美国之所以同意成立这样一个法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知道这一点，从而感到有把握。结果，法庭的英国成员、大法官阿尔弗斯顿勋爵投票支持美国人。他坚持说，他是根据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来考虑问题的，并且做出了严格的合乎法律的决定。然而，不论是在美国或在加拿大，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成员也是这样做的。1901年麦金莱被刺后接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无疑在人选问题上选择了亲信而违反了协议的精神。没有一个人是协议所要求的“著名法学家”（虽然伊莱休·鲁特后来曾担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法官，但当时他是陆军部长，并无司法经验），而且，所有的人在开庭前均已公开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其实，更不必要进行这些选择，因为罗斯福已公开宣称，他无意接受不利的裁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法庭本身就标志着美国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罗斯福式的。若依温和而亲英的约翰·海，一定会满足于保持临时解决办法；在建立法庭时，他看出罗斯福的提名没有必要地刺激了对方。然而，罗斯福却认为美国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他把法庭看成仅仅是给英国政府提供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而美国所以同意这样做，则是一种让步。他不准备在最终的解决办法方面做出任何让步，甚至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嘴上甜言蜜语，手里挥舞大棒”，这是罗斯福最欣赏的格言之一。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他的弱点不在于他挥舞大棒，而在于他完全不会甜言蜜语。他不能够理解，甚至没有注意到，加拿大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懑。

在阿拉斯加边界问题解决以前不久，缔结了海—庞斯福特运河条约，从而使加拿大一度曾试图将之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的有关运河问题的谈判宣告结束。通过中美地峡开凿一条通航运河的可能性已讨论了很多年，对这样一条运河如何管理，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19世纪

中期，英美在中美洲的竞争，由于在1850年签订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而趋于缓和。该条约规定可能修建的任何地峡运河应共同管理，不得设防，并应保持中立，以有利于各国。

南北战争后，美国对通航运河的兴趣日益增长，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渐渐被看成是对美国的束缚。当开凿运河的主张还是商业上的考虑时，存在着对立的利益之争——例如铁路的利益——再加上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妨碍了运河的开工；但是，美西战争大大促进了兴建运河的要求。战争爆发后，美国战列舰“俄勒冈”号不得不长途航行，绕过合恩角驶往大西洋才能有效地参战。鼓吹扩张主义和建立强大海军的宣传家们立即指出：在加勒比海的战争中，运河一定会大有用途，因此，重新提出兴修运河的坚决主张，而且不仅是兴修，还应由美国兴修并加以控制。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成了一道障碍。一些不负责任的美国政界人物企图辩解说，该条约已经失效，可以置之不理；但这不是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虽然有很多人谈论美国废除该条约的可能性，但约翰·海和他的同僚们仍然坚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约翰·海在1898年12月提出了他的建议。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初步反应是良好的。于是，约翰·海和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一道着手进行工作。庞斯福特是一位经过专门训练的律师，而且在此以前曾参与订立苏伊士运河条约，因此对处理类似问题具有专门经验。约翰·海和庞斯福特工作得很快，到1月中旬，他们就拟出了条约草案。要求改变运河条约的压力，完全来自美国方面。英国政府对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已经感到完全满意。再者，他们看到，在通航运河问题上向美国利益做出让步，很可能换取到在别的地方向加拿大做出让步。他们也知道，在同美国继续存在重要争执的时候，对兴修运河有着种种反对意见。因此，他们试图把运河问题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这使新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一年。由于遭到美国的拒绝，才放弃了这样的企图，于是第一次海—庞斯福特条约于1900年2月签订。

新条约仅仅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修改了一处，即撤销了英国关于参加开凿和管理运河的要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除被新条约所代替的地方以外，其余仍然有效。但是，尽管约翰·海和庞斯福特注意尽可能少地修改原条约，毫无疑问，美国将是主要的获益者。英国对于经由巴拿马通向东方，兴趣本来不大，而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

就更加无所谓了。从战略上讲，运河的优越性——即必要时美国可将其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支海军舰队集中到一个洋面上——也将属于美国。英国的地位不但不会由于运河建成而得到加强，反而会适得其反。虽然如此，有好几十年时间，人们曾认为建成地峡运河将是对文明的一大贡献。除非使用武力，继续反对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即使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反对也是困难的。英国无意参加修建运河。即使为了支持加拿大，英国也不能长期拒绝放弃行使它的否决权。

因此，英国政府按照草案接受了第一次海—庞斯福特条约；但负责批准这项条约的美国参议院却不予接受。参议院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反对条约中邀请其他欧洲国家也要加以遵守的条款。在许多参议员看来，这种邀请协助保证条约在西半球生效的做法，不符合门罗主义。然而，更重要的批评是认为一条中立化的运河的存在，将会加强任何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海军的国家的地位，从而违背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强国能够有效地封锁运河，而美国虽然拥有同等的权利，却无法阻止比自己强大的外国舰队通过运河。海军战略家们说，只有在运河可以设防的情况下，它才会对美国有利。

参议院对条约的反对，在1900年春夏日益强烈。到参议院于6月休会时，还未进行投票，而在夏季，布尔战争、美国竞选运动，尤其是中国的义和团叛乱以及接着举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转移了两国对运河问题的注意。但在12月参议院复会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对条约进行了攻击，使它成为一场政治性争论，并纠集起民主党人对它加以反对。最后，参议院对条约做了三项修正而批准了它。第一项修正虽然使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整个被废除这一点明确化，但并非很重要。第二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修正，是给有关运河中立化的条款增加了另一条规定，即所有这些条款均不应“适用于美国为了以自己的力量保卫美国的安全而认为必须采取的手段……”第三项修正则把邀请其他国家遵守条约的条款一笔勾销。

修改后的条约，实际上是否定了提交参议院的那个草案，因此，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修订本。虽然约翰·海和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乔特竭力劝英国政府说，这些修改都是无关紧要的，但那完全是谎言。约翰·海所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不接受新条约，参议院就会无视国际法而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过，当1901年3月新条约宣告

无效（因为它未被接受）时，参议院同时宣布休会，因而如庞斯福特所说，没有“犯什么更大的罪过”。

两个互相对立的条约草案似乎没有调和的余地。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兰斯多恩勋爵在对参议院所提的草案进行评论时，提出了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却重要并站得住脚。不过，已有迹象表明，兰斯多恩所真正反对的是参议院采取行动的方式，而并不是修正案的实质。条约草案宣告无效，在1901年夏季，又拟定了另一个新草案，条约于11月18日签订，并由两国顺利地批准。在这个条约，即第二次海—庞斯福特条约中，美国得到了反对第一次条约的那些人所争取的一切。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明确地废除；运河在战时的中立地位不再予以保证；其他国家不再被邀请遵守该条约。兰斯多恩放弃了他先前的反对意见。在谈判新条约时，他和庞斯福特得到的唯一让步，是保证其他非签字国根据条约受到和英国同样的限制。在获得这一保证后，他们也就对由美国来实施和执行这些限制感到安心了。在他们看来，参议院中支持海军的大多数人士，并不想将英国置于特殊不利的地位。达成的这项协议反映出自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加勒比地区的力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事实在英国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丝毫未引起人们的争论。

不论是阿拉斯加边界纠纷，还是控制地峡运河问题上的纠纷，都是美洲大陆本身的问题，因此，比起对较远地方发生的冲突，美国的态度表现得更直率，更强烈，并夹杂着以往的情绪。其直接的后果是，美国决心把每一项谈判加以分别对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和取得的解决办法，不影响另一个问题。因此，海—庞斯福特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改变美国在阿拉斯加问题上的立场。而且，虽然由于英国对美西战争的态度而产生的对英友好感情是真实而明显的，但也未能影响后来同英国谈判的结果。这种把某一谈判同外交政策分开的做法，并非单单在那一时代或单单在美国如此。把外交谈判和某一项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是困难的，也并非必要的；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策中，根本就没有打算这样做，这一点比以往更为明显；其原因是美国对自己控制西半球的能力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而且，对美国有权这样做这一点也同样坚信不疑。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待最微不足道的争执时，也仿佛是涉及生死攸关的利益一样。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像奥尔尼和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人，在推行美国政策时表现得如此激烈。它们也很能说明为什么这些人倾向于从

法律的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却又不顾前后矛盾，运用政治压力来决定这些问题的结果。

当美国的外交活动集中在西半球的时候，它的局限性被掩盖着。美国对自己的实力所具有的信心，事实上是有根据的，但这并不是建立在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这种信心其实是70多年以来发展起来、而从未被怀疑过的一种安全感。美国人暂时还可以一方面支持在世界政治中实现一些新的抱负和理论，另一方面则仍然坚持同这些新的抱负和理论相矛盾的旧原则。他们就开凿地峡运河的条件进行的辩论，主要在于战略方面。然而，美国海军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将他们提出的在运河设防的要求同任何更大范围的政策联系起来。虽然开凿运河的要求包含着更大的野心，但这种野心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然运河是在西半球，对它设防就当然是必要的。而且，由于英国持反对态度，就更应如此。类似的矛盾情况，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影响罗斯福和其他人，而且无疑大大促使他们在应付问题时采用激烈手段的，是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必然会导致要求扩大美国的利益和影响，这实际上正是罗斯福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对其他进取精神并不亚于他们的人来说，各种旧思想使他们对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含义认识不清。正像苏格兰出生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委内瑞拉危机时所说的：“（英国）可以自在地漫游于三大洲，它不会果真舍不得将一个洲给予她在这里的同种人。”

美西战争是对美国政策的第一次真正考验。战争仅持续了几个月，美国并未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美国的动机比起战争的规模来要重要得多。这次战争既可以看成是由于一次骤起遽落的帝国主义浪潮而引起的一时反常现象，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主要转变的起点，即放弃孤立，而不断地、越来越频繁地参与世界事务的开始。这两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美国并未拥有海外属地的正式政治控制权，就这一点来说，不论怎么衡量，它都没有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热情也已迅速消失。但是还有其他形式的殖民扩张。有了力量，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使用它的愿望。到1898年以后，孤立主义者就站不住脚了。

美西战争的起因在于美国已经日益准备好要管理西半球的事情。引起这次战争的表面原因，是西班牙未能平息在古巴不断发生的反对其统治的叛乱。美国终于决心结束这场正在毁灭该岛的游击战争。古

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在整个19世纪此起彼伏。虽然在多民族的古巴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西班牙血统或主要是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但这个岛屿却是由从西班牙派来的官员们统治着，古巴人关于自治的要求被置之不理。西班牙人的统治既无能又腐败，因而挥霍无度。最严重的叛乱是从1868年到1878年的10年大规模战争。这次战争与其说反映了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要求，不如说是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最后，以达成一项允诺进行改革的协议而告终。但西班牙人并未遵守协议的精神——甚至连字面上也未遵守——这正是导致1895年爆发一场新叛乱的主要原因。在两场叛乱之间的年代里，古巴领导人中的分立主义者的影响已超过了自治主义者。

南北战争前，许多美国人曾考虑购买或兼并古巴。该岛在加勒比海的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热带作物，尤其是蔗糖，价值相当可观。不过，热衷于得到古巴的，仅限于南方人；在北方，人们不无理由地怀疑南方之所以热衷于此事，其真实目的在于再建立两个蓄奴州。当地区之间的竞争左右美国政局的时候，这种怀疑足以阻止美国采取行动。但到了1898年，形势已大不相同。奴隶制已不再是政治问题；在古巴，和在大陆一样，它已不复成为一种制度。如果说兼并古巴的主要动机已不复存在，那么，主要的反对意见也随之而消失。而且，兼并也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甚至并不是最吸引人的办法。许多美国人不喜欢让古巴成为殖民地，因为他们坚决主张共和制度，而且，同样不愿意再增加大量的混血种公民。在这些人看来，正确而满意的解决办法是让古巴独立。

在叛乱的头几年，美国保持适当的中立，但只是形式上的和官方的中立。克利夫兰总统的拒绝干涉并不受人欢迎，到麦金莱就任总统，美国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干涉。然而，即使在美国进行干涉以前，西班牙人就感到他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对美国不满。许多古巴人逃到美国，在那里组成集团，搜罗金钱、武器和人员，并进行反西班牙的宣传。这些古巴武装集团的活动已是尽人皆知。西班牙人说，如果没有他们，叛乱早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指责美国政府对这些人不加控制。而这还不算是最主要的不满。西班牙人认为，即使这些人私运军火，也并不是足以使叛乱分子有任何机会取胜，而他们之所以继续努力，只是寄希望于美国最后会进行干涉。只要美国政府坚决声明美国将不会进行干涉，他们的这种希望就会化为泡影，叛乱也将结

束。因此，尽管美国人虚伪地谴责西班牙统治的罪恶，其实，他们自己应对这些罪恶负主要责任。

诚然，截至这时为止，美国舆论是支持古巴叛乱者的，因此，对美国总统来说，要公然反对他们是很困难的。但是造成美国人这种情绪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商业帝国主义。美国在古巴有大量投资并进口该岛几乎全部的食糖（该岛最重要的产品）。但是，美国商人对古巴的重要性，看法并不一致。只有各糖业公司拥有直接的利益，整个来说，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是恢复西班牙的统治。至于其他商人和保守派，则认为干涉古巴多半会大大分散对远东的关注，而我希望美国政府进行干涉的是后一地区。促使对古巴进行干涉的，完全是另外一股势力。这股势力产生于概括称之为“进步党运动”的原则，并且满足了他们的情绪。博爱主义是这个运动的基础，它自然就对商业动机抱怀疑态度，并对商业上的自私自利行为表示憎恶。再者，反对进步党运动的人曾采取手段，援引宪法和利用法院来阻止改革，这就使改革者为了进行改革，往往在必要时不注意法律细节，或对这些法律细节置之不理。既然目的是好的，就不应让法律上的技术细节来妨碍其实现，否则就是胆小怕事。

在进步党人看来，国内的改革和国外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同样的道义力量促使他们既攻击美国的大商业，也攻击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但这两者显然不同。美国的商业是非常成功的，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则是不成功的。许多美国人本来会毫无疑问地同意由西班牙对古巴进行稳定的统治，现在却感到西班牙既然不能安抚古巴，那它就无权对之进行统治。西班牙人反驳说，美国应对西班牙的困难负主要责任，这遭到几乎所有美国人的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拉丁民族天生就是无能、残暴而腐败的，因此，不适于统治他人。西班牙统治的缺点是固有的，不能指望其有所改进。在进步党人中，这种民族优越感很强，它往往形成对世界政局所抱的一贯的观点的基础。当布尔战争爆发时，数目惊人的进步党人不顾反英的传统立场和热衷于追求共和之名的态度，竟认为为了文明着想，英国应当获胜。而对待古巴战争则迥然不同。它是野蛮人，或者说，是堕落分子之间的争斗，颇像土耳其人压迫亚美尼亚人一样。对这样的事，受过文明教养的良知会强烈地加以反对，文明国家有责任加以制止。这就使进步党人对古巴人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真正希望他们获得自

由，另一方面又深信他们需要美国的监督。不论从种族，还是从历史来看，他们都不适于自治。

当问题还是如何结束西班牙的暴政时，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被掩盖起来。人们本来很容易相信西班牙人罪大恶极，而纽约的报纸在扩大发行量的竞争中，又报道、夸大甚至虚构了严重歪曲西班牙形象的种种暴行故事，来迎合这种心理。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政府非但根本没有劝阻古巴人，反而在1897年9月以后向西班牙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西班牙人更加不满，他们现在所不满的，已经不是美国的过失，而是美国的政策。西班牙人准备做出让步，但他们把这种让步看成是为了表示善意，是为了使美国失去国际的支持，并无法找到任何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从而最终迫使它抛弃叛乱分子。美国人则把这种让步看成是在古巴实行自治，甚至是结束西班牙统治的步骤。分歧无法得到弥合。

1898年2月，美国战列舰“缅因”号在访问哈瓦那时发生爆炸而沉没，从而使局势更加恶化。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一直没有真正查清。虽然与真正争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缅因”号的炸沉使两国的紧张局势加剧，以致无法再保持和平。西班牙是一个弱得多的国家，因此渴望和平，但它除非是冒着国内爆发革命的真正危险，否则无法做出美国所要求的一切让步。它一再设法使其他国家进行干预，但均告失败。然而除英国外，这些国家都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遗憾，但它们基本上对此事漠不关心。它们决定保持中立，这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可以为所欲为；当这一点变得明显后，已经做出了最后让步的西班牙宣布开战。

这场战争本身为时甚短，作战中美国大获全胜。由塞尔维拉海军上将指挥的唯一的一支举足轻重的西班牙舰队，被封锁在圣地亚哥湾内。虽然美国曾企图沉下一艘船来封锁港口未能成功，但塞尔维拉的舰队在港内停留了很长时间，使美国远征军得以未受阻击而登陆。当这支军队在陆上包围了圣地亚哥后，塞尔维拉已陷入无力防守的境地，只好命令舰队出海，但这只不过使他的舰队在一场海战中迅速覆灭。美国在海战中获胜，主要是由于它的火炮优越。随着塞尔维拉舰队的覆没，西班牙陆军的投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美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竟如此迅速而容易，实属出人意料。在海上，美国人略占优势，但西班牙在该岛上差不多有20万军

队，可用来对付大约15000美国人；然而，这支小部队不仅未受到抵抗就登陆，而且，大约在一个星期内就推进到圣地亚哥。当他们真正投入战斗时，只遇到比自己少得多的西班牙部队。西班牙领导人受到的主要指责，是他们未能有效地集中兵力，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展开游击战。

古巴战役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实际上是继战前的长期争论以后，势所难免的唯一的一次战役。但是，由于海军舰队司令杜威在马尼拉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且使战争的范围扩大了。杜威指挥着美国的亚细亚舰队。战争一开始，他就开往菲律宾，攻入马尼拉湾，全歼了西班牙舰队。他的胜利成了美西战争中第一场最彻底、最引人注目的胜利。这就提出了显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在战前考虑到的问题——菲律宾的前途问题。美国人高涨的军事自豪感和他们取得的彻底胜利，使得将这些岛屿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西班牙已不再可能。根据1898年12月10日在巴黎签订的和约的规定，西班牙撤离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转让给美国；它还转让了菲律宾，为此得到2000万美元的补偿。

对于这些转让，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远东不像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对这里感到浓厚的兴趣。菲律宾的命运使它们都十分关注。西班牙作为这些岛屿的统治者，并不侵犯他人。它非常软弱，除了保住自己，而且还不是十分有效地保住自己以外，其他都已无能为力。美国插手远东的前景却令人不安得多。尽管如此，如果这些岛屿不能归还西班牙的话，那么，留在美国手里就普遍被认为是可取的代替办法。向征服权提出挑战是很困难的，而且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激烈，把这些岛屿转让给其他国家，是谁也不会接受的。这种态度也表明了一般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不见得会有效地利用它新获得的这块属地。那些预见到美国将展开行动的观察家们所以有如此看法，一般是因为他们预料美英将进行合作；而多数人则充分认识到，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

就菲律宾而言，事实证明国际上的这种判断是对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统治该地热情在美国即已开始下降。为了反对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爆发了一场起义，用了3年时间才镇压下去，耗费远远超过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这使美国人深深认识到统治一块属地意味着什么。但引起人们怀疑的，还不仅仅是因为绥靖和管理菲律宾耗费巨大。许

多热心于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古巴的改革家们，出于明显的理由，反对美国自己征服菲律宾。仍然控制着民主党的那位西部平民党重要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便是其中的一个。另一方面，大多数进步党人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美国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他们的种族适合于统治他人。他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表现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拒绝在国外承担实力所带来的义务的话，那只会是自相矛盾。美国的改革家们面临着激进派在对外政策方面经常遇到的那种困境。他们在古巴问题上意见几乎是一致的，而这时却开始分裂了。

但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对菲律宾感兴趣，主要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一种反映，因为中国当时乃是各国竞争的中心。竞争的目的是贸易。长期以来，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一直在设法比较顺利地进入中国内地，并一直在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以消除北京和各省的中国官员们设置的种种障碍。在19世纪90年代末，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要求曾一度得到广泛的支持。未来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除了通常的推销消费品方面的竞争以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竞争形式，即争取获得铁路筑路权。筑路权就其性质来讲是专有的，铁路是用向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来修筑；不管是筑路权还是贷款，均可用来增加政治影响，而政治影响又是在谈判取得这些特权和贷款时所必需的。中日战争暴露了中国的软弱无能，瓜分的时机似已成熟。尤其是俄国步步紧逼，要控制华北，而控制的目的在于政治而非贸易。这就使许多人担心瓜分已经开始。当时的局势，引起那些鼓吹种族竞争的人们对它做出强烈的反应。

美国人也感到其他人普遍感到的这些忧虑。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为时已久，并使各种各样的集团联合在一起。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像他们的欧洲竞争者一样，长期以来要求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但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特殊利益似乎不那么特殊了。美国商业界开始担心发生生产过剩的问题。1893年到1898年十分迅速地发展起来的突然的出口盈余，不仅表明生产量已达到惊人的规模，而且表明国内市场已达到饱和。如果美国的生产超过它本身的消费，那么，人们相信，只能靠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才能避免发生灾难。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欧洲、英帝国、非洲，甚至南美洲似乎都无甚希望找到这样的市场。只有中国仍然是有希望的地方，对美国商业界来说，像对欧洲人一样，它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当时的贸易现状。

总的来说，在中国有利益的商人并非是帝国主义分子。已有的证据表明，一般说来，他们是反对美国战争的。除了这次战争耗费巨大以外，他们认为这将会把本来可以更好地花费在发展对华贸易上的精力用在别的地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战争的结果是取得了菲律宾以后，他们认识到这个群岛对他们的事业会是多么重要，于是，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他们能够看到，而且准备帮助别人也看到，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联系。

在这一方面，他们在扩张主义者中间找到了盟友。这些扩张主义者从理论上对东方贸易感觉兴趣。贸易竞争是各国必然要参加的一种竞争形式。必须保卫横越太平洋的贸易航线，这一直被用来作为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取得夏威夷、控制地峡运河的一个论据。再者，对华政策由于不存在任何兼并领土的问题，所以对美国激进派来说，不会像取得菲律宾那样遇到严峻的考验。反对掠夺成性的列强而保护中国和维护贸易自由，甚至对在国内反对“大企业”的那些人来说，毫无疑问也是合乎道义的。最后，在中国有为数众多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对那里的政治发展日益感到失望，而他们在国内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这样，来自上述各个集团的压力日益增加，要求政府在中国采取行动；但在美西战争以前丝毫没有效果。克利夫兰总统对于这种要求是不同情的。麦金莱当选后，战争又把注意力从中国移开；麦金莱的第一任国务卿约翰·谢尔曼也缺乏能力。1898年3月，英国大使非正式地问麦金莱，两国是否可在远东进行合作，却被婉言谢绝。麦金莱说，美国一贯的传统是拒绝采取联合行动。由于当时正值古巴危机最尖锐的时刻，英国提出这个主张不合时宜，而美国的政策也毫无改变的迹象。然而，到1898年约翰·海任国务卿后，院外援华集团就有了一个他们更喜爱的代言人。在战争将告结束时，他们便希望实行一项更积极的政策。

对华贸易商和扩张主义者的联合，没有取得成效。原来以为美国的贸易将以菲律宾为基地、以马尼拉为“美国的香港”而迅速扩大，但这种想法证明是一场空想。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以前，即使在菲律宾本地，大部分美国货也必须靠特惠关税来保护。当然，菲律宾作为商业基地，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幸的是，中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如何针对其他强国的压力，向中国

政府施加有效压力的问题。而这是美国，甚至在西奥多·罗斯福当权时期都不准备做的。尽管他和一些鼓吹者竭力要加强海军，美国在菲律宾却没有一个有效的基地。迟至1902年，还没有能够说服国会通过为防务和设施拨款。然而，美国的远东政策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弱点。即使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基地，它也会由于距离遥远而鞭长莫及。在列强中，只有日本和俄国不存在这种不利条件。要想有效地抵制这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虽然当时步步紧逼的主要是俄国——均需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仍很牢固，无法打破。而且，在中国的竞争与在欧洲的竞争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单独对待。卷入中国事务就意味着卷入欧洲事务，而美国还不愿面临这种局面。

由于以上原因，美国占有菲律宾，对远东政局并无重大意义。只有英国对之抱有更多的希望，即希望在遏制俄国的野心时能得到支持。然而，在此期间，英国已将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占有的威海卫港攫取到手，并向中国提供了贷款，以便付给以威海卫作为担保的赔偿金。索尔兹伯里是考虑到他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抗衡德国新近取得胶州湾之举，才勉强地走这一步棋的。但在美国人看来，取得威海卫似乎表明英国已对维护“门户开放”——即各国在中国全国各地享有平等权利的政策——不再抱希望。随后，在1898年，英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演说，因而加深了美国的疑虑；而1899年签订了所谓的斯科特—穆拉维约夫协定，英国答应不在长城以北取得筑路权，为此，俄国也答应不在长城以南取得筑路权，这就更加深了美国人的疑虑。虽然遏制俄国南进这一点大受欢迎，但这样一来，肯定也会把中国划分成贸易“势力范围”。美国的利益集中在中国北部，俄国在这里获得特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国也偶然在更南的地方取得相应的特权，以此来抵消俄国所取得的利益，而美国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阻止各国要求获得新的特权，对美国的利益就是特别重要的。

约翰·海为达到此目的而做出的第一次尝试，是他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1899年9月6日，他向俄国、英国和德国这些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国家，发出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照会，接着，又在11月向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出了同样的照会。这些照会主要是请求各国以他们现有的条约为止境，并同意各国国民在整个中国均应受到平等的待遇。各国对此建议抱着复杂的心情，但均表示接受，其条件是其他国家也都接受。虽然俄国的答复十分含糊，实际上是表示反对，但约翰·海

也佯作感到满意。起草这一照会的经过，清楚地说明它主要是针对俄国在华北的扩张。俄国人不大会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决定表示赞同，并不表明他们打算修改他们的政策。像照会中提出的这样一种完全消极的政策，能否强加给各国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肯定的是：凭一纸通知照会，是不能把它强加于人的。很清楚，这个照会是向国际舆论发出的一种呼吁，是设法让各国公开承担义务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美国允诺将不使用武力来反对俄国。约翰·海鼓吹的是一种自我克制的政策，这样，他也就必然要选择这样的方法来推行这一政策。两者都是软弱无力的。

1900年3月20日，约翰·海宣布他接受欧洲各国的答复，3个月后，就爆发了义和团叛乱，暂时掩盖了“门户开放”照会的失败。中国的混乱造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局势，以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反对另一个国家为保护其侨民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不管是有扩张企图的国家，还是没有扩张企图的国家，根据不同的理由，一致认为迫在眉睫的是平息这场危机。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约翰·海的第一个反应，是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只限于采取独立行动保护美国公民。当形势显然已变得十分严重后，他才同意采取联合行动。他在另一个通知照会中，宣布了他的政策。他借这一机会重申，美国的政策依然是维护中国的完整和同该帝国的“各个部分进行平等公正的贸易的原则”。虽然这个照会常常被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开始实行一种新的比较积极的政策，或甚至是决心保卫中国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但实际上美国的政策还和以前一样小心谨慎。在义和团危机期间，它暂时似乎很有力量，因为所有的强国——也许德国除外——都准备暂时采取温和态度，也许是为了结束谈判以便腾出手来，也许是为了加强中国政府。各国的协调一致和中国的统一，被认为是并行不悖的。当各国都渴望维护前者时，它们就愿意接受后者。

各国的一致掩盖着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也掩盖着美国政策的弱点。但是，即使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美国的行动也只有在这样的紧张情况下才有可能同其他国家协调一致。正如约翰·海在1900年6月23日所指出的：“现在我们为了维护我们受到危害的利益而在中国应当做的一切，都将被说成是‘屈从于英国’。法国卖身谄媚俄国，却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让步，我们大概可以把德国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也许同英国、德国和日本在一起，就可以使我们免受损失。但是这样的做法会使我们所有的蠢人们在大

庭广众之中大发雷霆，而这种蠢人比比皆是。”俄国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日俄战争才被阻止。这时，欧洲列强的注意力转回到了欧洲，日本的优势地位也像以前俄国的优势地位一样，成为美国所不欢迎的东西。

因此，南北战争以后的40年中，美国政策模式是：一方面对西半球的支配日益加强，一方面在西半球以外则仍然踟蹰不前。不过，由于地理条件而造成的美国政策上的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信心。倒不如说，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才使它得以保持在孤立状态下形成的那种更大的信心。对国际关系持不相信的态度（有点儿像杰斐逊不相信政府那样），使美国的政策受到了限制。这产生于美国人的理论，而不是由于缺乏信心；它同美国一方面有很强的自尊感、而另一方面又对受侮辱过于敏感的情况是很一致的。因此，美国仍然能够保持有关对外政策的性质的旧观念，而这些旧观念虽然无疑证明是持久的，但已经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了。由于他们从来没有试探过自己的实力有多大，因此，他们的实力感就更大了。他们开始树立起更大的雄心，但还不具有实现这些雄心的意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罗斯福得享盛名的美西战争，对确立他所鼓吹的思想却发挥作用极小。归根结底，使罗斯福感到十分愤懑的那种鼠目寸光、偏颇狭隘的观念却是很有道理的。一项世界政策并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所以就凭空设想出来——它是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美国缺乏这个基础，因此向外扩张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

总之，在这些年中，美国与欧洲的外交关系仍然是无足轻重的。美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美国和其他人都公认的，但美国在参与世界事务方面犹豫不决，同样是人所公认的。要使美国在美洲以外发挥它的力量，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外交方面。美国从来没有一贯地追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它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商业联系在继续增加。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债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种地位一直未变——但这样的头衔已经名不副实，因为在国际收支上正出现顺差。外国投资越来越变成只不过是再投资。此外，美国的贸易对欧洲国家来说，比对美国来说已愈益重要。这一事实在美西战争时已很明显，而且在外交上至为重要。欧洲大陆各国以及英国不愿支持西班牙反对美国，以免使贸易和投资受到危害。这是迅速达到中立协议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异常有力而重要的纽带，把美国和欧洲联系起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这样同别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移民。一开始，大多数移民，不论是自愿地还是被迫地，都不得不作为个人迁移而来，离开他们曾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群。尽管如此，最初的移民，在一块渺无人烟的新土地上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很快就重新建立起尽可能接近于他们曾熟悉的那种社会环境。不久，他们的后代就建立起一个也许不如他们离开的那个社会那么严格，但也是既密切又亲近的社会。这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当稳固的居民点建立起来，移民们向西迁徙时，他们就遇到了在西欧未曾见过的自然环境。他们适应了这种环境；美国人专心致志于开发西部地区的这一段时间，使他们发生了变化，其影响比仅仅横渡大西洋给他们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新来的移民这时便建立起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充满信心的、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的社会。甚至当西部地区大都还是荒无人烟的时候，这种变化即已完成。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成为一个陌生的国度，到这里来的人都有一种置身异乡的感觉。然而，人们却空前地大量涌来。移民和当地美国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变得比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

美国的移民史，像过去一样，基本上仍然是一部欧洲人的外迁史。在南北战争以前很久，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黑人移民实际上已告停止。从1854年前后起，大量中国人移入美国。1882年达到4万人的最高峰，不过，在其他年份均未超过25000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是每年5000人至10000人。中国移民很快就遭到反对，不过无论如何这几乎只限于在西海岸。人数更多的是加拿大移民。数字波动甚大，1881年曾达到125000人，但平常却少得多。1885年后，降到几乎等于零，有20年时间未能恢复。不过，从加拿大来的移民，其实也就是欧洲移民再次迁徙而来的。越过边界而来的加拿大人，是一些处于变成美国人过程中的欧洲人，如果不是已经变成美国人的话。这些数字同从欧洲迁徙来的移民数字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波动幅度也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欧洲造成的，有些则是美国造成的。但1865年以后从未少于101000人，而1878年加拿大移民只不过26000人。1905年欧洲移民增加到944000人——这一年移民总数第一次达到百万以上——其次的最高年份是1882年的648000人。

与移民人数的上升同样重要的是移民国籍的变化。迟至1865年，大多数移民来自英国和德国。来自东欧和南欧的人数仍然无足轻重。

但临近19世纪结束时，增加的移民几乎全部来自这些地区。（其数字见下表）

移民国籍表

单位：千人

年份 国家、地区	1865	1870	1875	1880	1885	1890	1895	1900	1905
总数（欧洲）	214	329	183	349	353	446	250	425	974
英国	82	104	48	73	58	70	29	13	84
爱尔兰	30	57	38	72	52	53	46	36	53
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	7	31	14	66	41	50	27	31	61
其 他 西 北 欧 国家*	8	9	12	15	14	21	7	6	25
德国	83	118	48	85	124	92	32	19	41
波兰	<1	<1	1	2	3	11	<1	*	*
奥匈帝国	<1	4	8	17	27	56	33	115	276
俄国	<1	1	8	5	17	36	36	91	185
其 他 东 欧 国家*	<0.1	<0.1	<0.1	<0.1	1	<1	<1	7	11
意大利	1	3	4	12	14	52	35	100	221
其 他 南 欧 国家*	1	1	3	2	3	4	3	8	18

* “其他西北欧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士；“其他东欧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欧洲部分；“其他南欧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未包括在其他项下的欧洲国家。波兰项下的空白是由于1899年至1918年间美国移民当局将波兰人列入俄国、德国或奥匈帝国项下。在19世纪末，在人数增加的奥匈帝国和俄国移民中，波兰人占很大比例，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表数字编选自《从殖民时期至1952年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美国人口调查局），参见其原始资料。

除了某些例外情况，美国的基本传统一直是欢迎移民。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不论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安全，都需要移民。但移民所以受欢迎，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是前来参加一种试验的。美国很早就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自觉意识的国家，它体现了一种政治理论。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得天独厚，使人们有可能着意创建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又会培育出优秀的新人。这样的一个国家吸引了那些精力旺盛的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吸引了那些追求财富的人；但也吸引了那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理想，这种吸引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理想又提供了可以用来评价移民的各项标准。其中潜藏着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因为欧洲的腐败风气也非常容易随欧洲人而一同进入美国。美国的排外主义可以分析为三个组成部分，三者又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虽然在不同时期其重要性各不相同，但始终是存在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天主教的思想，其本身是由于怀疑天主教既不忠诚、又很腐败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心情。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反激进主义的思想，而且，由于这个国家是在所有革命中最稳健的一场革命中产生的，因而这种思想便更为强烈。法国革命给美国人打下了烙印。他们认为，他们的革命没有走得太远。这成了他们感到自豪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激进主义比反动更加危险。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承认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条顿人是美国的祖先。应当记住，美国革命者在把要求取得做英国人的权利的主张扩大到要求人权的主张时，曾是十分犹豫不决的。溯本追源，把英国式的自由作为自己的传统，这种趋势依然存在。它形成了美国人的看法，而并没有限制它的眼界，但也带来了某种怀疑其他种族的成分。

上述这些态度，除了由于美国本身发生某些困难而显露出来以外，仍然是潜伏着的。由于新移民的人数和他们的种族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像以前的爱尔兰人一样，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或东欧犹太人是很难同化的。这是因为宗教和文化的差别很大；而且他们也遇到德意志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遇到的语言困难。他们的人数众多，意味着他们甚至比早先的移民更倾向于集体定居，并坚守自己的风俗习惯。在各大城市里，大规模的种族居住区日益增加，不仅使当地政府愈感困难，而且使州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行政工作也复杂起来。但是，这些困难虽确实存在，也只不过是加深了主

要由于国内原因，即工业社会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而造成的紧张情况。美国仍然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美国所以能为人们提供机会的主要条件——但它已开始遇到欧洲存在的种种问题，而直至那时为止，由于空旷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政治上的民主，使美国还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自由放任的政策受到了攻击。在这个时期，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到平民党起义时达到了顶点。国内的紧张局势，决定了美国对外国人的态度，移民问题也成了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的争论中的一个症结。

当争论触及移民问题时，就不简单是一个赞成或反对的问题了。移民的涌入是受欢迎的，而且实际上往往是由那些有土地待耕耘和有矿山待开采的人们所安排和资助的，但却日益引起劳动者的愤懑。移民比当地人报酬低；比较容易慑服和管理，但他们威胁着美国劳动者既得的或正在设法得到的利益。然而，界限并不只是简单地存在于当地人和移民之间。为数甚多的最活跃的工会会员本身就是移民。他们在限制后来的移民的活动中，把根据契约受雇于某人的人——只有这种人是悲惨的——和自行移来的人加以区分。对那些反对劳工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也并不简单。移民可以作为驯服的劳动力而受到欢迎，但也可以作为容易被混在他们中间的激进鼓动分子所欺骗的人，或者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头目们的工具，而为人们所害怕。并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大雇主或他们的同盟者。那些想恢复早期美国个人主义的改革家，同样敌视“大企业”和严密组织起来的劳工。虽然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争论有时激烈，有时缓和，但由于其他方面产生的排外情绪，使这些争论复杂化了。即使在美国，种族主义者也开始争论异族人蜂拥而至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不应该把这些疑虑和困难加以夸大。虽然国会在1882年曾承认它有一定责任对欧洲移民加以控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并未对之实行有效的控制。这对美国的物力和财力，以及对美国传统的宽宏大量精神，都是一种贡献。美国的信心并没有发生危机。确实，在1886年建立的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镌刻着以下著名诗句^[2]：

交给我吧！把你们那千千万万渴望自由呼吸的，
筋疲力尽、一贫如洗、困居在一起的人们，
你们拥挤的海岸遗弃的苦难的人们……

它显示出一种充满自豪的自信：美国能够把大量无用的材料铸造成有用之物——这种自信是缔造美国的祖先们未必具有的。这并不是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主要是一个避难所。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榜样，这种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且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既能够运用于兼容并包的目的，也可以运用于排外的目的。但所有的议论都越来越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已经确立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容纳大批的移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至于这个任务究竟有多么艰巨，其利害得失究竟孰大孰小，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所有这些都没有严重地削弱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使命所抱的信念，但欧洲人的信念则不够坚定。美国从它存在之日起一直宣称自己是进步的前驱，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不论观察家们对美国的前途抱着热情，抑或是感到惊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里有一些新鲜而有意义的事物。对南北战争的评价尽管众说纷纭，但这场战争也未丝毫动摇这种一致的看法。但如果要想取得领导地位的话，则这种要求只有由一个小国提出才不致触犯别人，也只有由一个既小而且位置又遥远的国家提出才不致招来危险。随着美国的力量的增长，它的贸易的扩大，以及随着交通联络的发展，它在国际天平上的重量比它在政治上的榜样作用更为重要了。在欧洲人看来，它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和其他强国相似。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是激进派的灯塔的美国，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国家。它在实现政治民主方面首屈一指；在社会改革方面则瞠乎其后。到1890年，美国在工业立法方面已落后于西欧国家。英国的雇主们越来越抱怨，由于在美国没有能发挥作用的工会，他们的美国对手占有不合理的优势。英国工人也不再认为移居美国是改善自己景况的捷径。要证明新来的移民总比在他们以前来的移民要贫困是很困难的。大多数移民一直是贫困的。如果说由于美国的工业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各轮船公司积极招揽下等舱乘客，而使得一批批完全是新的移民能够来到美国的话，那么，同样可能的是，他们是受到吸引而来的，并不完全是由于在东欧实在过不下去才被迫离乡背井的。不过，贫困比以前更加是促使他们移民的重要动机——特别是由于别的动机，如冒险精神或政治理想等这时已经很少，所以就更加重要了。

由于这些原因，欧洲的观察家们对美国的兴趣减少了。近50年来，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需要而对宪法加以解释所使用的那套权术，当时还没有形成，即使已经形成，也不会给其他国家的人以深刻印象。欧洲的改革家们一度把美国看成是一个由于健全的政治制度而自然导致繁荣的国度，现在他们则认为，在这个国家，仅仅是由于资源丰富，才使得人们能够容忍已经过时的政治制度。美国就是这样在尚未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的情况下进入20世纪的。这时，它已从一个伟大的试验场所降为列强中的一强了。

（郭健 陈长青 译）

[1] 旧世界系指美洲新大陆（称为新世界）以外的欧洲、亚洲和非洲。——译者

[2] 这首长诗的作者为犹太女诗人拉扎鲁斯，这是其中的几行。——译者

索引

（此索引中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bas Pasha II, 阿拔斯帕夏二世, 埃及总督, 587, 591
- ' Abd al-Aziz, 阿卜杜勒·阿齐兹·土耳其苏丹, 324—325
他的性格和花费, 327—328, 341, 346
- ' Abd al-Hamid II,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323, 326, 340—343, 346—347, 348—351
他作为哈里发的地位, 349—350
- Abd al-Kerim, 阿卜杜勒·克里姆, 337
- Abd-el-Kader, 阿卜杜勒·卡德尔, 阿尔及利亚领袖, 596
- Abdul Fräsheri, 阿卜杜勒·弗拉谢里, 阿尔巴尼亚领袖, 344
- Abdur Rahman, 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富汗埃米尔, 578
- Aberdeen University, 阿伯丁大学, 181, 198
- Aberdeen White Star Line, 阿伯丁白星航运公司, 52
- Ac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行动, 120
- Adams, Henry Brooks, 亚当斯, 亨利·布鲁克斯, 美国历史学家, 他的《民主》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514
- Adler, Victor, 阿德勒, 维克托,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111
- Adult education, 成人教育, 201—203
- Advertising, 广告, 57, 69
- Aestheticism, 唯美主义, 126—127, 132, 133, 159, 162, 171
- Afghanistan, 阿富汗

英国与阿富汗, 412, 414, 416, 417, 569, 570, 575—579, 581, 590; 英属印度支付的款项, 574; 英国驻扎官被杀害, 578; 印度军队进入阿富汗, 578—579; 英俄划界谈判, 581, 582

俄国与阿富汗, 556, 570, 575—577, 578, 580, 581, 590; 平狄事件, 556, 579, 581, 587, 653

阿富汗与波斯, 567, 578

国内事务, 586

Africa, 非洲

瓜分非洲, 66—667, 251—253, 384—386, 593—640

教育, 179—180

奴隶贸易, 384—388, 611, 618, 622, 632

修筑横贯撒哈拉沙漠铁路的计划, 603

被瓜分前的社会结构, 617

反抗瓜分的斗争, 617, 618

民族主义, 617—620, 629, 639—640

参见各有关地区条

Africa, East, 东非

德属东非, 252, 292

在英属东非的亚洲劳工, 393, 401

瓜分东非, 611—617

铁路, 628, 629

Africa, South, 南非, 见South Africa条

Africa, West, 西非, 560, 602—611, 620—633

Agassiz, Jean Louis Rodolphe, 阿加西兹, 让·路易·罗道尔夫, 瑞士博物学家, 哈佛大学自然史教授, 183

Age, The, 《时代报》, 墨尔本报纸, 406

Agriculture, 农业

世界农业生产, 2, 5—7, 9—10, 54—55

农业科学的进步, 2—3, 397

萧条的状况, 9—10

农业生产者的组织, 14

肥料工业, 91—92

美国的农业院校, 182—183, 202

澳大拉西亚的农业, 5, 6, 54, 385, 398—399

丹麦的农业, 8, 200, 398

法国的农业, 14, 307, 309

德国的农业, 9—10, 285—286, 290

英国的农业, 7, 9, 64, 395—397

爱尔兰的农业, 14, 264, 397

日本的农业, 475, 477, 485

俄国的农业, 6, 10, 54, 334, 367, 369—370, 380—381

美国的农业, 182—183, 202, 395—396, 500—504

Ahmad Khan, Sir Sayyid, 艾哈迈德汗爵士, 赛义德, 穆斯林思想家, 431

Ahmed Arabi, 艾哈迈德·阿拉比, 埃及领袖, 567, 574, 585, 586, 597, 598, 599, 638

阿拉伯主义者, 598, 601

Ahmet Jelaleddin Pasha, 艾哈迈德·杰拉勒丁帕夏, 351

Ahmet Riza, 艾哈迈德·里扎, 土耳其政治家, 350—351

Aida, 《阿依达》, 为苏伊士运河通航而写的歌剧, 53

Akhal-Korassan convention, 阿哈尔—霍拉桑协议, 581

Aksakov, Ivan, 阿克萨柯夫, 伊凡, 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 337, 360

Alam, Shah, 阿拉姆, 沙阿, 莫卧儿王朝皇帝, 418

Alaska, 阿拉斯加, 669

 美国购买阿拉斯加, 670

 阿拉斯加边界争端, 673—679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336, 343—345

 保卫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联盟, 343—344

Albert, 阿尔伯特, 奥地利大公, 215, 218

Alcock, Sir Rutherford, 阿礼国爵士, 拉瑟福德, 437, 439, 442—443

Além, Leandro, 阿莱姆, 莱安德罗, 阿根廷自由主义者, 530—531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沙皇 (1855—1881年), 352, 358, 545

 改革纲领, 352, 356

 企图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 359, 362

 与民族主义者, 360

 与三皇同盟, 361

 被刺, 362, 553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俄国沙皇, 224, 248, 366

 专制统治, 363

 他的反犹太主义, 365

Alexandria bombarded, 炮击亚历山大港, 579, 586, 599, 601

Alexis, Paul, 亚历克西, 保罗, 法国小说家, 136

Alfonso XIII, 阿方索十三世, 西班牙国王, 189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553, 570, 595—596, 598, 610, 611, 621, 631

‘Alī Pasha, 阿里帕夏, 见Emin’ Ali Pasha条

‘Alī Su’ āvī, 阿里·苏阿维, 青年土耳其党作家, 326

被杀害, 341

企图营救穆拉德五世, 350

Allgemeine Deutsche Frauenverein, 全德妇女联合会, 199

Alliances, nature of, in this period, 这一时期各联盟的性质, 38—43, 253, 551—554

参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条

Alsace-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35, 39n., 252, 282, 542, 543, 554, 559, 561, 564

Altamirano, Ignacio, 阿尔塔米拉诺, 伊格纳西奥, 墨西哥诗人, 531

Alula, Ras, 阿卢拉, 拉斯, 埃塞俄比亚领袖, 614

Aluminium, 铝, 3

成为建筑材料, 89, 93

改进生产, 89—90

Alvear, Marcelo, 阿尔维阿尔, 马尔塞洛, 阿根廷自由主义者, 530

Alverstone, Richard Everard Webster, Lord, 阿尔弗斯顿勋爵, 理查德·埃弗拉德·韦伯斯特, 英国首席大法官, 675

Amadu Shehu, 阿马杜·谢胡, 西非穆斯林领袖, 608, 610, 619, 620, 629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 联合工程师协会, 75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美国劳工联合会, 15, 16, 75, 510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传教士协会, 504

American Pacific Mail Company, 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 518

Americans as patrons of art, 美国人作为艺术事业的赞助者, 157, 8

Anaesthetics, 麻醉术, 82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15, 108, 112, 269, 359

Anatolia, German rail development in, 德国在安纳托利亚发展铁路, 591

Ancón, Treaty of, 安康条约, 535

Andrássy, Count Julius, 安德拉西伯爵, 居拉, 匈牙利首相, 333—337, 342

担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544—545, 546—547, 548

Angell, J.B., 安吉尔, 密执安大学校长, 182

Anglo-Congolese agreement (1894), 1894年英国—刚果协定, 625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 1902年英日同盟, 38, 40, 40n., 486, 565—566, 665—667

Anglo-Portuguese Treaty (1882), 1882年英葡条约, 604—605

Anglo-Portuguese Treaty (1891), 1891年英葡条约, 614

Angra Pequena, 安格拉皮奎那, 235, 587, 605, 635

Animist religions in America, 美洲的泛灵教, 618, 632

Annam, 安南, 252, 449—450, 644, 650—652

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651

Annenkov, Michael, 安年柯夫, 米哈伊尔, 俄国将军, 581

Anthropology, influence on political thought, 人类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106, 109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516

参见Cuba条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108, 119

在奥地利, 119, 339

在法国, 321

在德国, 108

在俄国, 365—366, 374

Antiseptic techniques, 防腐技术, 82

Anti-Trust legislation, 反托拉斯立法, 21, 508

Antoine, André, 安托万, 安德烈, 他与法国自由剧院, 137

Anzengruber, Ludwig, 安岑格鲁伯, 路德维希, 奥地利剧作家,
142

Arabi Pasha, 阿拉比帕夏, 见Ahmed Arabi条

Arabists, 阿拉伯主义者, 598, 601

Arakan, 若开, 418

Arana, 阿拉纳, 见Barros, Diego Arana条

Aranha, José Pereira da Graça, 阿拉尼亚, 若泽·佩雷拉·达
• 格拉萨, 巴西作家, 538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国际争端的仲裁,
43, 242, 254

Archinard, Pierre-Louis, 阿尔希纳尔, 皮埃尔-路易, 法国军
人, 610, 627n.

Argentina, 阿根廷

经济事务: 外国投资, 4, 55, 517, 519; 出口贸易, 5, 6,
520; 农业, 5; 银行, 519; 经济的增长, 519

人口, 12; 欧洲移民, 517, 519

工会, 15, 531, 532

铁路, 519

政治结构和发展, 526, 528, 530—531

与邻国的关系, 530, 533—536, 670

武装力量, 534

文化生活, 536—541

教育, 537

Argyll Commission (Scottish schools), 阿盖尔委员会 (调查苏格兰学校的), 191

Aristocracy, 贵族

贵族的财富, 17

贵族成分的不断变化 (在英国), 31—32

继续保持贵族的权力, 31—32

在美国没有贵族, 32, 490

Arkwright, Sir Richard, 阿克莱爵士, 理查德, 英国发明家,
74

Armar, 阿马尔, 见D' Armar条

Armed forces and armaments, 武装力量和军备, 41—42, 204—
242

军火制造商, 13, 240

技术的发展, 41, 92—93, 204, 206—208; 筑城技术的发展,
208

征兵制, 41, 204, 214—217; 作为纠正民主倾向的手段, 219

舰艇和海军军备的发展, 41—42, 228—234

作为国家的象征, 44, 222

军事预算的负担, 205, 208, 240; 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预算, 205

战略铁路的重要性, 205, 211—213

海军竞赛, 206, 228, 232—240

缺乏现实主义态度, 209

骑兵战术, 209—210

军事动员的分散, 213

陆军的规模, 217—218

军官的阶级成分, 218—219

军事对政治的影响, 219—225

军纪和忠诚, 220, 221

国家安全和预防性战争, 222—223

在海外承担的义务, 225

基本类型的军事人员, 225

裁军建议, 43, 241

海牙会议, 241—242

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宣言, 241

参见各国条

Armenia, 亚美尼亚, 347, 350, 372, 374, 567, 588, 590

Armenian massacres, 亚美尼亚大屠杀, 347, 350, 561

Armstrong, 阿姆斯特朗, 军火制造商, 13, 240

Armstrong, H. E., 阿姆斯特朗, 英国教育家, 196—197

Arnold, Matthew, 阿诺德, 马修, 英国诗人和文艺批评家, 126, 189

Arnold Thomas, 阿诺德, 托马斯, 拉格比学校校长, 177, 192

Arrhenius Svante, 阿列纽斯, 斯万特, 瑞典科学家, 85—86

Arrow War, “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442, 443, 449, 450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和建筑“为艺术而艺术”, 125, 127

唯美主义, 126—127, 132—133, 159, 162, 171

印象派运动, 154—159, 163, 165, 166, 168, 170, 171, 175

后印象派, 154, 171

巴比松派, 155

日本的影响, 156, 160, 168, 171, 172

美国人作为艺术的赞助者, 157, 158

拉斐尔前派艺术, 160, 171

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 162, 170, 171, 172

住宅建筑复兴运动, 163, 164

花园“市郊”和花园“城市”, 164

罗马和柏林的新巴洛克式建筑, 164

美国的房屋建筑, 164—165

绘画中的古典主义, 165

新印象派, 166, 168, 170, 171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 166

新艺术运动（青年派艺术, 自由派艺术）, 170—174, 175, 176

英国哥特式建筑的复兴, 171

巴黎独立派艺术家沙龙, 171

布鲁塞尔的“二十人沙龙”, 171

抽象派艺术, 171—172, 176

分离运动(维也纳), 173

美国的摩天大楼, 175

钢和玻璃结构建筑, 175

20世纪的各学派, 176

拉丁美洲的艺术和建筑, 537—538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 170—174, 175, 176

Arthur, Chester Alan, 阿瑟, 切斯特·艾伦, 美国总统(共和党人), 493

Artificial silk, 人造丝, 3

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 工艺美术品展览协会, 170, 171

Arya Somaj, 雅利安人协会, 179

Asepsis, 防腐技术, 82

Ashanti, 阿散蒂人, 599, 630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569, 570, 573, 575

德国在小亚细亚兴建铁路, 591

Assis, 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阿西斯, 若阿金·玛丽亚·马查多·德, 巴西小说家, 538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fricaine, 国际非洲协会, 26, 253, 603

Astronomy, 天文学, 79

Atlanta University, U.S.A., 美国亚特兰大大学, 186

Atlantic community, 大西洋共同体, 6

Atlantic Quarterly, 《大西洋季刊》, 美国期刊, 504

Aube, Théophile, 奥贝, 泰奥菲尔, 法国海军上将, 232

Auckland, George Eden, 1st Earl of, 奥克兰, 乔治·艾登, 第一代奥克兰伯爵, 414

Auersperg, Prince Adolph, 奥尔施佩格亲王, 阿道夫, 奥地利首相, 333

辞职, 337

Aurore, L', 《震旦报》, 法国报纸, 320

Australasia, 澳大拉西亚

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 6, 54, 397, 398, 399

公共卫生, 20

与太平洋上的扩张活动, 385, 641—642, 648

自治, 386

地方政府, 391

铁路建设, 394, 401

社会立法, 404, 408

教育, 404, 405—406

民族主义, 409

参见Australia, New Zealand各条

Australia, 澳大利亚

人口: 移民, 4, 11, 12, 393, 401—402

经济结构和发展: 粮食出口, 5, 6, 54, 597—599; 关税, 64, 393, 396; 土地所有制, 393; 银行业, 400; 发现黄金, 401

贸易和工业, 5, 6

工会, 16

政治和宪政的发展: 选举权, 29, 390, 391; 自治, 251, 386, 408; 联邦, 386, 393, 407—408; 工党势力的加强, 392; 白人澳大利亚政策, 393, 402; 共和主义, 394

教育, 183, 187, 404, 405—406

防务, 226

昆士兰的棉花和糖, 385

联邦, 386, 393, 407—408

宗教, 405, 406

报纸, 406

致力于在太平洋的扩张, 641—642, 648—649, 663

参见Australasia条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323—324, 330—347

人口, 12, 246; 200万斯拉夫人的拥入, 337

社会结构: 工会, 15; 劳动条件, 31

政治结构和发展; 政府控制的加强, 19, 22; 公民权, 30, 259; 自由主义, 33, 268; 社会主义, 34, 111, 119, 270, 273; 宪法, 104, 219, 244, 259, 331; 反犹太主义, 119, 339; 奥地利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 119; 德意志人集团, 119, 248—249, 275, 332—333, 337, 338, 339; 君主制和民主制, 244; 多民族的结构, 249, 259, 323, 332—333, 338, 340; 与马扎尔人的关系, 249, 331—333, 339—340; 捷克人集团, 249, 273, 332—333, 337, 338—339; 教士的政党, 261; 斯拉夫民族主义, 324, 334—337, 340; 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竞争, 249, 332—333, 339; 加里西亚事务部, 332; 占领波斯尼亚, 335—336, 337, 340, 342, 343, 344, 361; 宪法政府的垮台, 340;

参见Hungary条

经济结构和发展: 所得税, 23; 消费的分配, 331; 关税同盟, 331—332; 1873年的财政危机, 333; 塔菲领导下的财政改革, 338

对外关系: 联盟体系, 39—40; 与柏林会议, 336; 在巴尔干半岛日益增长的影响, 344, 348; 参见与各国关系部分

与德国的关系, 40—41, 104, 119, 223, 244, 274, 275, 287, 288, 323, 331, 546, 551—552, 647; 参见Dual Alliance, Three Emperors' Alliance, Three Emperors' League, Triple Alliance各条

与土耳其的关系, 42, 323—324, 333, 336—338, 342, 348

艺术: 维也纳的新艺术运动, 173—174

武装力量: 维也纳的军事思想, 206; 军备, 207; 战略铁路, 212, 224; 动员准备, 213, 多民族成分, 214; 征兵制, 215; 作为对付民主的手段, 219; 陆军的规模, 217, 219; 与政治问题, 220, 221; 陆军作为国家的象征, 222; 与德国联合制订计划, 223—224; 防务开支, 240; 改革计划, 331; 要求军事占领波斯尼亚领土, 335

内莱塔尼亚, 249, 259, 331, 333

教育: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268

贸易: 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336, 348; 通商道路的重要性, 336, 344

交通运输: 铁路, 336, 338, 344

与俄国的关系, 336, 361, 366—367, 545, 546—548, 551—553, 557; 参见Three Emperors' League条

与意大利的关系, 553—554

Austro-German (Dual) Alliance (1879), 1879年的奥德(两国)同盟, 38, 39n., 40—41, 223, 323, 551—552

Austro-German-Italian (Triple) Alliance (1882), 1882年的奥德意(三国)同盟, 39n., 40, 42, 224, 244, 552, 553—554, 557, 559, 560, 566, 571, 615, 638, 647

Austro-German-Roumanian Alliance (1883), 1883年的奥德罗同盟, 40n., 41

Automatic loom, 自动织布机, 98

Automation, 自动化, 100

Axelrod, 阿克雪里罗德, 他与瑞士劳动解放社, 110

Bacongo, 巴刚果人, 619

Baden, 巴登, 30, 119, 260

Badeni, Count Kasimir Felix, 巴戴尼伯爵, 卡季米尔·费利克斯, 匈牙利政治家, 他的语言法令, 249

Baganda, 巴干达人, 618, 628, 632

Bagehot, Walter, 白哲特, 沃尔特, 英国自由主义者, 他的《物理学和政治学》, 106

Bagh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 297, 591

Bahr-al-Ghazal, 加扎勒河, 601, 622, 623, 624, 625, 630

Baker, James, 贝克, 詹姆斯, 326, 327

Bakunin, Mikhail, 巴枯宁, 米哈伊尔,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269, 359, 362

Balance of Payments, international, 国际支付平衡, 55—56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事务中的均势, 35—37, 47—48, 291, 542—543, 551, 558, 560, 562, 566, 602

经济均势的变化, 47—48, 56

Balfour, Arthur James, 1st Earl of Balfour, 贝尔福, 阿瑟·詹姆斯, 第一代贝尔福伯爵,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他的《信仰的基础》, 409

与防务问题, 592

Balkan affairs, 巴尔干半岛事务, 35, 223, 328—340, 342—348, 544—550, 551, 556—557

民族主义愿望, 25, 323—324, 328, 333—336, 337, 343—345; 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 51, 335, 360, 546—547, 553; 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主义, 324, 334—337, 340

铁路, 51, 297, 336, 348, 591

土耳其割让领土给奥匈帝国, 342

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Berlin, Congress of 条

Balloons, military use of, 气球在军事上的应用, 209, 241

Ballot Act (1872), Great Britain, 1872年英国的无记名投票法, 31

Balmaceda, José Manuel, 巴尔马塞达, 何塞·曼努埃尔, 智利总统, 526

Balmer, J. J., 巴尔默, 科学家, 80

Balta, José, 巴尔塔, 何塞, 秘鲁总统, 523

Baltic provinces, 波罗的海沿岸各省

俄罗斯化, 248, 366

民族对立, 360, 366

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政治活动, 372

参见Estonia, Latvia, Lithuania各条

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 88

Baluba, 巴卢巴人, 619

Baluchistan, 俾路支, 385, 578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 法国小说家, 134

Bancroft, George, 班克罗夫特, 乔治, 美国历史学家, 540

Banking, 银行业, 6, 55—56

在澳大拉西亚, 400

在加拿大, 400—401

在中国, 659—660, 663, 667

在德国, 62, 74, 292, 519

在英国，50，71，399，400—401

在日本，484

在拉丁美洲，519

在俄国，355，365

在土耳其，328，345

Banks, 银行

英格兰银行，56，399，400

达姆施塔特银行，62

巴林银行，71，399，400

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帝国银行，74

柏林贴现公司，292

奥斯曼帝国银行，328

伦敦的登特和帕尔默财团，328

君士坦丁堡各银行，345

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345

俄国贵族土地银行，365

巴克利斯银行，399

格拉斯哥城银行，399

蒙特利尔银行，401

新斯科舍银行，401

伦敦和拉普拉塔河银行，英国南美银行，伦敦和巴西银行，519

德雷福斯公司，523

路特希尔德，内·迈，584，636

俄华道胜银行，659，663，667

汇丰银行, 660

Baratieri, 巴拉蒂耶里, 意大利将军, 626

Barbizon School of painting, 巴比丛画派, 155

Bardo, Treaty of, 巴尔多条约, 596, 597

Baring, Evelyn, 巴林, 伊夫林, 见Cromer, Earl of条

Barnard, Henry, 巴纳德, 亨利, 美国教育家, 186

Barnardo, Thomas John, 巴纳多, 托马斯·约翰, 英国慈善家,
402

Barnato, Barney, 巴纳托, 巴尼, 南非百万富翁, 66

Barrès, Maurice, 巴莱士, 莫里斯, 法国作家, 139, 322

Barrios, Justo Rufino, 巴里奥斯, 胡斯托·鲁菲诺, 危地马拉
总统, 529

Barros, Diego Arana, 巴罗斯, 迭戈·阿拉纳, 智利历史学家,
540

Barthou, Louis Jean Firmin, 巴尔图, 路易·让·菲尔曼, 法
国政治家, 321

Batbie, Anselme-Polycarpe, 巴特比, 昂塞尔姆-波利卡普, 法
国政治家, 302

Batlle y Ordóñez, José, 巴特列·伊·奥多涅斯, 何塞, 乌拉
圭自由主义新闻工作者, 531

Batum, port of, 巴统港, 548, 572

Baudelaire, Charles Pierre, 波德莱尔, 沙尔·皮埃尔, 法国
诗人, 126, 130, 143, 539

Bavaria, 巴伐利亚

政治选举权, 31

教育, 199

在德意志帝国内享有特权，278

Beaconsfield, 1st Earl of, 第一代比康斯菲尔德伯爵，见 Disraeli, Benjamin条

Beale, Dorothea, 比尔，多萝西娅，切尔特南学院院长，197

Beardsley, Aubrey, 比亚兹莱，奥布里，英国艺术家，171

Bebel, Ferdinand August, 倍倍尔，斐迪南·奥古斯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10, 112, 270, 281

Bechuanaland, 贝专纳，594, 635, 636, 637

Beck, Feldzeugmeister, 贝克，军需总监，奥地利总参谋长，213, 214, 218, 223

Becque, Henri, 贝克，亨利，法国剧作家，137

Becquerel, Antoine Henri, 贝克勒尔，安托万·亨利，法国物理学家，80

Bedales School, 比德尔斯学校，199

Bedford Park, 贝德福德公园，第一个花园郊区，164

Beef extract, 牛肉汁，4, 522

Beerbohm, Sir Max, 比尔博姆爵士，马克斯，评论家，127

Beggarrstaff Brothers, (Sir William Nicholson and James Pryde), 贝加斯塔福兄弟，(威廉·尼科尔森爵士和詹姆斯·普赖德)，招贴画艺术家，172

Behrens, Peter, 贝伦斯，彼得，德国建筑师和设计师，174

Beit, 拜特，英国财政家，66

Belgium, 比利时

贸易和工业：工业化，2；自由贸易和关税，8；钢材市场的划分，13；铁的出口，63

社会结构和发展：工会，15, 74；劳动条件，21；社会立法，265

政治结构和发展, 22, 26, 250, 256, 260; 选举权, 30, 261; 自由主义, 33, 264; 教士的政党, 34, 261; 社会主义运动, 110, 270; 天主教团体联合会, 261; 社会立法, 265; 教育中的政教关系, 268

与刚果, 26, 45, 180, 253

国际关系: 利奥波德二世与比利时的国际关系, 26; 中立, 36n.

艺术, “二十人沙龙” 展览会, 171

教育, 183, 188, 268

德国计划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 224

交通运输: 铁路国有化, 273

在华利益 (法比铁路银行团), 663

参见Leopold II 条

Bell Alexander Graham, 贝尔,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苏格兰裔美国发明家, 与电话, 89

Bengal, partition of, 孟加拉的分治, 435, 436

Benin, Bight of, 贝宁湾, 602, 608

Bennigsen, Rudolf von, 卞尼格先, 鲁道夫·冯, 德国自由党人, 263, 278, 291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 英国作家, 114, 115, 119

Bentinck, Lord William, 本廷克勋爵, 威廉, 第一任印度总督, 413, 414, 419, 420, 426, 427, 432

Bergés, 贝尔热, 水力发电的创始人, 57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亨利, 法国哲学家109, 113, 322

Berlin to Baghdad Railway, 柏林—巴格达铁路, 297—298, 591

Berlin Conference on Africa (1884) , 1884年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 38, 45, 253, 555, 584, 587, 605—607, 608, 612

Berlin, Congress of (1878—1879) , 1878—1879年柏林会议, 38, 44, 249, 336, 341, 343, 361, 388, 547, 548—549, 550, 551, 553, 573

Berlin Discount Company, 柏林贴现公司, 292

Berlin Memorandum (1876) , 1876年柏林备忘录, 545

Berlin, Treaty of (1878) , 1878年柏林条约, 337, 342—343, 346, 361, 561, 573

Bernard, Émile, 贝尔纳, 埃米尔, 法国画家, 166—167, 169, 170, 171

Berne Convention (1886) , 1886年伯尔尼公约, 254

Berne Treaty (1874) , 1874年伯尔尼条约254

Bernhardi, Heinrich von, 伯恩哈迪, 海因里希·冯, 德国将军, 219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施坦, 爱德华,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110, 111, 281

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 112, 269

Besika Bay, 贝西卡湾, 545, 572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39n. , 336, 342, 361, 374

Bessemer, Sir Henry, 贝色麦爵士, 亨利, 英国发明家, 51, 95, 230

Bethmann-Hollweg, 贝特曼-霍尔威克, 德国政治家, 297, 299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 Count von, 博伊斯特伯爵,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 奥地利政治家, 331, 333

Bible, 圣经

圣经的校勘, 116—117

圣经在学校中, 195

圣经在英国畅销, 406

Bicycle, 自行车

新式自行车的发展, 3, 97, 395

军队使用自行车, 209

Binet, Alfred, 比纳, 阿尔弗雷德, 法国心理学家, 197

Biology, developments in, 生物学的发展, 80—83, 103—104

Bird, R.M., 伯德, 英国在印度的行政官员, 420

Birmingham University, 伯明翰大学, 181

Bismarck, Otto Edward Leopold von, Prince Bismarck, 俾斯麦,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 俾斯麦亲王, 普鲁士—德国政治家, 帝国首相

与工人保险法, 21, 264, 273, 289

与政治选举权, 29, 280

欧洲政策, 36, 41, 104, 288, 291, 301, 310, 331, 339, 361, 366, 543—560各处, 561, 581, 649

对格莱斯顿的蔑视, 38

与工业界, 61, 286

与对工会的镇压, 74

与国家的最高权力, 188, 289

与陆军的规模, 220, 293

与毛奇的关系, 223

辞职, 224, 294—295

有限责任政策, 236, 248, 275, 562, 579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243

他的国内政策, 250, 257, 263, 275, 276—280, 287—293

他的殖民政策, 252, 292, 555, 587, 593, 605, 612, 616, 632, 635, 647

与政教关系, 267, 287—288

担任帝国首相, 276

他对路德教的信仰, 287

关于预防性战争的见解, 287, 544

他的健康情况和性格, 291—292

向岩仓讲解“现实政治”问题, 470

与埃及, 585, 587, 604—605

Bizet, Georges, 比才, 乔治, 法国作曲家, 322

Björko Agreement, 毕由克协定, 367

Black Sea, 黑海

俄国对巴黎条约条款的谴责, 37, 543, 569

黑海海峡, 548, 549, 554, 556, 561, 569, 570, 572, 581

Blaine, James Gillespie, 布莱恩, 詹姆斯·吉莱斯皮, 美国国务卿(共和党人), 487, 670

Blanc, Jean Joseph Louis, 勃朗, 让·约瑟夫·路易, 法国激进党领袖, 305

Blanco, Antonio Gúzman, 布兰科, 安东尼奥·古斯曼, 委内瑞拉总统, 529

Blanes, Juan Manuel, 布拉内斯, 胡安·曼努埃尔, 乌拉圭画家, 538

Blanqui, Louis Auguste,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法国社会主义者, 271

他的社会革命党, 316

Blignièrès, de, 布利尼埃, 德, 埃及政府官员, 585

Bloch, Jean (Ivan) Gottlieb de, 布洛克, 让(伊凡)·戈特利埃布, 波兰财政家, 他的《现代战争》, 43, 240

Blow, Susan, 布洛, 苏珊, 193

Boer Republics, 布尔共和国, 见South Africa条

Boer War, 布尔战争, 见South Africa条

Bohemia, 波希米亚, 249, 259, 332, 338, 339

参见Czechs条

Boisdeffre, Raoul-F.-C. Le Mouton de, 德布瓦戴弗尔, 拉乌尔, -F.-C. 勒穆东·德, 法国将军, 副参谋总长, 224

Bokhara, 布哈拉, 576, 639

Bolivia, 玻利维亚, 525, 530, 534—535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110, 120, 272, 371, 373

参见Marxism条

Bonchamps, Christian de, 邦尚, 克里斯蒂昂·德, 在非洲, 628

Bonin Islands, 小笠原群岛, 647

Book-Production, 书籍出版业, 98

Booth, Charles, 布思, 查尔斯, 英国船业主, 他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402

Booth, William, 布思, 威廉, 救世军创办人, 他的《最黑暗的英国》, 402

Bornis-Desbordes, 波尔涅斯-戴波德尔, 法国军人, 603

Borgu, 博尔古, 630—631

Borneo, British chartered company in, 英国在婆罗洲的特许公司, 384

Bosanquet, Bernard, 博赞克特, 伯纳德, 英国哲学家, 115

Bosnia, 波斯尼亚, 39n., 334

在土耳其统治下, 328, 330, 333, 342, 544

与奥匈帝国, 333—335, 336, 337, 339, 340, 342, 343, 344, 348, 548

Boulanger, Georges Ernest Jean Marie, 布朗热, 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 法国将军, 221, 256, 293, 310—312, 557

Bourgeois, Léon, 布尔热瓦, 莱昂, 法国激进党领袖, 319

Bourget, Paul, 布尔热, 保罗, 法国作家, 139

Bournville model village, 伯恩维尔式工业村, 69, 164

Bowen, Edward, 鲍恩, 爱德华, 哈罗公学校长, 179

Boxer Movement, 义和团运动, 见China条

Boyen, Hermann von, 博伊恩, 海尔曼·冯, 普鲁士军国主义者, 214

Bradley, Francis Herbert, 布雷德利, 弗朗西斯·赫伯特, 英国哲学家, 他的《伦理研究》, 115

Brabm, Otto, 布拉姆, 奥托, 德国戏剧导演, 142

Brahminism, 婆罗门教, 423

Brailsford, H.N., 布雷斯福德, 他的《钢铁与黄金的战争》, 591

Branco, Baron de Rio, 布兰科男爵, 德·里奥, 巴西政治家, 536

Brazil, 巴西

人口, 12, 521, 524; 欧洲移民, 517—518, 520

政治结构和发展: 君主政体的垮台, 25, 527; 建立巴西合众国, 527

1870年的地位, 516

经济发展: 外国投资, 517, 521; 银行机构, 519; 经济的增长, 520—521; 经济势力的南移, 527

铁路, 520

与邻国的关系, 533—534, 670

武装力量, 534

教育, 537

参见Latin America条

Brazza, Pierre Savorgnan de, 布拉柴, 皮埃尔·萨沃尔尼昂·德, 法国探险家, 驻刚果共和国总专员, 603, 604, 607, 622

Brentano, Lujo, 布伦坦诺, 路约, 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279

Brialmont, Henri, Alexis, 布里阿尔蒙, 亨利·亚历克西, 比利时将军, 208

Brisson, Henri, 布里松, 亨利, 法国政治家, 629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s Society, 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 184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The,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80, 86, 102

British Bank of South America, 英国南美银行, 519

British Cotton and Wool Dyers, 英国棉花和羊毛染色公司, 72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 英国东非公司, 612, 613

British Guiana, 英属圭亚那, 672

British India Association, 英属印度协会, 422, 433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 英属北美法 (1867年), 104

British Soap Makers Association, 英国肥皂制造业协会, 70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英国南非公司, 614

Broglie, Jacques Victor Albert, Ducde, 德·布洛利公爵, 雅克·维克托·阿尔贝, 303

Brougham, Henry, 1st Baron Brougham and Vaux, 布鲁厄姆, 亨利, 第一代布鲁厄姆和沃克斯男爵, 与伦敦大学, 180

Brousse, Paul, 布鲁斯, 保尔, 法国可能派, 111

他的法国社会主义劳工联合会, 316

Bruce's type-casting machine, 布鲁斯的铸字机, 99

Brunetière, Ferdinand, 伯吕纳吉埃尔, 费迪南, 法国批评家, 139

Brunner, Mond and Company, 布伦纳蒙德公司, 化学工厂, 72

Brussels Conference (1874), 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 241, 254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布赖恩, 威廉·詹宁斯, 美国民主党人, 503—504, 677, 684

Bryce, James, 1st Viscount, 布赖斯, 詹姆斯, 第一代子爵, 672

他的《现代民主国家》, 406, 408

他的《美利坚共和国》, 487

Buddhism, 佛教, 433

Buganda, 布干达, 624, 625, 632

Bukovina, 布科维纳, 259, 335, 339

Bulgaria, 保加利亚, 39n.

自治, 25, 244, 249

俄国人与保加利亚, 208, 212, 348, 556—557; “大保加利亚”计划, 547, 556, 571—572

1885—1888年的危机, 223, 233, 347, 556—557, 558

选举权，260

在土耳其统治下，329—330，342，346；“保加利亚惨案”，545，547

与泛斯拉夫主义，335

对罗多皮的穆斯林起义的镇压，343

边界，343，361

民族主义，347

Bullock, William, 布洛克，威廉，发明家，99

Bülow, Prince Bernhard Heinrich von, 比洛亲王，伯恩哈德·海因里希·冯，德国政治家，1900年帝国首相、外交大臣，258，296，297，298

Bulygin, A. S.，布里根，亚·格，俄国内政大臣，377

Bunge, N. Kh.，本格，尼·赫，俄国财政大臣，367，370

Bunnerjea, Surendranath, 班纳吉，苏伦德拉纳特，印度政治领袖，435

Bunsen, R. W. von, 本生，罗·威·冯，德国化学家，79

Burma, 缅甸，385，416，418，448，579，618

Burns, John, 伯恩斯，约翰，英国劳工领袖，403

Buss, Frances Mary, 巴斯，弗朗西斯·玛丽，英国教育家，197

Butler, Ben, 巴特勒，本，美国激进派，502

Butler, Samuel, 勃特勒，塞缪尔，英国作家，125

Buxton, Sir Thomas Fowell, 1st Bt, 巴克斯顿爵士，托马斯·福埃尔，第一代从男爵，英国社会改革家，384

Cables, 海底电缆，见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条：电讯

Caland, 卡兰德，荷兰工程师，53

Calico Printers, 棉布印染公司，72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180

与女子教育, 198

Cameron treaties, West Africa, 卡梅伦条约, 西非, 603

Cameroons, 喀麦隆, 605, 606, 607

Campbell-Bannerman, Sir Henry, 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亨利, 英国自由党领袖, 579

Campos, Martínez, 坎波斯, 马丁内斯, 西班牙将军, 古巴总督, 532

Canada, 加拿大

人口: 移民, 4, 11, 401—402; 亚洲人成分, 393, 401; 向美国的移民, 401, 689—690

经济发展: 关税, 8, 64, 393, 396; 土地授予, 393; 银行业, 400—401

交通运输: 铁路建设, 51, 94, 394, 401; 运河, 395

贸易和工业: 贸易和工业中的海外投资, 67; 木材制造业, 92; 与法国的商业条约, 387; 小麦生产, 397

英属北美法, 104

政治结构和发展: 联邦, 104, 386, 407—408; 自治, 251, 386, 408; 宪法, 389; 政党政治, 393; 社会立法, 404; 民族主义, 409—410; 奥伦治党人协会, 409

教育: 蒙特利尔大学, 181; 宗教因素, 183, 405—406

防务, 226

地方政府, 391; 各省在社会立法方面的责任, 404

讲法语的加拿大人, 405, 409

宗教, 405—406

报纸, 406

与阿拉斯加边界纠纷, 673—676, 679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51, 94, 401

Canals, 运河, 见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条

Canning, George, 坎宁, 乔治, 英国政治家, 415, 424, 425

Canning, Stratford, 坎宁, 斯特拉福德, 外交家, 568

Cape to Cairo route, 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通路, 614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xport of, 投资和资本输出, 4—5, 49—50, 55, 285

与加拿大, 67

与法国, 6

与德国, 4, 55, 285

与英国, 4, 49, 55, 66—67, 394, 400

与印度, 49—50

与拉丁美洲, 49—50, 516—517, 521, 525

与俄国, 355, 367—368, 369, 379

与土耳其, 328, 345, 571

与美国, 4, 49

与西印度群岛, 400

Caprivi, Georg Leo Count von, 卡普里维伯爵, 乔治·利奥·冯, 德意志帝国首相, 俾斯麦的继任者, 221, 295

Caran d' Ache (i.e. Emmanuel Poiré), 卡朗·达什(即埃马纽埃尔·普瓦雷), 法国漫画家, 221

Cardwell, Edward, 1st Viscount Cardwell, 卡德韦尔, 爱德华, 第一代卡德韦尔子爵, 与陆军改革, 226, 227

Carey, Henry, 凯里, 亨利, 美国经济学家, 290, 502

Caribbean, 加勒比海地区, 46

控制权由英国转入美国手中，678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托马斯，历史学家，惠斯勒给他画的肖像，159

Carnarve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4th Earl of, 卡纳尔文第四代伯爵，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英国殖民大臣，634

Carnegie, Andrew, 卡内基，安德鲁，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43, 50, 73, 105, 679

他的《财富的福音》，505

Carnot, Marie François Sadi, 卡诺，玛丽·弗朗索瓦·萨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被刺，318

与非洲，623, 624

Caro, Heinrich, 卡罗，海因里希，科学家，84, 92

Caroline Islands, 加罗林群岛，662

Carpet manufacture, 地毯制造业，98

Cart, Comyns, 卡尔，科明斯，与格罗夫纳画廊，160, 164

Carr, Jonathan, 卡尔，乔纳森，164

Carroll, Lewis (i.e.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卡洛尔，刘易斯（即查尔斯·勒特威奇·道森），英国作家，127

Cartwright, Edmund, 卡特赖特，埃德蒙，英国发明家，74

Cassel, Sir Ernest, 卡斯尔爵士，欧内斯特，66

Castner, H. Y., 卡斯特纳，科学家，89, 90

Cavaignac, Jacques-Marie-Eugène-Godefroy, 卡芬雅克，雅克-玛丽-欧仁-戈德弗鲁瓦，法国激进党领袖，321

Cave, Stephen, 凯夫，斯蒂芬，英国财政部主计长，他关于埃及财政情况的报告，583—584

Cavour, Count Camillo Bensì di, 加富尔伯爵, 卡米洛·本西·迪, 243

Cazemajou, 卡泽马儒, 在西非的法国军人, 630

Céard, Henri, 塞阿尔, 亨利, 法国小说家, 136

Celmán, Miguel Juárez, 塞尔曼, 米格尔·胡亚雷斯, 阿根廷总统, 530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518, 529, 530, 533, 536

Central Labour College (South Wales), 中央劳工学院 (南威尔士) 203

Century, 《世纪》, 美国期刊, 504

Cervera y Topete, Pascual, Count de Jerez and Marquis de Santa Ava, 塞尔维拉·伊·托佩特, 帕斯库亚尔, 赫雷斯伯爵和圣阿瓦侯爵, 西班牙海军上将, 683

Céspedes, Carlos Maria de, 塞斯佩德斯·卡洛斯·玛丽亚·德, 古巴民族领袖, 532

Ceylon, 锡兰

教育, 181, 404

经济的发展, 398

Cézanne, Paul, 塞尚, 保罗, 166—167, 169, 170, 175, 176

Chabrier, Alexis Emmanuel, 夏布里埃, 亚历克西·埃马纽埃尔, 法国作曲家, 321

Chad, Lake, 乍得湖, 见Tchad条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张伯伦, 豪斯顿·斯图尔特, 他的《19世纪的基础》, 108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约瑟夫, 英国政治家

与伯明翰大学, 181

任殖民大臣, 251, 396, 400

与帝国政策, 265, 383, 386, 387, 392, 614, 626, 630, 637, 638

他的地位和政策, 389, 409

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 389

论政党组织, 391

论教育, 405

与外交政策, 571

Chambers, Robert, 钱伯斯, 罗伯特, 生物学家, 80

Chambord, Henri Charles Dieudonné, Comte de, 尚博尔伯爵, 亨利·沙尔·迪厄多内, 法国王位追求者, 302

Chang Chih-tung, 张之洞, 中国湖广总督, 447, 452, 453, 455

他的《中国的唯一希望》(1895年), 179

竭力主张镇压拳匪, 458

与南方各省中立(东南互保), 460

Chanoine, 夏努安, 法国探险家, 631

Chantrey Bequest, 钱特里遗产基金会, 164

Charcot, Jean Martin, 夏尔科, 让·马丁, 法国神经病学家, 137

Charivari and French Impressionists, 嘲讽的批评与法国印象画派, 157

Charmes, Gabriel, 夏尔姆, 加布里埃尔, 法国作家, 232

Chartism, 宪章运动, 202

Chase, Salmon Portland, 蔡斯, 萨蒙·波特兰, 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492

Chatterji, Bankim Chandra, 查特吉, 般金·钱德拉, 印度作家, 431

Chefoo Gonvention, the, 烟台条约, 448

Chekhov, Anton, 契诃夫, 安东, 俄国剧作家, 149—150, 152

Chemical industry,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的发展, 2, 89—93

在法国, 91

在德国, 59—60, 92

在英国, 59, 399

Chemistry, 化学, 83—86, 103

有机化学, 83—84

立体化学, 84—85

溶液的理论, 85—86

Chen Fei, 珍妃, 中国光绪皇帝的妃子, 被杀害, 462

Chernyaev, M. G., 车尔尼亚耶夫, 塞尔维亚司令官, 337

Chernyshevsky,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 俄国社会主义作家, 359

Chevreul, Michel Eugène, 谢弗罗尔, 米歇尔·欧仁, 法国科学家, 165

Ch' ien Lung, 乾隆, 中国皇帝, 445

Children, decline in employment of, 雇佣童工的数目减少, 17

Chile, 智利

经济发展: 关税, 9; 氮的生产, 92; 采矿业, 516, 522, 534; 外资及其发展, 517; 银行业, 519; 经济的增长, 521—522

人口, 12, 521—522; 欧洲移民, 517

铁路, 521

政治结构和发展, 526—527, 528, 531

工会, 531, 532

与太平洋战争, 533—536

与阿根廷的关系, 535—536, 540

教育, 537, 540

China, 中国

人口, 12n.; 土地不足, 442

在中国争夺特许权, 43, 453—454, 563, 658—667, 662—667, 686—687

贸易和工业, 54, 55

教育: 西方的影响, 179

中国沿海的海盗, 235

与法国的关系: 在越南(安南、交趾支那、东京)的冲突, 252, 449—451, 650—652, 653, 654, 658; 天津教案, 437—438, 443—444; 李鸿章—福祿诺贸易协议, 449, 450, 651; 法国要求建立加煤站和修筑铁路的权利, 661; 法比铁路银行团, 663; 参见Arrow War条

太平天国起义, 437, 438, 439, 441, 449, 452, 463

社会结构和发展: 近代化问题, 437, 440, 452—453, 454; 中国人的排外情绪, 437, 439, 448, 454; 新兴的城市商人阶级, 440

外交, 437, 447—451, 644—647, 650—667;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的外交部), 441, 444, 450; 修订条约, 443

同治中兴, 437—440, 442

清王朝, 438, 440—441, 452; 皇位继承制度, 445, 456; 清王朝权力的衰落, 448—449, 450, 453, 461

政治结构和发展: “通向革命的道路”, 438; 第一次垂帘听政, 438, 441—442, 444; 第二次垂帘听政, 446—451; 南方与守旧的北方之间的不和, 452; 百日维新, 454; 义和团战争中南方各省总

督宣布中立，460—461；朝廷出走西安，462；人民对王朝的忠诚，463

通商口岸，439，448

武装力量：建立兵工厂和船坞，439；成立军官学校，453

穆斯林，440；穆斯林作为叛乱者，442，445，447，448

满族的特权，440—441

鸦片战争，440，441

缺乏交通设施，442；修筑铁路和设立电报，452—453

“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442，443，449，450

义和团运动，444，454，457—463，485，565，598，664，677，687

广西省，449，651

“维新派人士”，640

与日本的关系：644—647，652—662各处；通商条约，646；日本的影响，664；为威海卫支付的赔款，686；参见Korea, Sino-Japanese War各条

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664，686—687

与德国、英国、美国的关系，见Germany, Great Britain, United States各条

参见Formosa, Korea, Manchuria各条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中东铁路，659

Ch'ing, Prince (I K' uang), 庆亲王（奕劻），450

Chirol, Valentine, 契罗尔，瓦伦丁，他的《中东问题》，567n.

Choate, Joseph, 乔特，约瑟夫，美国驻伦敦大使，678

Chocano, Jesé Santos, 乔卡诺，何塞·桑托斯，秘鲁诗人，539

Chocolate, 巧克力, 4, 68

Christianity, 基督教, 见 Church and state; Education; Missionary Activity; Religion;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ology; the Vatican各条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教科学派, 117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

奥匈帝国, 119

英国, 202

Chuang, Prince, 庄亲王, 中国支持义和团的亲王, 460

Ch' un, Prince (I Huan), 醇亲王 (奕譞), 恭亲王之弟, 446, 451, 452

Ch' ung Hou, 崇厚, 清朝外交官, 444, 447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between, 政教关系, 117—119, 177, 184—189, 261, 263, 266—268, 304, 314—315

在澳大利亚, 405—406

在奥地利, 268

在比利时, 268

在加拿大, 181, 405—406

在法国, 117, 187, 267—268, 303—304, 314—315

在德国, 267, 287—288

在英国, 181, 184—185, 202, 268, 404—405

在意大利, 117—118, 266, 544

在俄国, 365—366

在美国, 202

在威尔士, 405

参见 Religion;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Vatican各条

Churchill, Lord Randolph, 丘吉尔勋爵, 伦道夫,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389, 391, 392

Circassian refugees from Russia, 来自俄国的切尔克斯难民, 329

Cis-leithania, 内莱塔尼亚, 249, 259, 331, 333; 参见 Austria-Hungary条

City and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 伦敦城市和行会学会, 202

Civil Services, 文官制, 见 Government, reform and increased power of条

Clam-Martinič, Count Henry, 克拉姆-马提尼茨伯爵, 亨利, 捷克人领袖, 333

Clarendon Commission, The, 克拉伦敦委员会, 177—178, 179

Claretie, Jules, 克拉雷提, 朱尔, 法国评论家, 155

Claudé, Paul, 克洛岱尔, 保罗, 法国诗人, 138

Clay, Henry, 克莱, 亨利, 美国演说家和政治家, 490

Clemenceau, Georges, 克列孟梭, 乔治, 法国政治家, 306, 320, 321

Cleveland, Stephen Grover, 克利夫兰, 斯蒂芬·格罗弗, 美国总统(民主党人), 492, 503, 504, 507, 650, 670, 672—673, 680—681, 685

Clothing, ready-made, 成衣, 3, 98

Clough, Anna Jemima, 克拉夫, 安娜·杰迈玛, 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创始人, 198, 203

Coal production, 煤的生产, 3

在法国, 58, 308

在德国, 58, 285

在英国， 58

在印度， 429—430

在俄国， 354， 368

Coats, J. and P., Ltd, 科茨股份有限公司， 13， 72

Cobden, Richard, 科布顿， 理查德， 英国经济学家， 396

Cobden Treaty (1860)， 1860年科布顿条约（英法商约）， 247

Cochin-China, 交趾支那， 449， 450， 650

Cockerton, 科克顿， 英国政府审计官， 190

Colebrooke Commission (Scottish educational endowments)， 科尔布鲁克委员会（调查苏格兰各教育捐款基金会）， 191

Colin, 科兰， 法国陆军上校， 209

Colomb, Philip, 科洛姆， 菲利普， 英国海军少将， 他的《海战》， 234—235

Colombia, 哥伦比亚， 525， 530， 536

Colonial Policies, 殖民政策， 250—254

殖民地的教育， 180

关于自治、托管和联邦的概念， 251

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Colonial rivalries and expansion, 殖民地竞争和扩张， 567—688各处

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Combes, Justin-Louis-Émile, 孔布， 朱斯坦-路易-埃米尔， 法国政治家， 187

Comité de l' Afrique française, 法属非洲委员会， 621

Commune, The Paris (1871)， 1871年巴黎公社

马克思论巴黎公社，105

巴黎公社的性质，301

Communications，交通，见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条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101，406

Compulsory insurance，强制保险，21，24，264

Comte, Auguste, 孔德，奥古斯特，法国实证主义者，106，117

Concert of Europe，欧洲协同体，43，45，48，545—546，
550，553，559

基本原则，37

1871年以后幸存下来，37

欧洲协同体的衰落，38—46，542—550

Concrete，混凝土，3

Confédération Cénéréal du Travail，劳动联合总会，74

Conger，康格，美国驻北京公使，461

Congo，刚果，26，253，555，603—604，605，606—607，610，
621，624—625，630，632，636

自由国的国际地位，45，606

刚果的教育，180

参见Berlin Conference条

Conrad, Joseph, 康拉德，约瑟夫，英国小说家，125，126

Conrad, M. G.，康拉德，《社会》杂志主编，142

Conradi, Hermann, 康拉第，赫尔曼，德国作家，143

Conscription，征兵制，41，188，204，214—217，219，225

Conservation，trend towards，保守的倾向

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保守倾向, 25—34, 244—245, 513—515,
692—693

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保守倾向, 34—36, 243, 248

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Consolidated Gold Fields, 统一金矿, 636

Constable, John, 康斯太布尔, 约翰, 英国画家, 印象画派的先驱, 157

Constantinople Conference, The (1876), 1876年君士坦丁堡会议, 38, 546

Consumer Goods, 消费品, 4, 17, 68—69

Contemporary Review, 《当代评论》(英国期刊), 105

Co-operative Societies, 合作团体, 14—16

Coppée, François, 科佩, 弗朗索瓦, 法国诗人, 138

Copper, 铜, 93—94

Coptic Church, in Africa, 非洲的科普特基督教会, 620

Corbett, Sir Julian, 科贝特爵士, 朱利安, 英国历史学家,
234

Corbière, Tristan, 科比埃, 特里斯坦, 法国诗人, 131

Cornell, Ezra, 康奈尔, 埃兹拉, 美国电报承包商和慈善家,
182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182, 183

Cornwallis, Charles, 1st Marquis, 康华理, 查尔斯, 第一代侯爵, 420

Cotton, Sir Evan, 科顿爵士, 埃文, 英国律师, 印度国大党主席, 434

Cotton, world production, 世界棉花生产, 3

在昆士兰，385

在印度，399，429，434

在美国，399

Courbet, Gustave, 库尔贝，古斯达夫，法国画家，155，158，163，538

Courcel, de, 库塞尔，德，法国外交家，605

Crampel, Paul, 克朗佩尔，保罗，法国非洲探险家，621

Crete, 克里特岛，348，573

Creusot, armament manufacturers, 勒克勒佐军火工厂，13

Crispi, Francesco,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意大利政治家，33，252，257，265，593，614，616，626

Coratia, 克罗地亚，333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334，337，338，340

Croce, Benedetto, 柯罗齐，贝内戴托，113，116，268

Cromer, Evelyn Baring, Earl of, 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386，583，584，585，586—587，589，591，592，600—602，613，615，622，626

他的《近代埃及》，574

与英埃苏丹，590，627

Cross, R. A. , 1st Baron, 克罗斯，第一代男爵，英国内政大臣，392

Crossfields of Warrington, 沃林顿的克罗斯菲尔德，63

Crystal Palace, 水晶宫，175

Cuba, 古巴

推翻西班牙的统治，25，238，516，524，533，680—683

美国与古巴，239，532—533，680—683；普拉特修正案，533

外国投资和经济的增长, 517, 525

1868—1878年的独立战争, 524, 532

人口和移民, 525

民主的理想, 531

Cunha, Euclýdes da, 达·库尼亚, 欧克利德斯, 巴西作家, 538

Cunningham, Sir Alexander, 坎宁安爵士, 亚历山大, 英国军人
和考古学家, 434

Curie, Marie (née Skłodowska), 居里, 玛丽(母家姓斯克罗
多夫斯卡), 波兰物理学家, 57, 80

Curie, Pierre, 居里, 皮埃尔, 法国物理学家, 57, 80

Curzon, George Nathaniel, Marquis Curzon of Kedleston, 寇
松, 乔治·纳撒尼尔, 凯德莱斯敦的寇松侯爵

任印度总督, 386, 395, 431, 435—436, 591

入侵西藏, 416

改革加尔各答大学, 428

孟加拉的分治, 435

他的《俄国在中亚》, 570

Cyprus, 塞浦路斯

英国占领该岛, 251, 548, 553, 573, 575

土耳其来自塞浦路斯的税收, 346

Czechs, 捷克人

与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关系, 249, 332—333, 338—339

社会主义, 273

民族主义, 332—333, 337—339

青年捷克党, 338—339

Dahn, Felix, 达恩, 费利克斯, 德国小说家, 141

Dahomey, 达荷美, 603, 610, 618, 621, 632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406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使用金属印版, 99

发表文章《德皇在英国》, 298—299

Dakota, wheat exports, 达科他州, 小麦出口, 5

Dalhousie, James Andrew Broun-Ramsay, Marquis of, 大贺胥侯爵, 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 任印度总督, 415—416, 417, 418, 419, 421, 422, 425, 427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333, 334, 335, 339

Danilevsky, Nicholas Y., 达尼列夫斯基, 尼古拉·雅, 俄国社会学家, 108, 360

Darío, Rubén, 达里奥, 鲁宾, 尼加拉瓜诗人, 539

D'Armar, 德阿马尔, 他的《潜艇与对英战争》, 232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博物学家

进化论, 80—82

《人类起源》, 101, 102

《物种起源》, 102

与卡尔·马克思, 103

与尼采对比, 113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

对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 81, 101—109, 114, 194—195, 232, 360, 409, 505—506, 507, 640, 671, 679, 692

“适者生存”, 194

Daubigny, Charles-François, 多比尼, 沙尔-弗朗索瓦, 法国画家, 155

Daudet, Alphonse, 都德, 阿尔丰斯, 法国小说家, 137

Dauthendey, Max, 道滕代, 马克斯, 德国诗人, 144

Davies, Emily, 戴维斯, 埃米莉,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创始人, 198, 200

Davy, Humphry, 戴维, 汉弗莱, 89

Daza, 达萨, 玻利维亚总统, 534—535

Deak, Francis, 德亚克, 费伦茨, 匈牙利政治家, 334

Death duties, 遗产税, 23—24

Death-rate, 死亡率

死亡率的下降, 20, 24

婴儿死亡率, 24

俄国的死亡率, 369

De Beers, 德比尔斯公司, 636

Debussy, Claude Achille, 德彪西, 克劳德·阿希尔, 法国作曲家, 137, 322

Decazes, Louis Charles, 德卡兹, 路易·沙尔, 法国外交部部长, 544

Defence League (Germany), 国防协会(德国), 296—297

Degas, Edgar, 德加, 埃德加, 法国印象派画家, 155, 156, 157, 159, 160, 168, 172

Dehmel, Richard, 戴默尔, 理查, 德国诗人, 144

Delagoa Bay, 迪拉果阿湾, 637—638

Delane, John Thaddeus, 德兰, 约翰·撒迪厄斯, 伦敦《泰晤士报》编辑, 406

de la Torre, Lisandro, 德拉托雷, 利桑德罗, 阿根廷自由主义者, 530

Delcassé, Théophile, 德卡塞, 泰奥菲尔, 法国政治家, 625

Delyanov, I. D., 捷里扬诺夫, 伊·达, 俄国教育大臣, 364

Democracy, 民主, 26—28, 32—33, 110, 255—262

在德国, 277, 279

在英国, 31, 110, 244, 255, 390—393, 403—404, 408

在印度, 431—433; 民主和维多利亚女王, 394

Demolin, 德莫兰, 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是怎样产生的? 》, 192

Denis, Maurice, 德尼, 莫里斯, 法国评论家, 170

Denmark, 丹麦

农业, 8, 200, 398

贸易和工业: 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8, 200, 397; 自由贸易, 8

社会结构: 劳动条件, 21

政治结构和发展: 有限制的选举权, 30; 社会立法, 265; 社会主义政党, 270

德国的丹麦人少数民族, 44, 249, 282

与德国的战争, 104; 丧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200

教育: 教师协会, 185; 教育的世俗地位, 187; 成人教育, 200—201

Dent, Palmer of London, 伦敦的登特和帕尔默财团, 贷款给土耳其政府, 328

Depretis, Agostino, 德普列蒂斯, 阿戈斯蒂诺, 意大利政治家, 33, 257

Derby, Edward Henry Smith Stanley, 15th Earl, 德比, 爱德华·亨利·史密斯·斯坦利, 第十五代伯爵

论帝国主义, 265, 612

论英国在中东的利益, 569

论埃及, 583

Dernburg, 德恩伯格, 德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682

Déroulède, Paul, 戴鲁莱德, 保罗, 法国政治家, 221

Derozio, 德罗齐奥, 在印度的影响, 430

Derrécagaix, Victor-Bernard, 戴莱加盖, 维克托-贝纳, 法国将军, 他的《现代战争》, 211, 213

D' Estournelles, Baron, 德斯土尔内耳男爵, 与国际合作, 43

Détaille, Jean Baptiste Édouard, 德泰, 让·巴蒂斯特·爱德华, 法国战争画家, 221

Deussen, 多伊森, 德国东方学家, 433

Devonshire, 8th Duke of, 第八代德文希尔公爵, 见Hartington 条

Dewey, George, 杜威, 乔治, 美国海军上将, 238, 683

Dewey, John, 杜威, 约翰, 美国哲学家, 202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104, 112

Díaz, Porfirio, 迪亚斯, 波菲里奥, 墨西哥总统, 524, 528—529

Dicey, Albert Venn, 戴西, 艾伯特·维恩, 英国法学家

《英国19世纪法律与舆论的关系讲演集》, 114

《宪法之法的研究导论》, 114n.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尔斯, 英国小说家, 137, 193, 407

Diesel engines, 内燃机, 96

Dilke, Sir Charles Wentworth, 迪尔克爵士, 查尔斯·温特沃思, 英国激进派政治家和作家, 52, 227

他的《大英帝国问题》, 265

论埃及政策, 585, 589

Dilthey, Wilhelm, 狄尔泰, 威廉, 115

Disarmament proposals, 裁军建议, 43, 241

Disraeli, Benjamin,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 迪斯累里, 本杰明, 第一代比康斯菲尔德伯爵, 英国保守党领袖

与参政权, 29

与苏伊士运河, 53, 584

与劳资协议法, 75

论国家教育, 184

与议会活动, 255

他的地位和政策, 387, 388, 408; 帝国政策和殖民政策, 251, 383, 388, 407, 603; 与对外政策, 431, 571, 572, 573

逝世, 389

与劳工选票, 392

论英俄竞争, 575

论通往印度的路线, 598

与西非, 603

Dodds, Alfred Amédée, 多兹, 阿尔弗雷德·阿梅代, 法国将军, 621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516, 530

Dooley (i.e. Dunne, Finley Peter), 杜利 (即邓恩, 芬利·彼得), 美国幽默家, 73

Dorgut Pasha, Dervish, 多尔古特帕夏, 德尔维希, 土耳其军司令, 344

Douglas, Stephen Arnold, 道格拉斯, 斯蒂芬·阿诺德, 美国民主党人, 489

Dragomiroff, 德拉格米罗夫, 俄国将军, 209

Dreikaiserbund, 三皇同盟, 见Three Emperors' Alliance and League条

Dreyfus, Alfred, 德雷福斯, 阿尔弗雷德, 法国陆军上尉

“德雷福斯案件”, 120, 216, 222, 263, 319—321, 629

左拉为德雷福斯的辩护, 135

Dreyfus et Cie, 德雷福斯公司, 法国银行, 523

Drumont, Édouard, 德律蒙, 爱德华, 与反犹太主义, 108, 321

Dual Alliance (Austria-Hungary and Germany, 1879), 两国同盟 (奥匈帝国和德国, 1879), 38, 39n., 40—41, 223, 323, 551—552

Duff, Alexander, 达夫, 亚历山大, 在印度的苏格兰传教士, 420, 430

Dufferin and Ava,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 Temple Blackwood, 1st Marquis of, 第一代达弗林和阿瓦侯爵, 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

任印度总督, 425, 432, 435

论埃及, 586

Dupré, 杜白蕾, 法国海军上将和交趾支那总督, 650

Dupuis, Jean, 迪皮伊, 让, 法国高人, 650

Dupuy de Lôme, 迪皮伊·德·洛姆, 法国海军上将, 228

Durand-Ruel, 迪朗-吕艾尔, 艺术品商人, 157

Duret, Théodore, 迪雷, 泰奥多尔, 他的《印象派画家》, 157

Durham University, 达勒姆大学, 创立福拉湾学院, 180

Durkheim, Émile, 涂尔干, 埃米尔, 法国社会学家, 117

Durnovo, P.N., 杜尔诺沃, 彼·尼, 俄国内政大臣, 367, 378

Duruy, Victor, 杜律伊, 维克多, 法国教育家, 191, 199, 200

Dybowski, 迪波夫斯基, 法国非洲探险家, 622

Dyestuffs, 染料, 见Chemical industry条

Dynamite, 甘油炸药, 93

Dynamite Trust Ltd, 甘油炸药托拉斯有限公司, 13

Eastern Question, The, 东方问题, 35, 37—38, 44—45, 544—561各处

 参见Turkey条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412

Ebner-Eschenbach, Marie von, 埃布纳-埃申巴赫, 玛丽·冯, 德国作家, 141

Eckmann, Otto, 埃克曼, 奥托, 德国艺术家, 171—172

Economic organisation, increase of, 经济组织的增加, 12—14, 21, 61, 71—75

Economist, The, 《经济学家》, 英国期刊, 394

Ecuador, 厄瓜多尔, 525, 530, 536

Edinburgh University, 爱丁堡大学, 181, 198

Edison, Thomas, 爱迪生, 托马斯, 美国发明家, 白炽灯的发明, 87—88

Education, 教育, 20, 24, 32, 177—203

 国家管理和世俗化, 20—21, 177, 184—189, 304

 科学的重要性, 59, 177, 179, 183; 194—197

 现代学科, 179

殖民地教育, 180

大学教育, 180—183

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 184—185

义务教育, 184, 187, 188, 189

教师团体, 185

中等教育制度, 189—193

教育理论, 193—194

妇女教育, 197—200

男女同校教育, 199

成人教育, 200—203

非洲的教育, 180

澳大拉西亚的教育, 183, 187, 404—406

奥地利的教育, 268

比利时的教育, 183, 188, 268

加拿大的教育, 183, 405—406

锡兰的教育, 181, 404

中国的教育, 179

芬兰的教育, 201

法国的教育, 117, 178—179, 182, 185, 187, 191—193, 199—200, 267—268, 313

德国的教育, 59, 178, 182, 187—188, 191, 196, 199, 201, 288, 404

英国的教育, 20, 59, 177—184, 189—194, 196—199, 391, 404—405

印度的教育, 22, 179, 404, 413, 415, 420—421, 425, 427, 431, 435

日本的教育, 20, 179, 472, 474

拉丁美洲的教育, 537, 540

荷兰的教育, 268

俄国的教育, 188, 358—359, 364—365

斯堪的纳维亚的教育, 183, 185, 187, 197, 200—201

西班牙的教育, 188—189

瑞士的教育, 183, 185—187, 196—197, 199—201

土耳其的教育, 326, 350

美国的教育, 182—183, 186—187, 197, 199, 202, 500, 504, 511

Egypt, 埃及, 346, 546, 567, 574

英国与埃及, 35, 38, 45, 251, 347, 385, 386, 554—555, 557, 561, 564, 579, 583—592, 594, 595, 597—602, 605, 613, 615, 617, 622—629; 俾斯麦建议索尔兹伯里“占领埃及”, 550; 亚历山大遭到炮击, 579, 586, 599, 601

向土耳其纳贡, 328

法国与埃及, 554—555, 559, 560, 584—590, 600, 601, 611, 622—629

欧洲债券持有者的利益, 555, 583, 584, 595, 597

两国(英法)共管, 585, 587, 597—599, 604

1879—1882年的民族主义革命, 594, 597

对埃及危机的反应, 608, 610, 611, 612, 613, 629, 632

民族主义, 632, 640

参见Sudan, Suez Canal条

Ehrlich, Paul, 埃尔利希, 保罗, 科学家, 82, 83

Fiffel, Gustave, 埃菲尔, 居斯塔夫, 法国建筑家, 175

Eiffel Tower, 埃菲尔铁塔, 96, 175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 德国出生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79

Eldon, John Scott, 1st Earl of, 第一代埃尔登伯爵, 约翰·斯科特, 415

Electrical industry, 电力工业, 2

水力发电, 57

德国的电力工业, 60, 88, 285

技术的进步, 86—89

英国的电力工业, 87—88

Electricity, 电学, 2, 78—79

Elgin, Victor Alexander Bruce, 9th Earl of Elgin and 13th Earl of Kincardine, 额尔金, 维克托·亚历山大·布鲁斯, 第九代额尔金伯爵和十三代金卡丁伯爵, 任印度总督, 432, 433

El Hadj Omar, 埃尔·哈吉·奥马尔, 西非穆斯林领袖, 610

Eliot, Charles William, 埃利奥特, 查尔斯·威廉, 哈佛学校长, 182

Eliot, George, 爱略特, 乔治, 英国小说家, 140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st Earl of, 第一代埃伦伯勒伯爵, 爱德华·劳, 英国政治家, 任印度总督, 414, 417

Ellis, Peter, 埃利斯, 彼得, 英国建筑家, 175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埃尔芬斯通, 蒙斯图尔特, 英国在印度的行政官员, 427

Emigration from Europe, 来自欧洲的移民, 4, 30, 247, 688—693

参见Population条

Emin ' Alī Pasha, Mehmed, 埃明·阿里帕夏, 穆罕默德, 土耳其首相, 324, 325, 326; 他的死, 327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101, 102, 103, 109, 110

他的《反杜林论》, 102, 103

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法德农民问题》, 103

他的《自然辩证法》, 106n.

与《资本论》第2, 3卷, 268

Engineering Employers Federation, 工程界雇工联合会, 75

English Agricultural Society, 英国农业学会, 397

Eötvös, Baron Joseph, 埃特韦什男爵, 约瑟夫, 匈牙利政治家, 334

Erfurt Programme, 爱尔福特纲领, 111

Eritrea, 厄立特里亚, 615

Eros fountain, London, 伦敦厄洛斯(爱神)喷泉, 171

Espinas, Alfred, 埃斯皮纳斯, 阿尔弗雷德他的《动物社会》, 105

Esterhazy, Marie Charles Ferdinand

Walzin, Count, 埃斯特哈济伯爵, 玛丽·查理·斐迪南·瓦尔金, 320

Estonians, 爱沙尼亚人, 366, 372

参见Baltic provinces条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252, 593, 599, 613, 614—615, 620, 623, 625—627, 632, 640

在阿杜瓦击败意大利人, 252, 626

法国—埃塞俄比亚远征法绍达, 628

Étienne, Eugène, 艾蒂安, 欧仁, 法国负责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事务的副国务秘书, 610, 621

Eto Shinpei, 江滕新平, 日本武士叛乱领袖, 476

Eugénie, Empress, 欧仁妮皇后, 为苏伊士运河开航, 53

Europe, 欧洲

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1, 42, 45—47, 49—56, 246—247, 562—566; 与中东的关系, 567—592; 与非洲的关系, 593—640; 与远东的关系, 641—667; 与美国的关系, 668—693

从欧洲的移民, 4, 30, 247, 688—693

资本输出, 4—5, 49—50, 55

欧洲的民族国家, 25, 44, 243—244, 248—251, 274

欧洲协同体, 37, 43, 45, 48, 545—546, 550, 553, 599; 参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条

Evolution, 进化论, 见Darwin和Darwinism各条

Explosives, 炸药, 92—93

Fabian Society and Fabianism, 费边社和费边主义, 108—109, 269, 270, 272

Factory legislation, 工厂立法, 21, 24

Faguet, Émile, 法盖, 埃米尔, 法国评论家, 117

Faidherbe, Louis Léon César, 费德尔布, 路易·莱昂·塞扎尔, 法国将军, 603

Falk, Adalbert, 福尔克, 阿道尔伯特, 普鲁士政治家, 188, 266

Family, decline in size of, 家庭规模的缩小, 17

Faraday, Michael, 法拉第, 迈克尔, 英国科学家, 78, 86, 88

Farming, 农业耕作, 见Agriculture条

Fashoda crisis, 法绍达危机, 见Sudan条

Fauré, Gabriel Urbain, 福莱, 加布里埃尔-于尔班, 法国作曲家, 322

Fawcett, Philippa, 福塞特, 菲利普, 198

Fénéon, Félix, 费内昂, 费利克斯, 法国评论家, 165—166

Ferdinand of Coburg, 科堡的斐迪南, 与保加利亚的王位, 557

Fergusson, James, 弗格森, 詹姆斯, 苏格兰艺术史家, 434

Ferranti, Ziani de, 费朗蒂, 齐阿尼·德, 发明家, 与德特福德发电厂, 87

Ferry, Jules François Camille, 费里, 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 法国政治家, 187, 305, 306, 311, 587, 593, 595, 596, 604—605, 606, 607, 647—648, 651

Fertilisers, 肥料, 91—92

Fichte, Immanuel Hermann von, 费希特, 伊曼努尔·赫尔曼·冯, 德国哲学家, 200

Figaro, 《费加罗报》

与印象派画家, 157

与德雷福斯案件, 320

Fiji Islands, 斐济群岛, 385, 386, 393, 401, 639, 641—642, 649

fin de siècle, 世界末日, 121, 159

Finance, international, 国际金融, 6, 55—56

Finland, 芬兰, 29, 201, 248, 372, 374, 381

Fisher, John Arbuthnot, 1st Baron Fisher, 费希尔, 约翰·阿巴思诺特, 第一代费希尔男爵, 英国海军上将, 海军大臣, 222, 223

论潜水艇, 232

Fisk University, U.S.A., 美国菲斯克大学, 186

Fizeau, Armand Hyppolyte Louis, 菲梭, 阿蒙·伊波利特·路易, 法国物理学家, 79

Flatters, Paul-François-Xavier, 弗拉泰尔斯, 保罗-弗朗索瓦-格扎维埃, 法国的非洲探险家, 621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居斯塔夫, 法国小说家, 126, 132, 134, 136, 140, 141

Flores, Venancio, 弗洛雷斯, 贝南西奥, 乌拉圭政治领袖, 530

Fonseca, Manoel Deodoro da, 丰塞卡, 马诺埃尔·迪奥多罗·达, 巴西第一任总统, 528

Fontane, Theodor, 冯塔纳, 泰奥多尔, 德国作家, 139, 140, 141, 142

Fontanier, 丰大业, 法国驻天津领事, 437, 444

Formosa, 福摩萨(台湾)

1895年割让给日本, 453, 484, 657—658

1884年法国进攻台湾, 651

19世纪70年代中日关于台湾的争执, 645—647

Fortnightly Review, 《双周评论》, 英国期刊, 117

Forum, 《论坛》, 美国期刊, 504

Fouillée, Alfred, 富耶, 阿尔弗雷德, 法国社会理论家, 117

Fourah Bay College, 福拉湾学院, 180

Foureau, Fernand, 富罗, 费尔南, 法国探险家, 622, 631

Fournier, François Ernest, 福禄诺, 弗朗索瓦·欧内斯特, 法国在中国的海军上将, 与李鸿章一福禄诺贸易协定, 449, 450, 651

France, 法国

贸易和工业：工业的发展，3，57；冶金工业，3，57，96，308；出口贸易，7，56，57，63，307；原料进口，54；纺织工业，57，308；煤，58，308；萧条的年代，307—308

经济结构和发展：投资，4；关税，8，64，309；经济的衰落，307—309；税收，319；在拉丁美洲的金融利益，519；向奥斯曼帝国提供的贷款，571

人口，12，48，245，246，247，308—309

农业，14，307，309；葡萄的灾害，307；拥有土地的农民人数增加，309

社会结构和发展：工会和工人团体，15，74，112，312，313，315—316；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21，309；来自意大利的移民，247；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和区域观念的心理状态，261；阶级结构，300；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变化，309；社会改革，313—314；总罢工的主张，317；劳工联合会，317；反犹太主义，321；知识界的生活和其他阶层生活的差别，321—322

第二帝国的崩溃，25，542

政治结构和发展：机会主义者，27，305—307，310—314，315，318，321；自由行动党，33；巴黎公社，104，105，301，315，322；法国工人党，或称盖德派（马克思主义者），110，271，316—317；可能派，111，270，316；政教关系，117，187，267—268，303，304，314—315；共和运动，244，263，301—302，304，318；宪法，249—250，256，302，303—304，306—307；政党的软弱，259，261—262；选举权，260，322；社会立法，265，312—314；社会主义政党，270，271，314，315—318，321；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内阁，272；选举：1871年，301—302；1876年，303；1877年，304；1885年，310，314；1889年，312，314；1893年，315，317；保皇派，301，302，311，315，318；道德秩序内阁，303；赋予基本自由，305；激进党人，305—307，310，315，318，320；贝尔维尔纲领，306；保守党人，310，312，314，317；反议会趋势，310；布朗热运动，310—312，313，314，315，316，322；民族主义，310，322，557；（天主教）归顺派，314—315，318，321；农村选民的影响，313，319；法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316；社会革命党，316；工

会联合会, 316; 无政府主义者, 316, 318; “巴拿马(运河公司)事件”中的贿赂行为, 317—318; 政治性报纸, 318; 卡诺总统被刺, 318; 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和解, 318—319; 财政制度, 319; 由德雷福斯案件引起的重新组合, 320; 反犹太主义, 321

与德国的关系, 36, 310, 544, 554—555, 604—606, 616;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和, 111; 施奈贝累事件, 310;

参见Franco-Prussian War条

与意大利的关系, 39

与俄国的关系, 39—40, 216, 224—225, 312, 366—367, 546, 557, 561, 601, 657—658; 参见Franco-Russian alliance条

与中国的关系, 42; 在天津, 437—438, 443—444; 在越南(安南、交趾支那、东京)的冲突, 252, 449—451, 650—652, 653, 654, 658; 李鸿章—福禄诺贸易协议(1883年), 449, 450, 651; 要求建立加煤站和修筑铁路的权利, 661; 法比铁路银行团, 663

殖民政策和扩张, 42, 180, 252, 312, 384, 575; 在赤道非洲, 252, 611, 619, 621—623, 629—630, 631; 在西非, 560, 602—606, 608—611, 620—625, 629—631, 632; 统一的法属非洲概念, 610, 621; 阿尔及利亚、法属苏丹和法属刚果的联合, 631; 参见Algeria, Morocco, Tunisia, Vietnam各条

交通运输: 铁路, 51

巴黎展览会: 1881年, 87, 97; 1889年, 175

教育, 117, 178, 172, 182; 中学体制, 178, 189, 191—193; 教师协会, 185; 国家管理和世俗化, 187, 267—268, 304—305; 义务教育, 187, 267—268, 313; 妇女教育, 199—200; 成人教育, 201; 驱逐耶稣会会士出教育界, 304

德雷福斯案件, 120, 216, 222, 263, 319—321, 629; 各政党的态度, 320—321; 参见Dreyfus, Alfred条

文学, 126, 130—139, 322

艺术与建筑，154—159，165—176，321—322

武装力量和军备：军事理论，206，209；勒贝尔式步枪，207；步兵操典，209；依靠质量，211；动员准备，211，213；战略铁路，212；军事改革和征兵制，216，223，293，310—311，543；海外军事义务，216，225；陆军编制的规模，217；与德国的比较，286，293；总参谋部（玛丽亚·特雷西亚学院），218；军官的社会成分，219；军队与政治事件，219，220，224；团结精神，221；声誉，221—222；防务开支，240

海军事务：海军的重要性居第二位，228；铁甲舰，229；发展海军的先驱，231—233；潜艇的优势，231—232；与英国的海军竞赛，570

与日本的关系：赴日军事使团，239

地方政府：市长的任命，305

音乐，322

外交：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利益，348；重新采取积极的政策，544；在利凡得，571；参见与各有关国家的关系各条

与埃及，559，560，584—590，611，622—629，630

与英国的关系，见Great Britain条

France, Anatole, 法朗士，阿纳托尔，法国作家，139，322

Franchise, 选举权，见Surfrage条

Francis Joseph, 弗兰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

与马扎尔人结盟，331—333

宪法改革，331

与德意志人，332

与捷克人，333

与柏林条约，337

权力的增加，338

Franck, César, 弗兰克, 塞扎尔, 法国作曲家, 322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35, 36, 104, 192, 244, 542—543

法兰克福和约, 204, 222, 302, 542, 544

法国崩溃的原因, 205

普法战争中的军备, 206, 207, 208, 212

战争中骑兵的大屠杀, 210

德国战略的成功, 211

对德国统一的影响, 274

色当战役, 274

和谈, 301

Franco-Russian Alliance (1892—1894), 1892—1894年法俄同盟, 39n., 40, 42, 224—225, 312, 366, 552, 558, 559—560, 566, 570, 613, 623, 657, 658

Frankfurt, Bismarck's annexation of, 俾斯麦并吞法兰克福, 278

Frankfurt, Peace of (1871), 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 204, 222, 302, 542, 544, 561

Frankland, Sir Edward, 弗兰克兰爵士, 爱德华, 英国科学家, 氮的命名, 79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王, 210

Frederick III, 弗里德里希三世, 德国皇帝, 293

Frederick William IV of Prussia,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相信君权神授, 188

Free Trade, decline of, 自由贸易的衰落, 1, 7—8, 64, 264—265

参见Tariffs and Free Trade条

Freeman, E. A. , 弗里曼, 爱·奥, 与种族主义, 108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法属赤道非洲, 252, 611, 619, 621—623, 629—631

参见各属地条

Frere, Sir (Henry) Bartle Edward, 弗里尔爵士, (亨利·) 巴特尔·爱德华, 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576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心理学家, 113, 115, 120, 125

《释梦》, 120

Freycinet, Charles de, 弗雷西内, 沙尔·德, 法国陆军部长, 216, 224, 314, 587, 598, 607

Friendly Societies, 互助会, 14—16

Froebel,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福禄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 德国教育家, 193

Fu' ād Pasha, Mehmed Kecheji-zāde, 法德帕夏, 穆罕默德·克谢吉-扎德, 土耳其首相, 324, 325

Fulani emirate, 富拉尼人的酋长国, 609—610

Gabon, 加蓬, 603, 607

Gaj, 盖伊,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334

Galicia (Polish Austria), 加里西亚 (波属奥地利), 332, 339

Galié, Émile, 加莱, 埃米尔, 法国艺术家, 171, 173

Gallegos, 加列戈斯, 拉丁美洲作家, 538

Galliéni, Joseph Simon, 加利埃尼, 约瑟夫·西蒙, 法国军人, 225, 606, 608, 610

Galli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 marquis de, 加利费侯爵,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法国将军, 216

Gallipoli peninsula, 加利波利半岛, 572, 573

Gambetta, Léon Michel, 甘必大, 莱昂·米歇尔, 法国共和党领袖, 301, 306, 543, 585, 596, 597, 598, 614

Gambia, 冈比亚, 602, 610

Gamboa, Federico, 甘博亚, 费德里科, 墨西哥作家, 538

Gana, Alberto Blest, 加纳, 阿尔维托·布莱斯特, 智利作家, 538

Gandhi, Mohandâs Karamchand, 甘地,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 印度领袖, 435

Gandu, 甘杜, 尼日利亚酋长国, 606

Gapon, G. A., 加邦(神甫), 格·阿, 俄国工人领袖, 376

Garden cities, 花园城市, 69, 164

Garfield, James Abram, 加菲尔德, 詹姆斯·艾布拉姆, 美国总统(共和党人), 670

Gaudí, Antoni, 高迪, 安东尼, 西班牙建筑师, 154, 173—174, 175, 176

Gauguin, Paul, 高庚, 保罗, 法国画家, 156, 166—168, 169, 170, 171, 175, 176

Gautier, Théophile, 戈蒂埃, 泰奥菲尔, 法国诗人, 130

General stores, development of, 百货商店的发展, 68

Geneva Convention (1864), 1864年日内瓦公约, 241

Gentil, 让蒂尔, 法国的刚果探险家, 631

Genyosha, 玄洋社, 日本政治组织, 483

Geography, increased knowledge of, 地理知识的增加, 4

Geology, 地质学, 2, 4—5

George, Henry, 乔治, 亨利, 美国经济学家

他的《进步和贫穷》，108，506—507

他的单一税，392

George, Stefan, 盖欧尔格，斯蒂凡，德国诗人，143—145

Georgia (Russia)，格鲁吉亚（俄国），372

German Association of the Eastern Marches, The, 德国东进协会，292，296

German Colonial Union, The, 德国殖民协会，296

German East Africa, 德属东非，252，292，612—614，632

German East Africa Company, 德国东非公司，612

Germanisation of Poles, 波兰人的德意志化，44，249，292—293

Germany, 德国

贸易和工业：工业生产，3，30，47，58—60，285；棉花，3；钢铁，13，48，51，58，74，95，285，290，398；商船，52；与英国的竞争，54，56，58—64，395—396，398—399，605；出口贸易，56，60，285，295；煤，58，285；化学制品，59，285，399；电子工业，60，285；卡特尔，72—74，291；染料工业，92；克虏伯工厂，96；发动机，285；粮食进口，285；海上利益，296

经济结构和发展：投资，4，51，285；关税和自由贸易，8，9，10，62，64，264，290，396；依靠进口原料，54；工业化，58—62，246—247，284—286；银行，62，74，292；按人口平均收入，62；经济的波动，284—285，286；国家岁入和税收，289—291，298；繁荣的年代，295；在拉丁美洲的银行利益，519

人口，12，30，48，58，246，285—286

社会结构和组织：工会，15，62，74，281；社会保险，21，264，273，289；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21，58，264，285，286，289；中产阶级的解放和影响，191，286，297；对政治的关心的增加，275，279，280；阶级关系的紧张，280；普鲁士贵族的特权，280；矿工的罢工，294

政治结构和发展：强制社会保险，21，264—265，273，289；国家对公用事业的控制，22；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者），26，28，31，110—111，261，270—271，273，280—281，283—284，288—289，294，296，298；选举权，30，257，260；自由主义，33，34，263，264，278，279，280，289；帝国主义，42，48，60，265；民族主义，44，119，297；非德意志少数民族，44，249，282，287；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61；帝国的统一，104，243，244，274；强权政治，107；民族纯化和反犹太主义，108；马克思主义，110—111，112，280—281；国家社会主义，110，270—271，289；哥达纲领，110，271，280；爱尔福特纲领，111，271，280；讲坛社会主义者，112；文化斗争，117，119，267，282，284，287—288，292，544；天主教中央党，119，261—262，278，281，282—284，287—288，290—291，298，299；保守派政党，244，278，279，283，296，299；君主政体，244，250，258，259，276，277，280；宪法，257—258，259，276—278，284，289，291，298—299；联邦议会，257；国会的地位，257，277，278，280，283，294，298—299；民族自由党，264，277，278，282，283，288，290—291；自由派反对关税政策，264；政教关系，267，282，287—288（参见“文化斗争”）；保守派的僵化和民族的活力，275；民主，277，279；联邦主义，277—278，282；政党体制，277，278—284，291；进步党，278，287，296；土地所有者联盟，279；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280；非常法（反社会主义者的），280，288，294；分立主义者，282，284；帝国国会议员选举制，283；教皇党，287；国家财政，289—291；七年选举制（1887年），293，310；“政党联盟”（1887年右翼联盟），293，294，298；政治团体，296；泛德意志联盟，297；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297；1906年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盟，298

与法国的关系，36，310，544，554—555，604—606，616；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社会主义者不和，111；德国惧怕法国的联盟，233，287，543，557；施奈贝累事件，310；参见Franco-Prussian War条

对外关系：柏林成为外交中心，36，555，587；成为世界强国，47—48，562；在欧洲的野心，48（参见Bismarck条：欧洲政策）；法俄的威胁，216，244—245，233；派往日本的军事使团，

240; 威廉二世时期活动增加, 295—296; 战争目的的演变, 297; 在拉丁美洲的利益, 519; 致克留格尔的电报, 561; 参见与有关国家关系部分, Berlin Conference; Berlin, Congress of 各条

与奥匈帝国的关系, 40—41, 104, 223, 244, 274, 287, 288, 323, 331, 546, 551—552, 647; 奥地利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 119, 275; 参见Dual Alliance; Three Emperors' Alliance; Three Emperors' League; Triple Alliance 各条

与土耳其的关系, 42, 347—348; 德国在土耳其修筑铁路, 591
丹麦人少数民族, 44, 249, 282

波兰人少数民族, 44, 249, 282, 287, 292; 德意志东进协会, 292

交通运输: 铁路, 51; 第一条电气铁路, 88; 在战略上的作用, 211, 212, 224; 国有化, 273; 航运业, 52; 基尔运河, 53, 237

教育, 59, 178; 大学, 182; 国家控制与世俗化, 187—188, 199, 288; 中学体制, 191; 科学和现代学科, 196, 404; 妇女教育, 199; 成人教育, 201

哲学, 81, 115

文学, 139—145

武装力量(1): 征兵制, 188, 214—215, 216, 219, 225; 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 205, 210—211, 213; 军事理论, 206, 210; 枪炮, 207, 208, 210; 步兵操典, 209; 骑兵, 210, 217; 战略铁路, 211, 212, 224; 陆军的规模, 217, 220, 293; 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事科学院, 218, 228; 军官的社会成分, 219; 政治的影响, 219—225; 军纪和优越感, 220—201; 陆军成为国家的象征, 222; 在非洲承担的义务, 225; 防务开支, 240; 与法国的对比, 286, 293; 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陆军和海军的独立地位, 294—295; 国防协会, 296—297

武装力量(2): 海军事务, 48; 海军法, 61; 海军只具有有限的重要性, 228; 德国作为海军强国的发展, 235—237, 295—296,

563; 殖民力量和海军力量的联合, 292; 提尔皮茨任海军大臣, 296; 海军协会, 296

普鲁士的霸权地位, 205, 278

与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海的舰队, 235; 在中国的殖民据点, 296; 攫取青岛, 457, 485; 占领胶州湾, 563, 659; 支持中国反对日本, 657—658

殖民政策和发展, 252, 292, 298, 384, 562, 579, 605; 在东非, 252, 292, 612—614, 632; 德意志殖民协会, 292; 德国殖民地协会, 292; 在太平洋的扩张, 292, 296, 385, 642, 643—644, 647—649, 662; 在西南非洲的扩张, 298; 宣布多哥兰和喀麦隆为保护国, 605; 参见与中国的关系, Angra Pequena条

农业, 285, 286; 农业和关税, 9—10, 290

与俄国的关系, 366—367, 368, 545—546, 551; 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 39n., 40n., 224, 294, 366, 558, 559, 613; 惧怕俄国, 223, 233; 与俄国在远东的关系, 657, 660; 参见 Three Emperors' Alliance条

与意大利的关系, 553—554; 参见Triple Alliance条

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关系, 662

与英国的关系, 见Great Britain条: 与德国的关系

Gerov, Naiden, 格罗夫, 纳伊丁, 保加利亚领袖, 329

Ghana, 加纳, 609

参见Gold Coast条

Ghil, René, 吉尔, 勒内, 法国诗人, 137

Gibbs, Josiah Willard, 吉布斯, 乔赛亚·威拉德, 美国物理学家, 78

Gibraltar, 直布罗陀, 570, 575, 579

Giers, Nicholas de, 吉尔斯, 尼古拉·德, 俄国政治家, 224, 570, 579, 580, 582

Giffen, Sir Robert, 吉芬爵士, 罗伯特, 统计学家, 69

Gilbert, Alfred, 吉尔伯特, 艾尔弗雷德, 英国雕塑家, 171

Gilbert, William Schwenk, 吉尔伯特, 威廉·施文克, 剧作家和幽默家, 127, 160, 163

Gilchrist, P.C., 吉尔克里斯特, 英国科学家, 他的炼钢法, 51

Gilman, D.G., 吉尔曼, 丹·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182

Gimson, Ernest, 吉姆森, 欧内斯特, 英国设计家, 172

Girls' Public Day School Company, 女子公立走读学校协会, 198

Gissing, George, 吉辛, 乔治, 英国作家, 125, 126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英国自由党领袖, 44, 45, 114, 263, 387—388, 400, 408

 与欧洲协同比, 38, 45, 550, 553

 与埃及, 38, 590, 595, 598, 600—602, 612, 616

 与宗教争论, 102; 政教关系, 268

 与海军预算, 220; 由于海军的需要问题而辞职, 233

 与爱尔兰, 249, 264, 388

 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 255, 391—392, 569

 与民主, 255, 391

 维多利亚女王与格莱斯顿, 256

 与巴尔干政策, 344—345

 退休, 389, 392

 “人民的威廉”, 392

 与殖民地事务, 407, 593, 606, 612, 625

 他的《坚如磐石的圣经》, 409

与印度自治, 432

抗议移交阿尔萨斯和洛林, 543

就“保加利亚惨案”提出抗议, 546

与俄国的争论, 556

Glasgow School of Art, 格拉斯哥艺术学校, 173

Glasgow University, 格拉斯哥大学, 181, 198

Globe The, 《环球报》, 多伦多报纸, 406

Glyn Mills, Currie and Company, 格林·米尔斯, 柯里公司,
向土耳其提供国防贷款, 345

Gobineau, Count Alfred de, 戈宾诺伯爵, 阿尔蒂尔·德, 种族
主义的代表人物, 108

Godeffroy and Son, 哥德弗洛伊父子公司, 德国商行, 644

Godwin, Edward, 戈德温, 爱德华, 建筑师, 159—160, 161,
163

他的家具设计, 172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德
国作家, 140, 188

Gokhale, Gopal Krishna, 戈卡尔, 戈帕尔·克里希纳, 印度政
治家, 433, 435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385, 602, 626

Gold discoveries, 黄金的发现, 71, 385, 401, 635, 636, 637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55, 506

俄国采用金本位制, 369

Goldie, Sir George, 戈尔迪爵士, 乔治, 603, 606, 607,
621, 630

Golovnin, A.V., 戈洛夫宁, 亚·瓦, 俄国自由主义者, 教育大臣, 358

Gompers, Samuel, 龚帕斯, 塞缪尔, 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510

Goncourt, Edmond de, 龚古尔, 爱德蒙·德, 法国作家, 126, 134, 135, 164

Goncourt, Jules de, 龚古尔, 于勒·德, 法国作家, 126, 134, 135

Gorchakov, Prince Alexander Mich-aelovich, 哥恰可夫亲王,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俄国政治家, 545—546, 547, 570, 577

论俄国的文明使命, 576

Gordon, Sir Arthur, 戈登爵士, 阿瑟, 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407

Gordon, Charles George, 戈登, 查尔斯·乔治, 英国将军, 587, 600

Goremykin, I.L., 哥烈梅金, 伊·洛, 俄国内政大臣, 372; 后任首相, 379

Goschen, George Joachim Goschen, 1st Viscount, 第一代戈申子爵, 乔治·乔基姆·戈申, 英国政治家, 584

Gotha Programme, 哥达纲领, 110

Goto Shojiro, 后藤象二郎, 日本官员, 468, 476, 477, 481

Government, reform and increased power of, 政府的改革和权力的增强, 11, 17—25, 28—29, 30—33, 75, 104, 177, 184—189, 245, 248—250, 262—264, 319, 403, 419, 468, 471, 473—474, 479, 484, 493, 507—510

在公共卫生方面, 19—21

在教育方面, 20—21, 177, 184—189

在强制保险方面, 21, 24, 264

在税收方面，23—25，319

Goya, 戈雅，印象画派的先驱，157

Crant, Ulysses Simpson, 格兰特，尤利塞斯·辛普森，美国总统（共和党人），491，502，643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2nd Earl Granville, 格兰维尔，乔治·莱维森-高尔，第二代格兰维尔伯爵，英国政治家，586，589，598，604—605，606，612

Gray, Asa, 格雷，阿萨，美国植物学家，183

Great Britain, 英国

经济结构和发展：高度工业化的经济，2；按人口平均的收入，4，62；海外投资，4，49，55，66—67，394，400；国内投资，4；自由贸易和关税，7—9，64，396；国民收入的分配，23；税收，23—24，400；贸易平衡，54，55—56，65—66，400；依靠制造业，65；经济的增长，69；在远东的利益，386；金本位，399；银行业，399，400—401（参见Banks条）；国债，400；殖民地贷款法案，400

贸易和工业：外国的竞争，3，7，48，54，56，63，348；企业的经营管理，13，63；钢铁生产，48，95，308，398；铁路技术，49，394；原料，54；与德国的竞争，54，56，58—64，92，395，398—399，605；煤，58；煤产量，58；贸易萧条问题委员会（1885年），63，395；主要出口物资的价值，64—65；与美国的竞争，64—65，95，395，398—399；纺织工业，64，98，398，399；销售方法，65，71；制造业的重要性，65，398；国内市场，68；广告，69；卡特尔和联合企业，71—72；商业性供电，87—88；波动，395；化学工业，399；印度市场，413，414；西非市场，603—607

社会结构和发展：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4，16，17，21，23，68，69，402；友谊和合作团体，14；工会，14，15，68，75，186，203，272，392，403；失业，16；熟练工人的增加，16—17；公共卫生，20，23；强制保险，21，23；中产阶级的增加，31，68；罢工，68，75，403；利润的分配和模范乡村，69；工业化和都市化，246；贵族的结构，31—32，393；实行分配办法，403；宗教作为社会力

量，406；体育，407；唯物主义日益盛行，409；社会上的虚荣风气，409

农业：自由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影响，7，9，64，396；海外竞争，395，396—397；农业财富的消长，397；成立农业部，397；成立英国农业协会，397

政治结构和发展：国家对行政事务的干预，18n.，19，22，29，408；内阁的控制权，26；政党制度，26—27，33，256，262，391—393；宪法，26，250；共和派的情绪，27，394；选举权，31，255—256，260，390；秘密投票法（1872年），31；选区重新划分法（1885年），31，255；民主制的进展，31，110，244，255，390；社会民主联盟，110，403；工党的成立，111，270，272，392；考试法（1871年），180；宪章运动，202；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202；第三次选举改革法案，255；格莱斯顿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255，391—392；国王任命政府的权力，255—256；激进主义，272；独立工党，272，403；费边社，272，403；贵族院（上议院），390；妇女作为不拿报酬的政党工作者，391；政治教育，391；参见保守党；自由党

地方政府，18，185，190；地方政府法案，25；地方政府的改革，390—391；设立选举产生的教区议会和区议会，391

教育，20，59；公学，177，178，189；克拉伦敦委员会，177；古典学术、近代学科和科学，178—179，194—196；汤顿（或称学校情况调查）委员会，178；教育委员会，178，190，195；大学，180—183，196，197—198，404—405；在教育方面教会和国家的关系，181，184—185，268，404，405；威尔士的教育，181，190；苏格兰的教育，181，185，189，190—191；教育法规（1862年），184，191；地方教育委员会，184，190—191，195；强制入学，181，185，391；教师联合会，185；纽卡斯尔委员会，189；中等教育，189—190，199；科克顿的审查意见，190；地方政府的责任，190；布赖斯委员会，190；阿盖尔委员会，191；科尔布鲁克委员会，191；保留圣经课，195；科学学校，195—196；妇女教育，197—199，405；男女同校，199；成人教育，202—203；受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405；废除宗教考试，405

立法：工厂法，21；秘密投票法，31，390；选区重新划分法，31，255；英属北美法，104；伦敦教区慈善事业法，203；陆军入伍法，227；海军防务法，233；地方自治法案，249；选举改革法，255，390，391；爱尔兰土地法（1881年），264；工人赔偿法，265；太平洋岛民保护法，385；惩治舞弊行为法，391；殖民地公债券法，400；

参见“教育”

交通运输：电讯，22，89，395；航运，52，399；曼彻斯特通航运河，53，395；海底电缆，53；伦敦地下铁道，88；英国成为发展的先驱，383；商路，385；对帝国发展的影响，394；商船，394；冷藏船，394，397；电车和自行车，393；内燃机，395；铁路政策，401；参见India：“英国通往印度的路线”；Suez Canal各条

自由党，27，256，552；与政治教育，261，391—392；格莱斯顿的领导，263，387—388；与宗教问题，268；激进主义，272；支持工人阶级，392；与阿富汗，578—579；与英俄关系，581；与埃及，590，598，599，625；与南非，634

保守党：20年连续执政，27；“民主托利主义”，244；在迪斯累里的领导下，388；地方政府的改革，390；被格莱斯顿指责为“道德松弛”，391；与非洲事务，603；与取得斐济岛，642

与埃及，35，38，45，251，347，385，386，554—555，557，561，564，575，579，583—592，594，595，597—602，605，613，615，617，622—629；俾斯麦建议索尔兹伯里“占领埃及”，550；亚历山大港被炮击，579，586，599，601；参见Sudan，Suez Canal各条

外交：对法俄关系的态度，36，542；在东欧的外交活动，38，323，341，344，545—546，548—549，551，556；有关地中海的历次协定，41，557，558；孤立，41，545，555，556，559，560，562，564，566，571；需要保卫商路，385（参见India条“英国通往印度的路线”）；在远东的外交活动，563—564，565，653—654，660（参见“与中国的关系”）；中东政策，568—570，575（参见Egypt条）；需要欧洲同盟国，571；“中亚问题”，575—579；参见与有关国家的关系部分

与日本的关系：英日同盟（1902年），38—39，40，486，566，583，592，666—667；派赴日本的海军使团，239；1894年条约，482；合作谈判，563，565；与太平洋岛屿，647；在中国，665，666

爱尔兰问题：为地方自治而进行的斗争，44，104，249，250，264，388—389；格莱斯顿的政策，388；张伯伦的反对，389；在地方自治问题的辩论中的宗教偏见，406

殖民帝国，66，71，251，265，383—410各处；各殖民地的选举权，29；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64，387，396；各殖民地的教育，180，404—405；自治，250，386—387，407—408；建立联邦的主张，251；帝国会议，251，387；特许公司，384；传教活动，384，404；人道主义政策，385；间接统治的原则，386；移民政策，386，393，401—402；各殖民地的政治民主，390，403—404，408；各殖民地的社会民主，393；交通改进带来的影响，394；鼓励发展经济，398，400，401；黄金的发现，401；英国向各殖民地提供人力，401；英国社会与各殖民地社会的差异，407，409；各殖民地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依赖性，408；“帝国地位造成的必然结果”，583；反对帝国的传统，590；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和财政利益，66，517，519，524，525；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672

报纸：大众化报纸，68，403，406；新闻事业由于使用电报而发生巨大变革，395；参见各报纸条

政治思想，114—115，117，272，403，408；马克思的社会主义，392，403

宗教：救世军，117，402；威尔士的不遵奉国教者，181；在教育领域中的政教关系，184—185，268，404，405；基督教青年会，203；政教分离问题，268，405；海外传教团体，384，402，404，406，420，423；作为一种社会力量，402，405—406

文学，121—129

艺术和建筑：惠斯勒，158—160；莫里斯和拉斐尔前派，160—163，171；“工艺美术运动”，162，171，172；住宅建筑复兴运动，

163—164, “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的建筑, 163, 175; 花园城市, 164; “新艺术”运动, 170—176; 参见各艺术家条

教育立法: 公学法, 178; 考试法(1871年), 180; 教育法规(1862年), 184; 初等教育法(1870年), 184, 189, 268, 390; (1880年), 184; (1888年), 185; 苏格兰教育法(1872年) 185, 191; 教育法(1900年), 180; 市镇和教区学校法, 185; 1899年法, 190; 中间教育法, 190; 1902年法, 190, 268; 捐款管理法(1878年), 191; 技术教育法, 196; 威尔士中间教育法(1889年), 199

慈善组织, 203, 402

武装力量(1): 军事思想, 206; 坎伯利参谋学院, 218; 防务开支, 220, 240; 与国王的关系, 221; 在海外承担的义务: 225; 军事改革, 226—228; 陆军入伍法, 227; 在布尔战争中暴露出的弱点, 227, 237, 239; 设立国防委员会, 228

武装力量(2), 海军事务: 在皇家海军周围聚集了一批政论家, 222; 需要海外基地, 223; 海军事务的重要性, 228; 舰艇和装备的发展, 229—230; 订购潜水艇, 232; 两强标准, 233, 570; 海军防务法, 233; 与海军造舰计划, 233; 海军协会, 233; 与德国的竞争, 237; 舰队派往贝希卡湾, 545, 572; 在君士坦丁堡, 547; 控制地中海, 555, 564; 海军实力, 561, 565; 从爱琴海撤退分遣舰队, 561, 570; 与法国的竞争, 570, 648; 海军的声望, 592; 在汉密尔顿港(巨文岛)的海军基地, 653—654; 舰队派往朝鲜, 660

人口, 245, 246; 移民, 5, 401; 都市化, 12, 402; 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 402

与土耳其的关系, 344, 347, 349, 545, 568, 613; 参见Egypt条

与俄国的关系, 361, 545, 550—551, 554, 556, 569—570, 572, 577, 581—582, 590, 591, 592, 653—654; 与俄国在中国的关系, 374, 660—661, 663, 665, 686; 英国公众的惧俄症, 568; 英俄协约(1907年), 577; 与俄国在波斯的关系, 579—583; 斯科特-穆拉维约夫协议, 686; 参见Afghanistan; India各条有关部分

与美国的关係，388，684；贸易竞争，395—396；在太平洋，649，663；在拉丁美洲，672；与加拿大—阿拉斯加边界问题，673—676，679；与巴拿马运河，676—679

与法国的关係：在亚洲的竞争，416，418，641，658；1898年的战争威胁，545；与法国在埃及的关係，554，559，560，564，584—590，594，597—599，600—601，602，615，617；与法国在非洲的关係，560，594，602—607，610—612，629—623；海军竞争，570，648；恢复英法协约（1904年），592；英法关于非洲的声明（1899年），629

与中国的关係：阿礼国（北京）协议（即中英新订条约十六款和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437，442—443，444；商业利益，437，443，658；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448；支持光绪，546；干预义和团叛乱，458—459；保证教会独立，565，666；英中谅解，654；派遣军事教官，655；财政援助，660，686；与俄国的威胁，660—661，665—666；英国占领威海卫，686；参见Arrow War；Hong Kong；Korea各条

与德国的关係，557，559，563，587，591，602；工业和贸易的竞争，54，56，58—64，92，395，398—399，605；海军竞争，237；“每日电讯报事件”，298—299；与德国在远东的关係，563—564，565，647—649，662，663，665，666；与德国在非洲的关係，604—607，612—614，616；参见South Africa条“德国的影响”

与意大利的关係，571；在非洲与意大利的关係，614，625—626

与波斯的关系，580—582

在非洲与葡萄牙的关系，604—605，614，637

Great Depression, The, 大萧条，见Trade and industry条

Great Powers, 列强

欧洲以外的强国的兴起，35

与小国的对比，36

Greece, 希腊，36n.，260，571

基督教团体的独立，328—329

在伊皮鲁斯的要求，344

与奥地利接近以结成联盟，348

参见Macedonia条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腊正教，329，343

Green, Thomas Hill, 格林，托马斯·希尔，英国哲学家，114，115，264，408

他的《政治义务原理讲演》，115

Grenfell, Sir Wilfred Thomason, 格伦费尔爵士，威尔弗雷德·托马森，英国医生，他在拉布拉多岛的医疗团体，402

Grévy, Jules, 格雷维，朱尔，法国总统，共和党人，304

Grey, Edward,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格雷，爱德华，法洛顿的格雷子爵，582，583，626

Grey, Maria, 格雷，玛丽亚，英国教育家，198

Grosvenor Gallery, The, 格罗夫纳美术馆，160

Grundtvig, 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格隆德维格，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丹麦诗人，神学家，教育家，200，201

Grünwald, 格吕内瓦尔德，168

Guam, island of, 关岛，662，683

Guatemala, 危地马拉，525，529

Guesde, Jules, 盖德，朱尔，他的法国工人党，110，316

Guimard, Hector, 吉马尔，埃克托尔，法国建筑家，172，173，174

Guinea, French, 法属几内亚，610，611

Gumplowicz, Ludwig, 龚普洛维奇，路德维希，奥地利社会学家，106—107

Guyot, Yves, 居奥, 伊夫, 法国激进党人, 313

Habsburg dynasty, 哈布斯堡王朝, 104, 219, 323, 332, 335, 340

Hague Conference (1899), 海牙会议 (1899年), 38, 43, 46, 206, 241—242, 254, 562

Hague Conference (1907), 海牙会议 (1907年), 254

Hague Congress (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 269

Hague Court, The, 海牙法庭, 242, 254, 562

Haiti, 海地, 235, 516, 530

Halbe, Max, 哈尔伯, 马克斯, 德国剧作家, 142

Hall, C.M., 霍尔, 科学家, 89

Hall, Granville Stanley, 霍尔, 格兰维尔·斯坦利, 美国心理学家, 他的《青春期: 它的心理学和它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科学和教育的关系》, 194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 美国政治家, 515

Hanotaux, Gabriel, 阿诺托, 加布里埃尔, 法国政治家, 625, 630

Hanover, 汉诺威, 278, 282

Hardenberg, Carl August, Fürst Von, 哈登堡公爵, 卡尔·奥古斯特·冯, 普鲁士政治家, 280

Hardinge, Henry Handinge 1st Viscount, 哈丁, 亨利·哈丁, 第一代子爵, 任印度总督, 414, 421

Hardy, Thomas, 哈代, 托马斯, 小说家和诗人, 122—123

Hare, 黑尔, 印度民族主义者, 430

Harkort, 哈尔科特, 德国工程师, 62

Harmsworth, Alfred Charles William, 1st Viscount Northcliffe, 哈姆斯沃思, 艾尔弗雷德·查尔斯·威廉, 第一代诺思

克利夫子爵，英国报业主，68，406

Harper's，《哈泼斯》月刊，美国期刊，504

Harriman, 哈里曼，美国商人，53，73

Harris, W.H.，哈里斯，美国教育家，193

Harrison, Benjamin, 哈里逊，本杰明，美国总统，650，670

Harrison, Frederic,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英国法学家和哲学家，117

Harrow School, first “modern” side, 哈罗公学，最初的“现代”方面，179

Hart, Heinrich, 哈特，海因里希，《批评的论战》编者之一，142

Hart, Julius, 哈特，尤利乌斯，《批评的论战》编者之一，142

Hart, Sir Robert, 赫德爵士，罗伯特，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450

Hartington, 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Marquis of and 8th Duke of Devonshire, 哈廷顿侯爵，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什，第八代戴文希尔公爵，227

Hartington Commission, 哈廷顿委员会，227，228

Harvey, Hayward Augustus, 哈维，海沃德，奥古斯塔斯，美国发明家，230

Hashemites of the Hejaz, 汉志的哈希姆，567

Hastings, Warren, 哈斯丁，沃伦，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412

Hauptmann, Gerhart, 霍普特曼，格哈特，德国剧作家，142，143

Havemeyer, Henry, 哈夫迈耶，亨利，美国艺术赞助家，157

Hawaii, 夏威夷，35，641，649—650，662，670，673，685

Hay, John, 海，约翰，美国国务卿，663—664，674，675

海—庞斯福特运河条约，676—678

关于（在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686—687

论对华政策，688

Hayes, Rutherford Birchard, 海斯，拉瑟福德·伯查德，美国总统（共和党人），670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乔治·威廉·费里德里希，德国哲学家，106, 113, 115

Heligoland, 赫尔戈兰，605, 611, 613

Heligoland-Zanzibar Treaty, 赫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611, 614

Helium, discovery of, 氦的发现，79, 103

Helmholtz, Hermann, 赫尔姆霍茨，赫尔曼，科学家，与热力学第一定律，103

Henley, William, 亨利，威廉，英国诗人，128

Hennique, Léon, 埃尼克，莱昂，法国小说家，136

Henry, Commandant, 亨利少校，法国情报局官员，320

Herat, 赫拉特，580, 581, 582

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赫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193, 194

Herbert, Hilary, 赫伯特，希拉里，美国海军部长，238

Herbst, Edward, 赫布斯特，爱德华，在奥地利的德国自由主义者，337

Hercegovina, 黑塞哥维那，39n., 330, 335, 336, 342, 361, 548

Heredia, José-Maria de, 埃雷迪亚，约瑟-玛丽亚·德，法国诗人，138

Hernández, José, 埃尔南德斯，何塞，拉丁美洲作家，538

- Hérault, P.L.T., 埃鲁, 保·路·图, 科学家, 89
- Herschell, Farrar Herschell, Lord, 赫谢尔勋爵, 法勒·赫谢尔, 英国政治家, 574
- Hertz, Heinrich von, 赫兹, 海因里希·冯, 物理学家, 78, 89
- Herzen, A.I., 赫尔岑, 亚·伊, 俄国流亡者的报纸《钟声》报编辑, 359
- Herzl, Theodor, 赫茨尔, 泰奥多尔, 他的《犹太国家》, 119
- Hesse, Bismarck's annexation of, 俾斯麦兼并黑森, 278
- Hesse, Grand Duke of, 黑森大公爵, 他在达姆施塔特的宫室, 164
- Hewett, 休伊特, 英国驻尼日尔领地的领事, 604, 606
- Heyse, Paul, 海泽, 保罗, 德国作家, 141
- Hicks, William (Hicks Pasha), 希克斯, 威廉(希克斯帕夏), 指挥埃及军队的英国军官, 628
- Hicks-Beach, Sir Michael Edward, Later Viscount St Aldwyn, 希克斯-比奇爵士, 迈克尔·爱德华, 后封为圣奥尔德温子爵, 英国政治家, 638
- Hill, James J., 希尔, 詹姆斯, 美国商人, 50
- 在铁路方面的活动, 73
- Hindus, 印度教徒, 423, 433—434
-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 518
-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tudy of, 哲学与历史研究, 115—117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豪·斯·张伯伦对他的影响, 108
- 奥地利种族主义对他的影响, 119

Hobart Pasha (August Charles Hobart Hampden), 霍巴特帕夏
(奥古斯特·查尔斯·霍巴特-汉普登), 土耳其海军司令, 326

Hodler, Ferdinand, 贺德勒, 斐迪南, 瑞士画家, 170

Hoffmann, Josef, 霍夫曼, 约瑟夫, 奥地利建筑家, 174

Hofmannsthal, Hugo von, 霍夫曼斯塔尔, 胡果·冯, 德国诗人, 145

Hofmeyr, Jan Hendrik, 霍夫麦耶, 扬·亨德里克, 南非布尔人政治家, 634, 636

Hogg, Quintin, 霍格, 昆廷, 英国慈善家, 203

Hohenlohe-Schillingfürst, Prince Chlodwig von, 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亲王, 克洛德维希·冯, 德国自由派政治家, 1894年帝国首相, 295

Hohenwart, Count E. de, 霍亨瓦尔特伯爵, 奥地利首相, 249, 332, 333

Hohenzollern dynasty, 霍亨索伦王朝, 274, 291

Holland, 荷兰, 英国海军发明家, 231

Holland, 荷兰, 见Netherlands条

Holstein, Baron von, 霍尔施坦男爵, 冯, 德国外交家, 43, 294

Holy Land, 圣地, 584

Holz, Arno, 霍尔兹, 阿尔诺, 德国作家, 142

Home, Colonel, 霍姆上校, 英国军人, 572—573

Hong Kong, 香港, 579, 659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British), 汇丰银行(英国), 660

Hopkins, Gerard Manley, 霍普金斯, 杰勒德·曼利, 诗人, 128, 129

Horta, Victor, 霍尔塔, 维克托, 比利时建筑家, 172, 173, 174

Hosiery industry, 针织工业, 98

Hostos, Eugenio María de, 奥斯托斯, 欧亨尼奥·玛丽亚·德, 波多黎各改革家, 539

Howard, Ebenezer, 霍华德, 埃比尼泽, 他的《明天的花园城市》, 164

Hötzendorf, Conrad von, 霍曾道夫, 康拉德·冯, 奥地利总参谋长, 218, 222, 223

Hsien Feng (I Chu), 咸丰(奕詝), 中国皇帝, 438, 445

Hsü Ching-ch' ong, 许景澄, 461

Hsü T' ung, 徐桐, 中国守旧派领袖, 452, 455

Huggins, Sir William, 哈金斯爵士, 威廉, 英国天文学家, 79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 法国作家, 322

Humbert I, 亨伯特一世, 意大利国王, 553

Hume, A. S., 休姆, 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 434

Hungary, 匈牙利

选举权, 27

自由主义, 30, 264, 323

马扎尔人的影响和民族主义, 249, 339—340

在奥匈帝国中的地位, 331—333, 337—338, 340

克罗地亚人的不满, 334

参见Austria-Hungary条

Hunter, Sir William Wilson, 亨特爵士, 威廉·威尔逊, 在印度任文官的苏格兰人, 他的《女王的印度》, 424

Husain Awnī Pasha, 侯赛因·阿伍尼帕夏, 土耳其改革家, 326

Huskisson, William, 赫斯基森, 威廉, 英国政治家, 415

Huxley, Thomas Henry,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英国生物学家, 80, 102, 109, 184

他的拉丁语讲演《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 107

他对教育的影响, 194—196

Huysmans, Joris-Karl, 于伊斯芒斯, 若里斯·卡尔, 法国作家, 126, 132—133, 134, 136

Hydro-electricity, 水力发电, 57

Hyndman, Henry, 海德门, 亨利, 英国社会主义者, 110

I Wei, Prince, 奕纬, 王子, 道光皇帝长子, 445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克, 挪威剧作家, 127, 137, 142, 146—147, 148

Idealism, 唯心主义, 102, 105, 113—116, 119

Iglesias, Miguel, 伊格莱西亚斯, 米格尔, 秘鲁将军, 535

Ignatyev, Nikolai Pavlovich, 伊格纳切夫,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俄国外交家, 329, 335; 任内政大臣, 363

Iloron, 伊洛林, 631

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 帝国东非公司, 385

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 (British), 帝国联邦同盟(英国), 251

Imperial League against Social Democracy (Germany), 帝国反社会民主联盟(德国), 296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42, 45—48, 60, 107, 128, 234, 245, 248, 250—253, 265—266, 383—387, 449, 512, 555, 560—566, 629, 632—633, 639—640, 641, 647, 668—670, 679—682

参见各国条

Impressionist school of painting, 印象画派, 154—159

18世纪以前的美术大师们的影响, 157

与英国“住宅建筑复兴运动”的联系, 163

传统的风格未受印象派的影响, 164

Income tax, 所得税, 23—25, 319

India, 印度

贸易和工业: 与欧洲的贸易, 6, 54, 55, 429; 靛蓝种植的衰落, 92; 橡胶, 98; 棉花加工工业, 399, 429, 434; 黄麻和茶叶, 429; 煤和钢铁, 429—430

人口, 12

社会结构和发展: 社会改革, 22, 415; 西方化, 412, 413, 415, 419—422, 423, 425, 426—427, 428, 432; 一个新阶级的兴起, 413, 420, 430—431, 432, 433; 土地整理和土地贵族的没落, 420; 英文代替波斯文成为法庭使用的语言, 421; 种族歧视的增加, 434; 中产阶级运动成为半群众性的政党, 435

交通运输: 铁路, 22, 415, 421—422; 成为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428—429; 公路, 包括通往白沙瓦的大干线, 421

灌溉, 22, 415, 421—422, 428—429

征服饥谨, 22, 428, 435

教育, 22, 179, 404, 413, 420, 421, 435; 大学, 415, 423; 传教活动, 420; 王公的教育, 425, 427; 亨特委员会, 428; 阿利加尔学院, 431

政治结构和发展, 30, 31, 413, 419; 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 251, 431; 印度王公的地位, 386, 412, 418—419, 425; 政府的独立地位, 414; 丧失权利说, 415, 419, 425; 旁遮普摄政会议, 417; 1833年的特许状法宣布英王对印度的统治权, 418; 立法会议, 419, 426; 进步的行政管理措施, 425; 宗教中立的理论, 425; 文官的印度人化, 426, 433; 莫利—明托改革, 426; 印度立法会议法, 426, 433; “觐见”制, 427, 432; “帝国的印度”时期, 431—432, 435—436; 民主自治政策, 431—432; 地方代议机构的建立,

432—433；本地语言新闻法，434；欧洲人强烈抗议关于印度司法权的伊尔伯特法案，434；孟加拉分治，435，436；参见“孟加拉兵变”“民族主义”

经济结构和发展：英国的经济利益，55，66，67，412；税收结构，396；英国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400，430；财政改革，428；英国用于修筑铁路的资金，428；印度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429；卢比的贬值，435

穆斯林：支持土耳其，350；反对英国统治，433；瓦哈比派，430

英国并吞俾路支，385；并吞信德，414，417；并吞旁遮普，415，417—418，419；并吞那格浦尔、萨塔拉和贝拉尔，419；并吞奥德，419，422

边境政策和安全，385，386，412，416—418，435，569，578，579，580，581；并吞俾路支，385；与并吞缅甸，385，416，418；与俄国的威胁，412，413，416，417，431—432，575—577，590；杜兰德线的划定，435；参见Afghanistan条

民族主义，394，409，411，431，433—435；印度国大党成立，394，435；印度人提出的第一个宪法方案，433

莫卧儿帝国，412，413，417，418

东印度公司，412，569；撤销，424

国际地位，413

文化活动，413，433—434

第一次锡克战争，414

孟加拉兵变（1857年），414，419，422—424，430；尼尔事件和库珀事件，424；其后果，426，434

文官组织，419，434

伊纳姆事务委员会，420

刑法典，421

土地所有者协会，422

英属印度协会，422，433

武装力量：普遍服役征兵法案，423；1857年兵变后的改编，424—425；成立帝国军团，425；在印度国外使用印度军队，434，572，575；

参见“孟加拉兵变”

旁遮普行政管理学校，427

宗教思想，430；婆罗门教，423；印度教，423，433—434；佛教，433

英国通往印度的路线，554，568—570，575，580，591，595，598，601，612，633

与阿曼和科威特的条约，591

Indo-China，印度支那，见Vietnam条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416

Industrialisation，Industry，工业化，工业，见Trade and industry条

Ingersoll watches，英格索尔的钟表，57

Ingres，Jean Auguste Dominique，安格尔，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法国画家，157，170

Inoue Kaoru，井上馨，日本外相，652

Insurance against accident and sickness，introduction of，实行事故和疾病保险，21，24，264

International Africa Association，国际非洲协会，26，253，60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crease of in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direction，行政管理和技术的指导方面国际合作的增加，43，253—254，555

参见Hague Conferences条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253

国际私法协定, 25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542—688各处

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 532—536

参见Alliances; Balance of Power; Concert of Europ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r各条

International Workers' Union, First, 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 110, 269, 543; 第二个(即第二国际), 109,
111, 112, 271, 562

Investment yields, decline in, 投资效益的下降, 2, 10, 71

Iran, 伊朗, 见Persia条

Ireland, 爱尔兰

农业: 合作社, 14; 改革运动, 397

地方自治运动, 44, 104, 249, 250, 388—389; 巴涅尔的爱尔兰
民族主义党, 256, 391; 地方自治运动使英国自由党分裂, 264,
388

教育: 大学, 183, 197—198

移民, 247, 388

土地法案(1881年), 264

爱尔兰教会与政府的分离, 268, 405

地方政府的选举原则, 391

Ireland, Royal University of, 爱尔兰皇家大学, 183, 197—
198

Irigoyen, Hipólito, 伊里戈延, 伊波利特, 阿根廷自由主义
者, 530—531

Iron, 铁

世界产量的增加, 3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铁生产的发展, 6

参见Steel industry条

Irwin, Edwin Frederick Lindley Wood, Baron Irwin, later Earl of Halifax, 欧文, 埃德温·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 欧文男爵, 后封为哈利法克斯伯爵, 432

Islam, 伊斯兰教, 574, 594, 595, 598, 609

印度的瓦哈比运动, 423

在非洲抵抗欧洲, 619—620

参见Muslims条

Ismail Pasha, 易斯马仪帕夏, 埃及总督, 571, 584, 585, 597, 599

Itagaki Taisuke, 板垣退助, 日本官员, 468, 469,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Italo-Prussian Alliance (1866), 意普联盟 (1866年), 39

Italy, 意大利

贸易和工业: 棉纺织业, 3

经济状况: 关税, 10; 所得税, 23

社会结构和发展: 工会, 15; 劳动条件, 21

政治结构和发展: 国家对公用事业的控制, 22; 选举权, 30, 257, 260; 自由主义, 33, 264; 与帝国主义, 265—266; 人民行动党, 34; 民族主义, 44, 409; 统一, 104, 243, 248, 257, 262; 社会主义, 111, 116, 273; 政治理论, 116; 国家与梵蒂冈的关系, 117—118, 261, 266—267, 544; 民族统一主义, 243; 君主政体, 244, 257; 中央集权政府, 250; 在宪政方针上动摇不定, 256—257; 政党, 259, 260, 262; 社会立法, 265; 社会主义政党成立, 270

人口, 30, 246

对外关系: 联盟体系, 39—40, 244, 553—554; 国际地位, 553; 参见与各有关国家关系部分, Triple Alliance各条

武装力量: 海军事务, 228

殖民帝国, 252, 384, 614—615; 乌西阿利条约(1889年), 252; 在阿杜瓦遭到挫败, 252, 626; 在东北非的野心, 571; 在厄立特里亚的野心, 614—615, 626

交通: 铁路国有化, 273

与奥匈帝国的关系, 553—554

与英国的关系, 571, 625

与中国的关系, 661, 663

Ito Hirobumi, 伊藤博文, 日本官员, 451, 468, 470, 471, 478, 479, 480; 任首相, 481—482, 483, 484, 486, 653, 656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603, 604, 606, 609, 610, 621, 625

Iwakura Tomomi, 岩仓具视, 日本政治家, 468, 470, 471, 478, 480, 646

Iwasaki (Mitsubishi), 岩崎(三菱), 日本工业联合企业, 478

Izzet Pasha el-Abid, 伊泽特帕夏, 阿比德, 349

Jamaica, emigrants to Cuba, 牙买加, 向古巴移民, 525

James, Henry, 詹姆斯, 亨利, 小说家, 121—122, 127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117, 120

他的《心理学原理》和《与教师谈心理学》, 194

Jameson, Sir Leander Starr, 1st Bart, 詹姆森爵士, 利安德·斯塔耳, 第一代从男爵, 南非公司行政官员, “詹姆森袭击事件”, 561, 594, 637

Japan, 日本

经济结构和发展：工业化，2，484；为反德川幕府的起义提供资金，466；明治政府的财政，469—470；政府干预经济发展，473，474，484；贸易平衡，473；通货膨胀，474；银行，484；国债，485

人口，12，485

政治结构和发展：政府的集权，19，22，31，468，471，479；革命的起因和明治政权的政策，25，47，440，465—466；选举权，30，480；德川幕府的垮台，179，464—467；明治天皇成为效忠的中心，239，465；明治行政机构的建立，466；五条誓文，467；太政官，467；废藩置县，468—470；开始实行改革计划，471；萨摩叛乱，476，483；“自由主义”运动，476—477；政党的出现和联盟，477—478，479，481；镇压性立法，478；成文的宪法，479—480；预算危机，481；玄洋社组织，483；先进的力量，655

教育，20；作为担任公职的资格，179；义务教育，472；创办东京帝国大学，472；技术学校，474

贸易和工业，55；政府的主动行动，473—474；外国技术人员，473；进口纺纱机，474；纺织品贸易的增长，484，485；政府协助重工业，484；商船队，484—485；钢铁，485

社会结构和发展：西方化，179，471—472，646；武士和农民中的骚乱，465，475—476；近代日本统治阶级的起源，465；藩主的独立地位，466，468；高级官员让位给低级官员，467—468；封建主义的废除，468；政府注意社会习俗，471—472；各阶级在法律上的平等，475

武装力量：军事思想，206；海军力量，230，235，240，660；组织与训练，239—240；征兵制，240，470，475；帝国陆军的建立，466；战略工业，473，474；武士叛乱时陆军的规模，476；武装力量的实力，483

外交：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239，449，482—483，484，486；孤立的威胁，465，与西方强国的关系，465，470；修订条约，470，471，482，484；对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提出领土要求，483，

645, 646, 647; 对马关条约的“三国干涉”, 484; 参见与各国关系部分

与朝鲜, 374, 450—451, 471, 483—486, 646—647, 652—653; 中日保护国, 654—655; 日俄竞争, 559—561, 664, 666—667

与中国的关系, 465, 644—647各处, 652—662各处; 在义和团叛乱中援助各公使馆, 485; 通商条约, 646; 参见Korea; Sino-Japanese War各条

与美国的关系, 465, 470, 482, 647

东京代替江户成为首都的名称, 466

神道教, 468

交通通讯, 472—473

农业, 475; 农民反对政府, 477; 人口超过粮食生产, 485

新闻控制, 478

与俄国的关系, 484, 485, 486, 565, 647, 656—658, 661—667, 665, 666; 西—罗申协定, 661; 参见Russo-Japanese War条

与满洲, 656, 657, 665

与英国的关系, 见Great Britain条

Japanese influence on Western art, 日本对西方艺术的影响, 156, 160, 168, 171—172

Jaureguiberry, 若雷吉贝里, 法国海军上将, 海军和殖民地部长, 651

Jaurès, Jean, 饶勒斯, 让, 法国社会主义者, 110, 111, 272, 317

作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 321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 美国总统, 515

Jenatsch, Jürg, 耶纳奇, 于尔格, 瑞士爱国者, 140

Jesuits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为耶稣会会士, 129

在法国禁止耶稣会士任教, 304

Jevons, William Stanley, 杰文斯, 威廉·斯坦利, 英国经济学家, 408

Jews, 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 108, 119, 321, 339, 365—366

犹太复国主义, 119, 372

在俄国的政治组织, 371, 374

Johnson, Andrew, 约翰逊, 安德鲁, 美国总统(民主党人), 491, 495, 669

Johnston, Sir Harry Hamilton, 约翰斯顿爵士, 哈里·汉密尔顿, 英国探险家, 384

Joint-stock Companies, development of, 股份公司的发展, 12—13

Jones, Viriamu, 琼斯, 弗里亚姆, 威尔士教育家, 181, 190

Jones, Sir William, 琼斯爵士, 威廉, 英国东方学家, 433

Jongkind, Johan-Berthold, 容金, 约翰-贝尔托特, 荷兰画家, 155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德国皇帝(1741—1790年), 249

Joubert, 若贝尔, 法国财政家, 584

Joule, James, 焦耳, 詹姆斯, 科学家, 103

Jowett, Benjamin, 乔伊特, 本杰明,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 405

Juárez, Benito Pablo, 胡亚雷斯, 贝尼托·巴勃罗, 墨西哥总统, 528

Jung, Carl, 荣格, 卡尔, 心理学家, 113

Jung Lu, 荣禄, 中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458, 460

Justo, Juan B., 胡斯托, 胡安, 阿根廷社会主义者, 531

Kahn, Gustave, 卡恩, 居斯塔夫, 法国诗人, 137

Kallay, Benjamin, 卡莱, 本亚明, 匈牙利领袖, 333, 340

Kang, I, 刚毅, 中国守旧派领袖, 452, 458

K' ang Yu-wei, 康有为, 中国的改良派, 455, 456, 463

Kangwha, Treaty of, 江华条约, 652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德国哲学家, 其影响, 115

Kapital, Das (Marx and Engels),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 101, 112, 268—269

Kardorff, Wilhelm von, 卡尔多尔夫, 威廉·冯, 德国保守派领袖, 290

Kars, 卡尔斯, 572

Kashmir, 克什米尔, 590

Kassala, 卡萨拉, 615

Katanga, 加丹加, 619

Katkov, M.N., 卡特柯夫, 米·尼, 俄国民族主义者, 360

Kato Takaaki, 加藤高明, 日本政治家, 485—486, 661

Katsura, 桂太郎, 日本官员, 482

Kaufman, Constantinc Petrovich von, 考夫曼,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冯, 俄国将军, 土耳其斯坦边区总督, 576, 578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281
他的《社会民主党问答》, 281

Kekulé, Friedrich, 凯库勒, 弗里德里希, 科学家, 84

Keller, Gottfried, 凯勒, 哥特弗里德, 瑞士作家, 139, 140—141

Kelley, William G., 凯利, 威廉, 美国激进分子, 502, 504

Kelvin, William Thomson, 1st Baron, 凯尔文, 威廉·汤姆森, 第一代男爵, 苏格兰物理学家, 103

Kemāl Bey, 凯末尔贝伊, 青年土耳其党人, 341

Kenya, 肯尼亚, 632

Kerschensteiner, 克申施泰内, 德国教育家, 201

Ketteler, von, 凯特勒, 冯, 主教, 119

Kettler, Baron von, 克林德男爵, 冯, 德国驻北京公使, 460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英国经济学家, 119

Khair al-Din Pasha, 哈伊尔丁帕夏, 突尼斯大臣, 342

Khérédine, 赫雷丁, 突尼斯首相, 595

Khiva, 希瓦(汗国), 576, 578, 580, 639

Khokand, 浩罕（汗国），574, 576

Khojend, 霍占特（一译忽禅），576

Khorassan, 霍拉桑, 580

Kiao-Chow, taken by Germany, 德国夺取胶州湾, 563

Kido Koin, 木户孝允, 日本官员, 468, 469, 470, 471, 477

Kiel Canal, 基尔运河, 53, 237

Kierkegaard, Søren, 克尔恺郭尔, 泽伦, 201

Kim Ok-kyun, 金玉均, 朝鲜领袖, 655

King, Clarence, 金, 克拉伦斯, 美国科学家, 183

Kingsley, Charles, 金斯莱, 查尔斯, 英国作家, 与种族主义,
108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 拉迪亚德, 英国作家, 128, 227,
435, 515

Kirchhoff, G.R., 基尔霍夫, 古·罗, 化学家, 79

Kitchener, Horatio Herbert, 1st Earl Kitchener of
Khartoum, 吉钦纳, 霍雷肖·赫伯特, 喀土穆的第一代吉钦纳伯爵,
225, 573, 626—629

Knights of Labour (United States), 劳动骑士团（美国）,
509—510

Koch, Robert, 科赫, 罗伯特, 科学家, 19, 82

Kold, Kristen, 科尔德, 克里斯滕, 丹麦教育家, 200

Kollar, General, 科勒将军, 布拉格军事总督, 333

Kolping, Adolf, 柯尔平, 阿道尔夫, 119

Korea, 朝鲜, 374, 449, 450—451, 471, 483—486, 644, 646
—647, 652—661各处

东学党起义, 453, 655—656

与西方强国缔结的条约，652

英国在汉密尔顿港（巨文岛）的基地，653—654

成为中日保护国，654—655

日俄竞争，659—661，664，666—667

英国海军的示威，660

拒绝俄国在马山浦（马山港）建立基地，664

英日协定保证朝鲜独立，666

Kosagovsky, 科萨戈夫斯基，俄国将军，580

Kropotkin, Prince, Petr, 克鲁泡特金亲王，彼得，他的《互助论》，109

Kruger, Stephanus Johannes Paulus, 克留格尔，斯蒂凡努斯·约翰内斯·保卢斯，德兰士瓦总统，43，561，634，635，636，637，638

Kruger telegram, 致克留格尔的电报，43，561

Krupp Works, 克虏伯工厂，13，96，240

Kuang Hsü (personal name Tsai T' ien), 光绪（本人名载湉）中国皇帝，446—447，449，451—452，454—456，463

反对义和团，459

Ku-Klux-Klan, 三K党，498

Kung, Prince (I Hsin), 恭亲王（奕訢），同治皇帝之叔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438，441—448各处，450

在阿礼国协议问题上丢了面子，443

被解职，450

Kurile Islands, 千岛群岛，483，645—647

Kuwait, 科威特，591

Labrador, Grenfell Mission to, 格伦费尔赴拉布拉多岛的医疗团体, 402

Labriola, Antonio,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 116

Lachelier, Jules, 拉希利埃, 朱尔, 法国哲学家, 322

Laforge, Jules, 拉福格, 朱尔, 法国诗人, 138

Lagarde, 拉加尔德, 法国将军, 628

Laing, Samuel, 莱思, 塞缪尔, 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 428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主义

在国际政治中, 37—40, 542, 550, 562

在国内事务中, 见Economic organisation; Government各条

在国际贸易中, 见Tariffs and Free Trade条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de, 拉马克, 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托万·德·莫奈, 舍伐利埃·德, 法国生物学家, 80

Lamennais, 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Abbé, 拉梅耐神父, 雨盖-费利西泰·罗贝尔·德, 118

Lamy, 拉米, 法国探险家, 631

Lang, John, 兰, 约翰, 澳大利亚帝国主义分子, 641

Lange, Helene, 朗格, 海伦, 德国教育家, 199

Lansdowne, 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 5th Marguis of, 兰斯多恩, 亨利·查尔斯·基思·佩蒂-菲茨莫里斯, 第五代侯爵, 582, 678

Laplène, Treich, 拉普莱纳, 特莱克, 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604

Lasker, Eduard, 拉斯克尔, 爱德华, 普鲁士犹太人自由主义领袖, 律师, 279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 德国社会主义者, 110, 111, 270—271, 289

Latin American, 拉丁美洲

人口和移民, 4, 516, 517—518

经济事务: 贸易, 5, 9, 525, 670; 关税, 9;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 66—67, 517, 519, 524, 525; 成为橡胶供应者, 97; 欧洲的投资及随后的发展, 516—517; 银行业, 519

社会结构: 劳工组织, 14, 15, 531—532; 工业无产者, 517

政治和宪政的发展, 19, 22, 26, 27, 31, 525—526, 528, 530—532, 540; 军事首领的影响, 219

拉美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力量均势, 35, 533—536

文化生活, 516, 536—540

交通运输, 518; 铁路, 519—523各处, 525

参见各有关国家War of the Pacific条

La Tour du Pin, René de, 拉图尔·杜班, 勒内·德, 118

Latvia (and Letts), 拉脱维亚 (和拉脱维亚人[列特人]), 366, 372, 381

参见Baltic provinces条

Laurier, Sir Wilfrid, 洛里埃爵士, 威尔弗里德, 加拿大自由党领袖, 389, 393, 410, 675

Lavigerie, Charles Martial Allemand, 拉维热里, 沙尔·马夏尔·阿莱蒙, 非洲大主教, 46, 315

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拉瓦锡, 安托万-洛朗, 法国化学家, 77

Lavrov, P.L., 拉甫罗夫, 彼·拉, 俄国社会主义者, 362

Lawes, John Bennet, 劳斯, 约翰·贝内特, 过磷酸钙的制造者, 91

Lawrence, Sir Henry Montgomery, 劳伦斯爵士, 亨利·蒙哥马利, 在印度的英国军人和行政官员, 417, 427

Lawrence, John Laird Mair, 1st Baron, 劳伦斯, 约翰·莱尔德·梅尔, 第一代男爵, 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 418, 422, 424, 427

Layard, Sir Austin Henry, 莱亚德爵士, 奥斯汀·亨利,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 341, 342

Lear, Edward, 利尔, 爱德华, 英国作家, 127

Lebanon, 黎巴嫩, 571

Le Bel, J. A., 勒贝尔, 约·阿, 法国化学家, 84

Leblanc, Nicholas, 勒布兰, 尼古拉, 法国化学家, 91

Le Bon, Gustave, 勒蓬, 居斯塔夫, 法国社会学家, 108

Le Cour, Paul, 勒科尔, 保尔, 丹麦教育家, 200

Lee, Robert Edward, 李, 罗伯特·爱德华, 美国将军, 200, 494

Leeds University, 利兹大学, 196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李仙得, 查尔斯·威廉, 美国军人, 645, 647

Legouvé, Ernest, 勒古韦, 欧内斯特, 法国教育家, 200

Leighton, Frederick, Lord Leighton of Sketton, 莱顿, 弗雷德里克, 斯克顿的莱顿勋爵, 英国画家, 皇家艺术院院长, 164

Lemnos, 利姆诺斯, 573

Lenin, Vladimir Ilyich,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俄国革命家, 101, 111—112, 268, 272—273

他的《怎么办? 》, 120

与《火星报》, 373

Leo XIII, Pope, 教皇利奥十三世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118, 314, 315

他的通谕: 《自由》, 118, 314; 《新事物》, 118; 《在关怀中》, 315

俾斯麦与利奥十三世的谈判, 288

Leopold II of Belgium, 利奥波德二世, 比利时国王
掌管海外事务, 26

在刚果, 26, 253, 603—604, 605, 606, 624—625

他的国际非洲协会, 253

他对非洲的兴趣, 593, 597, 616

Lepic, Vicomte, Manet's picture of, 马奈为莱皮克子爵画的画, 156

Lesseps, Ferdinand, vicomte de, 德莱塞普斯子爵, 斐迪南, 法国工程师, 53, 584

Letchworth Garden City, 莱奇沃思花园城, 164

Levant, the, 利凡得, 567n., 568, 571, 590, 640

利凡得特有的文明, 573—574

Levassor, 勒瓦瑟, 法国工程师, 57

Lever, William Hesketh, 1st Viscount Leverhulme, 利弗, 威廉·赫斯基恩, 第一代利弗赫尔姆子爵, 英国肥皂制造商和慈善家, 63, 66

Leyland, F.R., 莱兰, 船业大王, 160

Liang Ch' i-ch' ao, 梁启超, 中国改良派, 455, 456

Liaotu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

日本被排斥出辽东半岛, 484, 657

俄国攫取辽东半岛, 485, 660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8, 27—28, 33—34, 114, 118, 243, 262—268, 273, 289

参见各国条

Liberty' s London store, 利伯蒂在伦敦开设的商店, 171

Libya, 利比亚, 632

Liebermann, Max, 李卜曼, 马克斯, 德国画家, 158

Liebig, original plant at Fray Bentos, 利比格, 最早在弗赖本托斯建立的工厂, 522

Liebknecht, Wilhelm, 李卜克内西, 威廉, 德国社会主义者, 112, 270

Li Hung-Chang, 李鸿章, 中国外交家, 两广总督, 448, 450—451, 452—453, 455, 460, 462, 463, 484, 651—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61, 666

Liliencron, Detlev von, 里林克隆, 迪特莱夫·冯, 德国诗人, 144

Liliuokalani, 丽里奥卡拉尼, 夏威夷女王, 650

Lincoln, Abraham, 林肯, 亚伯拉罕, 美国总统（共和党人）, 489, 490, 494

Linoleum, 亚麻油毡, 3, 98

Linotype machine, 行型排铸机, 99

Liotard, Victor, 利奥塔尔, 维克托, 在非洲的法国军官, 622, 623

Li Ping-heng, 李秉衡, 中国将军, 462

Lipton, Sir Thomas Johnstone, 利普顿爵士, 托马斯·约翰逊, 苏格兰商人, 66, 68

Li Shan, 立山, 中国官员, 459

Lisle, Leconte de, 李尔, 勒孔特·德, 法国诗人, 138

Lister, Joseph, 1st Baron, O.M., 李斯特, 约瑟夫, 第一代男爵, 有勋章获得者, 英国外科医生, 19, 82

Literature, 文学, 121—153

文学书籍的大量出版, 98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125, 127

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结合, 125

象征主义, 129—132, 133, 137, 143—145

自然主义, 134, 142—143

“罗曼派”, 138

德国的诗歌现实主义, 139

保护文艺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254

参见各国和各作家条

Lithuanians, 立陶宛人, 366

参见Baltic provinces条

Littré, Émile, 利特雷, 埃米尔, 法国辞典编纂家, 117

Liu K' un-i, 刘坤一, 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452, 455, 456, 460

Liu Yung-fu, 刘永福, 在越南的中国叛乱领袖, 650, 651

Livadia, Treaty of, 里瓦几亚条约, 447

Livery Companies of London, 伦敦同业公会, 与成人教育, 202

Livingstone, David, 利文斯顿, 戴维, 苏格兰传教士和探险家, 384, 637

Lloyd, Henry Demarest, 劳埃德, 亨利·德马雷斯特, 73

Lobengula, 洛本古拉, 马塔贝莱国王, 636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18—20, 24

在澳大利亚，391

在奥地利，18

在加拿大，391，404

在法国，305

在英国，18，25，185，190，390—391

在印度，432—433

在俄国，357—358，364，371—373

在南非，391

在美国，493—494

Lockyer, Sir Joseph Norman, 洛克耶爵士，约瑟夫·诺曼，英国天文学家，79

Lomakin, 洛马金，俄国将军，580

London and Brazilian Bank, 伦敦和巴西银行，519

London and River Plate Bank, 伦敦和拉普拉塔河银行，519

London Conference, The (1871), 伦敦会议(1871年)，37，543

London Conference (1884), 伦敦会议(1884年)，605

London University, 伦敦大学，180—181，197，202，203

Long, Edwin, 朗，埃德温，英国画家，164

Loos, Adolf, 鲁斯，阿道夫，奥地利建筑家，174

López, Francisco Solano, 洛佩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巴拉圭总统，534

Loris-Melikov, M. T., 洛利斯-梅里柯夫，米·塔，俄国内政大臣，362—363

Loti, Pierre (pseud.) 洛蒂，皮埃尔(笔名)，法国小说家，139

Lowe, Robert, 1st Viscount Sherbrooke, 洛, 罗伯特, 第一代舍布鲁克子爵, 英国保守派政治家, 391, 407

Lüderitz, 吕德里茨, 605

Lueger, Karl, 卢格, 卡尔, 108, 119

Lugard, Frederick John Dealtry, 1st Baron, 卢加德, 弗雷德里克·约翰·迪尔特里, 第一代男爵, 384, 624, 630

Lugné-Poe, and Théâtre de l'Œuvre, 吕尼埃-波埃, 与“作品剧院”, 137

Lugones, Leopoldo, 卢格内斯, 莱奥波尔多, 阿根廷诗人, 539

Luxembourg, and Hague Conference, 卢森堡, 与海牙会议, 241

Lyautey, Louis Hubert Gonzalve, 利奥泰, 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 法国元帅, 225

Lyons, Richard Bickerton Pemell, 1st Earl, 莱昂斯·理查德·比克尔顿·佩梅尔, 第一代伯爵, 英国外交家, 586

Lytton, Edward Robert Bulwer, 1st Earl of, 第一代利顿伯爵, 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 任印度总督, 425, 427, 431, 572, 578, 590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st Baron Macaulay, 麦考莱, 托马斯·巴宾顿, 第一代麦考莱男爵, 411, 419, 420, 427, 540

McCosh, James, 麦科什, 詹姆斯,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182

Macdonald sisters, 麦克唐纳姐妹, 苏格兰艺术家, 172

Macdonald, Sir Claude Maxwell, 窦纳乐爵士, 克劳德·马克斯韦尔, 英国驻北京公使, 458, 459

Macdonald, Sir John Alexander, 麦克唐纳爵士, 约翰·亚历山大,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 389, 393

Macdonald, 麦克唐纳, 在非洲的英国将军, 628

Macedonia, 马其顿, 335, 336, 344, 548, 549

反对土耳其当局的起义，348

Machine-tools, 机床, 99—100

McKim, Mead and White, 麦金、米德和怀特公司, 美国建筑公司, 164—165

McKinley, William, 麦金莱, 威廉, 美国总统（共和党人）, 492, 493, 504, 673, 675, 681, 685

麦金莱关税法, 57, 64

Mackinnon, William, 麦金农, 威廉, 英国船主, 612, 613, 624

Mackintosh, Charles Rennie, 麦金托什, 查尔斯·雷尼, 苏格兰艺术家, 172—173, 174, 176

Mackmurdo, Arthur H., 麦克默多, 阿瑟, 英国艺术家, 170, 171, 173, 174

他的《雷恩的伦敦城教堂》, 171

MacMahon, Marie-Edmé Patrice Maurice, 麦克马洪, 玛丽-埃德梅·帕特里斯·莫里斯, 法国元帅, 第三共和国总统, 256, 263, 302—304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252

Maeterlinck, Maurice, 梅特林克, 莫里斯, 比利时剧作家, 哲学家, 137—138, 149

Magnus, Sir Philip, 马格纳斯爵士, 菲利普, 伦敦城市和行会学会会长, 202

Magón, Enrique, 马冈, 恩里克, 墨西哥激进派, 531

Magón, Ricardo Flores, 马冈, 里卡多·弗洛雷斯, 墨西哥激进派领袖, 531

Mahan, Alfred Hayer, 马汉, 艾尔弗雷德·塞耶, 美国海军史学家, 206, 236, 237, 238, 239, 514

他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 234—235, 238

Mahdi, the, 马赫迪, 见Mohammed Ahmad条

Mahdists and Muslims in Sudan, 苏丹的马赫迪派和穆斯林, 385, 587, 594, 596, 598, 600, 601, 623, 626, 628, 629, 632

Mahmūd II, 马哈穆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326, 328, 330

Malaria research, 疟疾研究, 82

Malaya, 马来亚, 54, 385, 386, 398

 英国对马来邦的托管, 251

 在马来亚使用印度军队, 575

Mali, 马里, 609

Mallarmé, Stéphane, 马拉美, 斯特凡, 法国诗人, 130—131, 143, 322

Malta, 马耳他, 548, 570, 572, 573, 575

Manchester School of liberals, 自由主义者的曼彻斯特学派, 262, 265

Manchester Ship Canal, 曼彻斯特通航运河, 53

Manchu Dynasty, 满清王朝, 见China条

Manchuria, 满洲, 42, 462, 484, 654—661, 663—667各处

 俄国取得旅顺港, 374, 485, 563—564, 583, 660—661

Manding empire, 曼丁帝国, 610

Manet, Édouard, 马奈, 爱德华, 法国画家, 155—156, 157, 168, 538

Mann, Horace, 曼, 贺拉斯, 美国教育家, 186

Mann, Tom, 曼, 托姆, 英国劳工领袖, 403

Manning, Henry Edward, 曼宁, 亨利·爱德华, 英国红衣主教, 403

Mansfield , Katherine (i.e.Kathleen Mansfield Beauchamp), 曼斯菲尔德, 凯瑟琳 (即凯思林·曼斯菲尔德·比彻姆), 新西兰作家, 408

Marchand, Jean Baptiste, 马尔尚, 让·巴蒂斯特, 法国将军, 564, 628—631各处

Marconi, Guglielmo, 马可尼, 古利耶利莫, 他的无线电报公司, 89

Marées, Hans von, 马雷, 汉斯·冯, 德国画家, 165

Margary A.R., 马嘉理, 在中国被杀害的英国人, 448

Mariana Islands, 马里亚纳群岛, 662

Marlitt, 马尔利特, 德国作家, 141—142

Married women, decline in wage-em-ployment of, 已婚妇女就业人数下降, 17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 艾尔弗雷德, 经济学家, 69

Martí, José, 马蒂, 何塞, 古巴民族主义者, 531, 532, 539

Martin, Pierre, 马丁, 比埃尔, 法国炼钢专家, 95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09, 543

《资本论》, 101, 103, 112

《共产党宣言》, 101

《政治经济学批判》, 101

辩证唯物主义, 104

批判哥达纲领, 110

与尼采的比较, 113

与科学社会主义, 268

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的影响, 269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8, 101—120, 268—273, 315, 403

与达尔文主义, 101—106

反对马尔萨斯学说, 106

第二国际, 109, 111, 112, 271, 562

第一国际, 110, 269, 543

与罗马教会, 118

参见Bolshevism条

Mason, Charlotte M., 梅森, 夏洛特英国教育家, 193

Mason, Sir Josiah, 梅森爵士, 乔赛亚, 英国慈善家, 制笔商,
18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183, 202

Matabeleland, 马塔贝勒兰, 614, 618, 636, 637

Matsukata Masayoshi, 松方正义, 日本大藏大臣, 474, 479

任首相, 481

Maulvi of Fyzabad, the, 法扎巴德的毛勒维, 印度教领袖, 424

Maupassant, Guy de, 莫泊桑, 居伊·德, 法国作家, 126, 136—137, 149

Maurras, Charles, 莫拉斯, 沙尔, 法国作家, 120, 138

Maxim, Sir Hiram Stevens, 马克辛爵士, 海勒姆·史蒂文斯, 美国人, 机关枪的发明者, 41, 208

Maximilian, Ferdinand-Joseph, 马克西米连, 斐迪南-约瑟夫, 墨西哥皇帝, 156, 528

Maxwell, James Clerk, 麦克斯韦, 詹姆斯·克拉克, 数学家, 他的《电学和磁学论》, 78, 101, 104

Mayo, Richard Southwell Bourke, Earl of, 梅奥伯爵, 理查德·索思韦尔·伯克, 任印度总督, 425

Mažuranić, Ivan, 马茹腊尼克, 伊凡, 克罗地亚诗人, 334

Meade, Robert Leamy, 米德, 罗伯特·利米, 美国海军司令官,
643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26n.

Medical practice, improvement in, 医学实践的改进, 19—
20, 57, 82—84

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1887), 地中海协定 (1887年),
38, 41, 557, 558, 561, 571

Mehemet Ali, of Egypt,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 567, 568,
599

Meiggs, Henry, 梅格斯, 亨利, 美国铁路建筑商, 523

Meiji (Mutsuhito), 明治 (睦仁), 日本天皇

参见Japan条: 明治政权

Meinecke, Friedrich, 迈内克, 弗里德里希, 德国哲学家和历史
学家, 115

Melbourne, William Lamb, 2nd Viscount, 墨尔本, 威廉·拉
姆, 第二代子爵, 29, 414

Méline, Félix-Jules, 梅利纳, 费利克斯-朱尔, 法国政治家,
309, 319, 321

Mendel, Gregor Johann, 孟德尔, 格莱哥尔·约翰, 奥地利生物
学家, 60

Mendeleev, Dimitri, 门捷列夫, 德米特里, 化学家, 76

他的化学元素周期表, 103

Menilek, 曼涅里克, 埃塞俄比亚皇帝, 615, 623, 626, 627,
628

Meredith, George, 梅瑞狄斯, 乔治, 英国小说家, 123—125,
144

Merrill, Stuart, 梅里尔, 斯图尔特, 美裔法国诗人, 137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572

Metcalf, Charles Theophilus Metcalfe, 1st Baron, 梅特卡夫, 查尔斯·西奥菲勒斯·梅特卡夫, 第一代男爵, 418

Metternich, Prince Clemens Lothar Wenzel, 梅特涅亲王, 克雷门斯·洛塔尔·温采尔, 奥地利政治家, 562

Mevissen, 梅维森, 德国银行家, 62

Mexican Petroleum Company, 墨西哥石油公司, 524

Mexico, 墨西哥, 516, 517, 518, 524, 528, 529, 531, 532, 668

Meyer, Conrad Ferdinand, 迈尔, 康拉德·斐迪南, 德国作家, 139, 140

Michelet, Jules, 米希勒, 朱尔, 法国历史学家, 117

Michelson, Albert Abraham, 迈克耳孙, 艾伯特·亚伯拉罕, 美国物理学家, 79, 80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人数和财富的增加, 17

对政治的态度, 28—30, 244—245, 262, 296—297

Midhat Pasha., 米德哈特帕夏, 土耳其领袖, 324, 325, 329, 341, 351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人口的外移, 见Population条

Mikhailovsky, N.K., 米海洛夫斯基, 尼·康, 俄国社会主义者, 362

Milan, 米兰, 塞尔维亚国王, 348

Miletić, Svetozar, 米莱蒂奇, 斯韦托扎尔, 匈牙利塞尔维亚人领袖, 335

Miliyukov, P.N., 米留可夫, 巴·尼, 俄国“大同盟”领袖, 377

Mill, James, 穆勒, 詹姆斯, 他的《英属印度史》, 411, 433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 114, 115, 408

 他的《自传》, 114

 他的《论自由》受到詹·菲·史蒂芬的抨击, 114

 他的《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 117

Millais, John, Everett, 密莱司, 约翰·埃弗雷特, 英国画家, 164

Millerand, Étienne Alexandre, 米勒兰, 埃蒂耶纳·亚历山大, 法国社会主义者, 271—272, 317, 318

Millet, Jean François, 米勒, 让·弗朗索瓦, 法国画家, 154

Milligan, 米利根, 美国诉讼案当事人, 492

Milner, Alfred, 1st Viscount Milner, 米尔纳, 艾尔弗雷德, 第一代米尔纳子爵, 英国政治家, 任驻南非高级专员, 638

Milyutin, Dmitry A., 米柳亭, 德米特里·阿, 俄国将军, 213, 215, 223, 361

Mines, naval, 海军水雷, 231

Mining, improvements in, 采矿业的改进, 3, 5, 93

Miquel, Johann, 米凯尔, 约翰, 德国民族自由党领袖, 258

Missionary activities, 传教活动, 46, 118, 180

 英国传教团体, 384, 402, 404, 406, 420, 423

 天津屠杀法国人事件（天津教案）, 437—438, 443—444

 成为中国排外的原因, 439—440

 义和团打击中国的基督教信徒, 457, 459

 美国传教士协会, 504

在非洲，624

在太平洋，642

Mistral, Frédéric, 米斯特拉尔，弗雷德里克，法国诗人，138

Mitre, Bartolomé, 米特雷，巴托洛梅，阿根廷政治领袖，539—540

Mohammed Ahmad el Mahdi,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苏丹的穆斯林领袖，596，600，619—620

参见Mahdists条

Moltke, Helmuth, Count von,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冯，普鲁士陆军元帅，211，218，220，222，223，228，287

Monarchy, 君主政体，25—26，44，550

君权神授，188

欧洲君主政体的体制，244

新世界唯一的君主政体巴西君主政权的被推翻，527—528

Mond, Ludwig, 蒙德，路德维希，德国商人，63，94

Monet, Claude, 莫奈，克劳德，法国印象派画家，154，155—156，157，158，159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35，46，669，672—673，677

Monroe, James, 门罗，詹姆斯，美国总统，669

Montague, Francis C., 蒙塔古，弗朗西斯·查，英国社会学家，论《个人自由的限度》，264

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尔贝，118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黑山），26n.，36n.，241，329，330，333，334，335，336，344，361

阿尔巴尼亚边界冲突，343—344

Moore, George, 摩尔, 乔治, 爱尔兰作家, 126

Morant, Sir Robert, 莫兰特爵士, 罗伯特, 英国教育家, 190

Moravia, 摩拉维亚, 249, 259, 333, 338

Moréas, Jean, 莫雷阿斯, 让, 法国诗人, 130, 138

Morgan, John Pierpont,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 美国金融家, 50, 73, 503, 506

Morgan, Lewis Henry, 摩尔根, 刘易斯·亨利, 美国人类学家, 106, 183

Mori, 毛利, 日本长州藩主, 469

Mori Arinori, 森有礼, 日本文部大臣, 472

Morley, John, 1st Viscount Morley, 莫利, 约翰, 第一代莫利子爵, 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17, 387, 391, 432, 586

莫利—明托在印度的改革, 426

Morocco, 摩洛哥, 570, 592, 593, 632, 640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英国艺术家, 诗人, 社会学家, 144, 160—164, 172

他的美术工匠公司, 160, 162

韦布为他设计的“红房子”, 161, 163

他设计的壁纸, 161, 171

他关于艺术和社会改革的理论, 161—163, 175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164

Moscow Art Theatre, 莫斯科艺术剧院, 149

Motor-cars, 汽车, 96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180, 614

Muirhead, John Henry, 米尔黑德, 约翰·亨利, 苏格兰哲学家, 115

Mul Raj, 穆尔拉吉, 415

Müller, Friedrich Max, 缪勒,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 英裔德国东方学家, 433

Mun, Albert de, 门, 阿尔贝·德, 118

Munch, Edvard, 蒙克, 爱德华, 挪威画家, 170, 175

Murād V, 穆拉德五世, 土耳其苏丹, 341, 350

Murat Bey, 穆拉特贝伊, 土耳其领袖, 323, 350—351

Muraviev, Count Michael, 穆拉维约夫伯爵, 米哈伊尔, 俄国外交大臣, 660

Murray, James, 默里, 詹姆斯, 爱尔兰化学家, 91

Muslims, 穆斯林

在土耳其, 325, 328—330, 340

巴尔干的罗多皮起义, 343

在中国, 440, 442, 445, 447

在利凡得, 574, 591

在非洲, 594—597 各处, 603, 608, 609—610, 617, 619—620, 622, 624

参 见 Islam; Mohammed Ahmad el Mahdi; Mahdists and Muslims in Sudan 各条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120

Mustapha ben Ismail, 穆斯塔发·本·易斯马仪, 突尼斯首相, 595

Muthesius, Hermann, 米特希乌斯, 赫尔曼, 德国建筑家, 164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ies, 互进会, 203

Mutsu, 陆奥, 日本外务大臣, 482

Mutton, exports to Europe, 向欧洲输出羊肉, 5

Mytilene, 米蒂利尼, 573

Nachtigal, Gustav, 纳赫提加尔, 古斯塔夫, 德国探险家, 606

Nacion, La, 《民族报》, 阿根廷报纸, 540

Nadaud, Martin, 纳多, 马丁, 法国泥瓦工, 共和派, 312

Nāmik Kemal, 那米克·凯末尔, 土耳其剧作家和爱国者, 326

Napier, Sir Charles James, 纳皮尔爵士, 查尔斯·詹姆斯, 英国将军, 417, 626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192, 210, 543, 555, 602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铁甲汽船的最早使用者, 228

 普法战争后被俘, 542

Nasir-el-Din, 纳赛尔·埃尔·丁, 波斯国王, 574

Nasmyth, James, 内史密斯, 詹姆斯, 英国工程师, 94

Nation, The, 《民族》周刊, 美国期刊, 492—494

National Africa Company, 国家非洲公司, 603

National Society (of Britain), The, (英国) 全国协会, 184

National Un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Women of all Classes, 改进各阶层妇女教育全国同盟, 198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全国教师联合会, 186

Nationalis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公共服务事业的国有化, 22, 273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4, 243—244, 248—252, 262, 640

 受到教皇的谴责, 118

 与伊斯兰教, 423, 430, 619—620

 在非洲, 617—620, 629, 639—640 (参见South Africa条)

在阿尔巴尼亚, 336, 343—345
在澳大拉西亚和加拿大, 409—410
在奥地利, 249, 324, 332—339, 340
在巴尔干半岛各国, 25, 323—324, 328, 333—336, 337, 343
—345
在保加利亚, 347
在中国, 437, 439, 448, 454
在克罗地亚, 334, 337, 338, 340
捷克的民族主义, 249, 332—333, 337—339
在埃及和突尼斯, 595—601, 632, 640
在芬兰, 201
在法国, 310, 322, 557
在德国, 44, 119, 280, 283, 297
在匈牙利, 249, 339—340
在印度, 394, 409, 411, 423, 430—431, 433—435
在爱尔兰, 44, 104, 248—249, 250, 256, 389, 391
在意大利, 44, 409
在波兰, 44, 249, 282, 287, 292, 360
在俄国, 51, 248, 335, 360, 366, 370—372, 546—547,
553, 556—557 (参见Par-Slavism条)
在斯堪的纳维亚, 249
在南非, 阿非利卡人, 410, 594, 634—635, 637—638
在土耳其, 249, 325, 637, 638
在美国, 512—513, 692
在威尔士, 181

Naturalism in Literature, 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134, 142—143

Naumann, Friedrich, 瑙曼, 弗里德里希, 德国社会学家, 244, 265, 279

他的《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尊严》, 295

Navies, 海军

技术发展, 41—42, 228—234

国际竞争, 48, 61, 206, 220, 228, 231—240, 292, 295—296, 570, 648, 660

参见各国条

Navy Leagues, 海军协会, 233, 234, 296

Négrier, François-Oscar de, 奈格里埃, 弗朗索瓦-奥斯卡·德, 法国将军, 209

Negroes, 黑人, 见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条

Nelidov, 涅利多夫, 俄国外交家, 588

Nervo, Amado, 内尔沃, 阿马多, 墨西哥诗人, 539

Nesfield, Eden, 内斯菲尔德, 伊登, 英国建筑家, 163

Netherlands, 荷兰

贸易和工业, 8

劳动条件, 21

政治结构和发展: 自由主义, 33, 264; 教士的政党, 34, 261; 宪法的修正, 260; 选举权, 260; 社会立法, 265; 社会主义政党, 270

教育: 创办阿姆斯特丹大学, 183; 教派的和国立的学校, 268

Newcastle Education Commission, 纽卡斯尔教育委员会, 189

Newfoundland, 纽芬兰, 386, 400, 401, 674

New Guinea, 新几内亚, 252, 385, 587, 643, 648, 649

德商新几内亚公司，648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纽曼，约翰·亨利，红衣主教，英国神学家，他的《大学教育论文集》，180

New South Wales and Pacific expansion, 新南威尔士与在太平洋的扩张，642，648

Newspapers, 报纸

廉价报纸，4，68，98

新闻的影响，32，120

采用新的印刷方法，98—99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06

在法国，120，318，320

在英国，68，395，403，406

在印度，434

在日本，478

在俄国，359，373

在美国，504

“New Unionism”，“新工联主义”，15

参见Trade unions条

New Zealand, 新西兰

人口：向新西兰的移民，4，11

经济结构和发展：农业的发展和初级产品的生产，5，397—398；政府在银行危机中采取的行动，400

贸易和工业，5；肉类和奶制品，397，398

政治发展：选举权，29，390，391；自治，251，386；统一，389；自由党—工党联盟，393

教育：创办大学，183

国防, 226

没收毛利人的土地, 386

着意于太平洋上的扩张, 641—642, 648—649, 663

联邦法案, 648

参见Australasia条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 俄国沙皇, 562, 567, 568

Nicholas II, 尼古拉二世, 俄国沙皇, 254, 372, 374, 375, 378, 379, 382, 570, 592

Nicholas of Montenegro, Prince, 门的内哥罗的尼古拉亲王, 335

Nicholson, Sir William, 尼科尔森爵士, 威廉, 英国画家, 172

Nickel, 镍, 94

Nieh Shil-ch' eng, 聂士成, 中国军官, 458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81, 113, 114, 120, 144

他的《悲剧的诞生》, 101, 113

Niger territory, 尼日尔领地, 603, 604, 606—610各处, 620—621, 626, 629—631

拉各斯, 602

在柏林会议上领地被瓜分, 606

Nigeria, 尼日利亚

皇家尼日尔公司, 385

英国统治的巩固, 386

Nil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控制尼罗河的斗争, 见Sudan条

Nitro-glycerine, 硝化甘油, 92—93

Nittis, Giuseppe de, 尼蒂斯, 朱塞佩·德, 意大利画家, 158

Nobel, Alfred, 诺贝尔, 阿尔弗雷德, 瑞典制造商, 13, 14, 43, 93, 207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向北美的移民, 4, 11, 247

 北美的公共卫生, 20

 油井, 97

 北美英国殖民地的自治, 104, 386

 工业化, 247

 英国殖民地的联邦, 386

 黄金的发现, 401

 教育, 404

 参见Canad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各条

Northcliffe, 1st Viscount, 诺思克利夫, 第一代子爵, 见 Harmsworth, Alfred Charles William条

Northrop, J.H., 诺思罗普, 发明自动织机的美国发明家, 98

Norway, 挪威, 22, 23, 29, 30, 201, 245, 249, 260, 270, 273

Novipazar, Sanjak of, 新帕扎尔行政区, 336, 342, 344

Nubar Pasha, 努巴尔帕夏, 埃及大臣, 585

Nuri Bey, 努里贝伊, 土耳其作家, 326

Nyasa, Lake, 尼亚萨湖, 613, 636

Nyasaland, 尼亚萨兰, 618, 632, 637

Oceania, 大洋洲, 385

O' Conor, Sir Nicolas, 奥康纳爵士, 尼古拉斯, 英国外交官, 570

Oil, 石油, 见Petroleum条

Oil-firing, in ships, 石油作为船舶的燃料, 97

Oil tankers, 油轮和油罐车, 97

Okubo Toshimichi, 大久保利通, 日本官员, 468, 469, 470, 471, 476, 477—478, 646, 647

Okuma Shigenobu, 大隈重信, 日本官员, 468, 469, 478—479, 480, 481, 482

Olney, Richard, 奥尔尼, 理查德, 美国国务卿, 472, 673, 679

Oman, 阿曼, 591

Omdurman, British defeat of dervish army at, 英国在恩图曼打败马赫迪军队, 564

Omer Pasha, 奥马尔帕夏, 330

Ordóñez, 奥多涅斯, 见Batlle Ordóñez条

Osman Pasha, 奥斯曼帕夏, 208, 342

Ostwald, Wilhelm, 奥斯特瓦尔德, 威廉, 化学家, 85—86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见Turkey条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125, 180, 成为神学和科学争论的中心, 125

与妇女教育, 198

Pacific, War of the, 太平洋战争, 522, 523, 533—536, 540

Pago Pago, 帕果帕果, 见Samoa条

Pahlen K. I., 巴伦, 俄国司法大臣, 357

Palacios, Alfredo, 帕拉西奥斯, 阿尔弗雷多, 阿根廷社会主义者, 531

Palacký, František,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捷克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323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坦普尔, 第三代子爵, 英国政治家, 414, 416, 568, 571, 583, 586, 592

Pamir Russian invasion of, 俄国侵犯帕米尔, 590

Panama, 巴拿马, 518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46, 71, 317, 676—679, 686

Pan-Germanism, 泛日耳曼主义, 297

Pan-Slavism, 泛斯拉夫主义, 51, 208, 212, 248, 335, 348, 360, 546—547, 553, 556—557

Papacy, 教皇, 见Vatican; Roman Catholic Church各条

Paper industry, 造纸工业, 3

Paraffin stoves, introduction of, 煤油炉的使用, 97

Paraguay, 巴拉圭, 525, 530, 533, 670

Paraguayan War, 巴拉圭战争, 530, 534, 540

Parents'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 全国家长教育协会, 193

Pareto, Vilfredo, 帕雷托, 维尔弗雷多, 意大利实证主义者, 他的《社会主义制度》, 116

Paris, Louis Philippe, Comte de, 巴黎伯爵, 路易·菲力浦, 302

Paris Salon of Art, 巴黎艺术沙龙, 164, 171

Paris, Treaty of (1856), 巴黎条约 (1856年), 543

巴黎条约的黑海条款, 37, 543, 569

Parker, Barry, 帕克, 巴里, 英国建筑家, 164

Parkes, Sir Henry, 帕克斯爵士, 亨利, 澳大利亚政治领袖, 407

Parliaments, 议会

增加议会权力的努力普遍遭到失败，25—26

在欧洲，255—262

在美国，490—493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巴涅尔，查尔斯·斯图尔特，爱尔兰领袖，256, 389, 391

Parochial Charities of London Act, 伦敦教区慈善事业法，203

Parsons, Sir Charles Algernon, 帕森斯爵士，查尔斯·阿尔杰农，英国工程师，与汽轮机船，96

Pasteur, Louis, 巴斯德，路易，法国生物学家，19, 59, 81, 82, 83, 84

Patagonia, 巴塔戈尼亚，540

Pater, Walter, 佩特，沃尔特，英国作家，126, 127, 132

Pattison, Mark, 帕蒂森，马克，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182

Pauncefote, Sir Julian, 庞斯福特爵士，朱利安，英国驻美大使，676

海—庞斯福特巴拿马运河条约，676—678

Peabody, Elizabeth, 皮博迪，伊丽莎白，美国慈善家，193

Peabody Education Fund, U. S. A. , 美国皮博迪教育基金会，186

Peacock, Thomas Love, 皮科克，托马斯·洛夫，英国小说家，180

Pearl Harbour leased to U. S. A. , 珍珠港出租给美国，650

Pearson, Arthur, 皮尔逊，阿瑟，英国报业主，68

Pease, Edward, 皮斯，爱德华，费边社秘书，他的《费边社历史》，108

Pedro II, 佩德罗二世，巴西皇帝，527, 528, 537

Peel, Sir Robert, 皮尔爵士, 罗伯特, 英国政治家, 400, 414, 415

Peerage, Great Britain, 英国的贵族

贵族成分的变化, 31—32

贵族的政治影响, 31—32, 393

与美国女继承人结婚的风气, 32

Péguy, Charles Pierre, 贝玑, 沙尔·皮埃尔, 法国诗人和小品文作家, 138, 320, 321

Peixoto, Floriano, 佩绍托, 弗洛里亚诺, 巴西总统, 528

Peking, Treaty of, 北京条约, 374

Peking (Alcock) Convention, The, 北京(阿礼国)协议, 437, 442—443, 444

Pelew Islands, 帛琉群岛, 662

Pelloutier, Fernand, 佩卢蒂埃, 费尔南, 法国工会活动家, 317

Penjdeh incident, 平狄事件, 556, 579, 581, 587, 653

Pepper, John Henry, 佩珀, 约翰·亨利, 英国化学家, 195

Perkin, William, 柏琴, 威廉, 英国化学家, 84, 92

Perret, Auguste, 佩雷, 奥古斯特, 法国建筑家, 174

Perry, Matthew Galbraith, 佩里, 马修·加尔布雷思, 美国舰队司令, 670

Persia, 波斯, 412, 416, 572

萨非王朝, 417

与阿富汗, 567, 578

在英国—印度商路上的地位, 569, 577, 580

俄国和英国在波斯的利益, 579—583

Persian Gulf, 波斯湾, 385, 580, 582, 583
 英国炮舰在波斯湾, 567
 德国铁路计划, 591
Peru, 秘鲁, 517, 523, 525, 530, 531, 534
 在太平洋战争中, 523, 533—535
Pescadores, 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 484, 657, 658
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 裴斯泰洛齐, 约翰·亨利希, 瑞士教育家, 193, 199
Peters, Karl, 彼得斯, 卡尔, 德国探险家, 612
Petrol engine, 汽油发动机, 41, 96, 209, 395
Petroleum, 石油, 3, 73, 96—97, 368
Phayre, Sir Arthur Purves, 费尔爵士, 阿瑟·珀维斯, 英国驻缅甸首席专员, 418
Philadelphia Enquirer, 《费城问询报》, 轮转式印刷, 99
Philippines, 菲律宾, 35, 239, 563, 662, 683—684, 685—686
Phillips, Peregrine, 菲利普斯, 佩里格林, 英国制造商, 91
Phylloxera, 葡萄蚜, 307
Physics, 物理学
 物理学的发展, 77—80, 103—104
 原子物理学的开端, 80
Picquart, Colonel, 皮卡尔上校, 320
Picric acid, 苦酸, 93
Pierce, Charles, 皮尔斯, 查尔斯, 美国哲学家, 117
Piérola, Nicolās de, 彼罗拉, 尼古拉斯·德, 秘鲁领袖, 535

Pirandello, Luigi, 皮兰德娄, 鲁伊治, 剧作家, 137

Pisarev, D.I., 皮萨列夫, 德·伊, 俄国虚无主义作家, 359

Pissarro, Camille, 毕沙罗, 卡米耶, 法国印象派画家, 155, 157, 158, 166

Pius IX, 庇护九世, 教皇

 他的《现代错误学院汇编》, 118, 304, 314

 任期的结束, 118

 囚禁于梵蒂冈, 544

Pius X, Pope, accession of, 庇护十世教皇即位, 118

Pixii, Hippolyte, 皮克西, 伊波利特, 法国科学家, 86

Plehve, V.K., 普列维, 维·康, 俄国警察首脑和内政大臣, 373

Plekhanov, and Swiss Liberation of Labour Group, 普列汉诺夫, 与瑞士劳动解放社, 110

Plevna, Turkish defence of, 土耳其防守普列文, 208, 547

Plombières, Pact of, 普朗比埃尔条约, 39

Plunkett, Sir Horace Curzon, 普隆克特爵士, 霍勒斯·柯曾, 爱尔兰, 农业改革家, 397

Pneumatic tyres, 充气胎, 3, 97—98

Pobedonostsev, K.P., 波别多诺斯采夫, 康·彼, 俄国东正教最高会议总监, 363—364, 365, 366

Poe, Edgar Allan, 爱伦·坡, 埃德加, 美国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 132

Poincaré, Raymond Nicolas Landry, 彭加勒, 雷蒙·尼古拉·朗德里, 法国机会主义者, 321

Poland, 波兰, 25

 德国的波兰人, 44, 249, 282, 287, 292—293

民族主义, 44, 249, 282, 287, 292, 360

驻波兰的俄国军队, 214

移民, 247

俄罗斯化, 248—249, 366

在奥地利（加里西亚）的波兰人, 332, 338

土地改革, 360

社会主义者, 371

Polish minority in Germany, 德国的波兰人少数民族, 44, 249, 282, 287, 292—293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政党的发展和性质, 26—27, 30—32, 34, 110—111, 225—264, 270—273

参见各国条

Polytechnics, 工艺, 202—203

Pomak rising, 波马克人起义, 343

Ponty, 蓬蒂, 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632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大众科学月刊》, 105

Population, increase in, and migratio of, 人口的增长与移民, 4—5, 11—12, 14, 30, 245—247, 689—691

在澳大拉西亚, 4, 11—12, 393, 401—402

在奥地利, 12, 246, 337

在中国, 12n.

在古巴, 525

在欧洲, 245—246

在法国, 12, 48, 245—247, 308—309

在德国, 12, 30, 48, 58, 246, 285—286

在英国, 5, 12, 245—247, 386, 393, 401—402

在爱尔兰, 247, 388

在意大利, 30, 246

在日本, 12, 485

在拉丁美洲, 4, 12, 516—519, 520—522, 525

在波兰, 247

在俄国, 12, 30, 48, 246, 354, 369

在南非, 4, 11, 393, 401, 633

在瑞典, 245

在美国和加拿大, 4, 11—12, 48, 50, 247, 401—402, 489, 501, 511, 671, 689—691

Populism, 平民主义, 民粹主义

在美国, 27, 500—504

在俄国, 362, 371, 373

Portal, Sir Gerald Herbert, 波特尔爵士, 杰拉尔德·赫伯特, 英国外交家, 624, 625

Port Arthur, Russians in, 俄国人在旅顺港, 374, 485, 563—564, 583, 660—661

Porter, Noah, 波特, 诺亚, 美国牧师, 耶鲁大学校长, 182

Portsmouth, Treaty of (1905), 朴次茅斯条约 (1905年), 374

Port Sunlight, 桑莱特港, 69, 164

Portugal, 葡萄牙, 30, 36n., 189, 260, 261

殖民地事务, 563, 604, 637, 662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01, 109, 114—117, 119

Post-Impressionist school of painting, 后印象画派, 154, 171

Poussin, Nicolas, 普桑, 尼古拉, 法国画家, 157

Poverty, 贫穷, 1, 17, 24, 30

Powell, John Wesley, 鲍威尔, 约翰·韦斯利, 美国地质学家, 183

Prada, Manuel González, 普拉达,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 秘鲁爱国者和自由主义者, 531

Prado, Mariano, 普拉多, 马里亚诺, 秘鲁总统, 535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17, 120

Prague Treaty (1866), 布拉格条约 (1866年), 249, 282

Pre-Raphaelite movement, 拉斐尔前派运动, 160, 171

Press, 新闻, 见Newspapers条

Prices, decline in, 价格的下降, 2, 10—11, 70

Primrose League, The, 樱草会 (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团体), 391

Prinsep, Henry Thoby, 普林塞普, 亨利·索比, 在印度的英国文职人员, 433

Printing, 印刷术, 98—99

Profits, decline in, 利润的下降, 2, 10—12, 70—71

Protectionism, 保护贸易主义, 见Tariffs and Free Trade条

Protestantism, new trends in, 新教的新派别, 117—118

Proudhon, Pierre Joseph,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 109, 313

Prudhomme, Sully, 普律多姆, 苏利, 法国诗人, 138

Pryde, James, 普赖德, 詹姆斯, 英国画家和广告艺术家, 172

Public health, advances in, 公共卫生的进步, 18—21, 24

Public schools, 公学

在英国, 177—179, 189

法国模仿英国, 192

P' u Chün, Prince, 溥儁, 王子, 被指定为中国的王位继承人, 456, 462—463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516, 683

Pueyrredón, Prilidiano, 普埃雷东, 普里利迪亚诺, 阿根廷画家, 538

P' u Lun, Prince, 溥伦, 亲王, 道光皇帝的长孙, 445, 446, 456

Punch, 《笨拙》周刊, 70

Puttkamer, Robert Viktor von, 普特卡默, 罗伯特·维克多·冯, 普鲁士内政大臣, 280

Puvis de Chavannes, Pierre, 皮维斯·德夏凡纳, 皮埃尔, 法国画家, 165

Queensland, 昆士兰

昆士兰的棉花和糖, 385

对东新几内亚提出领土要求, 648

Rabih, 拉比赫, 穆斯林领袖, 619, 622, 630, 631

Racialism, 种族主义, 107—108, 119, 297, 434

见Anti-semitism条

Radetzky, Count Johann Josef, 拉德茨基伯爵, 约翰·约瑟夫, 奥地利陆军元帅, 214

Radio-activity, study of, 放射性的研究, 80

Radiowaves, discovery, of, 无线电波的发现, 78

Radium, isolation of, 镭的分离, 80

Radowitz, Joseph Maria von, 拉多维茨, 约瑟夫·玛丽亚·冯, 德国外交家, 589

Railways, 铁路, 见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条

Ramkrishna, 罗摩克里希纳, 印度思想家, 430

Ram Mohan Roy, 拉姆·摩罕·罗易, 孟加拉思想家, 412, 422, 431

“梵社”的创始人, 430

Ramsay, Sir William, 拉姆赛爵士, 威廉, 科学家, 79

Ramsey, Agnata, 拉姆齐, 阿格纳塔, 198

Ranjit Singh, 兰吉特·辛格, 旁遮普的锡克统治者, 417

Ranke, Leopold von, 兰克, 利奥波德·冯, 德国历史学家, 115

Raphael, 拉斐尔, 意大利画家, 157; 对雷诺阿的影响, 170

Rawlinson, Sir Henry, 罗林森爵士, 亨利, 英国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576

Redistribution Act, 选区重新划分法(1885年, 英国), 31, 255

Reeves, William Pember, 里夫斯, 威廉·彭伯, 新西兰社会和经济改革家, 389

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实验》, 403

Refrigerated ships, 冷藏船, 5, 394, 397, 520

Regent Street Polytechnic, 摄政街工艺学校, 203

Regnier, Henri de, 雷尼埃, 亨利·德, 法国诗人, 138

Reid, Whitelaw, 里德, 怀特洛, 美国政论作家, 495

Reinach, Joseph, 赖纳克, 约瑟夫, 法国政治家, 321

Reinhardt, Max, 赖因哈特, 马克斯, 德国导演, 142

Reinsurance Treaty, The (Germany-Russia, 1887), 再保险条约 (德俄, 1887年), 39n., 40n., 224, 366, 558, 559, 613

Religion, 宗教

新教中的新派别, 117—118

基督教科学派, 117

救世军, 117

基督教与希腊文化, 125—126

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325, 328—330

希腊正教, 329, 343

婆罗门教, 324

印度教, 423, 433—434

芝加哥世界宗教代表大会 (1893年), 430

佛教, 433

伊斯兰教, 574, 594, 595, 598, 609, 619—620 (参见 Muslims条)

萨努西派, 596, 619, 622

泛灵教, 618, 632

非洲的科普特基督教会, 620

参见 Church and state; Education; Missionary activities;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ology; The Vatican各条

Rembrandt, 伦勃朗, 印象画派的先驱, 157

Renan, Ernest, 勒南, 厄内斯特, 法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322

他的《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和《科学的未来》, 116

Renoir, Auguste, 雷诺阿, 奥古斯特, 法国印象派画家, 155, 156—158, 159, 170

Reutern, M. von, 路特恩, 冯, 俄国财政大臣, 355

Rhodes, 罗得岛, 573

Rhodes, Cecil John, 罗得斯, 塞西尔·约翰, 南非政治家, 66, 614, 636, 637, 638

Rhodesia, 罗得西亚, 385, 614, 637, 638

Rhodope rising, 罗多皮起义, 343

Rhys, Sir John, 里斯爵士, 约翰, 威尔士语文学家和教育家, 190

Ribot, Alexandre, 利鲍, 亚历山大, 法国政治家, 192, 224

利鲍委员会, 179, 192

Richardson, Henry Hobson, 理查森, 亨利·霍布森, 美国建筑家, 154, 164, 174, 176

Richter, Eugen, 李希特尔, 欧根, 德国自由主义领袖, 279, 296, 298

Rieger, Ladislaus, 里格尔·拉迪斯劳斯, 捷克领袖, 333, 337, 338, 339

Rifat Bey, 里法特贝伊, 青年土耳其党杂志编辑, 326

Riis, Jacob, 里斯, 雅可布, 丹麦出生的美国新闻工作者, 他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 511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 雷纳·玛丽亚, 德国诗人, 145

Rimbaud, Arthur, 兰波, 阿尔图尔, 法国诗人, 130—131, 138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Marquis of, 里彭侯爵, 乔治·弗雷德里克·塞缪尔·鲁宾逊, 任印度总督, 425, 432, 434

Ritchie, D.G., 里奇, 戴·乔, 英国哲学家, 105

Rivera, Diego, 里维拉, 迭戈, 墨西哥画家, 538

Roberts, Sir Frederick Sleigh, later Earl Roberts of Kandahar, Pretoria and Waterford, 罗伯茨爵士, 弗雷德里克·斯莱, 后为坎大哈、比勒陀利亚和沃特福德的罗伯茨伯爵, 英军总司令, 227, 576

Roberts, Isaac P., of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的艾萨克·罗伯茨, 183

Robilant, Count di, 罗比兰特伯爵, 意大利外交大臣, 614

Robinson, Hercules George Robert, Lord Rosmead, 罗宾逊, 赫尔克里士·乔治·罗伯特, 罗斯米德勋爵, 任驻南非高级专员, 638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森, 美国商人和慈善家, 13, 14, 50, 73, 506, 508

Rodd, Sir James Rennell, later 1st Baron Rennell of Rodd, 罗德爵士, 詹姆斯, 伦内尔, 后为罗德的第一代伦内尔男爵, 任英国驻埃塞俄比亚使节, 628

Rodó, José Enrique, 罗多, 何塞·恩里克, 乌拉圭作家, 539

Roedean School, 罗丁学校, 198

Roentgen, Wilhelm Konrad, 伦琴, 威廉·康拉德, 德国物理学家, 80

Roggenbach, Freiherr von, 罗根巴赫男爵, 冯, 293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

与工会, 15, 117—118

与政党, 34, 117—119, 261, 267—268, 282, 284, 287—288, 292, 544

与传教团体, 46, 118, 624

理论和发展, 117—118, 266—268, 282, 304, 314—315

社会天主教和天主教民主, 117—118

参见Church and state; Leo XIII; Pius IX; the Vatican各条

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Count von, 罗昂伯爵, 阿尔勃莱希特·泰奥多尔·艾米尔, 冯, 普鲁士陆军大臣, 215

与德国海军的创建, 235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美国总统 (共和党人), 73, 238, 515, 672, 675, 679, 688

Root, Elihu, 鲁特, 伊莱休, 美国陆军部长, 239, 675

Rosas, Juan Manuel de, 罗萨斯, 胡安·曼努埃尔·德, 阿根廷独裁者, 540

Roscoe, Henry, 罗斯科, 亨利, 英国化学家, 59

Rosebery,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5th Earl of, 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 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

任英国外交大臣, 571, 575, 587, 591, 622, 624, 625

任首相, 590

Ross, Sir Ronald, 罗斯爵士, 罗纳德, 82

Rossetti, Dante Gabriel, 罗赛蒂, 丹特·加布里埃尔, 英国画家和诗人, 155, 160

Rotary printing press, 轮转式印刷机, 99

Rothschild, N.M. and Sons, 路特希尔德家族, 商业银行家

与苏伊士运河, 584

与南非, 636

Roulin, Madame, painted by Van Gogh, 梵高画的卢兰夫人像, 169

Roumania, 罗马尼亚, 6, 22, 25, 30, 40n., 244, 249, 260, 261, 264, 273, 335, 348

Roume, 鲁梅, 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632

Roumelia, 鲁米利亚, 328, 346, 347, 548, 556, 572

Roy, 罗易, 见Ram Mohan Roy条

Royal Academy, Chantry Bequest purchases, 皇家艺术院（钱特里遗产基金会购买），164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丘镇皇家植物园（一译丘园），398

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皇家科学学院, 196

Royal Institution, The, 英国科学研究所, 203

Royal Niger Company, 皇家尼日尔公司, 385, 607

Royal School of Mines, 皇家矿业学校, 196

Rubber industry, 橡胶工业, 3, 97—98

在印度建立橡胶种植园, 97—98

Rudini, Marchese Antonio di, 鲁迪尼侯爵, 安东尼奥, 意大利大臣, 615

Ruskin College, 罗斯金学院, 203

Ruskin, John, 罗斯金, 约翰, 英国作家, 126, 157, 160, 175, 202

Russel, John, 1st Earl Russel, 拉塞尔, 约翰, 第一代拉塞尔伯爵, 414, 571, 577

Russia, 俄国

贸易和工业：工业生产, 3, 6, 48, 354—355；纺织业, 3, 368；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者, 6, 10, 54；关税, 10；政府的管理, 22；技术的发展, 48；煤和生铁的产量, 354, 368；在外高加索发现石油, 368

经济结构和发展：关税, 10, 64, 368；外国工业投资, 355, 367, 368；外国工业投资与国家, 369, 379；私营银行, 355；国债, 355, 369；税收, 355, 367, 369；贵族土地银行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的补助金, 365；财政改革, 367；工业化, 368—369；采用金本位制, 369；农民土地银行, 370, 380

人口, 12, 30, 48, 246, 354; 死亡率, 20, 369

社会结构和发展: 工会, 15, 371, 376, 380; 为警方的密探所操纵的工会, 373, 374; 群众的不满, 30, 370; 工人的保险, 265; 农民在政治上的迟钝, 352; 知识界, 352, 359, 362, 370; 原来的农奴的状况, 353—354, 367, 369; 土地贵族的衰落, 354, 365, 370; 在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 357; 地方自治会所起的社会桥梁作用, 357; 饥馑, 367, 370; 工业中的劳动条件, 370; 总罢工, 377; 第一届杜马中的农民成分, 379; 不断壮大的城市无产阶级, 380; 宗教信仰自由, 381

政治结构和发展: 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控制, 22; 政治上的落后状况和缺少宪法, 23, 26, 30, 263; 保守主义, 27; 自由主义, 27, 263, 264, 371, 373, 377, 381; 选举制度, 30, 364, 377—379; 废除农奴制, 47, 243, 352—353; 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 51, 248, 335, 360, 546—547, 553; 无政府主义, 108, 269, 359; 布尔什维克党, 110, 272, 373, 376;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11, 112, 272, 371, 373; 1905年的革命, 120, 188, 245, 376—378, 382; 专制君主政体, 244, 352, 372, 378—379; 用武力反对民主, 225; 革命的因素, 260, 261—262, 272—273, 354, 358—359, 362, 370—374, 375—379; 警察国家的状况, 270, 373—374, 379—380; 学生的骚动, 358; 新闻和检查制度, 359, 373; 虚无主义者, 359; 对柏林条约的不满, 361; 民粹派的政党, 362, 371, 373; 反犹太主义, 365—366, 374; 社会民主党, 371, 376; 边境地区的工人运动, 371—372; 地方自治会的领袖们要求制订宪法, 372, 375, 377; “社会革命党”(民粹派), 373; 解放同盟, 373; 孟什维克, 373, 376; 全俄农民联合会, 376; 杜马, 377, 378, 380, 381; 十月诏书, 377—378; 圣彼得堡苏维埃, 377—378; 立宪民主党, 378, 379, 380; 俄国人民同盟, 378; 帝国根本法, 378—379

外交: 谴责巴黎条约有关黑海的条款, 37, 543, 569; 联盟体系, 39—42, 361, 366—367(参见Three Emperors' League条); 在波斯的行动, 42, 583; 提议召开海牙会议, 43; 扩张主义政策, 384; 惧怕在黑海的英国舰队, 548; 在中亚的行动, 556, 569, 575—576(参见Afghanistan条); 在近东的地位, 561; 与法国和德国一起保护中国, 657—658; 参见与各有关国家的关系部分

与法国的关系，39—40，216，224—225，312，366—367，546，557，561，601，657—658；法俄联盟（1892—1894年），39n.，40，42，224—225，312，366，552，558，559—560，566，570，613，623，657，658

与中国的关系：在华北和满洲的扩张，42，563，583，654，657—667各处，686—688；取得旅顺港，374，485，563—564，583，660—661；占领新疆伊犁地区，447；里瓦几亚条约和圣彼得堡条约（中俄改订条约），447；占领满洲（1900年），462，664；财政援助，657—658，659；支持中国反对日本，657—658；要求筑路权，658—659，661，663；支持中国反对德国，659—660；俄华道胜银行，659，663，667；对朝鲜的阴谋计划，664；从满洲撤退，667

武装力量（1）：防务开支，43，240；军事装备，206，208；骑兵，210；动员方法，213—214；米柳亭的改革，213，215，23，361；波兰人的部队，214；征兵制，215，219，361；陆军的规模，217，223；尼古拉总参谋学院，218；政治影响，219—220；作为国家的象征，222；部署，223—224；在高加索，225；提议限制军备，241；士气低落，376；从征服的穆斯林民族中征募军队，574

武装力量（2），海军事务：海军的重要性有限，228；兵变，376

交通运输：铁路发展计划，51，212，355，368；西伯利亚铁路，51，212，368，564，655，658，666；铁路不适应战略要求（1876年），214；修筑铁路的费用，224，240，564；里海铁路，581；要求在满洲的筑路权，658—659

教育，188，358—359，364—365

与波兰的关系，214，248—249，360，波兰社会民主党，371

波罗的海各省，248，360，366；在波罗的海各省的政治行动，372

巴尔干事务，323，336，337，342，345，348，360—361，367，544—548；泛斯拉夫主义，51，248，335，360，546—547，553；与保加利亚，208，212，348，556—557；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

国，342；俄国撤出巴尔干半岛，346；在马其顿进行改革的建议，348；参见“与土耳其的关系”

与土耳其的关系，328，329，342，345，346，347，583；参见Russo-Turkish War条

与奥匈帝国的关系，336，361，366—367，545，546—548，551—552，557；参见Three Emperors' League条

农业的萧条，354；土地使用权，367，370；土地改革，369，380—381

司法制度，356—357，364

地方政府改革，357；地方自治会的建立和工作，357—358，364，371，372—373

政教关系，365；在波罗的海各省，366

与德国的关系，366—367，368，545—546，551；与德国签订再保险条约，39n.，40n.，224，294，366，558，559，613；在远东，657，660；参见Three Emperors' Alliance条

与日本的关系，484，485，486，647，656—658，661—667；参见Russo-Japanese War条

与波斯的关系，577，579—582，583

与英国的关系，见Great Britain条下，参见Armenia; Baltic Provinces; Finland; Georgia各条

Russo-Japanese War，日俄战争，35，42，212，240，374，554，566，688

朴次茅斯条约，374

对马海战，377，569，579

Russo-Turkish War，俄土战争，35，38，204，337，341，355，360—361，547

圣斯特法诺条约，38，343，344，361，547—548，572，573

Ruthenians in Austria，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332

Rutherford, Mark (i.e. William White), 拉瑟福德, 马克 (即威廉·怀特) 英国小说家, 125

Ryukyu Islands, 琉球群岛, 483, 644, 645, 646, 653

被日本接管, 647

Sagasta, Práxedes Mateo, 萨加斯塔, 普拉塞德斯·马特奥, 西班牙自由党领袖, 188

Sahara, 撒哈拉, 611

修筑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铁路的计划, 603

Said Pasha, 赛义德帕夏, 埃及总督, 583

Saigo Takamori, 西乡隆盛, 日本官员, 468, 471

武士叛乱的首领, 476

与朝鲜战争的计划, 646

Saigo Tsugumichi, 西乡从道, 日本军人, 647

Sailing ship, survival of, 仍在使用的帆船, 52

St Andrews University, 圣安德鲁斯大学, 181, 198

Saint-Hilaire, Étienne, 圣伊雷尔, 埃蒂耶纳, 法国生物学家, 80

Saint-Hilaire, Jules Barthélemy, 圣伊雷尔, 朱尔·巴特米, 法国外交部长, 596

St Leonards School, 圣伦纳兹学校, 198

St Lucia Bay, 圣卢西亚湾, 635

St Pancras Station, 圣潘克拉斯车站, 154, 163, 175

St Petersburg, Treaty of (1881), 圣彼得堡条约 (1881年), 447

Saionji, 西园寺, 日本官员, 482

Sakhalin Island, 萨哈林岛 (库页岛), 647

Salisbury ,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 , 3rd Marquis of, 索尔兹伯里, 罗伯特·阿瑟·塔尔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 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38

论海牙会议, 43

论要求建立海外基地, 223

建立国防委员会, 228

与国会活动, 255

论给土耳其的贷款, 345

任首相, 389, 390, 392

与党的组织, 391

论《每日邮报》, 406

论在印度的安全措施, 416, 590

与东欧政策, 548, 553, 556, 557, 558

论联盟, 560

论防御君士坦丁堡, 568

论英国在欧洲的地位, 571

论地中海和利凡得的安全, 572—573, 575

论利凡得文明, 573

论喀布尔埃米尔舍尔·阿里, 578

与同波斯的关系, 580, 582

与埃及的问题, 587—588, 601, 610—611, 613, 615, 622, 628, 631, 632

与非洲帝国, 593, 610—611, 612, 614, 615, 616, 637

与东非铁路, 629

命令吉钦纳入侵苏丹, 626—627

他的关于“垂死的民族”的讲话，661—662

论门罗主义，672

与巴拿马谈判，676

与取得威海卫，686

Salt Union (British)，联合制盐公司（英国），72

Salvation Army, The, 救世军，117, 402

Samain, Albert, 萨曼，阿尔贝，法国诗人，137

Samoa, 萨摩亚群岛，563, 642—644, 648, 649, 662, 670

Samori, 萨摩利，西非穆斯林领袖，608, 610, 620, 625, 629

Sampson, William Thomas, 桑普森，威廉·托马斯，美国海军上将，239

Sangnier, Marc, 桑尼埃，马克，118

San Stefano, Treaty of (1878)，圣斯特法诺条约（1878年），38, 343, 344, 361, 547—548, 572, 573

Santillán, Pedro Abad de, 桑蒂连，佩德罗·阿巴德·德，阿根廷工联主义者，531

Sanusi, 萨努西，教派，596, 619, 622

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 萨米恩托，多明戈·福斯蒂诺，阿根廷总统，537, 539, 540

Savaii (Samoa)，萨瓦伊岛（萨摩亚群岛），663

Sayyid al-Mahdi, 赛义德·阿里-马赫迪，萨努西派领袖，619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木材和铁生产的发展，6

Schellendorf, Bronsart von, 舍伦多夫，布龙扎尔特·冯，德国将军，他的《总参谋部的职责》，212

Scheurer-Kestner, Auguste, 舒勒-凯斯特纳，奥古斯特，法国政治家，321

Schiller, Johann Friedrich von, 席勒, 约翰·弗里德里希·冯 (1805年卒), 140

Schlaf, Johannes, 施拉夫, 约翰奈斯, 德国作家, 142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200, 249, 278, 282

Schlieffen, Alfred, Count von, 史里芬伯爵, 阿尔弗雷德·冯, 普鲁士将军, 217, 220, 224, 297

Schmoller, Gustav, 施莫勒尔, 古斯塔夫, 德国经济学家, 60

Schneider Works, and armaments, 施奈德工厂与军备, 240

Schönerer, Georg von, 舍纳雷尔, 格奥尔格·冯, 奥地利德意志人, 119, 339

Schools Enquiry (Taunton) Commission, 学校情况调查 (汤顿) 委员会, 178, 197

Schreiner, Olive, 旭莱纳, 奥利夫, 南非作家, 《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 408

Schroeder, Ludwig, 施罗德, 路德维希, 丹麦教育家, 200

Schwarzenberg, Prince Charles, 施瓦尔岑堡亲王, 查理, 奥地利人, 323

Schwegel, Baron, 施韦格尔男爵, 奥地利外交部官员, 336

Science, 科学

科学与政府力量的增长, 18—19

科学的进步, 77—86, 103—104

科学与政治思想, 103—104 (参见Darwinism条)

科学与宗教, 117, 125

科学与文学, 133

科学与技术, (参见Technology条)

Scotland, 苏格兰

艺术, 172—173

教育, 181—182, 185, 189, 190—191, 198

农业, 397

任命苏格兰大臣, 409

Scott, Dred, 斯科特, 德雷德, 美国黑人, 492

Scott, Sir George Gilbert, 斯科特爵士, 乔治·吉尔伯特, 英国建筑家, 154, 163, 175

Scott, R. W., 斯科特, 美国发明家, 98

Seddon, Richard John, 塞登, 理查德·约翰, 新西兰政治领袖, 407

Sée, Camille, 塞, 卡米耶, 法国教育家, 200

Seeley, Sir John Robert, 西利爵士, 约翰·罗伯特, 英国历史学家, 251

Selborne, William Waldegrave Palmer, 2nd Earl of, 第二代塞尔伯恩伯爵, 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帕尔默, 任殖民地事务次官, 638

Selīm III, 谢里姆三世, 土耳其苏丹, 324

Senegal, 塞内加尔, 603, 609, 610, 611, 621

Serbia, 塞尔维亚

政治结构: 对公用事业的管理, 22; 选举权, 30

与土耳其的关系, 36n., 328—329, 330, 335

交通运输: 铁路国有化, 273

与波斯尼亚的分治, 333—334, 335

与俄国的关系, 334, 337, 361

秘密团体“塞尔维亚青年联盟”, 335

奥地利人的统治, 336, 348

与阿尔巴尼亚, 343—344

通过柏林条约得到的领土, 361

Seurat, Georges, 修拉, 若尔日, 法国艺术家, 154, 165—166, 167, 170, 175

Seward, William Henry, 西沃德, 威廉·亨利, 美国国务卿, 669, 670

Sewing-machines, introduction of cheap, 使用廉价的缝纫机, 98

Seymour, Beauchamp, 西摩尔, 比彻姆, 英国海军提督, 458, 599, 601

Seymour, Sir Hamilton, 西摩爵士, 汉密尔顿, 英国政治家, 568

Shamil, 沙密尔, 切尔克斯人领袖, 567

Shantung, Germans in, 德国人在山东, 457, 485, 563, 569, 660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乔治, 剧作家和讽刺作家, 127, 128

Shaw, Richard Norman, 萧, 理查德·诺曼, 英国建筑家, 154, 163—164, 174, 176

Sheng Hsüan-huai, 盛宣怀, 中国邮电局长, 460

Sher Ali, 舍尔·阿里, 喀布尔埃米尔, 567, 574, 577, 578

Sherbrooke, 舍布鲁克, 见Lowe, Robert, 1st Viscount条

Sherman, John, 谢尔曼, 约翰, 美国政治家, 21, 73, 492, 508, 685

Sherman Anti-trust Act,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21, 508

Shimonoseki, Treaty of (1895), 马关条约 (1895年), 484, 485, 657

Shināsi Efendi, 希纳西·埃芬迪, 土耳其作家, 326

Shipov D.N., 希波夫, 德·尼, 俄国保守派贵族, 372, 377, 378

Shipping, 航运业, 见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条

Shoes, ready-made, 成品鞋, 3

Shuvalov, Peter, 舒瓦洛夫, 彼得, 俄国外交家, 576

Siam, 暹罗, 241, 418, 560, 590

Siberia, 西伯利亚, 357, 380, 564

西伯利亚铁路, 51, 212, 368, 564, 655, 658, 666

Sickert, Walter, 西克特, 沃尔特, 英国画家, 158

Sidgwick, Henry, 西奇威克, 亨利, 英国哲学家, 198

他的《政治学精义》, 114—115

Siemens, Frederick, and steel-making, 西门子, 弗里德里希, 与炼钢技术, 51, 95

Siemens, Werner von, 西门子, 威纳尔·冯, 德国科学家, 60, 62

Siemens, William, 西门子, 威廉, 科学家, 53, 60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602, 611

福拉湾学院, 180

Signac, Paul, 西涅克, 保罗, 法国画家, 165—166

Simon, John, 西蒙, 约翰, 医生, 20n.

Sino-Japanese Treaty of commerce, 中日商约, 646

Sino-Japanese War (1894), 中日战争 (1894年), 35, 179, 204, 240, 451, 453, 475, 481, 654, 656—658, 684

中国舰队的失败, 230—231, 656

朝鲜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483, 655—656

马关条约, 484, 485, 657

Sipyagin, D.S., 斯皮亚金, 德·谢, 俄国内政大臣, 372

Sisley, Alfred, 西斯莱, 阿尔弗雷德, 印象派画家, 155, 157

Sivori, Eduardo, 西沃里, 爱德华多, 阿根廷画家, 538

Skobolev, Mikhail Dmitrievich, 斯科鲍列夫,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俄国军人, 222

Skoda Works, and armaments, 斯科达工厂与军备, 240

Skyscrapers, 摩天大楼, 96, 175

Slave Coast, 奴隶海岸, 606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384—385, 611, 618, 622, 632

Slavonia united with Croatia, 斯拉沃尼亚, 与克罗地亚联合, 334

Smiles, Samuel, 斯迈尔斯, 塞缪尔, 苏格兰著作家和社会改革家, 69

Snow, John, 斯诺, 约翰, 英国麻醉医师, 82

Soap industry, 肥皂工业, 4, 68, 70—72

Social legislation, 社会立法, 14—15, 20—24, 265

在澳大利亚, 404, 408

在比利时, 15, 265

在丹麦和瑞典, 265

在法国, 15, 265, 312—314

在德国, 15, 21, 264—265, 273, 289

在英国, 14—15, 20—21, 23, 75, 203, 264

在印度, 265, 415

在意大利, 265

在荷兰, 265

在俄国, 265

在西班牙, 15, 21, 265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4, 111, 243, 268—273

参见Marxism; 各国条下

Sociology, 社会学, 105—106, 115, 506—507

Soejima Taneomi, 副岛种臣, 日本外务大臣, 645—646

Sokoto, 索科托, 尼日利亚酋长国, 606, 610, 630—331

Solomon Islands, Lesser, 小所罗门群岛, 663

Somaliland, use of Indian troops in, 在索马里兰使用印度军队, 575

Sorel, Georges, 索列尔, 若尔日, 法国哲学家, 112—113, 120

他的《工会的社会主义前途》, 113

South Africa, 南非

人口: 向南非的移民, 4, 11; 非欧洲成分, 393, 401; 欧洲成分的迅速增加, 633

贸易和工业, 5, 6; 黄金, 71, 385, 594, 633, 635, 637; 钻石, 633

布尔战争, 25, 35, 75, 120, 204, 239, 251, 385, 410, 564—565, 566, 570, 677, 682; 布尔战争中的装甲列车, 212; 布尔战争暴露了英国武装力量的弱点, 227, 237, 239; 从澳大拉西亚和加拿大来的志愿人员, 407; 布尔战争的爆发, 638

布尔共和国: 武装力量的优势, 225; 抵抗兼并, 385 (参见Boer War条); 阿非利卡民族主义, 410, 594, 634—635, 637,

638; 阿非利卡语的地位, 410; 德兰士瓦起义 (第一次布尔战争, 1881年), 634, 638

英国人居留地和防御能力, 226

部族的反抗, 385

德国的影响, 385, 561, 633, 635, 637—638

“致克留格尔的电报”, 43, 561

地方政府, 391

未遇到过的社会问题, 404

英国在南非的统治, 410, 633—639; 与自治问题, 251, 386,
633

詹姆森袭击事件, 561, 594, 637

班图人, 633, 634

荷兰改革派教会, 634

阿非利卡协会, 635, 636, 637

迪拉果阿湾铁路, 637

浅滩危机, 637

South Africa Chartered Company, 南非特许公司, 385, 614,
636, 637

Spain, 西班牙

经济发展: 关税, 10

政治和宪政的发展: 社会立法, 15, 21, 265; 君主专制政体压倒共和政体, 25, 244; 选举权, 30, 260; 卡洛斯战争, 244; 国会和政党, 260, 261

教育, 188—189

武装力量: 军事领袖的影响, 219; 在海外承担的义务, 225;
海军在美西战争中, 238

帝国在美洲的灭亡, 533, 662

参见Spanish-American War条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35, 120, 202, 204, 238—239, 512, 533, 563, 662, 671, 676, 679—683, 685, 688

菲律宾为美国所占领, 563, 662

西班牙舰队在马尼拉湾遭到失败, 662, 683

宣战, 682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英国哲学家, 105, 506

Spengler, Oswald, 施本格勒, 奥斯瓦尔德, 德国历史学家, 162

Spurgeon, Charles Haddon, 斯珀吉昂, 查尔斯·哈登,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406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约瑟夫, 俄国领袖, 120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的改善, 4, 17, 28—29, 71

德国和英国的对比, 62

Standard Oil Trust (U.S.A.), 美孚石油托拉斯(美国), 13, 73, 506, 508

Stanislavsky (i.e. Konstantin Sergeivitch Alexeyevl),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即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列克谢也夫), 俄国戏剧导演, 149

Stanley, Sir Henry Morton, 斯坦利爵士, 亨利·莫顿, 英国探险家, 603

State, increased intervention and power of, 国家干预和国家权力的增强, 见Government条

Stead, William Thomas, 斯特德, 威廉·托马斯, 英国新闻工作者, 406

Steam-ship, development of, 汽船的发展, 5, 52, 228

Steam-turbine, 汽轮机, 96

Steel industry, 炼钢工业

技术的发展, 3, 10, 50—52, 94—96, 100

钢轨, 95; 钢管, 96

第一艘钢壳船, 95

成为建筑材料, 96

用于装甲材料, 96, 230

在法国, 57, 95

在德国, 13, 48, 51, 58, 74—76, 240, 285, 290, 398

在英国, 48, 50, 95, 100, 308, 398

在印度, 429

在日本, 485

在美国, 4, 10, 48, 50, 57, 96, 398

Stein, Heinrich Friedrich Carl, Baron von, 施泰因男爵,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 冯, 246, 280

Stein, Lorenz, 施泰因, 洛仑兹, 德国社会学家, 244

Steinberger, Albert, 斯坦伯格, 艾伯特, 美国军人, 643

Stephen, Sir James Fitzjames, Bt, 斯蒂芬爵士, 詹姆斯·法策詹姆斯, 从男爵, 英国法官, 他的《自由、平等、博爱》, 114

Stephen, Sir Leslie, 斯蒂芬爵士, 莱斯利, 英国文人, 《双周评论》撰稿人, 117

Stevens, Thaddeus, 史蒂文斯, 撒迪厄斯, 美国共和党人, 495, 497, 502

Stevenson, J. J., 史蒂文森, 英国建筑家, 163

Stevenson, Robert Louis, 斯蒂文生, 罗伯特·路易斯, 作家, 125

Stifter, Adalbert, 施蒂弗特, 阿达尔贝特, 奥地利作家, 140

Stöcker, Adolf, 施特克尔, 阿道夫, 德国宫廷牧师, 108, 294

Stocks and shares, 股票, 13, 73

Stolypin, P. A., 斯托雷平, 彼·阿, 俄国首相, 379—381

Storm, Theodor, 史托姆, 泰奥多尔, 139, 140—141

Straits Settlements, 海峡殖民地, 398

Strauss, Richard, 施特劳斯, 理查, 德国作曲家, 145

Strindberg, August, 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 瑞典剧作家, 147—149, 150, 152

Strong, Josiah, 斯特朗, 乔赛亚, 美国牧师, 他的《我国: 其未来前途和当前危机》, 107

Strossmayer, Bishop, 斯特罗斯迈尔, 主教, 与斯拉夫宣传, 334

Struve, P. B., 司徒卢威, 彼·别, 俄国激进派, 373

Stuart, James, 斯图尔特, 詹姆斯, 大学补习部讲师, 203

The Studio, 《画室》, 英国期刊, 171

Submarines, development of, 潜水艇的发展, 231—233

Sudan, 苏丹

法绍达危机, 35, 43, 232, 564, 594, 601, 622, 623, 627—629, 630

苏丹的穆斯林和马赫迪派, 385, 587, 594, 596, 598, 600, 601, 623, 626, 628, 632; 被吉钦纳所打败(1898年), 564, 629

建立了英埃共管(1899年), 386, 590, 629

英国重新征服苏丹(1896年), 564, 626—629; 恩图曼战役, 564, 629

印度军队在苏丹, 575

土耳其在苏丹的利益, 587

埃及的统治和马赫迪派的叛乱(1883年), 587, 599—600

为控制苏丹而进行的国际斗争, 615—616, 622—629

Sudan, western (French), 西苏丹(法属), 609—610, 620—621, 622, 630

西苏丹穆斯林国家, 603

Sudermann, Hermann, 苏德曼, 赫尔曼, 德国剧作家, 142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5, 52, 53, 385, 395, 568, 569, 570, 583—585, 589, 595, 597, 599, 600, 676

迪斯累里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 53, 388, 584

Suffrage, 选举权

选举权的民主化, 29—31, 255, 260—261

在澳大拉西非, 29, 390—391

在奥匈帝国, 27, 30, 259

在巴伐利亚, 31

在比利时, 30, 261

在保加利亚, 260

在丹麦, 30

在德意志帝国, 29—30, 257, 279—283

在英国, 31, 255—256, 260, 390

在意大利, 30, 257, 260

在日本, 30, 480

在荷兰, 30

在葡萄牙, 29—30

在普鲁士, 279—280

在西班牙，30

在瑞典，30，201

在瑞士，260

在土耳其，30

在美国，29，32，496

在美国（黑人），496—500

Sugiyama, 杉山，在中国被杀害的日本外交官，459

Sullivan, Sir Arthur, 沙利文爵士，阿瑟，作曲家，127

Sullivan, Louis, 沙利文，路易斯，美国建筑家，175，176

Sumner, Charles, 萨姆纳，查尔斯，美国共和党政治家，495，496，499

Sumner William Graham, 萨姆纳，威廉·格雷厄姆，美国社会学家，105

Svyatopolk-Mirsky, P.D. ,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彼·达，俄国内政大臣，375

Swan, Sir Joseph, 斯旺爵士，约瑟夫，英国科学家，88

Sweden, 瑞典

贸易和工业：生铁向德国出口，6，285

政治和宪政的发展：选举权，30，201；自由派的统治，33，201；与挪威的联合解体，240；社会立法，265；社会主义政党，270

教育，201

人口，245

Swinburne, Algernon Charles, 史文朋，阿尔杰农·查尔斯，英国诗人，126

Switzerland, 瑞士

劳动条件，21

政治状况和发展：教士党，34，261；劳动解放社，110；政府体制，244，249，258；宪法修正案，260；选举权，260

中立，36n.

教育，183，185—186，187，196，197，199，200，201

铁路国有化，273

Sybel, Heinrich von, 济贝耳，海因里希·冯，德国历史学家，219

Symbolism in poetry, 诗歌中的象征主义，129—132，133，137，143—145

Syndicalism, 工联主义，15，112—113，120，531—532

Syria, 叙利亚，570，571，572，584，588，590

Taaffe, Count Eduard, 塔菲伯爵，爱德华，奥地利政治家，338—339

Taewongun, 大院君，朝鲜领袖，652

Tagore family, 泰戈尔家族，422

Tagore, Satyendra Nath, 泰戈尔，萨蒂恩德拉·纳特，第一个担任印度文官的印度人，426

Tahsīn Pasha, 达赫辛帕夏，349

Taine, Hippolyte, 泰纳，伊波利特，法国哲学家，116，117，322

Takezoe, 竹添（进一郎），日本驻朝鲜公使，652

T' an Ssu-t' ung, 谭嗣同，中国改良派，455，456

Tanganyika, 坦噶尼喀，612，613

Tanguy, 唐居伊，法国艺术作品商，168

Tao Kuang, 道光，中国皇帝，445—446

Tariffs and Free Trade, 关税和自由贸易, 7—10, 57, 64, 247—248, 264, 290, 309, 393, 396, 507

在澳大拉西亚, 64, 393, 396

在比利时, 8

在加拿大, 8, 64, 393, 396

在智利, 9

在法国, 8, 64, 309

在德国, 8, 10, 62, 64, 264, 290, 368, 396

在英国, 7—9, 64, 387, 396

在意大利, 10

在俄国, 10, 64, 368

在土耳其, 8

在美国, 8, 10, 57, 64, 396, 507

Tashkent, 塔什干, 569, 576, 580

Tata, Jamsetji Nasarwanji, 塔塔, 詹谢德奇·纳沙尔旺吉, 印度工业家, 429

Taunton (or Schools Enquiry) Commission, 汤顿(或称学校情况调查)委员会, 178, 197

Taxation, 税收

作为社会改革, 23—25, 391

参见各国条下

Taylor and White's alloy steels, 泰勒和怀特的合金钢, 100

Tchad, Lake, 乍得湖, 611, 621, 622, 623, 629, 630, 631

Tchemkend, 奇姆肯特, 569, 576, 578

Technology, 工艺学

工艺学的经济效果, 2—3, 49—56

与科学的紧密联系, 76—77

在工业上的应用: 电力工业, 60, 76, 86—88; 涡轮发电机, 96; 染料, 76, 84, 91—92; 铝, 89, 93; 有色金属的冶炼, 89, 93—94; 钢铁, 94—96, 100; 工程学, 96; 苛性钠, 90; 硝酸钠, 90—91; 硫酸, 91; 化肥, 91; 烈性炸药, 92—93; 石油, 96—97; 橡胶, 97; 纺织机械化, 98; 印刷术, 98—99; 机床, 99; 自动化, 100

Tegetthoff, Baron Wilhelm von, 泰格特霍夫男爵, 威廉·冯, 奥地利海军上将, 229

Tel-el-Kebir, Battle of, 特勒凯比尔战役, 586, 599, 601

Telegraph, 电报, 88—89, 94

Telephone, 电报, 3, 89

Temo, Ibrahim, 特莫, 易卜拉欣, 阿尔巴尼亚革命家, 350

Temperance movements, 禁酒运动, 118

Templs, Sir Richard, 坦普尔爵士, 理查德, 他的《1880年的印度》, 576

Tenasserim, 丹那沙林(即德林达依), 418

Teodros II, 提奥德罗斯二世, 埃塞俄比亚皇帝, 626

Test Act (1871), 考试法(1871年), 180

Tewfik Pasha, 特伍菲克帕夏, 埃及总督, 585, 597, 599, 600

Textile industries, 纺织工业

纺织工业中的技术发展, 92, 98

在法国, 57, 308

在德国, 3, 59

在英国, 64, 98, 398—399

在印度, 399, 429, 434

在意大利, 3

在日本, 474, 484—485

在俄国, 3, 368

Théâtre Libre, 自由剧院, 137

Theebaw, 锡袍, 缅甸国王, 418

Theology, 神学, 117—118

Thermodynamics, laws of, 热力学定律, 77—78, 103—104

Thiers, Louis Adolphe,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214, 301, 302, 303, 543, 543, 544

Thomas, Sidney Gilchrist, 托马斯, 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 发明家, 与炼钢法, 51, 95

Thomason, J., 托马森, 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 420

Thomism, 托马斯主义, 118

Thomson, Joseph, 汤姆森, 约瑟夫, 苏格兰探险家, 606

Three Emperors' League (Austria-Hungary, Germany and Russia, 1873), 三皇同盟(奥匈帝国、德、俄, 1873年), 39n., 40n., 361, 543—544

Three Emperors' League or Alliance (Austria-Hungary, Germany and Russia, 1881), 三皇同盟或联盟(奥匈帝国、德、俄, 1881年), 39n., 40n., 347, 348, 361, 366, 551, 552—553, 554, 647

三皇的最后一次会议, 555

同盟的终结, 557, 558

重新恢复(1897年), 562

Tibet, 西藏, 416

Tientsin, Treaty of, 天津条约, 442

Tientsin Massacre, 天津教案, 437—438, 444

Tiffany, Louis C., 蒂法尼, 路易斯, 英国玻璃艺术家, 173

Tiflis, 第比利斯, 572

Tilak, B.G., 提拉克, 巴尔·甘加德哈尔, 印度政治领袖, 435

Tillett, Ben, 提列特, 本杰明, 英国劳工领袖, 403

Tillman, Ben, 蒂尔曼, 本, 美国民主党人, 500

Times, The, 《泰晤士报》

城市新闻专栏, 73

引用泰晤士报的话, 75

沃尔特印刷厂采用转轮印刷机, 99

与爱尔兰自治, 406

Tirpitz, Alfred P.Friedrich von, 提尔皮茨, 阿尔弗雷德·P. 弗里德里希·冯, 普鲁士海军上将, 236—237, 296

Tisza, Koloman, 蒂萨, 科洛曼, 匈牙利自由党领袖, 337—338, 340

Titian, 提香, 作为印象画派的先驱, 155, 157

Tocqueville, Comte de, 托克维尔伯爵, 法国外交家, 345

Tod, James, 托德, 詹姆斯, 433

Togoland, 多哥(兰), 605, 607, 663

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 605

Toit, S. J. du, 杜托伊特, 南非布尔人民族主义者, 634

Tokolor empire, 图库勒帝国, 609, 610

Tokugawa family, 德川家族, 464—467

Tolain, 托伦, 法国铸铜工人和机会主义领袖, 312—313

Tolstoy, Count Dmitri Andreievich, 托尔斯泰伯爵, 德米特里
• 安德列耶维奇, 俄国守旧分子

任教育大臣358—359

任内政大臣, 363, 364, 367

Tolstoy, Count Leo, 托尔斯泰伯爵, 列夫, 俄国小说家, 141,
150—153

Tonga, 汤加, 649, 663

Tongking, 东京, 252, 310, 449—451, 639, 650—651, 658

黑旗军, 449, 651

Toorop, Jan, 托罗普, 扬, 荷兰画家, 170, 175

Torpedo, 鱼雷, 231

Torpedo-boat, development of, 鱼雷艇的发展, 231—233

Torre, 托雷, 见de la Torre条

Toulouse-Lautrec, Henri de, 土鲁斯-劳特累克, 亨利·德, 法国艺术家, 172

Toynbee, Arnold, 汤因比, 阿诺德, 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203, 402

Tracy, Benjamin F., 特雷西, 本杰明, 美国海军部长, 238

Trade and industry, 贸易和工业

工业化, 2—4, 60, 246—247, 383

大萧条, 2, 7—8, 10—11, 46, 49, 71

工艺的增加, 3, 86—100, 308

世界贸易的增加, 5—7, 53—56, 73

国际支付平衡和财政的发展, 6, 55—56

国际贸易脱离了自由放任政策, 7—10, 57, 64, 247—248,
264, 290, 309, 393, 396, 507; 参见Tariffs条

经济的波动, 10, 70—74; 参见Prices; Profits各条

经济均势的变化, 47—48, 56

组织和政府控制的加强, 见Economic organisation;
Government各条

参见各种产品、工业和各国条

Trade Union Congress (British), 工会代表大会(英国),
392, 403

Trade unions, 工会, 14—17, 33, 62, 74, 272

天主教工会, 15, 118

“新工联主义”, 15, 509

索列尔与工联主义, 112—113

工会与教育, 203

在澳大利亚, 16

在奥地利, 15

在比利时, 15, 74

在法国, 15, 74, 112, 312—313, 315—317

在德国, 15, 62, 74, 109—111, 281

在英国, 14—15, 68, 75, 186, 203, 272, 392, 403

在意大利, 15

在拉丁美洲, 14—15, 531—532

在俄国, 15, 371, 373—374, 376, 380

在美国, 15—16, 74—75, 509—510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交通运输

世界范围的改进, 5, 32, 49—53; 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 5—
6, 45, 53—56; 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6—10, 53; 政府控制, 22,
273; 在巴尔干的商路, 51, 336, 348; 技术的发展, 88—89, 94—

96；通往白沙瓦的大干道，421；在缅甸的商路，448；从好望角到开罗的商路，614

航运：世界范围的增加，5，52；汽轮，5，52，228；冷藏船，5，394，397，520；仍在使用的帆船，52；第一艘钢壳船，95；汽轮机，96；油船，97；通往拉丁美洲的航线，518

电讯，6；在英国，22，89，395；海底电缆，53；技术的发展，88—89，94；在拉丁美洲，518

铁路：铁路的发展，5，49，51，95；国有化，22，273；英国在铁路技术上的领先地位，49，383；西伯利亚铁路，51，212，368，564，655，658，666；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88；电气化，88；钢轨的使用，95—96；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205，211—213，224；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297—298，591；东方铁路（维也纳到君士坦丁堡），336；对英帝国发展的影响，394；里海铁路，581；可通往波斯湾的铁路线，591；修筑横贯撒哈拉沙漠的铁路的计划，603；中东铁路（中国），659

在非洲，628—629

在澳大拉西亚，394，401

在奥地利，336，338，344

在巴尔干，51，336，348，591

在加拿大，51，94，394，401

在中国，452—453，658—659，661，663

在法国，51

在德国，51，88，211—212，224，273

在英国，22，49，89，394，401

在印度，22，415，421—422，428—429

在意大利，51，273

在日本，472—473

在拉丁美洲，519—523，525

在俄国, 51, 212, 214, 355, 368, 581, 655, 658, 666

在南非, 637

在土耳其, 350, 591

在美国, 5, 49—50, 88, 501, 508

内燃机, 41, 77, 96, 209, 399; 汽车, 96

运河, 52—53

苏伊士运河, 5, 53, 568, 569, 570, 677; 巴拿马运河, 46, 71, 317, 676—679, 686; 基尔运河, 53, 237; 曼彻斯特通航运河, 53; 在加拿大, 395

Transvaal, 德兰士瓦, 见South Africa条

Treaties, 条约, 见Alliances条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特赖奇克, 海因里希·冯, 德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107, 219, 296

Trentinian, 特朗坦尼安, 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631

Trinity College, Dublin, 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 183

Triple Alliance (Austria-Hungary, Germany and Italy, 1882), 三国同盟(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 1882年), 39n., 40, 42, 224, 244, 552, 553—554, 557, 559, 560, 566, 571, 615, 638, 647

Troeltsche, Ernst, 特勒尔奇, 恩斯特, 德国哲学家, 115

Trollope, Frances, 特罗洛普, 弗朗西斯, 英国作家, 407

Trotsky, Leon Davidovich, 托洛茨基, 列甫·达威多维奇, 俄国孟什维克, 377

Tsai Chih, Prince, 载漪, 亲王, 中国王子奕纬的嗣子, 445

Tsai Ch' un, 载淳, 见T' ung Chih条

Tsai T' ien, 载湉(慈禧太后的姨侄、恭亲王的侄子), 中国皇帝, 见Kuang Hsü条

Tsai Ying, 载滢, 中国恭亲王的儿子, 446

Ts' en Yü-ying, 岑毓英, 中国云南总督, 448

Tseng Chi-tse, 曾纪泽, 中国外交家, 447, 654

Tseng Kuo-fan, 曾国藩, 中国南方的领导人, 452

Tso Tsung-t' ang, 左宗棠, 中国将军, 445, 452

Tsushima, occupied by Russians in 1861, 对马岛, 俄国于1861年占领该岛, 654

参见Russo-Japanese War条

Tuan, Prince, 端王, 中国道光皇帝的孙子, 456

亲义和团的行动, 458, 459, 460

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459

被流放, 463

T' ung Chih, 同治 (本人名字载淳), 中国皇帝, 444—445

T' ung Fu-hsiang, 董福祥, 中国将军, 460

Tunisia, French occupation of, 法国占领突尼斯, 252, 550, 553, 567, 570, 571, 573, 584, 587, 595—597, 598, 599, 600, 632

Turati, Filippo, 屠拉梯, 菲利波,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111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417, 569, 572, 574, 576, 589

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叛乱, 447

俄国军队在土耳其斯坦, 570, 580, 592

Turkey, 土耳其, 30, 323—330, 340—351

经济结构和发展: 关税, 8; 破产的威胁, 325, 327—328; 税收, 330; 帝国银行拒绝向苏丹提供贷款, 328; 外国贷款, 328, 345, 571; 财源, 328, 346; 穆哈兰敕令, 345—346; 从君士坦丁堡各银行获得的贷款, 345

奥斯曼帝国的地位, 25, 35, 45, 204, 323, 342, 351, 545, 547—548, 561, 574, 595; 柏林条约签订后割让的领土, 44, 342

政治结构和发展, 26n.; 自由主义, 27, 263; 保守主义, 27; 选举权, 30; 政治改革, 324—328; 坦齐马特运动的支持者, 324, 330; 知识界的民族主义, 325; 要求西方化, 325; 青年土耳其(新奥斯曼)运动, 326, 327, 341, 350—351; 税收的政治作用, 330; 穆斯林的影响, 343, 349—350; 警察国家的出现, 346, 348—349; 新的革命运动, 350—351

与奥地利的关系, 42, 323—324, 333, 336—338, 342, 348

武装力量, 206, 325, 326—327; 舰队的覆灭(1853年), 228; 被俄国所战败(1877年), 337

保加利亚的叛乱, 244, 329—330, 342, 346, 347, 545, 547
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关系, 325, 328—330, 340; 罗多皮起义, 343

教育, 326; 在安纳托利亚, 350

与俄国的关系, 328, 329, 337, 342, 345, 346, 347, 588

(参见Russo-Turkish War条)

波斯尼亚的叛乱, 328, 330, 333, 544

与埃及, 328, 347, 557, 585, 588—589, 598, 600, 601, 613

亚美尼亚大屠杀, 347, 350, 561

交通运输: 赫贾兹铁路, 350; 德国的铁路计划, 591

与英国的关系, 见Great Britain条

Turkey in Asia guaranteed by British, 英国保证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安全, 548

Turkmanchai, Treaty of, 土库曼查伊条约, 577

Turkoman territory, 土库曼地区, 580, 581

Turner, F. J. , 特纳, 弗·杰, 美国历史学家, 513

Tylor, E. B. , 泰勒, 爱·伯, 人类学家, 106

Typewriter, 打字机, 3

Tz' u An, 慈安, 中国皇太后, 438, 447

Tz' u Hsi, 慈禧 (叶赫那拉氏), 中国皇太后, 同治之母, 438, 441—448各处

 计议第二次听政, 446—447

 退休, 451

 反对光绪的阴谋, 455—456

 支持义和团, 458, 459—461

 逃出北京, 462

 由于她的政策而引起的混乱, 463

Ubanghi-Shari territory, 乌班吉沙里领地, 622, 623, 624, 625, 630

Ucciali, Treaty of, 乌西阿利条约, 252, 615

Uganda, 乌干达, 384, 601, 613, 614, 624, 625, 628, 632

Ukraine, 乌克兰, 354, 360, 370, 371

 乌克兰的农民叛乱, 373

 总罢工 (1903年), 374

Ukrainians in Austria, 奥地利的乌克兰人, 332

Unemployment, 失业

 失业的状况, 16—17, 24, 71

 没有防止失业的保证, 24

United Alkali Company, 联合制碱公司, 7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经济结构和发展：工业化，2，50，247，487；投资，4；关税和自由贸易，8，10，57，64，396，507；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控制，21，507—509；进出口平衡，54；北方的经济利益，494；南方的工业革命，498；通货危机，501—504；问题和理论，505—507；州际商务法，508

贸易和工业：工业生产和发展，2，48，50，71，247；棉花，3，399；钢铁，4，10，48，50，57，96，398；国际贸易所占的份额，5，55—57；反托拉斯法，21，73，492，508；南方成为初级产品的产地，54；国内市场，56—57；工业的效率，57，73；广告，57；托拉斯和联合企业，73，508—509；宾夕法尼亚的石油，97；自动化，99—100；与欧洲的贸易，688—689

交通运输：铁路，5，49—50；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88；铁路的管理，501，508

农业与土地占有：小麦的生产，5，396；农业教育，202；大平原，500—501；农业激进派和货币改革，501—504

外交：孤立主义，8，671，686，688；门罗主义，35，46，669，672—673，677；跃为太平洋强国，35；在加勒比海的扩张，46；跃为世界强国，225，680，693；在远东的利益，235；参见“与中国的关系”；在刚果会议上，253；参见“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在太平洋的利益”部分；与各国的关系；Spanish-American War条

人口和都市化，12，48，50，671；欧洲移民，4，11，247，509，511，689—692；西部的罗马天主教徒移民，489；南北战争后的向西部移民，501；黑人移居北方，511；来自中国的移民，689

社会结构和组织：合作团体，14；劳工联合会，15，16，75，510；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16，21，28，511；工会，16，74—75，509—510；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婚，32；北部和中西部的资本家集团，487；缺少上层阶级的领导，490；三K党，498；南方的落后状况，500；文化来源，504，511；突然出现的商业文明，504—506；劳动骑士团，509—510；罢工行动，510；物质的进步成为富有浪漫色彩的观念，512；达到了社会的稳定，514；多种族问题，691—692；参见“黑人”部分

政治结构和发展：中央政府控制的扩大，21—23；南北战争，25，104，202，487，668，689，692；为立法至上而进行的宪法上的斗争，26，32，490—491，493；最高法院，26，492—493，499，508；自由放任态度，27，105，505，507，691；共和党，27，28，488—514各处；民主党，28，488—514各处；平民党的骚乱，27，494，502—504，513，691；选举权，29，32，496；政教在宪法上分离，202；联邦形式，251—252；重建问题和政策，487，491，494—498，499，513；官位分肥和政治手腕，488，493；坦慕尼协会，489；任职法，491；总统的否决权，491—492；联邦所得税法遭到否决，492；州际商务法，492；文官制的改革（彭德尔顿文官服务法），493；市政改革，493—494；共和党在南方统治的结束，498；南方的“自治”，499；南北方保守联盟，499，514；农民协进会，501，507；要求实行货币改革，501—504（参见“平民党”）；绿背纸币劳工党，502；谢尔曼收购白银法，503；民族主义，512—513，692；制定了宪法，515；“一个保守的国家”，693

艺术和建筑，164—165；摩天大楼，96，175；参见各艺术家条

教育：大学，182—183，186，197，504；莫里尔法，182，202；政府拨地建立的学院，183；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183，202；全国教育协会，186；黑人的教育，186，202；国家管理，186—187，511；义务教育，187，511；妇女教育和男女同校，199；成人教育，202；教会捐赠，202；南方的落后状况，500；美国公民的教育，511

黑人：黑人的教育，186，202；共和党保护黑人，489；公民权利（德雷德案和米利根案），492；种族平等原则，494—498，499；选举权，496，497，498；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497，500；剥夺公民权的措施，499—500；从南方移居北方城市，511

武装力量（1）：军事思想，206；陆军：规模和组织，239；与裁军建议，241

武装力量（2）：海军事务，228，231；战略考虑，235；扩充237—238；海外基地，238

与英国的关系：由爱尔兰移民造成的对英国的仇视，388；贸易竞争，395—396；在拉丁美洲，672；与加拿大—阿拉斯加边界问题，

673—676, 679; 与巴拿马运河, 676—679

与日本的关系, 465, 470, 482, 647, 670, 688

慈善活动, 505

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516—519; 国际美洲会议, 670

在拉丁美洲的利益, 517, 518—519, 524, 670; 与古巴的关系, 238, 239, 532—533, 680—683; 与太平洋战争, 535

在太平洋的利益, 641, 647, 669; 在萨摩亚, 642—643, 649, 662, 670; 在福摩萨（台湾）, 646; 在夏威夷, 649—650, 662, 670, 673

在太平洋与德国的关系, 662

与中国的关系, 663—664, 669—670, 684—688

阿拉斯加, 669, 670, 673—679

政治思想, 671, 679

阿拉斯加—加拿大边界争执, 673—676, 679

Universities, 大学, 180—184, 197—198, 203

在非洲, 180

在加拿大, 181

在德国, 182

在英国, 180—183, 196—198, 200, 202—203, 404—405,

409

在印度, 415, 428, 431

在爱尔兰, 183, 197—198

在日本, 474

在荷兰, 183

在新西兰, 183

在俄国, 358—359, 364—365

在美国, 182—183, 186, 197, 504

Unwin, Raymond, 昂温, 雷蒙德, 英国建筑家, 164

Upolu (Samoa) 乌波卢岛 (萨摩亚), 663

Upper Niger, 上尼日尔, 603, 604, 606—608, 620—621

Upper Volta, 上沃尔特, 620, 621, 630—631

Uranium, discovery of radiation, 铀, 放射线的发现, 80

Urbanisation, 都市化, 11—12, 17, 19, 58, 246—247, 510—511, 691

Uruguay, 乌拉圭, 517, 518, 519, 522, 530, 531, 533—534, 537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101, 114—116, 119

Valéry, Paul, 瓦勒里, 保罗, 法国作家, 132

Van de Velde, Henri, 范德威尔德, 亨利, 法国画家和建筑家, 165, 166, 171, 172, 174

Van Gogh, Vincent, 梵高, 文森特, 荷兰画家, 156, 166, 167, 168—170, 175, 176

Van Kerckhoven, 范·克尔克霍芬, 比利时将军, 624

Van' t Hoff J.H., 范特荷甫, 雅科布·亨利, 科学家, 84—86

Varela José Pedro, 巴雷拉, 何塞·佩德罗, 乌拉圭领袖, 537, 539

Varona, Enrique José, 巴罗纳, 恩里克·何塞, 古巴作家, 539

Vatican, The, 梵蒂冈

与教皇权力, 104, 118

梵蒂冈公会议 (1870年), 104, 118, 266, 282

与意大利国家的冲突, 117—118, 266, 544

攻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118

态度的变化, 118—119, 314—315

与德国的文化斗争, 267, 387—388

与法国的归顺运动, 314—315, 318, 321

参见Church and State; Leo XIII Pius IX, Roman Catholic Church各条

Vaughan, Bolckow, of Middlesbrough, 米德尔斯布勒的博尔考
• 沃恩, 矿业主, 73

Velasco, José Maria, 贝拉斯科, 何塞·玛丽亚, 墨西哥画家,
538

Velasquez, Diego, 委拉斯开兹, 迭戈

马奈论委拉斯开兹, 155

对印象画派的影响, 157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25, 529, 536, 671—673

Verhaeren, Émile, 维尔哈伦, 艾米尔, 比利时诗人, 138

Verlaine, Paul, 魏尔伦, 保罗, 法国诗人, 130, 131—132,
539

Victor Emanuel II, of Italy, monument to, 意大利的维克托
• 埃曼努埃尔二世的纪念碑, 164

Victoria, 维多利亚, 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皇后, 293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386, 575, 637

与哈廷顿报告, 227

任印度女皇, 251, 388

反对任命格莱斯顿, 256

她属意于迪斯累里, 388

与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 392

维多利亚的声望, 394

不喜欢民主，394

她在历史上的地位，410

不赞成进行法绍达战役，629

Victoria University, 维多利亚大学（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181, 197

Viéle-Griffin, Francis, 维厄莱-格里芬，弗朗西斯，法国诗人，137

Vienna, Congress of, 维也纳会议，35, 38, 204, 243, 248, 551

Vienna, municipal planning in, 维也纳市政规划，18

Vietnam (Annam, Cochin-China, Tong-King), 越南（安南、交趾支那、东京），252, 449—451, 563, 590, 639, 644, 650—652, 658

Villiers de L' Isle-Adam, Auguste, Comte de, 维里埃尔·德·伊斯勒·亚当，奥古斯特，伯爵，法国作家，132, 134

Virchow, Rudolf, 微耳和，鲁道夫，德国病理学家和进步党政治家，19, 267, 287

Vitalism, 生机论，80

Vivekananda, 维韦卡南达，印度思想家，430

Vogel, Sir Julius, 沃格尔爵士，朱利叶斯，新西兰总理，389, 642—643

Vogelsang, Baron Karl von, 福格耳臧男爵，卡尔·冯，119

Voulet, 武莱，法国探险家，631

Voysey, Charles F. Annesley, 沃伊齐，查尔斯·F. 安斯利，英国建筑家，174

Vyshnegradsky, I. A. , 维什涅格拉茨基，伊·阿，俄国财政大臣，367

Waddington, William Henry, 瓦丹通, 威廉·亨利, 法国外交部部长, 573, 588

Wade, Sir Thomas, 威妥玛爵士, 英国驻北京公使, 448

Wages, 工资

实际工资的增加, 16, 71, 75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别的增大, 17

最低工资率, 24

德国和英国的比较, 62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理查, 德国作曲家, 131, 134, 135, 322

Wainwright Building, St Louis, 圣路易斯的温赖特大厦, 175

Waldeck-Rousseau, Pierre-Marie-René, 瓦尔德克-卢梭, 皮埃尔-玛丽-勒内, 法国政治家, 321

Waldersee, Count von, 瓦德西伯爵, 冯, 德国将军, 222, 223, 224, 287, 294

Wales, 威尔士

教育, 181, 190, 199; 威尔士国立大学, 409

民族主义, 181

教会与政府的分离, 405

Wallace, Alfred Russell, 华莱士,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 英国博物学家, 与进化论, 80

Walter, John, 沃尔特, 约翰, 《泰晤士报》的业主, 99

War, 战争

在此时期不经常发生战争, 34—40, 204—205, 542

战争方法的变化, 41—43, 204—240

防止战争的试图, 43, 254

战争的耗费增加，240—242

控制战争的国际规定，241—242，254

俾斯麦与“预防性战争”，287，544

参见Armed forces; World War各条

Ward, Mrs Humphry, 华德夫人，汉弗莱，小说家，125

Ward, Lester, 华德，莱斯特，美国社会学家，107

他的《动态社会学》，507

Washington, Booker Taliaferro, 华盛顿，布克·托利弗，美国黑人领袖，186，500

Weapons, 武器，见Armed forces and armaments条

Webb, Philip, 韦布，菲利普，英国建筑家，154，160，161，164，176

为莫里斯设计的“红房子”，161，163

Webb, Sidney James, 维伯，西德尼·詹姆斯，英国社会改革家与《费边社会主义论丛》，108，127

与萧伯纳，127

Weber, Max, 维贝尔，马克斯，德国社会学家，115—116，265，279，295

Webster, Daniel, 韦伯斯特，丹尼尔，美国演说家，490

Wedderburn, Sir William, Bt, 韦德伯恩爵士，威廉，次男爵，印度文官，印度国大党主席，434

Weights and Measures Union, 度量衡协会，254

Weihaiwei, British lease of, 英国租借威海卫，686

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Wellesley, 1st Marquis, 卫尔兹力，理查德·科利·卫尔兹力，第一代侯爵，418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阿瑟·卫尔兹力, 415

Wells, Herbert George, 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 英国作家, 128, 196

Weng T' ung-ho, 翁同龢, 中国开明派领袖, 452

被革职, 455

West Africa Frontier Force (British), 西非边境部队 (英国), 631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386, 398, 404, 405, 516

西印度群岛的亚洲劳工, 393, 401

不利的贸易状况, 396, 399

英国的发展贷款, 400

Wheat, 小麦, 5, 396, 397

小麦价格的下降, 9, 307

Whistler, James Abbot McNeill, 惠司勒, 詹姆斯·艾博特·麦克尼尔, 美国画家, 156, 157, 158—160, 164, 168

White, Andrew D., 怀特, 安德鲁, 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 182

White, Stanford, 怀特, 斯坦福, 美国建筑家, 154, 164

White, 怀特, 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507

White, Sir William, 怀特爵士, 威廉, 英国外交家, 347

Whitehead, Arthur, 怀特黑德, 阿瑟, 自动鱼雷的发明者, 231

Whitworth, Sir Joseph, Bt, 惠特沃思爵士, 约瑟夫, 次男爵, 英国工程师, 他与自动化, 100

Wicks, Friedrich, 威克勒, 弗里德里希, 发明家, 99

Wilberforce, Samuel, 威尔伯福斯, 塞缪尔, 牛津主教, 80

Wilde, Oscar Fingal O' Flahertie Wills, 王尔德, 奥斯卡·芬戈·奥弗莱厄蒂·威尔斯, 爱尔兰作家, 126—127, 159

Wildenbruch, Ernest von, 维登布鲁赫, 厄内斯特·冯, 德国作家, 141

Wilfley process, the, 威尔弗莱选矿法, 93

Wilkinson, Spenser, 威尔金森, 斯潘塞, 英国作家, 227

William I, 威廉一世, 德国皇帝, 40, 275, 293

刺杀威廉一世的企图, 288

威廉一世之死, 293

会见俄皇亚历山大二世, 361

William II, 威廉二世, 德国皇帝, 289, 348

论海牙会议, 43

与教育, 188

为征募陆军军官提出的呼吁, 219

滥授军职, 221

与奥地利联盟, 223—224

与海军政策, 236—237

“亲政”, 250, 294—295, 298

威廉二世的性格, 293—294

与俾斯麦的冲突, 294

“《每日电讯报》事件”, 298—299

访问利凡得, 591

与再保险条约, 613

与意大利人在阿杜瓦的失败, 627

Wilson, Horace Hayman, 威尔逊, 霍勒斯·海曼, 英国东方学家, 433

Wilson, H.W., 威尔逊, 英国海军专家, 他的《战斗中的铁甲舰》, 231

Wilson, James, 威尔逊, 詹姆斯, 英国经济学家, 428

Wilson, Rivers, 威尔逊, 里弗斯, 埃及政府官员, 585

Wilson, Thomas Woodrow,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 美国政治家, 513

Wire, 金属丝

铜丝, 94

镀锌铁丝, 94

刺铁丝的使用, 94

Wislicenns, Johannes, 维斯里辛努斯, 约翰奈斯, 德国化学家, 85

Witte, Count S.Yu., 维特伯爵, 谢·尤, 51

任俄国财政大臣, 368—369, 371, 372—373, 375, 377

他的外交政策, 374, 570, 660, 664

任首相, 377—379

他的进步的独裁统治的思想, 382

Wöhler, Friedrich, 维勒, 弗里德里希, 德国化学家, 83

Wolff, Sir Henry Drummond, 沃尔夫爵士, 亨利·德拉蒙德, 英国外交家, 582, 588, 589, 613

Wolff, Julius, 沃尔夫, 尤利乌斯, 德国小说家, 141

Wolseley, Sir Garnet Joseph, later Viscount, 沃尔斯利(吴士礼)爵士, 加尼特·约瑟夫, 后为子爵, 英国总司令, 227, 573, 585, 589, 599, 601

Women, 妇女

已婚妇女为了争取工资而就业的情况减少, 17

选举权, 29, 390, 391

妇女教育, 197—198, 200, 203, 405

Women' s Liberal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英国)
妇女自由协会, 391

Wood, Sir Charles, later 1st Viscount Halifax, 伍德爵士,
查尔斯, 后为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子爵

与印度的教育, 415, 420

与印度的铁路, 421

Woods government, in Fiji, 斐济的伍兹政府, 642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工人教育协会, 203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

生活水平的改善, 4, 17, 20, 62, 68, 285

与工会, 14—16, 74, 509—510, 530—532

与政治组织, 16, 28—31, 34, 244—245, 260, 269—273,
509—510, 530—532

人数的增加, 16, 262

熟练工人的比例增加, 16—11, 24—25

与工资, 16, 24, 62, 71, 75

挣工资的就业妇女数目减少, 17

与失业状况, 17, 24, 71, 285

国家对劳动条件的注意, 17, 21—24, 71, 264, 289

与教育, 20—21, 201—203

World, The, 《世界》, 纽约民主党刊物, 489

World Congress of Faiths, Chicago 1893, 芝加哥世界宗教代表大会（1893年），430

World Postal Treaty (1878), 万国邮政公约（1878年），254

World Postal Union, 万国邮政联盟，254

World War, First, 第一次世界大战，112, 211, 214, 243, 254, 689

战争的起因和对战争的策划，47—48, 204, 224, 297, 549, 552, 592, 632

印度各王公在战争中的忠诚，425

预示将出现堑壕战，547

Wortley, Colonel Stuart, 沃尔特利上校，斯图尔特，298

Wright, Frank Lloyd, 赖特，弗兰克·劳埃德，美国建筑家，175

Wundt, W., 冯特·威廉，人类学家，106

Württemberg, 符腾堡，31, 278

Wycombe Abbey School, 威科姆修道院学校，198

X-rays, discovery of, X射线的发现，80

Yakub of Kokand, 浩罕的阿古柏，新疆穆斯林领袖，447

Yamagata Aritomo, 山县有朋，日本官员，468, 471, 481

Yeats, William Butler, 叶芝，威廉·巴特勒，诗人，128—129, 137, 144

Yellow Book, The, 黄皮书，127

Yohannes, 约翰尼斯（四世），埃塞俄比亚皇帝，615, 620

Yorkshire Wool Combers, 约克夏羊毛精梳公司，72

Young Men' 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会，203

Young Turk Movement, 青年土耳其运动, 325—327, 341, 350—351

Yü Hsien, 毓贤, 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 457, 463

Yü Lu, 裕禄, 中国直隶总督, 457

与义和团叛乱, 458

被八国联军打败, 462

Yüan Ch' ang, 袁昶, 中国军机大臣（据原文译, 按袁之职务为太常寺卿在总理衙门行走）, 459; 被处决, 461

Yüan Shih-k' ai, 袁世凯, 中国政治家, 任山东巡抚, 457, 458, 460, 461, 656

“Yugoslav idea”, “南斯拉夫思想”, 334

Yule, Sir David, 裕尔爵士, 戴维, 英国东方学家, 434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中国云南省, 449, 651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 613, 633, 636, 639

Zamyatin, D.N., 扎米亚金, 俄国司法大臣, 357

Zanzibar, 桑给巴尔, 235, 384, 611, 612, 613, 614

Zasulich, V.I., 查苏利奇, 薇·伊, 俄国革命者, 362

Zhelyabov, A.I., 热里雅波夫, 安·伊, 俄国民粹派领袖, 362

被绞死, 363

Ziller, 齐累尔, 教育家, 193

Zinc, 锌, 94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119, 371—372

Zionist Congress, 犹太复国运动大会, 119

Zīyā Bey, 齐亚贝伊, 青年土耳其派作家, 326, 341

Zola, Émile, 左拉, 埃米尔, 法国小说家, 134—137, 142, 149, 150, 322, 538

马奈为左拉画的像, 156

论印象派画家, 157

Zubатов, S. V., 祖巴托夫, 谢·瓦, 莫斯科警察首脑, 374, 376

Zürich Polytechnic, 苏黎世工艺学院, 201, 202

1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1898—1945年

[英] C.L.莫瓦特 (C.L.Mowat)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2: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 1898-1945

1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1898—1945年

[英] C. L. 莫瓦特 (C. L. Mowat)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 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79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2卷,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1898-1945年/ (英) C. L. 莫瓦特 (C. L. Mowat)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书名原文: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2: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 1898-1945

ISBN 978-7-5203-2598-1

I. ①新… II. ①C…②中…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1898-1945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234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60.5

字数 960千字

纸书定价 19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爵士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共约800万字，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近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英文版权页

This is a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12: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 1898-1945

ISBN 978-0521045513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出版前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20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1945年间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地图集一卷暂不出）。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论近代史的界限](#)

[第二章 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三章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计划化](#)

[第四章 科学与技术](#)

[第五章 1900—1912年的外交史](#)

[第六章 1914年战争日益临近](#)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凡尔赛的和平解决方案（1918—1933年）](#)

[第九章 国际联盟](#)

[第十章 1900—1945年的中东](#)

[第十一章 印度和东南亚](#)

[一 印度](#)

[二 东南亚](#)

[第十二章 1900—1931年的中国、日本和太平洋](#)

[第十三章 英联邦](#)

[第十四章 俄国革命](#)

[第十五章 1917—1939年的苏联](#)

[第十六章 德国、意大利和东欧](#)

[一 1900—1914年的奥匈帝国](#)

[二 巴尔干半岛](#)

[三 1900—1914年的意大利](#)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五 大萧条时期：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六 德国和奥地利的“清洗”](#)

[七 1929—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八 对波兰的进攻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七章 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一 20世纪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

[二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府（1900—1914年）](#)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1914—1921年）](#)

[四 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1921—1939年）](#)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第十八章 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九章 拉丁美洲

第二十章 1895—1939年的文学

第二十一章 哲学与宗教思想

一 哲学

二 宗教思想

第二十二章 绘画、雕塑和建筑

一 绘画

二 雕塑

三 建筑

第二十三章 1930—1939年间的外交史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

索引

第一章 导言：论近代史的界限

1896年，阿克顿勋爵计划编写《剑桥近代史》的时候，曾就这个大胆的尝试做了以下的论述：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十分难得的机会，把19世纪将要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记载下来，以便最大多数的人从中获得最大的裨益……

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写出终结性的历史；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资料，而且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写下传统的历史，并表明在世代交替的历程中我们已经到达的里程碑。

阿克顿计划将《剑桥近代史》写成一部世界通史，以“区别于综合性的国别史”。

本书将写成一部连续性的丛书，各国历史在这部著作中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叙述这些国家的历史，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参照并从属于更高系列的情况下，以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的贡献时间早晚和程度大小作为依据来进行叙述。^[1]

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仍然抱着阿克顿的信念，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事实上，乔治·克拉克爵士在他撰写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已经否定了他那一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可能写出一部“权威性世界史”的信念。“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的新版，既不是作为将来编写权威性世界史的垫脚石，也不是作为我们关于这一时期的全部知识总和的摘要或具体而微的缩本，相反，它却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2]它的范围和原先那套《剑桥近代史》相同：“它论述这样一种‘文明’的历史，这种文明自15世纪起，从它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新异的成分，一直到它在不同程度上巩固地扎根在世界各个角落。”^[3]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最后一卷从一开始，不但必须估量它所论述的那个历史时期，而且也必须审度它在这一历史丛书中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对于《剑桥近代史》的最后一卷的编写者们来说，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该书出版于

1910年，它所涉及的时期是1870年至1910年。将这一时期称作“最近的时期”，并假定它不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或真正的终点，那也就够了。它的编写人不会想到：近代史上和20世纪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过4年就要爆发，而且那12卷著作所论述的“近代史”的连续性在将来也不能再视为当然了。然而，他们的那部著作远不是以欧洲作为中心；该书各章包括关于埃及、苏丹、远东、英国的印度帝国、日本、拉丁美洲、欧洲殖民地的论述，并有一章专论科学时代。

本书实际上是以1910年那部著作的终点作为开端的，尽管其中有几章回溯到20世纪初。本书以1945年作为结束点，因此与前一部书相比，它所论述的时期与写作时间相隔要长久得多，而前书就其所叙述的后一阶段来说，事实上是现代史。本书有几章不得不涉及1945年后发生的事件。在所有各章里，不论其表面上的界限在何年，但对于1945年以后的世界历史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我们如何把1900—1945年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就其若干部分来进行观察，关于这一点，我们对过去20年的历史所做的解释势必要产生影响。

那么，从1966年的优越地位出发，本卷的主题应当是什么呢？原先的版本于1960年问世。它在编纂计划及主要内容方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如果说它不是反映紧接1945年的战后岁月的精神的话，将它的题名称作“暴力时代”也是很自然的。况且，谁也不会否认暴力已成为它所记载的大部分历史的特征——至少如果我们从暴力和残酷行为的程度和受难者的数目来衡量，这个时期的暴力比历史上任何更早的时期也许更加严重。

然而，当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来的20年或更长的时期进行观察，他可能感到暴力并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他看到对核动力的使用已取得了进展，不仅将它当作破坏力量，也把它用于和平目的。他看到美国和俄国1957年在双方打击力量方面已取得了对等，而且中国在1965年^[4]也实现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但正是这个事实表明了有关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发现已经有普遍性，而且我们确有必要承认这个情况：我们都是互相依赖的成员。对于空间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看来这种探索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协作性的，不过每个队伍，即使在某一个行动方面，显然也可以从它的对手的工作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因此，俄国人1957年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

后，接着在1961年，美国和俄国制造的人造卫星也有好几次载着宇航员在太空中航行。

与这些发展同时并进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使我们对20世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发展就是人们突然认识到世界正处在一次“人口爆炸”中，到1986年可能使人口达到50亿，到2110年增长到500亿（或者说，整个地球表面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尺1人）。从1850年以来，世界原有的10亿人口到了1930年增长了1倍，到1947年将增至23.26亿，到1962年将增至30亿，预计到1977年仅仅15年以后，将达到40亿。粮食供应问题以及世界各国人口中多数人的贫穷生活与少数人丰衣足食的优裕生活的对比变得日益尖锐。同时，新的化肥农药，人工孵鸡箱以及工厂饲养食用牲畜的方法都预示食物供应将会增加，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供应所依赖的自然生态平衡也会造成威胁。然而，生物学与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以及避孕方法则为人们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即限制人口的增长，塑造未来世代人口的生理特征以及采用繁衍后代的人工方法。

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进展预示着其他的发展，这些发展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计算机的发展和自动化操作预示在工商业中将有许多日常工作会被取消。普通的人们享受的空闲时间看来大概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同样地，商业性航空事业，只是在1945年才在各大洲之间，横越各大海洋的主要航线上繁荣起来。外交往来、商业活动和旅游事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这种新的旅行速度是以若干小时而不是若干天或若干星期来计算，而且距离也明显地缩短了。

在1945—1965年间，世界政治和国际间与洲际间的关系也同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变化相配合，尽管速度很慢。强权政治围绕着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俄国发生两极分化，而美俄两国在“冷战”中进行抗衡已经很久了。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5]由于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以及科学上的优势，对上述这种过分简单的“力量均势”开始进行干扰。西欧，特别是法国、德国以及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的复兴（1957年），在世界事务中形成了另一个即便是比较次要的力量。对旧秩序的挑战的，还有新近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国家，它们从殖民地上升到现在的地位，最初是在1947年获得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1957年获得独立的加纳，随后又有英国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以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领地和殖民

地。新兴国家从一开始便坚持要求享有与旧有的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对英法两国的企图入侵进行抵抗，因而坚决维护了这种要求。新兴国家在联合国中开始形成多数。白种人与非白种人的抗衡，不论在一国之内（如60年代在美国的“民权”运动）或国与国之间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历史学家才不得不考查20世纪的变化整个性质，并探讨是否一个新阶段或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历史和一个新的名称。本卷第一版的编写者认为，在20世纪内确立一个“更加完整和更加确切的世界史概念”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六大洲相互间的关系变得真正重要了”。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成为“以往50年世界史的中心主题”。^[6]另一位历史学家谈到“各个大陆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我们的生活正经历着这种变化”。

在20世纪中期那段岁月，我们发现世界正处于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与世界自从15世纪和16世纪中古世界崩溃衰亡而近代世界奠定基础以来所经历的任何变化相比，也许都更加深刻、更加广泛。……这种转向我所称为现代世界的过渡……迄今尚未完成：这正是20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着的革命性变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今天，人们才第一次有可能敢于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名副其实地充分进入历史范畴的各国人民组成的。……^[7]

同样的想法促使另一位历史学家相信，“近代史”已告结束，而最近的或现代的历史不能被简单看作近代史（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作为开端的那段时期的欧洲史）的最后阶段。“现代史在质量与内容方面与我们所了解的‘近代’史是不同的。”

有关现代史的特殊事实之一就是它是世界史，而且对于促使它形成的各种力量，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世界性的观点，否则不能理解；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几章关于欧洲以外事务的论述，以补充我们对于刚刚过去的事实所持的传统见解，而且还要重新考察和修正作为我们见解的基础的种种设想和偏见的全部结构。

20世纪的前半叶具有“一个标志着革命性变化和危机的时期”的一切特点，它可以同“11、12世纪前后的社会与思想方面的巨大动荡”以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相比。而后一时期则是历史上的这样一种时刻：“即人类背离了它的老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离开了已经标明的道路，转到一个新方向。”^[8]

关于这里所引起的专门术语问题——如何称呼这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不必关注。但是，较大范围的争论提出了这个问题：20世纪前半叶属于什么历史时代。它是否像巴勒克拉夫坚决主张的那样是“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从俾斯麦退隐的1890年延续到约翰·F. 肯尼迪开始任职的1961年的那个分水岭？这是否标志着旧的一章的结束或新的一章的开始，或包含新旧两个时代的过渡时期？提出这种问题并不是要做出回答。将20世纪历史解释成现代史，即具有新含义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求撰写它；旧的思想习惯、旧的界限继续存在的现象，即便在历史学家中，也不是罕见的。本卷只希望提供某些材料以供判断这一时期的性质。

在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世界史的那些力量中，至少有4方面的力量在1914年以前的20世纪初期变得明显起来，“欧洲的衰落”和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在20世纪初由于日本战胜俄国（即一个亚洲国家击败一个欧洲国家）而已经显出预兆，成为“未来的全球时代的最初一瞥”^[9]。这就发出警告：亚洲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命运，不会由欧洲列强来决定。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另一个预兆，其重大意义由于随后30年间发生的内战和内部衰落状况而被掩盖（见第十二章）。在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毕竟不是各大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抗衡，也不是1905年和1911年的外交危机，也不是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两国关于海军力量的竞赛；相反地，它们是有关社会、技术与科学的事件。这不是说社会被改变了，而是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做法正在改变。阶级的觉悟更加提高，工业动乱更为尖锐，要求给予更多平等待遇的呼声更加强烈。在英国，工党的诞生、对上议院的抨击以及关于社会福利的立法（1908—1911年）都是征兆，表明一种新的倾向以及英国政府为了安抚所做的努力；同样也是在1911年，俾斯麦关于德国社会保险的庞大计划已告完成。技术和工业的变化更加渐进，而影响日常生活的变化——冷藏设备、罐头食品制造、电力、电话、机动车——所有这些都在19世纪末期开始，如同托拉斯和垄断公司一样。然而，20世纪开始时，有两项成功的发明具有世界影响；一项是马可尼1901年将无线电信传递到大西洋彼岸，另一项是布莱里奥于1909年驾机横越英吉利海峡的飞行（也许比莱特兄弟于1903年驾机飞行的创举更有重大意义）。

然而，即便在那个时期，科学家们已经“确实地预感到未来了”（见第四章）。1896年贝克雷尔发现了放射现象，1897年J. J. 汤姆森发现了电子，1911年拉瑟福德证实放射性分裂中释放出来的“光线”实际上是原子。同样地，普兰克和爱因斯坦的定理，不仅指向物理学的改变并指出以后对核力量的利用。这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它在两次大战之间继续进行，主要没有引起公众注意，但到了1945年，却像恶魔一样突然出现。遗传学以孟德尔已被人遗忘的著述作为基础，其进展也同样缓慢。对防御或医治疾病的药品的发现，则更激动人心；罗纳德·罗斯和沃尔特·里德在20世纪初就表明怎样能够控制疟疾和黄热病——“西方的”科学家们帮助改变了其他大陆千百万人的生活。埃利希于1909年发明了洒尔佛散（即六〇六），这只是一系列药品之一，以1935—1938年间磺胺药物的发展和1940年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最为显著。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科学职业的成长，并成为它的基础（科学职业本身是20世纪新兴职业的一个方面）。科学进步的现象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现已变得司空见惯，因此，这就带来一种危险，即科学作为一个改革的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量，往往过分容易被人低估，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更加如此，因为今天播下的种子，以后才会有收获。甚至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调子也似乎很低沉，使人产生错觉：

20世纪的前半叶证明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时期，无论在范围、速度及应用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时期；在这50年中，近代科学400年来的收获都被彻底地收集起来，以致它改变了我们文明的一切方面与看法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习惯。[\[10\]](#)

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突然爆发，而将要发生的变革最初带来的震动，几乎没有使世界受到干扰。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名称用得不当；它是一场欧洲的内战，有些附属性的战争是在欧洲以外的战场上进行的，并使美国作为一个交战国来到了欧洲。旧有的名称“大战”，把这场战争局限在欧洲的范围以内：它在生命、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失都比以前任何一场战争要严重得多。然而，不是由于在欧洲所损失的生命和物资财产才使它在决定新的世界史进程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相反，起决定作用的，倒是它造成的一系列的震动和打击。其中有一部分是心理方面的。在这次战争发生以前的100年中，世界各国普遍享有和平，欧洲处于优势地位，国际贸易取得发展，而大批移民从欧洲迁往海外。一个

世界性的投资、信贷与贸易体制似乎已成为永久性的事物安排的一部分，而大不列颠则是其中的“乐队指挥”（见第三章）。这时欧洲各国已经削弱了自己，而旧的结构也已瓦解，奥地利、德意志、奥斯曼和沙皇等帝国也不复存在；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1910—1936年）的25年中，5位皇帝和8位国王失去了王位。俄国革命可能很好地证明了一种世界革命的开端：共产主义实践的具体表现以及它的榜样和宣传所产生的力量，使统治阶级感到畏惧而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间则传播了希望。

在所有的上述情况中，欧洲的地位已经开始削弱；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已被破坏。尤其在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精神已被赋予新的力量；旧的商业与工业体制已经瓦解；新的竞争者也已出现来反对旧的供应者，特别是英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的煤炭输出在欧洲已被取代，而它在印度和非洲的棉织品市场也被日本侵入。战争把工业动员起来；但扩大生产的结果只是使竞争者留有剩余的能力。战争导致食品生产的增长；在战争结束时，供应显然过剩，而世界价格的暴跌约束了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的发展达10年之久，并延缓了世界贸易的复苏。不错，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几百年来使得一种国际经济在各国贸易中成为现实，而在实行更高关税和自给自足政策的运动中，这种关系确也没有消失。计划经济不论是在集权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或民主国家中都是一个特征，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并且能更公平合理地利用世界的资源（参阅第三章）。

战争留下的比较明显的后患是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以及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几个其他国家中崛起的独裁制（见第十六章）。在那些仍然保持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大萧条”削弱了其凝结力及保护本能，在法国和比利时，民主政治本身遭到攻击，而在英国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是如此（见第十七章）。在德国，民主政治给希特勒和纳粹党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夺取政权，建立集权制的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并开始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希特勒的野心所以更加令人恐惧，是因为它显得阴暗暧昧而又毫无节制，它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削弱了欧洲的优势，并为开创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打开了道路，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些情况都被一

种恢复到旧有秩序的幻想所掩盖。国际贸易和信贷制度得到了恢复，不过，因为新的战争债务和赔款而受到了妨碍；1925年英镑恢复了金本位，达到战前与美元的兑换比值——采取这种姿态是不成熟的，而且不能令人信服。国际联盟（见第九章）似乎不仅是取代旧的“欧洲协和体”而是对它的一大改进，它是世界性的组织，但由欧洲领导。苏俄由于受经济计划和革命的社会建设（见第三章、第十五章）的困扰，没有显示出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的多少迹象。美国同样迎合战时产生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于欧洲的力量均势，避而不做公开的承诺。另一方面，欧洲各国的海外帝国并吞了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后，扩大了面积，比以前变得更加庞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英帝国已达到它的最大范围，太阳永远照耀着它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大厦。

在表面现象下面，欧洲秩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受到侵蚀。帝国主义正在没落中。J. A.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4年）一书，对于欧洲在20世纪所持的自信来说，也许是第一个打击；或者，布尔战争是不是已经对它首先提出了谴责？各自治领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使它们获得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新地位，而给予英帝国的新名称——英联邦，也不只是象征性的。在印度，1919年国大党起草了独立宣言，而甘地在同年发起了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第十一章第一节），不过，印度获得独立和分治却需要花费25年时间，并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东，新的国家脱离旧的土耳其帝国的部分地区而成立起来：诚然，英法两国对它们的影响看来很巩固，虽然巴勒斯坦的早期历史预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实力（第十章）。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南亚，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不大感到变革的趋势，尽管也小心地做出努力，使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参与政府（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三章）。法国的殖民地继续被当作法兰西母国的永久附属国而加以统治，目标仍是“同化”。M. 萨罗的《法国殖民地的开发》（1923年）一书所阐述的政策，与卢加德在英国殖民地实行的“双重的委任托管”十分相似，它强调将当地的中坚人物纳入政府机构，经济发展应为土著人民造福。在比属刚果（1908年后由比利时统治的刚果自由邦），家长式的统治与对矿藏财富的开发同时并进。[\[11\]](#)

至于欧洲的力量在它自己的大陆以外遭到侵蚀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日本的行动对此做了最清楚的说明。1915年在大战期间，日本提出它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控制中国与亚洲大部分地区。当时的

形势迫使日本停止进逼；但是，日本在1931年对满洲进行的侵略只是意味着它重新提出了以前的要求（见第十二章）。在这些事件的背后，东方的人口迅速地增长而欧洲的增长速度却逐渐放慢。日本人口在1930年以前的60年中增加了1倍；印度在1920—1940年间人口增长了8300万；在爪哇和中国的江苏省，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800人之多（在欧洲平均为每平方英里184人）。这不是农业人口增长的问题；1900年亚洲只有3个城市拥有100万以上的人口；到了1960年，在世界上69个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城市中，亚洲占有26个。“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在1890—1940年这半个世纪的人口学方面的革命是根本的变化，它标志着从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12]“欧洲各国的亚洲帝国于1941年崩溃，这主要是由于人口问题方面的失策。”^[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那些在以前的20年中一直潜在着的因素都显示出来了。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不但在欧洲和亚洲、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而且在空中、陆地和海洋作战。如果说西方强国（美国和英国）联合俄国挫败了日本人企图在亚洲建立帝国的打算，在欧洲则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虽然不像拉库恩与神蛇的斗争那样一直搏斗到同归于尽。^[14]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现代世界的轮廓是明显可见的；欧洲失去了重要地位，殖民地帝国宣告结束，亚洲与非洲各国人民觉醒起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革命成功后获得了巩固地位，以及向科学发明、空间探索、技术更新和核武器等新领域进军。这个世代的暴力给欧洲带来了报应。

在受难者中命运最悲惨的是最无辜者——犹太民族。在纳粹统治下，历史久远的反犹太主义的祸害在它所造成的恐怖与罪恶方面达到了极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德国集中营里惨遭屠杀，仅奥斯威辛一地就有175万人被害。1939年在纳粹控制的国家中原有650万犹太人，经过战争幸存者仅150万人。在6年的战争中，世界上的全部犹太人有1/3死亡；在欧洲的死去一半；在中欧的死去3/4。在我们的词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即“种族灭绝”。正如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所写的“在历史上，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待遇”。^[15]

对于人类的前途，我们总是可能采取乐观的或悲观的看法。在战争结束时，在许多国家中，绝望情绪本来可以处于支配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年以后，尽管国家间的战争和私人间的暴力行为仍然方兴未艾，但历史学家不大可能将暴力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相反地，他将“大同世界”的说法不仅是当作一种辞令：这个世界在种族战争中可能分裂自己，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可能毁灭自己，然而，由于各国之间的共同问题、共同愿望以及科学上更大的进展——揭开“宇宙的奥秘”并将这种知识应用于新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世界性影响，它日益变成更加团结的一个整体。

这是否使20世纪的前半叶成为从旧到新、从近代史到现代史的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是否已告结束？这究竟是近代史的最后一章，还是世界通史的第一章？也许下一部《剑桥史》会做出回答，而阿克顿的“终结性历史”最后也会写出来。

（张自谋 译）

[1] 《剑桥近代史：它的由来、作者与出版》（剑桥，1907年），第10—14页，E. H. 卡尔在其所著的《历史究竟为何物》（剑桥，1961年）一书中第1页和第145页曾经引用。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1957年，第34页和第24页。

[3]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1957年，第35页。

[4] 原文如此。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应是1964年。——译者

[5] 原文如此，系指中国。——译者

[6] 戴维·汤姆森：《1914—1950年的世界史》（国内大学丛书；牛津，1954年），第4—6页。

[7] E. H. 卡尔：《历史究竟为何物》，第112、128、135、144页。

[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伦敦，1964年），第2、4页。

[9]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伦敦，1964年），第101页。

[10] 见本书第四章，第88页。（正文括号中第×页及注释中第×章第×页，均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译者）

[11] 黑利勋爵：《非洲考察》（修订版，牛津，1957年），第206页及以下；R. 奥利佛和J. D. 费奇：《非洲简史》（伦敦，1962年），第210—211页。

[\[12\]](#) G. 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第87页；并参阅第71—74页和第83页。

[\[13\]](#) G. 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第78页。

[\[14\]](#) 拉库恩是古代特洛伊城的神殿祭司。特洛伊战争时，他因识破希腊军的木马计谋而触怒了女神阿西纳，后被两条神蛇缠死。详见《希腊神话》。——译者

[\[15\]](#) 《钱伯斯百科全书》（1955年）中“犹太史”条目。

第二章 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影响的各种历史势力和历史事件引起的。当20世纪开始时，欧洲已分成三个区分明确的地区。易北河以东的欧洲部分，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民的欧洲，那里50年间工业化缓慢进展，而民族意识却常常在语言、家族或种族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东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远远落后于易北河以西的大多数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又分为两类。北欧和西欧各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在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方面进展得最远。它们经历了都市化，资本积累和信贷组织，对外贸易，并享有普通较高的生活水平。南欧和西南欧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南部和爱尔兰南部——在地理上（而且某些方面在历史上）属于西欧，但是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发达方面，它们更类似东欧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在新世界获得并失去大片帝国属地：过去光荣的残余，成为对它们的现代发展的一种障碍。

对这种三部分的划分，必然也会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奥地利的某些部分，工业化程度几乎与德国相等，而法国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却和意大利的南部一样不发达。但是这三个地区保持着各自特有的差异，这些差异大大影响了20世纪各种变化对它们的社会生活的冲击。在欧洲大陆总的力量对比中，德国是一个枢轴，三个地区相互之间的关系则围绕这个枢轴转动。

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从地理上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为方便起见，它们可以被视为两大类。有社会规模、结构和组织方面的变化，包括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城市和交通的扩展，新的职业团体和社会阶级的兴起。也有社会职能和职业方面的变化，包括由于工艺变化而能得到的更大的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这种更大的财富的消费与利用，以及社会和国家越来越多地接受新的目标，例如范围更大的“社会正义”或“社会保险”。此外，社会的结构变化和职能变化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最深刻的变化发

生在家庭的性质和社会作用上，而这既是结构上的，又是职能上的变化。整个说来，时间和地点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可能比单独考虑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更为重要。社会的变化发生在三个根本不同的因素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每一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抱负，以及欧洲的政治地图；在这个地图中，国界只是部分地与可行的经济单位相符合，或与在社会方面和民族方面相同的共同体相符合。这种相互作用虽然极为复杂，仍然可以概括为某种模式，这种模式又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20世纪欧洲文明的本质和发展。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世界人口增加了10亿以上，大于整个19世纪增长的绝对数字。但是，到1940年，欧洲和其他大陆之间的差异，还没有扩大到能够决定性地改变世界人口统计的平衡。1900年估计总数为16.08亿人，到1940年估计为21.6亿人。在这些总数中，欧洲部分（俄国除外）所占的份额，从20%降低到18%。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亚洲和非洲；以后即开始被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率所超过。20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的衰落，就是以这个人口统计为基础的。各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差别很大，欧洲东部和南部增长比例最大。到1939年，西欧和北欧各国除荷兰外，增长率变得很小。虽然欧洲（包括俄国在内）人口从1900年的约4.23亿增加到1940年的5.73亿，但其中将近1亿是在俄国增加的。^[1]从欧洲大陆向其他大陆的移民，反映了如下事实：自1896年后，从东欧和南欧外流的人，超过了从西欧和北欧外流的人数，整个迁移在1913年达到高峰，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又急剧下降。

在这一时期，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常常发生从一个欧洲国家到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大迁移。中欧和东欧所受影响最大。长期战争，战后各国边界的重新划分，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都对这种大变动起了作用。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在内战结束以前，就造成一两百万的难民或流亡者。德国在1919年后，吸收了约75万人，他们的家园主要是在新划定的波兰境内，而面积小得多、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匈牙利，也从它的边境地区吸收了40万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在相当大的强制下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德国的纳粹恐怖统治和西班牙的内战，又使成千上万人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美国（1921年和1924年）和英国各自治领实行的移民入境限制，使欧洲在两次大战之间主要靠独立处理它自己的人口问题。这时接受移民的主要国家是法国，

它因为沉重的战争损失和低出生率而感到人口不足。1920年到1928年间，法国接受了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瑞士的150多万外籍工人。每1万名居民中外籍居民的人数，从1901年的267人增加到1931年的691人。其他地方，由于普遍失业，导致抵制外籍工人入境。除法国外，在欧洲境内发生的移民，主要是出于强迫或恐惧。由于有选择的迫害造成的大批移民，比如从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恐怖统治下的逃亡，给接受他们的各个社会——通常是信教自由的民主国家——带来文化上的重大好处。

在每个国家的内部，继续发生人口进一步重新分配：人们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趋势从乡村移居城市，因此，这时也日益影响着东欧国家。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后相当一段时间，使大部分欧洲人变成城镇居民，然后又逐渐停止。但是，“都市化”是一个相对的用语，某个社会认为是相对较小且具有“农村”风味的城镇，另一个社会则可能认为应属于“城市”。超过10万居民的无可置辩地属于“城市的”单位，很早便在英国形成。早在1831年，英国大约有16%的人口即已居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到1936年，法国才有同样比例的人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那时英国已有40%的人居住在那样的城市里了。1939年，这种规模的城市，苏联有81个，联合王国有57个，德国有56个，但法国仍然只有17个。就整个欧洲而言，虽然在速度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大城镇的数目是趋于增加的。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伦敦、格拉斯哥、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等城市的人口增长了1倍或将近1倍；伯明翰和里斯本的人口增长了将近2倍，马德里、汉堡和米兰增长了3倍；巴塞罗那、罗马和布拉格增长了4倍以上。

如果把居住在有1万以上居民的城镇中的人口比例，作为真正“都市化”的总标志，那么英国和荷兰就是欧洲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1946年，各国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镇中的人口百分比，英国和荷兰为70%；意大利为53%；德国为47%；比利时为45%；而法国只占33%。[\[2\]](#)虽然这时绝大多数欧洲人为城市居民，但大多数仍为小城镇的居民。但是人们彻底地脱离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集中到城市地区内，受工厂工作和办公时间纪律的约束，这些正是各处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特征。更确切地说，在一个人口增长的时代，这意味着农业人口往往保持停滞状态，甚至有所减少，而增多的人口几乎被不断扩大的或新

兴的工业部门所吸收，或被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运输、服务或专门职业这一不断发展的“第三部门”^[3]所吸收。

在大规模的都市社会的周围，通常发展起一些“郊区”，即不断扩大的外层。许多工人每天从这里乘电车、公共汽车或火车去城里工作。这些大都市几乎全是一些工商业中心、大型港口和重要城市。住在这种地方的人们享有现代都市文明的各种舒适生活，但也遭受它带来的一切危害。他们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承受着由于人口过多而产生的压力，他们在工业衰退和失业面前首当其冲，他们最容易听凭通货膨胀和行政控制的摆布。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群众意见和社会动荡力量的影响，在骚动时期更容易不知不觉地走上犯罪和暴乱。人们大量聚居在一起，产生一种吸引力，把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人吸引到他们当中。在现代战争中，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鹿特丹、华沙、汉堡、列宁格勒、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都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另外，城市居民虽然更容易受到现代经济制度的动荡的影响和空袭的攻击，但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对于能够为他们提供较大的保障以抵御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的运动，也比较乐于支持。他们更善于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恶劣的环境。在20世纪的欧洲，正是这些城市群众，不仅为劳工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而且为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产生社会骚乱和暴力革命运动的主要温床。在20世纪，欧洲很少发生农民起义。

也许，城乡生活的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显著，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及其郊区的发展更加扩大。直到实现廉价而快速的公路运输和普及无线电广播以前，乡村居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几乎完全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乐趣。即便是铁路，也不像使用内燃机的汽车那样，能在交通运输方面提供巨大的方便，而且电影不同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主要是一种城市娱乐。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是：农业日益机械化，乡村居民越来越容易享受城市的物质福利，因而也就越来越被原先只是属于城市居民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所同化。另一方面，由于每年享有工资待遇的休假期增多，铁路和公路交通费用日益低廉，渴望“重返大自然”的怀旧心情普遍存在，自行车在法国风靡一时，德国的“远足”风气盛行，英国的青年旅游招待所纷纷建立，“童子军”运动遍及各处，战

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居民的疏散，以至于在和平时期建立了国民义务兵役制（所有的大陆国家到1914年都建立了这种制度，只有英国到1939年后才加以接受）。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导致城市居民更多地到乡村去。姑且不论这种城乡交流的最终效果究竟使乡村生活变得更加贫乏还是更加丰富，它肯定地有助于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同时有助于在国家生活中造成更大的和谐。在那些相对说来尚未大规模城市化、农业的独特利益和经营方法比较根深蒂固的地区，例如在法国、西班牙以及东欧许多国家，城乡居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情形是否会因这几年国际旅行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有所改变，我们很难断定。穿越国境的旅行，不论是为了经商还是消遣，主要都是大城市之间，港口之间和机场之间的旅行，或者直接到“旅游中心”。

在20世纪工业的新形势下，和原来的工业国家比较起来，有利条件并不完全在新兴的工业国家一方，虽然最后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权衡以后有利条件可能是在新兴的工业国方面（见第三章、第十九章），美国为了便于使用汽车，很快改进和扩充了公路，他们的工业家（特别是亨利·福特）完善了大规模生产的传送带技术，并实行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们能够购买他们制造的汽车这一原则。除了已经拥有适合于第一代汽车使用的良好公路网（像比利时和法国在20年代战后重建后所拥有的那样）的国家以外，欧洲人迟迟没有把自己装备起来，使用这些新的发明。意大利和西班牙落在西欧和北欧的后面，但是就连德国，也是直到20年代希特勒的战争准备中才包括了著名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一条建成的从法兰克福到达姆斯塔特的高速公路，于1935年5月通车。1929年英国自由党以《我们能够战胜失业》的纲领参加竞选。它极力主张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包括建设全国的干道网和环城公路。但是1931年和1932年英国用于公路和桥梁的年度基建经费只增加到1900万英镑，而到1936年又减少到800万英镑。另一方面，欧洲人在发展作为商业运输工具的航空方面，却比美国人更富于创业精神，到1937年，意大利和德国就在欧洲范围内远远超过了法国。1920年荷兰开辟了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之间的定期班机，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的首都逐渐由定期商业航班联系起来。此后10年期间，欧洲各殖民地也通过航空线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联系起来。说来奇怪，美国的航空这时却主要限于军用和运输邮件，国内商业航空和客机的发展比欧洲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和美国才定期通航。横越大西洋的电话通信却是自1927年就已存在了。

同交通运输的发展一样，在开发新的能源和采用新的技术上（见第四章），欧洲各国人民在进取精神和成就方面也差别很大。法国采用新工业技术比较迟缓，只有汽车工业是突出的例外。雷诺和雪铁龙两家大公司以及规模较小的白茹公司，获得政府贷款和大宗订货，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德国迅速发展它1914年以前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机械工业和新纺织工业。瑞典的经济在20世纪初刚刚从以农业为主导调整到以工业为主导，随即有效地发展纸浆和造纸、电气制品和机械等这些适当的新工业。在另一个极端，南欧和东欧各国倾向于仍然生产初级产品或采掘产品。西班牙坚持从事农业和采矿业。意大利甚至到1939年仍以出口水果和供应市场的园艺产品，或用进口原料制造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为主。

这些倾向所包含的社会结构方面和社会利益平衡方面的主要变化，都程度不同地有助于抹杀从事不需熟练技术或只需有限技术的重劳动的“劳苦大众”和免于这种苦工的老板、经理和专业人员之间旧有的区别。虽然旧的两级分工，从不曾像社会理论所暗示的那样明确或那样普遍，但在这个时期，它的确是越来越不真实了。由于各种职业团体在性质上的多样化和在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各个国家社会的结构也因而改变，而且常常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改变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减少，熟练工人或职员、技术人员和男女专业人员的增多，可能已被视为这些年中最大的一种社会变化，至少在西欧是如此。这一变化对人们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求扩大普及教育和技术训练，把大部分实际权力从工人和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现代社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手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学和计算机的应用，这种广泛的变化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20世纪初，英国还保持着它在19世纪获得的地位——全世界最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1910年，英国商业部宣布，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8%的人口从事制造业和采掘业，而德国人只有40%，法国人只占33%，美国人只有30%从事这些行业。1936年，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意大利人（10岁以上领取报酬的人）不足30%，而将近48%的人从事农业，相比之下，1931年法国从事农业的人为35%，英国只有6%。在这几十年间，欧洲各国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都在下降。甚至在丹麦这样的农业国，到1911年也缓慢地下降到40%，然后到1939年较快地下降到

28%。在苏联，因为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机械耕作，这种减少是引人注目的。1926年到1939年间，俄国从事农业的绝对人数下降了10%—20%，按总人口比例来说，则从占全国人口75%以上，下降到约56%。

[\[4\]](#)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3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鸿沟。在法国（见第十七章），对盘踞在“财政封建主义”中的“经济寡头集团”的强烈抗议，尖锐地表达了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产生的不满情绪。

它表明“两百个家族”怎样通过拥有共同股份、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类似的手段，把控制法国经济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不到150个大多数由婚姻和家庭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拥有煤炭、电力、钢、石油、化学、铁路、银行和保险等领域最重要的企业中的1900多个行政管理席位。[\[5\]](#)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它上台时从德国实业家和金融家如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亚尔马尔·沙赫特和弗里茨·蒂森那里得到极其重大的支持，但是究竟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还是出于对有利可图的重新武装的希望，仍然是疑问（见第十六章）。蒂森后来承认，“我个人总共给了国社党100万马克”。[\[6\]](#)其他如冯·克虏伯，在希特勒上台前反对他，但是一旦国社党掌权后就给予支持并从中获利。

在其他地方，社会冲突或者产生左派和中派联合的“人民阵线”以阻止法西斯政变，或者真正导致政变，而在西班牙，社会冲突的结果发生了这两种情况和长期内战。西班牙内战开始于1936年6月军队起来叛乱，反对人民阵线共和国政府（共产党人曾经帮助这个政府上台，但是和法国共产党一样，并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内战使国内新旧派别和国际上相互敌对的势力结合起来，造成非常富于爆炸性的复杂局面。随之发生的残酷的战斗，对于30年代的欧洲有着社会的和心理上的深远意义。3年的流血牺牲，再加上特别影响农产品出口和冶金采矿工业的经济萧条、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使西班牙成为一个民穷财尽的贫困国家，成为敌对社会和敌对思想的战场。

一方是这个国家经济势力的大头们，由军队领导，并得到昔日光荣的体现者——教会的支持。所有这些势力都相信，他们即将被推翻。和他们对立的一方是教授们——有知识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和这个国家的

几乎全部劳动者，他们因多年备受凌辱、生活悲惨，被人忽视而愤怒，又因得知他们在法国和英国的阶级弟兄享有较好的条件，并因他们设想俄国工人阶级已获得实际上的统治权而狂喜。[\[7\]](#)

奥地利共和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经历，甚至更清楚地说明了那些最容易使缺乏强烈民族感情这种较大内聚力的社会解体的种种势力。圣日耳曼条约强使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世界性工业大城市维也纳，一个是新共和国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各个农业省份。一个国家内各社会阶级在地理上和行政管理上分离的结果，造成社会民主党统治城市，而敌对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全国委员会中拥有多数。1932年，经过一段时期的不稳定的共处，终于导致经济萧条的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来自法西斯意大利的干涉以及经常发生的好斗的示威游行以后，这个国家屈服于陶尔斐斯总理的教权主义独裁统治；他于1933年终止了议会制政府。

在这些年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在上述压力下虽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变化着，但其性质最终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这不仅是因为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按照比较注意民族主义的原则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而且也因为一些在经济困境、政治思想和社会冲突的破坏力面前，不能依靠民族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往往屈服于独裁。1917年的俄国和1918年的奥匈帝国是如此；1933年的德国，1939年的西班牙，也是如此。

到1939年，整个社会变化的最大好处，实际上归于民族主义。一些国家面临着经济萧条，采取了保护贸易的措施，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公共工程计划。最缺乏民族内聚力的民主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则深受破坏之苦，或被迫接受独裁统治，在30年代实行一党统治的国家中，各国情况都是党内比较注重民族主义的一派要胜过比较注重改革的一派；斯大林派驱逐了托洛茨基分子，希特勒和希姆莱1934年清洗了“第二次革命分子”，墨索里尼和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为所欲为，并粉碎了法西斯党内部的持异议者。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民族联合政府竭力通过实行温和的改良和抵制左、右翼的过激分子，以保持民族团结。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三（共产）国际，甚至罗马天主教会——在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强烈吸引力面前，也只好甘拜下风。在殖民地世界，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已经抬头——如在印度、远东和非

洲（见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成为一切社会变化的特点，不管它是结构和组织方面的变化，还是职能和目的方面的变化。

新的社会财富最普通的用途，当然是提高部分或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要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范围和程度做出估价却很困难。我们至今还没有想出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实际工资很难作为尺度，因为个人或家庭大部分的收入是实物；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中，很大一部分的实际收入体现为免费的或给予补助的社会福利；有的时期（在许多国家是这样的），收入的增加又体现为已婚妇女越来越多的就业。一般的居住条件和习惯消费的食物品种这类重要因素，在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时，都必须考虑进去。同样地，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出现率以及提供医疗和养老金等劳动保险的程度，也是真正衡量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生活水平问题脱离了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因此，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这类资料很能反映一个社会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居住条件、营养状况以及人们的劳苦程度。[\[8\]](#)

按人口统计资料的标准来衡量，联合王国取得了巨大而稳固的进步。1900年至1902年，一周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是142%，1920年至1922年的年平均率是82%，1930年至1932年是67%，1938年至1939年是54%。[\[9\]](#)用同一方法来衡量，法国取得了同样迅速的进步，但是标准较低。1896年至1900年，法国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161%，1920年至1924年是97%，1930年至1934年是80%，1935年至1939年是71%。后来，虽然在1945年那一非常时期，死亡率重又高达112%，但到1950年又下降了一半多（降为52%）。这两个国家都在1945年以后取得了最显著的进步。在联合王国，婴儿死亡率从1945年的49%下降到1950年的31%。1950年瑞典的婴儿死亡率是21%，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在20世纪前50年内，至少下降了一半，而1930年至1950年间的下降率尤其显著。

这一时期，在平均寿命的延长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从1850年至1950年这100年间，西方文明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整整30岁。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中，1900年以前的50年间，平均寿命每10年增长两岁，1900年以后的50年间，加速到每10年延长3岁半至4岁。从

1900年至1950年间，除俄国以外，欧洲人口从大约3.1亿增长到3.96亿，就是由于这种婴儿死亡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的结果，同时也是这种新的生命力旺盛的某种标志。这样，尽管某些国家的出生率有所下降，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大量死亡和动乱，但欧洲人口显著地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虽然势头已经减弱。

正因为有了工业化、世界贸易以及耕作方法和交通运输的改进，才使得这样日益增长的人口能够维持着普遍有所提高的生活水平。由于各个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广度以及采用的更加科学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它们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差也很大，几乎与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一样悬殊。1940年，西班牙一岁婴儿预期的平均寿命是男52.4岁，女58.8岁，比1900年法国的水平还要低；1940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是188‰，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水平相仿，高于1940年的印度。1948年，联合国的经济事务部调查了欧洲各国生活水平的这种差距，并试图以1938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数（以美元为计算单位）来估量。从对比数字可以看出，这种差距是很大的，联合王国平均每人收入378美元，荷兰367美元，法国236美元，意大利127美元，希腊80美元。按地区计算，这种差距为西北欧收入最高，平均每人362美元，西欧其次，为262美元，中欧和东北欧各国明显下降，为132美元，南欧和东西欧，包括意大利，仅89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就是按照这种以地区划分的模式变化的。

[\[10\]](#)

除这类说明以外，很难做出一个确切的概述，但大致说来（尽管情况并不均衡），健康水平和寿命年限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群众的物质福利也有普遍的改进。这种改进包括工作日和工作周的缩短，也包括由于延长学制及实行按惯例年龄退休养老等趋势而缩短了工作年限。但由于种种原因，物质的改善是不均衡的。虽然最初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既提高了移民的生活水平，又改善了继续留在欧洲的人们的贸易条件，但到1914年后的几十年中，向海外移民的规模便大为缩小。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和1945年以后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由于着意把投资重点放在扩展重工业上，而不惜损害农业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压低了生活水平。不论在何处，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消费者的需求都是矛盾的，结果造成了“要大炮还是要黄油”这样一种严重的困境。

如果说财富比过去增多了，而财产却变得更无保障了。这半个世纪充满了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它们轮番地对以往的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国这些历史悠久的帝国崩溃，而它们的崩溃又导致许多豪门世家和地主贵族的垮台。在整个东欧，旧秩序在革命和战争的暴力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土地、工厂和一切财产都被没收。政权和财富控制权落入新一代的党和国家的统治干部手中。在德国，地主同军队和新兴的工业家联合起来，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如同在匈牙利，他们以反动的暴力行为阻挡革命的潮流。1923年，德国的通货大崩溃使大部分中产阶级和食利者破产，同时使社会动乱达到了1919年所幸免的那种严重程度。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许多以前的殷实富户纷纷毁于破产和失业。1933年以后，国社党政权没收了犹太人和所有被指控为政治反对派的人们的财产。1939年后，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德国的全部占领区。而战后的各国政府又采取相反的做法，打击了通敌者和发国难财者。在东欧，1945年后建立的共产党新政权重复了1917年后俄国的许多做法。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和战后年代里的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造成了成百万战时流民和难民流离失所，丧失生计。

究竟哪些社会阶层在这些动乱中所获最多或损失最重，是很难断定的。或许，总的来说，仍然作为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基础的农民阶级，结果从这些变动中获得了好处。在东欧，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土地。20年代的经济萧条促使政府资助农业，并帮助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精耕细作。30年代是一个粮食生产稳步上升的时期，到1939年，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处于正常发展状态。战争的动乱、德国的占领以及后来的解放带来了生产的急剧下降，并且往往造成饥馑。但是，除作战地区外，这些动乱与其说打击了农村人口，不如说打击了城市居民，而且战后，在美国帮助下，为恢复欧洲的繁荣所做的巨大努力，很快地就使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战后世界性的粮食短缺造成粮价高涨，导致官方对农业的补贴和鼓励，而且往往就像在法国那样，使农民的生活提高到了战前的水平之上。

地主虽然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损失小于中产阶级，在通货崩溃中遭受的损失小于食利者，但在没收土地的严厉措施中却受到了较大的损失。工商业家和运输商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和战时的征收、管制和

破坏中都遭到了打击。1923—1933年，在德国发生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成员，不论是靠薪金、年金、经营小店铺小商业、不动产租金，还是靠债券利息或抵押贷款利息为生者，往往都变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获得了利益，其中包括欠债户、大雇主、资金投机者以及由于交付固定地租或自己拥有土地而能够从高涨的物价中获利的农户。产业工人、农业工人以及许多靠薪金生活者，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从大规模失业中遭受最惨重的打击。大多数国家出现了一支长期存在并且人数日益增多的失业大军。在德国，失业人数1930年接近500万，到1932年年初超过了600万。在英国，1921年至1922年间的某些时候，失业人数是200万，在1931年至1933年间接近300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遭受大规模失业的痛苦比德国更加严重。法国由于国家的繁荣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较小，因而比德国和英国遭受的损失较小，而且时间也较晚。

上述这些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焦虑、损失和极度贫困，是近代工艺技术给欧洲带来的大量新财富的一个消极方面。在普遍的富裕中，贫困变得更难容忍了，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险和进行更系统的财富再分配的呼声会如此强烈而普遍。正常的财富体制一再被粗暴地打乱。经济与政治分离这一原则，在19世纪中期曾经是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但经历过这些事件后，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从1914年前的若干年开始，就发出了要求“社会正义”的更迫切的呼声，并且同时提出了借以实现更大社会正义的多种方案，因此，这些方案的实施和推广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第二个主要方面。

争取社会正义的要求涉及几个互相关联的步骤。首先，它要完成19世纪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旨在争取普选权并要使全体公民普遍地能享受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其次，它要实现更多的社会平等：消除贫富悬殊、要求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均等和量才录用。再次，它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障：保护个人和家庭免受工业社会和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造成的灾难和动荡；防止雇用劳动者由于患病或残废、周期性失业或长期失业以及年纪衰老而遭受贫困。最后，它要求不同的社会彼此奉行新的行为准则：扩大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权和公民权；在多种多样的国际组织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促使世界上一切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的呼声如此强烈而又持久，因而到1950

年，欧洲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实行这类政策。以前那种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做法完全被摒弃了，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执行关于社会保险、经济管制和充分就业的方案。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关系，原是19世纪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的产物，到了20世纪前半期，又更进一步地得到了改善和发挥。

到190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已经实行或接近于实行普选制。1870年以后，法国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德国全体男子获得选举权从1871年开始，瑞士从1874年开始，比利时从1893年开始，荷兰从1896年开始，挪威从1898年开始。虽然最低年龄各国不同，原则却被普遍接受了。瑞典和奥地利在1907年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土耳其在1908年，意大利在1912年，在芬兰和挪威，甚至妇女在1907年也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以后，民主政体盛行，所有的欧洲新国家都正式通过了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宪法。1918年，联合王国年满30岁的女子获得选举权；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年满20岁的女子获得选举权。1934年，土耳其给予妇女选举权。到1950年，整个欧洲普遍实行了男女平等的选举制：俄国在1918年实行，英国在1928年，法国在1945年，意大利在1946年，比利时在1948年，只有瑞士是唯一特殊的例外。男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原则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这对代议制政府产生了深远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估量的影响。仅仅在30年内，选民的人数往往就增加了1倍以上，从而迫使各个政党不得不设法去争取妇女的选票。这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积极地建立制度，以便为寡妇和老人提供年金、建立国家保健机构以及给予家庭补贴。女子在选举方面的新压力也加强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其他各种趋势。

20世纪欧洲的社会革命在大多数国家中，使妇女获得了新地位，但其起因要比争取妇女普选权深刻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比扩大选民范围广泛得多。它和强调每人生来就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这样一种民主的平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是社会生活观念产生的更广泛的变化的一部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解除了妇女多孕的负担；人们采用更科学的节育方法和接受小家庭生活方式；妇女（包括已婚妇女）也有机会在机关、工厂、饭馆和零售店就业；国家对男女儿童同样实行普及教育；人们普遍要求更多的空闲时间和舒适生活。在英国，19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的孩子平均数超过了5个，1900年前后为3个或4个，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

和30年代，便只有两个左右。随着工厂和机关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家庭女仆变得更加稀少了，而且对她们的需要也减少了。作为家庭主妇，妇女由于有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机械设备，有了供应更加充足的廉价肥皂、廉价家具和现代化的住所，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减轻了。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提供了大量的补充劳动力。在经济上对父亲和丈夫的依赖减少，使得妇女在精神上更加独立，更加要求获得各种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而立法机构越来越急于满足新的女选民的要求，也乐于给予这些权利。在这整个过程中，原因和结果往往难以区分。在这方面，变化的程度也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差别很大，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在法国，妇女就业的比例1926年小于1906年。妇女解放常常受到罗马教会势力的抵制。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出现的一些独裁政府，特别是在德国，对于妇女解放是压制的，它们力图提高出生率，力图迫使妇女回到厨房和育儿室去。由于奉行这种政策，德国国社党政权就没有能够像英国那样彻底地动员妇女参加战事工作。[\[11\]](#)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最后的结果是妇女的地位和状况，以及家庭这个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单位的地位和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蒂特马斯教授所谈到的50年代英国妇女的状况，也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妇女情况：

……看来，19世纪90年代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在她十几岁或二十来岁时结婚，怀孕10次，孕期以及给每个孩子第一年的哺乳大约共要花费1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她被束缚在生儿育女的车轮上了。今天，对于一个典型的母亲来说，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大约是4年。仅仅60年间，花在生儿育女上的时间这样大幅度地减少，完全说明妇女控制生育，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自由。[\[12\]](#)

此外，1931年一个45岁的妇女，平均可以活到73岁，而在19世纪90年代，她只能指望活到67岁。因此可以说：“这些变化表明今天的典型母亲在实际上履行完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时，她还有一半的寿命好活……对于我们有可靠记载的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这是一个新情况。”[\[13\]](#)

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些年来家庭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但关于这些变化的意义，他们的看法却不一致。一个变化是，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变得比“大家庭”或“亲属关系”更为重要了。这

主要是由于已经提到的人口迁移，破坏了许多人同邻居和近亲的原来的联系，也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和就业机会。另一个变化是由于母亲参加工作和享受较多的个人自由，家庭规模更小，空闲时间增加，因而小家庭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看来，可以说处于各种社会地位的家庭，都变得较多协作而较少独裁，更独立于祖父母、叔伯父母等众多“亲属”之外，更可能拥有自己特有的财产（家庭的住宅、汽车），并作为一个单独的集体进行活动（如家庭假日）。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去遇到困难时靠亲属给予的支持，现在则靠社会事业的支持，而且通过家庭补助，加强了家庭自己肩负其责任的一定能力。

在20世纪的社会中，家庭历史的一个特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家庭的作用和性质的一些主要变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或世界大事的影响无意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有意实施某些政策或政治法令所造成的结果。工业化、人口迁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所带来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在2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传统的父母权威的削弱，大概更多地是由于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使得父亲不再成为家庭中挣钱养家的人，而不是由于任何政府法令。两次世界大战，比世界性经济萧条以外的任何其他事件，更多地造成了家庭生活中的根本变动。例如，英国的离婚统计资料说明，从20世纪初到1918年前后，离婚率一直很低，从1918年起便急剧地增长；然后离婚率又下降，虽然没有下降到战前水平，但直到1939年之前始终是稳定的；从1939年又急剧上升，直到1947年；在这之后，又开始下降。虽然其他因素也应考虑在内，包括1937年的《婚姻诉讼法》这类法律的变动在内，但是，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是离婚率增加的唯一最大的原因。

[\[14\]](#)

另外，力图改变家庭生活的习惯和作用的各项政府政策已明显失败。墨索里尼企图抬高意大利的家庭地位和提高出生率的努力，被证明无力抗拒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欧洲降低出生率的总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法西斯的宣传和诱导做法还得到教会人士规劝的支持。虽然意大利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大约3200万增长到1922年的大约3700万，1936年又增长到接近4300万，但这种增长既不是由于结婚的人增加，也不是由于出生率的提高。实际上出生率从1901—1905年的32.7%，下降到1922—1925年的29.5%，1938年又下降到23.7%。

1938年意大利人口的净增率（1.131%）低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低于保加利亚。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更明显的证据，说明即使极权主义的政权，要反对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和看法，相对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虽然违反列宁本人的意愿）对于家庭生活是完全敌对的。离婚变得容易了，不管离多少次都行，节制生育和堕胎受到鼓励，以前为保护家庭而采取的一切外部的强制办法都已废除。有几年时间，至少在城市中，家庭生活似乎是被破坏了。但是在大部分乡村，俄国人民的大多数继续在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为他们的家庭营造住所。从1936年起，苏联政府一反其过去的政策，开始颂扬家庭，重新施行外部的强制措施，而且把“自由性爱和性生活混乱”斥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表现^[15]。一项可以更加振振有词地声称取得成功的官方政策，是法国的家庭津贴和补助制度，它是在1932年以责成全体雇主提供捐款的形式设立的，1939年又精心制定为家庭法典。战时和战后所以贯彻执行，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家庭和提高出生率。事实上，法国的出生率在战后确实急剧地增长，而且与战前的趋势对比极为明显，因而许多人把这个变化归功于慷慨的家庭津贴制和从那时开始给予多子女父母的种种特权。但是，甚至这一点也是靠不住的，事实上无法证明哪一种说法是对的。^[16]到出生率的增长变得明显时，这项制度不仅被纳入范围更广的1945年的社会保险制度，而且法国社会和社会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战后重建时期的激烈动荡。其他获得解放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同样地，关于住房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主要国家有政策获得成功的良好记录。许多地方完成了拆除贫民窟和兴建工人宿舍或新住宅区的工作，但是这类措施还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基本问题。城市和郊区的发展，往往毫无计划，而且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长远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了许多城市地区，造成有系统地重建的必要，从而促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政府措施在两个方面对社会变革发生了更加决定性的有效的冲击。这两个方面是，提供免费的国民教育，及按照美国1935年的例子，采取了后来被称为“社会保险”的全面的制度。这些活动不论对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对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共同的，它们在各地都成为现代国家正常的主要活动。

到1914年，所有的欧洲人都已入校学习。免费的义务教育制（至少是在小学），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被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或可取的做法。在法国，从1881年起，国立小学全部免费；从1882年起，6—13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学。在英国，1870年制定一项法令，授权地方教育委员会要求一切适龄儿童入学；1881年普及了义务教育；10年以后，初等教育全部免费。在同一时期或更早时候，西北欧的大多数国家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所以，1900年以后，那些国家的人民文化水平都不断地提高了。在20世纪中，1917年以后的苏联、穆斯塔法·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以及整个南欧和东欧的文化程度也有相似的提高，虽然往往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例如，1950年，7岁以上的葡萄牙人有40%以上不能读写；1946年，将近1/4的保加利亚人是文盲。

随着各个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中等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变得十分发达，高等教育也有了发展。在1937年以前的40年中，法国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进一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的增加远比1倍还多。1900年，英国设立了教育委员会，1902年通过的法案为在中央政府推动下迅速发展中等教育铺平了道路，从而促使人们要求扩大高等教育。1918年和1944年的《教育法》为在全国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不过英国大学的发展比大多数国家缓慢。在1939年以前的40年中，英国大学生人数增加不到1倍。威尔士大学于1903年成立，另外，在英格兰的伯明翰（1900年）、利物浦（1903年）、利兹（1904年）、谢斐尔德（1905年）、布里斯托尔（1909年）、雷丁（1926年），还创办了6所新大学。这些年里，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建立了新的大学。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和波尔图大学在1911年建立，意大利1924年在巴里、佛罗伦萨、米兰和的里雅斯特，1944年又在萨莱诺建立了新大学。丹麦的奥尔胡斯大学是在1928年创办的，而挪威的卑尔根大学则建立于1946年。但是到这时，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正开始了一个高等教育迅速扩大的新阶段。苏联在1917—1941年间，大学和学院的数目从90所增加到782所。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由国家提供经费或补贴的公共教育事业迅速扩大这一事实，引起了国家和在此以前一直是教育事业主管者的教会之间的冲突。在罗马天主教会势力强盛的地方，这种冲突尤为剧烈，它导致1905年法国的政教分离。在这类国家，国立学校和师范学院里提供的教育内容往往都是实证主义的

和世俗的，充满了强烈的反教权情绪。在独裁政权之下，一种类似的冲突重又发生，因为这些政权竭力向全国青年灌输它们自己的反宗教思想。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冲突也时常再现，例如英国通过了1902年的《教育法》后，1919年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后都有这种情况。

自由民主制度在欧洲获得这些胜利的同时，本身也遭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甚至在20世纪头10年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上述各种发展加在一起，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如自由民主主义者所期望而且相信的那样，这些发展倾向于造成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思考能力的公众舆论，能够竭力做到审慎地和合理地运用选举权，并能遵循民主思想行事，因为这些思想是从18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民主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或者，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听任群众凭感情用事，让舆论完全为煽动性宣传所左右，以及听任操纵和利用乌合之众和暴民所固有的那种反理性的疯狂情绪。普及教育、成年人教育运动^[17]、较为负责的报刊以及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等，都有助于促使民主运动朝着具有思考能力和责任感的方向发展。而那些着意吸引工人阶级日益提高的购买力的商业广告活动，那些由于有广告商补贴而售价便宜的哗众取宠的报刊以及更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助长着反理性主义和群众的疯狂情绪等相反的势力。1914年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第二种趋势就其可能性和先天性来看，至少和第一种趋势同样是新的民主运动的一个结果。社会理论家们，像法国的居斯塔夫·勒邦和英国的格雷厄姆·华莱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8]由于英国进行布尔战争、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德国鼓吹扩张殖民地和海军以及美国发动美西战争而引起的疯狂而激烈的群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1900年那种城市的、民族主义的、更有文化的各国社会中残暴的劣根性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力量。

1900年以后出现的新鲜事并不说明人们容易被花言巧语的劝导和宣传所打动，而古往今来杰出的领袖人物却显示了舆论是怎样可以左右的。19世纪的民众团体已经发现了煽动群众的一切技巧，用民族自豪感和发动侵略去赢得民众的热情也并不新奇。新奇的情况是，粗通文字的城市民众容易受到商业界和报界宣传家们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普选制、政府活动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些民众的反映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时间造成了人们生理上和情绪上的高度紧张，在这以后不久，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工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电影、无线电广播以及由于采用扩音器而有可能举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政体似乎只是使独裁政权容易在世界上出现。俄国苏维埃、意大利法西斯、德国国社党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类似独裁政党，正是通过巧妙地操纵一切最新的宣传工具，来利用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的反常的病态的冲动，才能夺取并保持它们的权力。这种冲动以追求时髦的服饰、崇拜运动健将和电影明星、迷恋流行歌曲或爱读畅销小说等无害的形式表现出来，却被用来不仅为政治，而且为经济服务（例如配合苏联的5年计划所进行的宣传）。到1950年，电视在这个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可能性：甚至在最稳定的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依靠电影、广播和电视来竞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利用广告、报刊和公众集会。[\[19\]](#)

在结构和精神方面日趋民主化的一些国家，又成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提供者。在这方面，也承袭了19世纪晚期的某种模式。到1914年，除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外，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了相当完善的工厂法和劳动法。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提出法案，目的是使德国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国家制度，为预防疾病、工伤事故以及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提供社会保险，1911年上述立法被编为法典，并且扩大到农业劳动者和家庭仆人等非产业工人阶层。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获得了这种保险，并增定了有关工厂和童工的法规。德国的各个邻国对这些措施留下深刻印象，很快就全部或部分地加以仿效。1911年，联合王国通过了第一个国家保险法案，建立起一项资助制度，为很大一部分工人提供了疾病保险和免费医疗，并为某些工种的工人提供了失业保险。比利时和丹麦如同英国那样，也仿效德国，建立起预防疾病、工伤事故和年老的保险制度。奥地利在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瑞士在90年代都建立了关于工伤事故和疾病的保险制度。在这些年中，英国、法国、挪威、西班牙和荷兰还通过了立法，责成雇主对在工作期间遇到工伤事故的工人给予补偿。法国在1928年才实行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由于国家对其公民的安全与福利所负的责任比以往增加了，加上欧洲社会大半变得城市化，这就导致对地方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普遍整顿。到1914年，各国民主化的和工作积极的市政府为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新颖的公用事业网，其中包括公共卫生设施、自来水、煤气、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医院、商场、洗衣房、屠宰场、职业介绍所、博物馆、游艺场所、公园、图书馆、学校以及现代城市生活的其他娱乐设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活动增加以后，势必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在1871年以前，几乎只有英国采取征收直接所得税的办法。由于间接税不受消费者选民的欢迎，按照个人的收入或财产科学地予以评定并征收直接累进税的办法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劳合·乔治先生在他提出的1909年度财政预算中，包括了若干年来在英国形成的一整套财政方案：规定烟、酒征收重税，个人财产征收更重的遗产税（这是威廉·哈考特爵士1894年首先提出的），分级征收更重的所得税，对于超过相当高的水平的收入额外征收“附加税”，对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值征收20%的赋税，对未开发的土地和矿山的资本价值课税，等等。19世纪90年代，德国及其各邦以及意大利、奥地利、挪威、西班牙等国在其政府不仅对于公共福利事业而且对于军备大大增加开支的同时，全部实行了或增强了所得税制度。法国政府一再回避这种做法，虽然在1901年实行了累进遗产税，但直到1917年，才建立一个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所得税制度。财政上巨大的战费开支使人民经常承担着较重的税。1920年法国大使保罗·康邦先生曾对丘吉尔先生说：“20年来我一直待在这里，目睹了一场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深刻和彻底的英国革命。统治阶级几乎已经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他们的财富和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剥夺了。这种变动是悄悄地完成的，几乎使人察觉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丧失一条性命。”^[20]如果说康邦先生在1920年是夸大其词，那么，可以说他有预见，因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所谈的情况无疑都变成了现实。早在1937年就曾计算过，当时有5%—6%的国民收入正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

欧洲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贝弗里奇勋爵1942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保险及其有关福利事业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欢迎，被公认为战后世界应该奉行的社会信条，尽管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做法并没有被接受。1946年的英国国民保险法，同年的国民卫生服务法和1948年的国家补贴法，都是工党政府通过的，这些法令充分地体现了上述报告的精神。这些立法措施把以往有关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失业和年老的各种保险制度加以统一，变为一个由政府组织的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虽然也为进一步的自愿提供保险留了余地；此外，还普遍扩大了免费的医疗和牙科治疗，并废除了旧的济贫法。贝弗里奇的报告所倡议的家庭补贴制度，于1946年在英国建立，并且在1945—1946年间，以宏伟得多的规划在法国建立，成为它的社会保险总方案中的一部分。相似的条例1939年以来在西班牙

已经存在，同时分别于1944年和1946年，在比利时和挪威建立。社会保险意味着政府应当保护个人和家庭，使他们“从生到死”一辈子免于疾病、贫穷、失业、肮脏和愚昧，这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痛苦经历而产生的一个社会理想。

这些目标不仅包括提供国民教育、保健和养老金等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事业，而且包括由政府采取的一项“充分就业”政策，这项政策是要通过货币与贸易管制措施以及政府投资计划，预先设法防止大规模失业重新发生。没有充分就业，社会福利事业就很难维持下去。到1950年，欧洲已经广泛地接受这样一些观点，应该消灭贫富悬殊；应该通过审慎的国家行动和调节办法使所有国家的平均生活标准都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虽然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基本上依赖世界贸易。整个舆论气氛和1900年完全不同了，那时候，除了在德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得不到信任。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实行更为激进的集体化政策。

在依靠政府行动和提供社会公益服务来促进社会福利和保障这一总的模式中，由于环境和着重点的不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因此法国的体制主要是靠人口统计政策，利用家庭补贴和保健措施来鼓励多子女的家庭。西班牙在内战后建立的体制也是这样。英国的体制由于更多地受失业问题的左右，因此优先给予工人失业、疾病或残废以保险，甚至养老金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成为失业救济和补助的一部分。苏联体系不大关心人口统计问题，因此1936年国家补助只给予生育第七个孩子的母亲。1944年，作为加强家庭生活的政策的一部分，生第三个孩子就可得到国家补助。但是，苏联自1931年以后十分关心提高生产率，着重对熟练工人和精深的劳动给予较大的鼓励和较高的奖励。因此社会福利成为高度个人的，决定于在一个地方工作期限的长短和技术与生产水平等因素。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同样是根据受益者以前的收入水平，给予差别很大的津贴，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实行一种平均补助或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制度。它关心的是保证经济保险，而不是“社会保险”。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总的世界趋势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大多数国家，国民收入普遍增加，以及其中较大份额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个人收入所享有，这反映在用于消遣娱乐和奢侈品的支出日益增多。消遣时间和财富的增多，使社会风尚和经济结构产

生了重大的改变。整个工商业，特别是零售业的结构，都因为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而深受影响。产品、质量和包装的标准化，变得更为普通。联号商店越来越多，但小商店也同样增多。美国的伍尔沃思商行1910年将它的大规模销售术推广到英国，1927年又推广到德国。以后，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发展了类似的联号商店，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普里絮尼克和莫诺普里这样的“不二价”大商店。起源于法国和美国的百货公司，在20世纪初传入英国；1906年戈登·塞尔弗里奇在伦敦开办他的商店后，这种百货公司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出现了赊购，即先付部分货款后再分期付款（在英国奇怪地叫作“租购”）等办法，从而使工人阶级家庭也能买得起比较昂贵的家庭用品，如家具、真空吸尘器、电冰箱和无线电收音机等。

用于购买奢侈品的费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而在东方国家的富裕家庭中也是如此：主要用于烟、酒、糖果和娱乐、赌博和运动。20年代，无声电影成为一切娱乐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因而使卓别林成为世界名人。从1929年以后，无声电影让位于有声电影，甚至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也纷纷建造电影院，而在大城市则建造更为壮丽的“超级电影院”。到1937年，英国电影观众每年花费4000万英镑。意大利有约9000家电影院，座位可容纳350万观众。西班牙有将近4000家电影院，座位可容纳200万观众。跳舞变得很流行，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英国从欧洲传入的“舞厅”，其富丽堂皇可与同样“富丽堂皇”的新电影院相媲美（虽然不如电影院那样备受欢迎）。各种商业化的体育运动以及赌博工具的发展，产生了用电兔引诱的赛狗（1926年开始于曼彻斯特）、赛马的赌金计算器（1928年传入英国），以及30年代最受欢迎的群众性赌博足球赛赌馆等新玩意儿。到1937年，英国花在足球赛赌馆上的费用同花在看电影上的费用相等；战后，由于各种新式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推翻了电影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霸权地位，花在足球赛赌馆上的费用就更多了。

广大群众对场面壮观的娱乐活动永不满足地爱好，甚至超过了对耸人听闻的新闻的爱好，因而导致20世纪社会两个最重要的现象：大众化的报刊和对体育运动的狂热崇拜。这两方面并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发展，着重地说明了社会变化的几个固有的特点：现代社会中“宣传”的巨大重要性，使广大群众感兴趣的一切活动商业

化的固有趋势，政治活动在社会中具有的渗透力，以及一切对群众有吸引力的民族主义的，甚至沙文主义的潜力。

法国报纸在20世纪所达到的规模上，从几个方面率先在欧洲创办了一份大众化的日报。1905年《小巴黎人》销售120万份，它和《小日报》《日报》《晨报》《巴黎之声》加在一起，一共拥有500万读者。英国最受欢迎的日报（和在大量发行方面一向领先的星期日报纸截然不同）在3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这样多的读者，以后通过给予“读者订户”以免费保险和免费赠品这类强行推销的花招才达到这样的规模。德国的报刊被公认为更具有政治色彩而且比较分散：1914年仅社会民主党就有110家日报，总发行量将近150万份。意大利报纸一般说来在社会或政治方面都不十分重要，尽管北部城市也有几家有影响的日报。大量发行的现代报刊，有赖于几个不同的因素：廉价而快速的轮转印刷的现代技术；迅速有效的新闻采访机构；几乎全民普遍的阅读能力；实际上遍及全国的迅速的发行组织；以及——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自商业广告的大量收入。只有后一个因素才可以使报纸售价低廉到任何工人都买得起一份。现代报刊既是大规模宣传的产物，也是大规模宣传的主要工具。

但是，正因为主要产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多数欧洲的大众化报刊以及不那么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报刊，在其态度上，甚至在所有权上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法国，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即大多数报纸都被公认为赞同某一个政党，或至少赞同政界中的左派、中派或右派。主要的政治家们，一个克列孟梭、饶勒斯或勃鲁姆派，往往被看作同某一报刊或杂志的编辑和撰稿方针是一致的。在英国，一些流行的报刊也被视为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或者像诺思克利夫报和比弗布鲁克报那样，被认为遵循拥有这些报刊大亨们的政治观点。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逐渐形成这些相同的密切联系，甚至当大量发行明明是由于与政治很少相关的内容，如体育新闻、评论、为妇女或儿童创办的星期日专刊特辑等引起兴趣而达到的。以刊登耸人听闻的新闻和全国关心的严重危机而最为繁荣兴旺的群众性报纸，往往也倾向于沙文主义，以一种兴奋或惊恐的口气报道国外发生的事件，从有爱国热忱的普通人的观点，来论述对外政策的问题。在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期间，各国比较喜欢采用耸人听闻手法的报刊，都充满着支持军备竞赛的那种惊恐和畏惧的情绪。

体育运动的发展，恰恰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它也从一种有选择性的社会活动，变成一种群众性的场面壮观和高度商业化的娱乐活动。有扩音机和聚光灯设备的大型现代体育场的建立，使得大批群众能够观看运动会。1896年在雅典首次举行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捐赠戴维斯杯，1904年在巴黎首次设立世界杯，“环法国赛”自1903年开始，法国“大奖赛”自1902年开始，旅游有奖赛自1905年开始。大约20世纪初，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这类比赛开始风行，实际上这种风尚遍及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随着内燃机的出现，速度成为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种新的挑战。当大量金钱投下去时，体育运动变得高度商业化了，因为这样大规模的“促进”，需要巨额投资。

因此，它也变得高度职业化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许多单独的全国委员会竭力想保持“业余爱好者的地位”，由此产生大量谄上欺下、弄虚作假、荒谬愚蠢的行为，一再发生争吵，结果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20世纪20年代，约翰·凯利先生不能获得戴蒙德·斯卡尔杯，因为他是一个砌砖工人，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因而被取消了资格。但是他赢得了奥林匹克冠军，成了百万富翁，而他的女儿，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同摩纳哥亲王雷尼埃结了婚。纪录不断地被打破，因此如果不专心致志地进行训练，实际上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谁也不能大胆地参加比赛。体育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赌博风气是如此盛行，以致任何宣传工具都不能忽略它。新闻短片、广播节目和报刊必然予以相当的注意。专门的体育报刊和职业体育记者和评论员逐渐出现；体育冠军和电影明星一样，成为群众崇拜的偶像。妇女也像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一样，在某些运动项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作为群众性的娱乐，体育运动可能是一种业余的消遣，而对于最受到广泛宣传的参加者，它早已不再是一种消遣了。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欧洲文明扩大到了全世界，欧洲的体育比赛也普及整个世界，特别是由英国人在传播。板球在美国或丹麦没有普及，但是足球、草地网球和高尔夫球被证明是能够移植的，尤其是足球。人们认为，体育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反映了工业城市社会中特殊的心理需要。

男性产业工人，即使只是作为热心的观众，主要是通过体育运动（至少在和平时是这样），沉溺于“他们的”队，他们所属的团体应该得胜这种集体意志之中……可以把这些体育队看作有机的社会，

去想象并无休止地讨论这个团体及组成这个团体的英雄们的命运，他们提供由于共鸣而产生的与野性、与结局莫测，以及与自然力的接触……把“风格”一词用在这些活动上，如同用在所有的艺术上一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体育运动，确实应该被承认为一般城市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的民间艺术。[\[21\]](#)

群众形式的运动，当然很符合民族主义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库贝坦男爵原计划只有个人参加者能获胜，但不久就习惯于说美国、英国或俄国“胜了”某个比赛项目。这主要是由于体育报刊用这样的词语向各国公众描述比赛情况。因此，体育运动的所谓“国际主义”，不管多么“友好”，通常也成为国家队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脱离任何国家关系的个人之间的竞争。现代独裁者们无一例外地利用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贬低别国的情况下来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地位，这并不是巧合。体育场，以及由集体歌唱、游行、乐队和有关运动场面的其他花样所鼓动的易受影响的广大观众，成为不管是德国国家社会党还是俄国共产党，都最喜爱的政党集会的场所，这也并不是出于巧合。如果不是最强大的现代各国政府承担起挑选、训练并资助国家队去赢得国际比赛的责任，而认为应该把千百万人中少数个人杰出的体育运动才能，当作国家精力充沛实力强大的证据，这本身就是愚蠢的。各国政府和公共舆论已经信服：这类比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心、威望和影响。如果不是主要的全国比赛项目成为一种民间仪式，就像在温布利举行英国杯决赛仪式时群众虔诚地唱着《与我同在》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不是所有这类场合都有像西班牙的斗牛那样成为传统风尚的趋势，这种情况本来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这一点，或许是关于20世纪社会生活的变化的最后评论。不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社会还是独裁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明显地有着一种超越地区、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倾向，因为它不可抗拒地把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商业、政治、社会和各种趋势结合起来。

（宋蜀碧 徐式谷 译）

[\[1\]](#)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1部（1965年），第59—63页。

- [2] C. P. 金德尔伯格：《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1851—1950年》（1964年），第249—250页。
- [3] 关于三个部门的活动和它们如何受20世纪工艺技术急剧进步的影响的著名论述，见让·富拉斯蒂埃《20世纪的巨大希望》（1947年，修订版1963年）。
- [4]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1部（1965年），第24页。
- [5] H. W. 埃尔曼：《从人民阵线到解放的法国劳工》（1947年），第13页。
- [6] 弗里茨·蒂森：《我付钱给希特勒》（1941年），第133页。他认为（第134页）“总的说来，重工业部门给纳粹的钱估计为一年200万马克”。
- [7]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1961年，修订版1965年），第159页。
- [8] 婴儿死亡率是指每1000名出生的婴儿中周岁前死亡的数字。平均寿命是指一个人在他出生那一年的死亡率保持不变时可能活到的平均年龄。
- [9] 《统计年鉴》，第94期，第35页。
- [10] 《1948年欧洲经济调查》，联合国经济事务部（1949年），第235页。
- [11] 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非军事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实际减少了大约25万，1939年5月31日的统计为14636000人，3年以后减少为14437000人，参阅《希特勒的欧洲》，阿诺德·汤因比与维朗妮卡·汤因比合编（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4年），第8、226、234页。
- [12] R. M. 蒂特马斯：《福利国家文集》（1958年），第91页。
- [13] R. M. 蒂特马斯：《福利国家文集》（1958年），第93页。
- [14] 见格里塞尔达·朗特里和诺曼·H. 卡里尔合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案件，1858—1957年》，载于《人口研究》，第11卷，第3期（1958年3月）。
- [15] 见约翰·梅纳德爵士《俄国农民和其他研究》（1942，1962年版），第521—525页；莫里斯·欣德斯：《俄罗斯母亲》（1943年）。1944年7月的一项法律巩固了官方对家庭、母亲和父母权威的新的态度。
- [16] 参阅劳伦斯·怀利《法国：变化与传统》（1963年），第191页。
- [17] 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展了业余教育活动。工人教育协会于1903年成立。瑞典的类似组织则成立于1908年，而法国在1899—1903年间开办了民众大学。著名的丹麦民众高级中学早在1844年就已建立。
- [18] 居斯塔夫·勒邦的《鼓动心理学》于1895年问世。格雷厄姆·华莱斯的《政治中的人类本性》于1908年出版。像威廉·麦克杜格尔这样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这样的社会学家，在1914年以前的若干年中，对整个这一时期内一直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行为，做了更科学的研究。

[\[19\]](#) 参阅R. B. 麦卡卢姆与A. 里德曼合著《英国1945年的普选》（1947年），第七章；H. G. 尼古拉斯：《1950年的英国普选》（1951年），第六章。

[\[20\]](#) 温斯顿·丘吉尔：《早年回忆》（1930年，1947年新版），第90页。

[\[21\]](#) 雷尼·海恩斯，见A. 纳坦编《运动与社会论文集》（1958年），第60—61页。

第三章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计划化

20世纪前半期，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那样多的变化，各国社会和其中的各社会集团发生了那样多的兴盛和衰败，因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很久就可明显地看出，再也不能回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世界上所理解的那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理论和实践上去了。尽管1939年以后特别是1950年后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剧烈，但是1914年以前的世界和1914年以后的世界的差别是如此悬殊，致使当时人们感到难以使自己适应新环境或接受新问题的挑战。

1914年以前，一些经济上的重大变化，例如美国工业力量的增长或以钢铁和电力为基础的新技术的发展，是在一个专门化的体制内发生的，而整个体制并无变化：细节的变动与总的稳定似乎并不矛盾。1918年以后，欧洲各国国内经济严重失调，加上美国国内规模空前的繁荣与衰退，给国际经济造成那样巨大的混乱和震动，以致产生了一种把大危机发生前的事物状态理想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批评者，他们指出这种状态的严重的局限和缺点。肯定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年份之间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1]；而且，尽管那时的确“存在远比今天联系得紧密的国际社会……却只有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属于这个社会，因为它把大部分人类排除在外”^[2]。

这种新的解释考虑到了新经济的发展，新国家的出现和新愿望的表达；它所根据的还不只是对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机制做出了估价，而且对各个经济的内部和彼此之间制定“计划”的力量做出了估价。的确，“相互依存”和“计划化”是20世纪的课题，它们有时似乎是完全独立的，而在另一些时候又似乎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令人沮丧的结局中，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约·梅·凯恩斯关于进行自觉的经济控制的前景的观点，彻底改变了1939年后的经济政策，他仔细回顾了1914年以前体制的“相互依存”和“自动作用”两方面。1920年，他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有

说服力地描述了于1914年结束的“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914年以前，

伦敦居民可以一边躺在床上喝早茶，一边用电话订购全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他想订购多少都可以，而且可以合理地指望尽早在他门前交货；他可以同时用同样的方式把他的财富投资于世界任何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用不着去经营，甚至用不着操心，便可分享未来的成果和利益……只要他想要，他就立刻可以获得前往任何国家或地带的便宜而又舒适的交通工具，用不着护照或其他手续。他可以派遣他的仆人去附近的银行办事处，提取所需的贵金属，然后随身携带兑换成硬币的财富，前往国外一些他不了解其宗教、语言或风俗的地方，只要稍微遇到一点麻烦就会感到严重的不安和惊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稳定的和永久的，只有在进一步改善方面除外，任何偏离这种情况的现象都是异常的、丑恶的和可以避免的。^[3]

凯恩斯意识到但不赞美这种情况。在他的态度上没有留恋过去，因为他也特地强调西欧所处的“经济组织的极不正常的、不可靠的和暂时的性质”。其他人，例如有影响的1918年英国坎利夫委员会，建议英国在1918年以后的世界上压倒一切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恢复战前的金本位，而忽视了凯恩斯在其分析中考虑的许多因素。大多数了解情况的“正统派”的意见也是如此。凯恩斯的分析中包含有关于1914年以前的“体制”的很多根本问题。伦敦有哪些居民是以或能以上述方式行事？为什么欧洲以外的世界某些地区仍未开放？“依存”的代价是什么，特别是对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来说代价是什么？如果所有偏离这个体制的情况都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体制内部的变化又将如何？其中有些变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令人不安的，在“先进国家”里也完全一样。把战争这个外在的因素“谴责”为战后一切紧张事态的来源就够了吗？19世纪后期的国际贸易，曾是以英国为中心而组织的，英国战略地位的改变，难道不是像美国经济的增长一样，在1914年以前早就开始了的吗？因而战争最多只不过是加速了已有迹象可循的过程而已。这些问题当中，有些已在1939年以前被提出来，少数问题甚至在1914年以前就被这个“体制”的批评者提出；其他的问题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不同的语气——提了出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产生了新的混乱，而且产生了应付这些混乱的最好的新方法。

无可争辩的是，1914年以前的国际经济是19世纪经验的产物：它是独特的，也是要消亡的。^[4]它的基础是欧洲人口的不断增多；人员

和资本自由移往海外的数量日益增加；机器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西欧，但在1870年以后，也在美国和日本；一个复杂的交通、银行和保险服务网的发展；通过专业化而使多边贸易得到扩展。这些因素各有其自己的历史，它们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从19世纪后期到1914年这一时期的特殊的经济特点。18世纪末期，英国曾经首先发生了这些变化中的某些变化，从而获得了领先的地位，这种地位后来却变成了障碍，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其他国家遵循不同的道路“赶上”或超过了它。

[5]特别是德国，它于1871年统一以后，开始向英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工业强国的地位提出挑战。俄国的人口从1870年时的7700万增加到1914年时的1.11亿，它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改善了交通，特别是在产业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铁路。整个欧洲的铁路网从1890年的14万英里增加到1914年的21.3万英里。

虽然西欧各国（除荷兰以外）在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出生率下降，而且欧洲大陆上人口按比例增长最多的地方是在不太发达的南欧和东欧，但工业比较发达的西欧各国日益利用这一事实：它们能把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人口密度高、面积相对小的土地上。从1900年至1913年期间，它们的工业生产增加了大约一半。[6]它们的专业化的工业人口，生活水平较高，要求日益增多的食物和原料供应，这些只能通过促进海外国家的初级工业和建立新的交通服务事业以运输它们的产品才能获得。在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开辟了广大的新的初级产品地区——其规模是空前的——其中有些是生产新产品，例如橡胶（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生产矿物和化学产品（智利、加拿大和刚果），生产谷物（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果品（南非）、食糖（古巴和爪哇）和肉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伦敦或汉堡或鹿特丹的办事处，控制着新加坡、上海或圣地亚哥的发展。

这是地理上的关系；而在经济关系上，那些依赖海外廉价劳动但是供应必要的资本和企业的工业化国家，发现自己在19世纪最后20年能够以非常有利的贸易条件出售它们的工业品而从海外购买初级产品。在1900年到1914年期间，贸易条件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因为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量增加了1倍而初级产品只增加了2/3。然而在这期间，欧洲的海外投资数额巨大（每年约3.5亿英镑），以至到战争爆发时，投资的趋向正在逆转。这就是欧洲成为经济力量中心时的世界经济状况；而在欧洲内部，三个国家——联合王国、德国和法国——在

1913年占欧洲制造能力的7/10以上。在煤和钢铁技术的时代，这三个大国生产了欧洲的煤的93%，欧洲的钢的78%和欧洲的机器的80%。[\[7\]](#)

美国从1870年至1913年的年增长率（4.3%）远比联合王国（2.2%）、德国（从1871年起为2.9%）或法国（1.6%）高，在农业机械化和煤（生产了世界供应量的42%）、钢（41%）和制成品的产量方面超过了欧洲。但是，由于它有巨大的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它在国际贸易上所起的作用远比欧洲小。1913年，世界上制成品出口的60%来自欧洲三个主要的国家，特别是在联合王国，工业的结构和组织——正如货币和资本市场的组织一样——是与世界贸易相适应的。拥有海外原料供应和庞大的海外市场的英国纺织工业，比法国和德国的加起来还要大，而日本的竞争这时还没有能损害它的信心。伦敦比巴黎或柏林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不只是国内投资中心。此外，这个中心提供的服务依赖广泛的贸易，这种贸易远比仅仅涉及联合王国作为一个进口国或出口国的贸易，或者涉及以伦敦为基础的“形式上的”帝国的贸易，要广泛得多。“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有世界范围的联系，并且通过新的股票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和通过票据市场提供短期资本。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的作用，伦敦各种金融服务工作的廉价和安全，鼓励了正常的和扩展中的国际交易。

尽管在目光远大的观察者看来，世界经济的未来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决定，但是欧洲仍然似乎稳稳地处在国际社会的中心。甚至美国人口的巨大增长也仍然是由欧洲的大规模移民造成的：事实上，从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中，有875万移民从欧洲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欧和东欧。这些“永离故土的外来者”构成一个新社会的基础：他们也给一种新的经济提供了人力，这种经济的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增长率很高，工资比欧洲的高而工作时间比欧洲的短，而且更注意新的工业和消费品。然而，无论是由于企业的强大压力所造成的美国生活的转变，还是政治指导下的日本工业的发展——在1914年以前的10年中，日本的机械织布机从19000台增加到123000台——都没有超过欧洲的作用。

还有，现在回顾起来能够清楚地看出而在当时只能部分地看出的是，在一个长时期里，联合王国在扩大世界贸易上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1880—1885年间占19%，1911—1913年间占14%）；它在某些出口市场——例如南美洲——的地位由于美国的竞争而日渐削弱；它的工

业活动过分依赖“传统的”19世纪的产品；在钢铁及“新型工业”上，它的对手已经走在前面，例如德国，在1871年以后由于获得了洛林的铁矿而得益很大，产量为英国的两倍；它在农业上的衰落（这是在欧洲农业发展时期发生的）导致大量的有增无减的粮食进口；总之，它的收支平衡的地位是脆弱的，它的生存能力和恢复能力是可疑的。尽管在1914年以前的10年期间有大量的资本输出，但是支付进口的款项总是大于从出售商品和劳务的所得。联合王国的长期繁荣显然严重依赖从海外支付的利息中获得的日益增加的巨大收益和迅速利用新的地区。即使1914年至1918年没有发生减少联合王国的海外资产的战争，1914年以前的繁荣的消失，也会给世界经济的结构带来严重的影响。

然而，对这种情况加以夸大是危险的。就1914年以前的世界经济而言，联合王国所起的作用，用凯恩斯的另一句话来说，是“乐队指挥”^[8]。的确，它的有些“弱点”有助于体制的顺利运转。联合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没有利用它的地位聚敛大量的黄金，从而把属于金本位制度内的其他国家的财源吸干。它所安排的支付汇划——极少发生混乱——总是让其他国家在一个地区所负的债用另一个地区的收益来补偿。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利益广泛分散，矛盾就减少了。这种多边关系的主要方程式是，联合王国在同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的交易中有支付顺差，后者则以对欧洲大陆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出超来弥补它们的收支逆差。然后欧洲大陆各国用它们对联合王国的出超来支付它们自己对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和美国的入超。

与其说是金本位的货币结构或其运转的“规律”，不如说是运用这一机构时的那些条件，维持了1914年以前的世界的稳定，尽管当时这种稳定从来不是完善的。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增加了，并且有了令人感到宽慰的剩余。因此，一些小国能够满足于大体上按平价保持它们与伦敦之间的汇率，而不必密切关注一个国际金融体制运转的细节。^[9]就资本而言，尽管法国和德国的资本流动的数额和方向要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但在伦敦的自由输出资本的道路上却从未设置过政治障碍：例如，在1914年以前的7年中，英国向那些供应它食物和原料的国家提供了6亿英镑的资本在这些国家里修筑铁路，而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的那些年

里，联合王国每年投资的数额几乎等于它从海外拥有的资金中所获得的利息和红利的收入额。[\[10\]](#)

资本的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金本位所提供的“法定秩序”（有些人，不仅是英国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道义的秩序），便利了国际商品交易。也是在这种贸易中，联合王国的地位的特点，包括它的“弱点”，促成了多边贸易。联合王国对进口的依赖——1913年，它的进口的63%来自欧洲以外——刺激了发展和贸易；而在欧洲内部，不仅像丹麦那样的一些欧洲国家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趋向伦敦，而且联合王国的主要工业对手德国，也是化学产品和染料这类制成品的主要供应来源（以及英国产品的好主顾）。在1914年以前的这段期间，联合王国始终“恪守”自由贸易，抵制一切相反的论点，无论这些论点的根据是互惠原则，是保护受到威胁的工业或新工业的重要性，是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必要性，还是适应帝国优先的要求。它还抵制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往往是强烈地退向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形成基本原则的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结果，由经验丰富的批发商、经纪人和银行家主持，并且不受政治家干扰的自由而开放的英国市场，吸引了世界全部出口产品的大部分，并在商业危机期间通常是成功地吸收了所有暂时的剩余产品。

在这个相互依存的复杂错综的格局后面，关于“法定的”或“道义的”秩序的概念，在1914年以前商业衰退的时刻受到了最明显的挑战，例如在1907—1908年，经济活动量急剧减少而失业人数增多。[\[11\]](#)联合王国从这种衰退中受到的损失比德国或法国的大，而美国，尽管发展速度比欧洲快，但发生了更急剧的衰退；然而，有可能找出关于不满和不安的更持久的原因。相互依存体制所根据的某些默认的假设，涉及各国相互之间及政府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反映在政治家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干预国际经济专业化这一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主要靠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压力。商人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集团，即使当工业化以前的一些与“贪得”或“冒险”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仍然存在于民族文化中时也是如此。政治家形成了“社会上层”，即使他们从群众党派中获得支持时也是如此。正统的自由经济理论虽然没有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但它的基础是市场的独立。非洲和亚洲对欧洲的“依赖”，通常被认为是当然的。

然而，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有一些力量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1914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感到越来越有必要对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组织的某些领域，例如外国投资、中央银行的业务以及铁路，都有重要而明显的政治和战略含义，因而促使政府执行蓄意干预的政策；也有一些政府由于传统的或紧急的原因，积极地对经济进程进行干预。结果，在1914年以前，尽管对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实行计划化的尝试还不存在，在经济内部实行计划化或对某些经济部门实行管理的尝试却不少。虽然还没有直接制定关于保证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国家政策，但对运用预算政策作为社会调节手段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虽然对进口的数量限制还没有实施，关税却都是自由运用的。尽管联合王国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到1900年，它出口货物的45%是输往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的，其中有些国家，例如德国，把关税看作国家总政策的工具。

因此，20世纪的干涉主义的历史根源在1914年以前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就能看到，而决定各种事件的形式，则是大多数来源于19世纪的各种力量的结合。在经济内部采取的最早行动，是从某些上层特权人物感到的不安和某些下层社会人物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人所不能控制的市场力量、家庭贫困的循环无尽和对工业劳动条件进行的攻击开始的。选举权扩大以后，紧接着发生了一——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提前发生了一——群众提出的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社会保险的要求。例如，法国在1900年把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10小时，并在1906年把每周的工作日限制为6天；奥地利在长期效法联合王国以后于1883年设立了工厂视察员，并在1907年通过了一部新的工业法典。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无论多么有限，总是造成了群众压力。这些压力的某些影响从政府原来以紧缩为基础的政策改为大量开支的政策即可看出来。^[12]1908年，劳合·乔治能够宣布，任何人不用想在他的一生中会取消任何税收，而在一年以后，当时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温斯顿·丘吉尔能够宣称，如果要他用一个词来概括民主政治最近将来的发展，那么，他就选用“保险”这个词。

关于从拉萨尔所说的“警夜国家”到20世纪的“福利国家”的渐变过程，在1914年前的欧洲许多地方，可以追溯到它的早期阶段。和通常一样，动机是复杂的。对自由市场发展的后果持怀疑态度的传统主义者的专制思想，可能与以保证比较平等的公民权的必要性为基础

的进步理论融合在一起。社会保险可能给右翼集团带来获得政治保险的前景。英国的保险立法在各国政府采取这类行动中绝不是最早的。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1881年俾斯麦开创的，到1911年，随着一部有将近2000条款的工人保险法典国家保险条例的公布而圆满完成。这个德国法典的制定，部分原因是由于要使德国工人阶级“免受”“社会主义的海妖歌声”的诱惑。到了1914年，联合王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丹麦、奥地利、挪威、瑞典和瑞士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详尽而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是实行大量开支政策的先声。即使当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于捐款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税收，而且即使当伴随社会保险而来的有“劳资协商会”的发展和“劳工介绍所”成立的时候，社会保险也标志着国家日益关心劳动市场的作用。

尽管在经济内部进行更多的干涉的某些倾向来自下层社会的要求，另外一些倾向仍然来自企业界本身。从1890年到1914年间，对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要求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人们是否承认或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点要看当地的情况而定。1891年一次瑞士的公民投票结果赞成提高关税；1894年，瑞典的农民获得了关于在他们的国家内重新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保证；而在1897年，德国皇帝徒劳地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成立一个全面的“欧洲关税同盟”，以保护欧洲免遭美国竞争之害。国内的以及国际的经济上的对手到处鼓励征收关税。在某些“新兴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里，政党的纲领中强调工业化、投资和保护贸易政策（工党政治家支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有些国家里，关税不仅被认为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而且被认为是自主的标志，是建立没有自由贸易主义色彩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必要工具。

至少在有些国家里，与关税同时出现的有卡特尔和企业的集中化。在美国产生像美国钢铁公司（1901年建立）那样的托拉斯（由“工业巨头”创建的大企业组织，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计划化的真正先导）的同时，德国产生了瓜分市场的卡特尔，其中有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它建立于1893年，控制了德国煤炭生产的一半，而1904年建立的“钢铁工厂联营”，几乎控制了整个的钢铁生产。在小企业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的法国，“冶金工业公会”实际上被6个主要的公司控制。在这一切情况下，大企业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的体系”^[13]。在美国，到1904年，各个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本的2/5；而在德国，从1914年以前私有企业变为卡特尔化和政府资助卡特

尔，直到30年代国家（在企业结构内）实施“经济计划化”，有一条不断发展的路线。在1914年以前，许多德国经济学家已经把国家看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调节者——这是美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及时指出的一个事实——并把大企业看作有效率的组织的典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美国，像在包括联合王国在内的其他地方一样，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要通过工商业者和工商业组织的中介才能实施，为建立德国战时经济结构做了许多贡献的瓦尔特·拉特瑙曾经说过，他所知道的关于计划经济的一切，都得自他的父亲埃米尔（1883年建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瓦尔特·拉特瑙本人至少也是68家企业公司的董事。

把“计划化”的渊源之一追溯到这样的开端是必要的。当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福音时，大企业的所谓“社会化”已成为事实。经济学家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汇合，有一个具有中间形式和过渡形式的“过渡地带”^[14]，而且早在1911年，其中的一位经济学家就曾有力地争辩说，民主的前途取决于它是否能成功地处理公有共管的问题。^[15]当然，工业规模的发展及其日益垄断化的结构，导致了人们日益怀疑古典的市场理论在20世纪条件下是否适用。很明显，这种怀疑与对私有制的不满，再加上集中控制，将会导致以社会名义进行控制的新方案。

“计划化”的第三个渊源——通过附属国或“殖民地”社会的不满——不能明显地追溯到1914年以前^[16]，不过正如在“先进的”社会中享有社会和经济特权的人们有时可能预见到群众运动后来提出的批评那样，在“先进的”国家内部，对“帝国主义”的某些方面（包括它的种种不平等）的批评，在1914年以前早就提出来了。拥有1914年以前最大和最富的海外殖民地的联合王国的批评者呼号最烈，影响最大，特别是约·阿·霍布森，他的《帝国主义论》一书发表于1904年，后来由列宁引用。但是，尽管人们纷纷议论在1914年以前的10年期间的“剥削”统计，而且一些发生在像比属刚果那样的麻烦的发展地区的戏剧性“事实”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然而，当战争在1914年爆发时，它绝对不是关于“殖民主义”的战争，而是“富裕国家的不公正的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场内战”^[17]。

在相互依存的“美好时期”里，不同的海外国家获利的程度和时机大有不同。例如，印度的商业有很大的发展，但印度的工业却没有

发展：贸易行似乎比工厂发展得快。南非由于有丰富的矿产和相对多的白人居民，就比东非开发得快。不同的国家可以提供不同的自然资源——世界市场对有些资源的需求量大于对另一些资源的需求量——而且有不同的社会传统、制度和人口来促进或妨碍适应性和发展。西方的“冲击”可能是破坏性的、建设性的，或者更通常的二者皆有。由于在此期间建设的公路、铁路、商港和港口这些进取的标志和往往是合同承包人的技能的胜利，仍然是有价值的经济资产，后来的独立的经济的发展可能以这些为基础。荷兰资本在现在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地方的使用或美国资本在菲律宾的使用，提供了这种经济基础。

在1914年以前做出了巨大的、独立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非白人国家——日本——把旧的传统和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固有的历史结构内利用了进取精神的因素（见下文第十二章）。然而它的发展道路与西欧国家早些时候所遵循的道路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制造业上劳动力的相对人数的巨大增长，起初并未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增长是在普遍地精心仿效欧洲的机器生产以后才取得的。像联合王国一样，日本是在出口制成品——这被认为是它的经济的“主导部门”^[18]——的基础上发展其工业体系的，而且它在开拓新的市场上，因联合王国继续执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事实而偏重制造业。纺织品是主要的出口货，1900年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2%，而在1913年的门类较多而且较先进的经济中，则占30%。在上述两年之间，日本进口的纺织品从占全部进口的20%下降到5%。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使日本改变或延缓长期的经济趋势：实际上，由于它基本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它给日本的企业家就像给日本的政治家一样，提供了新的机会。

然而，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延续性在1914年突然中断。在前一个世纪中已经建立起来而在“美好时期”里似乎已达到顶点的经济结构永远破坏了。1914年人们很少认识那种本来应当支付的代价，因而更加不愿支付。起初，“照常营业”是1914年时的口号，德国和联合王国最初都是想夺取对方的市场。只有当“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被证明是一种幻想，战争变为一场军事消耗的长期竞争时，与1914年以前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决裂的程度才开始变得明显了。20世纪“计划化”的另一历史渊源——为胜利或生存而实行计划化可以追溯到海军封锁和堑壕战的年代，堑壕战大多是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工业化地区进行的。经济一旦在战争中成为控制因素，那就必须加以控制。战争越是延长，政治家就越感到难以把打赢战争同保持私人企业自主权

不受侵犯这两个目标协调起来。对于市场机构，不能听其运转而不加以限制。但是，向管制体系的过渡仍然是缓慢而且犹豫的，往往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行动，而是由于日益紧迫的物资短缺的压力和无法满足的军事生产需要而形成的。1914年前，即使是在德国，也从未有过关于特殊的“战时政治经济学”的详细探讨。而到战争结束后，企业家们正在继续渴望回到“正常状态”时，像范·默伦多夫等一些行政官吏却在议论“计划经济”了。在战争的末期，特别是当1914年以前的比较专制的帝国开始崩溃时，更促进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要求。

1914年所有交战国都面临同样的重大问题，不过只是由于紧急状态和危机才迫使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包括充分利用一切能够得到的国家资源的组织工作，还要在正确的时机，既按照正确的优先顺序，又按照正确的比例，把这些资源分配给各个生产者，同时又要对人力、财政和金融政策做出安排，使实际的资源迅速地转移到战争努力中去。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所具有的这一切含义，在1918年比1914年要清楚一些，在1945年又比1918年更为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许多意外的情况。将军们无法使战争早日结束；工厂不能生产出足够的军火；在供应品的分配中，不能忽视平民；而处理财政问题的标准与战前的财政标准完全不同。在试图处理这些问题时，政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有来自笃信自由贸易和个人主义等学说的人士的阻力。尽管在大多数国家中，实业家们不得不赞成国家管制的体制，但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并没有得到普遍的热烈拥护。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卡尔·黑尔费里希在他被委任主管德国一个新的经济部门时写到，如果尽快回复到战前的经济状态，这个部门将会十分熟悉它的任务。他的话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

负责战时德国的经济计划化工作的，主要是拉特瑙，而不是黑尔费里希。在交战国中，德国第一个接受全面经济动员的挑战。1914年8月，拉特瑙被授予广泛的权力。由于他提出了供应有中断的危险的警告，1914年8月设立了军用物资部，处理物资储备、代用品生产和计划分配的问题。当年年底，关于金属、木材和羊毛之类基本物资的一系列技术机构都建立了起来。这些战时经济机构起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环节的作用。1916年11月，所有执行中央统一管理职权的各个分支机构，都在最高作战办公厅统一领导下协调工作，由格罗纳将军直

接指挥。而在12月，国民服役法规定，所有年龄在17岁至60岁之间的男子都应编入部队或工厂。这时，经济体制就作为一个整体在严密的集中指导下工作了。

比这一新的经济结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看法。拉特瑙本人宣称，经济任务不再是一种个人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任务。他认为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之间的战斗，不如说是经济对手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战争的最后结局不在于德国军队的胜负，而在于德国经济的胜负。如果结局——通过组织——是胜利，那么，任务就将是和在平时时期像在战时一样继续从私人经济向集体经济前进。

在联合王国，尽管充分采取了新的权宜措施，但没有这样清楚或明确地提出新的学说，虽然在1916年12月的政治危机以前采取了许多管制经济的步骤，但只是从这个日期开始，一些主要部门例如粮食部、航运部才开始工作，而由人数很少的战时内阁作为精干的中央协调机构。战时内阁报告称，战争（特别是1917年的战事）已经促成国家的社会和行政机构的改造，“它的许多部分肯定会是永久性的”^[19]。这个过程是逐步积累的过程。在军需品生产方面，1914年10月，陆军部拒绝了关于政府接管大军火工厂并把它们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加以管理的建议；直到1915年5月，才成立了军需部。同月，法国的阿尔贝·托马接受了同样的任命。军需部面临有关优先顺序、调配、价格和雇佣等困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它既在纵的方面把管制扩大到原料供应，又在横的方面扩大管制范围，不仅管制军需，而且管制民间需要。在人力的组织上，和平时设计来用于不同目的的机构——例如，劳工介绍所——被用来调节人力的需求。在食品供应和航运的组织方面，步骤是缓慢的，不那么激烈，但最后还是实施了广泛的管制。市场机构永远不能完成紧急的和必要的任务。粮食部“彻底压制私人企业，完成了国内私人企业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航运部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必须制定一项满足整个经济需要的国家进口政策上。从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尝试性答案，产生了实行计划化的办法。“由沙袋、炮弹或食物的短缺以及更具有根本性的航运和劳动力的不足所促成的许许多多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形成了一种格局。很少人把它们看成一种格局；看到形成这种格局的逻辑的人就更少了。”^[21]

有一个交战国——俄国未能建立起实行战时计划化的满意机构。考察它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计划化确实有一个格局的问题。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内，俄国的枪炮和弹药就严重短缺，而且工业潜力（尽管有战前的巨大跃进）不足以供应当前的军事需要。到1916年冬，经济解体已达到严重程度。在这一年里，尽管战争的需要增加，钢铁产量却比1914年下降16%，煤下降10%。没有制定劳动力政策，而且由于把俄罗斯人口的37%送进军队，严重损害了原来已感不足的工业生产力。粮食状况是灾难性的。尽管1916年政府采取了管制粮食贸易的措施，而且在1917年3月，新政权又宣布粮食贸易由国家垄断，但粮荒还是很严重，特别在城镇地区是如此，因而产生了严重的政治不满情绪。到1917年，很明显的是，中央采取的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如果没有一种革命的动力加以推动，都将归于无效。协约国实行计划化的努力，首先依靠协商同意，而在俄国的革命形势下，计划化则只能依靠暴力。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为应付长期的紧急状态和内战所产生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在战后年代实行计划化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战时计划化还有另一种形式，在当时是重要的，回顾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协约国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以代替战前年代的多边贸易市场体制。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在伦敦设立了国际粮食委员会，以保证对粮食供应实行有秩序的分配，而不是进行竞争性的抢夺。后来的发展包括建立了两大类商品组织，一类属粮食委员会，另一类属军需委员会管辖。此外，还有协约国海运委员会，其目的是在航运联营及调配方面实施联合王国早已采用的那些原则。这个委员会成了协约国的经济战机器的中心。然而，这样的国际计划化并不侵犯各国政府各自的特殊职责。“这个国际机器不是以授给的权力为基础的外部组织，它是由许多国家组织结合在一起，共同从事国际性的工作，而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工具。”^[22]当战争结束时，在对各种管制的大破坏中，这个机器被摧毁，所剩下的就只有各国各自的国家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取消战时计划化的企业界要求的影响。用1918年12月法国《政府公报》的话来说，就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重新建立商业交易的自由”。

1918年以后这种压力的结果，产生了一场全面的反计划化运动。联合王国和德国的情况是，两国政府在战时都曾占领了经济的制高点，尽管当它们管制生产时并没有企图继续限制利润。战争结束后，

促成创建管理体制的集体目标消失了。短暂的战后繁荣延续到1920年为止，继之而来的急剧的萧条引起了一些惯例性的反应。繁荣“激起了对新的欢闹生活的如饥似渴的欲望”^[23]，萧条又彻底摧毁了团结一致的局面，使劳资冲突表面化，把战时规划的一切遗迹化为乌有。有些管制办法只是失效后没有展期；另外一些则是被有意废弃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米尔纳勋爵写道：“在战争期间，不仅仅是建设部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做出了真正有益的工作来制定恢复和平时期活动的计划，以便使这些活动根据比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了的更好的路线进行。在战争结束时开始的混乱的抢夺中，所有这些计划都被放弃了。”^[24]在国际方面，经济力量大为加强了美国，在幕后对取消协约国共同管制原料的运动，施展了它的全部影响。赫伯特·胡佛写道：“本政府将不同意在和平恢复后实施任何即便从表面看来像是协约国共同管制我国资源的计划。”^[25]结果，不仅设在英国的“煤炭管制部”和设在法国的“国际财团”等机构撤销了，连“协约国海运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拆散了。国际机构的撤销使世界重建工作更加困难。战争造成的许多情况，并不随着敌对行动的终止而告终，共同的混乱仍需要共同做出努力。当时却没有做，这就使以后六七年的许多问题更加突出。

如果说计划化的机构被突然地和决定性地搞垮了，但它并不是消失而不留痕迹的。在许多政府里——而且在所有的反对派中——都有一些人或一些集团赞成继续实行经济管制。在德国，默伦多夫关于继续实行计划化的计划是夭折了，但是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各级工人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最上层是“国家经济委员会”。虽然这个委员会从1920年组成以后只是在临时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但它所反映的思想在德国一直是很重要的。^[26]魏玛共和国中期的杰出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以前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业组织的首席官员。在法国，为把战时机构改用于和平时期的目标做了某些尝试，20年代在石油之类的工业中建立了私人资本和政府资本合伙的所谓“混合企业”（法国石油公司），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银行，即“国家信贷银行”，以处理赔款支付和建设拨款，这家银行被授予官方的权力，可以对经营进行干预。^[27]1924年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为工业家、工人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协商提供了讲坛，并在1926年和1929年制定了发展“国有设备”的计划。^[28]

战时经验还留下另一种遗产。当人们看清1918年后的世界与1914年前的世界迥然不同时，有些战时的说法，作为比喻重新出现，并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计划化“运动”中被运用。在苏联——俄国的战时混乱状态所产生的巨大的副产品——继续存在着工农业“战线”、生产“战斗”、集体农庄的“队长”和工厂的工人“突击手”。在法西斯意大利，1925年宣布进行一场“粮食战斗”，“把意大利人民从外国面包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1934年宣布进行一场类似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战斗；“劳动阵线”正在用一个“类似军人的核心”的劳动组织来代替工会，并且赞扬强迫性劳动服务的优点。所有这些做法都力图重新创造那种促成战时计划化的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利益：有些的确是准备新的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对上次战争的回忆和对下次战争的考虑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发展计划化的影响，远远超出战时设施的偶然延续，或战时的说法作为比喻的重新出现。尽管1925年至1929年间多边贸易有了明显的恢复，但战后世界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其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历史学家可能仍然在争论战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应对后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发生的一切震动和混乱负责，特别要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分水岭、1929—1932年的大萧条负责。然而在1918年至1925年之间，欧洲内部由于战争造成的耗费，人力物力的紊乱，欧洲以外的经济力量和地域力量的变化，欧洲内部和外部心理的和政治的转变，战争及和约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的令人不安的财政后果，全部变得很明显了。甚至在1925年至1939年之间，当战前体制的某些方面似乎已经“恢复”了的时候，也还有一些倾向直接导致1929年和1931年的情况。虽然战争的影响不容易同当时一些变化——例如，人口或技术的变化——的影响分开，但是，至少战争的某些直接后果是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的。而且，用一个钟摆做类比，可以更全面地看出，战争造成的混乱使经济体制受到那样剧烈的震动，以致带来多次大动荡，其中最大的动荡是大萧条，而且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一直延续着。^[29]

战争造成的损失和资源的紊乱是从人力开始的。据计算，欧洲（俄国除外）由于战争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损失了2000万到2200万人，占欧洲总人口的7%，俄国损失了大约28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

18%。^[30]在1880年至1913年之间，欧洲人口每年增长230万；而在1913年至1920年之间，总人口实际上减少了200万。就在这7年间，欧洲的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3%，而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却增长了22%。^[31]欧洲的国民收入也受到损失，三个大工业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法国——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在20年代中期还低于1913年。工业中的失业是经济的一个经常性的特点，即使当企业复苏时也是如此。1924—1928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生产低于1913年，而1913—1925年大洋洲和亚洲的粮食和原料产量增加了20%，美国和加拿大增加了25%，拉丁美洲和非洲增长更大，在20年代中期，美国和加拿大的谷物生产比1900—1913年的年平均产量高16%—17%。与此同时，新的原料，例如石油，向欧洲的旧原料，例如煤，提出了挑战。原油产量从1910年的3.27亿桶增加到1920年的6.88亿桶和1930年的14.11亿桶。而且直到20年代后期，联合王国每人每班的煤产量才达到战前的数字。^[32]总之，纯粹从经济的角度估计，由于战争的结果，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8年。从1881年到1913年期间，欧洲制造业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3%。如果战争期间维持了这种增长率，1928年的产量水平本来应该是在1921年达到的。^[33]

资源的紊乱反映在欧洲经济体制的很多方面——例如，在运输方面，反映在欧洲铁路系统的遭到破坏和战时造船工业的过分发展上，后者导致了严重的战后萧条，也反映在钢铁生产力过剩上。特别是联合王国，从它的经济格局紊乱上所遭受的损失，就像俄国以及西欧的法国和比利时从直接破坏上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样。到1918年，联合王国向海外出口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仅为1913年时所占比例的一半。在整个20年代，英国主要工业的停滞，引起了企业家和政府的严重关注，而从新的工业中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在与国际贸易联系紧密的19世纪主要工业之一的纺织业中，日本甚至成功地打入了英国的国内市场。欧洲经济格局内部还有其他种类的紊乱或变化，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强有力的、巨大的经济单位被打碎了，民族国家的数目大为增加。1914年前，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口加在一起大大地超过美国，而在1919年后，29个欧洲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的人口超过4000万，有10个国家的人口少于500万。在市场力量要求持续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政治力量则在再次强调主权和国界的重要性。1913年，奥匈帝国对10种德国制成品的关税税率为16%—25%。而到1927年，匈牙利的税率提高到34%—54%，1931年更高达42%—61%。再往东去，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在1919年后很快地筑起高关税壁垒，部分原因是为了增加税收。

在20年代，比资源紊乱、关税或重划疆界甚至更扰乱人心的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国际债权债务平衡关系的改变。国内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战前水平的1倍至20倍——是一种由于战时预算赤字所引起的普遍现象，首先是在中欧和东欧，然后是在德国，到处蔓延。德国的崩溃特别严重。1920年，250德国马克相当于1英镑——1914年是20马克——而在1921年最后几个月里是1000马克。1922年上升到35000马克，而到1923年秋初，马克变成了废纸。存款化为乌有，社会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扰乱——通货膨胀对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扰乱，犹如失业对工人的扰乱一样——因此必须对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重新进行审查。赔款是为“战争罪”而支付的款项，是协约国作为和约的一部分而加以坚持的。德国的财政崩溃不是由于要求它支付赔款造成，而是由于故意放弃财政义务而造成的。然而，这种崩溃的结果是，赔款和战债之间以及协约国和美国之间的不稳定的关系，必须重新予以估价。

在战争结束时，所有的欧洲协约国都欠了美国的债，而除美国以外的所有的协约国又都欠了联合王国的债。事实证明，1919年联合王国为取消战债所做的努力和3年以后国际上为减轻债务负担所做的努力，被证明是美国和法国所不能接受的；而战债与赔款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拒绝承认这种关系）直到30年代仍然是国际财政会议的主要争论问题。

官方的借款和由此而来的交易，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尽管是很大的一部分。在表面现象下面，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国际债务债权关系甚至发生了更根本的变化。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下降了15%，而且尽管在为恢复战前地位进行了艰难的斗争以后，到1929年海外投资又上升到超过了1914年的水平，但在许多当时人看来，投资的范围缩小了，大到危险程度的一部分长期信贷，是用从海外吸引到伦敦来的敏感的短期资金支付的。伦敦城对国际金融的兴趣仍然比对英国工业的兴趣高，但在国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远远不如1914年以前。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的国外投资从1913年的大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150亿美元，其中30%投放在欧洲。这个比例可能是太高了；

投到“不发达”地区的运输或生产企业上的外国资本比1914年前少得多。

就欧洲本身而言，同样严重的是，对美国的依赖已经成为体制的靠山，正如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便不可能复兴欧洲——当时美国救济协会提供了价值2.91亿英镑的粮食，其中只有29%用现金支付——一样，在1923年以后，如果没有美国的贷款，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支付赔款或战债。德国按照1923年4月的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结束了德国的财政危机）所偿付的赔款是用的美国贷款，而在执行这一计划期间，德国的纯资本输入比德国所要偿付的赔款额多1倍至2倍。与此同时，协约国用德国偿付的有限的赔款，来偿还他们每年应偿还美国的战债。凯恩斯在1926年写道：“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欠债，主要是在纸面上，而不是用物资来清算的。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同样数值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它送回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转手——没有人失去一个便士。”^[34]

这一循环过程的继续存在，依靠美国的资金，而且，尽管事实证明美国的贷款不如战前曾经维持世界体制的英国贷款那样稳定可靠，但是美国的经济在20年代中期似乎是强大的和能恢复活力的。当联合王国正在经历一个就业不足和工业失调的困难时期，美国却在蓬勃的繁荣中突飞猛进，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进展大大向前推进，特别是在一些有前途的新工业上，例如汽车、橡胶和电力。在1925年至1929年间，当国际贸易的数额增长了将近20%（由于价格下跌，实际价值仅增加5.5%），世界的食物和原料生产增加11%，制成品增加26%时，欧洲也分享了大部分繁荣。被乐观主义者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复苏的另外一些迹象有：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有效的国际经济援助；对战债和赔款的多少比较明智的态度和普遍的“恢复金本位”。1924年，瑞典是第一个恢复金本位的欧洲国家，但是对国际经济最重要的是一年以后联合王国的恢复金本位。（这个行动受到凯恩斯的激烈批评，他反对“恢复”，并寻求一种代替的方式，以保证建立在经营“战后半偶然性地成长起来的实际体制”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35]比利时于1927年，意大利于1928年相继恢复金本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芬兰、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他们不是用持有黄金的方式来支持他们的货币，而是以保有对金本位国家的通货、银行存款私有价证券的提取权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

下，金本位从来没有完全以正统的金融家所希望的那种传统方式运转，或者以他们所声称的1914年以前曾经运转过的那种传统方式运转，“普通人”也不像1914年以前那样经常提出兑换硬币形式的黄金。这种制度开始显得可疑了。在“完全的”金本位国家里发生的任何严重的紧张状态似乎都扰乱了金汇兑本位各国。大多数国家的黄金储备与债务相比都太少。联合王国已不再处于以少数黄金储备“支配国际体制”的地位，而法国，1926年把法郎的价值定在一个无疑会打乱国际贸易竞争态势的水平上，却积累了超过需要的黄金。

在1925年至1929年之间，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很容易遭到忽视，因为当一批统计数字经常出现（是某些国家的国家保险的一种副产品）使失业现象的存在不容忽视时，它往往被认为是这个体制必然的特征。大多数人看不到“先进的”和“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整个20年代，粮食和原料的世界价格与制成品的价格相比仍然很低，然而生产继续增长，导致积累了大量库存。例如，世界的小麦库存在1925—1929年的4个“好年景”里从大约900万吨增加到2000万吨以上。其他的国际商品，例如在热带国家里以低工资劳动生产出来的主要作物食糖或咖啡，给生产这些作物的大量劳动者带来极不稳定的生活。由生产者组成的垄断性协会在20年代——后来在30年代——对自由商品市场的运转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他们试图不用降低产量而用抽掉或销毁库存的方法保持加拿大小麦或巴西咖啡的价格；可是当他们试图阻止个人收入的下降（往往是徒劳的）时，仍然常常得到他们的担心外贸收入减少的政府的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管制橡胶价格的史蒂文森计划，这个计划在马来西亚的英国橡胶种植者协会已经决定用限制产量的方法应付价格下跌的两年之后，在英国政府已经下令进行一次官方调查的一年以后，于1922年实行，这个计划于1928年撤销，6年以后由一项把荷兰帝国也包括在内的政府间的计划所代替。

无论在殖民地社会或在独立国的社会里，种植业工人对自由市场的运转所表示的不满不像企业界的抱怨那样经常地为人们所听到。的确，这种不满不像“先进的”国家里的消费者的抱怨那样经常地为人们所听到，消费者的抱怨是，每当庄稼被毁时，就出现了“富裕中的贫困”这种社会怪事。然而，事实是，只要土地的使用和耕作方式以及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种植业工人就注定是贫困的。

“当统计学家玩弄食糖定额的数字时”——人们回顾以往的情况指

出，而且这适用于食糖以外的许多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当各国政府玩弄甜菜补助金时，食糖市场失调的真正损失，要用从事这项工业的殖民地工人所遭受的痛苦来衡量”^[36]。在初级产品生产国和在“先进的”国家里一样，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初级产品生产者越是积极，收入越少，无力购买制成品，而“先进的”国家里的低收入消费者（其中有些是失业者），无法将他们的需要变成有效的需求。很多制成品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而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广大市场而生产的。这一事实就像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投资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或社会状况一样，回顾起来至少是表明没有抓住机会和没有尽到责任。

这些问题的性质之所以在当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认识，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重要原因，尽管大多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通过获得比较低廉的粮食和原料的进口，至少能够维持相对强大的国际经济地位，尽管有失业，雇用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却增加了。这些事实使得人们比较容易忽视一般的经济景况和责任。实际上，对这些国际经济问题的谈论比对赔款和战债问题的谈论要少得多。

1929—1933年之间美国经济的崩溃，以及随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的崩溃，在它们内部造成了许多偏见。1925—1929年的乐观主义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行情暴跌而突然消散，这种暴跌达到了一系列狂热的顶点：10月24日，“不祥的星期四”；10月29日，“纽约股票市场史上最凄惨的一天”，而且可能是“所有的市场史上最凄惨的一天”，^[37]当时《泰晤士报》上的工业指数下降了43点；而且在11月11日、12日、13日三天中，指数又下降了50点。在如此戏剧性的开端以后，继之而来的是持续的“大萧条”。从欧洲撤回美国资金，不仅意味着抽走信用贷款，而且意味着欧洲银行必须用黄金偿付债务。这就带来了力量中心和组织方法的失灵。崩溃是全面的，影响到人、金钱和物资。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和在世界上其他经济依赖国，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物价、产量和贸易急剧下降；失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惊人水平；国际财政债务遭到拒付；而且在大多数国家里，政策主要关心的是使国家经济不受世界范围的不景气的影响。在崩溃的最初几个月内，难以理解的是，就在不久以前，乐观主义者还曾经相信，“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朝着以前认为不可能的繁荣水平前进”^[38]，有时还预言繁荣将是永久的。

继1929年美国的崩溃而来的，不仅是美国有一段持续的困难时期，而且在不到两年以后发生了欧洲的金融崩溃。短期资金（“热钱”）大量扰乱性的流动，对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产生了危险的压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投机，资本从需要它的国家转移到不能利用它的国家。1931年3月，奥地利的信贷机构只是由于获得了国际结算银行和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些外国银行的贷款才得救。这一年早些时候，危机来到了德国。这个国家从1928年以后一直存在着财政上的和政治上的困难，尽管代替道威斯计划的1929年的杨格计划慷慨地重新规定和减少了赔款的支付。即使在美国的胡佛总统于6月21日建议赔款和战债延期偿付一年以后，德国国家银行在6月和7月仍然处于极端危险的状况。为了拯救德国免于金融崩溃而进行的国际活动，使危机转向联合王国，在那里，黄金以每天250万英镑的速度外流，黄金储备低到了危急的程度。1931年8月工党政府垮台，由“国民”内阁代替，暂时制止了这种外流，但是到9月末时，在两个月内已经丧失了价值2亿英镑的黄金。9月21日，英国暂停实行金本位制，这是一个放弃金本位的普遍运动的前奏。到1932年4月，已有23个国家效法英国，而且在另外17个国家里，金本位实际上已经失效。在20年代期间小心谨慎地和引为骄傲地重建起来的货币体制已被摧毁了。

然而，对黄金的命运所抱的成见并不是事情最严重的部分。价格的下跌才是灾难性的。在美国30年代的病态经济中，劳工局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3年3月的63。而在联合王国，那里的经济即使在20年代时也不是健康的，商务部的指数在上述期间从100下降到72。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的收入所依赖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甚至更剧。1933年1月，以黄金计算的橡胶价格仅为1929年1月的13%，羊毛为22%，丝为28%，铜为29%，棉花为34%，大米和咖啡为41%，小麦为42%，食糖为50%。虽然矿物产量减少了，农产品的产量却没有下降。但是，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了严重的贫困和国际贸易的猛烈收缩。在1929年至1932年第三季度期间，国际贸易的价值减少了65%以上，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下降到不足30%。在所有的主要工业国里，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增多，出口减少。以1929年为100，美国1932年的生产为54，德国为53，法国为69，英国为84。但是英国在1932年的出口仅为1929年的63%，美国的出口为53%，法国和德国的出口各为59%。[\[39\]](#)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求助于许多权宜之计和临时措施，其中有些是根据这样一句简单的格言：“各自求生”。另外一些则是根据一句同样简单的格言：“以邻为壑”。联合王国于1932年放弃了自由贸易和金本位：根据进口税法，普遍征收10%的关税，对某些制成品实行的保护性关税高达33.3%，一年以后，在渥太华试图组织一个帝国“集团”，主要作用是提高从外部向英帝国进口的商品的关税。对很多国家来说，传统的经济手段，例如关税，似乎很不够了，于是采用了进口限额，控制国内生产的产品的销售，规定价格和调节资本的投放和分配。这种影响市场活动的有意识的干预，尽管在起初是临时性的，却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长期的特点。

采取哪种手段为宜，就像这些手段能起的作用那样，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取决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德国，1932年失业人数增加到将近600万，政治形势朝着对国家社会党人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社会党人在紧张和暴力的气氛中许诺要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国家自给自足，这种许诺肯定不是根据周密思考的计划做出的。在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国家里，企业界力量强大，政府机构的目的是保护工业资本和利润：1932年试图在现在称为比荷卢经济联盟的地区组织一个低关税地带（只是由于英国的反对未能实现）。在东欧和南欧的“绿色国际”国家里，就像欧洲以外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一样，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而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那里在政治上迫切要求实行老的论点：农业构成经济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必须最慎重地注意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然而，正如英国阻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之间的协议一样，德国和意大利（在1931—1932年）阻拦关于组织一个多瑙河关税联盟的计划，而这一次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在欧洲国家中，只有瑞典在社会民主党人于1932年（与农民党联合）执政后，才有足够的胆量依靠不平衡的预算和以借债兴建的公共工程来达到“一种肯定无疑是膨胀主义的心理状态”^[40]。然而，在所有的欧洲工业国里，经济萧条的全部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得到了“缓和”：即由于进口价格的猛烈下降，这些国家可以把它们的初级产品的进口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联合王国作为最大的进口国得益最多。有工作的人在1932年的平均实际收入几乎与1929年相等。即使把增加的失业人数包括在内，平均收入也只低10%。^[41]

美国的工业建设资金从1929年的9.49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7400万美元，在那些困难年代没有对国际复兴做出有效的贡献。即使在没有得到批准的1932年7月洛桑会议实际上取消了赔款要求以后，美国人不仅仍然死抓住战债不放，而且还在国际贸易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

[\[42\]](#)在经济萧条开始以后，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法案提高了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所规定的本已很高的保护税率。这一行动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引起了一系列报复性措施。大通国民银行董事长在1930年写道：“外部世界欠我们的债，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我们用这些绳索把他们拖向我们这边。我们的种种贸易限制是紧紧顶着他们身体的草叉，我们用这些草叉把他们同我们隔开。”[\[43\]](#)这样一些矛盾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强有力的地方企业压力的产物。

与此同时，美国的农民和工人受大萧条的打击特别严重，这一事实使得美国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有很多没有受到企业界压力影响的美国经济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1933年发现“赞扬旧的放任自由的国际主义……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44\]](#)。1933年4月，这种立场的实质无情地显露了出来，就在新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世界发出了一封强调需要国际经济合作的激动人心的信件后，美国政府却在一个由国际联盟发起的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自1929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处理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正在伦敦召开的时刻宣布放弃金本位，把美元贬值41%。贬值被认为是提高美国国内价格水平和增加农场收入的一种手段。罗斯福高兴地说，“所谓国际银行家的旧迷信”，“正在为对国家通货实行计划的努力所代替”[\[45\]](#)。然而，由于贬值实际上是在美国已有贸易顺差，并正在进口黄金的时候，把美国的关税提高60%和给美国的出口货物提供40%的补助金，因而它起了进一步加剧国际不平衡的作用。在这颗“炸弹”之后，难怪世界经济会议既没有就与通货直接有关的问题，也没有就关于增加国际贸易额的建议达成协议。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就是进一步扩大或加强了对有关小麦、橡胶、食糖、茶叶、锡和铜之类产品的限制性的国际商品管制。[\[46\]](#)

然而，无论美国的政策怎样无助于国际复兴，对它的全面作用必须做两点保留。第一，绝不能肯定换一种美国政策就会使世界经济会议获得成功。到处都有要求国家采取独立行动的强大压力，而且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矛盾，即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与银行家和正统经济学家

所表示的让“金本位仍然成为最好的实用的货币制度”的虔诚愿望之间的矛盾。^[47]第二，罗斯福总统显然厌恶自由放任主义、紧缩通货和为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莫测而调整货币政策，这在欧洲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反响。例如，凯恩斯把罗斯福的行动说成是“非常正确的”。罗斯福在他的国家采取的力求适应“危机”情况的各种强有力的行动，被看作决心的胜利。当他当选执政时，失业人数超过1300万，他向他的人民提出的对付失业和其他经济的和社会的挑战的“新政”，结束了一个曾被称为“中止活跃”的时期。^[48]尽管新政在理论上或目标上都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内容，而且它显示出许多互相矛盾的倾向，但它在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就像一些有关的美国“计划”一样，例如1933年以恢复美国拓荒者的精神和梦想的名义，作为一种扩大计划化的富于想象力的尝试而实行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建设计划，就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新政的第一个目标是把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挽救出来，第二个是扩大社会正义的概念，第三个是平衡经济体制。这些目标——不仅他的敌手而且他的有些朋友都认为这些目标是互不相容的——中，没有一个有任何长期的、全面的计划，但是它们全都意味着增加政府的干预。无疑的是，到1938年时陷于停顿状态的美国的“实验”，在总统的各个顾问小组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和面临企业界越来越大的抵制的情况下，既在美国，也在欧洲，激发了对各种计划化问题的巨大兴趣。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可能要问：“广泛的失业所带来的痛苦，使得政府的干预成为不可避免，这种干预是否已经创造了一种半自由半严格控制，不能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转的混合社会”^[49]，但是在欧洲，人们广泛地认为，罗斯福“为重建和复兴所做的努力，肯定是改良的资本主义的杰出范例，正如俄国的五年计划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杰出范例一样”。^[50]

当美国赢得这种声誉时，瑞典被称为30年代的“经济奇迹”^[51]，而新西兰在工党于1938年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以后，尽管有国际上的复杂情况，仍然有意识地把自己变为一个“福利国家”^[52]。实际上，这就使一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能够在1934年（不动感情地）写道：“我们现在也许还不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确实（几乎）都是计划者。”^[53]回顾起来，即使从美国、瑞典和新西兰的经验来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是夸大的。经济上的计划化仍然远比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少得

多。尽管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是20世纪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里程碑之一，但人们并未普遍理解关于失业的经济学。当联合王国讨论“计划化”的时候，这种“计划化”往往只不过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管理”，通常是用毁掉过多的生产力和库存或用使价格“合理化”的方法，解决特定工业的特定问题。一个年轻的保守党政治家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38年写道，“计划化是强加于我们的”，他在其他场合则夸夸其谈地把“一个有机的社会的概念”说成是与“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抗衡的力量^[54]，“不是由于理想主义的原因，而是由于当市场自然地 and 自发地扩大时，曾为我们服务的旧机构在形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已经不再适合了”^[55]。例如，1934年英国钢铁联合会的建立，就是保护主义联盟的一个例子和“一项相当大的改组措施”^[56]，这种改组措施根本没有全面的甚至有限的经济计划。1933年的农业销售法案规定对牛奶、马铃薯和酒花等商品要制订销售计划，其精神是相同的。^[57]

对联合王国说来是正确的东西，对其他国家说来也是正确的。意大利的法西斯经济学家能够把“社团主义”说成能对劳动和资本的分配以及生产制度事先加以规划的一种新秩序，但是直到1936年和1937年墨索里尼才强调对工业加强国家干预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且迟至1938年，仍然很少通过各“社团”的行动来取得国民经济的协调。在法国，经济政策建立在对进口的定量限制上，正像在罗马尼亚那样的小国一样，那里实行限额的货物种类从1932年11月的120种增加到1933年7月的500种（占罗马尼亚全部进口的50%）。在意大利和法国（正如在美国一样），1937年的工业生产仍然比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要低。

只有在瑞典，由于思斯特·韦福斯是一位杰出的财政大臣，又由于那里的经济学家是直接为政府服务的，因而政府有一套对付通货紧缩危险的成熟的方法。然而，即使在那里，外部力量也影响恢复的方式，而被认为是反周期性起伏的赤字预算，也没能消灭失业。似乎矛盾的是，韦福斯的许多想法是从联合王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那里吸取来的^[58]，英国在1933—1937年的明显的经济“恢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得力于官方的这些想法，而是得力于贬值（1931年那样勉强地实行的）、“合理化”、保护贸易和低利贷款的“非理论性”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恢复是对20年代的停滞的补偿：过迟的新投资弥补了20年代严重的投资不足，特别是在建筑业方面。这

是一种“勉强对付过去”的恢复，与“计划化”无关。在美国，罗斯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是一个理论家，尽管他的顾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家鼓吹各种不同的计划。在制定国际政策方面，只有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比如说，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公共工程政策，给了“膨胀主义”以某种一贯的、即使是有限的理论支持。

在大萧条开始时，和30年代末期出现恢复的那几年一样，唯一实施的全面计划化方案是苏联的方案，那里的产量在30年代期间迅速增长。然而，由于1917年的革命和20年代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结果，苏联实际上从国际经济舞台上消失，在萧条时期仍然与世界经济绝缘。对它的计划化程序的了解，远不如对它的领袖们所使用的口号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即使在苏联国内也从来没有对计划化程序做过很清晰的说明。

尽管在革命开始时，关于计划化的机构还有待思考和建立，苏维埃计划化制度在托洛茨基的把目的和计划纳入社会的基础这句话中就已开始了（见第十五章）。列宁在十月革命发生后6个月时写道：“这些东西还没有写进布尔什维克的书本，即使在孟什维克的书本里也一点都没有。”^[59]苏联的计划化机构，正如战时经济组织的情况那样，是国家紧急状态的产物。对它的采用最初是试验性的、犹豫的；后来，由于先是在紧急状态下，接着又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转变时期，经济管理获得了实际经验而使它得到了改进。最高国民经济会议这个早在1917年2月建立并且一直延续到1932年1月的机构内部，经过了不断的适应和改组。像把中央“指挥”经济同地方对国有化生产的主要单位“托拉斯”的管理工作联系起来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也是通过反复试验来解决的。没有事先存在的关于计划的概念。1929年一份官方的报告说：“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摸索着前进，而且，只要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要求创造性活动完美无误是不可能的。”^[60]

负责制定和协调苏联各种计划的最重要的机构主要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它最初建立于1921年2月，是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然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最初的任务是制定一些多少带有抽象性质的“远景”规划，包括像工业的广泛电气化和谷物贸易的国有化这样一些总目标。列宁1921年写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电气化谈得太多了，而关于现行经济计划的议论却太少了。”^[61]直到192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才开始为整个苏联经济发布经济“控制数字”，

而且直到1931年，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来自各个工业部门的一系列数字才成为同下一年度总计划相联系的数字体系。同年设立的中央经济统计局有利于政府政策所要求的“物资需要”（包括投资额）的必要计算。在1932年撤销最高国家经济会议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协调权力大为加强，而且1935年和1938年的改革强调了它的“领导”作用。尽管经济管理工作由其他部门——各人民委员部，这些部从1932年的3个（重工业、轻工业和木材）增加到1939年的20个——负责，但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了它作为苏联计划化的中央总部的地位。

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苏维埃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把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广泛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不必依靠国内的私人资本家或海外的投资者。这种改造的历史可以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7年革命到1921年3月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着手夺取原有经济体制的制高点；第二个阶段是在所谓新经济政策（1922—1927年）的范围内完成恢复和重建的时期，目的在于增加流向市场的商品量，在必要时鼓励数量上有严格限制的个人企业；第三个阶段是在一些战略性的和有争议的决定之后的一个加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时期，由1928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是一个“远景规划”，但在实施以前，曾多次进行讨论和修订。它的主旨是高投资率，特别是在重工业和农业方面。在执行计划的头两年，没有遇到很大困难便达到了目标，但在1929年和1930年，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政府蓄意加快社会主义化步伐的结果，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农业方面，以有力的威逼手段推行强迫集体化。1927年，所有各种形式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中的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2%；到1930年3月初，这个数字上升到55%，而到1936年时达到90%。^[62]强迫似乎是解决政府的严重农业问题的唯一方法，这些问题在20年代曾显得很难解决。强迫还是使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唯一方法。因此，农业的被纳入（而且即使当时是不完全地纳入）总的计划化体制，是以数量众多的个人和以整个农民阶级遭受巨大的眼前苦难为代价才做到的。

1929年至1931年这一时期标志着国家最后夺取了整个经济系统，与农业的变化相应的是工会的改组，旧的领导人被解职，工厂纪律加强了，工会变成了有利于实现计划而提高生产率的半政府机构。还进行了重要的财政和信贷改革，包括1931年实行周转税，1932年建立专

业化的投资银行，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发放短期贷款的垄断权力。这些做法也都有相同的目标：实现计划。这个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堡垒。”

在“艰难的岁月”里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下了模式，随后是1933年到193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着重于实际的进展和巩固，而不是巨大的跃进（见下文第十五章）。执行这一计划时的经济气氛似乎是有利的。到1935年，取消配给制被认为是稳妥的。也是在那一年，集体农庄章程（一直执行到1957年没有多大改动）结束了与“自上而下的革命”相联系的农村混乱时期。随后的农业产量的增长，伴之以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是靠了劳动力比较充足才做到的。新的工厂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开始使国民生产有了巨大的增加。1937年，工业总产量中的4/5来自新建的或1928年以后改建的工厂，仅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斯大林斯克两个冶金工厂的生产能力，就相当于1914年前整个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

苏联经济体系的规模使它能比一个更多依赖进口供应的国家较少注意对外贸易。在品种极其繁多的农业和非农业物资的基础上，苏联能够建立和经营许多工厂，生产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大量制成品。自1918年以后，国际贸易由国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垄断。这种垄断使政府能够将卢布保持一种以外币表示的人为价值，并坚持实行极其严格的进口计划。从1929年到1932年那些严厉的岁月里，几乎90%的进口货是用于工业的商品。专门从事进口或出口特定商品的各贸易公司，严格按照计划的范围进行活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把重要的进口需要和可供出口的剩余的数字通知它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出口限于“国民经济的剩余产品”，而进口限于能以这些剩余产品支付的物品。事实上，1938年，整个对外贸易的价值仅为1913年水平的24%（尽管在最高峰的一年1930年曾高达73%）。苏维埃计划化就这样尽可能地独立于世界经济活动之外。它甚至能直接对抗这些活动，如在大萧条期间，它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外倾销出口货。它也能用贸易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以长期的外国合同和协议作为有用的政治筹码。

虽然在30年代末期，备战工作打乱甚至破坏了苏联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撇开军工部门的发展，苏联的整个计划化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期间，也是“一种独特的战时经济”。

[\[63\]](#)把一切努力全部集中在由政治当局决定的主要目标上的做法——“运动式的计划化”——与唤起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的做法结合在一起，使市场“政治化”并无视价格—成本准则的，不仅仅是对外贸易。“价格机构很少被用来从事资源的分配，只不过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将碰巧能够到手的東西分配给公民。”[\[64\]](#)一般地说，在“领导者的思想过程中”，合理的经济计算被置于次要地位，而始终强调把整个计划看成是基本的“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是对经济的有意识的指导。莫洛托夫在1939年宣称：“计划化并不仅仅是与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无关的表格和数字的堆积。”[\[65\]](#)完成计划是一种实际的任务，一种政治的和行政的任务。有意义的是，在1928年至1954年期间，苏联没有出版过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66\]](#)

不论这种情况有怎样的缺点——这些缺点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受到苏联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苏联的计划化，连同它的一切失误、浪费和强迫，无疑地在当时和以后不仅对“先进国家”中遭受长期性失业之苦的各集团，而且对急于获得经济发展的“落后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作为苏联发展基础的经济的“军事”性和“战略”意义，本身就具有积极的吸引力。它的大胆想象也是如此。1939年以前，土耳其的五年计划和墨西哥的六年计划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的非共产主义邻邦波兰的某些经济政策也是如此。然而，从1945年以来，这种影响在共产主义国家（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除中国以外，都比苏联小，自然条件也比苏联差）里是明显而直接的，而且在很多论述“发展”的非共产主义著作家中，至少有一些人已经承认，苏联的经济发展“道路”是普遍适用的。正如战争一样，“（发展）过程要求打破一个接一个严重的障碍”。边际计算不如部门计划化那样重要，对于妨碍部门计划化的人或集团，就必须摧毁他们进行抑制或抵制的力量。“正像贫穷的和停滞的经济实行计划化发展那样，总体战包括一些明显的断续的结构变化和不考虑市场的资源分配。”[\[67\]](#)然而，这仅仅是分析的一部分。关于苏联的计划化的争论仍在继续，而且1945年以后的其他一些计划——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计划——的经验，影响着苏联国内的辩论。

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的计划化和苏联的计划化不同，它承认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个结构内，政府对人力和生产、分配和金融、消费和投资以及外汇和贸易，实行强有力的控制。

政府通过所谓“经济管制”来领导私人企业，其目标是指挥经济机器为政治目的服务，而在形势需要时，最终为战争需要服务。然而，直到1942年为止，德国没有完全的“战时经济”。从1935年以后作为国家支出一部分的战备支出经常增长，使得德国能够进行“闪击战”，但是经不住对像美国这样在发展军需生产方面比较全面的大国进行的持久战。据估计，1933年至1938年期间全部投资的一半是用在军事设施和基本工业之外。^[68]实际上，德国经济政策的准则究竟是什么，正像应该作为这种准则的基础的理论究竟是什么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模糊的。一位评论家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考虑怎样方便就怎样决定，并且为了人民的福利，不抱任何偏见地把所有被认为必要的手段用于每一个特定的情况。”^[69]“福利”一词是有伸缩性的，包括大炮和黄油^[70]，即使当政府政策的效果是通过限制工资收入者和企业主两者的自由以控制通货膨胀时也是如此。工资限额伴随着对股票持有者分配股息的严格限制——这是一种国民收入政策；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调节着收支平衡；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组织和宣传强调，在所有经济组织中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一份。1937年，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写道：“私人企业已成为公有的托拉斯，就所有实际目标而言，国家已成为每一个德国企业的合伙人。”

当国社党人在1933年接管政权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存在他们后来所采取的政策中的两个必要成分：一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结构，它早已受到20年代“合理化”宣传的影响；另一个是外汇管制，最初是在1931年7月为了制止资本外逃而实行的，它已成为实行更广泛的经济管理的出发点。他们没有多少经济创新，也没有一致同意的支持创新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党内一部分人反对一切经济计算，认为那是对德意志失败的一种辩解——但是他们有决心使经济体制适合他们的目的。大量失业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当前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形式是许诺人人有工作：对国家自给自足的梦想，或者至少是对大大减轻德国在诸如铁、石油、橡胶之类的原料上对海外国家的严重依赖（只有煤在国内有充足的供应）的梦想，把可能采取的技术政策同贸易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德国工商业已经存在的高度发展的协作，他们是很难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体制结构的。企业主协会中央委员会早已于1920年建立。它的最重要的成员德国工业全国联合会，是在1919年由两个分别

在1876年和1895年先后成立的较老的组织合并成的。联合会的影响和范围很广泛，在德国最强有力的工业家领导之下，它的组织是复杂的，是以按地区和行业建立的双重单位为基础的。1932年，属于它的团体有29个工业组织和50个地区组织，占德国工业企业的约80%。^[71]它能对制定国家政策起相当大的影响。国社党政府在建立全国经济联合会和工商业公会合作委员会时，最初认为它的任务只限于“使德国工商业管理的广阔领域中的现存组织同当前的国家政权相协调”^[72]。国社党的立法，特别是1934年2月制定的德国工业组织体制法规定，所有企业主都必须参加“公会”及其所属团体，实行“有领导的原则”，并且规定整个体系的指导原则是“永远不采取违反帝国政府意愿的行动”^[73]。从1934年以后，大企业显然比小企业强大得多，而且加强卡特尔化和使卡特尔化更加广泛，就进一步促进了集中和控制。

政府本身也有自己的许多机构可供运用。1919年设立的经济部，是从魏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1933年7月任该部部长的库特·施密特做了一切努力以使企业界适应新秩序。^[74]在亚尔马尔·沙赫特任部长期间——从1934年8月直至1937年11月——这个部把控制扩大到德国金融业和商业，并被拖入关于为重新武装提供资金的激烈争论中。沙赫特本人放手试行了双边贸易政策，并且谋求增加企业的机会和利润，但是他害怕通货膨胀，并且是赤字财政的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对者。但是，在1938年以后，在瓦尔特·丰克领导下的经济部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影响。与此同时，由于重点从恢复转向了重新武装，在1936年业已设立了四年计划办公室，由戈林将军亲自控制，名义上拥有无限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增加合成材料的产量（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合成石油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多，但是仍然低于指标数字45%）和加强国社党对经济的控制。希特勒在1936年给戈林的一项反沙赫特的命令中清楚地说明了第一个目标：“原料的成本问题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宁可生产到时候能够拿到手的成本较高的轮胎，而不去购买理论上比较便宜但经济部拨不出外汇的轮胎。”希特勒把这种说法同对“资本制度”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并把戈林的任务同第二个目标联系起来评论说，如果工业家拒绝合作，“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将知道如何完成这一任务”。^[75]第二个目标的标志是建立在不伦瑞克平原上的赫尔曼·戈林钢铁厂，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看得见的

纪念碑，然而，尽管有这个钢铁厂和其他企业，德国1939年的钢产量只是由于攫取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才得以超过1929年。

最后一个政府机构，即军队本身，也自上至下建起了自己的经济部门：负责这个机构的官员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非常担心在1939年以前不能协调和扩大国民经济计划化，同时又缺少充分的统计上的或理论上的根据来支持他的这一看法：如果希特勒计划在经济上做好准备以前进行战争的话，那就将冒无法辩解的风险。^[76]托马斯抱怨说，他既没有被告知整个的物质需要，也没有被告知战略计划。他的这种抱怨已被近来一些历史学家用来证明这一说法：直到1942年为止，德国的军事经济只准备进行小规模的速度战，这种战争不会过分地打乱平民的生活水平或生活方式。实际上，“希特勒的基本政策是，战略不是经济计划者的事”，而且由于计划者只是收到由各种各样的要求者提出的关于人力和物资的扩大的要求，因而“不可能总结出一个关于需要的真实合理的全貌”^[77]。与此同时，德国各军火公司在1935年和1936年被提高到“国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它们的经理可以用半军人身份活动。^[78]

计划化的复杂机构远远没有产生一种有效的、组织良好的工业活动。回顾起来，比这种机构更重要的是关于减少失业的实验。1933年至1939年期间，德国人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大多数私人企业经济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的实行经济计划化的主要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也继承了过去的策略。1932年12月曾任命一个“创造就业机会专员”；在国社党开始掌权的前两天，一项“紧急计划”付诸实施，把大量公共开支用于建设道路、住宅、公用设置及内河航运，1933年5月，希特勒宣布了一个关于消灭失业的计划。相当大量的公共开支——不像美国的“新政”那样实行赤字预算，并因而征收新税——与私人投资的恢复结合在一起，使1933年至1936年期间总产量和就业有很大提高。1936年，失业人数减少到160万，接近大萧条前的数字，两年以后，减少到不足50万。^[79]

争取实现充分就业，是同管制劳动力和物价的广泛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对劳动力的管制从取消自由工会开始，它防止了工资收入者在卖方市场强求增加工资；物价管制被认为是必要的，与其说是为了“管理”经济，不如说是为了保证工人的忠诚和干劲。1934年1月颁布的国家劳动管理法和1934年10月法令，规定以“劳工阵线”取代原有

的工会组织，以“企业社团”和“企业条例”取代集体劳资谈判和罢工权利。劳工托管人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以管理整个劳动力市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些管制办法，才使政府限制工资的政策得以生效。在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之后，仍然保留了这些管制办法，而且还同延长工作日和指导劳动的措施联系在一起。就物价而言，早在1931年12月就已任命了一名帝国物价监督专员，但在1936年设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即帝国物价制定专员办公室。^[80]1936年11月的限价法令把物价限制在任意选定的1936年10月17日这一天的水平上，并全面禁止因需求增长而进一步提高价格。的确，某些集团的人士在谈论说，供求关系的规律已被废弃。实际上，物价制定专员拥有广泛的提价权力，而且可以宣称，当他提价时，造成提价原因的生产成本的提高，是由于进口货成本提高或代用品成本高昂。

实际上，所有德国的国内政策都取决于严格的外贸管制。对外汇实行管制和拒绝将马克贬值，曾是1933年以前的政策，1934年9月沙赫特的“新计划”，自然是继承了前任的工作，不过使用了更多的精力和谋略。任何涉及外汇外流的交易都必须领取许可证。所有来自国外的收入款项均须移交帝国银行，出口商还被迫向当局申报输往国外的货物的性质和价值，以便查核。进口额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股息最初是被削减，后来又限用出超偿付。在管理体制的范围内，贸易上的区别对待，连同对不同种类的贸易实行不同的汇率的做法，实际上被发展到了极限。只要可能，只从那些愿意用马克而不用自由兑换的通货来结算的国家进口货物。特定的马克比率，则按每个不同市场的结构来调整。在签订大批成交额和长期合同的双边协定的基础上，一个主要在东南欧的地区性集团建立了起来。

采取这些复杂的措施的结果，并没有使德国的出口有任何惊人的回升：实际上，出口与工业总产量之比，从1933年的22.5%，下降到1938年的13.1%。但在那一年，德国对外贸易额中只有大约1/5是需要外汇和获得外汇的。贸易方针是依据国家政策的利益来调节的：而在1938年的营业衰退中，不仅共产主义的苏联，而且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也同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了。

1936年至1939年期间，德国重新武装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欧洲任何其他大国——德国的这一比例从1933年的3.2%上升到1935年的5.5%，1938年的18.1%——但在大多数其他欧洲国

家，包括联合王国在内，增加了重整军备费用——在联合王国，它是随着建筑业的“繁荣”而来的——在30年代末期的经济恢复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1]虽然这些支出有助于工业原料的需求和新技术的发展，但它们无助于充分动员国内或国际的经济资源，包括人力在内。随着工业产量的增长，失业仍然很高，某些人士在谈论着，在“成熟的”经济中，增长（或如凯恩斯所称的“饱足”）不可避免地要愈来愈减少。而且，虽然在长时期的间隔之后，欧洲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相对的地位有所改善，使20年代的趋势有所扭转，但是世界贸易的恢复非常有限。^[82]甚至迟至1937年，世界贸易额才勉强同1929年相等，而且，所有为降低关税和限额以及为鼓励更大的贸易自由而做的官方努力，例如科德尔·赫尔自1934年^[83]和范泽兰自1938年以来所做的努力^[84]，都没有得到什么响应。进展中的工业产量与停滞的商业之间的对比仍然很鲜明。例如，在联合王国，1929年至1937年间工业产量增长了24%，而与此同时，出口额却降低了不下16%。

在30年代期间，世界贸易的构成和国际收支的格局都起了变化。在1937年，粮食贸易总量大约比1929年的水平低7%，制成品的贸易总量低14%，而原料的贸易总量则高12%。这种方向不同的变动是与相对价格的相反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国家在跟初级产品供应国进行贸易时继续享有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继续从“不发达”国家的无力提高它们的收入或使它们的经济多样化这种情况中获得利益。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上和在生活水平以及使用制成品的能力上，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85]尽管仍然很少有迹象说明这种情况引起了明显而有效的反应，但是人们正在开始认识到，如果在较穷的社会里提出了实行“计划化”的要求，那么它采取的形式将可能是“从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和从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境况的理解”而得出的合理结论。^[86]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联盟在30年代末期的某些报告，把注意力引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联系上。例如，经澳大利亚建议，国际联盟于1935年举办了一次“卫生、农业和经济政策与营养的关系”的调查；两年以后，由国际联盟的经济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进一步就提高一般生活水平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联合举行了调查。1938年，国际联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关于预防或缓和贸易衰退的实际措施”。

当欧洲政治家的头脑中只想到战争的时候，这种对福利的关心带有讽刺意味。进行上述调查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某些方面也同样是不利的。市场仍然左右着大部分国际经济关系——例如，可可的价格在1937—1938年的衰落期间灾难性地下降了40%——但这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它受到各国政府的干预，不过没有被它们所控制。

国家的干预正在逐渐扩展到价格的制定和收入的分配方面。结果，造成转变的某些市场的刺激因素被削弱了；另一方面，国家计划化的概念还没有发展到政府准备把经济的发展引导到一个特定的方向，或者发展到政府的命令代替了以前由私人主动性所起的作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缺点，部分地由国家干预的缺点所代替。[\[87\]](#)

1937年和1938年的主要特点是不稳定，过分依赖对长时期中的各种指数所做的对比是危险的，同时牢记这两点，就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的工业和贸易格局综合到一起，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哪些历史关系已经改变，哪些关系从20世纪开始以来或多或少地维持原状。

1896—1938年世界人口、生产和贸易趋势[\[88\]](#)

1913 = 100

年份	人口	生产		贸易量		贸易单位价值	
		制成品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初级产品
1896—1900	90	54	76 (1900)	54	62	82	77
1911—1913	99	95	93	94	97	98	98
1926—1930	111	141	123	113	123	145	128
1931—1933	117	110	120	81	116	100	68
1934—1935	120	133	125	84	114	117	85
1936—1938	124	158	135	100	125	120	93

从最近一个主要特点看，由于有1945年以来获得的事后经验的帮助，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30年代末期是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转变”时期，而且认识到这一时期在世界制成品产量和世界制成品贸易的指数之间历史关系的中断是“由于起到降低贸易水平作用的特殊因素（对贸易和通货的限制）所造成的不连续情况”[\[89\]](#)。我们同样可以

认识到，对贸易和通货的某些限制，就像对产量的限制一样，本身就是“干涉主义”转变的例子。

在这个转变的时期里，没有世界范围的货币本位，少数国家为了坚持金本位而做的尝试，就像联合王国在20年代为了“恢复”金本位制度而做的尝试一样，被证明是短暂的。法国为了继续金本位而做的持久的努力——而且法国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来做到这一点——带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并使法国工商业家在跟外国竞争者对抗时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为使物价下降，必然对工资带来压力，同时大规模的遣返外国工人，使许多法国工人回到农村务农，掩盖了失业的实际情况。这些人助长了无形的失业。1936年，法国新上台的人民阵线政府决定，在法国处于衰退的情况下，如果不将法郎贬值和通过一笔汇兑平衡基金来维持平价，就不可能增加经济活动。1936年9月莱昂·勃鲁姆放弃金本位一事是法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与试图在社会事务中实行一种法国的“新政”联系在一起的。^[90]实际上，法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长久的改善。尽管经济活动出现了暂时的高涨，但经济政策（其理论根据并不比罗斯福或联合王国的有力）与社会政策冲突，因此，在一次惊人的“资金外逃”和几个月的进一步的货币贬值后，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只有法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恢复到1919年的工业生产最高水平。

1932年以后一直坚持金本位的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荷兰——在1936年以后对使用黄金做了限制，此后，黄金的流动在维持国际汇率上不起什么作用。金本位制度终于崩溃，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取而代之，尽管在法国宣布贬值以后，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在1936年9月的一项三国货币协定中保证它们要采取实际的步骤来保证汇率稳定，谋求“恢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秩序”，“推行一种旨在促进世界繁荣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政策”。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采取的一些实际步骤，在1936年至1939年期间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国际收支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困难，由于国际投资枯竭，在充分实现最全面的目标上是失败了。30年代末期国际收支的格局，正如国际贸易的格局一样，带有许多过去的标记，同时又显示了一些重大的改变迹象。欧洲贸易的特点仍然是，联合王国有大量的入超，而德国则有出超，同时世界贸易仍然依靠欧洲从美国的入超以及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入超。然而美国在整个30年代（1936

年除外）一直保持每年有大量的出超，继续从世界其他地方吸取黄金，尽管有科德尔·赫尔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计划，美国仍然对德国政策蓄意追求的双边贸易的倾向起了作用。与此同时，它以前的海外投资损失严重，因而它在国际上不再是一个贷方。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不再起它的传统作用。英帝国所属各国不能再像20年代那样，由于把原料卖给欧洲和美国而获得很大收入，而许多制成品又被保护贸易政策摒除在英国市场之外。结果，英帝国所属各国同联合王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愈来愈重要。在现行国际交易中从未获得可观的出超的联合王国也停止了向海外投资。在1930年至1939年期间的收支平衡上，它实际上是输入了资本。

在30年代的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大部分由私人企业根据市场刺激组织的旧式的国外贷款，显然没有地位。但“不发达国家”要想从技术进步（“先进”国家中的一个生活现实）中获益，即使想获得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旧式的贷款或新式的援助取得外国资本也是必要的。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些年里，从工业化国家流入非工业化国家的长期或短期资金都比较少。一方面，私人海外投资被认为要担过大的风险，汇率的不稳定也给扩大投资造成了不利条件；另一方面，没有关于“援助”或“再分配”的实验。19世纪后期的国际经济专业化，至多不过是用作最有效的利用特定数量的人的劳动和特定集团的国家的资源的另一种手段：它曾被作为发展的工具。^[91]当它停止用于这一目的时，就必然产生由某种不同的东西取代它的要求。西方世界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处的地位肯定比20世纪最初10年中要好，经济上的不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或社会停滞不前。但对于欧洲以外的亿万人民说来，困难和不利不仅限于萧条时期：贫穷是难以摆脱的，社会的愿望受到严厉的制约。

在一场将要根本改变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战争前夕，欧洲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表明。它比美国稍有进展，因为它的一些最新的工业——例如汽车和电力——弥补了丧失的阵地，而且也因为对美国商品的歧视已经成为某些国家政策中的一个蓄意的因素。但在其他工业方面，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上，日本的竞争在30年代已经日益强大。^[92]与欧洲一切工业发达的新地区（其中很多建立在“轻工业”或服务性行业的基础上，位于靠近大城市人口集中处）共存的还有一些“萧条”地区，例如南威尔士，英格兰东北部，

里昂周围的工业区和鲁尔地区的一些部分。与水泥或人造丝之类新兴工业并肩存在的有一些老的问题很多的工业，例如煤炭或棉纺工业。在整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的新老工业中都有组成更大的经济单位的趋势——这是进一步经济集中的证据——但是规模巨大并不一定能保证效率，也不一定能保证关心后来称为“研究和发展”的工作；在有些国家（其中最重要的特别是法国）中，小规模生产仍然占绝对优势。1913年以前的年代里的三个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1938年时在欧洲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比1913年要少，尽管有其他各种变化，欧洲全部出口的40%是输往欧洲以外的，这个比例很少变化。其余的60%是输往欧洲其他国家，占欧洲全部进口的大约一半，另一半从海外进口。

欧洲的出口和进口[\[93\]](#)

	1913		1928		1938	
	占欧洲的 总额的 百分比	每个国家中 的总额往欧 洲的百分比	占欧洲的 总额的 百分比	每个国家中 的总额往欧 洲的百分比	占欧洲的 总额的 百分比	每个国家中 的总额往欧 洲的百分比
出 口						
联合王国	26.1	30.1	23.6	31.6	22.2	32.1
德国	24.7	66.3	19.3	69.9	21.1	65.1
法国	13.6	66.6	13.7	62.5	8.6	54.2
三大国 总计	64.4	51.7	56.6	52.2	51.9	49.2
意大利 比利时 卢森堡 荷兰 瑞士 瑞典	21.9	70.6	21.8	68.6	25.5	66.3
其他	13.7	79.5	21.6	85.6	22.6	83.7
进 口						
联合王国	26.9	37.5	27.6	38.9	31.0	31.0
德国	21.2	40.7	17.8	47.1	50.3	50.3
法国	13.3	46.5	11.2	42.7	9.9	33.7
三大国 总计	61.4	40.6	56.6	42.2	57.5	37.0
意大利 比利时 卢森堡 荷兰 瑞士 瑞典	24.7	59.3	21.7	61.0	22.5	62.6
其他	13.9	70.3	21.7	75.9	20.0	75.3

如果撇开1937年和1938年的那些不稳定的主要特点，在世界上这场最大最全面的战争前夕，计划化和相互依存的问题就会随着对后来的各种不同特点的选择而显得不同。在战争期间和紧接而来的战争后果中，不同的著作家和政治家从1939年以前的体制的“失败”中，得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一是，迫切需要恢复不受阻碍的市场力

量；二是，“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必然出现的那种不平衡状态中，不可能依靠市场力量来恢复平衡”。^[94]第一种意见普遍存在于欧洲和美国^[95]，第二种意见则在联合王国和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里占优势。

尤其在英国，特别强调的是：既要通过凯恩斯的关于控制总需求水平的方法以维持充分就业，又要推行不久即被加上“福利国家”标签的一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社会政策。威廉·贝弗里奇的名字同这两种政策都有联系，因为，除了在他所著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1944年）一书中把凯恩斯的某些观点通俗化以外，他还是“贝弗里奇主义”的创立人，这个主义是扩大社会保险的深远的战时计划。相形之下，在1945年以后的德国，有一种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自给自足和政府管制”的反应^[96]，对充分就业的经济不感兴趣。在欧洲一些以前被德国占领的地区，最困难的眼前任务是指出并把以下两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关于重建工作的短期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发展和增长的长期问题。即使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在经济政策的幅度和范围方面又会发生意见分歧。尽管人们承认，在被称为“总体战”的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愿望同经济事实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认识到，1939年以前曾经是可以接受的东西，不一定在1945年以后还是可以容忍的，有一种赞成尽量减少计划化的强烈的反潮流。如果说某些集团的人士广泛持有的看法是战时计划化的极限不应缩小，而应作为新发展的战略基础，那么另外一些人士却是强烈地厌恶各种形式的“统制经济”。在东欧，共产主义提供了另外一套想法和方法，而在欧洲以外，新的愿望开始影响政策，而且在“不发达的世界”里，苏联的榜样比在1939年以前受到更广泛的注意。由于这一系列的态度、意见和政策，显然，国际上相互依存的概念——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通用意义，因为战时世界分裂成了两个组织严密的“集团”，处于相互封锁的状态——在战后的条件下要求新的思想。“以假定一切国家都实行自由私人企业，市场力量在全世界都自由活动为基础，定下用于计划经济时就会实际丧失全部意义的规则，又公然借用作为计划经济主要工具的经济管制方法，这样的国际经济体制，显然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97]

从后来的一个主要特点看，人们得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教训。在一段时期看来，战后紧张的调整和国家之间的分裂，不仅威胁着欧洲的重建，而且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物质进步。但到50年代结束时，欧洲

在50年代期间的高经济增长率，连同走向更大的团结的那种影响深远的活动，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年里的记录成了鲜明的对比。50年代期间所达到的生产率的增长——12个欧洲国家年平均增长3.5%——是从1913—1960年整个期间的平均数的两倍。只有美国以前曾经达到过可以与之相比的增长，而美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飞跃和战后在国际上称霸的动荡时期（当时欧洲严重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后，增长率已经缓慢下来。在整个西欧，每个雇用劳动者的产量增长率，高于以前任何有记录的时期。“到那10年结束时，已经很明显，西欧正在从重大的改革趋势中得益，而且这种改革不仅仅反映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工作的充分就业政策”[\[98\]](#)。回顾起来可以说，欧洲在30年代期间曾经患了一种陈旧僵化的、投资过多的经济体制的“动脉硬化症”，不能灵活应付急剧的经济变化。农业和许多制造业中的生产率低和普遍失业，使国民的产量和收入很低，而且堵塞了迅速全面发展的道路。[\[99\]](#)

在一个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中的环境里，经济学家较少关心就业经济而较多关心增长进程，在有些国家里，超出了30年代凯恩斯改革的限制而把改革视为当然，在另一些国家里则把改革视为无关紧要。美国经济学家曾在这方面指出了道路：现在是由欧洲的经济学家来指出道路了。[\[100\]](#)尽管认识到把长期的统计数字做比较有严重的困难，经济学家仍然开始回顾历史的经历，以表格的形式摆出他们的结论：

数字涉及的时间越早，错误的幅度就越大。与此同时，这些数字暴露了一些关于本章涉及的历史的广泛误解。很少有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论点：稳定的人口曾是增长的障碍。而且，尽管做了进行概括的大胆努力，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国际增长率的模式上有任何经久不变的或定型的东西：过去50年的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不仅中断了增长的趋势，而且似乎打乱并改变了国民生产增长率。也不能把各国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正常地”迅速发展的国家，另一类是没有这样发展的国家。除了日本这个重大的例外[\[101\]](#)，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相当长时期有时迅速发展，有时缓慢发展。

最近的和长期的国民生产增长率[\[102\]](#)

	长期的增长率		1950—1959	1954—1959
	开始年份	增长率		
联合王国	1857	1.2	1.7	1.6
美国	1871	2.0	2.2	2.2
德国	1853	1.5	4.5	3.6
法国	1855	1.5	3.6	3.3
瑞典	1863	2.1	2.8	3.0
日本	1880	2.9	6.1	7.6

要想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主要特点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事情，肯定还为时过早。在西欧发生的事情——在平均数的后面存在着增长率和竞争力的巨大差别——必须同在东欧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在1917年以后还必须同苏联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有两个国际经济体系，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同欧洲以外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1945年以后独立国家的数目的增多，连同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改变了辩论的模式和内容。国内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必须同国际贸易的格局联系在一起。在50年代期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额比20世纪以往那些年增长得快，比生产增长得快。[\[103\]](#)与此同时，非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进口迅速增加，而半工业化国家（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部分地工业化了的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增加较慢。与其他技术部门相比，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的出口（石油除外）只有缓慢的增加，对这个因素需要进行详细的专门的分析。从1914年以来的整个时期，先进国家中的科学化工业已经不那么依靠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了，尽管至少在一些短时期里，这种工业曾经向“不发达”地区要求并得到新产品。另外一个影响进口和出口活动的因素是，初级产品生产国本身对它们自己的产品（包括粮食和矿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根据最近的调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况似乎就像19世纪的情况那样独特和变化无常。但已经很明显的是，在变化着的环境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扩大，取决于减少收支平衡上的困难，减少的办法或者是通过增加非工业化或半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或者是通过贷款和发展赠款。这方面的很多新的想法有其历史的眼光，因为这些想法把过去在个别国家内通过收入再分配和计划化来

抵消“不平等趋势”的想法扩大到了国际上。[\[104\]](#)与此同时，1958—1960年从工业化国家流入非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净值，仅占其国民总生产的1%。[\[105\]](#)与联合王国在1900年至1913年期间的资本输出相比，这个比例是很小的。[\[106\]](#)（见下表）

关于联合王国的资本输出和海外投资分配的统计[\[107\]](#)

年份	国民收入净值	资本输出净值	投资分配统计（有数字统计的）				
			美国和加拿大	南美	印度和锡兰	南非	澳大利亚
1900	1750	23.6	—	200 （仅指阿根廷）	—	—	389

续表

年份	国民收入净值	资本输出净值	投资分配统计（有数字统计的）				
			美国和加拿大	南美	印度和锡兰	南非	澳大利亚
1902	1740	9.8	205 （仅指加拿大）	—	—	—	—
1911	2076	171.3	1061	587	351	351	380
1913	2265	198.2	1270	722	370	—	—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1945年以后对于私人提供的外国资本和“附带条件”的政府援助有着越来越大的怀疑，因而显然必须对正在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关于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概念重新下定义。

至于“计划化”，从1945年以来在理论和方法上，在目标和政策上，都发生了那样多的变化，因而可以说计划化是“一种起源于最近的活动，属于60年代而不是属于50年代”[\[108\]](#)。在1950年以后的“繁荣”条件下，长期的计划化运用各种多少是复杂的手段，在和平时期里第一次开始被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是整个经济的计划化，而不仅仅是各个经济部门内部的计划化。在萧条时期，各国政府曾求助于“管制个别市场”——企业团体往往“乐于放弃根本用不着放弃的行动自

由”，而劳工方面则以“福利”为理由要求进行干预。^[109]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已经变化的条件下，至少在某些国家里的“全面的”计划化，开始不仅考虑具体的或短期的问题（包括收支平衡的问题），而且考虑打乱市场价格的总趋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以及长期预测的需要。通过“现代化”或者通过对未来“国民需要”的估计和计划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想法，开始赢得了新的支持者。在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对扩大政府权力的怀疑，那些国家里大企业内部计划化的方法有所发展，有时是通过银行的中介：在这方面也有“眼光长远的展望”（特别是在一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中），涉及计划化战略的观念。^[110]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大多数西方经济的公、私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态度更趋于相似”的过程。^[111]与此同时，在各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关于经济计划化的辩论，已经开展到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发展“比较合理的”价格结构，企业之间自由订立合同，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更直接的联系。^[112]而且，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看出曾经导致公、私政策和做法重叠的过程一样，也有某些计划化过程（特别是那些涉及决定大规模投资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还有，在一些较小的不发达的国家里，计划化是一个方便的有吸引力的口号，这些国家在采用计划化以控制局势的做法上面临最大的困难。^[113]随着技术的改变和计划化方法变得更加高度成熟，为了保证工业在规模上经济实惠和有效的计划化的前景所需的最小规模已经增大了。^[114]这种考虑对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有何作用，仍然是不肯定的，就像经济上“相互依存”最终将采取什么形式一样不肯定。

（周叶谦 译）

^[1] S. 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普林斯顿，1961年）；W. A. 刘易斯和P. J. 奥里里：《1870—1913年生产和贸易的长期变动》（《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学派》，第23卷，1955年）。

^[2] G. 米尔达尔：《在福利国家之外》（伦敦，1958年），第103页。

^[3] 约·梅·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伦敦，1920年），第10页。

^[4] 见W. 阿什沃思《国际经济简史》（伦敦，1962年），第217页。

^[5] 见A. 格申克龙《从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2年）。

^[6]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00—1962年的工业统计》（巴黎，1964年）。

[7] 关于这些数字和其他数字，参看并比较下列著作：国际联盟：《工业化和国际贸易》（日内瓦，1945年）；I.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日内瓦，1954年）；C. 克拉克：《经济发展情况》（第3版，伦敦，1957年）；R. 纳克斯：《贸易和发展类型》（乌普萨拉，1959年）；A. 麦迪逊：《西方的经济增长》（纽约，1964年）；A. 梅泽尔斯：《工业发展和世界贸易》（剑桥，1963年）。

[8] 约·梅·凯恩斯：《货币论》（伦敦，1930年），第2卷，第307页。

[9] R. S. 塞耶斯：《1890—1914年英格兰银行的营业情况》（牛津，1930年）；P. B. 惠尔：《战前金本位的作用》，重新刊印在T. S. 艾什顿和R. S. 塞耶斯合编的《英国金融史论文集》（牛津，1953年）一书中。

[10] 详情可参看A. K. 凯恩克罗斯《1870—1913年的国内和国外投资》（剑桥，1953年）。

[11] 见W. L. 索普《商业年鉴》（纽约，1926年）。在索普进行了研究的17个国家中，有15个在1907—1908年发生了衰退。

[12] 例如，参见A. T. 皮科克和J. 怀斯曼《联合王国公共开支的增长》（伦敦，1961年）；U. K. 希克斯：《1880—1952年英国财政的结构和发展》（伦敦，1954年）。

[13] R. A. 布雷迪：《作为一种力量体系的企业》（纽约，1943年）。

[14] A. H. 汉森：《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纽约，1932年），第329页。并见J. A. 舒姆佩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4版，伦敦，1950年）；约·梅·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束》（1924年），重印在《说理论文集》（伦敦，1931年）中；A. 伯利和G. 米恩斯《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纽约，1932年）。

[15] F. W. 陶西格：《经济学原理》（伦敦，1911年），第2卷，第411页。

[16] 不过在1906年，在一次咖啡丰收之后，巴西的圣保罗州决定收购一部分咖啡，不进入市场，然后等到比较有利的季节出售，仍然是“稳定物价措施”的一个很早的例子。

[17] 米尔达尔：《在福利国家之外》，第109页。

[18] 关于通过对外贸易而发展的各种模式，见C. P. 金德尔伯格《经济的发展》（纽约，1958年）。

[19] 英王敕颁文书第9005号（1918年）。

[20] 威·亨·贝弗里奇：《英国的食品管制》（1928年），第338页。

[21] W. K. 汉考克和M. M. 高英：《英国战时经济》（1949年），第29页。

[22] J. A. 赛尔特：《协约国的航运管制》（1921年），第179页。

[23] R. H. 托尼：《经济管制的撤销》（《经济史评论》，第13卷，1943年）。

[24] 米尔纳勋爵：《当前存在的问题》（伦敦，1925年），第24页。

- [25] 引文见A. 齐默恩《国际联盟与法治》（伦敦，1938年），第157页。
- [26] 参见G. 斯托尔佩《1870—1940年的德国经济》（伦敦，1940年）。
- [27] A. 夏泽尔和H. 普瓦耶：《混合经济》（巴黎，1963年）。
- [28] 关于这一点的意义，见R. 卡希尔起草的英国官方报告《法国的经济情况》（伦敦，1934年）。
- [29]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19页。关于以钟摆做类比，见R. 弗里希：《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和冲击问题》，载《纪念古斯塔夫·卡斯尔的经济论文集》（伦敦，1933年）。
- [30] F. W. 诺特斯坦等：《欧洲和苏联的未来人口》（日内瓦，1944年），第三章。
- [31]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18页。
- [32]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44—45页。
- [33] W. A. 刘易斯：《1870—1960年的世界人口、价格和贸易》（《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学派》，第20卷，1952年）。
- [34] 引文见《国家与雅典娜神庙》，1926年9月11日。
- [35] 见约·梅·凯恩斯《丘吉尔先生造成的经济后果》（伦敦，1925年）。一种相反的观点见R. S. 塞耶斯《恢复金本位》，载L. S. 普雷斯内尔编《产业革命研究》（伦敦，1960年）。
- [36] P. 拉马丁·耶茨：《商品管制》（伦敦，1943年），第53页。
- [37] J. K. 加尔布雷思：《大崩溃》（伦敦，1955年），第105页。
- [38] A. 索尔特：《恢复》（伦敦，1932年），第22—23页。
- [39] 见国际联盟《大萧条的过程和各个阶段》（日内瓦，1931年）。
- [40] B. 奥林：《瑞典的经济复兴和劳动市场问题》，载《国际劳工评论》（1935年），第21卷，第498—501、670—699页。
- [41] C. 克拉克：《国民收入和支出》（伦敦，1937年），第208页。
- [42] 1933年以后，实际上停止了向美国偿付战债，只有芬兰在那年12月以后仍然偿付。
- [43] 《大通经济公报》，1930年3月14日。
- [44] R. 特格韦尔：《新政日记摘抄》，1933年5月31日，引文见W. E. 勒奇滕伯格《寓兰克林·德·罗斯福与新政》（纽约，1963年）第200页。特格韦尔后来写道：“秘密揭开了。没有看不见的手，从来没有。”（《为民主而斗争》，纽约，1935年，第213页）

- [45] 引文见W. E. 勒奇滕伯格《寓兰克林·德·罗斯福与新政》（纽约，1963年）第202页。
- [46] 见H. V. 霍德森《1929—1937年的衰退和复兴》（伦敦，1938年），第六章。
- [47] 《黄金代表团的报告》（日内瓦，1932年），第23页。
- [48] H. W. 阿恩特：《30年代的经济教训》（伦敦，1944年），第42页。
- [49] A. H. 汉森：《完全恢复还是停滞》（纽约，1938年），第8页。
- [50] G. D. H. 科尔：《实用经济学》（伦敦，1937年），第145页。
- [51] B. 托马斯：《货币政策和危机》（伦敦，1936年）一书第10页中引用的H. 多尔顿的话。并见M. 蔡尔兹《瑞典，中间道路》（伦敦，1937年）。
- [52] J. B. 康德利夫：《新西兰工党的实验》，载《经济记录》，1957年8月，第153—154页；W. B. 萨奇：《新西兰追求保障》（伦敦，1942年）。
- [53] L.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第145页。
- [54] 哈·麦克米伦：《保守主义精神》（伦敦，1929年），第103页。
- [55] 哈·麦克米伦：《中间道路》（伦敦，1938年），第7—8页。
- [56] 英王敕颁文书第4066、4181号（1932年）；G. C. 艾伦：《英国的工业及其组织》（第3版，伦敦，1951年），第109—112页。
- [57] 对英国国民内阁，特别是在1931—1935年的“重要时期”，“重申政府权力”所做的比较积极的评价，见S. H. 比尔《现代英国政治》（伦敦，1964年），第十章。
- [58] K. G. 兰德格伦：《瑞典的“新经济”：约·梅·凯恩斯，恩·韦福斯，B. 奥赫林，及其后果，1929—1939年》（斯德哥尔摩，1960年）。
- [59]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第27卷，第272页。——译者
- [60]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莫斯科，1928—1929年），第2页。
- [61]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6页。
- [62] 见N. 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
- [63] O. 兰格：《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华沙，1957年），第6页。
- [64] A. 诺夫：《苏联经济》（伦敦，1961年），第147页。
- [65] 《苏联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莫斯科，1939年），第20—21页。
- [66] A. 诺夫：《苏联经济》（伦敦，1961年），第267页。1941年正在计划出版一本教科书时，有迹象表明当局感到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在1931年至1941年期间，甚至“统计”这个词也从中央会计机构的名称中被抹掉。
- [67] B. 希金斯：《经济的发展》（纽约，1959年）。

- [68] B. H. 克莱恩：《德国对战争所做的经济准备》（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第14—15页。
- [69] L. 巴特：《本质与任务》（柏林，1936年），第26页。
- [70] A. S. 米尔沃德：《德国的战时经济》（伦敦，1965年），第6页。
- [71] K. 古特：《德国的工业组织》（柏林，1941年），第19页。
- [72] 库特·施密特博士1934年言论。见R. A. 布雷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伦敦，1937年），第266页。
- [73] L. 巴特：《本质与任务》，第13页。
- [74] 见A. 施韦策《第三帝国的大企业》（伦敦，1964年），第124页及以后各页，第249页及以后各页。施韦策指出了“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冲突。第524页及以后各页。
- [75] 引文见克莱恩《德国对战争所做的经济准备》，第36页。
- [76] 米尔沃德：《德国的战时经济》，第24—25页。
- [77] 克莱恩《德国对战争所做的经济准备》，第38页。
- [78] A. 施韦策《第三帝国的大企业》（伦敦，1964年），第533页。
- [79] 见C. W. 吉尔博《1933—1938年德国的经济恢复》（剑桥，1939年）。
- [80] 1933年至1936年期间的物价管制没有产生效果。1933年至1936年期间官方的生活费用指数增加了7%，批发价格上涨了约13.7%（A. 施韦策《第三帝国的大企业》（伦敦，1964年），第324—325页）。
- [81] 见M. M. 波斯坦《英国的军需生产》（伦敦，1952年），第二章。
- [82]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九章。
- [83] 在1934—1939年间，美国同20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其中一半在拉丁美洲。1938年，在经过长期的谈判后，同联合王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 [84] 1937年4月，英国和法国政府要求当时的比利时首相范泽兰调查“普遍减少国际贸易限额和其他障碍的可能性”。他的报告于1938年1月公布。
- [85] C. 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伦敦，1940年），第二章；A. 佩特尔：《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它的起源、程度和展望》（《经济杂志》，第74卷，1964年）。
- [86] 米尔达尔：《在福利国家之外》，第89页。
- [87]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36页。
- [88] 本表系根据梅泽尔斯《工业发展与世界贸易》制成，第80页。
- [89] 关于该表所列趋势的详细分析，见前注所引著作第四章。并见F. 希尔格特《世界贸易网》（日内瓦，1942年）和R. 德奥利维拉·坎波、G. 哈波勒、J. 米德和

J. 廷伯根《国际贸易趋势》（日内瓦，1958年）。

[90] R. 马乔林：《对勃鲁姆实验的看法》（《经济学》，第5卷，1938年5月）。

[91] D. H. 罗伯逊：《国际贸易的将来》（《经济杂志》，第48卷，1938年）。

[92] G. E. 哈巴德：《东方的工业化及其对西方的影响》（第2版，伦敦，1938年）。

[93] 本表采自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173、175页。

[94] 阿恩特：《30年代的经济教训》，第300页。

[95] W. 罗普克：《我们时代的危机》（纳沙特尔，1945年）；《国际秩序》（苏黎世，1945年）；《经济理论》（苏黎世，1946年）。

[96] L. 埃哈特：《德国重返世界市场》（伦敦，1954年）英文版序言。

[97] 阿恩特：《30年代的经济教训》，第301页。

[98] A. 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伦敦，1965年），第4—5页。肖恩菲尔德的数字是根据麦迪逊：《西方的经济增长》，并见联合国《50年代欧洲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日内瓦，1964年）。

[99] 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停滞》，第52页。

[100] S.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六次讲演》（芝加哥，1959年）；O. 奥克拉斯特：《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个最近的研究报告》（《世界经济文库》，93集，1964年）；P. D. 亨德森（编）：《英国的经济增长》（伦敦，1966年）；R. 纳克斯：《不发达地区的资本构成问题》（纽约，1953年）。最早的权威性章节现在成了J. A. 舒姆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9年），该书的德文版早在1911年即已出版。

[101] 对日本情况的说明，见小岛清《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过程——日本专论》（《经济杂志》，第70卷，1960年）；大川一司《1938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率》（东京，1957年）；W.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版，普林斯顿，1965年）。

[102] D. C. 佩奇、F. T. 布莱卡比和S. 弗罗因德：《最近一百年来的经济增长》，载《国家研究所经济评论》（伦敦，1961年）。

[103] 梅泽尔斯：《工业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第384页。

[104] D. 西尔斯：《国际援助：今后的步骤》，向达累斯萨拉姆会议宣读的论文，1964年。

[105] 梅泽尔斯：《工业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第412页。并见R. 普雷比希《走向新的发展政策》，英王敕颁文书第2417号（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有关文件的最后决议》。

[106] A. K. 凯恩クロス：《1870—1913年的国内和国外投资》（剑桥，1953年），第180页。

[107] C. H. 范斯坦的关于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被适宜地列入了B. R. 米切尔和P. 迪恩的《英国历史统计数字摘要》（剑桥，1961年），第367—368页。关于资本输出和投资分配的数字被适宜地编入了A. K. 凯恩克罗斯：《1870—1913年的国内和国外投资》（剑桥，1953年），第180、185页中。

[108] 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第220页。

[109] A. J. 廷伯根：《世界经济的形成》（纽约，1962年），第68页。

[110] J. B. 奎因和A. M. 卡瓦诺：《基础研究是可以计划的》，载《哈佛商业评论》（1964年）。

[111] E. S. 梅森编：《现代社会中的公司》（马萨诺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第17页。

[112] A. 诺夫：《苏维埃计划化：可以预见到的改革》，转载于《真正需要斯大林吗？》（伦敦，1964年）。

[113] 其中有些困难，见G. 米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伦敦，1957年）。

[114] E. A. G. 鲁宾逊编：《国家大小的经济后果》（伦敦，1960年）。

第四章 科学与技术

到19世纪将结束时，在科学家们看来，大自然的结构和格局大体上已被揭示出来了；因此，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仅限于深入地探索已为前人的研究工作初步发现和确立的结构，这种倾向在物理学方面尤其突出。在此以前，科学思想已经历了三次堪称为革命的巨大变化，因为它们绝不仅是侧重点的转移，而是基本观点的改变。这三次革命都是在近代并且都是在西欧发生的。在17世纪，发生了力学上的革命，从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这场革命由伽利略开始，而由牛顿完成，以他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一个显著标志。到18世纪，发生了化学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是由拉瓦锡的著名的实验引起的，因此，就确定这些事件的年代而言，不妨以1789年拉瓦锡发表的《化学基本教程》作为它的标志，所以，人们为了方便起见，至今仍把这一年看作近代化学的奠基年。生物学上的革命则更晚一些，它是由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开始的。在这以前，生物学的进展一直落后于物理学，这时看来也终于踏上了近代的征途。在这个时期中，科学家们所致力的工作，概括地说，是对大自然进行越来越细致的解剖。当时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不论其有生命和无生命形式都是由若干化学元素组成，其中已发现的约有75种，据传可能还有若干种尚未发现。这些元素是由永恒的、不可消灭的原子构成的；任何一个元素的原子，其形状和重量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元素的原子，其形状和重量却不相同。能的多变性已为人们所理解；它能够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它具有的多种形态中的一种，如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电能等，而且通过精密的实验，在数量上也被确定了。世界的结构看来已经大体上弄清楚了。

然而，就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性；接着，居里夫人在1899年断定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并观察到在放射过程中，随着能量的释放，原子发生衰变现象；与此大约同时，约·约·汤姆生爵士在1897年证明普吕克尔于1859年所发现的所谓阴极射线原来是由带有负电的、超微观的微粒组成的，这些他当时称为“粒子”、后来又改称“电子”的微粒

是从许多不同的原子中获得的，但形态却相同，因此，它们是所有原子共有的组成部分。所以，原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合成物，而且，有些原子是不稳定的，并以可测的速度衰变。19世纪最后几年的这两项发现，引起了近代科学上的第四次革命，把我们带进了原子物理学这个崭新的领域。

当然，早在17世纪，科学就已在小范围内被应用于工业，进入19世纪后，其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仍不普遍，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并不密切。在当时的政治家中，认识到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对当代世界具有重要性的，却不乏其人。19世纪末，阿·詹·贝尔福（后为勋爵）在谈到科学家时曾说：“他们才是改变世界的人，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政治家只不过是车轮上的苍蝇^[1]，而科学家才是动力。”但是，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才向近代民族国家及其政府有力地表明应用科学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它们的生存具有的必要性。

因此，19世纪结束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塑造未来世界的是科学。

在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进展无论就其范围、速度和应用而言，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时代。在这50年中，前4个世纪的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因而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想习惯，甚至改变了我们文明的整个面貌。当人们在大约400年前开始放弃他们对大自然及其各种现象所持的比较陈旧的思考方法，同时摒弃那种仅仅依靠一些零星的证据就过早地勾画出世界结构的做法时，他们转向某种有限的目标。他们也转而寻求一种仅仅在暂时的和科学的意义上被认为是“真理”的“解释”，只要这种“解释”与无可争辩的、可以检验的实验结果相符的话。他们从事一项新的探索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人们从事航海探险的情况相仿；任何人都没有能够料想到，他们最后所获得的知识，竟很快地就超出他们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驾驭，因而，使他们无法控制这种知识的应用并将它仅仅用来为人类造福；而且也绝没有任何人能料想到，在某些领域中，出于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危的利益，科学家们多少世纪以来一贯享有的那种发表自己发明的自由，最后竟会遭到剥夺。在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这个时期内，内燃机的问世解决了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难题，因而给我们带来了飞机，但同时也带来了它在战争中的巨大破坏力；原子物理学的进展使我们有了原子弹；于是，人类手中就掌握了毁灭自

己的手段，甚至可能毁灭“这个伟大的星球”以及“人类所继承的一切”，或者可能将一切生命形式弄成畸形，使它们变为新的、怪异的变种。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

当然，近代科学从一开始起，其重大意义早就不限于书房和实验室的范围，而超出了它自身目前的界限，并且远远超出这个领域。如在物理学方面，哥白尼1543年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所阐明的地动说，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由宇宙的中心（据认为太阳是特地围绕着它旋转的）降为太阳系中一颗小行星，从而降低了人类在物质世界中的尊严和地位；又如更晚一些时候，在生物学方面，达尔文1859年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阐明的进化论，论证了人类的远祖原来竟是低级动物，从而剥夺了人类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仅次于天使”的高尚地位。但是，不论这些发现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科学进展对人类的生活应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从哥白尼到达尔文的这段时期内，这些发现只对极少数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没有任何影响。直到20世纪的前50年，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各种各样普及与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手段的大量增加，世界各地，至少在一些民主国家里，各阶层的男女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取决于科学的进展，或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或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决定如何利用这种进展。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告结束时，通过可怕现实，这些问题就变得更明显、更严峻了。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前半叶初期其他领域的情况。

在20世纪前50年中，我们不仅对原子的复杂结构，而且对宇宙的无边无际，不仅对无限小的物体，而且对无限大的物体，都空前未有的增加了认识。当20世纪刚开始时，我们只知道大约20颗恒星的距离，而且还不十分准确。而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制造了新型望远镜并在摄影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已经准确地测出几千颗恒星的距离，从而大大丰富了对宇宙系统的体积和构造的认识。加利福尼亚州威尔逊山的100英寸巨型反射望远镜造成后，为我们提供了一台聚光能力大为增加的观测工具；因此，不久就发现原来除我们自己这个银河系外，还存在其他的星系，即所谓“宇宙岛”，其数目多达1亿左右，它们的体积都差不多，并且看来是离我们自己的这个宇宙即银河系愈来愈远。最近的星系距离我们也约有5亿光年，也就是说，光通过这段距

离需要5亿年，而光的每秒钟速度是18.6万英里。实际上，天文学家不得不想出并采用一种新的度量单位：“光年”，即光在一年内所走的距离，从而使他能够方便地处理这些庞大的、不可思议的数字。在这50年中，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大，使人们的智力已经无法设想它的广大范围，尽管天文学家可以向人们表明，他们“不是普通城市的公民”，但人们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却难以看清我们这个世界的宏伟壮观。我们自己这个“宇宙”的直径，据目前估计，就约达10万光年。

因此，就近代巨型望远镜所观测的结果而言，它表明宇宙空间有着许许多多“宇宙岛”，它们的体积大致相同，并且它们大体上是平均分布的。有些“宇宙岛”看来还处在由炽热的气体物质凝固成形的过程中，至少在若干亿年以前还是处于这种状态，因为它们的光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到达地球，从而使我们的望远镜能发现这些“宇宙岛”的存在及其形状时，已经有若干亿年之久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星际空间是空的，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在星际空间中存在着大量极稀薄的物质，而这种星际物质，几乎与宇宙中恒星的总质量不相上下。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对星球及其化学成分和形成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我们不但发现了“巨星”，也发现了由每一立方英寸重达10吨的非常稠密的物质组成的“白矮星”以及各种不同的变星。此外，还发现，主星序上的恒星，总的说来，大概主要是由氢元素所组成的，根据其他理由，还可以推定，所有其他化学元素也都是由氢元素形成的。随着望远镜倍数越来越大，对空间的探索必将不断发展，但是在20世纪中，对茫茫无际的宇宙，或者说“无数宇宙”的体系的结构，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对宇宙的形成过程和成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仅就20世纪过去几十年中所获得的这些进展而言，它使人们更加感到宇宙浩瀚无际，因此，至少就体积而言，把人类缩小到更渺小的地步，但是，尽管人类发现自己是处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使它堪以自慰的是，它居然能凭着自己的智慧，探索出其中一部分奥秘。

现已发现，这上亿个宇宙，和人类本身一样，归根结底都是由原子即超微观的粒子组成的；这种粒子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微小的宇宙，这是在20世纪前50年中，根据19世纪末所进行的一些初步研究而发现的。尽管早在19世纪的头10年中，约翰·道尔顿就创立了一种化学原子理论，但是差不多直到1900年，科学家们还一直认为原子是坚硬的、实心的物体，它没有任何结构，形状如肉眼看不见的一个无限小的台球，或者像卢克莱修在两千年前所说的，它是一个“坚实的内核”。在1897年至1899年间，约·约·汤姆生爵士发现了原子结构的第一种成分，这就是人们以后所熟知的电子。从各种原子中获得的电子都是相同的；此外还发现，它们是带有负电的粒子，其质量远较氢原子为小，现知其仅为氢原子的一千八百五十分之一。人们发现所有原子都是相同的成分，不禁想起古代炼金术士企图把一种元素嬗变为另一种元素的梦想，这种梦想后来也真的实现了。

不久，在原子结构中又发现了另一种粒子，它带有正电，其带电量 and 电子所带的负电量恰恰相等，而其质量则又和氢原子相等。它被命名为“质子”。原来不同的化学元素的原子是由不同数目的电子和质子组合而成的，因此，原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不带电的。

后来在1911年，卢瑟福勋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阿瑟·爱丁顿爵士称它为“人类自德谟克利特以来对物质这一概念的最重大的改变”。卢瑟福在研究放射性时证明，在衰变中像 β 射线和 γ 射线一样辐射的 α 射线，实际并不是光，而是带正电的氦原子。它的质量为质子的4倍，所带电量则为质子的两倍。此外，它的运动速度极大，而且具有极高的动能，因此，能够很容易地穿过物质，有时会产生大量散射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原子内部大部分是空的。这样才能解释上述观察到的现象，即 α 射线粒子在穿过物质时，一般并不会发生散射现象，只有当这些射线粒子穿过原子时接近一个微小的、带正电的中心核时，偶然才会产生散射。因此，由德谟克利特直到道尔顿，甚至到道尔顿提出他的学说以后100年才发现，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实心体的原子，原来它的结构大部分是空的，中间含有一个极微小的、但质量极大的带正电的核或核心，在离这个核心一定距离外的周围，还有一个由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外壳。原子其实就像是一个微小的太阳系。因此，原来物质大部分是中空的。

同时，还发现质子和电子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形成两种略有不同的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原子量也略有不同，某一种化学元素的原子可能存在于原子量略有不同的两种形式中。在这以前，人们一直认为一种元素的原子量是它不变的特点之一；但是现在却发现，可能存在着化学性质相同的原子，除了其原子量略有不同外，在化学上没有任何区别。索第在1913年发现分别由铀和钍的放射衰变过程中产生的两种铅元素，其原子量略有不同，他把它们命名为铅的“同位素”。同一年，约·约·汤姆生在研究正射线时发现了氦的同位素。弗·威·阿斯顿在1919年以及随后几年中，借助巧妙的质谱仪证明了化学元素大多数都是同位素的混合物。

一切原子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不同化学元素的原子是由不同数目的质子和电子组成的；这一发现将科学又带回到早已为人们所放弃的想法，即物质是可以嬗变的，为了证实这种理论，古代的炼金术士曾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恐怕也浪费了他们赞助人的不少钱财。在这以前，对放射现象的研究就已表明，某些元素正逐渐地经历着变化和衰变，如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逐渐地变成铅，钍也是如此。换言之，某些元素正处于“嬗变”的过程中，只不过既不依靠古代炼金术士所用的方法，又不根据他们的梦想罢了；因为他们原来是想把贱金属铅变成贵金属金或银，而大自然却把贵金属铀逐渐变成贱金属铅。第一次近代的“嬗变”是由卢瑟福于1919年实现的，他用 α 粒子轰击某种轻元素，使之成为氢元素，从而使一种结构较复杂的原子变为另一种结构较简单的原子。然而，布莱克特于1922年进行同样实验时却发现，用 α 粒子轰击氮原子，可以获得氧原子。这次是把一种结构较简单的原子“嬗变”为另一种结构较复杂的原子，也就是说，升级了，而不是降级了。此后，由于使用了回旋加速器以及后来的原子反应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从而实现了许多其他元素的嬗变，甚至产生了许多新的元素，即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列在最重的元素铀以后的所谓“超铀元素”。这些新元素如镎、钚、镅、锔、锿、镗等最初是在实验室里获得的，以后发现原来沥青铀矿中也含有微量的这类元素。然而，最重要的进展是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原子物理学家不仅成功地进行了元素的嬗变，而且还造成了人造元素或合成元素。

在这个领域内，另一项重大的进展就是制成了一些已知元素的放射性的，即不稳定的同位素。这一成果有许多重要用途。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放射性碳（这种碳同位素又通称为辐射碳）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的应用：由于从外部就能拍摄碳同位素的放射现象，因此，当碳同位素在机体中经过时，就可利用这种方法对其进行追踪。

放射性碳的应用还带来了另一项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动物组织也和植物组织一样，能够利用过去认为是无用的二氧化碳来造成更复杂的物质，而这种功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植物所独有的；同时还发现绿色植物在光照下产生的光合作用之所以能够释放出氧，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植物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分解，而是由于水的分解。

因此，既然原子看来是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而且每个原子由于含有数目相等的上述两种粒子因而不带电的；既然质子的质量是电子的大约1800倍，因而实际上相当于氢原子；那么，看来可以断定，质子或者说氢原子可能同古代希腊人所谓的不可分原质（*protyle*）即原生物质相近似；一切物质，因而也就是一切原子都是由它而来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伦敦的一位医生威廉·普劳特就曾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提出了这种古老的看法；他根据他当时所掌握的一些并不充分的证据论证说：虽然有许多元素的原子量实际上并不是整数，但如以氢的原子量作为一个单位来衡量，这些元素的原子量却都是整数。普劳特认为他已经发现氢就是构成一切原子，因而也就是一切物质的要素；为了进一步确定各种化学元素的原子量以取得这种重要的数据，他曾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实验，但是就当时来说，事实还不足以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然而，到了1911年，巴克拉在研究X射线散射现象时，却表明一个原子的电子数正好与该原子在元素周期表上所排列的序数相符，而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如果将各种元素按其原子量由小而大的顺序排列的话，这些元素就会明显地分成几大系和几大族。在1913年至1914年间，莫斯莱发现一种化学元素的原子核上的正电荷单位（即质子）的数目，正是这一元素的“原子序数”，而这个“原子序数”也正是这一元素在周期表中的序数，只有某些一向属于不规则的元素例外。由于莫斯莱的发现，现代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元素都不是按照其原子量的大小，而是按照其原子序数来排列的，因为

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只要是同一种元素的同位素，其原子序数必然相同，而且不会有任何例外。

早在1901年，斯特拉特就被普劳特的假设所吸引，他研究了8种经过极其精确测定的原子量，并用数学方法表明这8种原子量的总和与一个通过实验而得出的同样大的整数相比，总误差概率大约是1%。他随后又用同样方法研究了其他18种无法精确测定的原子量，最后得出结论说：“对这种误差概率的测算，充分证实了根据常识所做出的推断，即原子量非常接近整数，这绝对不是用偶然的巧合能给予合理的解释的。由于用这种偶然巧合作为解释的可能性只有1%，因此，用拉普拉斯的口吻说：我们有更强有力的理由相信普劳特定律只需稍加修正就是真理，而不相信历来被普遍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种种现象。”^[2]由于发现了一切原子一律都是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从而揭示了原子的结构，由于莫斯莱引人注目地发现了“原子序数”，人们在20年代以为他们已经证明了斯特拉特在其结论中所预言的“普劳特定律只需稍加修正就是真理”这一说法，即以核即质子的形态而存在的氢原子，就质量而言，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要素。后来，又得出了结论，认为主星序的恒星很可能主要是由氢构成的，因此，氢想必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不可分原质即天地万物的根本，当然古希腊人认为天与地不同，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因而是不同性质的。但是就原子而言，不久就发现它除了质子和电子以外，还有其他的基本构成粒子，因而它的结构远非如此简单。这些基本构成粒子是：中子（查德威克于1932年发现），即一种质量和质子相等而不带电的粒子；正电子（安德逊于1933年发现），即一种质量和电子相等，但带正电而不是负电的粒子；还有各种介子，即各种寿命很短，带正电或负电甚至不带电的粒子；甚或还有中微子，即一种质量极小而不带电的粒子。当初以为结构非常简单的原子，现在发现它竟如此复杂；然而，尽管原子本身现在看来几乎成为一个宇宙，但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对原子复杂的组成和精细结构却一直在进行实验和探索。

对原子及其结构的知识的不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界限；这两种科学其实是一门科学，人们把这两门科学相互重叠的特殊领域，分别称为“原子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同时，数学也被引进了化学领域，它对化学的影响与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几乎同样重要。与生物研究有关的其他进展，产生了生物化学；后

来，在距今更近的时期又产生了生物物理学。作为化学的一个旁支，生物化学在其短短的50年历史中，取得了也许是最重大的进展，这就是高兰·霍普金斯的发现，最初被称为“辅助食品素”，后来又改称为“维生素”。食物中如果缺少维生素，不论它能为人体提供多少热量，也无法维持其健康。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中必须有少量的维生素，否则，就会引起诸如软骨症、坏血症等所谓“营养不良症”。例如，现在才弄清楚，斯科特的南极探险队（1910年至1912年）所带的食品就热量而言是足够的，但可惜缺少维生素，以致这支探险队全部丧生。维生素的发现和这一领域知识的扩大，对各国人民健康的裨益是无法估量的。实际上，有几种维生素现已大量生产了。另一类对生命和健康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激素（荷尔蒙），也是在这一时期中由贝利斯和斯塔林发现的（1902年）；它是由人体某些腺体中分泌出来，经血液带到人体各部分发挥作用的。高峰让吉于1901年从肾上腺分离出了肾上腺素；肯德尔于1915年由甲状腺分离出了甲状腺素；班廷和贝斯特于1922年由胰脏分离出来的胰岛素，证明对治疗糖尿病有显著疗效；肯德尔于1936年由肾上腺分离出来的可的松，现已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激素，其中有些已人工制成，有些已大规模生产了。

虽然细菌传染学说早已为人们所确认，这时却发现还有比细菌更微小的传染媒介，即具有超滤过性能的病毒。这种病毒只能在活组织中滋生。斯坦利于1935年由植物中分离出某些病毒的结晶；发现它们大多是合成蛋白物质或核蛋白。至今还不能明确地断定它们究竟是不是生物。

在有机化学方面，这一时期的进展也日益加速。“经典的”有机化学家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典型地表现为把某些存在于生物中或与生物有关的物质分离出来，进而在实验室中弄清它们的结构，进行人工合成，而且如果这些物质证明确有工业或医药价值的话，常常大规模地予以生产。其他的有机化学家则成功地把关于化合价和分子结构的价电子理论用来研究化学变化，以阐明有机物质之间的作用机制；而在此以前，用无机化学长期应用的电化学理论是很难或无法说明这种作用的。因此，到19世纪结束时，化学这门科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比其他任何科学都大，而且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有机化学，另一个是无机化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由

于在有机化学中广泛应用了上述那些物理化学的方法和理论，这两个化学领域又融为一体了。其实，这个结合过程仅是贯穿这个时期中的物理学和化学更广泛的结合过程中的一部分。

在这半个世纪中，科学家们经过探索，还研制成一些新药品，这些新药能杀死侵袭高级动物的病菌和其他微生物，但对宿主却一般无害。要做到这一点是煞费苦心的，并且显然是很困难的。必须在能够杀死病菌和其他微生物的成分外再配上另一种成分，以组成一种新的分子组合，才能既对宿主无害，而又保留了原来成分的杀菌效能。洒尔佛散（六〇六）便是最初研制的这类新药品之一，它是由保罗·埃尔利希于1909年研制成功的。它能杀死梅毒螺旋体，而对宿主却无害，从而为这种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是砷的有机化合物；埃尔利希反复配制了600多种人工化合物，最后才研制成功具有上述效能的药品，由此可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耐心。嗣后，其他与此相类似的药品如治疗嗜眠症等热带病的药品也相继问世；但直到1935年，才由多马克发现，按同样原理，可以用百浪多息，一种红色活性染料治疗由链球菌引起的疾病。在发现百浪多息分子化合物中的有效成分是磺胺后，尤因斯和菲利普斯于1938年研制成功一种新药，称为“M和B693”即磺胺吡啶，用于治疗肺炎和其他“致命的疾病”。这种药品大大降低了因肺炎而造成的死亡率，以至奥斯勒为这种可怕的疾病所取的名称“死神之王”——这个词出自约翰·班扬——已经不再适用了。磺胺类药品对治疗产褥热也证明有特效。1929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具有杀菌效能。1940年钱恩和弗洛里将其研制成为抗菌素，从而使医生手中又增加了另一种强大的武器。不久，青霉素就被作为商品大量生产了。此后，其他一些抗菌素也相继问世，如链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等，它们分别对某些类型的肺结核以及对斑疹伤寒和某些病毒性疾病具有特效。

在结晶学领域中，威廉·布拉格爵士及其子劳伦斯·布拉格爵士在他们所首创的研究工作中，使用了物理学的方法，从而揭示了分子的化学结构。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把一个晶体作为X射线的衍射栅。从利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光谱中，可以辨别出晶体分子的原子排列。由于这种方法令人惊奇地揭示出大自然的结构，物理学和化学又一次合而为一；布拉格父子及其学生和其他结晶学家的研究成果再次表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基本上是同一门科学。

生理学在这50年中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除了对呼吸过程的化学作用有了详尽的认识外，还发现了激素，即内分泌腺素。在神经生理学方面，取得了同样显著的进展，尤其是谢灵顿对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的研究，戴尔对神经刺激的体液传输的研究，以及艾德里安对末梢神经的研究。部分由于使用了物理学家的方法和手段，如X射线衍射法和改进了的显微技术，特别是这一时期初的超级显微镜和后来的电子显微镜，因而促进了生理学和与它有关的组织学的发展。

在20世纪中还有一门科学也普遍使用了物理学和化学技术，这便是地质学。在纯理论方面，它们被用来阐明地球化学方面的问题，在应用方面，则被用来勘探地壳下面的宝贵资源。除了为工业勘探新原料来源外，人类文明今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听取地质学家的意见，诸如勘探水源，选择建筑材料，测定土壤的性质及各种用途，选定道路的路线和建筑物的位置，等等。由于使用装有记录仪器的各种运载工具（包括风筝以至最近的动力火箭）对大气层进行了探测，现已发现大气层是由三个极不相同的气层组成的：最下面的一层是对流层，由地球表面起，它的垂直高度约为6英里，在这一层中，对流运动频繁，温度也不一致；在对流层之上是温度一致的平流层；在平流层之上是电离层，由距地球表面约30英里处起，其高度约为120英里，电离层分若干气层，气层愈高，电离度愈大，由于电离层能够将无线电波折射回来，因此，影响无线电波的传递。此外，对大气环流和云的形成，以及对大气层这一复杂的系统的其他千变万化的现象，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发现，雨雪的起因和冰的形成并不像原来所想的那样简单。

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已知的能源在前一时期已被盲目开采殆尽，因此需要地质学家协助寻找诸如煤和石油等能源。于是，一些物理方法，如冲击波或电磁波（无线电波）反射法、地磁场或重力场的微小变化测定法，就被用来探测地下的石油、水以及各种矿藏。在地球物理学方面，魏格纳1915年在他的大陆漂移学说中提出了地质学理论上的一个引起兴趣的新见解，来解释大片陆地即大陆在地球表面上的分布现象。他论证说，各个大陆是在远古时期由一整块原始陆地逐渐破裂、漂移而成的。这一学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但表示同意者却并不多。

然而，在20世纪初，对放射现象的研究，却为地质学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确定他们所研究的多数岩层的形成年代。物理学家通过实验测出了放射性物质的衰变率，例如镭放射出氦，衰变到放射性铅（普通铅的一种同位素）的衰变率。因此，只要测出放射性矿物中的含铅量和含氦量，就可断定含有这种矿物的岩石的年代。采用这种方法，就证明了地质学家过去根据纯地质资料所推断的岩石年代即若干亿年大多是准确的；事实上，地质学家过去想要查明的“地质年代”，现在有些却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十分可靠，不像以前那样时而产生怀疑。在这上半世纪中，地质学家还致力于寻找铀和其他高原子量元素的资源。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时制成了原子弹，同时希望应用并发展原子能，因此，几乎全世界都在寻找这种必不可少的基本原料。

还有一门科学也利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工具，这便是气象学；由于利用了这些手段，每天的气象预报变得更为可靠；海员们能够事先获悉恶劣气候的警报，而农民也可以收到天气晴朗的消息。所有文明国家都设立了国家气象站，它已成为航空事业的一项必要设施；由于无线电报加快了通信速度，因此，为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所必需的各种资料也变得更及时了。

但是，就科学理论而言，最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物理学这一领域。在19世纪末，人们还对牛顿力学深信不疑，但马克斯·普朗克对热辐射的研究却推翻了旧的信念。原来认为黑色物体辐射的能量，在不同的波长中，是平均分布的，但普朗克却发现能量并不像过去所认为那样是连续的，而是不连续的、分散的，几乎是微粒性的，因此，不妨认为它是以单位即“量子”的形式释放的。如以 ν 表示辐射频率， h 表示普朗克常数即普朗克所谓的“行动量子”，则某一辐射体所释放的能量为 h 和 ν 的积或 $h\nu$ 。普朗克的量子论和他的普朗克常数，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家对能量的认识。继而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证明了根据 $E=mc^2$ 这一质能关系，某一物体的能（ E ）与它的质量（ m ）成正比（ c 为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因此，原来认为质量和能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现在却发现原来它们是同一个概念。质量和能量只是对同一个片面理解的概念的两种片面的解释而已，因此，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后者的确立是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明同一概念。其

实，由太阳所获的能量，恐怕主要就是由于氢变成氦时丧失质量所致。人们现在认为，正是因为太阳发生了这种变化，才使它释放出能量。

狭义相对论问世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以及旧的机械论的以太说就被摒弃了；狭义相对论把引力场论和电磁场论（还有光，克拉克·麦克斯韦于1873年发现光也是一种电磁现象）统一成为新的“场物理学”。牛顿的宇宙观被四维空间——时空连续区所代替，从而彻底改变了对宇宙面貌的认识，但这并不是由于推翻了牛顿的原理，而是扩展了牛顿的原理。既然光的发射基本上也是一种辐射现象，因此它也是分散的，并且是以称为光子的单位发射的。然而，由于在20世纪初认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因此，在对波的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结果，如同对热辐射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发现波的现象是有概率可寻的。事实上，概率论，即认为某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在若干可能性中发生的概率最高这一理论，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中已在物理学领域内广泛应用了。

在这20世纪上半叶中，由生物学派生的科学也不亚于物理学：专门研究遗传和变异的遗传学，由于它的空前发展，而且更由于它不同于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无须借助物理学的技术方法，已被人们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孟德尔至少早在1857年就已从事他的研究，但以后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认识到，原来孟德尔早已通过试验，发现并奠定了遗传学的原理。这事说来很有意思。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在《物种起源》中阐述了他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1858年共同提出的关于生物演化的起因，即自然选择；他的著作的全名《通过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实际上就已有这一含义。不过，达尔文指的是微小的、连续的变异现象，因此，在19世纪结束前，生物学家就已决定宁可转而研究不连续的变异现象，即所谓嬗变。由于自然选择说被过分简化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论”，因此，不久便用特殊遗传说加以补充。这种学说认为特殊遗传或孟德尔遗传，是由基因所引起和控制的。基因是任何人身上都有的一对分别由父母遗传下来的因子或单位。基因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中并按照孟德尔遗传定律起作用。孟德尔遗传原理后来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结合，也许是生物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最重要的发现。

孟德尔遗传学表明，遗传单位保留了各自的特性，而达尔文原来却认为，这些因子彼此已经混合了。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成就表明，进化是由孟德尔遗传说或“颗粒”遗传说的自然选择作用所决定的。这样，达尔文学说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至于诸如拉马克的进化论，他认为由于用进废退而产生的获得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并以此作为他的学说的基础，同时认为正是有机体中的这些变化支配着进化过程，这种观点所以能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中在苏联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它有任何学术价值。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陆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尼安德特人化石，这有助于确定人类是演化而来的这一事实。继而在1891年在爪哇发现了爪哇猿人，后来在北京附近发现了北京猿人；到了1900年，人们普遍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在介于爪哇猿人——这是已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和现代人之间的某个时期出现的。在1912年“发现”了著名的辟尔唐人化石，后经证明原来是一个学术上的空前大骗局。1933年发现了施泰因海姆头骨，1935年发现了斯旺斯库姆（肯特郡）头骨。由于这两次发现以及许多其他发现，尼安德特人便被排斥在现代人的谱系之外，而降为早已绝灭的一支旁系。在这上半世纪中，还发现了许多其他各种人类化石，其中主要是1925年于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它显著地兼备人和猿的特点。然而，现代人的祖先却仍然是一个谜。

在上述这个时期中，科学在医学上的应用也是多种多样的。早在20世纪初，罗纳德·罗斯就已证明，疟疾是由曾经叮过疟疾患者的蚊虫传染的。1900年里德证明致命的黄热病也是经由同样途径传染的。这两项发现导致对蚊虫滋生地带进行控制，以防止上述疾病的传播，并使大片土地得到开发供人们耕种和居住。防治黄热病的工作所获得的一项突出成就，便是使这种曾迫使巴拿马运河工程一度中断的疾病不再传染了。在治疗而不是预防疟疾方面，奎宁已为许多新的人工合成抗疟药品所代替。在这一时期中，人工免疫也有很大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过去曾吞噬成万将士生命的伤寒所造成的危害已微不足道，而且从那时以来白喉的死亡率也降低了。1940年以后，由于改进了鉴定患者血型的方法，输血在医院中已司空见惯。各种科学发明也都相继应用于医学，其中最主要的是X射线摄影。

从工艺技术的角度来说，在这上半世纪中，最重大的变化也许是用汽车和飞机上所用的内燃机代替了马做动力。早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中，汽车就已问世，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普遍使用。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以汽油为动力的飞机实现了第一次空中飞行。1909年，布莱里奥上校制作了横越多佛海峡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飞机的发展和设计；1919年阿尔科克和布朗由西向东飞渡了大西洋，同年，伦敦和巴黎之间开辟了民航航线。直升飞机和喷气式飞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研制成功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类飞机的需求促进了这种至今仍未过时，而且大有前途的武器的积极发展。

1947年，一架飞机首次以超音速飞行，就在同一年里，完成了环球2万英里的飞行。长途飞行已经司空见惯，大型客机也制造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空中飞行的另一项发展是研制成飞弹和火箭炸弹。对火箭的研制促使人们进一步考虑飞往月球的可能性；此外，还计划发射携带装有无无线电发报机的记录仪器的人造地球卫星。

在农村，常见的马被内燃机所代替，而在这上半个世纪，尤其是在最后几年中，犁和其他农具均已改由拖拉机牵引，从而大大地减轻了人畜繁重的劳动。同样，在家庭中，由于使用了电力，特别是电吸尘器即所谓真空吸尘器和电洗衣机，同时以煤气和电力代替煤来取暖，因而大大地节省了劳力。

在这个时期内，电代替了煤气成为家庭和工厂的光源，并成为工厂的日常能源。如今，凡是有充沛的水源和“水头”的地方，即多雨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到处都有水电站利用“落水”大量发电，即生产所谓“白煤”。利用水力所发的电不仅输往大城市，而且也送到穷乡僻壤。这样，在这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许多农民家庭就从使用木材、煤或石油做燃料和使用石油照明，直接过渡到改用电力，而不必像城市居民那样，中间还要经历一个使用煤气的阶段。在同一时期内，电力还为城乡带来了广播和电视。在这方面，发展是极其迅速的。1897年马可尼用无线电报进行了距离为18英里的通信；1901年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获得成功；到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已经普及；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也普及了。

在这些科学发明中，有许多被用于歧途；无线电广播仅是其中一例。它本来大可用于消除各国之间的误会。它最初出现时确曾轰动一时，人们以为“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即将实现。不料一旦各国真正利用它进行对话时，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却往往是诸如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宣传；广播里不是时常充满了喧嚣的争吵，便是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于某些国家不惜滥用这项技术发明，以这种尖叫声来干扰对方的广播，使本国人民无从收听。各国政治家和政界领袖使用这种新的通信方法，向国内外听众讲话；依靠这一工具，可以和海上的船舶联系往返，从而拯救了许多生命；同时它对农村居民的城市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已成为学校中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它们把古往今来的音乐、文学和艺术送到每个家庭和每个人身边，甚至在人们患病或衰老时，送到他们床头。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伟大的发明在陶冶人们的思想感情方面具有几乎不可限量的可能性，然而，对它们的控制和利用，却受到了那些只热衷于提供群众娱乐而不关心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遗产的人们的挑战和争夺，情况过去如此，现在仍然未变。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工艺技术终于合而为一了，它们为我们的文明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可惜我们的文明却还不够成熟，无法充分享受和予以利用。

随着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近代工艺技术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这在开发原子能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上表现得最为显著。近代炼金术士的鼻祖卢瑟福早在1919年就使用镭衰变过程中释放出的高速 α 粒子轰击某些轻元素，使之嬗变成为氢；布莱克特在1922年用同样的方法将氮嬗变成氧，但这些嬗变仅是小规模，因为在受到轰击的原子中发生嬗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然而，到了1931年，剑桥大学的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使用一台高压装置实现了嬗变，从而改进了嬗变的方法；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的劳伦斯研制出回旋加速器，即名副其实的所谓“原子轰击器”，从而无须使用相应的高压，就可获得高能量的带电粒子。这一巧妙的方法极为成功。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了原子结构的另一组成部分——中子，它是不带电的，而其质量则与质子相等。费米于1933年至1934年间发现中子对于嬗变极为有效，用中子轰击各种原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放射性元素。1939年1月，德国的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宣布，他们用中子轰击铀获得了钡的同位素。钡与铀相距很远，钡的原子序数是46^[3]，而铀的原子序数是92。如上所述，原子序数就是原子核的电荷数，因此，这是一项崭新

的发现。往常轰击的结果仅是从受到轰击的原子核上增加或减去一个诸如质子、电子^[4]或 α 粒子之类常见的粒子；恰恰相反，这次轰击却把原子核分裂为两块——核裂变终于实现了。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立即意识到这项发现的重大意义。然而，由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此事照例实行了军事保密，尽管参与战争的各国政府最初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项发明的重要用途。在以后的3年内，除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外，还正式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物理学家组成的小组，研究如何将核裂变这项发明用于军事方面。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了。1945年8月6日，向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又向长崎投掷了第二颗。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对制造这些原子弹所需的技术情报一直实行保密，没有透露给它们的盟国，包括苏联在内。当苏联获悉这一政策，并发现甚至直到战后美、英等国仍继续奉行这一方针，它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战时的盟国，这时却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竭力想在核技术的发展上赶超对方；由此发生了一些“泄密”事件，以及由于政治原因而有意违背诺言的事件。总体战曾促进核裂变的应用，但在以后6年半的时期内，世界却由于对这项发明的应用问题而陷于分裂，双方都竞相取得技术优势，以便研制出一种威力足以造成无法估量的物质损失，并能在瞬息间毁灭整个国家的进攻性武器。美国、英联邦和西欧各国等民主国家，在1945年还遥遥领先，但不出5年，苏联就缩短了这个差距，制成并试验了它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在上述这个令人不安的紧张时期内，文明遭到了几乎是无法消除的威胁。

由于突然发现了原子能可供利用，一些国家便获得了一种新能源。这些国家不但拥有能处理这个问题的科学人才，还有必需的原料资源，特别是铀。在这方面，进展也是同样迅速的。在本章所述的这段时期结束后不久，原子能发电站就已开始运转了。

核裂变的发现还带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但这仅限于科学界本身。从16、17世纪起，自有近代科学以来，科学家一直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他们国家的统治者或政府的干涉、检查或禁止。现在，情况却不同了，而且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关一门专门科学——原子物理学的知识，由于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军事安危，对各国政府来说已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它被列为

机密，并且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不言而喻，他们多数是在专为这种研究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和实验室里工作——也被禁止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进行学术交流。长期以来，科学一向自夸是无国界的，而过去也确是如此，但现在却不得不适应这种新形势了。

工艺技术方面的发展种类繁多，如果将各项发明列举无遗，势必失诸芜杂烦琐，因此，仅能择要加以评述。例如最突出的是冶金技术的进展，尤其是在研制各种合金钢方面。1903年开始专门使用硅钢做电磁芯，从而节约了大量电力。不锈钢是一种铬合金，它节省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并为外科医生带来了莫大的方便。在复杂的近代机器制造业所需的各种金属中，增添了镁合金、钨合金、镍合金、钒合金、钴合金和钼合金；此外，用它们又制出了上千种含有不同比例的这类合金的合金钢。在这半世纪中，轻金属合金的研制和应用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关系到铝合金的研制和应用，也就是飞机制造业。铝的用途极广，因为它不但具有重量轻的优点，而且有耐空气侵蚀的性能。这是因为铝和空气接触时，在它的清洁的表面上，立即形成了一层具有保护作用的氧化薄膜。

汽车运输所必需的充气轮胎主要也是在这一时期中研制出来的；由1930年起，还研制出许多种不同性能的人造橡胶。

1908年第一种塑料——电木投入商业生产，它的生产标志着日后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工业的开端：塑料即合成树脂现已广泛用来代替石头、木材和金属。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几乎到处都有塑料制品。1930年，发明了第一种可以代替玻璃的塑料——有机玻璃，1939年制成了一种软性塑料——聚乙烯。此外，还制成了其他一些可用作包装材料的电气绝缘材料的塑料。

1935年制成了尼龙，它可以拉成线状，代替人造丝做纤维用。最早的人造纤维即人造丝，是在20世纪初发明的；随后，又相继制成了醋酸纤维素和尼龙；到了这个时期末，涤纶也证明有良好的效果。

凭借各种工业方法，可以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为硝酸或氨，这对农业和炸药制造业都有极大的好处，因而使它们能不再依赖诸如智利硝矿石之类的自然资源。据说促使德国在1914年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德国发明了一种这样的方法；因为这意味着，即使从智利输入硝石的来源一旦被切断，也能保证有足够的硝酸供制造炸药之用。

在这一时期中，制出了许多更好的新染料，从而使得纺织品更加丰富多彩。根据不同用途而制成的不同敏感度的感光板和胶卷，使得摄影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当初原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摄影术，现在已为无数业余爱好者所掌握。此外，还研制成许多种杀虫剂，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滴滴涕了。但据说杀虫剂如使用不当或过量，则不仅会杀死危害农作物的害虫，也会杀死起授粉作用的益虫。同时，还研制成具有选择能力的除草剂，它能够杀死莠草而对农作物无害。

在这半个世纪中，尽管由于应用科学知识，农业产量稳步上升，但它仍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因而，不时有人提出警告说，在这个人口已超过20亿的世界里，只要每年增加两千万人，即总人口仅增加1%，很快就会出现粮食严重不足的现象。在西方，粮食的增长，截至目前为止，尚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但在东方，总的说来，粮食的增长却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不得不提倡节制生育，以免发生饥荒。开垦过去从未耕种过的荒地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在降雨量和温度勉强适于耕种的边缘地带。应用科学方法防止水土流失也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美国的长期风沙为害的干旱地带。尽管如此，到这半个世纪末期，虽然某些国家的剩余粮食已堆积如山，以至粮价有可能暴跌到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地步，但世界广大地区的人民却长期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在食品储存方面，由1934年起，在用船只运输肉类时，采用了冷藏法方面的一项重大发明。在这以前一直沿用两种方法：或是将肉类冷冻到冰点以下10度左右，这种方法适于长途运输，如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到欧洲；或是将肉类冷藏于略低于冰点的温度，这种方法仅适于短途运输，如从美国到欧洲。但是冷冻的肉类一旦解冻，很快就会变质；冷藏的肉类虽然不致变质和变味，却不能保持色泽。后来发现，冷藏肉类在运输途中，只要在空气中加进10%的二氧化碳，就可使肉类的储存时间延长一倍，如再加进一定分量的氧，就可防止肉类变色。这项发明用途极广，除可用于保存肉类外，还可用来保存必须在温度适宜的空气中贮存的其他货物。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项发明也被人们普遍使用，这就是家庭冰箱；随之而来的是所谓“低温快速冷藏法”，人们以此代替干燥贮藏法来储存水果和蔬菜。冷藏的水果和蔬菜基本上能保持新鲜，只是在解冻后不能保存很久。

船只也由使用煤改为使用柴油，由使用蒸汽机改为使用汽轮机，1894年首次使用汽轮机来驱动船只。由于用柴油代替了煤，船上司炉的数目比原来减少了9%。用无线电播送报时信号则大大减轻了领航员的工作，因为从此他不必再靠计算格林尼治时间来确定他的船只航行位置的经度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研制成其他一些无线电导航工具，特别是雷达，它最初是在1936年被用来探测飞机的飞行位置的。这些无线电导航工具实际上把船只和岸上联系起来了，从而可以掌握船只的航向，就雷达本身而言，它还有助于减少因浓雾、黑夜和冰山而造成的事故。

在通信方面的发明中，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阴极真空管，它彻底改变了无线电通信的方法，并在1920年前后开始普及；另一项是多路通信电缆，它可以同时传送许多路信息，其数量往往可达几百之多。这项改进大约是从1930年开始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还发明了彩色电影和有声影片。

在1913年，发明了利用传送线或传送带连续组装产品的方法，这项发明在美国是和亨利·福特的名字分不开的。它日后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一大特点。

由于全世界动物脂肪奇缺，因此，各种植物油和植物脂肪的使用较前增加了，而且由于缺少脂肪所引起的肥皂生产不足，则又促进了各种合成洗涤剂的生产。

我们本来可以继续叙述下去，将工艺技术方面的进展一一列举。但是，就这半个世纪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成就是通过科学和工艺技术的紧密结合而取得的，而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近代的文明不妨称作科学的或工艺技术的文明。在这个时期中，无意的发现虽然偶尔也曾起过一些作用，但和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探索新的科学知识并为了实用目的而加以利用的情况相比，无论就其程度和质量而言，前者的作用都越来越小。在这半世纪中所以能够获得这些新知识，并予以利用，应归功于仅仅在不久前出现的一批人物即专业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把他们的情況详加论述。

近代科学是由业余科学家，而不是由专业科学家创立的，这些人多半是爱好所谓“自然科学”的牧师，或是对大自然的研究有同样爱

好的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只限于古典著作、数学和神学，而有些人则专攻医学。当时的大学并不讲授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至于应用科学，就更谈不到了。在18世纪，法国和德国虽有几所军事工程、土木工程和矿业等专科院校，但首先讲授应用科学的，却是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创立的综合工科学学校。在19世纪，各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也很缓慢。当时德国首先增设水平较前提高的技术学校，但是直到1899年，这些学校才提高到大学的地位。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技术教育的发展和德国一样缓慢，在讲授科学方面，英国在19世纪也是逐渐地获得了进展。最先设置各种科学课程的高等院校是1826年创立的伦敦大学学院，但在这以后，新式院校的增加却很缓慢，由此可见当时在瓦特和法拉第的同胞们中间，对应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普遍认识不足。后来，甚至在旧式大学里也逐渐地添设了科学课程。欧洲和美国都有了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受过这种教育后投身工业界。以应用其成果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在当时还不普遍，除了大学理工学院外，科学家人数不多，不仅如此，当时的高等教育是指文科而言，甚至在大学里，理工科的学术与社会地位也较文科为低。

但到了20世纪初，科学教育在德国大学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德国大学的技术教育一向以高水平著称，当时也为世界所公认。法国的情况和德国差不多，科学与工艺技术也早已结合了。一般说来，各国都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对工业的重要性，正如本章开头所引的阿·詹·贝尔福（后为勋爵）那段话所表明的那样。但在20世纪初，对这种重要性认识最深刻的，只有德国；其他国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被应用于某些军事工业，而且对科学研究在促进德国工业的技术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后，才采取步骤以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并为这类技术或工业研究，提供官方或半官方的鼓励和资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期间，就成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局，由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领导；以后，又成立了各种工业研究协会，由政府及有关工业平均分担这种研究协会的经费；还成立了各种研究委员会，并接管了全国物理实验所。在美国，看到英国对战前忽视科学和工业研究所做出的反应不仅表示同情和赞赏，而且还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全国研究委员会，并设置了全国研究奖学会。法国则由于科学和技术早已紧密地结合，因此，不甚需要采取什么新方针了。苏联在革命时期结束紧接着实行改组后，也十分重视大量设立技

术院校并给予必要的设备。上述国家的这些趋向，其目的都在于通过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都强调科学与工业效率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在一个时期中，经过这种训练的年轻科学家数量并不很多；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一批崭新的专业人才，即所谓专业科学家、工业科学家或工艺技术专家正在形成中；直到本时期末，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在企业和各级政府文职机构的科学部门中才有了大批的科学家。各国这时已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关系到它们的生存，这就使专业科学家在他们的国家中获得了公认的地位，而科学研究所需的庞大经费通常也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由于这类科学研究多半必须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所以各大学理工学院系不得不大量增添教职员。许多工业也必须设立自己的研究实验机构，不但其规模往往相当庞大，而且拥有的科技人员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本身必须在基础知识方面取得进展，而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纯科学或纯学术性研究的进展也日益加速。理工科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不仅限于学习某一两门科学，而是像医科学生一向所做的那样，为将来实践自己的专业而做准备。虽然在上述时期初，这种机会确实很少，但接近20世纪中叶时，这已成为专攻科学的青年们的前程了。

紧接着这些变化，开始了另一种发展。在上述时期初，一名专攻科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如果有志于研究工作，需要先在国内或国外跟着一位教授工作两年。他也许享有或者没有（多半是没有）一笔在当时说来是难得的奖学金或津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也许能在某大学的院系里找到一个工作，从而能在他的职务所允许的时间内继续从事这项研究。但一般都是个人研究，由个人利用教学或其他工作的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而且由自己负担费用。众所周知，威廉·拉姆赛爵士就是靠行医所得的诊费，对惰性气体进行了他著名的研究。但是到了20年代初，一个刚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可以从上述那类机构领取津贴。这种津贴是供他在他的教授或导师指导下，专门研究某一项专题用的。这项研究也许是或者不是一项更大的研究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同一实验室里也许还有其他人员也在研究同一课题。经过这样一段工作时间后，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可能在专门研究某一课题的小组中成为一个成员，因而他进行个人研究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组织这样的专题研究小组，是上述时期末期大多数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例如在英国，这种学术研究大多是由科学与工业研究

局、医学研究学会、各种研究协会和一些工业公司资助的。通常是先明确地提出所要研究的课题，然后，根据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和大致时间组织专题研究小组，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难以估计的。在我们所述的这段时期内，许多科研项目的时间性和紧迫性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因此，往往为了解决一项课题，就需要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人通力合作。这就是20世纪中期科学的组织和做法。

关于世界各国人数众多的科学家按其专业组成的各国专业性学会的情况，这里就不详述了。但要指出的是，这些学会依靠其会员的订阅费来出版的刊物，已成为发表全世界大多数科研成果的园地。此外，这些学会还做了另一项有益的工作，就是编辑和出版各种专门学术刊物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的分类摘要。这就使研究人员能够获悉他自己的专业或他所关心的任何其他专业的最新进展。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日益复杂化，不但各种学会有增无减，而且它们的刊物也大大地增加。在这方面，《世界科学期刊一览》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富有参考价值的期刊目录，其第一版包括1900年至1921年这一时期，所载刊物目录包括1900年以前和1900年至1921年间出版的所有刊物，除可能有遗漏外，总数达2.5万种。第二版所包括的时期延长至1933年，所载刊物总数增至3.6万种。第三版所包括的时期则延长至1950年，期刊总数已超过5万种。至于在此期间出版和翻译的科学著作增加了多少，就很难估计了。

我们可以看出，在1921年至1950年间，科学期刊的数目增加了1倍。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是19世纪中叶首批成立的各国科学院的院刊。嗣后，这类刊物数目逐渐增多。《世界科学期刊一览》的统计表明，到了1921年，这类刊物的总数已增至2.5万种，而我们知道，其中大部分是在19世纪增加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1921年至1933年这12年中，科学刊物的种类增加了1.1万种。然后，在1933年至1950年这17年中（其中应除去6年战争时期）又增加了1.4万种。这便是上述整个时期的特征。如果我们再回顾更远的时期，看看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则我们不妨说只要仔细地观察过去100年来的进展，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进展都是在这半个世纪中取得的。同样地，如果再分析一下这些进展，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后25年中实现的。由此可见，在这100年中，进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当一位科学史专家回顾这前50年时，倘若能抛开目前的一些争论——例如关于应用科学发明进行战争是否合乎道德、纠正科学教育狭隘性的办法、技术人员统治国家的危险性以及培养更多的科学家的迫切需要等争论，他就会发现，在这个时期中，科学与技术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和加速的发展。这种发展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中完成的，而其中多半是出于两次世界大战和所谓“冷战”的需要。他将引以为憾的是，科学最初仅是为了探索大自然本身的奥秘而进行的一种研究工作，而现在却关系到各个相互敌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因为如此，科学以往在超然地探求真理的进程中，虽然绝不承认任何国界，但如今却不得不在一道不可逾越的国界面前停止前进。

（罗式刚 译）

[1] 比喻狂妄自大者，典出《伊索寓言》。——译者

[2] 引自《哲学杂志》，1901年第1卷第6期，第313—314页。

[3] 原文如此。按钼的原子序数应为56。——译者

[4] 原文如此。按原子核中并不含电子。——译者

第五章 1900—1912年的外交史

到了1900年，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两个动力，彻底地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均势。在国家控制日益加强的同时，这两个动力已把欧洲的统治权扩展到几乎整个非洲，导致在亚洲的新的竞争，并有助于促成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在财富和力量方面的惊人发展。它们更进一步带来的结果是，欧洲各大国变得更加强大，而各小国则相对地变得更加弱小。虽然主要的“大国”仍然是欧洲国家，但它们同其他大陆各国人民的关系却越来越重要，而造成它们彼此分裂的那些问题，常常涉及远离欧洲的地区。随着交通工具在种类和速度方面的增长，政治影响的范围和灵敏度也就惊人地增加了。到了1900年，国际关系变成了世界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在1800年或从前任何世纪开始时都是未曾有过的。

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关系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巴尔干半岛以外，俾斯麦维持了欧洲的和平，欧洲关系的格局呈现出相对的稳定。但是，俾斯麦在1890年垮台了；解除俾斯麦的职务的威廉二世，是一位才华横溢、容易冲动和举止轻率的年轻皇帝，而且，性情多变；接替俾斯麦的那些较为次要的人物，政策摇摆不定。他们部分是出于对英国的考虑，没能同俄国恢复再保险条约，但确实（在1891年5月6日）恢复了三国同盟；这一切开创了一个具有根本变化的时期。俄国同德国的关系，甚至在再保险条约有效的时候，就已经是冷淡的，它对三国同盟的恢复和英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感到惊慌，因而，开始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俄国出于战略的和经济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它的天然盟友是实行共和制的法国，而法国的政治家也急于寻求俄国的友谊；法俄同盟（双方交换了1891年8月27日签发的信件，同意为维持和平而采取联合行动；1893—1894年冬，两国政府批准了1892年8月18日的秘密军事协定）带来了恰恰是俾斯麦曾经设法防止的那种联合。这些协议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而且没有包含“为了实现任何明确的野心而互相支持的意图”，但却给了法国一种自从1871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全感，并且，不但在德国而且在英国，引起了担忧，因为英国的利益主要是同法国

和俄国发生冲突。力量均势很可能再一次成为欧洲的一个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因素，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一直是基本的因素。然而，到那时为止，并非所有后来结成伙伴的国家都已壁垒分明，而且，新的组合的持久性还有待考验。虽然这时有了两个同盟体系，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特点是，政策如此复杂多变，以致人们把它称为“同盟互相交错”的时期。[\[1\]](#)

欧洲外部也有重大的变化。欧洲的统治权继续迅速扩展，并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开始了新的扩张阶段。

在远东，古老的中华帝国是争夺的主要对象。第一个在现场的是英国，到了1890年，英国以海上力量为基础，在那里已建立了贸易上和外交上的优势。在北方，俄国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横贯西伯利亚的重要铁路的终点站。1891年，俄国在法国资本的帮助下，开始修建这条铁路，并打算用它来改变俄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在南方，法国在间接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了印度支那，正像英国1885年在同样情况下，兼并上缅甸一样，于是，这两个国家就能够渗入中国的南部。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和贸易机构，雄辩地证明了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正发生争执。毋庸置疑，中国是远东的“病夫”，但是，正如对待近东的土耳其一样，欧洲国家在如何对待中国方面发生了分歧。因此，虽然俄国赞同肢解中国的边陲地区，反对贸易上的门户开放政策，而英国则提倡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这个政策使英国在数额不大的中国外贸中获得了2/3的份额。

然而，使远东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在1894年的介入。日本只是在不久前，才摆脱了封建的隔离状态，并以善于吸收西方思想和技术而使世界震惊。它在琉球群岛和朝鲜问题上同中国发生争执，并决心防止这两个地方落到欧洲的尤其俄国的控制之下。经过一次短暂的和成功的战争以后，根据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日本迫使中国割让福摩萨岛[\[2\]](#)和大陆上的辽东半岛及其有价值的不冻港旅顺，给予日本在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并承认朝鲜独立。这个结果对俄国和德国来说，都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因为俄国的统治者开始设想攫取满洲，并最终使中国沦落到附庸国的地位，而德国在俄国的勉强默许之下，则策划攫取中国的一个港口；这两个国家连同那

个认为应该支持俄国的法国一起，要求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日本答应了，接受一笔赔款作为代价，但对俄国和德国深为不满，总有一天要向它们报复。这样，远东事务促使那些在欧洲处于对立地位的欧洲国家，在亚洲结成了松散的联盟。欧洲国家的合作断断续续地维持了10年，事实上，这种合作是欧洲反对英国的政治家们一再敦促的那种欧洲大陆反英同盟在中国的一种表现。那些自命为中国的支持者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得到报酬。俄国很快就得到了报酬，主要是在建筑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方面，这条铁路使它便于渗入满洲，而法国则获得了在云南地区建筑铁路的特许权。两年以后，德国在1897年11月14日，攫取了胶州湾的一个基地。俄国拒绝英国关于“划分优势”^[3]的提议，在1898年3月，占领了它所垂涎的旅顺港，并把这个港口改建为海军基地，这时，对中国的掠夺就更深入一层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欧洲国家都在毗邻的领土上获得经济利益，它们宁愿索取租借地，而不宣布断然的兼并。这是一个方便的新方法，“根据这个方法，外国列强可以获得殖民地权力的实质，而不需要所有权的彻底转移”。^[4]不可避免的是，其他国家感到需要寻求一些类似补偿的权益，于是，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尽管英国以及后来（1899年）美国做出姿态，要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该政策大体上已失败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成了主导的事务。

这些事件具有意义深远的后果。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在1900年的义和团叛乱中表现出来了，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馆遭到围攻，包括德国公使在内的许多洋鬼子被杀死了。与此同时，日本对俄国的反感由于俄国攫取旅顺港而加深了，它开始考虑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以防止俄国进一步扩张。当义和团叛乱使得俄国军队能够大举进入满洲的时候，日本的疑虑以及始终反对俄国对华政策的英国的疑虑就加深了。因此，欧洲的主要国家和日本虽曾联合起来，派遣一支国际军队对付义和团，并强迫中国政府进行赔偿，但在20世纪开初，中国问题成为增加白人国家之间的摩擦的诱因。尤其是，英俄利益已经在广阔的领域里发生了冲突，而中国问题又给这个领域增加了一个新的庞大地区。

然而，由于俄国全神贯注于中国问题，因此，在近东，它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由来已久的争执，便有了一个间歇期，同时，这种比较令人满意的事态由于1897年5月的协议和1903年的穆尔兹台格方案

而被巩固下来了。根据1897年5月的协议，两国放弃为自己进行任何掠夺，如果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现状会因此而受到干扰的话；在1903年的穆尔兹台格方案中，它们同意协力解决马其顿事务。但是，奥地利与俄国关系的暂时改善，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事务不再令人烦恼或不再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从属的少数民族的新骚动，由于亚美尼亚（1894年）、克里特（1896年5月）和马其顿等地的起义，土耳其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再一次被震动了。1895年英国扬言要显示海军威力，以此作为一种威胁手段，劝使土耳其不要通过屠杀亚美尼亚人来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后来只是由于俄国以反措施相威胁，才制止了英国实现它的恫吓。在克里特，叛乱促使希腊向土耳其发动一次毫无希望的进攻，结果各大国进行了干涉，防止冲突扩大到巴尔干半岛各国，并迫使土耳其同意克里特人在一名希腊地方长官监督下实行自治。

正如以前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土耳其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些风暴，主要是因为各大国的利益互相冲突。传统上，英国是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主要支持者。但是，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自1879年以后便衰落了，而且，由于索尔兹伯里深信土耳其的改革毫无希望，他的同事们由于法俄缔结同盟便不愿让英国舰队为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冒险，因此，英国在地中海东端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保持土耳其，而是控制尼罗河流域。于是德国便起而充当土耳其支持者的角色。早在1881年，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就着手训练土耳其军队，1888年，德国一家辛迪加获得特许权，建造一条从伊兹米特到安卡拉的铁路。1889年，德皇第一次访问了君士坦丁堡，1898年，在大马士革，他示威似的宣布了他对穆斯林世界的友谊。1888年关于建造铁路的特许权，标志着德国经济势力开始迅速扩张。德国政府自然赞成这些事态发展，而这些事态发展又得到了1897年派驻君士坦丁堡的能干的德国大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男爵的大力支持。几年内，他在土耳其首都获得了一种优势地位，同时，德国“企业创办人、银行家、商人、工程师、制造商、船主和铁路建造者”^[5]的效率，很快就损害了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并在近东建立了类似德国经济帝国的局面。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德国控制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在1899年获得准许，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达尔帕夏建造一个贸易港，土耳其原则上特许德国把铁路从科尼亚延伸到巴格达和波斯湾。

对土耳其自己来说，这些事态发展似乎是非常可取的：铁路将给帝国的落后地区带来繁荣，并使政府能够比较迅速地调动军队去保卫边疆或对付内部动乱，而遥远的和表面上无私的德国在经济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似乎是对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的最好保证。但是，就国际关系来说，这种经济渗透不能不具有政治意义。其他国家感到震惊的是，德国势力沿着从柏林到君士坦丁堡的轴心，斜跨大陆进行新的扩张，可能要把欧洲分成两半。这样一个轴心横切了俄国穿过巴尔干半岛各国向地中海扩张时可能要经过的路线，而土耳其势力在德国影响下的复兴，则可能挫败俄国要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夙愿。再者，这个轴心穿过小亚细亚向波斯湾延长，可以被看成是对英国在埃及和波斯的利益的威胁。因此，虽然德意志银行设法寻求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资本，来资助巴格达铁路的建造，但上述各国政府不可能把这看成纯粹的商业活动。俄国对德国获得海达尔帕夏的特许权表示震惊；根据1900年的黑海协定，它强迫土耳其人承认，在安纳托利亚北部和亚美尼亚的任何铁路特许权，只能授给沙皇所批准的俄国公民或辛迪加；它最后不再同意俄国资本参与巴格达铁路的扩展。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一直赞成使该铁路具有国际性质，但本已对德国高度怀疑的英国舆论却大声疾呼，反对英国一家金融辛迪加的参与，以致他们撤回了支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说明外交活动有时不得不在新的舆论力量面前退却。法国政府被迫追随俄国，也拒绝给予官方的支持，这样，德国人1904年在没有获得外国政府的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开始建造第一段铁路。德国侵入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为它们自己划定的势力范围，这就把一个新的制造纷乱的因素引入国际关系中去，尤其是，给德国同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

欧洲大国推行它们的瓜分方案的第三个大地区是非洲。在这里，主要的特征是，法国和英国长期争夺殖民地，德国决心使它的势力产生影响，意大利企图征服一个新的领地而遭到了失败。

英国和法国的利益在许多地点发生冲突，虽然西部的边界争端通过1898年6月14日的英法协定已得到解决，然而，在更东的地区，双方的争执则不那么容易调停。主要的紧张局势是随着争夺对上尼罗河的控制而来的。对于自从1882年以来就成为埃及事实上的霸主的英国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埃及的繁荣取决于尼罗河河水。英国在1894年至1895年试图同法国就势力范围的界线达成协议，但没有获得

任何结果。法国一直认为主要是由于它的怯懦，英国人才获得了对埃及的独家控制。对于这件事，它始终耿耿于怀。再者，法国的一些殖民扩张主义者希望，从大西洋到红海或印度洋，获得一片连绵不断的领土。为了这样一个计划，并且为了在埃及向英国施加压力，上尼罗河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法国在1896年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把法国国旗插在法绍达。同年，英国政府派遣吉钦纳去重新征服英国在1884年撤离的埃属苏丹，1898年，他攻占了喀土穆。1898年9月25日，当吉钦纳发现马尔尚的法国军队驻在法绍达，并命令他们撤走时，英法两国关系发生了从1815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英国政府动员英国新闻界支持它的立场（新闻界异乎寻常地获得了外交部的直接信任），并且在马尔尚的军队奉命撤退以前，拒绝谈判。英国和法国当时处在交战边缘上，在19世纪90年代，这是第二次（1893年由于暹罗问题，双方关系曾经有过极度的紧张）。但是，法国的新外长德尔卡塞及其同僚明智地认识到，法国没有条件进行一场殖民地战争来反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11月3日，他们下令撤离有争议的领土。1899年3月21日的英法协定，在尼罗河和刚果河之间的流域地区，划分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范围，有关控制上尼罗河的问题，在有利于英国的情况下解决了。

法绍达危机使得法国的许多殖民主义者相信，法国已经不再能够对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进行有效的挑战。他们反而敦促德尔卡塞向英国建议，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只要英国也能够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要求。^[6]这就是几年以后英法协约谈判的基础。不过，在法绍达危机善后处理中，德尔卡塞仍然不愿放弃法国在埃及的残余权力。然而，除埃及以外，他却真诚地希望法国和英国之间在其他方面的争端能够迅速而友好地获得解决。因此，1899年年初，法国新任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曾几次试图和索尔兹伯里达成谅解。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德尔卡塞于1899年8月对英国大使说，事态似乎表明“要在友好的基础上和英国保持关系是不可能的”。^[7]德尔卡塞不久即认为英国卷入了南非战争，这是法国向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进行一次新的挑战的时机。

在南非，主要的互相冲突的利益是英国和德国的利益，因为德国在1884年在西南非已站稳了脚跟；纠纷的主要根源是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19世纪80年代的淘金热，促使大批新的白人人

口涌进布尔人各州，但在当地却不受欢迎。这批白人很快就相当于并可能超过原来的布尔种族。对这些外国人来说，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总统的限制政策变得如此令人厌烦，以致他们在毗邻的英属领土的某些人的纵容下，公开策划叛乱。詹姆森^[8]在1895年发动袭击，企图加快这样一次叛乱，但遭到了惨败。这个事件最具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德皇的干预，他在1896年1月3日打电报向克留格尔总统祝贺，因而在英国引起了激愤。再者，这封电报鼓励克留格尔相信，他可以依靠外国的援助，于是，他的态度变得更不妥协，终于在1899年10月导致布尔战争的爆发。

尽管德国在南非进行直接的干涉是孤立无援的，但是，英国在南非的困境，葡萄牙的财政困难，这些情况都给德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为不再进一步鼓舞布尔人而索取代价。这就出现了1898年8月30日的安格拉协议。在这个协议中，英德两国确定了它们的利益范围，同时也确定了葡萄牙人一旦放弃其殖民地时它们将要占领的那些地区。但是，翌年，当事实表明为了报答葡萄牙停止向德兰士瓦输送武器的保证，英国向葡萄牙重申了有关殖民地的保证时，上述含糊的安排对德国产生的良好作用就被消除了。德国人觉得受骗了，而他们对英国人这次“背信弃义”所留下的记忆，无疑地会对未来的英德之间的调解形成一个障碍。德国外交部的有影响的司长冯·霍尔施泰因男爵愤慨地说：“同这些人不可能订立盟约。”^[9]然而，尽管两国彼此不信任，德国在布尔战争期间还是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英国的孤立地位，而英国的这种孤立地位却是其他国家希望加以利用的。例如，德尔卡塞最初就曾希望德国会采取外交主动，参加法俄的两国同盟，目的在于迫使英国遵守它做出的关于秩序一旦恢复即从埃及撤出的保证。但是，1900年3月德国却声称，德国在考虑干涉之前，必须获得法国承认欧洲现有边界的保证。这个问题涉及法国承认阿尔萨斯—洛林永远成为德国的一个部分的问题，而这种要求德尔卡塞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认为，这一点就是德国为法德进行合作规定的条件，于是便始终不渝地拒绝与德国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主张。因此，正像南非的事态，在英德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而且不容易根除。同样，布尔战争也是法德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样，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便在欧洲的某些国家之间导致了严重的摩擦。但是，非洲的殖民地问题，总的说来，是从属于欧洲的种种利

益的，而且，也没有严重地妨碍这一过程，即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地区置于欧洲大国更有效的控制之下。然而，欧洲的另一个大国意大利的扩张企图却不那么成功。意大利希望将埃塞俄比亚沦为附庸，但1896年，它在阿杜瓦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从而打击了白人的威信，改变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所致力方向，并对它在欧洲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19世纪90年代也同样由于美国取得新的进展而具有深远的意义。在美国，具有扩张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又一次占优势。1895年，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边界争执时，克利夫兰总统所发出的美国的好战口吻，赋予门罗主义以新的附加内容，并迫使全神贯注于南非事务的英国诉诸仲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同西班牙的战争（1898年4月至8月），这次战争不但导致美国建立对古巴的保护关系以及兼并夏威夷群岛和波多黎各，而且还导致美国对关岛和菲律宾群岛进行直接统治。兼并菲律宾群岛一事，使多年对太平洋地区的渗透行为突然达到了顶峰，引人注目地背离了把美国政治责任局限在西半球的那个传统政策。虽然这件事没有自动地使美国卷入远东的角逐中去，但意味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但在贸易上，而且在领土上和战略上，美国非常可能这样卷进去。不管多么勉强和犹豫，美国人还是开始有了世界大国的意愿和野心，因为他们的财富和人口已经促成他们必须这样做。

欧洲疆界以外的这些事态发展，虽然没有严重地影响欧洲内部的各个联盟体系，但却揭示出这些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而致克留格尔的电报和法绍达之类的事件所造成的战争紧张形势和危险，引起了一种不安全感，从而迫使各主要国家设法加强它们的地位。这种加强地位的做法导致联盟体系臻于完善，它是我们论述下一个10年的主要课题。

这种不安全感由于防务性军备的增长而加深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事预算自从1878年以来几乎增加了两倍，英国和法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多或几乎一倍。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协商裁减军备，沙皇在1898年实际上提出了这种建议。俄国在8月24日关于建议召开国际会议的照会中敦促说：如果军备继续增长，就会发生“人类不堪设想的巨变”。但是，沙皇所做的姿态发生在俄国攫取旅顺港以后不久，因而遭到了不信任和怀疑。首先，德国“无意在军备问题上

束缚自己”^[10]，而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1899年5月至7月）仅有的一些积极成果是：建立了常设的仲裁法庭，通过了有关战争规则的两个公约。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海牙法庭后来证明是调整国际关系的一个持久而重要的工具；但是，海牙和平会议的令人沮丧的结果立即使人们看出，军备竞赛将继续下去。不久以后，这将不但在陆地上而且在海上构成危险。

当海牙和平会议还在举行时，法国在德尔卡塞的倡导下恢复和扩大了它同俄国的联系。因为他十分担心弗朗西斯·约瑟夫死后奥匈帝国有解体的危险。1899年8月9日，法俄交换了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法俄同盟的主要目标由原来的“维持和平”改为“维持力量均势”。这个重新规定的含意（后来广泛地被认为是暗示法国将比以往更乐意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是德尔卡塞企图将其作为一个法俄声明，来反对据认为德国抱有的野心，即一旦奥匈帝国瓦解，便夺取的里雅斯特，并在地中海站稳脚跟。与此同时，原来只打算和三国同盟保持同样长久的军事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从而保证不论奥匈帝国怎样解体，法俄同盟这时将保存下去。1900年，两国间的军事安排也进行了调整，以便在发生同英国作战的风险时能够适用，1901年，为了这个目的而缔结的协定被批准了。20世纪初，两国都必须考虑可能同英国作战的危险性。这并不意味着，德尔卡塞放弃了同英国取得谅解的目标，但表明他仍然怀疑这种谅解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法国与意大利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结束了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时开始的紧张时期。法国自然欢迎有机会使三国同盟中的第三个伙伴比较不那么重视自己的义务，而意大利由于未能攫取埃塞俄比亚，便以更加渴望的目光注视着地中海对岸的黎波里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未开发的属地。意大利对黎波里的任何企图要获得成功，首先必须与占有毗邻的突尼斯的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一些新人物帮助促成了这种变化，他们是：意大利的首相鲁迪尼，外交大臣维斯孔蒂·威诺斯塔和普里尼蒂，法国的德尔卡塞和法国1898年派往罗马大使馆的卡米耶·巴里埃。1898年，一个贸易条约结束了1888年开始的关税竞争，这种竞争对意大利的损害，超过了对法国的损害。随后是1900年12月14日的秘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允诺意大利可以在黎波里放手行动，而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法国得到最后胜利是在1902年，当时意大利（刚刚第四次恢

复了三国同盟，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强使奥地利承认它在的黎波里的利益）向法国秘密保证：如果由于“直接的挑衅”，法国遭到攻击或被迫宣战，意大利将保持中立。因此，由于意大利的地中海利益和法国的巧妙外交，意大利便做出许诺，这个许诺必然不符合意大利在三国同盟中的义务的精神。虽然这个许诺的文本在1920年以前一直秘而不宣，但德尔卡塞在法国议院的声明声称，法国这时对意大利不必担心了。然而，事实上，这种许诺是模棱两可的。虽然法意关系的改善通过1901年意大利的一支海军分舰队访问土伦以及随后两国首脑的互访中已经显示出来，但是大国中最弱小的意大利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因此德国对这些事态发展自然感到恼火，尽管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帝国首相却假装把它当作无害的调情。正像法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种调情后来“发展成为勾搭”。[\[11\]](#)

法国当然要设法扩大它的朋友圈子。对它来说，孤立状态一直是一种失败的惩罚。对英国来说，它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现在由于英国对需要安全的一种新认识而要放弃这种超然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态度，但这却是一个孕育着重大结果的事态发展。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是由于布尔战争和担心俄国而产生的。在大多数的英国政治家和相当一部分舆论看来，俄国直到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为止，一直是英帝国利益的日益增长的巨大威胁。

最初，英国最天然的盟友看来是德国。但是，早期的谈判毫无结果。因此，在看来是要削弱英国国际地位的法俄同盟签订后，德国一些统治者便倾向于相信，英国不久就会恭恭敬敬地来找他们，使他们能够就英德友谊索取高价。虽然德国人有时沉湎于公开敌对的迷梦，想要结成大陆联盟，以便摧毁英帝国，但他们的总政策是要在俄国和英国之间保持放手行动的自由，不过，同时要表明，有铠甲保护的手中却握着利剑。因此，德皇受到他的首相比洛的鼓励而相信，他可以扮演世界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德国就走上了一条令人不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为了打破法俄同盟，并使英国就范，德国便咄咄逼人地显示了它日益增长的力量。

德国这种政策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致克留格尔的电报，这件事第一次使英国感到，解决英国的一些分歧，并在欧洲赢得一个朋友，将是明智的；但是，英国却转向俄国，而不是德国。索尔兹伯里关于英俄互相承认在土耳其的利益范围的建议，是作为更广泛的解

决方案的一个部分提出来的。这是几个这样的提议中的第一个，但是，直到它被日本打败为止，俄国一直认为，同英国达成协议，对它的扩张主义政策是一个障碍而不是协助，因而充耳不闻。

首先是远东问题使得以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一部分重要的舆论深信，放弃孤立状态的时候已经来到。在不能考虑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下（日本当时还无意缔结同盟，以免挑起同俄国的武装冲突，因为日本对此尚未做好准备），张伯伦便转向德国。1898年，在索尔兹伯里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建议，以“有关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政策的互相谅解”为基础，结成防御性同盟。但是，中国并不是德国的主要利益，而德国并不想站在英国一边反对俄国，也不想为英国在远东火中取栗。通过保留放手行动的自由，德国人反而希望，从英俄之间似乎非常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得到好处。英德之间的协商逐渐停止，张伯伦后来公开声称，英国需要同某个“陆军强国”结成同盟，这在德国或英国都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实际上，1914年以前，英德关系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公众对德国表示冷淡或怀有对抗情绪，而德国的大部分舆论对英国则有明显的和日益增加的敌意。这种相互间的反感，主要是从布尔战争时期开始的，后来由于在19世纪90年代两国的廉价大众报刊的发展，而更加普遍了，因为双方都不十分了解对方报刊的工作情况，而且双方政府都不完全能够限制本国报纸不大量流露敌对的感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同盟是很难实现的。

张伯伦尽管遭到了失败，但还是不愿放弃他那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传统相违背的迷梦，即想在陆军强国和海军强国之间结成伙伴，因而，当德皇在1899年11月访问英国时，他又重提结盟的问题，这一次是要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结盟。但是，当张伯伦在莱斯特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英国同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天然联盟”时，他在英国得到的支持少得令人吃惊，在美国遭到了批评，在德国遭到了暴风雨般的敌对评论。再者，比洛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对张伯伦的提议泼了冷水，并谈到需要建立强大的德国舰队。1900年1月提出的第二个德国海军法案所包含的原则是，“德国必须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舰队，以致即便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敌人，也只有自己冒着严重的危险，才能攻击它”，这个法案继续了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的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所开创的、具有潜在的挑战性质的政策。英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当英德两国根据1900年10月16日长江协定（“在大

不列颠和德国之间为了进行外交合作而签订的唯一正式协定”[\[12\]](#)），“在两国能够施加影响的地方”着手维持中国的完整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时，由于对该协定的解释发生了尖锐分歧而很快就闹翻了。

为了实现结盟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01年。这次尝试的起源大概是由于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埃卡德施泰因个人的主动精神，并再一次得到张伯伦及其朋友的支持。后来，在德国那一方面便发展成为一个建议，要英国参加三国同盟。但是，索尔兹伯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保卫德国和奥地利的边界免遭俄国侵犯的负担，要比保卫英伦三岛免遭法国侵犯的负担更重一些”[\[13\]](#)——而且，由于德国人只有在英国承担这种义务的情况下才会满意，而不再对地区性合作（例如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提出的关于在远东的联合）发生兴趣，所以，这些协商也同样没有结果。如果德国人真正希望获得英国的友谊，那么，他们坚持要英国参加三国同盟的做法表明，德国人缺乏心理上的洞察力，因为正如英法协约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没有任何正式的约束，同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也是起作用的。比洛及其同事仍然相信，他们只要再等一些时候，英国就会重新提出请求并付出代价。尽管张伯伦在1898年4月给予明确无误的暗示，德国人还是认为，英国不可能转向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估计是严重的。

远东出现新的紧张局势，是促成这些谈判的一部分背景情况。一方面，据说中国同意承认俄国在满洲的霸权，日本对此感到惊慌，于是便试探英国是否给予支持以反对俄国。另一方面，俄国蚕食满洲和波斯，使英国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立。但是，兰斯多恩一直到他在寻求德国的支持以抑制俄国以及直接与俄国达成妥协均告失败时，他才打算单独和日本结盟。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家们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与英国结盟有利（主战派），一派主张与俄国和解。因此，当日本驻伦敦大使林男爵在伦敦进行会谈时，伊藤公爵又被授权访问圣彼得堡，以便试探同俄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日本人鉴于过去的经验，丝毫不能肯定，这两个目标中哪个能够实现。但是，在英国重新向俄国提出自己的建议遭到失败以后，兰斯多恩便深信英国需要日本的支持，因此在伊藤报告说俄日协议也有可能实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原则上做出保证要同英国结盟。日本人不能两者得兼，但又不愿当谈判已取得这样的进展的时候撤销原议同英国疏远，因为英国曾避免干

涉日本人在马关的胜利，并且第一个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因此，在1902年1月30日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标志着英国放弃了在远东的孤立状态，并且引人注目地突出了日本在各国中间为自己赢得的地位（见第十二章）。

根据这个将要持续5年的条约的条款，日本看来比英国得到更多的好处。按照第一项条款，双方都各自承认对方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英国同时还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则拒绝扩大它的义务，不同意把印度、暹罗和海峡殖民地包括进去。按照第二项条款，如果任何一方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卷入同第三国的敌对行动，那么，另一方就严守中立。按照第三项条款，如果签约国之一为了保护这些利益而同两个国家作战，那么，另一方就必须前来援助。换句话说，如果俄国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英国将保持中立，但是，如果法国参加到俄国一边，英国就必须帮助日本。这个条约大概使俄日之间的战争变得比较可能发生（尽管这并非出自兰斯多恩的本意），但也使法国的参与变得比较渺茫；因为如果“法国不肯为争夺尼罗河流域而作战，那么，它就更加不可能为朝鲜而拔刀相助”。^[14]对英国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联盟所包含的内容，而是结成联盟这一事实”^[15]，因为如果俄国和日本同意采取共同的政策，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一般说来，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由于英日同盟解除了英国在远东受到的压力，英国便能够加强其本国海域中的舰队力量。兰斯多恩在这个新方针路线中设法“集中自己的军事资源以便加强英国的全球利益”。^[16]这个新的方针路线在西半球也无独有偶。1901年11月18日签订的海—庞斯福特条约使美国能够着手建造并保卫横穿地峡的运河。但是，这个条约实际上标志着英国交出了它在加勒比海的海军优势。然而，这却使英美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

虽然英日同盟使俄日之间的战争变得比较可能发生，但并没有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或使日本不再试图通过协商解决它的分歧。导致冲突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集团控制了俄国的远东政策。

在俄国这样一个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里，如果独裁者本人如同尼古拉二世那样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那么，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向

沙皇施加影响而互相倾轧，政策就可能出现剧烈的摇摆。能干的财政大臣维特和他的大多数同僚都赞成在中国实行和平渗透的政策，但是，1903年8月维特下台并任命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上将作为直接向沙皇负责的远东总督，则标志着一个以名叫贝佐布拉佐夫的冒险家为首的奸党集团上了台，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不惜策划战争的。结果，俄国没有实现它在1902年4月关于撤出满洲的许诺，而在1903年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以后，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实现和平解决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最后，日本人确信俄国不守信义，便决定采取他们早就做好准备和行动。如果要作战的话，那就应当在日本人选择的时刻进行，也就是在日本人的海军备战已经完成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尚未竣工的时候。1904年2月8日，日本人没有宣战，就袭击俄国在旅顺港的舰队，开始了敌对行动。俄国人遭到突然袭击，失去了制海权，并很快就遭受一系列的挫败。经过7个月的围攻以后，旅顺港在1905年1月2日陷落；沈阳在1905年3月被攻占；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半个世界，企图重新控制中国海，5月27日，却在对马海峡覆没。与欧洲大多数军事专家的预料相反，日本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打败了俄国巨人，像在克里米亚战争一样——但更加富有戏剧性——沙皇帝国再次表明是一个泥足巨人。俄国欧洲部分的不同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骚动，沙皇政府不再能够继续作战，便欣然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调停。按照随后签订的1905年9月5日的朴次茅斯条约（时间在英日同盟为延期5年而修订和续订以后的一个月），俄国人割让了旅顺港和库页岛的南半部以及他们在满洲建造的铁路的南半部。俄国人也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权力，而日本在1910年正式兼并了朝鲜。尽管日本的舆论感到失望，但除了维持战俘的费用以外，日本却能够放弃要求任何赔款：日本已经达到目的，日本的节制，为改善它同俄国的关系并为后来的第二个协定（1907年）铺平了道路，该协定把满洲划分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一个亚洲国家在一场较大的战争中证明胜过一个欧洲大国，这还是第一次。正像保罗·康邦所预见的那样，虽然这场战争局限在远东，而且没有涉及法国及英国，但它后来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并“将影响整个世纪”[\[17\]](#)。

与此同时，俄国的盟友和日本的盟友——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要了解这种重要的变化和弄清法国的政策，关键在于摩洛哥。摩洛哥实际上是被法国北非领地所包围的一个飞地，它毗连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很长而又没有划清。在精力旺盛的苏丹莫莱·哈桑统治期间，外国势力不能渗入；但在他于1894年逝世后，摩洛哥国土显示出瓦解的迹象。德尔卡塞担心其他某个大国利用摩洛哥的虚弱，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并危及阿尔及利亚的安全，便决定法国迫切需要获得其他国家对它的特殊利益的承认。于是，在1900年获得意大利的同意以后，他在1902年开始同西班牙谈判，西班牙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是特别关心摩洛哥事务的另一个地中海国家。然而，谈判失败了，因为西班牙在没有得到那个占据直布罗陀的国家的同意以前，不愿采取行动。但是，这时摩洛哥发生叛乱，面临着一场动乱，这就迫使兰斯多恩第一次考虑要在摩洛哥问题上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由于法国的盟友俄国同英国的新伙伴日本之间在远东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因此这就着重说明和解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可取的。1903年年初，当德尔卡塞与西班牙的谈判破裂后，紧接着有消息说，兰斯多恩可能准备谈判；康邦报告说，德尔卡塞最后终于认识到，英国在摩洛哥给予支持必须在埃及或其他地方获得代价。

在1902年8月开始的谈判中，德尔卡塞获得了1898年12月以来法国驻伦敦的大使保罗·康邦的大力支持，而且由于1901年1月即位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亲法气质，他的任务变得比较容易完成。再者，英王爱德华和法国总统卢贝在1903年的互相访问，也有助于在两国间建立更加友好的感情。但是，只是到了1904年4月8日才签订了全面的协议，这个协议成为后来的英法协约的基础。在这期间，双方一再地竭力讨价还价，因为讨论的范围扩大，涉及全部殖民地利益。对英国来说，由于法国急于要在摩洛哥站稳脚跟，这就为它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机会，来获得法国对它在埃及的地位的正式承认。但是，摩洛哥问题和埃及问题都有其复杂性，而且纽芬兰渔业这个老问题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法国人在放弃他们对通商海岸的权利的时候，作为交换条件，既要求在财政上，也要求在领土上给予赔偿，法国人最初对冈比亚的要求以及后来对尼日尔河右岸广大地区的要求，使谈判延长了几个星期。

最后的协定包括三个协议。按照第一个协议，法国放弃了它由于乌得勒支条约而获得的关于在纽芬兰捕鱼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它

获得科纳克里对面的洛斯群岛，同时冈比亚与塞内冈比亚之间的边界也进行了调整。第二个协议调整了英法两国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实行的共管制度，并划定了在暹罗的势力范围。按照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协议，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而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则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此外，还有某些直到1911年才透露出来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为埃及或摩洛哥最后可能改变地位做出了规定，尤其是其中有一项，规定在摩洛哥的苏丹在将来任何时候不再行使权力时，必须保证西班牙的利益。这项条款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法国和西班牙进行了新的谈判，最后产生了1904年10月3日的秘密的法西协定，这个协定确定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并规定，如果法西双方一致认为不再能够维持现状，西班牙有权在其势力范围内立即采取行动。这样，德尔卡塞便得到了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三国的同意，许可法国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获得摩洛哥的最大份额。但是，德尔卡塞忽略了同德国磋商，结果英法协定——他的事业中最大的胜利——后来也证明是使他垮台的原因，尽管他的政策没有垮台。

1904年的协议只不过是対悬而未决的争执做了合乎常识的解决，从而结束了长期的摩擦。它反映了英国保守党政府显然的傲慢偏见。这个协议没有带来什么联盟。除了摩洛哥的情况以外，它没有为未来的外交合作做出规定；它的目标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大概有助于使它获得成功，而早些时候的英德谈判的目标则范围太广，界限不清。再者，这个协议具体地证明了英法两国关系的改善，而英法报刊论调的改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双方关系改善的事实不久以后就受到了考验，并且胜利地存在下来。经过考验以后，真正的英法协约方告实现。

与此同时，其他的事件使英法两国政府倾向于进行合作。德国舰队的增长促使英国当局在1903年3月决定，在罗赛斯创建新的海军基地，并把大部分海军部队调回本国海域。由于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法国的友谊就变得更加需要了，尽管自1902年以来法国的海上总兵力在下降。英法两国政府也由于日俄战争而感到焦急，并对防止战争扩大表示关切。因此，在1904年10月，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驶往远东途中，夜间无意中向英国赫尔地区的一些渔船开火，造成一些伤亡时，法国外交在劝使俄国人迅速给予赔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

后，法国人尖锐地意识到英俄摩擦的危险，便不断地敦促英国甚至要像解决英国同法国的分歧那样，去解决英国同俄国的分歧。

使英法友谊第一次受到严峻考验的是德国。德国对英法协定的最初反应是和解的，没有特别强调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但实际上，德国外交部深为恼火。事实上，德国的外交地位一落千丈：意大利不再是可靠的盟友，奥匈帝国苦于日益增加的内部困难，而法俄同盟和英法协定这时似乎威胁着要把它包围起来。德皇及其顾问们不久以后就因为感到德国遭到包围而经常惶惶不安。再者，德国人由于英法两国没有同他们磋商而感到恼怒。“德国必须抗议法国蓄意占有摩洛哥”，霍尔施泰因写道，“这不仅是为了实质性的理由，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威信……如果我们在摩洛哥任人践踏，那么，我们就会在别的地方招致类似的待遇”。^[18]选择抗议的时机需要仔细的考虑，在最初发表了息事宁人的声明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德国保持谜一样的缄默。只是到了1905年3月，在德皇勉强地访问丹吉尔，并响亮地提到德国决定保护它“在摩洛哥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利益”时，世人才大吃一惊。这次演说是对法国和英法协定发动强大外交攻势的前奏曲，并伴有报界的强烈宣传运动。

毋庸置疑，德国政策这种明显的大转变的时机选择和凶猛来势，是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俄国既然被搞垮了，德国便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来瓦解刚刚开始英法协约，并搞掉德尔卡塞，就像当初俾斯麦搞掉布朗热那样。有证据证明，德国总参谋长赞成对法国发动防御性战争，但是，尽管比洛准备用战争进行威胁，而且他的行为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战争仍然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但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德尔卡塞关于谈判的提议遭到拒绝，德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的形势。如果法国人坚持他们的立场，那就要冒战争的风险；如果他们屈服，他们也会蒙受耻辱。德尔卡塞极力主张坚持下去，理由是德国在虚张声势，而英国的支持是有保证的。这种看法太过火了；虽然英国由于德国的行动含有向英法关系挑战的意思而感到激动，但兰斯多恩所提议的只是，“在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多少令人不安的时期中，为了预先对任何令人忧虑的复杂情况做好准备……英法两国政府应当进行全面的和秘密的磋商”^[19]，但是，德尔卡塞及其顾问们对于这一声明，似乎是根据他们认为英国军事首脑曾经提出给予军事支持这种非正式的保证来

进行解释的。但是，德尔卡塞的同僚们对英国却不那么依赖，他们知道，英国的主要力量——海军不能“靠轮子跑”^[20]，并且，痛苦地意识到德国的陆军优势。他们拒绝了德尔卡塞的冒险政策，德尔卡塞在6月6日便辞职了。卢维埃关于法德达成协议的提议被比洛拒绝，法国不得不接受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现在可以希望，法国会认识到，英国的支持是毫无价值的。翌月，德皇同俄国订立一项条约，似乎抵消了法俄同盟的威胁，这时他踌躇满志，兴高采烈，因为欧洲大国形成不同集团所造成的整个局势，似乎就要变得对德国有利。但他所看到的仅是一个幻景。

德皇曾经鼓励沙皇同日本作战。在1904年，当战争爆发时德国看到有机会设法“修补通往圣彼得堡的通话线路”，便把一个防御性同盟条约的草案送往俄国首都。这个草案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因为沙皇感到，如果对这个草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就必须同法国磋商。但德国却继续献殷勤，并且超出中立的界限，给俄国船只加煤，翌年，在芬兰的毕由克的私下谈话中，德皇说服沙皇签订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如果签约国之一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进攻，另一方将在欧洲给它支持。但是，这两位君主亲手做的事情据当时不在场的大臣们看来却不高明。比洛认为，如果英国及其易受攻击的印度帝国是未来的敌人，“在欧洲”这种措辞就使该条约变得不利于德国，因而竟然打电报提出辞呈（然而，人们说服他撤回了辞呈）；另一方面，拉姆斯多尔夫则立即宣布，这种安排由于没有提到俄国的盟友法国，因而是无法接受的，而德国人的打算是要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才让法国参加进来。当俄国人向法国试探，是否可能把法俄同盟扩大，以便包括德国在内，俄国人得到了他们预期的答复，即法国的意见是它不能容忍一种更密切的关系。沙皇随后写信提议加上一条规定，即一旦法德之间发生战争，该条约将不适用，于是，这件事就此结束。对于这样软弱无力的同盟，德国是不可能感兴趣的，结果，毕由克条约虽然从来没有正式被废除，但实际上流产了。

这些谈判影响了摩洛哥问题的发展。只要有机会同法国和俄国结成欧洲大陆的大同盟，德国人在德尔卡塞辞职后，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一直是调和的。但是，一旦这个计划宣告失败，摩洛哥问题就仍然是用来反对英法协约的主要手段。自由党政府在英国的重新上台，促

使德国采取一种不妥协的口吻，德国指望召开它所要求的国际会议，以便使它得到满足。

然而，德国又一次注定要失望。1906年1月16日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会议上，有关争论最大的问题——摩洛哥各港口的警察组织问题，德国只得到奥地利的支持。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而俄国由于急需法国的大笔贷款，则坚决地站在法国和英国一边。大多数国家接受法国的观点，即警察组织应当委托给法国和西班牙官员；1906年4月7日的阿尔赫西拉斯法案中所体现的最后的妥协办法，对德国来说，只是可怜的慰藉罢了。根据这个妥协的办法，苏丹将警察组织委托给法国和西班牙官员管辖，同时，在他们上面，另设一名瑞士监察长，该监察长将向外交使团定期报告新的警察组织的工作情况。德国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各国承认摩洛哥事务是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法国所希望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而上述的承认则意味着，如果时机到来，德国可以合法地再次提出摩洛哥问题。然而，除了这一点以外，阿尔赫西拉斯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德国的外交活动弄巧成拙，它的相对的孤立地位公开暴露了；它没能够为自己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而且，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能够搞垮英法协约。实际上，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格雷要比兰斯多恩更为重视英法协约。英国政府不但给法国以外交的支持，而且还暗示，一旦德国进攻法国，英国不能保持中立。此外，他虽然拒绝向法国书面保证给予武力支持，但他在英国内阁不知悉的情况下，于1906年1月同意，已经暂时开始的双方参谋人员会谈应正式举行，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经明确规定，这些会谈对任何一方政府都毫无约束力，但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而且使英国当局承担了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多的义务。英国毫不含糊地回到它那维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传统政策。

虽然毕由克条约是秘密的，但俄国人在巴黎进行的试探则显示一种迹象，表明局势正发生某种动荡，从而使解决英俄分歧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德国关于结成欧洲大陆反英同盟的计划已告失败，俄国在对日战争中遭到失败，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同英法协约国进行了合作，对于德国势力渗透波斯的担心，以及1906年5月10日出任俄国外交大臣的伊斯沃尔斯基赞成改变政策——凡此种种都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于是，英俄在6月6日正式开始谈判。由于俄国内部不稳定的局

势，由于英国公众对俄国应付这种局势的措施提出了批评，由于伊斯沃尔斯基不想触犯德国而遭到德尔卡塞的命运——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以及由于俄国参谋部的反对，谈判的进展变得很慢；但是，最后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涉及发生摩擦的三个地点——波斯、阿富汗和西藏，从英国的观点来看，它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英国的主要目标达到了。俄国承认波斯保持独立和完整的原则以及在波斯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承认英国对阿富汗有特殊利益，同意使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继续作为一个缓冲国，这一切看来都制止了危及印度安全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而印度的安全则是英国最关注的。虽然波斯问题仍然给英国外交部带来许多头痛的事情，但是，英俄之间的重大的利害冲突由于这些协议而基本上消除了。

英俄协定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它没有包括有关友谊或合作的特殊保证，而且与英法协定曾在英国和法国受到欢迎的情况不同，它在英俄两国都不受欢迎。虽然这个协定使俄国稍微靠近英法这两个协约国，但是，这个协定也没有阻止俄国同德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实际上，伊斯沃尔斯基极力想这样做，并且特地采取合作的态度，例如，1907年在毫无结果的第二次海牙会议上就是如此。英俄协定也不是英国为了包围德国而蓄意已久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虽然格雷把俄国看成一个对付德国的平衡力量。人们说得好，这两个集团是肩并肩地站着，而不是面对面地站着，英俄协定“不是要俄国参加英国一方来反对德国，而只是防止俄国参加德国一方来反对英国”^[21]。然而，不幸的是，德国把英俄协定看作一个反德步骤，而当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于1908年6月在雷维尔会晤时，德国的这种印象加深了。同样不幸的是，这个协定结果把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转到更危险的领域。俄国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牵制，而又不能向印度进行进一步的扩张，于是，便再一次转向巴尔干半岛各国。

但是，正由于奥地利所采取的主动，结果导致了20世纪巴尔干半岛的第一个主要危机。匈牙利政府实行的马扎尔化政策，以及该政策在它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特族人口中间引起的不满，加剧了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自从塞尔维亚的奥布廉诺维奇王朝在1903年经过流血而被推翻以来，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系恶化了。塞尔维亚的新的统治者有意向法国寻求金钱和军火，指望俄国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倾向于允许贝尔格莱德成为实现泛塞尔维亚愿望的中心——上述这一切

使奥地利统治者面临一个外交问题，而俄国一旦对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恢复了积极的兴趣，此问题可能变得更加棘手。只要担任奥地利外长的波兰人戈鲁肖夫斯基主持工作，奥地利的政策就始终是审慎的。但是，在1906年，他被爱伦塔尔所接替，而康拉德·冯·霍曾道夫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参谋长，从而使这些生性比较专横而且急于要想恢复他们国家正在下降的威望的人物跻身显赫的地位。爱伦塔尔曾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他和伊斯沃尔斯基、比洛等人一样，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大陆的外交部长，是从狭隘的外交界而不是从政界中训练出来的。人们知道他同俄国人过从甚密，而且急于重新结成三皇同盟，因此，他的任命被看作奥地利想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一个预兆。然而，当他最初试图同塞尔维亚进行经济和解，但主要由于奥地利国内的反对而遭到失败时，他便着手采取强制政策，这种政策很快就引起了复杂的情况。1908年初，他宣布，奥地利打算建造一条铁路，穿过新帕扎尔地区，通往土耳其的米特罗维扎，从而把塞尔维亚同门的内哥罗分割开来。他所以宣布这个消息，目的是要对塞尔维亚进行警告。俄国曾经友好地暗示说，复杂的情况可能随之到来，但他置之不顾，仍然予以宣布。实际上，这就结束了奥俄两国从1897年以来在巴尔干半岛各国进行的合作，并开创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爱伦塔尔同伊斯沃尔斯基个人之间日益增长的仇恨，给欧洲各国关系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起初，俄国提出一项反建议，要从多瑙河建造一条铁路通往阿尔巴尼亚海岸，如果不是因为7月间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改变了整个形势，那么，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可能就只是双方在铁路建设方面进行竞争这件事了。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奥地利被授权无限期地管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土耳其省份，并派兵驻扎在新帕扎尔地区。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使奥地利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占人口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可能要求给予权利，以便派代表参加当时正在拟议中的土耳其国会，而土耳其在新的民族主义的鼓舞下，可能重新坚持要求对奥地利实际上统治了30年的这两个省份行使完全的主权。同意这样的要求，对奥地利的统治者来说是不能想象的，爱伦塔尔采取的补救办法在8月中获得了他的政府的批准，其内容是，在适当的时机兼并这两个省份，与此同时，作为安抚土耳其的一个姿态，奥地利军队撤离新帕扎尔地区。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兼并既会解决奥地利同土耳其的混乱的关系，又会给

建立一个“大南斯拉夫王国”这个煽动性的梦想造成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的动乱，由于对塞尔维亚不会有任何指望，将平息下去，而奥匈帝国将腾出手来完成30年的占领所没有完成的改善经济的使命。”^[22]这个计划要获得成功，俄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谈判，终于导致爱伦塔尔和伊斯沃尔斯基于9月16日在巴契劳秘密会晤。结果，爱伦塔尔相信，他已获得俄国的同意，让他实行计划中的兼并，而作为交换，奥地利则支持俄国关于修改海峡管理制度的建议，以便使黑海国家的军舰能够自由进入地中海。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当伊斯沃尔斯基接着前往巴黎和伦敦时，他遇到了困难。法国不肯表态；而英国则不同意他关于海峡的建议。英国内阁并不认为由于最近的英俄协定而有义务支持俄国；伊斯沃尔斯基谈到，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对英俄关系将产生后果，英国内阁也无动于衷。在此期间，爱伦塔尔急于要获得上述交易中奥地利的那一份，便在10月6日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在前一天，保加利亚的王子在和爱伦塔尔串通的情况下，宣布保加利亚脱离土耳其而完全独立，并采用国王的称号。这样，伊斯沃尔斯基的政策失败了，而爱伦塔尔的政策却获得了成功。伊斯沃尔斯基的目的是要在海峡地区搞政变，这个目的选错了，因为俄国人民为了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要比因为海峡这个老问题更容易被激励起来，于是，他只好在没有取得巴契劳交易中作为交换的权益的情况下返回本国。伊斯沃尔斯基深感屈辱，为了摆脱困境，扬言他受了爱伦塔尔的欺骗，要求召开一个欧洲会议来讨论波斯尼亚的问题，并煽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在兼并后发生动乱。

爱伦塔尔试图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做法导致一场持续6个月之久的严重危机。对大多数欧洲大国来说，他的行动使人震惊。虽然他的行动实际上没有给这两个省带来任何差别，但是，正像格雷所写的那样，这是“在没有其他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由一个国家任意改变欧洲的条约”，这个做法本身就“打击了一切良好国际秩序的根基”。^[23]结果，英国像早先谴责俄国宣告1870年巴黎条约中黑海条款无效那样谴责了这次兼并。对德国来说，奥地利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也同样是不受欢迎的。比洛由于他的盟友没有事先和他磋商而感到愤怒，德皇则发现他所珍视的土耳其政策已处在危险中。然而，德国却不能

眼看着奥地利遭到削弱，因此，不是单纯为了批准这次兼并而召开的任何会议，德国都支持奥地利加以拒绝。自从毕由克政策失败和英俄协议签订以来，德国更加愿意通过赢得对俄的外交胜利来支持奥地利。

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奥地利的做法激起了骚动：“土耳其正式提出抗议，对奥地利货物的抵制开始了；门的内哥罗请求修改边界和取消柏林条约的枷锁；在塞尔维亚，人们在谈论战争。”^[24]随着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裂痕变得明显，指望俄国给予援助的塞尔维亚人的好战性也就增加了，奥俄关系逐渐陷入危险的紧张状态。决定性的因素是德国给予奥地利的坚决支持。在比洛拒绝了由西方国家进行调停的建议以后，奥地利感到自己力量强大，足以要求塞尔维亚撤回它对兼并的反抗，而当塞尔维亚人表示依从，但拒绝以书面保证将来循规蹈矩时，奥地利便准备采取高压手段。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俄国和德国，因为没有俄国的援助，塞尔维亚就不能冒战争的危险，而德国则决心阻止这种援助的实现。1909年3月22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奉命就俄国是否接受奥地利照会和废除柏林条约中有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条款的问题，取得明确的答复。“我们将把闪烁其词的、附有条件的或含糊不清的答复看作一种拒绝。那时我们将撒手不管而听任事态自行发展。”^[25]俄国这时刚刚被日本打败不久，尚未做好准备来应付另一场较大的战争，只好屈服，于是，塞尔维亚也退让了，并做了奥地利所要求的保证。土耳其已经在2月26日承认这次兼并，而换得大约240万英镑的赔偿。爱伦塔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件事预示着前景不妙。它不但没有把塞尔维亚人吓倒，反而进一步招致他们的怨恨，并使奥地利的斯拉夫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它对仅存的国际道义是个打击，尤其对俄国人是个痛苦的耻辱。当塞尔维亚遭到威逼时，俄国始终无能为力，而且在没有在海峽或其他地方得到补偿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结果，德国关于欧洲大陆同盟的梦想和奥地利关于结成新的三皇同盟的设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实现了。在德皇宣称他“披坚执锐”，支持了奥地利，从而揭了俄国的伤疤以后，情况就更加如此。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英俄协定和英俄君主在雷维尔的会晤所未能取得的成果：它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虽然俄国对法国和英国没有给予支持而感到失望，同时，英国一些外交家，由于认识到

这一点而劝说格雷把英国的若干协约改为同盟，结果也没产生任何影响，但俄国毕竟不能退回到孤立状态，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则是与西方大国实行合作。1910年，德国提议放弃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支持奥地利，来换取俄国答应不援助英国反对德国，试图用这个办法来改善彼此的关系，但没有得到结果。奥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敌对状态，再一次成为欧洲政治中一个主导的危险因素。再者，巴尔干半岛力量均势的改变震惊了意大利，使它更加疏远奥地利（意大利对奥地利一向抱有强烈的民族统一主义情绪），并在1909年10月24日同俄国缔结秘密的拉科尼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意大利同意一旦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再一次受到奥地利的威胁时，决定支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而作为交换，俄国则承认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利益。奥地利对此所做的反应是，它试图通过以下的办法来确保它的地位，即答应在没有事先同罗马达成协议，以便使意大利得到补偿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新的兼并。但是，除了德国的支持外，奥地利此时正处于孤立的地位，结果奥地利在巴尔干各国中的势力便衰落了。比洛曾经做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由于他给予奥地利无条件的援助，他便使自己承担义务去支持一些他所不赞同的方法和目标，而且，关于这些方法和目标，奥地利并没有同他进行充分的磋商。再者，对未来更为不祥的是，现在有一种危险，即奥地利会采取新的冒险政策，坚信德国将不得不给奥地利以支持。主角和配角的地位颠倒过来了，现在轮到德国充当奥地利的“出色的配角”了。正如在摩洛哥事件时比洛希望打破英法协约那样，这时，他的政策也可以从他公开宣称的旨在打破“包围圈”的愿望中得到部分的解释，而且，像在1905年至1906年间一样，他的政策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这个“包围圈”在此以前主要是德国想象中的产物，但这时却开始变成现实。只要乌云笼罩着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北海，这个包围圈就不大可能解除。甚至像奥地利的巴尔干半岛政策似乎是对俄国的一个威胁那样，德国的海军计划也似乎是对英国的一种无端的恫吓。

虽然德国早期的海军法案以及德国海军协会主张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的宣传，曾经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在1906年以前，德国的海军计划并没有成为英德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争端和主导因素。到了1906年，鉴于摩洛哥危机及其战争风险，英国政府已意识到，同德国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使它在令人极其厌恶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加快步伐和增加负担。1905年上台执政的英国自由党急于要削减开支，因此，1906年，

它对俄国邀请英国参加第二次海牙会议表示欢迎，并建议限制军备。这样的建议在德国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到了这时，由于不断的宣传，大多数德国人民终于相信，为了维持德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利益和威望，或者像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克在1912年所说的那样，“为了伟大德国的总目的”，强大的海军是必不可少的。海军计划的贯彻执行被看成德国政策的基本要点。海军计划是反复无常的德皇始终坚持的少数几个目标之一，如果要修改这个计划，那就大概需要在人事和观点方面实行彻底的改变。再者，英国的建议必然是可疑的，因为英国这时似乎要求人们认可它永远保持海军优势。因此，1907年海牙会议的结果只是增加了不信任。由于没有希望达成关于限制军备的国际协议，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举行直接商谈。与此同时，军备竞赛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在继续下去，因为对英国来说海军优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德国这个最强大的陆军国家有意争取海上的平等地位，则对力量的均势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

最初德国人不愿谈判，但德国驻伦敦大使梅特涅一再警告比洛，说在英国人中间存在着强烈的反感（英国人相信，英国政府在1908年至1909年的冬天也有正当理由相信，德国一直在加速建造舰只，从而加深了这种反感），因此比洛终于考虑，是否可能用放慢德国海军建设速度的办法来换取英国关于保持中立的保证。但是，德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在1909年春对比洛的建议所作的答复不会导致任何结果，因为提尔皮茨提出的三比四的比例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而且，在德国向英国做出任何表示以前，比洛就辞职了，在1909年6月由贝特曼-霍尔威克接任。贝特曼-霍尔威克是一个没有多大魄力的文官，而且对于外交事务比较陌生，因此，不大可能彻底地改变政策。然而，他确实接受了比洛关于谋求政治交易的想法，1909年开始的英德谈判断断续续地但毫无成果地持续到1912年。贝特曼的提议是延迟实现德国海军计划的进程而不是加以削减，以此来换取英国在德国一旦受到攻击时保持中立。即使德国在海军方面提出更大的让步，鉴于英国对其他国家承担的义务，上述这样一种许诺，对英国来说也将是难以接受的。英国一再保证，它所缔结的一些条约和协约并不针对德国，并提议就巴格达铁路这类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但德国认为，这些保证和提议是不够的。格雷关于交换海军情报的建议也毫无结果。1911年双方谈判似乎接近陷入僵局，这时，新的摩洛哥危机爆发了，危及欧洲的和平并增加了英德之间的互不信任。

阿尔赫西拉斯法案并没有使摩洛哥帝国恢复秩序。1907年，苏丹被赶出首都，接着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从而鼓励了法国的渗透。然而，在1909年，当两国仍然全神贯注于波斯尼亚危机的时候，德国同法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使英国舆论感到不安，似乎预示着一个法德合作的新时期的到来。当两国政府保证两国侨民应当“在他们获得特许权的那些企业中联合起来”时，德国表示它在摩洛哥“并无政治兴趣”。但是，这个协议的经济方面引起了误解，尤其是当法国建议建造铁路，但拒绝接受德国人员参加经营，认为这侵犯了它的政治利益时，误解就更深了。到了1911年，法德关系恶化了，新的动乱迫使法国派遣军队到非斯去。法国政府已经向柏林提出建议修改协议，德国便重新提出摩洛哥问题，而且摆出的那种惊人姿态使人不禁想起1905年的丹吉尔事件。7月1日，德国派遣一艘炮舰“黑豹”号到阿加迪尔这个已经封闭的摩洛哥港口去保护所谓的德国商业利益，并向全世界宣告，既然在德国人看来，法国占领非斯已使阿尔赫西拉斯法案失效，现在应该是双方重新“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时候了。

德国争辩说，像法国派往非斯的那种军事远征，非常可能变成永久的占领，而且，法国和德国必须重新考虑它们关于摩洛哥的安排，德国的这种说法是有一番道理的；但是，德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再一次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德国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曾经争辩说，这是为了促使法国提出令人满意的补偿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在“黑豹”号到达阿加迪尔以后的几天中，当时担任德国外交大臣的基德伦，仿效了比洛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采取的谜一样的沉默态度，局势十分紧张。德国最终的意图很难断定：比方说，由于德国在阿加迪尔地区没有商业利益，许多人便相信，德国打算要求或攫取一个濒临大西洋的港口。法国外交部长最初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反示威，英国人予以拒绝，但警告德国说，如果没有英国人参加而在摩洛哥做出任何新安排，英国一概不予承认。在此期间，法国亲德的新总理卡约接受了德国关于“交换意见”的建议。德国人这时摊出了他们手里的牌。他们以承认法国在摩洛哥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作为交换，实际上要求占有整个法属刚果。当法国内阁7月17日拒绝了他们的条件时，看来基德伦似乎准备发动战争或至少想以战争相威胁，以便胁迫法国唯命是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态度（它于7月13日谨慎地把英日同盟延长了10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7月21日，格雷面告德国驻伦敦大使，德国的要求太过分了，同时，德国在阿加迪尔的行动仍然需要加以解

释。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一向被柏林看成英国内阁亲德派的领袖，他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一篇强有力的演说中宣称，英国如果“在它的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的地方，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那么，以这种代价取得的和平将是一个耻辱，绝非一个伟大的国家所能忍受”。劳合·乔治没有提到德国或摩洛哥问题，但这个警告是明确无疑的，德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表明，他们知道他们的虚张声势受到了挑战——于是，德国赶紧就其意图向伦敦做出了有礼貌的保证。和平保持下来了，但德国的威望遭到了损害，随后，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艰苦的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两次发生过会谈可能破裂的危险，同时，战争的谣传重又甚嚣尘上。最后，德国在9月间的一次财政危机迫使它加速采取解决办法，1911年11月4日，新的法德协定签订了。德国同意不阻碍法国在摩洛哥的活动，并承认法国有权最后在那里建立保护国，而法国则割让法属刚果内地面向比属刚果（德国人希望获得对比属刚果的先占权）的一部分地区和一条狭长的地带，这条地带使德国这片新获得的领地能够通向海洋。

虽然德尔卡塞的政策最后胜利了，而且，法国这时成了摩洛哥潜在的霸主，虽然德国花了很小的代价便扩张了殖民地领地，但是，阿加迪尔危机的结果使双方都不满意。在德国，基德伦由于对公众要求在摩洛哥获得领土补偿的呼声即便没有予以鼓励，也曾表示赞同，因此，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殖民大臣对他的政策的软弱表示抗议而辞职了。在法国，这个解决方法也受到殖民地利益集团的攻击。同时发现，卡约在没有他的外交部长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部分的谈判，这就导致他的内阁在1912年1月垮台。卡约确实希望，按照1904年英法协定的路线，把摩洛哥问题当作同德国全面解决分歧的基础；但这种希望是枉费心机的，因为德国的外交手段以及在两个国家中所激起的强烈反感，使得这种希望没有可能实现。阿加迪尔危机没有改善法国与德国的关系，反而再一次证明了英法协约的牢固。鉴于战争的危险，英法参谋人员的会谈恢复了。英国已经拟定计划，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派遣远征部队到法国去，这时便加紧讨论技术上的细节。更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同英国的关系恶化了，英国这时理解，对它来说，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否打算维持英、法、俄三国协约，以及它是否“应当在它认为必须仗义执言的时候屈从德国的颐指气使”[\[26\]](#)。

阿加迪尔危机的另一个后果还需要加以叙述。由于这次危机为法国在摩洛哥建立保护国铺平了道路（保护国实际上在1912年初建立），这就促使意大利向黎波里进逼。意大利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族主义已经感到震惊，同时又担心德国的竞争，这时便相信，它必须“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1911年9月25日，意大利没有提出警告，就发表了指责土耳其的声明，4天以后，拒绝了土耳其的谈判建议，宣布开战。曾经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做出保证的1856年的巴黎条约，重申这种保证的1878年的柏林条约，以及意大利作为一方参加的海牙公约，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意大利决心不给外界以进行干预的时间，而且甚至没有在事先同它的盟国磋商。意大利认为它有理由采取这个行动，其根据是法、奥、俄三大国都曾签订过协议，给它放手处理的权力。这是对国际道义的另一打击，而意大利对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征服和兼并，是巴尔干半岛各国对土耳其进行联合进攻的一个信号。巴尔干半岛战争引起的新的复杂情况，是预示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前奏曲中的一个部分。

（陈少衡 译）

[1] 例如，G. 萨尔温米尼和W. L. 兰格就持有这种看法。见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纽约和伦敦，1935年），第1卷，第297页。

[2] 即台湾岛。——译者

[3] 索尔兹伯里勋爵1898年1月25日致N. 奥康纳爵士的信。参阅G. P. 古奇和H. W. V. 坦珀利（合编）《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1898—1914年》，第1卷（伦敦，1927年），第9号。索尔兹伯里所说的“优势”是指经济的，不是指领土的。

[4] G. F. 赫德森：《世界政治中的远东：近代史研究》（第2版，1939年），第100页。

[5] E. M. 厄尔：《土耳其，各大国和巴格达铁路》（伦敦，1923年），第37页。

[6] 此处以及其他各处引用的材料，均借重于C. M. 安德鲁博士即将发表的对德尔卡塞的研究材料。

[7] 《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1898—1914年》，第1卷，第212页。

[8] 利安德·斯塔·詹姆森爵士，南非政治家，1895年率领500名骑兵，袭击德兰士瓦，企图推翻克留格尔的布尔人政府。——译者

[9] H. 尼利尔森：《阿瑟·尼科尔森从男爵，第一代卡诺克勋爵：早期外交研究》（伦敦，1930年）一书中的引语，第128页。

- [10] “我们考虑不周，在军备问题上，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必束缚自己的手脚，在这里就不必提了”，比洛给德国参加会议的首席代表明斯特的指示。
《1871—1914年欧洲各国内阁的大政方针》，第15卷（柏林，1927年），第190页。参看G. P. 古奇《战争之前，外交活动的研究》，第1卷（伦敦，1936年），第196页。
- [11] M. 博蒙：《工业高涨和殖民帝国主义，1878—1904年》（巴黎，1937年），第323页。
- [12] A. J. P. 泰勒：《在欧洲争夺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牛津，1954年），第393页。
- [13] 《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1898—1914年》，第2卷，第86号。索尔兹伯里使用了“英伦三岛”这个词，尽管用“英帝国”一词比较恰当一些。
- [14] G. P. 古奇：《战争以前》，第1卷，第22页。
- [15] W. L. 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第2卷（纽约和伦敦，1935年），第783页。
- [16] J. A. S. 格伦维尔：《索尔兹伯里勋爵与对外政策》（伦敦，1964年），第389页。
- [17] “你就这样处在这些事件的舞台上，这些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并将影响整个世纪。”《来往信件，1870—1924年》，第2卷（巴黎，1940年），第111页。
- [18] 《大政方针》，第20卷，第208—209页。参看G. P. 古奇：《战争以前》，第1卷，第24页。
- [19] 《英国文件》，第3卷，第95号。
- [20] 法国内阁总理M. 卢维埃使用的措辞。
- [21] 见H. 尼利尔森：《阿瑟·尼科尔森从男爵，第一代卡诺克勋爵：早期外交研究》（伦敦，1930年），第234—235页。
- [22] A. J. P. 泰勒：《哈布斯堡王朝，1815—1918年》（伦敦，1941年），第260页。
- [23] 格雷子爵：《25年，1892—1916年》（伦敦，1925年），第1卷，第175页。
- [24] G. P. 古奇：《战争以前》，第1卷，第403页。
- [25] 《大政方针》，第26卷，第694页。
- [26] A. 尼科尔森爵士1911年7月24日致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以及1911年9月14日致哈丁勋爵的信。H. 尼利尔森：《阿瑟·尼科尔森从男爵，第一代卡诺克勋爵：早期外交研究》（伦敦，1930年）中引用，第347、350页。

第六章 1914年战争日益临近^[1]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名称用得^{不当}。战争的起因和战场都不是世界性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民族对抗是欧洲的民族对抗；在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交战各国的阵线，与欧洲列强因帝国利益不同而形成的真正阵线并不一致，也与欧洲以外各国因野心不同而形成的真正阵线并不一致。有人将战争的起因说成是世界性的，因此也将起因追溯得较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人们在回溯历史时都扩大了战争的真正界限，这主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次战争创巨痛深。但这也是由于研究国际政治和历史、各国政治和历史的各派空论家们的偏执，这些空论家们助长了对于这次战争做出种种流行的解释。例如，有这样的武断说法：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发生的战争，一定会表现出“帝国主义矛盾”——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说——这种理论要求将这次战争说成是全球性的。欧洲战后还流行这样一种理论，认为战争是德国的独裁的军国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要求将战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第二帝国的建立。^[2]

然而，多数派别认为，1914年战争的起源可分远因和近因，其分界线最早只应划到1912年，这才有意义。持上述看法的人们所根据的理由也许不尽相同。这种见解认为，关键性的发展是从造成1914年7月危机（或者至少是对垒的最后阵势的形成）的三大原因中的两个原因开始的，这两个原因一为联盟体系的形成，一为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发展——第三个原因则为英德海军的竞争。此外还有一个与欧洲问题有明显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最近法国与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协议，它们之间海外冲突的最后原因已经消除。

1911年11月的摩洛哥协定承认法国取得一个保护国，其交换条件是法国在非洲中部让出一些领土。法国及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这个协定时议论颇多，这就是评价这个协定功过的一个尺度。在法国，签订该协定的卡约政府已为彭加勒的所谓“伟大内阁”所代替，彭加勒内阁接受了这个解决办法，但是不大想再做让步。彭加勒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彻底检查与俄国的联盟。摩洛哥危机已经表明，这个联盟不

足以成为对法国的道义支持，正如在4年前的波斯尼亚危机中这个联盟不足以成为对俄国的道义支持一样。但关键的事实是，俄国急于迎合法国，因为下一个国际危机显然在巴尔干，而俄国在这场危机中要比法国得益更多。因此，俄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1912年初，在俄国的赞助下，巴尔干联盟就发展起来；法国并未参与其事，实际上连情况都不甚了了。然而，这个联盟仍然把两国卷入巴尔干危机中去。

这时在德国，摩洛哥协定正在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说，德国在与法国达成协议时，“遭到了外交上的挫折，我们必须以一个海军补充法案来做补偿”。^[3]他作为海军大臣，却不顾首相贝特曼-霍尔威克的反对，径自赢得了威廉皇帝对这个法案的支持。这个法案就是通常所称的1912年的“新闻”（novelle）。贝特曼虽然在谈判时忠实地按这个法案办事，但是对这种在德国战斗舰队后面施展的政略并无兴趣；按照这种政略，当大陆发生战争时，战舰将是制止英国干涉的一支威慑力量。按照提尔皮茨原来的“冒险理论”，只要德国舰队能取得重创英舰的胜利，英国舰队就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但是这个理论已经变得不恰当了，因为除了孤立主义的美国以外，其他海军强国都已成为英国的朋友，而不再是英国的潜在敌人了。这样一来，德国舰队还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它至少要有获胜的希望——因此，提尔皮茨怀着对于德国计划具有优势的合理的自信心，正在考虑到1920年英德海军并驾齐驱的问题。^[4]海上巡洋舰的竞赛是次要问题，但是这种竞赛赢得了有影响的殖民和商业方面的“压力集团”对海军的支持。

英国1908年建成了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军舰“无畏”号，从而使它失去了在最新式战列舰数量上的优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自从公众和海军部接受了“二舰对一”的口号以后更有起色。但是这样的海军竞赛不仅把自由党政府的预算弄得捉襟见肘，而且使他们的原则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当德国这件“新闻”传到伦敦时，自由党政府就准备再开谈判了。接着便是1912年2月被认为是亲德派的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柏林之行。但是，德国方面要求英国在德国的殖民扩张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要求允许德国的巴格达铁路延伸到英国控制下的波斯湾；他们甚至要求英国发表一个中立宣言。而且，伦敦方面在对提尔皮茨法案的全文进行研究时，发现其中还包括这样的内容：大量增加兵员，以及由一些新旧舰艇组成一支新的战斗舰队。而德国方面提

出可以商量的范围只限于最后两项暂缓执行。这当然是不值得一殖民地让步来做交易的，更不用说以放弃英法协约来换取了。

德皇在与霍尔丹会谈时也许真得到了已经达成协议的印象，尽管霍尔丹既不拥有充分的权力，也并不掌握全面情况。德皇假装因受英方阻挠而感到气愤，但还是同意让会谈在伦敦拖延下去。德国曾建议英国发表一个互不侵犯的声明，这个建议已经证明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贝特曼对驻伦敦的德国大使发出指示说，只有签订一项“英国保证严守中立，并与我们结成一个大致相当于防卫同盟的关系”的协议，德国才能考虑修改提尔皮茨法案的问题。^[5]这就完全认可了提尔皮茨关于德国战斗舰队的威慑作用的主张。而且，还必须使英国人承认这种威慑作用；因为伦敦官方往往将德国舰队看成只是一种体面的象征，德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个侮辱，深感愤慨。

英国方面对此“新闻”的回答，在7月18日的海军部预算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英国将要增建的海军舰只几乎等于德国新增舰只的1倍，两国扩充海军方面的速度使战列舰保持在8：5的比例，这种情况到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未变。但是提尔皮茨却做出一项前后矛盾的决定，将他的法案所规定的建造军舰的工作放慢，因此，英国的预算也相应地做了调整，这就促使丘吉尔在1913年再度提出实行“海军休假”的建议：两国在一年内不建造新舰。这是一项限制扩充海军的最后计划，德国很难接受这个计划，因为从技术上考虑，这样做有利于英国。

但是，海军方面的僵局并未使英德关系恶化。德国政府仍然没有认识到，德国以不妥协的态度在海军建设方面进行挑战，不仅难以把中立强加给英国，反而使这种中立显然变得更无法实现。在德国的外交战略中，直到最后都是坚持要和英国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的。这种做法，并未从伦敦方面得到什么鼓励，但是在霍尔丹谈判中剩下的两个问题，即殖民地交易问题和解决美索不达米亚铁路问题，谈谈还是有好处的，因此在以后的两年中，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了缓慢的进展，只是由于战争爆发，才没有最后达成协议。

英德谈判使法国和与法国人订有条约的友邦大为恐慌。^[6]因此，法国利用英国拒绝对德国发表中立宣言的机会，要求做出关于英法协约的声明。这时，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发展，也给法国人以一臂之助。英国从地中海调运舰队来增强本国海域的工作已经完成；尽管正式宣

布说这项工作并没有同法国海军的行动互相配合，但是法国战列舰却调往相反的方向去了，这就表明英国已经开始履行其保卫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海岸的义务。1912年11月16日及17日，格雷与法国大使互通信件，格雷在信中决定对这种战略联系上的发展做出正式的说明，但是秘而不宣，这与其说是为了发展这种联系，不如说是为了进行阻拦。来往信件明确指出，舰队的重新部署并不意味着承担超过早在1906年军事及参谋人员会谈中业经确定的义务。但是格雷在信中又说，他允诺英法两国在遇有担心第三国进攻或和平遭受普遍威胁的情况时，应进行协商；如果决定采取行动的话，将制定共同的参谋计划。

在战争爆发以前，“英法协约”的基本内容一直未向英国内阁以外的人透露过，除了在1914年年初，作为对法国方面希望正式结成三国协约的让步，才将内容告诉了俄国方面。其后，由于同样的外交上的原因，英国也与俄国秘密地安排了海军参谋人员的会谈，尽管这些会谈并不具有多大战略意义。俄英两国之间的直接联系实在是很微弱的——英国给俄国以安全保证，仅仅是由于英国对法国承担了义务或对法国怀有的意图。俄国在波斯进行的政治干预，仍然使英俄之间的直接联系困难重重。萨佐诺夫认为，俄国可以指望英国最后会在亚洲做出让步，因为对英国来说，“欧洲的政治目标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7]。但是，这个程序也可以颠倒过来，英国人也指望俄国人在欧洲做出让步。他们两国之间的摩擦一直继续到1914年7月。

协约国之所以是“三国”，是由于法国在里面两头搭线，但是另一方面，法俄同盟的严格执行，却减轻了英国对法国的义务。正如格雷在1914年最后时刻还坚决主张的那样，英国并不负有这样的道义上的义务：法国按照一项条约必须采取行动，英国也就跟着必须采取行动；此类条约，英国对法国也一直是有意回避签订的，更不用说与俄国了。特别是，当俄国的政策和威望与所谓巴尔干联盟纠缠在一起，从而扩大了法国对俄国所承担的义务时，英国就更审慎了。巴尔干联盟是以1912年3月13日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签订的联盟条约为基础的。^[8]这个条约的表面目的在于反对奥匈帝国的扩张，但是它的一份秘密附件却规定要瓜分马其顿，这是仍由土耳其统治的说斯拉夫语的人居住的地方。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条约的谈判；沙皇将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进行仲裁是一个重要条款，但俄国人搅在中间，

却不仅由于这项条款。俄国人的动机不只是由于爱冒风险，也不在于洗雪1908—1909年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外交失败的旧恨。最初的真正动机在于害怕奥匈帝国重新占领新帕扎尔区，从而使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无法连在一起，并使计划中的铁路穿过新帕扎尔区，一直通到萨洛尼卡。后来在瓜分土耳其过程中俄国有机可乘的诱惑力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当时怎样才能使对巴尔干各民族野心的领导权便于俄国实现其垂涎已久的对君士坦丁堡及黑海海峡的控制，一直都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

尽管法国人一问再问，但在彭加勒1912年8月访问俄国以前，俄国人只向他们的法国盟友透露了巴尔干各国联盟的部分情况。彭加勒在看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秘密条约的文本时，他对萨佐诺夫说，“如果德国并未主动挑起协定条款中所提到的事件，换句话说，如果德国并未进攻俄国，那么，法国就不会因为巴尔干的争端而对俄国进行军事援助”。他指的是1892年的军事协定，协定中有这样一条：“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所有的军队和德国作战”。这个协定是1894年以条约形式批准成立的两国同盟的基础。但是从1908年起，事情越来越明显，使俄国向这个同盟求助的紧急情况将是：奥地利进攻巴尔干半岛上某一个斯拉夫国家；接着便是俄国干预，反对奥地利；而德国又来干预，反对俄国。彭加勒的话实际上暗示法国将在新的情况下给予支援，否则他一定会提出这样的必要的保留条件：俄国不得首先进攻奥地利。重申联盟的义务而又不钉死这一点（彭加勒在1912年的做法就是这样^[9]），这意味着同盟的防御性质已经改变，或者说，与奥地利相邻的斯拉夫国家从此已包括在同盟范围之内了。毫无疑问，彭加勒已在俄国人的一再要求下做出让步，他怕的是失去整个的同盟，他认为这个以防卫形式出现的同盟对于法国是十分宝贵的。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他不承认同盟实际上已变得有利于俄国。

当彭加勒在彼得堡时，巴尔干的一场冲突已迫在眉睫。希腊已于5月29日与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缔结了条约，门的内哥罗也在口头上答应受这个条约的约束，整个巴尔干联盟的目的是想利用土耳其与意大利之间一直进行战争的时机。这个战争曾经是促使联盟得以组成的因素之一，现在它正在为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暴乱火上浇油。

巴尔干危机考验了德奥两国在同样的战略问题上的团结程度，虽然当时的形势不像1914年的危机那样具有戏剧性；因此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巴尔干危机为什么没有造成1914年危机那样的严重后果？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德国在1912—1913年明白地拒绝支持奥匈帝国，而在1914年却给予了支持，这是对这两次事件的进程作了错误解释。奥地利对巴尔干危机的政策及德国的反应这时都还悬而未决。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尔希托德根本不想惩罚塞尔维亚人，他最初在外交上曾率先为避免这场危机而努力。他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忠告，希望土方同意将行政权分散到行省，并且警告巴尔干各国政府要保持和平。德国方面对这个单方面行动表示担心，这种担心是一种确认德奥联盟的排他性质和团结一致的行为，而不是相反。^[10]最后，贝尔希托德的计划又增添这样的警告：列强不会同意变更领土的现状。他的计划被各国接受了，并由奥国及俄国这两个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来代表各国执行计划。欧洲这种颇有希望的合作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萨佐诺夫对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态度起了突然变化，他曾于无意中招来了民族主义的幽灵，现在却对它怕起来了。但这种合作为时不长，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在各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同时，门的内哥罗于10月8日对土耳其宣战，10天之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也参加了战争，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俄国的赞同；但斯拉夫各国在共同行动时是期待着俄国的赞同的。

这次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新帕扎尔区的问题，这个区在1909年以前由奥地利占据，后来改属土耳其，但并未建立牢固的统治，现在塞尔维亚人为了与门的内哥罗人连成一片，又一心要把这块地方夺到手。这是对奥地利人的面子与战略控制的挑战，贝尔希托德起先并不想应战，他只求恢复现状^[11]，但这与总参谋部的意见相左。奥地利并没有要求德国做出这样的保证：如果奥地利把塞尔维亚人逐出该区，德国将出来制止俄国的干涉，尽管有些迹象表明，如果奥地利提出要求的话，德国是会给予保证的。^[12]

在巴尔干危机的初期外交活动中，所有大国都强调维持现状，其主要原因是，在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中，谁能获胜还说不准。最初几天的战斗消除了一切怀疑。保加利亚人已穿过色雷斯，向海峡前进，但希腊人抢先一步进抵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这时也已抵达亚得里亚海。保加利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周围遇到土耳其人的抵抗，停止了前

进，但他们的进军，俄国人是欢迎的。塞尔维亚人的成功只对奥地利人起到威胁作用。因此，在这个时刻，俄国的官方政策和泛斯拉夫情绪开始会合起来支持塞尔维亚人。但在维也纳，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正在复活，即扶持保加利亚，使它成为一个不受彼得堡宠爱的、敌对的巴尔干国家。

近来一些历史学家也许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和解的可能性看得太容易了。^[13]的确，有一种思想派别可以称为“试验主义者”，他们喜欢将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地位与日耳曼人及马札尔人的地位等量齐观。他们认为，如果奥地利方面能够容许塞尔维亚政府得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的话，塞尔维亚方面是会欢迎和解建议的。^[14]但是，尽管奥方在1912年秋天及1913年两度提出建议，他们的诚意肯定受到怀疑，因为不喜欢妥协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在暗中施加影响。

由于奥地利人决心不让塞尔维亚人得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他们就利用民族原则，说服列强建立起一个新国家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不是斯拉夫人，原先受土耳其统治，他们居住的地方包括从门的内哥罗到希腊的整个海岸线。但是俄国政府以塞尔维亚的利益为托词，坚持要在海岸上开辟一个自由港口，并特别提到都拉斯，虽然没有同时要求得到一个通往港口的走廊。当俄奥双方在加里西亚边界两侧增加掩护部队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达到了高峰。这种互示威力的情况持续数月之久。维也纳方面没有要求德国给予支援，对侵占了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土的塞尔维亚人进行干预，柏林方面也没有表示不给予支援；德国虽未被要求，却对维持神经战表示充分鼓励，像通常一样，德皇发表的谈话内容前后矛盾，语气却很重。但是贝特曼在12月2日的国会演说中宣称，“如果奥地利在取得其重大利益的过程中……遭到俄国的进攻”，德国将以兵戎相见。^[15]

但是，俄国人为塞尔维亚的要求做后盾却多半是虚张声势。早在11月9日，塞尔维亚人就得到警告不要指望得到俄国的帮助。^[16]但是在俄国国内，泛斯拉夫情绪正在高涨，在大公们及总参谋部的人员中都有热心好战的分子，因此，塞尔维亚人的事业是不可能被轻易地抛开不管的。倒是彭加勒有点沉不住气，他怀疑俄国人会漠不关心，他对伊斯沃尔斯基抱怨说，奥地利的军事准备并没有遇到足够的抗衡。

[\[17\]](#)此话的背后看来有这样一个信念：欧洲战争即将到来，如果俄国不愿拖住奥地利及德国的兵力，法国势必首当其冲。在法国来说，彭加勒在彼得堡对于条约条款中规定的条件所做的新的解释当然是含蓄的，而伊斯沃尔斯基也认为，他访问俄国以后对此已予以证实了。

[\[18\]](#)

12月3日，取得胜利的巴尔干联盟与战败国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伦敦举行和会。与此同时，大国外长也在伦敦举行会议，以监督巴尔干及爱琴海各国实行和解。外长会议立即同意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并决定迫使塞尔维亚人撤离亚得里亚海，接着又决定奥地利放弃新帕扎尔。外长会议反映了大国都想息事宁人，它们之间的争端并未受到巴尔干和平会议不欢而散的直接影响，也未受到巴尔干各国重新发生冲突即所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直接影响。重要的问题在于，塞尔维亚的胜利和扩张损害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望，因此，也就损害了它的安全。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建国以后，它的现时遭到塞尔维亚人及门的内哥罗人侵犯的未来边疆问题，已成为奥俄两国政府之间的一大难题。奥匈帝国必须采取怎样的立场，在什么情况下才值得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对于这两个问题，贝尔希托德事先肯定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但是德国首相在2月10日抱怨说，他被人家蒙在鼓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贝特曼和毛奇确实正在尽力使奥地利采取稳健政策。[\[19\]](#)贝特曼颇有远见地说，“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俄国几乎不可能坐视不理”。直到六周以后，外长会议上才有这样的记载：奥地利让出边界上有争议的两个村庄即迪布拉和贾科伐，但是在此期间，维也纳与彼得堡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奥地利军队的撤出加里西亚，应归因于德国的态度。

但是，德国人摇摆不定的态度，表现在1913年4月发生的斯库台危机上。这个城镇仍然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但已由列强划归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它曾先后受到塞尔维亚人及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基塔率领的军队的包围。塞尔维亚人接到俄国人的指令，已经撤退，但是尼基塔还没有撤兵。奥地利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参加伦敦会议的各国不能共同做出保证要尼基塔撤兵，奥地利将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柏林方面没有阻拦发出这个警告，而且德国人还明白地警告法国人，如果俄国进行干预，德国将进行战斗。与此同时，萨佐诺夫在这场危机中的行动至少与贝特曼在上次危机时一样，是息事宁人。萨佐诺夫指责门

的内哥罗人“操之过急，态度也太愚蠢”，违背了“欧洲和平的最高利益”。^[20]但是谁也不相信，泛斯拉夫情绪会容许俄国抛弃门的内哥罗人；只是由于尼基塔国王突然顺从起来，才避免了明显的战争危险。据说，他在危机时期大量购进维也纳交易所的股票，以求在危机结束时谋取利润。

斯库台事件教训颇多。门的内哥罗人撤出斯库台而未经奥地利人动武，这种场面按照20世纪政治及宣传的恶规陋习，应被认为是使奥匈帝国丢脸的事。因此，国内批评贝尔希托德是一个软弱的亲俄派，这就使他打算采取铤而走险的方针，虽然这在当时表现得还不明显。斯库台问题解决以后，巴尔干交战各国又回到伦敦举行会谈，各国代表最后于5月30日签订了伦敦条约。这个条约使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缩小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内地及两个海峡；希腊与保加利亚两国在爱琴海岸的确切划界，与爱琴海上岛屿的处理一样，将交由大国处理；马其顿的划分办法则交由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谈判决定。

正当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争吵时，贝尔希托德又重提扶植保加利亚来包围塞尔维亚的计划。该计划没有受到柏林方面的欢迎，主要是因为三国同盟的名义上的仆从国罗马尼亚也是保加利亚的竞争对手。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虽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人，但是罗马尼亚不可能长期与同盟国家站在一起。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是亲法的，所有各阶级的民族主义者都认为他们的敌人是匈牙利人，因为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省有一百多万罗马尼亚人少数民族。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保加利亚由于判断错误而对塞尔维亚和希腊发动突然袭击以后，德国人还反对奥地利为了解救侵略者而进行的干涉。当时人们曾经料想，奥地利的行动会使俄国参战，甚至连好战的奥地利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霍曾道夫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贝尔希托德的战争计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想打仗。但是，当希腊、土耳其，最后还有罗马尼亚都参加到塞尔维亚一边时，德国人却拒绝为其盟国的政策承担责任，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公开批准于1913年8月11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并且尽力鼓动报界敦促撤换贝尔希托德。^[21]事情还不仅如此。这个条约及伦敦条约曾将一些问题留待大国决定，当保加利亚及希腊双方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德皇竟使德国站到与奥地利对立的阵营里。^[22]奥地利人发现自己与俄国人站到了一

边，俄国人眼前所关心的是，不让希腊人沿着海岸悄悄地向君士坦丁堡扩展。

直到1913年秋天，贝尔希托德才在德国支持下第一次赢得了对塞尔维亚人的明显的外交胜利。塞尔维亚人从阿尔巴尼亚北部撤军的步子很慢，并且轻率地扬言，希望修改一下边界。维也纳方面发表的语气越来越重的警告都不够分量，对方一直未予理睬，最后到10月18日，奥国发表了要求塞尔维亚于一星期内撤退的最后通牒。德国方面是在最后一刻才被通知有此通牒（意大利人则直到通牒已发出才接到通知）。德皇的反应倒很积极。他反对和平解决，并向康拉德将军指出：“其他（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23]此话不假，因为在奥地利最后通牒之前所发出的最后一个警告已经使得萨佐诺夫和法国方面劝告塞尔维亚人撤军了。塞尔维亚人确实马上撤退了，但是贝尔希托德行动的最明显成就在于使德国政府特别是德皇注意木已成舟的事实。看来协商确实是不受欢迎，看来下列原则也已确立：奥地利在道义上和战略上对它自己的巴尔干政策负责，而德国只对这个政策的后果负责。

其实，德国只是在一场反对“斯拉夫国及高卢人”的预防性战争（德皇认为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中投机地支持奥匈帝国而已，除此之外，德国并没有什么正式政治策略，而且肯定也没有明确的战争目标。^[24]德皇是一个过于反复无常，而本质上又过于墨守成规的欧洲人。他有一句名言颇能说明他的特点：“保卫欧洲真正的利益要靠（两个）集团中的两大国家，即德国和英国并肩互助。”^[25]在世界政治方面，他对“黄祸”的重视超过了与英国的竞争，他还对他所称的“建立一个非洲殖民帝国的狂想”进行冷嘲热讽。^[26]“对东方的强烈要求”（这大概表现在巴格达铁路的建立上）也绝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一直帮助土耳其军队进行装备及训练，但是，德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政策并未受这种关系多大影响，也未因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想利用这种关系在土耳其树立德国的外交威信而受到多大影响。修建铁路的计划，由于德国的流动资金日益缺乏而告搁浅。军事上的支持则是明确无疑的，往往带有竞争色彩却又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谁也不知道土耳其人究竟会加入哪一个大国阵营。^[27]

在1913年年底经受考验的不仅是对腐朽的土耳其帝国承担义务的德国，而且还有其他承担义务的国家。德国应土耳其的邀请，又派遣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去重新整顿土耳其军队。德国将军李曼·冯·赞德尔将统率君士坦丁堡军团，同时兼任代表团团长。11月间消息传来，俄国感到震惊——也许是意料中的震惊。在彼得堡方面看来，重新考虑在海峡问题上究竟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持和平这个基本问题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到了1月间，萨佐诺夫准备把欧洲各国都拉进纠纷中来，以便促使土耳其方面解雇李曼；他建议三个协约国占领小亚细亚几个选定的地点。^[28]但是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能指望得到这种合作。法国一直想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它“将海峡的钥匙交给了”德国人。^[29]但是英国人则甚至做不到这一步，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派到土耳其海军中的顾问林普斯海军上将所拥有的对海军的指挥权与李曼在陆军中的指挥权是一般大小。无论如何，他们还害怕彼得堡与柏林会以牺牲英国为代价来实行和解，这比俄德两国打一仗的可能性更大。^[30]但是伦敦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德国人对瓜分的兴趣。德国人对于土耳其的领土是有些打算，但是还没有做好并吞的准备。他们比俄国人更希望尽量推迟瓜分的时间。^[31]

柏林方面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解的办法：将李曼的职位提升到超过了土耳其军团司令官那一级，让他只担任顾问。这个让步正好赶上了1月在彼得堡举行的为应付这个紧急形势而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在会上声称，俄国“已完全做好与德国进行一次较量的准备”，如果非较量不可的话；尽管总参谋部与萨佐诺夫都在指望着法国会来帮一手，也许还指望着英国的帮助。会议反对在两个“协约”伙伴都未参加的情况下冒战争风险，但听从了首相科柯夫佐夫的不同意见——但是科柯夫佐夫由于与宫廷体制不相适应，当时即将去职。

李曼事件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影响了6个月后战争与和平的均势。人们对俄国的战略和军备情况重新做了估价，俄德两国的政府关系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不祥的恶感。俄国总参谋部经过三思得到的结论是：在海峡地区不可能进行一场进攻战，因此决定为黑海舰队追加拨款，决定现役军人暂不退役，并且大力宣传重整军备。^[32]德国官方和公众意见认为这是挑衅，于是在德国和俄国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宣传战，这很可能是双方政府鼓动起来的。不久以后，各结盟国、奥匈帝

国，还有法国（在较小的程度上）都被拉进“一场其激烈程度无以复加的论战”。这是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所写的一句话，他还说：“这次论战，即使在一场战争即将爆发时也不会更加激烈。”^[33]

俄国在进行宣传战的同时，还准备对法国进行忠告。俄国公众及官方意见特别急切地希望法国能维护住三年兵役制的新法律。这个法律已于1913年春天通过，它与德国最近一次大规模扩军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任何一方的措施似乎都并不一定是由另一方的行动引起的，但是这种巧合的竞争却减少了各方的国内批评。法国的三年兵役制是弥补德国人口比法国人口多出一半以及德国的较高出生率所造成的差距的唯一办法。法国各左翼政党反对这个法律，但是法国1914年担任总理的维维亚尼答应彭加勒对这个法律维持不变。这样的各党之间的妥协，反映了法德之间的关系比俄德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尽管法国的报界更为谨慎一些。德国方面显示武力，特别是在阿尔萨斯或洛林显示武力，被认为是一个不妙的征兆。法国及德国的左翼政党对这种紧张状态表示遗憾，而于1913年在伯尔尼举行的一次国际议会会议则是一次反对民族主义联合的示威。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乃是肤浅之见，第二次年会也因此而未能开成。

英国并非置身于这些动荡之外。俄国由于惊恐，便力促英国加强其与三国协约的联系。英王于4月间访问巴黎，使法国人大受鼓舞，他们竭力为俄国的要求做辩护。格雷甚至做出这样的让步：可以让俄国大使了解1912年英法协定的内容，并建议举行英俄海军参谋人员会谈。德国人听到了这个风声，他们很难根据格雷在议会里回答问题时所说的支吾搪塞的话就表示谅解，格雷这番话的大意是：并不存在任何将会妨碍英国自由选择作战与否的协议。他们是从盗窃来的俄国文件中获悉这些情况，或俄国人对这些情况的乐观主义的解释。^[34]这时英德双方就欧洲以外的争端进行的直接谈判已接近尾声；柏林方面也许认为，这种会谈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到了7月底，关于英国的盟友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的瓜分计划已无障碍，可以签订协定了。7月27日，德皇授权签订巴格达铁路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英国控制波斯湾的航运，作为交换，德国人则控制直到终点站巴士拉的全部铁路线。与这个条约相联系，而且至少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一系列半私半官方性质的英、德及土耳其三方关于石油及航运利益的会谈

——这些会谈正在产生一个不相称的结果：两个敌对帝国的海军依靠的竟是同一个燃料来源。

近东和非洲外交局势的稳定——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俄国和日本在远东要求瓜分中国长城以北的地区——并没有影响欧洲各国的对立，若说有影响的话，只是使几个对立国家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罢了。当时人们对于欧洲的这两个关键问题是深信不疑的：一是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已是瓜熟蒂落——或者反过来说，南斯拉夫势力正在增强；二是德国的兵力确实具有压倒的优势，此事究竟是祸是福尚难预料。德国国务大臣雅戈将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前途比作“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先土崩瓦解”，他还哀叹德裔奥地利人缺乏帝国的意识。^[35]在维也纳，契尔斯基预见到土耳其终将被瓜分而与德国合并，他问道：“我们将自己与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紧密地拴在一起是否真正合算？”^[36]但是德国人却不肯耐心地研究这个帝国即将土崩瓦解的征兆和抢救的药方。他们认为，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即将实行合并的威胁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反对奥地利与保加利亚联合到一起，他们继续鼓励对罗马尼亚进行安抚，直至1914年6月沙皇访问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背叛同盟国已洞若观火时为止。^[37]

德国军事上的优势妨碍了斯拉夫民族解放的自然进程，但这甚至也不是俄国忌恨这种优势的唯一原因。德国在军事上胜人一筹本身就令人无法容忍。萨佐诺夫一语道破了此中原委，他说，“感觉到别国比本国强大，而且还得向这个只是在组织及军纪方面具有优势的对手让步”是“令人丢脸的”，而且这将导致“士气低落”。^[38]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德国人武器后面的外交政策是多么缺乏章法，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多么无所作为。为当时局势担忧的人们可以用德国军事政论家贝恩哈迪将军的畅销于国内外的一本书《德国与下一次战争》来做论据，该书要求最后压服法国，并且重谈特赖奇克^[39]攻击世界和平为“不合时宜”的谬论。其实这些观点有时也在德皇心中回荡（尽管公众并不知道），也许还影响了政界人士，正如他在1912年写的，“强调世界和平”颇有点“阉人气息”^[40]。美国总统的私人使节豪斯上校曾说过一段话，道出了欧洲人的情绪。他到欧洲是为了进行调解，这个任务本身也颇耐人寻味。他说：“形势非同寻常，好战情绪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除非有人代表你能够做出不同的理解，否则这里总有一天要发生可怕的灾难。仇恨太多了，猜忌太多了。”即使在

德国陆军中，在它的总参谋部里，也存在着大量的互不相容的信念——这是这些将军们固有的错误，他们被提拔当领导，不在于谋略，而在于战斗（或计策），而在疆场上志得意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品德。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以威慑胜，而是以征战胜。

当沙皇进入三国同盟的前哨地带访问罗马尼亚国王时，德皇到了波希米亚，在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的官邸与大公就奥匈帝国及巴尔干问题进行会谈。刚刚两个星期，这些问题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转折。6月28日，大公及其出身寒微的妻子遭到暗杀。凶手是一个有奥匈国籍的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名叫加甫利洛·普林西普。这次暗杀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秘密团体“黑手会”策划的，因为弗兰西斯·斐迪南主张实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联邦制，这种主张对于建立一个更大的南斯拉夫国家是个威胁。年轻的凶手们在受审时声称他们是出于私人动机^[41]，而奥匈政府并不了解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组织的规模，更不了解其领导人是迪米特里耶维奇，此人化名为阿皮斯，既是“黑手会”的头目，又是塞尔维亚陆军部的军事情报人员。尽管阿皮斯及其手下的特工人员是由俄国人给钱的，可是这次特殊行动俄国完全不可能给予帮助，而且俄国的大小官员也不可能知悉。案情不利于塞尔维亚政府之处在于它全面放纵民族统一主义者，实际上鼓励了它的活动。据说塞尔维亚参加“民族保卫”组织（Narodna odbrana）的官员还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武器，这个组织是个公开的爱国团体，奥地利人将它与秘密的“黑手会”混为一谈。奥地利警察的情报工作与他们的预防措施同样拙劣，这方面的无能肯定使他们在控诉塞尔维亚人时软弱无力。现在还弄不清楚，塞尔维亚的帕西奇政府对于“黑手会”的计划到底了解多少，如果他们参与其事的话，到底是默许还是胁从。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曾向维也纳方面提出警告，不过过于谨慎从事，因而没有引起重视。

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所引起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本质上与前几年的危急情况一样。那时奥匈政府没有以之作为借口向南部的斯拉夫人开战，因为当时存在着俄国会进行干预的危险，而德国是否支持奥匈帝国还不一定。康拉德将军认为这一次机会并不如上几次那样好，但他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42]这次冒险，对于宫廷方面及官员们在深思熟虑以后有意孤注一掷的情绪是有吸引力的。到7月1日，政府方面的意见普遍倾向于开战，因此，蒂萨在一次内阁会议以后（他在会上

是唯一的持异议的人），便向皇帝表示他绝不赞成开战，他认为运用贝尔希托德所说的“条约规定的开战理由”很不恰当，是“致命的失策”^[43]。但是，这一次德国肯定是会合作的。一个特别使团已经派往柏林，去探测三国同盟的大伙伴的意向了。

霍约斯伯爵于7月5日递交德皇的文件中有弗兰西斯·约瑟夫写的一封信，附有奥国关于巴尔干政策的一份简要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重申奥方关于争取保加利亚入盟以对付塞尔维亚并防止罗马尼亚背叛同盟的计划，备忘录警告说，俄国干涉巴尔干的真正目的在于反对德国。信和备忘录均未明确提出立即行动的建议，更未附有关于立即行动的计划，但是信中宣称，未来的计划必须以“孤立并削弱塞尔维亚”为基础^[44]；奥方认为德皇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点：“绝不能让在贝尔格莱德的祸乱根源不受惩罚地存在下去。”

霍约斯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佐基耶尼感到德皇已有愿意接受的心情，因为他对这次暗杀他的私人朋友的弑君行动是十分气愤的。但他在忙着安排一些急事，以便能够于第二天离开首都与德国舰队一起做一年一度的海上巡游。他匆忙地同意了奥方的意图，交由首相去进行正式商谈。佐基耶尼可以立即打电报报告说，即使与俄国交战，德国也答应给予支援；并说，如果奥地利外交部认为“必须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德皇将对他们失去“当前有利时机”感到遗憾。^[45]德皇于7月6日登上快艇以前，与陆军及海军参谋人员的代表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当时毛奇和提尔皮茨均不在。他警告他们，有可能与俄国突然爆发战争，从而也会与法国交战，但他不认为俄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显然根本没有研究过英国的态度。

德皇与首相之间进行的商谈也是同样草率。首相是在奥地利人之后来到波茨坦的。历史学家们早已破除了这样的神话：在一次正式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战争计划。^[46]据佐基耶尼说，商谈结果是首相确认了他主子做出的保证，首相同样认为，目前最彻底、最有利地解决问题而对塞尔维亚采取“直接行动”最有利的时刻。^[47]佐基耶尼在报告中谈到的首相的保证与贝特曼-霍尔威克自己致契尔斯基的电报中所谈情况差距并不很大。贝特曼-霍尔威克的电报记录了德皇已同意维也纳方面提出的关于巴尔干的总计划——其中在谈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德国将继续进行合作——电报又称，至于“与塞尔

维亚之间的问题”，德皇“将不表示态度，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他的权限”^[48]。但他将“忠实地站在奥匈一边”。

有人替贝特曼辩解说，德皇的不明确表态意味着保留，但这种说法与下列事实有矛盾：在将近三个星期之中，德方并未向维也纳方面发出确有助益的暗示，甚至连主张采取稳健做法的暗示都没有。大约三个星期之后，只关心什么是最有利时机的军事政策，就使得防止战争爆发的外交活动的活动余地缩小了。在这期间，契尔斯基对他的指示所做的解释，即敦促德国的盟国^[49]自由行事，并无条件地做出保证的说法，不断受到支持。在这方面，首相和德皇都不打算在各大国之间有意挑起争端；但他们却赞同在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进行一场他们认为是实力悬殊的较量，他们估计这种较量可以局限于一个地区。至于万一判断错误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却漠不关心。他们对于其潜在敌人们将如何组合，也没有从政治上及战略上做认真的估计。因此，在凡尔赛条约中指责德国将战争“强加于人”，这是出于误解。德国做出这种致命的许诺，是由于轻率，而不是由于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德方在处理下列问题时则是经过考虑的：一是执行对奥国的许诺比实际需要严格得多；二是出于保证奥地利在政治上战胜塞尔维亚这样一个未见得必要的考虑，把发动一场对俄法两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贝尔希托德接到德方鼓舞人心的回答后，7月7日，他使内阁会议做出决定，对塞尔维亚人发出挑衅，使之进行战争，从而不使他们在外交上丢脸。^[50]他争辩说，德国人将把任何种类的讨价还价看作“示弱，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在三国同盟中的地位和德国的未来政策”。这时佐基耶尼发来报告，使这种观点更坚强有力了；报告说，柏林方面迫不及待，正流行着这样的意见：俄国正在为将来打一场进攻战做准备，但是对于打一场防御战则还未准备就绪。

在这期间，一个行动计划已经初具规模。7月10日，契尔斯基已经可以向柏林报告说，奥国即将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一份限48小时之内答复的最后通牒，报告指出，如果这个最后通牒被接受的话，那对贝尔希托德来说将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解决办法。^[51]但是德国人不肯帮助奥国提出明确的要求。他们拒绝对这种外交活动的方式承担责任，但是却接受其后果。德国人的要求是加速奥国的战备，并采用让

德奥两国的总参谋长度假的欺骗办法来解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奥地利方面向柏林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必须将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7月23日，是因为7月16日至22日彭加勒和维维亚尼正在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最好等法国人回到国内以后。但是贝尔希托德对康拉德解释说，推迟除了因为外交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要在动员之前收完庄稼，并等待暗杀事件的调查情况。[\[52\]](#)

对塞尔维亚进行控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外交部派往萨拉热窝的调查人员在报告中提不出甚至应负间接责任的证据，更不必说官方参与其事材料了。[\[53\]](#)但是，到7月19日，一份最后通牒的条款已经草拟好了，并经内阁会议及皇帝批准，以便于第二天将其发出，在7月23日晚上向贝尔格莱德递交照会后通知各大国。德国人当然在几天以前便知道最后通牒的大意了，但他们对文本的确切内容感兴趣，看来却只是为报界做准备。[\[54\]](#)国务大臣雅戈声称，他曾向奥地利大使提出过批评，指出最后通牒过于苛刻，但是他在收到文本后的24小时却打电报给几个主要德国大使馆说，他还不知道最后通牒的内容。[\[55\]](#)德方事先确定好了的政策是装作没有看到最后通牒的内容。

德奥这两个中欧国家之间直到这个阶段为止的勾结程度，已记载在巴伐利亚驻柏林的代表舍恩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由他于7月18日送往慕尼黑，谈的是他与副国务大臣齐默尔曼会见的情况。舍恩预告了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条款，写明德方已让奥方全权处理，并说明德国人虽然对奥地利的立场给予直接的外交支持，却将“声称德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对奥地利的行动感到惊讶”[\[56\]](#)。德国要求将这场冲突局部化，希望俄国的反对也许不过是虚张声势，并希望法国和英国也许会劝说彼得堡谨慎行事，但是舍恩的情报表明，如果法国的生存受到威胁从而危及力量对比的话，甚至不能指望英国会采取中立态度，雅戈在致利希诺夫斯基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对德国政策的动机做了更为权威的解释；利希诺夫斯基在伦敦一直批评德国的政策竟屈从于奥地利的利益。而雅戈在信中辩解说，如果奥地利要能在“政治上重整旗鼓”，如果要想防止“俄国稳定它在巴尔干的霸权（他说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么，德国的唯一可利用的盟国奥地利就必须惩罚塞尔维亚，同时，他表示希望使这场冲突地区化。不过，尽管他不想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却认为趁现在与俄国摊牌，要比几年以后

摊牌为好。“到了那时，它（俄国）将在兵员数量上压倒我们，那时它将建起波罗的海舰队和战略铁路。在这段时间中，我们的阵营将变得越来越弱。”^[57]

这就是7月份第四个星期的最初几天中，奥德方面互相承担义务的情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另一方面动向不够信赖或缺乏了解，才这样做的，或者说，才更要这样做的呢？为这两个中欧国家辩解的人，在为柏林和维也纳之间洗刷直接责任时，发现以下几点可以减轻它们的罪责：贝尔格莱德的挑衅态度；法国及俄国挑衅性地巩固自己的阵线；以及英国做出的令人误解的中立态度。这些指责，尽管是一些争辩的说法，却也有些历史意义。当时从塞尔维亚发出的报道都是偏袒一方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舆论十分激烈，在萨拉热窝发生暗杀罪行以后，塞尔维亚报刊上立即开始与奥地利对骂。政府的态度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他们的过错在于没有倡议由塞尔维亚方面和奥地利方面同时对暗杀背景进行调查。他们之所以这样考虑欠周，无所作为，也许是由于“黑手会”的威逼，也许是由于担心揭露出来对自己不利，而不是由于听从了舆论的意见。但是，帕西奇与其同僚对于打一场将会造成很大牺牲的民族解放战争并没有热情，他们害怕这场战争即将到来，因此终于通告各大国，声明塞尔维亚人确未参与暗杀事件，并表示愿意使奥方得到合理的满足，不过，这个措施未能有效地防止奥地利人发出最后通牒。

从危机开始直到奥地利宣布条件时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曾经从俄国得到任何重要保证或劝告。但是，重要问题不在于俄国一国对于奥国备战动向的反应——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维也纳和柏林方面只将这种反应看成虚张声势——而在于法俄团结的发展。彭加勒和维维亚尼的彼得堡之行，无疑与局势的日益紧张恰好吻合。

在7月份前两个星期中，法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课题并不比其他两个协约国更为积极。7月15日，法国领导人按原定计划启程访问俄国。在他们会商的议程中，塞尔维亚问题是排在后面的，例如，排在增进英俄关系的问题之后。^[58]他们预定于7月20日到达，23日离开，28日回到巴黎。这些日程后来未做任何变动，而且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日子里，法国外交部的政策处于瘫痪状态。这从法国文件材料（包括彭加勒自己的回忆录）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关于这次俄国之行的报道极少——俄国公布的文

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补充材料——这是很难用活动不多解释得了的。^[59]毫无疑问，这两个盟国的领导人之间一定交换过直接的保证。7月21日，萨佐诺夫第一次对德国大使说，俄国不会容忍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更不用说对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了，他说，因为俄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不是消极的”^[60]。同一天，彭加勒自己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用下述事实教训奥地利大使：“塞尔维亚是有朋友的，因此会产生危及和平的局势。”^[61]但是，关于这次访问期间法俄双方实行联合政策的协议，唯一明确可靠的记录是英国大使于7月24日的一封电报提供的。布坎南报告说，法俄之间已就欧洲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并“决定在维也纳采取行动，以防止提出让塞尔维亚进行解释的要求，或任何等于干涉塞尔维亚内政的命令”^[62]。法、俄方面没有接着在维也纳提出什么对应的最后通牒，但是上述决定暗示，法国政府认为，保卫塞尔维亚的独立就是条约条款中所考虑的情况。对彭加勒个人持批评态度的人以及专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人，一直利用这次俄国之行大做文章，说这是这两个军事盟国的阴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相形之下，人们谴责英国的外交直到这个阶段还采取模棱两可的不偏不倚态度。^[63]其实早在7月6日德国大使便告诉格雷，奥地利很可能采取行动，甚至还谈到德国予以支持的可能性。利希诺夫斯基关于奥地利情况的警告业经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证实，甚至德国“怂恿”奥地利的情况也于7月22日被格雷在外交部的最敏锐的顾问克劳觉察到了。但是，就在同一天，格雷却对法国大使说：“也许柏林方面正在努力节制维也纳。”^[64]尽管格雷向奥地利和德国大使表示了他的日益不安的心情，他并没有指责他们的国家。直到7月23日，他还在说什么其他“四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言而喻，英国是中立国了。^[65]

英国暗示中立，这无疑是个可以避免的错误。格雷倾向于将德国政府当作一个没有向谁承担义务的国家，只是不如英国那样不偏不倚，这种倾向肯定是出自理智上的错误，而且是由于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而做出的判断；随后，柏林方面又重新考虑了自己的政策，这证明格雷的看法还是有些道理。但是，人们倾向于夸大格雷影响事件的机会，并且认为他早就有这种机会。不论在奥匈帝国犯下罪行以前，格雷的分析有怎样的缺点，他也绝不可能以通过法国向俄国做出反对德

国的保证，来与奥匈帝国相对抗。采取英法协商协定这样的临时措施——这就是1912年双方来往信件的全部成果——就会要求内阁同僚们表示审慎的同意。但是在一个已因北爱尔兰危机弄得四分五裂的内阁中，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若是不鼓励法俄两国，而在私下对德国提出警告，这种威吓对德国实际上能有多大效果，就很难说，而且这种做法也与格雷的直率作风不合。倘若以英国自己承担义务来鼓励它的两个协约国伙伴，那又会冒这样的风险：引导他们“依仗我们的支援来面对战争的考验”，到头来却发现这种支援并不是真能马上得到的。^[66]这种风险是冒不得的。如果格雷没有将英国的干涉看作避免战争的一种办法，那是因为他的思想必然要受到英国政治现实的制约。^[67]

德国人的政策并不以英国的不干涉为转移，这依然是事实。正如舍恩的报告所表明的，德国外交部估计，如果为了援救法国而需要干涉的话，英国是会进行干涉的。在德国，流行着两种战略原则，一是不相信英国会持中立态度，二是不理会英国中立不中立的问题。持第一种战略原则的人是提尔皮茨的大海军主义派，他们认为两大海军、商业帝国在全世界的对抗应该是德国政策的主要动因。提尔皮茨不仅不愿与俄国打仗，他还很想牺牲英国利益来求得和解，因为“代价不论如何，我们必须使鲸鱼与熊相对抗”^[68]。这样一种外交改革也得到与他性格很不相同的德国保守派人士的赞同，并得到彼得堡宫廷中一个强大的亲德派的支持。^[69]另一个战略派别在总参谋部。这些人既不偏袒英国，也不偏袒俄国，他们相信欧洲的霸权将在佛兰德平原和波兰平原上打一仗而见分晓。他们的日程表是先胜法国，再胜俄国，而没有考虑大规模的英国陆军会参战，也没有考虑海上力量所起的长期影响。多年来，德皇在这两派之间忽东忽西，对它们的矛盾所在也不甚了了，但7月5日采取的是总参谋部的政策。

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送到了贝尔格莱德，通牒要求在48小时之内接受。提出的各项要求是惊人的，但是，这些要求与提出它们的种种借口是相称的，与尚不明真相的塞尔维亚的阴谋也是相称的。这些要求包括公开谴责民族统一主义者的野心、解散“民族保卫”组织以及其他使泛斯拉夫主义丧失体面的让步。^[70]但奥方却不认为此事已引起俄国人的敏感，只是相信他们会接受战争的风险，这种见解载于维也纳方面向驻彼得堡的奥国大使萨帕吕

发去的一封电报中，这封电报向大使提供了一个为最后通牒辩解的简要说明。电报开头说：“如果俄国认为与中欧国家进行最后清算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么，下列指示就是多余的了。”^[71]当然，这种非难忽视了一点，即双方都断定俄国在1917年以前不会准备就绪。^[72]不过，他们采取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战争将使沙俄得到民族统一的最后机会这种理论——后来这种理论很流行。在1914年夏季，俄国的革命运动及大规模政治性罢工是否使沙皇及其顾问们受到影响，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是有证据证明，他们并未利用泛斯拉夫主义这个唯一有利于沙皇的重要政治力量。

据说萨佐诺夫看到奥国提出的条件后曾惊呼：“这就是欧洲大战了。”^[73]但是，在他会见奥国大使及德国大使时，并没有任何表示无可奈何的迹象，而只是愤慨。他对德国大使波尔塔莱斯发出警告：

“如果奥地利要吞并塞尔维亚，我们将与它作战。”^[74]这话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令人容易产生误解的保证：奥地利不想吞并塞尔维亚；话中实际上掩藏着一个由巴尔干其他各国分割塞尔维亚的计划。当时没有首脑的法国政府的回答很暧昧，但意大利则表示反对不经协商便进行“这样影响深远的侵略行动”^[75]。这时好像已经可以看出，意大利将在最初几次战役以后参加出价最高的投标人一方、即最有可能得胜的一方；在意大利，与在罗马尼亚一样，舆论并不支持其盟国，而是支持协约国。甚至格雷的不偏不倚态度也不足以证明奥国和德国的使“争端地区化”的希望是能实现的。在他看来，对俄国的挑衅好像搞得太过分了，他呼吁德国在维也纳作为四国调停国的一部分进行活动。^[76]

俄国的反应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内阁会议批准了一个对付奥地利的部分动员计划，以备在适当时机实施。他们还同意建议塞尔维亚人撤出贝尔格莱德，并听任大国来为它进行安排。这种建议被认为是鼓励塞尔维亚人拒绝奥国的最后通牒，但是全部论点所依靠的根据则是对一些残缺的来往函电任意重新进行解释。^[77]直到7月27日，沙皇就塞尔维亚的呼吁发去的复信，还显然是一片闪烁之词。与此同时，萨佐诺夫虽然满腔愤慨，但还是向奥地利提出了延长期限的要求。不过，这时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在于争取英国对俄法表示团结一致。当布坎南向国内报告萨佐诺夫对英国的这一希望时，克劳表示的意见是，法国和俄国已经决定接受奥地利的挑战，因此唯一的问题在

于德国是否决心以兵戎相见。他建议，如果法俄任何一方开始动员，就向柏林发出警告。但是他未能动摇格雷的如下信心：英国公众不会批准为了塞尔维亚的争端打一场战争。^[78]

塞尔维亚的答复并未无条件地接受奥地利的要求，因此奥国大使离开了贝尔格莱德，接着，奥国便开始按原定计划进行部分动员——只针对塞尔维亚，而不是针对俄国。其实，塞尔维亚的动员工作不仅走在奥国的前头，而且在对最后通牒发出回信之前便已开始了，他们对最后通牒是认真对待的。不过，塞方照会的内容十分和解。他们明白地接受了大约半数的要求，对其余要求则作了含混的回答，但用词甚为谦逊。他们还建议将尚有争议的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德皇很恰当地称这个答复为“在期限只有48小时的时间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他认为，奥国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大胜”，并说“进行战争的所有理由都已消失了”。这是欧洲人普遍的看法，奥地利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列强各有自己的战略，和解的前景仍然不妙。悲观助长了武力，武力又证明悲观是有道理的。

英国方面提出召开会议的计划，建议各方实行和解，并暂停调动军队。格雷是在对1913年伦敦会议的愉快回忆的影响下提出这个建议的，但是形势已经与当时大不一样了。在前几次巴尔干危机中，大国均不是争端的直接当事者，奥匈政府既没有全力以赴，也没有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1914年举行一次会议的价值是可以为和解提供时间。但是，和解并非普遍的要求，而且据了解，各国的军事计划制定者莫不相信——互相矛盾地——时间是在他们对手那一边。

尽管德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四国进行调停，但是反对举行会议，理由是，这样的会议对于奥地利来说等于是有一个“仲裁法庭”。^[79]法国和意大利接受关于举行会议的建议，但是萨佐诺夫宣称，他宁愿与奥地利人直接谈判，一天以后，贝尔希托德就拒绝以最后通牒及其复照为基础讨论奥塞两国关系。^[80]接着，维也纳方面通知英国使节，调停已经太晚了；7月28日的宣战实际上是有意用来破坏调停的。贝尔希托德在两天前请求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批准宣战时就说了这样的话；看来是德国总参谋部敦促他们造成既成事实的。^[81]事实上，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并没有要求在8月12日以前采取实际行

动，他们炮击贝尔格莱德本来是想借以结束政治措施，而并不是开始进攻。

这第一声宣战并不算定局。俄奥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尽管萨佐诺夫宣称谈判显然不会取得什么成果。^[82]德国在维也纳的代表机构确实很受鼓舞，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关于德国的政策，还很难说已经有了统一的掌握。最严重的是宣战对俄国备战所起的影响，因此对德俄关系也起着重大影响。从7月25日开始，俄国和德国都开始了所谓“先期动员”，包括一些预备措施。按照惯例，这个阶段还不算敌对时期，德国由于动员迅速，所以这个时期对它作用不大，而动员慢得多的俄国却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好处。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使俄国提出了现役人员进行部分动员或总动员（涉及颁布征集令及全部其他措施进行战备）的问题。主张采取更为激进方针的军方的论点被认为占了上风，认为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及时备战乃是当务之急。7月29日的事态发展就更有利于这种论点，错误地认为德国人竟会让俄国人抢先一着。原来有迹象表明，奥地利可能会做出让步；但这种迹象已不如下列消息重要了：贝尔格莱德已遭到炮击，德国发出单独的威胁说，如果俄国不停止其规模较小的军事动员，德国将进行全面动员。^[83]这时柏林方面像往常一样莫衷一是；萨佐诺夫从波尔塔莱斯那里收到的类似最后通牒的文件，其精神与贝特曼及雅戈在另外场合讲话的精神不一致。^[84]但是萨佐诺夫现在深信，对贝尔格莱德的攻击表明，奥地利进行谈判一直只是为了争取时间。^[85]于是他改变初衷，决定进行总动员，并且说服不愿进行动员的沙皇批准总动员。法国方面最近发出的表示支持的保证，也许有助于俄国政府做出决定，但法国实际上是很不同意这样操之过急的。^[86]

进行总动员的指示刚刚批准，沙皇又下令撤销该指示，而代之以各国已经知道的部分动员。这是德皇致沙皇的一封亲启函件的结果。德皇与沙皇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电报，是在德国方面重作考虑的时期发出的。不幸的是，德皇鲁莽行事，胸无定见，而沙皇优柔寡断，考虑不周以致无法控制有利形势或不利形势。德皇从海上巡游回来以前所起的影响完全是好战的。但是自从他看到塞尔维亚的复照（看来是有意不让他看到的）以后，他在评论问题及发出的指令中，就时而自夸军事上的强大和政治上的正确，时而自感无能为力以表现清醒，两种情绪交替出现。他看到复照后立即感到，奥地利拿下贝尔格莱德以

后，也许就感到已经有“面子”了。这与贝特曼-霍尔威克已经开始对英国的调停建议给予支持是一致的——鼓励他表示支持的原因显然在于他看到英国中立的希望越来越小，除非德国能赢得英国的中立。7月27日格雷向德国大使谨慎地谈到一次欧洲战争的范围问题，这番话使利希诺夫斯基向贝特曼明确地警告说：“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将招致英国与我们对阵”^[87]，因此，一定要坚持以英国向彼得堡提出和平建议来交换德国在维也纳采取同样的行动。

贝特曼将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传到维也纳，并加上他自己的赞同意见。他的目的很可能是要在世人眼中减轻德国的责任，但是正如他坦率地表明的那样，从国内政治看，也需要做出德国是“被迫参战”的样子。^[88]他在发给契尔施基的指令中有一些保留条款，特别是这样一点：大使必须“注意避免给人以我们要遏制奥地利的印象”^[89]，这都说明，他不大考虑避免战争的问题，而主要考虑的是为进行战争找到更充足的理由。不管贝特曼的个人见解如何，他向维也纳发出的越来越强烈的告诫，几乎肯定要被毛奇和国务大臣雅戈弄得不起作用。7月28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佐基耶尼报告说，德国支持英国关于调停的建议，显然只是做做样子，德国政府实际上是“坚决反对重视这些建议”的。^[90]不论佐基耶尼在转达雅戈对首相意见的解释时是否言过其实，贝尔希托德听信了佐基耶尼的话，开始对德国官方表态有意地采取了冷淡态度。我们尚不清楚，契尔施基对首相的指示（更不用说对他的心情）的解释到底忠实到什么程度，但是贝特曼的论点及指责得到的只是闪烁其词的答复。奥地利人早已得出结论：取得面子上的胜利并无价值，必须将部队的调动进行下去。

这时柏林的形势起了变化。贝特曼最近向维也纳发去的非常愤慨的电报已经撤了回来^[91]，德皇对于德国政府准备劝告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在贝尔格莱德住手”所给予的支持十分软弱无力，而且也为时太晚。^[92]奥地利人由于成功地拖延了足够的时间，已使德国总参谋部对俄国备战情况日益加深的忧虑在决定德国政策上占了上风。7月29日，总参谋部向首相正式提出警告，如果俄国和法国继续备战的话，德国将逐渐丧失在动员方面的领先地位。7月30日晚上，贝特曼得悉这方面备战情况的军事情报时大为震惊；而且，德皇的和解态度实际上也有所变化，这就令人更加担忧。因为汉诺威的一位诸侯向威廉报告说，乔治五世希望英国保持中立。当威廉听到来自伦敦的消息

说，英国保持中立已无指望，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沮丧。^[93]与此同时，毛奇却早已在向维也纳的康拉德发去的电报中反对贝特曼的做法了，他鼓动说：“立即动员起来对抗俄国，德国将要进行动员。”^[94]这个命令引起贝尔希托德发出如下评语：“到底是谁发命令，是毛奇还是贝特曼？”这话问得好。正是由于各方缺少配合，更确切地说，由于柏林方面权力不统一，使得处于从属地位的盟国能够对其上级盟国主张和解的正式意见采取拒绝接受的态度。贝特曼在其回忆录中不援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这反映了他的忠诚态度，而并不说明他这种写法作为一个历史资料是可信的。

俄国进行部分动员的措施足以说明德国将军们为什么在7月30日急躁不安，而向贝特曼及康拉德施加压力。德国第二天就实行了总动员。因为据悉，俄国的部分动员，除三个征兵区以外，包括了帝国的全部地区。而且，这三个被除外的地区都是面对着德国战线的，这一做法在政治上和在军事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却被人们低估了。不仅如此，俄国进一步实行总动员，这就阻止了德国做出决定性的反应，使俄国真正铸成了大错。

俄国于7月30日做出的决定，在第二天早晨公开宣布，这个决定完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部分动员已不切实际；相信德国的总动员已近在眼前。将军们强烈要求撤销沙皇前一天发出的最新命令；由于萨佐诺夫的鼓吹，这个懦弱无能、伪装虔诚的专制君主终于背离他的求和平和亲德的倾向，而求助于平日惯用的宿命论。法国在最后关头发出要求谨慎行事的呼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对俄国人的决定起过什么影响，如果起过影响的话。7月30日法国发出的有关电报一方面重申它对联盟义务，同时又建议俄国“……不要立即采取任何措施，致使德国得到全面或部分动员其军队的借口”^[95]。这封电报是真诚的，理应被接受，但是很可能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将这个警告转达得太晚了，或者只转达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甚至根本没有转达。他在整个这次危机中的行为都是可疑的。^[96]伦敦方面没有发出这种要求谨慎行事的忠告。格雷仍然抱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其是对是错）：当他不能对由于自己的影响而造成的间接后果承担责任时，他绝不施加影响。

俄国的总动员是起决定作用的祸源。有人说，俄国的总动员只是为了防止德国方面的同样行动，即使用这样的借口，上述关于祸源的看法也还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不能确有把握地说，俄国的部分动员确实促使德国人采取了反措施，尽管有毛奇向康拉德发的电报。再说，俄国人的动员也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俄国人在竞赛的最终阶段想使德国方面不那么领先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德国人迅速抵消。历史学家不会宽恕当年的战略家们的幻想：迅速动员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迷信进攻的做法从来没有这样流行过；而由于火力的优势压倒了战术上的机动性，这种做法也从来没有这样不再适用。

在1914年，一个大国进行总动员，毫无疑问地要造成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因此职业军人不能像政客们那样假装认为：俄国的军队会在战时体制下永远不采取行动。德国政府于7月31日立即声明全国处于战争紧急状态，接着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停止军事准备工作，这些只是在技术上构成入侵的主动权。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人已开始按照所谓的史里芬计划提出的要求，尽力加强其战略上的主动权了。

这个著名的计划又是另一种情况，它从史里芬到毛奇经过了20年的演变，一直是训练和动员的基础。它设想以一场“闪电”进攻，在挥师指向俄国以前先打败法国，同时以德国的防御战役顶住俄国。其战术包括假道比利时进军包围法国的左翼。^[97]在这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中，以西线为主，因此必须挑起与法国的冲突。按照计划，在向俄国发出限12小时之内答复的最后通牒的同时，并向巴黎发出限于18小时之内做出答复的要求保证中立的最后通牒。在此以前已将自由通过比利时国境内的要求发往布鲁塞尔。一俟对法开战，立即提交比方。但是作战行动推迟了，因为法国人并没有首先宣战，如果他们同意中立的要求，德国大使将进一步要求——德国政府对势必在两线作战，态度是如此坚决——临时交出边境上两个要塞作为保证。但是如果法方既不答应中立，又不宣战，柏林方面则考虑以暂不进攻为宜，这是为了寄希望于法国方面首先动手或进行挑衅，那样一来，也许会影响英国的态度。德国方面不会由于英国的原因而放弃史里芬计划；他们没有另外的代替计划，因此接着一定会与比利时中立的保证者英国发生对抗。但是，尽管实际上各方面都认为，既然俄奥两国已开始动员，几天之内，欧洲大陆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但并不

认为英国会马上就进行干涉。法国人或德国人并不把比利时的中立看成关键问题，他们认为最紧要的问题在于法国的命运及其行动——也许英国人也有这样的看法。

7月27日格雷发出的警告已使柏林方面对问题重新作了考虑。但是警告发出之后，英国议会及舆论界并没有配合外交方面的需要以收到实效。内阁的看法也没有跟上。尽管自由党的报纸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分歧意见，但是自由党的大部分支持者对战争均无思想准备。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总是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打仗是不道德的，而且从财政上看，也不可能打得起来。他们还认为，德国是个商业大国，一定是先倾向于和平的。再说，德国国内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抱着国际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吗？不是有反对军国主义的强大的工会吗？许多保守派人士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也抱有上述许多幻想中的某一种。还有，在一般认为已经结盟的国家中，俄国既是英帝国在亚洲的传统敌人，又是国际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传统敌人；对于法国，则是一方面寄予同情，同时又怀疑它对一场复仇战争有兴趣，而减少了对它的同情。

在和平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政治上的这些牵制导致了内阁的分裂。照丘吉尔的看法，如果格雷超越事态而冒进，并寻求权力来影响来压服内阁成员的话，内阁就早已“解体”了。^[98]当德国人赤裸裸地提出比利时中立的问题时，舆论是会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内阁在几天以前就不会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设想中的开战理由。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格雷若要进行干预，到底准备承担多大的义务，到底准备最早在什么时候承担义务。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按照当时战略家们普遍的看法，在俄国人发出全面动员令以前，如果德国坚持要求维也纳方面实行和解，时间还不“太晚”。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奥地利人可以与前一个阶段一样，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取得和解。第二，早在俄国进行总动员以前，而且无须发出明确警告，就已有足够的迹象使德国人得出英国将进行干预的结论。英国人的意图虽已有迹象但未能影响外交形势，是由于柏林与伦敦一样号令不一。

格雷没有在比利时问题上向内阁施加压力；他的有限目标在于取得一项保证，使法国北部海岸不受德国舰队的进攻，因为英法两国舰队的联合重新部署已使英吉利海峡各港处于没有防御的状态。这时，

法国和德国大使都向格雷一再提出要求，法国大使要他进行干预，德国大使则要他中立。他向德国人提出的警告比向法国人做出的许诺稍稍强烈一些，但是不太过分。7月29日，英国驻柏林大使戈申报告说，贝特曼提出了希望英国中立的很不明智的要求，答应以不夺取法国在欧洲的领土为条件；格雷在回电中明确指出，英国不能眼看着法国被人击败。^[99]7月31日，俄国和德国进行动员，德国宣布处于战争紧急状态，德国向俄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种情况使格雷向巴黎和柏林方面提出尊重比利时中立的要求，但是他拒绝向利希诺夫斯基做出英国将守中立的保证。^[100]另一方面，他在8月1日仍然拒绝对法国承担任何义务，他指出，英国并不了解法国已对俄国做出什么许诺。从表面上说，法国政府并没有要求英国在军事方面承担什么任务，但法国大使康邦私下里却提出了英国的荣誉问题。

直到8月2日，英国内阁才准备做出保护法国北部海岸的保证。到这时，保守党正式保证将支持干涉，卢森堡已遭到进攻，法国和比利时已开始动员，比利时人已明确表示，他们如遭到进攻将进行抗战。^[101]在德军开进卢森堡时，德国含糊其词地辩解说，那是因为法国即将发动进攻；他们在对比利时准备发动进攻时也同样提出了一套所谓非中立行为的荒诞不经的指责，德方并已开始企图在德法边界上制造和捏造事端了。

这种宣传几乎打动不了任何人。相反，法国的实际表现却为英国的干涉铺平了道路。法国不仅撤除了前沿的防御工事，以避免德方挑衅，而且还推迟了动员，直到法国总司令以辞职相威胁，才停止撤除工事，恢复动员。^[102]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有消息说奥俄关系发展得颇有希望，因此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时机并不成熟。^[103]事实上，奥俄关系并没有什么进展。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建议停止动员，也没有要求“在贝尔格莱德住手”^[104]。贝尔希托德则只是重复他早先那一套推诿之词。与此同时，德国的支持调停的人已经偃旗息鼓。贝特曼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已经变成及早对法宣战的拥护者了，尽管这样做遭到了强烈的指责。提尔皮茨提出反对意见，他还没有做好与英国进行海上战斗的准备。贝特曼一旦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就没有足够强硬的力量能顺应新的形势发展来修改这个政策了。据说，英国将于8月1日提出建议，只要德国军队不进攻法国，就保证法国严守中立；对于这个传说

中的建议最感兴趣的是德皇。^[105]伦敦方面实际上讲了些什么，我们仍不清楚；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伦敦方面的意见莫衷一是，如果不说是优柔寡断的话。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德国方面在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上顽固己见，这从毛奇处处节外生枝^[106]以及德国首相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严厉条件可见一斑。他要求英国“答应在俄德两国发生冲突时以其全部武装力量保证法国实行无条件的中立”，这个中立的范围及期限“将由德国一方做出决定”。^[107]

最后，德国方面按计划于8月3日对法国宣战，并向比利时发去了最后通牒，这给格雷提供了一个进行干涉的成熟的时机，他便在当天发表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干涉的问题。根据分析，这个讲话无异承认说，他对英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失去了控制。但是，他的听众并没有做这样的分析，他们同意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民族利益与道义责任结合起来。格雷没有要求投票支持战争。在向德国发出一个要求停止入侵比利时的劝告，而德国未予理睬后，他才提出了这个要求。德国人却利用这段宽限时间，把自己的战列舰在英国大炮的炮口下驶往君士坦丁堡，借以诱使土耳其人与之结成军事联盟。

德奥这两个同盟国也有意地放弃了它们名义上的盟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支持它们的机会，就像放弃了使英国中立的机会一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照理说，各国之间的宣战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形式：俄国对奥国宣战，接着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最后是法国对德国宣战。但是各国都想在军事进攻方面抢先一步，这就将这个顺序打乱了。因此，德国的技术性进攻使它的几个仆从盟国得以自由行事，这些国家的舆论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参战的。^[108]德国认为应用“赔偿”来诱使意大利参战，但是贝尔希托德没有理会这个要求，他认为意大利中立倒是一件大好事。^[109]代替这些临阵脱逃的盟国的是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不久前还受上述盟国欺侮，后来却参加了同盟国一边，虽然不是立即参战。

贝特曼在与英国大使戈申最后一次会面时，曾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责备的话，他说，英国与其他大国不同，它是为了“一张废纸”而参战的。不论从政府关系上还是从政治分析上看，这话都说得不对。比利时中立的问题确实瓦解了英国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而只有道义上的因素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道义因素消除了因疑忌德国

而产生的内疚心情之后，却使上述各种势力都服务于基本上属于力量均衡的政治。在英国以外，别国虽然没有这种道义上的批准，但这次危机的最后挑战，却也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到意想不到的激烈程度。在法国、德国那样一些左翼各大政党已公开表示坚持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中，议会也实际上与政府是一致的。格雷在下院发出进行干涉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呼吁时所激起的发自内心的热情，并不比贝特曼在德国国会所激起的热情更强烈；贝特曼当时宣称“需要面前无法律”，他许愿说，“我们做的错事，我们一定会设法补偿”，他还辩解说，“谁若像我们一样受到威胁，谁就会只想到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各国人民都没有追问什么是积极的战争目的，而且，除了法国想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外，没有任何事例适于说明这一点。德国和英国都没有什么现成的帝国计划；甚至奥地利对于分割塞尔维亚也没有攫取领土的目的，而对于俄国人想扩张领土的野心，他们的盟国至少与他们的敌人一样抱有反感。^[110]每一个交战国政府都准备声称，这次战争即使往最坏的方面说也是预防性的，各国还都忙不迭地编纂、公布其最近外交函件汇编，但加以删节和解释来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求证明本国的参战不仅是为了预防，而且还有更充足的理由。第一批参加战争的6个国家所公布的文件，其明显特点是以不同的声调组成一幅阴森森的画面，总的说来，它们在向每个国家的知识界人士证实——尽管发表了内容相反的文件，而且不久即可得到其译文——这次战争不仅是预防性的，而且是防御性的。

（陈廷祐 译）

[1] 编者及作者十分感激A. E. 坎贝尔博士对本文做了压缩。

[2] 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范围最广泛的解释，见格奥尔格·W. F. 哈尔加滕：《1914年以前的帝国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德国的对外政策》（慕尼黑，1951年；1962年修订版）。

[3] 提尔皮茨：《我的回忆录》，第1卷（英文版，伦敦，1919年），第211页。

[4] E. L. 伍德瓦尔德：《英国与德国海军》（牛津，1935年），第316页。

[5] 贝特曼1912年3月18日致梅特涅的信。《欧洲各国内阁的大政方针，1871—1914年》（柏林，1922—1927年），第31卷，第11406号。

[6] 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甚至鼓动彭加勒反对英国政府（彭加勒：《为法国服务》，巴黎，1927—1933年，第1卷，第170页）。

- [7] B. 冯·西贝特：《战前协约国政策史的外交档案资料》（柏林，1921年），第205—206页。
- [8] 旧历是2月29日。巴尔干联盟的所有条约可参阅J. E. 居埃肖夫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伯尔尼，1919年）的附录。
- [9] 《黑皮书》（巴黎，1922—1934年），第1卷，第323页；彭加勒：《为法国服务》，巴黎，1927—1933年，第2卷，第200页及以下，第340页及以下。
- [10] 基德伦1912年9月2日致贝特曼-霍尔威克的信。《大政方针》，第33卷，第12135号。
- [11] L. 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英文版，I. M. 梅西编，伦敦，1952—1957年），第1卷，第387页。
- [12] 《奥匈对外政策，1908—1914年》（维也纳，1930年），第4卷，第4022号。
- [13] 例如，E. 艾克：《威廉二世当政之时》（苏黎世，1948年），第643页；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1卷，第394—395页；A. J. R. 泰勒：《欧洲争霸的斗争》，第491页。
- [14] 《奥匈对外政策》，第5卷，第5005号。
- [15] 艾克：《威廉二世当政之时》，第639页。
- [16] 西贝特：《战前协约国政策史的外交档案资料》，第577页。
- [17] 《黑皮书》，第1卷，第369页。
- [18] 《黑皮书》，第1卷，第326页。
- [19] 《大政方针》，第34卷（i），第12818及12824号。
- [20] 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1卷，第446页。
- [21] 《大政方针》，第36卷（i），第13781号，其中，德皇宣布了这个目标。
- [22] 威廉对希腊表示的同情，以及他本人对保加利亚国王的厌恶，在这方面都起了作用。
- [23] 康拉德·冯·霍曾道夫：《我担任公职时期》（维也纳，1922—1925年），第3卷，第170页。
- [24] F. 菲舍尔：《攫取世界霸权》（杜塞尔多夫，1961年）一书和以后的论战中，尤其在同一作者的《世界政治，争夺世界市场和德国的战争目的》（载于《历史杂志》，第199卷，1964年10月）一文中都重新提出战争目的问题（意指“战争罪责”）。他阐述的根据是战争爆发头一个月间各国的战争目的，其余的则多半是追溯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与战前战略和商业方面冲突过程的关系问题，即战时和平目的所表现的问题。但是，哈尔加滕对这些冲突过程的描述（F. 菲舍尔：《攫取世界霸权》（杜塞尔多夫，1961年），第329页），已参考了菲舍尔的

关于波茨坦档案研究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最近的一次争论（1967年），见E. 利纳尔《1914—1918年德国的战争目的》。

[25] 《大政方针》，第36卷（i），第13781号。

[26] 《大政方针》，第31卷，第11422号。

[27] 《历史杂志》第199卷中菲舍尔的文章。

[28] 1月6日备忘录的摘要，见《面临巨大的灾难》（柏林，1929年），第291页，该书作者是M. 陶贝男爵（曾任萨佐诺夫的助手）。

[29] 《法国外交文献，1871—1913年》，第3辑，第8卷，第544号。法国的文献并不支持E. 勃兰登堡（《从俾斯麦到世界大战》，牛津，1927年，第461页）与其他为德国辩解的人所提出的论点，即法国人正在挑动俄国人作战（《法国外交文献，1871—1913年》，第3辑，第8卷，第598、689、694号）。

[30]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伦敦，1926—1938年），第10卷（i），第180号。

[31] 1913年7月雅戈致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信（勃兰登堡，第459页）。

[32] M. N.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战争早期历史的三次会议》（柏林，1920年），第66—67页。

[33]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0卷（ii），第526号。

[34]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0卷（ii），第548号。1964年第199卷《历史杂志》中的E. 策奥林的文章提出，英德关系中发生的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参见第352页中的注②。

[35]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0卷（ii），第532号。

[36] 《大政方针》，第39卷，第15734号。

[37]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9902号。

[38]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3辑（1931年），第1卷，第289号。

[39] 特赖奇克（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具有强烈的日尔曼主义，攻击一切不利于德意志帝国兴起的意见。——译者

[40] 《大政方针》，第33卷，第12225号。

[41] A. 摩塞：《一个历史悲剧——萨拉热窝的暗杀》（巴黎，1930年），《审讯记录》，第151页。

[42] 康拉德：《我担任公职时期》，第4卷，第72页。

[43]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9978号。

[44]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9984号。

[45]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058号。

- [46] S. B. 费伊：《世界大战即将到来》（1936年编），第2卷，第181页。
- [47]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076号。
- [48]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夏洛滕堡，1919年），第1卷，第15号。
- [49] 指奥地利。——译者
- [50]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118号。
- [51]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83号。
- [52] 康拉德：《我担任公职时期》，第4卷，第72页。
- [53]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252号。
- [54]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83号。
- [55] 雅戈：《世界大战的根源》，第110页。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回忆了他和雅戈的忧虑（《对世界大战的评述》，第1卷，第139页）。这些重要事实，像G. 里特尔这样一位学者实际上却把它们弄错了（《治国术与作战方略》，第2卷，第312页）（他甚至把日期都弄错了）。
- [56]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4卷，附件4。
- [57]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72号。
- [58] 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2卷，第188页。
- [59] 《法国外交文献，1871—1914年》，第3辑，第10卷，第6页。P. 朗努万：《1914年7月的法国政策》（《战争史杂志》，1937年1月号，第1—21页）。
- [60]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120号。
- [61]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461号。
- [62]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1卷，第101号。
- [63] 例如，见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2卷，第214—216页。
- [64] 《英国文件》，第11卷，第72号。
- [65] 利希诺夫斯基被提醒说，对门斯道夫使用的言辞要激烈得多，尽管其中包括这样的建议：支持奥国在贝尔格莱德提出“温和”的要求。利希诺夫斯基在向国内报告这个情况时还说，英国估计德国不会支持奥国利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来实现它在巴尔干的野心。——这个警告引起德皇说了如下评语：“英国已无耻到了极点。”（《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121号）
- [66] 格雷：《二十五年》（1935年版），第2卷，第158页。
- [67] 如果英国早一点做出允诺而又未能防止战争的爆发，那就很可能使格雷在一场关于战争罪责问题争论中成为主要被告之一。这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而不是历史事实。因为格雷此时还没有考虑做出允诺。他也许不会因为曾经利用战争来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受到谴责，但是肯定要以曾经鼓励法俄两国利用战争

来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受到谴责。《政治报》（格雷：《二十五年》（1935年版），第2卷，第504页）认为格雷“在努力促使战争更快地发生”。同样掌握了众所周知的材料，可是苏联的这个最新论述表明，它对欧洲当时的人物，以及集团和阶级的利害关系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68] 冯·提尔皮茨：《我的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174页。

[69]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还远不如法国的倾向更为异想天开。法国的这个倾向是：联合德国、英国来反对俄国，有些历史学家已觉察到了这一点，例如A. J. P. 泰勒《在欧洲争夺霸权的斗争》，第514页。

[70]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395号，第11卷，附录A。

[71]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685号。

[72] 据塞尔维亚大臣约亚万诺维奇说，这是已经确定的“总解决”的日期。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意大利文版），第1卷，第400页对面所附的复制信件。

[73] 希林：《战争是怎样在1914年开始的》（俄国外交大臣的日记）（伦敦，1925年），第29页。

[74]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160、206号。

[75]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156号。

[76]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1卷，第99116号。

[77] 例如，见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2卷，第353页及其后数页。

[78]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1卷，第101号。

[79]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1卷，第185号。

[80]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年》，第179卷，第198号。《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5卷（1934年），第116及188号。

[81]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855、10656号；《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213、257号。

[82] 《英国文献》，第11卷，第258号。

[83]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5卷，第224号。

[84] 例如《英国文献》，第11卷，第263号及《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385号。

[85]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1003号。

[86] 彭加勒：《为法国服务》，第4卷，第385页。在维维亚尼7月30日在巴黎发出警告，希望不要激起德国方面进行动员以前，分散在各地的法国内阁成员做出

保证时所选择的时机及保证的意义，一直引起人们很大的争论。这在阿尔贝尔蒂尼的书中有详细的论述，见该书第2卷，第13章。

[87]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265号。

[88]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1卷，第277号。

[89]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323号。

[90]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0793号。

[91]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441及450号。电报中有这样的话：“如果……维也纳拒绝一切意见，那就证明它坚持要求战争……俄国则是无罪的。”

[92]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368号，374号，400号和452号。

[93]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437号。

[94] 《奥匈对外政策》，第8卷，第11033号；康拉德：《我担任公职时期》，第4卷，第152—153页。康拉德摘引的他自己的通信当然不是十分可靠的。

[95] 《法国外交文献，1871—1914年》，第3辑，第11卷，第305号。

[96] 这是由于他的好战观点已臭名远扬，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他所提出的证据批评颇多。见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2卷，第618—619页。

[97] 德军也进攻荷兰的行动一节曾从原来的计划中取消；后来到1940年又被恢复，使原来的全部计划均得到采用，尽管计划中各个阶段的划分有所变动。G. 里特尔：《史里芬计划》（慕尼黑，1956年）一书中对该计划作了详尽阐述。

[98] 《世界的危机》（伦敦，1929年），第1卷，第204页。

[99] 《英国文献》，第11卷，第293、303号。

[100] 《英国文献》，第11卷，第448号。

[101] 对卢森堡的国际保证与对比利时的国际保证有所不同。对卢森堡的国际保证只是“联合”保证，而没有同时给予“个别的”保证，因此对于各个保证国来说，所担负的义务较少。

[102] 阿尔贝尔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3卷，第97页。

[103] 《英国文献》，第11卷，第428号。

[104]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2卷，第421号。

[105]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3卷，第562、575页。

[106] 毛奇以后勤为理由，反对德皇要德军回过头来向俄国进军的意见；事后，他返回他的办公室时，泪流满面。

[107] 《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献》，第3卷，第578号。

[\[108\]](#) 《意大利外交文献》，第5辑，第1卷，第101号。

[\[109\]](#) 《1914年战争早期历史的外交档案资料》（维也纳，1919年），第3卷，第117号。

[\[110\]](#) 见原书第149页注①。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9年，诺尔曼·安吉尔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幻想》。他在文中论证道：随着贸易、商业和金融日益具有国际性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对于胜负双方来说都肯定是有害的。10年以前，华沙银行家伊万·S. 布洛克出版了一套6卷本非凡的论文集，名为《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方面看战争的未来》。布洛克从正确的战术原则出发，认为火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倾泻到防守的一方，因而在未来的战争中，步兵必须躲进堑壕里，否则就会遭到可怕的屠杀。他设想未来的战争将会是一些规模巨大的包围战，要由饥馑来做最终的裁判官。布洛克的结论跟安吉尔的一样，认为除非以自杀为代价，否则，战争已不可能发生，因为，即便是胜利者也要遭受资源的破坏和冒社会分崩离析的风险。

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警言，在1914年以前的10年里，对于军人和政治家的影响甚微。相互对立的同盟的缔结，国际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以及在巴尔干日益可能发生爆炸性事态，这些都只不过是一场沉疴的表面症状。在政治上，这些年来对于那种企图通过秘密外交和武装力量来保证国家安全的弄巧成拙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同时，由于宣传，由于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错误地应用到人类身上，由于尖锐的阶级分歧，特别是由于对战争性质的误解，使得各国在心理上也都在做打仗的准备。对战争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已使布洛克的预言和近如1905年满洲冲突那样的实际经验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1914年8月开始的冲突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起源主要在欧洲，孕育于奥、俄在巴尔干的权力之争和英、法对德国主宰西欧的恐惧之中。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其势头便迅猛异常，冲破了地理上的轸域和欧洲政治家们的控制，变得真正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影响之一便是欧洲本身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意义减少了。

如果说，政治家们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之后，使用了令人莫名其妙的虚张声势和反虚张声势的外交手腕而把欧洲带到了深渊的边缘，那么，最后的一着却是来自各国的总参谋部。奥地

利既然已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将军们极力要求立即实行总动员的压力，便挫败了格雷等人为避免战争所做的为时已晚的努力。为了使沉重的军事机器组装起来准备打仗，必须进行多年的准备工作。人们认为，胜利有赖于先敌动员。各国总参谋部所作的估计——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必须说明为什么首先是同盟国，然后是法、英两国继俄国之后迅即实行总动员。从那时开始，左右事态发展的是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不是这些军队的缔造者了。

回顾往事，看到所有的交战国家不论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没有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不禁令人感到惊讶。在政治上，他们预料进行的是一场以传统的同盟为基础的时间短暂的战斗；在军事上，则是由职业军队进行较量，而平民百姓只是远远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19世纪“全民武装”的概念，只是缓慢地由20世纪“全民战争”的概念所取代。

德国在许多方面都为进行一场短暂的决战做好组织工作。它那经过充分考验的兵役制度，即2—3年的入伍训练，然后服更长时期的预备役和当民兵，因而它在1914年便拥有一支包括预备役兵团在内的兵力约达500万人的陆军，能够立即投入前线。德国的总参谋部是德国陆军的“神经中枢”，它的人员是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具有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战术上，德国人衡量了机枪和重迫击炮的潜力，他们装备这两种武器远比敌方多。在战略方面，德国人率先把铁路军用发展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德国还有一项重要的本钱，这便是陆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

在德国的盟国方面，上述优点就都不明显了。奥匈帝国的陆军在他们近期的历史中败绩累累；而且，它是由于多民族组成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在征兵中更为明显。在装备和领导上，也不如德国。而最糟糕的是，自19世纪90年代初以后，由于德国的战略家们开始把西线置于优先的地位，但却没有把他们的计划告知奥地利人，因而两个盟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摩擦便有增无减。

在协约国方面，法国竭尽全力来克服它在兵员潜力方面的劣势——约为594万对975万——对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进行训练。1913年，一项引起很大争议的“陆军法”，把服役期限从2年（1905年规定）延长到3年，这就暴露出它担心德国陆军也因新的立法得到扩充，已使自己难以匹敌。这样，在战争爆发时，法国就可以征召400万受过

训练的兵员来对付德国的500万。但两国大为不同的是，法国并不认为它的预备役兵员有多少战斗价值。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法国的军事学说是建立在爱国热忱和进攻精神之上的，这些素质可以用来掩盖装备和兵器的严重不足。因此，它就过于依赖一种第一流的武器75毫米口径的野炮。俄国的资本是，它拥有无穷的人力资源，军队以英勇顽强而著称。它的领导差，部队教育程度低，而且制造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各工业大国。英国远征军是协约国部队的精华，是一支训练最好、装备最好、组织最好的部队，英国过去就是用这支部队来发动战争的。但是，考虑到德国在8月间已经在法国战线投入了150万人，法国野战军也超过了100万人，因而12万英国远征军从数量上讲只能在1914年扮演配角。而且，除了不受重视的卡桑德拉的吉钦纳勋爵外，英国总参谋部还坚信：战争不会打得很久，英国本身在军事上的贡献也是很有限的。

同盟国在政治上的准备，跟它们在军事上的筹划是不相匹配的。英国的参战使一向就令人怀疑的盟友意大利解脱了它对三国同盟所负的义务。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野心，使它也暂时保守中立，这样就造成同盟国无法对俄国南部做侧翼进攻，而且暴露了它们自己在多瑙河平原的侧翼。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究竟效忠何方，显然会受到战争初期的趋势以及它们对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战争记忆犹新的影响；在这两次战争中，它们都是战败者。英国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立即宣战，出乎同盟国的意外，但并未使它们过分地感到不安。它们低估了英国远征军，也小看了皇家海军在一场短期战争中的价值。

德国所处的两面作战的地位以及它与奥匈帝国结盟这点有限的本钱，迫使它寄全部希望于打一场短期战争，从而就把兵力集中于西线。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总参谋部日益相信在东线难以速战速决，而且不管怎样，一旦法国战败，俄国的财政也就可能崩溃。那个要在6个星期内打垮法国的计划的逐渐形成，主要出自1891年到190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史里芬伯爵之手。史里芬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问题是怎样突破法国的边境，以便使多达100万人的军队得以展开。从卢森堡到瑞士之间的边境是天然的坚固防线，而且法国自1871年以来就一直在构筑坚实的工事。史里芬的解决办法，与他那不问政治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非常适合，就是侵犯低地国家的中立地位，把大部分兵力放在自己的右翼，目标是包围巴黎。他念念不忘的是打一场现代的

坎尼^[1]之战。他故意让德军战线的中部和左翼的兵力呈现为薄弱环节，因此，如果法国人选择进攻这两部分，他们就会使他们自己进一步地陷入罗网。在东部边境，只留了一点象征性的部队，协助奥地利人遏制动员缓慢的俄国人，在打垮法国以后，再从容地去消灭他们。

史里芬的继任者黑尔姆特·冯·毛奇，对1905年的计划草案在细节上做了某些变动，主要是取消对荷兰领土的侵犯并加强左翼。由于对“总计划”做了修改，因此他在1914年以后受到了不无过分的批评。但是最近发现，史里芬本人对自己的计划也曾日益感到担心，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只是在纸面上解决那些错综复杂的人力和行动问题。实际上，这项计划中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而且它是以对敌人的反应所做的大量猜测为根据的，所以，有一位权威人士称为“一个圈套，一种幻想”^[2]。它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要想成功，需要有一个极高明的统帅，并且要大走红运。

法国最高统帅部做出的反应，说明德国显然交了好运。法军总参谋长米歇尔在1911年就正确地猜测到德国人的计划。他建议集中兵力于北部里尔至雷代尔一线来对付这个计划，而在其他地区只做防御性的部署。但是，他却被一心想采取攻势的霞飞所取代。霞飞在1913年采用了第17号计划，该计划采取全面进攻突破假想的德军中枢，造成其通信瘫痪。这一计划由于对敌军的分布情况估计错误，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军在西线部署的近150万兵力中，有一半兵力分配给组成右翼的三个集团军；近40万人拨给位于中央并将穿越阿登山脉的两个集团军，剩下在洛林的两个集团军只有35万人。法国人在梅斯以东投入了约45万人，在阿登山脉有36万人，只给德朗雷扎克（他对德军的计划也心中有数）留下了25万人来防守易受攻击的比利时边境。

法国人的两次攻势均遭惨败。8月20日，他们在梅斯以东的萨尔堡和莫昂热被击败；4天以后，又在阿登山脉被打退，损失惨重，树木茂密的隘路使得他们的75毫米口径的大炮发挥不了优势。但是，法军虽然被击败，却没有被歼灭。他们秩序井然地撤至铁路线上，很快就能在出现德军重大威胁时，把增援部队派往北部。

与此同时，北部的德军在8月4日进入比利时后，主要依靠使用重炮攻下了重镇列日，迫使比军撤往安特卫普，并有进而吃掉德朗雷扎克的第五集团军之势。英国远征军虽然人数不多，但这时由于船运迅速地展开，遂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8月21日，英国人开到了比利时的

边境与敌军遭遇。数量上处于极大劣势的英军在蒙斯（8月23日）和勒卡脱（8月26日）进行的阻击战，使法军左翼得以免受包围，这使毛奇大为不解，原来他以为英军还在登陆中。德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官冯·克鲁克和冯·比洛错误地分析英国远征军必然是驻扎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各港口，因而错过了把英国人同撤退中的法国人分割开来的良机。

当德军冒着夏天的酷暑深入法国的东北部时，毛奇逐渐地认识到史里芬计划并未奏效。英、法、比三国军队虽然在边境战役中受挫，但是并未被摧毁，实际上它们正撤往交通便利和利于防守的位置；而德国人，特别是靠近海峡一带的克鲁克集团军，却处于补给跟不上的境地。真正的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是在总参谋长的心目中，它们被夸大了。毛奇是个聪明人，也不乏勇气，他所缺少的却是健康的身体以及通常伴随健康而具有的自信心。他对其前任的计划从未抱有充分的信心，在开战初期的几周内，他又犯了不少错误，终于失去了在西线速战速胜的可能性。首先，他离前线较远，最初把总部设在科布伦茨，后来又设在卢森堡。由于8月间他本人或他的作战参谋人员均未到过前线，因而他没有掌握比较近的情报以便向集团军司令官们下达命令。这种情况就使得他的第二个错误，即允许他的下级过多地便宜行事显得突出了。他的那位著名的叔父在1870年就曾这样做过，但也不是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在右翼，精力充沛的克鲁克和他那情绪悲观的毗邻将领比洛又发生了争吵。而在洛林，巴伐利亚的鲁普雷希王储则获准继续向前推进，却不后撤以便把法军引入圈套。因此，德国人便在8月底全线挺进，史里芬计划的要点已变得面目全非了。8月25日，毛奇又犯了第三个错误，他从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里抽出6个军派往普鲁士。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欠妥的决定，对于一个意志比较坚决的统帅来说，不一定就是不可收拾的，但是毛奇的身体到8月底时已经快要垮了。所以，当克鲁克在8月30日挥师向东南以与比洛保持接触时，毛奇并未加以阻拦，而是听任包围巴黎的计划被抛弃。

这就给撤退中的协约国军队以发动反攻的机会。霞飞在巴黎军事长官加利埃尼的敦促下，命令部队回过头来在9月6日发起总攻（马恩河战役）。克鲁克被吸引去和马努里指挥的新建第六集团军进行单独的交锋，以致在他和比洛之间出现了一段30英里的空隙。比洛唯恐英国远征军司令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会把他的骑兵投入这个空隙中来，于是在9月9日开始后撤。克鲁克无奈，只好采取一致行动；毛奇此时

身体已经垮了，遂批准全面撤退。这对德国的战略是一个沉重打击，虽然他们以埃纳河为天然屏障建立了防御阵地，在战术上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失败。由于鲁普雷希王储未能突破工事林立的南希地区，因此，9月中旬以后，唯一能够取得速胜的希望，就只有在北方对协约国军队进行侧翼包围了。双方都不具有能够完成这一行动的机动手段。于是，在一系列的牵制行动之后，战线便从埃纳河经过亚眠和阿拉斯一直伸展到海峡沿岸。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英国远征军由于在10月末和11月间在伊普雷附近屡屡阻挡进攻，实际上已被歼灭。在此期间，安特卫普于10月9日陷落，但是比军主力得以沿着海岸逃脱，并与伊塞尔河对岸的协约国军队会合。

德军自马恩河后撤和法金汉在9月中旬替换了毛奇，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史里芬计划的失败。但是，失败的程度并不大，德国人虽然在战略上受到了牵制，但这时却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将近十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已掌握在他们手中，而被占领区包括了法国工业生产的关键地区。实际上，对于这场战争剩下的日子来说，法国已经失掉了80%的煤，全部的铁矿资源，以及东北部的大工厂。德国的经济却相应地加强了，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它可以经得起让协约国军队发动大部分的进攻了。在1918年3月以前，大包围的战线变动从未超过10英里。

在此期间，东线的最初几次交锋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格式：俄国人在德国人手下望风披靡，但在跟奥地利的交战中却占上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甚至在部队尚未完全集中时就入侵东普鲁士，这就立即打乱了德国的算盘。俄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分别由雷宁茨普和萨姆索诺夫指挥，人数超过德国人一倍多，有着在马祖里湖地区用钳形行动一举粉碎敌人的良好战机。但是这两个集团军却不愿合作，这很可能是由于它们的司令官们在日俄战争中发生过争吵的缘故。德军指挥官冯·普里维茨在这场危机中慌了手脚，他在命令部队撤过维斯杜拉河时被兴登堡将军接替。兴登堡是从退休中东山再起的，由鲁登道夫担任他的参谋长。由于雷宁坎普在东线按兵不动，加上俄国人愚蠢地用明码无线电报下达命令，使得鲁登道夫得以扭转局势。他只在雷宁坎普的正面留下一支骑兵掩护部队，而把主力投入南线去攻击萨姆索诺夫。在集中压力之下，萨姆索诺夫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也自杀身亡。然后，鲁登道夫在来自法国的部队增援

下，转而攻击雷宁坎普，把他赶出了东普鲁士。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的战役中，俄国损失了25万人和大批作战物资。

如果不是加里西亚的形势对同盟国不利的话，坦能堡战役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会要大得多。奥地利的两个集团军入侵波兰，但是俄国人猛击其掩护右翼的薄弱兵力，奥军遂被遏止。到8月末，奥军已被赶过了伦贝格，奥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冯·霍曾道夫为了避免奥军被切断，不得不把军队撤出波兰。到了9月底，奥地利人几乎撤到了克拉科夫。在波兰，整个秋天战斗呈拉锯状态；到年底，俄军已精疲力竭，弹药奇缺，退到了尼达河和多瑙耶茨河一线。俄国人疲惫不堪，奥地利人战绩欠佳，两相抵消。奥地利人曾两次企图入侵塞尔维亚，但都被轻蔑地击退了。

陆军作战计划的失败，逐渐使海上力量崭露头角。虽然在战争爆发时英国主力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在无畏战舰的数目上的对比是20：13，但由于最近10年来在重炮、潜艇、水雷、无线电和飞机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英国在主力舰方面拥有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它在一场大海战中必然获胜。在德国方面，德国海军部采取了巧妙避战的策略。在布雷舰和潜艇削弱敌人的优势之前，他们避免让舰队采取重大的行动，等到敌人的优势丧失后，才伺机进行突然袭击。这一策略对于德国海军基地天然的防御能力来说是合适的，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它使德国的海外贸易遭受损失，并且大大限制了德国对英国及其盟国的海运补给进行干扰的行动。再者，英国海军部采取的保存“现有舰队”的谨慎策略，使敌人无可乘之机来缩短差距。杰利科海军上将并不排除取得一次纳尔逊式大捷的希望，但是他认为自己首要的职责是防止敌人入侵，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和保证与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的交通联络。

在本土以外的海域里，英国在确立优势之前曾经几次遭到屈辱。德国两艘最快的舰只，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巡洋舰“布累斯劳”号在地中海避开了协约国的拦截，抵达了君士坦丁堡。这对于土耳其于1914年10月底站在德国一边参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英国的海军集中于北海，这就使德国袭击商船的舰只得以享受几个月昂贵的行动自由。例如，德国的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在11月1日于科科斯岛被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击沉之前，一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横行霸道，得其所哉。更为严重的是，在同一天，克拉道克海军上将的巡

洋舰队，在科罗内尔被冯·施佩海军上将威力更大的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击败。这就促使英国海军部采取行动，迅速派遣斯特第海军上将率领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和“常胜”号出击，致使冯·施佩于12月8日在福克兰群岛阵亡。到1914年年底，德国在远洋的水上力量已被消灭殆尽。

新的一年年初，海上战争开始采取了一种更为可怕的形式。由于英国控制了海上通道，德国遂集中力量对付陆上的终点站，并且日益依赖潜艇，而潜艇迄今为止被人认为只是一种用于海岸防卫的武器；英国对付这种武器的防御能力是很不够的。英国战列巡洋舰1月24日在多格尔沙洲一带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就促使德国决心采取袭击海上贸易船只的策略。由于削弱英国主力舰队的方针遭到失败，接替英格诺尔担任德国公海舰队司令的波尔便向法金汉建议，可采取潜艇进攻的战略，而这种战略如要奏效，就必然不能加以任何限制。与此同时，1915年1月，英国海军部通知英国商船，在靠近不列颠诸岛时，要悬挂中立国的旗帜或不挂旗帜，以便增加德国潜艇的困难。德国在2月4日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包括英吉利海峡在内的不列颠诸岛附近水域为交战区，在交战区范围内行驶的全部敌船均将予以击沉，中立国船只的损失自行负责。这一做法有助于英国政府摆脱它有道义责任遵守1909年伦敦宣言的羁绊。英国虽然并未批准这一宣言，但是由于它对战时禁运品和封锁的规定所做的解释，这个宣言却一直限制英国在海运方面向德国施加压力。现在英国宣布有权拦截运送货物去德国的一切船只，如有必要，还可将它们带回英国港口搜查。这就造成了同中立国特别是同美国的严重摩擦，但是德国因5月7日在南爱尔兰沿岸一带用鱼雷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因而丧失了它的有利地位。这种毫无意义的暴行直接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因为有一百多名美国人丧生，同时这一行动也是对美国保持中立的决心施加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使英国或其盟国能够席卷德国的所有海外殖民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轻而易举的事。新西兰的一支远征部队于1914年8月占领了萨摩亚；9月间，澳大利亚又拿下了新几内亚。1914年8月作为英国的盟国而参战的日本，出兵攻打位于山东半岛上的青岛的德国海军基地，并于11月初占领了该地。在非洲，多哥很快就向英国人投降，而喀麦隆直到1916年年初才最终被置于英、法控制之下。过去与英国为敌的路易·博塔将军，征服了德属西南非洲，而同等重要的是，他还把不肯臣服的布尔人的叛乱镇压下去，那次叛乱是除

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之外，在整个大战期间仅有的一次反对英帝国当局的叛乱。在轻而易举地征服德国海外帝国的过程中，突出的例外是它的最大和最富庶的殖民地德属东非。在那里，卓越的冯·莱托夫-沃贝克将军凭借有利的地形，牵制了20万左右的英帝国的军队，直到1917年年底。他本人一直到欧洲停战以后，还继续打游击进行抵抗。这些“插曲”的重要意义，也许不在于它们对欧战有什么影响，而在于它们对印度、日本等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反响；否则，这次战争无论从任何意义来说，对于这些国家实在是太遥远的了。

从长期来看，德国的潜艇战和英国的报复性封锁，使欧洲所有交战国的平民都亲身体验到现代战争的滋味。但是，早在1915年，人们就从空中首先看清了战争将不再仅仅限制在作战的前线了。在1914年，列强尚未准备好把空中力量用于军事目的，因而飞机在西线的作用实际上仅限于进行侦察。但是从1915年1月起，齐柏林式飞艇开始空袭英国海岸，1916年夏达到了顶峰，接着是飞机进行空袭。开始时可能还想对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加以区别，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在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民心士气也被置于固有的打击目标之列了。

1914年年底，由于将军们未能使战争迅速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政治家们全都多少感到为难了，因为他们从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从经济上都只是为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进行准备的。1915年，曾想找出某种办法摆脱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特别是在西线，运动战已被布洛克预料的大规模包围战所取代。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个重要的反应，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实验，平民百姓逐渐适应这种“长途负载”的局面。

法金汉是这次大战中最有才智的将领之一，但是由于史里芬计划的失败和英国坚定不移地遵守保卫法国的义务，使法金汉遇到了无法解决的战略上左右为难的局面。他认为，要想结束战争就必须打败英、法军队；而且，要在1915年取得对俄国的决定性胜利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认识到，只有在东线才有可能打一场能够获得大量领土的运动战。他还必须和兴登堡及鲁登道夫的反对意见做斗争，因为这两个人必然认为自己所在的战区是决定性的战区，而且自坦能堡一战告捷之后，他俩在德皇面前的声誉甚高。因此，法金汉一反自己的正确判断，决定在1915年集中兵力对付俄国，而在西线一般采取守势。东

线果然取得了大捷，但是法国却赢得了恢复力量的时间，英国也得以动员其二线兵力和自治领的部队。

德国的战略由于要想保持1914年所攫取的领土而受到影响，法国人则满怀决心要解放自己的家园。集中兵力对付敌军的主力也是一种正统的军事理论，但是如果在战术上对付敌方防御屏障上的优势束手无策，那么这样做只会导致灾难。法军1915年在阿图瓦、埃纳河和香巴尼发动的攻势，其主要教训是：在坚定和老练的防守者面前，进攻者的伤亡必然更大。英国由于兵力和战线^[3]都要小得多，它不能起到独立的战略作用。而且，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约翰·弗伦奇爵士都是坚定地支持霞飞的。再者，由于在西线对法国人做出了这样的无条件的承诺，再加上英国的大部分高级将领这时都在法国参战，因此，在怎样才能尽力发挥迄今尚未使用的海军力量来支援陆军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听到军方的客观意见。只要是持不同见解的将领寥寥无几，西线就仍然是决定性的战场。

虽然西线的防御系统在1915年尚未臻于完善，但堑壕和带刺铁丝网这些基本条件，加上机枪的支援，就是步兵和骑兵所无法摧毁的；特别是在英、法两国极端缺少重炮和爆炸力强的炮弹时更是如此。协约国的攻势是按照一种令人气馁的模式进行的。“在对德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之后，用炮火轰击德军阵地上的铁丝网、机枪掩体及堑壕。当掩护炮火向敌军阵地后方延伸时（使延伸的炮火正好落在向前推进的步兵的前方，一直到1916年才采取这种做法），步兵跳出战壕，以100码的行距进行波浪式的冲锋，士兵与士兵之间相隔6至8码。”^[4]进攻者通常能攻占第一道堑壕，有时在攻占第二道堑壕时即被敌方预备队挡住。反攻常常能使战线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1915年期间，英、法军队进攻的进展从未超过3英里。

这一年，战术上的一项真正改革是德国人于4月22日在伊普雷用毒气袭击了法军防线。实际上，德国人已于1月间在波兰试用了一种催泪瓦斯，但是由于气候严寒，没有发生作用。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初次失望就使德军大本营对这一新武器缺乏信心。毒气的发明人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他得不到制造炮弹的设备，只好把他那致命的毒气装在钢瓶里来施放。而且，也没有集中任何预备队利用毒气给敌军造成的混乱，所以，协约国部队虽然受到毒气的折磨后奔逃而造成了一段4英里长的缺口，但还是能够及时把它堵上。这

样，德国虽然背上了首先使用新武器的罪名，但并没有为此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双方对防毒面具的改进很快就使毒气攻击所收到的效果减少了。

霞飞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要在1915年结束战争——是对德国人1914年后撤时所造成的巨大凸出部分采取钳形动作。英、法联军在阿图瓦进攻，法军单独在香巴尼进攻。进攻从春到秋时断时续，收效甚微。交战双方的防区相距太远，彼此难以施加直接影响。于是霞飞采取了先是长时间的炮击，然后再实行突破这种互相矛盾的做法，从而把突然袭击这张王牌扔到了一边。法国在1915年的伤亡近150万人。英国按人数比例来说，也同样损失惨重。在由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的卢斯战役（9月25日至26日）中，新建的集团军“浴血奋战”。他的指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最后终于在12月间由道格拉斯·海格爵士接替。与此同时，弗伦奇的参谋长威廉·罗伯逊中将回国就任帝国总参谋长。这一行动带来了一项改进，就是把战争的战略指导的重担从吉钦纳负担过重的肩上卸了下来，但同时这也给伦敦的“西线派”增加了一位强有力的发言人。

解决法国战场上堑壕障碍问题最为大胆的办法是“东线战略”，这是由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吉钦纳等这些有影响的内阁大臣们在英国提出的主张。他们虽然在细节上尚有分歧，但在主要方面都一致认为，现代的发展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距离和机动能力的概念，以至于在另一战场上实施的打击，相当于传统的侧翼攻击——这种攻击在法国是实行不了的。这样一种行动，将跟英国传统的两栖战略完全一致，也能使英帝国的军事资源发挥作用。

很遗憾，由于对目的和目标的看法不同，采用“间接方式”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被毁掉了。吉钦纳首先担心的是埃及的安全，他主张在亚历山大勒达湾登陆，以削弱土耳其。劳合·乔治则赞成一种旨在支援塞尔维亚的巴尔干政策。而丘吉尔却在法国出现僵持局面之前就已盯住达达尼尔海峡了。年事已高而又喜欢挑动争执的费希尔勋爵是第一海务大臣，他那自相矛盾的态度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取得他的通力合作却是至关重要的。费希尔早就设想要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虽然表面看起来他是支持在1915年年初远征达达尼尔的，但这种支持实际上顶多是三心二意的，对于由海军单独进攻从未抱有信心。这种观点上的分歧本来是常事，但悲剧在于考虑不周的计划掩盖了深

刻的分歧。因此，最后终于派出的达达尼尔远征军应验了劳合·乔治1914年的警告：“未经充分考虑而贸然决定组织的远征军，一般的结局都是损失惨重的。”^[5]

试图单凭海军行动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无疑是由丘吉尔鼓动和策划的。遗憾的是，伦敦对于摧毁土耳其的炮台和消除海峡最窄处的水雷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从来没有充分的认识。在3月18日海军唯一一次突破土耳其防线的尝试遭到失败（后来才知道土耳其人弹药已尽，险些被攻破）后，由于费希尔的消极情绪日益增长而吉钦纳又愿意派出部队，遂做出了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胡乱决策。这样就在关键的时刻拖延了6周，使土耳其人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加强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防御力量。然而，由于陆军司令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和海军上将罗贝克之间发生了误会，只剩下陆军——在法国人的参与下——独自承担这一战役任务。4月25日开始的登陆虽非奇袭，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还有过几次——特别是8月6日在苏夫拉湾采取的新的登陆行动——看来协约国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但是每次都由于运气不佳，白厅和埃及支援不力，土耳其人恢复力量的能力惊人，以及在行动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等原因，胜利却一直未能来临。当时担任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的莫里斯·汉基爵士曾谈到过两点致命的错误：一是从未冷静地计算过，采取这一极端困难的行动所必需的部队数量，给予汉密尔顿的只是剩余的兵员，而且给的总是“数量太少，时间太晚”；二是过于依靠（错误的）估计，认为土耳其人只会进行微弱的抵抗。

令人颇为惊讶的是，加利波利很快就沦为另一条“堑壕战线”，西线的战术又原封不动地在这里照样搬用，并且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到1915年年底，为了减少损失，遂大胆地做出了决定，撤出半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撤退却是自4月间登陆以来最辉煌的一次成就。

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后果的战略失败。加利波利毁掉了汉密尔顿的英名，也败坏了吉钦纳的并影响了丘吉尔的声誉。从长远看，它也有损于阿斯奎斯，尽管他本人是个“西线派”。最可悲的是，这次失败似乎使“东线派”的主张垮台了；这派主张认为，要结束战争，有比慢慢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更为可取的捷径。1915年以后，即便是最积极的“东线派”，顶多也只能提出从法国向例如意大利或萨洛尼卡发动

象征性佯攻这样的意见而已。在加利波利失败后，走向胜利似乎并无捷径。

对于加利波利的冒险行动是否明智的问题，迄今仍然意见分歧。它究竟是像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所说的“一种正确而又具有远见的观念，由于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而被弄糟了”；或者，只不过是白白地分散了主战场的人力、物力。由于对这次远征的确切目标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这一问题便更显突出了。当时如果能让俄国继续打下去，那么协约国获得的好处显然会是巨大的。某些历史学家表示怀疑：即便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协约国方面是否能有必不可少的军火来供应俄国。1915年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以后两年里，只要从西线消耗的大量军火中拿出一小部分来，对于俄国也就是极为可贵的了。至于兵力的情况，由于有近50万人麋集在萨洛尼卡桥头堡，因此，如果说每一名兵员都是西线所需要的，这显然是不真实的。总之，尽管达达尼尔海峡也许确实是一个辉煌的战略收获，然而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确切后果，仍然只能由人们去推测了。

在1914年，让文职官员去适应准总体战的要求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由于人们过分地尊重将领们的军事才能，这一过程因而变得倍加困难了。^[6]各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提供军事领袖们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要求的资源，从而忘掉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家们只是逐渐地才认识到，军事家跟他们一样，对于一场超出他们的经验和想象力的战争，也感到困惑不解。

虽然战争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在所有交战国中引起军政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各国问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传统所先决的。例如在英国，按照宪法规定，权力是赋予陆军部的政治首脑的。而在实际上，吉钦纳在陆军部任职期间（1914—1916年）把这个问题搅乱了，以致劳合·乔治在担任首相期间（1916—1918年）只能采取治标的妥协办法，最后撤换了罗伯逊将军和杰利科海军上将，但不得不让他不信任的海格留任直到大战结束。德国方面，至少从俾斯麦引退以后，情况的发展恰好与此相反，而大战只是使这种趋势达到了顶峰。到1916年，人们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看作德国不可或缺的救星。他们左右战略，强迫撤换异己的大臣；而且，由于他们的领土要求太

过分，因而使任何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希望成为泡影。这种由最高统帅部支配文官政府的做法，其后果远远不只导致了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且也致命地破坏了帝国的宪法结构。法国的经验又有所不同。自从发生了德雷福斯案件以来，陆军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在对最高统帅部1914年到1916年的指挥作战的表现批评日增之后，尼韦尔发动的攻势的失败更是如同火上浇油。法国人遵循丹东和甘必大的传统，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激进派的克列孟梭，他使人们明白无误地了解，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将军们未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他们的政府面临着的任务是在空前规模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各国政府为了应付这一挑战，不仅在战场上保持了大量的军队，而且实际上也取消了军人和平民之间的区别，使欧洲社会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只能从法国在1914年缺乏准备和英国逐渐适应总体战的要求等情况中略见端倪。

法国人相信战争将是短期的，因此应立即动员所有经过充分训练的军人。这种信念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全民武装”的军事学说，虽然对预备役军人并不是信赖的。^[7]甚至极个别对这种军事学说表示怀疑的人，如莫达克上校，仍然倾向于认为，财政上的困难将使战争顶多不过打上一年。因此，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给人们带来的震动是惨痛的。陆军部长大为惊骇地发现每天需要的炮弹近10万发，而他却只能供应1.2万发。本来以为重炮在运动战中价值不大，因而过去对它极不重视。由于准许技术熟练的工人参军，有几家军火工厂关闭了。最糟的是，政府根本不懂得需要保护经济资源和控制工业生产。在大战的前夕，法国每年生产的2100万吨铁矿石中，至少有1500万吨是来自梅斯附近的布里埃盆地的。但在开战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这个重要地区几乎是不战而失守；后来才发现，在最高统帅部或在政府中，没有人了解铁矿石与法国的战争努力有什么关系。如果史里芬计划成功，那么，认为在一场时间短暂的战争中后勤供应并不是重要因素这种指导思想，当然也就不会看起来如此荒唐可笑了。

英国不肯抛弃维持战争的传统方法，当然并不是由于什么“全民武装”的政策，因为它依靠的是一支为数不多的职业军队和一支不必去海外服役的本土军作为后备队。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所以直到1916年还能够奉行它的传统政策，是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和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使它再次赢得时间去逐步扩大武装部队。但是，对于现代

战争有着比增加兵员数字更为复杂的需求这一问题，人们却是逐渐地有所认识和承认的。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努力只是短时期的和有限的，这种看法只能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另外还有“对政府的行动抱有反感，对科学、技术漠然视之”这样一些独特的态度，这些态度迫使阿斯奎斯政府和整个国家不得不继续执行一种“照章办事”的方针，直到1915年春天。^[8]最终摧垮这种自满情绪的，是在1915年3月10日新夏佩勒战役后，炮弹奇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当约翰·弗伦奇爵士把此种情况向报界透露后，政府的威信扫地。随后，在5月间成立了由劳合·乔治主管的军需部。这是政府干预工业和限制工会事例的先声，并为此后无尽的管制开了先例。

吉钦纳提倡的不加选择的征集志愿兵的做法，在1915年也给战时生产问题增加了困难，因为大量的熟练工人当兵去了。许多工会固执地反对由非熟练工和女工来补缺，直到迫使政府做出了某些保证。关于人力分配的这些尖锐的问题，逐步地迫使政府——自1915年5月起由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同意需要采取某种征兵措施，这在1914年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1915年8月的国民登记，是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第一个信号，随后于1916年1月开始征召单身汉和无子女的鳏夫入伍。普遍征兵制在1916年5月定为法律。除了在军事上的价值外，征兵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社会后果：它摧毁了反对妇女充分就业这种偏见的最后障碍（只是家务受到了损失）；它第一次使全体居民中的一个截面取得了打仗的经验，每三个成年男子中就涉及一人。

但是，放弃自由放任的神圣原则，即自由贸易、自由通货和自由企业是多么勉强，真是令人感到惊讶。例如，阿斯奎斯在整个1915年中对于政府进行干预以抑制物价上涨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而直到1915年7月英国的战费达到每日300万英镑时，才废止了拨给战费专款专用的做法。再者，尽管反对普遍国有化的势力日益削弱，但政府甚至到了1916年仍然行动迟缓，以至当阿斯奎斯辞职时，像食品管制这样重要的事情还在商讨之中。

劳合·乔治出任首相，1917年战争给英国带来的沉重负担日益加重——特别是在潜艇战期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至战争结束时公众的（或者说，实际上私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波及。例如铁路、采煤工业和航运事业都处于国家直接监督之下，二百多家

工厂实行国有化，全国9/10的进口物品直接被政府购买。食品配给和严格限制酒店营业时间，使得无人能够完全逃脱战争的间接影响。如果说，绝大部分的人民到了1918年都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国家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自由英格兰”的自由放任原则，是属于战争年代国内遭受的重大损失之一。

在东线，俄国军队于1915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惨败。俄国人首先发动进攻，在1月到4月之间把同盟国从波兰南部一直赶回到喀尔巴阡山麓。后来，冯·麦肯森于5月1日在加利西亚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开始了他那戏剧性的突破。他在短时间的炮击之后，出其不意地发起猛攻，俄军从喀尔巴阡山地区溃退。到5月14日，德、奥联军已推进到萨恩河，距出发地点达80英里。

与此同时，意大利一直在进行备战，虽然它打算如有可能则不经由战斗而从奥地利手中满足其领土要求，主要是要获得的里雅斯特和普拉这两个港口。罗马和维也纳之间在1914年至1915年的冬季不断地进行讨价还价，一直到协约国方面的出价高于奥地利时为止。因为协约国用敌人的领土送礼，自然比较慷慨。1915年4月26日签订的伦敦密约，不仅许诺把利布林内罗边境地区（包括30万日耳曼人），而且还许诺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大部给予意大利。但是，即便5月中旬意大利姗姗来迟地对奥宣战，也未能阻挡德、奥联军的推进。6月3日普热梅希尔被占领，6月22日伦贝格又失陷。俄军的这次退却，仅被俘的就有75万人，一直到10月间在从波罗的海海滨的里加到罗马尼亚边境的泽诺维茨一线才停了下来。

在此期间，第三次的钳形攻势结束了塞尔维亚的英勇抵抗。10月6日，冯·麦肯森及其参谋长冯·塞克特率领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同时保加利亚的两个集团军向西进攻，越过塞尔维亚陆军主力的后方，进入塞尔维亚的南部。这一行动成功地切断了塞尔维亚人和英、法等盟军的联系，这些盟军正从萨洛尼卡姗姗来迟。塞尔维亚军队在包围下没有屈服和投降，而是分散转移，幸存的部队经阿尔巴尼亚山区向西撤退，其中一部分在科孚找到了存身之处。征服塞尔维亚不仅解除了对奥地利侧翼的威胁，而且也使德国能在巴尔干自由来往，并在实际上控制了巴尔干并通过小亚细亚直达底格里斯河。对协约国方面来说，由于英、法部队未能及时与塞尔维亚人会合，以致他们在萨洛尼卡只剩下一个毫无意义的桥头堡。

另一个“小插曲”是在1915年发生的。英国卷入美索不达米亚，是出于政治上的而非军事上的考虑，接踵而来的战役，不过是欧战的外围战。1914年11月，一支英、印远征军占领了巴士拉，以保障波斯湾对英国的石油供应。对于战场上的司令官来说，利用这次军事胜利来对付土耳其人，这种诱惑力实在太太，因而到1915年年中英国人便已沿着底格里斯河而向上推进了180英里，到达了库特。自视颇高的汤森将军在那儿立下了雄心壮志，要进逼巴格达。他的计划被战时内阁乐观地批准了，因为内阁正急于要寻找一个地方取得成就，以弥补在法国所遭到的失败。汤森不久即发现自己低估了土耳其的实力，11月22日他在泰西封遭到阻击，到12月8日便在库特被包围。在几次企图解围均被打退以后，汤森最后于1916年4月29日投降。土耳其人极为野蛮地对待他们俘获的1万名俘虏，以致幸存下来的还不到1/3。[\[9\]](#)

1916年作战重心又转移到西线，使得法金汉1915年的折中战略的失败具有重大的意义。协约国方面1915年年底首次制定出一项早就应有的一致策略。12月5日军事首脑们在霞飞的司令部开会，商定采取由英、法、俄、意各国在1916年同时发起总攻的原则。计划在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月里发动一系列预备性进攻，以耗尽德国的后备力量，同时也为英国对新组成的集团军进行训练赢得了时间。

这些同时发动的攻势一直未能实现，因为法金汉抢先发动了进攻，从而破坏了协约国的计划。他在1915年年底的战略考虑，是把英国当作敌方同盟的骨干作为基础的。英国本身只能通过潜艇战间接地削弱它的力量，因为法金汉认为，对英军在法国防守的战线是不宜采取硬攻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用摧毁英国的盟国来迫使英国讲和。俄国已接近精疲力竭，意大利可以由奥地利在德军支持下加以牵制。剩下的只有法国，但法金汉认为法国的军事努力也已接近强弩之末。要摧毁法国人民的意志，不必去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只需采取消耗战的方针就够了。只要能够找出正确的目标，就能让法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而置之于死地。法金汉选中了凡尔登。这个堡垒林立的地区对德国的交通联系构成威胁。它是一个突出部分，可以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而首先是，凡尔登那引以自豪的历史，对于法国人来说，具有远远超过军事价值的感情上的重大意义。法金汉的战术计划极为简单：用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有限进攻，引出法国的预备队，把它置于德国炮火的轰击下。进攻者用短暂密集的炮火来保护其步兵以节约兵力，使步兵们能在敌人把预备队投入反击之前冲入新的阵地并加以巩固。

固。法金汉对法国人的反应估计得很准确，他的新战术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严重地低估了法国人的防守决心和消耗战对他自己兵力的影响。

由于法国人全神贯注于自己即将发起的进攻，这就给德国人在2月21日发动的攻势帮了忙。再加上关于凡尔登坚不可摧的传奇说法现已成为幻影，因为它的堡垒没有大炮，这时主要是用作掩体。堑壕工事很浅，兵力分布稀少。但是最初的几次进攻还是被抵挡住了，因而贝当在3月初接管防御工事的指挥权时，第一场危机已经过去了。

法国的盟国放弃了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以便解除凡尔登所受到的压力。海格从法国第十集团军手中接管了阿拉斯防区，从而建立了一条自伊斯尔河绵延到索姆河的英国战线。意大利人发动了越过伊松佐河的第五次徒劳的进攻。俄国人则把大批未经训练的兵员投入了在维尔纽斯附近的纳罗茨湖进行的同德国人的战斗。这些英勇的姿态均未能阻止德军向凡尔登节节的推进；而且，开始阶段的伤亡报告似乎证明法金汉的可怕估计是正确的。当伏堡于6月7日陷落时，凡尔登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

俄国人再次试图同时解除法军在凡尔登所受到的和意大利人在特兰提诺因遇到反攻而受到的压力。指挥西南战线的布鲁希洛夫在6月4日开始了一次据说起吸引敌军作用的进攻，但结果却发展成为一场重大的攻势。在卢茨克附近的奥地利第四集团军和在布科维纳的第七集团军的抵抗微弱，布鲁希洛夫得以持续前进了3个月。遗憾的是，他没有预备队来利用已造成的突破形势，等到预备队从北线赶到时，德国人已迅速赶运预备队把缺口堵上了。布鲁希洛夫所以能在被阻后再次发动攻势，主要是靠消耗自己的部队，虽然他俘虏了45万人，但他自己的巨大损失——在作战中损失近100万人，还有成千的人开了小差——却断送了俄国的进攻能力，并且也使革命变得迫在眉睫了。

布鲁希洛夫的攻势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阻止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进攻，迫使法金汉从西线撤走部队，从而放弃了在索姆河对英军进行预防性攻击的计划；并且，也使他不敢再在凡尔登重打一场令人难以忍耐的消耗战。布鲁希洛夫对奥军的胜利，也影响罗马尼亚，使它造成严重的失策而于8月加入协约国一边参战。布鲁希洛夫的胜利，还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法金汉一事起到了一部分间接的作用。法金汉发动凡尔登攻势的最终目标未能实现，但他

重创了法军，使他们在计划中的夏季攻势里发挥不了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即便尼韦尔将军和曼金将军在1916年年底收复了在凡尔登战役中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凡尔登还是标志着法国军队在西线协约国军队中的优越地位已告终结。

这样，1915年12月计划的巨大攻势，在英法联军进攻索姆河时已面目全非了。在这些战役中，吉钦纳的各集团军和坦克首次登场，协约国也不言而喻地接受了消耗战的策略。

经过一周的炮轰后，发起突击已无任何可能，攻势遂于7月1日晨在明亮的阳光下开始了。由罗林森将军指挥的新建第四集团军，以13个师的兵力向索姆河以北的一条15英里长的战线发起进攻，而法国人——他们投入的兵力已大为减少——以5个师向一条大部分处于索姆河以南的8英里的战线发起攻击。已无突击可言，加上视野清晰，炮火又未能摧毁敌方的铁丝网和机枪，因而进攻者取胜的机会甚微。再者，事实证明，排成整齐的行列秩序井然地向前推进的战术是自杀性的。除了最右边法国人遇到的抵抗比较微弱外，各处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伤亡骇人听闻——达57400人——是英军在一日之内遭受过的最大伤亡。7月14日再次发动了攻势，这次采用的战术比较灵活了，实际上进到了德军的二线阵地，但是再向前进就不可能了。海格不得不逐渐改变了他原来的希望，即在突破后占领巴鲍姆和康布雷。7月中旬，已没有必要为援助凡尔登的法军而特地发动进攻，但是海格为了夺取尺寸之地，还是继续他那按部就班的进攻，直到冬雨迫使他不得不在11月间下令停止前进。

在此期间，英军于9月15日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这种武器终于在打破堑壕战僵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就是被神秘地命名为“坦克”的装甲战车。战前，对用发动机驱动的履带式车辆所做的实验，并未引起高级军官们的兴趣。只是由于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洞察力和果断精神，才使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和其他坦克的先驱者们得以在1916年把坦克用于作战。它们首次表演时，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只有49辆可供使用，而且其中17辆在到达出发点之前就坏了。其余的坦克，只有9辆能跟得上步兵，但它们的确给人以良好的印象，特别是在扫荡富勒村时尤其如此。考虑到驾驶员们训练的匆忙，而且又没有时间去改进机械上的缺陷，因此有这么多的坦克出了故障，是不足为奇的。到9月中旬，突破德军纵深防御的前景甚为渺

茫，因而对于总司令试验这样一种武器是否得当，也是大有疑问的，即使这种武器——在有利的情况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索姆河战役在战略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前一年的“东线派与西线派”之争。而且，也对劳合·乔治和最高统帅部之间1917年的冲突产生影响。加利波利冒险行动的失败，可能断送了对同盟国的薄弱侧翼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可能性。不管怎样，英、法两国大多数的政治家和将领们所共有的正统的见解是：只有把力量集中西线才能打败德国。因此，协约国必须采取进攻的战略：由于德国人在占领土地上占优势因而需要这样做；财政上的考虑也很紧迫；而最主要的是，协约国政治上的团结，有赖于为取得胜利而不断地做出努力。法军在1915年轻率的进攻中遭受损失和在凡尔登的浴血苦战，都表明必须要由英军来担任进攻的主力。上述种种原因，使英国和法国的统帅部得以稍稍摆脱由于1916年6月至1917年11月间持续地发动攻势而受到的激烈的批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执行的方法统统都是正确的。

在战略上，英军和法军过于死板和狭隘地遵循集中兵力用于决定性战线的原则，他们没有认识到：德国处于中央位置，而且铁路运兵的效率比较高，因此它能在任何受到最大危险的地点更为迅速地集中兵力。^[10]德国一再派出援军援助奥地利人，就充分地表明了这种优势。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认识到，即便西线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指一旦西线受挫，其损失是其他战线无法弥补而言——也必须使德国的人力、物力尽量地分散开来，以便给正面进攻造成取胜的机会。因此，1915年援助塞尔维亚的计划，以及劳合·乔治的1917年年初增援意大利战线的未遂计划，便应运而生了。在战术上，协约国的将领们——除史密斯-多里安和普卢默等少数例外——除了“蛮干”以外，找不出更高明的办法来。而且，他们总是喜欢支撑败局而不愿意取消攻势以减少损失。这种固执的态度从下面这一点也可看出：他们不愿放弃经过苦战得来的土地。例如1916年冬季在索姆河地区，甚至当攻势在敌军可以俯瞰的沼泽谷地渐趋停息的时候，他们还是如此。因此，尽管海格和他的军、师指挥官们1916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多数没有作战经验，要进攻的战区有重兵防守，而且法国人的支援尚无把握——竭力奋战，但从指挥才能方面来说，仍然有欠高明。

道格拉斯·海格爵士个人作为总司令具有一些令人钦佩的品质，特别是他在和法国人打交道时耐心、沉着，而且他了解行政上的重大问题。他的最严重的缺点是由于他本人远离前线所造成的，这可能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利条件，这种不利条件又由于他对取得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主要是以宗教信仰为根据）而更加严重；而且他又不能任用能够独立思考、不论如何令人不愉快而敢于向他讲述真情的参谋军官。最后，海格认为能在1916年打败德国人，从而使他能在凡尔登的压力被解除后继续进行索姆河的攻势。当取得突破的希望破灭后，他又寄希望于拖垮敌人，对敌人的伤亡数字做了最乐观的估计。^[11]已经发表的海格书信集，并没有透露出那些可能使他对英、法、德三国军队的伤亡做出客观估计的重要情报。

在海上，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由于与美国的摩擦日益增多而于1916年6月暂告中止。正是由于这种被迫的政策变化，间接地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唯一一场大海战——日德兰战役。5月30日深夜，英国舰队离开基地前往北海一带进行例行的巡弋。德国舰队也在次日凌晨出海，希冀把敌人切断一部分。英国主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始终保持十分谨慎。他认识到只有他是唯一有可能“在一个下午就输掉整场战争的人”，因而他决心只在极有利的情况下才打大仗。5月31日午后不久，指挥战列巡洋舰队的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爵士，发现了5艘敌方战列巡洋舰。他立即与之交战，在损失两艘战列巡洋舰之后便与德国的主力舰队遭遇了。这时他的任务是把敌舰诱向杰利科，但是由于浓雾以及夜色终于降临，使他未能达到目的。然而，杰利科已经把舰队调动到德国舰队与其基地之间的位置上，看来有可能大获全胜。但是战机被贻误了。因为指挥德国主力舰队的舍尔海军中将虽然已被发现，但他还是设法从英国的驱逐舰的警戒网中溜了过去，安全地回到了本国的水域。双方都声称自己打了胜仗。德国人在击沉舰只数和吨数上占上风，但舍尔并没有达到只和英国主力舰队的一部分舰只交战的目标，而且在没有遭受更大损失的情况下逃脱，实属万幸。英国主力舰队仍然完整无损，而封锁的压制也未放松。德国由于在水面上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便转向了潜艇战——而且采取了更大的规模。7月间中立国船只在北美洲沿岸一带被击沉，这就造成美国参战这一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日德兰海战之后，大型舰队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舍尔在他的小型舰队被调去进行潜艇战之后，实际上已

变得无能为力了。而杰利科则由于护航驱逐舰被调去与潜艇作战而受到牵制。在四年大战中，大型舰队只打了半个小时的仗。

在德国潜艇左右一切的形势下，协约国在毫无起色之中结束了一年。每月损失的船只从1916年6月的10.9万吨上升到1917年1月的36.8万吨。大部分船只是在地中海被击沉的，因为在那里，德国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要小一些。被击沉的船只数量的这样增长，鼓舞着德国的作战领袖们在1917年2月又重新放手让潜艇不受限制地去击沉船只，他们的算计——或赌博——是：协约国在美国有效地参战以前就会在陆上由于挨饿而被打败。

1916年和1915年一样，是在协约国的盟国之一的战败声中结束的。罗马尼亚为了追求其贪婪的领土要求，曾经等待着在有利的时机参战。而布鲁希洛夫的攻势使它在1916年8月终于投身到战争中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不明智的赌博。由于瓦拉几亚位于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之间，因而在欧洲国家中没有比罗马尼亚处于更难防守的地位了。只有俄国能够给予它以直接的支援。但是，俄国却看不起它。[\[12\]](#)它的部队装备低劣，领导无方。而且，由于罗马尼亚攻进了特兰西瓦尼亚，它的侧翼就在它的死敌保加利亚面前暴露出来。

由法金汉提出，由鲁登道夫执行的同盟国战役，在战略上大概是整个大战中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了。在法金汉率领的德、奥联军主力在特兰西瓦尼亚咬住罗马尼亚人的时候，由冯·麦肯森领导的一个保加利亚集团军侵入多布罗加，从而威胁敌军的后方，迫使敌军无法前进。法金汉于11月中旬穿越山口进入罗马尼亚，而麦肯森这时则从多布罗加撤出他的集团军，在西斯托瓦渡过多瑙河。在两军会击下，首都布加勒斯特于12月6日投降。然而，罗军主力北逃，在塞雷斯河的对岸建立了一条安全的防线。他们在那里由法国人重新装备和训练后，一直坚守到1918年3月。

同盟国在凡尔登陷于僵局以及在奥地利人大败于布鲁希洛夫之后，取得了罗马尼亚的3/4的领土，这无异是一种兴奋剂。反之，协约国因为对一个巴尔干盟国的支援太慢而再次蒙受屈辱。从物资方面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有价值的牺牲品，它向德国提供石油和小麦，没有这些物资，德国就很难抵抗到1918年年底。

1916年年底，在领导战争的军政领袖中间，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英国，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出任首相。6月间，劳合·乔治已经由于吉钦纳在赴俄途中溺毙而担任了陆军大臣。他主张组成一个人数不多、由他领导的战时内阁，以便更有力地进行战争；这就终于导致了阿斯奎斯在12月间的辞职。新首相对于消耗战的方针和统帅部的能力意见很大，但在实际做法上，却并没有改弦易辙，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在下院要依靠保守党的支持，他的政治地位一直不稳固；二是他担心和将领们的直接冲突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将领们的群众威信现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他只好采取婉转的办法，但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在衡量他和高级将领们做出的这种不稳定的妥协时，还必须看到以下几点：劳合·乔治通过一个精干的战时内阁，发挥了生气勃勃的领导作用；他在罗致重要人选时独具慧眼，例如他召回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他在推行新办法——如护航制——时颇有卓见，反对专家的保守观点。

霞飞也于12月间因被授予元帅称号而改任挂名闲职。他在马恩河战役中和1915年间曾经鼓舞过人们的信心，但显然应付不了堑壕战僵局所带来的独特问题。他的继任者是集团军司令官中资历最浅，在凡尔登战役中崭露头角的罗贝尔·尼韦尔将军。尼韦尔具有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领中少见的能言善辩的本领。他说得白里安，更令人惊奇的是，也说得劳合·乔治改变了主意，竟然同意他提出的在1917年春季用闪电攻势结束战争的计划。

在同盟国方面，鲁登道夫这时实际上负责战略问题，法金汉和康拉德均已被解除统帅职务。11月21日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去世，由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查理八世继位。只要他的盟国允许他单独谈判，查理八世是会欣然媾和的。与此同时，兰斯多恩勋爵的和平建议，在英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是，来自同盟国方面的不明确的和平试探在1917年1月10日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无法克服军事上的障碍，这便是：只要还有取胜的希望，德国就不会交出夺得的土地；而在协约国方面，如果达不到恢复法国的疆土和比利时的独立这样起码的目标，也就不能考虑媾和。甚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不久也认识到，“不分胜负的和平”是没有的。

霞飞在卸任前不久，曾在尚蒂伊召开了一次集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1917年的战略方针。他和海格一致认为，过去一年消耗战的过程

已使西线德军濒于崩溃。在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月里，进一步发动有限的攻势以耗尽敌人的后备力量，能为在春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铺平道路。霞飞了解法国的兵源已近于枯竭，因此他宣称这将是法国最后的一次重大攻势。由于“西线”观点在为劳合·乔治所支持的卡多尔纳将军的建议中居于如此支配的地位，因而这个建议被搁置起来；这个建议是：英、法应派增援部队去意大利，给予奥地利以决定性的打击。

霞飞的缺乏想象力的战略前景，由于尼韦尔的升迁而立即受到影响。后者的做法不仅和霞飞的依靠逐步消耗的做法显然不同，要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破办法，而且还彻底地改变了计划的具体做法。霞飞本来想要英军于2月初向原来的索姆河战场以北和以南发动一次主攻，而由法国人向南直到瓦兹进击以支援英军。在这些进攻之后，由法军接着在香巴尼发起一次人数较少的攻势；这时英军——除非敌军的抵抗出乎意料之外地崩溃了——则转而进攻佛兰德。与霞飞的想法截然不同，尼韦尔想利用索姆河的攻势分散敌军兵力，以便法军在香巴尼发起主攻。因此，法军这次将担任主角；而且，为了支援法军，要求海格接管索姆河以南至鲁瓦的法军防线。

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变更做法，造成了两个协约国之间长期的摩擦。海格听说法军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感到高兴；但是，他坚持要求在接管法军防线前满足若干条件，因为接管显然要影响他进攻佛兰德的计划。这些不可避免的分歧需要有统一的领导；但遗憾的是，白里安和劳合·乔治两人采取的不是正道的做法，只是增加了将领之间和盟国之间的厌恶感；他们在2月26日的加来会议上，打算让海格隶属于尼韦尔，以此来达到统一领导的目的。海格同意在进攻期间接受尼韦尔的指挥，只要他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向本国政府求助。结果，尼韦尔就被置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地位：既要指挥一个由协约国共同进行的战役，同时又要指挥法国的军队。

鲁登道夫采取了比法金汉头一年进攻凡尔登时采取的更为有效的行动，从而打乱了尼韦尔的计划。鲁登道夫预料协约国还会在索姆河发动进攻，于是在距离前线约10英里的朗斯、努瓦荣、兰斯弧形地带构筑了一条强大的人工防线（“兴登堡防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敌人在准备撤退，尼韦尔对此拒不相信。然而，德国人的确从2月底即开始准备撤退并有计划地在无人地带进行彻底的破坏。消耗战的

支持者认为，这一撤退是德军在索姆河地区“失败”的证据；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一行动“无论在设想上或是在实行中都是高明的一着”，其目的在于交出无用的土地以阻挠敌人。无论如何，尼韦尔的攻势化为泡影，而海格别无他途，只好把兵力集中于阿拉斯防区，那里的战线一直没有变化。

尼韦尔由于未能调整其计划，并且公开吹嘘自己的意图，因而给自己招致了更多的困难。再者，当法军4月16日在兰斯附近开始大举进攻时，他已不再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盟友的，甚至也得不到他的集团军的司令官们的信任了。这场进攻持续到5月7日，在一条16英里长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4英里；但是，这点有限的成就跟尼韦尔自己许下的诺言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比。总而言之，法国的军队正葬送在他的手中。前线部队由于经常奉命去攻打难以攻克的防线，因而士气低落；再加上没有休假，并且生活条件恶劣而长期心怀不满，因而哗变在军队中蔓延，到5月初，已有近半数的部队受到影响。

于是，法国兵最后终于结束了对轻率发动进攻的迷信。贝当5月15日取代尼韦尔后立即宣布：法军在美军各师到达和获得更多的坦克、重炮之前，必须继续严取守势。通过巧妙地把坚定的态度和改革的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贝当很快地恢复了秩序。但是，即使是贝当也无法在1917年恢复法国陆军的进攻能力。英军别无选择，只好来分散敌人对法军战线的注意力，因而海格在4、5月间不断地发动进攻，这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6月7日，对佛兰德的攻势顺利地开始了，先由普卢默的第二集团军（蒂姆·哈林顿任参谋长）做示范性的有限进攻。敌军防御工事下面19枚巨型地雷的爆炸，更增加了进攻的突然性，然后步兵占领梅西奈山，从而拉直了伊普雷突出部。

接着便出现了令人惋惜的拖延，直到7月31日“第三次伊普雷战役”开始（也被误称为帕琛达尔战役）。鉴于迄今对这次攻势仍有争论，因此必须着重指出，海格已不再是在法国人的坚持要求下发动进攻了。实际上，早在5月11日，贝当就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大型进攻；5月19日他又说，海格预定对奥斯坦德的进攻肯定要失败。无疑地一贯赞成进攻的福熙，6月2日也说，海格的计划是“鸭子进军”，认为整个事情是“无益的，想入非非的和危险的”。甚至罗伯逊也劝海格把他的预料的调子放低，不要说这个战役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13]在为海格辩解时，必须指出：他要占领佛兰德港口奥斯坦德和泽布勒

赫的决心，可能是受了杰利科海军上将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杰利科认为，除非占领这些潜艇基地，否则英国不久即将被迫求和。但是，实际上决定这一任务是否能够从陆上去完成的人，应该是海格而不是海军部。[\[14\]](#)

虽然攻势在8、9月间有所进展，但是海格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在这种气候和地形条件下进行突破是可行的。过去80年的气象记载表明，从8月中旬起可能会有大雨。而且，由坦克部队总部绘制的“沼泽地图”也指出，在7月31日将要进攻的大部分地段里，因排水堤被（7月15日开始的）炮轰损坏而造成的泥塘，形成了一条充满泥浆的深沟。后来坦克部队终于奉命不得把这类悲观的报告送往统帅部，正如最近出版的海格传记的作者所说：“没有证据说明，海格曾经看过这样一份‘沼泽地图’，如果看过，他就会对他所收到的某些报告有不同的想法。”[\[15\]](#)

如果说，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这样可以为海格的8月进攻开脱一部分责任；那么，他在看清这个目的不可能达到以后很久，还要把攻势继续进行到11月间，其动机就值得仔细考虑了。如果说，海格是在法国人的压力下进攻的，或者说是因为他怀疑法国人是否经得住德国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也是谬论。现在拿不出当时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相反，海格在10月8日贝当来访之后写信给罗伯逊说，法国人完全能够守住自己的防线，因此他没有必要去接管更多的法军防线。[\[16\]](#)

海格所以坚持进攻，既非出于麻木不仁，也非由于所谓占领帕琛达尔山脊是出于战术上的必要。根本原因是1916年曾经蒙蔽过他的那种乐观情绪此时还在影响他的判断。海格相信他的情报处长查特里斯将军供给的情报。这些情报强烈地暗示“德国的民心和士气均已濒于崩溃，在不断无情地施加压力下，将不仅可以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而且还能赢得整个战争”。直到9月28日，他还预言说，进攻布鲁德赛德可以收到“决定性的效果”，只是在这次进攻于10月4日失败之后，他才甘心于只达到帕琛达尔—克莱肯山脊这一有限的目标。[\[17\]](#)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对佛兰德的攻势在削弱德国第四集团军的兵力和士气上是成功的；但是，英国部队可能也遭受同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由于德军主要是在进行防守，而且采取了纵深防御，防守许

多分散的坚强据点，而不是防守一条条战线这种明智的战术，因此进攻者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帕琛达尔战役造成的士气的挫伤，以及众所周知的兵力不足这两个因素，在解释1918年3月英国防御工事被突破的原因时，都应考虑在内。

支持和反对消耗战方针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伤亡的统计数字的，然而这种数字是极难计算出来的。在这方面存在的重重困难中，不妨指出三点：首先，德国人发表的数字涉及的时期和战线的地段，并非总能跟每一战役相符合。其次，双方的统计材料常常是死亡、受伤、失踪和被俘不分的。最后，德国的记录有许多已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毁，而协约国方面的某些报告不是散佚就是看不到，因而对已发表的材料中有出入的地方，也就无法进行审核。由于这些缺陷，某些史学家因而根本就不利用统计数字。而另外一些人，则利用统计数字来支持一些先入为主的见解。特别是一位英国官方的史学家陆军准将詹姆斯·埃得蒙兹爵士为“西线派”下述观点提供了支持：1916年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的伤亡比协约国的伤亡大得多。但事实证明，他的计算方法是完全靠不住的。[\[18\]](#)最近对可以获得的英、法、德三国的材料做了一番检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1915年至1917年西线的损失两相比较，肯定对协约国方面不利：

	1915 年	1916 年	1917 年
德军损失：死亡、失踪	170312	295572	281524
受伤 ^[2]	677916	896879	776943
合计	848228 ^[1]	1192451	1058467
法军损失、死亡、失踪	330000	300000	145000
受伤 ^[2]	970000	576000	424000
合计	1300000 ^[3]	876000 ^[4]	569000
英军损失、死亡、失踪	73160	151086	185555
受伤 ^[2]	239867	500576	564694
合计	313027	651662	750249

[1] 损失总数可能比此数稍大一些。

[2] 包括伤重死亡数。

[3] 只包括2月至11月。

[4] 只包括2月至12月。

每个战役的伤亡被俘数字都说明同一结论。例如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至11月初），德军最高伤亡数字为50万人（未分类），而英军总数为419654人（亦未分类），法军为204253人。1916年2月21日至8月底的凡尔登战役中，法军损失317000人，德军损失为300212人。第三次伊普雷战役（1917年7月31日至11月中旬）中，据“官方历史”发表，英军的伤亡被俘人数为245000人，^[19]法军损失8525人（仅为死伤）；而德国第四集团军，虽然其防线比英国攻势涉及的范围宽得多，损失却在175000人到202000人之间。1914—1918年西线死亡（由于各种原因）总人数约为：英军70万人，法军130万人，德军120万人。

但是，即便数字比例显然表明英、法两国损失较大，另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德国人损失的人数是否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的必胜信念是何时何故开始减弱的？虽然消耗战的过程从未使德国的兵力接近枯竭的地步，但惨重的伤亡确实从1916年开始产生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影响，特别是当统帅部沉溺于反攻方针中的时候。到1917年底，兵员人数从6月里达到顶峰时拥有的野战军538万人（包括各条战线）下降后，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便如此，1918年3月德国野战军还有510万人（其中380万人在西线），另外还有200万人左右的本土军。由于鲁登道夫发动的攻势的结果，德军兵员人数显著下降，因为在3月到7月间德军损失了约97.3万人，还有100多万人被列为病号。到10月间，西线只有250万人，而征兵情况极糟。即便如此，德国在1917年和1918年年初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兵力人数不足，而是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以及对此有极大影响的食物匮乏。军纪问题的明显增多，即说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即便野战军正在节节向前推进时，这种问题在驻扎本土的部队中间也是至为严重的。

因此，关于消耗战的有效程度如何是无法得到精确的答案的。1914年至1917年间，各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几乎力量耗尽，濒于败北。德军在这些年中的伤亡虽然要比协约国将领们的估计小得多，但也已超过了它所能经受的程度。人数上的不平衡，只是从1918年中期才开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时德军由于发动持续的进攻已经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士气亦已涣散；而在协约国方面，由于美国军队的到来，法国的精疲力竭得到了弥补而有余。

1917年西线的战事并没有在佛兰德的泥淖中结束。当在伊普雷进行突破的希望消失后，坦克部队经批准计划在康布雷附近起伏的丘陵地带进行突击。由宾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在11月20日以近400辆的坦克为前锋，取得了一次重大的突破，在一些地方推进了7000码，俘虏7500人和120门大炮。遗憾的是，没有后备的坦克和部队来充分扩大战果，而两个可以调用的骑兵师却又莫名其妙地按兵不动。11月30日德军发起反攻，夺回了大部分的失地，士气因而大振。坦克的表现比以前大有进步，这一点使英国人的失望情绪多少有所好转。

法国军队中哗变事件的严重情况，被非常严密地掩盖起来，不仅敌人，连朋友也不得而知。俄国长期以来即要出现的军事崩溃，却是掩盖不了的，特别在1917年3月导致沙皇被废黜的彼得格勒起义之后，更是如此。临时政府曾经一度答应要把“人民战争”积极地进行下去，但是革命来得为时已晚。这时，革命的宣传已向精疲力竭和毫无斗志的部队灌输了要求结束战争的正当的政治理由。布鲁希洛夫被任命为总司令，于1917年7月进行了最后孤注一掷的进攻。进攻失败了，当布尔什维克在10月间夺取政权时，军队实际上已停止作战。到年底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停战协定时，各协约国已经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重新开战。

到1917年年底，问题显然是：在从俄国抽调出来的德国部队到西线打败疲惫的协约国军队之前，美国是否能够在陆上提供有效的支援？在海上，美国参战的影响几乎是立即可以感觉得到的。它和英国进行合作，把海军封锁变成了一种并不因尊重中立国而受影响的压制行动。与此同时，潜艇给英国补给造成的威胁，也逐渐地开始受到控制。这种威胁曾经是一直存在的。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一直增多，到1917年4月达到了顶峰，协约国损失的船只将近100万吨。英国海军部对护航制度持怀疑态度，只是出于勉强试行。然而5月间第一次对从直布罗陀驶来的商船队试行护航时，却取得了成功。到了9月，由于有了美国驱逐舰的支援，横渡大西洋的船只，在来往的途中都得到了护航。同时，特制的猎潜舰和飞机以及新式水雷的出现，反潜艇攻势得到了加强。德国仅仅用了140艘潜艇投入现役，其中经常出动的不过50艘，就几乎打赢了这场摧毁商船战。[\[20\]](#)

地中海商船航运的重大损失，是意大利在1917年年底几乎战败的原因之一。意大利8月间在伊崇佐河发动第十一次攻势之后，鲁登道夫

断定已不能指望奥地利再坚持一年，为了挽救盟国，必须打垮意大利。10月24日，在一阵短暂的炮轰之后，他便对卡波雷托地段发起攻击。在随之出现的溃退中，卡多尔纳将军的军队有25万人被俘，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开了小差。卡多尔纳在控制威尼斯的皮亚韦河上建立了防御工事之后，他的职务便由迪亚斯接替。英国和法国这时赶来增援，这次增援如果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到来，就会有价值得多了。奥军把辎重远远丢在后面，一再打算包抄意军的防线，但未获成功。

意大利危机给协约国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它促成1917年11月在凡尔赛建立了最高作战委员会。各协约国的合作要采取切实的步骤，还需再发生一次危机，因为起初各国代表并无实权，而海格或贝当又都不愿意拿出几师兵力来充当总预备队。

协约国在中东的作战行动，1916年以埃及为起点。1917年获得了迅速的进展。在一次辉煌的机动作战后，迫使耶路撒冷于12月9日向艾伦比投降。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时英军在巴格达站稳了脚跟（见上文第187页）。这些胜利并不能立即对欧洲微妙的平衡产生影响。俄国即将（1918年3月2日）签订强加于它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鲁登道夫在美国人能够调集大军参战之前，也肯定能得到大量的援兵。

1918年年初，西线的主动权显然是操纵在德国手中。从1917年11月起，军运列车就把大批德军从俄国前线运往法国，因而到1918年3月初，他们已拥有193个师来对付协约国的173个师，这是把每一个人数较多的美国师当作两个英国师或法国师来计算的。但是鲁登道夫明白，他既是在和时间斗争，也是在和迄今还无法摧毁的防御工事斗争。潜艇战正在遭到失败；封锁对国内战线的影晌变得严重起来了——例如，柏林1月间发生了总罢工；最紧要的是美国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进法国。鲁登道夫如同1914年的毛奇一样，也把赌注下在彻底的胜利上，因为有限的推进只会把敌人赶回到交通线去，却使进攻者的补给问题增多。就协约国来说，只要他们能经受住了即将到来的攻势，就能指望单凭人力和物力，在1919年取得胜利。

虽然提出了不少的警告，但协约国的防御准备工作还是不充分的。没有一国政府愿意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军队来增援法国。意大利反对将卡波雷托危机时派来的协约国军队撤走；法国政府坚持保留萨洛尼卡桥头堡；英国内阁的大多数成员，急于在巴勒斯坦取得彻底的胜利。劳合·乔治和战时内阁故意不给海格增派援军，他们认为，由于

指挥官们盲目地相信不断发动进攻的方针，已经无谓地牺牲了许多性命，他们唯恐大规模的增援只会死人更多。军政双方都有理由不信任对方，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是毫无可以指责之处。现在回顾起来比较容易看出，政府应当要么对总司令表示信任，要么就撤换他，即使冒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也在所不惜。虽然首相和总司令之间的互不信任，是造成3月灾难之后双方交相指责的原因，但是那场灾难与预备兵员被留在英国一事之间，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明显的联系。

首先，鲁登道夫在第五集团军的战线方面建立起五对一的兵力优势时，并未引起英国最高统帅部的警觉。实际上，海格在3月2日还认为自己的防线固若金汤，甚至怀疑敌军是否敢于冒进攻的风险。^[21]其次，由于对敌人的意图判断错误，预先采取的防御措施很不充分。最后，鲁登道夫非常精明，他把他的主要打击方面放在英、法防线的接合部上。这时，这两个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低潮，主要是因为在英国应当再接管多长防线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及建立总预备队这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因此，协约国之间的争论，估计错误，以及兵员缺乏，为德军的突破开辟了道路。

当攻势于3月21日开始时，德军在从阿拉斯到拉费尔的60英里长的战线上拥有69个师对33个师的兵力优势。鲁登道夫的目标是要把协约国的军队分割开来，把英军赶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这是后来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在1940年所完成的业绩。在战术上，德军的表现，比前几年的刻板举动大有改进。新战术的实质是渗透。经过特殊训练、配备有轻机枪、轻堑壕迫击炮和喷火器的突击队，越过堑壕防线，绕过强大的火力点和机枪巢，设法渗入敌人的炮兵阵地。鲁登道夫也深知突然袭击的重要性，因此他开始的炮击时间很短；在别的地方制造威胁以分散敌人兵力；充分利用瓦斯和烟幕这种人工隐蔽手段和天然的掩蔽物大雾。最后，鲁登道夫下决心要使用以预备队去扩大战果的原则，而不是用它们去重新鼓舞那些攻势已经无力的地段，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在5天的时间里，看来一切都对进攻者有利。德国第二集团军在索姆河以南所向披靡，一直到达索姆河的旧战场时才被挡住。但是在河的北面，英军在阿拉斯地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鲁登道夫向攻势顺利的侧翼调动预备队时大大地贻误了时机，因而使协约国的军队赢得了时间，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实际上，他只差一点就取得了完全

的突破。英国第五集团军已被打垮，贝当也一度打算跟溃败的盟军分手，向巴黎方面撤退。这一危机终于使协约国的军队统一了指挥。3月20日在杜朗匆匆地举行了一次会议，斐迪南·福煦被任命为最高统帅，协调协约国的军事行动。正如海格敏锐地认识到的，这一任命的直接价值是法军预备队大批地开往英军防线。

鲁登道夫于3月28日再次炮轰阿拉斯，但是这次既无大雾又非突袭，因而未能把宾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从阵地上赶走。他把剩余的预备队调去支援向亚眠的进军，这次又稍嫌过迟。当进军在3月30日停下来时，已经前进了近40英里，缴获大炮近千门，俘虏8万人。

接着，鲁登道夫又进攻佛兰德，4月9日突破了葡萄牙部队据守的薄弱防区。到4月底时，英国人已经把在1917年以昂贵代价换来的全部土地丧失殆尽，虽然伊普雷本身还在他们手里。英军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让敌人突破。

兵力的对比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了，然而这在夏季以前还不明显。自从攻势开始以来，英军已损失近30万人，被打垮了10个师。援军自英国赶来，并且从意大利、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撤回了一些师。这时德军有208个师在法国，要进一步发动进攻仍然有力量，但是时间不多了。早在3月危机时，潘兴将军就放宽了不许美国部队过早地投入战斗的纪律，只是规定他们必须整师地进行作战。从4月底开始，美军每月到达30万人。到7月中旬，已有7个师投入战斗，还有14个师正在准备进行战斗。

鲁登道夫在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休整后，接着于5月27日进攻苏瓦松和兰斯之间的达姆路。被打垮了的英国师，调到这个据认为是安静的地段来休整。但是，法军指挥官迪歇纳把他的步兵集中在前沿堑壕中，使他们成了部署巧妙的德国炮兵的“炮灰”，从而丧失了本来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地位。第一天，是德国人自堑壕战开始以来在西线推进最远的一天。中央的部队前进了13英里，越过了埃莱特河、埃纳河和维斯莱河。但是，正如经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两翼进展缓慢，形成了易受攻击的突出部。

可笑的是，鲁登道夫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却成了他的包袱。他在协约国军队的防线上造成了两个大的和一个较小的突出部分，当他的部队进攻的势头减弱时，这些突出部就成了反击的目标。7月中旬战局

开始发生变化。鲁登道夫15日在兰斯附近发动攻击，但进展不大。3天后，贝当使用大批轻型坦克向马恩河反攻，迫使鲁登道夫后撤，把自己的战线拉齐。原定对佛兰德的进攻推迟了，后来干脆放弃了。主动权遂逐渐转移到协约国手中，福煦此后一直没有把它丢掉。

德军进攻开始时极为顺利，大有获胜的希望。后来，鲁登道夫由于不断地进攻抵抗最坚强的中心部位，因而失去了德军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西线取得胜利的机会。归根结底，比德军在这些攻势中人员的伤亡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德军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时，衣衫褴褛、营养不足的进攻者发现，协约国军队的后方地区跟德国比起来大不相同，那里“牛奶和蜂蜜满地流”——或者更实在一点说，遍地是葡萄酒和面包。幻灭的感觉和失败的情绪这时普遍蔓延开来。在1918年夏季可以看出，德军的作战素质已经下降，特别是悄悄投降的人愈来愈多。海格过去曾经毫无根据地认为战争的结束已经在望，这时却已有了确实可靠的理由了。

协约国军队于8月8日开始进攻，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罗林森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向亚眠以东地区进击，它们使用了400辆坦克，席卷了德军的前沿各师。这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深远，鲁登道夫后来曾描绘说，这一天是“德国陆军战史上黑暗的一天……它毫无疑义地使我军的作战能力下降”。此后不久，他主张在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进行和谈，使德皇感到震惊。

这时，福煦拥有充足的兵力、大炮、军火和坦克，使敌军不能巩固阵地。他迅速不停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在进攻受阻时，不再无谓地坚持进行下去，而是暂停下来，等到敌军被吸引到别的地方时，才又恢复进攻。德军现在尝到了因节节败退而造成的士气低落的滋味。到了9月中旬，美军在作为一支独立的作战部队进行的首次战斗中，一举拔除了圣米希尔突出部，不过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英国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则推进到坚强的兴登堡防线。

海格那种难以遏制的乐观情绪，现在证明是最可贵的了，因为他不受法国将领和英国政府迟疑态度的影响，始终深信战争将在这年年底结束。他于9月2日向兴登堡防线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星期巧妙的军事行动后，突破了北方运河最牢固的防御地段。兴登堡防线已被突破的消息，使已经失去斗志的鲁登道夫感到十分震惊，他在精神上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在恢复过来以后，就坚决要求新任首相巴登的马克斯

亲王立即寻求停战。新首相于10月3日这样做了。军事领袖们的失败情绪，很快就传染了国内战线，因此，虽然到10月底时将领们稍稍恢复了一些信心，但已为时过晚，难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协约国军队节节向前推进，进一步摧毁了德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力。到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时，德军已被赶出比利时的西部，只有极少的法国领土仍在德国人手里。福煦即将发起对洛林的进攻，这将是战争第一次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

要把德国战败的原因，按其重要性准确地列出先后次序，这样做虽然引人入胜，但却是难以办到的。问题之一是：要衡量军事上的败绩和国内的失败主义情绪孰重孰轻；或者说，德国军队的消耗和平民百姓在封锁中遭受的消耗几乎是一回事。要把国内战线和战争前线截然分开，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内悲惨状况的消息削弱了士兵们的战斗意志；而受人尊敬的军事领袖们的失败主义情绪，又打破了对德国国内社会革命的最后束缚。

另一个问题是要确定（如果有的话）究竟哪个战场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按时间顺序算，看来对“东线派”要有利一些。1918年9月，萨洛尼卡战线终于被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打开，50万大军总算是没有白白地部署在那里。保加利亚于9月30日停止抵抗。土耳其则因君士坦丁堡暴露在来自马其顿的攻击之下，加速了末日的到来。在巴勒斯坦，艾伦比在T. E. 劳伦斯非正规地领导下的阿拉伯人的协助下，于9月19日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由于进行了卓越的机动作战，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遂告陷落，土耳其因于10月30日投降。当奥军在特兰提诺和威尼斯平原败北后，原来尚能维持下去的摇摇欲坠的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了。奥地利在10月底请求停战，于11月4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促使德国投降的主要原因，不可能由于德国的盟国的垮台。德国的军事领袖们曾把兵力和希望集中于西线，而鲁登道夫未能在3月至7月间取得胜利，这才使希望成为泡影。德国失掉了盟友，无非证实了预料中必然的结局。实际上，奥地利（保加利亚更是如此）在1918年的夏季就已经认识到德国已无力再派遣预备队援助他们。这很可能是使他们放松自己的抵抗的部分原因。

回顾过去，很容易看出，两个势均力敌的联盟在1914年一旦交战后，其后果很可能是一场浪费惊人的消耗战。近代的军事史，著名的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日俄战争都表明，如果敌对双方都充满着爱国热

情，而且政府也愿大力动员全国资源的话，那种为期短暂的决定性的战役，则已成为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将大屠杀的全部恐怖都归罪于将领们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倾向，是错怪了他们。特别是，如果认为个别的人能够严格控制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想法更是大错特错了。无怪乎成百万的大军往往不是累垮了他们名义上的指挥官（如毛奇），便是使他们陷入行政事务之中不能自拔（海格便往往如此）。值得指出的是，1918年仍然留在统帅岗位上的将领们，终于显示了他们打运动战的才能，虽然只有艾伦比拥有真正适合进行机动作战的地形。

因此，对于某一战役或某个人的缺点提出批评固然是正当的，但必须要从当时实际可行的情况出发，而不能以理想的标准作为根据。同样，将领们战前所受的教育（指广义的）也必须加以考虑，因为每个社会终究只能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领袖。^[22]那些在战争中跃居最高统帅地位的军人，是他们这个职业中的佼佼者。其中很多人在1914年以前就已崭露头角，还有一些人将在1918年以后的文职生涯中居于显赫地位。

在战争结束时，防御的主导地位终于受到了新的机动手段的挑战，突出的有坦克、摩托车辆和飞机。战争中出现了彻底更新的机器，但是还没有掌握能充分发挥它们作用的技术。对于这种半截的战争“课”，反应是大不相同的。法国总参谋部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急躁病是愚蠢的，因此在20年代中又重新奉行固定的防御方针，集中体现为构筑了马其诺防线。英国在首先研制坦克并率先发展军事航空事业之后，在20年代中实际上又置这些成就于不顾，并且回到了那种外行人鄙视机械化的战前传统。德国由于是战败者，因而特别热衷于遵循由于坦克和飞机的出现所带来的新作战方式的军事逻辑。在30年代中期，它再次准备打一场运动战。

如果从世界政治的前因和后果来冷静地观察，这次大战虽然在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浪费是无与伦比的，但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可能对于德国是例外，因为它在中欧的工业中跃居主导的地位，只不过是时间推迟了而已。战祸的直接后果是，三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国，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从而一些新国家建立了，一些古老的国家复兴了。法国收回了1871年失去的省份，比利时恢复了独立。战前国际关

系中无政府状态的灾难性结果，导致了一个大胆的试验：建立国际联盟来捍卫国际和平与正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各交战国全都是失败者，因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如果不是造成）国际权力一方面从中欧转到了北美，另一方面又不那么明显地转到了苏俄。这场战争更直接地使欧洲的民族主义蔓延到更为广大的世界。日本在1905年已经尝到了民族主义胜利的甜头，它参战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它的自豪感和帝国的野心。在印度，由于对帝国事业做出自我牺牲而充分赢得的荣誉感，再加上由于成千上万的平民从军从而接触到西方的环境和思想，遂使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战后新阶段。在各个自治领中，也很明显地出现了类似的反应；这些自治领对于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各自治领的参战行动，使它们在和会上和在国际联盟中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代表。因此，英国已不能片面地要求它们采取它们不同意的政策——如加拿大1922年与土耳其发生查纳克危机时所表现的那样。总之，这次世界大战孕育了英联邦。

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为不妙的发展情况是：蓄意煽动民族仇恨，报界日益严重地将群众引入了歧途，以及把政府发动的宣传提高到成为重要的战争手段的地位。[\[23\]](#)

大概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协约国的宣传才对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奥匈帝国的平民忍饥挨饿，军人则衣衫褴褛、瘦弱不堪，这些都成为极好的宣传材料。用这个帝国中所有各民族的语言写成的传单，从飞机上纷纷撒向敌军的堑壕和远离战线的后方，传单上着重指出奥地利统治的暴虐并且利用了民族的敌对情绪。从逃兵人数不断地增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所收到的效果。而1918年4月在罗马举行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则受到了各协约国政府的热烈支持。

英国的宣传战是在诺思克利夫勋爵卓越的领导下进行的，而由新闻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予以有力的协助。在德国上空投下的传单中，提供了被德国新闻检查机构扣押的消息，说明了协约国军队进展情况的地图；着重地指出了每天都有大批美军到达法国；把战争的一切罪过归咎于普鲁士军国主义分子；寄公正的和平希望于一个民主的德国。到战争结束时，仅英国每天就向德军战线投下14万份传单。德国人是头一个使用对敌宣传的，但现在他们对于“从天而降的毒物”却不知所措。

从军心的突然涣散，罢工和示威的蔓延，以及出现像库尔曼1918年6月24日在国会发表“失败主义的”演说这样的政治危机等等，可以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协约国的宣传无论在瓦解德国的军队上，或在德国国内激起革命形势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无法掩盖时，受蒙蔽的人民大众感到震惊，精神上受到无法忍受的打击。

在一场无限制的战争中，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战来增强本国的士气，涣散敌人的军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真情、谎言和半真半假的话混杂在一起，这总要比物质耗损的危害要小。然而，这个武器有利亦有弊，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由于达成停战就能消除的。因此，举例说，1919年普遍出现的战争歇斯底里，排除了达成一项温和的、妥协的和平协议的任何可能性。而戈培尔之流，则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手段拿过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滥用，用以支持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推行的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主义政策。

“国内战线”这个新词，确切地说明了平民投入战争的规模。甚至在有着自由放任和反军国主义传统的英国，战争的需求也使生活中未受干扰的方面变得不多了。英国的夏季时间和限制售酒的时间，就属于战时遗留下的永久性的后果。在总的趋势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机器方面，政府的活动由于设立了新的部门而扩大，而且实施了一些在1914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控制措施。如果战争在1916年结束了，那么回复到类似战前的状况还有可能，但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欧洲社会却经历了一场无法逆转的变化。

（华庆昭 译）

[1] 坎尼（Cannae）：古罗马著名战场。公元前218年罗马和迦太基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军和罗马决战于此，击败罗马。——译者

[2] B. H. 李德尔·哈特为G. 里特所著《史里芬计划：对一种神话的批判》（伦敦，沃尔夫，1958年）——书写的前言。

[3] 在1914年11月，法国人防守的战线为430英里，英国人防守21英里，比利时人防守15英里。一年以后，英国人的防守线增为50英里左右（见C. R. M. F. 克拉特韦尔《1914—1918年世界大战史》（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34年），第109页注；我从该书和B. H. 利德尔·哈特《1914—1918年世界大战史》（伦敦，费伯，1934年）中获益匪浅）。

[4] T. 罗普：《现代世界的战争》（修订新版，纽约，科利尔书店，1962年），第246页。

[5] R. R詹姆斯：《加利波利》（伦敦，巴茨福德，1965年），第14页。下面几段，我主要依据这本令人赞许的书，虽然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结论。关于这次战役的战略意义，另见J. 诺恩《加利波利，消逝的幻象》（伦敦，费伯，1936年），特别是第83—100页。

[6] M. E. 霍华德编：《军人和政府》（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57年），第11—86页。

[7] R. D. 沙伦纳：《法国的全民武装的理论，1866—1939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83—136页。

[8] A. 马威克：《洪流：英国社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波德莱黑德，1965年），特别是第39—44、52、56—85、90—94、151—186、226—239页。

[9] 克鲁特威尔：《大战史》，第346—348页；A. J. 巴克：《被忽视了的战争：美索不达米亚，1914—1918年》（伦敦，费伯，1967年）。

[10] 关于“西线派”观点详见陆军元帅W. 罗伯逊爵士《军人与政治家，1914—1918年》（伦敦，卡斯尔，1926年），第1卷，第238—289页。

[11] R. 布莱克编：《道格拉斯·海格的私人书信集，1914—1919年》（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52年），第175页。关于伤亡统计问题，下文将加以论述。

[12] 俄国总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曾这样向沙皇表示过他的不满：“我的想法是，如果陛下命令我派15名伤兵去罗马尼亚，我绝不会派16名。”（引自克鲁特威尔《大战史》，第295页）

[13] 有关贝当的引文，见陆军少将C. E. 卡尔韦尔爵士编《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伦敦，卡塞尔，1927年），第1卷，第349页，第354—355页。福煦的挖苦话是B. H. 利德尔·哈特在《奥尔良人福煦》（彭吉恩编，1937年），第1卷，第253—254页中引文。罗伯逊劝海格要小心谨慎，是因劳合·乔治的不信任引起的，见J. 特兰《海格，一位有教养的军人》（伦敦，赫金森，1963年），第330页。

[14] 特兰：《海格》，第334页。另见S. W.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1917年的潜艇战和第三次伊普雷战役》，载于《皇家联合军种学院学报》（1959年11月），第440—442页。

[15] 特兰：《海格》，第342页。

[16] 布莱克：《道格拉斯·海格私人书信集》，第258页。当时法军的防线为350英里，英军为100英里。但法军防线大部分远在南端靠近瑞士边境，在整个大战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战斗。

[17] M. E. 霍华德引自《皇家联合军种学院学报》（1960年2月），第107—109页上发表的海格书信集中的一封信。另见B. H. 利德尔·哈特《帕琛达尔战役的基本事

实》（彭吉恩编，1937年），第1卷，第433—439页；并见布莱克《道格拉斯·海格私人书信集》，第255—260页。

[18] 见M. J. 威廉斯《百分之三十：伤亡统计数字之研究》及《英国官方历史对索姆河战役德军损失数字之处理》，载于《皇家联合兵种学院学报》（1964年2月），第51—55页，及同刊（1966年2月），第69—74页。威廉斯博士慷慨地提供了他对英、法、德三方材料所做的统计研究摘要，本节所引数字，均出自他的材料，但根据这些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则是笔者的。

[19] 但根据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的估计，英国死伤被俘人数至少为30万人。

[20] 罗普：《现代世界的战争》，第262页。

[21] 布莱克：《道格拉斯·海格私人书信集》，第291页。关于德国人准备工作的详情，见B. 皮特：《1918年：最后一幕》（柯基编，1965年）中第50—78页中的叙述。

[22] R. 威尔金森：《高级官员》（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特别是其中的第77—79、83—89页。关于德国的军事传统，见卡尔·德米特《德意志军官团》（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逊，1965年）。

[23] E. P. 钱伯斯：《战争背后的战争，1914—1918年》（伦敦，费伯，1939年），第494—537页。

第八章 凡尔赛的和平解决方案 (1918—1933年)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停火沿着西线实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次大战死了不下1000万人，4个大帝国垮了台，并使欧洲大陆陷于贫困之中。

迄今在大半个世界中一直未逢敌手的德国战败了，这在那天黎明时分载入了贡比涅停战协定之中。停战的苛刻条款，主要是由协约国最高统帅福熙元帅提出的，其苛刻程度介于英国陆军元帅海格和美国将军潘兴的意见之间；海格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继续抵抗的能力，因此主张条件要宽大些；而潘兴则主张拒绝停战，协约国应继续进军。这一点正符合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态度以及美国民众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事实上，停战一个月后，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第一个政府的首脑艾伯特在勃兰登堡门欢迎归国的德国部队时说：“任何敌人都不曾打败你们……你们保卫了祖国，使它免受敌人的侵略。”^[1]

从长远看，和停战条款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乃是左右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些先决条件。德国政府于1918年10月4日向威尔逊总统提出停战请求时，曾巧妙地提出建议说，和平谈判，而不仅是为停战进行的谈判，应以他的1918年1月8日演讲中提出的、在他以后的声明中又加以阐明的“十四点”作为基础。在协约国就停战条款问题于10月底在巴黎和凡尔赛进行预备性会谈时，欧洲国家的总理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奥兰多，以及意大利外长索尼诺，都持谨慎态度，不愿对含义颇不精确的“十四点”承担条约上的义务。劳合·乔治问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德国政府声明，我们不赞成以‘十四点’的和平为基础？”^[2]但是，威尔逊的心腹、先遣人员豪斯上校威吓说，如果拒绝接受“十四点”作为基础，美国将抛开他的盟友而单独与敌人缔结一个和约。到11月5日，美国政府在蓝辛照会中已向德国政府传达各协约国的声明说，“他们愿意根据总统1918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规定的和平条款以及其后发表的演说中所阐明的解决原则，与德国政

府媾和”^[3]，但要服从两个条件：第一，协约国保留就航海自由做出任意决定的全部权力（第二点）——这是劳合·乔治反对美国经常埋怨英国的封锁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第二，根据凡被侵占的领土必须“归还”的规定（第七、八、十一点），协约国“理解，德国将对其在陆、海、空侵略中对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4]——这个范围比当时估计约为240亿英镑的协约国全部直接战费这一可能的、但却无法实现的要求小得多。这就是把“十四点”应用于对德停战协定的所谓停战前协议；它不涉及早先签订的对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和对奥匈帝国的停战协定，但“十四点”同这些国家的领土颇有关联。

协约国没有把豪斯提出的美国对“十四点”的官方意见转达给德国政府；豪斯在10月29日的一次协约国最高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指出，威尔逊“坚持德国必须接受他的全部演说，而且，根据这些演说，任何人想在任何一点上反对德国，几乎都可以成立”。^[5]这种意见肯定使“十四点”变得更加可以灵活应用了。例如，“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达成之”一词（第一点），“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在微妙问题上进行秘密的外交谈判”^[6]——威尔逊曾向参议院阐明这一点。至于意大利的边界“沿着显然可以辨认的民族界限”加以调整的问题（第九点），现在提出“意大利对特兰提诺的要求应予满足，但德国人居住的北部应完全实行自治”。^[7]

美国的评论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开诚布公地而且绝对公平地调整所有各殖民地的要求”（第五点）；后来，威尔逊在和会的头几天中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发言说，“他认为，大家一致反对恢复德国的殖民地”^[8]。这个原则是英帝国所欢迎的，立即为最高委员会（1919年1月24日）所通过；随后，又就其实施，特别是就国际联盟委任统治这种新办法的方式和归属问题进行讨论（参见第九章），从而协约国就接管了德意志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疆界以外的领土。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在1918年12月初协约国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短暂的会议上，就已利用英国在土耳其战区的巨大优势兵力，从克列孟梭那里获得了口头同意，把1916年达成的关于处理土耳其帝国问题的赛克斯—皮特秘密协定做了对英国有利的修改，克列孟梭后来恪守了他的诺言。本来要实行国际共管的巴勒斯坦，现在却一变而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而盛产石油的摩苏尔则从法国的势力范围转为英国的势力范

围。这位英国首相，还从协约国那里得到他们的认可：经过战争考验的英国各自治领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和会。的确，劳合·乔治被迫同意卡斯尔雷100年前在同样情况下所不同意的东西，即，他同意对航海自由可以加以讨论；但是，当和会召开时，威尔逊却又用他“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9\]](#)的说法，以他要求一个没有中立国的国际联盟为借口，巧妙地回避了中立国权利这一棘手问题。因此，劳合·乔治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党魁选举”中，重新得到英国选民的委托。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他一开始就巧妙地为英国取得了一种强大的地位，并使英国逐步达到了它在海上和海外的主要目标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如摧毁德国的舰队和铲除德国的殖民地，确立封锁原则，英国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中东地区据有经济和战略上的地位，以及它的帝国体制上的演变。

如果说，英国开始时的地位要比大陆上精疲力竭的盟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位强大的话，那么，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地位，又要比英国强大。实际上，美国的地位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美国与欧洲的盟国不同，经过这场战争，它变得不是比较贫穷，而是更为富裕。其他国家不仅由于感谢它的宝贵援助而要领它的情，而且，在硬通货上，对它负债累累，约达20亿英镑。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参战了，但是，许多美国人往往认为他们是不偏不倚，超然于旧日欧洲的贪得无厌的纷争之外。这种态度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共和党参议员博拉所主张的孤立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主党领袖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他的那个要建立一个具有比较良好秩序的国际社会的抱负，给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世界带来一片希望。看来，哲学大师们旧日的理想现在终于由这位学者总统重新提出，而这位总统有力量、有决心领导人类走向一个更加丰硕的未来。美国看来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最富有的国家，所以，甚至连那位玩世不恭的老虎总理克利孟梭都相信，或起码自称他相信美国“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伦理时代”[\[10\]](#)。

国际关系现在令人兴奋地向前飞跃发展，进入国际联盟的时代。这主要是（虽然并不完全是）在威尔逊的影响下实现的，因此，1918年12月13日他莅临欧洲时，就成了希望的中心；他是由国家元首来充当巴黎和会的唯一代表，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明智的。这次和会的预备会议，于一个月以后开始；全体会议在1919年1月18日正式开幕。

来自五大洲的25个协约国和参战国的代表，出席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威尔逊语）的开幕典礼。

由于战争结束得太突然，非始料所及，因此，和会迟迟开幕，不能认为是过分拖延；但是，和会一旦开始，特别是由各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英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每国两名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开始工作，却仍然迟迟不能抓住主要问题。不仅谈判代表们不愿过早地摊牌，而且，这些代表们发现，他们非但不能集中精力于主要问题，反而成了一个听从当前事件摆布的“国际内阁”（劳合·乔治语）。从一开始，俄国革命的巨大阴影就隐隐地笼罩着和会，正像和会的第一个星期内那个流产的普林基波提案^[11]表明的那样。在柏林，社会党政府用军国主义的自由军团来对付斯巴达克同盟的极端分子，才在实际上将其粉碎；列宁的俄国渴望在德国实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野心开始落空。这一严重失败又以不久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出现的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而更甚。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目前罢工的浪潮进一步令人丧失信心，并使已经被削弱的欧洲经济，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的经济更加混乱。在法国，由于它的北部煤田被德国人恣意破坏，因此，1919年的煤炭产量估计只达1913年的40%左右。更有甚者，全世界时疫流行，死于病毒性流感的人数，大约为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两倍。

多灾多难的欧洲不仅缺乏煤炭和其他原料，而且也缺乏粮食。由有权势的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时，他成为十人会议于1919年2月8日明智地设立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协调下列机构的工作：为时不久的供应和救济最高委员会、协约国封锁委员会和协约国海上运输委员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配合军事方面的最高作战委员会。十人会议本身此时正集中精力处理有关续订对德停战协定和放宽封锁（这是它曾经特别坚持的）方面某些军事和经济上的具体执行问题。为期36天的贡比涅停战协定终于在1919年2月16日在特里尔续订；这个协定曾在1918年12月13日，其后，又在1919年1月16日临时续订，当时规定：“为了保证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能够获得供应”^[12]，德国商船队在停战期间应置于协约国控制之下，但不影响其最后的处理；而且，使用这些船只，保证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是协约国认为应提出的额外要求之一。这些“使停战恶化的做法”（威尔逊语），当然招致了

某些道义上的批评，但是，有鉴于德国采用潜艇战所造成的船舶吨位普遍短缺的情况，因此，对德国商船队提出的这种要求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有助于放宽封锁，以便执行原来停战协定中所做的声明。声明说，协约国“认为在停战期间为德国提供粮食将是必要的”。^[13]德国嗷嗷待哺的饥民的情况，不如中欧某些国家那么严重，但是，1月17日协约国声称，如果德国立即交出商船队，它们将愿意让德国第一批先进口27万吨粮食。然而，德国政府现在却拒绝这样做，除非它首先得到协约国关于具体交货条件的保证。随后，就交付条件与支付方法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法国当局仍然一心想要让德国对它所造成的破坏付出赔偿，因此，它不愿意让德国以黄金支付；但是，在3月8日的十人会议的一次会议上，由于劳合·乔治的有力干涉而被压服。6天以后，在关于向德国提供粮食的布鲁塞尔协定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后，对德国的粮食封锁得到放宽，一直到1919年7月12日德国批准和约后才告解除。

3月14日，在签订布鲁塞尔协定的同一天，威尔逊在离开一个月后又回到了巴黎。因为在国际联盟盟约草案一经完成并于2月14日提交和会全会后，他就立即前往华盛顿，在国会休会前，听取以共和党为多数党的参议院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威尔逊把全部精力放在国际联盟上这一点，再加上执行中各行其是，并不是造成迟迟不能完成缔结对德和约这个主要任务的唯一的，或许甚至是主要的心理因素。在包括英美代表团中那些年轻有为的专家在内的许多人看来，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严厉地和德国算账，而在于以慈悲为怀来缔造像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这样一些新的民族，以实现协约国战时的宣传；这种宣传把这些民族的解放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热烈追求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作战目的。十人会议的时间，大部分花费在听取中欧和近东的代表所做的令人厌倦的陈述上面。而直到3月17日，威尔逊还“坚持同时对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媾和”^[14]。这种不切实际的态度受到意大利的支持，而意大利实际是从要让奥匈帝国解体这个私利出发的。这一点，在2月初和会组成领土委员会时，就部分地反映出来。这些委员会，分别负责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波兰问题、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问题、比利时和丹麦问题，就是没有成立专门负责德国问题或奥地利问题的委员会。虽然，在这个月底，又成立了起协调作用的领土问题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考

虑敌国代表权问题的各个委员会，但是，这个缺点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补救。

在组织上做出有效的改进，是在3月的最后一周，十人会议紧缩为比较秘密的、非正式的四人会议，很像100年前在维也纳会议上八人委员会实际上由五人委员会所代替那样。3月25日，劳合·乔治在他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首先提出了有关媾和的关键问题的综述意见。他们4个人终于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克列孟梭年事已高，戴着一副小山羊皮手套；威尔逊“相信人类，但……对任何人也不信任”^[15]；劳合·乔治“唇枪舌剑”^[16]，而奥兰多，唯独他不会说英语。在四人会议之下，成立了一个外长会议或称之为五人会议；的确，威尔逊和克列孟梭比劳合·乔治更为严格地把各自的外长蓝辛和毕勋当作下属对待。

和会现在由于法国提出对莱茵兰地区的主权要求而遇到了难题；自从一千多年以前查理曼帝国崩溃后、中世纪的罗塔尔王国形成以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就一直为这个地区发生纷争。法国在1917年就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要求，主要有两点：第一，“阿尔萨斯和洛林必须归还我们，但归还时不应像根据1815年条约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应按照1790年以前的边界归还。这样，我们就将在地理上以及在矿藏上拥有萨尔盆地”^[17]。第二，法国政府“希望看到莱茵河以西的领土和德意志帝国分开，并成立一个类似缓冲国的国家”^[18]，以防备他们人口众多的德国邻居，这个邻居在克列孟梭的一生中，就曾两次入侵法国。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反对这种要求，因为他们颇有理由地担心这过去德国因兼并阿尔萨斯—洛林而触怒法国的往事，反过来由法国重演。经过全力的谈判，终于在4月中旬找到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决定萨尔峡谷的领土应稍加扩大，并由国际联盟特别管理15年，然后，它的主权归属应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萨尔盆地的矿藏则给予法国，作为对其遭到破坏的煤矿的补偿。使彭加勒总统和福煦元帅大为失望的是，克列孟梭勉强地放弃了关于缓冲领土的要求，换得三项安全保障：第一，英国和美国应在军事上做出保证，在德国一旦进行无端的侵略时，要立即援助法国；第二，莱茵河的西岸以及东岸50公里的地带，划为非军事区；第三，莱茵河西岸和三个地区的桥头堡应由协约国占领，15年内，每隔5年，应从其中的一个桥头堡撤出；或者，如果德国在15年期限结束以前完全履行其义务，则可提前撤出。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特别对协约国占领一项表示怀疑，不过，威尔逊终于在4月15日表示同意。同一天，克列孟梭当着他的朋友豪斯的面，对其秘书指示说，法国报纸必须停止对这位面皮薄的总统进行冷嘲热讽的攻击。这些攻击立即终止了。人们普遍认为，这不大可能是偶合，而且认为威尔逊已经屈从于一场令人失望的交易。在此期间，劳合·乔治暂时离法回到伦敦；他回来后，发现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在占领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此不大高兴；但是到4月22日，他也表示同意了。

德国政府在4月18日就已接到邀请，要它派遣全权代表前往凡尔赛。而且，和约草案于5月7日就在凡尔赛送交了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最初，一般主张是协约国应举行某种“预备性和会”，作为和会全体会议的序幕，全会可包括敌国代表在内。然而，现在在程序上，甚至比通常的情况还要模糊不清。例如，贝尔福在2月间曾谈到“最后的军事提案”，最初提出这个提案是与续订停战协定有关，作为促进“初步和约的一个重要步骤”^[19]。大约一个月以后，在讨论波兰领土委员会提交的第一个报告时，劳合·乔治问道：“委员会是否提议仅仅根据片面的证据来最后确定德国的疆界。还没有听取另一方的意见。这不仅是一个对待德国是否公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欧洲建立持久和平的问题。”^[20]但是，在条约起草以前听取德国人意见的主张未受到重视，因此在5月7日终于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形势不妙。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与在他以前发言的克列孟梭不同，他是坐着发言的，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那种仇恨势力，而且，我们也听到了那种感情冲动的要求：胜利者应当要求我们作为战败者付出赔偿，作为犯罪者受到惩罚。人们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战争的唯一祸首；我本人要是这样承认，那就是撒谎。”^[21]

克列孟梭在其先前的一次发言中，给德国全权代表15天的时间，后来又延长一周，就草案条款提出书面意见。其后，德国的备忘录便接连不断地涌来。这些备忘录往往措辞巧妙，有时听来也振振有词，其中主要的论点是：“这个条约的条款之苛刻，是德国人民所无法忍受的”^[22]，而且在许多方面，这些条款是与明文规定的“十四点”相矛盾的。这种反唇相讥，使英国代表大为震惊。英国的代表本来倾向于和他们的协约国同事们一起逐条逐段地订立条约，而没有经常考虑各个条款加在一起的沉重分量（豪斯评论说，“他们在画这幅画

时，不是用粗线条勾画，而是像做蚀刻画似的精雕细刻”。[\[23\]](#)）。再者，“十四点”有时也被人们忽视，因为威尔逊并没有紧接着为它做出具体的计划，却把他的满腔热情转向了国际联盟；因此，也就放松了豪斯在停战时所掌握的美国外交上的主动。但是，现在很明显，德国能够在某些问题上“把事情弄得很棘手”，正像贝尔福在6月1日至2日的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英帝国内阁讨论德国意见时所说的。一方面，在公正地处理德国问题上抱有真诚和崇高的意愿，同时，又恐怕一旦德国拒绝这些条件，就会重新出现敌对行动；由于这两种心情，英帝国内阁遂一致同意指示英国首相要施加巨大压力以保证对德国做出重大让步。不仅克列孟梭，而且威尔逊也反对做出这些让步。威尔逊埋怨说，英国人现在害怕“他们在起草条约时所坚持的那些东西了；这使我感到非常厌恶……他们在惊慌失措这一点上真可谓是完全一样的。这使我感到非常厌倦”[\[24\]](#)。

可是，劳合·乔治有时超过了威尔逊，这次他获得了重大的修正条款。早在3月间，他就已经对波兰委员会关于领土问题的建议做了修订；根据威尔逊的种族自决原则，这些建议对于德国是过分苛刻了；现在，他又提出这种指责。除了对波兰的疆界进一步做有利于德国的修改外，他还克服了威尔逊的反对，把自决原则应用于上西里西亚，并且坚持在那里举行公民投票，而不是把它直接割让给波兰，以此来迎合德国的主要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满意意见。但是，劳合·乔治终于未能使克列孟梭反对减少协约国占领莱茵兰15年的期限这一态度有所改变。而且，他的争取德国早日参加国际联盟的开明主张，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德国曾经提出，如果能让它早日进入国际联盟，它愿将它获准保存的那部分海军交出。人民的愤慨情绪，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使得这些主张民主的和平缔造者们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和平缔造者们，和他们的前辈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情况不同，是在舆论和议会的强大而直接的压力下从事工作的。赔偿问题也是这样；劳合·乔治奉内阁指示，这个问题“要按照德国人对协约国的赔偿额应确定一个明确的数字这一方针”[\[25\]](#)进行修改，以代替由负责监督德国财政义务执行情况的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1日前将德国应承担的赔偿总额通知德国的规定。

正如美国代表团极力主张的那样，在其他事情都相同的情况下，把赔偿总数写进条约显然是有益的；但是，在以后发生的事态中，实

行起来却严重地受到阻碍，因为除了确定赔款额耗费时日外，要付出一笔巨大的赔款，更不可避免地要拖延时间。但是，其他的事情并不相同。劳合·乔治很清楚，德国的偿付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它要偿付，主要靠出口，这就非常可能损害它的工业上的竞争者英国的贸易；而英国由于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作为它19世纪霸权基础的国外市场。然而，这位英国首相是有义务要实践他在竞选中做出的保证的，就是德国“必须拿出最后一文钱来赔偿”，他不想让他的保守党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把他甩掉”^[26]。但是，政治是先于经济的，所以，劳合·乔治在四人会议中声称，“如果现在就提出数字，这些数字只会使德国人感到惊骇，而不会使他们放心。任何数字要使德国人不会感到惊骇，只能比他和克列孟梭先生在目前舆论下向本国人民所能交代的那个数字要小”^[27]。他现在希望，时间将会有利于减轻赔偿。

根据蓝辛照会提出的条件，英国在赔偿中所获得的份额，除船舶外，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主要由于英国提出争议，特别是南非的品德高尚的史末资将军的1919年3月31日备忘录，才在对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补偿这一项目中把服役年金和补助包括进去。在损害协约国声誉这种值得怀疑的理由的幌子下，德国的负担就从约20亿—30亿英镑（这是英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估计德国能够而且应当赔偿的数字）上升到60亿英镑这个高不可攀的数字，比原来至少增加1倍。德国代表团曾经在其意见书中提到50亿英镑这个看来颇令人注目的数字作为可能的最高数额，但是，要以保留殖民地和国外资产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条件为前提，并且受种种技术方面的限制，以致实际将要偿付的数额会大大减少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狡猾的因而也是不能接受的建议。于是，仍旧保持了在1921年5月1日前确定德国赔偿数额的规定，虽然劳合·乔治在6月10日得到了各国的同意，确定德国可以在条约签字后4个月内将其选择的任何偿付方式，即或以一笔总金额，或以劳役和物资，或“任何实际可行的计划”等建议提交协约国^[28]。德国并没有利用这个让步。

协约国6月16日提出的对于德国意见书所作的长篇而且措辞强硬的答复，尽管主要是驳斥这些意见，但是，同时也证明了不仅在赔偿和上西里西亚问题上，而且在诸如波美拉尼亚的边界、购买西里西亚煤炭、德国裁军比率这些对德国的微小让步上，以及例如国际管制德国

的主要航道这些具有和约特色的问题上，英国都在采取主动行动。协约国的这个照会给德国5天时间（后来延长到7天）来表明它愿意接受经过修改了的和约，逾期停战即告失效，协约国即将“采取它们认为有助于强制执行和约条款的步骤”^[29]。这些步骤将首先是协约国的39个师“分两步进军”，从莱茵河向威悉河，然后沿美因河流域而上，目的是切断德国的南部和北部。福煦受权在1919年6月23日下午7时“停战终止时，立即开始前进”^[30]。与此同时，德国激烈地反对这些条款，内阁出现危机，鲍尔代替谢德曼出任总理；谢德曼曾经声称，谁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谁就没有好下场。6月22日，最高委员会拒绝了德国新政府提出的建议，即在有关德国的战争罪行和交出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德国人这些特定条款（二百二十七——二百三十一条）上持保留态度的条件下签字。这就使德国的这个新政府大为震惊。6月23日晨，由于被拘留在斯卡帕弗洛的德国舰队两天前逃跑了，最高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因此，便拒绝了德国提出的把期限再延长48小时的要求。最高委员会因为还没有接到德国的答复，便在当天下午5时重新开会。会议在贝尔福发言的过程中结束了，干练的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记录的会议情况如下：“至于对德国人施加压力……（这时，杜塔斯塔先生进入会议室，后面跟着亨利上校和波蒂埃上尉；杜塔斯塔手里拿着德国代表团的照会，表示愿意代表德意志共和国被迫在一个不光彩的和约上签字……于是下令鸣炮。没有再进一步进行讨论）”。^[31]

1919年6月28日下午3时12分，德国全权代表在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里，在那个共有440条款，标志着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的卷帙浩繁的和约上签了字。不到50年前，这个帝国就是在这同一大厅中，在胜利声中宣告成立的。签字这一天，距在萨拉热窝发生行刺事件的那一天整整过了5年，一天也不差。

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的西部，把欧本和马尔梅迪这些小县割让给比利时，但附有须经人民协商这一条件，并把1870年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而且，还接受了有关萨尔和莱茵兰的规定。在南部，德国“承认并将严格地尊重奥地利的独立”（第八十条）；原来与奥匈帝国接壤的疆界，除上西里西亚的一小块楔形地带割让给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仍然保持不变。在东部，德国承认和重建后的波兰保持一条大体上以民族来划分的疆界，按照18世纪的样子，把

波森和西普鲁士连同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给予波兰，以此来实现“十四点”中所规定的：波兰“应保证拥有一条自由并安全的出海通道”（第十三点）。在这一方面，德国的但泽港作为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一个自由市，成了波兰的出海口，但没有像萨尔那样规定以后要进行修改。在东普鲁士的另一边，德国失去了梅梅尔，它最后归属于立陶宛。还规定举行公民投票来确定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尔两县的归属问题。这一规定像关于但泽的规定一样，主要是在英国的要求下用来代替原来提出的将该地让与波兰的主张。在协约国主持下进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证明英国的主张是对的。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尔以1920年7月公民投票时压倒多数的票，几乎全部归于德国，而1921年3月在西里西亚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德国获得约60%的票数，而波兰只有40%。由此造成的分割上西里西亚的局面，激起波兰人在科尔凡蒂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而且，也挑起了英法之间的尖锐不和。后来，国际联盟于1921年10月做出裁决，把这块领土分开，把面积较小但在经济上富庶得多的那一部分归于波兰。这个困难的裁决，使得双方都不满意，但是，把德国东部疆界按照民族居住界线全部确定下来，是非常复杂的事情；然而，终于取得了一个大体上是公正的妥协办法。尽管如此，这个妥协办法并没有能够使德国消除由于那条让可恨的波兰人获益颇多的疆界而产生的消除特殊愤懑之情绪。在西里西亚遇到的困难，并没有在石勒苏益格发生，因为条约已经为这个边界地区具体地规定了要在两个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它的北部归于丹麦，南部归于德国。总之，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内，德国失去了它的领土的13.5%和与此比率大体相等的经济生产力以及它的人口的10%强，即700万人左右。它还失去了它的全部殖民地——这是非常苛刻的——和全部总装载量在1600吨以上的商船，以及半数的总装载量在1000吨到1600吨的商船。

凡尔赛条约还进一步规定德国裁军。征兵制在德国被废除了。这主要是劳合·乔治不同意福煦的意见而提出的，福煦看出废除征兵制而建立职业军队的危险性，结果，德国的军队就被限制在仅仅10万人。这支小小的军队不得配备重炮和坦克。德国的海军减少到很小的规模，没有潜艇，而且德国不得拥有空军（但是，威尔逊反对和会航空委员会中的多数意见，坚持要准许德国拥有民用航空事业）。裁军要由协约国之间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前德国皇帝被控“犯有违反国际道德的最严重罪行”（第二百二十七条），但是，荷兰人却

坚决拒绝把他从中立国的避难地交出。和约第二百二十八条要求德国政府必须把所有被控犯有玷污德国的战争行为暴行的人，交由协约国军事法庭审讯。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极力规避这个责任，最后有12名被告在莱比锡由德国最高法庭审讯。他们在这个法庭上不是被宣判无罪，就是量刑很轻，因此，1922年1月，协约国的司法调查委员会提出，其余的被告应交由协约国进行审讯。但是，他们后来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了。

引起德国人最强烈不满的另一个条款就是所谓的“战争罪行条款”。这一条款写道：“协约国和参战国政府认定而德国也承担，由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侵略而把战争强加于协约国和参战国政府及其国民的身上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与破坏的责任。”（第二百三十一条）协约国自然认为这是确认真实的情况；但是，这个条款的目的是要在根据蓝辛照会的方针对德国的财政负担加以限制以前，先确定它在财政上应承担的责任的范围。这个条款主要是由美国的年轻专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的，其目的是要在蓝辛照会中所体现的美国观点和不得不承认蓝辛照会中各种限制的法、英观点之间达成妥协。针对这个条款，德国滔滔不绝地宣传道义上的战争罪行，而这一条款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却没有引起相应的不平叫嚣。这一条款所提出的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解决办法，已如上述。其中还包括短期的规定，即在1921年5月1日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以前，德国应拿出相当于10亿英镑的赔款，但是，从中要减去协约国军队的占领费用，而且，经过协约国的同意，还要减去他们认为“德国为了应付赔偿义务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供应的费用（第二百三十五条）。

这就是凡尔赛条约主要的、但远不是全部的条款。这些条款给新成立的民主的魏玛共和政权造成沉重的负担，而这个共和政权在其成立之初，由于威尔逊在停战之前反对和“专横的国家”的代表打交道，曾经受到鼓舞。但是，正如威尔逊所说，“问题在于，公理本身完全不在德国一边”^[32]。这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中心结论，除了这个中心结论外，还有战败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他们发动了一个颇有成效的反对这个条约的宣传运动，竭力宣扬条约和“十四点”不一致之处，不管是真的还是所谓的不一致。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不去注意德国的武器曾经极力想要攫取的那些贪婪和复仇的战争目的。协约国在缔造和平时，他们善良意图的表现，首先在于在他

们真心诚意地采取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根据这个高标准所进行的指责宣传，的确使他们感到惭愧。一个条约，其意图是那样理想主义的，其条件却如此的苛刻，确是罕见。这种二重性使有先见之明的法国评论家班维尔在批评这个条约时说：这个条约“就其严厉来说是太宽大了”^[33]。协约国在强制媾和时所表现的伪善受到了指责，现在，遭受指责的缺点更多了。这首先是由于失策，和这个敌人缔结了一个条件模棱两可的停战协定；接着，实际上允许这个敌人以书面而不是在口头谈判中陈述意见；之后，又把协约国对那些条件的解释强加在它的身上。

然而，只有凡尔赛的解决方案进而把对奥和约（1919年9月10日，圣日尔曼昂莱）、对保和约（1919年11月27日，纳伊）和对匈和约（1920年6月4日，特里亚农）也包括在内，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才能为人们所意识到。对匈和约的拖延，首先是由于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统治下陷入了共产主义中去（1919年3月21日到8月1日），其后，又由于相继发生的罗马尼亚占领布达佩斯的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代表团长会议发出告诫。这些“四人会议的合法继承者”（英国代表贝尔福语），在和会的后半段时间里，即从凡尔赛和约签字到1920年1月10日条约生效，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他们主要完成了贝尔福所谓的“清算奥地利帝国的大量工作”^[34]。

结果，欧洲地图和原来相比，完全变了样。奥匈帝国被6个“继承国”瓜分了。奥地利的由日尔曼人构成的其余部分，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和经济上岌岌可危的国家，居民不到650万人，其中近1/3的人集中在维也纳。奥地利的南蒂罗尔割给了意大利，但经过公民投票，仍保有克拉根福，并且取得了布尔根兰，然而，匈牙利却从那里夺回了肖普朗。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匈牙利将几乎失掉一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连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道，与塞尔维亚以及后来与门的内哥罗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在北部，匈牙利把斯洛伐克（包括马扎尔少数民族地区）让给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在东部，把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另外一部分没有理由拒绝的马扎尔民族地区）让给了罗马尼亚（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已经做出特殊安排，以便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参见第九章）。罗马尼亚由于得到了巴纳特、布科维纳和从俄国那里得来不易的比萨拉比亚，又进一步扩大。这种扩张主要可以以民族问题为理由

加以解释；但是，这种理由却很难应用于罗马尼亚在牺牲保加利亚的利益下保持多布罗加这一情况。保加利亚还把它通向爱琴海的出海口色雷斯割让给希腊。如果说，罗马尼亚根据凡尔赛和约得到许多好处，那么，波兰也是如此。波兰在经受一个多世纪的压迫后，重新在地图上出现。波兰在西部已经从德国得到领土，现在，它于1920年夏挫败了苏维埃势力向华沙的推进后，出于胸中郁积的爱国主义，又把它的东部疆界向前推进，越过寇松线，囊括了东加里西亚及其邻近的领土。这是俄国对西方输出革命的计划的又一次严重失败。第二年秋天，泽里戈夫斯基将军发动突然袭击，从立陶宛人那里攫取了维尔那，把波兰制造的另一个既成事实提到了各大协约国的面前；各大协约国终于在1923年3月对波兰这两次夺地行为表示认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切申问题上的争执，这时已经由协约国于1920年7月28日裁决，把这个小小的公国瓜分而暂时得到解决，从而又在捷克、斯洛伐克、日尔曼、匈牙利和加里西亚乌克兰人这些民族集团外，增加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波兰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加在一起，就使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不祥的缩影。

最简略地说，这就是中欧的巴尔干化，那些和平缔造者们后来曾为此而受到指责，尽管这种指责不尽公平。因为，这种解决办法虽然有缺点，但它毕竟解开了大体上根据民族自决这个新鲜概念而出现的种种针锋相对的要求和考虑所造成的难分难解的纠结。这一原则不像当时人们往往认为的那样，是个一成不变的万灵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例如被挑选出来实行民族自决的这些单位的大小和对它们的抉择。然而，一般来说，这种解决办法的得力之处，由于这些新疆界网大体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得到证明；而且，这些疆界后来发生变动的地方，也未见得就更好。不仅如此，在凡尔赛和约起草的时候，这种新的民族自决的主要特征已经出现，因为在1918年至1919年间，在整个奥匈帝国都能看到起分裂作用的争取民族自决和自由的起义获得成功；而这种起义在70年前曾经被镇压下去。因此，如果说协约国各大国对此应负责的话，可以说责任不在于他们缔造了和平，而在于他们战时所做的宣传非常成功地鼓吹了帝国的解体。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们，也不像有时人们以为的那样，对于更广泛的经济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例如，1919年8月26日，他们就讨论过一项关于“从但泽至西西里的关税同盟”的建议。但是，贝尔福说：“在半个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关税制度的建议，使他感到担心。”^[35]欧洲

协约国提出要研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上对美国所处的地位，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所处的地位，而且，它们还要吸取最高经济委员会的经验来成立未来的经济合作机构。欧洲协约国所采取的这些主动行动，都由于美国的态度而受到挫折。

然而，这个解决办法的确有其固有的弱点，特别是在合理应用自决权方面存在的主要缺点。因为，这一理论在损害德国的情况下应用于波兰和其他地方，却不允许德国在苏台德和奥地利从自决中得到好处。在那里，于1918年11月12日特地成立了德奥共和国作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把苏台德也包括在内。凡尔赛条约第八十条和在圣日尔曼签订的对奥和约的条款相吻合，并没有制止魏玛新宪法的制定者们在制定宪法时规定奥地利在“和德意志帝国合并（第六十一条）前列席德国议会。1919年9月22日协约国相应地强迫德国签署一项声明，宣布新宪法中凡与凡尔赛条约相矛盾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协约国要准许德国的领土和权力再行增大，本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实际上，德国感到不公平，而这种不平之感恰可诉之于胜利者自己制定的自决原则：这是协约国立场中的一个道义上的弱点，它在20年中一直存在着。

劳合·乔治在其枫丹白露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德国人民已经无疑地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力量的种族之一，但他们竟然被许多小国所包围，而这些小国中，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为自己组织过一个稳固的政府，他们每个国家却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这些人吵闹着要和自己的祖国合并。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能成为将来产生战争的根由了。”^[36]然而，这种情况恰恰就是劳合·乔治及其同事们发现是无法避免的。史末资早在1918年就曾写道：“欧洲正在受到清算，国际联盟必然是这笔大产业的继承人。”^[37]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和实验性的权力机构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遗产。

旧有的均势已被打破。到1919年秋天，欧洲协调已经缩小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西方联盟。这时，人们正在巴黎试图促进比利时和荷兰防务的协调，以便对付德国一旦重新发动任何侵略，从而加强这一联盟。这一当务之急，已经成为委员会修改1839年的各项条约的思想基础。这些条约由于德国在1914年侵略比利时已被撕毁，成为一团“废纸”。在和约签字后的两个月内，英国的一位军事代表通知该委员会

的各成员们说，在他看来，比利时重新遭到被侵略的危险，“主要是在将来德国能够重新武装并且或许能够和俄国结成联盟的时候，因为这样就将产生一个与国际联盟相抗衡的对手。但是，这个危险在二三十年内不可能出现……法国的边界沿着莱茵河向北推移这一事实，使得德国愈来愈有必要在林堡发起攻击。因此，德国就会愈来愈趋向于迫使荷兰作战”^[38]。但是，固执的荷兰人不仅对于比利时在斯凯尔特河自由航行问题上的意图，甚至对它在林堡和荷属佛兰德领土问题上的意图也疑虑重重。四人会议拒绝了比利时要求得到荷兰的这些小块领土和将普鲁士属格尔兰德或东弗里斯兰的德国领土赔偿给它的计划。全面修改1839年的条约，也成为毫无意义的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不愿保障比利时，除非比利时重新保持它那无用的中立。

至于东线，协约国仓促地进行复员，剩下的兵力仅够把冯·德尔·戈尔茨将军统率下的那些残忍的德国强盗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新成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中赶出去；而冯·德尔·戈尔茨将军甚至在和约签字后还想在这些国家中强行建立日尔曼人的统治，从而可以重新向东方推进。巴黎的最高委员会对于它本身是否有力量在必要时对即便是像匈牙利或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实行强制，表示怀疑。贝尔福在1919年7月26日发表意见说：“8个月前作为世界的征服者的那些国家，目前却不能够把它们意志强加于一个只有12万兵力的军队了。”^[39]在欧洲的征服者中，英国一心想要减少它对欧洲大陆所承担的义务，法国已经感到厌倦，意大利则由于在和会中受到冷遇而心怀怨恨。

如果意大利的盟国对于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军事表现不满，那么，意大利对它的盟国背着它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做法，当然也会感到不满。而且在媾和时，它发现它还比不上它的亚得里亚海的对手、主要由它的宿敌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南斯拉夫能够得到这些盟国的欢心，这又进一步使它感到愤慨。但是，意大利和它的朋友们所以疏远，是由于它“利令智昏”（劳合·乔治语），它不仅根据伦敦秘密条约，坚持它那贪得无厌的要求，而且，还吵闹着要求得到阜姆，可是，伦敦密约已把阜姆划归克罗地亚。对阜姆问题，不仅意大利，而且，另一方面还有威尔逊，都赋予它以比其本身更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意大利的诗人邓南遮于1919年9月12日在一次擅自发动的袭击中占领了阜姆；而威尔逊则拒绝把阜姆

给予意大利，而且和索尼诺一样的固执。他于1919年4月23日发表了一个颇不得体的声明，激怒了意大利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便暂时退出了和会。劳合·乔治警告威尔逊说，“日益感到欧洲正受到美国的欺侮”^[40]。经过一番骚乱后，这个问题最后交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直接解决，而且，一直拖延到1924年阜姆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被意大利取得时为止。在此以前，意大利虽放弃了它根据伦敦条约对达尔马提亚的比较广泛的要求，但已经得到了扎拉和拉戈斯塔。意大利由于把精力集中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因而它在非洲等其他地区的活动（如果说不是欲望的话）减少了。它对非洲的兴趣，意在阿比西尼亚，这表现为它对英法所属的索马里兰和对吉布提一亚的斯亚贝巴铁路中的法国股份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意大利又于1919年5月提出要对西非的前德国殖民地多哥进行托管，作为交换。这种要求也是英法所不乐意的。于是，英法两国最后将多哥和喀麦隆分而治之，进行托管。英国于1924年把东非的朱巴让与意大利，法国在利比亚边界也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意大利不管满意或不满意，也只好如此罢了。

意大利首相于1919年5月25日曾写信给英国人说：

我不能不对欧洲大陆的前途表示严重的忧虑；德国一心要复仇，这一点必须要和俄国的立场一并加以考虑。因此，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所要达到的解决办法，欧洲大陆的过半数的居民将不会对它表示赞同。如果我们要把4000万意大利人排斥在欧洲的新体制不得不赖以支持的那个集体之外，并把他们推到不满者的行列中去，那么，难道你认为这种新秩序会建筑在一个牢靠的基础上吗？^[41]

俄国的力量这时已退到东方，美国的力量现在也行将从西方撤退，所以，尽管还剩下国际联盟，但在整个20年代里制定的欧洲政策，除个别例外，都趋向于紧缩范围。威尔逊回到美国后，于1919年9月末突然瘫痪，从此一病不起，苟延残喘而已，后来的事件很快证明威尔逊在党派之争中犯了错误。他不该在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得罪了共和党，而且也不该不听劝告，把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之一排斥在美国和谈委员会之外。凡尔赛条约在一些人中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中应像英国在19世纪那样，采取光荣的孤立。1920年3月19日，这个条约终于未能按照宪法要求那样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总统的政策就这样遭到否决，而这位总统在他们前往参加和会的航行中，还曾经向他的幕僚们保证说，“我们行将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

物，并不代表他们的本国人民”^[42]。美国曾经强制它的欧洲盟国按照美国的方案进行媾和，可是，现在却抛弃了他们。

和这个条约同时被否决的还有美国签订的从军事上保证法国安全的条约。根据商定的条款，这又使英国解脱了它所承担的义务。于是，法国发现它已失去了由于它放弃对莱茵兰的要求而对它提供的主要的安全保证之一。到1921年年底以前，英法在挽救这一局面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令人抱有希望的尝试。而且，即使在这个时候，谈判仍在有气无力地进行着，最后渐告停顿。英国所做的种种尝试中，还包括想在谈判中涉及一些次要问题。法国则坚决认为，1919年最初提出的保证，由于它没有把德国在东欧的“间接侵略”包括在内，因而是片面的和不足的。在法国看来，这个保证是带有侮辱性的。正如法国大使1921年12月间对寇松勋爵（他是温文尔雅的贝尔福的继任者，为人言谈犀利）所说的：“这不会使我们防止一场波兰的萨多瓦战役^[43]；对德国来说，这倒是为它获得一次新的色当大捷做了最好的准备。”^[44]如果说波兰是“凡尔赛条约的关键”（丘吉尔语），贝尔福则早已做出预言说，一旦波兰重新建立，“法国在下次战争中就将听凭德国的摆布。因为俄国要援救法国，就不能不破坏波兰的中立”^[45]。但是，这个问题就像寇松现在拒绝保证英国在德国一旦破坏莱茵兰非军事区时将立即从军事上援助法国一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一样，毕竟有待将来分晓。他承认，法国东部的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英国本身的外部边界”，但是，他拒绝走得太远，或对东欧承担义务。法国现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和俄国结成同盟了。只好去寻求它在传统做法中所能找到的安全保障，如与波兰结成同盟（1921年），以及与1920年到1921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反对匈牙利而结成的“小协约国”取得联系。意大利与法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的竞争，表现在它往往支持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来反对这些国家。这种竞争的规模，虽由于大战前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立而大为减小，但仍然是一次更为严重的分裂的先兆。1922年8月，即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开创法西斯时代的两个月前，一位奥地利的政治家在对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实真相是，两个互不相容的联盟正在为争夺中欧的霸权而斗争：一个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结成的南北联盟。一个是由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结成的东西联盟。”^[46]

英国对于法国的这一活动持近似不赞成的冷淡态度，并且不恰当地谈论法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法国的力量是虚弱的。这一点最初在中东表现出来，在那里英法两国所处的地位恰恰相反，英国成为前进政策的主要代表。英国不必为自己的基本利益担心，而且在波斯又居于统治地位，于是它在和会上玩弄两项有些没有道理而又感情用事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估计都是要招致穆斯林居民的反对的。第一个政策是古希腊在爱奥尼亚海沿岸殖民的现代翻版：1919年5月，在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的支持下，那位善于游说的希腊首相维尼齐洛斯向大部分居民为希腊人的士麦拿派出了一支希腊的远征军；这是威尔逊发表了4月23日的声明后、意大利退出和会期间的事情，意大利人已在这个根据圣让德莫里昂秘密协定分配给意大利的地区的另一些地方单独登陆，现在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止意大利人再在士麦拿登陆。就意大利的权利来说，这个1917年签订的协定是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必然结果，但是，它的盟国认为，这个协定由于俄国的背离已告失效。一个未必行得通的在高加索对意大利的损失做出补偿的计划，被精明强干的尼蒂的政府拒绝了。尼蒂是在1919年6月接替奥兰多的。

英国的第二个政策，就是根据贝尔福1917年11月2日的声明，在圣地巴勒斯坦为千百年来一直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英国打算在巴勒斯坦把它对阿拉伯人和对犹太人所承担的义务统一起来的做法，乃是一个漫长的、可悲的和单独的故事。还有一个与之有关联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英国根据侯赛因—麦克马洪1915年至1916年的信件而对阿拉伯人承担的义务（见第十章）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而对法国人所承担的义务统一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两种义务，至少在精神上是不协调的。法国当局错误地怀疑，他们在叙利亚的地位正在受到不忠实的英国人的暗中破坏，而英国人事实上却在敦促他们的阿拉伯追随者费萨尔埃米尔和法国人达成协议。但是，费萨尔于1920年3月挑衅地开始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国王”的称号，在法国（尽管遭到阿拉伯的激烈反对）于1920年4月25日协约国圣雷莫会议上被委派担任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国后，他就被驱逐出国。这时，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也以委任统治权的形式出现，而且还签订了英法石油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后来又做了有利于美国的修改。美国虽然并未同土耳其交战，但通过坚持要求贯彻为委任统治制度规定的门户开放原则，也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脏

物中分得一份。这就是用新的国际理想主义在近东对各国的野心进行微妙调整的情况。

土耳其放弃其阿拉伯领土和它对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宗主权所以值得注意，这是由于它是载于非永久性的塞夫勒条约中的那些持久性的条款之中的；签订了这个条约，协约国便于1920年8月10日与土耳其媾和了。这个条约规定土耳其人留在君士坦丁堡，希腊人留在士麦拿，这都是和寇松的见解相违背的。对这个条约的具体条款，以及对在土耳其划分法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的相应的协定的详细内容，也许联系到19世纪的东方问题来看，要比联系到20世纪的和平解决问题更有兴趣。这个条约所以拖延，是因为协约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未必会发生的事态，即美国决定对君士坦丁堡或亚美尼亚实行委任统治。由于民族起义，这个条约一直未获批准，而且失去了意义。这时，民族起义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愈演愈烈，这主要是由于希腊占领了士麦拿而造成的。这次占领当时普遍地被认为是可悲的错误，但是，那位亲希腊的战士劳合·乔治却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势力日益强大的凯末尔在安格拉^[47]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和在君士坦丁堡的垂死的苏丹政府相抗衡；而且，根据1921年10月签订的弗朗克兰—布荣协定，法国又避开英国而单独与民族主义分子缔结了一个新的和平协定。法国未能理解，从而怀疑英国维护连寇松自己都说是“靠不住的，因而我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希腊人的联合”^[48]动机何在。法国和意大利现在支持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最后打败了希腊人，并于1922年9月初进入士麦拿。这个胜利反过来又威胁着协约国仍然驻扎在黑海海峡亚洲沿岸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而法国和意大利对于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一直抱有怀疑。他们两国于1922年9月21日把他们的分遣部队从查纳克撤走，只剩下英国人驻守在那里。他们这样做，产生的一个幸运的后果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同意于1922年10月3日在穆达尼亚举行会议，这是洛桑和平谈判的前奏（见下文，第291页）。

劳合·乔治的东方政策，给他的宠儿希腊人带来了灾难，而且，也使他自己的政府于1922年10月19日垮台。但是，寇松在博纳·劳的保守党政府中仍然留任外交大臣；而且，尽管法国进行阴谋破坏，但由于他个人在洛桑会议中的成就而挽救了英国的地位。至于同英国的利益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在黑海海峡问题上，最后在摩苏尔问题

上，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这样，根据1923年7月24日的洛桑条约，英国在解决土耳其问题中，至少可以说是与法国和意大利取得了同样的成果。

英法两国在战后年代中发生的一系列争执，看来几乎可以证明保罗·康邦在其代表法国出使伦敦20年结束时所写的那番话是正确的：

“我不相信（两国）有破裂的可能，可是，在每个地方，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不幸的是，巴黎既不能，伦敦也不会明智地把他们的分歧局限在那些重大的问题上，而不纠缠细枝末节。解决重大的问题要比解决琐碎小事容易。但是，像寇松或莱格这样的人所关心的就是这些琐碎小事。”^[49]的确，同历来一样，人物的性格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国人认为劳合·乔治过分亲德、亲俄，因此，对他不信任；而英国人则由于从1922年1月至1924年6月担任法国总理的彭加勒刻板地墨守陈规，因而，对他疏远。但是，这些摩擦不过是一种比较深刻的心理上的分歧的表现，这种分歧使得真正的大问题，即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很不易解决。在莱格和彭加勒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内担任总理的白里安，于1921年11月21日代表历尽战争创伤的法国发言时声称，在德国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以前，法国是不能在实质上解除武装的。而英国的政治家们则是想通过帮助德国复兴的办法，以换得其善意来寻求一种比较真诚无间的安全。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在心理上英国人不大对人抱仇恨，在政治上他们害怕俄国，而在经济上则设法促进作为英国主要支柱的世界贸易。只有时间本身能够证明，而且事实上也证明了究竟哪一个观点是比较接近正确的。

这种分歧明显地表现在实施和约时发生的一些插曲中，如上西里西亚问题，特别是1920年到1922年间协约国就赔偿问题而举行的一系列谈判。德国并没有帮助英国以便英国也帮助它。德国的代表们在1920年7月举行的斯巴会议上第一次出现时，曾就赔偿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当的建议，德国的煤炭大王施廷内斯还为这些建议做了一番咄咄逼人的发言，因此给人的印象很坏。他们又在1921年3月1日的伦敦会议上提出“站不住脚的”条件（达伯农语），拒绝被激怒了的协约国所提出的要求，因而协约国便于3月8日延长对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鲁尔奥尔特的占领，这是根据条约实施的起码的合法制裁。1921年4月27日，赔偿委员会宣布决定，规定德国的总赔偿额高达66亿英镑。该委员会还发现，最初规定的德国必须于1921年5月1日以前偿付的10亿

英镑（200亿金马克），它至少拖欠了120亿马克。5月5日，协约国政府把一份“支付时间表”送交德国，规定德国清偿义务的方法，这实际是减轻了这些负担；不过，其中要求在该月底以前先偿付5000万英镑（10亿马克）。附送的一道最后通牒宣称，如果德国在六天内做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协约国就将于5月12日占领鲁尔。德国在经历了一场政府危机后，维尔特政府于5月11日接受了协约国的条款，并于8月前偿付了第一批的10亿马克，这是德国第一次以现金偿付。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协约国保持了团结，不过，这种团结是如此不牢靠，以致展望将来的紧张局面，前景不佳。

协约国的政治家们越来越认识到，德国的赔偿问题是和协约国的债务问题密切相关的。他们在1919年3月就曾接到美国财政部就这一微妙立场提出的尖锐警告，但是，那年7月，豪斯在写给威尔逊的一封有先见之明的关于英美关系的函件中说：“难道你不也认为应当提醒我国人民不要指望给协约国的贷款能够全部偿还？难道不应该要求他们把这些贷款的大部分当作我们必不可少的战争费用的一部分，而且，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而不是由债务国提出进行调整？”^[50]威尔逊却不是这样认为，国会也不是这样想的。国会于1922年2月指派了一个“世界大战外国债务委员会”以便在1947年以前收清协约国的债款，并规定利率不低于4.25%。英国的情况特殊，因为它既是债务国，又是债权国。因为美国参战后，它就接替了英国的传统地位而成为这个联盟的银行，而英国则成了它的欧洲盟国的经纪人，主要为这些盟国向美国借了大量贷款。1922年8月1日致各协约国的贝尔福照会提醒它们说，除了俄国应偿付的6.5亿英镑和作为德国赔款的14.5亿英镑外，它们共欠英国约13亿英镑，利息还未计算在内；英国自己则欠美国8.5亿英镑。照会解释说，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还债，这就迫使英国放弃原先它不愿要求协约国向它偿还任何欠款的政策；然而，英国政府仍然愿意免除协约国应偿付给它的全部战争债务和英国应取得的一份赔偿，作为通过“一笔大交易”来全面取消战争债务的一部分。这种颇有政治家风度的建议，却不受欢迎。把战争债务和赔偿加以一并考虑的想法，由于不同的原因，既为法国人、也为美国人所反对。美国人的实利主义的态度反映在柯立芝总统所说的一句话中：“他们借了这笔钱，不是吗？”英国政府因而就派遣斯坦利·鲍尔温和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曼前往华盛顿。在华盛顿，美国的谈判代表提出的条件如此苛刻，以致英国首相博纳·劳几乎宁可辞职也不愿接受这些条

件。但是，在要对党忠诚的压力下，他默认了。英国的固定债务确定为46亿美元，可在62年内偿还，平均利率为3.33%。

法国一直是美国贷款的主要受惠国，而这些贷款却要英国来偿还；但是，彭加勒还是对英国企图转嫁压力的做法感到不满。这又加深了法国由于对其遭受破坏的地区做优先赔偿的一切要求遭到拒绝而已经产生的不满。法国的重建，再加上战争抚恤金，要用去法国政府每年总支出的一半。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下，彭加勒决心从德国那里取得“有成果的保证”，而德国在1922年间通货膨胀不断上升，政府正在请求赔偿延期，而且也部分地得到允准。有成果的保证对于彭加勒来说，就是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对鲁尔的占领。1922年12月末，在赔偿委员会的会议上，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代表不管英国代表约翰·布雷德伯里爵士的强烈抗议，投票表决，宣布德国在无关紧要的交付木材问题上实行拖延；并于1923年1月9日，在同样的情况下宣布在交付煤炭上也有拖延。两天以后，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就开进了鲁尔。

正如达伯农所指出的，布雷德伯里曾在头一年的8月间“特意对德国人说，法国一旦单独采取行动，英国将不会进行干预，但要采取一种‘不友好的中立’态度。这句话已经深深地印在德国人的脑海中。”^[51]这是一个准确的预告，但是在政治上是失策的。由于没有形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于是，德国政府便下令在鲁尔进行消极抵抗。这个措施造成混乱，严重地阻挠了法国打算占领鲁尔从而在经济上取得利益的企图。法国由于在莱茵兰煽动在当时仍然微弱的分裂主义运动，又由于把当地那些宁愿通货膨胀而不愿提供赔款的实业家监禁起来，因而从政治上损害了这次占领行为。然而，法国人估计那年他们从德国那里榨取了13亿多法郎。而德国政府采取了不计后果的对抗手段，在鲁尔对闲散在家的工人给予补贴，使得通货膨胀扶摇直上，物价疯狂上涨，到1923年11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与美元的比值竟为42000亿比1，比起1918年，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德国社会变革。但是，事态已在转变中。那年的11月，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慕尼黑发动的政变也告失败，这是一年中极端分子在德国制造骚乱的顶峰。早在9月27日，那个具有破坏性的消极抵抗政策已被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新政府所放弃；他过去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和稳健而内心富于幻想的人物。到11月末，沙赫特-

路得的财政金融改革在迅速恢复方面已经取得杰出成绩，其显著程度几乎就像通货膨胀本身那样。而且，法国政府也于11月30日同意参加其他协约国政府和美国所赞同的对德国偿付赔偿的能力这个中心问题进行的专门调查。

这次调查由美国的道威斯将军主持，并于1924年4月9日提出报告，这就是所谓的道威斯计划。法国迟迟不从鲁尔撤兵，从而迫使德国接受了这个计划。而法国接受这一计划，则是由于赫里欧于6月1日接替了彭加勒所促成的。由此而在德国和协约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便于8月16日在伦敦签字。道威斯计划是以一些相互有关联的前提作为基础的，这些前提就是德国的预算要平衡，货币要稳定，发行货币的银行不受政府控制，但要受到监督以保障外国的利益。法国对这种监督制度是欣然同意的，但对赔偿委员会的地位相应下降，则不那么乐意了。根据类似的调整，尽管应该偿付的赔款总数在理论上说仍然未变，但德国实际上要偿付的赔款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5年中只从5000万英镑上升到标准外汇兑换率1.25亿英镑，并制定了由接受赔款国执行的汇兑特别规定，作为防止兑换率暴跌的保证。为了帮助德国渡过难关，筹集了8亿金马克的外国贷款，大部分是出自美国。于是，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便源源流入德国。这样，在1924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内，德国得到了不大稳定的繁荣，并且根据道威斯计划按期清偿了它应偿付的债务。因此，这种表面上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过是在财政上兜圈子而已。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就向欧洲的协约国赔款，欧洲的协约国又向美国还债。这就是各国都卷入其中的战争所遗留下的复杂问题。

然而，道威斯计划却标志着战后余波中最坏的局面的终结。1925年，欧洲的农业生产第一次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从政治上来说，1924年10月，在亲法的奥斯汀·张伯伦出任鲍尔温的保守党新政府的外交大臣后，克服英法矛盾的挫折，才有了改善的前景。的确，这届政府拒绝了前届工党政府参与制定的日内瓦议定书（见第九章），但是英法合作的有利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为此，张伯伦又重新提出防务联盟这个主张。从1923年到1929年间指导德国对外政策的施特雷泽曼认为，“一个没有德国参加的安全协定就将是一个反对德国的安全协定”^[52]。1925年2月9日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在与莱茵河有关的各国之间，特别是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

国之间缔结一个相当长期的条约，据此，它们将保证彼此之间不发动战争。这个建议是德国总理库诺于1922年11月间提出的那个流产了的建议经过修改的翻版；现在把英法联盟包括进去而产生的“洛迦诺相互保证条约”，连同各项附带协定于1925年10月16日缔结。根据这一条约，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各自并共同保证德国的西部边界和凡尔赛条约有关非军事区的规定。这一协定在道义上加强了1919年的和约，因为德国现在自觉自愿地在阿尔萨斯—洛林、欧本—马尔梅迪和解除武装的莱茵兰的问题上签了字。但是，这一协定在实质上却削弱了和约，因为正按照施特雷泽曼原来的打算，它限制了和约的军事强制手段。但是当时至少英国政府对于用军事手段来保证根据洛迦诺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几乎是不关心的，因为这时鲍尔温首相正在强调“陛下的政府所承担的任何新义务，必须是和平的”^[53]。西欧在短时间内沐浴在“洛迦诺的暗淡的阳光”之中（丘吉尔语）。

洛迦诺公约是要在德国进入国际联盟时生效的，而德国于1926年9月10日进入国际联盟。一个星期以后，施特雷泽曼和白里安私下在日内瓦附近的杜阿里的一家烹调技艺精良的小旅店中共进午餐；他们就施特雷泽曼喜爱的题目——法德经济合作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按照他的说法，甚至要把这种合作扩大到俄国。这个月底，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在西方组成了一家国际钢铁卡特尔，这是欧洲各国经济上合伙的新的开端，但是英国对此却明显地置身事外。在杜阿里，施特雷泽曼还就以德国支持法国经济为交换条件，进一步放松凡尔赛条约的问题进行试探。虽然这样做既不为德意志帝国银行掌权人物沙赫特所欢迎，也没有给美国利益集团以良好印象。

但是，美国的主动精神鼓舞白里安在另一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27年，他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提交了一个关于在两国间放弃战争的条约草案。凯洛格在6个月以后才答复。他在12月提出建议，拟议中的条约应是多边的。结果便是1928年8月27日缔结的巴黎公约或称凯洛格公约。根据这个公约，15个国家都放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有限的保留。例如英国就提出在对它利害攸关的“一定地区”有保留，这指的是苏伊士运河。到1933年，有65个国家曾在这个虽然意义不大明确、但意图却是良好的公约上签了字。

这些事件说明各大国在战后的余波中，为了结束战争而对安全表现出忧心忡忡。安全问题的核心是裁军问题。赔偿和裁军是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长期应尽的两项主要义务，而对这些义务的履行进行监督，则是协约国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监督分别由赔偿委员会和管制委员会在巴黎的各国大使会议的领导下进行。在解除德国的武装中，他们不得不首先对付那个有教养而又孤僻的杰出的普鲁士参谋军官冯·西克特将军。自1920年第二季度起担任德国陆军总监的西克特，已经开始指示各司令官停止实行把德国陆军减少到规定的10万兵力的措施，因为德国政府反对这一点。但是，西克特在斯巴会议上未能诱使协约国同意把10万人数增加1倍；最后，裁军至少在文件上是付诸实施了。因为西克特仿效了沙恩霍斯特在耶拿大战失败后，不顾拿破仑的裁军规定，巧立名目，秘密重建普鲁士军队的故技。尽管按照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限定正规军的服役年限应达12年，志愿人员却迅速地在军队受训后退役。征募所谓的“黑色国防军”，包括成立诸如“国民自卫军”和“劳动指挥部”等准军事组织，这就破坏了条约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与此相配合的是，还把警察非法地军事化。的确，如果一丝不苟地执行裁军而不是规避，那么，要维持国内秩序，这些警察很可能是特别重要的。条约中的任何漏洞，事实上都被巧妙地加以利用：例如，条约虽然把军官的人数限制为4000人，但它却没有对军士做出同样的规定，因此，按照西克特要建立一个军官团的目标，军士的人数增加了，完全超过了一支人数很少的军队所需要的比例。同样，在最上层，第一百六十条禁止建立的总参谋部，在种种遁词的掩饰下，却保持下来，并且从事同样被禁止的活动，如像制订总动员计划（违反第一百七十八条）和推进第一百九十八条禁止的军事航空计划。应予交出的库存武器，往往被隐藏起来，而协约国各个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总是弄得困难而又不愉快。更严重的是，德国军队受到训练，使用被禁止使用的武器，如像装甲车和坦克，因为西克特就是一个具有远见的运动战倡导者。而用假炮和纸板做的坦克进行的演习，是由下了这样一个可怕定义的人指挥进行的，这就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了；这个定义是“尚武精神并不是指模拟战争，而是指准备战争”[\[54\]](#)。

西克特通过全面规避和违反条约的做法所建立的，不是一支人数很少的军队，而是一支袖珍大军，它的危险性就在于它的潜力。这里既有心理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西克特决心要和“精神上解

除武装”进行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德国的好朋友达伯农于1922年3月在柏林时就已写道：“我不仅此刻对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而且对于在任何时候是否有丝毫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表示怀疑。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战争只要打赢了，在道义上就无可指摘。”

[\[55\]](#)在经济方面，西克特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积累正在被淘汰的军备，而在于协调军备制造的潜力。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维尔特总理的支持。维尔特秘密地对克虏伯军火工业给予资助。这个庞大的联合企业于1922年1月25日和德国国防部签订了一项正式协定，“共同逃避实行……凡尔赛条约的条款”[\[56\]](#)。这一活动一直扩展到国外，超越了协约国的控制。到1925年，克虏伯在瑞典的勃孚士军火工厂拥有能够左右一切的股权，并且正在设计最新式的大炮和坦克。在荷兰、西班牙和芬兰，秘密地制造德国潜艇并训练艇上人员。甚至在1922年签订俄德拉巴洛条约以前，就在暗中进行安排，要在苏联的喀山制造德国的大炮、坦克，在萨拉托夫制造毒气，还要在利佩茨克制造空军基地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训练项目也加以扩大，由苏联军官来教授参谋课程。甚至在1923年通货膨胀期间，维尔特的继任者库诺还于7月11日暂时同意下一年为德国与俄国的军事合作提供6000万金马克的资金。西克特认为，东山再起的德国应当特别与俄国携手，共同摧毁波兰。维尔特也是这个意见。他对在拉巴洛条约签订后启程前往莫斯科担任德国驻苏大使的布罗克多夫-兰曹说：“波兰必须被除掉。我的政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有关东部边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是经我同意的，这些事情除我自己以外，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和军方的意见，特别是和冯·西克特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57\]](#)

然而，这位也许是20年代最值得重视的军人西克特，却和他们的最杰出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的意见不一致。施特雷泽曼的名字标志着履行裁军和赔偿义务及签订洛迦诺公约的这个和平时期。但是，这种分歧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小得多。施特雷泽曼对西克特的非法重整军备，特别是在俄国进行的重整军备活动是了解的，但是，为了掩盖，他便对达伯农撒谎。虽然，施特雷泽曼确是主张和平的，因为在德国处于弱者地位时，他企图不通过战争的办法来实现他的政策。但是，这是一个深远的政策，既深远又广泛。这个政策包括“保护国外的德国人，我们的那些现在居住在外国，处于外国桎梏之下的1000万到

1200万的同胞”^[58]。关于这个方面，例如，施特雷泽曼在谈到南蒂罗尔时，就认为“瓦尔特·冯·德尔·弗格尔魏德的日尔曼人的品质证明博岑（波尔萨诺）是属于日尔曼的文化整体中的”^[59]。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要从比利时那里重新得到欧本。在他看来，“收复德国的殖民地乃是德国政策的一个目标，一个当务之急的目标”^[60]。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重新调整我们东部的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改正上西里西亚的边界”^[61]。正是在施特雷泽曼执政时，而且是根据他的指示，布罗克多夫—兰曹于1924年12月20日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提出“波兰问题的解决，对德国和俄国说来，都在于把波兰推回到它的种族边界上去”^[62]，而这个边界是它的敌人们划定的。

在谈判洛迦诺公约时，施特雷泽曼利用了英国长期以来不赞成法国在东欧承担义务的态度。他反对法国为了支持它在东欧的盟国而要求德国保证“不发动任何进攻”的一切企图。“我们在西方承担了这个义务，但是我们拒绝在东方承担。国际联盟成员的地位并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63]达伯农先前向施特雷泽曼提出的德国和法国之间在莱茵兰建立一个“相互提防的铁幕”^[64]的建议，开始起着一种不祥之兆的作用。施特雷泽曼“在洛迦诺看到可以保住莱茵兰，并有可能在东方收复德国的领土”^[65]。正如同德国的对外政策常常表现的那样，这个解决办法具有两面性，对西方满面笑容，对东方冷酷无情。在东方，尽管法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条约，但是，法国的已被削弱的地位，不仅由于施特雷泽曼对于这两个国家报以恶意的嘲笑，而且也由于1926年4月24日在柏林进一步签订了俄德友好条约，因而每况愈下。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可怕的友谊”（劳合·乔治语），施特雷泽曼才在洛迦诺为了德国而使国际联盟盟约的第十六条受到重大的削弱。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上利用了民族主义反对派在德国议会中对他的反对。他把洛迦诺公约说成是对协约国的一种让步。协约国为了回报，便对德国采取了一些有利的“反应”，特别是在1926年1月31日以前从科隆区撤兵，这就使得他在洛迦诺反对法国所取得的成功臻于圆满。从科隆区撤兵是从莱茵兰撤兵的第一个阶段，这种撤兵在头一年由于在裁军问题上“德国政府多次拒不履行义务”^[66]，曾为协约国

所拒绝。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到1927年1月31日，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意撤销时，它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满意的。一个月后，它在它的最后报告中声明：

委员会在德国政府中遇到一个老练而孜孜不倦的对手的对抗，关于这个对手，委员会本身是无法加以约束的……[军事]管制的历史，成了德国对委员会的要求和决定不断地进行阻挠的历史……但是一幅图画的身影，不足以掩盖它的色彩，应该承认，虽然所取得的结果不过如此，却是极其重要的……委员会方面在取得这些结果时，已挖掘建筑大厦的基础……这个大厦自从洛迦诺公约缔结以来，正缓慢地开始从地上升起。

[\[67\]](#)

这种辞藻华丽的辩解适合官方的乐观情绪。虽然那些基础的薄弱在1927年1月中已经由英国新任驻柏林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提出。他向施特雷泽曼表示，他对“德国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复仇情绪感到忧虑”[\[68\]](#)，1928年，德国内阁专门批准了德国非法重整军备。根据1929年8月的海牙协定，施特雷泽曼取得了在他那年10月逝世前的最后一个重大成就：协约国同意于1930年6月30日以前从整个莱茵兰全部撤兵。这次撤兵是和采纳短命的杨格计划有关。根据这个计划，德国的赔偿义务进一步减少了，比它为了要促使法国从鲁尔撤兵而承担的道威斯计划的赔偿义务还要少。这就是施特雷泽曼的如下政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这个政策是“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把法国赶回去，因为如同我某次所说的那样，全面进攻是行不通的”[\[69\]](#)。

哪里有空隙，德里就在哪里猛烈发动“和平攻势”（施特雷泽曼语），因为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的前言中就说，强迫德国裁军“是为了推动所有国家普遍限制军备成为可能”。这段话，以及协约国1919年6月16日在回答德国人时对它所做的粉饰，并不像德国的宣传试图证明的那样，给协约国的裁军赋予条约义务；但是，它们的确构成了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这种道义上的义务由于德国违反条约采取了种种重整军备的措施，因而被解除了。虽然这些措施是直接防御性的，但却给未来投下了不祥的阴影，因为当时白厅的10年限期规定，使英国行政长官们在整个20年代无法预见到今后10年内将发生一场大战。但总的说来，战胜的大国表示出一种良好的意愿，要为普遍裁军而进行工作。

但是，这种意愿最初主要表现在最少涉及德国的方面，即海军。这方面的中心问题是英美的竞争，因为在大战期间，美国就一直在建立海军方面追赶英国，而且在和会期间，无视英国代表反对继续建造海军的意见。在这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成见，在1921年到1922年各海军大国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显示出来。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成就：一方面在远东得到了政治解决，根据美国和自治领的意愿，英日同盟终止了（见第十二章）；另一方面，1922年2月6日签订了一项限制海军军备的重要协定。这就表明“在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局面”下的海军霸权业已告终；日渐贫困和消沉的英国，不失体面地接受了这一点；而步步竞争的美国，则充满想象力地利用了这一点。这个协定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主力舰的总吨位确定了一个比例，规定10年内海军停造主力舰，还限制了主力舰的规模，同时也规定了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但是，条约未能对潜艇、轻巡洋舰和辅助舰做出任何按比例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法国横加阻挠的缘故，为此，英法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然而英美的纷争又破坏了1927年夏在日内瓦召开的海军会议上与日本就上述最后确定的计划达成协议的另一次尝试。1930年1月在伦敦再次召开了海军会议，经过复杂的谈判后，于4月22日产生了英、美、日三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有权建造相当于英国和美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吨位的70%的同类军舰和同等吨位的潜艇，但总吨位限制得较低。法意两国在地中海的竞争使得要把这两国包括在这个协定之内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而且，也表明在海军裁军中所取得的可观的成就是有限性的。另一个有限性的表现就是，德国当时建成了第一艘“袖珍战舰”。这种战舰设计巧妙，既完全符合和约强制定限定的1万吨规定，同时，又因其新式的、威力强大的武装而挫败了和约规定的这种限定的目的。

陆军和空军的裁军，由于其本身性质以及与德国问题特别有关，因而要比海军裁军难以达成。在国际联盟范围内举行的裁军谈判旷日持久。开始时，于1925年指派了一个裁军筹备委员会，其结果导致1932年2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见第九章和第二十三章）。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不祥之兆，威胁着会议的成功。会议之初，日本在满洲发动了侵略；结尾时，又逢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日益得势，咄咄逼人。

纳粹党的势力在1930年9月举行的选举中猛然增强，从80万张选票增加到650万张，1932年7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获得1375万张选票（见第十六章）。这个现象的背景就是在施特雷泽曼去世的那个月，即1929年10月，在华尔街出现的美国的不景气，以及接踵而来的横扫欧洲的经济大风暴。这再次证明旧世界需要依靠新世界的财富。头一年夏天实施的杨格计划被席卷而去了。美国收回贷款，暴露了德国经济的不稳定。德国银行与之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奥地利财政，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往往是脆弱的。于是，1931年3月，德国的布吕宁政府试图双管齐下，一面支持两国的经济，一面又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大胆的措施，突然宣布同意建立一个奥德关税同盟。这个计划在遭到英法反对的情况下，不得不予以放弃。1931年5月11日，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公司倒闭，突然造成“危机中的危机”。这种局势从德国蔓延到英国；英国的工党政府垮台，英镑被迫于9月21日放弃了金本位。早在7月中，欧洲的主要大国在法国提出某些争议之后（它继美国之后，已经建立了最大的黄金储备），接受了胡佛总统及时提出的建议：一切赔偿和战时债务的支付暂缓一年。1932年6月，在洛桑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考虑在胡佛的“缓付一年”到期后的局面。刚接替布吕宁内阁的冯·巴本的“巨头内阁”，在这个会议上为德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从而使赔偿终于取消，只要德国交出数达1.5亿英镑的债券。根据德国的债权国7月2日达成的“君子协定”，批准这项解决办法的条件是，这些债权国与它们的债权国即美国之间要取得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但是，美国拒绝取消或减少协约国的战时债务，从而堵塞了英国1933年采用的只作象征性的偿付这种权宜之计。此后，英国政府便和法国以及其他各国政府一道拖延偿付，实际上是拒绝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财政负担不公平地从德国转嫁到欧洲协约国的身上，因为德国已不再支付赔偿。而且，事实上，即使德国在偿付赔款时，实际上并不是用它自己的钱财或自己做出牺牲来偿付，而是用它从外国得到的贷款和投资来偿付的。这些贷款和投资到1931年数达350亿到380亿马克左右，而根据赔偿委员会的账目来看，它同期向协约国偿付的总数却是210亿马克。这就是毫无结果的和平解决，它最初采用了军事干涉的手段来强制实行赔偿，而不是裁军；后来却又依靠（在财政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是如此）迁就的办法来实行苛刻的条款，而不坚持这些条款。

面对着经济大风暴，特别是在美国1929年至1930年间提出了非常严厉的霍利—斯穆特税则后，欧洲大国匆忙抛弃了20年代那种向外发展的国际主义（最后的表现就是白里安的成立欧洲联邦的计划），各自埋首于关税壁垒后面的本国经济。这种情况，使得1930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设法达成关税休战的那次会议遭到失败。自由贸易的时代正在告终，而且，在极权国家中，自由思想的时代也正在告终。现在，德国也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去。德国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刻，转向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超越了经济，改变了政治，而且终于粉碎了凡尔赛的解决方案。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三个相继而来的、但又相互重叠的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浪头给逐渐破坏了。几乎从一开始，这个和平解决方案就在政治上受到损害，这不仅是由于和平缔造者们在制定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计划中有时犯了判断错误，而且更多地是由于一方面因为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撒手不管而留下了对德国有利的力量真空。这种真空太大了，它是国际联盟所做的那些颇有希望的革新无法填补的。这种政治上的动荡，由于出现了其严重程度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20年代中越演越烈；这个危机首先是德国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接着又是世界范围的不景气。凡此种种，不仅损害了处理德国赔偿和协约国战时债务的整个结构，而且也表明：在4个世纪以前发现美洲以来的一次可能是最大的地理政治重心的转移中，经济天平现在倾向于美洲。而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没有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一种将为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带来稳定的经济秩序。30年代接着又表明：维护和平解决方案，受到种种意料不到的现象的严重威胁。这些现象不仅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这次为了维护世界上的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自由主义的倒退：俄国退向共产主义，意大利退向法西斯主义，而马上就显示出其破坏性的是德国退向了国家社会主义。曾经设法要使凡尔赛条约成为国际民主制度保障的威尔逊，原打算这个条约会使德国人成为“好好地思索的一代人”^[70]。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转而内向，难以捉摸，积怨日深，与其说是有所悔悟，不如说是复仇心切。而当协约国的战胜者们寄希望于那些才智平庸的政客们的时候，德国的战败者们却找到了一个具有狡黠而邪恶的天资的领袖。他的喉舌在1928年4月就有言在先：

我们进入议会，就是为了要在民主的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成为议员，就是为了要借助魏玛的力量来涣散魏玛的人心。如果民主制竟然愚蠢到如此程度，竟然付给我们免费票和工资以便达到这个目的，那是它自己的事情……我们是作为仇敌而来！就像狼闯进羊群，我们也是这样闯进来的。[\[71\]](#)

他们就是这样来的。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的、也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总理。

（丁钟华 译）

[\[1\]](#)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著作、记事和演说集》（德累斯顿，1926年），第2卷，第127—128页。

[\[2\]](#) 查尔斯·西摩：《豪斯上校私人文件》（伦敦，1926年及以后版本），第4卷，第167页。

[\[3\]](#)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皇家档案局，伦敦），第111卷，第650页。

[\[4\]](#)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皇家档案局，伦敦），第111卷，第651页。

[\[5\]](#) 戴维·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伦敦，1938年），第1卷，第80页。

[\[6\]](#) 《美国1918年对外关系文件，附录一》（国务院，华盛顿，1933年），第1卷，第405页。

[\[7\]](#) 《美国1918年对外关系文件，附录一》（国务院，华盛顿，1933年），第1卷，第410页。

[\[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9年的巴黎和会》（华盛顿，1942年及以后版本），第3卷，第718页。以下简称（1919年的巴黎和会）。

[\[9\]](#) 1919年9月19日威尔逊总统在圣迭戈的讲话：《威尔逊总统的演说》（第六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120号：华盛顿，1919年），第278页。

[\[10\]](#) 1918年11月9日与豪斯的谈话，根据豪斯的报告：《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1卷，第344页。

[\[11\]](#) 劳合·乔治本人主张给苏维埃俄国在和会上发言的机会，他满怀希望地提议应约请俄国所有敌对的派别来遵守“上帝的停战协定”，并出席一次特别会议，在协约国的主持下来解决冲突。劳合·乔治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支持，威尔逊并起草了参加在马莫拉海普林基波的太子岛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1919年1月22日的协约国邀请信，这个地点反映出克列孟梭拒绝苏维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白俄当局在法国的鼓励下拒绝和苏维埃代表打交道，而苏维埃方面则送来一封不适当的侮辱性的接受邀请的回信。因而试探性的普林基波提案宣告失败，协约国只得在巴黎就进一步干涉俄国的得失问题进行困难的辩论。

- [12]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12卷，第899页。
- [13]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11卷，第619页。正式文本为法文，英译文见H. W. V. 坦珀利《巴黎和会史》（伦敦，1920年及以后版），第1卷，第468页。
- [14] 豪斯上校笔记。查尔斯·西摩：《豪斯上校私人文件》（伦敦，1926年及以后版本），第4卷，第401页。
- [15] 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第1卷，第234页。
- [16] 安德烈·塔迪厄：《和平》（巴黎，1921年），第113页。
- [17] 1917年1月12日的法国照会：《关于英法条约谈判的文件》，敕颁文书1924年，第2169号，第2页。
- [18]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1917年7月2日就前发照会致英国驻巴黎大使函，《关于英法条约谈判的文件》，敕颁文书1924年，第2169号，第3—4页。
- [19] 《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4卷，第86页。
- [20] 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第2卷，第984页。
- [21] 《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3卷，第417页。
- [22] 《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6卷，第795页。
- [23] C. 西摩：《豪斯上校的私人文件》，第4卷，第418页。
- [24] 威尔逊1919年6月3日在美国和谈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速记报告），见《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11卷，第222页。
- [25] 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第1卷，第719页。
- [26] 1919年3月6日劳合·乔治致豪斯上校的信：引自塞思·P. 蒂尔曼《1919年巴黎和会中的英美关系》（普林斯顿，1961年），第239页。
- [27] 1919年6月9日的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6卷，第261页。
- [28] 1919年6月16日协约国对德国意见书的答复：《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12卷，第285页。
- [29]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12卷，第253页。
- [30] 1919年6月20日四人会议的决定。E. L. 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皇家档案局，伦敦，1946年及以后出版），第1辑，第1卷，第18页。
- [31] 1919年6月20日四人会议的决定。E. L. 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皇家档案局，伦敦，1946年及以后出版），第1辑，第1卷，第18页。
- [32] 1919年6月3日的四人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6卷，第159页。

- [33] 1919年5月8日的话。雅克·班维尔：《德国》（巴黎，1939年），第250页。
- [34] 1919年8月19日代表团长会议：E. L. 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辑，第1卷，第432页。
- [35] 伍德沃德和巴特勒：《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辑，第1卷，第547—549页。
- [36] 《关于英法条约谈判的文件》，敕颁文书1924年第2169号，第77页。
- [37] 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第1卷，第622页。
- [38] 特威斯中校1919年8月22日在委员会中大国会议上的发言。伍德沃德和巴特勒：《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辑，第5卷，第iii—iv和第277—278页。
- [39] 伍德沃德和巴特勒：《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辑，第1卷，第207页。
- [40] 1919年5月3日的四人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5卷，第430页。
- [41] 劳合·乔治：《和平条约的真相》，第2卷，第883页。
- [42] 1918年12月10日鲍曼备忘录；查尔斯·西摩：《豪斯上校私人文件》（伦敦，1926年及以后版本），第4卷，第291页。
- [43] 萨多瓦系捷克村庄名，1866年普鲁士军队在此战胜奥地利军队。——译者
- [44] 《1919年1月10日—1923年12月7日关于保障安全、防止德国侵略的谈判文件》，1924年法国黄皮书，第92页。
- [45] 1916年2月14日豪斯上校与劳合·乔治、贝尔福和爱德华·格雷爵士谈话时贝尔福说的话。刘易斯·L. 格尔森：《威尔逊与1914—1920年波兰的新生》（纽黑文，1953年），第27—28页。
- [46] 达伯农勋爵：《和平使节》（伦敦，1929—1930年），第2卷，第101页。
- [47] 即安卡拉。——译者
- [48] 1922年9月27日致奥斯汀·张伯伦函、罗纳德谢伊伯爵《寇松勋爵的生平》（伦敦，1928年），第3卷，第305页。
- [49] 1920年10月14日致其子函、保罗·康邦：《1870—1924年通信集》（巴黎，1940年及以后版本），第3卷，第386页。
- [50] 《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11卷，第623页。
- [51] 达伯农勋爵：《和平使节》，第2卷，第91页。
- [52] 施特雷泽曼1925年7月1日笔记。埃里克·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伦敦，1935—1940年），第2卷，第98页。
- [53] 1925年10月8日鲍尔温在布赖顿的讲话：《泰晤士报》，1925年10月9日。

[54] 冯·西克特将军语。引自弗里德里希·冯·拉本瑙将军《西克特1918—1936年的生涯》（莱比锡，1940年），第503页。

[55] 达伯农勋爵：《和平使节》，第1卷，第279页。

[56] 引自戈登·A. 克雷格《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年》（牛津，1955年），第406页。

[57] 引自赫伯特·黑尔比希《东欧史研究》一书中的《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在莫斯科的使命》一文（H. 雅布洛诺夫斯基和W. 菲利普编，柏林，1954年及以后版本），第2卷，第306页。

[58] 1925年9月7日施特雷泽曼致前德国皇太子函。埃里克·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503页。

[59] 1926年2月9日在德国国会的演说，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454页。

[60] 1925年8月29日的演说，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314页。

[61] 致前皇太子函，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503页。

[62] 引自库尔特·罗森鲍姆《共同的命运》（纽约州锡拉丘兹，1965年），第124页。

[63] 1925年12月14日的演说，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217页。

[64] 达伯农勋爵：《和平使节》，第3卷，第101页。

[65] 1925年11月27日致冯·科德尔函，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231—232页。

[66] 1925年6月4日英、法、意、日、比各国驻柏林大使向德国政府提出的照会。1925年敕颁文书2429号，第3页。

[67] 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最后的报告》，1927年2月28日（巴黎，1927年），第512—514页。

[68] 施特雷泽曼1927年1月15日笔记。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3卷，第105页。

[69] 1925年7月27日致冯·舍赫中将函，萨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日记、函件和文件》，第2卷，第58页。

[70] 十人会议，1919年2月12日。《1919年的巴黎和会》，第3卷，第1002页。

[71]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进攻报》（慕尼黑，1935年），第71—73页。

第九章 国际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缔结的每一个和平条约，都以国际联盟盟约作为第一项内容。自战后第一个和约——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时起，国联即开始存在。把盟约内容写入各项条约，是威尔逊总统曾经在和会上坚决提出的一项主张；他指望国联能作为一种手段，依靠它使条约中不公正和有缺陷的部分在将来某个时候得到纠正；或许，他还预见到，如果拖延到各项条约生效后再来成立国联，那几乎可以肯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国联了。对于国联来讲，这种做法兼有利弊。一方面，这使它与那些遭到抨击的和约同样不得人心，因为无知的或怀有敌意的批评者会说，它不过是战胜国为了把不公正的解决办法强加于战败国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这些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只有借助于一种常设机构才能实施，而国联就是要成为这样的机构；为了利用国联达到这一目的，和约规定国联将立即被要求在重大事务中发挥作用，而不会被默默无闻地抛在一边，就像威尔逊有理由怀疑他的一些同僚本来曾经希望的那样。

在和会上，起草委员会以英、美两国的法律顾问塞西尔·赫斯特和戴维·亨特·米勒根据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史末资将军和菲利莫尔勋爵领导的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委员会以及豪斯上校的意见归纳而拟定的草案为基础进行工作。法国和意大利提出的草案，简直未予考虑。因此，定稿的盟约所反映的是英美的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观点。国联产生于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谈不上拥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力，就严格的意义来讲，甚至连行政机构性质的权力都不具备。国联所体现的无非是一个组织体制的大概轮廓，因此，很容易随着以后事态演变的方向而发展。国联要把各个主权国家联合在一起，保证为若干特定的目的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合作能否收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恪守诺言。国联在建制上属于一种可能使它的会员国更容易取得一致和协同行动的机构，而不是借以采取联合行动的组织。至于“国联”一词本身，不过是对其会员国的一个总称。同样明显的是，国联是一个更多地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法律性质的联合组织，它具有“欧洲协同体”性质的而不是历次海牙会议性质的传统。国联的创建者认为，前

一传统在19世纪使欧洲受益匪浅，而后者在刚刚结束的大战中实际上毫无作用。英国舆论特别希望国联能成为一个便于大国定期地和发生紧急情况时进行磋商的组织，但它的成员和职能不应再局限于欧洲，应该设一个常设秘书处作为办事机构，并对世界的其他地区承担一定的责任。

国联的创始会员国是各项和约的签字国，以及和约中规定邀请加入盟约的几个其他的国家。国联设有一个代表全体会员国的大会，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由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后为珀思勋爵）为首任秘书长的秘书处。按照赫斯特-米勒草案的规定，行政院应当仅仅由大国的代表组成。但是，鉴于小国的强烈反对，决定在大国为常任委员国的同时，由大会定期选出另外四国代表。这些非常任委员国的数目，后来逐渐增加到11个。盟约对大会和行政院的一些职能分别做了专门的规定，但没有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有权处理“国联行动范围以内或影响世界和平的任何事件”^[1]。这种分工不明是整个盟约富有伸缩性的典型表现，因而不会造成任何不便。也许与创建者的意愿相反，后来大会变成了主要机构，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大会能够控制预算。大会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并且提供了一个论坛（这只有在日内瓦盛行的讲究礼貌和克制的气氛中才有可能），在这个论坛上，小国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大国，大国也不拒绝在世界各国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说明和进行辩解。行政院的机构较小，举行会议较为频繁，因而能够比较迅速地行动。这样，它就逐渐变成了大会的一种执行委员会，负责为已在原则上为大会所接受的政策拟定具体细节并监督其执行情况。遵照国际会议的惯例，两个机构的决议一般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但也有若干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程序问题可以由多数决定；另外，在把某一争端付诸表决时，争议各方的票数不予计算，但在行政院或大会就这一争端提出其解决争端的意见报告时，则必须全体一致通过。然而，在国联的实际工作中，全体一致通过这一规定的影响并不像有时想象的那样大，因为国联的“行动”并不表现在做出某种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在于提出会员国在盟约上签字保证要予以尊重的建议和裁决。因此，全体一致通过这一规定并不是给予盟国以反对国联行动的否决权，而是要保证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不经它们自己同意就不会被改变的一种手段。

秘书处是国联体制中最富于创新的部分。以前国际会议的做法，一般都是由会议参加国临时指派官员担任秘书工作。这种做法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共同责任感很少有机会得到发展，也不会留下一个实际机构来实施会议的决议。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一开始就决定，国联的秘书处应当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案。它不是由国家的代表组成，而是由国际雇员组成，这些人员必须首先忠于国联。这种设想并不总是可能彻底实现的。在补充人员和分派秘书处的职务这类事情上始终不涉及国籍问题，既不现实，甚至也不一定受人欢迎。有一些政府总是设法施加压力来暗中破坏秘书处成员的独立性，而这种压力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在极权主义兴起以后，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尽管如此，这一真正国际性的行政机构体制的首次尝试，主要并不是以它的某些失败，而是以它的成功著称于世的。

遵照盟约第十四条，行政院负责为筹建常设国际法庭制订计划。它首先采取的若干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法学家委员会，就此提供咨询意见。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个草案，经大会同意作为法庭活动章程的依据。国际法庭于1921年下半年成立。它的权限是对“各方提交该法庭之一切案件及现行条约和协定中明确规定的一切问题”进行裁决。因此，是否把争端提交法庭出于自愿，但法庭章程中有一项规定，即所谓的“可选择条款”，会员国如果愿意接受这一条款，就应当承认对于该条款所列举的各类争端的裁决是强制性的。经过几年的实践，随着法庭信誉的提高，这项条款广为各国所接受，虽然各国在接受时往往带有保留，因而大大降低了它们的作用。法庭实际上是国联的司法机构，二者之间有着建制上的联系。法官由大会和行政院选举产生；法庭的费用来自国联的预算；而且，除了对有争议的案件进行裁决以外，法庭还被授权对大会和行政院提交给它的任何争端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然而，这些联系丝毫无损于法庭在司法权上的完全独立。

国联的主旨是要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盟约中包括了为实现这一宗旨而提出的种种观点，这些观点并不都是彼此相互一致的。根据第十条，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各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的侵犯”。但是，这个表面上似乎相互做出保证的体系，并不能约束任何会员国为援助任何其他会员国而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因为一旦出现侵略，行政院就要“为履行这一义务所

要采取的手段提出意见”。这个条款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有着良好意愿的原则声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威尔逊总统却把它当作盟约的核心；而美国参议院所以拒绝批准和约和盟约，主要是由于他拒绝在这个条款上做出任何妥协。但是，塞西尔清楚地看出这个条款中所包含的危险，它可能把一种硬性规定强加于这个国际体系（这一点法国人是欢迎的）从而使这个体系无法和平地应付将来无法避免的要求改变的压力。由于盟约第十九条，塞西尔所担心的问题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根据第十九条，大会被授权“经常地就已经无法执行的条约提出重新考虑的意见，并对维持下去势必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形势提出建议”。这个条款基本上也是一纸空文；而且，如果说会员国不能找出并且实行和平改变的有效方法，是由于国联的十分软弱而不在于各会员国没有履行维护彼此领土完整这个或许是彼此意见不一致的义务，这种论点是肯定会有争议的。

第十一条体现了实现和平的第二种观点。“凡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都被宣布是“与国联全体有关的问题”，而起着一个调解委员会作用的国联应采取“一切经认为适当及有效的措施以维护各国间的和平”。与当初的想法相反，后来证明绝大多数提交给国联的争端，都是根据这一条款处理的；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一条，反映了英国关于如何才是最明智地利用国联机构的见解。

第三点，国联应该对国际争端行使仲裁一类的职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它还应该成为强制实现和平的工具。根据规定了这些职能的盟约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会员国有义务把任何“可能引起关系破裂的争端”提出来，按下列三种方法之一处理：交由常设国际法庭解决，提请仲裁，或由行政院进行调查。在法庭做出判决、仲裁人做出裁决或行政院提出报告之后的3个月以内，有关各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诉诸战争。按第三种方式处理时，除争议当事各方以外，行政院中意见必须取得一致。如果某一国家竟然无视其中的任何一项保证而敢于诉诸战争，那就可以对该国实行所谓的制裁。这时，所有其他的会员国都将与该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和财政关系，禁止本国国民与该国国民的一切交往，阻止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与该国国民的一切交往，无论其是否为国联会员国。此外，行政院还将建议各会员国为维护盟约应分别提供多少武装力量。这些规定反映了人们所认为的战争的教训之一，即经济压力具有巨大的威力。因此，有关经济措施的各条都规定得既

详细又绝对，而有关军事措施的规定则十分含糊，以致根本无法确知这些规定对会员国是否提出了任何实际的义务。

所以，战争既没有被排除，也没有被宣布为非法。只要行政院在其解决争端的报告上不能取得全体一致，或者，行政院认定某一争端是由于完全属于其中一方国内权限范围之内的问题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它不提出任何建议）；或者，如果在“冷却”期结束时任何一方都不接受国际法庭和仲裁人的决定或行政院的报告时，会员国就可诉诸战争而又不违背其义务，从而也就不会受到制裁。盟约制定者们这样谨慎从事也是从实际出发的，不过一国可以诉诸战争而不致受到惩罚的这种可能性却被视为盟约中的“缺陷”。在20年代中曾经在堵塞这些“缺陷”方面，进行了不少工作。

国联甚至还没有正式成立，就遭到一个严重的打击：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和平条约。这一拒绝的含义远远不止是美国将不参与国联的事务，虽然仅此一点就已经十分严重。对于国联会员国特别是英法两国来说，由于这一拒绝，现在的这个国联就完全不同于他们接受盟约时所想象的那个国联了。当盟约提交英国议会时，尽管作为一个海军强国，他们的负担显然将是最沉重的，却没有一个议员对于接受制裁条款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可是一旦领悟这种重负不仅不可能与美国共同承担，而且很容易造成英国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的局面：或者不履行自己对制裁侵略者应尽的义务，或者带头实行海军封锁从而否定美国一贯坚持的公海自由航行权，这时人们对于这些条款的看法便全然改观了。对于各自治领特别对于加拿大来说，美国不参加国联使盟约的实施条款大为改观了。主要由于这个缘故，加拿大代表在1920年国联大会首届会议上提出取消盟约第十条时，盟约的这些条款遭到抨击。提议被否决了，但在以后的两年中重又提出，由此导致1923年通过了一项阐明这一条款的决议，宣布在依照条款履行义务时，各国可自行决定应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它的军事力量。1921年，第十六条也遭到抨击，结果通过了若干实施该项条款的“指导规则”，其后果则是削弱了该项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对于盟约所做的这些修正，即实行制裁不应操之过急或希冀一蹴而就，应该逐渐地、一步一步地进行，而且有关制裁的一切讨论应由行政院进行，从来没有获得法律效力，因为法国拒不批准。但是，在1935年实行唯一的一次制裁时，法国却首先坚决要求这些修正案应作为指导国联行动的方针（参

见下文第259页)。这一切表明，已经有一种把集体安全条款视为危险尝试的思想倾向，如果这种倾向蔓延开来，必将导致各国回到国联成立以前的那种局面，依靠各自的武装力量来进行防御。显然，这还危及国联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将各国的军备缩减到“适足保卫本国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低限度”，因为裁军与安全这二者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参阅第八章）。

协约国曾经提出，凡尔赛条约之所以规定解除德国的武装，是出于实行普遍裁军的需要，而盟约也特别责成行政院制定裁军方案。因此，尽管可能不合时宜，国联却势必要首先处理这个问题。根据盟约建立了一个常设军事委员会作为行政院的顾问。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一个专业性的机构更容易偏重于考虑种种困难，而不是考虑裁军的紧迫需要。于是，第一届大会决定另外成立一个既有非专业性人员又有军事成员组成的机构，即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临时混合委员会。最初，并不是普遍都已意识到裁军的种种困难。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裁军是一件颇得人心的事情，因为许多人认为，军备并非仅仅是说明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一种标志，而是一个引起战争的独立因素。某些人认为，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会议的成功，证实了军备可能主要作为一种技术问题来处理的观点；但是，事实上华盛顿会议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只是因为政治问题同时获得了解决，因为签署协议的5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经济上有能力从事竞争性的造舰活动，而且因为协议范围仅限于主力舰。国联在政治问题方面的会谈情况则迥然不同。美国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因而未对法国做出保证（结果英国也没有做出保证），这就使某些法国人得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德国拥有的较大的潜在实力，必须通过大量赔款、各国军备不等、与东欧小国结成联盟以及利用国联作为使德国就范的一种手段等办法而使之与其他国家达到平衡。

人们不久即认识到，在裁军会谈中，政治解决才是根本性的。1923年，临时混合委员会在一份互助条约的草案中，尝试了政治性解决的方法，把当时已经存在而且几乎肯定非被接受不可的地区性同盟体系，与一个总的安全体系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行政院有权决定谁是侵略者，但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的义务，却局限在位于发生战争的大陆上的国家，而且这个保证仅对那些同意裁军的国家有效。这个条约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否决。英国这样做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因为英联

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和英国海军在世界范围的义务，很难与以地区为基础的条约义务协调一致。尽管英国不是唯一反对的国家，但这就足以决定草案的命运了。因此，1924年的国联大会尝试了另一种不同的办法。被否定的条约本来是要建立一个与盟约的安全体系相互并列而基础不同的安全体系。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肯定了盟约，但试图予以加强。那年，第一次以其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总理赫里欧作为代表的英国和法国提出了一项联合决议案。此项议案成为本届大会工作的基础。人们认为强制性仲裁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新途径，是否予以接受，可以对侵略做出一个类似自动的测验。简言之，仲裁能够带来安全，安全则进而导致裁军。强制性仲裁可以堵塞盟约中的“缺陷”，因为一切争端都要经由盟约中提出的办法之一来加以解决，如果各种办法皆不奏效，最后一着是由仲裁人进行仲裁，仲裁人的决定是最后的。这样，制裁条款便可以适用于一切发动战争的事件，而不像迄今为止那样仅仅适用于违反盟约的战争。然而，整个计划只有当裁军方案在一次会议上得到采纳以后方能生效。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此时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意识到，以致有人提议第二年就举行会议，与此同时行政院应拟出一个草案，提供会议考虑。事实证明，在1932年以前，这个会议一直无法召开。

在对议定书进行辩论期间，英国由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执政，但在英国表态以前，就为斯坦利·鲍尔温的保守党政府所接替，后者决定否决提议。看来未必是由于政府的改换才影响了结局。因为当人们事后比较从容地审核议定书时，那些在大会的热烈气氛中未被发现或估计不足的缺陷便暴露无遗了。议定书的作者关于保证一切争端将无例外地得到最后解决的声明，并没有为它的条款所证实。许多最危险的争端是那些由于属于一方国内权限的事务，或一方要求它并不具备合法权利的某些利益而引起的争端。根据议定书，这些问题只能在现有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做出裁判，这样一来，即便根据法律来处理，仍然不会改变原有的利害冲突，因而使问题继续存在。事实上，对于国联的某些会员国来说，这也确实成为议定书的一个优点，因为它似乎为任何更改领土安排的途径设置了障碍。但是，英国新政府决定否决议定书的态度，由于若干英联邦自治领反对该议定书而变得更加坚定，而且，即便是工党政府在议定书问题上比保守党政府甘冒更大的风险，它对此项反对态度也是不能忽视的。某些自治领提出的它们反对该议定书的理由，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不过，它们一致表示反对，

这就表明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再增加他们已在盟约中承担的制裁义务。同1923年对条约草案的命运一样，英国的否决宣判了议定书的命运。但是，对于那些感到自己不甚安全的国联会员国来说，议定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长久地满足它们的要求，议定书给予它们的保证，实际上仅仅是盟约上规定的那些，而法国及其盟邦却从未以此为满足。议定书所依据的是对国联软弱原因的完全错误的判断。国联之所以软弱，并不是由于盟约在法律上的任何缺陷，而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一旦出现挑战，国联中的大国是否愿意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来对付侵略者，或者，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一个有效的安全体系所依仗的，正是兵力的绝对优势。

在日内瓦，奥斯汀·张伯伦发表了一次讲演（讲稿被公认为出自A. J. 贝尔福的手笔），宣布否决议定书。由于他似乎暗示，没有美国参加，盟约的条款就无法实施，这不禁使人目瞪口呆。但在讲演结束时，他提议“通过缔结目的纯属维持彼此之间长期和平的条约，把那些彼此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的分歧有可能导致新的冲突的国家结合在一起”^[2]，这种特别安排可能会充实盟约。这个含义隐晦的处方似乎预示了解决安全问题的新方法。这篇演说发表的时候，由于1924年年底接受了道威斯委员会的方案，关于德国赔款的问题至少在当时已结束了争吵，并由此而使法国和比利时的最后一批军队撤离鲁尔占领区，这样，当时也就展现出全面安定的局面已经大大加强的前景。1925年年底，张伯伦心目中的特别安排在洛迦诺公约中得到了体现，这种特别安排显然是由于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提出关于多边区域性保证的建议才提出的。由于德国还不是会员国，这些条约的谈判当然是在国联以外进行的。但如果能改变法国的以压倒的力量来制服德国的政策，显然就会改变国联的整个前景，而国联则是一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说它还不是十分得力的话。条约的主要规定是：法国和德国，比利时和德国相互保证不向对方发动战争；一旦这些保证遭到破坏，英国和意大利将立即援助受攻击的一方，并保证德、法之间和德、比之间的边界；以德国为一方，以法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另一方，成立调解委员会；由法国（而不是英国和意大利）来保证德、波之间和德、捷之间的边界。

洛迦诺公约对欧洲局势具有深远的影响，奥斯汀·张伯伦称它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是确有理由的。^[3]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条款。根据英、意两国的保证，只有在“公然的”侵略破坏了条约时才能采取行动；否则，只有在国联行政院确认违约事件已经发生时，才能给予援助。因此，法国的安全没有得到任何加强。而英国拒绝将其保证扩大到波、捷两国与德国的边界问题上，使法国—东欧—德国这个复合体不可能在战略上统一，而这种统一却是法国在此以前一直理所当然地坚决要求的。洛迦诺条约的重要性在于开拓了这样一种前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法德之间一个世纪之久的敌对终于有可能缓和了。自大战以来，德国第一次同它从前的敌人签订了一项经过协商的条约；德国已经同意永远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做出安排，在大会1926年3月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德国将加入国联并将被选为行政院常任委员。不幸的是，这一安排在最后一刻却又节外生枝。另有三个国家，西班牙、波兰和巴西，出来要求作为常任委员的候选国。由于西班牙和巴西此时已经是行政院的非常任委员，选举德国，需要它们投票赞成。大家都感到，无论把另外哪个国家选为常任委员都是对德国背信弃义，因此，大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便宣告散会。然而，在大会的例会召开以前，商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行政院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国数目增加到9个；另设一种新的半常任委员国，它们在三年正常任期结束时，有资格被再次推选；并且达成了默契，波兰将成为这些半常任委员国之一。西班牙和巴西收回了它们反对选举德国的意见，却宣布退出国联。后来，西班牙未等盟约所要求的两年间隔期届满，就收回了退出国联的通知，但巴西离开了国联。

接纳德国进入国联体系，担任行政院的大国常任委员，使凡尔赛和约中单方面裁军的规定成为反常现象。因此，洛迦诺最后议定书有一项规定，各签字国保证“对国际联盟已经进行的有关裁军的工作给予真诚的合作，促使这个工作得以在一项总协议中实现”^[4]。为了实现这项保证，行政院于1925年12月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备它仍然希望在1926年举行的国际会议，但很快就遇到了种种困难。它发现，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各国之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个筹委会下设的各个技术小组委员会竭尽全力，试图处理那些表面看来是技术性的，而实际上却是根源于迥然不同的民族利益的事务，结果只是徒劳无功。甚至“军备”一词的内容究竟包括些什么，也众说纷纭。

如果把军备潜力也包括在内，则构成一个国家实力的经济、地理位置、人口等全部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而其中有些因素是不能算数的，而且所有因素由于科学和技术的价值也在改变都受到影响。然而，要是把战争潜力一概撇开不算，则又非常不公平，只是对某些国家有利。其他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究竟应该仅仅按实际服役的兵员计算，还是要包括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呢；是否应该从国家预算上限制军备的规模；应该以总吨位还是应该以舰只的种类计算海军的力量；应该在什么程度上确定国际监督的形式，来检查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执行情况。在所有这些具体的分歧后面，还笼罩着一层阴影，即某些国家显然一心要求对它们的安全做出更加可靠的保证，以此作为它们裁减任何军备的代价。在1927年6月的会议上，英国、美国和日本三个主要的海军强国，没有能就限制非主力舰的问题达成协议，这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令人失望的因素。筹备委员会将陷入僵局已很明显，然而，1928年在国联以外发生了一个事件，似乎为通过政治的而不是技术的方法达到裁军，提供了新的可能。

1928年大会举行前不久，在巴黎签订了“巴黎非战公约”，即所谓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样，国联会员国由于加入了两个在某些方面相互矛盾的维护和平的体系，所以地位颇为特殊。“非战公约”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以发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而盟约由于存在一些“缺陷”，却在一定情况下允许这样做。公约声明，除了和平手段，不得寻求其他任何解决争端的方法；而盟约却没有绝对保证任何争端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解决，甚至根本就没有保证它必须得到解决。因此，现在如果要把战争排除在外，那么，人们就要问道：对于无法和平解决的争端，将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实际上无关紧要，但就形式讲，无疑需要对公约进行补充，或者把它并入盟约，或者在盟约之外建立一个或许能为非国联会员国所接受的体系来解决争端。前一种方针势必要涉及弥补盟约中的缺陷，从而把制裁条款扩展到适用于所有的战争。虽然英国政府这次背离其拒绝承担更多义务的政策，支持了这样一种计划，这个方针却没有被接受。相反，大会制定了一个不修改盟约，而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补充公约的计划。议定书规定，由争端各方分别与所有其他各方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法律性的争端提交常设法庭，非法律性的争端提交仲裁。尽管往往带有许多保留，议定书还是被广泛地接受了，不过，它完全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议定书准备仓促，模棱两可之处比比皆是，纯粹是

一纸理论性的空文。它所提议的调解委员会始终无济于事，而且议定书的拟定者希望用调解委员会取代国联，也是一个倒退。因为，行政院具有这些委员会无法具备的优点：行政院享有威信，它的成员都是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人士，并且习惯在一起工作；对于提交给它的案件，它拥有掌握有关事实和法律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价值已经得到证明，而它们是那些短命的委员会根本无从掌握的。

因此，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为之进行工作的政治关系方面，毕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1930年筹委会最后制定出一个原则声明草案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于1929年爆发，和希特勒的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后成为德国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世界总的局势已经大大地恶化。这个声明草案即使对于争执中的问题，除了表示一下反对的立场外，也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声明草案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但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都不包括在内。由于日本侵略满洲并公然抗拒国联，不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但是，这时要把定于1932年2月召开的已经长期拖延的世界裁军会议再予推迟已不可能（参见下文第二十三章）。但是，从会议一开始，德国就提出平等的要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辩论都蒙上一层阴影。1932年6月，德国又以退出国联相威胁。12月，裂痕暂时用一个含糊其词的方案予以弥补，这就是在原则上既承认德国要求平等的权利，又承认法国要求安全的权利，但却没有表明二者如何取得一致。在会议再次召开以前，希特勒担任了德国的总理。几个星期以后，日本通知退出国联，尽管它仍然参加会议。英国企图提出一个以拉姆齐·麦克唐纳命名的新的草案挽救即将失败的会议。会议于1933年夏季休会，这个方案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后，被定为今后讨论的基础。但是，直到会议复会的那一天，才得知德国已经离去并宣布退出国联。会议从未正式解散，不过，这已经宣告了它的崩溃。一年以后，对于国联来说，希特勒的兴起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这就是苏联的态度出现了彻底的大转变。1934年9月，苏联被选入国联，担任行政院的常任委员国。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日内瓦就再没有一个盟约原则的鼓吹者比苏联代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更为雄辩的了。

在实现和平以后的数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存在着战争心理。国联既没有可供运用的实力，又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声誉作为后盾。所以，当一个国家企图以巧取豪夺的方式为自己攫取某些利益，

并在全世界面前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时候，国联往往无法使它的裁决生效。此外，由于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和它分庭抗礼的权力机构，更使国联的困难有增无减。这些机构最初是协约国的最高委员会，后来是设在巴黎处理和约未了事宜的大使会议。它们与国联之间在职能上没有明显的区分，后者发现自己有时被排斥在本应属于它处理的事务之外，有时又被要求去处理前两个机构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几乎已达到无法解决地步的问题。提交给国联的第一起争端是1920年瑞典和芬兰之间有关阿兰群岛主权的纠纷，它成功地安排了一个为双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但是数周以后，又出现一起更为棘手的事件。波兰一位擅自行动的将军泽里戈夫斯基攻占了维尔那这座有争议的城市，破坏了停战时规定该城归属立陶宛的局面。他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波兰政府的同意，尽管波兰政府当时否认这一点。国联枉费心机地试图劝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同意在国际监督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末了大使会议却在1923年把它判给了波兰。另一起能够得逞的侵略行为是1923年1月立陶宛人占领梅梅尔。在没有决定它的归属以前，梅梅尔原是由协约国掌管的。在大使会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联行政院时，占领实际上已经被接受，不过，国联在这个问题上总还算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使德意志人居多数的该市市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1923年8月，国联机构第一次被要求处理一个大国的侵略行为。代表大使会议调查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问题的委员会中，有一名意大利成员特利尼将军遭到暗杀。意大利人没有等待对情况进行任何调查，就向希腊索取赔偿，并在一阵使许多人丧命的炮击以后，攻占了科孚岛。希腊人一面向国联呼吁，一面又声明他们准备接受大使会议做出的任何裁决，这样就使意大利在法律上有理由申辩说，既然争端已经由另外一个机构进行调解，国联就不应插手干涉。但是行政院拒绝接受这种申辩，商议了一项解决办法，决定大使们应调查谋杀的责任所在，常设法庭应确定希腊偿付多少赔款，并让希腊人筹措5000万里拉等待判决。大使会议和希、意双方都接受了这一解决办法。可是，科孚岛被占领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大使会议突然又决定希腊立即付给意大利5000万里拉的赔款。显而易见的是，这笔钱是意大利为从科孚岛上撤军所索取的代价，因为这种占领是不会被考虑，而且这样做法是绕过国联进行的。行政院甚至在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之间也没有能做到主持公道。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感到，如果没有国联的存在，这场纠纷可能导致一场普遍性的战争；而且，尽管意大利

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一个大国毕竟不得不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从而墨索里尼事实上在以后的11年中处理与国联会员国的关系时不得不谨慎行事。因此，事件的结局并不完全令人沮丧，似乎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国联机构在顺利的情况下会被证明是有效的。国联在处理下一个提交给它的争端时的态度，似乎使这一希望得到了证实。1925年10月，由于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发生边界冲突，希腊军队入侵保加利亚的领土。保加利亚立刻向国联呼吁。德拉蒙德迅速采取行动，3天内就召集行政院的成员开会。行政院主席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批准这一行动，并且打电报给双方，劝告他们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希腊人接到这个电报后，取消了即将发动的攻势。行政院在巴黎开会，它在达成停火协议以后，便着手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以便决定争端的是非曲直。据委员会报告，过失主要是在希腊人一方。于是，行政院确定由希腊付出一笔赔偿金。国联在这件事上的彻底胜利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希望：它开创了一个也许可供今后同样顺利地效法的先例。但是岂不知这次的条件是特殊有利的。希腊是个小国，而大国这次却破例地联合起来了，其中又没有政治问题的纠缠。行政院这次所起的作用很像19世纪的“欧洲协同比”有几次起过的那样。希腊总算受到威慑而屈服了，但在国联后来的历史中，这些夤缘时会的条件却注定不再重现。

在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问世后的这几年，是国联大有希望的年代。一些迹象表明，国联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正常而必要的部分。国联的三个主要国家的外长：张伯伦、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认为有必要亲自出席大会或行政院的几乎一切会议，他们三人之间日益形成的相互信任，对于欧洲局势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欧洲其他各国的外长也大都以他们为榜样，开始按时出席日内瓦的会议。美国虽然没有做出愿意加入国联的任何表示，但已开始比较友善地看待国联的工作，并参加了它的许多非政治性活动。1927年，苏联也开始采取同样的态度。在这几年中，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危机来考验国联的结构是否正确。虽然赔款、安全和裁军这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是，在这种已开始盛行的更加友好气氛中，它们似乎不再是无法解决的了。

随着1929年和以后数年中经济大萧条的来临，国联短暂的乐观时期结束了。1931年，它面临着自1923年以来第一次、不久即被证明为

一个大国直接破坏盟约的行动。这年9月，驻扎在南满铁路的日军进攻并迅速解除了沈阳及其附近城镇中国驻军的武装，赶走了中国的省政府。他们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受到中国威胁的南满铁路地带日本利益和侨民的自卫行动。中国的这种威胁似乎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国民党政政府决心要从中国把包括国联中其他一些主要会员国在内的外国特权和租让地清除。在此之前，日本在国联的表现一直是良好的，因此，在没有确实了解的情况下，日本代表的陈述最初就按照它的表面价值而被人接受了。到了12月底，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满洲，日本政府发表的无意侵占满洲的信誓旦旦的声明与日本军队的行动风马牛不相及，这时要采取有效的行动，已经为时过晚。

中国曾立即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向国联呼吁（参见第二十三章）。行政院最初提出派遣一个调查团的主张，由于日本反对和美国拒绝合作而被放弃。于是，行政院便努力劝说日本把军队撤回到铁路地带以内，日本表示保证这样做。但是，到10月中旬，情况已经很清楚，日军不仅没有撤退，而且继续向前推进。行政院因此于10月24日提议确定一个全部撤离的日期。国联的立场，似乎由于美国同意派遣一名代表参加行政院而强硬起来。但是，美国的代表奉命只是在讨论涉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问题时，才发表意见。而且，事实上，他在第一次礼节性的出席会议之后，只发过一次言。日本代表投票反对10月24日的决议，因此，根据当时对盟约第十一条的理解，从而就使这个决议不具有合法的效力。由此，第十一条的调解程序，表明它对于一个大国的一意孤行，是完全无能为力的。12月，行政院为时已晚地最后做出决定，派遣一个由5个大国代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组成的调查团，日本表示同意，只要中国提出的日本军队首先应撤回到铁路地带这个唯一的条件被否定。

在调查团动身以前，事态已经恶化。1932年年初，上海爆发了一场抵制日货的风潮，日本以施加轰炸和调入军队数月不撤作为报复。3天以前，中国根据盟约第十五条提出申诉，因此，使国联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有可能使会员国根据第十六条，承担起对日本实行制裁的责任。他们还根据盟约所给予的权利，要求把申诉转交给大会。因为在大会上小国占大多数，而这些小国认为它们的安全有赖于有效的集体安全。为此，大会在3月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不承认使用与盟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相反的手段而造成的变动；并成立一个特别

委员会，从行政院那里把寻求解决争端的任务接受过来（这是第一次把一个特定的政治问题移交大会处理），但却决定等待以英籍团长命名的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这个决定几乎是必然的。所有这些拖延都有利于日本计划的成熟。当调查团终于到达满洲时，才知道日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成立的“独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于9月到达日内瓦，行政院和大会相继对此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个权威性的文件，对满洲的特殊状况也做了充分的和公平的考虑；但总的来说，报告对于日本行动的规模进行了谴责；它特别坚持中国应对满洲拥有主权。1933年2月，大会接受了报告的主要部分。一个月后，日本为此宣布退出国联。但是，报告中提到的解决条款已无法实施；而且，这时即使大会裁决（它并没有这样做）日本无视其盟约义务而发动了战争，制裁问题也根本无法提出。但这却是日本的所作所为。侵略已经犯下而却不受谴责，小国对于国联的信心已严重地动摇，它们和大国之间的裂痕已经出现。国联中大国会员国准备实施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软弱无能，已暴露无遗。

国联在满洲问题尚未了结时，又不得不将它的注意力转向南美洲发生的两起战事。其中一起是由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在查科地区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所引起的，战争从1932年6月开始，到了第二年的5月，巴拉圭正式宣战。虽然国联派出的一个委员会没有获得任何成果，但国联总算实施了武器禁运，最初是对交战双方都实行禁运，后来，当玻利维亚终于迟迟地向国联申诉并表示愿意接受大会的建议以后，则仅对巴拉圭实行禁运。禁运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从未彻底生效。双方随着战争优势的易手，轮流地表现出顽强态度。1935年6月，战争终于结束。它的结束不是由于国联的任何努力，而是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

对于南美洲的另一起争端，国联的调解较有成效。1932年6月，一批秘鲁人擅自占领了莱蒂西亚村附近一段无疑是属于哥伦比亚的领土。对于这件事，秘鲁政府最初是反对，后来则改为支持。哥伦比亚向国联呼吁，行政院通过了一份要求秘鲁人立即撤退的报告。秘鲁最初拒绝遵从，但是，后来政府更迭，于是，双方同意邀请国联派遣一个委员会，在撤退之际管理争议地区。

但是，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粉碎了对恢复安全体系所抱的任何残存的希望。1934年12月，在埃塞俄比

亚和意属索马里兰之间，两国军队在靠近没有划定的边界的瓦尔瓦尔发生了冲突。由于意大利要求赔偿，埃塞俄比亚便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向国联申诉。于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次提交国联。在行政院下个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两国之间的一项条约，决定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在此以前，行政院暂缓对它进行考虑。意大利迟迟不指派仲裁人，仲裁法庭一直到7月才开庭。9月间，仲裁法庭做出裁决，宣布双方都不受到谴责。但是，早在这以前很久，瓦尔瓦尔事件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意大利扩军备战所达到的程度，已无法再继续隐藏其居心。早在3月，埃塞俄比亚就要求把问题作为“可能引起决裂”的争议，根据第十五条来加以考虑。遗憾的是，它提出请求恰好和德国否认凡尔赛条约中的裁军条款是同一时间，英国和法国那时极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疏远意大利的行动。因此，行政院对这个请求再三拖延。10月3日，当行政院仍在忙着准备一份报告，打算提出它所认为的“公正而合适”的解决方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侵入埃塞俄比亚。

这样，从战争开始起，争端已经以种种形式提交国联处理达10个月左右，本来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国联安全体系的创建者颇为自信的“冷却”办法。然而，安全体系这次不得不解决的侵略事件，据意大利总司令德·博诺元帅后来透露，是两年前就已策划的。国联缓慢的步伐不仅没有起到使各方情绪冷静下来的作用，反而有利于侵略者的安排得以完成。一直到9月，行政院由于在英法两国的领导下采取了一再拖延的做法，已经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中无数公开支持国联的人们中间，造成越来越大的失望。墨索里尼的指望，即国联的作为也不过是像在满洲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也变得强烈了。但是，英国政府由于在一年之内行将举行大选，对于舆论不能置之不顾。因此，大会在9月间开会时，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便宣称，英国支持国联“主张共同维护盟约的完整，尤其主张对任何无端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共同抵抗”^[5]。法国代表皮埃尔·赖伐尔对霍尔的发言表示支持时含糊其词，不能令人信服。对于墨索里尼气势汹汹悍然决定侵略埃塞俄比亚，这时已经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在10月7日，行政院除意大利外的所有委员国，都宣布本国政府同意行政院委员会报告的说法：意大利已经“无视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二条而发动战争”^[6]。在10月9日、10日和11日的大会上，除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全都

受了意大利的影响）和意大利以外的全体会员国，都表示类似的一致意见。国联会员国各自对一份引用了盟约第十六条开头词句的报告表示同意，并表示接受实行制裁的义务。于是，它们便着手筹建一个委员会以协调它们进一步的行动。

墨索里尼对于国联反应之迅速而有力，几乎肯定会感到意外。但他也无须担惊害怕。如果按照盟约条款的字义执行，盟约第十六条要求国联会员国立即断绝同意大利的全部贸易和财政关系，禁止与意大利公民的交往，并阻止意大利人与包括不管是否国联会员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的一切财政、商业和个人的交往。但是，协调委员会决定不采取这个绝对不交往的政策，而按照1921年的决议行事（参见第247页）。第一步，先劝告各会员国禁止从意大利输入货物，以及向意大利贷款和输出某些原料。看来，为了不給意大利人带来太大的不便，这些禁令都是经过选择的，其中没有包括石油禁运，而在一些有能力的评判者看来，实行石油禁运本可以对意大利的行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许可以认为，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即使不采取石油禁运，已经实行的有限制裁也足以产生效果；同样也有这种可能：公众舆论迟早总会迫使各国政府甘冒可能招致报复的危险，实行石油禁运。但是，最后为了不致使意大利投入德国的怀抱，法国人采取了一种旷日持久的拖延行动，而且取得了成功；因为，由于意大利人对待完全没有防御设备的军队和平民不加区别地施用毒气，1936年初埃塞俄比亚的抵抗终于瓦解了。在此以后，显然只有军事制裁才能产生影响，但国联的各个大国却不肯使用。在7月4日大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取消制裁。1937年12月，意大利宣布退出国联。

这是国联安全体系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不仅因为这次事件的借口要比满洲事件那次少得多，而且因为这是在国联主要大国英法两国空唱高调地表示抗议的影响下，第一次采取的强制性制裁程序。人们已不再可能相信它们所宣称的维护盟约的决心和愿望是真诚的了。此后再也不曾有哪个国家认真地提出执行实施和平的条款。从此，国联只是消极地目睹极权主义国家的侵略，唯一的例外是1939年12月在苏联进攻芬兰后把它逐出了国联。国联对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所做的反应就是把奥地利从国联会员国名册上勾销。无论捷克斯洛伐克于1938年，还是波兰于1939年，都认为把它们的问题提交给日内瓦毫无意义。在这些年间，人们普遍地感到，应当对会员国显然无意遵守的

那些盟约条款进行若干修订，事实上，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建议。但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国联是否应继续拥有某种形式的、可能以地区而不是以全球作为基础的强制力量；或者，从此以后，就让国联仅作为一种便于进行磋商与合作的机构。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这个争论始终悬而未决，盟约也始终未曾修改。

除了这些人们希望通过它们实现和平的政治和外交措施外，国联在国际社会与经济合作方面开展了范围广泛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启发，即可以通过消除某些非常可能触发战争的摩擦因素，直接或间接地解决爆发战争的问题。这些活动的开展更多地要归功于史末资将军的著名的小册子：《国际联盟：一个切实的建议》。他在这个小册子中敦促国联应成为“各国共同国际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世界文明共同体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见得着、具有生命力的、而且有效的组织，它在各国的一般和平交往中起着如此强有力的作用，以至它在国际争端中成为不可抗拒的……”^[7]根据这些宗旨而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国际劳工组织。它是根据和约中专门的一章建立的自治机构，旨在通过国际行动进一步改善劳工的处境，其机构包括：（一）全体会议，由每个成员国各派4名代表组成，其中2名政府代表，另外2名由政府征得本国产业组织的同意后选派，分别代表资方和劳方。它的职能是为国家的立法提出建议，起草各种须经国家批准方能生效的协定。（二）国际劳工局，它是该组织的秘书处，由12名政府代表，6名资方代表和6名劳方代表组成的领导机构控制。费用从国联基金中支付。凡是参加国联的国家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国，虽然非国联会员国也可以被选入。由于本身的工作性质，该组织有幸避开了国联的主要机构不得不面临的那些政治风暴。而且，不同国家的雇主可以超越国家疆界发展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不同国家的雇工也可以这样做，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根据国联大会和行政院具有的一般权限的规定，也建立了一些技术组织。其中第一个建立的是交通运输组织，它的基本章程成为以后建立类似组织的范本。它包括全体会议，每隔4年左右召开一次会议，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成，其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国联会员国。一个顾问与技术委员会，由不代表政府的专家组成，开会较为频繁。还有一个秘书处。委员会就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对国联和有这种要求的个别政府提出咨询意见；在解决交通问题的争端时，它可以充当调解

委员会；它负责调查和起草全体会议所要讨论的协定。它设立了一系列专家委员会，处理铁路运输、内河航运、港口、电力和其他若干有关通信的特殊问题。全体会议促进就通讯问题签订的国际协定，不时地就一些专门的议题召开特别会议。盟约第二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该组织的总目标为：“保证并维护通信与运输的自由。”虽然这一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它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它提出的一些协定得到采纳并付诸实施。但是，取得的成就并不如它本来可以取得的那样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通信问题都涉及政治意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苏联和德国不愿参与许多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一致意见才能生效的计划。

在经济方面，国联早期在处理一些十分紧迫的战后复兴问题上，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中突出的一例是复兴奥地利的财政。许多国家向奥地利提供了救济贷款，但这些毕竟只能应急一时，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贷款。很明显，只有一个治本的复兴计划，才能挽救奥地利经济的彻底崩溃。然而，进行任何这类计划的关键在于，有权向奥地利索取赔偿的国家必须首先同意延缓付款，从而使它能提供在足够大的规模上进行借贷所需要的保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联行政院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能够在它的一个专员的监督下，实施了一项紧缩和改革预算的综合计划。这项计划使奥地利的情况迅速好转，经济处于稳定状态，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期，它才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同被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席卷。后来，在匈牙利实施的复兴计划，就是仿效对待奥地利的一套做法。

在指导国际经济关系使之得到长期改善方面，国联的努力收效甚微，在20年代初，各国经济政策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变得只顾本民族的利益，对此，国联的工作很难取得进展。况且，在国联成立的早期年代中，关系到国际经济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赔款和盟国间的债务，然而，它对这两个问题都无权过问。第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重要事项是在布鲁塞尔组织一个财政专家会议，讨论纠正战争遗留的金融混乱的措施问题。虽然专家们一致同意所提的建议，但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这些建议要使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都发生重大的改变，但这点是各国政府既不乐意而且也许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然而，这次会议的一个成果是决定把会议的临时筹备委员会变为常设财经专家委员会，附设一个秘书处作为办事机构。后来，这个委员会被分成财政和

经济两个独立的委员会。1927年，经过长期和周密的准备工作，在日内瓦举行了世界经济会议。这次会议又提出了一份值得赞许的报告和各种建议。但两年后，由于经济大萧条的袭击，这些建议失去了一切可能付诸实践的机会。为了解决大萧条的问题，1933年又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世界经济会议。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对于必须采取的措施持有相反的意见，而且美国在会议的中期又改变了方针，因而使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国联在经济方面遗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许是它的经济情报局所做的一系列的研究，以及对经济情报的收集和传递工作。国联可以诊断出经济疾病的病因，找出合适的医治方案，却无法强迫患者采用这些方案。

在国联所有的社会公益服务部门中，可能要数卫生组织的工作最有长远的价值。最初，为了制止因战争和革命而在东欧流行的斑疹伤寒和霍乱的蔓延，成立了一个传染病防治委员会，卫生组织的工作便从此开始了。不久，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小亚细亚，大批被赶出家园的难民拥入希腊而造成了种种卫生问题，这个委员会又被用来协助希腊政府解决这类问题。1923年成立了常设卫生组织，其中包括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一个顾问委员会、一个较小的卫生专家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从此，这一组织的工作便迅速开展起来。传染病防治委员会扩大成为常设的传染病防治机构，在收集有关某些疾病的资料以及把这些资料分发给全世界各个全国性的和港口的卫生当局方面所做的工作，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卫生组织的另一部分工作是使药品、血清、疫苗和维生素标准化。这对于在各国科学工作者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所推荐的标准，现在大部分已收入各国的国家药典。1935年，当大会责成该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及国际农业研究所共同起草一份有关营养问题的报告时，它又从事了一项新的重要课题。报告于1937年发表，它以惊人的方式揭示出饮食不足或不适当的人数是多么众多。报告导致许多国家成立了国家营养委员会，为达到所推荐的标准而努力（顺便说一句，这些标准很快就被发现对制订战时定量配给计划颇有用处）。最后，卫生组织还能应邀对某些希望改进其卫生部门工作的国家提供咨询意见和帮助。尤其是中国，它在一个有关改组检疫机构、训练医护人员以及指导消灭天花与霍乱的全面改革方案方面，得到的这类帮助是无法估量的。

国联还在其他许多更为有限、然而却是重要的领域，促进了国际合作。早期的一项重大慈善工作是南森博士举办的。他于1921年担任国联处理难民问题的专员，把他的晚年贡献给了这样一项工作：设法安顿成千上万因战争或和平解决方案而失去家园和国籍的不幸的人们。根据希腊政府的请求，这项工作扩大到设法解决1922年由于土耳其侵占小亚细亚，致使该地一百多万人口拥入希腊而造成的令人震惊的问题。在国联着手清除的社会罪恶现象之中，还有关于贩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的问题。对贩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曾经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于1921年达成一项协定。有关贩卖毒品的问题，由于毒品容易私运，这种生意又是一本万利，所以，仅仅采取国家措施几乎毫无效果。由于贩卖毒品的详情尚未弄清，国联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就每个国家对某些规定的毒品的进出口，达成了特许制度的协定。以后，对这一特许制度又补充了一项措施，即把毒品生产国的产量尽可能限制在与医药和科研需要量相接近的范围之内。这一方案由贩卖鸦片问题常设中央局和顾问委员会监督执行。最后成立的技术机构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委员会。它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国际接触，在教师、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中间建立一种国际意识。由于各国政府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并且缺乏经费，因此，这个委员会遇到的阻碍甚至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大。

国联各会员国所愿提供的经费确实极少。整个国联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常设法庭以及它的建筑投资在内，每年平均经费为160万英镑，其中英国分担了约15万英镑。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写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致力于人道主义和科学方面，国联所开展的关于思想和方法的相互交流与探讨，其范围之广和领域之多，显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组织所无法比拟的。

在国联的后期，由于安全体系的瓦解和极权国家的敌意，使得它必须改变其技术组织的工作方法。筹划召开大型全会，或希望就各国利益一致的问题达成协议，都已无济于事了。相反地，召集有限的国家集团的会议或者代表个人的专家会议来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方法逐渐兴起，例如糖和小麦的问题，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人们的兴趣也从政府的活动转向个人的利益。除已经提到的营养问题外，以这种方式解决的问题还有关于财经困难、经济萧条、贸易周转、金本位制以及卫生和住房等问题。同时，还产生了一种赞成增强社会福利性

和技术性机构的独立地位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布鲁斯子爵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提议，应当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接管大会和行政院对这类机构承担的责任，包括批准它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要求。后来，被联合国宪章指定为它的“主要机构”之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采纳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除了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这两个主要职能以外，国联还有和约加给它的许多迥然不同的义务。例如，它被授权修订和约的一些条款，解决有关解释条约的若干分歧；参与为要求有德国参加的协定确定条款；对于奥地利独立地位的任何更动，都必须征得它的同意。但是，除了这些它被要求或被授权去做的特殊事项以外，国联还承担了某些具有连续行政特点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盟约本身所包括的对于委任统治制的监督。根据这一制度，从战败国夺得的那些“其居民尚不能自立于今世特别困难状况之中”的殖民地和领土，被置于“受国联的委托”的先进国家的“监护”之下（见下文第292页）。盟约产生了一个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为行政院提供咨询意见，并接收来自各个受托国的年度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积累了大量有关殖民地问题的经验。它的成员不是作为政府的代表，而是根据他们个人在工作方面的专门资历委任的，他们懂得如何估价殖民地管理的各种困难。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常常发现委员会的建议和批评颇有效用，逐渐认识到他们有着合作的真诚愿望，而丝毫没有吹毛求疵的想法。无论行政院还是委任统治委员会，都没有权力去胁迫一个受托国，但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是卓有成效的。

国联在另一项有些类似的工作中却不很成功。这项工作是监督各保护少数民族条约的执行情况，这些条约是由各大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这些依靠协约国的胜利才获得独立或扩大了领土的国家签订的。这些条约要求有关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给予占少数的种族、宗教和语言集团以一定的权利，并把这些权利的执行置于国联的“保证”之下。但是，除了依靠劝说和宣传的压力以外，这些条约并没有赋予国联以实施这个保证的其他手段。因此，这个保证的作用便随着国联本身威信的起落而改变。行政院拟出了一套处理少数民族申诉的程序。就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程序。它规定了若干是否接受申诉的准则，由秘书处来执行；它建立了一套常设委员会的制度，来研究那些认为可以接受的申诉，并决定其中哪些

申诉有必要提交行政院全体会议。这一程序的作用比人们有时想象的要大，这是由于人们通常只根据它的失败进行判断，而这些失败又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时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件申诉未经提交行政院就解决了，事情是以机密的方式处理的，所以，国联并不一定总能得到它应享有的荣誉。然而，只有当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所在的国家双方都学会求同存异，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有效的保护少数民族的制度，而在国联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一条件却远远没有实现。这类条约与受它们约束的大多数国家中所盛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有时倒可能激起那种有害于领土安排稳定性的领土收复主义的情绪。由于签订这类条约被看作一种民族地位低下的标志，特别是由于没有一个大国要遵守类似的义务，而且，作为大国之一的意大利在从奥匈帝国索取的领土上推行臭名昭著的相反政策，这类条约也往往遭人怨恨。在国联后期，对这一制度的信任自然地下降。1934年，波兰宣布不再承认行政院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裁决。

和约加给国联的另一项艰巨任务是关于但泽地区的归属问题。但泽是一个以德意志人为主的都市，但它的位置邻近维斯杜拉河口，使它成为波兰的天然港口，在19世纪以前显然就一直是波兰的入海门户。因此，协约国为了把波兰的这个重大利益与它们所承认的作为领土安排依据的自决原则调和起来，就把但泽从德国分割出去，建立为一个“在国联的保护下”的自由市。它的宪法将在一位由国联指派的高级专员的同意下制定，然后，它便被置于国联的“保证之下”。这一安排包括，规定但泽的自治局限于波兰的利益范围之内；波兰可以随意使用但泽的码头，控制维斯杜拉河和市内的铁路系统，处理但泽的对外关系，并把但泽划入它的海关地区。有一位高级专员代表国联常驻但泽。

鉴于但泽地区的各种利害冲突极为复杂，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是持久不变的，除非双方都承认它的权威性，或者，如果做不到这点，至少要有一些强制执行的力量作为后盾，这一安排才有可能生效。这两个条件无一得到满足。高级专员的职责是调解争端，并作为宪法的保护人，但是，他没有统治但泽的权力；国联根据他的决定听取申诉。当争端提交日内瓦时，常常发现在日内瓦较为冷静的气氛中，是可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的。但如果争议双方中有一方固执己见，那么，无论是国联还是它的专员，都没有强制执行决议的权力。从根本

上说，但泽与波兰的关系从来都不过是德国与波兰关系的一个方面。当德波关系良好时，但泽的情况就顺利；当德国对波兰的政策变得带有侵略性的时候，但泽的事态就变得恶化了。在1939年前的最后几年中，柏林攫取了管理但泽事务的权力，纳粹对该市逐步实行专政，条约规定的解决办法被彻底地破坏了。

为了赔偿法国北部煤矿的破坏，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放弃对萨尔盆地的控制权，转由国联托管该地，并且立即把该地的煤矿割让给法国。国联被指定负责成立一个由一名法国人、一名萨尔人和三名不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人组成的五人管理委员会。15年以后将举行公民投票，在维持条约安排、与法国合并还是重新归属德国之间做出抉择。如果选择的是后者，则德国要从法国人手中重新买回煤矿。委员会从一开始，前景就不妙。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他的一些同僚被怀疑为过于偏袒法国。但是，即使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委员会，面对着交给它的工作中的种种困难，也会感到气馁。它不得不在一个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从无到有地组织起一个行政体系。委员会是被强加在愤懑的人民头上的；由于这一地区的归属问题有待于前途未卜的公民投票来决定，这里的人民便处于长期动荡不安的状态；委员会始终受到柏林企图破坏它的权威的敌对宣传的攻击。随着委员会主席的更迭和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萨尔地区的气氛有所改进，委员会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可靠的和高效率的政府机构。在它的领导下，这一地区的经济和财政繁荣起来了。当公民投票的日期临近时，形势再度恶化。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实行恐怖统治，看来进行正常的公民投票已不可能实现。但结果是，幸亏国际势力在最后一刻给予了保护，1935年1月才顺利地举行了公民投票。投票的结果是，愿意重归德国的票数占了绝大多数。总的说来，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同时证明，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

自1939年12月开除苏联的那次会议以后，在战争期间，国联大会再也没有召开，但经济和社会工作并未中断，虽则其范围必然很有限，而且，还要想方设法维持国联的机构及其章程完整无缺，保证重要的工作持续不断。国际劳工组织迁到蒙特利尔，卫生部门和贩卖鸦片问题常设中央局迁到华盛顿，经济、财政和运输工作移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但是，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事实已经很明显，一个新的组织将取代国联。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以后，那些对国联的命

运负有责任的人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设法以一种与国联曾在世界事务中所起过的作用相称的方式来结束它的活动。国联和联合国的代表制定了一个计划，后来在第二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联大会上通过。经过共同议价，国联在日内瓦的建筑和图书馆移交给联合国，成为它的欧洲总部。国联秘书长奉命为联合国提供一切便利，协助这个新机构接收它可能决定承担的那一部分国联的非政治性活动。常设法庭正式解散，由一个新的国际法院代替，章程几乎没有变动。国际劳工组织作为一个与联合国有着密切联系的自治机构继续存在。根据1946年4月18日大会的决定，国联终于宣告解散。

（朱小红 译）

[1] 盟约第三条和第四条。盟约引文见F. P. 沃尔特斯《国际联盟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卷，第五章中所载盟约文本。

[2] 国际联盟的《正式议事录》，第6年，第4号，行政院第33次会议，第450页。

[3] 引文见A. 沃尔弗斯《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哈考特和布雷公司，1940年），第260页。

[4] 《国际联盟条约集》，第54卷，第299页。

[5] 国际联盟《正式议事录》，特别补充记录，第138号，第16次大会，第46页。

[6] 国际联盟《正式议事录》，第16年，第11号，行政院第89次会议，第1225页。

[7] 引文见沃尔特斯《国际联盟史》，第59页。

第十章 1900—1945年的中东

20世纪前半叶的中东史，可视为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酝酿过程——这场危机始于18世纪末，没有一个地区和社会角落终于能够幸免。导致这场危机的，乃是传统的穆斯林社会和欧洲的接触。前者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后者则有如旭日东升，在军事上不可一世，而且，扬扬自得，充满信心，朝气蓬勃，励精图治。欧洲对中东的影响最初是在军事方面。由19世纪最初几十年起，中东各国政府就已日益感到欧洲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远比它们优越；为了扭转这种劣势，它们采取了一条当时看来是捷径，即向欧洲购买武器并仿效欧洲的军队编制，以为这样既能对付欧洲的威胁，又可转而威胁在采用这种新技术上比它们落后一步的邻国。

然而，与欧洲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的这种接触，却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恶果。我们不妨先以奥斯曼帝国为例。谢里姆三世（1787—1807年在位）和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二人相继废除了传统的奥斯曼军队，从而为建立一支欧洲式的征兵制军队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样一支军队，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来领导和一批受过欧洲军事技术训练和欧洲军事思想教育的军官来指挥。而中央集权制又不可能仅限于军事，因而到19世纪末，由于日益中央集权化（并由于诸如有线电报和铁路等使中央集权化成为可能的交通方面的改进），奥斯曼帝国对其国土管辖之严格，和它对其臣民事务管制之严密，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因此可以说，采用欧洲军事技术和行政管理方法，既延长了奥斯曼帝国专制制度的寿命，也促进了一些中间性的组织和社团（如近卫军、手艺行会和同业行会、某些享有自治地位的宗教团体等）的衰亡，而这些组织和社团过去却曾起过某种立宪制的作用，因为它们曾非正式地但却有效地限制了奥斯曼帝国君主在理论上所享有的无限权力。

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就需要一批受过欧洲军事技术和行政管理技术训练的、因而势必受到欧洲政治和社会思想熏陶的新式军官和文职官员。由于现代化——它本是由苏丹及其左右人物所倡导和实现的——并未明显地使帝国能抵御野心勃勃的欧洲，这个由受过欧洲

训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所组成的新阶层，对一手提拔他们起来的政府日益感到不满。他们声称，仅仅靠技术不能够消除帝国的弊端，只有实行立宪制议会政府才能铲除积弊；他们认为，这才是欧洲的优越性的根源所在。首先成功地实现这一主张的是新奥斯曼党人。他们在一名任内阁大臣的高级官员米德哈特帕夏的率领下，趁国内政局动荡和国外有军事威胁之际，说服新登基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12月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规定设置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届议会共有120名经过选举产生的议员，于1877年3月举行了首次会议，但不到一年于1878年2月便被苏丹解散。由于苏丹不容它有考验的机会，遂使新奥斯曼党所鼓吹的只有使内阁对颇孚众望的议会负责，只有推行地方和各省自治才能救国的主张成为一种空谈，一个没有实现的诺言，这在哈米德以后统治的30年中，一直是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阶层梦寐以求的理想。

哈米德在位期间，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的趋势一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贯穿了整个19世纪，席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伯纳德·刘易斯教授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执政的初期，整个‘坦齐马特’运动，即立法、行政和教育改革运动取得了效果，达到了顶点。同时，在坦齐马特时代已初露端倪的那种建立一种新式的、中央集权的、权力无限的专制政体的倾向，也取得了效果，达到了顶点。”^[1]事实上，不妨说，正是哈米德提倡的教育——平民教育和军人教育——和发展铁路及电报的政策取得成功，才导致了他的政权的崩溃。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他们日后都成为军官和行政官员——受到欧洲式教育和思想的熏陶，因而日益对现政权感到不满，而恰恰是这个政权兴办了各种学校，使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交通的改善，又将这些新思想传播到帝国的穷乡僻壤，而在这以前，这些新思想是几乎无法到达这些角落的。其结果是，对奥斯曼帝国传统制度的合法性表示的怀疑，信仰自由，盼望变革——不论是和平的或暴力的——思想在受教育的各阶层中普遍传开。在哈米德执政的30年中，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不断得到加强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政变成为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发动政变者只要一举消灭或推翻国家最高当局即苏丹，就可控制整个帝国及其军政机构。

事实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就是如此。这年7月，驻在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总部设在萨洛尼卡）的一批图谋叛乱的青年军官发

动兵变，兵变迅速蔓延到整个集团军和驻在埃迪尔内的第二集团军。当有迹象表明，苏丹从伊兹密尔派去镇压叛军的部队也同情叛军时，苏丹屈服了，因于7月24日接受了萨洛尼卡军官提出的要求，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但不久就发现，苏丹无意按立宪议会制来治理帝国。由军官们组成的统一进步党一直和阿卜杜勒·哈密德为争夺权力而进行斗争，但胜负一直未见分晓，因为哈密德地位虽已摇摇欲坠，但仍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很大的势力。这种令人忐忑不安的局面直到1909年4月才告结束。1909年4月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不论是否出于哈密德的授意或纵容，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集团军哗变，扬言宗教处于危险之中，这就促使萨洛尼卡派出一支所谓“行动军”、向伊斯坦布尔进军。“行动军”于4月23日抵达伊斯坦布尔。它粉碎了这次反叛乱，于是统一进步党便废黜了苏丹并取而代之。但不久就发现，君主专制制度并未因此就变成了立宪制度，仅仅是原来苏丹的权力转移到那批胆敢废黜他的军官们的手中而已。尽管举行了选举，选出了议会，但并不是议员控制政府，倒是政府操纵选举而控制议会。实权不在议会，而是掌握在那些发动1908年7月政变和平息1909年4月的反政变的军官们手中。不久就看出，这种权力是不受宪法制约的。既然这种权力是通过政变获得的，只有发动一次类似的政变才能粉碎它，而不是限制它。1911年，统一进步党内部发生分裂，反对该党统治的势力开始抬头。因此，统一进步党于1912年1月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结果当选的议员中除6名外，其他的议员都是亲政府派。这次选举遂被称为“大棒选举”。同年7月，一批称为“救国军官团”的军官们在军队中策动一场运动，迫使统一进步党政府下台。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继任者，苏丹穆罕默德·雷夏德——他实际上只是一名傀儡——批准了“救国军官团”提出的人选，任命了一个新政府。统一进步党议会也被解散，举行了新的选举。1913年1月，一批统一进步党军官，在1908年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思维尔上校（1881—1922年）的率领下，冲进了内阁正在举行会议的政府大厦，随即与政府成员发生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一名军官开枪打死了陆军大臣。内阁在武力威逼下被迫辞职。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统一进步党对帝国的统治再也没有遭到挑战和非议。于是原来苏丹的稳定的传统专制制度就为不稳定的军人统治所取代。在军人统治下，统治者动辄以武力夺取并保持其地位；文职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梦寐以求的现代立宪议会制政府最后终于实现了。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在1908年至1914年之间所

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奥斯曼帝国及其继承者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些事件开创了近代史上现已屡见不鲜的军人干预政治的先例，即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批青年军官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能够为扫除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弊端而提供良策，因而他们便进行策划并实行干预政治。这些事件还表明，这种危机已日益威胁整个中东政治。在过去，传统的统治者与其臣民还有共同的思想体系，何况在长达数世纪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中间性的组织和社团，它们起了斡旋、缓冲和制约的作用。在这些组织和社团中，有的——如米勒特制^[2]——是当局为了便于治理而设置的；有的——如近卫军——则是由于统治制度的腐败，趁机在帝国中僭取于半独立的地位。而现在，这些开始搞政变的军官和文职官员，由于他们具有西方思想，便和他们决心想改变其命运的这个仍然是传统的旧社会格格不入。此外，上述的那种新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这批军官就是它的产物和结果——主要破坏了或削弱了传统的中间性组织和社团。而恰恰是这些组织和社团，过去虽非正式地，但却有效地“代表”了各种主要的社会势力，并在这些势力和中央当局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式选举中，当选的都是合乎当局心意的人。这样产生的议会既不能监督也不能制约政府，因为议会本身全赖政府才有今天。在奥斯曼帝国，代议制实际上意味着代表性反而有所削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颁布宪法的另一个中东国家是伊朗。伊朗的情况和奥斯曼帝国出现的情况截然不同。伊朗在19世纪所受的西方影响，远不及奥斯曼帝国，它根本没有经历过像奥斯曼帝国由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到阿卜杜勒·哈米德所倡导和推行的那种持续的和彻底的西方化。尤其是伊朗的军队，一直处于软弱和落后的状态，既不能抵御外侮，也不足以维持国内安全。在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最成功的一次要算是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年）进行的那一次了。他于1879年聘请俄国军官训练并指挥一个伊朗哥萨克旅。直至礼萨国王（1925—1941年）推行改革前，这支部队一直是伊朗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有作战力的部队。由于伊朗根本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自然也就没有其重要的共生物——一个人数众多、受过欧洲军事教育的军官阶层。由于同样原因，伊朗始终是一个旧式的东方君主专制国家，基本上不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由于革新，竟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极权国家。

但是，伊朗在军事、经济、思想上当然不能不受到欧洲的影响。和在中亚的其他地区一样，伊朗是俄国和英国角逐的场所。这两个国家都力图在这里建立并扩大自己的势力，并要消灭对手的势力。此时，欧洲的经济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将通过金融家和谋求特许权者的活动，迟早要把伊朗纳入它的范围之内。有线电报便是一个说明欧洲势力在伊朗不断增长的标志。它是由一家英国公司——印欧有线电报公司于1858年第一次引进伊朗的，1862年以后就扩大成为一个庞大的通信网。此外，还有与欧洲接触而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阶层中的少数人，这些人人数不多，却颇有影响。

欧洲人的活动和欧洲人的势力在伊朗引起了动乱，1891—1892年的所谓“烟草抗议”便是一例。早在纳赛尔丁国王统治时期，伊朗国内即已骚乱四起，其中尤以纳赛尔丁国王统治初期巴布教徒所煽动的那几次救世起义最为严重。但烟草抗议却具有这种旧式起义所没有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在以后导致1906年颁布宪法的一系列事件中还将一再出现。欧洲与伊朗交往，向伊朗的宫廷和文官各阶层打开了取得和消费财富的新的前景，而出让开发伊朗各种资源的特许权——通常都带有垄断性——似乎是大量增加收入方便的和没有痛苦的办法。1890年，国王把垄断伊朗烟草的加工、销售和出口的特许权给予了一家英国公司。这一让步引起了全国的普遍反对。研究一下伊朗社会中究竟哪些团体发动和组织了这次抗议，这是有意义的。本国的商人和放债者认为这种垄断对于它们的利益是一种威胁，因此立即表示反对。什叶派的穆斯林学者也声援他们；因为什叶派并不主张完全听命于世俗的君主，而这在逊尼派占优势的地区则是盛行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自萨伐维王朝起就被定为国教，这一派认为只有哈里发阿里^[3]的那名自幼遁迹的第十二代后裔才是穆斯林世界的合法统治者，而这位隐遁的伊玛目总有一天会回来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而在此时，解释圣典的权力归神学家，他们由于精通圣典，熟谙先例，有资格做这位伊玛目的代言人。因此，一俟这位隐遁的伊玛目出现其权力即告结束的世俗统治者，必须尊重神学家的权威，服从他们的旨意。什叶派的另外两个特点，也有助于加强穆斯林学者的地位，使得他们一致反对世俗统治者的斗争更为强大。一是什叶派的一些最神圣的圣地如卡尔巴拉、纳杰夫、卡齐迈因都位于奥斯曼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境内，不在伊朗国王的管辖之下，而这些圣地拥有一些什叶派最著名的神学

家，伊斯兰广大虔诚的教徒们把这些人的话奉为金科玉律；二是，正由于广大群众对这些著名的神学家的崇拜，伊朗的穆斯林学者在伊朗的社会中才具有影响和力量。在烟草抗议中，这些穆斯林学者由于有伊朗国内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学家的费特瓦给他们撑腰，便运用他们的势力来反对出让特许权；事实证明，这种势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显示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他们宣布抵制烟草，禁止各种形式的吸烟时，他们的禁令普遍地得到了遵守。穆斯林学者所以反对出让特许权，无疑是出于对异教徒和外国人的仇视；他们深深地怀疑欧洲人的办法和思想迟早要推翻传统的宗教。随着反对国王的斗争收到了成效，穆斯林学者们无疑也因能显示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而感到高兴。与商人及穆斯林学者们共同组织和坚持这场抗议运动的第三类人，则和前两类人大不相同；他们人数少得多，力量似乎也小得多，但现在看来，却是最重要的。这些人认为，伊朗的弊端起源于传统的制度，只有采取激进手段，才能有效地予以清除。换言之，这是一些西方派，他们本身就已经——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西方化。伊朗的西方派只能来自文职官员和知识分子各阶层，他们人数不多，在纳赛尔丁统治的最后10年前后，开始鼓吹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不得不谨慎从事，因为在一个宗教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的国家里，他们很容易被扣上异端的罪名而身败名裂。为了应付这一危险，看来至少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故意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给他们的西方思想披上一层穆斯林的外衣。这些革新派中的一位著名人士马尔坎汗曾在1891年的《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波斯文化”的文章，文中直言不讳地论述了这些策略：

正由于伊斯兰教……（文中写道）是集亚洲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海洋……因此，不论你想推广何种新法律或新原则，都能在其中找到许多箴言或准则来作为论据。至于构成欧洲文明基础的那些原则，我们必然要设法援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决不能直接从伦敦或巴黎搬用这些原则，决不能说这是出自某国大使之意，或是出于某国政府的忠告（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是说它是出自伊斯兰教，并且是有据可查的。这并不难做到。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体会的，我们发现，由你们在欧洲的代理人提出的因而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些主张，如果能证明是伊斯兰教所固有的话，人们就非常乐意接受。我敢说，在波斯湾和土耳其，尤其是在波斯，我们所看到的稍许进步，都应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人接过了你们欧洲人的原则，却不说它们出自欧洲，出自英国、法国或德国，而是说：“我们和欧洲人毫无关系。这些原则本来就是我们的伊斯兰教的原则（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是欧洲人由我们这里‘取’去的！”这话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也正是他的朋友，著名的杰马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在伊朗和其他地方所推行的策略。对于这些现代化派来说，烟草抗议可以扩大成为反对整个政府的运动，以便趁机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

因此，这三派势力——商人、宗教人士和现代化派——尽管动机截然不同，却能采取一致行动。凭借有线电报，他们发动的这场运动迅即席卷伊朗全国。俄国人担心烟草的垄断会加强他们的英国对手的实力；因此，这场运动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得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响应，结果国王只得取消特许权。

取消特许权对政府的权威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政府对于人民运动的压力无条件的屈服，不仅使人们对它的行为是否正当产生了怀疑，而且也无异默认了比较极端的批评者对它的指责：专制、贪婪、腐败。烟草抗议使日后在1905—1906年颁布宪法时又再次听到的种种不满公开化了；它使国王和政府是可以受到约束的甚至可以靠人民起义来推翻的这一思想，为人们所熟悉起来。1896年纳赛尔丁国王被刺一事，足以说明在烟草抗议时期散播的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而暗杀本身又使这些思想进一步流行起来。这位国王是在杰马勒丁·阿富汗尼煽动下，由他的一名追随者——米尔扎·穆罕默德·里扎刺死的。凶手是一个本质纯朴，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人。因此，他为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辩解是颇值得注意的。他所以暗杀国王，首先是为阿富汗尼“这位圣者和先知的真正后裔”报仇，因为国王于1891年逮捕了阿富汗尼并把他逐出伊朗。但是，更使米尔扎感到愤慨的乃是这样一幅景象：

成千上万贫苦的波斯臣民，由于不堪忍受压迫和暴政而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靠最悲惨的办法锄口谋生……殊不知（他往下说道）你的羊群需要有草地来放牧，它们才能增加奶水，才能哺育自己的羊羔，并为你提供奶汁；你不该在它们还有奶水的时候拼命地挤，直到它们奶水挤干后又吃它们的肉。你的羊群现在已经四处逃散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暴政的结果。

由于这种种原因，他才暗杀了国王，并且毫不含糊地声称，如果纳赛尔丁的继位者不更弦易辙，定将落得和他父亲一样的下场：“只要……他仍然采取这种行径，那么，这种下场就是不可避免的。”有人问他，他既然如此忧国忧民，为什么又做出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动乱

的事情，岂非自相矛盾？他回答说：“不错，确实是这样，但请看一看法兰克人的历史吧：如果想不流血而能实现崇高的目的，那只是妄想。”

在莫扎法尔丁国王（1896—1907年）统治时期，这种引起商人、穆斯林学者和现代化派不满的状况非但没有好转，甚至变本加厉。伊朗的外债越来越多，为了偿付外债的本息，不得不增收赋税。这就给伊朗的经济增加了负担，引起了群众对外国的剥削、官吏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提出强烈的抗议。秘密团体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特别在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的各个阶层中间，大力宣传革新和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就在1904年，各种团体决定联合起来，统一步骤，以推翻专制统治。1904年5月28日，大约有60人举行秘密集会，商定了一项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共有18条，其中第十六条就提出“实行革命”。如前所述，现代化派一直小心翼翼，以免被扣上异端的罪名；就此而言，纲领的第十四条和第十七条是颇值得注意的：第十四条规定委员会传播的一切言论必须合乎伊斯兰教规，以免任何成员被指控为异端；第十七条则规定其成员不得参加非伊斯兰教的集会。此后不久，一个叫作“秘密会”的组织于1905年2月成立。根据它的纲领所说，其目的是要唤起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铲除暴政，以及设法清除弊端。1905年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全国各地普遍地并且公开地出现了反对国王、大臣以及俄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势力的运动。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居然惨败于一个东方国家之手）以及相继而来的俄国革命，对这种激昂的情绪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具体触发一系列事件从而最后导致颁布宪法的，还是人们对1903年实行的新关税法的不满，因为商人们认为新关税过于苛刻。1905年，由于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新关税法，各个城市都爆发了抗议行动。尤其是一群德黑兰商人，他们跑到首都附近的沙阿卜杜勒阿齐姆清真寺避难，要求纠正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国王当时正在国外，由他的王储摄政。王储为了平息商人的不满，答应一俟国王归国即加以纠正。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政府与首都的以及各省的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得到缓和。下列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加兹温省总督虐待一名毛拉；克尔曼省总督下令对当地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处以毒打脚底的刑罚；士兵向反对马什哈德省总督的示威群众开枪，等等。这些事件使形势进一步恶化。12月间，首相指责一些商人抬高糖价，将他们加以逮捕并处以毒打脚底的刑罚，因此，一批商人跑到德

黑兰的一座清真寺去寻求庇护，以示抗议。一些知名的穆斯林学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随后也到该寺院寻求庇护。但在一名拥护政府的毛拉的唆使下，一群人把他们赶出了这所清真寺。于是，这些抗议者便和他们的追随者离开首都，前往沙阿卜杜勒阿齐姆清真寺避难。最后，这里的避难人数竟达两千人左右，一个月后，他们仍无离开寺院的迹象。他们在那里受到朋友们，也许还有一些阴谋反对首相的知名人士的资助、供给和鼓励。国王为了结束这种有损自己的权威与声望的事态，亲笔签署了一封给首相的信，许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许诺颁布一部法典并设立司法部以监督法典的实施。这大概是对一个秘密团体前一天公开提出的一项要求做出的反应。这些抗议者对国王的许诺感到满意，于是便返回德黑兰。但是，不久发现国王的诺言并未实现，因此再度爆发了抗议运动。一些秘密团体以及对它们表示同情的穆斯林学者便谴责暴政，并不断地把国王没有兑现的诺言公布于众。6月间，首相企图把两名有势力的穆斯林学者逐出德黑兰，从而发生了骚动。于是，一大批穆斯林学者、商人和其他人士又跑到寺院去避难，不过这一次是去库姆的清真寺。德黑兰的商人与手艺人罢市，市场关闭。7月19日，另一批人跑到英国公使馆的花园中避难，此后陆续又有许多人跑去；到8月初，估计在这些花园中露宿的人竟达12000人左右。正如1月间被迫做出让步一样，国王又再次做出让步，将这位不得人心的首相撤职，并于8月5日下诏成立国民议会。9月举行了选举，10月7日国王召开议会。议会立即着手起草并通过了一项基本法，国王于12月30日批准了这部宪法。1907年10月7日，又颁布了基本法补充条款。

这场运动刚开始时，原是针对财经方面的压迫的。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提出的要求是颁布法典和进行司法改革。因此，可以说，成立立宪代议制政府原是国王的缓兵之计，但结果却使自己毫无回旋的余地。立宪代议制政府恐怕恰恰正是现代化派和西方化派所追求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巧妙地利用了国王的软弱和失策。从1906年12月30日的基本法和1907年10月7日的基本法补充条款中就可看出，在反对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穆斯林守旧派和欧化维新派——并可看出，维新派的观点显然占上风。基本法补充条款的第一条体现了守旧派的观点，因为它规定贾法里派（即十二伊玛目派）的伊斯兰教“为波斯国王必须信奉并振兴之教义”。第二条甚至比第一条还更明显带有守旧派的色彩，它规定：

凡由经当代之教主猊下（愿真主佑他早日降临！）恩助，经伊斯兰教万王之王陛下（愿真主佑他万寿无疆！）恩准，经伊斯兰教诸见证（指神学家）（愿真主佑彼等日益众多！）及波斯国全体民众关怀而成立之神圣国民议会所制定之法令，不得与伊斯兰教之神圣原则或由众生之灵猊下（指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佑他及其家族平安！）所立之教规有任何抵触。

这一条款进而规定设置一个由五名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审查立法提案，委员会有权“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或推翻与伊斯兰教圣规相抵触之立法提案，使之不得成为法律。关于此类问题，应遵从该教义委员会之裁决，本条款永久有效，直至当代之见证猊下（指隐遁的伊玛目，一俟他再度出现，就是天下大治之时）（愿真主佑其早日降临！）问世为止。”

与这条始终是一纸空文的条款相反，这部宪法中却充满着许多无疑是出自欧洲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了欧化派势力之大。例如，基本法的前言第二段就提到国王赋予“每一国民”以通过普选选出国民议会成员之权利。基本法第二条声称，议会代表“伊朗全体人民，从而使他们得以参预国家之经济、政治事务”；基本法补充条款第八条也声称：“伊朗帝国人民在基本法面前享有平等之权利”；第二十六条：“国家一切权力均来自人民”；第三十五条：“主权（系神赐的恩典）乃人民委托国王行使之权力”。这种认为国家是由享有种种“权力”的“个人”所组成，因此，政府权力来自人民，“主权”也由人民委托给君主观点，当然是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理论完全背道而驰的。同样，宪法规定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内阁对议会负责，也都是和传统的做法和理论背道而驰的。

结果不出所料，在这种情况下颁布的这样性质的一部宪法，在伊朗这样一个国家中即使是采用甚至和宪法的起草者原来的意愿相去万里的方式，也是行不通的。马扎弗丁于1906年10月7日召开了议会。他于第二年1月去世，由其子穆罕默德·阿里国王（1907—1909年在位）继位。从一开始就可看出，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大臣们是完全反对议会的，而俄国人在这场争端中则是站在他的一边的。这时，国王的权威大为损伤，而议会的权威又未建立，维持法律与秩序至为困难。各省出现骚乱，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8月，某个秘密社团的一名成员暗杀了亲俄、反对宪法的首相。12月，国王逮捕了支持议会的新首相和大臣，企图重新显示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慑于德黑兰和各省的

群众大哗而一时未能得逞。1908年2月，有人向国王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但是国王幸免于难。6月，哥萨克旅炮击并驱散了议会。著名的群众领袖被逮捕，其中两人未经审判即被绞死。6月27日，国王解散了议会，并以违背伊斯兰教规为名废除了宪法。于是，阿塞拜疆的首府大不里士的秘密社团揭竿而起，将国王的士兵驱逐出大不里士，并坚守该城约9个月之久，使围攻该城的军队无法越雷池一步。在腊什特和伊斯法罕等地，也组织了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一支由巴赫蒂亚尔部落人组成的部队由伊斯法罕向首都进军，在与腊什特的部队会师后，于1909年7月13日进占德黑兰。穆罕默德·阿里逃入俄国使馆避难，并于7月16日退位。同日夜间议会举行会议，正式废黜了穆罕默德·阿里，由他的12岁的儿子艾哈迈德（1909—1925年在位）继位。

临近1909年年底，举行了第二届议会的选举。1909年12月5日，第二届议会举行会议。它的命运简直和第一届议会一样地多灾多难。在政府中占压倒优势的巴赫蒂亚尔部落的领袖们并不尊重宪政，国家处于混乱之中。俄国人因而想乘机树立和扩大他们在伊朗的地位。在第二届议会产生后约18个月，即1911年6月，事态已到严重关头。前国王企图复辟，他潜回伊朗，并煽起一场叛乱，卢尔族人和土库曼族人也投靠他参与了这场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前国王也被迫逃亡。但是，这些事件却使得伊朗的形势更为混乱，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英国为了保护其在伊朗南部的利益，遂派遣军队在布什尔登陆。俄国人则趁机增加自1909年夏起就已驻扎在伊朗北部的俄军兵力。1911年5月，一名叫摩根·舒斯特的美国人被任命为伊朗政府的财政大臣。俄国人对此极为不满，便开始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最后竟于11月24日发出为时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撤换舒斯特。政府深知自己无力抗拒俄国人的压力，因此有意屈从，但议会却要抵抗。政府为了打破僵局，遂强迫解散议会，并中止宪法。1909年当巴赫蒂亚尔部落人向德黑兰进军建立这个政府时，曾宣布其目的是要重新建立宪政，现在伊朗的宪政实际上已寿终正寝，直至二次世界大战末。艾哈迈德国王于1914年7月达到法定年龄，遂趁机恢复议会制。但是，第三届议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的情况下召开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各方面来说，都对伊朗有百害而无一利。德国人及其奥斯曼帝国盟友自然竭力煽动反俄和反英的势力。由于俄英两国在过去10年中经常干涉伊朗内政，两国在伊朗的文职官员和知识分子各阶层中不得人心，因此德国人的阴谋在这些阶层中极易得逞。德国人的活动自然要促使俄国

做出反应。1915年11月，俄国军队似乎正朝着德黑兰进军，议会被迫解散，大多数议员逃往库姆。议会要到1921年才复会。但是，到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解决办法已使伊朗政府摇摇欲坠，形形色色的觊觎政权的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的天性和所采用的办法当然不是要实行宪政。其中一人是哥萨克旅的一名军官礼萨·汗，他通过军事政变统治了伊朗，并于1925年自立为国王。礼萨·汗从1925年起任国王到1941年止，一直未遭到挑战。在他统治期间，议会虽按时开会，但不过是为政府装饰门面而已。

在这个阶段中，中东的另外两个国家的宪政经历，并不更妙一些。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两国的宪政运动，乃是本国民心所向的产物，是这两个国家对西方的挑战做出反应的结果。欧洲国家的政策，可能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立宪运动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是，埃及和伊拉克的情况则不然。它们的立宪政府却是由一个欧洲国家——英国一手炮制的。埃及自1882年起即被英国占领。1883年，英国在埃及设立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但二者的职责纯粹是咨询性的。1913年，取消了上议院，下议院的权力就有所增加。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下议院自1915年起休会，以后一直没有复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便是埃及展开了反对英国占领者的运动，因为后者于1914年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英国政府终于让步，于1922年2月28日发表宣言承认埃及独立。早在1914年，埃及名义上原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封埃及的统治者为“赫迪夫”。在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后，为了表示其地位的变化，埃及的统治者改称“苏丹”。1922年2月28日宣言宣告埃及独立后，为了标志这一新纪元的开始，又改称国王。埃及独立后，将成为一个立宪制王国，设立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1922年4月，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0月间提出一部宪法草案。草案声称，主权属于人民；并规定举行选举，选出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国王法德，原是在1917年因其兄去世而出乎意料之外地继位的。此人素以专横著称。他竭力反对这个宪法草案。他对草案进行了多处修改，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最后，在英国高级专员阿伦比的强大压力下，他才于1923年4月批准了这部已被他改得面目全非、根本不起作用的宪法。如果没有英国施加压力，是否会颁布这样一部或其他任何一部宪法，这只能是一种揣测。但是，英国人认为迫使法德颁布一部宪法既有必要，也是可取的，这一点毕竟是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英国人认为独立的埃及

应成为一个具有向议会负责的代议制政府的君主立宪国家是可行的。事实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埃及的政治史，却一直不断地使英国人感到失望。其原因正如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君主立宪制失败的原因一样，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中，西方式的选举和代议制根本起不了代议的作用，因而也无法产生一个对议会负责的立宪政府。在君主制的埃及，历次选举非但不能决定开罗政府的性质，而选举本身却为控制开罗政治舞台的某一派所左右。在1923年的选举中，华夫脱党获得压倒的胜利。这是一个由萨阿德·扎格卢尔建立并由其控制的民族主义运动。扎格卢尔1918年在法德的鼓动和怂恿下，曾经反对英国把埃及变为它的保护国的做法。1923年，国王法德对他的支持使他在选举中得益不少，因为他的政敌是受到阿伦比的支持的。而阿伦比迫使法德勉强地批准宪法，实际上就是代表着这些政敌的做法。扎格卢尔组阁后，在执政期间曾试图通过游行示威等手段，胁迫法德交出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的政府寿命还不到一年。1924年11月，英国驻苏丹总督被恐怖分子所暗杀，而这些恐怖分子与华夫脱党有关。于是，扎格卢尔辞职，法德遂解散议会并任命了一个非华夫脱党的内阁，内阁随即重新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扎格卢尔派和政府派在议会中平分秋色。在君主立宪制的埃及举行的历次选举中，选举的结果不是随着左右开罗政局的某一派的意愿而转，这还是破天荒的一次。其原因无疑地是由于新政府还来不及消灭华夫脱党的组织或使其丧失活动能力。因为扎格卢尔执政期间，已经使他的政党得到巩固。新议会于1925年3月举行一次会议后，随即被解散。政府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一年多；在此期间，国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继阿伦比担任英国高级专员的劳埃德勋爵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他运用他的影响和权力，说服埃及政府进行选举。英国高级专员当时拥有的影响和权力仍然很大，因为1922年2月28日宣言虽然允许埃及独立，但规定英国仍然拥有保卫埃及、英帝国的交通设施的安全、保护外侨以及英埃苏丹仍由英国管理等权力。埃及政府被迫举行选举，对法德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华夫脱党在1926年5月的选举中取得多数选票，便足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立宪责任制政府的程序，按理应由扎格卢尔组阁，但由于劳埃德的反对，改由一名非华夫脱党人出任首相。翌年，扎格卢尔去世，他的继承人纳哈斯利用该党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迫使国王任命他为首相。不久，他与英国人发生冲突，尽管他的党在议会中居多数，法德还是解除了他的职务，解散了议会，并任命自由立宪党领袖

穆罕默德·马赫穆德为首相。新首相中止了宪法，并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一年。1929年，英国工党执政。工党政府希望缔结一项英埃条约，按照工党政府的意见，这个条约只能和一个有权代表埃及人民发言的政府进行谈判并签字；而只有一个在议会中据有多数席位的政府，才有权代表埃及人民。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使得工党政府的这种看法占了上风，穆罕默德·马赫穆德的职位就要保不住了。随后举行的选举表明穆罕默德·马赫穆德——也就是法德遭受了一次挫折，因为华夫脱党赢得了压倒的多数票。华夫脱党组阁后，却未能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于是，国王解散内阁，任命非华夫脱党人伊斯迈尔·西德基为首相。西德基解散了议会，颁布了一部旨在加强首相职权的新宪法，举行了新的选举。选举结果是议会中反华夫脱党人占压倒多数。这届议会由1931年一直维持到1936年；在此期间，埃及实际是由法德通过他的手下人统治着。1936年，英国又想和埃及缔结一项条约。他们再一次表示，他们只能和一个有资格代表埃及的埃及政府谈判。他们显然仍然认为，只有华夫脱党才代表埃及人民，至少代表大多数的埃及人民。因此，从选举结果华夫脱党人占压倒多数可以看出，国王的政策显然又遭受了一次挫折。纳哈斯组织了一个华夫脱党政府，于1936年与英国签订了英埃条约。同年，法德去世，由其子法鲁克继位。但他当时还未成年，直至1937年7月他成年后才执政。法鲁克和他父亲一样，敌视华夫脱党，因而他于12月解除了纳哈斯的职务，任命穆罕默德·马赫穆德为首相。穆罕默德·马赫穆德解散了1936年选出的议会。因此华夫脱党便遭受了挫折。1938年选出的议会中反华夫脱党人占多数席位，便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届议会一直存在到1942年；这时，英国人由于对国王的亲轴心国倾向深感不安，便策动一场军事政变，迫使国王任命纳哈斯为首相。纳哈斯重新举行选举，结果华夫脱党人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法鲁克才能将纳哈斯免职。他的继任者解散了1942年选出的议会，在新的选举中，反华夫脱党人取得了压倒多数。1945年选出的议会是在君主立宪制下，唯一一届有始有终的议会。1950年，华夫脱党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这恐怕是国王与华夫脱党之间达成谅解的结果。1952年7月埃及发生军事政变，从而结束了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

在伊拉克，英国人推行和确立的宪政，也证明是一次惨败——但其原因则有所不同。伊拉克是由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占领的前奥

斯曼帝国的三个省——库苏尔、巴格达、巴士拉——所组成的。这三个省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南部，绝大多数居民是信奉什叶派的半定居的农业人口，他们一向听从部落首领和纳贾夫、卡尔巴拉两地的神学家的领导；北部多数为库尔德人；西部和西北部则为大批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牧民。英国政府于1921年把这几种人和其他人强行组成一个在巴格达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扶植麦加谢里夫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为国王。在这个以什叶派和库尔德族人居于多数的国家中，掌权的政治家和官吏却是来自居于少数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这些人过去一直效忠奥斯曼帝国，因此自然推崇和仿效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这些人又给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加上一种带有浓厚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想将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个由不关心政治的不同部族组成的人民。在这一大堆复杂化问题和潜在的矛盾之外，英国人又要在这个国家推行君主立宪制和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从而使问题更为复杂了。1925年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规定成立一个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伊拉克当时尚未独立，不过是一个委任统治地，英国高级专员起着监督、约束和调解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选举显然也是按照政府的意旨进行的。1932年委任统治结束后，选举和议会就成了巴格达的一小撮政客在政治赌博中的筹码。伊拉克的政局由于基础非常狭小，因而极不稳定。从1921年至1958年这段君主立宪期间，内阁更迭达58次之多。由于政局的基础狭小和不稳定，政客们往往采取宪法以外的手段来取得和保持权力。1934年至1936年间，他们为了迫使巴格达政府更迭，遂利用治安管理不善的南部的一些部落的不满情绪挑起叛乱。叛乱被伊拉克军队镇压下去。军官们一旦发现政客们非依靠他们不可时，他们自己便通过与这派或那派政客进行勾结，开始干预政治。因此，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军事政变层出不穷。1941年4月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使一个亲轴心国的政府上台，这就促使英国进行了干预，从此伊拉克政府便处于英国的监管下，直到1945年。1945年以后，由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已不可能再发生30年代那样的部落叛乱了。同时，通过不断清洗和严格的控制，军队也无法干预政治。但是，这些措施最终证明是无用的。1958年7月爆发的那次流血政变，终于结束了伊拉克的君主立宪制。1945年至1958年间，伊拉克首都的一小撮政客们之间，仍然继续玩弄这种缺乏广泛基础的政治把戏；他们操纵选举，钩心斗角，彼此倾轧。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立宪运动，有助于提高西方在东方各国的威望，但是，埃及和伊拉克的立宪运动，却是欧洲在征服和强大的军事优势的基础上，施加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欧洲的控制力量逐渐地、最后全部地撤出了中东。这种情况与在这以前的几十年间几乎整个中东都处于这个或那个欧洲国家的势力控制下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

欧洲在19世纪期间对中东各国领土的大举侵犯，可以说是以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开始的。但是，欧洲和地中海的力量均势，在几十年中间一直普遍地起着作用，不允许法国进行兼并或占领。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才根据在柏林会议上达成的一项交易，正式把阿尔及利亚西边的邻国突尼斯变为自己的保护国。

同样，英国自1882年出兵在埃及登陆以平息“阿拉比叛乱”所造成的骚乱以后，即对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行使有效的、尽管是非正式的保护国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另外两个中东国家的领土也被欧洲国家征服和占领。意大利本来就对突尼斯怀有野心，不料突尼斯竟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因此，意大利自认为有权取得“补偿”。唯一合适的领土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省的黎波里。意大利政府在取得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或默许后，于1911年9月28日向伊斯坦布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居住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人受到虐待，因此将派兵登陆进行保护；并限奥斯曼帝国政府于24小时内表示同意。尽管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意大利政府——或许是由于决心要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力——却于次日宣战。的黎波里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奥斯曼帝国终于被迫于1912年10月签订了乌希条约，将的黎波里割让给意大利。

同年，法国根据非斯条约，把摩洛哥的大部分变为其保护国。自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以后，法国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必然要紧张起来。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界不是尚未划定，便是划得不够明确；因此，冲突原在意料之中。法国的力量显然比较强大，而摩洛哥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着大片柏柏尔族居住的山区，这片地区是摩洛哥苏丹的统治鞭长莫及的地方。法国作为一个称霸北非的国家，它认为自己迟早总要控制摩洛哥的。它所以不下手，并非慑于摩洛哥的军事力量，而是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阻挠和反对。尤其是英国的政策一直坚持主张摩洛哥应独立。但是，英国于1904年放弃了这项

政策，以便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法国对英国占领埃及的默认。在同年4月签订的英法协定中，英国政府声称：“法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其领地与摩洛哥大片接壤的国家，有义务维持该国的秩序，并为该国在行政、经济、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提供必要的援助。”继英法协定之后，同年9月又签订了一个法西协定。该协定将直布罗陀对岸北摩洛哥的一部分割让给西班牙。此外，为了安抚意大利，则允许它在黎波里可以放手行动。但是，德国仍然反对法国的野心。但是，法国于1911年将刚果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德国，以换取可以在摩洛哥自由行动的权力。

1912年法国把摩洛哥变为其保护国一事，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耗资巨大的绥靖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摩洛哥在1912年时的状况，在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写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是他于本世纪初任英国驻丹吉尔公使时写的，他写道：

我对当地政府的成员越了解，我对改革或进步所抱的希望似乎就越感到渺茫。当地政府的主要方针和任务，就是先挑拨各部落间的关系，然后支持这一部落打败另一部落，向打败的部落勒索金钱，最后又向战胜的部落索取巨款，作为援助的报酬。这些官吏希望这些部落两败俱伤，变得一无所有，仅能苟延残喘，这样它们才能俯首帖耳，不足为惧。他们认为，如果让一个部落安居乐业下去，这个部落就会（相对地）富足起来，从而就要购置枪支弹药，摆脱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方针下，难怪这个国家就要变得如此落后，商业日益萧条，商人无法收回债款。这纯粹是掠夺、欺诈、权术和恶政。我曾到过许多东方国家，但从未见过如此黑暗的国家。我所遇到的人们，其愚昧无知的程度，简直令人无法置信。除非有外界的推动，否则这个政府还将原封不动地苟延下去，但是只要稍稍推动一下，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就会被摧垮。

然而，这个大厦非但没有垮台，却由于法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和行政改革反而得救，大大地增强了力量。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而艰难的，因为这个国家在3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没有平定。及至30年代中期，尽管摩洛哥的中央政府仍在法国的控制之下，但其蕴藏的力量之强大，是多少世纪以来任何一个摩洛哥土著政府所未有过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法国人在摩洛哥实行中央集权制和镇压反叛方面，花费了那么多的资财，流了那么多的血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运动才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并且摆脱了保护国的地位。在突尼斯以及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崩溃时被英法占领的各省所发生的情况，也和在摩洛哥所发生的情况大同小异。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处理办法，欧洲的势力扩大了，几乎控制了整个中东，虽然为时不过一二十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并站在同盟国的一边，事实证明，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影响究竟有多大，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英国彻底地、明确地抛弃了它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一贯政策。这一政策虽然直至柏林会议前后还得到各方面广泛的赞同，其实，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20年中间，就已经不那么得人心了。及至1914年，奥斯曼帝国对英国来说，已是无足轻重了。这一点从当时英国已不怎么热心要把奥斯曼帝国拉到协约国一边或者至少争取它保持中立，就可看得很清楚。但是，虽然到了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对于英国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利害攸关的了，但也没有出现什么情况，必须立即制定另一种政策。但是，大战一旦爆发，势必要明确地另行考虑态度与方针。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英国宣布埃及和科威特为英国的保护国。其他一些具有更为深远意义的行动也接踵而来。1915年年初，英国远征军在加利波利登陆，目的是要攻下伊斯坦布尔，摧毁奥斯曼帝国的政权。这件事立即引起俄国提出要求英军一旦取得胜利，伊斯坦布尔应由俄国占领。英国人和法国人于1915年2、3月间同意了俄国的要求。不让伊斯坦布尔和两海峡落入俄国人之手，原是英国政策的一项首要原则；因此，英国一反原来的态度，势必要产生深远的后果。事实上，这就是说要由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有理由分得一份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盟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英法两国于1915年11月间开始磋商，商定了一项瓜分的计划。俄国在获得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一些有利于俄国的修改后，也参加进来。这便是1916年5月签订的、以英法两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姓名而命名的赛克斯—皮科协定。1915年4月签订的伦敦密约，已经同意意大利在参加协约国后，可以在瓜分小亚细亚时取得“应得的一份”。这一诺言已经及时地兑现，1917年4月英法两国根据圣让德莫里昂协定，同意将士麦那和艾登省以及以北的一大片势力范围让给意大利。因此，到1917年年中，英、法、俄、意之间已经秘密商定，一旦取胜后即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将取得直到巴格达以北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沿岸的一块飞地——海发及其周围地区。可以说，这两块英国领地将由包

括叙利亚南部、叙利亚沙漠和外约旦在内的一大片土地“连接”起来。法国将取得黎巴嫩、吉里吉亚并可在叙利亚内地及摩苏尔省行使最高权力。俄国除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外，还将取得东安纳托利亚的大片领土。巴勒斯坦则将由国际共管。

这些秘密协定本来就够复杂的了。再加上其他种种计划、谅解，就更加错综复杂。大战初起时，麦加的谢里夫在英国的怂恿下，阴谋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英国人以种种空洞的甜言蜜语打动他，例如：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汉志王国，把奥斯曼王室的哈里发职位转给他的王朝，以及成立一个阿拉伯国，等等。在1915年整整一年中，他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断断续续地举行了一系列谈判，1916年3月谈判以毫无结果而告终。这位谢里夫索价甚高，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国；而麦克马洪却还价甚低。麦克马洪在1915年10月24日致谢里夫的信中，提出了英国的建议。尽管信中的措辞听来十分慷慨大方，但却使人误解，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的。D. G. 霍格思对此所做的综述，迄今仍不失为最审慎的：

尽管信中将侯赛因（谢里夫）声称属于阿拉伯的操土耳其语的全部地区以及我们与其首领签有条约的全部阿拉伯社会明确地排除在谈判之外——不仅如此，信中还将保证叙利亚沿海地带（即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4个城市地区）的独立，即不受叙利亚内地管辖问题交由法国处理——尽管信中对法国可能在其中具有特殊利益的其他阿拉伯地区持保留态度，从而使摩苏尔、也许还有巴勒斯坦的归宿都悬而未决——最后，尽管信中明确表示我们不能保证将上伊拉克或下伊拉克无条件地交给阿拉伯人——虽然信中有这么多保留，它却承认侯赛因所声称属于他的广大的土地（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拥有一个阿拉伯头衔，只是附有一些限制性的而不是否定的条件。[\[4\]](#)

我们不妨进一步说，这一措辞极易使人误解的建议，绝不是与一个公认的权威签订的一项条约，它只不过是与一个其头衔并不足以代表“阿拉伯人”发言或谈判的人物书信往还中交换的一个部分意见，并不是什么定论。即便说信中毫不含糊地或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这当然是很难想象的）提出的什么建议，这种建议也无非是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立一个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国，这早已写入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了。因为在这一协定中，英法两国保证“承认并支持”在他们虽无意兼并、但将分别行使无上权力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内，成立一个阿拉伯国或联邦。

虽然麦克马洪向谢里夫提出的建议由于措辞含糊不清，日后引起了很大的纠纷和争论，但是，这一建议无疑是与当时欧洲列强所达成的各项协议相一致的。另一个建议，即1917年11月发表的贝尔福宣言则不尽然。这是英国单方面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发出的宣言，它声称：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力促成这一目标之实现。”这项宣言也是由于措辞含糊不清，对它的解释日后引起了许多纷争。但是，它不仅措辞含糊不清，而且在实际上与其说是与麦克马洪向谢里夫提出的建议相矛盾，毋宁说是与赛克斯—皮科协定相矛盾。这一宣言提出给予巴勒斯坦以国际地位，并且（多半是在英国的保护下）“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却是和赛克斯—皮科协定相矛盾的。事实上，赛克斯—皮科协定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令人不能满意的。对奥斯曼帝国作战的重任是由英国军队承担的。1915年的加利波利战役，是英国军队进行的；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奥斯曼帝国作战，并于1914年11月攻占巴士拉，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的，也是英国军队；在西奈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并在阿伦比的指挥下于1917年12月攻占耶路撒冷、1918年10月攻占大马士革的，也是英国军队。那么，法国凭什么要在这些地中海东岸的国家中拥有支配的地位？正是出于这种政策上的重大考虑才出现贝尔福宣言的。英国支持谢里夫的种种野心，也破坏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谢里夫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所建立的一支部落军队于1917年7月攻占了亚喀巴。当时，费萨尔已被阿伦比所收编，被任命为所谓的“北方阿拉伯军”总司令。这支军队在必要时可充当英国军队的辅助部队，在约旦以东地区作战。1918年10月，在终于击溃奥斯曼帝国军队以后，阿伦比准许谢里夫的军队首先进入大马士革，这样费萨尔就能够声称他攻下了这个城市。他被任命为叙利亚的军事总督，在阿伦比的管辖之下。因此，他可以在叙利亚置法国人于不顾；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在叙利亚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俄国自1917年11月退出了世界大战，因此这些事态的发展意味着赛克斯—皮科协定已寿终正寝，英法两国势必要在中东达成新的临时协议了。

达成新协议的过程是漫长的，可以说是从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起，一直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心地带的今称——与英、法、意、日、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之间经过长期谈判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洛桑条约止。停战时，英军已占领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吉里吉亚，以及位于美索

不达米亚的巴士拉省和巴格达省。紧接停战后，英军还抢占了摩苏尔省。根据这种事态，劳合·乔治自然要竭力劝说法国放弃或修改它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应享有的权力。而紧接停战后，法国确实已经屈从英国，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和摩苏尔的要求，但在其他地区则寸步不让。双方僵持达一年之久。最后，劳合·乔治终于让步，与克列孟梭签订了一项协议，从而英军将撤出叙利亚、黎巴嫩和吉里吉亚，后两地由法军接管，叙利亚则仍由费萨尔控制。交接于1919年11月进行。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即在4月间，意大利派兵在阿达利亚登陆，以强行取得他们根据圣让德莫里昂协定所应取得的权利。5月间，希腊的一支军队在协约国军舰的保护下，相继在士麦那登陆。士麦那及其周围地区原本居住有大批希腊人。希腊首相维尼塞洛斯在大战期间是亲协约国的，他于1919年2月正式向巴黎和会提出要求占有这个地区。协约国也担心意大利会占领士麦那，遂表示同意。希腊的进占，就是说由一个原来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国派兵占领信奉伊斯兰教、操土耳其语的地区，这就引起了广泛的反抗情绪，重新激起了这个国家的斗志。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因势利导，组织各界人士起来反抗，不仅在军事方面成功地抗击了希腊人和协约国，而且在抵抗的过程中，使一个奥斯曼苏丹国演变成为一个土耳其共和国。此后，凯末尔即成为这个共和国的无可争议的元首，直至逝世。穆斯塔法·凯末尔1919年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将领，大战期间，在加利波利战役以及在东安纳托利亚抗击俄军中崭露头角。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时，他在首都，目睹国难当头而苏丹政府却缺乏斗志，无心抵抗。5月间他设法谋得驻在黑海沿岸萨姆松的第九军总监的职位，从该地着手有步骤地组织抗击希腊的抵抗运动。1919年年末，他进驻安卡拉。从此，安卡拉便逐渐成为实际上的首都，最终取代了伊斯坦布尔政府。自1921年4月起，凯末尔的军队在与希军的作战中开始占上风。1921年8月24日萨卡里亚的决战，希军终于被击溃，1922年9月9日收复了士麦那。土耳其兵力大振，使意大利人认识到占领阿达利亚并非上策，因此他们于1921年6月同意自小亚细亚撤军。萨卡里亚战役后，法国人也决定撤出吉里吉亚，并于1921年10月20日签订了安卡拉协定，结束了对土耳其的军事干预。这样一来，英国就成了唯一卷入土耳其事务并对安卡拉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在收复士麦那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将希军逐出也被他们占领的东色雷斯。为此，他的军队必须渡过自从签订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后一直被协约国军占领的达达尼尔海峡。协约国

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分遣部队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军队；法、意两国决定不加阻拦，但劳合·乔治最初却坚决主张英国军队应使用武力阻止土耳其人渡过海峡。两国军队在查纳克几乎发生冲突，但劳合·乔治发现自己在国内外均处于孤立，最后终于让步，签订了穆达尼亚停战协定，同意在伊斯坦布尔及两海峡恢复土耳其的主权（见前面229页）。随着第二年缔结了洛桑条约，协约国在大战期间商定的瓜分奥斯曼帝国操土耳其语地区的种种计划，也就荡然无存了。

由于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反抗希腊人及其保护者的斗争中取得这一重大胜利，因而他能够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在安卡拉建立了政权，成为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府。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丁是在1918年7月即位的，他一直对凯末尔非常敌视，并且对协约国采取的种种反对凯末尔所领导的运动的措施，采取默认的态度。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废除苏丹制，但奥斯曼王室仍然保留哈里发的职位，并把这一职位视为宗教的职位，这也是一反惯常的做法。由于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丁此时已逃上一艘英国军舰避难，因此就认为他已被废黜，由他的堂弟阿卜杜勒·美志德继任哈里发。废除苏丹制后，国家元首的职位便无人担任。大国民议会1921年1月通过了一项基本组织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主权无保留、无条件地属于国民”。1923年10月，苏丹制被废除一年后，根据1921年1月的基本组织法，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共和国总统由大国民议会从其成员中选出。然而，由享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所建立的共和国，是无哈里发容身之地的，不管他的职务带有多少“宗教”性质。1924年3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除哈里发制度，废黜哈里发，将奥斯曼皇室全体成员逐出土耳其的国境。这样一来，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政治职位，便从此被取消了。这应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这位青年土耳其党人及其19世纪鼓吹欧化的先驱者的直接继承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的处理办法，使他得以趁机敦促他的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同胞，从此不再把自己看作奥斯曼人，即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臣民，而把自己看作一个共和国的享有主权的公民和土耳其“民族”的一员。

战胜国原来所设想的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不仅是土耳其一国的情况。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或美索不达米亚，事态的发展都打乱了协约国原来的如意算盘。1919年秋天，法军继英军接管了黎

巴嫩。留在叙利亚进行统治的费萨尔，不得不寻求某种对付其强大邻国的方针政策。在此以前，他一直得到英国的保护，因为英国人利用他来说服法国人放弃他们对地中海东岸国家的要求。这一企图失败后，英国人撤出，这就使费萨尔清楚地看出，他不得不与英国人的对手达成某种妥协。但费萨尔软弱无能，控制不了他那难以驾驭的臣属，他们迫使他法国人采取一种挑衅而鲁莽的政策。因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界便出现了紧张的局势，变得不安定起来。1920年3月，费萨尔竟被推为叙利亚联合王国的国王，而这个联合王国却包括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法国人对于费萨尔这位谢里夫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不会饶恕，因此于7月间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费萨尔接受法国的保护和控制。费萨尔在法国的威胁与其臣属的众说纷纭之间，不知所从。最后通牒期限一到，法军便迫不及待地 toward 大马士革进军。两军于7月24日在大马士革附近的汗迈萨伦稍一接触，费萨尔的军队便溃败。法军一举占领了大马士革，结束了费萨尔的统治，并且把他逐出叙利亚。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黎巴嫩应由法国兼并，而叙利亚则将完全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结果，叙利亚和黎巴嫩却都成了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委任统治地”一词，似乎是在大战末由史末资将军所创立，并包括在成为1919年6月23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个部分的国际联盟盟约之中。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对“委任统治地”一词的概念及其实施办法，阐述如下：

对由于这次大战而不再受其原来的管辖国家所统治，但其居民又尚无能力自立于现今世界之严格条件的殖民地和领地，应实行下列原则，即上述地区人民之福利与发展乃文明委托于吾人之义不容辞之义务。在本盟约中，应对这一委托得以实施的保证有所体现。

使此项原则得以付诸实现之最佳办法，乃是将管理上述人民之重任付托于无论就其国力、经验或地理位置而言，均最适合于承担并乐意承担此项义务之先进国家，由其代表本联盟担任委任统治国，行使此种委任统治权。

协约国由于受自己在大战期间及战后所发表的公开宣言的束缚，很难推行诸如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所提出的计划。因此，英、法两国在中东并未能进行兼并或建立保护国，只是取得了一些“委任统治地”。1920年4月，协约国最高协商会议在圣雷莫举行会议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法国委任统治。法国在这两个委任统治地及时地设置了地方行政机构，以便顺利执行国际联盟委托给它的职责。

圣雷莫会议还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交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直到巴格达以北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应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但在大战结束时，法国将摩苏尔割让给了英国，因此，把美索不达米亚交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时，英国事实上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三个省。这个地区此后便由驻在巴格达的一名民政专员，在遍布各省的政务官吏的协助下进行管理。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采取什么形式的政府，英国的占领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等问题，全都悬而未决。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还无法制定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方针。再者，奥斯曼帝国旧有的制度已经崩溃，取代的是一个欧洲式的基督教政府，其治理的方式是人们所不习惯的。此外，如前所述，这个国家，尤其是南部，管理起来甚为困难。凡此种种，均构成骚乱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却正是圣雷莫会议后为下述两派所利用的：在南方各部落中有极大影响的卡尔巴拉、纳杰夫、卡齐迈因等地的什叶派神学家和边界那边叙利亚境内的谢里夫派。每派都想为自己夺权，但两派在1920年夏天却联合起来，煽起了一场严重的反英叛乱。到了秋天，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是，英国政府由于国内要求节约的呼声甚嚣尘上，因而决定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不必由英国直接占领和管理。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国家变为一个王国，由英国皇家空军稍加巡逻即可。英国人于1921年扶植被法国人从叙利亚逐走的费萨尔为这个新王国的国王。这个新王国称为伊拉克。这是一个来自伊斯兰教古代时期的阿拉伯名称。这就说明，在费萨尔及其追随者心目中，这个新王国意味着伊斯兰教最初几个世纪的阿拉伯往昔的荣耀，将重放光彩。但在当时，伊拉克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原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发展至一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时，只要委任统治国在国家管理方面加以指导和协助后，即可先行承认其为独立国家，一直到它能够独立自主时为止。”在实行这一条款时，经国联通过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的规定，要求委任统治国促使这些国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一条规定，自然总是要使委任统治国由于其统治的地区迟迟不能“独立自主”而受到非难。正是这种非难，左右着费萨尔即位后10年中英伊政治的主旨。英国巴不得让伊拉克完全独立，因此在此在1931—1932年间，一方面向国联提出伊拉克将来会循规蹈矩的种种保证，一方面又审慎地对国联施加压力，终于把伊拉克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塞进了国际联盟。英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势必要影响叙

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由法国人进行委任统治地区的政局。法国人自己于1925年在叙利亚南部也遇到了德鲁兹人的叛乱。由于地形复杂，法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场叛乱平定下来。这次叛乱是由于德鲁兹人的骚乱，再加上法国人处理失当所引起的。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也把这场骚乱扩大到大马士革及其周围地区；他们声称这次叛乱不是过去奥斯曼帝国经常遇到的那种部落叛乱，而是一次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叙利亚全国阿拉伯民族起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口号，以及叙利亚人已经要求而且能够实行“独立自主”的呼声，使法国的委任统治不断受到责难。1936年在法国执政的人民阵线政府决定步英国的后尘，同意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以独立。经过谈判后法国和两国签订了条约。但是，由于法国议会的反对，条约未获批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地位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与中东其他地区的委任统治所以有所不同，在于国联并未责成委任统治国要使巴勒斯坦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相反，它要求委任统治国“负责实施”写入委任统治一节前言中的贝尔福宣言。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定居就有了法律的根据。这并不一一而且绝不意味着可以就此一帆风顺了。巴勒斯坦原来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操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一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定居。因此，他们毫不迟疑地提出抗议并进行骚动，表示反对。在巴勒斯坦成为委任统治地的头10年中，最严重的一次便是1929年所谓的“哭墙骚乱”。有人认为，这些骚动和宣传鼓动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领袖企图用以恫吓英国这个委任统治国，要它放弃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承担的义务的；而且，一方面由于英国表示不为恫吓所动，另一方面犹太移民的势头也不能一直保持下去，骚乱也就会平息下来。这两种见解固然言之有理。因为在1933年以前，这两个见解不失为正确的。但是，纳粹在德国上台后，这两种见解便立即被推翻了。犹太移民开始不断地由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源源不断地拥来，英国也开始感到欧洲和地中海的这两个独裁国家对它的威胁和压力。因此，英国面对阿拉伯人的抗议，特别是这些抗议得到了其他各地阿拉伯人的支持时，它的态度就不像原来那样强硬了。1936年爆发的一次叛乱，促使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皮尔勋爵为首）重新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个委员会于1937年提出报告说，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它建

议从巴勒斯坦划出一部分，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犹太人国家，而把巴勒斯坦其余部分与外约旦酋长国合并，这个酋长国是于1921年由巴勒斯坦分出去的，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英国政府最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约一年后，又声称这个建议实际行不通。于是，英国政府便着手召开一个犹太人—阿拉伯人的会议，以便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这个所谓“圆桌会议”于1939年2、3月间在伦敦举行，但未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因于5月间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大大地限制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人数，并严格限制犹太人在该地购置土地的范围。

很显然，英国政府所以采取此项政策，是因为它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阿拉伯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到了1939年，轴心国家日益拉拢和支持阿拉伯人；而且，由于阿拉伯人所处地区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英国政府因而认为必须对阿拉伯人进行安抚。因此，阿拉伯人所反对的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被放弃了，这也便是白皮书的由来。然而，圆桌会议标志着英国在中东的政策改弦更张。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是委任统治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直接有关的各方，英国政府还邀请了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外约旦出席这次会议。这无异于承认这些国家，大概由于都是“阿拉伯国家”的缘故，在磋商和决定巴勒斯坦问题时，都有权参加。因此，英国政府愿意承认“阿拉伯”集体，并愿与之打交道。换言之，这就等于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阿拉伯人是一家，迟早定将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张。我们不妨说，英国政府想必是经过慎重权衡之后才同意这一主张的，而召开圆桌会议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脱离轴心国，并把它拉到英国一边来。194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一项演说中，进一步阐明和强调了这一方针；艾登答应“大力支持任何博得各方面赞同的（阿拉伯统一）方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问题上，又一次表明了它对泛阿拉伯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1941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一年后，英国向地中海东岸国家中的维希政权进行远征，并迅即占领了这个地区。自由法兰西的一支部队随英军远征，并在这两个委任统治地中建立了自由法兰西的政权，以取代维希的政权。在开始这一远征时，自由法兰西在英国的压力下，发表了一项声明，答应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以完全的独立，英国立即表示支持，也就是说给予保证。但自由法兰西由于一心想要维护法国过去的的光荣，事后却不愿全面贯彻这一宣言。1943年11月，自由法兰西与黎巴

嫩政府发生冲突。后者显然由于确信有英国的支持，因而有恃无恐，单方面地结束了与法国的委任统治的关系。英国政府凭借压力和威胁，迫使自由法兰西承认既成事实。1945年5、6月间，法国解放几达一年时，法国人又和叙利亚政府发生冲突；英国人又一次毫不含糊地站在叙利亚人一边，英军开入大马士革，解除了法军的武装，从而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法在中东的长期对抗暂时告一段落。英国现在成为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国家。英国于1941年解放了不久前被意大利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及至1943年，又解放了自1912年以来一直处于意大利占领下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如今法国人也被逐出了中东。由1943年7月以来，阿拉伯各国就在英国的鼓励下进行谈判，以便制定一项统一的措施。结果，于1945年3月成立了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英国满可以心安理得地以联盟的保护人自居。但这种表面权威纯属假象。因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经大大地被削弱，无力再维持其帝国的地位了，而就中东本身而言，采取一项亲阿拉伯的方针无异作茧自缚。实际上，中东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与之友好交往或给予支持的，在那里只有一伙竞争的对手，或者几乎是誓不两立的准仇敌，每一个国家都自我标榜是一个真正促进泛阿拉伯主义的唯一的倡导者。要支持其中的一个国家，就会得罪另一个；因此，战后的历史很快就表明，英国的政策在这种两难的局势中，处处碰壁。法国外长皮杜尔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言时，谈到1945年5、6月间的叙利亚事件的善后处理时，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说，“今天是我，明天该轮到你了”。他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了。

（罗式刚 译）

[1]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崛起》（1961年），第174—175页。

[2] 米勒特制（millet），是奥斯曼帝国准许希腊基督徒、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教徒等宗教社团实行宗教文化自治的一种制度；始行于15世纪中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译者

[3] 哈里发阿里，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婿。——译注

[4] H. W. V. 坦普莱编：《巴黎和会史》（1924年），第6卷，第126页。

第十一章 印度和东南亚

一 印度

表面上看来，对1905—1947年间的印度史的探讨，显然应从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胜利，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分治入手。然而，稍加思索便须改变这一观点。印度的民族主义虽然受到西方的理想和榜样的多方影响，本身却在印度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产生了许多独特的东西。此外，印度与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话，也包括经济方面；其实，从长远看来，这一方面才是它最起作用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不能把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同经济问题分开，或者把二者同印度社会结构分开。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些冲突说明正在兴起一场远比政治纲领甚或经济变革深刻得多、复杂得多的运动。事实上，改革时代的乐观的改革派曾徒劳地寻找的那些东西，这时开始具体形成。印度社会已经超越了出自强迫或为了便利而从西方接受种种事物的阶段；它开始希望将新老事物相结合；它开始对它本身赖以为基础的某些基本前提提出疑问。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探讨不应只限于政治和经济问题，也应包括“文化”问题；不应只限于注意哪些是西方化的标志，还应注意哪些方面出现了同化和修改的迹象。

20世纪初，在观察者看来英帝国的势力很像是处于顶峰。政府显然是空前的强大和生气勃勃；在它的代表寇松勋爵的亲自领导下，它正在对本身进行大整顿。政府普遍抱有信心，同时怀有强烈的帝国使命感并有力地加以宣扬。效法西方的运动日益增强，西方化的阶级稳步成长。代表这个阶级的政治抱负，并对政府采取批评态度的国大党，看起来十分软弱，以致寇松希望“帮助它无痛苦地寿终正寝”。

寇松于5年后去职，这时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舆论鼎沸，阴谋迭起，政府本身则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英国政界全神贯注于寇松与吉钦纳在如何处理总督的行政参事会中一个席位问题上的争论，而忽略了孟加拉人对寇松在行政上分割孟加拉省所提出的抗议的重要

性，这种抗议不久便扩展到印度各地。正是对这些抗议傲然不予置理的态度，比分割的行动本身更加激怒了孟加拉人敏感的性格。国大党第一次发现它在印度的一个地区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几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一个不祥之兆；它甚至使一些较稳重的国大党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宁愿发表演说而不愿参加游行，宁愿做出决议却不愿付诸实行。抗议活动并没有以反对分割行动为止；它加强了国大党的极端主义一翼，这一翼的新成员不再相信英国的诚意，开展了一场规模不大但积极活动的恐怖主义运动，其中最轰动的是1909年对柯曾·怀利的暗杀和1912年在哈定勋爵进入德里的仪式上将他刺伤。同时，1904—1905年间日本对俄国所取得的胜利，也使对舆论界有影响的公众感情激动；而不久以后发生的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更加证明了西方毕竟不是一贯正确的。

这就是在印度的明托勋爵和在伦敦的新任国务大臣约翰·莫利于1906年年初所面临的局势。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鸿沟，而且这条鸿沟有日益加深之势。在此后8年中，政府做出不懈努力来填平这条鸿沟，而又不肯在政策上实行重大的改变。莫利和明托同意应使印度新兴阶级的成员有机会与政府更密切地协商，并与行政机构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两人都没有考虑实行议会民主，而这是国大党温和派从格莱斯顿和里彭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信条。明托的“觐见”计划不久便被搁置起来，但这时发现印度政府已深受西方政治形式的左右，而新兴阶级也深受议会民主概念的影响，以致原打算模仿普鲁士和日本的体制建立的评议制专制政体，实际上成为走向责任制政府的第一步。政府一只手挥舞着镇压的大棒，另一只手高举政治进步的火炬，于1909年实施了莫利—明托改革方案。在扩大的帝国立法会议中仍保持了官方的多数，但选举产生的议员也有增加，并能做补充质询和提出决议案。在加尔各答的行政参事会和在伦敦的印度参事会首次任命了印度人为成员。伊斯林顿委员会（1912年）开始考虑让更多的印度人进入公务机构。除了这些“评议”措施之外，1906年在穆斯林联盟的创建者们的要求下做出重要的革新，在立法会议中为穆斯林保留了一定的席位^[1]。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由于贫困，大多数穆斯林将被排除在以财产为根据的选举人名单之外，从而不能进入公民选举团体。这一理由是真实的，但由此而在民主原则上造成的裂缝，后来便扩大成为分治的鸿沟。

实行改革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取消对孟加拉的分割以及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前者是为了使孟加拉人满意，后者则是为了使全体印度人满意。这些措施整个说来应被视为获得了成功。温和派领袖戈凯尔被吸收参加了某种伙伴关系，得以赢得中产阶级对他的合作和说服的“温和”路线的支持。恐怖主义未能扩散，而是逐渐平息下去；以马拉塔人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极端派在1907年的苏拉特年会上遭到失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未能恢复其力量；1909年提拉克被判6年监禁时，在西印度没有人起来支持他。与戈凯尔相比，提拉克所采取的态度是主张坚持权利而不是祈求让步，是在合法范围内极力反对政府，并利用印度人的感情来激起反政府的情绪。他的言辞虽豪壮，但新兴阶级尚未准备接受这些策略。莫利一明托改革往往被估价过低。然而，应该联系到在实行改革之前的那种充满自信的帝国主义专制统治这一背景来看待它。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即使微小的进步也是极为重要的。改革在“评议”方面达到了合理的限度，随着政治潮流奔向民主，下一步就必须超越那个限度。

在此9年间，印度在其他方面也振奋起来。塔塔家族于1907年创建了他们的钢铁公司，1913年生产了第一批钢。诗人罗宾德拉那塔·泰戈尔的作品《吉檀迦利》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奖，从而把印度文学传向全世界。举国振奋，明显可见，而这一过程，除了那个主张恢复传统的雅利安人协会之外，一般都遵循西方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第一个影响证实了这个判断。出自突然爆发的忠诚之心，王公们提出要提供军队和服务，中产阶级则投票赞成拨款并在征兵方面给予支持。政府于1914年年末向法国派出了军队，又向埃及派遣部队保卫苏伊士运河，后来又向东非和伊拉克派军，这些部队的英勇作战赢得人们的钦佩，但后勤工作的失败使军事当局丧失信誉。印度的英国部队已被调离殆尽。但是，对这种高涨的热情并没有加以利用，而随着战争延续多年，这种热情变成焦躁和不满。最重要的是印度人的总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政府在政治上停顿不前并允许年轻的文官纷纷加入军队，这时印度人的舆论却迅速地活跃并成熟起来。人们对印度军队的成就感到骄傲；显然，印度人能够和欧洲人一样打得好。同时，对于在欧洲所进行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和双方所表现的凶狠残暴，感到极为厌恶和失望。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与印度人在18世纪的战争中的行为所差无几。于是，关于欧洲人的道德优

越性的概念便破灭了。随后发生的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它承认了自决原则。如果最大的专制国家能够在一夜之间崩溃，那么为什么印度的专制统治一定会维持下去？再者，如果欧洲各国人民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为什么印度人就不可以？印度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成熟的一员，于是戈凯尔的要求做出让步的态度，让位于提拉克的要求和维护权利的路线。

英国对印度的态度也产生了变化，但程度有所不同。这说明了过去表现为激进的任何政治改革为什么在大战后的年代里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反对。1917年的宣言许诺，“让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参加一切行政管理部门，并逐步发展自治机构以便在印度逐渐实现责任制政府，使其成为整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就超越了宪政改革的界限，而导致1921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这个法案体现了“蒙特福德改革方案”^[2]。通过这一措施取消了各级立法会议中的官方多数（这些立法会议已大加扩充），约有600万人被列入选民名册以选举各立法机构。中央的权力下放，为后来实行联邦制铺平了道路。印度人在中央政府并未获得负责职务，但在各省建立了“两头政治”：对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负责的部长们与任命的行政顾问官们并肩行使职权，这些行政顾问官也作为地方行政当局的一部分。当局鼓励部长们和行政顾问官们进行共同磋商。部长们负责诸如教育等“国家建设”部门，同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对税收项目做了分工，从而在财政上提供了某些回旋余地。与此同时，在新总督里丁勋爵领导下的仍然实行专制统治的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种新姿态。罗拉特法和新闻法均被废除^[3]；为兰开夏的利益而强制征收的不得人心的棉织品税先是缓征，后被取消；开始制定有关工厂和社会方面的立法；并着手对印度军队的军官骨干实行“印度化”。关于行政机构问题的李委员会注意在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平等分配印度文官职务。财政上获准实行自治并为此建立了关税委员会。在对外方面，印度作为国际联盟成员获得了国际地位，并且在（当时的）帝国会议中得到一个席位和发言权。著名的自由主义领导人斯里尼瓦萨·沙斯特里率领政府代表团跻身于各自治领中维护印度的事业。

这一切都说明印度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与寇松勋爵的时代相比截然不同。然而政府仍未能避免与民族主义发生重大冲突，因而造成的裂痕在独立之前一直没有完全

愈合。这个明显的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印度观点的变化，这使得从战时工作返回印度的官员们发现，他们的言谈和印度人的格格不入，而过去他们认为他们是懂得印度人的主张的。这一冲突所采取的特定形式，来源于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这个人的特殊性格。1918年年末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的舆论动荡不安。食物短缺，在北方过多的征兵，以及政府的无动于衷，都使舆论恼怒不满；而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对附属国人民的事业的鼓吹，更使之变本加厉。当时的气氛中充满着焦躁不安和对美好前景的期望；过去本来会被当作恩惠而受到欢迎的东西，这时很可能被当作侮辱而受到鄙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蒙特福德改革方案”仍在审议过程中时，提出了被称为罗拉特法案的措施，以加强镇压颠覆活动的法律。在当时思想和情绪都处在紧张状态的情况下，这一措施看起来简直是一种暴行，是对新近在“蒙特福德报告”中所表明民主原则的嘲笑。在帝国立法会议中，全体非官方印度人代表投票反对罗拉特法案，但由于官方多数的赞成而得以通过。这时，从南非回来只有4年的甘地，起而在大城市中组织发良心的总罢业（hartals）。他发现这是一个道义问题，并找到一种向全体印度教徒，而不是向某一特定的种姓或特定的主张发出呼吁的方法。各处发生骚乱，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军队未发出警告即袭击了聚集的群众，官方承认有379人丧命，1200人受伤。这一事件及对其后果的严厉处理，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造成感情上的鸿沟。亨特委员会于1920年初就这一事件提出的报告中，根据种族划分了界限，上议院对负责指挥的将军给予支持，而另一些人则为他募集了大批捐款。甘地宣布绝不可能与魔鬼般的政府进行合作。他用印度教中受人尊崇的“达磨”（dharma），即责任的观念来衡量政治问题，从而再次引起人们的共鸣。斯里尼瓦萨·沙斯特里所领导的温和派和老资格的提拉克那样的立宪派都被排斥到一边，国大党追随甘地的领导，投入不合作运动。这时，穆斯林教徒由于哈里发统治的中心地土耳其有被肢解的威胁而愤懑不安，甘地得到这些穆斯林的支持，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这个运动震撼了政府，持续约18个月，自兵变以来，政府还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震动。尽管如此，新宪法还是诞生了。这件事，加上暴力行为的爆发和在马拉巴尔发生的穆斯林莫普拉起义所引起的不安，使高涨的热情冷却下来，而到1922年年初甘地本人也被逮捕。不久，土耳其人废除了哈里发

制，穆斯林失去了不满的根据。到1922年年底，这个运动便烟消云散了。

但是印度已经改变了面貌。政府继续实施新宪法，作为老国大党的骨干的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对此一时感到满意。然而国大党本身这时已掌握在与前不同的、更为坚定的领导者手中，它在社会中扎下的根远比过去为深。国大党由甘地控制，从此他就是印度独立的主要缔造者。甘地作为南非印度人社会的律师和斗士而成名，终于签订了1913年的史末资—甘地协议。他正是在南非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部分来源于他在古吉拉特的家乡，部分来源于托尔斯泰和另外一些人：它包括以非暴力为道德信条，同时强烈反对西方社会，视其为实利主义，唯利是图和败坏道德。在印度他扩大了这些主题思想，增添了他自己关于“萨蒂亚”（satya），即“真理”的神秘概念，作为整个生活和一切行为的基础。非暴力最初主要是弱者反对强者的政治策略，这时对他逐渐成为一个普遍原则。他又给这一信条增添了印度人心理中的神秘感，这使他得以用能够打动一般印度教徒心灵的语言来鼓吹他的政治运动。为了表示他对印度贫民的同情和对西方实利主义的反对，他穿用“多蒂”和“查达尔”^[4]这样的农民服装；为此人民欢呼他为“圣雄”^[5]。圣人的光辉给他带来了印度教徒的广泛支持，他运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对此充分加以利用。一些老练的国大党人由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在全国的声望而默然同意他的纺纱和说教；群众接受他的政治活动，对他因之而一再入狱表示支持；因为他们看到他就是印度教的化身和祖国印度的捍卫者。

甘地的办法是在他的周围聚集一群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satvagrahis）的忠实信徒，由他们传播非暴力主义，这对少数人是作为信仰，对多数人则是作为策略。他提倡手工纺纱和织布，以反对机器制品；他开展一个运动以促使印度教社会接纳广大的贱民阶层。他把贱民称作“哈里詹”（Harijans），即神的子孙。这样，他把那一时代的理想主义集中于自己一身，将其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当国大党未能遵循他的路线时，他便退隐，深信该党不能长久离开他的领导。甘地将国大党从一个阶级运动转变为一个群众运动；他把民族主义扩展到全民族。他通过使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印度教的感情相结合，做到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一种半宗教观念。甘地所获得的成就是独立，而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分治。

在20年代中期，甘地不得不恢复他已失去的领导地位。在英国，强大的保守势力还不相信国大党运动在印度真正生根。在甘地入狱期间，国大党在吉·兰·达斯和莫蒂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决定作为“自治党”参加下几届竞选。其目的是阻挠成立能够得人心的政府，从而使改革停顿下来。他们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并开始受到被名利所引诱的政客们的腐蚀。当这种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持续下去时，国大党的年轻一翼日益明显地对议会中毫无结果的反对和收效更少的纺纱活动感到不耐烦。他们接受圣雄对政府的分析，但是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不合作。他们发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两位年轻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两人在1928年的国大党马德拉斯会议上首次对该党产生显著的影响，他们违背长辈们的愿望，通过了一项要求完全独立的决议。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时刻，政府为了解决问题于1927年任命了一个以约翰·西蒙爵士为主席的印度委员会，以便就根据1921年法案所建立的政体的实施情况提出报告。早于法律所要求的时期便设立这个委员会，本来是为了表示善意，但是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白人却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反对印度委员会成为国大党各派团结的基础。由莫蒂拉尔·尼赫鲁领导的一个全党委员会草拟了一部宪法，以此表示印度的强烈反对。到1930年，舆论已变得十分坚定，以致国大党要求在一年之内举行圆桌会议，以起草一部自治领宪法，扬言如不这样做民众将不服从政府。作为反击，欧文勋爵的政府于10月宣布说，英国发展宪政的目的就是给与自治领地位，并提出建议举行圆桌会议以考虑下一步骤。但是国大党立场坚定，于是甘地在1930年4月以这一微小的差别为理由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反政府运动。由于做出这一决定，甘地被指责为不守信义和判断失误。鉴于他最初曾赞成接受政府的建议，因此，促使他这么做的动机看来并不是反政府的敌意，而是国大党的状况。左翼情绪在年轻人中间日益发展，这种情绪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尖锐并且为欧洲极端主义运动的情景所激励，要求对严重的局势采取激烈的对策。甘地担心左翼会发生的反抗，甚至脱离组织，这将会导致与政府正面冲突，在国大党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严厉镇压；此外，独立也可能被推迟到下一代。因此他决定亲自领导一场非暴力运动，只是感到遗憾，因为欧文勋爵制造了那么多困难使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这样做。

这一斗争持续了将近一年。政府感到紧张，但没有垮台，这主要归功于欧文勋爵的坚定和冷静。在一个时期里有6万名“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入狱，但圆桌会议仍按计划举行，不过没有国大党的代表参加。到1931年，已可清楚地看出，国大党不能够推翻政府。甘地和欧文之间的休战，导致甘地参加了圆桌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但当他表现出不妥协并重新开始反政府运动时，这个运动很快遭到严厉镇压。正如1922年那样，公众已经感到厌烦；国大党第二次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失败。

然而，这两年的骚乱留下了它的痕迹，并成为走向独立和建立国家的路程上的重要里程碑。起初，国大党似乎已销声匿迹，但1934年它东山再起，而且和以前一样强大。事实上，这场斗争既显示了国大党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它虽不能够接管这个国家，但它可以阻止它发展；国大党既不会被摧毁，也不能把它长久镇压下去。它表现出不仅是一支力量，而且是在这个国家中要认真对待的主要力量。印度政府认识到这一事实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也同样认识到这一点。保守党当时进入长期未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该党的大多数人（工党已经改变看法）这时认识到：没有国大党的参加就不可能在印度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全民运动已是一个现实，而且其力量日益增长；不可能长期违反印度的意愿而压制它屈从于现状；因此，必须计划给予它独立。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必须要一个独立的印度，那么我们宁肯要一个保守的独立的印度。这些设想就是保守党在30年代制定的对印政策的基础。

在印度当地，穆斯林教徒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在运动中加深了。穆斯林群众置身于运动之外，这本身就引起憎恨；莫蒂拉尔·尼赫鲁委员会由于拒绝在拟议中的宪法中包括分别或按教派划分选区的原则而得罪了穆斯林领袖们。穆斯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和国大党决裂。在行动中发展起来的极端主义，在国大党内日益得势并开始出现某些恐怖主义派系。但是在社会上，运动的浪潮壮阔起来。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和大逮捕吸引了各阶层的人们，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这里面临的问题已超越了种姓范围，斗争有助于打破至少某些外在的种姓隔阂。它对妇女运动的影响尤其明显。在此之前，妇女运动为少数西方化的人物所把持，这时已吸引了大批妇女，她们参加示威游行，在集会上讲演，在酒店前设置纠察

线，并因而被逮捕。甘地为她们祝福，著名的女国大党人，如萨罗吉尼·奈杜夫人等，对她们加以鼓励。今天她们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起作用，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甚至属于贱民阶层的那5000万人也感觉到这一变化的风气，因为这个运动所发扬的同胞精神和甘地的威信，使得许多人以更多的善意来看待甘地为他们提出的要求。

此后几年，英国贯彻实行了保守党关于印度的新观点。尽管遭到以温斯顿·丘吉尔和劳埃德勋爵为首的一批人的坚决反对（这导致了也许是致命的两年拖延），终于制定出一部新宪法，作为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这个法案是独立印度的宪法的蓝图，但这部宪法遵循的是保守派路线。联邦制代替了过去的中央集权制；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把各土邦王公纳入单一的印度国家之中，而为了起平衡作用，又建立了一个联邦法院。在各省实行完全责任制政府，在中央则实行两头政治，即分权责任制。各省的选民增加到3000万人，并相应地设置立法会议和第二院。显然，下一步至少应是获得完全的自治领地位。政府希望联邦制以及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半地方自治，再加上精心制定的按教派划分选区和保留席位等制度将会消除穆斯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担心。

宪法的保守倾向主要并不表现在总督所保留的权力，或英国议会在控制印度方面继续拥有的权力，或对选民规定的资产条件。这一切都可予以撤销而并不影响主要结构。与英国议会的联系只不过是在政治上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一条脐带，实际上已做出安排使印度议会得以在某些方面修改自己的宪法。保守原则的本质在于对待土邦王公的方式，而它却披着革命措施的外衣，即土邦统一在一个新的联邦之中。王公们将把某些权力交给中央政府，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在自己的土邦中保持内部自治，并将在全印事务中获得很大影响。他们将通过指派议会下院的1/3成员和上院的2/5成员来做到这一点。由于中央政府最后对新成立的议会负责，因此政治倾向将会大大有利于保守派政府。这是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亲王公政策的必然结果。国大党的统治可能无法排除，但国大党极端派政权将会被排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保守派的另一个花招破坏了这些计划。土邦加入联邦按规定是自愿的，而且在全部土邦的半数人口加入之前是不生效的。这样，王公们就得到机会重新加以考虑并反复斟酌，而政策是施行得如此温和以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没有一个土邦加入联邦。这时

谈判中止了；到大战结束时，王公们发现时代和事态的发展业已把他们抛在后面。

在这些年里印度在政治上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第一是1934年停止了民众的反抗后国大党立即重振旗鼓。但它已不是原来的国大党了。虽然它在12年里第二次超越群众支持的限度而受到惩戒，然而同时也加强了决心和团结。这后一长进使它得以在根据新宪法举行的1937年选举中大获全胜，而前者所带来的谨慎则促使它在11个省中的6个省份组成省政府。这些省政府的工作进行得顺利而有效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们辞职为止。然而在国大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年青的一代和一些低收入集团日益为行动主义政策而吸引，他们寄希望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战斗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苏巴斯·鲍斯及其革命理想主义和独裁倾向。甘地在这些年的成就是保持了国大党的团结，既不使它在革命的暗礁上翻船，也不使它因衰老而退居于清静无为的地位。他的方法是把激进分子提拔起来，然后运用他个人的魅力和工作委员会中老委员们的投票来加以控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他发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这种做法比苏巴斯·鲍斯更为顺从，而且他个人的确对尼赫鲁建立了一种支配地位，这一直持续到独立前夕。他尽可能推迟发生冲突，但是在1939年，当尼赫鲁任两届国大党主席后鲍斯要求第二次出任该职时，甘地把他赶下了台。从此各自分道扬镳，尼赫鲁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鲍斯则去缅甸领导国民军。这种行动主义情绪的一个支流，就是30年代共产党的兴起。它使政府感到担忧，然而它外来的和世俗的色彩太浓，因而不能对国大党构成严重的挑战。

30年代的第二方面的政治发展就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下的穆斯林联盟的兴起和巴基斯坦这一概念的出现。印度的穆斯林占全人口的1/4，英国人把他们当作孟加拉兵变的替罪羊后，他们已处于失势的地位。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1815—1898年）把他们从这种受压抑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他坚定地宣传自助，促使穆斯林教徒接受西方教育以便在获得公职方面与印度教徒相竞争，并使他们相信英国的统治要比印度教徒的统治为好，对之加以接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穆斯林社会，使其成为英属印度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新成立的国民大会党开始考虑最终实现自治时，他感到惊恐。他说，多数人的统治只能意味着印度教徒的统治。他对国大党

保持着戒心，大多数穆斯林教徒追随他。自此以后，每一个走向自治的步骤都引起穆斯林对保护措施的要求。在寇松离职后，当改革似乎有可能实现之时，穆斯林联盟便马上于1906年成立。它要求规定保护措施，1909年法案中包括了这些措施，并且随着每一期改革的实行，都加以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支持哈里发制的穆斯林参加了不合作运动时，他们和甘地的国大党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好时期。但是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之后，又回到以前的怀疑与日俱增的过程。随着最终实现独立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恐惧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而国大党无力控制的印度教极端主义集团所发表的毫不妥协的声明，更加剧了这种情绪。鉴于1935年的改革即将实现，退出政策便成为讨论的课题。这一政策是由穆罕默德·伊格巴尔爵士于1930年首次提出，并于1933年由乔杜里·拉麦特·阿里命名为巴基斯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真纳把一直是以无声无息的群众为背景、其领导也存在争议的中产阶级运动转变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长期以来真纳一直希望将伊斯兰的政治主张与民族运动相结合。他对莫蒂拉尔·尼赫鲁的报告或拟议中的1928年宪法所提出的条件感到失望；而且国大党在1937年联合省的省议会选举中获胜后，企图完全搞垮那里的穆斯林联盟，这使他非常恼怒。此后，真纳这个不会讲乌尔都语的西方化的孟买律师兼政治家便向群众发出呼吁。他得助于穆斯林教徒心中郁积着的对印度教徒的不信任感，也得助于国大党政府小官吏们策划的一些教派挑衅活动，他是很懂得如何利用这些事件的。当这些省政府于1939年年末辞职时，他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感恩日活动，次年他将独立的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联盟的政策目标。他说，印度有两个民族，他们必须各自听从自己的命运。

在30年代，新印度稳步地向一个成熟的国家前进。在经济领域里殖民主义正让位于计划经济，它的口号是财政自主，它的象征是关税委员会。关税委员会建立于1923年，它成功地保护了年轻的钢铁工业免受30年代初经济萧条的影响，并帮助棉纺织工业不受廉价的日本纺织品的威胁。兴建了水泥厂这样的新工业，制糖之类的旧工业也得到扩充，以便使印度不需依赖国外的供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印度虽然还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已是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它在世界产钢国家中名列第六。

在教育方面，由于仿效了英国公立式的师范大学并试办了联邦学院体系，因而得以迅速发展。技术教育开始发展。随着甘地的基础教育计划和萨金特^[6]的普及小学教育计划的实施，到1970年小学教育在设想上比在实际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尽管如此，小学教育还是前进了，特别是在旁遮普省。妇女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识字的女子只有男子的一半。知识界获得了新的活力。过去，泰戈尔多少像一颗孤独的明星，但现在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如哲学方面的萨·拉达克里希南爵士和S. C. 达斯古普塔博士，科学方面的贾·钱·玻色爵士和钱·梵·拉曼爵士，以及历史学家贾·萨尔卡爵士。在文学方面，兼用英语和印度各种语言写作的整个一派年轻作家，利用西方文学手法来探讨当代社会和文化问题，其中值得提及的有穆尔克·拉吉·阿南德和R. K. 纳拉扬。印度音乐获得了复兴，印度画家受到阿旃陀石窟艺术形象的启发，创立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流派，其领导人阿巴宁德拉那塔，泰戈尔赢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切发展除了上述最后两项以外都是西方性质的，甚至印度现代音乐也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些迹象表明，在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里，西方正在争取改变印度的传统。也有显著的例外情况，其中可以提到的有：用流畅的英语阐明新吠檀多主义的本地治里人阿拉宾多先生，以及用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写作的哲学家兼诗人穆罕默德·伊格巴尔爵士，他的主张为巴基斯坦运动提供了思想动力。除此以外，传统主义派别，如雅利安人协会等，进展甚小。甘地提倡的农村经济和乡土哲学显然正在动摇。他的帽子成为国大党的一个标志，他的“卡达尔”^[7]成为国大党的制服。另一方面，他称贱民为“神的子孙”和让贱民进入寺庙的运动则公开与印度教的正统观念相敌对。因此，还不能够说东方概念与西方概念已相互结合，或有任何早日实现在思想上或种族上一体化的前景。但是，一方在批评时盛气凌人，另一方负疚辩解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这时出现的是相互交流思想，即在成熟的平等基础上持续进行对话。

1939年夏天，在印度的观察家如果只是漫不经心地观察一番，很可能认为情况并非没有希望。国大党政府已经在8个省份里执政两年多，得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双方支持的两个政府牢牢控制了孟加拉和旁遮普。穆斯林联盟抗议之声虽甚嚣尘上，但它在至关重要的旁遮普进展甚小，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在伊斯兰民众之中扎根有多

深。王公们对参加联邦仍犹豫不决，但使者往来于他们的宫廷之间，看来总督是决心要获得成功。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印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没有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把自己看作与英国是一体；英国的事业就是印度的事业；王公们迸发出忠诚之心，中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热情。但自那时以来，英国政府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成为“魔鬼般”的存在；现在国大党是印度良心的保持者。印度公众对事务的态度已臻成熟；他们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并非不同情同盟国的事业，但对英国的政策持尖锐批评态度。他们记得在大学里曾经学到的宪法准则：“不纠正弊端就得不到供应。”战争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直到法国失陷才震动了公众，使他们关切和担忧。英国的立场和不列颠之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钦佩，但他们并不愿意提供无条件援助；此后又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1942年年初日本的军事行动把战火烧到印度的大门口为止。

两大党都没有正式表示支持战争或允许它们的党员参加在德里召开的军事会议。但这并没有阻止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战争对印度的生活和发展造成深刻影响。首先是为战争做出努力。印度军队参加了北非的沙漠战役，他们的第四师和第七师在那里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们也参加了在阿比西尼亚和中东的作战。后来他们又参与了导致新加坡失陷的遭到惨败的马来亚战役。有9万人成为日本的战俘，苏巴斯·鲍斯从中征集一部分人编入他的国民军。缅甸沦陷后，他们负责防守印度的边界，1944年在英勇的科希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1945年年初夺回仰光，从而赢得了最光辉的成就。他们的战绩是可观的，但他们远不如他们的先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深得人心。这再一次证明印度在公共事务中达到新的成熟程度。他们不再为印度的军事成就感到惊异和满足；他们期望得到这样的成就，并认为理应如此。

但是在战线的后方，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确实很大。军队从和平时期的17.5万人扩充到200多万人。兵员是从农村征召的，他们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远为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许多人接受了机械化战争所要求的技术训练。社会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和技术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地增大。这一扩展有助于为印度战后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奠定基础。在武装部队扩大之后才出现了供应的扩大。最初，军事当局对此颇为冷淡，理由是一支没有机械化的印度军队在一场机械化战争中是

起不了任何作用的。然而法国沦陷后，这种态度改变了。印度成为对中东的供应中心。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当时正是当政的鼎盛时期，组织了东方军团供应委员会。印度供应这一战场总需求量的75%。日本和美国参战后供应的格局改变了，但工业发展继续比过去加快。塔塔的大型钢铁厂在伯恩普尔和其他地方得到扩建与补充。水泥工业大加扩充，以供应在印度东部新建机场的需要，新兴的制铝工业利用了供应丰富的矾土，云母工业也得到扩大。这些发展的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大得多，再次为印度政府战后的大规模工业化政策奠定了基础。在阻止日本人的努力中，殖民主义最后的残余也被清除无遗。

战争的另一个影响是1943年在孟加拉再次发生饥荒。自从1883年制定饥荒赈济法以来便没有发生过饥荒，这是因为进口食物维持了无粮村民的生活，救济工作又使他们有事可做。但是，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并切断那里的大米供应后，便没有代替它供应食物的外部来源。整个短缺额估计不超过5%，问题在于调配。但是由于从孟买到阿萨姆自西向东调运军需物资，铁路运输已经十分紧张。此外还增加了自北向南运输食物的新任务。各地方政府表现出完全无能力应付这种局势或公平地分配来自旁遮普的供应品。总督不合时宜地囿于联邦权力，顾虑多端，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悲观绝望和乘机发财中饥荒日益加剧，直到新任总督韦维尔勋爵视察加尔各答，调用英国军队负责分配工作，并在所有主要城市实行配给制作为公平分配的措施为止。随后的调查委员会估计直接和间接死亡者达150万—200万人之间。这场饥荒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它似乎表明英国人正在丧失一种东西，这主要倒不是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而是他们在一场危机中做出决定的魄力。

国大党各省政府为了抗议未经它们同意印度便卷入战争而辞职，从此开始了战时的政治斗争。许多人认为这是国大党犯的第一个策略性错误，因为这样做就使该党失去了对行政机器的实际控制，并促使政府倾向于不太难驾御的穆斯林联盟。接着出现了政治上的僵持局面，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谈判。对国大党来说，不达到自治就不可能参加战争；对政府来说，只有到战后才能提出宪政解决方案。“战后”这一口号成为套在政府脖子上的沉重枷锁，正如“不合作”这个口号成为国大党的枷锁一样。二者之间失去了通过共

同行动达到谅解的机会。旷日持久的战争引起的不满，由于日本于1941年末参战而变本加厉，这给国大党带来好处；另一方面，自那时起大批军队拥入印度，从而使任何重大的颠覆活动成为不可能的事。与此同时，事态的发展也为穆斯林联盟扫清了道路。1940年，该联盟决定以建立巴基斯坦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宣传工作。它在穆斯林的补缺选举中几乎每一次都获胜，到战争结束时，它在中央立法会议中由选举产生的104个议席中占有25席之多。

总督对国大党策略的反应是允诺扩大他的行政参事会（他于1940年8月付诸实行），以及在战后召开宪政会议。另一方面，甘地再次采取号召民众不服从的手段，但把这一运动组织得非常谨慎，因此政府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1941年年初，以甘地的主要门徒维诺巴·巴夫为首的约1.4万人被投入监狱。事态就这样维持到日本参战造成新的局面为止。这时战火已烧到印度的大门口，它在防务方面的合作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正是做出重大努力的时刻，当时在莫斯科取得成就后刚刚返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1942年3月和4月带来了有关宪政的新建议，从而做出了这种努力。这个建议提出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有理由认为它既出自英国的慷慨或远见，也出自英国在危机中迫切需要支援。建议规定：战后立即召开宪政会议，以便为具有自治领地位的印度联邦制定一部宪法。这个新国家像其他自治领一样，将拥有退出英联邦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可以加入新国家，但必要时即使没有它们也仍将推行这个计划。任何一省均可不受这种新安排的约束，从而承认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对未来似乎做出了妥善安排，但眼前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上述建议正是触了这块礁石而沉没。国大党领袖们最初抱赞成态度，但在甘地的影响下，他们坚持拟议中的国家领导人的执行委员会须拥有自治领内阁的全部权力。据说，甘地对英国提出的前景持悲观看法；难道国大党还应该向正在破产的银行开取支票吗？稍微再等一等，当英国的窘境再加剧一些后，整个政府就有可能落入他们的手中。

对上述建议抱着很高的希望，结果产生了相应的反作用。甘地预料日本将在10月发起进攻，便在这一危机出现之前先发制人，于8月间威胁要发动大规模民众不服从运动，因为英国没有“退出印度”。他说：“无论如何，这是公开叛乱。”政府拘留了整个国大党委员会的成员并坚决镇压了左翼企图举行的起义，为此付出了900人的生命和

100万英镑的损失。从此以后政府再未受到挑战。国大党失去了在穆斯林联盟强大到有力进行干涉之前控制政府的这一机会，同时也失去了既保持印度的统一又赢得独立的最后一个机会。

欧洲的战事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新局面。现在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给予自治领地位。但英国认为亚洲的战事还会持续一年，而在此期间政府能够从实力出发与印度的各党派进行谈判。韦维尔勋爵于6月召开一次会议，以便按照克里普斯的方针组织一个过渡内阁，但由于穆斯林联盟要求代表全体穆斯林，这次会议宣告失败。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为最后一幕准备了舞台。转夜之间，各种政治因素的分量起了变化。英国不再能够发号施令，或阻止其他人发号施令。随着迅速的遣返工作，他们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少，而且由于英国国内和世界上对印度问题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他们的统治意志产生动摇。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决心要实现印度的自治，它只关心以什么方式来完成此事。从此以后，英国在印度能够进行争论和调停，但已不能发号施令。根据当时情况下印度人的情绪来看，分治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初的那个冬季举行的大选说明，正如国大党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占有支配地位一样，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的穆斯林教徒中也占有支配地位。这时两党的对抗已十分清楚，而较小的一方的领袖是一位老练的策略家。与此同时，一次短暂的海军兵变表明，英国仍保留的权威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从3月到6月，由佩西克—劳伦斯勋爵、斯·克里普斯爵士和阿·维·亚历山大（后封为子爵）组成的内阁使团为了寻找一个各方同意的解决方案而做出了重要尝试。^[8]这一尝试失败了，表面上是因为各教派的席位分配问题，实际上却是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放弃各自要求统一和要求分治的目标。互相指责导致真纳的8月16日“直接行动日”。当时使加尔各答陷入苦难的流血暴乱，在印度北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1947年年初开始的旁遮普的地区性内战。面对日益加剧的混乱和日渐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双方领导人都束手无策；一方采取的每一行动都遭到对方的破坏。

伦敦政府为了应付这一局势，1947年2月宣布派遣蒙巴顿勋爵前往印度，以便至迟在1948年8月之前结束英国的统治。他为调停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制定了一个分治计划，双方于6月同意了该计划。他非常迅速地推进工作，以至1947年8月14日便完成了实际的移交手续。巴基斯坦分得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西北边境省以及东孟加拉和阿

萨姆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新印度分得其余部分。一个边界委员会解决了有关边界的细节问题。印度的王公们被解除了他们对英国国王效忠的义务，并被要求加入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英国与印度的争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久便可看出它除了好感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它使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争执相形之下更加突出了，这个争执其实并未得到解决而是改变了性质。由于这个未得到解决的紧张状态这样一改变性质，付出的代价是，1947年分治时双方各有约50万人遭到杀害，还有一千多万人迁居。另一方面，分治使两国都得以建立起一个能够贯彻执行现代化计划的强有力的政府。印度人，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巴基斯坦人，都发现在过去1/4世纪中英国人的行动，已经为这样的现代化计划打下了基础。

二 东南亚

20世纪初，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几乎垄断了对现在被称为东南亚的由大陆和岛屿构成的广大地区的控制权。四国中荷兰立足最久，并拥有富庶得多的殖民帝国。荷属印度被誉为“抛在赤道周围的绿宝石腰带”，它以1619年由扬·彼得森·科恩创建的巴达维亚为中心，包括整个马来岛群，只有美国不久前根据1898年12月的巴黎条约从西班牙获得的菲律宾群岛，以及婆罗洲西北部、帝汶岛的葡属半部和新几内亚的东部（其北部为德国所有，南部为英国殖民地）等地除外。荷属东印度群岛从苏门答腊的西北端到新几内亚荷属领地的东端，横跨近3000英里，自北至南的宽度约为1300英里，陆地总面积将近73.5万平方英里。1900年，这整个地区尚未完全纳入荷兰统治之下，它的大部分只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落入荷兰手中。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人自1873年以来一直为独立而斗争，直到1908年才最后被制服。

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主要是在大陆上。它最大的领土是前“阿瓦王国”（缅甸），这个国家是在1824—1886年间被英属印度逐渐蚕食的。在缅甸的南面是由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组成的英国直辖的海峡殖民地，而四个马来联邦：霹雳、雪兰峨、森美兰和彭亨，则是在英国保护下的名义上独立的苏丹国。1909年，暹罗将它对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几个马来土邦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1912年柔佛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婆罗洲，沙撈越由原来的王公詹姆斯·布鲁克的侄子统治，英属北婆罗洲由领有特许状的同名（北婆罗洲）公司管辖，它们和文莱苏丹国也都是英国的保护国。

在湄公河流域和南中国海沿岸，法国从1859年以来一直忙于为自己开拓一个广阔的印度支那帝国。它包括最南端的交趾支那殖民地，以及安南和东京、柬埔寨和老挝等保护国。它对老挝的统治到1900年还未完成。美国是在东南亚获得相当大的一部分统治地的最后一个西方强国。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后，西班牙被迫让出整个菲律宾群岛。但是，直到1901年，在同一个强有力的菲律宾独立运动进行了激

烈的游击战以后，美国的统治才最终确立。而这个独立运动是美国人自己在以前加以扶植和武装来反抗西班牙的。

暹罗王国是在整个这一地区唯一幸存的独立国家。多年以来，它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对外扩张的帝国之间维持一种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生存。锡袍国王企图挑拨当时正在征服东京的法国反对英国，结果导致缅甸王朝覆灭和上缅甸被并吞。而当法国利用它在越南的新地位从暹罗的宗主权之下攫取琅勃拉邦的老挝王国，并把暹罗人从他们在湄公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上逐出时，暹罗的危急时刻就来到了。在东南亚的英国官员们深信，法国人把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帝国当作一个基地，以便一方面进一步向中国推进，另一方面又向湄南河流域推进，甚至进入马来半岛。1893年7月制造的“北榄事件”，无疑是指望暹罗会失去理智，给法国提供一个似乎可信的借口，以便再一次向前推进。实际上，这个事件把英国和法国带到了战争边缘，因为英国的政策是维持一个独立的暹罗，作为印度帝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德瓦旺亲王对局势的巧妙处理和英国对法国施加的外交压力，暂时保持了暹罗的独立。随后，在1896年，由于湄公河上游的英法边境官员之间发生的一场争吵，使两国关系再次紧张到几乎要破裂以后，这两个大国同意共同保证湄南河流域的独立。但是，直至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后，暹罗才算平安地摆脱了纠纷。

1900年开始了一个开发殖民地的新阶段，它比以前更紧密地把东方同西方的生产体系联系在一起。随着内燃机的问世，东南亚的锡、橡胶和石油成为西方经济不可或缺的物资。私人资本在几个强大的公司的指导下，坚持更有效地开发殖民地。效率这个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行政格言，在印度的寇松勋爵是它的最重要的鼓吹者。但是对正在兴起的新的一代殖民官员来说，效率不仅仅是为了使“大企业”获得利润，同样也是为了使被统治的老百姓得到福利。荷兰的范·德芬特尔提出的“道德政策”，与吉卜林的“白人的重任”内容极其相似，他发表在《导报》月刊上的文章《道义上的负债》（1899年），标志着荷兰对其殖民地人民的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繁荣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东南亚那些拥有潜在的财富但尚不发达的国家过于贫穷，因而无力承担改善社会服务所需的巨大费用。因此，在使它们成为私人资本进行角逐的理想猎场的同时，殖民政府

自己筹措经费来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并把公共卫生和福利提到较高的水平。

于是，东南亚人民的经济开始依赖于外部市场，尤其在法属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它们的经济与它们宗主国的经济密切相关。随着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大和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当地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遭到破坏；而从欧美进口的廉价制成品使当地的许多手工业陷于萧条，这些手工业曾经是农民的宝贵的辅助生活来源。与此同时，由于行政工作的改善和西方的公共卫生措施所引起的空前的人口增长，在许多地区造成社会的解体。在缅甸，特别是1870年以后，有大量人口移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在英国的鼓励下扩大稻米生产。因此到19世纪末，缅甸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出口大米的国家。在爪哇，惊人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荷兰为增加食物生产所做的一切努力，并对土地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因此在20世纪初就已经太少的个人土地占有量（平均每家庭二英亩半），有进一步减少之势，给农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严重后果。这种境况虽然不好，但比东京的红河流域那些人口拥挤的地区还好一些，在那里，分散零碎的土地占有所造成的萧条，由于投机者获得了公地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公地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村社防止贫困的保障。在菲律宾，到西班牙统治末期，上述趋势开始在吕宋中部和宿务表现出来，在这些地方，租佃问题使人口压力变得更加严重，而美国人抱着他们的自由企业思想，对这个问题没有试图加以解决。[\[9\]](#)

因此，20世纪的殖民统治没有能够为构成东南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世界经济萧条的全部后果于1930年开始表现出来，它使东南亚的主要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价值。这第一次暴露了在农业上仰仗他人恩惠的问题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使东南亚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经济依赖西方经济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农民的困境表现为在缅甸和越南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起义，以及在菲律宾的农民组织和地主私人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印度尼西亚，荷兰的统治非常稳固而机警，因为它已经遭到过在1926年年末和1927年年初达到严重关头的左翼革命运动的挑战，但这些运动没有成功。

作为对西方统治的反应，各处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更为激烈的民族主义。西方的教育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福

利国家需要大批经过训练的当地人在它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中任职，工商业也是如此。随之而发展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以西方的方法为基础并采用西方的语言作为教学工具，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学到了西方的思想和组织，西方的历史和科学。他们感觉到正在改变西方的观点和技术的科学革命的影响。西方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们拯救了他们的古迹和艺术珍宝，使之免遭毁灭和湮没，并对他们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科学研究，使他们通过这些获得了对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的新认识。这一切事物的影响给他们带来一种新的自觉意识，并激发了与中世纪末欧洲的文艺复兴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一场文艺复兴。他们深恨西方人把他们降到劣等地位。他们认为，除工艺方面以外，他们的文化并不亚于西方。再者，西方的教育灌输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它忽视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因此，其反作用是传统主义的复活，它表现为在佛教国家将佛教、在伊斯兰教国家将伊斯兰教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又表现为重新肯定传统神话，以及要求对民族语言和文学给予更大的重视。[\[10\]](#)

针对由于西方在经济上开发东南亚而吸引来的外来亚洲移民，特别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也煽动起了民族仇恨。这些移民对激烈的民族主义的关心和支持（民族主义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与东南亚的民族运动同时发展起来），严重妨碍了他们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发生同化，使他们成为当地人的仇外目标。

最后，还有外界事件的影响。1899年中国的反西方的义和团叛乱，自称为亚洲人权利维护者的日本的崛起及其在1905年战胜俄国，中国的革命和相继而来的满清王朝的崩溃，以及甘地对印度“自主”（swaraj）运动的领导，这一切都使东南亚的知识分子阶层感觉到亚洲正在崛起并向西方的统治做出挑战。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正是从这些人中涌现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为解决欧洲问题而提出的“十四点”中阐明的自决原则，具有普遍的效力。它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团结口号。

这一觉醒过程，在菲律宾比在任何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始得早。这原在预料之中，因为菲律宾人受西方统治的时间比这一地区任何其他民族都长，并遭到西班牙的最严厉的文化压制。[\[11\]](#)这个群岛曾被紧紧地与墨西哥连在一起，并且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经济发展。但是在19世纪，随着与外界比较自由得多的贸易的成长，菲律宾人中出现了一

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去国外留学，并发展了强烈的改良主义思想。属于这阶级的人物，如何塞·黎萨尔和马塞洛·比拉尔等，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宣传运动的领袖，要求进行改革，不过还没有要求脱离西班牙。然而黎萨尔的温和的“菲律宾联盟”遭到镇压，但随后却出现了名为“卡提普南”^[12]的全国性秘密革命团体，致力于以武力推翻西班牙的统治。1897年，该组织在艾米利奥·阿奎那多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府，但遭到镇压。次年爆发的一场新起义后来卷入了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并且如前所述，在西班牙将菲律宾移交给美国之后，最终被美国扑灭。

美国对菲律宾的兴趣完全在于战略方面；但是当美国人意识到菲律宾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时，他们做出许诺，他们将十分尊重菲律宾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给予“最充分的自治”。美国人恪守了自己的诺言。此外，他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就必须比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更为广泛地普及教育，于是他们开展了一场以英语为教学手段的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教育是美国对菲律宾的最重要的贡献；教育经费在殖民地预算中占有的百分比比任何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高得多。美国保留了大部分的西班牙行政结构，但是在中央以及省、市、乡镇等整个地方区域中，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代议制政府的成分。这就需要准许组织政党，其中大多数是以鼓吹马上实现独立开始的。从1907年菲律宾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占领时期为止，一个政党——国民党始终保持压倒优势，这主要是通过三位杰出人物的领导：美国训练出来的律师塞尔希奥·奥斯敏纳（1878年生）和曼努埃尔·奎松，以及菲律宾大学所培养的才华横溢的曼努埃尔·罗哈斯。

在很短时间里，美国便把类似它自己的那种民主形式引进菲律宾；然而菲律宾的民主具有严重的缺陷，因为只关心保存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特权的土地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有效地掌握了所移交的权力。他们对行政事务的操纵使大多数自耕农降为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或雇农。1909年将菲律宾纳入美国关税区，进一步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因为它有利于在私营企业和大土地所有者的控制下的糖、马尼拉麻、椰子油和干椰肉的大规模出口生产。扩大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在部分地牺牲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实现的，于是“糖业大王”比“粮业大王”掌握了更大的政治权力。^[13]再者，菲律宾依赖美国的程度比

东南亚任何其他国家依赖自己宗主国的程度更加严重，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发展的迟缓。

到30年代，美国的舆论开始转变为强烈支持菲律宾独立。1934年，国会规定一个准备实行自治的10年期限，并准许召开菲律宾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成文宪法。作为对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美国可以保留它的陆、海军基地，直至实现完全独立时为止。

但是，当菲律宾人刚刚真正走上完全自治的道路时，欧洲和太平洋的国际局势就开始恶化。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引起了巨大的惊慌，以致菲律宾的政策急剧地转向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菲律宾联邦军事顾问后，在美国资金的援助下开始建立和训练一支当地部队。

荷兰人在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最初两个世纪中，如此热衷于维持他们的商业垄断，以至毫不关心它对当地的制度有何影响。19世纪前半期推行的“种植制度”（cultuurstelsel）变成了用来剥削当地生产产品的最有效的制度，并给荷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殖民盈余（batig slot）。为了补救这种做法在爪哇所造成的危害，自由主义开的药方是尽可能地向私人企业敞开大门，但这对于印度尼西亚人的利益仍然没有提供保证。因此，20世纪初期的“道德政策”就被作为一种最后的弥补手段。其办法是分散行政权力，以村社（desa）作为提高当地人福利的主要工具。严密的乡村行政机构逐步地建立起来。但是荷兰人的家长式统治如此严密，因此，任何属于真正乡村自治性质的事物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最初迹象，20世纪初表现在天才的拉登·阿强·卡尔蒂妮的活动中。卡尔蒂妮是扎巴拉摄政的女儿，她在1911年发表的信件，激发了本国精神力量的解放，这在荷属东印度是一个新现象。她和哇希丁·苏迪罗·胡索多医生（一位退休医官，曾于1906年发起一个推动爪哇前进的运动）都指望把推广西方教育作为救国手段。1908年，他创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协会“至善社”，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随后不久，在1911年，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协会“伊斯兰联盟”也建立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最初是爪哇的印染花布商为了反对中国人的剥削而建立的一种联合，在几年之间变成了一个革命政党。它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组织罢工和要求独立。

1917年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对爪哇的局势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积极活动的共产党支部（“第二支部”）企图控制伊斯兰联盟。这个目标失败以后，它组成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 K. I.）并与母体脱离，因为它的母体尽管持有社会主义观点，仍然坚持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理想。1922年，由于从欧洲回来的本国留学生对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本国人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在他们的影响下，伊斯兰联盟与印度国大党建立了联系，并采取了不合作政策。

战后的萧条与由此产生的劳资纠纷正好给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机会来造成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莫斯科把爪哇看成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战略中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发生了接触。从1923年以后，一系列的革命罢工运动终于在1926年11月爆发为一场突然的叛乱，地点主要是在西爪哇，但也在苏门答腊邻近爪哇的地区，因而导致荷兰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数百名追随者被拘禁在新几内亚，于是该运动逐渐消亡。第二年，苏加诺博士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它曾经试图仿效甘地的做法）也被摧毁，它的领袖被捕入狱。严厉的镇压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限制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运动。

战后这些年间的大部分动乱，是由于对荷兰人不愿实行任何真正的权力移交感到失望所造成的结果。他们那些漂亮的诺言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者坚持要求在政府中分享更多的权力。为了应付这种要求，1917年成立了一个国民议会，但其中欧洲人占多数，一半的成员是任命的，而且它的权力极其有限。与这一发展相联系的，是一个关于在各省将权力分散的总计划，但这种新制度迟迟未能形成，只是到日本人入侵以前不久才实现。它表示荷兰人准备做出的最大让步。

1900年以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东南亚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1938年，荷属东印度、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实际上生产了世界上的全部橡胶和一半以上的锡。这两种产品的主要买主是美国，而主要生产者则是马来亚。马来亚橡胶和锡的生产的巨大发展，是依靠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事业心和资本取得的。它造成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的大量涌入，因而到1941年，马来亚人不过占人口的41%，不如中国人多。他们仍然大多是种植

水稻的佃农，他们非常自傲，因而对于使他们国家改变面貌的经济发展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又很无能，所以无法使用英国人为他们提供的比较现代化的方法。

据说再没有别的民族比他们更不关心政治和对经济发展更不感兴趣的了。因此，用L. A. 米尔斯教授的话来说，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外国资本和移民的合法利益与马来人关于更多地参与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同样合法要求结合起来”。由于大多数中国人和印度人只是暂时留在这个国家，因而只有马来人发展了一种马来亚爱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征服以前，这只限于人数很少的中产阶级，他们曾经受过某种程度的西方教育。对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憎恨起了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复兴也起了作用。

在马来联邦中实行的间接统治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由在吉隆坡的首席部长及其附属的文官机构将它作为一个整体实行非常有效的统治。在马来属邦中，顾问们必须用建议和说服的方法来促进政策的协调。海峡殖民地由总督管辖，而由一个行政委员会和一个人数不多的立法委员会协助工作；1924年以前，立法委员会所有的成员都是任命的，那年增加了两名英国成员，是由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商会选出的。非官方的成员包括一名马来人和三名华人。官方的成员总是占多数，他们必然支持总督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对非官方成员的意见却非常尊重。很少有人要求对这种形式的政府作任何改变。英国和华人的经济利益集团担心由于把权力移交给苏丹们而造成管理松懈的后果，但是英国的行政官们对这种局面并不感到满意，在30年代期间，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采用了一种分权政策；首席部长一职于1935年撤销，某些额外的权力移交给苏丹的国务委员会。在这种方式下，协调政策的责任转到了高级专员及其“发言人”联邦秘书手中，同时苏丹们的威信也提高了。直到1941年日本人入侵时，伦敦的殖民部仍然坚定地推行分权政策，只是在等到对1935年实行的改革的效果做出判断后，才在这方面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缅甸在1826年至1886年之间被英国蚕食，到1886年1月1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吞并时，又恢复为一个整体，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进军曼德勒”几乎没有流血，但随着君主政体的崩溃，在全国范围爆发了严重的反抗活动，英国不得不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安

抚”工作。此后，缅甸在很长时期里一直平静无事。20世纪初，缅甸的行政机构与印度的其他省份非常相似，即最高层有少数英国文官指挥下面各级本地属员工作，在这些属员中，印度人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因而引起缅甸人的不满。大规模地扩大政府的职能的要求，开始显示出实现现代化和加强效率的迫切愿望，而这样做，就必须创立一些专业部门，结果把较老的家长制度变成官僚政治。这时，在英国的统治下，改革之风第一次吹到乡村，建立了以村庄为基础的新的地方行政系统，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员们日益干预乡村的日常生活。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从寺院学校（它在缅甸人的生活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转变为由政府举办或资助的世俗教育的过程，其重点是发展用英语教学的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变化所引起的佛教僧侣的憎恨，以及在锡袍被废黜后英国行政当局未能维持国王对“僧伽”（Sangha）的保护，都是导致僧侣戒律松弛的重要因素，在20年代里，以及在民族主义僧侣的反英宣传鼓动的高潮中，这种戒律松弛现象变得严重了，尤以乡村为甚。

世俗人的民族情绪表现为1906年创立的佛教青年会的佛教复兴主义，以及大约10年以后开展的禁止在佛塔和其他神圣场所穿鞋的宣传运动。然而，外界观察家认为缅甸人对政治无动于衷。特别是1917年当埃德温·蒙塔古宣布在印度发展责任制政府时，只不过引起缅甸人脱离印度的要求，这更加深了上述看法。1920年，在印度各省建立两头政治的蒙塔古一切姆斯福德计划将缅甸排除在外，这时，群众的愤怒突然爆发了，这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新成立的仰光大学和全国各地政府和教会办的中学中的学生罢课，以及在国民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的“国民学校”制度，都最强烈地表现了这种不满。英国政府急忙把两头政治也应用到缅甸。1923年，成立了一个由103名成员组成的立法委员会，其中79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该委员会通过从选举产生的成员中选任部长的办法，得以控制教育、公共卫生、森林和税务各部。

这时民族运动取得迅速的发展。极端主义者以爱尔兰为榜样，鼓吹暴力革命。缅甸人民团体总会抵制了立法委员会的第一次选举，秘密的“不合作协会”（BuAthins）则在乡村进行恐吓并开展抗税运动。1930年的大萧条带来的贫困，导致暴力活动日益加剧。反印运动造成1930年，后来又在1938年发生的流血暴乱。1930年12月，在受到

萧条打击最重的产米地区爆发了全面起义；其领导人以前是一个僧侣，他宣扬一度与君主政体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救世主的预言。

尽管如此，两头政治在有限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立法委员会中有一个稳定的民族主义多数派，它常常利用该派给政府制造麻烦，但从来没有把政府逼入困境；同时还有热心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温和分子。然而，他们坚持要求立即实行自治并脱离印度。但是，对立各派之间的争权斗争，使得在实行两头政治的时期里没有能够就改革通过任何立法。1937年，当印度实现各省自治时，缅甸达到了脱离印度的目的，并建立了两院制议会和内阁制政府。另外又有许多权力移交给新政府，因此，尽管总督拥有“保留的”权力，它实际上对缅甸本部的整个内政行使了有效的管理；但山区的掸族、克钦族和克伦族以及钦族不包括在这个安排之内。民族主义者仍不满足，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威胁和太平洋地区来自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危险，缅甸本来可能逐步地和不事声张地取得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必对它的宪法结构做任何重大的修改。有意义的是民族主义的鼓动活动只限于缅甸人之间；非缅甸人的少数民族把英国人视为他们的保护者，使他们免遭缅甸人统治的威胁。

民族自尊心是创立法属印度支那的最初动机。它开始于第二帝国的沙文主义，继而是对普法战争的耻辱做出的反应。法国人从来不像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对其臣民的福利有着责任感。他们只知为了法国的利益而剥削当地的财富。其次，才是传播法国文化的愿望，但远非那么强烈而且大部分是由于环境的驱使。任何关于训练本地人以便最终实现自治的想法，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王室被保留下来作为权力的象征，但一切实权都操在法国总督之手，他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的首脑。

在法国的政策中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因为尽管很少有法国官员说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语言或能够了解这些人民的想法，但是，1899年在河内建立的远东法文学校的一群人数很少的法国东方学家，却对印度支那的语言、风俗、历史和考古发现进行了最卓越的研究，这里所使用的印度支那一词是指其最广泛的范围。

但是，在这种无可置疑的伟大成就的背后，应当看到为了推行法国的农业殖民地化而使广大地区的本地农业经济所遭到的破坏，以及

创造出一个富有的地主阶级来剥削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农民的劳动。在法国人的统治下，印度支那与暹罗和缅甸一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输出地区之一。它成了法国的海外领地中最有利可图的领地。但是广大人民的工资仍然低得可怜，因而共产主义在法属印度支那比在东南亚任何其他地方扎根更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具有中国文明的越南人，在印度支那联邦的各国人民中，是文化上最先进的。越南人的民族主义最初大部分是法语——本地语学校的产物，这些学校的建立是为了训练本地低级职员。为了抵制民族主义，法国人通过高等学校和河内大学灌输分量更多的法国文化。但效果适得其反，人们评论说，最激烈反法分子，正是那些最精通法语的人。因此，当1907年保罗·博为了对民族主义让步而建立河内大学时，这所大学要纠正的弊病却大为发作，结果它在第二年就被关闭，直到1917年才重新开放。法国人犯了英国人在缅甸所犯的同样错误，即忽视本地语教育。早在1910年，有位观察家就曾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犯罪与欧洲式教育的曲线同时上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使法国人感到严重的不安，当时，受过教育的高级职员阶层受到西方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和印度的自主运动的双重影响。共产主义也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而且到了1925年，有了一个革命党，主要由学生组成，他们从广州人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1930年和1931年，在东京发生了小规模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起义，遭到法国人的残酷镇压，处死的人数以百计。反法运动多年被打入地下，而且大半停止活动。

1938年，日本在它于前一年7月开始的第二次大进攻中给了中国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宣布在东亚实行“新秩序”。正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它有两重性：一是反共，一是反西方。两年以后，当德国在西欧获得军事胜利时，日本宣布建立一个“共荣圈”，邀请东南亚各国参加。当时东南亚由于生产为现代技术文明所需的粮食和原料，就其面积而论，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富饶的地区。在它的各个地区中，荷属东印度是日本最垂涎的，但它说服荷兰人参加共荣圈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于是，日本认识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是，日本直到它于1941年投身于大规模南进时，并没有能够在东南亚各国中煽起任何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反对西方列强的起义。日本人的进攻也没有得到遭到他们蹂躏的各国中民族主义运动的任何物质援助。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有一些人和他们合作，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缅甸的巴莫和昂山；但同样也有一些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例如苏门答腊的沙里弗丁埃米尔和苏丹·沙里尔，他们坚决不同日本人打任何交道。广大人民群众以一种不知所措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眼看征服的浪潮席卷他们。

日本人出人意料，迅速而轻易地占领了东南亚，从而使西方列强威信扫地，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是没过多久，日本人的狂妄和残忍，特别是他们无情地剥削当地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引起人们对他们的畏惧和憎恨。抵抗组织到处涌现，这些组织往往是由撤退的军队留下的或者是空降到各国的欧洲军官们领导。在1945年的反入侵战斗中，大部分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缅甸国民军投向盟国，并在骚扰撤退的日军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人的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因而在盟军还未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个地区——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西亚——在盟军尚未实行占领以前便有一段空隙，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乘机攫取了控制权。胡志明及其追随者控制了安南傀儡政府，保大皇帝退位，越南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印度尼西亚，从日本人投降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开始占领爪哇以前，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多月的拖延。而且，荷兰刚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荷兰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以便应付由于日本突然崩溃而造成的局面。因此，苏加诺在沙里尔和哈达的支持下，乘机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无论法国或荷兰都不承认在它们战前的殖民地帝国中新建立的革命政府的权威，两国都准备尽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失去了的权力。

在缅甸和马来亚，英国人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并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重建了文官政府。但是，在这两个国家，战争年代的经历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英国计划在缅甸恢复1937年的宪法之前实施短时期的直接统治，在此期间进行复兴工作。然后将为召开制宪会议举行选举，缅甸人将草拟他们作为英联邦自治领的一部宪法。但是，国民军司令官昂山和他在“我缅人协会”里的朋友们要求立即

实现完全独立。他们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使其成为实现民族主义抱负的核心。日本的统治和日本于1943年8月1日赐给缅甸的“独立”给他们带来的经验，加强了他们争取真正独立的愿望；同时他们要阻止外国企业利益集团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据原来的地位。他们有效地反对了重建文官政府后英国总督所组织的每一届内阁，以及英国企图恢复秩序和推动经济复兴的努力。于是，1946年10月，总督休伯特·兰斯爵士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同意成立一个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占统治地位的、以昂山为首的部长会议。次年1月，昂山与艾德礼先生的工党政府在伦敦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他的内阁得到对内政的完全控制权，而英国则保证接受为决定自治形式将于1947年4月举行的大选的结果。

最紧迫的问题是那些非缅甸民族——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激烈反对任何导致缅甸人占支配地位的安排。昂山—艾德礼协定中包括一个保障他们的权利的附带条款，返回缅甸后，昂山立即开始与他们谈判，终于谈妥他们同意加入拟议中的缅甸联邦的条件；这些条件正式写入了宪法。然而，克伦族站出来要求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缅甸本部，构成他们定居的各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使他们的要求完全无法实现，于是英国不得不遗憾地加以拒绝。1947年7月，当昂山和他内阁的大多数成员被一个政敌所雇用的刺客暗杀时，这是缅甸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休伯特·兰斯爵士立即任命昂山的挚友吴努为总理，英国政府就是与他谈判签订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1948年1月4日缅甸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缅甸选择不参加英联邦而成为一个共和国。这样，从一开始它就表现出孤立主义，后来这成为它的政策的主导方针。

马来人的民族情绪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表现为一股政治力量，日本人撤出后，它的团结口号“马来人的马来亚”就指向华人。英国的政策是结束允许各邦独立自主的做法，因为这曾有助于日本人获胜，因此于1946年，所有9个马来土邦以及槟榔屿和马六甲共同组成马来亚联邦。华人占绝对多数的新加坡自由港不包括在内。如果包括新加坡，华人在联邦内的人数将超过马来人。此外，新联邦的大部分税收要依靠关税。联邦被视为走向马来亚独立的第一步；但是将苏丹的主权移交给英国以及为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所做的宽大规定，引起马来人非常

强烈的反应，以致英国对他们的抗议做出了让步。1948年，以联合邦代替了联邦，苏丹们恢复了他们过去的权力，对非马来人的公民权的规定也加严了。

马来人反对华人的态度是引起1948年开始的由华人领导的共产党暴动的重要因素，这场暴动成功的希望虽然非常渺茫，但多年来使英国当局感到严重不安并付出巨大力量。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马来亚的宪政发展，它比到那时为止任何其他殖民地的宪政发展都快。从下列事实可以衡量权力的移交究竟有多快：马来亚的第一届大选到1955年才举行，那时它的立法会议中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才第一次占据多数；1957年8月31日，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实现了完全的独立。假如没有两大种族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和马华公会（MCA）——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加强合作的话，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新加坡走向独立的进程不那么迅速。它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它那里共产党阵线的力量，是妨碍移交全部权力的因素。只是在林有福的领导下对左翼暴力和颠覆活动采取了坚决行动之后，英国政府才于1959年6月感到它可以允许实现近乎完全的自治，不过必须接受特别安全措施。左翼的人民行动党在第一届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李光耀证明他是共产党人难以战胜的对手。他现实地估计了新加坡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积极促进这个岛屿与马来亚的重新联合。

为了完成对殖民统治从东南亚消失过程的叙述，我们现在要从英国统治的领地转移到美国、荷兰和法国的属地。菲律宾是在整个东南亚第一个实现独立的国家。美国根据1934年通过泰丁斯—麦克达菲联邦法案时所做的许诺，于1946年7月准许它独立。在印度尼西亚，荷兰和1945年8月宣告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进行了长期残酷的斗争。当荷兰人开始第一次采取他们所谓的“警察行动”时，世界舆论强烈地反对他们。根据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提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干预，成立了一个调停委员会来监督局势和促进谈判，这是荷兰企图以武力解决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1949年12月，荷兰和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后者获得独立。

越南的悲剧在于它为争取独立而反对法国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为1949年年末共产党在中国获胜后，越南成为美国征讨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当法国人显然已无法摧毁胡志明和越盟

以及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时，他们企图扶植前皇帝保大为国家领袖，但尽人皆知他是他们的傀儡，而胡志明却成功地对法国进行斗争。中国和苏联集团承认了胡志明政权，与此相对抗，美国和与它为伍的国家承认了保大政权；于是，通过巴黎，美援开始涌入越南。但是，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这场斗争，尤其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面对着越盟的决心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法国的战争努力开始一蹶不振。它很少得到越南人的支持，而且在国内也越来越不得人心。然而，美国的援助日益增多，并以此迫使在军事上做出决定。因此制订了“纳瓦尔计划”，这个计划在1954年5月的奠边府惨败中破产了。导致这场惨败固然是由于法国在战略上劣于对方，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给予的物资援助。中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越南共产主义的成败，不如说是它本国边界的安全。但是，这时在美国准备大量援助法国的情况下，出现了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幸好，强烈要求谈判解决的力量占了上风，7月，在英国和俄国两主席的主持下，在日内瓦签订了停战协定。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为界暂时被分割，民主共和国控制北部，名义上以保大为首的西贡政权控制南部。协定规定，1956年7月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决定重新统一的形式。法国撤出印度支那，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的独立也就不再是一句政治空话了。选举则一直没有举行。

（李家骅 周叶谦 译）

[1] 1906年12月30日创建；1907年12月举行第一次会议。

[2] 这个名称来自改革方案的提出者1917—1922年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埃德温·塞缪尔·蒙塔古和1916—1921年任印度总督的切姆斯福德勋爵二人的名字。

[3] 关于罗拉特法，参阅第301页。1908年和1910年的新闻法案规定在报刊上煽动暴力行为以重罪论，政府受权在某些情况下得以对报刊实行查禁。

[4] “多蒂”（dhoti），印度人使用的缠腰布；“查达尔”（chadar），印度人穿用的一种连头巾和面纱在一起的长衣。——译者

[5] 罗宾德拉那塔·泰戈尔首先给予他这个称号，但从这时起人们普遍加以应用。

[6] J. 萨金特爵士1938—1946年任印度政府教育顾问。

[7] “卡达尔”（khaddar），为提倡印度自主，抵制外货而穿着的一种土布衣服。——译者

[8] 使团自1946年3月24日至6月29日在印度。

[9] C. A. 费希尔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和政治地理》（伦敦，1964年）一书第161—194页论述了西方统治的主要经济后果。

[10] 关于这一点，参阅唐纳德·E. 史密斯《缅甸的宗教和政治》（普林斯顿，1965年），第52—57、75—76、118页；W. F. 沃特海姆《转变中的印度尼西亚社会》（第2版，海牙，1964年），第209—217页。

[11]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是约翰·L. 费伦《菲律宾的西班牙化》（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59年）。

[12] “最崇高的、最受尊敬的菲律宾儿女协会”的简称。——译者

[13] E. H. 雅各比：《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农业》（纽约，1949年），第184—185页。

第十二章 1900—1931年的中国、日本和太平洋

20世纪初，西方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来对待远东和太平洋各国的。从经济上来说，这些国家作为原料来源地、投资场所和商品的市场，对于西方是重要的。从政治上来说，它们和西方列强的交往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曾被迫在贸易、投资和对居住在这些列强租界内的本国侨民的司法权方面，给予这些国家以特权。其他的国家则沦为殖民地或保护国。即使是在1901年已成为联邦的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也不能摆脱这种普遍的局面而成为例外。它们作为收入较高、人口主要为欧洲人的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范围内，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它们虽然拥有责任政府，对外关系却要受到英国的控制。只有日本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西方列强开始把它当作国际社会中的一名正式成员对待。

日本的国际地位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获得的。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已达二百多年之久，只有在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行有限的接触时才有所放松。但是，在被迫与西方列强发生条约关系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它却实现了政治现代化的计划，这是亚洲其他地方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点，推动了这种适应新时代环境的做法。日本像英国一样，是一个邻近具有高度文明的大陆的岛国。因此，它曾经能够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同时发展了一种鲜明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效忠依然存在，但并未妨碍一个统一的政体的早日出现，虽然这个政体曾经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提供过机会，以幕府为中心，又通过幕府名义上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寡头政治结构。职权分散在各个特权集团的成员手中；只有经过讨论和磋商才能做出决定。这种形式的结构，鼓励了官僚政治程序的发展，鼓励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发展一种凭借法律与习惯办事的关系，而不是凭借个人的权威。这种结构也提供了一些渠道，可以对拟议中的改革方案进行审查，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使之实现。

在和西方列强发生外交关系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的“实权派”的各个集团一直在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改革时机已经成熟，而列强的行动又加速了这个时机的到来。幕府的首领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行使天皇的权力，这时幕府由于在西方面前受到屈辱而声名扫地。不过，反对幕府的人们的动机却是复杂的。他们既出于传统上的野心，即与控制幕府的德川家族相抗衡，同时也是出于对待西方的态度。虽然有一些人对于幕府在抵抗西方的要求时表现无能表示不满，而另一些人则认识到，日本的未来有赖于它要采取西方的办法，但他们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在采取政治行动的问题上趋于一致。1867年，日本新天皇即位和新的幕府将军当政后，便成功地提出了把全部权力归还给朝廷的要求。实际上，这只是使天皇依附于那些策划还政天皇的人物。

在以后的30年中，日本的国家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封建权力告结束，组成了一支国家军队，建立了广泛统一的法制，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征收土地税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岁入。在决定这些改革的性质时，日本政府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的经验。德国当时的发展情况，被认为特别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德国为1889年以天皇名义向全国颁布的宪法提供了一个模式。根据宪法，建立了议会，不过对于议会在立法和控制财政方面的职能都加以限制，并且使之不得拥有任命或解散内阁的权力。通过这些变革，并辅之以在行政管理的结构和程序方面的改组，日本便有了一个有效率的政体，大权归于行政部门。由于改革计划是在名义上还政天皇后进行的，因而其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议会以及其他措施，它也设法使那些曾经积极响应与西方接触的人物的抱负得以实现。日本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对中国的重大胜利，给西方列强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证据：改组取得了成功。

日本曾经采取的是一种开明的保守政策。因此，这种政策是讲究实效的。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对于新目标没有什么抵触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原封未动。例如，在町村一级，政府对思想守旧的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那里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没有什么变动。而在其他方面，变革也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是依仗法令硬性推行，传统的组织形式依然存在。

在经济方面，现代化的结构是通过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在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新工业和新技术，其影响还是有

限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仍然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渔业。即便是在当时已经存在的那些现代工业方面，引用新的技术方法，比生产规模的扩大更为引人注目。棉纺业是个重大例外，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棉纺厂；还有几家政府经办的生产军需品的大型工厂，特别是东京和大阪的兵工厂。在丝业方面，动力驱动的缫丝机这时已占整个生产的一半，不过都是一些小型企业。在诸如水泥、玻璃、啤酒和纸张等工业中，也有了小规模的生产。在重工业方面，发展是不大的。生铁的生产达到2.5万吨左右，而整个钢的需求量只有25万吨左右，实际上全由国外供应。同样地，技术装备的制造和造船业也是小规模，而煤炭产量虽然迅速增长，但在1895年仍然只有500万吨。经济改变的程度是难以衡量的；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可能走得最远的制造业中，看来在家庭工业中就业的人数大约为在工厂中就业人数的3倍；当然，绝大多数的工厂规模很小，和现代的西方企业比较相去甚远。

日本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的效果，这时已经可以开始从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中感觉出来。生丝仍然是主要的出口品，但是丝、棉纺织品和煤炭的重要地位却在迅速增加。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开始显示出它对进口商品的影响，绵纤维和棉纱的重要地位下降了，原棉在进口货物中增长了，占全部进口货物的20%左右。糖和钢铁产品则是另外一些重要的进口货物。19世纪50年代后日本向西方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日本经济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然而所产生的相应的影响，即日本进入国际经济领域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对外贸易在价值上已经上升到大约占国民收入的1/4，但它仍然只相当于英国的对外贸易的约6%；日本只是在丝的贸易上，才是大规模的世界性的贸易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增长起限制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对于外国资本的输入，持有几乎是固执的怀疑态度。因此，进口货物在价值上便受到出口货物的收益和日本所能提供的硬币的限制。

到了1900年，日本已经创造了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交往的基础。在某些方面，它的地位仍然是相对软弱和不可靠的。但是，从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来说，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它像中国一样，曾经被迫在与列强最初缔结的条约中，准许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同意在它向这些国家的产品征收关税时有所限制。

1899年，治外法权终于被废除，关税实际上已经实行自主。两年前，它和贸易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道采用了金本位，并且开始从国外大量借款。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日本国际地位的力量，不仅是它的对外政策，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结果，也是列强承认日本内部改革取得成功的结果。

与此相反，1900年中国的地位却是一系列失败和挫折累积的结果。从国内政治结构来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由单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大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它在东亚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承认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国家，只是把它们当作属国。这种传统本身就使得要适应由于西方的扩张所造成的环境这一任务，变得大大复杂起来。中国政府在承认不仅需要改变其原则而且需要改变其传统的办事方法方面，表现得既颞顽又迟缓。外商经常出入的沿海一带和大江两岸的港口城市，距离都城北京甚远。对古老的政治秩序的威胁，其范围和性质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为那些大权在握、可以径自做出重大决策的人物所理解的。需要采取一种以西方的主权概念为基础的对外关系的体制，这一主张既不为人们所接受，甚至也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19世纪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状况，使得一些阻碍适应状况变化的固有束缚为害更烈。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王朝的没落阶段，政府机构腐败透顶，负责维护治安的由满人组成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极大部分的军事威力。南方各省已经心怀二志。由于这些情况，由于清王朝本身原本是满洲异族，因此，与已经确立的常规保持一致就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满洲人在确立他们统治者的地位中，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不折不扣的捍卫者。在他们衰落的过程中，他们日益把对革新的同情视为可疑，政事则由一些道地的正统派人物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在中国进行扩张的过程，其特色是一方决意侵略，另一方抵抗不力。西方的代理人主要是一些商人、海军指挥官和外交官，他们率先采取的一些办法，都是他们本国文化的惯常做法所允许的；而许多中国人便利用他们的活动所开辟的局面，获得好处。在每个阶段，中国政府的反抗（或拒绝合作），又为西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提供了机会，而中国政府在西方列强显示武力之后，又不得不被迫表示同意。西方蚕食的规模，只是由于各国希望不要激起中

国政治秩序彻底的破坏，或者到19世纪末，由于他们对于彼此的野心心存疑忌，因而才受到限制。

外国商人在广州所处的困境，引起了中英两国间1839年的战争，嗣后英国战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取得了他们第一批重大的特权。中国开放了5个对外通商口岸，商定了海关税则和通商条例，外国侨民可以享有治外法权。此外，英国还获得了割让地香港。由于这些让步的结果，在通商口岸中，外国侨民居住地便发展成为一种实行自治的租界，完全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之外，并为建立现代的工商事业提供了场所。19世纪50年代，当中国人拒绝讨论扩大西方的特权时，再次诉诸战争，新的条约便又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开放的通商口岸的数目大为增加；长江也向通商贸易开放；由已经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管理的关税，限定在值百抽五。到了1860年，中国已经几乎完全处在西方侵略者的摆布之下。

35年以后，中日战争又把中国推向进一步崩溃的阶段。中国和他过去的某些附庸国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中国北方的边境遭到俄国的侵犯。1895年日本人强行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割让台湾。日本的要求得逞，西方列强提出的新的要求便接着蜂拥而来。英、法、德、俄各国竞相争夺特许权，在一些战略上或经济上的重要地区内取得了租借地，取得了筑路和开矿的垄断权，而且广泛的“利益范围”也得到承认。在这些利益范围内，某一特定强国对于将来获得特许权居于优先的地位，并且得到保证：它的敌手将不会获得垄断权和租借地。列强（包括日本在内）正在准备瓜分中国。

中国对西方影响的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作用仍然甚小。一直到1895年，工业的变革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铁路只有几百英里。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靠从事以农业为中心的多种传统职业为生。政府对于发展现代的经济漠不关心，到1894年只借贷了大约1300万英镑。外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局限在如航运、保险和银行业等与贸易有关的事业方面，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在通商口岸非法地建立制造业。西方经济影响的主要手段是贸易。从价值来说，为数并不大，在90年代中期总额大约只有5000万英镑。出口货物主要是以传统部门的产品为主，特别是茶、生丝和丝织品，这些产品在19世纪90年代中，仍然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在同一年代中，鸦片仍然占进口货物的15%到20%，不过棉产品（棉布和棉纱）占总额的大约35%，成为最大的进口

货物。虽然无法获得确切的数字，但看起来英国在19世纪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远远占有最大的份额。到了1900年，日本对英国的这种地位提出挑战。但是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为中国的进口提供几乎达半数的货物，并购买中国出口货物的约1/4。

因此，从经济上以及从政治上来说，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欲望获得满足的传统场所。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于殖民统治之下，而蒙受彻底的耻辱，如果说是由于它过去的辉煌历史声威犹存，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是由于它现在的实力，则更无从谈起。其所以能够幸存，就较小的程度上说得力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各强国的国民均享有平等的经商机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其所以维护了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任何强国均不愿意无克制地提出要求，以致使自己陷于与敌手发生战争的地步。

在中国和日本东南方向广大海域中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各岛群上，列强并没有被迫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无论从已有的农业生产，或已知的矿藏来看，这些岛屿的价值有限，虽然它们对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有势力的商人和投资者集团具有重要意义。从战略意义来说，某些拥有优良海港的岛屿，被看作可能建造海军基地或加煤站的理想地方。距离英国属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近的一些岛群，早就为一些殖民主义者所担心，唯恐它们会落入一个不友好国家的控制之中。实际上对这些岛屿实行政治控制，部分是由于认为这些岛屿具有经济的和战略的价值。但是，部分也是由于不同的处境的缘故。在许多岛群中，作为商人、种植园主和征募劳工者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活动使建立一个殖民形式的政府成为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前提。各国之间就这些岛屿的竞争，并不足以使之成为造成战争的原因。

到1890年，这些主要的岛屿和岛群有很大一部分已被这个或那个强国所获得。斐济和新几内亚东南部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塔希提岛为中心的新喀里多尼亚和一些群岛属法国；新几内亚东北部、所罗门群岛北部和马绍尔群岛属德国；新几内亚西部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9世纪90年代，瓜分的过程几乎已经完成。在这个时期，美国 and 德国兼并的领土以后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某种意义。美国获得了夏威夷、关岛和萨摩亚群岛东部，德国获得了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不包括关岛）和萨摩亚群岛西部。再加上美国取得了菲律宾，德国

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特许权，这些发展形势便大大地增加了这两个强国在太平洋事务中的利害关系。

在从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个阶段中，19世纪开始的变革已告完成：中华帝国终于垮台；正式承认日本是一个重要强国；并且，随着1906年的协议新赫布里底群岛成为英法共管地，从而解决了在大洋洲实行政治控制剩下的唯一问题。

1900年，中国发生的一些新的动乱促使远东的政治有了一系列的发展。这年5月，一个反对西方的宗派义和团开始在华北破坏电报线路和铁路。6月，他们进入北京，在那里残杀中国的基督教徒，骚扰外国人，攻打各国公使馆。义和团一直被中国朝廷和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是爱国者，而不是叛乱者。当英国军队从通商口岸天津出发前去保护各国公使馆和外国侨民不受义和团的侵犯时，他们遭到帝国军队的抵抗。当他们攻下控制通向天津海路要塞时，中国便对列强宣战。这是盲目乐观做出的反应，它是一些男人（和一个女人，即慈禧太后）做出的决定，他们认为西方使中国的旧有秩序蒙受耻辱，因而他们判断失策。华南各地的总督和山东巡抚袁世凯当机立断，对宣战诏书隐而不发，保持中立。8月，八国联军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北京，朝廷逃离京城（参见前面第五章）。

一年后签订了《和平议定书》^[1]。中国被迫惩办了对于这次起义负有责任的人员，为德国公使和日本公使馆参赞被害一事表示道歉，并准许外国军队占领北京通海的通道。各国还要求中国政府做某些变动，并强行要求大量的赔款。

但是，义和团的起义却有着比较深远的反响。虽然列强采取一致行动，对它进行镇压，但是它们是在彼此日益猜忌的气氛中这样做的。在采取共同行动的整个过程中，它们既着眼于它们当前共同的问题的解决，同样也对促进他们本国未来的利益表示关心。俄国为支持它在满洲的地位所采取的行动，特别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惧。

俄国在满洲的利益集中在中东铁路。此外，俄国人还在经营银行业务、采煤和航运事业，并且从事与中东铁路^[2]的修筑和运营有关的行政管理和贸易的事务。1900年6月间，一股股义和团在满洲十分活跃；7月，中国政府命令它的军队和他们联合起来。俄国作为回击，一

方面与各省巡抚进行合作，一方面调入军队，其结果是，俄国军事占领满洲，直到与中国一起恢复和平后仍继续下去。

俄国保持它在混乱期间所取得的地位，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一种威胁。但是，这些国家是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理解这种威胁的：日本是从它在朝鲜的利害关系日益增加的方面来理解的；英国是从俄国进一步西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在波斯）来理解的；而所有这些国家则是从俄国意在与中国单独达成交易这一点来理解的，俄国的这种意图在整个义和团事件期间即已昭然若揭。在有关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中，没有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是举国一致的；不同的集团主张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当时的形势，又似乎有许多方针路线可供选择。在日本，有人支持与俄国达成协议，以便日本可以在朝鲜放手行事，交换条件是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利益占首要地位。在英国，许多人认为，与德国达成协议就会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提供极为有效的支持。但是，到头来这两个国家采取的行动却是缔结了1902年的英日同盟。

形势对这一行动是有利的。近年来，英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显著的友好，两国公众中的重要人物都表示支持使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尽管如此，两国政府仍然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论哪一个政府，如果放弃了不结盟的好处，而代之以对联合军事行动承担义务，却又得不到足够的补偿，那么它就会在国内受到攻击。在最初的讨论中，日本人寻求对日本在朝鲜的最高利益给予正式的承认；英国人则要求对拟议中的同盟的条件加以延伸，把保卫印度包括进去。但是，英国不愿在朝鲜问题上自动地卷入一场战争，而日本则不愿在远东以外的地方承担义务。在范围仅限于远东这个问题上，英国做了让步。至于朝鲜问题，则是以对条约的措辞认真加以推敲而解决的。两国宣称，它们承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对其中任何一国均无侵略意图。另一方面，它们又承认两国在中国均拥有“特殊利益”，而日本在朝鲜“从政治上以及商业和工业上均有特殊兴趣”。“如果这些利益或者受到任何其他国家侵略行动的威胁，或者受到（中国或朝鲜发生的）骚乱的威胁……两国中的任何一国起而保护这些利益将是可取的”。如果任何一方在保护其利益过程中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中，另一方只有在前述一方的敌人与另一国联合的情况下才对它进行援助。条约于1902年1月30日签字。[\[3\]](#)后来又通过交换外交照会做了补充。在这些照会

中，每一国均同意另一国的海军舰只在和平时期可以使用其港口，并保证“尽可能地做到在远东的海域中集中一支比任何第三国的海军都要强大的海军”。^[4]这些条款对于英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世界范围都承担了义务。但是，由于这些照会保密，因此以后对这项同盟做公开说明时，当然没有提及它们。

在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同盟是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它稳定了远东的局势。同盟除了保证英日两国之间的合作外，还排除了日本在损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与俄国签订一项协议的危险。但是，在某些方面有人争议说，这个同盟增加了英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日本获得的利益比英国的大得多。后面这一点，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同盟使日本在与俄国打交道时处于坚实的地位，因为现在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其他国家援助俄国已不大可能。英国海军对于潜在的敌人是一种威慑力量，如果最坏的情况竟然发生，它则是日本舰队的积极伙伴；它为一种新的安全感提供了基础。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同盟标志着日本被承认为头等强国。由于这些原因，英日同盟建立的消息在日本受到极为热情的欢迎。

有一个时期，看起来英国寻求在远东出现稳定的希望似乎将会实现。俄国同意从满洲撤走它的军队。但是撤军行动的第一阶段实现后，俄国的政策似乎改变了，剩下的军队没有动静，并对在满洲和朝鲜做出的让步日益注意。事实上，俄国行动性质的改变，似乎反映了中央政府内部势力的消长，并非反映了俄国为了加强其在远东的地位而做出的坚定决策。^[5]但是，局外人对此并不清楚。而且，在一个政府势力非常薄弱的地区，要在追求经济利益和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之间划出界限并非易事。日本人认为在这种局势下需要坚决维护其本身的利益。

1903年6月，日本决定就它与俄国在中国和朝鲜的地位问题，寻求与俄国达成一项协议。8月提出的建议的性质，不仅受到英日同盟的存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日本近期政局变化的影响。尽管策动1868年明治维新的所有仍然活着的“政治元老们”还在政府中居于有影响的地位，但是这个时期这群人物中最显要的山县有朋，却是他们当中最独裁、最跋扈的人物。他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根据这种改变，只有高级现役军官才是担任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的合格人选；而且，由于他对政党持有敌意，他竭力挫伤议会反对行政部门的力量。结果，日本提

出的解决方案，条件甚为苛刻。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压倒一切的利益”是无条件的，而日本反过来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利益的方式却有种种限制，以便不致妨碍日本在满洲地位的发展。谈判持续了几个月；但是，到了1904年1月，两国都认识到无路可走，于是开始准备战争。

2月初，日本人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军队在朝鲜登陆并向南满辽东半岛上的租借地旅顺口的俄军海军舰只进攻。紧接着这些行动之后，日俄两国都宣战。在紧接而来的战斗中，日本军队占领了俄国在满洲的主要中心地区，并在实际上摧毁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这个舰队本来被派往远东是打算摧毁日本的海军优势的。日本人在海军大胜之后，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建议，要他邀集两国会谈以便讨论和平的条件。总统同意采取这一主动行动，于是1905年的8月和9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举行了和平会议。在和会进行中，日本的地位由于公布了经过修订的英日条约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条约扩大了英日同盟的范围，把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包括进去，并对日本在朝鲜的霸权给予更为明确的承认。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了俄国对它在朝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承认，俄国把在南满的租借地和铁路转让给日本（须经中国同意，中国表示欣然同意），并割让库页岛的南半部。^[6]条约的条款以及作为这些条约后盾的军事胜利，都进一步确定了日本作为一个重要强国的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发展情况在另外方面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它们使日本实实在在地成了一个在亚洲大陆具有广泛利益的国家。不仅如此，由于日本本来希望俄国能够做出甚至更大的让步，现在的这种发展使得日本——特别是日本的越来越有势力的军事集团——感到不满。日俄战争为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而来的岁月中，日本巩固了它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至于朝鲜，其他强国在那里的利益是微小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久即成为半国内性质的。在日本国内，在应如何建立完备的控制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而在朝鲜，则出现了反对日本控制的局面；但是，列强一旦接受了日本霸权所包含的意义，外部对于日本的种种决定也就没有表示什么反对。1905年11月，朝鲜成为一个保护国；日本取得了对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的控制权；次年，日本委派了一名驻汉城的统

监。1907年，朝鲜国王退位后，日本攫取了对国内事务的控制权。1910年，这个国家被兼并。[\[7\]](#)

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租借地派有一名总督，并且组织了一家政府拥有半数资金的公司，控制铁路并从事包括采矿业在内的其他各种广泛的事业。日本在谋求中国同意将俄国享有的特许权转让时，又进一步从中国那里取得了更多的权利；而且，日俄之间在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中的合作，逐渐密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投资迅速增长。但是，满洲不像朝鲜那样，它却是一个使其他各国的投资者都对之相当发生兴趣的地区。特别是英美两国对修筑铁路颇为关心的集团，从中国那里获得了特许权，日本认为这些特许权触犯了他们自己的特殊权益。对于日本来说，这些行动造成的对抗并不比美国重申其“门户开放”政策更为严重。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代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挑战和潜在的危险。

正像在这个世纪开始的头几年中那样，中国的软弱仍然是纠纷的一个主要根源。政府没有能力直接保卫国家的权利，但是却看出，在那些加紧侵犯这些权利的各国之间挑起不和，倒是有利的。虽然采取这种行动可以使外国投资的规模有所缩小，但对于那些促使帝国最后崩溃的内部势力却不起作用。

义和团起义以后，各省政府的自治地位变得更加牢固。在那些领导有力的省份，他们整顿了地方军队，改进了交通运输，促进了工业发展并创办了现代的学校。各省的领导人认为这一工作不仅本身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建立实际可行的防御外国控制的唯一办法。所以，要想恢复中央控制的种种企图，都遭到各省的反对。

但是，中央政府同样也受到甚至更直接地影响其行使职权的那些因素的阻碍：财政匮乏和行政机构涣散无力；而且，在慈禧太后1908年去世以前，一直受这位顽固守旧、嫉贤妒能、诡计多端的太后的有害影响。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即便是经过比较审慎的计划和指导的政府活动，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由于创建现代军队，其组织者和指挥官袁世凯的地位被慈禧太后所剥夺。为实行代议制政府做准备，成立了立宪会议，这却为议员们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广泛的抨击提供了讲坛。关于发展全国铁路系统的决定，加速了帝国本身的崩溃，

因为这个决定的实施既侵犯了各省的利益，而且它的经费是由外国的贷款提供的。

1911年在长江流域的四川省发生了一次反对中央政府的起义。这是由于铁路计划所引起的。这就给那些具有比各省领导人远为激进的政治目标的人物开了一个头。在各通商口岸和海外，年青的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颇为赞赏，并且制订了一个改革中国的计划，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像日本那样以平等的地位来处理它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他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组成了同盟会以便推进他们的计划使之得以实现。这个组织通过秘密会社与农村居民进行接触，并且通过曾在外国留学的军官们与各省的政府发生接触。1911年，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举行起义。由于武汉的一些会员在一所房子里制造炸弹时发生爆炸，警察遂进行搜查，发现证据证明此事牵涉当地的一些军官。这些军官迫使他们的司令官领导起义，反对清王朝。这次反叛迅速传播到华中和华南的其他各地；12月，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推选为民国政府的总统。

清政府对于这些行动做出的反应是，邀请袁世凯重掌军权并率北洋军镇压反叛。袁世凯迅速地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他却不是利用这种军事胜利去恢复帝国的权力，而是去和革命党的领袖们取得协议。为了酬谢他迫使清帝逊位的功绩，他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的总统以代替孙中山。

由于中国的最有经验的军事领袖与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而新政府具有明显的实力。但是，它的软弱之处不仅数不胜数，而且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是不可救药的。袁世凯在掌握大权的时候，对于各省或各地区的在职官员，除了确认他们的职务外，别无其他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的与革命党人的目的大相径庭；而革命党人之间也四分五裂。袁世凯大权独揽，自以为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孙中山及其支持者主张实行一种革命的集权。但是，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的另一个派别则希望中国能够采用英国的议会制政体。宋教仁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劝说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和同盟会一同组成一个政党——国民党。新政府遵循它的前任的意图，即应在1913年举行一次选举，并成立国会。国会开会时，在选举中取得议席最多的国民党，极力要制定出一部宪法，规定行政大权应归于总理，而内阁应向国会负责。这一目标直接与袁世凯的追求个人至高无上权力的目标相冲突。在国会开

会之前，他就曾做出安排暗杀了宋教仁。这时，他又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解散国会。

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颇为得手。除了摧毁公开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外，他还从列强那里取得了财政援助。他开始起草一部宪法，把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并使自己当选为终身的总统。但深入地看，绝大多数根本的弱点依然存在。革命运动仍然在为争取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而继续进行工作。各省依然在反对北京的权威。列强以及他们的侨民依然保有严重损害中国独立的那些特权。中国有了一个新政权，但是它依然缺少一个可行的政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和平解决办法，深刻地改变了远东的政治形势，对于南面的各个岛屿的影响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意义重大的。这些变化是整个战争的产物。太平洋区域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不大，时间也局限于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阶段。这些军事行动影响某些战胜国在一些特定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力量。但是，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比较深远的变化而言，它们的重要性就比较小了。

战争于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后，立刻就直接地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卷了进去。最初的四个交战国——英、法、俄、德，都是在中国有着重大利益的大国；而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国也很快参加到它们中去。此外，太平洋上的绝大多数的岛屿领地是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属地，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则是英国的自治领。

德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力量的中心是山东胶州湾的租借地青岛。这里建有设防强固的海军基地，东亚舰队就停泊在这里。德属岛屿领地则没有什么防御工事，但那里却有着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可以和海上的海军舰只保持接触。战争开始时，东亚舰队的绝大多数大型舰只都在太平洋上巡弋，准备好去破坏敌国的舰运和交通。所以，协约国最初的任务是保护航运并占领德属岛屿领土，以便摧毁德国的无线电台。

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德国的海军偶尔也能对协约国在太平洋上的航运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德国的海军除了青岛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基地，因而受到限制，而青岛不久又处于日本人的攻击之下。到了1914年年底，东亚舰队的全部舰只不是被摧毁，就是因缺煤而被迫驶入中立国的港口。

占领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一支新西兰的远征部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海军舰只的支持下，于8月底进至德属萨摩亚群岛。岛上的总督拒绝将领土交给协约国军，但他也没有下令对协约国军队进行抵抗。德属新几内亚的首府拉包尔于9月间被一支澳大利亚的军队攻占，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新几内亚地区的其他港口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也被攻占。孤零零的瑙鲁岛由于它的磷酸盐矿藏而显得重要，它被一艘驶向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巡洋舰所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也是由拉包尔管辖的，攻占这些群岛并不带有更大的军事危险，但它却引起了协约国战略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当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向英国提供援助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却不愿鼓励日本全面参战。另一方面，英国在太平洋上却需要海军力量的协助。因此，英国驻日大使提出一项正式要求，“如果可能，日本舰队应搜索并摧毁正在袭击我们商路的德国武装商船改装的巡洋舰”^[8]。英国希望这一方案将把日本的参战限于在中国海的海军行动。但是，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中根本没有理睬英国建议的这种限制。日本在德国没有按照最后通牒的条件行事后，便对德国宣战，因此英国和日本就必须确定两国海军的行动区域。两国达成的协议规定，日本海军应在赤道以北的海域巡逻，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则在赤道以南海域巡逻。

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都位于日本负责巡逻的海域以内；但是人们一直是这样理解的：这些岛屿要由澳大利亚人来占领。然而，在英日两国达成协议时，并没有派出远征部队。因此，日本人便占领了德国人在那里设有一座电台的加罗林群岛中的雅浦岛；他们声称，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愿把控制权移交给澳大利亚人。但是，当一支澳大利亚的军队行将乘船前往这些德属岛屿时，东京却发生了骚动，反对拟议中的权力移交。因此，日本要求英国同意让他继续占领这些岛屿。这一要求被接受，英国政府便于12月3日通知澳大利亚，“我们认为让日本目前继续占领，而把有关岛屿未来归属的全部问题留待战争结束时去解决，从战略上说是最适宜的”^[9]。

尽管这一行动显然是拙劣的（不过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却是和日本政策的其他方面相一致的。战争爆发时，美、中两国政府曾经试图取得协议在远东保持现状。但是，日本在致德国的最后通牒

中，曾要求把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日本接受了英国的要求，在最后通牒中包括以下字样：“目的是最后将把胶州湾地区归还中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向全世界保证“日本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攫取更多领土的要求，也无意剥夺中国或其他国家人民现在所占有的任何东西”。^[10]但是，在立即占领的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是坚定的。

胶州湾对于日本确实具有重大意义。曾经用德国资金修建了一条从海军基地青岛通向内地济南的铁路，又在这个被打开门户的地区取得了采矿和其他特权。这些发展就使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参战后立即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包围青岛，日本部队在少量英军的支援下在山东北部登陆。11月10日，青岛陷落，于是日本建立了一个军政机构来管制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

中国政府设法解决自己由于协约国军队登陆所牵涉的问题，便宣布划定一个交战区域，在该区域内，对交战双方的行动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接受划定战区。当日本建立了一个军政机构时，中国提出抗议。1915年1月7日，中国撤销了交战区域，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归还租借地，赔偿在租借地以外地区进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日本政府进行报复，指责中国人的举动是“对国际信义缺乏信心，置双方的友好关系于不顾”，并且要求解决所谓“日本和中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11]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占领胶州湾而引起的争端，为日本实行外交新方针提供了机会，但并非导致这种新方针的原因。日本对于俄国、法国和德国在1895年采取的行动一直耿耿于怀，当时三国曾经迫使日本放弃它对中国的某些要求；对于1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施加影响，因而使它对俄国提出要求时有所节制，也感到不满。现在看来，在其他大国正从事战争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达成一项双边协议，就可以大大地加强它在最后的和会上讨价还价的地位。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12]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希望按照它早先在南满所遵循的方针，在山东建立它的地位。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日本以后可能与德国就胶州湾租借地和其他德国权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国政府不得将山东省境内的土地让与“任何

其他国家”；但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同意日本另外建造一条铁路。最后，要求开放某些城镇，供外国人居住和进行贸易。第二号关于南满和毗邻的内蒙东部。中国要承认在这两个地区“日本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并给予日本以某些特许权。后者最重要的是以下各点：租借旅顺、大连的期限和管理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均“再延长九十九年”；给予日本臣民充分自由，以便他们能在这两个地区的所有各地居住、取得土地并从事商业；有关利用外国资金或聘用外国专家的任何意见，中国均有义务与日本进行磋商。日本在第三号和第四号中分别要求汉冶萍钢铁公司应改为日中两国合营企业，中国不得“将沿海任何港湾或岛屿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国家”。在第五号中，日本的更大野心充分暴露无遗。其中包括这些条款：中国要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军事和财政顾问，警察事务（在有必要做出这种安排的地方）由中日两国共管，向日本采购武器或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全部接受“二十一条”，中国就会沦为日本的属地。

日本驻北京公使在提出上述要求时，曾责成中国政府严守秘密。但是，中国政府认识到只有把上述内容泄露出去，才能激起各方的反对。因此，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是在各方严加指责下进行的，不仅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甚至在日本国内也遭到谴责。此外，日本的盟国英国，也正式要求日本采取温和政策。结果，日本放弃了某些要求，第五号中的要求被搁置起来“容日后协商”。但是，日本坚持要求将租借地和管理南满铁路权利的期限延长，并且最终将德国势力驱逐出山东。在这些条款实际上已达成协议后，中国政府继续拖延谈判。中国政府明白这些条约会大大地损害它在中国的地位，所以一直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才签字。

袁世凯政府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除了外交上对日本的投降之外，还涉及其他方面。这个政府先前从西方国家那里接受的财政援助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也无法为中国的开发计划再从西方国家的私人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在袁世凯开始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君主国并自立为皇帝的时候，各省督军便起来反对他。这些督军们和从前国会中的各个派系集团串通一气，共商迫使袁世凯辞去总统职位的办法时，袁却于1916年6月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国随即重新陷入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过去的国会重新召开。国会过去所起草的规定政府应向国会负责的宪法，现在

付诸实施。由于国会为国民党及其同盟者所支配，这一安排并没有解决革命运动与军人之间的根本矛盾。于是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妥协办法：前副总统、国会的支持者黎元洪出任总统，北方的军人领袖段祺瑞担任总理。但是，老矛盾不久首先在各省的政府（宪法在那里是无法实行的）问题上，其次又在对外政策上重新表现出来。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要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时，美国决定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敦促所有其他中立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促使各协约国重新考虑它们自己的态度，它们过去是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的。日本决定鼓励中国尽快地参加协约国。日本政府和一般的看法一样，认为美国断绝和德国的关系后不久随之而来的将是宣战。因此，日本政府极力希望避免出现中国作为一个受美国庇护的国家而参战的局面，因为这将可能导致美国在和会考虑二十一条”这一问题时强烈地支持中国。英国和法国出于不同的原因，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及早宣战是可取的。因此，协约国向中国概略地指出了它参加协约国可以指望获得的好处，这主要指借款和其他让步。

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主要是根据国内的形势来衡量美国和协约国提出的这种做法的。段祺瑞很快地支持断绝外交关系，因为他希望这样做将会使他获得财政上的援助，从而可以减少依赖国会的程度。出于类似的理由，他稍后又赞同宣战。国会对于段祺瑞的想法了如指掌，最初对于这些做法中的甚至第一步做法都是有保留的；但是由于有希望得到援助，便被争取过去。于是3月14日经过投票通过，中国遂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国会对于参战问题的怀疑更为严重，而且不易消除。对参战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提出的理由，其可靠性似乎值得怀疑：协约国有可能不提供它们的代表所说的那种财政援助；而且，俄国革命爆发后，协约国是否能获得胜利看来也没有把握。但是，国会最担心的是，宣战会使军人的势力增长。由于段祺瑞召开的各省督军会议支持段的参战政策，而且由于一些被雇用的暴徒企图对国会议员进行直接的恫吓，这种担心便大大地变得强烈起来。

最后的这些事件终于使国会和军人之间不稳定的联盟垮台。在总理、国会和总统相继倒台以及一位军事领袖企图复辟清王朝这段昙花一现的插曲以后，段祺瑞重新执政，担任一个军政府的首脑。该军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国宣战。一个月后，过去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在广

州另行成立的“临时政府”承认了所采取的行动。于是，中国便在它的混乱的政治局势允许的情况下一致承担义务而参战。

中国进入交战状态的结果，整个来说对中国人和对协约国都是令人失望的。中国从英国、法国和美国（它于4月间参战）那里取得了几项有用的让步，但没有获得大量的财政援助。协约国在进行战争中，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多少帮助。一直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日本，却成为主要的受惠国。它给予北京政府以贷款，作为酬报，又获得了另外一些特许权，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军事事务。

1917年下半年，日本政府也在企图争取美国支持它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像其他协约国一样，日本也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去华盛顿。日本代表团名义上的目的是要协调当前的战时活动，可是代表团长石井菊次郎的主要目的是要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最高利益”。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最初针对石井的建议，提出发表一项美日宣言，重申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领土的完整。结果双方取得一个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这就是11月2日签订的蓝辛一石井协定。在这个文件中，美国接受这种论点：“领土上的邻近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和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重申它将“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并且否认日本有“任何侵害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企图。^[13]协定措辞不无含糊之处，签字双方各有不同的解释。对石井来说，协定表明美国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现有地位，并默认一种日本式的“门罗主义”在远东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蓝辛来说，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只是指地理上而言，并不是从政治上来说。石井的论点也许占了上风；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使美国接受了一个在以后的谈判中可能对日本是有用的、而对美国则是麻烦的文件。

蓝辛一石井协定签字后的几天内，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使远东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对协约国来说，这个事件具有两个重要的后果：俄国与协约国的合作到此告终；而且，新政府如要存在下去，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当协约国正在考虑这种局势在军事上的意义时，北满又出现了危机。帝俄政府逐渐把铁路区的行政权完全控制起来，因此，像哈尔滨这样的中心，简直像是俄国的殖民地一样地被统治着。这时，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企图使

铁路区的行政长官就范。中国军队代表协约国，被派到这个地区，并且成功地恢复了铁路区行政长官的权威。

协约国的行动使铁路区成为一个俄国反布尔什维克的策划中心。1918年春，一支俄国非正规军越过边界，进入西伯利亚；但是，这支军队6月间被红军击溃后，又退回到满洲。这一事件使人产生一种恐惧（不管是真是假），认为俄国的侵略迫在眉睫，于是一支日本军队便被派往这个地区。与此同时，协约国一直在讨论派遣军队在海参崴登陆以便和反苏维埃集团进行合作的问题。主张采取这个计划的一些主要理由要么是不充足的，要么是欺人之谈。有人争论说，实行这个计划可以使5万名正向东方进军以便为协约国效力的捷克军队自由行动，从而减轻对西线的压力。而且，它还有助于在西伯利亚成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实际上，协约国的想法不仅受到这样一些考虑的影响，而且也出自它们彼此之间的猜疑。日本人唯恐美国人有意从苏维埃政府那里取得在西伯利亚的特许权；这就使日本更加决心给予已经在这个地区作战的反布尔什维克集团以军事支持。美国人唯恐日本人在策划另一次扩张主义的行动，因此他们不愿让日本人单独行动。由于这种种理由，终于做出决定，由协约国进行干涉；1918年8月和9月间，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便在海参崴登陆。[\[14\]](#)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但在西伯利亚，如同在俄国的其他疆界上，协约国的军事行动仍在进行。一直到俄国人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取得胜利的一切希望最后都告落空，而且日本失去了获得领土的任何机会以后，这一军事行动才被放弃。

在世界大战结束时，太平洋的形势已经和大战开始时的形势不相同了。日本在满洲已经扩展其势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其他特许权，并且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各岛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德属诸岛。主要的协约国家及其卫星国，在战争期间已经就它们作为战胜国举行会议时所应获得的利益问题，彼此取得了或是公开、或是秘密的协议。俄国由于发生了革命，已经暂时地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所具有的影响；德国则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失去了它的殖民地和特许权。主要决定协约国在和平会议时决策的，就是这些变化。

但是，还有一些具有另一种重要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即将举行的谈判关系不大，不过对于将来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和影响却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英法两国在战争中削弱了，法国因而失去了在远东政治活动中充当一个主要角色的能力，而英国则已失去了恢复其过去的海军优势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经过这次战争取得了比战争开始时更为强大的地位。两国都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战争使这两个国家深切地感到，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取得使它们自己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对于确保国内的安全与繁荣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俄国现在是由这样一个政权所控制，它虽然抛弃了帝国主义的手段和目标，但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缘故却决心要在中国确立它的势力。在中国国内，变化是不大明显的。那些为了追求个人权力而背叛帝国的老军阀们，现在在政治上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不过为他们效力的年青的一代人，往往是在国外受教育的，他们有能力按照现代的方针整顿国内的行政管理，或代表他们的国家处理对外事务。而实际上没有效率、缺乏军事实力的广州政府，仍然代表着一个争取政治现代化的、基础广泛的民族运动。中国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而出现，但这至少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这就是在和平会议期间做出的各项决定将要经受其考验的那些变化。

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上讨论的问题中，对太平洋地区具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即处置太平洋德属岛屿，解决山东问题，以及日本提出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包括一项保证种族平等的条款。由于在战争进行期间曾经缔结秘密协定，和会对于上述头两个问题享有的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1917年初，当德国潜艇的攻击对协约国的航运造成很大压力时，英国曾要求日本派遣驱逐舰到地中海。日本答应了这项要求，但交换条件是，英国保证支持日本对赤道以北德属岛屿和德国在山东的特许权的要求；在日本方面，它同意支持英国对已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领的那些岛屿的要求。^[15]对于这个协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勉强地予以默认；而且不久以后，法国和意大利也同样地默认了。

因此，和会面临的关于太平洋德属岛屿的问题，并不包括选择一个行政管理当局的问题，而只是涉及这个当局据以行使其权力的条件问题。美国总统威尔逊非常重视对不具备自治条件的原敌国领地实行国际托管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正在写进国际联盟盟约中的关于委任

统治地条款的基础。另一方面，日本要求不受约束地控制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将分别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的前德属领地上行使英王的权力，并与英国共同管理瑙鲁；两国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方针（南非对前德国领地西南非洲也采取了同样方针）。两国还特别要求取得对贸易和移民进行限制的权利。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在盟约中规定了一类新的委任统治地，即所谓第三类委任统治地。盟约宣称：“某些领土，例如西南非洲、某些南太平洋岛屿，由于人口稀少，或面积有限，或地理上与受托管理国领土邻近，以及其他理由，最好置于受托管理国的法律治理之下，成为该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规定，使得要求担任受托管理的国家获得了根据它们的意愿施加限制的权力，这些限制已成为它们自己法律的一部分。受托管理国只受两条限制，即一般不许可在委任统治领土上设防，还要承担保护当地人利益的义务。对于这个妥协性的解决办法，不但威尔逊总统感到不满意，而且可能担任受托管理的国家也不满足，但这项办法总算被双方勉强接受下来了。

和太平洋岛屿问题不同，日本人为在山东问题上提出的要求拼凑了非常充分的理由，因此得以避免做出妥协。除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于1917年答应给予的支持，他们还取得了中国的正式同意。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政府就曾保证接受日本和德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1918年9月，双方取得协议，同意把原来德国经营的铁路改为中日两国合办，并由日本出资修筑两条重要支线。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坚决认为美国在蓝辛—石井协定中已经承认日本在山东具有特殊的利益。根据这些协定，日本要求应把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以及享有的其他特许权转交给日本。租借地最终将归还中国。唯独经济方面的特许权将予以保留，将来根据中日两国现有的协定来处理。

尽管北京政府先前已经做出允诺，但是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激烈地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虽然担任代表团团长的中国外交总长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但是代表团中一些起支配作用的团员却是年轻一代的人物，他们在中国就曾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后来又毕业于国外的大学。和属于留学生集团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们决心要为挣脱列强对中国行使主权所加的枷锁而努力。由于北京政府十分虚弱而且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因此他们在巴黎似乎有异常的自由，采取他们自己的行

动方针。除此以外，在和会进入具有关键意义的几个月中，北京政府正在试图和广州的临时政府就中国重新实现统一问题达成协议。中国的发言人在巴黎发表的强有力的言论，可能被视为对于这种实现统一的努力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既转移了公众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关键性谈判的注意力，并且也着重说明了政府在有力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顾维钧在和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时，一方面据理力争，一方面呼吁同情。他声称，德国的租借地是用武力取得的，1915年的中日条约也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而且，在中国参战时，中国曾经宣布和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均已废除，因此，德国已经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转让给日本。但是，他也着重指出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又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孔子、孟子的故乡，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圣地”^[16]。根据这些理由，他要求把战争爆发时德国在山东拥有的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

中国陈述的意见以及陈述意见时的巧妙做法，在世界的报刊上博得了颇为有利的宣扬，也激起了中国的西方留学生集团的巨大热情。结果，当上述问题交付最后解决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废除1915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而且要求废除1915年和1918年两国签订的包括关于满洲和内蒙的条约在内的一切条约和协定。中国代表团未能充分理解讨论中的获胜和强权政治的手腕是两码事。日本的要求全部获得通过。

但是，日本获得这一胜利之前，却在对它来说第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上遭受了失败。在国际联盟起草盟约的委员会上，日本代表提议在条款中增加一条保证种族平等的条款：“国际联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因此，各缔约国一致同意，尽速给予国联会员国的一切外国侨民在各个方面以平等而公正的待遇，不因其种族或民族关系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有所区别。”^[17]从获得威望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对日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它对于移民问题也有着实际的重要意义。由于第二个原因，日本的提案深为诸如英国各自治领这样一些国家的代表所厌恶，这些国家对于非欧洲人的入境是加以限制的。尽管这个提案经过日本一再修改，最后变成仅仅阐明种族平等的原则，但这也没有能够使英国自治领的代表们，特别是使澳大利亚总理威廉·莫里斯·休斯平息下来，他威胁要挑起英国各自治领和美国西部各州人民起来反对。在这种局面下，当

修改后的日本提案交付表决时，威尔逊总统和英国出席该委员会的代表都弃权。当17票中有11票赞成这个提案时，威尔逊宣布本提案必须全体一致赞成才能通过。

因此和会的各项决议等于是进一步肯定当时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各种态度。日本代表团在能够依靠大战期间达成的坚定的承诺的问题达到了它的目的；但是，在主要依靠西方强国发善心的问题上，没有达到目的。中国所取得的好处，不过是和会的职权范围本身以内所能确定的那些必然的结果而已。在战时废除的中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条约被宣布永远予以废除。而中国的代表团通过出席这次和会，使各国感到有必要全面修订中国与各国的条约关系。但对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出现，和会却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行动。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和会的气氛和西方国家舆论的调子，重新强调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即便是日本，尽管必然要被承认是一个强国，但是在西方的心目中，它仍然是亚洲的一部分。国际联盟虽然成立了，但是5个世纪的欧洲扩张的传统，仍然阻碍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性社会。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世界局势仍然是动荡不安的；而且，在大战后紧接而来的那些年代中，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在进行庞大的建设海军的计划。这些计划所需要的支出，既妨碍了这3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各国政府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海军军备的增加，其结果只不过是又加深了造成这种增加的不安全感。

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是远东的局势。美日两国政府彼此继续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对方的对华政策。从美国的观点来说，由于英日同盟的存在，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美国人认为，这个同盟一直使英国容忍日本提出的要求，将来可能更会这样，因为英国已经丧失了过去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英日同盟将于1921年7月满期。这个同盟会展期吗？如果展期的话，将根据什么条件？这个问题不仅对两个签字国是重要的，而且对于美国、英国各自治领和中国都是重要的。

在1921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英美两国政府已经把各自在限制军备和英日同盟的前途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向对方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到6月间，英国政府获悉，美国赞成召开裁军会议，而且希望

英日同盟或者予以废除，或者做实质性的修改。在美国政府方面，它知道英国已经接受英美海军实力保持均等的原则，而且愿意修订英日同盟条约，虽然并不予以废止。因此，两国仍然有待找出一个办法，解决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以及与其他有关方面的分歧），并将最后取得的结论付诸实施。

6月下旬在伦敦举行的英帝国会议上，加拿大总理阿瑟·米恩充当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调停者的角色。他提出建议，并得到他的同事其他总理们的同意，应就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在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举行一次会议。^[18]这个建议在正式提出以前，美国政府就已获悉。美国政府为了保持主动地位，便立即邀请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各国政府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限制军备会议。当正式接到英国的建议时，美国人便建议会议的规模，以及根据情况的需要，会议的成员应加以扩大，以便把太平洋和远东的问题包括在内。英国政府同意这项程序。

在美国人最初邀请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对于接受邀请持保留意见。日本政府不是不愿意参加讨论限制军备的问题。但是，它对于美国提出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包括进去的动机表示怀疑。这是不是企图迫使放弃英日联盟？美国是否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希望破坏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日本接受了邀请，但提出意见说，他们宁愿“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而不愿纠缠于重算过去的旧账。^[19]

除了美国原来邀请名单上的那些国家以外，另有4个国家收到并接受邀请参加扩大的会议：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这4个国家将不参加讨论限制军备的问题，但参加讨论有关远东和太平洋的问题。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在哈定总统主持下开幕。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万斯·休斯被选为会议主席。休斯立即投入会议的主要议题，提出立即减少并继而限制主力舰吨位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大批拆毁现有舰只，并且同意在10年内停止建造舰艇。美国、英国和日本所拥有的主力舰吨位要削减40%，然后美国和英国主力舰的吨位限制在50万吨，日本为30万吨。

英国和日本两国都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也都附有保留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条件。在吨位问题上，方案稍经修改后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这个方案允许美国和英国的主力舰最高吨位各为

52.5万吨，日本为31.5万吨，两个比较小的海军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各为17.5万吨。但是，日本在同意这个方案的时候，又坚持要满足其另一个要求。它要求停止在太平洋兴建海军基地和要塞。这项条件最后明确规定不包括签字国所属的领土（包括派代表参加英国代表团的各英国自治领），也不包括某些其他地区（特别是夏威夷）；但是，最有意义的是，它适用于菲律宾、关岛和香港。^[20]因此，其结果在于保证日本本土不受到任何可能在近便的作战范围内兴建的基地对它进行的海上攻击。

会议在谈判海军军备的同时，也考虑摆在会议面前的关于太平洋和远东的各项问题。与海军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是英日同盟问题。鉴于美国极力反对这个同盟，英国代表团团长阿瑟·詹姆斯·贝尔福最初提议由英国、日本和美国三国签订一个条约来代替它。但是，这个提议是休斯所不能接受的，他建议把法国也包括在内，以避免造成投票表决时英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压倒美国的危险。由于美国的坚持，新签订的四国条约的约束力远比原来的英日同盟条约松散。它只保证四国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地区内的岛屿领土与岛屿属地”的权利。四国之间如因“任何太平洋问题”一旦发生争议，则共同开会解决；而且，如果任何一国因同样问题一旦受到“任何其他国家侵略行动的威胁”，也由四国协同会商。^[21]结果，就连这样会商的条款也从未履行过。因此，四国条约正如美国所打算而日本所担心的那样，只不过是用来结束英日同盟的一种外交策略而已。

其他最重要的区域性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地位问题。在总的原则问题上，参加会议的九国签署了一项公约，十分符合中国发言人所提出的要求。它们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全”；给予中国“最充分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机会”，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维持各国对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不得利用中国的现状，乘机谋取特殊权利或特惠。但是，为实现这些保证所采取的步骤，仅仅是在任何一国认为“需要执行本条约的情况发生时”，各签字国可以随时进行“充分坦率的会商”。因此，会议满足于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洞言辞作一番高谈阔论，但在要承担义务采取具体的行动以保证条约的执行时，则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讨论中国政府感到不满的问题，如外国控制中国关税，外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和治外法权等问题时，上述的后一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

显。对于关税问题，九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准许中国将关税率提高一大步，尽管提高的幅度仍然是有限的；同时，还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改革海关的行政机构。另外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治外法权的行使情况，以便将来在可能条件下予以废止。此外，在邮政、电信等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较小的让步。

中国最感不满的是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这个重大问题，包括山东问题在内。中国政府迫切希望会议讨论胶州湾租借地归还的条件，因为它希望能在谈判时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日本则不愿意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这种做法而受到削弱。由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能置之不理，双方最后一致同意采取一个妥协办法，即在会外举行谈判，但休斯和贝尔福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根据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中规定的条件，日本同意将全部主权连同前德国公产的所有权，都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则同意向日本银行家洽借贷款，作为购买铁路的价款，而且承认日本在矿山享有的某些利益。日本还进一步保证撤军，而中国则保证将该地开放，与外国通商。[\[22\]](#)在这项协议公布后，英国提出放弃威海卫租借地，以便中国恢复它对整个山东省的全部控制。

中国代表团还要求会议重新审查“二十一条”以及日本根据“二十一条”所享有的特殊利益的问题。由于“二十一条”中有些条款的内容已经处理，而且由于第五号现在已由日本撤销，其余尚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关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权益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日本人在名义上做出两项让步。他们同意将它享有的优先贷款兴建铁路的权利向国际财团开放；而且，他们放弃他们的意图，即坚持要求在南满行政管理工作中必须聘用日本人充当顾问。但是，他们坚持保留在山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全部权利。由于南满和内蒙对日本和朝鲜的经济愈来愈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保持对该地区交通系统的控制权，是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华盛顿会议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持续了3个月，因此，会议在此期间研究了范围广泛的问题，详尽地加以分析，并对各项问题做出了坚定的决议。过去，在国际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疑虑重重和变幻无常的局势，而现在却在范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明朗而确切无疑的局面，由此，它就增进了未来和平的前景。而这正是会议成就的真正核心所在。

当时，对会议的评论是有所不同的。休斯把海军军备条约说成是“在缔造和平的历史上，也许是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23]日本首相高桥是清把会议的决定描绘为“造福全人类”。^[24]这种热情的评价在当时的世界各地报刊中和整个20年代的有识之士中都得到反响。但在现实中，要维护和平仅仅使当时存在的各种关系正式确定下来是不够的；随后10年的外交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华盛顿体制”崩溃的记录。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出现，是由于日本的经济获得了发展才做到的。虽然日本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取得的成功，由于日本国内的民政和军政成效显著，由于日本的领袖人物广有权谋而其决心又冷酷无情，因而大为增大，但是，成功的基础还在于经济的增长。

在1900年到20年代末大萧条开始的这个时期，日本的总产量，估计每年增长率为4.2%。^[25]由于人口由4400万人增至6400万人，每年增长率为1.2%，因此，产量按人口计算每年增长达3%，这个速度也许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平均分享的，不过全国的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显然获得很大利益。增长的基础，主要是在日本日益仿效现代西方的模式时工业结构有了改变。到1930年，日本虽未达到这样的模式，但现代化的成分这时已经牢固地奠定。有收益的就业者，几乎有一半人仍在从事农业劳动，而农业中的小农制并没有什么改变，农民中大约有一半人是佃农。稻米仍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它所占的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一半以上。作为第二种最重要的农产品的生丝的生产，曾经有了一个大发展，所以，到了1929年，大约2/5的农产都以蚕茧的生产为副业。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29年它雇用的工人占职业人口的17%，它所生产的产品占总量的27%。最引人注意的是丝棉的发展，过去传统的生产方法和组织形式，现在已看不到了。整个纺织工业的工人，这时占产业工人的25%，其中有一半的工人是在有5个以上雇工的工厂中劳动的。因此，日本的生产十分偏重于轻工业，而重工业却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落后了。在冶金工业方面，钢产量达到了200吨以上，但这只能满足日本需求的约70%；同样在机械工业方面，尽管产量和产品品种都有了发展，但对于机械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靠大量进口的国家。

日本现代工业，是在传统的职业、生活条件和生活观念继续存在的同时建立起来的。结果是，出现了“双重经济”，这种经济在20年

代现代工业作为整个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出现时特别明显。在所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工艺、收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现代的部分和传统的部分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在西方社会中无法与之比拟的差距。这种社会与经济上的差异，实际上阻碍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且，对现代部分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又日益落入日本的大财阀手中。这些财阀是在明治初期与政府企业密切提携中起家的，而且是日本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心。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些财阀不受法律的束缚，而且经营活动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因此它们与西方的财团显然不同。在20年代中，它们甚至渗入小规模的商业和制造业。从社会方面来看，这些财阀组织，是以权贵的地位和权势的统治作为基础的，因而把封建日本的许多传统带进了现代工业。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些财阀和政府的关系在20年代变得更加密切。主要由于财阀的实力雄厚以及传统的生产部门几乎可以无限地提供劳动力，因而劳工组织极为软弱。工会会员人数在1926年达到28.5万人，但是他们只占劳动大军的一小部分。在日本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劳工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由于日本在1900—1930年间采取了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办法，因而把西方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一直限制在很低的程度。日本只是在1897—1913年期间才大量依靠外国的资本。在这个阶段中，日本的借款大约为20亿日元；这笔资本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构成总资本的约20%。20年代，日本另外又借款10亿日元，但是，日本经济在这期间成长起来，这笔借款的意义就不大重要了。但是，借款几乎完全是由日本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向外国的私人贷款者借得的，所以外国的影响和介入是微乎其微的。外国对日本的私营企业的直接投资是有的，不过这种投资与政府的借款和日本在企业上的总投资相比，都是很少的。同样地，外国的企业在这一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小的。

日本在1900—1930年期间，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接触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口货物与出口货物的数量，大约增加了4倍；增长总额从占国民收入的25%增加到占40%。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国际经济，它的繁荣依赖于世界市场。日本的地位与英国相似，自然资源的种类有限，拥有专业技术，是一个从事海上贸易比较方便的岛国。但是，虽然日本这时像英国一样依靠国际贸易，可是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是相当小的；1913年为2%，1929年为3%，而英国在上述

年份中则为17%和13%。因此，日本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进口货物逐渐变成主要是粮食和工业原料，特别是纺织业的原料，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机械设备。从这种贸易中获利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和英联邦各成员国。日本的主要出口货物仍然是生丝，其出口量从1900年至1929年增加了大约7倍，在20年代中，日本出口了其生丝总产量的大约80%，美国在日本的生丝市场中占首位。增长最引人注目的货物是居于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商品棉纺织品：其出口量在1900年至1929年间增加了15倍，从数量上说，1929年的主要市场是在亚洲，其中印度占32%，中国占30%，荷属东印度群岛占11%。这两项在日本的出口货物中居于支配地位，所以，1929年日本生丝占出口货物总额的37%，丝织和棉织品占28%。20年代日本出口的这些棉织品，正是日本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制造品出口国的先兆。棉织品并不是世界贸易中有活力的商品项目，而西方的输出国家发现日本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新的竞争者。例如，英国的棉布在世界贸易中的销售额之所以从1909—1913年的65%下降到1928—1929年的34%，日本是难辞其咎的。即使日本的进口货物以粮食和工业原料为重点，西方输出国家也很难在日本的市场上得到好处，以弥补日本在它们自己的海外市场中竞争所造成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和日本没有什么贸易关系。日本的竞争也在另一个不景气的工业方面出现，即航运业。1893年，日本的船只运载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货物只有约8%；到1913年，达到了一半；随着大战期间航运事业的迅速发展，日本一跃而居于拥有最大商船队国家中的第四位，在世界各处进行竞争，运载日本对外贸易货物约2/3。在20年代，日本航运业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贸易中的赤字。

日本缔造了一个帝国从而建立了一些特惠关系，而且在较小程度上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这些都对日本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出于经济上的目的，日本帝国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包括台湾地区和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与殖民地的贸易约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0%，在20年代末约占20%。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要根据日本的需求而定，因此殖民地就成了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糖和朝鲜的大米）和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市场。日本的资本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中享有特权地位，就像日本的航运业在殖民地的贸易中的情况一样。直到30年代，日本占领了满洲和华北后，才真正为推动帝国发展并与日本经济协调做出了很大努力。总的来说，日本在1930年以前

是否从它的殖民帝国获得了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日本特别依靠对外贸易，而且对于相对的贸易自由和多边协定尤感兴趣。实际上，这种贸易体系直到1930年基本上存在着，这对日本是有利的，而日本与其殖民地所建立的那种特殊关系，则是损害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因素，在30年代中加速了这一体系崩溃。

1900—1930年间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日本卷入世界经济危机中，所以，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动很快就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影响。不妨举出两个突出而截然相反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机会。欧洲的供应国与它们过去所把持的市场的通商被割断了，因而日本制造的出口货物和航运业便迅速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大战使得日本能够在英国的亚洲棉纺织品市场中取而代之。在日本，这种世界性的需求导致收入的增长、就业和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取得显著繁荣的时期。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日本并不都是有利的：通货膨胀和滥用海外储备造成了20年代初期社会的骚乱和财政、贸易上的困难。1929年年末美国的大萧条开始时，在日本出现了与战争后果相反的后果。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出生丝在日本的出口货物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有半数的农民依赖生丝的生产，而且美国的需求居于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美国的大萧条直接导致生丝价格于1930年间下跌约50%，从而打击了日本的整个经济，特别是给农村带来了贫困。世界大萧条浪潮的冲击，是造成20年代的开明政策和政治领袖们威信扫地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也是30年代在国内走向反动、在国外实行侵略的背景。

在中国，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既是造成缺乏类似日本的那种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后果。研究中国1900年至1930年这个时期经济情况的材料如此欠缺，其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落后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情况。

中国的人口似乎有4亿至4.5亿人左右，在这个时期如果说有所增长，那也必然是很少的。到1930年年末，劳动力的使用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大约80%的人仍然从事农业，而整体说来，从事传统生产的人所占比例还要大得多，大约为90.5%。这时，从事现代生产的人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所生产的产品只增长到约占国民收入的1/8。^[26]可是，尽管传统的生产在经济中继续居于支配地位，中国却已发展成为外国投

资的场所；到1902年，外国投资估计达到1.62亿英镑，1914年翻一番为3.31亿英镑，1931年又翻一番达到6.66亿英镑。^[27]并不是所有这一切都能看成是不动产的实际增加；据估计，扣除物价的上涨，1902年至1914年间实际增长大约为90%，1914年至1931年约为20%。^[28]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公司的直接投资（约占70%），其余部分则是中国政府偿付债务的款项。直接投资主要用于修筑铁路和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方面；制造业只占大约10%—15%；而用于农业方面的几乎等于零。政府借款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的方面；大约2/5（实际数）用于军费和赔款，1/5用于一般的政府行政经费，其余则主要用来修筑铁路。英国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最重要的来源，大约占整个这一时期总投资的1/3。1902年俄国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投资份额几乎相等，但是到了1931年，则为日本所取代，俄国所占的份额已下降为不到10%。外国的直接投资都局限于某些地区。例如，20年代末，英国的直接投资约有3/4是在上海，日本的直接投资有2/3是在满洲。

从数量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9世纪90年代末至1914年间翻了一番，以后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末又增长了50%。^[29]从价值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914年大约与日本相等，为世界贸易额的2%，在20年代末，仍然保持这个比例。这时，中国不是世界上贸易大国之一。如果以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很重要的。从一些估计中可以看出，它在20年代末达到顶峰时也只不过约占国民收入的12%；而且，由于贸易在这段时期内的增长比国民收入快得多，因此它在本世纪初必然是很低的。丝和丝织品一直到这个时期末仍然是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尽管已从1900年占总出口货物的30%降到1928年的18%。随着外国的投资而使经济产生的变化，其结果明显地表现在满洲的大豆和豆饼出口量上升，在20年代末已从原来占总出口货物的2%增加到占21%，这时已成为中国首要的出口货物了。工业化对进口货物的影响，主要从各地棉纺工业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出：1900年至20年代末，棉织品的进口，已从占进口货物的20%下降到15%，而棉纱从15%下降到2%，原棉的进口则从零上升到7%。同时，中国的棉织品和棉纱的出口逐渐增加（占总出口额的4%）。在此期间，和中国进行贸易各国的重要地位的对比有了显著的变化。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因而要在各国之间分别确定贸易额也就困难了；

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对华贸易相对地下降了，而日本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却增加了。这两个国家在一起大约共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

单靠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在经济上产生的影响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是，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决定外国在华贸易和投资特殊性质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贸易结构。在中国投资的各国重要地位的高下，受到各国在这个区域的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俄国和德国的地位下降了，日本的地位上升了。不仅如此，这种投资仍然主要是在租让地之内。到1931年，外国的直接投资几乎有一半是在上海，几乎有2/5（主要是日本的，还有一些俄国的）是在满洲。铁路——外国早期直接投资重要的领域之一——的修筑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赢利。政府的借款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为了生产来修筑铁路，而不是用作战争赔款或偿付过去借款的利息；即便是这样的用途，通常也要把这些线路的修筑权和控制权交给外国人之手。1914年以前的外国贷款，几乎都是将中国政府的某些特定的产业、岁入和税收的控制权交给外国人后才获得的。即使外国投资的政治意义姑且不管，其经济效果也是难于估计的。从好的一面来说，外国投资是把现代技术引进中国的一种手段；已经实现的这种现代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外国投资而促成的；在某些地区，它带来了稳定、法律和社会间接资金——运输业、公用事业、银行业——它既对外国企业有利，也给中国人带来好处。[\[30\]](#)另一方面，支付外债的利息，对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是一项很沉重的负担，而外国的投资在其有限的地区内取得的成功，导致这些地区和中国其他的地方分隔开来，从而使得一种非常显著的双重经济继续存在下去。

虽然外国投资往往局限于一些地区之内，但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却波及甚广，尽管这种影响只限于在靠近交通方便的那些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中国人能够买到西方的工业产品，同时，向传统生产部门所生产的那些种类繁多的产品提供了出口市场。一般说来，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中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但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日本通过种种手段，为它本国的货物在满洲取得了优越的待遇，因此这个地区20年代的贸易大约有2/3是与日本帝国进行的。

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史显著的特点是，现代化的程度有限，外国的投资和对外贸易为数甚少。到1914年，当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大约达到2%时，它已接受了全部外国投资的约3.5%。在这个水平上，即使大部分投资未曾直接用于政治目的方面，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也不可能使中国经济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国投资所以这样少，是由于在一些人口密度大、收入低的国家中普遍缺乏有利可图的机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由于中国未能适应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以及这个国家在整个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混乱所造成的。

西方列强在20年代中承受了（尽管是勉强地）对它们特权的侵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所占比例甚少。例如英国1929年在中国的投资只占它的对外投资的5%，而对华贸易只是它的对外贸易的3%。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地位的改变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日本在满洲的投资，以及主要凭借它的特权地位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中进行的贸易，都对日本的国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日本还继续指望满洲——正像它从20世纪初以来所指望的——作为一个为日本提供它那日益工业化的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原料的供应地。到了1930年，满洲的地位问题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已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20年代中赋予远东政治以新的形式的绝大部分力量，在大战期间或紧接在大战之后，都已显露出来。但是，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的那些年代中，却对这些力量认识不足。它们往往忽视了日本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和在中国出现了一代新的领袖人物，以及苏联决心要在这个区域充当一个重要角色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意义。这种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未能理解这些发展的性质或分量；但是，更直接地是由于它们专心于考虑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在华盛顿会议时就曾为在远东进行国际合作制定了一个框框；而当前的形势又迫使它们更加决心要把它们的政策纳入这个框框之内。日本与美国结成的经济纽带，使日本政府具有强有力的理由，避免在中国追求扩张主义的目标。而且，更广泛地来说，中国的混乱状况促使各国采取克制的态度。追求经济的目标——无论是关于发展贸易，或是偿还债务——不能收到实效，因此人们往往争辩说，不论取消治外法权，或是恢复关税自主，时机均未成熟。

然而，各大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曾同意讨论中国提出的取消对于中国管理关税所加限制的要求。所以拖延几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不仅因为几个主要国家普遍采取了保留态度，而且也是因为法国拒绝批准关税条约。但是，1925年法国批准了关税条约后，华盛顿会议与会各国接受中国的邀请，参加了该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税会议。中国政府就恢复关税自主问题提出了经过审慎考虑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就其最终解决关税自主问题的方面来说，为各国代表所接受。但是在关于过渡期间应做何安排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会议不愿意把大大增加了的岁收，在中国的政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时候交到中国人手中。由于北京政府只控制着中国的相对来说较小的一部分，增加的岁收看来大部分肯定要落到互相竞争的军阀们的手中，从而加剧普遍混乱的情况。在会议开会期间，中国国内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对立的派系之间发生的战争，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交通切断了；就在北京城内发生了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而且，段祺瑞政府终于在1926年4月下台。这个事件发生后，北京关税会议不得不宣告中断。

在会议进行的头几个星期里，美国驻北京公使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曾指出，和一个保持其权力或许不能“超过几个星期，或者甚至超过几天的”政府讨论达到长远目标的问题，是不现实的。^[31]在讨论过程中，出席会议的成员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在远东进行国际合作整个政策的基础是虚构的。而且，在会议最终失败后，派有代表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华盛顿体系”有不足之处，并且在比较现实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确定它们的立场。

列强在考虑中国问题时，特别是对苏联的行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苏联在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一项条约中，解决了中苏的分歧；而且，它在这样做时，曾着重表明它的“反帝”立场，放弃了苏联公民享有治外法权的任何要求。但是，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苏联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它仿效苏联共产党的样子，采取了一个极权主义的结构；它发展了给工农大规模地灌输信仰的方法；而且它从1924年担任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汲取了一整套理论。此外，它还与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结成同盟。作为这些政治行动的补充，又建立了一支革命军。为了给这支军队提供在

军事技术上称职、在政治上可靠的领导力量，又在广州附近成立了一所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

因此，苏联人使用了两个重要的方法，改变了中国的局面。他们通过与北京以及与国民革命运动建立的关系，挑起了中国对于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对立情绪。他们通过对国民党人提供援助，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政治力量的均势。在苏联的顾问们到来之前，国民党主要是靠党员一致赞同中国需要实现政治现代化以及他们对孙中山个人的忠诚而团结一致的；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是依靠与该省领袖人物结成联盟从而获得军事上的支持。在俄国的指导下，国民党改变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在它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既能使用武力，也能运用说服的办法。

在关税会议不光彩地结束时，国民党的军队即将进行北伐。自从孙中山在头一年逝世，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由于国民党内部赞成和反对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两派之间的对立而受到削弱。这种分裂不断地使国民党人争夺权力的斗争变得复杂起来。但是，从人民大众对于节节向前推进的北伐军的态度来看，国民党领导内部的争端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国民党人曾经宣称：“造成中国人民大众所有苦难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他们的工具——卖国贼军阀们的残酷和暴虐。”^[32]当北伐军经过那些国民党的政工人员在老百姓和各省的军队中十分活跃的地方时，他们都被当作一支解放大军受到欢迎。到1927年年底，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它准备再派遣军队继续北伐，去推翻满洲军阀张作霖领导下的已无能为力但仍在北京苟延残喘的政府。

从“北伐”开始，列强即不得不考虑国民党人的成功。但是，它们也面对着另外一种迹象，说明中国人已经不再愿意忍受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人，都开始征收关税会议拒绝认可的附加关税。外国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常常不为人们所理睬。而北方的工商业者就像国民党人那样，坚决要求彻底修订所有的条约。

这些发展情况促使列强逐渐改变了态度。由于国际合作的原则，在过去的一些年代中，因各国对于中国的局势采取拖延和不现实的态度而受到破坏，各国便开始各行其是以捍卫它们的国家利益。

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英国利益的建立为时已久，而且规模庞大。这些利益主要集中在那些早期即由于国民党的势力向前推进而受到影响的地区。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反对外国利益的情绪，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英国的利益的。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却是列强中第一个认识到与国民党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且准备好在他们一旦占领北京后应如何行事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一俟政局恢复稳定，它准备讨论修改条约和其他的问题。与此同时，它又在小处让步和维护其重大利益之间尽力保持平衡。维护英国的利益，首先要维护英国在上海的利益。当中国国内的混乱日益加剧，看来要危及英国在上海的商业和投资以及侨民的安全时，英国在上海的驻军便大大地增兵了。这种行动，比英国希望借以赢得中国友好而表示的亲善姿态和表明意图的声明要坚决果断得多，因而国民党人和北京政府的支持者们中间的反英情绪都在增强。

英国保护它在上海的利益这一行动的主要受益国家可能是美国。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稳定的、能够行使全部主权的政权；但是，它在处理当前局势中的一般做法，似乎不如英国那样亲善。尽管如此，由于它不再需要采取军事干涉的办法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因此它依然能够保持它是中国最坚定的友邦这一声誉。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局面的改观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日本的利益主要在北方，因此它在制定（和显示）新的战略方面，时间比较宽裕。1927年1月国民党的力量进入华北之势已迫在眉睫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了一项泛泛的政策声明。日本政府像英美政府一样，宣称应让中国人自行解决其内部分歧并表示愿以同情的心情来考虑中国的要求。但是，它也强调两国之间需要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要保护日本的利益。这一声明由于内容泛泛，日本在行动方面便大有回旋的余地。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几起事件，使日本越来越强调其声明中比较积极的原则和含义。4月间，由田中义一领导的一个新政府在东京上台。田中是军人出身，他坚决主张保持日本在满洲享有的地位。在此以前不久，国民党的士兵曾在南京袭击外国侨民并破坏外国人的财产。这次袭击外国人的责任被推卸给该运动的共产主义派，即受到俄国怂恿的一派。所以，日本便理所当然地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

日本的1月声明并没有具体地提及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实际上，日本关心的是要保护其支配满洲经济并把它和日本本国的经济融为一体的权利，是要保持为了实现其经济目的所需要的行政管理及其他机构。至于这些利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受到保护，日本各界人士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普遍认为满洲问题应与同中国本身的关系问题分别对待。

虽然日本的领袖们由此认为满洲问题本身的性质特殊，但他们也认识到他们解决满洲的问题将不仅会影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也要影响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想法就受到这种影响：既要考虑现有的关系，也要考虑未来的期望。那些极力不愿破坏日本与美国密切关系的人士，以这个问题为例，提出有力的根据来支持实际权柄由中国的或满洲的政府来掌握这种解决办法。另一方面，那些认为最终与美国一战在所难免的人士，则认为对满洲的全面控制，实为日本的防御所必不可少。这种见解上的分歧，再加上日本在满洲行使其权利中军界和有关的民间集团的既得利益，都使制定一项明确的政策变得大大复杂起来。

国民党军队1928年继续北进时，满洲问题便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紧迫的问题。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有可能立即到达满洲的边境，日本政府发表了一项表示其立场的声明。国民党人不应进入满洲，如果他们进入，就将遭到日本军队的反击。张作霖应从北京下野，但应允许他在满洲另立政府。根据种种理由，这显然是一个诡诈的建议，掩盖不了日本要把满洲和中国分开并通过一个傀儡政府来统治它的决心。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事态正是按照这一主张进行的。当国民党人向北京推进时，他们提出建议，允许张作霖及其军队和平地撤退到满洲去。由于张作霖的北京政府面临着立即垮台的局势，张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当他到达满洲时，他乘坐的火车车厢被日本的军官炸毁。

国民党占领北京，标志着正式达到了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运动一直追求的目标。中国有了一个政府，它可以管辖全国并根据平等的条件处理它与外国的关系。但在实际上，国民党人仍然面对着巨大的困难。新政府的领袖们在国内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分歧。政府在各省实际具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它既不能从土地赋税中取得国家的税收，也不能解除过去军阀们拥有的私有军队的武装。而对于满洲，它则依然处于一种特殊困难的地位。1928年

底，日本阻止中国与满洲重新联合的努力失败后，中国与满洲实现了再联合。不过，满洲政府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自治，而日本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给中国的统治造成了进一步的阻碍。但是，这个政府内在的虚弱，并没有妨碍它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

占领北京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宣布它准备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行动引起普遍持有同情的反应。西方国家根据它们先前发表的政策声明，签订了新的条约，使中国恢复了关税自主权。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还给予新政权以承认。以美国而论，对这个政府给予的支持就更多了。美国向中国派去了顾问，美国的商界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助。

日本的对华政策既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暧昧的。张作霖之所以被炸死，即是陆军的一派企图推动日本政府，使它走得比原来所打算的更远。这次谋杀的组织者，曾经希望这个事件会在满洲造成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对它确立军事控制。结果，他们只是使中国对日本的意图已经持有的怀疑更为加深，因为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都不愿贸然造成一场危机。

田中内阁的处境是困难的。它相信，要保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既要改善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要抑制陆军的不妥协和日益桀骜不驯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由于日本陆军采取的高压行动而表现疏远，而日本陆军支持采取一项侵略政策的态度，又因西方国家显然不愿与日本采取共同的行动而日益变得强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决定，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一种可以收到实效的关系非常必要。当满洲与中国重新统一时，日本政府因而接受了这一事态发展，没有提出异议。与此同时，它还同中国开始讨论关于恢复关税自主以及解决两国间有争端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日本政府便给予中国的新政权以正式的承认。

此事发生后不久，田中辞职。有一个时期，由于他未能将对暗杀张作霖一事负有责任的军官们交付审讯，不得不承受日益高涨的反对。新首相滨口雄幸与其内阁甚至更加坚定地主张在满洲实行一种温和的政策并寻求西方国家的合作。他们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深信，只有把日本的经济完全置于国际贸易通常的压力之下，才是对日本的长远利益最有利的做法。他们因而撤销对黄金出口的限

制，而且，由于采取了这种做法，在随后的调整时期中，日本就日益依赖其他贸易大国的支持。但是，由于新政策不是把重点主要放在日本与满洲的经济联系上，这就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这种不像过去那样重视维护特权问题的做法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正式条约以取代过去在关税自主问题上达成的一般协议。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同日本签订的条约标志着争取关税控制权的斗争已成功地告结束。但是，中国政府对于撤销在它对外人行使司法权上所施加的限制的问题，表示同样的关切。^[33]1929年4月，它向英国、美国和法国送致照会，寻求早日废除治外法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各国明确表示，虽然它们赞成逐渐减少治外法权，但是它们不准备同意像中国所希冀的那样，几乎是立即地予以全部废除。由于这时中国政府对俄国在满洲的领事人员和铁路人员采取鲁莽的行动，西方国家的保留态度便坚定起来；这次事件曾造成与苏联短暂的武装冲突。而且，在1930年和1931年中国内战重新爆发，这就着重说明中国政府的权力是脆弱的，外国侨民仍然是不安全的，因此各国对于采取根本改变治外法权做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就更加怀疑了。尽管如此，谈判仍在继续，而且到了1931年的夏天，英美两国都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但是，9月间，日本军队在满洲占领了沈阳城；这一事件的悲剧性意义很快即为人们所认识；它比头几年的那些动乱远为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政府的地位。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因而中断，要等到比较稳定的局势重新到来。

在满洲采用暴力的做法，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的结果。日本内阁并没有放弃1929年它上台时曾经奉行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被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这个政府本身施政的效力，由于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受到了破坏。日本恢复金本位后，世界性的大萧条便紧接着发生了。物价下跌、市场缩小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由于日本经济近来日益置于世界贸易的压力之下，变得更为剧烈。同时，日本也无法从美国或英国那里获得援助，因为它们也都面临着经济危机。于是，人们普遍地把收入和就业的减少，归咎于政府及其政策方面的缺点。

人民大众反对情绪的增长，大大地加强了军界的声势。日本的生存依靠它的武装力量的加强和它在中国的地位的巩固，而不是靠和西方国家的合作，这种见解现在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在东京和满洲的

高级军官因而准备采取彻底变革的行动。1931年5月的一次推翻政府的阴谋失败了。但是，9月18日至19日这天夜间，日本占领了沈阳，这标志着—个军人统治的时代在日本开始。

20世纪初，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是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到了30年代，这些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勉强行事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它们的残存的特权仍然保留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在南太平洋岛屿，这些国家继续担负着行政管理的职责，这只不过反映它们接受了人们通常对“落后民族”的自治能力所抱的各种傲慢的偏见而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仍然拥有的那些残余的权力，是应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的要求而保留的。两国政府不愿撤销对威斯敏斯特法赋予它们的主权所施加的约束。^[34]

但是，它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正由日本来扮演。日本占领沈阳后，继而完全征服满洲并炮制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国际联盟的干涉，其目的虽是在保护日本的权益的条件下恢复中国的主权，但日本对之大为震怒，加以反对，并且从而退出了该组织。

这些行动进一步削弱了远东的政治稳定。由于日本的国内政治状况使得日本要从满洲撤出一事成为不可能，它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它的侵略范围（参见后面第二十三章）。为了对付中国日益敌对的态度，日本就运用军事行动与政治阴谋并施的办法，在内蒙古和中国本部的东北各省巩固它的地位。1937年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附近的一次武装冲突，造成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国民党政府被迫西逃，在重庆建立了一个新都。1940年，日本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羽翼丰满起来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的重大冲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解决的时代。占领沈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后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受到鼓励，对世界的舆论报以嘲笑。日本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日本的对华政策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起因。日本最后的成败，只有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才能定夺。

（丁钟华 译）

[1] 此处《和平议定书》原文为peace protocol。按1900年12月24日由美、英、俄、日、德、法、意、奥与西、比、荷十一国提出“议和大纲”，1901年9月9日

签订《辛丑条约》。——译者

[2]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1881年至1904年俄国的远东政策》，（伯克利和洛杉矶，1958年），第124—176页。

[3] 关于英日同盟问题，参见伊恩·H. 尼西《英日同盟：1894年至1907年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伦敦，1966年）。至于1902年条约的全文以及1905年和1911年有关此条约的照会，均参见约翰·V. A. 麦克默里编《与中国签订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894—1919年》（2卷本，纽约，1921年），第1卷，第324—326页。

[4] 尼西：《英日同盟》，第217—218页。

[5] 马洛泽莫夫：《1881年至1904年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77—249页。

[6] 佩森·J. 特里特：《1895年至1905年的美日外交关系》（斯坦福大学，1938年），第242—248页；爱德华·H. 扎布里斯基：《美俄两国在远东的角逐：1895年至1914年的外交活动和强权政治的研究》（费城，1946年），第115—130页。条约全文见麦克默里《1894年至1919年与中国签订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22—528页。

[7] 希拉里·康罗伊：《日本夺取朝鲜：1868—1910年》（费城，1960年），第325—441页。

[8] 引文见A. 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838年），第181页。

[9] 引文见S. S. 麦肯齐《澳大利亚人在拉包尔：南太平洋德属领地的攻占和管理》（第4版，悉尼，1937年），第160页。

[10] H. W. V. 坦珀利编：《巴黎和会史》（6卷本，伦敦，1920—1924年），第6卷，第373页。

[11] T. E. 拉法格：《中国与世界大战》（斯坦福大学，1937年），第27页。

[12] 此处引用的“二十一条”条文，系根据日文译本。全文见T. E. 拉法格：《中国与世界大战》（斯坦福大学，1937年），附录1，第241—243页。

[13] 协定全文见《1917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264—265页。

[14] 关于这段插曲，参见詹姆斯·威廉·莫利《1918年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纽约，1957年）。

[15] H. W. V. 坦珀利编：《巴黎和会史》，第6卷，第634—637页。

[16] 这些话载于《和会正式记录》（引文见拉法格《中国与世界大战》，第198页）。

[17] 戴维·亨特·密勒：《国联盟约的起草工作》（2卷本，纽约，1928年），第1卷，第183页。

[18] 关于此事，见J. 巴特利特·布雷布纳《加拿大、英日同盟与华盛顿会议》，载于《政治学季刊》，第50卷，第1期，第45—58页。

[19] 美国第六十七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126号，第755页。

[20] 关于华盛顿会议签署的条约和协定的全文，以及会议记录，见《1922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卷，第1—384页。关于英国有关会议的文件及其背景，见罗恩·巴特勒和J. P. T. 伯里编《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第1编，第14卷（1920年4月至1922年2月的远东问题）（伦敦，1966年）。

[21] 《1922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卷，第35页。关于该条约起草经过，见J. 查尔·文生《华盛顿会议四国条约的起草工作》，载于《现代史杂志》，第25卷，第1期，第40—47页。

[22] 《1922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卷，第948—960页。

[23] M. J. 普西：《查尔斯·伊万斯·休斯传》（2卷本，纽约，1952年），第2卷，第490页。

[24] M. J. 普西：《查尔斯·伊万斯·休斯传》（2卷本，纽约，1952年），第2卷，第508页。

[25] K. 大川：《1878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东京，1957年），第248页。

[26] T. 刘和K. 叶：《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年至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展》（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城，1963年），第132页。

[27] C. F. 雷默：《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纽约，1933年），第58页。这些数字不包括最初数值为6750万英镑的庚子赔款。1902年还没有这项赔款，1903年年底该款总数为6350万英镑，1931年已微不足道。

[28] C. 侯：《1840—1937年外国在华投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3年），第14页。

[29] Y. 陈：《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华盛顿，1956年），第258—259页。

[30] 外国资本在铁路、航运、对外贸易、铁矿和煤矿方面是起支配作用的，但在工厂制造业方面，有一项估计数字表明中国在1933年的总产量中所占份额为65%（见C. 侯《1840—1937年外国在华投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第127—301页）。

[31] 引文见入江昭《继帝国主义之后：在远东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努力，1921—193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5年），第72页。

[32] 引文见入江昭《继帝国主义之后：在远东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努力，1921—193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5年），第93页。

[33] 关于这个问题，见韦斯利·R. 菲谢尔《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伯克利和洛杉矶，1952年），第127—187页。

[\[34\]](#)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英联邦

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是一段英帝国在世界上最不得人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连这个帝国本身的许多臣民都对帝国的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但是，大多数英国人却觉得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为帝国统治地球上如此广袤的地区，统治着“从棕榈之国到松柏之乡的疆域”而感到骄傲。南非发生的那场惊人的可怕事件——在那里，有几个月之久，英国军队到处都被一批批神出鬼没的大胡子农民队伍打得落花流水——曾经使那些认为背信弃义的“英国佬”^[1]正在衰亡的欧洲人幸灾乐祸。但是，“英国佬”尽管困惑不安，却并没有想到衰亡。它对自己的将军们摇头叹息一番以后，又派出另外一些将军，接受了殖民地的帮助（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小狮子们纷纷聚集到母狮子的周围”），经过了一段令人厌烦而又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终于把农民们拖得精疲力竭。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的首领接受了费雷尼欣和约和英国的宗主权。吉卜林作品的读者们消除了疑虑；飘扬在南非草原上空的英国国旗标志着文明和效率的胜利；道路为米尔纳勋爵^[2]的那个“幼稚园”班子，即一群来自牛津、满脑子自由帝国观念的青年人进行安抚的努力敞开；像新西兰的理查德·约翰·塞登那样的殖民地总理们，纷纷以他们那朴实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向一个既感到满足而又觉得困窘的母国表示祝贺和提出劝告。

然而，就是在那胜利的顶峰时刻，人们本来也很有理由会想到那些颇堪忧虑的问题。那些感到大失所望的英国的敌人要是能够看得远一些，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因为，对那个已被制服的实行愚民政策的老人克留格尔，对他受到挫败、但仍有希望的下属波塔和史末资来说，并非什么都已失掉。布尔人的心没有被征服，条约还允许他们实行自治。看来，征服者终于懂得了伯克的箴言：一个伟大的帝国和狭小的气量是难以并存的。他们打算做到宽宏大量，但以后50年的情况表明，宽宏大量的帝国将根本不再是前几个世纪所理解的那种帝国了。甚至对于曾做出“殖民地责任政府制”这一重大发现的19世纪中叶来说，责任政府制的发展或许在逻辑上也显得太过分了。对自治领

不能实行统治了，这一点即将变得很清楚。当然，在1902年，尚未创造出“自治领地位”一词。一见“帝国”一词就恶心的人毕竟还不多。诚然，确实有一些为帝国的前途担忧的真诚的联邦制拥护者。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殖民地居民，都认为帝国的稳定就像欧洲的稳定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在重新获得稳定的时候，他们并未停下来想一想，英国的另一种自由观念，即把自由看成是宽宏大量行为的工具，对帝国说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有一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要是活到后来，是会把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的，但他们是否会明白那种特别的聚合力已经随着绝对统治的丧失而丧失掉了呢？

当然，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帝国的理论并不是简单的，也不是一成不变。它已经不再把严密的经济控制作为其组成部分和目的之一。从一个自由贸易的、迄今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帝国的政治家们向外望去，他们对逐步实行保护关税的自治殖民地尽管有点不安，但还是够容忍的了。这些殖民地中，像新西兰和它的澳大利亚姊妹国，到1900年就已根本不再把自由放任主义看成是一条可以容忍的社会法规了。在帝国经济中，这些自治领连同加拿大和纽芬兰仍然主要是“初级商品生产者”。由于在肉类和黄油的冷藏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南方自治领作为初级商品生产者的作用加强了。但在宽宏大度的宗主国的眼下，这种情况并未影响它们政治发展的多样性。除了责任政府制这一点，幅员狭小的新西兰或幅员更小而人口又很稀少的纽芬兰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有30年历史的加拿大联邦制，或者同1901年元旦开始实行的崭新的澳大利亚联邦的另一种联邦制，都很少有共同之处。这两种联邦制在结构、权力分配或在调整和修改权限方面也不尽一致：澳大利亚的决心是，必要的变动应当尽可能全部由澳大利亚自身来做^[3]，而另一方面，司法委员会过去是，以后仍将是加拿大宪政制度的权威解释者之一，而对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进行修改，则必须通过英国议会才能进行。与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政体都不相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不一样的，是开普殖民地连同它的南非邻邦。由于农业资源贫乏，它们主要依赖金矿和钻石矿，它们的政治因总督的地位而变得复杂化，总督既要同对他负责的部长们共事，而且作为高级专员，他又要掌握同布尔人（不管他们是独立的，还是已被征服了的）以及同南非地理疆域内英国统治下的土人的关系；总督既是自治领殖民地宪法上的首脑，又是对英国负责的行政和外交官员。尽管20

世纪初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在10年当中，战争、宽宏大量的态度和经济需要还是起了作用；而1909年的南非联邦法又创立了那种自治政府的另一个宪法上的变种，按照坎贝尔一班纳曼关于治国之道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它要比“有效的”治理好。它既不是联邦政体，也不是新西兰那样的完全中央集权的政体，因为南非各省拥有实权。它可以被波塔和史末资这样的人管理得像一个好政府；而在对帝国权力的关系方面，南非联邦已经相当稳固地取得了自己的地位，成了又一个那种海外自治领，即它既效忠于英王，而又肯定不再是英国单纯的殖民地。那种微妙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的一个标志曾经是，1907年新西兰的地位从“殖民地”正式上升为“自治领”，虽然除了面子上好看而外，那种地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尚有待法学会议去确定。加拿大自治领是一个自治领；现在新西兰也是自治领；纽芬兰亦是；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南非是一个联邦。在帝国的范围内，它们有什么区别没有呢？

不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什么，在它们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存在区别是没有疑问的。为了区别于联邦和自治领，那些部分不久就被总称为“殖民帝国”，它们是：濒临崩溃边缘的西印度群岛，约瑟夫·张伯伦不久前才给它的经济注射了一服“帝国农业部”的刺激素；刚由一个商业公司转让给英王的上尼日尔和下尼日尔的广大地区；热病流行，成了1899年在英国创立的一批热带医学学校实验对象的西非其他领地；软心肠的人至今还可以在那里嗅出一点马塔贝莱人的鲜血气味^[4]的罗得西亚；大贝专纳和尼亚萨兰保护地；乌干达和英属东非的其他保护地，在那里，英国外交部负责对其进行经济渗透；事实上的保护国埃及以及埃及和英国的“共同属地”苏丹；锡兰；马来西亚的各个土邦，以及那两个巨额贸易集散地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本身就堪称使用多种语言的帝国；星罗棋布于南面大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这是些多多少少开发过，多多少少传过教，但管理较少而不是管理太多的岛群。这里是奇特的一群零星岛群，几乎全部是维多利亚时代对外扩张的产物，而且爱德华时代的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显然都认为这些地区是不适宜于自治的。这些地区没有文明或科学的传统，不熟悉那种友好的议会辩论的习惯，仅仅几年以前，当时大批人还蹒跚于奴隶贸易那种镣铐银铛的漫长而悲惨的道路上，或者互相用长矛杀戮，或者在形形色色奇异的野蛮经历中惨遭横死，或者仅仅从事捕鱼和采集椰子。很显然，

对他们来说，有效的管理优于自治；年轻的帝国缔造者们会给他们修筑道路，架设桥梁，指导种植园劳动和施行法律。但所有这些是否完全清楚呢？究竟什么是有效的管理呢？什么是法律呢？紧接着有几十年时间，人们对此提出了某些疑问，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又过了5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看到，就宪法地位来说，要在自治领和殖民地、自由社会和附属帝国之间永远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另外还有印度。对印度来说，世纪的划分也就是政治和经济时代的划分。实际上一直未被触动的专制主义在总督寇松勋爵任内曾引起群情激愤和舆论哗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印度的传统有碍于自治到了多大程度呢？

历史学家在回顾过去时，可以看到变化，至少可以看到变化的某些决定因素。帝国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个过去强烈影响着、并将在一个新的世纪里不断地影响其建筑式样的世界里建立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政治和社会革命，亚洲震撼大地的骚动等，都属于上述决定因素。政治智慧也是一种决定因素：它不顾既得利益，尽管有忧虑的理由，还是做到宽宏大量。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或者说爱德华时代的——帝国寿终正寝了，它被彻底破坏了。它的帝国形象的虚幻美景消失了。然而，还是保存下来有待未来史学家去说明的某种东西：那个奇特的大英怪物仍然存在；一个“英联邦”（不管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基于若干“决定因素”的20世纪帝国的发展是一种心理上的发展。譬如说，心理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一谈到“帝国”这个词就很不舒服。人们不愿被别人统治了——这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早就如此；不久以后，在印度也是如此，而在“附属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则要慢得多，虽然程度彼此并不一样。但是，人们也不愿再统治别人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部分是粗野的、部分是自由主义的、并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帝国主义，开始让位于一种颇带怀疑眼光的、越来越带批判性的新态度。帝国主义的文学开始成为探索性的、当然也是批判性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19世纪的人道主义越来越多地与新的人种学方法和充分考虑经济因素的决心联系起来。它的批判作用促发了有关非洲殖民地的争论，这场争论使人联想到一百年以前鼓吹

“保护土著居民”的伟大时代。其区别是，在一个世纪期间，改革家们很难再以公正善良自居了，因为一切形式的人类社团都已经成了被人们最彻底地加以考察的对象了。

有一点仍旧是确实的：在我们现在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宪法上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那个后来被叫作英联邦的一些社会群体的关系的发展上。这个英联邦由联合王国和各自治领，帝国宗主国和正在发挥责任制自治各种可能性的半英国式社会组成。在这里，“半英国式”一词必须写上，因为不管某些自治领会多么为它们的英国血统和传统而自豪，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南非联邦的南非白人和自由邦的爱尔兰人却使关系问题变得永远无法解决了。在整个社会中少数“种族”的境况决不像那些热心人士在20世纪早年惯于设想的那样已经得到妥善安排；作为民族差别的调和者，英国这个总的共同体还有待于向前迈进一段距离。

这个事实正是不止一个自治领民族感情日益增长的根本原因之一。法裔加拿大人没有显出被同化的任何征兆；他们的出生率很高，当他们向加拿大的其他一些省份外流时，实际上是殖民者，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求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魁北克仍然是联邦政治的一块基石，它对一般世界的看法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如果部长们忽视这点，肯定会招致危险，也许会带来灾难。但是，法裔加拿大人至少还留在一个总算是在内部保持了几十年和平状态的联邦之中；他们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也无意于利用危机来搞武装叛乱。另一方面，在南非则有一部分人从来没有对英国的统治，甚至对与英国的联合表示妥协；1899年的战争给1914年的叛乱增添了最后一把助燃剂。而这种南非白人的不可调和性使许多自认为通情达理的人们感到绝望。荷兰新教是传统中心，它像魁北克的天主教一样具有吸引力。在南非的公用语言中，有一种易于发展文学的语言，并且像在魁北克一样，开始有意识地培植萌芽状态的本地文学。全世界物质上的统一似乎即将被日益增长着的文化分裂所抵消。在南非还有一个附加因素，即南非白人由于对与英国联合的厌恶，认为他们自己也是统治种族的一员，是屹立于几百万劣等土著部落人当中的欧洲文明的基石和堡垒。这里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感情上的彻底的不妥协和不宽容。与这种情况相比较，澳大利亚东部居民中爱尔兰血统的影响似乎就非常微不足道了；然而，在分析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时，如果忽

略这个血统也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个血统的居民下定决心，无论在哪里都不轻信英国的任何政策。不过，整个说来，澳大利亚的民族感情仍然是澳大利亚式的，这或多或少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大陆性质和民主的社会发展，并有一种文学作为标志，这种文学在培植地方色彩方面有时几乎具有持敌对态度的自我意识。只有在新西兰，民族地位没有因为存在少数民族而复杂化；因为，虽然毛利人在这个时期造成了一种对其本身极其重要的文化和经济复兴，但一点也不关心他们自己是处在一个帝国或是处在一个联邦里的地位。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新西兰民族感情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岛国的孤立地位而产生的，它只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产生，或者说，只是到那时，才第一次有个性地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以前已经产生新西兰人。

除了民族传统，还有好几个原因使这些社会开始感觉到和坚持要实现独立的存在；在20世纪的复杂世界里，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广阔余地。总的说来，50年来，它们的生活逐步地变得更复杂，而且其生活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大。虽然在经济上决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们却在为积累财富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并正在生产更多的财富。以帝国的利益为首位的旧的简单理论，是同初级商品生产者对宗主国制造商和金融家的旧的简单关系相伴随的；甚至在那种关系基本上保留下来的地区，如新西兰，经济大萧条以及伴随而来的世界大战的影响，也促使这些地区下决心发展制造业；而生产原料，即使当地不出产，也不一定要从英国运来。例如，在这个时期将近结束时，新西兰使用的钢大部分是澳大利亚的产品。一直以小麦和羊毛为主要出口物的澳大利亚，创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它们到1939年已占有主要地位；虽然加拿大的大草原省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而它东部的工业化省份却已加入了世界上主要工业国的行列。这些地区的人口在增加，尽管白种居民的中心仍然是联合王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作为本地出生的加拿大人或澳大利亚人在增长着的，他们的家庭纽带集中在一个国家里，而且随着对“故国”的情感在19世纪逐步淡薄，他们从“母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倾向也越来越减退。在一个多事的、充满战略考虑的世界里，除了所有上述因素，还要加上地理方面的事实和影响：加拿大与美国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哲学，它逐步变成了一种美洲势力；澳大利亚几乎是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太平洋势力；英国已不再能控制世界所有各大洋；很显然，当40年代开始时，不仅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帝国的势力也在日益衰落。

这种到处传播的民族主义本身，甚至还在它的早期，就足以使在维多利亚王朝的最后20年吸引了那么多好心人的帝国联邦理论变得无用。当1902年第四次殖民地会议在伦敦召开时，事情已成定局，不管以后的宣传多么巧妙，显得多么有道理，都不能再给这个理论注入新的生命。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沃德爵士向1911年帝国会议提出的建议，由于被他的同僚们一致地和轻蔑地推翻而引人注目。但回顾起来，这个建议还是有意义的，而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企图复活一个已经消亡了的事业，就无法看到这个意义。因为沃德想到的不仅是宪政建设，甚至也不仅是防务——这些问题帝国会议已讨论得很多了。1902年，加拿大脱离英国海军一般性的微弱支持，提议建造自己的舰队。1907年，澳大利亚效法其榜样，其结果更为直接。然而，在那一年，还是就建立帝国总参谋部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沃德希望改进这个协议，建立一种“帝国防务议会”，它不仅应控制各自治领的海、陆军事务，而且还要控制它们的整个对外政策。他的接入口选举下议院的建议，必定要剥夺除联合王国以外任何一个伙伴的实际权力，而且除去其他细节，牺牲自治权也将因付出的代价过大而作罢。阿斯奎斯先生争论说，联合王国也不可能允许分享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因为那样的话，主权必定会受到损害。但是在沃德的不明确的计划背后，却明确地存在着分享的愿望。他不仅仅是诚心希望防务费用有人分担，而且希望自治领在制定英国的政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由于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自治领是可能被召去流血的。

不仅新西兰有这种想法，实际上，它也不是表明这种想法的最突出的一个。沃德在实行联邦制方面这种不充分的要求，只是总的自治权发展中的一股支流而已，这话似乎不确，但正是事实。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尽管未必是有意的选择）要把自治领都引导到独立的国际地位。（这种情形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克伦威尔的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的人走得最远。）在它们取得了可以单方面退出或信守英国的各种商约的权利以后，紧接着于1907年又获得自己谈判缔结商约的权利，只是须经英国外交部委任的全权代表最后签字。随后于1908年签订了英美仲裁条约，该项条约加给加拿大的条约义务只有经加拿大同意才能生效，这样就把上述原则大大地扩展到商业事务之外。然而在起草1909年的伦敦宣言（对1907年海牙会议通过的战时禁运品和中立国贸易规定所作的说明）时，英国没有同自治领协商；一些自治领政治家颇为沮丧。因而，虽然1910年加拿大在同美国发生渔业争端

时为自己制定了法律，1911年的帝国会议上对英国的非难超过了沃德所表示的不满。澳大利亚抗议未与自治领协商，并建议——但没有坚持——自治领和英国外交部直接联系。加拿大意见不同，威尔弗里德·劳里埃似乎觉得，协商必将表明义务，而义务正是法裔加拿大人要拒绝的东西。然而，尽管阿斯奎斯说“我们无能为力”，还是采取了某些步骤。会议决定，将来对出席各种会议代表的指示以及在可能涉及自治领的协定的签字方面，应与自治领协商；至于其他国际协定，如果时间和情况许可，也要征询它们的意见。出席会议的政治家随后听取了英国外交大臣关于欧洲外交问题的一个详细的、全面的报告，建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于这个报告，他们回家时满脑子考虑的是即将发生的麻烦，并不是英国宪法的灵活性。

协商的发展是以摇摆、矛盾和神经质的退缩为特征的。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协商一词的全部含义；或者根据国际关系的严酷事实斟酌一下导致在英国外交大臣或内阁——殖民地事务部（自治领司）——地方长官或总督——自治领总理和内阁之间依次往返协商这一套累赘手续的理论。1914年夏天，这些严酷事实表现出来了：自治领当时发现它们在未经自己动议的情况下，就已经完全地、毫不含糊地卷入了战争，似乎它们的自治权还没有怀特岛^[5]大，然而自相矛盾的事总是立即就会出现。这场战争可以说以严重违反宪法的方式开始，而它本身又成了独特的促成宪法进步的土壤。因为，专作预测的外界观察家认为已濒于崩溃的帝国，事实证明还有特别的聚合力量，具有能建立适应其需要的新制度的顽固的内部精神。各式各样的需要使自治领的总理们聚集到伦敦，在那里，由于他们取得了帝国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使得协商变得直接而有效。这个试验的成就是那样巨大，共同努力所引起的团结情绪是那样强烈，以至在1917年战时帝国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应该用某种方式使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在和平时期也继续下去。必须充分承认自治领是“帝国联邦的自治国家”。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必须根据现实为一个已把团结和自治十分引人注目地协调起来的帝国，重新确定一种理论。

但是，现实的本质是什么呢？看来，甚至在那时就有不同的解释。譬如，新西兰的梅西主要对在自治中才可能有团结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拿大的罗伯特·博登爵士则对团结中才有自治深为关注。而梅西作为一个政治家，并不比博登保守。正是博登坚持：自治领由于如

此始终不懈地献身于战争的目的，并如此自由地参与协商，因此，在缔结和约时也应同样自由地参与协商；自治领领导人在英国代表团中不能单纯地追随服从，而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地位。给予欧洲较小国家的重要地位，难道能拒绝给予这些自治领吗？用一个更好的新世界的语言讲话而且所讲的话受大家重视的史末资，难道可以被忽视吗？机敏而又固执的澳大利亚人休斯，难道可以被撇到一边吗？于是，自治领的总理们既以英国的谈判者，又以独立的谈判者的身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于是，在根据那个独特的条约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中，他们的国家成了享有自身权利的成员。在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来，这些做法是十足的自欺欺人，是英国佬惯有的狡猾；这些做法难道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会议上替英国争得五票而不是一票吗？但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并非如此。因为欧洲人关于主权的理论合乎逻辑而且谨严，美国人的大陆联邦制则导致了单一的外交政策，所以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这种否定意见听起来很可能显得空洞无物，虽然语气是温和的。其他人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英国和自治领本身都往往被很多人认为是危险的胡闹；无论如何，这种制度在法律上是叫人极为捉摸不定的；如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那样，这种制度只不过是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宪政发展的表现。然而，无可挽回的步骤已经采取。除非通过联合王国提供的渠道，否则，新西兰就会拒绝接受西萨摩亚的委任统治权；那位特别能干的宪法专家约翰·萨蒙德爵士从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回到新西兰时，或许会坚持认为帝国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至少加拿大和南非却坚信一种新的地位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而且不应该让英国政治家们忘记这点。而且，出于行事方便的考虑，在此项考虑的强有力的推动下，这种地位似乎最终也为爱尔兰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

战后预计要召开的宪法会议并未举行，因为要开的会议太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太多了。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根本不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它是联邦组成部分的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为建立自治领和海外殖民地而失去其儿女的“母国”。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在一个殖民帝国里竭尽所能地成为一支分裂的力量。研究爱尔兰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历史，是学术专家们的事；对于广大爱尔兰人来说，要紧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被统治的民族的历史。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由于从一个依靠爱尔兰民族支持的自由党政府得到自治的许诺，他们似乎终于脱离了那个黑

暗时代；自治似将于1914年随自治法令的生效而得到实现。但是在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准备反叛而不愿接受这个法令；军官们宁肯辞去军职而不肯镇压叛乱；继向北爱尔兰输入武器后，又在都柏林湾运进武器和组成爱尔兰志愿军。由于欧洲战争，这一切在一般人的感觉中已微不足道，因此，1916年在都柏林爆发的少数人为复兴爱尔兰而精心策划的造成“流血牺牲”的复活节叛乱，使他们的同代人和英国人都感到震惊。1919年爆发了游击战争，作战双方都很残酷，而且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也未能结束战争。该法令将这个国家分为北爱尔兰的6个郡和26个叛乱的郡，分别由各自的议会控制地方事务并与英国议会保持某种联邦关系。只是在1921年6月北方的议会召开之后，劳合·乔治才放弃了用武力使爱尔兰就范的希望。叛乱分子同意停战，派出代表团前往伦敦，代表团在“立即而可怕的战争”威胁下，接受了12月6日的条约。这个条约得到爱尔兰国民议会的批准，爱尔兰自由邦遂告成立，但受到不妥协分子强加于它的一场内战的破坏。但是新政府态度坚决，因而这个国家得以平静下来从事一定程度的经济重建达10年之久，没有发生严重妨害它的理论上的宪法地位的事情。

但是，这个条约并未表明已经解决了问题。因为爱尔兰人想得到明确的规定，而只有共和国才能符合这样的规定。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参加英联邦后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像史末资将军这样用心良好的联邦政治家看来，似乎“自治领地位”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认为各个自治领所能希望的一切宪法上的灵活性就在于此。但是其他自治领没有经历过爱尔兰的历史，而从历史上看，自治领地位含有愿意与英国密切联合的意思，一种与英国联系的积极的天然要求。这正是爱尔兰人所没有的。他们曾被邀请到伦敦，以“确定爱尔兰与称为大英帝国的许多国家的联合体怎样联合才能最符合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愿望”。但是他们的利害之所在是与英国的联合，而且他们对“帝国”这个词——一个意味着行使它自己的暴政的词——的含义是太清楚了。对于任何不是自治领的国家来说，要完全确信自治领地位的好处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在这次条约谈判中提出的建议，是他们自己主张的“对外联合”，那就是，在内部事务中保持绝对主权，在共同关心的对外事务上与英国联合：爱尔兰实际上是一个在帝国之外但与它实行联合的共和国。正是这个建议，激怒了英国政界一些空谈教条的人，对他们来说，宗主权的象征——对英王的共同忠诚，承认英王为国家首脑，通过他委派的总督行使最高权力，爱尔兰议会成员宣誓

效忠——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价值。而爱尔兰一些空谈教条的人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些象征：它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异国的臣民，成为一个被统治者，而不是一个自治领的公民。与此同时，在日常的做法中，真理在哪里呢？爱尔兰自由邦得到了“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自治领和南非联邦”那样的宪法地位，而且更具体地参照了加拿大的情况，“制约英王及帝国议会同加拿大自治领之间的关系的法律、习惯做法和宪法惯例，将制约它们同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关系”。但同样的问题是：那个法律、习惯做法和宪法惯例又是什么呢？再重复一遍，现实的性质是什么呢？当然，如果你要从历史来判断，“自治领地位”不能被看成静止不变。那么，它的秘密就在于以后有发展的余地吗？如果它的实质就在于今后可以发展，那么，它可以被允许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有没有任何理论限制呢？或者“法律、习惯做法和宪法惯例”等结果会不会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一片像龙似的云”[\[6\]](#)呢？

正当这类问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不安地盘旋着的时候，加拿大同美国就保护北太平洋大比目鱼渔业条约进行了谈判，并在没有英国大使干预的情况下，由一名加拿大部长在华盛顿单独签署了该条约，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这件事导致1923年的帝国会议对谈判条约的方式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就协商和互通情报的原则达成了一个总的协议，而不管主要涉及的是联合王国或一个自治领。在这以后不出一年，英国方面便完全忘了就洛桑条约问题同自治领协商；于是1924年6月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加拿大总理重申已被破坏了的的原则，而爱尔兰自由邦则向华盛顿径直派出了它自己的公使。这后一项行动是很重要的一步，尽管它再次使那些感到不安的人踌躇不决，很快便被加拿大所效法；为了方便的缘故，美国、欧洲和远东的其他自治领也纷纷照此行事。这样20年后，每个自治领都有了一个小小的外交名单，都有了为外交活动训练年轻人员的问题。与此同时，那些心情不安的人们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1926年，许多争论被带上了同年于伦敦召开的帝国会议。这次会议是战后终于召开了的制宪会议，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在1917年召开时复杂得多。

英联邦（这个名词这时已为大家所习惯）内部宪法上的进步，以前照例都是由加拿大带头做出的。这时，加拿大还在带头前进，但是爱尔兰自由邦和南非在这个阶段也参加进来了。每个自治领或每个自

治领的重要政党都深切地关心着本自治领的地位。爱尔兰人感到不可能把他们对他们新获得的自治领自治的理解同条约的限制条款调和起来。在南非，由博塔以及后来由史末资那样长期地掌握着的绝对领导权被民族主义者推翻了一一而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十分需要肯定南非退出帝国的权利（如果有此愿望的话）。在围绕南非新旗帜的图案和挂旗方式发生的争论上，党派情绪表现得更加激昂；而从南非联邦十足的民族主义出发，产生这场争论是很自然的。英联邦或者说帝国对于挂多少旗帜都可以容忍，但它能同意南非退出吗？加拿大的麻烦更不止一桩。在政治上，它经受了最大的危机，在法律上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危机涉及总督的特权。当他的总理建议解散议会时，总督究竟是仍然有权加以拒绝呢，还是必须照办？朱利安·宾勋爵因拒绝一位总理解散议会而又同意另一位总理解散，使遭到拒绝的麦肯齐·金大为恼怒，他谴责这种做法是对自治领自主地位的基础的一个打击，是向殖民主义的倒退，是对宪法进步的所有成果的危害。因为，如果加拿大的自治是真实的，那么，总督的特权，他决定批准或不批准某项事务的自由处决权就不能比大不列颠国王的特权更为真实。（以后发生的争论表明了宪法进步的真正程度，其分歧点不是集中在应该有多大特权的问题上，而是国王本人是否具有自由处决权的问题。）在法律领域，情绪虽不甚激烈，但麻烦也不少。事情发生在一起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的纳丹对国王的刑事案件上。1888年一项加拿大法令企图废除在刑事案件方面向枢密院的上诉权。枢密院这时宣布此项废除令无效，其理由是：第一，上诉权是由1833年和1844年的司法委员会法所规定的，这是一项英国立法，由一项加拿大法令来宣布废止它，就违犯了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第二，如果该项著名的议案还不足以作为根据的话，加拿大的这一法令还擅自行使了治外法权，这是枢密院所不能让与的。加拿大的或任何其他自治领的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这些法律的自治领内部，它们不能影响设在其他地方的法院。所以，加拿大的法学家得出结论：加拿大的司法最终不是在加拿大法院根据加拿大法律来判决，而是根据大西洋彼岸的法官采用的一堆大西洋彼岸的过时的法律来判决的，而许多加拿大人早已厌恶这些法官们的制度了。这许多不满肯定会使1926年的帝国会议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困难的宪法上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纽芬兰均未表现出任何沮丧。敏感的政治家们——人们可以举出南

非的史末资和英国的艾默里——已经在尽力解决原则问题和方法问题。

这次著名的会议建立了以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为主席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但是委员会紧张工作了两周之久，而且靠了贝尔福勋爵的机敏，才算“很容易地确定了”“由大不列颠与各自治领组成的自治社会群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些自治社会“就一切至关重要的方面而论，均已得到充分的发展”。接下去有一段话虽然由于排字工人的错误而印成了仿宋体字，但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其成员乃是“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会。它们虽然是以对国王的共同忠诚而联合在一起，但地位平等，无论在其内政或外交的任何方面，彼此均不互相隶属，而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而自由结合的。”

但是报告接下去说，平等和彼此类似的原则，虽适用于地位，并不普遍扩大到职能上。外交和防务需要有灵活的组织体制。委员会不仅致力于阐明政治理论，而且还要运用这种理论于共同的需要；那就是说，遵循20年代的惯例，现在可以被我们称为“自治领地位”的两个方面，即对内和对外方面——或许可以说从联邦内部和外部来看的地位——都需要予以考虑。

在国内方面，行政、立法和司法形式都公认已经过时。既然爱尔兰已不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改变国王称号便很容易了。“大不列颠陛下政府”这时肯定已无意把司法委员会强加给任何其他地区的陛下政府。关于总督问题，委员会只能笼统地措辞。总督当然不再是帝国政府的代表，他个人代表国王，他的宪法地位（以及可以设想的不论任何与此有关的职责）与大不列颠国王的地位相同；因此认为，从此以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应是直接的，而不通过国王的代表。有关自治领的立法权问题应该如何确定，尽管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说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于是建设由专家从法律上来进行研究。在对外关系方面，进一步规定了订立条约的程序和自治领在国际会议中的代表权安排。其总的意图是，每个自治领都可以根据自己政府的建议，派出经由国王委任的自己的全权代表。报告“坦率承认”，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像在防务方面一样（这里涉及“职能”问题），过去主要是，今后一段时期将仍然是由“大不列颠陛下政府”承担责任。然而，由于所有的自治领实际上都被卷进了某些对外关系的瓜葛，委员会认为，除非得到它们自己的政府明确赞同，否则，无论是自治领还

是大不列颠，都不能承担积极义务。实际上，也没有一个自治领承担英国根据洛迦诺公约对德法边界所做的保证。自治领向外国首都派遣公使的权限得到赞同，附带条件是，在没有此类公使的情况下，得利用现行的外交渠道。但是大不列颠陛下政府和其他地区的陛下政府之间的日常磋商怎么办呢？如果没有总督，应设立某种别的官职。

总理们带着不同程度的欣慰心情分手了。那条用仿宋体字印刷的著名的准则使加拿大和南非得到满足，因为这一准则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看来合乎情理地满足了这几个地区提出的主要要求，尽管有关退出英联邦的问题确实只字未提。在爱尔兰，是否得到满足取决于是否愿意妥协；而且，在表示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的同时，仍强调平等和自由联合。因为用后来几位爱尔兰总理的话说，英王的这顶王冠是“在爱尔兰受诅咒的东西”，是（用更带人身攻击的话说）戴在“一个外国国王”头上的。爱尔兰对在职能平等方面的任何理论上的限制，也并不满意。其他自治领则没有得到明显的满足。纽芬兰人口稀少，资源贫乏，在宪法地位的争论中很难发生什么影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进一步跨入自治这个利害尚难以预料的领域。事实上，新西兰还存有戒心。这个自治领尽管在殖民地时代对英国的政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时却认为加拿大、爱尔兰和南非的举动似乎要招致帝国的瓦解。由于怀疑联邦这个新名词，它既不想派什么全权大使，也不想接受什么政治理论；它的政治领袖们被勉强地拖入了以后5年的活动，并且对这些活动的顶点，实际上也是责任制政府全部立法发展顶点的伟大法规，一直顽强地反对。

这项伟大的法规就是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这是进一步研究行政、立法和司法形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1926年委员会曾认为必须进行的这种研究，是由出席1929年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实施自治领立法和商业航运立法会议的专家们进行的。可是，除了有所暗示以外，研究时并未触及枢密院问题；专家们关心的是对自治领议会立法权限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由帝国议会强加的，而帝国议会本身却不受这些限制；如果要使地位平等成为真实，这些限制就必须废除。这些限制部分来自各自治领借以获得自身宪法的各项法令，或者存在于有专门词句涉及它们的其他法令中，部分来自（如加拿大所发现）另一项基本法规，即1865年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部分在模糊的治外法权观念中作了规定。在帝国扩张的历史过程中，还有过对殖民地自治的更多的

限制，但它们在通常的变化过程中已经消失。例如，根据法规，英王可以否决自治领的立法案（爱尔兰自由邦除外），虽然这种权力从1873年以后就没有行使过；法规还规定总督有非强制性的或强制性的“保留权”，即在得到白厅的认可以前保留对法案的裁可。非强制性的保留权业已停止；强制性的保留权在某些情况下仍保留下来。根据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自治领立法机关不能抛开这些限制，正如自治领立法机关不能（譬如说）废除向司法委员会的上诉权一样；因此，不仅抽象的平等受到了损害，而且存在着实践上的不方便。至于治外法权，法律知识既和限制的存在相矛盾，也和限制的范围相矛盾。毫无疑问，应当采取措施在诸如渔业、航运、航空、婚姻等法律领域作一些明确规定。然而自治领的航运却一直受到帝国法规的制约。除非通过英国议会的一项法令，会议找不到废除大量不正常情况的办法，于是在它的报告内插入了许多草拟的条款。

这些草拟的条款由1930年帝国会议再行讨论后被提交到各联邦成员国的立法机关，它们又增加了一些条文，以便使总是怀疑联邦在扩张权力，因而总是很敏感的加拿大各省和澳大利亚各邦放心；1931年12月，法案获得通过。像很多宪法上意义深远的法规一样，它不是以措辞高雅或语调铿锵来表明其在帝国发展中的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所应用的政治理论本来满可以集伯克、查塔姆和福克斯的雄辩术之大成，从这点来说，它的确是十分平淡的。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令人难忘的辞令，而在于令人难忘的行动。它是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主权的最后分崩离析，面对着一个国王要听取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政府的意见的场面，宪法学家们还不得不尽力去对付这个不愉快的法律概念的残余。这项法规的标题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关于实施1926年和1930年帝国会议若干决议的法案。”它为自治领废除了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案，并声明任何自治领议会都有权制定效力及于领土以外的法律；它废除了所有保留权；它宣布，将来英国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不应再运用于任何自治领，除非其中的一项条款说明，该法律是经该自治领请求和同意而制定的。有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宪的法令，根据这些国家的请求，不受上述法规的约束。实际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纽芬兰都统统不受该项法规的约束，直至它们通过自己的立法机关决定采纳它为止；因此，是否受该项法规的约束是自愿的。但是，宪法的发展又是多么奇特和多么没有规律！就在通过该项法规的那一年，阻止该项法规实施的澳大利亚却利用了委任总督的新程序，

成了把一个本地出生的人推举到总督职位上的第一个自治领，因为，尽管1930年一致同意总督代表国王，但总督必须由国王根据负责大臣的推荐委任，而后者又必须是有关自治领的大臣。这一惯例比任何法规都有损于旧的帝国理论。可是时隔不久，威斯敏斯特法的第一批成果就在加拿大和爱尔兰自由邦废除向枢密院的上诉权方面显露出来了；而态度比较温和的南非则以废除否决权开始了它的运动。

实际上，联邦关系的独特性一方面可以用爱尔兰的向外运动来衡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用1934年纽芬兰所遇到的厄运作为尺度。纽芬兰这个环境的不幸产儿由于受到不负责任的政府和经济衰退的打击，那时除了把自己交给接管者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它的放弃自治领地位原来只是想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事实上，经过几年由委员会治理以后，又有了解决办法，战后它的宪法命运不是恢复了它的自治领地位，而是作为一个省于1949年并入加拿大。同时，分离运动被联邦生活的其他一些事实所缓和。不管定期协商如何困难，还是可以互通情报，而且从中心到边沿的情报往返的周转量日增。总督这个虚设的职位作为在自治领的政府代表，已被联合王国的高级专员所取代（第一位这样的官员实际是1928年派往渥太华的）；虽然在自治领政府间直接交往的事务较少，但有几个自治领认为在相互的首都派驻政治代表是有益的。这样，每个自治领都为自己建立了一种外交模式，反映其本身在联邦内外的需要，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加以扩大。在联邦内部，作为对基本理论和程序的一种检验，人们研究了1936年“国王爱德华八世逊位法”的立宪过程；因为，由于主权已经分散，提供意见的政府又那么多，如遇到包含着感情的争论，向同一方向引导舆论和立法就非常重要。于是，这套组织体系运转着；联邦得以避免由于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君主而造成的困难。

英国人虽然可能是善于自治的人民，也是善于协商的人民。有时，再也没有比这个零星分散而情况又千差万别的帝国或它的大部分要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的决心更加引人注目了；就像有时再也没有比各个自治领自行其是的决心更加引人注目一样，因此，在外部观察家看来，整个情况都显示了不断发生惊奇事件或烦恼的可能性。烦恼来自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当时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发生了英国财政政策上最新的重大变革——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而大约90年前的上一次变革则是放弃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因此，注意一下这两次变革的多

方面含义是饶有兴味的。因为，自由贸易虽是在殖民地成为自己的主人以前出现的，但它实际上却让这些殖民地具有采取自己所喜欢的财政政策的自由（甚至是它们政治自由的基础的一部分），而放弃自由贸易这件事在这些已获准得到自治的殖民地看来，几乎像是浪荡的母亲回心转意了。不是终于要采用30年前为殖民地所神往的那个帝国特惠制了吗？为追求这个制度，张伯伦曾经辞职，现在，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上，帝国特惠制也许可以支撑摇摇欲坠的联邦。渥太华会议没有实现这些美好的希望，围绕“渥太华精神”这个没有非常准确定义的概念而显示的雄辩术，已经从为进行另一场更使人悲痛的表演而搭起的舞台上消失了。因为，渥太华协定尽管在相当程度上表示了制定共同经济政策的决心，尽管也大大地帮助了某些集团，譬如，帮助了肯尼亚的咖啡种植者，但实质上是与促进世界贸易最大可能的恢复背道而驰的。能够为整个这些协议提出的最有力的辩解，也许只有：既然人们似乎没有能力或善意为世界组织一个合理的经济体制，那么，合理地组织一个较小的单位至少比听任全面的混乱更可取。但是，仅仅在帝国范围内，英国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救的，而且自治领的经济生活已经和工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本应受到鼓舞的英国制造商，反而常常感到遭受了挫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黄油和肉类的生产者也没有为他们问题的解决感到更有信心。繁荣是伴随世界经济的恢复而恢复的；有些批评家认为，这种恢复由于1932年政治家们果断的（虽然并不是一心一意的）努力而受到了妨碍。至少历史学家们会怀着某种兴趣去考察其过程，而不致过深地受经济假设的影响。

这次渥太华会议以加强帝国团结对付外部世界作为其基本观念，这就不能不意味着制定一项总的外交政策。纵然如此，随着这10年的向前发展，引人注目的还是分离问题。或者更确切些说，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复杂化和欧洲政治越来越充满厄运，我们看到，自治领也越来越努力地为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把他们的民族利益与对一般文明的某种责任协调起来；在此同时——或者说又时而——把英国联合体的力量和团结等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和可取的事物加以维护。这种独立存在的倾向也许是一种传统立场的表现，例如加拿大的不愿陷入外事纠纷；或许是由于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出现了一些深信国际道义的强有力人物，例如在新西兰；或是由于澳大利亚认识到，潜在的市场和潜在的危险都在北方；总之，这种独立存在的倾向

是伴随着这样一种决心而出现的，即在对联合王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支持以前，要对它进行仔细检查。因此，在30年代中期，自治领的代表自然就发现国际联盟既是政策的依托，又是阐明政策的讲坛。它们当然没有被拖着尾随英国；当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冒险期间，关于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问题，它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大谈集体安全而集体安全又很少被注意的时候，当1936年正在研究改革国联，在究竟是改革国联还是遵守国联旧章程的问题上还没有普遍下定决心的时候，澳大利亚声明支持经济上和财政上的自动制裁，并赞成签订区域性的互相公约；新西兰和南非主张按字面上执行盟约，而加拿大则反对凭武力行事的主张，即国联的主要宗旨就是维持现状的见解，并建议完善调解的机构。它们全都反对那些不考虑自治领对集体安全的情绪或不讲道义的势力；但是在最后发生的一系列可怕的危机中，它们沉默了，而为时不久以后，它们的儿女们就为此流了鲜血。

几乎延续了6年的战争使各自治领完全地确立了它们的国际地位；有些自治领单独宣战，而南非在1939年战争开始后，经过了好几天在战争与中立之间的权衡利弊才决定宣战。从宪法上说，也许爱尔兰的中立更带有决定性。Eire是一个新名称，是爱尔兰文。^[7]我们可以再看看爱尔兰，当北方6个郡坚持忠于它们同英国的联合时，英国和自由邦之间的分裂已经不断扩大。这种分裂由于感情不同，因而和其他联邦伙伴不断扩大自治权的情况性质不同，因为其后果是连续地单方面宣布1921年的条约无效，而英国也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反对。1932年，一位1916年起义的幸存者德·瓦勒拉和共和党^[8]掌权，继续执政达16年之久，致力于一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具有民族特点的纲领。1937年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了德·瓦勒拉起草的新宪法：爱尔兰这时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的民主国家”，称“爱尔兰”。总督改为选举产生的总统，宣誓效忠于英王改为宣誓效忠于国家。但它还不不是一个共和国。这个国家虽然对英王退位引起的危机漠然置之，但它仍然准备为了宪法上的方便而利用新国王，目的只在于能向国外委派外交代表。联合王国政府则设法使自己相信，这并不意味着爱尔兰地位的根本改变——就是说，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自治领；其他自治领也表示同意。但是，事实上这难道不是1921年提出并引人注目地遭到拒绝的那种“对外联合”观念的胜利吗？1938年，英国将条约签订以来一直在它控制之下的“军港”交还给爱尔兰。但是，在国际形势日益黯淡

的情况下，德·瓦勒拉预示只要继续保持分离，爱尔兰将恪守中立。尽管这种中立对英国有着某种痛苦的后果，但至少是一种友好的中立。虽然英联邦的其余部分都认为这是不幸的立场，但它受到了尊重，特别是联合王国对这种立场审慎地表示尊重，最能表明自治地位已成为现实。即便在这时，爱尔兰问题也还没有“解决”：爱尔兰到这时已不能把它的民族自由，它的独特的主权，与自治领地位或对外联合这种微妙的关系调和起来。当战争结束后，1947年它的发言人曾说，它并不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那么，它是什么呢？过了两年多，它采取了强制性的、明确的最后步骤，没有受到那些因此而不再成为英联邦伙伴的任何一个成员的阻碍。没有什么能比英国1899年对南非共和国和1949年对爱尔兰共和国态度的不同^[9]，更清楚地反映50多年间帝国观念的变化了。印度刚刚在1948年给自己制定了一部共和国宪法，宣布成为共和国，但仍继续作为英联邦成员国，这在字面上把这个问题搞乱了，破坏了宪法的严格的逻辑性，就像19世纪中期在责任制政府和殖民地自治的起源这个问题上破坏了宪法的严格逻辑性。

战争迫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法律上都进入了更大范围的自治。澳大利亚认为必须于1942年采纳威斯敏斯特法，以便把联邦的各种权力置于毋庸置疑的地位。新西兰在卷入了那些使刑事律师感到是一场噩梦的混乱状态以后，1947年也终于采取了这一步骤。战争进程本身赋予了自治领一种几乎是崭新的地理概念，以及一种当然也是崭新的战略观。加拿大除了派遣一支军队去英国和欧洲，还感到它与美国在北极圈战略中连成一体；随着新加坡的陷落和英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消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感到它们已与美国在海洋战略中连成一体。只有南非，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有利害关系，并在英国和东方的另一条海路中占据中间位置，感到它的传统战略地位没有改变。对于其他自治领来说，这种与美国密切联合的关系导致了时常不以伦敦为中心，而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新的“协商”方式。同时，由于与英国相隔很远，激发了更大的区域责任感，因而使这两个太平洋自治领很自然地制定了它们自己称为“堪培拉协定”的1944年澳新协定，该协议不仅坚持将来实行共同防务，而且坚持对这个岛群的福利负起共同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在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参与的情况下，成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更有见地的托管制度。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战后在日本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固然是一个相当无权的机构）的英国代表不是英国将军或外交官，而是一个澳大利亚

人。这是一种即使在1939年也不敢梦想的自治和合作。而且，在财政制度的破坏和改造中，当西欧竭力争取稳定的时候，协商的过程一直在继续，向英国提供食品也在继续进行；同时，各自治领虽然与19世纪的殖民地已经迥然不同，还是再一次开始从人口和劳动力、移民的新试验，以及在工业化的新冒险这些方面出发来考虑问题。

对于“自治领”一词又是如何想的呢？它们当中有的已经开始回避，也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再使用这个现成的词了。在敏感的人看来，是否这个名称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微妙的难堪呢？对于加拿大，这一名称的使用始于1867年；新西兰始于1907年。^[10]情况是否是：不管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自治领一词仍旧带着地位平等而职能不平等这种难以察觉但又始终笼罩在头上的阴影呢？1926年的“自治社会群”真是在这一年“得到充分的发展”了吗？的确，在50年中，涉及全世界的整个英国复合体发生了变化。这个复合体在其宪法的事实和哲学方面，在其总的政策和经济方面，在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都发生了那样多的变化，以致它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比过去显得更惊人，更加自相矛盾了。但是，归根结底，那些自相矛盾的事在当时不正是符合逻辑的吗？

除了研究这类发展，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仍然被当作附属帝国的各殖民地的情况。这是一部特别复杂的历史，并像拥有主权的自治领的历史一样有趣。因为，如果说比较老的自治领已可以根据一个一致公认的、现时已不再会触动感情的客观基础而加以对待的话，那么，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种种争论的乌云，这时仍笼罩着这些不久前还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才建立了责任政府制并取得独立的实体。在20世纪中叶，1948年在联邦内部获得独立地位的锡兰，同东非和西非社会之间有很大区别；这样得到解决的锡兰的宪法问题，同马来亚或西印度群岛的宪法问题迥然不同。然而，同英联邦的各个老伙伴一样，它们的历史也是建立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不断变化基础上的政府发展史，这种发展产生了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历史上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它更为强烈，因为各个老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英国式的或欧洲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亚洲或非洲的民族主义；它不存在外来的传统或肤色的不同。而这时，殖民地与帝国中心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恰恰是由于这些东西而变得复杂化了，正如民族主义本身因为语言或部族的不同而变得

复杂一样。附加在这样一些传统和这些一些区别上面，并紧紧地抓住不放的，正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和议会制的一套做法。这些附加上去的东西来得很晚而且很突然。

在这全部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各殖民地人民的贫困，虽然并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潜在的财富，冒险家们才首先不辞辛劳地上溯河流，穿越森林来到这里；并且也确实从当地人民身上榨取了财富。或者像在西印度群岛一样，他们用赤裸裸的奴隶制换取了世界经济的奴隶的地位，当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下降时，就发现人口的增长完全超过了本地有可能供养的水平，这样，不管一个殖民地是旧的还是新近获得的，不管它所具有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总是这样一幅景象：土地肥力逐渐减弱的农业，完全不能充分供给它的绝大多数居民的口粮；或者可能像在东非那样，是一幅游牧生活的景象。但情况也并不尽然，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单一的供出口的作物使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变革，并导致其多样化，如非洲大陆的黄金海岸的可可粉生产就是这样；或者如棉花生产和合作销售改善了乌干达广大地区的生活。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欧洲公司在北罗得西亚开采铜矿，或是一——我们不一定只看非洲——在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开采金矿，在把男性居民都吸收进去的同时，使乡村生活方式复杂化和贫困化，却没有增加真正的物质繁荣。贫困意味着缺乏社会服务——卫生、教育、农业研究和农业机构、交通设施等。甚至在情况最好、各种基本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像在非洲大陆的尼日利亚或黄金海岸，问题也很大；在最差的地方，像在东非保护地这个20世纪“殖民剥削”的典型，英国种植园主只是靠损害被剥夺了肥沃土地的土著居民才发财致富的。殖民地某些出口产品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或经营农业的科学方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种植园生产了世界橡胶和锡的一半的事实，并未根本上改变上述普遍现象。对于那次战争开始时的英国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6000万人民（其中80%居住在非洲）来说，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在殖民地生活的这个物质基础上，构想出了对英国政策有极大重要性的两种概念——“双重委任统治”和“间接统治”。第一种概念是“白人的重担”观念在20世纪的变种，它在逻辑上（尽管不是在时间上）先于第二种概念。它主张帝国当局负有双重责任：务必使对本地人民的统治和对本地自然资源的开发符合那些人民本身的最大利

益，同时要保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拒绝全世界享用这些自然资源。这个双重责任就是一种双重委任统治制。这个概念被批判为伪善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把不能相容的东西调和在一起的企图。它所依据的当然是这样一些设想，即归根结底，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比被统治的各国人民更清楚什么对他们有好处，而被统治的人民则担负着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原料的道义责任。但是，就算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的土著人民能够永久抵制一种对他们自己的根本道德准则非常有害的外来经济生活的影响，这种新观念也还是多少有一些内容。它确实比赤裸裸的剥削前进一步：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行政官员只不过是伪善的代理人。

对“双重委任统治制”做出经典式说明的，要推卢加德勋爵^[11]。他的实践对间接统治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他并不是这个概念的唯一发现者。30年前，阿瑟·汉米尔顿·戈登爵士就在斐济按同样的原则工作过；和卢加德同时代的则有在巴布亚的威廉·麦格雷戈爵士；德国人在新几内亚，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做法也相似。实际上，任何殖民国家，面对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而它自身的行政管理人员又极缺乏的地区行使管理职责，几乎都会被迫采取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它的问题。但是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无疑是卢加德及其继任者在尼日利亚做出的光辉榜样。当卢加德还是一个青年军人时，他就在取得和安抚尼日利亚的许多地区中起了决定作用。他运用在东非首次焕发出来的卓越的行政才能，着力于发挥通过当地的机构和制度来进行统治的可能性，这就是：仍旧让过去一直负管理责任的机构去承担或继续原来的责任，而赋予英国殖民机构的官员以一般监督、咨询和上级审判权，再加上从总体上为该殖民地区制定政策的任务。说“殖民地区”，是因为尼日利亚包含一个实行直接统治的小的沿海“殖民地”和一个广大的内地，即一个“保护国”；像黄金海岸的情况一样，也是包括殖民地和保护国，不过规模小些；此外还有塞拉利昂殖民地和保护国（这种包括两种性质的殖民地的情况不限于西非：稍晚一些在东非有肯尼亚殖民地和保护国；英国的南非公司负责管理南罗得西亚殖民地和北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保护国；也有不带殖民地的保护国，如乌干达）。另外，说“殖民地区”而不说土著国家，或单一的部落集团、民族或语言集团，是因为对非洲的争夺，并未导致领地的瓜分，需要人们对这类事情给予更多的注意。因此，虽然北尼日利亚强大的穆斯林酋长国出现的问题与南方各丛林国家不同，但是

只要有耐心和坚决的态度，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看来都可以通过实行间接统治来解决。人们主张，可以鼓励被认为已经衰落的部落当局或机构重新恢复生命，也可以取而代之；没有必要把人为的一致强加于一个地区的各个部分。唯一的一致是最后被统治。不论是容许、鼓励或授予行使任何权力，有一种权力却要保留，即制定法律和征税的权力，即“对可以授予土著当局的次要的立法权加以控制，对属于最高当权者的土地进行处理……当然还有招募和控制军队”的权力。

[\[12\]](#)这种制度在一定的环境下，如在北方各酋长国，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乌干达似乎也同样成功，那里也有强有力的土著统治者。在那些土著统治权不那么集中或不那么稳定的地方，这种制度也能够或似乎能够取得成功：事实上，凡是有部落统治当局，即酋长或部落会议，可以体现地方的行政和司法权力，并接受英国地区官员的建议和指导的地方都是如此。在北尼日利亚有酋长的地方，或乌干达有国王（称为卡巴卡）的地方，这个制度授予这些首领人物以附加的权力，而对他们的宫廷和财产则加以监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东非保护领地的大部分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政府制度。

这个制度备受实行它的人们和许多比较政府学家们的赞扬，这是十分自然的。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它似乎是容易实行、简单而有效率的；在人类学家看来，它对传统和“天生的忠诚”的重视，连同良好的秩序，都是值得称赞的；它对讲求实际的人和富于幻想的人都有吸引力。另外，从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 and 持赞同态度的帝国评论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的正确性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似乎得到了证明，其论据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非洲人的忠诚，他们参加了由最高当权者征召和控制的武装和非武装力量，东征西战，而这场战争就其起源来说，却看来与非洲各部落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也有一些不大表示赞同的批评家；随着这一世纪向前推移，某些不利之处变得明显了，仔细研究现代非洲生活的学者会认为，作为一项宪法上的安全措施，这种值得称赞的制度也许已经做得过分了。虽然和平和良好的秩序得以维持；虽然当地的生活并未在一种完全是外来的政治或经济效率的名义下被打乱或破坏；虽然有才干的酋长并未被迫陷入令人绝望的无所事事的境地；虽然把停顿不前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并非随时随地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不少地方官员面对着政府的贫困所显示的那样；虽然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说，在像西印度群岛这样早已建立的殖民地里，直接统治已不具有进取精神和灵活性——然

而，在以后的20年中，情况变得日益明显：间接统治不能给未来提供任何东西。因为非洲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地方更能不受变革的影响；而这种制度的主要不利之处在于它的下列倾向：容易接受现状，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美德，而不管这种现状多么糟糕——容易把部落统治的外部形式作为永久性的现实而加以支持，并不总是能够了解这些现实究竟是什么；容易在经济和社会变动面前束手无策，容易使土著的既得利益永久化；容易忽略年轻人的合理的骚动；容易使行政官员普遍缺乏想象力。没有为发展初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做好准备。虽然有一些，也是着重于为酋长们的子弟提供教育。随着这个世纪向前推移，对教育，西方教育、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了，否则非洲大陆比起世界其他地区，将无限期地停留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受监护的幼稚状态。由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已渗透到各殖民地，其波浪亦远远地弥漫于各保护国。因而有相当多的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对上述前景感到不满，并将他们的愤懑情绪表达出来。职员、教员、新闻工作者，以及为数甚少的律师和医生，尽管或许是彷徨于两种文化之间举棋不定，但他们的职业宗旨与他们的部落的古老目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很可能尊重其他的领袖而不是尊重他们传统的领袖。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制度日益成为西方的制度。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终政治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因此，在治理非洲的整个制度中，有一种固有的自相矛盾的现象，确实使得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对非洲表示良好愿望的人困惑不解。例如，人们设想，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总有一天会愿意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制政府；但是对于一个（按西方标准来说）如此落后、在宗教和文化上四分五裂的民族，“除了英国强加于这块任意划定的非洲土地上的统一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统一，那一天将是遥遥无期的”[\[13\]](#)。自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中产生的问题，是否可能有一天以另外的方式解决呢？

英国的政治传统，包含自治即指代议制议会制度这种设想，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也持这种看法。但是，在间接统治的哲学中寓有这样的意思，即最终可能出现的政治形式的性质，不应该过早地加以确定；因为，一种谨慎地以非洲的制度为基础的发展，有可能会产生某种新型的自治组织。[\[1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见多识广的人所做的推测就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在尼日利亚或黄金海岸，或者在乌干达或贝专纳，土著人民的景况，同肯尼亚占少数的白人统治下的土著情况相比（尽管殖民地事务部极力在那里强制实际它对土著居民的保护和仁政），要算是幸运的了。而同由南非联邦日益严重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坚决信奉白人优越论——不仅仅是白人优越论，而且还有一种属于白人文化模式范围内的南非白人优越论——决定其命运的几百万不幸的土著居民的景况相比，也算是幸运的。在南非，事情正变得明显起来，英国的理想不止一次地趋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在肯尼亚——1895年成为东非保护国，1920年成为肯尼亚殖民地——出现了典型的种族间的混乱和剥削，直到最后发生了最严重的反叛和镇压，或者说直到各保护国和殖民地的面貌几乎完全改观的时期，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保护国的人民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农业仅能维持生活；他们不具备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传统政治组织。实行合理而有效的治理，以及将这些国家开辟为欧洲人的居住地（不言而喻，这是合乎需要的）都要依靠交通工具。为了修筑从沿海的蒙巴萨到维多利亚湖之间的铁路，招来了印度人，1903年铁路建成后，他们留了下来。因而出现了“复性社会”的问题。根据1901—1902年咨询枢密院后未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以优惠的条件，在由乌干达划归肯尼亚的肥沃的“西部高原”，以优惠的条件为欧洲移民提供了土地。为欧洲人居住地勘定土地时，又兼并了属于吉库尤部落的大片土地，当时这些土地荒芜着未加使用，不仅仅因为当地人民是游牧民族，还因为他们的人数已因天花流行而减少。他们始终认为这片土地理应属于他们，随着他们的人数重新增加（人口增长是由于和平的统治和现代医学），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就增长了。马赛人也感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英国移民川流不息地来到这个国家最好的土地上，把它作为一个自由精神的家园而由衷地爱上了它，他们使肯尼亚的咖啡闻名于世，他们抱怨劳动力缺乏，抱怨在各保留地有许多未动用的劳动力宁愿闲着浪费时间而不愿为欧洲人的农场工作；他们沿袭了殖民者形成达数百年之久的思想方式，即认为他们自己（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是他们选定的这个国家经济进步的奠基人，哀叹官方人士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方面无所作为，要求得到参与管理自己的政府的权利。1919年和1920年，欧洲移民和印度少数民族先后获得选举立法会议代表的权利，1927年，印度人的席位（指定的和选举的）增至5个（印度人有7年时间拒绝合作），欧洲人的席位增至11个，阿拉伯人有一名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表广大非洲居民利益

的，是一名指定的欧洲人，通常是一名传教士。欧洲移民曾要求在选举立法会议代表时欧洲人应占多数（又表现了上述思想方式），殖民地事务部的答复是，它不能将权力交给由选举产生的任何非非洲人多数派。这是一种在经济上和宪法上令人担忧和不满的不平衡状态，在殖民地和英国都就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复性社会的种种问题是复杂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英国为委任统治制下出现的新问题所苦恼，虽然在乐观主义者看来，在现行实践中，托管的原则有充分的约束力，能够使这些问题在英国人手里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处理完全不是殖民地的伊拉克和外约旦的问题比较顺利是一回事，而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巴勒斯坦是一个正在被阿拉伯人所憎恶的犹太人以炸弹和罪恶的暗杀活动进行殖民化的国家，它提出了一个在殖民地条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最后不得不在1948年放弃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英联邦成员国所瓜分的原德属殖民地，则无疑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对待。划给英国的有德属东非即坦噶尼喀（这是有几年社会服务水平低于德国人统治时期）以及西非的喀麦隆和多哥的一部分；这些“乙”类委任统治地实际上同英国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划给南非的有德属西南非洲。南非人没有死守委任统治条件，不久就想把德属西南非洲完全并入联邦。划给澳大利亚的是新几内亚的德属部分，它在1945年以前有完全独立于毗邻的澳大利亚领土巴布亚的行政机构，1945年两个行政机构才合并起来。新西兰得到了西萨摩亚，它那可爱而难以对付的人民清楚地表明，要卓有成效地治理，单凭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可是，根据一项后来的安排，正是西萨摩亚成了1947年与联合国达成的第一个托管协议的对象，并于1962年获得独立（一种不加入英联邦的独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以在宪法和经济两个领域的讨论和发展而引人注目，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对苦难和骚动的原因进行的调查，促进了这一讨论和发展。在宪法方面，出现了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等试验。锡兰在殖民地当中几乎可以看成是20世纪宪法改革的先锋，在那里，从1910年起立法会议的民选代表名额逐渐增多，官方的多数在1920年被取消，1931年实行了成人选举权和一定程度的责任政府制。这个国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有能力的受过教育的阶层，虽然它潜伏着语言问题，不过没有后来使许多亚洲国家陷于混乱的那种严

重的教派仇恨。它具有建立一个成功的单一国家的一切因素。1920年，允许乌干达成立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1923年，尼日利亚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中增加了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同年，南罗得西亚脱离英国南非公司的控制，成为英王的一个自治殖民地；当时该殖民地有3.4万白人（选举权仅限于他们所有）和81.3万多土著非洲人，大约一半的土地为欧洲人所有。1924年，北罗得西亚也不再受南非公司的控制而成为一个保护国。大约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提出了设立某种共同的行政机构，合并殖民地或组织联邦的野心勃勃的主张，这些地区的地理或经济利益，似乎证明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其中有一个计划是主张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实行更紧密的联合，这个运动主要得到欧洲人集团的支持，而遭到土著和经商的印度少数民族的反对；帝国政府出于某些有限的目的对它表示赞同，但整个运动由于对土著居民的利益缺乏充分的保障而受到冷遇。发展并统一运输事业本来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乌干达，禁止将土地转让给欧洲人；在坦噶尼喀，不鼓励欧洲人定居；在肯尼亚，移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个白人的殖民地。有什么总的经济政策能够把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统一在一起呢？怎么能把更紧密的联合加在如此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上呢？结果是决定每年召开一次总督会议，首次会议在1926年举行。另有一个计划是主张南北罗得西亚合并，或许再加上尼亚萨兰。这个计划于1927年由一个皇家委员会加以研究后遭到拒绝，1939年又被第二个皇家委员会拒绝。西印度群岛的地理条件与中非完全不同，它实行的是一种将代议制政府和直辖殖民地政府相混合的奇怪政体，曾计划结成联邦，但宣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形成一种西印度群岛区域意识。但1932年的委员会在制定哪怕是一个小规模联邦计划方面，其成效还不如以前的历届委员会。

这一时期在经济领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的进步，是在时期终了时到来的一一事实上，它是在英帝国再次被拖入世界大战的时刻，作为它在许多方面的焦虑达到顶点而到来的。这一步骤（更早采取的这样的步骤，我们可以追溯到约瑟夫·张伯伦时期）是以1929年设立的殖民地发展基金（英国财政部通过这项基金向非自治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区提供款项）为具体表现的向殖民地紧迫计划项目提供财政援助这一政策的扩大，但同时也是为了刺激英国的贸易。1940年的殖民地福利和发展法规定在10年间向殖民地提供1.2亿英镑的无偿补助，用于已批准的研究、教育、卫生与农业服

务、文职人员训练、劳工和合作机构、兴办地方工业和交通等的发展计划的开支，事实上，这是对殖民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和重新安排。一些大型的计划将通过各地区的开发公司来管理，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经济和发展委员会作为殖民地事务部的咨询机构。虽然这笔资金的总和肯定不能充分满足殖民地的需要，但它没有被看作履行义务，而是被当作打破那种使得所有的自助活动都变得无效的恶性贫穷循环的一种方式，等于是作为一笔激发潜能的特殊拨款（无疑也是激发殖民地在战时的忠诚）。这个充满希望的新进展的动机，同要求就托管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运动是协调一致的，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对旧的委任统治制度进行亟须的改革。除非洲以外，正是这个运动通过不同的方式，产生了1942年的英美加勒比委员会及其机构加勒比研究委员会（包括法国和荷兰的代表）和咨询性的西印度群岛会议；而在太平洋则产生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它是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倡议，于1947年创立的，与加勒比海有关的那些国家也加入了。这可以说是试图使以前仅仅还只是意愿和模糊希望的东西成为具体计划的一些努力。

战争虽然能建立帝国，也能促进帝国的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战争中的共同努力，既使帝国关系达到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也促进了宪政方面的重大变革，因而1939年才有可能以共同的语言谈论一个庞大结构中的两个根本不同的组成部分：英联邦和英帝国。前者是自由联合在一起的，后者则以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为标志。1945年以后，英联邦在宪政方面的自由发展从未停止过——这点已经谈过——因为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出现了各种新的外交政策，新的地区性联盟。因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得以在1951年与美国缔结“太平洋防御”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英国没有加入这一条约，虽然这三个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属于根据1954年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而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英帝国的宪政发展并未就此停止。如果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乃是英帝国的标志，那么1939年开始的战争是在一种几乎使帝国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国人民对帝国观念的态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们再也经不起帝国在物质上，以及同样在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事实上，英国在西方大国中并不是唯一被迫退却的宗主国。但是，这种退却也是一种前进；人们即使不是信心十足，也是怀着某种希望，计划建立一种新的、各种族之间的联邦。[\[15\]](#)

接着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事件，是印度的独立。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是锡兰作为自治领而独立。锡兰自从1931年在政治上取得进展，建立“半责任制”政府以来，英国保留的权力太多，真正的自治太少，因此继1946年制定了取得相当改进的新宪法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又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即1947年的锡兰独立法和一道咨询枢密院后颁布的敕令，即将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的规定扩大到锡兰——这一扩大，无疑是该法规的制定者们所不曾想到的。在西印度群岛，由于1947年在牙买加召开了7个殖民地的会议，建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来继续研究制定细节，由此产生了比1932年时较大的希望。到1958年，发展到制定了一部联邦宪法，但是实际上几乎马上就宣告无效，因为牙买加和特立尼达于1962年成为单独的自治领。在尼日利亚，1947年允许主要殖民地（过去只有这里有立法会议）和南北两地区都建立“议会上下院”，以非官方指定的成员占多数，在它上面有全国的立法会议，也是非官方指定的成员占多数。

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国用以对付日益不可抗拒的各种要求的一些新观念，正在非洲的舞台上发生作用。这些观念是西方的，不是非洲的，它们已使间接统治寿终正寝。其中主要的观念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治理，和按照英国模式通过部长们进行治理。这是党派政府，而且正是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各民族党派宣告了它们的存在——这些党派的主要要求是民族自治。按照欧洲的观念分成不同的党派，已指日可待。民族的，或者不如说民族主义的政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它们的许多年轻、受过教育、对非洲人来说具有新的政治头脑的领袖们，被指控煽动叛乱而投入监狱，这一事实也并未使群众对他们的支持有所减少。而对这样的要求，只许诺在遥远的将来成立议会制政府的做法，都是毫无意义的。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官员们和政治家们对这点已深信不疑：以后10年将到处出现宪法和制宪会议；不出15年，大多数非洲人，不管是好是歹，将在政治上当家做主。[\[16\]](#)

（王章辉 宋蜀碧 译）

[\[1\]](#) 原文为Albion，是古代希腊人对英伦岛屿的称谓，意为“山地”，带贬义。此处用来指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反感，故转译为“英国佬”。——译者

[\[2\]](#) 米尔纳（1854—1925年），英国殖民地统治者，曾任南非高级专员和开普殖民地总督。——译者

[3] 尽管如此，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一些向它提起上诉的涉及联邦权力的澳大利亚案件的判决有突出的意义，例如对1936年的市场交易和对1949年银行国有化的判决就是如此。

[4] 1893—1894年，英国曾血腥镇压原住在罗得西亚的黑人部落马塔贝莱人的起义，用机枪扫射的方式成批屠杀抵抗者。——译者

[5] 英国岛屿，离英格兰南部海岸不远。——译者

[6] 意为虚幻的东西，语出莎士比亚的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四幕第十二场）。——译者

[7] 爱尔兰自由邦于1937年宣布废除自由邦称号，改用爱尔兰文Eire（即爱尔兰），1949年又宣布称为爱尔兰共和国。——译者

[8] 又称“替天行道士兵党”。——译者

[9] 如果我们往前看，或许还有1961年对也脱离了英联邦的南非共和国的态度。

[10] 这种敏感态度的变化恰好被白厅行政机构的变化所抵消。1907年殖民地事务部建立了自治领司。1925年，该司变成单独设有自治领事务大臣的自治领事务部。1947年，又改名为联邦关系部和联邦关系大臣；不出几个月，印度事务部和印度事务大臣也并入该部。

[11] 《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1922年初版。卢加德并非有系统地考虑这一问题的唯一的人（参阅唐纳德·卡梅伦爵士的《对土著的行政管理的原则及其实施》，拉各斯，1935年）。卡梅伦1925—1931年任坦噶尼喀总督时曾实行间接统治。

[12] 卡梅伦：《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第24页。

[13] 马杰里·佩勒姆：《尼日利亚的土著政府》（1937年），1962年版，第360页。

[14] 黑利勋爵：《非洲概论》（1938年），第134—135页。几年后，欧内斯特·巴克在其《大英帝国的思想和理想》（1942年）中更直率地谈到这种看法：

“非洲自治的发展必须是非洲式的；它必须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东西；不能仅仅是欧洲方式的模仿和抄袭。”巴克不像黑利，他没有在非洲的经历，但他是一位有创见、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15] 关于印度和东南亚的变化，见第十一章。

[16] 非洲国家获得在英联邦中的独立地位的顺序是：黄金海岸，即加纳，1957年（1960年成为共和国）；尼日利亚，1960年；塞拉利昂，1961年；坦噶尼喀，1961年（1962年成为共和国，1964年成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数月后改称坦桑尼亚）；乌干达，1962年（1962年成为共和国）；肯尼亚，1963年（1964年成为共和国）；尼亚萨兰，即马拉维，1964年；北罗得西亚，即赞比亚（共和国），1964年。

第十四章 俄国革命

1917年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爆发，俄国虽然属于最后获胜的那个强国联盟，却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因此，革命看来仿佛只是军事崩溃造成的后果。然而，战争只不过加速了几十年来一直侵蚀旧秩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不止一次地被加剧了。1861年，沙皇政权曾试图以解放农奴的措施来克服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带来的后果。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受失败后，接踵而至的是革命的“奇异的一年”。经过1915年至1916年军事上的惨败以后，这个革命运动从它在1905年陷于停顿的那个基点上重新开始。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后一幕，而圣彼得堡的武装起义则是1917年革命的开场锣鼓。1905年革命创建的最重要的制度是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会议”或苏维埃。经过12年的间歇期后，在这次新的巨大动荡初期，上述这种制度立即复活，成为即将展开的这个戏剧性事件的主要中心。

当人们将1917年的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英国清教徒革命^[1]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统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君主与某种议会机构之间的争执是其他革命的典型序曲，而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却没有这种现象。罗曼诺夫王朝旧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可以说革命的序幕刚一拉开，他们就从舞台上消失了。那些希望保存君主制度但要把它置于一定程度的议会控制之下的立宪主义者，几乎没有机会公开阐述他们的纲领。革命刚开始，由于共和主义情绪的高涨，他们不得不收起旨在保存君主制的主张，作为单纯的立宪派来追求他们的目标。像法国的“三级会议”或英国的议会那样的机构是不存在的。1917年事件的主要内容是迄今一直构成秘密反对派的极端派别的两个集团——“俄国的吉伦特派”（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山岳党”（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

革命的立宪阶段实际上在1917年以前业已告终。沙皇1905年在十月宣言中曾经许诺召集代议制议会。但是，尽管以往查理一世或路易

十六在被废黜以前都曾向他们的议会机构一再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却很快就从1905年的“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重新树立了自己作为全俄罗斯独裁者的地位。从1906年至1916年间，政治历史的特点是俄国的半议会——“国家杜马”不断地遭受屈辱。这种“国家杜马”仅仅是咨询机关，无权控制政府；沙皇可以随意命令它暂停召开或解散；其成员时常被捕下狱或遭到放逐。因此，在1917年3月，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议会机构可以作为各政党相互竞争的舞台，或是供他们进行辩论的场所。这样，苏维埃就注定要成为整个运动中引人注目而具有权威的中心了。

1905年的警告对沙皇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专制政府继续存在——存在于一种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乃至出现离奇的拉斯普廷丑闻的气氛之中；而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革。大约3万名地主仍然拥有将近7000万俄亩^[2]土地。另一方面，1050万名农民却只占有7500万俄亩土地。1/3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农业技术水平惊人的低下：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1000万木犁和“索哈”^[3]以及2500万木耙，而铁犁只有420万个，铁耙则不到50万个。机械牵引几乎没有听说过。1/3以上的农产完全没有农具，30%的农户没有牲畜。因此，大战前几年，俄国谷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仅仅达到德国农夫收获量的1/3和法国农夫收获量的1/2，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困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由于他们每年要向地主缴纳价值4亿至5亿金卢布的租赋而变得更难以忍受。抵押给贵族银行的地产半数以上租给农民，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或其他封建形式的租税。地租往往是收成的50%。在解放农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农奴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而且颇有势力，在某些地区，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还公开存在着“短期农奴制”。要求降低租税或减免“劳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一直发展到大声疾呼地要求完全没收地主的财产并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种情况使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迟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加了农民的爆炸情绪。1914年至1916年连续战争动员，使农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强壮劳动力；牲畜被大量屠宰以供军需；农具生产降至正常时期的25%，同时农具的输入完全停止，而在平时期，俄国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输入的。产量的下降

使农民无法忍受沉重的地租负担，而且也使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变得不可抗拒。从1905年至1917年间，只试行过一次重大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的斯托雷平改革方案曾试图助长一个富农阶层的增长，以便使这个阶层的保守性成为沙皇政权的支柱。但是，这个为时过晚的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不大显著，而且大都被战争的破坏所抵消了。

工业落后和农业上的贫困并存。大战前夕，按人口计算，俄国生铁产量是每年30公斤，德国是203公斤，英国是228公斤，美国是326公斤。煤产量俄国每人为0.2吨，德国是2.8吨，英国是6.3吨，美国是5.3吨。棉花消费量俄国是每人3.1公斤，英国是19公斤，美国是14公斤。俄国的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刚刚创立，而且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工工厂和汽车制造工厂。在战争期间，军备生产勉强有所增长，基础工业的生产却下降了。从1914年至1917年间，为1500万应征入伍者仅仅制造了总数不超过330万支的步枪。工业落后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军事上的虚弱，纵然俄国的西方盟国向它提供枪支弹药，也无济无事。然而，看来一个十分离奇的矛盾现象是，俄国的工业有一个方面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它高度集中，其集中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美国工业。超过半数的俄国工业无产者在雇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做工。这种情况势必会带来政治后果：这种前所未见的集中性使工业无产者高度组织化并具有巨大的政治攻击能力，而且正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具备这些特征，它才能够在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但是，还没有等到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显示出它的力量，旧政权的虚弱就由于财政上的破产而进一步恶化了。俄国的战费开支总计达470亿卢布，其中只有不到1/10的数目可以由正常收入来支付——内外战争债务共达420亿卢布。通货膨胀猛烈：1917年夏季的货币流通额是1914年的10倍。到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生活费用上涨到战前的700%。1916年全年，在彼得格勒^[4]、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经常爆发罢工和因粮荒而引起的暴乱。

“如果后代诅咒这场革命，他们将会责备我们没有能及时地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它。”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马克拉诺夫这样概括了宫廷、政府以及自由中产阶级在这次动乱前夕的态度。一点不假，在国家杜马中，自由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对于正在酝酿中的风暴是有预感的。1915年8月，由于军事上屡遭挫败而导致俄国损失了350万人，并丧失了加里西亚和波兰以后，在国家杜马中形成

了一个革新派。它包括以巴·尼·米留可夫和格·叶·李沃夫亲王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以亚·伊·古契柯夫为首的十月党人。十月党人是一些放弃了实现宪政的主张并与专制政权言归于好的保守分子；还有一个极右的国家主义者集团，它的发言人是瓦·维·叔尔根。这个革新派相当胆怯地要求沙皇成立一个“受全国信任的政府”。这个提法甚至没有暗示新政府应该对杜马负责——他们并不要求沙皇限制自己的专制权力，只是要他使这种权力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而已。这个革新派主要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它的领袖们对宫廷中的主降派势力感到惊恐。当时许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宫廷奸佞都劝说沙皇设法同德国单独媾和。由于沙皇皇后神秘地宠信拉斯普廷那个目不识丁和生活放荡的西伯利亚僧侣，他的集团势力很大，而这个集团却特别有主张投降的嫌疑。革新派的领袖们一致下定决心，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并受到驻在俄国首都的西方各国使节的鼓励。最高统帅部里也有反对派活动的迹象。总司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对于文职政治家们的活动持有一种谨慎的、不介入的同情态度。一个反对沙皇的密谋后来被认为是另一位军官克雷莫夫将军策划的。然而，如果说任何这种计划曾经策划过的话，却没有一个真正地实现。沙皇在拒绝做出让步方面显得出奇地顽固。内廷佞臣尽最大的努力使沙皇的态度强硬，防止他起用一个内克式或杜尔果式的俄国人物^[5]，从而使革命迅猛地发展。1915年9月16日（俄历9月3日），沙皇发布了“临时解散”杜马的诏令。他改组了政府，但是改组的方式却是蓄意要侮辱革新派和整个反对派。每次改组都把越来越多的招致公愤的人物塞进了政府，从而使主降派阴谋的迷雾更加浓厚。在开战后的两年期间，俄国撤换过4个首相、6个内务大臣、3个外交大臣和3个国防大臣。“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登台……”研究这场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这样写道：“然后，又陆续地销声匿迹，让位给那些和他们自己一样唯宫廷佞臣之命是听的走卒。”1916年年底，杜马重新召开，革新派的领袖们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惊恐。米留可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说中首次公开谴责沙皇皇后本人，一再向政府发问：“这到底是愚蠢还是背叛？”沙皇再次以他惯常的方式做了答复：取缔批评言论，杜马本身也被解散。闸门紧紧地关闭着，以阻挡革命的浪潮，结果是潮水更加高涨，直到猛然冲开缺口，把一切障碍统统席卷而去，其中也包括古老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

1916年12月30日至31日（俄历12月17日至18日）夜间，宫廷的“妖师”拉斯普廷被刺杀，这最后一次显示出，劝说沙皇改变态度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圣僧”是被沙皇一个亲戚尤苏波夫亲王当着其他宫廷近臣的面刺杀的。这一事件向全国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事实上，行刺者旨在消除宫廷内亲德派的势力。一时间，对统治方式会发生变革的希望增长了，但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沙皇和皇后为他们的“圣友”被刺而感到愤恨，因而更加顽固地坚持一贯的做法。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实际的教训，也是人民彻底记取的一个教训：清除某一个宫廷佞臣的集团并不会产生人们普遍希望的变革；令人不满的事态是与沙皇本人密不可分的，或许更广泛地说，是与整个帝国秩序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混乱：战场上的失利、饥荒、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以及无止境的战争动员都在继续着，人民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不安了。

那些老朽的参谋部废物们（托洛茨基写道）……希望用新的动员来堵住一切缺口，并且在需要一队队能打仗的战士的时候，却用纸上一行行的士兵数字来安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盟国。大约有1500万人已被动员，聚集在兵站、营房和转运点，他们拥挤着，互相践踏着，变得暴躁不安，咒骂着。如果说这群人在前线是一支虚假的巨大力量，他们在国内却真正是一个破坏的因素。死伤和被俘人数大约有550万，而且逃兵的数字与日俱增。早在1915年7月，大臣们就哀叹道：“可怜的俄罗斯啊！连它那支在以往的岁月中曾威震世界的军队……现在也只剩下一些懦夫和逃兵了。”

然而，当革命终于到来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识别它，或者对它那翻天覆地的力量能够有所估计。像早先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最初，它被认为是一场骚乱。不仅沙皇、宫廷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就连革命派也都持有这种看法。所有的人们都被此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出来的事件吓呆了。直到沙皇被迫退位的时刻，他还继续发布一道道恐吓性的诏令。当沙皇本人已经为全国人民所抛弃的时候，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还在迫切要求撤换沙皇的各部大臣。接着，当起义的人民已经抛弃整个王朝，而共和制度已经成为事实以后，这些领袖们还在敦促沙皇退位，由他的儿子或兄弟继承。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秘密集团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当粮荒引起的骚乱已经变成罢工和示威，并最后发展为总罢工的时候，这些集团还以为它们目睹的仅仅是连续发生的一次骚乱；当首都卫戍部队参加了叛乱后，它们仍然忧心忡忡地害怕罢工会被武力镇压下去；当它们突然醒悟过来，发现政权已落入它们手中

时，它们对于整个斗争的结局仍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以后，它们在极度的惶恐不安中，又开始左顾右盼，审察应该把政权交给谁。在旧秩序已经土崩瓦解以后，革命派本身似乎仍然受到旧秩序威力的震慑。

概括地说，这就是事件的演变过程。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广泛的罢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家庭主妇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少数面包店遭到人群的袭击，但整个说来，这一天是和平度过的。第二天，罢工继续进行，示威者冲破警察的封锁线，进入市中心，抗议饥饿，要求面包。在他们被驱散以前，队伍中传出了“打倒专制”的口号。

3月10日（俄历2月25日）首都的所有工厂和工业企业全部陷于停顿。在郊区，工人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出来镇压示威，双方发生了几起冲突，但士兵们多半不肯向工人开枪。哥萨克骑兵在镇压1905年革命时曾经十分卖力，现在甚至支持示威者反对警察。第二天，沙皇从他的军事大本营发布一项解散杜马的敕令。杜马的领袖们仍然害怕违抗沙皇的权威，他们决定不召开杜马，只是呼吁代表们留在首都，成立一个杜马临时委员会，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一天，沙皇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立即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在几处地方，军队向群众开枪。到傍晚，整个卫戍部队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士兵们在营房集会，考虑是否应该服从命令，向示威工人开枪。

3月12日（俄历2月27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又有一部分卫戍部队参加了革命，士兵们把武器弹药分给工人，警察从街头消失，运动取得了十分迅猛的进展。到下午，政府就完全陷于孤立——它的命令只能在冬宫和海军部里产生作用。大臣们仍然希望已由沙皇下令调回彼得格勒的前线部队能够帮助把革命镇压下去。傍晚，罢工委员会领袖、工厂选出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举行集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到次日早晨，事情已经很清楚，不会再有任何前线部队来挽救政府——这些部队的调运正被铁路工人截住了。首都卫戍部队完全倒向了革命。团队也选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纳为苏维埃（后改称“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成员。这时，苏维埃已经使工人和士兵绝对听从它的指挥，成为唯一事实上存在的政权了。它决定成立工人民兵，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并命令恢复民用铁路交

通。群众攻占了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施利塞尔堡要塞，释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对着既成的革命事实和苏维埃的支配地位，一直不愿向沙皇权力挑战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终于决定组成一个政府。3月14日（俄历3月1日），经过磋商，组成了一个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但不包括社会主义者（只有“劳动团分子”克伦斯基的名字列在部长名单上，但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党的代表身份出任司法部长）。在临时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他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劝说沙皇让位给皇储阿历克塞。沙皇没有抗拒，但他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而不要皇储阿历克塞继位。3月15日（俄历3月2日），他签署了退位法令。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还没有获悉详情以前，就公开宣布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一个军官集会上宣称，沙皇将由他的儿子继位，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尔大公将担任摄政。参加集会的军官们提出抗议，表示如果不撤销关于摄政的公告，他们就不撤回部队。而在苏维埃里，克伦斯基则已经谈到建立共和国，并因此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临时政府陷于分裂，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部长们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和克伦斯基则劝他退位。大公决定引退。但临时政府却没有能力宣布它本身是拥护帝制还是拥护共和，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时解决。

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从它们彼此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敌对者。苏维埃没有任何合法的资格来支持它所拥有的权力；它代表着实际上发动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临时政府拥有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它的合法资格也颇成问题。诚然，沙皇在任命李沃夫亲王为首相的法令上签了字，但是，沙皇的签字究竟是在退位以前还是以后，历史学家们迄今仍有争议。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新政府的领袖们在混乱之中多半是忘记了宪法程序的微妙细节。看来，沙皇批准李沃夫亲王组成的政府时，严格地按照法律来说，他的批准已经无效。然而，不论合法与否，革命毕竟已经抛弃了沙皇，不再把他当作合法权力的源泉。临时政府代表最后一届杜马，而我们知道，这届杜马已经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据1907年7月16日（俄历7月3日）的一项选举法选举出来的，该选举法又

是斯托雷平政变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杜马在1917年不负众望，而以后又无声无息以至完全销声匿迹。但是，临时政府的主要弱点却在于它没有能力行使实权。它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当时惊慌失措，而且政治上分崩离析，结果，没有力量和那些已经同叛乱的军队联合起来的武装工人相对抗。因此，只有在彼得格勒和外省的苏维埃愿意听命于它的情况下，临时政府才能够行使职权。但是，它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与当时流行的激进情绪差距如此巨大，以致它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和模棱两可的方式去追求这些目标。几个最有势力的部长——李沃夫、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希望恢复君主立宪制；他们期待着革命的退潮，并准备尽力加速这种退潮的到来；他们迫切地想对工人们重新施加工业纪律，并防止发生土地革命。最后，他们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希望俄国在胜利后，能够根据1915年秘密的伦敦条约控制土耳其的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泄露出去，都会使群情激愤，造成极其危险的局面。

另一方面，苏维埃不仅有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在彼得格勒还有驻防军的支持），而且由于它们的选举方法，它们能够同不断波动的群众情绪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能够最有效地召集群众采取任何行动。任何一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厂由全体工人群众，在营房由全体士兵选出的。但是选出的代表任期不定。如果选民们不赞成代表的态度，可以随时加以罢免，并选出新的代表去替换。这是苏维埃最初的一个特点，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特点虽然在教义上仍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却放弃了。作为代议机构，苏维埃的基础要比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狭窄。它们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组织，它的选举方式排斥了上、中层阶级的一切代表。另一方面，1917年的苏维埃在代表它们的选民这一方面，要比任何通常的议会机构更加直接得多，同时也更加敏感得多。代表们始终处在选民经常的、警惕的监督之下，而且事实上也时常被撤换。通过几乎连续不断的补缺选举的更替，苏维埃的组成随着工厂、营房和农村中情绪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此外，由于选举不是按区域而是按生产单位或军事单位进行的，苏维埃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如同庞大的罢工委员会一样，它们向工厂、火车站、公共企业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发布命令。代表们是立法者、执行者和人民委员，一身数任，自成一体。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划分被取消

了。到了3月（俄历2月）革命末期，彼得格勒苏维埃就成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经过8个月的间歇以后，它将再一次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经历过3月（俄历2月）的各种事变以后，苏维埃与其说是驾驭了革命的浪潮，不如说是被革命的浪潮所推涌着。它的领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却又害怕行使这些权力。3月15日（俄历3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接纳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号召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指令，同时不要执行与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任何指示。这项命令特别提醒士兵们守卫军火仓库，抵制可能由军官做出的解除部队武装的任何企图。这是在苏维埃承认政府权力后，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第一次争端。临时政府指责苏维埃败坏军纪，而在苏维埃方面，由于害怕军官团的反革命行动，认为只有依靠军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因此，正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苏维埃才警告革命部队防止任何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第一号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对军官，同时，也引起军官反对苏维埃。它提出了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者一般的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带有双重政权的一切特征。从3月到11月（俄历2月到10月）的整个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充满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绝望的尝试。这两个机构在这一时期内互相重叠、互相倾轧，竭力想弥补它们之间的分歧和推卸各自的责任。这种双重权力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注定是过渡性的。最后，不是临时政府就是苏维埃势必要独揽大权和消灭对方。立宪民主党和军官团一心要消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一心要消灭临时政府。唯有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希望巩固这个双重政权，也就是想把这种过渡性的结构变成某种永久性的东西。

从沙皇退位至布尔什维克掌权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月15日至5月16日（俄历3月2日至5月3日），在这一阶段中，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领袖们单独执掌政府权力，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喜好去塑造当时已成事实的共和国。在这一阶段的开始，苏维埃^[6]的领袖们承认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到这一阶段的末期，自由主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不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统治。第一届临时政府已经在革命过程中耗尽了力量。

第二阶段从5月16日至7月15日（俄历5月3日至7月2日）。在这一阶段中，自由主义派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次联合政府竭力挽救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这个仍然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中，自由主义派（立宪民主党）是地位重要的参与者，但他们是依靠那些地位次要的参与者的支持才能执政的，因为后者当时在苏维埃里掌握着大多数群众。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必要性表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的政权处在温和社会主义派的掌握之中，而温和社会主义派又处在苏维埃的掌握之中。由于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温和社会主义派的领袖们便被他们的追随者看成是放弃了原则。到这一阶段的末期，他们也变得和他们的立宪民主党伙伴一样不得人心。他们本来可以通过与立宪民主党决裂而单独掌权的方法来挽救自己，但他们不能使自己下定决心来采取这个步骤。

第三阶段从7月16日至9月12日（俄历7月3日至8月30日），以一次夭折的革命开始。同时，以一次夭折的反革命告终。在这一阶段的中期，温和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由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来掌握领导权，组成一个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政府的办法来挽救联合政府。但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虽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却已决心要结束联合政府。他们威胁地向温和派领袖们提出要求，指出他们要单独地（或者和布尔什维克一道）执政，并且以苏维埃的名义公开地行使权力。这就是7月间被温和社会主义派领袖们在军队的支持下所击败的“半起义”的实质。正是在这次危机中，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不复存在了。不仅是工人和士兵，还有它的许多中产阶级支持者都转而反对它。资产阶级这时陷于分裂：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影响日益下降，却仍然争取维持与温和社会主义派的联合；另一部分还较有力量，它已经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消灭苏维埃的反革命行动上。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政变。克伦斯基击败了政变，但这是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协助才完成的。两次夭折的运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两个阵营中不肯妥协的分子都削弱了，从而创造了一个暂时的社会平衡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鼓励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派联合政府的尝试才得以进行。

到第四阶段（自9月12日至11月6日，俄历8月30日至10月24日）开始时，联合的两派都退出了政府：自由资产阶级退出政府是因为它同情科尔尼洛夫，而温和社会主义派退出政府则是因为他们责备克伦斯

基不应当容许科尔尼洛夫在他的政府的卵翼下酝酿阴谋。克伦斯基这时只能组成一个残余内阁——所谓“执政内阁”。它处于如此的真空状态，仿佛成为克伦斯基个人的政府。但是，克伦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击败科尔尼洛夫以后，发现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革命变得更深入了。由于布尔什维克行将控制苏维埃，温和社会主义派力图在苏维埃之外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又一次发现与自由资产阶级有了某种共同点，于是组成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合政府。这届政府只存在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为推翻二月共和国进行了极度紧张的准备工作。

早在革命爆发以前，互相对抗的各个政党就已经存在，并且围绕着预期的革命的目标展开了争论。它们一致同意这次剧变，就其目标来说将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许多方面将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们全都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当作信条（只有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对这个信条表示拒绝接受）。但是，尽管在对总的历史前景的估计上有这种一致的看法，各个政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很深的裂痕。和1789年的法国不同，俄国在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时候，已经拥有一人数尽管不多，却非常活跃而有政治头脑，同时深受社会主义熏陶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905年，这个无产阶级就已经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因此，不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如何评述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上述这种情况也必然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恐。自由资产阶级拒绝领导反沙皇的运动，团结起来捍卫君权。它重新接受沙皇制度是三心二意的：立宪民主党仍然希望把沙皇制度逐渐改变为君主立宪制，而十月党人则与王朝彻底和解，尽管这个王朝不能令人满意。

中间阶级的这种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引起了重大的争议。它的温和派——孟什维克认为，既然这次革命的性质只能是反封建或反专制的，则它的领导权自然应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工人阶级。据说，尽管资产阶级态度暧昧，事态的发展最终将驱使它担负起建立一个西欧式议会民主制度的指导任务。而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则争辩说，由于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转入反革命阵营，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只有工业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国家，至少是领导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但是，布尔什维克还补充说，即使革命将由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愿望的阶级领导，但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取得胜利以

前，它的目标也不可能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政府将把地主的地产分给农民，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此外，还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进步的社会立法；但它不会建立工业公有制，也不废除一般的私有财产——仅仅是要以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去取代封建和半封建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在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获得充分发展的时期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刻才会到来；至于这个发展时期的长短，只能是一个猜测。而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工人阶级不应放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不能像孟什维克主张的那样，等待资产阶级采取主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参加1917年3月（俄历2月）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仍然持有这种观点。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另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组织方式的问题。1903年，他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第一次分裂。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有自己的理论，精心制定的策略和严格的内部纪律，这使得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计划行动步骤的时候，确信自己的命令和指示能够被基层党员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个政党有它自己公认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他把渊博的学识、热情的革命家气质、策略天才以及巨大的行政才能这样一些不同的特质统统集中于一身。他宁可用他自己的说服力和道德品质的威信去左右他的党，而不是依靠那种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特色的机械似的纪律。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在组织上是相当松散的，在理论问题上含含糊糊的。它的一翼接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另一翼接近布尔什维克主义，两翼之间则是范围广大的中间派。孟什维克有许多天才的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和出色的作家，但是缺乏一个能够制定出明确政策的全国性领导集团。在3月（俄历2月）革命中，这个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两个格鲁吉亚人——采列捷利和齐赫泽是它在二月革命的全盛时期最有威信的发言人。采列捷利在沙皇时代曾经是一个被判处苦役的囚犯，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先后在苏维埃和联合政府里都有相当的影响。齐赫泽曾经是国家杜马中主要的社会主义派发言人。采列捷利领导党的右翼，齐赫泽则代表中间派。极右翼是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列宁在青年时代曾把他看作导师和领路人。左翼是孟什维克的创始者马尔托夫，他领导着孟什维克国际主义集团。“区联派”的成员是原先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都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组织。以托洛茨基为领袖的这个集团，后来于1917年7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两条阵线之间的无人地带，有高尔基的《新生活》杂志，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在这里阐述他们的见解。

像孟什维克一样，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包括若干集团和个人。这个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民粹派运动，继承了其同情俄国农民的态度、鼓吹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对沙皇制度做斗争时采取的恐怖手段。社会革命党的右翼是诸如克伦斯基之流的人物，这些人，譬如说，如果参加法国激进党，那倒更加合适，然而，他们却徒劳地企图用激昂慷慨的议会雄辩来迷惑革命群众。在克伦斯基周围，有萨文柯夫，他本是一个冷酷而浪漫的恐怖主义者，如今却变成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拥护“法律与秩序”。在党的核心，则有它最富于才华的发言人切尔诺夫，他是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农业部长，前不久，刚和列宁一起参加了在瑞士齐美尔瓦得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反军国主义会议。以老练的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和纳坦松为代表的党的左翼是民粹派运动老革命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在11月（俄历10月）间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追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们主要是城市居民，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虽然属于知识分子，却是农民的喉舌。右翼按照富农的保守语调发表言论，左翼则笃信那种独特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在巴枯宁的国家中已经深深地扎根了。但整个说来，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寻求孟什维克的指导，特别是在革命的头几个月中。

二三月间，人们普遍相信这次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令人迷惑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会愿意承认李沃夫亲王政府。这种行为看来完全符合孟什维克的观点，即在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由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参加这样一个政府；他们只能从外部给予支持以反对反革命阴谋，同时，也必须从外部去保卫工人的应得权利不受资产阶级侵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和立宪民主党一同参加联合政府以前，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一直是忠于这些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起初是惶惑的。他们过去一向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支反革命势力，如今却看到它的领袖们成为第一个事实上的共和政府的首脑。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该是什么呢？列宁的信徒们是按照一种不与上层阶级妥协的精神培养起来的，他们无法同李沃夫亲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这样一

些地主和工业家的领导人物和解。但另一方面，由于相信革命应该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不是企图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似乎又需要实行某种和解。这是一个难题，而列宁在流亡瑞士的时候，自己已经加以解决。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俄国工人阶级应该在农民的支持下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专政。这和他自己原先的预言有重大的差别，而他在俄国的信徒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没有列宁的指导，他们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应该无保留地反对临时政府，还是应该有条件地支持它。在3月（俄历2月）革命期间，他们的领袖是几个激进的青年，其中只有莫洛托夫后来享有国际声誉。3月25日（俄历12日），他们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领袖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发现莫洛托夫及其友人鼓吹的观点充满了对临时政府的鲁莽的敌视。特别是加米涅夫，他劝告布尔什维克采取一种比较妥协的态度。列宁在他从瑞士寄回国的几封信中，已经阐明后来成为11月（俄历10月）革命的基础的那些观点，但是由于他远在国外，无法说服党予以接受。因此，在彼得格勒二月共和国的和谐期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传统和观点，却一致同意这次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于是，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呈现出一派田园诗式的团结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甚至认真地考虑要合并为一个党。

有关革命任务的一些基本问题，由于各个政党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而变得复杂化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希望革命不要妨碍政府进行战争和保持俄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我们知道，1915年签订的秘密的伦敦条约曾许诺俄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在巴尔干半岛获得领土。米留可夫作为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试图重新确定这些目标是革命俄国的战争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军队就必须作战；而为了使军队能够作战，就必须在士兵中重建纪律，同时军官团的权威地位也必须恢复。于是，这位自由主义的外交部长成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然而，只有苏维埃愿意在这方面给予合作，才可能恢复纪律。可是，即使处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如果想要苏维埃去去除军队中的革命精神，它们最多也只能是勉强敷衍而已。这是因为，首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集团和政党都曾经含糊地承担了反军国主义的义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把这场战争斥为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冒险，只要它是“为了沙皇和祖

国”而进行的战争，那就只能是这种性质。沙皇政权被推翻，使情况与前迥然不同。如今有可能宣称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而俄国的革命民主政府正在和英法两国的议会民主制政府联合起来，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反革命君主制政权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这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二三月间所宣扬的观点——就此而论，他们成了爱国者或“社会爱国者”。但正是因为他们出于上述理由才接受战争，所以，他们不能公开地接受旧政权的战争目标。当时的流行口号是“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战壕里几百万饥饿的、缺乏武装的士兵由衷地相信这个口号，以及关于很快就要结束战争的诺言。所以，当米留可夫5月1日（俄历4月18日）在一份致西方盟国的照会中，明白表示他的政府信守沙皇政府的外交和军事义务并追求其战争目标时，单单这一行动就足以在整个俄国掀起一阵抗议的风暴。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第一届联合政府在米留可夫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古契柯夫辞去陆军部长职务以后，宣告垮台。由于任命克伦斯基为陆军部长，战壕里的士兵和城市里的工人的猜疑情绪暂时缓和下来了。然而，由于当时在革命时期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和谐，因此，即使在战争问题上，它们也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分歧；它们的言论和行动仍然本着一种富有感情的和平主义态度，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战争努力采取半支持的态度。真正的裂痕尚未发生。

革命自始至终以彼得格勒为中心，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城市是政治上首先发难之地。但革命绝不仅仅是城市的事情。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阶级的独唱得到了全国各地起义农民大合唱的有力陪衬。农民们最初是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而后则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大声疾呼，要求在农村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急躁的农民开始向地主进攻，焚毁他们的邸宅，并分配他们的土地，直到整个运动具有一场名副其实的农民战争的迅猛声势。军队的瓦解正好可以看成是这场土地革命的一个方面。士兵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期待着新政权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政府一再采取拖延态度以后，他们就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政府内部有代表地主的强大势力。事实上，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也确实希望避免农业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就鼓吹土地革命；然而，现在他们却犹豫不决了：这场革命应该在战争中期进行吗？废除地主所有制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道不是只有国民议会才能解决吗？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召开国民议会看来本来应该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历届政府都以政治激情会由于选举而一发不可收拾，从而会损害战争努力为理由，一再地拖延召开议会。但实际情况是，“政治激情”毕竟已经发作了，而每一次拖延召开议会，更无异火上浇油。资产阶级部长们坚持拖延，他们害怕在革命高潮中召开的议会会变得过于激进；社会主义派部长们则牺牲了议会以挽救联合政府。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立宪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都违背自己的意愿，助长了苏维埃取得最终的优势，因为苏维埃是除了市议会以外唯一存在的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如果在尽早的时候召开国民议会，本来可以使苏维埃相形见绌，在人们眼中沦为一种企图篡权的宗派机构。可是，在1917年宪法处于真空状态时期，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诸如苏维埃立宪主义之类的东西吸引了群众，而面对苏维埃的，则是一个接一个的临时政府，它没有任何民选代表的支持，反倒越来越像是篡权者了。布尔什维克最坚持主张立即召开国民议会。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设想出这个议会和苏维埃彼此之间将处于什么关系，同时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布尔什维克自己召开国民议会，仅仅是为了几个月后就把它直截了当地加以解散。然而，特别自相矛盾的是，在3月至11月（俄历2月至10月）期间，在鼓吹议会权利方面，布尔什维克这个极端主义的革命党，也似乎比其他政党更热衷于宪法形式。对于土地改革这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布尔什维克最初没有明确的看法。早先，列宁在许多场合曾谈到赞成土地国有化，这是和他那个党的集体主义观点相一致的。虽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把大地产分给了农民，但这种做法原来却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是社会革命党纲领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个纲领的制定者切尔诺夫是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农业部长。在革命前的10年中，布尔什维克内部只有一个派别（斯大林属于此派）提倡过“分配”土地。

因此，在革命性质、战争以及土地等所有重大的问题上，对立的各个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最初似乎并不鲜明，也不深刻。只是在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国后，他才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相区别的明确界限。列宁假道德国和瑞士回国是在英国政府拒绝批准革命流亡者途经英国返国以后，由瑞士社会主义者安排的。德国政府知道列宁的反战活动，希望他的宣传会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但它不曾料到，列宁在短短几个月以后，就会以俄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和它谈判；它也不曾料到列宁的宣传反过来会对德国军队产生影响，而这种

影响正是1918年德国军事力量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献证据表明，列宁本人并没有同德国当局谈判，也没有承担义务，仅仅通过瑞士中间人表示：作为回报，他答应利用自己在俄国的影响帮助某些德国人离开俄国。他的不同寻常的旅行表明，他急于尽快地到达革命中心，以便对他的党实行领导。他回到俄国时，对布尔什维克应当如何指导革命航程，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以及许多演说中，列宁预言，革命很快就将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最终将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圆满结束。这种专政应采取由苏维埃执政的形式，这是一种最适合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但如果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工人就应该对李沃夫亲王的政府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这是一个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只是由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狼狈为奸，才掩盖了它的实质。布尔什维克应该澄清自己原来的暧昧态度，坦率地向工人、士兵和农民阐明自己的立场，直到他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从而有资格向资产阶级夺取。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党决不要支持战争，因为尽管政权发生了变化了，战争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性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大地主的土地必须分给农民，这是革命在“资产阶级”阶段的首要任务。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变将因西欧革命的爆发而加速，而列宁相信这种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工人监督”工业，或者不如说，由工人与资本家联合监督工业，将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新的国家将使人民获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多得无可比拟的自由。

革命一经开始，就应当把它巩固和继续下去。（列宁回国后不久，在一次士兵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全国自下而上，从最偏僻的乡村到彼得堡各市区的一切政权，都应当归工人、士兵、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管理国家的不应当是警察，不应当是对人民毫不负责的、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不应当是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应当是苏维埃所联合起来的普遍武装的人民自己。……只有这样的政权，只有兵农代表苏维埃，才能够……解决重大的土地问题。土地不应当属于地主。……要自己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只有这样，俄国才能以坚定的、整齐的、正确的步伐，把我国和全人类从战争的灾害和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7\]](#)

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国家，这样一幅无产阶级专政的美景，有着无比的号召力。现在回顾起来，这本来可能是一种纯粹蛊

惑性的宣传，旨在把当时临时政府仅有的任何一点权力全部摧毁。然而，对列宁的态度所作的这种解释，却被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证明不能成立。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一种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方式发挥了上述思想，这种学术性论文不可能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写的，它是列宁本人深刻信念的反映。鉴于苏维埃政权后来的演变，记住1917年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图景和后来的现实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列宁回国后不久提出的另一个有关俄国以及全世界劳工运动前途的论点，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提出建立第三共产国际的想法，他认为，由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新的国际。

列宁自己的许多信徒，或者说，大多数信徒最初接受这套想法的时候，都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使用了他的全部雄辩才能，加上党内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很快就使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信服他的观点。4月27日（俄历4月1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此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这一提纲。从许多方面看来，这是沙皇退位以后一个最重大的事件：第一次革命的和谐时期连同它那“革命民主队伍中的团结”的假象已告结束，而下一次革命的纲领已经被即将完成这次革命的党所接受。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各项动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133名代表，他们代表了7.6万名党员。在2月间，党员总数还不到3万人。但布尔什维克的强大力量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质量。每个布尔什维克通常都是工厂或车间一个有影响的领袖和组织者，他们越来越能影响不属于任何政党、乃至原先参加孟什维克党的广大工人群众。

第一届联合政府垮台以后，在五六月间，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民众对二月政权的失望。首都举行的市选举暴露了在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的虚弱；半数选票归孟什维克，而一些激进的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则坚决支持列宁的党。作为少数派，布尔什维克表现了巨大的策略上的机敏和灵活。列宁使它的党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面前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他并不号召立即举行革命。这时，只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还控制着苏维埃，列宁就拒绝考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任何打算。他极力主张苏维埃里的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立宪民主党抛开，由他们自己单独组成政府，以表明他们不辜负工人阶级的信

任。列宁于6月16日（俄历6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推行这种政策，博得曾经追随温和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和士兵们的很大信赖。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刚刚加入由10名资产阶级部长和6名社会主义派部长组成的第二届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鼓动家这时提出“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一口号不仅煽起了布尔什维克，也煽起孟什维克一般党员对资产阶级部长的猜疑。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越是靠拢联合政府，他们与自己的信徒之间的鸿沟就愈加扩大。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期间，由孟什维克控制的执行委员会号召7月1日（俄历6月18日）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指望工人阶级会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表示拥护联合政府。但是，出乎温和派领袖们的意料并使他们惊慌的是：大约50万工人和士兵们竟然举着“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和标语从他们面前经过。列宁的策略显然赢得了首都无产阶级的支持。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革命达到了一个奇异的转折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获得首都工人和很大一部分驻军的支持，但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地各省仍然拥有更大的势力。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首都和外省之间的这种“差距”很快消除。与此同时，他们极力避免任何决定性的实力较量；他们希望拖延下去，等到有理由确信自己能有取胜的把握，而且将在首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被外省调来的军队所粉碎的时刻，再来摊牌。但是，由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信徒们的急躁情绪，7月间的起义终于流产了。7月16日（俄历7月3日），第一机枪团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工人群众的会合下，举行了一次武装示威，围攻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并威胁温和社会主义派把政权交给他们这一派在其中占多数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竭力抑制这次运动，防止它变成一次真正的起义。政府把前线的部队调来首都，镇压了这次示威。就在这样的动乱之中，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据称俄国自7月1日（俄历6月18日）以来在西南前线发起的攻势遭到溃败。这次导致军队最终瓦解的溃败，引起了对政府的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站出来支持武器装备恶劣和缺衣少食的士兵们，指责政府无力制止那些克扣部队衣粮以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他们还谴责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不应该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承担这次进攻任务，并且利用前线的不利形势，作为鼓吹和平的一个理由。政府反过来把战争的挫败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对战壕中的士兵们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当7月间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被指控为替德

国总参谋部效力。这种指控由一家民众报纸发动并附有伪造的文件作为依据，从而掀起了一阵愤怒的风暴。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轻而易举地给予列宁的党以沉重的打击。军官联合会和其他右翼组织袭击了布尔什维克总部、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并对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郊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7月19日（俄历7月6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藏了起来，直到11月（俄历10月）革命时才又露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其他人被逮捕。7月25日（俄历7月12日），政府重申在前线触犯军纪者将处以死刑。7月31日（俄历7月18日），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被任命为总司令以接替布鲁西洛夫将军。

上述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一种“向右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的力量在当时却被夸大了。列宁认为苏维埃已经完成了它的革命使命，当他的信徒们举行半秘密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时，指示他们不要再鼓吹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军官联合会及其他右翼组织的领袖们认为，这时是最后消灭苏维埃及其一切主张的大好时机。但是，事实上，苏维埃的力量仍然很强大，而来自右翼的威胁又激起温和社会主义者采取行动。8月6日（俄历7月24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李沃夫亲王提交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解散国家杜马，禁止土地买卖以待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方案。李沃夫亲王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的政府也就垮台了。第二届联合政府宣告组成，由克伦斯基担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它和它的前届一样，依旧是内部分崩离析，政策上优柔寡断。参加政府的两个政党都感到不满。但现在却轮到右翼来发动攻势了。

8月25日（俄历8月12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有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召集这次国务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会址特地选在莫斯科，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那么强大。然而，会议一开幕，就遇到莫斯科发生总罢工，这件事意味深长地暗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俄国的第二首都也不断增长。会议本身表明，左右翼之间，即以温和社会主义者为一方，以立宪民主党和军事团体为另一方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会议同时暴露出克伦斯基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之间刚出现的对抗。会上的辩论一再被暴风雨般的喝彩和喝倒彩声所打断，这种喧叫声时而由左翼发出，又时而由右翼发出，时而是拥护

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又时而是拥护科尔尼洛夫反对克伦斯基。右翼欢呼总司令是俄国的救星，是注定要为此分崩离析的国家重建纪律的人。左翼则宣称内阁总理是革命的卫护人，能够保护革命免受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损害。在会议厅外，内阁总理和总司令检阅着彼此对立的军事示威游行。这种带有个人倾轧成分的对抗涉及重大的政治分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主张要有一个被赋予全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但科尔尼洛夫认为军官团是这个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独裁者候选人。克伦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苏维埃的压力，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却不得不依靠苏维埃的支持——他自己当时仍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伦斯基曾命令重新在前线实行死刑；科尔尼洛夫却希望在全国重新实行对破坏“法律与秩序”的罪犯判处极刑。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一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要求，而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则是要全部解散苏维埃。

9月3日（俄历8月21日），俄国遭受了另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里加被德国占领了。这次军事挫败的详情不明。左派谴责最高统帅部故意把“红色里加”让给敌人。科尔尼洛夫则利用里加的失陷作为反对政府的借口。9月7日（俄历8月25日），他命令强大的哥萨克支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公开收回他忠于政府的誓言。克伦斯基指斥总司令为叛逆，并决定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平定兵变。他将赤卫队武装起来，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并鼓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出来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接触。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如此卓有成效，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不肯攻打红色彼得格勒。9月12日（俄历8月30日），科尔尼洛夫被撤职并被逮捕，克伦斯基接替他担任总司令。

7月间夭折的革命造成暂时的和表面的向右转，而科尔尼洛夫夭折的反革命则导致猛烈的向左转。这首先间接地表现为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垮台。科尔尼洛夫刚一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就退出政府。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同情科尔尼洛夫兵变，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为克伦斯基的行动分担责任。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也宣布辞职。他们的党倾向于责备克伦斯基本人，指摘他在科尔尼洛夫阴谋叛乱的早期阶段，与之有某种程度的勾结或疏忽大意。因此，将近一个月，无法组成正规的政府。到了9月14日（俄历9月1日），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由5名部长组成的执政内阁，在这5人当

中，只有他自己具有公认的政治地位。他的个人统治，或者毋宁说，他个人在统治上的无能（这被布尔什维克夸张地批评为波拿巴主义），弥合了各对立政治阵营之间的裂痕。

当9月13日（俄历8月31日）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获得明显多数的时候，向左转的趋势就更直接地被觉察出来了。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这是他在1905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5天以后，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苏维埃，嗣后很快地又在大多数外省苏维埃中相继获得多数。

根据民意的这种变化，列宁断定他的党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早在9月间，列宁就从他在芬兰的隐匿地敦促党的中央委员会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这是从4月以来布尔什维克政策发展的自然结果。列宁认为：3月（俄历2月）政权之所以可能出现，是由于苏维埃把权力让给了临时政府，而这种让权行为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是由于温和社会主义者控制了苏维埃。现在，布尔什维克已占有优势，因此，苏维埃必须夺回全部权力。既然政府不大可能屈从苏维埃的意志，所以，必须用武装起义的手段把它推翻。政府及其支持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感到这种局面势在必行，但他们拒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采取这种行动。此外，完全撇开这一切因素不谈，面对着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感到孤立无援。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要公然反抗苏维埃的权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曾经在许多场合下拥护过这种权威，现在不能仅仅由于苏维埃为布尔什维克所控制这一点就改变态度。迟至此时，克伦斯基仍然拒绝召开国民议会，相反地，却于9月27日至10月5日（俄历9月14日至9月2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一个所谓“民主会议”作为代替。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成立了所谓的“预备议会”，这是一个咨询机构，由于根本没有得到选民授权，并无权控制政府，其权力极其微弱。而当布尔什维克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抵制预备议会时，它的权力进一步遭到削弱。民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各种办法来重建正规政府，以取代残缺不全的执政内阁。但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退出会议后，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仍然投票反对重建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者联合内阁。克伦斯基本人曾将这次会议吹嘘为唯一具有代表性的议会，然而，会议结束后3天，他就违反会议决定，以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联合政府取代他的执政内阁。这届政府比前两届更没有权威。从理论上讲，如果它再

次向支持过科尔尼洛夫的力量求援，这届政府可能重新站住脚跟。列宁果断地决定，不给它足够的时间来达到这个目的。

10月23日（俄历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起义计划。列宁从他隐匿的地方前来出席会议，他强调说：“时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错过了。……起义问题还是十分尖锐，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转移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8]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和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中央委员会开会后一天，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面对历史，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面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押在举行武装暴动这一着儿上。”他们极力主张中央委员会等待政府已答应召集并将由激进派多数控制的国民议会；他们把新的国家设想为苏维埃共和国与某种议会民主制的结合体，认为列宁的政策将导致一次大崩溃。他们断言：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同时也低估了临时政府的力量；列宁相信欧洲的一次社会主义剧变将挽救俄国革命，而他们两人则否认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针对这些议论，列宁重申，等待召开国民议会毫无益处，因为政府曾经多次加以拖延，这次也会故技重演；与此同时，军官联合会则会得到充分时间来准备一次反革命行动并建立他们的专政。列宁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10个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激烈的争论几乎一直进行到起义的当天，但是，到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被多数票所否定，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列宁的指导。

列宁是这次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并隐匿地指导他的信徒们做好举行起义的准备，而托洛茨基则是起义的实际领袖和现场组织者。列宁极力主张他的党直接以本党的名义发动起义，不必考虑任何宪法细节问题，并且一开始就把它作为对政府的公开进攻。然而，托洛茨基则审慎地把起义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基础上，以苏维埃的名义，而不仅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动起义，并且使起义表面上显得处于守势，其目的在于保护革命不受到一次反革命政变的袭击。他的巧妙策略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起义只是以一个党

的名义发动，许多人就一定会对是否给予支持感到犹豫，但是，当起义以彼得格勒苏维埃或各地苏维埃的名义发动时，他们则给予赞助；同时，许多人对于公开的进攻性行动，一定会畏缩不前，但为了防御而有充分理由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予支持。事实上，这次起义也确有一些防御的性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毕竟相信，如果他们自己迟迟不采取行动，对方就会先发制人地发动另一次科尔尼洛夫式的反革命政变，而这一次的反革命政变将会获得成功。

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政权移交”给苏维埃呢？6月间，曾经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按计划，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在9月间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即使在准备采取行动的各地苏维埃已经为布尔什维克控制以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仍然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优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一再拖延，不肯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他们明白，布尔什维克党肯定会在这次大会上获得稳固的多数。最后，他们迫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决定在新历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把起义的日期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结合起来。经过最后一次的拖延，大会定于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开幕。起义准备在开会的前一天举行，以便代表大会能够立即批准它所期望的结果，即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立。起义本身由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的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代表它负责指挥。设立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由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提议的，这确是一个历史的嘲弄。10月上半月，彼得格勒谣言蜂起（这些谣言似乎可以从官方的公告中找到一些依据），盛传德国人在向前推进，彼得格勒将实行撤离，政府将迁往莫斯科。后来，官方进行了辟谣，但与此同时，在由于谣言而引起的一片恐慌和愤怒之中，孟什维克提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应承担保卫首都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对此欣然表示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与首都卫戍部队保持接触，以便熟悉驻军布防情况并估量其实力。这些活动表面上是为了防御德国人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也是为举行起义所采取的预备措施。隔不多久，克伦斯基命令重新调配部队，同样，这在表面上看，也只是为了加强前线，实际上却有意把最革命的团队遣往前线，以加强政府在首都的地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调防。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它的委员们分头前往驻扎在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所有支队，以便控制部队的调动。这是对政府以及正常指挥的一种挑衅，克伦斯基不能置之不理。11月5日（俄

历10月23日），他下令查禁布尔什维克报纸并逮捕已经保释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第二天，他在预备议会内指控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下令调查它的活动。

正当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内发表演说和恣意地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种种已嫌过晚的威胁时，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他的威胁只是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把起义说成是为了进行防御。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发布著名的“第一号命令”作为这次起义的开端，命令说：

“彼得格勒苏维埃处在万分危急之中。昨天晚上，反革命阴谋分子企图把士官生和突击营召进彼得格勒。因此，特命令你们要使自己的团队做好战斗准备并等候下一步命令。一切拖延和犹豫不决的行为都将被看作对革命的背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伏森科和拉舍维奇精心地拟订了军事行动计划。11月6日至7日（俄历10月24日至25日）那一夜，赤卫队和正规军团队以闪电般的行动，占领了预备议会所在地塔夫里德宫、邮局、火车站、国家银行、电话局、发电站和其他战略地点。3月（俄历2月）间推翻沙皇专制的运动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而推翻克伦斯基的最后一届政府只用了几个小时。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已逃出首都，想召集前线的部队参加战斗。到了中午，他的政府被围困在冬宫，恰如3月（俄历2月）革命最后阶段沙皇政府的情形一样。一夜之间，几乎没有流血，布尔什维克就成为首都的主人。人民群众清早醒来，惊讶地读到这样的布告：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9\]](#)

傍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649名中占390名）。从7月以来，列宁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并提出有关和平和土地的两项重要提案。列宁提出的和平法令呼吁“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不割地……不侵占别国领土，不赔款”。土地法令直截了当地宣布：“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10\]](#)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当代表大会为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被捕的消息欢呼的时候，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托洛茨基任外交人

民委员、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李可夫任内政人民委员、米柳亭任农业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任劳动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伏森科、克雷连科和季宾科共同主管陆、海军人民委员会。这个新政府的纲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很模糊的。但它的领袖们决心要建立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此争取占俄国民众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他们准备把本来属于大地主的1.5亿俄亩土地分给农民，借此来取得这种支持。他们第二个迫切的目标是缔结和约。在革命爆发的时刻，他们坚信其他欧洲国家会很快仿效俄国，因而和约将在各主要交战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府之间缔结。至于在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化方面应该达到多大程度的问题，新政权的领袖们的主张则比较含糊：他们宣布将银行和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有，但是把大多数工业留给企业家和工人们共同管理。最后，他们着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把苏维埃建成为一个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和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新型国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写道：“那些夸耀自己进行了一场革命的人们，往往在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当初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而革命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设想一点也不相同。”恩格斯主要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做出了这个总结。但这个结论的真实性在每一点上也都为俄国革命的命运所证实，并反映在俄国革命执行者的行为、信念和幻想之中。1917年4月，李沃夫亲王曾得意扬扬地夸耀说：“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民。我们这一代有幸生活在俄国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同一个人眼中，这个“最幸福的时期”就变成了俄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克伦斯基在他最得意的时期曾经在一次士兵集会上问道：“俄罗斯自由国家是一个由叛变的奴隶组成的国家吗？……我后悔没有在两个月以前死去。假如那样，我就会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而死去；梦想着一种新的生活已经在俄国开始，并将永远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在没有皮鞭、木棍抽打的情况下生活着，人们互相尊重，并且以不同于往日专制君主的新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革命在充分利用李沃夫和克伦斯基之类的人物以后又把他们抛弃，因而使他们的幻想不断地破灭。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缔造革命；对革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清楚的概念，因此在他们身上，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是绝对的。

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则不同，在1917年，他们是唯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能为此而采取行动的政党。他们对这次大动乱的各种因素有深刻的理解，并且代表了俄罗斯人民深刻的历史要求。然而，他们也同样会发现革命的结果与自己本来的愿望并不相同。同样地，他们也需要经受一系列残酷的教训才会了解到，他们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那些设想，仍然不免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幻想，甚至是可悲的幻想。

十月起义的前夕，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生争论的时候，列宁曾经阐述了他的两个主要设想。他相信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这次革命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将得到绝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他还相信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这次革命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行将来临的国际革命的序曲。他的第一个设想——即布尔什维主义能在整个俄国范围内确立下来，很快就在他自己也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上被证实了。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反对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残酷的内战。如果说他们经受住这种严酷的考验而终于取得了胜利，归根结底，这必定是因为他们当时深得民心。实际上，这次内战的一个方面就是布尔什维克和旧政权的各种势力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展开的紧张竞争。这场竞争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俄国农民根据苏维埃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所获得的1.5亿俄亩的土地，为新政权奠定了一个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俄国农民保卫布尔什维克抗击白军将领和外国干涉，实际上也就是保卫自己，不让跟在白军后面的地主们卷土重来。人们也许会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收买”了农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但这种说法改变不了以下事实：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民来说，旧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腐朽制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必须满足；没有一个旧的政党愿意或者能够毫不拖延地满足农民的这个要求；1917年的土地革命使苏维埃制度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布尔什维克从这项措施中获得的初步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使他们不仅能够经受住内战的考验，而且能够在约10年后的土地集体化运动中，与农民中的广大阶层冒险发生了一场危险的冲突，并且在这场冲突中也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主义在它本国的土壤中已经扎下了牢固的、不可摧毁的根基。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以鼓动他们的信徒发动革命的第二个设想，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一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念和希望中半幻想的成分。说它只是一半幻想而不是全部幻想，这是因为在若干

欧洲国家中确实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当1918年11月德国和奥匈帝国确实爆发了革命以后，这些革命只限于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代替旧的君主专制，而不曾发生所预期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且，这些革命发生的时间比布尔什维克预料的要晚；而在这期间，由于处境的孤立和厌战情绪，苏维埃已经被迫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从1918年到1920年间，欧洲工人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异常强烈，足以阻碍并最终制止外国的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欧洲”是没有错的。但列宁所希望的比这更进一步——他曾经展望“无产阶级欧洲”革命的胜利。他一直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文明“落后的、亚洲的”特性，因而很难设想社会主义怎样能够单独在俄国建成。正因为如此，在1905年至1906年以及其后的若干年内，他始终只期望在俄国进行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他说服他的党应当相信革命可以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也相信，上述情况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革命不会停止在俄国国境之内。他一再说明：一旦革命在高度工业化和文明的西方各国中取得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就会具有一种国际的性质，而先进的欧洲就将在机器、技术指导、管理经验以及教育等方面援助俄国。同时，俄国则具有革命的政治首创精神；为了加速欧洲革命的进程，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但是到内战结束时，或者最晚到1921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已经抵挡住共产主义的冲击，至少暂时是如此。苏维埃俄国孤立地存在着，疮痍满目，一片贫困。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进行一次调整，这已变得不可避免，而随后发生的，不是某一种调整，而是一系列的调整。首先根据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部分地重新容纳了资本主义。其次，在1924年，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理论，其实质是断言俄国革命能够自力更生。暂时说来，许多国家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显得黯淡了，或者说，变得更加遥远了。而代替或者掩盖这种前景的，则是另一幅远景；通过由国家控制的工业革命和强制的农业集体化这一系列严酷的考验，俄国孤军奋战，走向遥远的社会主义目标（参见第十五章）。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革命的结果也和革命缔造者当初的愿望大相径庭。1920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独立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在内战中必须采取这么多的恐怖手段，而且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双手会沾满血迹”。

在内战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革命国家的性质整个改变了。1917年，列宁曾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更高一级的民主，是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新型国家。诚然，有产阶级被剥夺了参政权，新的国家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项非常时期所必须的临时性措施；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归根结底将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获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然而，到内战结束时，工人和农民也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党专政制度打下了基础。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人们往往认为列宁的党从一开始就蓄意要做成这样的结果；但这种看法却没有事实予以证明。事实上，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时常不能区分敌友，这才在各种事变的推动之下逐步地摸索着，终于实际上采取了镇压一切反对党的做法，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垄断。在以后的年代中，由于意识到俄国孤立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之中，加上政府长期采取镇压手段养成的惰性；这就促使“无产阶级民主”终于被废止，而苏维埃政权终于变成一个实行恐怖政策的警察国家。历史辛辣地嘲弄了那些本来想建立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国家的人们。然而，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幻想被时间和事态发展逐渐地或者以极其猛烈的方式粉碎了，但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在它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仍然开辟了一个不仅局限于俄国历史的新纪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这一天像一个巨大的、不可摧毁的里程碑，永远屹立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而且，尽管到了20世纪中期，当初发生的这场剧变的全部含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十月革命已经开始大大地提高了俄国的地位，将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且已经使中国革命成为它的伟大的续篇。

（徐式谷 译）

[1] 指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以清教徒反对专制王权和国教开始的。——译者

[2] 一俄亩等于二点七英亩。

[3] 一种极简陋的犁。——译者

[4] 圣彼得堡在战争期间改名为彼得格勒。

[5]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相继起用重农学派杜尔果和瑞士银行家内克进行财政改革，企图以此来摆脱财政困难。——译者

- [6] “苏维埃”（单数）在本章中均指彼得格勒苏维埃。
- [7]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3—84页。——译者
- [8]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9—170页。——译者
- [9]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页。——译者
- [10]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7、237页。——译者

第十五章 1917—1939年的苏联

1917年11月，列宁及其同事在俄国的两个首都夺取了政权以后，面临着两个突出的问题，而其性质都十分紧迫。第一个问题是对他们当时在重要的城市中心所掌握的极其脆弱的权力，必须加以巩固，并扩展到全国的其余地区。第二个问题是，需要明确一下革命的新俄国与当时正在猛烈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关系。俄国毕竟是交战国；敌对行动仍在持续；局势不容许再作任何拖延。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作为列宁政权支柱的政治集团，在一个约有1.6亿人口的国家中，其成员不过稍稍超过7万人。这群人数极少的追随者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一些边远工业区。尽管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然而，在俄国的全部政治派别中，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党派内部，他们也不占多数，而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也只拥有全国选民的一半左右。尤其是在有组织的劳动群众中，他们的支持者虽然逐渐增加，但为数仍然很少。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这类广阔的边远地区，他们的追随者更是微乎其微。他们所以能够在大都市中心夺得政权，完全是因为军队的士气普遍低落，临时政府孤立无援；也因为他们自己毫不留情地运用了非正规武装力量，并利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旗号以掩护自己的行动；最后，还因为他们向农民提出了夺取全部大地产的蛊惑性号召，从而暂时缓和了本来会要遭到的来自农民这个至关重要的阶层的严重抵抗。但胜利仍然是不牢靠的。对于许多民众阶层中已被唤起的各种渴望，此时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满足或消除。布尔什维克政权结构的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裂缝，有待弥合。

最突出的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曾经承诺召集立宪会议以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体制，这时，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便面临危险和困境。列宁在他的政治纲领中很久以来就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求尽早选出这样一个机构（英语通称为“制宪会议”），他的追随者们也曾毫不犹豫地就所谓临时政府迟迟不安排必要的选举而大声疾呼。然而，到11月推翻旧政权的时候，关于选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现在找不出任何借

口来中止这一进程。然而，进行选举必然会产生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派。

对于俄国公众中保守的非社会主义阶层必然普遍存在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列宁并不十分担心。由于沙皇的倒台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时对他们已无可挽回地背离，这些阶层已经遭受了决定性的政治挫败；而且，随着旧警察体系的崩溃和军队的瓦解，他们已经失去了唯一有效的自卫武器。对于社会民主运动内部的孟什维克对手，列宁也不十分忧虑。除了外高加索这一有限地区外，支持他们的人寥寥无几。最严重的危险在于“社革”分子即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他们在农民中所获得的广泛支持。立宪会议的选举必定会显示出社会革命党人所享有的广泛的群众支持，并且强调这些以及其他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派系所提出的要求：建立一个他们也可以参加的联合政府。

列宁设法应付了这些危险，但只能说是十分侥幸。他用分裂社会革命党的办法来对付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将该党内部最激进的而政治上又很幼稚的左翼纳入一个不牢固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到1918年3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时即告终），但已足以在这段关键性的时期内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获得多党支持（特别是农民支持）的假象。

关于立宪会议，1917年11月底，按计划进行了选举。事实表明，即使和它的左翼社会革命党盟友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新机构中拥有的表决力量也不足30%。这个代表会议于1918年1月中旬召开，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不屈从于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因而根据列宁的命令，立即遭到武力镇压，被强制解散。在当时由于革命而造成的一片困惑和混乱中，尽管这一行动包含着不祥的预兆，却暂时没有遇到严重的抗争；但是，它在布尔什维克的对手中所引起的仇恨，无疑是深刻和持久的。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需要确定新俄国和战争的关系而产生的。鉴于这个问题给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内部的团结带来特别不利的影响，因而显得更加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再次为自己以前所做的蛊惑性宣传付出代价。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宣称导致战争的争端只对资本主义剥削者有利害关系。他们从未号召过俄国单独对德媾和；事实上，他们还曾经否认这是他们

所希望的东西。相反地，他们的号召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亦即在一切实参战的国家内，都举行激进的社会主义起义，然后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缔结一项普遍的社会主义和约。但是，他们事实上确是许下了诺言，保证给俄国人民带来“和平”。而今他们夺得了政权，却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初的设想全然不符。其他参战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响应俄国的革命，起来反对本国的剥削者。西方各国政府当时仍在执政，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回答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数小时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要求实现普遍的和平。在东部战线上，德意志帝国强大的军队继续与残余的俄国军队对峙，因而不可能期望他们长期保持静止状态，不发动进攻。布尔什维克曾经大力促使俄国军队涣散瓦解，它再也不是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而少数几支部队虽然保留着一定的纪律和战斗力，在政治上却又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想要在战斗中能够使用他们，只好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刺刀有一天可能会转向新政权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按照德国愿意提供的最有利条件，求得单独媾和。在列宁的那些比较鲁莽急躁的追随者中，议和问题遭到了十分激烈的反对，以致投降过程尚未完毕，党的团结从根本上就发生了动摇。但是，列宁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需要所在，终于使媾和的主张获得通过。12月初，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此后，经过了持久的、激烈的并且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退出而一度中断的谈判，终于在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军东线司令部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项条约在历史文献中成了一个屈辱的惩罚性和约的范例。它的各项条款实在苛刻，它是俄国长时间来耗费了巨大代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得的痛苦结局。但是必须记住，德国人这时并不是和战争初期与之对抗的那个合法的俄国政府打交道，在德国人眼中，现在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一帮政治上狂热的篡权者，他们只是在前帝国的一个部分夺了权，他们代表全体俄国人民讲话的权利这时还丝毫没有获得证明。

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最苛刻的条款在于它意味着要求新政权放弃它对波罗的海诸国、波兰、特别是乌克兰的所有权。德国人决意攫取乌克兰的资源以供军需，而反对任何阻拦，因此断然拒绝与布尔什维克谈判，特别是有关这一地区的处

置问题，同时坚持和一个乌克兰分裂主义小集团单独媾和。这个小集团亦称“拉达”，它企图在旧帝国倒台后确立自己为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再者，德国人还否认苏维埃政府有权代表芬兰或波罗的海诸国。所有这一切对于俄国共产党人而言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所打击的并不是他们实际上占有的东西，而是他们希望占领的地盘。共产党尚未在任何一个有关地区建立起它的政权（虽然就在德国与拉达签订和约的那一天，他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当时，他们声称有权代表这些地区的人民说话，主要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因此，可以理解德国人所以对这些要求绝对不抱同情的原因。

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双方都出于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考虑，因此，这就意味着双方都不承认对方享有永久的与合法的地位。条约的签订仅在德国的战争努力瓦解以前大约8个月，它的有效期极短。在执行条约过程中，双方的冲突和争执也层出不穷。但是，条约确实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它当时最需要的东西：免除了德国人进一步的军事惩罚，赢得了一个喘息时机，从而得以巩固政权，并把势力扩展到未被德军侵占的前帝国的其余部分。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缔结使政府与左翼社会党人之间的不稳固的联盟告终。左翼社会革命党的群众基础主要在乌克兰，德军对该地区的占领特别使他们受到影响。他们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看作可耻的投降，拒绝分担责任。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向农民征收谷物时采用的残酷手段也深感不满。

在夺得政权以前，列宁曾经毫不犹豫地鼓励农民去夺取尚未到手的一切土地。为了消除农民对于建立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反抗，他甚至全盘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理论上主张消灭私人占有制，而实际上允许把较大面积的地产分配给比较穷困的农民。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所持的强烈敌视，始终没有真正消除；所以，在1918年冬春之际，当经济中的极端无组织状态使城市的粮食供应发生严重的短缺后，布尔什维克政权毫不迟疑地采取没收农民粮食的严厉措施，以保证供应产业工人以及那些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

正是这些做法以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促使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脱离了他们。到了1918年春季，左翼社会革命党不仅离开了政

府，而且独树一帜地发动出击，以一系列谋刺德国军政要员的行动，使苏维埃领袖陷入困境（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和基辅德军司令都成为这些袭击的牺牲品）；在某些场合，他们甚至企图用武力向苏维埃政权进行挑衅。

到这时，对共产党人进行的暴力反抗已经变得具体化了，这种情况已经不仅限于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中。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力量一时尚未到达的一些边远地区，敌视或者至少是抵制布尔什维克统治的那些政治机构或实体，如今也在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有些集团是受了其他社会主义分子——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另外一些则是由保守分子亦即旧政权的维护者们组成的。后者甚至不屑承认临时政府的权力，现在当然不愿俯首帖耳地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被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的迅猛势头和大胆行动惊呆了，但是，到了1918年春天，他们已有足够的时间来审度形势，逐渐发现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支持十分薄弱，同时也觉察到共产党领袖为了实行独裁统治而采取的那种咄咄逼人的不容异己的做法。现在，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反攻了。

这些全国性的反应来自那些在政治上希望把传统的俄国领土完整地保全下来的人们，除此以外，多民族的沙皇帝国新近的倒台，又引出了许多分裂主义倾向。这类倾向是因为受了在奥匈帝国出现的同类倾向，以及协约国政府（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本身也是如此）对于民族自决原则所作的承诺的刺激而产生的。到1918年春，在芬兰的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之间已在进行激烈的内战。争端之一就是芬兰同现在已由共产党执政的俄国之间将建立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不久由于赞成芬兰实行完全的独立而得到解决。在乌克兰，一个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分裂主义倾向受到德国人的武力支持。类似的独立倾向在前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内也正在酝酿着。总而言之，到了1918年春末，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政治反抗虽然一度延迟，这时却由于已经遍及前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而获得加强，正开始产生强烈的影响；只需要有某种特殊的刺激，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反抗就会爆发为全面的军事行动。

这样一种刺激终于在1918年夏季以协约国的军事干涉的方式发生了。俄国退出了战争，接着，实际上数以万计的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同时，对乌克兰进行开发，以供德国在经济上的掠夺——这些情

况在协约国首都，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强烈的激动和惊恐。在协约国的军事策划者看来，正当德军在西线发起最后一次强大攻势的时候，在东线对德国的一切军事抵抗却发生全面的崩溃，则无异是一场灾难。大约在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期间，伦敦和巴黎曾经做过种种大胆的设想，企图在俄国恢复某种战场，目的在于至少将一部分德国军队从西线吸引过来。他们起初曾设想给予布尔什维克以军事支持，希望诱使实力得到增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撕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恢复对德国的军事行动。1918年3、4月间，当时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曾一度采取审慎的态度，以防这一希望完全破灭。他害怕德国人会无视和约而再次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对于保留后路十分关切，以便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从协约国方面取得支持。然而，到了5月，已经可以看清，不论德国人对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其他方面可能做出多么苛刻的解释，却无意对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地区发动任何严重的进犯。于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便失去了和协约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兴趣；相应地，各协约国首都的舆论也就发生了变化，转而主张对俄国进行军事干涉，而不考虑布尔什维克的意愿，甚至不惜与之对抗。道理很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和布尔什维克合作来恢复对德国的抵抗，或许可以通过和其他政治派别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的。

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对手，特别是那些保守分子，仍然声称对协约国效忠，愿意看到俄国重新参战。今天回顾以往，显而易见，他们做出这些声明主要是希望在反共斗争中争取到协约国的帮助，而不是出于对协约国事业的任何热忱，也并不认真地打算恢复对德作战。事实上，现在俄国军队毕竟已不存在了。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把那些桀骜不驯的而且大部分业已解散的农民士兵再赶回战壕。协约国似乎始终也没有完全认识到，此时此刻，置于任何一个俄国党派手中的武力，都会不可避免地主要被用于内战去打其他俄国人，而不会用来打德国人。但是绝望往往会引起痴心妄想。那些声称协约国的军队只要一踏上俄国土地，就会获得四方响应的奢谈，在伦敦和巴黎很容易被信以为真。于是，出于这种孤注一掷的妄想，有关各国政府做出了决定，派遣各种小型远征军前往俄国，这些军队通称为协约国干涉军。

严格地说来，武装干涉可以说并不是以向俄国派遣新的部队作为开端的，实际上，早已驻扎当地的一支协约国队伍已采取了行动。这

支队伍就是由一些仇视奥匈帝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多数是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这个军团在俄军溃败以前，与俄军一同驻扎在东线。到1917年年末，它在理论上是由法国指挥的，因此从正式的意义来说，它是一支协约国军。他们和前线上的大多数俄国军队不同，一直保持着纪律，甚至在11月推翻旧政权后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俄国退出战争，他们无法守住前线阵地。大约在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时候曾做出安排，让他们取道西伯利亚撤往西缘。可是1918年5月，一些捷克部队在撤退途中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共产党政权发生了冲突。几天工夫，这些捷克部队便夺取了大段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使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出乎意料。当地的反共势力自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参加了反对共产党的行动。

这些捷克人获得华盛顿的深切同情。正是由于他们和西伯利亚的共产党政权冲突所造成的形势，威尔逊总统（他对当时的局势不甚理解）在长期拖延以后终于屈从了英法两国从年初就一直对他施加的压力，同意派遣一支美国远征军前往东西伯利亚。日本人立即仿效美国，派出一支实力庞大得多的分遣队，而且抱着截然不同的目的。与此同时，一支协约国混合部队被派往俄国北部（阿尔汉格尔），它由美国人组成它的最大分队，但却由英国人担任指挥。在阿尔汉格尔，与布尔什维克对抗的那些亲协约国政治力量正在恳求他们到来。最后，一支英国分遣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充满锐气和决心，越过了前帝国的南部边境，从外高加索和外里海两地入侵，目的是要防止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利用该地区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捞取过多的好处。

协约国进行的这些远征，规模都不大，其目的的混乱，也令人难以设想。当然，不论他们开到哪里，他们都会解放和鼓动反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于俄国内战的爆发，无疑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和俄国的反共分子有了这种联系，同时因为共产党人的政策和观点一般都使他们感到惊恐和厌恶，所以在俄国的许多协约国军官无疑地会极端厌恶布尔什维克，容易相信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勾结的种种谣传，往往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协约国的事业怀有敌意，从而把推翻布尔什维克当作协约国军队进行干涉的目的之一。但是，当初派遣这些分遣队到俄国去的主要考虑，确实是为了把反德战争进行到底，只有日军进入东西伯利亚和一支法国远征军进驻南俄（直到休战后才开去）的情况例外。肯定地说，假如当时不是一场世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假如不是认为他们在俄国的行动将有利于协约国的胜利，那就根本不会派遣军队前往北俄、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细亚。这些远征军在停战后的撤离所以如此缓慢，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部分是由于协约国之间的误会和抗衡，部分也是由于他们到那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俄国内战中反共军队一边。除了在北俄地区以外，任何一支远征军都没有严重地陷入反苏维埃力量的军事行动。而且，他们最后的撤退也绝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必要，他们之所以撤离，主要是因为世界大战的结束已消除了使他们当初来到俄国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因为敌对状态在一切其他地区均已停止后，企图让他们继续留在俄国，会导致难以克服的士气问题；此外，还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与之发生联系的形形色色的俄国党派彼此之间矛盾尖锐，互相倾轧，这种局面使得进一步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不会带来任何成效和希望。

尽管俄国内战是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协约国的干涉而触发的，但仍然不能说协约国的干涉对俄国内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乌拉尔、伏尔加中游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以及克里米亚这些内战的主要战场上，协约国远征军很难说是一个军事因素（唯有捷克军团除外，但他们也只是短暂地起过作用）。各协约国政府确实曾经通过提供军备和财政援助的方式给予反共党派重要援助。然而，协约国的干涉在俄国从来不得民心，它对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在许多方面似乎倒是起了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

“内战”一词通常是指1918年年中到1921年3月这一时期内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总称。通过这些军事行动，俄国共产党人终于消灭了对他们用武力进行反抗的国内敌人，并把他们的权力范围扩展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维持着的那个国境线之内的全部土地。^[1]尽管没有人对于这段漫长的斗争过程做出更好的描述，“内战”这个名词却也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在那些岁月里，以武装暴力的方式在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通常的那种军事冲突的模式：即由阵容分明的敌对双方，沿着一条单一的战线相互对峙。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方面确实有着统一的目标和指挥，但它的对手却远非如此。共产党面临的不是单一的敌人，而是几方面的敌人。在后一方面，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极其严重，以致往往宁可相互火并而不与

布尔什维克作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为了发展自己以便摧毁对方，甚至不惜与布尔什维克暂时联合。

内战的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小规模，而且很重视机动灵活的方式。对于参战的各方来说，他们作战，在很大的程度都得取决于他们能够从当地老百姓手中榨取到多少粮食、运输工具和军需用品。交通干线和枢纽是通常的进攻目标，而占领邻近的领土则或多或少是虚张声势。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易手十分迅速，令人感到应接不暇，至少从名义上看来是如此。军纪荡然无存，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进行野蛮的报复，人民的生活遭到可怕的破坏——凡此种种，当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为完成一项贯彻始终的政治与军事目标而展开的作战行动，往往和那些无止无休、形形色色的地方游击活动、自由掠夺以及纯粹的盗匪行为结合起来，变得难以辨认。

在战争的前一阶段，尤其是在伏尔加、乌拉尔以及中亚细亚边境一带，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一般说来，他们往往很快就被保守的军官们所取代，这些军官蔑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军事素养，而反共党政权的立场甚至也更加强烈和顽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内战时期，以温和的社会主义分子为一方，以保守的前军官和保皇分子为另一方的两股主要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互相敌视，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这正是双方都归于失败的根源。社会主义者如不借用前统治阶级的军事与行政管理的技能，就无法指挥军事行动；而前统治阶级如不借用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群众拥有的政治号召力，也就无法征集由普通士兵组成的可靠的队伍。换言之，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胜利。然而，相互的对抗妨碍在他们之间达成任何有效的联合。他们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对布尔什维克的夺得政权有不同看法（双方现在对此都深感痛心），而是在于对待俄国第一次革命即二月革命本身的态度存在着分歧。社会主义者接受并赞成这次革命，而保守分子却断然反对。固然，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纪律严明，既有决心又有魄力，这些都大大地有助于它取得成功，而且也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俄国共产主义的实际群众基础相当薄弱，假如它的主要敌手之间不存在上述那种根本性的和无法弥合的裂缝，则它在这场斗争中能否取胜，就大可怀疑了。

1918年，内战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伏尔加和乌拉尔之间的地区以及俄国北部。在前一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暴动触发了军事冲突；在后一地区，协约国的干涉造成了同样的效果。在乌拉尔战斗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前沙皇夫妇及其5个子女和一部分皇室扈从于1918年7月16日在叶卡特林堡被赤卫队屠杀。这一行动看来是共产党地方政权决定的，他们考虑到白军兵临城下，沙皇夫妇如果活着，就有逃出共产党控制的危险。然而，这一决定显然符合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一贯的指示，并在事后得到他们的默认。

1919年，共产党军队在俄国北部以及伏尔加河与东西伯利亚之间地区都取得了胜利。在北方，协约国远征军于1919年夏末和秋季撤离，从而使当地白军的士气低落，陷入分裂状态，轻易地成为共产党复仇的牺牲品。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聚集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周围的保守分子于1918年年末抛开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自己控制了反共产主义运动以后，一向对社会革命党表示同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便对这场斗争丧失了信心。这时，保守分子才发现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不能聚集足够的群众支持来取得胜利。1919年年初，高尔察克的部队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这些胜利竟然使当时在巴黎的一些协约国政治家产生了严重的错觉），但不久以后即被击溃，并被迫在西伯利亚节节败退。1920年2月，高尔察克本人被捕并被处决。在这一年其余的时间里，共产党政权推进到西伯利亚的整个西部和中部，事实上已经同日本的权益与势力范围的界限相衔接（美军已于1920年春撤出西伯利亚）。为了避免在日军还留驻东西伯利亚期间和日本发生冲突，苏维埃领袖们于1920年4月建立了一个名为“远东共和国”的缓冲国家。这个古怪的政治实体，由共产党人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结成的不巩固同盟管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类似日后的苏联卫星国。1922年11月，当最后一批日军撤出西伯利亚本土以后，它被消灭，其领土被并入苏维埃国家。此后，日军仅仅留驻在萨哈林岛的北半部，直到1925年才撤走。

与此同时，内战的军事活动中心转移到俄国欧洲部分的南方。1919年夏，邓尼金将军指挥的部队自北高加索向北出击，进犯莫斯科和黑海之间的大部地区，到10月，在北面已迫进到奥勒尔。然而，在这个地方，战争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到同年年底，邓

尼金已被赶回北高加索。1920年年初，他的部队在这里被最后击溃，再也不能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了。

当邓尼金以最大的兵力深入俄国欧洲部分的时候，苏维埃领袖们在西北一翼也同时面临着另一威胁，即白俄将军尤邓尼奇从爱沙尼亚发起了进攻。1919年10月末，尤邓尼奇的部队一直逼近到彼得格勒郊区，这是苏维埃政权在整个内战期间的最危急的时刻；邓尼金在俄国中部被战败与尤邓尼奇的部队遭到反击和被迫退却，在时间上恰巧相合，从而成为内战的转折点。共产党人在这几次交锋中获胜后，就只剩下克里米亚地区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成为他们的政权的严重威胁了。

正在这一时刻，发生了1920年戏剧性的苏波战争，它成为俄国内战奇妙的延续。凡尔赛和会，在俄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不可能为在这次会议上批准成立的新波兰确定任何一致同意的东部边界。西方协约国提议的通称“寇松线”的边界（与今天的边界无大出入）不能满足波兰人当时过分的领土野心，而俄国国内当时的骚乱状态又似乎为实现这种野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前景。然而，在俄国内战的转折关头尚未到来和白军的失败还未变得十分明显以前，波兰人一直没有下手。他们不愿支持那些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这一主张甚至怀有比布尔什维克本身更强烈的敌意的人们（大部分俄国保守分子都是如此）在俄国取得胜利。现在，由于邓尼金的失败，这种危险似乎已不复存在了。1920年春，波兰人发动了进攻，波军一直打到第聂伯河，5月初以攻占基辅而达到了胜利的顶点。这时，红军已经解除了大部分的内战威胁，对这一挑衅做出了强烈而巧妙的反应。他们的反攻不仅夺回了波兰人最初赢得的地盘，而且苏维埃军队在8月初推进到华沙城下。波军在这里成功地打了一场防御战，苏军被迫停止前进并被击退。波军取胜的原因部分归功于毕苏斯基出色的战略指挥，部分是因为苏维埃指挥内部相互嫉妒和缺乏协调的情况十分严重。波兰人在反击中机敏地以苏维埃军队的交通线作为攻打目标，迫使红军像进攻时一样急促地狼狈退却。1921年3月，在里加和会上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苏波战争宣告结束。这条边界线一直保持到1939年，比起协约国当初提议的边界来，对波兰人更为有利，但仍未能满足当时波兰人更加贪婪的野心。

对波战争的结束使苏维埃领袖们有可能集中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去摧毁弗兰格尔。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虽然也不是没有经过严酷的战斗。弗兰格尔最后一批部队于1920年11月中旬撤离克里米亚以后，可以说俄国的内战整个看来已告结束。但还剩下一个小小的尾声，那就是1921年年初，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所建立的并一度获得前协约国承认的独立共和国镇压下去。

尽管内战带来的种种严格要求使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不得不为之殚精竭虑，但它却没有妨碍他们同时在巩固国内共产党的政权组织和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这两个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从理论上说，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剥削阶级的消灭应该使得国家政权的存在没有必要了。然而，在1917年的俄国，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不能被认为是已经完全被消灭了，同时也不能被认为会在最近的将来被消灭干净。这意味着某种不能与党本身等同的国家机构仍须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必须彻底地、最终地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以，不可能存在恢复沙皇国家机器的问题，而必须用某种东西来取代它。关于这个问题，大都市的和地方的各种“工农代表苏维埃”似乎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归根到底，1917年11月正是用他们的名义来夺取政权的。列宁也正是依靠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事后的认可，才使得他镇压立宪会议的行动变为合法，从而堵死了以一切其他方式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道路。这样，从上述行动的含义来说，列宁和他的政党已经承认这一理论：苏维埃应当成为新的国家机构的基础。这一概念在1918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正式得到承认，这次会议批准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该共和国是第一个地域性的苏维埃国家，其领土包括前帝国内布尔什维克权力当时所能达到的地区。从理论上说来，根据这部宪法，一切国家权力都来源于地方苏维埃。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实际上却被否定了，不仅关于权力应当集中在按宪法定期选举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规定未能执行，更有甚者，共产党全面介入并完全控制了一切政府事务。这种控制极其广泛，以致政府机关很快就丧失了独立权力机构的一切迹象；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再尊重它自己的各级组织应尽的职责，而变成和它在地理上的管辖范围相同的党组织的死板的执行机关。

这样，党本身——它的正式名称已于1918年3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一切时候，都始终是绝对权力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持有者。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周中，对政敌开始施行的肉体镇压规模尚小；但是1918年8月发生了一起企图暗杀列宁的案件^[2]，使列宁身受重伤，在时间上，它恰好同协约国开始进行干涉相合，因此，共产党领导集团大为惊恐和震怒，作为报复，他们对真正的或者潜在的政敌采取了狂暴的恐怖统治，此后，这种恐怖统治以不同的严重程度持续了几十年，在30年代被斯大林甚至用来作为在党内实行个人独裁的工具。共产党在运用恐怖手段时如此残酷无情和猜忌异己，以致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包括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其他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集团中所剩的最温顺的分子，也全部遭到镇压，甚至从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中排斥出去。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则从1921年开始，共产党把与其他社会主义分子共同执政的最后伪装也抛掉了，党对权力的垄断已不再受到任何约束了。

与此同时，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也开始有所进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批外国政府，则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疆界接壤的国家的政府，它们和芬兰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20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些国家都急于用一切办法来巩固它们刚刚获得的独立；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同俄国的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苏俄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协约国干涉的结束也为英苏关系的发展扫除了障碍。1921年3月，英国与莫斯科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从而建立了一种事实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注定只是在几年以后，并且经过了许多周折才发展成为永久性的、法律上的关系。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很快也仿效了英国的榜样。

但是在那时，由于苏维埃领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竭力采用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来促其实现，这点仍然妨碍苏维埃政权与外部世界实现任何意义更加深远的关系正常化。“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其宗旨是向其他国家输送共产主义革命，在作为俄国共产党的工具这一点上，它和苏维埃政府本身的作用同样明显。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里，它的领导人始终在处心积虑地设法推翻别国政府，所以，各国政府在和

苏维埃政权建立任何关系时，或是犹豫不决，或是虽然建立了邦交，也感到十分不安和厌恶。

外国干涉的结束和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使苏维埃政府有了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也迫使它第一次不得不认真考虑对待在它权力范围以内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在前帝国人口中只有少数是大俄罗斯人，甚至他们和乌克兰人加在一起，也只占全国人口的62%左右。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包括前帝国的全部非俄罗斯民族，但却包括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如何确定这些人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在革命前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大部分成员是少数民族。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控诉曾经在对沙皇政权进行的社会主义批判中占有引人注目的位置。对于这些人的情绪，现在不能轻易地置之不顾。再者，为了鼓励把共产主义扩展到尚未被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毗邻地区，有必要做出实行联邦制的某种姿态。但另一方面，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不仅是列宁及其主要同事们的天生倾向，而且也是他们当前正在全力以赴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任务本身的需要。

从形式上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因时而异，也因个别民族或少数民族集团而异。一言以蔽之，解决这个问题的总方针是在加盟共和国这一级，给予非俄罗斯民族以程度不等的自治权，或至少是外表上的自治权，同时却通过共产党这一工具仍然把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换言之，各少数民族不得不满足于独立个体的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这一解决办法，通常都允许他们在政府的行政与教育工作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对于他们使用本族语言可能发表的意见，却严加限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最初年代里，它曾做过很大的努力在地方党政机构中大量录用本地区人员，借以装点自治门面。然而，到斯大林执政的后期，甚至这种做法也都削弱了，对于俄罗斯人实行的控制也不大加以掩饰，这种控制，在多数情况下，和沙皇制度最后几十年中突出表现出的那种控制没有多大区别。

1921年冬春，随着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的结束，苏维埃领导人发现自己在国内政策方面面临着紧迫而棘手的问题。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经济崩溃状态，其真实情况恐怕只能说是多数西方人士无法想象的。工业生产只占革命前的极小部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就连那些

被认为是目前在全国人口中最受优待的产业工人的情形也不例外。采用强迫与没收的办法来征集农民粮食的政策越来越不奏效，粮食更加短缺。显而易见，广大农民士兵离开红军，复员还乡后，不准备再顺从地忍受进一步的盘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支持过共产党，但并不十分热情。他们所以这样做，只是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获胜以后，旧政权将会复辟，而以前的地主将重新确定他们的财产权。事实很明显，如果要确保国内和平，要恢复农业生产，特别是恢复可供市场交换的农产品的生产，则对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必须有所照顾。

工业方面也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大部分的大型工业企业在以前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已经名义上实现了国有化。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对于这些企业，通过权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加以利用。但这种做法却付出了设备迅速折旧、库存耗尽和劳动纪律涣散的代价。同时也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去取代以前私人业主实行的制度。产业工人不满情绪很严重，很多人返回农村。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减少。共产党以维护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执政，这个阶级全盛时期也只占人口中很少一部分，现在作为一个阶级却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这些情况不仅威胁到现政权的主要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由此造成的不满情绪还开始得到社会主义者阵营内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的支持，并加强了他们的力量。1921年2月底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大规模工人骚动使这种倾向表面化了，而这次骚动和4年前也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导致沙皇覆灭的那次动乱，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和1917年的情形一样，地方驻军的不满加大了内部叛乱的危险。而且，不满情绪达到极点的，也正是曾经在1917年11月共产党夺取政权时起过突出作用的驻守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他们的不满在1921年3月初爆发为一次酝酿成熟的兵变，政府当局只是采取了重要的军事行动才把它镇压下去。

苏维埃官方的历史记载至今仍坚持认为喀琅施塔得兵变是反革命、白军或外国资本家策动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兵变完全是工人和水兵自动发起的，也是工人和水兵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可以说，叛乱者提出的要求，事实上恰好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在内战中自认为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诚然，这些目标包括在全部人口中

的社会主义阶层内部争取更大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但却绝不考虑人口中的其余部分（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绝没有提出为这些人扩大公民权利的口号。总之，从叛乱者提出的要求中，没有反映出任何资产阶级或外国资本家进行策动的痕迹。

苏维埃政权不仅针对喀琅施塔得起义，同时也针对酿成这次起义的总形势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一般简称为“内普”（NCP，见本书第三章）。政策上的这种改变并不表现为在某一时刻所宣布的任何专一的全面纲领。它是由一系列的和缓的措施构成的，其中的第一项于1921年春付诸实施，有些甚至在喀琅施塔得兵变以前。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同年3月列宁在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它规定废除强迫性与没收性的征粮办法，将它改为对农产品征收单一实物税，允许农民交税后可以自由地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售他们可能剩余的更多产品，在紧接着的几个月和以后的几年中，对此又补充了一些其他措施。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总的目的，是要在食物和其他消费品方面恢复一定限度的市场经济，准许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大规模恢复，让集体（合作社等）或个体私人经营小型的工商业企业以谋取利润。但是，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事实上，也就是足以构成布尔什维克本身称为经济“制高点”的那些部门，则仍就完全为政府所有并由政府加以控制。

苏维埃领导人在思想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一种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经济，因此，在他们看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被迫而做出的临时性退却。他们所以必须做这种退却，部分原因是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像他们最初所希望和估计的那样，在战后时期扩展到欧洲其余地区，但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经济崩溃状态，如果甚至不肯部分地或暂时地借助于个人动机的刺激，那么，想要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在一个农民人数占人口80%的国家里，想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化，条件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新经济政策被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无可奈何地予以接受，一旦适当的时机到来，就要把它尽快地抛弃。但是党内的统治集团，或至少是列宁，了解得很清楚，这样的时机不会很快到来，过渡阶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正如他们用这种行动来调动个人机动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恢复，苏维埃当局还采取措施，防止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或其他反对派集团利

用这种宽容的政策在政治上谋取好处。斯大林后来说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危险局面下”，党绝不容许党内存在任何集团。1921年后，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起过很大作用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强了镇压，1922年夏天，能被搜捕到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都受到长时间的公开审讯，很多人被判处死刑。^[3]与此同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规定了一系列相当含糊的新戒律以限制党内的反对派活动。这些戒律在以后的年月里被斯大林滥加利用，来实现在制定这些戒律时想象不到的一些目的。

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有利的经济效益是很缓慢的。在农业方面，1921年的歉收延迟了它的成效。歉收是某些主要产粮区发生了严重旱灾的结果，而连年的革命和内战造成的混乱状态则使它变得更加严重。它不仅造成了一次地方性的严重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而且使商品粮的数量减少了数百万吨。在赫伯特·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署和其他外国救济机构的大力援助下，加上苏维埃当局本身做出的巨大的努力，这场灾荒的后果受到了控制，并且最后被克服。1922年和1923年，收成总量达到战前同一地区的75%左右，基本上又令人比较满意。但上述暂时的挫折却是严重的。

工业生产恢复得更加缓慢，而且很不平衡。小型地方工业（特别是食品和皮革制品业）以及多种小手工业的生产首先得到恢复。重工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它的恢复要求更多的投资和较高的管理技能，所以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经济政策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1922年底，经济恢复有了迅速的进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中期。实行这个政策遇到的最大困难不在于恢复速度缓慢（重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例外），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某些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最初采取的一些宽容措施，1923年便在发展城乡贸易的交换条件方面引起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即所谓“剪刀差”问题。当时，工业品和农产品在价格上出现了危险的不平衡状态，工业品价格是1913年的170%—180%，而农产品价格则接近1913年水平的50%。其结果是农民自然形成这样一种倾向：不向市场提供产品，退而进行各种形式的自给自足生产或地方交换。当局建立了一套价格管理制度来克服目前的危机，使工业品价格终于降到了比较合理的水平。这个插曲使政府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依靠刺激个人动机的办法使农产品进入市场，那就必

须满足农民对于正在恢复中的工业的产品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不能不使得为进一步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积累变得复杂化。

实行新经济政策带来的一个甚至更重大的后果就是使乡村中比较富裕和比较贫困的农民之间的差别逐渐扩大了。尽管当局使用了种种反措施，但比较富裕的农民仍然显得比他的比较贫穷的邻居更善于利用新经济政策中对农民所做的各种让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习惯于把人民中间各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看作互相关联的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些社会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有觉悟和有组织的活动者的角色，一直陷于为本阶级独占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无情的相互斗争，因此，新兴富农的经济地位的增强势必被看作他们在政治上的一种胜利，按照同一推理，自然也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严重失败和耻辱。

关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新经济政策的极盛时期到底兴旺发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些历史学家接受了共产党人自己的断言，认为兴旺程度超过了沙皇时代所知的任何繁荣景象。由于各种原因，此说未必确实。但对此不必加以深究，也能够看到：20年代中期俄国农业的恢复速度是迅速的，给人以很深印象；这种恢复是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鼓励个人盈利的基础上实现的，它使得私营农业得到很大的加强，使其中的多数即使没有完全达到，也几乎达到沙皇时代它所达到的那种中等的繁荣水平，但是，与紧紧衔接的前一时期相比较，它也造成了收入方面较大的差别以及所有权和劳动关系方面较大的不平等。

在同一时期内，自然也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利润是来自对一些为新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小型工商业企业所做的经营。对于这类企业的数量，同样不应估计过高；但是，由于夜总会、赌场之类供这种自由企业的受惠者享乐的各种豪华场所的重视，其后果很快就变得触目惊心。

富农的相对富裕以及所谓“新经济政策分子”所炫耀的高消费水平——所有这一切，自然在党员中引起了强烈的憎恶和烦躁。其结果是给党内激进的反对派火上浇油，这些人怀念革命与内战时期叱咤风云的岁月，始终不能适应内战以后时期各种比较世俗的问题，而且急

于寻找争端，以便发泄他们的委屈和不满情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这些分歧，虽然并不表明党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它们本身却很严重，以致在执行这一政策的时期内预先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党内争论和派别活动。1922年春天，列宁病重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夺党内领导权的危机，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分歧的重要意义。

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突然中风，以后又发病三次。他在夏季恢复得很好，秋天又能够继续工作一段时期。可是，12月情况再次恶化。12月13日，他第二次中风，使他严重瘫痪。整个冬天，他都卧床不起，但头脑仍然清醒。经医生准许，他每天可以抽出很短的时间，就他最关心的若干问题口述自己的意见，由别人笔录下来。1923年3月，第三次发病造成了严重的瘫痪，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变成一个十足的病残者，这样一直拖到1924年1月24日逝世，约有10个月不可避免地完全摆脱了国家事务。只是再经过4个月以后，到1924年5月，列宁的政治遗嘱才向新选出的党的领导班子宣布，并由他们认真地予以考虑。这样，由于列宁患病和死亡而引起的党内继承危机，在整整两年的时间内，对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斯大林擅长玩弄逐步过渡的手段，对他来说，权力交接危机的持久过程无疑是有利的。苏维埃政权结构的一贯特点是党和政府的权力古怪地重合在一起，这对斯大林也是有利的。列宁享有的支配地位，与其说是由于他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政府职务（这一职务在列宁死后顺利地由地位较低的李可夫继任），不如说是由于他在老一辈领导人中享有的个人威望。斯大林已经于1922年4月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在列宁开始患病的时候，就已经从组织上牢固地控制了党的中央机构。从此以后，在大多数党的高级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织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不论什么时候，斯大林都无疑地能够对它们的表决施加决定性影响——至少在日常的组织问题上是如此（政治局对于重大政策的决定，享有特殊权限，因此情况有部分的例外）。不过这时候，斯大林还是一个不大出名的政治人物，这主要是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使他在公众的心目中显得逊色。他所缺乏的正是构成列宁的权力基础的那种无形的威望。斯大林不声不响地逐步为自己在组织上取得优势地位，早已遭到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党内领导人的怨恨和反对，其中包括许多在早期夺取政权和内战时期起过卓越作用的人

物。显然，在列宁患病和逝世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公然出来争当列宁继承人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广泛的愤慨，从而自毁前程。要想实现任何这样的打算，首先必须使那些更加杰出的人物在公众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丧失充当接班人的资格。

斯大林在企图建立他的优势地位时面临的问题，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十分复杂：列宁在整个患病期间，一直明显地垂青托洛茨基，认为他在指导国家政策方面是自己最合适的继任人，即便在党的日常工作方面并非如此。斯大林对于列宁的这种倾向知道得很清楚，于是无耻地利用列宁瘫痪在床的机会来削弱列宁在指导日常政务方面的影响。尽人皆知，至少有一次（或许还有若干次），他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采取了粗暴无礼的态度，倘若列宁身体健康，他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同时并以党的纪律来禁止她向列宁申诉。同时，特别是在处理有关他的家乡格鲁吉亚的问题上，他明明知道有些做法和政策违反了列宁的最强烈的愿望，但却坚持予以实行。这一切显然给病中的列宁带来相当大的痛苦和刺激，无疑地使他的病情加重。列宁第二三次发病，都是由于感情上发生了重大的波动，而这正是与斯大林有显著联系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曾经暗示或断言，斯大林曾经授意毒害列宁（托洛茨基恰好在他自己死去以前，曾支持过这种说法，虽然他从未直接提出这种指控），然而，现有的大量证据却无法证实这一说法；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斯大林也不像是要采取任何这样的步骤。

1922年12月到1923年1月间，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后来被称作他的政治遗嘱的那份文件。在这份遗嘱中，列宁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特别指出他的作风粗暴以及在私人关系中不守信义，实际上是请求撤销其党的总书记职务。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在他的同事中是最有能力的人，由此推断，他认为托洛茨基最有资格继承他来管理国家事务（列宁似乎没有想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接替他在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按照列宁的愿望，遗嘱由他的妻子秘密保存，直到他死后才公布。1924年5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对少数杰出的党的领导人宣布了列宁的政治遗嘱。在这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了轻率鲁莽的行动，以致日后悔恨不已。他们竟默许把文件扣压下来（甚至没有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公布遗嘱，虽然

列宁的意图显然是要将它公之于众），并且支持斯大林保留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显而易见，列宁遗嘱所反映的意向，在遗嘱的确切内容被公布以前很久，就已经被党的领导集团得知，或者说被他们觉察了。其结果是导致一个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的防御性同盟，以遏制托洛茨基，并防止他继承列宁的权力。这个后来被称为“三人统治”的集团存在的迹象，早在1923年1月就已显示出来了。作为一个政治联盟，它最活跃的有效时期正是托洛茨基看来最有希望成为继承人的时期。这一联盟直到1925年后期才完全告终，到那时，托洛茨基不仅已放弃了军事人民委员这一关键性的职务和决定性地丧失了他在党内的权力，而且，由于公开否认外国报刊上有关列宁遗嘱的报导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把自己作为继承人的候选资格一笔勾销了。

托洛茨基已经被取消了作为争夺继承权的对手地位，照此办法，斯大林又致力于摧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地位。在这一斗争中，他首先是设法摧毁由他们两人作为党的首领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中所把持的地方上的组织力量。1924年夏季，有步骤地破坏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地位的行动开始了，到1926年1月完成；这时，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列宁格勒负责人的职务，随后，莫洛托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对这个城市的党组织进行了无情的清洗和改组。这样，在列宁逝世两年以后，由于斯大林在党内取得了明显的组织上的优势地位，因此，继承危机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决定性的阶段，便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的外交关系继续在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发展着，这两个方面在此后的许多年中构成了他们的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一个方面是共产国际（亦即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其任务至少在形式上是致力于推翻其他大国的政府；另一个方面则是公开的外交关系，只要这些政府继续挫败那些企图推翻它们的活动，那就必须争取在有利的条件下和它们共存。

在那些年中，德国一直被看作革命活动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成功希望的目标。1921年春和1923年秋，德国共产党人曾发动两次重大的斗争来夺取政权，但都遭到惨败。这两次失败对于苏维埃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企图把共产主义革命尽早地扩展到欧洲其余地区的希

望成为泡影，因而使得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问题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苏维埃政权需要和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贸易，同时也需要利用西方金融界的信贷来源，因而希望尽可能快地与一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只要苏维埃政府仍然拒绝承担前俄国政府的债务，并且对于在革命时期将外国在俄国的工业和其他财产收归国有而使以前的业主们遭受的损失，拒不做出赔偿，这些大国的政府对于采取这一步骤，便犹豫不决。由于这一问题，加上西方人士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所怀的憎恶情绪，因而使得西方国家一般都推迟对苏维埃新政权的外交承认。1922年4月热那亚会议期间，这种僵持局面第一次部分地有了突破。此时，德国政府仍受凡尔赛和约的严厉约束，迫切要使俄国不加入向它索取赔款的国家的行列，于是单独行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其中规定缔约双方互相取消对方的一切权利要求并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行动削弱了其他西方大国以清偿债务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的立场。1924年1月，意大利和英国各自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步德国的后尘，随后又有一连串其他国家的政府跟着仿效，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坚持要求首先清偿债务。这种普遍的承认行动也包括中国和日本，1925年，日本军队终于从萨哈林岛北部撤走，这是它自1922年以来一直占领着的最后一块苏俄领土。（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外当然是美国，它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维埃政权。）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苏联被普遍地接纳为国际社会的一名成员并广泛地与其他大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在时间上，大体上和列宁的逝世以及接班危机的解决恰好相合。

在取得这些进展的同时，根据1924年1月31日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批准的新宪法，苏维埃国家结构也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在20年代中期，新的苏维埃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从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所留下的创伤中迅速恢复过来，而且，在国家结构上也得到巩固，经历了争夺个人领导权的第一次重大的危机而没有显示出不稳定状况，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因此，可以说，紧接着革命和内战而来的那个充满考验和进行重新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基本结束。

然而，这一时期国内的主要事态发展——斯大林与党内激进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盟）进行斗争的胜利以及经济生活的复兴——还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才达到最高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党内的组织力量被粉碎后，才迟缓地（实际上已经太晚了）与托洛茨基取得和解，并和他以及党内其他的左翼分子联合起来展开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从1926年夏到1927年底这段时期内，党内充满了与这一斗争有关的各种阴谋活动和论战。此时出现的这个所谓“反对派联盟”的领袖们在党内组织上无能为力，但在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中仍享有巨大声望。他们的政纲是要求取消新经济政策，主张及早结束对农民和私人企业所做的让步，迅速地 and 深入地实现工业化纲领并通过共产国际这一工具在世界其他国家展开进攻性的革命活动。斯大林在个人手腕方面比这些反对派领袖们都更高明，他轻易地用计谋挫败了他们，并最终把他们开除出党和驱逐出莫斯科。但这一切却很费时间；直到1927年和1928年交替时期才大功告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逐出莫斯科，流放到哈萨克，次年被逐出苏联）。从1927年年底开始，左翼反对派就不再是斯大林的严重危害了。

这一时期经济恢复的进度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到1927年，产量数字已经达到或接近战前的水平。当然，差别是存在的。重金属的生产落后，另一方面，电力生产却大大超过革命以前取得的任何成就。根据略微混乱和不完备的统计资料判断，农业生产，如果不是全部也已经大部分从革命时期的动乱中恢复过来。谷物收成现在已达战前水平的80%—90%，虽然商品粮与可供非农业人口消费以及出口的粮食的比例仍比战前的数字要小得多。可以肯定，在经济恢复的整个过程中，产品质量的恢复赶不上产品数量的恢复，人口的增加（比1913年增加5%—6%）也降低了1927年的人均生产水平的意义。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到了1927年，苏联经济在新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这时在政策方面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恢复生产，而是确定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路线来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和发展。这又引起了新的和重大的政策问题。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实际上是要求立即加紧努力，把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实行社会化并完成国家的工业化。显然，只有以牺牲新经济政策为代价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它完全排除了国家经济继续沿着永久承认一切形式的自由企业的道路发展的可能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

大林曾经在任何时候在原则上反对过这些观点。但是，对于时间安排的某些问题，他显然不赞同反对派的意见，而且在他没有把反对派完全压倒并使他们不再能为实现改革而居功以前，他也不愿完全改变自己的做法。直到1927年底，斯大林一直小心谨慎地遵守中间立场，让布哈林和其他未来“右翼反对派”的领袖们继续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更激烈和更热情的维护，而他自己则巧妙地对左翼的各种要求做出有限的让步，不声不响地削弱左派论点的锋芒。

左翼反对派在其政治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对斯大林发动的攻击绝不局限在国内政策方面。他们对于斯大林处理外交事务的情况所做的批评甚至更加激烈和有力。与西欧主要国家建立的法律上的外交关系现在并没有给苏维埃领导集团带来多大好处。虽然西方国家关于清偿债务的要求已经不再构成严重的压力，但是在债务没有清偿以前，长期贷款也就不会到来。苏维埃领袖曾经将特别重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与德国政府的关系上。自1921年以来，由于秘密商定了在军事合作领域里相互提供方便，这种关系得到了加强。苏联领导集团曾经希望，德国对凡尔赛和解方案的憎恨会在主要西方国家之间造成无可挽回的分裂，而关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前景的预言主要是以上述情况作为依据的。但是，这种希望未免过早。1923年，在紧接着法国占领鲁尔区以后的时期内，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为稳定化。道威斯计划被采纳、稳定的德国货币制度的出现、洛迦诺条约的缔结，以及最后德国被国际联盟接纳为会员国等都是这种稳定化的标志。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德国无意完全把与莫斯科的关系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在德国人眼中，德苏关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可以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英国的关系的发展甚至更难令人满意。1924年年初，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对于苏维埃政权曾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同年秋天，工党政府因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案而倒台，结果使上述承认大体上被撤销了。继任的保守党政府为与苏联谈判清偿债务问题所做的努力未获成功，结果两国没有互派大使。苏维埃政权对待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态度又引起英国极大的不满，使得本来不愉快的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一年后，即1927年5月，英国当局搜查了驻伦敦的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住处，以搜查结果作为理由，完全断绝了两国关系。在1930年以前，这次新的破裂甚至在形式上也一直没有愈合。

苏联领导人的幻想在远东遭到了更痛苦的破灭。新成立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遵照莫斯科的命令，企图联合国民党一同打击西方列强的势力，却遭到它一直努力与之合作的这个政治集团的残酷镇压。苏俄对外关系的这一篇章过于庞杂混乱，充满了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微妙因素，因此不可能对于造成这场灾难的个人责任做出明确的历史裁决。但是，反对派联盟猛烈地抨击斯大林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地迫使他在一个时期内采取守势。

1927年最终粉碎了左翼反对派，从而把斯大林从来自左的方面的骚扰中解放出来，这时，苏俄在对外关系方面遭受的种种失望和挫折所带来的后果，便在他的行动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在此后的几年期间，他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种显然是审慎克制的态度，把注意力主要置于国内事务方面，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在外交置于从属于国内需要的地位。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他对于指责他对世界革命事业缺乏热情的非议颇为敏感，因此，他对于亚洲的民族反帝运动和西欧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两股非共产主义力量，都拒绝以任何形式与之合作，同时，他把共产国际这一机构置于个人严密的控制之下（以防止它成为反对派用来对付他的另一种武器），主要地利用它来增进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在正常的外交方面，他并不准备有意地破坏刚刚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但是他的行动表明他对这种关系不大重视。1928年至1933年间，为了把苏联的社会生活中各种消极现象和难堪局面归咎于德、法、英三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破坏，他曾三次大肆宣传叛国案审判，从而使俄国与德、法、英三国的关系变得紧张。在这几次纠葛中，每当事情显然做得太过分的时候，他就勉强做些让步。但是，无论是在1928年德苏关系因为苏联的这些侮辱而几乎破裂，还是在1933年英国由此而决定建立并一度坚持经济禁运来抵制对苏贸易，这些情况都显然没有引起斯大林的严重关注。他显然认为，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苏联的态度来看，苏维埃政权不会遭受多大损失。

然而，斯大林一旦从左翼反对派的严重压力下解放出来以后，他在政策上做出的最重大、最惊人的改变并不是在外交方向而是在内政方面（见本书第三章）。这些改变是：不仅取缔了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市场经济，从而迅速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了富农阶级；取缔私人耕种这一基本的农业组织形式，迫使剩下的大部分

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力求以过去梦想不到的规模和速度实现工业上和军事上自给自足的目标。一旦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们被置于这样一种处境，使他们不再能够把这种路线转变的功劳据为己有以后，斯大林会做出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以应付左翼反对派的批评，这是不会出人意料的。可是，实际执行的方案，虽然恰恰符合反对派领袖们曾经要求的方向，但在规模和速度上却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任何想象。不仅与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们对于这一变化的突然到来及其极端主义的做法感到惊愕，而且历史学家也难以为之做出明白的解释。

人们不难看出，把实现集体化的原则作为解决苏维埃政权在20年代中期面临的农业问题的一项长期性措施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苏维埃政权不能使用强迫的和没收的办法来征收粮食的情况下，自由农民只肯以那种在政府眼中是难以接受的高昂价格出售他们的剩余粮食——不仅从货币的角度，而且特别是从必需足够的工业品来满足农民出售余粮后所获得的购买力这个角度来考虑，农民的过高要价都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情况对于比较富裕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对于工业产品的这种消耗，不仅使得为支援一项深入的工业化计划所需的资金积累变得复杂化，而且使苏维埃政权无法确实控制为满足城市和军队以及军事储备和出口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在这方面，自由市场的不可靠性在1927年至1928年间的冬季，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粮食的征集遭到了严重困难，而根据估计，农民手中却还囤积着大约200万吨粮食等待政府收购价格上涨后才抛出。事情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指望自由农民，特别是力量比较强大的农民成为城市粮食供应的基本来源，那就不仅要容忍被政府看作人口中非社会主义分子的势力的继续增长，不仅要很不光彩地依赖这些分子来满足国家经济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需要，而且要放弃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从而使苏维埃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继续处于军事上的劣势地位。

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看来是围绕着这样或那样的集体组合来重新组织农业生产过程，以便在这种组合中使用机器，同时政府在经济上和行政管理方面取得更大程度的控制后，能够有把握得到廉价粮食以供应城市、军需和出口等方面的需要。

看来，这无疑是斯大林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倾向，与反对派联盟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到了1927年，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加快前进的步伐。然而，直到1929年年底，关于可能实现这些变革的速度问题，官方的估计看来是比较温和的，计划只让很少一部分农民在以后的5年期间加入集体农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29年4月得到批准，原拟实行到1933年秋季。这个计划只要求18.6%的农业人口实现集体化）。这个预计数字在1929年年底为何突然加以修改，主张开展一个深入的运动，把大部分农民立即赶进集体农庄，人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

对农民实行激进政策是从1928年开始的，当时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目的是要从比较富裕的农民手中攫取存粮，其方法是完全没收，或者廉价收购，必要时甚至采取暴力。农村对这些措施的反抗非常强烈（显然比预计的情况强烈得多），而且反抗者不仅仅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当局显然严重地低估了村社在维护新经济政策成果方面的团结一致。面对这种形势，这场斗争在许多地方很快就具有了政府与全体村民冲突的性质。

这种形势必然要在斯大林与党内右派之间造成紧张的关系。当斯大林需要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以及其他右派领袖们的支持以对付反对派联盟的时候，他一直比较相安无事地与他们共处。现在对农民发动的进攻，便结束了这种共存状态，而且引起了一场斗争，其激动人心的程度，不亚于最近与左翼反对派进行的那场斗争。在某些方面，这场斗争是斯大林曾经面临过的最困难的一次，因为右派的立场甚至在他精选出来的一些亲信中都得到了同情。

这一次，斯大林又故技重施，巧妙地逐步摧毁其主要对手的政治地位与个人地位。然而，这同样需要花费时间。直到1929年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才从党的最高机关中被开除出去并被迫公开承认他们反对斯大林的见解是错误的。

斯大林一旦这样把右派领袖清除以后，便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不但要最后地和彻底地“消灭富农阶级”，而且要使其余的大部分农民，不论其自愿与否，立即全部实行集体化。1930年秋季，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发动的运动积极地加以推行，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残暴手段。他把农民中所有比较充满活力和精明能干的那部分人完全消灭，或剥夺其社会地位，或消灭其肉体，或二者兼施；其中大部分人被流放到国内的边远地区，往往在与被处死刑相差无几的环境下，从事强迫劳

动。农民的反抗非常凶猛。乡村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特别严重的是存栏的牲畜的大面积死亡。造成这种后果的一部分原因是，农民不愿交出他们的牲畜由公家饲养，因此故意地屠宰；另一部分原因是，原来由各农户精心饲养的小群牲畜，现在被匆忙地集中，大规模地饲养，往往由于疫病照看不周而死亡。这样，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国家竟损失了大约60%的农用牲畜。这真是一场大灾难，不仅影响了肉食供应，而且影响到新建的集体农庄的畜力和肥料。

为实现全面集体化而突然发动的运动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到1930年3月，仅仅在运动开展3个月以后，斯大林便不得不指示放慢步伐，但是，这一喘息时间刚使农民的抵抗有所缓和，他就立即继续施加压力。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结束，即1932年至1933年间，有60%—65%的农民被赶进集体农庄。对于其余的农民来说，参加集体农庄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无须强调，这一发展无异于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就其深刻程度而言，堪与1917—1921年间发生的革命相比；就其对广大农村人口的意义而言，它具有甚至更基本和更彻底的性质。

与这场自上而下的农业革命同时执行的是一个规模巨大而又十分深入的工业建设与发展计划，其采用的手段也几乎同样残暴。这一规划的第一个阶段，称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限为1928年至1932年。实际上，这个“五年计划”只是罗列了它希望在这一时期内达到的各项经济指标。至于对工业化进程所进行的日常指导与协调工作（如果说确实做了一些这类工作的话），则完全是按处于统治地位的党组织的临时决定办事，“五年计划”中的最初估计对于这些机构来说，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事情很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和随后的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一样，实际上只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幌子，借以掩盖另一项不予公布的军事工业化计划，其目的在于使苏联的经济尽可能在最早的时刻，保证能够在各种武器和重型军事设备的供应方面处于独立自主地位，不再依赖外国的供给。

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指标，只能说有些是完成了，其中有一两项超额完成，有些则完全没有完成。斯大林宣称完成计划指标水平的87%，但这个数字在统计上没有意义（因为它硬从不可互相比较的各项数值中得出一个平均值），而且给人以严重的错误印象。根据对各种指标进行典型取样计算，原指标总的完成水平更接近于50%而不是87%。实际取得的成就是：仓促建起了大量新的工厂，大体上说，工业

产品在数量上翻了一番。另一方面，在计划预定的期间，质量标准严重下降，劳动效率也是如此。许多新工厂是仓促设计的，与周围的经济环境配合不当，而且工程草率。我们找不到有关折旧指标的充足材料，但折旧速度必定很快，从而必定大大降低已建成的工厂设备的价值，并使许多设备需要过早地进行更换。

苏联在1928年至1933年间工业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就其规模来说，确是巨大的。它是通向苏联领导人希望实现的军事与工业自给道路的重要的第一步。由于选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西部两地作为建设新的冶金工业的中心（以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新建的大钢铁厂最为有名），它为重工业向战略上比较安全的内地进行大转移奠定了基础。这个大转移在以后年月里一直持续下去，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大大加强。但是，考虑到这项计划所造成的物资浪费、设备折旧、生产成本膨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应该说实现这一重大计划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很难相信，它真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目标的最好的或唯一的道路。

到1932年，由于在农业和工业两个领域内采取了上述种种做法，俄国的境况再度恶化，变得比1922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更糟。毫无疑问，大部分农民此时都已正式加入集体农庄，但谷物的总产量仍低于1913年的水平，而且看不出此后会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每年为供应城市和军队而从农民那里攫取的农产品的百分比却有所增加。牲畜的损失如此严重，以致想要使畜群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再者，由于“消灭富农”和实行集体化的运动破坏了农业生产过程，结果导致主要产粮区在1933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大饥荒，灾情十分严重，据估计有三四百万人丧生，并不可避免地造成那种吃尽谷种的问题。城市和工业区不得不再度实行粮食配给。同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缓和因成百万新劳工拥进工业区而变得更加恶化的城市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整个交通运输系统都因负担过重而到达崩溃的边缘。人们普遍尝到了压低生活水平所造成的困难和痛苦。

上述情况不能不在政治舞台上反映出来。这些情况使得很多党内高级人士开始怀疑国家正在沿着1917年的路线走向完全崩溃，同时也促使一些过去的反对派竭力设法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络，试图重新成立某种政治组织以防万一发生意外事件。这些努力自然无法躲过秘

密警察警惕的监视，也不会不引起斯大林暗中怀恨和图谋报复。尤其严重的是，即使在那些迄今一直忠实支持斯大林的党内高级人士中，现在也有人产生怀疑。在地位较高的斯大林分子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在1928年和1929年镇压右翼反对派的时候就曾经把事情弄得复杂化，现在，由于1932年遭受的困难和挫折而变得更加强烈。人们普遍感到：实行集体化的残酷手段太过火，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且也太快，采取的暴力手段也太多，甚至工人阶级都对党离心离德了。整个党的各级领导都强烈要求在党的路线中增加一种人道主义的新内容，要求对各个公民的情绪和尊严表示新的关切。这种情绪以作家马克辛姆·高尔基为其精神支柱，但是人们却期待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首脑谢尔盖·基洛夫在政治上把这种情绪体现出来。基洛夫在他的事业中一直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不过人们普遍相信，他此时也变得和大家一样，对于斯大林最近几年的政策中那些极端主义的做法深感忧虑。

正是在这种紧张和困难的时期，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那不幸的1932年的11月间突然死去，而她的死或许和当时的环境也不无关联，这个事件使斯大林的个性发展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斯大林生性一贯疑心太重，对人报复的手段毒辣，而对待自己的党羽的关系尤其如此，但是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有了明显的增强，变成一种病态心理，危害党和国家生活，到死方休。看来，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要求对以往各次反对派运动中的首要成员采用极刑。

与此同时，俄国的国际地位经过几年相对平静的时期以后，由于出现两个重要的新因素而变得复杂起来。从此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两个因素对苏联的外交政策都注定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国社党人在德国的上台。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10年前签订附有秘密军事协定的拉巴洛条约以来一直保持的那种德苏关系，而且增加了斯大林个人处境的困难，使他易于遭受下列理由充足的指责而无法辩解，这种指责是，由于在前一时期斯大林一直顽固地拒绝让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联合阵线，因而实际上纵容了希特勒上台执政。

第二个新因素是日本人占领了满洲。这一事件对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和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时苏联政府没有力量去冒军事冲

突的风险，但它知道采取过分容忍的态度又只能刺激日本人的领土野心，因此它做出了妥协。苏联政府于1935年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在满洲的傀儡政权，从而放弃了它从沙皇继承下来的在满洲享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权益。与此同时，在保卫苏联的西伯利亚边境和实际上早已沦为苏联保护国的外蒙古问题上，苏联政府则采取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警惕态度。从这时起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战败为止，沿着敏感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境部署的强大的日本军队一直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忧虑，他们在处理欧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时，不论在思想上或具体安排上，都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威胁。

说来凑巧，这两个新因素对于美国权益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不亚于对于苏联权益的影响。这一点，加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总统，便为打破美苏两国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外交僵局提供了先决条件，1933年年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中断16年后重新恢复。和10年前与英国建交时的情形一样，苏联领导人在获得承认时没有对债务和权益等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因此，一旦获得了承认以后，他们就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做出这种让步了。结果，他们想要获得大量长期贷款的希望便成为泡影。苏美关系最初曾经一度热烈，不久却很快地冷淡下来，转入一般低沉的和不愉快的状态。但是，美苏建交的事件毕竟削弱了希特勒新近上台执政所带来的威胁，并且无疑地为苏联此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便利条件。

1934年法国政局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形势，从而强烈地反映出法西斯主义席卷整个欧洲的危险。面对这种威胁，莫斯科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开始鼓励西欧共产主义分子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在1933年至1936年这段时期内，由于它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指导得力，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苏联加入了被其领导人一贯斥之为帝国主义机构的国际联盟，并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军事同盟，这些同盟最后并未发挥什么作用，但在当时也许产生了一些微小的政治影响。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遏制或者转移德国可能向东方的推进。

然而，在同一时期，苏联国内政局却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1932年底，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步伐有所缓慢；经济生活随之好转，在生活水平方面也有了相应的改善，但仍然

比较有限。与此同时，斯大林准许起草并于1936年颁布一部新的国家宪法，仿佛至少在与非党群众的关系上，他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使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更加仁慈。和它所取代的那部宪法相比，新宪法表面看来在精神实质上更富有自由主义。但在实践中，它却完全没有显示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这份文献似乎主要是为了掩饰一种性质完全相反的东西，即斯大林的一个新决定：他要充分利用警察机构的阴险狠毒的手段来消灭异己，不仅要把以往或现在对他个人的独裁统治的任何一点反抗都彻底消灭，而且要扑灭可能在将来导致这种反抗的一切微小因素，同时，为了达到目的，即便必须对党本身使用恐怖手段，也在所不惜；在1932年以后的时期，这种动向的蛛丝马迹日见显露并愈益频繁，自然在党内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士中引起极度惊恐，促使他们寻找互相保护的办​​法。这样，斯大林的恐怖手段本来是为了惩罚可能出于其他原因而反抗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反而激起了他本想以惩戒手段加以制止的新的反抗，现在转而变为一种武器，也被用来镇压那些胆敢表示不赞成使用恐怖手段的人们。

有证据表明，在1934年1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遭到党内一些资历较高的同僚们的反对或冷遇。总之，基洛夫看来是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欢迎，即便不能说是极其热烈，也备受尊敬。这个情况不能不引起斯大林原本存在的嫉妒和猜疑。再者，基洛夫经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党的书记处的一个关键性职务，这表明他很快就要离开在列宁格勒的职务，调到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可是，在任何这样的调动还没有实现以前，实际上似乎就在即将调任的前夕，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被暗杀。当时和后来所能了解的关于这次谋杀案的一切背景材料都表明，案情牵连到列宁格勒警察总局的某些上层人物，而且种种迹象暗示斯大林本人对此案不无关系。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斯大林却以这一发展作为借口，在全国现有的官方机构内部发动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大屠杀，对象不仅限于党内，还有军队、文化界以及其他部门，这就是通称30年代的“大清洗”。如果说这一行动有特殊的重点对象的话，则它似乎主要是针对党的老战士的，尤其是针对那些对1917年以前的时期有过经历和记忆的人以及在20年代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人（这两类人大体上是吻合的）。然而，受害者绝不限于党员。

大清洗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二者密切相关，却又显然可以区别。一个目的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曾经在早年反对过斯大林的所有那些重要的共产党人。这些人遭到逮捕，在一种残暴的警察制度对于独立无援的囚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能施加的种种压力下受尽了折磨。那些具有坚决不屈的意志，始终不肯公开承认捏造的罪名使自己当众受辱的人们，干脆就被秘密处决而不公开宣布。那些在诱骗之下愿做这种忏悔的人们，则在1936年至1938年的三次大审判中被当作被告，对其中大多数人在审判后即根据他们供认的罪状而加以处决。因此，上述种种折磨与其说是为了确立他们的罪行，不如说是对他们施加的惩罚中的一部分。

三次大审判紧接着从前的各个反对派集团被瓦解后便开始了。第一次审判处理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亲信们，第二次同样地处理了托洛茨基分子，第三次则是右翼反对派。这些审判制造借口来处决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和克里斯廷斯基等人；但他们在成为大清洗牺牲品的杰出共产党人中仅仅是一小部分。

除去这些明显的个人目标以外，看来大清洗还针对所有那些地位不甚显要但大部分却颇有影响的人们。他们或者被认为是可能同情那些地位显要的受害者，或者从他们气质上来看，有可能为未来的反对派活动提供有利的土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从前并无任何具体的过错，但是总有办法巧妙地诱使他们承认将会导致他们自己毁灭的主要罪名。当时故意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得对自己上司和同僚进行不负责任的告发，似乎成了换取自己和一家老小免受逮捕和惩罚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在清洗过程不断进行中，秘密警察机关里简直堆满了这类告密函件，而监狱中也塞满了受害者。对这些人进行逮捕和判决的程序甚至不能仅称作审判不公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局甚至不准备遵守那些最基本的审判手续。每一次新的逮捕又都扩大了嫌疑和告发的范围因而又增加了受害者的人数。在清洗运动于1938年后期停止（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战争危险的增长）以前，千千万万的人们（实际上数以百万计）遭到处决或被强行押送监狱和劳动营，由于条件极为恶劣，长期生存和生还的机会甚少。在这些地方，即便被囚禁者得以不死，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也受到极度摧残，以致在许多情况下使生命已失去主要意义。虽然当时劳动营里的囚犯不全是30年代大

清洗的受害者，但是到30年代末，劳动营的囚犯总数显然已达到数百万，这一事实也多少可以说明恐怖统治达到了何种程度。它对党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则可以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的事实中看出：党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但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到1939年召开另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大多数都已被陆续杀掉。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巨大的恐怖浪潮并没有对整个国家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清洗运动大半是针对统治集团的成员，而且总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下属伺机取而代之。至于一般老百姓，尤其那些早已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人们，他们和农民一样，在与当局发生的冲突中幸存下来，这时受到较小的影响。外国观察家的印象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只不过抱着一种愤恨的冷漠态度，冷眼旁观在他们上级之间发生的这场惊人的自我毁灭过程。总之，经济生活并没有显著倒退，虽然仅仅因为高级管理部门遭到破坏以及人事变动频繁也必然会在这个领域里造成一些消极影响。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模庞大，却比较顺利地颁布了。到了1939年，除农村外，生活水平重新达到了至少是1926年至1927年的标准，工业生产增长了好几倍。增产的工业产品大部用于军事目的，结果，到1939年，红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大规模地实行了现代化。然而，大清洗不仅处决了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1937年处决他们时，俄国人和全世界公众都感到震惊），而且也断送了很大一批普通高级军官（为数可能多达军官团成员的一半以上），从而使红军的士气和实力都受到了损害。

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的对外政策也有了显著的新动向。事实上，我们不能排斥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到1936年中期，苏联的决策者已经十分明白，西方国家既已默认希特勒破坏凡尔赛条约和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它们就不会用武力抵制德国势力将来向东方的任何扩张。无论是国际联盟的道义支持，还是法俄联盟的条款，都不能被人指望足以克服这种冷漠态度。

各大国对西班牙内战做出的反应使得上述看法进一步为人们所接受。苏联政府最初坚持执行各大国之间达成的关于不干涉这一冲突的协议。但是，在战争发生的最初几星期内，当事实清楚地表明德国和意大利无意尊重这项协议的时候，苏联政府也就不再受协议约束，于1936年10月开始在军事上大力支援西班牙的共和主义事业。它派遣了

空军和坦克部队。特别是马德里保卫战初期的胜利，似乎主要归功于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但是，当情况表明西方各大国不会仿效苏联的榜样，它们对西班牙内战只抱消极态度而不会认真采取措施以防止民族主义分子取胜的时候，莫斯科便开始对西班牙失去兴趣，逐渐削减它所承担的义务。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查出，莫斯科早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就已经露出对西班牙失去兴趣的迹象；嗣后不久，毫不意外地又有类似迹象表明，莫斯科很快对于同希特勒达成某种交易发生了兴趣——这笔交易从最好的方面设想，将会把希特勒的狂妄野心引向西方，使他陷入与西方大国的战争，而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也会推迟德国对苏联本土发动的任何进攻。表明这一目标的种种迹象，在慕尼黑协议签订以前的一些时候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些迹象不仅反映出苏联日益加深的疑虑，即一旦德国进一步向东扩张，能否诱使西方国家以军事手段做出反应；而且，还反映出苏联非常理解满洲—蒙古边境的微妙形势，以及它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自己卷入一场与德国和日本的两线战争，因为对于这场战争西方大国则会袖手旁观。

诚然，在慕尼黑会议时，甚至更晚的时候，在1939年夏季与英法两国举行的那次流产的谈判中，苏联政府始终摆出一副姿态，表示准备用武力反对纳粹的任何进一步扩张，唯一条件是西方大国也采取同样行动。但是，由于俄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际上与纳粹德国有着共同的边界，因此苏联政府的姿态具有的意义便被削弱了。而且，莫斯科在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来反对希特勒的时候，总是难免地而且也是很自然地附带要求给予苏联军队通过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领土的权利。但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这一前景对于他们的独立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并不亚于纳粹的扩张主义。很明显，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假如英法愿意接受挑战，苏联本来会乐于对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一种象征性的贡献。然而，即使罗马尼亚和波兰准许苏联军队过境，则单从地理上和其他军事方面的原因来考虑，苏联是否愿意——或者事实上是否能够——做出比这更大的贡献，也大可怀疑。如果罗马尼亚和波兰不准许苏军过境（事实上他们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苏联就可以遗憾地耸肩，表示它已经尽了责任。在上述这些情况下，莫斯科对于反对希特勒的集体安全行动表面上显得热心，但却不会招致多大风险。

这就是1939年8月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真实背景。即使到了1939年夏天，假如当时能够向苏联人表明，只要他们拒绝德国的提议并加入西方国家反抗希特勒的共同战线，西方国家就会在军事上大力抵抗德国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动，那么，还是有可能（即使不是肯定能够）争取苏联领导人的合作。但是，甚至在那个时候，苏联也只是在其政治条件得到满足后，才会同意这样做：也就是说，苏联会要求建立对东欧各国的军事支配地位，而这是东欧各国政府本身不能接受的，而且西方盟国当时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另一方面，在处置别国领土的问题上，纳粹就较少顾忌，它不反对给予莫斯科一些暂时的好处（同意苏联占领和并吞波兰东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认为，只要粉碎了西方国家的抵抗以后，德国发动一次进攻就能够轻易地使苏联所获好处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选定了德国这张牌，在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备忘录中同意了实际上与德国瓜分东欧的方案。或许可以说，他用这种办法推迟了势必要同希特勒兵戎相见的时间。他还赢得了一定的空间，可以在德国发起进攻的时候用来换取时间。此外，他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机，还成功地预先制止了日本对苏联的东部边境的任何进一步侵略。但正因为这同一做法，他也丧失了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的军队在适当的鼓励下，作为阻止德国的政治和军事扩张的辅助力量本来可能具有的宝贵作用。同时，斯大林突然改变了态度，也给他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至于总的结局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将会引起长期的争论。

到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维埃政权已建立了22年。它给固有的俄国领土上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939年前，苏联领土上的人口从大约1.4亿人增加到1.7亿人（据推测，如果没有内战、政治迫害、人为的饥荒以及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其他灾难，人口还会增加大约1000万人到2000万人），农村人口完全没有增加，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

农业仍然需要人口中的大多数投入他们的精力，但其所有制和管理方式都已彻底革命化了。俄国乡村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也被改变了。除极少数人，全体农民现在都受雇于国营农场，或事实上由政府控制的集体农庄。虽然增加了28%的人口需要吃饭，主要农作物的产量

才刚刚超过1913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征收了较高比例（从谷物总产量的15%增加到34%）的谷物收成供给城市消费。牲畜数目以及农业可以施用的畜力和肥料的总量，仍然没有从仓促地实行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显而易见，通过实行并坚持集体化制度，政府能够有权对现有的农业进行更多的控制，能够把占更大比例的农产品用来供应城市和军队，并且按照政府自己规定的价格而不是按照自由市场经营的价格来征购，虽然所付出的代价是它决定使俄国农业的总产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苏联共产党还有一点感到满意，且不论这给它多大安慰，那就是，它不论付出了什么代价，毕竟完成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从而使广大农民群众第一次和它建立起一种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的关系。

在工业方面，情况有所不同。不容置疑，在大战爆发前10年中，工业取得了给人印象深刻的巨大进步，从而为苏联的工业实力奠定了基础。有关统计资料既不充足又不可靠，因此，无法用来进行比较；但挑选诸如钢铁之类关键性指标来做推测，则从1927年以来的这一时期，平均工业增长率是12%—15%，工业产量增加了4倍。当然，工业增长是不平衡的。房屋建筑被忽视了，交通运输也是如此。总的说来，1939年的生活水平未必高于1913年。正如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所显示的，军事上自给自足的目标未曾完全达到，虽然这时已相差不远。从军事工业化的努力来看，30年代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而考虑到以下事实则更应做出这种评价：在革命以前的时期，俄国的工业化广泛依靠外国市场的长期贷款而取得30年代的成就，却几乎完全是依靠本国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从大量人口的死亡以及人民生活所遭受的困苦来看，为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幸福才可能取得这个成就。这笔账绝不是单单用统计数字就能够算清的。

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内，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我们应该注意到，假如沙皇统治最后几年中的教育发展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进展会更大一些）。教会在正规教育中的作用完全被摧毁了（即便在革命以前，教会也从来没有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政府还竭尽全力去消灭宗教信仰。但是，在城市中，或许有一半人口，在乡村中甚至为数更多的人在庆祝个人生活中

的重大节日时，仍然采用宗教圣礼；为数较少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仍然去教堂做礼拜。

22年以来深入的思想灌输，对人们的头脑也不是毫无影响的。人们广泛承认由政府占有并控制整个工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合乎理想和满足需要的。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们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始终是丑恶可憎的。总的说来——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是由于大清洗造成的沮丧与幻灭的情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益失去它的魅力和神秘性。尤其是在年青人做出的反应中，它已经由一种振聋发聩、激励人心的新思想变成了一种显得荒谬可笑的国家宗教，越来越无力解答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有关个人命运的问题。

22年以来，无论是知识界还是艺术界，都不是没有才华横溢的人们在认真地做出努力；但正因为它们成了党内思想家关心和帮助的对象，艺术和科学各个部门的创造力都受到了抑制，其程度与它们受到党的理论家的注意与关照的程度恰成正比。纯科学的发展没有遇到十分严重的困难，因为它比较不容易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加以解释；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却受到严重束缚，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完全被毁掉。苏联文学在20年代多半仍保持着从19世纪以来那种异常的活力；但是，“大清洗”的精神与纪律对于文学的创造性是十分严酷的，迫使剩下的创造性大半转向地下文学。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技巧力量，并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在30年代，戏剧创作理论和文学的其他专业一同遭殃，戏剧也同样遭受了损害。芭蕾舞几乎一直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作为苏联人民伟大的表现艺术，它仍然生气勃勃地发展；但是，甚至在这个领域里，由于大清洗逐渐扼杀了艺术家的主动精神，全部剧目也变得越来越刻板，演出也越来越带有拘泥传统形式的性质，而不再是活生生的艺术了。到了1939年，到处都可以看到苏联与国际社会的知识界和艺术界的主要潮流极度隔绝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而在这些年中，这种隔绝状态随着独裁制度的严厉控制的加强而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它总是超过了正常的必要限度，最后在大清洗中被弄到极端的程度，在近代欧洲文明的历程中，还找不出相似的实例。

总而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苏联人民发现自己仍然处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过程之中。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的

进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这个国家凭借着几乎是超人的努力，取得了同时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取得了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近自给自足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受管制，最后几乎完全被控制起来。至于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能仅仅从生活是否舒适安逸来衡量，还要看人民是否享有自由，特别要看人们是否觉得政府的目标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要看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否亲密无间。随着独裁制度的强化，个人的本能、创造精神以及自信和自立的能力也按比例地丧失了。由于刚刚以令人憎恶的巨大规模实行恐怖统治，现在，迫使那些在政府权力控制下的人们自动服从，已经不是难事了；正如在最近的未来即将表明的那样，只有狂妄傲慢的敌人从外部进攻的这一挑战，才能再一次唤起这个伟大的和有才能的民族所具有的真正的团结精神，并在另一次伟大的民族事业中把他们天生的精力和热情与国家融为一体。

（徐式谷 译）

[1] 远东地区是一个例外，日本军队在较晚的时候才撤离该地。

[2] 刺客是社会革命党人多拉（芬尼）·卡普兰。

[3] 根据布哈林向国外社会党领袖们的一项个人承诺，这些死刑判决，后来都得到减免；可是，在某些情况下，被判刑的人此后再无消息。

第十六章 德国、意大利和东欧

就20世纪最初的14年而言，欧洲最富有生命力的政治社会乃是德意志帝国。德意志人虽然统一于俾斯麦策划的奇特的联邦格局之中，却显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暴露了尖锐的社会分歧与冲突，不过，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向心倾向。普鲁士王国的疆域从亚琛直至梅梅尔^[1]，从弗伦斯堡迄于卡托维兹，横贯新德国的整个版图。实际上，2/3的德国人从法律意义上讲都是普鲁士人，而莱茵兰和西里西亚的煤田又都在普鲁士的疆域之中。普鲁士议会是按照三级选举制选出的，这就给富人以大得多的代表权并使他们得以从行政管理上对选举（这是间接选举）施加强大影响。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议会则比较公正地反映了公众舆论；北部的城邦如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也是如此；而联邦帝国中仅次于普鲁士的大邦巴伐利亚则拥有特殊的权利，它作为居于少数地位的天主教徒^[2]利益的主要代表而与柏林和北部信奉的路德教派抗衡。德国老百姓的生活主要依附于所在邦的权威，而不是帝国的权威，譬如：他要向普鲁士或巴伐利亚邦缴纳直接税，而只对帝国负担间接税。

帝国国会，即帝国下议院，是根据普选制由25岁以上的男子选出的。它只能与参议院（代表各成员邦）和皇帝一道制定法律。它可以批评，但不能控制政府的政策。1900年的德国还是由一位专制君主统治的，由他任命帝国首相或宰相；宰相则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上、下议院负责，大臣们也不是议员。上层文官由地主阶级人士及其门徒们担任；他们同样只对皇帝负责。历任宰相都做了一些努力以争取帝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但并非非如此不可，因为帝国国会并无限制帝国经费支出（如军费）的有效办法。比洛之所以于1909年夏辞职，不论当时说的理由是什么，其真正原因在于他和皇帝意见不合，而皇帝也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挑选了内务国务秘书贝特曼-霍尔威克来接任宰相。在前一年中，威廉二世对《每日电讯报》发表的言论招致了批评，这给了帝国国会一个显示自己力量的机会，但是国会却没有加以利用。

关于威廉二世的德国，能够指出的最大优点是：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在这里法治是有保障的。新闻界尽管为政府所利用，在法律上还是自由的，而官僚机构和司法机关是廉洁公正的。1907年发生的马克西米连·哈登一案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证。哈登是德国社会所鄙视的那种犹太新闻记者，他在自己办的报纸《未来报》上攻击皇帝的朋友们对朝政施加了恶劣的影响，因为他们搞同性恋爱。这些人，奥伊伦贝格亲王和柏林城防司令库诺·冯·毛奇伯爵，控诉他犯了诽谤罪。哈登在一审时却获得胜诉。

另一方面，这个法治国家却一直受到俾斯麦和比洛等居心叵测人物特别是威廉二世的威胁。虽然宪法给了皇帝如此巨大的权力，皇帝并不认真重视宪法；看来，他对决斗的结局比对法官的判决更感兴趣。他使德国人熟悉了喧嚣的暴力恫吓和拜占庭式的态度；他说话的口气总是：凡是政敌就应该加以迫害。在他周围的亲信当中，常常嘲笑帝国国会“清谈馆”，而且不时地打算要发动一场废除帝国国会的政变。

皇帝的权力部分地依赖于军队的特权地位；陆军总参谋部实际上从未接受文官对军事政策的控制，正如他们不接受文官对军费（这总是得到保证的）进行控制一样。军官们不论职务高低都通过门阀关系与大地主、大官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德国人每人都必须服军役，这就使他们直接体会到军官阶层的力量，并使军官们同他们所指挥的人当中的个别的社会主义者有过一些接触。

1870年以来，德国迅速地而且越来越快地实现了工业化，这使人口日益增加并不断流动，把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为明显的工业国家。城镇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比从1890年的47%增加到1900年的54.3%和1910年的60%。新兴的工业老板们想方设法与旧有的统治阶级联成一体，因此后者的力量看来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大学是国立机构，它们在技术上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其中绝大多数的教授在20世纪初年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拥护者，而学生们则为各个学生组织所左右。许多这类组织，除了有酗酒作乐，动辄以所谓受到侮辱为由而挑起决斗等陋习以外，对谄上欺下的人们具有极大的价值；这些组织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多数是反犹太主义的；它们认为信仰社会主义简直就等于叛国。因此，在许多大学城内，学生组织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会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官僚机

构的职务大都由这些学生组织原先的成员充任；一个人如果想在以后得到一个好职务，就必须在脸上具有学生时代决斗留下的伤疤。有一些青年人对统治阶级的严格组织和僵硬传统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反抗，他们加入了青年运动，在各地漫游。这符合所谓“新艺术”的精神（德文叫作“青年式”），却出人意料地毫无结果：“回到大自然去”看来并无出路。

人所共知：俾斯麦曾想用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险来收买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同时竭力镇压那些胆敢提出更高要求的工人领袖。他的做法在实践中加深了阶级之间的鸿沟，驱使不平的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德国社会在他们看来明显地证实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教条。1900年的工厂工人仍然受到类似新兵的待遇，像煤炭大王埃米尔·基尔道夫这样有权有势的老板还在极力摧残莱茵兰的工会活动。

克虏伯在埃森的巨型钢铁企业是按照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与洛林铁矿紧密联系的萨尔煤矿则由被称为施杜姆老王爹^[3]的一位男爵所主宰，他死于1901年。萨尔的矿工们想要结婚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简直如同他的农奴一样。在西里西亚煤田，许多工人是受人鄙视的波兰人，他们已经开始对德国人的统治愤愤不平。1903年，科尔法狄作为矿城卡托维兹的波兰工人代表而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说明了上述的新情绪。德国东部的工作条件，无疑要比西部差，于是人口不断地向西部的莱茵兰流动，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移居海外。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在1900年为563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将近6700万人。虽然按照多数标准来衡量，德国还不如英国富裕，但是在经济发展上却比英国更快。德国统治阶级表现得傲慢而自信，并津津乐道德意志种族的优越性，也就毫不奇怪了。有意思的是：像冯·施皮蔡姆贝格夫人这样明智而正直的人竟会对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于1899年发表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如此印象深刻；柏林的犹太人和文化人所持的批判态度使她更加感到惴惴不安。^[4]

然而，在1900—1914年间，统治阶级慢慢地、时多时少地丧失了人心；他们的力量从而遭到削弱。还在1890年俾斯麦下台的时候，社会党获得的选票就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多，虽然由于选区仍按旧时办法划分，该党在国会中仅得到35席；当时，天主教中央党取得了大多数议席。从那以后，社会党和中央党这两个大党如果共同投票反对政府的话，就能够表现出反对派在数字上（即使不是在政治上）的力量。

从1890年选举到1912年选举，中央党平均拥有100个议席，而社会党于1912年在国会总共391席中赢得了110席，成为第一大党。在此期间，一般约有40名进步党议员和代表丹麦人、阿尔萨斯人和波兰人的大约30名议员也对德国政府持敌对态度。但是，进步党人对社会党疑虑甚多，尽管社会党自从艾伯特于1906年担任书记以来，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其主流已经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这样，在国会里，以及更谨慎一些在报刊上，就有可能，实际上也经常对政府进行批评，而且这种批评的影响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整个制度仍然十分有害，因为进行批评不等于担负职责；而那些希冀保持当局宠幸的人绝不愿进行批评，就更说明问题。

如同在匈牙利^[5]一样，德国的教育只能用官方语言来进行。这使西普鲁士（波兰人称为波兹南尼亚和波莫瑞）大约300万波兰人和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离心离德。德国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而加以鄙视。不仅如此，根据1886年和1908年的决定，还派去了德国移民把他们和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分隔开来。而在毗邻的奥地利，波兰人却是受到优待的少数民族。因此，到了1914年，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已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一 1900—1914年的奥匈帝国

在德国的南面和东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900年，由一位70岁的老人在统治。从1867年以来，奥地利在行政管理上与匈牙利大相径庭。当局在奥地利境内勉强给予非德意志人（主要是斯拉夫人）以某些权利，其中首要的是在受教育和在法庭上受审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的权利。1907年，当时的总理大臣冯·贝克男爵结束了由选举人团选举帝国咨政院的代表院的制度，这种叫作库利伊（*curiae*）的选举人团给了德意志选民很大的优势。贝克把选举权实际上给了所有24岁以上的男子，并重新划分选区，使之与民族成分相适应，而不是各民族混杂交错。在一段时期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并未觉察到自己已经居于日益缩小的少数民族地位，但是，新的选举制显然表明：奥地利的主要人口是斯拉夫人。最为兴旺的斯拉夫人集团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他们在布拉格拥有自己的大学，并要求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再建立一所大学。1905年的摩拉维亚妥协案曾规定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大体上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摩拉维亚议会的议员。而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却彼此不能达成类似的妥协，这一点在1900年便已是十分不妙了，因为波希米亚在许多方面都对王朝极为重要。在奥地利全境（不算匈牙利），此时大约有900万德意志人；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有大约600万捷克人和300万德意志人；仅就波希米亚而言，德意志人占人口的1/3以上。

奥地利还拥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人（约为425万人），东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路西尼亚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共有325万人以上），施蒂里亚和伊斯特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此外，在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还有不到100万的意大利人，在达尔马提亚也有一些意大利人。1907年选出的议会颇像一个各民族的联邦议院：甚至有两名俄罗斯民族主义议员，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议员和一名犹太民主派议员。只有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党竭力超脱于种族斗争之外并保持德意志人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议员长期以来是领取薪俸的^[6]，这在德国或匈牙利都是闻所未闻的事。

除了给予各种族集团以社会的和法律的权力（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上最少也是在理论上如此）以外，奥地利的统治方式与德国的相差无几：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任命主要的大臣，这些大臣也只对皇帝负责。维也纳咨政院^[7]如同柏林的国会一样可以批评时政；新闻界也多少有些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罗马天主教会强大影响的制约，而教会则与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行政机构的效率不如德国，但由于种族情况的压力而使它较为宽容。除了朝廷和相当混杂的贵族的狭小天地之外，总的气氛也比德国更为寒酸和卑屈。

在来塔河的彼岸，弗兰茨·约瑟夫虽是匈牙利的国王，实行的却是一套截然不同的制度。不管人们在家里讲什么语言，德语、斯洛伐克语还是罗马尼亚语，他们都被迫用马扎儿语来受教育和在法庭上受审，只有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例外。非马扎儿人可以有一定数量的教会小学，但是在1900年，这些小学数量日益减少或者逐渐失去它们的独立性。正如在维也纳可以经常听到人们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对待捷克人的顽固态度将会毁掉哈布斯堡王朝一样，人们也为了同样的原因哀叹马扎儿人的政策。被迫讲德语至少还有实际用处，而被迫讲马扎儿语则毫无用途。人所共知，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对匈牙利人的态度十分不满：从血缘上讲，他只是部分地是那不勒斯波旁王族的后裔，而在观点上则与波旁王族基本一致。他所谴责的，既是马扎儿人对促进帝国分崩离析所起的作用，又是他认为的马扎儿人对王朝的桀骜不驯的态度。

如同德意志人在奥地利一样，马扎儿人在匈牙利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由于他们推行马扎儿化政策，这个少数民族在慢慢地增长，尽管非马扎儿人的出生率一般都较高。因为只有在人数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马扎儿人的选民区才行使选举权，也由于投票是公开进行的，并利用警察恫吓选民不得支持非马扎儿人的候选人，因而布达佩斯议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是匈牙利人。

圣斯特凡王冠^[8]的非马扎儿人臣民主要是一些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他们大都居住在为数不多的城镇、特别是在布达佩斯）以及斯洛伐克人、路西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后两类人语言相通，但宗教不同，他们在古老的克罗地亚王国境内享有相当广泛的合法的自治权利。布达佩斯和萨格勒布之间的关系在1904—1906年之间有一段短暂的和缓时期之后又趋于紧张：克罗地亚人又回

到他们指望维也纳的支持的传统，现在更超越维也纳而指望得到布拉格的支持。斯洛伐克人、路西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多是些贫苦农民，往往目不识丁，常常迫于贫困而并不在乎自己的种族身份。然而，马扎儿统治阶级的政策并不能阻止捷克人对一些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一定的鼓励，因为斯洛伐克语与捷克语几乎完全相同。这种政策也无法阻止雷加特王国的罗马尼亚人慷慨解囊，寄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做教育经费。

奥匈帝国不仅在民族国家林立的欧洲越来越显得反常；它本身的二元性就使散居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与拥有大庄园、常常控制工业的德意志或马扎儿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更加突出。斯拉夫人滋长着一种在社会上受迫害的不满情绪，使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潮流方兴未艾。因此，只要斯拉夫人的领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时把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与伸张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奥匈帝国的二元制度之所以危机四伏，还由于奥地利相对自由的统治与1900年至1914年间想在匈牙利实行类似做法所遭到的明显的失败形成了对比。几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贝克对选举权实行改革以后，在奥地利的不到10万罗马尼亚选民选出了5名帝国咨政院的议员作为自己的代表。而在匈牙利议会里，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几乎300万罗马尼亚人仅有16名议员——其中之一是茹利乌斯·马纽。（当然，维也纳议会有516名议员，而布达佩斯议会只有453名。）在维也纳，至少在理论上说，罗马尼亚议员还可以用罗马尼亚语发言；而在布达佩斯则禁止这样做。

自然，事情并不像种族主义宣传家所说的那样简单。在奥地利境内，同是斯拉夫人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部分地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不能友好相处。帝国的许多南部斯拉夫人在1908年以前并不认为自己和塞尔维亚人有什么同胞情谊。在奥匈各地都有许多农民，以及店主阶级和贵族，认为弗兰茨·约瑟夫的统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以接受的传统；他们的神父们鼓励他们持这样的态度，并对城镇上的社会主义“卖国贼”提出的相反说法嗤之以鼻。在匈牙利，社会党自然而然地是个弱小的党，但在奥地利却有81名社会民主党人于1911年当选为议员，并左右了维也纳的局势。有意思的是：奥地利社会党的许多领袖，包括维克托·阿德勒本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而德国社会党领袖们在1933年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情况。

奥地利在经济上落后于德国。维也纳的工业十分发达，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一直延伸到巨大的西里西亚煤田区域的奥属西里西亚也是如此。施蒂里亚的铁矿也很重要。然而，依赖土地生活的奥地利人口比例，从1900年到1914年间却显著地高于德国。许多农民，不论是否德意志人，都拥有自己的小农场，但是奥地利的贵族（诸如施瓦岑贝格这样的家族）却拥有巨大的庄园，而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最甚。匈牙利在各方面都落后得多。布达佩斯是唯一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匈牙利的显贵们（最大的地主是埃斯泰尔哈吉家族）和乡绅们拥有土地，而许多农民则是无地的劳动者，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生活得跟农奴一样，却和土地分离。匈牙利人经常反抗他们与奥地利的联合。有时，他们抱怨在帝国和皇家军队^[9]里使用德语发号施令。但是，他们最经常抱怨的是实际上开始于1850年的关税联盟。他们说，正是这一关税联盟阻碍了匈牙利工业的发展。不过，借助于犹太人的资本和干劲，匈牙利的工业在1914年以前还是有所发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到25%左右。从1900年到1914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人口总数从4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左右。回顾起来，这个二元帝国值得称赞之处，正在于它在多瑙河流域为这样众多的人口建立了一个免征关税的地带。

贝克在奥地利实行改革之后的第一次选举刚刚结束，1908年7月爆发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就震撼了整个东欧。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那从1878年以来即由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吏进行治理；如今于1908年10月，奥匈帝国的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决定立即兼并波斯尼亚。这个地区虽然十分贫困，但大多数居民却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此，兼并这个地区被斯拉夫人认为是德意志人和马扎儿人对塞尔维亚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公然侮辱。实际上，布拉格从此之后才成为南部斯拉夫人的中心，并纷纷谈论将来应建立某种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这样，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对捷克人又有了新的不满。斯拉夫政治领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动摇了；捷克人中间的亲俄倾向加强了。连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家们多年来也在谈论奥匈帝国的必然解体，某些居住在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甚至希望被德国兼并。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并吞加上俄国随后显然予以默许，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德意志人认为奥地利不但不会瓦解而且可以扩张。扩张就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扩张思想与由德意志人主宰中欧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连德国牧师兼政论家弗里德里

希·璁曼这样开明的人士都宣扬这种设想会为社会进步提供最好的经济基础。

二 巴尔干半岛

19世纪的民族主义理想到20世纪初仍未实现，这不仅在奥匈帝国和分属德、俄的波兰是如此，而且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也是如此。的确，要在巴尔干实现这些理想就只能牺牲二元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利益。土耳其当时由臭名昭著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虽然多年来一直在退缩，但仍然主宰着巴尔干和北非；在理论上，土耳其人还统治着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克里特的局势动荡不安，也因为马其顿还在土耳其统治下，希腊人群情激愤、极为不满。马其顿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这里，各民族混杂交错，都想成为主宰。南部是希腊人，西部是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北部有一些罗马尼亚人，而到处都有一些散居的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认为马其顿最大的居民集团是保加利亚人；自从1878年签订了随即失效的圣·斯蒂法诺条约以后，保加利亚便认为马其顿理应归它所有。1893年成立了最为著名的马其顿民族主义团体，恐怖主义的“马其顿国内革命组织”（简称I. M. R. O.）来与土耳其人进行斗争。1903年，奥匈帝国和俄国在米兹泰格就马其顿行政改革方案达成协议；其他列强和土耳其人一起支持他们。

由于土耳其的统治，巴尔干半岛贫穷落后、交通不便。除了罗马尼亚蕴藏石油以外，半岛上还有重要的金属矿藏，然而20世纪初年取得的任何经济进步，都是靠了奥地利或德国投资者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德国人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上十分活跃——这实际上是德国“向东方挺进”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在经过土耳其征服而幸存下来以后逐渐成为自由农民；只有罗马尼亚保存了大地主贵族；1907年，农民们曾举行起义，但遭到了镇压。

由于和居住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稍远一些的斯洛文尼亚人有着亲属关系，居住在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便成为吸引南部斯拉夫人的主要中心。1903年，在前国王和王后惨遭谋杀之后，贝尔格莱德恢复了卡拉乔治维奇王朝，以表明自己具有更大的民族独立性。

然而，到了1908年7月，不是居住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而是土耳其人自己举行了一次革命。一些自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官终于迫使苏丹承认早已被他抛诸脑后的宪法义务。同时，青年土耳其党人还感染上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而不再采取以前那样的立场；土耳其人不再打算坐视敌对的民族主义侵蚀他们的权力；他们开始从一个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民族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的沙皇迅速宣布独立，而克里特则于10月宣布与希腊联合。^[10]前已表明，奥匈当局与此同时决定公开并吞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而马其顿却被列强弃予土耳其人。俄国政府尽管十分讨厌巴尔干的革命分子，却经不起在泛斯拉夫知识分子中丧失威信，它不得不接受哈布斯堡王朝对波斯尼亚的兼并。然而，在所有斯拉夫同情者当中却流传着这只是以退为进的说法。总而言之，一方强烈亲德意志、亲马扎儿或亲土耳其，另一方则强烈亲斯拉夫，双方的感情冲突激烈异常；其后果演变而成两次巴尔干战争和随即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巴尔干国家中，不能简单地以德意志—斯拉夫冲突划线的例外情况是罗马尼亚和希腊，这两个国家都以不属于斯拉夫民族而自豪。罗马尼亚尽管激烈反对马扎儿人压迫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罗马尼亚人，但对于俄国的斯拉夫人以及由于边境争执而对保加利亚人都怀有强烈的反感。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就有可能和得到该国霍亨索伦王朝赞同的三国同盟建立联系。不仅希腊人在马其顿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有冲突，而且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尽管在各个方面都极相近，却不断地相互争吵。阿尔巴尼亚人又与所有的集团在种族和语言上均不相同，这使矛盾更为加剧；作为一个种族集团，阿尔巴尼亚人为数最少，仅仅有100万人左右。

在意大利人于1911年在利比亚打败土耳其人之后，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和希腊一起攻击土耳其；其实还是门的内哥罗这个偏僻的塞尔维亚人前哨率先于1912年10月宣战的。土耳其人几乎被彻底从欧洲赶了出去。胜利者之间的争执，使得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这次在罗马尼亚人的支持下，于1913年进攻保加利亚人。这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人总算把版图恢复至马里查河一线，但也仅此而已。克里特永远归并于希腊。这样，巴尔干国家终于使半岛获得了自由，但谁也没有心满意足。保加利亚人拒绝承认塞尔维亚对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坚持于1913年建立一个阿尔

巴尼亚人的民族国家，以阻止塞尔维亚扩展到巴尔干的西海岸。德意志—斯拉夫矛盾的爆发并没有推迟，反倒迫近了，因为扩大了版图的塞尔维亚对于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又为哈布斯堡保护下的阿尔巴尼亚所加强一事，更加感到愤恨不平。

三 1900—1914年的意大利

意大利于1896年在阿比西尼亚遭到惨败，又于1898年发生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危险冲突，在米兰尤为严重。此后，随着20世纪的到来，意大利进入了和解与繁荣的时期。当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给1898年的平民死伤者报仇而于1900年刺死国王翁贝托的时候，继位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看来能够打开新的局面。1901年2月，开明激进派扎纳德利被任命为首相；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内务大臣乔瓦尼·焦利蒂。在意大利当权人物中，这两个人最早表现出对意大利社会的新问题的理解。意大利国王对政府的控制，不像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那样彻底，而扎纳德利和焦利蒂这样的人强调了议会的权力——他们本身就是议员并依赖议会多数的支持。

在前10年里，尽管缺乏煤铁资源，意大利北部的现代规模的工业化业已开始。米兰已成为巨大的工业中心，也是意大利的金融、商业首府。1899年在都灵创办了菲亚特汽车工厂，从而改变了都灵的面貌。热那亚港由安莎尔多公司进行了扩建。人口在恶劣的条件下迅速增长。工业利润为富人们所独占，而财政制度也极不合理地偏向富人。虽然选举权从王国创立以来略有扩大，仍然只是比较富裕的阶层才能选举议会的议员。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在1900年的人数^[11]即使在北部也还是少于从事土地耕种的人口，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权利。但是，他们得到了一群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于1892年在社会问题还来不及成熟时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党）。

扎纳德利和焦利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感到了意大利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并对有产阶级僵硬的保守主义表示不满。焦利蒂于1903年接替扎纳德利担任首相，并在意大利参战之前几乎没有间断地一直治理着这个国家，他首先是个心慈手软的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改善社会状况、扩大选举权来把新兴的工人阶级融合为立宪国体的一部分。20世纪初期意大利的主要社会主义领导人，诸如菲利波·屠拉梯、伊瓦诺埃·博诺米和莱奥尼迪·比索拉蒂等人，都赞成实行温和的社会改革，以便使工人阶级的地位得到改善而能争

取进一步的成果。因此，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愿意和焦利蒂的做法配合。就实际情况而言，意大利国体就这样变得不仅仅是立宪制，而且还自由化了；另一方面，尽管每个城市都有民选市长和自治机构，由于内务大臣任命郡长进行统治，意大利仍然是个过于集中的国家。

意大利在1900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家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是天主教徒。新兴的意大利对待梵蒂冈不可谓不宽容大度；然而，历届教皇却拒不承认这个王国，反倒予以谴责。从理论上说，在教的天主教徒被禁止参与这个世俗国家的生活，然而凡是有选举资格的教徒显然大都参加了投票。在20世纪的初期，许多天主教徒实际上都批评梵蒂冈的政策。那些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的教徒，认为教会应该和社会党人竞争，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把工人们从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邪恶中拯救出来。有一个叫作“现代主义者”的教会团体认为天主教教义不应当一成不变，而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教皇庇护十世于1903年当选后不久即谴责了“现代主义者”；然而，他决定从根本上修改教皇在参加投票问题上所拥有的否决权。此后即由各主教决定他们管区的教徒是否应该参加投票；随之做出的决定日益趋向于准许参加。

1911年，焦利蒂实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将选民人数由300万人增加到800万人。接着于1913年进行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的选票显然最为重要。因此，本性反对教会人士的焦利蒂与天主教选举联盟的首脑简蒂洛尼达成了妥协：按照一项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协定，焦利蒂的许多追随者都许诺反对离婚和资助天主教学校，以争取天主教徒的选票。虽然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之间还没有和解的前景，焦利蒂希望将天主教徒也“融合”为立宪国体的一部分。

在焦利蒂时代（这是战前这段时期在意大利的称呼），也出现了激烈反对焦利蒂所做的合乎常情的妥协的情况；特别是因为他的种种妥协交易在意大利南部导致了骇人听闻的贪赃枉法现象，这种反对态度就更趋激烈。在北部日益繁荣的同时，南部不但没有前进反而越来越倒退；1908年在墨西拿发生的可怕地震，突出地暴露了南部的极端贫困。历史学家萨尔韦米尼开始领导一场把焦利蒂视为腐化者加以反对的运动；同时，他呼吁给予他的出生地意大利南部[\[12\]](#)以援助。在社会党方面，以拉萨里和墨索里尼为首的极端派于1912年在勒佐艾米利亚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击败了温和派领导人；此后不久，墨索里尼

成为社会党的主要报纸《前进报》的主编，用它来抨击焦利蒂的机会主义。在另一极端，兴起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新党，它反映了对焦利蒂的广泛的厌倦情绪并要求执行敢于进取的外交政策：对土耳其作战只不过标志着一个开端而已，这场战争给意大利带来了利比亚和多德卡尼斯群岛。新民族主义通过诗人邓南遮和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与当时的文学艺术运动建立了联系。正是在1909年，马里内蒂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未来派宣言》；他的先锋派主张当时在意大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影响；只要他的主张保持其沙文主义和好战黩武的特点，这种影响就肯定会存在下去。

当战争于1914年夏天在欧洲爆发时，意大利虽然多年来和同盟国结盟，却早已秘密地与法国达成协议：正是这一协议才使得利比亚战争有可能进行。1914年，焦利蒂和温和派社会党人奇怪地与总参谋部和梵蒂冈站在一起，都反对参战；而后两个势力中心实际上却是亲德的。民族党却同样奇怪地与萨尔韦米尼这样的亲法激进派结伙，希望站在协约国一边。1914年秋天，墨索里尼创办了一家主张参战的社会党报纸。1915年5月，在协约国于伦敦密约[\[13\]](#)中以领土作为贿赂以后，意大利遂对奥匈帝国宣战。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在奥匈帝国，特别是在德国，大战最初几年最为直言无忌的意见认为，德意志人将主宰多瑙河流域、整个波兰（或许可以给予它某种区域自治）、波罗的海诸省，大概还有富饶的乌克兰，从而完成创建大德意志世界强国的宏图。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和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只不过是证实了这些看法而已，尽管平民因食物短缺而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奥匈帝国正在分崩离析之中。1916年以后，德皇实际上已让位于代表旧统治阶级沙文主义的军事领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然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国会各党派却在暗地里扩充实力。中央党、社会党和进步党极力主张在普鲁士进行选举权的改革以维持公众的士气，同时为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而努力；1917年7月，一名叫埃尔茨伯格的中央党议员提出了一项具有这种措辞的和平决议并获得通过。俄国的军事崩溃使得德国统治阶级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俄国革命却深刻地震撼了所有的斯拉夫人民，从而增添了奥地利政府的忧虑。不仅如此，就在俄国革命发生之前不久，老皇帝于1916年11月死去，留下年轻而缺少经验的查尔斯收拾残局，何况他还没有老皇帝那有着连鬓胡子的威严仪表可资借重。

在意大利，1917年10月的卡波来托大败使人们大为震动，要发奋图强，国家的士气得到了恢复。随着奥匈帝国的瓦解，意大利成了胜利者的角色：昔日意大利民族统一党收回的里雅斯特和特兰提诺的目标实现了，蒂罗尔的南部直至布伦内罗山口并于特兰提诺，而且伊斯特里亚、扎那和亚得里亚海的几个岛屿（虽然开始时还不包括阜姆）也并于的里雅斯特。于是，意大利就有了一个大约25万人的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和一个50万人左右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这些异民族自然不会减少意大利现已束手无策的社会问题。

大多数意大利农民，尤其是南方农民，在战前从未想到他们的北方同胞的生活水平会有多高；像俄国农民和马扎儿农民一样，他们也带着新的思想返回了家园。社会党领导人特别为俄国革命所振奋。与他们相敌对的是民族党和邓南遮的追随者：这些人因为意大利未能得到更多的领土而愤怒万分。然而，在1919年11月举行的战后第一次选

举中，与法国和英国的“卡其”大选^[14]不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天主教的人民党得票最多。尽管经济困难严重，这个国家在1920年看来在新的一届焦利蒂政府的领导下安定下来了；新政府立即把邓南遮从他于1919年9月夺取的阜姆驱逐出去。可是在1921年，社会党的地位大为削弱。它的左翼分裂出去组成了新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工业上的经常罢工又惹恼了非社会党的公众，使民族党和其他右翼党派大为得利。1915年的左翼参战派墨索里尼在1919年3月建立了一个他称为法西斯运动的组织。墨索里尼逐渐看出：和民族党联合起来会增强他的力量；他越来越多地接受退役军人流氓集团的支持，这些人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乐于从某些实业家那里拿钱，替他们吓唬或殴打社会党人。1922年，意大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国王及其顾问们一筹莫展，竟然在10月间邀请墨索里尼出任首相，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徒们此时正在威胁着罗马。墨索里尼组成了由所有大党（包括社会党）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直到1925年1月他才仿效列宁的榜样，建立了只有法西斯党人担任部长的一党制国家。看来没有理由认为，他在1922年10月就想到这样的结果；尽管如此，1922年10月成了一道分水岭。对于一切反对自由政体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在1924年，马泰奥蒂仍有可能指责墨索里尼的恐怖主义选举手段：可以说，马泰奥蒂差一点就取得了胜利，他于6月份被谋杀一事几乎导致墨索里尼垮台。事态的发展既然未能使墨索里尼下台，便反倒促使他建立起彻头彻尾的法西斯统治。

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的统治，结束了一切自由权利。它对教育和艺术灌输了沙文主义和貌似好战的基调，加强了意大利行政管理上的过分集中。它的经济成就并不惊人；它强调了意大利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性质，却未能使意大利自给自足，例如小麦就不能自给。法西斯实行反犹太主义则是后来的事；它与天主教会达成协议、签订了1929年的拉特兰协定；它保存了君主制和根据1848年法令建立的参议院。它甚至容许贝内戴托·柯罗齐继续出版他的刊物《批评》而很少加以干涉。

在1918年春季德军的攻势遭到失败而美国站在另一方参战的影响日益明显以后，德国军方领导人便在夏末时命令文官们谋求和平。安抚协约国方面和平息本国愤怒的舆论的任务落到了埃尔茨伯格及社会党人艾伯特和谢德曼这些人身上。鲁登道夫化装出走瑞典，德皇避难荷兰，其他的德意志王室也作鸟兽散。受他们鄙视的工会领袖和天主

教徒留下来主持一切，战败的军队将士返回了饥饿的家园，革命言论广泛传播。马克思原来曾预言先进的工业化德国将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列宁在得到德国军方的帮助回到俄国以后，也总是认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德国即将出现。然而，尽管德国社会受到深刻震动，尽管旧有的信仰似乎全部破灭，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没有剥夺地主和实业家的财产，只不过在战败国地位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了实现1848年的政治梦想的尝试：其结果就是魏玛宪法。如同当时的多数新宪法一样，它规定了20岁以上男女的普选权——普鲁士也不例外——以及比例代表制，从而对缺乏经验的选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统由人民选举，政府却由同一批人民选出的国会来任命或撤换。首次设立了一名帝国内务部长——帝国这个含混的词仍然存在——尽管掌握普鲁士警察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权力更大。

凡尔赛和约，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苛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旧有的统治阶级和他们在农民、店主中的支持者，利用所谓的“凡尔赛霸约”来使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名誉扫地；由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逃避责任而承担起战败重责的文职人员，如今却被指责是“在背后捅了德国军队一刀”。在骄横傲慢的德国前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和那些希望按照20世纪情况实现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正直而胆怯的人们之间，本来就横着一道鸿沟，这一弥天大谎使它得以继续存在。由于通货的崩溃和德国现金储蓄的消失，德国社会于1922年至1924年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拉平现象。通货膨胀部分的是由于德国经过多年战争以后的必然处境，部分的是由于盟国方面提出的赔款要求，但也是由于某些工业巨头的推波助澜：他们的资产跟土地不动产一样也变得更加值钱了（见前，原书232页）。

长期以来，最为激烈的反斯拉夫（和反犹太）种族主义情绪发自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施蒂里亚这样民族杂居的奥王领地上的德意志人，大战期间，这些德意志人热烈拥护与柏林的联盟，认为这一步骤终将导致德语国家和东部地区（其中，德意志人最多仅在城市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全体德意志人的真正联合。随着同盟国的崩溃和协约国方面（正是因为关于主宰中欧的种种言论）不准奥地利与德国联合，正是波希米亚、南蒂罗尔、诺维萨德、特兰西瓦尼亚等地的德意志人感到最为愤慨。他们不再被看作哈布斯堡帝国的先进成分，而沦落为意大利的或罗马尼亚的或分别由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

地亚人组成的斯拉夫人新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昔日俄国波罗的海诸省中的德意志“贵族”、德国过去的波兰属地上的德意志地主，都同样地感到屈辱。他们中许多人逃亡到魏玛共和国来，增加了反对共和国的公民人数。他们厌恶魏玛共和国在种族问题和其他方面的宽容精神；他们尤其厌恶它的首都。因为柏林迅速成为新的现代艺术的中心。柏林从20世纪开始以来就有其老练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里的聪明而多疑的犹太新闻记者。这部分人如今变得更为突出而且影响更大了。

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一个自称斯巴达克团的左翼集团作为共产主义者从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1919年1月，共产主义者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柏林的一场混战中被右派谋害了。事实证明，没有人能代替这两人。德国共产党先于1921年，后来又于1923年10月（在汉堡和萨克森）企图举行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后一次还动用了军队帮助镇压。早些时候（1919年春）在巴伐利亚建立了短暂的共产党政权；接着，巴伐利亚威胁要脱离柏林；随后又于1923年11月发生了由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策动的流产叛乱（这群人由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仇恨犹太人的奥地利人所领导并得到鲁登道夫的支持）；在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协约国方面终于和德国领导人就赔款问题达成了协议。1924年夏，在德国通行新货币以后，道威斯计划开始执行，成为五年欧洲恢复时期的启端——这是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5年。施特雷泽曼于1923年8月被艾伯特任命为总理；由于社会党投了反对票，他的政府于11月垮台，但是他仍然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10月去世为止。

德国又开始了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在轻工业方面，并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所需的资金大多由美国以短期贷款形式提供。1925年春，冯·兴登堡元帅当选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接替去世的艾伯特。施特雷泽曼由于1922年与俄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解除了后顾之忧，本来已与巴黎进行接触，希望达成双方和解；不料民意转而支持旧的统治阶级，引起国外的疑虑，使施特雷泽曼颇为狼狈。不过，他在白里安的合作下终于在10月份促成洛迦诺公约的签署（见第八章）。这又导致德国于1926年9月当选为国联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从此，德国人再没有理由感到遭受排斥。虽然德国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但在先进的柏林和外地各省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快的紧张关系；而

柏林作为普鲁士的行政中心，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是由一位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托·布劳恩所掌握；而外省的天地，不论是地主、店主或是农民都害怕革命的柏林。

维也纳人在那些年的处境与柏林人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维也纳由于是一座巨大城市，又位于哈布斯堡帝国残余部分（阿尔卑斯省，这部分现已成为第一个奥地利共和国）的一端，因而受到战后形势的打击更为严重。维也纳仍然是中欧和巴尔干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奥地利却受到四处林立的关税壁垒的打击。如今不但马扎儿人，还有捷克人和波兰人，都希望保护他们自己的工业。奥地利共和国实行联邦制，社会党控制的维也纳是其9个邦之一。工业与贫困都集中于维也纳；社会党的市长和自治机构尽快地建造了大批的工人住宅区，并很自然地要维也纳的其他住户也为这些住宅付钱。这促使有教会背景的基督教社会党产生了反对社会党的愤慨情绪，而基督教社会党在所有其他8个邦的店主和农民中很有力量。在奥地利各城镇和奥地利各大学里，德意志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情绪尤为强烈，对协约国否决了德意志人的奥地利与德国联合一事，以及对中、东欧的德意志人在兴起的各国中沦为一般的少数民族从而感到的地位下降，愤慨异常。

在以布拉格为中心的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现在已有300万德意志人，他们曾对共和国进行了抵制；前已表明，布拉格这个城市的作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代已在不断增长。捷克斯洛伐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布拉格大学一位年迈的斯洛伐克哲学教授的产物。他叫托马斯·马萨里克，是个极其正直而开明的人。600万捷克人热烈地拥护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受匈牙利人统治的200万斯洛伐克人现在也为可以自由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感到高兴，遭到忽视的路西尼亚的50万路西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对于逃脱马扎儿人的统治也并不感到难过。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剧烈竞争由来已久；很可能正是这种竞争才刺激其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署了由国际联盟制定的少数民族条约，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有自己的学校和大学。但是，如今是捷克人坐了天下；尤其是那些捷克小官吏肯定会经常提醒德意志人不要忘记这一点。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一部先进的民主宪法，并开始制定重新分配土地的法律；该国的大多数德意志人觉得这部宪法比贝克于1907年实行的选举权改革更糟，而且在他们看来，土地改革只是针对德意志人

拥有的巨大庄园的。不过，20年代后5年的繁荣总算使这种种情绪得以平静下来。

战后建立了塞尔维亚卡拉乔治维奇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三元王国（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奥地利和马扎儿地主离去以后，这个国家与保加利亚一样没有贵族阶级；这是个贫困而不发达的农民国家，包括波斯尼亚、原属匈牙利的巴纳特大部和塞尔维亚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马其顿。毕竟保利亚在1914—1918年间又站到了失败者一边。南斯拉夫特别妒嫉意大利，在墨索里尼于1924年1月终于并吞了阜姆以后就更是如此。

这样，斯洛伐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从马扎儿人统治下解放出来。更困难也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人占多数的特兰西瓦尼亚交还了罗马尼亚；马纽成为罗马尼亚民族农民党的领袖，他促使在该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如前所述，匈牙利在1914年以前的局势极其紧张，一触即发。如今，除了50万德意志人外，它已失去了所有的非马扎儿人；不仅如此，还有150万马扎儿人落入了罗马尼亚境内，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还各有差不多75万名马扎儿人。1919年发生了短暂的共产主义事变，在贝拉·库恩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匈牙利的权贵和乡绅们重新夺取了政权。但是他们没有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做出什么努力；一场主张废除1919年和1920年和约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转移了公众的注意，使他们不去关心为数300万人的无地农民，而这些农民的处境在整个欧洲大概是最为恶劣的。

在某些方面，新波兰是战后建立的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它一创建时碰到的障碍也许是最严重的。它曾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它从零开始而又没有天然疆界和港口。它没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只有通过1921年3月公民投票而取得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例外。在俄国部队于1920年8月被逐出华沙以后，苏俄于1921年3月被迫接受了这样一条国境线，即把它的全部“西部领土”划给波兰。于是，信奉希腊正教或一元正教的600万左右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臣民。然而，此后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纠纷更多，尽管这条边界是比较合理的。许多德意志人住在波莫瑞的城镇里（他们称这个地区为“走廊”）和波兹南（也叫波森）。然而，在3000多万人口的波兰仅有70万左右的德意志人，这比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更不必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少得多。解决波兰的港口问题的办法是把德国的但泽

市^[15]变为独立的自由市，附属于波兰关税区内，对外由波兰为其代表。德国人不愿听取为这些边界辩护的任何理由；连社会民主党也不接受这些边界；而对于中间派的机会主义者（施特雷泽曼后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来说，一有机会就应该废除这些边界。因此，波兰从一开始，便遭致了深刻的敌意和极大的贫困。

德国人原想征服的波罗的海诸省，在战争结束后成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独立小国；它们剥夺了这些国家中的德国贵族的财产，那些人大都已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归侨。波兰希望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个打算之所以落空，主要是因为波兰在1920年从立陶宛人手中夺取了民族杂居的维尔那城，而立陶宛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的首都。此后，列强即无法阻止立陶宛夺取原属德国的梅梅尔港，不过，由列强予以保证的法令给了梅梅尔自治权。

同时，土耳其在一名叫作凯末尔·帕夏的军官领导下的振兴使希腊人在小亚细亚遭到失败与挫折。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希腊不得不再次承认马里查河为土耳其的西部边界并同意从安纳托利亚撤走大约100万希腊人；从希腊撤走的土耳其人约为50万人。因此，本来已经很穷的希腊在大萧条时期之前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把国内治理就绪。

早在大萧条时期之前，东欧有三个国家业已出现政治不稳的迹象。1926年，在大战中为解放波兰出力最大的波兰将军毕苏斯基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奇怪的是，这是他与波兰社会党协力进行的；政变的矛头主要指向奥匈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农民党。毕苏斯基宣布代议制政府已经垮台，先是监禁后又放逐了曾任维也纳帝国咨政院议员的农民党领袖维托斯。随后，毕苏斯基便通过军队行使权力，但仍然让权力缩小了的议会继续存在。在奥地利，当一些参与1927年1月混战的右派分子被宣判无罪释放以后，由社会党召集的人群于7月份烧毁了维也纳的司法部大楼。这使奥地利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剧，并促使教会人士与泛德意志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社会党人。1928年，代议制政府在南斯拉夫开始瓦解，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憎恨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的统治和他们认为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僧侣及塞尔维亚军队、官僚的落后影响；克罗地亚人要求实行自治。他们的领袖拉迪奇在议会中遭到一名塞尔维亚人枪击而受了致命伤，但开枪者却未受到任何惩罚。1929年1月，国王宣布自己实行独裁；1931年9月，他颁布了一部滑稽可笑的宪法，规定进行公开投票而不是秘密投

票。这样，当许多南斯拉夫农民已经对政府十分愤恨的时候，他们又遭到了大萧条的袭击。

然而，直到1929年秋天为止，政治、社会生活总的来说得到了巩固：农民国家可以向工业国家出售粮食；它们自己由于生产落后而加剧的人口过多问题仍然可以忍受。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10月去世，促使美国莫名其妙地丧失了信心，把资本从德国抽走，德国的就业率下降，减少了粮食的进口。这就开始了恶性循环。

五 大萧条时期：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到1929年年底，就业率在德国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使人感到在此以前的繁荣时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在奥地利，繁荣本来就不那么令人信服；很快，维也纳街头似乎到处都是乞丐。德国的社会党总理赫尔曼·弥勒引咎辞职；兴登堡指定中央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于1930年春接任总理。布吕宁根本没有认识到背着他正在进行着种种阴谋，其中心意图是要使兴登堡更能起到1914年以前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并相应地减少国会的权力。这些阴谋来自总统之子奥斯卡的朋友，一个叫库特·冯·施莱歇的“政治将军”。当布吕宁于1930年7月未能获得国会对他的某些紧缩通货措施的赞同时，兴登堡在施莱歇的鼓动下将这些措施以紧急法令形式付诸实行。布吕宁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解散1928年5月在繁荣时期选出的这届国会。

大选于1930年9月14日举行，其结果如晴天霹雳，震撼了德国和整个欧洲。共产党议员人数由54名增为77名，而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从在上届国会中仅占12席一跃而占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这些纳粹分子即是1923年11月企图于慕尼黑夺权而遭到不光彩的失败的奥地利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他曾在监狱里开始撰写《我的奋斗》；在1924年圣诞节获得释放以后，他立即大力重新组织他的党徒，特别致力于组织“冲锋队”（简称S.A.）。即使在高度就业的时期，也到处有许多年轻人不能适应魏玛德国的生活。他们被发给一套奇特的军队式的制服和一双长统靴子；宣布说需要他们来保卫纳粹党的会议不受共产党的破坏。实际上，这些人的用处是进行威胁。随着经济衰退的来临，由于这时有许多一般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帮人的队伍迅速扩大；他们感到愤慨、孤独，一旦有吃、有穿、有事干，又有一套抨击时政的公式和拯救社会的口号，当然十分高兴。冲锋队特别兴旺的地方是在外省而不是在柏林：看来，普鲁士当局比较了解这些人的危害性，因此给他们设置了障碍。1930年9月大选给纳粹带来了第一个大好机会，他们也没有轻易把它放过。

选出新的国会以后，布吕宁更加依赖于总统的支持。实际上，他已全然指靠紧急法令来进行统治。他企图在国外取得成就来提高威

望：1930年6月，协约国部队从莱茵兰撤出。但是，由于大萧条的缘故，根据新的杨格计划支付的赔款更加引起人们的愤恨；“可怜的小奥地利”遭到的困难，同样招致不满。1931年春，德国和奥地利提出一项关于实行奥、德关税同盟的计划。这不但远远没有缓和危机，反倒加速了危机的恶化。法国人认为这是重温“主宰中欧”的旧梦而表示不满；于是，这个计划被束之高阁。人们认为，法国对维也纳施加的压力，促使该地的信贷市场于1931年5月崩溃：这在整个中欧引起了反响。它直接导致德国国家银行于6月20日停止私人贴现付款，并促使德国的达姆施塔特银行于7月13日倒闭。胡佛政府6月20日宣布的延期偿付赔款，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喘息机会（见前，第八章）。下一件事就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英镑的崩溃。希特勒的宣传充分利用了整个局势。布吕宁错误地估计了兴登堡的支持，决定努力促使兴登堡连任总统，为之取得了自己的中央党和社会党的支持。希特勒匆忙地首次取得德国国籍之后决定与兴登堡竞选，从而又为他的广泛宣传活动开辟了新的门路，尽管兴登堡还是于1932年4月重新当选。

希特勒向德国灌输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它赤裸裸地声称：德意志人是一个优秀民族；为了这个优秀民族的利益，其他民族应该放弃一切在希特勒看来是有利于这个民族的东西。可能要求其他民族放弃自己的领土、教育、身份，甚至要求它们被消灭。即使在德意志人中间，还鼓励那些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去消灭其他人而不必顾忌任何道义准则。不过，希特勒的教义利用了德国社会的全部弊端，宣传得十分巧妙。它声称能够洗雪凡尔赛和约带来的耻辱；它声称即将取消魏玛共和国大体继承的僵硬的阶级界限；它声称可以为每一个诚实的德国人找到工作和适当的报酬。它充分利用了外省人对犹太人所怀有的恶感，而正是这些犹太人使柏林成为现代艺术的辉煌而稍微有些狂热的中心。希特勒当时并未说明他为犹太人准备了什么样的结局，但是他有时谈到了要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敌人。人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而加以忽视；实际上，许多德国人更赞成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和解的做法，而不太赞成希特勒的真正目的。在希特勒冲锋队的破坏性宗旨暴露无遗之后，布吕宁于1932年4月决定，必须在全国予以取缔。他要求重新当选的兴登堡对此表示同意。然而，兴登堡已会见过希特勒；他宁愿支持希特勒的党徒，而不愿支持为了保卫共和国而建立的社会党“国家旗帜”组织。结果，他把布吕宁免职，任命弗朗茨·冯·巴本接任总理，其手下的部长班子又像1914年

以前一样，不再依靠国会的支持，而全凭国家元首的信任。7月份，巴本解散了奥托·布劳恩的普鲁士政府（后者在4月的选举中丧失了许多选票），并重新举行全国大选。这时，失业现象仍然很普遍，国家社会党获得的选票比1930年9月增加了一倍多。8月份，希特勒要求成为拥有全权的总理，但为兴登堡所拒绝。于是，希特勒傲慢地对一些由于在波坦巴进行政治谋杀而被判处死刑的冲锋队员表示“团结一致”。秋天，失业现象不像前三年同一时期增加得那样快，而在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1933年1月，希特勒利用巴本与其国防部长和继任人施莱歇之间的争执，同意担任总理而让巴本任副总理，并且只要两名纳粹部长入阁——希特勒不能等到经济恢复变得更有起色。

希特勒任职的条件是于1933年3月5日在纳粹党的行政控制下进行新的大选。随他上任的还有戈林（他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兼有帝国内阁席位），以及出任帝国内政部长的弗里克。希特勒和戈林大言不惭地说这将是1000年以内的最后一次选举，因为纳粹党取得了多数之后会知道如何加以利用的。在1月30日和3月5日之间，组织了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恐吓运动。一些出名的反对希特勒的人士纷纷入狱，并受到拷打。2月27日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在不到一周以后即将举行选举之时给纳粹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声称这是共产党进行政变的信号，宣布了紧急状态，大肆逮捕政敌，并对新闻界进行箝制。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并未取得绝对多数；中央党和社会党并未受到震动，他还需要民族党的支持才在国会中拥有52.5%的票数，因此民族党人在他的内阁中充任了大部分部长职务。

希特勒并不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有所顾忌。共产党议员大部分已遭逮捕，而且全都不准出席国会，除了社会党人（他们的领袖奥托·韦尔斯义正词严地发言表示抗议）以外，其他议员都被迫投票赞成给予希特勒全权，并于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案加以确认。此时，第一座纳粹集中营已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建成。纳粹说这是由基钦纳在南非首创的。其实全然不同。这些集中营是些设计周密的拘留地，反对纳粹的人们在这里受到肉体上和心理上的系统的折磨，其拘留时间则完全由纳粹决定。

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时，奥地利总理从前一年5月以来一直由基督教社会党的青年政治家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担任。由于希特勒

纲领中的第一点就是德奥合并，希特勒的上台在奥地利激起了各种各样的亲德情绪。纳粹可以轻易地说什么奥地利国家太小，难以单独存在下去，因此与德国合并是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情况下，陶尔斐斯于1933年3月宣布奥地利议会无法进行工作而予以解散。

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对欧洲农村的影响，不如工业中的失业对德国城镇和维也纳的影响来得那么突然。然而，所有的社会联系，在30年代初期却因此而变得紧张了。除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以外，要煽动农民对犹太“高利贷主”的仇恨情绪，已是很容易的事。有些煽动家悄悄宣传共产主义可使社会免遭萧条的灾难，他们在亲俄的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颇有市场。而共产主义的威胁，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假想的，都越来越使统治者们赞赏墨索里尼及其做法。他的自给自足或保护贸易政策受到赞扬与仿效，从而关税壁垒林立，阻碍了经济恢复的到来。特别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中产阶级中的失意者，但也有农民，组织了“箭十字党”或“铁卫军”，穿着各色衬衫，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这使社会总的气氛增加了恐惧和讹诈的成分：特别在布达佩斯，情况很像希特勒上台前的柏林。

墨索里尼从1927年4月的意大利—马扎儿条约以后一直亲近匈牙利：这就是说，他站在马扎儿修正派一边反对“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及“和约”。罗马与布达佩斯的友谊带有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色彩，因为马扎儿人大肆渲染他们所经受的贝拉·库恩领导的短暂的共产党统治。他们说，他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却故意不提紧接着在匈牙利发生的白色恐怖。

1932年，一个叫贡伯什的半德意志血统的匈牙利军官成为匈牙利的首相，从而取代了以贝特兰伯爵为首的巨头统治。贡伯什钦佩法西斯的意大利，更钦佩纳粹德国。他尚未意识到，希特勒后来会宁愿站在罗马尼亚一边而不站在匈牙利一边。他也未意识到，希特勒的胜利将会对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起的振奋作用，而这些人除了具有强烈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以外，别无其他政治意识可言。

在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局势已紧张到似乎难以忍受的程度。由于德国社会党人或已入狱，或已四散，奥地利的社会党人业已感到陷入罗网。由于奥地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比德国社会党人更加反对

教会，而奥地利主教们则谴责他们是共产党。意大利也对奥地利社会党人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揭露了意大利和匈牙利之间的武器私运，终于在1934年2月爆发了陶尔斐斯政府与奥地利社会党之间的4天内战。这造成了悲惨而深远的后果。奥地利社会党在存在将近50年以后遭到取缔，党的领袖奥托·鲍尔在捷克驻维也纳公使费林格的帮助下逃往布拉格。意大利的影响似乎在维也纳占了上风。1934年3月，奥地利和匈牙利与意大利签订了罗马议定书中的经济协定。然而，不为人们觉察的胜利者其实是希特勒：除掉了社会党，奥地利就肯定无法抵制他，而维也纳的基层社会党人对“神父们”和强加于首都的新官吏们十分痛恨，以至更愿意相信纳粹才是工人的救星的说法：这些都符合奥地利社会党的传统。希特勒于1933年规定，凡是想去奥地利旅行的德国人，必须缴付1000马克的签证费用，目的是要给奥地利的度假胜地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这种困难又可以反过来归罪于奥地利政府。

六 德国和奥地利的“清洗”

纳粹德国经常失去人们的同情却又赢得人们的钦佩，这种现象确是十分特别。欧洲的舆论显然回避那些令人痛苦的不利证据，却草率地相信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在通过授权法案以后，除希特勒自己的党以外的一切政党都被取缔，而巴伐利亚和其他邦的权力也被废除，代之以纳粹党领导下的僵硬的集中统一。工会在1933年春被取缔，代之以纳粹的劳工阵线，雇主们与工人们变成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报界遭到扼杀。幸存的一切报纸都成了国家社会党的某种机关报，只有《法兰克福日报》例外；这家自由主义大报被给予一点点自由的假象，一直办到1941年。纳粹愿意拿这个奇妙的摆设来装点门面——实际上，在停刊以前，这家报纸早已作为其发行人马克斯·阿曼所赠的生日礼物于1939年4月成了希特勒的财产。会议上、报纸上、电台上，到处都听到、看到纳粹党的口号，结果，使坚定地反对纳粹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态度。

反犹太行动在开始时还是零零星星的。后来，纳粹党命令于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商店，这就开始了系统的反犹太行动。那一天没有发生多少暴力行为。即使外国报纸报道了反犹太事件，纳粹也可指出在4月1日一切都是和平的，反而指责犹太人煽动世界舆论反对德国。渐渐地，犹太人想从事任何自由职业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直到1938年为止，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

1934年年初，希特勒碰到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困难。他的两大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和取得东欧领土以便德国人向那些地方移民。其中第二项肯定会带来战争。因此，希特勒希望建立一支规模巨大而富有效率的新的军队。他的老朋友，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则希望由自己控制的冲锋队来同化军队。将军们对罗姆的打算十分不满，特别是因为他们中有的人知道冲锋队实际上只是些横行不法的暴徒而已。希特勒也反对罗姆的计划，因为这将削弱军队的效率。巴本的一些保守派追随者想利用这种紧张形势获得好处，便劝说这位副总理于6月17日在马尔堡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多方面。显然，这篇演说很得人心。

希特勒以极其巧妙而又可耻的手段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在幕后进行的“清洗”中，最重要的是对警察力量的“清洗”：到了1934年4月，整个警察机构已落入希特勒的忠实爪牙亨利希·希姆莱的控制之下。同时，希姆莱还担任一个原先是冲锋队里的特别卫队组织的全国领导人。这支特别卫队的成员身穿黑色制服（褐色衬衫），被称为党卫军（简称S. S.）。种种证据表明：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促使军队领导人相信冲锋队即将发动叛乱，又使冲锋队领导人相信军队打算消灭他们。在6月30日和7月1日，希特勒利用党卫军逮捕并处决了一些冲锋队领导人，其中包括罗姆本人。与此同时，他又杀害了巴本演说的策划者和抨击纳粹暴行的其他右翼人士，其中包括施莱歇。而希特勒为整个事情进行开脱的理由仅仅是宣布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这样，从威廉二世时代以来已是半死不活的旧法制，和冲锋队一起被“清洗”掉了；所谓法治国家至此荡然无存，直到1945年以后才发生变化。1934年以后，冲锋队完全失去其重要性，主宰德国社会的乃是党卫军，由他们控制集中营。正是在希特勒首次会晤墨索里尼并发生6月30日和7月1日的屠杀的那个夏天，几个星期以后又发生了奥地利纳粹分子在维也纳杀害陶尔斐斯的事件^[16]，最后以兴登堡于8月份去世而由希特勒继任达到高潮。希特勒从来不用总统的称号，但是作为国家元首，他得以使每个士兵宣誓效忠于他本人。

从1934年到1938年，德国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就业增加了。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在德国由于重整军备而增加得更快。1935年3月，重新正式恢复了征兵制，这带来了它本身的社会后果。除了纳粹官员以外，国外旅行由于外汇短缺而受到限制；外汇短缺还使原料供应不足。沙赫特主持国家银行和经济部表现了卓越的金融才能，他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见第三章）。在兴建住房方面所做的工作出奇得少。希特勒感兴趣的毕竟是对东欧的殖民，而不是扩大德国本土的城市。

宣传部长戈培尔一直保持着紧张气氛，尤其是利用所谓德意志人在国外遭受迫害的问题大做文章，例如在萨尔地区一直搞到1935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为止，对但泽、梅梅尔、捷克斯洛伐克也如法炮制。然而，在1934年1月与波兰签订“十年条约”以后，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被置诸脑后，直到1939年又重新提起。戈培尔如今成了德国艺术生活的太上皇。与他妥协的重要艺术家只有理查·施特劳斯一个人，他当上

了国家音乐协会的会长。学校和大学由纳粹青年组织掌握。这些组织强调的是准军事性质的训练。在大学里，旧有的一些从事决斗的青年组织，在魏玛共和国整个时期一直存在，现在遭到了取缔；因为希特勒厌恶一切贵族传统。起初，天主教会对国家社会主义表示某种欢迎态度。1933年7月与教皇签订的协定，是纳粹国家在国外取得的第一次肯定的承认。希特勒的反共态度，也受到了梵蒂冈的欢迎。然而，天主教和纳粹的教义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教皇庇护十一世越来越意识到这点，正如他于1937年3月对德国教会人士发出的圣谕《吾心悲痛如焚》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德国的新教徒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追随迪贝利乌斯和尼默勒^[17]的教徒从一开始就持抗议态度。他们在国防军军官中享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后来的豪斯总统和夫人就是迪贝利乌斯的密友）。还应补充的是：柏林以及汉堡的纳粹化程度从来都不如德国其他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两个城市的统治也不那么严密，讽刺纳粹的笑话一直在那里流传。

1937年9月，柏林不得不为墨索里尼举行游行。11月，希特勒进一步推行自己的计划，即在那年冬天和1914年以前的旧统治阶级进行最后的决裂。于是，里宾特罗甫接替冯·牛赖特男爵主持德国外交部。布罗姆贝格将军和弗里奇将军被赶下台，希特勒亲自出任总司令。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被撤销德国驻罗马大使的职务，而最后，任命的新大使却原来是一位投靠纳粹的容克贵族汉斯·格奥尔格·冯·麦肯森。此时，几乎也可以归入同一类型的巴本，被从维也纳召回；在那里派驻一名使节实际上已快成为不必要的了。所有这些变动，都与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而由一个名叫瓦尔特·丰克的纳粹党羽接任一事同时发生。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开始行动。

七 1929—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起初并未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该国的财政情况健全，经济上颇能自给自足。居民的教育程度相当高，至少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如此；宪法的执行情况也令人满意。这里在20年代看来已出现了摆脱异族贵族阶级统治的新的20世纪社会。布拉格的生活可以与柏林和维也纳的生活相比拟：知识分子同样强烈地左倾，并和俄国人保持着自己的特殊关系——生活不如柏林那样绚丽多彩，却要清醒一些，也不像柏林那样与内地隔绝。当时的一个饶有兴味的人物是卡夫卡的女友米莱娜·杰森斯卡。在1914年以前，她是个渴望民族独立的、革命的捷克女学生。后来遇见了卡夫卡^[18]，然后是他的早逝。她在翻译卡夫卡的小说以后，成了文艺记者和捷克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人物。在20年代后期，不仅布拉格的犹太人，而且一些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都开始安定下来，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奈斯在国际联盟的活动，提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地位——德国于1926年9月被接纳入国联的那天，正是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外长主持国联大会的会议。

捷克人由于他们自己的处境和禀性，无论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还是一般公众，都难以理解30年代在他们周围开始出现的种种情况。斯大林早在1928年便选择了专制的道路。从1930年9月的德国选举之时起，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极端种族主义又开始抬头；狂热分子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现在人们又倾听起他们的言论了。由于他们居住在共和国的边缘地区，而那里没有大城市，布拉格也是他们的中心。随着德国经济危机趋于缓和而希特勒迅速掌握政权（他的掌权似乎成了形势得以改善的原因），捷克斯洛伐克却开始了经济萧条。正如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发生萧条时那样，这次萧条严重地影响了德意志人（他们如今自称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居住的波希米亚边境地区的轻工业。结果造成了很大的苦难，而责任又可归罪于捷克当局。旧有的争执重新爆发；现在，纳粹德国开始给苏台德德意志人煽动家提供资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个叫康拉德·汉莱因的人所领导的新的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在1935年5月的大选中获得了1249530张选票；这样它就成为该国的第一大党，刚刚超过捷克农民党。

那一年年底，已经85岁的托马斯·马萨里克辞去总统职务，由贝奈斯接替；对于他所主张的一切来说，中欧的新形势是一个挑战。在奥地利内战之后，捷克人对于陶尔斐斯的大企业国家，或奥地利纳粹分子于1934年7月对他的谋害，或亲教會的舒什尼格的继任，都难以表示欢迎。1934年秋，苏联被接纳入国际联盟，并取得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地位，于是贝奈斯决定和他的法国盟友一起与苏联人签订一项审慎的条约。这恰好是汉莱因开展竞选之时，于是遭到了所有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德意志人的大声指责：他们说，贝奈斯把欧洲出卖给布尔什维克并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苏联的空军基地。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希特勒乘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并与国联发生争执之机，使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很可能正是这一行动使捷克和法国的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墨索里尼开始意识到：奥地利人的情绪不仅一如既往，是反对意大利的，而且在本质上是赞成大德意志主义的。因此，他事先默许1936年7月的德奥协定一事，事实上就等于放弃了奥地利独立的事业。

在希特勒于1913年去慕尼黑之前在维也纳游手好闲的日子里，他颇以自己是个老式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而骄傲。对他来说，不仅要翻1919年的案，而且要翻1866年的案；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应与德国统一。《霍斯巴赫备忘录》表明：到1937年11月，他已决定要解决这些事情：“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19]——在他看来，这是一次统一的行动。

在布拉格，捷克人记得他们过去生活过的艰难岁月，但是他们不打算束手待毙，也不想失去已有如此美好开端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仍想寄希望于苏联，但是像米莱娜·杰森斯卡这样正直的人已经懂得，进行清洗审判的苏联是既邪恶而又软弱的，于是她放弃了共产主义。^[20]贝奈斯自然竭力安抚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并加强防务。然而，甚至遭到希特勒威胁的苏台德德意志社会党人都难以安抚，而加强防务又增加了与大多数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摩擦，因为这些人居住于边境地区而他又不能指望他们效忠捷克。

继陶尔斐斯之后担任奥地利总理的舒什尼格，是个模棱两可的人物。他既有蒂罗尔人的强烈的德意志民族情绪，又有强烈的天主教徒

的虔诚：两者合在一起似乎使他不知所措、进退两难。不过，他像1931—1932年的魏玛当局一样，由于发现了纳粹对奥地利的恐怖主义计划而大为震动，采取了某种行动。他在希特勒从1934年到1938年派驻维也纳的使节巴本的鼓动下，同意于1938年2月对希特勒进行访问，并在德国总理的威迫下表示了含糊的归顺之意。当他回到维也纳时，他又决定自己要诉诸奥地利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希特勒也许对投票结果深怀恐惧。总之，他决定先夺取奥地利，而暂时不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不但如此，当德军于3月12日开入奥地利之时，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公使得到保证说，这绝不包含任何对捷克的威胁（见下文，第二十三章）。

早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曾使整个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欣喜欲狂。奥地利于1938年3月并入纳粹德国，犹如第二剂强心针。所有的苏台德德意志人除了社会党人以外，纷纷加入汉莱因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对于德奥合并的阴暗面，他们却故意不闻不问。捷克人现在已是四面楚歌——除了匈牙利以外，波兰人填补了唯一的缺口——不能设想，捷克在5月份的部分动员，尽管使希特勒暴跳如雷，实际上并未对他的计划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在他眼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根本就无权存在——这既妨碍了他，又使他恼火。到了1938年秋天，他已打算把奥地利在1914年以前曾拥有的生存空间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无论如何是要攫取这些地方的，不过有时他也开始承认：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准备对西方作战。

由于慕尼黑会议（第二十三章）的缘故，希特勒分两步摧毁了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显然，他自己是愿意通过一次速决战加以消灭的。到1939年3月，他建立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一个依附德国的斯洛伐克，并将路西尼亚归还匈牙利；这时，他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实力。德奥合并使德国控制了中欧的多种多样的金融和工业联系。但是，捷克人在布拉格建立了小协约国的某种经济中心。捷克银行家在南斯拉夫这个蕴藏丰富的铜、铅、铝土矿的不发达国家作了可观的投资；他们还想打入罗马尼亚（当时除了俄国以外，欧洲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生产石油），虽然他们事实上无法与美国、英国、荷兰的大石油公司进行有效的竞争。

从希特勒掌权以来，他和他的经济顾问们，首先是沙赫特，似乎拯救了东欧的农民，因为他们购买了这些农民的粮食。由于货币不稳

定，德国用自己需要输出的商品进行实物交换。沙赫特巧妙地使这些弱小国家变得逐渐依赖德国，并使它们的货币与德国货币建立了联系。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南斯拉夫政府不大情愿地参加了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南斯拉夫人发现，他们不向意大利出口，以后可以向德国出售更多的商品（而在英国人拒运煤炭之后，意大利人发现德国人可以提供煤炭）。匈牙利人同样发现，尽管有罗马议定书的规定，他们可以向德国出售更多的货物。在布拉格被占领以后，所有原来的捷克投资都落入了德国掌握之中，其中自然包括规模巨大的斯科达兵工厂。顿时，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中欧已经形成。1939年3月23日的德、罗商业条约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形势。石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一有效期至少为5年的条约规定，由德、罗合资公司加紧开发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前已表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曾经出现在罗马尼亚，而在战争结束时被驱逐出去。现在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关键地带取得了“自由区”，要由他们来提供开采油田所需的设备。德国人认定，这一条约将为保证他们从经济上控制整个东南欧的以后的各项协定提供样板。

八 对波兰的进攻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了被墨索里尼称为“钢铁条约”的条约。这是一个公然显露侵略性的条约，它加剧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的威胁。它在某一方面却迷惑了世界舆论，即用德国的强大掩盖了意大利的虚弱，而这对希特勒却正中下怀。原来墨索里尼刚刚征服阿比西尼亚不久，即派出大批意大利“志愿军”去为佛朗哥作战。就其缔约的时机而言，“钢铁条约”似乎是给佛朗哥和轴心国在西班牙进行了将近3年的战斗之后所获得的胜利锦上添花。德国人只投入了少量的飞行员，墨索里尼却耗尽了他的军队和经济资源。他刚一签订条约，便立即为其后果担心。然而，希特勒却感到更加自信了。如今，墨索里尼已仿照他的榜样在意大利推行反对犹太人的措施。在德国人直接控制的疆土之外，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都乐于采取反犹太的姿态以取悦柏林。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时期，还要在两年之后才会来到；但是，存在着可以用来献媚的替罪羊，这是希特勒进行他所极为擅长的神经战的武器之一。东欧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耳濡目染、所读所说，一切都在煽动反犹太主义而挫伤宽容精神。

不过，应该指出：希特勒知道德国舆论对于战争并不热心。在他的装甲师于1938年9月在柏林遭到人们的冷遇以后，他于11月指示新闻界煽动好战情绪。在同一月份，德国各地都发生了有组织的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即所谓“全国水晶夜”，造成了生命损失和大量犹太人财产被毁——这一行动的发生绝非偶然。^[21]从此开始系统地迫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在经济上破产。继征服布拉格之后，希特勒打算如果波兰不顺从就把它消灭。关于这一点，德国的舆论，至少在德国东部，是比较积极的。但是，随之而与苏俄签订条约一事，却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统治波兰的是他的一些老军团部下^[22]（即上校们）——其中最主要的是约瑟夫·贝克。贝克是反对西方的。他就奥地利人希特勒对波兰的谅解大放厥词。到了慕尼黑协定时，他又乐于在切欣问题上，煽动对捷克人的敌对情绪。波兰确实在

1938年10月初得到了这块领土。从1926年以来受到压制的农民党，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仍然是波兰的最大政党。尽管政府施尽诡计，该党领导人从毕苏斯基死后一直十分活跃；他们在1938年12月的市政选举中，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他们和他们的朋友西科尔斯基将军（他也是加利西亚人）竭力提醒波兰人民：希特勒的友谊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波兰境内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表现与苏台德德意志人最近的行径非常相似。于是，贝克采取的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变得十分不得人心；波兰将军们开始准备抵抗。但是，他们的装备和技术知识都过于陈旧；从任何标准来看，波兰也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当英国和法国于1939年春提出对波兰的边境予以保证时，希特勒决定进行一次讨伐行动来消灭波兰；这会给西方国家一次有益的教训——看来，西方自慕尼黑以后对此已经忘却。斯大林于8月份决定与希特勒，而不是与西方国家达成妥协，也便利了希特勒的计谋（见下文，第二十三章）。

波兰的覆灭以及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假战争”，当时看来并没有改变东欧的生活：由于1938年11月取得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大块土地而扩大了疆域的匈牙利，以及意大利，似乎都因保持中立而欣欣向荣。但是对波战争确实在两个方面使希特勒更接近于实现他的真正企图。这加剧了保护区内的紧张局势，引起布拉格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于是纳粹以此为借口关闭了捷克的这所大学——这又导致捷克人的一切高等教育的结束，这是毁灭斯拉夫劣等民族的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更为直接的是，征服波兰提供了在生存空间上的积极收获。比德国在1919—1921年间丧失给波兰的领土更大的地区，如今并入了德国，并把波兰人赶了出去。1939年10月7日，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负责迁入德国移民事项的加强德意志民族性全国总监；这是一项非常及时的任命，因为希姆莱对如何安置那些在“钢铁条约”签订后愿意离开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的德意志人，正好感到束手无策。这些波兰人的父辈和祖父辈在威廉二世统治下，就在这里居住（当时，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其规模如同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但没有这种“少数”民族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被赶出自己的家园，送往更远的东方的所谓一般管理地区。纳粹当局的意图是在经济上对这个地区不闻不问，使那里的波兰人的生活注定要日趋没落。德国国内的气氛在1939—1940年的冬天也并不十分欢乐。人们在“冬季战争”中同情芬兰人而反对希特勒的新朋友斯大林。

接踵而来的是由于1940年春的占领和胜利而引起的乐观情绪，和法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崩溃：几乎突然间，德国人占领了挪威、丹麦、低地国家，不久又占领了法国。从6月10日起，意大利已成了盟友，西班牙看来也即将成为盟友。东欧不是被征服，就是在经济上成为附庸，而苏联在表面上保持友好。尽管如此，胜利并未使战争结束：大英帝国不肯服输，而在秋天意大利开始了一场对希腊的并不成功的战争。不仅如此，苏联不但进入了波兰东部，而且还进入了波罗的海诸国和罗马尼亚的东北部：会不会在靠近油田的海峡地带，或者就芬兰在佩萨莫的资源发生冲突？德国工厂开始出现人力不足问题。这是法国战俘没有被遣送回国的一个原因。这也使得大批的意大利工人以及波兰工人被送往德国。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拯救了斯拉夫民族；这甚至拯救了若干犹太人。

到1940年年底仍然没有赢得战争。希特勒于7月已做出决定：必须征服背信弃义的俄国，以便按他所说去消灭背信弃义的英国。作为第一步，他必须征服整个巴尔干半岛，占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紧随墨索里尼之后征服希腊，并劝降南斯拉夫。然而，当南斯拉夫政府为了获得巨大的让步而于1941年3月底同意支持1940年9月的德、意、日三国条约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人民奋起抗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曾于1939年8月达成一项协议，但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部分的是由于克罗地亚人情不自禁地希望轴心国的压力会扩大他们的自治权力，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怀疑轴心国只想削弱南部斯拉夫人、掠夺他们的矿藏。塞尔维亚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下列因素的影响：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贝尔格莱德大学对卡拉乔治王朝及其忠于沙皇态度的敌视，以及对南斯拉夫境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和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怀疑。在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于1934年10月在马赛遇刺丧生以后，担任年幼的新国王的主要摄政的保罗亲王遭到驱逐；年轻的彼得国王开始亲政，任命了以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这等于否定了三国条约的支持，于是激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德国立即在4月初开始进攻。贝尔格莱德遭到了残暴的轰炸，南斯拉夫暂时瓦解。彼得国王及其政府出逃，斯洛文尼亚被德国和意大利瓜分，马其顿被并入保加利亚。老牌的恐怖主义者安特·帕维利奇被安顿在萨格勒布，成为意大利庇护下的克罗地亚人的独裁者。这根本不是克罗地亚农民的愿望，而他们的领袖马切克不久即被软禁在其家中。塞尔维亚本身沦于德国军事管制之下。德军大举前进，攻入希

腊，建立了德意混合占领体制。于是，整个欧洲，从哥本哈根到雅典，都在德军或意军的占领之下，并落入德国秘密警察和党卫军（两者已很难加以区分）的掌握。只有瑞典和瑞士还保持独立，此外就是佛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的葡萄牙。就像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一样，匈牙利也成了一个附庸国，随时可以受到希姆莱为了进行反犹太行动或剥夺自由权利而施加的压力。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又重弹了反共十字军的老调；这个口号又有了用场，尽管已不那么吸引人了。除去英国以外，进攻和瓜分俄国是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劣等的斯拉夫人必须为优秀民族德意志人腾出地盘——空间。枪毙共产党政委的命令刚一下达，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残暴措施，目的在于消灭俄罗斯人并把德意志人移居到他们的土地上。^[23]中欧、东欧和意大利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对德军官兵来说，尽管他们在1941年进展神速，处处却是一片焦土、冰天雪地，而全无占领巴黎时的那种乐趣。不久，俄国战俘增加了德国工厂的劳动力；又过了一些时候，德国主妇高兴地发现她们可以得到俄国农村姑娘充当用人。

随着对俄战争的发展，在德国及其占领下的欧洲加强了恐怖统治，尤其在波希米亚更是如此——在这里，慕尼黑协定留下了对西方的怨恨，恢复了亲近俄国的旧有感情。捷克人十分担心会遭到驱逐^[24]，在实践中，德国工厂需要他们的劳动。到这时，捷克和波兰的流亡政府已在伦敦建立。马扎儿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旧有的反俄情绪的驱使，同意加入德国人一方对苏联作战。

恐怖统治如今包括用毒气来消灭犹太人。1941年夏，希姆莱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开始对其下级，诸如艾希曼，发出执行“最终解决”这一做法的命令。同一个海德里希，于1941年9月被派往布拉格代替请病假的“摄政者”冯·牛赖特男爵进行统治，也绝非偶然。这是老统治阶级悄悄从后门离去的一例。军事运输问题越是吃紧，总是可以抽出卡车来运送犹太人到奥斯威辛去用毒气处死。这件事就显得越为突出——同时，也就越发显得难以形容地残忍。纳粹的做法是严密地掩盖这种罪行。任何人稍一涉及真相，就会被指为敌人。因此，一般人在威胁下只好加以回避，“不闻不问”。正因为有教养的人感到难以相信，在20世纪竟会犯下这般罪行，掩盖罪行也就相对地容易了。

1942年中欧政治、社会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海德里希于5月底在布拉格被刺。结果，他于6月初死去。此人是德国秘密警察的智囊，很可能是无人可以代替的，但是，他已经开创的诸如消灭犹太人之类的罪恶做法，仍然继续下去。对他的刺杀是由一名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从伦敦乘飞机空降后进行的。这个事件并非没有它的象征意义。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区内纳粹恐怖统治的极大加强；捷克人过去一直是过分就事论事、不动感情，不能向世界舆论有力地申诉他们的情况，现在终于使公众心目中对那年夏天夷平利迪策村和莱萨基村的罪行有深刻的印象：在布拉格附近的这两个村子里，全体男人遭到屠杀，全体妇女被押往集中营，而儿童们全部失踪。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成功地使利迪策事件成为暴行的代名词。

在德国人占领的所有国家中，南斯拉夫的山区——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具有最适宜游击战的地形，游击战很快就爆发了。不幸，出现了两个相互敌对的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代表了向后看的狭隘的塞尔维亚观念；而人称铁托的共产党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一半是克罗地亚人，一半是斯洛文尼亚人。萨格勒布的帕维利奇政权冷酷地屠杀了大量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从而使克罗地亚人对铁托变得不那么怀有敌意。1942年11月，铁托感到羽毛丰满，可以在波斯尼亚的比哈奇召开他所谓的“国民大会”。事实上，到会的只是一小群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但是，从那以后，铁托的游击队抓紧一切机会打击德国人，而米哈伊洛维奇的追随者们却按兵不动，或者与意大利占领军相互勾结。南斯拉夫的这种局面逐渐变得不可收拾，这一点希特勒十分清楚。

希特勒于1941年圣诞节在莫斯科城外受阻，遂于1942年重新发动攻势。那年年底，盟军出乎他的意料于11月份在北非登陆。同时，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进行的抵抗，也使他感到吃惊。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整个冬季震动了中欧和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队都遭到惨重的损失。最后，犹如晴天霹雳，德国将军保卢斯及其部队尽管明知希特勒禁止投降，仍然于1943年2月1日向俄国人屈膝了。

在许多方面，意大利是轴心国统治下的欧洲在1943年里最有兴趣的地区。公众舆论对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宣战一事，并未表示多少热情。10月份的对希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而且毫不顺利。经济

困难日益增多，盟军空袭不断增加。共产党在工业化的北部保存了若干支部；随着政治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的活动日益频繁。1943年3月，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给遭到轰炸的工人予以补偿；人们知道有些厂长也持同情态度，而法西斯当局则束手无策。都灵的罢工浪潮刚刚平静下来，米兰的几家大工厂又举行了罢工。这些是轴心国统治下的欧洲所发生的第一次真正严重的罢工。或许应该加以补充的是，德国本身进行罢工的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外国奴隶劳动（事实就是这样！）的比重现在已经很高，举行任何罢工行动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墨索里尼于4月份在克莱斯海姆会见希特勒时，他的副外长巴斯蒂亚尼尼告诉里宾特洛甫，意大利由于经常发生工潮而无法继续进行战争。此时，墨索里尼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阿拉曼战役于1942年10月粉碎了他在非洲的妄想；1943年5月，突尼斯落入盟军手中（见下文，第二十四章）。德国人知道意大利人想要求和，便增加了他们在意大利的各种人员；这使得意大利人更加反对德国。在犹太人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反对纳粹的政策，他们成功地给希姆莱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事情都汇报给希特勒；后者在1938年5月作为德国元首访问意大利时，就极为讨厌意大利国王，他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维克托·伊曼纽尔。这倒有一定的道理，意大利国王原来就不愿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并正在谨慎地考虑免去墨索里尼的职务、进行和平试探的问题。但是，他害怕人民的压力，于是等待到7月下旬。此时，盟军已在西西里登陆，除了德军以外，并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7月24日，墨索里尼被说服，召开了法西斯党的大理事会。格兰迪和现任驻梵蒂冈公使的齐亚诺^[25]提出一项赞成恢复国王权威的措辞含糊的动议并使之获得通过。维克托·伊曼纽尔已决定任命巴多利奥元帅取代墨索里尼，而将后者免职并逮捕。顿时，如同魔术一般，法西斯主义似乎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可是，希特勒派了一名党卫军特工人员于9月12日绑架了墨索里尼，并迫使这位意大利头目建立一个以加尔达湖为根据地的新的法西斯共和国。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这个依附于希特勒的共和国对盟国支持的君主国进行了一场日益败北的斗争。1945年春，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们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在出逃时被抵抗运动战士抓住枪毙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悲惨而充满破坏性的时期。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站在盟军一边对新的共和国作战最为积极的力量，正是痛恨萨伏伊王室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是为一个新的经过改造的意大利而战，尤其是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

会主义而战。最后，实现这一理想的意大利游击战士们（值得记住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就曾对佛朗哥作战）建立了不亚于任何地方的抵抗运动战士的功勋。希特勒还是死死抓注意大利北部的工厂不放，但是，这些工厂的工人在某些方面都是他在意大利遇到的最厉害的敌人。

墨索里尼掌权21年之后于1943年7月25日垮台，这个事件，深刻地震动了轴心国世界。人们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这样做了），对于这件事了解得十分详细。在德国，斯大林格勒战役产生了它的影响。不仅如此，盟军的空袭在1943年也比以前厉害得多；尽管一致的意见似乎是：破坏交通比制造恐慌情绪更起作用。的确，就人们的反应而言，柏林实质上与伦敦并无多大不同；尽管对柏林的空袭破坏性更大，并且终于在1943年8月1日宣布柏林开始疏散人口。从此以后，凡是可以撤离的人，都被送往德国各省。在以前，人们也许被疏散到西里西亚或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到重新夺回的“西普鲁士”。但是，现在既然俄国人尽管仍然遥远却不断挺进，就最好前往苏台德区或奥地利或巴伐利亚了。

在纳粹德国这样残暴的警察国家里，组织任何有效的反对行动是极为困难的。只有在军队里担任关键职务的人们才能做到这点——这种说法大概实际是对的。衷心反对希特勒政权的路德维希·冯·贝克将军于1938年辞去参谋长的职务。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机构保密局里和他一起工作的军官们曾进行了策划，但是秘密警察在1943年逮捕了其中几个关键人物，并于1944年年初安排了卡纳里斯的免职，同时接管了他的职权。最后，在1944年7月1日，即盟军侵入诺曼底不到一个月之后，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被任命为后备军指挥官弗罗姆将军的参谋长。施陶芬贝格和一些人一样，确信希特勒是个必须加以消灭的罪犯。他于7月20日利用他任新职之便，在东普鲁士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在希特勒身旁放置了一颗炸弹，然后找了个借口马上离开会场并乘飞机去柏林。他在动身之前目击了炸弹的爆炸，因此在到达柏林时认为可以报道希特勒的死讯。他和他的朋友们已制订了控制驻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军队的计划。对施陶芬贝格很不幸的是，虽然在腊斯腾堡炸死了4个人，希特勒却得以幸免，仅负轻伤。这位元首由于这件事表明他得到天佑而更加得意，便对阴谋反对他而露了马脚的各种人发动了近乎疯狂的报复和威吓运动：他生命的最后9

个月，对于德国和仍然处在德国人占领之下的地区来说，确确实实是一场噩梦。

盟军对法国的入侵取得了成功，巴黎于1944年8月23日获得解放。不过，对东欧来说，这一天倒由于罗马尼亚发生的事件而更值得纪念。当年3月，俄国人征服了比萨拉比亚——在同一月份，德国人完全占领匈牙利并镇压了当地最后的抵抗行为。自从卡罗尔国王于1940年退位以来，一位军人，安东尼斯库元帅，专横地统治着罗马尼亚。他倒不是通过他所鄙视的铁卫军，而是用略微体面一点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他的旺盛精力、爱国情绪和反犹太主义都使希特勒满意。尽管当时的亲法西斯潮流把马纽推在一旁，但他像克罗地亚的马切克一样，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人们知道他在轴心国迫使罗马尼亚向匈牙利割让领土时曾经提出抗议。年轻的米哈伊尔国王（他是现居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的同时代人）在他母亲和马纽的敦促下于8月23日将安东尼斯库免职并逮捕，并准备成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两天以后，他和他的顾问们倒戈向德国宣战。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就这样交给了俄国人掌握。这是1900年以来德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二次结束。保加利亚也反戈一击；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赶出雅典和贝尔格莱德；铁托的游击队对南斯拉夫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证明他是正确的。在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和民族主义游击队之间的斗争还要持续若干时候；在这里，没有苏联军队来帮助共产党。

与此同时，在俄国人挺进的前景下，波兰人于1944年8月1日发动了反对驻波德军的起义。8月早些时候，在一些捷克志愿者参加下，发动了反对德国保护下的斯洛伐克政权的重大起义。这些事件不但造成了巨大的苦难，而且暴露了西方盟国和苏俄之间的分歧——这正是希特勒最大希望之所在，也是他进行垂死挣扎的最大原因。在整整6周的时间里，俄国人拒绝让西方飞机去支援波兰人（这些飞机往返波兰必须在东方重新加油），因为这是整个波兰民族的起义，而不是其中成为共产党人的那一小部分人的起义。这样，德国终于把华沙的起义镇压下去，屠杀了许多华沙居民。俄国人对斯洛伐克起义的态度比较暧昧。德国人仍然能够及时地镇压了这两次起义，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匈牙利的另一次危机。这里，摄政王霍尔蒂于10月中旬决定克制自己的马扎儿人的骄傲和成见，向苏联求和。他的总司令向俄国人投诚了。

德国人于是把匈牙利置于箭十字党领袖萨拉西的控制下；他们在布达佩斯一直坚持到次年3月，甚至到了1945年2月，还在那里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时，俄军已越过波兰，进入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然而，除了匈牙利的一小块地区以外，德国人仍控制着人们常说的欧洲的钥匙——波希米亚。直到1945年4月，美国部队才在那里以及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和俄国部队会师。由于美国对日本的不必要的担心，当时就决定了中欧的命运（至少就下一代人而言）；为了取得俄国对日作战的多余的支持，美军只好撤退，让苏军去占领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些地方当时并没有落入西方手中，但是俄国人被给予控制这些地方的权力，如同控制布达佩斯一样。在俄国人包围柏林之后，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

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的社会情况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变得高度政治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抵抗运动，或者予以支持，或至少通过破坏来妨碍当局。城市里的多数人都经常挨饿，只有德国人自己的食柜总是颇为充实（这与1917—1918年完全不同）。随着1944年秋天的来临，德国人开始感到易北河以东处于危险之中；西方盟国不久即将侵入德国西部，但人们对他们却不那么害怕。于是，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里，而且在一个空袭不断、铁路被毁、败兵溃退的异常寒冷的冬季里，人们纷纷西逃，柏林的政府各部也在加紧疏散。迁移的人群汇入了日益扩大的难民洪流——这些难民是直接从俄国人及其庇护下的波兰共产党人（这时他们终于组成了一支队伍）的控制下逃命的。结果使奥得河—西尼斯河一线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实际边界线。欧洲所有的德意志人在1945年以后都居住在这条边界的西面，聚集在一个相对说来很小的区域里；除此以外，仅仅在匈牙利还有一批大约25万人的讲德语的居民。

在1900年至1945年的时期，德国、意大利和东欧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不论是好是坏，在20世纪初仍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到了这个结束时期终于被消灭了。所谓1944年7月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是由“封建反动分子”策划的神话，全然是无稽之谈。社会各阶级的人们都参与其事，尽管倡导者必然是一批军官，其中有些还有贵族的姓氏。此后，俄军拥入了德国东部，这正是许多大土地产业遗留下来的地区。俾斯麦小儿子比尔的遗孀对骑马逃往西部的登霍夫伯爵夫人说她太老了，不能离开在瓦尔青的祖业^[26]——她不想再活下去了。俄

国人来了，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在勃兰登堡的娄文布鲁克，一个俄国军官和他的士兵们准备枪毙冯·丹·克奈塞贝克夫人。但是在她的庄园上干活的80名俄国战俘都高呼“妈妈”“妈妈”以示抗议，从而救了她的性命^[27]；她曾有胆量、富有人道地对待他们，这需要有极大的胆量，因为这样做是完全违反纳粹规定的。这是东欧贵族阶级及其势力和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曲。

（潘绍中 译）

[1] 即克莱彼达，在苏联立陶宛共和国现境内。——译者

[2] 在霍亨索伦帝国的全体居民中，约有36%信奉天主教。

[3] 严格地说，他的名字叫冯·施杜姆-哈贝格男爵，是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贵族院议员，对威廉二世颇具影响。

[4] 《施皮蔡姆贝格男爵夫人的日记》（1960年），第403页。

[5] 见原文第477页。

[6] 即使在奥地利实行这种做法很久以后，俾斯麦仍特别反对给议员发放薪俸。

[7] 1907年，奥地利的帝国咨政院被赋予立法权，但事实上，帝国政府在其存在期间一直都用特殊条款形式独立地制定法律。

[8] 圣斯特凡（975—1038年）是1001年起任匈牙利国王的第一个人，因此圣斯特凡王冠被用来指匈牙利的任何君主，此处即指哈布斯堡王室。——译者

[9] 帝国和皇家两个字在德语中都以K开始，所以人们把它简称为“K和K”。

[10] 这一点只是到了1913年才以条约形式得到承认。

[11] 实际上大约占总人口的35%。

[12]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在墨西拿地震中丧生。

[13] 这项条约是在1915年4月26日签订的，协约国许诺给予意大利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及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不包括阜姆、斯普利特和拉克萨，但包括亚得里亚海中的岛屿），并让它实际上占有阿尔巴尼亚。

[14] 这些选举由于穿黄卡其军衣的复员军人起了重大作用而被称为“卡其选举”。——译者

[15] 即格但斯克，现属波兰。——译者

[16] 这件事的时机看来并没有让希特勒感到高兴（至少他表面上显得并不高兴）；但行动本身对他来说，肯定不是坏事。

[17] 尼默勒于1937年7月被捕。

[18] 弗兰茨·卡夫卡 (Franz Kafka)，奥地利作家。——译者

[1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编，第一卷，第十九号。

[20] 她于1939年被德国人逮捕，并于1944年死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见M. 布贝尔-诺伊曼所著《卡夫卡的朋友米莱娜》（1965年）。

[21] “全国水晶夜”指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采取行动的借口是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巴黎被一个犹太人杀害。但是，即使没有此事，戈培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一个口实。

[22] 指毕苏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组织的波兰军团的成员。——译者

[23] 参见《德国外交文件》，J编，第十三卷，114号。另见布赫海姆、布罗扎、雅各布森和布劳尼克《对党卫军控制的国家的剖析》（1965年）。

[24] 霍斯巴赫备忘录表明，希特勒确实有过这种想法，见《德国外交文件》，J编，第一卷，19号。

[25] 墨索里尼之婿，1936—1943年任外长。

[26] 见马里昂·登霍夫《不再使用的称号》（1964年），第36—38页。

[27] 瓦尔特·凯特尔：《施洛斯-娄文布鲁克的夜晚》，载于《新苏黎世日报》，1965年1月21日。

第十七章 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20世纪初，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特点，可以说是尊重人民主权的原则和一个建立在以贵族和资产阶级构成的有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北欧和西欧各国的特点尤其是如此；除实行共和制的法国以外，其他各国政体的形式都是以选举制度作为支持的君主立宪制。而这种选举制是以财产条件限制作为基础的，因而人民的代表通常是被排除在选出的议会之外的。政治斗争局限于统治阶级的两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但是，任何一派都从未想到以任何方式来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甚至社会主义，由于尚在初期，也未强大到足以对社会格局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

但是，在随后50年间，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动摇，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加（虽然增长率仍低于其他地区），但主要是因为工业的增长。这就要引起整个人口的社会 and 职业分配的大变动。而且，由于社会各不同阶级之间的力量均势发生了变化，又必然造成这个社会各种制度和精神状态的根本变革。因此引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大战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加速了这些变革的节奏。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西欧和北欧那些至少在1940年以前能够避免出现一场社会变革或独裁政权的国家，即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般说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发展的，虽然不可能确言各种事件总是完全同时发生的；情况有千变万化，这可以解释为各国的特点和传统的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且各国还有各自特有的问题等。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切实地说，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方面的变革，都是为了实现代议制的民主化、扩大国家职能、社会主义的高涨（它在剥夺原来统治阶级的无限权力方面获得了成功）以及拉平生活水平——但是，这并没有防止财富分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一 20世纪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

法国在1848年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原则，但是在英国，尽管1884年的选举法已将选举人的人数从400万增加到500万，选举权仍不普遍，在几个选区拥有房产、地产的人，仍然可能享有多选区投票权。在瑞典，3/4的公民没有选举权。在荷兰，仍然实行财产条件限制，不过1896年已将这种限制从10个弗罗林减为一个弗罗林。比利时1893年实行一人多选区投票权，从而给予拥有价值2000法郎的财产或有100法郎收入的公民和户主，以及达到一定教育水平的人以额外的选举权。但是，就整个人口来说，选民所占比例一般仍然很低：法国为26.6%（1898年）；比利时为22%（1900年）；荷兰为11.9%（1900年）；挪威为18.6%（1900年）；而在瑞典，只占7.4%（1902年）。

各国都实行两院制，但是这一制度总是由于上院拥有广泛的权力而被削弱，而上院又是从那些在人口中所占的范围远比下院狭小得多的人中选出的；同时也是由于国家元首手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不过这种权势极易变动。

议会制还只是在挪威（自1880年）、丹麦（自1901年）和英国等少数国家中牢固地确立了起来。英国堪称模范，受到各国自由党人的赞赏。英国女王总是选择多数党的领袖为首相。这个制度在法国却不很成功。法国的政党很多，这就造成政府的不稳定。在荷兰也不很成功，那里的人们由于对宗教和政治的效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联盟。

除挪威以外，原来的贵族仍然拥有极大的权势，特别是在上院和宫廷中——在比利时和荷兰，特别是在瑞典，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但是，与贵族共同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他们得到教士和农民群众的支持。除英国外，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部分。代表权仍然全部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在英国，1900年只有两名工党成员被选入下院；在法国，只是由于1902年的左翼选举，才有57名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当选，占议员人数不到10%；在瑞典，1905年才首次有一位律师担任大臣。

工人阶级本身，由于人数少，组织不完善，仍处于孤立状态。工会运动在英国有其最早和最重要的发展时期；而在法国，工会组织却由于人们对巴黎公社的记忆而受到阻碍。工会会员的人数，在英国从1885年的5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125万人；但是在法国，1902年法国总工会与工人联合会合并时，会员也只有12.1万人。另一方面，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非常活跃，虽然这一运动仍然分裂为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盖德派与改良主义者两派。在英国，直到1900年2月，工会、社会民主联合会（唯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129名代表才组成劳工代表委员会，负责建立一个完全区别于其他党派的独立自主的团体，此后称为工党。

二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府（1900—1914年）

在20世纪的最初年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政治民主只有通过实施普选权、巩固议会制并将权力完全转入中产阶级手中才能实现。正是在这些原则问题上，统治阶级中的两派——保守主义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不管他们自己怎样称呼自己（在英国和比利时叫自由党，在法国叫激进党）——进行着斗争。自由党人得到工人阶级政党（工党和社会党）的支持，因为这些政党还不够强大，只能在斗争中提供支援。随着自由党纲领的逐渐实现和一些带政治性的根本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由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合作就越来越不稳定。社会党人对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各种诺言和权利日益不能忍受，不久就要求进行结构改革，而他们以前的同盟者势必要拒绝这些改革。

1899年，一场特别严重的危机，即德雷福斯案件，震撼了法国。这个共和国受到陆军、教会和那些企图回到过去的人们的群起反对，以远比他们在布朗热运动时期更为激烈的手段对它进行攻击。共和派，从进步人士——这时成为民主同盟——到社会党人，通力合作支持由瓦尔德克-卢梭组成的“保卫共和国政府”。在这个政府中，社会党人A. 米勒兰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象征性地并肩站在一起。瓦尔德克-卢梭和孔布领导的两届政府花了5年半的时间来彻底解决德雷福斯案件，因为他们必须清洗陆军最高统帅部，逮捕并审讯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尤其是要削弱教会的势力，因为教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它为了反对1789年的“无神派”和“假教条”，在每次发生危机的时期，都动员它的教徒支持反对共和的右翼政党。1901年法令是为了镇压教会中较易妥协的各派（“结盟的僧侣”和“经商的僧侣”），而将其余的人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孔布在使两院拒绝提交给它们的大多数授职请求方面取得了成功。他执行1901年的法令时雷厉风行，从而引起与梵蒂冈的争吵并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导致了1905年12月的政教分离。这些措施是在一种近于内战的气氛中进行

的，每当编制教会“财产目录”，或在抵制实施这一法令的宗教团体被驱逐时，民族主义分子就发动示威游行。

从中左派、左派和社会党人当中产生的温和派的联盟，由于所有各派的代表组成了左翼代表团而得到巩固。这些代表对共同的重大问题联合做出决定，这些团体只能从让·饶勒斯的蛊惑人心的雄辩中得到好处。但是，一些温和派分子对当时的一些事态发展感到担心。到了1906年，随着克列孟梭政府的上台，由于社会党人对野蛮镇压法国北部的罢工投了不信任票，这一联盟实际上已开始分裂。

在这个时期，两个主要的左翼团体最后组成了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派。1901年组成的“激进—激进社会党”，将成为法国直到1940年为止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党，其成员在每届政府中均有一名出任总理，或至少主管一个处理内部事务的关键性的部——教育部、内政部或农业部。这个党代表外省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秩序”，主张大经济；尽管它敌视富有的上层阶级，却反对城市工人阶级的要求和主张。它是保守的、沙文主义的，并且不信任当时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它在该党1904年图卢兹代表大会上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党”，赞同私有财产。具有各种不同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们——盖德分子、布朗基分子和主张参加政府的改良主义分子——通过1905年举行的一次团结代表大会联合起来。他们声明支持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谴责了改良主义和参加政府）的决议，并组成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和饶勒斯才智上的声望，都使该党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巩固：社会党党员从1905年的3.5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7.2万人，获得的选票从1906年选举中的83万张（51名候选人当选）跃增到1914年选举中的140万张（103人当选）。

1902年各工会组织与法国总工会合并。法国总工会通过它的总书记格里甫埃勒，给予革命的工联主义纲领以全力支持。这个纲领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各种破坏活动和罢工作为总罢工的前奏。它在1906年在亚眠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声明它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但是，在将近750万靠工资生活的人当中，只有83万是工会会员，而且只有30万人参加法国总工会。因此，法国的工联主义是一个与英国的工会运动完全不同的运动，是一个与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任何公开承认的联系的少数派团体，它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和暴力革命的纲领中吸取精神力量。这种态度变得强硬，是由于他们对左翼联合政府——左翼集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社会改革既感到失望也感到不安的结果。1904年，服役期减为两年，但是豁免服役的权利被废除了，工作日规定为每天10小时——仅限于混合企业。工人种的种种要求都碰到激进派设置的社会保守主义的障碍。克列孟梭的政府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和罢工的答复，是禁止1906年5月1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是用警察进行野蛮的甚至血腥的镇压，在镇压库里埃公司所属矿井的矿工时还动用了军队。这种对付电气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工人（1907年）和基建工人（1908年）的镇压，以采取法律手段阻止政府雇员——已参加法国总工会的小学教师和1909年举行过罢工的邮政部门职工——组织工会而达到顶点。法国南部也发生了严重骚动，种植葡萄的农民抗议市场上葡萄酒的价格暴跌，一些市长和市会议员辞职，群众暴动，纳尔榜的区长的官邸被烧毁，在当地招募的第十七步兵团的士兵发生兵变。

1906年的选举因为运用了“共和国纪律”的原则，对左翼联盟来说是一次胜利。由于没有拥有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左翼选举人在第二轮投票时投了获得选票最多的左翼候选人的票。左翼联盟获得多数，拥有325个议席，而右翼各党派则减少到174个议席；以往，要构成多数，90名中左温和派分子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时他们却转而投了中右派的票。但是，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工人阶级和政府低级雇员中的骚动，而镇压政策又进一步使他们脱离了激进党。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之间的冲突，在其他问题上也有所加剧。这些问题是与沙皇俄国（当时正残酷镇压革命）结盟的政策；德尔卡塞所主张的敌视德国的政策；以及殖民地政策，这一政策造成饶勒斯谴责“殖民党”在摩洛哥的冒险事业，正如几年以后他要支持卡约在阿加迪尔事件后缓和国际局势的政策一样。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不仅右翼，就是激进派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和社会党人不一致：他们关心的是工联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宣传，是过分频繁的罢工，此外，还害怕陆海军预算的大量增加，1909年对工人抚恤金进行投票表决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以及购买西部铁路系统所需的开支，势必要实施卡约所提出的所得税。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分子的宣传活动，各党派这时正借助这一宣传活动进行重新组合。由于反对三国同盟的英法协约的缔结，由于威廉二世在摩洛哥的主动精神，由于1906年德尔卡塞不光彩的免职，以及1911年的阿加迪尔事件，受到天主教强烈影响的民

族主义便又重新抬头；这时，天主教正被坚定地推向采取与政府合作的原则。右派热衷于大张声势地宣扬教皇庇护十世为之行宣福礼的贞德，借以吹捧以不喜欢共和政体闻名的利奥泰元帅的殖民事业，并煽起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侵略主义的爱国主义。1910年白里安用征召铁路工人入伍的办法破坏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因而获得激进党中派和右派中的多数的信任票，这时，各党的联合遂告破裂。中左派的成员被任命担任政府中四个最重要职位中的3个职位：保罗·德夏内尔任众议院议长，雷蒙·彭加勒任共和国总统，路易·巴尔都任总理。这时，这一新的反社会主义的多数便充分暴露出来；正是这个多数派，投票通过了把兵役制延长到3年的立法。

左派重新统一后，在1914年的选举中获胜：他们提出了一个反对三年制兵役法和“愚蠢的重整军备”的政纲，因而300名左翼候选人当选，其中包括130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人，而右翼候选人只有120人当选。然而赞成保持三年制兵役法的仍占多数。虽然以前的议会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左翼议员，但向右转却是无法否认的，因为这时激进派资产阶级背弃了它原来的同盟者，认为他们所提倡的一些改革很可能危及国家、财产、安全和秩序。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政治演变，也是趋向制度的民主化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瑞典由于贵族和君主政体的势力较大，政治演变的进程最缓慢。尽管这样，1906年后，右派逐步地被排除，1901年成立的自由党终于在下院中获得了多数席位。1907年，选举的改革降低了上院选举中的财产条件限制，并限制了一人多选区投票权；选民范围扩大了1倍，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已成为全国的主要政党。但是，国王还未完全承认议会政体；1914年2月6日，他在一次3万农民民族主义分子举行示威游行时，公开宣称他本人反对斯托夫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并迫使它辞职。在丹麦，左派反对党自1906年起实力强大起来；激进党领袖萨赫勒领导的政府，被敌视大地主的农民以及社会民主党扶上了台。

挪威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较深入。它曾经受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阻碍，这一斗争最后在1905年6月解除了与瑞典的联盟，并建立了经过公民投票认可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自此以后，自由党分裂为两派，其中比较进步的一派温斯特勒派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自1908年至1919年组成政府（1909—1912年除外），通过了有关利用自然资源和外国投

资的进步立法。君主政体的权力削弱得最厉害的也是在挪威；加冕典礼和授予圣职的仪式在1908年即已废除，有关宪法问题的批准权也在1913年废止。

在荷兰，权力仍然保持在3个宗派的政党手中。一直到1913年，自由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在上院居于多数（拥有100个议席中的55席），并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权。在比利时，斗争甚至更加艰巨，自由党人被教会的专横势力所激怒，遂与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他们的联合在1908年成功地迫使他们的反对派同意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实行的是便于顶替的、用抽签方法挑选的制度），1914年又迫使他们同意实行义务初等教育。自1906年起，发生多起工人阶级的骚动，历次罢工都遭到野蛮的破坏。这种骚动，和其他地方一样，使自由党陷于分裂，它的一些成员感到惊恐：战争的冲击终于扫除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最后障碍。

在英国，1906年的选举是发生决定性变革的信号。1900年，保守党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击败了分裂的自由党人和出现不久的工党运动；为帝国主义派在南非战争中获胜而举行了喧闹一时的庆祝；凡此种种，都没有阻止人们对经济形势日益增长的忧虑。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以及所有的主要大国所采取的保护贸易的政策，都给英国的工业造成了重重困难。早在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就提出要实行帝国优惠制，这种制度将成为未来的英联邦的基础。保守党意见分歧；许多实业家，主要是兰开夏的出口商，反对这种前途未卜的轻举妄动的做法。自由党人得到赞成自由贸易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对1902年的教育法心怀不满的非国教教徒的支持；1905年贝尔福辞职。自由党温和派的坎贝尔·班纳曼组成了一个由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派和格莱斯顿激进派，并包括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在内的内阁，并于1906年1月获得压倒的胜利；下台10年之久的自由党赢得了399个议席，保守党党员（其中2/3是关税改革派）获得157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得83席，工党候选人获得29席。

新政府抛弃了帝国主义政策，1906年通过了劳资争议法，撤销了威胁到工会基金的1901年的塔夫·维尔判决。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去世，由阿斯奎斯接任，劳合·乔治担任财政大臣。实行了许多改革：由霍尔丹改革陆军；费希尔勋爵改革海军；制定了养老金法案，规定给予年过70的老人每周五先令；投票通过实行煤矿工人八小时工

作日制。最重要的是实行税制改革，以便为这些改革措施提供经费。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要重新分配财富。1909年的预算主要是针对富人，它降低了对户主征收的所得税，但是对汽油和汽车征收特别税，而且凡土地易手时则征收20%的土地自然增值税。上院拒绝了这个预算。为了保证这些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进行两次大选，同时还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削减上院的权力以实现民主化。

自由党人和上院议员之间的冲突，类似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存在的同样的冲突。在法国，这一冲突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过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保守党的上院议员们对于自由资产阶级怀着古老的贵族世家的全部轻蔑；对于自由党和工党中的无数小人物——劳合·乔治本人就是一个教师的儿子，而且是由他的当鞋匠的叔父抚养成人的——以及新近发迹的中产阶级，他们也是抱着轻蔑的态度。他们对于自由党的计划，一贯采取反对的政策。劳合·乔治对预算案的辩护极为有力，使上院议员们狼狈不堪。1910年1月，275名自由党候选人当选，273名保守党人当选，40名工党党员当选，82名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当选。由预算引起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但是在宪政方面斗争仍在继续：具体规定——并限制——上院的权力是当务之急。乔治五世几次试图调解均告失败，于是举行了另一次选举，保守党人再次失败，在加封一批自由党贵族的威胁之后，通过了议会法案。上院否决权的有效期限缩减为两年，但是，作为补偿，一届议会的最长任期从7年减为5年。

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因为工党和爱尔兰议员总是和自由党人投一致的票，而自由党人方面也只有保持这种支持才能继续执政。因此这种联盟比法国议会的联盟的基础更巩固，虽然这种联盟不久即将受到危害，但还没有破裂。这时，英国社会正经历一个强烈不满的时期。工人阶级抱怨由于工资不动而购买力降低，因而他们并未享受到普遍繁荣的果实。除了这些经济因素以外，工人当中还滋长了一种感到日益遭到挫败的沮丧情绪。他们谴责他们的代表太软弱，对自由党跟得太紧，例如，1909年当自由党拒绝撤销上院支持的“奥斯本判决”（这一判决危害工会的政治性动员）时；还有，当人们获悉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是受俾斯麦为工人阶级制定的立法影响而制定的，该法规定财政部不提供资金，而由工人自己筹措一部分资金时，工人的代表们都过于跟从自由党。正如也主张罢工、联合抵制、使用暴力和实行

总罢工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工联主义的势力，对英国工运发生过作用一样，支配法国总工会的工团主义势力，会对英国的工运发生作用就不足为奇了。党员人数寥寥无几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倾向，渗透了工党党员的队伍；无数的传单和小册子纷纷出现，谴责工党领袖的种种怯懦而又蛊惑人心的政策，号召采取直接行动。1912年创刊、1913年起即由乔治·兰斯伯里编辑的《每日先驱报》，发表议论，主张采取有力的行动，并谴责自由党联合政府。1911年、1912年和1913年，在矿工、铁路工人、棉纺织工人、海员、码头工人和舰只修造所工人中相继发生了多次罢工，在默西河畔和南威尔士还曾调来军队，有时竟然发生流血事件。大战前夕，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结成“三角同盟”预示着一场总罢工将来来临。

在另一个领域，自由党人顽固地拒绝给妇女以选举权，这就激怒了鼓吹妇女参政的各小团体，她们这时便更加频繁地举行示威游行和采取暴力行动。再者，爱尔兰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北爱尔兰发生内战的威胁，使社会立法陷于停顿，自由党及其多数地位亦被削弱。

英国的保守党也像法国保守派政党一样，实际上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1910年他们在国内政策上被击败后，就把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上：他们是英帝国和君主政体的支持者，反对将于1914年实行的爱尔兰自治，而且，他们鼓励爱德华·卡森爵士组织一支决心用武力反对自治的北爱尔兰志愿军。这一威胁行动的结果是爱尔兰志愿军的建立和内战威胁的更加迫近。而且，由于1914年3月英国在爱尔兰的一部分驻军中的军官哗变，内战威胁就更形严重了。

虽然自由党政府继续推行它的社会立法计划（1909年的劳工介绍所，1911年的健康保险和有限的失业保险计划），但是这只能加深自由党人与工党支持者之间的鸿沟。自由党改革派并不想改革现存的社会秩序，因而他们的努力不可能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1906年取得胜利的党，开始衰落了。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1914—1921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去解决许多不曾预料到的问题。至于中立国家，它们的日常活动也被这场大变动打乱，只是在部分程度上避免了这场灾祸。它们也必须对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临时提出解决办法。

各参战国中自发地建立起一种“神圣同盟”。在法国，尽管一名“法兰西行动”的追随者暗杀了饶勒斯，但政党之间的休战仍然实现了。各地的罢工业已停止。在英国，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团体和爱尔兰问题引起的骚动都已停止，甚至像拉姆齐·麦克唐纳那样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发表声明支持1914年9月的征兵运动。在法国，勒内·维维亚尼建立了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朱尔·盖德和保守派代表阿尔贝·德门。在英国，阿斯奎斯于1915年5月组成了一个由12名自由党人和8名保守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包括工党的阿瑟·亨德森和自战争爆发后即担任陆军大臣的吉钦纳勋爵在内。

破坏比利时的中立，犹如有关德国人在此利时暴行的报道——严重地夸大了——一样，激起了普遍的愤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为被侵犯了的权利而战斗的感情。一阵最朴素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冷静的分析。对于这种感情的浪潮，像罗曼·罗兰、一些杰出的社会党人和工党的支持者、克莱德和南威尔士的社会主义的工联主义者，以及法国的金工联合会等则不以为然。

但是，这种一致不久就消失了。随着战争拖延下去，原有的种种分歧又重新涌现出来。来自前线的报道，很快暴露出武器和弹药不但缺乏，而且使用不当。生命和物资白白地浪费，而且，拥有无限权力而政府又控制不住的军事领袖们则独断专行。霞飞将军发动的猛烈而无成效的攻势，以及他在整个1915年所采用的愚蠢的“消耗”战术，受到战斗部队及其在议会两院中的代表们最严厉的批评。法国的三任

陆军部长，1914年的梅西米，1915年的加利埃尼和1917年的利奥泰，都对统帅部的越权并对任何控制表示抗拒的行为不满。在英国，达达尼尔海峡战役造成海军上将费希尔和这次战役的鼓吹者温斯顿·丘吉尔的辞职。1916年1月实行的征兵，又引起工党代表和许多自由党人的反对。对军需品短缺和各国政府的软弱提出批评的结果，是设立了军需大臣（或部长）等职务，并使一些决心以非凡的干劲指导战争的人物上台掌权：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乔治·克列孟梭于1917年11月先后执政。这样，权力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有5名成员的英国战时内阁（1917年5月，加上史末资将军和其他自治领的代表，组成英帝国战时内阁）和1917年接近年底时成立的由总理、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军需部长和财政部长组成的法国战时内阁。

各国都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战时独裁，因为各种决定都必须在议会之外做出，事后再交议会批准。1914年通过的“保卫国土法案”把有关武装力量和平民问题的全部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包括不经审讯即可扣押人员的权力。在法国，通过宣布紧急状态而将同样的权力授予政府。出于对军事行动保密的需要，扩大了对报刊和邮件的检查。对政府的决定和文职官员的行为、投机商和逃避义务者提出批评，均被认为是国防和战斗人员的士气不利的。报刊，特别是左翼和反对党的报刊，如《自由人》——克列孟梭的《被奴役的人》——不断地有文章被删掉。这些滥用权力现象在法国是彰明较著的，而在英国却少得多，因为在英国，人们对于保卫个人权利的传统比较尊重。

但是，政府仍然被迫做出了让步。在法国，两院召开秘密委员会，听取不能公开的报告；派出“特派员”对军队进行节制。1914年至1918年间，内阁经过7次近于彻底的改组——只有一次（潘勒韦垮台，由克列孟梭接任）是由于两院中的一次选举失利造成的——这一事实就证明了形势的严重。英国的情况也相类似，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和卡森鼓动人们起来攻击阿斯奎斯的所谓渎职，《泰晤士报》也在推波助澜，结果便由劳合·乔治出面组成联合政府。

政府监督扩大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领域：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雇主利润、雇员工资、工作日长度以及劳资纠纷等。行政管理机构大大地扩大了：1914年到1923年间，英国的文职人员增加了1倍，设置了一些新的部，如1917年设置了军需部、粮食部、优抚部、劳工部和封锁部，1918年成立了航空部和重建部。法国也设置了主管军需

品、粮食、卫生、军用航空、军法和研究重大军事发明的国务部长和次长。

一些社会问题再次具有从前那样的紧迫性。1915年，工会领袖放弃了罢工的权利，交换条件是设立全国协商委员会并在每家工厂任命工人代表。同样地，在法国，军需部长阿尔贝·托马在生产作战物资的工厂中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必须为这些工厂提供一支劳动大军，在英国是采用“稀释法”，即使用非熟练工人，这种做法引起工会的抗议，不过最后工会还是做了让步。战时军需法禁止罢工并建立强制仲裁和厂际调动工人的权力；还禁止工人无准假证明而擅离工作岗位（1917年撤销）。由于这些规定，再加上生活费用的上涨（从1914年8月到1915年7月上漲了33%），克莱德赛德地区遂于1915年2月爆发了战时的第一次大罢工，接着南威尔士的矿工在7月间也举行了罢工。随后建立了车间工人代表，这种做法迅速地传播开来。工人代表都选自工厂基层，他们的影响抵消了工会领袖的影响，因为人们常怀疑工会领袖与政府勾结。

于是，从1916年起，工人阶级的运动便重新又开展起来。人们对工人国际产生了新的兴趣。这时，国际已分裂成为赞成和反对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之间恢复关系的两派（1916年12月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成员赞成恢复关系）。工人运动在1915年齐美尔瓦尔得代表大会上在参战问题上，在1916年昆塔尔代表大会上在“战争的目的”和俄国革命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布尔什维克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纲领，得到大批社会党人和工党的支持者们的热烈赞同。工党党员阿瑟·亨德森在同法国代表加香和弗罗萨尔访问俄国后发表声明说，英国应该支持拟议中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党人会议。这一声明在1917年8月10日举行的工党会议上，以184万票对55万票获得通过。但是政府拒不发给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于是亨德森便退出战时内阁。同一时期，法国发生了多起罢工，1917年5月和6月，有71种行业受到圣艾蒂安和巴黎的罢工的影响。在战线后面“少女通道”^[1]地区的军队，由于尼韦尔4月16日发动的危险进攻遭到失败，军队伤亡惨重，士气沮丧，发生了哗变。在前线本身和战线后方，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而又毫无胜利希望，出现一片厌战情绪。克列孟梭捡起名副其实的独裁者的衣钵，对商人、激进党和社会党的政治家们——如内政部长马尔维和约瑟夫·卡约——一起诉，指

控他们散布失败情绪或通敌，从而压制人们不敢对战争和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以对付德国人1918年春季和夏季攻势的一切批评。

当战争结束时，胜利和和平带来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以及认为“这场战争将结束一切战争”这一幻想，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4年来往往是无谓的牺牲、破坏和痛苦的记忆。痛苦和愤怒，与欢乐和宽慰交织在一起；俄国革命的榜样，鼓舞人们渴望变革——这是对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强加于人们的毫无节制的纪律的一种反应。这一革命使得那些备受苦难、对许多投机商人深恶痛绝的人们燃起了希望。据说，1919年在埃及出现了士兵委员会。在英国，军队由于迟迟不复员而举行示威游行；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暴乱中，升起了红旗，好几个人受伤；约克郡的矿井和伦敦地下铁道发生罢工，最后在1919年爆发了铁路总罢工。在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星期一起义以后，反叛即蔓延开来，到这时已酿成一场全面战争。“动乱”时期已经开始。法国也爆发了罢工，对于继续对俄国进行战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黑海舰队所属的几个舰队中发生了兵变。

因此，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各国政府被迫做出了一些让步，以平息这些危险的群众运动。在法国，制定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1919年）。在英国，胜利给劳合·乔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望，他非常聪明地要求尽早地举行选举。这时，自由党已分裂为对劳合·乔治1916年可疑的忠诚决不宽恕的阿斯奎斯派和仍然忠于劳合·乔治的一派。劳合·乔治面对着在保守党与这时决心单独奋斗的工党之间处于孤立的威胁，遂同意与前者结盟。随后是“党魁选举”，所有支持他的候选人都收到一封由劳合·乔治和博纳·劳签名的认可信。联盟一方赢得478个席位（335个席位归保守党），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获得28个席位，工党候选人获得59个席位，他们现在代表正式的反对党。自由党早在1914年就受到分裂的威胁，这时更是一蹶不振。这些选举开创了保守党几乎连续执政20年的时期。

但是，在“威尔士巫师”的指导下，自由党与保守党的联盟继续执政到1922年10月。1919年通过了“住房和城市规划法”，拨给地方当局住房津贴；设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1920年通过了失业保险法以解决失业问题。1921年，120家铁路公司合并为4家。1922年，垄断了广播事业的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但是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领导下

的经济委员会建议实行一些节约措施，部分地破坏了费希尔的1918年的教育法。煤矿工人提出的煤炭工业实行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得到桑基委员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仍被否决。在爱尔兰，进行着一场罪恶的战争，打伏击、逮捕人质、严刑拷打、即时处决，无所不用其极。在这场战争中，爱尔兰的恐怖分子与英国派来的特别警察进行较量（这支特别警察的功绩之一就是火烧科克）。由于英国承认了除北爱尔兰的6个郡以外（参见第十三章）的爱尔兰自由邦为英帝国内的自治单位，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但是，这一措施引起保守党人的不满，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盟遂告破裂。

法国虽然在1919年11月选举了与英国战后的下院相类似的“天蓝色的议会”，但是它的政治生活的恢复还是比较迟缓的。由于实行新的选举办法，即介于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之间的折中办法，制定了建立以省为基础的按党派名单投票的制度，超额选票归多数党候选人，其余的选票按比例分配。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中派和中右派联合的全国共和集团获得613个议席中的437席，反对派只有社会党人获得68席，激进党人获得88席。这是法国自1876年以来最右翼的议会。虽然克列孟梭已经粉碎了由于生活费用急剧上涨而引起的巴黎工人（5月1日）、北方的矿工、鲁昂的纺织工，以及铁路工人和地下铁道工人的罢工，但是获得胜利的右派，对于他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给予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签订的集体协议以合法地位，以及他的反教权主义等，均不能谅解。1920年1月，他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由于右派支持了温和派下院议长保罗·德夏内尔，遂被抛弃。

比利时由于在大战中遭到侵略，它的清一色的天主教党政府便迁往勒阿弗尔附近的圣·阿德雷斯，在增加少数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后，组成了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被占领区由德国人管理，他们支持讲佛兰芒语的居民，从而加剧了讲佛兰芒语和讲瓦隆语这两种语言的居民之间的不和。在根特办了一所用佛兰芒语的大学，并成立了弗朗德勒委员会，该委员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这两个部分在行政上的分裂。停战以后，阿尔伯特一世组成一个三党联合政府——天主教党六人、社会党三人、自由党三人——并答应给予普选权、成立工会的自由、语言平等和劳资联合。1919年11月的选举——选举权扩大到全体男性居民——结果，反教权派第一次获得多数：30名自由党人、70名社会党人对73名天主教党人。结果，地方选举权在1921年扩大到了妇

女，作为补偿，天主教党接受了一项协议，给予国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同等补助金；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给予养老金；取消对罢工权利的阻碍；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北欧和西欧的其他国家保持中立。虽然它们无疑地从向德国人提供原料和粮食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但也深受潜水艇战、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之苦。为了用一种复杂的分配制度来调节食物供应和物价，它们被迫实行一项政府干涉的政策。为了防止报纸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它们还发现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所有这一切措施，引起了舆论的不满，于是又感到必须向公众的压力让步。因此，丹麦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修改了宪法，并将选举权扩大到年满25岁的妇女。在瑞典，因亲德而臭名昭著的哈马舍耳德内阁被迫于1917年辞职，由亚尔马·布兰廷领导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这是除法国以外，欧洲的第一个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政府。挪威于1919年实行比例代表制，从而结束了代表权相当严重不平等的现象；事实证明，这对社会民主党有利。荷兰也实行了普选权（卢森堡也在1919年实行）和八小时工作日。

普选权从各方面削弱了自由资产阶级举足轻重和充当仲裁人（如在荷兰、瑞典和英国）的作用，并且也鼓舞了人民政党的发展（在荷兰和比利时）。有的地方自由党人确实保持着一定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充当了保守派的角色。凡是牢固地建立起议会制的地方，否决权和解散议会权均废弃不用，除非是要找出一条出路来摆脱无法解决的困境或加速实行一些紧急的改革，这时才使用解散议会的权利。这种冲突的唯一例子是，卢森堡极端亲德的女大公于1919年被迫退位，由她的妹妹继位；根据1919年9月18日的公民投票，使用这种解决办法在各方面都是符合民主原则的。

四 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1921—1939年）

当各项和平条约开始生效时，参战各国都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英国没有遭到入侵，但是它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损失惨重，而且也有它的“被破坏的地区”：工业需要恢复和重新装备，船队需要重建，原来的市场需要夺回，还要面对着美国和日本（不久以后又有德国）的竞争；国债沉重，收支平衡受到威胁。必须重新发展商品出口并恢复英镑原来的最高地位，因为过去这是英国获致繁荣的条件。

法国在战争中流血牺牲惨重，损失了175万人，而出生率却下降到1913年以下；需要从废墟中重建家园，但是，由于需要赔偿战争的损失和支付战争中各类牺牲者的抚恤金，法国债台高筑。国际局势是暗淡的。法国和英国采取了坚决敌视俄国的态度，不过英国在程度上轻一些，他们害怕俄国的革命宣传。他们也不信任德国，由于德国似乎要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凡尔赛的“强迫命令”所强加的种种约束，因而对它更加不信任了。法国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它坚持严格执行条约的各项条款，心胸狭窄地坚持不折不扣地按照彭加勒所体现的法律的文字行事。它同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缔结了一系列有附带义务的盟约，同时不惜支出大量费用重新装备和维持军队。

因此，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由于这些问题的技术特点和紧迫性，议会机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决定做得太迟，或不是其时，结果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停滞，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这种停滞没有任何补救办法，这种哲学曾经使得19世纪的自由党人把国家看作公众自由的天敌。人们不赞成国家干预。但是社会的工业化带来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与人们迄今视为不可剥夺的基本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结果，自由党的危机就变得日益严重了。

伴随这一危机而来的，是社会各阶级以及它们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工人阶级，或者不如说靠工资生活的阶级，在人数和重要性方面都有所增长。虽然他们仍然处于少数，工人组织却已成为群众运动：法国的总工会从1919年的60万人增加到1920年的200万人；英国的职工

代表大会经过改组，这时与工党联合，组成全国联合委员会，从1915年代表400万会员增加到1919年代表650万会员，1920年则代表830万会员。法国社会党在1919年的选举中获得170万张选票，比1914年多30万张。英国工党经阿瑟·亨德森和西德尼·韦布重新统一，建立了地方支部，加强了它原来的组织结构，从而兴旺起来。这就为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支持韦布起草的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工党与社会新秩序》。这个纲领强烈要求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但是，虽然形势看来对它有利，事实上工人阶级却是摇摆不定的、分裂的。1917年由俄国革命引起的高涨的热情，激起工党左翼对于干涉俄国的政策的敌视；1920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但泽的军火，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以贯彻“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但是这种团结一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共产党号召的直接行动，引起多数人的反感。于是，1920年7月英国共产党成立。虽然它继续以一种很实际的方式影响着知识分子和某些工会，但成就甚少。在法国，1919年罢工的失败和1920年选举的失利是令人沮丧的，全国革命迅速发生的希望破灭了。与布尔什维克和改革者的对立，导致社会党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多数派声明拥护第三国际，赞成保留饶勒斯的值得赞扬的报纸《人道报》，而少数派却聚集在莱昂·勃鲁姆的周围。在工会运动中，多数人留在莱昂·儒奥领导的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中，少数人组成法国统一总工会，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这一分裂，造成了全面削弱——1925年法国总工会的人数只有5万人，法国统一总工会的人数为40万。

因此，英法两国工人从这段繁荣时期只得到很少一点好处，而这个时期物价的上涨又远远超过了工资名义上的增加。英国工人的失业，使情况更加严重。1920年12月失业人数达85.8万人，1921年3月则为166.4万人。到1921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250万；1922年降为140万人，但直到1939年，从未低于100万人。在法国，工人阶级的骚动变得断断续续，最后在沮丧中平息下来。

面对着孤立的、分裂的、遭到挫败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也经历了一场变化。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陷入混乱状态；地主和有产者、有固定收入的人、政府雇员、私人雇员和工人都受到生活费用上涨的影响。但是通货膨胀对于制造商、中产阶级和债务人有利。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和战前同样严重，靠战争和战后重建致富的新兴的工业资产

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它要求限制雇主对工厂车间控制权的主张感到害怕，即使工人阶级的纲领就像工党纲领那样的温和，也使他们感到担心。“雇主的神圣权利”使它接近传统的保守势力——他的祖先在19世纪曾与之斗争的教会、军队和从前的贵族。战争期间，英国曾经组成了一个特别活跃而强大的压力团体“英国工业联合会”。同样地，在法国也成立了“锻工委员会”“煤炭中央委员会”“冶金矿业总联合会”和“保险中央委员会”。这些团体都力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司法界和金融界，并对政府和议会的决定施加压力；由于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国家的保护这时已成为不可或缺，他们所施加的影响和压力就有增无减。这些团体影响报刊，影响负责贯彻执行政府决定的行政干部，并影响选举——“经济各界联合会”从身为雇主的候选人那里领取津贴，1924年激进党也从保险委员会领取。它们还通过家庭关系、各种社会关系去团结统治阶级的成员。这个统治阶级这时正趋向于同那些它从其中汲取反动思想的前教士的、保守的社会上层阶级结合在一起。于是，一个新的右翼就这样出现了，他们不再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也不再是主张议会制的，他们支持的是只有1908年成立的“法兰西行动”在战前曾经主张的民族主义。新右翼陶醉于1918年的胜利，陶醉于法国这时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这个事实，对“永恒的德国”一贯敌视，并拒绝对它做出任何让步。它蔑视人道主义的原则（按照莫拉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空想”，而且违背法国天主教的传统）和国际联盟。它主张建立权力主义的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政权才能够制定出强有力的宏伟政策，要实现这种政策，只有用尊重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纪律，才能把国家团结起来。“法兰西行动”由于其理论上的一致性，由于它的总编辑夏尔·莫拉斯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由于善于辩论的莱昂·多代的天才，因而它在保守派和天主教等各界中影响很大（或者至少可以说，1926年天主教界被罗马教廷谴责以前，对天主教界的影响很大）。“法兰西行动”反对“南欧人”、犹太人、共济会员、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反对“股份资本主义”的充满仇恨的宣传，它的“保王派报纸推销员”在公众集会上的野蛮行径，以及它一贯的诽谤中伤，终于造成一种带有传染性的暴力气氛。它貌似反对资本主义，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人数增加而利润率日渐减少的零售商，使用效率低的陈旧设备进行工作、因而感到身受大联合企业和比较先进国家的竞争威胁的工匠和小实业家，吸引到它的队伍中来。这些愚昧无

知、头脑简单、又怀着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们，由于对未来感到忧虑，很乐意求助于暴力，把它作为一种解决办法。“法兰西行动”所赞扬并树为榜样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黑衫党，正是从相同的社会团体中招募来的。1924年法国出现了为反对共产主义而组织起来的“爱国青年运动”，必要时它可进行武装反抗；1925年，“法兰西行动”的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成员G. 瓦卢瓦创立了一个法西斯小派别穿蓝衫的“群团”。这些团体，把共产党的行为作为借口，重新使革命威胁这个幽灵复活，以便为他们使用暴力进行辩护，并以此来取得公众中思想右倾的那些人的支持和赞助。

这种反对自由、反对议会制的思想，得到报刊的鼓励和传播，而这些报刊大部分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5家主要的日报（所谓的新闻报纸），所有的巴黎晚报和所有的杂志，都发表文章，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策。

在法国，政治斗争必然与政权本身及其赖以建立的原则有关；而在英国，政治情况却不同。保守党和工党之分，可以说是代表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不同概念，但是两党都并不怀疑政权的根本原则。此外，英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基本上是保守的，加之它也不愿意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就促使工党倾向于温和，并使它坚决拒绝不论集体或个人与共产党人发生关系的一切尝试。相反地，在法国，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的存在，既不能使左派团结一致，也不能产生持久的多数，而只能加深资产阶级的恐惧，使他们随时都可能转向极右翼并指望有一个“救世主”出现。但是在英国，上层阶级并不那样感到自身处于危险中，贵族分子继续在下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概占下院议员的40%。

因此，英国和法国都存在互相对立的两部分完全不同的人，自由党夹在这两部分人当中，注定要消失，或不再成其为自由党。激进社会党在法国的情况，犹如自由党之在英国。同样地，在比利时，自由党实现了它的纲领以后，在1920年发现它自身被两种势力拖向不相同的方向，一方是空谈理论的资产阶级、显贵阶级、政府高级官员和既讨厌教士但也害怕工人阶级骚乱的实业家；一方是小学教师组成的各个团体和非常敌视“神父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后一种力量势必和社会党联合，如同许多左翼自由党人团结在工党周围一样，从而加强了两个党中的温和分子，而思想右倾的人则进一步向右转。

欧洲各国货币的疲软，既是这些变化的起因，又是这些变化的结果。长期习惯于币制稳定的各国政府和舆论，由于这种稳定的消失而陷于混乱状态。兑换和贸易平衡机构的崩溃，造成工资名义上的增加和生活费用的上涨；结果是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法郎与英镑的比值下跌，美元的增值超过了英镑和法郎，由此造成挤兑法郎和抢购可靠的股票债券。因此，资本主义寡头集团得以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各国政府，利用本国货币的贬值作为一种手段，把那些证明难以驾驭的政府赶下台，把正统保守的政府扶持上台。

在英国，博纳·劳于1922年10月接替了劳合·乔治：保守党以345席获得多数；自由党的两个竞争的派别，阿斯奎斯派获得60席，劳合·乔治派获得57席；工党获得142席。这是工党第一次获得超过自由党两派共同取得的议席。当博纳·劳因病于1923年让位给斯坦利·鲍尔温时，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举行的一次新的选举中，多数党改变了。这时保守党得到258个议席，而联合捍卫自由贸易的自由党获得159席，工党获得191席。因此，1924年1月在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下组成了工党政府——因为工党是主张自由贸易各派中较大的一派——但是由于工党是少数党，还得依靠自由党，因而不能制定任何明确的社会主义的立法。9个月后，工党政府在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上垮台，在1924年的大选中为保守党所取代。这次选举对自由党来说又是一次灾难，它丧失了116席，减少到只有42席。至于工党，虽然投给它的票数——占全部记录在案票数的1/3——有所增加，却只获得152席。保守党增加了161席，一共赢得415席。这是自由党一蹶不振的最大的证明。

鲍尔温政府执政5年之久，他与白里安合作，在欧洲实行了和解政策（洛迦诺公约）。与此同时，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这时回到保守党的行列中，实行了通货紧缩的政策。1925年恢复金本位，再次恢复英镑的原来价值，但由于提高出口货物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也造成了出口的减少。这也是1926年爆发总罢工的一个原因。煤炭工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出口危机和失业的影响最深。罢工频繁发生，说明了煤炭工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况。1926年4月30日，全国煤矿工人开始了一场罢工，反对降低工资。这次罢工得到5月3日总罢工的支持。在这次总罢工中，交通运输、煤气、电力、印刷、建筑和重工业各行各业的工人都举行了同情罢工。这是一次力量的考验，因为保守党政府决心破坏这次罢工，早就做了种种安排，派出警察和军队保

护公用事业，使其保持正常工作。事实证明，舆论对于对当选的政府施加压力的明显企图，是持反对态度的。首先，工会领袖中许多人对这次罢工的态度犹豫不决，他们在5月12日便表示屈服。矿主则利用他们取得的胜利，使矿工们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1927年政府通过“劳资纠纷法”，禁止同情罢工，并取缔工会进行政治动员。工会会员人数下降，职工代表大会内部的革命趋势便失去了条件。政府采取了一些步骤缓和社会上的紧张形势，包括制定立法，发给寡妇抚恤金和捐献养老金，以及改革地方政府。1928年制定法律，规定男女均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完全平等的普选。

在法国，事态沿着类似的方向发展。赫里欧领导下的激进派联合政府，如同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下的工党的一段执政一样，中断了各届保守党政府的连续执政。两国类似的利益集团——统治阶级集团和工人阶级集团——之间都有对立情绪，而且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多少也相类似。但是事件发生的形式是不相同的。法国没有经受长期失业的尚未愈合的创伤，也没有经历过像1926年那样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法国的极右翼却恶毒得多，而非常活跃的共产党又不断地制造紧张局势。然而，每当一个左翼政府上台，接着就会发生一场财政危机把它推翻。办法很简单：由于一年中纳税时间的间隔不均匀，每届政府不得不向私人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储蓄银行贷款，这些银行则要求担保和特许权。此外，这些银行所持有的短期债券——1924年为9100万国库债券——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因为可以随时提出要求偿还，这就构成经常的威胁。

在1924年的选举中，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组成的左翼集团取代了国民集团，社会党人支持赫里欧，但不参加他的政府。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联合，重新提出被国民集团撇在一边的反对教权的立法。他们的这种做法，促使天主教徒组成了全国天主教联合会，由德卡斯特尔诺将军担任主席，由极右分子进行指导。教徒们组织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坚决地表示要抵制各项新措施的实施。此外，洛迦诺公约和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遭到民族主义分子的激烈批评，最后，财政困难终于给予右派以推翻政府的机会。政府面对着由于国家重建工作所需费用和国债（国债由于各种抚恤金和贷款的利息已然膨胀，又因为对战争破坏赔偿金额估算得过于慷慨而进一步加重）造成的沉重负担，遂采取了一些措施，打算改善局面，制止资金外流和偷税漏税

——“小票本”和“税务清算证”^[2]。社会党人方面则要求进一步稳定国库债券，并对资本课税。于是，存款储蓄人的信任逐渐丧失；法郎的价值1925年12月开价为90法郎1英镑，1926年5月贬值为165法郎1英镑，7月贬值到240法郎1英镑。一名社会党议员提出的“哪儿有钱哪儿拿”的威胁，被报刊大肆宣传。赫里欧被迫在“银墙”面前退却。他只好放弃他计划中的“小票本”，才从法兰西银行借到了必需的贷款。即使如此，他仍然被参议院推翻。从此，银行家们就以在短期债券持有者当中进行“公民投票”相威胁，作为一种敲诈勒索的手段。在1924年至1926年的两年间，政府换了6届；激进党的联合政府终于在1926年7月分裂。于是雷蒙·彭加勒组成了一个得到银行家们支持的政府，并把法郎的价值稳定为它1914年的价值的1/4；激进党中的大多数，在与社会党人决裂后，就转而支持右翼的财政政策。1928年选举时，重新建立了双重投票制度，从而使右翼获得胜利。由于激进党选举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放弃了“共和国纪律”的原则，在第二轮投票时投了右翼或中右派候选人的票，而没有投第一轮投票后领先的社会党人的票，因此，在1928年和1932年间统治法国的是右翼或中右派，首先是彭加勒和塔迪厄，然后是白里安和赖伐尔，两个大资产阶级和两个前社会党人转向了右翼。

欧洲陷入了经济萧条，法国自1931年开始，但其他各国自1929年即已开始。这场大萧条虽然遍及欧洲各地，但其严重程度在整个大陆并不相同。尤其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在各地也不尽相同。这一点，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上最突出的特点——法西斯主义的传播——考虑即可看出。整个东欧、中欧和南欧都受到它的传染，而北欧和西欧各国却能够一直抵制到1940年。但是对其中一些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荷兰）说来，法西斯主义的高涨，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如同一场热病，不久即过去。但是在别的地方，在法国和比利时，就严重得多，它所产生的后果在1940年以后很久还能被感觉到。因此，对这两类国家以分别叙述为宜。

随着华尔街的崩溃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在英国特别严重，几乎整整10年期间，失业人数从未低于劳动大军的10%。1929年11月有132.6万人失业，1930年12月这个数字一跃而为250万，在1931年和1932年，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有将近300万（实际上大概是375万）。1929年5月保守党失败后组成的麦克唐纳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

府，得到288名工党议员和26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但是它的生存有赖于59名自由党议员的善意。经济萧条的到来，使这3个政党都感到震惊，而不理解引起萧条的真正原因的大有人在。其中无疑也包括财政大臣斯诺登，他采取了一种最严格的正统政策，拒绝任何可能造成预算赤字的措施。几乎只有负责失业问题的大臣J. H. 托马斯周围的一个小组懂得需要采取一些什么步骤。这个小组由托马斯·约翰斯顿、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和乔治·兰斯伯里组成，并起草了一个行动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斯诺登的阻挠，他满足于一些治标的措施——1930年的住房法，以加速消除贫民窟；1931年的农产品销售法，以帮助农业社会；以及被上院否决的延长学制、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5岁的教育法案。1931年7月，乔治·梅爵士的经济委员会预测，将出现1.2亿英镑的赤字，因此建议增加税收并厉行节约，主要是节省支付给失业人员的款项。这个报告一经公布，即引起了混乱，英镑猛跌，甚至从巴黎和纽约给英格兰银行提供贷款也无法使英镑恢复。8月24日麦克唐纳辞职，乔治五世请求他组织联合政府以“挽救英镑”。政治后果是严重的。除12名工党议员外，工会和工党领袖都反对“国民政府”，而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却支持它。新政府接受了梅的委员会提出的许多建议，但是它仍然无法挽救英镑：在一阵接连不断地挤兑黄金以后，不得不放弃金本位，英镑从4.86美元跌到3.4美元。在接着而来的选举中，政府获得压倒的多数，615名议员中，自由党、保守党和全国工党占554名；保守党获得300万张选票，主要是在损害自由党的情况下获得的，工党丧失137.5万张选票，只保持了52个席位。新政府以保守党为主，内维尔·张伯伦取代斯诺登任财政大臣。他提出关税改革，从而在1932年2月实行了他的父亲在1903年主张的那些赋税。对英帝国内部的进口货物则征收种种特惠关税。

从此，政策只是一些短期措施，这是为环境所迫而采取的，制定这些措施的人虽然审慎，却不了解由于国际贸易的不景气所造成的新形势以及由于各个独裁政府的野心勃勃和穷兵黩武所造成的力量均势的剧变。这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是悲惨的年代，是“一个悲惨地失掉了各种机会，永远抓不住最后机会的时代”^[3]。1936年，“特区法”使工人们得以转移到那些新兴工业在发展中的地区。市场贸易委员会和补贴制，对农业有所帮助；由于获得了贷款，“玛丽女王”号得以建成。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00）1931年曾降到84，但是1933年上升到93，1937年上升到124，这主要是由于建筑业所取得的成就。

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与其说是由于政府的努力，倒不如说是由于贸易平衡，因为由于世界价格崩溃的结果，国外进口的食物和原料这时便宜得多了。然而，在某些“灾区”——泰恩赛德、提兹、苏格兰和南威尔士——失业人数仍然很多，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低。虽然可以领取失业救济，但这种救济仅能使工人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当法西斯主义利用失业者的悲惨境况和绝望情绪，在整个中欧、东欧和南欧蔓延的时候，西欧和北欧各国也或多或少地为这一运动所吸引。就连英国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魔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所发起的运动，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由于各传统党派的明显失败，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混乱，而且可以被看成是有代表性的。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原为一个工党大臣成立的小组的成员，这个小团体1930年曾起草一个和不景气作斗争的计划。尽管莫斯利的计划得到工党年会的重视，而且争取到100万张选票——仅以205000票之差被击败——但他却感到是被抛弃了，因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派——英国法西斯同盟，由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组成。他得到《每日邮报》的支持，并从意大利得到一定的津贴，因而能够建立起有相当巩固的组织为后盾的各地方分会。1934年6月在伦敦的奥林匹亚大厅举行了一次集会，当时保守党的主张遭到抵制，但是由于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同警察和左翼分子混战一场，由于它激烈的反犹，这次集会以后，这个运动即一蹶不振。工党自1931年即处于反对党的地位，它在1935年的选举中进一步遭到失败，只获得154个席位。西班牙内战、阿比西尼亚事件和各国独裁政府的侵略政策，使工党觉察到战争的危险，但是由于对政府不信任，它反对重整军备。工党的领袖们基本上是稳健的，也反对在英国建立人民阵线，因此，1939年年初，他们开除了主张建立人民阵线的克里普斯。

张伯伦自1937年担任首相，他的各项政策引起了所有政党的不安。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后，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了。自1933年起，失业人数逐渐减少，虽然1938年冬季失业人数仍达180万。

经济萧条对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影响，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它们仿效英国的榜样，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失业人数增加，主要是在丹麦。1932年冬季，丹麦有20万人失业，而在瑞典，失业人数却低

于1922年。这一时期，农业地区也开始动荡不安，特别是在丹麦，那里农业主要依靠出口，由于关税壁垒而受到沉重打击。经济萧条的结果，还造成危险的社会紧张局势，一方面是工会内部共产主义明显地在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数不多的法西斯小团体也在出现。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各国居于多数。他们自1929年起控制了丹麦议会，1935年在挪威掌权，1936年在瑞典重新获得多数。他们的财政和经济计划缺乏独创性，甚至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他们和这时已被他们取代的原来的自由党一样，在相信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上，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见一致。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政府干预这个问题上。为了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在瑞典和挪威与农民党结成同盟，在丹麦与激进党结盟。他们集中力量促进全面就业，建设公用事业和增加工资，并用保证价格和给予出口奖励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境况。这三个国家缔结了一项关税协定，即1931年的奥斯陆协定。瑞典的经济危机在1934年结束。但是，丹麦却因为经受了多次严重的罢工，直到1936年才结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因而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丹麦议会中的法西斯分子从未超过3人；挪威由于吉斯林建立了“国民议会”，并得到实业家和军官们一定程度的支持，因此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候选人被选入议会。只有在芬兰，极右分子取得某些进展；由于1917年获得独立后，接踵而来的内战又持续到1920年，困难的环境曾经有利于这样一种发展。芬兰曾经实行一种总统制的政体，并实施了土地改革计划。但是，由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的出现和苏维埃俄国就在近旁，这就使得芬兰的右翼焦虑不安并采取咄咄进逼的行动，因而他们得以在1923年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民族主义的和反共的拉普阿运动于1930年组织了1.2万农民向赫尔辛基进军，造成政府的垮台。这个运动由于它采取了过火的暴力行动而被解散，但只不过是有一个有着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民族爱国运动”所取代，这个运动接着也在1938年被解散。

比较起来，荷兰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平静的，尽管它的党派为数很多——有17个，其中参加政府的从未少于10个。实行比例代表制是政局稳定的保证，每个政党所拥有的议席，从这一次选举到下一次选举的变化从未超过4%。荷兰的自由党也日益衰弱：1918年减少到10名议员，到1937年减少到只有4名议名。1936年，不景气引起弗罗林的贬值并对外币兑换进行控制。荷兰也参加了奥斯陆协定集团。工程师穆瑟特建立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个党遭到由自由党人和

各宗教党派成员组成的政府的反对。1939年，政府中第一次增加了一名社会党成员。

经济萧条对法国的袭击比对其他国家来得晚些，这个事实可以由它的结构古老这一点来解释。除了某些生产部门中有限的几个大商号采取了现代生产方式以外，法国仍然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和小生产者的国家。1/3以上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仍然是受雇于不足5人的企业。而在商业领域中，87%的商店中雇用5个人或不足5个人。资产阶级对于任何类似冒险精神的事情都感到害怕，并且对于投资和设备的更新也感到厌恶。一些雄文大作，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强调这样一些优点，即小规模储蓄（“羊毛袜子”方法）、小规模耕作、手工艺人阶级（这是被认为唯一能生产“优质产品”的）和一种所谓平衡经济——这种平衡实际上是由生活状况悲惨的广大农民来实现的——的优越性。技术进步有时被斥为“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精神上失去平衡的根源”。工艺进步被说成是造成失业的原因，结果在大萧条袭击法国以前的几个月期间，人们津津乐道于遵循一种稳定的政策乃是审慎和明智的。而没有认识到法国所以能够躲开这次萧条，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生产潜力薄弱而已。失业人数之所以比较低——1934年至1935年间失业人数为100万，部分失业人数为300万——是由于前来法国寻找工作的许多外籍工人这时正纷纷回国。统治阶级对“新政”的经验视而不见，就像他们对J. M. 凯恩斯的理论一窍不通一样，因此，正当其他各国以重整军备和进行公共工程的政策来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却采取最糟糕的办法来对付经济萧条，这就不足为奇了。1936年12月，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紧缩通货，以灾难性的节约措施重新建立预算平衡，并迟迟才做出法郎贬值的决定（英国在1931年就将英镑贬值，美国在1933年将美元贬值）。他们采取的这些步骤颇能蛊惑人心，但无实效。房租和政府雇员的工资在1935年降低了10%。为了改善酒和食糖的市场贸易，实行国家对农业的控制：禁止新户栽培葡萄，对剩余的谷物加以处理，使其不能用于消费。对某些职业实行马尔萨斯式的控制办法；禁止开设新的制鞋作坊、“货不二价”百货商店和流动商店。总的说来，这种立法是为了保护小资产所有者和成本太高收益仅敷支出的小生产者，而使一切有利可图的企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

传统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它无力解决经济萧条问题和对付战争的危险。因此，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所有其他自由主义的国家一样，出现了根深蒂固的危机，即自由主义和议会制的危机。事实上，1934年后，由于政府日益频繁地应用“法令”和“全权”，议会两院的职能受到了限制。这个政权由于处于搞宗派活动的右翼和革命的左翼的攻击之下，更加不能使旧有的政治结构适应现代的种种经济问题了。在此以前，只有政府危机；这时又出现了国家危机。相继执政的各个政党一再失败，民情既感到沮丧，也感到愤慨。提出的解决办法名目繁多。共产党在比利时是软弱的，那里的工人党拒绝和它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而在法国，共产党却牢固地站住了脚。1928年法共获得100万张选票，到1936年增加到150万张。它的目标是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继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临时的步骤。希特勒主义的出现，使法共改变了策略，主张同左翼各党派联合组成人民阵线以牵制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各国社会党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在比利时和在法国一样，正经受许多修正主义学说的考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德芒，此人在德国居住多年，曾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后来在比利时工人党内部继续他的工作。1927年他发表了《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他在该书中拒绝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而主张用心理学来解释，强调精神的价值，强调平等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社会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所抛弃了的民主制度的实行者，也是教会所背叛了的基督教理想的实现者。”随着《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在1930年的出版，德芒背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更远了。1933年1月以后德国社会主义的崩溃，促使他寻求一个对法西斯威胁的答案——经济萧条必须尽早地加以遏止，因为它对法西斯主义是有利的，遏止的办法是重新建立充分就业、实行信贷国有化和建立综合经济，综合经济部分实行国有化——煤炭、电力和一部分钢铁工业——一部分向私人企业开放，私人企业则须通过信贷、商业和财政政策置于国家的影响之下。这些就是他的“劳动计划”的目标。在1933年圣诞节的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他几乎说服整个工人党采纳这个计划，他的新费边主义受到莱昂·勃鲁姆和德·王德威尔得有保留的欢迎。1935年亨利·德芒在范泽兰和让桑的两届政府中担任大臣，但是他始终不能将他的“工作计划”付诸实施，随着他对议会民主制信念的破灭，他于1938年辞职。

在法国各阶层的社会党人中间传播着对一项计划的设想。1933年蒙塔尼翁向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个纲领，正是从这种设想中得到启示的。他说：“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必须使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秩序的庇护所和权威的支柱而出现。”阿德里安·马尔凯也用了完全相同的语言：“秩序必须建立，权力必须确定，国家必须承认。”莱昂·勃鲁姆宣称，他对此感到“骇然”。马尔赛·戴阿在他193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展望》一书中，揭示了他的“国家社会化”的主张：要利用中产阶级、手工艺者、小商贩、小农和雇主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将资本主义击退，因为根本的问题不是财产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于是，新社会主义便出现了。

对国家和各政党的改革，也是右翼和中派研究和计划中的主题。安德烈·塔迪厄前10年在中右派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他在《权力的较量》（1931年）和《决定的时刻》（1934年）中提出彻底检查议会制度：通过加强行政的权力和限制两院的权力使其失去确定开支的权利等办法来复兴国家。使用解散议会的权利，将会使稳定得到保证。他还提议给妇女以选举权，实行公民投票，禁止政府雇员罢工。埃马纽埃尔·穆尔埃是一位观点更不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在1932年创办了一份后来影响很大的叫作《精神》的刊物。他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信徒，既反对资本主义，又是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仇敌。这一时期，在右翼各界中出现了大量或多或少昙花一现的运动，这些运动提出种种“革新”计划和建立“新秩序”的计划，目的在于摆脱左右两分法，而与新自由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一致起来。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受到“社团国家”主张的吸引，他们认为“社团国家”将会结束阶级斗争，保证社会的安定。一些极右团体也做了一些尝试，利用反对议会的纲领去争取农民站到“社团国家”一边来。农民是这个国家中唯一“健康”的成分，而议会的议员们又“收买”，又“出卖”，却是在为了工业和犹太人财源的利益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在一个强盛的国家的内部，只有两个现实，即人们的工作和家庭。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以外，这就是多热尔的“农民保卫委员会”、阿格里科拉的“土地党”和勒鲁瓦·拉迪里的“农民联合会”现在为之斗争的纲领。

这些运动当中没有一个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些真正是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情况就不同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榜样传播到法国，给希望采取直接行动和使用暴力的分子增加了力量。资产阶级感到自身

处于危险之中，它做出的反应是和在最终导致1848年6月对起义者和1871年对公社社员进行大屠杀的那种恐惧下产生出的同样反应。布朗热主义的反议会的倾向和一种反德雷福斯式的爱国主义，以使用纳粹和法西斯方法的武装同盟的形式重新出现。大批受到威胁的人并非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对于墨索里尼正在建立“秩序”的统治表示钦佩。他们使用武装同盟的威胁——偶尔也让它们出笼——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因而危险是严重的。1934年至1936年这段时期在法国甚至比德雷福斯案件时期更属关键，因为这时宗派活动分子正从外部得到帮助。

这些同盟得到各主要的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团体的支持：如全国天主教联合会、民族战斗同盟、纳税人联盟、主要的日报和《老实人》与《直言》周刊。这些组织把所有那些留恋过去、渴望一个强大国家的人都组织进德拉罗克中校在电气大王E. 梅西埃的协助下组织的军事组织“保王派报纸推销员”“爱国青年”“法兰西团结”和“火十字”等冲锋队之中。这些团体的重要性迅速增加。其他团体有雅克·多里奥在1936年后建立的法兰西人民党和以“卡古尔”闻名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这个秘密委员会储备武器，并从法西斯分子那里领取津贴，以进行报复活动（如暗杀卡洛·罗塞利）或挑衅行动（如袭击“法国雇主”和农民阵线”的办事处）作为交换条件。1934年2月6日组织的反对“共和国同志会”的示威游行，利用斯塔维斯基丑闻，号召建立一个能够结束混乱的政府。游行变成了暴动。有25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这一压力下，达拉第政府尽管在议会中拥有多数，也只好辞职，让位给前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尔格领导的政府。杜梅尔格原为激进党人，后转向右翼，这时他号召休战。他的内阁中包括一名新社会主义派的领袖（马尔凯）、一名退役军人的领袖，以及A. 塔迪厄、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杜梅尔格和他的继任者赖伐尔采取了全面紧缩通货的政策。当这项政策不能改善财政状况时，广大舆论深为不满。

2月6日的流血事件，导致左翼力量的重新改组。那些热爱共和国理想的人团结得更紧了。2月12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多少可以称之为全面的总罢工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许多省城中心也组织起来，以回敬2月6日未遂的武力夺取政权。各种力量在“法西斯主义行不通”的口号下团结起来。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签订了一项“一致行动”公约。在

保罗·里韦和朗之万这类学者领导下，建立了“反法西斯行动治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知识界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左翼党派，从激进党人到共产党人，无一例外地为保卫共和国而结成联盟，称为人民集会，或者，更通常地称为“人民阵线”。它的纲领主要包括采取一系列步骤保卫自由和和平，恢复购买力，建立粮食局（以控制谷物价格），使法兰西银行国有化，作为财政措施，并设立战争损失抚恤金基金，实行累进所得税，并制止偷税漏税。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任何结构的改革。

1936年5月，两支主要的工会运动联合起来，从此成为法国总工会。同年5、6月间举行选举，人民阵线取得多数，获得378个席位，而右翼和中右派，即所谓的“民族主义各党派”，获得220个议席。共产党人（72席）和社会党人（149席）获得1/3以上的选票，占新产生的多数的57%。社会党人第一次超过了激进社会党人（109席）；但是当他们提出权力要求时，如同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自由党人过去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新政府却不得不依靠激进党来维持平衡。

人民阵线的胜利和一名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参加政府的领导，使工人阶级中产生了一阵热烈的情绪和尽早改善自身命运的希望。从5月26日开始，工人们自发地展开罢工，但这是以法国前所未有的“静坐罢工”的形式进行的，目的不像意大利1921年那样是为国有化铺平道路，而在于使任何破坏罢工的企图不能得逞。6月5日雇主们开始与工会谈判，7日缔结了马提翁协议——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权利，履行工会代表全体工人与资方签订的协议，并在不相应地降低收入的条件下将每周工作时间减为40小时。这一胜利，把半个世纪以来工会的奋斗成果确定了下来。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雇主根本不承认工会的存在，拒绝会见工会代表，不同他们谈判或签订集体协议。在允许工会合法存在的法令颁布52年以后，工会代表工人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承认。由于这一跃进，法国的社会立法弥补了原先在这方面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较的落后状况。这一运动后来有所衰退，但是激荡不安仍继续存在，尤其是当雇主们从他们无比的恐惧中恢复过来，试图进行反扑、排斥工会代表并拒绝续订集体协议时，情况更是如此。除了马提翁协议和假日付薪的法令，以及1939年7月将以前通过的有关家庭的全部措施汇编而成的“家庭法典”——特别是雇主一方有义务给家庭提

供补偿（1931年）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938年）——以外，10年间的社会资产负债表一直是空白的。

实际上，人民阵线政府执政只有一年。1937年6月又开始向右转，1938年达拉第的激进党政府破坏了它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因此，从长远看，必须把它视为一场失败，部分原因是它与各国独裁者一再进行侵略的战争行为恰好同时发生。如重新占领莱因兰，征服阿比西尼亚，特别是“西班牙内战”，在这场战争中，“不干涉的闹剧”使得许多左翼思想家对英法两国政府的软弱感到不能容忍。它的失败还可归咎于它的纲领没有考虑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困难，比如由于拖延法郎贬值所造成的困难，以及由于使用陈旧的设备，使得大多数企业在实行8小时三班倒的原则时不得不大量增加成本。

但是，达拉第政府倒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整个统治阶级感到恐惧和渴望报复，以及工会数目的惊人增长所引起的惊恐。到1936年年底，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人数已超过400万，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36年5月到10月间增长1倍，达到38万人。统治阶级眼见一个公开站在工人一边反对雇主的政府上台，眼见一个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可疑分子的人担任总理，他们是不放心的，即使这位总理能够分清“通过革命夺取权力”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内行使权力”的差别，他们也仍然是不放心的。除了这一切，还必须记住，雇主们对于静坐罢工和占领工厂以及马提翁协议亦深感震惊，而马提翁协议所包含的一些新的义务，又是许多收益仅敷支出的小企业所不能履行的。而且，也不能忘记，他们“在自己家里当家做主”的权力曾经被争夺，他们曾经受到威胁和侮辱，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种渴望报复的心理，明显地表现在雇主们重新组织了起来。新任秘书长C. J. 吉纽给“法国雇主总联合会”定下了好战的调子，该联合会已接管“法国生产总联合会”，这时还将有大批小雇主加入。产品没有增加，而是有意抑制生产，并且普遍不愿投资；物价高涨，恢复缓慢，使工人们已经得到的好处化为乌有，因而他们只好又回头采取罢工行动。法郎贬值。1937年6月，参议院拒绝授予莱昂·勃鲁姆所要求的全部权力，8个月之内，连续三届政府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包括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法郎的第二次贬值——只值彭加勒时期价值的58%——慕尼黑危机，以及试图实行每周工作40个小时所遇到的困难。1938年11月，达拉第中止了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的法

令；随之而来的总罢工却失败了，因为工人阶级由于赞成和反对慕尼黑协定两派人之间，共产党人和反对共产党的人们之间，和平主义者和主张抗击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等内部的斗争而被削弱。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深，而舆论又是如此之混乱，因此随之而来的两种传统的立场奇怪地相互颠倒过来。自1935年后，左派和右派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一反他们的常态（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不过不那么明显）。左派支持关于国际联盟的主张，支持集体安全和制裁，把保卫民主与保卫国家作为首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二者都由于法西斯分子干涉西班牙、意大利提出了权利要求和在慕尼黑缔结了投降协定而受到威胁。除了很少一部分反共分子外，和平主义这时已被抛弃。右翼原来是激烈地反对德国人的，敌视对和约的任何修改，敌视裁军、国际联盟和绥靖政策，现在却感到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布尔什维主义；它之所以转向和平主义，是因为一场战争，甚至一场胜利的战争，也只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希特勒这个秩序的堡垒将会被击败。右派在仍然敌视德国的同时，试图将希特勒“争取生存空间”的胃口引向欧洲东南部的平原。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无疑使许多人看清了希特勒主义的真面目，但是法国却由于达拉第的反工人阶级和反共政策而不能团结一致，因为这些政策使大多数的左翼疏远了。极右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反对“在但泽问题上走向战争”。保卫社会比保卫国家更重要。

比利时的政治生活，在这10年期间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动荡不安，虽然原因并不尽相同。政局相当不稳定；比例代表制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三个政党间意见分歧，这就导致了一次次的联合政府。在1928年至1940年期间，发生了30次政府危机，经常是一年当中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社会党曾在1920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曾经实现了它的基本纲领：实行普选权、组织工会的自由和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但是它在真正的结构改革面前退却了，实际上放弃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税务誓言”（为制止欺诈行为和偷税漏税而设），仅仅满足于给农业以担保，工人假日的工资照付和实行维持生活必需的基本工资均等。深受“法兰西行动”影响的重新建立的天主教党，由于工人阶级的冲突和佛兰芒问题而发生分裂。与商业界关系日益密切并竭力保护最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党，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它放弃了反对教权主义的立场，并在社会政策方面更深地转向了天主教党的右翼。天主教党和法国的激进党相同，是一个中间派的

政党，它时而向左摆，时而朝右摆，在历届两党内阁中都起作用。只有在真正的严重危机时刻，才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因此，比利时法郎在1926年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结果与在伦敦和巴黎发生的情况相同。内阁由一名商人、比利时重要的总公司的副董事长埃米尔·弗朗基接替。他被授予充分的权力，并着手紧缩开支和实行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即价值5个比利时法郎的“贝尔加”。他把这种货币价值稳定在175法郎比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人被迫同意将全部铁路产权移交给政府，交给全国铁路公司，它的股份被用来加强巩固国库债券。

当大萧条到来时，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危机。橡胶和铜的市场崩溃，导致严重的预算赤字，失业人数上升到30万。再次使用了传统的解决办法：厉行节约，降低政府雇员的工资，提高关税和征收新税。由于出现抢购黄金风潮，泰尼斯、弗朗基和居特的政府得以重新掌权——即所谓的“银行家政府”，这个政府执行了一项通货紧缩的政策，降低了购买力，并在1935年3月放弃了黄金平价。结果和法国实行同样的政策时所产生的结果相同。对“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人民阵线和共产主义”的反应表现为两种形式：在佛兰芒人居住的地区，民族主义高涨，在瓦隆人居住的地区是雷克斯运动高涨，这是一种由莱昂·德格雷尔所创立的法西斯运动，是卢万的“青年天主教”运动的产物，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法兰西行动”的倾向；他谴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提出应在家庭和同业公会的基础上改组社会。在1936年的选举中，三个传统的政党遭到惨败：自由党丧失4.1万张选票和1个议席，社会党丧失11.2万张选票和3个议席（保持70席）。但是，天主教党丧失了22.9万张选票和3个议席，在新议会中只有63席。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赢得6个议席，佛兰芒民族主义分子（称为阵线分子）获得8个席位。雷克斯党第一次参加竞选，以27.1万张选票获得21个席位。他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并未保持多久，因为几个月后，一直遭到教士们反对的德格雷尔就在布鲁塞尔被范泽兰击败，范泽兰所得选票比他多10倍。1939年，雷克斯党只剩下4席，尽管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

范泽兰政府得到两位社会党人亨利·德芒和斯巴克的支持，取得特殊权力达12个月之久。它利用这些权力再次将法郎贬值（150比利时法郎合1英镑），然后通过奥斯陆协定上签署而放弃了自由兑换，并实行了一个“四年计划”。德芒这时是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他

开始靠近雷克斯党，大谈一个“有秩序、有权威”的民族党。追随他的有斯巴克，斯巴克是担任总理（1938年）的第一个社会党人。一次新的经济衰退造成更多的人失业，当资金开始外流时，发生了新的货币危机。社会党人的团结由于王德威尔得和布鲁克尔反对亨利·德芒以及语言问题而遭到破坏。1939年选举后，当皮埃洛组成他的天主教党——自由党政府并放弃了全部改革计划和主要的公共工程时，社会党便成为反对党。

正如在法国一样，这些政党虽然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名称，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唯一保持团结的政党是自由党，不过必须说明，它的党员人数这时已经很少。社会党分裂为几派：一派主张正统的做法；一派主张计划工作，即斯巴克的坚决支持者；还有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的一派。在天主教党的党员队伍内，老右翼分子、基督教民主派、农民联盟会员、佛兰芒自治派、雷克斯党人和“阵线分子”之间彼此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亲政又加深了这种混乱状况。他并不想隐瞒他对这些政界人物们的蔑视，而且，他的幕后政治活动，也引起了皮埃洛对他的直言不讳的指责。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西欧和北欧所有自由的民主国家，除英国和中立的瑞典外，都遭到敌人的占领。它们中间，唯一与德国人进行合作的政府是法国。所有其他各国的政府都在英国避难，并尽最大的努力战斗下去。占领军在各国都遭到顽强的抵抗。

全体英国人民从战争一爆发就坚定地接受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受了考验、现在又重新实施的全部措施。政府被授予极其广泛的权力，成立了新的政府部门，但是议会行使的控制权从未受到干扰，而且，公民的个人自由也总是得到支持。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并且尽可能使生活条件均等，对全国的经济生活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控制。实行了普遍的定量配给制，对非必需品征收重税，对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控制。由于实行了这些措施，因而能够在一种友好的兄弟情谊的气氛中保持全国的团结一致，其程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未有的。

再者，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最艰难的日子里组成的内阁中，包括6名工党议员，其中两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他们参加内阁，并未使任何特定的社会主义的立法得以通过，但是这是对全国所有企业（包括银行和私人企业在内）实行严格控制的一种保证。不论在议会还是在全国，都没有固定的反对派。政府和议会都注意到需要为战后的重建进行准备，结果便出现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报告。这是一个针对疾病、失业和贫穷等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它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工党从过去的失败——特别是1931年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背叛——中吸取了教训，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让我们面对未来”，把充分就业和有限制的国有化放在首要地位。这个党在1945年7月5日多少有些仓促的大选中，欣然为一项关于住房和社会保险的具体计划而辩护，这个计划赢得了所有那些对25年来的不可靠和长期失业记忆犹新的人们的选票。尽管温斯顿·丘吉尔个人威信很高，工党仍然赢得393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61%，全部选票的48%），保守党

获得213个议席，自由党获得12席，共产党3席。工党第一次获得明显的多数，因而能够将其纲领付诸实施。

在法国，1939年9月建立的民族团结，只不过虚有其名。战前曾经起过作用的强烈的愤怒情绪并没有完全隐蔽起来，当侵略的沉重打击和灾难突然来临时，反对共和主义、渴望报仇的巨大浪潮迸发了。共和派的敌人们由于他们所憎恶的政权被征服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应对失败负责。原来的反对议会制的情绪，和传统上既反对英国也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那些希望把这一斗争继续下去的人沉默下来。国民议员和参议员们慑于反共和派气势汹汹的宣传以及由于他们自身的不得人心，遂在维希召开了国民议会，同意赖伐尔提出的一项建议，即授予贝当元帅以充分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由他全权处理颁布宪法的事宜，新宪法是建立在“劳动、祖国、家庭”三项新原则上，于7月10日取代了“自由、平等、博爱”。投票结果，80票反对这一提案，57票弃权。

接着而来的是“一场突然的、不合时宜的复旧”。胜利者受到与反动的右翼——政治上的天主教的产物——所受到的同样的原则的鼓舞。反动右翼这时“为德雷福斯案件报了仇”，因而企图破坏自1789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新政权的领导人是莫拉斯的支持者，就是那些建立这种联盟的人；保皇党人、教士和民族主义分子；被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被德芒和戴阿的理论争取过去的独裁主义者；还有天主教僧侣集团，这个集团认为“失败是神对我们的反宗教法律的惩罚”，它为有一个打算让它控制教育的政权而感到高兴——红衣主教热利埃就说，“贝当就是法兰西；法兰西就是贝当”——高级文职官员也因摆脱了工会及其选出的代表们的控制而兴高采烈。他们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班子，他们的利益和倾向远非一致。在这个班子里，冒险家、空想主义者和反德分子、纳粹主义的支持者沆瀣一气。因此，维希派形形色色，他们在占领军的压力下彼此明争暗斗，相互倾轧。

然而，在某些原则和目标上，这些维希派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见一致的，如压制普选权和一切形式的选举；一切权力都来自以贝当元帅为化身的国家。这个政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也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它的理想是小型的家庭企业；它号召回到土地去，因为“土地不会说谎”，它吹捧农民，认为他们生来就具有一切美德；它

的信仰建立在道德和宗教的护卫者家庭上；它尊重社会等级制度、秩序的传统保卫者教会、军队和上层阶级。用A. 西格夫里德的话说，“法兰西从未有过这样气度狭隘、极其专横的政权”。“言论罪”恢复了，强行政治上的一致，结果适得其反。共济会和一些政党被解散；连“共和国”这个名称也消失了，重新实行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的做法。这是一个“秩序和道德的政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受到了镇压，小学恢复了宗教教育，有关宗教团体的立法停止实行，私立学校得到了津贴。1941年建立了镇压性的政治司法部，从而勃鲁姆、达拉第和甘末林被拘禁在一个军事要塞中。组织了各种专业团体——农业方面有工会和农业协会组成的农民公司，工业方面则有各级组织委员会。劳动宪章规定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并声称阶级斗争已经消灭。还颁布了反犹太的立法，这种立法是从纽伦堡的法律那里得到启迪，但也乞灵于传统的天主教民族主义。

和这个直到1942年4月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和反英的维希派沆瀣一气的，还有赖伐尔、达尔南、多里奥、马里翁、昂里奥、戴阿、阿贝尔·博纳尔等的维希派，所有这些人都是“通敌分子”；还有银行界和工业界的某些亲德分子的维希派，如沃尔姆银行的巴诺，雷诺的女婿勒伊德也是通敌分子。所有这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而且急于将法国纳入希特勒的大陆体系。贝当元帅原来打算逮捕赖伐尔（1940年12月13日的“阴谋”），将他除掉，然后依靠P. E. 弗朗丹的帮助，后来又想借助达尔朗海军上将之力来进行统治。但是，最后他不得不又召回赖伐尔。此后，最重要的职位都给与忠于德国事业的人。经济方面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军团，在俄国作战。与此同时，这个政权日益具有一个警察国家的特征；1941年，皮谢从贝当创立的“老战士荣誉团”成员中组成了“荣誉军团局”，作为一个单一的政党，打算从事警察工作。当达尔南担任“负责维持秩序的秘书长”时，荣誉军团局就成为类似于党卫军的名副其实的冲锋队，被用来进行反民主和反“犹太麻疯病患者”的斗争。1943年1月，国民军从它的普通士兵中招募了一批恶棍充当告密者，并配合军事法庭、德国警察和军队，逮捕、拷打和枪毙犹太人、抵抗运动分子和马基^[4]成员。

盟军在北非登击后，德军占领了法国的南部，这就加强了“通敌分子”的地位。德国人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尊重一个独立国家这种神

话了。从1943年的冬季以后，像卡塔拉、阿贝尔·博纳尔、比歇隆、昂里奥、戴阿等许多死心塌地的通敌分子进入了政府。他们企图保持德国人为了能够继续剥削这个国家所需要的那些服务。但是德国人的事业显然是失败了，原先支持过国民革命传统的保守人物，现在也像那些精明、审慎的人一样，成为顺应时势的人物，随波逐流，见风使舵。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形势要清楚得多。爱国者从来没有什么良心上的问题，他们在服从自己的感情时，也服从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命令。

抵抗运动所采取的形式，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在占领初期，资产阶级和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及农民——以及一部分相对来说人数不多的赞同纳粹事业的人——感到宽慰。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至少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是确定无疑地消除了。以后，随着人们逐渐地、比较深刻地感受到战败的耻辱，特别是随着德国人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暴露出他们的真正面目，于是人民的精神便逐渐复苏了。黑市和征购造成的食物短缺，肆无忌惮地滥用警察制度，迫害犹太人，处决人质，以及强迫劳动等，激起了各阶级男男女女的反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先是表明了德国人有可能会失败，继而表明大概会失败，最后终于说明德国人肯定会失败，当地居民们也从失败主义转变为消极的抵抗，然后是积极的抵抗。但是，总的说来，每个国家的真正的抵抗运动，虽然得到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有时还得到他们的帮助，实际上这些抵抗是由少数英勇的爱国志士构成的，为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甘愿放弃他们的生计，忍受苦难和放逐，以至牺牲他们的生命。

瑞典是唯一保持中立的国家。但是处在德、苏之间，在芬兰战争时期和挪威与丹麦沦陷之后，它的处境是特别困难的。由于处在完全孤立的地位和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德国，它被迫做出军事性质的让步，比如允许德国的军队（化装成休假的士兵）和物资过境，在瑞典领海内建立秘密的潜艇隐蔽处。随着同盟国军事形势的好转，瑞典有了较大的行动自由；1943年只允许个别的德国士兵过境，给予丹麦的犹太人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运动的成员可以在瑞典的兵营里受训。

挪威对德国的入侵只能够抵抗两个月。6月10日撤离纳尔维克后，国王哈康七世及其政府撤退到伦敦。正式的抵抗是在最高法院院长帕斯卡尔·贝尔格和贝尔格拉夫主教的领导下进行的，并竭尽所能地反对德国人扶植的约瑟夫·特博文区长领导的傀儡政府上台。直到1942年2月，特博文才任命挪威国家社会党领袖维德库恩·吉斯林担任一个民族政府的首脑。为了响应抵抗运动，一些高级文职官员提出了辞职；组成了一个“内部阵线”，这个阵线组织了罢工和破坏活动（如1943年破坏重水工厂）以及为反对1941年实行强迫劳动而举行示威游行。鲁盖将军领导下的军事组织“米洛尔格”，能将特工人员和情报送往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并大量散发秘密出版物。德国人方面则征调所有18岁至55岁的男子，关闭奥斯陆大学，逮捕大学的65名教师和1500名学生，放逐和处决抵抗运动的成员。占领的最后几个月变得特别困难，因为德国人在俄国人的挺进和挪威游击队的袭击下退却时，采取了“焦土政策”。

丹麦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国王查理十世仍然在位，他命令停止一切抵抗。社会党人斯陶宁的政府和主张与德国人密切合作的外交大臣斯卡文纽斯所采取的政策，甚至走得更远——由德国人完全控制丹麦的经济，实行极其不利的兑换率，撤换敌视新政权的分子，加强检查制度，警察和地方法院与盖世太保合作。1943年3月，在德国许可下举行的一次选举，表明了人们反抗这些措施的强烈程度；克劳森的丹麦纳粹党仅获得选票总数的2%和3个议席，而联合政府获得143席；反对合作最激烈的保守党，获得选票总数的40%。在这里，抵抗运动也组织了破坏活动，把年轻人和情报送往伦敦和瑞典，并散发秘密出版物。在开始迫害犹太人时，抵抗运动遍及全国；国王本人就反对排犹，威胁说他自己也将佩戴“黄星”；随后发生了罢工和破坏活动，最后终于宣布戒严并逮捕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1944年6月30日发生总罢工，接着9月再次爆发总罢工，在这以后，丹麦的全部警察被驱逐。

在荷兰，居民被认为是纯德意志血统，不久即将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因而德国在那里的统治并不十分严厉，至少在占领初期是如此。德国高级专员赛斯-英夸特逐渐实施了纳粹制度和反犹法律，并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和上、下两院。唯一允许存在的党派是穆瑟特领导的国家社会运动，其成员充其量不过11万人。荷兰的森林稀少和人口稠密，几乎不可能进行游击战，但是荷兰人民当中存在的民主精神、宗教信

仰和同胞情谊，使他们的抵抗运动带有某些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深深地触动了荷兰人的良知，因而他们开展了一个运动，组织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并给予犹太人、逃亡者和那些逃避强迫服兵役的人们以帮助。德国人的镇压也是特别收效的：在两年的时间里，德国警察就逮捕了大批伞兵并查获了大量的物资。

卢森堡也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德意志的国家，它一步一步地附属于德国，归特里尔和科布伦茨的区长管辖。各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实施了，这个国家隶属于德国军队管辖，使用了德国马克，当地语言卢森堡方言被禁止使用。但是出现了顽强的抵抗运动，采取的形式为公开怠工、开小差、出版秘密出版物、拒绝交纳征用的物资，并在这个游击队便于进行有效活动的国家里开展了马基运动。

在比利时，由于国王拒绝离开这个国家并且无条件地投降了，其后又决定把自己作为拉埃肯要塞里的一名战俘，并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因而使德国人更加容易地进行工作了。舆论总的说来是赞成国王的决定的。德国人也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亲纳粹的佛兰芒民族主义党、佛兰芒雷克斯党、佛兰芒国家同盟，以及这时已组成“大德意志帝国之友联合会”的瓦隆雷克斯党的相当大的支持。总的说来，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不像其他被占领国家的生活那样艰难。但是，当德国人开始对佛兰芒族活跃分子表示同情以后，不久就重新出现了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期间曾经出现过的态度。这个国家实行了定量配给制，抵抗运动得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鼓励，这些神职人员从不隐瞒他们对于通敌分子的谴责，并对放逐工人提出抗议。列日、韦尔维埃、拉卢维埃尔、沙勒罗瓦和蒙斯等地爆发了罢工；破坏活动和暴力行动发生了；为盟军战俘和飞行员组织的逃亡网非常活跃，并组成了一支秘密军队。和“比利时军团”“争取自由阵线”及其他团体一起，最大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阵线”。国家很快得到解放，国王由于1940年在贝希特斯加登拜访过元首和1941年的婚姻问题失去了人心，不得不离开比利时，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摄政。

在法国，组织抵抗运动比较困难，而且由于在法兰西的国土上存在着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政府，因而抵抗运动采取的形式也是极其独特的。右翼人物出于对军队首脑的忠诚，出于对一个普遍受人尊敬的人物的忠诚，并且深信贝当是在鼓励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民族国家，因比对他颇为信任，认为他的道路无疑是当时情势下唯一正确的

道路。因此，许多法国人如果不愿合作，只有辞职。一直到蒙特瓦尔会晤后，宣布了一项切实的合作政策，随即又召回赖伐尔，这时，许多人才开始想到戴高乐将军的道路，想到这是一条最光荣、也可能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结果，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便和反对维希政权的斗争一致起来。于是法国人终于多少积极地起来反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了，只有那些害怕德国人的失败即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的结束的人除外。

事实上，抵抗运动主要是左翼人士的事，他们得到右翼的一些人的帮助，这些人厌恶德国人及其维希盟友的所作所为。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自伦敦发表谈话，号召法国人继续与英国并肩战斗，抵抗德国人；“法兰西打了败仗，但它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就在国内的抵抗运动在法兰西国土上自发地产生时，他建立了国外的抵抗运动。他对国内抵抗运动的影响日益强大，主要得力于英国广播公司。这家广播公司先是在法国，后来又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这位不知名的将军争取了听众。抵抗分子重新组织起来，散发秘密出版物，送回有关德国军队的情报。起初从外部和他们建立联系是困难的。由英国“特种作战执行局”和由法国帕西上校领导的“情报与行动总局”派出的特使，以及通过同样渠道送出的物资和无线电收发报机，使抵抗运动的成员能够协调他们的行动，也使戴高乐将军的密使们能够将各种抵抗运动团结在他的周围。事实上，从1940年起，在法国北方决心抵抗的人们已互相取得联系，而且找到了和他们的英国盟友联系的方法。这些为数不多的孤立的团体，大部分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军人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军民组织”，以及主要由社会党人和工联主义者组成的“解放北方”。在法国南方，由前军官F. 弗雷内指挥的“战斗”，几乎由左翼人士组成，由阿斯蒂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南方”和里昂地区的“游击队”，也几乎全部由左翼人士组成。共产党人自1940年秋季起，或单独地或分成小组地散发秘密小册子。俄国参战以后，共产党建立了民族阵线，并组织了武装团体“共产党人游击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前巴黎警察局长让·穆兰，成功地说服了南方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联合起来；1942年年初，抵抗运动即出现。在北方，联合较晚，1943年5月由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基督教工人总联合会这两个主要的工会运动的代表们，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政党的6名代表和各种抵抗运动的8名代表，联合一致，在戴高乐的代表和伦敦的全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穆兰的主持下，建立了

“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穆兰被捕后，由乔治·皮杜尔代替他。因此，当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尔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由包括两名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政党的代表和各抵抗运动的成员组成），特别是当他召集协商会议时，整个抵抗运动已成为他的后盾。

法国南部被占领时，被德国人解散了的停战前军队中的反贝当分子，组成了“军队抵抗组织”。1943年后，组织了用降落伞空投武器；通过“逃亡网”，把被德军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送到北非去，并把志愿人员送到正在北非重新组成的军队去。几十个情报网的工作非常活跃。对德国军官和单个士兵的袭击急剧地增加，破坏活动也有增无已，这主要应归功于共产党人；他们进行紧张的活动，对放逐和处决人质进行报复。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逐渐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们忽视了向他们提出的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忠告；而且，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大部分是职业军人，他们不大信任这些根据在法国以外不为人所知、或者以共产党人闻名的领袖们的命令行动的、自发地建立起来的团体。这些领袖们抱怨说，不给他们武器，要不就是给的数量不足，并且认为这种缺乏信任正是造成马基在安省、阿尔卑斯山（格利埃内高原和维科尔）、中马西夫（穆歇山）、科雷兹、阿里埃日和加尔的某些战斗失败的原因。

在诺曼底登陆期间，两支法国军队参加了战斗，一支是编入美军的正规军，一支是“法国内地军”这支地下军，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这支军队顶盟军的15个师。

法国解放后建立的政权，并不是由那些在法国本土抗击德国人的真正的抵抗战士组成的，而是由来自伦敦和阿尔及尔的人组成的。他们答应实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纲领，但左翼的势力在他们当中是微弱的。右翼的领袖们绝大部分是通敌分子和维希政权的支持者，他们因而失势；因此政府是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加上一个新党派，即“人民共和运动”组成的，“人民共和运动”是从基督教民主党的学说中吸取精神力量的。这个党从右翼搜集选票，此后对其他政党起着牵制作用，与激进党在1940年以前的做法很相似。

在英国，工党的胜利——这只是自1880年以来英国左翼在大选中真正赢得胜利的第二次——使它能够实施它的纲领，不过这个纲领并未超出福利国家的范围。社会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掌权，在法国和

比利时的政治舞台上起着主要的作用，各国社会党都成为改良主义者，他们急于为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尽全力，但是并不像他们的父辈们20年前所理解的那样去实行社会主义。苏联军事威力的发现，以及这个强国的势力扩张到欧洲的心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管愿意与否，西欧各国出于重建的需要，不得不在财政和经济上紧紧依赖美国，这种情况只能使那些敌视社会主义思想的分子们的立场更为坚定。在大流血之后，不管外表如何，西欧的社会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保守了。

（宋蜀碧 译）

[1] Le Chemin des Dames，法国香巴尼地区埃莱特河谷与埃纳河谷之间的山脊上的通道，长约30公里。1917年4—5月间曾在此发生激战。此路系路易十五为其女儿们所修，故名。——译者

[2] “小票本”可以使股票证券持有者查对兑现的情况。“税务清算证”可以作为缴纳所得税的结算记录。

[3] 戴维·扬姆森：《二十世纪的英国》（1964年），第127页。

[4] 马基（Maquis）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或其成员。——译者

第十八章 美利坚合众国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人民重新选举威廉·麦金莱为总统。通过这个行动，他们批准了对古巴的解放和对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群岛的兼并。美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做的这些事意味着什么，大概还不清楚；对他们所处的新形势的全部含义，肯定也不愿意接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迈步登上了世界舞台。他们对自己充当的新角色在精神上并无准备，比日本人在佩里海军准将的“黑船”打破他们那个岛屿帝国数世纪闭关自守的状态时精神上的准备好不了多少。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1896年曾为经济上的不幸者，特别是为愤怒而穷困的农场主进行了斗争，在1900年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了斗争。但是，尖锐的不满情绪已经由于南非和育空河滚滚而来的黄金，由于商业周期的自然好转而失去了锋芒，“帝国主义”这个模糊的争论也就成为无足轻重的斗争课题了。美国人民因为轻易地战胜了软弱的西班牙而扬扬得意，并且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自以为是生活在最好的共和国里，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是值得惧怕的。

感觉到这种情绪的政治家们，无须为重新选举威廉·麦金莱当总统而担心，其中有些人还利用这个机会排斥了难以驾驭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在为时不久的美西战争中出现的英雄人物。当时，他因为率领一个非正规的骑兵团在古巴建立了功绩而取得了纽约州州长的地位。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这可能是违反他的意愿的。在华盛顿，他把无用武之地的巨大精力暂时用来研究法律。1901年9月6日，麦金莱总统被一个可能是发了疯的“无政府主义者”利昂·左尔格茨枪击，于9月14日逝世。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

新总统尚不足43岁，是白宫历史上最年轻的主人，他还有其他许多出众之处。他生于1858年，南北战争对他来说仅仅有一点模糊的记忆，而不像自从林肯以来他的所有前任那样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危机。在约翰逊之后，他是第一个没有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共和党总统。虽然他是狂热的共和党人，他母亲的一家却是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他还有一个叔父一直是克利夫兰的民主党人。虽然按新的标准来衡

量，他算不得出身豪富，但也还属于纽约社会上的殷实阶层。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有各种经历，做过州议员、大牧场主、警察局长、文官委员会委员和助理海军部长。但是，他虽积极投身于政治，却不是麦金莱理解的那种政治家。他是杰斐逊以后最多才多艺的总统。如果说他的知识大都是肤浅的，他的爱好、求知欲和同情心却真正是广泛的。善于像演戏一样表现自己，是他的最大天赋。他谈吐举止的风度博得漫画家和讽刺作家的欢心，也博得选民的欢心。他几乎立刻使总统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中心，这是自林肯任职以来未曾有过的。他懂得如何操纵、如何抚慰国会的领袖们；他不作无谓的争吵。而对于那些曾想把他埋在副总统职位上的保守分子，他在1904年重新被提名和重新当选以前，一直避免同他们摊牌。

西奥多·罗斯福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超过他的政府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的确，这种印象是其政府的主要成就。他使联邦政府大显身手，引人注目，深得人心。他也使联邦政府更符合现代要求。这位新总统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有一套主张。他计划按照希腊的模式改革币制；他重新提出了发展华盛顿城的朗方计划^[1]。他不仅为从前的“义勇骑兵团”的人安排工作，也同样给诗人和博物学家安排工作。他揭露了芝加哥肉食加工厂的肮脏丑事（厄普顿·辛克莱的著名小说《屠场》帮了他的忙）。虽然罗斯福的经济观点远不是激进的，但他丝毫不像自约翰逊以来的他的所有的前任（包括克利夫兰在内）那样，对实业家抱有自发的同情和敬佩。因此，他站在矿工一边，干预了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大罢工。总统的这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态度在白宫是罕见的，而且，是受人欢迎的罕见的事。因为，在布赖恩竞选运动中爆发出来并逐渐平息下去的不满情绪已经采取了更为合适的新形式。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克利夫兰政府在一起诉讼案中并没有能够援用该法，有些人说该政府在这起诉讼案中并没有有效地施加压力。各托拉斯自然也就兴盛起来。最知名也最为人所憎恶的美孚石油公司比任何时候都强大，而1901年创立的美国钢铁公司不仅将所有大钢铁生产者联合成为一个巨型联合企业，而且其投资额达到14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国债的总数。而且由于尽人皆知它所接管的资产不值此数，因此人们断定其创办者J. P. 摩根公司是把未来的垄断利润也估算在内了。所以，当这家银行在1902年创立北方证券公司以调解哈里曼和希尔这两家铁路行业之间的冲突时，公众极为震

惊，因而最高法院于1904年这个大选之年命令解散该公司，这是政府取得的一个胜利。

罗斯福政府以推行两项政策而著称，除了其他方面，这两项政策也是总统的业余癖好。罗斯福在西部度过其青少年时期，他对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深信不疑。制止单纯开发国有土地的政策可以追溯到克利夫兰时期，但罗斯福扩大了这项政策，尤其是扩大了保护森林的政策，建立了林业机构，并取得了对未来联邦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成就，从而使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从青年时期起，罗斯福就爱上了军事。他虽然宣称自己热爱和平，却念念不忘爆发战争的可能。他支持其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改革陆军的努力，然而怎么也无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强大的陆军国家。海军则不同。罗斯福为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而乞求过、辩解过并且争论过，他终于如愿以偿；他亲自关怀备至地注视这支海军的成长。作为以实力实现和平的一种姿态，他派遣这支海军做环球巡弋，却只有够一半路程使用的国会拨款，这就使本来不赞成此事的国会不得不承担拨款责任，以便使舰队返航。

但并非他的所有行动都仅仅是姿态。为了签订关于“地峡运河”问题的新条约，在他就职之后便同英国重新开始谈判。第二次海—庞斯福特条约允许美国在运河设防。现在必须决定这条运河的路线是选择巴拿马，还是选择尼加拉瓜呢？结果，选定了巴拿马，于是在1903年签订了海—埃兰条约。但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如果不是在巴拿马省适逢其会地爆发了一次革命，运河建设就会停顿下来，或者建在尼加拉瓜了。巴拿马革命爆发不到三天，美国就给予承认，并由海约翰和布诺-瓦里亚谈判签订了一项条约，给了美国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领土上开凿运河的权利。后来，罗斯福吹嘘说，是他“夺得了运河”。虽然美国是否阴谋参预这次适逢其会的革命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但这个插曲却损害了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达好多年之久。罗斯福还以其他方式挥动了一——用他自己的一个生动的词汇——称为“大棒”的武器。他将门罗主义的意义解释为：如果美国阻止了欧洲列强使用通常的强制手段从加勒比地区发生骚乱的各共和国的短命政府那里得到赔偿，那么，美国就必须强迫这些共和国遵守最起码的正当做法。于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不是通过一项条约，而是通过一个“行政协定”被置于美国的监督之下。而奥尔尼在委内瑞拉争端中

的格言，即美国的“命令”就是法律，至少在这个地区俨然已成为真理。

更大的争端也未能避免。为保持太平洋力量均势而进行的巨大斗争，导致了日俄战争。美国官方的态度和非官方舆论一样，是深切同情日本的。然而，罗斯福与其说是充当了诚实的掮客，不如说是充当了率直的朋友，他说服了至少在经济上已是山穷水尽的日本人在和平条件上适可而止，于是在美国的主持下于1905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大西洋的力量均势也受到了威胁，虽然不像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时那样明显，但罗斯福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和会上支持了英法的立场。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在世界政治中从来还没有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那时它像是一个病人，此时却很像一个代理人了。

没有疑问（无论在麦金莱的后台老板马克·汉纳^[2]死后是如此），罗斯福将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克利夫兰的民主党人利用了1900年布赖恩的失败，这时提名纽约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守主义的法官奥尔顿·帕克为总统候选人，想借此来利用保守派对罗斯福的不满。但是，“大企业”害怕罗斯福总统还没有害怕到要去支持帕克的程度，他们给罗斯福总统的竞选捐了大量资金（虽然罗斯福对此事不知道或者宁可当作不知道）。帕克失去很多布赖恩的支持者，从共和党的不满分子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支持。竞选对罗斯福来说是他个人的一次巨大胜利。在胜利的时刻，他宣布，将不再做下届选举的候选人。他是美国历史上仅仅是通过继承得到总统职位，而以后又凭自己的能力当选为总统的一个人。对于加在他身上的不得连任三届的限制，他本来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指的是不得超过两次经过选举而取得的任期。但他自断后路，在整个第二届任期内，由于国会知道他将在1909年下野而受到掣肘。他的朋友们希望他改变主意，他的敌人则害怕他改变主意。然而他决心信守诺言，甚至说服自己，在白宫待上将近8年，对他自己和对国家都已经够了。

第二届任期不是没有成果的。联邦对铁路运费的有效控制开始实行。同日本的关系，先前由于日本人对朴茨茅斯条约的条款感到失望和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日本人的立法感到不满，而急剧恶化，此时在总统及其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护理下，即使没有康复，也已开始好转。巴拿马运河工程在经过了开头的混乱和争吵之后，也在大力进

行。这位总统在同别人争论时，总是能够把公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像历来那样深孚众望，这就使他得以遴选他的继位者。他曾考虑过鲁特，但鲁特同一些公司的瓜葛被认为是过分不利的条件，所以罗斯福的选择便落在其陆军部长、身材魁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上。民主党人提名布赖恩，他的结果比帕克好得多，表明民主党仍然拥有力量的地方是南部和西部。但是由于全国都在塔夫脱身上看到他就是罗斯福的继承人，便投票选举了罗斯福总统所遴选的继任者。

新总统在进入白宫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选任的官职。作为联邦法官、作为司法部副部长、作为菲律宾总督、作为陆军部长，塔夫脱虽担任过高级职务，但均系下属。现在他要独当一面了。他必然意识到，他之所以成为总统，仅仅是因为罗斯福选中他作为继承人。他整个抛弃了罗斯福内阁，一开始就没有搞好。接着他又冒险提出修改关税的问题，而这是罗斯福从来没冒过的风险。原来在罗斯福当政时感到痛苦的参议院领袖们，开始估量他的这位继任者，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感到宽慰。因为塔夫脱相信分权制，他认为，他的职责不是去支配或者甚至去领导国会。结果，最后提交给他的关税法案（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地做了一些修改。塔夫脱本来可以在早些时候加以制止，可以强行加以修改，但他把它接受下来，并为它进行辩护。在其贸易政策中，同加拿大的互惠条约本来是可以提高他的声誉的，却遭到加拿大的拒绝。这不是塔夫脱的过错；如果说这是哪一个美国人的过错的话，那是当时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一类轻率的民主党演说家们的过错。因为民主党人利用了共和党的分裂，自1892年以来第一次在众议院内取得多数席位。在众议院里，中西部的反对分子已经同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罢黜了独断专行的坎农议长。即使总统想领导国会，为时已经太晚。罗斯福已经从非洲和欧洲回来，他先是怀疑，很快就感到气愤。

对旧秩序，对“顽固派”不满的浪潮远远没有平息下去。在全国，选民都在物色一位领袖，而塔夫脱并非这样的人选。他感到他并没有辜负罗斯福对他的信任，这是对的。对于指责他和他的内政部长巴林杰轻率地把值钱的那部分公有土地转让出去并从中贪污，他表示强烈不满。他知道，他的政府在检举托拉斯方面做得比罗斯福政府更积极更成功。但塔夫脱是个生性审慎的人，在体质上，某种程度在精神上都缺乏生气。那些西部的反抗的激进派绝不会需要他这种人。一

时间，他们似乎可能要拥戴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恩·拉福莱特。但是要想做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拉福莱特是无法与罗斯福匹敌的。而罗斯福年纪尚轻，如他后来所说的，感到自己就像“一头公麋”，他的朋友们和他自己的性情，都有力地促使他同塔夫脱决裂。他的年龄仅仅比林肯进入白宫时稍长一些，对他这样一个精力如此充沛的人来说，在非洲猎狮，拜访国王和皇帝们，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金，甚或在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3]讲课，仍然感到有使不完的力量。在朋友们和他自己的性情的驱使下，他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

毫无疑问，他是一般共和党选民的第一个选择对象，而且可能是唯一能够使严重分裂的共和党团结起来的候选人。但是塔夫脱决不示弱，而支持他的有共和党的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包括罗斯福的密友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伊莱休·鲁特等人。这些高级领导人宁愿与塔夫脱一起失败，也不愿与罗斯福一起胜利，而使共和党的控制权落入危险的激进派手中。一个在职总统往往能够得到重新提名，塔夫脱也是如此。但是罗斯福及其支持者们抗议他的提名权利被剥夺，匆忙成立了进步党，并提名罗斯福为其总统候选人。

这样一来，民主党的胜利就确定无疑了。从政治家们的观点来看，显然候选人应是众议院议长、密苏里州的钱普·克拉克。但是，布赖恩虽然最终也已明白争取第四次提名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了，但看到克拉克是他以前的保守派政敌，即在1904年提名帕克的那些人的候选人和同盟者。于是，他把他仍然是很大的力量倾注给克拉克唯一认真对待的竞争者、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取代了这位众议院议长原来所占有的领先地位，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同罗斯福一样，其作风在美国政治上都是异乎寻常的。他在被提名的时候，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只有两年。他原是出色的政治学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校长。他是标准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同布赖恩和布赖恩主义格格不入。他为把普林斯顿大学办成民主的大学而一再斗争，但终归无效。他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殉道者——连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也当不下去了。他接受民主党首领们的建议，竞选新泽西州州长，结果胜利当选。他又同这些首领们发生了争执，挫败了他们，并提出越来越激进的观点，从而再次成为全国著名

的人物。正是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或者说至少是作为一个为“新自由”而奋斗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他才胜利当选的。

这位新总统推崇英国宪政。他认为自己既是总统又是首相。当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时候，曾写道：“如果他（总统）领导国家，他的党几乎不能反对他。他有什么样的才智和魄力，就做什么样的总统。”他实践了这个原则。他无视杰斐逊创下的先例（杰斐逊不是演说家），他不是向国会送去冗长的——也是不被理睬的——书面咨文，而是亲自向国会发表咨文。威尔逊是一个演说家。他拟订了一整套立法计划，这时便促其实现。一个削减关税的议案提交国会，由于有效地、大张旗鼓地诉诸公众并有效地对国会施加了公私压力而得以通过。长期辩论的改革银行体制的问题，以建立联邦储备系统加以解决，该系统规定使通货更富有弹性并建立一个组织更加完善的联邦银行体系。联邦储备系统也在表面上平息了农民激进派对银行家的敌意。这个激进派的领袖布赖恩被威尔逊深谋远虑地任命为国务卿。

他在其他方面也满足了布赖恩：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布赖恩的要求，对那些忠实的“有功的民主党人”加官赐爵；不再支持美国银行家在前届政府鼓励下对中国已经混乱不堪的事务所进行的干涉。“金元外交”也被认为不复存在了。诚然，威尔逊的运气并不佳。在墨西哥，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继续。没有一个墨西哥政府能够担负起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义务。许多美国人确实对墨西哥十分不满，威尔逊也认为他不得不进行干涉，占领坦皮科，以便对美国国旗受辱事件进行报复。然而他确实成功地除掉了“篡权者”韦尔塔，并且通过接受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调停而平息了拉丁美洲的舆论不满。他宣称门罗主义并不是对保护国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他虽然继续插手加勒比地区事务，却坚定地拒绝对墨西哥进行全面干涉；1916年当潘乔·比利亚侵扰美国领土之后，他仅仅是派遣军队给予惩罚便适可而止。他答应给菲律宾以更大的自治权，如同准许波多黎各居民享有美国公民权一样，同样都是他这种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态度的证明。

然而，正如威尔逊所惧怕的，1914年的大战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将他拖入外交领域，而对此他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使布赖恩辞去内阁职务。美国对交战双方的态度问题，越来越使总统和公众关切。立法工作还没有停止。工会（据认为）被免除了反托拉斯法的约束。

建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便按照“新自由”的精神来管理企业。经过一场剧烈斗争之后，将大企业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路易斯·布兰戴斯安排进最高法院。亚当森法案满足了铁路工人要联邦限制工时的要求。因此，在第一届任期结束时，威尔逊回顾对国内事务的领导，可以说取得了以前的总统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的成就。

重新联合起来的共和党人提名为竞选而辞去最高法院职务的查尔斯·伊万斯·休斯为候选人。休斯是一个生硬而不圆通的候选人，疏远了一些他本来可以争取到的进步党支持者。威尔逊的主要资本就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国内取得的成就，而且人们认为——如某个大会的著名发言所归纳的那样——“他使我们避免了战争”。这也竟然成为他取得胜利的一个原因。

民主党人选举了他们的总统，但几乎无法控制国会。威尔逊一经重新当选，就试图在交战国之间进行斡旋。但是，未来的德美关系正在柏林做出决定，而不是在华盛顿。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不顾美国干涉的危险，他们认为美国的干涉为时已经太晚，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就在威尔逊第二次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便带领美国人民参加了战争。改革家威尔逊变成了战时领袖威尔逊。诚然，美国不是一个协约国，仅是一个“参战国”，但威尔逊却成了对本国人民，对各协约国人民，对德国人民，对俄国人民讲话的主要人物。势所必然，“新自由”被置诸脑后，政府越来越专心致力于战争。在美国参加的战争中，像这次这样之有效，流言蜚语之少，就一个已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来说，其力量动员之迅速，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民有理由感到庆幸，但与他们的爱国主义不同，他们的庆幸是有限的。威尔逊的著名演说响彻全球，而以1918年1月8日的“十四点”演说为顶峰，这些演说在备受折磨的欧洲比在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美国，有着更热情的听众。

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战争对国内的影响是很大的。为在海外服役而征兵是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对农产品价格实行限制、对铁路运输采取统一管理之类的经济控制，也均属前所未有的。为发行“胜利公债”而进行的宣传运动，甚至在南北战争时也是没有的，伴随这种宣传运动而来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也是南北战争时所未曾见过的，其严厉程度远为英国、法国或德国所不及。很多人觉得，那两个“间谍法”似乎粗暴地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德裔美国人成为一个愚蠢的敌视

运动打击的对象，激进的不同政见者开始遭到合法的和非法的压制。总统全神贯注于进行战争，往往把人们的批评和怀疑看成是对他自己的道义目标的指责，他不像林肯那样明智而宽宏大量。然而，他不愿意像林肯那样按照含糊不清的“战时权力”来办事。他请求国会给他权力，却又像林肯一样不赞同成立类似南北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委员会”那样的机构。大部分共和党反对派热心地支持为战争做出的一切努力。的确，共和党反对派叫嚷得最响亮的成员，也为总统对德国人民讲话时所使用的温和语调感到遗憾，并表示担心会缔结一项“软弱的和约”。威尔逊拒绝将海外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授予罗斯福和伦纳德·伍德，从而激怒了他们的许多共和党朋友，他也忽略了鼓励那些除了取得战争胜利之外还想有所作为的共和党人同政府密切合作。1918年秋，战争胜利在望，国会选举也将来临。威尔逊在别人怂恿下发表了为争取民主党赢得国会而斗争的呼吁。此举通常被判定是个错误。是非如何，无法论定。但无论如何，共和党在两院取得了胜利。

在战争初期，许多美国人就考虑成立一个“实现和平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的问题，总统决心以此为新和约的基础。大战在美国人民看来简直就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十字军圣战。谁也没有着重考虑事情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实行间谍法的体制之下，对战争问题进行坦率讨论是困难的。威尔逊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仍未能动摇他对自己承担的权力或使命所抱的信心。他不顾某些密友的劝告，决定亲自去欧洲。他没有带任何像塔夫脱这样在当时控制着国会的政党中有影响的共和党人一同前往。正当威尔逊在欧洲充当救世主的时候，他在国内失去了民心。因为此时美国人民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心理上正在解除动员状态。对作战努力的多方支持此时已可以看出并非出自人们的本心，强求一致的那种荒唐做法也已暴露出来。德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转而反对政府。

共和党领导人充分利用了这种转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新任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操纵了该委员会，并发起运动，对国际联盟盟约强加了总统不能同意的保留条款。最后，威尔逊从欧洲返国，带回一项他认为同国联盟约不可分割的和平条约。为了使全国重新支持他的主张，他开始了旅行演说。威尔逊没有借助于无线电，承担了他力所不及的任务，终于在丹佛病倒了。他拒绝妥协，失去了美国参加国联的一切机会。

显然，潮流正在变得对民主党人不利，威尔逊曾经号召进行的公民表决，结果当然也就同他的伟大计划大相径庭。总统所患的中风使他既无法行使总统的职权，也无法行使党领袖的职权，而在1920年这个大选之年又爆发了剧烈的经济衰退，这使民主党微弱的希望更加渺茫。民主党人提名俄亥俄州的前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位在本州之外很少为人所知的干练而负责任的报业主，和他搭配竞选的伙伴是那位年轻漂亮、精力充沛的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在更加重要得多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主要的竞选人互相倾轧，彼此抵消力量，于是共和党参议员一小伙人和某些狡猾的党阀便把不学无术、无所作为的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强加给精疲力竭的代表们。其竞选纲领极为模糊，但那些曾支持美国加入国联的著名共和党人知道只有投共和党的票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领导竞选的人对此更加清楚。最后，大会作为表明自己独立行事的唯一姿态，提名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为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共和党人轻易获胜，赢得了除“坚定的南方”^[4]以外所有各州的选票，并且把南方的田纳西州的选票也争取过来了。这个认为只有它才适于治理国家的政党的在野状态结束了。对别国事务的干扰从而也结束了。共和党一上台，对其竞选纲领中所做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诺言，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要去实现，而是同德国签订了单独和约。“伟大的十字军圣战”结束了，而且是被否定了。

后人认为，从哈定就职到1929年10月24日股票市场崩溃这些年，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值得赞赏的时期之一，只能同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些年相比较，两者都是“镀金时代”。由于后一时期恰逢美国人民社会习俗发生深刻变化，影响了家庭生活、教育、宗教、体育运动等方面，由于一大批新的力量冲击了旧的美国方式，因而这个时期比格兰特时代更为动荡。它处在两次灾难性的大战之间，处在至少像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那样深刻变化的时代。如果政界、企业界、宗教界、教育界的领袖们都善于应付这种危机，那才是怪事了。许多人不善于应付，完全善于应付的则一个也没有。但他们受到了双重的责难，因为他们很多人自称具有能力。而很快就可悲地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力，而且，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1920年由于摆脱了外部世界的事务而感到高兴，但外部世界却不愿被美国人所摆脱，不愿把它的坏事和蠢事局限于那些不影响美国的事情上。

哈定1920年取得的压倒优势的胜利，表明人们怀念美国安全而稳定的过去。他们正当地认为这个过去受到了威胁。哈定的胜利是共和党中反对自从麦金莱总统逝世以来强加给该党的那种向“进步主义”让步的各个派别的胜利。然而联邦政府没有完全回到过去的路子上。它把对铁路的更严的控制权交给了州际贸易委员会，并把新的义务强加给铁路部门。联邦其他控制机构的权力，也许像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被削弱了；共和党各届政府对待企业权利（名义上往往是各州的权利）的态度也许比威尔逊政府友善得多——但是联邦的权力只会是增加，而不会是削弱，即使仅从以下原因也可以看出：新兴工业已扩展到先前的农业地区，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作用而使得财政更加一体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只有空谈家才会看不见的“更加完备的联邦”。自从1914年以来，国债增长了将近25倍。单是支付国债的利息及提存偿债基金，就扩大了联邦的权力，并使人们对税收政策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产生新的强烈的兴趣。通过一项先是暂时的然后是永久性的关税法（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法）已有可能，但这种恢复严格的保护贸易制原则的做法，当其立法生效后不仅未能使美国重新成为债务国，或为欧洲闹美元荒的国家提供手段以便它们用以购买美国出口货，特别是购买由于战争促成的美国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加强而提供的产品；它也未能控制移民限制措施所产生的后果，这些移民限制措施使大量拥入的移民大大减少，并对从欧洲东部和南部来的“新移民”加以歧视（这些措施就是为了歧视）。柯立芝总统说：“美国必须是美国人的美国。”

这也是一些并不十分著名的人们的看法。在南方，三K党又复活了。它并没有长期局限在南方诸州，不过，在北方，它往往只在像印第安纳州那样有大量南方人的州里势力才最为强大。它也不仅仅是与黑人为敌。其成员必须是“白种的非犹太人的新教徒”。它以鞭打、打烙印、阉割、谋杀来强制推行原教旨主义的新教道德标准。

导致建立新的三K党的动荡不安局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它在几个州内促使通过了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达尔文进化论的立法；它在新教教会内部引起了“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源于此时）反对“现代主义者”的激烈争论。

在政治上，这种保卫美国旧道德标准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19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它不是规定扩大国会对

酒的贸易的管制权，而是规定“在美国及其治下的一切地区，禁止各种酒的生产、销售或运输，以及进口和出口”。它还规定“国会和各州有共同权力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除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外，所有各州最后都批准了这个修正案。许多州开始通过立法加强主要的联邦法律“沃尔斯泰德法”（禁酒法）。但当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法律有严重局限性的时候，热情就消失了。在几年之内，禁酒立法是否应实施，随之而产生的这个修正案是否明智和有效的整个问题，便成为两三个激烈争辩的政治话题之一，成为老的和新的美国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老的美国即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主要是北欧人的后裔，宗教上主要是新教；新的美国即巨大的新兴城市的美国，居民大多数是晚近的移民的后裔，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在生活方式上则忽视乡间的某些最宝贵的传统和成见。

对美国生活方式受到损害的担心的背后，同样存在着对它某些方面的强烈不满。战争造成了虚假繁荣的市场，使人们荒谬地过高估计了对美国粮食和棉花等原料的长期需要。当人们预料到这种前景时，地价便猛涨了。在战争中和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耕地面积扩大了，连那些除了特别有利的季节之外不宜耕种的地区都被开垦了。人们为了买地、为了改良土地、为了修建学校和道路而贷款。1920年的衰退使好几亿的投资化为乌有，使许多业主变为佃户，更多的人要成为业主的希望破灭了，并且使西部各州和南方一些州长期感到不满。别的地区黄金到处滚滚而来，唯独这些州没有分享到这种利益。由两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一个联盟“农场集团”削弱了政党的纪律。共和党虽然表面上胜利了，但实际上这种不满暗地里积聚着。推崇企业精神的历届共和党政府没有一个能够给农场主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即某种真实的、可以拿到手里的、能够同由于高额关税而带给工业的利益相当的现金收入。共和党新政府在执政的头一两年交了好运。1920年的企业衰退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见的繁荣，其间只有些小的跌落。以亨利·福特为代表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工业使美国人兴高采烈，也使世界为之惊叹和羡慕。人们大胆地断定贫困正在消失，企业带来的无限财富，即使并非平均分配，也是慷慨地分配给各方了。

甚至世界其他国家一时间仿佛也在重新走上正轨，恢复了偿付能力。美国政府小心谨慎地避免在欧洲和亚洲承担任何义务，但德国赔

款问题的两个“解决方案”，即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格计划，却都是在美国赞助之下拟订的。对于德国欠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赔款和这几个国家欠美国的债务，美国政府否认其间有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联系，但是德国向战胜国支付赔偿所用的资金，是由美国私人投资者提供的，而其大部分又转付给美国政府，作为这些年里议定的战争债务解决办法中的一部分。如果承认这样的偿付方法是可取的，那么，就推测出来的欧洲经济情况来说，这些解决办法是很慷慨的——这种看法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强烈。在远东，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暂时解决了海军力量的比例问题，对于乐观的人们来说，这个条约似乎恰当地应付了当时由于俄国势力的消失，英法势力的衰落，中国的长期内战，以及在此情况下给经济上正在扩张但仍觉窘迫的日本带来的诱惑而造成的那种局面，甚至当这种安排是否可靠越来越受到怀疑的时候，1928年的凯洛格公约——除苏联之外所有大国均在该公约中表示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手段”——对于相信法律条文的人来说，似乎意味着重演1914—1918年那种蠢事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这个公约也使人们对军备协定方面的争论更难理解，更容易用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的赤裸裸的利益加以解释。失败了民主党人自己也放弃了国际联盟的事业。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尽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历届总统都支持美国加入国际法庭，但所有这方面的努力都在参议院遭到了挫败。

好运气也以不吉利的方式光临共和党人，因为哈定总统在1923年去世，解除了他们一个致命的负担，否则，他们在1924年便可能没有胜利的希望。哈定即使不像死后对他的批评那样，完全不适合于做总统，而且他在慢慢学会当总统，但他没有真正的行政或立法经验；而且，即使他并不像他的贪污腐化的朋友们所暗示的那样，完全受他们愚弄，但他确实对他的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那样的小城镇贪污分子和内政部长福尔那样的铤而走险的人过于宽容。不久以后，关于贪污的传言，后来是关于贪污的确切消息，开始传播开了。这些传言说的是大规模的贪污，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唆使下进行的贪污，以及涉及较低的联邦官员的贪污。在这场风暴爆发之前哈定就死了。参议院调查到的丑闻牵连到联邦油田的转让，牵连到司法部的工作，牵连到退伍军人管理局。证据是大量的而且是无可置疑的。自从格兰特时期以来，还没有这样的掠夺公共财产的事情。新总统虽踌躇不定，但做了

让步。内阁三个成员辞职，后来有一个被监禁。新政府清理了内部，把弊病连同哈定的尸骨一同埋葬了。

新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和硬塞给美国人民的那位嗜酒的演说家和小城镇的编辑大不相同。他是一个禁酒的新英格兰律师，曾任北安普敦市长和马萨诸塞州州长，有行政经验；他还有搞政党活动的经历，但他并没有上哈里·多尔蒂或艾伯特·福尔等政客的当，或者成为他们的同谋者。在一个不断丧失准则的时代，他以新英格兰人的那种节俭、谨慎和缄默，给白宫带来一种令人放心的气氛。共和党人迅速发现他们的新总统是一位可贵的人物，便利用所有的宣传手段来树立他的威信。

在民主党内，城市和农村、老派和新派之间长期存在的斗争达到了惹人注目和不顾死活的程度。争夺1924年的提名的两个主要的候选人是威尔逊的财政部长（和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和大得人望而连任纽约州长的艾尔弗雷德·伊曼纽尔·史密斯。一个是该党农村的、福音派新教会的和“禁酒”各派的候选人，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所支持；另一个则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坦慕尼厅”^[5]的成员、反禁酒者，一眼就能看出是“纽约街头”的产儿。双方的党徒破坏了民主党的大会和胜利的希望。几乎在绝望中提出的候选人是一位杰出的公司律师约翰·威廉·戴维斯。他以反对贪污的问题作为竞选纲领。在繁荣年代贪污这个问题不是很有力的竞选纲领，不仅如此，国内一大部分激进的不满者，都转而支持“进步党”的候选人，闻名的激进派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恩·拉福莱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党人的胜利便是必然的了。

柯立芝同沃波尔一样，是个不愿招惹是非的人。商业繁荣继续着，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既鼓励国内企业的合理化、技术工作和商业业务标准化，又鼓励美国企业向国外寻找越来越多的市场。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新英格兰的各纺织业城市越来越沉重地遭到南方竞争的打击。许多煤田面临着那些或者较新，或者因为工会势力不大或没有工会而较易管理的煤田的致命竞争。扩大有组织的劳工队伍，在战时曾认为大有希望，但此时看来，这种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工会只能勉强维持现状。在某些地区甚至连现状也无法维持。曾聚集在拉福莱特周围的激进派力量已瓦解并丧失了斗志。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积极

地煽动罢工，建立对立的工会，从事各种类型的宣传鼓动，但在柯立芝的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中有什么用呢？

当1928年总统竞选运动已经接近的时候，观察家们怀疑的仅有一个问题：柯立芝总统是否将参加竞选？他在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中表示将不参加竞选，这就注定了两个候选人将是企业家在政治上成功的化身赫伯特·胡佛和正在连任第四届纽约州州长的艾尔·史密斯。他们果然被正式提名了，而这次竞选比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提名一位天主教徒，使隐藏在三K党背后的力量公开出头露面。在近代的任何竞选运动中，都没有像这次竞选运动那样，口头诬蔑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在一点上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在近代的任何竞选运动，也都没有像这次竞选运动那样，两个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如此接近。每一个人都要求授权给他继续照常进行美国正在进行的事业。唯一不同的是，史密斯州长对联邦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推行禁酒的那种热情怀有敌意，而在胡佛部长看来，禁酒则是“伟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实验”，动机高尚而意义深远。

结果如何，仍然是没有疑问的。繁荣太广泛了，对财富和一般福利更迅速增长的“美妙希望”太普遍了，以至一个反对派候选人，即使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不是纽约人，也不可能击败干得这么出色的党。表面上看起来，民主党干得比以往更糟糕，甚至连坚定的南方的5个州也丢掉了。但某些观察家注意到，史密斯比以前的任何民主党人得的选票都多，他赢得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并在各大城市显示了民主党候选人在30多年的时间里还没有显示过的力量。然而企业界的候选人当选了，并且准备将企业文明引向新的高度。不到6个月肥皂泡就破灭了。初期的“恐慌”可能同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价格暴跌时的恐慌一样严重。这种恐慌也有明显的政治后果。但1929年的“萧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一直延续到1940年，虽然严重程度逐渐减弱，其影响则比早期的恐慌具有更大的革命性质。它给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的变化，同内战造成的变化一样重要，而且比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可能比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变化更为重要。

首先，它促进了美国政府职权方面和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方面无疑总会出现的演变。孤立主义已采取了更多的形式，而不只是从欧洲脱身。孤立主义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在美国国内以及国外都存在

着威胁美国方式的危险，存在着国家为劳工的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危险，存在着实行初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存在着根据某些社会正义的思想，而利用征税的权力重新分配收入的危险。由各大公司组成和控制的一些工会，竟被其发起人加之以“美国图样”的称号，这并非是偶然的或无意义的。正是这些力量，即导致从政治上支持禁酒，支持限制移民，导致制定反对“激进主义”的一些法令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使美国不致受欧洲榜样的传染。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在老罗斯福和塔夫脱总统任职期间和威尔逊总统第一届任期内起作用的那些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只不过一时受到抑制，并未被制止。这些力量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共和党人和他们的企业界的同盟者振振有词地声称他们是美国人民天然的、仁慈的和成功的领袖。柯立芝曾无意中说道：“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如果不管他当时说话时上下文的内容，这句话倒真是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企业领导人声称他们制造了巨大的经济机器，也懂得如何越来越熟练地加以操纵；但以1929年至1933年，人们发现，对于这个巨大经济机器，企业领导人并不了解，也无法控制。

这次萧条的必然结果是削弱了，然后是丧失了对企业主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信任。即使萧条仅仅是清除了投机事业，那么，单就这一点来说，萧条也够严重，够让人丧失信心的了。成百万的人受到怂恿从事投机买卖，购买德国债券，拉丁美洲债券，购买许许多多大量兜售的美国债券，而这些投资如同在赛马会上赌输了的赌注一样，证明是没有永久的价值的。而且这些债券的大多数并不是由一些无信用的中间商销售的（虽然中间商是足够多的），而是由大银行和大银行家销售的。即使没有更多的投机买卖，信用结构已经是投资过多了。在经济崩溃以前的几年，长期的农业萧条不仅使地方银行难以撑持，成千成千家地倒闭，而且使保险公司、贷款公司、农场抵押的受押人也难以撑持。铁路的状况也不好，即使在经营良好的时候（当然不是全都如此），也受到汽车，不论是小汽车还是卡车的剧烈竞争。由于压力持续下去，由于银行坚持要收回贷款，由于经纪行坚持要支付保证金，由于金钱在“保险的”银行和“保险的”债券中丧失，谨慎而稳当的市民们发现自己简直像赌徒一样处境糟糕。而且，当一个丑闻接着一个丑闻被揭露，当人们得知税收法如何使有钱而又主意多的人轻易地而又合法地逃避缴纳所得税，当人们得知市场是如何被人所操纵，当英萨尔公用事业“帝国”或丑闻虽较少但同样不能偿付债务的

范斯威林根铁路“帝国”这样一些用纸牌垒成的骗人的金字塔倒塌的时候，不满和不信任便发展成为恐惧和愤怒。美国人民，或者说，他们之中的千百万人，被他们的天然领袖出卖了，因此，他们转向另外一些领袖。

如果说这种丧失信任的情况一定会最明显地表现在群众对新总统的态度的改变上，这也不见得是公平之论。赫伯特·胡佛精明、正直、勤勉，具有特殊能力，这些声誉并非虚传。但他不仅要对付一场世界危机，还要对付一场国内危机，而他的党——假如不是他自己——因其关税政策，因其盲目相信大企业的明智和可靠，因其幻想可以无视外部世界，对这场国内危机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这样，共和党对美国支付平衡危机的唯一回答，就是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中进一步提高关税。这是一项极不合时宜的立法。许多人虽然相信提出这个法案的两个国会议员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他们不能相信总统——曾那样努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强有力的前商务部长——竟然也会不知道这一点。美国积极协助清理战争债务、赔款和在繁荣时期纠缠不清的金融往来的烂摊子，是否一定能够拯救欧洲使之免于最后崩溃，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但总统除提出暂时延缓偿付之外，也别无他策。国会和舆论不允许他再干更多的事情。即使美国的麻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来自欧洲，美国人民十多年来已被告诫，不要理会外部世界制造危害的力量。现在责难欧洲已为时太晚，代之受到责难的是政府。

政府因许多事情受到责难，对其中某些事情它是没有责任的。很难相信竟会有任何政府敢于严格限制为投机性的金融活动提供货币，从而使繁荣告终，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这个繁荣继续下去，并会把繁荣的结束归罪于政治家，而不归罪于银行家和企业家。胡佛政府起初认为市场的萧条仅仅就是市场的萧条，是清除投机家的一种健康的动荡，因而它过分地相信了保证，过分地相信了那些打包票的话，过分地相信了那些认为迅速恢复“就在眼前”的预言。在1930年曾有短时期的恢复，即短时期的小繁荣，那年的国会选举也不像料想的那样令人担心。共和党人刚好失掉了众议院，而刚好赢得了参议院。

遭受一连串的失败是胡佛任总统的后半期的事。之所以遭到这些失败是因为，当萧条继续下去并愈益严重的时候，究竟怎么办的问题，就成为政治上的主要课题，一个使各地区、政党、阶级产生分歧

的课题。在十年预算盈余之后出现了一连串的赤字。应该如何弥补这些赤字呢？提高所得税，堵塞各项税收法出现的漏洞，抑或部分地征收销售税？由于民主党人和一部分起来反抗的共和党人反对，销售税在众议院遭到否决。许多铁路已破产，许多银行濒于破产，许多银行灾难性地倒闭，地方信贷枯竭，联邦政府除了为信贷机构提供担保外，别无他法。这种担保的一个办法就是成立复兴金融公司。但是，在国会中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们看来，这个新公司所依据的正是曾经使国家遭难的那一套理论。这是一种从上到下一层层克扣财富和福利的理论。他们要求对失业者的救济由联邦政府提供，要求向破产的市政机构和税源正在枯竭的各州提供援助。贫穷并不分州界，大多数穷人居住在一些最穷的州。直到1932年，胡佛政府为对付“抢劫国库”而设立的屏障才开始拆除。人们气愤地注意到，这些屏障是直到萧条最后影响到有产阶级的时候才拆除的。因为削减了工资并解雇了工人的大公司还保持着红利，而这些红利不是挣来的，并且得到它也不一定非花掉不可。免税征券（连续几届财政部长都曾试图加以取消）的持有者仍提取利息。而所有公用事业却都被削减了——图书馆、学校、公路甚至监狱都受到猛烈缩减经济开支的浪潮的打击，而许多“负责的”人则认为这乃是治疗经济病的猛烈药方。

但并不是所有的选民和政治家都是“负责的”。有一些人听信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异端理论；其他人则重新采用通货膨胀这个老的万应灵药；退伍军人，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要求得到退伍津贴，成千成千的退伍军人一下子拥到华盛顿；“争取退伍津贴大军”像1894年的科克西大军^[6]一样。最后这些退伍军人被军队使用毒气弹赶出营地。这同克利夫兰在1894年使用军队破坏普尔曼罢工^[7]并无二致。但赞成它的人却寥寥无几，成为政府在大选年不得不背上的许多包袱之一。

不管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各种类型的激进派如何活动，选民们还是转向通常的反对党。民主党提名的人一定会当选，问题只不过在于他是谁而已。候选人显然将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1928年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当时他的上司艾尔·史密斯却没有获得自己的州的支持。1930年，罗斯福又以该州历史上最大的多数再次当选州长。他是最“有希望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尽管有人激烈反对，他仍获得提名，并打破一切惯例，立刻飞至大会当场接受提

名。这个不顾常规的举动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印象，证明这位候选人患的小儿麻痹症并没有使他丧失精力。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尤其是它做出的削减联邦开支和支持取消禁酒令这两项诺言，把数以百万计的选民从共和党那里争取了过来；因为，共和党错误地认为公众仍坚持总统称之为“高尚的试验”的那些事情，而对这些事情的前途，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从而又给自己的沉重负担增加了另一块重石。罗斯福在42个州获胜，包括除宾夕法尼亚之外所有的大州。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和所有各州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中大获全胜。罗斯福虽得到委托可以大显身手，但当时在选举和新总统就职之间还有4个月的间隔。胡佛总统固执地坚持他的政策，特别是坚持旨在保持美元的金本位的措施。当选总统也同样坚定地拒绝支持已经威信扫地的政府和政党所奉行的政策。世界形势也每况愈下。希特勒在德国掌了权；在佛罗里达，罗斯福险被刺客暗杀。早就许了愿的商业复兴一再迟迟未能出现，共和党人说，这是因为人们不清楚新政府的政策而丧失了信心，但是这种信心至少在一年之前就丧失了。

如果有什么危机可以同新政府必须应付的危机相提并论的话，那就是林肯在1861年3月和4月所面临的危机。3年不断加深的经济困难，已经使许多一度曾经是资产雄厚而且信誉卓著的机构的基础遭到削弱。有偿付能力的政府机关、城市、县、州已所剩无几。旨在为农村社会服务的社会机构，帮助人们解决经济上的一般灾难或个人不幸的慈善机构已不得不面临日益严重的拮据局面。在这种拮据的局面下，这些机构正在倒闭，不可收拾的大难，眼看就要压顶而来。促进安定和秩序的社会习俗已经遭到败坏。对那些担惊害怕的人来说，华盛顿的“争取退伍津贴进军队伍”只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兆而已。如果满腔怒火的退伍军人、铤而走险的失业者一旦蜂拥而至，那些往往已经破产、警察力量已经减少、周围尽是愤愤不平的市民的地方当局，又能够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精神”这个传统口号，自助、节俭、坚持独立自主这些传统的格言还有什么意义呢？的确，使人惊讶的不是这些观念正在消失，而是它们竟然坚持了这么久。新政府所面临的就是这年冬季的这种不满情绪，而由于银行系统的崩溃，形势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显然也就需要采取引人注目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农村的小银行，还是城市的大银行，倒闭的越来越多。到这时，银行和信贷机器正在陷于停顿。越来越多的银行宣布休假。到了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前夕，47个州的银行已经关闭。新总统首先做的事情之

一就是由总统宣布关闭美国的所有银行。国会急忙批准了这个行动，没有联邦政府允许，任何银行不得重新开业。联邦储备银行首先重新开业，然后是没有破产的私人银行。这次危机的第一次冲击应付过去了。

不记住新政府所面临的这场危机的性质就不可能理解“新政”。罗斯福在其就职演说中曾说道：“除了惧怕本身，什么也不必惧怕。”但构成信任的原有基础，即对于办事的正常方法的信赖，对企业家作为政府机器的天然监护者的信赖，所有这些信任的支柱都已消失。它们不得不由新的信任所代替，即相信新的办事方法，相信新政府的力量和胆略。人们充分地、毫不苛求地提供了这种信任，如果苛求几乎就意味着背叛。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开始执政时比其他任何总统——也许杰克逊、格兰特和胡佛除外——都享有国人，尤其是（但又不限于）选举他的人的更大信任。

后来人们称“新政”的最初几个月为“一百天”。但它不是导致滑铁卢的一百天，而是导致美国人民自1930年以来未曾感受过的那种希望和力量的一百天。再者，事后不久人们回想起来，似乎这个时期完全决定于新总统的领导；是的，它是决定于总统，但不是完全决定于他。他是由西部和南部的联盟提名的。这个联盟也就是1912年提名威尔逊并于1916年再次选他的那个联盟。这个联盟所追求的仍然是老一套的补救办法，首先是利用白银或发行纸币来实行通货膨胀。因此，新政府所以被迫实行这项金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知道主张通货膨胀的势力是强大的，它知道“坚实的银行活动”对很多人——在1933年也许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意味着是一套巧取豪夺的方法。因此，紊乱的银行系统仍然没有合理地加以调整，因为虽然数千家银行一直没有重新开业，但地方的银行系统依然原封未动。一项大的变动是推行对存款的联邦担保制度（那时最高5000美元）。这个措施使正统派大吃一惊，但要恢复对银行的信任和恢复信贷结构，这个措施就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必须使吃了苦头的农场主们得到某些实惠。共和党人曾企图用“周转基金”即各种销售计划来防止出现使农村信用结构濒于崩溃并可能酿成像扎克雷起义^[8]那样结局的大动荡，现在这些做法都被抛在一边。农场主可不生产过多的农作物，以避免使价钱降到破产线以下，这样就会得到补偿，为此而成立了农业调整署（A. A. A.）。在工业领域，为了制止可诅咒的“你死我

活的竞争”继续为害，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这个努力体现为第一批新政措施中争议最多的试验——国家复兴署（N. R. A.）。国家复兴署在其草率拟订的一份章程中拼凑了一堆互不相干的救世药方。像这个时候通过的其他一些法案一样，这个章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更激进的措施，如建议推行30小时工作周的办法来扩大就业的布莱克—康纳里法案等。原来国家复兴署应当提供公共工程（即继续执行胡佛政府实行的一项办法），其任务也包括救济农业。但到法令通过时，这两个活动领域已经属于其他机构的职权范围了。使国家复兴署出了名的“公平竞争法规”，本来也只是为那些组织良好的大工业拟定的。但是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坚持要得到避免“不公平竞争”的保证。劳工也要求得到一份好处，即工资得到保证、工时受到限制、力量薄弱的工会得到承认。甚至连消费者也要求得到利益，受到保护。国家复兴署是在休·约翰逊将军领导下像发行“胜利公债”那样大肆宣传而成立起来的。其标志“蓝鹰”曾为大小企业所炫耀。而且由于国家复兴署的一个目的是提高物价，因此人们为了防备预料中的涨价而抢购商品，致使物价长时期螺旋下降的情况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种因怕涨价而采购的现象，不过几个月就结束了；不仅如此，并非所有的公司都活跃起来了，最明显的如亨利·福特的那家直到最近还被奉为神圣的大公司便是这样。许多曾兴高采烈地炫耀“蓝鹰”的小企业，现在开始后悔了。逃避国家复兴署所规定的义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该署仓促制定的法规越来越难于实行。劳动者也发现就业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即使在有些地方增加了，但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这应归功于国家复兴署的规章。在该法案和该规章中规定的给工会的保护，到头来也成为泡影。到了最高法院在审理1935年的“谢克特家禽公司与美国双方争讼案”中一致宣布原法案不再有效时，国家复兴署已经奄奄一息了。对该机构的告终，除总统外谁也不感到惋惜，就连总统公开表示的惋惜也许并非出自真心。

在其他方面，新政府也置前届政府的政策于不顾。共和党曾愤愤地指责新政府要破坏币制，而新政府真的立刻就干出来了。美国取消了金本位制，新总统拒绝讨论稳定币值的问题，从而给伦敦经济会议“投了一颗炸弹”；这个决定给仍然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特别是法国——造成了更严重的压力，同时等于是既对欧洲进口货筑起了关税壁垒，又对美国出口货提供了补助。如果说这个新的货币政策使正

统派吃惊的话，它却使那个人数多得多的债权人集团高兴，因为1929年以来他们的实际债务在不断增加（参阅第三章）。新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实际上它在这一时期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孤立主义”。新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个热情的威尔逊信徒，主张实行低关税和国际合作。但是这时总统还听不进他的话。

当日本不顾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的激烈抗议而把中国在满洲最后剩下的一点主权也践踏无遗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对这个抗议连口头上都没有表示任何热情支持，这使美国人看到，想靠一纸空文来阻挡侵略是多么不中用。1934年的约翰逊法案禁止向那些拖欠美国战争借款的国家提供任何信用贷款，就反映了人民的这种情绪。在一些不明是非的人看来，以参议员奈为首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似乎证明了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是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即“死亡商人”的自私自利。一系列的“中立法案”禁止军火贸易和增加对参战国的信贷。政府尽力抵制对行政权限的限制，但它不得不接受如后来所说的旨在“使美国置身于1914年的战争之外”的立法。

在拉丁美洲事务方面，从共和党人那里继承下来一项较为积极的政策。使威尔逊已经焦头烂额的那些问题，由于在墨西哥发生了一连串的革命而更加复杂了。对于没收美国人财产的回答是强烈要求予以赔偿，必要时将使用武力来索取。同墨西哥的最紧张的局面是由柯立芝任命的大使德怀特·莫罗设法消除的，虽然正式解决美国的要求直到1942年才最后完成。对加勒比地区各共和国的干涉结束了（海地除外），并于1921年付给哥伦比亚2500万美元作为对没有特别指明的损失的补偿，其实这些损失就是指在巴拿马“革命”时期由于美国的政策而造成的损失。罗斯福政府继续执行“睦邻”政策。在一次古巴革命之后，罗斯福政府同意废除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曾批准美国进行干预以保持这个新取得自由的共和国的秩序。从海地撤出了军队，赫尔国务卿还利用泛美会议来发展“西半球团结”的政策。在菲律宾，威尔逊的自治政策曾在很大程度上被哈定政府所完全改变，罗斯福政府则促使实现完全的独立（由于美国有一批人敌视菲律宾产品在美国关税壁垒内竞争，并向政府施加压力，因此推行这一方针就比较容易些）。菲律宾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并于1946年取得完全独立。

除银行家之外，公众所厌恶的就是大电力公司。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邦政府在田纳西河岸的马瑟肖尔斯地方修筑的工程设施来发电，在国会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一项曾被前几届共和党总统以简单方式否决了的议案。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除改良航运，和在名义上兼营副业而生产电力之外，还经营其他业务。整个田纳西流域都将由一个政府经营的公司来加以复兴。这个公司不受政治干扰，承担着在一个一般的资本主义开发动机尚未发生影响的极为落后的地区促进社会福利的广泛使命。尽管在法庭上受到攻击而且由于内部斗争而遭到挫折，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仍然保持下来并得到了发展，成为政府夸示于人的杰作之一。

还创立了其他新的联邦组织，如用来控制股票市场的证券与汇票委员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和复兴金融公司的职能扩大了。为失业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这项保险制度由各州管理，但大部分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补助金”制度虽非新设，但现在大大扩大了。儿童、寡妇、失业者、盲人都得到了好处。往往是无能和破产的地方机构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削减联邦开支的诺言，曾在新政府最初几个月导致薪金和退伍军人津贴的实际减少，现在这些诺言已被政府忘记，但它的敌人却记着。这些敌人有创立“自由同盟”的那些人，包括像艾尔·史密斯这样的著名的民主党人。然而，潮流只对一方有利。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政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它在两院中都增强了自己的多数地位。共和党在1936年获胜的希望已经渺茫。即使最高法院不仅判决撤销了无人惋惜的国家复兴署，而且还判决撤销农业调整署和其他社会立法，这也没有使共和党的前途光明些。最高法院中多数人的保守主义，早已成为那些想利用州或联邦的权力来减少经济不平等并缓和竞争的残酷性的人们义愤填膺的根源。最高法院似乎要坚决阻止各州或联邦在欧洲各国政府早就有权立法的那些领域内通过立法。

共和党1936年的提名是不值得去争的。提名落在了安全度过大风大浪的少数几个共和党政治家之一的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兰登身上。兰登是1912年的老进步党人，在地方上政绩斐然，但却是拙劣的演说家，运气也不佳。由于在1934年可怕的干旱之后跟着又来了1936年同样严重的干旱，农场主们没有心思听他那些关于政府的铺张浪费和各州的权力的喋喋不休的说教。压倒多数的新闻界、企业界领

袖和稳重的、保守的舆论，都是反对罗斯福总统的，但当选举结果揭晓时，他却在除缅因和弗蒙特之外的所有各州获胜，所得公民选票的百分比仅次于哈定在1920年所得到的。共和党人在国会中的席位进一步减少，以致他们发现连在各委员会安排他们的名额都发生困难了。

美国人民比在1932年时更明确地将改革这个共和国的使命交给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将如何解释这个使命呢？1937年2月4日，国会民主党领袖们得到了回答：“法院改革法案”摆到了他们眼前。这个法案声称要对联邦法院系统实行普遍改革，其中许多改革是早该实行的。这个法案的要点规定，总统可以任命最多不超过6人的最高法院法官，以代替年满70岁或超过70岁，工作已满10年而未退休的法官。换句话说，就像他的敌人所说的，这个法案是要“往最高法院里安插亲信。”为通过这个法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共和党人聪明地让那些民主党中的反对分子去进行斗争。结果表明，即使在1936年选举以后，美国人民对一些机构不管进行如何严厉的批评，但对它们却仍然是珍惜的。

法院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正是“静坐罢工”浪潮引起温和的舆论界注意的时候。这次罢工浪潮标志着在大工业中建立有效力的工会的巨大努力。它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的以矿工领袖约翰·刘易斯为首的产业工会委员会领导进行的。到处都是关于将发生革命和动乱的威胁和谣言。同新政府一起进入华盛顿的，不仅有通常那些拼命想捞取官职的人，还有成千上万迫切希望参与拯救美国社会的热情的青年男女。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想按马克思主义路线参与改造整个美国社会的人。他们虽不宣扬自己的存在，但人们怀疑在华盛顿、底特律和匹兹堡都有他们存在。不管人们如何怀疑其领导，大罢工终归取得了胜利。1919年曾成功地抵制过成立工会的美国钢铁公司，这次则同新成立的钢铁工会妥协了。其他钢铁公司和各汽车公司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工会。唯独顽固的利己主义者亨利·福特坚不退让。但是，在他让步之前很久，最高法院就批准了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生效，从而改变了它的立场，也改变了工会的地位，因为该法案使联邦法律和政府有权去支持工会。瓦格纳法是否符合宪法曾引起争议，但以一票的多数得到确认。这对有组织的劳工来说是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抵消了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开除产业工会委员会和支持它的各个

工会而造成的分裂。“产业工会委员会”变为“产业工会联合会”，其简称仍为C. I. O.，保持了这3个当时具有魅力的字母。

上述决定和与此相类似的一些决定，对在法院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果法院不再是社会立法的障碍，那么，支持“法院改革计划”的许多势力也就会消失。随着每一个得人心的决定的做出，这种势力也确实在消失。法院改革法案被否决了，政府在取得辉煌胜利的6个月之内遭到了失败。但也可以说不是遭到失败。因为按照新的养老金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开始退休，在罗斯福结束总统任期之前，他已亲自任命了全部法官，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哈伦·斯通，而他把斯通提升为首席法官了。法院不再是联邦立法的障碍了，原来为推行“新政”而提出的大多数立法，除那个不幸的“公平竞争法规”外又都重新生效。童工、最低工资、工作时数，这时都成了联邦立法的课题。在联邦同州的关系方面的一个无声的革命完成了。

然而，虽说“新政”在法院里取得了胜利，它却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胜利。灾难性的失业曾是共和党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由于新政府或由于时间的流逝失业者的人数已经减少，数百万人仍旧依靠赈济或依靠州或联邦的救济而生活。在实行“新政”的最初几年，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临时性机构来提供工作。其中之一“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把失业青年送进由军队管理但不算军事编制的劳动营，供给伙食，发给工资并辅助他们就业。“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很快成为唯一没有什么人反对的“新政”试验。对年龄较大的失业者采取两种方式给予救济。后来被称作“工程发展署”的机构，向他们提供了临时性的工作，有的工作真正有用，有的并没有什么用处。并且人们怀疑，工程发展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把物力和财力一方面用在了对失业者有利的事情上，一方面也用在可能在政治上带来好处的事情上。另一个开销庞大的机构是由机警而暴躁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领导的“公共工程署”，它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的，它负责兴建的工程都是长期而真正有价值的。开销如此浩大而在政治上或财政上的流言蜚语却很少，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而，失业依然存在。政府开支的减少带来一次“衰退”，因而在1938年国会选举中，虽然民主党仍然保持异乎寻常的多数，但1936

奄奄一息的共和党却表现得充满活力和斗志。在新的国会中，总统已不再能够发号施令，而不得不采取诱导、说服和恳求的办法。

这时，总统的思想越来越转向国外。最初几年执行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已被放弃。国务卿通过互惠贸易协定体制来打破高高的关税壁垒的努力，得到了其上司的支持。随着国际联盟面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问题而陷于瓦解，随着希特勒占领莱茵兰，随着西班牙内战预示着更大规模战争的来临，总统开始试探美国的舆论。1937年10月，他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主张在经济上孤立侵略者（参看后文710页），但舆论界拒绝听从他的主张。慕尼黑事件虽震动了舆论界，但仍未使之改变，以致总统关于修改中立法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临近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面貌改变了。原来仅仅是一些担心主将不出马便会输掉下届选举的政客们作为一种策略的办法，这时却成为更严肃的现实可能了。一些对革新并不喜欢，对选举也不一定非操心不可的人，开始为美国的命运担忧，也开始越来越公开地谈论起一种没有先例的解决内外问题的办法，即让总统连任三届。

随着战争的来临，这种谈论日益甚嚣尘上。1939年11月，总统强行通过对中立法修正，允许参战国在“现购自运”的基础上购买战争物资。这在1939年意味着英国和法国可以买到他们能够付得起款并能够用自己的船只运走的战争物资。这项法律的修改是对德国不利的。德国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胜利使罗斯福重新提名成为定局。为军备开支匆忙通过了巨额拨款；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被引进内阁，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总统开始考虑如何尽最大力量帮助当时孤立无援、很快就要受到围困的英国。

争取得到提名的一些主要的共和党候选人使自己陷入不幸的地位，因为他们在希特勒使人们对同盟国取得即使缓慢但必然来临的胜利的信念完全破灭之前，就已决定实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出乎所有内行人的意料之外，参议员范登堡、参议员塔夫脱和年轻的纽约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都败给了温德尔·威尔基。威尔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出人意料胜利者。几年之前他还是一个民主党人，仅仅因为他大力为他所领导的各公用事业公司进行辩护，以反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才为公众所注意。他第一次期望担任的公职，就是以当总统为目标。威尔基开展了出色的竞选运动，要是大战在这次选举之前结束的

话，他准会赢得胜利，但是大战在继续进行。英国的立场激起了人们的赞扬和焦急心情。总统通过一系列协定，以驱逐舰、武器、补给品援助英国作为交换，在西半球取得了基地。罗斯福竞选取得胜利。在新的国会中，以一项被恰当地有意编为第“1776”号^[9]议案的形式，拟定了“租借法案”。如果说这是中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中立。当俄国遭到进攻时，“租借法案”便进而适用于它。但是，德国人仍然迟迟不向美国动手。日本人促使美国断然下定决心，从而政府摆脱了这种越来越困难的处境。日本军方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让步，深信美国的支持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的主要原因，它采取了同1917年德国军方采取的同样决定。1941年12月7日，停泊在瓦胡岛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主力被从空中摧毁。几个小时以后，在马尼拉的空军主力在地面上被摧毁。美国同日本开了战；几天以后，又同支持其盟国日本的德国、意大利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很不相同。那时，它作为积极的参战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它从遭到进攻的那天起就参加了战斗，并且经历了一系列在其历史上几乎无可比拟的挫折。科雷吉多尔的失守结束了在菲律宾的抵抗，直到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为止，谁也不敢说日本不会胜利地进攻夏威夷群岛，如果不是进攻美国大陆的话。

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加入这次战争，就产生了比1917年远为真实得多的团结和力量。战争的规模之大，使美国不得不对经济进行更加严格得多的控制，对人力的需要也远为巨大得多。到战争结束时，武装人员达1200多万，美国成为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最大海军强国和两个最大的陆军强国之一。和第一次大战相比，人们在这次大战中也更严肃地意识到失败的可能性，对意识形态则不那么强调了。罗斯福毕竟不像威尔逊那样是个发表伟大演说的大师，因此无论“四大自由”（1941年1月）还是“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都没有威尔逊演说那样的影响。并且，在美国参战之后就以苏俄为盟国，它的统治者是不想让罗斯福像威尔逊在1917—1918年那样在宣传上占上风的。

罗斯福作为一位战时领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同威尔逊不同，他对战争和防御问题做了深思熟虑。甚至在1939年前，他就在国会允许的范围内增强了海军。他还以巨大的勇气和巧妙的手法使得国会1940年在表面上仍是和平的时候同意征兵，同时以卓越的眼光和决心遴选

和支持了他手下的战时领导人。可是参战的第一年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是受挫折的一年，民主党在1942年的国会和地方选举中几乎失败，就是这一点的反映。然而潮流已经转变。这次选举刚刚结束，盟军就在北非登陆；太平洋上的瓜达卡纳尔岛终于被攻克；不久，俄国人就在斯大林格勒俘虏了德国一个集团军。

公众舆论这时为美国参加和平谈判做了准备，每个人都渴望避免或忘却1919年的错误。“两党”外交政策是人们鼓吹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在一系列同盟国的会议上，制定了最高战略，拟定了媾和条件。当1944年将要来临的时候，谁将做民主党的候选人已经不成问题了。自1940年以来的唯一变化，就是不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为竞选伙伴，而起用密苏里州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共和党提名当时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为候选人。到选举来到时，如同在1918年那样，胜利虽已在望，但并非在即。罗斯福再次当选，并于1945年2月同英国首相共赴雅尔塔会见苏联统治者斯大林。希特勒德国已临近末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则仅存幽灵。美国海陆军力量的罗网把日本包围得越来越紧，而且美国也许很快就要掌握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突然，甚至连他的密友们也感到意外，罗斯福竟于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亚的沃姆斯普林斯逝世，离第三帝国的灭亡只有一个月。

几乎没有哪一个总统比他受到更多的爱戴而又遭到更多的憎恨。在他任总统几个月之后，对他的支持主要来自经济上贫困或不满的人；对于比较富裕的阶级来说，他成为憎恶的对象，比之他所崇拜的安德鲁·杰克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执政时期——如果不是完全或者主要由于他的活——美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改变了，可能世界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如果是一个勇气和智谋稍为逊色的领袖，在1940年那个危急的年头早就会完全不知所措。通过极广泛地使用记者招待会和无线电，特别是在“炉边谈话”中，他连续而有效地越过国会向人民发出呼吁。几乎没有哪位总统像他这样使他的同事，甚至他的敌手相形见绌。罗斯福的继承人几乎是一位不知名的人，但是落在他身上的是去柏林的废墟上同其他盟国首脑折冲樽俎，是在波茨坦接到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并且授权对日本使用这种炸弹。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已经在旧金山创立（6月26日）。8月15日日本投降。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而这个世界简直已被它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到处盘踞，世界上的一切地方也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同美国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并成为美国财富和恩惠的附庸。但回顾它的空前的成就和力量时，它也并不是一个充满自信和有保证的国家。因为美国能够依靠自己而单独在其中生活的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之所以一去不复返，是因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原子弹，也因为大战所造成的许多其他事态发展。人们曾像在1865年和1918年那样欢喜若狂，认为“可怕的旅程终于结束了”。但在胜利欢欣之余，却也知道“他们只有在昨天才能享受到的那种甜蜜的睡眠”现在再也得不到了。

（罗凤礼 译）

[1] 皮埃尔·查尔斯·朗方（1754—1825年），美国军人、工程师和建筑师。——译者

[2] 马克·汉纳（1837—1904年），美国著名的工业家，曾资助麦金莱竞选总统。——译者

[3] 乔治·约翰·罗马尼斯（1848—1894年），英国生物学家，1891年在牛津大学开创“罗马尼斯讲座”，内容包括科学、艺术和文学。——译者

[4] 美国南部各州一贯投民主党的票，故称“坚定的南方”。——译者

[5] 坦慕尼厅（Tammany Hall）是民主党在纽约有实力的组织坦慕尼协会总部所在地，一般也作为该协会的俗称。——译者

[6] 1893年经济恐慌后，由采石场场主科克西领导的失业工人向华盛顿进军，支持创造工作条件的立法，称为科克西大军。——译者

[7] 1894年美国全国性铁路工人罢工。——译者

[8] 1358年法国北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译者

[9] “1776”为美国独立的年份。——译者

第十九章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各国在19世纪取得的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这20多个新国家在面积、民族和资源方面大不相同，对它们以前的统治者，以及在它们彼此之间都抱有怀疑，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外发生的事件和变动所左右。作为专门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它们必须依赖国外市场销售其商品，依赖国外投资开发其资源。作为革命的产物和往往是政治和财政不稳定的受害者，它们之中许多国家经历了外国的积极干涉。在19世纪，这些干涉国家通常是欧洲国家；除了得克萨斯战争^[1]这段插曲和在内战时期无力他顾而外，美国政府是支持拉丁美洲独立的。它不仅反对欧洲的干涉和影响，而且整个来说，它自己也避免进行干涉。但是，在20世纪，欧美在政治上的作用发生了引人注目的相互易位。欧洲的势力衰落；北美的势力增强；一些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步履蹒跚地走向真正的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和空前严重的世界大萧条有时打断、有时加速了这一进程。

1898年，西班牙在同美国进行了短时期的战争后，丧失了大美洲帝国的最后两块土地——古巴和波多黎各。西班牙不再被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为人们所恐惧和痛恨，变成了在感情上受人尊重和爱戴的对象，泛西班牙主义情绪的中心。英国虽然仍是一个殖民大国，在拉丁美洲仍是最大的投资者，工业产品的主要来源和粮食、原料的唯一最大市场，但越来越不愿进行政治干涉。特别是自从德国的海军力量日益增长，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追求北美的友谊以来，更加如此。法国尽管在19世纪有着长期进行干涉的记录，但这时似乎比西班牙或英国更不愿再在政治上卷入拉丁美洲事务中去。

另一方面，在美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权力感日益增强，这就促使人们要求对门罗主义做出更加咄咄逼人的解释。1897年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给美国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大嚷大叫地发表了一些声明。在美洲内部事务中，美国正在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第一次泛美会议于1889年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于1901年在墨西哥召

开。泛美主义比感情上的泛西班牙主义或建立单纯的拉丁美洲联盟这种含糊的主张，似乎会带来更加切实可靠的利益。

但是，泛美主义以及作为这种主义的基础的，认为整个西半球具有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这种设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中楼阁。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同拉丁欧洲的关系，比起同信奉新教的美国的关系来要亲近得多；对许多南美人来说，欧洲实际上比美国，甚或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容易接近一些。泛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的产物；长期以来被人们怀疑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工具，因此在20世纪头30年几乎是毫无进展。

1900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有4个国家在实力、财富和政治稳定方面超越其他各国而名列前茅。在疆域和人口均占首位的巴西，1889年的军事革命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由此而产生的1891年的宪法，创立了联邦共和国，各州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包括征收出口税和招募军队的权力，而联邦当局的权力则较小。政治领导权由巴西中部种植咖啡和经营矿业的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二州分享。政府不是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政党组织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该两州为保持均势所形成的一项惯例的基础上，从1894年到1930年，每州各出了4任总统。根据这一惯例，总统通常可以同各州州长和国会的多数达成谅解而指定继任人。国会最初协助进行总统选举，后来又对总统选举是否合法做出公断。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可以把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提拔到总统位置上去。

巴西的政治惯例，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经济趋势。该国的繁荣一度依靠食糖和烟草，这时则依靠大量出口咖啡，辅之以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橡胶和其他林产品。咖啡工业要求建设港口和铁路，为此，就需要资本。总统在访问欧洲时，同路特希尔德财团谈判借款1000万英镑，使该国得以度过1899年的财政危机。里约热内卢和桑托斯在20世纪初从肮脏的海滨城镇发展成为漂亮的现代海港。巴西的咖啡经济是靠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和葡萄牙、意大利、德国的劳力不断流入而建立起来的；而大部分咖啡却销往美国。

牛肉和小麦之于阿根廷，就像咖啡之于巴西。牛肉的大部分输往英国。为了适应英国市场的需要，牛肉的生产要求具备有围圈的牧场、良好的运输安排和精细的加工过程。刺铁丝、铁路和冷冻设备成

为阿根廷繁荣的工具，而资本主要是英国的投资者提供的，机器则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提供。农村社会还是宗法式的，面积广大的良好土地掌握在寥寥无几的所有者手中。正是这种以拥有优种牲畜而自矜的、经营得有条不紊的土地垄断组织，从英国输入纯种牛，从而发展起质量高、数量多的阿根廷牛肉生产。

开始大规模输出谷物要比输出牛肉晚得多，但到1904年，其价值则甚至超过牛肉。耕种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力，因此，同巴西一样，阿根廷也吸引了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量移民。这些移民中许多人是季节工（golondrinas），每当收获完毕即返回欧洲；但从1880年至1913年，他们之中有300余万人在阿根廷定居下来。

和巴西一样，政府虽然保持宪政的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依靠土地垄断寡头各成员和集团之间的协议。按照这种协议，总统不但指定其继任人，而且指定各省的省长、国会议员和大部分的重要官员。但阿根廷和巴西不同，半自治的各省之间的势力不再是平衡的。财富和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湿润的草原地区 and 这个首都本身。阿根廷有一个激进党，它叫嚷着要求自由选举，并且为政治事务一直受到操纵所激怒，有时还发动暴乱。这些事件都局限于首都范围之内，没有一次引起人民大众的多大兴趣，也没有一次引起人们严重的慌乱。总的说来，局势是稳定的。连续数届的保守政府在繁荣不断上升的时候，把国家治理得十分妥善，井井有条；而且看起来也不大会有在选举中，或者由于财政危机，或者被控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而被赶下台的危险。

在所谓南美“A.B.C.”^[2]三大国中居第三位的智利，是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其人口的大部分在智利中部美丽而肥沃的河谷地带以耕种为生。和阿根廷一样，少数家族占有大部分耕地，但耕作方法和庄园的经营则是保守的、世袭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没有成效的。因此，智利虽为农业国，但需要进口粮食。社会财富大部分来自科迪耶拉西部的铜矿，而最主要的是来自世界上天然硝石主要产地的北部沿海沙漠地带各省。硝石是由雇用智利工人、但主要是英国、随后是美国资本经营的各公司开采，并输出到世界上种植小麦的地区。因此政治权力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分裂愈来愈严重。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政治权力掌握在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他们操纵着由范围限制得非常狭小的选民所选出的议会。而且由于1891年的内战，结果

行政权被严重剥夺，议会竟可经常控制或破坏总统的政策。寡头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许多变换不定的派系。大多数政府是联合政府，大多数内阁则是短命的和不稳定的。与此同时，硝石贸易的稳步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和专业的中产阶级以及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的成长。硝石的出口税使社会服务和国民教育能够比其他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有较快的发展。从长远来说，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力地削弱贵族政府；但是，只要硝石市场保持稳定，这个国家的事情就可以由一个有教养的，而且整个说来非常热心公益的贵族来管理，即使并非卓有成效，至少也是温和稳健、奉公守法。

墨西哥和智利一样，大部分收入也是依靠输出矿产。主要矿产品包括金、银、铅、锌、铜、铋和20世纪发现的石油；第一口油井是于1901年开凿成功的。像智利一样，墨西哥的矿产资源的开采，铁路和港口的修筑，都是利用外国资本，由外国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本国的工人进行的。但是，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则在这样一个干旱多山的国家里面积不大的可耕地上以农业为生。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庄园手中，其集中程度甚至比智利尤甚。墨西哥人不像智利那样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的多数是混血种。但是，大庄园主往往是欧洲人的后裔，而多数农业工人不是印第安人，就是主要属于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许多地主是在外地主。工人被束缚在庄园中，一是由于对他们的祖先曾居住生活过、但现在已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是由于债役制（peonage）。这是一种以实物抵债为基础的农奴制，债役农（peón）处于债务奴隶的地位，按照惯例（如果不是按照法律的话），这种地位通常是代代相传的。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债役农渴望获得土地，这成为墨西哥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后来在20世纪证明是一股强大的爆炸力量。

墨西哥从1876年起一直由一个有效而残暴的专制政权所统治。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的整个期间，虽然保持着联邦宪法的大部分形式，但是他却是通过一个错综复杂的职业网和对他个人的忠诚，有效地统治着他那荒芜而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法官、州长、国会议员都是他的人；“乡警”（rurales），即效率很高但横行霸道的非正规警察，也是一样。他本人是一个混血儿，对他的印第安子民并非没有直觉的恻隐之心；但他既没有打算，也不敢去触犯那些大地主们。在他当权时期，不论是通过购买或巧取豪夺而把村庄公地（ejidos）兼并

入私有大庄园（haciendas）的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会蛊惑人心，也不鼓吹利用军事进行民族主义的扩张。他的正规军，至少是那些士兵，大都是徒有其名。他的对外政策是同美国友好，认真地偿还公认的债务和履行条约义务，并积极地参与各种国际合作计划。第二次泛美会议于1901—1902年在墨西哥召开；1906—1907年，墨西哥与美国合作制订了一项有雄心、有政治见地的在中美洲缔造和平的计划。在国内，迪亚斯首先设法开发墨西哥最能获利的资源和建设引人注目的公共工程，办法是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最有吸引力的条件。矿场、港口、铁路、工厂、油田在外国的控制下发展起来，毗邻的农场和牧场的土地大都落入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之手。波菲里奥先生使自己闻名于世，使他的国家在国外为人喜爱并受到尊重。在国内，他却让他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异乡人。

这4个大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主要特点，在这20多个共和国中的大多数国家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20世纪初期，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企业、资本和人民的技能。它正在成为一些必不可少的重要商品的主要来源。大多数较大国家的政府治理得有条有理，卓有成效，对投资者抱同情态度。如果从生产、出口和财政收入来看，它正在稳步地繁荣起来。但是，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存在着危险的弊病，不过当时尚未暴露出来。他们的收入都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输出，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工业原料。因此，他们极易受世界市场价格变化的打击。他们往往以重息不断向外国借来公私贷款，而且有时并非为了生产目的，因此差不多都是债台高筑。而欧洲投资者又不怕损失得更多，继续贷款，这就使财政上的挥霍浪费难以制止。大多数拉丁美洲人以农业为生，通常采用原始而浪费的方法。他们并未从外资的大量流入或专门化出口贸易的赢利中得到任何直接而明显的好处。一般说，他们耕种的土地并非己有；如果是佃农或者是分成佃农的话，其租种土地的条件往往是苛刻而没有保障的。因此，他们随时都表示不满。

那些实行宪政的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数是根据一些多少带有理论性质的宪法条文来进行统治，而这些条文大都是从美国宪法上照搬过来的，不切合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环境的实际，也得不到普遍的尊重。在许多国家，“联邦主义”具有极端虚假的性质，便是一个明显的例

证。宪法的字句往往并不指明真正的权力属于谁。在一些强有力的集团或私人利益的面前，要靠宪法纠正弊病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行政改革；而“革命”往往只不过意味着超越法律范围举行一次要求改革的示威而已。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中，为了照顾现实情况而做的让步，主要就是赋予总统以暂时停止宪法“保证”的紧急权力，这正好使他能够阻止这样的“革命”。在许多国家中，宪政只是一层很不牢靠的表面装饰；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中，它几乎就不存在。

像在公共事务方面一样，在个人的精神和心理领域内，拉丁美洲人民也表现出依赖那些舶来的并没有完全吸收的思想。天主教是大多数人表面上信奉的宗教；但在许多共和国中，很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都游离于只有一知半解的基督教和已经多半遗忘了当地的异教神灵之间。在这样的人中间，譬如在墨西哥，反基督教的暴动一旦发生，很容易走向极端。即使在欧洲人的后裔中间，除少数明显的例外，拉丁美洲天主教的信条最主要的部分过去是、现在还是外国的教规和外国天主教的思潮。在很长时期内，要维持神父的数目和水平是很难的。不仅如此，作为大土地所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的教会，为那些在整个拉丁美洲往往是反教权而且有时是反宗教的革新派所厌恶和恐惧；不过还应当指出，革新派中的多数人大大地低估了教会赢得的人们的忠诚，而且他们所鼓吹的那些世俗的理论，从实证主义直到共产主义，其本身也大都是从欧洲输入的。公开承认信仰宗教的人们，很久以来就模糊地对民族主义感到灰心丧气；他们之中有些人对信仰一种其根基在美洲似乎浅薄得令人难堪的教会感到不安，但是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代替它的东西。梵蒂冈把拉丁美洲当成一个积极传教的区域，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论从欧洲进行何种活动，其本身都不能使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具有它所缺少的那种乡土特色。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首都是蓬蓬勃勃的文化生活中心。对真正的文学，其次对音乐和视觉艺术进行很有见地的鉴赏和评论，很久以来就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的特点。对诗的欣赏，在拉丁美洲的任何地方，从来不乏其人；但离开城市，有文化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活动限于少数人，而且模仿欧洲的方式。诚然，像《法昆多》或《马丁·菲耶罗》这样的作品，除了阿根廷，在别处是写不出来的；像《腹地》这样的作品，除了巴西，在别处也是写不出

来的；但是，除了这些罕见的天才作品之外，几乎没有人打算去发展一种意味着将印第安人和伊比利亚人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方式融为一体的独立文化。相反，自由豪放的拉丁传统把他们引到法国，于是法国的文化影响在19世纪末就风靡一时。对于那些不喜欢法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反教权主义的人们来说，最吸引人的替代物就是回到西班牙的传统。

总之，1900年的拉丁美洲，无论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赖外部世界。它的文化生活虽然丰富多彩而且生动活泼，但却缺乏本乡本土的自信，并且是从外国汲取灵感。它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虽然在其本地区范围内偶尔动荡不安，却从其他地区接受了和平和稳定的因素。不论是国民经济或国家的政治结构，都经受不住全面的灾难。

的确，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使人感到灾难临头。从进入本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欧洲的繁荣继续不断地溢往拉丁美洲。阿根廷的发展特别迅速。引进苜蓿作为饲料作物，从1907年起以冷冻方法代替天然冰，对纯种牛细致地分等论价，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优质牛肉出口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和在规模上几乎与英国相当的铁路系统的中心。

但是，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有三方面引人注目的重大发展对未来是不祥之兆。这就是阿根廷的和平的然而却是激进的宪法改革；墨西哥的极端激烈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以及美国在中美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势力显著增长，而且态度越来越专横。

现代阿根廷的激进党的前身激进公民联盟，是在1892年成立的，20年来从事显然是徒劳的选举改革。后来改革实现了，但并非这些激进党人直接努力的结果，而是激进党人要打倒的那个贵族阶级的一分子——1910年至1913年任总统的一位卓越的律师和非常正直忠诚的政治家罗加·萨恩斯·培尼亚的功绩。萨恩斯·培尼亚显然是纯粹出于信念，在1912年坚持通过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选举法，规定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并采取秘密的、强制性的投票。这项革命的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此——赋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部分是移民的工人以选举权，从而改变了阿根廷政治的整个基础。在一家以可靠和温和著称的日报的赞助下，这项立法允诺逐步扩大政府的自由化。这也在日后暴露出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家身上突然注入民主

而造成的种种危险。其后果首先是1916年伊波利奥·伊里戈延当选为总统，激进党人开始统治这个国家，直到1930年发生革命才告终止。

1910年至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要激烈而深刻得多。这次革命的近因有：1907年财政上的不景气，1907年和1908年的粮食歉收，野蛮镇压由于以上原因而引起的罢工，以及排外情绪和政治动乱层出不穷。在仅仅几个月之内就把波菲里奥·迪亚斯赶下台并赶出国去的武装起义，是由一位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所领导的，采用的却是一般的战斗口号：“不得连选连任”；但它很快就产生了另外一大批领袖人物——农民煽动家如萨帕塔等，土匪如潘乔·比利亚等，军事冒险家如谋杀马德罗并继承其位的韦尔塔等。墨西哥遭受了10年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内战之苦，而且由于所有各方都指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因而威尔逊总统的政府很快就被拖入这场冲突中去，它向以卡兰萨为首的自封的立宪主义者提供武器，而拒绝向韦尔塔提供武器。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在坦皮科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生了对抗；因此，美国于1914年进行干涉并夺取了维拉克鲁茨港。干涉虽促使韦尔塔下台，但未能使“立宪”党上台；这自然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不过，由于“A.B.C.”三国联合提出调停，才使得威尔逊得以脱身，而未过分地丧失威信。战斗在继续进行，最后卡兰萨取得了总统职位，这并非由于美国的帮助，而是由于他公开接受了一个他自己也根本不相信的纲领——萨帕塔及其印第安人的土地改革纲领。因而，在破坏声中，而且由于大战正酣，在外人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1917年的宪法为一种初生的新制度绘制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蓝图。这部宪法至今仍是墨西哥的宪法。它的政治条款极少新的内容，只是重复和引申了1857年那部激进而猛烈反对教权的宪法，不过在迪亚斯的巧妙操纵下，那部宪法当时等于是一纸空文。最显著的革新是在经济条款中。在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将一个内容广泛的、在当时说来是极为宽厚的产业工人法写入了宪法。更加革命的第二十七条，声称要把墨西哥的农业历史的整个发展趋势倒转过来。它宣称，全部土地、水流和矿藏均属国家财产，私有制只是在官方含蓄地和有条件地授给的情况下才允许存在，而某些类型的蕴藏着矿藏的土地，包括油田在内，则是不准授给的。它限制了外国人可以获得土地的区域，并规定了他们拥有和利用这些土地的条件。它严格限制个人或公司所能拥有的土地面积，并且禁止教会团体拥有土地。它答应恢复自1854年以来交出的一切农村公地，并授权将土地（预计要从私有庄园没收来的土地）

授予没有公地的村庄。农村的怨恨当时达到顶点，斗争到处发生，因此，要想保持任何表面的平静，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过激纲领，或许是唯一的途径。事实上，机会主义者卡兰萨既无力进行统治，也不能信守他在土地方面的诺言。他于1919年被他的副手奥夫雷贡赶下了台，不久便被谋杀。1921年，奥夫雷贡当选总统，从而达到某种和平局面；但是，为了实行这个新秩序几乎用了近20年的时间，至于要使它发挥作用，则需要无法预料的更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另一种革命正在震撼着中美的几个小共和国。美西战争开始了美国进行干涉的历程，这一历程很可能变成殖民侵略的历程。波多黎各于1899年被兼并。加勒比海岛屿中最大而且最富庶的古巴，在被美国占领了一个短时期后，于1902年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但美国在关塔那摩保持了一个基地，并根据普拉特修正案保持了一旦发生严重骚乱时进行干涉的权利。由于出现了穿越中美开凿一条通航运河的前景，而且由于美国政府希望控制运河区，因此美国的注意力就被引向加勒比海各国的政治事务。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开凿运河的两个障碍，一个是外交方面的，另一个是领土方面的，都已消除。外交方面的障碍是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经过一番讨论，英国政府同意以1902年的海—庞斯福特条约代替该文件。新条约规定修建一条由美国控制和防守的运河。领土方面的障碍是哥伦比亚对修建一条通过哥伦比亚领土的运河的计划所持的态度。正好这时，哥伦比亚的巴拿马省于1903年爆发了叛乱。美国派出海军以防止哥伦比亚当局进行干涉。匆忙得到承认的新成立的巴拿马共和国同意签订一项把运河区的实际主权给予美国的条约。这一政策措施虽然为运河扫清了道路，但在哥伦比亚却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不满，而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并不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视（参见第十八章）。

正当西奥多·罗斯福“取得中美地峡”之际，海牙仲裁法庭就委内瑞拉的债务纠纷做出了裁决，这就使保卫加勒比通路的问题复杂化了。这一裁决确认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封锁委内瑞拉海岸是合法的，从而助长了利用武力索取债款的做法。这就暗示，欧洲人有可能在美国认为为了保卫其自身安全必须加以控制的地区，进一步进行为国际法所认可的武装干涉。要防止这种可能，唯一的希望看来只有指靠美国政府采取警察行动，来防止拖欠正当的债款和发生危及外国人的骚乱。为此，西奥多·罗斯福于1904年发表了所谓的对门罗主义的延

伸：即警告说，美国为了消除别国进行干涉的借口，可能被迫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事务进行干涉。

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巴拿马的事务。1905年它同多米尼加共和国谈判一项协定，根据此项协定，该国的关税将由美国的官员征收，以便消除欧洲人插手的机会。1906年，为了防止一次危险的国内危机，根据普拉特修正案和古巴宪法的有关条款，古巴被重新占领。这第二次的占领，只延续到1909年正式组成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后即告结束；但是美国仍然不断地向古巴政府提供一些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劝告。针对中美这个动乱地区的问题，1906年至1907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墨西哥参加的会议，以便制定缔造和平的方案。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由于某一国家发生了在别国领土上策划的革命而引起的争执。这次会议的主要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巧妙的协定：对通过革命夺取权力的政府不予承认。这样，不出数年，罗斯福的政策就在巴拿马取得了以助人为怀的监督权，在古巴不时地进行干涉，在中美则产生了一项新的不承认政策，一般把这种政策看成是——或仇视为——一种间接干涉的形式。这些手段尚不足以保持美国认为满意的和平，于是继罗斯福出任总统的塔夫脱，不久便把他的中美政策从警告外交转向使用武力。1909年，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塞拉亚由于对外策划侵略阴谋，对内实行仇外政策，屡屡威胁和平，因而在一次由美国各商业公司支持的革命中被赶走。191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登陆，以防止塞拉亚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外，尼加拉瓜一直到1933年都是处在美国的监护之下。接着又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两次武装干涉，这两次干涉都是由于严重的国内骚乱引起的。海地从1915年至1934年被占领，圣多明各则从1916年至1924年被占领。

人们用“金元外交”这个名词来讥讽这些行动，未免失之天真。不错，塔夫脱的国务卿、厉害的诺克斯曾认为，把中美各国的公债从欧洲人的手中转到美国人的手中是符合和平的利益的；但是，他在劝说纽约的银行界贷款给像海地、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的政府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只有在古巴，美国投资才达到可观的数目。诚然，传教士式的讲求自觉效率的那种热忱，促使美国人“整顿”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国；但是它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的。为了阻止欧洲人可能对运河区构成威胁，历任的国务卿都准备即

使同拉丁美洲造成不和也在所不惜。当然，美国的这一政策遭到反对。它在国内不得人心，因为它违背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在中美洲自然也为人们所不齿。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也使人们在长时间内深感怀疑。特别是在阿根廷，一些野心勃勃要让阿根廷领导南美的报界人士，大肆宣传美国佬的帝国主义行径。美国所以在战略上感到忧虑，主要是由于德国海军实力的增长。1914年，当对德作战的第一次大战爆发时，美国在美洲几乎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1914年，拉丁美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已经比在1900年时重要得多。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了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会议，他们在这次会上表现出的智慧使欧洲大开眼界。拉丁美洲的几个较大的国家为人所知，并且普遍受到重视。最主要的是，它们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已经大大增加。欧洲离开拉丁美洲的食品和原料就难以维持下去，因此，拉丁美洲的友谊便成为交战双方外交上争夺的宝贵目标。尤其是德国，在和平时期就在同拉丁美洲通商各国中居于第三位，这时更是千方百计、不惜破费地展开宣传而大献殷勤。然而，由于德国击沉中立国的船只，因此反而造成最有害于己的议论。

美洲对交战双方没有共同的政策。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国政府始终是亲德的。在智利，因为该国的军队是由德国人训练的，所以有许多人同情德国。这三个国家以及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和萨尔瓦多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持中立，与所有交战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并尽可能地保持着商业关系。1915年英国军舰在智利的一个港口击沉了“德累斯顿”号巡洋舰，直接破坏了该国的中立，英国政府曾为此道歉，这使南美洲海军实力最强的智利的忍耐程度受到一次考验。阿根廷虽坚守中立，但明显地偏袒协约国，特别是理所当然地同情意大利。1917年德国击沉三艘阿根廷轮船，德国政府为此充分表示歉意并且给予赔偿；这使阿根廷在外交上赢得一次很大的胜利。1917年下半年，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国会也做出决议要求与德国决裂，伊里戈延要保持同德国的关系，就遇到了某种困难。阿根廷和乌拉圭都以提供购粮贷款的方式给予协约国以物质援助。

美国的参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拉丁美洲各国的立场。中美和加勒比海各国几乎全部同美国一起正式宣战。秘鲁、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与德国断绝关系，并将在各该国港口中的德国船只全部交给了协约国。巴西的对外政策多年来一直以政治家的稳健和遵守国际

法而著称，1917年10月也单独向德国宣战。巴西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它的船只被击沉。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大多数巴西人都同情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因为他们把法国看成是拉丁文化的楷模和指南。巴西虽未派兵前往欧洲，但其军舰在大西洋上同协约国的舰艇协同作战。战争在国内引起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不断要求把在巴西南部的德国人侨居地“巴西化”。

在政治上，战争给拉丁美洲各国的主要影响是使它们更密切地参预国际事务。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或早或晚地都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大多数是发起国。参加国的数目有所变化，有几个国家由于在委员会的席位分配上发生争执而退出，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始终忠诚不渝。国际联盟对拉丁美洲的理想主义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它提供了一个讲坛，使比较弱小的国家的呼声也能为人们听到。的确，为数甚多的小国出席国际联盟大会，而它们拥有的投票权同他们的实力却极不相称，这就使得往往表现了该机构特点的那种不现实的气氛更加突出。同样确实的是：某些国家把国际联盟当作与美国实力相抗衡的砝码，是美国所支持的泛美体系的替身。美国不出席日内瓦的国联会议自然要使国际联盟在美洲的政治活动极端困难。即使如此，国际联盟中的拉丁美洲会员国仍然是重要而可贵的。国际联盟各技术性机构在拉丁美洲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那次解决1933—1934年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在莱蒂西亚领土问题上的严重纠纷中，国际联盟（这次是在美国的合作下）也是克尽厥职的（参见原文257—258页）。

在经济上，战争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打击虽然沉重，但为时短暂。欧洲资本的来源和大量移民的输入遽然中断。对欧洲的出口，由于船只调作他用而暂时下降，随后幸而由于协约国急需食品和原料，即迅告恢复。另一方面，从欧洲输入的制成品严重减少，因为欧洲工业集中力量于战争的需要。输出超过输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A. B. C. 三国的工业一时得到发展，特别是供应国内市场需要的纺织品生产和食品罐头加工工业。这种为使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多样化和自给自足而进行的努力，迄今一直在继续着，虽然并不是持续保持同样速度。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从美国的进口不论从绝对或相对来说，都大大地增加了。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在战后仍然保持下来，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战时所获得的利益，尽管法国和英国的企业在20年代竭力想恢复它们失去的地盘。整体来说，随着贸易接踵而来的是资本。1913年，英国

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总数约达48.93亿美元；而美国投资总数为12.42亿美元，而且差不多全部在墨西哥和中美，仅有1.73亿美元在南美国家。到1929年，英国拥有的资产为58.89亿美元，而美国则拥有55.87亿美元，其中包括在南美的31.02亿美元。^[3]美国的投资方针同英国基本相同，但分布较广，不那么大量集中在铁路及其他公用事业上。直接投资占据主要地位。大部分资本投入诸如矿山一类向制造国输出原料的企业，以及附属于这些企业的交通事业，而不是投入生产成品的企业。所以，在整个拉丁美洲，战时和战后贸易和财政方面的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独立，只是一部分企业主易人，投入的外资全面增加，表面的繁荣继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总趋势下有一两个重要的例外。战争至少在两个主要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造成严重混乱。智利虽远离这场冲突，但战争的间接后果使之受害匪浅。硝石不仅是肥料，而且是制造硝化甘油的原料。在战争期间，协约国购买了大量智利的硝石，但德国人由于被封锁而与智利隔绝，转而生产合成硝酸盐并且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大部分需要。战后使用合成硝酸盐已成普遍现象。它比天然硝石价格高；但是，各大国政府都不愿使重要的军火依赖于遥远的来源，而宁愿让农场主为肥料多花钱，以便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生产这种炸药原料。智利硝石产量在20世纪初占全世界产量的70%，到1924年降至35%，1931年又降至11%^[4]，到30年代仍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铜的世界市场也极不可靠。智利的人口太少，无力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提供市场，而它的两种主要矿产品的价值下降，意味着它的经济将会衰退，对此尚未找到适当的补救办法。

战争给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牛肉工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在战争期间，除需要冷藏牛肉之外，对罐头牛肉和冷冻牛肉的需要大量增加。制成罐头的产品，不论使用的牛肉质量如何都同样淡而无味，而需求量很大，这就助长人们去饲养和出售次等的牛。同时，在战争的头几年里，苜蓿连年严重歉收，使优质牛肉的生产更加困难而耗资巨大。1922年欧洲的萧条使市场突然变得不景气，除了质量最好的牛肉之外，一切牛肉都销售不出去，这时畜产业却仍处于上述紊乱的状态中。到1925年，障碍被清除，畜产业再度恢复，但即使在这时，它也不得不进行另一次调整，以适应欧洲大部分地区由于家庭人口减少而造成的对小牛肉的需要。冷冻公司开始需要较小的牛。在此以前一直

具有最高价格的短角大公牛行情下跌，不得不代之以像阿伯丁-安格斯这类体格不高而又壮实的品种。当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受到1930年萧条的严重打击时，这种变化仍在进行中。

除以上这些遇到困难的工业之外，拉丁美洲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直是和平而繁荣的。在巴西，棉花和咖啡一样成为重要出口作物，而牛只（虽然质量不佳）的头数在南方各州中却有了相当大的增加。矿业和工业均有稳步的发展。巴西虽然缺乏合适的煤，但拥有大量的铁矿石。在干旱的北方各州，战后历届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修筑水坝蓄水。由于移民和自然增长，人口全面地稳步增长。在南方，国家发起的开拓事业，虽然缓慢却在稳步地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内财富增加最显著的要数安第斯山脉北部各国，特别是委内瑞拉，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大片的油田。委内瑞拉在过去是个落后的畜牧和农业国，除了城市、油田和近来开发的铁矿之外，现在仍然如此。1918年开始输出石油；到1930年，委内瑞拉出产的石油已占全世界供应量的10%以上，而且由于收取石油产地使用费，它是拉丁美洲各国中唯一不负公债的国家。生产的石油几乎全部出口；而且，几乎全部生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掌握在英美外国企业的手中。国民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的石油价格。

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20年代也开发了油田；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为了发展公共事业，它们都向外国资本提供了特许权。不过，这些国家中没有有一个国家的生产达到委内瑞拉的水平，或者那样严重地依赖于石油。特别是哥伦比亚，曾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和发展的时期。该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1倍以上，出口货物除石油外，还增加了咖啡、可可和食糖。两个工商业城市，即远离首都的谷地卡利和麦德林，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麦德林，在此期间成为矿业和纺织业的重要中心。秘鲁比哥伦比亚较为集中，更多地依靠其首都利马与近郊的港口卡亚俄。而且，秘鲁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一方是闭塞的高原居民，即印第安人和农民；一方是沿海居民，他们大多持有欧洲的观点，从事商业、矿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从事工业。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但在20年代中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和多种经营的成果。秘鲁输出铜、棉花、食糖和其他各种农产品以及石油；并且与毗邻各国一样，其经济生活多半而且日益为外资所控制。

在20年代这个繁荣时期中，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产业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和一般福利表示关怀。各国政府由于普遍要求使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加快起来，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劳工问题上。国际间通过国际联盟国际劳工组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就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无疑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有没有一部先进的劳工法，成为一个涉及国家威望的问题，一个是否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的标志。而且，大部分拉丁美洲的矿山、油井和工厂都为外国人所有。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向外国雇主施加压力受到人们欢迎，被视为爱国行动，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必担风险。根据欧洲或美国的标准来说，大力改善劳动条件，无疑是必要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都设立了单独的劳工部或劳工局；它们和其他几个国家还实施了劳工法，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罢工权利、最低工资以及保护妇女儿童这样一些社会立法的原则。乌拉圭一度曾是高卓人的军队的战场，现在通过出口牛肉变得繁荣和稳定，它和智利都开始实施国民保险计划。立法篇幅和内容的浩繁，是令人难忘的，但大都是根据欧洲和北美的理想而制定的，未必符合当地的需要。在大多数国家中，它几乎不触及农村生活；在这方面，雇主（Patrón）是当地人，而且雇主与债役农之间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那些工业中心，大多数立法也由于缺乏应有的检查而形同虚设。拉丁美洲各国立法机构的活动往往同实施立法的能力成反比。

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主要是从上面——由政府一进行，而不是从下面发起的。各国的工会组织都软弱无力；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不过处在幼年时期，而且往往遭到禁止。然而，整个运动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产业工人和学生之间保持着联系。拉丁美洲各大学提供的大都是专业和技术训练，而不是普通教育；学生人数甚多；他们的组织相当巩固，在政治上往往非常活跃。他们的活动通常表现为大吵大闹地提出某种含糊不清的改革要求，而不是支持某一政党的具体纲领；这种要求吵闹得非常厉害，有时是异常激烈的。在某些国家中，学生组织的活动，在20年代，而且从那时以来就一直在政治上造成麻烦。

在20年代实施所有这些社会改良计划的各个政府，其政治形式迥然不同。在某些国家，突出的如哥伦比亚，战前那种通过一套谨慎地

操纵的宪法体制来进行统治的地主寡头政权，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在巴西，虽然发生了几起未遂的军事暴动，但是战前的一套成规仍然承袭下来。在少数几个国家中，立宪激进主义曾暂时居优势。由于萨恩斯·培尼亚的选举改革，阿根廷的激进党（“辉格党”这个名称也许更能说明其性质）执掌了政权。1920年，智利政府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新任总统亚历山德里是北部的塔拉帕卡省人，自称是工人和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处境和国会反对进行改革的要求，迫使亚历山德里废除了1833年的旧宪法，经过公民投票批准实施了一个大大加强总统权力的新宪法。结果，发生了一系列政变，从1927年起建立了半独裁的军事统治，把亚历山德里改革计划的大部分条文付诸实施。各激进党的一个普遍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的组织具有浓厚的个人性质。阿根廷激进派领袖、曾两度担任总统的伊里戈延以作为最后的一位“考迪略”^[5]而闻名；他对党的组织和全国政府，事无巨细，均必躬亲；他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十分严厉，使人想起老“考迪略”们的手段；不过，他的所作所为起码还不超越宪法条文许可的范围。另一方面，在20年代有几个国家则是连任何宪法形式的外衣都不顾，以毫不掩饰的独裁手段来推行许多发展和改革计划。无耻的政客们学会利用工业无产阶级来支持违反宪法的权力。1919—1930年统治秘鲁的莱古亚出身微贱，他靠维护中产阶级和劳工利益受到支持而取得权力，他的纲领包括保护劳工的立法、普及教育、重新分配土地，以及通常是精心擘划的公共工程。纲领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公共工程和教育，是靠向美国借公债来实现的。然而，集激进派独裁者之大成的则是胡安·维森特·戈麦斯。这位没有受过教育的混血儿以各种官衔掌管委内瑞拉事务达26年之久。戈麦斯的武库中拥有现在人们所熟悉的一切武器，诸如检查制度、秘密警察、严刑拷问、不经审判就把政治犯投入监狱、把各种负责的职位分配给这位独裁者的亲戚之中那些表现有能力而又忠诚的人，等等。戈麦斯治理委内瑞拉严酷无情，办事认真，讲究效率。他像莱古亚一样，专门致力于教育和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但是，他由于有石油工业的收入，所以不曾遇到财政困难。1935年，他在总统任内寿终正寝，遗留下万贯家财并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他指定的继承人接管了权力，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动乱；因此，戈麦斯的体制一直维持到1945年发生的一场革命把民主行动党（一个宪政主义的中产阶级组织）拥上台为止。

可见，即使在和平繁荣的20年代，宪政在拉丁美洲也绝不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似乎都已丢弃了革命的习惯。戈麦斯认为最值得夸耀的事，就是在委内瑞拉打破了这种习惯。在像阿根廷这样一些主要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政府从没有经过暴力而更迭，人们认为稳定和秩序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各个地方，以法治来代替依靠武力、利害关系或恣意妄为进行统治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先天的弱点，即过分地依赖外部世界，未能发展当地人民的创造力等情况，仍然存在。拉丁美洲人所无法控制的世界势力，将把他们推进一个混乱和不幸的时代中去。

1929年将近年终时爆发的世界贸易的大萧条，几乎立即向拉丁美洲袭来，给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拉丁美洲各国或许变得比以往更加虚弱了。它们在许多基本商品和服务事业方面依靠外力；它们靠出口少数几种基本商品来支付购入多种多样的货物的费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根据契约规定的义务向顾主供应货物，由于价格下跌，它们按契约承受的负担便大大增加。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国家公私债务负担沉重。偿付利息和维持行政开支都靠财政收入；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出口税，而进出口税则由于贸易衰退而锐减。面对着经济危机，除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之外，所有各国政府对外都拖欠应付的利息，在国内不得不削减开支。在基本建设工程、公共卫生、教育等事业方面的开支大幅度削减。各国政府和各私营企业都裁减人员。失业——拉丁美洲新出现的一种现象——普遍发生，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骚动、暴乱和政治叛乱。

在1930年和1931年，20个拉丁美洲共和国中有11个经历了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经历了非正常的政府更迭，因为这些更迭不仅都同样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说来都具有不流血的性质。有些国家曾对下台的统治者提出刑事诉讼——莱古亚即死于狱中——但却很少发生暗杀或屠杀的情况。革命一般采取了游行示威——提出最后通牒——辞职这样一种文明的、但超越法律的方式。把这些骚乱完全归咎于大萧条，未免过于简单化。商业不景气促使人们对治理不善无法再容忍。在所有的情况下，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早已存在，大萧条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人们最普遍地感到不满的是：某些国家存在着实际的或者所谓的独裁；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存在着激进主义和对工人的姑息；对外国资本家提供的条件过于宽厚；政府部门

浪费和贪污；还有永远消除不了的“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忌恨；等等。

在阿根廷，伊里戈延政府由于激进而为保守派所反对，由于其个人性质而几乎为人人所不满。这个政府把根本无法应付的大量行政事务，集中到一个虽然正直但却刚愎自用而且心胸狭隘的七十多岁的老人手中。它不是什么独裁，而是日渐加重的行政瘫痪；因此，人们对之日益不满。伊里戈延由于对1930年的罢工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因而失去了工人的支持。该年9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了规模巨大而组织良好、秩序井然的游行示威，迫使伊里戈延去职。示威游行是由学生和军人发动的。它的直接结果是，在乌里武鲁将军领导下实行了一年的军事统治。1931年下半年终于举行了选举，胡斯托将军作为当选的民族民主——亦即保守——政府的首脑而上台。对于通常意义上的保守政策来说，这正是时乖运蹇的时代，于是，政府便从实行宪政日益趋向于实行旧式的寡头统治。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寡头政权便为一个至少在表面上类似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政权所替代。

阿根廷革命后6个星期，紧接着在巴西普遍发生了动乱。巴西的咖啡业有一个时期通过一项稳定物价计划而受到控制；根据这项计划，政府限制产量，购买产品加以储存，并按需求情况决定销售量，以便维持咖啡的价格。1930年年初，这项计划不可避免地、而且灾难性地遭到失败，处理无法销售的大量咖啡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烧毁。在1930年的总统选举中，由于在任总统、圣保罗州的华盛顿·路易斯给一个圣保罗籍的候选人以官方支持，这就在咖啡问题引起的不满之外，又增添了政治上的不满。按照巴西的选举惯例，正式候选人当选了，而这次选举的做法就大大地触怒了米拉斯吉拉斯州，因为这个州根据长期的政治惯例，本来是要提供下届总统的。这种形势以及圣保罗人可能要长期组阁的威胁，都被第三个州即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候选人抓住并加以利用；这个州的财富和人口均一直在增长，这时要求在中央政府中享有更多的权力。热图利奥·瓦加斯博士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和他自己所属的里奥格兰德州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击败了圣保罗州的军队，赶走了总统，对宪法做了两项旨在加强总统权力并削弱国会和州政府权力的重大修改，据以建立了一种变相的独裁统治。其中的第二项修改于1937年规定建立一种“合作”组织，不禁令人想到

法西斯意大利的类似组织；但是，瓦加斯并非墨索里尼，他的统治虽然集中而独裁，却既不专横，又不实行镇压（只有在对付由所谓的共产党人发动的暴动时除外）。他本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伟大的皇帝佩德罗二世^[6]好自称为巴西最杰出的共和主义者；而瓦加斯博士如果不是不幸而成为独裁者的话，他很可能也会说他本来是会成为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物的。

智利革命是一场不寻常的、成功地反对军事独裁的起义。智利大概比任何其他国家受大萧条之害更为严重。它的本已衰退的出口贸易，有一个时期几乎完全中断。然而，闭塞、贫穷、自豪、素以文明著称的智利人却选择不吉利的1932年来恢复宪政。经过两次争执不休的选举和严重的混乱之后，在这一年就职的总统仍是亚历山德里，他是一个正直而有为的自由主义者，在智利政治家中最受尊敬。他执政6年，稳步从事恢复，谨慎处理政务，一步步从以前的激进主义转而实行通常的保守政策。在他执政的后期，他采取了积极镇压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措施，这就驱使他们弥合了他们的分歧，并同激进派联合起来进行竞选。于是，亚历山德里在1938年由“人民阵线”联盟的领袖阿吉雷·塞尔达所接替——这个联盟本身就是拉丁美洲政治中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

在墨西哥，没有发生通常所说的那种革命。墨西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1910年起就一直在进行着一种不断的革命。不过，在20年代这个过程缓慢了下来。原来的革命者变成了新的保守派，除了反对教权之外，革命的纲领大部已被遗忘。奥夫雷贡的继任者卡列斯，从1924年至1934年，不论是担任总统还是作为总统背后的实力人物，都在操纵着墨西哥的政治。1929年，他公开地申明政见说，土地改革纲领已经走得够远了。30年代初，土地分配差不多已经停止。诚然，有关产业工人的法律似乎已经超出了工业所能承受的安全限度；但是，工人运动就像政府一样，营私舞弊比比皆是，当上工会领导就是飞黄腾达的阶梯。与此同时，在20年代还发生过几起武装暴乱；而且，墨西哥政治中依靠枪杆子的传统依然存在。卡列斯的绰号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阶段革命的一般政治气氛。人们把他叫作最高首领（Jefe Máximo）。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革命的热情是如此之强烈，就连从国外刮来的经济暴风雪也不能使它冷却下来。大萧条所产生的不是反革命，而是对革命进程的缓慢不能再忍耐。由于1934年卡

德纳斯将军当选总统，情况便急转直下。在他执政的6年期间，占有任何相当数量的肥沃耕地的土地所有者，大都被全部剥夺，只剩下一小块土地。没收土地不再限于以非法手段取得土地的地主、经营不善的地主或在政治上犯法的地主。一个庄园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而它又靠近一个需要土地的村庄，就足以构成被剥夺的理由，而且即使行贿，要想逃避没收也是难上加难。从1936年到1940年，有4700万英亩土地分给100多万农户，而在这以前的20年中，只有大约200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了75万农户。^[7]卡德纳斯的政策颇受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影响（托洛茨基即在墨西哥政治避难）；他的政策主张将公地交给村庄公用，而不主张将公地分成小块交给个人永久占有，因为这些人往往利用这些小块土地只生产糊口用的粮食，此外不作他用。这样匆忙地重新分配土地，而且显然未经过充分的丈量，这就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至少暂时造成生产的严重下降。发展村社共耕，也提出了资金和管理这样迫切的问题。为了向村社（ejidatarios）提供贷款而建立了一套土地银行体系，但从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借款者手里收取小额利息则需要有一个花费既大而又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组织，而且银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向邻近地区条件优越的村庄提供贷款。管理问题解决起来甚至更加困难。债役农很少有人懂得管理问题，而且由于公地管理人是通过选举产生，因此选择这些人往往是根据他们是否孚众望而不考虑他们的业务能力。不过，在新制度下，有些村庄，特别是在现在驰名的拉古纳植棉区，曾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由于政府决心推行普及教育并开始收到效果，因而领导问题看来还比较易于解决。与此同时，革命不得不在生活费用高涨、国家信贷浮动和社会动荡不安这些方面付出代价。

这次革命既可称为土地革命，又可称为民族革命。卡德纳斯政府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之一是1938年没收外国石油公司；其条件是付给一点只不过是儿戏的补偿。将如此重要的一项资源收归国家掌握，这一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此又不得不付出代价，那就引起外国，尤其是英国的不满，以及石油工业的暂时衰落。不管是由于管理缺乏经验、工人们难于驾驭或缺乏勘探资金，在没收这些公司后，生产下降达10年之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不能进口必须更换的机械，更谈不上发展用的机械了。到50年代初，生产才开始显著恢复。

这次革命的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对大庄园主（hacendados）的掠夺，给有教养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这种生活是城市的性质，法国的情调）带来了灾难，因为他们的生活是靠大庄园主的财富供给的。一种主要以印第安艺术传统为基础的、自觉形成当地风格的卓越的新文化发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前者。墨西哥现代本国艺术以绘画和雕刻这两个领域最为著称，在文学作品方面次之。这种艺术以严格的态度专心关注迫切的社会问题，这就限制了它的创作范围和感染力；但它却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有独创性的创作努力，可能预示着整个拉丁美洲迫切需要的那种精神上的独立在成长。

要完成30年代这些激烈的变革，需要超乎寻常的力量，因此，受到军队、产业工人和农民支持的卡德纳斯总统，实质上是一个独裁者；只有一个政党，即墨西哥革命党。但是，这种独裁却是一个具有创造热情的独裁，而不是一味只知镇压。它除了迫害教会和无情地侵犯财产之外，容许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允许对它的政策公开进行批评。最有意义的是，当卡德纳斯的任期届满时，他既没有设法重新当选，也没有干预继任的政府来规避宪法。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30年代表现出的明显趋势，是要采取权力更加集中的政体。把这样的政体称为“极权主义的”未必恰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拉丁美洲人具有极强烈的自尊感，不会容忍极端的独裁；对受到愚弄也极敏感，不会被拙劣的种族神话所欺骗。此外，这些政府也缺少“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一套具体的行政机构。然而，自觉的民族主义十分明显地成长起来。在国内事务方面，它采取宣传鼓动的形式，有时在财政上对外国资本采取歧视的形式——在阿根廷对英国铁路、在智利对硝石企业，当然还有在墨西哥对石油公司的歧视等。许多这类企业名声扫地，无利可图；很明显，外国人——起码是欧洲人——在拉丁美洲投资的好日子已经过去。有一些国家，旨在保护劳工的立法，成为歧视外国雇主的手段。大多数政府实施了排外的就业法，限制外国人在工商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实行的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也告结束。限制性的立法开始在巴西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实行，规定了旨在限制日本移民的限额条例，因为这些日本移民引起了棘手的同化问题，而且他们一般是不受欢迎的；但在失业时期，大多数政府也希望保护工农业劳工市场，以防止欧洲雇佣劳动力的大量拥主。在移民集中的主要国家阿根

廷和巴西，限制性立法的严厉，在1938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两个国家仍然有着大量的荒地，因此例外地对农业移民不加限制；但在30年代，移民中几乎没有这类农业移民。拓荒定居过去由于、现在仍然由于缺少资金而受到阻碍。今天，在拉丁美洲任何地区，再出现不加区别地准许大量移民的希望是不大的。

在整个拉丁美洲，为了在经济上达到更大的独立，曾经重新不断地做出努力，尤其在发展工业方面是如此。各国政府都打算控制主要产品——巴西的咖啡、阿根廷的小麦、智利的硝石、玻利维亚的锡——的生产，以便维持价格。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之间的易货协定开始代替公开市场的竞争。其中著名的有1933年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罗加—朗西曼协定，接着又出现了其他类似的协定。这些协定不论其经济上的必要性如何，都引起了美国的严重不满。民族主义也在政治方面公开地表现出来。在一些国家之间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执，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还因大查科的领属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玻利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家，秩序混乱，岁入依靠由外国人占有的锡矿的产品；它在这次战争中败北，又丧失了另外的土地。玻利维亚若不是软弱无力的话，它收复领土的要求一定会严重地危及和平。后来，在50年代初期，玻利维亚发生一场墨西哥式的革命，将大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武装了锡矿矿工并把锡矿国有化，为此它的资源更加紧张起来。

但是，民族主义显然并不是医治拉丁美洲各种困难的万应灵药，而且大多数政府也知道并且承认：自给自足即使是好事，但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是根本谈不到的。许多国家——虽然并非所有国家——热衷于泛美思想的趋势，在30年代明显增长，并为召开泛美会议和商讨有关问题做了精心的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际联盟的威信下降，拉丁美洲人对国联的成就感到失望，不愿再卷入那些似乎已经超出国际讨论范围的欧洲争执中去。但在很大程度上，泛美主义的重新抬头则是由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所促成。

美洲国家联盟在理论上说来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完全自愿组成的联合组织。它没有集中的执行机构，没有宪章；它的一些机构都不是根据正式条约设立的。从1910年起它在华盛顿保持着一个常设局，作为研究和宣传的中心以及定期召开的泛美会议的秘书处。美洲国家联盟的主要职能是为公开商讨与美洲国家共同利益攸关的各种问题提供便

利。美国一直是这个联盟的主要发起国，而联盟工作的主要障碍却是拉丁美洲对美国的怀疑。许多美国政治家，如著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宣称美国尊重所有邻国的主权。但是看来下列行为似乎是与这些声明背道而驰的：1914年和1916—1917年它两次干涉墨西哥，其后10年，两国关系始终很坏；美国在海地、圣多明各和尼加拉瓜驻有军队（不管人数是多么少，意图是多么好）；美国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奉行不承认政策；美国的糖业公司在古巴掌握着经济实力，而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掌握经济实力的则是联合水果公司，这个公司比它经营所在的一些小国远为有钱有势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般认为美国干预加勒比海地区事务的战略借口已不复存在。1928年的哈瓦那会议上，对美国政治、经济政策的不满在公开发言中突然爆发出来。当时表现出来的敌对情绪，使美国的舆论大为震惊；因而，就在开会的这一年，美国开始要坚决改善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睦邻”政策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他同1930年发表的明确反对“罗斯福延伸”的克拉克备忘录无关；与任命德怀特·莫罗为驻墨西哥大使（他在培育友好感情和推迟墨西哥对外国资产的打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无关。然而，这项新政策，在罗斯福于1933年成为总统后，最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泛美会议上，美国接受了一项决议，不承认任何国家有权干涉任何别国的内政。在1936年由罗斯福总统本人主持开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用更加明确的词句重申了这一原则，并且拟订了一项公约，规定一旦出现任何威胁美洲和平的情况时进行协商。1938年在利马举行的第八次泛美会议上建立了实施这项协商公约的执行机构和协商程序。

在屡次召开泛美会议的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从尼加拉瓜和海地撤出了最后一批军队，1934年撤销了普拉特修正案，并于1936年自愿放弃了干涉巴拿马的条约权利。政策上发生急剧变化的证据，不仅表现在国务院的行动上，而且表现在国务院避免采取行动上。美国在国外的投资者要靠他们自己设法维持下去。在格劳·圣·马丁执政时古巴出现无政府状态期间，美国没有进行干涉；当墨西哥政府没收外国油井时，也只有英国外交部独自提出无效的抗议和断绝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由科德尔·赫尔先生根据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而开始实

施的更加自由的新贸易政策，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活动范围。到1939年年底，已同11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协定。

“睦邻”政策并非普遍取得成功。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就坚决拒绝签署美国的中立法。在采取何种步骤结束查科战争的问题上，在阿根廷提出的关于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国家可能被邀请参加）的建议上，阿根廷和美国意见尖锐分歧。阿根廷历届政府不仅对美国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产生妒忌，而且由于阿根廷的经济是欧洲经济的补充，因此便直接同美国经济发生了竞争。今天，在拒绝批准国际协定方面，阿根廷在美洲国家中，无疑是保持着纪录的。

虽然如此，泛美运动还是日益强大，它的价值在1939年便明显地表现出来。战争爆发不到3个星期，美洲各国外长便举行会议商讨在美洲建立一个“中立区”，并设立一个目的在于减轻战争在拉丁美洲造成的经济后果的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1940年，重点从中立转为防御，他们又去哈瓦那开会，提出了一旦德国在欧洲取胜，如何接管西半球的欧洲殖民地的管理权的计划。哈瓦那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凡受到一个非美洲国家的任何进攻，都将被认为是对全体美洲国家的侵略行为。

1941年年底便发生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1942年年初美洲各国外长在里约热内卢再次开会。这次会议经过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阿根廷是反对派的魁首——决定建议全体美洲国家同“轴心国”断绝关系。拉丁美洲的合作，这时对于盟国的事业是关系重大的，因为日本人在东方已据有锡、橡胶、奎宁和一大批热带产品的主要资源。拉丁美洲国家起而对付这一局面。墨西哥和巴西于1942年夏宣布参战。两国都及时地向国外派出了军队。在会议结束前，除智利和阿根廷外，所有国家都同“轴心国”断绝了关系。智利于1943年1月也断绝了关系。阿根廷则在1944年断交，1945年1月宣战，显然是为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在此以前，阿根廷在政治上差不多已陷于孤立，它同美国的关系极度恶化。阿根廷没有出席1945年的第四次外长会议，但它终于还是接受了最后签订的查普尔特佩克法^[8]。该法重申美洲国家共同抵抗侵略的原则，并明确指出这一原则也将包括某一美洲国家对另一美洲国家的侵略在内。此外，它第一次规定了侵略的实际定义，并规定各国在必要时有义务采取经济的和军事的“制裁”。于是查普尔特佩克法便以书面形式表明，门罗主义已由一种单方面宣

布的政策，转变成为一种在拟议中的联合国体制之内相互保证区域安全的体系。

这一体系是否有力量 and 是否能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睦邻”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美国决心采取格外克制的态度，并且在眼前的利益上做了重大让步。不过，拉丁美洲仍然对美国抱有相当严重的潜在的敌意。在战时，秘鲁和厄瓜多尔因亚马孙领土问题而发生纠纷，美国对此所采取的态度，曾使这种敌意一度在这两国甚嚣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虽不愿意，却出于现实认识到，美洲对外来进攻的全面防务必须依靠美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极力避免公开干涉其他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上述态度和政策虽未能促成友好合作，却足以避免发生公开的对立。然而，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它颇为不安地感到不干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行为端正。而如果，譬如说，亲俄的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广泛地发展起来的话，美国就很难继续执行不干涉政策。

当时，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虽然在许多国家存在着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往往正当地被指责为制造阴谋与混乱；但它们力量很小，无足轻重。诚然，墨西哥革命的思想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土地改革运动（agrarismo）是墨西哥所特有的现象，实际与当代俄国的极权主义极少共同之处。其实，在墨西哥掌权的革命党的理论和政策，在40年代比10年前的极端做法已大为缓和，并且变得保守得多。为了逃避针对土地集中的大庄园的立法，找出了一些办法；对利用私人资本发展工业，也没有设置任何障碍。阿普拉党（APRA）^[9]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为时较短，收效较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政党），在1945年的选举中在秘鲁上台。阿普拉运动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上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重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承认在社会改革中必须取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阿普拉运动反对外国资本的影响，支持泛拉丁美洲主义的主张，并强调印第安人在美洲事务中应起重要作用。它的纲领体现了任何一届秘鲁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把失去土地和贫困无依的印第安农民纳入国民经济生活的主流。阿普拉党政府的成就极小；它于1948年下半年被得到雇主和土地所有者阶层广泛支持的一场军事暴动所推翻。军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认为，或假装认为，阿普拉运动与共产主义危险地相似；但实际上阿普拉党在执政期间一直向右摆，被推翻后仍是如此。它可能无所作为；

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它的政治特色是把中产阶级和职业阶级同工人联合在一起，这是拉丁美洲许多温和的激进运动的共同之点。战后拉丁美洲取得成就的一些政府，都是建立在这种联合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联合，所以在政治上软弱无力，但是它能借以发展壮大那种不满，却几乎在各地都广泛存在。

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之一，直至1955年仍然由一个简直是极端典型的激进独裁政权所统治。阿根廷类似澳大利亚，虽然它的财富来自无限的农村资源，却有3/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移民总是愿意在城市里或城市附近寻找工作，因此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由于工业的发展，城市化便加快起来。人口的1/5居住在首都。在战时，由于对工业生产，特别是（像在1914年一样）对罐头牛肉的需要大大增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获得很高的工资并变得非常强大起来。战后，随着暂时需要的减少和试图恢复战前正常的贸易，罐头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工人就变得极难对付。由于1943年的军事政变和1945年混乱的选举，结果使庇隆将军执掌了政权。他的力量在于得到工人和军队的支持，而且由于他具有用首都工人们听得懂的语言——简单、富于感情而又激烈——向他们讲话的天赋。他讲话的主题是极端左倾的民族主义，答应领导工人反对资本家和外国人。他在1945年取得成功，或许是由于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先生企图网罗反对派来反对他而促成的。该政府对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不愿意妥协，这就妨碍了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英国的贸易谈判。国民的情绪坚持要求在1947年购买丝毫无利可图的英国铁路——在庇隆主义的报刊上称这些铁路为英国章鱼。肉类公司无法交付牛肉来偿付购买铁路的款项，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不怀好意或不守信用，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制造的麻烦和贸易中的普遍混乱。的确，尽管阿根廷的经济生活具有很大的潜力，但在1949年它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

像庇隆主义式的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起码在较大的国家中实属罕见。在墨西哥，革命已不再是那样狂暴而又具有紧迫感，立宪政治这时似乎已稳固地建立起来。在巴西，瓦加斯政府于1945年告终，杜特拉总统正确地把他的政府说成是一个致力于使政治体制“重新宪法化”的政府。智利和乌拉圭两国都已长期保持着传统的政治稳定局面。因此，在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地方，过去经常提出的那种论点，说拉丁美洲的经济困难起因于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不稳定，似乎

已完全失去它一度曾有过的说服力。在经济领域这一范畴之内，看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原料，特别是矿产品的需求暂时增加，而制成品的供应减少，这给生产代替进口物品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一进程受到高度保护，在和平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在巴西、墨西哥和秘鲁都开始建立重工业。在巴西，人们欢呼规模巨大的沃尔塔雷东达钢厂的建设是经济独立的宣言。然而，如果像某些拉丁美洲人所断言的那样，认为南美在1950年已开始进入类似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那样的发展时期，未免过于草率。整个地区面临着可怕的困难。许多新建的生产代替进口物品的工业，在和平时期是并不经济的。它们的产品在国外没有销路，而国内市场又太小，不能消化这些产品。农业在许多地方被忽视，技术落后，并停滞不前。它缺少推动力：因为与制成品相比，和平时期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是呆滞的。此外，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新国家，成为生产拉丁美洲长期以来赖以出口的农作物的竞争者。整个说来，拉美地区一直没有从20年代末期的萧条中真正恢复过来。1932年，拉丁美洲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额还不到1928年的一半；此后世界贸易得到恢复，而拉丁美洲的出口额，以实际价格计算，仍停滞不前。拉丁美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35年至1940年不断下降；由于对原料的需求增加而自1940年至1945年表现出回升；但自1945年至1950年再次下降。^[10]因此，拉丁美洲自1930年至1950年的经济史，除战争年代以外，是一段长期持续萧条的历史。然而，人口却大幅度增加，实际上，比世界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地区更为迅速。许多国家里失业成为普遍现象，并且随着大量人口从贫穷不堪的农村移居到大城市的贫民窟而变得更为显著。为了对付这种情况，需要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但是，没有巨额的外国投资和外国贷款，就根本不可能着手进行。但这些投资和贷款并没有到来。在拉丁美洲各国中能够获得相当数量外汇的国家只有：靠石油收入的委内瑞拉，靠旅游收入的墨西哥和靠运河收入的巴拿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拉丁美洲各国中只有这几个国家同时保持了一一并且仍保持着——较高的人均收入（按拉丁美洲的标准）和较低的物价年上升率。其他各国或者陷于经济停滞，或者推进想入非非的工业计划和野心勃勃的公共工程，其结果带来——如在巴西——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造成普遍的贫困。在世界上一切较贫穷的地区中，拉丁美洲在1950年是教育最发达，领导能力最老练，最明显地具备经济迅速发展的“成熟条件”的地区，然而在这个

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大概只有墨西哥在1950年表现出开始出现这种发展的明显迹象。拉丁美洲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无法忽视的一支政治和文化力量，以及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则是不容怀疑的了。

（郭健 译）

[1] 即1845年的美墨战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占有了得克萨斯州。——译者

[2] 指阿根廷、巴西、智利。——译者

[3] 见M. 温克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波士顿，1929年），第275—283页。《南美各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牛津，1937年），第182页。

[4] 见C. A. 汤姆逊《智利为民族复兴而斗争》，载《外交政策报告》第9卷（1934年），第288页。

[5] 考迪略（Caudillos），拉丁美洲国家的拥有军事实力的政治首领的称呼。——译者

[6] 1831—1889年在位的巴西皇帝。——译者

[7] 见P. E. 詹姆斯《拉丁美洲》（伦敦，卡塞尔，1943年），第602页。在N. L. 惠顿《墨西哥乡村》（芝加哥，1948年）一书中列有详表。

[8] 1945年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洲国家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通常称为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会议通过了《查普尔特佩克决议》。这里查普尔特佩克法即指这个决议。——译者

[9] 阿普拉党（APRA），是指一批流亡的秘鲁知识分子在1924年成立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缩写为APRA，简称阿普拉）。——译者

[10] 《战后时期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纽约，1964年）。

第二十章 1895—1939年的文学

1895年，哈代最后的、也许是他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以下简称《裘德》）问世了。这立即遭到大西洋两岸一大群书评家的辱骂，有一位主教甚至把它付之一炬。哈代后来追怀说：“他大概因为不能把我烧死而大失所望，才这样做的。”进步已经发展到竟然如此冒犯信仰的狂热。哈代也曾表露过，这件事对他只产生一个长远后果，就是“完全打消”他“再写长篇小说的兴致”。幸运的是，他的诗癖并没有戒除。在本章里，《裘德》仿佛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从显然可见的几个方面来看，这部小说是非常现代的作品。它对人类性生活的描写，比起英国过去任何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更加露骨，纵然未必更为写实。福楼拜、左拉、易卜生和欧洲其他一些作家所提倡的自然主义终于对英国传统产生了影响。如果不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学流风过重，这种影响本来早就应该产生的。但是，与英国绝大多数优秀的长篇小说一样，《裘德》根本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书主要以神话的力量感人。对于哈代，正如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许多先进作家一样，现代生活像是一出悲剧。裘德和淑一意追求浪漫主义的自我满足，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不错，有些苦恼来自社会的原因，但这些原因是可以消除的。虽然裘德个人的求学志愿遭到挫折，可是并没有注定人人同此命运的天理。尽管牛津的大门关得很紧，“野鸡”学院却纷纷成立。“福斯特教育法案”（1870年）已经扫除许多障碍，50年后的一位裘德就很少有机会碰到这一类困难了。此外，裘德的性生活问题在以后的时代也不至于那么无法解决。他可能感到自己不必再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其中一个完全代表生活的肉体方面，即庸俗、粗蠢、憨厚、泼辣、没法教育的艾拉白拉；另一个完全代表精神和智力方面，即文雅、善良、极度神经质和令人心醉神迷的淑。尽管这样说，哈代所写的悲剧的某些起因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也许包括裘德和淑之间的性的关系。裘德具有强烈的动物本能，使他进入艾拉白拉的趣味比较低级的世界——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淑则多愁善感，似乎注定要摧毁钟情于她

和她所钟情的人。尤其重要的是，裘德和淑的感受性已经达到难以在一个苦难世界中浪静风平的程度。哈代几乎是在暗示：裘德和淑已经步入人类进化的绝途，像他们那样的高度感受性使生存的意志衰退下来。而艾拉白拉则是一个不论甜酸苦辣都能生存下去的人，她虽苦也不改其乐，遇事常坚韧不拔。但是，感受性和智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看来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一个为虫子和兔子感到痛苦的人或许注定要灭亡。在我们这个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文明世界里，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想法。

在亨利·詹姆斯晚期一系列堪称杰作的长篇小说——《梅西所知道的》（1897年）、《波音敦的珍藏品》（1897年）、《未成熟的少年时代》（1899年）、《圣泉》（1901年）、《鸽翼》（1902年）、《专使》（1903年）、《金碗》（1905年）里，也都隐隐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通过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两种深刻的但是水火不相容的见解。头脑聪明和多愁善感的人不仅需要而且必须追求美好的命运——一种通过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美化而设想出来的命运。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而且也许特别是在培养得最为敏感的时候，都具有双重性，容易遭到背叛和消亡。詹姆斯晚期的长篇小说都是刻画入微的杰作，如此细腻以致部分读者感到厌倦。他们怀疑：这是否只是没完没了地卖弄一种技巧，用此硬给陈腐的故事增添风雅与情趣？然而，詹姆斯所取得的效果实际上与此相反。他表明，某些可能为漫不经心的旁观者轻而易举地斥为陈腐和卑污的人物，也许正经历着高度清醒而又几乎意志麻痹的紧张的戏剧冲突。如果仅取《鸽翼》的情节，把它看作两个反面人物阴谋夺取一个垂死友人的钱财的故事，那么这部作品似乎陈腐不堪。而事实上，这部作品中的主要反面人物凯特·克罗伊，甚至比她的“受害者”米丽·西尔更加令人注目地代表着“生活”；因为米丽尽管热爱生活，却只是高雅地死去，而凯特如果能得到米丽的金钱（她肯定是在设谋夺取），就可以富贵而舒适地生活下去。詹姆斯全神贯注的中心就是“生活”的本质。同时他也涉及了一个以金钱与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必然发生的各种纠纷和弊端。作品中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朴实的道德论断，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论断至今仍是正确的。凯特·克罗伊本人和她那位盛气凌人的阔姨母洛德太太役使、剥削别人，这正是詹姆斯所认为的根本罪恶。米丽所代表的是高雅大方，这种品格尊重个性，看来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这接近詹姆斯的理想。莫尔吞·丹什尔则属于那种漂

亮、善良、意志薄弱的年轻人，可以在恋情驱使下不自觉地被拉进一场卑劣的阴谋，然后却又为他图谋陷害的对象高尚宽厚的行为所感动，而无力执行这一阴谋；这就是詹姆斯常常反复描绘的现代人的形象。令人困惑的模糊之感使詹姆斯晚期小说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学经历之一。但是，《鸽翼》中如果单独有一个可以为本文特别一提的方面，那就是它使我们联想到《无名的裘德》的那种洞察力。凯特和洛德太太可以活下去，在她们自以为心安理得的粗鄙庸俗中挥霍无度地生活，而米丽和莫尔吞·丹什尔则不可能。小说结尾是凯特受伤而米丽死去，莫尔吞瘫痪；即使敏感和天良是最大的生存“潜力”（詹姆斯在《波音敦的珍藏品》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最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却是活得兴高采烈而良心则已丧失的人。如果我们贸然说得更简单化一点，现代世界就是以更大的痛苦来报答更为清醒的意识。

詹姆斯晚期的长篇小说因为文体凝重而受到E. M. 福斯特的攻击。但是，这些小说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却似乎被福斯特带进了自己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年）发表之后，紧接着就是《最长的旅行》（1907年）、《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1908年）、《霍华德别业》（1910年），多年后又出版了最伟大的压卷之作《印度之行》（1924年）。福斯特的长篇小说并不是没有那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但是，他的特点是：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达这些矛盾心理，这种象征主义也许不像詹姆斯的象征主义那样善于引起回响共鸣，却比他的更加清晰明快。福斯特是一位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直珍视自己的道德价值，同时又反过来探究在需要抉择与行动的情况下这种道德价值的局限性，他在探究中如此冷嘲热讽，以致人们怀疑他的道德准则在现代世界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即使是民主，在反对暴政的战斗中也只受到两声欢呼；是的，福斯特说，这只算是坏事中的好事，但绝不是什么光辉的理想。而作者笔下的自由主义的男女主角，开始以博爱精神去“联系”他们的同胞，在艺术与友谊方面跨越阶级、肤色与信仰的卑劣的人为的障碍——由于他们的理想和善心，这一切都得到赞许，但是却由于他们的基本判断力常出差错而注定要遭到失败。

《霍华德别业》说的是德国姓施莱格尔的两姐妹玛格丽特和海伦的故事。她们体现了热烈的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一心希望匡正时

弊。她们遇到了广有钱财、崇尚物质的威尔科克斯一家，虽然海伦起初有点晕头转向，但是她们两姐妹都对这个家族傲然轻蔑；然而，对于这个由阶级区别构成并且具有企业效率的威尔科克斯世界，这个“电报与发怒”的世界，外表上奢侈、粗俗而透过表皮就是惶恐与空虚的世界，却不能简单地嘲之为反文化或“反生活”。两姐妹本人都很富有，而且在小说描写的过程中，她们开始理解她们那笔财富的含义。里昂纳德·巴斯特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他力图摆脱贫困和庸俗的婚姻，而且正是由于贫困和这种婚姻，他拼命追求“文化”而不可得”；两姐妹见到巴斯特的情况方才懂得：她们自己之所以能献身艺术，能保有各种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特权阶级的悠闲安逸。她们个人的自由是由投资保障的，支付并维持这些投资的则是世界上的那些威尔科克斯家族，而不是那些施莱格尔家族。小说甚至还提出这样一种暗示：具有自由思想和艺术气质的施莱格尔姐妹，虽然本能地嘲笑物质财富，而她们却也许正是拥有这些物质财富的人身上的寄生虫。在这部小说中，两姐妹选择的道路大相径庭，这象征着她们个人对这一新认识的反应。玛格丽特同威尔科克斯先生结了婚，想走一条中间道路；她也许能够“缓和”他的生活方式（人们不禁提出疑问：究竟能否缓和它而又并不破坏它？），而同时又中途妥协，承认它在现代世界中是切实可行的方式。然而，她的婚后生活时好时坏，平平而过；虽然双方互有让步，而且存在真正的友谊，但是，像这样的关系是不足以应付海伦后来终于造成的那种精神危机的。因为海伦拒绝任何妥协，完全否定威尔科克斯家族，而且专心致志，要使巴斯特在文化上真正提高到她的水平。在小说中，福斯特以源源不断的喜剧性的创造力展现了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的种种实际障碍。最后，也许是由于怜悯和无可奈何，虽然书中对这点没有完全说明，海伦自己献身于巴斯特。使她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欲望终于得到满足的唯一的“联系”是两性的肉体联系。有些评论家把这看作象征主义战胜了心理上的必然性，但是，人们可以理解，像海伦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理想主义和对虚情假意怀有强烈反感的女子，是可能让自己的真诚去接受这种至高无上的考验的。然而，海伦委身巴斯特，而且怀孕，结果却产生了一个社会灾难。她姐姐的婚姻在灾难的考验中几乎达到破裂，而巴斯特则在一次真正荒谬绝伦的不幸事件中丧命。小说的结局模糊含混，尽管比詹姆斯作品的结局明确一些，但是也不是图表式地黑白分明。虽然施莱格尔一家人陷入泥潭，种种事件迫使她们的理

想转化成玛格丽特的妥协和海伦的灾难，然而下一代仍有可能由她们所做的一切得到益处。巴斯特和海伦的孩子将成为霍华德别墅的继承人。这所别墅一度曾是温文尔雅、离群索居的第一个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家，而这位太太代表着古老英格兰许多优雅和直觉的传统。

于是福斯特期望通过民主进步来清除阶级意识，他也许还企望福利国家（如果人们可以事后聪明的话）。在他后来一部长篇小说《印度之行》中，他再次描写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意图，想越过社会的压力和界限，把印度人和英裔印度人“联系”起来；这种意图在第一代人中间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将来还有一些成功的希望。由于福斯特主要采用喜剧手法而不采用悲剧手法，所以人们还可以在阴暗的背后感觉到某种乐观主义。也许，由于1945年以后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实行了福利措施和印度立法，这种乐观显得还有一部分道理。然而，正如人们在读哈代和詹姆斯的作品时所常常感到的那样，在福斯特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到他确信有些损伤绝不是时间所能弥补的。他同20世纪初期大多数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看到了日益加速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一定会摧毁旧秩序中许多优美和宁静的东西，且不论它们是否也会纠正旧日的罪恶。他再也不能怀有那种十足的安诺德式^[1]的希望，想通过玛格丽特和威尔科克斯联姻，把中产阶级从市侩提高为有文化教养的人；他更不可能设想用合理的工资和教育就能把安诺德所说的那些“粗鄙而愚昧的人民大众”改造得温柔而又文明。在福斯特的作品里，人们已经能够觉察到随后为布卢姆斯伯里派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在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讽刺中表示对自己改变事物的力量不那么充满信心，更多地感到自己对历史的控制岌岌可危；暗示旧的人道主义已经不再代表历史的主流，而已变成一潭死水，成了日渐凋零的旧时名流的隐蔽所。

爱德华时代的长篇小说，即使仅有詹姆斯和福斯特两人的作品引为自豪，也堪称出类拔萃的了。但是，在从维多利亚鼎盛时代逐渐向辉煌灿烂的后期过渡的时候，这一体裁另外还出了两个重要的作家。吉卜林此时仍在写作他某些最优秀的作品：《丛林故事续篇》（1895年）、《斯托凯公司》（1899年）、《吉姆》（1901年）、《正是如此的故事》（1902年）、《他们》（1905年）、《普克山的帕克》（1906年）、《丛林少年》（1907年）、《作用与反作用》（1909年）。吉卜林的声誉在生前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不久以

前，然而现在他又被评定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曾经把他仅仅当作帝国扩张赤裸裸的宣传家，由于这一点，他在公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人们指出了他的作品虐待狂的因素，但是认为它只起消极作用；人们不认为他具备洞察残忍与暴力的能力，而这种观察力是弗洛伊德以后即使最粗浅的作家也可以具备的。不过，即使在反吉卜林的最高潮时期，主要的评论家如托马斯·艾略特、乔治·奥维尔、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克莱夫·刘易斯，都为吉卜林而心醉神驰；他们都承认他的想象力，他的作品神奇的紧凑，尽管他们对他的思想一直不屑一顾。直到最近才有一些评论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推诺埃尔·安楠——这样指出：吉卜林的智力远比他的那些评论家所设想的为高。^[2]哈代、詹姆斯·福斯特全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讨过浪漫主义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吉卜林则根本否定这一传统。他认为这种人道主义不过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传统习俗的束缚，人的本性并不生来就是善良的和仁慈的。如果没有法律，人的状况就像霍布斯^[3]所说的那样：肮脏、贫穷、孤独、残暴、浅薄。公立学校宿舍里的学生、在印度的士兵、街头的普通人，都有他们的礼仪，但是，礼仪永远是同必须加以约束的本能互相冲突的。吉卜林谈到“没有法律的次等族类”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讥笑，而是在叙述他所明白的真理。法律是维持文明生活的条件，超出了这个条件，谁也不可能希望在自由中生活。但是，法律无疑也是纪律的来源，尤其是在有严格的考验人的生活方式做后盾的时候，例如在公立学校或军队中，法律的性质更是如此。首先，法律具有动人的魅力。在法律化为一个阶层或一个团体、一个“内部的”社团或一群众所瞩目和忌妒的杰出人物的信念时，它就会提供刺激和人们赖以生活的自尊心。看来吉卜林也认为人必须行使他们的权威，扩展他们的疆界，否则就会开始——在开头是不知不觉地——沉沦。在个人生活中，同在帝国中一样，是没有停顿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吉卜林对普通人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一些以对性的现实主义态度自诩的评论家对他视同陌路。吉卜林所赞赏的残忍、粗俗、大胆和含而不露的礼仪的混合物，对于那些认为米丽·西尔必然优于凯特·克罗依的人，的确是无法接受的。吉卜林的真正立场，虽然确实在政治上是右翼，却完全与法西斯主义无关；诺埃尔·安楠曾指出，他是受了德克海姆、韦伯、帕雷托等人直接的思想

影响，这些欧洲社会学家“在本世纪初根本改变了对社会的研究”。这样一些指导思想可以有助于证实我们的感觉：吉卜林长篇小说的想象力，并不源自浮躁的爱国主义和无法觉察的虐待狂，而是源自更加有条有理的东西。回过头来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曾经令人奇怪地过低估计吉卜林的长篇小说，这正如当时极度疯狂地过高估计戴维·劳伦斯的作品一样，似乎鲜明地说明了帝国后退的历史。倘若吉卜林的声望在最近的将来重新得以恢复，那么这很可能不仅是因为英帝国既然一去不返，就需要它自己的运用想象力的历史学家；而且也因为帝国的价值同经济生存的价值并不迥然不同；吉卜林说过，要么发展，要么死亡。

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是康拉德，继承英国小说传统的一个独往独来的人物。他是一个波兰人，用异国语言写作，过着流亡生活，然而却成了英语艺术的名家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发表于1895年，在这以后30年间问世的作品有：《逐出海岛的人》（1896年）、《“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7年）、《吉姆老爷》（1900年）、《台风》（1903年）、《诺斯特罗莫》（1904年）、《特务》（1907年）、《在西方的眼睛下》（1911年）、《机遇》（1913年）、《胜利》（1915年）、《阴影线》（1917年）、《拯救》（1920年）、《悬而不决》（1925年）。康拉德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他很少写当时在英国小说中极其流行的家庭的场景和中产阶级的人物。对两性关系以及即使是正常的家庭关系，他都没有什么兴趣。他所主要关注的，看来是一些个人受到环境考验，并且为了求得生存而孤军奋战的断面。他小说中的那些主角的男子气概一再经受考验，或者是在海上的狂风暴雨之中，或者是在人生的狂风暴雨之中。这种挑战是要在一个漫无目的、然而却为人类传统的责任感与勇气提供了某些完美理想的宇宙中，发展勇气与毅力，尤其是发展自信力。英勇的品德既是取得胜利的手段，又是它们本身最佳的酬报。康拉德看待某些人类的风习，很像天主教徒看待教会。一个海船的船长必须经受考验，来证实他是否能担任一个需要高度勇气的角色；正如一个教士，他在他也属于其内的已确立的继承次序中，为他一生的成败而奋斗。康拉德在这种考验人的框框之外，很少有时间再去描写个人追求的业绩；他不屑于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中去寻求感情上的满足。有时他的某些批评家似乎认为他冷静到了严峻的地步；有人甚至认为：他对自己的角色的冷酷可能就是他的艺术的动

力。但是，这样一种观点不是公开回避又是什么呢？——而康拉德是觉察到这种回避是出于多愁善感的第一个人。

例如，在那本《特务》中，他描写了怀抱理想的人，甚至具有非凡品德的人，以及坏人和疯人，有各种不同的通往政治混乱的道路。他在维尔洛克太太身上，写出了一个似乎在大声疾呼要求得到理解并且同时得到宽恕的女人通向谋杀的道路。但是，康拉德本人能够理解而并不宽恕；人们怎么能找到一个轻易的方案，既能够宽恕，而又不推卸对既成事实的责任呢？固然，他用了那种激起我们恐惧的、富于想象的领悟力，描写那些善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维尔洛克太太，从而使我们无法沉溺于直截了当的谴责。但是，他又把注意力非常清楚地集中于他们的行为事实上面，同样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躺在安乐椅上予以容忍。对问题的认识就是：他们都是生活中的牺牲品，他们只能无可逃避地忍受；而且这些牺牲品既危害他们自己，同样也危害至关重要的社会秩序。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部小说中所作的分析的特点确是严酷得令人心神不安；但是，要把它称为“不人道”，则等于否定这位小说家丰富的艺术洞察力。令人庆幸的是，康拉德除了严峻之外，还可提供令人惊叹的丰富多彩的色调，在一个悲剧世界中可能实现的种种伟大成就和冒险事业，真是千姿百态。

对爱德华时代的长篇小说做过这些必然是简短的评论之后，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一个重大的共同主题。所有这四位约略论及的小说家以及哈代，都鲜明地指出了我们在现代世界需要培植忍耐力。正如哈代在《还乡》中所暗示的，人们越来越看到，他们的苦难不是反映在远古世界人类童年时代的敏捷和好奇之中，也不是反映在中世纪青年时代欢乐的梦想和礼仪之中，而是反映在爱敦荒原阴暗、朦胧的微光之中。成熟带来真理，但是真理又带来幻灭。孔德实证论的时代并未发现什么精神上的安慰来弥补这种损失。年轻的叶芝已经在他早期的诗作中歌唱这种主题了：

阿卡狄森林已经死亡，
他们昔日的欢乐化为乌有；
古老的世界，依靠梦幻哺育，
现在苍老的真理是它那彩色的玩偶……

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都被这种见解压抑着，他们察觉到在这得不到希望滋润的世界上，无可旁贷的责任还永远是不容推卸的。在一个悲剧的世界里，人的理想必须合乎人性；而在人类世界中，背叛理想似乎是真正的悲剧的结局。难怪小说中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在命运使他们周围逐渐变得一团漆黑、世界越来越衰老的时候，除了他们自身的正直完美和经过考验的忍耐力量之外，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

如今人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些作家距阳光普照、欢欣若狂、晴空万里、板球服与冬青丛的情调，犹如天悬地隔。然而，人们却一度认为，爱德华时期那些天真烂漫的人就是在这种情调中优游岁月的。自由主义者以伤心断肠的冷嘲热讽来探索自己的弱点，而那些非自由主义者则蛮横粗野地把他们的文明推向溃灭。多数次要的作家（赫·乔·威尔斯是其中显著的，但绝不是唯一的）都看到，文明世界的上空正在聚集着变革与暴力这场风暴的乌云。在战争年代以及在随后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势将统治欧洲文学的那些因素已经开始形成。这些因素就是：在艾略特、休姆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对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有所保留或直截了当地否定，作家感到敏感的欧洲人可能毕竟只是一小批特殊人物，他们已为历史所遗弃，并不是大地的当然继承人；还有一种恐惧心理，讽刺性地扭转了若干世纪以来的乐观主义，唯恐人类正在丧失对他们自己的发明的控制，可能像弗兰肯斯坦^[4]一样，注定要为他本人自作聪明地制造出来的怪物所摧毁；而最重要的则是文明终将毁灭的神话——《荒原》，艾略特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而且也创造了这样一部文学杰作。在所有这些趋向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政治动乱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样一种观点：种种绵延不断的危机，如英国与德国关系的恶化，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斗争，地方自治的危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工业中经理方面与工会方面的日益疏远，越来越多的关于国际颠覆活动与阴谋的谣传，以及科学新发明和变革越来越令人不安的后果——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思考和写作的方式。

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文学的伟大之作是长篇小说，由此开端看来是正确的。诗人仍然还不足以和欧洲大陆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相提并论，虽然已经可以看到波德莱尔、马拉美和拉弗格有益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有才华的英国诗人，但是，天才

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哈代。他的无与伦比的多才多艺，使他从上一个世纪的伟大小说家转变成下一个世纪的伟大诗人。哈代在那以前也写过诗，其中还有一些佳作，但是，他那些真正令人难忘的诗，则是在他的妻子爱玛1912年去世后不久写作的。爱玛去世，他就从婚姻不幸的压抑中解脱出来，沉入对初恋的最强烈的缅怀。他的一些诗，像《旅途之后》和下面所引的这首诗，表达了悼亡之情，纯洁动人，达到了诗歌所能表达的极致。

石上的影子

我缓步在祖依德石^[5]旁，
这白石蹲在园中孤独凄凉。
我停下注视浮动的树影，
看它们不时洒落在石上。
近旁的树木轻轻摇晃，
也在我心中勾出了一幅倩影，
那正像她种花植草的时候
映在石上的我所熟悉的头影和肩膀。

我想象我背后就有她的身影，
可我又早知道她已离我远行。
我自言自语：“我相信你就站在我后面，
可是你怎么又能走上这条熟径？”
这儿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
只有一片落叶像一声悲戚的答应；
为了抑制我的悲哀，我不愿回头
去发觉我所想的只是一片空虚凄清。

然而，我还是想回头望望
看是不是没有人跟在我的身旁；
但是我又想：“不，我不愿打破
这个也许真会存在的形象。”

于是我轻轻地走出树丛，
让她在背后映出她的倩影，
因为她确实是一个魂灵——
我没有回头，以免我的梦境化为泡影。

在这个时期，英国艺术中唯一可以与之比美的成就，就是埃尔加的作品。哈代悼念亡妻诗中的意境，同埃尔加那些伟大的清唱剧、交响乐和大提琴协奏曲之间，存在着某些深刻的类似之处，这样一种印象或许值得一提。

大战爆发，正是文学发生酝酿变化的时刻，这时某些新的重要诗人已经崭露头角。正当鲁珀特·布鲁克歌颂爱国主义与光荣那些旧日罗曼蒂克思想的时候，20世纪即将问世的战争诗则正在形成之中。威尔弗雷德·欧文的《无益》一诗犹如阵亡战士墓前的碑铭，是对一个牺牲了的无名青年的纪念：

把他抬到阳光下一——
在故乡，太阳曾经用轻轻的抚摸唤醒过他，
那尚未播种的田野说着悄悄话。
直到今天早晨的这场雪，
就是在法国，它也常常唤醒他。
如果现在还有什么能够把他唤醒，
仁慈的太阳老人一定知情。

想想吧，太阳是怎样唤醒种子——
他曾经唤醒过寒冷星球上的那些泥土^[6]，
这好不容易长成的四肢，布满神经的腰身，
仍然是温暖的，怎么就这样难以掀动？
难道泥土就是为了这才长高？
——啊，是什么让这昏愤的阳光
为打破土地的长眠竟然还要操劳？

“我的主题是战争和对战争的怜悯，”欧文写道，“诗就是怜悯。”在《无益》和其他一些次要的杰作中，他探讨新的语言技巧和

韵律来体现他的怜悯：采用母音和子音的谐音代替全部正规的押韵来改变悦耳的感觉，呈现死亡与暴力赤裸裸的形象，使人们无法从中寻求美学方面的安慰。到了60年代中期，欧文的诗得到广泛流传，这是由于人们恢复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特别是由于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哀诗》。大学生对欧文的诗比对奥登或格雷夫斯的诗更为熟悉。看来很清楚，欧文的声音在原子时代越来越铿锵有力。欧文记载了1916年或1917年的时代，而当时正是文学起源以来诗人就战争所写的几乎所有诗篇都变得与人类前途毫不相关的时代。

在欧洲，最引人瞩目的战争诗人是纪尧姆·阿波里耐（1880—1918年），他的《美好的文字》（1918年）包括了他最伟大的一些作品。他在1918年11月死于西班牙流感，离威尔弗雷德·欧文去世还不到一个星期。大战时期另一个最重要的英国诗人是爱德华·托马斯。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极为亲切和具有强大魅力的作家，他有时能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单纯而富有田园风味的诗篇，描绘出正在消逝的世界异常生动逼真的形象。在《阿德勒斯绰普》中，他捕捉到人们曾经十分熟悉的乘坐火车时的经历的本质。突然之间，在那个不期而遇的情绪高涨时刻，我们听见了古老英格兰最后那种令人沉醉的声音，在工业和战争咄咄逼人的音响中，我们听见了这种声音还在那儿，但是，它还能存在多久呢？

是的，我记得阿德勒斯绰普这个站名，
因为在那个6月的下旬，
正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
快车异乎寻常地在那儿停留。

蒸汽哧哧作响，有人在清嗓。
在那个光秃秃的月台上
没有人走，也没有人来，
我只看见阿德勒斯绰普那个站牌。

柳树，曼陀铃，草儿青青，
还有绣线菊和那一堆堆干草，

它们和高空的朵朵浮云
同样安静，同样孤寂清新。

一只乌鸦在车站的近旁
为那个时刻放声歌唱，
牛津郡和格罗斯特郡所有的小鸟
都在他的周围，雾浓浓，路遥遥。

但是，诗在这时已经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在大战以前几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大重要的反叛。在1912年和1922年之间由爱德华·马什爵士编辑诗集、现在人们通常称为“乔治时期诗人”的一派人，就否定过世纪末诗体那种沉闷和说教，但仍然保留了近似维多利亚晚期传统的其他一些方面。他们继续珍视抒情、音乐、“诗情画意”的主题和想象，认为诗人的主要任务是用美的创造来安慰人类，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爱德华·马什爵士团结了当时最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瓦尔特·德·拉·马雷、爱德华·托马斯、威廉·戴维斯和戴维·劳伦斯，而且他的鉴赏力绝不是像后来非难他的那些批评家所设想的那样狭隘。他证明在普通的知识分子读者中间这种诗歌拥有相当广大的市场；他编的诗集畅销，直到最近，诗歌才又有了那样广的销路。

然而，乔治时期诗人的风味，虽然具有天主教色彩，而且是在一定范围中流行，对于另外一派年轻诗人却是一种刺激。1913年，意象派发表宣言宣告成立，并且为诗歌宣布了全新的宗旨。他们的那些宗旨中有这样一条：诗必须出而探索整个现实，囊括整个现实。在一个充满了大城市、汽车、飞机的世界，诗人绝不能再抒写赏心悦目的风光中的田园情调。意象派的思想基础是，诗人必须追求真实，甚至把美放在次要的地位。如果他把美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逃避现实的人。诗人只有用现代人所经历的全部体验来从事创作，才能使自己的语言生动有力，创造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诗篇。意象派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措词、韵律和意象的种种陈规旧约已经寿终正寝了；披荆斩棘的情感要求在形式上进行实验。因此，1913年的宣言要求得到风格和内容的自由，要求通过这种自由来承认：诗意的感受在于诗人创造的实际形象之中。正如托马斯·艾略特后来在他评《哈姆雷特》的文章中所说的，诗人要为他自己的感受寻

求“客观的关联词组”，“换句话说，就是用以表达那种特定感情的一组对象、一种情景、一串事件；因而，外界事物（它们必须以感官的体验为限）一旦出现，就立即激起感情”。

这种“意象”的概念十分广泛，足以包括整个诗歌，甚至还可以包括整个戏剧和整个小说。着重点在于词汇的精确，在于“具体”；但是，这种精确具体能完整无缺地抓住一种感受，让这种感受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毫无限制，引起共鸣。因此，意象派诗人往往不顾语法与句法、逻辑关系，以及语言和风格的约定俗成的含义等通常的文学程式，而宁可把诗看成是通过“意象程序”而起作用的。诗人着重独创和精确，一首诗的唯一考验就是是否有人鉴赏。意象的生命力存在于各种意象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之中，而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将在读者有意识的甚至无意识的心灵中激起反响。迈克尔·罗伯茨在他编的《费伯现代诗歌丛书》那篇著名的序言中说过：

《荒原》具有“意象程序”，我用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它对某些心灵说来，甚至在还没有掌握它的叙述和议论的连贯性以前，就已经对它信服。这种“意象程序”不是什么武断的、独特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用以表示复杂情景的种种意象，一旦由抽象的观念取而代之，那么诗的许多表面上的支离破碎现象就会消失。它就会变成一篇描述世界情况的散文，一个神话的转述，一篇生活悲剧观的辩护词。但是，作为一首诗，它的作用就更多一些：一首诗表达的不仅是对某一社会事实或科学事实的观念，而且还有对思想或认识的实感；它不仅阐明这种悲剧观，还要传送这种悲剧观。

人们在这样一段概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波德莱尔、拉法格和兰波的影响；意象派和象征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于借鉴；“意象”之所以变得有价值，和法国的“象征”一样，在于它能唤起共鸣，在于它有力量表现出有意识的感觉与思维的表层下面的种种联想、暗示和原型。

在前面提到艾略特是有必要的，他在现代诗歌这一伟大阶段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有趣的是，唯有他和庞德是与意象派运动有联系的著名诗人，而且他们两人同在他们以前的詹姆斯一样，同样都既是美国人，又是欧洲人，两种成分几乎各占一半。意象派作为一个独特的运动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几乎全部仰仗这两个人的作品——特别是仰仗庞德的《长诗》（1911年）及其随后的续集，以及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年）。但是，意象派的根本重要性在于

它是“现代派”的一种表现；意象派的宣言毫无疑问得力于以下这两件事情：人们感觉到叶芝的主要诗篇虽然是完全独立的，却越来越属于意象派；另一件是霍普金斯的遗作身后在1918年出版。霍普金斯之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派是生拉硬凑的，一些学者发现他的生卒年（1844—1889年）时，不禁大为惊异。

但是，与此同时，意象派的贴切中肯却由于两位重要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而得到证实。他们在小说方面的实验使他们确定了同艾略特和庞德相近的各项“意象程序”原则。散文与诗的界限淡薄了，此时有创造性的作家开始认为两者都是通过语词的精确来表达想象中的真实。然而，人们一谈到小说，马上就注意到近在咫尺的欧洲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正如英国的现代诗人同马拉美、瓦勒里和里尔克有血缘关系一样，现代小说家也发现他们同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特里斯坦》，1903年；《在威尼斯之死》，1913年）和纪德（《蔑视道德的人》，1902年；《窄门》，1909年）是近亲。从这整个酝酿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派”一词，现在我们就来对它更详细地研究一下。

这些作家所使用的“现代派”一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争论如此激烈，而且又如此难以捉摸，所以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做出承前启后的考察，人们就无比感激了。第一本是理查德·埃尔曼和小查尔斯·菲德尔森合编的资料汇编《现代的传统》（1965年纽约版），其中收集了一些“现代派”作家自己的论述。第二本是斯蒂芬·斯彭德所著的《现代派的斗争》（1963年），顾名思义，这本书不仅给现代派下了定义，而且也是在为现代派论战辩护。根据斯彭德的意见，“现代派”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次才是一项文学纲领。现代人所处的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的体验就要求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现代人作为社会存在，生活在与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一切迥然不同的一个工业世界里，生活方式（包括其中的一切含义在内）既不相同，而且还生活在日益忧虑世界毁灭的恐惧之中。同一切传统的源泉切断了关系，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人没有确定的阶级或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众所公认和实行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主张。然而，作家的困难固然在增加，他的机会同样也在增加。或许唯有作家才能提出真知灼见，甚至拯世救人，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社会作用看来已经缩小。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

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阿特拉斯^[7]式的人物，独自肩负起世界的良知、世界苦难的全部重担。但是，根据同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他的境遇也可能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敏感的人怎么能肩负这样的重担而保持自己的姿态不变呢？难怪“现代派”常以悲观的态度描述自己，惋惜以往失去的财富和宁静。许多现代派作家，包括艾略特和劳伦斯在内，都追怀历史上比较欢愉的时代。对于艾略特来说，在德莱敦和密尔顿以前曾有一个思想和感情“水乳交融”的时期，两者之间不像以后那样分歧离异。对于劳伦斯来说，则有工业化以前英格兰的那种原始纯朴的意境，那时的人生活比较接近自然，是自然的、本来的自我。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祖业失传的故事，是一种更加古老得多的传统；维护这种说法的先辈中，就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许多名重一时的人士。自然，这些维护者中，找不到任何两个人对发生作用的一切罪恶力量意见一致，因此对于失去天恩这件事的看法是人言人殊。自然会有不少不光彩的历史（历史学家可以明鉴），而文学传统却需要许多的黄金时代，超过了过去历史所能包括的限度。于是，这种传统就已届高龄，无法称为独树一帜的“现代派”了。但是，现代派作家还是相当广泛地接受了这种传统，同时还经常加上自己的精心发挥。饶有趣味的是现代派对于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态度，他们非但没有被当作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而受到阿谀逢迎，反而一再串演了反派的角色。在休姆和托马斯·艾略特的作品中，他们差不多同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一道，成为应对我们工业化以后时期的堕落承担责任的替罪羊。因为，如果破坏人的宁静的主要敌人出在自己城堡之内；如果“心灵感情的圣洁”变成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那种沸腾的冲动，情况又将如何？如果脱离了任何形式的约束或纪律，难道“自然”本身不会直截了当地走向荒原？强烈激情、乐观人道主义、“真诚”等浪漫主义的价值的确要受到彰明较著的抨击，而来自艾略特本人的抨击绝不是最轻的。

在许许多多现代派作家那里，也都可以看到这种疑虑，虽然戴维·劳伦斯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伊夫林·沃的讽刺，提出了类似的教诲；卡夫卡的世界体现了抱着无法解答的自身之谜生活下去的噩梦。但是，仅仅提一下所有这些作家，就可以使我们警觉到一种非常根本的危险：“现代派”作家各自的特点显著，癖性迥异，如果一定要对他们进行概括，肯定要归于失败。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谈谈两本主要的现代派杰作，它们都是在1922年那个文学上不平凡的一年出版的。人们常常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称作那个时代的散文史诗，把艾略特的《荒原》称为韵文史诗，或者嘲讽史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所以是现代派的，既在于它的语言生动有力和独具一格，也在于它极富实验性的形式。作品极其深刻地探索了一个当代都柏林人布卢姆一天的生活。作品中并不存在通常所说的那种情节，仅仅累积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一些，如果不是以那么大的想象力去进行探索，就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了。对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态度达到极其忠实的程度，竟至于使人感到陌生，无法辨认；关于色西的那一段插曲中，在描绘城市的贫困污秽方面别开生面；但是，作者这样做时使用叙述荒诞不经故事的凝重笔触来描绘都柏林（在这方面，狄更斯或许比左拉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同时，乔伊斯还采用了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敏感探索的技巧——“意识流”手法；这种手法非常紧密细致地追踪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使我们也能通过他的意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他的半意识，甚至潜意识）体验那些事件。这种技巧在突出追寻内心世界现实方面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但是，由于这种现实都是内心世界的，所以这种手法的确又可十分鲜明地背离社会的“现实主义”。它可以同外界情况形成讽刺性的对比，有时是喜剧式的，有时是悲剧式的；它也可以突出个人在他自己的意识中的完全孤立，在这种意识中，过度的敏锐往往以幻境、衰竭或者死亡作为代价。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更加花样翻新，她的许多人物都具有一种反常的意识，这种意识常常同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对这些人物来说，它似乎是要加强自我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孤立。

在所有意识流作家中，普鲁斯特是最伟大的。他那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8年），穷尽无遗地探索了把意识流手法同象征主义结合起来的种种可能性，以致有区别地探讨文学又行不通了。但是，谈到普鲁斯特使人又回到《尤利西斯》特有的种种优点；虽然乔伊斯仅就心理分析的见解和唤起的深度而论，绝不能与普鲁斯特比肩并立，但是有种种论证可以说明《尤利西斯》更加接近正常人类生活的中心。关于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的主要事实，就是他们神志正常。我们深入认识他们，能够起调谐和深化我们的社会观念的作用。如果说《尤利西斯》有弱点，那就在于它那荷马式的上层结构；把现代生活中的一天同《尤利西斯》的神话相对照，这种概念

虽然无疑是富于暗示性的，但会造成难以确定的效果。有些类比过于矫揉造作，令人难以认真看待；而采用嘲弄地模仿英雄风格来贬低人物，不管是出于有心或无意，这种引喻都可能使人如堕五里雾中，而不能得到助益。但是，引喻过多大概是大部分现代派文学的一条缺点。它给读者故意设置重重障碍，几乎是存心令人无法读懂；即使《荒原》也有这种瑕疵，而庞德的《长诗》尽管有那样一些美妙动人的章节，却因此而整个地遭到了破坏。

《荒原》这部偶尔照顾音步和韵律的自由诗，是那个不平凡的一年中的另一部杰作。诗中有许多地方引喻早期的文学作品，而且同《尤利西斯》一样，效果主要是讽刺性的，虽然究竟是借古抑今还是借今抑古，常常不能一目了然。艾略特的神经过敏的现代美女（她坐的椅子，像一个擦得发亮的宝座，在大理石上闪闪发光等），究竟是由克利奥帕特拉蜕化演变而来，抑或她本身可能就是克利奥帕特拉身后的现实？艾略特把这个问题强加给我们，而没有给予解决；如果答案是“两者皆然”，那么这首诗就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要稀奇古怪了。这首诗实质上是记述现代的伦敦，但是，这是同现在和早期的其他通都大邑血肉相连，并且也同但丁的地狱紧密相关的伦敦。下面引用的几行诗是表现艾略特多层次含义的一个有益的缩影：

一座并非现实的城市，
笼罩在冬日黎明的褐色烟雾里，
人们拥上伦敦桥，那么多，
我以前未曾想过，死亡毁掉了那么多。
人们偶尔发出了短暂的叹息，
每个人都把双眼盯在自己双脚前面。
拥上桥头又拥下威廉国王大街街头，
而在那里，圣玛丽·伍尔诺思钟楼遵照时辰，
敲着九点钟最后那一记沉闷的响声。

这样地引出交通拥挤时刻的伦敦是非常美的，即使其暗示的意义是在精神的浓雾中迷失方向。人群在桥上流过，而河水在桥下流过；诗句把人群同但丁《神曲》中《炼狱篇》飘忽的鬼魂相提并论，他们既没有善举足以得到拯救，又没有恶行足以遭受地狱中那种真正狂暴的虐待与苦难。但是，最吸引人的则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共鸣。毫无疑

问，圣玛丽·伍尔诺思的时钟，正像艾略特告诉我们的那样，确实在敲响九点钟的响声，但是，它的效果则更接近于哈隆（但丁同一长诗中的人物）等待着把亡灵摆渡到地狱中去。

艾略特这首诗的主要情节是描写死亡与转生的两次轮回，月份和季节周而复始，以及异教和基督教关于垂死的神祇的经久不衰的神话。诗中叙述的尘世，毫无得救的希望；4月是最残酷无情的月份，它从忘却一切的冬季苏醒过来，踏入生活的苦难。我们的现代世界是一片不毛之地，陈腐不堪，呓语汹汹，形象凌乱；是一个映照出孤寂、枯燥、性生活卑鄙下流并且使人感到绝望的世界。

在天空出现紫霞的时刻，人们的眼睛和背脊
从办公桌上抬起，这时人像一部机器等待着
像是一辆出租汽车一边震颤一边等待，
我，提瑞西阿斯^[8]，虽然瞎了眼睛，在两种生活之间震颤，
我这个长着老妇干瘪乳房的老翁，可以看见
紫霞升起的时刻，黄昏时分，人们急忙回家，
而且让水手从海上返回自己的家园^[9]，
打字员在喝午后茶的时刻回家，收拾早餐的杯盘，
点燃炉子，摆出罐头食品。
在窗外，危险地飘扬着
她那快干的内衣，上面洒着落日的余晖，
长沙发（晚上就是她的卧榻）上堆着
长袜、拖鞋、衬衣和腹带。
我，提瑞西阿斯，长着干瘪乳房的老翁，
看到了这个景象，还预见到其余情况——
我也在等待这位为人期待的客人。
他，这个脸色红润的年轻人，来了，
这个房产经纪人的小伙计，圆睁着眼睛，
这地位卑微的一员，自大的神气在他的身上，
就像一顶大礼帽戴在布拉德福一个百万富翁的头上。
正如他所猜想，此刻时机非常有利，

晚饭吃完了，她感到心烦、疲倦。
尽自己的力量去对她加以爱抚，
即使她并不喜欢，可是也没有责难。

红着脸，下决心，他立即进攻；
探索的双手没有遭到抗拒；
他很自负，不需要得到任何响应，
而且也可以把冷漠当作欢迎，
（我，提瑞西阿斯，已经预感到
在这同一个长沙发或者卧榻上演出的一切；
我曾经静坐在底比斯的城墙下，
并且行走在最卑微的死者当中。）
他赠给了最后恩宠的一吻，
摸索着，走到了没有灯光的楼梯……
她转过身来对着镜子照了一会儿，
几乎没有留意她那离去的情人；
她头脑中闪过一个影影绰绰的念头：
“好了，现在完事了；我真高兴已经完了。”
一个美丽的女人自甘堕落，干些蠢事^[10]，
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孤苦伶仃，这时候，
她不由自主地用手抚平自己的头发，
并且把一张唱片放在唱机上。

通过社会和政治结构，人类找不到任何希望。唯一的希望来自宗教；但是，宗教的希望本身却与荒原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而立足在谵妄与欢乐之间。在埃毛斯路一章中出现的那个神秘莫测的陌生人，可能就是胜利地征服了死亡而再生的基督；也可能就是那个干渴欲死的狂人的最后幻想。后来艾略特也成了基督教徒，人们事后可以看出，这首诗就是在向宗教信仰前进的过程。但是，信仰在这首诗中只是一个神秘莫测的谜；确切的感受则是对社会的厌恶和对生活的厌倦。

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迈克尔·罗伯茨和其他一些人把这首诗看作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份如实报道呢？更明显的解释则是诗人自己精神病态的想象。人们理解，世界确实可能看来像是如此，但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却很少会感到如此。艾略特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生动的描述唤起人们的感情；不可否认，我们之中多数人都像艾略特所描绘的那样，总有意志消沉的时刻。在重要的诗作中累积这样一些时刻，就可以使之显得比真实情况更具典型意义。在小酒店里的确有非常潦倒、淫荡的老妇，但是，诗中第二部分小酒店中的那场对话，是否可以典型地代表伦敦的下层酒吧间呢？对于任何一个欣赏伦敦小酒店的人来说，酒店打烊的时候那种“请快一点”、人声嘈杂、碎语闲谈，同文明价值无可挽回地沦丧败坏之间，并没有任何不言自明的联系。注意到艾略特的联想古怪的读者可谓寥寥无几，这大概是意象派手法的一种危险；如果是用通常的语言写出来，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全诗也可能唤醒我们警惕藏在艾略特的郁悒后面的其他一些含义：他暗示“房产经纪人的小伙计”只可能是“脸色红润”的；而东欧的政治变动就等于野蛮游牧民族自天而降。

这些评论并不是要对这首诗的伟大提出怀疑，而是探讨它所取得的是什么样的声誉。《荒原》似乎是一首令人毛骨悚然而又不同凡响的诗篇，它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一面明镜；确实，它不是一面明镜，而是一面哈哈镜，诗人自身就具有一些这种歪曲的成分。必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显然按照它的表面价值来接受它；为什么艾略特那种极端悲观的论调能在那么多人的心中引起共鸣？对于前途、对于国际混乱局势所怀有的恐惧必然是一种答案；对于人性——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揭示的——所怀有的恐惧，则是另一种答案。或许新的心理学增添了人们现有的颓唐混乱之感；或许敏捷的人在本世纪20年代对加剧的变化还不如以后那么（表面上）容易适应。但是，在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中间，普遍都有一种寻求解脱的愿望，而《荒原》则反映了当时广泛感觉到的一种病态精神。某些作家如艾略特本人和随后的奥登走向英国国教；有些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和埃夫林·沃则走向罗马天主教；有些作家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叶芝和劳伦斯走向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还有些作家如30年代的诗人走向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坚定强烈的政治信仰。

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文学中是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时期，像本文这样一种概述，除了列举一些名字外，简直不敢再有所企求。在美国，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也选用了荒原这个主题（在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真正使用了这个词），但是，菲茨杰拉德给它加上了他自己暖人心怀的人情味。《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完美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有什么作品竟然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超过了它，那也只有菲茨杰拉德本人的那部最具有雄心的长篇小说《夜色融融》（1934年）。最先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态度冷淡，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部重要的作品。《夜色融融》描写一个年轻的医生狄克·狄维尔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刻。他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娶了一个患有严重神经病的妻子尼柯尔；其实尼柯尔那些有钱的亲属想的是用钱给她买一个常在身旁的医生；狄克尽管知道这一点，他却主要是为了爱情才结婚的。随着故事的发展，他终于治好了尼柯尔，但首先是由于他是丈夫而不是医生。最后，他的妻子完全康复，而他则身心交瘁。这场悲剧在于尼柯尔无论怎么说具有为生存所必须的那种铁石心肠；治疗一完成，她就得到自由，可以重新独立了。医生得到的报偿则是变成了累赘；但是，他这位医生同时也是丈夫，他的精力已经竭尽无余，这时感情的崩溃看来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然而，狄克接受尼柯尔，是在完全知晓大有可能发生这种后果的情况下决定的，因此他的倒霉使人想起哈代和詹姆斯作品中早已见过的那种道德教诲。在现代世界，过分的敏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障碍；然而，我们之中却很少有人不愿具有这种障碍。

在欧洲，纪德的《若是种子不死》（1926年）树立了自传必须忠实的新标准；安德列·勃勒东的《娜佳》是1928年超现实主义的预兆。但是，20年代最为出众的作家则是卡夫卡，他的两部伟大作品（《审判》在他去世后于1925年出版，《城堡》于1926年出版）反映了我们时代那些最可怕的事情。这两部作品每部都写了一个半匿名的角色陷入一种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之中，他努力想求得理解，却越来越大惑不解，他努力想求得生存，种种事件却挫败了这种努力。作品中似乎约略预感到日益迫近的法西斯恐怖；名副其实的敌人是那些置身幕后的政客和官僚。但是，这些小说之成为政治预言却是第二位的；它们作为讽喻，探索了现代人对于宗教真理的追求。显而易见的暗示是：神并不存在，或者神是敌视人类的，或者至少神是无法接近的（虽然可以认为，强调这些情况的是一种巴特派^[11]新教，它的教义

否定人的理性和道德，把上帝视为“完全另一个”）。当然，卡夫卡的小说可以看作一种病态过敏的产物，至少有一位卓越的医生发现这些小说可做偏执妄想狂的病例，只不过如此而已。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又面临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为什么现代人这样乐于在偏执妄想狂中去寻求他的真实的意象？对待卡夫卡，人们不能像对待艾略特那样，怀疑他对性行为畏缩，或者是一味讨厌下层阶级。他的幻象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后来体现了的更为深刻的梦魇，而随后的历史竟骇人听闻地证实了这种梦魇。在一个时代里，人们的病态心理以为自己受到迫害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真正受到迫害；本来只能作为虚幻病例的事件竟然成为政治现实；我们对这样一个时代又能说些什么呢？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英国作家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初看之下，他可能像是对这样浓重的阴暗提出强烈的抗议。从他那部成功之作《儿子与情人》（1913年）开始，陆续发表了许多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劳伦斯的研究者公认为是他杰作的《虹》（1915年）和《恋爱中的女人》（1920年）两部长篇小说，一直到他死后出版的最后一部引起众说纷纭的长篇小说《恰特里夫人的情人》（1928年），毫无疑问，劳伦斯是以非凡的精力和对人物与地方精妙入微、富于想象的观察来写成这些作品的。然而，这些作品存在的根本理由看来往往具有预言性；劳伦斯是一个救世主式的作家，他自己越是觉得自己遭到世界的否定，就越是心怀愤懑。

他的视野的中心是热情的浪漫主义。他相信人具有生活和幸福的巨大潜力，痛恨各种把人类精神置于桎梏之中的社会观念。他在其《民主》的文章中，识别出妨碍个人的发展的三大现代敌人：崇拜一般，千篇一律的单调沉闷；崇拜至尊，千篇一律的自我牺牲；迷信“个人”，千篇一律地信奉既定教义的社会结构。他针对这些敌人，公开赞扬“个人主义”，就是培养个人的内心丰富的世界，使个人独一的、自然的自我欣欣向荣。但是，记住这点十分重要：劳伦斯并不相信孤立的异葩独放。人要有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来满足自己，劳伦斯往往就是在以超凡出众的见解和细心来研究这些问题方面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优势。他的基本信念之一是身心不可分离；他写道：“人是身体与心灵结合为一的；他的各个部分绝不是相互敌对的。”旧的观念认为，心灵是我们“较高的”部分，而身体则是“较

低的”部分，劳伦斯则用身体与心灵两者平等的思想，取代旧有的观念。性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善，是人的需要，但是在这种肉体活动中必须心灵、精神和肉体完全交融。劳伦斯显然同布莱克相类似；他同布莱克一样相信，人类激情的巨人如果摆脱了桎梏，就会相互监督；人的柔情和忠诚能够保护他不进行杂交，这比消极的宗教训诫或者法律条款有效得多。

毫无疑问，劳伦斯描绘他的幻想时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这并不是说他那些长篇小说就没有任何云遮雾障。他也可以是具有破坏性的，带有性虐狂的；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这种种冲动。他对性的看法往往十分奇怪地留有余地。有时他把它表现得超越人类关系而成为神秘的感受；有时他又像在《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中那样全神贯注于肉体活动——恰特里夫人离弃自己的丈夫以及梅勒斯同她的同居生活中复仇和暴力的潜在倾向，都引人注目地脱离了作者通常的看法。人们可以觉察出来，劳伦斯晚期越来越灰心丧气。他面对人类艰苦境遇中的悲剧因素（其中也包括丧失青春和活力），努力为人类寻求替罪羊。他的激烈论战带有歇斯底里的调子，他那具有明确自信的幻想，不再显得那样逼真了。在他生命的尾声，他迷醉于死亡与复活。他晚期的诗篇都是在为位于终极黑暗中彼岸的生活未雨绸缪，他的凤凰涅槃带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如果他不死，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宗教作家，走上他的赞赏者，表面上同他背道而驰的奥尔德斯·赫胥黎所选择的那条神秘主义的道路。劳伦斯将永远是一个最令人着迷的现代作家，特别是在他脱离了他的那些朋友的影响的时候。

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虽然严峻，不过也有比较轻松的时刻，这是一个属于玄思异想与奇言怪行、开路创业与未卜先知、异域奇闻与起义反抗的伟大时代。大众报刊制造出那种使它受到欣赏的情调（如艾略特的作品）；它大事渲染地报道那些耸人视听而又令人伤情的头条新闻。这就是当时使两个重要的讽刺作家得以崛起的社会背景。这两个作家一个是奥尔德斯·赫胥黎（1921年的《 Cromwell 》，1923年的《滑稽的雙人舞》，1928年的《旋律与对位》，1932年的《美妙的新世界》，1936年的《加沙的盲人》，1939年的《天鹅死在许多夏天之后》）；另一个是伊夫林·沃（1928年的《衰落与瓦解》，1930年的《邪恶的肉体》，1932年的《黑恶作剧》，1934年的《一抔土》，1938年的《抢新闻》）。这两个作家都写上层阶级异国情调的

世界，伦敦社交界的时髦风尚，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报业巨头和自以为救世主的人物，时新的贿赂者和衰老的腐化者。这两个作家都看出了尘世的欢快放浪中绝望挣扎的痕迹，像在各种无底深渊之上的荒原中寻欢作乐。在赫胥黎的作品中，讽刺常常犀利无比，带有沉重、锐利的恐惧之感。他的那些主角看来像是在打油式地模拟劳伦斯想从性生活得到解脱的希望，因而，他通过抛弃肉体而转向神秘主义的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伊夫林·沃，虽然同赫胥黎完全一样妙趣横生，有时几乎更加粗暴，但是却总是有些爱恋那个为他的讽刺所否定的世界。“青春是短暂的，爱情是有翅膀的；时间也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销蚀了青春妙龄时期的聪明漂亮……”然而，沃的无情反映了他对他的人物保持一种毕竟是冷漠的态度，或者说一种随意打发掉的轻蔑态度；在他的外表后面，他似乎很少像赫胥黎那样严肃认真。

在赫胥黎和沃的作品中，意象破碎的世界，转变成闹剧和荒诞；而在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随着30年代渐渐展开，暴风雨的乌云越聚越浓，这个世界提出挑战，要求更严肃地对待事物。奥登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在30年代，他和一批同他相仿的青年诗人名声鹊噪。下面是其中一些作者和作品的名字。威斯坦·奥登：《诗集》（1930年）、《雄辩家》（1932年）、《死亡之舞》（1933年）、《看吧，陌生人》（1936年）；路易斯·麦克尼斯：《盲目的焰火》（1929年）、《诗集》（1935年）、《大地在强制》（1938年）、《秋天日记》（1939年）；斯蒂芬·斯彭德：《诗集》（1933年）、《维也纳》（1934年）、《静止的中心》（1939年）；塞西尔·戴·刘易斯：《山毛榉守夜》（1925年）、《乡村的彗星》（1928年）、《过渡的诗》（1929年）、《从羽毛到钢铁》（1931年）、《磁性山》（1938年）、《跳舞的时候到了》（1935年）、《死亡序曲》（1938年）。这些诗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三十年代的诗人”，他们全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奥登在《西班牙一九三七年》中称为“像炸弹一样爆炸的诗人”。他们的诗篇非常清新、充满活力，同强有力的社会信仰相得益彰；自从19世纪初叶以来，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一群诗人，起而为政治事业斗争。他们的立场是从根本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斯彭德在一首诗中把失业者描绘为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漂流的破船碎板，断然拒绝用艺术去粉饰他们的困苦生活。对于欧文来说，诗存在于怜悯之中；而到现在，怜悯就是对世界提出革命的挑战。随着30年代时间的推移，法西斯主义完全被肯定为“真正的敌人”。西班牙

牙内战强烈地吸引了这些诗人，当然，它也吸引了其他许多作家，包括像奥威尔那样对左翼并不那么热心的一些作家。奥登的《西班牙一九三七年》是描述这次战争的几首诗中最优秀的诗篇。它是一个战斗的号召，呼吁在还来得及战斗的时候为文明的生存而战斗，它提醒人们唯有人才能够创造现代世界的命运：

星辰已经死亡；动物都不会再观看！

只有我们面对今天的战斗，可是时间已经不多，

历史可能为失败者叹息，

但是它不能帮助，也不能原谅。

这些30年代的诗人激励人心，很有影响，不过并不杰出——但是，他们的标准严格，而奥登至少是现代诗歌格律的巨匠之一。在这一方面，30年代只有迪伦·托马斯可以与他媲美。托马斯早期的诗歌以《诗十八首》（1934年）作为一种征兆登上文坛，然而他最优秀的作品直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去世前不久方才问世。奥登和麦克尼斯诗意清新，常常又格律谨严，接近口语——他们把富于才智，又以才智为乐本身作为善。但是，迪伦·托马斯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更为深刻的独到之处，他使用最常见的思想和辞藻，经过熔炼，宛如新造。他对复杂的句法结构和复杂的诗章形式运用自如，而随着年龄渐高，愈加精工出众。

在英国诗坛，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引人瞩目的歌手——罗伯特·格雷夫斯和埃德温·米尔。两人固然都比较拘守传统，但都是优秀的诗人，而且后来都得到最高的声誉。在美国，现代派运动通过一大批重要的诗人继续发展。这里只列举其中几位：康拉德·艾肯、玛丽安·穆尔、华莱士·史蒂文斯、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塔特、哈特·克兰、爱德华·卡明斯、里查德·埃伯哈特。

即使如此，人们可能感到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小说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没有落在诗歌之后；虽然也许没有新出现像詹姆斯·康拉德、卡夫卡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样超凡出众的小说家，不过也有一批属于二流但地位很高的小说家。英国有格雷厄姆·格林和乔治·奥威尔；美国有福克纳和海明威，斯坦贝克或许是第三个。在这些作家中，格雷厄姆·格林在欧洲比他同时代的大部分英国作家得到更广泛的承认。他在30年代写出了一系列冷酷的“消遣作品”，这些作

品成为他许多比较伟大的成就的前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的《布赖顿硬糖》。这位小说家在《布赖顿硬糖》中取得的胜利，同他随后写出的几部小说一样，只是用极其自相矛盾的形式来表现他自己的信仰。小说的主角、犯罪青年平基的命运，表现得几乎和扬森派^[12]的宿命论如出一辙，牧师在小说收尾时设法安慰平基的妻子，看来是为了表示信仰毫无力量，甚至毫不相干。然而，格林使我们相信，在艾达·阿诺德的想象之外，存在着现实的秩序，艾达是一个勇敢大胆、信奉异教的快乐的酒吧女招待，她对平基一直追踪到底。作者不去描写她不断流露在外的美丽动人的素质，而是表现了居住在一个更加可怕也更加真实的世界上的那些受难的基督徒。作者把她世俗的“是非”标准提出来与宗教的善恶观点相对照。平基是恶，但是他又是天主教徒；他的戏剧性在于罪恶行为的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具有稀有的才能，善于把符合惊险小说公式的种种情节，同探讨道德和宗教等复杂问题结合起来。小说中的同情感由于罪恶感而深化，但是作者不让我们忘记，同情本身是可能受到影响的；格林能够使他的最高价值在地狱里也行之若素。

在气质和价值观念方面，奥威尔同格林的距离有如从南极到北极，但是，奥威尔所创造的一些罪恶的幻象，特别是在40年代末他去世前创造的那些幻象，使他们共同受到的某些文学影响异常明了。这两个作家都创造了举目无亲的罪犯遭到受谴责者历来所经受的各种痛苦的折磨，在这一方面他们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深刻影响。奥威尔和20世纪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一样，似乎可以莫名其妙地自相矛盾——他是一个生来的反叛者，然而又是吉卜林的崇拜者；他是毕生为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念而奋斗的殉道者，然而却又是创造了《动物饲养场》中的羊和《一九八四年》中无产者的作者。理查德·里斯爵士在奥威尔的身上看出有四种显然相互冲突的成分：反叛者、家长式的人物、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提醒我们，奥威尔是这样一个人：对正义的热爱和对失望的强烈愤懑很容易在他身上相互交织。^[13]《让叶兰继续飞》中的主人公似乎是50年代出现“愤怒的青年”的预告，他对社会的愤怒固然出于理想主义和满腔义愤，却逐渐转变为牢骚失意和虚无否定，用奥威尔的说法就是“邪恶的反叛情绪”。然而，整个奥威尔早期作品却都是明明白白，合情合理，而且热情真

诚的；同时，贯穿着一切事物的是冷静地接受每个人在悲剧世界中的困境。大概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比奥威尔的这些作品更令人难忘地唤起30年代的情调了：《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年）、《缅甸岁月》（1934年）、《教士的女儿》（1935年）、《让叶兰继续飞》（1936年）、《通向魏刚码头之路》（1937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上来呼吸空气》（1939年）。

如果不提对这个新的黑暗时期的某些欧洲作家的记述，这一篇简短的论文就不能完稿。安托万·德·圣·埃格絮佩里的《夜航》（1931年）、路易-菲迪南·赛林纳的《到夜的尽头去旅行》（1932年）、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年），当然还应当提到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两部精心杰作：《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再见吧，柏林》（1939年）。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在1938年出现，而1939年乔伊斯的《菲内根的觉醒》经过14年之后终于完稿了。

我们直到此刻还未讨论戏剧，虽然戏剧总是与“现代派”有牵连，它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研究戏剧甚至比研究诗歌和小说更需要自始至终纳入欧洲这个范围。映在背景上的是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巨大形象；前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伟大的悲剧作家，后者即使伟大之处有所不及，却极有魅力，极有影响。易卜生的早期戏剧，直到《玩偶之家》为止，主要注意社会问题。他的人物发现自己局促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不让生活中有一点点欢乐和自由。特别是妇女，都已沦为玩具和木偶。《玩偶之家》（1879年）描写一个妇女打破这个框框，力求实现自己的抱负。十分清楚，她需要勇气去冒犯社会并甘冒失掉保障的危险；她特别需要勇气去冒伤害自己亲人的危险，从而可能也对她自己造成损害。她还需要一种勇气来对付伦理道德方面缠结不清、难解难分的牵扯；如果有人要说娜拉是一个撒谎的、毫无心肝的母亲，那么，谁，包括她自己，又能够矢口否认呢？但是，只要有勇气，胜利并非不可能。《玩偶之家》结尾时，娜拉所做的决定，虽然代价高昂，但基本上得到肯定；她的事例证明，一个敏感的成年妇女能够鼓起勇气来自由行动，而这种程度的自由是不会使那些沉沦堕落的人感到多大为难的。《玩偶之家》使我们感到，娜拉的勇气可能终将有助于改变社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

由可能将会变得不是那么例外，不是那么暧昧，也不是那么带有污点的了。

然而，随着《群鬼》（1881年）的问世，易卜生的捉摸不定之感加深了，他作为一个悲剧作家的伟大阶段真正开始了。他以后的剧作发展了索福克勒斯式的嘲讽；置人于死地的过去的力量同一个不祥的社会结合起来，要摧毁那些寻求危险的自由以实现愿望与欢乐的人。理想主义模棱两可的性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归根结底，理想主义者和解放者可能要比曼德牧师和克罗尔这类公开反对欢乐的敌人更危险、更堕落、更不现实。易卜生此后的戏剧探索了那些愿望和理想高于芸芸众生的人物的复杂的矛盾和幻想；他那些主要的剧中人由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本身所造成的种种情况，变得具有破坏性。人们有可能感到，《建筑师》（1892年）中的人物，如索尔内斯和希尔达，过于沉溺在幻想之中，因而不是成为十分悲剧性的人物。但是，《约翰·加布里尔·博克曼》（1896年）则读来确实是好高骛远的现代人的普遍悲剧。

斯特林堡继续发展以神经病患者或疯人做剧中主人公传统，比易卜生走得更远。他主要的主题是人类根本的、无法逃避的冲突，即男女之间、主仆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冲突。在《朱丽小姐》（1888年）中，性和阶级这两重斗争是在即将临头的革命和社会暴力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他晚期的剧本更多地具有象征性，同时也更多地带有斯特林堡个人独具的阴冷。在《朱丽小姐》的序言中，他实际上是把悲剧的怜悯说成是个人恐惧的一种不大光彩的延长。但是，他剧中的情景对于整个现代派的传统却大有益处，在这些情景中的人物，有的由于神经错乱所造成的脆弱，有的由于表现得非常残酷的那种清醒，结果必然是互相折磨和互相残害。两个较为温暖、较为人情味的悲剧作家接过了他的主题，那就是包括在本篇论述时间范围之内的尤金·奥尼尔和稍晚于这一范围的坦内西·威廉斯。他们走在精神病学这门未来的科学（或艺术）的某些令人恐惧的发现前面；他们提供的戏剧程式影响了像萨特和品特这样一些格调迥异的作家。

与此同时，另一位剧作家契诃夫在1895年到1905年之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的名字可与易卜生并列在真正伟大的剧作家之林。契诃夫笔下那些敏感与绝望的人物是一个日趋腐朽的社会的典型产物，他们孤立无助，内心痛苦；他们对于人们可以不像他们那样束手无策的

某种未来，抱有一点淡淡的希望：如《海鸥》（1896年）、《万尼亚舅舅》（1899年）、《三姊妹》（1901年）、《樱桃园》（1904年）。契诃夫并不把他的这些戏剧称作“悲剧”，它们的结局也没有那种悲剧的感情净化；事情过于徒然无益，无法达到感情的净化，而苦难又几乎迹近荒诞。然而，这种苦难从来不是赤裸裸的，也不是完全荒谬的，剧中充满了极其哀婉的调子，因而使这些剧本发生了变化。即使在《万尼亚舅舅》里，剧中主人公企图起而采取悲剧式的行动，结果沦为笑剧，然而我们的最后印象也不是荒诞，而是强烈的抒情风味：伊琳娜的烦闷无聊，阿斯特罗夫的满腔怒火，万尼亚的自知之明，索尼娅最后那段爱恨交融的动人台词都表现了这一点。对于研究戏剧史的人来说，契诃夫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是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在于他是悲剧和笑剧的中间地带的探索者。但是，契诃夫的真正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仅仅是一种影响：他是荒诞派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早的一个戏剧家。

在英国戏剧中，肖在这个时期占据优势地位。肖是一个卓越的喜剧作家，但是还难以同易卜生和契诃夫平起平坐。肖在《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年）中大力维护易卜生，反对那些贬低易卜生的人，但是，在他公正评价易卜生的许多精微巧妙之处的时候，他主要关心的则是作为社会改革剧作家的易卜生。肖所注意的易卜生是一个利用戏剧向社会进行道德挑战的剧作家，易卜生提出的问题，假以勇气和真诚，仍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肖本人是一个极其相信理智的人；他毫不停息地披荆斩棘，要求以理智处理各种各样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挑出他的许多剧本的剧名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愉快和不愉快的戏剧》（1898年）、《为清教徒写的三个剧本集》（1900年）、《人与超人》（1903年）、《巴巴拉少校》（1905年）、《医生的困境》（1911年）、《卖花女》（1912年）、《安德罗克利斯和狮子》（1916年）、《伤心之家》（1919年）、《回到玛士撒拉^[14]时代》（1921年）、《圣女贞德》（1924年）、《苹果车》（1930年）、《女百万富豪》（1936年）。现在人们对肖评价过低，往往出于缺乏历史见解；他所争取的许多东西现在有的早已到手，有的被当作奇谈怪论，不值得枉费时间。对肖评价过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目前人们不重视知识；评论家不会由衷地承认，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熠熠生辉的真挚的乐趣。然而，也有这种可能：肖的戏剧具有不合时宜的论战性质；有人嘲讽他的序言比剧本更重要，说得也不无道理。肖过多地

倚仗理智来支持剧情，我们见不到他作品中象征的与想象的共鸣，而这种共鸣却是伟大艺术的组成部分。肖赞赏王尔德和巴特勒，他也同这两个作家一样，喜欢令观众大吃一惊，因为他钻刁顽皮，有时为了让观众吃惊而故弄玄虚，不过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吃惊之后向观众传达有益的道德目的。但是，他的戏剧受到理智的硬性支配，即使令人吃惊的布局也如此，台词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人物似乎受到自己思想的禁锢。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别出心裁地化大事为小事，甚至不了了之。他凭空编造——或者轻轻放过——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他把罪恶过分简单地归因于抽象的观念，或归因于经济趋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肖的戏剧仍然是妙趣横生，既好读又好看，但是却无法使人觉得像它们应有的那样意义重大。它们的意义主要限于它们当时的时代，而不是万古千秋。根据最高的检验标准，它们还是属于二流。

在20世纪初期，即使不把肖计算在内，戏剧舞台也是由爱尔兰剧作家占居优势。在爱德华时期，既有叶芝的那些极富诗意的诗剧，又有沁孤那些同样富于诗意却是用散文写出的剧作。沁孤的几个主要剧本是在非常短促的一段时期内写成的：《幽谷暗影》（1905年）、《骑马下海的人》（1905年）、《圣贤之泉》（1905年）、《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年）、《悲哀的戴尔德拉》^[15]（1910年）。这些剧作的特点是辞藻独具风格，有意识地加上爱尔兰色彩，与生活中普遍的悲剧格调协调一致。沁孤无论是选择伟大的神话人物如戴尔德拉，或是选择他那个时代的农民或补锅匠，总是既表现生活的欢乐，又表现尘世无常和死亡的悲哀。读他的作品（就像读品特的作品一样），人们常会受到这样一种感受的捉弄：他的语言尽管抑扬顿挫和极其真实可信，然而更近似宗教仪式而不是日常生活。他的角色的活力与人性同某些几乎与它们完全相反的东西并列共存：“例如在《戴尔德拉》中，独具特色的降调使激情带上一种奇特的回溯性质，好像那对情人恋爱伊始就在仔细琢磨他们自己的那个已成过去的故事”^[16]。尤其是（即使）在悲剧中，人们可以在故事的悲愁气氛中意识到美。作品中反复出现明显的抑扬顿挫的调子：“她越来越老，身心交瘁”；而且更像祈祷似的：“愿万能的主怜悯薛玛斯和派奇，怜悯斯蒂芬和肖恩，愿主怜悯我的灵魂，诺拉，怜悯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戏剧进行中，沁孤对大自然的野性和普通百姓的生

活所感到的欢乐，同尘世无常的必然性交融在一起。戏剧的结尾使人想起那种悲剧的传统：在尸体或坟墓旁残留的幸存者寥寥无几，一切热情消磨殆尽。

肖恩·奥卡西同样是爱尔兰人，但在其他方面和沁孤适成对照，他最著名的剧本直接取材于爱尔兰的“纠纷”：如《枪手的影子》（1923年）、《朱诺与孔雀》（1925年）和《犁与星》（1926年）等。奥卡西的剧本比沁孤的剧本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奥卡西剧本的对话，虽然同样也是别具风格，但是文绉绉的东西较少，更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节奏。严格说来，他没有受过教育，他是从其他戏剧家，特别是莎士比亚，学习这门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的。毫无疑问，他的弱点是过分渲染和感情夸张。《犁与星》中的诺拉开始时神志正常，由于极度紧张而发展到疯狂，这种发展写得并不完全成功；人们在其他角色身上感觉不到什么伟大的潜在因素，因而诺拉不足以代表她所应代表的爱尔兰的悲剧。但是，在《朱诺与孔雀》中，几个主要角色都更加精雕细刻，朱诺是完全根据悲剧的尺度塑造出来的。

奥卡西的主要灵感来自他与爱尔兰之间结成的波涛般汹涌起伏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而造成的不得人心的状况驱使他自动流亡国外，从此他再也未恢复过他原来的烈火一般的力量。作为一个具有阶级觉悟、坚持反天主教的爱尔兰爱国者，他比许多人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能甘受这种不得人心的情况，他也并未因为对于各种纠纷持有独特的两可态度而得到好处。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苦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使人发生变化的魔术；叶芝在他那首伟大的诗篇《1916年复活节》中，歌颂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偶然的喜剧”，进入阵亡英雄更加宏伟、更加悠久的历史。

我把它写入诗行——
麦克多纳和麦克布里德
还有康诺利和皮尔斯
在现在和在将来，
在任何青春凋零的地方，
变了，完全变了：
绝伦的美于是诞生。

但是，对于奥卡西来说，偶然的喜剧同英雄主义共存；而且在偶然的喜剧之外还有辛辣的讽刺，正如这位爱尔兰的老战士所指明的那样，在那些英雄的背后就有腐化、恐惧和荒唐。毫无疑问，在20年代中期独立的爱尔兰终于诞生的时候，做这种揭露有欠策略；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奥卡西的这种直言不讳也很难受人欢迎。然而他的那些剧本却仍然葆有它们极度的清新和活力——住在都柏林分租房屋里的贫民的生活，在考验人的时代里人类的徒劳和勇气、幽默和欢愉。这些剧本虽然都是热血沸腾、满腔义愤，但是它们又都是技巧精湛之作；它们同肖的多数剧本相比，似乎更接近于富有想象力的直接感受。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尤金·奥尼尔正在产生影响；不过从来不是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甚至直到现在都一直是我们时代最受人过低估计的剧作家。应当承认，他早期的剧本都过分简单化，场面简陋粗糙，人物只靠卖弄台词，塑造得过分简单。但是，他发展到中期以后，悲剧的想象力加深了。由于采用神话，他对家庭悲剧的体会扩展了，他对人类失败的探索越来越激动人心，他从早期的剧作如《琼斯皇帝》（1921年）和《安娜·克里斯蒂》（1922年），经过《榆树下的欲望》（1924年）和《大神布朗》（1926年），发展到《奇妙的插曲》（1928年）和《哀悼》（1931年）。他那两部最伟大的戏剧是他的晚期之作：《卖水的人来了》（1946年）和在他去世后才发现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在将来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些剧本肯定会同萨特、加缪、布莱希特、阿瑟·米勒、坦内西·威廉斯和杰内特的作品并列为当时的主要剧作，而英国曾以偏狭的地方观念认为那个时代正等待着贝克特的出现。

关于30年代诗剧的复活，讲一点最后的意见。虽然也有寥寥几个使人感到兴趣的左派剧本[奥登和伊舍伍德的《皮下之狗》（1935年）和《攀登F.6》（1936年），斯蒂芬·斯彭德的《审判官的考验》（1938年）]，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诗剧只有托马斯·艾略特的《大教堂里的谋杀案》（1935年）和《破镜重圆的家庭》（1939年）。《大教堂里的谋杀案》是为了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上演而写出的，这是一个早期的尝试，想把戏剧从营业性的剧场解救出来，把它重新放到更严肃的舞台上。艾略特之所以回到希腊戏剧家那里去寻求榜样，一个原因是为了提高他的宗教主题，他后来说过，还有一个原因是要逃避莎士比亚对英国戏剧韵文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如同某些希

腊戏剧一样，合唱队起着双重作用。它既表现一般谦顺的基督教徒对他们那位大主教面临的危机所抱的态度，同时也造成恐惧和厄运将临那种风雨欲来的气氛。贝克特的种种诱惑，告诉我们艾略特也从英国道德剧学习了技巧。出人意料的第四次诱惑使这次诱惑发展到了顶点，此时大主教内心的骄傲已具体表现出来，推动着他“为了错误的理由去做正当的事情”。剧情步步发展，紧紧地吸引观众，先是在观众中自由来往的合唱队，其次是作为听贝克特圣诞布道的会众；然后是作为诱惑的真正对象，此时谋杀大主教的那些凶手从戏剧的场景中逐渐出现。这时就很容易看出，艾略特如何把他写的这次历史事件同30年代的情绪联系起来，虽然也许在这些前提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不大容易接受自己的这些前提。然而，这个戏没有降格成为对道德的一场直接的挑战。诗体结构丰富多彩、精妙绝伦，在教堂或大教堂内，它产生的效果使它成为英语文学中最优秀的基督教戏剧。

在《破镜重圆的家庭》中，艾略特采用了一个甚至更具雄心的主题，描写一个家庭处于幽闭恐怖症环境中的厄运和罪过。他在这出戏里所用的手法可以同易卜生作直接对比；然而，这一对比适足以说明，艾略特的戏剧才能毕竟非常有限。剧本的宗教性质起了使动作降慢和使人物缺乏个性的作用；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看到的是一个刻意编造的难题，其中对道德行为的精妙讽刺和造成人的精神创伤的事件似乎都失去了应有的力量。

克里斯托弗·弗赖伊1939年写了《推小车的男孩》，但是，他此后的一些诗剧同艾略特的诗剧一样，都未能给诗剧注入真正的生命。

《大教堂里的谋杀案》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成功。再过20年之后，具有诗歌的丰富想象和集中凝练的戏剧才在英国真正新生。那是通过贝克特和品特才有这样的发展的，而艾略特和弗赖伊对此都未能预见。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叶芝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我们对叶芝还只是约略提及，但是，虽然大多数对“现代”文学的概括没有能把他包括在内，他仍然是所有现代派作家之中最伟大的作家。1937年，他发表了《蓝宝石》：

我听说过，歇斯底里的女人说
她们讨厌那些永远快乐的诗人，
讨厌他们的调色板和提琴弓，

因为谁都懂，或者应该懂：
如果不果断从事，
飞机和齐柏林飞船就要出动，
像比利王^[17]一样投掷炸弹，
直到把城镇夷平。

大家都在演自己的悲剧，
哈姆雷特高视阔步，李尔王已经上场，
那是奥菲利娅，那是考狄利亚，
然而，如果还在演最后一场，
舞台的大幕就要落下，
如果他们在剧中的重要角色值得一看，
就不要打断台词哭泣悲伤，
他们知道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都心怡神畅：
欢乐使一切恐怖的东西都变得漂亮，
人们争取的、寻得的、失去的一切；
灯火管制；火光烛天；
悲剧把一切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哈姆雷特漫步闲游，李尔王怒气冲冲，
在成千成万的舞台上，
凡是演到幕落，就立刻落幕，
不能增长一寸，也不能增加一两。
他们步行而来，或者乘船，
骑骆驼，骑马，骑驴，骑骡，
古老的文明都遭到刀枪之祸，
于是他们和他们的智慧都毁灭一空，
卡利马库斯^[18]的精工制作无影无踪，
他雕刻大理石就像雕塑青铜，
他雕的帷幕仿佛徐徐升起，

若有海风吹拂它的一角。
他做的长灯罩像一棵
细弱的棕榈树干，可是只保存了一天。
一切都遭毁坏，一切又重新建造起来，
那重新建造它们的人，个个欢乐。
两个中国佬，后面还有第三个，
刻在蓝宝石上，
在他们头顶有一只仙鹤飞翔，
象征着年高寿长，
第三个无疑是个仆人，
还有一件乐器随身。
宝石上每一块色瘢，
每一道偶然的裂纹或一块凹痕，
都好像一条溪流或一处雪崩，
或者像高耸的山坡上白雪纷纷，
一定还有樱桃树和梅花，
让旅途中的小客店变得舒适温馨；
这些中国佬爬坡走向客店，
我乐于遐想：他们坐在客店休息；
他们凝望高山，凝望苍天，
凝望整个悲剧的场面。
有人要求听几支悲歌：
娴熟的手指于是开始弹拨。
他们眼睛周围布满皱纹，他们的眼睛，
他们那年高睿智、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欢乐。

这首奇妙的诗关键就在一个词，它探索人和艺术复元的能力。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艺术有什么用呢？“欢乐”这个字首先是给滥用了，是不负责任的标记；但是，叶芝说，这种滥用是歇斯底里的，哪怕我们就像那些女人所担心的那样要遭到毁灭。在这个艺术家的欢

乐中，有超越悲剧的希望，在生活与艺术中间的腹地上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奇迹：

欢乐使一切恐怖的东西都变得漂亮……

但是这种欢乐并不是逃避现实；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征服，我们可以用这种精神来面向文明的死亡：

一切都遭毁灭，一切又重新建造起来，

那重新建造它们的人，个个欢乐。

这两行诗句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那种泼辣大胆。第一行是无法承受的负担；第二行是坚如磐石的保证。但是，这首诗所说使得万物变得漂亮的欢乐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指哈姆雷特的性格，又不是指哈姆雷特这个角色，那么也许是指哈姆雷特的思想——哈姆雷特移入拜占庭式艺术的永恒之中？从一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叶芝所说的：对于艺术家的创造，对于演员或观众的再创造来说，一切艺术在其形式丰富多彩方面都是“欢乐”的，而不管悲剧是多么阴惨，它同生活的关联多么凄凉。但是，欢乐、复元的力量，既不属于艺术家，也不属于艺术；它们的拯救力量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某处。因此，这首诗的主要意象在于蓝宝石，刻画它那些欢乐的老人。欢乐属于他们，正如他们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样；然而，这种欢乐来自早已消亡的人物本身，因为除了人的眼睛以外，还能在何处看到光明？再者，艺术也能够死亡，正如创造艺术的人一样；艺术本身就是可能灭亡而又可能重新创建的事物。在这首诗光辉灿烂的中心部分，叶芝取得了极其非凡的胜利；他不仅叙述了他的主题，而且实现了他的主题，好像卡利马库斯的失散了的作品在他的诗篇中又复活了。叶芝是多么神奇地再现了那位一去不返的艺术家的优美和典雅！——跨过黑暗的往昔和时间的深渊予以再现。蓝宝石的裂纹变成了它那内在美的一个部分，艺术消弭了时间正常的侵蚀；这些都表现得多么中肯！艺术与生活的相互作用，使我们想起济慈——特别是他的《希腊古瓮》——但是，叶芝终究说的是不同的事。《希腊古瓮》记载了一双永不愈合、互相摩擦的裂叉——强度与持久，命中注定永远无法会合。一件艺术品（古瓮）产生了另一件艺术品（济慈的诗），但是，原来的恋人从我们面前消失了，而艺术家本人也在他们艺术的时间范围内消失了。在叶芝的《蓝宝石》里，一件艺术品死亡了，但是又为另一个艺术家召回了——艺术有赖于艺术家，正如艺术家有赖于艺术。正如欢乐既不会在

一个活着的老人身上，也不会在一件蓝宝石像中永世长存，然而两者结合起来就证明了欢乐在一个悲剧世界中的力量；同样，人的精神也如叶芝所表明的那样，具有在创造中复元的力量；在创造和再创造中，就存在生命的胜利。而这就使我们回到这首诗最后的也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形象，即在旁观者和艺术之间存在的使事物变得美好的欢乐。诗人，思考着艺术，沉浸在艺术之中，“我乐于遐想”，他写道。他的欢乐由艺术引起，然后又反过来重新创造艺术。老人想听音乐，于是音乐为他们而弹奏。在这首诗和它的听众之间产生了一个奇迹，“娴熟的指头开始弹奏”。与此同时，叶芝娴熟的手指援笔成诗。在1939年的尽头和在欧洲毁灭的边缘，诗人证明：

他们眼睛周围布满皱纹，他们的眼睛，
他们那年高睿智，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欢乐。

（张扬 张玲 译）

[1] 马太·安诺德（1822—1888年）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具有民主思想的诗人与评论家，他生活在那个生产空前扩张而缺乏任何理想的时代，对生活感到悲观、苦闷，厌恶贵族和资产阶级，称为“野蛮人”和“市侩”，希望普及知识与文化，把智慧赐给“粗鄙而愚昧的人民大众”。——译者

[2] A. 拉瑟福德编：《吉卜林的思想与艺术》（1964年）。

[3] 霍布斯（1588—1679年），英国哲学家，认为人有利己的本性，“人对人像狼一样”，应当实行君主专制政体。——译者

[4] 《弗兰肯斯坦》为玛丽·W. 雪莱1818年发表的一篇故事。故事主人公弗兰斯坦是日内瓦的一个自然科学家，他用骨头制成一个人形怪物，并使它能够活动，最后怪物进行反抗，终将弗兰肯斯坦本人杀害。——译者

[5] 祖依德石：英国道塞郡和维尔特郡地面散布有很多大块沙石，据说是第三纪地层遗物。英国残余的圆形石坛多由这种大石建成，人们多认为这是英国古代祭司（称为祖依德）的祭坛，故称这种石为祖依德石。——译者

[6] 据《圣经》，上帝用泥土捏造人形，赋以生命，创造人类。泥土意指芸芸众生。——译者

[7]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扛天的巨人。——译者

[8] 据希腊神话，底比斯人提瑞西阿斯因杀死神蛇被天罚失明，并由男身变为兼有女身，但作为报偿，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译者

[9] 这是利用英国作家罗伯特·刘易斯·斯蒂芬森（1850—1894年）著名的《挽歌》一诗中的诗句略加变化而成。艾略特用原诗哀悼亡人安息的诗句来反衬现代

人的熙熙攘攘。——译者

[10] 这一句为英国著名作家、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30—1774年）所著长篇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中的一行诗。原诗说女人失身于人，羞愧难禁，只有自杀一途。艾略特用这一行诗来暗喻对比现代女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译者

[11] 巴特派是在瑞士神学家巴特影响下所成立的教派。——译者

[12] 扬森派为基督教派之一，信奉比利时弗兰德斯一个主教科涅利乌斯·扬森（1585—1638年）的学说，宣扬神力不可抗拒，原罪等宿命论思想。——译者

[13] 理查德·里斯爵士：《乔治·奥威尔：脱离胜利阵营的逃亡者》（1961年）。

[14] 玛土撒拉：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玛土撒拉年岁最老，活到969岁。——译者

[15] 据爱尔兰传说，戴尔德拉为北爱尔兰康丘王的竖琴师之女。巫师预言，她的美貌将使爱恋她的人死于非命。康丘准备娶她为妻，但她爱恋纳西，纳西和弟兄一道把她带往苏格兰。康丘把纳西三兄弟骗回杀害，她因而自杀。——译者

[16] 罗纳德·加斯科尔：《约·米·沁孤的现实主义》，载《评论季刊》第五卷，（1963年），第247页。

[17] 比利为威廉的昵称，此处指德皇威廉二世。——译者

[18] 卡利马库斯为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著名雕刻家。——译者

第二十一章 哲学与宗教思想

一 哲学

哲学是没完没了的对话。哲学的肌理和结构，哲学的方法和结果，都很像人们夜晚聚在挤得满满的房间内高谈阔论。如果有人事后向你说明当时讲了些什么，不管他是亲耳听到当时谈话的直接参与者，或者多少是消息并不灵通的转述者，都肯定会在某些重要方面歪曲真相。他所讲的会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不是加油添醋，就是掐头去尾。因为独白从来不能完全表达出对话在音调、音高和音速上的变化。除非把哲学史本身写成对话，否则就不大可能准确地反映哲学这种对话。

虽然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维特根施坦这些哲学家，都把哲学说成是辩证的，但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几乎所有非专业的哲学读者和注意哲学的人，并没有充分重视哲学辩证的对话性质。在处理哲学本身以及在编写哲学史上，他们往往过分地注意政治甚至军事上的类比：把哲学家看作在组成党派或团队，追随首领，隔着深沟、峡谷或不可逾越的激流彼此射击，或者是在有着各种根深蒂固的联合的议院中互相叫嚷，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突然发生政权上的改变。

在描述20世纪的哲学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这些形象特别吸引人，而且至少和过去一样是危险的。到处有人讲“哲学革命”，人们模糊地认为：1900年以前是绝对唯心主义者组成的保守党在执政，他们后来被经验主义者、实在论者和实用主义者结成的强大联盟所击败，他们又同极端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结成人民阵线，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很快就接管了党和国家，直到在职的种种乐趣使他们软化，变成了比较温和的语言哲学家。这一派已经占有不可抗拒的绝对优势，可以不去理睬那些日益增长的关于反革命的窃窃私语。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初哲学情况的细节，特别是想一想大家常常提到的革命战争的第一声枪响，就是乔治·穆尔的《驳唯心主义》一文^[1]上面那种干净利落令人满意的说法并不正确，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但是看一下这篇经典性的文献，或者它所攻击的唯心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弗朗西斯·布拉德莱的《现象与现实》，我们就能明白这幅不真实的图景为什么似乎也有一些道理：

有机统一的原则，正像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的原理一样，主要是用来维护人们在似乎方便的时候同时承认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正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黑格尔对于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使经验已经证明哲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容易犯的一类谬误，获得一个名称并发展为一个原理。那么，有人追随他和崇拜他，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过了三页以后，我们正期待听到一阵发动起义的嘹亮号角时，穆尔却写道：

在此，我无须掩盖我的想法，即哲学家没有不犯这种自相矛盾的谬误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最惊人的结果，都来自他们把蓝色等同于对蓝色的感觉；存在被认为就是被感知，完全因为人们把感受到的事物同对它的感受当成一回事。人们也许会承认贝克莱和穆勒犯过这种错误；我希望，现代唯心主义者也会犯同样错误这一点，以后会显得更加清楚。

《驳唯心主义》投入了一场不仅有黑格尔和布拉德莱，而且也有贝克莱和穆勒参加的对话。穆尔就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向他们以及一切其他哲学家提出了挑战。他同他的前辈进行了交锋，从而也同他们进行了接触。他证明存在不能等同于被感知。这无疑是预示20世纪英国哲学中最显著特色的最早信号之一，同时也是对于英国和欧美哲学家研究了至少几个世纪之久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翻阅穆尔另外一些著作，会把图景弄得更加复杂。《伦理学原理》（1903年）表明作者立论仍然力求清楚明白和周密具体；他引用巴特勒的“每件事物只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事物”这句警句，成了崇尚常识和分析哲学的口号；但是，这本著作在维护伦理学的独立上，却又同布拉德莱、哈罗德·阿瑟和普里查德站在一起，反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自然主义功利论。

布拉德莱的《现象与现实》（1893年）是本世纪初流行的重要哲学著作之一。他是英国化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一方面指责理智本身必然歪曲现实，一方面又要通过系统推理表明现实的性质是什么和必

然是什么。穆尔通过《关于现实的概念》（1917年）^[2]这类文章，分析了布拉德莱得出时间和空间都是不真实的，外在关系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以及只有完全描述每件事物，才能大部分是真实的这些令人惊讶和带有戏剧性的结论所用的论证以及词义含糊之处。

但是，布拉德莱并不是那一代人中唯一说英语的唯心主义者，穆尔也远远不是唯一批判唯心主义的人或批判唯心主义的唯一类型。在美国，约赛亚·罗伊斯倡导一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这就促使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提出他们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学说。他们同穆尔一样，强调思想及其对象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反对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倾向。在剑桥，穆尔和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伯特兰·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都受到约翰·麦克塔格特的教诲和影响。麦克塔格特用谨慎的分析方法来阐述他的多元人格唯心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宇宙是一系列永恒的自我之后很久，一直是剑桥哲学的显著特色。

要想得出20世纪早期哲学的清晰图像，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当时赫伯特·斯宾塞仍然在世，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继续吸引着英美不同派别哲学家的注意。在欧洲大陆则有柏格森的生机论，这种学说同实用主义的唯意志论倾向和唯心主义所强调的理智歪曲现实的看法，都有密切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恩斯特·海克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的《宇宙之谜》（1899年）是当时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

对于哲学最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胡塞尔、勃伦塔诺、迈农，特别是弗雷格所关心的问题。这些人都关心以后几十年内成了哲学的中心课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系列问题，尽管他们所用的术语和获得的结论各不相同。回顾过去，弗雷格在这些人当中显得更为突出。他研究的算术基础，开创了一条新路，使罗素和怀特海终于写出了《数学原理》（1910—1913年）这部在整个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想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努力以及罗素几部阐述性的重要著作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这一科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几乎全部哲学领域。F. P. 拉姆齐死后出版的论文集《数学基础》（1931年）是同类努力的成果之一。他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称作“哲学的典范”。通过形

式演绎分析解决了虚构的和想象中的实体这个疑难问题，从而摧毁了迈农那种由虚幻实体构成的世界以后，罗素和他的朋友们雄心勃勃，一心想取得更大的战果。他们标榜罗素所提出的口号：只要可能就用由已知实体构成的逻辑结构来代替未知的和推论出来的实体。罗素的《心的分析》（1921年）和《物的分析》（1927年）是对这一计划的贡献。精神被看作可以还原为行为，而物体可以还原为“感觉资料”。分析成了指导性的口号；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成就，推动了哲学家，正像过去神学、伦理学和生物学推动了他们一样。

穆尔不像罗素那样富有纲领性，但是他研究了同样的题目，使用了相似的方法。1922年编成的论文集《哲学研究》特别论述了“知觉客体的性质和现实”和“内在关系和外在此关系”。他使用的是日常的但严格而又合乎逻辑的语言。（后一篇文章引进了蕴含概念，这个概念后来在剑桥和其他地方一直被人讨论到今天；但在当时却是为了探讨和反驳那种主张一切关系都是内在的唯心主义学说而提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看看那些跨越时间、空间和题材的环节。罗素及其追随者的还原主义认识论，在古典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以及约翰·穆勒的著作中已露端倪，19世纪末英国和其他国家某些带有科学倾向的作家又提出了更加详细的说法。恩斯特·马赫的《力学》（1883年）于1893年译成英文，比卡尔·毕尔生那本广为传阅而很有影响的《科学入门》晚一年。1899年出版了海尔茨的《力学原理》（1894年）的英译本。这些著作发表的日期及其性质，都足以驳倒那种认为“剑桥分析学派”某种空前未有的事物引进哲学的看法。

上述几部著作对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即它们再一次把英国哲学和大陆哲学紧密结合起来。英国的实证经验主义思潮，只有在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影响及其学说被人吸取之后，才形成一股洪流。

1908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来到曼彻斯特研究工程学。由于他对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兴趣越来越大，就促使他到剑桥从罗素学习。罗素曾为1922年发表的《逻辑哲学论》及其英译本写了导言。这是一篇宣言，其信心和文笔的犀利足以使激进的哲学改革派感到鼓舞，其傲慢和专断又足以使许多旧传统的维护者产生畏惧并受到鞭笞：

在我看来，本书所表达的思想，其正确性是无懈可击和不可改变的。所以我以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最后解决。

维护者和诽谤者都很容易忘掉下面的话：

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没有弄错，那么，这本著作的价值其次就在于它表明，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我们做的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

双方都更加注意那种认为传统哲学中大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没有意义的主张和《逻辑哲学论》中有名的最后一节：

6. 53. 正确的哲学方法有如下述：除了可以说出的话，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事物之外，什么也不去说；然后当某人想说些形而上学的话时，总是要向他指明，他没有赋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符号以意义。这种方法不会让别人感到满意——他不会感觉我们在教他哲学，但这却是唯一严格的正确方法。

6. 54. 我的命题就这一方面说是阐明性的：凡是理解我的人，在他经过这些命题、依靠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攀登上来之后，终于会认识到这些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打个比方说，他凭借梯子攀登上来之后，必须扔掉梯子。）

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才能正确观看世界。

对于不能说的东西就一定要保持沉默。

但是《逻辑哲学论》远远不仅是宣言。人们已经公认它是一部哲学的经典著作。同许多经典一样，这部书晦涩难解、言简意赅，引起人们做出互相对立的解释，在对它做出的过于丰富的评述和注释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必要的。

这里只能提一下这部著作中的某些主题和学说。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序言中总结说：

我认为这本书处理哲学问题，表明提出这些问题的方法，来自对于我们的语言逻辑的误解。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大致归结如下：

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见上），就一定要保持沉默。

他对“弗雷格的伟大著作以及我的朋友伯特兰·罗素先生的著作”的感谢，使读者特别关注到数学、逻辑、意义和必然性这些问题。追随者和评论家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意义的图像说”。根据这种说法，语言反映世界，句子和事态所共有的东西乃是一种形式或结

构，因而事态不能用语言加以说明或表述，而只能“显示自己”。他们在这里还找到了罗素在《逻辑原子主义的哲学》（1918年）中承认受到维特根施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分析要求有“不可再分的简单事物”的存在。至于是否可以认为维特根施坦提出过这类明确和正式的理论，则一直没有定论。这本书是用警句、格言体裁写成的，颇像文学作品，而不是按照罗素和弗雷格那种系统的和形式的写法。比较明显的是，这本书提供了关于逻辑必然性的说明，成为以后实证主义思想的特点。数学和逻辑的命题被说成是同义反复，由于它在任何可能的事态中都是真实的，所以对世界“什么也没有说”。在任何事态中都不真实的矛盾式，也是毫无意义的。意义只属于“自然科学命题”，这些命题是“可以说的”。

维特根施坦的逻辑主义同道和追随者，对于《逻辑哲学论》中所表现的神秘主义倾向，如对上帝、死亡和“更高者”的提法，并不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满意地看到维特根施坦把这些题目划归“不可说的”领域。他们并不认真地探讨他是否会反对拉姆齐所说的“神学和绝对伦理学是我们知道没有真正对象的两门有名的学科”。拉姆齐还写道：“不能说的事物就是不能说，吹口哨也照样不行”。

维特根施坦并不属于维也纳学派，尽管他认识学派中某些成员，但是，在《逻辑哲学论》同形成经验主义和反形而上学共同运动的哲学家施利希、卡尔纳普、牛拉特、费格尔、汉恩和其他成员的更加直截了当和正式主张实证主义的著作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精神上的共同点。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夸大这个学派的统一性；关于把形而上学打进地狱里去的证实标准或意义标准的确切性质，以及关于作为世界“逻辑结构”的基础或材料的“基本命题”或“纪录命题”的性质，学派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但是，他们确实形成了自觉的正式学派：他们进行讨论，召开会议，并发行刊物。

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把类似的思想介绍给英国读者。1923年该书第一版就提到维特根施坦和罗素，（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更深根源）也提到查尔斯·皮尔斯。但是由于对这些作家只是随便一提，所以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印象，使人认为这部著作一定

受到剑桥的哲学讨论的影响，而这类讨论本身又受到维也纳传来的消息的影响。

直到1936年艾·朱·艾尔出版了《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以后，英语国家的普通读者才第一次看到关于维也纳学派学说的系统而公开出现的介绍。艾尔的序言一开始就承认他的观点“来自罗素和维特根施坦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本身又是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表示受过穆尔很大影响，尽管他承认穆尔及其追随者“不愿意像我那样主张彻底的现象主义，而且他们对哲学分析的性质也有颇为不同的看法。同我观点最接近的哲学家乃是那些组成‘维也纳学派’的人。他们以莫里茨·施利希为首，通常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

尽管书中有这类慷慨承认思想来源的说法，正文中还有更多比较具体的参照，但《语言、真理和逻辑》却很像是哲学上全新的开端，而许多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也是抱着这种看法来欢迎或反对这本书的。这本书就阐述清晰和行文有力而论，可称一部杰作；对于它是否有重要创见来讲虽有疑问，但是它通过清楚易懂因而便于讨论的表达形式，讲述一些当时多数哲学家还不熟悉的重要思想，大大促进了哲学的进步。本书说理透彻、文笔优美，拥有广大读者。正因为如此，直到近几年来专业哲学家才能让他们的非专业朋友们相信：在英国并非所有哲学家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讲逻辑实证主义的也并非只有这一本书。

艾尔无疑是彻底的。第一章的标题是“消灭形而上学”，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传统哲学家的争论，很多都是既无成果可言，又无正当的存在理由。”这本书提出了“肯定的办法，解决引起过去哲学家主要争论的问题”。

形而上学要通过维也纳学派关于字面真正意义标准的修订看法来消灭：

我们用来测验事实表面陈述是否真实的标准是可证实性的标准。我们说，就任何人来讲，只有当他知道怎样证实一句话想要表达的命题时，这句话才是在表述事实上有意义的句子。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知道什么样的观察会使他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命题为真实，或者拒绝命题为虚伪时才有意义。相反，如果假定的命题具有下面这种性质，即关于它是真实或虚伪的假定，同关于他未来经验的性质的任何假定都不矛盾，那么，它不是同义

反复便只是假命题。表达这个命题的句子，在情感上可能对他有意义；但在表述事实上并没有意义。关于疑问句，方法也是一样。就每个疑问句来讲，我们都要研究什么样的观察会使我们肯定地或否定地回答这个问句；而如果找不到回答，我们就要认为：对我们来讲，所说的句子并不表达真正的问句，不管其语法形式多么有力地让人认为它表达了真正的问句。

艾尔承认他的偶像破坏论同休谟对于中世纪经院派形而上学的猛烈攻击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休谟，我们不仅可以说他实际上不是形而上学家，而且可以说他明白表示反对形而上学。我们认为他的《人类理智研究》的最后一段，就是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他说：“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任何一本书，比如说是讲神学或经院派形而上学的书，我们可以问：书中有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没有。有关于事实和存在的经验推理吗？没有。那就把书扔进火里去烧吧！因为书中除了诡辩和幻觉以外，再也不会有什么了。”难道这不是合乎修辞地表示了我们自己关于句子既不表达形式上真实的命题又不表达经验上的假设，那就毫无真正意义的论点吗？

标题为“伦理学和神学批判”的那一章，也许是最令人热血沸腾或者冷水浇头的部分。他对基督教徒帮倒忙，肯定他们的信仰同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的信仰一样，“并不虚假，但无意义”。道德判断被说成是“一半表现情感，一半发号施令”。“没有命题的伦理学”，成了某学派道德哲学家的口号。C. L. 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是关于这种道德的最详尽的论述。用“情感的”这个词或者“这是价值判断”这种毁灭性的反驳来压制一切关于道德、政治、宗教、文学和艺术的认真讨论，在前途光明的青年人中已经蔚然成风。（他们当中许多人仍在这样做，尽管光明已经减退，青年时期也早已过去。）

艾尔的现象主义可以代表他对全部哲学的主要问题的看法。他按照罗素的方法进行分析，提出了各种还原：精神、数目、概念、命题、物质的事物以及过去和将来，都成了逻辑构造而不是推论出来的实体，没有考虑其他可能性。

甚至在旗帜鲜明的实证主义者行列之外，许多30年代的哲学著作也带有类似的倾向。吉尔伯特·赖尔在《系统地令人误解的表达形式》（1932年）^[3]一文中，强调了从句子形式与句子表达事实的“逻辑形式”之间的通常区别引出来的若干教训。柏拉图的共相由于我们断定其产生根源在于语言混乱而被取消。赖尔对于他在著作中所指的方向抱有某些疑虑：

但是，因为忏悔对于灵魂有益，我得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些结果所指向的结论。我愿意使哲学从事一项更为崇高的任务，而不是在语言用法中寻找反复出现的错误结构和荒谬理论的根源。但事实至少是如此，这一点我却不能真正怀疑。

在《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的同一年，即1936年，有人发表了一篇方向不同的文章，这就是约翰·威兹德姆的《哲学的困惑》^[4]。威兹德姆的著述曾经过了几个阶段。他那本《心理与物质的问题》（1934年）属于更早一段时期的剑桥，就是沃德、斯托特和麦克塔格特的剑桥，通过穆尔和布劳德的讲授才把他跟麦克塔格特等人联系起来。在他写的关于“逻辑结构”的一系列论文（《精神》，1931—1933年）中，他参加了当时以寻找逻辑等式来解决哲学问题的时髦活动。现在，他在圣安德鲁斯度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剑桥，发现维特根施坦正在全力追击，追击的目标也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照这位第二个维特根施坦的说法，他和他的同道曾经正确地把“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逻辑哲学论》序言）当作引起哲学混乱的根源，但是他们却误解了疾病的性质和适当的治疗方式。他们自己就被语言引入歧途，误认为哲学问题和命题在逻辑性质上和表达形式上，都类似科学和数学的命题。“追求普遍性的愿望”可以通过注意细节和差异加以节制。哲学家必须用描述代替分析，才能从“词意就是客体这种思想”以及其他迷惑人的错觉中解脱出来。

维特根施坦的新思想很快就广泛传播开来，一是通过口授，二是由于学生们传阅他讲课笔记的打字稿（《蓝皮书和褐皮书》，该书直到1958年才出版），但主要还是由于威兹德姆和其他学生的功劳。威兹德姆夸大了维特根施坦对他的影响：就是他从维特根施坦那里懂得了哲学家是以诡论的方式讲话的，即把常见的表达式用于不常见的用法上，从而使自己和别人都产生误解。但是，他比维特根施坦看得更清楚的是：在这些诡论中，既有混乱，也有卓见。威兹德姆发展了维特根施坦本人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唯我论者的主张当然是对的”这句话。威兹德姆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详细阐发了这些论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系列论述“他人的心”的文章（《精神》，1940—1943年）。在实证主义者那种不合历史甚至常常是违反历史的偏见流行一阵之后，毕竟还有人强调哲学的连续性，即新的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和传统哲学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之间的联系。他的哲

学实践已经预示他后来写的《形而上学的演变》（不列颠学院，1961年）的倾向。

《语言、真理和逻辑》继续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判性的注意。一方面有像A. C. 尤因那样的传统思想家，他使唯心主义在剑桥仍有市场，尽管周围的人都像C. D. 布劳德所说已经模仿起“维特根施坦先生吹笛子的变调节奏”。另一方面则有莫里斯·拉策罗威茨和C. L. 史蒂文森等人，他们同情艾尔的激进论调，但不愿意像他那样走向极端。布劳德本人继续照稍早一些时候的剑桥分析学派的风格来写哲学；他不顾新评论家的看法，认为“思辨哲学”和他自己实践的“批判哲学”都各有其地位。像《精神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1925年）和《麦克塔格特哲学的研究》（1933—1938年）这类书的优点是立论稳健、明察细微和不带偏见，这一点现在看来比二三十年代新运动的支持者所见到的要明显得多。

与此同时，在牛津出现了一派注重常识、实事求是的哲学家，他们不自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支配牛津的“语言哲学”铺平了道路。库克·威尔逊，同剑桥的W. E. 约翰逊和穆尔一样，早在“日常用语”成为时髦口号之前就强调其重要性了。约基姆、普里查德、约瑟夫、J. A. 史密斯和（年青一代的）H. H. 普赖斯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为了避免19世纪形而上学家的空洞热情，彻底和逐步解决问题，在政治上都尽力做到具体、细微和明智。这些优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局限性，都传给了那些把“剑桥哲学”移植到牛津土壤的年青一代哲学家。

罗宾·乔·科林伍德在牛津还使人对于研究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问题以及历史哲学和美学继续感觉兴趣，而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却集中力量探讨范围较窄的逻辑和认识论问题，根本不读他所依仗的大陆作家——柯罗齐、秦梯利、狄尔泰和黑格尔。科林伍德的《自传》（1939年）展现出两次大战之间牛津的哲学图景，尽管并不全面，却起着很有价值的矫正作用。塞缪尔·亚历山大的《空间、时间和神明》（1920年）和怀特海的某些著作（如《过程与现实》，1929年）都是宏伟的形而上学著作，而比较时髦的哲学家则认为这种壮观不过徒有其表。

人们疏忽这些思想家及其论述主题，也伴有对于同他们比较接近的大陆作家的轻视。普通读者抱怨，学院派哲学家不重视本世纪一般理智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一切。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经济学家和在政治方面活动的人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那些兴趣主要是文学而不是哲学的人，则阅读尼采的著作；神学家和哲学爱好者，阅读克尔恺郭尔的作品；每个人都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是，那个时期的许多专业哲学家，却对这些思想家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也许弗洛伊德算是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人们相应地比较忽视哲学的历史研究，并且除了逻辑与认识论之外，几乎所有哲学研究领域都受到冷遇，例如伦理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和政治哲学。固然可以列举很多重要的例外，但这些都是对于当时流行的哲学不抱同情态度的一些人的作品。艾尔弗雷德·爱德华·泰勒、约翰·伯内特、亨利·杰克逊、弗朗西斯·康福德和戴维·罗斯爵士，对于希腊哲学的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是罗斯和泰勒各自进行的哲学工作都是旧式的，而其他各人也远不是有独创见解的哲学家。研究近代哲学史的工作，大多只限于那些从他们论述的以前时期汲取哲学营养的人，或者在真正哲学研究上并不积极的人。G. R. G. 穆尔论述黑格尔，A. C. 尤因论述唯心主义，肯普·斯密士论述笛卡儿；科林伍德富有独创思想的著作（《自然的观念》《心镜》《新利维坦》）在方法和态度上都是系统地属于历史性质的。但是，在罗素的《莱布尼兹的哲学》（1900年）发表以后，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现代运动的主要哲学家写出过关于过去大哲学家的全面论述。

宗教哲学也同样是孤立的。F. R. 坦南特的《哲学神学》（1928—1930年）带有当时剑桥分析学派那种崇尚具体和常识的倾向，但是他像查尔斯·奥曼爵士、H. H. 法默以及其他人一样，并没有受他的同时代哲学家主要思潮的影响，而是保持着独立的见解。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尽管罗素仍然积极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对于这种说法以及关于20世纪哲学许多容易得出的概括，卡尔·波佩尔爵士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35年）直到1958年才有英译本，这部书还是使他获得了与维也纳学派有关而又对其口号持批判态度和独立见解的哲学家的显著地位。他提出科学命题的标志是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

性这个论点，甚至在该书译成英文之前，就已经在专业哲学家范围之外广为人知，并得到承认。

波佩尔更著名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把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做的细致而高度的批判性的研究，同他为“开放的社会”和以经验主义方法逐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进行哲学上的辩护结合起来。这本书几乎是当时直接有关本世纪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唯一重要哲学著作。同这位作者写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样，广泛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有教养的一般读者，都读过这本书，达到近年来哲学著作很少能够相提并论的程度。

正如莱尔德在其《当代哲学》中所说，任何叙述20世纪哲学的人，都要为提到又漏掉许多名字而进行辩解。埃丁顿和琼斯、普恩加来、杰弗里斯和凯恩斯、塔斯基和哥德尔、杜威和席勒、赖辛巴赫、亨佩尔和布里奇曼、吉尔松和马里丹、博赞克特、格林和拉什戴尔、克拉伦斯·刘易斯和魏斯曼，对这些人像现在这样只提一下就完了的做法，是很不够的。他们多半都是重要人物，其他人士至少由于许多人重视也就成了重要人物。漏掉的人同提到的人一样，也是多种多样。再增加一些名字会加深20世纪哲学派别繁多的印象。没有理由不去相应地强调那些使上述哲学派别具有由对话统一起来的相互关联。人们在战后哲学领域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但这已不属于本章和本卷论述范围。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序言是在1945年写的，但是这本书却直到1953年即他死后两年才出版。这是一个界标，大多数战后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可参照它而确定其地位，不论是通过比较还是通过对比。当代的许多作家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追随者：约翰·威兹德姆、拉施·里斯、莫里斯、拉策罗威茨、诺曼·马尔科姆、伊丽莎白·安斯科姆、彼得·纪赤。另外很多人并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追随者，然而却表示和承认深受他的影响：D.M. 麦金农、D.F. 皮尔斯、斯图尔特·汉普夏和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就是突出的例证。吉尔伯特·赖尔和约·兰·奥斯汀是战后哲学界两个最有影响的人，他们所写的重要著作和文章虽然很少提到或者根本不提维特根斯坦的名字，可是无须做出深奥的解说也可以看出，他们显然同他的著作有着密切关系。牛津的艾·朱·艾尔和H.H. 普赖斯，剑桥的R.B. 布雷思韦特和卡西米尔·卢伊，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一样，写出的著作

带有罗素、穆尔和布劳德的早期剑桥哲学的精神，而不像后期的维特根施坦。坚决反对后期维特根施坦的著作和影响的有两大类活跃的哲学家：传统主义的形而上学家（尤因、布兰夏德、穆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及哲学逻辑学家（奎因、古德曼、卡尔纳普），这后一派的兴趣使他们同维也纳学派、《逻辑哲学论》或《数学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概述是以反对时间上的狭隘观念的警告开始，就必须以反对空间上的狭隘观念的警告来结束。为20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裂而感到惋惜，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是，两者之间的分歧被下述两方面的人夸大了：一方面是那些以萨特和加缪、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为学习典范而抨击当代英国哲学的人，另一方面是新实证主义者和语言哲学家，他们又拿这些大陆哲学家来警告不当心保卫从古代形而上学获得解放的人重新掉进陷阱的危险。

因为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不好的哲学家，而甚至最好的哲学家有时也不免陷入谬误之中，所以在这种争吵中，双方都很容易从主要对手的著作中搜集无稽之谈。但是认为任何一方可以独占那种认真研究哲学中心问题的特权的看法，是经受不住最后受到的考察的。说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哲学家们，攻读了相同的哲学经典著作，并从中继承了基本相同的思想倾向。不同地区虽然在用语上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超过不同时代在用语上的不同，也不超过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哲学家之间的不同。并非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哲学家对于所有哲学问题都同样感到兴趣，目前大陆哲学家和英国哲学家之间思想重点的不同，不过是这种浅显道理的一个例证。

让-保罗·萨特是英国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大陆哲学家当中的一个。他的著作的性质具体显示出变得越来越宽阔的局面。他的《情绪理论大纲》（1939年，英译本1962年）探讨了在英美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精神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在英美已经同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著作联系在一起，正如萨特本人做的那样。一般公认《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1946年，英译本1948年）同当代关于道德根据和道德判断的性质的讨论是紧密相关的。《存在与虚无》把这两类兴趣结合起来，另外还带有一种十分类似许多英国哲学家特别注意认识论的倾向。书中有一节标题就叫作《他人的存在》，简直是威兹德姆的

《他人的心》法文版的很好书名。同时，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也有人研究艾尔、赖尔、奥斯汀和维特根施坦的一些著作。对话仍在继续中。

二 宗教思想

“宗教思想”与世俗思想之间的界限可能并不存在，而且确实很难划分。回顾一下20世纪的宗教思想，前半世纪可以分为两个恰成对比的时期——1914年以前和1918年以后。前一时期的特征是哲学与宗教紧密联系，而后一时期则两者逐渐分道扬镳：有影响的哲学家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毫无意义，而神学家则认为神的启示用不着人类理性的支持。本世纪开始时，赫伯特·斯宾塞仍然健在，他那种来自圣公会教长曼塞尔的不可知论神学，正受到新兴的唯心主义派的攻击。孔德一派的实证主义被广泛认为符合科学的观点，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的这一命题被很多人接受。大约在这个时候，“自然主义”一词开始用作科学形而上学的通称，这种主义反对上帝这一观念，尽管强调的程度有所不同。由于关于自然主义的这场争论是围绕着真理的性质和知识的局限性，因而也牵涉到许多本来不是神学家的人。

“基福德讲座”的设立，就是专门为了按照理性而不是凭借权威和所谓启示来考察对上帝的信仰，这就保证可以继续从许多观点来探讨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这些伟大的主题。后一时期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自然主义，它认为凡是不能用感觉经验证实或“否认”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趋于极端的立场，后来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说英语的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而理性的神学也是不可能的。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思想越来越集中到启示的观念和宗教经验的性质。我们时代标志之一是：20世纪初宗教哲学眼看就要取代讲授教义的活动，而到了后来系统神学和教义神学却又恢复了它们在神学课程中的统治地位。

在简要叙述神学发展之前，必须先提一下在这半个世纪中，对大部分宗教思想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属于较早时期的两个作家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激发过许多宗教思想家叫作“存在主义”的哲学，据说渊源于克尔恺郭尔，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采取的形式却如此变化无常，从无神论到天主教教义应有尽有，所以仍然令人困惑难解。也许它最明显的作用就在于加强宗教中反理性的成分，鼓励在宗教经验中强调意志、决定和“介入”地位。比较一下克尔恺郭尔和布莱斯·

帕斯卡是会很有启发的；两人都是由于有一种与“哲学家的上帝”毫不相干的“信仰跃进”而皈依宗教的，两人都具有非凡的智力和文学才能。另一普遍影响就是心理学的新发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他已经证明宗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普遍的神经官能症”。无可否认，他促使那些认真对待他的著作的神学家，好好进行内心反省和修正旧有的概念。但是，他关于无意识的学说究竟有多少经得起不断的批评却是个问题；同样的说法甚至更加有力地适用于他的学生和对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著作。两人对于我们理解宗教无疑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分析哲学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评价他们使用的象征和神化的意义。某些对宗教思想一直存在的影响，来自想在历史中找寻某种“意义”的努力。贝内戴托·柯罗齐和乔瓦尼·秦梯利是把绝对价值赋予历史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历史当作神意的体现。这种观点对于基督教上帝观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关于历史性质的思想也是如此。施本格勒的《西方之没落》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于其中表现的悲观主义和无神论而轰动一时。汤因比的大部头的《历史研究》，对于宗教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因为他比施本格勒更为博学和全面，集中阐述了宗教对于理解历史的极大重要性，并且可以说为科学的历史学家勾画一种基督教上帝观。

当时许多最好的思想，都注意到宗教的性质，根据近代科学怎样看待上帝的观念，以及新知识对于传统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等问题。普林格尔·帕特森的《上帝的观念》从唯心主义的观点重新讲述了有神论的教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卓越的解释论文。克莱门特·韦布用了毕生的思考来研究自然神学史以及对神的信仰所涉及的各个哲学方面。坦南特博士在其《哲学的神学》一书以及其他篇幅较短的著作中，运用敏锐眼光和分析能力探讨了宗教的中心教条。他采用的基本假定与其说是唯心主义的，不如说是属于主张实在论的剑桥学派。黑斯廷斯·拉什戴尔的《善恶论》及《神人和合说》，是两部把深刻的神学知识和哲学知识融为一体的重要著作。尽管他是唯心主义者，他却反对绝对唯心主义而赞成贝克莱的经验唯心主义。除了这些名字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W. G. 德·柏格。他那本论述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理性在宗教中的地位的著述《理性生活》，出版于这段时期的末期，其价值在于概括了有许多思想家参加的思潮。我们也不要忘记两位专门从道德方面为宗教世界观进行辩护的哲学家——威廉·索利教

授和艾尔弗雷德·泰勒教授。泰勒最初是作为布拉德莱的门徒而开始哲学生涯的，他说明的宗教思想运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思想的发展。他放弃了绝对主义的泛神论结论，最后采取了至少接近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

上段中提到的作家，都关心维护宗教经验的可靠性和基督教核心教义中的基本真理，但是我们不能说神学家在一切问题上都感谢这些所谓的神学捍卫者。某些宗教哲学家想引进公认教义中的修正和限制，在许多人看来都是背离启示真理的危险做法，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拉什戴尔博士和坦南特博士这两位当时最优秀的英国圣公会思想家，没有受到应得的承认和影响。事实上，时代并不适合于冷静地讨论宗教思想，因为从这个世纪开始，基督教就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其中有许多问题看来比冷静的思想家所争辩的问题更为迫切。教会领袖们面对的是很多人不再去教堂参加教会活动，也不认真信仰“有组织的宗教”。这种事实虽然还不是影响1900年到1950年宗教思想的唯一重要因素，却是我们应当时时牢记的因素。

宗教既是主观经验，也是社会活动，因此，它同历史演变的关系也就必然会比哲学更为直接。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顶点的西方文明危机，非常清楚地反映在神学思潮中比较突然发生的变化上。19世纪留给20世纪两个没有解决的神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调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和基督教信仰所蕴含的世界观。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吸取对圣经的历史考证的结果以及比较宗教学者得出的结论。

20世纪开始时，在英、美、德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出现了强大而热诚的新教徒团体，他们采取了主要是批评他们的人称为自由主义新教神学。这种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特点是尽量减少基督教中超自然的和教条的说法，提出“回到《福音书》”的主张。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主要思想就是天国的思想。因此，自由新教就把天国当作它解释基督教的中心，但它集中注意力在天国降临到现世，而尽量排除《福音书》中关于天国的“来世”方面。在某些人心目中，“社会福音”已经等同于进步这一观念，后者在本世纪最初10年中，被人看作一件即使不带必然性也是差不多完全可靠的事。哈纳克是与自由主义新教神学连在一起的最伟大人物，他写的《教条史》是当时思想动荡中最有影响的力量之一。在这本以博学见长的著作中，哈纳克提出的论点是：产生《新约》的原始基督教经验，经过希腊哲学的解释，已

经由原始的简单形式变为一套神学命题和烦琐的圣事与教阶体系。哈纳克在柏林给学生们的讲演，收进了他那本流行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是为简化了的基督教信仰做出的有力辩护。这种信仰只肯定了上帝为人类之父和人类皆兄弟这两点基本信仰。说哈纳克和许多同情他的“自由派”神学家完全忽视诸如罪恶、赎罪和道成肉身这些重要问题，未免不够公正；他们的目的倒是要按照他们认为是耶稣的朴素教导重新估价这些教义。特罗特·格洛弗的《历史上的耶稣》在英美广泛为人传诵，它就是这类基督教学术研究产生的著作的优秀范例。格洛弗还研究希腊时代的宗教，它又构成了问题的另外一个因素。赖岑施泰因、居蒙和其他人的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神秘崇拜”的重要性，又提出了原始基督教福音的变化有多少是由于受到神秘宗教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是否由圣保罗开始的问题，因为有人认为，他借用了异教徒宗教仪式的思想和说法。

哈纳克的著作是罗马天主教会现代主义运动兴起的部分原因。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学者都感到有必要把教会的教义与实践同现代的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结合起来，至少有些人不满意教会权威对于接受新时代思想所抱的顽固态度。他们同时坚信，教会是代表上帝安排的精神生命的承受者和保护者。卢瓦齐神父接受哈纳克和自由新教的挑战，在《福音与教会》和《一本小书》这两本简短而有说服力的书中，打算发展一种新的天主教辩护学。他一方面接受了至少像哈纳克那样提出的对基督教历史来源所做的严格考证，另一方面又试图表明福音和教会是不可分割的，而教会中一脉相承的礼仪活动是基督教的主要内容。在英国，乔治·蒂勒尔和弗里德里希·冯·许格尔男爵这两个有名的神学家同现代主义运动有关。后者就他的批判性见解而言，虽然确实是现代主义者，但在哲学上也许不是现代主义者；他幸免于他的朋友们遭到罗马教皇谴责的命运。因为罗马教会，至少是梵蒂冈，不承认这种新的教义辩护，反对宗教适应现代知识的做法。现代主义于1907年被贬为异端，接踵而来的是在神学院和教区神职人员进行严厉的“清洗”。从表面上看来，现代主义运动在罗马教会中遭到失败，也许它的最大影响最后还是落在圣公会中英国天主教自由派身上。卢瓦齐和蒂勒尔继续从事著述。前者变得偏离信仰而接近不可知论的立场，他的《基督教的诞生》就很难同他的《福音和教会》相调和。

社会福音在圣公会这一派中显出不同的面貌。拥护它的人，即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如查尔斯·戈尔和亨利·斯科特·霍兰都以道成人身和天主教关于道成人身的说法作为他们的学说根据。戈尔的主要著作都是为这些说法进行辩护和说明。戈尔主教代表本世纪头30年圣公会思想的一种主要趋势，并且是当时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早期为《世界之光》撰稿时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总是极有限度的，晚年则想用正统思想压制那些超过《世界之光》的立场而进一步批评传统教义的教士。然而他总算是一半自由主义者；令人感觉兴趣的是看到他关于道成人身“屈尊到世界来”的学说，现在已经受到英国天主教神学家的驳斥，因为他们认为这位昨天的天主教派领袖的自由主义，对于今天来说还是太自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自由主义新教神学的乐观主义沉重的打击。把基督教原则渗进社会的这一梦想，尽管还没有完全破灭，却也蒙上了阴云。国际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理想主义的产物，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创造它的精神力量不足以维护它。20年代的希望和30年代的幻灭，在宗教思想上是有反映的，但是，在神学本身内还产生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原因。

领导人类走进天国的“历史上的耶稣”，是理想主义基督教的中心人物。他是个普世的人物，至少就他使用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重要意义的语言来讲话这一点来说，他也是现代的人。这个人物是靠从福音书中专选同我们思维方式一致的特性和言语而抛弃其他部分来构成的。解释《新约》的启示录派就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丢弃了《新约》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指出，前三部《福音书》浸透着犹太启示录的思想和形象。阿尔伯特·施韦泽的《寻求历史上的耶稣》，引起了最大的震动，作者认为耶稣是“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其他著作，特别是《圣保罗的神秘主义》，都是根据《启示录》的线索写成的。施韦泽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性格，加上他作为从事医疗工作的传教士的忘我工作，使他成了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之一。对《福音书》做出的极端启示录式的看法受到了批评，一些著名学者仍然完全不承认它，但是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施韦泽以及像伯基特教授这样同他基本立场相同的人的主张，在《新约》的解释以及在耶稣教义和经验中天国的概念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新的心理学提出了宗教经验的性质问题，因此许多活跃的神学讨论都是为了反驳弗洛伊德派所抱的基本怀疑主义。鲁道夫·奥托的《神圣观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这本书中发展了关于“神圣情感”的学说，认为这是具在特殊色彩的情感，存在于从非理性并令人战栗的恐惧一直到敬畏和尊敬这一系列的方面。奥托把他的学说同施莱尔马赫的神学、弗希特的哲学和路德的宗教联系起来。他在《东西方的神秘主义》这部深入的研究著作中，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思想过程。由于不易发现的原因，他在英、美比在德国有着更多的追随者。他是这个时代中写出也许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的作家之一，他的“非理性”神学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各种互相对立的学说之间的斗争，也许使系统神学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感到并不是站在稳固的前提上面，但是也有人当代人做出了卓越努力，重新解释正统教义。戈尔博士在其一生即将结束时，又回过头来维护和阐述基督教对上帝、基督和教会的信仰；阿瑟·黑德勒姆博士除了写过《耶稣的生平和训诲》和《神人和合说》这些书外，还发表了生前来不及完成的神学体系的第一卷。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那些年月里，是用自由主义观点阐述正统神学最有力的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表达流畅的能力，使他在百忙的教会工作之外，还写了很多书。他写的《创造的精神》《基督即真理》和《自然、人和上帝》这三本书，包括了他的基本思想，表明他的思想从“广泛教会派”逐渐转向比较接近传统的观点。

我们早已顺便地看到，不少人开始对神秘主义感到兴趣。可以认为，加速这种兴趣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安定。人们在寻求某种生活基础，而他们在进步的观念和教会的教条中，却找不到使人安心的答案。他们转而向内心寻找基础，许多人真的找到了。研究神秘主义的有名学者很多，我们只能略举一二。威廉·拉尔夫·英博士在他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和讲演集《普洛提努斯的哲学》中，扩大了人们对于神秘主义的理解，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认为神秘主义值得认真研究。伊夫林·昂德希尔在她的《神秘主义》和许多其他书中，使广大读者了解伟大的神秘主义作家的话，她的精神谈话也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弗里德里希·冯·许格尔男爵特别熟悉当代欧洲大陆的学术研究和哲学，他是一个用这方面的知识致力于自由

天主教神学事业的宗教思想家。但是，他那本最值得注意的书《宗教的神秘成分》，却是研究热那亚的圣凯瑟琳的专著，他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神秘经验的性质和意义。许格尔创立的伦敦宗教研究学会，是20年代和30年代中许多上等人士聚会之处。犹太学者及《福音书》的研究者克劳德·蒙蒂菲奥里和希腊文化专家及《象征主义》这本很有价值的书的作者埃德温·贝文，是必须提到的两位会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年，卡尔·巴特开始崭露头角，此后他的“辩证的”危机神学便成了新教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我们几乎说不出他有立场与他完全一致和门徒或同道，而且他还同原来属于他这一派的成员如葛加登和E. 布伦诺等人进行过热烈的争论，但是1925年以来，大多数新教神学家对他的观点表示同意或提出批评，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期开始时，有人特别相信宗教哲学，认为它可以取代以前教条神学在教会中所占的地位；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出现了强有力的运动，否认宗教同哲学有任何联系，提出以《圣经》为人类唯一能见到的神圣真理的教条。上帝的道这个概念是巴特的中心概念，他在上帝训言和人类全部智慧及心灵经验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上帝的道来到人间是上帝直接和单独的行动。它不能用人的理性来批评或证实，因为人的理性由于始祖堕落而败坏，不能对上帝的道做出判断。巴特敌视各种哲学神学，都是因为他否认“存在的类比”，即否认可以根据人心中的“上帝形象”通过类比推理得出关于上帝的知识。巴特的神学是代表反对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和“合理宗教”的另一极端。正如“危机神学”一词所表明的那样，历史情况带来的威胁促成了这一运动，但是它也可能具有更永久性的意义，因为就学说中一个方面来讲，它复活了基督教中由圣保罗开创的事业。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俄国和东正教作家的贡献。许多基督教学者被迫背井离乡，这就丰富了西方的宗教思想。我们只能略略提一下弗朗克斯和布尔加科夫的名字，尽管前者对不害怕教会这一观念的哲学型神秘主义做了出色的阐述。尼古拉斯·别尔嘉也夫在他写的一系列书中，提出了宗教哲学以及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方法和思想根源不同于任何西方宗教思想而受到重视的神学。不管是经院派的逻辑和形而上学，还是宗教改革运动，都不是他的思想的根本来源，他的思想主要是由东正教神学、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哲学塑成

的。他写书像先知而不像哲学家，虽然他的著作中到处提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哲学；他并不是辩论，而是像说预言那样提出结论。他晚年对启示录式的历史观所包含的永久性价值和真理感到兴趣。他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体现在他写的《历史的意义》和《人的命运》这两部最重要的著作中。他真正重要的贡献很可能在于他坦率承认宗教需要“神话般的思维”以及他为了阐明基督教信仰中的神话性质所做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正统神学家把别尔嘉也夫当作朋友，尽管后者的思想明显接近同新教和旧教的传统教义都格格不入的立场。这是许多原因造成的，例如别尔嘉也夫善于启发人的思想，他的著作的晦涩难解，以及正统派感受迟钝等。

抱着预测未来发展的目的去研究20世纪前半世纪宗教思想的人，可以认为这个时代的最有希望的征兆是团结基督教徒的普世教会运动，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脱颖而出。在神学思想方面，基督教的普世教会精神已经在讨论方法的改变上表现出来。对话代替了争论，神学家不再着重反驳持不同意见人的错误，而是大力了解对方。预期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4年）鼓励重新解释天主教会教义的立场，这就有可能对“称义”这类重大分歧，进行各种新的探索。汉斯·金博士研究卡尔·巴特神学的论文（《因信称义：卡尔·巴特的学说》是这种富于和解精神的分析的范例。站在新教的观点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克对系统神学做出了令人难忘的研究，这两个人在美国和英国都有很大影响。在学术领域中的宗教思想上的合作（例如1960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已经成为人所公认的事实；关于上帝的存在和人类得救的教义这些神学的中心问题上的合作，也越来越得到承认。我们至少可以说，就基督教思想来讲，各派互相诅咒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金言 译）

[1] 《精神》，1903年。后收进《哲学研究》（1922年）。

[2] 《精神》，1903年。后收进《哲学研究》（1922年）。

[3] 见《亚里斯多德学会学报》，1931—1932年。

[4] 见《亚里斯多德学会学报》，1936—1937年。

第二十二章 绘画、雕塑和建筑

一 绘画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现代派艺术，即一种摆脱了表现手法上的传统观念的革命艺术；而由于这时公众眼里对自然的观察，受到摄影技术的影响，因而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现代派艺术产生于印象主义，因此起源于巴黎，因为印象派是在那里发展成熟的；但是当印象派的作品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大规模展出后，印象主义就成为国际性的，现代派运动就开始在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发展起来，而巴黎本身的艺术就成为世界性的了。在法国，一年一度的当代画家作品展览会，继续组织展出的全是传统绘画，评奖团将一切先进的作品排斥在外，因此先锋派不得不组织自己的画展，先是举办了印象派的专门画展，后来又于1884年成立了“独立派沙龙”，1903年成立了“秋季沙龙”。于是艺术也和当代政治一样，形成了保守派和激进派。

1900年，点彩派和象征派这两个流派风靡一时。点彩派画家追随修拉，试图用把补色的色点在近距离加以视觉调和的画法，来使印象主义合乎科学性。象征派则追随高更，为了诗意而摒弃科学，他们既不模仿，也不分析，而是以用一些装饰线条隔开的大块色彩面积，追求与自然相等的绘画效果。随后的10年间，另外三位画家，梵高、塞尚和卢梭，开始为人们所理解。梵高以强烈的色彩和暴风雨般的笔触使绘画富有表现感情的色调；塞尚力图通过小块色彩色调的细微变化来体现他对主题的视觉感受，把印象主义的鲜明性与一种新古典主义结构的完整性结合起来；“海关职员”卢梭^[1]则以他原始的写实主义赋予所画的对象以一种神奇的色彩。

回顾起来，1905年以前的年代，似乎是现代派的序曲。当年轻的毕加索用一种表现感情的现实主义风格画杂技团的人物时，维亚尔和勃纳尔则以色彩丰富的室内景和街景为印象主义写下了尾声。最早的现代派艺术是野兽派在1904年到1908年间创造的。在1905年的秋季沙

龙上，他们用色之强烈，一时引起议论纷纷，使他们得到“野兽群”之称。色彩的确是他们全神贯注的中心。他们使用原色，既不加深它，使画面有立体感，也不按气氛来变换色调。在点彩派画家们使用补色的地方，他们却采用陡然变换和极不谐调的色彩，为了加强浓艳的装饰效果和不拘常规画法，他们的绘画更有平面感，他们的形式也趋于单纯化。

野兽派有两个流派，一个以弗拉芒克为代表，一个以马蒂斯为代表。弗拉芒克运用快速的手法和炽烈的色彩，这对梵高来说，曾经是由于为热情而表现热情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精神紧张状态造成的结果。马蒂斯与高更在一起，通过几种颜色并列，追求一种具有阿拉伯式的图案所表现的那种抒情色彩的新构图。印象派画家们倡导过这些主张，但是用来描绘自然；而对于野兽派来说，大自然是一个起点，绘画本身就是目的。他们记录情感，而不是事实；但是他们所谓的情感，意思是指美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讲什么故事情节，不存在什么社会的或道德的目标。虽然他们在实践上不像在理论上那么激进，还保留了许多描绘成分、印象派的题材和明快的基调，但是他们所关心的色彩本身应该是绘画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仍然构成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

立体派是和野兽派相对应的必然产物，它是继色彩革命以后出现的在形式方面的革命，以理智的艺术反对感官的艺术，以清教徒式的艺术反对享乐主义的艺术。它通常被认为经历了三个互相交迭的阶段：1907—1909年的原始立体派，1909—1912年的分析立体派，和1912—1914年的综合立体派。

原始立体派开始于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1907年），这是一幅5个裸女的大幅画，她们棱角分明的形象好像是“用斧头砍出来的”。透视法和明暗对比法都为平面所代替，这些平面表示一种空间感和实在感，不使画布显得空虚。右边的两个人物的头部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人物形象都更加严重变形，这或许是受黑人雕塑的影响。其中一个人的鼻子在脸上折成扁平的，以此说明立体派的一个原则——同时从几个不同的视点描绘对象。

布拉克受塞尚的影响，1908年试验用浅色调的色彩平面来构成画面，从此这两个画家就肩并肩地一起发展立体派。1909年毕加索专注

于着重从移动的视点观察裸体模特儿的各个表面，于是人物形象看上去像水晶一样的多面体，并且强调触觉而不是强调视觉感受。描绘的对象显然简化了，但仍能辨认出来。但是到了1910年允许把块面层次渗透进身体，使它们互相切入，并与背景的块面交错在一起，因而人物形象成了碎片，直到再也无法辨认，画家也到了抽象化的边缘。但是抽象化似乎是一种枯竭，于是毕加索立即退却了，不过只是稍微后退一步。1911—1912年毕加索创作了《吹单簧管的人》，布拉克创作了《葡萄牙人》，这类绘画使分析立体派达到了顶点，但这时仍然可以通过互相渗透的和半透明的块面的图案以及小块油彩的整个纹理，隐约看出作为画家出发点的所画对象。所以立体派仍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流派，不仅因为它的出发点（六弦琴和弹六弦琴的人、瓶子、报纸等）是取自画家眼前的环境，而且因为对它的欣赏依赖于被分解成碎片的形象中剩下的一点现实性和结构图案之间的相互作用。

1911—1912年，毕加索和布拉克在他们的绘画中采用了糊墙纸、报纸等的碎片，以此表明传统的艺术手段也并不比传统的形象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东西，甚至垃圾，也可以用来作画。人们把这叫作“拼贴”，它把立体派画家的探索进一步带进了绘画的真实性和空间。报纸的碎片本身是真实的，不是画出的想象之物；糊墙纸的碎片上绘有模仿木纹的图案，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而这二者又都是绘画的一部分，这样就摒弃了透视，强调表面，它们在一幅由许多具在色调和质感的色块构成的作品中，均占有自己的地位。

当所画的对象几乎完全被分解了时，分析立体派就只能限于它原来所反对的抽象化，正是拼贴才给它打开了钻出这个死胡同的道路。彩色纸开始被用于作画，这促使迨至那时为止仅注意构图的一派人重新注意用色，但重新注意用色，是把它作为构图的一个因素，利用色块的隐显明暗来增加画面的表达力。而且，一幅用剪贴物构成的画，往往只有较少的部分，各部分也较大，轮廓较清楚，因而趋于清晰。最重要的是，这些剪贴物体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因为艺术家不再把所画的对象分解成为近乎抽象的图案，而是安排各种形状，直到出现了一把六弦琴、一个瓶子等的形象为止。格里斯是采用这种综合方法的纯粹派。毕加索和布拉克则仍旧注重经验，他们只要感到理论是一种束缚，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撇在一边。然而毕加索的《三个音乐家》（1921年）可说是综合立体派的杰作。它由一些边缘挺直，又突如其

来地附加上一切东西的类似剪贴物的图形构成，通过熟练地运用这些色块而得到了一切——形象、空间和层次。而且在此以前很久，至少到1914年，立体派即已确立了野兽派仅仅预示过的原则，即绘画就是绘画，它只遵从它自己的法则，而不遵从自然法则。

分析立体派是从分解所画的对象开始的，而“黄金分割社”（1912年在巴黎展出）则从绘画的各种因素开始。他们使外形服从于一种合乎数学比例的结构，并且像修拉那样，通过使色彩服从于他们的数学准则，努力使之合乎科学。他们认为色彩是主要因素，因此要是他们之中有任何伟大的画家，他们或许可能把立体派和野兽派这两个流派融为一体。但结果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了德洛内的“奥费主义”^[2]。德洛内的真正主题是色彩的自然的、本能的生命，因而到1913年他把一个由各种同心彩色圆盘组成的主题，发展成为大气光辉的象征，它既是动态的，同时又是抽象的。他的合作者莱热从塞尚曾在自然界中寻求的圆锥体和圆柱体开始，在形式方面也同样转变到动态的抽象。

意大利的“未来派”和法国的各流派不同，它是以一个文学上和政治上的宣言，即马里内蒂1909年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为开端：应该忘掉过去，应该烧掉它的那些博物馆，应该热情地接受一个机械、城市、喧嚣、速度和战争构成的未来。一年后，在米兰形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纲领就是把这个宗旨体现在绘画之中。为了表现动态本身，而不是表现某一特定的动作，采纳了点彩派的色彩和立体派的技法。巴拉同时描绘一个动作的几个阶段，博乔尼以《力的线条》描绘了“一条大街的运动”；但是他们的绘画一直属于逸事奇闻，直到他们把试图表现一种运动的表象改换成试图表现抽象的运动为止[如博乔尼的《骑脚踏车的人的运动》（1913年）]。

表现派是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挪威人蒙克（他曾以梵高的热情和高更的线条去表现中等社会人物的忧虑神情）有着深刻的影响。1905年，在德累斯顿成立了名叫“桥社”的团体（基希纳、施密特-罗特卢夫、黑克尔等人），这派人创造了一种类似于野兽派的艺术，但色彩夸张，情调苦闷。从1912年起，它的风格变得比较统一和富于民族性了，它从非洲雕塑和哥特式的木刻中吸取灵感，注重感情的强烈而牺牲结构。在这个团体的外围，诺尔德将表现主义运用于宗教艺术，科科施卡则将之运用于肖像画。但是最伟大的表现派大师也

许是巴黎的鲁奥，他从1904年开始画妓女和丑角、律师和法官，粗野地、怜悯地把这一切都加以纯洁化，纳入他所画的基督的形象中。

1911年慕尼黑的艺术团体“青骑士”，开创了表现主义的新阶段。它和“桥社”不同，其成员和观点均具有国际性，他们之所以志同道合，与其说是由于风格的一致，不如说是由于为了达到心理上的目标而运用野兽派—立体派在形式方面的种种发现。弗兰茨·马尔克运用德洛内的技巧来表现动物在它们的栖息地的生存；而该团体的领袖和理论家康定斯基则受到他记忆中的祖国俄国的斯拉夫民间艺术和拜占庭教堂壁画的影响。他早期的风景画有着像高更那样的宽阔的色带，但是它们那令人陶醉而又令人心绪缭乱的色彩，使它们更富于神秘性，而不是装饰性。这种诉之于内心观察的成分，在牺牲表面主题的情况下日益加强，到1910年，表面主题便消失了。此后，康定斯基运用色彩表现抽象的和非具象的形状，它们在一个与其说是绘画空间，不如说是心灵空间的种种冲突，表现出人类心灵的激烈波动。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就来源于这些绘画。

1914年以前，抽象的风格并不是一个流派，而是野兽派和立体派专门注重形式而产生的必然结果；1910—1912年左右，它在几个国家同时出现，以证实绘画可以仅仅由形式构成。毕加索在1910年改弦易辙，但是蒙德里安把立体派的分析画法坚持到底。为了显示其风格，画一棵树，直到仅仅剩下几条垂直和水平的线条。然而即使在这早期，抽象的画法也是各种各样的。对德洛内来说，它象征着光；对莱热，象征着大小不同的体积；对博乔尼，象征着运动；而在康定斯基笔下，它不仅带有心理色彩，而且不再具有几何的以及自然的外形。因此康定斯基达到了一个极端。一些莫斯科的俄国画家则走到另一个极端。拉里奥诺夫用明暗不同的斜线构图（“辐射主义”）；马列维奇则用四方形和三角形构图（“至上主义”），1917年他画出了逻辑上最大限度精练的结晶——在白底上画了一个白方块。

除表现派外，各艺术派别的目标全都是发现表现形式的新方法。但是1913年左右，一些称为超自然派或空想派的画家们，找到梦幻的境界作为新的题材。俄国出生的巴黎人沙加尔用农民画的色彩和立体派艺术家的几何图形，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在那里，他记忆中的维切布斯克^[3]犹太区紧靠着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可以看见母牛腹中的小牛，身首异处却安然地活着。意大利出生的巴黎人基里科，用极其

清晰的色调和夸张的透视法画传统的拱廊；画无头的雕像或一个看不见的精灵的影子，栖居于尽头是一只钟的拱顶长廊中；一个工厂的烟囱，或一堵墙后面的一列火车。像卢梭的画一样，清晰中隐藏着神秘，但基里科的魅力则令人不寒而栗，似乎大祸即将临头。至此，绘画离开了理性，而为超现实主义铺平了道路。

1905—1914年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期，这时几乎所有伟大的发现均已完成，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一个把这些发现付诸实现的时期。然而学院派仍然居于支配地位，不论是上流社会的人们还是普通公众，对新艺术都不了解，只要这种艺术一展出，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人们普遍认为这正是这种艺术的目的。但是情况要比当年印象派的处境好些，因为这时先锋派已被认为是正常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都是先遭谴责，后被接受：这是新的模式。先锋派这时已从巴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它已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同时对未来也满怀信心。一些大胆的画商（如康惠勒尔）和一些大胆的收藏家（如美国的斯坦家族和俄国人舒金）被说服接受了他们的作品，主要的艺术家们也能够维持生计。在法国和英国，各博物馆顽强地固守旧的阵地，但在德国出现了一些大胆的馆长——官方的壁垒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一时期的艺术与社会的联系，不仅是通过“桥社”的社会意识或未来派自觉的现代意识，更多的是通过它所显示出的那种试验的态度。艺术家在探索自然和绘画的方法时，成为研究工作者，不仅象征着当代的科学成就，更确切地说可与这种成就相提并论。

立体派的风格臻于完善后，它就不再起破坏的作用，只有马塞尔·杜尚在继续进攻。他在1911年至1914年间揭穿了许多公认为神圣的东西的“真相”：用一排唇管作为女人来表现爱情；用一些偶然的技巧来表现灵感；用他的“可可研磨机”来表现机器的效率；用“现成品”（把一些成批生产的物体堆成雕塑的样子）来表现艺术本身。在1916年的大规模屠杀中，他那种由于饱经沧桑而产生的怀疑主义变成了达达派的虚无主义，这一流派主张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来对待艺术和社会。战败的德国自然很容易欢迎这种哲学，于是达达派在德国和巴黎都写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诗，画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画来嘲笑理性，并举办挑衅性的展出和幼稚的表演以震动世界，让世界认识到它自身的疯狂。虽然如此，达达派还是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恩斯特和施韦特斯的拼贴画，是为了进行讽刺而将立体派为了追求形式

的缘故而发明的东西加以发展；“现成品”则可以证明整个世界就是潜在的艺术，而阿尔普则新创了一种生物形态主义，坚持艺术家必须与自然平行存在，而不是模仿自然，这样，他的木雕是在他的手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水果在树上生长出来一样。最后，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即达达派的胡闹并非胡闹，而是象征着下意识的欲望。从这一点，达达主义演变成为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起源于文学，1924年诗人布雷顿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诗人们通过不假思索的书写，去探索人的潜意识；艺术家们也寻求类似的技巧，牺牲形式上的考虑，借助一些有用的手段，甚至幻想的现实主义，去发现和表现一种心情烦乱的和失去理性的形象。于是马克斯·恩斯特除其他方法以外，采用拼贴方法去寻找和拼凑一些毫不相关的形象，并把它们从所应处的自然环境中挪开——例如一只独木舟和一个真空吸尘器在树林里谈恋爱之类的作品。其效果是使看画的人大吃一惊，使他对日常现实中照例被认为必然是正确的东西产生疑问，使他在荒谬中领会到诗意。达利的极其可怕而逼真的视觉形象，宣扬这种狂热迷信，但是这一派的真正的艺术家兼诗人是加泰罗尼亚人米罗，他拒绝用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而采用抽象的形象。他很少把抽象形象作为形象图案的因素，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神话世界的象征。米罗超越了超现实主义，在他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符号中发展了从欢乐的到可怕的或猥亵的一系列表现。但是他的特殊才能是在准确、微细而有理性的艺术中，保存了原始人和儿童的洞察力和本能的反应。米罗在某些方面得益于克利。克利的艺术也是植根于潜意识，他深入探索潜意识的原始，他认为这是万物之源。克利寻找这个原始领域的各种象征，这些象征使人看到自然的形成过程，而不是自然的最后成品。他的方法是从线条、色调、色彩等形式上的因素开始，直到形成一个他有意识地使之完美的形象为止。虽然他的绘画是小的、个人的、怪诞的，而且显然微不足道，但是他纯熟地运用了从野兽派、立体派和德洛内的创新中发展而来，并在他的《教学笔记》中加以阐明的结构，在这方面是举世均难以超过的。他正是通过这种把在形式上注重结构与在心灵上注重即兴发挥这二者相结合的做法，把现代派艺术的这两大流派融为一体，并成为这一派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针对超现实派的这种失去理性和毫无约束的表现主义，在战后的最初年代出现了一种极端强调理性的倾向，在严格的几何图形中寻求规律。它的一个来源是格里斯的立体主义，格里斯通过与具体物品形体完全相同的画法（“我用一个圆柱体画出一个瓶子”），不断加以修正而形成一种抽象的规程，从这种规程出发，直到完成一种本身具有充分理性的结构在现实中能够站得住脚为止。奥藏方的“纯粹主义”（1918年在巴黎发表宣言）则是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从许多罐子抽象出形体，就像普桑从裸体抽象出形体一样。结果就产生了一些标准图形，假如这种绘画能有足够的感染力的话，它也许会把它同工艺图案统一起来。替代他的是莱热。莱热揭示工艺社会，并将之理想化。在他的《丰盛的早餐》（1921年）中，图形是以在工业产品中具有工业色彩的各种机器形式组合在一起的，但是在它们那机械化的完美境界中仍然达到一种庄严而从容的宁静。蒙德里安走得更远。他摒弃形象和各种联想，从而把他的形式减少到只剩一个格子，色彩只剩下底色。他坚持他的“新造型主义”是在这些简单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构成一种新的人造的绝对形式。它是一种纯冥想的艺术，其目的在于显现出一种独立于自然状态之外的普遍的和谐一致。康定斯基由于受到构成派的激励，摒弃了他的把人的感情外表化的非具象的抽象画，而采用了一些随意排列的几何图形。有时这些画像蒙德里安的一样绝对，有时则在它们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空间的相互作用方面，似乎是与人类根本无关的自然状态内部的普遍冲突的象征。所有这些倾向都被格罗皮厄斯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包浩斯”^[4]作为学派的固定宗旨，在这里，艺术家们设计建筑物时包括它的全部内容（壁饰、灯插座、机械设备、家具），以便以建筑为中心把艺术与工艺重新结合起来，艺术家与社会重新连为一体。“包浩斯”建立了现代艺术训练体系，其基础训练是根据某种特定的材料来学习基本设计。它的两个最卓越的教师康定斯基和克利，则是通过研究点、线、面、色诸因素，力求系统阐述造型规律。

从1918年直到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勃纳尔、马蒂斯和布拉克继续发展他们的个人风格，不受艺术流派、经济萧条、革命或战争的影响。勃纳尔在印象派的基础上发展，马蒂斯在野兽派的基础上发展，布拉克在立体派的基础上发展。他们没有发明任何新的原则，但是每个人都全面探索了其风格的各种可能性，因而他们的绘画属于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品之列。毕加索先后属于立体派、新古典派、超

现实派和表现派，甚至同时集各派的风格于一身。他从1915年开始交替画安格尔风格的素描和立体派的作品，在20年代初期又改宗普桑而画有宏伟感的人物，从而恢复到常态。他当时的立体主义没有受表现手法的影响，只是画面单纯化了，也比较清楚了。甚至在战前，他已画了一些现在看来是超现实主义的绘画，但是从1927年起，超现实主义成为他的艺术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他在感情上陷入了这10年的悲剧之中。他的全部创作才能和技巧，现在都用于一种人物形象被极度歪曲了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第一幅不朽之作是大幅画《格尔尼卡》（1937年），接着他继续画了一系列的坐着的女人和静物，直到1945年。

1910年前，只有西克特的印象派现实主义打破了英国绘画毫无生气的局面，所以当1910—1912年罗杰·弗赖举办两次法国现代艺术展览时，公众为之惊骇不已。后来温德姆·刘易斯发起“旋涡画派”，这是在未来派启发下出现的一次反叛，但由于战争和他本人不足以称为画家，这个画派也就成为牺牲品。在20年代，除了怪僻的斯宾塞以外，自满情绪占绝对支配地位，但是1933年成立了以里德为代言人的“一体画会”，它的刊物是《轴心》，成员有尼科尔森、赫普沃思和摩尔，全都住在汉普斯特德，有几年里，一些著名的流亡者（蒙德里安、加博、格罗皮厄斯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在欧洲造成了最激动人心的艺术气氛。1936年，由于抽象派和超现实派的国际画展的举行而达到高潮。一年以后，“尤斯顿·罗德小组”受失业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促使，抵制他们视为一种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艺术，从而领先回复到印象派现实主义。“一体画会”瓦解了，但尼科尔森继续画几何图形的抽象画，萨瑟兰则开始创作一种现代浪漫风格的风景画，这些，再加上雕塑家摩尔和赫普沃思，才使英国艺术保持了新的大胆探索精神及其规模。

在美国，首先冲击学院派的是“垃圾箱画派”的印象派现实主义。但是美国的艺术家们则向往着欧洲，有些人十分大胆，在1909年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法国现代派作品画廊——纽约的“二九一画廊”。1913年举办了大规模的“军械库画展”^[5]仅纽约一地就有10万多人，在一片骚乱、嘲笑和一些喝彩声中参观了美国和法国现代派的作品。大量收藏现代派作品的工作从此开始，与此同时“二九一画廊”也着手

赞助一些在革命的巴黎或柏林受过训练的美国人，因而到1917年现代派艺术已站稳了脚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公众当中和对收藏家们偏爱欧洲感到愤慨的艺术家当中，产生了一种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一种富于浪漫色彩和地方色彩的自然主义风行一时，经济萧条后，对社会和政治承担义务有意识地取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新政”初期用委托作画来帮助艺术家们，但是有两件依靠私人赞助的事更具有重要意义：1929年以布利斯的收藏品为基础，创立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些第二流的流亡艺术家被吸引到了美国。就像在汉普斯特德一样，在这里，杰克逊·波洛克领导的一个流亡者小团体，造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艺术风气。他们在心灵感应下进行即兴创作，以这种新技巧为基础，探索一种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从而产生了美国的“行动派绘画”，这种绘画很快就出现在世界各地。

二 雕塑

米开朗琪罗去世后，雕塑衰落了，因为艺术转向对绘画有利的光和空间的效果。这方面以印象派的出现而达到顶点，但随着印象派的枯竭，绘画回复到物体和画面层次，于是雕塑恢复了。它的现代史就是这种恢复的历史，而这种恢复又主要是通过画家们所开创的各个流派而实现的。

雕塑的恢复始于罗丹，他自己就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于一身，但是他把对这些风格的运用，结合于对米开朗琪罗的新了解。他从米开朗琪罗那里学习了一些纯属雕塑的东西，即通过质感的明暗配合来表现运动。他像德加一样，从未忘记肌肉的内在张力，即使当他的作品表面是在表现光的闪动时也是如此；但是他又不像德加，他不仅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技巧，也保留了它全部崇高的人道主义，而这点，既提高了他的形象，又使他成为旧传统的顶峰，而不是新传统的发轫。

马约尔领导了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运动，新古典主义是罗丹唯一没有吸收过的流派。马约尔对希腊雕塑的改造，在于他是按照自然而进行塑造，因而他的《连锁动作》（1905年）既表达出概括的和静态的特征，也表达出库尔贝笔下那种动物的特性，但是由于他恢复了人道主义，这就使他仍属于19世纪的范畴。

德国的表现主义是雕塑方面一个典型的异端，因此表现派的天才代表人物莱姆布鲁克甚至通过拉长了的和突出感情的形态，保存了马约尔明晰的风格。

野兽派的雕塑只限于马蒂斯，他从用色彩构图，转为用造型构图。由于侧重的方面有所改变，这种构图便成为现代派的东西，因为现在是形式和手段先于表现。将《斜倚着的裸女》（1907年）和《珍妮德头像五号》（1911年）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为了质感和结构层次的缘故而越来越倾向于夸大单一的形式，从而说明了这一点。

立体派、未来派和布兰库西打破了自然形象的束缚。毕加索的《妇女头像》（1909年）则是将他1909年的绘画直接转化为三度空

间。此后稍晚些时，利普契茨和洛朗斯创作了与立体派发展的每个阶段相应的雕塑。虽然雕塑仍然受绘画的启示，但它在破坏传统和创造新的形象方面只不过稍微落后一点，而到1922年就确实取得了独立地位。比如，利普契茨的《坐着的男人》（布列塔尼花岗岩）不仅具有综合立体派的平面结构，而且具有石头的那种沉重的纪念碑似的效果。

未来派的雕塑属于这个流派最富有生气的创作之列。博乔尼在他的《一个瓶子在空间的显示》（1912年）中，最成功地表明了他的空间一时间概念，而杜尚·维荣的《马》（1914年）则是机械力的有力而抽象的形象。

布兰库西的机体抽象与绘画毫无关系，因为他一直在探索雕塑的本质，力求用最少和最简单的造型来表现思想。他的《吻》（1908年）以最低限度的细节和对材料的最低限度的加工来表达动作。他的《梅耶夫人像》（1910年）把肖像减少到四个弯曲的形状，而他的《空间的鸟》（1919年）几乎仅用一个卵形体来同时表现形体和飞翔。

立体派对传统观念的否定，从传统的形式发展到传统的手段，导致毕加索从拼贴画发展到空间构图。这些仍然是绘画，就是从正面看的，到构成派画家才把这个观念发展成为完全的三度空间。麦杜尼茨基的《雕塑品1919》是用一个圆圈、一个三角形和两条弯曲的金属做成的雕塑，从而开康定斯基几何形抽象之先声。它既不是雕刻的，也不是塑造的，而是构筑的，确实，一些构成派艺术家装配成的作品类似建筑师所设计的模型。

达达派的雕塑几乎比绘画还来得自然，像马塞尔·杜尚的“现成品”以及恩斯特和施韦特斯的讽刺雕塑品就是这样。假如说超现实派在才智方面稍现逊色的话，他们却比较富于创造性。超现实派的雕塑确实大大超过了超现实派的绘画，因为它不矫揉造作。因而贾科梅蒂的《匙形女人》（1926年）用微妙的波状形，而不是用任何双重的意象，凭幻想做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利普契茨的《人物1926—1930》——两把交叉的钳子，顶上是一个有着闪光的眼睛的抽象的头——真正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如果说毕加索的半人半马的《人物1928》与他当时的绘画有关的话，那是因为他当时的绘画是雕塑风味

的。现代雕塑的基本表现语言到1930年已经完成，以后虽在继续发展和挖掘，但这里只能简略地加以说明。

毕加索在他的雕塑活动的两个阶段（1928—1934年和1940—1945年）运用了许多材料和许多风格。他的作品范围包括从精巧的小塑像和可憎的超现实主义的怪物，到偶得的和接近自然主义的表现对象；他的技巧则包括从焊接的铁到卷曲的纸，不一而足。即使他没有创作出什么杰作，他的无可匹敌的创造能力也使他的作品成为表达思想的丰富源泉。相比之下，马蒂斯没有创作出什么惊人之作，但是他的《人背》组雕以两个极其宏伟壮观的大型作品而达到了顶点。

瑙姆·加博是俄国构成派的先驱，他在木头和金属之外又增加了透明塑料，这种材料再加上它的抽象的几何图形，使得他20年代的作品看上去好像科学仪器或天体物理现象的照片。而佩夫兹纳的同类雕塑品，则使人想到生物学：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分成碎片的薄膜，或鸟翼。美国人卡尔德用金属薄片做成的雕塑品，更明显地像动物（《鲸鱼》《黑兽》等），但最著名的是他的活动雕塑——用彩色片做成的具有米罗风格的形象，在风中随意移动。对未来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胡安·冈萨雷斯，他的雕塑用锻铁做成，外形棱角粗糙，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属于50年代的风格。

在生物形态的创作方面，两个主要人物是让·阿尔普和亨利·摩尔。阿尔普的《人类的具体化》不如布兰库西那样精练，将无尽的含意浓缩在一个象形符号中来给人以联想，其形状像石头或筑巢的鸟，可明显地感觉到有着内在生命的气息。摩尔在题材范围和表现力方面都大得多，但在他的作品中心也仍然有一个主导思想，斜卧着的人物形象既是女人，又是风景，它代表大地持久的、不断更生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如《斜卧人像，绿色霍尔顿石，1938年》）。摩尔30年代的作品不仅创立了英国的雕塑学派，而且使英国重新回到西方艺术的主流，其作用在任何英国画家之上。

三 建筑

19世纪，社会变革和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新的建筑。像火车站和百货商店这些新型建筑物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建筑物中使用了铁和玻璃等新材料，使得无支柱的跨梁成为可能，可以得到更好的采光。但是只有在临时的或实用性的建筑结构如水晶宫、帕丁顿火车站天棚，或加拉比特天桥上，这些事实才能看得出来。在其他一些建筑中，比如艾伯特大会堂，工程师所设计的结构，外面都镶贴着石头，表现出过去某一时代的风格。

威廉·莫里斯在罗斯金的鼓舞下，攻击这种虚假的做法，认为现代建筑应该仿效的是中世纪的方法，而不是中世纪的风格；应该把艺术建立在工艺的基础上，使它植根于社会之中。他设计了一种取材于植物形象的具有新颖风格的新型装饰物，以取代机器制造的缺乏美感的装饰物，因为后者使一切都受到窒息。他自己的住宅（1859年由菲利普·韦布建造）就以适合于家居的风格代替了华丽的风格，砖和结构是露在外面的，而且是按照实用而不是按照讲求对称和外表来设计的。查尔斯·沃伊齐把这种谨严的艺术风格继续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住宅也是具有过去时代的风格而没有过去时代的复杂装饰，但是更明亮，更具有郊区的特点。与此同时期进行的建设花园城（乡村城市）的试验，是第一次向工业住房的肮脏现象发动进攻。但是由于莫里斯抵制正在成为文明核心的机器，使整个工艺美术运动出现缺陷，因而在1900年以后就不合时宜了。

机器时代的建筑始于芝加哥，路易斯·沙利文在那里为高层办公大楼创造了一种建筑形式。他的“保证公司大楼（1895年）摆脱了历史的影响，既表现出它的功能（下层是商店，上层是办公室），又表现出它的钢筋结构。

大约同时，由于新艺术运动的兴起，在欧洲出现了一种避免历史循环主义倾向的尝试。这是一种主要来源于莫里斯的曲线流畅的装饰风格，不过更加粗犷、更具有异国情调，而且是反理性的。通过普遍应用于各种物体、家具、瓷器、首饰、书籍标签，形成一种内在的统一风格；但也确实能够用在建筑上。因此霍尔塔的“人民之家”（布

鲁塞尔，1896—1899年）由于使用铁和玻璃，产生了一种明亮的空间透明效果；而那不仅遍布于其大厅，而且遍布于外墙和整个布局的波浪形风格，完全排除了实用主义的感觉。在巴塞罗那，高迪则更趋于极端，他建筑了一幢倾斜状的石头宫，好像是海水冲成的一些洞穴（卡萨米拉，1905—1910年），是一幢富于造型美和不落窠臼的建筑物，犹如一件雕塑品一般。

这些流派以在芝加哥的最有希望，沙利文在那里已为如何表现工业城市扫清了道路；但是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开创了新古典主义的新阶段，这种风格风行于整个美国和欧洲，很大程度上占主要地位，直到1945年。因此，纽约的摩天大楼的发展，也就是工程学发展的一部分。

沙利文的大弟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914年以前在郊区别墅的建筑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因为他的一些摩天大楼工程尚未兴建。这是一件矛盾的事，因为社会和技术的变革，要到1920年以后才随着汽车的使用、仆人的不足和服务行业的逐渐机械化而在家庭领域里变得明显起来。赖特的“罗比住宅”（芝加哥，1909年）的特点是一条条横贯全楼的水平线条，象征着机器切割的效率和横过平面的有目的的移动，从而表现出其现代的特点。它那向外伸出的悬臂梁（阳台的顶）开始把室内和室外的空间连成一体。不对称的和不规则的总体结构，打破了像现代主体派那样的由交叉平面分割而成的传统箱式结构。内部模仿过去的乡下茅舍，光线阴暗，是一个隐蔽的处所，小小的菱形窗格，甚至使玻璃窗也成了栅栏，但是房间高度的变化，以及以壁炉前的地面为中心，通过宽阔的通道，把空间连成一片。这种布局就打破了房间的方盒子形状，就像外部一样是立体派的。不论内部还是外部，只要可能就露出砖、石、木的天然表面。赖特的一个不朽的工业工程“拉金办公大楼”（布法罗，1904年），也是砖面建筑。它完全是一个立方体，四角有光秃秃的双层塔楼，它背对城市，朝内可一直看到它本身那装配着玻璃的大厅，大厅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空间一直通到走廊中。

随着新艺术派堕落到追求商业性奢侈铺张，苏格兰人麦金托什像赖特一样，寻求一种新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他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1898—1909年）预示着现代建筑发展的两条主线：主观的即表现主义的，和客观的即理性主义的。这所学校正面的窗子是格子式的，

是合于理性的；但是它的入口处和从小山山腰矗立起来的高大的图书馆则是表现主义的。图书馆内部又有所不同；它的柱子和横梁在空间的相互作用，半是装饰，半是结构，实开风格派建筑之滥觞。

这两种主要倾向的明确分离开始于维也纳，麦金托什在那里备受赞扬；奥尔布里希的“婚礼塔”（达姆施塔特，1907年）是表现主义的，瓦格纳的“邮局储蓄银行”（维也纳，1905年）则是理性主义的。凡是在“婚礼塔”上才华横溢地表现出创造才能的地方——五指状的塔楼，立方几何形的屋顶，刻成圆角的窗户镶边——在邮局内部却表现出古典式的朴实无华的风格。霍尔塔曾经把铁和玻璃作为表现他的离奇想法的工具，而在瓦格纳，它们表现的则是机器的平稳的效率。最后，由于卢斯发表了《装饰与罪恶》（1908年），给维也纳的理性主义派提供了战斗信条。卢斯的“施泰纳住宅”（维也纳，1910年）实际上表明了怎样可以使建筑回复到它的基本因素，即不加装饰的立体体积。

但是现代建筑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德国发展成熟的。曾经研究过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赫尔曼·米特希厄斯，于1907年抱着同样的目的，创立了“德国艺术与工艺同盟”，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艺术家和工匠不是制造个别的、因而昂贵的物品，而是为机器再生产制造样品。工艺美术应转而面向工业和广大社会。

同年，彼得·贝伦斯被任命为电气联合企业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设计师，为公司设计各种产品、宣传材料和建筑物。在他设计的“涡轮机厂”（柏林，1909年）中，他努力发现一种适合于这类建筑的形式，从而完成了一件杰作，但它同时具有古典的和表现主义的风格，即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风格。为了支撑巨大的连续突腰的屋顶，支柱看上去像是在角隅用大石块加固了的圆柱子，结果成了一座转面用以表现工业威力的希腊神殿式建筑。但是这个工厂之所以合于理性，在于其支柱显示出是钢制的，而且各个支柱仅仅用玻璃连接起来；它之所以不合乎理性，在于这些支柱真正是一些拱形结构，从基础一直到拱顶弧线平滑，无一处间断，而那笨重的柱角，却是薄薄的混凝土，什么也不支撑。

当代的建筑大师们——格罗皮厄斯、米耶斯·范·德尔·罗埃和勒科尔比西埃——都在贝伦斯的工作室工作过，所以当一本有大量插

图的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书在德国出版时，最早的现代派风格（所谓“国际风格”）的主要源泉一时汇合在一起。这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格罗皮厄斯所设计的“法古斯工厂”的车间（1911—1913年）就是一幢完全现代化的建筑。它继承了贝伦斯的作品的风格，仍然是一座神殿式建筑，但它的形状是二三十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风格的典型的水晶状立方体。浪漫主义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已成过去，代替它的是一种半透明的、线条笔直的优美的玻璃外层悬挂在那里，以它那窗户之间许许多多方柱形的墙壁而自豪，四角显然没有加固。贝伦斯是突出个人的，赞扬发电机的轰鸣声，格罗皮厄斯则是客观的，象征着平静有效和默默无闻的合作。

在艺术与工艺同盟展览会（科隆，1914年）上，格罗皮厄斯采用了贝伦斯的主题。他设计的“机器棚”是一个没有柱子的神殿式建筑，它那伸长的用线条装饰的外壳，只说明它的功用——工业场地的围墙。在这个模型工厂的办公楼里，他为这种国际风格创造了另外一个主题——一个圆柱形的玻璃塔楼，其中是从外面可以看出一个螺旋形楼梯。然而格罗皮厄斯在布局方面并非现代派。上述这两座工厂都是由各个部分，即由一些独立的建筑物组成的。在法古斯工厂里，仅仅是根据功用来分成若干组；在“模型工厂”里（这里不存在功用问题），则是一条中轴线，两面对称，也就是说，是学院派的。

如果说格罗皮厄斯领导了德国建筑的理性——古典派，那么佩尔齐格、贝尔格和陶特就构成了所谓的表现派，它即使不十分纯正，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而且在形式上更富于创造性。佩尔齐格的“水塔（波森，1911年）就概括地表明了这一点。它那些巨大的圆柱体，旨在造成一种气势凌人的效果，但它们是作为蓄水罐和展览室而出现的。他的“化工厂”（卢班，1911年）是按照英国方式自由地设计的，而陶特则在他的“玻璃大厅”（科隆，1914年）创造了格子结构，即经纬网络构成的穹顶。

法国对现代建筑的贡献，在于钢筋混凝土的发展。最早用这种材料建筑的大型建筑有“图尔昆纺纱厂”（1895年），在这座建筑中，弗朗索瓦·埃纳比克用一种镶有玻璃的轻型混凝土格栅代替墙壁。他的目的是实用——可以防火和增加亮度。他获得极大的成功。这种材料和方法被迅速用于以实用为目的的建筑物上。

但是把以实用为目的转变为以审美为目的的是奥古斯特·佩雷。在他设计的“富兰克林街乙二十五号大楼（巴黎，1903年）”中，他用细得难以想象的柱子，支撑着用悬臂梁支持的六层楼的高层公寓。虽然他用了带装饰的瓷砖，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框架和悬臂梁是外墙的主要成分；所以佩雷在这里是在关于横梁式结构的传统原理范围内使用了混凝土，其方法是将这些原理运用于以无重和大量空隙为基础的均衡比例。他的方法看起来完全适用于他使用的材料。但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钢筋混凝土当然是整块的，用在拱形结构上最为适合。埃纳比克在他为“小王宫”设计的螺旋形楼梯（巴黎，1898年）中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构思也为工程师们所采用。因此，马亚尔用弯曲的混凝土板建造桥梁（塔瓦纳萨桥，格里松斯，1905年），而弗雷西内设计的巨大的飞艇库，连同这些飞艇库所采用的抛物线形拱形结构（奥利，1916—1924年），其成就堪与巨大的维多利亚车站天棚相媲美。但是按照这些方法进行设计的唯一的建筑家是德国的个人主义者马克斯·贝尔格，他的“百年纪念会堂”（布雷斯劳，1910—1913年）是现代的万神殿，它所用的弯梁和网格穹顶后来为内尔维所仿效。

另外还有两位先知，即法国人加尼埃和意大利人圣埃利亚。加尼埃的“工业城”（1901—1904年，1907年出版）是一份详尽的蓝图，不仅画出了有白色外墙、阳台和屋顶花园的住宅大楼，而且研究了它们的周围环境和城市各部分功能——工作、居住、娱乐和交通——的划分。从未来派圣埃利亚的“设计图，1914”中，则可以富于浪漫色彩地瞥见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有着多层次的交通线路，它激起人们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必须重新考虑整个生活方式。

实际的城市规划，以荷兰最为先进，在那里，伯拉格的“南阿姆斯特丹规划”（1915年开始）以宽阔的街道和住宅区为基础，如果说它虽然不如那些善于幻想的人所拟订的计划那样大胆，但它比起花园城市的计划来，基本上更具有城市特点，更能适应人口增长的事实。

战争创伤未愈的1919—1923年，是一个人心惶惶、抗议迭起和人们采取冒险行动的时期，这适合于表现主义的抬头；而且，因为后来出现的一些领袖人物几乎没有人从事建筑，而是转而致力于富于想象的计划，所以这是各种思想的全盛时期。

荷兰作为一个中立国，是最早开始建设的；但是阿姆斯特丹学院（埃伊根哈尔德区，1917—1921年）的表现主义是别出心裁的，是新艺术运动这一流派已经站稳脚跟后晚期的产物。真正的表现主义是在德国：虽然着重装饰，但也重视实用。即使是门德尔森的“爱因斯坦塔”（波茨坦，1921年），尽管惊人地令人想起潜艇，也有它奇特的逻辑。因为它是一个地下天文台的“潜望镜”；它的流线型虽不合理性，但它浇铸成的形状来自混凝土的可塑性，虽然由于缺乏必须的熟练工人，它实际上是用抹灰的砖建造的。霍格的“智利大厦”（汉堡，1922年）同样也是又着重实际，又寓有他意，利用其地点在一个拐角处，使人联想到高耸的船头和层层甲板在波涛中起伏。但是有些曾被称为是“表现主义”的工程并不追求修饰。这些工程的建筑师们否认一定的用途意味着一定的形式。他们重新研究了建筑物的功用，从而着手创造新的形式，比如哈林的“牛舍”（加尔考，1923年）。

荷兰的“风格派（创立于1917年）重新评价了形式本身，像卢斯在1910年一样，又回到了形式的各个因素。但是卢斯把建筑物看成是一些闭合的体积（特别是箱状体）的简单的集合体，风格派则一方面受到赖特，另一方面受到立体派的启示，或者把箱子拆开，构成平面，或者使箱子互相交叉、互相连接，以便打破它们在一个新的统一连续体中各自的独立性。这样的建筑不再可能简单从一个角度去了解；必须围绕着它走一走，并穿过它走一走，从时空关系去欣赏它。范·多斯伯格在“一所私人住宅的设计图”（1923年）中，把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

同一时期，德国艺术与工艺同盟所主张的艺术和工艺统一，并与建筑和工业重新结合的思想，由于格罗皮厄斯领导的“包浩斯”的创立（魏玛，1919年）而达到了高潮。虽然表现派和风格派都是有影响的，但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机能主义的一个变种（近似于哈林的主张）。根据这一派的主张，艺术家根据材料和机器生产的情况而对功用做重新估价，从而获得灵感。因此到1930年就创造了一种当代风格的家具、设备和印刷工艺。

这一派对建筑的态度，可以用米耶斯的一些没有兴建的工程设计来说明。1919年设计的摩天楼是古怪的堡垒样式，这并非出自表现主义，而是出自对玻璃墙的美学观点；它是为了反射而不是为了隐蔽

而设计的。1923年用砖造的一所别墅探索了风格派的主张，内墙都从里面延伸出来，把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连接在一起。一年以前设计的办公楼是结构主义——机能主义的，长长的混凝土横墙与一行行的玻璃交替层叠，这在1930年以后在商业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在德国领导恢复常规的是格罗皮厄斯。1922年他为《芝加哥论坛报》设计的工程就已经使用了原芝加哥学派那种平庸单调的结构；但是当“包浩斯”迁到德绍后，他的机会来到了，因为“包浩斯”的新建筑（1925—1926年）是这些大型工程设计中第一个成为现实的。车间大楼发展了法古斯工厂的长方形外形和玻璃间壁，但是这时玻璃之间的方柱都是隐蔽的；底层缩了进去，所以整个楼看上去像是悬在空中。左右两翼都是一个单独的部分——车间、设计学校、宿舍、行政管理部门——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各自的功用。但是各个因素又都按照风格派的传统在造型上融为一体；各个空间体积均有自己的特点，又在一个总体结构中自由地融入其他部分，这个总体结构每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形式。

在荷兰，奥特所设计的公寓（荷兰湾区，1924—1927年）产生了当代的理性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勒科尔比西埃的作品。他在巴黎忙于他的“西特罗汉”计划：这是一种住宅的设想，它把圣埃利亚的想象变成精确的、具有重大的改革意义的计划，这种住宅将类似汽车，成为一部“居住机器”。它是一个由一些标准件构成的简单的立方体，这些标准件用柱子支撑，以便墙壁上可以安装玻璃，隔板可以移动，建成后易于维修，房间里装有设备，不需配备家具，甚至花园也是装配在住宅中的。这些立方体可装配成楼房，设备齐全，有自己的商店和汽车房。因为集中在一起，节省了地皮，所以有宽阔的庭园。便于通往但相隔有一定距离的多层公路，可以将其居民带到城市中心高高的楼群里，那里有工厂、办公楼和商店。他的“新精神馆”（巴黎博览会，1925年）就是这样的住宅的原型。

新思想迅速传播开来，1927年的魏森霍夫展览会上展出了米耶斯、奥特、勒科尔比西埃和其他人设计的公寓，表明一种新的风格已经出现。这就是“国际风格”，公寓是长方形的，白色的外墙，黑色的屋顶，上面有屋顶花园，正面平坦，有阳台，窗户是穿孔式的或整体构件。这种风格不讲求装饰，而是依靠简单的几何形和匀称的比例给人以美感，它宣称，这些都是天然地来自新的功用和材料。事实

上，它们是为象征机器效率而随意做出的选择，因为不论是混凝土还是现代化的生活，都不一定要求采用正方形。

如果说表现主义时期的自由这时已经丧失，那么在风格方面种种新的限制却是富于创造性的。米耶斯的“巴塞罗那馆”（1929年）表明了它在利用空间方面的各种可能性。在这座建筑的柱座上面，丰富多彩的大理石与白色形成对比，玻璃与反射出来的水池和光亮的钢形成对比；而那些不透明、半透明和透明的墙壁，使得仅仅由地板和天花板隔开的空间渐趋协调，它的明朗宁静重新成为古典式的，使室内与室外融为一体。对比之下，勒科尔比西埃的“萨瓦别墅”（普瓦西，1928—1930年），下面的一层是缩进去的，保持着平衡，像是一些细细的支柱上支撑着一个密闭的立方体。内部则是另外一种几何形，因为坡道、阳台和可能是弯曲的或玻璃的隔板，都造成一种空间连续统一体，上述米耶斯的建筑同样精巧而复杂。

在设计国际联盟大厦（日内瓦，1927年）的竞争中，勒科尔比西埃大量运用了在“包浩斯”学到的东西，各自分开的侧翼表现了各自的功用，然而又把所有这些都结合在一个很自然地形成的造型整体中，而且考虑到它所在的地点。他设计的楔形礼堂，屋顶是悬吊的，以不妨碍视线，而且是抛物线形的，以达到最佳音响效果，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虽然他在竞争中输给了保守派，但官员们和各国政府都不得不研究他的设计，并承认现代建筑回答了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建成的建筑物是失败的——它忽略了实用性，而且破坏了所在的地点——它成为传统主义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最后勒科尔比西埃得到了几项大型工程的委托。现代派建筑家们为失败所激怒，成立了“现代建筑国际代表大会”（C. I. A. M.）。这个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去宣传和统一国际风格，并做了一些工作使之更加严谨。

20年代创立了一种风格，30年代得到了传播，并变得多样化。由于大萧条的到来和各国独裁政权的抬头，它们开始遭到不幸，在这个时期，独裁政权使俄国和德国的现代建筑告终。但是从纳粹政权下逃出来的人传播他们的主张，而且，虽然这一流派本身由于与敌对行动进行斗争而变得过分教条，但并没有束缚它的一些领袖人物，他们在魏森霍夫展览会以前一直在一起，但这时却渐渐地分道扬镳了。

勒科尔比西埃为苏维埃宫所做的设计（1931年）虽遭到拒绝，但证明他的创造力是丰富的。设计中要建造一个很大的礼堂，礼堂的房顶装在八字形桁梁上，这些桁梁的一端架在柱子上，另一端落在一个巨大的抛物线形圆拱上，看上去像哥特式建筑的半圆形后殿的拱壁那样稳固。他的“瑞士馆”（巴黎，1932年）则完全不同，风格上没有调和的地方。这是一个大胆地用粗大结实的悬臂梁支撑的方形板，但它的楼梯塔曲线优美，在底层有一些附属的公用房间，其尽头是一堵用参差不齐的石头砌成的墙，是对机器美的有力否定。至于使用更大得多的板块（里约热内卢的教育部大楼，1936—1945年），他仅仅是提出咨询意见，但是在这方面他为战后建造的无数摩天楼构思出了原型。他设计的遮阳板，即遮蔽大楼南侧的一种混凝土格栅，不仅对炎热国家的玻璃窗帘做了必要的改善，而且创造了一种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具有很大潜力的新的风格特点。巴西人科斯塔和涅梅耶完成了这幢建筑，从而开创了欣欣向荣的拉丁美洲现代学派。

英国自1900年以来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当欧文·威廉斯为布茨有限公司建起一座现代工厂（比斯顿，1930—1932年）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从德国逃难出来的艺术家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推动力。格罗皮厄斯和弗赖伊合作设计了英平顿学院（剑桥郡，1933年），这是一所自由地设计的学校，是英国在这个领域领先的开始，而卢别特舍则促成了另外两座现代建筑——“海波因特公寓”（海格特，1933年）和“芬斯伯里卫生中心”（伦敦，1938年）。

美国的建筑是依照历史已有的风格的或者是商业性的；即使赖特的“加利福尼亚住宅”也受了玛雅神殿的影响，它们是辉煌的，但不是现代的。“洛克菲勒中心（纽约，1931—1940年）标志着一种进步，因为虽然它是表现主义的，却是设计成一个建筑群。但是欧洲人带来了真正的变化。瑞士人莱斯卡兹设计了第一幢国际风格的摩天楼（储蓄基金会大楼，费城，1932年），有20年的时间里其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人诺伊特拉把同样的风格用于家庭住宅（洛弗尔住宅，洛杉矶，1927—1929年）。

193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显示欧洲成就的展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赖特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促使他开始了他的第二个创作时期。他的“乌索尼亚”住宅就是他早期的风格适应简单朴素、标准化和造价低廉的要求的产物；而他的“瀑布”（贝尔朗，1936年）

则是将大胆的国际风格的白色混凝土悬臂梁与一座用粗糙的石头建成的塔卓越地结合在一起，与它的自然环境极为协调。

格罗皮厄斯和米耶斯的到来，巩固了这些成就。格罗皮厄斯是哈佛大学新一代的最伟大的教师；米耶斯则接受了设计伊利诺埃工艺学院的校园的任务，通过他设计的建筑物，对他们的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设计的校园布局（1940年）继续使用了他在设计“巴塞罗那馆”时那种线条流畅的古典风格；而建筑物本身却是一些用砖、钢材、玻璃建造的方箱式建筑，回复到了贝伦斯实践过的将工业主义与希腊神殿出人意料地融为一体的风格，但摒弃了表现主义。

斯堪的纳维亚建筑的特点是一种颇具审美力的兼容并蓄，这种风格的杰作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1909—1923年）。但是1930年，冈纳·阿斯普伦德设计的“瑞典馆”（斯德哥尔摩博览会，1930年）以其轻快优美，一举而表现出完全的现代派风格。“贝拉·比斯塔公寓”（1933年）标志着阿恩·雅各布森在丹麦的出现，但是芬兰产生了一位新的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他的“维普里图书馆”（1927—1935年）中，他把讲演厅的天花板做成波浪形的，以满足音响效果的要求，从而比勒科尔比西埃更有力地说明了曲线形式可以是合理的；而他的“梅里亚别墅”则通过使用曲线和天然材料，使一个现代化的别墅与乡村协调一致。

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虽然阻碍了意大利的现代建筑，但还不是致命的。泰拉尼的“人民宫”（科莫，1932—1936年）把国际风格的格栅结构完善地移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上。工程师们甚至更自由些，他们当中内尔维是一位真正的建筑家，他的“佛罗伦萨体育场”（1930—1932年）有一个用悬臂梁支撑着的房顶，看起来像是悬在空中；西班牙人托罗哈甚至超过了这一功绩，他的“马德里看台”（1935年）用像波纹铁那样的轻型弯曲板，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1939年的苏黎世博览会上，马亚尔设计的展览馆像一张弯曲的纸，不过是按照建筑物的比例。它同样有力地证实了混凝土薄壳用于建筑上（如果不是用于艺术上）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工程师们，和弗雷西内一起，揭示出国际风格中利用柱子和桁梁的方法，是如何使建筑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建筑家们依赖耗费昂贵的赞助，而这种赞助并不充分，也不及时，所以结尾部分需要透露一下那些全力紧张工作的当代大师们的情况。勒科尔比西埃的“统一住宅区”（马赛，1947—1952年）是一些“西特罗汉”式单元的集合体，实现了在他所设想的城市中建造设备齐全的房屋的计划之一。但是它那短粗的立柱、太平梯、各式各样的遮阳板，尤其是抽象派的屋顶花园，造型均极优美；混凝土是露在外面的，而且采用拉毛工艺。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完全摆脱了他早期风格中那种讲求轻巧和用机器抛光的做法。在他设计的隆香小教堂（1950—1955年）中，他甚至连正方形的结构也抛弃了。他的建筑造型变得像高迪的一样自由和不合理性。在昌迪加尔（旁遮普，1954—1965年），他设计了一座城市，但强调的已不再是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是单独的大楼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地，米耶斯1952年在伊利诺埃工艺学院校园里建造的“王冠大厅”作为一个巨大的不分隔开的房间，把他的工业神殿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他的“西格拉姆大厦”（纽约，1958年）则把帕提依神庙^[6]建筑师们的精确性用到了玻璃板上。内尔维已履行了贝尔格的诺言，坎德拉履行了托罗哈的诺言，因此国际风格开始在各种传统风格中取得了地位，虽然它关于功用、材料和结构的各项基本原理仍然和以往一样有效。

（宋蜀碧 译）

[1] 亨利·卢梭曾任海关职员，因此被人们称呼为“海关职员”卢梭（Douanier Rousseau）。——译者

[2] 奥费主义（Orphism）或称奥费立体主义，系由法国诗人阿波里耐于1912—1923年首先提出，主要用来描述画家德洛内及其妻子的作品，以别于一般的立体主义。他解释说，奥费主义“是描绘新结构的艺术，其组成元素不仅取自视觉范畴，而且完全由艺术家自创，并将之重新组合，赋予完整的真实……这是纯粹的绘画”。——译者

[3] 维切布斯克是沙加尔的出生地。——译者

[4] 包浩斯（Bauhaus），魏玛建筑研究所的简称。这一派人后迁居美国，成立芝加哥建筑设计研究所。——译者

[5] 这次画展在纽约的第六十九团军械库举行，故名。——译者

[6] 帕提依神庙（Parthenon），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女守护神雅典娜·帕提依的神庙。——译者

第二十三章 1930—1939年间的外交史

到了1930年年底，在凡尔赛和会上建立的不稳定的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在西欧，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的继任者因受失业和纳粹党迅猛发展的压力，被迫放弃逐渐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由于国家衰弱而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在东南欧和地中海，法意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因为法国拒绝考虑意大利关于裁军的立场和它在巴尔干的地位而正在瓦解。在东欧，苏联积极推行集体化运动，削弱了它与德国的重要联系，却没有为苏联人带来任何其他道路，使他们摆脱孤立的地位。在太平洋地区，根据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英美两国已经迫使日本军方及其他方面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阴谋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侵略中国的满洲，而对内则进行革命。为了洗刷他们认为是自己国家蒙受的耻辱，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

这些主要属于政治上的争端，与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相结合，变得更加严重。欧洲在战后的复苏，以及1923年德国发生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以后所以获得恢复，是因为它依靠一种不稳定的、但不大为人们理解的国际贸易体制。这种体制严格依赖黄金作为基础，它的流动储备金不足，却承担了额外的重任，要负责处理有关德国向战胜国偿付赔款、战胜国向美国偿付战时债务所涉及的庞大资金的转移。为了承担这一资金转移所必需的额外流动储备金，大部分是依靠主要来自美国的大量高利率的短期贷款来满足。这笔资金中有一部分早在1928年底就已经开始回流，在美国股票市场出现的巨大繁荣时期被用于投资。1929年9月股票行情猛跌，使更多一部分资金流回美国。当时欧洲还剩有很大一笔“国际流动资金”，后来由于不景气在美国蔓延，这笔资金本身开始加紧在法国寻找栖身之地，使法国在储备金方面具有了信心和财政力量，而在1931—1932年间的经济危机时期，法国毫不犹豫地这笔资金用来谋取政治利益。

德国和奥地利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特别严重（见第十六章）。在德国，为解决德国赔款债务而实行的杨格计划遭到了反对，因而使工业

与金融同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使纳粹党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所获的议席猛增到107个，仅次于社会民主党。德国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同英、法、美三国进行谈判，要求修订杨格计划而未成功，为了寻求外交上的胜利，转而考虑同奥地利缔结关税同盟。奥地利本身经济虚弱，在这种压力下，表示同意。1931年3月德奥在维也纳签订了初步议定书。

在世界舆论界看来，上述议定书似乎是一个初步的行动，目的在于实现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德奥合并。当唯有直接的国际援助能够防止奥地利最大银行——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时候，两个签约国由于在财政上处于虚弱地位，因此要想实现它们的计划，那是既不可能，而且和它们的地位也是不相干的。由于大量的资金从德国和奥地利撤走，英国便来填补空缺，给予两国巨额贷款。美国总统胡佛对美国剩下的资金的命运感到忧虑，被迫在1931年6月提议对于一切战时债务和赔款，准予延期一年偿付。法国希望利用德国的虚弱地位，强迫它放弃关税同盟，终止它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和断绝它同苏联的联系，因此，在关键性的三周时间内拖延了胡佛提议的执行。

在这个时期，向德国银行挤兑存款，从外国信贷蔓延到国内信贷。德国政府向巴黎和伦敦求援；但对于法国的要求，德国鉴于国内的舆论，不可能予以接受。而且，从7月中旬起，英镑开始受到德国马克承受的同样的压力，而这时胡佛提出的延缓偿付期的建议使英国不能收回借给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大量款项。8月24日，英国工党政府在为了支持英镑而必须采取的国内经济措施上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新成立的国民内阁9月中旬完全放弃了金本位，宣布采取节约措施，结果引起了英国舰队的哗变。德国政府因被英国抛弃，便随遇而安，迁就不理想的实际情况，于1931年9月3日放弃了关税同盟，最后认为只有同法国达成广泛的政治谅解，才能对赔款条款实行修订。法国的政策暂时获得胜利，主动权完全在它手中，但一旦等到英国的财政地位得到恢复而金融危机蔓延到德国的时候，这种局面便不能幸存下去。法国的实力是虚幻的，而法国对这种实力的使用，并没有在接踵而至的衰弱时期给它赢得任何朋友。

英国的财政危机与远东国际秩序的彻底崩溃恰好同时。这个秩序主要是以日本对中国及其英美后台的友好关系作为基础。因为，虽然华盛顿九国公约曾于1922年规定签约国保证尊重中国的政治统一和领

土完整，然而，在同一会议上又签署了五国海军裁军条约。这项条约规定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实力与日本的比例为五比三，并禁止在夏威夷、新加坡和日本之间兴建任何设防基地，从而剥夺了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日本侵略时进行干预的海军力量。1931年9月18日夜晩，在南满首府沈阳发生的“事件”，使表面上为保护南满铁路而驻扎在该省的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满洲，并宣布满洲为一个号称满洲国的独立国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由一小批身居要津的日本人组织的，但这是他们对于几方面的联合压力做出的反应：中国国民党为了将日本人驱逐出满洲，曾施加了它的压力。英美两国曾施加了外交压力，它们于1930年3月在伦敦曾迫使日本接受一项第二次海军裁军条约，使日本军方感到这是他们国家的耻辱，同时日本的文官力量有所增长，使军方认为它正在取消日本宪法规定的武装部队的独立地位（见第十二章）。军方的行动，使日本内阁在无法对他们实行控制的情况下宣告辞职。在华盛顿和国际联盟所组织的对付日本的外交压力，即使没有因为缺少力量和意见分歧而变得甚至更加无效的话，大概会因为日本内阁无法控制关东军而宣告失败。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为了对付中国抵制日货，采取两栖作战行动进攻上海，上述情况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国际联盟对于满洲事件已做出反应，派遣了一个由前印度总督李顿勋爵率领的调查团。美国对日本的行动无法忍耐，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932年1月7日宣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拒绝接受以武力实现的政权更迭。但是，正当英国政府开始工作，要使国际联盟接受这一原则时，上海事件却造成了两国之间的误会，结果妨碍英美在远东实行合作达几年之久。史汀生知道美国的力量虚弱，而且胡佛总统拒绝被卷入任何纠纷，因此在写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博拉的信中威胁要废除四国条约与五国条约。英国感到自己没有防御力量，并且担心公开表态将会增强而不是挫败日本的极端主义，因此宁愿展开工作以便实现上海停战和日本撤军。1932年4月3日，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却付出了代价，从此使美国对于英国的毅力和善意完全失去了信心。

美国的谴责和1932年10月的李顿报告中为实现和解而提出的审慎的调停建议都不能约束日本。1932年12月，英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的行动，防止了一些小会员国挑起与日本的直接冲突，因为英国的武装力量由于10年的财政紧缩和1931年财政危机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如

果一旦发生冲突，英国势必首当其冲。虽然如此，日本拒绝了国际联盟采取的一切调停措施，1933年1月24日宣布它退出国际联盟。

拟议中的德奥关税同盟宣告瓦解，使法国在中欧取得了暂时的领导地位。法国设法利用这一地位，不是为了与德国重归于好，而是想建立更进一步的障碍，防止对《凡尔赛和约》进行任何修改。对于多瑙河流域，塔迪厄先生的政府于1932年3月5日提一项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准备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连接起来，并以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提供的建设贷款予以支持。由于法国主动提供的1000万英镑，将会形成经济支援的主要部分，其他三个国家就联合起来，于1932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阻挠这个计划。但是，对意大利的影响，是它完全破坏了法国与墨索里尼的对外政策的合作，因为法国顽固地拒绝接受意大利关于在海军军备中取得平等地位的要求，本来已经使意大利感到不安。4月间，墨索里尼将其外交部长格兰迪伯爵撤职，任他为驻伦敦大使，亲自接管了外交部。在裁军问题上，意大利的政策转向德国；而在中欧，墨索里尼努力设法取得对奥地利的控制，采取的步骤是资助半军事性的民族主义组织——“保国军”和支持匈牙利反对小协约国。

法国对待苏联，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1931年8月，在有关奥德关税同盟的危机达到高潮时，法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以至可以着手起草一项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法国坚持要苏联同它的西方邻国取得和解，结果因为罗马尼亚的顽固态度，这个要求成为泡影。苏联当局当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在它的西方边界上保持平静局面，因此对法国的压力感到不满，因为它没有提供多少好处来弥补苏联同德国关系恶化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苏联面临的前景是在法国支配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这就引起了它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即资本主义世界企图在反对苏联的运动中寻找一个摆脱各种矛盾的出路，而在它看来，这些矛盾造成了世界的不景气。

1932年2月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开幕时，法国提出的裁军计划又增加了上述那些恐惧。自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会议本身一直在酝酿之中。但是，它的筹备委员会每年举行的会议只拟订了一个公约草案，却没有获得任何一个与会国的同意。法国提出的新计划要求实行强制性的仲裁作为裁军的最初步骤，并以一支国际警察部队作为后盾。按照这一情况，它否定了德国提出的对权利平等的要

求，这在当时的柏林，被认为是布吕宁内阁抵制不断增长的纳粹主义浪潮，使自己得以幸存的唯一希望；它使苏联产生一种可怕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展开一个对它讨伐的运动；同时它也面临英国不再接受任何更多承诺的决心。在美国政府看来，它似乎是一个诡计，目的要把会议垮台的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因为人所共知，美国不愿和国际联盟制裁侵略者的行动进行正式的合作。

当会议正在争辩不休时，法国的地位不断削弱，因为英国货币贬值使伦敦获得了财政稳定的局面，却使“国际流动资金”不断地从巴黎外流。英国代表团在幕后竭力想使德法两国联合起来，但结果只是这个计划被胡佛总统彻底破坏。由于总统选举即将到来，胡佛总统在这个急迫形势的压力下，于1932年6月发出呼吁，要求对条约规定的军事力量，全部削减三分之一。对于美国来说，这个要求只适用于国会本来不愿予以批准的舰船。对英国来说，这意味着对未来已经处在为保护国家安全所应有的水平之下的军事力量，需要进行削减。就整个裁军会议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出路，以便摆脱法德两国之间已经形成的僵局。

这个僵局，事实上，与其说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不如说是在洛桑会议上被打破的。6月中旬在洛桑举行的这次会议，试图在胡佛提出的延缓偿付期届满以后，解决德国赔款的偿付问题。布吕宁政府最后在1932年5月底垮台。布吕宁的继任者弗兰茨·冯·巴本企图一举解决德国的全部困难，其具体措施是提议建立关税同盟，缔结协商性条约，以及关于军事参谋人员的安排，而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应同意取消赔款，并使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但这一计划具有过分彻底的改革性，因此不能使法国对其提议人有过多的信托；而法国的新任总理赫里欧先生宁愿接受英国提出的一个协商性协定，其中附有秘密的限制性条款，规定保持一个反对德国的共同阵线。

冯·巴本于1932年8月进一步向法国接近，但同样未获成功。在遭受挫败后，他退而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具体表现是，1932年9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直到德国提出的关于平等权利的要求得到承认时止。当时这种退出会议的做法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大会抓住胡佛总统的干预引起的混乱作为借口宣布休会，而另一方面，则进行秘密商谈，设法使人恢复一些希望，相信裁军会议的商讨会取得各方一致同意的结果。然而，冯·巴本的提议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在东

欧，波兰和苏联感到法德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使它们受到了威胁，乃于1932年7月25日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波兰的榜样被法国自己所仿效，因为法国对于冯·巴本退而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英国重新施加压力，要为德国回到裁军会议寻找一个根据这两种情况，感到吃惊。1932年11月29日，法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巴黎签字。这个条约缔结后，使法国增加了勇气，于1932年12月11日同意五国宣言，这个宣言阐明了德国在“一个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的体制中”享有平等权利，从而使德国能够重新回到裁军会议。然而，这种让步为时已晚，不能防止德国走向纳粹主义。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正当复仇主义的化身在德国爬上权力地位的时候，美国也在使自己摆脱欧洲的事务。1932年11月的总统选举，使一位民主党的总统上台执政，同时选出了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总统与国会都强烈地仇视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观念，决心在孤立的状态下解决美国的经济与财政问题，在对待欧洲问题和国际联盟的态度上，则有一种矛盾心理。罗斯福总统在他当选后与1933年3月底就职前的5个月中，拒绝同即将下台的共和党政府进行任何合作。1932年12月15日胡佛提出的延缓偿付期限届满后，引起了关于欧洲向美国偿付战时债务的危机，结果美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英国偿付了它应付的款项，但警告说，如果不做出某种调整，它预期将会发生普遍崩溃的情况。法国拖欠不付；美国的舆论对于欧洲更加不满。

然而，随后发生的情况更糟。虽然新总统罗斯福对访美的政治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法国总理赫里欧、德国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发表一些哗众取宠的空洞谈话，但他坚决反对任何稳定国际金融方案，并且对他的国务卿提出的关于减少世界贸易障碍的计划，予以漠视。1933年4月20日，他使美元放弃金本位。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它企图制定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某种方案，以便制止国际资本由于恐慌而造成的流动，这种流动使世界经济体系分裂成三大集团，即美元、英镑和黄金。而且不久将迫使德国在一种“长期遭受封锁”的经济中，在经济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罗斯福当时决定公开指责会议提出的唯一的积极建议，所用的措辞表明，他重视国内的经济复兴甚于重视国际的经济复兴。

世界经济会议垮台后，美国的其他债务人日益拖欠他们的战时债务。孤立主义者占优势的国会于1934年用约翰逊法案进行报复，这个法案禁止任何拖欠战债不还的外国政府进入美国的资金市场。同时，美国的舆论越来越反对欧洲并重新解释历史，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由于英国的宣传以及美国军火商和战争贷款者因害怕协约国一方失败而损失了投资所施展的阴谋。到了1935年，参议院迫使总统勉强接受中立法，它规定在发生美国保持中立的国际冲突时，总统有责任禁止对任何交战国，不论是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出口军火。欧洲那些国家，曾得到国联盟约的保证：它将维护国际现状，反对侵略，而且如果必要，将施行军事制裁，但由于上述法案，这些国家一举被排斥在美国的工业以外。

当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从国际舞台的保留席位上退到看台上的时候，新任德国总理正在策划单方面地逐步取消和约，作为将德国推上征服世界道路的一个准备。他在9年前目睹法国侵占鲁尔区带来的后果时曾写了《我的奋斗》一书，书中主张把英国与意大利对法国的畏惧加以利用。现在他又利用这两个国家作为工具来反对和约。他下令建立一支空军，扩充德国的陆军和海军，以便使德国到1938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他开始将他的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下列两个方面：同波兰维持友好关系，以及使他的祖国奥地利与他归化的德国合并（见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对奥政策，既低估了基督教社会党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的力量和决心，同时也证明无法控制奥地利纳粹党。但是各大国除了对这项政策表示震惊外，最初对于希特勒上台执政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应。它们的主要活动是试图把裁军会议向前推进一步，并限制法国在裁军前对安全提出的要求。1933年3月，波兰人对纳粹在但泽的行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增强了他们在韦斯特普拉特的驻军，以炫耀力量；但此后，由于德国的主动接近，情绪稳定下来。1945年后，亲波兰的历史学家们鼓励人们相信，1926年后在波兰实行独裁统治的毕苏斯基元帅，曾向法国提议，对德国施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看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有苏联人，由于对日本向他们在满洲和阿穆尔河^[1]的权益施加压力本已感到惊恐，因而对希特勒做出了正面反应。1933年夏，苏联人中断他们与德国国防军的秘密合作。而苏联的外交开始转到强烈的亲法方向。

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希特勒秘密重新武装德国的措施的情报是令人震惊的；虽然英国的舆论已经同意下列看法：德国重新武装自己的某种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于1933年5月17日发表演说，支持英国在1933年3月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裁军计划。这篇演说被认为足以证明他能控制他的一些妄动分子，另一方面，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希特勒最初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同盟者，共同反对法国势力在东欧扩张，以及国际联盟中亲法国的小协约国集团。1933年3月，墨索里尼提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缔结四国公约，目的在于用四大强国共管制度来代替国际联盟采用的议会制度（墨索里尼憎恶这种制度），同时想对1919年的和约在东欧实行一致同意的修改。上述公约本身以经过大量删削的形式，于1933年6月7日缔结。紧接着发生了奥地利危机，因为希特勒加紧广播宣传，对奥地利施加经济压力，在奥地利内部煽动怠工，而陶尔斐斯向英国呼吁，要求给予支援以反对德国，并准许它招募短期服役的民兵，将奥地利军队增加到3万人。1933年8月7日，英法两国在柏林联合宣布新的外交方针，墨索里尼保证向陶尔斐斯提供意大利军事援助，而陶尔斐斯则以增强其政府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回报。

由于共同反对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企图，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地缓和下来。在1933年夏天的具体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对奥地利施加的这种压力，同德国秘密地重新武装自己的消息结合起来，对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和裁军会议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英国内阁认识到，在国际合作看来仍然发生作用的这个唯一领域内，他们获得任何成功的希望，都由于希特勒的行动而受到很大的影响。法国对它的安全的忧虑，第一次被人看来并不是过分夸张；因此，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接受了法国的一项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双方同意的国际监督制度，并对它实际考验4年，然后才能对德国在军备领域中享有的平等权利加以接受。英国拟定的草案将这个经过修订的麦克唐纳草案包括在内，于1933年10月提交给裁军会议。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做出的答复是，德国不但退出裁军会议，而且退出了国际联盟。

日本和德国在同一年内先后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两个事件促使英国对其武装力量极其虚弱的状况，尤其是根据关于德国在空军方面重新武装的情报，感到十分忧虑。1933年底到1934年初的那个冬天，英

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防务需要问题小组委员会对于英国国防弱点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它在1934年2月提交内阁的最后报告，强调英国的安全受到了日本和德国的威胁。它提出的军备方案，使英国财政部感到它已超过英国经济的负担能力，因为经过1931年的压力后，英国的经济仍然虚弱。全体内阁阁员对防务需要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考虑后，随即展开了辩论，在辩论中，有的论点认为，实行充分军备，费用浩大而财力却不足，因此要求采取一种以明智的让步来避免冲突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坚持到1938年的冬天。

防务需要问题小组委员会判断日本对英国利益的侵犯在时间上会更早一些，但归根结底，德国对它们的威胁毕竟要更大一些。它的报告引起了认真的研究，探讨是否可能与日本取得谅解，因为日本在满洲获得成功，看来比以前更加好战而不是有所收敛。1933年冬天，日本的侵略野心所以被刺激起来，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愿意向欧洲寻求支援来促使自己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欧洲和华盛顿展开积极的活动。国际联盟派往中国的顾问团和援助团的数目似乎在增加。为了使它的武装部队实现现代化，中国向德国求援，邀请1919年后成为德国军队创建人的冯·泽克特陆军元帅就如何培训一支精锐军队提供意见；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和意大利与美国的空军代表团都积极地培训中国的武装部队。日本当局重又感到中国一旦在军事力量方面实现了现代化，经济上取得了健康发展，政治上又取得了统一，它将对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形成威胁。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一项声明，宣称日本在维护远东的和平中应享有特殊的地位，并宣布日本反对外国对华的一切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论这些援助是双边还是多边性质。

英国政府对天羽声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然而，它在以后却竭力劝说美国当局在海军裁军问题上采取联合政策，以抵制日本政策中更加极端的民族主义因素。华盛顿海军条约与伦敦海军条约将在1936年底届满，而日本和法国正扬言要废除这些条约。由于看到了一个新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前景——英国15艘主力舰中，有12艘在1936年以后需要更换——因而它们进一步加紧自己的努力；而且，因为英国内阁在1934年6月显然最后认为，为弥补英国国防缺陷所留下的有限的国家收入，应当用于补救英国几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空军，而海军建设至少必须延缓。然而，日法两国没有能获得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相

信日本的财力本身就不够满足它成为一个主要海军国家的要求，或者也不能冒战争的风险。1934年12月31日，日本正式废除上述两项海军条约。它对华北地区的入侵在翌年继续进行。

对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看法，在伦敦与在巴黎有所不同。为了试图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进行某种补救，英国政府转而考虑同意使德国的重整军备合法化，而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应对国际安全做出某种贡献。法国的反应却被推迟，因为当时它正面临着由于斯塔维斯基财政贪污丑闻和右派的示威而引起的危机（见第十七章）。杜梅尔格内阁于1934年2月7日组成，以路易·巴尔都任外交部长。它特别倾向于使法国同意大利和苏联缔结协定来遏制德国。李维诺夫尤其主张缔结集体协定，因此他和巴尔都于1934年5月18日提议缔结一项东方安全协定，这个协定遵照洛迦诺公约的路线，以法苏互助条约作为后盾。法国内阁已经表明，它对英国的计划无法接受，因为4月17日，它利用德国国防预算增加的机会，断然拒绝经英意两国调停而由德国提出的建议，即将其新编军队即定为30万短期服役士兵，而且只配备“防御性”武器。

德国对于东方洛迦诺建议已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因为希特勒对波兰进行劝诱已获成功，终于在1934年1月26日缔结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波兰人以猜忌和敌对的眼光，观察法国努力设法通过对苏联的拉拢来调整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尽管巴尔都于1934年7月9日至11日在访问伦敦期间由于受到英国的压力，努力使上述建议在表面上看起来不是明显地为了控制德国和削弱波兰的国际地位，但德国于1934年9月10日，波兰于9月27日，却轻易地找到借口将建议否决。1934年德国国际地位的每况愈下，不是由于法国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内部危机和希特勒的对奥政策的彻底失败。

自从1933年夏天以来，德国对奥地利施加的压力迫使陶尔斐斯逐渐地投入墨索里尼的怀抱，这样一个发展事实上是由于法国和英国的鼓励，虽然陶尔斐斯自己做出努力，想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1934年1月，意大利事实上命令他用武力镇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结果，在2月12日至16日采取的军事行动，使陶尔斐斯失去了英法两国舆论的同情，以致他成为墨索里尼的手中物。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有必要维持奥地利的“独立与完整”。但是，实际的形势于3月17日显示出来，因为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三国的代表签

署了罗马议定书，规定了共同协商的办法。由于匈牙利的反对，才防止意大利加强这个议定书，使之成为关税联盟。但其结果却使意大利牢固地奠定了它在中欧的地位，而中欧的稳定局面现在依赖意大利的修订和约派伙伴和法国在小协约国中的同盟者之间建立的不稳定的力量平衡。如果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破裂，则会使所有这些国家同样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中。

这时，希特勒宁愿加速步伐。6月15日至16日他在威尼斯和墨索里尼会晤，相信已取得意大利的支持来实现他想把著名的奥地利纳粹党员纳入陶尔斐斯内阁的希望。他的错误究竟有多大，关于这点，在7月25日由一群奥地利党卫队试图举行的政变所带来的后果中显示了出来。关于这次政变，他也许事先并不完全知情（第十六章）。世界舆论本来对于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清洗德国纳粹党冲锋队的领导人物以及他所选定的以前的仇敌和对手，已经十分震动。这次奥地利党卫队将陶尔斐斯谋害，不仅使世界舆论感到震惊，而且促使墨索里尼调动4个师前往奥地利边境——给法国和意大利为实行反对德国的直接合作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种合作剩下的主要障碍，是南斯拉夫对意大利的畏惧。南斯拉夫事实上采取了同样的军事调动，以回答意大利军队向布伦内罗山口的调动。巴尔都企图消除南斯拉夫的这些忧虑，却于1934年10月9日，与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同被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刺杀，这些恐怖分子是由意大利和匈牙利当局组织、训练和资助的。

巴尔都的继任者，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继续执行巴尔都的政策，却改变了重点。就意大利和苏联而论，他宁愿要意大利的支持。对于德国，他考虑更多的是争取和解，而不是施加压力。因此，他优先选择缔结一个由四大国组成的欧洲条约而不是与苏联缔结的同盟。而且，他恢复了东方洛迦诺计划，把它作为防止上述同盟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像巴尔都曾经筹划的那样，作为缔结同盟的一种掩护。他对德国的友好态度使他在和平地解决萨尔问题中采取了合作态度。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地区举行了公民投票，通过正式投票表决，赞同该地重新与德国合并。赖伐尔的主要努力用于对意大利的接近。1935年1月7日，他同墨索里尼在罗马会晤，并同后者缔结了一系列协定，解决了两国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殖民地问题，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享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使两国在欧

洲进行合作，赞同缔结一个多瑙河条约来抵制对奥地利独立的任何威胁，并反对德国单方面废止凡尔赛条约对它重整军备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军事参谋协定在1935年6月实际上已在谈判中，它补充和加强了上述那些协定。

与此同时，英国内阁对英国国防缺陷仔细研究后，被德国秘密地重整军备的消息弄得深为不安，但究竟采取什么对策，却很难决定。有人竭力主张谴责德国和鼓励法意合作。但是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及其支持者仍然希望以宣布德国重整军备的合法化来换取一项全面的欧洲和解方案，从而解除英国——以及法国——对安全的忧虑。德国应当重新加入国际联盟，接受东方洛迦诺条约和1934年2月关于奥地利的宣言。西蒙于1934年12月22日在巴黎竭力要赖伐尔接受这些计划。

接着，在1935年2月1日至3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举行了更详细的会谈。法国的部长们表明，除非他们自己针对德国而享有的安全地位有所增强，否则决心不接受英国的计划。他们提议缔结一项空中协定以保证洛迦诺公约的签字国不遭受突然的空袭，当时的舆论相信这种突然的空袭充分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因而使惯常的陆地入侵变得毫不必要。1935年2月3日发表的最后公报，扼要说明这样的计划将成为总的和解方案的一部分，其中亦将包含一致同意废除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的规定。这个提议交给了德国政府。但是，希特勒从中觉察到英国不愿采取任何更有力的行动。而且，当英国政府在3月4日企图根据德国的状况而为自己的重整军备方案辩解，同时法国提议将征兵服役期限从一年增至两年的时候，希特勒抓住机会，片面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第五部分并宣布德国重新实行征兵制。

希特勒的行动几乎使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取消了他们计划对柏林进行的访问。然而，尽管法国和意大利表示疑虑，他们仍然前去，在3月25日至26日同希特勒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希特勒与此同时已宣布成立了一支德国空军，却对这两位大臣明确表示他对英国的友谊，因而使他们不知所措。但是，他提出的唯一积极的建议就是缔结一项英德协定，排除两国之间的海军竞赛。有一部分英国官方意见对于英国海军的弱点和日本的威胁感到忧虑，因此上述建议引起了他们的某种兴趣。然而，英国对于这次访问的主要反应是，英国更加需要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进行调停。

这个需要之所以变得更加紧迫，是因为法国召集英国和意大利参加在斯特雷扎举行的一次关于德国行动的会议，而且，它还向国际联盟行政院呼吁。更为重要的是，赖伐尔在他的同僚们的压力下，已在法苏谈判中达到最后的阶段。4月11日至14日，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在斯特雷扎决定要缔结参谋协定（1935年5月和6月缔结），并在陆军与空军方面进行合作，以抵制德国在奥地利或莱茵河区的侵略。约翰·西蒙爵士为英国所能做出的一切努力就是防止最后的公报在谴责德国方面显得过分露骨。4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上述方式又重新予以应用。1935年5月2日，在法国的东欧盟国（其中包括罗马尼亚，但没有波兰）的同意下，法苏互助条约在巴黎签字，条约的条款甚至无须国联行政院一致同意即能生效。5月16日在布拉格签署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内容相仿，唯一差别是它只是在法苏条约实施以后才能生效。

法苏条约的缔结标志着法国的反德政策达到顶峰。但是，由于1935年6月18日英德两国缔结了海军协定以及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直接与英国和国际联盟发生冲突，因此，法苏条约的基础几乎立即遭到破坏。希特勒提议和英国商讨海军军备问题，这正符合英国正在进行的计划，即制定一个新的海军条约以代替日本曾经予以谴责的条约。但是，6月5日，一个由希特勒的私人大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率领的德国代表团到达伦敦后，德国人拒绝参加任何有关海军问题的会谈，除非英国接受一个双边协议，确定德国的海军力量达到英联邦的海军力量的35%。英国内阁接受了协议，把它当作一种措施，至少在一个方面捆住了希特勒的手脚。但是，欧洲的舆论从这个协议中看出英国原谅了德国对凡尔赛条约所做的谴责。法国和意大利的反应特别强烈。

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同时，英意两国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关系明显地变得尖锐化。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所抱的不良企图可以追溯到它在1896年被阿比西尼亚在阿杜瓦击败以前。1906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一致同意，一旦阿比西尼亚政府垮台，则将它划分成势力范围，由意大利控制最大一部分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和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进行争夺时期，法国和德国赞助阿比西尼亚参加国际联盟，尽管阿比西尼亚仍然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封建国家，普遍实行奴隶制，中央政府的命令只是偶尔通行全国。英国在1925年12月英意两国

互换的照会中宣称，它对整个阿比西尼亚没有兴趣，仅对尼罗河在塔纳湖的源头表示关切。1928年8月2日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协定，看来已经给予意大利以必要的跳板，使它在阿比西尼亚建立经济优势。

然而，到了1934年，阿比西尼亚的新皇帝海尔·塞拉西决心抵制意大利的侵占。同一年，墨索里尼似乎已经决定使用他作为奥地利的保证人的重要地位来攫取阿比西尼亚，以完成他获取东非领地的事业。在瓦尔—瓦尔发生的一个边境事件，涉及意属索马里兰与阿比西尼亚之间未曾勘定的边境地区内的一批水井，这就给意大利提供一个借口采取行动，尤其是因为阿比西尼亚拒绝了意大利的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月3日至7日，当墨索里尼和赖伐尔在罗马会晤时，墨索里尼使赖伐尔同意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建立优势地位；不过，看来赖伐尔不大可能想到墨索里尼会使用武力来向国际联盟挑战。但是，意大利做出同样的努力，企图使英国认可事实，却由于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申诉后英国反对意大利的舆论非常激昂而告失败。英法两国企图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进行调停，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因为阿比西尼亚过分相信国际联盟有能力约束意大利。

到了1935年6月中旬，英国内阁增强了它的信念，认为根据以约翰·马菲爵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没有任何直接的英国利益受到牵连，但它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的舆论反映出强烈的反意大利的情绪；内阁的外交顾问们不愿采取任何足以招惹意大利对抗，并迫使它投入德国怀抱的行动；它的参谋长们提出劝告，指出英国的武器不足以应付对意战争，而且，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损失，这就会大大削弱海军的力量，以致破坏在远东抵制日本侵略的机会。

6月间，艾登访问罗马，后来又在巴黎举行英、法、意三方会谈时，英国试图说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接受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它企图进行军事占领的计划，结果没有成功。它的失败促使他们承认必须行使国际联盟盟约，尤其是第十六条及其关于实施经济制裁的规定；但是，为了奏效并避免和意大利发生纯属两国之间的冲突起见，英国所能采取的行动无论就其范围或速度来说，都不能超过法国所赞同的程度，因为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在陆海军方面给予合作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一些小国对于国际联盟成功地制裁意大利的行动不担多少风险，却可获得很大的好处，因此，鼓动这些国家的舆论证明要比推动

法国容易得多。塞缪尔·霍尔爵士在9月11日向国际联盟大会发表的演说（他在6月继约翰·西蒙爵士任外交大臣）制造了一种错觉，使人认为世界各国团结起来，一致反对侵略，而由于赖伐尔不愿使法国和它一个反德的盟友疏远，因此这种团结便失去了任何反对意大利的真正力量。

意大利充分相信法国会故意阻挠国际联盟通过决议，便在10月3日正式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做出反应，谴责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它们使经济制裁（见第九章）。对禁止输往意大利的货物进行详细的检查，揭示出许多特殊的辩解理由。奥地利和匈牙利拒绝参加这一行动；苏联对意大利的输出品与它平时的标准相比，没有多少差别。然而，真正的症结是将禁运措施扩展到石油、煤炭和钢铁。这个建议，赖伐尔成功地予以拖延，直到新年以后很久才加以讨论。英国企图获得法国更坚决的支持，但法国的反应是它不愿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作为交换，它能得到明确的保证：如果德国在它与法国接壤的莱茵兰边境重新设防，英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这就进一步诱使英国企图依靠赖伐尔的帮助来提出一个方案，借此能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进行调停。这样一个方案的最后细节，于1935年12月7日至8日在巴黎由霍尔和赖伐尔确定下来。他们没想到意大利将要保持当时已在其军事占领下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将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意大利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将和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交换条件，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部分地区将划给阿比西尼亚，使它获得一个直接的出海口。

这个计划泄露给巴黎新闻界后，在英国和法国掀起轩然大波，招致公众谴责，以致断送了签署人的前程。艾登继塞缪尔·霍尔爵士任英国外交大臣，看来也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而只好等到阿比西尼亚的雨季使正在进行的军事战斗停止时，有可能进行一次新的调停。弗朗丹在法国接替了赖伐尔，和他的前任者一样坚决地反对实行石油制裁，而另一方面，做出甚至更多的努力，企图从英国获得关于防止德国违反洛迦诺公约的进一步保证。在这方面，弗朗丹不比赖伐尔获得更大的成功。事实上，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已经决定莱茵兰不是一个英国应当为之而战斗的争端，再一次忍不住想要利用希特勒自称希望合法地使他自己摆脱凡尔赛条约的说法，作为实现一项欧洲和解方案的手段。

这一想法既欠考虑，而且也不合时宜。在1935年年末至1936年年初那个漫长冬季中，墨索里尼逐渐向希特勒表明他将不再支持法国。1936年2月中旬，希特勒在罗马进行初步试探，作为重新武装莱茵兰的准备。1936年3月7日，他派遣小规模的和平时期驻军进入莱茵兰城镇，然而却谨慎地不太过于接近边境，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主动提出要回到国际联盟并和德国的所有邻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对于法国政府来说，这个行动发生的时机是再糟也没有了。在它的东欧盟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支持它。南斯拉夫采取推诿态度。波兰表示要尊重它们之间的盟约，但这只有在德国军队越过法国边界时才能生效，而越界问题并非争端所在。比利时政府需要佛兰芒人对它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给予支持，在这一压力下，只是在上述行动的前一天才通知终止法比同盟。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宣告失败，从而排除了国际联盟采取反德行动的一切希望。而法国军队盘踞在马奇诺防线的巨大防御工事后面，只是在极其勉强的情况下才考虑突然侵入莱茵兰。

法国政府向洛迦诺公约签字国和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成员国发出呼吁。但他们的呼吁未引起任何反响。比利时是一个比法国虚弱得多的国家，其安全也同样受到德国的行动的影响。比利时政府拒绝使自己参与法国的要求，这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德国对国际联盟行政院中一些较好的成员国却施加外交压力。然而，主要的角色则由英国来扮演。英国的舆论由于希特勒主动声称他将重新加入国际联盟，并准备商讨缔结一个欧洲总的和解方案而受疑惑，同时英国唯一可以调用的军事支援也因反对意大利而留在地中海区，终于拔不出来。英国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保证，如果德国一旦发动进攻，英国将给予军事援助；而双方初步的参谋会谈事实上已于1936年4月15日至17日在伦敦举行。但是，英国所做的主要努力全都在于试图迫使希特勒就西欧的安全问题举行新的会谈。谈判一直拖延下去，直到1937年年底，艾登的耐心与德国人的拖延相匹敌。但在这14个月中，欧洲整个状况已发生了变化（见原书下面740—741页）。

1936年5月6日，意大利攻入亚的斯亚贝巴，比雨季的到来早一个月。艾登曾经希望趁雨季通过谈判实现和解。此后，由于对意大利施行制裁宣告失败，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获得成功而未受西方国家的干扰，国际联盟中的小国随即大批地退出以前的集体安全体系。在小协

约国委员会中，罗马尼亚的领导在5月6日至7日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上重新获得对集体安全制度的公开支持。但是，罗马尼亚外交大臣尼古拉·蒂图列斯库于8月底在诱使下辞职，从此罗马尼亚日益靠拢德国和意大利。南斯拉夫竭力减轻它和意大利及匈牙利的关系中原有的紧张状态，并主动地和保加利亚举行会谈，最后导致在翌年1月缔结的友好条约。希腊首相梅塔克塞斯将军利用5月4日至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巴尔干各国会议明确表示，希腊不会承担巴尔干半岛以外的任何义务。

德国在沿多瑙河地区发动的一次重大的贸易攻势，对于某些巴尔干国家也不是没有产生影响。然而，土耳其的实例表明，这次攻势并不具有当时归因于它的那种深远影响。土耳其努力想保全它的地中海边境，采取的措施是保持和英国的友好关系，同时尽其所能来改善和意大利的关系。然而，它的主要努力用于它更加直接的亚洲边境。1936年7月，它在蒙特勒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不顾苏联的激烈反对，给它以充分的自由对达达尼尔海峡重新设防。9月间，它强烈抗议法国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缔结的旨在实现叙利亚自治的协议，并开始引起一次危机，只是在国际联盟行政院进行干预，将哈塔伊地区，即部分由土耳其人居住的亚历山大勒达省从叙利亚分离出去，将它置于特殊的统治之下，这次危机才于1937年5月结束。1937年7月，它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调解成功，使它们和阿富汗一同缔结所谓东方协约，并于1937年7月8日在萨达巴德的伊朗国王夏宫签字。

对意大利的制裁实际上于1936年7月15日由国际联盟撤销。7月1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4个国家以及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的外交部长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如果将来运用任何制裁手段，他们不准备接受。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两年以后（1938年7月23日）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哥本哈根继续发表一项具有更深远影响的宣言。瑞士也明确表示它将重新奉行传统的中立原则。

然而，在比利时和美国却产生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比利时人同意和英国举行参谋会谈，以此作为开端。但是，当事实表明德国无意同它的西方邻国缔结一项新的集体保证条约时，比利时国王于1936年10月14日公布他向内阁发表的演说全文，宣布一项“比利时的排他性”新政策，目的在于“使我们与我们邻国的冲突隔离开来”。1937年4月24日，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勉强同意让比利时不再受洛迦诺公约的

约束，另一方面又重申它们保证比利时的领土完整，10月13日，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1935年至1936年的事变，在美国被人们用同样关切的眼光注视着。国际联盟禁止对意大利的贸易，在美国做出的反应是禁止同意大利进行军火贸易。但是，美国政府无权实施更广泛的禁运，而美国在石油、卡车、钢铁方面和意大利进行的贸易在10月几乎增长了1倍。霍尔—赖伐尔方案破坏了实行“道德上禁运”的企图，促使主张实行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人物提议通过比以前要严厉得多的中立法案，使总统享有的自由处理权很少或根本没有。辩论在1936年至1937年间剧烈地进行。1937年5月1日通过的最后的的中立法案，自动地禁止出售军火、贷款、乘交战国的船旅行以及武装与交战国贸易的美国船只。向交战国的其他输出品，则需经总统斟酌决定，按规定将货物的一切所有权转到给购买这些货物的交战国名下，方可运离美国。这就是所谓“现购自运”条款。它产生的后果是几乎使美国军火工业对英法两国关上了大门，使英国政府在和德国发生任何战争时面临这样的事实：它需要用现金，而不是像在1914年至1918年那样依靠信贷来筹措战费。

然而，1935年10月至1936年3月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被毗连德国东南边界的国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感受到。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破坏了意大利帮助奥地利的能力和愿望。奥地利人在短暂时期内转向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但是谈判归于失败，因为这些斯拉夫人的国家坚决认为，奥地利当局应当正式放弃有关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企图——这损害了舒什尼格的拥护君主政体的计划，使他不愿接受。此后，奥地利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墨索里尼宁愿使奥地利同德国而不是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的打算，迫使舒什尼格同德国进行和解。根据1936年7月11日的所谓“君子协定”，德国承认奥地利的独立，并保证不干涉它的内政。作为报答，舒什尼格同意准许奥地利民族反对派（亲德但不公开其纳粹面目）的代表参加他的内阁，保证执行与德国相仿的外交政策，准许德国报刊享有在奥地利境内传播的充分自由。表面上，这是一项和解方案，事实上，这项协议只是德国给予奥地利的一项暂时的生存许可证。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它现在在中欧完全陷于孤立地位，它所获得的唯一保障，就是法国为了保护捷克斯洛伐克，愿意招致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

这一重要时期的事件，实际上完全粉碎了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建立的国际秩序，而且极其彻底地暴露了对上述秩序做出保证的主要欧洲国家，在军事上和心理方面没有力量保卫它免受单方面的修改。它们还暴露出尽管有国际联盟盟约建立的集体主义的假象存在，但对这种集体主义的真正保卫则依靠欧洲的大国。然而，这些大国中的主要国家英国和苏联，由于1931年至1933年远东安全体制的早期失败，因而在整个这一时期受到了不断的压力。如前所述，1934年英国曾经企图试探是否可能实现一项新的太平洋和解方案，结果遭到失败——其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继续不愿接受一项有利于日本的和解方案或者联合英国一起建立一个障碍来制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犯。在同一年，苏联通过把它在中国中东铁路的权益卖给日本的谈判，取消了在它自己亚洲边境以外的任何许诺。这些权益的最后转让在1935年3月取得了协议。然而，俄国人在实现这一协议的同时，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外蒙古和新疆的地位。苏联的远东军得到了大力增援，并且采取了下列政策：只要日本军队对边境进行任何侵犯，立即予以反击。在整个1935年，沿满洲和外蒙古一带的边界，它同日本军队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1936年3月12日，苏联人和蒙古当局签署了一项互助议定书。

但在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的主要努力用于入侵中国。它采取了两种方式。日本从东京施加外交压力，企图排斥西方给予中国的援助，并迫使中国和日本缔结从属性的同盟。在东北，关东军及其附属部队企图将日本的势力扩展到华北五省。日本的主要武器是由美国真正无偿地提供给它的，在美国由于来自多山的州^[2]的参议员们的压力，1934年8月通过法案，提高白银的美元价格。它引起的后果是支持中国货币所必需的白银不断地从中国外流。1934年10月，中国对白银征收巨额出口税，企图借此停止白银的输出，但是它带来的唯一后果是白银走私活动大量增加，日本人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予以鼓励，以此作为对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施加经济压力的一个武器。在它的货币面临立即崩溃的威胁下，中国向英国和美国发出呼吁，要求给予财政援助。美国既不愿进行干预，也不愿修改它的白银法案。英国人由鉴于欧洲日益增长的威胁，仍然希望维持远东的现状。然而，他们再一次无法使美国给予他们支持，因此逐渐改变态度，对日本的行动采取更露骨的批评，并以实际行动加以支持，他们派遣内阁的首席经济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前去中国对币制改革提出建议。

与此同时，日本在这一年中同蒋介石和中国行政院长汪精卫举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从中显示出日本的外交压力。汪精卫主张不惜以任何条件和日本达成协议，但是，1935年10月，日本首相广田宣布他为和解方案提出的“三原则”，这事与关东军在华北的活动结合起来，掀起群众反日情绪的高潮，使得与日本根据这些条件实行任何和解的打算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广田的“三原则”是：缔结反共同盟；放弃挑拨一个外国反对另一个外国的企图；按照对日本极为有利的条件，实行经济“合作”^[3]。然而，这些条件虽早在1935年5月初第一次提出，但对于关东军来说，它们的意义却不够广泛，于是关东军在1935年5月在热河省、河北省和内蒙古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目的是要使这些省完全脱离南京的控制而成为日本的卫星国。1935年7月6日的何梅协定确认了日本希望在热河省所要的一切。1935年1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它在这两个省实现了它的要求。

就日本人来说，李滋罗斯代表团没有获得任何成就。但是，它却帮助中国人于1935年11月将白银收归国有，借此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经济问题。美国在同一月同意收购5000万盎司白银，这就进一步帮助中国为其货币体制奠定一个新的基础。不久以后，白银在美国的价格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由于这种鼓励，中国人在英国的建议下，调整了对英国债券持有者规定的现有条件，使之有一个更加易于履行的基础，同时开始执行一个扩建铁路和工业的颇有雄心的计划，在扩建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在双边的基础上参加；1936年4月，蒋介石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军火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以原料来换取广泛的军火。

日本对所有这些发展的反应是强烈的。一方面，日本陆军和希特勒的代表冯·里宾特罗甫开始秘密谈判，想要达成一项反对苏联的协议。另一方面，内部的斗争于1936年2月酿成陆军中一派军人的哗变，他们企图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的失败，说来也怪，却大大地增强了对立的一派的政治力量——结果其力量之雄厚足以完全控制日本外务省，并重新和德国举行关于缔结反共产国际条约的谈判。一个目标是使德国减少它对中国的援助。然而，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要巩固日本面向苏联的北方边境，以便它有可能更有力地进行对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侵犯。日本内阁在1936年8月11日决定的“国策基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迁就了关于维持友好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目标的要

求，但却明确表示日本将要遵循的“帝国道路”是“向海外扩张”并将国家建成为东亚的“稳定力量”。

反共产国际条约在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字。条约的公开条款说的完全是共同协议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并邀请其他国家参加。10月24日签署的一项秘密议定书则要求签字国保证，任何一方卷入对苏联的战争，则另一方必须在外交上（尽管不是在军事上）给予支援。议定书的条款通过情报渠道，立即被苏联和英国获悉。后来日本外务省努力想在外交上加以利用，其做法是同英国商谈建立友好关系。这在莫斯科看来，令人十分担心，而伦敦则以怀疑的眼光表示欢迎。上述条约设立的各种委员会及其他等从未行使职责，条约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两个签字国主要是在宣传方面对其加以利用。在德国，这是冯·里宾特罗甫的工作，而不是外交部的工作，里宾特罗甫认为同意大利达成1936年10月21日的协议而进行的谈判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协议标志着轴心国的形成。

这些谈判导致1936年10月德意两国签署协定和墨索里尼于11月2日发表演说，宣布轴心国成立，但推动这些谈判的力量则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国提供的。意大利曾以很大的猜疑看待制裁的结束；墨索里尼及其党羽，往往把是否事实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和是否承认意大利国王，作为一个真正的标准来衡量就在不久以前对他们施行制裁的那些国家对他们表示的友好。实际上，墨索里尼根据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深信英国对他满怀敌意而他需要和德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些信念最后可能消失——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发生摩擦的原因毕竟很多，尤其是关于德国在巴尔干诸国的贸易竞赛和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关系。但是，1936年6月在法国选出一个由法国社会党人勃鲁姆先生领导的中间派和左派组成的政府（即所谓“人民阵线”政府），同时1936年7月15日在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就使墨索里尼有一整套新的理由依附德国。

1936年7月15日，西班牙的将军们举行叛乱，反对1936年1月当选的中间派——左派政府，这次叛乱完全由于西班牙本身的原因。几乎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德国或意大利事先获悉这些将军们的计划（虽然根据1934年缔结的协定，意大利一直向西班牙的右翼集团提供军火）。但是，他们的叛乱一旦没有能够以过去的军事暴动时常推翻西班牙政府那样的方式把西班牙政府推翻，西班牙的军事领导集团就利用一切

可用的渠道向意大利和德国吁请给予军火；而在内战爆发后两周以内，意大利和德国的军火和飞机源源不断地涌往马略尔卡岛和摩洛哥的西班牙军事据点。

西班牙政府方面则向法国要求军事援助。勃鲁姆政府发生了深刻的分歧，而英国在勃鲁姆于7月底访问伦敦时给他的忠告，往最好处说也只能是敌视西班牙政府的。英国保守的舆论对于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反对僧侣的暴行和屠杀民族主义者的事件感到十分震惊；英国政府也十分害怕由于西班牙的原因而引起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正如它曾害怕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那样。勃鲁姆的外交部长德尔博斯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即建议在欧洲强国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保证不用军需供应、财政支援和志愿军在西班牙进行干预。这个建议到1936年8月底被所有的国家接受，从而又导致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协议的执行。但是，到了1936年9月9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事实表明协议没有得到尊重。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输送大量武器到西班牙以支持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者；而在9月初第一批运来的苏联军火和顾问则开始到达西班牙政府的军队里。同时，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开始控制与西班牙政府军并肩作战的一小批非西班牙籍的志愿兵从中组成国际纵队。由于西班牙民族主义派的军队第一次进攻马德里时被击退，因此，德国和意大利轮流派遣军事部队（婉转地称作“志愿军”）在民族主义派军队攻打首都和北方的巴斯克共和国时充当补充力量或担任前锋。在以后的18个月中，欧洲的外交被西班牙内战引起的争端所左右。

德国在这场内战中的目的是很明显的。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经济的：西班牙的铜和其他矿产资源具有吸引力。从这点出发，希特勒产生了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发生战争的想法，从而使他能够同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算账。因此，德国在军事上卷入西班牙内战，严格地限于装甲部队和空军方面，而德国军事战略家利用这一机会来试验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在参谋学的研究中所形成的闪电战术，却大有收获。苏联的目的比较隐晦。西班牙内战对他们十分有用，可以作为一个手段在法国建立拥护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力量，而在英国，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宣传价值。他们试图将“不干涉委员会”变成一个实现集体安全的工具。而且，正如希特勒希望

利用战争使法国和意大利卷入纠纷那样，苏联很可能希望利用这场战争使英法两国和德国发生纠葛，而把德国的军事努力引向西方。

俄国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谈判进展，消息非常灵通。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对斯大林的反对者们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次清洗翌年使苏联的军事领导人物除了占百分比极小的高级军官外，全被撤掉，总起来说，影响到苏联军官总数的30%至40%。其结果是破坏了苏联军事力量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在苏联除了斯大林本人的领导以外，消除了任何可能的其他领导来源。因此，引人瞩目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斯大林决定通过他的格鲁吉亚同乡、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团团长达维德·坎杰拉基接近希特勒，提出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实现谅解。这次对德国的接近遭到了拒绝，对方评论说，如果俄国发展成为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专制国家，那么，将来可能举行这样的谈判——这正是预示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条约的不祥之兆。

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府来说，它们在“不干涉委员会”中奉行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设法使德国和意大利撤出西班牙，以此作为一个开端，以便再做一次尝试来商谈欧洲的和解方案。由于战争持续下去，意大利对民族主义派领袖佛朗哥将军的支持变得较前更加肆无忌惮地露骨，因此，他们自己的意见也变得更加分歧，安东尼·艾登和连续几届法国政府被迫日益采取更加反对意大利的立场，而其他人物，尤其是1937年5月底在英国担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都不得不在他们为开始新谈判所做的努力中完全不考虑西班牙问题。

对比之下，意大利政权看来从未彻底考虑过它对西班牙进行干预的理由。很可能，墨索里尼真正相信他自己的宣传，认为自己是反对苏联将在西班牙实行接管的一位斗士。他的努力遭到很大的挫折，以致意大利对西班牙民族主义派的支援逐步升级，直到撤退就意味着失败，1937年3月意大利在瓜达拉哈拉遭到失败后，情况尤其如此。然而，对于意大利来说，在西班牙的冒险行动是灾难性的。它在国内不得人心，又使得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对抗，并且不论意大利是否愿意，迫使它投入德国的怀抱，而另一方面，德国不断地接管意大利在多瑙河流域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经济领域内，这个冒险行动耗尽了意大利的武器和钱财，并使它不能从制裁造成的后果中恢复过来。西

班牙内战把墨索里尼从一个与希特勒地位相等的人物，降为希特勒的仆从。

意大利与德国的关系，至少到1937年年底，由于它担心英国和德国缔结协约而不断地出现不融洽。而且，这种关系不仅支配着导致1936年10月齐亚诺伯爵对柏林进行访问的那些谈判——当时签署的议定书大体上代表着意大利所做的尝试，想在例如对国际联盟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和为在西欧缔结一项安全条约而进行的谈判这些方面钳制德国，意大利担心由于德国希望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这就可能使德国接受那些将使意大利陷于孤立的建议。甚至在这以后，意大利人也发现，他们不得不按照德国的行动来缓和他们自己的对英政策。

他们的地位由于希特勒施展的等待策略而变得更加困难。1936年夏，他开始实行一项新的重整军备计划——四年计划，目的是使德国更加自给自足，并且到了1940年能够在欧洲冒险进行一场大战。在他同英国的关系中，根据他在1936年10月向齐亚诺为他的对英政策辩护的情况来看，他似乎仍然希望通过鼓吹反对共产国际来使英国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表示认可。但是，在1936年至1937年，他为了测验英国是否乐于赞同他的计划而选用的尺度，就是看英国是不是愿意讨论关于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即便在英国这个想法能得到真正的支持，英国也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因为德国的西南非已在南非的控制下，而澳大利亚已经接管了德国在新几内亚的地位。在希特勒进行关于殖民地的宣传运动的时期，他对英帝国的分裂力量做了过高的估计；到了1937年年底，他显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应当永远被列为他的敌人。1937年的夏天，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的新命令第一次正视对英国作战的可能性。在艾登和德尔博斯的指引下，英法两国的关系取得了明显的团结一致，这可能增强了他的这种看法。而且，还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他认为导致爱德华八世（后为温莎公爵）于1936年至1937年的冬天逊位的危机，是保守党领导人物有计划地撤换一位亲德国的君主。

希特勒对英国态度的改变同英国的一位人物上台执政同时发生，这位人物比他的任何前任者都更加坚决地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对德国的友好关系。这种情况正是导致德国和英国之间在1939年爆发战争的许多怪事和误会之一。内维尔·张伯伦这位英国新任首相，并不是他的敌人所描述的那种天真的和平主义者。他一贯认为德国是一

个扰乱性和破坏性的力量。但他相信，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设法在欧洲实现一个和解方案；他对于现存的条约结构为达成这样一个和解方案而设置的正式障碍，感到不耐烦。在1935年，他原是一个坚决支持集体行动和制裁的人，而到了1937年他变成了一个坚定地鼓吹实行双边谈判者，主张通过谈判，具体地消除大国之间的积怨。

他采取这些看法是受了四种重要考虑的支配。1937年5月召开的帝国会议表明英国的自治领普遍反对英国卷入一场欧洲战争。财政部在他还在担任财政大臣时已经开始进行的调查表明，英国没有力量达到足以使它在欧洲遏制德国、在地中海遏制意大利和在远东遏制日本所必需的军备水平，而且即便一旦达到了这种水平——至少在不是没有永远削弱英国经济的情况下——也没有力量保持足以使它遏制德国和日本所必需的军备水平。张伯伦相信日本是真正无法予以满足的；他对美国是否愿意或能够在中国遏制日本，也没有多少真正的信心。最后，他并非完全不正确地相信，一场第二次大战对于欧洲的文明将是灾难性的，而且，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法的抱怨一旦得到满足，某种共存就可能实现。

他上台执政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发展：派遣一位新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前往柏林，指示他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改进英德两国的关系；邀请德国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访问伦敦；主动地同意意大利直接接触以结束英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发展中的第一项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不干涉委员会”中的危机使冯·牛赖特男爵推却了英方的邀请。然而，邀请的消息足以驱使意大利人暂时接受英意会谈的计划。他们的行动开始了一系列的接触，最后导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辞职以及奠定张伯伦的政策及其性格在他的内阁和保守党内处于压倒一切其他思想倾向的地位。

在1936年7月放弃对意大利的制裁后，艾登做出很大努力来重建友好关系。一旦轴心国的建立消除了意大利害怕自己被孤立的忧虑，墨索里尼便欢迎这些行动，并在1937年1月2日缔结了英意两国关于维持地中海现状的所谓“君子协定”。他在签署这个协定以前和以后，曾秘密派遣大批意大利“志愿军”前往西班牙，艾登把这看作意大利施展欺骗的证据。从1937年的2月至6月，英意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墨索里尼用宣传、金钱和军火交货等手段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的叛乱中谋取好处，这就大大地加剧了这种恶化的过程。7月，意大利担心英国和德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结果促使张伯伦和墨索里尼交换了信件；双方并同意开始就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进行会谈。但是，意大利的潜艇袭击驶往西班牙港口的船只，到8月底，它们变本加厉，击沉了一艘英国商船“伍德福德”号并袭击了一艘英国驱逐舰“哈沃克”号，从而使会谈暂时中断。

相反地，艾登在尼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法国人原先曾提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给他支持；这个会议建立了一个关于在地中海实行国际海军巡逻制度，指令海军对于所遭遇的一切不明国籍的潜艇予以击沉，大部分的巡逻任务由英法两国的海军舰艇承担。意大利潜艇的活动迅速地中止。然而，墨索里尼采取了报复手段，在利比亚聚集重大军事力量，在那里他的军队可以同样从容不迫地袭击埃及的英国人或突尼斯的法国人。虽然他谨慎地向英国和法国重新保证他愿意恢复会谈，但在他这方面他更加关注的却是从希特勒那里获得重新保证。1937年9月底，他访问柏林，他最初曾提议在这次访问时召开中欧会议，其中包括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但是，希特勒利用墨索里尼的虚荣心，从而能避免承担这样一种会议可能产生的一些约束。结果，这两个独裁者的会晤几乎没有导致什么政治性会谈。墨索里尼回到了罗马，他对希特勒的个性更为倾倒，但他在中欧或地中海的地位并未得到增强。

因此，在1937年10月底，欧洲的形势如下：苏联被投入斯大林的清洗的恐怖中——它名义上和法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结盟，不过没有达成军事协议使它们之间的同盟产生有效的作用，它在西班牙和国际联盟竭尽全力使英国和法国跟轴心国发生纠葛。在中欧，捷克斯洛伐克孤立地面对德国。它在小协约国中的同盟者已经和轴心国缔结和平——它的敌人波兰和匈牙利一点也没有减少对它的敌意。意大利和德国被一个轴心牢牢拴住，其中德国日益变为一个更强大的伙伴，而意大利显然在西班牙问题上走上一条与英国和法国发生冲突的道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士和比利时退而保持中立。英国和法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经济衰弱阻碍了它们重整军备的努力，而在法国，政府的敌人越来越变得亲法西斯了。在远东，日本现在正在进行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尽管缔结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他们在中国的形势从1936年夏季以来变得显著地恶化。最令人震惊的发展就是在1936年12月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军队扣押蒋介石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的基础就是将要组成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当有关组成这样一个战线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看来对于这次扣押事件和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并未插手的苏联当局，于1937年4月提议缔结一个苏中互助条约。他们的主要动机似乎由于对日本接近英国而感到忧虑，这一情况上文已经叙述，而且它一直持续到1937年6月。但是，另一个有关因素很可能是由于对军队进行了持续的清洗而使他们本身的军事力量变得虚弱；虽然这些清洗造成的全部影响直到1937年至1938年的冬天才在苏联远东军中感觉出来，但1937年6月，日本和苏联军队之间在阿穆尔河发生的事件已经使日本军部认为苏联远东军由于清洗而士气低落，失去了战斗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在华北的卢沟桥附近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这个事件与1931年9月在沈阳发生的事件不同，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但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直到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于1945年8月投降才告结束。在中国，产生了过分自信和反日情绪的巨大浪潮，而日本所做的回答则是陆军的力量和极端民族主义得到了增强，已不是比较温和的政治因素的力量所能控制的。7月底，北平被日本军队占领，8月13日战争蔓延到上海。9月13日，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

中国的呼吁再一次提出了关于国际联盟施行制裁以及事先未取得美国的同意难以组织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等问题，而对于上述后一困难，英国和法国感到特别尖锐。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这种形势曾引起英法两国的分歧，并促使英国成为遏制美国的主动行动的制动器，而现在英国对于上海的忧虑以及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密切合作所产生的信念，却使英国成为采取主动者，另一方面，美国在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本人的领导下却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动器。

英国在最初的中日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一次同华盛顿进行接触。关于联合提供“善意的帮助”的建议遭到了拒绝，赫尔声称他宁愿各自采取相同的行动而不要联合的行动，并且认为这次战争是一个机会，可以继续对全世界进行反对使用暴力的道义教育，而不主张采取联合的行动予以防止。然而，关于国际联盟援用第十六条的前景则使

英国忽视这一断然的拒绝，并援引1922年的九国公约。11月初，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和其他国家正式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会议。

但是，在这次会议能够召开以前，罗斯福总统于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一篇演说，号召对侵略者国家实行“隔离”，结果使会议参与国感到完全迷惑不解。他的想法似乎脱胎于有关美洲各国共同奉行中立的计划，这是头一年12月，美国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泛美会议上提出来的；而从他后来对日本侵犯美国在华利益的行为所产生的反应来看，上述建议似乎标志着在他逐渐接受下列想法的过程中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这个想法就是对犯下侵略行为的国家采取一致的经济行动。作为一个想法来说，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足以同它在国际上和国内所引起的强烈兴趣相称；罗斯福发表自己想法的习惯从来没有像这次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因为它使艾登将以后的3个月完全用于幻想英美两国对日本将采取联合行动。艾登所遭到的失败大大地损害了他的政策的权威性，并肯定了张伯伦为了消除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法的”抱怨而寻求达成双边协议的做法。

美国代表团到达布鲁塞尔时，除了打算邀请日本参加会议以外，没有任何行动计划。小国立即表明它们决心避免采取对日本施行经济制裁的任何计划。当日本拒绝派遣代表团前来布鲁塞尔的情况已经变得明显的时候，美国代表团试图同英国和法国商谈合作事宜，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对日本采取联合行动，但它的这一企图却遭到了国务院和罗斯福的愤怒斥责，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会在诱使之下成为采取行动的先锋，或是承担无所作为指责的替罪羊。因此，会议在11月24日发表了一项只有赫尔能够感到满意的公报后宣告休会。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局势已经非常显著地恶化。在9月，后来又在11月初，日本政府通过德国的斡旋向蒋介石提出了条件，进一步确认中国在华北的统治权并从华北撤出日本军队，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则应停止中国的反日活动，建立中日共同反共阵线和重新确立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事实上的关系。但是，正如想要先发制人地防止国联或布鲁塞尔会议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提出这些比较温和的条件一样，结果国际联盟或布鲁塞尔会议在中国人心中所燃起的虚假的希望却使条件变得不能接受。在12月的第一周内，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到了年底，几乎整个中国沿海一带都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由于对布鲁塞尔会议所抱的希望破灭，这就驱使中国表示愿

意接受日本的条件，而这时正值日本陆军所获得的军事胜利使他们中间的鲁莽分子压倒了文职人员组成的内阁对于谈判的偏爱。1938年1月14日，日本同蒋介石政府断绝了一切谈判和一切关系，宣布它有意采取步骤，要建立一个它能够与之合作的中国政府。

在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英国政府暂时放弃了要求美国支持其反对日本的所有企图。11月27日，后又在12月13日，在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扬子江的美国炮艇“潘南”号和袭击了伴随它的英国炮艇“瓢虫”号以后，英国人提议举行英美海军联合示威，但遭到了断然的拒绝。“潘南”号事件的全部真相只是在英国第二次进行接触遭到拒绝后才传到华盛顿，这促使罗斯福政府中的某些人士，特别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议英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经济行动；但英国这次除了政治和军事协议外，反而拒绝接受其他提议。1938年1月，一位美国海军军官英格索尔上校访问伦敦，并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议”，规定英国和美国卷入对日战争时将要遵循的方针。但是，这个计划极不明确而且期限太长，以致英国当局事实上不再讨论关于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日本接管中国海关行政的第三个提议，而宁愿在双边基础上和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

在华盛顿，关于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反对日本的问题，继续在辩论中，从而导致罗斯福于1938年1月11日向伦敦发出信息：提议他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就处理国际关系中应当遵守的主要原则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削减军备、享有取得原料的同等权利以及战争法。张伯伦这时因艾登休假正暂时兼管英国外交部，上述提议使他感到既不切合实际而又可能干预他为了抚慰德国和意大利而举行的谈判的进程。艾登的反对虽嫌稍晚，却撤回了张伯伦要求罗斯福不要插手干预的最初回信。但是，罗斯福此时由于张伯伦表明他正考虑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而产生了新的想法，也没有重提上述指责。艾登的地位更为削弱，而张伯伦的地位由于他努力寻求与独裁者们达成和解而变得更加巩固。

只是由于远东的事变和1938年年初完成的对英国重整军备工作的长期审查的结果，上述努力才得到了增强。甚至已经取得协议的那些措施所需的费用也日益增长，结果使英国内阁在1937年年底将英国的国防努力仅仅局限于保卫英国国内和海外的领土并保护它的贸易通路，而把在保卫它的盟国领土中所需的合作看作可能超出英国财政力

量的事情。这个决定由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发表了明确的声明而得到增强；上述声明在1938年2月初又予以重申，即英国的军队在1938年不能应付一场重大的战争，而且没有力量来满足它现在承担的国防任务。因此，重要的是探讨一切可能的办法以减少英国的潜在敌人的数目。

到了1937年的秋天，张伯伦本人看来对于外交部同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接触的缓慢速度，变得越来越不满意，正如他对于满不在乎地听任西班牙事变或地中海事变阻挠了计划在1937年6月对德国以及7月和10月对意大利进行接触这一情况感到不满一样。艾登强调需要同法国人保持步调一致，这使张伯伦感到同样压抑。德国要求归还它的殖民地的宣传，再一次促使英国考虑使德国的要求变为合法，作为总的和解方案的部分内容，但这个想法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和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以前的那几个月里，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对德政策。德国在1937年10月对张伯伦最亲密的内阁同僚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出的邀请，立即被热烈地接受。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访问了柏林和贝希特斯加登，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概述了英国愿意支持对中欧现状的改变，倘若不使用武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德国对这一行动没有做出反应，这就使张伯伦更加相信需要更积极地推行这件事情。

英国的行动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到了1937年底，法国政府除了彻底向德国投降外，只好跟随英国走上它领导的任何道路，而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如果说就中欧的事务而言，英国大体上是奉行孤立主义的，而且迷恋于实现和解的前景，那么，法国内部是如此严重地分裂，以致一个独立的反德政策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如果说英国的重整军备的努力逐渐减弱，而且财政部决心不让这种努力削弱英国的财政复苏，则法国所做的努力简直是可怜的，因为工会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鼓动使它深受危害，而且法国的法郎处于几乎不断贬值的状况。肖当和德尔博斯于1937年11月底到伦敦同张伯伦和艾登会谈，他们对张伯伦的政策从怀疑逐渐变成根本不信任。但是，他们不能反驳他的建议。德尔博斯后来又访问法国的东欧盟国，这只显示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隔绝后正如它和小协约国中以前的盟国隔绝后一样，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这种孤立的地位由于1938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的最后一次会议中辛辣地抨击法国，同时由于苏联决定把外国在

俄国的领事馆除少数外全部予以关闭而变得突出。上述步骤强调俄国又退而奉行一种新的孤立主义。

希特勒善于观察他的敌人的弱点，这一神秘的才能已经向他指明前进的道路（见第十六章）。1937年11月5日，他召集他的高级后勤领导人举行一次会议，表面上为了解决有关德国钢铁生产中优先权问题的争执，但乘机机会大体上说明他准备在国际条件允许时攻打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发生战争，或是西班牙内战蔓延到法国，这二者看来是最可供选择的时机。否则，他准备等待到德国的军备竞赛足以大大超过英法两国的军备竞赛，他把这两个国家的特点描写为它们是对德国怀有疯狂仇恨的敌人。哈利法克斯提议帮助希特勒，使他在中欧的要求得到满足，以此作为对他的良好行为的一种奖励，但希特勒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吸引力。1937年12月，德国武装部队的作战规定作了修订，以便将主要规划的重点置于对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上面，而将德国的主攻力量用来摧毁捷克的防线。1938年2月初，他重新组织了武装部队的指挥机构，以便将主要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国防部长和参谋长都被迫离职。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被提升为一个永不开会的帝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冯·里宾特罗甫从他驻节伦敦的使命的失败中被救出来，担任经过彻底清洗的外交部的首脑。然而，正如这些年中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希特勒自己的行动加速了事变的发展，并给他带来了他所寻求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却与他当初所计划的形式完全不同。

正当他的清洗即将完成时，奥地利的第一次危机爆发了。它的起因最初是因为奥地利的纳粹党对于它从1936年奥地利和德国达成协议以来遭到德国漠视而产生的怨恨，因为德国赞成冯·巴本推荐的政策，即通过努力把享有更高威望的秘密纳粹“民族反对党”的代表渗入奥地利政府。这种怨恨导致一个反对奥地利政府的新的军事政变阴谋。1938年1月22日当该党的机关被搜查时，政变阴谋的计划落入奥地利的警察手中。这次捕获使舒什尼格有信心接受邀请去和希特勒会晤，这是冯·巴本长期以来一直迫使他接受的。而正是由于他接受了邀请，因此使冯·巴本得以逃避希特勒的清洗，并确定2月12日为会晤的日期。舒什尼格的希望是想在会晤日期以前也能和“民族反对党”达成和解；但是由于未能识破他们和柏林秘密勾结，因此他没有认识到他正在破坏自己事先抵制希特勒的压力的一切机会。

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的要求比他准备做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并且需要在一周以内予以满足；同时，他还面对着大肆炫耀的军事力量。回到维也纳后，他似乎已经认定，他进行抵制的唯一机会就是举行一次经过仔细准备的全国公民投票，表示赞同奥地利的独立。英国或法国看来不会给予任何支持，而意大利虽然准备利用这个危机迫使英国和它就地中海的和解方案进行谈判，却不准备支持奥地利反对德国。张伯伦在和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兰迪会晤后，于2月19日就与意大利开始谈判的问题，迫使艾登辞职。但是，当舒什尼格的意图于3月8日泄露出来后，墨索里尼劝他不要这样做。

舒什尼格的计划威胁到希特勒的整个对奥政策的垮台。因此，3月10日，他命令做好立即入侵奥地利的军事准备，并要求取消公民投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后，在3月11日，他接着要求舒什尼格辞职，由“民族反对党”领袖、德国的傀儡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来接替。德国军队的实际入侵不受赛斯-英夸特的欢迎，正如不受奥地利纳粹分子和奥地利政府的欢迎一样。但是，奥地利总统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同时希特勒发现意大利不会干预，这就为直接入侵扫清了道路。3月12日，德国军队越过边界。翌日，希特勒在他的故乡古老的林茨城宣布奥地利和德国合并。

对奥地利的兼并获得成功，标志着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新的、较前更加肆无忌惮的阶段的开始，而且在这一阶段中，国际事变将完全被他的行动所左右（见第十六章）。从战略上来说，它对捷克的堡垒体系形成包抄之势，使整个波希米亚像一个半岛那样伸入德国控制的领土。欧洲各国政府几乎一致认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把300万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并入他的帝国。他们现在还不准备相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只是摧毁和并吞捷克人的国家的一个开端，或者说，一个借口。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和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口号，使它们看不到希特勒的真正目的，如同它们没有看出希特勒对捷克人及其国家的仇恨一样。

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问题，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捷克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在民族意识上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君主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融为一体的事实。1918年，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宣布他们和德国合并，结果发现他们的运动被捷克人用军事行动所镇压，而他们自己则被凡尔赛条约纳入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20世纪

20年代，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中间的主要政党曾和捷克人的国家实行合作，1926年加入了农民联合政府。只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反对他们，在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个小小的纳粹党。由于在世界经济萧条的岁月中对经济的不满以及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因此在1933年使纳粹党的力量大大的增长，以致捷克用警察行动将纳粹党解散。德国的外交部利用这一机会对于由一位年轻的领袖康拉德·汉莱因所领导的新兴的政治运动的诞生给予鼓励。他的政党——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从德国外交部获得秘密的财政支持，在1935年4月的捷克大选中，赢得了66个德意志人议席中的44个，使他们成为捷克议会中的第二大党。此后，汉莱因集中精力在海外，特别是在英国，为他的政党以及为他对捷克政府提出的要求赢得人们的同情；在这方面，他获得显著的成功。把300万德意志人强行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矛盾一直使盎格鲁—撒克逊人问心不安；而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20年代卑躬屈膝地跟从法国在国际联盟的路线，使它在英国政府人士中没有赢得任何好感。1937年11月，张伯伦已经明确地向肖当和德尔博斯表示，英国的舆论不会支持卷入一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对德战争。

因此，在德国并吞奥地利后，在伦敦和巴黎立即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巴黎，一个以勃鲁姆为首的新政府于3月13日就职，但仍保留德尔博斯为外交部长。3月15日，他们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取甘末林将军的报告，指出法国的陆军对于战争尚未准备就绪，并对他是否能够帮助捷克抵抗德国的进攻这一前景，持十分悲观的看法。勃鲁姆和德尔博斯拒绝接受这个看法；但是，在东欧重新展开外交试探的结果揭示，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4月8日，勃鲁姆政府倒台。爱德华·达拉第这位善于辞令却缺乏判断力和决心的人物就任总理，而乔治·博内这个狡狴、主张和平的阴谋家担任外交部长。

在伦敦，如果说情况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三军参谋长们的看法更为悲观。他们提供的劝告是，英国无法阻止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开始作战，将会从事一场长期的斗争，预期意大利和日本将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时间进行干预。他们不能预见英国在什么时候即便有法国和盟友的支援而能抵抗这样一种来自三方面的进攻。1938年，英国肯定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如要开始进行战争，将有遭到失败

的严重危险。他们的劝告加强了首相的信念：抵制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的压力不是英国的责任。而且，根据这样虚弱的军事力量，他不想使用恫吓手段。1938年3月24日，他向议会发表的演说后来成为阐明英国政策的庄严文本，其中谈到苏台德区问题是一个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问题，应当在那个基础上予以解决。英国除了国际联盟盟约中规定的义务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其他义务。他警告德国说，如果战争爆发，它就不大可能局限在中欧。双方私下取得协议，应当避免任何明显的反德阵线，并且应当施加压力，迫使布拉格满足关于苏台德区问题的要求，同时要求巴黎按同一意义影响布拉格。

在莫斯科，主要的焦虑似乎是要抵制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并使它们陷入与德国的纠葛，同时又避免一切可能使它们卷入与德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行动。3月17日，李维诺夫通过外国报刊的记者们，竭尽全力要求一致抵抗德国。但是，苏联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只是在法国首先尊重它自己的义务的条件下，才能执行。苏联的军队只有穿过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才能支援布拉格，而这两个国家都坚决地反对苏联军队进入它们的国境。莫斯科让巴黎去完成劝导他们改变自己立场的任务。李维诺夫进一步建议召开一次由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 and 苏联参加的会议。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他的建议的拒绝，只是突出地表明苏联在以后的12个月中被排斥在欧洲的政局之外。

伦敦、巴黎和莫斯科对于德国将采取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前景，一致感到忧心忡忡，而希特勒本人的行动也证实这忧虑是正确的。3月28日，他对苏台德区德意志入党的领袖们说，他的意图是要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解决捷克问题”，并且训令他们提出的要求要超过他预料布拉格政府所能让步的程度。因此，当捷克政府在英法两国的怂恿下，开始和汉莱因举行谈判时，他们面临汉莱因于4月23日在卡尔斯巴德（卡洛维发利）举行的苏台德区德意志入党的会议上所提出的八项要求。这些要求将会使苏台德地区在捷克国境以内成为几乎自治的地区。与此同时，希特勒已经指示他的武装部队重新起草1937年12月的作战规定，以便包括并吞奥地利以后战略形势的变化。5月5日至8日，他访问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提议缔结一项直接的军事同盟。

这个提议遭到了墨索里尼的拒绝。尽管他对奥地利被兼并表示默认，但他对于德国军队到达布伦内罗山口感到震惊。纳粹在南蒂罗尔的过激的宣传和德国在南斯拉夫的活动进一步使他恼怒。4月18日，他终于和英国就地中海和中东问题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英国最后保证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而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停止在利比亚和中东施加压力，并且从西班牙撤回志愿军。当希特勒到达罗马的时候，意大利和法国为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而举行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希特勒大失所望，空手返回德国。5天以后，法意两国的谈判破裂，墨索里尼企图重新接受德国的提议，结果发现希特勒已有其他考虑。引起这些考虑的原因是所谓5月20日至22日的“周末”危机。

这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将报道大批德国军队向捷克边界移动的情况，与关于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在捷克地方选举的前夕和捷克政府的联系发生中断的消息凑在一起。5月20日，上述报道促使捷克政府在它的军事顾问们的压力下，下令全国总动员（这些报道和奥地利被占领以前的报道相似，乃是不祥之兆），同时下令同一等级的后备役军人和各种专家入伍，总数约为5万人。同一天，英国在柏林进行探询，却遭到愤怒的否认，指出事实上没有正在进行任何不适当的军队调动。英国武官和他的工作人员所做的调查也没有揭示出任何与所传的规模有关的调动。然而，英法两国政府在5月21日在柏林采取了警告性的措施，第二天，英国接着由哈利法克斯向里宾特罗甫提出特殊的呼吁。德国的否认在西方的报刊上引起了广泛的欢呼，认为这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的失败。

事实上，希特勒还没有决定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当危机开始发生时，他正在考虑草拟中的命令，这些命令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军队处于准备作战状态，在他感到政治时机适当的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英法两国的行动和西方报刊对此所做的评论，对他的反复无常的性格产生的影响，就像一块红布对一头公牛产生的影响一样。^[4]5月24日，他指令他的海军参谋部起草有关大力增强海军实力的计划，因为英法两国现在已被看作德国最大的死敌。5月30日，他宣布他打算在第一个可乘的时机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军队到10月1日必须做好准备，以便采取行动。至于时机，它将由德国的政治领导通过对苏台德区领袖汉莱因所做的工作设法制造。

在伦敦和巴黎，“周末”危机造成的后果似乎是使两国政府决定不再允许事件的任何重演。对捷克人施加的压力大大地增强，要求他们和苏台德区达成一项和解办法。两国政府看来都不了解汉莱因接受德国的指示；这种指示使找到妥协方案的任何想法都变得不可能实现。事实上，捷克人和苏台德区的领袖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重开谈判，而捷克人为了满足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汉莱因忠实于他从希特勒那里接到的指示，找出理由予以拒绝；而捷克的领导在他们这一方面，也要克服联合执政的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阻力。

这些谈判的失败使英国人转而考虑派遣一名调停者，设法促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哈利法克斯和博内7月20日在巴黎讨论了这个建议，当时哈利法克斯作为外交大臣正陪同英王乔治六世访问巴黎。捷克最初抵制这个计划，但在英国和法国威胁要在德国与捷克之间发生战争时置捷克于不顾、听其由命运播弄以后，它便不再抵制。英国遴选的调停者为前内阁大臣朗西曼勋爵，他在8月3日到达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政府虽然曾表示对于中欧缺乏兴趣，但采取这一行动后，便公开承担了责任来解决苏台德区争议和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事实证明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在8月这个月中，尽管朗西曼勋爵致力于他的使命，但事实表明要想找到一个苏台德区问题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苏台德区人正式拒绝了捷克当局在9月2日向他们提出的第三套建议。捷克总统在绝望中强迫他的内阁全部接受汉莱因的卡尔斯巴德计划。这一决定在9月6日正式向吃惊的苏台德区的谈判者宣布。但是10月1日即将到来，同时，在9月的第一星期，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的大会开幕，这些情况使所有上述努力都已过时了。

关键性的事件是希特勒在9月12日向纳粹党的大会发表的演说。但是，8月间，德国的宣传制造舆论，以便使世界舆论界深信德国宣战的日期预料将与这次大会恰好相合。希特勒的政治与心理战术再一次比他的军事时间表提前展开。8月27日，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重复了张伯伦3月24日的演说中含有的警告。但是张伯伦已经转而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

俄国以这种日益增加的压力为理由，重新进行了干预。自从苏台德区危机开始以来，苏联的外交一直致力于设法使捷克对德国的抵抗变得坚强，并鼓动英国和法国参加一个反侵略的“大同盟”。关于苏联如何能够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所得的回答是苏联指责波兰和罗马尼亚不愿给予苏联军队过境权或飞越领空权。关于缔结一个大同盟的建议曾提出两次，一次在3月17日至22日，另一次在5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和博内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时，从那个日期直到8月底，苏联当局除了重复保证他们将会实践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外，没有采取新的行动。

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显然迫在眉睫，这一情况现在迫使李维诺夫进行一次最后的尝试，想组成一个反希特勒的共同阵线。8月26日，苏联驻巴黎大使敦促博内在捷克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坚强的态度。9月2日，李维诺夫对于法国询问苏联，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过境问题所持的态度，苏联将提出什么建议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时回答说，苏联建议运用国际联盟的机构，并要求立即举行参谋会谈。9月10日至12日李维诺夫紧接着在日内瓦和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姆南和博内举行会谈。科姆南仍然反对允许苏联军队通过罗马尼亚的一切会谈。博内躲避李维诺夫要求举行参谋会谈的压力，以英国进行抵制作借口，同时漠视李维诺夫重新要求使国际联盟的机构展开活动的呼吁。博内和张伯伦都愿意将苏联排斥在他们的计划以外，怀疑苏联阴谋把他们卷进对德战争。在苏联人这一方面，他们仍然没有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其现有的行动范围只限于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同盟，也就是说，在法国先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支援的条件下，同时他们需要获得国际联盟的支持，证明他们的军队有权通过罗马尼亚。

希特勒的演说是在9月12日发表的。在这以前，苏台德区在9月7日发生了一个事件，有两名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被一个捷克宪兵杀死。这个事件给予苏台德区的领导人以所需的借口，使他们能够逃避讨论最近提出的捷克建议。希特勒的演说内容恶毒而且杀气腾腾；紧接着爆发了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极端分子策划的骚乱，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埃格尔兰，这些骚乱达到了公开叛乱的规模。捷克人采取报复手段，宣布实行紧急法，调遣大批军警进入骚乱地区。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领导人和它的大部分冲锋队员在德国避难，而这个党本身遭

到禁止。当时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的以前的温和派中甚至产生了一个运动，要求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与捷克当局继续谈判。

希特勒的演说及以后在苏台德区发生的骚乱在巴黎引起了惊慌，促使张伯伦开始实行他从8月底以来就曾考虑的计划：直接和希特勒会晤。9月15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张伯伦要求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回归德国，而且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和波兰少数民族分离出去。然而，在张伯伦的压力下，他同意寻找方式方法来贯彻民族自决原则，如果英国接受这一原则的话。9月16日张伯伦回到伦敦，说服他的内阁接受关于苏台德区划归德国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其余领土提出保证的问题。实行脱离看来比墨索里尼特别要求的公民投票更好一些，捷克人自己完全拒绝了这一要求。9月18日，在捷克将要立即实行动员的前景下举行会晤时，张伯伦劝告法国的内阁阁员达拉第和博内接受下列原则：允许所有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实行脱离，在其他地区实行人口交换。翌日，英法两国按照这一意义提出的联合建议交给了贝奈斯总统。9月21日清晨，捷克内阁最后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这以前，他们最初对建议表示拒不接受，但英法两国驻布拉格的公使们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个做法将招致德国立即入侵并且会使法国的同盟宣告废止。贝奈斯在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以前，曾询问苏联，倘若法国不实践它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义务，苏联将持什么态度。苏联的回答将其内容与捷克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联系起来，十分含糊而又模棱两可，因此不能使贝奈斯愿意和西方决裂，同时又对德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具的指责提供了依据。

于是9月22日，张伯伦在戈德斯贝格会见了希特勒，告诉他捷克接受了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建议。当希特勒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个建议现在已不够满足要求时，张伯伦大为震惊。第一，波兰和匈牙利提出了要求。第二，捷克的军警最迟不得超过10月1日必须从操德语居民的边境内地区撤出。张伯伦因此中断了谈判，随后和希特勒互相交换了信件，希特勒在信中重提他的要求。9月23日晚上第二次会谈时，希特勒交出一幅地图，标明捷克军队应当立即撤出的地区以及另外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内，将根据1918年10月以前，也就是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以前当地的居民情况举行公民投票。张伯伦迫使希特勒答允对撤出的时限稍加宽延，然后回到伦敦。在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晤以前，他已经同意撤销英国对捷克总动员的反对（同一晚上，

法国接着也实行了部分动员）。然而，他也同意将德国的这些新建议转达给捷克人；9月25日，伦敦接到了捷克的照会，全部拒绝接受上述建议，但同意和波兰人谈判。

法国和英国的内阁一致同意拒绝戈德斯贝格建议。9月25日博内和达拉第重又飞往伦敦，策划下一个步骤。会议一直延长到第二天。达拉第在不断地被严厉盘问法国作战能力的实际情况后，于9月26日接受英国的一项建议，即向希特勒发出一个新的呼吁，其中应当含有以下警告：如果法国由于德国攻打捷克斯洛伐克的结果而和德国发生战争，英国将支援法国。这个呼吁在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好战演说以前到达，但未能制止他发表这篇演说，他在其中要求捷克在10月1日以前全部撤出苏台德区，否则战争将要爆发。上述呼吁由张伯伦的使者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转达；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将所附的警告交给希特勒。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希特勒似乎失去了一些准备打仗的决心。当天（9月27日）发出了动员令，但仍保守秘密。一个产生作用的因素可能是德国广大的人民，特别是柏林人民对于当晚他在柏林发动的一次军事示威运动显著地缺乏热情。英国根据9月24日在日内瓦和李维诺夫举行的谈话而发表的声明，表示苏联也会支援法国，这不能不增加希特勒的不安。

然而，当晚英国人开始提出另一套建议，规定要举行一个由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参加的三方会议，为捷克撤出苏台德区、划定新的边界和将来修订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关系进行安排。与此同时，张伯伦通过广播演说呼吁和平，其中谈到“对于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人民之间发生的争吵，我们完全不了解”，同时说明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9月28日，张伯伦又向希特勒发出一项新的呼吁，同时附有向墨索里尼发出的呼吁。他提议前往德国召开一次新的四大国会议，以解决德国所有的重大要求。在这一呼吁发给希特勒以前，墨索里尼也进行干预，提议德国暂缓实行动员，其措词暗示意大利以前准备支持希特勒（德国与意大利武装部队之间的参谋会谈恰好将要开始），现在将要不这么做了。他接着发出第二个信息，提议举行一次四大国会议。对此，希特勒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只好接受。

这次会议于9月29日下午在慕尼黑举行。希特勒首先会见了墨索里尼，后者已经获悉德国的建议。在会议上，墨索里尼提出德国的建议，仿佛这是他自己的建议一样。张伯伦或达拉第都没有对他的草案提出任何有力的反对，协定的最后草案在当天午夜以后不久签字。协定规定将整个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捷克的军队和官员在五国（四个签字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委员会监督下于10月1日开始撤出，到10月10日全部完成。某些有争议的地区，将作为举行公民投票予以解决的问题。英国和德国将保证新的边界不遭到无端的侵犯，德国和意大利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要求得到解决时亦将这样做。协定只是在签署以后才交给了捷克人。

捷克政府发现自己面临的选择是，单凭自己的力量与德国作战，或者投降。与德国对比，它的部队，除空军外，力量接近于相等；而且他们驻扎在长期准备好的防御工事的后面。但是，匈牙利和波兰参战的前景使情况截然不同了。他们向苏联人发出了最后呼吁；但在能够接到苏联的回答以前，不得不对建议做出决定。为了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免于战祸，他们接受了建议，这个建议使他们丧失了所有的防御工事，无法保卫自己。

9月30日，张伯伦短暂地会晤了希特勒，使希特勒签署一项仓促拟就的英德两国宣言。这是在张伯伦的指示下，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要求希特勒必须保证用协商方法来解决“任何可能与我们两国有关的其他问题”。他把实现一个新的欧洲和解方案的短暂希望建筑在这个文件上面。这是他从1937年夏天以来一直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由于这个文件，他自己的个人胜利已经圆满完成，而对于德国人和法英两国人民来说，也都同样是胜利。

然而，慕尼黑和解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和解政策的彻底失败。它摧毁了凡尔赛和约造成的平衡局面的残余。它使整个东欧和东南欧易于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它不但交出了捷克军队的装备和消灭了对德国东南边境的威胁，而且把整个斯科达军火工业联合企业置于德国控制之下，因而使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大大地有利于德国。最后，它还使匈牙利和波兰坚决地站在德国一边。

波兰政府从1919年以来一直小心操纵特欣争端，以便使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开。从1933年起，波兰曾试图在中欧扮演一个大国的角

色，这就在1937年促使贝克上校宣布海洋之间地带原则，划定一个区域，从斯堪的纳维亚延伸到意大利和巴尔干诸国，由波兰和意大利共同加以领导。对于这一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是主要的障碍，而且因为它和苏联有关系，这一障碍变得更为可厌。事实上，贝克当时的平衡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苏联继续采取敌视态度，同时在波兰和日本之间还有某些接触，这是贝克有意以此来增强日本政策中的反苏内容。贝克在1938年2月和霍尔蒂海军上将，3月和齐亚诺伯爵举行的会谈中以及1938年夏天访问主要的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首都时，轮流和他们讨论建立一个共同的波兰—匈牙利边界的必要，并暗示关于海洋之间地带的设想是对德国的进一步扩张的阻碍。1938年8月，随着捷克危机的日益加深，波兰的要求，如贝克所说的那样，于9月8日按照与德国“步调一致”的方式提了出来。9月20日，关于特欣，波兰提出了正式要求，并且开始进行军事准备，只是由于苏联在9月27日提出警告和苏联军队在波兰的东面边界集结的不祥之兆才使之完全停止。9月25日，当捷克拒绝了戈德斯贝格条件，因而使战争看来不可避免时，捷克人主动提出将特欣割让给波兰，以此换取它的北翼的安全。然而，慕尼黑会议对于波兰的要求保持缄默。

与此对比，匈牙利这时遵循一条比较谨慎的道路，它对捷克斯洛伐克在小协约国中的伙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可能采取的态度感到忧虑，因而使它受到压力。4月，它要求和德国举行参谋会谈遭到忽视，以致后来戈林在6月和7月对匈牙利驻柏林公使斯托亚伊和在8月底对前来访问柏林的霍尔蒂本人施加的压力都不再起作用。而且，匈牙利人也不能迫使罗马做出保证。德国和意大利特别重视南斯拉夫首相斯托亚季诺维奇所奉行的亲轴心国的路线。相反地，匈牙利感到不得不同小协约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于8月28日在布莱德签字。这并不阻碍匈牙利人在9月22日提出他们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问题。但是，它并没有使在慕尼黑开会的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些要求比对波兰人的要求更认真地对待。

9月30日在张伯伦和希特勒之间进行的讨论中，希特勒提到了西班牙内战和中日冲突。西班牙内战，由于德国在中欧的新的行动和1938年4月西班牙共和阵线在北部的崩溃，事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一度看来仿佛不再需要德国和意大利的部队了；但是，此后重新开放法国边界以便将军火交给共和派，而且

大量的苏联援助源源而来，结果重又确立了军事上的对峙局面。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勉强地决定继续维持它们支持佛朗哥的军队，而且空军和潜艇袭击那些同共和国控制的剩余港口进行贸易的英国船只的情况重又出现，但这在捷克危机的紧张阶段大部被忽视了。国家主义派当局看到捷克危机在8月和9月初急剧恶化，非常恐慌，他们害怕如果法德两国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将成为法国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事实上，佛朗哥在9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宣布他无条件地保守中立，因而使轴心国的领袖们大为憎恶。然而，1938年11月，他又重新接受德国大规模的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当局似乎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希望，不再想扩大西班牙的冲突来使西方和佛朗哥的轴心国支持者卷入纠纷。国际纵队在同一月撤出，紧接着在1939年3月共和国军队在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中部崩溃。1939年2月27日，英国和法国正式承认佛朗哥政权。

在远东，1938年的主要发展按照头一年同样不明确的方式进行。中国主要依赖苏联的援助；然而，这并不阻碍中国和日本在1938年夏天举行新的会谈，商讨和解方案，但会谈终因日本不肯让步而告破裂。日本军部方面念念不忘需要阻挠苏联的支援，于1938年1月通过日本驻柏林的武官大岛将军和里宾特罗甫接触，商讨将反共产国际条约改为军事同盟。1938年7月，德国对华援助最后断绝，德国的军事顾问亦被召回。同时，德国的建议草案由一名日本特使送到东京。日本当局决定予以采纳，但附有两个条件：同盟主要应当是针对苏联的，而且条约应当是防御性的。中日谈判破裂后，接着由于宇垣内阁^[5]在9月由一个以近卫公爵领导的内阁所取代，日本的态度变得显著地强硬起来；日本的军事行动现在完全用于控制整个中国的海岸线。广州和汉口于该月在日本攻击下沦陷。8月，苏军和日军在苏联—满洲边界的张鼓峰发生剧烈的战斗，这次战斗表明尽管斯大林的清洗已扩展到苏联的远东军中（它的指挥官布留赫尔元帅在1938年11月被处决），但他们仍然能够异常英勇地作战。

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得以控制东欧；但它仍保全了他曾决心要予以征服的捷克国家的剩余部分。它为他不论是向东或是向西采取行动，不论是进攻乌克兰和苏联，或是进攻法国和英国，都打开了道路。虽然看来在他的党羽中有一些人，特别是戈林和东普鲁士省长科赫主张向东采取行动，但是，关于捷克危机的解决不是使希特勒而是使张伯伦博得了世界和德国群众的赞扬，因此，捷克危机的过程和结

果看来已经使希特勒决定下一步采取行动来反对法国和英国。然而，第一，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必须攻陷，德国国旗必须在布拉格上空飘扬。其次是梅梅尔领地^[6]问题。最后是但泽、波兰走廊。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些只是枝节问题，下列的情况可以作为证明：例如他努力举行谈判，要把反共产国际条约改为反对西方的三国同盟，竭力要同波兰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优先建立德国的海军以及他下令和意大利举行参谋会谈等。

然而，他的庞大计划过分浮夸而筹划却不够周密。第一，他必须重新建立他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迫切希望建立一个通过斯洛伐克和鲁森尼亚的共同边界。这个任务由于他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不能认识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的力量，而且戈林对鲁森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加以鼓励，结果变得复杂化，只是在取得意大利的援助和对布达佩斯施加最严厉的压力以后才能完成。根据1938年11月2日的维也纳裁决，匈牙利对斯洛伐克的边界要求得到了解决，而匈牙利人经过劝导后实行复员。德国对罗马尼亚增加了经济上的诱惑，同时向斯洛伐克人表示他们可以依靠德国的保护。此后对鲁森尼亚人的支持予以撤销。10月21日和12月17日的指示，使德国军队做好准备以便开进布拉格。新成立的捷克政府企图对柏林做出让步，但无效。1939年2月初，斯洛伐克人在煽动下要求布拉格给予独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谈判于3月10日宣告破裂。斯洛伐克领袖蒂索3月13日奉召前往柏林，获准放手行动，翌日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鲁森尼亚人也跟着仿效。同一晚上，捷克总统哈查也被召到柏林，在威胁之下被迫要求建立一个德国的保护国。3月15日早晨6时，德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翌日宣布保护国成立。匈牙利军队吞噬了不幸的鲁森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了。

这是庞大计划中的最小部分，也是唯一正确执行的部分。它的绝对成功将其他事情全都打乱了；但是这个计划的其他部分已经遇到了麻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关于但泽和波兰走廊的和解方案（见第九、十六章）。希特勒和里宾特罗甫曾经费了5个月的时间，设法说服波兰人接受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将但泽重新归还德国，而在乌克兰给予补偿，同时把通过走廊的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的主权授予德国。波兰人被邀请参加反共产国际条约，他们正确地看出这是邀请他们接受卫星国的地位，而没有认识到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

化，使他们没有保持真正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德国人于1938年10月24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向波兰大使利普斯基要求接受他们的慷慨建议；后来于11月19日在柏林；12月15日在华沙；1月5日在慕尼黑，当贝克上校作为希特勒的客人的时候；1月底在华沙，当里宾特罗甫回访的时候，都曾一再提出。波兰人予以应付、规避和拖延。相反地，1938年11月19日，他们和苏联缔结一项新的协议。而贝克上校还梦想波兰获得殖民地，他认为希特勒正迫使英国人实行新的殖民地瓜分，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为了表示德国的友好，里宾特罗甫把对苏联的关系（预定将与苏联举行新的贸易谈判）完全停顿下来；但一切均归于无效。

同日本和意大利进行的谈判也并不更加成功。日本军部和近卫内阁要求缔结一个总的条约，将中国孤立起来，使国民党投降。但事实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条约的主要力量应该用于反对俄国。意大利人表示的同情更少。在慕尼黑会议期间，齐亚诺收到了最初的草约，将它列入“归档与不再考虑”一类文件。墨索里尼并不急于想使他与英国达成的复活节协议的批准遭到危害，同时他看到自己在柏林—东京关系中将成为一名局外人，因而感到震惊。里宾特罗甫在1938年10月28日突然来到罗马，想要取得对同盟的签字，却遭到无礼的断然拒绝。英意协议于11月16日得到了批准。

两周后，在11月30日，意大利的众议院发动了一次有组织的示威，要求将科西嘉、尼斯、萨瓦、突尼斯归还给意大利。法国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墨索里尼本来一直要求德国和意大利举行参谋会谈，到了1月2日，他告诉德国人他已做好准备，愿意签署盟约。4天以后，日本内阁垮台。接替的内阁由平沼男爵任首相，它具有更加强烈的慎重行事的精神。双方陆续地交换草约和性质相反的草约，但终无结果。日本内阁的多数阁员认为，如果他们在国内和在伦敦与华盛顿都不能正确地证明一项条约是纯粹针对苏联的话，他们将不予接受。英国和美国的压力（尽管谈判保守秘密，但英美两国对于谈判的进程，消息灵通）只是增强了他们的反对。里宾特罗甫坚持缔结这样一个盟约：它将针对英国并且把英国的力量从欧洲分散和消耗掉；然而，他再一次没有获得结果。

与此同时，德国的对英作战计划正在成熟中。11月26日，德国军队的最高司令部发出希特勒的命令，与意大利举行参谋会谈。他们的目的是要同英国和法国开战，直接突破马奇诺防线而把法国打垮，最

后将英国的势力从欧洲大陆赶出去。12月，海军计划让一支舰队采用水面上的运动战来击败英国的海上力量，这个Z计划最后得到了批准。为了废除英德海军协议所做的准备工作经过了讨论，不过同时对于礼节也予以遵守。在这年年底，英德海军会谈宣布德国的潜艇部队可以合法地增加到与英联邦的潜艇部队相等的规模。而在1月初，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命令，规定在拨给钢铁和其他重要原料方面，准许德国海军比德国陆军和德国空军享有优先权。

促使希特勒加紧反对英国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英国对于慕尼黑协定的反应。这个和解方案本身在伦敦得到了赞扬，它被认为是开辟了英德关系中的一个新时代。但是不久事实表明，人们并不想使它成为这样一个时代，即英国的军备再一次变得像在1938年9月时那么虚弱。新的重整军备措施已经宣布而且开始执行。并且，虽然事实很明显，英国政府准备承认德国在中欧的霸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关于其他问题包括殖民地争端在内，英国的态度已经大大地强硬起来。因此，他们不反对法国按照英德宣言的同一方针路线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且，事实上，这样一个协议于1938年12月6日，由博内和里宾特洛甫在巴黎签署。但是，当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11月24日访问巴黎的时候，他们敦促法国人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军备计划。他们对于同德国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谈判，寄以某些希望。但是，11月10日在德国发动的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大屠杀，激怒了英国的舆论，结果。当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1月访问罗马时，他们所抱的目的之一似乎是向墨索里尼呼吁，要求他使希特勒听从道理。

与此同时，英国情报机关不断收到报告，说明德国进行新的侵略行动的计划。12月末，这些报告都报道了一个向东面的新行动。但是在1月，它们预告将对荷兰进行袭击，或者，直接对英国进行空中轰炸。1月24日，哈利法克斯提醒华盛顿和巴黎加以注意。2月初，英国人开始坚决要求法国人举行参谋会谈。法国人做出回答，强烈要求英国人实行征兵。2月中旬，内阁否决了财政大臣和首相为维护旧制度所做的努力，决定装备一支远征军去法国作战。正在这个时刻，恰好在塞缪尔·霍尔爵士在诱使之下很不明智地谈到了和平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以后的一个周末，消息传来说德军已长驱直入布拉格。

随着德军开进布拉格，希特勒完全破坏了他可能具有的一切机会，不再能够完成他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庞大计划。然而，他的计划的

失败并不是由于他将大批非德意志人口并入德国的统治之下，尽管这使得进一步利用“民族自决”原则和西方对凡尔赛条约的内疚心理已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却又为他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驳论点。正是由于他的突然行动在欧洲造成的那种气氛使人对战争神经紧张，结果导致了他的计划的失败。

最初的反应发生在3月17日，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蒂莱亚先生向英国请求援助，以反对据说德国要求在罗马尼亚的贸易中占有垄断地位。据他声称，这些要求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英国的反应是立即考虑到，只有向希特勒表明，进一步的扩张将招致一场欧洲战争，才有可能同德国达成一项和解方案。因此，在3月18日，便向所有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和苏联询问，如果罗马尼亚请求给予援助以抵抗德国的侵略，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

这一行动立即受到李维诺夫的欢迎，他在苏联，如同他在欧洲一样，是体现集体抵抗德国的思想的最后一人。自从苏联被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以外，他在莫斯科的影响日益衰落，因为苏联退到了孤立状态。2月间，他曾试图组成一个黑海公约，从而加强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力量来抵制德国的压力，但未成功。苏联政策的真正趋向于3月10日在斯大林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演说中显示出来，它祝贺苏联的武装力量，同时又谴责民主国家，指责它们错误地指望苏联“将为他们火中取栗”。自从慕尼黑协定以来，俄国唯一的在外交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就是和波兰缔结了1938年11月的协定，并将它自己的顾问和国际纵队全部撤出西班牙共和国，而让它听任命运安排。

李维诺夫必然把英国的主动看作他的最后机会。3月18日，他做了回答，建议立即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次有英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和苏联等国政府参加的会议，讨论采取一致的行动。英国人感到这一建议范围太广，毫不紧凑。相反地，他们提议由英国、法国、波兰和苏联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将立即磋商如何一致抵抗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所遭受的威胁。李维诺夫的建议被认为“不成熟”而不予考虑。到了3月22日，事实表明，想要波兰和苏联一起参加一项联合声明或一次会议，这一希望是要落空的。由于这个情况，李维诺夫对于集体行动所抱的希望逐渐消失，而苏联当局看来已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仍然不是认真地想要抵抗希特勒。

3月21日希特勒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想说服波兰参加他的阵营。次日，他的军队开进梅梅尔领地。作为回答，波兰人动员了三组年龄的兵员，关于3月23日和3月28日，全部拒绝了德国关于但泽的建议，声明想要对但泽问题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任何企图将导致波兰宣战。在伦敦，关于德国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的报告耸人听闻，结果使张伯伦按照建议单方面地发表了声明。3月31日，他向感到震惊的下院宣称，如果波兰感到自己受到威胁，被迫用武力抵制上述威胁，英国将给予支援，这一宣言使华沙正式成为决定英国是否参加战争的主宰。这项保证表示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动，虽然立即被波兰人所接受，但是，不论在柏林或在莫斯科，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这个保证本想用来阻挡希特勒，但它仍然完全不能令人置信，因为如果没有英苏同盟或者苏波军事合作，那就无法支持波兰反对德国的进攻。只有波兰人相信他们能够抵抗德国的武力。

对于苏联人来说，英国的行动代表进一步，想利用苏联作为英国政策的后盾的尝试。也许是为了考验英国的诚意，他们提议在4月6日举行参谋会谈，4月18日又提出缔结一项十年盟约。同时，苏联外交官开始在柏林暗示苏联有兴趣改善对德国的关系。然而，苏联的真正忧虑看来是对英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所获得的进展。在巴尔干，英国由于当地国家对意大利的恐惧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德国在布拉格采取的行动刺激了墨索里尼，使他重又愤怒。他曾长期要求和德国举行参谋会谈，讨论对民主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3月初，希特勒同意举行会谈，但限于纯粹的技术范围。4月5日，会谈在因斯布鲁克开始。4月9日，墨索里尼的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作为对布拉格事件的报复，他给予德国的预告与他当初收到的关于布拉格行动的预告相仿。

意大利的行动依次又对英国产生了作用。这时英国的主要外交努力在于企图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巴尔干集团的基石，这个集团保证罗马尼亚不遭到侵略。英国和法国于4月13日向罗马尼亚提出了保证。他们的努力一度获得很大的成功，足以使苏联当局感到震惊。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波坦金先生奉派访问巴尔干各国首都。但是，当他到达安卡拉的时候，苏联当局似乎已得出结论，英国只是利用他们作为英国政策的最后一个后盾；而在伦敦，外交部开始忧虑，觉得英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的保证中虽然含有对苏联的间接保证，但苏联对此没有做出多少报答。因此，4月15日，英国邀请莫斯科向这些国家提

出相同的保证。李维诺夫宁愿采纳一项法国的建议；4月18日，他提议缔结一项反对德国侵略的十年盟约，结果发现他的建议又遭到断然的拒绝。因此5月4日，他被免职，由莫洛托夫继任外交部长。在以后的10周中，莫洛托夫竭力说服伦敦和巴黎，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们的保证体制将会毫无意义，而且，只有按照下列条件，苏联才乐于提供这样的援助，这些条件就是担保波兰和罗马尼亚成为苏联的缓冲地区。苏联领导集团最后发现这也不可能实现，便转向纳粹德国。

因为，苏联的建议基本上不可能使英国和法国接受。事实证明当贝克在4月初前来伦敦的时候和以后，不可能使他信服，波兰必须接受苏联的援助，同样地，也不可能劝说罗马尼亚的领袖加芬库先生缓和一下他对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出现的问题所持的断然反对的态度。英国人专心想要找到能够阻挡希特勒并引导他到会议桌旁的某种办法，而不需要把希特勒彻底打垮的军事同盟。因此，他们并不很重视苏联的军事援助；他们的专家对于苏联经过大清洗以后的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认为它只能尝试对德国的入侵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德国，人们感到了李维诺夫下台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英国向波兰提出保证的问题和英国在东欧就防范问题进行谈判所获的进展，既使希特勒震惊，也使他大为愤怒。3月底，他指令他的参谋总长准备对波兰作战的命令，尽管这些命令最初只被解释为它们是针对与西方作战所做出的准备的“预防性的补充命令”，而对西方作战则要等到波兰在外交上被孤立起来的时候才予以执行。他的军队也奉命准备单独对但泽进行一次突然的袭击，如果政治形势可能使这一行动实现的话。4月间，尤其是当他的外交活动未能阻止英国与土耳其的合作时，他较前更加愤怒。4月28日，他对英国实行征兵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废除了1935年缔结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5月6日，里宾特罗甫向齐亚诺提议他们应当缔结一项双边同盟，而不必再等待日本克服它的犹豫。德意盟约，即所谓“钢铁条约”，事实上在5月22日签署。然而，希特勒充分了解，单凭这一条约不能够制止法国和英国。如果他能使苏联脱离了西方，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5月20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第一次向俄国做出要与它进行接触并表示。莫洛托夫对他的接待，乍看之下令人十分沮丧，以致希特勒的顾问们几乎感到绝望。但他坚持下去，5月底开始了新的会谈。与此同时，但泽参议院对波兰施加压力的最初迹象开始出现。5月23日，希特

勒向他的将军们表示，他有意抓住“第一个可乘之机进攻波兰”。他清楚地说明，他想竭尽全力先把波兰孤立起来。但是，如果英国和法国届时进行干预，他准备同英国摊牌。他可以利用日本来遏制苏联；然而，苏联可能显示自己对波兰并无兴趣，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德国的外交活动现在努力使罗马尼亚脱离波兰，加紧对但泽问题施加压力，同时使苏联脱离西方。

直到7月底，希特勒才断定时机已告成熟。在其间的两个月中，曾发生一次重大的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看来柏林考虑另一可供选择的计划：即对但泽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但是，德国的主要力量用于破坏英国想在罗马尼亚周围建立一个巴尔干集团的努力，结果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土耳其在5月12日接受了英国的一项保证，而且在要挟法国把亚历山大勒达省完全转移到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以后，也接受了法国的一项保证。在对苏战线上，希特勒只需监视莫斯科并与之保持接触，另一方面，英国人在苏联的压力下不断地做出让步，结果发现他们所寻求的协议仍然不能得到。英国起草了一个与国际联盟盟约联系在一起的条约，这个草约在5月27日遭到无理的拒绝。莫洛托夫接着要求这个草约应当扩大范围，将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包括在内。英国提出一个新草约，6月22日又遭到了拒绝。7月1日，莫洛托夫要求缔结一个苏联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同盟，同时又提出，这些条约在发生“间接的侵略”的情况下，应当产生作用，他所解释的这一概念在伦敦引起了怀疑，认为这个条约的目的是要把苏联对它所厌恶的或是希望予以推翻的任何政府采取的行动也包括在内。7月23日，莫洛托夫突然要求参谋会谈应该立即开始举行。

莫洛托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至今仍不清楚。但是，7月中旬在戈林的“四年计划”组织中任高级官员的沃尔塔特博士与英国财政部常务次官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贸易大臣罗伯特·赫德森之间曾在伦敦举行会谈，这可能使莫洛托夫受到了影响。就英国这一方面来说，有一些人对于希特勒党羽中存在着温和派的迹象持有信心；这些会谈看来是他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他们想在共同开发非洲与其他地方的市场和原料方面做出广泛的让步，准备用这样一个前景来诱使希特勒不要在欧洲走上暴力的道路。这些会谈在英国方面从未超过半官方的性质，但也涉及下列一些建议，如举行裁军谈判、发表不干预宣言、承认德国在东南欧经济上占首要地位以及根据某些说法，英国给予大

量的贷款。对于莫洛托夫来说，这些会谈必然使他产生恐惧，害怕苏联重又陷于孤立地位，同时推动他对英国那些认为这类会谈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集团，继续予以增强。

但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在6—7月间有意地被弄得恶化，这就加强了这后一派人的论点。在6月最后一周的危机过去后，7月中旬，由于但泽当局给波兰海关视察员设置了种种困难而引起了新的争执。波兰人在经济上进行了报复，而在7月底，但泽参议院在希特勒的指令下，向波兰政府发出一个故意挑衅的照会，威胁要对波兰的海关视察员采取报复行动。同时，里宾特罗甫向苏联人试探是否可能达成政治上的协议。8月3日，他得到了积极的反应。希特勒看来这时已经决定，孤立和消灭波兰的条件已经变得合适了。

威尔逊—赫德森—沃尔塔特会谈确实一定程度上使希特勒相信英国向波兰提出的保证只是虚张声势；而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财政部不愿向波兰提供贷款，让它购买武器，而且在关于英波缔结同盟的会谈和英苏谈判中都出现了拖延现象。此外，驻在日本的陆军分子对于东京抵制与德国进行结盟谈判的告成深感愤怒，竭尽全力想挑起一场对英国的战争，封锁了天津的英国租界。只是因为英国驻东京大使采取了非常高超的外交手腕，同时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才得以避免一场冲突。对于希特勒来说，英国的反德阵线出现了崩溃迹象，看来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予以利用了。

8月4日，波兰人答复但泽参议院说，对波兰驻但泽的官员所采取的行动将被看成是对波兰国家的暴力行为。希特勒召集纳粹党的但泽省长前去贝希特斯加登，命令他加强压力以挑起波兰对但泽进攻。8月9日德国向波兰人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照会，次日收到了一份复照，口气也同样强硬而不妥协。德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奉命要在8月24日以前完成。

到了这个时刻，希特勒自己的计划开始瓦解了。同苏联的谈判进行顺利。8月14日莫洛托夫提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苏联军方的领导人对于由莫洛托夫邀请到莫斯科来的英法两国的参谋代表团则予以敷衍。希特勒在一系列的文电中粉粹了苏联想要采取进一步敷衍手段的企图，8月21日，里宾特罗甫到达了莫斯科。两天后，纳粹德国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签字，附有秘密的议定书，将波兰和东

欧瓜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向但泽发出命令，要它进行挑衅以破坏和波兰的关系。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重又夸夸其谈波兰的孤立地位与英国和法国的懦怯行为。德国进攻波兰的命令规定时间为8月26日清晨四点半钟。

8月25日的事件证明希特勒是错误的。当天下午四点半钟，希特勒听说英国不但没有因为纳粹德国和苏联缔结了条约而被吓住，相反地却放手行动，与波兰签订了一项正式的盟约。6点钟，他听说意大利将不给他支持。在签订“钢铁条约”时，意大利曾约定欧洲至少在两年内不发生重大战争。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在8月初才认清了德国政策的真正方向。8月11日，他突然访问贝希特斯加登，结果遭到了希特勒和里宾特罗甫的训斥，而他认为他们的态度是傲慢的、愚蠢的和欺骗性的。齐亚诺回国以后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不乐意的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参战是不可能的。希特勒颇受震动，撤销了进攻的命令，德国的军队回到了营房。同一天，日本政府中断了它和德国关于结盟的谈判，因为它对德国同它们最初以缔结反共产国际条约来反对的一个国家结为同盟极其反感。事实上，日本军队正和苏联军队在外蒙古边境的诺蒙坎进行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双方各自投入几个师的兵力，战争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日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极其惨重。

在一两天内，看来希特勒已经遭受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希特勒一向做好对英国和法国开战的一半准备工作，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而无法后退。如果他和波兰的争执是真实的，那就可能有机会提出一个和解的建议。相反地，他施展了一个最后的阴谋，要在外交上孤立波兰。波兰人被邀请到柏林谈判，然后使谈判破裂以便将罪责推在波兰人身上；接着立即执行早已策划的对波兰的进攻。这个阴谋还包括要准备一个能够作为一项真正的和解方案向英国提出的建议。在戈林的帮助下，同时又利用一个中立国家的中间人瑞典商人伯格·达勒卢斯，同英国政府讨论了这些建议。与此同时，在8月28日，又确定在一个新的日期，即9月1日进攻波兰。

这个阴谋在三个方面都遭到了失败。波兰人不顾英国施加的很大压力，拒绝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派遣一个全权大使前去柏林，而且英国人感到不能强迫波兰人这样做。德国的建议草案的实际递交，由于里宾特罗甫处理不当，以至不能及时交给英国人，让英国政府予以考虑，更谈不上对英国的舆论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因为到了这时，英

国舆论界大部已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德国军队的时间表过于刻板，因而没有时间找到回旋的余地。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在9月1日黎明正式开始。

这时，法国内阁竭力挣扎，想避免一场谁也不想进行的战争，而且法国的大部分舆论对于这样一场战争都深恶痛绝，它劝告墨索里尼提议召开一次新的四大国会议。经过36小时的延迟，英国议会和内阁产生了反抗的意见，迫使英国政府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军队在两小时内撤出波兰领土。法国在6小时后接着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张自谋 译）

[1] 即黑龙江。——译者

[2] 美国蒙大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亦称多山的州。——译者

[3] 广田“三原则”系广田弘毅外相于1936年1月提出，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取缔一切反日言行；（2）中国承认“满洲国”，中、日、“满”合作；（3）中日共同防共。——译者

[4] 公牛看见任何红色，便拼命与之角斗。——译者

[5] 宇垣虽被日本天皇提名组阁，但实际并未组成。——译者

[6] 梅梅尔领地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以前属于东普鲁士。根据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该地区包括梅梅尔城和港口，由国际联盟授权法国管理。——译者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机和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出的两件新式作战手段或战争工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间歇期，它们成了军界争论的主要原因。在此20年中，对其潜在力识之者寡，持怀疑与批评态度者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战争的进程。

另外一件新式战争工具是海战工具，即潜艇。潜艇由来虽然较早，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得到充分的机会显示其威力。当双方舰队在水面交锋到战争中期均无明显结果时，海军较弱的一方德国才给了潜艇发挥威力的机会。后来到了1917年，德国潜艇已控制了海上的战斗，并以其封锁能力使海军强国英国遭受饥饿，濒临失败。但是大战结束后，潜艇即受到忽视。海军界大多数人抱着战列舰仍是海洋主宰的幻想和信念，而不相信潜艇的威胁有重新出现的可能。因此，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时，就连德国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艘潜艇。然而，这几艘潜艇不久便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即使它们的作用始终未及前次大战时那样大，但随着其数量的增长，进而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至于飞机对水面舰只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当时同样遭到怀疑和轻视。海军为了表明战列舰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和无懈可击，专门进行了一些浮夸的试验。显然，战列舰的优势地位和无懈可击只是一种信条，而不是一个用科学试验来检验的技术问题。

这里应该注意，并着重指出：这三种新式战争工具通常虽称为武器，但更确切地讲应是武器运载工具。它们是将炮弹、炸弹或鱼雷送至接敌的战斗地区，使之发挥最大效力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赋予武器以机动灵活性能的手段。

认识到这一基本的共同性质甚为重要，因为它说明这类新式战争工具在战争中所引起的重大变化，即机械力已发展到超越人力的程度。

由于战斗部队减少的人数被后勤部队增加的人数所抵消，因此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便不为人所见。此外，在旧观念影响下，战争一来，动员旧式部队时，也不问需要如何以及所能获得的装备有多少，因此，为了吸收多余的人力，后勤部队往往增加到超过需要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仍然取决于人力消耗的状况。

但是，这一情况不应掩盖这样一个具有更深刻意义的教训，即在现代战争中，人力与机械力相较，其价值已大为降低。一个缺乏机械装备的国家在遭受一个装备优良的国家的攻击时，是不太可能打一场长期的战争的。前者不论能在战场上投放多大的兵力，其价值将被其机械劣势所降低，从而遭到迅速的失败。在这种战例中，攻击一方也可能在人力和机械力方面均占有优势，但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仍在于机械优势。这一情况在1935—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对这一预兆并没有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军队一直满足于保持1918年的技术。英军在发展坦克方面虽居于领先地位，然而犹豫不定。但是一些青年英国军官预言，在新的机械化战争时代，高速坦克或如某些人所说的，坦克与轰炸机协同作战，将打开未来的大门。

与此同时，特伦查德勋爵领导的英国空军参谋部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轰炸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成为决定因素，由于轰炸机能摧毁敌方的工业力量，因此它本身就足以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见解后来虽然同意大利将领杜埃的著作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早在杜埃的理论流行之前，它便是皇家空军的一个主要信条。由于飞机具有在三度空间活动的的能力，因此有人主张，空军不应去袭击阻挡道路的敌军，而应飞越敌军，集中力量摧毁过去由陆军保卫的城市和工业力量。

皇家空军独立成为单一的军种之后，自然要建立与众不同的理论，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皇家空军另立门户，使它在战后厉行节约期间得到庇护，在节约的压力减轻后即得到发展。相形之下，隶属于陆军，地位较低的皇家坦克兵团却受到了损害。但这样一来，使得皇家空军在发展协同作战的理论方面，甚至在参加与坦克协同作战的训练方面，不愿进行合作。

坦克与飞机协同作战的理论，在战败国德国比在战胜国受到更大的重视。对这一新思想接受很快的另一个国家，便是在俄国革命中新出现的苏联。这两个国家都更倾向于在作战区域使用坦克与飞机协同作战的新思想，而不是对敌国整个范围内进行单纯的轰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1年后，纳粹德国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坦克与飞机协同作战的理论付诸实施。这一理论在1939年取得了对波兰的迅速胜利，1940年又取得了对西欧盟国的更大的胜利。德军领导人完全承认，这一理论是从其创始国英国引进的，并承认，在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装甲部队之前，就密切注意英国在这一理论方面所进行的实际试验，从中得益很大。

引进国对这一理论的威力，在认识上和发展上为什么比创始国快得多呢？

首先而又极其明显的解释是，这种机械化战争的新技术，即坦克与飞机协同作战取得多种效果，自然适用于侵略的目的，因为它在进攻上增加了速胜的前景。

对于要求和平和具有和平思想的国家而言，这一新技术似乎是一种所费不费的多余之物，对它们的国民保险政策来说是一笔不必要的额外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已使预算捉襟见肘，因此预算制定者所希望的莫过于避免一切可能增大负担的战争方法和战争手段的改革。就眼前看，使部队维持老样子当然要便宜些。

根据历史经验，另一个解释是，军队只有从失败中才能学到东西。这一点说明了一个军队在一次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往往在下一次战争中却遭致失败的原因。胜利使人自满，即安于现状。只有失败才会使一个军队或一个国家震惊，不再墨守成规。

协约国的军事首脑在1918年取得胜利之后，过分地满足于自己的战争工具。他们甚至想回到1914年的战争工具上去。由于他们之中有些人是骑兵出身，对骑兵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不问骑兵所起的作用与其规模相比是否相称，而一味地吹嘘这一兵种的长处。

这种“陈腐思想的既得利益”所造成的心理作用，在海格勋爵1925年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已说得很清楚。拙著《是巴黎还是战争的前途》[\[1\]](#)中，本文作者曾阐述了未来机械化战争在地面和空中的图

景。但是这位英国最有影响的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法英国总司令的意见却与之截然不同，他说：

今天，有些人在热烈谈论马匹可能要过时，并且预言飞机、坦克和汽车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取而代之。我相信马匹的价值及其未来的用处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大……我完全赞同使用坦克和飞机，然而它们不过是人和马的附属品而已。我十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像以往那样发现马——良种马——大有用处。

但是，鼓吹新思想的人逐渐取得了胜利。到了1927年，世界上第一支实验性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便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建立了起来。由于对机械化部队的检验获得成功，帝国总参谋长甚至谈到要建立“装甲师”。但不久便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反对力量，到了1928年，这支机械化部队遂被解散。当时，一位高级军官对新闻界宣称：“骑兵是必不可少的。坦克已不再起一种威胁了。”

1929年，经过说服，陆军部同意颁发第一部正式机械化作战操典。这部操典给人以深刻印象，为1931年重新建立一支试验性的装甲部队铺平了道路。此事一年后便被搁置下来了。但过了一年又被重新提起。进一步，退一步，进展的过程就是这样时起时伏。

在那几年中，新技术尽管遭到不断的反对，却在实践中逐步地形成起来了。对发展这一新技术起首要作用的人当中，首先应受到特别称赞的是在理论上有远见的富勒上校，其次是对此做出了实际贡献的林赛、布罗德、派尔和霍巴特这几位上校，以及马特尔少校。促使这一新技术趋于完善的是于1934年成为英国永久性装甲部队首任司令的霍巴特。

英国在明白无误地看到纳粹德国迅速重新武装的迹象后，准备重整军备。当时，英国对保持它在机械化战争中原来的领先地位，既有此愿望，也有此能力。

不幸的是，陆军部的首脑们在一次政策声明中顽固地表明：“在机械化的问题上，我们得慢慢来。”因此，德国便得到了一跃而领先的机会。与此同时，英军中的机械化专家又受到种种阻碍，或被解雇。这显然是为了防止他们坚持己见而引起麻烦。

这一做法对英国的前景尤为不幸，因为在发展新的进攻性技术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导致了新的有效的反击技术的发现。这一

新的反击技术是，利用地雷和反坦克炮延缓和阻挡敌方的进攻，并协同己方隐蔽在固定阵地上的坦克进行射击，当进攻者溃乱时，己方坦克立即进行反击。但是这种进攻性技术整整费了10年的时间才被正式接受，而且即使那时也还是半心半意。因此，除非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至1945年爆发，否则根本不可能期望会采纳什么对付的办法，并及时做好准备。

对英国面临的问题的基本因素加以考查，便可得出某些互有联系的结论。第一，由于反坦克的防御力量不断增强，使用新的进攻技术必须是一开始便利用突然进攻的有利条件，及优势的坦克和飞机，才能有最大的获胜机会。第二，英法两国寻求和平的政策必然会使它们丧失此种机会。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发展防御性的进攻战略，以及为这一战略提供必要的现代化手段。人们总得面对事实，而不应一味谈论没有可能实现的空空洞洞和进攻。[\[2\]](#)

就法国人而言，由于经济的重压，同时由于他们一味相信征兵制度，因而夸大了胜利带来的快慰感。胜利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很快便过时了的战争物资，但他们却不愿把它废弃掉。他们迫使德国解除武装，然而却为德国从头开始创造了条件，使德国可以不受旧战争工具以及这些战争工具所形成的思想习惯的约束。

1935年以前，德国一直被迫废除征兵制度。这就迫使德国将领们集中力量建立一支素质和机动性都很高的部队。而法国军队由于墨守征兵制的成规，却每况愈下，成为一支民兵式的部队，这种部队随着服役期的缩短，变得更无效能。更有甚者，法国的主要将领们对他们1918年所取得的胜利是那么满足，对自己军事学识的优越是那么自信，他们比谁都自满，因而也最不愿意看到技术上出现任何重大变革。而在法军中，坦克是步兵和骑兵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分属于这两个兵种，而不是一个新的、独特的兵种，这样，就使上述障碍更加增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档案记录中，从政治、军事首脑的回忆录，特别是军事首脑的回忆录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有关证据。确实，盟国军事首脑争执十分激烈，彼此的论点又截然相反，可以说，和平带来了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军之战”。

本章着重论述论战的主要方面，自然也就是论述那些在共同作战的基础上作战的各战区的情况。在这些战区中，任何一国都没有明确规定的和公认的指挥战斗的支配权。因此，这就需要集中讨论西欧和地中海战区，而比较扼要地谈及俄国和太平洋战区。在这一范围中，也只能稍稍触及争论较少、并且只发生在级别较低的军人之间的比较单纯的海战和空战的军事行动。

这里需要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适合于达到军事目的，并最终达到政治目的？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重大影响的，究竟是哪些失误？

我们可以通过对战争的各阶段逐一进行考查来求得对上述两个主要问题的答案，这些阶段是指形成战争的转折点——1939年至1942年秋盟国处于不利的阶段，以及其后所处的日益有利的阶段。

丘吉尔将这场最终为俄国打开进入欧洲心脏的道路的灾难性战争称为“不必要的战争”。在竭力避免战争和遏制希特勒方面，英法政策的一个根本弱点乃是对战略要素缺乏认识。在这一方面，当时的英国政治家比法国政治家还要无知。鲍尔温对待所面临的问题麻木不仁，张伯伦则对之想入非非，他们二人均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由于缺乏战略观念，西方盟国在最不利的时刻陷入了战争，尔后又加速了一场引起深远后果的、本可以避免的灾祸。英国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但实际上这是由于希特勒犯了整个历史上侵略性的独裁者们所不断重复的错误。

由于希特勒转而进攻俄国，以及美国参战，战局终于转为不利于希特勒，这时盟国为了追求“胜利”的幻想，即只顾消灭眼前之敌，而未虑及将来，从而失去了战后的前途。

为了分析成败得失，考察一下战前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从战前阶段中才可以找到战争初期遭受失败的原因。

回顾一下过去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于1936年重新进入莱茵兰，对双方来讲都是决定命运的第一步。对希特勒来讲，这一行动含有双重战略利益：既可以保护德国在鲁尔的居于要害地位的工业区，又给希特勒提供了将来进入法国的一个跳板。

希特勒此举为什么没有受到制止呢？这主要是由于英法极力避免冒武装冲突之危险，以免演成战争。即使德国所采取的方式是错误的，但它重新进入莱茵兰似乎只是想纠正它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点就使英法更加不愿采取行动。特别是偏重政治考虑的英国，倾向于认为德国此举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看不到其战略含义。

但是，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国毫无迅即作出“灭火”行动的军事准备。本章作者在其1927年出版的《重建现代化的军队》一书中及其以后，都曾强调指出，法军的模式和理论均已过时和呆板到了危险的程度。其“僵化”和“臃肿”一至于此，“在未来战争的考验中很可能全军覆没”。本文作者主张，法国首先应做的是在动员大量应征士兵之前，先建立“一支由长期服役，训练有素的志愿兵组成的机械化攻击力量，以便形成一支先头突击部队”。

夏尔·戴高乐接受了这一论点和建议，并以此作为他在1934年出版的引人注目的小册子《为建设一支职业化部队而努力》的主题。保罗·雷诺也力陈这一主张，要求建立一支机械化、职业化的突击部队。但是，法国并没有为此而进行任何工作。

这一军事因素——缺少这样一支立即可以使用的突击部队——主要涉及时间问题。英国在政治上的踌躇不定固然加强了克制态度，但在这以前，上述军事因素便已妨碍了对希特勒进入莱茵兰之举进行任何迅速的反击。雷诺和戴高乐所谈到的这一障碍，已为甘末林将军的《回忆录》第二卷中所载高级领导人讨论的详细记录，以及敦促立即采取坚决行动的内阁阁僚，特别是总理萨罗、保罗-邦库尔以及当时的外长弗朗丹的叙述所证实。

法国陆军部长莫兰将军在1936年3月8日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对莱茵兰进行任何干预都要大规模地动员后备役军人。事实上，据弗朗丹、保罗-邦库尔和芒德说，莫兰坚持认为需要进行“总动员”。这一严酷的前景就像一盆冷水似的将前一天内阁会议上占上风的要求即立即采取行动的主张泼灭了。另外两个军人部长同样令人沮丧。只是在这次内阁会议之后，关于采取行动的決定才被搁置起来，待英国政府表明态度后而定。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英国的态度是消极的。

希特勒在1938年采取行动时，再次从以下一些政治因素中收到了战略上的好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要求合并；德国国内对捷克人对待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的办法强烈不满；以及在西方各国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不无道理。

但是希特勒3月进军奥地利，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南翼暴露出来了。对希特勒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的南翼是他向东扩张计划的一个障碍。9月，希特勒利用战争威胁和因此而产生的慕尼黑协定，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区，而且在战略上使捷克斯洛伐克处于瘫痪状态。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从而包围了波兰的侧翼，完成了一系列“不流血”的行动中的最后一个行动。英国政府随即采取了致命的轻率行动，在没有首先得到唯一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给以有效援助的国家俄国的保证的情况下，突然向这两个战略上已被孤立的国家提供保证。

就时机而言，这种保证势必会起到挑衅的作用。就现在所知，希特勒在遇到这一挑战姿态之前，一直没有立即进犯波兰的意图。就地理位置而言，由于这两个国家位于英法部队无法接近的欧洲地区，这种保证就给希特勒提供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西方国家从而就破坏了在它们没有机动打击力量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唯一切实可行的战略方式的根本基础。因为，他们非但没有能够在西面开辟一条抵抗任何进攻的强大的战线来制止侵略，反而给了希特勒轻易击破一条软弱战线的机会，从而使他赢得了最初的胜利（参见上文第725页以下）。

这一时期最令人惊奇的特点是，政治家们相信给予波兰的那种战略上愚蠢可笑的保证能对希特勒起威慑作用。对这种蠢事唯一提出警告的是劳合·乔治。丘吉尔虽然也能看出这种保证的弱点及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却对它表示赞同。

有战略头脑的希特勒马上认识到，只有俄国的援助才能使这一保证产生效力。因此，希特勒便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和恐惧吞咽下去，集中力量同俄国修好，争取它不介入。这一转变比张伯伦的转变还要令人吃惊，其致命的后果也不相上下。

8月21日里宾特罗甫飞往莫斯科，23日签订了条约。条约附有秘密协定，根据此协定，波兰将由德俄共同瓜分。

在希特勒一系列迅速的侵略行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中，这一条约肯定要引起战争。英国由于已保证援助波兰，因此感到袖手旁观必然要丢失体面，同时也必然会给希特勒扩大侵略开辟道路。而希特勒即使看到他在波兰所追求的目的意味着一场全面战争，也不会再后退了。

这样，欧洲文明的列车便急剧地开进了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经过了6个耗尽人力物力的年头才重见天日。但即使到那时，胜利的灿烂阳光也只是一种错觉。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德军入侵波兰。英国为了履行早些时候给予波兰的保证，于3日，星期日，对德宣战。6小时后，法国政府继英国之后对德宣战，态度更加勉强。

波兰在一个月之内便被占领。大部分西欧国家不出9个月也都被到处漫溢的战争洪水所淹没。

波兰的位置好像是德国上下牙之间的“舌头”。这一战略地位使它的处境极为不利。而由于波兰的战略是将其大部分军队部署在靠近舌尖的地方，使形势更加糟糕。不仅如此，波兰军队在装备上和思想上均已过时，他们仍然相信规模庞大的骑兵，而事实已证明骑兵对德国的坦克毫无办法。

德国当时只有6个装甲师和4个机构化师可以投入使用。但由于古德里安将军的热心和希特勒的支持，它们在采用20年前由英国首创的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新思想方面，比其他兵种走得更快。德国人还发展了一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得多的空军，而不仅波兰，并且还有法国，都严重缺少空军，甚至支援和掩护陆军的空中力量都很缺乏。

因此当波兰看到德国的“闪电战”技术显示出首次胜利之时，波兰的西方盟国还在按常规进行战争准备。9月17日，红军越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由于波兰几乎没有军队对付这第二次的入侵，因此这背后的一击便决定了波兰的命运。

德国于9月1日晨将近6时越过波兰边界；空袭早一小时便已开始。德国空军没有采用大编队的形式作战，而是广为分散地活动，这样就在尽可能广大的地区造成瘫痪状态。另一重要因素是德国电台冒充波兰电台发动广播攻势。这大大加剧了波兰后方的混乱，并使之丧失斗

志。由于波兰对其部队能战胜机械的力量过分自信，因此一旦遭受失败，便导致了幻想的破灭，从而使上述所有因素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在北路，入侵由包克的集团军群担任。该集团军群包括屈希勒尔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和克鲁格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前者从东普鲁士侧翼阵地向南推进，后者则越过波兰走廊向东推进，同第三集团军会师，包围波兰右翼。主攻任务则由南路的伦斯塔德集团军群承担。该集团军群比包克集团军群的步兵力量几乎多一倍，装甲部队力量则更强。它包括由布拉斯科维兹指挥的第八集团军、赖歇瑙指挥的第十集团军和利斯特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但决定性的攻击由位于中央的赖歇瑙部担任，为此大部分装甲部队交他支配。

到9月3日英法参战时，克鲁格部的推进已切断波兰走廊，到达下维斯杜拉河；屈希勒尔部则自东普鲁士向纳雷夫河不断进逼。更为重要的是赖歇瑙的装甲部队已穿插至瓦尔塔河，进行强渡。4日，赖歇瑙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并渡过了皮利查河，深入境内50英里。两天后，其左翼已深入罗兹的后方，右翼则插入了凯尔采。波军被分割成数股，无法协同作战，有的后撤，有的则对附近之敌进行零星的攻击。

与此同时，在喀尔巴阡山附近，利斯特的机动部队依次渡过杜纳耶茨河、比亚瓦河、维斯沃卡河和维斯沃克河后，直达著名的普热米什尔要塞两侧之桑河。在北路，屈希勒尔军的先头部队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已渡过纳雷夫河，正向华沙后方的布格河一线进击。最大的一部分波军残部还没有来得及撤过维斯杜拉河便已在华沙以西的维斯杜拉河河湾陷入紧缩的钳形包围，而这样一来，在这一钳形包围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钳形攻势。此时，德军除由于战略突破而获得的优势之外，又获得了战术防御上的优势。面对着已同后方隔断，且战且退之敌的慌乱袭击，他们只要能坚守阵地便可夺得全胜。

当维斯杜拉河以西的大包围圈逐渐紧缩之时，德军正深入该河以东地区。此外，他们已同时包抄了北面的布格河一线和南面的桑河一线。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由东普鲁士向南推进，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实行大范围的侧翼包围。在利斯特部前线，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于12日抵达利沃夫城。入侵部队虽因纵深推进而感到过度疲惫，并缺乏燃料，但波军的指挥系统已被严重打乱，以致既未能利用敌军行动

暂时放慢的时机，又未能利用许多波兰部队虽已孤立但仍表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

17日，俄国人越过了波兰东部边界。德军和俄军在由东普鲁士向南、经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利沃夫直至喀尔巴阡山一线会师，并相互祝贺。他们通过共同瓜分波兰结成了伙伴关系，但这一关系并不牢固。

英法在解除德国对波兰的压力方面是否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呢？据现在所知，就其兵力表面数字而言，乍看起来，答案似乎是“可以”。

德军对于在1939年进行战争还远未准备好。波兰和法国共有130个师，而德国只有98个师，其中36个师尚未经过训练。德军留下保卫西部边界的43个师中，经过充分训练，装甲齐全的作战师只有11个，而法国总参谋部则准备在那里部署85个师。因此，毫不奇怪，德国将领在战后受审时，以及在其后所写的回忆录中，都一致宣称，如果法军做出认真努力攻打西线，便可将其攻破。

但是，希特勒的战略使法国处于这样一种地步：它只有迅速发动进攻，才能解除波兰所受到的压力，而法军却又无力采取这种行动。法国老一套的动员计划不能迅速获得所需要的兵力，其进攻计划依赖的是大量重炮，而这些重炮要到第十六天才能准备妥当。到那时，波军的抵抗已纷纷瓦解。

法军无力迅速出击的责任，一半应由从贝当直到甘末林等历届法军首脑负责，他们全都墨守行动缓慢的战争常规；另一半应由政治领袖们负责，他们坚信通过征兵来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保卫国防最省钱而又最可靠的方式。军政领导人都对雷诺和戴高乐所提出的论点和警告置之不理或表示怀疑。

在海峡的对面，少数几位进步的军事思想家极力主张，英国对于保卫西欧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用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和一支由二至三个装甲师组成的、规模小而效能高的机械化部队及早进行干预，以弥补法军在这方面的不足。这一见解在1937年曾得到短暂的支持。但是，慕尼黑协定后，法国军政首脑极力劝说盟国采取征兵制，以使用老方法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墨守成规的英国总参谋部，以及越来越多的内阁成员也都同意他们的看法。

英国政府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之后，终于放弃了原先的军事政策，实行了征兵制。这一决定由于将工业力量转而用于装备计划筹建的庞大军队方面，从而减少了英国本来可以做出的有效贡献。战争爆发后，英国派遣了一支4个步兵师的部队到法国，并且打算将步兵增至55个师。1940年春，13个英国步兵师抵达法国，但没有装甲师，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装甲师会更为有效得多。当时投入战场的坦克旅在阿拉斯进行了反击，德军统帅部认为，其作用甚大，致使向里尔和敦刻尔克推进的德国机械化部队停顿了下来。

在波兰被迅速征服后，接着出现了6个月的平静时期。被这种表面平静所蒙蔽的旁观者将之称为“假战争”。更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幻想的冬天”。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公众此时都把时间耗费在制订进攻德国两侧的空想计划上，并且十分公开地谈论此种计划。

实际上，英法单独地发展战胜德国所需要的力量的前途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德国和俄国已在同一条边界上对峙，英法最好的希望莫过于德俄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国之间发生摩擦，从而把希特勒这股爆炸力引向东方，而不是引向西方。这一情况一年之后出现了。西方盟国如果不是那样迫不及待——西方民主国家一向如此——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出现得更早一些。

他们大喊大叫扬言要对德国两侧发动进攻，使希特勒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他首先的一击便是占领挪威。缴获到的希特勒的会议记录表明，直到1940年初，他仍然认为，对德国而言，“维持挪威的中立是最好的方针”。但是，到了2月，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想在那里登陆，我必须在他们之前到达那里。”4月9日，德国一支小小的入侵部队到达挪威，打乱了英国控制这个中立地区的计划，并在挪威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英国海军进入挪威领海之际，占领了挪威的主要港口。

这一惨重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丘吉尔。丘吉尔已于战争爆发时重入内阁任海军大臣，从9月以后即力促采取激烈行动阻止德国通过挪威中立海域的运输，从而切断其从瑞典获得铁矿供应。他认识到此举将激起德国人的“反击”，但是他坚持说，“德国攻击挪威和瑞典，对我们来说利多害少”。他的这种不现实的主张和完全无视斯堪的纳维亚中立的做法，先后受到达拉第和雷诺，同时也受到甘末林的支持。

丘吉尔等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开辟新战场来攻击德国的波罗的海侧翼的梦想。其结局不久便表明了这种主张是何等不现实。盟国坐令一支小小的德国部队站稳脚跟，并把比它强大的盟国部队赶回到海里，这一处置失当的行动，主要应归咎于海军上将庞德和陆军元帅艾恩赛德领导下的计划人员和执行人员的笨拙无能。

英国的反击行动缓慢，犹豫不决而又十分拙劣。海军部尽管战前藐视空军，但等到该采取行动时，却又无比谨慎，畏缩不前，不敢将其舰只置于可以决定这一干预行动胜负的地点上去。部队的行动更是软弱无力。部队虽已在数处登陆，旨在将入侵的德军逐出，但不到半个月，除了在纳尔维克的一个据点之外，其他部队均又返回舰上。即使这个据点也于一个月后德国在西部发动主要攻势时放弃了。

丘吉尔建立的空中楼阁倒塌了。这种空中楼阁是建立在对局势，以及对现代战争的变化——特别是空军对海军的作用——这些方面的根本错误的看法上的。

德军在开始攻击时用于占领挪威首都及其主要港口的兵力小得令人吃惊。它仅有7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一些辅助舰艇，以及约1万名军队，即用于这次入侵的3个师的先头部队。各处首批登陆部队均不超过两千人。为了夺取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机场，使用了一营伞兵。这是战争中首次使用伞兵部队，证明它很有价值。

但是，德军获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空军；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使用的力量有作战飞机800架和运输机250架。它在初战阶段吓到了挪威人，其后又使盟国的反击陷于瘫痪。

4月7日傍晚，英国飞机实际上已发现了“强大的德国海军舰队正急速向北移动”越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出口，向挪威海岸进发。丘吉尔说：“我们发现海军部简直不相信这支舰队是前往纳尔维克的。”——尽管“从哥本哈根来的报告说希特勒意在夺取那个港口”。英国舰队当即从斯卡帕启航，但是看来海军部和海上指挥将领都一心想虏获德国的战列巡洋舰。他们在力求与德国战列巡洋舰作战时，却没有看到敌人有企图登陆的可能性，因而丧失了堵截敌军较小的运兵舰的机会。

说来不幸而且令人啼笑皆非，在德军登陆前至关紧要的24小时中，英国的布雷行动竟吸引和分散了挪威人的注意力。由于缺乏战斗

经验，富于和平思想，以及军事组织过时，挪威人受到第一次打击后重振旗鼓的机会减小了。

入侵者沿着深深的河谷，摧枯拉朽地横扫整个挪威，其速度之快完全清楚地说明了抵抗之薄弱。如果抵抗顽强一些的话，阻挡侧翼包围的山谷两旁的融雪，很可能对德军获胜的前景造成更为严重的障碍。

在开始时的一系列突然袭击中，最惊人的是对纳尔维克的攻击，因为这个远在北方的港口，离德国海军基地大约有1200英里之遥。两艘挪威海岸护卫舰英勇地迎击来犯的德国驱逐舰，但很快即被击沉。次日，一支英国驱逐舰小舰队驶进海湾与德军交战，双方互有损伤。13日，一支较强大的英国小舰队在“沃斯派特”号战列舰的支援下发动突然袭击，全歼敌舰。但此时德军已在纳尔维克内外站稳了脚跟。

再往南面，德国舰只闯过了控制海湾的交叉炮火，轻易地夺取了特隆赫姆。这一冒险行动曾使考虑过这一问题的盟国专家惊愕不已。德国人夺取特隆赫姆后，便掌握了进入挪威中部的战略咽喉，剩下的问题则是他们为数很少的部队能否得到南来的增援。

德军虽在卑尔根、斯塔万格和克里斯蒂安桑等地受到挪威战舰和炮台的轰击而遭受一些损失，但登岸后即未遇到麻烦。然而，在逼近奥斯陆时，入侵军的主力遭到严重挫折。因为载有大批军事人员的“布吕歇尔”号大型巡洋舰被奥斯卡斯堡要塞发射的鱼雷击沉。于是，放弃了强行通过的企图，直到这个要塞遭到猛烈空袭于当天下午投降为止。这样，夺取挪威首都的任务便交给了在福纳布机场着陆的部队；当天下午，这支象征性的部队炫耀式地列队进入城内，它的虚张声势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但是，德军的延误，至少使挪威国王及政府得以北逃，以便集合抵抗力量。

预定占领哥本哈根的时间恰好同预期到达奥斯陆的时间相吻合。丹麦首都容易从海上进入，凌晨5时前不久，三艘小型运兵船在飞机掩护下驶入港口。德国人登陆时没有遇到抵抗，一营人长驱直入，出其不意占领丹麦兵营。与此同时，德军侵入丹麦日德兰半岛的陆上国境线，经过短暂的交火后，丹麦放弃了抵抗。

占领丹麦进一步保证德国人从本国港口至挪威南部控制了一条有掩蔽的海上走廊，并且使他们获得了可以支援在挪威的部队的前进机

场。

德军一旦在挪威建立了据点，动摇其据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其供应和增援。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封锁丹麦和挪威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但是，情况不久便表明，海军部由于害怕德国空袭，除了几艘潜艇外，不愿派任何舰只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

如能坚守从奥斯陆通向北方的两条长长的峡谷，并迅速制服在特隆赫姆的德军小部队，则仍可有望保住挪威中部。这时，英国想集中力量达到这一目的。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一周以后，英国在特隆赫姆的南北，分别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内斯登陆，准备向特隆赫姆发动主要的直接进攻。

英军自纳姆索斯向南推进时，由于在该地唯一的一艘驱逐舰支援下的几小股德军在特隆赫姆湾口附近登陆，威胁其后路，遭到了失败。从翁达尔内斯推进的英军，非但不能挥师北上直指特隆赫姆，反而不久便采取守势来抵御从奥斯陆沿古德布兰德峡谷扑来并扫清挪威军的德军。

由于盟军遭到猛烈空袭，自己又无空中支援，战地指挥官建议撤离。5月1日和2日，这两路部队全部乘船撤出，从而使德军完全控制了挪威的南部和中部。

盟国于是集中力量夺取纳尔维克。此举与其说是想进抵瑞典铁矿区，不如说是想“挽回面子”。英国原已于4月14日在这一地区登陆，然而即便当他们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增至两万人，即5倍于敌之时，其进展仍然缓慢不堪。直至5月27日德国人才被逐出纳尔维克城，然而此时西欧发生了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终于使盟国及早放弃了他们在挪威的最后据点纳尔维克。

其原因是希特勒下一步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打击，已于5月10日开始。他在前一年的秋天，即在击败波兰后盟国拒绝接受他所提出的和平建议之时，便已着手准备这次进攻。他认为打下法国才最有希望迫使英国接受和平。由于天气恶劣，以及他的将领们对此表示怀疑，进攻自11月之后一再推迟。在此期间，德国的计划也经过彻底修改，其结果，改变了战争的整个前景，对盟国甚为不幸，对希特勒则暂时非常有利。

原计划主要是通过河道纵横的比利时中部进军。这样做实际上将导致同法英精锐部队正面相遇，可能招致失败，从而动摇希特勒的威信。但是由曼施泰因建议制订的新计划，却完全出其不意地将盟国打得惊慌失措，使其遭到惨重损失。因为正当盟军进入比利时迎击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德军第一次进攻时，大批德国坦克（共7个装甲师）却长驱直入，通过了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的阿登山脉。而法军参谋部以及英军参谋部一向都认为这里是坦克“无法逾越的”。

德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渡过了马斯河，击破了盟国前线薄弱的一环，然后向西直趋位于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海峡沿岸，切断了盟军的交通。这样，在大部分德军步兵投入战斗之前便决定了胜负。英军勉强地由敦刻尔克从海上逃走。比军和大部分法军被迫投降——其结局已无法挽回。因为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一周，德军便挥师南下，此时法军残部已无力抵抗他们。

法国之战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事例之一，说明一位精悍的实干家所推行的新思想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德里安曾说过，在战前，以单独的装甲部队实行战略渗入，即用远程坦克进攻，切断敌方远离前线的交通线的思想，曾大大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古德里安热心于发展坦克。他深刻地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军事思想新潮流中出现的这一新思想，将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

德国入侵西欧从右翼开始，攻击荷兰和比利时各防御要冲，取得了大出意外的胜利。由空降部队担任先锋的这几次打击，竟使盟国忙于应付，分散了注意力，有好几天时间看不到德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在中央突入，穿过山峦起伏和森林茂密的阿登山区，直捣法国的“心脏”。

5月10日凌晨，荷兰首都海牙及其交通中心鹿特丹均遭到空降部队的袭击。与此同时，在它以东100英里之处的边防线也受到攻击。由于前方和后方遭到双重打击所产生的混乱和惊恐，又因德国空军的广泛威胁而加剧。德国装甲部队利用这种混乱状态迅速突破了南翼的一个缺口，于第三天同在鹿特丹的空降部队会师。他们从刚刚赶来援助荷兰的法国第七集团军的眼皮下面穿过，直趋他们的目标。

第五天，虽然主要防线尚未被攻破，但荷兰投降了。德国空军对人口密集的城市近距离空袭的威胁，加速了他们的投降。

对比利时的入侵也是一开始便令人吃惊。地面进攻由赖歇瑙指挥的强大的第六集团军（其中包括霍普纳的第十六装甲军）担任。德军必须克服一个极为艰险的障碍，才能有效地展开。协助这次进攻的只有500空降兵。他们被用于夺取阿尔伯特运河上的两座桥梁和这条国境河流一侧的比利时最现代化的要塞埃本埃迈尔要塞。

次日晨，足够的德国部队正越过运河，突破了运河后面的比利时薄弱防线。接着，霍普纳的两个装甲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开过了没有被毁的桥梁，在对岸的平原上展开，横扫一切，长驱直入，迫使比军在来援的英法部队刚刚到达时开始总退却。

突破比利时的防线虽非入侵西欧的决定性打击，但对战局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不仅将盟军的注意力引到了错误的方向，而且把盟军大部分机动部队牵制在比利时的战斗中，因而这些机动师无法抽调出来，向南调往尚未完工的马奇诺防线西端以外法国边界最脆弱的部分，去对付5月13日突然出现的更大的威胁。因为伦斯塔德集团军群的机械化先头部队此时正越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卢森堡省向法国挺进。他们在穿过70英里纵深的阿登山区，扫除了一些微弱的抵抗后，跨过了法国边界，于发动进攻的第四天清晨出现在马斯河两岸。

事实证明，法国的致命弱点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在于他们偏重防御的思想，即“依赖马奇诺防线的心理”，而是他们的作战方案中侧重于进攻的方面。他们从左侧推进到比利时，这反而为敌人助了一臂之力，从而自投罗网——正像1914年第十七号作战计划几乎害得他们一败涂地一样。这次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对手更为机动，是以摩托的速度调运军队，而不是徒步行军。所遭受的损失也更重大，因为这次左侧突入的行动是由法军的三个集团军和英军进行的，而这包括了盟军中装备最现代化和最机动的部队。

德军穿越阿登山区进军是一次巧妙的军事行动，也是参谋工作的卓越表现。5月10日拂晓前，在卢森堡边界对面集结了在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大量坦克。这支德军由三个装甲军组成，共分三组或三个梯队，第一、二组为装甲师，第三组为摩托化步兵师。先头部队由古德里安将军率领，全军由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克莱斯特集团军的右面是霍特率领的一个独立的装甲军，其任务是迅速穿过阿登山区的北部，直扑纪韦和迪南之间的马斯河。

这7个装甲师只不过是集结在法国边境沿线准备插入阿登山区的大军的一部分。大约有50个师密集在一条狭窄而纵深的战线上。但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德军装甲部队能否迅速穿过阿登山区，渡过马斯河。

德军赢得了这场竞赛的胜利，虽然优势并不大。守军如能利用按原定计划进行破坏工作，使敌军部分受阻这一有利条件，则结局很可能有所不同。对法国的安全来讲，不幸的是进行了破坏之后，却无足够的部队进行防御。

古德里安的攻击集中在紧靠色当以西的一段长一英里半的河流上。攻击于下午4时开始，由乘坐橡皮艇和跨过浮桥的装甲步兵在前。渡船不久便将轻型车辆输送过河，沿河突出部分很快便被占领，德军步步进逼，夺取马尔费森林和南面的高地。午夜时分，德军已深入近5英里，同时在色当和圣芒热之间的格莱雷架好了一座桥梁，坦克开始源源不断地渡过了河。

盟国空军猛烈轰炸这座桥梁。由于德国空军主力已他调，盟国空军才暂时占据优势。但是，古德里安军的高炮团在这座要害桥梁上空保持了密集的防空火网，击退了盟国空军的袭击，并使其蒙受重创。

到16日夜间，西进德军已向英吉利海峡挺进50多英里，到达瓦兹河。

战局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均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军反攻之所以屡屡失灵，其原因在于择定时机太慢，赶不上不断变化的形势。而形势之变化莫测，则是由于德军先头部队行动之迅速，总是超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预计。法军首脑们是根据这样一种设想制订他们的计划的，即德军攻出马斯河不会早于第九天。这个时间表竟与德军首脑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表相同，但后来古德里安打乱了这个时间表，时间表打乱后，情况就更加糟糕。

法军司令官受到的是1918年那种行动迟缓的作战方法的训练，思想上不适于对付装甲部队的快速行动，这使他们普遍感到束手无策。

雷诺采取行动，撤换了甘末林，将福煦的老助手魏刚从叙利亚召回。魏刚直到19日才回到国内，因此最高统帅部有3天的时间处于停顿状态。

20日，古德里安进抵英吉利海峡，切断了盟军在比利时的交通线。更有甚者，魏刚比甘末林的思想还要过时，继续按照1918年的方法制订作战计划。这样，挽回大局的希望就消失了。

16日，英国远征军在布鲁塞尔前面的前哨战线上后退了一步。它还没有到达斯凯尔特河边的新阵地，古德里安就已将远远通向南面的交通线切断，从而破坏了这一阵地。19日，英国内阁获悉，戈特“正考虑，如他被迫撤退的话，是否可能向敦刻尔克撤退”。内阁虽已知道戈特只有供4天用的给养和进行一次战斗用的弹药，但仍命令他向南进军法国，强行突破德军在他后方布下的罗网。

戈特尽管争辩说内阁的指示行不通，但仍率所部12个师当中的两个师和派至法国的唯一一个坦克旅，试图从阿拉斯向南发动进攻。反击于21日开始，但最终只投入两个坦克营和两个跟随在后的步兵营。坦克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后援，因步兵受到俯冲轰炸而动摇。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坦克部队的小规模反击竟使一些德国高级司令官大为恐慌。它曾一度迫使他们考虑让自己的先头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盟军在阿拉斯取得了昙花一现的进展后，在北面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去突破敌军的包围，而魏刚所计划的，由南面姗姗来迟的解围攻势，又软弱得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25日傍晚，戈特决心在敦刻尔克向海上撤退。48小时前，德国装甲部队早已抵达距这一海港仅10英里的运河前线。

次日，在包克的攻击下，比利时陆军防线的中央出现了缺口，当时又无后备队前去填补。利奥波德国王早已通过凯斯海军上将向丘吉尔提出多次警告，说局势已是越来越没有希望。比利时国土早已大半沦陷，军队背临大海，困守在一条挤满了难民的狭长地带。因此，当日下午早些时候国王决定请求停战。次日清晨宣布了“停火”。

尽管法国提出了抗议和严厉的指责，此时英军已争先恐后向海滨退却，赶在德军合围之前登上舰船。幸好英国在一个星期以前便在国内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在多佛尔任指挥的海军上将拉姆齐在前一天，即19日，已被任命负责作战指挥。大批渡船、海军扫雷舰和小型沿海航船立刻被调集起来执行这次所谓的“发电机作战计划”。

在随后的几天里，局势急剧恶化。海军部不久便清楚地认识到，敦刻尔克是唯一可能的退路。26日下午，即比利时请求停战的24小时

前，亦即内阁批准撤退前，“发电机作战计划”付诸实行。起初，预料只有一小部分英国远征军能够得救。

在其后的3天中，德军空袭增加。6月2日白天，撤退不得不停止下来。从英格兰南部机场起飞的皇家空军战斗机竭力把德国空军遏制在海湾，但由于众寡悬殊，且距离较远，不能在该地区上空久留，因此根本无法维持充分的空中掩护。德军的轮番轰炸虽因柔软的沙地而减弱了威力，但使在海滩上候渡的部队极度紧张。

在海上造成的物质损失要大得多。用于这次撤退的英国和盟国的860艘各类大小舰船中，共损失驱逐舰6艘，运兵船8艘和小型船只200余艘。

十分幸运的是，德国海军没有使用潜艇或鱼雷艇来进行干扰。此外，令人欣慰的是天气极好，也帮了这次撤退的大忙。到5月30日，英国远征军已撤退了12.6万人，剩下的部队，除小部分在后退时被切断外，均已到达敦刻尔克桥头堡。

到了6月2日午夜，英国的后卫部队已经登船，英国远征军的撤退宣告完成。22.4万人安全撤离，只有约两千人在返回英国途中因船只被击沉而牺牲。此外，约有9.5万名盟军也撤出，其中主要是法军。次日夜间，尽管困难越来越大，仍然尽了一切力量撤出了剩下的法军，又有2.6万多人获救。不幸的是，有数千名后卫部队没有撤出，此事在法国留下了深深的创痛。

到4日晨战斗结束时，共有33.8万名英国和盟国部队在英格兰登陆。与先前的预期相较，其结果是惊人的，也是海军的一次宏伟战绩。

同时也清楚表明，若不是希特勒在12天以前，即5月24日，命令其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前进，要将英国远征军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

自从突入法国后，希特勒一直神经高度紧张，心惊肉跳。由于他进军格外顺利，没有遇到抵抗，使得他心神不宁。从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17日，即法军在马斯河后面的防线大出意外地崩溃之后的次日，哈尔德记载道：“元首极为紧张

不安。他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不敢再冒险，因此宁愿约束我们前进。”

当希特勒的装甲部队挥师向北，特别是英国坦克部队从阿拉斯发起反攻，尽管来势不猛，但也造成短时间的惊恐之后，希特勒的疑虑又抬头了。在紧要的时刻，即5月24日晨，他视察了伦斯塔德的指挥部，这时他的疑虑加深了。因为伦斯塔德在检讨局势时，详细谈到坦克部队在长驱疾进中力量被削弱的情况，并指出德军可能会遭到来自南北两面，特别是来自南面的攻击。

下午，希特勒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后，立即把总司令叫来，给他下达了明确的停止前进的命令，当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沮丧地概述了这一命令的后果：“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其前面虽无敌军，但在元首的直接命令下，将就地停止前进。歼灭被围之敌的任务将交给空军去完成！”

如果说希特勒觉得他下达停止进军的命令是受了伦斯塔德的影响的话，那么在英军逃走之后，在他为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辩解时，十之八九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惯于把错误归咎于别人的人。看来希特勒前往伦斯塔德的司令部，很可能是想进一步寻找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疑虑和强行改变计划是正确的。

同时，有证据表明，甚至德国空军可以发挥的力量也没有充分和大力利用。有些空军将领说，希特勒在这方面又刹了车。

这一切都使高级领导人猜测，希特勒的军事理由后面有着某种政治动机。伦斯塔德的作战计划人员布卢门特里特把这一点同希特勒视察他们的司令部时所作的令人惊讶的谈话联系在一起。他说：“他接着使我们大吃一惊，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把英帝国同天主教相提并论，说它们都是世界稳定的基本因素。他说，他要求于英国的只是英国承认德国在大陆上的地位。”

希特勒的性格非常复杂，所以任何简单的解释都未必是真实的。他做出这一决定很可能交织着好几条线。三条是看得清的——他希望保存坦克力量以备下一次出击之用；他长期以来始终畏惧佛兰德沼泽地；戈林为空军争功。但是，这个生性爱好政治权术、头脑里花招很多的人，他心中很可能有一条政治线和这些军事线交织在一起。

法军沿索姆河和埃纳河一带的新防线比原来的要长，但防守力量却大大地减少了。尽管有盟军助战，法军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便损失了30个师（当时在法国的英军只有两个师，另外还有两个训练尚不充分的师在来法途中）。魏刚共调集了49个师守卫这道新防线，留下了17个师守卫马奇诺防线。

对比之下，德国的10个装甲师重新补充了坦克，兵力达到满员，而他们的130个步兵师几乎还没有动用。

德军为了发动新攻势，对兵力重新作了部署。为了增加对埃纳河地区的压力，又投入了两个集团军。已经运动至该地区潜伏待命的两个装甲兵团归古德里安指挥。克莱斯特指挥另外两个装甲军分别从位于亚眠和佩龙纳两地的索姆河上的桥头堡进击，形成钳形包围，最后在克雷附近的瓦兹河下游会合。其余装甲军则在亚眠和海滨之间推进。

新的攻势于6月5日开始，最初在拉昂与海滨之间的西段地区开始。头两天遭到顽强抵抗，但在7日，最西面的装甲军突破到了通向鲁昂的各条公路，9日，德军渡过塞纳河时，未遇到严重的抵抗。

但是克莱斯特的钳形攻势没有按计划进行。右翼虽在8日终于突破，但从佩龙纳进击的左翼却在贡比涅以北因遭到顽强抵抗而受阻。德军最高统帅部于是决定抽回克莱斯特的兵团，令其向东支援已突破香巴尼的部队。

在这一地区的进攻直至9日才开始，但以后法军溃败十分迅速。当大批步兵强渡之后，古德里安的坦克迅即以破竹之势冲破缺口向马恩河畔沙龙挺进，随后挥师向东。到11日，克莱斯特扩大扫荡范围，在提埃里堡渡过马恩河。德军飞速前进，直抵瑞士边境，切断了马奇诺防线全部法军的后路。

早在7日，魏刚便建议法国政府请求停战，不要延误。次日，他宣布：“索姆河之战已经失败。”法国政府意见不一，对投降犹豫不定，但在9日决定撤离巴黎。究竟迁至布列塔尼，还是迁往波尔多，举棋不定，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迁往图尔。

10日，意大利宣战。尽管为时已晚，还是许诺让予墨索里尼很多殖民地，但他为了改善他对希特勒的地位，轻蔑地拒绝了这些让步。

不过意大利的进攻轻而易举地被法国抵挡住了。

此时，法国内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投降，一派主张从北非继续作战。但只决定迁往波尔多，同时指示魏刚在卢瓦尔河固守。

德军于14日进入巴黎，同时向两翼纵深进军。16日抵达罗纳河谷。

与此同时，魏刚在所有主要指挥官的支持下，继续促请停战。为了防止做出这一决定，并保持住在非洲的立足点，丘吉尔做了最后的努力，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关于建立“法英联盟”的建议。这个建议除了引起愤怒之外，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法国内阁对这一建议进行了表决，大多数阁员反对，结果竟然做出投降的决定。雷诺辞职，从而由贝当元帅组成新内阁。16日夜，向希特勒递交了停战要求。

22日，法国接受了德国的条款，在附带安排了同意大利的停战后，停战于6月25日凌晨1时35分生效。

英国这时已是唯一剩下来同纳粹德国作战的对手了。但它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军事上无力防御，处于敌军占据的长达2000英里海岸线的包围威胁之下。即使英军大多数已经脱险，但大部分武器均已丢失。如果德军在法国沦陷后一个月之内的任何时候在英国登陆，英国便无法抵挡。

用海军实行截击既困难、缓慢，又无把握。为了将舰队置于德国空军的航程以外，英国将它们远远地留在北方。当时英吉利海峡这个“防坦克壕”是一块比海军更为有效的盾牌。

敌军如果真正登陆，英国地面部队是无法加以抵挡的。虽然英军在法国设法逃脱了覆没的结局，但遗弃了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在国内可供防守海岸线的部队使用的武器，仅仅剩下各种火炮500门和200多辆坦克。工厂要用长年累月的时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武器来弥补在敦刻尔克受到的损失。国内当时只有一个接近全副装备的师，到7月中旬也还只有两个师。

英国国民警卫军能够提供大量兵员，而且士气旺盛，但直到德国入侵的威胁解除后很久才得到装备和训练。这支队伍原名“地方防卫志愿军”，成立于5月中旬，一周之内便有25万年龄在16岁至65岁的男子入伍，当月底入伍人数共达30万人。但只有10万人得到了枪支，其

余的人只好用短棒、长矛等临时凑合的原始武器。7月底，这支队伍的人数已经达到近50万人，并于7月31日更名为英国国民警卫军。但是，它直到当年很晚的时候才又得到少数枪支。事实上，甚至1942年春，国民警卫军人数已超过150万时，也还有1/4的人没有枪支或其他随身武器。

幸好，由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50多个空军中队出色的战斗，德国以夺取制空权作为入侵英国的第一步的企图遭到了挫败。战斗机司令部是在空军中将休·道丁和指挥驻在英格兰东南部的第二空军大队的空军少将帕克的卓越指挥下进行战斗的。即使按照战后查明的修正数字，截至10月底，他们共击落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1733架，英国损失战斗机915架。（德国初期的空军力量是轰炸机130多架，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数目相等。而英国开始时的防御力量仅有可用的战斗机600架。）

1940年8月和9月，入侵的威胁已经部分地被争夺空中优势的空战所掩盖了。这一空战被引入注目地概括为“不列颠之战”。继空战之后便是长时期对伦敦和其他主要工业中心的猛烈夜间空袭。形势十分严峻，防御又大部分不奏效。

但是，当时存在着其他拯救危亡的因素。这种因素的意义甚至更为重要。首先，希特勒及其三军首脑并没有做入侵英国的准备，甚至没有制订计划，在击败法国之后立即采取这一显然十分重要的步骤去扩大战果。希特勒指望英国会同意讲和，从而坐令这一关系重大的月份白白消逝过去。

德国就是在对英国的指望破灭之后，对英进攻的准备也是三心二意的。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把皇家空军赶出天空之举遭到失败后，德国陆海军将领都窃喜得到了停止入侵的借口。更奇怪的是，希特勒本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停止入侵的种种借口。

希特勒的私人谈话记录表明，停止入侵的一部分原因是他把英国视为世界的稳定因素，并仍希望英国能成为其伙伴，因此不愿消灭英国和英帝国。

但是，希特勒除了不愿消灭英国外，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此时，他的思想又正在转向东方。事实证明，这一点是英国得以保存下来的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如果希特勒集中力量进攻英国，英国的覆亡几乎就会肯定无疑了。因为希特勒即使失去了通过入侵征服英国的最好时机，他还可以利用飞机和潜艇钳制英国，使其逐渐挨饿，最后崩溃。

但是，希特勒认为，当驻守在东部边界上的俄国军队在陆地上对德国构成威胁之时，他不能将他的人力物力孤注一掷地用来在海上和空中与英国作战。因此，他论证说，要使德国后方稳固，唯一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击败俄国。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俄国的共产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对俄国的意图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同时，他自认为，英国一旦不能再指望俄国介入战争，就会同意讲和。

早在7月21日，在研究匆匆忙忙草拟出来的入侵英国计划的第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宣布他的结论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解决俄国问题。”虽然他迟至1941年年初才做出明确的决定，但当时便已立即开始制订计划。

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希特勒的海军顾问、海军上将雷德尔曾一再促请他占领地中海的要冲地带，以便间接地集中力量打击英国。然而，希特勒对这类的计划和机会毫不感兴趣，他念念不忘的是俄国。

这对英国来说更是幸运的事，因为法西斯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想利用法国的覆亡和英国的脆弱这一企图的驱策下，于1940年6月参战，而且日本对远东的威胁日益增加，所以英国在海外的地位已是危若累卵。

最初，战争扩大到地中海对英国十分有利，因为这给英国在海军能发挥作用的地区提供了一个进行反攻的机会。丘吉尔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抓得太快了。丘吉尔不管三军首脑的顾虑，就在英国本土仍处于德军的入侵迫在眉睫之时，便将英国为数不多的全副装备的预备队派往非洲。他的这一大胆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韦维尔的机械化部队数量虽小，但很快就将意大利在北非的已经过时的部队击溃，此外还征服了意属东非。他们本来可以直扑的黎波里，从而将敌军全部逐出非洲，但因为要准备交通工具将一支英军运往希腊，便停止了前进。

当希特勒在西线的进攻到达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突破了脆弱的索姆河—埃纳河防线，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时，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10日将意大利投入战争，企图分得一些胜利果实。在墨索里尼看来，意

大利参战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决策，对英国在地中海和非洲的地位则几乎肯定是致命的打击。

当时，防守埃及和苏丹的英军人数甚少，又无法获得增援，而意大利在利比亚和意属东非的部队随时可能入侵。意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与之对阵的由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指挥的一支小小的英军。英军仅有5万，面对的却是总数达50万人的意军和意大利殖民地部队。

在南方战线，意军在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集中了20多万人，向西可以进入仅有9000英军和苏丹军防守的苏丹，向南可以进入守军不多于此数的肯尼亚。在北非战线的昔兰尼加，格拉齐亚尼元帅指挥的一支更大的部队，面对的是3.6万名守卫埃及的英国、新西兰和印度部队。在这条战线上，双方被埃及境内的西部沙漠所隔开。英军的前哨阵地位于距边界120英里，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约200英里的马特鲁港。

局势更加恶化了，因为意大利的参战，使得地中海的航线太危险而无法利用，派往埃及的增援部队必须经好望角绕一个大圈，沿非洲大陆西岸而下，溯东岸而上，进入红海。

但是直到9月13日，意大利在调集了6个师以上的兵力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向西沙漠进军。他们在前进了50英里后，便在距马特鲁港英军阵地还有一半以上路程的西迪巴拉尼停下来，驻扎在一连串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这些营地相距甚远，难以相互支援。过了好几个星期都不见有前进的动向。在此期间，韦维尔获得了增援，其中包括三个装甲团。增援部队是在丘吉尔倡议下，由三艘快速商轮从英国赶运来的。

韦维尔这时决定，趁意军尚未来袭，英军应出击给他们以打击。按照计划，这次出击并非一场持续的进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袭击。韦维尔是想猛揍一下来犯之敌，暂时打得他们不知所措，以便分兵前往苏丹击退在那里的其他意军。遗憾的是，在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后，没有做出充分准备乘胜追击。

奥康纳将军指挥的英军仅有3万人，而敌方却有8万人，但英军有坦克275辆，敌方仅有130辆。第七皇家坦克团的50辆“马蒂尔达”重

装甲坦克，由于敌军大多数反坦克武器不能将其击毁，在这次以及其后的战斗中，都起了特殊的决定性作用。

12月7日夜间，英军自马特鲁港阵地出发，穿过沙漠进军70英里。次日夜间通过敌军一连串营地中间的一个空隙，又次日，先后占领了3个营地，10日，占领了西迪巴拉尼周围的营地，共俘敌军近4万名。

残余的入侵意军则逃回了自己的边界，躲入巴迪亚的海岸要塞。他们很快就被第七装甲师席卷而来的包围攻势所孤立。可惜当时手上没有支援的步兵师，未能趁敌人混乱时予以重创。因为韦维尔已拟订计划，在夺取了西迪巴拉尼之后立即将第四印度师抽出来调回埃及，以便派赴苏丹。因此，在战斗的第三天，当溃败的意军仓皇西窜时，胜利者的半数部队却向东开去，双方竟背道而驰。等到从巴勒斯坦开来增援英军继续进攻的第六澳大利亚师抵达时，3个星期已经过去了。

1941年1月3日，对巴迪亚的进攻终于开始。由第七皇家坦克团的22辆“马蒂尔达”坦克充当“开罐头刀”开路。敌军的防御迅速崩溃，第三天，守军4.5万人全部投降。1月21日，托布鲁克海岸要塞受到攻击，次日即告陷落，3万人被俘。

但是，这时丘吉尔正在想象追捕另外一只野兔。他按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冒风险的老路子行事，并由于希腊敢于奋起抵抗意大利而受到激励，设想着建立一个巴尔干国家的强大联合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这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但在实际条件下并不现实，因为巴尔干国家的原始的军队无力抗拒德国的空军和坦克部队，而英国又只能给他们很少的援助。

1月初，丘吉尔便强烈要求希腊接受一支英国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分遣部队，让其在萨洛尼卡登陆。但当时的希腊政府首脑梅塔克塞斯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所提供的这支部队很可能招致德国入侵，而其力量又不足以与之对抗。

希腊政府彬彬有礼地表示断然拒绝之时，恰好也是奥康纳攻克托布鲁克之时。因此，英国政府决定让他再推进一步，夺取班加西港。但是，2月3日，空中侦察表明，敌军准备放弃班加西，退守阿盖拉隘道，以便堵塞由昔兰尼加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道路。奥康纳当即采取大胆截击敌军退兵的计划。他仅仅使用已经精疲力尽的第七装甲师，令其穿越沙漠直趋远离班加西的海滨公路。英军从它在梅基利的

阵地出发，大约要走150英里，第一段漫长的路程还要通过极为崎岖的地带。他们只携带了两天的口粮和勉强够用的汽油就出发了。

5日傍晚，这支部队的两路，在敌军退路上建立了堵截阵地。到7日上午，意军即放弃了突围的努力，两万人投降，损失或遗弃了100多辆几乎全部是新到的巡逻坦克。而在这里断敌退路的英军仅有3000人和38辆巡逻坦克。当巴迪亚被攻陷、守军覆灭时，安东尼·艾登把丘吉尔的一句名言翻新了一下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缴出这么多的东西，向这么少的人投降。”就贝达富姆大捷而言，这句话尤其恰当。

但是，胜利的光辉不久便暗淡下来。这应归咎于伦敦的最高决策。格拉齐亚尼部队的全军覆没，为英军扫清了越过阿盖拉隘口直达的黎波里的通道。但是，正当奥康纳及其部队准备全速向的黎波里推进，以便将敌军赶出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据点时，英国内阁却命令他们断然停止前进。怎么会有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原来是梅塔克塞斯于1月29日突然逝世，新任希腊首相的性格不像他那样难以对付。丘吉尔看到他念念不忘的巴尔干计划有了复活的机会，便立刻抓住它。他再次迫使希腊政府接受他的建议。这次希腊政府被说服，接受了该建议。3月7日，5万英军组成的第一支分遣队在希腊登陆。

丘吉尔又犯了企图在同时做许多事的老毛病。他梦想在巴尔干开辟一个新战场，集中巴尔干国家的力量共同打击德国的侧翼。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韦维尔慑于丘吉尔的个性，同意了他这一不现实的计划。但是德军很快横扫整个南斯拉夫和希腊，迫使英军做第二次“敦刻尔克”大溃退。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又被赶出了克里特岛。

威尔逊将军率领的英军（约3个师）此时正开入中央地段的阵地，其位置在与阿尔巴尼亚境内的意军相对峙的希腊主力部队（14个师）和在萨洛尼卡附近的一支较小的希腊部队（3个师）之间。其任务是掩护向希腊南部的进军和统率为同一目的派至该地的3个实力较弱的希腊师。4月6日，英军尚未进入阵地，德军即已开始进攻。南斯拉夫政府被迫同希特勒签订条约后，在10天前被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一次军官政变所推翻。希特勒立即决定同时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并为这一扩大的军事行动对德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将18个师增加到28个师，其

中包括7个装甲师（希特勒在欧洲共有17个装甲师）。这些德军由大约1000架飞机支援。

不出一周，到4月5日，在保加利亚的利斯特第十二集团军的3个军中的一个军便已越过南斯拉夫东南边界，开辟了新的供应线，而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则转向西北，直达靠近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部边界。与此同时，魏克斯的第二集团军已在奥地利南部集结待命，准备同匈牙利部队一道入侵南斯拉夫北半部。

进攻是以对贝尔格莱德和其他中心城市的毁灭性轰炸开始的。接着，德军在陆路上的猛烈推进打乱了南斯拉夫部队。不久便使之在强大的压力下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利斯特在西边的两个军迅速占领了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希腊的浅滩地带，另外一个军则插入南斯拉夫南部。第二天，即4月7日晚间，德军进抵斯科普里，将南斯拉夫同希腊分割开，并同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军会师，从而可以和友邻的德军（利斯特所部）一道转而向南，进入希腊。

德军除切断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主力部队的退路外，同时也在威尔逊指挥的英军进入阵地之前，从侧翼对其实行了包抄。4月10日，威尔逊开始撤退。由于德军不断超越英军面向内陆的一翼，因此这次撤退便成了连续地加速后退。到21日，当威尔逊的部队还据守着原阵地130英里以南的塞莫皮莱防线时，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英军应撤出希腊。英军于24日夜间开始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最南的港口撤退，28日前，大部分剩余的部队均已撤离，多数人撤至克里特岛。

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希特勒的新装甲部队尽管遇到山地障碍，但其不可阻挡之势犹如在波兰和法国的平原上一样。它们像旋风一般席卷了这两个国家，将抗拒之敌打得落花流水。后来的文件表明，仅利斯特陆军元帅所部便俘虏南斯拉夫军9万人、希腊军27万人、英军1.3万人，自己仅伤亡5000人。（当时英国报纸估计德军的损失超过了25万人，甚至英国的一份官方声明也说德军的损失“可能是7.5万人”。）

尽管希特勒本人是一个不愿改变计划的人，克里特还是成了德国人的下一个目标。他原想在进抵希腊南部后，便结束巴尔干战役。但是，空降部队司令施图登特将军在4月21日得到了戈林的支持后，说服了希特勒，使他相信，夺取克里特是可行和可取的。他获准为此目的

使用德国唯一的一个空降师、唯一的一团滑翔部队和一个由空运送去的山地师。

5月20日上午8时，约3000名伞兵在克里特岛上降落。防守该岛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共2.86万人，以及人数几乎与此相等的两个希腊师。但是只有6辆坦克，而且缺乏空中支援。

德军在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之后必然夺取克里特，已是意料中事，而且英国在希腊的情报人员也已提供了关于德国为此进行准备的充分情报。但是，英军，特别是克里特岛上的英军司令弗赖伯格将军，对空降的威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严肃对待。

第一天晚上，岛上德军已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利用空投、滑翔，第二天晚上以后又利用运输机，不断获得增援。在已占领的马莱梅机场还在受到守岛部队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猛烈轰击时，这些运输机就开始在机场着陆。空运至克里特岛的德军共约2.2万人。很多人由于飞机着陆时坠毁而死伤，但活下来的人战斗十分顽强，而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却没有受过这样高度的训练，并且仍然因被逐出希腊而惊魂未定。

第七天，即26日，岛上的英军司令报告说：“在我看来，我指挥的部队已经坚持不了……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由于这一判断出自弗赖伯格这样一位曾经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勇敢军人之口，因此是毫无怀疑余地的。撤退于28日夜开始，31日夜结束。海军由于坚持不懈地撤出尽可能多的部队，受到占优势的敌方空军的袭击，损失惨重。共救出1.65万人，其中包括约2000名希腊人，其余的人员则或阵亡或沦为德军俘虏。海军死亡达2000余人，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被击沉。13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包括两艘战列舰，以及当时地中海舰队中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德军死亡约4000人，受伤人员约为此数的1倍。这样，德军总损失不到英军的1/3，而希腊军和克里特当地招募的人员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由于德军死伤的主要是它当时唯一的一个伞兵师的精锐，所以这一损失对希特勒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影响，结果反而对英国有利。

因为希特勒在地中海第三次获胜后，完全没有像英方所预料的那样接着便进攻塞浦路斯、叙利亚、苏伊士运河或马耳他。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入侵俄国，从此便失去了将英国逐出地中海和中东的大好

时机。如果说他坐失良机主要是因为他热衷于入侵俄国的冒险行动，那也是因为在克里特获胜后的心情造成的。征服克里特岛固然使他高兴，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更使他沮丧。它与他先前取得的胜利以及大得多的战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英国除在这些灾难中蒙受损失外，还在非洲付出了加倍的代价。由于英国在非洲停止进攻，使希特勒获得了时间派遣由隆美尔指挥的一支装甲部队到达的黎波里，营救行将崩溃的意军。这支部队虽小，但它在3月31日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已足以将英军逐出昔兰尼加，使其退回到埃及边界。丘吉尔于是强令韦维尔匆忙做出新的作战行动。当这一大事夸张的“战斧作战计划”于6月失败后，他撤换了韦维尔，代之以奥金莱克。

此时，丘吉尔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隆美尔而置其他于不顾。为了赶走隆美尔，丘吉尔将绝大部分能调动的英军投入非洲。英军这一新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即所谓“十字军作战计划”于11月18日开始。这一次，丘吉尔给英军（此时称为第八集团军）提供了750辆坦克，比隆美尔的坦克多1倍以上，而且隆美尔的坦克中，1/3是装备低劣的意大利坦克。但是，德军坦克在战术上比英军更好地发挥了作用，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装备有重武器。此外，隆美尔还巧妙地诱使英军坦克像公牛似的向前直冲，落进德军隐蔽的反坦克炮火网之中。结果，尽管英军拥有1/4的空中优势（而且隆美尔为数甚少的飞机中，还有2/3是意大利飞机），但隆美尔却在战斗的头几天便能转守为攻。隆美尔的反击使进攻的英军陷入混乱，第八集团军司令坎宁安将军甚至考虑停止战斗。在这关键时刻，奥金莱克从开罗飞来亲自掌握战局，坚持进攻。里奇将军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新司令，并运来了大批增援坦克和部队。最后，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艰苦战斗，优势的英军终于获胜，将隆美尔精疲力竭的部队赶出了昔兰尼加。

后来，在圣诞节前后的一个星期中，隆美尔终于得到了少量的增援——两个坦克连和几个炮兵连。这是自战斗于一个月前开始以来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增援。他利用这支援军打退了英军于节礼日^[3]向德军停止退却处阿杰达比亚附近的阵地发动的猛攻。然后，他于1月21日突然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英军，其时英军还认为隆美尔的部队损失惨重，已无力行动。第八集团军在隆美尔的突然反扑和一系列神速打击

下，陷入混乱，被迫放弃了所占领的大部分阵地，勉强在托布鲁克紧西面的加扎拉—比尔哈希姆一线停了下来。

英国击败隆美尔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它的盟国受到影响）——丢失了它在远东的阵地。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曾在5月着重指出：“我们在战略上的一条公认的原则是，新加坡的安全最终应置于埃及之上。”他反对为了在非洲早日发动攻势而忽视远东的防御。但丘吉尔拒绝了这一警告，并满怀信心地宣称，日本即使参加战争，“无论如何也不会一开始便围困新加坡”。

丘吉尔这种盲目忽视远东防务的态度，实在是太令人莫名其妙，因为长期以来英国政策中就有一条不言而喻的原理，即日本的石油供应如因禁运而被切断，它必定会进行反击。7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时采取了这样的严厉措施，以加强他们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的态度。而当日本终于在12月7日发动进攻时，英美两国却都毫无准备，给人以可乘之机。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竟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充分地加强新加坡的防务。

迪尔的继任人阿兰布鲁克最感到愤愤不满的，莫过于这一严重错误及其更为严重的后果。（丘吉尔无法再容忍迪尔所提出的疑虑，解除了后者的职务，这表现了他的性格，而一周以后，日军就在新加坡后方的马来半岛登陆，从而证实了迪尔所提出的警告。）

唯一的补偿就是日本对美国的太平洋各基地同时发动的进攻，导致美国的参战，而这一点最终证实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到头来，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希特勒也是致命的。

6月22日德国发动对俄国的入侵，这比拿破仑侵俄的日期早一天。装甲部队迅速击溃了仓促调集的苏军，不出一个月就向俄国境内推进450英里——这是到莫斯科3/4的路程。然而德国人始终未能到达那里。

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和他的军事首脑举行会议后，于1941年2月3日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的最终方案。在俄国西部的俄军兵力被估计为155个师，包括60个坦克旅。德国为发动进攻所能集结的兵力只有121个师，其中包括17个装甲师。而且，装甲师的数量得以增加到这一数字，只是由于各师平分了坦克的配备量。降低坦克的比例是与坦克专

家的见解背道而驰的，但希特勒为了在表面上增加装甲师的数量，却下令这样做。这种数字对比并未能消除执行作战计划的将领们的疑虑。

希特勒原来的时间表被巴尔干的事态发展所打乱（见前第762页）。他深恐英国在靠近他的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的巴尔干进行干预，在墨索里尼未经与他商量即在10月对希腊发动进攻后，这种恐惧益发增加了。希特勒大为恼火，而且意军遭受的挫折也未能给予他多少安慰。因为在希腊出现的一小批英国援军，表明有可能随后到达更多的增援部队——而他们果然来了。希特勒通过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相继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取得了在巴尔干的统治地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决定在入侵俄国之前占领希腊，以便进一步掩护他的巴尔干侧翼。由于一场军事叛变，南斯拉夫政府被推翻，这使希特勒做出更大的努力，派出更多的军队同时征服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迅即沦陷，英军被迫登船撤离。但是，当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时，他感到不得不将入侵俄国的日期从5月中旬推迟到6月中旬。然而，由于春季的来迟和恶劣的天气，他至多也只能比这一日期早一周左右开始入侵。

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从制订计划之初即有分歧意见——而且一直未能取得一致。

希特勒主张把占领列宁格勒作为主要目标，以便能扫清他的波罗的海侧翼并沟通芬兰，而倾向于贬低莫斯科的重要性。但是，出自对经济因素的敏锐感觉，他也希望获得乌克兰富裕的农业地区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地区。这两个目标相距甚远，因此必须在两条完全分离开的战线上作战。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主张集中力量向莫斯科进军——这不是为了夺取首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进攻路线会提供最好的机会，摧毁他们“预期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会遇到的”大部分俄国部队。在希特勒看来，这种做法会带来风险，即迫使俄军向东总退却，撤到他们的打击范围之外。

不过，他们一致同意在进攻的第一阶段应把重点放在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正北的包克集团军群的地段，并沿着明斯克到莫斯科的路线推进。这里投入了装甲部队的主力——包克得到两个装甲兵团

（由9个装甲师和7个摩托化师组成）作为突击部队，共拥有兵力51个师。

李勃指挥的靠近波罗的海的北翼集团军群配备一个装甲兵团（包括3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共30个师，兵力与其对峙的俄国部队刚刚相等。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以南的伦斯塔德集团军群配备有一个装甲兵团（包括5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总兵力为30个师，大大少于敌方。

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从两路迅速深入，第六天便在边境以内200英里的明斯克会师。跟随他们后面的步兵钳形攻势在斯洛尼姆合围，但他们完成包围圈不够迅速，以致被围苏军的大部分得以突围。

第二次攻势的目的是在明斯克附近包围苏军，此举取得较大成功，俘虏近30万人——虽然在合围前有大批人马设法逃脱了。战果之大引起一片乐观情绪，甚至对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抱有疑虑的将领中也是如此。哈尔德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俄战役已在14天之内获胜，我这样说大概并非夸张。”那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到达第聂伯河——深入俄国境内320英里，并且是距莫斯科的一半路程。

这时，德军上级指挥部认为最好等待他们的步兵大部队赶上来，但那意味着要拖延近两周的时间，于是古德里安决定单独使用他的装甲部队冲过第聂伯河。进攻获得成功，7月10日突破第聂伯防线后，他于16日到达斯摩棱斯克市，并迅速向杰斯纳河推进。

古德里安强调不断追赶苏军迫其溃逃，不给他们集结时间的重要性。但是希特勒又回到他原来对下一阶段作战的设想。将装甲部队调离包克的中路集团军群而派往两翼——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南调，帮助击败在乌克兰与伦斯塔德对阵的苏军，霍特的装甲兵团则北调，帮助李勃进攻列宁格勒。

勃劳希契没有立即要求改变作战计划，而是再次设法拖延时间。他争辩说，在开始任何新的作战之前，装甲部队必须休整一番，以便检修机件和得到补充。在此期间，高级指挥官们继续就今后应采取的步骤进行讨论，甚至在装甲部队已能重新开展攻势之后，还在继续讨论。尽管如此，在基辅的另一次包围战又获得巨大胜利，引起了美妙的希望。古德里安插入苏军后方向南推进，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则向北

冲击。钳形攻势的两翼在基辅以东150英里会师，有60万俄军陷入包围圈中。但是，恶劣的道路和多雨的天气减慢了包围行动的速度，到9月末，战役才告结束。

10月2日重新开始向莫斯科进军。包克集团军群在维亚兹马周围进行了一场大包围战，又俘获60万俄军，因而前途似乎颇有希望。这样，德国人一时有了几乎可以长驱直入莫斯科的道路。但是，维亚兹马战役直到10月底方告结束，德军已疲惫不堪，气候更加恶劣，地面变成一片泥泞，而且在德军缓慢地向前移动的路上，出现了俄方的生力军。

不论是包克还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然都很不愿意停止前进，因为他们先前曾力争希特勒接受他们的论点，占领莫斯科而不去追求在南方的目标。

于是，天气暂时转好后，11月15日又开始向莫斯科推进。但是，在泥泞和风雪中经过两个星期挣扎之后，德军在距莫斯科仅20英里的地方又奉命停了下来。12月2日又发动了一次攻势，几支小部队攻入莫斯科郊区，但整个攻势却在掩蔽这个首都的森林中被阻挡住了。

这正是朱可夫所计划和指挥的俄军大规模反攻的信号。这次反攻迫使精疲力竭的德军仓促溃退，两翼受到包围，造成危急局势。

放弃莫斯科的损失，并未因德军在南方的胜利而得到补偿。在基辅的大包围战之后，伦斯塔德占领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河流域，但向高加索油田推进时，遭到了挫败。于是，他企图撤到米乌斯河边，建立一条有效的防线，但希特勒禁止后撤。伦斯塔德回答说，他不能服从这样的命令，请求解除他的司令职务。这事发生在12月的第一周——正是在莫斯科遭到挫败的时候。

同一周，勃劳希契以患病为理由要求辞职，下一周包克也提出同样要求，不久以后，李勃建议从列宁格勒附近的北方前线撤退，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于是他也辞职了。就这样，4名最高司令官全部离职。

希特勒没有派人接替勃劳希契，却乘机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

红军在12月发动的冬季反攻继续了3个多月，不过它的进展逐渐缓慢下来。到3月，红军在某些地段前进了150英里以上。但是，德军守

住了他们冬季战线上的主要阵地。

德军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1）秋季的泥泞和冬季的大雪是明显的原因。

（2）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错误地估算了斯大林能够从苏联大后方调来的后备部队。他们估计要对付200个师，并估计到8月中旬可将之击溃。但到那时又有160个师出现在战场。到这些师又被解决之后，秋季已经到来，而当德军在泥泞中向莫斯科推进时，他们发现又有新的部队挡住他们的去路。

（3）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尽管苏维埃革命后在各方面取得技术进步，但苏联仍处于原始状态。这不仅是指苏联军民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也是指它原始的道路。假如苏联的道路系统已发展到西欧那样，它无疑会像法国一样迅速被征服。

（4）即使如此，如果在夏季，装甲部队直取莫斯科而不等待步兵部队，入侵仍有可能获胜——古德里安曾极力主张这样做，却遭到希特勒和陆军的一些老首领们的反对而作罢。

在苏联的一冬使德军元气大伤，他们一直未能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很明显，希特勒在1942年仍很有可能取胜，因为红军严重缺乏装备，而且由于战争初期的惨败，斯大林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

希特勒1942年的新攻势迅速伸展到高加索油田的边缘——依靠这个油田，苏联的军事机器才能运转。但是希特勒为了实现同时夺取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这一双重目标，将他的军队兵分两路。由于苦攻斯大林格勒不下，希特勒一再发动顽强的进攻以夺取这座“斯大林之城”，从而使他的部队消耗殆尽，这座象征着不屈精神的城市简直迷住了他的心窍。进入冬季后他仍禁止后撤，因此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不可避免地被年末开到战场的俄国生力军所包围和俘获。

进攻之初，“闪电战”再次奏效——但这是最后一次。德军在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地区迅速完成突破之后，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沿着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向南冲击。它冲过通往高加索的门户，6周之内仅推进到迈科普周围的西部油田。

这是苏联最虚弱的时刻。它新组编的部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投入战场，而即使这一部分也严重缺乏装备。对苏联来说，幸好敌方也已比1941年虚弱得多。希特勒设法以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队填补空隙，用他们来掩护漫长的侧翼——这一替代措施到年末却成了致命的负担。

克莱斯特从迈科普向高加索的主要油田推进时，首先由于缺乏汽油而停顿下来，然后又在山区受阻，他在那里既碰上更严峻的山地障碍，又遇到更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部队由于希特勒要增援分兵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那路部队而不断被抽走。在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第一次攻势勉强被阻住，但一次接一次的进攻却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德军由于采用正面强攻，苏军也就比较容易对付这一威胁。希特勒无法忍受“斯大林之城”对他的挑战，在持续猛攻该城的战斗中，把他的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时，苏联新投入的部队正在两翼集结。

反攻开始于11月19日，时机选得非常之好，正是在头几次严重霜冻和几场大雪的间歇间；霜冻使地面坚硬，有利于快速行动，大雪则妨碍军队的调动。在斯大林格勒西北，苏军先头部队沿着顿河两岸猛插到卡拉契和通往顿涅茨河流域的铁路线。在斯大林格勒东南，钳形攻势的左翼向西插入南通提霍烈次克和黑海的铁路线。在切断这条铁路之后，他们逼近卡拉契，到23日完成了包围圈。在其后几天里，包围圈愈益收紧，陷入包围的敌军达20多万。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冯·保卢斯将军的部队完全陷入孤立。

与此同时，另一支强大的苏军冲出绥拉菲莫维奇桥头堡，在顿河河曲以西的地区展开。这一外层包围行动极为重要，因为它在可能赶来解救保卢斯的援军必经之路上设置了一道铁幕。德军于12月中旬在顿河以东从西南方进行还击。但是，这一仓促组织的进攻在离被围部队很远的地方即受阻，而且在俄军对其侧翼的压力之下，被迫逐渐撤退。这次尝试失败后，一切援救保卢斯的希望都化为乌有，因为德军统帅部已没有后备兵力再发动一次进攻。

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给德军留下一条漫长的战线，以他们遭到削弱的兵力是根本无法防守的。正如德军将领所极力主张的那样，撤退是唯一的出路，但希特勒顽固地拒绝予以批准。希特勒的军队越来越尝

到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的恶果——这曾经是拿破仑遭到失败的原因。

德国已经在地中海地区付出战线过长的代价。意大利军队在北非的败北，促使希特勒向那里派遣了由隆美尔统率的德国援军。但是，由于希特勒全神贯注于苏联，他只派出仅足以支撑意军的部队，而一直没有做出重大努力去夺占地中海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门户——苏伊士、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因此，实际上他不过是开辟了一个消耗德军兵力的新战场，这最终抵消了隆美尔的反攻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这些反攻，德军自北非的撤退延缓了两年多。

德军这时沿着地中海两侧和西欧的整个海岸线拉开战线，同时又竭力据守着一条深入俄国境内，极为广阔因而有致命危险的战线。

战线过长同样成为德国的新盟友的致命因素。日本用海军飞机对珍珠港发动的进攻，暂时削弱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其直接后果是日军得以占领盟国在西太平洋的阵地——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然而，由于这样迅速的扩张，使他们鞭长莫及，远远超过他们据守这些占领区的基本能力。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其工业实力有限。

最初是英国人为了战线拉得过长而付出了代价——同时他们和美国人都不不得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而付出代价。

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派遣他的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出使伦敦，转达他对丘吉尔的政策是否明智感到的担心，同时也告诫丘吉尔，由于他“企图在中东做过多的事”，会给其他地方带来风险。美国陆海军专家都同意发出这样的告诫，并认为新加坡的防务应优先于埃及。这些论点没有一条能够改变丘吉尔的看法：“我决不容许放弃保卫埃及的斗争，不管在马来亚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甘心情愿。”但他并没有真正料到那里会有什么危险。他说：“我承认，在我的头脑中，日本的全部威胁与我们的其他需要相比，只不过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凶兆而已。”因此，令人痛心的是，马来亚的防御不足，显然应由丘吉尔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坚持要在北非过早地发动攻势。

一系列的错误并未就此为止。在做出断绝对日本供应石油的决定之后，丘吉尔“意识到禁运的可怕后果”，一个月以后，他提议派遣

一支他称为“威慑力量”的海军部队前往东方。海军部正计划在那里集结“纳尔逊”号、“罗德尼”号和4艘较旧的战列舰，再加上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两三艘航空母舰。丘吉尔却宁愿使用“最少数量和最好舰只”，建议派遣一艘“乔治五世国王”号型新战列舰，加上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他说：“我认为日本对付不了现在形成的反对它的英美俄三国联合力量。……一旦我提到的舰队到达，尤其是开到一艘‘乔治五世国王’号型战列舰，就会使它更加踌躇起来。这可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于是，“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开赴新加坡，但没有带航空母舰。原定一同前往的那艘航空母舰在牙买加搁浅，不得不进入船坞修理。实际上，在印度洋还有一艘航空母舰，离新加坡不远，但没有接到开往那里的命令。因此，这两艘巨舰只好依靠以海岸为基地的战斗机做空中掩护，而这些飞机数量很少。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于12月2日到达新加坡。5天以后，向美国海军下达了“战争警告”信号，说“预期在今后几天内日本将采取进攻行动”。12月6日，据报告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的一支很大的日本运输船队正从印度支那朝马来亚方向驶来。

与此同时，日本的一支海军舰队（有6艘航空母舰）正接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12月7日晨，那里的美国人在睡梦中遭到突然袭击。这一袭击是在宣战之前进行的，承袭了日俄战争之初日本人袭击旅顺口的先例。

直到1941年年初，日本的计划一直是，一旦与美国开战，就在南太平洋使用他们的主力舰队，配合对菲律宾群岛的进攻，迎战美国为了解救其在菲律宾的驻守部队而横渡太平洋开来的舰队。美国预料日本将采取这一行动，而且由于日本最近进驻印度支那，美国更加深了这一看法。但是，山本海军大将这时却设想出一个新计划——偷袭珍珠港。突击部队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千岛群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北面南下夏威夷群岛，然后，在日出之前，从离珍珠港近300英里的地方，用360架飞机发动了进攻。美国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其余的都受重创。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日本就控制了太平洋。

日本在南太平洋发动的首次进攻也同样奏效。日本的入侵运输船队未受任何阻挡便越过暹罗湾，它的部队于7日夜在马来半岛北端的三

个地点开始登陆。次日晚，菲利普斯海军上将率领两艘巨舰自新加坡启航，英勇地向北驶去攻打那些运输船，虽然在这么靠北的地方已不能得到海岸基地飞机的空中掩护了。10日天明后不久，英国舰队在关丹附近遭到从印度支那西贡的基地起飞的约80架日本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袭击。日机分为9批接连向“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猛扑，两舰都被击沉。

通过这些袭击，日本扫清了从海上源源不断地运送部队入侵马来亚和马来群岛的道路。正当日本的主力突击部队驶向东北方的夏威夷群岛时，其他海军部队护送运兵船队开进西南太平洋。几乎与空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开始登陆。进攻马来半岛的目标是夺取英国在新加坡的大海军基地，但并没有试图从海上攻打它——而守军原来准备应付的就是来自这方面的进攻。日本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进军路线。

日军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两个地点登陆，以便占领机场和转移视线，而主力部队则在新加坡以北约500英里的马来半岛暹罗地峡登陆。日军从东北端的这些登陆点拥向半岛西岸，相继包抄了英军试图阻住他们的几条防线。

日军不仅因为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么困难的进军路线，而且由于茂密的草木往往使他们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渗透而得到好处。英军几乎节节败退6个星期，最后于1月底被迫撤出大陆，退到新加坡岛。2月8日夜，日军跨过一英里宽的海峡发动进攻，在多处登陆，沿着一条广阔的战线又展开渗透。2月15日守军投降，从而也就失去了通往西南太平洋的要冲。

在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上，日军首先在马尼拉以北各地登陆，随后迅速在这个首府的后方登陆。在日军打击下，美国的部署被打乱，并受到两面夹攻的威胁，于是在12月底之前放弃了这个岛屿的大部分地区，退入小小的巴丹半岛。相对说来，美军在那里只有一条缩得很窄的战线能够遭到正面进攻，所以成功地固守到4月才被击败。

远在这以前，甚至在新加坡陷落以前，日军占领的浪潮就席卷了马来群岛。1月24日，几支日军分头在婆罗洲、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登陆。3个星期后，日军包抄了爪哇岛的侧翼，使之陷于孤立，然后对这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核心发动进攻。不出3个星期，整个爪哇岛就像一

只熟透的李子落入他们的手中。然而，似乎已迫在眉睫的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却没有发生。

这时，日军的主要力量指向相反方向，即向西征服缅甸。从泰国向仰光展开的正面但战线宽阔的进攻，其目的是间接促进日本在整个亚洲大陆上的主要目标，即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因为英美供应中国的物资装备都要经仰光港进入，经滇缅公路运往内地。同时，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也是为了完成征服通往太平洋的西方门户，并在今后英美可能从陆上发动攻势时所要取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一道坚固的屏障。3月8日仰光陷落，两个月后，英军被赶出缅甸，越过崇山峻岭，退回印度。

这样，日军便得到一个很坚固的天然掩护阵地，夺回缅甸的任何企图将遭到严重障碍，并且必然要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盟国花费很长时间才集结了足够的兵力收复日本占领的地盘——从东端开始。在这方面，他们由于保全了澳大利亚而得到好处，因为澳大利亚靠近日本一连串前哨据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基地。

一旦美国的力量有了发展，而俄国也生存下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德意日三国轴心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三国军事力量的总和比盟国的小得多。唯一不能确定的事情是要花多少时间战胜他们，以及取得多么彻底的胜利。侵略者这时已转入守势，他们所能抱的最大希望就是拖延时间，直到“巨人们”感到厌倦或相互发生争吵，从而获得较好的媾和条件。但是，要做到这样的长期抵抗就必须缩短战线。没有一个轴心国领袖甘心“失掉面子”自动后撤，于是他们死守每一块阵地，直到它被打垮。

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带来了不利于日本的转折，次月发生的中途岛海战更加确定了这一点。这两场海战史无前例，双方舰只根本没有相遇，也没有发射一发炮弹。这是因为两场海战都是靠远距离空中袭击进行的，日本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大大削弱了它的海空力量。太平洋地区虽然出现了转折，但是过了很久这一转折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1942年8月7日，美国一支强大的特遣舰队把一个海军陆战师送上日本在所罗门群岛新建立的基地瓜达卡纳尔岛，经过在岛上的艰苦战斗和一系列海战，6个月后才完全收复该岛。与此同时，日军在新几内

亚登陆，他们企图占领南海岸的莫尔斯比港的努力虽被澳大利亚军挫败，但仍死守西部的据点直到1944年夏——尽管他们遭到已发展为10个师的盟军日益加大的压力。

然而，1943年秋季以后，战局的发展加快了。这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各自沿着一连串岛屿进军的路线上，采取了越过进军途中的某些岛屿，把这些据点的守军孤立起来，越来越深地插入日本的外围防卫圈的办法。这种越岛战术，使日军的战线过长成为它致命的弱点。

不利于德国的战局变化发生得较晚，但一旦出现了这一变化，其发展则快得多。

希特勒1942年在俄国发动的攻势——他为获胜而进行的第二场赌博——的失败，本身并没有引起在冬季接踵而来的那场灾难。致命的一步是冬季来到时，希特勒顽固地拒绝让保卢斯的集团军从深入到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阵地后撤。在高加索的集团军虽处境更险恶——因为他们推进得更深——却得以自拔，这足以说明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本来是能够自行解脱出来的。尽管侧翼和后背不断受到威胁，但克莱斯特的集团军乘俄军受阻之机，已通过咽喉地区，撤退到安全地带。那次严冬中的长途撤退，是历史上摆脱敌人包围的最杰出的军事成就之一。此外，苏军于2月收复哈尔科夫后，推进到第聂伯河附近时，南翼的德军在曼施泰因的指挥下发动反攻，突破了苏军两个突出部分的联结部，迫使苏军慌乱后撤，并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

这一战役显示了德军仍拥有雄厚的防御能力，但对希特勒却产生了使他得意忘形的作用。他坚决不听从撤退到第聂伯河一线的主张，并决定在夏季重新发动攻势——尽管德军兵力大为减弱而俄军则日益增强。对比之下，自1942年以来，苏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大有改进。新装备的供应和新编师的数目均大大增加，苏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这时已达到约四比一。

7月5日，德军终于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进攻。希特勒为这次攻势投入17个装甲师——几乎是他的全部装甲师。钳形攻势的两翼都陷入苏军设下的纵深很大的布雷区——德军长时间准备进攻，使苏军事先得到了警告——因而未能取得大量俘获，因为苏军已将他们的主力

部队撤出，德军扑空。7月12日德军开始后撤，这时俄军发动了进攻，起到反弹簧般的反击作用。

8月下半月，苏军发动攻势的范围更广，虽然进展并不很快，但它的交替打击却使德军为数甚少的后备部队疲于奔命。瓦图丁、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熟练的指挥官，机敏地利用了德军战线广阔兵力薄弱的弱点。9月底之前，他们已推进到第聂伯河，越河在广泛地区建立了多处桥头堡。当德军的注意力集中于瓦图丁对著名城市基辅的威胁时，科涅夫突然从他在克列缅楚格的桥头堡发起猛攻，几乎切断了第聂伯河河曲形成的大突角。苏军在这里的新攻势于11月初进展到第聂伯河河口，封住了克里米亚的出口，把那里的敌军孤立起来。

希特勒能够感到宽慰的，主要是他的北翼各集团军于9月从斯摩棱斯克撤到第聂伯河上游的防线后，在10月至12月之间成功地打退了俄军连续5次的进攻。这里的进攻主要集中于横跨莫斯科—明斯克公路的阵地。由于进攻路线颇为明确，而且战线狭窄，防守组织得很好，尽管在人数上处于约一比六的劣势，却占了上风。这说明，如果希特勒采取更为明智而减少自我消耗的战略，他原可以把战争拖延下去。

但是，苏联得以保存自己并在以后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上力量所固有的两栖作战的灵活性及其给敌人造成的广泛威胁，从而使德国的力量分散。分析表明，其影响比历来所认识到的更为重大。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投入其兵力的95%。而当1941年进攻苏联时，却只敢动用70%的兵力——因为他们感到有必要保卫他们已占领的各国的广阔海岸线，以对付英国从海上发动袭击的威胁。

美国的增援和进攻性航运规模的日益扩大，使这种威胁增加，这时力量的分散更形严重。甚至在西方盟国登上诺曼底之前，就有将近一半德军已调离苏联战线。而且，调离苏联的部队中，有将近1/4的兵力是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这就是海上力量作为一种威胁——沿着欧洲长达8000英里的海岸线，任何地方入侵部队均可登陆这个普遍存在和无法估计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

地中海地区的战局变化比在苏联出现得早。1942年春，丘吉尔再次催促早日行动。他指出，苏联人正在殊死战斗，近在咫尺的马耳他，由于凯塞林的连续空袭而陷于绝境。但是，奥金莱克深知英军在技术上和战术上的缺点，准备等到里奇的兵力提高到足以抵消隆美尔

在质量上的优势以后再动手。丘吉尔否定了他的论点，最后决定向他发出明确的进攻命令，要他“必须服从，否则将被解职”。

但是，隆美尔先发制人。5月26日的月夜，隆美尔带领3个德国师，后面跟着意大利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绕过了英军阵地的侧翼；把4个意大利非摩托化师留在防守加扎拉防线的几个英国师对面“虚张声势”。他的侧翼包抄行动使英国装甲部队陷入不利地位，只能零星投入战斗，因而受到沉重打击。

尽管隆美尔初战得胜，但他并未能实现原来的计划，冲到海边，从而切断加扎拉防线上的几个师。他的装甲师第一次遇上美国提供的装有75毫米火炮的格兰特坦克时，大为震惊——已有200辆这种坦克运抵第八集团军，而隆美尔在发动进攻时尚不知道此事。他本人写道：“美国新式坦克的出现，使我们的队伍损失惨重。……德军在一天之内损失的坦克远远超过1/3。”

第二天，他再次向海边进军，但进展很小，损失却更大。第三天也无所收获，于是他下令突击部队布置防御阵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阵地，因为它位于英军筑有坚固工事的加扎拉防线后面，使他与其余德军被英军防守部队和他们延伸很长的布雷区隔离开来。

在此后几天里，英国空军向这个很恰当地被称为“大锅”的阵地投弹如雨，同时，第八集团军在地面上向它发动进攻。然而，到6月13日夜，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14日，里奇放弃了加扎拉防线，开始迅速向边境撤退，使托布鲁克的部队陷于孤立。到21日，隆美尔占领了这个要塞，俘获了3.3万名守军以及大量军需品。除了新加坡的陷落外，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遭受的最大一次灾难。次日，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放弃了萨卢姆附近的边境阵地，慌忙穿过沙漠向东撤退，隆美尔则跟在后面紧追。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局势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呢？这样错综复杂的战斗，实属罕见，而且始终也没有很好地理出个头绪来。在隆美尔的笔记里却能找到主要线索：“里奇把他的装甲部队在不同的时间里零星地投入战斗，因此使我们有机会每一次以刚刚足够的坦克和他们交战……”

隆美尔的估计完全正确。英军坚持对他的阵地发动一系列零星袭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正面进攻是极为不慎重的打法。隆美

尔在击退这些进攻的同时，摧毁了他背后由第一百五十步兵旅据守的在西迪穆夫塔的孤立据点，并且为了获得供应，在布雷区扫清了一条通道。他还拔除了在南翼比尔哈希姆的更加孤立的据点，该据点由柯尼格将军指挥下的自由法国第一旅防守。

在此期间，英军的坦克实力已从700辆下降到170辆，而且大部分后备坦克也已用光。隆美尔在一次突然反击中，又俘获了4个炮兵团——这是很重大的战果。6月11日，他向东发动进攻，把剩余的英国装甲部队的大部分逼进他两个装甲师的夹击之下，迫使他们在一个狭窄地区作战，任由他集中火力猛轰。到13日黄昏，英军坦克只剩下70辆。虽然隆美尔自己在三个星期的作战中损失了许多坦克，这时他在仍能作战的坦克数量上已占有二比一以上的优势——而且，由于控制了战场，他能够收回并修复许多被损坏的坦克，而英军则不能。

次日，正当英军后撤时，丘吉尔发来一封口气强硬的电报说：“无论如何不放弃托布鲁克，此点想无问题。”他在15日和16日的电报中又重复这一告诫。这个千里迢迢来自伦敦的忠告，却更铸成了大错。因为英军匆匆做出决定，把第八集团军的一部分留在托布鲁克，而把其余部分撤退到边境，这就使隆美尔有机会乘托布鲁克的防御尚未组织好之前，击溃那里的孤军。这场灾难结果是，里奇的残部仓促退入埃及，而隆美尔在后紧追。在这次追击中，隆美尔在托布鲁克俘获的大量军需物资使他受益匪浅。据非洲军团参谋长拜尔莱因将军说，当时隆美尔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有80%是缴获的英军车辆！

里奇的意图是在马特鲁港站住脚跟，用他的全部剩余兵力，再加上刚从叙利亚开到的新西兰师，在那里与德军一决胜负。但是6月25日晚，奥金莱克接替里奇直接指挥部队。他研究这一问题之后，取消了原命令，决定在阿拉曼地区打一场较为机动的仗。

这是一个难以做出的决定，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在撤走军队和军需物资时会遇到种种困难，而且也必然会在国内，特别是在白厅里，引起新的恐慌。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奥金莱克表现出一位伟大军人的冷静头脑和坚强意志。幸好做出这个决定，因为隆美尔推进得非常迅速，他的先头部队于26日突破了马特鲁以南的阵地，到达它后面的滨海公路。但英军已及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大部分被围部队得以在德军收紧包围圈之前突围而出。

在阿拉曼，奥金莱克并不满足于阻挡住隆美尔，而是企图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隆美尔7月18日写的信，说明了他多么接近于取得成功——“昨天是特别困难和危险的一天。我们又熬过来了。但不能老是这样继续下去，不然，前线就要垮下来。在军事上，这是我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时期。”对隆美尔来说，幸好英军和德军一样，打得精疲力竭，不久，奥金莱克也不得不停下他的进攻。然而，隆美尔最后发出感慨说：“尽管英军的损失超过我们，但是奥金莱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大。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阻住我们的前进，而不幸，他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很清楚，这场第一次阿拉曼战役是真正的转折点，尽管丘吉尔的说法和一些战争回忆录都掩盖了这一事实。此外，英国的增援部队这时正经海路源源不断地开进埃及。

虽然奥金莱克像丘吉尔所承认和所说的那样，已经“挡住了逆流”，但是当时并不能像事后那么清楚地看出，战局真正发生了变化。隆美尔仍停留在距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仅60英里的地方——近在眉睫，令人不安。丘吉尔已经在考虑更换司令官，后来他发现奥金莱克强烈反对他要早日重新发动进攻的要求，坚持进攻必须推迟到9月，以便使新的增援部队有时间适应沙漠的气候并受到一些沙漠战的训练，这时丘吉尔更换司令官的考虑就变成了决心。于是，经过进一步讨论，丘吉尔向在伦敦的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发出电报，建议任命亚历山大为总司令，并任命戈特为第八集团军司令——鉴于戈特这位英勇军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作为军司令官表现笨拙，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但是戈特于次日飞往开罗的途中，由于飞机失事身亡。于是蒙哥马利得以幸运地从英国调来，填补这个空缺。

然而，这些调动却带来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那就是，英国重新发动攻势的日期竟被推迟到比奥金莱克原建议的日期还要晚得多。

8月中，隆美尔只得到两支新队伍的增援——一个德国伞兵旅和一个意大利伞兵师。这两支部队都“下到陆地上”，作为步兵使用。到隆美尔计划于8月底发动进攻的前夕，他的两个装甲师拥有约200辆装炮坦克，意军的两个装甲师有240辆。但是，英军在前线的坦克实力已增加到总共700多辆（其中约160辆是格兰特式）。

隆美尔不得不依靠在时间上和速度上收到突然袭击的效果。他希望，如果他迅速突破南部防线，截断第八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就会张皇失措，其防线也会分崩离析。但是，8月30日夜发动进攻后，发现布雷地带比预计的要纵深得多。黎明时，隆美尔的突击部队只越过布雷地带8英里。

由于隆美尔不得不比原订计划提早转而向北，德军的进攻就直接指向了第二十二装甲旅，而且是单指该旅——但进攻在这一天较晚时才开始。因为不断遭到空袭，以及燃料和军火运输队的来迟，大大推迟了前进速度，以致非洲军团北转的路程虽已缩短，但要到下午才能开始。即使到9月1日清晨，燃料依然非常缺乏，隆美尔只得放弃在当天大战一场的打算。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虽已减少，但仍一再受到获得增援的守军的阻击。他们这时手中只剩下一天的燃料，大约只够各部队行动60英里之用。因此，在第二夜几乎不断遭到轰炸后，隆美尔决定停止进攻，逐步后撤。

对第八集团军的各部队来说，亲眼看见敌军后退，即使只是后退几小步，这一事实也比未能切断敌军退路所带来的失望大得多。这是战局已经发生转变的明显标志。蒙哥马利已在部队中树立了新的信心，部队对他也坚信不疑了。从战术上来说，这一战役也有特殊意义。因为不仅是守方获胜，而且是纯粹靠防御决定胜负，没有发动任何反攻——甚至没有认真打算开展反攻。

7个星期以后，英军才发动攻势。迫不及待的首相因这一拖延而感到恼怒，但蒙哥马利决心等到他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并确有把握获得胜利才进攻，亚历山大也支持他。英国自年初以来遭到一连串的灾难后，丘吉尔的地位这时很不稳固，于是他不得不屈从他们的主张，将进攻推迟到10月末，那时发动了第二次阿拉曼战役。

到那时候，英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了空前的优势。第八集团军的战斗力达到23万人，而隆美尔只有不到8万人，其中德军仅有2.7万人。坦克实力的对比则更为悬殊。战役开始时，第八集团军共拥有1440辆装炮坦克，其中1230辆已做好战斗准备——而且在一场持久战中，还可以从存在埃及的基地仓库或车间里的另外1000辆坦克中，抽调一些来补充。隆美尔只有260辆德国坦克（其中20辆正在修理，30辆是轻装甲II型）和280辆意大利坦克（全是老式的）——因

此，实际上，英军开始时在能够投入作战的坦克数量上占1/6的优势，而且还拥有大得多的潜力来补充自己的损失。在战斗力方面，就坦克打坦克而言，英军更占优势，因为他们除格兰特坦克之外，这时还得到从美国运来的大量更新式、更优良的谢尔曼坦克的增援。此外，隆美尔已经失掉他先前在反坦克炮方面的优势。在空中，英军的优势也空前之大。他们拥有1500多架第一线飞机，而德军和意军在非洲可用来支援装甲部队的飞机总共只有约350架。

但是，对决定这一战役的成败具有更重大关系的是，为了扼杀德国装甲部队的海上供应线而由英国空军和海军潜艇共同采取的间接的战略行动。最严重的损失是油船被击沉，在英军发动攻势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没有一艘油船抵达非洲，因此，战役开始时，德军装甲部队手中所有的燃料只够拨发三次，而不是据认为最起码需要的储备量30次。严重的燃料短缺在各方面限制了反击行动。

给养的损失也是使部队中疾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最重要的“病号”就是隆美尔本人。当时他正在奥地利疗养，10月25日飞回前线，负责那时已大为削弱的防线，就在这一天，德军在毫无成果的反攻中损失了将近半数能使用的坦克。

这一战役成了一场消耗战——主要靠猛攻猛打而不是靠运筹策划——有一度看来这一努力已几乎濒临失败。但是，双方的实力异常悬殊，因而即使消耗的比例相差很大，也必然有利于蒙哥马利达到目的——而蒙哥马利的特点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旦下定决心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还在他已制订的计划范围之内，不断改变进攻方向并发展一种击溃敌人的战术手段，从而显示了无比杰出的才能。

然而，由于在追击中迂回包抄得不够，或者说范围不够广，失去了截断隆美尔退路的机会。

隆美尔一旦逃脱了追击他的英军装甲部队的虎口，就不停地撤退到位于昔兰尼加西端靠近阿盖拉的他所看中的后方屏障阵地——远离阿拉曼700英里。然而，这时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以致他不能进行任何反击，即使在阿盖拉长期防守也不可能。

战斗停止了三个星期，这时第八集团军才把部队开上来对阿盖拉阵地发动进攻。这次进攻刚刚展开，隆美尔就开始溜掉，虽然一个包抄行动成功地切断了他的后卫部队，但这支部队在“战略拦阻网”还

没有封好口之前就设法突围逃脱了。隆美尔再后退200英里，到布埃拉特的阵地又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但当第八集团军逼近，并于1月中旬发动另一次进攻后，他又向后撤退。这次他几乎一口气撤退350英里，越过的黎波里，退到突尼斯境内的马雷特防线。他做出这一决定，不仅是因为他的兵力虚弱和补给船只大部分被击沉，而且也由于英美军队在艾森豪威尔统率下于11月入侵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所造成的新局势。那次行动紧跟在阿拉曼攻势之后，发生在相距约2500英里之远的北非另一端。

在阿尔及尔附近的登陆，把通往比塞大的路程缩短到仅有400英里。当时，只用一小股摩托化部队就能够冲到比塞大和突尼斯，除了崎岖山路之外，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另一种办法，从海上或空中在这两个城市附近登陆或降落，也几乎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海军当局小心翼翼，不敢在这么远离空中掩护的地方实行即使是小规模登陆，而陆上的进军也过于谨慎。然而，尽管盟军的登陆出乎他们的预料，德军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从第三天起，他们动员一切可用的运输机以及沿海小船只向突尼斯赶运部队。盟军开始登陆后两个半星期，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接近突尼斯，这时德军总兵力虽然仍很小，但正好足以阻击盟军。

由于这一阻击，双方在掩护比塞大和突尼斯的山区弧形战线上相持了5个月。虽然如此，这次失败从长远来看反而对盟军有利。因为它鼓励了敌方跨海向突尼斯源源不断地增派援军，而盟军则可利用海上力量的优势，愈来愈紧地勒住敌人的咽喉，来切断他们的物资供应，然后再截断他们的退路。

但是，1943年在突尼斯的战役，则是以德军的反击开始，使盟军惊慌失措。正当盟国的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从西，第八集团军从东——即将用两腮咬碎轴心国部队时，他们发动了这次反击。轴心国统帅部的目的是使敌人的两腮脱臼，从而抢先排除被嚼的危险。对于达到这样的目的，当时的情况已变得比表面上看到的形势更为有利。这时，运到突尼斯的增援部队已组建成一个集团军，由冯·阿尔尼姆将军指挥，同时，由于隆美尔的残余部队向西撤退靠近了补给港口，因而得到新兵员和装备。

美国第二军（其中包括一个法国师）是这次反击的直接目标。该军的战线长达90英里，但主要集中在穿越山岭通往海边的三条通道上，先头部队部署在加夫萨、费德和丰杜克附近的山口。1月底，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突然猛扑费德山口，在美国援军到达之前击溃了法国守备部队，从而获得一个出击口。2月14日，真正的进攻开始，首先从费德山口发动了又一次猛扑。当美国装甲部队前来迎战时，第二十一装甲师展开队伍，在正面牵制住美军，却迂回他们的左翼并包抄他们的右翼，以便从后面捕捉他们。然而，美军在通往塔拉的路线上集结了兵力，并顽强防守卡塞林山口，德军直到20日晚才在那里突破。次日他们冲入塔拉，但已精疲力竭，被当时已抵达那里的英军后备部队赶了出来。到22日，德军认识到他们已失去良机，于是停止进攻，开始逐步后撤。

迟至2月26日，蒙哥马利只有一个师部署在马雷特防线对面。这一次他感到担忧了，他的部下拼命设法在德军发动进攻之前恢复均势。到3月6日隆美尔出击时，蒙哥马利已把兵力增加了4倍——除400辆坦克外，他在阵地上还有500多门反坦克炮。这样，在此期间隆美尔丧失了以优势兵力进击的机会。进攻到下午便停止了，德军损失了50辆坦克，对战役的下一阶段极为不利。到这时，他们也失去了隆美尔，他病魔缠身，灰心丧气，返回欧洲去了。

第八集团军于3月20日夜发动了对马雷特防线的进攻。主要的打击方向是正面，意在靠海处突破防线，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使装甲师通过缺口向前推进。同时，新西兰军向敌军后方的哈马发动了一次大的迂回敌人侧翼的进击，目的是牵制在那里的敌军后备部队。正面进攻未能打开足够大的缺口。因此，经过三天的战斗后，蒙哥马利改变了他的计划，向敌军内陆侧翼进攻，派遣第一装甲师去支援新西兰军对敌人后方构成的威胁。

然后，在4月6日天亮前，第八集团军趁漆黑的夜色对瓦迪阿卡里特发动了进攻。由于这一战术上的新创造，使英军得以突破敌方防线，但由于天亮后受到德军阻击，未能充分加以利用。德军迅速从瓦迪阿卡里特撤退，并逃脱了盟军截击他们的企图。这时，如果德军做出决定把他们的部队撤到西西里，他们是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的。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宁肯延长非洲战役，而不愿把两只犄角收回来，将欧洲防务的基础放在欧洲南部海岸。即使在突尼斯，德军为了

保住突尼斯和比塞大两地而设法防守的战线也过长——100英里的环形防线——与他们的人力物力不相适应。德国在那两个“进退维谷的犄角”之间拉得很长，给盟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利用可以在两个目标之间任意选择的有利条件。

在发动进攻之前，亚历山大重新做了部署。4月20日第八集团军发动攻势，首先打击敌军左翼。但是，在昂菲达维尔以北，海滨走廊变得非常狭窄，前进的速度不久就缓慢下来，到23日便完全停止。

这时亚历山大再次调整了他的进攻部署。他在中路右侧的古拜拉特附近只留下一支屏护部队，把第九军主力调到中路左侧，集结在第五军后面，并以第八集团军的两个精锐师——第七装甲师和印度第四师为后援。由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阿尔尼姆几乎没有机会识破这一诡计，或在受到打击后重新调整他的部署。5月6日天亮以前，满天星斗但没有月光，当时已归霍罗克斯将军指挥的第九军发动了兵力高度集中的突击。守卫这一门户地带的敌军惊慌失措，很快便被印度第四师和英国第四师的步兵所击溃。拉得过长的防线不仅兵力薄弱，而且也没有纵深。这时，第六和第七装甲师集中的坦克开过了缺口。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德军许多小块地区的抵抗而耽搁了时间。到夜幕降临时，他们越过缺口只推进了几英里，距突尼斯城大约还有15英里。

然而，到次日晨已可清楚地看出，整个敌军在空中打击和战略打击的双重震动之下，仍处在严重的瘫痪状态，以致他们无力开展任何战术反击。当天下午，英国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冲入突尼斯城。然后，第六装甲师转向北，第七装甲师则转向南，以便使敌军陷入更大的混乱。几乎同时，美军和法军也涌入比塞大。在战线的北半段，想不到敌军的抵抗一触即溃。敌军司令部被打得晕头转向，头上有空中压力，后有坦克紧逼，双方协同作战，于是，使它的机构完全失灵。德军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指挥陷入混乱，而交通联络的破坏，又加剧了缺乏后备部队和供应失调所造成的士气涣散。另一个因素是德军的后方基地距离被突破的前线太近。为加剧了由于背靠大海作战而产生的沮丧情绪——因为这时海面已完全被盟军的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所控制。

这一战的结果，俘获了非洲的全部德意军队，为盟军重返欧洲扫清了道路——不然的话，盟军返欧可能受到阻挠。随后，他们于7月在

西西里登陆并获得胜利，导致墨索里尼的垮台，紧接着意大利便投降。西西里战役又为盟军于9月初对意大利本土的进军扫清了道路。但是，德军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而做出的反应，比盟军为利用这一机会所采取的行动要快。盟军沿着山路崎岖的半岛向北进军，艰难而缓慢。凯塞林指挥下的德军将领，发挥才能充分利用了这些障碍，而盟军将领在克服障碍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却大为逊色——不过吉尧姆对法军的指挥，是一个光辉的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普遍存在威胁的情况变成实际登陆的行动，盟军两栖作战的灵活性所造成分散敌人力量的作用就减小了。到1944年6月，盟军在意大利投入的兵力比凯塞林多1倍。对比之下，这样使用力量并不合算，而且证明美国的主张是合理的，那就是在南部占领战略机场之后，即停止在意大利的攻势。再者，继续进攻并没有从诺曼底引开德军后备部队，也没有像英国所希望和所声称的那样，阻止德军增援诺曼底。

作为对诺曼底登陆成功的辅攻，意大利战役所起的唯一战略作用是，假如没有这一军事压力，德军在英吉利海峡前线的兵力有可能会增加得更多。那里的进击部队和后续部队的规模，受到可供使用的登陆舰艇的限制，因此，盟军在意大利使用的部队，不可能在诺曼底登陆关键的初战阶段，调去增加那里的力量。

为了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大陆而在英国组建起来的盟军主力，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如果他们能够在岸上牢牢地建立一个大桥头堡，足以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并击破德军的封锁线，他们就保证会取得胜利。因为，一旦盟军突破防线，他们就可以在法国辽阔的土地上任意调动他们完全机械化的部队，而大部分德军主要还需依靠马匹的运输力。

因此，除非德军能够在最初几天把入侵者再赶下海去，否则德军的防御力量就注定要最后崩溃。但是，结果德军后备装甲部队开赴战场时，由于盟国空军的干扰而陷于瘫痪，以致被无可救药地耽误了。在这个战场上，盟国空军对德国空军拥有30：1的优势。

即使对诺曼底的入侵在海滩上被击退，盟军这时所拥有的巨大空中优势，如果直接用于袭击德国，也肯定会把它打垮。因为，纵使在

日益加剧的轰炸中仍能保持战斗意志，但由于交通的瘫痪和必要物资供应的破坏，有组织的抵抗也将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1944年以前，盟军空中战略攻势作为除陆上入侵之外可供选择的另一手段，远远落后于对它的要求，而且对其效果也估计得太高。对城市不加区别的轰炸并没有严重减少军火的生产，也未能像预期的那样，瓦解敌国人民的斗志，迫使他们投降。因为，作为集体，这些国家的人民处在他们的独裁者十分严密的控制之下，而个人是不能够向空中的轰炸机投降的。

但是在1944—1945年，空中力量的使用情况改善了。除了对德国陆军的反攻给予阻击并常常使之陷于瘫痪之外，也用于轰炸对敌方抵抗力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军事生产中心，其准确性和破坏效果日益增加。在远东，空中力量这把万能钥匙也保证了日本的垮台，没有任何必要使用原子弹。

一旦战局发生了转变，盟国前进路上的主要困难就是它们自己设置的一道障碍——它们的领导人缺乏明智和远见，要求“无条件投降”。这是对希特勒最大的帮助，使他得以保持对德国人民的控制；对日本的主战派来说，也是如此。假如盟国领导人足够明智，就他们的媾和条件给予某些保证，那么，很可能在1945年以前很久，希特勒就无法再严格控制德国人民了。

3年前，在德国广泛出现的反纳粹运动的代表们，向盟国领导人透露了有关他们推翻希特勒的计划，以及准备参加这场反叛的许多军界首脑的名字，他们的要求就是就盟国的媾和条件得到某些保证。但是，当时也是，后来也罢，一直没有对他们做出表示或给予保证，因此，他们当然也就很难得到对这样一种“贸然行动”的支持。就这样，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不必要地打了下去，无端地多牺牲了几百万生命，而终于降临的和平，只不过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另一场战争的阴云。事实证明，为了追求敌人“无条件投降”而不必要地拖延战争，只对斯大林有利——为共产主义统治中欧开辟了道路。

在占有极大优势的空军掩护之下，盟军在诺曼底的立足点很快便扩大为80英里宽的大桥头堡。虽然德军设法将盟军拦阻在那里近两个月，但他们一直未能进行任何有威胁性的反击。

7月25日，美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代号为“眼镜蛇”的新攻势，新近登陆的巴顿第三集团军准备随后跟进。为了阻止英军在西边卡昂附近发动的突击，德军已投入了最后一批后备部队。31日，美军先头部队突破了在另一翼的阿弗朗什战线。美军坦克冲过这个缺口，迅速遍布于战线后面开阔的原野。

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兵力被投入诺曼底战役，并根据希特勒“不准撤退”的命令死守在那里，直到溃败——其中大部分陷入包围。残军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继续抵抗，他们在撤退途中——主要靠徒步——又很快被英美机械化部队追上。

8月31日，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南面100英里的凡尔登渡过了马斯河。次日，巡逻队未遇到任何抵抗就推进到更向东35英里的梅斯附近的摩泽尔河。到达那里，他们距德国边境的大工业区萨尔仅仅30英里，离莱茵河也不到100英里。但是，主力部队未能立即跟上这次进军，因为他们的燃油告罄。

9月3日，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一支先头装甲部队攻入布鲁塞尔——他们于当天早晨从法国北部出发，越过比利时推进了75英里。翌日，另一支先头部队开进安特卫普，在惊慌失措的德军基地部队尚未来得及进行任何破坏之前，抢占了那些完好无损的大船坞。这里距从莱茵河进入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的通道，不到100英里。如果鲁尔被占领，希特勒就无法继续进行战争。同一天，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马斯河上的那慕尔。在这一翼上，这时在英军面前出现了一个宽达100英里的大缺口。在附近，没有任何德国部队可用以填补缺口。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也难得遇上如此大好机会。

可是，正当全面胜利业已在望之时，盟军的进击却逐渐停止了。到9月中旬，德军在全线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在最北面的那一段。由于蒙哥马利当时正准备于9月17日在阿纳姆向莱茵河发动另一次大规模进攻，这一点就尤其不幸。在这次进攻中，他计划投下最近组建的盟国空降军来开辟道路。这一进击在达到目的地以前就被敌军遏止了，降落在阿纳姆的英国空降部队有一大部分被切断，最后不得不投降。

在下一个月里，美国第一集团军粉碎了亚琛的防线，而蒙哥马利则指挥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消灭了控制着从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的通道的两个德军小块阵地，从而封锁了该港口。消灭这两块阵地的战

斗艰巨而缓慢，直到11月初才完成。在此期间，德军沿着莱茵河前线构筑工事的速度比盟军要快得多，尽管德军在物资供应方面相差很远。11月中旬，盟军在西线的所有6个集团军发动了一次总攻，其结果损失严重，收获却小得可怜。在此之后，德军甚至有力量于圣诞节之前在阿登山区用两个装甲集团军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这次反攻把美国第一集团军打得措手不及，突破了他们的战线，几乎推进到马斯河，在被阻止之前使盟军大为惊慌失措。后来，蒙哥马利和巴顿左右夹击，才把德军造成的突出部挤了回去。

盟军为9月初坐失良机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们在解放西欧的过程中，伤亡人数约75万，而其中就有50万人的伤亡是在9月受阻之后。就世界范围来说，付出的代价则更为巨大——由于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男女丧失了生命。而且，在9月间，苏军大部尚未进入中欧。

在东线，1944年战役中的主导因素是，德军的战线仍然那么宽，而他们的兵力却日益减少。其必然结果是，苏军不断前进，除了受到自身补给问题的影响之外，很少遇到阻力——而由于苏联士兵的要求比较简单，补给问题所造成的障碍，比在任何其他大国的军队中要小得多。6月23日，俄军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以北发动了夏季攻势，不久便把德军赶出白俄罗斯和波兰东北部。7月14日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以南又展开另一场进击。到月末，苏军也开到里加湾，而在中路他们已挺进到华沙市郊，那里的波兰“地下运动”领袖们受到鼓舞，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这正是德军经历一场总危机的时刻。在西线，他们在诺曼底的战线正在瓦解，而他们的后方受到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及随之而来的清洗的冲击，动荡不安。但是，8月份德军令人吃惊地重整旗鼓，这首先在华沙开始。三个党卫队装甲师在关键时刻开到那里发动反击，击退了苏军先头部队。这给德国人带来了喘息的时间，以便乘机镇压波兰人的起义。但是局势的变化并不局限于那个地区——因为到8月第一周的周末，苏军几乎在各地都受到阻遏。苏军在5周内前进450英里——这是他们迄今完成的距离最远、速度最快的进军。他们这时尝到了把运输线拉得过长的必然恶果，于是不得不屈从于这一条战略法则。苏军在维斯杜拉河畔停留了6个月后，才准备好发动一场新攻势。

暂时的僵持局面由于改变了进攻方向而被打破——苏军在南方的罗马尼亚战线采取了新行动。罗马尼亚很快便投降，紧接着保加利亚被占领，苏军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匈牙利。

1945年年初，波兰的西半部仍在德军手中，但苏军统帅部已做好准备，尽量利用德军处境的基本弱点。源源运到的美国卡车使俄军能够把更大一部分步兵旅机械化，而且他们自己生产的坦克也在不断增加。这就增加了装甲军和机械化军的数量，以利于突破敌方战线。同时，新型的斯大林式坦克增强了他们的打击力量。

1月12日苏军开始进攻，科涅夫的部队向波兰南部的德军战线发动攻势。他们突破敌军防线，并对中部地区的侧翼造成威胁之后，朱可夫部队从更靠近华沙的两个桥头堡出击。同一天，即14日，罗科索夫斯基部队向北攻入东普鲁士。到第一周周末，苏军的进攻已深入100英里，而且战线这时宽达400英里——要靠姗姗来迟的很少一点援兵来填补这条战线，那是太宽阔了。1月31日，朱可夫的机械化部队到达奥得河下游，距柏林只有40英里。但是，德军由于被赶回到由奥得河下游和尼斯河所形成的一条笔直而较短的战线上，因此对防御有利。在这条防线上，他们的战线仅及原来的1/4宽——从波罗的海到波希米亚山区的边还不到200英里。由于需要防守的地域大大缩小，这就很有助于抵消他们兵力的损失。到2月的第三周，由于德军得到从西线和内地派来的援军，东线稳定下来了。

尽管苏军受阻，但正是他们即将进军柏林的威胁促使希特勒做出决定，大部分新征集的兵员必须派去增援奥得河地区，而不管莱茵河防线要担多大风险。这就为英美军队渡过莱茵河提供了方便条件。

到3月21日，巴顿已经肃清了莱茵河西岸从科布伦茨到曼海姆之间70英里长的地段之内的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德国部队能够撤到莱茵河之前就切断了他们。第二天晚上，巴顿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渡过了莱茵河。这时，蒙哥马利已完成为了在下游150英里的韦塞尔附近大举进袭莱茵河而进行的精心准备工作。他在这里集结了25个师。他计划进攻的那段30英里长的河段，只有5个力量单薄并疲惫不堪的德国师防守。3月23日夜，经过3000多门大炮和一批接一批的轰炸机猛烈轰击之后，进攻开始了。先头步兵部队在水陆两用坦克的支援下，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渡过了河，并建立了桥头堡。

盟军在向纵深进展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阻碍，是盟国空军的过度轰炸所造成的一堆堆瓦砾，这些瓦砾比敌军更加有效地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德国人，不管是部队还是人民，这时都迫切希望英美军队在苏军攻破奥得河防线之前尽快向东推进，到达柏林，并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国土。几乎没有人愿意帮助希特勒用自我毁灭的方法来达到阻挠敌人的目的。

随着末日的来临，希特勒的妄想有增无已，几乎到最后时刻，他还在指望出现某种奇迹来拯救他。4月12日，希特勒得到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的消息。戈培尔给他打电话说：“我的元首，我祝贺您。命运使您最大的敌人大难临头。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看来这就是希特勒一直在等待的“奇迹”——18世纪七年战争的危急时刻俄国女皇去世的重演。于是希特勒开始相信，东西方强国之间的同盟，由于他们相互对立的利害冲突，这时将会解体。这个希望并未实现，两周后，希特勒不得不自尽——就像腓特烈大王正好在他的“奇迹”降临，拯救了他的命运和生命之前几乎要做的那样。

3月初，朱可夫扩大了他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但还未能发动突击。苏军在远处的两翼继续前进，4月初占领了维也纳。这时，德军的西部战线已崩溃，那里的盟军从莱茵河向东挺进，很少遇到什么抵抗。4月11日，他们到达离柏林60英里的易北河。根据最高领导的决定，他们在这里停止不前了。16日，朱可夫和强渡尼斯河的科涅夫相配合，再次发动攻势。这一次苏军冲出了他们的桥头堡，不出一周就打到柏林城郊——希特勒曾决定留在那里决一死战。到25日，柏林被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所包围，完全陷于孤立，27日，科涅夫部队在易北河与美军会师。但在柏林市区，德军展开巷战，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希特勒自杀，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战争结束时，才完全被制服。

欧洲战争在1945年5月8日午夜正式结束。其实，那不过是正式承认战争的结束，因为一周以来，各地已经陆续停战。5月2日，在意大利的南线，全部战斗已经停止，实际上，那里的投降书在3天前便已签字。这是三份正式投降书中的第一份，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希特勒还在世时不顾他的权威而签订的。而且，它也是将近两个月前在这条战线上开始的“秘密”投降活动的结果。

9月2日，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了投降书。从希特勒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零一天，到此结束——这时离德国投降已4个月。这是正式宣告大战结束，是一个使胜利者感到满意的仪式。因为真正的战争结束日期是8月14日，那一天天皇宣布日本接受盟国所提出的投降条件，战斗便已停止——那是在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星期之后。然而，即使是那次可怕的打击——它毁灭了广岛市，以显示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也只不过稍稍提前了日本的投降而已。投降已成定局，实际上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武器，从那以后，全世界就生活在原子弹的阴影之下。

到1945年春，日本显然已无法阻止美军在太平洋上双管齐下的反攻。1月，麦克阿瑟的部队完成了占领他们在菲律宾群岛的第一个立足点莱特岛的任务，并且再向前跃进一步，登上了主岛吕宋岛。到2月底，他们收复了这个大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首府马尼拉。比收复领土更为重要的是在战斗中消耗了日方空中力量——据估计日军损失飞机达9000架以上。这就严重削弱了可供防卫日本之用的战斗机力量，而这一点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又向前跃出一大步，于1944年夏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从而能够在那里修建机场，以便重轰炸机向1500英里以外的日本展开轰炸。

在海军上将蒙巴顿所统率的以英军为主力的各部队的集中压力下，日军对缅甸的控制也被打破了。1944年日军入侵印度被击退后，斯利姆的第十四集团军推进到缅甸中部，1945年3月收复了曼德勒市。然后挥师向南，打开了通往仰光的道路。

在此期间，美军又来一次大跃进，越过了台湾。4月1日，他们在介于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的琉球群岛的冲绳岛登陆。这个消息所带来的震动，再加上俄国通知日本解除他们和日本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不祥预兆，促使小矶内阁于4月5日倒台，随后，铃木接任首相。直到6月中旬，冲绳岛的日军才被彻底肃清，但他们的命运早在美军登陆后第一周便已注定，当时日本最后和最新型的现代化战列舰“大和”号从日本出击，企图解救冲绳岛，却于4月7日被美军飞机击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因为在1944年10月的菲律宾海战中损失4艘航空母舰后，再也没有航空母舰为“大和”号护航了。

很明显，美军一旦占领这个岛屿，很快就能够加强他们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因为这里的机场离日本不到400英里——仅仅是从马里亚纳群岛到日本的距离的1/4。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进行的空袭已造成可怕的破坏——春季以来轰炸的效果大为增加，因为美军把白天从高空投掷高爆炸弹的空袭方法大部分改为夜间从低空投掷燃烧弹。3月9日夜間对首都东京的一次空袭，就投下1600吨燃烧弹，市区约有15平方英里被烧毁，伤亡达18.5万人。到5月底，东京市民中有300万人无家可归，到8月，在被选为破坏目标的66座城市中，共有900多万人失去住所。

任何有战略头脑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局势已毫无希望，但铃木海军大将和他那寻求和平的内阁，陷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接受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看来似乎是对作战部队的背叛，如果盟国要求废除天皇的话，他们有可能拒绝服从“停火”命令，因为在他们眼中，天皇不仅是他们的君主，而且也是神圣的。天皇本人采取行动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6月20日，他召集由6名核心内阁成员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4]，在会上他说，“你们要考虑尽早结束战争的问题”。最后决定派遣近卫公爵前往莫斯科谈判媾和问题——天皇私下给他指示，要他不惜以任何代价谋求和平。

这时，美国人已独自获悉日本希望结束战争，因为他们的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使用被称为“魔术”的破译密码手段——日本外相发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电报。但是，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大多数主要顾问，这时一心要使用原子弹来加快日本的崩溃，正像斯大林一心想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对日作战，以便在远东获得有利的地位一样。

有些人对使用原子弹感到怀疑，其中就有历任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的李海海军上将，他反对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平民——“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与黑暗时期野蛮人一模一样的道德标准。”但是，那些最接近政治家的科学家，有更多的机会引起注意，他们的积极主张在做出决定时占了上风——况且他们已经引起政治家对原子弹的浓厚兴趣，把它视为结束战争的捷径。于是，8月6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毁坏了该市的大部分，炸死大约8万人——占该市居民的1/4。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

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到杜鲁门总统时，他刚参加完波茨坦会议，正在乘船回国的途中。据在场的人说，他高兴得大声说道，“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然而，原子弹轰炸对日本政府的影响，比西方当时所设想的要小得多。俄国于8月8日对日宣战，次日立即出兵满洲，看来对提早结束战争产生了几乎同样有效的作用，而天皇的作用则更大。这时，日本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愿意投降，只要天皇的君主地位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7月26日的盟国波茨坦公告不详地一字未提。经过讨论，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条件，这是对“无条件投降”的重要修改。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使用原子弹呢？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要求共同占领日本，这是很令人为难的事，美国政府急于想避免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态。李海海军上将透露了第二个原因：科学家和其他一些人想要做这样的试验，因为在这个计划上已经花了庞大的费用——20亿美元。有一位曾参加这个代号称为“曼哈顿区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的高级官员，把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原子弹非得成功不可——在这上面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当炸弹制成并投下后，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极大的宽慰。”

然而，20年以后，最清楚不过的是，美国投下原子弹，对人类并不是值得宽慰的事。

盟国在军事上所犯的一些最大的错误，发生在由于日本的严重错误判断而使美国加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头9个月里所犯的那些错误。但是，“无条件投降”政策不仅导致战争的延长及由此而造成的巨大消耗，而且对建立一个美好而稳定的和平的前景极为不利。虽然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政治错误，但实际上却是总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罗斯福和丘吉尔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但他们提出如此不明智和目光短浅的要求，也是受到民众情绪的影响，而他们的战略顾问们在这一要求的弊病未被经验证实之前，也未能对这个愚蠢的原则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最后，在与日本议和时，他们不声不响地放弃了这项要求。

美国参战后，1942年至1945年间，盟国方面在军事上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将领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记载的种种争吵，大部分是关于对

结局无甚重大影响的次要问题——而且很难说某些人所赞成的另一种做法，会大大缩短战争或减轻其代价。

盟国占优势的工业实力和占优势的资源与海上力量相结合，才得以扭转战局并确定战争的结果。指挥才能对加速战局的发展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它充其量不过是有效地发展了一种克敌制胜的手段，并小心地避免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白白地牺牲众多生命，以致使各国军队和成年男子消耗殆尽的情况。但也决谈不上高明——如果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衡量的话。盟国方面有少数将领曾不时闪现出才华，但他们也是那些最容易犯错误的人。

同样明显的是，有些将领要求，或者让他们的拥护者为他们要求，把过多的功劳归于自己——同时又过多地抱怨他们的盟友。

由布赖恩特表达的阿兰布鲁克的说法^[5]是：正是他想出了打赢这场战争的战略，并说服美国人采用这一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通过“把希特勒的战略后备部队引诱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并牵制在那里”，从而使希特勒无法抵抗“跨越英吉利海峡和从俄国同时发动的进攻”。布赖恩特还强调，阿兰布鲁克于1941年12月就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后即制定了这一战略，并“预见到”其发展过程。然而，阿兰布鲁克本人的日记并不能证实他的头脑中曾有过这样目光远大、全面而细致的计划。相反，日记表明当时他的主要目的只是重新打通地中海，作为通往远东的交通线。

仔细研究阿兰布鲁克的日记还可以发现，他对地中海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掌握得很慢并抱有怀疑。1942年6月，他曾反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的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计划，即怀疑其实际可能性，又怀疑其价值，不过他后来改变立场，接受了这一计划。登陆成功后，他在日记中一再批评对比塞大和突尼斯的进军推进得不够快，并为此指责艾森豪威尔。他对进军步伐缓慢的批评，从战术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这表明他并不像现在所说的那样，当时即已发展了那样巧妙的诱敌战略。因为进军速度的缓慢，无意中成为诱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突尼斯投入大批援军的手段——盟军的海上力量在那里孤立了轴心国部队，迫使他们于1943年5月投降。

这大量的“猎获物”使西西里失去了防御部队，而只有在这种防御空虚的状况下，阿兰布鲁克打定主意要现实的入侵西西里和意大

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此外，在上一个冬天他曾与以马歇尔将军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生冲突，后者要求结束在地中海地区的作战，以便于1943年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对诺曼底的进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由于盟军向突尼斯的进军进展缓慢，他们才放弃希望，同意下一个行动应是入侵意大利——如阿兰布鲁克所希望那样——因为当年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已为时过晚。盟军的战略政为入侵意大利，是丧失时间所造成的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辩论所得出的必然结果。但是，尽管阿兰布鲁克的愿望得到满足，不久他的希望便由于登陆后的进展缓慢而又变成失望，于是他再次批评美国军方领导人，以此发泄他的失望情绪。

另一方面，美国将领们在回忆录中，怀疑阿兰布鲁克和丘吉尔是否真心诚意接受了已确定的计划，即继1943年入侵意大利之后，应于1944年入侵法国。阿兰布鲁克的日记中的许多条记述会使人们重新想起他们的上述怀疑，以及他们对英国当时企图延缓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的猜疑。迟至1943年10月，他还在日记中记述了丘吉尔给他的一个便笺表示“希望牺牲横渡海峡的作战，而把战略重点转回地中海地区”——并评论道，“我在许多方面完全支持他”。此后一周，他记录下丘吉尔在主张地中海地区的作战时，把它和横渡海峡的进攻“对立起来”，而他自己则称后者为“非常成问题的”。他知道美国人会强烈反对再次推迟横渡海峡的进攻，也反对在巴尔干采取任何行动，他评论道，“眼看我们的战略被他们的短见所歪曲，我感到厌烦”。

然而，在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上，由于斯大林支持了美国的反对意见，英国的战略计划受到很大的抨击。这是个不祥的预兆，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日记，美国人曾预料在德黑兰会议上俄国人会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主张在1944年进攻巴尔干，而不是进行诺曼底作战——这样的预料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看出斯大林的战略的长远政治目标。他当然愿意看到英国所致力目标远离东欧，从意大利转向法国。

因此，丘吉尔和阿兰布鲁克被迫承认了他们二人都不喜欢的一个明确的义务。几乎就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阿兰布鲁克还在日记中写道，他“由于疑虑和不安而肝胆俱裂……横渡海峡作战简直使我忧心忡忡”——并担心这可能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可怕的灾难”。甚至在

诺曼底完全获胜之后，他仍在连续向德国进军的各阶段抱悲观态度，对在那个战场早期获胜的前景表示怀疑。

但是从诺曼底登陆那时起，不但阿兰布鲁克，连丘吉尔都不再对战争的进程或结局发挥任何重大影响。在战略方面和政治方面，美国的影响都占有压倒优势，决定了盟国的方针。事实上，当英国首相开始认识到他和罗斯福一起那么轻率地确定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所带来的不祥后果时，他已无力改变这一政策。正如早些时候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实际上他已降为美国总统的“副手”。

在战术领域里，蒙哥马利保持了英国的影响——先是作为在诺曼底担任实际指挥的盟军司令，接着在突破德军防线后，作为这一战场上的英军司令。盟军之间的斗争，这时主要表现为以蒙哥马利为一方，和以布雷德利以及他那不听话的下属巴顿为另一方的拔河比赛，艾森豪威尔是双方之间的绳子。

在艾森豪威尔接管战地指挥权之前的第一阶段，蒙哥马利是主要的批评对象——当时和后来在回忆录中，受到美国将领们的猛烈攻击。他的态度使他们恼火，这是不难理解的——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两人都表现出惊人的耐心，除非是到了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对各次战役进行分析，并不能证明有许多批评是正确的。整个说来，他打乱敌人阵营的计划实施得卓有成效，在进行中受到的一些挫折，多半应归咎于英军和美军的执行人员。

关于突破德军防线后应如何利用战机的问題，艾森豪威尔成为主要批评对象——特别是受到英方，尤其是蒙哥马利的批评。他们把未能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艾森豪威尔相信在“宽阔的战线”上进军，而不赞成蒙哥马利所主张的集中力量沿着一条路线突击。但是分析证明，这种分歧，以及说它是盟国从诺曼底向莱茵河的追击遭到挫败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论点，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为了巴顿在右翼前进而给予他的供应份额，比他停止前进时每日只多500吨——而每日2500吨的总额，与蒙哥马利和霍奇斯共同向前推进的左翼所得的数额相比，只占一小部分。此外，对巴顿的额外供应，比在左翼由于种种错误估计而浪费的物资要少得多，特别是蒙哥马利所计划的对图尔内附近的一次不必要的空降袭击，在关键性的6天里每天损失800多吨物资供应，直到取消这次作战为止。

盟军进抵莱茵河，从而阻止溃散的敌军集结，这本是很有希望的，但致命的是，英军到达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后，从9月4日至7日却按兵不动。这和蒙哥马利从塞纳河进击时所宣布的目标很不一致。他的目标是“迫使敌军一直溃逃到莱茵河，在敌军重新组成一条防线抗拒我们之前，‘冲出’一条路，渡过莱茵河”。在任何深入穿插或追击中，不容喘息的前进速度和压力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即使是一天停止不前，也可能使前功尽弃。在安特卫普的长时间停留，一部分是由于从塞纳河出发进行突击之后，普遍出现一种松懈的倾向，但也由于做出了德军已无力集结这样过分乐观的估计。

在追击中发生的这些错误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错误。盟军有机会如此有利的时候所遇到的一切麻烦的根源，是由于最高决策者中没有一个人预见到8月里所发生的敌军的彻底崩溃。他们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乘机立即发动一次快速而远程的冲击。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在追击中的错误和拖延，这并没有切中要害。从根本上来说，在追击开始之前，他们的认识便都有错误。

（崔思淦 李家骅 译）

[1] 由基根·保罗在《今天与明天》丛书中出版。

[2] 见B. H. 利德尔·哈特《欧洲在武装》（第2版，1938年），特别是第七，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各章；《英国的防务》（1939年），特别是第一一五，二十各章；《利德尔·哈特回忆录》（1965年），第1卷，特别是第十二章和插叙部分；第2卷，第一章（第24—28页），第四章（第161—162，172页），第五章（第188—189，200—204页），第六章（第241—246，253—255页），后记（第280—281页）。

[3] 节礼日（Boxing Day），即圣诞节的次日。——译者

[4]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并不是6名核心内阁成员，而是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组成。——译者

[5] 阿瑟·布鲁恩特爵士：《西线的胜利，1943—1946年》（1959年），第197页。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专制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如同在军事战略方面一样，也可从它们的外交方面看出来。争取中立国家；保持盟国间的良好关系；民族权利的要求最终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审慎的外交所具有的这一切特点，在民主国家一方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俾斯麦以后，德国的政策，无论是在威廉二世或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以不讲分寸而著称。希特勒把以往政权的错误更加以扩大；充斥于《我的奋斗》一书中的那些粗鲁的说教，实际上是集他的政治观念之大成，正如闪电战，即以优势兵力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是他最喜欢采用的方法一样。他主要靠个人会见来采取重大的外交步骤，因为在会见中他能施展他恫吓和狡诈的策略。^[1]他对他的职业顾问置之不理——事实上，他认为德国外交部在政治上不可信赖——很少设法取得别人爽快而出自真心的赞同，即使对盟友亦是如此。他与墨索里尼多次会晤，几乎都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话。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竭尽其平庸的才能仿效主子的特点，在会见齐亚诺时一样趾高气扬。德国的军事首领们也毫不掩盖他们对意大利人的藐视。德意之间没有相当于设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那样高级别的联络机构。墨索里尼在把意大利拖入战争后，很快得出结论：希特勒关心与法国的和解，甚于关心满足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至少暂时如此，虽然他绝不会对维希政府信守诺言）。墨索里尼未同德国商量就向希腊发动进攻，希特勒不同意此举，因为他认为这可能引起英国轰炸罗马尼亚油田之类的行动。希特勒则直到开始进攻苏联之前一星期才告诉墨索里尼他的这一意图，以示回敬。毋庸置疑，在怂恿德国进行侵略上难辞其咎的墨索里尼，一定是极力希望德国不要在苏联轻易得逞，因为德国如获全胜，将意味着意大利屈居附庸。德意之间在1942年也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来对付盟国可能在北非的登陆。意大利人希望在政治上控制突尼斯，最后试图坚守该地区，而德国人实际上无视他们的存在。

希特勒同日本的关系更加疏远，自然也更加小心。他不可能威吓日本，也不可能对它的决策施加多大的影响。他对日本在战争初期取

得胜利的规模感到不安，据戈培尔日记说，他担心会出现“黄祸”。在苏联人看来，希特勒是不可信任的和狡诈的，正如他们在希特勒的心目中一样。1940年2月签订的苏德经济协定，允许德国有27个月的时间完成对苏联的交货，而苏联却必须在18个月之内履行诺言。^[2]因此，当希特勒在1940年12月决定进攻苏联时，他知道德国是无须再履行它的交货义务了。

希特勒甚至对设在维希的法国附庸政府也感到不放心。他夸大了这伙抱失败主义情绪的手下败将们愤而采取行动的可能，因为在一位难以揣度的老人有名无实的领导下的这伙人，在继续玩弄那在最后岁月败坏了第三共和国声誉的个人阴谋。另一方面，希特勒并无意真正安抚法国人的情绪。对阿尔萨斯—洛林事实上的吞并；驱逐法国人的做法；为德军占领而付出的极高昂的费用；拒绝遣返法国战俘；处决人质，因此，除了少数缺乏判断力的政客、工业家或军人之外，这些都断送了任何真诚合作的可能。美国参战后，那些愿意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它至少不会由共产党统治——牟取利益的法国工业家，开始怀疑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德国人除武力和剥削外，不懂得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1940年9月宣布的欧洲“新秩序”所遭受的命运，表明了这一点。要想在各有关民族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组成一个由德国领导的单一的共同体，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新秩序”的概念是以国家社会主义者关于“生存空间”的模糊思想为基础的。不过，尽管它字义含混，但在一种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制度中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共同体这种想法，对饱尝战祸的欧洲各国人民来说，可能是有吸引力的。英国很可能因此而陷于孤立，绝望地同在一个在德国领导下追求和平与繁荣，而不愿无休止地进行战争的欧洲大陆相对抗。^[3]对纳粹宣传家们来说不幸的是，希特勒从未对此计划感兴趣。虽然他吹嘘什么“千年帝国”，他专心致志谋求的仍然是征服和吞并。“新秩序”在德国人不得不在实践上予以放弃之前，在理论上就已被丢弃了。回顾起来似乎很奇怪：德国人并未准备打长期战争，而且，当1943年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战时，他们加紧对占领国进行掠夺和剥削，并对公众和个人的自由进行压制。整个战争期间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不仅是德国人品格上长期抹不掉的污点——就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是不可能找到任何理由加以辩解的——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与

取得胜利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增加了所有文明人类对德国统治的厌恶而已。

苏联在外交上不择手段，与轴心国如出一辙。俄国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态度，与德国对较小的中立国的态度几乎毫无二致。而德国和苏联在对待波兰人时的所作所为也是如此。像德国一样，苏联的外交是在一个独裁者和他的一些亲信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大战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始终配合一致。由于莫洛托夫对一切采取否定态度，并且不愿考虑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的要求，致使与德国或盟国的谈判都遇到重重障碍。苏联的大使们几乎没有谈判的自由；驻莫斯科的大使们则如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0—1941年英国大使）感到沮丧的那样，很少能见到斯大林，或者甚至莫洛托夫。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盟国抱怀疑态度，很容易为一些琐事所激怒，或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他们往往为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夸大怀疑，但抱有这些怀疑也有某种真实的根据，即使仅仅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西方国家不会像他们自己那样狡猾和欺诈。在他们同德国人合作期间，他们不信任希特勒的各种建议，但是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接受了德国针对他们的每一着棋；而与此同时却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夺取了可以使他们处于军事优势的一切领土。因此，在把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归还匈牙利，苏联人自己也获得比萨拉比亚和北部布科维纳以后，德国人竟于1940年8月30日对罗马尼亚领土的其余部分给予安全保证，这使俄国人感到意外。当1941年3月德军进入保加利亚后，虽然他们这时形成从南方进攻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工业中心和高加索油田的威胁，但苏联人仅仅是提出抗议而已。1941年夏，他们几乎已无法再向德国让步。除非在军事上彻底投降，希特勒不给他们任何选择余地，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消灭俄国的武装力量。

德国进攻后，苏联的一种政治行动方式——宣传德国的好处而反对英国——方告终止，不过苏联人继续间接地干扰英国的作战计划，其手段是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这项军事行动欲取得成功，为时尚早得很。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公开鼓励对英国政府的批评。^[4]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同英国建立像英美之间那样的密切关系。丘吉尔曾试图同斯大林私人通信，但苏联人方面对此一直不十分热情；1943年6月，由于英国无法，或如斯大林所说不愿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种通信已几乎中断。

因此，随着战争形势主要由于俄国的胜利而变得对盟国更为有利，苏联对盟国的政策也就必然变得更加疏远、诡秘和欺诈。苏联对未来的看法是，他们必须继续保卫自己，以对付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获胜所带来的后果和德国东山再起发动侵略的可能。苏联人从旧式的军事思想出发考虑问题：他们在1939年至1941年曾竭力扩展他们的边疆，形成一个对德缓冲地区；他们意欲控制西部毗邻的，以及他们的军队所能达到的所有各国的政府，以重建这个缓冲区。在他们占领了他们想要控制的领土之前，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向英美谈论什么在从德国统治下解放的国家重建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政府之类的含糊其词的说法。

美国的外交与苏联和轴心独裁国家的外交迥然不同。美国总统较英国首相有更大的个人权力，但罗斯福的行动自由，在1941年以前一直受到高度有组织的舆论界更多的限制。罗斯福和他的大多数顾问认识到德国尤其是德日的胜利对美国所造成的危险。美国很可能得不到中东和远东的原料，德国的影响可能在拉丁美洲扩大。希特勒在摧毁欧洲的政治自由后，将要破坏西半球各个地方的民主制度。然而，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厌恶独裁，同情英法，却认为欧洲民主制度之存亡与己无关，更不要说英帝国之存亡了。他们受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历史学家（以及德国宣传）的影响，首先关心的是美国应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干预的错误政策。迟至1939年7月，国会仍拒绝废除中立法案中防止交战双方从美国购买武器的条款。罗斯福虽在1939年11月初得以使禁运解除，但美国船只却被禁止运军火至交战国，或进入总统所规定的作战区域。1939年10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会议，确定了一个“安全区”，以排除在西半球周围海域发生战争行动（加拿大和“欧洲各国没有争议的殖民地和属地”除外）。这个巴拿马宣言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英国海军在拉普拉塔河作战时即对它置之不理。要想强制实行宣言，唯有诉诸交战行动，而这正是美国所不愿采取的。避免美国卷入战争，最稳妥的办法是劝说交战国终止战争。罗斯福于1940年2、3月间派遣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前往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试探通过谈判媾和的可能性。英法担心韦尔斯提出的解决办法将会让希特勒继续当权，因而仅仅是一种不稳定的休战。韦尔斯的商谈还没有任何结果，德国就发动了对挪威和丹麦的入侵。

法国的崩溃使美国公众感到了自身的危险。法国和荷兰在西半球的属地可能沦于德国人之手。若英国失败，其前景更为可怕。那时美国将不得不在两个大洋上保卫自己和拉丁美洲，而美国的海军力量，只足以用于一个大洋。法国战败后，美国舆论的很大一部分认为英国已凶多吉少，应让其听天由命，而美国人应集中精力加强自己的防务。幸好总统另有考虑。

为应付轴心国控制新世界领土的危机，国会做出决议，申明美国不承认西半球领土从一个欧洲国家转让给另一个欧洲国家。1940年7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美洲国家会议支持这一决议（阿根廷最初不同意）。1940年11月，罗斯福竞选总统，并获连任，但未能赢得共和党接受“两党”外交政策，不得不宣布美国将不派兵去海外参加外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坚持他的计划，把未来英国的需要包括在美国防务计划之中。他获连任后，有可能在援英问题上更加坚定。1940年12月，他提出“租借法案”。较早，在9月，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5\]](#)宣布时，总统经与英国协商后决定，如美国被迫参战，它将在大西洋采取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这个首先对付德国的计划成为英美战略的基础。1941年1月在华盛顿开始了秘密的参谋人员会议。经一系列会议，在年底成立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为协调和指导两国战争行动的机构。

从此，英美合作即继续不断。这种合作在军事方面较外交方面更为密切。制定一项“联合”的外交政策以应付长远的利益，较之制定一项以打败共同敌人作为直接目的的军事政策更非易事；即使如此，“打败敌人”这一说法本身，对英美两国来说，其含义也并非完全相同。不过，除正常的外交联系外，还辅之以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个人通信。丘吉尔任海军大臣时，即已经首相批准开始这种通信往来；其本来目的仅仅是互通信息，但在他本人任首相，特别是美国参战后，这些信件对制定政策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总统与美国国务卿之间的关系不如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丘吉尔更勤于写信；从1940年5月起，他发出了大约1000封信，收到约800封，多数是回信。虽然他经常将信件内容告诉外交部，但这种做法有可能造成过分强调个人观点的危险。而且，在战争后期，罗斯福对丘吉尔在决策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多少感到不安，或许是有忌妒。美国人在各个领域的联合行动中，对

英国人的谈判手腕均抱有戒心。甚至在参谋人员会谈初期，美国人就受到他们上级的告诫，说英国起草的建议，一定会“主要关心对英联邦的支持。英国人念念不忘的是他们战后的商业和军事利益”^[6]。他们对丘吉尔说服别人的能力是抱有警惕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在谈到总统的另一亲信哈里·霍普金斯时写道：“谁也愚弄不了他，即使是丘吉尔。”^[7]

战争开始后头几个月，英国外交迫切任务之一是说服中立国，特别是美国，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之所以使用“经济战”一词而不用以往的“封锁”，是为了使之也适用于阻止德国保持其海上贸易或获得进行战争的基本商品，以打乱其经济生活的努力。英国政府最初这个时期过分相信经济战的作用，正如德国人过分依赖闪电战一样。德国人直到为时已经太晚时才认识到动员他们的全部经济资源的必要；英国人则忽视了以下事实：德国直到以闪电战进攻俄国造成很大损失之前，并未耗尽他们的物资储备和生产力。因此，断绝海外输入，并未能使之停止前进。

英国同中立国家的协商，由附属于外交使团的经济作战部代表具体执行^[8]，但遇有可能导致政治关系紧张的事务，大使需亲自过问。鉴于过去美国人对英国的干预很敏感，对海上权利的解释如发生纠纷，很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1940年年初，确实就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当时战时内阁考虑到有必要（与法国一起）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同美国讨论封锁的办法，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该使团达成了圆满的协议。此外，也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瑞士、希腊，以及在较小范围内同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达成了各自的战时贸易协定。法国的崩溃，轴心国对大西洋和地中海欧洲海岸的占领或控制，改变了经济战的中心问题。与这时已处在轴心国控制下的各国所签订的战时贸易协定已不复存在。英国海军在从事保卫英国和英国商船的活动，不可能抽出足够的舰艇巡弋整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岸地带。切断敌人补给最可靠的办法是与生产国达成协议。美国是这类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此，美国接受“航运证书制度”^[9]和对德国的邻国实行进口限额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合作虽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臻于完善，但在1941年夏已大大增加，不仅提供了优先购买原可能运往德国的商品的权利，“冻结”了德、意、日的财产，而且撤销了禁止美国商船向英国运送货物的限制，并在大西洋西部由美

国海军进行护航。从1941年9月，美国海军舰艇即被授权可向大西洋西部区域发现的轴心国军舰进攻。

当英美合作逐渐接近军事同盟之际，美国正在对维希政府施加一定压力，并且使日本比较有所收敛，不敢一意孤行。贝当及其同僚仍然坚持他们的两个根本错误，即认为英国的失败已在所难免；德国将会允许法国不再受战争的约束，甚至如赖伐尔所希望的，可以设法使法国在德国控制的欧洲处于有利地位。维希政府的部长们对英国怀恨在心。如他们所说的，是英国把法国推向法国尚未做好准备的战争之中，尔后又未给予它足够的援助。他们对英国支持戴高乐将军甚为愤懑，因为戴高乐的运动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减少了维希政府获取德国让步的机会。1940年晚秋，英国外交部主要通过法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从维希政府的成员或代理人那里得到愿意进行接触并表示，但态度暧昧。这种接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英国对戴高乐的援助和防止英国对法国同北非的贸易实行封锁。1940年10月，贝当、赖伐尔与希特勒在蒙托埃举行会议，提出法德实行超出停战条件之外的合作。在这件事上唯一可能采取的影响维希政府的办法，是通过美国。在丘吉尔的请求下，罗斯福警告维希，交出法国舰队将会严重影响法美关系。英国政府更多地寄希望于北非的魏刚^[10]而不是维希的贝当。它建议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法国允诺不进攻站在戴高乐一方的各殖民地，也不允许法国的港口和领土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基地。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政府愿讨论就法国通过地中海的贸易做出让步。这个建议未取得任何结果，法国在经济上的要求太高。

这些接触失败后，英国外交部对维希政府不再抱希望；海军上将达尔朗^[11]如同赖伐尔一样，是一个附敌和反英分子，不过没有赖伐尔那样诡计多端。然而，美国人仍然认为让步可能对魏刚产生作用。为此，他们决定给北非送去数量有限的补给品。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计划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但也愿意一试。德国进攻俄国并没有影响维希的政策。1941年5月，贝当发表了一次卖国色彩很浓厚的广播讲话。俄国战役开始后，他认为德国人在年底肯定会占领莫斯科和顿河流域，然后回师击败英国。

美国的参战并没有促使贝当转向同盟国，而只是对美国参战表示遗憾。他告诉美国驻维希大使，如果德国坚持要改变法美关系，法国将不得不同意；否则它将继续保持中立。然而，虽然美国人和英国人

一样十分希望法德之间的合作保持在停战范围之内，但他们此时再次更多寄希望于一旦进攻北非时能得到法国的支持。他们于1942年7月恢复了4月间因赖伐尔重新掌权而中断了一个时期的对北非的供应。这个时期，丘吉尔与外交部之间在对维希的政策上看法有很大不同。丘吉尔虽不指望维希政府的部长们会采取公然行动抵制德国的要求，但同美国人一样，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会改变态度，只要这样做可以有把握的话。外交部认为贝当将始终是一个失败主义者；赖伐尔和达尔朗不仅仅是设法与德国人和解，而是把自己的一切押在德国的胜利上。因此维希政府决不会让法国或北非投入战争。到他们回心转意，想为胜利做出贡献的时候，也就为时过晚了。

与美国人对维希政府，或者说无论如何对北非抱乐观看法相对应的是他们不同情戴高乐将军。戴高乐自从被英国政府承认（1940年6月28日）以来，未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既获得法国著名人士——法国知名人士很少有人来到英国加入他的运动——又获得法属各殖民地更多的支持。不过法属赤道非洲追随他的运动，这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价值的。戴高乐将军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他关心的是法国的荣誉和地位，因此，总是忽略这样的事实，即法国的复兴有赖于英美的胜利。他正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给英国造成困难。当这两个前法国委任统治地主要靠英国的武器从维希政府控制下收复后，戴高乐曾同意宣布给予独立。他继续拖延实现这项诺言，并寻找理由说，英国施加压力要他具体实施上述诺言，是企图消除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影响。1942年初，戴高乐将军更大地损害了改善与美国当局的关系的机会。英国政府曾建议，应允许戴高乐接管当时由维希政府控制的纽芬兰海岸附近的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12]美国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不愿冒犯维希政府，并曾保证凡非美洲国家在西半球领地的主权，均不得转让。^[13]然而，戴高乐将军派遣自由法国的军舰去占领这两个岛屿。英国政府费了很大气力才劝说美国总统接受折衷方案：维希当局撤离这两个岛屿（当地居民对此感到满意），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监督无线电设施。

尽管发生了这些和那些麻烦，英国认为仍应支持戴高乐将军，因为舍他之外再无其他法国人可胜任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这位将军所造成的许多困难，是由于英国政府答应向他提供援助，但没有得到他同意他们自己应承担任何义务，而且他所建立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都是由他自己提名的人所组成。因此，英美的政策应该是利用美国承认该委员会的机会，重新确定其地位。1942年7月重新确定这一点时，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的名字；委员会被说成是法国人与联合国合作的一个组织。^[14]然而，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进一步带来了麻烦。美国人不愿让戴高乐参加作战，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在北非只有少数追随者，所以在登陆进行后才告诉他。^[15]美国支持另一位法国将领吉罗，误认为他能更多地获得当地人的支持，这样，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利用海军上将达尔朗至少暂时作为法国在北非的行政首脑，这种想法的后果更加糟糕。不管从军事上找出任何理由说明这样做有利，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舆论都对这种简直是在政治上开玩笑的做法感到震惊。

1942年12月24日达尔朗被刺，使英美同盟的严重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但戴高乐与吉罗的争斗依然存在。戴高乐比较有能力，也比较机智，而且更有资格代表法国各抵抗运动组织，终于成为新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首领（虽然美国很久以后才承认这一事实），但罗斯福拒绝承认该委员会有能力在从法国解放到举行大选之前一段时期接管法国的民政。丘吉尔同罗斯福一样不信任戴高乐。美国提议应在法国建立一个类似在意大利行使职能的盟国军事政府那样的机构，直到有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政府为止。外交部则认识到，法国人民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后，是不会理解为什么在作战区之外还要受英美的控制；因此，虽然罗斯福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但除戴高乐将军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之外别无选择。美国总统直到诺曼底登陆后仍然坚持上述看法。戴高乐有把握相信法国人民很快就会支持他，因而接受这种多少有点不伦不类的地位的话，也许会更明智一些。而他却与此相反，最初，拒绝允许属于盟国远征军的任何法国联络军官前往法国，直到使美国人就有关这些联络军官的职责签订了协议为止。丘吉尔尽管对戴高乐很恼火，仍然再次向罗斯福提出要求，罗斯福终于让步，不过直到1944年10月中旬，他才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政府。

从战争爆发起，英美在远东的外交目的是设法使日本不要站在德国一方作战。法国崩溃后，英国的困难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建立牢不可破的地位的机会。即使日本人中间比较谨慎的人也几乎跃跃欲试。维希政府无力反对日本进驻印度支那；英国抵抗的

可能性取决于美国的支持。美国政府认为，除使用武力外，无法阻止日本前进；而在1940年，美国海军还无力在太平洋冒战争的风险。因此，美国建议英国暂时依从日本的要求，尽可能地避免战争。英国政府同意封闭滇缅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向中国供应物资），不过规定以3个月为限，在此期间，日本人应设法同中国人达成令人满意的和平。由于日本人连西方国家认为对中国来说是合理的条件都不愿讨论，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日本的政策实际上是很明确的，不过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在时机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就在德国空军为入侵英国扫清道路遭到失败的几天以前，日本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对珍珠港的袭击，恰恰又正是德国对苏联进行闪电战宣告失败之时。

与日本毫无结果的谈判，最后是由美国进行的。英国的政策是与美国密切保持一致。因此，在1941年7月，当美国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冻结日本的资产时，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虽然这样做总是带有冒险性的，因为如果日本仅仅对英国和荷兰的领地进行报复，美国很可能不加干涉。有一个时期，由于日本政府中一些不太极端的分子试图同美国达成直接谅解，曾使外交谈判复杂起来。美国政府虽然不指望这种谈判会成功，但认为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推迟日本进攻的机会。11月，谈判达到紧要关头。11月18日，日本谈判代表警告美国政府，除非美国放弃对他们的经济制裁，战争将不可避免。美国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这个条件没有被接受。美国国务卿赫尔于是考虑提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一项允许有两三个月时间求得全面解决的安排——其基础是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出大部分军队；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放松经济封锁。外交部认为向日本提出的让步要求是不够的，但他们却告诉赫尔，英国政府对他掌握谈判抱有信心，并让他自行决定下一步应怎么办。在中国对此临时解决方案提出强烈抗议后，赫尔未同英国商量，就决定予以放弃。外交部指示哈利法克斯勋爵重申英国赞成这样一个临时协议。赫尔的回答是：重提上述方案为时已晚。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16\]](#)

在对中国的看法上，英美有很大分歧。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抱有更大的希望（这是总统所同意的看法）。英国则认为蒋介石将军已不可能改变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援助中国不是打败日本的上策；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如罗斯福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远东的一个稳定力量。美国人倾向于把这种估计看作英帝国主义的观点。蒋介石将军试

图干预印度内部事务，更无助于改善这一情况。1943年，英国和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放弃治外法权的条约。从这时起，有关中国与盟国关系的问题，实际上由美国负责处理。英国政府不安地注视着蒋介石政权的继续崩溃和共产党势力的巩固，但英国政府无法使这一局势好转。

约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前往莫斯科，说明英国有关战时和战后英苏政治合作的建议。他发现，苏联要求英国立即保证承认它对波罗的海国家和直到寇松线的波兰领土的兼并。^[17]艾登反驳说他无权同意领土的变更，而且英国已向美国保证在战时不做出任何这样的变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此加以拒绝。战时内阁未立即答复苏联的要求。然而，他们又改变了看法，认为虽然这些要求与大西洋宪章相抵触^[18]，但拒绝这些要求也是极为困难的。如果西方国家对斯大林要按照德国发动进攻前的状况划定苏联边界的要求加以拒绝，他很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除这一危险外，如果英国在无力解救苏联军队遭受的压力之时，拒绝苏联在将来取得它认为对它的防御必不可少的边界的话，那么在战后将更加没有可能得到苏联的合作。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苏联击退德国，它将重新占领这些领土，西方国家将不可能把它赶走。因此，接受苏联人的要求，同时设法限制他们，特别是在有关波兰的问题上限制他们，一般说来是现实的。然而，这种原则上的让步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危险的步骤。英国在1939年的英、法、苏谈判中曾拒绝采取这一步骤，而且在大西洋宪章宣布以后，很难为此而辩解。英国政府这时却允许苏联统治者们“侥幸得逞”，以伪装和“欺人之谈”来掩饰他们这种与小国的独立水火不能相容的行动。一旦做出这种让步，要拒绝类似的要求就更加不容易了。

俄国人不久就设法扩大他们外交胜利的战果。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来到伦敦，带来了英俄条约的方案，其中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连地方自治也不允许得到；苏波边界的划定也无须与英国进行磋商。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些建议，只提出一项战后英苏同盟条约，以反对德国侵略重新发生，而未提及边界问题。苏联同意该条约，但指出他们并未放弃他们关于自行决定应获得多少波兰领土的要求。如果说人们还有所怀疑，认为他们在这件事上不至如此残酷无情的话，他们在1943年就打消了这种怀疑。当时他们不顾丘吉尔的多次呼吁，以波兰人怀疑他们应对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和士兵一事负责为口实，断绝了同伦敦的

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19]苏联人已经采取种种不友好的行政手段，对付在苏联领土上避难或按照苏联的命令放逐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人。他们此时即将胜利进军，重新进入波兰领土；他们的态度对波兰民族的未来来说是不祥之兆。

1942年5月26日英苏条约的条款规定“具有同样想法的国家……将在战后时期为采取共同行动维护和平并抵抗侵略”而组织起来。这句话象征着已经到了在盟国的计划中考虑战后安全问题的阶段。在战争前期，英国无法就战后计划提出任何精确的想法。谁也无法预见到战争何时会结束，或者哪些国家将会卷入战争。第一个提出肯定说法的是美国。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的军舰上会晤。根据罗斯福的建议，他们比较仓促地起草了一个关于两国正在遵循的广泛原则的联合宣言^[20]，即所谓大西洋宪章。宣言规定，两国不为自己“谋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扩张”；两国不要求任何不“符合有关的民族自由表达的意愿”的领土变更。两国尊重“各民族选择其所生活的政体的权利”，并希望被横遭剥夺了自治权利的民族恢复其自治。他们坚持所有国家，“不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均平等享有进行贸易和获得原料的自由，并将努力促成国际经济合作、社会安全和摆脱恐惧和匮乏之虞的生活条件；在“广泛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建立之前”，两国将不允许那些以侵略威胁别国的国家获得军备，两国并将进一步采取一切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民族沉重的军备负担”。

英国政府认识到，这个宣言的发表意味着美国在缔结和约时将要求起领导作用。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由于以威尔逊措辞含混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停战和缔结和约的基础而造成的那种不幸结果，需要更加明确地考虑如何使宪章的条款能够具有实际的效果。然而，下一步骤又是美国采取了主动。1941年12月丘吉尔访美，美国向他提出了一份宣言草案，规定签字国必须保证打败“轴心国的征服力量”，并重申大西洋宪章的“目的和原则”。这个《联合国宣言》^[21]又是在本不应有的仓促情况下制定的，使战时内阁感到不满。俄国人抱着不同目的，也对这个文件提出了批评。

然而，有一个时期反轴心国专心关注军事形势，无暇考虑战后的和平组织问题。外交部起草了一些备忘录，总的意见是英国应努力建

立一个由四大强国^[22]监督的世界安全组织。外交部还建议成立一个盟国停战及复兴委员会来处理战后恢复欧洲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欧洲委员会，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和美国均将派代表参加。丘吉尔特别对欧洲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欧洲合众国”感兴趣。

1943年3月，艾登赴华盛顿就战后问题进行非正式会谈。他发现人们普遍主张四大国应该起一种联合国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但美国还未拟订出详尽的计划。仍然有一种看法，认为筹划建立世界组织的工作仍必须在幕后进行。外交部认为任何计划的先决条件是大国必须保持一致；英国政策应是集中精力保持这种一致，然后才能开始（用A. 卡多根爵士^[23]的话说）“设计未来和平大厦的全部外表”。而且首先还必须就停战条款和对敌国的占领制定出共同的政策。当时尚未就如何对待德国做出决定——究竟是应将德国分成若干单独的国家呢，还是应将其边境上的一些大片地区分割出去，或者采取某种形式的分权制即可；只是就一件事发表了声明，那就是要求“无条件投降”。罗斯福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会谈时就已提出了这个要求。这里又一次几乎是轻率地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虽然罗斯福曾和他的军事顾问们讨论过此事）。美国要求避免发生1918年停战条款中那种含糊其词的情况。“无条件投降”也是一种含糊的说法：究竟投降包括些什么，由谁投降，代表谁投降呢？

对提出这种要求是否有利，有着不同的意见。丘吉尔同战时内阁商讨时，不主张把意大利包括在内，但艾登和艾德礼（副首相和工党领袖）则认为应将意大利包括在内。丘吉尔的观点是，这种要求可能会妨碍意大利单独媾和。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垮台和西西里失守后，他们“无条件投降”了。他们是不会在更早的时候投降的，而且他们的“无条件投降”是得到让步的，即答应在缔结和约时将考虑到他们后来曾与盟国合作的事实。对东南欧的轴心卫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也做了修改。在1944年强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前，英美曾就是否用一些确切的条款来代替“无条件投降”进行过某些讨论。1944年2月丘吉尔在议会解释道，“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以野蛮方式对待德国，而是说在停战前不会进行讨价还价。事实上，丘吉尔认为，当时盟国计划迫使德国人接受的条款，比含糊地要求无条件投降更会使德国人大为惊慌。德国的抵抗之所以毫无意义地拖延下来，并不是由

于盟国坚持“无条件投降”，而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自己或其同伙已无指望获得宽恕，已经疯狂至极，不愿承认失败。同时，只要国内的独裁机构还在起作用，那么，没有最高统帅部的积极支持，德国国内是不可能发生革命的。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距离就如何对待德国和战后安全组织的问题做出决定，稍稍接近了一步。美国提出了一个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指出“必须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建立一个以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一切这样的国家，不论大小，均可加入，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宣言于10月30日公布，三大国同意就该组织的性质非正式交换意见。艾登说服他的同僚接受一个比较有限而立即能够实现的建议，即建立一个欧洲顾问委员会，以提出处理战后欧洲问题的办法。莫斯科会议是为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做准备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这三位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军事问题，但对如何对待德国也做了重要讨论，不过未得出结果。这个问题提交欧洲顾问委员会监督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到1944年9月还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英国政府甚至连自己的政策也尚未确定。这时，罗斯福在魁北克会议上劝说丘吉尔（艾登尚未到达）接受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提出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计划。这个得到彻韦尔勋爵（丘吉尔的科学事务顾问）支持的计划内容是，摧毁德国的“战争工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主要变为农业和畜牧业。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将使西方盟国承受养活一批饥饿的居民的重担。总统本人不久也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俄国提出了一个类似摩根索计划的方案，不仅要求在政治上肢解德国，而且要求德国以实物支付赔偿，其规模将达到把德国的重工业约减少80%。与会的英国大臣们只同意对肢解德国做进一步研究；他们没有拒绝先以实物一次大规模支付赔偿，然后在10年内每年以货物交付赔偿的原则，但他们拒绝考虑俄国提出的数字——相当于200亿美元（其中苏联将得到一半）——因为它远远超过德国的支付能力。斯大林于是不得不同意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提出确切的数字。

英国大臣们从雅尔塔回国后不久，财政部即向战时内阁提出了关于德国赔偿和肢解的文件，文件最后辩称，苏联既要求最大限度的赔

偿，同时又要求最大限度地肢解德国，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的建议将使整个西欧陷于贫困，从而危及其政治稳定。此外，如同摩根索计划一样，有关赔偿的建议将对西德工业区带来严重的后果，而这一地区正是在雅尔塔会议决定由英国占领的地区之内。对付这种不可避免的贫困的重担将落在英国人肩上。事实上他们将支付苏联获得的赔偿的一大部分。不久，苏联放弃了肢解德国的主张，赔偿委员会未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将问题留待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1945年7月）去解决。

在战时英、美、苏三次会议中这最后一次会议上，苏联人重新提出他们的要求；英国人再次拒绝他们所提出的数字。美国无意为自己要求赔偿，不过也未放弃它的权利。最后作为就会议中争执的主要问题取得妥协的一部分，建议三大国各在他们的占领区取得实物赔偿。苏联已从他们的占领区内运走大量机器，还应从西方国家占领区中另外再得到赔偿物资。西方大国还须提供分摊给较小的盟国的份额。作为交换条件，苏联答应从他们自己和波兰人占领的德国领土上提供煤和食品，因为战前西部德国就是从这部分领土上获得供应的。

在德黑兰会议上曾谈及未来世界组织的问题，不过也没有得出结论。1944年年初，英美政府着手拟订详细方案，以便在邀请其他国家政府代表参加大会前，与苏联先进行磋商。^[24]英国的一个委员会在五份备忘录中提出了建议，曾在1944年5月于伦敦召开的自治领总理会议上提出，然后提交战时内阁。建议内容是，召开一次世界大会，所有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另建立一个世界理事会，包括四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世界理事会将在维护和平的行动上起主导作用，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均受理事会决议的约束。这些备忘录在当时还未试图制定程序方面的细则，也没有提出建立“国际警察部队”以维持和平的建议。因为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在人员选择、经费、驻地和指挥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似乎是不可克服的。

英、美、苏三国代表于1944年8月至9月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各种建议。英美大体上是一致的。同苏联的主要分歧在于，如果世界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是争执一方的话，它是否有投票权。三大国曾同意，凡涉及做出采取行动以反对侵略的决议时，必须是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同意。但是，如果允许某常任理事国在它是争执一方的问题上参加投票，它就可以阻止反对它的行动，因

为，它投反对票就会破坏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投票权就是否决权。英国的观点是：小国，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在理事会中没有席位的英联邦成员国，将会反对这种否决。譬如说，英国投了否决票，从而能够阻止任何对它自己不利的行动，而加拿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否决就会遭到反对。美国人最初认为，参议院很可能要坚持否决权，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苏联不愿放弃否决权，因此这个问题不得不留给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去解决。

在雅尔塔举行这次会议之前，陆军元帅史末资曾向丘吉尔建议，接受苏联的观点是可取的。苏联人正在寻找理由说西方国家怀疑他们的合作愿望；他们把否决权看作一种考验，看是否对苏联真正平等相待。无论如何，拥有否决权可以使西方大国防止苏联采取他们所不赞成的行动。一部分美国人的舆论继续支持否决权，把它作为保护美国利益免受联合敌对行动侵犯的一种手段。英国代表团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主张对理事会所议决的积极行动可允许行使否决权，但对调查某一争端或提出解决建议这样的议案，则不允许行使否决权。12月初，罗斯福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解决办法。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接受了这一妥协方案，但又提出了他们以前曾提出过的要求，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均各有其单独的代表权。但这时它只限于要求两个或三个加盟共和国享有代表权。英美的一致意见是，加盟共和国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因此把他们包括在内，只不过是增加了苏联的投票权。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要求为英联邦各大自治领取得单独的代表权，而这些国家的要求理由更加充分。最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获得了单独的成员国资格。

联合国成立大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由于俄国拒绝履行雅尔塔会议上就波兰独立的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大会几乎延期。苏联还要求应由他们控制下的华沙傀儡政府代表波兰参加大会。西方大国拒绝了这一要求。除增加了关于托管制的一章和在否决权问题上做了妥协外，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出的草案没有多大差别。英国代表提议用“联合国”作为该组织的名称。[\[25\]](#)他们本想选择欧洲一个小国作为秘书处总部所在地。[\[26\]](#)

对联合国成败所系的大国一致原则，在敦巴顿橡树园和旧金山进行的协商，未给人们带来乐观情绪。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的开会情况，对未来更是不祥之兆。苏联人不许西方大国插手保

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事务。英国外交部认为，对苏联在其军队控制下的东南欧地区的支配地位提出争论是徒劳的，但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应在波兰问题上坚持立场。俄国在进入波兰领土后，已建立了一个在性质上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并拒绝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回国。他们先前曾坚持要波兰流亡政府立即公开同意交出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并且同意关于不把利沃夫划归波兰的另一种解释），以此使该政府感到为难。他们杀害或驱逐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1944年初秋，地下抵抗运动的军队在苏联军队逼近华沙时开始举行反对德国人的起义，而苏联人丝毫没有援助他们。

英美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设法得到苏联同意：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包括傀儡政府的成员以及波兰国内外的非共产党领袖人物，以维护波兰的独立。雅尔塔会议一结束，苏联就制造种种借口推迟新政府的组成。他们明确表示，既不想包括不屈从他们统治的波兰人，也不允许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丘吉尔要求英美对斯大林不遵守雅尔塔协议采取强硬路线；他向美国提出，这个问题远不止是波兰命运的问题。波兰问题是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在如何理解民主、主权、独立、代议制或自由选举这些东西的意义上的一块试金石。在罗斯福去世前不久，丘吉尔写信给他说，如果三大国在波兰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协议的话，世界组织就没有什么成功的可能。丘吉尔也不止一次向斯大林呼吁，告诉他说：“展望未来，如果你和你统治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均排列在一边；而那些聚集在英语国家周围的各国……站在另一边，这很难使人得到安慰。很明显，他们的争吵将使世界分崩离析。”

丘吉尔要求立即召开三大国会议，保证雅尔塔协议的执行，而在这时，他本想要求英美军队全力以赴在德国向前推进，而且除非苏联在波兰让步，否则将拒绝撤出确定由俄国占领的地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他取得苏联合作的能力过于自信，杜鲁门总统也仍然如此。杜鲁门或许对英国的政策更加有点怀疑^[27]；极力避免“伙同”

（用罗斯福的话来说）英国反对苏联。因此美国不急于立即召开丘吉尔认为必要的会议。在三大国举行波茨坦会议之前，当时已不指望得到更好结果的波兰人，便同苏联就临时政府的组成达成协议。苏联在新政府中控制了一半多席位。对他们答应举行的所谓“自由”选举的性质，已无怀疑的余地。当波茨坦会议正在举行时，英国驻华沙临

时代办报告说，事态已经“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新政府召集的议会，“并不是人民民主的议会，而是精心强加给他们的投票机器”。会议的最后阶段，工党外交大臣贝文竭尽全力争取苏联答应举行自由选举，作为对英国同意苏联关于把波德边界延伸到西尼斯河的要求的交换条件。英国原来的看法是，新边界不能越过奥得河。丘吉尔后来写道，他本想拒绝任何进一步的扩大，但值得怀疑的是，英国能否阻止斯大林获得他所要求的东西，特别是由于美国愿意接受以西尼斯河为边界，作为打破会议僵局的总的交易的一部分。这样，盟国外交的最后阶段，与其说是接近于实现杜鲁门所满怀信心期望的三个用军队打败德、意、日的国家在战后的合作，不如说是更接近于丘吉尔关于盟国将出现不团结现象的忧郁说法。

（李梅彬 译）

[1] 佛朗哥将军是希特勒未能动摇其不动声色的自信心的少数较小的人物之一。1940年10月在昂代举行会见前，佛朗哥坚持午饭后睡觉的习惯，让希特勒等候了一个小时。

[2] 之所以有此差别，理由是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原料，而德国交付的是必须加工制造的成品。

[3] 维希政府部长博杜安曾把丘吉尔在1940年8月关于进行长期战争直到胜利为止的一次演讲，说成是“注定要导致毁灭的论调”（P. 博杜安：《在政府任职九个月》，1948年，第309页）。英国外交部认识到德国这种宣传的危险性，建议由凯恩斯通过广播给予实际的回答，说明英国能够组成一种建立在英镑基础上，并同英联邦各自由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秩序，这比起德国那种建立在马克基础上，受德国经济支配的秩序来，会给欧洲带来更多的益处。

[4] 外交部考虑最好不理睬迈斯基滥用其大使身份的过分做法，但艾登认为有必要在1942年9月向他谈及此事。

[5] 三国同盟条约保证缔约国在其中任何一国受到尚未参加欧战或在中国的敌对行动的国家攻击时互相援助。可能进行这种攻击的唯一的国家是美国。

[6] M. 马特洛夫和E. M. 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1953年），第29—30页。

[7] W. D. 李海：《我在那里》（1950年），第138页。

[8] 关于经济战中的外交活动，参阅W. N.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民丛书，1952年，1959年）。

[9] “航运证书”是从驻在输出国的英国代表那里领取的一种证明书，证明运往欧洲国家的货物并非供给德国。

[10] 魏刚将军于1940年9月被任命为维希政府在北非的总代表。

[11] 达尔朗海军上将于1941年2月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2] 在圣皮埃尔岛上，有一个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可用来为德国潜艇导航。

[13] 参见原书第802页。

[14] 在戴高乐将军的请求下，他领导的运动的名称由“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

[15] 如果戴高乐得悉罗斯福曾建议称呼贝当为“我亲爱的老朋友”的话，他的敌对情绪会更加严重。

[16] 英国驻日本大使R. 克雷吉爵士认为，如果赫尔继续就此临时解决方案进行谈判，日本很可能会推迟他们开战的决定。外交部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且看来它是正确的；不过也并不排斥这样的可能，即如果日本推迟进攻哪怕是一个星期，德国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也许会改变日本的政策。

[17] 寇松线即1919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划定的边界线，1920年当苏联与波兰发生战争期间，由寇松勋爵作为解决苏波民族疆界的实际可行办法而提出。这条线在南端有两个不同方案，一是把利沃夫划给波兰，一是不划给波兰。由于丘吉尔和艾登有一度似乎不清楚这个事实，曾引起某些混乱。

[18] 参见原书第811—812页。

[19] 综合英国和美国正反两方面的舆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应对这次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发生的惨案负责的是苏联政府，而不是德国人（他们在别处对待波兰人是同样残酷的）。

[20] 起草文件时的仓促，可以从丝毫未直接提及宗教自由这一点看出（这在美国受到批评）。在英国档案中，没有大西洋宪章的正式签字文本。

[21] 罗斯福提议用“联合国”这个词。如用简单的“联盟”一词，将会在美国引起宪法上的困难。

[22] 即美、英、苏、中。英国竭力争辩说，法国不应被排斥在外，或被置于低于中国的地位。国务院赞同英国的观点，但罗斯福既不同意排除中国，也不同意包括法国。

[23] 常务外交副大臣。

[24] 美国人继续坚持应将中国作为第四大国包括在内，并作为该组织的领导成员国。但这时他们同意，一俟这个组织建立，就给法国在世界理事会中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英、美、苏三国代表举行会议后，又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与中国人进行了商谈。

[25] 外交部本想用“国家联盟”的称呼，但美国人拒绝使用这个词，因为它的含义所表现的各国关系过分紧密。

[\[26\]](#) 英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苏联反对日内瓦或西欧其他地方，则哥本哈根、布拉格或维也纳均是适合的。

[\[27\]](#)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第1卷〔1995年〕，第164页）中写到，1945年4月底，他曾“试图说服丘吉尔忘记过去那一套强权政治”。

索引

（此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的边码）

Aalto, Alvar, 阿尔托, 阿尔瓦, 芬兰建筑家, 683

Abdul Hamid II,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270—272, 480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226, 390, 536, 543, 580; 意大利遭受失败(1896年), 119, 121; 意大利的侵略, 258—260, 696—699

Acton, Sir John (baron), 阿克顿爵士, 约翰(男爵), 英国历史学家, 1

Adrian, Edgar Douglas (baron), 艾德里安, 埃德加·道格拉斯(男爵), 英国生理学家, 97

Aegean Islands, 爱琴海岛屿, 148

Aehrenthal, Count Alois von, 爱伦塔尔伯爵, 阿洛伊斯·冯, 奥地利外交大臣, 132—1325

Afghanistan, 阿富汗, 131, 700

Africa, 非洲

新国家, 3, 402n.; 人口, 11

东非, 德属东非, 179; 英属东非, 375, 393—394

北非, 参见Algeria, Egypt, Morocco, World War I and II

南非: 贸易, 40; 工业, 47; 南非联邦(1909年), 375; 不顺从分子, 377; 国民党人, 384; 白人的优越地位, 397—398; 英国南非公司, 399; 黄金, 556; 参见Boer War

西南非, 德属西南非, 118, 179; 委任统治地, 350—351, 399; 希特勒的意图, 707

西非, 英属西非, 375, 394—395; 委任统治地, 226

另见各有关国家条

Agadir (1911年), 阿加迪尔事件, 137—138, 517

Agriculture, 农业: 科学与农业, 3, 14, 102, 106; 农业工人, 13, 16, 21; 在纳粹德国, 53; 销售, 65; 国际农业研究所, 263

Ahmad, Shah of Persia, 艾哈迈德, 波斯国王, 280

Aiken, Conrad, 艾肯, 康拉德, 美国诗人, 634

Aitken, Max (Baron Beaverbrook), 艾特肯, 马克斯 (比弗布鲁克男爵), 报业主, 34, 207

Alamein, El, battles of, 阿拉曼战役, 779—781

Alanbrooke, Alan (viscount), 阿兰布鲁克, 艾伦 (子爵), 英国陆军元帅, 765, 794—795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146—148, 187, 254, 480, 482; 意大利的侵略, 729

Albert I of Belgium, 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 526

Alessandri, Arturo, 亚历山德里, 阿图罗, 智利总统, 599, 602—603

Alexander, King of Serbia, 亚历山大, 塞尔维亚国王, 491; 南斯拉夫国王, 505, 694

Alexander, A.V. (viscount), 亚历山大 (子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312

Alexander, H.R.L.G. (viscount), 亚历山大, 哈·鲁·利·乔 (子爵), 英国陆军元帅, 779—784

Alexander, Samuel, 亚历山大, 塞缪尔, 英国哲学家, 653

Algeciras Conference (1906年),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130—131, 137, 559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27, 285

Allenby, E. H. H. (viscount), 艾伦比, 埃·亨·海(子爵), 英国陆军元帅: 巴勒斯坦, 200, 205, 289; 埃及, 281

Alsace-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119, 169, 215, 219—220, 250—251, 799

Amann, Max, 阿曼, 马克斯, 德国报业主, 496

Amau, Eiji, 天羽英二, 日本政治家, 692

Ambassadors' Conference, 大使会议(1912年, 伦敦), 146—147; (巴黎和会后在巴黎举行的), 234, 254

America, Latin, 拉丁美洲

泛美主义, 585, 606—608; 泛美会议(1901年), 584—585, 588; (1928年), 607—608; (1933年), 607; (1936年), 607; (1939年, 1940年), 802

与美国: 对门罗主义的延伸, 593; “金元外交”, 593—594; 对美国的怀疑, 606; “睦邻”政策, 607, 609

天主教, 589; 学术活动, 589—590

经济: 外国投资, 584, 596; 石油, 597—598; 大萧条, 601; 世界贸易, 607, 611

与两次世界大战, 594—595, 608

与国际联盟, 595, 598

民族主义, 605—606; 共产主义, 609

参见有关各国条

Amery, Leopold C. M. S., 艾默里, 利奥波德, 英国国务活动家, 385

Amir Sjariffoedin, 沙里弗丁埃米尔, 苏门答腊民族主义者, 324

Amritsar (April 1919年), 阿姆利则暴乱(1919年4月), 301

Anderson, Carl D., 安德逊, 卡尔·戴维, 美国物理学家, 94

Angell, Sir Norman, 安吉尔爵士, 诺曼, 他的《大幻想》, 171

Anglo-American Arbitration Treaty, 英美仲裁条约 (1908年), 379—380

Angora (Ankara), 安哥拉 (安卡拉), 229; 安哥拉协定 (1921年), 291

Annam (Indo-China), 安南 (印度支那), 313, 323—324; 参见Vietnam

Anscombe, Elizabeth, 安斯科姆, 伊丽莎白, 英国哲学家, 655

Anti-Comintern pact (1936年), 反共产国际条约, 703—704

Antonescu, Ion, 安东尼斯库, 扬, 罗马尼亚元帅和独裁者, 509

Antonov-Ovseenko. V., 安东诺夫-奥伏森科,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8—429

Apollinaire, Guillaume, 阿波里耐, 纪尧姆, 法国诗人, 622

Aquinas, St Thomas, 阿奎那, 圣托马斯, 神学家, 658

Arab world, 阿拉伯世界, 228; 民族主义, 284, 288; 与巴勒斯坦, 295—296, 399; 阿拉伯国家联盟, 296

Argentina, 阿根廷, 585—586; 宪政的变革, 590—591; 与美国, 594, 607—609; 贸易, 40, 597, 606; 革命 (1912年), 601—602; 限制移民, 605; 罗加-朗西曼协定 (1933年), 606;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4; 第二次世界大战, 608; 联合国, 608, 610; 庇隆, 610; 参见America, Latin

Armenia, 亚美尼亚, 1, 15, 229

Arnim, Ferdinand von, 阿尔尼姆, 斐迪南·冯, 德国将军, 782, 784

Arp, Jean, 阿尔普, 让, 法国雕塑家, 675

Asplund, Gunnar, 阿斯普伦德, 冈纳, 瑞典建筑家, 683

Asquith, Herbert Henry (earl), 阿斯奎斯, 赫伯特·亨利 (伯爵), 英国首相, 183, 185—186, 193, 379, 519, 521, 523,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 582, 811—812

Atomicbomb, 原子弹, 792—793

Attlee, Clement R. (earl), 艾德礼, 克莱门特·理查德(伯爵), 英国首相, 325, 813

Auchinleck, Sir Claude J.E., 奥金莱克爵士, 克劳德, 英国陆军元帅, 764, 777—779

Auden, Wystan H., 奥登, 威斯坦, 英裔美国诗人, 622, 630, 633, 640

Aung San, 昂山, 缅甸国民军司令, 324—326

Austin J.L., 奥斯汀, 约·兰, 英国哲学家, 655—656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经济, 40; 大萧条, 59, 378; 关税, 374

委任统治地, 334, 343, 350, 399, 401, 707

民族主义, 378

防御, 379, 392; 美澳新安全条约(ANZUS)和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401

与英联邦, 329, 371—372

威斯敏斯特法, 380, 385—388

世界大战: 第一次, 179; 第二次, 390

Austria, 奥地利

被分裂, 6, 20, 152, 222—223

社会状况: 社会保险, 29, 44—45; 寡头政治, 479; 1918年后的贫困, 489

政治发展: 国内骚动(1905年前后), 128; 共和国, 224; 1918年后的社会民主党, 17, 479; 陶尔斐斯任总理, 495; 镇压社会

主义者，496；陶尔斐斯被刺，497；舒什尼格任总理，501，701

财政：1918年后的危机，240，262；金本位，57；大萧条，493；拟议中的与德国的关税联盟，240，493

与俄国：三皇同盟，132；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分歧，132—136，171；在布赫劳的政治交易（1908年），133；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33—134；泛斯拉夫情绪，144—146；两国进行动员，161—165

与德国：两国同盟，120，144；三国同盟，112，120—121，154—155，173，517；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态度（1911—1912年），144—145；萨拉热窝事件之后，154—156；奥地利的纳粹分子，497；德国接管，501，715，741

与塞尔维亚，132—134，145—149；萨拉热窝事件及其以后，153—169

与土耳其，115，133—134

第一次世界大战，172，176，186—187，189，191—193，200，205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1919年），222，224

Axis（1936年），轴心国；德意协定，704，709

Ayer, A. J., 艾尔，艾·朱，英国哲学家，649—651，655—656

Badoglio, Pietro, 巴多利奥，彼得罗，意大利元帅，508

Bagh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137，141，149；巴格达铁路条约，151

Baldwin, Stanley (earl), 鲍尔温，斯坦利（伯爵），英国首相，231，233，249，531

Balfour, Arthur James (earl), 贝尔福，阿瑟·詹姆斯（伯爵），108，219，222—223，225—226，519；战争债务，231；贝尔福宣言（关于犹太人的），228，289；四国条约，355—356；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385

Balkan States, 巴尔干国家, 480—482; 相互之间的抗衡, 5;
两次战争, 139, 144—148; 巴尔干联盟, 141, 143; 与土耳其, 480—481; 德国的贸易竞争, 704; 第二次世界大战, 509—510

参见各有关国家条

Balla, Giacomo, 巴拉, 贾科莫, 意大利画家, 668

Ba Maw, 巴莫, 缅甸民族主义者, 324

Banat, the, 巴纳特, 222, 490

Banting, Sir Frederick, 班廷爵士, 弗雷德里克, 加拿大生理学家, 95

Bao Dai, 保大, 安南和越南皇帝, 325, 327—328

Barkla, Charles G., 巴克拉, 查尔斯, 英国物理学家, 93

Barrère, Camille, 巴雷尔, 卡米耶, 法国外交家, 121

Barth, Karl, 巴特, 卡尔, 瑞士神学家, 663—664

Barthou, Louis, 巴尔都, 路易, 法国总理, 693—694

Basra, 巴士拉, 283, 289

Bastianini, Giuseppe, 巴斯蒂亚尼尼, 朱塞佩, 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507

Batavia, 巴达维亚, 219

Bauer, Gustav, 鲍尔, 古斯塔夫, 德国国务活动家, 219

Bauer, Otto, 鲍尔, 奥托, 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 496

Baudouin, P., 博杜安, 维希分子, 800n

Bayliss, Sir William, 贝利斯爵士, 威廉, 英国生理学家, 95

Beatty, Sir David (earl), 贝蒂爵士, 戴维 (伯爵), 英国海军上将, 192

Bechuanaland, 贝专纳, 375, 397

Beck, Freiherr von, 贝克男爵, 冯,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476, 479, 489

Beck, Colonel Joseph, 贝克上校, 维瑟夫, 波兰国务活动家, 503, 723, 726, 730

Beck, Ludwig von, 贝克, 路德维希·冯, 德国将军, 509

Becquerel, Antoine, 贝克勒尔, 安托万, 法国物理学家, 5, 87

Behrens, Peter, 贝伦斯, 彼得, 德国建筑家, 677—678

Belgium, 比利时

殖民地, 3, 8, 47, 138

社会状况: 都市化, 13; 选举权, 22—23, 513; 社会保险, 29, 31, 45

政党, 518—519, 539, 545—546

经济: 金本位, 57; 国际粗钢卡特尔, 234; “工作计划”, 539; 大萧条, 544—546; 铁路, 545

对外关系: 中立, 225, 698—700, 709; 洛迦诺公约, 250; 德国进犯(1914年), 168; (1940年), 552, 749—751

凡尔赛和约: 获得的利益, 219

莱茵兰, 重新武装, 698—699

占领鲁尔(1923年), 232

Beneš, Eduard, 贝奈斯, 爱德华, 捷克总统, 499, 500

Bengal, 孟加拉, 分治, 297; 饥谨, 310

Berchtold, Count Leopold von, 贝希托尔德伯爵, 利奥波德·冯, 奥地利外交大臣, 145, 147—148;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 153, 155—156, 162, 164, 168

Berdyayev, Nicolas, 别尔嘉也夫, 尼古拉斯, 俄国宗教哲学家, 663—664

Berg, Max, 贝尔格, 马克斯, 德国建筑家, 678—679, 683

Berg, Pascal, 贝尔格, 帕斯卡尔, 挪威抵抗运动领导人, 550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亨利, 法国哲学家, 646

Berkeley, Bishop George, 贝克莱主教, 乔治, 英国哲学家, 645, 649, 658

Berlage, H. P., 伯拉格, 亨·佩, 荷兰建筑家, 679

Berlin, Treaty of (1878年), 柏林条约, 139, 287

Berne, 伯尔尼, 议会间会议 (1913年), 151

Bernhardi, Friedrich von, 伯恩哈迪, 弗里德里希·冯, 德国将军和理论家, 152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173, 222; 被俄国征服 (1944年), 509

Best, Charles H., 贝斯特, 查尔斯, 加拿大生理学家, 95

Bethlen, Count Stephen, 贝特兰伯爵, 伊斯特万, 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495

Bethmann-Hollweg, Theobald von, 贝特曼—霍尔威克, 特奥巴尔德·冯, 德国首相, 137, 141—142, 146—147, 473;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 154—155, 163; “一张废纸”的条约, 169

Bevan, Edwyn, 贝文, 埃德温, 英国学者, 663

Beveridge, Sir William, 贝弗里奇爵士, 威廉 (男爵), 英国经济学家; 他的《关于社会保险及其有关福利事业的报告》, 31, 81, 547

Bezobraroff, 别佐布拉洛夫, 俄国冒险家, 125

Bhave, Vinoba, 巴夫, 维诺巴, 印度领导人, 311

Bichalonne, M., 比夏隆, 维希分子, 549

Bidault, Georges, 皮杜尔, 乔治, 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和外交部长, 554

Bieberstein, Baron Marshall von, 比贝尔施泰因男爵, 马歇尔·冯, 德国外交家, 115, 149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俾斯麦亲王, 奥托·冯, 德国首相, 5, 29, 45, 112, 129, 474—475, 798

Bissolati, Leonidi, 比索拉蒂, 莱奥尼迪,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 483

Björkö, Treaty of (1905年), 毕由克条约, 130—131

Blackett, P.M.S., 布莱克特, 帕·梅·斯, 英国物理学家, 92, 103

Blériot, Louis, 布莱里奥, 路易, 法国飞行家, 5, 101

Bloch, Ivan S., 布洛克, 伊万, 波兰银行家, 他的《未来的战争》, 171

Blomberg, Werner von, 布洛姆贝格, 维尔纳·冯, 德国陆军元帅, 498

Blum, Léon, 勃鲁姆, 莱昂,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和总理, 34, 77, 528, 539, 540; 人民阵线, 542, 544, 704, 719; 被监禁, 548

Blumentritt, Günther, 布卢门特里特, 京特, 德国将军, 755

Blyukher, Vasily K., 布留赫尔, 瓦西里, 苏联元帅(即加伦将军), 725

Boccioni, Umberto, 博乔尼, 翁贝托, 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 688—689, 674

Bock, Fedor von, 包克, 费多尔·冯, 德国陆军元帅, 743, 767—769

Boer War (1899—1902年), 布尔战争, 8, 28, 118, 122—123, 373

Bohemia and Moravia, Protectorate of, 波希来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501, 参见Czechoslovakia

Bolivia, 玻利维亚, 257—258;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5; 查科战争, 606, 608

Boncourt, Paul, 邦库尔, 保罗, 法国国务活动家, 741

Bonnard, Abel, 博纳尔, 阿贝尔, 维希分子, 549

Bonnard, Pierre, 勃纳尔, 皮埃尔, 法国画家, 671

Bonnet, Georges, 博内, 乔治, 法国外交部长, 718—721, 727

Bonomi, Ivanoe, 博诺米, 伊瓦诺埃,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 483

Borah, William E., 博拉, 威廉, 美国参议员, 211, 686

Borden, Sir Robert, 博登爵士, 罗伯特, 加拿大总理, 381

Borneo, North, 北婆罗洲, 313, 320

Bosanquet, Bernard, 博赞克特, 伯纳德, 英国哲学家, 654

Bose, Sir Jagadis, 玻色爵士, 贾加迪斯, 印度科学家, 308

Bose, Subhas Chandra, 鲍斯, 苏巴斯·钱德拉,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303, 306; 印度国民军, 309

Bosnia and Herzegovin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被兼并(1908年), 133—134, 480, 48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222

Botha, Louis, 波塔, 路易斯, 布尔人将领和南非总理, 373, 375

Boulanger, Georges, 布朗热, 乔治, 法国军人和政治家, 129

Boxers, 义和团, 335—336

Bozen, 博岑, 236

Braden, Spruille, 布雷登, 斯普鲁伊尔,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 610

Bradley, Francis H., 布拉德莱, 弗朗西斯, 赫伯特, 英国哲学家, 645—646, 658

Bradley, Omar N., 布雷德利, 奥马尔, 美国将军, 796

Bragg, Sir Lawrence, and Sir William, 布拉格爵士, 劳伦斯
和布拉格爵士, 威廉, 英国物理学家, 97

Braithwaite, R.B., 布雷思韦特, 英国哲学家, 655

Brancusi, Constantin, 布兰库西, 康斯坦丁, 罗马尼亚雕塑
家, 673—675

Brandeis, Louis, 布兰戴斯, 路易斯,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562

Braque, Georges, 布拉克, 乔治, 法国画家, 666—667, 671

Brauchitsch, Walter von, 勃劳希契, 瓦尔特·冯, 德军总司
令, 767—769

Brazil, 巴西

经济: 咖啡工业, 58, 597, 606; 棉花, 597; 沃尔塔雷东达钢
铁厂, 611; 通货膨胀, 612; 移民, 605

政治制度, 585, 599, 602

世界大战: 第一次, 595; 第二次, 608

Brenner frontier, 布伦内罗边境地区, 186

Brentano, Franz, 勃伦塔诺, 弗兰茨, 奥地利哲学家, 646

Brest-Litovsk, Treaty of (1918年),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
约, 431, 434—436, 485

Briand, Aristide,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 法国总理和外交部
长, 193, 195, 230, 234, 255; 欧洲联盟, 240; 铁路罢工 (1910
年), 517; 参见Locarno Pacts

Bridgman, P.W., 布里奇曼, 英国哲学家, 654

Brinon, Fernand de, 德布里农, 费尔南, 维希分子, 549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英国广播公司, 525, 553

Britten, Benjamin, 布里顿, 本杰明, 英国音乐家, 622

Brockdorff-Rantzau, Count, 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 出席巴黎
和会的德国外交部长, 215—216, 236—237

Brooke, Rupert, 布鲁克, 鲁珀特, 英国诗人, 621

Brooke, Raja James, 布鲁克王公, 詹姆斯, 沙捞越王公, 313

Broukère, Charles de, 布鲁克尔, 夏尔·德, 比利时经济学家, 546

Bruce, Sir Stanley (viscount), 布鲁斯爵士, 斯坦利 (子爵), 澳大利亚国务活动家, 265

Brunei, 文莱, 313

Bruning, Heinrich, 布吕宁, 亨利希, 德国总理, 240, 492—494, 688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布赖恩, 威廉·詹宁斯, 美国国务卿, 556, 559, 561—562, 569

Buchanan, Sir George, 布坎南爵士, 乔治, 英国驻俄国大使, 158, 161

Bucharest, Treaty of (1913年), 布加勒斯特条约, 148

Bukharin, Nikolai, 布哈林, 尼古拉,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60, 466

Bulgaria, 保加利亚, 480—482; 文盲, 27; 宣布成为王国 (1908年), 134, 481; 与塞尔维亚联盟, 143, 154; 巴尔干战争 (1912年), 145—146, 14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3, 192, 204, 210; 纳伊和约 (1919年), 222; 与希腊发生争端 (1925年), 255; 第二次世界大战, 509—510, 762, 766, 788, 817

Bülow, Prince Bernhard von, 比洛亲王, 伯恩哈德·冯, 德国国务活动家, 129, 132, 137—138, 473—474

Bülow, Karl von, 比洛, 卡尔·冯, 德国将军, 175—176

Bureau Central de Renseignementset d' Action (B. C. R. A.), 情报与行动总局, 553

Burgenland, 布尔根兰, 222

Burgh, W. G. de, 德·伯格, 英国神学家, 658

Burke, Edmund, 伯克, 埃德蒙, 英国国务活动家, 373, 387

Burkitt, F.C., 伯基特, 弗·克, 英国圣经学家, 661

Burma, 缅甸, 被吞并, 113, 313—315; 工业, 320; 民族主义, 321—322; 第二次世界大战, 306, 309, 324—325; 独立 (1948年), 2, 326

Burnet, John, 伯内特, 约翰, 苏格兰的希腊学家, 653

Burns, John, 伯恩斯, 约翰, 英国国务活动家, 519

Byng, Sir Julian (viscount), 宾爵士, 朱利安 (子爵), 英国将军, 199, 202; 加拿大, 384

Cachin, Marcel, 加香, 马塞尔,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 524

Cadorna, Luigi, 卡多尔纳, 路易吉, 意军总司令, 194

Cagoule, 卡古尔, 541

Cailloux, Joseph, 卡约, 约瑟夫, 法国总理, 138—139, 140, 517, 524

Calder, Alexander, 卡尔德, 亚历山大, 美国雕塑家, 675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反日本人的立法, 559

Calles, plutarco, 卡列斯, 普卢塔科, 墨西哥总统, 603

Cambon, Paul, 康邦, 保罗, 法国驻伦敦大使, 30, 118, 126, 167, 229

Cambodia, 柬埔寨, 313, 323, 328

Cameroons, 喀麦隆: 委任统治, 226, 399

Campbell-Bannerman, Sir Henry, 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亨利, 英国首相, 375, 519

Camus, Albert, 加缪, 阿尔贝, 法国作家, 655

Canada, 加拿大

经济, 40, 54, 58, 378

作为英联邦成员, 206, 374, 380, 386, 390; 制宪危机, 384; 威斯敏斯特法, 388; 与国际联盟, 246, 390

法裔加拿大人, 377, 390

与美国, 383, 560

Canaris, Wilhelm, 卡纳里斯, 威廉, 德国海军上将, 509

Candela, Felix, 坎德拉, 费利克斯, 墨西哥建筑家, 683

Caribbean, the, 加勒比海地区, 8, 558, 562, 577, 592, 595; 加勒比委员会(1942年), 401

Cárdenas, General Lázaro, 卡德纳斯将军, 拉萨罗, 墨西哥总统, 603—605

Carnap, Rudolf, 卡尔纳普, 鲁道夫, 德国哲学家, 655

Carol I of Rumania, 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 148; 二世, 509

Carranza, Venustiano, 卡兰萨, 贝努斯蒂亚诺, 墨西哥总统, 591—592

Carson, Sir Edward (baron), 卡森爵士, 爱德华(男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521, 523

Castelnau, Edouard de, 德卡斯特尔诺, 爱德华, 法国将军, 533

Cathala, M., 卡塔拉, M., 维希分子, 549

Cecil, Sir Robert (viscount of Chelwood), 塞西尔爵士, 罗伯特(切尔伍德子爵), 242

Cerda, Aguirre, 塞尔达, 阿吉雷, 智利总统, 603

Ceylon, 锡兰, 375, 399; 独立, 3, 393, 401—402

Cézanne, paul, 塞尚, 保罗, 法国画家, 665, 668

Chadwick, Sir James, 查德威克爵士, 詹姆斯, 英国物理学家,

Chagall, Marc, 沙加尔, 马克, 俄裔法国画家, 669

Chain, E., 钱恩, 恩斯特, 英国化学家, 96

Chamberlain, Austen, 张伯伦, 奥斯汀, 英国外交大臣: 国际联盟, 249—250, 225; 参见Locarno Pacts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张伯伦, 豪斯顿·斯图尔特, 英国激进理论家, 475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约瑟夫, 英国国务活动家, 122—123, 375, 400; 关税改革, 519

Chamberlain, Neville, 张伯伦, 内维尔, 英国首相, 535, 706; 与德国, 707—708, 711—712, 720, 729

Chanak, 查纳克, 206, 229

Chang Tso-lin, 张作霖, 满洲军阀, 366, 369—370

Charles VIII, 查理八世, 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统治者, 194, 485

Charles X of Denmark, 丹麦国王查理十世, 551

Chautemps, Camille, 肖当, 卡来耶, 法国总理, 713, 716

Chekhov, Anton, 契诃夫, 安东, 俄国作家, 636

Chelmsford, Viscount (Frederick Thesiger), 切姆斯福德子爵 (弗雷德里克·塞西杰), 印度总督, 322

Chernov, Vietor, 切尔诺夫, 维克多, 俄国革命家, 415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中国国务活动家, 366, 368, 702, 709—711; 被扣押, 709;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809—810

Chicherin, Georgy, 契切林, 格奥尔基, 苏联外交部长, 237

Chile, 智利, 586—587; 硝石贸易, 40, 596—597, 606; 改革, 599; 革命, 602—603; 世界大战: 第一次, 594; 第二次, 608

China, 中国

第一次核爆炸, 2

人口, 8, 361

西方列强的争夺, 113, 333—334

经济和贸易, 361—364; 外国投资, 362; “门户开放”政策, 363—364

政治制度, 庞杂的政府, 332; 义和团(1900年), 114, 316, 335—336; 清朝的衰亡, 332; 各地方政府, 340; 民国(1911年), 5, 341; 国民党, 256, 341, 347, 366, 726; 孙中山和袁世凯, 341; 共产党, 366;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 366; 在北京, 369; 撤退到重庆, 372; 德国军事使团, 692; 抗日统一战线, 709—711; 共产党的巩固, 810

与俄国: 权利要求, 152; 中东铁路, 336; 苏联关系, 365—366, 701—702, 709, 724; 参见Manchuria

与日本: 权利要求(1914年前), 152; 战争和马关条约(1895年), 113, 124, 330, 333; 辽东半岛, 113—114; 朝鲜, 113, 124—125, 333, 336—339, 360; 满洲, 239, 256—257, 339—340, 364, 368—372, 685—687; 二十一条要求(1916年), 334—336, 351; 关税自主, 370; 抵制日货(1932年), 686; 广田三原则(1935年), 702—703; 何梅协定, 703; 战争(1937年), 710—711, 724—725; “新秩序”, 324

与美国, 346, 710; 蓝辛—石井协定(1917年), 347—348, 351; 顾问, 369; 九国公约(1922年), 685—686

与英国, 113—114; 威海卫, 114, 357; 战争(1839年), 335—336; 义和团, 335—336; 反英情绪, 367; 李滋—罗斯考察团, 702—703

与德国: 胶州湾, 114, 344—345, 351, 356; 军事使团, 692; 召回使团(1938年), 724

与国际联盟, 256—257

与世界大战: 第一次, 346—347; 第二次, 774, 808—810

Chirico, Giorgio de, 基里科, 乔治·德, 意大利画家, 669

Chkheidze, Nikolai, 齐赫伊泽, 尼古拉, 俄国社会主义者, 415

Chungking, 重庆, 372

Churchill, Sir Winston, 丘吉尔爵士, 温斯顿, 英国首相, 30, 44, 193

“海军休假”, 142; 印度, 304; 金本位, 532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东方战略, 181; 坦克, 190; 达达尼尔海峡, 182—183, 522

第二次世界大战: 挪威, 746—747; 法英联盟, 756; 希腊, 761—762; 北非, 764, 776—780, 794; 远东, 765, 771—772; 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入侵, 745; 欧洲委员会, 812; 波兰, 817—818; 与罗斯福总统, 771—772, 793, 801, 803—804, 811, 813; 与斯大林, 801, 814—816; 与维希, 805—806; 与戴高乐, 808

Ciano, Count Galeazzo, 齐亚诺伯爵, 加莱亚佐, 意大利外交部长, 508, 726; 与德国, 730, 733, 798

Cilicia, 吉里吉亚, 288, 290

Clark, Champ, 克拉克, 钱普, 美国众议院议长, 561

Clark, Sir George, 克拉克爵士, 乔治, 英国历史学家, 1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普鲁士军事著作家, 183

Clayton-Bulwer Treaty (1850年),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592

Clemenceau, Georges, 克列孟梭, 乔治, 法国总理, 34, 184, 515; 巴黎和会 (1919年), 209; 叙利亚, 290; 第一次世界大战, 522—524, 526

Cleveland, Grover, 克利夫兰, 格罗弗, 美国总统 (1885—1889年), 民主党人, 119

Cochin-China, 交趾支那, 313; 参见Indo-China

Cockcroft, Sir John, 科克罗夫特爵士, 约翰, 英国物理学家, 103

Coen, Jan Pieterzoon, 科恩, 扬·彼得森, 巴达维亚的创建者, 313

Collingwood, Robin G., 科林伍德, 罗宾·乔, 英国哲学家, 653—654

Colombia, 哥伦比亚, 258, 558, 592, 599;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4; 石油, 598

Colonial Conference (1902年), 殖民地会议, 379

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1865年), 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 384, 387—388

Combat, “战斗”, 553

Combes, Emile, 孔布, 埃米尔, 法国总理, 515

Comité secret d' action révolutionnaire (C.S.A.R.),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 541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帝国防务委员会, 380, 691

Communism, 共产主义, 7, 524; 第三国际 (1919年), 18, 431, 446; 在东欧, 21, 81; 在东南亚, 323—324; 共产国际, 458; 在法国, 528, 543—544, 554; 在德国, 488, 498; 与文学, 609

Comnène, M., 科姆南,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719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etiens (C. F. T.C.), 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554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 法国总工会, 514, 516, 528, 543, 554

Congo, 刚果, 比属刚果, 8, 47, 138; 法属刚果, 138

Congress (India), 国民大会党 (印度), 299, 302—311

Conrad, Joseph, 康拉德, 约瑟夫, 法裔英国作家, 618—619, 634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C.N.R.), 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 554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 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 ,
145, 178, 183, 228—229

Coolidge, Calvin, 柯立芝, 卡尔文, 美国总统 (1923—1929
年) , 共和党人, 564—570

Copernicus, Nicolaus, 哥白尼, 尼古拉, 波兰天文学家, 89

Cornford, Francis M. , 康福德, 弗朗西斯, 英国哲学家, 653

Coubertin, Baron Pierre de, 库贝坦男爵, 皮埃尔·德: 奥林匹克运动会, 35

Courbet, Gustave, 库尔贝, 古斯塔夫, 法国画家, 673

Crane, Hart, 克兰, 哈特, 美国诗人, 634

Crete, 克里特岛, 115, 481

Cripps, Sir Stafford, 克里普斯爵士, 斯塔福德, 英国国务活
动家, 312, 800

Crna Ruke (the Black Hand, Serbia) , 黑手党 (塞尔维亚) ,
153, 157

Croatia, 克罗地亚, 222, 478, 491, 694

Croce, Benedetto, 柯罗齐, 贝内戴托, 意大利哲学家, 486,
653, 657

Cuba, 古巴: 与美国, 119, 556, 577, 584, 594, 607; 食糖,
40; 独立, 592; 普拉特修正案, 577, 592—593

Cummidngs, Edward E. , 卡明斯, 爱德华·埃, 美国诗人, 634

Cumont, Franz, 居蒙, 弗朗兹, 比利时历史学家, 660

Cunliffe Committee (1918年) , 坎利夫委员会, 38

Cunningham, Sir Alan, 坎宁安爵士, 艾伦, 英国将军, 765

Cuno, Wilhelm, 库诺, 威廉, 德国总理, 233, 236

Curie, Marie, 居里, 玛丽, 波裔法国物理学家, 87

Curzon, George (Marquess of Kedleston), 寇松, 乔治 (凯德勒斯顿侯爵), 印度总督, 297, 300, 314, 376; 外交大臣, 227, 229

Curzon Line, 寇松线, 223, 443, 810n.

Cyprus, 塞浦路斯, 228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在奥地利统治下, 476—477; 1918年以后, 212, 214; 共和国, 219, 222, 489; 小协约国, 227, 495, 501, 691, 694, 699, 709, 713; 少数民族, 265, 488—490; 在俄国的军团 (1918年), 438—439; 大萧条, 499; 与法、俄签订的条约, 464, 500, 696, 709;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 499—502, 715—723; 德国接管, 501—502, 741—742; 纳粹的恐怖统治, 506

D' Abemon, Vicount (Sir Edgar Vincent), 达伯农子爵 (埃德加·文森特爵士), 英国驻德国大使, 227, 230, 235—237

Dachau, 达豪, 495

Dahlerus, Birger, 达勒卢斯, 伯格, 充当调解人的瑞典人, 733

Dairen, 大连, 345

Daladier, Edouard, 达拉第, 爱德华, 法国总理, 541, 543—544, 746; 捷克危机, 720—721; 被监禁, 548

Dale, Sir Henry, 戴尔爵士, 亨利, 英国物理学家, 97

Dali, Salvador, 达利, 萨尔瓦多, 西班牙画家, 670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225

Dalton, John, 道尔顿, 约翰, 英国化学家, 91

D' Annunzio, Gabrielle, 邓南遮, 加布里埃莱, 意大利诗人和无端侵袭别国领土者, 225, 484—486

Danzig, 但泽, 219, 223, 237, 266, 490, 528; 德国与但泽, 725—726, 729—732

Darlan, Jean François, 达尔朗, 让·弗朗索瓦, 维希海军上将, 549, 806—807; 被刺, 808

Darnand, Joseph, 达尔南, 约瑟夫, 维希分子, 549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英国博物学家, 89, 646;
《物种起源》, 87, 100

Das. C. R., 达斯, 吉·兰,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302

Das Gupta, S. C., 达斯·古普塔, 印度哲学家, 308

Daudet, Leon, 多代, 莱昂, 法国辩论家, 530

Davies, William Henry, 戴维斯, 威廉·亨利, 英国诗人, 623

Dewes Plan (1923年), 道威斯计划, 56, 60, 232—233, 250,
255, 457, 488, 567

Déat, Marcel, 戴阿, 马塞尔, 维希分子, 540, 549

Degas, Hilaire, 德加, 希拉埃, 法国画家, 673

Degrelle, Léon, 德格雷尔, 莱昂, 比利时法西斯分子, 545

Delaunay, Robert, 德洛内, 罗贝尔, 法国画家, 667—669, 671

Delbos, Yvon, 德尔波斯, 伊冯, 法国外交部长, 705, 713, 716

Delcassé, Théophile, 德尔卡塞, 泰奥菲尔, 法国外交部长,
118—121, 127, 129, 138, 517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 希腊哲学家, 91

Denikin, Anton, 邓尼金, 安东, 俄国将军, 442—443

Denmark, 丹麦: 农业, 16; 教育, 27; 社会保险, 29, 45; 与英
国的贸易, 43; 议会制度, 513, 518, 537; 第一次世界大战, 526;
大萧条, 536—537; 第二次世界大战, 551

Depression, the Great (1929—1932年), 大萧条, 7, 53—
54, 59—62, 239, 378, 389, 491—493, 534—538, 601, 684—
685; 延期付款方案, 240, 493, 572, 685, 689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 勒内, 法国哲学家, 654

Deschanel, Paul, 德夏内尔, 保罗, 法国国务活动家, 517, 526

De Stijl, “风格”派, 荷兰艺术家团体, 677, 679—680

Devawongse, 德瓦旺, 暹罗亲王, 314

Deventer, Conrad van, 德文特, 康拉德·范, 荷兰作家, 314

Dewey, John, 杜威, 约翰, 美国哲学家, 654

Dewey, Thomas E., 杜威, 托马斯·埃, 美国政治家, 581—582

Diaz, Porfirio, 迪亚斯, 波菲里奥, 墨西哥独裁者, 587—588, 591

Dibelius, Otto, 迪贝利乌斯, 奥托, 德国牧师, 498

Dien Bien Phu, 奠边府, 327

Dill, Sir John, 迪尔爵士, 约翰, 英国帝国总参谋长, 765

Dimitrievic (Apis), 迪米特里耶维奇(阿皮斯), 塞尔维亚情报机构首脑, 153

Disarmament, 裁军, 220; 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义务, 238; 海军裁军, 238—239; 筹备委员会, 239; 日内瓦会议(1932年), 687—688, 691

Dobrudja, the, 多布罗加, 222

Doesburg, Theo van, 多斯伯格, 泰奥·范, 荷兰建筑家, 680

Dollfuss, Engelbert, 陶尔斐斯, 恩格尔贝特, 奥地利总理, 17, 495, 500—501, 690—691, 693—694; 被刺, 497

Domagk Gerhard, 多马克, 格哈德, 德国化学家, 96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558, 593—594, 606

Dorgères, Henri, 多热尔, 亨利, 法国政治家, 540

Doriot, Jacques, 多里奥, 雅克, 法国政治家, 541, 549

Douhet, Guilio, 杜埃, 圭利奥, 意大利将军, 736

Doumergue, Gaston, 杜梅尔格, 加斯东, 法国总理, 541, 693

Dowding, Sir Hugh (baron), 道丁爵士, 休 (男爵), 英国空军中将, 757

Dreyfus affairs, 德雷福斯案件, 184, 514—515, 519, 541, 548

Drummond, Sir Eric (Earl of Perth), 德拉蒙德爵士, 埃里克 (珀思伯爵), 国际联盟第一任秘书长, 243—244

Dual Alliance, 两国同盟, 120, 144

Duchamp, Marcel, 杜尚, 马塞尔, 法国雕塑家, 674

Dulles, John Foster, 杜勒斯, 约翰·福斯特, 美国外交家, 221

Durazzo, 都拉斯, 146

Dybenko, F., 德边科,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429

Dzerzhinsky, F., 捷尔任斯基, 费,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429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 东非保护国, 394; 参见Kenya

Eberhart, Richard, 埃伯哈特, 理查德, 美国诗人, 634

Ebert, Friedrich, 艾伯特, 弗里德里希, 德国总统, 209, 486

Eckardstein, Baron von, 埃卡德施泰因男爵, 冯, 德国外交家, 123

Economy, world, 世界经济: 经济模式 (1941年前), 39; 自由派理论, 43—44; 第一次世界大战, 51—52; 两次大战之间, 75—78; 增长速度, 83; 各次经济会议, 62—63, 262—263, 689; 民族主义政策, 262; 参见Depression, the Great; Planning

Ecuador, 厄瓜多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5; 石油, 598; 与秘鲁, 609

Eddington, Sir Arthur, 埃丁顿爵士, 阿瑟, 英国天文学家, 91, 654

Eden, Sir Anthony (earl of Avon), 艾登爵士, 安东尼 (阿冯伯爵), 英国外交大臣, 296, 695, 697, 707, 813; 西班牙, 706;

尼翁，708；美国，710，712，812；俄国，801n.，810

Edward VII of Great Britain，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127，132，151

Edward VIII of Great Britain，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退位，707

Egypt，埃及：苏伊士运河，3；英法协定（1899年），117，119；与土耳其，228；独立（1922年），281；华夫脱党，282—283；英国的保护国，285，287，375；英埃条约（1936年），283；军事政变（1952年），283

Ehrlich, Paul，埃尔利希，保罗，德国生物学家，6，96

Einstein, Albert，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瑞士数学物理学家，6，99

Eisenhower, Dwight D.，艾森豪威尔，德怀特·戴，美国将军和总统（1953—1961年），共和党人，554，794，807

Eliot, Thomas Stearns，艾略特，托马斯·斯特恩斯，美裔英国诗人，617，620，623—626，640；《荒地》，627—630

Ellman, Richard，埃尔曼，理查德，美国作家，625

El Salvador，萨尔瓦多，594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德国共产主义者，429

Enver Bey，恩维尔贝伊，土耳其军人，272

Ernst, Max，恩斯特，马克斯，德国画家，670，674

Erzberger, Matthias，埃尔茨伯格，马蒂亚斯，德国国务活动家，485—486

Esterházy，埃斯泰尔哈吉，匈牙利地主家族，479

Estonia，爱沙尼亚：与俄国，445；与德国，474

Ethiopia，埃塞俄比亚，参见Abyssinia

Eulenberg, Prince, 奥伊伦贝格亲王, 德国朝臣, 474

Eupen-Malmédy, 欧本-马尔梅迪: 割让给比利时 (1919年), 219, 233

Ewing, A. C., 尤因, 英国哲学家, 652, 654—655

Ewins, A. J., 尤因斯, 阿瑟·詹姆斯, 英国分析化学家, 96

Exupéry, Antoine de Sainte, 埃格絮佩里, 安托万·德·圣, 法国作家, 635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514

Faisal I, of Iraq,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 228, 284, 292—293

Falkenhayn, Erich von, 法金汉, 埃里希·冯, 德国总参谋长, 176—179, 187, 189, 193—194

Faraday, Michael, 法拉第, 迈克尔, 英国物理学家, 108

Farmer, H. H., 法默, 英国哲学家, 654

Faruq I of Egypt, 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 283

Fashoda (1896年), 法绍达危机, 117, 120

Faulkner, William, 福克纳, 威廉, 美国作家, 634

Feidelson, Charles, 菲德尔森, 查尔斯, 美国作家, 625

Fez, 非斯, 137; 非斯条约 (1912年), 285

Fichte, Immanuel, 费希特, 伊曼努尔, 德国哲学家, 662

Fiji, 斐济, 335, 395

Finland, 芬兰: 选举权, 22; 俄国的进攻, 260; 阿兰德, 254;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436—437; 与俄国, 445; 政党, 537

Fisher, Sir John (baron), 费希尔爵士, 约翰 (男爵), 英国海军上将, 182, 519, 522

Fiume, 阜姆, 225, 486, 490

Flandin, Pierre-Etienne, 弗朗丹, 皮埃尔·艾蒂安, 法国总理, 549, 698, 741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居斯塔夫, 法国作家, 613

Fleming, Sir Alexander, 弗莱明爵士, 亚历山大, 英国科学家, 96

Florey, Sir Howard, 弗洛里爵士, 霍华德, 英国病理学家, 96

Foch, Ferdinand, 福煦, 斐迪南, 法国元帅, 196, 202, 209, 215, 218, 220

Forces Francaises de l'Intérieur (F.F.I.), 法国内地军, 554

Ford, Henry, 福特, 亨利, 汽车制造厂厂主, 14, 107, 547, 579

Fordney-McCumber tariff (1922年), 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 62

Formosa, 福摩萨 (台湾), 113, 333, 360

Forster, E.M., 福斯特, 爱·摩, 英国作家, 615—617

Four Power Treaty (1922年), 四国条约, 355

Four Power Pact (1933年), 四国公约, 691

France, 法国

移民, 11—12; 人口统计, 19

经济和工业: 工业化, 10, 15—16, 40, 65, 78; “经济垄断组织”, 16; 失业, 21; 劳动工时, 44; 托拉斯, 46; 1918年后状况, 52—53, 212; 国际粗钢卡特尔, 234; 法郎的稳定 (1914年), 57, (1926年), 533; 限制进口, 65; 工联主义, 514, 516, 528, 542—543, 554

社会状况: 农民, 21; 选举权, 22—23, 513; 妇女地位, 23; 教育, 27; 社会保险, 30—31, 45

政治发展：人民阵线，77，542；1914年前的议会和政党，513—516；教会与国家，515；骚乱（1906年），516；冶金工业公会和1918年以后的其他压力集团，529；反自由思想，530；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514，516，522，528，533，542—543，554；议会制度的危机，539—541

与英国：英法关于埃及的协定（1898—1899年），117，124，127；布尔战争，119；国事访问，127，151；英法协约（1904年），127—128，139，286，517；军事谈判（1906年），143，（1936年），699；舰队的重新部署（1912年），143；战争迫近，167—169；关于北方海岸的保证，168；捷克危机，716—722；拟议中的英法联盟，756；维希，805—806；参见Sykes-Picot Agreement

与俄国：法俄联盟（1891—1894年），112，130，517；在俄国的投资，113；彭加勒在圣彼得堡（1914年7月），157—158；萨拉热窝事件之后，165；法苏条约（1932年），464，467，687，689，695—696；失败的谈判（1939年），468

与德国：拒绝关于边界的建议，119；关于摩洛哥的争端，128，130，137—139，286，517；法德协定（1911年），138；紧张形势（1913年），151；德国的最后通牒（1914年7月31日），166；鲁尔区，231—233，238，250；萨尔，215，267，694；莱茵兰，214—215，698—699；重新武装，693；参见Locarno Pacts，Reparations，the world wars各条

与印度支那：113，313，322—323，37—38

与意大利：秘密协定（1900年），121；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684，687；局势的缓和，691；斯特雷扎（1935年），695；阿比西尼亚，696—698；参见Locarno Pacts

与利凡得：巴格达铁路，116；富兰克林—布荣协定（1921年），229；安卡拉协定（1921年），290—291；查纳克事件，229；黎巴嫩和吉里吉亚，290；委任统治地，228，292；与英国的争端（1941年），296，806—807；参见Sykes Picot Agreement

与西班牙：法西关于摩洛哥的协定（1904年），127，286；内战，543，704—706；尼翁，708；承认佛朗哥政权，724

战争：兵役法，151，172，517；军队情况：（1914年），172—173，（1939年），741，745；马奇诺防线，206，751，755—756；华盛顿（海军）协定，239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后果：工业，212；厌战情绪，225；劳动力的困难，524—526；生命和物质的损失，527；工联主义的发展，528；新右翼，529—530；财政问题，533—534；参见第七章（关于军事史）和第八章（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目录

与国际联盟：美国拒绝参加国联的影响，226—227，248；第十六条，247；日内瓦议定书，248，530；委任统治地，228，292；裁军计划，687—688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第二十四章（关于军事史）目录

维希，547—549，552—553，555，799，805—806；抵抗运动，552—554；自由法国，807

Francs Tireurs，游击队，553

Francis Ferdinand，弗兰茨·斐迪南，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153，171

Francis Joseph，弗兰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120，154，485，476—477；逝世，194

Franco，Francisco Bahamonde，佛朗哥，弗朗西斯科·巴蒙德，西班牙考迪略，706，724，798n.

Franklin-Bouillon Agreement（1921年），富兰克林—布荣协定，229

Franks，R. S.，弗朗克斯，俄国东正教作家，663

Frege，Gottlob，弗雷格，哥特洛布，德国数学家，646，648

Frenay，Henri，弗雷内，亨利，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553

French，Sir John（Earl of Ypres），弗伦奇爵士，约翰（伊普雷伯爵），英军总司令，176，180—181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奥地利心理学家, 653, 656—657, 670

Freyberg, Bernard, 弗赖伯格, 伯纳德, 新西兰将军, 763—764

Freyssinnet, Eugène, 弗雷西内, 欧仁, 法国工程师, 678, 683

Friesland, East, 东弗里斯兰, 225

Fritsch, Freiherr Werner von, 弗里奇男爵, 威纳尔·冯, 德军总司令, 498

Fry, Christopher, 弗赖伊, 克里斯托弗, 英国剧作家, 640

Fry, Roger Eliot, 弗赖伊, 罗杰·埃利奥特, 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画家, 672

Fuad II of Egypt, 埃及国王法德二世, 281

Fuller, J.F.C., 富勒, 约·弗·查, 英国将军, 738

Funk Walther, 丰克, 瓦尔特, 德国经济学家, 72, 499

Gabo (Pevsner), Nahum, 加博 (佩夫兹纳), 瑙姆, 俄国雕塑家, 675

Gafencu, Grigore, 加芬库, 格里戈雷, 罗马尼亚政治家, 730

Galicia (E. Europe), 加里西亚 (东欧), 146—147, 177, 186, 212, 223, 406, 477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 加利莱伊, 意大利天文学家, 87

Gallieni, Joseph, 加利埃尼, 约瑟夫, 法国将军, 175, 522

Gallifet, Marquis de, 加利费侯爵, 法国将军, 515

Gallipoli, 加利波利, 182—183, 190, 287, 289; 参见 Dardanelles

Gambia, 冈比亚, 127

Gamelin, Maurice, 甘末林, 莫里斯, 法军总司令, 548, 741, 745, 751

Gandhi, Mohandas Karamchand (Mahatma), 甘地,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圣雄),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不合作运动, 301; 非暴力反抗, 8, 310—311; 不可接触的贱民, 302; 国大党, 302, 306; 影响, 316

Garnier, Charles, 加尼埃, 夏尔, 法国建筑家, 679

Gaudi, Antonio, 高迪, 安东尼奥, 西班牙建筑家, 676

Gauguin, Paul, 高更, 保罗, 法国画家, 668

Gaulle, Charles de, 戴高乐, 夏尔, 法国将军和总统, 553, 741, 745; 与美国, 805—808

Geach, Peter, 吉奇, 彼得, 英国哲学家, 655

Geddes, Sir Eric, 格迪斯爵士, 埃里克, 英国政治家, 525

Gelderland, 格尔德兰, 225

Geneva Protocol, 日内瓦议定书, 233, 248—249

Gentile, Giovanni, 秦梯利, 乔瓦尼, 意大利哲学家, 653, 657

George V of Great Britain,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6, 164, 520

George VI of Great Britain,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718

Gerlier, Cardinal, 热利埃红衣主教, 维希分子, 548

Germany, 德国

工业和商业: 工业化, 10, 16, 474; 制造业, 40; 对英贸易(1914年前), 43; 托拉斯, 46; “新计划”, 74; 进出口, 80; 国际粗钢卡特尔, 234; 1918年后的发展, 488; 国社党的经济后盾, 16; 克虏伯军火公司, 235—236; 希特勒对弱小国家的控制, 502

殖民地, 6—7, 141, 236; 在南太平洋, 335, 350

人口, 12, 151, 475; 由乡村迁入城镇, 12—13, 16, 474

经济: 货币崩溃, (1923年), 20—21, 48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48—4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51—53, 70—75, 85, 706; 大萧条, 60—61, 493, 684—685; 捷克资产的价值, 502; 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劳动力的不足，504；“新秩序”，799；希特勒统治时期的计划经济，70—75；四年计划，706

社会状况：社会革命，20—21；失业，21，43，73—74；选举权，22—23；妇女和家庭生活，24—25；社会保险，29，475；工人保险法典（1911年），45；教育，27，108，112，476；税收，30；报纸，33—34；体育，35；1945年后，81；统治阶级日益不得人心，475

政治和政府机构：1914年前，473—474；1918年前的政党，475—476；魏玛共和国，52，72，221，487，798；国社党人，7，20，24，61，239，492—495，799—800；斯巴达克同盟成员，488；共产党人，488，498；兴登堡总统（1925年），488，（1932年），493；希特勒总理（1933年），494；授权法，495

反犹太主义，9，20，497，729；“最后解决”，506

宗教：教会，498；神学，659—660，664

与奥匈帝国：支持巴尔干政策（1908年），134—135；在巴尔干危机中的暧昧立场（1912—1913年），144—145；德奥之间的冷淡关系，152；萨拉热窝事件之后，154—164；拟议中的关税联盟（1931年），493，685，687；奥地利的纳粹，497，690，694；德国接管，500—501，690—691，693

与意大利：南蒂罗尔的德意志人，487；意大利部队向布伦内罗移动，694；轴心国（1936年），704，709；双方在1937年10月底的关系，709；“钢铁盟约”（1939年），502，731；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498，507，717，79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工人在德国，504；营救墨索里尼，508；参见第二十四章

与土耳其：115—116，149—150；巴格达铁路，137，141，149，151；军事使团（1913年），149

与中国：114，123，333，342

与俄国：流产的毕由克条约（1905年），129—130；俄德之间的敌视（1913年），160；不同意德国军事使团访问土耳其，149；俄国革命，485；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1918年），431，434—436，485；拉巴洛条约（1922年），236，454，463，488；斯大林与

德国接近（1936年），705；德苏条约（1939年8月），706，733，742；参见第二十四章

与英国：布尔战争（1899年），118—119；试图建立友好关系，122—124；海军竞赛，123，128，136—137，141—142；长江协定（1900年），123；摩洛哥，128—131，137—138；英德谈判，151；萨拉热窝事件之后，158；德国拒绝参加会议，161—162；格雷的警告，163，167；“一张废纸”，169；德国重整军备（1933年），691—692；与希特勒谈判，695；海军协定（1935年），696；莱茵兰（1936年），699；西班牙内战，705—706；前德国殖民地，707，712；张伯伦的态度，707—708，712—713；1937年10月底的态度，709；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与捷克问题，715—722；希特勒与英国的重整军备，727；希特勒宣告废除海军协定，730；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733；对德发出最后通牒（1939年9月3日），734；参见Locarno Pacts, Reparations各条和第七章、第二十四章

与法国：参见France条下“与德国”项

与波兰：新波兰（1919年），219；德意志少数民族，490—491；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693；但泽和但泽走廊问题，725—726，729—733；最后时刻的谈判，733—734；参见第二十四章

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德意志人，489，499—502，715—725，741；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德国的保护国（1939年3月），501—502，741—742；恐怖统治，506

与日本：辽东半岛（1895年），114；第一次世界大战，179；太平洋岛屿，343；胶州湾和山东，344—346，349，351；反共产国际条约（1936年），703—705；日本对德苏条约感到震惊，733；希特勒的对日政策，799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起因，参见第六章；军事史，参见第七章

与凡尔赛和约：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全权代表，215—219；战争犯罪条款，216，221；丧失领土，219—220；裁军，220；战争的罪责，220—221；逃避军事条款，234—236；“凡尔赛的强制”，487；重新武装，693；参见Disarmament, Reparations

与国际联盟：加入国联（1926年），457；被选入行政院（1926年），488；退出国联（1933年10月），69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章

战争：军事预算（1900年），149；海军法案（1912年），141—142；为备战而充分组织起来（1914年），172；史里芬计划，173—174；海军战略，177—178，191；潜艇战，178，191—192，200—201，346；空战，179；施放毒气（1915年），181；重新武装（1933年），75，693；装甲部队，202；征兵制（1935年），695；海军，695—696；空军，695，747；坦克和空军协同作战的理论，737；闪电战术，743

Ghana, 加纳, 3, 402; 参见GoldCoast

Ghose, Sri Arabindo, 高士, 斯里·阿拉宾多, 印度神秘主义者, 308

Giacometti, Alberto, 贾科梅蒂, 阿尔贝托, 意大利雕塑家, 674

Gide, André, 纪德, 安德烈, 法国作家, 625, 630—631

Gignoux, C. J., 吉纽, 克洛德·约瑟夫, 法国雇主代理人, 543

Gilson, Étienne, 吉尔松, 艾蒂安, 法国哲学家, 654

Giollitti, Giovanni, 焦利蒂, 乔瓦尼, 意大利总理, 482—483

Giraud, Henri, 吉罗, 亨利, 法国将军, 807—808

Glover, Terrot R., 格洛弗, 特罗特, 英国学者, 660

Gödel, Kurt, 哥德尔, 库尔特, 摩拉维亚出生的美国哲学家, 654

Goebbels, Josef, 戈培尔, 约瑟夫, 德国纳粹宣传鼓动家, 207, 498, 790, 799

Goering, Hermann, 戈林, 赫尔曼, 德国纳粹领导人, 72, 494, 725, 733, 763

Gogh, Vincent Van, 梵高, 文森特, 荷兰画家, 666, 668

Gokhale, Gopal K., 戈凯尔, 戈帕尔·克利希那, 印度民族主义领袖, 299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394—395, 397; 独立后称加纳, 402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7, 38, 42, 57, 60, 77—78, 532

Goltz, Baron von der, 戈尔茨男爵, 冯, 德国将军, 225

Goluchowski, Agenor, 戈鲁肖夫斯基, 阿格诺,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132

Gömbös, G., 贡伯什, 久洛, 匈牙利首相, 495

Gómez, Juan Vicenti, 戈麦斯, 胡安·维森特, 委内瑞拉独裁者, 600

Gonzales, Juan, 冈萨雷斯, 胡安, 美国雕塑家, 675

Goodman, N., 古德曼, 英国哲学家, 655

Gordon, Sir Arthur H., 戈登爵士, 阿瑟·汉密尔顿, 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395

Gore, Charles, 戈尔, 查尔斯, 英国国教主教和神学家, 661—662

Gorky, Maxim, 高尔基, 马克西姆, 俄国作家, 415, 463

Gort, Viscount, 戈特子爵, 英国陆军元帅, 753

Goschen, George (viscount), 戈申, 乔治(子爵), 英国外交家, 167, 169

Grandi, Count Dino, 格兰迪伯爵, 迪诺, 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 508, 687, 714

Graves, Robert, 格雷夫斯, 罗伯特, 英国诗人, 622, 634

Graziani, Rodolfo, 格拉齐亚尼, 鲁道夫, 意大利元帅, 759

Great Britain, 英国

工业和贸易: 工业状况(1914年前), 10, 16, 29—4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7, 49—52; 海外投资, 42, 78—79, 85, 584;

进出口（1913—1938年），80；恢复金本位（1925年），7，532；自由贸易，43—44；放弃自由贸易和金本位（1931年），57，60—61，65，78，519—521，535；销售计划，65，535；英国工业联合会，529；1900年以前工会的发展，514；总罢工，457，532

社会状况：都市化，12；人口统计，19；失业，21，59，62，529；选举权，23，513，521；妇女和家庭生活，23—24；教育，27，108—109，519；社会保险，29—31，45，81，521，547；日报，34；福利国家，81；夏令时间，186，208

政治制度：自由党政府（1906年），519—521；贵族院，519；工党政府（1924年），531—532，（1929年），60，534—535，685，（1945年），547，555；国民内阁（1931年），60；社会主义团体，514

与中国：引起争论的原因，113—114，333—334，357；长江协定（1900年），123；战争（1839年），533；义和团，335—336；第一次世界大战，342，346—347；反英情绪，367；前德国特权，356；“帕奈”号事件，711；第二次世界大战，774，808—810

与土耳其：20世纪初期，11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系，287—291

与法国：见France条下“与英国”项

与德国：见Germany条下“与英国”项

与美国：克莱顿—布尔沃条约（1850年），592；委内瑞拉争端（1895年），119；改善关系（1900年），123；战争债务，231，567；凯洛格公约，234，252；大萧条，684—685；在满洲问题上缺少合作，567；租借法案，581，803；大西洋宪章，582，810—811；丘吉尔和罗斯福，771—772，793，801—804，811，813；维希，805；对戴高乐的态度，806—808

与俄国：惧怕俄国（1914年前），122；赫尔港渔船被袭事件（1904年），128；英俄协定（1907年），131—132；爱德华七世与沙皇，132；海军谈判，143，151；在波斯的冲突，273—275；协约国对苏俄的干涉，437—440；承认苏联（1924年），457；袭击驻伦敦贸易代表团事件（1927年），457；未取得成果的谈判（1939年），468，

728—732；第二次世界大战，810—811，813—818；英苏条约（1942年），811

与日本：同盟条约（1912年），124—126，138，239，336—338，353—356；太平洋岛屿，342—34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秘密协定，350—351；四国条约（1922年），354—356；1927年海军会议的失败，252；第二次世界大战，765，771—774，791—795，808—809

与意大利：伦敦条约（1915年），186，287，484；阿比西尼亚，696—699；西班牙，704—706；“君子协定”（1937年），708；英国承认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717；张伯伦向墨索里尼发出呼吁，722；同盟国进攻西西里，785

战争：海军预算（1912年），144；英国远征军，173；坦克，190；四国条约，238—239，353—355，567；帝国总参谋部，379；帝国防务委员会，380，691；英德海军协定（1935年），696；重整军备，691—692，727；机械化，736；空中政策，736；缺乏战略思想，740；征兵制，745；空中和海上力量，747；国民警卫军，757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登记和征兵，185；战争的耗费，186；定量配给制，186；劳合·乔治替代阿斯奎斯，193；伤亡人数，198；参见Reparations条，军事史参见第七章

与和约：英国的修正条款，216—217；关于赔偿的舆论，218—219；在新成立国家中的德意志少数民族，224

与国际联盟：英国参加了盟约的起草工作，242；对第十条的评论，245，247；议会与国联，246；拒绝接受互助条约，248；拒绝接受日内瓦议定书，249；裁军，238—239，353—355，687—689，691；麦克唐纳安抚德国的计划，253，691；英国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耽误了时间，259；预算的份额，264；委任统治地，265，292—293，350—351，399；霍尔的演讲（1935年9月），259，697；霍尔-赖伐尔的谅解，698；为阻止德国而进行的谈判，699

在南美：在该地区的投资，594，596；与阿根廷的贸易，585—586，606，610；委内端拉的债务，592—593；墨西哥的石油国有化，604；铁路，605

与西班牙：内战，704—708；承认佛朗哥政权，724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军事史参见第二十四章

Greece, 希腊：人口，12；生活水平，19；对土耳其的战争（1897年），115；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144；巴尔干战争（1912年），145—14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22；土麦拿，228—229；土耳其，229，263，480—482；克里特岛，481；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505，507；共产党的战争，510

Green, Graham, 格林，格雷厄姆，英国作家，630，634

Green, Thomas H., 格林，托马斯，英国哲学家，654

Grey, Sir Edward (viscount), 格雷爵士，爱德华（子爵），英国外交大臣：英法协约，131—132；巴尔干各国，134；德国海军，137；阿加迪尔事件，138；重新部署舰队，143；与俄国进行海军谈判，151；防止大战爆发的努力（1914年），159—169，172

Griffuelhes, Victor, 格里甫埃勒，维克托，法国工联主义者，516

Gris, Juan, 格里斯，胡安，法国画家，671

Groener, Wilhelm, 格罗纳·威廉，德国将军，49

Gropius, Walter, 格罗皮厄斯，沃尔特，德裔美国建筑家，671—672，677—678，680，682

Guam, 关岛，119，335，355

Guchkov, A. I., 古契柯夫，亚·伊，俄国十月党人，406，410，416—417

Guderian, Hans, 古德里安，汉斯，德国将军和坦克专家，743—744，750—752，756，767—769

Guesdes, Jules, 盖德，朱尔，法国共产主义者，521

Haakon VII of Norway, 挪威国王哈康七世，550

Hacha, Emil, 哈查，埃米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725

Haekel, Ernst, 海克尔，恩斯特，德国哲学家，646

Hague Court of Arbitration, 海牙仲裁法庭，120，592—593

Hague Peace Conference, 海牙和平会议（1899年），122；（1907年），132, 136, 243, 380, 594

Haig, Sir Douglas (earl), 海格爵士, 道格拉斯（伯爵），英军总司令, 181, 188—189, 191, 194—196, 200—201, 204, 209, 737

Haiti, 海地, 577, 593—594; 美国与海地, 606—607

Halder, Franz, 哈尔德, 弗兰茨, 德国将军, 754—755, 767

Halifax, earl of (Edward Wood, Lord Irwin), 哈利法克斯伯爵（爱德华·伍德, 勋爵欧文），印度总督, 303; 外交大臣, 713, 718, 727; 驻美大使, 809

Hamaguchi, Osaehi, 滨口雄幸, 日本首相, 370

Hamilton, Sir Ian, 汉密尔顿爵士, 伊恩, 英国将军, 182

Hampshire, Stuart, 汉普夏, 斯图尔特, 英国哲学家, 655

Hankey, Sir Maurice (baron), 汉基爵士, 莫里斯（男爵），内阁秘书, 182, 219

Hansen, Alvin H., 汉森, 阿尔文, 美国经济学家, 64

Harcourt, Sir William, 哈考特爵士, 威廉, 英国国务活动家, 30

Harden, Maximilian, 哈登, 马克西米连, 德籍犹太人新闻工作者, 474

Harding, Warren G., 哈定, 沃伦, 甘梅利尔, 美国总统（1921—1923年），共和党人, 354, 564—565, 578; 逝世, 568

Hardinge, Sir Charles (baron), 哈定爵士, 查尔斯（男爵），印度总督, 298

Hardy, Thomas, 哈代, 托马斯, 英国作家和诗人, 613—614, 619—621, 630

Harmsworth, Alfred (Lord Northcliffe), 哈姆斯沃思, 艾尔弗雷德（诺思克利夫勋爵），英国报业巨头, 34, 207

Harnack, Adolf von, 哈纳克, 阿道夫·冯, 德国圣经学家, 659—660

Hassell, Ulrich von, 哈塞尔, 乌尔里希·冯, 德国外交家, 499

Hatta, Mohammad, 哈达, 穆罕默德,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 325

Hawaiian Islands, 夏威夷群岛, 119, 335, 355, 581

Hawley-Smoot tariff (1930年), 霍利—斯穆特税则 (1930年), 62, 240

Hayashi, Baron, 林董男爵, 日本外交家, 124

Hay-Pauncefote Treaty (1902年), 海—庞斯福特条约 (1902年), 592

Headlam, Arthur C., 黑德勒姆, 阿瑟, 英国神学家, 662

Heckel, Erich, 黑克尔, 埃里希, 德国画家, 668

Hegel G.W.Friedrich, 黑格尔, 格·威·弗里德里希, 德国哲学家, 644, 653—654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 马丁, 德国哲学家, 655

Helfferich, Karl, 黑尔弗里希, 卡尔, 德国财政金融家, 49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 欧内斯特, 美国作家, 634

Henderson, Arthur, 亨德森, 阿瑟, 英国外交大臣, 521, 524, 528

Henderson, Sir Nevile, 亨德森爵士, 内维尔, 英国驻柏林大使, 708

Henlein, Konrad, 汉莱因, 康拉德,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党领导人, 500—501, 715—716, 718—719

Hennebique, Francois, 埃纳比克, 弗朗索瓦, 法国建筑家, 678

Henriot, Philippe, 昂里奥, 菲利普, 维希分子, 549

Hepworth, Barbara, 赫普沃思, 巴巴拉, 英国雕塑家, 672

Herriot, Edouard, 赫里欧, 爱德华, 法国总理, 248, 532—533, 688—689

Heydrich, Reinhard, 海德里希, 莱因哈德, 纳粹领导人, 506

Himmler, Heinrich, 希姆莱, 亨利希, 德国盖世太保头子, 18, 55, 497, 506

Hindenburg, Paul von, 兴登堡, 保罗·冯, 德国陆军元帅, 176, 180, 458; 总统(1925年), 488; (1932年), 493; 与希特勒, 492—494

Hiranuma, Baron, 平治男爵, 日本首相, 726

Hiroshima, 广岛, 104, 792—793

Hirota, Baron Kōki, 广田弘毅男爵, 日本首相, 702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德国元首, 7, 17, 18, 202, 463; 总理, 241, 492—496, 689; 自杀, 790; 参见第二十四章和Germany条下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霍尔爵士, 塞缪尔(坦普尔伍德子爵), 英国外交大臣, 697—698, 728

Hobson, John A., 霍布森, 约翰·阿, 英国经济学家, 8, 47

Ho Chi-minh, 胡志明, 越南领导人, 325, 327

Hoger, Fritz, 霍格, 弗里茨, 德国建筑家, 679

Holland, 荷兰, 参见Netherlands

Holland, Henry Scott, 霍兰, 亨利·斯科特, 英国神学家, 661

Holstein, Baron Friedrich von, 霍尔斯坦, 弗里德里希·冯, 德国外交部官员, 118, 128

Hong Kong, 香港, 333, 355, 363, 395

Hoover, Herbert, 胡佛, 赫伯特, 美国总统(1929—1933年), 共和党人, 52, 60, 569, 686, 688; 救济总署(1919年), 213; 延期付款方案(1931年), 240, 493, 572, 685, 689; 大萧条, 571—573

Hopkins, Sir Frederick, 霍普金斯爵士, 弗雷德里克, 英国生物化学家, 95

Hopkind, Gerard Manley, 霍普金斯, 杰勒德·曼利, 英国诗人, 624

Horrocks, Sir Brian, 霍罗克斯爵士, 布赖恩, 英国将军, 784

Horta, Victor, 霍泰, 维克托, 比利时建筑家, 676—677

Horthy, Admiral Nicholas, 霍尔蒂, 尼古拉, 海军上将, 匈牙利摄政, 723

Hoth, Hermann, 霍特, 赫尔曼, 德国将军, 767—768

Hötzendorff, Conrad von, 霍曾道夫, 康拉德·冯, 奥地利总参谋长, 132, 148, 153, 164, 177, 194

House, Colonel Edward M., 豪斯上校, 爱德华·曼德尔, 威尔逊总统的私人顾问, 152, 209, 242

Hoyos, Count A. von, 霍约斯伯爵, 冯, 奥地利外交家, 154

Hudson, Robert, 赫德森, 罗伯特, 英国政治家, 731—732

Huerta, Adolfo de la, 韦尔塔, 阿道弗·德·拉, 墨西哥冒险家, 562, 591

Hügel, Baron Friedrich von, 许格尔男爵, 弗里德里希·冯, 奥裔英国神学家, 660, 662

Hugenberg, Alfred, 胡根贝格, 阿尔弗雷德, 德国财政金融家, 16

Hughes, Charles Evans, 休斯, 查尔斯·伊万斯, 美国国务卿, 354, 562—563

Hughes, William Morris, 休斯, 威廉·莫里斯, 澳大利亚总理, 352, 381

Hull, Cordell, 赫尔, 科德尔, 美国国务卿, 75, 78, 576—577, 607, 710, 809

Hulme, Thomas E., 休姆, 托马斯, 英国作家, 626

Hume, David, 休谟, 戴维, 苏格兰哲学家, 649—650

Hungary, 匈牙利: 人口, 12; 与罗马尼亚, 148; 纳伊条约: (1919年), 222; 共产党政权, 222; 与捷克斯洛伐克, 725; 参见 Austria

Hurst, Cecil, 赫斯特, 塞西尔, 国际法学家, 242

Hussein-McMahon correspondence (1915—1916年),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 228

Husserl, E. G. A., 胡塞尔, 埃德蒙德, 奥地利哲学家, 646

Huxley, Aldous, 赫胥黎, 奥尔德斯, 英国作家, 626, 630, 632—633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里克, 挪威剧作家, 613, 635—637

Ickes, Harold L., 伊克斯, 哈罗德·勒, 美国政治家, 580

Imperial (British) Conferences, (英国) 帝国会议: (1911年), 379; (1917年), 380; (1923年), 383; (1926年), 384—385; (1930年), 387

Imperial Defence, Committee of, 帝国防务委员会, 380, 691

Imperial General Staff, 帝国总参谋部, 379

Imperial War Cabinet (1917—1918年), 帝国战时内阁, 380

India, 印度: 人口, 8; 人口统计, 19; 工业化, 47; 与日本, 124; 与俄国, 13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206; 共产主义, 319; 独立, 312; 参见第十一章 (原文297—312页)

Indo-China, 印度支那, 314—315, 320, 322—323; 参见 Vietnam

Indo-European Telegraph Company, 印欧电话公司, 273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47, 318, 324—325, 327

Inge, W. R., 英奇, 威廉·拉尔夫, 伦敦圣保罗教堂教长, 662

Inter-imperial Relations Committee, 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 38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国际农业研究所, 263

International Justice, Permanent Court of, 国际裁判常设法庭, 224, 25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66, 76, 261, 268, 598

International Steel Cartel, 国际粗钢卡特尔, 234

Iqbal, Sir Muhammad, 伊格巴尔爵士, 穆罕默德, 印度诗人、哲学家, 308

Iran (Persia), 伊朗(波斯), 272; 俄国与英国的角逐, 124, 131, 141, 143, 228, 273—275; 宗教领袖的影响, 273—275; 财政困难, 276; 骚乱, 277—278; 根本法(1906—1907年), 278—279; 废除宪法, 279; 第一次世界大战, 280; 礼萨·汗, 280—281

Iraq, 伊拉克: 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293, 399; 立宪政体的失败, 283—284; 费萨尔接国王位, 284; 君主政体的结束, 284; 成为国联成员国, 294

Ireland, 爱尔兰: 不发达状况, 10; 爱尔兰政府法(1920年)和内战, 382; 威斯敏斯特法, 388;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 391

Irigoyen, Hipolite, 伊里戈廷, 伊波利特, 阿根廷总统, 591, 600—601

Iron and Steel Federation (1934年), 英国钢铁联合会, 65

Ironside, Sir Edmund (baron), 艾恩赛德爵士, 埃德蒙(男爵), 英国陆军元帅, 746

Irwin, Lord, 欧文勋爵, 见Halifax, earl of

Isherwood, Christopher, 伊舍伍德, 克里斯托弗, 英国作家, 635, 640

Ishii, Kikujiro, 石井菊次郎, 日本政治家, 347—348

Italy, 意大利

概况（1900—1914年），482—484

工业、贸易和经济：不发达状况，10；贸易，15；金本位，57；社团主义，65；工业，482

社会状况：选举权，22，483；教育，27；社会保险，29，45；南方的穷困，484

政治发展：社会党和民族主义党，484—486；法西斯国家，486；参见Mussolini

与阿比西尼亚：在阿杜瓦的失败（1896年），119，121；征服阿比西尼亚，258—260，696—699

与俄国：拉科尼吉条约（1909年），135

海军：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239，353—355

与土耳其：战争（1911年）和夺取的黎波里，285；查纳克（1922年），229

教会与国家，483，486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中立，160，169，484；伦敦条约（1915年），186，287，484；宣战，186，484；历次战役，186，194，200，205

与凡尔赛和约：取得的利益，222；不满情绪，225—226

与国际联盟：科孚事件，254—255；阿比西尼亚的呼吁，258；退出国联，260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战（1940年6月），507，756，759；希腊，505，507，798；意大利工人在德国，504；北非，759—761；同盟国军在西西里岛，785；与德国缺乏合作，798；“无条件投降”，813

有关与法国、德国和英国关系，参见各有关国家条中“与意大利”项

Ito, Prince, of Japan, 伊藤博文, 日本公爵, 124

Jackson, Henry, 杰克逊, 亨利, 英国学者, 653

Jacobsen, Arne, 雅各布森, 阿恩, 丹麦建筑家, 683

Jagow, Gottlieb von, 雅戈, 戈特利布·冯, 德国国务大臣, 152, 156, 163—164

Jamaica, 牙买加, 402

Jamal al-Din al-Afghani, 杰马勒丁·阿富汗尼, 波斯改革家, 275

James, Henry, 詹姆斯, 亨利, 美国出生的英国作家, 614—615, 630, 634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美国哲学家, 646, 656

Japan, 日本

 人口, 8

 贸易、工业和经济, 7, 331, 359—360; 工业, 39—40, 47—48, 83, 331, 357—361; 经济, 357—358; 工会, 359; 大萧条, 361; 满洲的重要性, 364

 政治: 旧秩序, 329; 新秩序, 330, 338; 废除治外法权, 332; 军人统治, 371

 与俄国: 旅顺, 113—114; 战争(1904—1905年), 122, 125—126, 128, 205—206, 316, 338—339, 403, 558—559; 朴次茅斯条约(1905年), 126, 339; 559; 俄国革命后日本的干涉, 349, 439, 442; 拟议中的苏中条约(1937年), 709; 满洲, 124, 463—464, 690; 外蒙冲突, 733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海军部署, 343; 秘密协定(1917年), 350; 获得的利益, 347; 在巴黎和会上, 350—353

 与国际联盟: 满洲问题, 253, 256—257; 退出国联, 257, 691

 与美国: 蓝辛—石井协定(1917年), 347—348, 353; 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 239, 357, 692—693; 英美的接近, 710; 珍

珠港事件，77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772，774—775，790—793

有关与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关系，见各该国条目下“与日本”
项

Jaspers, Karl, 雅斯贝斯，卡尔，哲学家，655

Jaurès, Jean, 饶勒斯，让，法国社会党领导人，34，514—515, 517, 521, 528

Java, 爪哇，40, 319, 325

Jeans, Sir James, 琼斯爵士，詹姆斯，英国天文学家，654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托马斯，美国总统（1801—1809年），共和党人，561

Jeffreys, Sir Henry, 杰弗里斯爵士，亨利，英国哲学家，654

Jellicoe, Sir John (earl), 杰利科爵士，约翰（伯爵），英军总司令，主力舰队，191—192

Jesenská, Milena, 杰森斯卡，米莱纳，原捷克共产党人，500

Jews, 犹太人：贝尔福宣言，228, 289；德国人与犹太人，9, 497, 727；“最后解决”，506；意大利和东欧，502

Jinnah, Muhammad Ali, 真纳，穆罕默德·阿里，印度穆斯林领导人，304, 307, 312

Joachim, H. H., 乔基姆，英国哲学家，653

Joffre, Joseph, 霞飞，约瑟夫，法军总司令，174—175, 180—181, 193, 522

Johnson Act (1934年)，约翰逊法，690

Johnson, Hugh A., 约翰逊，休，美国行政官员，575—576

Johnston, Thomas, 约翰斯顿，托马斯，英国工党领导人，534

Joseph, H. W. P., 约瑟夫，英国哲学家，653

Jouheaux, Léon, 儒奥, 莱昂,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 528

Joyce, James, 乔埃斯, 詹姆斯, 爱尔兰作家, 625, 635; 《尤利西斯》, 626—627

Jubaland, 朱巴兰, 226

Jung, Carl G., 荣格, 卡尔·古斯塔夫, 瑞士精神病学家, 657

Justo, General Augustin, 胡斯托将军, 奥古斯丁, 阿根廷总统, 602

Kafka, Franz, 卡夫卡, 弗兰茨, 奥地利作家, 499, 626, 631, 634

Kamenev, Lev, 加米涅夫, 列甫, 俄国革命家, 416, 423, 426, 430, 452—453, 455; 被处决, 466

Kandelaki, David, 坎杰拉基, 达维德, 苏联贸易代表, 705—706

Kandinsky, Vasily, 康定斯基, 瓦西里, 俄国画家, 668—669, 671, 674

Kartini, Raden Adjeng, 卡尔蒂妮, 拉登·阿强,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 319

Katyn massacre, 卡廷惨案, 811

Kellogg, Frank B., 凯洛格, 弗兰克·比林斯, 美国国务卿: 凯洛格公约, 234, 252

Kelly, John, 凯利, 约翰, 美国百万富翁, 34

Kemal, Mustafa (Ataturk), 凯末尔, 穆斯塔法(阿塔图克), 土耳其军人和国务活动家, 229, 290—292, 491

Kendall, Arthur I., 肯德尔, 阿瑟, 美国细菌学家, 95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 约翰·菲茨杰拉德, 美国总统(1961—1963年), 民主党人, 5

Kenya, 肯尼亚, 395, 398, 400, 402

Kerensky, Alexander F.,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 409, 412—413, 415, 418, 423—429

Kesselring, Albert, 凯塞林, 阿尔伯特, 德国陆军元帅, 777, 785

Keyes, Roger (baron), 凯斯, 罗杰 (男爵), 英国海军上将, 753

Keynes, John Maynard (baron),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男爵), 英国经济学家, 38, 56, 538, 573, 654, 800n.;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64; 《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 81

Kiaochow, 胶州湾, 114, 344—345, 351, 356

Kiderlin-Wächter, Alfred von, 基德伦-韦希特尔, 阿尔弗雷德·冯, 德国外交家, 138

Kienthal conference (1916年), 昆塔尔会议, 524

Kierkegaard, Sören, 克尔恺郭尔, 泽伦, 丹麦神学家, 653, 657

King, W.L. Mackenzie, 金, 麦肯齐, 加拿大总理, 384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 拉迪亚德, 英国作家和诗人, 314, 373, 617—618

Kirchner, Ernst L., 基希纳, 恩斯特·路德维希, 德国画家, 668

Kirdorf, Emil, 基尔道夫, 埃米尔, 德国煤业大王, 475

Kirov, Sergei, 基洛夫, 谢尔盖,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63

Kitchener, Sir Herbert (earl), 吉钦纳爵士, 赫伯特 (伯爵), 英国陆军元帅: 布尔战争, 495; 法绍达危机, 117; 印度, 297;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3, 181—185, 521; 逝世, 193

Klagenfurt, 克拉根福, 222

Klee, Paul, 克利, 保罗, 瑞士画家, 670—671

Kleist, Ewald von, 克莱斯特, 艾瓦德·冯, 德国陆军元帅, 744, 751, 755—756, 768, 770, 775

Kluck, Alexander von, 克鲁克, 亚历山大·冯, 德国将军, 175—176

Kluge, Gunther von, 克鲁格, 京特·冯, 德国将军, 511

Knox, Frank, 诺克斯, 弗兰克, 美国国务卿, 594

Koch, Erich Gauleiter, 科赫, 埃里希, 东普鲁士省长, 725

Koenig, Marie-Pierre, 柯尼格, 玛丽-皮埃尔, 法国将军, 778

Koiso, Kuniaki, 小矶国昭, 日本首相, 791

Kokoschka, Oscar, 科科施卡, 奥斯卡, 奥地利画家, 150

Kokovtsov, Count, 科科夫佐夫伯爵, 沙俄首相, 150

Kolchak, Alexander,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 俄国海军上将, 442

Konev, Ivan, 科涅夫, 伊凡, 俄国将军, 776, 789—790

Konoye, Prince, 近卫文麿公爵, 日本首相, 724, 792

Koo, Wellington, 顾维钧, 中国外交家, 352

Korea, 朝鲜, 113, 124—125, 327, 333, 336—339, 360

Kornilov, Lavr, 科尔尼洛夫, 拉夫尔, 俄国将军, 413, 423—424

Krestinski, N., 克列斯京斯基,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66

Kruger, Paul, 克留格尔, 保罗, 德兰士瓦总统, 118, 373

Krupps of Essen, 埃森的克虏伯, 德国工业家族, 235—236, 475

Kruschev, N., 赫鲁晓夫, 尼基塔, 苏联国务活动家: 论斯大林, 467

Krylenko, N., 克雷连科,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9

Ku-Klux-Klan, 三K党, 566, 569

Kun, Bela, 库恩, 贝拉, 匈牙利共产党独裁者, 222

Küng, Hans, 金, 汉斯, 法国神学家, 664

Kuomintang, 国民党, 256, 341, 347, 366, 376

Kuwait, 科威特, 287

Kuznetsk steel works (Russia), 库兹涅茨克钢铁工厂 (俄国), 462

Kwang Chow Wan, 广州湾, 114

Kwantung, 广东, 357

Ladurie, Le Roy, 拉迪里, 勒·鲁瓦, 法国工联主义者, 540

La Follette, Robert, M., 拉福莱特, 罗伯特·马里恩, 美国参议员, 560, 569

Lagosta, 拉戈斯塔, 225

Laird, John, 莱尔德, 约翰, 苏格兰哲学家, 654

Lamsdorff, Count, Vladimir, 拉姆斯多尔夫伯爵, 弗拉基米尔, 沙俄国务活动家, 130

Landon, Alfred M., 兰登, 艾尔弗雷德, 美国堪萨斯州州长, 578

Lansbury, George, 兰斯伯里, 乔治, 英国工党领导人, 520, 524

Lansdowne, Marquis of, 兰斯多恩侯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123—124, 129, 131; 和平建议, 191

Lansing, Robert, 蓝辛, 罗伯特, 美国国务卿, 347—348; 蓝辛—石井协定 (1917年), 347—348, 351

Laos, 老挝, 313, 323, 328

Laplace, Marquis de, 拉普拉斯侯爵, 法国天文学家, 94

Larionov, Mikhail, 拉里奥诺夫, 米哈伊尔, 俄国画家, 669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 德国社会主义者, 45

Latvia, 拉脱维亚, 225, 445, 491

Laurens, Henri, 洛朗斯, 亨利, 法国雕塑家, 674

Laurier, Sir Wilfrid, 劳里埃爵士, 威尔弗里德, 加拿大总理, 380

Laval, Pierre, 赖伐尔, 皮埃尔, 法国国务活动家, 541; 与意大利, 694, 698; 维希, 548—549, 553, 805—806

Lavoisier, Antoine, 拉瓦锡, 安托万, 法国化学家, 87

Law, Andrew Bonar, 劳, 安德鲁·博纳, 英国首相, 229, 231, 523, 531

Lawrence, David H., 劳伦斯, 戴维·赫伯特, 英国作家, 618, 623, 625—626, 630—632

Lawrence, Ernest, O., 劳伦斯, 欧内斯特·奥兰多, 美国物理学家, 103

Lawrence, Thomas Edward, 劳伦斯, 托马斯·爱德华, 英国军人, 205

Lazerowitz, Morris, 拉策罗威茨, 莫里斯, 英国哲学家, 655

League of Nations, The, 国际联盟: 参见第九章

用以代替“欧洲协同体”, 7; 与民族主义的愿望相冲突, 18; 大胆的尝试, 206; 与各强国, 701

委任统治地, 292—293, 350—351, 399; 少数民族, 489

成员国: 英国各自治领作为成员国, 381; 德国被接纳(1926年), 459, 488; 俄国被接纳(1934年), 464, 500; 日本(1933年2月)和德国(1933年10月)退出, 691; 开除奥地利(1935年)和俄国(1939年), 260

满洲, 686—687, 710; 阿比西尼亚, 697—700

Leahy, William D., 李海, 威廉·丹尼尔, 海军上将: 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 792—793; 论原子弹, 792—793

Lebanon, 黎巴嫩, 288, 290, 292

Le Corbusier (Charles-Edouard Jeanneret), 勒科尔比西埃(夏尔-爱德华·让内雷), 法国建筑家, 677, 680—683

Lee Kuan-yew, 李光耀, 新加坡宪政派领导人, 327

Leeb, Wilhelm Ritter von, 李勃, 威廉·里特·冯, 德国陆军元帅, 767—769

Léger, Fernand, 莱热, 费尔南, 法国画家, 668

Leguía, Augusto, 莱吉亚, 奥古斯托, 秘鲁统治者, 600—601

Lehmbruck, Wilhelm, 莱姆布鲁克, 威廉, 德国雕塑家, 673

Leith-Rose, Sir Frederick, 李滋罗斯爵士, 弗雷德里克, 英国经济专家, 702—703

Lenin, Vladimir Ulyanov, 列宁,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7, 66, 212, 414—416, 486—487; 回到俄国(1917年4月), 419—422; 隐蔽起来(7月), 423; 重新返回(10月), 426; 掌权, 433—451; 逝世, 451; 隐瞒他的政治遗嘱, 453; 参见第十四和十五章

Leopold II of Belgium,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546, 55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753

Lescaze, William, 莱斯卡兹, 威廉, 瑞士出生的美国建筑家, 682

Lewis, C. Day, 刘易斯, 塞西尔·戴, 英国诗人, 633

Lewis, Clarence I., 刘易斯, 克拉伦斯, 英国哲学家, 654

Lewis, Clive S., 刘易斯, 克莱夫, 英国学者和作家, 617

Lewis Wyndham, 刘易斯, 温德姆, 英国画家和作家, 672

Lewy, Casimir, 卢伊, 卡西米尔, 英国哲学家, 655

Leygues, Georges, 莱格, 乔治, 法国总理, 229—230

Liaotu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 113—114

Libération Nord/Sud, “解放北方”, “解放南方”, 553

Libya, 利比亚, 226

Lichnowsky, Prince Karl Max, 利希诺夫斯基爵士, 卡尔·马克斯, 德国驻伦敦大使 (1914年), 156—157, 163, 167

Lidice, 利迪策, 506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卡尔, 德国共产党领袖, 488

Liège, 列日, 174

Li Hüan-hung, 黎元洪, 中国总统, 346

Limburg, 林堡, 224—225

Lim Yew Hock, 林有福, 新加坡政治领袖, 327

Lincoln, Abraham, 林肯, 亚伯拉罕, 美国总统 (1861—1865年), 共和党人, 556, 563, 574

Lindsay, Sir Ronald, 林赛爵士, 罗纳德, 英国驻德大使, 238

Linlithgow, Marquis of, 林利思戈侯爵, 印度总督, 309

Lipchitz, Jacques, 利普契茨, 雅克, 立陶宛雕塑家, 674

Lipsky, Józef, 利普斯基, 约瑟夫, 波兰驻德大使, 726

List, Wilhelm, 利斯特, 威廉, 德国陆军元帅, 743—744, 762—763

Lithuania, 立陶宛, 223, 225, 254; 与俄国, 445; 与德国, 491

Little, Entents, 小协约国, 227, 495, 501, 691, 694, 699, 709, 813

Litvinov, Maxim, 李维诺夫, 马克西姆, 苏联外交部长, 253, 464, 716, 719, 721, 728—729, 730

Lloyd, Sir George (baron), 劳埃德爵士, 乔治 (男爵); 埃及, 282; 印度, 305

Lloyd George, David (earl), 劳合·乔治, 戴维(伯爵), 英国首相, 30, 44; 社会改革, 519—520; 关于阿加迪尔问题的演说, 138;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81—182, 184, 186, 193—195, 522—523; 在巴黎和会上, 见第八章; 枫丹白露备忘录, 224; 与土耳其, 229, 290—291; 与爱尔兰, 382; 与大选(1918年), 525, (1922年), 531; 与波兰, 742

Locarno Pacts (1925年), 洛迦诺公约, 233—234, 250—251, 255, 457, 488, 532—533; 与英国自治领, 386; 东方, 694—695

Lodge, Henry Cabot, 洛奇, 亨利·卡伯特, 美国参议员, 561, 564

Loisy, Abbé Alfred, 卢瓦齐神父, 阿尔弗雷德, 法国神学家, 660

London, Treaty of (1917年), 伦敦条约, 186, 225—226, 287, 410, 417, 484; 伦敦宣言(1909年), 380; 关于多瑙河问题的伦敦会议(1932年), 687

Loos, Alfred, 卢斯, 阿尔弗雷德, 奥地利建筑家, 677

Lubetkin, Berthold, 卢别特金, 贝托尔德, 俄国出生的英国建筑家, 682

Ludendorff, Eric von, 鲁登道夫, 埃里克·冯, 德国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7, 180, 184, 189, 193—194, 199—204, 485—486; 慕尼黑暴动, 488

Lugard, Frederick (baron), 卢加德, 弗雷德里克(男爵), 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 8, 395

Luis, Washington, 路易斯, 华盛顿, 巴西总统, 602

Lunacharsky, A., 卢那察尔斯基, 阿纳托利,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9

Luther, Jans, 路德, 扬斯, 德国银行家, 232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 宗教改革家, 662

Luxemburg, 卢森堡：第一次世界大战，168，173，175，527；中立，700；第二次世界大战，552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罗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488

Lvov, Prince, 李沃夫亲王，俄国立宪民主党，406；与革命，409—410，416，422，429—430

Lyautey, Louis, 利奥泰，路易，法国元帅，517，522

Lytton, Earl of, 李顿伯爵，686—687

MacArthur, Douglas,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美国将军，318，775，791

MacDonald, Ramsay, 麦克唐纳，拉姆齐，英国首相，248—249，457，542，547，689；第一次世界大战，521；工党政府，530—531；国民内阁，535

Macedonia, 马其顿，115，143，148，271，490；“马其顿国内革命组织”，480—481

Maček, Vlado, 马切克，弗拉科，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509

McGregor, Sir William, 麦格雷戈爵士，威廉，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395

Mackensen, August von, 麦肯森，奥古斯特·冯，德国将军，186—187，193

Mackensen, Hans Georg von, 麦肯森，汉斯·格奥尔格·冯，德国驻意大利大使，499

McKinley, William, 麦金莱，威廉，美国总统（1897—1901年），共和党人，556—557，565

Mackinnon, D.M., 麦金农，英国哲学家，655

Mackintosh, Charles Rennie, 麦金托什，查尔斯·伦尼，苏格兰建筑家，677

McMahon, Sir Arthur, 麦克马洪爵士，阿瑟，英国政治官员，288—289

Macmillan, Harold, 麦克米伦, 哈罗德, 英国国务活动家, 64

MacNeice, Louis, 麦克尼斯, 路易斯, 英国诗人, 633

McTaggart, John, 麦克塔格特, 约翰, 英国哲学家, 646, 651—652

Madero, Francisco, 马德罗, 弗朗西斯科, 墨西哥政治家, 591

Maffey, Sir John, 马菲爵士, 约翰, 英国文官, 697

Magnitogorsk steel plant, Russia, 俄国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 462

Magyars, 马扎尔人, 477—478, 489

Mahmud II, 马赫穆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269, 272

Maillart, Robert, 马亚尔, 罗贝尔, 瑞士工程师, 678, 683

Maillol, Aristide, 马约尔, 阿里斯蒂德, 法国雕塑家, 673

Maisky, Ivan, 迈斯基, 伊凡, 苏联驻伦敦大使, 801

Malacca, 马六甲, 326

Malaya, 马来亚, 40, 58, 393—394; 马来联邦, 313, 320, 326, 375; 马来亚联盟, 326

Malcolm, Norman, 马尔科姆, 诺曼, 英国哲学家, 655

Malkam Khan, 马尔坎汗, 伊朗改革家, 274—275

Mallarmé, Stéphane, 马拉美, 斯特凡, 法国诗人, 625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 安德烈, 法国作家, 635

Man, Henri, de, 德曼, 亨利, 比利时政治家, 539, 546

Manchuria, 满洲: 与俄国, 113, 124—125, 336; 与日本, 126, 239, 256—257, 339—340, 345, 357, 363—364, 368—372, 463, 692, 702; 与中国, 348, 369—370, 576

Mandates, 委任统治地, 265, 292—293, 350—351, 399

Mandel, Georges, 芒德, 乔治, 法国政治家, 741

Maniu, Julius, 马纽, 茹利乌斯, 罗马尼亚农民党领袖, 490, 509

Mann, Thomas, 曼, 托马斯, 德国作家, 625, 634

Mansel, Hebry L., 曼塞尔, 亨利, 伦敦圣保罗教堂教长, 656

Manstein, Eric von, 曼施泰因, 埃利克·冯, 德国陆军元帅, 775

Marc, Franz, 马尔克, 弗兰茨, 德国画家, 668

Marchand, Jean B., 马尔尚, 让·巴蒂斯特, 法国军人, 117

Marconi, Guglielmo, 马可尼, 古利耶尔莫, 意大利无线电研究
创始者, 5, 102

Mare, Walter de la, 马雷, 瓦尔特·德·拉, 英国诗人, 623

Marienwerder, 马林韦尔德尔, 220

Marinetti, Filippo, 马里内蒂, 菲利波, 意大利作家和法西斯
分子, 484

Maritain, Jacques, 马利丹, 雅克, 法国哲学家, 654

Marsh, Sir Edward, 马什爵士, 爱德华, 英国艺术赞助人, 623

Marshall George C., 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 美国将军, 794

Marshall Islands, 马绍尔群岛, 335

Martin, Grau Sau, 圣马丁, 格劳, 古巴政治家, 607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 487, 520, 653—654

Masaryk, Thomas, 马萨里克, 托马斯,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500

Massey, William F., 梅西, 威廉·弗格森, 新西兰总理, 381

Matisse, Henri, 马蒂斯, 亨利, 法国画家, 666, 671, 673, 675

Matteotti, Giacomo, 马泰奥蒂, 贾科莫,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 486

Maurin, Louis, 莫兰, 路易, 法国将军, 741

Maurras, Charles, 莫拉斯, 夏尔, 法国作家, 529—530

May, Sir George, 梅爵士, 乔治, 英国负责保险事务的官员, 535

Mehmed Reshad, 穆罕默德, 里夏德, 土耳其苏丹, 271

Meighen, Arthur, 米恩, 阿瑟, 加拿大总理, 354

Meinong, Alexius, 迈农, 阿历克修斯, 奥地利哲学家, 646

Memel, 梅梅尔, 219, 254, 491, 725, 729

Mendel, Gregor, 孟德尔, 格雷戈尔, 奥地利生物学家, 6, 99—100

Mendelsohn, Erich, 门德尔森, 埃里希, 德国建筑家, 679

Mercier, Ernest, 梅西埃, 欧内斯特, 法国工业家, 541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87, 228, 287; 英国委任统治地, 293

Metaxas, Ionnis, 梅塔克塞斯, 伊奥尼斯, 希腊总理, 699, 761

Metternich, Count, 梅特尼希伯爵, 德国驻伦敦大使, 136

Mexico, 墨西哥

经济: 六年计划, 69, 596, 604, 607, 611

概况, 587—588, 591—592, 603—605; 与美国, 562, 577, 591, 606

世界大战: 第一次, 594; 第二次, 608

土地改革运动, 609

Michael, 米哈伊尔, 罗马尼亚国王, 509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意大利雕塑家, 673

Midhat, Pasha, 米德哈特帕夏, 土耳其政治家, 270

Mihailović, Draža, 米哈伊洛维奇, 德拉扎,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游击队“契特尼克”领导人, 507

Mikhail, grand duke of Russia, 俄罗斯大公米哈伊尔, 409

Miliukov, Paul N., 米留可夫,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 406, 409—410, 416—417

Miliutin, D. P., 米柳亭, 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9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 英国哲学家, 645, 647

Miller, D. Hunter, 米勒, 戴维·亨特, 美国法学家, 242

Millerand, Alexandre, 米勒兰, 亚历山大, 法国总统, 515

Milner, Sir Alfred (viscount), 米尔纳爵士, 艾尔弗雷德(子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373

Mintó, Earl of (Elliot), 明托伯爵(埃利奥特), 印度总督, 298

Mirb, Gabriel, 米罗, 加夫列尔, 西班牙画家, 670, 675

Mirza, Muhammad Riza, 米尔扎, 穆罕默德·里扎, 伊朗暗杀者, 275

Mitrovitza, 米特罗维察, 133

Möllendorff, Wichard, 默伦多夫, 维夏德, 德国经济学家, 52

Molotov (Scriabin), Vyacheslav,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维亚切斯拉夫, 苏联外交部长, 713, 730—732, 800, 811

Moltke, Count Helmuth von, 毛奇伯爵, 黑尔姆特·冯, 德国陆军元帅, 147, 154, 164, 166, 168, 174—176

Moltke, Count Kuno von, 毛奇伯爵, 库诺·冯, 威廉二世的朋友, 474

Mondriaan, Piet, 蒙德里安, 皮特, 荷兰画家

Mongolia, 蒙古: 内蒙古, 345, 352, 357, 703; 外蒙古, 俄国和日本的权力要求, 464, 701—702, 733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119, 558, 562, 584, 593

Montagu, Edwin Samuel, 蒙塔古, 埃德温·塞缪尔, 英国国务活动家, 321—322

Montefiore, Claude, 蒙蒂菲奥里, 克劳德, 犹太学者, 663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 134, 144—145, 147, 152, 222

Montgomery, Bernard (viscount), 蒙哥马利, 伯纳德 (子爵), 英国陆军元帅, 779—783, 787—789, 796

Montreux Conference (1936年), 蒙特勒会议, 700

Moore, George Edward, 穆尔, 乔治·爱德华, 英国哲学家, 649, 651, 653, 655

Moore, Henry, 摩尔, 亨利, 英国雕塑家, 672, 675

Moore, Marianne, 穆尔, 玛丽安, 美国诗人, 634

Morgenthau, Henry, 摩根索, 亨利, 美国财政部长, 711; 他关于战后德国的计划, 814

Morley, John (viscount), 莫利, 约翰 (子爵), 英国作家和国务活动家, 298

Morocco, 摩洛哥: 法国在该国的利益, 121, 126—128; 丹吉尔 (1905年), 128—129; 阿加迪尔事件 (1911年), 137—138, 517; 与西班牙, 127, 704; 法国的保护国 (1912年), 139, 285—286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英国诗人和工艺家, 675—676

Morrow, Dwight, 莫罗, 德怀特,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 577, 607

Moseley, Henry, 莫斯莱, 亨利, 英国物理学家, 93

Mosley, Sir Oswald, 莫斯利爵士, 奥斯瓦德, 英国政治家, 534, 英国法西斯联盟, 536

Mosul, 摩苏尔, 229, 283, 290

Moulin, Jean, 穆兰, 让, 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 553—554

Mounier, Emmanuel, 穆尼埃, 埃马纽埃尔, 法国政治记者, 540

Mountbatten, Louis (earl), 蒙巴顿, 路易斯 (伯爵), 英国海军上将, 印度, 312; 缅甸, 791

Mudania, Conference (1922年), 穆达尼亚会议, 229, 291

Mudros, Armistice of (1918年), 穆德洛斯停战协定, 289, 291

Muhammad Ali Shah of Persia, 穆罕默德·阿里, 波斯国王, 279

Muhammad Mahmud, 穆罕默德·马赫穆德, 埃及首相, 282—283

Muhammad VI Wahid al-Din, 穆罕默德六世, 瓦希丁, 土耳其苏丹, 291

Muir, Edwin, 米尔, 埃德温, 英国诗人, 634

Mukden, 沈阳, 125; 被日本占领 (1931年), 371—372

Mulk Raj Anand, 穆尔克, 拉吉·阿南德, 印度作家, 308

Muller, Hermann, 弥勒, 赫尔曼, 德国总理, 492

Mun, Albert de, 德门, 阿尔贝, 法国政治家, 521

Munich Conference, 慕尼黑会议 (1938年9月), 468, 501, 503, 536, 544

Mure, G. R. G., 穆尔, 英国哲学家, 654—655

Muslim League, 穆斯林联盟, 306, 310—311

Mussert, Anton, 穆瑟特, 安东, 荷兰国家社会党人, 537, 551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意大利法西斯领袖, 18, 65, 227, 541; 《前进报》编辑, 484; 首相, 486; 与希特勒会晤, 497, 507, 709; 逮捕, 营救和处死, 508; 参见Italy

Muthesius, Hermann, 米特希厄斯, 赫尔曼, 德国建筑家, 677

Muzaffer al-Din Shah of Persia, 马扎法阿尔·丁, 波斯国王, 276, 279

Nagasaki, 长崎, 104

Nahas Pasha, 纳哈斯帕夏, 埃及首相, 282—283

Naidu, Sarojini, 奈杜, 萨罗吉尼, 印度诗人和政治家, 304

Nansen, Fridtjof, 南森, 弗里特约夫, 挪威探险家和国务活动家: 难民工作, 263—264

Nasir al-Din, Shah of Persia, 纳赛尔丁, 波斯国王, 273—275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7, 8, 112, 119, 206, 316, 319, 393, 480

Naumann, Friedrich, 瑙曼, 弗里德里希, 德国牧师, 480

Nehru, Jawarharlal, 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 印度总理, 303, 306

Nehru, Motilal, 尼赫鲁, 莫蒂拉尔,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302, 304

Netherlands, 荷兰: 工业化, 10; 都市化, 12; 生活水平, 19; 选举权, 22—23, 513, 527; 社会保险, 45; 斯凯尔特阿, 225; 政党, 518, 537; 中立, 173—174, 700; 德国占领, 551—552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群岛, 40, 313—315, 318—320, 324, 395;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327

Neuilly, Treaty of (1919年), 纳伊条约, 222

Neurath, Baron Freiherr von, 牛赖特男爵, 冯, 德国外交部长, 498, 708, 714

Neutra, Richard J., 诺伊特拉, 里夏德, 奥地利建筑家, 682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 335

Newfoundland, 纽芬兰, 127, 374—375, 385; 放弃自治领地位, 388

New Guinea, 新几内亚, 179, 313, 319, 335, 343, 350, 394, 399, 707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 127

Newton, Sir Isaac, 牛顿爵士, 艾萨克, 英国物理学家, 87, 98

New Zealand, 新西兰

贸易和工业, 40, 390; 大萧条, 59; 关税, 374; 发展, 378

社会: 福利国家, 64; 毛利人, 378

自治领地位, 329, 371, 375, 385—386, 388, 392

太平洋岛屿, 178, 334, 350, 381, 399, 401; 南太平洋委员会, 392, 401; 国防, 美澳新安全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 401

Nicaragua, 尼加拉瓜, 558, 593—594, 606—607

Nicholas II, 尼古拉二世, 俄国沙皇, 125, 404, 406; 退位, 409, 412; 被刺, 442

Nicholas, grand duke, 尼古拉大公爵, 俄军总司令, 176

Nicholson, Ben, 尼科尔森, 本, 英国画家, 672

Nicolson, Sir Arthur (Baron Carnock), 尼科尔森爵士, 阿瑟 (卡诺克男爵), 英国外交家, 286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 莱因霍尔德, 美国神学家, 664

Niemöller, Martin, 尼默勒, 马丁, 德国牧师, 498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德国哲学家, 653, 657

Nigeria, 尼日利亚, 394—397, 399, 402

Nimitz, Chester, W., 尼米兹, 切斯特, 美国海军上将, 775, 791

Nitti, Francesco, 尼蒂, 弗朗切斯科, 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228

Norman, Montagu, (baron), 诺曼, 蒙塔古 (男爵), 英格兰银行总裁, 231

Norway, 挪威: 选举权, 22, 256; 教育, 27; 社会保险, 31, 45; 社会制度, 513, 518, 537; 世界大战: 第一次, 526; 第二次, 550—551, 746

Novibazar, 新巴扎尔区, 133, 144—16

Nyasaland, (Malawi), 尼亚萨兰 (马拉维), 375, 400, 402

Nyon Conference, 尼翁会议, 708

Oakeshott, Michael, 奥克肖特, 迈克尔, 英国哲学家, 653

Obregon Alvaro, 奥夫雷贡, 阿尔瓦罗, 墨西哥总统, 603

Obrénovich dynasty of Serbia, 塞尔维亚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 132

O' Casey, Sean, 奥卡西, 肖恩, 爱尔兰戏剧家, 638

O' Connor, Sir Richard, 奥康纳爵士, 理查德, 英国将军, 760—761

Oesada, Waidin Soedira, 胡索多, 哇希丁·苏迪罗,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 319

Ogden, C. K., 奥格登, 查尔斯·凯, 基本英语的创制者, 649

Okuma, Shigenobu, 大隈重信, 日本首相, 334

Olbrich, Joseph, 奥尔布里希, 约瑟夫, 德国建筑家, 677

Oman, Sir Charles, 奥曼爵士, 查尔斯, 英国历史学家, 654

O' Neill, Eugene, 奥尼尔, 尤金, 美国剧作家, 636, 639

Oraganisation Civile et Militaire (O.C.M.), 军民组织, 553

Organisation de R sistance de l' Armee, 军队抵抗组织, 554

Orlando, Vittorio, 奥兰多, 维托里奥, 意大利总理, 209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 英国作家, 617, 633—635

Osler, Sir William, 奥斯勒爵士, 威廉, 英国内科学家, 96

Oslo Convention (1931年), 奥斯陆协定, 537

Osmena, Sergio, 奥斯敏纳, 塞尔希奥, 菲律宾民族主义者, 317

Ottawa Conference (1932年), 渥太华会议, 61, 389

Otto, Rudolf, 奥托, 鲁道夫, 德国神学家, 662

Ourchy, Treaty of (1912年), 乌希条约, 285

Oud, J. J. P., 奥特, 雅可布斯·约翰内斯·彼得, 荷兰建筑家, 680

Owen, Wilfred, 欧文, 威尔弗雷德, 英国诗人, 621—622, 633

Ozenfant, Amedéc, 奥藏方, 阿梅代, 法国画家, 671

Pacific Islands, 太平洋岛屿, 334—335, 375; 委任统治地, 350

Pakistan, 巴基斯坦, 3; 与印度分治, 307, 312

Palèologue, Maurice, 帕莱奥洛克, 莫里斯, 法国外交家, 165

Palestine, 巴勒斯坦: 阿拉伯民族主义, 8;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0—201, 203, 211; 犹太人民族家园, 228, 289—290; 英国委任统治地, 293, 399;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 294—295; 有限制的移民, 295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123, 558—559, 577, 592—593, 607, 611, 802

Pan-Slav movement, 泛斯拉夫运动, 145—146

Papen, Franz von, 巴本, 弗兰茨·冯, 德国国务活动家: 总理, 240; 副总理, 494; 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说, 497; 奥地利, 501, 714; 与法国接近, 688

Papua, 巴布亚, 395, 399

Paraguay, 巴拉圭, 257;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4; 与玻利维亚的战争, 606, 608,

Paris, Treaties of, 巴黎条约, 134, 139

Park, Sir K., 帕克爵士, 英国空军少将, 757

Pascal, Blaise, 帕斯卡, 布莱斯, 法国作家, 657

Pašć, Nicola, 帕西奇, 尼古拉, 塞尔维亚国务活动家, 153, 157

Patterson, Pringle, 帕特森, 普林格尔, 苏格兰哲学家, 658

Patton, George S., 巴顿, 乔治, 美国将军, 786—789, 796

Paulus, Friedrich von, 保卢斯, 弗里德里希·冯, 德国将军, 507, 770, 775

Pavelić, Auton, 帕维利奇, 安东, 克罗地亚恐怖分子, 505

Pears, D.F., 皮尔斯, 英国哲学家, 655

Pearson, Karl, 毕尔生, 卡尔, 英国生物学家, 647

Peirce, Charles S., 皮尔斯, 查尔斯·桑德斯, 美国哲学家, 646, 649

Peking, 北京, 335, 369

Peña, Roque Sàenz, 培尼亚, 罗克·萨恩斯, 阿根廷总统, 590, 599

Penang, 槟榔屿, 320, 326

Perret, Auguste, 佩雷, 奥古斯特, 法国建筑家, 678

Perry, Olkver H., 佩里, 奥里弗, 美国分遣舰队司令, 556

Perón, Juan, 庇隆, 胡安, 阿根廷独裁者, 610

Pershing, John, 潘兴, 约翰, 美国将军, 203, 209

Perserikatan Kommunist India (P.K. I.),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319

Perserikatan Nasional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319

Persia, 波斯: 见Iran

Peru, 秘鲁: 与哥伦比亚的争端, 258;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5; 石油, 598; 独裁统治, 600; 与美国, 609; 阿普拉运动, 609; 重工业, 611

Pétain, Henri, 贝当, 亨利, 法国元帅: 第一次世界大战: 凡尔登, 188; 恢复士气, 195; 谨慎的政策, 196, 202;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 7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停战协定, 756; 维希政府, 548—549, 552, 805—806

Peter, King, of Yugoslavia, 彼得, 南斯拉夫国王, 505, 509

Pethick-Lawrence, F.W. (baron), 佩西克-劳伦斯(男爵), 312

Philippines, 菲律宾: 与美国, 47, 119, 313, 315, 317—318, 335, 355, 356, 556, 562, 577; 第二次世界大战, 581, 772—773, 791; 独立(1946年), 327

Phillimore, Baron (Sir William Frank), 菲利莫尔男爵(威廉·弗兰克爵士), 242

Phillips, M.A., 菲利普斯, 英国分析化学家, 96

Phillips, Sir Tom, 菲利普斯爵士, 汤姆, 英国海军上将, 773

Picasso, Pablo, 毕加索, 巴勃罗, 西班牙画家, 665—667, 669, 672—674

Pichon, Stephen, 毕勋, 斯特凡, 法国政治家, 214

Pilar, H. del, 比拉尔, 菲律宾民族主义者, 317

Pilsudski, Josef, 毕苏斯基, 约瑟夫, 波兰元帅, 443, 491, 690

Pius X, Pope, 庇护十世, 教皇, 483, 517

Pius XI, Pope, 庇护十一世, 教皇, 498

Planck, Max, 普朗克, 马克斯, 德国物理学家, 6, 98

Planning, economic, 计划经济, 37, 46, 48, 85—86; 第一次世界大战, 49—5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52—53, 64; 俄国, 66—69; 德国, 70—75; 比利时, 539

Plato, 柏拉图, 644, 654

Plekhanov, George,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 俄国, 革命家, 415

Plucker, Julius, 普吕克尔, 尤利乌斯, 德国数学家, 87

Podvoisky, N., 波德沃伊斯基, 尼,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8

Poelzig, Hans, 佩尔齐格, 汉斯, 德国建筑家, 678

Poincaré, Jules Henri, 普恩加来, 朱尔·亨利, 法国哲学家, 654

Poincaré, Raymond, 彭加勒, 雷蒙, 法国总统和总理, 146, 151, 215, 230, 517, 527, 533; 与俄国, 140—141, 144, 155, 157—158; 占领鲁尔区, 231—232

Poland, 波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7, 212, 406

重新建立, 219—220, 254, 490—491

与法国, 227

少数民族, 265, 490

与俄国: 战争(1920年), 222—223, 443—444; 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 689

第二次世界大战, 742—745

参见Germany条下“与波兰”项

Pollock, Jackson, 波洛克, 杰克逊, 美国画家, 673

Popper, Karl, 波佩尔, 卡尔, 奥裔英国哲学家, 654

Port Arthur, 旅顺, 113—114, 120, 125, 338, 345

Portsmouth, Treaty of (1905年), 朴茨茅斯条约, 126, 339, 559

Portugal, 葡萄牙: 殖民地, 10, 118, 151, 313; 教育, 27; 世界大战: 第一次, 202; 第二次, 505

Posen, 波森, 219

Pound, Sir Dudley, 庞德爵士, 达德利, 英国海军上将, 746

Pound, Ezra, 庞德, 埃兹拉, 美国诗人, 624

Pourtales, Count Friedrich von, 波尔塔莱斯伯爵, 弗里德里希·冯, 德国外交家, 160, 163

Price, H. H., 普赖斯, 英国哲学家, 653, 655

Prichard, H. A., 普里查德, 哈罗德·阿瑟, 英国哲学家, 645, 653

Princep, Gavriilo, 普林西普, 加甫利洛, 刺杀费迪南大公爵的凶手, 153

Prinetti, J., 普里内蒂, 意大利外交部长, 121

Prinkipo Proposal (1919年), 普林基波方案, 212

privy Council, Judicial Committee of,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374n., 384, 387

Proust, Marcel, 普鲁斯特, 马塞尔, 法国作家, 627

Prout, William, 普劳特, 威廉, 英国内科学家, 93—94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119, 556, 562, 584; 被美国兼并, 592

Quezon, Manuel L., 奎松, 曼努埃尔·路易斯, 菲律宾领导人, 317

Quine, M. V., 奎因, 英国哲学家, 655

Quisling, Vidkun, 吉斯林, 维德库恩, 挪威卖国贼, 537, 550

Radhakrishnan, Sir Sarvepalli, 拉达克里希南爵士, 萨尔维帕利, 印度哲学家, 308

Radić, Stiepan, 拉迪奇, 斯蒂芬, 克罗地亚领导人, 491

Raeder, Erich, 雷德尔, 埃里希, 德国海军上将, 758

Rainier, Prince of Monaco, 雷尼埃, 摩纳哥亲王, 34

Raman, Sir C.V., 拉曼爵士, 钱德拉塞哈拉·梵卡塔, 印度科学家, 308

Ramsay, Sir Bertram, 拉姆齐爵士, 伯特伦, 英国海军上将, 753

Ramsay, Sir, William, 拉姆齐爵士, 威廉, 英国科学家, 110

Ramsay, F.P., 拉姆齐, 英国数学家, 646, 649

Rance, Sir Hubert, 兰斯爵士, 休伯特, 缅甸总督, 325—326

Ransom, John C., 兰赛姆, 约翰·克劳, 美国评论家, 634

Rapallo Treaty (1922年), 拉巴洛条约, 236, 454, 463, 488

Rashdall, Hastings, 拉什戴尔, 黑斯廷斯, 英国神学家, 654, 658—659

Rasputin, Grigori, 拉斯普廷, 格里高里, 俄国僧侣, 404, 406; 被刺, 407

Rathenau, Walter, 拉特瑙, 瓦尔特, 德国工业家, 46, 49

Rawlinson, Sir Henry (baron), 罗林森爵士, 亨利(男爵), 英国将军, 189, 203

Read, Herbert, 里德, 赫伯特, 英国作家, 672

Reading, Mar qess of (Rufus Isaacs), 里丁侯爵(鲁弗斯·艾萨克斯), 印度总督, 300

Reed, Walter, 里德, 瓦尔特, 美国医生, 6, 101

Reichenau, Walter von, 赖歇瑙, 瓦尔特·冯, 德国陆军元帅, 743—744, 750

Reichenbach, Georg von, 赖辛巴赫, 格奥尔格·冯, 德国哲学家, 654

Reitzenstein, R., 赖岑施泰因, 里夏德, 德国神学家, 660

Reparations Commission (1921年), 赔偿委员会, 230; 道威斯计划 (1924年), 232; 杨格计划 (1928年), 240; 洛桑会议 (1932年), 688

Reynaud, Paul, 雷诺, 保罗, 法国总理, 549, 741, 745—746, 753, 756

Rhineland, 莱茵兰, 475; 法国的要求 (1919年), 215, 226—227; 占领, 230, 233; 撤离, 237—238, 493; 德国重新占领, 467, 543, 749; 重新武装, 500, 698—699

Rhodesia, 罗得西亚, 375, 395; 北罗得西亚, 400, 402; 南罗得西亚, 399

Ribbentrop, Joachin von, 里宾特罗甫, 乔基姆·冯, 德国外交部长, 498, 506, 696, 703—704, 714, 718, 724, 726—734, 798

Richards, I.A., 理查兹, 艾弗·阿姆斯特朗, 英国文学评论家, 649

Riga, 里加, 423; 里加和约 (1921年), 443

Rilke, Rainier, Maria, 里尔克, 赖纳·玛丽亚, 奥地利诗人, 625

Ritchie, Sir Neil, 里奇爵士, 尼尔, 英国将军, 765, 777—778

Riza Khan Shah of Persia, 礼萨·汗, 波斯国王, 273, 280—281

Rizal José, 黎萨尔, 何塞, 菲律宾民族主义领袖, 317

Robeck, Sir John de, 罗贝克爵士, 约翰·德, 英国海军上将, 182

Robertson, Sir William, 罗伯逊爵士, 威廉, 英国陆军元帅, 181, 184, 196—197

Roca-Runciman trade agreement (1933年), 罗卡-朗西曼贸易协定, 606

Rocque, Colonel de la, 德拉罗克上校, 法国“火十字”组织领导人, 541

Rodin, Auguste, 罗丹, 奥古斯特, 法国雕塑家, 673

Rodzianko, Mikhail, 罗将柯, 米哈伊尔, 俄国杜马主席, 409

Rohe, Mies van der, 罗埃, 米耶斯·范·德尔, 美国建筑家, 677, 680, 682

Röhm, Ernst, 罗姆, 恩斯特, 纳粹冲锋队首领, 497

Rokossovsky, Konstantin, 罗科索夫斯基, 康斯坦丁, 苏联将军, 776, 789

Rolland, Romain, 罗曼·罗兰, 法国作家, 522

Rommel, Erwin., 隆美尔, 埃尔温, 德国陆军元帅, 764—765, 771, 777—783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 美国总统(1933—1945年), 民主党人

第一届任期, 573; 第二届任期, 578; 第三届任期, 581; 第四届任期, 582; 世界经济会议(1933年), 62—63, 689

“睦邻”政策, 607; 孤立侵略国的演讲, 710; 建议召开会议(1938年), 712

第二次世界大战, 771, 796, 801—803, 805, 810—813; 与丘吉尔的关系, 771, 803—804; 与戴高乐的关系, 807—808; 大西洋宪章, 811—812; “无条件投降”, 786, 813; 德黑兰会议(1943年), 814—815; 雅尔达会议(1945年), 815; 逝世, 583, 790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美国总统(1901—1909年), 共和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9, 563

日俄战争, 126, 339, 559; 中美和南美, 592—593

生平, 556—557; “大棒政策”, 558

Root, Elihu, 鲁特, 伊莱休, 美国国务卿, 559, 561

Roselli, Carlo, 罗塞利, 卡洛, 意大利政治家, 541

Ross, Sir David, 罗斯爵士, 戴维, 英国学者, 653

Ross, Sir Ronald, 罗斯爵士, 罗纳德, 英国病理学家, 6, 101

Rosyth naval base, 罗赛斯海军基地, 128

Rouault, Georges, 鲁奥, 乔治, 法国画家, 668

Rousseau, Henri (Le Douanier), 卢梭, 亨利 (勒杜阿尼埃), 法国画家, 665, 669

Rouvier, Maurice, 鲁维埃, 莫里斯, 法国政治家, 129

Roxas, Manuel, 罗哈斯, 曼努埃尔, 菲律宾民族主义者, 317

Royce, Josiah, 罗伊斯, 乔赛亚, 美国哲学家, 646

Ruini, Antonio, 鲁迪尼, 安东尼奥, 意大利总理, 121

Ruhr: 鲁尔: 占领的威胁, 230; 占领, 231—232, 238, 690; 撤离, 250, 457; 希特勒与鲁尔, 740

Rumania, 罗马尼亚: 人口统计, 19; 经济政策, 65; 沙皇的访问, 153; 萨拉热窝事件, 154, 160; 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173, 186, 192—193; 占领布达佩斯 (1919年), 227; 小协约国, 227, 495, 691, 694, 709, 713; 少数民族, 265; 与苏俄, 468, 719; 石油, 481, 501—502; 农民党, 490; 接近德国, 699; 英法的保证, 729; 第二次世界大战, 788

Runciman, Walter (viscount), 朗西曼, 沃尔特 (子爵), 718—719

Rundstedt, Karl von, 伦斯塔德, 卡尔·冯, 德国陆军元帅, 743, 751, 754—755, 767—768

Rupprecht, Prince of Bavaria, 鲁普雷希, 巴伐利亚亲王, 175—176

Ruskin, John, 罗斯金, 约翰, 英国作家, 675

Russell, Bertrand (earl), 罗素, 伯特兰 (伯爵), 646—649, 654—655

Russia, 俄国

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7年), 2

革命 (1917年), 见第十四章目录

苏联, 见第十五章目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的进攻, 764, 766; 德国的推进, 766—768; 苏联的反攻和推进, 768—770, 775—776, 788—789; 苏联人在柏林, 790; 德国失败的原因, 769; 斯大林的战略, 795; 战时外交, 800—801, 810—811, 813—818

参见Austria, China,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Japan, Manchuria, Poland各条中“与俄国”项

Ruthenia, 罗塞尼亚, 489, 501

Rutherford, Ernest (baron), 卢瑟福, 欧内斯特 (男爵), 英国物理学家, 5, 91—92, 103

Rykov, Alexai, 李可夫, 阿列克塞,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9, 452, 460, 466

Ryle, Gilbert, 赖尔, 吉尔伯特, 英国哲学家, 651, 655—656

Saar basia, 萨尔盆地: 管理委员会, 267; 在克虏伯公司势力下, 475; 公民投票 (1935年), 694

St Germain-en-Laye, Treaty of (1919年), 圣日耳曼昂莱条约 (1919年), 222

Saint-Jean-de-Maurienne, Agreement of (1917年), 圣让德莫里昂协定, 228, 287

Sakhalin Island, 萨哈林 (库页), 岛, 126, 442

Salisbury, Marquess of (Gascoyne-Cecil), 索尔兹伯里侯爵
(盖斯科因-塞西尔), 英国首相, 117—118; 与德国, 122

Salmond, Sir John, 萨蒙德爵士, 约翰, 新西兰法学家, 381

Salonika, 萨洛尼卡, 144—145, 183, 201, 203—204, 271

Salvemini, Gaetano, 萨尔韦米尼, 加埃塔诺, 意大利历史学家, 484

Samoa, 萨摩亚: 被占领, 178, 343, 350; 新西兰委任统治地, 381, 399

Samsonov, Alexander, 萨姆索诺夫, 亚历山大, 俄国将军, 176—177

Sanders, Liman von, 赞德尔斯, 利曼·冯, 德国将军, 149—150

San Remo Conference (1920年), 圣雷莫会议, 228, 293

San Stefano, Treaty of (1878年), 圣斯特法诺条约, 480

Sant' Elia, 圣埃利亚, 意大利建筑家, 679, 680

Sarajevo, 萨拉热窝事件, 153, 157, 171, 219; 调查, 156

Sarawak, 沙捞越, 320

Sargent, Sir J.P., 萨金特爵士, 印度教育顾问, 307

Sarkar, Sir Jadunath, 萨尔卡爵士, 贾顿纳特, 印度历史学家, 308

Sarraut, Albert, 萨罗, 阿尔贝, 法国总理, 741

Sarraut, M., 萨罗, 法国作家, 8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保罗, 法国作家, 635, 639, 655—656

Sastri, Srinivasa, 沙斯特里, 斯里尼瓦萨, 印度民族主义者, 301

Sayyid Ahmed Khan,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印度穆斯林领导人, 306

Sazonov, Sergei D., 萨佐诺夫, 谢尔盖·季米特里耶维奇, 沙俄外交大臣, 143, 145, 148—150, 152, 158, 161—163, 165, 168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工业化,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 504; 政党(1914年前), 518; 大萧条, 536; 中立(1936年), 700, 709; 参见Denmark, Norway, Sweden各条

Schacht, Hjalmar, 沙赫特, 亚尔马尔, 德国银行家, 16, 72, 232, 234, 498, 501—502; 他的“新计划”, 74; 辞职, 499

Scheer, Reinhald von, 舍尔, 赖因哈德·冯, 德国海军上将, 192

Scheidemann, Philipp, 谢德曼, 菲利普, 德国总理, 219, 486

Scheldt, the, 斯凯尔特河, 225

Schleicher, Kurt von, 施莱歇, 库特·冯, 德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军人, 492—494, 497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施莱尔马赫, 弗里德里希, 德国神学家, 662

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 220

Schlich, Moritz, 施利希, 莫里茨, 奥地利哲学家, 649

Schlieffen, Count Alfred von, 史里芬伯爵, 阿尔弗雷德·冯, 普鲁士参谋军官: 他的计划, 166, 173—174, 179, 185

Schmidt-Rottluff, Kurt, 施密特-罗特卢夫, 库特, 德国画家, 668

Schmitt, Kurt, 施密特, 库特, 德国经济学家, 72

Schoen, Baron Wilhelm von, 舍恩男爵, 威廉·冯, 巴伐利亚驻柏林代表, 156, 159

Schuschnigg, Kurt von, 舒什尼格, 库特·冯, 奥地利总理, 500—502, 701, 714—715

Schwarzenberg family of Austria, 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家族, 479

Schweitzer, Albert, 施韦泽, 阿尔伯特, 德国神学家和医生, 661

Schwitters, Kurt, 施韦特斯, 库特, 德国画家, 670, 674

Scott, Robert, 斯科特, 罗伯特, 南极探险家, 95

Scutari, 斯库台, 147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 (SEA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401

Seddon, Richard John, 塞登, 理查德·约翰, 新西兰总理, 373

Seeckt, Hans von, 泽克特, 汉斯·冯, 德国将军, 187, 234—236; 中国, 692

Selim III, 谢里姆三世, 土耳其苏丹, 269

Serbia, 塞尔维亚: 与奥地利, 132—135, 145—149; 与保加利亚订立条约(1912年), 143—144; 巴尔干战争(1912年), 145—146; 与阿尔巴尼亚, 148—149; 门的内哥罗, 152; 萨拉热窝事件及其以后, 153—169;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7, 181, 191; 参见 Yugoslavia

Seyss-Inquart, Arthur von, 赛斯-英夸特, 阿图尔·冯: 在奥地利, 715; 在荷兰, 551

Shanghai, 上海, 363, 367, 686, 710

Shantung, 山东, 344—345, 350, 352, 356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乔治, 爱尔兰剧作家, 637

Sherrington, Sir Charles, 谢灵顿爵士, 查尔斯, 英国生理学家, 97

Shidehara, Kijuro, 币原喜重郎, 日本外务相, 367—368

Shi'ism, 什叶派, 274—275, 278

Shimonoseki, Treaty of (1895年), 马关条约, 113, 124

Shlyapnikov, G. A., 什利亚普尼科夫, 加·亚,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9

Shulgin, V.V., 叔尔根, 瓦·维, 俄国民族主义者, 406

Shuster, Morgan, 舒斯特, 摩根, 美国财政家, 280

Siam (Thailand), 暹罗 (泰国), 124, 127, 314, 320

Siberia, 西伯利亚, 349, 439, 442, 462, 464

Sickert, Walter, 西克特, 沃尔特, 英国画家, 672

Siegfried, André, 西格夫里德, 安德烈, 法国经济学家, 548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402

Sikorski, Wladyslaw, 西科尔斯基, 瓦迪斯瓦夫, 波兰总理, 503

Silesia, 西里西亚: 凡尔赛和约, 218—220, 230, 237; 少数民族, 476; 公民投票 (1921年), 490; 第二次世界大战, 508

Simon, Sir John (viscount), 西蒙爵士, 约翰 (子爵), 英国外交大臣, 576, 691; 与希特勒, 695, 697, 719

Simovitch, Tushan, 西莫维奇, 杜尚, 南斯拉夫将军, 762

Singapore, 新加坡, 313, 319, 375; 陷落, 309, 392, 765; 独立, 326—327

Sjahrir, Soetan, 沙里尔, 苏丹, 苏门答腊民族主义者, 324—325

Slim, Sir William, 斯利姆爵士, 威廉, 英国陆军元帅, 791

Slovakia, 斯洛伐克, 222, 477—478

Smith, Alfred E., 史密斯, 艾尔弗雷德·伊曼纽尔, 美国政治家, 569—570

Smith, J. A., 史密斯, 英国哲学家, 653

Smith, N. Kemp, 史密斯, 肯普, 英国哲学家, 654

Smuts, Jan Christiaan, 史末资, 扬·克里斯蒂安, 南非国务活动家, 218, 224, 373, 375, 381—382, 385; 国际联盟, 242, 260, 292; 战时内阁 (1917年), 522

Smyrna, 士麦拿, 228—229, 287

Snowden, Philip (viscount), 斯诺登, 菲利普 (子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534

Socrates, 苏格拉底, 644

Soekarno, Achmed, 苏加诺, 艾哈迈德,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 324—325

Solomon Islands, 所罗门群岛, 355

Sonnino, Baron Sidney, 松尼诺男爵, 西德尼, 意大利外交家, 209

Soong, T. V., 宋子文, 中国财政部长, 692

Sopron, 肖普朗, 222

Sorley, William, R., 索利, 威廉, 英国哲学家, 658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南太平洋委员会, 392, 401

Spa Confrence (1920年), 斯巴会议, 230, 234

Spaak, Paul H., 斯帕克, 保罗, 比利时国务活动家, 546

Spain, 西班牙

 殖民地, 10; 工业, 15; 人口统计, 19; 社会保险, 31

 与美国的战争, 28, 119, 317, 556, 580, 584, 592

 南北战争, 17, 467—468, 536, 653, 704, 708, 724

 第二次世界大战, 504—505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 (S. O. E.), 特种作战执行局, 553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英国哲学家, 646, 656

Spencer, Stanley, 斯宾塞, 斯坦利, 英国画家, 672

Spender, Stephen, 斯彭德, 斯蒂芬, 英国诗人, 633

Spengler, Oswald, 施本格勒, 奥斯瓦尔德, 德国哲学家, 658

Spiridonova, Maria, 斯皮里多诺娃, 玛丽亚, 俄国革命家, 415

Spitzeimberg, Baronin von, 施皮蔡姆贝格男爵夫人, 475

Stack, Sir Lee, 斯塔克爵士, 李, 英国外交家, 282

Stalin, Joseph (Djugashvili), 斯大林, 约瑟夫 (朱加施维里), 苏联独裁者; 流放回来 (1917年3月), 416; 列宁死后, 451—469; 妻子的死亡 (1932年), 463; 清洗, 709; 第二次世界大战, 800—818; 参见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507—508, 550

Stanley, Wendell M., 斯坦利, 温德尔, 英国科学家, 95

Starling, Ernest H., 斯塔林, 欧内斯特·亨利, 英国生理学家, 95

Stauffenberg, Count Claus von, 施陶芬贝格伯爵, 克劳斯·冯, 德国上校: 谋杀希特勒, 509

Stauning, Thorwald, 斯陶宁, 托瓦尔德, 丹麦社会民主党人, 551

Stavisky, Alexandre, 斯塔维斯基, 亚历山大, 法国财政家, 541, 693

Steinbeck, John, 斯坦贝克, 约翰, 美国作家, 634

Stevens, Wallace, 史蒂文斯, 华莱士, 美国诗人, 634

Stevenson, C.L., 史蒂文森, 英国哲学家, 651

Stimson, Henry L., 史汀生, 亨利·刘易斯, 美国国务卿, 576, 686

Stinnes, Hugo, 施廷内斯, 胡戈, 德国工业家, 230

Stolypin, Piotr Arkadevich, 斯托雷平,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 沙俄国务活动家, 410

Stone, Harlan F., 斯通, 哈伦·菲斯克,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579

Stout, George F., 斯托特, 乔治, 651

Stoyadinović, M., 斯托亚季诺维奇, 南斯拉夫首相, 723

Straits Settlements, 海峡殖民地, 124, 320

Strauss, Richard, 施特劳斯, 理查, 奥地利音乐家, 498

Strawson, P.F., 斯特劳森, 彼得·弗雷德里克, 英国哲学家, 655

Stresa (1935年), 斯特雷扎会议, 695

Stresemann, Gustav, 施特雷泽曼, 古斯塔夫, 德国外交大臣, 52

Strindberg, John A., 斯特林堡, 约翰·奥古斯特, 瑞典剧作家, 636

Strutt, John W. (Baron Rayleigh), 斯特拉特, 约翰·威廉(雷利男爵), 英国科学家, 94

Stumm-Halberg, Freiherr von, 施杜姆-哈贝格男爵, 冯, 德国工业家, 475

Sudan, 苏丹, 2, 282, 375

Sudetenland Germans, 苏台德的德意志人, 224, 499—501, 715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3, 234

Sukhomlinov, Vladimir, 苏霍姆利诺夫, 弗拉季米尔, 俄国将军, 150

Sullivan, Louis H., 沙利文, 路易斯, 美国建筑家, 676

Sumatra, 苏门答腊, 313, 319

Sun Yat-sen, 孙中山,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340, 366

Suzuki, Admiral Kautaro, 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 日本首相, 791—792

Sweden, 瑞典: 工业化, 15; 选举权, 22, 513, 518; 社会保险, 45; 关税, 45; 金本位, 57; 大萧条, 61—62, 536—537; “经济奇迹”, 64; 博福斯军火工厂, 236; 阿兰, 254; 政党, 518; 世界大战: 第一次, 526; 第二次, 550

Switzerland, 瑞士: 工业化, 10; 选举权, 22—23; 社会保险, 29, 45; 关税, 45;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3; 中立, 700

Sykes-Picot Agreement (1916年), 赛克斯-皮科协定, 211, 225, 228, 287, 289—290

Synge, John M., 沁孤, 约翰·米林顿, 爱尔兰剧作家, 638

Syria, 叙利亚, 228, 287—288, 290; 与法国, 292, 294, 296; 德鲁兹叛乱, 294; 与土耳其, 700

Szàlasi, F., 萨拉西, 匈牙利将军, 510

Szechwan, 四川, 340

Szögy' eny, Count, 佐基耶尼伯爵, 奥地利外交家, 154—155, 164

Sztojay, Doeme, 斯托亚伊, 多姆, 匈牙利外交家, 723

Taft, Robert A., 塔夫脱, 罗伯特·阿方索, 美国参议员, 581

Taft, William Howard, 塔夫脱, 威廉·霍华德, 美国总统 (1909—1913年), 共和党人, 559—560, 570, 593

Tagore, Abanindranath, 泰戈尔, 阿巴宁德拉那塔, 印度画家, 308

Tagore, Rabindranath, 泰戈尔, 罗宾德拉那塔, 印度诗人, 299, 307

Tahiti, 塔希提岛, 335

Takahashi, Korekiyo, 高桥是清, 日本首相, 357

Takamine, Jokichi, 高峰让吉, 化学家, 95

Tanganyika (Tanzania) , 坦噶尼喀 (坦桑尼亚) , 399, 400, 402

Tangier, 丹吉尔, 129

Tardieu, André, 塔迪厄, 安德烈, 法国总理, 540—541, 687

Tarski, Alfred, 塔斯基, 阿尔弗雷德, 波裔美国哲学家, 654

Tate, Allen, 塔特, 艾伦, 美国诗人, 634

Taut, Max, 陶特, 马克斯, 德国建筑家, 678

Taylor, A. E. , 泰勒, 艾尔弗雷德·爱德华, 英国哲学家, 653, 658—659

Tellini, Enrico, 泰利尼, 恩里科, 意大利将军, 254

Temple, William, 坦普尔, 威廉, 坎特伯雷大主教, 662

Tennant, F. R. , 坦南特, 英国哲学家, 654, 658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63

Terragni, Guiseppe, 泰拉尼, 圭塞佩, 意大利建筑家, 683

Thibaw, King of Burma, 锡袍, 缅甸国王, 314, 321

Thomas, Albert, 托马, 阿尔贝, 国际劳工组织理事, 50, 523

Thomas, Dylan, 托马斯, 迪伦, 威尔士诗人, 633—634

Thomas, George, 托马斯, 格奥尔·格, 德国将军, 73

Thomas, Edward, 托马斯, 爱德华, 英国诗人, 622

Thomas, James H. , 托马斯, 詹姆斯·亨利, 英国工党领导人, 534

Thomson, Sir Joseph J. , 汤姆生爵士, 约瑟夫·约翰, 英国物理学家, 5, 87, 91—92

Three Emperors' League, 三皇同盟, 132, 135

Thyssen, Fritz, 蒂森, 弗里茨, 德国工业家, 16

Tibet, 西藏, 131

Tientsin, 天津, 335

Tilak, Bal Gangadher, 提拉克, 巴尔·甘加达尔,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299, 301

Tilea, Virgil, 蒂莱亚, 维尔吉尔, 罗马尼亚外交家, 728

Tillich, Paul, 蒂利克, 保罗, 美国神学家, 664

Tirpitz, Alfred von, 提尔皮茨, 阿尔弗雷德·冯, 德国海军上将, 123, 137, 141, 154, 159, 168

Tiso, Fr., 蒂索男爵, 斯洛伐克领导人, 725

Tisza, István, 蒂萨, 伊斯特万, 匈牙利首相, 153

Tito (Josip Broz), 铁托 (约瑟普·布罗兹), 南斯拉夫总统, 507, 510

Titulescu, Nicolai, 蒂图列斯库, 尼古拉, 罗马尼亚外交大臣, 699

Togoland, 多哥, 179, 226, 399

Tomski, M., 托姆斯基, 米哈伊尔,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60

Tongking, 东京 (印度支那), 313, 315

Torroja, Eduardo, 托罗哈, 爱德华, 西班牙建筑家, 683

Townshend, Sir Charles, 汤森爵士, 查尔斯, 英国将军, 187

Toynbee, Arnold, 汤因比, 阿诺德, 英国历史学家, 658

Trade Unions, 工会: 英国, 514, 520, 522, 528, 532; 法国, 514, 516, 522, 528, 543, 554; 美国, 579

Transjordan, 外约旦, 295, 399

Transvaal, 德兰士瓦, 118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48, 173, 193, 212, 222, 481

Treichke, Heinrich von, 特赖奇克, 亨利希·冯, 德国历史学家, 152

Trenchard, Sir, Hugh (viscount), 特伦查德爵士, 休, 英国空军中将, 736

Trentino, 特兰提诺, 210, 485

Trianon, Treaty of (1919年), 特里亚农条约, 222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120, 186, 485

Trilling, Lionel, 特里林, 莱昂内尔, 美国文学评论家, 617

Trinidad, 特立尼达, 402

Tripartite Pact (1940年), 三国同盟条约, 504—505, 809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 112, 120—121, 154—155, 173, 517

Triple Entente, 三国协约, 139, 143, 151

Tripoli, 的黎波里, 121, 135

Trotsky, Léon (Bronstein), 托洛茨基, 列甫 (布龙施泰因),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18, 407, 413, 415, 422—423, 425—431; 军事人民委员, 438; 与斯大林, 452—455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 哈里, 美国总统 (1945—1953年), 民主党人, 582; 原子弹, 792; 波茨坦会议, 818

Tschirschky, H.L. von, 契尔斯基, 冯, 德国外交家, 152, 154—155, 163

Tseretelli, Irakli, 策烈铁里, 伊拉克利,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 415

Tsingtao, 青岛, 342, 344

Tuan Ch' i-jui, 段祺瑞, 中国国务总理, 346, 365

Tunisia, 突尼斯, 121, 286

Turati, Filippo, 屠拉梯, 菲利波, 意大利社会党人, 483

Turin, 都灵, 482

Turkey, 土耳其

人口, 12; 选举权, 22—23; 教育, 27

分裂, 20, 115, 152

青年土耳其党 (1876年), 270; 青年土耳其革命 (1908年), 133, 139, 271, 481; “行动军” (1909年), 27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3, 183—184, 200; 投降, 205; 巴黎和会 (1919年), 210—211; 塞夫勒和约 (1920年), 228—229

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下民族主义的兴起, 229; 洛桑条约 (1923年), 229, 291; 宣布成立共和国 (1921年), 291; 蒙特勒会议 (1936年), 700

参见 Balkan states, Greece 和 Austria,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各条“与土耳其”项下

Tydings-McDuffie Commonwealth Act (1934年), 泰丁斯—麦克达菲联邦法案, 327

Tyrol, South, 南蒂罗尔, 222, 236, 504

Tyrrell, George, 蒂勒尔, 乔治, 天主教现代主义运动分子, 660

Uganda, 乌干达, 375, 394—395, 399, 400, 402

Ukraine, 乌克兰, 435—436, 440, 446, 485, 490, 725

Ulster, 北爱尔兰, 159, 382, 521

Umberto II of Italy, 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二世, 482

Underhill, Evelyn, 昂德希尔, 伊夫林, 英国作家, 662

United Nations, The, 联合国, 3; 成立, 583, 812, 815—8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商业、工业和经济: 经济的发展, 36, 39, 41, 54, 62, 562—563; 托拉斯, 45—46, 557, 566; 大萧条, 59—60, 239, 534,

565, 570; 新政, 63—64, 73, 574—578; 欧洲贸易, 78—79; 关税, 240, 566, 571

劳工: 社会保险, 32; 失业, 577, 580; 瓦格纳法 (1935年), 579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潜艇的威胁, 191; 宣战, 200, 563; 作战行动, 203—204; 战后更加富裕, 211

巴黎和会: “十四点”, 209—210, 216; 参议院拒绝批准, 226, 564

二次大战之间: 孤立主义, 7, 211; 向德国贷款, 56, 233; 战债, 231; 凯洛格公约, 234, 252; 海军协定, 354—356; 中立法案 (现购自运), 580, 700—701; 罗斯福关于“孤立侵略国的演说”, 710; 租借法案, 581, 803; 经济战, 804—805; 大西洋宪章, 811—812; 维希, 805—806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日本的战争, 772—775, 808—810; 北非, 782—784, 791—793, 807—808;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 785—790; 同盟国协商中的支配地位, 795—797; 英美合作, 803; 戴高乐, 806—808; 德黑兰会议, 814—815;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815—816; 雅尔塔会议, 814, 816, 818; 联合国, 816—817; 波茨坦会议, 815, 817—818

参见 Americaa, Latin; Panamacanal, 和 Canada, China, Cuba, Great Britain, Japan, Mexioo Philippines各条“与美国”项下

Uriburu, José, 乌里武鲁, 何塞, 阿根廷将军, 601

Uruguay, 乌拉圭: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5; 牛肉工业, 597, 599

Uralsy, 乌拉尔, 440—442, 462

Utrecht, Treaty of (1713年), 乌得勒支条约, 127

Valèry, Paul, 瓦勒里, 保罗, 法国诗人, 625

Valois, G., 瓦卢瓦, 法国法西斯分子, 530

Vandenberg, Arthur H. , 范登堡, 阿瑟·亨德里克, 美国参议员, 581

Vandervelde, Emile, 王德威尔得, 埃米尔, 比利时社会主义者, 539, 546

Van Zeeland, Paul, 范泽兰, 保罗, 比利时经济学家, 75, 539, 546

Vargas, Getulio, 瓦加斯, 热图利奥, 巴西独裁者, 602

Vatican, The, 梵蒂冈, 483, 486, 498, 515

Vatutin, Nikolai, 瓦图丁, 尼古拉, 俄国将军, 776

Veblen, Thorstein, 凡勃伦, 索尔斯坦, 美国社会学家, 46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58; 边界纠纷, 584; 债务争端, 592—598, 611;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4; 石油, 597—598, 611, 独裁统治, 600

Vereeniging, Peace of (1902年), 费雷尼欣和约, 373

Versailles, Peace Settlement, 凡尔赛和平解决方案, 见第八章目录

Vietnam, 越南, 315, 325, 327; 分治, 328

Vigier E. Astier de la, 德拉维热里, 阿斯蒂埃, 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 553

Vilna, 维尔那(维尔纽斯), 223, 254, 491

Visconti Venosta, Marchese Emilio, 维斯孔蒂·韦诺斯塔, 马尔凯斯·埃米利奥, 意大利外交大臣, 121

Viviani, René, 维维亚尼, 勒内, 法国总理, 151, 155, 157, 521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348—349

Vlaminck, Maurice de, 弗拉芒克, 莫里斯·德, 法国野兽派画家, 666

Voysey, Charles, 沃伊齐, 查尔斯, 英国建筑家, 675

Wagner, Otto, 瓦格纳, 奥托, 德国建筑家, 677

Waismann, Friedrich, 魏斯曼, 弗里德里希, 哲学家, 654

Waldeck-Rousseau, Pierre, 瓦尔德克-卢梭, 皮埃尔, 法国总理, 515

Wallace, Henry A., 华莱士, 亨利·艾, 美国副总统, 582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维德, 中世纪德意志诗人, 236

Walton, Ernest, 沃尔顿, 欧内斯特, 英国科学家, 103

Wang Ching-wei, 汪精卫, 中国行政院长, 702

Ward, James, 沃德, 詹姆斯, 英国哲学家, 651

Ward, Sir Joseph, 沃德爵士, 约瑟夫, 新西兰总理, 379—380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1921—1922年), 华盛顿(海军)会议, 357, 685—686, 692, 710

Watt, James, 瓦特, 詹姆斯, 英国工程师, 108

Waugh, Evelyn, 沃, 伊夫林, 英国作家, 626, 630, 632—633

Wavell, Sir Archibald (earl), 韦维尔爵士, 阿奇博尔德(伯爵), 英国陆军元帅: 北非, 759—760, 764; 印度总督, 310—311

Webb, Clement C.J., 韦布, 克莱门特, 英国哲学家, 658

Webb, Philip, 韦布, 菲利普, 英国建筑家, 675

Webb, Sidney (Baron Passfield), 维伯, 西德尼(帕斯菲尔德男爵), 费边社会主义者, 528

Wegener, Alfred, 韦格纳, 阿尔弗雷德, 德国地球物理学家, 98

Wei-hai-wei, 威海卫, 114, 357

Welles, Sumner, 韦尔斯, 萨姆纳, 美国副国务卿, 802

Wells, Herbert G., 威尔斯, 赫伯特, 乔治, 英国作家, 620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375, 393, 396, 400—401

Westminster, Statute of (1931年), 威斯敏斯特法, 386—388, 394, 402

Weygand, Maxime, 魏刚, 马克西姆, 法国将军, 752, 755, 805, 806

Whitehead, Alfred N., 怀特海, 艾尔弗雷德·诺思, 英国哲学家, 646, 653

Wigforss, Ernst, 韦福斯, 恩斯特, 瑞典财政大臣, 65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德国皇帝: 免除俾斯麦的职务, 112; 访问土耳其, 115; 致克吕格斯的电报, 118, 120, 122; 访问丹吉尔 (1905年), 129; 与沙皇, 129—130; “炫耀武力”, 135; 巴尔干, 148; “黄祸”, 149; 萨拉热窝事件后支持奥地利, 154—163; 退位和流亡, 220, 486, 497, 798; 逝世, 485

Williams, Sir Owen, 威廉斯爵士, 欧文, 威尔士建筑家, 682

Williams, Tennessee, 威廉斯, 坦内西, 美国剧作家, 636, 639

Willkie, Wendell, 威尔基, 温德尔, 美国政治家, 581

Wilson, Cook, 威尔逊, 库克, 英国哲学家, 653

Wilson, Edmund, 威尔逊, 埃德蒙, 美国评论家, 617

Wilson, Sir Henry Maitland (baron), 威尔逊爵士, 亨利·梅特兰 (男爵), 英国陆军元帅, 761

Wilson, Sir Horace, 威尔逊爵士, 霍勒斯, 英国财政部官员, 721, 731—732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 美国总统 (1913—1921年), 民主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 563; “十四点”, 209—210, 299, 317, 563; 巴黎和会, 212—214, 301, 352—353; 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226, 564; 国际联盟, 212, 214, 242, 245—246, 564; “新自由”, 561—562; 倒台, 564; 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比较, 582; 墨西哥, 591; 拉丁美洲, 606

Wirth, Karl J., 维尔特, 卡尔, 约瑟夫, 德国总理, 230, 235—236

Wisdom, John, 威兹德姆, 约翰, 英国哲学家, 651—652, 655

Witte, Count Sergei, 维特伯爵, 谢尔盖, 沙皇大臣, 90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根施坦, 路德维希, 奥地利哲学家, 644, 647—649, 652, 655—656

Wohltat, Helmuth, 沃尔塔特, 赫尔穆特, 德国官员, 731—732

Woolf, Virginia, 伍尔夫, 弗吉尼亚, 英国作家, 624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重要性, 7, 37; 耗费和人力物力的紊乱, 54—55; 财政影响, 55—57; 直接后果, 521—527; 参见第六和第七章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起因, 7; 性质, 9; 参见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章

Wrangel, Count Peter V., 弗兰格尔伯爵, 彼得, 俄国将军, 443—444

Wright, Frank Lloyd, 赖特, 弗兰克·劳埃德, 美国建筑家, 676—677, 679, 682

Wright, Wilbur and Orville, 莱特, 威尔伯和奥维尔, 美国飞行家, 5, 101

Wyllie, Sir William Curzon, 怀利爵士, 威廉·柯曾, 印度军人, 298

Yagoda, H., 亚戈达,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66

Yamagata, Aritomo, 山县有朋, 日本国务活动家, 338

Yamamoto, 山本五十六, 日本海军大将, 772

Yeats, William Butler, 叶芝, 威廉·巴特勒, 爱尔兰诗人, 630, 641—643

Young Plan (1929年), 杨格计划, 60, 240, 567

Yüan Shih-k' ai, 袁世凯, 中国总统, 335, 340—341, 344, 346

Yudenich, G., 尤邓尼奇, 俄国将军, 443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组成, 222; 与意大利, 225, 490, 694; 小协约国, 227, 495, 501, 691, 694, 698—699, 709, 713; 议会政府的垮台, 491; 捷克的投降, 501; 三国同盟条约 (1940年), 504; 游击战, 507, 510

参见Serbia

Yussupov, Prince Felix, 尤苏波夫, 费利克斯, 俄国亲王, 407

Zaghlul, Sa' ad, 扎格卢尔, 萨阿德, 埃及华夫脱党领导人, 282

Zambia, 赞比亚, 402

Zanardelli, Giuseppe, 扎纳德利, 朱塞佩, 意大利总理, 482

Zanzibar, 桑给巴尔, 402

Zara, 扎拉, 225

Zelaya, Jose, 塞拉亚, 何塞, 尼加拉瓜独裁者, 593

Zeligowski, Luccan, 泽利戈夫斯基, 路切安, 波兰将军, 223, 254

Zhukov, Grigori, 朱可夫, 格里戈里, 苏联元帅, 768, 789—790

Zimmermann, Arthur, 齐默尔曼, 阿图尔, 德国外交副大臣, 138

Zimmerwald Conference (1915年),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524

Zinoviev, Gregory, 季诺维也夫, 格列戈里,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423, 426, 430, 432, 452—453, 455, 466; 他的信件, 457

Zola, Emile, 左拉, 埃米尔, 法国作家, 613